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中)

水陆洲 编辑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〇一二年九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第二篇(中) 目 录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4
第一节 大闹怀仁堂-----	4
第二节 批判两种反动思潮——“联动”的“血统论” 和遇罗克的“出身论”-----	223
第三节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468
第四节 内蒙军区的“二月黑风”-----	492
第五节 湖南省军区取缔“湘江风雷”-----	611
第六节 青海省军区大规模屠杀群众-----	732
第七节 成都军区的“二月镇反”事件-----	849
第八节 武汉军区解散武汉“工总”-----	954
第九节 南京军区镇压“倒许乱军”分子-----	1049

第十节 广州军区解散省革联	1422
第十一节 吉林省军区瓦解三大造反组织	1539
第十二节 福州军区打压造反派	1544
第十三节 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1562
第十四节 抓叛徒	1859
第十五节 武汉“七·二〇事件”	1929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2193
第一节 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2193
第二节 批判极左思潮	2240
第三节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531
第四节 内蒙革命委员会成立	2571
第五节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2738
第六节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919
第七节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035
第八节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402
第九节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901
第十节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922
第十一节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109
第十二节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247
第十三节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268
第十四节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685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1）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一节 大闹怀仁堂

本节资料

壹、文献资料

一、歪曲军委八条，镇压革命群众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石河子的指示
新疆自治区党委、人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

（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如有群众夺取部队武器，首先应该劝阻；不听，也应向天放枪以示警告。对武装反革命分子和过境窜入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敌人首先开枪时，才能自卫还击。

（二）新疆军区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值班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务。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在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区已经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该立即停止和劝阻，已经抓了的群众，必须立即释放。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元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徐向前与总后勤部系统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的谈话
〔被接见单位：二医大红色造反纵队代表，301护校红色造反大队代表，总后政干红色造反革命纵队军代表和总后机关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等共九名。陪同接见的，有李曼村同志以及全军文革的工作人员七至八人。〕

徐向前：你们什么时候到三座门的？（指全军文革办公室三座门三号）

群众：我们是29日去的。

徐向前：你们干劲可真大呀！你们都是那个组织的？我本应该找你们早一点谈一谈，因为事情很忙，顾不上，你们送上来了，这很好，你们是不是推举一、二个人把问题集中的讲一讲。接着代表们简单地介绍一些情况后，提出了问题。

群众：徐副主席，你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根据是什么？我们想听一下，你对邱会作的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要邱会作来开会也要不到。

徐向前：邱会作的问题，那天（25日）我说收回来，不是把我的看法收回，而是指收回派王峰去这件事，王峰是我叫他去的，是听说你们要开斗争邱会作的

大会, 派他去了解情况, 主要是想找造反派, 后来王峰找不到你们, 就先去找了张池明, 他去的目的是想开小会, 揭发批判邱会作的问题把问题弄清楚以后再开大会。

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今天我还是这样看, 尽管他有错误、缺点, 作了些错事, 说了错话, 但不是反革命, 这我们军委都了解他, 要看他的历史, 他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的, 是属于好人的, 你们要认清什么是敌人, 这两条路线斗争的锋芒, 是指向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也就是指向牛鬼蛇神和他们搞政变集团的那伙人。我们军队过去以彭德怀为首搞阴谋, 以及罗瑞卿、廖汉生、梁必业等, 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搞了许多坏东西, 刘志坚也对中央封锁消息, 不请示汇报, 搞了许多私货, 他搞独立王国, 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那时候刘少奇、邓小平是以中央名义, 下面只好执行, 如不执行不就是反党了吗? 如刘志坚搞三条黑指示, 下面的这些人都执行了, 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不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他们有的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对邱会作我们并没有看成是三反分子, 我以前是这样看, 现在这样看, 以后还是这样看, 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材料说明他是三反分子, 从你们揭发的材料来看, 都是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的问题。不能说明他是刘邓的人, 这些并不是我说的, 军委对这些干部还是了解的。

邱会作还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犯了严重错误, 正因为有错误, 才叫你们彻底批判, 彻底揭露。批成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军队内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 这个斗争很艰巨, 你们那天汇报四个多小时, 没有一条能说明他是三反分子, 是搞政变集团的人, 我并没有说他是三反分子。你们对邱会作彻底批判揭露斗争是你们的事, 我还是我的看法, 我是完全站在你们这边的, 赞成你们的彻底造反精神, 我不是保皇。你们总后的真正的牛鬼蛇神一定要揪出来, 不揪出来, 我们决不罢休。刀锋一定对准敌人, 你们那里哪些是坏人靠你们调查研究, 分析。这些人不同于好人犯错误, 我们军委几个副主席对邱会作有一致的评价, 过去后勤工作只抓业务, 不抓政治, 我们观察了好几年。没想到他在生活上这些问题引起很大公愤, 这些性质是严重的。但是他并没有站在彭德怀、罗瑞卿一边反对毛主席。而北京军区的廖汉生、杨勇这些人,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我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就是说拥护毛主席, 拥护林总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很正确的, 并不是说邱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邱会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厉害点, 对二医大红纵搞了许多小动作, 我就不同意, 邱会作说话有点不老实, 喜欢搞点两面手法。这些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不是敌我矛盾。我们都是为革命, 要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 搞刘邓司令部的人, 按两个阵营来说, 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这个意见我是同意的, 毫不含糊的。

这个我们军委常委都分析过, 也不是听了那一个人的汇报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政治上坏人我们不能保, 例如廖汉生我们就要打倒。郑维山就要保, 听说北京军区造反派把郑维山关起来, 他在接待红卫兵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 他们造反派把郑维山关起来, 我找不到, 我很激动, 一定要他们把郑维山放回来, 他们先不放, 要谈判后放出来。如这件事我与他们站在一起, (他们指造反派), 把郑维山打倒, 那我就与刘邓站在一起, 就犯了大的原则性错误。就炮打了无产阶级司

司令部里的人。郑维山这个问题可能比邱会作小一点，我上次说蒙在鼓里，是没有想到邱的问题那么严重，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生活作风等问题。我听了你们四个多小时汇报，没有一点说明他是刘、邓、彭、罗有串联，阴谋搞政变的，所以不能说邱会作是反革命修正分子。我收回王峰就是等于没有派。我认为邱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是可以烧的，但烧而不能焦，烧焦了就会犯错误，应按主席教导，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那天那么多人的大会我不能讲，今天少数几个人，我说心里话，这是军委的看法。他的身体的确有病，特别是武斗以后，他身体不太好了（群众插话：我们没有武斗，这完全是造谣诬蔑）你们去批判斗争。（群众：我们要人）没有他也可以批判，斗争嘛！我们要以大局为重，他肯定不是牛鬼蛇神，我可以保一万个险。对于这些高级干部，那个拥护，那个反对，我们心中大体上有个数，是了解的。所以我们要顾全大局，保他出来就是由于身体不好。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都亲自写了信，你们看了没有？（答：看了）叶群同志也表了态，他的态度也和我一样。我和你们讲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现在周总理和我保了，林副主席，伯达同志也保了。我们要以大局为重，斗争以小局服从大局，你们再不要向总理提意见，递条子啦，他们从井冈山开始，他们了解。

你们总后勤部，邱会作、张令彬，林总他们都了解，是熟悉的，谁拥护，谁反对，他们心里有底。我们没有就不好说话了。邱会作有严重的错误，但他不是他们刘、邓、彭、罗等反革命集团的人，看十六条和社论都是讲一小撮。我们要起来搞牛鬼蛇神。邱会作不是反革命。我们要保他，如果是牛鬼蛇神，我们不就成了保皇派了吗？那些人要推翻毛主席，你们后勤部都是有的，你们还没有揪出来（问：不是饶正锡吗？）你们去考虑嘛，何必问我，你们作一些调查研究，我们也作一些调查研究。我们和邱会作虽不经常在一起但经常开军委会，我们军委常委对每一个高级干部都有看法。你们去烧，去斗，我们不好说，但到一定的时候，我们要出来说话，总理也讲过，烧错了对我们不利。但是牛鬼蛇神放过了，对我们也不利。邱会作是烧而不焦的问题。我们到那里都是这个看法。你们不同意我的看法，要同我辩论，就是把我关起来，我也不改变。总后只了解邱会作的表面，好多同志不了解邱的本质，在大的方面作了很多好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但是他们不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都是代表，我要你们回去向大家作工作，讲清楚，我个人意见，对于邱会作已搞得差不多了，是否适可而止，这是我个人意见，不代表全军文革，但是这个看法是我个人。军委是不会保坏人的。你们看到保彭德怀、罗瑞卿等人吗？为什么要保邱会作，你们深思一下，现在到这时候了。从前没有给你们讲。你们不到三座门来也会找你们的。我们全军文革组织不健全，工作中有许多缺点，也是在阶级斗争中锻炼，与你们各战斗组织没有接触，希望你们经常提意见。使我们工作搞得好一点，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接着革命群众又提出了一些问题）

群众：刚才你讲了许多，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请举些例子，以便我们思考和说服群众。

徐向前：那么我问你们，你们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如何区别？

群众：就是看他是否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是否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群众：刘志坚是什么人？刘志坚包庇邱会作，紧急指示下达前，刘给邱予先打招呼，通风报信，是什么关系？

徐向前：刘志坚、罗瑞卿等人与邱的关系，都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但他的基本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我看到你们的材料都不能把他打成反革命，他

的那些错误都是思想认识问题。现在没有材料能说明邱与刘、邓、罗、梁有关系。他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军委看法。邱会作做后勤部长比任何一个后勤部长都好。过去后勤工作从不抓政治，单纯业务观点，他还突出一点政治。（有人问：29日给你送的材料你看了没有？）徐说：我还没有看。（有人说：我给读一段。接着读了一段三反言行和不突出政治的材料。）徐又说：这些问题都是工作上思想上的问题，你们不要断章取义。我们军委对这些同志都有评价，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那次你们大会上讲的材料，不能证明他不学毛著。今天我们讲过去后勤部不搞政治，邱搞了政治，他就是突出政治不够。今天革命主要是针对牛鬼蛇神，我不同意你们把他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今天还是这样讲，烧而不焦。军队里不突出政治的军事干部多得很，不是他一个人，但不能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拿不出一点根据来证明他与刘、邓、彭、罗、梁等人有关系，我们认为他在后勤工作上是有成绩的，我们体谅你们。我们并不保牛鬼蛇神。他与刘、邓、罗、梁不是一个山头的人，都是工作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斗廖汉生，你们应该清楚，如果邱会作是这样的人，我们早就把他揪出来了

群众：廖汉生这个人，不是群众揪出来的吗？

徐向前：你们可以这样认为，但我们心中有底，这并不是群众揪出来的。

群众：刘志坚你知道吗？

徐向前：刘志坚揪出来我感到很突然，他不仅有这些问题，他还被日本人俘虏过。

群众：被俘虏过的人怎么还能让他当这么大的干部？

徐向前：过去有些成了叛徒的人，也有留用下来的，刘志坚被俘虏过，邱会作就没有被俘虏过嘛。

群众：邱是会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徐向前：他可以吗？我们提倡文斗，不用武斗，（我们声明并没有武斗）就全军来讲，打人还是有的，对邱会作你们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看不要那样提。你们还说砸烂他的狗头，他不是狗嘛！怎么能砸烂狗头呢？我坚决支持你们揭发批判，但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要有分析，解放军要有纪律，要实事求是，要有革命性，科学性和纪律性。如果你们有材料，拿出一个定时炸弹来更好嘛！如果你们有大量事实，我可以承认错误，你们要顾全大局。邱会作不到会照样可以斗争，我肯定说：他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而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王峰你们不要揪他了。要揪就揪我，那些话是我让他说的，他的错误就是到总后不应该先到张池明那里去，而应该先到造反派那里去。

你们一定要注意以大局为重，你们想一想，林彪同志、伯达同志、周总理他们会不会保牛鬼蛇神？他们是不会的。

以上我讲的那些问题，如果你们不通，回去就不要给大家讲了，我是和你们商量的，交心的。

后来群众要求谈有关八条的问题，以及机关夺权等问题，徐副主席讲，今天就谈这一问题，别的就不提了，会议到此结束。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聂荣臻与国防科委所属各院校座谈纪要

〔开始，介绍代表。聂荣臻同志首先听取各院校代表反映情况。〕

（谈到北京工业学院情况时）

聂：“大方向一致的，都要联合起来。”

（谈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安都电讯工程学院时，介绍了成电两派情况。）

聂：“现在四川省混乱得很，有的部队有坏人，不能一样看待。有时部队弄不清楚，支持错了，因此，要求地方部队要了解情况。”

（又问了一下交大的情况）

聂：“交大两个组织观点一致，怎么不能合并呢？”

（交大回答：家里已合并）

聂：“交大夺权了吗？”

（交大回答：以前是“红革会”夺权，现在“红革会”与其他革命造反派矛盾很大，“红革会”犯了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大国沙文主义。）

聂：“怎么犯大国沙文主义？”

（交大回答：他们是较大的组织，他们到处插手，控制《解放日报》提出打倒托派，加剧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炮打张春桥，针对中央文革。）

聂：“他们是多大的组织？斗争是有反复的。上海交通恢复了吗？生产怎么样？学校夺权如何？”

（交大谈了一下上海的情况，下面问到南航情况，南航代表谈了一些南航的情况。）

聂：“中央反对山头主义。”

（南航谈到：……）

聂：“我不是保守，开除党籍慢一些，不要被事务性工作冲淡政治工作。”

（有人谈到：他也要夺，你也要夺。）

聂：“联合起来嘛！哪有一个人夺的呢？”

（谈到军事院校的军官如何打人等）

聂：“越是军官，越是不听话。”

（谈到哈军工问题）

聂：“‘八·八’和‘红旗军’搞到一块，你们主要是争取他们中的群众，要把受蒙蔽的群众和他们的头头分开。主要要做他们群众的工作，不要歧视他们。”

聂：“你们应该站在潘复生的一边。”

（我们谈：潘复生应该站在我们一边。）

聂：“一样嘛！潘在省委是受排斥的，李范五和一些人排斥他嘛！你们支持他嘛！”“哈市在开始时很乱，我们也很担心。你们哈市没有其他组织吗？”

（哈军工：没有其他组织了。西工大谈了一些情况，说：科委支持保守派。）

聂：“我们没有支持临委会，我们来查一查。”

（西工大：昨天付德林还说支持多数派。）

聂：“少数多数还要看谁是正确的。总是会有变化的。革命派总是由少数变成多数。”“西安的问题比较复杂，比较混乱。你们对霍士廉的看法怎样？”

（答：省委和西北局有矛盾。）

聂：“在军队一样么！霍在抗战时在山东。《红旗》十三期社论指的清楚。我没有和霍在一块工作过。不太了解。”

（同学说：李世英不是真革命，否则为什么自杀？）

聂：“陈总谈他原来受过害，对他有同情心，但希望在内部，夺权怎么样？解放军参加了吗？”

（西工大：没有反复，解放军支持了我们。）

（哈工大：目前哈市的运动情况有所变化，我们有些情况请示聂总，谈军委八条命令，给答复。）

聂：“可以派少数搞科委问题。”

（哈工大：科委的会议我们是否可以参加？）

聂：“公开的可以参加。我的意见是科委商讨一下，可以找几个单位商讨一下，有意见交换一下。”“关于毕业生分配，肯定也有争论，现在也没有决定，我的意见是实事求是。（因为有的学生家庭有困难）还可以讨论。”“关于经济主义，已经批了就算了，不要再追。”

（北航谈了一下夺权问题。聂又问了太机情况，南京炮工情况。谈到西军临委会时）

聂：“不是和稀泥，对于筹委会的人一定要区别对待，应该给予他们教育。帮助他们成为新人。”（谈到科委内部和院校串联问题。）“我们和你们是工作关系，不是什么串联，对于黑帮儿子，我们还要教育。父亲是黑帮，儿子不一定是黑帮。自来红思想是不对的。应该改造。应该教育，分配工作。可以提意见，（谈到材料问题。）关于材料问题，我们发给你们，（指八条命令以前）八条以后不能发。要同等待遇。现在解放军已介入，地方的问题也很复杂。为什么有的地方夺权成功一点，有的还不成功。现在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在台湾。苏修打留学生跟法西斯一样，我们要战备。新疆也很复杂。我们一方面要支持夺权，另一方面要搞战备。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一点不能忽视。所以军队上的要分批分期搞。支持左派问题上也很复杂，不能支持错的，在公安系统也要夺权，罗在公安部搞了好几年，我们也不放心。

在座谈中，聂荣臻同志指示纪要如下：

一、目前军队所处的地位很重要，解放军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还要做工作，因为派别很多，看不清楚，有时也会弄错了。

二、解放军一方面要支持左派，另一方面要加强战备，一点也不能疏忽。苏修对我们不断挑衅，新疆很乱，我们要提高警惕，因此，军事机关要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

三、公安系统在罗瑞卿手下管了十几年，我们对公安系统还不信任，你们夺权，我是支持的。

四、部队不能夺权。

五、要发展根据地，进行大联合，消灭山头主义，联合起来力量才大，要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大联合，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

六、夺权以后，还让原来那些人干（个别除外），你们只起监督作用，不要忙于事务工作。

七、夺权以后，在改的时候，你们可以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设立校务部，教务部。选出主任，采取集体领导，至于校长，不一定要了。

八、你们搞科委，是可以留一部分人的。不受军委命令的限制。

九、有些干部站在左派方面，你们要欢迎，因为你们不了解的情况，他们是可能了解的。

十、对于黑帮子女，一般不要清理，应该进行教育。争取一个算一个，看他是否与家庭划清界限，考虑将来分配工作。

十一、原毕业分配方案，可以重新分配，要群众重新讨论研究，对保守派也应分配，但要进行教育。

十二、许世友是一个老干部，人是好的，经过长征。只是性格有些特别。他

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

十三、红旗军是一个反动的组织，发展相当快，你们要多注意一些。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基地，并各总部：

兹将福建前线公告转发你们，望参照执行。

附：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最高指示

军队向前进 生产长一寸

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

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最近，正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实行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进行造谣诬蔑、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事机关，他们违背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规定，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两次冲进会场非法夺取大会领导权，破坏会场设备，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特别是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公布之后，三十日仍然有人明知故犯，乱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实行体罚，侮辱人格等等。公开违抗最高统帅毛主席批发的中央军委的命令，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应当受到纪律制裁。

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工具，是人民利益最忠实的保卫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忠实保卫者，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忠实保卫者，谁违抗毛主席的命令，谁就是反对毛主席！

我们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

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坚决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

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陈伯达接见第二军医大学和总后勤部机关代表的讲话

〔被接见的有：第二军医大学“红纵队”和总后机关革命造反派部分代表〕
伯达同志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向大家问好！并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很关心你们（会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陈伯达同志讲：你们在这里待了好几天，我们没来看你们很抱歉。希望大家回本单位去，在大街上不好。回本单位去，回学校去，有问题可以到那里商量。在这里吃不好睡不好，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安心。你们贴的大字报，标语我从这里过了几次了，我看了看。你们要准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要给改正的机会，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要回学校去，要本着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方针去做，我来转了几次了，我看了有些大字报后很难过，有些是黄色新闻，有些是低级趣味的，这不好。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你们贴这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干啥，我看了很难过，我叫别人把你们大字报贴掉了。

哪个同志有错误都可以尖锐的批评他。这些生活上的过程，不要搬到大街上来。贴到大街上来也弄不清楚，要给人家改正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错误，当然要给改正的机会。你们在这里想一想，这样做合适不合适，我想了很多天了，考虑你们的作法，这样做是否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每天都在搞我们的新闻。

看一个人要全面看，要看整个历史，不能只看一点不及其余，这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听了我的话是否难过？不要紧，在这里呆几夜也是有好处的，不过适可而止，你们吃过饭就回去，好不好？（众答：同意！）你们不同意可以写大字报，可以给我提意见，可以批评，我也是可以批评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非常重要的标志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我们自己都要改造，这样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要认为自己都是对的，认为自己完全是对的，这样就危险了，我说错了欢迎批评，你们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有的可以解决，就是有片面性。

我建议你们吃完饭就回去，有问题慢慢商量，你们在这里呆久了不好，有的人已经病了。我今天不是来答复问题，我是来请求大家早点回去休息。

众：首长对我们的关怀我们感谢，我们一定照办，但是徐副主席二月一日的讲话是不对的。

陈伯达同志说：徐副主席的讲话你们要辩论，有的人还要打倒。（众：我们没有要打倒）你们也不一定打倒邱会作同志，打倒了他就不能工作了。让邱会作在工作中改正错误。

众：他跑不了，他是三反分子。

伯达同志：我说先作结论不对。

众：我们有材料。

伯达同志：你们的大字报我大体上知道了（这时伯达同志听到了广播车的广播）我也不赞成这喇叭车在到处响。

伯达同志继续讲要帮助大家帮助别人，帮助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现在批评吧，我的话说完了，就欢迎你们批评、辩论。

众：邱会作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是否要批判？

伯达同志：你们可以继续写墙报、大字报，也可以写信送来。

众：我们批判他是否能到会？

伯达同志：他可以到会，也可以不到会。他身体不好，你们不要动不动就下命令，这样不对。

众：邱会作的病是假的，他欺骗了军委，假造了病历。

伯达同志：你们过半年就知道他有病没有，我检查没有检查出病来，但我要算是有病的。你们有揪邱会作的权力，徐向前有保邱会作的权力。

众：徐向前的讲话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伯达同志：你们批评是可以的，我也是保徐向前和邱会作的，思想对就保对了，思想错就保错了。我不赞成用这个“揪”字，我力气不够，我不赞成你们用这个“揪”字。斗刘志坚我也不赞成，什么喷气式，戴高帽子不好。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林彪同志早就讲了。就是要触及人们灵魂。我在街里看见一个汽车，上面站着一排戴高帽子的人，真难看，我不赞成，对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线要划清。犯错误不能当成反革命，当然也不能放过反革命，我们人民解放军是镇压反革命的，问题还没有闹清，就揪，揪出来就戴高帽子，这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八条命令？（众：赞成。）赞成还要看行动，回去好好睡几天，研究研究军委命令，毛主席（的）批示很好，你们回去想一想。

众：徐副主席的讲话划框框定调子是不对的。

伯达同志：我没有看见徐向前的讲话，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过程我是知道的，可以原谅你们。

众：你不了解邱，为什么保邱？

伯达同志：我是从很多同志知道他的，他在总后工作还不错，看一个人要看行动，看实践，不要有片面性。

众：邱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他欺上瞒下。

伯达同志：我是保护你们，也保护邱会作，不是没有原则的保，我保他的同时，也就是保护你们，你们这样呆下去不好。这是文化大革命……自我革命，我今天来看你们，我让一个学校把你们的大字报贴掉了。我不是发疯，我是提倡大字报的，你们要回去好好商量，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就不好了，那些大字报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很关心你们，我代表向你们问好（会场再次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期望，要很好地学习十六条，这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

众：徐向前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那我们就不能批判？

伯达同志：我没有给你们定这个调子。

随后伯达同志带领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详情见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专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告

1967.02.16；中发〔67〕国基建字 32 号

一、国务院工交各部直属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的试点，是经过党中央、军委、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是一项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重大措施。各试点单位，应积极做好整编试点工作。

二、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关于抓革命、促

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和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两次命令进行。由于基本建设工程兵不是作战部队，因此，除了进行正面教育以外，也应当在本单位党委领导下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三、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担负着国防和重点工程的施工任务，这是关系到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抢时间、争速度的大事情，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和随军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夺取革命和建设的双胜利，并注意保守国家机密。

四、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斗争锋芒应针对原来企业的领导干部，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刚从解放军调来的干部，应当安心工作，切实领会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精神，认真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对本身的缺点、错误，主动检查，接受群众批评，做出好样子。

五、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已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部队连以上的主要骨干又大部分来自解放军。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采取撤换调离的办法，一般不搞群众性的夺权。

六、由于基本建设工程兵的兵种机构和纵队领导机关尚未建立，国务院工交部门的有关各部必须加强对各支队、大队的领导，认真负责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

七、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坏人乘机攻击和诋毁解放军，挑拨兵工关系，破坏基本建设工程兵整编工作。

这一通告可在有关部门、地方和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各单位宣读、张贴。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对军队内部的夺权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由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那些要夺权，那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如果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的，要坚决夺回。夺权后，对于犯有错误的原有领导干部，应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对待。一棍子打死的风，万万不能长，一犯错误就一脚踢开，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不能把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人当作夺权的对象。

（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夺权，必须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实现最广泛、最紧密的大联合。必须是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和革命的群众三结合。必须是通过充分酝酿协商、条件成熟，经过上级批准后，才能夺权。不能搞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在夺权斗争中，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之间互相发生争执时,要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绝不能武斗。对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和个人,不能采取排斥、打击、压制和歧视。夺权单位,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保证既搞好文化大革命,又要完成各项任务。

(三)各学院学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这些分队的指挥权,应按军委二月八日的规定移交各驻地军区或部队。

(四)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它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群众对这些单位的党委和领导干部有意见,可以充分鸣放。党委成员个别不行的,个别撤换,大部分不行的,进行改组,但均须报请上级批准。在本规定之前,凡规定不应夺权的单位而夺了权的,可由上级机关、革命群众组织和本单位领导三方面协商解决,把权交回。

以上规定,望全军指战员、学院学校师生员工、文艺团体、医院和军事工厂的全体同志,切实遵照执行。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专职武装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问题的通知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在这种新形势下,公社、厂矿、院校等单位基层专职武装干部,要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要积极作好民兵工作,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此,对有关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规定如下:

一、公社、厂矿、院校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同地方干部一样,参加本单位、本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二、公社、厂矿、院校专职人民武装干部,负有组织民兵保卫文化大革命和战备任务。所有专职武装干部都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对民兵武器弹药,按上级规定,严加保管,不经上级军事机关批准,任何人不得动用。

中央军委 1967 年 2 月 17 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红旗漫卷福州市,凯歌响彻全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阶级斗争新阶段的今天,又一次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胜利消息,从福建海防前线传来了。

我们热情欢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我们热烈赞扬福建前线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出的新贡献!

我们衷心祝贺福建前线三军指战员,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新功勋!

正当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正当全军指战员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以实际行动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时刻,正当前线三军百倍警惕、加强战备的时刻,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拚命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伟大的

人民解放军，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工具，以达到保住他们所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维持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

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阶级敌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这绝不是偶然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在阶级斗争风暴中经过千锤百炼的强大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坚强后盾。上海、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和福建等地区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伟大的真理。阶级敌人对于忠于毛主席的人民军队，向来是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它们为了挽救即将灭亡的命运，必然要耍尽花招、玩弄阴谋，作垂死的挣扎。它们或者是乔装打扮成“左派”，以骗取军队的支持，镇压真正的革命群众；或者是颠倒是非，造谣惑众，挑动受蒙蔽的群众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或者是散布无政府主义思想，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去排斥一切，反对一切，打倒一切，把斗争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人民解放军。凡此种种伎俩，都是为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工具，破坏“三结合”的正确方针，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这真是蚍蜉撼大树，痴心梦想。它们得到的只能是灭亡！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阶级敌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正说明毛主席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正说明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全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做得对！做得好！我们要坚决地按照毛主席这个教导去做，坚决地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摆在我们面前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对每个指战员都是严峻的考验。我们要做到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一定要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洞察一切，明辨是非，区别真伪，分清敌我，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那一小撮反动的首恶分子，要坚决镇压，绝不留情。对那些受蒙骗的群众，要大力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和争取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军广大指战员要坚决遵循最高统帅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抓革命，促战备，百倍提高警惕，严守战斗岗位，随时准备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在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做出新的贡献，建立新的功勋。

（载《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聂荣臻对国防科委所属院校和国防科委八局同志的讲话

我想谈几个问题。

同志们到北京有相当时间了，你们是来造国防科委的反，对国防科委文化大革命起很大作用，国防科委文化大革命依靠科委群众和革命干部，他们是能把科委内的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当然院校师生起很大作用，这点感谢大家，以内因为主，加外部力量帮助，会搞得更好。你们回去以后，对科委有什么意见，可以随

时提出来,写信、写大字报,欢迎大家提意见。你们回去,可以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各校的革命师生,欢迎大家给科委提意见,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同志们响应国务院和军委命令,回本单位闹革命,这是很好的行动,总理早就讲过。工人,学生大部分回去了,北京联络站三千多单位都要回去,回本地区、本单位,大家应该贯彻这个命令。希望你们动员北京以外的同志收兵回来,在外面,很长时间了。当前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夺权斗争的阶段,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斗争第一是本地区、本单位,你们应该勇敢地站在最前线。

第三点,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很好,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从中国文化大革命看到真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命运,全世界人民把无限希望委托在毛主席身上和毛泽东思想上。毛泽东思想成为全世界革命最高的指导思想。全世界人民都在学习主席著作,和他们本国情况相结合,指导本国革命运动,现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很恐慌万状的,采取什么行动你们都清楚了。仇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采取一切手段,对留学生采取法西斯手段,证明他们是恐慌和虚弱的,苏联修正主义带头勾结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新的反华高潮,这就是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在我国边境加紧活动,不断挑衅,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在东南沿海蠢蠢欲动。国内地富反坏右纷纷出笼,斗争很尖锐,很复杂,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主席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们现在这样拚命反对我们,证明我们文化大革命做得好,做得对,但是,另一方面也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人民解放军当前任务还是十分重要,十分繁重的,有战备任务,又要支援左派夺权,又要支援左派巩固夺权的胜利,因此本身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军以下不搞“四大”,军以上在××地区现在我们还没动,那些军区要搞,还要军委批准。整个形势战备任务,决定怎样地进行,如何进行,因此,有的地方进行,有的地方没有进行。解放军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地指挥,同时必须保持严密、完整的指挥系统,不能有任何环节出现指挥脱节和瘫痪的现象。这是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有关的全局问题,解放军的指挥系统很有秩序,那就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如果指挥系统不灵,那文化大革命就不好搞。敌人是最希望我们军队中也出大乱子,地富反坏右主要矛头对准解放军,昨日人民日报登了福建前线的例子,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有代表性的,金门、马祖和台湾望得清清楚楚,地富反坏右利用这个时候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发表这一讲话,(指人民日报刊登韩先楚及魏金水的讲话——整理者)人民日报转载,是有代表性的,不是一般问题,这是带普遍性的现象,中央军委八条、七条都传达了没有。(答:都传达了)

第四点,最近中央、国务院、军委制订了很多文件,这些文件提出了很多十分重要的政策,这是总结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经验以后提出来的,有些是毛主席亲自修改,提出来的,有些人提出,有些中央文件是造假的,中央军委文件怎么会是造假的呢?这些文件并不会干扰文化大革命,相反,它推动和支持文化大革命,更有利更保证文化大革命的完成,这是最高指示,同志们要认真学习,不折不扣地执行。

军委七条规定,第一条说,凡是我军真正的革命同志,要坚决捍卫,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最后还说军委要求全体同志认清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充分认识我军在这场斗争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光荣任务,坚决执行上述规定,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这些文件虽是军委发的,但这些精神对地方也是适用的。

毛主席二月二日（八条命令规定后）有这样一段批示：此命令所印八条，亦将影响地方干部、群众，使之走向正轨。

第五点，同志们回去，搞本单位、本地区斗批改。有几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1）确实学习掌握林副主席提出来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性和纪律性。革命性是第一位，但如有革命性，没有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也革不好，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干劲要和科学精神相结合，要有严密组织性纪律性。（大意）所谓科学性，就是调查研究。

文化大革命进行八、九个月，现在有一个问题，如何分清敌我友。敌，我们打击的对象是什么？那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一切当权派是不是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是科学的，不是马列主义的，过去有人提出，除主席、林副主席不能怀疑，其他的都可以怀疑，这是没有根据的。要夺权，要夺谁的权？一切当权派是不是都要打倒？真有革命的领导干部没有，这就是当前所提出来的“三结合”问题。

有一些单位里，有的夺了权是假的，虚伪的，摸了一下就走了，现在真正夺了权的有黑龙江、山西、上海、青岛、贵州等。因为里面还有革命的领导干部，和当地群众的负责人和部队领导组成“三结合”。

没有“三结合”，这个夺权就比较困难，这是夺权中的具体问题。在北京有这样问题，你夺了权，他还不承认你。要有革命的领导干部，过去的当权派，如果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与他结合，因为他在过去有相当工作经验和广大群众的信任。

我们打击的对象究竟对不对，林副主席讲过，作战时要集中力量，五个指头同时按跳蚤，不如一个手指有力量，不要分散力量，我与四川几个同学谈，他们成立什么解放大西南××组织，你们首先把四川解决了好不好，现在四川就难办，七千多万人，是个大方向，你们先把四川问题搞好，就很了不起啦。你们要注意打击方向和重点，不要把战线分得很散，结果一个地方也没有搞好。

（2）军事机关有他的重要性，任务繁重，不要冲击，要看到这一点，这一点我还是要说一说。同学们，你们对解放军的认识，你们不是提出彭德怀、黄克诚，还有罗瑞卿、贺龙，但是军队还是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指挥的，这支部队可以说在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部队，经过几十年毛主席亲自培养，领导指挥成长起来，取得胜利的，这样的无产阶级军队在世界上是找不出来的，革命性是世界上找不出来的，因此我们要相信这一点。任何对解放军的侮辱，冲击，都是不允许的。冲击当然就要妨碍工作，冲击是不对的！过去的学生运动，不管是反帝，反军阀都要受到扼杀，我们参加了“五四运动”还有国民党机关枪扫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军队又是什么态度呢？军委命令，军队对群众的态度主要是很好解释党的政策，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有些地富反坏右就利用这一点就说解放军可欺，是纸老虎，要搞解放军。全国有一段时间要搞解放军，我们同学也有受蒙蔽的。昨天报纸登了福建前线的消息，就是地富反坏右把矛头对着解放军，革命造反派和解放军联合起来，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毛主席命令军队支持左派，保卫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还要冲呢？当然军队是有错误的，指出就可以立即改正，比如说支持错了，不支持他就好了，有很多地方说不清楚，真假包公不容易分出来，如果有支持错的，完全可以改，所以说军队所处的地位不同，支持迟了还要受责备，我看支持迟了一点不要紧，要弄清真正的左派。

有的组织知道你们是左派，但你们的同盟军搞错了，有的参加了《红旗军》，

到湖南还支持什么《湘江风雷》的。古人说：“观其人要观其友”又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革命运动中找同盟者，同志们要注意，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在政治上要划分界限，究竟同盟者对不对，所以军队发出命令支持左派不是简单的。

对冲击军事机关，违反八条命令是不能允许的，要纪律处分。防化兵部机关就是这样，抓了一些头头。他们煽动群众冲击，就抓了，这样的行动是必须采取的。对解放军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看出来谁是左派。要是真正的革命群众，有意见提出来了。可以马上纠正。你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可以派代表，不要冲……大家要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统帅下的军队是可以改正错误的，只要提出来。毛主席林副统帅对各军区的情况是很清楚的。是有数的。我是老兵了，虽然对一些地方不清楚，但我们对各军区还是清楚的。

(3) 夺权问题。“三结合”一定要搞，最近中央讲了很多，现在北京不是主要搞大联合吗？没有大联合就夺不了权。不要左派自己还争。要争取团结干部，要争取团结革命领导干部，和那些犯过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但又愿意改正的干部，同他们一起夺权，一起掌权，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非常错误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4) 学校本身问题，不少学校都夺权，要注意可能会有反复。在这时一定要重视学习古田会议的决议，一定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同学。对犯错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的，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允许人家有不同意见。要学会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志们在青年时代，我们也都经过这一时代。我现在年纪大些，可能你们会说我是“和稀泥”，同学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一棍子打死。主席对这个问题是反复讲的，是主席一贯的思想，前几天还在跟我们讲。谈到要团结大多数。很多人说“和稀泥”，特别是我们夺权了。你们当权的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去斗争，去达到新的团结，不要用压制的政策，压总是压而不服，在人民内部，在同学中允许人家有不同意见，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善于同不同意见的同志共事。党的七大说了这些，在遵义会议以前，在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统治下，在“左”倾机会主义统治下，王明（现在莫斯科，为修正主义写文章，还骂毛主席）博古……等等，当时红区损失 90%，但现在张闻天还是政治局委员，李立三犯过严重路线错误，也还是中央委员……不要怕党内有不同意见，有时有争论是有好处的。要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达到新的团结。还是这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所以一棍子打死就不好，总要留有余地，要给出路，否则人家就和你对立起来，可能同学们要说我是“和稀泥”，我还是要坚持这一点。这一点同学们还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我们夺了权，对保守派不能把人家当作反革命来搞，要教育团结他们，不要乱抓，搞得人家不敢回去，这不好。就是一批黑帮子女，还是要教育人家，不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们反对这个口号，但有些人的作法还是这样。老子英雄儿不一定是好汉，这没有遗传性。同样，老子坏蛋儿子不一定是混蛋，我们对地、富、反、坏、右还要改造他们呢！难道这些青年人还不能改造吗？一些高干子弟参加了“联动”，主席说：“干部要很好的教育子女，还是需要教育的，不要简单从事，最难的还是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现在我们一定要作好这一工作。”正象主席说的：“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行动。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5) 学校斗批改问题。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很好讲，因为我没经验，要靠全

体革命师生员工来努力，我们十七年来，在教育方面，是包下来的，包括有国民党的，北洋军阀的……都包下来的，那时我们只好接下来，我们没有教员，不能不要。统统赶跑，学校，科学院都搞不起来，当时包下来慢慢改造的。我们文化大革命还把那整个一套接下来？我们新的建设不多，还没有自己多少无产阶级的，苏联十月革命给我们经验不多，要靠我们自己来创造，指导思想，方针就是毛主席一贯的充分发动群众，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要把我们国防工业院校，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学校以教学为主，也学工、学农、军训、也搞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这跟刘少奇半工半读不同，所以主席讲，学校还是以教学为主，不是一个一半。也学点工、农、也军训。办学校当然要以教学为主。

在夺权告一段落后，一边主要抓革命，也可以搞教改，这个工程很大，我们没有这个经验，要多安排点时间，很多同学提过这个意见。各学校留的教师很多，将来一些教师可以出去，到生产科研部门，搞三、五年再回来，跟同学们一起搞教改，这是一种方法。究竟那些课程可以少，那些可以不要，就清楚了，现在有的教师，老的从国民党下来的，新的都从学校毕业，都是从本本到本本，很陈旧了，没有接触实际。这一点你们可以回去同家里的同学商量，把参加实践的一些教师跟在校教师换一换，当然同学们不能靠换几个教师能解决问题的，要靠群众，群众运动，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也不是短时期能完成的，已经夺了权的，可以一方面准备搞教改，没夺权的继续搞好夺权斗争。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校体制问题，暂时是维持现状，许多学校都要求军队编制，这还要等后期，现在决定不了，中央、国务院要统一安排，再考虑。就讲这几点意见。

（条子：保守派毕业生给不给毕业？）我同意毕业，和总理交换过意见，总理也同意，可以分配下去，应该分配下去。（其他条子略）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叶群陈伯达江青在总政治部所属单位座谈会上的谈话

〔十八日，叶群同志、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及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元帅、肖华同志与总政所属单位举行座谈。座谈会上叶群保了肖华同志。（一个版本说：座谈会是二十八日召开的）〕

叶群同志讲：肖华同志以前在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的，肖华同志是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并讲到，罗瑞卿整了七包（？）材料，罗瑞卿跳楼自杀时，把其它材料都烧光了，单把肖华同志的留下，转给彭真，彭真在被揭露出来以后，把几麻袋材料烧毁，也只留下关于肖华同志的材料。彭、罗、陆、杨都是很恨肖华同志的。在讲到罗荣恒时，叶群同志说：虽然他死了，但他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梁必业是罗荣恒的人，肖华同志是与他们做斗争的。还讲到，肖华同志过去搞了学习主席著作的经验，梁必业也不肯往下发，后林总很生气，才发下去。讲到肖华同志所犯错误时，叶群同志讲，肖华同志以前在大节上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在小节上有问题。并讲，肖华同志主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经滑到了危险的边缘，尤其在刘志坚被揪出来以后……肖华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火烧，但要允许他改正错误。

江青同志也讲，对肖华同志要烧而不焦。并说（可能是主席讲的）关于肖华的材料一律不准外传。

叶群同志讲道，几个老师每天只能工作二、三小时，都活不了几年了，大将与我们的身体都不好，身体好的又不跟我们，而上将又都在前线，选来选去只有肖华同志，并说，肖华不是降不降，而是应该升的问题。

肖华同志最后表态，表示要检讨，并不断革命。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中央军委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通知
各军区、军种、兵种、总部：

军委二月八日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下达后，外地来京人员已大部返回，但近日仍有一些人来京。为切实执行军委通知，特重申如下：

1、请各单位大力宣传军委通知精神，要求全体人员严格执行军委规定，不再外出，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有什么问题，应报请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解决，也可以写信向上级机关反映。

2、今后各单位来京和到外地去的人员，必须经军以上党委同意，报告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批准。未经批准外出的，各地接待站一律不予接待，各单位也不予报销差旅费。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五一研究所和机要密码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成都军区、大同办事处并告沈阳、南京、广州、兰州军区：

在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为确保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安全，贯彻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根据军委二月十一日“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和二月十六日“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精神，现对五一研究所（含实验工厂）和所有机要密码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做如下规定：

（一）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已经展开四大的单位，要说服群众恢复正面教育。已建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亦应说服他们解散。

（二）这些单位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已夺了权的要立即交回。某个领导人如有严重问题，不能参与领导，革命群众可以提出意见报上级党委审查处理。个别不行的，个别撤换，大部分不行的，进行改组。但均须由上级批准。

（三）一律不准外单位人员进入这些单位串连，本单位人员也不得到外单位串连。

以上规定立即向这些单位的全体人员进行传达，切实遵照执行。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八条命令的说明
1967.02.21；中发[67]61号

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中央还做以下几点说明：

（一）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中的有关规定，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

(二) 根据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要求，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联的大中学校师生、工厂职工、农民、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应当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本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三) 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包括保密的工矿企业、仓库和科研、设计单位在内），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四) 党中央各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财政部、各级银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经进驻这些机关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

(五) 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应以本机关、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进行夺权斗争，外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必要时可以协助，不得包办代替。

本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要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各总部：

党中央于二月廿日下达了《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文件。我军全体干部战士，要紧急动员起来，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积极协助驻地农村人民公社和各级领导干部，抓好春耕生产。这是一项时间性很强的紧迫任务，各级领导一定要十分重视，坚决抓好。

(一) 各地驻军要根据上述中央文件的精神，大力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意义，不违农时，迅速掀起春耕生产的高潮。

(二) 省军区、军分区和市、县武装部，要把抓好春耕生产作为目前工作的重点，协助当地（省、专、市、县）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开好春耕生产会议，具体安排春耕工作的落实。在某些原来干部已经不能工作的单位，军分区、市、县武装部以及驻军团以上的领导机关，要同当地的贫下中农组织协商，成立领导生产的班子，恢复生产组织，安排春耕生产，

(三) 各级人民武装部门，要号召全体民兵，成为春耕生产中的骨干，充分发挥民兵组织生产突击队的作用。

(四) 各地驻军要不失时机，以劳力、技术力量大力支援农村人民公社的春耕生产。

(五) 所有部队在助耕生产中，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四清运动中已被罢免的干部破坏农村文化大革命和破坏生产的活动，要协助地方专政机构和贫下中农组织，坚决给予打击。各单位接此通知后，应立即研究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上报。

二、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毛泽东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 有一些修改。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

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毛 泽 东 二月九日上午 二 林彪同志： 又改了一些，请酌定。此件应在总理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上讨论通过，然后发出。 毛 泽 东 二月九日下午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

各军区、各军兵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支持真正的（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已经遇到各种复杂情况，以至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如新疆、内蒙）。因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 （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派、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以逮捕他们的头目，但不要开枪。 （三）略 （四）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 （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 （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以上规定，大部分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进行宣传教育。 但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2）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送审的这个规定稿，毛泽东作过两次修改。本篇一写在第一次送审稿上；本篇二是写在第二次送审稿上；本篇三是经毛泽东两次修改后的中央军委规定稿，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给林彪写信说：“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我们把六条作为五条发出，第三条只在会议上念了一遍（发稿呈上），会后各军区请〔求〕将第三条单独发给他们再读一遍，以便掌握，我们已单独打印发给他们，说明看后收回（已经收回）。请报主席。”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叶剑英、陈毅、徐向前三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周恩来等人出席。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下午，中央的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讨论生产形势。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日程：（一）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二）讨论文件（包括运动中的政策规定等共六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林彪的一封信：

昨天碰头会议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上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

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群丑图》出笼后，上海、北京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林彪将此信送毛泽东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这些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同时附了此信。〕

主席：

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妥否，请予批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关键问题。

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思想，按照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党的干部政策，来正确地对待干部，才能建立夺权斗争的领导核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成立一个真正有领导能力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才能建立或健全领导文化革命和领导生产、业务工作的班子，把各项工作抓起来，把权真正掌起来。

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

经过半年多以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指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的是无产阶级。在党、政、军各部门，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

基本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巩固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国家里，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极其光辉的胜利。”

事实证明，这个基本估计是正确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必须从这个基本估计出发。

必须清醒地看到，确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门，篡夺了党政的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我们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敌人。不把他们打倒，我们国家就会变颜色，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从他们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谁要否认这一点，就是敌我不分，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犯有错误的干部，甚至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们绝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钻进干部队伍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估计得过多。如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干部，也是敌我不分，那是很危险的。

半年多以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猛烈的反击中，有一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是不好的，不能信赖的，应当一律打倒。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事实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都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对于当权派，当然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革命群众对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须坚决打倒，而对于无产阶级当权派，则应当坚决支持。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要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观点，就是抹煞十七年来的基本事实，就是否认十七年来的伟大成就。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故意混淆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界限，故意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团员，妄图达到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一切革命同志，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高度警惕，千万不要上当。

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

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

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

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而且能够成为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领导力量。这些领导干部应该密切联系群众，集中广大群众的智慧，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应当支持他们。

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过去，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也必须有大批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领导，才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战斗任务。

革命领导干部，政治上比较成熟，组织能力较强，斗争经验比较丰富，他们有为无产阶级国家掌权和管理业务的能力。经验证明，这些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了领导核心，他们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就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夺权斗争，就能较快地把权真正掌起来，把革命和生产真正抓起来，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反之，如果排斥革命领导干部，就不能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就不能把广大革命群众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有集中领导的、有统一指挥的革命队伍，而形成“群龙无首”，各自为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趁机捣乱。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夺不了权，也掌不了权。

党政机关的广大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广大干部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本单位夺权斗争的主要力量。他们最清楚本单位是不是应该夺权，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向谁夺权。他们熟悉本单位的各项工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熟悉干部和群众的情况。因而，需要夺权的单位，必须依靠他们，并团结和帮助那些觉悟还不高的干部，争取大多数。这样，才能真正把权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过来，才能把工作做好。外单位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应当相信他们，支持他们，给他们以必要的援助，而不应当排斥他们，到那里去包办代替。党政机关的夺权斗争，排斥本单位的革命干部，由外单位的群众组织去包办代替，是极端错误的，行不通的。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不分青红皂白，排斥带“长”字的干部，也是极端错误的，行不通的。

有的地方，少数人提出，“带‘长’字的靠边站”。这种提法，毫无阶级分析，它把群众和一切干部对立起来，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广大干部。这就背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基本精神，背离了斗争的大方向，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样做，在客观上是帮助阶级敌人的。不自觉地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迅速改正。如果固执己见，那是很危险的。革命干部，对于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改正，就应当欢迎，而绝不能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

毛主席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也必须实行革命干部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毛主席制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这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干部犯了错误，就一脚踢开，一棍子打死，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光辉的著作中指出：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我们党正因为实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所以才能够正确地开展思想斗争，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所以才能够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这是我们党的最宝贵的历史经验。今天，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决战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斗争中，一定要牢记这个经验。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毫不动摇地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要鼓励他们放下包袱，解除各种思想顾虑，站出来造反，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才能把无产阶级的敌人孤立起来，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否则，就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有失败的危险。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看到他们的错误，也要看到他们的成绩，要看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也要看他们长期的一贯的表现，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错误的一面，任意夸大，轻率地扣大帽子，这是一种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一切革命的同志，应当避免这种错误，改正这种错误。

对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志，也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一九四四年，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这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章中指出：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以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对于我们今天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对待干部问题，仍然是

适用的。

一般的犯路线错误的干部，同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种矛盾，必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对于这些干部，不能当做敌人，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应该给以检讨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只要他们作了检讨，改正了错误，站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仍然可以担任适当的领导工作。许多干部，还可以吸收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临时权力机构。

就是犯了很严重错误的干部，经过批判和斗争，在处理上也要宽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对于犯错误的各级干部和党团员，都是适用的，对于年轻的小将们，也是适用的。必须看到，革命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谁要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小将中，有些人犯了某些错误，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革命干部应该满怀热情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改正错误，发扬他们的长处，爱护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快地更健康地成长，而不应该单纯指责他们。如果有人借口我们党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而抓革命小将的小辫子，打击革命小将，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在这里，我们必须警惕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趁机进行反扑，进行阶级报复。我们必须保护革命小将，否则，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我们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的传统政策，才能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炉中彻底改造世界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各级干部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各级干部都要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自觉地、认真地、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不克服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绝不可能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错道路。

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最根本的区别，在当前，集中地表现在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上。

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问题，就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有的同志看不清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和它的深远意义，看不清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对新起的革命小将，对广大的革命群众，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种错误，必须纠正。

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一批人，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摆在这些干部面前的一个不能回避的根本问题，就是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一切过去为人民立过功劳的同志，绝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面睡觉，不能吃老本，而应当采取正确的态度，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运动的洪流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才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劳。

犯错误的干部，绝不能因为党对他们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而拒绝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拒绝接受群众对自己的批评，甚至掉转头来打击革命群众。如果那样，他们同党和群众矛盾的性质，就会逐步地起变化，从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使自己“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犯错误的干部，应该提高警惕，彻底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广大革命群众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应该看到革命小将的长处，不应该看轻他们。我们相信，新一代一定能够在毛泽东思想的培育下成长起来。这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希望。年青的革命小将，当然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他们缺乏斗争经验，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在革命发展的转折关头，往往认不清方向。在一些青年中，出现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归根到底，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年青的革命小将，也必须认真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斗争的痛苦过程。必须坚持不懈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这样才能逐渐地成熟起来，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不被历史的发展所淘汰。

正是年轻人，在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提出了打倒“私”字，提出了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同时，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这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最重大的问题，对年轻人是适用的，对老干部也同样适用的。

一切革命干部，一切要革命的、犯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干部，一切革命小将，广大的党团员，广大的革命群众，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第四期，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斗争中，我军担负着光荣任务。我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反击，展开了夺权斗争。敌人正在全线崩溃。形势好得很！但是，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自己的灭亡，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钻进党内的一小撮反动家伙，正在作垂死挣扎，他们纠集社会上的反动势力，进行疯狂反扑。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在与国内阶级敌人相呼应，掀起歇斯底里的反华浪潮，甚至进行军事挑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军肩负着十分重大的历史使命。

解放战争进入我军对蒋介石匪帮发起总反攻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伟大号召。今天，在我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举行总反击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努力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进一步加强组织纪律性，使我军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重要保证，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我军有着严格的革命纪律的光荣传统。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军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胜利，是和我军有着高度的革命纪律分不开的。我们要发扬这个光荣传统，提高全体指战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发挥我军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巨大威力。

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是以无产阶级政治为基础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军委制定的方针政策，就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纪律。在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斗争中，我们必须严格地、坚定不移地遵守这个最高纪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按照这个最高纪律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统一我们的意志，统一我们的行动。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主席亲自为我军制定的纪律，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起了伟大的作用。当前，在这场极其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大搏斗中，在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我军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才能加强我军战斗力，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更有力地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狠狠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

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中，我军一定要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保卫和执行“三结合”的正确方针，自觉地、模范地遵守无产阶级革命纪律，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光荣的历史使命。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社论）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总政治部关于工作组的干部回原单位不再作检查的规定

各总部、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

各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干部，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对这些错误，主要应由提出这条错误路线的人负责。同时，他们对自己的错误都已在工作单位作了比较深刻的检查。这些干部回去后，各单位不要再让他们作检查；他们在工作组期间的检查材料，也不列入档案。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江青陈伯达叶剑英在北京卫戍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在北京卫戍区干部大会上，首长对参加北京市革命师生军政训练的部队指战员讲了话。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有：陈伯达、康生、叶剑英、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郑维山、傅崇碧、叶群。〕

江青同志讲话

同志们好！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向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热烈鼓掌）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在过去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创立了不朽的功勋，现在，正在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立新的功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永远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中流砥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鼓掌）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贯彻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一夺权斗争正在胜利地进行，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在这个大好的形势下，把对革命师生短期军政训练的任务交给了同志们，这是党和毛主席对同志们的最大的信任，（热烈鼓掌，呼口号）是同志们的最大的光荣。（鼓掌）

毛主席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指示，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鼓掌）派军队干部、战士训练革命师生，是实现毛主席号召学习解放军的一个好办法。这样做，对加强革命师生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进一步走上正轨，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都有极大的好处。我们殷切希望同志们和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完成军政训练的任务。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鼓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革命军队，因为人民解放军是用毛泽东伟大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鼓掌）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军队，是具有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人民子弟兵，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同志们，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走到那儿，就把这种好传统，好作风带到那儿。

同志们，这次到大中学校去搞军政训练，要把人民解放军的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给广大的革命师生。

同志们，这次政治训练的中心内容就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定要使广大的师生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进一步懂得什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使那些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和迫害的革命师生和那些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欺骗和蒙蔽的师生，都把斗争的目标集中到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身上，集中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身上。要使广大师生正确地认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自觉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识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当前的表现形态，把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因为这个运动一直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在某些群众组织中出现了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极端民主化、个人主

义等错误倾向。这不是主流。这些错误倾向集中起来说，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这次到大中学校去也必然接触到这个思潮，你们的工作对象主要是还未定型的知识分子青少年，这个工作是艰巨的，同志们要有思想准备，同志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站稳立场，旗帜鲜明，坚决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热情、耐心地引导广大革命师生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他们的优点，例如他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可贵的，他们敢想、敢说、敢做。他们有些人是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的，他们敢于起来反抗，他们还很勇敢地跟一些反动组织，例如已被击溃的“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之流，例如目前还存在的“联动”这些反动组织，他们都进行过很勇敢的斗争。这些，同志们要充分地认识到要发扬他们勇敢的革命精神，同时，也要耐心地帮助他们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整顿思想作风，整顿组织，这样就能更好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更顺利地完成大中院校的斗、批、改。在座的不少的同志参加了在几个大中学校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试点工作。这次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正如毛主席说的，“训练一下和不训练不大一样”，学校的政治空气大为高涨，广大的革命师生对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更加深了。通过试点，你们已经取得了不少好经验，你们一定能够创造更多的好经验，你们一定能够依靠师生中的革命左派，团结广大群众，把这次军政训练，搞得更好。你们这次去搞军政训练，参加了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对同志们来说也是个锻炼自己和提高自己的一个好机会。希望同志们在实际斗争中时时刻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虚心向学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加强。我们相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人民解放军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地完成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鼓掌）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我向同志们致敬！（鼓掌）

祝你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在工作上取得新的大胜利，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新的面貌。（鼓掌）

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就是代表我们文革小组的意见。（鼓掌）

同志们，我们是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工作的，是努力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我们是毛主席的小小的小学生，同时是群众的小小的小学生，（鼓掌）也是你们的小学生。（鼓掌）我们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要向你们学习。（鼓掌）学习你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鼓掌）学习你们在工作中取得的新经验。（鼓掌）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愿意在你们帮助下，受一次军政训练。（热烈鼓掌）

毛主席告诉我们，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你们在军政训练的工作中，一方面帮助革命师生，另一方面也将向革命师生学习。（鼓掌）我想大家将进一步在军政训练工作中，善于分辨大是大非，分辨谁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谁是站在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而大大地提高无产

阶级的阶级觉悟，更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鼓掌）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鼓掌）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万岁！（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热烈鼓掌）

叶副主席的讲话

同志们：

我们都是军事干部，今天开会是为了要参加北京市的革命师生的几百个中学，几十个大学师生的军事政治训练。已经进行了一期了，时间不过是二十天，是毛主席看到了北京军区同北京卫戍区的二十天的革命师生的军政训练的总结，认为很好。所以，毛主席就把这个北京卫戍区的总结（大学中学的一起的总结）要通报全国，要全国的机关、学校每年都要按照这一次的办法来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军委已经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已经把指示的批语同北京卫戍区的二十天的训练的总结批发到全国去了。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短期的军政训练，这个开端是开得好的，是个良好的开端。现在第一期已经过去了，同志们就要进行第二期军政训练的工作。第二期究竟怎么搞法，刚才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对我们都有正确的同时也是明确的指示。这两位同志的讲话完全是代表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历来的指示的，是给同志们一个更落实的讲话，我是完全拥护。希望我们军队的同志坚决地到革命师生中去贯彻。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们在座的同志有些是军以下的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军以下是战斗单位，军、师、团、营、连是战略单位、战术单位、战斗的单位。随时准备着战斗，也是随时准备着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我们祖国的国防，不受帝、修、反任何的干扰。因此，军以下（军、师、团、营、连）的干部只是进行正面教育。所谓正面教育，就是把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间，自从十一中全会以来中央历次的指示，《红旗》杂志上面历次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间所发表的文章以及主席、军委一次二次所发出的命令、指令，联系到各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有益于我们的部队干部的一些教材，正面的教材，同时也是附带有一些少数的一些也是有益于我们的反面教材，以便教育我们的干部。虽然有些同志没有亲身参加到机关中间、学校中间、党政机关中间、各地机关中间、没有参加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没有直接批判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直接批判他们怎样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可是，可以使用运动中间所出现的一些教材结合我们自己本身的思想，部队自己本身的情况，来进行我们正面教育。所以，正面教育也应该是说，一方面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也保卫了我们自己的祖国国防，完成了自己方面的任务，也是保卫了军委所制订的（原讲话如此），保卫了一些单位，完成了你们的任务，同时，在这个中间，也受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上没有过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育。

另外一方面，是有的机关干部今天在座的自己亲身参加了的在机关中间进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出许多牛鬼蛇神，批判了许多错误的干部，自己亲自参加了斗争。这一批干部所积累的经验应该是更多了，自己体会主席、中央、文革同军委历次的一些指示，文件上发表的文章，对自己亲身参加过斗争的同志应该体会得更深，理解得更深，理解得比我们还深。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亲身参加过斗争的同志们，应该比我们认识得还彻底。这是一部分亲自参加过斗争的。

你们下去是要同广大革命师生在一块儿进行军训教育,而他们是什么呢?广大的师生是自己更加广泛的,全国各地,党政各机关、党政军民各机关都有他们的战绩,他们的丰功伟绩。在中国人民方面来说,在全世界人民方面来说,是创造着一种历史上没有见过的伟绩吧。就是全国院校师生组成的红卫兵为代表的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思想、中央的指示、军委的指示来进行的坚决的革命的行动。所以,他们集中回到学校里来的时候,经过一些经验的总结啊,开门整风啊,他们不仅是带着北京的经验,还有带着比如远处边疆的经验,黄河流域、珠江流域的经验,各地方的经验,沿海边沿的经验,他们的经验更多。他们一个小队一个小队,一个战斗队一个战斗队到处都去了,所以他们的经验更丰富。因此,给我们一个认识,同志们参加到实践里面去,进行军政的训练首先是我们军事干部首先要向他们革命师生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学他们进行八个月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得到的丰富的智慧。所以不是你们到革命师生里面去,就自己以老师自居,或者“你们是没有可学的,只是听我的”,当然同志们没有这个想法了。我们应该指出,首先要向他们学习,向他们小将们学习,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间的经验,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间的知识,学习他们怎样体会主席的思想,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这样,二十天的成绩中间有一大半是学生教给我们军事干部,革命师生们教育我们军事干部。还有一部分就是革命师生怎样从我们解放军干部身上学会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几年来把林副主席历年来不断指示我们的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要突出政治,要搞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怎样在部队中落实,怎样运用这个东西。所以,经过这一次二十天的第一期的教育,革命师生都知道了解放军怎样学毛著,所以他们就可以从我们解放军中间学习怎样学习毛主席思想的,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不是常讲嘛,身教重于言教吗?我们干部都知道这一句话嘛,你们到革命师生里边去,主要靠自己,以身作则,作出榜样,使革命师生看出受过严格的政治教育和军事纪律锻炼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它对自己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林副主席指示的落实这些东西。所以就变成相互学习,共同提高,而首先要向他们学。这是江青同志、伯达同志给同志们作正确的指示之后,我就是作这么个补充。更重要的,是同志们要从革命师生中间认识文化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有些什么贡献。假使说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度,十七年来的建设,在和平建设中间,在和平环境中间滋长了什么东西,那就是生长了一些危害的人物,滋长了一些走向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危险的思想,甚至有一些政策,这个政策已经被毛主席党中央批判过的了,如果我们不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国就会被谁,例如说刘少奇、邓小平这一流的人物,很不知不觉地就会把我们的国家带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同苏联现在一样,尽管你是四十多年的,近五十年的列宁主义的故乡还是一样走向修正主义。象苏联这个国家,苏联人民要重新解放,那就要进行革命,要进行武装斗争,那就不知要死多少人。革命必须流血,革命必须伤人。有些人多少年来,十七年来养尊处优,已经腐化了,已经腐朽了,已经蜕化了,还有许多叛变了。这些如果不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狠狠把它挖一挖,把它挖出来,那我们是非常危险的。伤了一些人不可免的,革命就是革命,就是要死伤,战斗就是要死人就是伤人的。如果一个都不死,一个不伤,还算什么革命呢?这个少数人的死伤,就可以获得全国绝大多数人避免修正主义这场灾害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行径,同志们应该坚决相信这一点,不要听信谣言蜚语。

这个胜利同中央文革直接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的工作,日日夜夜的奔忙是不能

够分离的。我们不是看见有些标语吗？（现在没有了，过去我们看到了）对中央文革不满，对中央文革有些反抗，是完全错误的。中央文革八个多月来的工作完全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来工作的，它的成绩是伟大的。希望我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坚定的认识。在毛主席、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

政治局的生活会整整开了二十多天。

陈毅对周恩来说：这一次，是党内最大的逼供信。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检查是假的，完全是逼出来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关于要注意反革命复辟现象的批语〔1〕

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毛泽东二月廿八日（根据手稿刊印）注释〔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二号上。这期《快报》登载了题为《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支持了谁？》的材料。材料说：“一月二十六日，北京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天津小站公社坨子地大队，支持以四清运动中下台干部为背景的‘燎原红色战斗队’抢走大队的大印，从此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实行反攻倒算。”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把这期《快报》报送毛泽东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革命群众要记者给主席反映情况。现在把材料送上，请顺便一阅。”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

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颁发后，得到全军广大革命同志的热烈拥护。军委决定暂停四大的单位，有的已经转入正面教育，并撤销了文化革命战斗组织。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广大革命群众按照保持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要求，也自动撤销或改组了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为了保持军队领导机关严密、完整的指挥体系，进一步贯彻军委指示，特决定：

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部队所属国防施工、基本建设、科研、设计等单位不准串连的通知

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并各省、市、自治区人委（均请所在军区转）：

为了保守军事机密，部队所属国防施工、基本建设、科研、设计单位和军队修理工厂、军需生产工厂，经中央文革同意，非军队人员一律不要去串连，已进去串连的，应立即退出。军队内部人员串连问题，按军委有关规定办理。这一通知，可在有关各单位内部张贴。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周恩来在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好久没有见了（鼓掌）。我应该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问你们好！（热烈鼓掌，呼口号）

同志们！我同意刚才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对肖华同志的错误检讨的估计，确实肖华同志刚才的检讨是诚恳的，是实事求是的。因为我们要求，领导同志作检讨，应该实事求是，合乎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把自己今天所认识到的错误，给大家很诚恳的说出来。不仅是而且首先教育自己、鞭策自己，同时，也可以帮助大家弄清，认识清楚一个问题。刚才肖华同志所检查的错误，只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运动中一小段时间的错误，可是为什么一小段时间错误，竟会引起这样轩然大波？几乎影响到我们解放军的许多方面，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在座的作政治工作的同志。好好的深刻的想一想。因为我们作的政治工作。一个领导同志在一小段时间内犯了一个错误，为什么要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据我看恐怕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有很多的人，并不完全清楚这个错误的真相，自己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听了一点传说，起来参加这个斗争，这个批判，这个揭露，有时候受一种说法蒙蔽，误听了一种传说，这样子参加进来的。

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是把这个问题，就是对肖华同志刚才检讨的这个错误，看得很大，用放大镜看，没有用全面看一个领导同志的整个历史。而确实有很多的同志，并不知道肖华同志三十多年来，近四十年了，所走过的漫长的一条革命历史的过程，这样子因小掉大的，只看眼前的一点，没有看到全部的历史。据我想恐怕这样的同志还不少。听说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还有第三方面，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方面，是有那么极少数的人别有用心，故意要利用这个问题，挑起一个大波浪，来把我们的解放军，首先把我们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抹黑，你看看，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都这个样子么，那政治工作就受影响了么。这样就影响解放军。这样，这一小撮的人，实际上就把这一个错误挑起来，实际上是反对解放军，反对我们林副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所以，我们应该很好的加以分析。而这种人最少数。是极少数，现在大（多）数人心里是透亮的。

现在，我们分析的时候，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发现这后一种人，这就是因

为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亲自发起、指挥、指导的。亲手制定十六条，亲自批准宣布聂元梓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号召全国，首先是青年学生，以后工人、农民。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运动，对于各方面说，都是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不仅我们跟毛主席走的人，广大的劳动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是跟着这样一个-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潮流往前进的。就是那些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外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者暗藏的一些特务，反革命分子，甚至于制定对抗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没有料到这次运动有这样大的威力。可是运动已经起来了。在学校中，首先是中学的红卫兵，冲向了社会，从北京冲向了全国，从城市冲到了农村。这样一起来以后，我们跟随毛主席的人，全世界革命的人民，是高兴得很，而反对毛主席这条革命路线的人怕得很。在这个当中，中国的革命群众可以敢这么做，毛主席所以能这么领导起来。当然因为有我们伟大的，英明的，有远见了领袖在。同时也是因为有我们的几万万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是当中还有一个力量，就是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热烈鼓掌）没有这个力量的保护，不可能设想我国能发动这样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国家有那一个敢于这（样）开展“四大”、“五大”一直到大串联？

所以，凡是敌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抗毛主席的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一定要来破坏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威信。敌人懂得，反对的方面懂得。怎样来集（中）目标，打击我们最有保证的人民解放军。这些人就企图抓住人民解放军的一点小小黑点点，一些人的个别错误，或者一段时间的错误，把它夸大，这样，这个事就出现了。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高潮正蓬蓬勃勃地高涨的时候，十月十一日正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红卫兵向全国大串联，正是无穷威力的时候，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我们解放军内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体院、工厂，都可以出来进行串联的时候，这个时候制造那么一个事件，就是说，要在我们伟大领袖和副帅接见了红卫兵以后，开一系列的群众大会，激动我们的军队的人，没有多少年经验的青年同志们，激动他们把斗争的矛头转错方向。就在那两次群众大会以后，斗争的矛头就转向国防部的大楼嘛，三座门嘛，三个总部嘛，各个军兵种嘛。然后转向各大军区嘛，省军区嘛。到现在的统计，差不多将近二十个单位，都是我们部队内部，把自己矛头对着自己的，你们想一想，如果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那么解放军自己都忙不过来了，那怎么能够抽出领导的力量，来保卫我们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呢？所以十一月以后，十一月、十二月、一月，这个时候最紧急的时期。那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看到这样一个形势，所以站出来，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一些老同志，尽管他们说错了一些话，那也要保护，就在这当中，有的人利用我们同志间内部的自己批评，加以歪曲，发造谣的传单，飞向全国。就这样把肖华同志这个问题影响到各军种、兵种、三个总部，以至到全国各大军区，这不是一种偶然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接触过很多部队的同志，来问我类似的问题，我看出了这个问题，这里头有原因，是有人在后头挑拨。我看现在大家冷静下来了，特别我们政治部的同志，应该更加冷静下来，你们会慢慢懂得，将来还会更多的懂得。这就是有人要把我们解放军搞乱。当然正如康生同志刚才说的，这是不可能的，这种阴谋是不能得逞的。（热烈鼓掌）

正这个时候，不仅中央文革站出来说话，而且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林彪同志，马上抓住这个问题，颁发了几个决定。一月二十三号的决定，是用中央、国务院、军委、文革小组的名义颁发的，是指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站出来支持

各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鼓掌），一月二十八日发布军委八条命令，接着又有七项规定也是军委的（鼓掌）。又接着二月十六号关于夺权的四项指示（鼓掌）。这四个文件，还加一个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那十二条决定。这五个文件一发表，对我们全军来说，清楚了。我只举一个例子，闹得最凶的地方之一新疆，那个地方不仅有军区，也同样有院校，有文艺团体。有工厂，有医院，而且有一百五十万人的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也闹起来了。而新疆自治区党委、军区、生产兵团负责人都在北京，我们远隔万里，但只要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军委命令一到，我们强大的军队，人民都一致拥护（热烈鼓掌呼口号）。你们想一想，这是我们主席崇高的威信，我们林副主席英明果断领导，问题解决了。所以这样的五个文件对全国来说，对全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包含你们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来说，使一场风波平息下来了。今天不是大家欢欣鼓舞对肖华同志的检讨，给予热烈的鼓掌声了嘛？如果在两个月前是什么样子？就是因为一小部份在那里挑拨，现在我们识破了。他们就是要把我们解放军队伍搞乱，这样来破坏整个文化大革命，破坏我们伟大领袖的威信，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得逞的。因为我们有绝对的信心，我们对我们的领袖，无限崇敬，无限热爱，无限信仰，相信只要主席一出来说话，中央文件一发表，军委文件一发表，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值得提出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对这些文件是作了很大贡献的。（鼓掌）

既然是一小撮人的挑动，不能成事，那么我谈第二个原因，错误究竟是错误，我们并不因为有人挑拨，我们就文过饰非，那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三十多年的老战士，肖华同志不会这样子，所以他今天站出来诚恳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根源，就是他刚才说的，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没有把无产阶级世界观巩固起来。在这个中间产生了动摇。当然这是一个时候的错误，从他整个历史来看，刚才说了，是光荣的。但这种错误，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如刚才康生同志所说的，我们大家都是在游泳中学游泳，斗争中学斗争，史无前例，没有经验，要靠摸索前进，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比如说拿十月，十一月两次体育场的接见来说，我也是不自觉的，一个电话一打，我也跑去参加了一下，恐怕在座的同志也看到，我巡视一番就走了。你没有弄清什么会议，你为什么出席？不像今天的会议作了这么多的准备。可见人的疏忽常常是难免的。当然我巡视一番就离场而走，也没有讲话，没有犯直接错误。但你总是间接支持了。如果年青的小将们贴我一张大字报，说你为什么要跑去？那如有道理呀！他可以问我，我也是准备他问我的。如果他问我，我就说我是个疏忽。可是你们这样一个负责的人，你不应该这样疏忽嘛。应该很认真嘛。他说这句话，就可以问倒我，我还得向他们承认错误（笑声鼓掌）。这说明人是容易不经心的时候被人家挑动的，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的。不要因为自己老了有经验，老马识途，老马有时也会不识途的，走错路的。肖华同志这个错误，当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是拿这个作比喻，人人都要引起警惕。

肖华同志是个红小鬼，参加红军的兴国老（江西话：兴国老表），到现在是三十七、八年了，一个人总要看他的全部历史。我跟肖华同志认识，拿在座的同志说跟聂荣臻同志差不多，当他很年青的时候当青年干事就认识他，一直到他成长，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的培养教育下，由青年干事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内战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作过贡献。在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反对反党集团斗争是积极的，特别是最后，反对彭、罗、陆、杨，反对刘邓反动路线，这些斗争是同志们记得很清楚的。肖华同志，如果说缺点的话，他很热情，但有时轻率一些。热情的方面我可以作证明嘛！不管他写的长征组诗，有的革命

的文学家有所批评，革命的音乐家觉得不够味，但是，拿我这个人来说，我很欣赏。他的长征组歌，我几乎能背能唱，而且我唱起来，不仅是欣赏而已，我是有感情，回忆到长征，歌颂我们伟大领袖，入云南的那一段，今天在座恐怕有同志会给我作证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句，那是得意之笔。肖华同志，在入云南那一首诗里，是把它描画出来了，这是要有真情实感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尽管他不是诗人，他在养病当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就这一点，是有充沛的革命感情的（热烈鼓掌）。大概因为前几个月肖华同志这一件事出来，连长征组歌有些人都不唱了，我还是唱的。因为这是代表一个时代。当然人都是有缺点的，肖华同志应该从这次教训中更虚心，更多地学习。要勤勤恳恳地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跟着林副主席学。因为肖华同志有很多有利条件，刚才伯达同志讲得很清楚，应该学得更好，这是我们大家期望他的。因为他今天领导我们全军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而我们全国的劳动人民都学解放军。如果政治工作象过去这两个月都瘫痪下去，我们大家都不安。所以肖华同志这一次检讨，我们在座的同志，总政治部的同志，我们应该兴奋起来，大家负起责任来，要把作为我们全军生命线的政治工作，做的更好，更出色。（热烈鼓掌）

第三个原因，我想这种人就更多了，因为是受蒙蔽，激于一时的义愤，出于一时的好心，觉得我是在闹革命，要把一切旧东西砸烂。当然，我们说的这个“砸”字也是一种象化的说法，不是真的提倡去砸呀！打呀！抢呀！现在“三个”的口号，可是不佳，叫做打、砸、抢，还有三个字叫抄、抓、揪。我看这六个字，我们都不要提倡，这是西安工人说得很对，他说：你打、打的是阶级兄弟，革命同学，你砸，砸的是国家财产，你抢，抢的是人民的东西。（鼓掌）现在居然有一种人，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我看西安的革命工人同志回答得最好，就是要反对打、砸、抢。

随便抄家也不行呀，肖华同志的家，就那么一股妖风，把他抄了么！抄总政治部主任的家，可以不经我们军委任何常委的同志知道，连阻拦也阻拦不住。

还有，揪人的事，把人揪去十多天，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前天我同我们国务院各院的造反派谈，有些副部长，揪去四十多天，我就不知道他的那里，找都找不到。军委的八项命令规定，这是不许可的，所以激于义愤是一回事，但激于义愤不能超过范围。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要怎么搞就怎么搞，完全不要领导，这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民主，毛主席说得很清楚，有民主，还有集中，有自由，还有纪律，毛主席语录上讲得很清楚，这里就重复了。那些受蒙蔽的，出于好意的同志，是可以谅解的，而且，他们大都是年青的同志，象院校的同学，文艺团体的一些青年人，医院的医生、护士、工勤人员，工厂的工人，他们不明白全部的真相，激于一时的义愤，受了一时的宣传，但是，对他们是可以解释得通的。陈伯达同志就做出了一个例子。三座门被包围了六、七天，硬是不走，伯达同志，单人匹马一个去了，一讲就通了，有些人不是不可以说服的。许多看不得的大字报，也就是说不是高水平的，象资产阶级贴的海报那样水平的大字报，陈伯达同志要求大家这帮助，把它盖掉，很快就盖掉了。最近还有一些不应该的漫画，什么群丑图啦，罚跪啦，这样的照片，登在小报上，马上就传到了世界各国，丑化了我们的党和国家。这也是不应该，不允许的。

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思想革命是高姿态的是向前进的，有些人要把我们拖向后退，我们就是要向这些人讲话，特别是那些青年的小将门，即不明真相，只凭着一时的热情，我们应该向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去责备他们。如果要责备，就责备我们老一辈，因为我们对他们教育不够，解释不够，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

你们是做政治工作的，应该要求通过你们去向他们做解释工作，宣传教育工作，说服工作。（鼓掌）

这样，我们把这三个原因作了分析，那么，我们解放军，毕竟还是解放军，我们政治工作者，毕竟还是政治工作者。我们能够继续担当起面临着的全面的阶级斗争的新阶级-夺权斗争的阶段的阶段的任务。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这一点小的波浪，在无产文化大革命中，并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么一次教训，对于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对于你们大家，对于我个人，都很有益处。把任何一件事情作为教训来看，作为经验总结来看，就会成为一种动力。推动我们前进。这样我们就会把工作比以前做得更好。证明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实是无穷威力的。确实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缔造的，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伟大的、英勇的军队。（热烈鼓掌、呼口号）

我们的政治工作，也是我们伟大领袖在古田会议所指出的，是军队的灵魂，是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相信，在这个检讨会以后，会使我们全军的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做得比以前更好更加有力量。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批发铁道兵党委转发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

1967. 03. 08；中发 [67] 84 号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

现将铁道兵党委的报告、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发给你们。

中央认为：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很重要的问题，并且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渡口驻军支持左派的经验，是值得全国全军学习的，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都应参照执行。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毛泽东三月七日

转发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

工指、铁指、各师、各独立团并报军委：

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以铁五师为主组成）在支持革命左派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具体做法很好，特转发供参考。

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首先要从政治上支持。也就是要帮助他们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依靠革命左派自己的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希各部队认真检查过去一个阶段的支左工作，及时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铁道兵党委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

附：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原电

我们来到渡口后，左派欢欣鼓舞，斗志大涨。也出现一种不正常心理，把斗争的胜利寄托在部队点头表态上，把部队视为各种事件的“当然裁判”，凡事必“请示报告”，有的甚至公开表示“解放军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种心理最集中的表现在动辄就请部队派兵去支持。一月来，上百个单位在双方争辩到对峙时都曾“紧急来电”，请求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或镇压“反革命”，特别是在左

派处于少数，右派制造白色恐怖的地方，请求部队派兵支持的更频繁。对此，我们从未轻易出动，必要时只派个别人前往呼吁双方坚持文斗。

我们认为，部队只能在确实判明是反革命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才能出动坚决镇压。如在两派激烈争辩时轻易出动，哪怕是少量部队，也危害很大：

一、容易掩盖矛盾，使观点不能充分暴露，推迟左派大联合的进程。

二、弄不好要被坏人利用，使部分群众误认为部队镇压工人革命运动，挑起一些事端。

三、还有可能助长了保守派的威风，挫伤革命造反派的锐气。保守派往往自持成分好、历史清除，认不清大方向，把革命造反派的某些过激行动，统统说成是“牛鬼蛇神出笼了。”保守派还最容易误认为部队是他们当然的后盾，在斗争激烈时，便强烈要求出兵支持。

有鉴于此，我们把支持革命左派的斗争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下功夫到群众斗争中去识别真正的革命左派。在对革命左派的支持上，又坚持首先从政治上思想上帮助他们成长壮大，具体做法是：

1、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主席的教导去寻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使这场伟大斗争真正变成普及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我们认为，在这场阶级大搏斗中，激烈的争辩和少数人出来捣乱，是必然现象和好事情，这场大风大浪正是产生真正革命左派的必然条件。只要我们适时的为群众送去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针对他们提出的各种要解决的问题，组织学习有关语录，启发他们开动机器，任何复杂纷纭事，都可以迎刃而解。也才能使他们在斗争中尝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甜头，建立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组织，才是真正的革命派，才是取得夺权胜利决定的力量。这一点，既是支左夺权斗争的关键，也是支左掌权的关键。

2、帮助他们抓好活思想，做好团结教育内部工作，使之成为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有战斗力的坚强集体。多数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原是普通工人，对抓好人的活思想认识不足，多是注重研究一些斗争的方法问题，往往在大风浪中便出现组织畸形发展的现象。我们便组织他们学习“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总结自己在激烈斗争中组织涣散的教训。现在，有的左派已重视这一环节，能根据斗争形式，大抓内部的活思想，他们在处于少数，甚至右派制造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轰不垮，压不倒，抓不散，在激烈尖锐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

3、帮助他们紧跟上头，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斗争的大方向。及时把全国的新形势、新经验和上级的政策精神，向他们传达，与他们同学共议，澄清糊涂认识，把自己的行动变成更自觉，使千头万绪的问题上到两条路线斗争这条纲上来，不被个别事件所激怒，及时修正错误，使一切行动都能将革命造反精神和强烈的党的政策精神统一起来。

以上报告当否，请示。

三、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到三月下旬，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介绍了毛主席 1966 年 5 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 2 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讲话。

康生手里拿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陈伯达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刚才康老介绍了毛主席 1966 年 5 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 2 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讲话，从理论上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必要，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极其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继续社会主义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的斗争，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那是很危险的，资本主义就要复辟。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1962 年刮单干风，就是刘少奇为首，邓小平赞成的。他们的那一套，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1964 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搞的那一套，表面上“左”，实际上右。现在揭发了很多材料，像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搞的四清，原来是假的，让坏人专了政。1964 年毛主席有意指出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否认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说社教运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当时，毛主席就反对刘少奇的错误意见，说：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封建社会就有清官脏官的矛盾，这种提法，不是阶级分析，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刘少奇 1962 年提倡单干，分田到组，包产到户。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了新的重大发展。

1964 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落到我们手里，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砍了，他就不让发了。他说：“这个报告修改后，有些地方还要斟酌。”这个报告讲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很强调，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他说的蹲点方法去做，按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去做，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支部书记，不能当干部。他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改组干部队伍，改组党中央。他说的蹲点，是王光美式的蹲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蹲点，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蹲点是毛主席提倡的，不是刘少奇提倡的。毛主席提倡的蹲点是阶级分析的蹲点，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是调查研究的蹲点。刘少奇抓住蹲点这个问题，就是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刘少奇的这种观点，不是 1964 年开始的，也不是 1962 年开始的。大家知道，日本投降以后，他就提出有名的“理论”和平民主新阶段，提出共产党员要当“红色买办”，就是要当帝国主义的买办，当帝国主义的走狗，那时候刘少奇是完全悲观的，对中国革命是绝望的。对中国的前途是绝望的。他要投奔另一条充当美国买办的道路。刘少奇的这些东西被毛主席否定了，毛主席对他进行了教育，要他执行七大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全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完全违背刘少奇的意志的。

中国革命胜利后，1949 年他在天津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的家里，对资本家说，资本家要大胆剥削，工人欢迎你们剥削，他说现在必须提倡剥削、欢迎剥削，

还说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不能生活。1952 年山西有一个合作化问题的文件，刘少奇批了，认为合作化是不行的。最近发现了一个材料，1950 年 1 月他在东北提出了一个意见，说搞变工队不行，不能发展到集体经济。大家知道，毛主席在抗日时期，大大提倡变工队，变工队是发展合作集体经济的前身，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刘少奇在东北否定变工队，提倡“三马一犁”。他认为“三马一犁”发展到 80%，才能搞变工队。没有“三马一犁”变工队就没有基础。要让单干放任自流，放任资本主义发展。

七大以后，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胜利，敢不敢胜利，胜利后走到那里去。一条是要胜利，敢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不要胜利、不敢胜利，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刘少奇的资本主义道路。

1965 年二十三条公布以后，彭真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召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他的一个讲话，我们做了注解，发给大家看看。彭真在东北实行的是国民党路线、美帝国主义的路线，是保护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林彪同志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彭真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东北取得了胜利，这是很重大的关键问题。后来，彭真在东北站不住脚了，回到华北。那时正在土改，刘少奇要他在华北搞土改，他搞“搬石头”，就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历史上可以查明，不是在文字上，而是在行动上，刘少奇、彭真都是这样搞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实际上不是一切，而是打倒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肯定地主、资产阶级。

从历史上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就容易看得懂。

彭真在去年二月搞的一个汇报提纲，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提纲，要在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革无产阶级的命。在同一时期，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搞了另外一个文件，无产阶级的文件。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文件，一个代表资产阶级，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后来中央发表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执笔的。否定了彭真的二月提纲。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不反映到党中央来。过去是若隐若现，现在变的非常明显，非常尖锐的了。

社会主义越发展，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一定要反抗。1965 年，彭真一边讲二十三条，一边反二十三条，经过一年多一点时间，他就抛出了这个汇报提纲，赤裸裸地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这个提纲，否定了彭真在中央在北京的地位，站不住了。中央的通知是五月份发出的，六月北京的形势就急转直下，一天等于二十年，时间过得很快，事情很多，这是一个大革命。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世界历史上没有过的大革命，广泛地动员了群众，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大规模斗争。在这样一场斗争中，八个多月大家都经历过来了，有好多问题事先没有想到，好多问题我也没有想到。但是如果想一想革命历史，想一想中国革命的历史，世界革命的历史，任何一次大革命，很多事情都是出现很迅速，是事先不能预料的。在座的同志有些问题一下子不能马上理解，是不奇怪的。

回想一下，运动开始的时候，以刘邓为代表，由他们主持，派了大量的工作组，到各地方，各部门，各机关，各学校，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中讲的，他们利用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下去，打下去。六月以后，大量的大字报在各学校、工厂、机关出现了。以刘邓为代表的一伙人显得非常恐慌，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

这些大字报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毛主席说过，大字报这个武器，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但是大量的，主流，是革命群众贴大字报揭发了工作中的问题。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本是平常的事情。但在刘邓他们看来，这是“反革命”，他们把很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对于真正反革命的大字报，如李世英反毛主席的大字报，刘少奇却说要保护，要保护少数。（康生同志：当时有两种少数，一种是毛主席保护革命派的少数，一种是刘少奇保护反革命的少数。）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毛主席回到北京，开始扭转局面。把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看一看，很多是革命的，是好人。这并不是说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是好人，没有一个坏人。而是说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打成“反革命”，这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两个月了，有些同志对于两条路线斗争、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看到《红旗》十三期社论后，还觉得不能理解。我看是由于没有好好考虑，没有好好想一想。

昨天讲了刘少奇的问题，下面再把邓小平的问题讲一下。邓小平每次开会，基本节目就是打牌，每次开会都要打。有人找他谈话，他没时间，还要陪他打牌，成了很大的负担。不陪不行，他是总书记，陪了又耽误时间。很多同志有议论，总书记带头打牌，每天都打，还打通宵。我想打牌这个风气传下去很不好。影响到小孩子也打牌，打扑克。下面地、县也打，各系统，各部门也打，形成了一个风气，在乡下不是一般地打牌，有的还赌钱，总书记打牌，下面不好说，就传开了，这决不是小事，作为总书记，有这样的作风，影响很不好。有时间为什么不找干部谈话，学习毛主席著作，接见群众。他找肖华谈话，不好好谈，谈几句就算了。（肖华同志：每次我去汇报情况，都是三言两语，卡住时间，所以我到他那里汇报最容易。）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到他的大的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同志给邓小平提意见，跟他商量，不派工作组，他就打回去，说一定要派工作组，哪里也要派，气势很凶，很嚣张。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有两个点，清华大学，师大附中，就是王光美、刘涛搞的。他还批评工作组，说你们没有蹲点，我蹲了点。这就是刘少奇的路线。邓小平蹲点的地方，也是靠他的儿子、女儿，根本不接近群众。当然小孩子的意见也是可以听的，但只是一方面，他只听这一方面，不听广大群众的。邓小平有个女儿，有个时期，读谭立夫的文章比读毛主席语录还起劲。她在美术学院说，谭立夫的发言，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对我们有利，我们已经翻印了五百本，广播了四次，最重要的话是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当然，对高干子弟要一分为二，大多数是好的，也并不是说高干子弟不能掌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要去操纵。我曾经说过，高干子弟不要去插手，去操纵。邓小平的女儿说的话，是谭立夫那里来的。流传最广的话，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联动”的根本纲领。他们无法无天，蛮干，不顾党纪国法，同志们看了“八一”学校，最早是主席建议中央文革的同志去看看，康生同志看了，建议到会的同志也去看看。一看很清楚，那是“联动”的堡垒。这个学校，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他们可能是少数人，威胁一批人跟他们走。好好的学校破坏成这样子，是刘邓路线造成的恶果。刘少奇同邓小平是有个人矛盾的，但在大的方面站在一个立场上，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共同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4年冬至1965年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二十三条时，毛主席批评刘少奇，又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批评邓小平搞独立王国。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就走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去了，这次会议以后，刘少

奇、邓小平的个人矛盾就抛到后边去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同性就突出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俩人立场一致，路线一致。在座的同志可能听说过，也可能没听说过，在紧急关头，邓小平是一个打手，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还是让那些人站在群众头上，采取高压政策呢？邓小平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坚持派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立场一致。为什么说刘、邓路线，就是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镇压群众运动。

毛主席回北京后，改变了局面。但刘邓路线还有市场。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说，这个决议（十六条）可能执行，也可能不执行。毛主席有伟大预见。十一中全会以后，路线问题是不是解决了？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这个时候毛主席看到这种情况，提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让大家进一步把问题弄清楚。毛主席有个讲话，林彪同志有个很长的讲话，会议快结束时，主席又单独找各大区的同志们谈了一下，说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负责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区别对待，要让我们去掉刘邓路线的包袱，不要把制定反动路线的人，同那些执行的，不自觉执行的，执行了又改了的混在一起。下面的同志是执行了的，但好多同志是不自觉执行的。一说明这个问题，大多数同志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事实说明中央工作会议是有成效的，很多同志同刘邓路线划清了界限。但是还有些同志不是很容易划清界限的。有的人，是一小撮人，还要为刘邓路线服务，阎红彦就是这样，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他并没有受谁的逼迫，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昆明有一批学生冲昆明军区，目的是找阎红彦辩论，这时我们出于好意，打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问他，你是阎红彦吗？他说是。因为我普通话说得不好，一边说，一边请汪东兴同志代讲，请他出来见一见群众，不用怕，没有什么问题。就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与昆明学生从来不认识，没通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往来，我们只是根据大局来判断，任何一个领导人，只要站出来与群众谈心，什么问题都好办，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根据毛主席思想，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的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精神。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他说是我们逼死他，给我们安了好大的罪名。他写了遗书，不交给别人，交给他老婆。他不请我们原谅，不请群众原谅，请他老婆原谅。这次简报上有的同志问，阎红彦是怎么死的？我说了这几句话，汪东兴同志还在，这怎么能说逼他去死。这是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向无产阶级屈服，不愿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屈服，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思想慢慢地通了，逐步转变过来了。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有很多同志是有感性认识的，接近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很容易接受。如果完全没有感性认识，不接近群众，就不容易通。我们也接触过很多同志，他们一与群众见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坐办公室，接触的就是那么几个人。我们本来是从群众中来的，现在与群众接触，却变成很困难的事情。这个困难好像很困难，其实只要一个钟头就能解决，只要见群众，就可以弄清楚，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待反革命，那要镇压，如果对反革命宽容放纵，就失掉无产阶级的原则、失掉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但是应当相信，只要我们同群众接触，反革命就更容易暴露出来了，就更孤立了，抓他就容易了。不然，反革命混在群众中，他抓住我们不接见群众这一点，拨弄是非、颠倒黑白，制造事件。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是有很大成绩的。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许多同志进

一步接触群众,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接着来了个工人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来主要是在学校,社会上扫四旧,横扫牛鬼蛇神。工人起来了,各地方都起来了,最集中表现在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愿意接近工人群众,把他们哄到北京来,给他们路费,大搞经济主义,想收买工人,想这样把工人运动压下去。上海的革命工人不理这一套,他们发现这是用经济主义来腐蚀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他们就发起了新的斗争,发展成为向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行夺权的斗争。这个时候,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介入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这样不但把一般的群众运动提高了一步,而且使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同群众相结合,使斗争走上了新的阶段。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解放军打出来的,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七大讲过,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是在人民解放军保护下进行,人民解放军公开站出来,公开支持革命左派,对文化大革命,对夺权斗争有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

夺权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康生同志传达的,毛主席同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志两次谈话所说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就可能渗透到上层建筑中来,渗透到政权中来,形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党中央一直讲就是一小撮。人民解放军要巩固、要壮大,一定要清除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相互联系的。

在全国解放前,在夺权以前,毛主席就说过:“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刚才讲的阎红彦就是一个例子。十七年的经验证明,有些人就是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他们失掉了政权,失掉了生产资料,他们就千方百计让他们的后代钻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量宣传剥削阶级的思想,大量保存剥削阶级腐蚀人民的文化。这样产生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足怪。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旁的选择,就是要坚决拔掉这一小撮人。这件事情必须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持,这也是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义务。人民解放军要保持光荣传统。这个传统,是无产阶级的传统,是人民的传统,毛主席英明地作出的这个决定,已经开始在全国收到了成效。当然,不要那么急,要充分酝酿,人民解放军要跟人民群众,要跟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老干部相结合,这就是《人民日报》上登的革命的“三结合”,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不是糊里糊涂的“三结合”,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三结合”。

这个斗争是很尖锐的,我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要充分估计到斗争的复杂性。最近我们写了个材料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这里顺便说一下,混到群众里面的也有坏人,反革命分子,浑水摸鱼,搞反革命活动。中央采取了措施,取缔了一些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有的是内部的,有的是里通外国的,有的是蒋介石策动的。所以毛主席说的很值得大家注意。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中也混进一些反革命分子,所以我们要头脑清醒、冷静地作阶级分析。到群众中去,就可

以把这些人分辨清楚。反革命活动本来是搞地下活动，他们利用大民主搞地上活动。地下活动不容易看得清，地上活动更有利于我们破获，这是好事。

大字报中有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大字报的主流是好的，是革命的。《人民日报》去年六月的一篇社论，“大字报是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说，这是一株大毒草，不准学。我们现在仍然认为，这篇文章是好的。当然对大字报，我们要有一定的领导，对反革命分子利用大字报，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采取措施。大字报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形式，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各个阶级都可以利用，问题是要看对无产阶级更有利，还是对资产阶级更有利。应当看到大字报还是对无产阶级更有利。大字报可以进行彻头彻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如有反革命插上来，我们就可以识别，对这种大字报，也不可怕。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队还是按照军委的规定执行。

有的同志问我，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怎么样？毛主席认为，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地讲一点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书里也讲阶级斗争，但只是概念上的，没有把阶级斗争当作现实问题。这本书是在抗日时期写的，他不分析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应如何做。毛主席说：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修养，毛主席说，不讲现实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个人，没有孤立的个人，抽象的个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地主到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我顺便说一下，马克思讲过，列宁也讲过，阶级斗争的学说，并不是我个人的发明。阶级斗争必然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发现阶级斗争，是一个进步。事实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的阶级斗争还不够格，完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本书是空空洞洞的，也有马列主义概念，也有孔孟之道，是一个大杂烩，是不三不四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从这本书里得不到无产阶级的东西，只是一点抽象的概念，糊糊涂涂的概念。原来刘少奇还有一封信，说中国没有斯大林，只有靠我们来工作。那个时候毛主席已经很明显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突破了斯大林讲的框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不是没有斯大林，而是有更高的斯大林，林彪同志已经充分阐明了这个问题。

先说到这里，有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请到会同志们原谅。原来准备和同志们座谈，不是来作报告，到场后同志们来个不发言，这就逼着我讲话，这样一讲难免要犯错误，这就相当为难。现谈几个问题。

一、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首先请同志们打开语录 204 页，把第二十四节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同一节的 208 页，倒数五行起“刘少奇……你的还是我的。（大笑）”这一段删去。为什么把标题改了？这是刘少奇的语言，是不通的，不科学的。在毛主席著作中，从来不用思想意识修养这个词。思想和意识有联系。但又是两个概念。讲思想是一回事，讲意识那就含意很广。意识是指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讲，在生理学上讲，意识和知觉有相同的意义，失掉知觉，就失掉意识。意识，

是包括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两个方面在内的。思想有独立的含意，它是指人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现象的反映。与这相同的语言，有时又叫思维，主要是讲通过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看来刘少奇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不通的。

毛主席讲过，刘少奇的这本书是欺人之谈。革命的根本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只谈个人修养，个人道德，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斗争，自然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同志们有时间可以看看这本书。

刘少奇说，共产党员修养要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他的共产主义道德是能“爱”人，能“恶”人。又说，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完全是孔孟之道。

刘少奇说要有最大的勇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是他说的共产党员的最大勇敢。

刘少奇在这本书中，说到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时，说什么没有偶像的崇拜。可以看出，这是暗示攻击毛主席的。他在讲到忠诚坦白时说，要能“无事不可对人言。”照他这样说，党的机密也是可以告诉蒋介石的。

刘少奇还说，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请同志们注意，他的所谓自爱心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是赫鲁晓夫的活命哲学。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叫安子文、薄一波去自首。这就是他的所谓“修养”。

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和丑恶灵魂。同志们提出，要对这本书进行批判，是很好的。这本书在国内外流毒甚广。毛主席说，要写文章批判。

二、昨天，我把毛主席同谢胡、卡博、巴卢库等同志的谈话向同志们传达了。我想同志们的问题原则上是可以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要夺权。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会产生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为什么还会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必要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天天写文章骂我们。《真理报》一月份就发表二百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和帝国主义腔调一模一样，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无非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革命的；说不是发展文化，是破坏文化。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人民的看法。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是向党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大革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黑暗面的大革命。因此，这场革命运动，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它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亿万人民头脑中，使亿万劳动人民直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直接掌握了马列主义。这是马列主义一百多年来发展的新阶段。这不仅对中国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对世界革命也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和马克思主义者，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相反，他们欢欣鼓舞，热烈拥护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骂我们，说糟得很，一切革命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异口同声说好得很，好得很和糟得很，这是世界上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

对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总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研究历史教训，对于认识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好处。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另一方面，革命的人民则认为完全是对的，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这是四十年前毛主席对伟大的农民运动的看法，我们今天重读这一段，仍感到很现实。

同志们还可以想一想，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的历史。毛主席说，这次整风运动是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粉碎了王明路线，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基础。对待这个伟大的运动同其他的革命运动一样，也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毛主席和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认为好得很，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则认为“糟得很”。

同志们，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主席提出的这三面红旗，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全国人民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认为好得很，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反党集团则认为“糟得很”。

所有这些说明什么呢？有些人是站在敌对的阶级立场上来反对革命的，有些人是反党分子，他们利用群众运动中的个别缺点，利用延安整风审干中的个别缺点，他们利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个别缺点，抓住不放，向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他们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有一种人一时看不清楚，分不清主流非主流，主要非主要，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固定一点，看不见运动的发展，看不到缺点错误已经或正在纠正。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其结果容易把是非颠倒了。

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认识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并得到全党的信任，是经过许多曲折，许多斗争的。从党创立时算起，到七大是经过二十四年。有个代表人物叫王明，住在莫斯科，化名外国人骂中国共产党，直到现在中央委员会里还有人否定延安整风，比如张闻天。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就更多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谭政等等。彭德怀最近又写信给毛主席为庐山会议翻案。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的会有两种立场，两种看法。有的是党外的敌人，有的是混进党内的敌人，也有一些同志一时看不清楚，有怀疑。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了相当胜利的时候，解放军同志必须吸取历史教训，看清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这个运动像延安整风运动一样，年限越久，意义越大，时间越长越看得清楚。同志们要坚信毛主席。今天到会的同志，包括我在内，摆在面前的是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那种情况。毛主席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要从主流本质和运动的发展看问题，吸取历史上的教训，看清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三、什么叫两条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什么？

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同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谈话，指出了这个问题。什么叫两条路线斗争？什么是刘邓路线的本质？有一个概括的说法，毛主席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他

是长期存在的东西。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本质是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消灭一切私有制，而且逐渐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刘邓路线就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坚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在这一年五月间，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工作，向天津的工人代表会议公开声明说，中国今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就违背人民的利益，违背工人的利益，这是刘少奇的纲领。同一个时候，他还在干部会议上讲了两句概括的话，他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劳动人民不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一九五零年刘少奇曾提出中国不是发展社会主义，而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这句话后来邓子恢也讲过。这些是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论调。考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虽说法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结论：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农村分散落后，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也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让资本主义发展到可以走社会主义的时候，才能发展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大大发展。他们说，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有一定的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力，才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不发达，怎么能实行社会主义，如果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1930年考茨基写了一本书，叫《陷入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在这本书里讲，十月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按照俄国的条件，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他狂妄地说，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列宁是对的，那么他几十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全部垮台了。在苏联，有个苏汉诺夫说，城市工业水平低，农村很落后，在俄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列宁在1923年写了一篇文章《论俄国革命》，严厉驳斥了这种修正主义观点。列宁说，俄国生产的发展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工业还有一定的基础，农民虽然落后，但同无产阶级一同革命，农民是赞成革命赞成社会主义的，你们是修正主义者。在哪本书上看见过先要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建设社会主义。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到一九二八年才实行农业集体化，这里除有各种原因外，主要是资本主义逆流的影响。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列宁在论合作化的文章中说，如果只有城市的社会主义，广大农村是资本主义，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就不巩固。只有农村实行集体化，合作化，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靠的基础。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一个社会基础，就是苏联农村存在的个体经济，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是这样。这样的国家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

再看看刘少奇，陈伯达同志已经讲过了。刘少奇一九五一年六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办互助组合作社，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就不能合作化。一九五二年，他批山西省一个报告说，把农业劳动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企图战胜自发势力，这是错误的，危险的，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批语曾发给马列学院的学生和中央各组委。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城市发展资本主义，在农村反对搞合作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后来大砍合作社，事实上也是他的主张。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对党校学习毛泽东思想。一九五九年在庐山反彭黄时不积级；一九六二年又大搞单干风；一九六四年搞形“左”实右；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切是有联系的，绝不是偶然的。毛主席说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

四、“三结合”的问题。

基本论点已经在《红旗》第五期社论上说了。这个社论，主席亲自修改，增了下面一段话：“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作。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林副主席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我们一万句。这个“三结合”是对我们解放军的最大信任。如何执行这个任务，请同志们好好讨论。对于否定一切，排斥一切的问题，当然要注意。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有的省委虽然有戴高帽子的，实际上问题并没有真正揭开，不要去“和稀泥”。

夺权问题，同志们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很好的经验。现在军管夺权，与解放初期不一样。这是大民主条件下的军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的军管。军管一定要毛泽东思想挂帅，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军管中可能发生一些矛盾，要放手发动群众去解决矛盾。解放军不要走工作队的老路。

我的讲话完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

各总部、军区、军种、兵种、院校：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革命群众组织外出串联人员，遵照军委规定返回本单位后，不少单位正开展整风学习，总结前一阶段斗争的经验，准备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有些单位的群众组织返回以后，没有切实执行军委命令，没有进行整风学习，不抓本单位的斗批改，而仍然热衷于搞大串联。有的外出人员迟迟不回，有的同地方群众组织搞串联，不通过当地驻军领导机关，擅自同地方群众组织一起去参加地方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夺权斗争。在与当地驻军发生分歧时，不尊重驻军领导机关的意见，一意孤行，甚至同地方群众组织结合起来去冲击当地驻军。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违反中央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和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的，妨碍了我军支左工作和支农业支工业生产的进行。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以两三周时间进行整风学习，学习文件，提高思想，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尔后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一律不再到外地串联，也不要同本地区外单位或地方组织搞串联。所有外出人员一律返回，地区性的和几个单位组成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能到军队串联。

二、支左、支农、工业工作，是毛主席交给军队的光荣任务，是对人民解放军最大的信任和鼓励，一定要切实作好，努力完成。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必须加强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各地区，各城市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律由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安排，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定要服从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不得各行其是。

三、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凡是未经上级批准撤职或停职的干部，除应在群众帮助下，认真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努力改正外，应该站出来做工作，把本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和行政管理工作的管起来，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帮助和支持他们领导好这几项工作。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广播车停止上街广播的通知

各军区、军种、兵种、总部、学院：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已停止串连，一律回到本单位搞斗批改，过去所有广播车停止上街广播。借用、调用的运输车辆，应立即归建，改装的广播车应将广播器材拆除。把这些车辆，应即提供当地负责支农、支工的指挥机关统一调用。这是响应毛主席提出军队要大力支援农业、工业的号召的一项措施，望各单位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关于杜绝将密码电报和秘密文件印成传单广泛散发张贴的通知

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各院校、各总部：

近来发现有的密码电报和秘密文件，被印成传单，广泛散发张贴，对保卫国家机密极为不利。各单位应对所属人员和革命群众组织，加强保密教育，严格杜绝这种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李富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主席最近提出：军队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要管农业，管工业，这是伟大领袖对抓革命、促生产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决战时刻的一项重要决策，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解放军支左、支农和支援工业，任务很重，这是抓革命、促生产三位一体的任务。支左，首先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宣传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将对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学习解放军，使工矿企业、农村掀起了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更高，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精神变物质，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得更快。我们表示最热烈的拥护。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我们搞好文化大革命就要把生产建设搞得更好，一定要抓紧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革命是统帅，用革命来统帅生产、带动生产、推动生产。生产的发展也为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保证革命的顺利进行。我们相信，解放军的支援，一定能使革命生产双胜利。解放军的任务很重，支左、支农、支工、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三位一体，首先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把工厂、农村左派队伍壮大起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的新秩序。有些单位已经有了经验，如沈阳军区、二十三军、二十七军、五十四军和铁五师。成都军区、新疆军区的经验也很好，他们已把省一级的生产班子建立起来了。建议军区抓省、市，军、师抓工厂、农村，及驻在地方各中、小城市。必须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的第一线指挥系统健全和加强起来（以军区和军、师首长为主，配备比较好的当地干部组成）。支农、支工，首先是支援毛泽东思想，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人的因素第一。我们过去往往是见物不见人，缺少毛泽东思想，缺少政治挂帅。工人、农民思想革命化了，毛泽东思想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精神变物质，

工农业生产和建设自然会上去，自然会出现大跃进。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先讲一讲军事管制的问题，生产问题等一会儿再讲。

军事管制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

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全国省、市、自治区，三分之一实行了军事管制，六分之一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剩下的十四个，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准备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有七个：北京、辽宁、吉林、天津、湖南、河南、安徽；另一类，情况未定，到底是实行军事管制还是“三结合”，还需要摸一下，这一类也有七个：内蒙、河北、甘肃、宁夏、四川、江西、湖北。这七个省和自治区如何进行，正在考虑。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毛主席的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站不出来，内部争论很多，甚至发现有的军区和地方党委完全处在对立的情况，所以要摸一下。

按地区来说，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一半有了领导，七个准备夺权，还有七个没有解决。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领导机构的问题。因为“抓革命、促生产”如果没有省、市、自治区领导机构，怎么能搞好？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就是象报纸上介绍的怀柔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

现在讲一讲关于军事管制的文件，供大家讨论。

一、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和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夺权斗争是由上海推动起来的。夺权斗争的发展虽然不算很快，但也不算慢。但是在这个阶段中，不少地区（有一半），不少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旗帜鲜明地联合起来，有的革命组织转化了，有的两方都是革命派，但不联合，甚至争论不休，发展到武斗，当权派干部没有挺身而出，没有检讨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线，这样就使当地的军事领导机关无从支持和参加革命的“三结合”夺权，这些单位陷于瘫痪状态，或者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或边防、沿海，或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或专政机构，或机密要害部门，或国防企业事业单位，国防工厂，仓库等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

目前省市公安局六十二个，大部接管了。公安机构过去长期受彭、罗影响，里面有一小撮坏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冲击了一下，揭发出一批坏人。公安部曾经试行夺权，但最后还是实行军事管制。内部即使是真正的革命派夺了权，但力量小，压不住坏人。南京、杭州公安局也有这样的情况。北京公安局，由政

法公社一个单位包下来, 结果不行。他们年轻, 革命热情有余, 但经验不足, 坏人不但没有被揭发, 反而保起来了, 反而使他们被动。也有由内部坏人夺权的, 他们拿权整好人, 如天津公安局有一个时期, 连交警都不上岗了。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实行军管, 坏人才有所畏惧, 广大革命群众欢欣鼓舞。

二、军事管制的形式有两种: 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种是派出军代表, 必要时可以派出军队保护。

如北京饭店, 派了三个军队干部去, 订出几条规定, 群众大多数是拥护的, 其他大饭店, 照办就行了, 人数还可以更少。有的地方不行, 需要派军队保护。

三、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 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 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 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 一般组成两个班子, 一个班子全面领导所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特别要作好支持左派的工作, 把左派联合起来, 帮助干部亮相, 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 另一个班子, 全面抓生产指挥工作, 把工业, 农业, 交通, 财贸, 文教, 卫生全部抓起来。这个班子叫生产指挥部。

现在春天到了, 文教卫生工作也得抓起来。防疫工作非常紧迫, 北京的卫生部还在吵, 我看要派军事代表, 一个人就行了。中、小学都开学了, 地方事情很多, 中央教育部还可以搞革命, 省、市、地、县就不行了。三位一体的生产指挥部, 要把这几方面抓起来, 相互结合。组织形式上大体是这样的, 但也要因地制宜。

各级军管会, 受上级党委和军管会的领导, 同时领导下级党委、人委和军管会。并代表本地区与其他地区党委、人委和军管会联系, 军管会本身受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党委的领导。

地委, 军分区, 如有军部驻在这个地区, 应受军党委的领导。师住在县, 应由师来领导。组织问题再具体化一下。

各地区军管会在抓革命、促生产中, 要注意促进当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帮助当权派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出来亮相, 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 给他们创造机会。教育革命群众允许他们出来检讨, 这样才能推动革命“三结合”早日实现。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 毛主席说: 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 见了毛主席, 毛主席又说, 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军事管制抓革命、促生产, 到底哪是中心? 还是把革命干劲鼓起来, 军队要政治挂帅。刚才富春同志说, 三月份是个关键, 生产有的是上升, 还有的不是上升。三、四月份很紧, 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干劲鼓起来后, 革命干部亮相, 大联合, 这些工作做好了, 到了五月份,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也可能成熟, 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 大概的眉目就可以看出来。地区军事管制最后要落实到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省、地、县三级的临时权力机构。五月份恐怕不行, 一般省一级可以实现。这是设想, 大家可以讨论。

各级领导干部, 在取得革命群众同意后, 可以吸收到抓生产的领导班子里来, 在工作中考验。

有的同志提出军管会中能不能吸收这些同志, 我认为不宜马上吸收。因为参加军管会, 将来就得参加“三结合”, 在军管会中只是解放军。生产班子可以经过革命群众同意, 吸收他们参加, 一边检讨, 一边考验。有些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 一时群众不能谅解的, 可以降级留用, 这样, 群众容易接受。调离只能

是少数。象广东的赵紫阳同志，错误是严重的，但他已经作了检讨，我们叫他回去降级留用。现在第一书记都跑到北京，不是个好办法。他们对情况很熟，要就地监督留用，甚至撤职留用。铁道部的吕正操、武竞天已经撤职，但还留在那里工作，看他们是不是真正回心转意，以观后效。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这符合毛主席所说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

军管会抓生产的班子，叫生产委员会或生产指挥部，应允许利用其管辖的业务机关和下属的业务机关来进行生产领导，不要另行组织机构。这是很要注意的事情。现在机构庞大，组织层次多，厅、局、处、科。可以在军管中，缩小一些机构和减少层次，但也不能大裁大减，为下一阶段的制度改革和机关革命化创造条件。整改就是改制度，军管要为下一步整改带来更有利的条件，决不要因为军管，机关变的更大，人更多了。这里讲的军管，是指省一级的。

四、企业事业单位的军事管制，应该根据各单位情况，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或者派代表。如卫生部，机构是可用的，就是派个代表，把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帮助他们实行“三结合”。

在一般的企业事业单位，军管会在抓革命、促生产当中，要注意促进这些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促进这些单位的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和民兵代表三结合早日实现，以便成立本单位的“三结合”监督业务权利机构，从而改组该单位的领导机构。

“三结合”搞好了，厂的领导才能巩固，另一方面，就是有了新的领导，改组了，也要提拔新生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特点就是自下而上“三结合”。过去都是自上而下的。一九四九年靠几百万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解放了全中国，实行了军事管制，国民党少数人跑了，其他的都接过来，包下来了，将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包下来。学校更是原封不动，资产阶级的影响很大，去年发作了，大家都领教过了。哪个军种、兵种没有军事院校？军里好一点。上次大军区来开会的同志意见可大啦，各级干部都是由上而下派的。派去的干部有的是新吸收的党员，就是解放区里的党员干部，派去也受到“糖衣炮弹”的影响。当然这也只是一小撮。一九五二年进行了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一九六三年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更不用说对经济基础的改造了。地主还在农村，资本家在城市还拿定息，革命总是没有搞彻底。所以，毛主席说十七年来我们是搞社会主义革命，但不是彻底的革命。其因为是没有找到自下而上的方法。这一次找到了由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一声炮响，大字报出来了，把学生发动起来了，来北京的就有一千多万，这个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个别老干部说，这个斗争真是激烈，从来没有遇到过。正象林副主席说的，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如果这样分析，就会很愉快，把旧的东西挖出来不是很好吗？你还是站在老立场，维持老秩序，站在群众之上，当然就看不惯，当然引起群众反对。这是革命的事物，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如此，在外国也是如此。这样一个大震动，才是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搞下去，把这个传统世代代传下去，才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党不变质。有了修正主义可以反掉，保证资本主义永不复辟，保证世界革命早日实现。这个时候，就要叫解放军参加这一工作，一月毛主席号召，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左派，并且成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是无产阶级

工作组还是资产阶级工作组，如果是压制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就是资产阶级工作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三结合”的实现，为什么不可以？这就是无产阶级工作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就找到一个方法，找到监督检查领导的方法，过去不要说检查，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管也是鞭长莫及，还是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还是要看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你正确，群众就跟你走。可是怎么样才能正确，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不完全正确，就可以得到补充和修改。本地区本机关本部门的人监督是有效的方法。过去我们还没有找到这种方法。有人说，开个代表大会，那也无效，不起作用。《二十三条》一发表，彭真还是搞彭真的，刘少奇还是搞刘少奇的。将来“三结合”要转为代表会议。那时要实行巴黎公社的选举。现在这种“三结合”，起监督作用。

企业事业的革命组织，应按行政单位归口编组。这些单位的群众组织可以允许串连，但不允许互设联络站，尤其不要学生到工厂设联络站。

“三结合”夺权斗争，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参加，其他单位不参加，因为不了解情况。有的同志问，今年的大串连搞不搞？不搞了，毛主席已经肯定今年不再搞大串连了。我们打算补发个通知。但在本地区还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总之，工人、学生要回去搞斗批改。国防工地、机要、要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仓库，实行军事管制，不进行夺权，不改组领导机构，革命群众对领导有意见，可以提出，也可以向上一级党委建议。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进行有限的“三结合”，成立监督组织。革命组织必须归口，对本单位以外的，不进行相互串连。一切革命组织，都在业余时间，按归口的系统活动，开全单位大会，必须经过军管会批准。各单位的民兵组织，必须不受群众组织的影响。民兵不能属于那一派组织，不然不能在“三结合”中，起民兵代表的作用。

解放战争后期，我们的党员是三百万，现在一千八百万，六分之五是解放后发展的。有的受到资产阶级影响，已经蜕化变质，有的是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徒，是会淘汰相当数目。但绝大多数是好的，团员淘汰就要更多一些。

五、县（含）以上党政机关的军事管制，一般只派军代表，一两个也可以。主要任务是促进该机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该机关的革命群众组织按行政单位归口编组，实现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成立该机关的业务监督机构。领导没有瘫痪的加以帮助。机关民兵组织，在军代表的组织下搞军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进行整顿。现在军训重点在学校，而后在厂矿，最后才到机关。

六、各地区、各企业事业单位的机关，要提一批积极有贡献的干部到领导层去。多数干部应该留用。少数犯了严重错误但愿意改正的，也可以降级留用，极少数应该撤职的，在本机关本系统下放劳动，下放工作，不能上交，本单位不能处理的，在一个地区范围内进行调剂。大批人力要下放，机关庞大，不利于革命。

军队已经肯定，院校、文艺团体多了，要下放。企业事业单位也要向下放。把上头搞得短小精悍。不要头重脚轻。将来，党政机关是不是转向供给制，把资产阶级法权早点去掉一些，树立新的生活方式。

七、军事管制批准程序。

各省、市、自治区和边防沿海的专区、自治州，各省辖市，中央各部和直属大的企业、事业单位，由中央批准。

各县，各省属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由省批准。

八、不论已经实行军管和尚未实行军管的，对反动组织、对严重违法乱纪和泄露国家机密的，军事机关应与公安部门配合，予以逮捕法办。

有的群众组织的头子是反动的，处置要慎重。可以将头子隔离起来，只要抓住他的罪状，就可以逮捕，可以不宣布解散，群众归各单位。因为宣布解散，对群众震动太大。这种方法比较有利。对抢国家文件的，要严肃处理。严重的要逮捕法办。遇到这种事件，要追究追回被抢的文件。

毛主席说：从上到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和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各地军事领导机关，要根据这个最高指示，对全军干部进行广泛的动员。解放军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吃透两头。学好《老三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农村调查序言》、《学习和时局》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林副主席和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林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只有吃透毛主席著作，才能正确贯彻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军队现在的的确很忙，又要军管、又要支左、支农、支工。正是因为忙，更需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包括参加军管的领导干部（同志）也要认真学，以便提高政治水平。然后到工作对象中去，走群众路线，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坚持四个第一、提倡三八作风，支持“三结合”，捍卫“三结合”，不是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合在一起，不是把保守派合在一起，而是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表现为反革命经济主义，也表现在其他问题上。我们不要松懈自己的阶级的警惕。解放军的阶级警惕是强的。解放军是工农子弟兵，现在要与群众进一步结合。毛主席依靠群众，依靠解放军。最高统帅这样信任解放军，我们要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最高指示，不要忘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科研设计单位和医院文化大革命的补充规定

各总部、军区、军种、兵种、国防科委：

根据二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不能夺权的科研设计单位和医院，文化大革命由党委领导，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也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精神，保障文化大革命和科研、医疗工作正常进行。不能夺权的医院所属的护士学校也不准夺权，夺了权的要把权交回。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充分发挥民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加强民兵建设，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一贯的战略思想。建国以来，毛主席先后多次指示，要大办民兵师，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些指示。

当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民兵

工作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民兵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民兵的作用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全国广大民兵都应该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遵照毛主席历来对民兵工作的指示,遵照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的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要求,充分发挥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指出:“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民兵在夺权斗争中参加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民兵的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鼓舞。我们决不能辜负毛主席的关怀和信任,一定要最坚决地完成这一项新的重大而又光荣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坚定地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积极参加革命的“三结合”,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打倒,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正在处心积虑地阴谋进行捣乱和破坏。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民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是群众性的革命武装,是人民解放军的有力助手和强大后备力量。广大民兵不仅要积极地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要警惕地、英勇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民兵要同人民解放军一起,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随时准备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掀起的反革命逆流。要大力协同公安机关,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革命活动。要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保持高度警惕,认真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敢于来犯的敌人。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我们民兵一定要最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最积极地执行“十六条”,坚决和那些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坏家伙们进行斗争,既当革命的闯将,又当生产的模范,更好地发挥自己在生产中的突击作用,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当前农村最紧迫的任务是搞好春耕生产。搞好今年的春耕生产,这是关系到全年农业生产的收成,关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的头等大事。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一切农村工作“必须注意季节”,要“不违农时”。农村广大民兵一定要用“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积极带头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为夺取全年农业大丰收奠定一个好基础。工业交通战线上的民兵,也一定要鼓足革命干劲,带头搞好生产,为每月每季都高质量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奋斗。

民兵要完成这些重大而又光荣的任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们要把“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作为座右铭

来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提高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解决斗争中遇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用毛泽东思想做武器，搞好灵魂深处的革命，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克服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风头主义等不良倾向，增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当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民兵同志们，人民武装干部同志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完成毛主席和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重大而又光荣的任务，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最大的贡献！让我们通过执行和完成这些任务，进一步锻炼和提高自己，促进民兵队伍的非常无产阶级化和非常战斗化，把民兵工作三落实搞得更好！

（载《解放军报》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肖华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是头一次军级干部会议。到会同志听了总理、伯达、康生、富春同志的报告，还有军委几位付主席也要给同志们讲话。林付主席还要给这个会议作指示。这是一次生动的毛泽东思想训练班，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最后毛主席还要接见大家。这是同志们和我军的最大光荣，这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以及付统帅林付主席和党中央，对我军的最大关怀和鼓舞。这必将给我们完成新的光荣的任务增加无限的力量。

现在，我就当前部队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讲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加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问题

这个问题我准备讲三点。

一、广泛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辉煌战果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开辟了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最正确的道路，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这个运动，是一个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巩固革命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党永不变质，保证我国永不变色的伟大政治运动。

这个运动，就是要触及人们灵魂，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的伟大的思想革命运动。

这个运动，对于我们军队，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毛主席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又说：“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因此军队必须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必须保证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领导，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他们也知道“有军则有权”，他们要篡党、篡国、首先就必须篡军。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出来的许多事实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使我军成为他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为了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使我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无产阶级革命化，

使我军无限忠于我们的党，无限忠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也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战争准备。

八个多月来的运动已经获得辉煌战果。这场席卷全国、震撼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调动了亿万人民的革命积极性。运动的洪流从学校到社会，从城市到乡村，从北京到全国，“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群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这次运动，挖出了一批隐藏得很深的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揪出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混进党内、军内窃据要职的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特别是把彭、罗、陆、杨修正主义集团和他们的总后台刘、邓这两个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了出来，粉碎了他们积极进行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活动，清除了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在这个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有五敢精神的革命小将，他们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新生力量。伟大领袖八次接见红卫兵，同一千一百多万革命师生见面，领袖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红卫兵战果辉煌，有些多少年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都由他们解决了。经过这次运动，使广大的青年一代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不少青年可以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者把“和平演变”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的幻想，必将破产。

在这个运动中，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大民主，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反修大演习，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丰富经验。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无比光辉的，创造性的发展。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如陈伯达同志说的，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一点。越往后就会看得越清楚。象列宁讲到十月革命意义时所说的，“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

怎样估价这次文化大革命，怎样看待群众运动，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阶级敌人，骂我们的运动“糟得很”，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欢呼好得很。我们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对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坚决拥护和积极支持的。很多同志都深刻感觉到，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极大的教育。这真是不上课的政治课，不经考试的考试。是最生动的阶级斗争课，毛泽东思想课。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抓活思想，防止我们有些同志不用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问题。要教育他们必须端正认识，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必须从全局从整体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不要只看支流，重要的是要看的主流，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到本质。不要只看一点，要看到全面。不仅看到眼前，而且要看到长远。政治工作，必须充分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成就，用生动的事实说服教育干部战士。对于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同志，更要认真地，反复地进行教育。

二、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写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党内长期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指明了它的实质。刘、邓在文化大革

命中所实行的白色恐怖，不过是他们长期以来所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暴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来已久，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早就对我们发动了全面的“内战”。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找到了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他们。动员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这正如主席所说的，我们同样要用全面的“内战”来回击他们，来打垮他们的猖狂进攻。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纲。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每当革命转折时期，国内外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那些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就猖獗起来，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适应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需要，顽固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中国扭转社会主义方向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刘、邓窃踞党中央的领导岗位，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充当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最大的代理人，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就可想而知。毛主席早就提醒和警告我们，北京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去年五月又说，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有的已经发现，有的还没有被识破。那时我们对这一点还不够理解，还睡在鼓里头，以为把彭真挖出来了，就挖得差不多了，没有敢再去想一想。幸亏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及时地发现了那些埋藏在我们内部的定时炸弹，并把它挖了出来，十一中全会揭了这个盖子。这样，才避免了我们党的事业受到更大的损失。

同志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党和我们军队的历史，回想一下我们亲身的体验，那一个中国革命的重要关头，那一次战争的危急局面，不是毛主席亲自指挥，亲自掌舵、扭转局势，克服错误路线，端正航向，引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到另一个胜利。

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统治我们党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同陈独秀作斗争的，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写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针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毛主席领导红军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马列主义是一个非常光辉的发展。之后，在建军的问题上，第一个提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建军思想的，是毛主席。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纠正了当时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克服了军阀主义的建军路线，那个决议成了我党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和纲领。一九三零年立三路线统治的时候，彭德怀就是执行立三路线最坚决的一个。首先反对立三路线，使红军主力避开向大城市的进攻（当时是向长沙进攻）保存了红军的力量，扩大了根据地的，是毛主席。接着领导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几次“围剿”，取得了辉煌胜利，又是毛主席。王明路线剥夺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和军队的统帅权，这就使我们的根据地和红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全国的根据地最后只剩下一块陕北根据地：红军三十多万，剩下二万四千。在大搬家中，红军遭到了几乎覆灭的危险。毛主席在长征的最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同王明路线的单纯防御路线作斗争。著名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领导，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在长征途中，又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逃跑主义路线作斗争，克服了红军分裂的危险，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任务。到达陕北后，又同彭德怀军事上的保守思想作斗争，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围剿，取得渡河东征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在红军东渡黄河返回陕北的时候，敌人大军逼近，毛主席亲自率领一个小团，在后

面打掩护，他是最后渡河过来的。在那样紧急关头，毛主席总是最沉着，最镇定的。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长征的胜利，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抗日战争初期，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即第二次王明路线的，还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提出，在敌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彭德怀提出的是运动游击战，完全同中央的方针相对立。毛主席提出了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方针，战略战术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一整套政策，使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猛烈的发展。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彻底清算了王明路线。七次代表大会，全党都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这就使中国革命很快取得了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在日本投降以后，毛主席又克服了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使我党我军有充分的准备，以对付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在解放战争的紧急关头，胡宗南进攻陕北，当各解放区军民的眼睛望着陕北的时候，毛主席亲自留在陕北指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大大地坚定了全党全军的胜利信心，鼓舞了斗志。

至于建国以后的几次路线斗争和粉碎反党集团的斗争，同志们都比较清楚，那天伯达、康生同志也讲了很多了。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抗美援朝战争，那是在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国内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国内局势尚未完全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那时对是不是出兵朝鲜的问题，是有争论的。是毛主席坚定不移地大胆地作出了这个出兵的决定。这是一个伟大的、英明的、果断的决策，也是毛主席和我们党伟大的国际主义的表现。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我军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在这次抗美援朝战争中，毛主席同彭德怀是有斗争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也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部署下取得胜利的。

解放十七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各个战线上的伟大成就，祖国面貌的根本改变，国防力量的无比强大，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都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取得的，都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完全正确。

上述这一切的事实，都充分说明了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党我军取得一切胜利的决定因素。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活着的马克思，活着的列宁。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今天，对待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区别革命或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界线和试金石。正象林付主席所说的，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必将战胜一切敌人，永放光芒，普照大地。只要我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必将无往而不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党内两条路线的长期斗争中，我们的付统帅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林付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最亲密的战友。他一贯最深刻地领会毛泽东思想，最英勇地捍卫毛泽东思想。他一贯紧跟毛主席，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我党久经考验的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

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林付主席总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同各种

“左”的右的错误，同形形色色的反党集团，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从井冈山起，他就一直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反对军阀主义、反对立三路线、反对王明路线。在东北，他反对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克服了彭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因此，取得了伟大胜利，解放了东北。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都是对中国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林付主席英明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使这些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后，在反对高饶，反对彭、黄、反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林付主席都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一边，都有卓越的贡献。

在我军的作战和建设方面，在传播毛泽东思想方面，林付主席的功绩不仅在全国人民中，而且在全世界人民中都是一致公认的。林付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提出和强调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创造四好连队等，加强军队革命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他号召在全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根本方法，推动全国掀起了一个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热潮，从而开创了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

林副主席对毛泽东思想阐明、发挥、创造性的运用，是有很高水平的。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关于群众路线的发言，解放战争时期他关于战略战术思想的多次讲话，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去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多年来关于军队建设，特别是关于政治思想工作的讲话，都极为精辟地阐述和发挥了毛泽东思想。他在学习、宣传、运用、捍卫毛泽东思想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组，确定林副主席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完全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的。林副主席是我党我军最理想的副统帅。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领导核心的改组，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贯彻。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这对全党全国以至全世界的革命都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正因为林副主席最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最坚决地执行和最英勇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怪不得一切反党的野心家，都把林副主席视为眼中钉。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必然要反对林副主席。这已经成为他们的共同规律。高岗、饶漱石是这样，彭德怀是这样，彭、罗、陆、杨是这样，刘、邓也是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造谣诬蔑，恶意攻击林副主席，这正说明敌人恨他，怕他。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对敌人的这种卑鄙恶毒的攻击，不管是来自社会上，还是来自党内的野心家，我们都要坚决给以反击。

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毛主席伟大的革命实践，以及林副统帅贯彻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榜样，来教育我们全军的干部、战士，这是主要方面。我们还要能够辨别是非，坚持真理，反对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路线的修正主义思想。修正主义路线。在当前斗争的主要矛头应该对准刘、邓，一定要把刘邓批深批透。

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长期地、一贯地抵制和反对毛泽东思想，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用具体的事实来进行揭发和批判，尤其要结合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来进行批判。要通过对部队的教育，剥掉刘邓的画皮、使广大干部、战士

认清他们的真面目。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康生同志的讲话，已经揭发了很多，他们讲的很清楚了。特别是关于刘少奇的问题，讲的更系统。这里，我只把刘少奇的问题概括地说一下。

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一再推行投降资产阶级的路线。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就大肆宣扬活命哲学，叛徒哲学，指使某些被捕的“共产党员”投降阶级敌人。以后，又把他们包庇下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让他们窃踞要职。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准备向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屈膝投降。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他拼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他提出欢迎资本家剥削，发展资本主义，一九五〇年，他把卖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称之为“爱国主义”的，他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富农，反对变工队、互助组，反对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叫嚷“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提倡“四大民主”。后来，他又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一九五六年，他迎合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大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二年，他大刮单干风，鼓吹什么“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时，大量印发他的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修养》。一九六四年，他执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长期以来，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我再补充几点：

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恶毒地诬蔑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是“把个人神化。”对于林副主席领导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攻击说：“有人搞学习毛主席著作，好象是捞资本”，并咒骂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庸俗化”。

他长期以来支持刘少奇，并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他同刘少奇一起刮黑风，搞“三自一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一同提出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路线。

他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时，把书记处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对毛主席实行封锁，不请示，不报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他，他不仅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刘邓在中央许多部门，在我们党的重要岗位上，安置了许多叛徒，许多坏人。旧中宣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旧中央组织部被叛徒控制了，几任部长，如饶漱石、习仲勋、安子文，都是叛徒。

他包庇篡军反党野心家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错误。上海会议以后，去年三月又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邓小平的态度一直是保护罗瑞卿的，包庇罗瑞卿的。上海开会，他说：“我不知道啊，怎么一下子到这里来，开什么会呀，我们不清楚呀。他在会上象个审判官一样。上海会议以后，邓的老婆还跑到罗瑞卿老婆那里，相抱大哭一场。在北京斗争罗瑞卿的会议，中央指定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彭真，一个是叶剑英同志组织三人小组。我和谢富治同志、杨成武同志几个人叫做工作小组，主持这个会议。会议开始之后，邓小平跑到西北去了，彭真

就跑到成都去了, 和李井泉去挂勾, 去部署。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 要写一个结论, 我们是经过仔细核对的, 凡是有一点不合乎事实的, 凡是过不得硬的, 一件件都勾掉了, 剩下来的都是证据确凿, 性质严重的。可是邓小平、彭真还在包庇他, 许多问题不准写, 不准写罗对四个第一的造谣诬蔑, 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等的不正常关系, 不准写罗向地方伸手的问题, 不准写罗恶毒诽谤主席的具体事例, 不准写罗做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和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罗瑞卿回家对地主祖坟三鞠躬, 也不准写, 因为彭真回家也给地主祖坟行了三鞠躬礼。所以, 斗争罗瑞卿、以后斗争彭真, 实际上是打在彭罗的身上, 痛在刘邓的心上。刘、邓就是彭、罗、陆、杨的后台, 就是他们的祖师爷。

邓小平还包庇黑帮分子吴晗。彭真所把持的旧北京市委那一伙人, 都是他打牌的牌友, 全国公开批判吴晗已经几个月了, 他还和吴晗在养蜂夹道打牌, 连理发工人都看不过去, 说: “我们这个总书记怎么搞的呀, 现在都在批判吴晗, 他还和吴晗打牌!”

在历史上他也是不光彩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 红七军从广西转移到江西, 只剩下一千七百人, 到了崇义附近, 正处于敌人前后夹击, 非常危急的关头, 身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 却擅自离开部队, 临阵逃跑。在抗日战争时期, 彭德怀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百团大战, 邓是积极支持彭德怀的。在庐山斗争彭德怀时, 他的态度非常消极。

邓小平根本不是一个能打仗、有战功的人, 但是他却拼命争地位。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注释中, 名字最多的是邓小平、罗瑞卿。林彪同志看到注释的时候, 再三强调要少写四野, 要少写他的名字, 要把自己的名字勾掉。本来林彪同志是战功最大的, 而他的态度却那样谦虚。可是邓小平却极力争这个功、要突出他个人, 有些注释根本不需要写邓小平, 他也硬要写上。其实他在抗日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 是在总政宣传部当干事, 以后在一军团当宣传部长, 根本没有打过什么仗。抗日战争时期, 他所在的部队, 打仗主要是刘伯承同志指挥。至于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 从战役方针到每一个具体布署, 都是毛主席亲自确定、亲自指挥的。

还有顺便提一下, 刘少奇、邓小平也根本不是什么国际反修的“英雄”, 国际反修的所有重大方针、政策以至于重要的发言稿, 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或亲自主持起草的, 决不能把功劳挂在刘、邓帐上。

只有剥掉他们的画皮、暴露他们的真面目, 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 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

向部队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必须同军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我们军队的内部, 还要继续肃清刘、邓路线的组成部分——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毒素。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是刘邓反动路线的一部分, 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军事上的表现。对刘志坚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也要继续肃清。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 结合部队的活思想来进行教育, 这是今年教育中必须抓紧和突出的重点。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我军中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但是这里要提醒大家, 两条路线斗争还没有结束, 还将继续下去。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 还要经过不断的斗争, 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因为刘邓错误路线在我们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 因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把错误路线当作他们的护身符, 继续拿反动路线作掩护, 因为党内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的人, 这些同志从错误路线上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还是需要一

过程的。所以还要作工作，还要继续斗争，要把刘、邓他们的市场一个一个地夺过来。特别要防止极少数顽固坚持反动路线的人。采取各种形式的新反扑，也要防止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破坏和卷土重来，死灰复燃。他们是行将灭亡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不会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一定会卷土重来，破坏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一切资产阶级代理人企图复辟的新花招，新阴谋。我们军队的同志应该百倍提高警惕性。

三、大立毛泽东思想，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聪明最勇敢的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是最勇敢、最坚强、最有战斗力的军队，是无敌于天下的军队。

林副主席说：“要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所以我们就要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抓紧这件大事，抓住不放。

学习毛主席著作最主要的方法，还是林副主席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我们现在好多干部去搞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还有的自己也在搞文化大革命，在完成这些任务中，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当前，我们支左工作，首要的也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援，帮助革命群众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要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教导，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教导，关于如何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的教导，关于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教导，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教导、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等等，是我们带着问题学习的主要内容。要抓住这些基本观点，反复学，反复用。要把毛主席的最高理论同当前文化大革命丰富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

我们要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把部队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根据我们去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应当注意下面两个方面：

第一是端正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林副主席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广大干部、战士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革命的根本，生命的灵魂，智慧的海洋，力量的源泉，行动的指南，战斗的武器”，是“我们建军的核心，建军的灵魂，建军的根本”。他们真正做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他们所以能够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许多部队经常搞忆苦思甜，每次都使干部战士对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加深一步。带着阶级感情学，就能记得牢，领会得深，用得好。

第二是狠学“老三篇”，改造世界观。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也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武器，对资产阶级世界观展开猛烈进攻，向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精神世界阔步前进。

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为私有制服务的，其本质就是一个“私”字。无产阶级

世界观恰恰相反,是为公有制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的,其本质是一个“公”字。为“私”为“公”,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社会上有阶级斗争,我们头脑里也有阶级斗争。要敢于在自己的头脑里搞阶级斗争,要敢于造自己的反。造别人的反比较容易,造自己的反就比较难。

“老三篇”文章虽短,但它是极其光辉的共产主义的教材,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修课。我们要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就必须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反复地学,认真地用。

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敢于大胆地亮,亮自己的思想;坚决地斗,斗争错误思想;彻底地改,把这些错误的思想彻底改掉。

几年来,我军采用的行之有效的学习组织形式和学习方法,今后仍继续推广。我们已经取得的好经验、好形式、好的方法主要有下面一些:

- 1、进行工作,执行任务、开重要会议,都要有的放矢地选学毛主席有关的论述,作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的武器。
- 2、政治、军事教育,都要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
- 3、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 4、军以上单位,要经常举办各级干部的读书班或集训班。
- 5、有计划地组织天天读。
- 6、小整风。就是抓住某一个重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 7、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应该推广。现在部队里的讲用会效果很大。各单位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 8、办好毛主席语录版。
- 9、对一些识字不多的战士,开一些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班,或者通过“一对红”等形式,辅导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
- 10、培养和宣传更多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先进集体。举办学习毛主席著作模范人物的事迹展览,如过去的廖初江、丰富生、黄祖示,刘英俊展览会,效果是很大的。各级都应该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全军也准备在半年召开这样的大会,来推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 11、通过报纸、文艺以及一切宣传工具,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推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经验,解答学习毛主席著作中提出的问题、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具体指导。
- 12、通过讲党史、讲革命历史故事,读革命回忆,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岁月中,掌握着革命的大舵轮,不断地拨正革命的航行,率领亿万革命大军,冲破多少惊涛骇浪,绕过多少暗礁险滩、经历过多少艰难崎岖的道路,战胜了国内外多少强大的敌人,使我们的革命由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毛主席还将率领我们去攀登人类社会的最高峰——共产主义。毛主席伟大的革命实践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我们除了用毛主席的伟大革命理论教育部队外,还要用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来教育部队。毛主席的全部革命活动和伟大事迹,都是最生动的教材。要用毛主席在战争年代的活动和故事,在各个时期的活动和故事,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来鼓舞部队的斗志和革命精神。这是对年青一代进行教育的最好教材。我们部队开展的“四个伟大”的宣传,就是要用毛主席这些活生生的光辉事迹来教育部队。尤其是我们这些老干部,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给部队讲课,宣传“四个伟大”。

第二个问题:当好工作队,完成毛主席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当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进入紧要关头,进入全面决战阶段。这个阶段主要特点,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种夺权是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一场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切阶级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斗争。一九四九年,我们是自上而下地夺国民党的权,接管他们的一切政权机构。这一次是采取革命“三结合”

的形式，自下而上地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即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毛主席、党中央又给了我们支持革命左派、支援农业、支援工业、军事管制、训练学生的重大任务。这是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的决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最大的信任，是我军的最大光荣。

在我军初创时期，毛主席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在战争时期，一直担负着打仗、生产、作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一九四九年二月，毛主席号召“把军队变成工作队”。毛主席强调指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去年，毛主席在给林彪同志的信中，又向我军发出伟大号召：“只要在没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付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毛主席最近又指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支左、支工、军管、军训，这些都是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对我们来说，也是最好的一次锻炼和考验。只有毛主席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才能执行这样的任务。这些问题，前些天几位领导同志的报告都讲过了，这里我补充几点：

一、最重要的是站好队，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鲜明的革命旗帜。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林付主席说：“站在那一边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林付主席的指示，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圆满地完成支援左派的任务。

在执行支左任务中，对于当地各个群众组织的情况，各阶级的情况，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便做到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如果因为情况不明而支持错了的，要公开承认错误，立即改正。

二、要当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工作队的根本任务。支持左派，促进左派大联合，实现革命“三结合”，首要的就是政治上、思想上的支持。这是最近参加支左工作的一些单位的共同经验。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抓活思想带到地方去，传给广大革命群众。千条万条，宣传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这一条搞好了，就一通百通。抓好了革命，才能带动生产，促进生产。

毛主席的指示，党的方针政策，都要尽快直接和群众见面。毛主席在人民群

众中有崇高的威信，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党的方针政策直接和群众见面，就可以迅速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搞好革命，搞好生产，搞好军事管制，搞好军政训练。

我们派出去的人员，要有革命的干劲，要把革命干劲同科学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结合起来。一切问题要同群众商量，依靠他们去办，不要包办代替。任何包办代替、命令主义、首长作风，都会脱离群众。要重视调动民兵的积极性，发挥民兵的突击作用。总理说：任重道远。又说：要作无产阶级的工作队，不要作资产阶级的工作队，不要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犯错误。这个指示很重要。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区别马列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我们一定要坚持毛主席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无论执行什么任务，无论到那一个单位，都不要束缚群众的手脚，而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促生产。就是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也要这样做。在需要夺权的单位，还必须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为夺权创造条件。

四、组织力量，加强具体指导。

派出的干部、战士都必须首先加以训练，进行党的路线政策教育。抽调干部应该分片包干，要注意突出政治，配备骨干。对那些分散的、要害的、重点的单位，更要加强具体的指导，不要派出去就不管了。要经常派出人检查他们的工作，了解他们的情况，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这次实行军事管制不同于一九四九年，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军事管制。那个时候是接收国民党的烂摊子，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军事管制，这是根本的区别。支援农业，支援工业，也不同于过去一般情况下的支援，一切都必须依靠真正的革命左派，才能够搞好。

要特别警惕军内外少数坏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挑拨军队和革命群众的关系，进行破坏活动。

五、向群众学习，向革命干部学习。

毛主席说：“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我们面临的工作都是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所有人员都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模范地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搞好关系，搞好团结，不断进行自我批评，听取群众意见，改进我们的作风，要学会群众工作的方法，要学会群众的语言，同群众打成一片，发扬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做好样子，不能做坏样子。

第三个问题，继续抓四好连队运动，抓好部队的活思想。

四好连队运动是有强大生命力的集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的群众运动，我们已经搞了好几年了。我们一定要通过四好运动的持续开展和不断提高，把连队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搞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今天要特别注意抓活思想，要善于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各种现实思想问题。党支部要发动全体党员进行群众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大力宣扬好人好事。要改善管理教育的方法。要加强对四好运动的领导，特别对那些薄弱环节，分散单位，更要加强具体指导。

第四个问题。加强组织革命化，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毛主席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用人行政，这是专政的主要问题。林付主席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结合我军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培养和选拔干部的两条标准，即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第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密切联系群众；第三、有革命干劲。要按照这三条来培养和大胆地选拔干部。

对于老干部，要作阶级分析。从总体上来看，我们的干部队伍是比较纯洁的，特别是老干部（现在老干部不多了）全军红军时期入伍的，只有千人，抗日战争时期的，只有五万七千人，经过战争考验的，大多数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站在毛泽东思想立场的，是好同志。这是党的宝贵的财富。

但是，必须看到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我军的干部队伍也是有分化的。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干部是错误的。目前，在文化大革命中，干部队伍就经历着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有一小撮已经蜕化变质堕落成为修正主义分子，还有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叛徒，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挖出来，进行清理，防止他们篡军、篡党、夺权，防止他们夺取我们的兵权。

所有的老干部，都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接受群众的教育，改造自己，过好社会主义关，保持革命的晚节。我们要牢记林副主席的教导，即把自己当做革命的一分力量，又要把自己当做革命的对象。每一个干部都要紧跟毛主席，紧跟革命的形势。不要吃老本，要为革命立新功，立新劳。

干部要严格正确教育自己子女，要从政治上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使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老婆孩子反映的问题都要作阶级的分析，都作具体的分析，不要偏听偏信。对他们错误意见，应该加以批评教育。如果自己子女出了问题，就要按照党的原则正确处理。

机关、院校、文艺团体，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要做到更加革命化，组织上更加纯洁。要精简机构，改革制度，改进作风。要使各级领导，真正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要特别注意加强各级政治机关的整顿和建设。这次政治机关里头，宣传部门、文化部门，保卫部门，出的乱子不少。解放以后，政治干部调出去比较多，对新提拔的政治干部，往往不注意政治质量。有的政治机关自己不突出政治。所以通过这次整改，首先把政治机关整顿好，把政治机关加强，使政治机关在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方面，大大地提高一步。请同志千万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思想战线的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杨成武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这次会议是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召开的，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这次会议非常重要，要解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会议开的很好，是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训练班。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富春同志、徐副主席和肖主任已经作了指示。聂、叶副主席也要作指示，林副主席还要作重要的指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还要接见到会的同志，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

我本来没有准备讲什么问题的，后来林副主席和叶副主席指示，要我讲一讲。我准备讲一讲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彻底肃清他们对我军恶劣影响的问题。同时，对我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中,如何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问题,也讲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毛主席经常用“树欲静而风不止”来警戒我们,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去年和今年同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志两次谈话中,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就可能渗透到上层建筑中来,渗透到政权中来,形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精辟地指出,一切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政治的斗争,是政权的斗争,是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就是结成一伙来夺权,要夺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权。实际上,刘、邓就是他们的后台。如果没有刘、邓的支持,他们是不敢这样嚣张、这样疯狂的。

我们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不能低估。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那就会千百万人的人头落地,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世界革命的胜利就会不知推迟多少年。

他们都有一套假象,很能迷惑人。他们的反动思想,有一定的市场,替他们吹喇叭、抬轿子的人大有人在,把他们揪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必须彻底地剥光他们的画皮,彻底地清算他们的罪行,彻底地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

去年以来,各军种、兵种、各军区和总部连续发生反党分子跳出来夺权的事件。如空军的,工程兵的,通信兵的,还有二炮的,沈阳军区的,总参谋部的,总政治部的,等等。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军内的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很尖锐的。我们总参谋部,就有王尚荣、雷英夫,疯狂地跳出来,要夺权。工程兵有谭友林,二炮有宋烈,空军有成钧、刘震等人。沈阳军区也有。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是有后台的。对这些事件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后台是什么人,不说自明。所以必须提高警惕,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

罗瑞卿是他们的急先锋,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急先锋。

罗瑞卿的罪恶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明目张胆地向党伸手,疯狂地篡军反党,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主要表现在:1、封锁林副主席。2、造谣、诬蔑、诽谤林副主席,挑拨林副主席和毛主席以及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3、向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出难题,百般折磨林副主席。4、公开向党伸手,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罗瑞卿的问题,林主席早就觉察了。林副主席为了挽救他,几年来,正式地对他进行过六次批评、教育。他不但不听反变本加厉。林副主席要他通气,非常严肃地、语重心长地教育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我这里,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而罗瑞卿仍然实行封锁,就连大比武这一件大事情,他都不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军委。这个大比武,是在南京决定的,毛主席不知道,林副主席不知道,军委不知道。叶副主席是主管训练工作的,也不知道。是他擅自决定的。许多重大的事情,他不但自己不去请示、报告,而且不准别人去请示、报告,谁去林副主席那里报告了,请示了,他就训斥、打击谁。今天在座的李作鹏同志就是挨了打的一个。他就告诉李作鹏同志,你以后不许到林总那里去。一九六五年五月初。我和罗瑞卿到上海去,林副主席又当面批评了他,又一次说他不通气,要他通气,并且当面给他规定了五条,那五条可具体哩!可是罗还是顽

固不改。

罗对林副主席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阴险得很。他让×××转告林副主席并亲自向林副主席说：“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了骨灰，也都是忠于林总的。”这是上午讲的。但就在当天下午，他坐飞机到广州，就同陶铸大肆造谣，诽谤、诬蔑林副主席。

一九六四年罗瑞卿的反党野心恶性发作。擅自决定大比武，妄图用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篡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制造毛主席批评四个第一的谣言，企图贬低四个第一的伟大意义，打击林副主席，挑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关系。罗竟敢当面向林副主席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说：“……还管什么事？……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屋子后，还在走廊里大叫“不要挡道！”这些都是在一九六四年干出来的。

到了一九六五年，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活动就更疯狂了，公开地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和罗瑞卿一起在民族文化宫看了戏。我一回到家，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我以为是有情况还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去了以后，他就大骂林副主席。他把陶铸造的谣也同我讲了。疯狂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他说什么如果突出政治是对的话，那我罗瑞卿不就犯了方向错误，犯了路线错误吗？大骂去检查×××师检查工作的同志，骂的很难听啊！他把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前前后后篡改了八次。到了二月十四、五日，罗就要×××向××同志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条。

这四条我们过去都讲过了。

在五月份召开的军委××会议上，又接连发生两件事。一是罗利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参加这次会议全体同志的机会，搞了一个大阴谋，带头并煽动各军区的同志向中央提出大量增加部队的定额。这个定额，提出最多要增加×××万，逼林副主席表态。第二个是要合并军区，要把××个军区，并成×个军区。第三个是要取消兵种，把兵种作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这些事情事先并没有报告、请示林副主席和军委常委，完全是向中央和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企图打击林副主席，挑起各军区对中央和林副主席的不满。这是一件事。二是罗瑞卿要用个人名义在军委××会议上作结论。林副主席知道以后非常严肃地说，××问题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作结论，只有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作结论。当天晚上，林副主席口述了一个指示，由他的秘书传给了军委××会议搞秘书工作的李静同志和我，也传给了罗瑞卿，并要把他的指示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宣布。林副主席在这个时候，就想把罗瑞卿反党活动的盖子揭开。罗瑞卿紧张了，半夜跑到林副主席那里，假装检讨，保证再也不犯了。林副主席再一次给他悔改的机会，打电话给我，要我不要传了，收回，看一看，将来他能改就好。林副主席还是想把他挽救过来。

可是以后，在军队六级以上干部的任免和调整级别等问题上，罗又公然反对林副主席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四月份，林副主席当面交代我，要我回来向军委办公室会议和总参、总政传达，六级以上干部（那时是中将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部长的任免要先报告军委各位副主席，得到同意之后，再报中央批准。结果呢，罗不执行。一九六五年五月中将以上的干部调整级别的报告，林副主席是不知道的，我举个例子，肖向荣是付兵团，定为正兵团，五级，林副主席是不知道的。罗瑞卿盗用了军委的名义向中央报告，是邓小平批的。林副主席批评他的时候，他竟然狂妄地说：“问题是在于做得对不对，不在于请示不请示。”你看他多狂妄！他专门搞突然袭击。听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大好的时候，他就去袭击，不先请

示林副主席，可不可以去，他突然坐飞机去，折磨林副主席。有那么好几次。

在总参政治部召开的突出政治、落实四好的座谈会上，他的谈话是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指示的。他以后又到广州、南宁、昆明，一路上在部队中大量散布折衷主义的谬论，系统地反对突出政治。

特别是林副主席看到罗瑞卿有一系列的造谣诬蔑反对毛主席的罪恶行径。罗多次说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

罗瑞卿对毛主席实行封锁。

罗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多年以来，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台湾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帮的斗争，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是一个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宣传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对蒋匪帮的一切作战行动，必须由中央决定。林副主席说：“打第一枪、第一炮、一个班、一个排的第一次动作，不是小问题，都是战略问题，只有最高统帅才能下决心。因为这个问题同外交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各国的政治态度联系在一起。政治统帅军事。”林副主席讲得清清楚楚，这个第一枪、第一炮、一个班、一个排的动作，过去了以后，你打几十万枪、几十万炮，几十万人的行动，都是比较小的事情。罗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非常清楚，但他却私自向福州军区布置说，今后海上作战，军区可以根据情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可以边打边报告”。他就这么干。直到福州军区请示总参谋部怎样执行罗的指示的时候，才发现他这个错误。中央军委纠正了他这个错误。

罗在民兵工作三落实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对台戏。毛主席自一九六二年以来对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前后作过四次重要指示，一再强调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军事落实。可是罗竟多次说，首先是政治落实，不是组织落实，公开地“教训”毛主席，指责毛主席没有把三落实的关系搞清楚。

罗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一九六〇年毛主席就指示要从主力军里面调若干个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罗瑞卿既不传达，也不贯彻执行，竟拖了五年之久。到了1964年六、七月间，毛主席又两次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严肃地批评了罗。罗瑞卿这才被迫布置，但他还是非常抵触，一面推卸责任，一面叫大家执行毛主席指示还可以打折扣。所以后来地方武装的建立，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直到上海会议后，才纠正了这个事情。

罗拼命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他反对林副主席提出的“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他说：“最高，还有次高吗？最活，还有次活吗？”他反对给民兵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任务，他反对向外国人宣传林副主席提出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

林副主席已经看透了罗瑞卿已不可挽救了，加上当时又发现了杨尚昆的问题。这个时候，林副主席才向毛主席报告处理罗的问题。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召开上海会议，揭罗的盖子。

毛主席对罗的问题早有察觉。毛主席几次在谈到罗的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罗的思想问题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个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

他总是搞几个人在一起。

毛主席把罗瑞卿看穿了。

罗之所以要把林副主席当作敌人对待，是因为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在全军、全党、全国和全世界有高度的威望，又是他的直接老上级，是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最大障碍。他要实现个人野心，就非攻击林副主席不可，他妄想把林副主席攻倒。如果他能够把林副主席攻倒，不仅军队大权可落入他们手中，而且为他们篡党篡国做好了准备。

先看看彭真在中央召开的揭发批判罗的工作小组会议上如何包庇罗。这个问题我再讲一讲。前天肖主任也讲了。归纳起来，他搞了四大阴谋。

一是六条清规戒律。(1) 只讲大问题，不讲枝节问题；(2) 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连别人，特别是不许牵连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3) 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要给罗抓辫子；(4) 工作小组成员发言要慎重，不要讲结论性的意见，发言稿要经过工作小组审查。实际上，就是要经过彭真和邓小平审查；(5) 发言的材料中要把可以证明许多关键性问题的叶群等同志的名字都去掉。这样，许多带关键性的问题都无法写上了；(6) 不要大家引用罗虐待公务员段光富同志的材料。

二是五个不准。(1) 不准写罗对四个第一的诬蔑；(2) 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肖向荣、×××、梁必业等人的关系；(3) 不准写罗向地方伸手问题；(4) 不准写罗恶毒诽谤攻击毛主席的具体事例；(5) 不准写罗作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充当了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

三是三支毒箭。第一枝毒箭是把林彪同志和军队推到反对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要在报告里面写上一条，地方上的文艺工作方针是有错误的，军队的文艺工作方针是正确的，成绩是很大的。他采取这样一个手法。林副主席讲，军队的文艺工作方针同样是错误的，林副主席识破了他的阴谋。第二支毒箭是以写一段林彪同志对罗进行过耐心教育为名，恶毒地攻击林彪同志。就是说，他企图诬蔑林彪同志，对罗瑞卿没有进行耐心的教育。第三支毒箭是以实事求是为名，恶毒地攻击会议对罗揭发和批判过头了。

四是五个追查。他气势汹汹地连续五次向我进行追查。(1) 追查工作小组关于罗的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是什么人起草的，什么人修改的；(2) 追查谁说文件温度不够；(3) 追查谁向林彪同志报告的；(4) 追查工作小组传达林彪同志的意见，到底是不是林彪同志的意见；(5) 追问我们对林彪同志的意见有什么意见。

林副主席及时地识破彭真的阴谋诡计，使他在关键问题上包庇罗的阴谋无法得逞。

彭真在历史上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这一件事情可能今天在座的同志不一定那么清楚。因为彭真过去吹牛，说他是一贯正确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他创造的，他是领头的。今天我们要把他这个画皮剥开。我讲的都是有文字为证的。彭真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忠实执行王明路线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彭真就把彭德怀在临汾会议传达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全部搬到晋察冀。他反复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说：“国共两党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任务。”他甚至大肆美化国民党的反共特务组织，恶毒地攻击我党对国民党的批评。他还提出要在“国民革命军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军队，统一作战计划和军事指挥”，在恢复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仍须保持旧有形式等等。这些材料多得很。彭真所传播的这一条彻头彻尾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曾使晋察冀局部地区的工作在

短时间内产生了束手束脚的倾向。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以聂荣臻同志为代表的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许多同志的坚决反对，这些地区的工作很快得到了扭转。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彭真参加了这次会议（聂荣臻同志未参加，留在敌后）。彭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份，第二次到晋察冀。这次本来是来传达中央六中全会决议的。可是他在晋察冀分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竟然公开歪曲中央的决议，仍然推行王明路线。

他连续鼓吹：“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不仅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

他宣传：“蒋介石是国民党中最有政治眼光的人”，我们“要竭诚地拥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要竭诚地拥护，一般的拥护还不行。

他大肆宣扬国民党的军队是“英勇善战的中央军”。他胡说什么“改编红军，为的使其成为统一战线的军队”。就是说，军队的独立自主性不要了，交给国民党，交给蒋介石了。

他荒谬地提出了我们党在“调节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立场与原则是：

(1) 公平合理；(2) 互助、互爱、互让；(3) 减少磨擦、分歧；(4) 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为难。”他还宣扬阶级调和，鼓吹“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互助，地主与农民之间互助。请同志们看看他是一个什么货色！他是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他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王明讲互助、互让，他还加了一个互爱。

彭真的手伸得特别长。他两次到晋察冀工作前前后后合起来只有两年时间。抗战八年，他只占四分之一，但他却盗窃了晋察冀工作成绩的果实。他到了延安以后，大吹牛皮，写了洋洋几万言的《关于晋察冀政策问题》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没有一句讲到军事斗争。在敌后抗日战争，离开军事斗争还讲什么呢？他到延安后，经常越过晋察冀分局，越过晋察冀军区，对冀中，对冀东等地的工作横加干涉，继续推行王明路线。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过去几年的工作就有了明确的指示，电报都在，我摘了一段，是这样讲的：“六年来，分局的同志以及晋察冀的全体干部党员和在边区的八路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创造和坚持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所给予的任务，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对晋察冀的工作作了全面的估价。可是一九四四年的八、九月，晋察冀分局召开的高干会，在彭真的指使下，不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不仅我们根本不知道，唐延杰同志那时是参谋长，他也不知道。中央一九四四年一月的指示，到了八、九月，高干会开了八几天都不传达，而且在这个会议上，还用极不正常的手法打击聂荣臻同志和以聂荣臻同志为代表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拒不执行中央关于整训部队、壮大部队的指示。中央在一九四四年七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要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对付国内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而他们还在那里拼命反对“轻敌速胜论”，拼命搞“精兵简政”。那个“精兵简政”可真是“彻底”啊！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才留了二十几个人。军区司令部也没有剩下多少人，唐延杰同志当参谋长没有事情干，到冀东检查工作去了。后勤部（那时叫供给部）还有八个人，卫生部还有七个人。结果抗日战争一到反攻的时候，完全措手不及，什么准备也没有，完全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所以晋察冀地区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相当长的时间，都没有翻身过来，要兵没有兵，要人没有人。大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呢？今天明白了。今天在座的同志都清楚的嘛，本来一个纵队三个旅，很好，三三制嘛，合乎林副

主席的要求嘛，他就是跟你砍掉一个旅。那一个纵队没有砍掉一个旅呀？你们过去大概不清楚这个事情，今天就清楚了嘛，就是他们干的。他们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彭真在东北实行的也是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正如伯达同志讲的，他实行的是国民党的路线，是美帝国主义的路线，是保护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他是反对以林彪同志为代表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解放后，彭真在北京市十几年，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彭真近几年来极力插手军队工作，同罗瑞卿勾结得特别紧。这是他反党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去年，他迫不及待地抛出二月提纲。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反党纲领。

下面讲讲刘邓的问题。

刘少奇在历史上是老犯机会主义错误的。解放战争初期，他就发表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对当时的对敌斗争起了极坏的作用。每一个纵队砍掉一个旅，是同他的错误分不开的。当时晋察冀边区就吃了他的大亏。晋察冀的不少同志提起这件事就有气。在当时敌我斗争那样严重的情况下，他不是加强战备，而是搞“精兵裁军”，这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思想的。以后有土地会议的形“左”而实右，村村点火，家家冒烟，扫地出门，“搬石头”。进城以后，同天津的资本家的谈话，以后接着反对合作化，刮单干风，一九六二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七千人大会上他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又一次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大吹王光美，到处做报告。一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他都是反对毛主席的，和毛主席唱反调的。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大毒草，是欺人之谈，流毒很广，必须彻底批判。他自以为了不起，和毛主席平起平坐的呀！每年国庆报纸上登照片都是登两个。他的照片和毛主席的一般大。替他抬轿子、吹喇叭的有的是。

再看看邓小平。

邓小平更是百般包庇罗。在上海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他就讲：“请军队与地方的负责同志来，不是来作一个决议，而是审查材料够不够对不对的，有出入的都可以提。林彪同志很重视这个问题，向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不三不四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在小组会议上公开说：“关于罗伸手问题，林彪同志说有，罗说没有，×××已死，死无对证。”他是不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是相信罗瑞卿的。他别有用心地用“死无对证”来否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及其他同志提出的铁证。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又向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讲罗的伸手问题，是“死无对证”。

这些事情今天在座的同志可能不清楚，所以要讲一讲。画皮不剥开，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上海会议后罗瑞卿回到北京以前，有一天下午，总理和邓小平去同罗瑞卿谈话。邓小平带着他的老婆一起去看罗瑞卿老婆。她一上楼梯就大哭特哭，痛哭流涕，哭啊，哭得一塌糊涂，把警卫员、副官都弄得莫名其妙，问是怎么回事。她上楼后，房子都没有走对，警卫员给了她手巾，擦完了眼泪，就钻到罗瑞卿老婆的房子里，关着门又大哭特哭。你们看一看嘛，这是什么感情！他们是有他们的阶级感情的。（肖华同志：郝治平的家庭是个恶霸地主，邓小平的老婆是宣威火腿总经理的女儿）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观人先观其友。罗瑞卿回到北京后，

一直到他跳楼自杀（未遂，因为他跳冰棍，如果他不是跳冰棍，脑袋冲下来就摔死了，他那是吓唬人的，不是真的想死），整整三个月，不仅不检讨错误，而且还狡辩。现在很清楚了，这是因为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在支持他。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中央召开工作小组会议批判罗瑞卿，邓小平在这个会议开场的时候（因为他是三人小组的组长嘛，三人小组里一个邓小平，一个彭真，还有叶副主席），当着罗瑞卿的面说了这么一段话：“罗总觉得冤枉，有委屈，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党从来不强迫人承认错误。”实际上他是告诉罗不要承认错误，我支持你。他是领导小组的组长，可是会议开始两三天后，他就借故到西北去了，留下他的打手彭真跟叶剑英同志捣乱，以后连彭真也跑到成都活动去了。直到会议结束前一两天后，在总理的催促下，他们才回来。回来以后，邓小平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又作了一个结论性的讲话，他对罗瑞卿跳楼自杀十分惋惜。他说：“他为什么自杀呢？如果你罗瑞卿认为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允许保留，党中央有这一条，你罗瑞卿为什么要自杀呢？”

会议过程中，彭真包庇罗捣乱活动，据说都是和邓小平商量过的。

罗瑞卿的公务员段光富同志揭发的材料好得很，揭发了罗不少见不得人的脏东西，但是邓小平和彭真坚决不同意印发。

这里我还要讲一件事，去年的二月份，就有人从千里之外给罗瑞卿送桔子，用飞机送来。空军的同志报告我，问给不给他？我讲给他，要懂得这个不是物质桔子，是政治桔子。千里之外送桔子来，是支持他反党嘛！现在，这个人很清楚了，就是西南的×××夫妇。他们对罗瑞卿真是关怀备至，大力支持！

邓小平是反对毛主席的。过去有的人不了解，说他是一贯正确的。这张画皮要剥开。他是长期封锁毛主席的。毛主席早就批评他搞独立王国。

邓极力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在去年二月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提出“以实带虚”反对政治挂帅。他还说什么地方学习解放军，要充分注意企业特点，说军队就是停止一个月，专门搞政治工作也不要紧。这是什么话？他是诬蔑解放军，说解放军没有事情干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他的这些话，是在上海会议以后说的。性质就更严重了，更恶毒了。

邓小平认为自己有两大功劳，一是他认为淮海战役有了不起的功劳。这个问题要戳穿，谁都知道，淮海战役从头到尾，整个的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在前线工作的有刘伯承同志等许多人，有广大群众的努力，怎么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呢？他自认为“你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从南京打到成都”，“你有辽沈战役，我有淮海战役”，自以为了不起，他把大家的功劳都归到他的帐上。他在《毛泽东选集》里面，特别注了一条，他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书记。这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其他的人都不算帐。另一个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修斗争中，以反修“英雄”自居，这也要戳穿。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伯达同志同我讲的，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篇文章，邓先在北京搞了一个班子，写了若干条，当时彭真他们大加赞扬，认为了不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认为不行。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在伯达同志主持下又重写，是在杭州写的。当邓知道毛主席亲自领导重写时，他还打电话问彭真：用杭州的稿子，还是用北京的稿子。他是不赞成用杭州的稿子的，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的。毛主席最后决定用杭州的稿子。这就是公开公布的《二十五条》，这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写的，他吹牛《二十五条》是他写的。

邓小平当红军政委时犯的错误, 肖主任讲了。

刘少奇、邓小平的这些事情, 我在中央的会议上, 当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面讲过的。今天在这里和同志们也讲一下。

毛主席说, 多少年来, 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 个别的人物。此外, 还搞了一些文化的斗争, 在农村的斗争, 在工厂的斗争, 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是没有找出一种形式, 一种方式, 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解决了这个问题。群众大革命运动的洪流冲刷了我们的黑暗面, 揭发批判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并创立了新方式, 自下而上的夺权。毛主席支持这种夺权, 现在广大革命群众正以“万里东风扫残云”之势, 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全面夺权的决战。形势好得很, 是一片大好形势。我们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还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 是资产阶级首先向我们宣战, 我们也要向他们宣战。

我们非常幸福地参加了, 经历了这一场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近一年来的惊涛骇浪般的阶级斗争, 对我们震动很大, 真正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我们在这不到一年的斗争实践中所受到的教育, 比过去几十年受到的教育还大得多、深刻得多。

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教导,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意义和取得的伟大成果作了精辟阐述。林副主席说, 这是一场不拿枪的全国性的大内战。决不能轻视不拿枪的敌人。他们可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不拿枪的敌人可以转化为拿枪的敌人。不拿枪的战斗可以转化为拿枪的战斗, 如果转化了,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 就可以避免拿枪的战争, 避免历史的大曲折、大反复、大破坏, 避免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大损失。所以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很大的, 对我们避免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命运, 作用很大。这不仅是保证我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重大措施, 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也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军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指示, 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紧跟毛主席, 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坚决完成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光荣伟大的任务。

林副主席说: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 是当代伟大的天才。” “毛主席是我们时代的代表, 是党的代表, 是群众的代表, 是无产阶级的代表, 是群众的领袖, 是群众的灵魂, 毛主席和群众是一个整体, 好象一个人的头和身子一样不可分的。”林副主席又说: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 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当代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林副主席对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最高度的颂扬, 说出了我们心里话, 表达了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 最最真实地反映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起到最杰出的舵手的伟大作用。

林副主席教育我们, 对毛主席必须坚信无疑, 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林副主席说, 站在那一边, 这是头等重要的问题, 是标准的头等重要

的问题。它统帅一切，统治一切，不是平等的。站错了立场，一切都错了，全盘都错了。如果立场错了，本事越大越反动，越是人民的敌人，不如一条牲口。

林副主席以实际行动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是我们的典范。他四十年如一日，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最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同各种“左”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捍卫了毛泽东思想，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对毛泽东思想精辟的阐明，创造性的运用，有非常高的水平。林副主席大力号召全军全党全国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并使这一运动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不断提高，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使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中大普及，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促进全国人民思想革命化。这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取得共产主义事业彻底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这是林副主席最大最突出的功勋。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最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理论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经过长期的考验观察，决定林副主席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众望所归，当之无愧。

林副主席对如何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作了许多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指示，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忠实地积极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把全军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最大最首要的支援。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世界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我军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这就是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保卫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建立了丰功伟绩。我们一定要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切指示。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指示我军要担负起支左、支农、支工和军管、军训的任务。这是毛主席对我军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重托，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

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接到最高指示以后，闻风而动，坚决贯彻执行，派出了大批干部、战士，深入农村、厂矿、学校，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坚定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旗帜鲜明，方针明确，立场坚定，毫不含糊，坚决完成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

在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夺权斗争中，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支持了革命左派，对保证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在支援农业和工业方面，全军已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深入到县市、公社、厂矿和学校，广泛地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宣传党中央各项重大政策，同广大的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师生一起大学毛主席著作，一块闹革命，一块劳动。这本身就是真正贯彻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的战略方针。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一经同广大群众见面，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大提高，生产状况大改变。这样的例子很多。

在实施军事管制和保护重要目标方面，已军管和保护了不少的单位，对这些

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进行和正常工作、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事实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非常英明的、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紧紧地 and 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严密组织，全力以赴，把支左、支农、支工等项工作搞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绩。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绝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我国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怕得要命。他们除在政治、外交上大肆对我进行诬蔑攻击，加紧反华活动以外，在军事上也在制造紧张局势，妄图对我进行破坏和捣乱。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战场上，愈陷越深，为摆脱它进退维谷的困境，在苏修的积极配合下，妄图以炸迫和，想炸出一个和平谈判。不断扩大战争，逐步的升级。现在越南战场的美国军队有四十三万，伪军六十二万，南朝鲜、澳大利亚等帮凶军大约五万多，总数（美军、伪军、帮凶军）约一百一十多万。飞机有一千三百多架，其中包含伪军飞机四百五十多架，还有美国第七舰队的配合。最近美国的主要动向是：正在开关岛会议，调整、加强在越南的指挥人员，和加强在越南的侵略力量；启用了在泰国的机场；美舰对于越南沿海地区的炮击逐步向北推移；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不断扩大。

最近美机、美舰侵入我国领空、领海进行军事挑衅的增多了。这个问题要注意。特别是在北部湾地区，美机入侵更加频繁。

蒋匪帮也正在积极地加强战备活动。蒋匪帮很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有机可乘，因此使用一些部队，对我东南沿海进行窜犯袭击是可能的，尤其是使用小部队从空中或海上对我进行袭扰的情况，随时可能出现。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估计和很好的准备。

苏修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掀起了新的反华高潮，在军事上也进行了一些配合的活动，加紧边境紧张局势。另外他们还组织“还乡团”，妄图内外勾结搞颠覆活动。对这些问题，我边防军区特别是边防部队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戒备。

对当前的工作提点意见：

1、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场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运动，是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党、国家永不变色的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一定要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对我军的恶劣影响，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大立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这是我们最大最根本的战备。

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部署，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已有安排，我军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等任务，就是最实际最生动的阶级教育，是最好的政治课，可以使我军更好地经风雨，见世面，受教育，受锻炼；学会做

群众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更好地和工农相结合，当好群众的学生，虚心地向工农群众学习；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大地促进我军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增强部队战斗力。部队的军事训练，各军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安排。总参不另作安排。

2、加强海、边防斗争和防空作战。

东南沿海、边防军区和海、空军，要切实掌握敌人的动向，加强对当面敌情的分析研究。东南沿海地区第一线守备部队，必须切实作好战斗准备，搞好军民联防，随时粉碎敌人可能的突然袭击和破坏活动。各边防军区，应加强边防站的工作和边防地区的群众工作，主要的又是加强少数民族的工作，搞好政治边防，以加强边防的对敌斗争。各部队应切实搞好通信联络，一旦有事，能够随时执行作战任务。

3、调整、压缩国防工程任务，抓好重点工程的建设（略）。

4、援越抗美（略）。

同志们，今年我们的任务十分繁重，责任非常重大，各级党委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抓住重点，统筹安排。必须加强集体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地贯彻毛主席、党中央所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开展四好运动，大抓狠抓活思想，大兴三八作风，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战胜一切困难，圆满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赋予我们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伟大光荣的任务，立下新的功劳，作出新的贡献！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各总部、各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各军、各军兵种、各院校：

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军委决定：

一、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这些单位究竟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党委讨论决定。

二、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包括各军区所属的这些单位），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样做，既可以增加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力量，又可以使这些单位的人员，更好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促进思想革命化。这些单位的整风何时结束，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党委讨论决定。

三、各总部、军兵种（包括在北京的所属院校）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区的院校抽调的人员，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第一，讲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第二，讲主流、支流的问题；第三，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前几年，毛主席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问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

级专政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可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面，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却变得容易被忽略，好象没有阶级斗争了。我们毛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毛主席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大发展了。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讲过，自从有了文字以后的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从原始公社崩溃瓦解以后，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列宁更进一步了，他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尖锐的阶级斗争。

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古今中外，阶级存在的社会领域里面，最基本的问题，影响一切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每一个人在思想上都有阶级的烙印，没有一个人不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总都是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一定的阶级。这种社会阶级是人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现象，区别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区别于将来的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阶级存在的事实，经历几千年的历史，贯串于各个方面。这种阶级斗争的存在，来自一定的经济基础，反映到上层建筑，就形成了政治、法律、文化、宗教、道德、政党、政党里面路线的分歧、政策上的分歧、社会上的风俗习惯的差别。这些分歧和差别，处处都有阶级的烙印，处处都是由于阶级、阶级斗争这个根源引起的。

因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阶级社会的现象的总的根源。离开了这个总根源去观察社会现象，就观察不出来，就会观察错了，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这个客观的存在不是不影响我们的思想，而是或者不知不觉地，或者有意识地，自觉地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共产党，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来影响我们的思想，自觉地指导我们的思想，自觉地指导我们的路线，指导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和政策，如果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我们观察人，观察事，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如果我们不自觉，不重视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不注意阶级分析，就会变成客观主义。而客观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体系。这种客观主义的思想，在表面上是否认阶级的。但是，实际上用这种形式来掩盖它的阶级面貌，阶级的愿望，阶级的政策，阶级的行为，便于欺骗群众。

整个的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处在阶级、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通常采取三种斗争形式来进行，一种是思想战线；一种是政治战线；一种是经济战线。可是这

三样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有的时候以这一个为主，有的时候由那一个为主，可是它总不是孤立的。所以，它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东西。

阶级斗争在各个时期，由不同的阶级来出现，采取不同的阶级对抗形式。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等。当然，每一个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在不同的阶段，每一个国家都有两个主要的对抗的阶级。但是，总会有其他阶级的残余，或者新的阶级的这种苗头。

我们的国家，正好如毛主席所说的，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对立、对抗、斗争都成为我们全部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一个总根源。不把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现象，那就把事情混淆起来，是非颠倒起来，就是回到一种所谓全民观念，就会把个人看成是孤立的个人。人哪，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他总是社会的人。正如医生给我们验血的时候，他抽出一滴血来，就看出全身的红血球和白血球，酸性和碱性的这些变化。这一滴血就代表你的全身。你一个人的活动，就是一个阶级整体的一种表现。

所以，没有这种无产阶级观念，看一个人就会看错了。对于每个问题的评价，每个问题的作法就会不同。例如：对老干部的看法，就可能认为一切老干部都好得很。其实，对老干部，是必须做阶级分析的。有很多老干部是保持了原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可是有些老干部，进到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跟得上，没有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而是停留在旧的民主革命阶段。有些就蜕化变质，变成资本主义分子，变成新的资本主义分子。他到底怎么样？是好，是坏？只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不会是通通变成资本主义分子，也不会是通通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的看法也是这样：或者说这些青年在冲你那个单位的时候，就说他们通通都是坏的；或者是另一种观点，说他们通通都是好的。其实，在现在还有阶级的社会里面，很多人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但一定还有属于资产阶级的分子，以及其他的社会成份，地、富、反、坏、右分子。干部的子弟也是这样子，有的是无产阶级分子，有的蜕化变质成资产阶级分子。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所谓“乱”的问题也就看不清楚。实际上，这次的乱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的方面，是把敌人、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头头、社会上面的资产阶级的头头，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打乱了。这样的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很好的事情。当然，是两方面对立的斗争，无产阶级这方面也有个别误伤的，干部中间也有个别误伤的。但这是个别，而且可以保护下来。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文化的看法，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只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才能甄别出那些是好的，那些是坏的，而没有这种观点就甄别不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阶级斗争。这次斗争，首先是资产阶级发起的，然后，无产阶级反击。首先是通过思想斗争，然后逐步进到政权的斗争，以及经济上的斗争。整个斗争中间出现许许多多复杂的现象，但是，辨别那些可取，那些可舍，那些是是，那些是非，只有从阶级的观点上，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就是说，从阶级、阶级斗争这一个总根源，才能够弄得清楚。

在我们党内，毛主席是最正确的，是革命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而刘、邓是

错误的，反动的，代表资产阶级。一个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就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这个阶级斗争，不会是一个短时期的斗争，是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斗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划时代的著作中早就指出：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又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估计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许多人在不同的程度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方面的倾向和无产阶级方面的倾向。只有毛主席这种最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准的人，才能排斥、克服、肃清资产阶级的这一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准稍微低一点，在自己脑子里面，就多多少少还存在着这两个方面的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政权是在较短时间可以完成的。推翻它的所有制，短时间也可以完成。可是，推翻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在思想里面的阵地，这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这个战线上如果不打胜仗的话，那么，政权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可以前功尽弃，我们一些老革命过去所奋斗来的这些成绩，革命的果实，广大人民所奋斗来的这些革命果实，可以悄悄地被资产阶级偷去了，窃取了，或者明火执仗地把它夺去了。

因此，我们应该在思想战线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展开持久的斗争，我们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才能够保住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和向前发展。不然的话，政权要悄悄地改变颜色或者要发生剧烈的反革命政变，资本主义所有制要重新代替社会主义所有制，地主富农的所有制要重新代替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所以，这一个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决定中国的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因为就现时说，中国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任何国家，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要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影响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重要的大事，关系国家命运，关系人类命运的大事。这是无产阶级进行的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战胜一个阶级，或被一个阶级所战胜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特别加强阶级的观念，阶级斗争的观念，我们才有劲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有决心来进行这场文化革命，我们才能够跟得上毛主席在文化革命中间这种伟大的气魄和勇气。不然，我们老是跟不上，而且老是犯错误。本来这一个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可是在新的情况下，重新提醒，那还是有作用的。我们写的座右铭，不是天天贴在那个地方的嘛，背也背的来，但是经常看看总会有点好处。而且今天尤其必要。今天的思想动态，今天的活思想，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实际上存在着这个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

第二，就是讲讲主流和支流的问题。

毛主席有这样的话：“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

方面, 主流方面, 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 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 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 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 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这是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不看清楚主流, 就会发生迷失方向的问题。任何时候的事情, 总是有主流和支流的, 总有顺的地方, 有逆的地方, 有正的方面, 有反的方面, 不会只是一个方面。可是这两个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是绝对平衡的, 都不会是半斤八两的, 它总是有重有轻, 它总是处在变动的中间, 一下这个轻那个重, 一下这个重那个轻。它不会象机械那样保持平衡的, 机械经过过细观察的时候, 它也是在变动的, 至于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肯定是有两个方面, 两个方面不会一样, 肯定有一个方面是主, 一个方面是次。

现在我们看看这次文化革命到底主流是主要的, 还是支流是主要的。当然, 主流是主要的。可以说这场阶级斗争中, 我们是打了大胜仗, 得了大胜利, 中国人民的大胜利, 人类的大胜利, 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的看法。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 我们就认为, 不要怕乱。这次果然经过这个乱出现了很多的好事情。我找了一些同志谈了一下, 他们高兴极了, 情绪非常之高, 他们觉得好得很。经过这一个乱, 就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 头目, 和四旧, 打得狼狈不堪。对他们来说, 是真正的乱, 使他们遭受惨重的失败。他们会感到是一种惨痛的失败。不经过这样的大的运动, 要想取得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是不能够打倒他们的。运动搞出了很多的牛鬼蛇神, 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如果不揭露、不打倒, 他们就要公开推翻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个这一套。我们通过一个表面上很乱的形式, 把他们打倒了, 这是伟大的胜利。当然, 假若他们夺权以后, 得势以后, 革命群众还会造他们的反就是了。可是那时的牺牲, 就会比现在大的多。这从表面上看来, 好象是乱, 也付出一点代价。但是, 我们的事业是在向上发展。例如生产, 有些地方还上升。抓一下就上升了, 今后抓下去, 还会大高涨, 会出现新的高潮, 新的兴旺的高潮, 发展的高潮。所付的损失, 少数人觉得很大, 其实, 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 也比不上我们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甚至比不上一次小的战役, 一场不大的流行病。当然, 毛主席是从头到尾强调文斗, 不要武斗。所以说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 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可是, 有的同志看到自己的几个熟人挨了一下斗, 就觉得天下整个都黑了, 就很容易产生这种错误观念。其实, 那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而且属于很末尾的现象, 很次要的现象。我们看到打倒那一批坏家伙, 这就是伟大的胜利啊! 如果不打倒他们, 将来还要大流血, 他们得了势, 就会要实行大白色恐怖来镇压革命群众, 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就是了。正像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提醒我们的: “那就不要很多时间, 少则几年、十几年, 多则几十年, 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 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 变成法西斯党, 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假定那种情况出现, 我们革命人民还要用革命战争反抗他们, 推翻他们, 那样还要死好多人。

这一个主流、支流的问题, 是很清楚的。

另一方面, 不经过这一个运动, 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很多好人也看不出来, 接班人也看不出来, 新的苗子也发现不了。在这一次斗争中间, 坏人固然揭露了, 斗倒了, 斗臭了, 斗垮了, 好人也涌现出来了。这就保证了今后的百年大计。许多好人, 很多无产阶级革命派, 他们涌现出来了。不然, 他们是处在九地之下, 压得很低, 冒不出头来。打倒了坏人, 发现了好人。没有这一场革命,

坏人打不倒，好人发现不了。我们的领导将来就可能落在坏人手上。这次革命是最好，是采取打倒他们的最好的办法：搞红卫兵，大鸣、大放、大字报等等。红卫兵就是捉拿牛鬼蛇神，捉拿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子的天兵天将，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起最主要的作用的是，还是我们毛主席。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党内走无产阶级道路的同志，广大的群众，广大的革命左派。

同时，除了打倒坏人，发现好人以外，还挽救半好半坏，差一点要滑下去的人，挽救了一批干部，使他们悬崖勒马，及早回了头，没有更深地陷下去。经过这场大震动，使这些同志不陷下去。和平生活过了十七年，有些人是变了，有些人也到了边缘上，这个运动，是把为数不少的人挽救了。

坏人打倒，好人发现，中间这部分人挽救过来，这是重大的成绩。我们打倒的那些，不是凭一个宗派的原则去打倒的，而是根据一个政治的原则，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这样的原则来打倒，或者是发现，或者是挽救。这是有原则的。不管那个山头，只要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面，站在毛主席这一面，我们这一次统统是保的。不管那个山头的，站在反无产阶级的这一面，站在反毛主席这一面，反社会主义这一面，那就有的要打倒，有的要半打倒。这样，就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这样子，今后所出现的局面是根本不同，会保持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革命的政权，是清除了那些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思想革命化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生产更加发展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更便于对抗外来侵略战争和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镇压颠覆活动的政权。这样的政权，也就能够保证我们更顺利地应付各种困难、天灾或者人事方面变化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方面，胜利是很大的。

同时，在思想方面，就是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一个大的革命，把新的思想——毛主席思想空前地普及，把人们的精神面貌、政治水平，都提高了。毛主席的思想可以说变成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小孩儿都能够讲得出几句毛主席的话来，这是一种很好的气象。思想上的这种变化，是很大的。今后还要继续地坚持下去，把毛主席的思想变成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行动的指导，必修的功课，这是保证我们不走错误道路、保持革命到底的重大战略措施。

这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苏联没有进行，因此苏联人民受了大害。伟大的十月革命，到今年恰恰是整整的半个世纪，可是，现在苏联的领导集团不但没有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相反地，他们倒退了，他们倒退了。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前后沦落为修正主义国家，成为变相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变相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成为变相的法西斯国家，用最欺骗的面貌来欺骗群众。

我们有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智慧、魄力、经验、威望，举行了这个史无前例的震撼全国、全世界的大运动，这是有伟大的意义的。不然，我们经过二十八年的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和十七年、十八年来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付之流水，付之东流，可以前功尽弃，可以毁于一旦。毛主席所进行的、所发现的、所领导的这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影响全世界，如同列宁、斯大林建立了在一个国家之内取得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胜利。

我们一九四九年那个时候的胜利是个什么胜利？是夺取政权的胜利。这一次是保卫政权，巩固政权的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一些国家实现了，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那里被资产阶级用狡猾办法，资产阶级的影响，剥削阶级的影响，

外国的帝国主义的影响，自己本身产生的一批资产阶级分子，把政权变了性质，国家变了颜色。阶级斗争是不能以调和的办法解决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条定律，如同数学上、物理学上、化学上的定律一样，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定律，是不能掩盖的。对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只有把它揭露，只有把它暴露，只有把它打倒，只有把它战胜。你不打它，它要打你。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树不动，风总是要吹得你动。这是流传的语言。这句话有道理。其实，我们不是个树，我们应该成风，我们要刮他们的风。当然，他们要刮我们的风，但我们也要刮他们的风。我们刮他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来摧垮他们。单纯的消极防御不行，要采取主动的进攻。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防御是必要的，但是后来这一时期采取主动的进攻是尤其必要的。今后有的时候还可能转到防御，但有的时候还采取大规模的进攻，或者小规模进攻。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要看到事情的两方面，要看到那一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不看到主流这一方面，只看到自己一些老同志挨点整，就把整个天下都看黑了，那就全错了，那就糟了。那就上敌人的大当。

看不到主流，就会迷失方向。而且，毛主席已经及时地采取了一些措施，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政策，来去掉支流中那些不那么健康的东西。我们要看到，不管怎么样，要看到这个伟大的胜利，要欢呼这个胜利，庆祝这个胜利，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讲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上教导我们：“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主席还经常说，我们军队不仅仅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不但要会打仗，而且要会做群众工作。这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教导。从红军时代直到最近。所以我们军队同世界上的一切的军队不同，其他的军队就是个打、就是打仗，其他的不管。我们军队还担负着这样多的任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军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军队不是单纯地执行军事战斗任务，应该义不容辞地、责无旁贷地来支持地方。军队和地方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军队离开地方就不能存在，不能存在，不能存在。地方越搞得越好，你军队就越好打仗嘛，地方越搞的不好，你军队就越不好打仗嘛。兵员靠地方，吃的靠地方，穿的靠地方。打仗的时候，封锁消息，切断敌人的电话，都靠地方嘛。侦探敌人的消息，伤兵抬到后方去，都靠地方嘛。所以，不把地方搞好，军队就好不了。在座的同志们有不少是经过长征走过草地的吧，那个时候沿途就是没有地方工作。我们的人，老实讲，给国民党正规军打死的不多，主要是给地主武装打死的。我们那个部队，过草地这一段，国民党没打倒几个人，主要是没有根据地饿死的。在江西的时候，一个连一百多人，后来一个连就只剩下了二三十个人，十来个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搞好地方工作。毛主席有个老办法，要打仗先要创造战场。什么叫做创造战场呢？就是把我们的军队分散，以连为单位，以排为单位，到处去打土豪，分田地，帮群众建立党，建立政权，做群众工作，让那个地方变成根据地。变成根据地了，敌人进来的时候，就进入了迷魂阵，我们在什么地方躲着，他们都搞不清楚，结果他们就是草木皆兵，一草一木都变成了红军，即使没有红军的地方，他们也觉得有红军，要拿队伍去对付，有红军的地方反而没有去对付，结果就遭我们的袭击，他们在整个的战争中都是被我们袭击打败的。我们所进行的人民战争差不多都不是那种堂堂之阵，那样子摆开来打的，

而是在群众的掩护之下，把他们打掉的。但有的时候没有群众，我们就困难了，例如，刚才我讲的长征啦，过草地啦。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到了那些没有群众工作的地方，又重新吃了苦头。兵没有补充嘛，粮食没有嘛，消息被封锁嘛，被反动派欺骗的少数人还放冷枪，这些，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中央苏区那么点队伍，能够抗击几十倍、十倍、八倍的敌人，可是一脱离了根据地，困难就多啦，人家就敢向前冲，我们就怕有伤兵，一个伤兵就几个人抬，士气就不旺。所以，搞好地方工作是个大事情，从军队的观点来说是个大事，从全国来说那更加是大事。

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有些当然搞过了，不同的程度搞过了，但是没有这样的抽出军队去这样搞。至少十七年来没有这样子搞过。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勇敢的、负责的、积极的来承担这些责任，来完成任务，但另一方面因为是新的，又是复杂的，所以搞得不好就要犯错误，或者是犯右的错误，或是犯“左”的错误，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军队，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实行军管，用了很多干部，十七年来还没有这样干过。这个事情是要看到有一种危险，有犯错误的可能。我们一方面要勇敢执行任务，但是要非常谦虚，非常谦虚，要非常细心。

支援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在革命的期间，当然应该以革命来带头，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搞生产。所以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但也不能等量齐观。革命期间要抓住革命。就是将来这个大运动过去以后，也始终要由革命、由政治来领导经济建设。但不等于说，我们一到地方就只搞革命，放松了生产。生产是不能放松的，生产放松了，会发生非常大的危险，会转过来破坏革命。因此，我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就重要性来说，要把革命摆在第一位，可是就时间上来说，生产时间应该占得多。

一般的说，生产的时间要更多。文化革命和生产，二者是统一的，但又是有所差别的，要分别对待。

地方有各派，左、中、右，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而不能站在右派那一边。我们派出干部的时候，要交代清楚，自己本身就应该是很好的左派。你派一些右派分子或者政治上糊涂的人去搞，他一定搞不出好事来，一定不会或者不懂支持左派！所以要站稳立场，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阶级问题，要站稳阶级立场，站稳这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样子的支援，就是好事。不然，可能帮倒忙，那就危险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楚的头脑，不能有点含糊。但是，左派、中派、右派有时搞不清。有搞错了的，本来想支持左派反而支持了右派，所以一定要照毛主席的老办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老办法，就是要唯物论呐！要调查研究，搞清呐！

我们支持左派，支援地方，首先应该从思想上支持。现在各个地方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办法，是大家创造的好办法。就是这么办，就要思想上的支持。毛主席思想，党中央的政策，同群众结合起来，变为群众自己的政策，自己的思想，群众自己懂得了，他们动起手来办，比我们包办代替，那就好多了。只要他们知道这一套思想，这一套政策，没有我们去，或者我们走了，他们也完全能够

办好！否则，你人在，这一套就在，人走了，这一套也就走了。能够扎下根来的还是思想。所以，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保证我们国家兴旺的最根本的措施。我们在军队内部固然要如此，到地方上，也要把思想工作这件事当作最主要的事情来办。

刚才讲到了要注意调查情况、弄清情况以外，还要报告请示，碰到重大问题要报告请示，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当然是对的。这种想当然，自以为是，常常同党的口径、党的政策差的满远！满远！满远！才不是那么回事情！才不能那么办的！所以重大的问题一定要向上级报告请示，要养成报告请示的制度。现在军一级的同志要办很多事，你们就是要经常向中央报告请示。

不能随便抓人，的确查清了是很反动的头头，不得已才抓起来，一般的少抓。我们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们要掌握这个政权，实行这个政权的专政职能。但是，多抓不如少抓好。几个很反动必须要抓的，一定要断然抓起来。

一般地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要开枪。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用不着开枪。有个别同志性情急要开枪，可不能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示。

我们搞军管的，是革命的“三结合”还不成熟的地方。军管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的作法。因此，一切事情，还是要支持地方的新生力量，左派的力量，把他们支持起来办事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整个的工作不能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只能协商，只能帮助，只能临时代管。有些同志可能调到地方去做工作，这是另一回事。在军队没有撤回来之前，一定要搞好一个新的班子，搞一个好的班子，不能马马虎虎地走了。原有的班子我想是有五种情况：一种是基本上好的，只有个别坏人；一种全部烂掉了的，那只好搬掉了；一种呢，烂掉一半，那就只搬掉一半就是了；一种呢，烂掉了一小半，那就搬掉一小半就是了；一种是烂掉了大半，那就搬掉大半就是了。总而言之，不能一概搬掉，也不能一概保留。要分清楚五种情况，分别处理。要看具体情况，分别处理。总的原则，就是团结大多数，要很具体地体现毛主席所说团结百分九十五这样的道理。

这次搞好一个好班子，是百年大计。政权就是这个班子的问题，班子搞好了，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保证，毛主席的路线能推行。一个坏班子，就不能够保证毛主席路线的执行，不能够保证无产阶级的利益，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向前发展。所以搞一个新班子，是当前面临着的一个迫切事情。怎么才能搞好一个新班子，是大问题。我们搞军管的时候，要把这个问题，很慎重很慎重地来注意，而不要把这样一个政权问题，轻率地处理。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嘛！你不通过政权，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嘛！你不通过政权，文化上问题不能解决嘛！那些反动东西就没法打它嘛！所以，一切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政治，归根到底是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是毛主席讲的，我们要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关于支援地方，现在还没有成套的经验。初步想到这些。

我们要看到，这些任务很大，很重，又新，我们要勇敢负责，但是要很谦虚谨慎，这许多必须注意。当然，应该注意的事，还绝不止我上面说的这些，你们还可以讲许多，工业怎么搞，农业怎么搞，军训怎么搞，等等。我们必须边做边总结经验。这是我们毛主席历来的作法，也是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

我总共讲的问题，就讲完了吧！三个问题：就是阶级观念，主流和支流，支援地方。这些问题已经提过，现在只是一提再提吧！三令五申吧！注意又注意吧！

无非是起这个作用。

另外，我讲一个单独的零碎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一个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财富。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一切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谈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指林彪三月二十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依靠群众。这一条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作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从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与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一条，组织性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区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动作很慢。

三、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肖华对总政治部直属单位的报告

〔地点：人民大会堂。李曼村、谢镗忠、徐立清、袁子钦到场，总政直属单位参加。〕

一、加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1、广泛地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辉煌战果的深远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防止和平演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国我党永不变色的伟大政治活动，是触及人们灵魂，破四旧，立四新的思想大革命。一句话，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的运动。

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支柱，所以这对我们的军队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保证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领导，敌人复辟必然要注意到军队，我们必须更加革命化，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好的军队建设，是最好的战备工作。

中央、省委一级揪出了 60 多个，南京揪出了副政委是个叛变自首分子。我们就是要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挖出隐藏很深的牛鬼蛇神，主席八次接见了 1200 万群众，领袖和群众打成一片。

红卫兵的功勋不能抹煞的。千百万的青少年有可能培养成接班人。这次运动比过去的历次革命都来得更加深刻及更加汹涌澎湃。（列举许多事例）越往后就越会看到他们的成果和深远影响。另外世界人民和世界上的敌人也都有反映。人民都说好得很，敌人都说糟得很。

我们要向社会广泛的接触，抓活思想，用阶级分析方法看问题，立场要站稳，不要只看支流，表面现象，要看到主流和本质。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要只看到眼前，不看到长远。

2、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深入批判刘邓反动路线。

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写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揭开了党中央阶级斗争的盖子。去年是刘邓的总暴露，其实从 57 年以后就开始了。从党内党外向我們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毛主席说：“我们也要全面的反击他们，我们就运用大民主的方法，我们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对刘邓的问题毛主席早就警告过我们，第一次在 62 年（或 64 年）说过：“北京，中央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我们不理解，觉得把彭真挖出来就差不多了。毛主席就是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把党内的定时炸弹挖出来啦！在十一中全会上，揭开了刘邓的盖子。在许多重要历史关头，危险局面，都是毛主席亲临指挥，转危为安（举了历史上的例子）。与陈独秀作斗争，第一个就是毛主席，井冈山上第一面红旗是毛主席打的，当时有不少人是悲观的；在建军问题上第一个提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思想的是毛主席，古田会议决议就是纠正各种错误建军思想；1935—1936 年党内产生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路线，彭德怀是最坚决执行的一个（举了一个例子，彭德怀攻打长沙）。毛主席第一个反对了打大城市，撤回到江西根据地，毛主席成功地领导了一、二、三次反围剿；以后王明路线剥夺了他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派他到长冈乡去调查；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使 6 个根据地只剩下来一个，三十万红军只剩下了二万五千人，毛主席在长征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与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遵义会议是我党我军的历史的转折点，挽救了我党我军，就是因为确立了毛主席，毛主席路线的领导。长征途中又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逃跑主义作了斗争，再一次挽救了我党我军，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任务。到陕北后又与彭德怀作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大围攻。毛主席是主张打出去，到陕西去补充红军，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全国就使这样唯一的一块根据得到了巩固。毛主席在革命紧急关头，都是最沉着、最坚定、最勇敢、最正确。（举了一个例子，渡大渡河时，亲自在第一线指挥。长征的胜利，把根据地的扩大奠定了抗日的胜利。抗日中又战胜了第二次王明投降主义路线，使得我们军队发展到 80 万，发展了大片敌后根据地。延安的整风运动，彻底地肃清了王明路线，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贯彻了主席的路线，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在敌人进攻延安，全国望延安，主席也最坚定、最勇敢，亲临指挥，而刘少奇跑了。主席这么做，是对当时各根据地影响很大。建国以后，四次路线斗争。和高饶的，和彭德怀、黄克城、张闻天，和彭、陆、罗、杨和刘邓的斗争。

抗美援朝问题。那时我们的部队打到西藏、海南岛，没有休息。刚解放，全国还不稳定。有些人是主张不出兵的。毛主席经过对国际形势的英明分析，做出了果断的决定，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国际主义贡献。在战争中是毛主席指挥部署的。没有彭德怀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是毛主席亲自指挥反击的，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取得完全胜利。

自力更生问题。苏联专家撤走，从反面帮了我们的忙，他们是有功我们要给他们一枚勋章，一吨铁。我们修了好多铁路，长江大桥不止一座，原子弹爆炸，新式武器，好多工厂。这一切都是毛主席在革命紧急关头，危险局面，亲临指挥，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毛主席是活着的列宁，活着的马克思。是当代最伟

大的天才，是世界革命，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

今天对主席路线的态度是鉴别真革命或反革命的试金石。

林副统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典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重要关头，总是最坚定地站在主席一边。从井冈山起，林就站在主席一边。在东北反对了彭真路线。彭真路线实际上是刘少奇路线。东北的解放对全国的解放有决定性的意义。解放以后几次斗争林有杰出的贡献。尤其在传播毛主席思想方面，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是有贡献的。在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提出了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现在已找不到了，正在找），62 年在人大大会堂 7000 人会议上讲话。说明林副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理解分析水平最高。特别是对政治思想工作讲话，起了极为重大的指导作用。还有一些没有公布的内部讲话，以后要印发全党全国。林经过几十年考验，证明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中央已确立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反对毛主席的人必定要反对林彪同志。在文化革命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牛鬼蛇神恶毒地攻击林彪同志。这说明敌人恨他又怕他。我们军队同志不要上当，要警惕。我们要用毛主席路线、林副主席的榜样来教育全军同志，又要用反面教材来教育。

就是要揭发批判刘邓反动路线。他们的错误是长期的，一贯的。尤其要结合文化革命的实践来批判。要剥开刘邓的画皮。比如说：刘邓是不是一贯正确的，刘邓是不是反修英雄，“修养”是不是好书。刘少奇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反毛主席的。抗日战争快结束时，主席敢于胜利，然后走社会主义道路。刘不敢胜利，而且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1947 年土地会议典型的形“左”实右。49 年天津王光美家的谈话，讲不是剥削多了，而是剥削少了，你们剥削，他们还是愿意的。在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50 年在××地他说，中国不是发展社会主义，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素质。在东北提出单干。毛主席在根据地提出互助组，他反对。51 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合作化是错误的。每户三马一驴以后才能搞互助组。59 年大提阶级熄灭论，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64 年提出毛主席调查研究过时了。他提出不是按照他的蹲点（即王光美蹲点）去做，就不能当中央委员。通过蹲点问题来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通过蹲点问题否定调查研究。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就是他提出的。他提出我们十七年来整个是漆黑一片，毛主席早就提出蹲点问题，是阶级分析，两条路线的蹲点，也就是进行调查研究。刘少奇也提出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二十三条开始的那一条是毛主席批评刘少奇的。62 年人大大会堂 7000 人会上的讲话，刘的和林彪的截然不同。

邓小平一贯犯错误。在红七军他是政委，打仗是他领的，在危急关头一个人开小差，丢下一封给警卫员的信，跑到上海去了，说是调查一个反革命事件。后来政治学院莫文骅，他自己打印了十几封材料，罗瑞卿告发了，邓把莫打成反党分子，他怎么反党呢（十一中全会上平反了）。邓小平长征时是政治部的宣传干事，后来是政治部副主任，在延安还不是中央委员，这个人爬的很快。从来没有在第一线。实际上有两个司令部，有两个统帅，副统帅。刘少奇说中央没有斯大林，有两个主席，庐山会议，军委扩大会议，邓没有揭发彭德怀，包庇彭德怀。在反彭罗陆杨时，在上海小组会上，我和他在一个小组，别人都发言，就是他不发言。十一中全会后才清楚，原来他们是一伙的。学习毛著不要形式化、庸俗化，就是他的话。他们不宣传，我们宣传，印了 1000 万份，军队用了以后，然后送到地方上，那时候发语录是走私的。林彪同志提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

64 年喊两个主席万岁的事, 有人加在我头上, 是造谣, 可耻。那时我在医院休养, 这种人没有共产党员起码的道德。批判吴晗时, 邓小平的警卫员曾反映过, 全党都在批判吴晗, 而总书记把他请来打桥牌。可见立场到哪儿去了。另外, 战功问题。战功是谁的, 谁的战役是主席亲自指挥的, 每一步署都是主席亲自打电报去的。可是他, 把他自己夸大, 加在自己头上。是不是反修的英雄? 在国际斗争中的发言稿都是中央, 主席拟了稿, 发出去的, 他们念了一下。揭露这些画皮, “修养”这本书, 不仅害了中国人, 而且也害了外国人。毛主席说: “是欺人之谈。”这本书蒋介石也可以拿去用, 敌人也很易接受。刘少奇谈的是超阶级的个人修养, 是抽象的烙印。以后要写专门文章来批判。我们军队在军内组织专门文章来批判, 把他影响彻底肃清。思想意识修养这是刘少奇的, 本身都不通。主席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208 页有一段话: “刘少奇同志讲过……大笑”, 这段话把他删掉。

揭开他们的画皮。在军内要进一步批判走资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军事路线, 这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军事的上反映。又讲了批判刘志坚主要开小会能触及灵魂, 然后开大会。

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 要提高警惕。

3、大学毛泽东思想, 把学习毛著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 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

(1) 端正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 带着阶级感情学, 就能记得牢, 用得好, 学得好。要带着阶级观点学。

(2) 狠学老三篇, 改造世界观。毛主席说: “世界观的改变是一个根本的改变。”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改造每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革命。根本是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是社会上有阶级斗争, 头脑里也有阶级斗争。造反也要造自己的反, 关键在三个字“亮、斗、改”。凡亮私字不丑, 凡斗私字不怕痛。

部队学毛著的经验:

(1) 进行工作、执行任务, 开会都要学毛著, 作为指导思想, 统一思想。

(2) 在平常学习教育中要用毛著作为基本教材。

(3) 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现在是战士好于连长、连长好于团长, 越往上学得越差。林总学得是最好的。

(4) 军以上单位要办。

(5) 天天读, 读书为了改造思想, 搞好工作。不能读语录打架。

(6) 抓住某一个重点, 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地学(举了艺术学院为例)。星火燎原大方向是好的, 最近冲了军区, 犯了错误, 是个犯方向问题。他们正在整风, 给我写了一封信来, 很有自我批评精神, 整风提得很好, 文艺团体可以上他们那学习。

(7) 学习毛著交流会(组织)效果很好。(即组织讲用会。)

(8) 按照当前工作重点、思想政治工作中心, 办主席语录板。

(9) 对文化低的同志, 边学文化, 进行辅导。

(10) 培养积极分子和学毛著的先进单位。下半年要召开全军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1) 通过报刊、文艺宣传毛泽东思想, 要用领袖一生伟大实践来教育大家, 回忆录还写得不够。

二、当好工作队, 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

三、继续抓好四好运动, 继续抓好活思想。

搞好思想革命是搞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今年的关键是抓好活思想。不搞好会出乱子，大力宣传好人好事，改进教育方法，狠抓基层建设、连队工作。

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贯彻干部的三个标准。

去东北夺权，揪出了后台，是北京军区。有人说我去东北定调子，制造白色恐怖，这怎么可能呢？在斗争中提高阶级斗争知识，反复是有好处的。牛鬼蛇神暴露了，正是阶级斗争的残酷、尖锐性。总的来看，干部队伍基本上是好的、纯洁的。老干部（长征的只有五千人。）抗日时期只有两万人。整个干部队伍出现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有的革命胜利后蜕化变质，要清理混进来的一小撮，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干部要紧跟毛主席，紧跟革命形势，不能吃老本，我们就是吃了吃老本的亏。

谈了陈士渠的儿子是联动的，到东海舰队贴反动标语，回来后陈亲自把儿子送到公安局，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打了个报告，主席、林副主席评价很高。联动的各单位组织搞出来了。董老对孙子的态度是鲜明的。要做到机关革命化，组织上更加革命化，的确有一小撮坏分子，把他们孤立起来。同时要精减机构。军队院校冲击军事机关是因为个别教员不纯。通过文化革命加强组织革命化。批判刘志坚，用大字报，面对面，触灵魂，再搞一次大会就差不多了。谢、李、袁等同志他们正在考虑向大家作检查交待，改造世界观嘛！

李是宣传部的，谢是文化部的，文艺团体派代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军马场进行正面教育
总后勤部党委并各军区：

三月十七日报告悉。同意总后勤部和各军区所属的军马场，一律改为进行正面教育，不开展“四大”。望各级党委和领导，讲清楚停止“四大”改为采用正面教育办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切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在“四大”中揭发的问题，都要做出交代，逐步处理和解决。

附：总后党委报告

关于军马场转入正面教育的报告

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

军马场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由正面教育转为“四大”，两个多月以来，取得了很大成绩。根据军马场的实际情况和所担负的任务：

（一）军马场是军队领导的军事企业，担负着繁重的生产军马的战备任务。而军马生产和为其服务的农业生产有着强烈的季节性。

（二）军马场多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情复杂，又高度分散，远离领导机关，有的马场处在反修、反帝的斗争前线，负有保卫祖国边疆的任务。

（三）军马场都进行了“四清”，结束不久。各级领导班子一般都进行了调整。从目前揭发的问题看，多属以前或“四清”中解决了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问题，将再从正面教育中去解决。

因此，我们意见：军马场及军马生产管理局由“四大”转为正面教育。全体革命职工和革命干部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进一步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从而把军马场的生产建设搞得更好，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以上报告妥否，请批示。

总后党委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2），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 泽 东 三月卅日下午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此处应引几句列宁的原话。（3）

三 动物也不是孤立的个体，分为纲、目、属、种，故此句可删。（4）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列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5）

五 因为中国，就现时说，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什么中等国、大国，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有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6），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释

（1）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于三月三十日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讲话稿上的批语；本篇四、五是毛泽东对讲话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播放林彪这个讲话录音的通知。四月二十四日，中央印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2）除本篇四、五外，毛泽东还作了以下几处修改：在第十六页，将“夺取政权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可是都保不住”一句中的“可是都保不住”，改为“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在第二十八页，林彪讲到：“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这样要传至万万世，指导我们现在的一切，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全中国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这样要传至万万世”一句，并将两处“永远的思想财富”中的“永远”二字删去。此外，还有几处个别文字的修改和删节。（3）林彪讲话稿的第二页讲到，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阶级斗争，改变了形式，有的地方变得更加激烈”。在这句话后面，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印发的林彪讲话中，在此处加写了以下两段话：“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4）林彪讲话稿的第四页讲到：“如果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人，那人同狗、牛、马、天上飞的鸟、水里边游的鱼，就没有区别了。”毛泽东删去了这句话，并写了这个批语。（5）林彪讲话稿中，这段话原为：“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斯大林所不能比的，更不用说什么赫鲁晓夫、什么勃列日涅夫和

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头头，那就更不能比了。”〔6〕林彪讲话稿中，这句话原为“所有的地方都修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在总后勤部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同志说：

同志们！

很久没有到你们这里来了。我想这个会是很难得的机会，跟我们全军总后勤部的负责同志见面，我想，首先，让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你们问好！

因为今天你们的部长邱会作同志身体的健康在开始恢复的时候，回来工作，我们借这个机会讲几句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风浪中，任何人，都是如同我们林彪同志所指示的，在这场大风浪中，要学会斗争。当然，我们的矛头是对准我们党政领导机关和其它的单位中间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是要彻底批判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执行过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些人，这样子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进行这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因此我们解放军也不例外。

所以在解放军中进行这个斗争的当中，我们每个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都要如同林副主席所指示的，我们既要参加这个斗争，成为革命的一分子，同时又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就是要去掉我们思想中，头脑中的一些私字，私心杂念吧，如果说我们要夺权，抓那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同时也要把我们头脑中私字的权夺掉，建立公的权。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小将提出来的，毛主席特别把它选出来登在我们的人民日报上，你们都读过。实际上大风浪中，有时我们这些负责同志，即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就是说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司令部的人，也免不了要经过一些风浪。这也是考验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你们的部长，我们战友邱会作同志，是经住了这次考验的。

另外，很显然照刚才最高指示上讲了，要识别干部嘛，不仅要看干部的一个时期的工作，而且要看整个历史。在这个阶级斗争中，我们要区别两类矛盾嘛！究竟是敌我矛盾，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执行了一个时期的错误路线，或者是其它的严重错误，要区别这个矛盾嘛。同时，要看我们干部的整个历史，不要看一个时候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革命的小将，青年们，他们有闯劲，在中央和中央军委十月五号紧急通知的号召下，起来在解放军内部来闹革命，特别是军事院校，后勤工厂，医院，以至文艺队伍，实行大串连，这是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办的。既然允许他们串连，允许他们提出批评，允许他们到北京来，除了接受我们领袖，伟大领袖接见以外，我们的副帅林彪同志接见以外，自然他们也要到我们解放军各个地方看看。后勤所管的军事学院、医院、工厂、文艺部队，他也要到后勤大院来看一看嘛。所以你们这里住满了人，就闹了一场大的风波，这是一场革命的风波。年青的人嘛，他要闯一闯，看一看，烧一烧，贴满了大字报，贴满了标语，当然在斗争中也有些激烈的行动啰！现在看起来，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一些呢，也确实年青人斗争的初期的发展，不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也要一分为二地看这些问题，应当欢迎他们这种闯劲。这样子，当然你们后勤大院最高的负责同志——邱会作同志，他就要首先变成了一个斗争的目标了。在这点上，你既然集中了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他就要有事情，就要闹革命。我刚才听说，集中了差不多将近两万，接待了一万七八千人嘛，最高的时候，他就要闹啊！我虽然没来过，闹的时候不在，我也差不多经常

听到消息。这些小将们他也不清楚整个历史,也没有辨别两类矛盾,有的就做的有些过了。但是呢,我们负责的人、指导全军的人,应该站出来给他们解释。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中央文革、我个人也参加过。但是,那个时候,在高潮的时候,你尽管那么解释,他觉得他不信,不大信,必须经过一场风波,考验了,以后事实被证明,慢慢信服了。年青的人需要自己亲身参加这个斗争,自己来证明认识这个真理,比别人去教育有好处。现在,许多院校回去了,医院的也回去了,文艺部队也回去了,工厂的也回去了。他们自己整风,就会把两类矛盾,一个人,一个领导整个全面地来观察,他们就会得出应该得出的结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要把这个冷静地看一看,这种代价需要付出。因为这是对领导干部的考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工作干部的考验。毛主席号召每个人要独立思考嘛,在斗争中是站在哪一边?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是挺身而出,敢于指出别人的错误,首先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敢于向小将们讲清道理,帮助他们,还是不管是非,就那么随便地煽风点火?那么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煽风点火的,比如说,煽社会主义之风嘛,点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这是必要的,也是对的,但是,也不要有些时候去煽阴风,点阴火,那就不许可了。这都是考验,这场斗争考验每一个人。当然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还在继续进行,而且要把它进行到底。现在正是处在一个全面阶级斗争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这一斗争同样地在后勤部门、军队的后勤部门。因为包括的有院校、有医院、有工厂、也有文艺部队,尽管我们今年发表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夺权的规定等等,加了一些界限,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但是,斗争发展还是要前进,我们不能阻挡。斗争中不断地摸索经验,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就要求我们总后系统的后勤部门工作人员要继续学习,继续参加这个斗争。我相信,邱会作同志健康开始恢复,重新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他有了经验嘛!

在这个地方,我简单回述一下子,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经过长征的,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差不多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认识,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地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后方的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也就参加后方工作、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每天几乎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共事最密了,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的,那时青年有为,是个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觉得我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没有看错。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后勤,然后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解放战争,转到东北,然后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后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的时候,他又来做总后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红军战士,老战士。这是他整个历史的主流嘛,好的方面嘛!但是不是没有缺点,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有严重的缺点。所以,毛主席的学生,林副主席的战友,不可能在我们一生不犯错误,我就是个嘛,也犯过多次错误嘛!但是有决心,有了错误,敢于正视错误,而且决心改正错误。不但是中年嘛,现在到了老年嘛,还是这样想嘛。跟主席怎么跟得紧呢?首先你要做嘛!主席号召通过实践来证明,你对于主席的思想怎么掌握,所以林彪同志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首先要去做,在实践中来证明,你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有错,是改了,还是没改,对,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搞得更好。首先要紧做,要紧学,用学结合,

学用结合嘛！在用字中下功夫，林彪同志所提倡的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读语录，读毛选，读林彪同志许多的指示，我们党中央的许多文件、政策、方针，最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红旗杂志的社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许多好的文章都应该经常地学嘛！但是一定要跟做联系起来，紧做紧学，如果有错误呢，要紧改。我们一般的战士，从年轻，到壮年，到老年，不可能不犯错误，总希望少犯一点错误，犯小错误，少犯大错误，有了错误就得改，紧改，最后一个，这样才能说得上紧跟。不是说紧跟毛主席吗？按照林彪同志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紧跟，你首先要做，要学，有时要改，这才能说得上紧跟。我相信我们后勤的战士，要学会这个精神，希望学会这个精神。同时，也希望邱会作同志现在又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我们长期的工作，远的不说了，就是我们解放以后和平十七年，后勤工作可以说，有三个时期，初期是刚开国，首先就遇到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我虽然做政府工作几乎也是大部分时间用在抗美援朝上，特别在后勤支援方面管得多。那个时候，一道共事的就是杨立三同志，恐怕是你们第一任的后勤部长，那就是解放后，这位老战友那是病故了，他对后勤工作的那一段时期，在抗美援朝上说是尽了很大力。今天在座的还有跟他同事的嘛。这是我相当熟的那个三年多。后来，彭德怀回来了，他管国防部、军委，那时任何人都不能过问的。主席的话他都不听嘛，所以我们就没接触了。先是黄克诚，后是洪学智，那时就是开口向政府要款子，要钱，要东西就是了。那是一个长时期。第四任恐怕就是邱会作同志。林彪同志主持军委，那么我们的关系又密切了，协作了，要需要部队支援的，可以说，只要党啊，政府啊一要求，总是支援的，你们做后勤工作，都会感觉到嘛，都会想的到嘛，支援了许多，所以这点，应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所以，在工作上也有个比较嘛。因为鉴定一个同志的全面工作，也还得跟别的比较，跟好的比较，跟坏的比较。对立面有个黄克诚，洪学智。那么一样好的，但是他超过杨立三同志，因为他时间长，杨立三同志时间短，成绩也超过他，因为现在管的方面大，短而现在管的不仅仅是我们解放军嘛，我们解放军现在扩大的，已经包括许多工程部队都进来了。而现在目前在夺权的阶段，我们伟大领袖给我们解放军的伟大任务，要我们支援革命的左派，支持农业，支持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等，实行军管，实行军训，不仅对大中学校实行军训，小学的高年级，乃至工厂企事业单位，最后乃至机关都要实行。这个五大任务，非常的繁重，光荣，既光荣而又繁重，在这个上头，后勤就要起更大的作用了。所以想到这儿，我们相信，邱会作同志恢复他的工作以后，经过这次锻炼，经过青年们这一代，受了一点点委屈，这算什么呢。我们想一想，我们要把后一代，在大民主中，四大、五大当中，锻炼出来，敢于提意见，敢于说话，敢于独立思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不受一切旧的东西束缚，有创造性地发展，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伟大的前途，我们伟大领袖下了这样的决心，从去年五月开始到现在，还继续下去，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后代是有希望的，那我们就应该很勇敢地站在青年的前头，帮助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带着他们前进。这样的精神，我希望我们后勤工作也要这样子，比比过去一个时期，后勤工作在邱会作同志领导下，学主席的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是高得嘛！去年主席的五七指示，给林彪同志的回信，就是因为后勤提出来的报告得到称赞的嘛，得到推广的嘛！现在的五大任务，确实确实是要使我们的军队从各方面去接触人民，更进一步地跟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解放军来说是光荣的，对后勤工作来说，也是一

个很大的鼓舞。所以，现在可以说，应该是我们后勤工作的新的一章的开始。我的话完了。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好！我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邱会作同志我是不太熟悉的，大概见过几次面。但是早一向我看过他写的自我批评，也听过他在这次运动中的一些态度，我对他那个书面检讨，我觉得是诚恳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此外，当他在群众面前，当群众运动在一个高潮的时候，出现了某一些偏激的时候，在这样关头的时候，最容易考验一个人了，考验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方面我听到邱会作同志是有良好的表现的，是值得我学习的，我相信也值得同志们学习。这是第一。他不承认他是三反份子，遭到了变相的体罚的斗争，这时他不是对抗的态度，他对群众采取了爱护的态度，这点我们不知道的，我听到我很感动的。他觉得很不安，群众为他在哪儿挨饥受冻，他自己非常不安，他不能够休息，这样，后来主席派人要群众散去，他才安心休息。那么，在这样一个运动中间，有很多不同态度的人，我想邱会作同志这种态度既不是对抗，也不是委屈，而是爱护群众，而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彪同志。这样的态度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呢，同志们？（热烈鼓掌）

我只想把这一点我知道的告诉你们，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说。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同志向同志们问好！

我完全拥护刚才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同志他不怕群众，站出来跟群众在一起，并且作了多次检讨。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很好的。希望邱会作同志，出来做工作。象刚才周恩来同志所讲的，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邱会作会工作得更好，我们希望他工作得更好。

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总后勤部关于军队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人员供应问题的通知

各军区、军种、兵种、总参三部、国防科委后勤部，各院校，各总部管理局，总后各办事处：

所有参加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干部、战士，必须发扬我军艰苦奋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传统，防止特殊化。因此：

一、伙食费标准，战士和供给制学员一律保持与被支援单位的生活水平一致，如果被支援的单位生活水平高于军队一类灶的，由军区个别解决。如因工作需要必须在招待所就餐或零星买饭者，每天补助二角，列差旅费报销。干部原享受二类灶以上补助的应停发。

二、粮食定量，凡到厂矿企业、农村公社的按“四清”工作队的标准。到县以上机关、院校的，由军区规定。报销时按原定量，不足者，由军区从自己生产粮中补助，结余上交。

三、差旅费，往返差旅费由军队报销。在地方工作期间按地方规定执行。

四、卫生医疗，应尽量在就近军队医疗单位治疗。如在地方医疗单位治疗，按地方规定交费，凭证明按实报销；伙食费凭证明回部队结算。

五、工资、津贴，可根据时间长短酌情提前发给。
以上，自四月一日起执行。

四、军委十条和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六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2），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毛泽东 四月四日

二 林彪同志：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3）毛泽东四月六日 603（根据手稿刊印）

三 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4）四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注释（1）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送审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林彪四月五日送审的命令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林彪四月二日送审稿中第一条、第六条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2）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三、四外，还将第三条中“对于确定实查明的反动组织”一句，改为“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删去第四条“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一般的概不追究”一语中“一般的”三个字；把第四条中“不能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来划分左、中、右”一句，改为“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删去第七条“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句中“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些字。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3）中共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发出了这个命令。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的十条命令是：（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

等等。（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命令中提到的赵永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九六七年二月，“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将青海省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于二月二十三日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的严重事件。赵永夫是当时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指出“一九六七年二月，青海省军区内部发生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4〕林彪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送审稿中，这句话原为：“对未向我开枪的群众，无论革命的、反动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至二十三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潘复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这是潘复生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已发：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富春、伯承、向前、荣臻、剑英、富治、江青、肖华、成武、粟裕同志。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参加会议各同志。〕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很好，离主席、中央的要求差得很远，与上海、山西、山东、贵州的经验比较差得多。我今天介绍一些情况，没有什么经验要介绍的。

一、联合夺权问题

（一）黑龙江省夺权情况

一月十二日，左派首先夺了报社、电台，然后夺了公安局，接管了省委、省人委。到一月三十一日，正式成立了三结合的省革命委员会。全省六个地专机关，全部被左派夺权。其中松花江、牡丹江、绥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它三个嫩江、合江、黑河成立了接管委员会。六个地委第一书记，站出来两个（松花江、×江），还有一个可能站出来。

四个特区：大庆、伊春已军管，大兴安岭七台河，情况复杂，尚未夺权。大庆的问题比较大，大庆工委干部站不出来。生产还好，主要是运不出来。伊春是出木材较多的地方，原不归省管，情况比较复杂，人口有百分之十到四十来历不明。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一次反革命暴乱。军管前，左派力量很小，反革命、保守派掌了权，把左派打散了。他们抓家属打小孩，实行白色恐怖。军管部队五点进去，八点被他们包围军队夺枪，并抓走我们的干部，后继部队被围在火车上。

以后我们派飞机去撒传单，开展政治攻势。群众看到飞机和传单，说，这一定是毛主席派来的，包围解放军上当了。于是，便都回去了。我们前进指挥部设在特委二楼，他们去围攻，随部队去的近一千造反团的学生，同他们辩论，反革命右派向学生开了枪，把一个同学拐伤了。当时部队坚持没有开枪，仍然进行政治攻势。群众觉悟了，揭发了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军官，杀人犯的罪行。在群众要求下，由公安机关出面，抓了几个首恶分子。被欺骗蒙蔽的群众觉悟了，情况好转。

七个市，已有四个市左派夺了权（哈尔滨、齐齐哈尔、鸡山、双鸭山），佳木斯、牡丹江、鹤岗三个市是保守派夺权，现在正在反夺权。

六十五个县、左派夺权的四十二个、占百分之六十三。保字号夺权的八个，占百分之十二。军管的一个（是西县）。不需要夺权的一个（栏县），该县社教不久，班子比较好，群众意见不大。但组织机构要变，要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已夺权，但情况不清的十三个县，主要是边境县。

全省夺权斗争，四月份基本可以解决。

（二）几个派别组织的特点

从哈尔滨市来看，共有四个较大的派别组织，即左派（红色造反团）；保守组织（八八团和赤卫队）；中间派（东方红）；反动组织（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

一、左派（红色造反团）特点：

1. 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觉自愿地用滚雪球的办法，点火，串连，由少数到多数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既不是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下组织起来的，也不是招兵买马的大杂烩，而是革命闯出来的，是真正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

2. 斗争的矛头一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李范五、王一轮、陈雪等。

3.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造反团无论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联合夺权等等，都是以十六条为纲，不折不扣地按照主席的教导、按党中央的指示，以及《红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去办，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例如在工厂里，保守赤卫队，离开生产岗位，造反团把生产顶起来。参加赤卫队的老工人，看他们的人离开生产岗位，而造反团抓革命促生产，很受感动，于是便退出赤卫队。

4.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注意政策和策略。每次大的斗争之后，都进行开门整风，现在进行了三次整风。他们的口号是：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不紧跟毛主席的整垮了活该，经过整风，促进了左派队伍思想革命化，战斗力更进一步增强。

5. 哈尔滨的左派是由军工红色造反团到各学校、机关、工厂串联点火组织起来的，他们联合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这个革命左派从开始组织，我和军区汪家道同志就和他们接触。在接触过程中，凡是他们做得对的正确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给予大力支持，他们做得是不对的，我们就给指出来。

黑龙江省的三结合，不是临时夺权凑合起来的，而是八月份就开始了。军区开始介入，我同汪家道同志研究，思想要介入，要坚决支持左派。为了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及时支持左派的革命行动，军区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同时，在我活动不方便时，军区帮助他们做了许多事情。

二、保守派（“八八团”，赤卫队）特点

1. “八·八”团，是由军工的八、八派串联形成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右倾保守，反对红色造反派，极力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八·一六”，“八·一七”事件，省委发通知，要群众辩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造反派反对这个通知，“八·八”团赞成这个通知，并提出坚决保卫省委这个口号，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起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工人、群众围攻造反派。我是八月十六日从北京开十一中全会回去的，当我发现后，在造反派的大会上宣布这个通知是错误的要收回，并赞扬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坚决支持他们。从那时开始，“八·八”团就斗争我，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 在红色造反派揭露他们保守面目后，就大搞形“左”实右，提出炮轰东北局，炮轰国防科委，冲国防部，并以车轮的方式，围攻我，以表示他们是革命的。但是他们没有揪一个三反分子。黑龙江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是左派揪出来的。

3. 在斗争过程中，失掉群众，十分孤立的时候，就同哈尔滨的反动组织红旗军勾结起来，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在北京、黑龙江省到处碰壁后，企图诬蔑造反派，制造舆论、斗争群众，就抬着死人（装死）在哈尔滨街上游行，喊着“为死难烈士报仇”。后被造反派揭发，群众对这很气愤。“八·八”团与北京某些负责人经常有电话联系。

在一月中旬，八八团和红旗军，赤卫队联合起来游行示威，打击左派、企图夺权，我们已掌握了红旗军的情况，当即由造反派和公安部门把红旗军的头子抓了起来，红旗军中被蒙蔽的群众，自己杀了回马枪，这个组织就垮了。继之，“八·八”和赤卫队就自行宣布解散了。“八·八”团头子，一个跑到河北，一个跑到南京，最后也抓回来。对“八·八”团受蒙蔽的大多数群众，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争取他们。例如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派，是用毛泽东思想把“八·八”团教育争取过来的。军工造反派没有按照师范学院的经验去做，所以军工的“八·八”团直到最后还保持不少的人数。当“八·八”团自行宣布解散后，军工造反派叫他们写检讨，有的挂牌子限制活动。效果不好，最近造反派用毛泽东思想争取教育“八·八”团，效果很好，现已交待一些攻击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反革命活动材料。

三、中间派（东方红）特点：

1. 东方红是九月份组织的。开始时，他们不赞成造反派，又不赞成“八·八”团。同意造反派敢造反的革命精神和大方向，但不同意造反派的猛打精神，认为造反派不讲政策和策略。对保守派同意他们稳，讲策略，不同意他保守。

2. 在整个斗争中，看风使舵，左右摇摆，造反派发展顺利时，他们靠造反派，造反派困难时，他靠“八·八”团，但基本观点是“八·八”团的。在左派大联合时东方红拒不参加，仍然保持中立，观望徘徊，举棋不定。后来大势已去，多数群众脱离东方红只剩三十多人到北京告状搞绝食，诬告我。黑龙江联合夺权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他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给我发贺电。这个组织实际上是中间偏右的。

四、反动组织红旗军、荣复、战备军的特点：

1. 少数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采取欺骗群众的手法，招兵买马搞起来的，不是群众自觉自愿地组织起来的，是大杂烩，其中什么都有。

2. 他们不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专门捉当权派，要钱要汽车，给

了钱就放出来，挥霍浪费，还有个搞女人。

3. 矛头指向左派，联合“八·八”团保守派，打击造反派。

4. 大搞经济主义，破坏生产，实行打、砸、抢，白色恐怖。

红旗军在伊春特区、哈尔滨道外、铁路、有三个支队、号称三十万，实际上二、三万人。他们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失败后上山打游击。他们的头头被我们逮捕后，被蒙蔽的群众觉悟过来，自己杀回马枪，解散了组织。

(三) 支持左派问题：

一、要发现左派，支持左派，首先要自己是左派。如果自己不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就发现不了左派。我开始与省委一些人是有争论的，我支持造反派，省委有人问我，你怎么知道他是左派，实际上他们同情和支持“八·八”团，打击造反派的，因为他们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二、识别左派，主要看他们是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党的政策、策略。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要看他们政治上是不是跟党中央，毛主席。不能只看成分。“八·八”团党、团员多，他们攻击我们说，你是第一书记，为什么不依靠党团员。而依靠成分不纯的，调皮的造反团。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敢于起来造反的，大多是平时对现状不满的，对领导有意见的，运动中给领导贴出大字报，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他们是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的，造反精神强。我们党有些党员受了刘氏《修养》的影响，唯唯喏喏，当驯服工具，有意见不敢提，自以为是好党员。“八·八”团就受了这个影响。我连想到刘英俊同志在部队不是五好战士，营团干部认为他是好提意见，调皮捣蛋的。他牺牲后，经过群众才发现他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真正有毛泽东思想的好战士。有些同志对造反派看不惯感情上格格不入，这是很值得深思猛醒的，我认为这是个阶级立场问题，是世界观问题。

三、要深入群众，从多方面了解情况，获得感性知识。包括保守派群众在内，也要接触。这样才能兼听则明，心中有数。同左派接触，可以很好的向小将学习，同时可以了解左派活思想，帮助他们提高，和保守派接触，可以了解保守派的活思想，便于研究政策和策略。

四、支持左派主要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用毛泽东思想支持，帮助他们掌握斗争大方向，转了向的可以帮助他们扭转过来。十月中央工作会后，我回去发现造反团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的把矛头指向八·八团，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同时有的进行武斗。我做了一次广播讲话，提出把斗争的重点指向省委、市委，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当时有的造反团说我的讲话是大毒草，并拉大队上街，经耐心解释说服，他们接受了意见，端正了政策方向。

五、坚决同左派战斗在一起，当左派遭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守派、反动派的打击时，要和左派一起斗争，保护左派，建立阶级感情。我八月十六日回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不明真相的工人围攻造反团，我就做工作，劝阻工人，保护造反团。九月七日，一些受蒙蔽的工人，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下，又围攻造反团，造反团不敢戴袖标上街，一上街就被围攻，我就找工人座谈，说服工人。十二月五日，反动组织保守派劫持一百多辆汽车，捕人打人，搞白色恐怖，军区以卫戍司令部名义，昼夜武装巡逻，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激动地喊毛主席万岁，向解放军致敬。

六、支持左派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支持了革命左派，保守派和反动派就反对，这是必然的，在这样情况下，就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围攻，不怕冲击，不怕抄家。原来省委多数人不赞成造反派，支持保守派，我支持造反

派,省委内部斗争很激烈。公安厅有人到我家以查户口为名,把我处的造反团同学的名字抄走,在我住的地方搞侦察,看有那些造反派的到我家去。“八·八”团轮番围攻斗争我,有一次四天四夜不让吃饭,休息,眼睛搞坏了。身体搞垮了。我住军区医院,八·八团先抄了我的家抢去东西,砸碎家具,实行阶级报复,然后冲击医院捉我。

坚决支持左派,不要怕斗争。不能站在几派之上,搞调和折衷。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世界观问题。

七、军队支持左派,革命干部和左派要很好配合,不要把军队搞在第一线,如解决战备军、荣复军时,各大专院校造反团,组织几千人到现场去,前面是学生,中间是公安人员,后面是解放军两个连。进去以后,宣传政策,展开政治攻势,把反革命闹事的现场,变为控诉的现场。对首恶分子都是公安机关出面捉的,解放军一个也没捉,要爱护军队,使军队留有余地。

勃利县:武装支持了保守派,军区派人去处理,撤了两个领导干部,把左派又扶植起来。军区汪家道同志情况掌握得很清楚,经常找分区、武装部同志来军区开会,要求他们一定支持左派,不能支持右派。

(四) 左派大联合问题。

一月革命风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联合夺权,左派迅速实行了全面大联合。

一、左派大联合,首先是政治思想上的大联合。也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联合起来。只有思想上的统一,才有组织上的联合,这个联合才是巩固的。

二、在斗争目标一致的性质下联合起来。从开始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到左派联合夺权。左派都是联合行动。

三、联合夺权后,左派内部开门整风很重要。左派夺权后,地位变了,掌权了,内部矛盾突出了。由于各种错误思想,有的支持了保守派,有的包办代替,有的冲解放军,等等,引起学校左派之间的矛盾。军工与黑大发生矛盾,大字报上街,宣传车上街。我们发现后即提出人民内部问题要用摆事实讲道理办法去解决,不要用大字报,宣传车在街头互相攻击,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各大专院校、机关、企业单位左派整风中,有的对总团提出炮轰的办法,我们提出不要采取炮轰办法,坐下来辩论,坐下来整风,学习毛主席著作能解决内部矛盾。为了把这次整风搞好,哈尔滨市大专院校于三月十七日召开政治工作会议。

(五) 三结合问题

坚决贯彻执行“三结合”的方针,不能认为是权宜之计,不能认为是过渡的,因而存有临时凑合的观点,是否认真贯彻执行三结合的方针,是区别真夺权还是假夺权的分界线。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组织问题。

一、解放军干部要有一定的比例。黑龙江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现在军队代表占 13%,我的意见可以占 15%。这样才能把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带到革命委员会来。在三结合中好好学习解放军。

二、革命群众组织要有一定比例的代表。以便代表群众,联系群众,有群众基础。彻底改变旧省委、省人委脱离群众的错误。要防止革命委员会中革命干部增加,群众组织代表减少,甚至把群众组织代表挤掉的现象发生。

三、革命干部,也要有一定比例。开始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时,革命干部站出来很少。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流毒,多数干部站不出来,例如原省委常委、副秘书长陈俊生同志,革命委员会要吸收他工

作, 别有用心的人就组织对他斗争, 使他站不出来。他并没有多大问题, 经过斗争, 才让他到省革命委员会工作。

全省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以上干部共有八百四十九人, 现在站出来的二百二十九人, 占 27%。干部站出来, 过急了不行, 不仅群众不同意, 而且干部也得不到锻炼。

干部问题中主要是三、四类干部要划清界限, 首先三类干部要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要组织三类干部面对面的揭发、批判、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彻底与他们划清界限。其次, 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第三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又要当做革命的对象, 彻底革自己头脑里的私字的命。边整风边战斗,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挽救干部。

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在联合夺权斗争中, 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有些地方在夺权斗争中忽视这个问题, 就犯了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不彻底,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立不彻底。从黑龙江省的情况来看, 目前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在:

(一) 破坏“三结合”的方针。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 以哈尔滨工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 在个别反革命分子的操纵下, 反对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企图把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扼杀在摇篮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他们说哈尔滨是白色恐怖, 新曙光是假的, 把“曙”字写成“鼠”字。又说革命委员会不是工人领导的, 是小资产阶级, 学生领导的。当时, 宋任穷同志也在哈尔滨市, 他们贴出“炮轰潘复生, 火烧宋任穷”的大字报。他们的阴谋破坏活动, 被造反派揭破, 未能得逞。军事工程学院有个学生叫游兴茂, 任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班长(当时不叫主任、副主任), 在他担任副班长期间, 搞阴谋活动, 拉拢一派, 排斥一派, 拨弄是非, 挑拨离间, 企图搞垮革命的三结合。省革命委员会的群众揭露了他的问题, 军工革命师生斗争了他。

(二) 在对待干部问题上, 一些别有用心的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止革命群众站出来。不给革命委员会输送干部, 企图从干部问题上破坏三结合。

(三) 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 他们用生产压革命, 用革命挤生产, 破坏抓革命, 促生产的方针。

(四) 借左派整风之机, 攻击左派。军工八·八团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我们大方向错了, 造反团大方向也错了。帮省委机关保守派反扑。造反团退出百多人, 也造谣说造反团大方向错了。

(五) 中学复课闹革命, 有的校长、教师回校后, 保守派反扑, 把造反派打下去, 企图复辟。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和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后, 红色造反者群情振奋, 哈市革命群众当庭集会, 第二天上午举行有二十万人参加的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拉下马的誓师大会。省革命委员会发出了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决定。边整风, 边战斗, 坚决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肃清其流毒, 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做法是:

(一) 在内容上: 着重批判他在政治上的投降主义, 思想上的唯心主义《论修养》; 经济上的资本主义道路, 组织上的招降纳叛。

(二) 批判刘邓时, 要结合批判本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如李范五、王一伦、陈雪等。对他们不但要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要批判他们过去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工作上等各方面的问題，使广大革命群众同他们划清界限。

(三) 在学校、机关、工厂、企业都要结合批判刘邓，批判本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这次批判，一定要搞深、搞透，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做法上，大会、小会相结合，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三、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一) 农业生产：去年大丰收，粮食生产二百多亿斤，上交粮食二十二亿五千万斤。今年计划播种面积一亿零九百二十五万亩，比去年增加六十多万亩，总产指标二百多亿斤，较去年增长 11%。今年积肥一千二百多亿斤，比去年增加二百多亿斤。化肥数量比去年增加一倍，达到四十八万吨。农田基本建设，很多地方正抓紧配套工程，去冬今春已完成土石方八千六百万立方米，现仍有十六万人坚持施工。全省有一百五十多个工厂、企业和六十多个县市挂钩支援农业。目前春播工作全面开始，大部分地区已形成高潮，到四月一日，全省已播春小麦三百五十八万多亩，占计划面积 20% 以上。

入春以来，牡丹江、合江地区发生火灾一百七十多起，烧毁森林二万余亩。森林火灾是个大问题，至今还没有很好解决。今后，要采取有效措施，尽量杜绝森林火灾。

(二) 工业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全省一、二月份完成工业总产值十四亿二千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4%。三月份比二月份更好。煤矿已军管，煤炭生产逐月上升，二月份全省平均日产量为三万八千吨，四月初，日产已达五万吨。伊春、苇河森二局已军管，木材也是逐月上升的。二月份平均日产木材六万二千立方米，三月末达到七万一千立方米。铁路运输情况逐步好转，哈尔滨铁路局一月装车二千五百九十八辆，三月上升到三千多辆；车辆周转率提高 15%。但现在车皮仍不足，粮、煤、木材、纸张积压较多，粮食八亿斤，糖七十万吨，纸张六千余吨，运不出来，有的粮食已发霉，全省各粮库正在抢晒粮食。公路运输也紧张，全省缺少载重汽车四百五十五台，路面也不好，需要修整。

目前三结合的生产指挥部，从上至下已建立和健全起来。凡是成立革命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条件不具备，未建立三结合权力机构，已成立三结合生产指挥。在生产中，狠抓突出政治，认真解决革命、生产的关系，以政治统帅生产。

解放军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到厂矿、企业和农村，宣传、组织与发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有些重要厂矿、企业、生产受到破坏，内部左派力量较小，领导班子瘫痪的，实行了军管。

四、省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问题

省革命委员会，现有工作人员六百六十九人。(包括临时工作人员一百七十九人) 其中革命干部三百七十九人，占 56.6%；军队干部八十九人，占 13.3%；学生一百七十八人，占 26.6%；工人二十一人，占 3.1%；农民二人，占 0.3%。

(一) 革命委员会机构设置的原则：

1、打碎旧机构，大胆创立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最

富有革命造反精神、最富有办事效能、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政权组织。原省委、省人委成立接管委员会，搞斗、批、改，革命干部逐步转一部分到省革命委员会工作，其余将来下放到基层，充实生产第一线。各接管委员会，归省革命委员会领导。

2、革命委员会的机构，要坚决贯彻“精兵简政”原则，把原省委、人委编制缩减四分之三（原有干部四千八百多人，现准备留下一千二百多人）。

3、要坚持重点配备，加强政治机构，强化专政机关，充实基层和生产第一线。

（二）机构设置、人员编制。

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三十九人组成（每个地、市、县各有一人，个别公社有一人），常委十九人（均脱产），其中工人四人，农民二人，其余为军队及革命领导干部。

省革命委员会下设四委一室：政治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保卫、文教、统战、文革、直工等组和办公室；生产委员会，下设工交、农林、财贸金融、计划统计、政工等组和办公室；人民武装委员会，下设民兵、防空、管小三线等组和办公室；群众工作委员会，下设红卫兵、工会、贫协、妇女、社会福利等组和办公室；办公室，下设政策研究、外事、秘书、机要、信访、总务等组。

省革命委员会，总编制为一千二百一十九人，比原来人员减少四分之三，机构减少三分之二（原七十七个部、委、厅、局，现设二十七个组）。

地专一级也成立革命委员会，编制一百人到一百五十人。

（三）省革命委员会是全省临时的最高权力机关，要坚决执行“三结合”的方针。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革命委员会成员，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立场坚定，政治可靠，在群众中有代表性的有威信的群众领袖。省、地、县、市，由革命干部做班长，基层工厂、学校，可由工人、学生当班长。解放军代表不能转业，转了就不成其为军队代表了。

革命委员会的作风，主要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贯彻主席提出的党的三八作风和解放军三八作风。

（四）制度：暂定三大制度。一是学习制度。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小时，每周拿出两个半天来学习。二是民主生活制度。一个月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保持大民主的作风。三是劳动制度。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平时三分之二下去调查研究、蹲点、参加劳动，每人每年下去不得少于四个月。

（五）建立中共黑龙江省核心领导小组。原省委有常委二十一人，（书记十二人）现已站出来五人，另有三人也可能站出来。准备建立一个由九人组成的中共黑龙江核心领导小组，但由于条件不成熟，还没有建立起来。核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小组的任务，主要是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业务由革命委员会办理

五、城市街道文化大革命问题

街道是生产的后方，阶级斗争的前线，情况很复杂，必须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省革命委员会在四月十日召开了城市街道文化大革命工作会议，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一）城市（镇）街道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精神，真正把街道文化大革命搞好。

(二) 街道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打击街道办事处（公社）以上领导机关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牛鬼蛇神，居民委员会的人员不是当权派，不要把斗争矛头指向他们，如果其中混入五类分子，应该清除出去。

(三) 街道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工人、贫下中农、贫民出身的居民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逐步做到团结 95% 以上的群众和 95% 以上的干部。

(四) 要敢字当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积极支持左派，发展壮大左派力量。不允许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刑满释放、保外就医的劳动教养人员混入群众组织。对专政对象要看管起来，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五) 不许以任何借口对群众打击报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革命群众，必须平反。

(六) 街道办事处（公社）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凡需要夺权的，必须坚决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

(七) 抓革命、促生产，反对投机倒把，整顿市场和生产组织，坚决把街道生产领导权夺回来。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八) 街道生产不强和居民中革命团体都不脱产。文化大革命后适当时机，动员无业青年上山下乡参加生产劳动。

(九) 机关、工厂、学校、部队要积极支持街道文化大革命，并密切配合街道搞好本单位职工家属工作。

(十) 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积极组织居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灭资兴无，破私立公，促使人的思想革命化，把城市街道坚决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以上汇报，不当之处，请指正批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同志要我来这里讲讲刘、邓路线问题。上一次的会我已经讲过一回，和康老一块，康老先开头，我继续讲。那次讲话有一个记录，虽然不那么很完全，但基本上可以。我想那个记录可以发给大家，我也不做修改了，即使有些错误，也是不要紧的。许多同志也听过了，没有听过的，看看记录也是可以的。今天，我讲的可能重复一些，但是不准备完全重复。

讲刘、邓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问题，我想讲一下我们党的发展情况，发展历史。

参加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他们看出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行的，中国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以经过民主革命阶段到社会主义革命，由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最后的目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很多党员。另一种人是为了民主革命，为了资产阶级革命到党里面来的。他们可能着重点是在反帝这方面，而反封建还是软弱的。他们就要停在民主革命阶段，而民主革命可能还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他们是拥护的。这是刘少奇所代表的部分党员。因为在我们党内，有带着两种目的的人加入了党，所以就有了两条路线。以无产阶级的代表人，无产阶级的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这是一条路线。还有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这又是一条路线。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人。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的就是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他有一套可以欺骗的东西，在党里面蒙混了很久。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谁呢？现在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的东西，过去我也知道不少，昨天和今天又看了他的一些讲话记录，有许多荒谬的东西，是令人吃惊的，我们所说的全国解放以后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毛主席很早就给我们指出，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梦想。因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回到老路上去，就是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所以说资本主义的道路，实际上还是老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批判王明的，同时也是批评刘少奇的。一九六五年初，搞“二十三条”，毛主席严厉批判他的时候，他在个别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批评他的。完全不错。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是这样告诉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处于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不是完全的梦呓？”毛主席在后面还讲了一个土耳其的例子。他说：“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就是说，土耳其事实上也变成了半殖民地。所以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不是走毛主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就是老路，走蒋介石的路，走汪精卫的路。

这一点，在日本投降后，刘少奇赤裸裸地说了。他说要当“红色买办”。红色就是红色，买办就是买办，那里有“红色买办”呢？他要粉刷一下。这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打垮蒋介石，赶走帝国主义，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经过这个阶段转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又出现新的买办，刘少奇就是准备当这个新的买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他在北京干部会议上讲话，说他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时，说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再没有第三个前途。你们（指资本家）是不是想出了第三条道路，既不搞社会主义，又不搞帝国主义，如果能想出第三条道路来就算你们有本事。其实毛主席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走老路。这个老路，不用资本家去想，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到蒋介石走的道路，就已经说明了。只要是无产阶级领导，只要是共产党领导，这是指真正的共产党，不是冒牌的共产党，不是刘少奇冒牌的共产党，那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由刘少奇冒牌的共产党领导，那就会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有什么帝国主义呢？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所谓第三条道路，本来中国的资产阶级讨论过多次了，他们也想找一条第三条道路，可是找来找去，还是蒋介石那条道路。但刘少奇还说是“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因为你本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嘛！其实，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已经打进来了。美国就是有一套计划，它要和蒋介石合作，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刘少奇那个时候说，就是准备当“红色买办”，就是准备在美帝国主义占领、控制下当买办。那里还有什么帝国主

义呢？他还说：“照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的方向一定要走到帝国主义，变成帝国主义以后，将来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他说：“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是根本把毛主席在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完全忘得干干净净了。全世界的市场，只有中国是最广大的市场，七亿人口的市场。原料，中国也是很丰富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过去帝国主义说，中国不可能成为钢铁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煤油的国家，这是完全破产了的。而刘少奇说，如果要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就要到外国去搞原料，搞市场，向人家去抢，那还不得打仗？发生世界大战？”他完全跟毛主席历来的指示、历来的教导唱反调。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发展。”这是他在解放以后讲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当然比欧美的要晚一点，但是它衰老快，衰老腐败。

日本投降以后，毛主席就很明确地给我们指出：“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于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肃的斗争。”这是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篇，毛主席讲摘桃子问题时讲的一段话。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讲的。而刘少奇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作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时，认为中国现在有三种民主力量。（周总理：实际上，他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就讲过一次，那时主席在重庆。）出现了奇怪的理论。这可能是华盛顿来的理论。他说：“中国人民三个主要阶级要民主，劳动人民、中等资产阶级中间派、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要求中国民主。”他在这里没有提无产阶级，只提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比较广泛，有工人阶级，有农民，有手工业者，等等，他没有突出无产阶级。他说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是什么人呢？大家知道，对于大资产阶级，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分析得很清楚，一种是亲日派的大资产阶级汪精卫，一种是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蒋介石。照刘少奇说，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也是要求中国民主的。而且还说“三种人民”，蒋介石也算是人民。毛主席早就说得很清楚，蒋介石是人民公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文中说：只要一提人民公敌，“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干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争论是有的。人民说：是。人民公敌说：不是。只有这个争论。至于人民群众，这样的争论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成为问题的，是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这是毛主席讲的话，认为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已经不成为争论的问题了。但六个月以后，刘少奇却把人民公敌变成了人民。

周总理插话：

大家还记得，日本刚投降，毛主席就写了《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这是很值得读一读的。因为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就调兵遣将要去接收。那个时候，我们在延安连发了很多命令，当时还用朱德的名义发的。我们解放区的军队要开赴前线去接管，因为我们都在沿海嘛，都在敌占区嘛，就在周围，很容易接管。蒋介石看了就急得很，这个时候，根据雅尔塔会议，斯大林就来了电报，要我们不打内战。实际上，蒋介石准备打内战，同我们夺取敌占区的大城市嘛！所以主席确定了这么个方针，连下命令，各个部队都向前线开。大家都记得嘛，从林彪同志起，大家都利用美国那个破飞机，从延安到太行山，到山东。正在这个时候，八月二十三日还是二十四日，来那个电报，就那么一个内容，说中国不能打内战，

要打内战中华民族是要毁灭的。这是第一点。这个不要紧，打内战，反正我们不先发动，总是蒋介石发动，算定他是要发动的嘛。第二点，就是要主席到重庆去谈判。难题就在第二点。第一点是阻止不了的，因为蒋介石要打嘛，我们准备好了就应战，就打。第二点这个弯子转就困难一些。主席的决心，是证明给世界人民看看，中国共产党不首先发动内战，发动内战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估计当时形势，冒一点险还是决定去了。我陪主席一上飞机，延安和各个解放区都打电报来，担心啊！是冒很大危险的。当时主席的决心，如果在重庆被扣，我们就准备坐牢。告诉延安决不要因为主席在重庆，军队就不准备，晓得他要利用主席在重庆，要发动进攻。头一场就是太行山，就是邯郸。中间有这个曲折，因此有双十协定啦，还有老政协啦，停战啦，我和王若飞等签的字。主席在双十辛亥革命纪念的第二天，十月十一日离开重庆，回到延安。去是由赫尔利保驾，坐的是赫尔利的飞机。回来是坐张治中的专机，直到现在我们对张治中还留有余地。的确，我当时把他抓住了。（江青同志：三上延安）三上延安府，送主席上延安这是一功。他送主席回延安，我就留在重庆作质。这是准备阶段，主席赞成有这个准备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大城市，敌人不交给我们，等蒋介石军队开到了，敌人把枪交给他。我们一下子打不进去，看着大城市，什么济南、天津、北京、南京，进不去。小城市什么淮安、淮阳进去了，临沂进去了，洛阳进不去，青岛进不去，烟台大概进去了吧！中等城市进了一点。这样，我们就积蓄力量，就扩大军队，不是什么复员哪，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哪，而是准备力量。练兵、扩大军队、土改三条，主席这三条建议，在重庆时就提出来了，想到这一点了。当时有这么个历史的插曲，因为客观形势发展需要这么一个插曲。开始的时候，就估计到不是马上就能够达到胜利。而刘少奇完全不认识这个。

康生同志插话：

斯大林那个电报，是错误的。我是经常这么想，斯大林是一个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德、日、意法西斯垮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功绩的。赫鲁晓夫污蔑和反对斯大林，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要看到，在战后一个时期，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有右的错误。他当时有一个什么想法呢？他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各国人民、世界人民革命的力量，他有一个政策，就是在各国千万不要引起武装冲突，不要把苏联再扯进去同美国冲突起来。他是这么样一个方针。因此法共交了枪，法共有四十万武装，整个占领了马赛，交了枪。希腊快要打到雅典了，也交了枪。他要毛主席到重庆去干什么呢？实际上也是要交枪。就是要搞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那一套。所以中国的胜利，是毛主席违反了斯大林那个错误政策而取得的。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如果我们按照斯大林那一套，那就象法国一样，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不是做了副总理吗，陶里亚蒂不也是副总理吗？后来统统干掉了。这也就是王明那一套。王明是最羡慕那一套的。可惜蒋介石没有法国帝国主义那个气魄就是了。主席伟大，违反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坚持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不仅对中国有伟大意义，对世界也有伟大意义。中国革命胜利后，据刘少奇讲，斯大林承认了错误。到底是不是承认了，我现在也还怀疑这件事。中国胜利了，在一九五〇年、五一年，印度、印尼、缅甸、马来亚还是交了枪。马来亚有武装交了，印尼有武装交了。他有个理论，说这些国家同中国不同，中国靠近苏联，国家又大，交通又不发达，所以能够胜利，主要是靠近苏联。那些国家不靠近苏联，国家又小，交通又发达，那就不能实行中国的经验。最近我翻了一下斯大林的文件，一九五〇年和五一年，他有两个文

件是这样说的：印度、印尼、马来亚这些国家不能学习中国的经验，因为他们那里地理环境，各方面情况不同，他还是那么一个想法。过去我以为只是欧洲交枪，最近我才知道亚洲也交枪，没有交枪的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有一句话说：“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来”。这是有极大世界意义的一个战略措施。

伯达同志继续说：

日本投降的时候，毛主席在讲摘桃子的那篇讲话中说：“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象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可是，刘少奇在毛主席回来以后，就作那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篇没有说和蒋介石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个方针，而是要靠议会斗争，提出要解除武装，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国民党军队。（王力同志：廉价出卖。说只要把军队交出去，美国的美金就来了）。（周总理：我们解放南京，美国大使馆还留在那里，司徒雷登找罗隆基去，要他给毛主席带封信，说如果中国愿意同美国建交，美国愿出五十亿美元投资。罗隆基到了北京，一看到《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一边倒，他把话吞下去了，不敢说，以后才说出来，他晓得我们不会接受。你看，罗隆基是个右派，但他总算看到这一点，不敢说）。这完全是一个骗人的东西，刘少奇说：“我们参加政府，美国借的二十万美金就来了，复员善后，每年用一点，其余要开工厂，我们要去参加，各种商业、农业亦要参加去搞”。美金不是送给我们的，是送给蒋介石，给我们一点点，用来收买。总之，毛主席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刘少奇在毛主席这个讲话以后六个月，他还认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要民主的，民主革命不是经过战争，而是经过宪法，成立议会，就可以彻底实现工业化，土地改革。蒋介石也搞土地改革，搞工业这不是天下奇闻吗？刘少奇那个时候说：“有些人要去做官了，中央政府的官”，“国民党各党派也会到解放区来活动，设通讯社、办报纸、设党部、讲统一，希望共产党给民主”。你看，他代表蒋介石来向我们要民主啊！他还说：“国民党也会来参加我们的政府，这不简单，与国民党办事不好办但非办不可”。就是说，非这样做不行了。军队不能够在党领导下了。他认为“国民党的军队会脱离国民党”，可笑不可笑呢？说我们共产党员也要脱离军队。（王力同志：全民国家！）说“相信国民党的军队能够脱离国民党的领导”，竟有这样荒谬的观点。这说明，他相信国民党军队可以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我们的军队也可以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是国民党要吞并我们的军队。他说，政协会议以后，“参加政协会的人，很有风头”；军队“显示不出其重要了”。虽然他也说没有军队出不了风头，可是他又说什么七君子等人出风头，这些人有什么军队嘛，所以说，军队出不了风头了，是政协会的人出风头了。他说，当时我们党的主要偏向是“狭隘的左的关门主义”，“使党内党外很多人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说国民党蒋介石不打我们了”。你看，这些不相信都是对的，但他却说这是“左倾”。他又说：使那很多人“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够民主改革，不相信能和我们办民主建国，因而他不相信中国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他还看看觉得党的工作不必要转变”。这是由革命变投降，丢掉武装搞议会。这是意大利和法国走的道路。

他还说：“觉得军队整编会整掉不去重视合法斗争，把自己限制在小的范围内”。这就是搞议会斗争，把军队交出去，这叫做不是“小的范围了”，这叫

做不是“左的关门主义”了！我们的军队没有党的领导，那还成什么人民解放军啊！他说：“党不直接给你们指示”，“只能简单的从报纸上、广播通讯社消息，了解党的方向，而不守纪律去做，更没有办法，那会失败的”。守纪律，什么纪律啊？国民党的纪律，不守国民党的纪律去搞，去听这个消息，这样从广播电台，广播通讯社，从报纸上，了解党的方向。他不了解，这么一搞，我们的报纸就根本出不成。

（周总理：从重庆搬到南京，一直出不成。）

可见他还比不上某些党外人士。他说：“左的关门主义，在党内外一样，有些党外人士比我还左。”那倒是真的。

（周总理：是啊！章士钊在重庆劝主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所以主席一直记住他这位老朋友）。

他又说，这些党外人士“偏到一边去了”。就是指他们不相信蒋介石那一套，即上面说的那几个不相信。他还说：“我们要说服他们，好好去说服。”就是党外人士不愿意搞投降，他要去说服。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解放战争中，他是根本没有什么作为的。他到西柏坡村按照他的一套搞土改，打倒一切（江青：搬石头）。另外一方面，把我们党变成俱乐部。他在西柏坡村有一个讲话，有记录，他在讲话里面不但没有说到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的党，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并且说我们要改组支部。说我们大家喜欢文化班就搞文化班。我们总支有三百多党员，如果都编入学习班，有的编入高级组，有的编入中级组，有的编入初级组。这就是支部组织的一个好方式。以后就不开小组会，开学习班的会，也就是开党的会。还说，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可以活泼一点，开一个钟头的会，演两个钟头的戏。

（康生同志：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找了一个漂亮的歌女，开音乐舞蹈会，拿着个表，说你填表加入共产党吧，你加入共产党，进俱乐部给你个长年票，不要钱。）

他还说，大家喜欢俱乐部，就把它变成俱乐部的会，没有戏班子就自己组织一下。我们很多同志喜欢唱，就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又演戏，大家可能要求一个月开两次三次。这样，就引起兴趣了。

（王力同志：邓小平就开了一个麻将俱乐部，天天晚上去干。）

我刚才讲的，大部分是解放以前的事。

解放以后，他在天津的讲话，是很有名的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那个臭名昭著的讲话，就是讲的他在王光美哥哥家里住的时候，同天津资本家的谈话，总之一句话，就是“剥削有功”。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毛主席在这里讲了在全国胜利，土地改革以后，国内还存在着两个阶级的矛盾。可是刘少奇在那个讲话中，全抹杀了这个矛盾。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说，对资产阶级要限制。刘少奇说不需要限制资产阶级，而是要限制工人阶级。他的整篇讲话都是批评我们的错误。说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对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要限制他。对资产阶级歌颂备至，对工人阶级则贬低备至，说得不成样子。说没有资产阶级中国就不得了。而事实是怎样的呢？在全国胜利以后，没收的工业已经占优势了，占主要的大量的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反对限制资产阶级，反对限制资本主义，他也讲社会主义，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他说以后限制，也讲了一点限制，想办法限制一下，就可以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他的所谓限制，是什么性质的限制？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限制，还是对资产阶级不利的限制？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限制和反限制，有斗争，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刘少奇这样讲，要限制一下，就是说要大量发展资本主义，他的限制，实质上是限制社会主义，限制工人阶级。

刘少奇提出，“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要多少时间？他说：“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很难具体讲，不过时间总会很长不会很短，是十年或二十年，或二十年更多。等到了那个时候一定要具体地讲。”他给一个资本家宋斐卿（很有名的，参加政协会议后便跑到香港去了，跑到巴西去了）讲，你现在几个工厂，将来还可以发展几个工厂，到社会主义了，还要给你管更多工厂，还可以加你的薪，你干不干哪？宋说，为什么不干。刘少奇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把很多工厂交给资本家，他还对宋说：“你干就好。”就是这个和平转变法。这是转变到资本主义，由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所谓“和平演变”，天津资本家要摸底，摸什么底就是摸了这个底。摸到了资本主义的底。

刘少奇说他的政策“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心里的话了。他又说：“不只是工人要向资本家进行必要的斗争，就是资本家也要向工人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你看，他提倡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斗争，他所了解的阶级斗争，恰好是资产阶级所想的，要向工人阶级作斗争。毛主席经常说，阶级斗争的学说，不是马克思发明的，这也是马克思自己说过的。但马克思发展了阶级斗争的学说，认为阶级斗争的发展，必然进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从刘少奇的观点中就可以了解到资产阶级所想的阶级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他看到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斗争，就提倡资产阶级也要向工人阶级斗争。他大唱工人和资本家“平等了”，所以工人阶级可以向资产阶级作斗争，资产阶级也可以向工人阶级作斗争。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斗争。有个工人要求复工，资本家不同意，一个糊涂的工会的同志对资本家说：“你叫他复工就复工叫他不复工就不复工。”这件事不知是真的是假的。但是刘少奇觉得很好。这就是提倡资产阶级专政嘛！

关于工资问题，刘少奇是替资本家说话的，说工人吃个半饱，总比完全失业好些，总比完全没有吃的好些，提倡吃半饱。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底下做工，只能吃半饱。大家知道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却说吃半饱比没有吃好。他非常担心资产阶级的消灭。

总之，他全篇讲话，锋芒是对着工人阶级的，是对着社会主义的，他所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是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宋斐卿这一个工厂不够，再发展几个工厂，将来搞社会主义，还交给他几个工厂，还加他的薪水。他问宋干不干，宋说干。但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以刘少奇的话为转移的。宋斐卿看到这个苗头，开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是刘拉进来的），就溜掉了。

康老的意见很对，他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上，历来在党内有两种倾向。如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这个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孟什维克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政权是资产阶级的，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列宁在最后一篇文章《论我国革命》中就讲到这个问题，讲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和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党，有一个很大的根本分歧，就是当时列宁主张由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

命，而孟什维克说工人没文化，不能搞社会主义。列宁驳斥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先搞社会主义革命，夺取了政权，再来搞文化呢？列宁说的是对的。孟什维克意见是这样的：不是由一个革命阶段迅速地再转变到另一个革命阶段，而是停顿在一个阶段上，让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然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是这样主张，刘少奇也是这样主张。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一条是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

（康生同志：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王明，一直到刘少奇，还有陶里亚蒂都是这么一个问题。）

（江青同志：一脉相通。）

陈独秀、刘少奇加了一个，就是民主革命不能深入发展，要把中国重新回到老路，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一点是不同的，因为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康生同志：这是真正的老修，这种理论出来，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这是两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毛主席在摘桃子这篇文章中，批评有些同志把原子弹估计得了不起，看得神乎其神，指出这是从受了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象打扫灰尘一样，经常扫除。灰尘是经常有的，刘少奇这个灰尘，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彻底暴露在群众面前，在我们党面前，现在是要扫除这个资产阶级的灰尘了。

全国解放以后，刘少奇对资本主义，对资本家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反对农业合作化，主张单干，这就不足为奇了。他主张单干是一贯的，没有变化的，如果是毛主席的意见在党内通过了，他也举手，那是一个形式。一九五一年，他就批评山西搞合作化。说没有机械化，就不能搞合作化。这也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嘛，没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就不能搞社会主义。第一次互助合作的建议，就是对刘少奇的意见作斗争产生出来的。毛主席看到刘少奇对山西那个批语，发了很大的脾气，要搞出个文件。毛主席在根据地时，在民主革命阶段，就为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作准备。他提倡互助组，提倡变工队。在中央苏区，就提倡耕牛合作社。在陕北，大力提倡变工，变工是一个互助的形式。经过变工，互助在一定的時候，可以过渡到合作社。这些，不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讲了，而且写上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可是刘少奇好象根本没说听过，没有见过，他的资产阶级本能，使他忘记，使他抵抗，刘少奇的这个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终归要暴露出来的。

这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下决心把他公开给全党。过去主席讲过多少次，刘少奇是不准备搞社会主义的。我就听过主席讲过多少次。在搞“二十三条”的时候，毛主席发了很大脾气，因为刘少奇要专毛主席的政，毛主席把宪法和党章端出来，说我有言论自由，党员可以在党内说话。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当时在四清运动中的错误。他那个错误，是要把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推广到全国，否定毛主席的方针，否定毛主席的工作方法。他在吹嘘王光美经验的时候，公开说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已经过时了。这个记录落在我的手里，我和王力同志把这一段改掉以后，他就不发了。当时我感觉到，他是为着这一点不发的。主要的是改了这一段，他说这一段改了不行，发下去变成严重的问题，不发了。

（江青同志：我都听了。）

（张春桥同志：各地都印了。）

都印了。当时改，是想把他的胡说八道勾掉。结果他不接受。现在了解，桃园的经验是假的。

（江青同志：那次他要反教条主义，谁要是不去象王光美那样蹲点，什么部长都不能当了。）

所有中央委员，省委第一书记，都不能当了。这里我要说公道话，康生同志有不满意的表现，有一回说，我一定下去蹲点了。我说，为什么呢？康生同志说，唉！不蹲点，中央委员就当不成了嘛！

（江青同志：发牢骚了！）

（康生同志：是发牢骚，其实她那个广播，我根本没有听。）

事实上，王光美并没有真正蹲点，说起来很好笑，什么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是假的。学冯玉祥的办法罢了！冯玉祥请客吃窝窝头，小米稀饭，进去喝鸡汤

（江青同志：彭德怀也是这样。）

刘少奇、王光美的这些是老的、腐朽的东西了，可是他在我们党内作为一个新发明。

总之，或者是刘少奇的路线胜利，或者是毛主席的路线的胜利。就是说或者是资产阶级胜利，或者是无产阶级胜利。在我们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决定中国的命运。刘少奇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影响，错误地估计了他所代表的力量，他失败了，破产了。斗争还存在。是我们毛主席的路线已经取得了胜利。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最大关键的时候，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报告中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刘少奇相反，他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以为他的王光美、刘涛、刘萍萍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等这几个人，还有几个“联动”的小头头，这些力量大得不得了，而对我们毛主席藐视。

（周总理：他不是过低估计，而是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他没有想到，他失败这么快。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列宁死得很早，他没有来得及提出这个问题。虽然他讲过要搞文化革命，是没有象毛主席提出的这样内容的文化革命，他很早就死了。后来苏联没有搞。现在不管还有什么曲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在胜利地前进，因为我们有毛主席掌舵，随时给我们指正方向，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这个革命正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斗争的根本问题。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从什么问题表达出来呢？从对待群众的问题表达出来，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反对群众，镇压群众。与主席这条路线，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有根本的不同。有的同志问，从哪里分别的？我想这个问题，只要到群众里面去就很清楚了。有些是不容易分别的，到群众里面去，就能够分别了。

不要去搞阴谋，不要去搞自己的块块。有人在组织红卫兵成为御林军。李井泉在四川搞了一个什么产业军（江青同志：近卫军）保卫他自己。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组织了什么赤卫军的野战兵团，保卫他自己。不要搞这些旧戏。这些东西，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威力下，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都要彻底破产的。这些东西，一时看来力量很大、占优势，没几天就垮台了。

斗争是反复的,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同革命群众在一起,要有充分的信心。现在的形势是清楚的,有一些人一下就夸大拥护他的人有多少、多大。但是真理不在他那边,而是在毛主席这边,是在拥护毛主席的同志这边,所以一击即溃。湖南的捍卫团垮台了。他这个造反派里边有两部分,一部分比较正派的,但是其中有个头头动摇了,在中间转来转去,摇摆来摇摆去,最后摇摆到那里去?看我们的工作,看群众工作,终归我们可以争取大多数,能够争取大多数。现在我们从整个估计,是获得大多数,不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各方面工作的进步。农业方面,工业方面,交通运输方面,现在都有很大的进步。经过文化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工作都好做了。

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一系列的新的问题,要我们重新来研究,我们在各个方面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苏联已经倒退了,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在那里搞资本主义复辟。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现在苏维埃是世界的模范国家,但是,有可能新起来的国家把苏维埃抛到后面去。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可能变成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但是我们要经常记住毛主席这句话:“戒骄戒躁”。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工作做的很少,无非是能够说几句话,写几篇文章。我觉得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使我们中国建成为全世界最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堕落下来了。

这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在军队的同志可能发生这个问题,不要因为反对我,或者对我有意见,就说他是反革命、反动,这个很危险。为什么主席提出,各省来谈判,两方面的人都来,你说他是反革命的那一派也来,因为他不一定是反革命,如青海的问题,内蒙古的问题,就很清楚嘛,说他是“反革命”的是真正革命的,说他是革命的,其实有个别是真正的反革命。赵永夫是暗藏下来的反革命,王逸伦也是暗藏下来的反革命。要把自己看成是群众中的一分子,这是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早已告诉我们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要以官的姿态,官的架子活动。我们现在有十七年的和平环境,的确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比较多,包括象我这样的人很容易同群众发生隔膜。发现问题,在工作中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必须在实践中,必须在群众中才能够做到。江青同志她就是深入接触实际,才发现了文艺界一塌糊涂,一大笔糊涂帐。

文艺界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呢?象他们说话或者写文章,现在的中国人还占少数,看戏的听音乐的看电影的占多数,为不识字的人也能看也能听。我们要通过文学艺术来教育群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业,象邓小平,对香港电影、美国电影有兴趣。这个事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主席就批评了的。

(江青同志:一九六二年,我到刘少奇那里去,我还说,中南海是人家的一块宣传基地。那时我还搞不清楚他。六四年我真正认识了他。)

如果我们的文艺阵地让资产阶级占领,让帝国主义占领,让封建主义占领,那我们的头脑就要起变化。因为那一套习惯势力,比新的力量要大。这就是毛主席再三强调的。列宁也说过,旧的习惯势力非常强大。剥削阶级有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几十年,是不是可以完全把剥削阶级的文艺阵地攻破?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除此以外,教学制度的改革,还有宣传、出版等一系列的工作,还在开头,还在摸索。

关于军队的问题,我就不说更多的话了。昨天我说过,我是你们的小学生,现在我还是讲这句真心话。在座的同志很多有丰富的经验、战斗的经验。但是小学生向先生说话也可以的。就是说接近群众,懂得群众,又是很容易的。又是不容易的。所谓不容易就是旧的意识经常在我们脑子里起作用。譬如冲军区这个问

题，群众没有想到人民的军队会向人民开枪，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嘛。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那么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这是不可理解的嘛。所以，在内蒙古一开枪大家都回去了，不来了。主席告诉我们，群众到军区来，要找军队谈判，说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这是一种好现象，是一种好事。当然，这里面出现一些别扭的事情是可能的。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我们的人民军队不能随便向人民开枪，不能随便抓人。我说这个道理是普遍性的吧！昨天我批评一个同志说过，说是我有一件事妨碍他的计划，妨碍他抓人的计划，我就给他说，你要抓人嘛，如果是真正的坏人，回去，还可以抓嘛，为什么一定要在大街上抓，这样丑化我们自己呢？回到单位去，让群众去识别，让群众扭送，那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在那里抓呢？

再说一下阎红彦的问题。阎红彦是新交，我一九六〇年在医院开刀，他去看我，我很感谢他。我无非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是听说群众冲了军区，要找阎红彦辩论，不管他那时在不在军区，出来一下就算了。我给他说，出来见一下群众，不要紧的。因为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我只是问了他是不是阎红彦，后来的话是汪东兴同志代讲的。就这么两三句话。第二天早晨他就死掉了，留下一个遗书，说他的死是陈伯达、汪东兴逼死的。我的话完全是好意，不但是爱护军区，也是爱护阎红彦本人，是叫他出来一下，解一下围，见见群众，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不见！为什么我要再提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有这么一种人，怕群众怕到这么一种程度，就是这么两三句话，说是我逼死他的，我是叫你出来见群众嘛？有什么逼的问题呢？你可以不听嘛！

（周总理：群众到军区去，目的是要他出来见一下。第二天周兴去，人家也是要他出来，不过话说得难听一点，什么滚出来，滚出去，其他也没有打算干别的。第三天赵健民去，也没有打算把他游街，完全是他自己把群众弄火了，站在毛主席像前面窜上窜下，指手划脚地批评群众。）

问题是在群众运动高潮的面前过不了关，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抵抗。他从一个共产党员蜕化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在群众的威力下边，他没法子活下去了。他不能操纵军队，如果他能操纵军队，我看他是要开枪的。

我说个笑话，我经常接见群众，天天来的那些群众代表我一个都不认识的，比如象北航红旗，它的领袖名字，不久以前我才弄清楚，叫做韩爱晶。原先我不知道他是个英雄。但不管怎样，我们要相信一条，毛主席的指示，坏人总是很少的，大多数是好人。相信这一条，我们就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有坏人也可以暴露嘛！

我今天说的，过去也说过一次，这次作为补充吧！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贵州省军区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
随着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传来了毛主席的伟大召唤，祖国的西南，响起了一声春雷，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联合起来，向原省委、贵阳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在这关键时刻，贵州省军区部队，最坚决地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命令，坚决地支持了贵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决定性的革命行动。我们的体会是：

一、掌握斗争大方向和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部队思想教育

毛主席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

我们对部队的教育，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运动初期，主要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教育，揭发控诉反党分子的罪行。第二阶段主要是进行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激发部队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级仇恨，最坚决地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时，通过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端正对群众运动的根本立场和态度。第三阶段是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投入夺权斗争时，进行了以夺权斗争的重大意义和支持左派夺权为中心的教育，教育部队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教导。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先后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和决定后，各级领导通过连夜下到部队、召开电话会议等各种方式，当天就迅速地将决定传达到每个干部战士。广大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有的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致表示：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这些教育为支持左派夺权，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加强调查研究，从斗争中发现左派

我们的调查研究是通过以下四个渠道进行的：

（一）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再含同志，受省军区党委的委托，参加了省文革小组，与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了坚决的斗争，紧密地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同他们商量，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他向省军区党委反映了很多情况，给军队支持左派作了政治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二）在去年“八·三一”“九·五”事件后，我们派出干部，与各革命造反派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对当时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污蔑为“反革命黑窝”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色工人战斗团”、“毛泽东思想贵阳战斗团”等几个主要革命造反组织都作了访问。所到之处，他们都热爱毛主席，热爱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痛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绝不是什么反革命。

（三）通过省军区设立的群众来访接待站，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收集了各群众组织的大量情况。

（四）通过抓社会治安，了解社会上五类分子动态，着重了解了“红卫军”组织，发现了“红卫军”、“赤卫队”总部为一小撮反动分子把持。同时也了解了“工人纠察队”是一个保守组织。他们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手扶植起来，为他们保驾的。夺权前后，我们密切同外地和本地左派组织联系，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通过他们了解了贵阳各个主要组织的情况，更加强了我们同左派的亲密团结。

通过上述工作，基本上弄清了贵阳各派组织的政治面貌。毛主席的指示一下达，我们就迅速判定了哪些是左派组织，坚决支持了左派。

通过了解，看出各派是有其不同特点：

左派的主要特点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能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斗争矛头始终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主要领导成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敢想、敢说、敢冲、敢闯、敢于批判旧世界，有强烈的革命造反精神。例如，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成员，在政治上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这个单位以“八·三一”为首的革命造反派有较高的觉悟水平。当毛主席号召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立即投入斗争。去年六月初，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抛出汪小川这只“死老虎”来当替罪羊时，就为地化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所识破，写出了革命的大字报，揭穿了这一阴谋。

从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对他们恨之入骨，多次发动反击和围剿，说他们最坏，是“黑窝子”，疯狂叫嚣要把他们赶出贵州。有的被抓入监狱，有的被打成“反革命”。但是，事与愿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们，在白色恐怖下没有屈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越战越坚强起来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大大鼓舞了地化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是，他们毫不迟疑地高举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十六条”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于八月底、九月初，连续发起了对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还击，掀起了反围剿高潮，震撼了贵阳山城。地化所的革命派不愧为革命先锋。去年十一、十二月，在极为复杂的斗争中，他们对反动分子把持的“红卫军”总部，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御用组织“工人纠察队”，作了坚决的斗争。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们又积极进行革命大联合，奋起向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投入决战。他们立下了伟大的功勋。

保守派组织，则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然，它的成员大都是受蒙蔽的）。例如“工人纠察队”，他们表面上，“守规矩”，“老实听话”，但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以各种借口转移斗争大方向。开始起劲地喊：“省、市委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后来退守喊为：“省、市委是革命的，缺点错误是难免的”，他们用这些口号来保护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实在混不下去了，也喊几声“炮轰”、“火烧”，但是只是空喊几声，一看就是假的。

至于混入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反坏分子，他们常常使用漂亮的词句，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大搞经济主义；招降纳叛，横行霸道；对机密文件、档案资料、枪支弹药很感兴趣；直至发展到公然反对毛主席，暴露出其反动嘴脸。

在识别左派问题上，要特别注意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克服干部思想上的保守倾向。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弄清在文化大革命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坚决斗争，与保守派严格划清界线。

二是多数和少数的问题。看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单纯地从量的多少作为判断的标准，而要看真理掌握在谁手里，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十六条”中说：“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贵阳地区的实践证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开始时，甚至发展到夺权斗争的时候，数量上仍然是少数，但真理在他们手里，他们掌握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所以他们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团结广大群众。

三是正确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和小缺点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工作中，也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坚持了看问题要看本质和主流，要看大方向，并且相信他们自己会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们在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接触中，除积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虚心向他们学习外，也注意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夺权后的事实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整风中，对一些缺点和错误都能正确看待并得到纠正。

在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和小缺点的问题上，有一点应该特别引起警惕，不要被敌人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一些别有用心坏家伙，对真正的革命派恨

得要死，经常无事生非，颠倒黑白地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诬蔑无产阶级革命派，妄图达到孤立无产阶级革命派，整垮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阴险目的。对此，千万要擦亮眼睛，不能轻信，不要上当。

四是要正确看待群众组织中纯与不纯的问题。世界上绝对纯的东西是没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各种群众组织，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产物。我们主要应看各个组织是贯彻执行了哪条路线，不能离开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去单纯地片面地看成份、看出身，看过去是否积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耍手腕，一开始他们提出所谓“红五类”、“黑五类”来转移视线，混淆阶级阵线，分裂革命队伍。这一手破产后，他们又耍出另一手，公开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妄图以此保自己过关。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质是一致的。

一个组织贯彻执行什么路线，决定于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坚决拥护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即使这个组织在大风大浪的激烈斗争中，混进了个别坏分子，那也是暂时的现象，起不了决定性作用，而且群众一旦发觉后，他们自己就一定会把坏分子清除出去。同时也不能机械地认为某个组织有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和过去犯过一般错误的同志参加，就是不纯。

三、坚决地支持左派

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必须拿出革命的气魄。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得知贵阳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权的消息后，立即向部队发出坚决支持左派的紧急指示。当晚派部队支援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二十六日清晨，出动了部队，配合左派组织，把早已调查清楚的确实为反动分子控制的“红卫军”、“赤卫队”总部包围起来，逮捕了一小撮反动头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二月二日，省军区召开了盛大的坚决支持左派的誓师大会，进行了示威游行。省军区领导同志连续五次公开表明态度：对左派坚决支持，对保守派分化瓦解，对右派坚决打击。公开宣布“工人纠察队”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手炮制的御用工具，教育和争取其中受蒙蔽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于是，“红卫军”、“赤卫队”、“工人纠察队”中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认识到自己上了当。这就促进了“红卫军”、“赤卫队”和“工人纠察队”的分化瓦解，大长了左派志气，大灭了右派威风，使贵阳的左派夺权一举成功，局势稳定，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大大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解放军报》供稿；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我对军队不熟悉，知道的东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们交谈一下。我的意见如果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欢迎你们提出来。

主席对我们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喽，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我自己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也讨厌听那些社会上的小广播。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再加上电报还要多哩！那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至于学习，我不比同志们好，我自己觉得学习的不够好，特别是不够系统。如果说我有一点点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么新鲜。这篇讲话强调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与同志们比较起来，我是个小学生，要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在历史上，不管是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等等这些战争时期，都为人们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连国内国外敌人都承认的。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在延安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不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红星拿掉，那个时候不明白，是闹过别扭的。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我觉得自己现在也还是军队的。我进城以后一直要求保留我的军籍。我只在军队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在中央直属大队当政治协理员。进城后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军籍除掉，就是说不要开除我。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战国时候，赵国的赵太后执政，她非常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这时候秦国攻击它，攻得很紧，她请齐国出兵解围，齐国说，要把你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儿子，很多大臣进谏，要她派长安君去。她恼火了，说谁再来劝说，我就要唾他的脸。当时有个左师（官名），叫触蜚。（音；上下结构字，上为“龙”字，下为“言”字。——编者。）他去求见太后，赵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后，他就问寒问暖，先不讲政治，然后说，我快要死了，我有个小儿子，十五岁了，太后能不能给派个吃饭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赵太后就说，丈夫也爱少子吗？他说，甚于妇人。听了这样的话，太后的气消下去了。她说不见得，我看溺爱少子，还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左师就驳她说，我看你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燕后是燕国国君的妻子，是赵太后的女儿）。她问何以见得？左师说，燕后出嫁的时候，你抱着她哭，因为是远别。燕后出嫁以后，每当祭祀，你都为她祈祷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要她在燕国生儿育女，世代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长久的。可是你对长安君就没有这样。太后说不是。左师然后就问，咱们赵国过去有名的世袭的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后代，现在还有没有继续世袭的啊？太后回答说，没有了。左师又问，不但赵国，其他国家，子孙封侯的，还有没有呢？太后说，没听说还有。左师说，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由于“位尊而无

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所造成的吗？“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权力。左师说：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职位，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给他的权力又很大，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我认为你为长安君打算的太短，你爱他不如爱燕后。左师触蜚讲了上面的话以后，赵太后立刻下了命令，准备百辆车子，送长安君到齐国去。齐国马上就出兵，解围了。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好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多年来，我一直是很欣赏这篇东西，曾多次翻阅。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从左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几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那样子的。你看，就是农业生产，夏收可能也会不错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错。因为革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军队这样子大力地去带头，起模范作用，我看这是解放以来，十几年没有过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

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是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这一次能真正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这个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他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就给你们钱。他就是耍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实实实在在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呀！就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这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

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屈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末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

界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修正主义搞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

（陈毅同志：记得。）噢，还记得。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又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分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像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他们不是驳斥，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

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我这两点意见，也曾经讲过，只是供同志参考，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就这样罢。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林彪同志和军委的同志要我在会议上讲一次话。我对于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都没有实践经验。参加这次会议，主要是向解放军同志们学习。既然要我讲话，要我讲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那么，我就把一些不系统的想法，提出来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一月廿三日中央关于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这个决定的第五条指出，必须“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决定。因为支左最根本的就是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支持革命左派，就是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坚决的斗争。林副主席讲过，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我觉得，军队支左正是我们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林副主席讲，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军队支左就是要在运用毛主席著作上狠下功夫。因为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邓的路线，这是划分左、中、右最基本的一个标准。我对于毛主席著作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学习是不够的。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不系统的意见，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前次军级干部会议我讲过，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同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谈话时，谈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当时毛主席指出，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进行阶级斗争，依靠群众，依靠无产阶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必然要依靠资产阶级、反对群众路线、反对阶级斗争，妄谈什么“共产党员的修养”，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讲，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着的。中国革命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这种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会存在。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的过渡阶段，必然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下面我想从几个问题上来谈一谈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一)

过去有一种说法，把刘少奇说成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譬如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如何正确，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个模范”。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个决议，对毛主席的作用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譬如对瞿秋白的说法，对刘少奇的说法，是不对的。这个决议不是毛主席写的，作为《毛泽东选集》的附录是不恰当的。征求过毛主席的意见，《毛泽东选集》将来再印行时，这个决议要抽掉。

刘少奇到底是不是一个“白区工作中策略思想的模范”呢？我们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来看一看。毛主席一九三九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刘少奇是不是“白区工作中策略思想的一个模范”呢？那么就看看他在这三个基本问题上，他的主张是什么？

毛主席说：“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最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这是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思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他不是主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去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引导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斗争，在城市工会工作中实行经济主义。一九二六年，他就说过：“工会为工人之经济组织”，“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作各种经济斗争，工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离开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的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共同的一个特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实际上是实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斗争。

再来看统一战线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是“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毛主席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政党统一战线问题上，一方面反对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反对把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反对投降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企图。强调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恰恰又是背道而驰的。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实行投降主义，放弃党的领导。他不是象毛主席所说的，把统一战线看成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是要把人民的武装交给蒋介石去统一领导。早在一九三六年、三七年，他在北方局白区工作时，就用陶尚行的笔名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资产阶级的刊物上发表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宣扬投降主义，主张把华北的人民革命武装交给国民党，完全接受了王明的投降主义。因此，王明对陶尚行的那篇文章大加赞赏，这不是偶然的。

再来看关于党的建设方面。毛主席说：“党的组织，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的实行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就是说，要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能够进行武装斗争的党，能够保持党的独立性并掌握统一战线的党。毛主席又说：“在过去发展的党组织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因此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要巩固党的组织、纯洁党的组织，刘少奇的组织路线恰恰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背道而驰的，他是实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的、招降纳叛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志们看到的那份一九三六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几个人自首反共叛党的材料，就是刘少奇实行招降纳叛的投降主义路线的铁证。这正如中央在三月十六日关于这个问题的批语上指出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自首投降出狱以后，由于刘少奇的包庇重用，“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中央和地方党、

政机关的重要职位”，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才把这个叛徒集团揭露出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叛徒集团，只是一个具体例子。在座的刘格平同志知道，薄一波出狱以后，刘少奇又派他到阎锡山那里去，贯彻刘少奇的叛党路线，把太原第一监狱的一些人同样按照这个办法去自首叛变投敌。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就是一个。过去杨尚昆那个办公厅的副主任龚子荣也是一个。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

在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上，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上，就明显地看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尖锐斗争、长期对立的。这是在基本问题上，原则问题上的对立。所以说，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只是在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而是很早就存在的，只不过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更集中地更突出地表现出来罢了。

（二）

上面所说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人民政权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政权问题上，我们看一看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是怎样表现的。

从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到一九三九年，民族危机加深，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国民党一直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一九三九年，正是国民党投降反共活动的逆流猖狂的时候，也正是蒋介石宣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号召全党全民积极投入革命战争，去争取胜利。针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和倒行逆施，毛主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打退了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逆流。同时，毛主席号召全国革命青年投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消灭日寇，在思想上和在各方面准备打倒反动的卖国政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主席出席了延安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在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演。在这篇讲演中，毛主席告诉全国青年说：“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在这篇讲演中又说：“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毛主席告诉青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毛主席号召青年，必须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合，这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分界线。毛主席说，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讲社会主义，是不算数的，要判断“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同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我们觉得，毛主席这段话对于我们今天去支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今天支左，是真支左，还是假支左；是真夺权，还是假夺权；是真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假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一个重要标准，就象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要看对广大的工农革命群众的态度和关系怎么样。

正当毛主席号召群众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一九三九

年七月,刘少奇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抛出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小册子。大谈什么“思想意识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封建哲学,要人们离开当前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去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毛主席说,这本书完全是欺人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到底要不要夺取政权,能不能夺取政权,怎样夺取政权,对于这些基本问题,这个小册子避而不谈。根本不谈夺取政权,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离开了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斗争,完全是一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的、不触及蒋介石一根毫毛的东西,是一株资产阶级的大毒草。

关于这个问题,这几天报上有很多文章,昨天陈伯达同志也讲过,我不详细说了。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在《修养》的许多地方含沙射影,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比如他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时候,谈什么没有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影射毛主席的。应当说,这个黑《修养》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为了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四〇年一月,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本名著。我这里顺便说一句,毛主席并没有看过这本黑《修养》,只是在一些场合中听到刘少奇的一些谬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的、深刻的、系统的总结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揭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的规律,粉碎了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梦想,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并且指出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这一本书,同刘少奇的黑《修养》针锋相对,一开头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紧接着就提出“我们要建立新中国”,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是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个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明确地规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和步骤,彻底地粉碎了王明、刘少奇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路线,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把刘少奇的黑《修养》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两相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谁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政权问题就更加尖锐地提到面前来了。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演讲。在这个演讲中,毛主席指出中国存在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他说:“从整个形势来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是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会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主席这些话是有深远意义的,是针对党内的投降主义路线而讲的。我们过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总是有些糊涂,不是象林总所讲的那样,带着问题去学,对林总这句话体会不深。现在把刘少奇那些文件、讲话拿出来,再同毛主席著作中那一年,那一个问题上讲的一对比,事情就非常清楚,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基本原则问题上,的确是明显地对立着的。

毛主席在这一篇演讲中,提醒大家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必须清

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确定了。”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在我们党正准备同蒋介石进行战争的过程中，象昨天总理所讲的，有一个插曲，就是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这个谈判的原因昨天总理已经讲了。毛主席率领代表团到重庆谈判，方针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尽一切可能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内战的阴谋，要揭破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同时也是为了我们争取备战的时间。现在我们看看《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这篇文章中指出：“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毛主席又说，“国民党向我们进攻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完全相反的。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以后，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幻想和平，提出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他作了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文件，昨天伯达同志作了很好的批判。我不多重复。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报告中大肆散布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宣扬议会斗争，取消武装斗争，主张取消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把人民的革命武装交给国民党统一指挥。他说：“军队也要整编，我们的军队成为国军、国防军、保安队、自卫队，我军的支部党委员会、政治委员取消，在军队中个取消党的组织，整编，各党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统一于国防部”，“我党与军队的关系要作到和国民党差不多。”

同志们！毛主席说：“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刘少奇不仅是交一支枪，一粒子弹，而是把整个军队，整个党都出卖掉了。如果按照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去做，中国人民永远不会翻身，永远得不到解放。但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刘少奇的错误路线破产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的大道阔步前进，终于赢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在政权问题上，哪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哪一条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三）

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国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在这个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斗争特别激烈，特别尖锐。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我们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报告。这一篇报告，最近毛主席还讲到，说看来有一些人对这个报告，对于二中全会决议，根本没有实行，也根本不想实行。今天必须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注意。所以，我就想读一下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主席提出要促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指明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道路。这个报告，已经形成

了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纲领。

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强调指出,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将成为国内的基本矛盾。毛主席提出这个基本问题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当时,毛主席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他教导我们全党警惕这些不拿枪的敌人用“糖衣炮弹”来进攻我们的危险,要求我们学会同资产阶级作公开的或隐蔽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在这个报告中,讲到人民解放军的问题,今天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今天来学习毛主席十八年前的这个指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现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又是生产队。毛主席在十八年以前,就是这样信任我们的解放军,相信我们的解放军,依靠我们的解放军。今天又给了我们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这样极其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们就要象林总所讲的,要勇敢的去实现这个任务,同时又要谦虚谨慎地来进行这个工作。因为许多任务都是新的。没有经验。某一个时期,某些同志,某些地区,犯一点错误是难免的。但是,在毛主席、林总的领导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军委的领导下,这些错误是会立即得到改正的。

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党的生日,毛主席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这篇文章,大家是很熟悉的。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全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其对内外的基本政策。

毛主席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在我国条件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文章中又强调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人民手中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在全国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大力提倡剥削,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上旬,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到天津的那个亲戚王光英家里去,就是刘少奇称王光英为二哥,称王光英的老婆为二嫂的那个家里去。在那里,他经常同一些大资本家混在一起,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资本家讲话。在此期间,他先后对天津市委、东亚毛纺厂职工、天津国营企业职工、工商业资本家、天津职工代表大会、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作了讲话。这些讲话,以及同年三月十九日他从天津回到北京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一套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他的主要论点是:

第一,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不是资本家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不是私人资本家工厂太多,而是太少了”。

第二,说什么工人阶级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工人阶级“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剥削他们一下,他们倒满舒服,

如果不剥削他们，他们就不舒服，觉得痛苦得很。”因此，“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要“多剥削”，“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利”。这些，都是他那些文件上有的，不是我们造他的谣言。

刘少奇为了让资本家多剥削，宣扬应降低工人的工资。他说，“工资太高应该降低，使资本家能够维持赚些钱，使工厂可以发展，对工人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利”，如果“工资提的过高，……就要发生错误”。

第三，宣扬共产党员和工人要和资产阶级、资本家搞好关系，要向资本家投降。他说：“和资本家要搞好一点，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有人说和资本家拉好关系，就是失掉立场，这是错误的说法”。他还胡说：“关系搞好，又不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他这一套投降纲领的结论是什么呢？昨天伯达同志已经讲过了，就是刘少奇自己说的，“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年老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这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也是中国资本家青年时代的开始。他还说，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进步性”，应该让它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建立“功绩”。他猖狂地说：“中国今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将违背人民利益，也违背了工人利益”。这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

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刘少奇在一系列的报告中，不断重复上述论调，并且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说：“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同年十一月，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再一次鼓吹“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同年五、六月间，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在政协民主人士学习会上，又反复宣扬资本主义剥削“有进步作用，剥削得好”，“工人要你们剥削，不剥削人家苦得很”，“社会主义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得过早”，等等。在那几年，他是大张旗鼓地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主席在二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

刘少奇不仅反对对城市、工厂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且也反对农村合作化，反对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幻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就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一九五一年七月，他在对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示中咒骂说：“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文件已经印发给同志们了。

在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刘少奇大力鼓吹发展富农经济，昨天伯达同志已经讲过，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刘少奇在对东北农村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三马一车一犁的农民，“不是富农，是中农”，应该“大力发展”，“在数年以后应该发展到百分之八十，其中百分之十应是富农”。他胡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他反教条主义和赫鲁晓夫是一脉相承的。一九五〇年六月，他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土改报告中公然宣称，保护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都要保护富农经济”。他所讲的发展资本主义，保护富农经济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恰恰是毛主席所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刘少奇这种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完全违背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所以毛主席同这种反动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特别表现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那个讲话中。这个讲话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彻底的批驳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讲话是针对刘少奇的,文件没有印发,我不妨念几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且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我们的各项工作,应当遵循总路线,为总路线服务。离开了总路线,就犯错误。我们必须过渡,把社会主义看作‘遥遥无期’是不对的,过渡只能是逐步的,企图‘一步登天’也是不对的。”

“有的同志,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的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通过发展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和扩大我国的工农联盟。农业支援工业,促进工业化,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合作化。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手工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化,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有几种错误观点,是必须批驳的:

第一,有的同志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的一切事物,一切社会秩序,时时刻刻处于发展变动之中,例如,我们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年年在变,月月在变,天天在变,不断有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第二,有的同志提出,‘确保私有财产’。这种提法,当然更是错误的。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在不断前进,农民的个体经济必然要被集体经济所代替,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生产资料方面说,我们不能永远‘确保私有财产’。‘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这个口号,只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

第三,有同志提出,‘由新民主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看来没有大的错误,但是不明确,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还没有走到社会主义,只是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走。我们不能在整个过渡时期老是‘走向’社会主义,老是不‘走到’社会主义。事实上,我们的国营经济早已就走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了。‘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可能使人认为我们现在并不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不能明确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

所以，这种提法也是不恰当的。”

上面所说的是右倾性质的错误。

现在把这个文件看一看，就会懂得当时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是针锋相对的。

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存在于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步发展，都存在着这种斗争，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在社会主义前进中的各个时期，都顽强的表现出来。

大家记得，一九五五年，当农村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邓子恢根据刘少奇反对合作化的错误思想，大砍农业合作社。全国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为此，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彻底批判了刘少奇、邓子恢的错误，推动了合作化高潮的发展，并且引导全国人民胜利地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

一九五六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报告中，在有些问题上同苏共的“二十大”的修正主义思潮相呼应，在相当的程度上，支持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修正主义路线。报告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同刘少奇的反动主张相反，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三月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指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今天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批驳和纠正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往后，同志们就更清楚了。

一九六四年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路线相对抗。今天正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尖锐斗争的时候。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在斗争中彻底破产。但是，他们并没有自动的退出舞台。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利用每一个时机进行反扑。

所有这些，都说明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象一条黑线一样贯穿于各个时期，在每个时期都顽强地表现出来。

（四）

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他的“理论”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讲话中说：“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止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和经济文化落后，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并不是刘少奇的新发明，而是一切老修正主义、新修正主义共同的反动理论。这种理论，人们叫它做“生产力论”。按照这种“理论”，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的高度的发展，生产力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农村还很分散落后，那么他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按照这种“理论”，社会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高度发展，新

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生产力如果还没有高度发展, 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那是没有用处的。这种“理论”存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苏汉诺夫, 以及中国的陈独秀等等, 没有一个不搬出这种“理论”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 看不到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伟大促进作用。在他们看来, 在生产力水平还没有高度发展的地方, 人民是没有资格, 也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点, 我们查一查修正主义者们的著作, 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举几个例子:

一八九九年, 伯恩斯坦就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提出这样的思想。一九〇九年, 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说: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 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的可能性。”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 和一九二七年所写的《唯物史观》等书中, 都一再重复这种滥调。特别是一九三〇年, 考茨基在一本叫做《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书中, 猖狂地攻击列宁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 诬蔑说, 这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 是犯了错误, 使自己“陷于绝境”。他狂妄地说, 按照俄国的条件, 根本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俄国发生的革命, 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后, 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苏汉诺夫以及中国的陈独秀等等, 都是继承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衣钵, 虽然语言不同, 但基本思想是一样的。

刘少奇的“理论”, 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 象昨天伯达同志所讲的, 从中国来讲, 他是同陈独秀一脉相传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国际方面来讲, 他是同老机会主义、同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一脉相传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理论。

为了反对这种“理论”, 列宁曾作过有力的斗争。十月革命前后, 列宁同这种反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尖锐的论战, 彻底粉碎了这种反动滥调。列宁强调指出, 不是什么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而是恰恰相反, 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阵线中最薄弱环节, 首先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总是强调革命对发展生产的伟大的作用, 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 他反复阐明俄国有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 有巩固的工农联盟, 有蕴藏着无比的革命创造力的广大工农群众, 在取得政权以后, 完全能够把苏联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二三年列宁为批判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革命杂记》, 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 叫做《论俄国革命》, 在《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上。这是很短的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看一看, 对于批判刘少奇的反动路线, 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帮助。列宁在这篇文章中, 尖锐地批判了苏汉诺夫之流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不懂革命对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列宁说“你们说,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 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 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 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 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 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呢?”列宁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来激励革命群众: “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 然后再见分晓”。

从列宁的文章中, 我们就更看到刚才引证的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 是真正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方面，从夺取政权方面，从夺取政权后走什么道路方面，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最本质的问题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大家还记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讲过，延安的整风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与反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继承、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一条是继承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路线。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继续和发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五）

邓小平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他同样的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泽东思想。

（1）邓小平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一九五六年，他在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个人崇拜是一种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很明显是恶毒攻击和诬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一年，他在黑龙江省委汇报会上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样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说：“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那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了，明天顾不住。”很明显，这是反对毛主席的。同时也是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

（2）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他在“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说：“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一九五八年四月，邓小平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说：“革命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建设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我国还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但主要是两种方法的斗争。……在党内来说，是速度问题，并非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3）攻击三面红旗，鼓吹单干，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一九五九年二月，邓小平在上海工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诬蔑大跃进是“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一九六一年十月在黑龙江省委汇报会上邓小平攻击人民公社“超越了阶段”。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宣扬“三自一包”，鼓吹单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什么“前几年还可以看出优越性，这几年不行了，不能吹牛了”。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鼓吹单干，说什么“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红卫兵已经画出漫画了，

一个白猫，一个黑猫，拉着车子，他在上面坐着。

(4) 反对政治挂帅。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马列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特别是去年二月间，他在薄一波召集的工交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政治挂帅的结果，一定要落脚到生产，落脚到科学实验”。他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所讲的政治挂帅。他要经济挂帅、业务挂帅。政治挂帅和反对政治挂帅，这不是一般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同军事，或者政治同经济、政治同业务的关系问题，不是一种工作安排或工作比重的问題。这是一个贯彻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从老修正主义一直到刘、邓是一脉相承的。列宁反托洛茨基的时候，一九二二年写过《再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其中有一句有名的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说，政治同经济比较起来，政治是第一位。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知识。布哈林说，从政治出发也从经济出发。列宁驳斥说，这是典型的折衷主义。列宁还提出工会工作如果不是政治挂帅，我们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

毛主席在政治挂帅这个问题上，应当说是更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政治同经济的关系、政治同军事的关系、政治同科学的关系、政治同业务的关系、政治同党的建设、组织工作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明确地阐述这个问题。他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这个问题上，林副主席是高度地发挥和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这个思想。

在我们军队中。到底是业务挂帅还是政治挂帅，这成为军队中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主要问题。因为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中，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会是真空的。任何部门、行业、领域，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必然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挂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去占领各种阵地，资本主义思想、修正主义思想就必然去占领。正因为这样，要不要政治挂帅就成为能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对于每个同志来讲，就成为能不能永远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战士的问题。

所谓政治挂帅，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还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挂帅还是修正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挂帅的问题。我们讲的政治挂帅是毛泽东思想挂帅，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而他们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所以讲他们不政治挂帅，是指他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从老修正主义一直到刘少奇、邓小平，都是这样。

一切修正主义者，在军事建设方面，都是反对人的因素第一，反对政治第一，都是宣传唯武器论的。考茨基曾经讲过，在现代枪炮技术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现在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每天在宣传“唯武器论”，说什么在核武器的条件下，人的因素已失去作用了，说我们的民兵“等于一堆肉”，说原子武器可以毁灭人类、毁灭世界，而不是人类能够利用原子科学来为人类服务。罗瑞卿、贺龙等人也就是这种修正主义、唯武器论的代表。他们强调军事技术，搞大比武，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解放军，我们党同罗瑞卿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修正主义者在经济工作中，大肆宣扬利润原则，“利润刺激论”，“物质刺激论”。苏联从城市到乡村，从工业到农业，天天喊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这样

就使修正主义泛滥，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理论基础。刘少奇、邓小平也是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贩卖者。刘少奇早在白区工作时，就实行一套经济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工业方面，希望经济部门的同志，检查一下刘少奇、邓小平所散布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我们在反对刘、邓路线中，必须强调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的支左工作，首先是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支左、支工、支农，一切工作应当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去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时刻警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从内蒙古的工作中看到，军队的个别同志有一种误解。革命群众最近提出要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指的什么呢？这是指刘、邓路线和坚持刘、邓路线的人在一月二月的反扑。但这个问题军队有些同志不了解，以为这是攻击军队，这完全是弄错了。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军队，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应当同革命群众以及革命干部一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我们支左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真支左假支左最重要的标准，是真夺权假夺权最重要的标准，是真拥护毛主席假拥护毛主席最重要的标准。因此这个问题，希望同志们很好的注意。希望同志们很好理解，为什么一月二十三号的支左五条中，最后着重讲一条，就是在全军不是一般地而是深入地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离开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所谓支左，离开这个问题，就一定要犯大错误。这一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都是讲过的。我们在这一个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有些地方犯了错误，但这不是主流。有些好同志还没有完全把毛主席这个思想掌握好，犯了错误，经过批评教育，是容易改正的。至于象赵永夫那种人，也会在运动中暴露出来。毛主席再三讲过，我们解放军不能因为在个别问题、个别的时间、个别的地点，犯了一些错误，就灰溜溜的。我们应当执行林副主席上次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坚决地、勇敢地、有充分信心地去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伟大任务。毛主席党中央，全党相信解放军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相信解放军的领导同志已经有，而且将来更会有这种信心，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改正个别地方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李曼村接见重庆后勤工程学院等单位代表的讲话
〔被接见的还有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代表〕

会议开始后，李曼村同志首先作了简要的讲话，他对四月十一日驻京部分院校、文艺团体的造反派集会游行以后到全军文革提出的意见说：“这些意见我们已经迅速向上面作了反映，一定研究解决，接（见）受同志们的批评意见。”

李曼村同志讲话以后，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提出了许多问题，李曼村同志作了回答。

重庆后工代表（简略后工）全军文革的命令中指出后工“红总”是“右”派组织，应该取缔！这是谁发的命令？

李：不知道！

后工：我们因为不同意当时重庆市的夺权，警备司令部对此不满就要取缔我们，调动几万人围攻我们，砸抢了我们 10 多辆汽车，抓了我们 40 多人，他们扶植保皇派，成立了所谓文化革命委员会，右派成了“左”派，他们点名要抓谁，警备司令部就抓谁，逼着人写检讨书，请罪书，还有两个营的兵力常驻校内（四月十二日才撤走）实行白色恐怖和法西斯专政，经常挑起武斗，保守势力集中住

在一个楼，扬言要和我们血战到底，骂我们是右派，总后张池明和当地警备区有勾结。现在警备区又急忙赶我们下去支工，当时打电话告诉全军文革，你们有人说：“后工红总就是坏”，“全军文革不管，你们自己搞”。你看怎么办？

李：这些情况不知道，现在可以表态，你们把“红总”打成“右”派组织，抓了那么多人是严重突出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已派了调查组去了，有十条（四月六日毛主席签发）作武器，这些问题可以解决。

后工：××军×付军长说：“你们不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十条到现在还扣下不公布出来，造反派看不到。

李：（这时对全军文革工作人员说：赶快打电话去追问，十条为什么还不发下去？）

后工：取缔我们，抓我们的指示都是叶剑英搞的，我们要你澄清。

李：我不知道，没法澄清，我可以反映。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代表提出：北京军区 3 月 28 日抓了我们六个人，全是造反派，现在还在隔离反省，一再交涉不放，还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不符合你们情况。”“这六个人是敌我矛盾。”有一个同志作了绝食斗争，他们便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押入监狱。负责看守的战士控告了这件事，北京军区追查控告的战士，我们要求保卫战士安全（同时拿出被抓同志在监牢里写的血书给大家看。）

李：我们要查办。

随后有许多革命组织作了汇报并提出许多问题，我们后勤学院的三个代表也作了汇报，李曼村同志很重视我们反映的意见，最后李讲了话。

李：今天谈的情况有的听（说）过，我们三月上旬派了几个联络组到西安、南京、重庆、大连、长春去了。四月六日林副主席亲自起草毛主席签发的十条，我认为可以说集中了全军革命造反派的声音。在军内同样有反复，这个反复各造反派程度不同都受到了打击，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听到消息的就派人去了，为什么产生这个严重情况？自一月四日刘志坚虽被揭发，但刘邓在军队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有些人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月十日发出各单位整风指示，各单位造反派进行了整风。革命造反派在这个斗争中立下了功劳，是对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猛烈冲击，成绩是很大的。但在斗争中有缺点错误。革命派整风前后，有些人过分强调冲击机关这些支流问题，否定大方向，以至无根据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形成反复、曲折，使许多人受委屈，这是件很不好的很严重的事情。但总是有反复的。现在“十条”已经下来了，我们有了这个强大武器，八条、四条也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个反复否定八条、四条，要坚决贯彻，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把文化大革命向前大大推进。你们受了委屈，凡是抓了造反派的都应该放出来，革命组织被无理取缔的压制的都应该作严肃处理，立即恢复，有些要做调查，真正造反派是压不垮的，有人坚持斗争很好。同志们对全军文革有意见，要我们站在造反派一边，像个造反派的样子，说我们在你们受打击、压制时旗帜不够明，没勇敢站出来支持，说：“全军文革向何处去？”我们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同志们今天提出了尖锐的诚恳的批评，我们热烈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我们确确实实有错误，没有勇敢地站出来支持造反派，有时支持了保守派，我们一定做检查，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旗帜鲜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有的已经派人去调查了，如通信兵、防化兵 105 等，有些问题没及时发现，有时问题没有及时处理，我们如果及时采取措施，同志们是可以不受委屈

的，革命组织可以免遭解散，同志们的批评我诚恳接受。

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就是大的解决，什么命令都是有斗争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就是有人不执行，靠同志们斗争嘛，我们是坚决执行十条的。

关于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四个单位“三支”通知问题，如果说卫戍区司令部那样答复的（指后勤学院“星火燎原”代表汇报时谈到的卫戍区关于下去“三支”的答复）任务暂时下不来，我同意恢复活动，按战斗组织活动，还要搞斗批改嘛！我再请示肖华同志一下，告诉你们，到底“三支”怎么下去还要考虑，如果有这样的单位，左派不占优势，保守势力还很猖狂，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下去怎么办，有问题，文化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三支”和斗批改关系如何解决？正在研究，还要有新的指示，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下去嘛！

当外地兄弟院校和文艺团体被抓跑到北京的同志们问李曼村副组长他们到北京来合不合法？李副组长说：合法。并当即答应给这些同志安排食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汇报一下上海的情况。

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看，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再一条是靠群众。

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这样一句话，我们反复的思索过，它包括的内容很丰富。这场大革命收获这么大，代价那么小，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

靠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当然，还是不平衡的。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也不少。我们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一条影响大的错误。这是群众提出来的，我们同意了。毛主席发现以后，要我们重新考虑，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对于干部在革命过程中犯的错误，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主席明确地指出这个名称不妥当，又考虑到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好。主席反复教育我们，又要改变名称，又要不伤害群众的热情。由于毛主席的威望高，同时主席讲的理由非常充分，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解决了。群众不但没有波动，而且情绪很高，说毛主席对这件事情这样关心，对群众的热情这样爱护，非常感动。

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提出，

多次教导我们的也是如何对待群众问题。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件是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的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干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的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昨天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员同志，在当地谈话，破口大骂革命派，说革命派连土匪都不如。说：“不管你有几万、几十万，我一个命令就叫你完蛋。”我劝这位同志注意，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革命造反派连几万人也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是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所以比较稳定，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

回去的这批人, 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 主要领导人, 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市委依靠的是保守派。在他们支持下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因为是官办的, 一个晚上就做了三十万个袖章。很多党团员参加进去了。到十二月中旬, 工人造反派有五十万, “工人赤卫队”也有五十万, 势均力敌。但是, 经过几次大的较量, 到今年一月初, “赤卫队”就垮台了。工人造反派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上海的学生起来了, 工人起来了, 机关干部也起来了, 农民也开始起来了, 他们在革命的斗争中, 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十二月二十五日, 毛主席谈到这个形势时就讲: “上海很有希望”。果然没有几天“一月革命”的风暴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 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 是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说话也好, 同学生谈话也好, 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 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凶。“赤卫队”的头头吵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 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以前知道一些, 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啊! 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 车没有人开, 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五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艘, 拥挤到一百二十几艘。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 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 学生也好, 谈起这些事情来, 就非常愤怒, 但是不知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 没有人管了。

当时, 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 还有其他的一些要害部门, 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一块商量, 究竟该怎么办? 最突出的问题是, 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 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 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 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 革命造反派很少, 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 把工人、学生调到要害部门去。象火车站, 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 再加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 把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 从各方面把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调到码头上, 把大、中学的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做装卸工。开始有些人担心, 究竟能不能搞好? 我们就鼓励他们, 大胆地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 铁路局长找不到了, 那有什么办法, 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 学生表现得非常好, 有力量、有智慧。我们作的工作很少, 只是开开座谈会, 给他们出一点主意。比如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的文件, 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 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 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 “一月革命”的说法才出来了。

“一月革命”的夺权, 开头是这样。后来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都夺了, 有一些夺得不好, 多数还是夺得好的。不过, 那时候我们头脑里还没有“三结合”, 主要是靠革命的大联合。如果回过头来看, 那缺点多得很。最近, 有的同志到上海去看了一下, 说码头上还有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甚至责备工人们管得不好。我们向这些同志解释, 你要看到这些工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上马的。铁路局整个瘫痪了, 就是九个工人组织了一个指挥部, 抓起来的。他们本领够大的了。就这么九个普通工人, 召集了上海、南京、蚌埠、南昌、杭州等全线的造反派代表会议, 发动群众, 把整个铁路线的秩序建立起来了。当然, 你说这九个工人的水平有那么高, 也不见得, 毛病也不少。特别是当了权以后, 私心杂念也多了, 但他们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 是那些局长、党

委书记，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责，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我们应当看大方向，看主流。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也不少。就在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夕，一月中旬，上海有个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叫“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革命委员会）。突然发动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他们提出了所谓“摘桃子”问题，他们不是从这个阶级摘桃子，还是那个阶级摘桃子，这个政权究竟属于那个阶级方面提出问题，而是从个人，从小团体方面提出问题。二十二日同各个革命组织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提出新市委、市人委的名单，第二天，街上就出现标语，反对成立上海市委，并指名攻击我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两面派，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吧，不要管他。因为工人不支持他们，许多学生组织也不支持他们。闹了几天，越来越不象话。我和姚文元同志还是去参加他们的会，受了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他们不听，还要开“打倒张春桥”的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复地考虑了两天发不发？批评了他们以后，多数人接受了，少数人不接受，又闹了几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工人、学生组织要把“红革会”的头头抓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抓。“红革会”战士起来造了他们头头的反，要开万人的请罪大会，我们明确表示不要开，战士们是没有罪的，头头们只要检讨了，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了，也还是给他们出路。对“赤卫队”那样的保守组织，到现在革命委员会也没宣布它非法，也没有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他打垮的。革命委员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一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还有些“赤卫队”头头，工人群众抓了送到公安局，留下了很少一部分，正在审查。

我们可能有另方面的问题，即对于真正的反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必须抓的，该抓的，抓得太少，我们正注意解决。

再讲一个对干部的问题。

干部问题比较大，几乎所有的部长、局长统统靠边了，甚至连处长，有些单位连科长在内。这当然是由于上海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结果。市委在开头就利用上海市委过去几年工作的成绩，利用毛主席领导批判《海瑞罢官》时造成的好影响，迷惑了群众，迷惑了干部。又强调“组织纪律性”啊，“内外有别”啊，害了好多干部，好多党团员。机关干部到十二月中旬才起来造反，而且都是中下层干部，人数也不多，所以要实现“三结合”。我们就面临着怎样把大批干部解放出来的问题。解放这批干部的问题，是干部问题也是群众问题。究竟实行什么路线呢？能包办代替吗？如果不走群众路线，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几个人关在小房间里搞“三结合”，即使把干部搞出来，他们发号施令是没人听的。

“三结合”，干部亮相，绝不只是“表态”，而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不搞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那种亮相是没有用的。对群众来说，是重新识别干部，重新鉴定干部的过程。“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是革命的过程、斗争的过程，不能随随便便把干部拉在一块就算“三结合”了。特别是有一些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不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发动群众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排了队，那些人要打倒，那些人还可以争取。有的想争取也很难。江青同志上次讲话中说到陈丕显，对陈丕显的争取实在很难啊！江青同志前天也谈到了，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开工作会议的时候，江青同志把他找来，对他做了那样多的工作，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江青同志还诚

恳地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给你当参谋，必要时，伯达同志也可以去上海帮你。这不是对他的很大支持吗？这个人现在才把他看透了。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啊！前一段上海文化大革命是曹荻秋主持的，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同他商量的。这个人搞两面派，专学旧政客一套。有人说他完全是个饶漱石。（江青同志：所谓请这位老兄，我也是给他出了不少主意的，叫他去群众中去，说几句就行了，说“我坚决站在你们那边，同你们闹革命”。本来这样就没有事了，但他就是不去，根本不理睬。）江渭清那时候完全可以出来的，因为他一开始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坚决地处理了匡亚明问题嘛，他可以很主动，但后来越陷越深，没办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要帮也帮不上。陈丕显也是这样的。我一月份到上海，给他谈话，而且把主席说他的话，都告诉了他。我说：“主席说可以火烧，烧一烧好嘛。希望他能经得住考验。”但不行。他这个人，我们过去也了解一点，但没有看到他的本质。他一直搞幕后操纵，从中央回去后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见革命派，明天接见保守派，后天接见革命派，再后天接见保守派，所以两派都觉得他不错，到最后一戳穿了，两边都反对他了。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还是他，但他到处推，说这个是马天水搞的，那个是曹荻秋搞的。查来查去，还是他搞的。因为他有个基本的口号，就是：“经济上放宽点”。慷国家之慨，而且死不纠正。一月九日，已经发表了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十一日党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发出来了，《紧急通告》写得清清楚楚，所有制可能改变，谁要违反要以反革命论处，但他在十一日还签字把老虎车改为国营。十六日他还给“红革会”签发一万块钱的经费。高级干部转移财产的恐怕不多吧？他和曹荻秋都转移了财产。把自己最心爱的表、金子等转移到主席住的那个地方去。这是犯罪行为。他到处藏，最后藏到那里，我给他打了电话，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祸的。怕他不听，又请总理给他打了电话，他才搬的。他们一家吃饭，要大饭店送，每天早点花样不同。他怕传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屋里去，包括我们在内，客人走了，门的把手要用紫外线消毒。这个人已经完全变了，完全资产阶级化了，总觉得他过去是红小鬼，是老同志，总想挽救他，对革命有利。但到现在毫无结果。

对能挽救的，我们尽量地做工作。比如象王少庸，他是市委候补书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得很厉害，但是他态度还好，而且还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一部分群众对他还有好感。我们想从他这里摸一点经验，群众也认为他这个人还能争取，可以试一试看。

我们是这样搞的：首先由造反派一部分同志，给他开小会。因为以前都是开万人、几十万人的大会，有用处，但是不能细致。开小会，每一件都落实，那些是你做的？那些不是你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怎样认错？让他在小会上检查，造反派代表批评他，帮助他，慢慢的思想比较一致了，王少庸和造反派都有点信心了，然后叫他到他犯错误的单位去检讨。但是，一个人去检讨的时候，他只进行自我批评，在检讨中不好揭发别人。因此群众就怀疑他究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了没有？再就是检讨的时候，情绪总是不会很高的，说话的声调也比较低，群众就觉得这个人没有站出来。象他这个神气来领导我们，同我们革命造反派距离太大，结合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这些干部在斗争中亮相，不仅要进行自我批评，还要能够揭发别人，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丕显、曹荻秋划清界限，应该使群众、干部都看得见。于是，由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两百人左右的电视会，把上海所有的局长、部长、副部长，不管挂过牌子没

有，戴过帽子没有，统统找来；工人、学生在家里看电视，搞了好多部电话，你有意见就打电话来。这样会场内外结合，成为一个揭发批判的会，也是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会。先是他们检讨，后是干部揭发批判。这个会开得相当好，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给他个机会。但是他们的检讨实在不象样子，这就在全市群众面前彻底地暴露了，群众的电话就不断地打来，会场上的干部也批评他。同时给干部一个亮相的机会。群众就看到干部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看到他们在那里同陈、曹作斗争中划清了界限。开了四个半天，群众就给他们排队，那个人表现好，那个人其次，那个人再其次，那个人表现最坏。排队的结果，第一是王少庸，其次是马天水。在这个基础上，再开一次大会，王少庸再作一次检讨，然后由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对他的检讨表示意见，最后由革命委员会宣布，批准他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对他一个人，我们做了近两个月的工作，比较细致。这样看起来好象很慢，但是有个最大的好处，是这种亮相比较可靠，他自己是真正触及了灵魂，进行了自我革命，群众在他的亮相过程中受到了教育，对他也进行了帮助，因此，他是真正站出来了。过了两天，开群众大会时，我们就试了一下，宣布说，今天的大会由王少庸同志主持，一宣布，全场一万多人鼓掌，欢迎他主持大会。他现在说话群众听了，说明群众承认了。马天水现在也站出来了，群众也批准了。将来会不会有反复，那是将来的事，但就这一段来看，这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比较好的一种办法。不是和稀泥，不是凑合，不是关在小房间里指定几个人“三结合”，而是发动广大群众，发动了广大干部。

电视大会，我们准备将来一个月开那么一两次。每次都给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机会。这对他们有好处，对干部亮相有好处，对群众也有好处。这就是使他们不至于忘记了斗争的大方向，斗争刘、邓，斗争陈、曹，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大方向。

看来上海的局面虽然比较好，我们在思想上还是准备有大的反复。夺权以后，也还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如何把这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带好，是个大问题。这个队伍是个好队伍，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它里边的基本骨干是左派，但是还有大量的中间派。队伍大了，和初期不一样了，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在队伍内部滋长起来。里边也还有个别的坏人。如果不采取正确态度，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要犯错误。需要认真地来引导他们，边战斗，边整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

要帮助他们，那就有一个感情问题，有一个对他们的态度问题。我和上海的警备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问他们，你们对造反派究竟是讨厌还是喜欢？他们说，从前是比较讨厌的。因为他们长期不介入，红卫兵的传单不敢看，是上级规定的嘛，红卫兵给他们一张传单，回去马上交给指导员。红卫兵、工人革命造反派有些事，如砸啊抢啊，甚至发生武斗啊，里边包含那些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无法理解。上级也从来没有进行教育啊！什么时候才开始变的？他们说，是一月十一日，中央不是给上海发了个贺电吗？那个贺电是四个单位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战士们一看那中央军委都署名了，中央军委都支持造反派啊，那我也支持。感情就变了。感情变不变，确实是大事。以前，只看保守派党团员多，成份好，就是喜欢。弄清楚真象，看着造反派可爱了，许多事就好办了。最大的问题还是到群众中去，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也就懂了。这是不太难的。我们自己也还要继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里面去。改造自己。

最后，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成立或者将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军管，也要准备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如何使得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机关，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全力地支持他们。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他们的领导成员，一般的说原来的职位都是比较低的，在社会上原来是不出名的。上海工人运动这么蓬蓬勃勃，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工人造反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真正政治水平比较高，工作能力比较强的领袖人物，还没有。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是关系能不能培养出接班人的大问题。非常重要。一个地方只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个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就是革命委员会了。军队也好，外来的同志也好，上级也好，都要想办法来支持它，树立它的威信。这样，它才能把革命抓起来，把生产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上海的工作没有系统总结过，就我们碰到的问题中，主要讲了一个对待群众的问题，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很久没有到广州来了。我首先向在座的、在场子里的广州军区直属队的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群众热烈鼓掌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你们问好！（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昨天向广州市的大中学校代表、红卫兵小将们和机关的革命造反派，还有工友农友们谈了一次话，今天下午已经向你们放了录音了，你们都听了，不要再重复这些话了。刚才看到军区政治部收集了你们的意见，那么多意见我怎么回答呀！我想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大家问，现在国内外形势大好，应当怎样看？特别是国际形势，应当怎样看？第二个问题关于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五大工作中，有什么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一个问题，主要谈谈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国际阶级斗争，当然很复杂很尖锐。但是，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应该从复杂尖锐的斗争中抓到要害，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本质。抓住中心环节，就会了解国际形势的概况。目前，国际阶级斗争的中心环节，即主要焦点是在越南，因为那个地方进行着武装斗争。现在全世界的注意力都看着越南，在越南战场上打着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除了越南以外，虽然在非洲，在拉丁美洲，也进行着一些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但都是比较小规模。美帝国主义正是在越南这个战场上被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撤退，还是继续把这个战争打下去，扩大到东南亚，一直扩大到中国？这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越南的战争，对敌人来说是一场侵略的战争，对人民来说是一场反殖民地的战争，人民战争，民族革命战争。这样一场战争，不仅关系到越南人民的命运，印度支那人民的命运，亚洲人民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命运。这话是不是夸大了一些呢？不是！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看一看越南南方这块土地，面积仅仅是十五万平方公里，不晓得广东省是不是十五万平方公里？（黄永胜司令员插话：广东二十万平方公里）。就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地区，上边住着南

越人民一千四百万，可是，他们抗击了一百万的敌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四十三万美军，这个数目还要继续增加；还有以南朝鲜为主的仆从国家的军队五万多人。这两项加在一起接近五十万。另外，就是美帝利用的南越傀儡军队，号称七十万，实际上五十万左右。总共加在一起一百万。这就是说，越南南方人民十四个人要抗击一个敌人，进行人民战争。

这个战争，大规模发展起来是在最近两年多，武装斗争开始是在一九六零年。头两年，越南南方人民几乎没有几条枪，人民拿起锄头来，拿起刀斧来，跟伪军，跟美国的顾问进行武装斗争，这样发展到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就渐渐地形成了人民的武装部队。美军直接参战是在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柯西金经过北京到河内去会谈的时候。正在这个时候，美军大举轰炸越南北方，跟着派正规部队在越南南方登陆。苏修新领导集团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在美帝国主义狂轰滥炸之下，吓破了胆，没有进行抗议、示威，所以就使美帝国主义敢于公开地大举出兵南越，轰炸北越。就在这两年内，美国侵略军从几万人增加到二十万、四十三万人，今年到年底有可能增加到七、八十万。越南人民对付这个世界上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毫无畏惧，越打越强，各界了经验，摸到了战争的规律，摸到了怎样在强大敌人压境的时候，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式的人民战争。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战役上，在一个地区，以多胜少，不断地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最近在美国关岛会议将开幕的时候，威斯特摩兰这个侵略南越的总司令，动员了一个师几万人去进攻西贡西北部（他认为是南越人民解放军的指挥部）。战争的结果，人民军队的指挥部没找到，美军被消灭了一千多人，而人民武装只牺牲七十多人。这一仗打得好。南越人民武装就是高度地集中兵力，分割敌人，然后歼灭大量的敌人，而保存了自己。

南越人民在劳动党和胡主席的领导下抗战，处在一个最困难的环境。海路是没有办法支援的，陆路要通过所谓胡志明小道，辗转地才能送到需要的弹药、补给，因此送到南越的东西数量总是很少的。但是敌人的困难就更大了。拿美军来说，一个人每个月要消耗三吨东西，一年要三十六吨东西，拿五十万人来计算，一年就要运输一千八百万吨东西到南越。你们想一想，这个运输量多大！如果按一万吨一条船计算，每天就要五条万吨船进港。尽管美帝国主义在南越千方百计地开辟港口，也是没法子满足这个需要的。而美军打仗，又离不开后方供应。它在一个地方空降一支部队，紧跟着就要送一切补给，从弹药一直到喝的水，洗澡的水都要送。因为怕喝了脏水生病，怕洗澡水有血吸虫传染。那个地方天时、地利、人和都对它不利。天气如是雨季，常常几个月阴雨连天，蚊虫疟疾、水、马蜂，都和它作战。你们想一想，五十万美军，在供应上就有这么大的困难，那么，准备它扩大到一百万吧，也不过是一百五十万敌人。它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南越的战争有一条规律，美军来得越多，越不想打仗，伪军更不想打仗。而美军如果没有伪军帮助带路，就成了瞎子、哑巴。因此，美军越多越分散，就越容易打，它的士气就越低。据越南同志们说，美军比日本军队、法国军队都不如。所以现在南越人民有这样一句口号：“专找美国鬼子打”。这样，美国即使出兵一百万，也不能解决南越问题，更不要说扩大战争了。一百万的美军需要多少的供应呢？如果五十万人需要一千八百万吨，那么加一倍就要三千六百万吨，就是每天要送十万吨东西到南越港口。除此没有别的办法。把轰炸机改为运输机，也戴不了多少东西，而且路途又那么远。即使用日本作它的后方补给地，也供应不了这么多。你们想一想，这样一个地区的战争就把美国抓住了，而美国后方呢，单单直接作

侵略南越美军后勤工作的,现在需要一百万人,就是说五十万人在前方,后方直接作供应运输的要一百万人,间接的还不算。如果将来增加到一百万,后方就需要二百万,合起来等于三百万人直接参加了战争。所花的经费呢,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的预算,单单用在越南战争的是一百三十多亿,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预算用了二百四十亿。可以想一下,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直接用在越南战场的经费,决不会少过四百亿。这就加重了美国劳动人民直接间接的负担,国内的内债也就渐渐上升,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现在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的宣传,总是说战争快结束了,不敢说扩大了。因为南越一个小地方,就把号称强大的美帝拖住了,要花这么多的经费。如果战争再扩大,就要增加兵源,扩大供应,增加预算,其他方面都要受到影响。在南越前方一百万,后方就要二百万人搞运输供应,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东南亚,扩大到中国,怎堪设想呢?前方五百万,后方直接服务的就要一千万。如果把后方间接地为军事生产服务的人员都加在内,就更多了。美国怎么能作这样一个动员呢?现在在美国人民中间,在劳动人民中间,在革命的青年中间,反战的情绪日益增长,反对侵略战争的口号,到处宣传着,动员着。美国政府面临着明年度的总统选举,一九六八年究竟如何过这个关,现在是没有把握的。美国关岛会议的结论说:在南越打着一场“令人烦恼的、无边际的战争”。大家还记得,一九五二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盛行着这样的说法,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个口号是美国人叫出来的,结果一九五三年他不得不结束这场战争,打不下去了。如果说朝鲜战争只能打三年结束,那么美国在南越已经打了两年半,将来扩大侵略的话,能够继续多久呢?如果继续打下去,那他更加陷入泥坑里,没有出路。最近,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泰勒将军,后来在南越当大使又失败了,回国退休写了一本书,他说根据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经验,美国人最好不要在亚洲登陆。这是他的结论。大概在亚洲打败了的美国将军,从麦克阿瑟起到泰勒,都是同一个腔调。但是,我们听到他们这样讲,有点不大高兴了。不高兴什么呢?不是说他认输了不高兴,而是说这样一搞,他不来了,我们不高兴。我们不是在准备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备战,你们不是已经手痒了吗?越南人民打得那么欢,他们反帝的革命精神的确值得我们敬佩。现在越南农村劳动的力量,百分之八十是妇女,男人多半投入各种战争准备工作。他们每个村子都组成战斗村。一旦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到北越,北越将采取南越一样的做法,每一个村子都能自己独立作战,能够对空射击,能够进行丛林战、地道战,也能够生产自给。这种战争准备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要说全国了,就拿我们沿海地区、接近越南的地区来说,我们的战备工作,从人民战争的要求来看,准备得还不够。当然我们沿海的民兵是比较好的,在消灭美蒋特务方面取得了成绩。但是广泛的动员还没有做到,还需要加紧战备,特别是广州军区担负着更重大的任务。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五大任务,还要加上备战的任務,还有战斗的任务。因为敌人从空中侵入,从海上侵入,我们都要打嘛!这是直接的战斗任务,需要有广泛的备战。所以说,我们广州军区,从领导到指战员,到一切工作人员,都负有相当重大的责任。从这点来说,我们应该向你们表示敬意!(热烈鼓掌)

我们还可以说到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形势。世界形势,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是国际阶级斗争。今天代表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已经不是苏联,因为那里修正主义当了道。中国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着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应当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正因为这

样,美帝国主义把我们看成它的主要敌人。而我们也把它作为国际阶级斗争的主要敌人。从武器装备简单的数字对比,我们可能是不及它,但是我们最根本的条件是人多过它,团结的力量大过它,大过它不知多少万倍!美国两亿人口,真正愿意为帝国主义效命的有几个呢?美国兵在南越打仗,完全是少爷兵的打法,离开火力就不知所措。美国动员入伍的都是新兵,规定一年一换。如果一年不换,下一年就动员不起来了。没有办法,只好用速成的办法来训练新兵。美国训练士兵,完全是机械性的。新兵从检查身体完了以后,穿上军衣,先是接受枪枝,练拆卸,然后练瞄准,然后练冲锋,然后练发射,然后配合其他火力作战。从班的动作,到排、连最多到营的动作吧,就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教室里,就象工厂的车间似的连起来,一道一道工序出去,就算毕业了。最长的三个月,速成的更短。他们把一个人当成一副机器,就象当年卓别林演机械化吃饭似的,流水式的。这样把人当成机器训练,如何能够消化呢?如何能熟练呢?如何能养成勇气呢?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说政治上,本来它就是被动的。美国的士兵是不自觉的,不是象我们为人民的利益、为民族独立的利益而战斗的。他们是为帝国主义卖命的。到了前方,到了越南,士兵想方设法消极怠工。害病的,或者装病的,比例就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住在医院里,疗养院里,卫生所里。再加上美军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很多守卫部队,所以真正拿出机动作战的兵力不到一半。在这一半里边又有分别,把黑人摆在前头,把白人摆在后头,这个战斗力就更差了。黑人为什么要为帝国主义效命呢?黑人当然不肯干。黑人在前面一溃退,后面的就要垮下来。离开火力,离开供应,就缩成一团,被动挨打。就如同在训练时就训练好了一样,两手举起,乖乖投降!所以这样的战斗力,的确是兵越多就越散,士气就越低,死伤就越大。

美国不仅把国内的兵员,按照七个适合的名额动员起来了,而且把现有的国外的兵力也调动了。主要是从欧洲调到亚洲,从西德把军队一个师一个师地抽调到南越。现在的南越战场上,连仆从军队算在一起,已经有三十五个旅。这么多的兵力,在南越战场上是不是布满了呢?没有。现在的兵力布署,在西贡地区集中了十三个旅。从西贡往东北海岸走,一个海港叫金兰湾,那边到归仁,就这两头,集中了十三个旅,再往北走到岬港,直到十七度,摆八个旅。共三十四个旅,还剩下一个旅在湄公河三角洲,而金瓯半岛还没有美军。所以,他的兵力只能够在一个小堆的据点,不能离开海岸线和运输线。这样就没有法子取胜,只能吃败仗,就是再加五十万,情况也不会改观。而现在越南人民打出经验来了,懂得战争的性质,是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这个战争的特点是人民战争,敌人是反人民战争。战争的形式,采取游击战为主,必要的时候,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运动战、阵地战,消灭更多的敌人。一般的都是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地消灭敌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王力肖华关锋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代表的讲话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杨成武、李曼村同志。〕

肖华:

我们刚才开了会,研究控诉军内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会,今天就解决一个问题。同志们有好些话要说,我们另安排时间。

关锋:

我们看了大家的决议,讲点意见和大家商量。我讲的可能旗帜不鲜明,态度暧昧,大家可以炮轰嘛!有些问题我可以答复,有些问题我不能答复,也无权答复,还有组织纪律的约束,我讲错了大家可以炮轰。

我在街上看到了“炮轰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大标语，我不赞成。前一个时期肖华同志管别的事情，现在肖华同志是常务副组长，江青同志是顾问，大家可以完全信赖的吧！杨成武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谢富治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还有军委的领导。总的我们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下，全军文革小组是可以信赖的。青海问题已经解决，四川问题也正在解决，也快要解决，情况也搞得差不多了，主席批准就解决。你们在大街上一糊大标语，外国人就很感兴趣。炮轰个人可以，炮轰我，我赞成。全军文革不能炮轰，不能改组，搞到大街上去敌人会造谣。

现在斗争的大方向，是对刘，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批倒批臭，必须先批深批透。这就要坐下来下点功夫，这不是象街上的大标语把刘少奇的奇字倒过来划的象个狗字能解决问题的。这样不够，不能批臭。得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好好去分析批判。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全党、全国、全军的重视，影响很大，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还只是开个头，我们还应当进行批判。刘邓是有一整套的东西要进行批判，解放前反毛泽东思想，鼓吹资本家发财致富，解放后还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土改、工商业改造，在农村反对合作化，和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唱反调。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没有解决。1960年1962年搞单干风、翻案风。他说，不能普遍使用拖拉机就不能合作化。又说，没有拖拉机，合作化就不能巩固，反对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一整套的东西，需要我们很好研究，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嘛！在大批判中，大立毛泽东思想，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才能使我们国家不变颜色。批深批透，提高全国人民觉悟水平，保证以后不再出修正主义，出了我们就能发现。把一个人拉下马容易，文化革命不是简单地罢官革命，要简单地罢官容易，中央下命令就行了，那样不能在意识形态中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当前最大的任务，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通过批判大立毛泽东思想。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和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他们都是那一套，起码有政治上的联系，都是搞资产阶级那一套。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前一段支左成绩是主要的，有的地方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有的地方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了条件，大家也知道，许多地方出了岔子，主要是没有经验，也是难免的。个别的坏人也有，青海就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是可以解决的。听说大家要开一个控诉大会，我建议不开的好，中央正在解决，情况清楚了。四川的问题是好事还是坏事呀？察觉了就是好事。大家要注意爱护解放军，要爱护解放军的荣誉，特别是我们解放军自己。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有很大成绩，我们千万不要动摇了对解放军的信任。毛主席讲，有三个依靠、三个相信：一是相信依靠人民群众；二是相信、依靠人民解放军；三是相信、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这三点不能动摇，动摇了这三点，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有一个地方军管，有缺点，学校去冲了，江青同志昨天严厉批评了的。毛主席提出的军管不能变，军管这块王牌不能冲破，有意见可以提。人民日报有篇社论说，对解放军的态度是区别和衡量左派的标志之一。支左中有缺点有错误是正常现象。对解放军贴大标语，开大会搞到社会上就不好了。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能开展“四大”？就是因为有解放军做后盾，我们的国家是巩固的。没有解放军，我们就不能那样搞了。个别军区有个别的坏人，我们跟

他们讲清,让他们自己去处理。个别严重的报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处理。现在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条命令,但是八条仍然有效的,不矛盾。

军事院校我接触的很少,地方院校接触的多,现在有个苗头,十条下来以后,革命派扬眉吐气,队伍又发展壮大,这是好事,另一方面又冒出来一点小资产阶级偏激情绪。毛主席说,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多的国家。从领导方面,要善于引导。前些时候提出来要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队伍。搞不好的话,又要发生反复,出一些纰漏。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攻你们也要攻我们了,在大好形势下面,要特别注意,要把革命推进一步,要特别小心谨慎,不要犯错误,使大好形势又不那么好,要避免一些可以避免的缺点。林彪同志提出“三性”即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希望大家重视,“三性”缺一不可。没有革命性就谈不到科学性,没有革命性谈不上组织纪律性,没有革命性的组织纪律性就是奴隶主义。没有科学性也谈不上革命性,就看不到大方向,目标打错了。报纸上写文章打倒奴隶主义,但是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资产阶级的纪律要打倒。我们服从毛主席、林副主席算不算奴隶主义?这不算!我们有政治原则性,有毛泽东思想作基础,离开了政治原则,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谈组织纪律就是奴隶主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离开毛泽东思想谈组织纪律,谈民主集中,那是奴隶主义。“一切服从我”,对上要民主,对下要集中,搞独立王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基础上,还要下级服从上级,这不矛盾。“三性”缺一不可。

我想大家看到十条命令,心情很高兴,也希望大家把以前的八条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和通知也看一看,避免片面性。

听说大家要成立粉碎军内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筹备会,要开大会,揪军内带枪的刘邓路线,我看不这样搞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借此破坏生产,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三支”中成绩是主要的,生产是很好的,军队一抓就好了。今年看来农业又是一个大丰年,工业水平比去年同期好得多,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正在抓,正在解决。搞到社会上,会破坏解放军的声誉,香港马上要见报(杨代总长:现在就见了。)苏联,蒙古修正主义也造谣。我们要时刻记住,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顾全大局。我活了四十八岁了,没做多少工作,犯了不少错误,往往在一点上,越想越有理,钻了牛角尖,忘了大道理,犯了错误。因此这样大会还是不要开,我这个建议不知对不对,和大家商量。今天就解决这个问题。

王力:

刚才肖华同志、关锋同志讲了话,我没有多少要讲了。刚才我文化革命小组会上听到同志们提出了意见,有些还是不大清楚。我们最近还想找机会听听大家的意见,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适当,然后再正式谈谈。中央文革临时让我们四个人到这里来,解决一个问题,听说同志们最近要开一个大会,希望不要开这样的大会。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叫我们来提这样一个意见。我们都是同志,都是战友,不是从感想出发,而是从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需要出发的,听说同志们要开个会,四川来控诉成都军区,同志们掌握的材料可以交给我。如果有受打击的同志名单可以交给我们,这样对中央和中央文革解决四川问题有帮助,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时好请同志们参加,至少可以派代表来参加。你们要开大会,反而不利于解决四川问题。可以说,四川的问题是严重的,成都的问题是严重的。同志们要相信中央,中央文革是能解决的,四川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半了,宜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四川来的材料这么一大堆,各县的材料都有,

材料我们都整理了。宜宾问题不是现在才发现的，去年就发现了，这次解决宜宾问题是我们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四川的问题很快解决，党中央正在处理青海问题，安徽问题，内蒙问题。中央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的胜利！是革命群众斗争的胜利！也包括军队同志的贡献。这几个省的问题解决了，同志们可能还要提出别的省的问题，但不一定都要中央下命令解决，中央通过对这几个省的解决，又有十条和一些政策性的规定，大多数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今年一月间，毛主席提出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不要出了问题就看不到主流，一团漆黑。毛主席作此重大规定，就考虑到可能出些问题，毛主席头些日子还讲过，问题再大莫过于青海。因为军队里确有两路线的斗争，不是真空，在部队里有两路线斗争，参加地方也是两路线斗争，要表演，但是要相信部队大多数是好同志，坏人是少数，好人犯错误是绝大多数。这是与两路线斗争教育不好有关。

毛主席说过，问题再大莫过于青海，但青海最近的情况最好。青海问题是反革命制造的，司令员被反革命抓起来了，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这是一次政变。坏事很快变成了好事。同志们对这些事情表示激愤这是好的，这是无产阶级应有的革命激情，这表现了大家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痛恨。但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

现在有人想把矛头对着解放军，要提醒大家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我这样说，不是对解放军不可以提意见，有意见可以提，但要讲求方式，对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要反对，要提不同意见和看法，但要采取适当方式。今天只能解决这一个问题。

还有不要武斗，看到十条，还要想到八条。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十七日，毛泽东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 退江青。 可以，照办。（2）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看过，删了一点。（3） 三 主席说，这篇文章（4），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几个月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曾先后两次送毛泽东审改。本篇一是对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江青四月十七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江青四月十七日送审稿的修改，其中“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说：“这是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改了几次，缺引证，不够典，因为没有发言稿。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对于这次送审稿，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在第五页，对江青讲的历史上“触詔说赵太后”的故事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在第七页，江青讲到军队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时说：“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实际上早已经介入

了。”在其中“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一句前，毛泽东加了“就许多单位说”一语。 在第九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其中的“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一句前，加写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九个字。此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增删。 (3) 毛泽东对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三、四外，还有以下几处：将第四页上“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一句改为：“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删去第六页上“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一句中“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九个字。在第七页，送审稿讲到广州市的文化革命情况时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毛泽东把其中的“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一句改为：“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在第九页上，送审稿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创作和教育情况时写道：“基本上为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完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毛泽东把其中的“基本上”改为“大量的”，将“那完全是”改为“那几乎全是”。在同一页上，江青讲到她在建国初期辞去一些工作职务时说：“我自己思想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改为：“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在第十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毛泽东把其中的“都是”改为“大量的”。在第十三页，江青讲到：“我身体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脏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们整出心脏病来了。”毛泽东删去了这些话。在第十四页，江青讲道：“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并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括号写了“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十个字。此外，对这个讲话稿，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增删。 (4) 指《战国策》中的《触谏说赵太后》一文。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关锋在空军司令部谈话纪要

关锋同志先询问今天来空军大院的有哪些单位。

答：有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后勤学院、测绘学院井冈山、七九六部队、空军通信学校红纵、工程兵学院、空军技术学院、海军×学校、二医大、空政文工团红旗。……等单位。

关锋同志：

提请同志们注意一点，要注意了解事情的真象。说老实话，有一些话我也不好讲，有组织纪律性嘛。

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同志，你们不要盲目支援。为了说明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但是要举例子，又恐怕大家贴大字报，上街，以致损害了左派。能不能不贴啊？（众答：能！）比如清华的井冈山，我们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从政治上支持。他们对空政文工团红旗，就听了片面之词，人家一串联，就盲目支持，搞得不大好。前些日子我们和他们谈过。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也参加了嘛，你（对北航红旗的学生）可以去问她。

空政文工团的事情，空军做的没有错，是正确的，在路线上完全对。真正的坏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的，要不要逮捕？有嫌疑的，

要不要拘留？是要的。在十条以后，还是要的。十条和八条是一致的，不能用十条来破坏八条。革命左派要提高警惕。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搞了一些片面性东西，受人利用。

有极少数坏人在背后煽动。我们这些人毛泽东思想还不是很多，我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就不是很多嘛！现在有人煽动用十条来破坏八条，各地都有这种苗头，有这个反映，要引起注意。

你们由于对背景不了解，也许你们认为今天行动是正确的。但可能是相反的。你们昨天的行动（指四月十六日部分军事院校人员接管三座门接待站）我们也是不赞成的，但我们认为精神是好的。昨天肖主任，我和你们谈过，肖主任谈的比较深，肖主任是全军文革常务副组长嘛！对肖主任的评价大家都知道嘛，这不是我个人讲的。这些今天不想多谈了。

你们不要轻率行动，要调查研究。听到有什么情况可以反映嘛！听到一方面的情况，还要听另一方面的情况。要对比，分析哪是对的，哪是不对的，不对的其中又可能有合理因素。

昨天江青同志讲了话，你们去听了吧！（有人答：去了。）批评得很厉害，但那也不是她个人的意见。

那么多的反动言论，有的辱骂江青同志的话那么坏，……这些，是要逮捕的。十条命令中规定不要抓人，但那也不是今后一个坏人也不要捕。极少数坏人还是要抓。希望同志们要小心，注意调查研究。

张家口工程技术学院的同志是不是和方凡在一起的？（答：是）请你转告他一声，我和他见过几次面，去年处理解放军报问题时，他给了我一些帮助，请你转告他：要千万千万警惕，不要自己走向反面。

你们犯了严重错误，使得支持你们的人不得不批评你们。

不用多说就明白了吧！再多的话我也不好讲。现在是大好形势，大家冷静一些，要学习毛主席著作，采取重大行动不要莽撞，免得再出现反复。

敌人睡觉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睡觉了没有。人家抓左派辫子，不光是整你们，也是整我们的。

主席、林彪同志是根据各方面情况考虑决定对策的。

现在有极少数坏人，利用青年人的热情，利用十条煽动群众，以后他们又说：你看，发下了十条，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了！你说十条对不对？！

修正主义、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惯于使用的手法，就是把我们的口号接过去。篡改成他们自己的。比如三结合，他们就接过去，抽掉了灵魂。正确对待干部的口号，他们就用来对革命小将，整我们。红旗杂志社论说：“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样干的，不能把这个罪名加在小将身上。后来又发表了清华大学的调查报告。所以，大家要分析，要充分考虑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中就告诉我们，事情是复杂的，头脑也是要复杂的。所以，大家要了解历史和背景，不要情况不清楚就行动，要采取恰当方式反映。

吴法宪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过去不认识吴法宪同志，去年冬天才认识的。一月十三日，江青同志讲话时也讲了嘛！空军在支左工作是好的。当然，我不是说别的军种就不好的。你们北航的试点是空军搞的，空军在地方上没逮一个，方向是稳的。

文工团的事情你们就不要管了！

文工团的事情就由全军文革和空军文革处理。

群众组织就不要参与了，由全军文革和空军文革负责处理。

肖华同志主持全军文革，军队问题主席和林彪同志一定会采取恰当的方法（讲了一些四个人的情况）……对这样的坚决抓了。空军天天战备。

（北航红旗：应当怎样支持军队造反派？）

军队问题复杂，你们年轻，这些让全军文革来解决吧！地方不要插手军队问题，要特别注意，要顾及到国际影响。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徐立清与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等组织座谈时的讲话

《井冈山》的革命同志们：

你们辛苦了！你们到这里来已经三天了吧？你们来了以后，我们听取了你们代表同志的汇报。我们座谈了以后，前天我们全军文革小组的一部分同志作了一些讲究，昨天我们向军委汇报了，报告了，军委研究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四月十四日，你们开会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你们这个会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这个会议也有些缺点，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在会议上，他们来冲你们的会，特别是打你们的人，砸了你们的东 西，这一些是错误的，是非常错误的。还把政治部的章子，保险柜砸开把一些公章抢走了，这些行动都是错误的。我们准备找《红联》的负责人，要他们把抢走你们的东西归还你们，我准备今天找他们，但没有找到，今天谈不成，明天会找他们谈的。

同志们到这里有很大的收获，你们到这里来，中央同志有两次接见你们都派代表参加了，中央首长、中央文革有很多很重要的指示，我们希望你们坚决照办，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高等军事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搞好，我想，今天就向同志们讲这几句话，最后高呼几个口号：

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汇报以后）

同志们：

今天晚上讲了很多情况。提了很多意见，还有很多同志的意见要讲没有讲完，你们的这种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问题要解决，我上次跟几个代表同志谈过了，我说，我们全军文革有官僚主义，你们那里武斗时间很长了，我们全军文革在一、二月份最忙，最乱，那时候高等军事学院的情况根本没有人去过问过，三月份以后情况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们的人也很少，这些时候派了有些人到院校去了，在家的很少，这时候我们想了解一下高等军事院校的问题，零星的有些同志去看一看，我们就是相信高等军事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主要靠高等军事学院的革命同志，一直到最近，你们了解，我们也去了一些同志，并且在 我们李曼村主管院校组工作，他也同军内的有些院校征求过意见，象今天晚上，军队的一些单位不是全部征求过，但是征求了一些单位的意见，是想解决高院问题。

四月十四日发生大武斗事件以后，你们到这里来以后，我们这几天天天开会，我们还准备研究，部分同志不是全部都研究了。昨天军委开会，我们把这个问题

汇报了, 研究过的, 在军委决定批准以后, 将来要告诉同志们, 将来一定按照军委决定作事那就解决了, 全军文革一定根据军委决定去办理。所以, 在军委这个决定还没有批下来以前, 今天晚上听说同志们要回去, 今天晚上简单地接见一下, 真正解决问题是在军委指示下来以后, 那时候再解决, 那时候同志们有意见都可以讲, 有什么话都可以讲完, 今天我不能谈很多意见。

刚才同志们要求江青同志、肖华同志接见, 你们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同志们要考虑江青同志、肖华同志一天到晚都是开会, 要他们马上来接见是困难的, 要体谅他们的工作, 照顾他们的工作。我们打一个电话是可以, 但希望同志们尽量不提出这个要求, 他们很忙, 昨天也接见了一些代表。

昨天晚上的会我没有参加, 肖主任的讲话不太清楚, 刚才这个同志(指郭其桥)说肖主任讲的是高等院校。因为我不了解情况不能肯定讲, 我的理解, 肖主任所谓高等院校不是高等军事学院, 高等院校很多, 军队有好几十所高等院校。高等院校打群架是不是指高等军事学院? 我认为不是, 因为现在高等院校打群架确有, 我估计不一定是指你们高等军事学院, 因为你们的情况他们也清楚, 前天、昨天开会都谈了这个问题, 李曼村同志汇报了, 我们也汇报了, 你们的问题清楚嘛, 有的高等院校确实有打群众的现象, 我估计肖主任不是指你们, 如果这样讲, 我相信是讲其他院校。

关于回去不回去的问题, 那由群众考虑, 我们希望同志们尽快回去, 因为坐在这里吃饭, 睡觉很多不方便, 但是我们考虑, 你们回去考虑的是《红联》再武斗, 你们回去我们全军文革有些同志可以陪你们回去(众: 我们不是怕)。刚才同志发言了, 它今天晚上还在打, 准备明天回去还要打。我个人的意见, 它如果象这样还要打的话, 那将来就要采取纪律制裁。所以, 同志们回去的问题, 你们自己研究。其他问题没有什么可谈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 李富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关于生产问题, 本来是总理要讲话的。因为总理还没有回来, 要我来讲讲。我没有很多准备, 想到几个问题, 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主席指示, 军队不仅要支持左派, 而且要支农、支工、支交通, 搞军管, 搞军事训练, 在文化大革命中, 这一系列的措施, 一系列的光荣任务, 交给了人民解放军, 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抓革命、促生产最大的关怀, 最大的支持, 是在文化大革命决战时刻的一项很重要的决策, 将会产生深远的意义。对于工农业生产, 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也将起着深远而重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解放军到工厂、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 宣传四个第一, 三八作风等, 把一套好作风、好传统带到工厂、农村中去, 将使每一个工矿企业, 每一个农村, 每一个商店, 更加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过去, 在经济战线上, 一般地说, 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不高的, 就是不突出政治, 经过这次解放军去宣传, 会在工矿企业、农村, 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 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也就会搞得更快、更好。

毛主席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 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我们搞好文化大革命, 必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把生产建设搞得更快、更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 我十个月来的体会是, 决不能搞“二元论”, 不能把革命和生产并列, 更不能拿生产压革命。革命是统帅, 一定要用革命来统帅生产, 带动生产, 推动生产。去年十二月以前, 拿生产压革命, 这是

刘、邓和陶铸的作法。我们如果不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不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那我们就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不复辟，不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的大事。因此，必须首先把文化革命搞好，必须以革命带动生产，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来带动生产，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然，生产发展了，也可以为革命提供物质基础，更加推进革命。正如林彪同志所讲的，从重要性来说，从主导性来说，革命应摆在首位，是第一位的问题，从时间的安排来说，生产的时间要占多些。中央去年十二月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就规定保障八小时工作制。我们完全相信，解放军一定会首先用政治来支左、支工、支农，首先用毛泽东思想来支左、支工、支农，一定能使革命和生产取得双胜利。

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交系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还有陈云、薄一波的影响是很深的。他们长期反对、抵制毛主席的思想，推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通过解放军对工农业的支援，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刘、邓、陈、薄在经济战线上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错误，肃清他们的流毒。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真正让毛泽东思想在经济战线的各个领域深深地扎根，统帅一切，把解放军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一套好作风、好传统，带到经济战线上去。这是很重要、很重大、很深刻的问题，也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战线上需要斗批改的中心问题。

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关于以刘、邓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想就经济战线上十几年来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简单地给同志们作一点介绍，提供一点线索。我自己还没有系统化，没有认真地研究，只是粗略地想了想，仅供同志们参考。

在经济战线上，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就是说，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另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加上陈云、薄一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是回到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长期以来是很尖锐的进行着的，是针锋相对。

首先讲一讲毛主席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著作和指示是很多的。还有一些会议中的谈话，一些重要的指示，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出来。现在，仅我所记得的，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关键性的文章以及一些重要指示，简单地介绍如下：

一、一九四零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还要搞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提出了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要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同时把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拿过来作新的解释。要“节制资本”，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是有条件的，私人资本是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是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在国家计划领导下的。在农村实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行分配土地，并发展互助合作经济，使农业经济逐步集体化。

实际上，这种革命阶段论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思想，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主席在《我们的经济政策》这篇文章里就讲过。这篇文章中讲：“我们的经济政

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可见，主席从一九三四年、一九四〇年就提出了经济建设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相衔接，提出了个人经济，私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在不妨害国计民生的条件下，才能适当地发展。

二、一九四二年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提出了人民战争，明确地提出了当时经济工作中和财政工作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当时的单纯财政观点，“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陈云长期以来的观点。批判了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这是当时谢觉哉的观点。还批判了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的错误。即搞大军工计划、大盐业计划。这是当时贺龙、高岗的思想。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就把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关系辩证地提出来了。但是，单纯财政观点，陈云却一直保持到一九六二年。当时，他是得到刘少奇、邓小平支持的。

三、一九四五年的《论联合政府》。这是纲领性的文件。《论联合政府》进一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所阐述的思想，深刻地、马列主义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内外的形势，论述了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个战场、两上地区的斗争，因而也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前途。据此，提出了我们党的纲领和政策。又一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分田地，节制资本，私人资本的发展不能妨害国民生计的原则。提出将新中国建设成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并说明没有这样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为建立新国家而斗争，而且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合作社、近代化而斗争。这篇有纲领、有政策的文章，批驳了当时党外国民党的错误，批驳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四、一九四五年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这篇文章强调了自力更生，互相合作，组织起来；组织工农兵和机关搞生产，领导与广大群众相结合。

五、一九四八年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老实说，当时我是没有体会的。

六、一九四九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提出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同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向城市。全面地、深刻地论述了党的各项经济方针、经济政策，明确地提出了发展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限制私营资本，引导个体经济逐步向集体经济发展。“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主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一九四九年而刘少奇却在大肆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富农经济。这就和主席的方针、政策完全背道而驰，公开地抵抗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点，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已讲得很清楚了。

七、一九五三年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更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合作社经济，限制、利用、改造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明确提出过渡时期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在刘少奇、陈云的主张下，还是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倡在加工订货中，要多给资本家原材料，要资本家多得利润，只讲利用而不讲限制和改造。这和毛主席主张的限制、利用、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方针相违背的。

八、一九五六年的《论十大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的文件。丰富、发展并超过了马、恩、列、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当时，我没有全面地体会，而刘、邓、陈、薄口头赞成，实际反对，大叫反冒进。

九、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提出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即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实际上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

十、一九五八年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以前，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还提出了十五年或者稍多的时间赶上英国的口号。

十一、一九五九年对“鞍钢宪法”的批示，强调了党的领导，反对一长制，强调了政治挂帅，群众路线，技术革命，敢想敢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

十二、一九六二年在十中全会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继而又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大革命运动。一九六二年是关键时刻。刘、邓、陈、薄对三面红旗大刮冷风，不抓阶级斗争，提倡单干，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正是这个时候，主席重新提出了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

十三、一九六四年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十四、一九六四年又提出了打破洋框框，甩掉洋拐杖，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当时针对我们的错误来讲的。

十五、一九六四年还提出的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问题，也就是大小三线建设的问题。这个布局，关系到我们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决定性的战略问题。但是我们只注意到沿海，没有人注意到内地。

十六、也是一九六四年，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十七、一九六五年，提出了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

十八、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提出了解放军、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成为革命化的大学校的伟大号召。其实，主席的这个思想早在一九四一年《组织起来》一文，和一九四五年《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就有了。

此外，主席关于放手发动群众，从下至上地全面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南，是马列主义的又一重大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拿我个人来说，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的。不懂得这个从下至上的群众路线：不懂得、不理解从下至上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懂得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冲刷我们的黑暗面，不懂得只

有依靠广大群众的发动，才能够真正揭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真正根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不懂得，我们每个同志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特别是对于是革命的对象这样一个问题，很不理解。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个人犯了不少的错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体会、逐步提高，现在开始才懂得了一点，认识到这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对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以上讲的，仅仅是从一九四〇年起到现在二十七年中，我所知道的，不是主席的全部有关文章和指示，还有一些过去重要的讲话没有整理出来。这二十多年来，主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的指示，大大地丰富、发展和超过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马列主义和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毛主席都大大的发展和丰富了，并且超过了他们。这样，也就大大地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对于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篡党、篡军、篡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地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证我国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极为深远的伟大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很好地、认真地、反复地学习这重要指示。我自己就是系统地学得不够，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不少的错误。这是讲的一个方面，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另一个方面，就是以刘、邓、陈、薄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完全采取了与毛主席相对抗的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也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清理。现在，仅仅举出几点重要的，我所认识到的问题，用我的水平来讲一讲，供同志们参考。

一、刘、邓、陈、薄长期以来，是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分开来讲。只讲社会主义建设，不讲社会主义革命，只讲生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搞建设搞生产，抽掉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个根本问题，来谈社会主义建设。这样搞，名义上是叫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因为这样的经济建设随时都可以为修正主义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不讲远了，就讲文化大革命以来，为什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用经济主义来进行反扑呢？那不就是利用我们长期不讲阶级斗争的结果，不就是因为经济工作中有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作怪吗？就是说，刘、邓的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所以影响和破坏经济基础。离开社会主义革命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十二月，江青同志在讲话中，还提到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指出上层建筑反过来可以巩固或破坏经济基础。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恰恰不谈上层建筑，只谈经济基础；恰恰不谈社会主义革命，只搞经济建设。

二、抛开生产关系，单纯谈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提倡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毛主席所提倡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刘、邓等人就认为生产关系问题没有问题了，于是就提倡康有为的《大同书》，破九界。在八大决议中，他不是根据主席教导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提出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关系适应先进经济没有问题了，只是发展生产力了，生产力落后了。

三、根本不讲政治挂帅，不搞群众运动，不搞四个第一，不是调动群众的积极因素，看不到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看不到精神可以变物质，而是见物不见人。不论在计划工作方面、财政工作方面、市场工作方面，都是机械的物

的平衡论，短线平衡论。陈云总是以三大平衡作为他财政经济的一条杠杠，就是物资、信贷、财政这三个平衡。这三大平衡搞好了以后，就在经济建设中，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即干多少扩大再生产的事，以确保这三个平衡。这里必须说明，陈云这里讲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同主席所说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同。主席讲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是指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就整个经济安排来说的，而陈云是先生活后生产，先财政后经济，先市场后建设的思想，是与毛主席的思想格格不入的，无论是他当财经委员主任的时候，或者是一九六一、六二年当财经小组长的时候，他是在刘、邓支持下，搞这个机械的物的平衡，短线平衡。他的这种思想，就是主席在一九五四年就批评过的单纯财政观点。这样，就完全违背了主席的教导，完全违背了主席的总路线的精神，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四、关于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强调条条的集中管理，强调搞托拉斯，实际上是强调一长制。违背了主席所指示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原理，和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的方针。因此，我们的工矿企业管理，除了象大庆和少数的一些企业，象主席所说的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以外，很多企业在管理办法上，至今仍然是不同程度地实行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

五、既然不强调政治挂帅，不强调群众路线，就必然强调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在工资、奖励、地区津贴和劳保福利等方面的有关分配问题，就有很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在劳动制度方面，有些临时工、合同工很不合理。有些临时工是需要的，但有些临时工则长期是临时工，三年、五年、八年、十年还是临时工。在半工半读方面，有些地方不是半工半读，实际上变成了顶班劳动，有些走上了资本主义超经济剥削的道路。这方面的斗批改任务很多，要做很大的工作。

六、主席提倡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运动之一，也就是说我们要搞技术革命。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培养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人才，建立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可是，刘、邓、陈、薄对技术革命，对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不感兴趣。过分地迷信外国进口设备，提倡爬行主义，提倡贾桂思想。而不是象主席所提倡的依靠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自力更生，打破洋框框，走自己的道路。这就说明，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当然，为了争取时间，更有利于自力更生，进口必要的新技术和设备还是应该的。

七、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的首创精神。当一九五五年、五六年、五七年这三年，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比较能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比较能按照主席指示办事，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实现了合作社高级化的时候，刘、邓、陈、薄他们就起来反“冒进”。反“冒进”不简单的是反对工作、生产建设中间的“冒进”，而实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所谓冒进。当时反“冒进”是陈云、薄一波出面，刘少奇、邓小平支持的。但是，刘少奇没有自我批评，陈云没有自我批评，薄一波也没有自我批评，而由总理担当了责任，总理做了自我批评。反“冒进”的错误，主要是刘、邓、陈、薄的错误，不是总理的错误，当三年大跃进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候，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出了一些偏差，犯了高指标的错误。他们就起来反对三面红旗，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吹冷风。刘少奇在大会上的报告实际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和主席、林副主席的报告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刘少奇反对三面红旗，只强调集中。而主席讲话，即讲民主集中制。就是已经退到山坡下了，现在要爬山了。林副主席讲话，指出我们难免不犯错误，付了代价，是值得的，不后悔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干扰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只是向后看，只看支流、抹煞主流。我们看到，

在七千人大会后，刘、邓、陈、薄继续吹冷风，一直到北戴河会议，还是在吹冷风。在工业上，砍项目，压速度。降低攀枝花的项目。在农业上，提倡单干，提倡分田到户，提倡自由市场。到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主席纠正了这种错误。

以后，经过主席的批准，订出了经济方面“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而刘少奇和陈云把它改成“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薄一波把它改成“恢复时期”。当一九六二年、六三年、六四年、六五年，在我们执行八字方针有成效的时候，在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大小三线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大纲的时候，他们又起来反对“高指标”，又起来吹冷风。主席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加强国防，建设大小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而刘、邓、薄主张解决吃、穿、用，与主席唱对台戏。

在文化大革命中，直到去年十二月九日提出工业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以前，以陶铸为代表，还是拿生产压革命。七月压一气，九月压一气，十一月还在压。

长期以来，正如林总所说的，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工交战线上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经济战线上，我认为以毛主席的路线为主导的，起主导作用的。但是，长期被刘、邓、陈、薄所影响，所干扰，大致每年小干扰一次，每三年大干扰一次。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经济恢复时期，刘少奇、陈云他们极力鼓吹发展资本主义，鼓吹“四大自由”，鼓吹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一九五五年至五七年比较按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时候，他们起来反“冒进”，一九六一年至六二年，他们起来大吹冷风，反对三面红旗；一九六四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搞形“左”实右的一套，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又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多年来，每三年就大干扰一次，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彻底地、顺利地贯彻。很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不是政治挂帅，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犯了不少的错误，做了不少的错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经济战线上，必须彻底批判刘、邓、陈、薄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地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同时，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完成斗批改的任务。这个斗批改，牵涉到经济战线上的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是很艰苦的工作，很艰苦的任务，但也是很重要的任务，必须做好。

几年前主席就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最近主席又指示解放军要支左、支工、支农。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工交战线上，最需要支援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而解放军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相信，在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持下。在经济战线上，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定会出现一个新面貌，一定会出现一个持久的、新的大跃进的新局面。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定可以建成一个真正的、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永不变色。

另外关于支工、支农、和支左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我有一个书面的材料可以印出来给同志们讨论，我就不必讲了。

最后只讲讲支左的问题，根据我的经验，提供一点参考意见，不一定对。从整个文化革命的历史过程来看，从去年到现在十一个多月来看，开始起来造反的。敢闯敢干的青年在工厂来说，这些青年有的是徒工，有的是学校刚刚毕业的技术干部，技术员，这些人敢想敢干敢闯，有的甚至成分不好，出身不好。比如现在我在计划委员会支持的那个左派，他们那个头头就是资本家出身。那种党、团员多，干部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甚至干部多的，是不是左派？这些人恰恰

是比较保守的，开始不是敢想敢说敢闯的，所以是不是左派，不是单纯看成分，而是看大方向，看敢不敢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敢不敢和当权派斗争，敢不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从大方向上看他是不是左派。这一条，仅凭我个人的经验提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我的看法如不对，将来事实再证明。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高等军事院校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进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央军委任命陈奇涵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曹广化同志为副主任。

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二、高等军事学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学、行政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和其他有关的指示、规定。

三、高等军事学院的群众组织，要认真进行整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务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认真提倡文斗，坚定地制止武斗。如再发生武斗，应对凶手及其主使者，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四、高等军事学院的警卫、通讯和运输分队统归军事管制委员会指挥，有线广播设备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五、全体员工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坚守岗位，积极工作，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建立良好的革命秩序。对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和决定，必须坚决执行。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示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林彪、恩来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

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陕西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政委袁克服、驻陕部队首长胡炜等负责同志，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工大和西大革命派，交大文革总会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意见和批评。

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有的还支持保守派组织，压制革命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而是“采取压制的与世隔绝的方

法”，搞“关门军训”，所以训练过程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主席注）

黄经耀、胡炜等同志欢迎和感谢同学们对部队的诚恳、善意、坦率的批评。随后黄经耀和胡炜等同志，因势利导转入讨论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的准备工作。李世英同学（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毛主席注）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即：

军区支左必须旗帜鲜明，态度明朗；

对新成立的群众组织，要进行调查研究，区别对待；

对保守派组织要在承认错误和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主动争取团结；

部队要帮助工总司整顿，进行调查清理，为大联合扫清障碍；

切实做好各大组织头头的工作；

抓好活思想；

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毛主席注）

在做好各院校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主席注）

黄经耀、胡炜同志认为，李世英同学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四月二十一日召集西工大、西电、冶院和交大四大院校的负责人，就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造反派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和讨论。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2）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林、周（3）阅后办。（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写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四川地区截至四月十九日止，已释放被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共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批示将这个报告“印发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参加四川会议各同志”。毛泽东审阅时，写了这个批语。（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3）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高等军事学院军管会召集该院两派代表会议纪要〔出席人员：军管会主任陈奇涵、副主任曹广化、及军管会其他同志。《并

冈山》代表孙继章，赵腾。《红联》代表张力平、吴恩庆。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和《红联》代表。】

会议开始前，由军管会方炎同志领读了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第三页第二段、第二二一页第二段及第二一九页。

读完最高指示后，曹广化代表军管会对《井冈山》和《红联》两个组织的代表作了如下指示：

中央军委对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昨天晚上已经由军委副秘书长，副总长代表军委向你们宣读了。今天下午陈志带我们军管会的其他同志来到高等军事学院，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完成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今天晚上，邀请《井冈山》、《红联》两个战斗组织的代表来研究一下，我们怎样开展工作的的问题。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给予我们大力支持，我们一定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站在一起，坚决地把高等军事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林副主席亲自领导下的一支光荣的军队。我们这支英雄的军队在世界上是没有第二个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三支”工作，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极大的关怀，极大的鼓舞，也是对我们有力的鞭策。我们解放军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柱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我们解放军必须坚决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执行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的一切命令、决定和指示，在各方面作出好的榜样。我们大家都讲执行最高指示，但是否真的执行了，还要看行动上做得怎样。

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八条命令、七条决定、十条命令以及这个决定（指军管决定）……，都是毛主席批示的，都是最高指示（此时曹广化念了军管决定第一条……略）。

我们今晚开第一次会议，就是根据这个决定把我们的工作做一个初步的安排。

一、把所有被夺了权的单位的印章立即停止使用，明天（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以前全部交出。交出后，部、处如何接再行研究。

二、有线广播由军管会接管，全部广播设备器材统交军管会，不能损坏，不得转移。（赵腾插话：有些广播器材已经被《红联》转移到昌平去了）今后广播如何建立由军管会负责计划。从明天早晨起广播的内容按军管会决定：反复广播军管会决定、中央军委八条、十条命令、中央十六条决定及中央、军委其他有关决定指示；军管会的命令、通令、通告、决定、通知指示等；转播中央广播电台新闻、播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解放军报社论；各个战斗组织的稿子暂时均不广播。可以写大字报。各战斗组织的稿子何时广播等候决定。

广播员由俱乐部的原广播员担任，如广播员在两方时，则应轮流值班。广播的内容不得擅自改变军管会决定的上述内容，要向军管会负责，如果将来有的广播员不执行军管的决定，我们再行考虑予以调换。

三、关于印刷厂的问题，对印刷处理的具体办法，我们明天再具体进行研究，现在应立即停止给各战斗组织印刷材料。但对军管会需要印发的材料必须予以充分的保证。

四、立即停止武斗。武斗是违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决定的，是违犯毛主席亲手批的八条、七条（决定）、十条命令的，是违犯毛主席亲自批的对高校

军管的五条决定的。各个战斗组织无论如何要做到坚决不武斗，如果做不到只好执行纪律。要特别教育自己的子女、家属、保姆不能进行武斗，如果继续武斗，也要执行纪律。八条命令有明文规定，子女发生问题就要找干部（家长）负责。

关于不准武斗问题，中央军委都曾三令五申，但是，你们学院还这样地进行大规模武斗，这是十分错误的。今后无论如何不允许再进行武斗，一定要做好样子。

五、关于其他院校来支援的问题，各战斗队以后不要再请了，要说服他们，相信高院的革命群众自己会把革命闹好的，相信他们能够斗倒，斗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高院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外来支援的同志，要劝说他们回去，以后不能再请他们来支援了。驻京附近的同志应立即回去，外地来的同志他们准备向我们作汇报，我们军管会也很喜欢听取他们的汇报。驻京院校的同志，他们回去后，我们也可以随时请他们来向我们汇报高院的情况。总之，你们再不要请他们来支援了。

六、各战斗组织对中央军委这个决定（指军管决定）要组织学习，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习时间暂定三天，如果时间不够，四、五天也可以。学习这个决定时，应结合十六条决定、八条、十条命令。周总理、江青等同志在北京市革委会大会上的讲话，一定要学好，真正的解决思想问题，然后再选学若干有关文件进行整风（具体部署另行研究。）

今天晚上，原则上把这些问题定下来，希望你们提出意见。我们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如果我们有错误希望同志们随时给我们批评指出，我们保证随时修正错误。

陈奇涵同志指示：

中央军委军管决定第一条就是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共同的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我们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做，譬如要搞大联合，要搞“三结合”等等。

各个战斗组织究竟怎样搞，希望你们下次会议提出意见。

曹广化同志：看大家还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进行研究。

以下讨论情况（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李曼村与海军文工团军乐队代表的谈话

〔海军文工团军乐队《红色造反舰队》代表参加谈话〕

问：今天欢迎李曼村同志来核对一些情况，解答一些问题。首先请你谈谈对海军直属机关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

答：有一个总的印象——这是个人看法，我们没有专门讨论过海军的文化大革命。海军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阵营是比较清楚的。据我所了解，一边是以李王张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是以三反分子苏振华和他一小撮狐群狗党为代表的黑司令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从海军党委处理报社“红流”这个问题，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我认为海军党委是处理得很好的。耐心地做政治工作，三令五申，耐心说服，发动群众，最后把问题搞清楚了，绝大多数群众觉悟了。没有抓一个人，也没有宣布解散一个组织。这个问题处理得很成功的。处理得这样圆满是很少见的。海军党委支持造反派比较坚定，比较稳妥。

问：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说你讲，火烧李王张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你说过吗？

答：那天接见很多单位，一个在我身后的人蓦然问我，火烧李王张是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说，现在你们主要的矛头应该指向苏振华，为什么指向李王张。李王张是左派嘛！他们说，我们也承认李王张是左派，左派有缺点可不可以批评，我说如果有缺点，可以善意批评，善意的批评不能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问：把斗争矛头指向李王张是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答：矛头不对准苏振华，而对准李王张就是对错了方向，当然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海直机关革命造反派代表在介绍海军大院情况后，李曼村同志说：不管什么组织，如果在海军文化大革命中不把斗争矛头指向苏振华，而把矛头指向李王张，肯定是方向的错误。

问：你知道海军有哪些革命造反派？

答：我知道查封海军报的海工红色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一派是革命造反派。海工红色造反派在全军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造反派。（代表们介绍了查封海军报社的情况）李曼村同志说：围困他们，是个错误的行动，是个方向错误。

问：海军报应不应该查封？

答：应该查封。因为他有错误。查封是革命的行动。

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路线？

答：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保苏振华，当然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问：现在有人把李王张的耐心说服说成是高压政策，白色恐怖，对吗？

答：那当然是错误的。

问：文工团有的战斗队到处散布，“全军文革有我们的人，”“李曼村同志支持我们”“到了全军文革就是我们的天下”，等等，你敢不敢辟谣？

答：我没有表示过支持他们。如果他们是这样说的，那是歪曲。

问：怎么区分真假造反派？

答：我理解真正的造反派是最坚决地反对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三，是最能听毛主席的话，按十六条办事。保守派就相反。如果在海军，炮打李王张，保护苏振华，那就是保守派。

问：现在有人把坚定地信任、支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李王张，说成是新的奴隶主义，对吗？

答：那是错误的。那是可以批评的。

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组织是什么组织？

答：如果不联系那个组织来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组织当然是个不好的组织。情况很复杂，也可能是保字号，也可能是右字号，甚至是反动组织。

问：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不顾军委规定，不听海军党委劝阻，硬要上街游行示威，回来还说你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请你谈谈这个问题。

答：我们开始一再打招呼不要上街，因为军队上街这是个大事情，有的单位比较好，如政治学院，你们海军接到通知以后都没有上街，但是有的军事院校和少数文艺团体自己上了大街。这是不符合规定的，是不对的。

问：他们还和地方串联。

答：这当然也不对，因为军委有规定不要串联。

问：他们是借声讨刘邓为名，实际上在街上大反三个老师，你怎么看？

答：我不赞成上街贴三个老师的标语，喊打倒三个老师的口号。

问：他们游行后，为什么对他们说这是革命行动？

答：我说声讨刘邓是革命行动。上街是不符合规定的。事后他们的代表找我，我没有批评他们这是有缺点的。如果他们利用我的话对抗海军党委，海军文办，那是不对的，那是利用了 my 缺点。我的责任是没有批评他们。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聂荣臻叶剑英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聂荣臻：

大家去搞军管，已经准备了一个时期，快二十天了。实行军管的单位要求赶快去，一直拖着没有去。有许多活思想要解决。前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说军队这也错，那也错，就考虑军管行不行？我们把主席的最新指示印发给大家，你们看到了吗？（大家答：看到了。）慢去一点好。别的地方的经验、材料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经过这一、二十天学习，比仓促上阵，比毫无准备好得多了。前一时期执行刘邓路线是错误的，就是仓促上阵。我记得政治学院搞四清的同志回来，科技大学的学生天天来要求派人去，以后派去了，犯了错误，形势也未弄清楚。这一次下去要弄清楚，军管是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宣布军管一个多月了，我们集中二十多天学习，这是有意识这样搞。同志们提了很多意见，现在作些说明。

现在大家学了一、二十天，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军委一系列方针、规定，林副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各地的典型经验，指导思想明确了。当然，也不能对别地的经验，生搬硬套。打仗的具体情况，也不是完全符合军事条例的那一条。如果这样做，就是一个蹩脚的指挥员。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现在，方针都有了。我讲几点活思想，供大家参考。

今天，在座的同志们要到××工业部门和××科研单位。军管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交给大家的重大的政治任务。同志们下去以前，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的指示，中央军委的规定；研究前一时期军管的反面经验。毛主席说：党的下级机关和群众对上级机关的指示，要详细讨论，理解其意义。对军管这样一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也应该这样。晚几天去，一定要把政策明确，不要仓促上阵，糊里糊涂犯错误。个人犯错误是小事，问题是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委托、信任，辜负了群众的信任，影响了解放军的威信，造成不良影响。

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指出：人民军队要有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三条本领。解放战争前夕，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人民解放军不仅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这些重大政治运动我们都是参加的。粉碎刘邓反动路线以后，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了我们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任务，工作只能做好，不能做坏。我们军队是从群众中来的，在过去十多年来，保持了红军时代的传统。这次任务跟过去不同，阶级斗争复杂，要求高了，我们面临新的情况。这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军管，这是在群众觉悟大大提高，是在毛主席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去的。党内资产阶级势力和社会上各种反动势力不甘心于失败，正在采取各种办法疯狂

挣扎，斗争错综复杂。跟过去不同，这次工作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工人，不要怕。有些同志怕知识分子，其实好多东西他也不一定懂，不要怕。当然，他们懂的，我们也不一定懂。下去以后，要支持左派，壮大左派队伍，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科研单位，还有调整问题，要建立机构，分工协作。下去搞军管，这是对你们的重大考验，同时也是极为繁重的学习和锻炼任务。

各地实行军管以后，多数单位是好的，比较好的，生产恢复比较快。但有些单位军管没有搞好，甚至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对待群众的问题。有的是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右派。有的旗帜不鲜明，没有建立以左派为主的大联合。有的“三结合”对象选错了，让坏人钻了空子。有的在促生产中，不是以抓革命来带动促生产。有的甚至随便抓人、开枪。毛主席四月六日批准了林副主席提出的十条命令，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八条讲群众对军队的态度，江青同志讲是拥军；十条讲军队对群众的态度，是爱民。我们要遵守十条命令。

怕犯错误的问题。有些同志怕犯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的看法，第一，力求不犯错误，把工作做好；第二，犯错误立即改正，用不着怕。主席二十四日对四川问题报告的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这是毛主席对军队最大的鞭策、最大的教育。希望大家深刻领会。最近林副主席指示，既要勇于负责，又要谦虚、谨慎，又要请示报告，又要根据客观条件办事。我们要挺起腰杆子来干事，夹着尾巴做人。要把军管工作做好。林副主席三月二十日的讲话讲得很透。一个是阶级观点，一个是把握运动的主流。毛主席著作头一篇就是讲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抓对了，我们就对了；这个问题错了，就完全错了。对文化革命中的一切（问题）现象，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哪是左派，哪是中间派，哪是右派，要弄清楚，要用无产阶级观点考虑。看哪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哪是站在刘邓路线一边。只有如此，才能把握运动的方向，主流，否则就会做政治上糊涂人，说错话，办错事。军管工作很多，矛盾很多，军管一切工作成败就是支左支得对不对。要看清真正左派，坚决依靠左派。这样才能以左派为主，团结中间派，教育保守派，经过运动，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抓革命，促生产，要把革命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统帅生产，不能搞二元论，更不允许以生产压革命，否则革命，生产都不会搞好。

有的地方没有经验，进厂以后，规定很严，生产恢复了，但革命冷冷清清。革命的大联合要以左派为中心，不能什么都恢复，恢复旧秩序，更不能允许建立资产阶级秩序。大家下去以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各单位都有几个群众组织，至少有两派。哪是左派，哪是中间派，哪是保守派，哪是右派，非要弄清楚。这里要有阶级观点，要认真领会中央方针，深入到群众里去。在没有调查清以前，不要轻易表态。毛主席说，站在那里远远望一望，就想去解决矛盾，这样做没有不出乱子的。大略的调查研究可以提出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需要作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即使自己觉得弄清楚了，也不能凭想当然办事。深入调查研究，可以避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关于对待科研路线问题，我在上个月的讲话中提到了。现在说明一个问题，所谓 1225 会议问题。××工业科研辩论，经过总理，叶副主席批准开会，就是 1225 会议。过去斗争很激烈，一派要开会，一派认为不该在此时开会，说这时搞部院合并是方向错误。在那个时候，我没有请示中央，没有表态。我看并不是不可以辩论。部院合并，中央决定是一回事，罗瑞卿利用这个问题搞政治资本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工厂，科研部门肃清罗瑞卿，贺龙的思想影响，要提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上。那时，没有提到这么高，提生产、科研矛盾突出。因此，有些

人说这是转移运动大方向，是大阴谋。现在另外一派又压这一派。我看这个争论不要再争了，问题清楚了，现在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应有研究机构。另外，我提了些材料，这是，××科研上刘，邓路线，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厂所合并，实质是取消科研的路线。这是同反对刘，邓路线分不开的。我看问题已经解决了，要一致反对这条错误路线。双方对这个问题不要再争论了。当然，要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最大的反动路线，可以结合起来。

在军管工作中要注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革命群众，帮助革命群众。军管工作就是群众工作，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抓活思想，做思想工作。凡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军管形式带有强制性，加上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就很容易犯强迫命令的毛病，很容易犯自以为是、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毛病。军管工作同任何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不能搞命令主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在工作中，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听取群众意见。一切大权集中于军管小组，群众对军管小组提出批评可能有顾虑，在这种情况下，要更加注意听取群众意见。群众对我们提出批评，不能说是反对军管。对军管小组某个人提意见，不能说是反对军管小组，不能说是反对解放军。注意这个问题，对于我们避免犯错误是十分必要的。军事接管是政治接管，是毛泽东思想接管。军管，首先要抓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抓活思想工作，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千条万条，这方面工作必须放在首位，贯彻在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雷打不动。

军管搞到什么时候？中央有个文件正在讨论，现在说一点精神。要首先做好各派群众的工作，实行大联合，实行三结合。我们这些单位不搞夺权，搞文化革命委员会。搞好了大联合，搞好了三结合，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军管任务就完成了。这个文件还没有经过讨论，将来以中央决定的文件为准。

叶剑英：

在座的同志们要去做军管工作。你们要去的地方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那里双方斗争很激烈，他们纷纷要求军管人员快去。匆匆忙忙上阵，容易犯错误。同志们先拿几天准备一下。现在五省、两市已经军管。同志们进去后，他们双方都要你支持他，要你表态。要说犯错误，就在一开头。开始你要多问少答。有些同志采取这个态度，好一些。匆忙表态就搞错了，以为支左实际支了右了，要经过详细调查研究，采取慎重态度。山西军区把下去的人抽出来学习了再下去。总之，这是新的工作，要稳步前进，宁可失之于过迟，但不是消极等待。利用一周、十几天时间学习经验，要深入调查研究。为什么支错了？那就是立场问题，认识问题。大家要利用时间很好研究一下。现在各地陆陆续续有人表示反对军管、军训。主席说军管不能退。你自己不能退，人家要来赶。要很好听取群众意见，以群众为师，站稳自己的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找出左派。还有一种情况，支持一派，也支持对了，但他是少数，就从外边找人支持，这不对，应该做另一派的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就是要支持左派，壮大左派，使左派成为

优势。这是决定的一着。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供参考。）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很对不住。由于批文件迟来了二个小时，对有关的问题讲讲。主要就是军管问题。

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实行军管或派军代表，其目的是因为在许多单位的大联合三结合还不成熟，领导班子还有瘫痪的，这就要派人去。这是过渡的办法。我们去就是把领导班子建立起来，既抓革命又促生产。另一方面就是促进革命派的大联合，建立领导班子，这是夺权的单位，不夺权的单位也可以搞三结合。

这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军管。我们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消灭了蒋介石的五百万军队，跑到台湾去的只是大头目，我们还要留下的这些人工作，就派军队接管，成立军事小组或代表。有的地方建立党的组织和新的政权。

现在不同，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在哪里都有广大的群众，问题就在于如何领导。十七年来，从全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由上而下的夺权。这种革命在城市是不那么彻底的，群众都还没发动起来。农村进行土改，也是由上而下，多数地区存在和平土改。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不断发动群众进行三反、五反，反右、批右倾，社教运动，这都是使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过来。这是由上而下的。这就有不彻底的地方，群众没发动起来就结束了。一个浪潮过去，旧的下去，新的又起来了。在政府军队都有这种现象。因此，这就不可避免产生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得到这样的土壤，气候，对它挖不到它的根。由于斯大林革命不彻底出了赫修，这是经验教训。难道我们就不能发生吗？从苏修廿大以来主席就研究这个问题。斯大林是不自觉为修正主义培养种子，斯大林没看到这个问题，因而产生历史上的曲折。我们不同，我们有苏修的教训，主席不能容忍这样的教训在中国出现。我们设想一下，去年六、七月，以刘邓为首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修正主义登台，发展下去就会变颜色。我们主席健在，阻止了这个逆流。我们的同志没发觉。我们各部多多少少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下去，不要多久，一旦条件成熟，修正主义就登台了，资本主义就复辟。我们的伟大领袖一号召，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群众就起来了。可见伟大领袖的指示能和群众结合。平时群众就看不惯某些领导，得到主席的支持群众就起来了。固步自封就不愿群众起来。这样的各级领导是便于毛泽东思想挂帅还是便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明显，利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意料的事情，是出现了的事情。从这点来说，我们落到群众后面去了，有些同志就落到群众后面去了。不要看到受伤，要看到主要的方面。我对省委书记说，老本输光了，要重新做起，即使是三反分子，主席处理的尺度越来越宽，红旗的那几句就是主席加的，给这样大的机会。所以这样的全国的大问题，关系到全世界命运的问题，我们要作深刻的分析。几乎很少例外。总是要通过大批判达到大联合，实现三结合。我们是如何把领导建立起来。过渡时期要实行军管。解放初期是先建领导，后发动群众。现在群众远远走在前面，和主席、林副统帅走在一起。你们军管就是要把领导建立起来，过渡到三结合。

二、军管的指导思想。首先是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我们还要重读老三篇，记熟。需要时时身体力行。你们去执行任务也要学，别人学，自己也要带头学。指导思想就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在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路线时，要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实现大联合，实现三结合。现在既参加共同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要搞本单位的斗批改。拿毛主席的红线，批那条黑线，一定要注意矛头是向上的，不是向群众。

三、我们到各机关去应该坚决实行伟大领袖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以革命来推动生产，毛泽东思想挂帅一切，革命统帅业务。群众已在革命化过程中，也远远超过干部，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你领导和他对立，就造成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官僚主义、机会主义造成的。各级领导思想革命化就会使生产大大推进。支农的就到地里去干活，到厂矿的去煤矿开矿。农村，厂矿干部是来自工农的，即使躺下来的干部，看到你们这样作了就不会不跟上去。这是通过实践来影响干部。但还要回到第一条，要有理论，有毛泽东思想，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样，你不在他那里也能搞得很好。抓革命促生产绝不是二元论。或倒过来只抓生产放弃革命，这样生产不能巩固。

四、要进行调查研究和整风学习，进行阶级分析、指导学习、进行整风。到一个单位，首先要摸一下，研究一下，调查研究。毛主席经常跟中央同志说，有些同志就很差。桃园大队的经验欺骗一些人，现在揭发出来是假的。我们听到大吃一惊。我们还是要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当然不是烦琐哲学，要抓住要点。阶级分析是抓住方针路线，而不是调查出身、党团员……，这是刘少奇的办法。这是他的一方面。他的另一方面是包庇那么多叛徒。我们要抓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不学毛著，有没有干劲，然后是不是遵守纪律。首先是有没有革命性，有了革命性，还要讲政策，按十六条办事。今年文件多，就是经验多了一些。我们都在摸索中学习。在摸索中就要总结经验。政策就是从实践中来的。去年八九月和今年三、四月的情况来比就不能比了。不能说过去没作，过去就是错了。主席就是在前进。

纪律是自觉的。要看你的政策是不是正确，正确的，纪律就会好。整风学习，这是由群众自己提出的，方向对的，工作总有些错误吗。经过整风，才能按行政单位编战斗组。一去就按单位归口那是不行的。整风后就可以。机关比较容易搞，学校是跨班或系。机关跨局、司的不同的战斗组也要联合，如不行待整风后再联合。对保守派不能下命令取消，但要支持造反派。联合有两种：合并，联合。对保守派不能下命令，只能教育、争取团结他们，分化他们，也可能他们××变成造反派，这也是允许的，革命不分先后，最后孤立极少数的人。多数部门夺权后，监督业务超过了范围。外交部两派不愿意在一起，他们不能说服我们。

五、要正确对待干部。我们的目的是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已经站出来的当然好，但有的还没有站出来要帮助他们。一月风暴席卷了全国，在夺权斗争中，要搞三结合，这样干部纷纷要求结合，要结合就要亮相，就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全靠边站，全部结合都不对。有的把旧秩序也恢复了，监督也不让了，这就不对了，已站出来的要帮助改正错误，现在还没有站出来的就要彻底检讨，要彻底革命，要为他创造条件，这一点我们要作工作，这是不好作的。对干部有两种倾向：打倒一切，全盘肯定。打倒一切对群众好说服，全盘肯定是错误的，是逆流，要批判。

六、军管是过渡。要经过整风学习，把对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彻底批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实现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主席原来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三四月看出结果，现在二、三、四、五、六月才能看出眉目，明年看出结果，就是全国都实现了三结合。当然，从夺权来说，在需要的单位进行夺权，如有的单位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存在夺权问题。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一直和群众对立，所以都有夺权的需要。这是由于各级领导不很好学习，落后于群众，远远的落后，就越难赶。看出身，党团员，是绝对化的口号，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受修养的毒害的结果。现在要去的部门都有这个问题。但你们去的地方是国防工业和科研单位。不需要夺权，但要三结合。这是困难。这些部门，外单位不能来串联，但在他本部门，你还得允许，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检查和监督不同，检查是事后的监督。是大政方针你们都得管。军管时期群众没有监督权，只能批评建议。对领导要撤职的就得撤，有的撤职留用。你还得调一些，还要升一些，这都要区别对待。领导机构总要吸收新的的血液形成新的领导。

七、要反对恢复旧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按旧的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八、要区别严格的保密和一般关系，不要强调什么都要保密，结果什么也不保密；另一种就会变成压制群众运动，因为你不让他串联。极重要的机密不要让大家讨论，例如党委会的记录，图表，否则就叫材料挂帅。北京为材料打架很长时间，但并没有用好它。六十一个叛徒是从社会上调查出来的，最后从档案证实。

九、在军管单位，由于群众没有监督，只允许他们批评建议，所以我们要引导他们提批评建议，不然就无法集中。

十、下去军管前，要先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当然真正的学习要到实践中去学习。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肖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讲话

今天我们来座谈一下，谈些问题。

我这两年养病，所以对艺术学院的事情管得很少。前个时期准备好几个会，有其他任务要料理一下，所以对全军文革的事也管得不多，从四月十八号开始吧！反正是从最近才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全军文革，为了保证我们的军队永不变色，永不变质，这是百年大计。

首先肯定艺术学院战斗革命组织星火燎原，你们大方向还是对的。你们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艺中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要贯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批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你们的革命干劲不错。闯劲也不错。敢闯敢斗。你们对文艺团体的点火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点革命之火嘛！最近同志们通过小的整风，风格很高，自己洗澡，互相擦背，思想有了提高。保证了今后运动能健康地发展。使我们军委同志们听了很高兴。你们在运动中主流是对的，这不等于说，你们没缺点，没错误，缺点错误是有个时间冲击军区。你自己是解放军，应以适当的途径提出来。这方面是有缺点的，但这不是整个星火燎原的问题。派出去的个别同志，极少数的同志当时对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没有很好的体会，犯了错误。经过检查、整风有认识，这是好的。那时是有些无组织无纪律，光要民主，不要集中，光要自由，不要纪律，没有把两者结合起来，你们已经检查过了。我想在革命的过程当中，只要大方向对，主流是好的，有了错误，及时改正，这还是好同志们，好现象。也可以锻炼自己。革命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最能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们给我写了信，进行了自我批评，我们欢迎

这个态度。同志们也有些过头的地方，一一请罪不好，我不让你们叫嘛，有了错误检查，请什么罪啊！改正就可以嘛！那天开会，我讲了你们，因为我发觉有人对你们有不正确的认识。（“星火”插话：已有人说我们是反革命组织）真金不怕火烧！是要在革命斗争中锻炼起来的。

现在的做法，江青同志不是讲过了吗？江青同志的讲话你们看了没有？很重要啊！要学啊！（肖主任念讲话中的一段）“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同时，按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转入斗批改，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总理讲话中也有：“……在目前，就是要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北京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联系到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要在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它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必须紧紧地把握住。”江青同志是代表中央文革说话的。这就是当前的大方向。在全国各地揭露，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修养》要批倒，同时又要结合本单位斗批改，要掌握这个大方向。也要彻底揭发文艺黑钱，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江青同志也批评了屁股坐不下来的小将。艺术学院主要靠你们自己。把运动搞深搞透，搞仔细，还得发挥你们革命派的力量。

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和最近三支两军（主要是支左），总的方面要肯定成绩，很伟大。特别是支工支农，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对推动全国学毛著，推动农村的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总理前几天开会，还讲是有伟大的成绩的。当然在繁重的任务中也有一些缺点，个别地方还犯了错误。这么多人投入运动，过去住营房，没接触过这么多群众。支左支错了，改就可以嘛！但有的是立场错了（象四川、内蒙古）；有的是反革命（青海的赵永夫）赵永夫搞政变嘛！残酷镇压革命左派，杀死三百余人。他原来是个国民党，受过特务训练，后来混入军队没发现。现在坏事变成好事。有些人受毒很深，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内蒙打死一个人，就是那个“韩桐事件”，凶手已经抓到。全国打第一抢的是内蒙，但过去（内蒙）宣传保守组织太厉害了，最近好几百人跑到北京，想一下子扭转过来很不容易。四川问题也是立场的问题，主要是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没有斗倒、斗臭，他们在西南工作十几年，有相当基础，有批亲信搞复辟，主要是李井泉、廖至高掌握了保守组织。军区有个别组织上了他们的当。大头子郭林祥、黄新亭。黄是李井泉的死走狗，郭也是李的亲信。甘渭汉去的时间不长，前一段批郭、黄，他是和他们有斗争的。后一段受韦杰方面影响，没调查研究立场不稳犯了错误。最近已派梁兴初去当司令员，准备再派一个政委。李文清假转真转还要看看，昨天还搜到李井泉藏在他家里的五个箱子。中央正在解决成都问题。其它地方或多或少有些缺点、错误，没经验；有对有错，或开始错，又改正过来了。但性质不一样，是错误和缺点的问题，军委也开了会，会后会很快的扭转过来。

十条主要是支左爱民与八条不矛盾，八条命令继续有效。军事机关不能失去作战指挥，要保持稳定，这些事都是一致的。江青同志概括为“拥政爱民”，我们要响应贯彻。

全国有些保守组织是不是有些抬头，军队有些地方活跃一些。保守组织看怎么来看，保守派抬头，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这个斗争经过一次次反复，在阶级斗争中左派力量才能受到锻炼。不能说活跃一点就是有后台，不能这么说。（《星火》插话，北京军区说：“李曼村是你们星火的后台”）。你们不要听小道消息。

另外,有些地方指导思想的确有问题,毛泽东思想旗帜举得不高,冲击军区真正冲的是左派(当然也有各种思想,有的就想看看司令员是什么样子……)冲军区的基本都是造反组织。毛主席讲:左派冲,欢迎;右派,要追究。如果思想不明确,就压制了左派。造反派本身也要检查一下在运动中存在的缺点,自己不争气,给保守派可以利用的机会。他们不从本质看问题,要抓住一个人,一件事错了,要掌握斗争的策略,政策,方法,不然也容易被人家利用,造反派应成为遵守、执行中央指示的模范,这样就少犯错误,少被人家利用,使人看到造反派真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近左派内部打内战,在大联合中有的“私”字当头,争名夺利,争席位,不照顾全局利益,计较个人利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斗争的大方向问题。就是在批刘邓的同时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二、在斗争中好好整顿组织、思想。最主要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带着(每个)造反派的思想活动去学,这样才能学得好。造反派组织大轰大冲做得好。就是有时坐不下来。毛主席语录是毛主席著作的精华,语录,著作都要学。还要按照陈伯达同志提出来的几篇学。要带着问题学毛著。你们每天都坚持吗?《《星火燎原》同志答:坚持)。要坚持,还要逐渐增加。昨天的社论很重要(指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打倒无政府主义”)你们学了没有?《《星火燎原》同志答:学了)这篇社论是有的放矢的,象这样一些社论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修改的。这篇社论很重要。社论中说:“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在某些时候也可以起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样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嘛!社论中说:“在搞违反政策的鲁莽行动和无原则的纠纷上是‘好汉’,在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的战场上是懦夫。”真是把无政府主义整个思想面貌都描写出来了。提倡纪律不能说成是奴隶主义。要有无产阶级的纪律嘛!没纪律怎么打仗?当然根本是靠政治、靠思想,但也要有自觉的纪律。打内战时多做自我批评。打内战在天津,辽宁地方上很突出,军队也有这些问题。这个很重要,打中要害,我们一定要克服其中所指的现象。

大破大立。大立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立。哪些是立刻能改的,马上就改。要从批判刘邓如何引导到本单位的斗批改上去,这是一致的,不矛盾的。

九个月了,艺术学院立了些什么东西,拿出什么新的创作来了没有,你们搞部队文艺的,要在舞台上和观众见面嘛!破是为了更好的立嘛。光有破不立那能行啊?开花要结果啊!部队文艺团体(包括艺术学院)如何很好地和战士,工农相结合,搞出新的创作,这很重要。《白毛女》改得很好,现在改得比歌剧都好,造反精神足了,武装斗争突出出来了。《沙家浜》最近也改了。我们军队一个也没有,一个新的创作都没拿出来,歌子还有几个,好的不多。这点是受了批评的。是不是可以从艺术学院、总政文工团、驻京文工团先拿出点文化革命的新东西出来,体现毛泽东思想、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体现无产阶级的东西,给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看看嘛!是不是你们腾出些力量,排出些新的节目来,这样子能看到成果。

最近要大破大立,艺术学院是全军文化革命的重点,也是培养军队文艺干部的基地,艺术学院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把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贯彻得更好。艺术学院搞好文化大革命意义很大,对全军都会发生影响的。过去做得不好,修正主义毒素经过批判要肃清。我不同意你们最近又派人出去啦?你们搞本单位的斗批改嘛。派人出去搞不好要犯错误。不相信人家会搞好斗批改,屁股坐不下来。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要把力量分散了。这样也不符合中央军委的规定。到青海去的五一以前都回来,军队也要贯彻。《《星火燎原》同志问:现在

有来京告状的，怎么办？）来京告状的那是另一回事，搞完了动员他们回去嘛。

军队武斗的风在滋长，你们这点还做的不错，没有发生过武斗。高等军事学院一个学生都没有，都是教员，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打了九个月的架，高等军事院校在这点上说来是不高的。老婆小孩都去斗，我们反对的。打本身就是违反八条。最近我们不得不对（高等军事学院）实施军管，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星火燎原》同志问：高等军事学院哪个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现在正在进行调查研究。会闹清楚的。

以后，有一条，那个地方搞武斗，你们不要去参加。你去起什么作用？两个都是左派，你支持谁？最好不要去，他们自己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艺术学院以后对这些事情最好不要去参加，我们不主张武斗，（武斗）是违反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的。文化革命就是思想革命，要触及灵魂。打人简单，主要是灭资兴无，保证不出修正主义，打两拳就不出修正主义了？艺术学院应该成为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模范。不要盲目，什么事情都要调查研究，独立思考。

那天，一些院校到三座门去接管（全军文革）接待站，要把是非界限搞清楚。你们不去是对的。不能因为一个人坏了就说军委文革都坏了，不能因为某个人而否定全军文革。江青同志就是全军文革的顾问嘛。还有杨成武同志，谢富治同志，关锋同志嘛。不能说解放军中某个人犯了错误，整个解放军就都犯了错误，罗瑞卿曾经有影响，但很快就被打下去了嘛！还是毛主席的路线嘛，这是主流嘛！全军文革就是有某个人犯了错误，那全军文革就都是坏蛋，不能这样看问题嘛！正象《星火燎原》一样，由于你们某个人的错误或一件事情上的错误，不能说整个《星火燎原》就都坏了嘛！不等于《星火燎原》的主流就错了嘛！我们看问题要具体分析，实事求是，行动要考虑后果问题。

对某个人的材料调查，有意见可以提，但考虑方式。敌人很注意我们军队的动态。《解放军报》最直接，他们要搞动态，找材料。修正主义最注视我们。我们要考虑国际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也知道军队是一张王牌，我们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中某些人有缺点，有错误，采取什么适当方式为好。这一种好些，另外一种可能产生副作用或震动太大。我们考虑问题不能凭主观想象，要从整体来考虑。你们对军委某个同志有意见，你们可以批评，提意见，写小字报，大字报，可以写给林副统帅，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你们要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大字报最好不上街。我做为一个意见提出来。

我很赞成你们批判文艺黑线的大会。可以批判，但仅限于军队范围之内，以开中型会议为主，大会开一、两次必要，主要是打掉他们的威风，教育群众，鼓舞士气。总这么开就成了老油条了。比如彭×在开第一次批斗大会时还吓得发抖呢，以后他就满不在乎了。（总政治部这次批判刘××，二百多人开了十三天会，把东西端出来，全斗臭了。开始他不承认，后来大家把他亲自写的，签过字的东西一一拿出来跟他对证，他就没有办法了，搞思想路线斗争，摆事实讲道理嘛！）各个文艺团体可以轮流，要搞材料。把炮弹，子弹准备好，从总政这次批判会来看，效果好，教育人。外地方面不要来了，驻京部队主要是文艺团体，对罗××、刘××、陈其通可以分几次（批斗）嘛！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大会只能用来教育群众，不要开太多了，主要是靠小会斗倒斗臭。我们支持你们开这个会，但你们一定好好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艺术学院的文化大革命是归全军文革直接领导。全军文革、文化部给你们提供材料。你们也掌握一部分，但本机关掌握得总是更准确一些。会一定要开好。斗倒斗臭。要有充分材料。

报纸不要办了，我们报纸够多的了。我劝你们还是搞好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

你们有稿子寄给《解放军报》，这是造反派最大的报纸，中央文革直接在抓，林总也在抓，你们应该完全信任。

魏传统的问题你们自己去批判。（《星火燎原》同志说：我们认为他是三反分子）现在我还不能定他是三反分子。我不能定调子，要先搞材料。你们搞的那些材料我再看看。苏××、许××、成××、张××都斗了，但军委都还未做结论。你们先斗嘛，先批嘛，摆事实，讲道理，把缺点错误摆出来，根据事实，根据问题的性质和他本人的态度来看。

夺权先不能定，看批判的结果。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夺嘛。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另做处理，这一点江青同志在（四月十六日）的讲话中也谈到了。

关于演出问题要先和文化部谈谈，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

造反派的力量要团结好，要壮大，你们要做保守群众组织的工作。有些地方保守组织的人很多（如内蒙有七、八万，成都产业军有十几万）要做广大群众的工作，他们那里也有左、中、右嘛。应该把群众和头头分开。这样才能分化，强制武斗，砸也不能解决问题，在两条道路斗争中使群众觉悟过来。保守组织不一定是反革命（写反动标语的、污蔑领袖、污蔑副统帅、盗窃国家机密、行凶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按公安六条办事），两类矛盾要区别开。对外单位组织的分辨，要很好地调查研究，不能用感情代替，有些单位斗争相当复杂。不能因为某组织中有自己的同学，或是什么就去支持，也不能因为他过去支持了我，我现在就去支持他。这样是不行的，要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

今天谈的你们要独立思考，你们可以提意见，送大字报。

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派内部参考文件：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四十五分至下午两点二十分，军委文革副组长肖华同志在××××接见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队的十六名同志，接见时在座的有王宏坤同志，余立金同志。肖华同志做了重要讲话。

在讲话前，肖华同志先听取了《星火燎原》同志们的汇报。在谈到“四方面军战史”时，肖华同志说：“过去的战史可能有问题。各方面都送战史，那么多，有些都没有经过审查。”

在谈到军委文革小组×同志曾到我院讲“目前不适宜杀回马枪”时，肖华同志问：“你们院的领导做过检查没有？”又说：“他不敢亮，你们要他亮嘛。应该给他们以机会。魏传统有什么事实，你们讲一讲嘛。”

《星火燎原》同志反映：军委文革×同志到我院放风：“军委文革×负责人讲了，魏传统基本是个好同志，应该以他为首组成三支两军的领导班子。要搞清楚究竟是谁讲的。”

肖华同志对军委文革×同志说：“没有调查研究，不要随便乱说话。”

当《星火燎原》同志问到有关军委二月密码电报问题时，肖华同志说：“有这个电报。因为那时各个军区都来告状，军委讨论了这件事，是军委发的。”

关于《星火燎原报》的出版问题，肖华同志说：“报纸很多罗，你们是不是每篇文章都看了？《解放军报》就是全军最大的造反报；《红旗》、《人民日报》就是全国最大的造反报嘛！我看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要节约闹革命，目前正在大量印刷毛主席著作，要印一、二千万册，毛主席语录也要重新搞，有的地方要删去，前言用林总写的。印刷厂很紧张，我们开会，会已经完了，可连个简报都印不出来。”

《星火燎原》同志们反映：“在我们整风时，为什么军委文革×同志要把我们检查材料直接送到叶办，要的很紧。第二天又退回来，说写的一点也不深刻。非要我们大谈给别人画黑脸时的活思想是什么，叶××又不是全军文革的，为什么要送到叶办呢？”肖华同志说：“叶办要的？我不知道。我不是说不要写请罪书嘛！”肖华同志立即对军委文革×同志讲：“把以前他们写的那些检讨，都统统送还给他们。”

《星火燎原》同志接着提到：“当时还有各军区给军委写的好多关于我们的材料，还说不给我们看……”肖华同志说：“这些东西放在军委文革也没用，全部交给你们自己处理。”这时《星火燎原》同志热烈地鼓掌。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中央军委关于捕人权限和处理错捕、取缔的群众组织问题的两个文件

关于捕人权限的规定

一，在本军区范围内拘捕军内人员，除行凶杀人必须当场拘捕外，要经各大军区，军种，兵种党委批准拘捕，属于国防部长以上任授的干部，要经中央军委批准。

二，到本地区管辖范围以外拘捕军内人员，要经各大军区，军种，兵种党委审核，报中央军委批准。

三，到外地捕军外人员，按四月四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各地来京拘捕人犯的手续实行。

关于处理军内错拘捕和取缔，解散组织问题的通知

一，对于已经拘捕，行政看管，隔离，反省人员，应进行迅速审查，除了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特别坏的右派头头外，应一律立即释放。

二，凡是错误地给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戴上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坏分子等政治帽子的一律平反。

三，凡是错误地把革命群众组织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强行取缔和解散的，一律宣布无效，一律平反，军以上机关革命群众组织按照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解散的不再恢复。

四，凡属以上三种情况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写的检查书，请罪书一律退还，革命群众组织的退还其组织，个人写的退还其个人。

五，以上问题处理由军，省军区以上机关掌握负责检查，督促迅速落实。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谢富治谈谭震林问题

〔1967年5月14日下午两点，在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前就农林口问题请示了谢副总理〕

问：现在外面传说，毛主席在一次会上说过：有人不是要打倒谭震林？他今天还参加会来了！毛主席真这样说过吗？

谢：没有这么回事，我参加会议没有听见主席这么说过，这是有人造谣！

问：今后农林口的问题怎么搞？谭震林的问题怎么搞？

谢：你们自己干嘛！继续深入地批判他！

说：谭震林五月一日上天安门后，农林口形势有很大变化，他的秘书吕伊波五月二日突然死去了，有恐怖气氛！

谢：吕伊波揭发了谭震林吗？

答：他写了一个揭发谭震林问题的提纲，还来不及揭发，就突然死去了，死的原因我们正在调查。

谢：不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你们批判谭震林的错误都是对的。即使将来给他工作，你们批判他也是对的。保守派要保就是错的。你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反映给总理。

五、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叶剑英接见国防工业某专业会议代表的讲话

【时间：7月8日下午，地点：京西宾馆。军委叶剑英付主席接见“×××”、“×××”专业会议代表，谈了目前形势，摘要如下。】

“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但国内外的阶级斗争是相当复杂和相当尖锐的，这就要求××科研、××工业认真抓一抓革命，来促进战备，促进生产，促进科研，加强国防建设。”

“文化革命把过去高高骑在人民头上的敌人、当官做老爷的威风打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全国男女老少一起闹革命，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战备。我们的国家已成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世界革命的灯塔，我们的党已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党，我们的领袖已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纪元，把世界革命推进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新时代。”

“帝、修、反用尽一切办法破坏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蒋介石在台湾指示潜伏的特务，要做到‘三要’、‘三抓’，这是他们的行动纲领。‘三要’是要造反、要串联、要夺权；‘三抓’：抓报社、抓电台、抓学校。反革命在动员他们的力量，介入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实现反革命复辟。”

“不经这场混乱，不会长治久安的。不经过这一乱，不会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现在还是要放，在革命群众觉悟提高以后，坏人，他自己是什么面目，就通通暴露出来了。”

“以色列把纳赛尔的五百多架飞机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都搞完了，所以我们不能象他们一样睡觉。”

“拉丁美洲、多米尼加、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巴西等十个国家的武装斗争也在发展壮大。我国影响、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正在扩大，正如主席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世界上马列主义的党和组织已有七十九个，分布在五十个国家和地区。”

“我的大字报遍中国，有个造反派在我家写了‘打倒叶剑英’的大标语，有的同志说撕了吧，我说不要撕，这是座右铭嘛。这样头脑里就想到我还有被打倒的地方。主席昨天还讲，现在乱的很呢，比去年还乱哪！乱到一定时候就不乱了。产生无政府主义是官僚主义的惩罚，要认识这一点，自由是认识的必然结果。”

“国防科委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国防工业部门广大革命群众也是做出了很大成绩的。”

“刘、邓、彭、黄、贺、罗，他们是根本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他们搞的是奴隶主义、爬行主义、取消主义的反动路线。”

“林付主席指示：‘生产要为试制服务’，生产要为科研服务，科研要走在前头，试制出来不一定搞那么多。可以把图纸资料放在保险箱里，需要多少，生产多少，再搞新的，不断前进。”

“林付主席的指示，过去没有坚决贯彻，以后要坚决改过来。64年部委合

并，罗瑞卿是搞鬼嘛，贺、罗都是有个人野心的，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的。”“他们是有个人野心的，贺、罗经常排挤、打击聂付主席。在长征时，林付主席当军团长，聂付主席就当政治委员。他多少年来一直受打击，不管是受多少气，他还是这样艰苦地工作，他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党性很强。特别是彭真打击他，廿多年，聂付主席闷在肚子里，去年才讲出来。贺、罗专门打击聂老总，当然他们更打击毛主席、林付主席，对于我这方面，就不要讲了。”

“建国十几年来，××科研、××工业战线一直有两条路线斗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揭发了大量的事实，揭发了他们削弱党的领导、瓦解、取消科学研究队伍，造成使用、科研、生产严重脱节，严重影响了××科研、××工业的发展。”

<原载第十研究所《东方红》(39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周恩来陈伯达在李先念检讨大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我认为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同志们应该欢迎李先念同志的自我批评，同时希望李先念今后多到各部里面去，能听取同志们的意见，随时发现、改进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祝同志们好！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周总理讲话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刚才讲的很好的几句话。今天的会证明我们经过半年多的奋斗以求的有了初步的结果，但这仅仅是开始。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是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如同主席所说的“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正因为这样，先念的检查是推迟了，当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喽。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蓬勃深入开展，我们的领导同志，首先到群众中去，那么先念同志这次检查后首先到财贸系统各部里、各学校里去。先念同志也对我说过他要到各部里、各学校里听取群众意见，向你们学习，就可以使思想前进。同时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学习。学习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遇到问题向主席请示，向领导同志请教，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相信群众，相信党”。我们不仅要求先念同志这样做，我们自己也要这样做。我们主席台上坐着的，都是受主席党中央委托的，都要兢兢业业地不断学习和改造。向你们学习。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如果坐在上边遇事不调查就随随便便发号施令，是危险的，这样要犯错误，可能被你们批判，以至非打倒不可！最后让我们呼几个口号：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彻底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打倒刘邓陶！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同意召开批斗谭震林大会

〔地点：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八月十七日早晨在中南海

国务院会议厅又一次接见了我们农林口革命造反派代表，对于揪斗三反分子谭震林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这是对我们农林口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支持，亲切关怀，巨大鼓舞！]

首先总理说：上次给你（指农大×××）谈的，在农大开一千人的会议，现在看来可能你们不满意。我先听听你们的要求，以农大还是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还是农政农办发起？开会方案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当×××提出大会的规模、地点、时间时，总理说：原来说开一千人会，现在看来不行了，你们要求开万人大会。

×××说：我们完全能保证，他们不敢冲。

当谈到发言时间时，总理指示说：有几个人发言？你们发言要控制在四个钟头，礼拜六开，时间下午一点半到六点，中间可休息一刻钟，或许休息不了。后天的大会我要去奉陪的。大会的名称叫批斗谭震林大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大会口号由你们定。

×××说：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提高谭震林的身价。

总理说：那怎么能这么说，那时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开完这会后，可以一单位一单位去批斗，我就不奉陪了，让联络员陪去。这大会后要是一星期批斗一次，你们订一个日程表，交给我，我们研究一下，我们还得给他留点时间，写写检查。

当×××提到揪谭火线的战士在开批斗谭震林会时再撤时，总理说：那很好。今天不去了。星期六以前我想办法去看看他们（指揪谭火线战士。）

当×××提出大会要照相和录音时，总理说：那可以。

当×××汇报到“斗、斗、批联络站”扬言要让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在八月二十五日再次向谭震林请罪时，总理笑着说：十九日谭震林不是就出来了嘛，就开会了嘛！

当×××汇报到农林口当前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时，总理说：农林口这个问题现在由李先念管，我同他商量一下。

当×××汇报说农林口假夺权后，老保把大印抢走，影响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时，总理说：这问题好办，我和先念讲一下，把大印都收回来不就解决了！（群众热烈鼓掌）

当×××汇报到季宗权长期不上班，操纵“斗斗批”破坏农林口文化大革命，要求总理令季宗权上班时。总理说：这事我和先念说一下。

另外代表们还汇报了农林口当前有关问题，总理都作了指示。

接见最后在热烈的掌声和一片口号声中结束。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李先念在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打倒姚依林大会”上的讲话

我坚决支持打倒姚依林大会的召开。

我也是犯了错误的，以前你们炮轰李先念火烧李先念，大方向是正确的，就是打倒李先念方向也是正确的，因为我犯了错误嘛！希望同志们对我还要继续批评。

总理接见你们时，你们提出要停姚依林的职。姚依林的问题，我已向总理反映过了，总理同意你们的要求（口号）。现在我代表中央、总理宣布停止姚依林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呼口号）

我的错误，你们不要因为我而分两派，如果因为我分两派，我心里不安，感到惭愧。

昨天总理接见你们，谈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打倒刘邓陶！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的指示

〔时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至五点半，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我们要提高警惕。民院抗大，东方红两派后面都有坏人挑动，钢院的也要注意：是否有坏人？有坏人就自己起来抓嘛！不要只抓对方的嘛！天津大联筹在陈伯达讲话以后就自己起来抓了。安徽的，江青 9 月 5 日讲话后，他们一天晚上自己就把双方的坏人抓出来了。这样就很好，不要别人抓，各派抓各派的。

这次周总理处理的农口秦化龙问题就处理得很好。本来谭震林讲了秦化龙是坏人以后，保守派就被扶植起来了，把革命派压下去了。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受到了批判，批谭是完全应该的，当时他们也提出为秦化龙翻案。后来通过几个月的调查，现在证明秦化龙确实是叛徒，在新疆监狱里叛变了，他们就把他揪出来了，这次秦化龙实际上就是曾经要为秦化龙翻案的这一派揪出来的，当然那一派也参加了一点，但主要还是这一派揪出来的。这就很好嘛！现在就不能把保过秦的那一派压下去而让保谭的那一派翻过来，那个保谭的案不能翻，这个作法是完全对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农口《革联》批准斗争谭震林批准二十五日前在农大批斗三反分子谭震林

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四点十五分至六点十六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在中南海会议室接见了农口“革联”所属单位革命派代表二十五人。

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对各单位的革命大联合革命大批判问题十分关心，一一询问了情况，并作了具体指示。

在谈到批谭问题时，总理指示的主要精神是：

1、时间由你们定，同意你们 9 月××日开批斗谭震林大会，具体安排跟总理联络员联系，问题是你们能否维持好秩序，我们要派人保卫。

2、批斗谭震林我是赞成的，各个学校和各部都可以批斗，农大批斗后，其它单位还可以批斗。

3、这次批斗要搞好，要树立模范，树立典型，不树立典型就失去了信任，不要弄得我支持的一派又垮台了（李先念插话：不要武斗。）

4、不一定很呆板，一周批斗一次，可以一周批斗两次。

5、批斗谭震林报告中为什么不提批判王观澜？要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

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这次接见是对我农口革命造反派的最大的支持、最大关怀，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遵照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在革命大联合和革命大批判中作出新贡献。

”

贰、研究资料

叶剑英在二月逆流中

第三十三章在动乱中稳定军队

一 “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

1966 年，中国开始进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这一年，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 8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国陷入了混乱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重任在肩，异常繁忙，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他虽然从一开始就感到运动来得迅猛，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但出于对毛泽东的长期信赖和深厚情感，还是力图跟上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曾一度负责首都工作小组，保卫北京市的安全。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乱，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多，他觉察到运动的矛头所向不对，开始为国家与军队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对运动中出现的

一些错误逐步进行抵制和斗争。

斗争集中围绕着“要不要党的领导和要不要稳定军队”问题展开。

林彪、江青一伙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制造天下大乱，同时搞乱军队。他们指使军内外“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和围攻军队领导干部，妄图从乱中夺权，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他们随心所欲的篡党夺权的工具。

叶剑英和军委几位领导人始终坚定地认为：“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人民解放军这支几十年来在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无论天下怎样乱，一定要稳住阵脚。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因此，叶剑英要求军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听从统一指挥，并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据查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文件和会议记录，以及访问刘志坚、李曼村等回忆，主要的有：（一）5 月 25 日，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 5 月 16 日通知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二）6 月 14 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三）6 月 21 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7 月 8 日，叶剑英在《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以

总政治部名义加上一个批语：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 23 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五)8 月 16 日，23 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机关档案，要严格控制。(六)9 月 3 日，经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七)9 月 23 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在会上提出，各大军区目前工作重点应即转向抓好部队工作，保证部队正常秩序。由于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党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并限定“四大”只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从而使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派出联络小组出席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交代联络员“只带耳朵，不带嘴巴”，进行大量调查。当发现林彪暗中指使李作鹏等人搞派性，制造混乱，妄图夺取海军领导权时，叶剑英即报告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务联席会议上，对海军问题作了专题研究。他根据总书记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一、萧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二、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三、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清是非，搞好团结，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对空军也是如此，他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何廷一，告他“不要卷进去”，站稳立场。

由于采取了相应措施，从而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伙夺取海、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军夺权的卑鄙目的，对叶剑英等抵制“文化大革命”、稳定军队的做法怀恨在心，多次密谋要搞乱军队。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陈伯达叫嚷：军队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江青质问列席会议的总政治部负责人：你们军队为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我看就是有人压着。她说的“有人”，首先指的就是叶剑英。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于是，10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连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

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并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这个“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一些“造反派”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乱冲乱闯。军队受到了很大冲击，战备训练受到了影响。叶剑英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甚为焦虑。他在西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

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这个通知，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加以扣压。为了控制由于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 5 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扣压了。

二在两个“十万人大会”上

紧接着，在北京召开的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双方又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次会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报告，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亲自出面讲话，抛出了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说：“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并把斗争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线。

针对林彪、陈伯达的谬论，叶剑英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发言，反复提出这样的问题：军队怎么搞？农村搞不搞？小学如何搞？哪些可以办，哪些一时不好办？请大家考虑。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要抓组织纪律，抓思想，抓政策；主张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要靠后期自己整风纠正，总结经验教训。他坚决反对“造反派”随便揪人和抄家。他强调指出，不论是社会上抄家，还是对机关干部抄家，都要提到政策上考虑。

林彪、陈伯达无视叶剑英的正确意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全国大量印发他们的“报告”和“讲话”，流毒甚广。自从他们提出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的追随者们到处煽风点火，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批判的浪潮，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连，参与造反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 11 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已达 10 万人。林彪、江青一伙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泽东批准，11 月 13 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10 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负责人同时出席。大会由总政主任萧华主持。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作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检讨”去年院校整风问题，然后谈到军队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和政策。他说，同志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不仅同情，还支持。但是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会发生质变。叶剑英批评一些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外出串连，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他说，我们是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放手，睁着一个眼睛看情况。

叶剑英引证毛泽东的话说，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个人，是不准别人改正错误、不准人家革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毛主席说，过去旧戏是《三娘教子》，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我们要向青年学习。但是我们奉劝青年同志们，不要把毛主席著作当圣经念。不要再犯教条

主义错误。

叶剑英劝大家要有阶级感情。他对有些“造反派”不顾老干部心脏病发作，不管人家死活，硬要把人家抓去批斗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慨！他批评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要大家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受坏分子利用。……

正当叶剑英讲话时，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一名“战士”（学员）递条子给会议主持人萧华，责问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剑英在主席台上当众宣读了这张条子，气愤地问大家：“同志们，他怀疑我们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我们？”台下回答：“相信军委。”叶剑英接着说，“我代表军委的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我们，请同志们信任我们。”他告诉大家，四个人的讲话是军委集体讨论过的。他重复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儿子教育老子，教育爷爷。但他希望递条子的那个学员也要接受教育帮助。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陈毅、叶剑英等元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四方。受迫害的老干部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无不表示赞同，而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叶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有几个院校成立“批资筹备处”，准备批斗几个元帅。“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

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再次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即第二次“10万人大会”）。据曾经参加这两次大会的杨德中、曹清、董守福等回忆，这次大会比上次大会气氛更为紧张。“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下，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们在会场贴满了大字标语，声言陈、叶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到会场看望大家，绕场一周随即离去。陈毅第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满腔热忱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他们学会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在陈毅讲话之后，叶剑英再次作长篇发言。他首先念了几张台下递来的条子，回答了所提的问题。对有人提出要上次递条子的学生恢复名誉问题，叶剑英耐心地讲明道理，明确表示了否定的态度。接着，叶剑英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以及军队院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意义。他肯定绝大多数师生是革命的，是好的，同时对少数人不守纪律，“住大房子”、“坐小汽车”，讲排场、摆阔气等破坏解放军优良传统等不良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最后，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同学们回校闹革命，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也就在这次大会的同一天，叶剑英针对一些“造反派”提出怀疑中共中央某些领导人的问题，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照片。

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两次参加“10万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公开对抗，也是对解放军院校师生进行的一次深刻教育。

叶剑英和其他几位元帅理直气壮的讲话，使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也促使一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开始重新思考问题。

有相当一部分院校师生接受了劝说，离京返校，甚至宣布退出“造反”队伍，

这对林彪、江青一伙是一次“反冲击”，正因为这样，他们掀起了疯狂的反扑狂潮，诬蔑叶剑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少奇、邓小平“树碑立传”等等，挑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对叶剑英进行“火烧”、“炮轰”。江青和康生等秘密策划，煽动“造反派”再开一个“10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和陈毅。

三“串连炮打何时了”

叶剑英无所畏惧，泰然处之。他稳坐在自己的西山住所，面对满墙遍地“大字报”的包围和“造反派”指责他“老机”、“老右”的一片叫嚣声浪，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他说：“大字报尽管贴，该讲的我还是要讲。”他排除一切纠缠和干扰，埋头攻读马列经典著作，希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新的启示。针对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他特意从书架上取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重新研读，并要秘书帮助摘编有关论述，“温故知新”。他联想俄国当年的情形，越来越感到当前这场运动确像列宁说的那样：“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他从马列著作中吸取了力量，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和智慧。陈毅元帅来到西山叶剑英住处，看到他和办公室人员认真研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情景，连声叫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钦佩。

12月8日，叶剑英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照常出席军委召开的13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10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严正地提出“反批评”说：“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驳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军事首脑机关的流言蜚语，斩钉截铁地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这一年冬季，叶剑英和聂荣臻住在西山，常和陈毅、刘志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等在山上会晤，有时徐向前、刘伯承也来。

几个人谈论形势，商议稳定军队的大计。一天，陈毅气愤地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叶剑英深有同感，说：“这样搞，把我们的老传统都搞乱了！”“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并谈了继续稳定军队的办法。

陈毅听了，举起双手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你！”

有一次，几位元帅在西山聚会。年高体弱、双目失明的刘伯承元帅，激动地问大家：“我的眼睛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样了？”他边说边走到其他的元帅身边，伸出双手，一个一个地从上到下抚摸着老战友。大家握着他的手，热泪盈眶，舍不得放开。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糟心！”

形势日趋恶化。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遭到越来越猛烈的围攻。但叶剑英一直保持坚定乐观的情绪，天天爬山不已，锻炼体魄。

在陈毅遭到“造反派”连日批斗、处境最困难的时刻，叶剑英特书《虞美人》词相赠：

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这首词深刻表达了处在逆境中的两位老战友肝胆相照、热情关注的真挚友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檄文，也是对共产主义的一曲赞歌。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腔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

词，陈毅拜读”。

林彪、江青一伙对几位元帅的迫害，有增无已。他们指使“造反派”纠缠陈、叶在两次“10万人大会”上的讲话，没完没了，硬逼他们继续检查。

此事上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想为陈、叶开脱，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

12月31日，年末岁尾，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被迫到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即所谓“师生代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检讨”，算是“送旧迎新”。但是此事并未了结。军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一些野心家的策动下，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确定1967年1月5日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检讨。开会的“通知”有两种颜色、两种写法，发给陈毅、叶剑英的是“到会接受再教育”，给其他人写的是“到会指导”。叶剑英接到通知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当即质问：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报告？果断地说，不能叫他们开这个批判大会，即使开，老帅也不能参加。然后，他亲自出面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两个晚上接见群众组织代表说：陈毅、叶剑英几位元帅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你们把他们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明天的会，我们不赞成”！经过耐心说服，制止了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又一次保护了陈、叶等元帅。

四保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1967年元旦一过，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1月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1月10日，江青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进一步抛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纲领和措施。经过林彪批准“完全同意”。于是林彪、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地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各级领导干部。1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由徐向前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任副组长（3月30日又增补谢富治），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10人。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江青、叶群等凭借自己攫取的干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在全国煽风点火，刮起了一股反军乱军风。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新疆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人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奔赴异地。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老师给以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如刘志坚、刘震、成钧、苏振华、赵永夫、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躲进大别山的许世友打电话呼救，叶剑英设法把他接到北京，住进京西宾馆保护起来。后来，许亲自打鸟，设家宴，请叶剑英和西哈努克，以报答“救命之恩”。受叶剑英保护的同志中，也有过去伤害过他和整过他的人，他不计旧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革命者要学会容忍。一个人能够容忍别人所不能容忍的事，就是英雄。”

据周家鼎、张佐良等回忆，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经过请示周恩来，开列出要保护的老干部名单，竭尽最大努力，采取紧急措施加以保护。凡来者不拒，既来之则保之。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和西山驻地，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床上、地板都住满了，轮番睡觉，分批开饭。这里住不下就送到京西宾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还特意关照要做好他们的医疗保健工作，

护理好每一个老同志。与此同时，他还同地方有关部门打招呼，想方设法保护钟惠澜、薛愚、柯麟、谢铁骊、华君武、袁世海、谢芳、李维康等知名人士。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揪斗之风越刮越烈。

五“内忧必然引起外患”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央军委从 1 月 8 日起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继续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激烈的斗争。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针对全国、全军混乱不堪的局势，气愤地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叶剑英讲到这里，有人当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会场上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但是，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叶剑英，还是开导大家冷静下来，要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搞好战备。

这一期间，叶剑英在参加和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还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只要有机会，就同江青等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针对搞乱军队问题，再次强调指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全国 13 个军区，有 7 个军区在搞运动。全军 157 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就是抓各个军区、军种兵种的领导人。三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凡瘫痪了的单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招待所全部被占领。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他激动地说：“现在空军指挥部只好转移到战备工事中去。如果全国空中有什么事，指挥中断了，事情谁去办！”

叶剑英据理力争，手里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指给江青看，严肃地说：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经过叶剑英等力争，在周恩来支持下，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通知对稳定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1 月 18 日，叶剑英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继续强调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规定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七个军区推迟或暂停“文化大革命”。

据总参作战部王宪志等部分同志回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叶剑英经常听取军委总参谋部作战、情报等部门汇报，掌握部队动态，加强战备，保证部队的稳定。他还抽空视察部队，主持军委常委会听取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军工生产等情况的汇报，并作了大量的指示。

第三十四章迎着逆流进攻

一“大闹京西”

斗争并未止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反军乱军、篡军夺权，伺机挑起新的更大的争端。

1967 年 1 月 19 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开扩大的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人，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 40 余人。主要议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会上，江青、陈伯达、康

生等蓄意制造混乱，起劲地叫嚷，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则不同意在军队开展“四大”，坚持维护军队的稳定。有人采取折衷的态度，主张军队要搞“四大”，但又要保持稳定。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态度非常鲜明，坚决反对搞“四大”。他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能打仗？怎么能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十分激烈。叶群突然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她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萧华头上，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接着，陈伯达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江青旁敲侧击，竭力帮腔，对萧华进行辱骂攻击。她指着萧华的鼻子问：今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 10 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逼迫他到会上说清问题。萧华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一伙转而向会议提出，由徐向前主管总政工作。会上没有人表态。很明显，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江青、陈伯达一伙围攻萧华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以便他们进而打倒叶剑英等元帅，夺取军权。叶剑英、聂荣臻对此看得非常明白，极为愤慨，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回电话说：“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但，风波并未平息。

这一天，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散会时，徐向前特意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但是，会后北京军区一位领导人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总政一位副主任的笔记本也被“造反派”劫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跑到景山东街抓他。萧华听到风声，立即从后门跑出，到傅钟家，然后坐上车子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发生了“大闹京西”事件。会议开始，主持人徐向前知道了昨天夜里发生的情况即向秘书查问，昨天会议谁作的记录？谁走漏了会议消息？这时，会场上，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有来，阴阳怪气地故意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面对江青的查问，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接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

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陈伯达相当狡猾。

他曾对人说“经过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就头疼”。他这天感到事情不大对头，当晚便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电话传给叶剑英，解释说，19号下午开会，因为安眠药吃多了，讲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他否定，要收回来。

二、下达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军委扩大的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同志。周恩来和毛泽东坐在一起。毛泽东特意招呼叶剑英等坐在他的身边，并询问碰头会上的情况。叶剑英扼要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军队一些高级领导同志此时此刻见到毛泽东主席，心情非常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诉说领导干部在运动中受到残酷斗争的情形。毛泽东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说：“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1月24日晚，徐向前、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个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

林彪同意，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讨论，又报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进行研究，最后审定批示“很好，照发”。《军委八条命令》于1月28日由中央军委颁布执行。2月21日，中共中央又正式通知全国各地执行。

“八条命令”规定，全军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不允许自由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连的军人和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机关；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和串连；军、师、团、营、连等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教育子女。

这“八条命令”的主旨在于稳定军队。由于它经过毛泽东批准，颁布后对稳定军队局势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各大军区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坚决执行这一项命令。有些军区派飞机广为散发。许多地区根据命令制止了一些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福州军区请示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集中管制，叶剑英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从战备需要出发，批准了他们的请示。但是，江青一伙对“八条命令”是一直反对的。“命令”下达没有多久，他们就四处活动，煽动各地“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弹药。

为了进一步解决稳定军队局势问题，1967年2月6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他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他和几位老帅商量后，于2月8日以军委名义发出通知：明令外出串连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

为了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叶剑英又和聂荣臻研究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下发部队。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

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

七条明确规定，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取消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对干部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八条命令”和“七条规定”相继颁布后，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根据“命令”和“规定”，先后解决了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内蒙、甘肃、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三“大闹怀仁堂”

林彪、江青一伙蓄意伺机报复，双方斗争日趋尖锐、白热化。

1967年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桌子两旁一边有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一边有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员，对阵分明。在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拍着桌子，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徐向前、聂荣臻也相继指责他们的错误。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议，斗争更加激烈。会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继续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提出批评。谭震林慷慨激昂，越说越气，大声指责张春桥等打倒老干部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站起来，夹起皮包要退出会场。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斗争！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拼凑了一份歪曲事实真相的所谓《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当即亲自安排，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满意。

2月18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责令他们检讨。周恩来也作了检讨。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进行批判。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把“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诬陷为“二月逆流”，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取代其职能，批判斗争一直没有停止。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谭震林被剥夺了参加中央全会的权利。参加全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遭到围攻。康生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林彪说：

“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次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一份歪曲事实真相的所谓《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当即亲自安排，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满意。

四、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叶剑英逆流而上，继续坚持斗争。就在怀仁堂会议的第二天，1967年2月17日，他亲自修改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这封信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开来。同一天，叶剑英还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1967年2月23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发生过程，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但林彪、江青却继续追查，把攻击矛头对准叶剑英。此后，叶剑英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了关于军事院校恢复党委领导、停止搞“四大”等四点指示。他还受中央委托继续帮助解决新疆、内蒙、甘肃等地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受到各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但却招来了林彪、江青的更大怨恨，一条条罪状和种种迫害接踵而至。

叶剑英并没有被压倒，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想尽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经过酝酿，2月26日他就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他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余人。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情况，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叶剑英了解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包括“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指示。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的多数同志心里有了底。但这次会议进展并不顺利。林彪、江青等发觉这次会议“风向

不对”，诬蔑叶剑英“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康生气势汹汹地到会上讲话，手里摇晃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3月20日，林彪突然来到会上讲话，大放厥词，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的进攻”，“要抓带枪的刘邓

路线”！这次会议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还是取得了很大成果。有人反映这次会议对稳定军队起到了积极的潜在的作用。

4月6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有关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十条”，否定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4月中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等罪行，逼迫叶剑英等元帅作“检讨”。紧接着制造了一系列事件：首先，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工作由萧华主持；然后，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走“小鬼”；与此同时，重新挑起“青海事件”背后两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祸首”赵永夫的“黑后台”叶剑英；随后在武汉制造“七二〇反革命事件”，揪斗陈再道，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带枪的刘、邓路线不打倒，不带枪的就打不倒”等反动口号。

7月23日，江青又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造成全国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各地掀起了冲击军事机关的新高潮，“造反派”到处“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叶剑英当场予以反击。会后不久，江青一伙竟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街81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还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叶剑英，必欲打倒而后快。他的小女儿文珊被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保护起来，当电话守机员。江青知道了，说她“泄漏机密”，要把她抓起来，傅崇碧连夜通知她离开，后到福建去当兵。

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什么“兵变”、“逆流”、“冲击事件”等谣言，恶毒攻击叶剑英等元帅和高级将领，而且从组织上改组最高统帅部，成立“军委办事组”，让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1968年3月，又制造“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蔑几个老师是“黑后台”。他们组织人员专门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造谣诬蔑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直到毛泽东亲自批示这是“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他们才被迫罢休。

五、忍辱负重，坚持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的罪名，首受其害。朱德被诬为“旧军阀”。彭德怀则“新老帐”一起算，再次被批斗。陈毅被打成“老机”、“老右”。聂荣臻主管的国防科委，被“九一五”、“九一六”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向前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勒令检查。刘伯承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叶剑英虽然受毛泽东一再保护，说他长征路上获取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但仍然处于被“半打倒”状态。有一段时间，黄永胜一伙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寂生活，但他仍然保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坚持斗争。他的亲属、子女十分担心他的生活和健康。他这个“逆流的老爸爸”以慈父之心关心爱护子女们，常常写信或面谕，告诫他们要“洁身自爱，奋发图强”，“挺起胸膛走路，夹着尾巴做人”。他曾书“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与女儿楚梅、女婿邹家华共赏警勉。他在给远在外地的文珊的回信中写道：“你信中问到二号楼

(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的住地),且听吧:二号楼前果木多,一间古庙一头陀(和尚)。如有假日归来看,你的窝儿照样呵!”他在信中语重心长地嘱咐女儿说:“人要成才,就要千锤百炼,才能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你要刻苦锻炼,‘马大哈’气味要大大压缩一点。”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人生是多么短促,宇宙是多么无限,人们以短暂的时间完成悠远的事业,只有代代相承,蝉联不断,愚公式地干下去。……亲爱的珊儿,勇敢地坚毅地准备好接起前一辈的班来吧!”

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表现非常沉着冷静,应付自如,他告诫办公室的同志:“大事多请示报告,小事要沉着思考,遇事与群众商量。”他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时,想方设法保护几位元帅和老将军、老干部。他看望病中的聂荣臻元帅,两人谈到林彪、江青一伙把跟随毛主席多年的老师和老同志列为“老机”,开会坐在右边或台下,动辄批斗,非常愤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对叶剑英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述:“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作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见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

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叶剑英身处逆境,犹念念不忘向党内外的知名人士、革命先烈及其亲属,给以爱心,送去温暖。他不但亲自写信表示慰藉,还派秘书和子女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困难,尽力相助。当他得知宋庆龄变卖衣服和书籍时,特修书安慰,以后又设法接济5万元人民币,解决燃眉之急;对李立三、黄琪翔、蒋光鼐、司徒美堂、邹韬奋、赵世炎的夫人及子女等都曾给以亲切关怀。叶剑英遭难这一时期,广东和家乡以及外地来京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老乡亲、老朋友想方设法,冲破阻拦去看望他,他表现出十分乐观豁达的态度,告慰大家,再难也能挺得住,闯过这一关。同时非常关心老熟人和各地区的情况,问东问西,了解甚详,深切关注。

六、“二月逆流”实为“二月正流”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谈话,并于1969年1月3日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周恩来也为“二月逆流”的平反问题做了很多工作。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李大章、张国华等,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到会的人员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接着他又对大家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1972年1月初,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

陈毅同志传达一下。”为了慎重起见，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1月6日16时20分，叶剑英匆匆赶到医院向重病的陈毅作传达。据当时在场的保健医生卞志强教授回忆，叶剑英泪流语塞，用颤抖的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他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看你，你要安心养病，会好的。”他把纸条上的内容读了一遍，再交给守坐床头的陈毅女儿姗姗，让她再念给陈毅听。姗姗伏在床头轻声对陈毅说：“爸爸，刚才叶伯伯的话，如果你能听见，就闭一闭眼睛。”这时说话已经困难的陈毅闭了闭眼。当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与世长辞。叶剑英悲痛异常。在陈毅患病期间，叶剑英多次去医院看望他。“毅公卧病，诗以慰之”，他在《慰陈毅同志》诗中写道：“君子坦荡荡，于人曰浩然”。“斯人有斯疾，闻道可闻禅。信回天有力，前路共巨艰”。他希望有回天之力能医好陈毅的病，好再并肩战斗，继续完成艰巨而重大的历史使命。以后，又写信安慰陈毅：“望宽心医治，老英雄定能战胜顽疾，祝早日恢复健康。”他在诗和信中高度赞扬了陈毅的大将风度和高尚品德，表达了对老战友的深切关怀。陈毅辞世，他去悼念，特书《悼陈毅同志》诗：“鬼蜮含沙射，元良息仔肩。儿曹当鹤立，接力竞无前。”赠给陈毅子女，对晚辈提出了殷切的慰藉和希望。他借用曹植《洛神赋》“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的诗句，勉励陈毅子女，当“鹤立”成才，挑起重担，继承父志，接力向前。

叶剑英和陈毅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肝胆相照、同声相应的知己和诗友。人们赞道：“叶陈二公，屹立青松，抵制错误，二月抗争。”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七、到新华印刷厂“蹲点”

1968年底，毛泽东亲自抓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1969年春节，毛泽东找几位元帅谈话，要他们到工厂去蹲点，作点调查。叶剑英被指定去新华印刷厂。

叶剑英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二里沟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同陈云、谭启龙一起学习、劳动。他在装订车间，一面参加学习、劳动，一面接触工人搞调查研究。在车间里，他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工人群众中间，和工人同吃同劳动，尽自己最大努力干些体力活，同时参加学习班的批判会、讨论会，虚心向工人学习。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还在厂里的安排下，到别的车间去参观访问，详细了解生产的每道工序，并同工人们座谈劳动经验体会，支持革新创造，关心群众疾苦。厂里的干部和工人知道他是军队元帅和中央领导人，7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就主动照顾他，劝他多休息，单独开伙吃饭。但他一再表示，自己是来学习的，都婉言谢绝了，始终遵守工厂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坚持同工人们一起作息，一起到大饭堂就餐。工人们很感动，亲切地叫他“老叶”，愿意同他说心里话。普遍反映，“老叶”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和咱们心连心。这期间，叶剑英常给在自己身边的子女和侄儿选钧等谈自己在新华印刷厂劳动的情况和收获，说自己“每天向工人学习，受到教育很深”。周恩来对他十分关怀，特意派杨德中几次去看望他，并带话嘱咐千万注意身体。叶剑英给周恩来写报告，谈自己在工厂锻炼学习的体会。报告中赞扬工人的革命品质，谦虚地表示自己“落后了，要赶上去”。

八、对国际新战略的建议八对国际新战略的建议

1969 年 3 月，苏联军队悍然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

这时叶剑英虽然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工作岗位，但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极为关注。3 月初，他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3 月 18 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 7 条具体建议。3 月下旬，他同其他几位老帅一起多次研究了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并根据研讨的意见由他负责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呈报毛泽东主席。报告站在世界全局高度分析了苏联军队突然入侵珍宝岛的原因、目的及其发展趋势，进而揭示了美苏称霸全球的战略企图、与各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珍宝岛事件”以及由此加剧的中苏关系紧张局势，一直压在叶剑英的心头。在这一事件一周年之际，叶剑英身处外地，肺病复发，犹念及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威胁，以《珍宝岛》为题赋诗一首：

病阅聊斋事可伤，
恒娘读罢又庚娘。
敌军压境魔侵肺。
心在边疆身在床。

1969 年 4 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际国内极其紧张的形势下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叶剑英在会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在发言中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争取时间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准备打败敢于来犯的任何敌人。而林彪、江青一伙则鼓吹国际“中心转移论”，强调军队要“突出政治”，对叶剑英继续进行围攻。但是，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却受到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和爱戴。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九大以后，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接受周恩来总理交代的任务，从 6 月 7 日开始，多次在中南海武成殿聚会，在陈毅主持下，全面深入讨论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在会上，叶剑英作了几次很有见地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强调要利用美国、苏联和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尽快打开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恢复中美会谈。他说，现在美国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联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联接管“真空”。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的新动向。后来由参加会议作记录的熊向晖等根据元帅们讨论的情况，整理成一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于 7 月 11 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上送周恩来总理转呈毛泽东主席。在这份报告中，四位元帅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全面地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着重地对苏美矛盾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并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报告全面地勾画了国际战略新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局面提供了依据，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重大战略决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这一年 9 月，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叶剑英作为副团长陪同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 9 月 4 日乘专机前往河内吊唁，并与越南领导人举行会谈。

九、“流放”湖南

但是，林彪一伙并没有放弃对叶剑英等的迫害。1969 年 10 月，他们借口所谓“紧急战备”需要，迫使叶剑英等许多老同志离开北京奔赴外地。年过七旬的叶剑英被“下放”到长沙，以后又辗转流徙于岳阳、湘潭、广州等地，含冤受屈，

受尽林彪及其追随者们的冷遇、刁难和折磨。同时也受到许多领导人和基层工作人员及群众的关怀和爱戴。周恩来曾亲自打电话慰问。下放到江西的王震特地赶到湖南看望。湖南省军区的一些好同志对处在困境中的叶剑英尽力给予关心照顾。叶剑英和这些同志相处甚安，经常说古谈今，启发他们读书明理，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他在外地的弟弟和子女偶尔来看望，或捎信来问候，他表示感谢：“千里寄书能慰我，似逃空谷听人声”，在给选宁的复信中写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在“战备疏散”期间，叶剑英虽然身处逆境，年老多病，儿女失散（有的在监，有的致残），但仍胸怀开阔，泰然处之，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情绪。每天坚持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古典文学，学习外语，坚持锻炼身体，坚持收听广播，关心天下大事，为国为民忧心。他利用各种机会，经常出外走一走，转一转，参观工厂，看望群众，向有关部门领导反映情况，提出合理化建议。他登临岳阳楼，极目八百里洞庭，览物动情，反复吟诵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国利民，其志更坚。心有所感，则吟诗填词以明志。1970年端午节，他遥望汨罗江，凭吊屈原，作诗一首：

泽畔行吟放屈原，
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
一读骚经一肃然。

叶剑英平生十分敬佩屈原的诗品和人品。他设身处地，想起屈原当年的放逐生活，以“行廉志洁”来鞭策自己。他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不提任何特殊要求，经常告诫身边人员，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不准搞特殊。他在岳阳招待所，亲自下厨房感谢炊事员陈炳生给他做的可口的饭菜。有一次他与陈聊天，看到要把剩下的藕汁倒掉，便劝阻说：“陈师傅，这是好东西丢了太可惜。替我留下来，下顿饭给我喝！”使在场的同志很受感动。

十、揭穿陈伯达的真面目

1970年7月6日，叶剑英突然被告知，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刚到住地二号楼，周恩来即打来电话，表示欢迎和慰问。紧接着，到京西宾馆连日开会，为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作准备。

从此，叶剑英结束了长达300天的“流放”生活。

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叶剑英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于8月20日飞上庐山，参加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会上，林彪、陈伯达一伙早有预谋，搞突然袭击，抛出“称天才”的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进行抢班夺权。当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与会多数同志的揭发批判。

叶剑英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保持清醒的头脑，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地与林彪、陈伯达进行斗争。

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庐山住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日研究“批陈”问题，确定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并把调查陈伯达反革命历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务当面交给周、叶。11月，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参加调查小组的人员和中央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他明确交代了任务，提出了要求，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会后，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奔赴陈伯达家乡福建惠安县陈安大厝和厦门鼓浪屿、集美等地调查。然后又去广东、广西等地找有关人员座谈，提审在押人员，查阅敌伪档案报刊，进行反复查证。为了弄清问题，他亲自与人谈话，

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时谈到深夜一、二点钟，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他及时与中央联系，亲自给中央写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查清了陈伯达这个政治骗子的反动历史，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所谓“红色理论家”的真面目，为中央清除林彪与陈伯达等反革命集团做出了重大贡献。

（摘自《叶剑英传》）

聂荣臻在二月逆流中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尤其对取消党的领导、怀疑和打倒一切老干部、军队开展“四大”等违背根本原则的做法，激起了许多老革命家的强烈不满。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在中央军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们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作了坚决斗争。这是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而林彪、江青一伙，却把它诬蔑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

这场重大的原则斗争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为了实现乱中夺权的阴谋，就唯恐天下不乱，今天要打倒某人，明天要打倒某人。他们以毛泽东关于党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论点为借口，到处煽风点火，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批判”、“揪斗”、“造反”、“炮轰”、“火烧”、“打倒”等形式，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致使许多地方的工厂停工，农村停产，学校停课。1967年1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制造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了夺权的高潮，形势越来越乱，并且波及军队各总部等领导机关。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为保持部队的稳定，进行了各种努力，费尽了心血。从1月8日到4月中旬，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他们在会上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

聂荣臻说：“这么多下级和战友，都是从战争年代一起考验过来的，互相都比较了解，怎么都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无法理解嘛！这样乱下去，怎么行！”

早在1966年9月1日，在由叶剑英主持，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参加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汇报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其中提到：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师以下部队及军以上机关的警卫、通信部队统统搞正面教育，不准地方到部队串联，也不准部队到地方串联，更不让地方群众和红卫兵到部队营房搜查。如果发现有人企图煽动部队搞武斗，各级党委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并立即上报。萧华的讲话，总的精神是要保持部队的稳定。聂荣臻是完全同意这些意见的。叶剑英、徐向前也都同意。9月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批转了萧华讲话的要点，要求部队坚决遵照执行。

可是过了两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聂荣臻与叶剑英议论说，让这些娃娃们去工厂、农村到处乱窜，煽风点火，这股火烧到哪里，那里的生产就得停顿，此举实不可取。10月5日，林彪授意发布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明确提出：在和党委的关系上，运动期间

要突出地强调文革小组的权力作用。军队院校要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四大”。此后，全军院校相继大乱，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造反派们互相串联，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连连遭到冲击。

林彪、江青一伙唯恐天下乱得不够，1967年1月初，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陈毅发动进攻，策划要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师。与此同时，1月3日，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航3名学生代表时说：“聂荣臻有缺点，可以烧一烧。学生可以与国防科委机关干部一起，把革命搞好。”在如此露骨的煽动下，北京航空学院一些受蒙蔽的学生，更是肆无忌惮地把炮轰聂荣臻的浪潮越掀越高。就是这些北航学生，1966年9月，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公然在国防部大院外安营扎寨，胡闹了28天，叫嚷什么要清算国防科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聂荣臻认为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打电话给王力进行解释。同时，要国防科委对这些学生进行开导教育。而江青一伙却对国防科委的有关领导人说，“科委不要把聂帅推到第一线”，“不要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这把火一点，一时间，北京街头立时出现了花花绿绿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其中，要数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过来竟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聂荣臻住在城里，被造反派纠缠不休，每天连正常的看文件、读报纸的时间也难以保证，不得不搬到西山。在僻静幽雅的山坳里，聂荣臻与住在那里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经常在一起议论“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左”的错误，对中央文革的乱军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后，这些同志间的正常接触和谈话，竟被当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重要“证据”。

聂荣臻常说，人民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在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的提议下，1967年1月1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同一天，林彪却授意《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社论指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第二天，林彪又授意军委发出《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这些举动，完全与中央通知精神相悖，进一步导致了許多造反派组织冲击军队，其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

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议。与会的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40余人。会议围绕着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荣臻等几位老师一致认为，军队不能开展“四大”。而江青、陈伯达一伙却顽固坚持军队不能特殊，必须开展“四大”。双方针锋相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时，叶群突然跳了出来，捏造罪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江青、陈伯达也一唱一和。陈伯达胡说什么“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总政是“阎王殿”，“军队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等等，硬逼萧华去群众大会上作检查。老师们听了都非常气愤。他们很清楚，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萧华的攻讦，矛头是冲着他们几位老师来的。江青一伙的目的，就是要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搞乱军队。对此，聂荣臻非常愤慨，会议还没有结束，就和叶剑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当天晚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得知会议情况，浩浩荡荡地由西山出发，直奔景山附近萧华的寓所。大概在半夜12点，聂荣臻家墨绿色的大门被

播得山响。有几个人正扒着铁门想往院子里翻。警卫战士一边大声喝问，一边通知了值班的秘书。虽然聂荣臻当时住在西山，但保密室里存有大量的机密文件。值班秘书很紧张，不由得摸了摸腰间的手枪。这时，大门外有人高喊：“错了，错了”，“往北，往北”。门外，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造反派突然出现在萧华家里，要抄家抓人。而早有戒备的萧华，连忙从后门离开家，几经辗转，来到了叶剑英家里。秘书很快把萧华家被抄的情况报告给了聂荣臻。当说到萧华办公室的保险柜已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材料散失在地上的情况时，聂荣臻气愤他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

20 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扩大碰头会仍在继续。江青在会上故作姿态怪声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没有来？他躲到哪里去了？”不一会儿，萧华来了。当会议主持人徐向前问明了情况，得知昨晚萧华的家被抄，非常气愤。这时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的叶剑英突然厉声痛斥道：“萧华昨晚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

叶剑英说着说着举起右手，用力向桌子拍去。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这就是以后被传扬开的“大闹京西宾馆”。

在以后几天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聂荣臻等几位老师坚决不同意江青等人要在军队搞大民主的主张，列举了大量的军队被冲击的事实，提出稳定军队，迫在眉睫。军队的情况越来越紧张，整了萧华，又整杨勇等高级领导干部，各地纷纷告急。

1 月 22 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扩大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干部。毛泽东在听取了一些领导干部关于当前形势的汇报和出现的一些问题后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指出，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在主持以后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人一起，反复商量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表示：“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部队搞乱了。”这时，聂荣臻也毫不犹豫地：“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限制才行。”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作为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这时实在坐不住了。1 月 24 日晚，他和聂荣臻、叶剑英先后来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这样乱下去的理由，要求规定出一些条条，以稳住军队。当晚，经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林彪同意后，叫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拿着这个命令初稿去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夜里 3 点多钟，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江青等人知道这已经经过林彪的同意，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请毛泽东审定。1 月 28 日下午，毛泽东特地把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几位老师请到中南海，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要严格管教好高干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

接着，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文件。这就是 1 月 28 日颁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八条命令”明确规定：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以及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的人员与职工等，应迅速返回

本地区、本单位；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今后则一律不准冲击；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央军委命令》公布后，受到了全军指战员的拥护，直接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反党乱军阴谋。

2月11日，在西山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聂荣臻、叶剑英等又共同拟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重申了军委“八条命令”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稳定军队的有效措施。这份砥柱中流般的文件，表明了共和国的元帅们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1967年2月初，为了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在这些连续召开的会议上，老一辈革命家们与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2月14日和16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2月16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会上，谭震林严厉地指责江青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倒，把全国搞乱了。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愤，狠狠地拍了桌子。然后，谭震林站起身，收拾完文件，夹起公文包，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完往外就走。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也对谭震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此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其他的老革命家纷纷发言，批评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

在这两次会议上，聂荣臻对林彪、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为“联动”分子、保守反动分子，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不让他们上学，甚至还有被关押起来的情况，表示十分愤慨。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碰头会议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驱车钓鱼台，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向江青作了汇报。当晚，江青便安排张、王、姚带着会议记录去见毛泽东告状。

2月18日晚上，听了一面之词的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碰头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革命家，并决定召开批评会。聂荣臻和其他老革命家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参加了7次“政治生活会”，接受批判。康生是这次批判会的组织者和煽动者。他们对老革命家围攻批斗了20多天，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到了老革命家头上。同时，林彪、江青一伙还借机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至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员被打倒或不能正常进行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林彪、江青一伙终于达到了目的，把肩负党、政、军重任的一大批老革命家整倒、搞臭、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这也使他们在篡党夺权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行为也越来越猖狂。

从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以后，聂荣臻的日子日益艰难起来，造反派的炮轰、批判接踵而来。1968年6月27日，国防科委有9个人贴出了大字报，说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在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意思是指，1967年6月，聂荣臻在向国防科委的领导人说起关于某干部历史上有过自首问题，后来经过长征考

验,又重新入党一事时,他讲了一句“记得这是毛主席说的”话。(事实是,1935年12月27日,聂荣臻曾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指出,凡属经过长征考验的,应广泛吸收入党。从此,国防科委机关造反派抓住这句话加以歪曲,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新高潮。国防科委系统的其他造反派与国防科委机关的造反派结合起来,闹得更是不可开交。在批评还是打倒聂荣臻的问题上,两派群众组织矛盾也日益尖锐,争论更加激烈。

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来到京西宾馆听取某工业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当听到有人说搞两面派的人没有好下场时,聂荣臻立即义正词严地表示:“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不论自己的处境多么困难,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大闹怀仁堂”以后不久,有一次叶剑英对聂荣臻说:“康生指责我,说我曾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我记得没有说过这句话呀?”聂荣臻当即回答:“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4月7日,聂荣臻专门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刘少奇被打倒后,专案组人员要聂荣臻写材料证明刘少奇是反对“八·一”南昌起义的。聂荣臻说:“我没法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工贼,让我写事实可以,让我表态也可以。”聂荣臻证明说:“南昌起义时,刘少奇是中央委员,他因为有病,住在庐山。恩来同志交代我把南昌起义的决定告诉他,好有所准备。我到九江找到了刘少奇同志,转达了中央的决定。他没有表态,没有说过反对起义的话,我怎么能说他说过呢?”“刘少奇的结论由组织上全面考虑,我知道这话他没有说过。”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革命家,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攻讦对象。于是,本来是为“九大”做准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到分组讨论时,林彪、江青一伙却有计划地把老革命家们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里,并对他们发动了总攻。把讨论会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所谓“为刘少奇翻案”的“二月逆流”了。

聂荣臻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第二小组。江青一伙专门安排聂荣臻的一些老部下参加这个组,发动大家兴师问罪。但在会上,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地表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没过多久,一位参加会议的老部下对聂荣臻的秘书说:“聂老总是个正派人,几十年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参加反党集团?!我就根本不信。你们心里也要有个数,把他的身体照顾好。”有一次,陈伯达有意追问聂荣臻:1948年敌机轰炸了城南庄,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就出在你的司令部,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聂荣臻干脆地回答: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你有本事去问毛主席好了。临到会议结束,江青还就此问题作了书面发言,聂荣臻知道后仍然泰然处之。

聂荣臻心里很清楚,在这次全会上是有“关”要过的。会议中他交了一份“检讨”,主要是关于“多中心论”的问题。1968年春,国防科委系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选举代表的条件中,有一条是“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聂荣臻和他的秘书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条件。当毛泽东、周恩来批评后,聂荣臻专门写了检讨。但是,他没有想到,连日来小组的批判发言逐渐升级,最后,竟把自己划为“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

聂荣臻在检讨中始终不承认“二月逆流”是有预谋的反党活动,对许多关于

“文化大革命”的议论，他认为是正常的同志间的接触，没有准备作检讨。但陈伯达等人步步紧逼，追问他与叶剑英、陈毅等人接触了几次。聂荣臻表示曾多次去过叶剑英家，也经常和陈毅、徐向前见面。这时，有人在会上拿出监视聂荣臻活动的登记，逼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活动。聂荣臻当场痛斥了这种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然而林彪、江青一伙不顾事实真相，硬把这说成是“反党活动”。按他们的说法，老同志分为两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为地方上的一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为军队中的一摊；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他们还说，这些老同志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的。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在讲话中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林彪的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从这以后，大会小会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毛泽东的讲话与林彪的讲话不同。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封锁，他不了解“二月逆流”的真相。他说：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嘛，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从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毛泽东的讲话，肯定了老革命家们行为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

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因肺炎高烧 39℃ 以上，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他的心率每分钟达 150 多次。早在 1965 年，国家卫生部就接连向中央递交了两份关于聂荣臻病情的报告，要求让他全体一段时间。然而，工作太多，他只能坚持。“文化大革命”以来，聂荣臻由于过度操劳，以至心脏病频繁发作，不得不经常住院。这次聂荣臻住院期间，叶剑英给张瑞华打来电话，请她一定要转告聂荣臻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叶剑英的几句话，给病中的聂荣臻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1969 年 1 月 3 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对老革命家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然阳奉阴违。林彪在派黄永胜、吴法宪向聂荣臻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时，同时也传达了他们的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这分明是一种警告。林彪一伙还严密封锁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不准外泄，以便他们在适当的时机，抓住“二月逆流”再做文章。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聂荣臻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的座次排列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主席台左侧，全是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说明他们是左派。主席台右侧，是所谓“二月逆流”的成员。别看他们还保持着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头衔，却是作为右的代表

出席“九大”的。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于是，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在“九大”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聂荣臻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同意把聂荣臻等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林彪、江青一伙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从心理上折磨你。

这场关于“二月逆流”的批判，整整持续了4年，使这些老革命家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

1971年11月，毛泽东接见了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当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在场的人大声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197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月正流》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前，编辑部来人征求了聂荣臻的意见。为此，聂荣臻专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信中写道：

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一伙蓄意陷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一桩大冤案。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双方就在如何掌握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三点深刻的分歧，一直在针锋相对地斗争：

- 一、要不要党的领导；
- 二、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
- 三、要不要稳定军队。

怀仁堂会议是双方斗争的最高潮。

为了打倒这些老同志和其他老干部，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个关键性的反革命谬论，说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解放军是资产阶级军队，因此都应该打倒。……而我们则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要看这个革命是谁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共产党领导下，就会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被国民党蒋介石篡夺了领导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彻底失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我们走的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争取到了革命领导权，经受了长期的艰苦、复杂的斗争考验……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不仅有民主革命的觉悟，而且绝大多数还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怎么能说成是民主派呢？至于军队，那是我们党一手创建的，并且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几十年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一系列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呢？

在部署上，林彪、“四人帮”搞“二月逆流”，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到二月上旬，双方多次在政治局或军委会议上，对要不要稳定军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在外事口集中攻击陈毅，把外交部搞瘫痪，妄图先夺国防和外交大权……这几个方面的斗争，发展到二月怀仁堂碰头会议，进行全面

摊牌……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初，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至此有了正确的结论。

（摘自《聂荣臻传》）

徐向前在二月逆流中 第一节被推进历史的漩涡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红卫兵。那一天，除了林彪之外，徐向前和其他各位元帅，都没有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临时得到通知说，接见完红卫兵之后，毛主席要和元帅们照相。元帅们的工作人员，都急忙返回住地取军装。贺龙元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帽子又太小，搞得很侷促。那张照片，是毛泽东和元帅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历史照片。

1966年秋，红卫兵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军队院校有的“造反派”向林彪当面告状，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限制太多”。于是林彪提出：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机关、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10月5日，以军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从此以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就大乱起来，军队与地方的一些“造反”组织，相互串联、勾结，相继发动了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11月8日，一批“造反派”把木板搭到警卫部队战士的身上，踏着“人桥”，疯狂地冲进国防部大院和总参谋部大楼。随后不久，在林彪的坚持下，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徐向前向林彪提出，各大军区开展“四大”不要全面铺开，可分批进行。因为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特别是地处沿海、边防的军区，即使内地军区，也要区别情况，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搞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要搞，可以在一两个军区试点。徐向前这个意见，实际没被采纳。

1966年国庆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肖华向徐向前说，请老师们接见一下军队院校来京的学生。徐向前说，你们准备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大家讲一讲就行了。肖华说，还是请老师们都讲一讲好。

过了几天，肖华给徐向前送去了讲话稿。徐帅看后，加了加强战备的话。

11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军院校10万来京师生大会。周总理、陶铸副总理，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参加接见，周总理、陶铸副总理接见后退场，由四位老师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

革命”，但共同的是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性。陈毅在讲话中说，有的同志头脑发热，给他一条冷水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在讲话中强调：“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主席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

老师们从稳定军队出发，苦口婆心地引导。叶剑英讲话时，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一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贺龙元帅当时已受诬陷，他出席大会，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忌恨。江青气急败坏他说：“你们把贺龙拉出来亮相，是向中央示威！”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几位老师的讲话。有几个院校成立了“批资筹备处”，在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军队内的“造反派”开始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军队的领导干部。

11月29日，全军文革再次安排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几位老师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会场上气氛有些紧张，贴满了批判几位老师11月13日讲话的大标语，还有什么“炮轰”、“火烧”之类的话。叶帅和陈帅发了火，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徐向前因头疼加剧，没开完会议，就先退出了会场。老师们的两次接见，都使江青恼火，她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全军文革”。1967年1月初，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斥责为军队中“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被撤掉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

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使徐向前越来越难以理解。他忧心忡忡，不知道这场“大革命”会导致何方？

1967年1月6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毫无思想准备。会客室里气氛沉寂。徐向前这位领兵几十年的老元帅，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对于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从不计较。他认为升迁和调动，对一个革命者、特别是一个军人来说，只有“服从”二字。由于他多年身体不好，患着严重的偏头痛和胸膜炎，这些年抱病参加一些工作，已是力不从心了。他的身体状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是了解的。真不明白，是什么人，在这个严酷的动乱之中，把他推了出来！是信任呢，还是其他的原因？

沉默了许久，徐向前自知难以胜任，便说：“我多年有病，对干部不熟悉，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杨代总参谋长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主席决定的。”

听说是江青的提议，徐向前一时难以相信。他和江青从没一起共过事，也从来没有私人接触。徐向前心里划着问号，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情，更加烦躁和不安。对这场“大革命”，他和许多人一样不能理解，他期望着毛主席能更改对他的委任。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来了全军文革成员名单以及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看来，中央文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徐向前明白他这个全军文革小组长已成定局，看了“通知”，当即表示了三条意见：

第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座谈一下，交代一下政策；

第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委领导不行。现在有的机关干部起来要求成立革命战斗组织，有这种苗头。尤其是空、海军，担负着保卫空海防的任务，战备任务比较频繁，指挥失灵了不好。机关干部成立战斗组织，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

第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讲一讲。北京军区抓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今天又把王辉球、成钧和常乾坤带走了，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一下，否则大家没有底。

这三条意见的意思很明确，要稳定军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乱揪乱斗。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下一步徐向前被打倒的祸根。

第二天，徐向前接到一个急件：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就这样，徐向前被迫仓促上阵，担任全军文革组长。命令还未公布，消息已经传了出去。许许多多的电话，各种各样的问题，蜂涌而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 1 月 12 日正式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峰、张涛、和谷岩。14 日建立办公机构，在三座门开始办公。

徐向前眼看军队各机关、院校一天比一天混乱，上任后，决定狠抓一下军队的稳定。他每天在电话机旁，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一样，下达命令，回答各方面提出的种种问题。原有的两部电话机不够用了，又新增加上两部。他在电话里，不止一次作出这样回答：“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军队不准大串联！……”

“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打砸抢，不准乱抓人！……”

海军司令肖劲光被北海舰队的“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海军文革办公室，命令那里的“造反派”立即把肖劲光送回来。他语气坚定，态度明确，“造反派”不得不照办。后来他说话也不灵了，有些“造反派”公然在电话里和他争辩起来。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工厂和机关的师生员工、干部大批涌到北京，要求澄清和解决问题。大批群众，大量问题，都压到全军文革来。全军文革小组 18 名成员，有些人在中央文革，有些人只是挂名兼职。有的成员刚开始工作，就被揪去“澄清问题”了。办公室经常没有人主持日常工作，最后只剩下徐立清一个人左右招架。每天来访人员多至 200 多批。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的头头，整天包围着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公机关。静坐、绝食、哄叫，有时连电话机都被占领着，搅得办公机关无法工作。一些文革小组成员陆续被揪斗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的叶群，隐藏在幕后，连电话都不接。中央文革还经常下达一些与军队要求相反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几乎每天要接见“造反派”头头，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者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徐向前常常恼怒发火，头疼症频繁发作。周恩来总理关怀徐向前，对他说：“和他们（指‘造反派’）打交道，你要掌握 8 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1 月 10 日，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突然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接着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大军区领导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有的军区作战室被封，一些领导人被挂黑牌，画鬼脸。一些军队“造反派”组织的人员，开车直接到徐向前往地，要求他回答问题，无理取闹。

徐向前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在一次军委碰头会上，他根据“十六条”精神和一些人的建议，断然提出 5 个不准：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戴高

帽，不准挂黑牌，不准游街等。会上，周恩来总理表示赞同，但陈伯达、江青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1月中旬，陈伯达、江青蓄意整肖华。陈伯达在接见群众组织时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在陈伯达的煽动下，总政机关大楼里贴满了打倒肖华的大字报。周总理得知后，很生气，站出来辟谣。消息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江青很紧张，赶忙令人覆盖大字报。

1月19日下午，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师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老师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争来争去，僵持不下。陈伯达、江青等人节外生枝，又对肖华进行突然袭击。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叶群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等。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肖华，都有发言稿，说明他们是早有预谋的，只是老师们都蒙在鼓里。散会时，徐向前郑重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但是，会后杨勇在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传达，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所以，晚上，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就抄了肖华的家，肖华被转移到西山才免遭揪斗。

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他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

1月23日，徐向前开了一夜的会，早上7点才回到家。他接近古稀之年，疲惫不堪，正想休息一下，这时墙外来“我们要见徐向前”，“我们要见徐向前”的吵闹声，徐帅闻声心烦，抓起大衣旋风般地冲出房门，身后留下“哐！”的一响关门声。他面对“造反派”，正襟坐下，气势凛然。“造反派”多是些娃娃兵，没想到徐帅真的坐到了他们面前，一时手足无措，愣了半天，才有一个头头要徐帅对杨勇的事表态。徐帅在前一天已听说上面有人说了话：杨勇要“烧而焦了”，此时徐帅仍然说：对杨勇同志要“烧而不焦”，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这帮“造反派”没有捞到什么，但他们总算见到了徐向前，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呼啸而去。

揪斗肖华后，又揪斗杨勇。眼看着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如果再乱下去怎么办呢？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心急如焚。他多次叫人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却得不到回音。在全军文革刚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再报告他。但实际情况是，陈伯达、江青都很难找到。徐向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他既不能眼看着军队乱下去，又不能按自己的见解行事。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的办公室，要求见林彪。回答不是说“身体不好”，就是说“已经报告过了”，林彪不肯见。

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毅然决定要直闯林彪的住地。他坐上汽车，才告诉秘书给“林办”电话通报一下。在西城区一个名叫毛家湾的深宅中，住着林彪和叶群。外表不起眼的大门和普通建筑，掩盖着住宅内部的奢侈豪华。林彪忌风又怕见水，后院内却专修了一座庞大的室内游泳池，四季温水不断。林彪为

了坐在室内晒太阳，用进口的石英玻璃，安装了一个晒口。徐向前的突然到来，打断了林彪和陈伯达的密谋交谈，使他们有些不悦。不过，林彪还是以元帅对元帅的礼貌，接待了徐向前。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当前全军混乱的情况，提出：“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听了，连连点头。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于是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并请叶帅、聂帅到毛家湾来研究。陈伯达当即告退。上述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去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去前，徐帅特意打电话给陈帅，请他也到会助阵。因为陈伯达知道九条的内容，所以，老帅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的人都在，还把总理也请来了。经讨论改为七条。当时陈伯达正和林彪关系甚密。他边把“七条”稿子装到徐帅口袋里，边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

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子送到“林办”，回到家已是早晨 4 点钟。后来，林彪把七条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主席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又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修改后的八条交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1 月 28 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同意照发。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件以“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具体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八条”的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这是不合乎江青一伙人的思想的。

因为“八条”是林彪参与制定的，她不便反对，把嫉恨集中到徐向前头上。等。

就在讨论“九条”的那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板着脸说：“徐帅老了，不能工作了！”她原以为徐向前既老又多病，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可能挂挂名，不会管多少事，没想到他和她们唱起了对台戏！可是，“八条”经过了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她只有内心不平。“八条命令”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在“八条”下达后不久，由于江青一伙捣乱破坏，军队混乱的局势，仍然不能阻止。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连续发生。在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努力下，2月8日，军委又发布了通知：明令外出串联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明令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各单位接待站，从2月21日起，一律停止接待。2月21日，军委又发出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强调军队肩负着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军（含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13个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接着，军委又发出一些指示和规定，但未能奏效。特别是对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战斗组织的指示，许多地方很有抵触。各大军区开会宣传军委“八条命令”时，“造反派”冲击会场，说这是镇压群众，“又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毛泽东主席和老帅们一样，都在维护“八条”，1967年3月27日晚，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八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第二节在逆流中勇进

尽管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也难免碰到暗礁，遇上逆流。“文化大革命”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徐向前和一些老革命家，迎着险恶的逆流，和林彪、江青一伙奋勇拼搏。

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一些老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在九日的会上，陈伯达诬陷被撤职的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是“叛徒”。刘志坚的情况徐向前是了解的。他是放牛娃出身，很小就当红军。红军长征路上，在川西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徐向前就认识他。抗日战争中又在冀南同事。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刘志坚受伤被俘。冀南部队负责人接到地下党的情报，立即组织部队，在敌军押送刘志坚的途中进行伏击，把刘志坚抢了出来。徐向前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语气肯定他说：“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跟我们打过仗的人，难道还不了解吗？他不是叛徒！”陈伯达不让徐向前说下去，蛮横地从中打断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定了，再不能改变了。”徐向前很气愤地质问：“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

徐向前和陈伯达公开争论，这是第二次了。在1月中旬的一天，总后的部分群众在三座门外静坐，全军文革派人做工作，没有做通。后来陈伯达接见这批人，他们才离开。为此，陈伯达指责徐向前。徐向前生气他说：“那些战斗组织的人，他们不怕冻，要呆在那里，那就让他们呆在那里好了”。陈伯达还说：“我也是保你的。”徐向前即回他说：“我用不着你保。”那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他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了。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他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是，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老义愤填膺，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又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接下去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他和周总理在延安挨过整。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谢富治插话辩解说，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审的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他们几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接着她亲自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里讲时，毛主席却只是笑。他们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主席的意思，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主席突然变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张春桥绷紧的脸才松弛下来。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林彪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听后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盛怒

他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

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则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所谓的“二月逆流”，倒并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位老革命家大义凛然的庄严举动，是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乱军分子的英勇反击，是捍卫真理、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行动。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的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徐向前和几位领导人，受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陈伯达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老革命家大兴问罪之师；说“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共产党的民主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的工作由肖华主持。4月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对几位老师说，由于“三支两军”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准备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段“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希望老师们和大家一起把会议开好。由于会议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操纵，几位老师连会议的进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

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

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涌上街头。

1967年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搜了又搜。徐帅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被劫去。幸得叶剑英得悉有人要抄徐帅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徐帅才没有被揪斗。

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继续发展。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一些“造反派”无中生有，说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是“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在首都所谓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挺的同时，大街上游行的人不断呼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许多正直的革命者，反对打倒徐向前。叶群公开出面，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于是，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展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徐向前的秘书，立即将上述情况报告总理值班室。总理指示：（一）所进人

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由于总理这三条指示，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才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找了回来。

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无情的折磨，使徐向前的身体越来越难以支持。他的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暗暗为老师的健康担心。徐向前身经数百战，什么苦头都吃过，草地来回走过 3 次，严重的路线斗争，他经历过，惊涛骇浪都不可能使他低头。他依然冷静、安详地面对着眼前的处境。他教育子女，并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担心，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我看天塌不了！”这时，唯一使他为难的是：要检查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检查任全军文革组长以来犯的所谓的“方向路线错误”。怎么检查，怎么认识，他实在说不清楚啊！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1967 年的“八一”建军节，是人民解放军建军 40 周年。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位元帅，这时心情是极度不平静的。他回顾军队 40 年走过的道路，越发感到责任重大，他坚信这支军队是无敌的，是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他希望出席纪念建军节的招待盛会，看一看许多老战友。可是会不会要他这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二月逆流”中的一员到会呢？他不知道。事情正像他预想的那样，为出席“八一”招待会周恩来总理正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斗争。依照惯例，军队的老师都应出席，林彪、江青一伙却持反对的态度，周总理只好去请示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7 月 31 日下午 5 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叶剑英还带来了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老战友的深情和周到安排，使徐向前深为感动。他刚刚理好发，周总理打来电话通知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周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了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并对沿线布置了警卫。徐向前乘车离开住处后，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的夫人黄杰：“徐帅走了没有？”黄杰听到总理亲切的声音，心情无比激动。大革命失败后，她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周恩来忘我的工作精神，高尚的品德和作风，深深记忆在她心中。她向总理报告说：“已经走了……”

她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总理说：“你和徐帅要保重啊！……”

这天，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门口迎接徐向前。在危难时刻，总理的关怀，使徐向前夫妇倍感温暖，经久不忘。

徐向前出席招待会虽然意味着毛主席是“保”他的，可是已经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成员，仍然继续受批判。谢富治对“造反派”说：“上面保上面的，你们搞你们的。”一切重要的文件停发徐向前，会议不能参加。“文革组长”这个头衔，早已名不符实了。9 月 12 日，徐向前经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正式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毛主席另选贤能。报告没有得到批复，徐向前继续挂着名。

全国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声势，从中央到地方闹得相当厉害。1968 年 3 月 24 日，林彪、江青一伙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杨、余、傅事件”。这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亲自出面讲话，公开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次大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全坐在主席台上，把所谓搞

“二月逆流”的人，都安排坐在台下，接受批判。林彪讲话中影射攻击“二月逆流”；康生讲话中说，“杨、余、傅”的后台是“二月逆流”；陈伯达说，“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个回合。他们在抓杨成武时，居然把和杨成武为邻的徐帅家所有电话线掐断，还撤换了哨兵。

在 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原定讨论召开中共“九大”、修改党章。会议开到第三、四天，林彪一伙突然扭转会议方向，改为批判几位老师。他们把“二月逆流”的老师分割开来，让到各个小组去受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徐向前被编在第 5 组。在这个“西北小组”的会上，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带头攻击徐向前。有人阴阳怪气，有人大声质问。这个说：“你徐向前不老实，要叫红卫兵来！”那个说：“你不说话，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还有人拿着“小红书”向徐向前念语录。会上充满了恫吓的气氛。然而，徐向前稳稳地静坐一旁。他最多回答一声：“有错误请大家批判，总要实事求是嘛！”

他更没想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诬陷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也是“叛徒”。徐向前深深感到，斗争更加严重了。

他不禁又回想起鄂豫皖斗争的年代，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为了搜集诬陷他的材料，竟以“改组派”的罪名，把他的爱人程训宣逮捕，严刑拷打逼供不成，最后杀害了她。35 年之后，竟又重演历史的悲剧，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师心情沉重。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 1928 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奋斗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 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老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向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他说：“我绝不是叛徒，让组织去审查好啰，要不，我们可以离婚，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徐向前从来不衰叹，不流泪。他听了黄杰的这句话，不由得落泪。他不光是为黄杰受诬陷，而是想到了许许多多被诬陷的好共产党员，什么“内奸”，什么“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他一生讲究实事求是，最讨厌说谎，从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胡言乱语。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又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布置批判几位老师，并发动老师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师划清界线。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 年 1 月 3 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林彪批示的最后一句话，使徐向前完全明白了：是要他老老实实靠边站，不允许再提相反的意见。不然就是“制造新的障碍”，就要问罪。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对一位老革命家来说，暂时禁止活动可以做到，但要他不思考，

要他屈服不是真理的“真理”。永远做不到。

第三节 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所谓的“二月逆流”黑干将，不断受到批判、声讨。

1969年2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让一些老同志到“六厂二校”去蹲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徐向前被指定去了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这是一幢二层楼的宿舍。徐向前和一些接受“再教育”的老人，分别住在楼上、楼下。铺盖是随身带的，睡的是单人床。冬天还没过去，夜晚寒气袭人，往往不能成眠。徐向前患着病，和工人们吃一样的饭食，还要到车间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工厂开批判大会要参加，车间的批判会也要参加。这时，在“二七”厂参加“接受再教育”的还有王恩茂、廖志高、江渭清、江华、朱德海等，住在徐向前的楼下。大家看到徐向前瘦弱的身体，上下楼步履艰难，都暗暗为老师的健康耽心。每天见了面，总要问候几句。徐向前笑笑说：“没什么，这样很好嘛，你们都要注意保重。”过普通工人的生活，大家看来，太委屈老人了。但是，徐向前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难熬。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日子里，徐向前仍把心思放在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军队安定上，虽然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一次次受到批判，但他始终认为，要稳定军队，要注意国家的经济建设，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他和工人、干部交谈时，总是鼓励大家要把生产搞好。一位老工人回忆起徐向前等人在那里“接受再教育”的情景时说：“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工人！”

在“蹲点”后期，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师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组长陈毅虽然受到批判，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每周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大家开一次讨论会。老师们每次坐到一起，谈笑风生，忘却了对他们的种种指责。他们看材料，交换思想，以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瞻远瞩的胸怀，分析研究世界局势。这种座谈会召开了许多次。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写出了《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针对苏军人侵珍宝岛事件，写出了《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报告，以精僻的见解，分析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美苏之间的矛盾，提出国防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会议的议程，本来是讨论“修改党章、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却借机批判“二月逆流”。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上海的代表，专门带了材料来批陈毅。朱德在会上几次检讨过不了关，最后还是毛主席说了话才算罢休。

徐向前和叶剑英分在军队的一个组，两人轮番受批判。会上，有人公然指着徐向前说：“你态度不老实，我们要做你的喷气式。”逼着徐向前承认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其他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徐向前只回答一句话：“总要实事求是嘛！”他的沉默和冷语是最好的回答。

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苦笑着说：“我得了五个鸡蛋。”林彪的政治报告和“九大”结束的公报，又公开批判“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

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九大”闭幕后，全国各地传达“九大”会议精神时，都批判“二月逆流”的“错误”，点名批判陈毅、徐向前等人是“老右”、“老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黑干将。然而，错误的批判和咒骂无损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声誉。在共产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正直的人们，都从心底热爱着这些老革命家。“九大”之后，徐向前又返回“二七”厂，继续“接受再教育”。

10月20日，中苏两党决定会谈，接着，两国总理在北京会晤。10月17日，林彪借口防止敌人搞突然袭击，要加强战备，快速疏散人日，遂发出反革命政变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借机将几位老师、副总理等，从北京“疏散”到外地。

所谓的一号号令——“紧急通知”，作为国家元帅和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的徐向前，事先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他于10月18日接到“疏散”通知，要他去河南开封，20日晚就离开了北京。到达郑州时，有关单位还没来得及安排住地，在一个招待所暂住一晚上。第二天才移到开封军分区一个师团干部休养所。徐向前到开封的第二天，《开封日报》上便披露出“二月逆流”黑干将到了开封的话。徐向前到开封，当地负责接待的单位是按照“不冷不热，偏重于冷”的规格对待的。在此期间，因为房子改装暖气，徐向前一度移居到一家银行的楼上。楼下，有一间阴暗的屋子，没人居住。徐向前后来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囚禁死在那里。

徐向前被“疏散”在开封一年半之久。当地冷淡他，北京也很少有人过问他，和许多被“疏散”的老革命家一样，他每日每时思虑的是：国家的前途，军队的命运，人民的生活。他期待着什么，又耽心着一切。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中科院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老人心里牵挂她们啊！

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徐向前上庐山参加会后，又回到开封。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师，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至庐山会议，在5年的大混乱中，徐向前经历了建国以来空前的一场灾难。他莫名其妙地被推进了全军文革小组，很快又陷入了受批判的大包围。先后3次被抄家，多次受围攻，又从“接受再教育”被迫“疏散”到河南。他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精神、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摧残。但是，他对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无限的希望。他光明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败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上。这一事件犹如在中国上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大感意外，无不惊喜林彪终于自食其果，人民拍手称快。

“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师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师。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老师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师。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会议由黄永胜传达中央第57号文件，通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黄永胜作贼心虚，浑身颤抖，念文件语

不成句，只好由别人代读。

自从批判“二月逆流”以来，老师们难得相聚。这天相逢，格外高兴。又闻林彪自我爆炸，更是内心喜悦。一向豪爽的陈毅老总提议，就地摆宴，举杯相庆。这时，陈老总已身患重病，老师们关心他的健康，纷纷劝说作罢。

会议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师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主席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师。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1972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群众都觉得徐向前等几位老师会进政治局，有的还买了鞭炮，准备庆祝。结果大出意料，徐向前等几位老师们又一次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周恩来总理带病支撑着困难的局面。他为老师们能出来工作花费了许多心思。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徐向前参加了频繁的国务活动。

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是徐向前复出后第一项工作。西哈努克亲王在1971年出国访问，国内发生了政变。在困境中，他来到中国，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接待工作，并请德高望重的领导人陪同他。从1972年到1974年，徐向前承担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的任务。先是于1972年5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东北，到了丹东、沈阳、抚顺、大连、鞍山、长春、吉林、哈尔滨、大庆等地，历时近一个月。又于7月，访问了山东济南和青岛，所到之处，受到数十万群众的盛大欢迎。1973年11月2日，徐向前和夫人黄杰专程到广州，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1974年10月8日徐向前又和黄杰一起参加了周总理为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2岁生日举行的宴会。西哈努克亲王在为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斗争中，把中国政府和人民作为忠实的朋友，和徐向前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1973年5月，徐向前受周总理委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使，出访斯里兰卡，出席中国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落成典礼。把国际会议大厦的金钥匙，移交给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国际会议大厦成为中斯友谊的象征，屹立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1973年7月10日，阿尔巴尼亚建军30周年。这时，中阿两党已出现分歧，但尚未公开。周总理从多做团结工作，维护中阿友谊的愿望出发，拟派一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地拉那参加庆祝活动。周总理提议徐向前为代表团团长。叶剑英也十分重视徐向前这次出访，并向徐帅开玩笑说：“我给你派一架最好的飞机。”徐向前肩负重任，飞赴阿尔巴尼亚，受到了热情欢迎。徐向前的阿尔巴尼亚之行，既坚持了原则，又注意了团结，圆满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从1972年到1975年，徐向前还先后参加接待了赞比亚副总统齐纳、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尼日利亚总统戈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加蓬总统邦戈。

徐向前一方面为国事忙碌，另一方面又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他和夫人黄杰对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有时也和亲密的战友谈谈自己的忧虑。特别是在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之后，徐向前的这种忧虑日深，常常夜不能寐。“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1976 年 10 月 6 日，中共中央顺应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同伙，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历时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81 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75 岁高龄的徐向前，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望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欢腾的群众队伍，仿佛觉得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看到了劫难后的新中国的光明前景。

（摘自《徐向前传》）

吴法宪回忆录（摘录）

二〇一一年七月，王广宇《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

怀仁堂 1967 年 2 月 16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不久，王力整理了一份怀仁堂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经过周恩来等人修改后，王力叫我将这个记录印发下去，大概只印十五份。这件事是王力交办的“绝密工作”，从抄写到排印、发送，始终是我一个人办的，办事组其他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7 年 2 月 16 日之后的一个晚上，王力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关锋（通常情况下，不管王力还是关锋向我布置工作都是他们俩同时在场）。王力说，叫你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很急，要严格保密，一切都由你亲自去办。说着，王力出示了一份有两、三页纸的记录稿和张春桥、姚文元给王力的信。

王力交代说，这是一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稿，是我同春桥、姚文元回忆追记的，经伯达、总理修改后，现在准备印发有关同志。王力把纪录稿和张春桥给他的信一起给我看（此时张春桥、姚文元已回上海）。张春桥给王力的信中只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补充修改。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送伯达、总理过目后再发。

我翻看了一下王力执笔的这份 2 月 16 日怀仁堂会议的发言记录。记录稿主要是按发言次序记录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和谢富治等的发言。记录还有另外参加人，他们是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原记录稿只在开头说“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字样，但正文中没见有周恩来的发言。我看的这份记录稿是经周恩来、陈伯达看过修改后的稿子，但不记得有陈伯达修改的字迹，只是周恩来亲笔在记录稿上作了几处补充。周恩来的补

充字数不多，都是加在发言中间的插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处是：当谭震林气呼呼地说：“我不干了，叫你们干吧！”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恩来拍了桌子严厉地说：“回来！坐下开会。”这段话王力的原稿未记，周恩来作了补充，还补充了几处字数不多的插话，内容记不清楚了，记录稿后边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追记。

王力向我交代，要我把他亲笔记录的，经总理补充过的原稿重抄一遍，把原稿给他保存，用我抄的稿子去打印。他再次强调排字、校对、打印、发送全过程都由我亲自办。他叫我到记者站印刷厂找一个党员排字，排字、校对完，印十五份后，马上拆版。要排字工人严格保密，印好后按他给开的名单，由我登记发送。

晚上十点以后，我去到记者站印刷厂，这是个临时新建的小印刷厂，是从中办、中联部和《红旗》杂志印刷厂抽调来的熟练排字工人，专为印刷《快报》、《文化革命简报》以及办事组办的几个小刊物而设立的。我找到一位从中联部调来的五十多岁的党员老工人，向他交代这份绝密文件，要他亲自排。在排字车间，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这位老工人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排完，经我校对后，印制十五份，当场拆了版。

我将排印好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十五份带回后，向王力汇报。当晚，王力给了我一份他亲自开列的发送名单，大约十来位，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部分参加会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还有没参加那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戚本禹等。第二天他又补充了几个人的名单。

我记得发完后，还剩下一、两份。王力说，剩下的文件和记录稿（我抄的那份）一律销毁。我当时想，以后万一他再要这个文件就麻烦了，想暂时留下一份，就没销毁。我把排印原稿和剩余的几份文件以及发放名单一起装在一个保密袋中，放在我办公桌带锁的抽屉里。直到我 8 月 31 日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这套材料都完好地保存在那里。如果后来江青一伙没有销毁它，如果最后中央文革办事组移交人作为重要档案交给了中央办公厅，那么，这套证据应是完整的。

2 月 16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和相关内容，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无一人知道，我是唯一的见证人。因为从王力布置这件事的前后看，他是把这份记录稿当成绝密文件处理的，按他的布置，这份记录稿不会轻易扩散到社会，更不可能到红卫兵手里。我作为中央文革办事员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方面的内容。只是在我被关押在监狱时，中央专案组要求我凡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交办的大小事情都要交代，因为他们做的每件事是阴谋活动。中央专案组逼供后，叫我把这些事都上纲成“三指向”（注：即清查“五一六”时给所谓“五一六分子”定的罪名：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我照他们的要求做了，这件事的过程我在监狱交代过。

对这份 2 月 16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稿，我的印象是，在会上谭震林、陈毅等同志因对中央文革在运动中打倒一切的做法表示出强烈的不满，言词中确有过激之处，比如谭震林要退出会场，陈毅对谭震林说：“别走！跟他们（指中央文革）斗。”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也说了些不满的话，譬如，李先念发言说：“把十几岁的娃娃打成反革命太过分了。”又如谢富治为中央文革辩护，陈毅说，“你谢富治不要和稀泥。”但主要还是对中央文革工作上的意见。作为党内的高层会议，同志间当面提提意见，发发牢骚，这是党章所允许的。即使意见不对，也可以反批评嘛。不知后来是谁把这个会议内容抖搂出来上纲成了“二月逆流”。

我不可能完全回忆起那份会议记录的所有发言，但从一些文化大革命“纪实文学”作品中所披露的发言主要内容看，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不准确和张冠李戴的情况也有。我认为把这些流传的东西作为历史的依据是不可靠的，最可靠的是查历史档案的原件。

□ 原载《记忆》第七期

2007 年 8 月 27 日初稿

2011 年 8 月 20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2）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二节 批判两种反动思潮——“联动”的“血统论”和遇罗克的“出身论”

本节资料

一、“联动”分子从反动血统论走向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联合行动委员会”政治上走向反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正式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实于党，忠实于毛主席，为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的革命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

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 003；1967.01.01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付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 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 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3. 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 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 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 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干部子弟组成；(2)

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 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指示。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它的成员，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予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命令，“我们一定要英勇、忠诚、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项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党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公元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原载《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一九六七年七月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

正当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这些天真的青年，应该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我们党，当时就是这样做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分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口号，实质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康生致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伯达，江青及文革小组诸同志阅：

这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三个学生来信，他们用“质疑”的手法，来保李洪山、乔兼武、杨勋、杨炳章等反革命分子的。

康生六七年一月一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康生对崔子明等人两封信的批语

当崔子明等人写到十二月十二日给康生公开信错误之一是“在于当时我们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时，康生批语：不对，是反动阶级立场问题。

崔子明等人认为：“李洪山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跳出来反对中央文革乃蚍蜉撼大树没有什麼了不起的，他们翻不了天。”康生批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小走狗，是“没有什麼了不起的，他们翻不了天”，但是你们给我的信完全不是这种观点，而是同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乔兼武、杨秉章反革命言论相呼应，

为这些反革命分子叫屈。

当崔子明等人谈到错误之二在于：“对于全国陆续发生斗群众，群众斗学生的问题，我们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和主流”时，康生批语：不对，李洪山等人不是群众，是反革命分子，斗争李洪山、乔兼武等人，不是群众斗群众，是革命群众向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北大同学批判你们这封反动的信，是正确的，作得对，作得好。

当崔子明等人谈到：“当然桥和船的问题在有些时候也会成为主要矛盾。尤其在目前运动正向纵深发展时，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小视。我们不仅要敢于革命，而且要善于革命”时，康生批语：你们不仅是反对革命，而且是破坏革命。

当崔子明讲到，他们“由于刚刚串联回来没有什麼事可做，（当然我们主观能动性也发挥得不够）”时，康生批语：你们反革命的能动性发挥得很够。在李洪山等反革命分子被镇压后，你们还要垂死挣扎，还写这样的反动信来进行反扑。

崔子明等人说，他们在信中“发了些牢骚，这是极不严肃的。”康生批语：可耻的狡辩。

崔子明等人认为公开信在“客观上使亲者痛，仇者快，影响很不好。”康生批语：这正如来信所讲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跳出来反对中央文革，乃蚍蜉撼大树，没有什麼了不起。”

崔子明等人对同学们的批判感到“我们目前所受压抑很大，几乎抬不起头来。”康生批语：好得很，这对你们是很好的教育，不是“几乎”，而是要将一切反动言论使它永远抬不起头来。

崔子明等人说：“我系文革的一位副主任则说：现在我认（为）你们是人民内部矛盾，继续下去就是敌……（康生在省略号之处加了“我矛盾”三个字）。谈到这儿，他把敌字咽了下去，改口道，继续下去就是对抗性矛盾……。”康生批语：讲得对，不应该咽下去！应该如实的讲。

崔子明等人说：“有一些人叫我们‘反革命’、‘跳梁小丑’，或许大多数同学在开玩笑。”康生批语：他们不是开玩笑，而是严肃的阶级斗争。

崔子明等人要求同学们对他们的态度“能否缓和一下？”康生批语：对错误为什麼要缓和呢？

当写到一位哲学系五年级的同学批判他们时，“我们还是陪着笑脸听了他的意见，心情您老是可以想见的。”康生批语：我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同你们所说的是相反的。

崔子明等人说：“我们的信件（经同学建议成了公开信）的观点和认识有错误，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我们感到很痛心。”康生批语：欢迎自我批评，但是要诚恳的，坦白的，革命的，不是玩两面手段的。你们的信原来就是准备公开张贴的。给我的信写明是十二月十二日，公开贴出也是十二日。

崔子明等人问：“我们的信件究竟是不是反革命信件？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康生批语：是大毒草。

崔子明等人在信中写道：“我们有了想不通的问题可不可以反映给你们？对中央文革的同志们有意见可否提出？（当然意见不一定正确），认识上有错误就一定是立场问题吗？”康生批语：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出，也完全可以批评。我们对于任何批评，不管是对的或是不对的，都愿倾听。但是你们的来信，一不是反映情况，二不是提出意见进行同志式的批评，而是伪装成提意见进行商讨的样子来，1、反对对彭、罗、陆、杨进行斗争。2、歪曲两条路线的斗争。3、抗议对李洪山等反革命分子的镇压。4、反对文革小组和陈伯达、江青。5、打击革命左派，包庇反革命分子。6、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7、反对无产阶级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革命的广大群众实行大民主，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绝对不允许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

崔子明等人写道：“我们提出的问题看来还有一定的代表性，您的指示对于我们和持有我们同样疑问的人都有好处。”康生批语：大概能代表李洪山、易振亚、万会秦、赖锐锐、伊林、乔兼武、杨炳章及《虎山行》等一小撮人。

崔子明等人对康生说：“上次给您的公开信就是很不认真地写出来的。”康生批语：不，很认真地写的。不要用谎言去掩盖错误。

最後崔子明等人要求康生：“我们急切地等待着您的答复。”康生批语：对此信的批语，就是对你们两次来信扼要的回答。

（二）拿刀子捅人打人的都要把他们抓起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 康生 江青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座谈纪要

江青：你出去了没有？

同学：出去了。（讲了串联情况）我们几个头头每天忙得要死，说不定哪天要下来，大家说我们是小当权派，以后还要斗我们哩！

（首长笑了）

康生：领导忙，下面没事干怎么办？

同学：整风……其实说整风也没整，以后说准备参加兵团，兵团没要，他们自己组织，这组织那组织。

江青：要哪个组织？要保他们自己。

同学：希望中央要注意中学情况，中学的问题要抓。

江青：对，我们的责任很大。

同学：铁杆红卫兵在中学还是不承认（错误），大学搞了，中学反动路线更深，各个学校组织不多，红五类组织起来……

江青：什么叫红五类？……（分析干部问题），有些人的父母可能就是黑的。彭小蒙我早就发现她浮躁，她很好，但要批评她。

同学：他们根本不是辩论，就是压，只要意见不同，反对反动对联，动手就打。

江青：这些人只要是拿刀子捅人，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镇压。

同学：我们认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

康生：对嘛！你们这个观点很好。

姚文元：（对李峰）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以这为题写一篇吗？

李峰：（表示遗憾）

江青：不要怕，不管他是谁的孩子，什么主席、副主席，将军、部长就甭提了，只要是反革命，就不客气，你们讲嘛，随便讲。

同学：红卫兵也应该有自我革命精神，以前只革别人的命，文化革命也要触及自己的灵魂，要造自己灵魂的反。

江青：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更何况老子也不一定革命。

同学：（谈到“西纠”镇压革命的活动问题）他们也是红卫兵，对他们不好

办。

江青：他们不叫红卫兵，叫纠察队！

同学：他们要解散我们。

江青：我们还要解散他们哩！

同学：他们的黑电话随便打，还准备砸我们哩！

江青：打人的都要把他们抓起来。

同学：一辩论他们就要看观点，观点不同就是“混蛋”，就打。

江青：这是流寇！

同学：他们只允许同意自己意见，不同意就打、骂。

江青：法西斯罗！希特勒！

同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影响极坏。

江青：完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还是四旧呢！提出对联的人，父亲职位高一点，是个大官，应该搞掉。那天（八月六日）很对立罗！（那对联）我一开始就反对。

同学：我们要看你的讲话，他们就保密，我们贴了三次，他们撕了三次。

江青：什么？撕的什么？就不对嘛，有的人有有利条件，有幕后操纵者。

（这时李峰给康生同志写了一个条子，问谢清泉是不是谢镗忠的儿子？说他干的两件事。康老递给江青，江青对谢镗忠说：“回去让你的儿子去派出所自首。”）

康生：那就是老子革命儿混蛋嘛！

同学：最近确实有一种反扑形势，他们砸其他地方都是坐汽车去的，我们的纠察队也得准备，比较紧张。

江青：你们不要把形势估计得那么高，他们只是一小撮，有幕后人，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要怕，其实他们那么几个人，从东城跑到西城，从西城跑到东城，就那么几辆车。

同学：现在红卫兵打人都合法了。

江青：不合法，你们帮我们辟谣。说我的什么秘书是张久舜，有人还说李润贵是林彪同志的秘书，我也要造他的反。

同学：（讲述红卫兵抢东西等恶劣作风。）

江青：这是流寇作风。

同学：他们为什么这么硬，敢于炮打中央文革？

江青：主要是背后有人。

陈伯达：不要叫纠察队，（指李峰说）你们的学校，他们真正的秘密的地方，我还没找到。（指六中杀人的红卫兵及西纠队员。）

同学：我们又发现了一些，其实在校外。

江青：他们在学校呆不住嘛！

同学：我们认为市联络站没有立场，把严肃的阶级斗争看成哄小孩，对谁都一样。（不分多数派，少数派。）

康生：这个意见对。

江青：我看这个联络站应该解散，就怕打仗，实际支持打。廖承志就是这样，把阶级斗争看成哄小孩，罗青长的孩子现在也打人，现在一个秘书长就了不起了。（面对同学）你们明白，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对他们酌情处理。

同学：西城分局的拘留所，西纠的人可以随便出入。……

江青：我昨天解决了，他们帮了资产阶级专政。

同学：我认为应该给无缘无故死去的同学平反，平反应该包括这些人，死得要价值，要死得其所。（首长们连连点头。）

同学：王光华昏死几次，一醒就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坚持党的政策，最后五分钟，给做人工呼吸后，还在喊。

江青：他是你们应该学习的英雄。

戚本禹：他喊“毛主席万岁”了没有？

同学：我记不清了，反正“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记得清清楚楚。

戚本禹：他贴第一张反党委的大字报，可以算左派学生。

江青：对！左派，左派！

同学：他出身算什么？（讲了他出身情况。）

戚本禹：不算资本家，小业主。

江青：不管什么，看他表现嘛！（对同学）救活了吗？

同学：说实在的，打人的还有董必武的儿子。

江青：董福三在哪儿？

同学：在广州，听说要办个农场。

江青：（对姚）要广州军区注意，把他们（董及同伙）叫回来。

姚文元：那是陶铸抓的。

江青：那……管他陶铸呢！

同学：联合行动委员会耍弄中央文革。

陈伯达：六中的红卫兵还要同我们辩论呢？

江青：不要理他们，该抓的抓起来，该平反的平反。

康生：你就说，我不同杀人凶手辩论！（气愤）

江青：你们就是要辩论，象谭力夫臭哄哄，你们不要理他，不要同他们辩论，提高他们的身价干什么？你们要正正派派地搞政治，不要学他们搞特务，你们要揭发他们，要有胆量斗争，保证你们的安全，专政。我们帮助你们。我们接见你们晚了，应作自我批评。

同学：我们特别想见首长。

陈伯达：我们都是老百姓。

江青：不要看职位高低，只不过革命工作分工不同。

同学：六中教员几十人到国务院要见负责同志，周不让……

江青：碰到鬼了，你们可以质问周荣鑫：“你究竟支持不支持我们？”你们贴他的大字报，在国务院许明（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孔原之妻）贴我的大字报，你们可以贴她的。（对康老）康老，她还是你的学生呢？

康生：是啊！你们都是我的学生，“一分为二”嘛！

江青：许明是我的同学，在外办，她们对你们什么态度？她可能有里通外国的问题呢！你们可以揭发她，没有群众压力，她才不交代呢！

同学：（编辑部的同学向首长讲印报困难，把三份战报给陈伯达同志，其中谈到《光明日报》印了一次）。

江青：穆欣同志可以帮助，解放军应该帮助。（穆欣站起来答应）

康生：你们《光明日报》印了一下，值得表扬。

同学：我们第三期、第四期出版，隔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地方印呢！

江青：穆欣同志有责任，（穆欣解释。）穆欣你虚心点，作自我批评吧！

同学：（又谈到谭力夫的事）

江青：哎呀！谭力夫那套该上厕所的东西。

同学：（谈一二·九以前的大反扑形势，又说了打人和暗害事件。）大庆工人代表恨他们，说他们再这样干就……

同学：什么是阶级路线？

康生：什么是阶级路线，毛主席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就是阶级路线，哪一条也不能少，他们就是不要第四条嘛，专横跋扈，不讲道理嘛！

同学：他们干了这么多坏事，公安局也不处理，我认为公安局有问题。

江青：要把幕后人揪出来就好了，昨天我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公安局是有问题，它起了帮助资产阶级的作用。最近我还听说有一封控告新的公安局的信，……背景是多方面的，多数是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康生关切地把手帕递给李峰擦眼。）

江青：这些孩子都睡眠不足。

同学：我们每天十二点，两点睡觉，有时不睡，外面砸得很厉害，还搞暗害。

江青：他们给你们制造压力了。

同学：最近，成立那个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我校的王昌明说中央文革犯了错误，毛主席不在北京，就象上次派工作组一样。

江青：谣言。王昌明是谁的孩子？

同学：全总王稼祥的孩子。

江青：是个造谣专家吗？

同学：（又提到对联）。

江青：这个对联我看是有人故意提出来的。

同学：有人说中央首长肯定了。

江青：哪个中央？

同学：他们说是您。

江青：那次（八·六）他们就很反对我嘛！

同学：我认为个对联是由来已久的。一年前，干部子弟传出一句话，说是主席说的，大意是现在有些干部子弟表现不好，而一些剥削阶级子弟表现积极，但政权不交给他们。好多干部子弟把它写在本子上。一年前，从石油附中传来一个

材料，平时干部子弟就要联合起来。后来康生在北大表示不同意，说党的阶级政策，在学校不是这样，阶级队伍就是共产党、共青团。我认为阶级路线就是十六条中第五条，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阶级政策是为它服务的。刚才同志提到红卫兵内部有修正主义作风，我认为就是有修正主义红卫兵。

江青：对一组织恐怕要慎重。

同学：他们说他们在学校受压。

江青：干部子弟受什么压。

同学：真正受压的是工农子弟。

江青：对，是工农子弟。以后不要叫首长，这是四旧，可叫负责同志。（同学反映方立功式的人物的情况。）

江青：比较起来是少数，但这些少数要注意。

陈伯达：方立功是盗窃犯。

江青：方立功怎么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就要实行专政，（向阎长贵问方立功父母的情况）抓方立功幕后人，他是董必武加流寇的作法。

同学：谭力夫回来了吗？

康生：回来了。谭力夫、方立功都是些小人物。

江青：谭力夫决不要提，算小人物嘛！谭、方都是小人物。你们要批判王任重，他拖着我们犯错误，王任重给你们搞了，王这个人糟得要死，背着毛主席、背着中央、背着我们小组另搞一套，他得停职反省了。

同学：（谈到几个纵队）。

江青：八一纵队负责人是谁？

同学：赖锐锐。

江青：可以抓了。

同学：学校的同学至今不敢组织起来，压得厉害。

江青：压力，无形的压力。

同学：对，无形的压力。关于军训我不同意，我希望中学要大干一场，乱，好多问题还没办嘛？路线斗争要搞（延长两天）。

江青：刚反一个军训，集训，又来一个军训。

同学：看来最近还要暗害呢！如六中九月末还打死一个同学，我比较了解。

(叙述惨害经过。)

江青：救活了吗？

同学：活了。

康生：被杀就因为他“变节”？

戚本禹：怀疑他揭发了西纠。

江青：都是革干子弟，他们无法无天了。

同学：没办法。

江青：不怕，不怕，我们帮助你们。西纠大头目叫孔丹，他父母都有问题。

同学：六中的教员要求中央接见，因周荣鑫不让。

江青：这可能。

同学：(谈到纠察队)

江青：不要叫纠察队，这个名字好象凌驾一切，我们不要这样一批人，你们可以叫另外的，多做宣传工作。

同学：他们不光是唯成份论，也是唯观点论，观点不同也打也骂。

康生：唯观点论，我们倒是要唯观点论。唯毛泽东思想观点论。

同学：红卫兵是否是阶级队伍，他们总说红卫兵是阶级队伍。

江青：不是，它那能高于党，他是青年学生的一种革命组织，你不能说修正主义分子，作为一个组织不是这样。有分子是修正主义分子，说修正主义红卫兵不好，这个组织在国际影响很大。(同学谈到阶级路线。)

江青：阶级社会要讲成份，这是本质，但要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有背叛其本阶级的人，这就是不要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

同学：其他劳动人民子弟，可不可以组织红卫兵？

江青：可以。怎么不可以？！只要是干革命就好嘛！

同学：我们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随时都准备着死！

江青：干么要死，要活嘛，干革命！

同学：我们希望解放军帮助我们搞军训。

另一同学：我不同意，中学运动必须大乱，刚刚搞起来，又要搞军训，等于阻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同学：军训有战备意义。

另一同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

江青：现在一切服从文化大革命，这最重要，我的意见不派，派不是好办法。

同学：总理讲过。

江青：什么时候？

同学：十一月九日。

江青：那天他还生气，西纠打了解放军记者，可能就讲了，我们不是这样。

同学：十五期社论讲到一个特点，就是工人起来闹革命，学生和工人，我们要不要到工厂去？

江青：暂时不去工厂，可以先到住宅区嘛！要一步一步嘛！

北医长征红卫兵总部、红教工总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王力戚本禹接见清华附中革命学生的讲话

〔王力、戚本禹同志在清华附中接见了部分革命师生（包括革委会，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革命组织），进行了热烈的座谈，并展开了热烈的辩论，现将王力、戚本禹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整理如下。〕

（有的同学谈到被公安部扣留的一些人的检查有逼供信的现象。）

戚：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应当爱护，不应当说是逼供信。我们的公安机关是没有逼供信的。

王：什么叫逼、供、信，就是他根本没有这种事的，被逼的写出来的，叫做逼、供、信。

戚：这件事就谈到这里，说逼供信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有压力了。

王：现在看来，大家对这一段时期什么叫无产阶级大民主，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看来大家认识不够。回去还应好好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

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专政问题。问题是说公安部不是左倾而是右倾了。

王：前一段公安机关软弱无力，不分别站在毛主席还是刘少奇一边，不分别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基本弱点，这是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的重要问题。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因为我们有一段的革命的友

谊（对革委会），你们是第一批红卫兵，是受压制的造反者，希望你们不要玷污了红卫兵的荣誉。（这时大家谈起了 8 月 24 日事件）前一段事情不能全赖他们。

（大家说：对，我们不追究责任）

同学：毛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有没有。

王、戚：没有。

（这时两方面就革委会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王力和戚小声交谈说：我们都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就是个大学校，这些青年人受到很大锻炼。）

最后王力说：这样很好，这样清华附中就有希望了。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用毛泽东思想做武器，抓住两条路线这个纲，从运动开始到现在的都可以摆。当前这一段是最重要最艰巨的时候，当前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我们怎样站到毛主席这一边。

戚：过去错了就交代，就检讨。这个责任不能让个人来负担，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希望你们保持这个荣誉。你们要继承你们的老传统。

（有一部分同学在辩论时总说：老红卫兵……）

王、戚：不要把老红卫兵新红卫兵区分开，才几个月怎么就老了？

戚：不要叫老红卫兵，一老就不好了。过去有错误就交代就改正，最后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两条道路的斗争由你们自己辩论，自己辩明（有同学反映没事办，没意思）。

戚：照现在的精神状态是不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大有搞头，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现在某些人的水平落后于三百年前《水浒传》里的英雄的水平（举李逵负荆请罪的例子）李逵不是共产党员，不是革命者，连当红卫兵资格都没有，难道你们红卫兵连他们都不如吗？

王：有错改错，希望你们早日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戚：立足清华附中，关心国家大事。路线斗争，搞头大得很，抓住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指革委会）你们是错误的，应该承认、认识。不要躺在成绩上。任何人躺在成绩都不成的。你说刘少奇没有成绩吗？有这么一点吧。但是搞成修正主义了，我们就要一笔抹杀。成绩是群众、老百姓、毛泽东思想做的。你们躺在成绩上，成绩就没有了。我们就承认你们的成绩了，你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成绩

应当归功于党、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群众。

（接着提到王任重的“指示”问题）

王：“转入斗批改”，普遍的就是用这个口号来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最大的斗批改，清华附中在反对刘邓路线应当起先锋作用，辩论是为了作战。统一思想，向刘邓反动路线开火。为辩论而辩论的不行的，国家都变颜色了，还辩论什么？辩论就是为统一思想，统一部队的思想，向修正主义作战，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你们现在的状况是不行的，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光荣伟大的。一部分人下厂下乡。大多数还是要斗、批、改。

（有的同学说我们在学校没事干）

戚：怎么没事干呢？我们整天都干不过来，刘少奇那几部大毒草影片你们都批了吗？人的阶级性你们批了吗？我们看你们学校没有几张大字报。（有同学说：学校没有人）

戚：这不都是人吗？

王：还是要热闹起来，热闹起来人就回来了。

戚：只要认错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就是阶级兄弟。团结一起作战。你们既要能当司令、统帅，又要能当小兵。只能当官不能当兵还不能接班的，接毛主席的班。你们要有这种气魄。不要有私心杂念，要提倡“公”字，破私字。林彪同志就是提倡破私立公，有私心的改了也可以当左派。清华附中几百人组织起来，统一起来，还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很有威望，是生力军。刘邓路线就是怕批判，你们就要抓住批判，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王：要作战必须分清敌我，只有分清敌我才能作战。

戚：毛主席解放了你们（指革委会）你们还为刘少奇撕大字报，特别是你们嘛，你们是有成绩的，但是不要站在功绩之上。

一同学：什么人算革命群众？

戚：你就是革命群众。

问：不是反革命的一般群众，但表现不太好，给不给平反。

戚：不是反革命就应该给平反，都是群众嘛。

（说完王力、戚本禹离开）

一九六七年三月某日，江青谢富治与北京中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谢：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大联合，听听中学生大联合的意见。

一〇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现在中学形势是这样，四期社论出来，保皇势力抬头，用四期社论来抵制我们的揭发，他们要翻案，一种逆流起来。

同学：他们说中央说话了，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谢：根本没那回事，胡说八道！社论讲的是革命小将，没讲是反革命小将。

同学：四中前几天有人挨打，要翻案。

谢：（念四期社论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的一段话）这个革命小将是指所有的年轻的革命造反派。现在实行三结合的政策，这是毛主席的政策。怀疑一切，排斥一切，否认一切是一种错误思潮。这从来不是毛主席的思想，不是中央文革的思想。这里讲革命小将犯了些错误，不是讲的“联动”犯的那个错误，和那个相差九万八千里。这里讲的错误是指的小的毛病。比如戴高帽子呀！这根本连不上呀！不是那个意思（指一小撮顽固分子利令智昏的判断：他们要翻身了），完全错了！我们都可以犯错误嘛，你们怎么不能犯错误？但是不是指的“联动”，根本不是那回事。你们可以写一篇文章，不是那回事嘛！

江青同志很关心中学。她说，你们去大学，就是听中学的少，开座谈会是她说的。

江青：同学们，战友们，我代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看看你们！我们衷心祝贺你们革命大联合！希望你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实行大联合。我说过好几次了。这是建议和希望，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就批评。希望你们的是革命的联合，不是无原则的联合，去争取夺权的胜利。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到。

对于“联动”这个反动组织要分化瓦解，孤立一小撮，对大多数进行工作。你们要提高警惕。他们组织严密，是有后台的。他们是对你们的，也是对我们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和同志们站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讲原则，不讲策略，不按十六条办事；就会犯错误。同学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和你们同生死，共患难的。祝贺大联合进行。胜利是属于你们的，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够关心，相信大

家会谅解的。我们忙，不能从头到尾参加你们的会。希望你们谅解。

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一方面要有精神准备，有反扑；一方面不排斥犯过错误想革命的人。要做这个工作，不然就会孤立自己，对不对？（众：对！）

谢：江青同志最关心我们，今天带病还来讲话。所以说最关心我们中学生造反派，你们还说不关心呀！（众：关心！）

我们这个会开得很好，提了大联合、“联动”的材料。江青同志带病参加会，作了重要指示，非常重要。

把“联动”挖掉。提高警惕。他们是一小撮。他们为什么顽抗？有新的情况它就反扑，就是因为它有它的后台老板。它代表了一个反动思潮。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代表。造反派必须坚决和它斗争。必须跟他们大干。要警惕他们，把他们击败。但要记住江青同志的指示，对少数头头儿专政，作艰苦斗争，从政治、组织、思想把他们彻底批透批倒。在斗争中要执行毛主席政策，分化、瓦解、争取，批判这个思潮，对多数采取瓦解争取政策。对四期社论他们歪曲，他们反对革命组织，尤其是反中央文革，要进行坚决斗争。谁反对中央文革就坚决同谁斗争。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反毛主席！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江青同志讲我们革命造反派和中央文革要共同战斗，共同胜利，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要关心大联合，在共同思想基础上，共同任务上大联合。这个共同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反对小团体主义等等。大联合要有酝酿过程，但只要每个革命组织、革命派都有愿望，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又去掉“私”字，就可以。即使是这样，也要有过程。大学开了红代会，相当重要，也是经过酝酿斗争的。工人正在实行大联合。中学比较多，比较分散，还要做很多工作。经过很多努力慢慢才能达到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现在都造反派，有真有假。这是新问题。值得注意、警惕。大联合非常重要，可以逐步，不要一下子。由下而上还是由上而下自己去讨论。

中学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不够。我赞成这个意见。甚至有的没批判，它还有市场。

反动谣言也出来不少。都是那些“联动”。为什么它那么猖狂呢？就是批判

不够，斗争不够。你们是造反派，有这个志气吗？（众：有！）非把他们这种思想打败不可。我们支持你们，中央文革支持你们。刚才江青同志病了还来看你们，支持你们的大联合，支持你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

（根据记录整理，仅供参考）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央文革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讲话
〔中央文革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王力、关锋同志于3月8日凌晨来到八一学校参观了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总部举办的联动罪行展览，上述同志与造反派谈话整理如下：

我们首先向康生同志汇报了三月五日一小撮家长破坏我总部举办的家长座谈会情况，首长非常气愤。〕

康生同志说：“你们根据军委八条写一篇文章。”

谢富治同志说：“登人民日报。”

我们说：“我们要求家长按照军委命令八条认真教育子女，有人说这是我们压家长。”康生同志连连点头。

在展览室内，我们汇报，我校不能开学的原因以及有人说我们不开学是对抗中央的情况。康生同志说：“个别情况应严格区别。”

在参观场路上，又问到开学问题。

康生同志说：“这个学校要彻底解散，重新招生。”“这儿那能没有军队？这儿是老窝？”

谢富治同志说：“要解决一下问题，这个学校要住军队。”

康生同志说：“下通知，让他们都来吗！”

康生同志又气愤地说：“都来，都来，用兵围起来，把大门关起来，一个一个地整，一个一个地检讨，一个一个地审查，整完统统滚蛋！”

康生同志在参观路上看到一个大门上写着过去的当权派的题词：“培养新的一代”。康生同志不满地说：“培养那个阶级的新一代呀！”

在参观完被联动破坏的不象样子的标本教室后康生同志气愤地说：“土匪、匪，完全是土匪！”康生同志气愤地问：“谁是校长？！”

我们汇报了情况并说：“学生说校长是二百五干部（即傻瓜）？”康生、陈

伯达、谢富治同志哈哈大笑。

我们向中央文革反映我们的展览，家长等都不看，

康生说：“要看！”

去参观“大观园”时，康生说：“这里比颐和园还好嘛！”

我们向康生同志建议：“红代会举办联动展览会址应该设在八一学校。”康生同志说：“这里挺好嘛，一看就知道联动，修正主义是怎么分裂出来的！”

这时关锋同志说：“高干子女再也不能集中在一起了”。“干部子弟学校不能办了。”康生、伯达同志连连点头。

参观路上，总部同志向首长汇报说：“我们要解散这样的学校，让学生到工农子女中去，参加一段劳动。”康生、伯达同志连连点头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走到水塔附近，伯达同志讲：“这个地方当个疗养院还不错。”我们反映说：“参观展览的工农兵群众也说这里可以做疗养院。”

我们汇报了联动分子现在还在活动，还在展览会门前点火，伯达同志讲：“还这样啊？！”谢富治同志问：“查出来没有？”他还说：“这里就是培养联动的社会基础。”

最后康生同志说：“明天让干部（指红旗杂志社干部）统统都来，把会调开，座谈会不开了，明天参观时可以谈更详细一些。”

康生、伯达、谢富治等首长离校时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谈话

【另一版本说是 1967.03.18】

总理详细认真地参观了联动罪行展览十分气愤，参观展览完后造反派向总理汇报了学校情况。我们首先十分气愤地向总理汇报了我们三月五日为砸烂高干子弟集中住宿制而召开的家长座谈会的情况。

当我们谈到有的家长说：“不给我的孩子安排好吃住，我一年不转学，两年不转学……”的时候，总理连连摇头说：“这就是当官做老爷嘛！”

当谈到一些别有用心家长挑动其它家长反对造反派时，总理问：“是穿军衣还是穿便衣的？叫什么名字？”（我们汇报了情况，总理秘书宋刚同志记下了

他们的名字) 总理说：“我倒想和她谈谈，看看她是怎么想的。”

有的同志讲这次家长会象苏联开会一样，乱叫乱嚷，最后一哄而散，这时总理笑着点头，总理问：“参加家长会的家长多少人？有女同志吗？你们有多少人？有学生吗？”我们如实地汇报了情况，总理说：“你们和他们辩论嘛？”我们说：“我们思想上没有做充分准备，把家长的政治觉悟估计太高了。”总理频频点点。

我总部郑玉富同志向总理谈到自己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及摧残挨学生打的情况，总理亲切地和他握手，郑玉富说：“学生说他们是革命小将主力军”，总理摇头说：“这算什么主力军呢？”

我们又汇报了联动高干子弟破坏我校学生宿舍的情况，总理点头说：“我已经知道了，并且问到底谁是联动的头目，我们说“田耕、刘历运”，总理问：“他们的家长是谁？”

我们向总理汇报了育英学校的情况，说一派主张开学，一派反对开学。主张开学派给谢富治同志写了报告，谢富治把报告给师大复课闹革命联络站处理，师大同志进行了调查研究说：“我们不是实用主义，不能只是复课就支持。”总理频频点头。

在参观的路上我们向总理汇报了我们办学的打算，第一（原稿漏）的学校不能开学，第二，要办主席提倡的亦工亦农的学校，总理点头表示同意，有的同志向总理说：“有人说我们不开学是对抗党中央，”总理摇头说：“不能那样笼统地讲。”

总理从卫生所回来的路上向革命造反派的一些同志说：“你们是教师吗？”这些同志回答：“是”。总理说：“这样的学生那能教好？”我们说：“有人要我们开学！”总理说：“这怎么能开学？！”

总理参观了将近两个小时，在离开八一学校之前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同志们一一握手说：“感谢你们使我受到教育，使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上车之前总理亲切鼓励大家说“你们继续努力！”革命造反派总部的同志激动地与总理握手，纷纷要求转达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问候，转达对林副主席的问候，对江青同志的问候，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最后总理和革命造反的同志一起高呼：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谢富治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谈话
〔谢副总理于三月九日凌晨五时到“八一”学校参观了“联动”罪行展览。〕

参观一开始，讲解员给谢富治副总理介绍“联动”罪行，

谢副总理关怀地问：“你是哪个学校的？”

讲解员说：“我就是这个学校的”。

谢副总理说“是学生”？“老师”，谢副总理笑了。

当讲解员说他们用炮竹打造反派时，谢副总理说：“冲公安部时放的可多呢？”

当有人给谢富治副总理介绍有的联动分子有几个证件时问道：“有没有坐班房？”当我们介绍到联动分子改头换面成立新组织时，谢副总理说：“反毛泽东思想嘛！”

当谢富治副总理看到被破坏的乐器时气愤的说：“小法西斯”。并说：“这个展览非常好，有的人不想听（也不知道）“联动”是反动组织让他们看一看”。接着问：“展览谁主办的？”，“是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联合造反总部”，“你们办的对！这件事情办得好啊！你们能不能把各单位的集中到一块办一个？”我们回答：“红代会”“联动”展览准备在这儿办，谢副总理频频点头说：“那好，那好，那好，这儿的实物多啊”。

我们向谢副总理谈到昨天周总理来时，谢副总理说：“总理昨天约我来，我因为忙没有来，总理回去和我说你管“联动”，你不去看看”。

谢副总理多次关心地问：“你们学校多少学生？多少中学生？多少“联动”？回家的有多少？“联动”的总部在这儿吗？”我们都一一做了回答。当谢副总理看到展出的摩托车、自行车说：“那么多摩托车啊？这些东西是不是集中起来？”我们向谢副总理说：“这个学校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学校”。谢副总理斩钉截铁说：“培养修正主义一定要砸烂！”谢副总理看见那些剩食，猫皮时说：“还吃猫啊！”我们向谢副总理说到那天抄“联动”的情况，谢副总理说：“那天不是抄了吗？抓了多少？”我们回答：“三十三个，有二十二个是本校

的”谢副总理说：“二十二个那么多啊！”我们介绍说：“他们满不在乎。”，谢副总理说：“现在不怕，杀他个脑袋就怕了！”

在去卫生所的路上，我们向他说有人要砸我总部。他说：“砸？有多少抓多少，统统抓起来”。我们又介绍昨天冲解放军，要见中央首长的情况。谢副总理说：“冲，为什么不抓起来？”在标本室参观时，谢副总理又生气地说：“土匪，土匪，完全是土匪，国民党”。

（参观后，谢副总理又看了他们写的标语，做了指示：今后不要提高干子弟，要提整一小撮有反动思想的……或者是高干子弟，干部子弟或叫什么子弟。）

这时，首都红卫兵的同学介绍了人大附中一个“联动”分子的话，他说：“真卑鄙，真恶毒”。

谢副总理快走到门口时说：“你们要做思想工作，分化瓦解他们，把他们中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死顽固的要孤立起来，孤立最少数的一小撮”。

我们想约谢副总理谈谈，他说：“以后我还来，还来！”“我跟红代会讲一讲在这儿办！”又问“这儿方便吗？”“我给红代会打个招呼！”

（我们向李震同志汇报开家长会时情况，李震同志说：“让本人和家长都暴露暴露好嘛！现在家长不是跳出来了吗？”我们又说：“家长说学生参加“联动”由教师负责”。他说：“倒打一耙啊”）。

谢副总理、傅崇碧、李震同志于晨零时才离开我校。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谢富治接见部分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对于学生中的各派政治力量主要看他们现在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跟不跟中央文革，符合不符合十六条，你们应该向解放军学习。

以后不要（笼统）提老红卫兵，不然就会上敌人的当，对“老”红卫兵要做阶级分析，也不要笼统地称高干子弟，高干子弟中坏的应该叫做有反动思想的高干子弟，以示区别。如果我们的孩子是联动，也要抓起来，联动是红卫兵的叛徒。

不要把老红卫兵搞起来，不要再搞那一套（指过去的组织形式）有联动思想的人，他们用老红卫兵的名誉搞起来统统是反动的，要解散它的组织，他们丢开造反派，丢开革命派，拣老红卫兵是一种错误的行动。不能恢复他们的组织，这样做是违犯毛主席的，违犯中央文革，统一开个会，统统不能恢复，只能解散，

解放军帮助一家伙。

真正承认错误的就争取，让他们参加造反派，所有斗争方法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孤立他们中的一小撮顽固分子。要孤立先要瓦解，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

解放军要把联动统统搞垮。要区别对待，不要把中间派赶到那一小撮一边去。所有的解放军要支持造反派，要帮助造反派掌握斗争的策略教育造反派孤立一小撮。

不能成立和造反派对立的组织。老红卫兵要改正错误，造反派应批评他们，老红卫兵拉起来再另搞一摊是错误的，不要上敌人的当。

将来召开工代会，农代会，要以左派为主的联合才能有力的斗争。

解放军搞个把月大联合，在毛泽东思想、在革命路线、在对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批改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主要矛头应对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批改。矛头对准反动路线。在毛泽东思想伟大革命基础上联合起来，在这个前提下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联合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毛主席提倡的。决不是搞和稀泥，搞合二而一的联合，必须经过斗争。

解放军军训后要留下几个，一直帮助搞完大联合再走，好吧！（好！解放军同志答应了）一定要支持解放军，这是立场问题。

工人，农民二十日内可以联合召开会议，你们看看什么时候召开？！

解放军一个月要把联动思想瓦解，行不行？不能发展什么老红卫兵组织，要发动支持造反派，瓦解有联动思想的人。（解放军插话说：凡是原来干过坏事的老红卫兵检讨后要拉起队伍的我们没承认）对!!!

原来的教员，干部统统成了黑帮，这是工作组搞的，小朋友受影响，教师不大好。这不难为你们，是刘、邓路线。要好好起来批判。对他们要一个考验，哪个能用、哪个留用，哪个监督留用，哪个留职留用……要从他们目前的检讨“亮相”和过去犯过错误的情况来识别和挑选他们，不能急，一下子都拉过来，要考验考验。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师。（读主席的“三·七”指示）马克思的话在这引用你们明白了什么意思么？我是对下一段话讲的，是对犯错误的老师讲的，要帮助改造他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这引用马克思的话。学校里不搞联合，就不能整顿，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就是把所有联动的思潮，及其在今天

联动以新形式出现的组织统统整垮。

（有人谈到“三·七”在六中许多联动分子想搞坏一事，这些联动分子打着红卫兵旗号）。

谢副总理讲：有多少人？（解放军答：有四百，如果解放军不在，可能发生武斗，解放军要捉他们，他们翻墙逃跑了。后来捉了几个人）把他们名字都记下来了，要一个一个审查他们是哪个学校的，每个学校去了多少人？把头头要逮捕起来还要坐班房。

陈士渠是个将军，这个人很好，大义灭亲，最近抓了他自己的四儿子陈仁康和三个小头目。陈仁康最近在海军大院被逮捕。他和几个写“打倒北航红旗”“打倒三司”“王八蛋”“联动万岁”等，被陈士渠将军看到了，他回去查了儿子的抽屉，有几个“文件”，他们搞了个平津纵队和红旗纵队，又有一支最强的太平路纵队。还有什么夜晚活动纵队。设宣传部、政治部、人事部，在一年内将拉起五百人，目前争取一百人。这是他们的计划。现在联动分子狡猾。他们以为十八岁以上的才能抓，所以四个人三个人都是十二、三岁、还是小学生。我们才不管年龄大小，只要干反革命活动就要逮捕，坐班房。

让那些要革命的老红卫兵的人退出，解散、让他们加入造反派，不要排斥他们。（有人讲：到今天还有联动的打人）。

谢副总理气愤地说：谁再打人统统地抓起来，解放军给这些人点颜色看看，要树立真正造反派，粉碎敌人的反扑。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陈永贵参观“联动罪行展览”谈话纪要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于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参观了我《摧毁“联动”展览会》。〕

参观中间，陈永贵同志和展览会工作人员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他热情地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并愤怒地谴责了“联动”分子破坏国家财物和危害人民生命

安全的罪行。他说：“我们那儿也有‘联动’逮捕了四个，我们送到了太原。你们（指展览会工作人员）还没有了解农村基层干部被‘联动’迫害得啥样！他们下去的名义也叫红卫兵，反正红袖章很多，可是不干正事。他们（指联动）说四、五月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包围北京，砸北京。我们贫下中农哪里让？他们和坏分子结合，和地富反坏右勾勾搭搭，借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搞武斗。把权夺在他们手里怎么成！”

当工作人员向陈永贵同志谈了干部子弟集中寄宿制学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联动”的一些情况时，陈永贵同志说：“青年人要好好受教育，现在可要好好教育他们。他们不知财富怎么来的，不知艰苦奋斗。东西破坏容易，来的可不容易。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再提倡，青年人要到工农中去劳动锻炼，而他们不象话，生活腐化堕落成啥样！他们接什么班？”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资产阶级的学校里培养的人，接资产阶级的班。我们工农子弟受的是无产阶级的教育，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工农子弟是一代胜一代，过资产阶级生活的只能是一代败一代！”

参观时，陈永贵同志仔细地听取了解说员的讲解并参观了现场。工作人员请他对展览会提提意见，陈永贵同志表示，展览会办得不错，教育意义很大。整个参观历时三小时，最后在全体工作人员和各地观众的热烈掌声中，陈永贵同志和大家告别。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刘格平同志，趁参加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之际，参观《摧毁联动展览会》。

在工作人员陪同下，详细地参观了各展览室和现场。下面整理的是刘格平同志的谈话纪要。

工作人员：“我们的‘展览’，办得仓促，准备还要大改。”

刘：“办得很好，受的教育很大。”

工作人员：（参观完大观园）“这部分两条路线不够突出”。

刘：“很好了，可以看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要把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突出出来”。

当工作人员汇报“联动”放出来后的猖獗情况时，刘格平同志说：“现在给

他们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他们实在不改，就是自取灭亡。”

看到“联动”分子的破坏罪行，刘格平同志非常激愤地说：“这是刘邓路线造成的，简直是法西斯匪徒，他们不是人，是鬼！”

在回去的路上，刘格平同志建议：“把‘八一’长期保存下来，是很好的现场教育。你们能不能复制一套，到我们山西去展出。”

（三）毛泽东下令把抓的联动分子全部释放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大学生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现在我们来请教一下，联动怎么处理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向你们请教的。

江青：你们集中地考虑考虑联动问题，其他问题慢慢可以说，对于联动的小头目怎么办啊？

同学：汇报了斗联动的情况。

陈伯达：你们是怎么斗的啊？你们参加了没有？（开大会，参加了）。

戚本禹：你们怎么斗的？是文斗还是武斗的？（文斗）有没有架着？（同学：没有）

陈伯达：坐喷气式飞机没有？（没有）

同学：讨论、争论、内部问题。

江青：（联动）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是受害者又是工作者，因此请你们来了，请你们直接提出一些方法来研究，当然要注意政策。今天我们特别来征求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对待联动？对那被抓的联动的小头目怎么处理？大家知道吗？

同学：汇报了一些做联动工作情况，谈到造反派处于劣势……。

陈伯达：同志们的批评我们接受，我们对中学运动关心的不够。

江青：我还想提一个问题，联动成了一个秘密组织了，是不是能让他们公开如何？他们见不得人，只能在晚上干，白天不能干，你们能不能让他们公开？你们可以讨论。

陈伯达：是不是可以公开，给一个房子，给个电话呀？

江青：我们4月3日接见了一次，4月4日接见了一次，就分成二派对立，

那不好。

（同学；抢着发言，比较乱）

陈伯达：守秩序守秩序，还没有说完呢？

江青：我们是来研究问题的，不是吵架的，中学造反派怎么没解放啊？现在是开会不要吵架，要文明一些，不要二人讲话，二人讲话就听不清了。

（同学谈到了乱扣帽子，扣反革命，反解放军帽子等）

江青：把这些帽子全部摘掉，这些帽子不要戴，都是自己戴的，一律平反，不要吵，一律平反。

陈伯达：我讲几句吧，不要鼓掌了，我们不同意分 4·3 派、4·4 派，从今晚上起我们要取消这个名字，我直到今晚上以前根本不知道 4·3、4·4 派，我不赞成分两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一家。红代会有缺点错误可以提出来，可以补充，不能拆台，你们双方各作自我批评，你们双方都有所不正确吧！要作自我批评嘛，像这样就不能解决大联合与三大结合的问题了。你们就会走上邪路，双方作自我批评是不太容易的，你们大家相互批评。双方都相当够了，要作自我批评。现在回到我们原来开的会议中心上来，现在来讨论。如何对待联动的政策问题。现在大家脑子要冷静一下来讨论对联动政策问题。

（同学说要把后台公开出来。）

陈伯达：你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不是把后台揪出来就解决问题了。联动代表一种反动思潮，要解决思潮问题，不是揪出后台就解决了。现在我建议江青同志给大家讲话。

江青：我听了小将们的意见，我同意陈伯达同志意见，不要打内战了，打内战不解决问题，你们之间可能有是非问题，有些原则的问题不能打内战了，要相互多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比方我和陈伯达同志吧，多作自我批评，我批评我，陈伯达批评他，这样我们就团结好了嘛，有时我们也要吵了几句，但自我批评就好了嘛，就解决问题了。陈伯达同志提出的自我批评是个好方法，很好，不要打内战，这样，联动可高兴了，敌人可高兴了。刚才你们提出了老红卫兵，什么联动分子又是亲联分子，这样就把联动说得那么多，本来不多，给你们这么一说就多了。不要叫老红卫兵，才几个月就老了。也不要说亲联分子，这样就扩大它们的队伍。我过去说过西纠还是做过好事，是有所功勋的，后来做了坏事，打了你

们，我们就帮助你们，对他们一小撮实行专政，他们后来就骂我，我不怕，骂我，怕骂我还是一个革命派，我现在精神不是很好吗？对联动我提个建议让他们公开吧，给他们一个房子，承认他们。他们没有多少，不要去冲他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气魄吗？（众：有！）他们不敢公开活动，夜里活动白天不敢出来，喝酒，吃猫肉，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戴上个大口罩进行活动，干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造反派要不要拉他们一把呀！（要！）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造反派不是劣势，只要你们不要打内战团结起来，你们不是劣势，他们没有几个人，让他们出来，要拉他们一把，不要让他们颓废堕落。要让他们公开化，要多做思想工作。他们过去还装备挺强，摩托车、军大衣，这没有什么，什么纲领那是吓人的，脱离群众的，没有什么用的，清华的老红卫兵，对老红卫兵我们还想接见他们，我们还想接见联动，他们是青年人吗？还是给他们出路的吗！青年人我就不相信，他们不能改正。我没有接见过他们，陈伯达同志比我强，陈伯达同志还接见了西纠，比我强嘛。我没有你们批准我不敢去接见嘛，你们可能要说江青去接见联动了，和我们不亲了啦！联动不但北京有，其他地方也有，这不但和父母有关，有些父母不是黑帮照样还是联动，这主要是等级，级别关系。我爸爸多少级我妈妈是多少级，这是主要的、反动的。我建议你们把他们（指被抓的联动小头目）放出来，现在他们很可怜，上坟去了，学封建主义一套，在天安门前集合到八宝山上坟，然后到颐和院去打人，八宝山那里不一定全是烈士，有的是叛徒。我建议你们让他们公开化，把那些小头目放出来，给他们房子，给他们电话，让他们把牌子挂出来，什么联合行动委员会。

陈伯达：这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一个措施，这是补台的第一个措施。对于你们被扣反革命、反解放军的帽子都摘掉要平反。

江青：对解放军有意见可提出来批评嘛，正确的解放军是会接受的。

康生：同志们、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我每次接见你们时我总在想，我什么时候能长到你们这么大啊，（陈伯达：过去了回不来了。）（江青：老少年）（张春桥：老红卫兵了）。我不管你们，你们说得对，说错了，你们文斗也好，武斗也好，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我总是十分羡慕你们啊，在你们这么年轻的时候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多么幸福啊，我们在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没有你们那样幸福嘛，我们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希望了。你们有雄心壮志，

甚至在打架时也有雄心壮志。我同意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听了同志们的讲话,有个毛病,一方面说联动是反动组织,另一方面又说联动那么多,我说不可能,坏人只是一小撮,好人是大多数的,广州说联动有一万多人,不可能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人。他们的政治宣传可多了,但我们造反派不能信他那一套,你们要象林彪同志讲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不要怕联动,让他们公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得更清,这一个方面不要错误估计形势,第二个不要替他们扩大队伍,不要把老红卫兵和联动联合起来,这是对红卫兵侮辱,不要讲老红卫兵,那有老红卫兵,我是比你们老,上海红卫兵送给我们许多袖章我才是老红卫兵。就算去年八月成立吧,怎么就老了啦!长胡子啦。不要说亲联派,帮他们扩大队伍,帮他们的忙了,对那些青年讲了错话,话讲不对不要说亲联分子,就策略来讲那是很不策略。你们有雄心壮志,为什么不能做思想工作,他们说老子打下了天下,我老子解放了你的老子,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完全否定了劳动人民的;第二把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了,天下是他老子打下的,那么,毛主席和党的领导到那儿去了,劳动人民到那儿去了,我想,你们可以去做一些思想工作,讲清这些道理,不是一次就能解决了的,你说了一次就过来那是不是真的,要加强政治工作。你们要揪出后台,不是揪出后台就行了。陈伯达同志讲了,联动是种反动思潮,报纸上不是提出了刘邓了吗?你们不是讲到刘邓了吗?揪出后台不能解决问题,这是阶级斗争,这是政治斗争。上面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陈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都讲了不要分4·3派、4·4派,同志们要好好地毛主席接班人五个条件学习一下,第一点第二点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第三条,就是要团结人,只要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也要注意民主,青年人火气大,一听不同意见就吵起来,这好象是赌气,实际上是没有力气的,你有理,让别人讲完了吗,你批判嘛。五条中讲了民主十分重要,没有民主不能团结广大群众。我们中央文革不是和你们商量了嘛,我们在和你们说话,没跟你们吵嘛。当然我们可能民主的不够,在五条中还有一条最重要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团结不同的意见的人,要有民主,这样内战就打不起来了,你们在这儿打内战,说了以后不打了,可是出去以后就又打起来了,这就不好嘛,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谢富治:我完全同意、支持江青同志讲话和康生同志讲话。听听你们小将们

的讲话以后如康生同志说的，我们很高兴，吵吵闹闹，我们变年轻了（江青：我就是变年轻了，我思想上就是年轻，和你们在一起，欢迎不欢迎？（众：欢迎！）刚才江青讲了我们是年轻了，我们要按中央精神办事，我没有其他什么话可讲，主要是按照江青同志昨天讲话，十条八条的关系如何处理，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好好地学习一下，坐下来学习一下，然后结合本单位怎么办，该批评就批评，该自我批评就自我批评。联动的问题是个大问题，我和你们一样是和联动干的。要对反动的家伙专政，专政什么时候都可以专政，要做分化瓦解工作，孤立少数。有多种方法，专政是一种方法，更主要的是大家做思想工作，分化瓦解，团结争取多数，打击少数，这次江青同志找小将们商量，今天这么多人没有好好地商量，你们回去，要结合江青讲话，要研究研究怎么办。你们造反派内部的问题，要解决嘛，退出联动的回去要欢迎嘛，要补台嘛。（江青同志：补台，补台。）没有参加的，应该参加进去，应该有一份，主要的一份。

康生：我插一句话，不要口号上补台，行动拆台。

陈伯达：我来讲几句，第一对于联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要接见联动，你们不要大吃一惊（江青：他们反对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接见他们，我们有责任嘛，尤其我有责任）。你们不要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向他们投降了，我们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对于联动的头头要放出来，不要怕联动，联动是个软弱组织，是一个要死亡的组织，长不了，让他们公开出来不是活得更长了，而是活得更短了。你们批判，你们要批判，批判血统论把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提高一步，要把思想批判提高一步，你们说得对，我们相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能胜利。你们要作思想工作，你们怕不怕做思想工作啊？（不怕）（江青：西城区把4·3派开除了，真有这事嘛，不对嘛那就错了，这样吧，开除的，退出的，统统地回去，好不好啊？（众：好！）把头头放出来还有许多事情做的，好吧，讲完了，散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接见获释的“联动”分子时的讲话，被关押（扣留）的140多名“联动”分子出席。

伯达：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众答：没有。）有点不好，就是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见你们，我有

责任。委曲了你们。主席说立刻释放你们（众呼：毛主席万岁！很多学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众：拍手）你们也不要写自我检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联动”还可以把牌子挂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如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去恢复你们的组织搞革命。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的责任大，有个同学叫彭小蒙写了两次信给我，说刘万平的问题，我也不清楚这个人，派了一个记者去了解一下。

还是我责任大，对你们帮助少，你们去八宝山上坟，搞颓废主义。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你们还半夜里出来喝酒，吃猫肉。你们关了多久了？

（答：100 多天了，有的答两个月），允许你们学习主席著作吗？（答：允许）虐待你们没有呀？（答：没有）责任我们负得多，教育的不够！你们写过一副对联“为革命召之即来”，有点才气。你们回去以后，再恢复你们的组织。如北大附中的“红旗”，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我不知道我把主席的意思传达的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希望你们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伯达：江青同志讲的很清楚了。毛主席下命令把你们放出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没做好。

（江青同志插话：昨天和其他同学讲时未讲主席的命令，我们的意思是怕强加给你们）

大家出去绝不能用主席的命令去压他们。你们犯的错误的很大的。在座的我和你们打过交道，也有西纠的。

（江青插话：我们对西纠的评价开始是有贡献的，后来犯了错误，你们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来，有错误改了就好了嘛。）

犯了错误会使今后谨慎些，避免犯错误了。你们“联动”是有思想基础的，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血统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你们说有三万人，有的说有十万人要我辩论，我去了又没有辩论，你们有没有这种说法？（未答）你们当时这种说法是反动的社会思潮，这就是反动的思潮，是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有

联系的，是从那里发出的？党内有部分干部长期在机关脱离群众，没有看到群众，有相当的人不了解群众。传说你们看见别人衣服破了，扣子未扣好就当流氓打，因为你们也未扣好。老百姓的扣子未扣的多得很。你们的父母在游击战争中，经常穿破衣服，没有鞋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了特权阶层，薪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是马列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思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了。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随便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毛主席回来很快就纠正了。不能包办代替嘛！毛主席从来提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提倡包办代替，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他们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了。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教训群众，结果使中国快亡了，这就是结果。中国共产党救了中国，其中有你们的父母做了一些工作，这主要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能记在你的，他的父母帐上，要看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看到阶级，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武装起来了，打下了江山。江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江山，不是个人的。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这点要充分警惕。刘少奇就是压制群众，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把群众打成“假左派真右派。”你们提倡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从刘少奇那里来的，还有邓小平的女儿也说要高干子弟掌权。你们抄了刘邓的口号。江青说过这是封建的世袭制度。掌不掌权是看老百姓是否授给你权，看你能不能做工作，不能自己封的，所以这是一种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害了你们。我们见面少，对你们帮助少。听说你们搞了颓废的生活，养了毛驴，养了狗，八一学校搞得乱七八糟，学校破坏的厉害，破坏得多的是干部子弟学校。你们不知道老百姓怎么劳动的，你们不知道桌椅板凳，穿的衣服，吃的窝窝头是那里来的。你们接近群众太少，只在干部子弟中来来往往，要吃亏的。说了你们服气不服气（答：服气）不服气可以辩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给你们带来损害。现在有剥削阶级，同时有高薪阶层。很多特殊的生活，特别是“八一”，“十一”等学校给你们很大害处，使你们脱离了群众，现在回过头来好，中国有句古话：“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们并不是浪子，将来可能成为宝贵的财富。现在回过头来很宝贵的，能不能成为宝贵的财富，要看你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将来没犯错误的人不一定如你们，看你们的态度，但不是你们

就对了。

对劳动人民的子弟不能用那样残暴的手段，你们是从旧的最坏的小说里学来的吧？我们过去没用过什么揪砸，你们不是走一条正路。毛主席讲科学，讲实事求是。你们靠打砸抢怎样能搞好我们的事业，搞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在座的有些是上当的，有些同学你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成了“联动”。

要好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这样是不是妥当，有没有污辱你们，（答：没有）你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联动”的名词不反动，但纲领是反动的，代表反动的思潮。

（江青同志插话，如果你们还要挂“联动”的牌子的话，我给你们交通，汽车，印刷等。父母革命儿女不一定革命，父母不革命儿女可以革命，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我相信你们能够革命。）

父母有问题不要紧，国家可以培养你们，他们不革命，你们可以革命嘛！什么“老子反动儿混蛋”要给人家一个出路嘛！祖父母可能是大官僚、大军阀，父母可能就革命了嘛！要看实际行动，不能看父母的出身。不要把父母的功绩吃一辈子，他们做好事、做坏事是一回事，你们做好事、做坏事又是一回事。反动血统论是封建的思潮，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长期的。

（江青同志插话：你们过去犯的错误，应该我们负，不要搞请罪，写悔过书，主席最反对请罪，今后好好干革命就是了。）

大家都在搞整风，你们可以回到学校去搞整风，灌输毛泽东思想，进行自我批评，对你们来说，要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你们过去犯的错误一笔勾销。

（江青同志插话：什么手续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们就可以回家去。）（众：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康生同志讲话：我没有更多的话讲，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同意。毛主席的宽大政策，使我想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实在是幸福的。我经常这样想，年青要象你们这样，是真够幸福的，大家要珍惜爱惜这个幸福。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要有雄心壮志。今天毛主席的决定，可以看出领袖是多么的伟大。（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你们有没有革命的雄心壮志。（众答：有！）我也相信你们有，既

然有，那么有没有勇气，敢不敢承认在过去短短的时间犯的错误。（答：敢）看一个人有没有勇气，其中有一条就是勇于承认错误。过去我看医生，看他是否承认三个字，承认就是好医生。看了病不懂就说不懂；看懂了，没有把握搞好，就说不能，治错了敢不敢说不对。敢于说三个不字是好医生，不敢说三个不字，就不是好医生。我们要敢于承认错误，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要敢于承认。第二，就是要敢改正错误，回去以后，有的人会说句把闲话，你们回去别人不会放鞭炮欢迎你们的。这个说闲话，那个说闲话，有的人不敢沾你们的边，怕说亲“联动”。有的时候还要打一打架。这些都阻碍你们改正错误，你们要做好准备，有勇敢精神。主席的政策是一看二帮。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有本领的人，不是不犯错误的，犯了就改正。犯了错误也是一个锻炼，只要你们改正，相信你们会革命的，可以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

周总理讲话：江青、伯达、康生同志讲得很好。的确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宽大，犯了错误，给你改正的机会。错误的原因有家庭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学校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责任，你们又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源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说是好文章，可是三个同学后来都有联动思想。可以说，你们落伍了。除了家庭、社会的原因以外，我们见你们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

（江青同志插话：我们对西纠的评价是：西纠初期还是有功绩的，但后来就不象话了。）

后来对你们管得就少了。过去责任尽得不够，今后我们帮助你们，不但是你们还有你们的家庭，还有社会，今后加强我们的责任。我是没有儿女的，我到八一学校参观后，才知道你们这样特殊。我有个侄女在八一学校，虽然不是“联动”，但有“联动”思想，在中南海北门骂解放军说：“就是你们把我们同学抓起来的”。解放军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们全家批评了她，让她学习了一个星期毛主席著作，后来让她回八一学校，她参加了反“联动”，成了造反派。你们一定要改，我们已经是老头子了，有了错误还要改！

家庭这关要过好。家庭有两种，一种是有的父母不赞成你们，骂你们甚至打你们，当然我们不赞成打罗！但生起气来打几下也是有的，你们要受得住，做错了自己承担责任；另一种是疼爱你们，溺爱你们，你们回去后，大哭一场不见得

好，不要一回家温暖了，就旧病复发。将来准备把你们的父母一起找来见一见，谈一谈。家庭这关要过好。

我到广州去了一趟，广州有个上万人的“主义兵”有“联动”思想，我不主张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就行了。回来以后和主席谈了谈，主席说：“根本不用抓”。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

还有一类家庭，父母犯了错误，被斗。那不要紧，你们是国家的财富，可以到公安部说一下，国家管你们，总会让你们学习的。

到学校那就更困难了，他们知道你们被捕过、拘留过，甚至有的同学把你们扭送到公安部。当然我们要做工作，你们也要做工作。不要因为过去他们扭送你们，回去后就报复；但也不要气馁。见了他们，既不自卑，也不要觉得了不起，好象我坐过监狱。要平心静气，叫别人感到诚恳，使同学们生不起气来。

不要请罪。请罪是封建主义的产物。错了改正就行了。要有自我批评，还要能听别人的批评。回去以后劝说有联动思想的孩子改过。这也是将功补过。你们受过拘留，自己改好了，还要说服他们改好。你们在学校里参加战斗组织，要成为表率，成为革命造反派。我和江青同志在二十日讲过“红卫兵”万岁！你们要把“红卫兵”光荣的旗帜再举起来！要真正举得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红卫兵”。把自己过去的过失补上。

（有的同学递条子，提到破四旧的问题）

周总理接着说：现在不忙破四旧。好好读点书，谈一谈，做一点批评自我批评，把家庭，学校关系搞好。再过十天半个月后把你们的父母一起找来谈谈。过去谈得少，今后多谈一点把经验总结一下。我们相信你们的大多数是会改好的，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跌了跤是有代价的，最后希望你们听我们全党全国的副统帅林副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江青同志插话：已发给红卫兵战士的文件，统统发给你们。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一个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康生同志插话：不要自封自己是老红卫兵，也不要自卑感。才十个月，有什么老啊！

康生同志见一个学生留有小胡子便说：把小胡子去掉。你们同意的话，我也把小胡子去掉。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抄家一事的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北京新四中 赤 潮《“四·三”，“四·四”派斗争的意义》

编者按：这是中学里策略派即四·三点五派的文章，我们选用了其中对矛盾分析的两段。经调查，其中内幕事例基本是事实，可供同志们参考。题目为编者所加。

分歧的由来和现况

四三、四四斗争关系到军训，军训中的四三讲话是矛盾表面化的导火线，但它的实质不在军训，四三派认为这是要不要革命到底的分歧，四四派认为是对犯错误的同志抱什么态度的分歧，（当然有些趁火打劫的论调是不应包括其中的）。双方的想法可以从下面对矛盾的全面考察而看其规律：

四三与四四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可以从其成员看出：四三派大部分是老造反派，即八月份反对对联，反对血统论，十月份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二月猛烈地与“联动”战斗，一月份群起夺权，可以说，是革命造反精神很强的小将（以下简称造反小将）。四四派有两部分主要成员，（一）在很长的时间里与造反小将一起战斗的，也曾经有一二次站在先头，但总的来说，不很得力，比较含糊，在当时就不是主力而是同路人，但也不愧为造反派（以下简称造反同志）。（二）受蒙蔽、犯过错误但基本上有所认识的人，如一部分老红卫兵。（以下简称曾保的人）。

在谈到现状之前，必须插叙一下文化革命转折前后的特点。

当造反派刚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前后，他们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有着强烈的政治性的，它关系到中央以至政治局的斗争。造反小将在中央文革的带领下为了矛刺后台而向保守派所作的猛烈进攻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冲不垮十七年来

刘少奇的桎梏。同时，他们对造反同志的右倾倾向的批评也是正确的。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些行动，文化革命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所以，由于私字作怪，造反同志当权之后不肯过多地容纳造反小将，因为后者更有当权的可能，在造反派中声望更高，这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伏笔。值得提一句的是：造反同志曾出面办报、召开大会，造反小将在几个关键时刻供稿（12·16大会，那时他们的配合是好的），受到了中央的重视。而当时一心向前冲的造反小将就把“通天”的机会让给了造反同志。后者以首都兵团为基础逐渐在红代会里掌权。

当刘少奇被揪出，并在全中国揪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后，曾保的人逐渐认识到自己后边的坏人，不愿再上当，也想杀回马枪，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这时，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就渐渐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成为一种历史遗留的较盲目的斗争。固然，曾保的人由于原先的地位，已经被造反派甩了很远，而且会有很多问题转不过来，但这已属于“允许保留”的不同意见了。

应该指出，大部分青年同志都没有很自觉地认识这个转变。然而由于原先的地位，造反同志在客观上对曾保的人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态度并逐步从理性上认识它。但他们在思想批判从严这一点上依然做的不够，造反小将这时对他们的批评依然是正确的。

造反小将（当然不是全部）程度不同地对曾保的人采取不太正确的态度，没有充分认识这时团结大多数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对对方的能量估计过大，不敢放心地容纳他们，强调斗争中求团结而缺少团结的愿望。总认为只有对方跟自己完全一个心眼了才算改错，而这在大多数曾保的人中是不可能的，思想差距不但有而且很大。于是造反小将有些同志采取排斥的态度，甚至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孤家寡人的政策，个别的还起到了压制别人革命的作用。当然，曾保的人有些只在认识后台方面有了进步，对血统论及对造反派都没有很好的认识，不愿认错服输，所以看不到造反派的大方向，抓住枝子加以攻击。但由于他们处于较被动的地位，所以在双方关系紧张的责任上要承担得少一些。

于是，当条件成熟的时候，矛盾就爆发了。造反同志扩大它的原因是如前所述要大权独揽，曾保的人受了某些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如左派分化论、新阶段论的影响加上原先的隔阂，就投靠在造反小将的对方，有人甚至企图通过批判所谓反动的四三思潮来否定造反派。这时，造反同志的错误是排斥大部分革命造

反派，曾保的人的错误是不承认十个月考验出来的革命左派，造反小将一些人的错误是对犯错误人的态度不正确，对团结大多数领会不深。

以上就是当前矛盾的由来及现状。

对症下药

解决以上矛盾的途径有二：（1）我们一致支持四三派，由于有十个月斗争的舆论准备，就能使革命造反派占压倒优势，很快以其为核心统一全局。同时帮助其领会团结大多数的思想，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2）四四派中的实权人物破私立公，大灭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小团体主义，与造反派的战友共享无产阶级大权；同时要加强对联动思潮的批判，使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人心。这样，四三派的同志就应该不咎既往，以革命大局为重，团结更多的同志一起干革命。

如果能够正确处理四三、四四的矛盾，那么就能够促成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教育犯错误的同志，批判反动思潮，打击顽固势力。这样也就能促进三结合。建立革命的权威和纪律，克服无政府主义，掌握大方向。否则，如果任四三、四四的矛盾继续下去而抓其他矛盾，则决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

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1966年6月11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摘录

一、狂犬吠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思想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指路明灯。“联动”罪行累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它在刘邓的幕前幕后操纵下，狂犬吠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抵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联动”在它们的（003号）通告中就疯狂地叫嚣什么说“要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十分恶毒地说什么要“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卜X X公开叫嚣：“我要学会全部马、恩、列、斯著作，来驳倒毛泽东思想。”

▲马甸中学联动分子公然写出反动标语：“★★★打倒！万万岁刘X X。”

▲翠薇中学联动分子公然写出反动标语：“打倒党内最大的当权派。”

▲定福庄联动分子在小说《风雷》中公开写上“打倒★★★。”

▲最近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写给《井冈山》的信中，竟然把林彪同志的名子上打“X”。

▲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卜X X说：“我现在怀疑有一个人，非常残暴，想把所有的老干部都踩下去”。“我担心会出现史达林时代的大疯狂”。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X X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我们的付统帅林彪同志。他说：“★★象赫鲁雪夫吹捧史达林一样吹捧毛主席。”还说什么“人说林彪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有什么材料可证明呢？”并且做贼心虚地说：“千万别传出去。”这就充分暴露他们的反革命嘴脸。

▲北大附中联动顽固分子宫X X在石油附中地下室说过：“这世道没有一个公道人替我们说话。”（按：这是对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极大诬蔑！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极大诬蔑！）

▲北航附中一联动分子说：“毛主席受了江青的骗，也要作检查。”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X X X说：“我不敢学习毛选，越学越反动。”他甚至还说：“老子不学毛选，照样当左派。”

▲北大附中联动小头目牛X X说过：“不是文化大革命方向错了，就是毛主席领导不得力。”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苏X X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和江青同志。他说：“列宁夫人反列宁；史达林死后，史达林夫人反史达林你就往下想吧……”

▲联动分子六冲公安部时，群众在广播中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时，联动分子则狂叫“刘X X万岁！”当场被捕获。

▲三月二十六日，育才中学联动分子竟说：“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看。”

▲一月六日晚，数百名联动暴徒打着“联合行动委员会”破旗闯入市委接待站。狂呼“打倒中央文革”，“刘X X万岁！”等极端反革命口号。革命群众当场把他们抓住。

同日晚，又一批联动分子飞车过西单狂呼“打倒★★★，保卫刘X X”反动口号。并散发同一内容反动传单。充分说明联动就是刘邓豢养的一群走狗。

▲农机学生李英华一贯反动。去年九月十七日他恶毒地说：“林X是最大的

坏蛋，X X X 次之” 农机东方红抓住了他押往公安部。途中一联动分子拦劫车辆，对反动学生李英华说：“你没有罪，你要坚持斗争。” 继而将他抢去。

▲今年三月份，农大附中联动分子贴出了“拥护刘 X X 当国家主席” 的反动标语。

▲定福庄中学联动分子把毛主席的巨幅照片撕成碎条扔满一地。从一个联动分子中发现一堆撕坏的主席象和林彪同志的象。

▲在石油附中地下室（联动老巢）中发现三个被砸烂的主席石膏象。

▲X 校一联动分子一次就撕毁主席象三十二张，另一个联动分子竟然用毛主席象当手纸。

▲“八?一” 学校联动分子 X X X，为了剪取一妇女头象，竟把背面的毛主席象破坏。

▲反革命分子彭 X X 极尽造谣能事，说“毛主席树北大附中《红旗》（注：该组织集体加入联动）为一面红旗，不能倒。” 妄图为反动组织招魂。她还说过：“我不参加联动，并不是我不反中央文革，因为联动反的不是点儿，只知道乱冲，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比联动还反动。” 一语道破其反动本质。

够了！够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小撮联动顽固分子的言语行动竟如此露骨，反动气焰竟如此嚣张！他们以最卑鄙的手段，最恶毒的语言疯狂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付主席，攻击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白底黑字，铁证如山，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正如几个跳梁小丑，几只嗡嗡乱叫的苍蝇，它们的一声一泣，却赤裸裸地活画出这小撮顽固分子的反革命嘴脸！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命根子！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就要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二、狼子野心，疯狂攻击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是毛主席的最高参谋部，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挥部，她最忠实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坚决地支持了无产阶级造反派，深刻无情地批判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遭到了联动刻骨的仇恨，他们歇斯底里大发

作，疯狂地漫骂，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下面记录了联动疯狂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行。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以“破私立公”为名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大会。由联动顽固分子李单绸、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马小军（石油附中）等人筹备召开，反动分子彭小蒙临场指挥，并煽动其他联动“老百姓”反中央文革。她对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张新月说：“你们反不反？你们不反我反”。宫小吉也高叫“反了！反了！”在彭，宫煽动下，首都《红后代》七个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北大附中的李铁兵）跳上台声嘶力竭地狂叫：“坚决批判以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某些领导人不要太狂了”……

随着他们的狂吼，“红绸子们”发狂似的蹦起来，跳上椅子，跳上桌子，狠命鼓掌，哇哇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满天飞舞，嚎叫声，炮竹声，震耳欲聋。是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彭小蒙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奔上台来，对刚刚念完反动口号的马X X说：“念的好！我支援你，你们在学校干，我在家里给你们搜集材料。”还鼓励大会主席周春英说：“你一定要顶住。大家情绪起来了，你要不支持就是右倾。”会后演了两部电影。一部是毛主席 8.18 接见红卫兵。目的是回忆一下自己的“黄金时代”，当看到他们自己的镜头时，简直得意忘形！当镜头照到贺龙时，也使劲鼓掌。当出现中央文革首长时，他们就发出一阵叫？。

这个大会就是一个反中央文革的乌七八糟的反革命大杂会。请看他们在这次大会上狂呼的反革命口号：

1. 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2.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这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4. 谁敢乱捕革干革军子弟小心狗头！
5. 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6. 活着干，死了算！

▲联动分子千方百计离间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关系，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关系，以达其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他们造谣说什么“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都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是企图搞政变”等。

▲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联动分子用十分卑鄙的手段十分恶毒的语言攻击江青同志。反革命分子彭小蒙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觉得江青同志有些冲动，不爱听反面意见。”“我要是把她的材料抛出来就够她受的。”联动分子苏秋滨说：“江青就会感情用事，江青太狂了！”另一个联动分子恶狠狠地说：“我恨江青！”还有一个联动分子（都是北大附中的）说：“江青、戚本禹净想把人家打下去自己好上来。”

▲联动分子攻击江青同志黑诗一首：

遥忆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且看今日送果人，戴上手铐把牢坐。

▲联动分子还恶毒攻击关锋、戚本禹同志。农大附中联动分子在大字报中大骂关锋，戚本禹是狗崽子的代言人。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轻蔑地说：“戚本禹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十七级干部。”

▲清华附中联动分子说：“戚本禹来了，咱们装作不认识把揍一顿。”反动气焰何等嚣张。

▲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养了二只狗，一个名叫“戚X X”一个名叫“蒯X X”。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极大侮辱！

▲去年十一月底牛皖平等联动分子在大街上贴出反动标语：“关锋、戚本禹逼我们上梁山，我们不得不造你的反。”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X X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谈到：“明起来我们跟三司干，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是跟中央文革干。”一句话道破了他们反三司的最终目的。

▲彭小蒙在一封黑信中写道：“我翻毛选，又拜读了十六条，认为中央文革所做所为都不符合。”

▲联动分子攻击中央文革的反动言论：

1. 要揪出三司后台，揪出中央文革是中央文革，揪出谢富治是谢富治。
2. 江青就会感情用事，江青太狂了！
3. 对中央文革要调查，要整戚本禹！
4. 中央文革破坏大民主。随便动用国家机器，逮捕红卫兵，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5. 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林副主席，更不是党中央，为什么反不得？

6. 谁要是中央文革不满，谁要是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就给谁打成反革命……这是什么作风，显然是国民党的作风。

7. 谁也没有中央文革权力大，他们一呼百应，现在又拼命挤入军委，X X X已被软禁了，政变的条件成熟了。

8. 中央文革从来不搞人的思想革命化。

9. 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

▲一封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信。这是北大附中联动分子X X的一封家信。这是他们炮打中央文革的自供状。全文是：

爸爸、妈妈，你们好！

北京市内白色恐怖，三司乱抓人，许多无辜同学因和三司观点不一致而入狱，公安局也拘留人，我们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主要成员是八?一八前老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群众认为是反革命组织，在马路凡戴联合行动委员会袖章的，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28号若不去天津，可能也只得被公安局拘留。

联合行动委员会明起来是跟三司干，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是跟中央文革干。我很怀疑江青，她干了些令人不理解的事。现陶铸被江青陈伯达等人点了名，北京开始炮轰陶铸，要知陶是4号人物，而现在一点陶的事都指不出来。

……

江青水平太低，她现在的错误往轻点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好，对无产阶级东西还不理解；往严重了点说，就是怀疑她有野心。在信上不便于一一细说。

……

现在大街上炮轰陈老总又轰叶剑英，文革现又把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周荣鑫抛了出来，我怀疑文革把责任错误都摊在一个人身上，保住自己。北京现文化大革命方向不对，文革很不胜任。

……

我是个有抱负的人，愿干出点东西来，不过现在形势所迫，走为上策。

女儿 1.7 晚

同志们，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毛主席的最高参谋部。谁恨中央文

革？只有阶级敌人，只有刘邓陶，只有帝修反。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衡量一个人一个组织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谁胆敢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要他的狗命！

三、顽固不化，死保刘邓黑司令部

毛主席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联动一小撮反动分子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但却对刘邓黑司令部一保再保。下面揭露出的许多事实，充分说明，联动就是刘邓黑司令部豢养的一群走狗。

▲联动黑诗一首，道破问题本质。下面是从一联动分子手中抄出的黑诗一首。

失败何心甘，
誓要把案翻。
重整旗和鼓，
死保刘和邓，
此仇须早报，
四时待鸡鸣。

▲清华大学八·二四事件

六六年八月清华大学的革命造反派，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的鼓舞下，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旗帜，彻底清算刘邓工作组迫害无产阶级革命的滔天罪恶。他们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拿起笔作刀枪，矛头直指刘少奇为首的黑司令部。在八月二十日以后的几天里，清华园内贴满了揭露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王光美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行的大字报。

清华大学革命派的这一行动，在革命群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十二，二十三日到清华看大字报的，每天都十万人左右。

但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为之心惊胆战，他们指挥他们的保皇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八·二四白色恐怖事件，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八月二十四日，以刘涛、贺鹏飞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调集了十二个学校的保字型大小红卫兵，撕去了矛头指向刘邓一伙狐群狗党的一切革命大字报。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刘涛、贺鹏飞同清华附中红卫兵一些人讨论了“行动”计画。叫嚷连什么水源，电源、广播台……都要“武装占领”。中午十二点赶制了专用的红卫兵符号，下午 2:00 十二个学校的保皇军集结在清华附中操场，贺鹏飞做了一番恶意的煽动，竟然污蔑揭露批判刘少奇这一革命行动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他们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

下午 4:00，所谓十二学校红卫兵一开进清华园，就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接着四处派人声嘶力竭地宣读了一份所谓“最后通牒”，什么“狗崽子放老实点”呀，什么“你们想把党的领导人一个一个搞臭”呀，陈词满书，不一而足。他们企图用武力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扬言这些大字报不许看、不许抄、强行抢走革命群众的抄录本。有一个同学因抗议了他们这一暴行竟被他们拳打脚踢。

他们为了“秋后算帐”，对大字报进行了详尽的拍照，特别认真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以便对之进行迫害。拍照结束后下午六时许，撕去了揭露、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王光美之流的全部革命大字报。盖之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狗崽子不许翻天”、“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之类的叫?口号。

事后，他们还在校园游行一周，向“狗崽子”示威。

晚上，他们非法抄了“第一红岩”等战斗组的家，理由即是因为他们揭露批判了刘少奇。

八·二四事件是在王任重一手策划下搞的，事先，刘涛向王任重打过电话，汇报了“情况”，事后，直到九月末，王任重还说，八?二四没有什么问题。

▲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 12.25 大行动。

66 年 12 月为了彻底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清华井岗山兵团举行了声势浩大的 12.25 大行动。

66 年 12 月 25 日五千余名井岗山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员工怀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刻骨仇恨，怀着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顶着刺入肌骨的冷风，步行到城里，分别在天安门前，王府井、西单、北京站和菜市口等地进行了大宣传、大游行、大示威。他们不怕天寒地冻、困难重重，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

争取胜利。”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捣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不向毛主席投降，就让他灭亡！”、“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等巨幅标语贴在天安门城墙上，贴在大街两侧商店的橱窗上了，把深刻地揭露刘少奇二十余年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大字报，以宣传栏的形式，张贴在大街小巷。

在各个宣传点，广播车不停地向群众宣传刘、邓的罪恶活动，宏亮有力的声音在大风中回旋，合成一股巨流，“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这声音响彻了天安门广场，震撼北京城！

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井冈山兵团的这次革命行动，激起了那些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混蛋们的无比恐慌和仇恨，一个歹徒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趁着散发传单时秩序混乱，用匕首刺伤井冈山兵团战士方雁生同志，殷红的血浸透了棉衣。另一批暴徒，趁着兵团大队进城宣传之空，偷袭了几个战斗小组，抢走各种宣传工具以及衣裳等物。

这一小撮暴徒混蛋们，他们倡狂之日正是灭亡之时，他们的后台老板已经完蛋了，他们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他们怎样的垂死挣扎，都终究逃不脱党的阳光，逃不脱毛泽东思想的阳光！

▲地质部事件简介

八、九月间，地院东方红战士高举革命造反大旗，三进地质部大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以何长工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调来“西纠”宪兵队前来镇压。

九月六日早上，西纠队员云集地质部，封锁了主楼，利用何长工提供的广播室大骂造反派，把地院东方红战士层层包围，连上厕所都受到限制。

西纠一到，何长工等就一见如救，老混蛋说：“没有你们（西纠），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西纠分子则大骂“东方红”战士：“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们纠察队爷爷有权保卫国家机密，有权保卫‘老首长’，‘你们这些混蛋，狗崽

子为什么无视‘红卫兵’，无视‘老首长’”。他们拳打脚踢，大打出手，气势汹汹，分兵把关，连何长工，邹家尤出入都有西纠分子“随驾”。

西纠后台许明（孔原老婆）怕露出马脚，急忙于第二天电告西纠撤退，第三天西纠灰溜溜遁走。

▲政法学院《政治公社》宣传车因白天到街上宣传毛泽东思想，揭露刘邓的罪行。联动分子也把它列为一条罪状，晚上纠集数十人，把宣传车砸坏。

四、蚍蜉撼树，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垂死挣扎的产物——“联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自出笼以来，作恶多端，坏事做绝，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去年十二月，他们公然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公安部，反动气焰甚嚣尘上。毛主席说：“捣乱，失败，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一小撮联动分子，正是按照这个逻辑一步步走向死亡。他们冲一次公安部，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进了他们及其刘邓黑后台的脖子上。

“联动”暴徒六冲公安部

一冲

去年 12 月 16 日晚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押送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人员接洽时，一伙“联动”暴徒冲进了接待室，劫走凶手并打伤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出面制止，这些暴徒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员，甚至动手打了一个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围攻、殴打，嚣张至极。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公安人员除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外，继续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拘留期间，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毛主席著作，没带语录本的还发了语录。这样，他们“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可是，释放出来后，一反既往，一口咬定，说公安部乱抓人。

二冲

12 月 28 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名暴徒、强占了接待站的八个办

公室，无理殴打在里面办公的同志，迫使这些同志离开办公室。他们还大肆破坏、砸烂玻璃、电话机、把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些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同志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个同志的头部。中午，又有十几个暴徒从窗户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仁至义尽的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误。到下午四、五点钟，在接待室的暴徒，又都从视窗跳到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暴徒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同志，该女同志当场昏倒，而暴徒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才把病人营救出来。这帮暴徒又撞入大礼堂，把里面的设备砸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堂里野驴般地尖吼：“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第三司令部”！“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反动口号，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把一些反动口号涂在墙上，这天半夜，一个副部长要找他们谈，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什么“兔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出礼堂。第二天，即 29 日早上，他们把被扣留的二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骂。有一个同志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箱子扣在工作人员头上。第二天，30 日，革命的工人、学生要求支援公安部，他们才蹒跚而退。

三冲

12 月 31 日，“联动”又纠集了近一百名暴徒，再次冲进公安部接待站，强占了两个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理，并动手打人，当场推倒一个女同志，踢伤一个男同志，经公安部同志耐心说服，他们到一月一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四冲

1 月 6 日晚上十一时左右，“联动”又纠集了百余名暴徒第四次冲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的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反动口号。以后又冲入礼堂，再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放鞭炮，涂写反动标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

又转而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公安部的猪肉真好吃”。真他妈是一群下三赖！以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暴徒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夹着尾巴仓惶而逃。其实电话早让他们砸坏了。

五冲

一月九日，他们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部，他们疯狂大喊“打倒三司”甚至喊“打倒江 X”。由于不少革命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联动”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他们竟将“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同志脸上扔去，使好几个战士受伤。

六冲

可是他们的贼心不死，隔一天即 1 月 11 日，他们于二十八中集结，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企图第 6 次冲公安部。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革命群众更多了，“联动”一到，立即就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冲成。在广大革命群众的严词驳斥下，他们一小撮人理屈词穷。但居然还无耻地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最后通牒”，临走时还喊出“油煎江 X”，“打倒周 X X”，“打倒陈 X X”、“刘 X X 万岁”等极端反动的口号。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行为决不施仁政。”公安部依法逮捕了一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家伙，好得很！打倒联动一小撮！枪毙联动后台！解放联动老百姓！坚决支持联动造反派！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

联动攻击公安部的各种反动口号：

1. 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
2. 公安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3. 公安部执行了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 强烈抗议公安公然对抗十六条！
5. 公安部挑动群众是一个恶毒的政治阴谋！
6. 炮轰公安部！火烧谢 X X！
7. 公安部打人凶手必须严办！
8. 不许公安部乱抓革干革军子弟！
9. 强烈要求给被抓的“红卫兵”平反！

10. 三司一部分受蒙蔽的同志起来揭发公安部的罪行。
11. 抗议公安部乱抓人。
12. 乱抓老“红卫兵”绝没有好下场！
13. 联动骨干宫小吉说：“公安部没干一件好事！”“压而不服越压越硬！老子就是不服！你逮吧！”

五、丧心病狂，围剿革命左派组织

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勇敢的闯将，他们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造反精神最强，他们是一支向着刘邓黑司令部冲锋的先锋队。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屡建功勋的首都三司和其他造反派就是这样的“闯将”和“先锋队”。正因为如此，“联动”这个反革命组织对他们恨之入骨，怕得要命，他们使用了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抄砸暗杀，恐吓谩骂，无所不用其极，千方百计要把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大旗的“三司”革命造反派打下去。

请看联动分子围剿革命左派组织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政治上的恶毒攻击和谩骂。

▲一月四日，联动分子在辩论会上大骂三司：“三司是牛鬼蛇神的大本营”。

“各种扒手的旅店”

“是反革命组织”

“破坏党的阶级路线”

“执行了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三司是镇压中学红卫兵运动的罪魁祸首”

“三司臭名远扬”

▲在一月十日联动的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他们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最强烈的抗议”，扬言要“严惩三司、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

▲联动狂呼：“三司是江X的干儿子”、“中央文革就是三司的后台”、“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等反革命口号。

▲他们到处张贴“打倒三司”、“油煎蒯大富！”“谁说青山不老，谁

说三司不倒，我们就是愚公，定把三司挖掉！”“谁说公鸡下蛋，谁说三司好汉，三司决非好汉，全是混蛋王八蛋”等黑诗、黑话、反动标语。

▲12?26 大会上，联动干将李蜀龙抛出了大毒草《年终话三司》污蔑三司是“捕打”、“随意抓人”，是“压迫有理，抓人有理。”狂叫：“有道是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三司，三司，于若惹得天怒，人怒，兔子尾巴，秋后蚂蚱。”

▲中央文革责成北京市委发出重要通告（十一月十八日）后，联动根本不理睬，进行打、砸、抢，大搞白色恐怖……钢院附中联动分子把贴在校内的《通告》全部撕毁，并在上面横加指示。北大联动分子指着《通告》说：“这他妈没用，对三司就得砸！”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对三司恨之入骨，狂吼：

“吃三司的肉，啃三司的骨头”

“三司小人一个，放屁何其多，妄图推翻联委会，老天对我无奈何。”

“看联动奋起镇妖，可喜可敬”

“藐三司横行一时，可憎可气。”“天壤之别”

▲各种反动口号：

坚决砸烂三司的狗头，三司是挑动群众斗争的罪魁祸首；

三司上保中央文革的错误，下保自己的错误；

谁说公鸡下蛋，谁说三司不完蛋，三司并非好汉，全靠抓人吃饭；

坚决反三司，反到底就是胜利，踏平三司！

西纠精神不死，血洗北京城！联 X 万岁！

全市的革干革军抬起头来，革干革军子弟不是好惹的！

活着干，死了算！

大抄大砸：

▲联动曾三次砸三司，每次都毒打三司的红卫兵战士，把东西抢劫一空。

▲从一月六日到九日，全市中等学校的批资联络站普遍被联动砸。

▲一月六日，农大附中“八?一八”井岗山红卫兵被砸，九日，北大附中井岗山被砸。

▲六六年十二月七日，联动闯进了民族饭店，乱抄乱砸，并殴打了坚持

斗争的北航红旗战士。

▲《新北大》校刊编辑部被砸；

去年十一月，北大附中联动分子以宫小吉为首的一伙，砸了毛主席亲笔题词诞生刚刚两个多月的新北大校刊编辑部。他们在墙上毛主席象旁写上“造反有理”，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贴在椅背上，把毛主席题字“新北大”扔得满地都是，甚至扔到厕所里，并砸碎玻璃窗往外面扔。他们抢走了两捆材料，从毛选学习宣传组偷走 50 多本语录。并顺手抢走九十多元卖校刊的钱。

各种恐吓信

按：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联动分子的各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都遭到了可耻的破产，于是他们采用各种恐吓的办法企图吓倒革命造反派，真是蚂蚁缘槐，蚍蜉撼树，可笑之极，无耻之至！镇压何所惧，恐吓奈我何。让联动这伙可怜虫抬着刘邓的僵尸，尽情哭泣吧！

▲北大附中井岗山的混蛋王八蛋们：

别看你们今天闹得欢，将来小心你们的驴头，崽子别狂，等着瞧！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你们靠边站！你们今天斗了我们的人，这血恨一定要报，小王八蛋们别高兴得太早了。

不管你们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反正革命的重担不能落在你们身上，崽子们，考虑考虑你们的后路吧！

彭小蒙、宫小吉、牛皖平是很好的干部子弟，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如果你们下次再开 4?13 类似会议，我们老红卫兵就不客气了！

打倒“红色”地主！

打倒“革命”资本家！

不许崽子翻天！

坚决击退崽子的倡狂进攻！

干部子弟要掌权！

天下是我们的！

北京一〇一中

你们的爷爷——老红卫兵

▲给清华井岗山的一封恐吓信。

可“尊敬”的蒯“司令”：

自总理给您平反以后，您“青云直上”沾沾自喜、不可一世、真可谓“老子天下第三”也！

殴打解放军、冲击天安门……诸如此事举不胜举、您——“司令”脸上好不光彩！即日登门“拜访”，奉送“清凉剂”一付、望“司令”接受。

最后予祝第三司令部“岿然不动”!!!

北京女八中

《忍无可忍》战斗小组

于 1966 年 11 月 15 日

▲一月二十日，从“八?一”学校联动分子身上搜出一封恐吓信，全文如下：

八一纵队的儿子们：

你们小心点！三天之内爷爷们抄你们，你们小心点，尤其是康小会，兰州小流氓李东京，北京小回子颜小光、北京大胖子邓国庆、天津小病包装小红、新疆小四眼以及你们的狐群狗党们，等着挨刀吧！下面将“八?一”纵队小子们形容如下：

颜小光：大肥猪；康小会：小狐狸；

韩北宁：大狗熊 李旦生：白面蛋白质

李乃民：日本人 丘志全：日本良人。

哈！哈！哈！哈！

山本太郎特务队（手印）

爷爷队（手印）

爸爸队（手印）

杀康小会战斗队（手印）

杀李旦生战斗队（手印）

杀李乃民战斗队（手印）

17 / 1

联动黑诗选

按：联动代表了一种最腐朽、最反动、最没落的社会思潮。他们心灵空

虚，精神颓废，走投无路。他们在大抄大砸大偷大抢之余，写出大量反动黑诗攻击谩?革命左派组织，发泄他们对中央文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现先登几首，供大家批判。

相当初小将可爱造反有理，看今朝血统高贵什么东西
横批：一落千丈。署名：想不通。

满天风雨满天仇，热血染战衣，
革命何须怕断头；刑场不回头，
留得志士豪气在，横眉冷对还乡团，（指“三司”）
三年归报楚王仇！老天知情是沧桑。

遥忆当年送沙果，滚滚鬼火照天烧，
江青阿姨真爱我，倒走横行尽魔妖，
且看今日送果人，乱世方显男儿志，
戴上手铐把牢坐。抛却书箱近山坳。
深仇大恨记心头，小丑跳梁，
不雪耻辱誓不休，又把老病犯。
今我决心高于天，暴风雨里直打颤，
不报此仇不丈夫，神智早已昏乱。
张牙午爪剿，雨过天晴心暖，
欺我联动如新仇，永读雄文四卷。
莫看三司狂一时，投入阶级斗争。
乃已是群拉物猴，昆虫休想翻天！
三司本是纸老虎，**
跳梁小丑不知羞，谁说青松不老
泥佛过江命难保，谁说三司不倒，
下场不如赫秃头。我们就是愚公，
**定把三司挖掉。

崽子狂吠奈我何，**
苍芒大地主沉浮，恨不卫旗者，
兵家胜败乃常事，难临逃之夭，
劝君何须自寻烦。残旗尚如此，
**我何惧贼捕。

浪迹京城忆西纠，**
故人生死各千秋。
散伙已在数日后，
二爷忍做三司囚。

**

秋风一吹稻谷香，崽子们，
会计跑遍打谷场，现在你们狂，
帐本算盘带的齐，我们会算帐，
一死有何难，一天不行两天，
到处是青山，一年不行两年，
四不清者，十年不行二十年。
“红旗”飘处送公粮。你们等着。

**

《红旗》战士们，昂起你不屈的头颅，喊出你心中的愤怒。
红卫兵天不怕，鬼不怕，神不怕，还怕逮捕坐牢房？

看联动，奋起锁妖，可喜可敬，
藐三司，横行一时，可憎可气，天壤之别

**

三司小人一个，放屁何其多，妄想推翻联委会（即联动），老天对我无
奈何，

**

吃三司的肉，啃三司的骨头。

**

野火烧不尽，革命不怕抓，
春风吹又生，誓死闹革命。
失败何心甘，独坐床前思潮湃，
誓要把案翻。亲人雍容友（？）在，
重整旗和鼓，昔日战友人何去？
此仇须早报。亲人一去不复返。
死保刘和邓，**
四时待鸡鸡。

**

风雷间，甘地慕，慈禧嫉，
鏖战急，金声盖旨，欲可愚。
陈宫溃，那些嫩手抽筋，
骚人溢，老文畏主信密计。
四十余年廉颇将，无奈“神塔”压顶头中立，
今日拜倒茶花女。昂首待鸡啼。

度三十
雪花飘飘夜风寒，
孤单一人坐房间，
无被难度漫长夜，
燃把木柴来取暖。
又烦又困又寒冷，
敲门两次未成功，
只好独自来《铁血》。

**

七绝
夜半更深雪花飘，春夏秋冬
无衣无被难睡觉，一江春水泛东舟，
忽见炉中有余烬，满山秋风送谷熟，

燃柴取暖待明天（天明）。春去秋归人心暖，

**瑟瑟寒霜冻死猴。

**

对联

是驴是马战场上见，

是真是假风浪中看，

走着瞧。

**

这话一点也不假这就是：

某君曰：臭鱼找烂虾，臭鱼找烂虾，

乌龟专找大王八。乌龟专找大王八，

嘻嘻嘻！这话一点也不假。嘻嘻嘻！这话一点也不假，

只有我们几个呆在一起才融洽！嘻嘻嘻！真是一点也不假。

要问这是啥道理，嘻嘻嘻。

你娘是个大地主，我爹才入过两次国民党，

他爹是个资本家，王五的老 K 不过是个小稽查，

张三妈是个“烂菜花”咱们几个朋在一起，

李四的爸是个伪员警，结成狗党。

----干脆就叫“X X X”。

战风才添春色，今又输，赢将至，

造反方显钢强，枪上膛，大乱宇宙多惬意，

先输后赢反复有常，坏蛋一扫光。

如来赞

石猴本英豪，大圣赌输赢，

初生猴性刁。佛手留猴臊。

只道会攀山，一掌翻过去，

谁晓天更高，休想将尾摇。
大言当皇帝，只缘收歹心，
欲把天庭搅。西天方得到。
其知玉帝蠢，若把顽心保。
如来是佛老。山压至今遭。

清平乐

红梅俏艳，革命熔炉争雄，
气煞墙草颤。越炼红心更红。
红梅心红经百炼，千秋挺胸昂者。
墙草随风摇撼！万戴小丑狗熊！

《无题》

身在曹营心在汉，下决心，坚宏图，
昔别几日胜几年，誓与崽子不戴天，
见信心里好生烦，有朝一日我归还。
崽子竟敢来翻天。杀他个片甲不留马仰人翻！

六、鼓吹血统论搅乱阶级阵线灭绝人性实行法西斯专政

联动狂热地鼓吹“自来红”谬论，以反动血统论代替党的阶级路线，以此来抬高自己，为自己掌权做舆论准备；以此来打击群众，压制革命，搅乱阶级阵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联动七月份就抛出反动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
基本如此（鬼见愁）
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以后有各种变种，如“代代相传”，“完全如此”，“永远如此”，“绝对如此”等。

江青同志建议将对联改为：

父母革命儿接班
理应如此
父母反动儿背叛
联动不听，却改为：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专政到底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代代相传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老子革命打江山
代代红
儿子造反为江山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谁敢翻天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真是乌七八糟无奇不有。诸如此类，数不胜数。联动之所以如此卖力地鼓吹反动血统论目的就是要“世世代代掌大印”，就是为着“高干子弟要掌权”。

请看几个调查材料：

▲师大一附中干部子弟掌权情况：

刘少奇把出身好例为“左派”的必备条件。狂热鼓吹反动血统论。刘少奇亲自控制的师大一附中工作组进校后就急急忙忙地秘密召开部分高干子弟会。肉麻地吹捧他们“最可靠”，“阶级感情最深”，“是立场坚定的‘左派’。”不久，工作组就宣布五名高干子女为工作组组员，并一手抛制了全是干部子女的革委会。不用说其他出身的革命师生，就连工农子女和工人都一律排除在革委会之外。当时各班掌权的核心组也都由干部子女组成。而革委会成员权力大小，地

位高低，则完全按父母官职大小来确定。高一学生刘平平就是工作组组员，又是革委会主任，并不是革命群众选举，而仅仅因为她是刘少奇女儿，她爸爸官最大。师大女附中初一学生刘婷婷任革委会委员，更没有别的道理，唯一的条件她爸爸是刘少奇。

刘少奇的阶级路线就是“高干子女要掌权”。就是“自己子女要掌权”。

再请看清华大学的有关材料：

▲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在清华大学向贺鹏飞调查材料整理如下：

一、6. 24 日辩论会后，叶林讲：“我们看着你们不行了，顶不住了，如果你们完了，我们也完了。但是你们不要怕，即使我们被赶走了，我们还要回来。”

二、6. 14—6. 15，叶林把一大群干部子弟叫到强斋去开会。说：“干部子弟要掌权。”凭印象任命各系革命委员会主任，指名 X X X 讲：“你当 X X 系革命委员会主任。”又指着 X X X 讲：“你当 X X X 系主任。”又问自控系主任谁当，刘涛自告奋勇地说：“我当。”叶林表扬了刘涛说：“在这个问题上要当仁不让。”

三、工作组临撤之前，工作组决定成立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工作组付组长扬壬放任命贺鹏飞为组长，刘涛、李黎凤当付组长。叶林说：“权一定要交给你们，交给别人我们不放心。”“工作组有错误，这我们的，要全承担下来，与你们无关，我们要保你们，把权交给你们。”

清华大学高干子弟掌权的概况：

一、简介：

刘涛——刘少奇之女，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付主任、校临时主席团和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

贺鹏飞——贺龙之子，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

李黎凤——李井泉之子，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及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

刘菊芬——刘宁一之女，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

乔宗淮——付外长乔冠华之子，伪“三临”（校“文革”临时敌委会、临时主席团、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数力系“文革”主任。

胡劲波——胡克实之子，机械系“文革”负责人。

王新民——王维舟之子，伪“三临”的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

王苏民——四机部部长王铮之子，伪“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之一。”

再看一个下面的调查：

北京的大中学校，特别是高干子弟集中的或刘邓直接插手的几个学校清华、北航、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景山中学、女一中、北大附中、二十六中、十一、八一、一〇一中……几乎或大部都是高干子弟掌权。

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在七机部原是工作组红人。刘允真在丰台农业学校被安排为临时团委书记，参加了工作组；刘平平在师大一附中被安排为革委会主任，参加了工作组；刘婷婷在师大女附中被安排为革委会委员。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师大女附中，原来连班代表也不是，也被安排为革委会委员。女儿邓林在中央美术学院被安排为革委会付主任；邓的儿子邓朴方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学习，原候补党员，也被王任重内定为北大校党委委员。

此外象贺龙的几个孩子，贺鹏飞在清华、贺捷生在北航、贺迎明在景山中学。赵如璋的儿子赵丹平在京工附中，邹家尤的儿子邹建平在京工附中，孔原儿子孔丹在男四中、张鼎承之女张梅妹在女一中，张文舟的女儿张兰兰在女三中，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在男八中，安子文的儿子安国在石油附中……一个个都当上了“红卫兵”或革委会的头头。

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刘、邓拼命鼓吹反动血统论的险恶用心。工作组在时，刘邓就实行高干子弟路线，企图为复辟资本主义作干部准备。工作组撤了，刘邓又通过反动血统论，为高干子弟掌权做舆论准备；组织起自己的阶级队伍，企图通过高干子弟继续左右运动方向，执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压制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抗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搅乱阶级阵线、混水摸鱼。随运动的深入，反动血统论又有新的用途，这就是压制群众，实行白色恐怖。

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摧残

联动分子（东、西、海纠）为了扼杀文化大革命，挖空心思对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进行政治迫害和精神摧残。下面几个方面的调查：

一、不准学毛着。运动初期，他们把大批非“红五类”出身的、不同意反动对联的、反工作组的师生员工一概打成“右派”“反革命”“狗崽子”，强行编入劳动队，不准他们学毛着，请看下面几个材料：

▲定福庄中学的“五条禁令”。

五条禁令

1. 不许学毛着和毛主席语录。（他们解释说“右派”“狗崽子”学毛着只会越学越反动）

2. 交出自行车和手表；

3. 降低工资到最低生活水平（十二元以下）能活命就行；

4. 只许吃窝窝头不许吃菜；

5. 禁闭劳改。

▲8. 26 农大附中《红旗》一小撮人，强行抢去了 131 名“狗崽子”所带的所有毛着和毛主席语录。

▲清华附中《齐向东》把大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同学和非“红五类”出身者一概骂为“狗崽子”，搜去了他们所有的毛着，他们的借口是“狗崽子没有资格学毛着，沾污了毛着”等等。

▲一中和六中竟然把毛主席语录当作一种对“犯人”的惩罚手段。

按：联动（东西海纠）一小撮混蛋自己不学毛选，也不准别人学毛选，他们仇视毛泽东思想，害怕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充分说明了他们就是一伙刘邓黎养下的反革命。

二、不许带主席象章。

▲清华附中郑光昭同学因出身非“红五类”，把他打成“狗崽子”“反革命”，胸前的主席象章多次被联动分子抢走，借口是“反革命带了主席像是对主席的侮辱”等，最后，这位同学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忍着剧痛，用锥子在胸前穿了一个洞，把主席象章别在肉上，鲜血一下子涌出来。他流着热泪对着毛主席象说：“毛主席呀毛主席，这下主席象章再也不会被他们抢走了”。

三、不准参加政治活动。

▲农大附中“八·二六”事件的受害者几乎全被剥夺了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力。剥夺了选举权。不准参加“七·一”庆祝活动，不准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抗美援朝”大会。不准参加“八月十八日的毛主席接见。”

▲清华附中全校一千多人，除二百多名“血统高贵”的“红卫兵”外，其他八、九百人全部剥夺了“八·一八受主席接见的权利。”

四、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

反动血统论盛行时，许多学校就规定：学校的笔墨纸张“狗崽子”一律不准用。他们还规定：“红五类”可以全天在校外串连；职员及其他一般出身的下午五—七点可以串连；“黑七类”不准出校门。

此外，他们还滥发各种“通谍”“勒令”剥夺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各种政治权力。稍有违犯就拳打脚踢鞭子抽。动不动就无限上纲随时把你打成反革命。出身工农的接近了出身非“红五类”的，工农出身的被骂为“划不清界限”。出身非“红五类”的被扣上“企图拉工农子弟下水”的罪名。非“红五类”的同学接触多了，他们又说是搞“密谋”活动。饭吃少了说是“抗拒改造”，吃多了又说成是“对粮食政策不满”；写检查说成是“蒙混过关”，不写检查又说成是“消极对抗”，念语录声小了被说成是“没有感情”，声音高了又说成是“出风头”，高兴了被说成是“不作思想斗争”，苦恼了又被说成是“抗拒同学批评”……总之一句话，不准革命。在他们的皮带下，简直没有广大革命同学生存的余地，第三师范十几个同学被逼得无法存身，含愤离开学校。有许多革命的小将被逼得精神失常被迫自杀呵！据安定医院门诊部统计，仅在一天之间就送来了八个因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神经失常者。

下面请看几个典型事例的材料：

▲女二中革命小将更改“扬威路”的事件：

八月二十日上午十点，女二中李源、张岚等几个革命小将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贴出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的宣言。宣言贴出不到二小时，就遭到伪文革张X X及伪红卫兵的一些人的迫害。他们气势汹汹地大叫：“苏修都照象了，这是国际影响问题，快撕了去，不然国际影响更大了。‘大骂’狗崽子企图制造国际影响”。

高二（4）班的革命小将首先以红卫兵的名义将“扬威路”的路牌贴上“反修路”的名字。结果遭到一顿臭骂：“狗崽子冒充红卫兵”。

中午，校门贴出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非红五类不许出门”的通令。下午就不许他们出门，他们要到王府井贴大字报支持男二中破四旧。于是发生一段对话：

你什么出身？

职员。

不行！叫你们班红五类贴去。

下午“外办”（市委）来了一个人，说什么“以我个人的意见，还是撕了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红卫兵”的一些人就是这样挥舞起反动血统论的大棒，企图把这个震惊中外的革命行动扼杀在摇篮里。

这一革命行动得到工人同志的坚决支持，8.20下午六点多钟工人敲锣打鼓来送喜报。小将喜在心里笑在脸上；他们却大骂小将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想出风头等等。

8月21日，党中央毛主席知道这个消息，立即给予坚决支援。那些人一看有利可图，便厚脸皮说，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劳。新华社记者来采访，他们装模做样去照象。原来贪天之功据为已有，把真正的革命小将抛在一边，主持反修路命名大会，拍电影，受周总理接见……他们的灵魂就是这样肮脏。

随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了原样，事实说明，压制群众的干将绝不是什么破四旧的英雄，绝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真正的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我们革命造反派。

▲农大附中“八·二六”事件

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农大附中召开大会，该校为“红旗”“红卫队纠察队”一小撮暴徒控制会场，把一百三十一个出身非“红五类”的无辜同学（有许多同学是最早站出来的造反派）拉出会场，残施毒打（挨打者占全楼人数三分之一），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雷管炸，剪阴阳头，侮辱女同学……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同学衣服被打成碎片，有的脊骨被打断，有的眼睛被炸失明，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烂血流如注……更加可卑的是他们打过人之后，还不准带着血出去，全部得洗去。后来，盆盆的清水竟然都变成了发黑的血水！更加不能容忍的是他

们把被打者的主席象章全部抢去，把他们的毛选、语录扔在地上踩来踩去！他们一边打还一边无耻地说什么“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毛主席给我们说的‘要武吗！’”这真是卑鄙之极无耻之至！决不允许联动分子（东西海纠分子）篡改歪曲最高指示！

农大附中“八·二六”事件是刘邓路线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血债要用血来还！

▲六中劳改所简介

六中劳改所是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来残酷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人间魔窟。劳改所设在六中后院东北角。由看守室、刑讯室、男牢、女牢几部分组成。上设值班岗楼（由该校四不清干部武继广、李雁书设计），安有警铃、自动控制门、探照灯、夜间稍有风吹草动，便警铃四起，强光环射，西纠分子发出阵阵怪叫，一片阴森恐怖。墙上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六个血淋淋的大字（由红漆和被害者流出的鲜血写成）。所内常放长短刀、木枪、皮鞭、弹簧鞭等种种刑具。正门用砖砌死，一律由后边窗口跳进跳出。除“犯人”及看守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严禁入内。为怕泄露劳改所内幕，曾打算挖地下室，因土质不好中途停工。大批革命群众就在这里惨遭迫害。左派学生王光华、老工人徐沛田就是被西纠分子活活打死、勒死在这里。人们称六中劳改所是新式“白公馆”和“渣滓洞”。

▲徐沛田事件

徐沛田是六中的退休老工人，今年八十六岁，对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他常说：“要是在旧社会，我早就死了，我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就这一个无辜的老人也惨遭西纠一小撮人的杀害。

九月初，以朱支前为首的暴徒以“老吸血鬼”莫须有的罪名，对徐沛田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他们强迫徐跪在地上，嘴叨着破鞋爬行，把老人推进小便池，用水管喷射，用尿浇头，逼着让他吃屎、喝尿，真是恶毒之极，一伙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徒！

他们将徐拉到淋浴室，用冷水浇身，然后又用滚开的水泼至徐的身上，把老人的皮都烫掉了，浑身通红，面部庞肿。

暴徒们并不就此罢手，他们把徐沛田带进厕所，活活地把老人用绳子吊

死。事后还将他的尸体放在院内曝尸三日，并将面部全部打烂。

▲王光华事件

王光华是六中高三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积极，六月三日他就和同学们贴出了全校第一张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但是推行刘邓反动路线的西纠一小撮却对他恨之入骨，竟然下毒手将他杀害了。

九月二十七日，他们乘王华串联回校之机，非法将他劫持到“劳改所”。暴徒们兽性大发，蜂涌而上，拳打脚踢，用木枪向王身上乱戳乱刺，并用枪托劈头盖脸地疯狂乱打，直使王光无法忍受，躺倒在地，暴徒们一面用脚猛踢王的头部，一面恶狠狠地说：“触及你的灵魂。”

第二天早上王光华便尿了血并且昏到在地上。但是，那些刽子手（粟胜利、陈小伦等暴徒）还不甘休，又将王殴打。到中午王光华便支持不下去了，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十几分钟后便死去了。

到了深夜，这一小撮人为了封锁消息，掩盖罪行，趁夜深人静将尸体送火葬场火化了。

王光华同志的死是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滔天罪行的深刻揭露，王光华同志同刘邓反路线的英勇斗争表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死不怕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在谈到王光华同志的时候，江青同志说：“他是你们应该学习的英雄……”戚本禹同志说：“他贴第一张反党支部的小字报，可以算左派学生。”江青同志说：“对，应该算左派。”

▲耿小西被刺事件

十二月二日，继“劳改所”之后，六中“红卫兵”中的那一小撮人又成立了什么“砍变节”战斗组。他们企图利用这一恐怖组织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以保住他们的统治。

“砍变节”声称：“要除掉叛变者”。当天黄昏就由他们的一个打手，六中“红卫兵”骨干鲍陕安（现已被公安局逮捕）动手，对正要揭发西纠的革命学生耿小西进行公开行刺，耿身中八刀，其中一刀刺伤肺叶；他们本来是想一刀致死的，但因杀人者缺乏经验，连刺脖子两刀都未中要害，以后便乱扎起来，这样，耿小西才又拾得一条性命。

反动血统论就是这样把鲍陕安这样一个烈士子弟推向犯罪的道路。

▲王明瑚事件

王明瑚是六中俄语教师，平时工作认真负责，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投入运动。对于“红卫兵”一小撮人执行的刘邓反动路线，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因而触怒了西纠一小撮“血统高贵”的人，他们于十一月七日，乘王明瑚值班的机会将王非法绑架到“劳改所”。

他们抢走了王明瑚的手表，将他打倒在墙角，用脚猛踢，抓着头发往墙上撞来撞去，发狂地向王的头上、身上抛唱片。王明瑚小腿被踢肿，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他们动用了“坐飞机”的酷刑，几个暴徒揪住王的四肢向上抛，使之重重地摔在地上，这样抛了三、四次之多。然后将王上衣剥光，用钢丝鞭猛抽一百余下，使其昏过去。他们恶狠狠地说：“这就是你小子和我们干部子弟做对的下场。”暴徒朱支前手还拿大姆指粗的钢筋抽打王明瑚，甚至用刀吹伤王的前额，鲜血喷出老远。

经过这几番非人的折磨以后，王明瑚已经是气息奄奄了。但是那群歹徒们还让他劳动，叫他围着炉子跑，逼他举大砖头。

直到十一月十九日陈伯达同志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首长来到六中、才使王明瑚出了虎口。

六中一小撮人疯狂进行武斗，制造白色恐怖。顽固推行刘邓反动路线。革命群众的遍体伤痕向我们无情地控诉了刘邓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一定要向刘邓讨还这笔血债！

七、打砸抢抄，搅乱社会治安

▲北京几个重点学校的统计：

校名：八一学校定福庄中学北京小学育英学校

损失数字：一百万元五万元五十万元一万四千三百元

校名：实小康乐里中学丰台三中

损失数字：八千元五千元五千元

▲定福庄中学联动破坏统计：

损失物品：图书乐器实验室医务室仓库

数量：一万册全套二千块以上

价值：三千元七千元七千元以上五百元以上七千元以上

玻璃电线被剪楼房破坏

二千块以上电灯被摘破坏

六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上

▲仅仅一个“八一”学校：

损失物品：电视机消防设备各种车辆电影机图书、幻灯机、照像机、答
录机

数量：5 部 225 件 9 辆 28000 册

价值：二千五百元六万七千元二万三千元二千元四万五千元

音乐器材体育器材教具 349 件、四个仓库 673 件抢劫一空

一万元四万五千元三万四千元

损失总值一百万元之多。

用这些钱可买：铁轨四万公尺；肥田粉四千五百吨；解放牌汽车七十辆；
大米五千吨，够二万五千人吃一年；够一所普通中学十四年的经费。

▲联动分子在大串连期间以破四旧为名，大偷大抢大饱私囊。十一学校
联动分子王毛点一个人就偷了以下各种东西：

1. 偷汽车：四次（有一次竟开着偷来的汽车准备逃亡香港，困遇上检
查站，未成）

2. 摩托车：一辆

3. 自行车：三辆

4. 手表：二块

5. 半导体：一个

6. 望远镜：一个

7. 军大衣：二件

8. 棉衣：一件

9. 呢子服：二件

10. 细腿裤：一条

11. 白补衣：一件
12. 女式毛衣：一件
13. 尼龙衣：二套
14. 尼龙袜：三双
15. 大提包：一个
16. 纱巾：一条
17. 香蕉：一筐数十斤
18. 甘蔗：一捆数十斤
19. 现款：四百元以上
20. 粮票：一百斤以上。

▲定福庄中学联动分子叶 X X 一人偷了以下几种东西：

1. 华沙牌小轿车一辆。（该车是经委的，停在北京站等客，转眼功夫就被偷跑，开回学校。后被公安局查获，该犯拘留十五天）
2. 探照灯一个（该探照灯是 X 生产队打谷场上所用，晚上悄悄偷走留一条子，名曰：“借走了”）
3. 自行车三辆以上。（有一次叶偷车回来，对他的同伙说：“我把车子弄走后，那个老头——失主回来一看车子不见，急得哭起来了”（何等可耻！）
4. 手表一块
5. 扩音器一个（北京机械学院的）
6. 各种电讯器材一堆

通过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联动分子腐化堕落道德败坏已达到了何等地步！他们口口声声说什么破四旧，其实他们是四旧最大的继承者维护者，他们还口口声声叫喊什么“镇压流氓”，其实联动才是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大流氓！

八、流窜全国，镇压各地文化大革命

联动中一小撮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分子，打着“革命串连”的旗号，到处镇压群众革命运动。他们自封“老子天下第一”，呼唤着“自来红”“红到底”的口号，打着所谓“阶级感情深的”幌子，流窜全国各地，大保特保，破坏

各地的文化大革命。

▲在新疆：勾结反动组织“红造部”（性同“联动”）大保王恩茂。

人大附中联动分子刘丹利、赵文峰、何延立、乔昕、张春、徐建等七名于去年十一月冒充乌市八一学生去乌市，于二月初被清华井冈山、乌市八一学校造反派围歼，押送回京。罪行如下：

1. 同乌市“八?一”学校反动组织“红造部”（由本地革干革军子弟组成）勾结，搞地下联络站，写反动标语，散反动传单，写反动日记，并大搞打砸抢等法西斯恐怖活动。专与“红二司”等造反派作对，乌市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2. 刘通过其父老战友乌市后勤部马部长的关系下到 7324 军密工厂，打制匕首破坏生产。

3. 刘等还准备去喀什去买匕首，然后再由兰州去内蒙买刀子。未成。

4. 新疆党、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他们视为珍宝，称他们和“红造部”为“左派”革命组织。

▲在江西勾结保守组织工人赤卫队，大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杨尚奎、方志纯等。罪行如下：

1. 攻击首都三司，骂“三司”是“反革命组织”“参加三司的都是狗崽子”、“蒯大富、聂元梓都是狗崽子”。

2. 在江西省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江西宾馆）门前，自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家伙多次挑起武斗。据反映，在九江、井冈山等地多次发生他们行凶打人的事件。

3. 甘霖（杨勇之子，代名）、杨小霞等四人拿着据说是省委给的四、五百元大吃大喝，砸坏南昌市招待所的门窗，抢走江西日报的高级照相机，偷走公安机关摩托车二辆。

陈伯达同志的二个月总结公布后，还大肆鼓吹反动对联，声称：“谭力夫、刘涛的观点就是正确，阶级感情就是深。”甘还说：“陈伯达算老儿？等运动后期看。”

▲在上海：

1. 以西纠名义先后派出几批人去上海，周荣鑫（或许明）事先电告上海市委说：“这二十几个孩子很懂政策，请接待”。曹荻秋如鱼得水，在一次大

会上得知他们的下落，立即召见。精心安排吃住，调拨物资，大量印发西纠“通令”。后曾写一份“调查报告”上交周荣鑫。

2. 彭小蒙在上海生活糜烂大肆挥霍，在政治上死保陈丕显、曹荻秋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3. 无理打死父子二人，引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恨。

▲在福建：

1. 西纠政宣组曾组织 3 个“宣传队”，大读“通令”，很得叶飞赏识，叶曾四次召见，并让他们住省委干部第一招待所。

2. 与“东海兵”勾结，大搞法西斯恐怖活动。

▲在广州：勾结反动组织“肃反委员会”和“主义兵”大保赵紫阳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行如下：

1. 去年十二月联动分子刘微宾（女三中学生）、李复明（八一学校学生）、何汉生（北京八中学生）等数人来到广州勾结“主义兵”“肃反委员会”驻在一被抄的资本家家中，扬言要“大干一场”。多次召开黑会，计画潜逃某小岛开办军垦农场，逃往海南湛江等地。

2. 刘多次攻击中央文革。说“江 X 与陈 X X 关系非常密切，互相吹捧”“我公开反江 X 反三司”。并同李复明一道多次对江青同志进行人身攻击。

3. 刘还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真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当权派都被揪出来了，我们国家都不知十五年在谁的统治下”。

4. “十一”学校王 X X 等曾在广州偷来汽车一辆开往湛江准备逃往香港。

▲在内蒙。大保党、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锋、王一伦，专与呼三司等作对。四月内蒙紧张，联动分子大批涌入，充当打手。

▲在沈阳。勾结反动组织“红后代”至今仍来往密切。

▲在山西。据陈永贵同志谈，联动分子在山西农村到处活动，勾结保皇势力、地富反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和社会治安。

▲在陕西西安。勾结“红恐队”（该组织与联动性同）大搞抄砸暗杀等法西斯恐怖活动，死保大叛徒刘澜涛破坏当地文化大革命。

▲在广西。刺探军事情报，绘制军事地图，有的竟偷越国境跑到 X X 国

去。

▲在西藏。买刀子和匕首。

▲在天津。勾结反动组织“特别行动委员会”（该组织与联动性同）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破坏天津文化大革命。

▲在四川。勾结反动组织“产业军”，死保李进泉。最近四川发生多起大规模流血事件，联动分子与产匪一起参加了对革命派的大屠杀。

▲红鹰纵队在昆明（该纵队属联动一部分）

（一）严重的政治问题

1. 假借周总理批准，国务院通过去云南办军校：《抗美军政大学》

2. 要军用地图、枪枝（未成，便自己制）、并探查当地公安局和解放军驻扎情况。

3. 散发反动传单，如六七年一月十日散发了反三司、保联动的反动传单，署名为：联合行动委员会驻昆明联络站。

4. 勾结当地保皇组织“红卫兵总部”他们手里有很多这个组织的介绍信。

5. 招谣撞骗，骗云南省委，声称有中央介绍信，骗取省委帮助，刻校章，伪造学生证，骗取介绍信。

（二）反动言论

1. “江 X 讲话漏洞百出、前后矛盾。”

2. “江 X 讲话下面无人听，起哄”。

3. “陈 X X、江 X 搞臭西纠是不对的。不合理的”。

（三）特务活动

1. 联络站、联络点用代号。联络站有：民盟、民革、翠湖宾馆、九三学社、民族学院。

2. 每人用代号联络：如葛卫东 05，张成江 06，白殿芬 07。

（四）联动成员：

1. 66 年 12 月份葛卫东回北京找到联动的组织部长，整个组织加入联动（以中央警卫师的名义参加），在外仍用红鹰纵队名义活动。

2. 今年 2 月份杨毅由北京寄信给葛（葛等 2 月初被捕，故信落到造反

派手中)，内容有：“北京联动不行了，我还未暴露，你们千万不要暴露，咱们红鹰纵队是联动的十大纵队之一，是中坚骨干，你们要以别的名义活动，听说北京揪出了许光达，看来你这个人不会用脑子，对人没有分析，以后一定要注意这方面。……”

（五）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壮大。

大量吸收高干、革干、革军子弟。

（六）流氓作风、打骂成性，砸、抄、抢样样都干。

（七）生活腐化，糜烂。

去云南后，向省委要证明信、钱、车等一切需要的东西，住高级房子，成天吃、喝、玩、乐。

（八）建校地址：

国际边境：元江、红河、到当地找县人委要房子、军用地图、枪枝等物。

他们虽在那里搭了两个棚子，其实是住在县人委高级房子里，吃喝玩乐。

（九）捕后发现：

1. 联动袖章 20 个；
2. 各式各样匕首、大小刀子若干；
3. 图章几个、汽枪两枝、铅字、扩音器、大洋刀、摩托车、汽油、钱……
4. 汽车轮胎 5 个（可做救生圈），许多很长的橡皮管（可用于潜水）；
5. 据同伙反映，葛有手枪一支（未抄出）；
6. 被捕后向外发信，说：我们被抓住了，你们要和三司搞好关系、越亲密越好、要利用三司……

（十）说明：

1. 他们得到周荣鑫的有力支持。
2. 周对他们曾说过：你们到那里去打游击很方便（同伙几个交待）。
3. 葛说：咱们到越南很方便，到越南假投降，投降后到台湾、蒋介石很想接见红卫兵，我们就把他砸掉就立了一大功。

九、腐化堕落、生活糜烂透顶

▲北大附中《红旗》生活糜烂的有关材料：

《红旗》中的一小撮人，思想反动，灵魂肮脏，生活腐化。他们借破四旧为名，行满足自己私欲之实。把抄家来的现款、金表、金笔、半导体收音机等归为已有。在“红旗”头目牛、宫、彭的带领下，“红旗”分子争先恐后地贪污盗窃、敲诈勒索。手持匕首对准老师心窝“借”钱的场面屡见不鲜。为了给自己的强盗行径开脱、竟恬不知耻造谣说：“总理说过，可以把抄家来的钱当串联费。”

这一小撮人嫌学校饭菜不够味，就偷来医务室的电锅，在宿舍里熬咖啡，炒鸡蛋。他们带着脏款下酒饭，吃烧鸡、烤鸭。有时在海淀小酒馆里一喝就是半夜，有人甚至酒精中毒，送至医院。“海顺居”是海淀一个酒饭馆，一个“红旗”分子竟狂叫：“海顺居万岁”！他们精神颓废、听黄色音乐，看黄色小说，酗酒发疯，变成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苗子。

仅彭小蒙一个人，就贪污四千元以上，这还是有帐可查的。买了五辆自行车、2 辆摩托车、手表、球鞋等物。

一次彭小蒙和她妹妹外出串联，带走 45 元，可是她妹妹就丢了二百元。这次串联中，就买了四辆自行车和很多东西。钱从何而来？原来彭小蒙在外地随抄随花，无钱用就抄。有一段时间，彭每天换一块表，甚至一次就带过三块表。破四旧后，她狗爹彭炎说：“小蒙这下子可有钱花了！”一句话泄了天机！

为了拉笼本班的 X X，彭小蒙很大方地给她一块手表，十元钱和许多高级药材。彭小蒙之流外出串联要坐飞机，要坐“红旗”牌轿车，要住高级旅馆，在井冈山，她住在茨萍招待外宾的高级旅馆里，吃的是最高级的食品。

十月初彭小蒙等一小撮人到上海，找到一个上海大资本家家里住下，住的是非常豪华的西式洋楼，用的是各种贵重家俱，还在“吃”字下功夫，苦心钻研，怎样把菜做得更好吃。一天到晚，大吃大喝，醉生梦死，道德败坏。

▲八一学校联动分子生活糜烂的有关材料：

一小撮“联动”分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追求低级趣味，成天吃喝玩乐，在宿舍用偷来的电炉、铁锅架起小灶，将盗窃来的食物，滥肆挥霍，吃炸鸡蛋糕，炸麻雀，甚至吃猫吃狗，将猫头砍下，肚里塞一条蛇，烧什么“龙虎斗”高级菜。酒足饭饱就睡大觉、打拳、聊天、下棋，甚至看黄色小说，听黄色音乐。

欣赏的是什么美人、明星。他们象夜猫子，每天夜里两三点不睡，听爱情歌曲、跳舞、吸烟、酗酒、喝得酩酊大醉，拿着刀一边乱骂，一边乱砍。他们借破四旧为名，大肆贪污盗窃，把抄来的手表、相机、金笔、半导体、现金吞为已有。有的竟示出皮鞭、匕首敲诈勒索。他们头目的宿舍里，摆着各种抄、偷来的高级陈设，大理石桌子，沙发，大衣柜、屏风、电视机、电唱机、半导体收音机、字画、花瓶、双人床、雪白的双人蚊帐。有的还带着金戒指、金表、骑摩托、坐小轿车。

他们强令司机开小轿车到城里专程给狗配种。他们让狗趴在钢丝床上，垫上近百元的体操垫子，穿大衣，给狗吃香肠。他们还玩“狗骡斗”，将狗和骡子拉到广场中央斗，他们骑摩托绕场转。他们还将棉花绑在猫尾巴上，浇上汽油点着火，看猫打转。将炮竹塞入猫的肛门，点着炸裂猫的肛门取乐。

十、垂死挣扎，破坏革命大联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迅猛异常地向前发展，随着伟大的“一月风暴”，革命开始进入大联合大夺权的阶段。大联合，是革命的需要，战斗的需要，是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召。

为了促进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派解放军“支左”“军训”是毛主席的又一伟大的战略决策。

革命派在乘胜前进，联动一小撮丧家狗也在作着最后的挣扎。

（一）破坏军训。

▲请看北大附中一个学校的调查：

解放军进校后，迫于革命群众的压力，联动分子曾参加了一个短时期训练。以后解放军通过调查研究亮明了观点，表示坚决支援该校造派组织——“井冈山”。在解放军的支持下，“井冈山”联合其他革命派夺了学校党政财文大权并且有步骤地开展对刘邓路线、联动思潮的大批判。这时联动分子便显了原形，由一开始的形式上的参加军训变为全面抵制军训，由抵制军训发展到攻击军训辱解放军。从“井冈山”夺权至今，他们中大多数人不参加军训，说走就走，说来就来，谁也过问不得。

他们攻击辱骂解放军的言论有：

1. 解放军是变相工作组；
2. 军训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 军训是个大阴谋；
4. 解放军是“土匪”，有“军阀残余”；
5. 解放军随便把一个组织打成反革命；
6. 解放军迫害革命小将；
7. 解放军早就该滚，走了我们好大干；

另外联动分子还多次围攻军训战士。有一次，某排长走到门口，一群联动分子就如狼似虎地扑了过来，大叫大骂，并无理责问解放军为什么支持“井冈山”等。还有一次，一个联动分子竟然在二楼视窗用汽枪打一个解放军战士。用弹弓打解放军，在解放军的被子上涂写反动口号，盗窃解放军衣物等事也多次发生。

▲育英学校联动分子为了破坏军训，曾经在一个晚上把解放军的鞋子全部偷去。

▲十?一学校联动分子王毛点根本不参加军训，多次偷解放军的大衣并多次指责解放军大骂：“要不是因为带着领章和帽徽，我早就砸烂你的狗头了！”（何等猖狂！）

▲二十八中发生大规模武斗时，X军训战士前去制止，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联动分子用砖头瓦块把该同志打得头破血流。

▲人大附中联动分子的活动调查：

人大附中“红卫兵”是联动的骨干。一直对抗军训妄图翻案。他们拒绝军训不学毛选，并大骂“解放军是变相工作组”、“人大附中文化大革命搞不下去就是你们解放军压的”，扬言要“赶走解放军”。严重的是，一个联动分子竟用砖砸解放军。

他们对革命派组织“井冈山”恨之入骨。他们大骂“右派休想翻天”“狗崽子不要太狂”“打倒井冈山”等。一次他们捉来三只麻雀放在桌上砸的血肉横飞，写一纸条：“这就是井冈山的下场”，以示恐吓。

三月十八日，他们连出三篇反动大字报。在大字报中他们把社会主义比作“黑暗的旧社会”还责问什么“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

三月二十二日，一个联动分子竟骂“红代会”是“黑会”。

三月十八日以后，他们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纷纷要求入“井冈山”，准备打入革命组织内部，伺机夺权。

（二）转移斗争大方向：

当前的斗争大方向是什么，中央文革早已给我们作出了明确回答：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大联合。联动分子为了转移斗争方向继续为刘邓路线效劳，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口号，他们的行动口号就是：“镇压流氓！”（其实是以“镇压流氓”之名挑起武斗，残酷围剿革命派。）

到底什么是流氓？他们说：“帽子歪戴的，扣子没扣的，头发留得大的梳得光的都是流氓，都该镇压”。

四月五日清明节，联动分子成群结伙去八宝山，在墓前大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散发反动传单：“红卫兵，革命汉，活着干，死了算，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老子英雄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高喊“打倒党内最大的当权派”的反革命口号。

十点左右他们来到颐和园，三百多人买十几张票往里冲，挤坏服务员、游人、票箱、并动手打前来劝阻的解放军。

在园里，他们以打流氓为名，大打出手，共打十七人，重伤六人，一人脑震荡。

凡是穿白球鞋没系带的，头发长的，穿翻领大衣的都被称为“流氓”残遭毒打。

有四个职工在大民餐厅吃饭，无缘无故被他们拖出，剥去鞋子扔进湖里，一顿毒打，当他们知道这几位工人抄过联动后，他们便打得更凶，可见他们打流氓是名，行阶级报复是实。

联动分子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对。

钢院钢铁公社当场抓住了正在行凶的两个暴徒。红代会作战部、体院、新北大、钢院、矿院、农大等战士纷纷闻讯赶来。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围歼战，经过二小时战斗，抓住首恶分子一百二十名，搜出匕首十把，带勾钢鞭一把，打人的宽皮带数十根，步枪子弹二发、大批反动传单。

▲天安门武斗行凶事件

四月二十八日深夜，联动十六纵数十人围住了在天安门前贴标语的钢院附中

同学，发生争吵，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数人赶来解围，也被分割包围。他们用皮带、刺刀、匕首、垒球棒、长剑朝被围的同学猛抽乱砍。有的头被打破，有的脸被打肿，有的肚子被刺伤。（有血衣作证）。

▲写恐吓信。

女八中东方红，三十一中东方红，三十五中，三十九中井岗山（五封）、新四中公社（八封）八中、六中红旗等中学造反派都收到各种恐吓信。内容大都是下流的谩骂，有一部分是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给三十一中《东方红》的恐吓信：

7434 代号 发 1008 号

致北京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的：

狗崽子、臭流氓、王八蛋们，听你们爷爷发话：

你们八月份躲在家里，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等我们犯错误时，你们却大打出手，抓住错误猛攻猛打，妄想整垮你们的祖师爷（老红卫兵）你们口称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却妄想翻天，还想当造反派，夺红五类的大权，放你妈的个屁吧！

凭着你们这些狗王八蛋掌权，中国好不了。总有一天你红卫兵爷爷要掌权的！混蛋们，老实听着，你们口说造反派心想翻天，想为你地主老子翻案！真是臭不要脸，你们对老红卫兵你的爷爷你的祖宗如此无理放肆，还是回家造你老子的反去吧！今后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以你们老子的下场为戒，你们炮轰李钟奇转移斗争大方向，否认红卫兵大方向，真是混帐之极！

如果你们胆敢继续与红大爷作对，小心狗头！

坚决镇压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的狗崽子！

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万岁！

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岿然不动！

砸碎狗崽子的狗头！

狗崽子休狂！

红五类万岁！

钢气节，英雄胆，酒热血，捍江山

老子革命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文化大革命第一批老红卫兵

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 abc

中发

7434 密字 3452

最紧急通告

下发各校纵队，校支队：

最近狗崽子活动很猖狂，我们行动很不便，红五类的威风起不来，望各校革干、革军子弟坚持战斗，打击造反派，准备于 4 月 24 日联合行动，各校革干、革军子弟加强团结、准备“五一”前夕大干一场，大打出手，杀下造反派的威风，打下臭流氓，臊阿飞的威风，竖立起我们革干、革军子弟的绝对权威、砸烂一切有关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罪行展览，这一行动成功后，会大长革干、革军子弟的威风、大灭狗崽子，臭流氓，臊阿飞的志气。

打倒狗崽子！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

老红卫兵万岁！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卫兵镇流纵 1967. 4 月 X 日

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狗崽子们休想翻天，你们“五一”之前有好瞧的，只不定哪天将要砸烂你们的老窝。哈哈……

你的爷爷

给女八中《东方红》的恐吓信：

“东方红”的崽子们！你们听着！

你们妄想借批联动之名提高自己，打击别人，换得解放军的信任，爬上左派的宝座，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他们的立场最坚定，绝不会支持崽子，崽子就是崽子，永远不会全心全意保卫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红五类永远向着党，绝不和反革命的崽子同流合污！崽子们休狂。

女八中的天下永远居于女八中真正的革命派！你们自成立以来，排斥异己打击不同意见，不联合群众，反对伟大的解放军……，你们的罪责已经不少了，总有一天革命的人们会讨还血债红色的八月快来了，去年的威风又要重抖，无情的鞭子又要在令人作呕的僵尸上挥舞，你们的末日要就要到来，现在你们快改邪归正，将来还可以少给你几鞭子！红卫兵爷爷在此大喝一声，狗崽了们老实点。

红卫兵爷爷上

联动最近动态：

▲四月二十二日，被联动歪曲的首长讲话传出后，女八中联动分子流着泪说：“压了我们三个多月，今天可算出头了”。并高喊：“拥护中央文革的第一次正确领导。”

▲师大女附中联动分子狂叫：“我们解放了！前一阶段对‘老红卫兵’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形‘左’实右”。

▲四月二十四日，联动分子在打给“八·一”学校革命造反派的电话中狂叫：“中央文革有什么了不起！”“打倒江X”“刘X X你们拉下得下马吗？”

▲一些革命造反组织连续接到恐吓信，上面写道：“我们要把你们这群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让你们黑血流成河，尸体堆成山。”

▲四月二十六日，一个过路工人在人民大会堂附近被联动分子殴打，借口是该工人衣领翻出。四月二十七日，一百多名联动分子在天安门前将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打得鲜血淋漓。同晚安定门外又有三个学生被联动打伤后投入“青年湖”。

▲五月六日，红旗杂志社一同志在京工附中《红旗》调查情况，在一个小时里亲耳听到三次联动分子打来的恐吓电话。

▲“八·一”学校联动分子近来经常是白天睡觉，晚上到处流窜，并在校内多次向展览会工作人员无理挑衅、殴打该校革命造反派。撕毁大字报等。

▲五月二十九日，中学革命造反派在午门前召开《将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联动分子在天安门前残酷殴打前去开会的X中学一学生。大会期间曾收到联动分子传来的数封恐吓信。

一个值得警惕的动向！

按：最近“联动”总部又向它下属的残兵败将下达了一个“联合通告”，这个“通告”是它们垂死挣扎的信号。它又一次向我们敲了警钟：联动人还在心不死，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破坏和捣乱，每时每刻都在妄图给刘邓翻案！我们的同志一定要保持旺盛的斗志，不断地研究他们的“那一套”，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现将通告转抄于后。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部

紧急联合通告

中发 7431 密字 3452（注意此为暗号！）

（下发各纵队各校支队）

继本联合行动委员会十日发出密件后，各纵队、校支队立即行动起来，战斗成果辉煌，大长红五类威风，但近日狗崽子活动更为猖狂尤其是四中王八蛋的“红四月”运动流传全市，企图煽动全市的狗崽子对我们革干革军子弟进行专政。

希各纵队、校支队配合当前形势立即行动起来，再次打击狗崽子的进攻，显一显我们红五类的威风，每个战士召集革干革军子弟借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和四月十四日戚本禹讲话之名把狗崽子给压下去！搞坏这些“左派”和解放军的关系，狠打狗崽子的威风，把他们整下去。

各纵队、校支队、每个战士见此通告后，立刻照此精神紧急行动起来，给“左派”们加上“反解放军”、“反军训”的罪名，直至搞臭，搞到红五类上台。

打倒狗崽子！镇压流氓！

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

特急火速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部

结束语

联动，这个刘邓黑司令部一手豢养起来的反革命组织，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对于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组织，必须坚决消灭彻底摧垮！经过各革命造反派几个月的坚决斗争，联动已经是四面楚歌，妄图在某一个早上猛扑过来！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奋起千钧棒，痛打联动落水狗。

（一九六七年七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摘录）

（四）特色社会中批判血统论、联动组织的余波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谭力夫的文章：《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政治上幼稚和“自来红”的优越感，一些中学红卫兵错误地提出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个形而上学的对联。在一次辩论会上，我引用了这副对联。这是错误的。此事被林彪、“四人帮”抓住，歪曲、扩大和利用，造成了极恶劣的后果。

“对联”一出现，江青、陈伯达首先煽动和“支持”，把事态引入歧途，后来更歪曲、发展到荒谬的地步。并把我们整顿红卫兵纪律，纠正、制止某些过头行为，指责为“右倾保守”、“消防灭火”。当毛主席、周总理批评这种倾向时，他们又把责任转嫁给无辜的青少年，借题发挥，无限上纲。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首先发难，装扮成正确路线代表，把我从未听过的一句地主资产阶级的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强加到我头上。把青少年对革命传统的珍重和自豪，诬蔑为对“血统”的迷信和崇拜。他给反对“阶级关系新变动论”但又有的“自来红”错误思想的人，扣上一顶“反动血统论”的帽子，并借此由头一脚把大批干部子女踢出文化大革命的队伍，大肆围剿，甚至兜捕监押。

林彪、“四人帮”当真是在批我这个无名小卒吗？不，他们是用“血统论”这根棒子，一头打孩子，一头打老子。一人受害，九族连坐，赶尽杀绝，斩草除根。

多少干部子女，被诬为“血统论的发明者和推行者”，身受迫害。我不过是受

受害者之一。不但母亲受我连累，进了八宝山的父亲和未婚妻的父母也受我连累。弟弟、妹妹因我入不了党，参不了军。江青、陈伯达亲自指挥，关锋、戚本禹出马“审问”我时，千方百计逼我交代“后台”。他们听说我的对象是个姓刘的干部子女，就硬要“找”出我同刘少奇女儿的“关系”，硬把刘少奇说成是我的“后台”，并妄图诬陷邓小平副主席、贺龙同志、林枫同志、张平化同志等。由于我父亲是湖南人，他们异想天开地把湖南省委和省委领导同志打成我的“后台”。此时，我才明白这场闹剧掩盖着怎样一个大阴谋啊！当毛主席发现林彪、“四人帮”非法捕押大批干部子女时，立即派周总理去解救这些孩子。是敬爱的周总理尖锐地指出我这种“自来红”思想应当批判；是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制止对我的万人批斗大会，不许转移斗争大方向；是敬爱的周总理几次指示恢复我的自由，让我回到群众运动中去认识错误。

现在，林彪、“四人帮”垮台了，真正推行反动“血统论”的罪魁祸首揪出来了。比我们年纪小的一代人，再不会重复我们那样的遭遇了。这是多么值得欣慰的事啊！我们确实犯过错误，遭过挫折，但是，从中提高了我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的热爱，对党的忠诚，为真理献身的的气节，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始终鼓舞我们克服逆境，奋勇向前。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章云的文章：《斥“血统论”》

最近看到一个材料：一位知识青年报考大学，考试成绩优良，身体检查合格，只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淘汰了。理由是：“在你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你反动老子的血液！”

这是什么？这是地地道道的“血统论”！

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反动的“血统论”，至今仍然被我们一些同志当做处理问题的准则。

宣扬“血统论”，是林彪、“四人帮”搞假左真右的一个重要内容。说它是假左真右，因为这种谬论听起来革命得很，似乎阶级觉悟高得很，其实，它在理论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存在决定意识。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出身对人的思想是有很大影响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是有成份论者。

矛盾是可以转化的，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可以改造自己的思想，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路。相反地，出身很好，如果不注意学习、改造，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蜕化变质，甚至陷入反革命的泥坑。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是唯成份论，而是重在政治表现。

“血统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既不懂得人们的思想如何受到阶级出身的影响，也不承认思想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变化。根据这种理论，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就象梅毒病毒一样，要从血液里遗传给下一代、第三代、第四代……，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无论是社会制度、经济条件的变化，无论是党的政策、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都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按照这种理论推论，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我们党内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负责同志，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相反地，象王洪文这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倒是命里注定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显然，这种谬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血统论”是反动的，因为它破坏和削弱了革命队伍，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剥削阶级的子女不是几千几万，而是数以千万计。是团结和教育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前途和希望，心情愉快地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还是歧视和打击他们，把他们排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队伍之外？如果按照“血统论”的主张和做法，只要家庭出身不好，就一律不准升学、就业、入团、入党，在政治上低人一等，甚至动不动就被扣上一顶“要翻天”的帽子，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同样对待，那就只能使这些人跟党和人民离心离德，悲观消极，甚至会把他们推到敌人方面去。这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政策对谁有利呢？显然只会对敌人有利，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则毫无益处。

全国解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已经消灭了阶级剥削的经济制度，对剥削阶级分子进行了长期的思想改造。剥削阶级的子女，特别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大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长期接受党的培养和社会主义教育。对许多人来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社会给予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思想影响，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他那个剥削阶级家庭。除了少数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反动分子，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拥

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是愿意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发展，这种人会越来越多。这种变化，说明了我们党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无比正确，表现了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人的伟大力量。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然而，有的人好象生怕剥削阶级绝了种。他们不仅不肯承认剥削阶级的子女会有进步，连革命干部、共产党员的子女，也要搞什么“查三代”，也要按照祖父、曾祖父一辈去填写家庭出身，甚至胡说什么如果剥削阶级的第三代、第四代改变了出身，剥削阶级就越来越少，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对象了。这真是荒唐得可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阶级越来越少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剥削阶级越来越多才好吗？

为什么在一些同志身上，“血统论”的流毒和影响这样深？除了认识上的原因，还有一个宁“左”勿右的思想作怪。一些同志认为：在对待阶级出身这类问题上，“左”了，不会有什么危险，甚至还可以博得个“立场坚定”的好评；右了，就不得了，至少也是“阶级观念模糊”。如果自己的出身不好，那就更严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党的政策落实不了，该解决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林彪、“四人帮”搞假左真右，拿“血统论”的大棒打人、整人；我们一些同志宁“左”勿右，置党的政策、党的事业于不顾。这就使得“血统论”这个反动的谬论，至今还有一定的市场。

现在是彻底批判“血统论”，认真肃清其流毒的时候了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胡思升的文章：《围绕血统论问题的一次谈话》

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来访，促膝谈心。他谈到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因父母受审查，或出身不好，或者平白无故地被扣上某种帽子而牵连其子女亲属的情况颇多。话匣子一打开，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探讨，联想不少。现把谈话略加整理，供关心和负责处理这类问题的同志参考。

客人：父母有问题、有错误，是不是等于他们的子女有问题、有错误，从而要牵连子女？这个问题你怎样看法？

主人：我们是共产党，是靠科学吃饭的。我们不能搞封建统治阶级那套“一

人有罪，株连九族”的作法。你刚才提到的这类问题，总的题目都是如何正确地看待血统和血缘关系的问题。

客：为什么我们的一部分同志会沾染上这种反动的血统论或血统论变种的观点呢？

主：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不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从历史上看，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毒不会在短短的三十年里烟消云散；从现实生活看，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刮起血统论的阴风，也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做人事工作的同志。

客：林彪有一句“名言”：“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林彪把“爹妈给的”提到决定一切的高度，否认社会实践的主导作用，就是在鼓吹血统论。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不仅把自己树为“天才”，还把自己的儿子树为“超天才”，这就非乞灵于反动的血统论不可。

主：我不懂遗传学。不过，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人的生理属性，如体型、体质等，是可以遗传的。譬如说，记忆力的强弱，听觉的灵敏度，就有先天的、即遗传的条件。但是一个人的社会属性，如思想觉悟，知识才干，是不能由父母遗传给子女的。说通俗一点，娘胎里带来的只是父母生理属性方面的某些特性；父母的阶级意识、知识才能是不能在婴儿呱呱坠地时就由爹妈赋予的。

客：你这样讲会不会给人一种印象：家庭出身对一个人没有什么影响。

主：我先讲的是：一个人的社会属性，不是娘肚子里的产物。这是为了批驳血统论观点。而一个人的品质、觉悟、知识和才能，是由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家庭在内，通过长期的灌输、培养和熏陶，由他本人在社会实践中去选择、消化吸收的结果。父母、家庭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有些子女身上还有相当深的烙印；它往往是少数人在革命征途上发生动摇、堕落、甚至叛变的一个重要根源。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否认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来选择革命道路，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革命一辈子的事实。因此，我们党历来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本人表现。

客：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父母或亲属中有敌我矛盾性质问题的人，能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本来不成为问题，但前些年也被搞混乱了。

主：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这是至理名言，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们党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父子不同道，兄弟不同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客：我们共产党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我记得就不是无产阶级出身。

主：是啊！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介绍这位现代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的出身时写道：“（马克思的）家庭是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说得具体一点，卡尔·马克思父亲的亨利奇·马克思是个律师和犹太法律学家，接受过基督教洗礼，“受过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教育”。如果按照某些特有血统论观点的同志看来，马克思的这个“不是革命的”家庭是不可能出现马克思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的。

客：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为马克思从事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活动，给予马克思以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协助，并曾为此忍受物质生活上的艰辛困苦，有时“家里一文钱都没有”。她也是一个背叛了她的贵族家庭出身的杰出女子。

主：可见，出身非革命家庭或剥削阶级家庭，并不一定能决定本人的政治态度和生活道路。这是一个需要对具体人作具体分析的问题，因为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在阶级斗争（包括民族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往往可以看到，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中会分化出一部分，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客：这少数人当中，也有为无产阶级立下丰功伟绩的杰出人才。

主：周总理一九七〇年有一次批判血统论的谈话，使人难忘。那一次，周总理讲了“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的道路可以选择”的道理，并举了陕北的刘志丹、赣东北的方志敏、海陆丰的彭湃、广西的韦拔群以及叶挺，说他们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但他们投降了无产阶级，投身革命，成为群众的领袖。周总理当时怀着深情缅怀刘志丹同志，说：“刘志丹在陕北人民中很得人心，确实是群众的领袖。我和他东征到清涧时，群众听说刘志丹来了，都来看望他，有两个瞎子看不见，就跑到窑洞，摸他的手。这一点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刘志丹后来攻打三交牺牲了。”一九四三年，周总理亲笔为刘志丹陵题诗：“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由此可见，在为人民革命献身的同志中间，有无数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苦大仇深的同志，也有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但在革命斗争烈

火中锤炼成钢的同志。今天，我们也应该为一切真诚地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出力的人敞开大门，而不应该因为他们的出身或他们亲属的某种错误或问题，而歧视他们、排斥他们。

客：我还有这样一个看法：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被消灭的，但绝大多数成员是可以争取改造的，有的人还可以作出杰出的贡献。当然，也必定有顽固不化、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进坟墓的人，但这只是极少数。

主：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先进、最有气魄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就包括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多数人改造成新人。

客：革命总是多一点人好。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我们不应当把出身于剥削阶级或父母有问题的子女推到敌人方面去，相反，要尽可能地争取、团结他们，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何况，现在二十几岁的青年人，都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即使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是地主和资本家，他们本人并没有参加剥削，就不应该歧视他们。最近，党中央决定，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其出身一律为社员，这实际上是反对血统论的一项重大政策规定，是大得人心的。

主：还可以指出一点，血统论总是受到古今中外反动派的膜拜，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封建帝王宣扬“生而知之者，上也”，是为了要人们服从帝王世世代代的统治。江青一再鼓吹什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要有女皇，是为“四人帮”建立法西斯封建王朝服务的。希特勒推崇种族优秀论，目的是为了在欧洲建立大日耳曼帝国。

客：“四人帮”推行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这条反革命政治纲领时，也祭起“血统论”的法宝。反革命小丑迟群就公开嚎叫：不仅要把眼睛盯住台上的走资派，而且要把眼睛盯住台下的走资派子女，即未来的走资派。按照这一逻辑，他们所谓的“走资派”也是会通过血统遗传的途径传宗接代的。他们这样叫嚷，不仅要打倒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蓄谋打击坚持走父辈革命道路的青一

代。

主：林彪、“四人帮”不仅发明了“走资派子女”，还有“黑帮子女”、“黑线人物子女”、“复辟派子女”、“还乡团子女”、“特务子女”、“叛徒子女”，等等，名目繁多。他们给很多革命同志扣上诬蔑不实之词，还要殃及他们的子女。永远去掉此类帽子，此其时矣。

客：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就有关子女的问题批判了“血统论”。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父母的“严重历史问题及政治问题对其子女不应牵涉”。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捣乱，党的政策不能落实。粉碎“四人帮”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有关子女的问题上，要使党的政策在全国各地都得到贯彻执行，还需要作许多工作，甚至进行必要的斗争。

主：按照党的政策认真解决有关这些子女的政治待遇、就业升学、入党入团、生活安排等问题，是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尽力的人，其中包括出身、家庭不好而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都应该有光明的前程。

宋永毅：《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尚处于发动阶段。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中共干部子女传出了一副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为“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的对联。这副对联的亮相，宣告了“血统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1966年7月至8月初是血统论的流传期。这副对联从北航附中、清华附中等北京中学迅速地流传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主要高校。它非但成为刚诞生的中学红卫兵（后被称为老红卫兵）的组织原则（以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红五类子弟”为核心），而且成为中学红卫兵以“游行”等方式狂呼对联冲击各高校及社会的思想基础。因为这副对联带着过于粗陋和荒谬的封建世袭的思想色彩，并力图把中国社会当时就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公开化与永久化，它一出笼便遭到了大多数学生与人民群众的反对，在中学与高校处处引发了极为广泛而对立的大辩论。尽管它一开始也遭到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

青等人温和的劝阻，但经过辩论它却反而迅速地走向社会，走向全国，成为风靡一时的主导性的社会思潮。原因并不复杂：一是发动文革的毛泽东与江青等人，此时正要利用以“血统论”为组织基础的老红卫兵作他们政治斗争的“革命先锋”。如中央文革成员关锋便公开赞同血统论，他曾在1966年8月在国务院接待室的讲话中说：“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我看基本精神是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是要工作组依靠工农子女，干部子女”^①。二是红卫兵的“血统论”作为一种封建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来自古籍古人，而是直接来自中共长期以来执行的“唯成份论”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说穿了，“血统论”不过是一群不懂策略的激进的高干子女，公开地撕下了“重在表现”等等貌似公平的幌子，把同样是浸透了封建权力世袭意识的“党的阶级政策”出了一个水落石出的公开版而已。

1966年6月至7月间，在一篇由红卫兵的创始者之一，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署名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的文章公开揭示：“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②换句话说，血统论的中心点是政权，即由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女夺权一掌权。不管老红卫兵的发起者中是否不乏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为它的组织路线的血统论则只强调先天的血统高贵。也就是说社会某一部分人的子女可以不通过艰苦的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公平的社会竞争，即制度化地攫取社会权力和财富，成为高踞于广大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至今为止，中国国内流传着把“血统论”的推行作为今日“太子党”在当年文革中一次流产了的掌权尝试，看来是不无道理的。当时，风靡一时的鼓吹血统论的重要文献还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做顶天立地的人》，北大附中红旗的《烈火捂不住盖子》^③，和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十号通令。

1966年8月中旬至10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是血统论的推广期。由于血统论的传播不仅导致了学生之间的公开分歧与对立，而且势必要转移毛泽东及文革派的既定目标——打倒一大批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这些人则是无法用“血统论”加以区别的。这样，“血统论”成了党中央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保卫自己以及他们派到大、中学的工作组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一方面，他们纷纷组织保卫自己的红卫兵，另一方面，他们挑动一部分群众（红五类子女）去斗争另一部分群众（黑五类及其子女），

以转移毛泽东对他们斗争的政治方向。8月12日，高干子弟、北京工业大学文革会副主任谭力夫贴出一张题名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④，企图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来阐释血统论的合理性，以弥补“对联”的粗陋。同时，又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要使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20日，谭力夫在北京工大的一个辩论工作组与阶级路线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这一发言的重点一是刻意宣扬血统论，鼓吹学生斗学生，甚至主张对黑七类子女“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二是竭力主张保工作组，把工作组及刘邓派的中共干部受到的批判说成是非红五类子女企图利用文革翻天的证明。由于1966年8月——10月中旬的文革运动已冲击了一大批“血统论”鼓吹者的父母——中共老干部，因而当谭力夫激动地质问反工作组的学生“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的讲话正在重复与阐释着刘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自我保护论，同时在一大批老红卫兵中激起极大的思想共鸣。于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在一次普通辩论会上的发言被官方或半官方地翻印张贴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大字报，一时贴遍中国大街小巷。谭力夫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与其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刘邓派干部，为了保护自己在与毛泽东的上层政治斗争中不至于被打倒，便利用“血统论”把红卫兵的祸水引向广大无辜的学生、教师与群众。正是在“血统论”的指引下，是红卫兵在北京第一次开了残酷的“红色恐怖”——暴力斗争的先河。仅8月下旬至9月底的40天内，据官方材料统计，仅北京市就有1,700人被打死，33,600多户被抄家，84,000多名所谓“黑五类及其子女”被赶出北京。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有325个“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被“血统论”的倡导者们残杀，22户人家被灭门，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血统论”暴露了它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狰狞面目。

当“血统论”的拥护者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残杀无辜时，毛泽东及文革派的中共领导人始终无动于衷，只有当他们看到“血统论”已成为刘邓派干部用以与他们抗争的一种政治斗争手段和工具时，在10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才声色俱厉地批判了“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

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⑤（陈伯达）。

至此，“血统论”才从一种占主导性的，为官方默认的社会思潮成为一种为中共文革派批判的异端思潮。

随着“血统论”被批判和群众造反派在“批判资反路线”中的崛起，尤其是随着“血统论”鼓吹者们的父母被一一打倒，血统论进入了它的挣扎期，1966年12月5日，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红卫兵中的一批高干子弟，酝酿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并于1967年1月1日颁发了著名的003通告。在这一通告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对文革“左倾机会主义”的有益思考，又仍可以看到它组织路线的浓重“血统论”色彩，如这一通告署名的次序——从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的干部子弟等级制地排列到“十六省市”的革干子弟。又如同时期“联动”对其他学生——黑七类子女的恐吓信。《紧急联合通告》，表现出了对文革的严重不满与一些宝贵的思考。例如提出“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以及“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即毛泽东还未形成斗“走资派”理论前的思想）⑥。

但由于他们所倡导的“血统论”以及耀武扬威的贵族子弟的言行正是最为广大人民所憎恶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突出表现，他们的这些言论只能被人们视为是一种保卫自己父母及自己优越的政治特权的一种本能挣扎。

1967年1月，联动成为中共文革派决意打击的对象，公安部不久逮捕了他们的骨干分子。这使一批“根正苗红”的、决意要革别人命的青年学生第一次尝到了被革命的滋味。然而，一开始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是来自毛泽东的始乱终弃，相反怪罪于反对血统论的其他家庭出身的中学同学。所谓《紧急联合通告》便是最典型一例。通告中讲要借“四月十四日戚本禹讲话之名把狗崽子们给压下去！”⑦所指，正是戚本禹把《出身论》（遇罗克著）骂成“反动文章”的讲话，在不遗余力执行血统论上，联动又一次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同流合污。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十年文革中也被抓进监狱，下放到工厂、农村，成为原来被他们迫害专政的“黑七类及其子女”的一员，迫害使他们成熟，只是在这时，他们中的某些人才真正开始跳出个人血统的狭隘背景，思索祖国和

民族的命运，并成为民主运动的一员。

余樵：历史可以这样改写吗？——评所谓“陈伯达抛出‘血统论’

第一次看到“陈伯达抛出‘血统论’”这个说法，是在《中华儿女》（国内版）2002年第2期发表的刘西尧的回忆文章《“文革”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里，刘西尧回忆说：他刚被派到中国科学院作周恩来的联络员时，碰上两派群众在吵闹，有人扭住一个“出身不好”的造反派揪打起来。他接着写道：“这也和陈伯达的‘德政’有关。因为他抛出了‘血统论’的名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一段回忆的小标题也就十分突出地用了这样一句话：“陈伯达抛出‘血统论’”。最初看到这个说法，笔者没怎么在意，只觉得是刘老先生年纪太大了，记忆上出了问题。不然，明明是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了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需要，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批判了“血统论”，包括“血统论”提倡者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之类说法，怎么现在会写成了“陈伯达抛出‘血统论’”呢？然而，无独有偶，过了没多久，笔者又在另一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纪实著作里读到了类似的说法。那是范硕先生写的《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下两集，华文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作者在书中写到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的报告时，列举了报告中的一系列“谬论”，其中写道：“他蓄意破坏青年团结，制造‘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等谬论”。作者把“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统统说成是陈伯达“制造”的“谬论”了。如果说刘西尧的回忆是记忆错误，那么范硕的书就不应有这样的问题了，因为作者在书中许多地方都强调了对某一事情调查了多少人，查阅了多少资料，应该是很严肃的记载。怎么也会出现与刘西尧回忆同样的错误呢？

对那段历史的真相，许多人应该都还留有记忆。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文化大革命”扫清障碍。16日，陈伯达在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又名《两个月运动总结》）的长篇报告。10月24日，毛泽东对陈伯达这个报告批示：“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

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0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此后，陈伯达这个报告便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不仅官方大量翻印，各地群众组织也竞相翻印，铅印本、油印本随处可见，许多地方还将报告全文抄成大字报张贴公布，因此，其中的内容可谓家喻户晓，特别是其中对“血统论”的批判。更是让广大因“家庭出身”问题长期遭受压制的青少年以及持有“血统论”观点的干部子女们铭心难忘。

陈伯达报告中对“血统论”说了些什么呢？他说：最近一个时期，有人“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份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重读一下这些文字，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到底是陈伯达抛出了“血统论”，“制造”了那些“谬论”，还是批判了“血统论”和那些谬论。不久，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的这些内容，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得到了转述，社论中说：“正当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

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份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别有用心的的人，利用这口号，实际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个元旦社论，在当时也是各大报甚至红卫兵、造反派小报都争相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因而家喻户晓的。如果说，是陈伯达“抛出”了“血统论”，“制造”了那些“谬论”，那么，岂不是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元旦，就在中央文革小组控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中，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出公开批判了？这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历史就是历史，不论陈伯达当年那个报告有些什么问题，也不论他批判“血统论”的目的何在，他当年的的确是率先提出了批判“血统论”。这是数亿人都清楚的史实。刚刚过去不久的，还有亿万亲历者、见证人活着并保存着自己鲜活记忆的历史，能够被人白纸黑字地改写成另一个样子吗？若按正常的思维，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这样的事居然就发生了。这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吗？

（网文）

永远战士：“联动”覆灭记 我们先从一份誓言看起：“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看看，够革命吧，够红色吧！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到过天安门，参加过破四旧，进行过大串联，至于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饭。他们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私设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己的同学老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其实大多出自于他们的疯狂，他们的正式名称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讲到这里，相信不少人开始认为他们是文革的宠儿，是文革的依靠对象，甚至以为文革自始至终始终是他们在主导。错！他们非但不是什么宠儿，更不是什么依靠对象，他们是一股反文革的力量，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对

象。

一、都是对联惹的祸 “拿起纸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扫黑帮”，文革初期，许多高干子弟连谁是黑帮都搞不清楚就跟着起来瞎折腾，就如同今天很多年青人连什么是“牛棚”都搞不明白就妄加评论文革一样。但时间会告诉人们一切。根据文革发动前“全国有三分之二以上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判断，到了1966年7月下旬，各单位的第一、二把手以“黑帮”论处已成定论。同时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反工作组的斗争也使相当数量高职老干部受到冲击。残酷的斗争不仅使大人们不寒而栗，他们的子女也觉得这一切令人窒息。孩子们聚在一起不免各自吹嘘家长的光荣史，与如今的残酷现实相比，不觉气愤难平。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冲动的驱使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我敢说，自中国有对联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幅对联的影响力能与此联相比。他不但将当时的社会搞得血雨腥风，甚至穿越历史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也许还会穿越时空影响未来。对于喜欢民主的朋友们来说，什么时候能把这幅对联的影响彻底消除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到来。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对联一出现，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撒进了生水，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对它发表不同看法。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围绕对联展开了。 1966年8月1日，创作对联的北航附属中学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但即使这样，学生们的热情丝毫不减，青春的燥动与传统封建礼念的浸润促使着他们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8月6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对联：从因果关系来看，对联是对子女高低贵贱的比较，但彰显的是英雄子女。在当时，谁自诩为英雄？自然是共和国的功臣，昔日的老革命，今日的当权派。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这些人的子女，眼看着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又不甘心像工农子弟一样做个普通红卫兵，于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替他们境遇悲惨的老爹老妈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对功臣们封妻荫子！这声音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上引起普遍共

鸣，从中央到地方，从孩子到大人，牛棚里的和牛棚外的，拿枪的、拿刀的、拿笔的、拿暗器的无不跃跃欲试，都想从这幅对联中争取到自己的未来。普通学生们管这幅对联叫“鬼见愁”，确实是鬼见愁，因为对方的辩论根本不是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只是要你表明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对反对者的处理也很简单，一个字——打！

当年黄炎培曾在延安对毛主席谈过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他说：“大凡一党一国乃至一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意思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会儿的事，问主席中共如何能逃出这个周期律。毛主席当年说：“我们找到办法了，就是让群众监督政府。”建国后，主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当年的诺言，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主席一直在努力，直到最后找到文革这种模式。姑且不论文革的成败，仅这种不懈的探索精神就足以让毛泽东光照千秋！他老人家始终在为中国人民探索奋斗，不像现在有些人，除了乐于探索女人的周期外，再也拿不出半点有价值的东西。

三、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由于文革的即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鬼见愁”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是干扰了这一目标的继续执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但经过运动洗礼的高干子女此时已不比当初，他们已经有了点政治头脑。刚开始揪“三家村”、“彭罗陆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路线斗争哪次不损耗几个人，跟他们划清界线就是。直到斗争不断升级，威胁到他们自己老爹老妈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自己又打又闹把火点起来是为了烧烤自己老爹呀！事到临头悔不及，怎么办？再次造反。

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乱。他们还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自来红，黑五类自来黑，但请注意，两者也并不是绝对对立，以后我们会提到。

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神。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

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如下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 儿子造反为江山。 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四、八旗子弟很疯狂 温和的劝导压制不住极端的热情，经过天桥剧场大辩论后，对联思想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很多红卫兵组织甚至将对联思想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竞相模仿的偶像。 可红色贵族并不好当，他们选择成员的唯一标准就是“纯”。什么意思？当时中国行政级别共有24级，父母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统统不要。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显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来红”。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组织内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职大小来安排职务，他们成了一群名符其实的“八旗子弟”。如此森严的等级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甚至连一般基层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是社会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冲动与幼稚，于是悲剧发生了：一个14岁小女孩要求参加红卫兵，结果红五类们不要她，理由是以她的出身必定“革命不够坚决。”小女孩听一言不发，抄起刀走进关押老师的“牛棚”，连续数刀将老师捅死，然后趾高气扬地对红五类们说：“我革命怎么不坚决？现在该让我参加红卫兵了吧！” 我觉得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牛棚”以正视听。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为在陈伯达主笔的《人

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它实际上是群众专政的产物。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就像上班一样。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周恩来总理更是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单位严禁搞逼供信，同时允许被专政者有上诉控告权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统论的八旗子弟们可不管这套，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带出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烧起来。于是，我们看到 60 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复活：他们将几间教室打通，将抓来的俘虏关进去，用活人来练习摔跤、格斗、擒拿、拳击等，美其名曰集训。这就是他们私设的监狱。再看看他们的公堂：像县太爷一样高高坐在老师的讲台上，将昔日的同学老师挨个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脸、开水洗澡、上吊练习……手段之残忍直追日本的 731 部队，真是骇人听闻！

五、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小时候看过一部香港古装戏，是描述清军攻克扬州的。当大批清军蜂拥着攻入城门时，旁边一个孩子忽然提出一个令人捧腹不已的问题：“他们（守城者）为什么不在城门口架几挺机关枪？” 有些人，总以为自己比前人聪明，好像只要通过时空隧道把他们送入古代他们就一定能功成名就一样。对于三十年前的文革，他们也是带着这种有色眼镜看的。一提起佩戴毛主席像章，他们就同愚昧、无知、高压、个人崇拜联系起来。仿佛毛泽东是个封建暴君，“毛主席万岁”等同于“皇帝万岁”一样。其实，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崇拜者还是被崇拜者，双方都清醒得很，谁的头脑都没有发昏。 早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就对林彪的过分吹捧不满，多次提出批评意见。但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非但没有住手，反倒把个人崇拜这股风越刮越猛。对于人们普遍佩戴主席像章问题，毛主席不止一次提出这是“讨嫌”的，甚至对于后期铝制像章过多的现象发出“还我飞机”的呼吁。他的头脑哪里有一点发热迹象！ 对于佩戴像章的人，他们的头脑更没发热，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种饰物，更是表明信仰的标志，佩戴像章就拥有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所以，佩戴像章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权利。这才是当时主席像风行天下，人们都趋之若鹜的真正原因。 红五类们对佩戴主席像章拥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他们既然能够在第一时间从老爹老妈及掌握大权的叔叔阿姨那里获得大批像章，自然也就有了特殊的“资源”，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他们竟然用这种资源去行贿。别以这是危言耸听，真有人凭借这些东西疏通各处关节，甚至混入党内。他们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的口号，大肆剥夺对立面的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这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打击和折磨，比杀了对方还难受。普通红卫兵多次被剥夺后，我们看到了今天常提起来的笑话：他们将毛主席像别在胸口的肉上，称之为“一针（真）见血”。有的还哽咽着说：“毛主席，这下他们再不会抢走你了。” 这个笑话让我怎么也笑不起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出身“黑五类”的学生明明被骂为“混蛋、狗崽子”却并没有失去像章的佩戴权。即使被红五类们刚刚暴打后，他们仍然腆着脸去和人家套近乎。仗着心狠手辣，在讨得红五类的欢心后，他们都夹在红卫兵中间作为专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的打手。当年，北京第二医学院曾有人贴出过一张题为《飞出一只白乌鸦》的大字报，对这类不伦不类的红卫兵进行了绝妙的讽刺。

六、出了个领军人物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来从事各种破坏活动。” -----恩格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举国一片”万岁”声，右派先生们绝望了，他们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这又高估毛泽东的能力了，他的敌人依然存在，只不过戴着红帽子罢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做为马列主义新阶段的毛泽东思想在也未能摆脱这一历史宿命。这不，一个自称“只承认毛泽东思想”的人出现了。

天桥剧场的一场大辩论，带来了“血统论”在社会上的大传播，引起一个小人物的强烈共鸣。相似的出身，共同的遭遇，无论是出于封妻荫子的潜意识，还是即将由红变黑的残酷现实，他和同类们都不得不拼死一搏。请记住这个名字，当时全国有很多人被他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成他的名字，以至于开放改革后他不得不改头换面，用另一个名字驰骋政坛。他就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 1966 年 8 月 12 日，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大字报一贴出，如同今天网上突然出现一个酷贴，立即有人响应。当日，北京各高校纷纷出现了只字不差的大字报，传播的速度是相当地快，新一轮大辩论又开始了。是日，仅到北京大学观看大字报

的人就达 17.9 万人。当然他们也借了一股东风，那就是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在把红卫兵运动推向全国的同时，对联的思潮也迅速泛滥起来。中央文革感觉到势头不对，他们组织力量到各高校张贴《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希望把势头压下去。但刚刚在破四旧中取得辉煌战果的红五类们此时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大字报事件，并引致了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又一次高潮。8 月 20 日，能言善辩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口若悬河，一气呵成了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大力宣扬“血统论”的同时，尖锐指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情。”谭力夫的讲话一出笼，不但很快风靡北京，同时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这并不庄严的宣告，这并不雄伟的声音，通过各种现代化工具，一样传遍白山黑水，黄河长江。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应大力宣扬。个别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以新华书店等主渠道迅速发行到工厂村庄。有些单位还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但他们对同时期下发的、中央一再要求严格执行的“十六条”却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大力推广谭力夫讲话的直接效果是：谭力夫在群众中获得巨大声望，仅在福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 5 人更名为“力夫”。这还不算，在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先后刮起了一股“报出身”风。比方说你要上公共汽车，售票员就会让你报一下出身：红五类，您上座；黑五类，站着，有座也不许坐。在特定的瞬间，历史往往是由小人物创造的。如同今天有人将讲《论语》的于丹视为“文化奶妈”一样，当时的走资派也是将谭力夫视为救世主的。他们渴望“血统论”救他们一命，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帮他一把，他们明白：帮这个小人物也就是帮自己。

元帅的愤怒 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一位共和国元帅家中。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的确是他的宝贝儿子，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的元帅此时根本想像不到他家老三在社会

上有多大能量。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举动极大地刺激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大批普通工农子弟参加红卫兵，这样一来让老红卫兵心里不舒服起来，用今天的话讲，他们感觉自己的知识产权被侵犯了。为了显示红色贵族的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笔者很想把这些组织的创始人一一列出，可惜惭愧得很，费了很大劲只能找到西纠的一些材料，除了那个陈晓鲁外，还有个孔丹，原国务院外事办主任。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他的成立和活动，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的支持，就连周恩来都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他们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涉及中央党政机关、革命干部、国家机密、首都秩序、以至对资产阶级政策和外宾接待政策等许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老爹。8月27日，“西引”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八、揭发的真相 回首文革，我们会发现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儿女揭发父母，这一奇怪现象常被改革者用来论证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在这方面，他们似乎很同意孔夫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笔者最近听到一个当年在批斗会上主动揭发母亲的人坦露心声：“那都是我妈让我干的，我们是黑五类，不这样能把自己洗干净吗？讲几句话，我参军、找工作、以至将来提干就不会受影响了。” 原来是苦肉计！这怎么会是文革对人性的扭曲，翻开史书看看，类似的办法数不胜数。这不但不是反封建的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恰恰相反，是它的敌人——封建主义遗毒在作怪。那个全国最大走资派对这一手玩的更是得心应手。在工作组受到主席的批评后，原来强烈支持工作组的儿子不但迅速改变立场，还有声有色地揭发起老爹来。大义灭亲的立场得到大多数人的欣赏，他不但未受到清算，反倒成了学生领袖，组织起一伙人来反攻倒算。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纠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刘涛、贺鹏飞（贺龙子）同清华附中一些人制订行动计划，赶制了西纠专用符号，组织北京12个学

校保皇军企图武装占领清华园。真不愧是将门虎子，他们的行动还是像模像样的：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下午 4:00，这两位当然的领袖带领 12 校联军冲进清华园，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牒，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薄等的人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进行秋后算帐。最后，他们捣毁了以批判刘邓为己任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家，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据悉，刘涛事后向王任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没什么问题。”

九、令人费解的死因 老舍之死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文革结束后，一直以来的相关作品总是沿着毛泽东---文革---老舍----迫害这样的简单逻辑推理下去，潜台词就是：是毛泽东间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吗？ 若果真如此，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那就应该先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批判的批判，总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做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老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带铁拳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申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1899~1966）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这是达成共识的老舍简历，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红苗正，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而且，老舍自归国后各方面一直紧跟形势，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60 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皇帝，对清朝的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多的满族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 1950 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族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但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

的人物，一般人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令人费解！老舍是个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令人费解！在老舍出事前的 1966 年 8 月 23 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发言，如果仅凭这点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他早就甬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密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动机何在？令人费解！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篓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 1966 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 12 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东西海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十、“红八月”大事记 我们刚刚经历了文革中赫赫有名的“红八月”，毛泽东、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打人、愚昧狂热，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全部印象！给我们这些印象的人是肤浅还是狡诈？其实，真相只需看一下流水帐即可：

- 1、1966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指责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随后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 当晚，“鬼见愁”对联贴到北京各大高校。
- 2、8 月 2 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部分中央领导做检讨； 同时，对联在北京引发大辩论，陈伯达改联灭火。
- 3、8 月 3 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十六条”，部分中央领导到北京建工学院做

学生工作。 4、8月4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江青反对成立“贫协”。 5、8月5日,毛泽东发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责“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6、8月6日,天桥剧场辩论,江青、康生劝止不住持“血统论”的学生;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 7、8月8日,新华社播发“十六条”;血统论在社会上大传播,高校陆续成立学生组织。 8、8月9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贺鹏飞、刘涛等人成立清华大学“八九派”串连会,只批“黑帮”,不批工作组。 9、8月12日,刘少奇职务不再被提起,叶群组织人员整理刘少奇材料;社会上,谭力夫主张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引发更大辩论。 10、8月18日,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王震等老干部遭受批判,社会上打砸打日渐增多。 11、8月19日,新华社播发18日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排名顺序,引起震动。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抄家,殴打“有问题”的人员。 12、8月20日,谭力夫发表演讲,认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同时北京30万红卫兵上街破四旧。 13、8月23日,红卫兵运动进入狂热化程度,达到最高潮。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14、8月24日,“西、东、海纠”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15、8月28日,中央正组织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16、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提出“四个伟大”。 分析:中央存在两种声音,社会上存在两股势力。毛泽东凭借高超的政治才干把中央的反对派压了下去,但社会上的反抗势力却日趋壮大起来。

十一、探讨文革的派性问题 一问起文革中派别,有些人总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造反派、保皇派”。每次听到这样的回答,心里总会生出一种疑问:他们当初真这么叫吗?要知道,自称“造反派”倒也罢了,因为毕竟有“造反有理”的理论支撑,可“保皇”一词明明是带有贬义的,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例外,这代表的是封建、落后,谁会用这样的词来标榜自己呢? 还有一些人一提起这两派就联想到红卫兵,联想到造反派的破四旧、毁文物、批斗老干部,可就是不肯想一想保皇派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当时怎样保皇? 事实上,造反

派和保皇派绝不是红卫兵的专有名词，这两顶帽子自始至终出现在文革史上，开始是学生们戴，后来是普通干部群众戴。他们的正式名称是：一派自称革命造反派，另一派自称革命促进派。保皇派在名称问题上有点像金庸小说中的明教，一听有人管他们叫魔教就抄家伙动手，因为对当时争斗的双方来说，“保皇”是一个污辱性的称谓。之所以会出现保皇派，是因为文革前的官员们大多贪欲还不太重，老百姓出于传统的惯性，还对他们保持着相当的尊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口号，实际上当时真正支持的并不多，因为中国人除非被逼得走投无路，一般不愿意造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即是残酷的现实，更是中国人处世哲学的写照。这是个勤劳善良的民族，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歌中的这一句，其实写出了国民的阿 Q 精神，难道不应对其发出含泪的鞭笞吗？从这个意义上讲，“造反有理”不但是在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更是埋下了一粒民主的种子。文革初起，大批造反组织应运而生冲击各级党委，其实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年青娃娃哪斗得过那些久经战阵的老油条。他们一方面丢下手头工作，指责红卫兵们破坏生产，即“用生产压革命、狂刮经济主义妖风”，另一方面他们也组织自己的红卫兵，即“拉一派打一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对立的双方都戴红兵标志，都自称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比较典型的是江苏的红卫兵，他们被老百姓戏称为“好派”和“屁派”，原因是在造省委的反时，一派表态说：“好得很！”，另一派说：“好个屁！”保皇派由于有官方背景，自然势力大些。文革从开始到结束，很多省份其实一直是保皇派在把持，只有上海是造反派完全夺取了政权，所以才受到毛主席的特别青睐。

十二、“红色恐怖万岁” 探照灯、岗楼、哨兵、瞭望孔、射击孔，尖锐的警铃，惨无人道的酷刑……，这阴森恐怖的地方既不是日本人的炮楼，也不是国民党的渣滓洞集中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居然是 20 世纪 60 年代北京的一所学校——北京六中。当时这是全北京红五类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后来“联动”最重要的据点。借着文革初期的混乱，他们将日常学习读书的地方改造为关押“黑五类”的“劳改所”。十五、六岁正是青春期萌动的时刻，如果这萌动一旦被名、利误导，立刻会滋生出可怕的魔鬼。“保爹”的愿望促使着红五类们不断探讨先辈的战绩，在他们灵魂深处，或许真的有“沿着前辈的足迹走”的良好

愿望，可一到具体问题上，他们不自觉地沿着敌人的足迹走起来。六中的大门早就被封死，要想进去只能从他们规定的窗口跳进。一进门，这几个血淋淋的大字就扑面而来——红色恐怖万岁！——这真的是用人血写成的。在这里，专政对象被无限扩大了，先是“黑五类”，后是“黑七类”，东、西、海纠的成立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专政对象逐渐扩大到一切不同意“对联”观点的人。他们轻辄打骂同学老师，强索钱财，重则草菅人命，而且手段极其残忍。老工人徐沛田、高二学生王光华先后被西纠成员活活打死，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东西海纠一下子臭遍了街。今天，我们应该回过头来思索这段历史：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法律精英会脱口而出“目无法纪”，右派精英会大声呼吁“缺乏民主”，他们会各自掉几滴鄂鱼的眼泪表示同情，然后兜售自己的私货。我们已经被他们骗了几十年，不能再上当了。用阶级分析的办法来看，我们会发现事情的真相——阶级斗争！“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就在共产党党内！”——毛泽东“孩子们未满十八岁，就是枪毙都不够格”，中国的走资派们就是看中了毛泽东这一软肋，所以毫无顾虑地推出了自己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无耻精神，让今天借孩子扮乞丐骗钱者望尘莫及。

十三、文革五大学生领袖 话说到 1966 年 9 月，我们似乎忘记了几个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他们就是后来被称做五大学生领袖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尽管他们只是昙花一现，但却是研究文革史绕不过去的人物。让我们回到 1966 年 5 月 25 日，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把北大哲学系党总书记聂元梓推上了历史舞台。大字报一贴出，立刻在北大师生中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当天就有上万张大字报贴出，其中大部分表示反对意见，甚至还有人围攻她。后来刘少奇派工作组来了，她一下子成了专政对象，被整得很惨，一度以绝食做为主要斗争方式。可即便这样也轰隆不出太大动静来，素来温顺敦厚的中国人一向对犯上者的下场都有共识。可惜这次大多数人看走了眼，随着毛主席对大字报的支持，聂元梓一下子成了造反英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威名不径而走。消息传到广东，几个学

生在辩论中达成共识，借着大串联的机会去趟北京会会这位反潮流的革命小将，可到了北京却大跌眼镜：原来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小将竟然是位半老徐娘，时年 45 岁。

在聂元梓的事件的影响下，各高校都掀起反工作组的浪潮。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引起一个人的强烈不安，因为这个人当年会同工作组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被打成反革命跟枪毙也差不多。现在蒯大富翻过身来了，会不会对他和他们一伙进行报复？自己“自来红”的高贵血统怎么能受蒯大富这种人的气！带着这种不良心态，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西纠和后来的“联动”组织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叫贺鹏飞，共和国开国元帅之子。

在整个红卫兵运动中，聂元梓和蒯大富不是最先起跑的，但毫无疑问是跑得最快的一批。在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时，他们受邀上天安门接受检阅，此举不但使他们在红卫兵中名声大振，也引起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视。随着中央文革权力的逐渐扩大，他们也水涨船高，逐渐成为领军人物。此时血统论骁将谭力夫等领导的老红卫兵组织“红一司”“红二司”已日渐成为文革的阻力。为了“斗走资派”这个大方向不动摇，中央文革支持蒯大富于 9 月 9 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造反组织。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首都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也日渐壮大起来，这些人被后来的“联动”称为“中央文革的宪兵队”，我猜想，“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一定是这些人喊得最起劲。

后浪推前浪，新人赶旧人，总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在他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同时，“西纠”等组织也日渐将他们视为眼中钉。这一时期发生了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带头冲击地质部揪斗前工作组组长邹家尤事件，“西纠”前往干涉，弄了个灰头土脸，威信扫地。此外，北航的韩爱晶带头冲击军事机关国防科委并一举成名也使他们感到不安起来，他们觉得自己是红卫兵的老祖宗，应该采取措施压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辈。于是，一个新的计划产生了。

十四、秘密成立“联动”

据小说家言，清朝乾隆皇帝继位之初，有几个王室成员不服气，想把他搞下台或者架空，于是他们精心谋划了一场政变：先联络一些平日合得来的宗室子弟，凭着这些人天大的“面子”先向兵部借兵器，然后占领大内，继而控制京城九门，最后掌控全国……

每当我读到这里，总禁不住哑然失笑：这些只会提笼架鸟的公子哥搞这杀头的玩意也这么浪漫！不过话

说回来了, 在现实生活中, 有面子确实很重要。比方说让我花钱联系个小剧场搞个演出什么的或许能搞定, 可要搞到中南海政治局礼堂简直是天方夜谭, 非得有天大“面子”不可。 1966 年 10 月 1 日, 手眼通天的老红卫兵们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动”组织, 这个组织当时并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它戴的是一顶更大的帽: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 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实际上是以“东、西、海、纠”为核心, 联合北京各高校干部子弟组织的一个联合体, 其核心任务是“保爹”, 路线是各省市干部子弟大联合。有了谭力夫讲话的理论支持, 有了各级干部挨整挨批斗的政治需求, 还真别说, 几个毛娃娃过家家似的组织居然在全国有了大批支持者。 需要澄清的是, “联动”成员实际上是以中学生为主, 如谭力夫等大学生在里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论指导作用。不过, 青春期燥动的少年更可怕, 我们叙述过的北京六中就是一例。青春期萌动是生理现象, 但让青春萌动到犯罪状态却是社会现象。是什么社会现象造成的呢? 相信不少人想脱口而出是文革,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 文革只是提供了一个社会机会, 也并不是所有处于青春期的人在文革中都疯狂, 真相被掩盖在迷雾中。在弄清真相前, 先讲一个小故事: 出生于 70 年代的人不知是否还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一篇题为《秘密学习》的文章, 讲的是几个小学生在日伪不断扫荡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的事, 敌人来了将课本埋起来, 敌人走后在露天教室里坚持上课。这是一个真实的学校, 当时叫“荣臻小学”, 原本是收留战争中烈士子弟的, 后来进城后改为“八一学校”, 60 年代, 这里成了一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各级干部对自己孩子的爱是不言而喻的, 他们不惜血本对这里进行投入: 统一的校服, 漂亮的教学楼, 校园内到处绿树成荫, 鲜花遍地, 的确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投入就是盖校舍, 这路子好像有点熟) 可教育方针却沿袭过去的老一套, 孩子们好一点的学会了温文尔雅, 追求名利。差一点的不消说了, 这里后来成为“联动”的一个重要据点。请看看这里旧教育体制教出的高徒: 一个小学生在描述未来理想时写到: “职务: 坦克兵元帅, 工资: 每月 700 (当时超高)”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打地洞。”长大后的八旗子弟们就是怀着这样的理念冲向社会的, 当他们优越感忽然被剥夺后, 犯罪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养不教, 父之过; 徒不严, 师之惰。”连私塾先生们都懂的道理却有人装做不懂。

十五、逮捕谭力夫 “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本来抄家这一行径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一般说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这是基于“四清”运动中从地主家抄出“子孙万代要报仇”等反动诗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检查措施。后来检查扩展到“四旧”等生活实物，抄家者也还算守规矩，文革结束后有人从堆积如山的仓库中拣出自家物品就是实例。可这些好的做法到了“联动”这里就统统废除了，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己需要的东西。他们在向“黑五类”们勒索钱财的同时，发现这些人家里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籍，不由分说拿了回去，可他们当时没有时间看——都忙着夺权呢！ “联动”的异常活动引起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此时文革已全面展开的，运动的重点也已明确，几个小屁孩“保爹”的举动自然难逃他们法眼。擒贼先擒王，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到血统论骁将谭力夫身上。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犹如三记重拳，一次比一次狠，红五类们顶不住了。 1966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到谭力夫家，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本禹约他中南海谈一谈。谭力夫又惊又喜：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了。他要在中央领导面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阐述血统论的正确性。可当他那滔滔不绝的辩解没进行几分钟，戚本禹就厉声喝问他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有无瓜葛，关锋则在一旁敲边鼓，不断地追问他们家同林枫、李雪峰的关系。自己的老爹干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能同这些人无关吗！谭力夫终于明白，对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事隔不久，谭力夫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想以此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借以除掉政治对手。可谭力夫毕竟不是普通人，他在狱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的企图，学着革命先辈的样，咬紧牙关硬是一句不话，非常投入地表演了一翻。为了证明“血统论”的正确，他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铁窗歌》：“铁窗孤影对，深夜寒风吹。生当共产

党，死作革命鬼。纵死亦含笑，问心无大愧。敬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诗有好坏之分，写诗人的境遇却各不相同。“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让作者“咔嚓”一声人头落地，可这首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却为作者日后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

十六、“联动”郁闷极了 自从被中央文革盯上后，“联动”的日子一直过得很郁闷。先是“中日青年大联欢”筹备工作的领导权被剥夺，继而平民红卫兵崛起，处处抢他们风头。1966年夏季，老对头北航红旗战斗队发出了制造“红海洋”号召，就是以美化市容为名，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大幅墙体涂成红色，以彰显“革命化”的环境赤风潮。这让“联动”成员们心里很失落：这本应该是他们提出来的才对！可人家先走一步，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没办法，只好跟在后面吃点浮食。除了到处泼油漆刷街道外，他们还将自己的红袖章进行了精心改良设计：双层绸面，外面红色，里面白色，寓意是：红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可惜这个顺风屁还没接热乎，人家北航忽然改口，大加挞伐起“红海洋”来。原因是制造“红海洋”浪费了大量红油漆，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真是：人要倒楣，连喝口凉水都塞牙！ 随着“联动”重要据点北京六中劳教所等陆续被曝光，他们在北京市民心目中一下子臭起来，老百姓都拿他们当小流氓，各校新崛起的平民红卫兵也渐渐不买他们的帐。“联动”正式成立后，他们组织了几次对“红三司”的冲击。可人家蒯大富一个电话就召来几千人，吓得哥几个面如土色。不过，此时“红三司”对“联动”还基本处于防御状态，基本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毕竟人家头顶上戴着红帽子呢！ 谭力夫被逮捕后，整个形势对“联动”越来越不利了，可个别脑子不大灵光的还不知死活，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己，比较典型的是：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一手拉住军车窗，另一手挥舞军刺招摇过市。行人侧目，避之唯恐不及，警察可睁大眼看着呢，带着闹事的不容分说被关了进去。 这下“联动”没招了。讲理吧，理论权威正在监狱里待着呢；讲打吧，人家蒯大富的“红三司”可是以大学生为主，个个膀大腰圆，还真不是个。“反了，反了，这年头流行儿子打老子”，同阿Q一样，他们也急需一场“精神胜利法”。

十七、“十二月党人” 1825年12月，一群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俄国贵族军官悍然发动政变，目的是反对沙皇的农奴统治。可惜活没干利索，指

挥官临阵脱逃，三千多人还在广场上傻等呢，沙皇的大炮轰来了。围观的百姓和士兵们顿时血流成河，政变就此破产。可贵族毕竟是贵族，碍着朝中老臣的面子，参加政变的军官们除首犯被杀外，大部分只是被罚去西伯利亚做苦力。沙皇本想借西伯利亚的狗熊之口除掉政敌，可万没想到这帮公子哥生命力还挺顽强，愣是在那冰天雪地里活了下来。他们美丽的妻子也拒绝了沙皇要她们改嫁的要求，宁可放弃贵族生活而去西伯利亚与丈夫厮守，真是浪漫的刑期啊！这个故事一向为“联动”的红色贵族成员们所熟悉，同样是贵族，同样是十二月，同样是挑战当局的危险活计，他们很自然地将二者联合起来，自称为“十二月党人”。面对蒯大富、聂元梓代表的平民红卫兵的挑战，红色贵族们出奇地愤怒了。从1966年11月27日起，他们就在北大附中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秘密集会，商讨对付“红三司”的办法，12月5日发表宣言，正式出现了我们在开篇中提出的那份誓词。这篇宣言以诗歌般语调强烈指责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在保卫“十六条”、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号召“拉起队伍自己干！”干什么呢？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仅仅贴标语、发传单当然满足不了“联动”的愿望，他们发动了对“红三司”一系列的攻势。12月6日，十几个“联动”成员在首领牛皖平的带领下，主动到蒯大富控制的“红三司”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结果还没进大门口就遭到围攻，只得落荒而逃。12月7日，“联动”再次从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等处调集大批红卫兵来到“红三司”所在地寻衅，结果被团团围住，最后是周恩来派秘书周荣鑫来解围才把他们救走。的确，无论从人数还是从体能上比，他们和人家蒯大富都不是一个等级的，更不用说蒯大富后面还有个中央文革呢。12月16日，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联动”的理论和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这等于斩断了“联动”的各种触角，形势已经将红色贵族们逼到了墙角。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在这次大会里，他们不但高呼“打倒‘红三司’”、“反对乱揪老前辈”等口号，还有人胆大包天地喊出“中央文革某

些人不要太狂了”。刚喊出这句时，台下一片寂静，几千人同时愣住了，继而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此时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才是“红三司”的总后台。“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会后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当游击队员们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时，全场的联动立即响应，齐声高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帽子乱飞，口哨乱响，一片疯狂。电影放完已是凌晨四点，大群的联动趁着热血还没凉，一队队蹬着自行车前往公安部去解救落难弟兄。这就是有名的‘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第一冲。

十八、灭顶之灾 在文革期间，各级党政组织包括军警等暴力专政机构，对红卫兵都是相当地忌惮。这当然同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绝不仅是以新代旧那么简单。要知道，几千年来，国家暴力机构同民众的关系一直是尖锐对立的，它几乎就是群众头顶的一层天。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改天换地的大事，这层天当然也在改革的范畴内，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毛泽东改革的办法就是把对立关系倒过来，暴力机构的活动要始终置于群众的监督下，为此他不惜让“群众运动具在天然合理性”的思潮泛滥。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毛泽东相信群众会在运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比较起历史上暴力机构对民众的压迫来，他们在群众运动中所受的委屈其实算不了什么，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老猫怕鼠”现象，其实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大民主。不过，对“联动”这样的组织来说，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可没他们的份。“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 12月26日，就是“联动”开大会的当天，两名“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时被老对头“北航红旗”的人逮个正着，他们不但不认错，还动手打人。可这时“联动”成员都在开会呢，寡不敌众下，被扭送公安部，这就是“联动”一冲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难兄弟”。当晚，他们不但打伤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员，连一位赶来调解的副部长都挨了打。无奈，公安部只好把闹得最凶的几个人抓起来，但学习过几段语录后立即就放了。可这几个人出来后却反咬一口，大骂公安部乱抓人——一冲。 12月28日到29日，“联动”调来几百名暴徒，强占公安部接待室，

不断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而且将三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来声援才撤退——二冲；12月31日到1月1日，调集百人再次冲击公安部，打伤二人——三冲；1967年1月6日到7日，纠集100人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入，撒传单、贴标语，砸烂礼堂，闹腾饿了，就跑进公安部食堂，将那里的四五十斤粉肠和熟猪肉一扫而光，还恬不知耻地到处宣扬“公安部的猪肉真他妈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将他们的暴行广播了出去，大批群众前来声援，“联动”一看形势不好，夺路而逃——四冲；一天以后，他们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一路高呼“打倒‘红三司’！”“打倒江青！”再冲公安部，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造成多人受伤——五冲；1967年1月11日，“联动”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由于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群众达十万之众，他们没有冲成，只好气势汹汹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权力下放的“最后通牒”，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别人倒也罢了，周恩来可是一直在护着他们，只不过不满意他们胡乱打人杀人最近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而已。“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联动”越疯狂也就越接近死亡。“六冲公安部”非但没有改变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反倒火上浇油，惹恼了文革中一位重量级人物——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并由起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同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负责人打电话：“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连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较杀令一下，“联动”的末日也就到了。先是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接着，由公安局的人领队，“红三司”的人动手，几万人在全市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大围剿。在中学里，新的平民红卫兵组织不断涌现，对他们发动了“中心开花”式的进攻；在大学里，“联动”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在社会上，浪迹街头的“联动”小流氓更是无处藏身。一天之内，“联动”各个据点纷纷被摧毁，大部分头头被抓。“联动”心里这个憋屈呀！想当年在大兴县灭“四类分子”时是警察给他们带队，怎么一转眼全变过来了！他们想骂、想打、想闹，可人家“红三司”跟他们耍的根本就不是一路拳，三四个对一个，像拎小鸡仔一样抓过来丢进囚车。此时他们倒真有几分“十二月党人”的血性：在冰凉的囚车里，稀稀落落地响起了《国际歌》声。

十九、将军们“绑子上殿” 当大多数监牢里的“联动”还在做“十二月党人”的美梦时，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在他们曾经的老巢里正在举行着揭发他们罪行的展览。展览地点虽各不相同，但主题却是一样的，都把“联动”罪行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在一起，主题是“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 之所以这样联系，是因为从种种揭发材料来看，这些人之所以在文革初期带头造反，同他们老爹的特殊身份是分不开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依靠近水楼台的优势，较早摸清了中央高层的意图，于是这些毫无造反动机的人率先造起反来，他们是希望尽早获得“左派”头衔，以便从中渔利。他们成功了。他们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几乎是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前后脚成立的，巨大的历史惯性迅速把他们推向风口浪尖，着实风光了一把，但渣滓终究是渣滓，还不到一年，一个个就原形毕露了。 北京六中森严恐怖的“劳教所”； 惨无人道的各种法西斯刑法； 杀人灭迹，血债累累的暴行； 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的流氓行径； …… 这一桩桩一件件，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黑暗的旧社会。人们很难理解，怎么解放翻身这么多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会出现这种罪恶。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变了，按说该太平了吧，可怎么一转眼旧中国的东西又回潮了？看来他们的生命力还很顽强，顽强到超乎我们的想象。 展览获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参观，这中间包括共和国的一些开国功臣们。当他们看到自己家宝贝在外面干的这些事后，从心底生出阵阵凉气：这不就是国民党吗！这不就是法西斯吗！自己把脑袋别在裤脚带上干了大半辈子革命，不就是为了推翻这些吗？怎么这些东西又从自己儿子身上出现了？大半辈子的辛苦，无数战友流血牺牲换来的红色江山，难道要由这群小兔崽子来执掌？过去是国民党祸害老百姓，难道以

后要换成他们来祸害？那自己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并不是每个功臣都没有觉悟，更不是谁都护犊子。“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可要懂得教育他们，那就是国家大事了。”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在陈士榘将军的带动下，一些将军们纷纷带着自己孩子去自首。毛主席听说这件事后，当即下令：把被抓的“联动”全放了。

二十、政治上彻底清醒了 1967年4月22日，关押“联动”的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未卜的前程。“不会拉出去枪毙吧？”“不会，最多是开批判会！”他们这样互相打着气。没想到汽车却直开人民大会堂，在东大厅的会议室里，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鱼贯走出。“联动”们一下子愣住了，悔恨、愤怒、恐慌、内疚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曾经天天盼望同中央首长见面，可万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更没想到一下子见这么多。“你们受委屈了”，江青一语出口，下面立起波澜。先是小声抽泣，接着是放声大哭，会场乱做一团。接下来的谈话就不那么顺利了。只要江青一开口，他们就齐声高诵“我失骄杨君失柳……”五十年代，毛主席前妻杨开慧闺中密友李淑一来信索取主席年青时赠送杨开慧的一首词，毛主席说当年那首写得不好，提笔挥就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服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里的“骄杨”指杨开慧，“柳”指李淑一爱人柳直荀，革命烈士。在这首词里，毛主席对前妻的怀念是无疑的，可并没有对江青否定的内容。有些人总拿这个说事，用意纯在诗词之外，否则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编排贺子珍呢？还不是因为当时贺子珍健在，有些谎话容易被戳穿。事实上，毛主席也给江青写过一道：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题为“为李进同志题庐山仙人洞”，“李进”是江青曾用名，“李”指江青原名李云鹤，“进”是进步的意思，加起来表示“李云鹤进步了”）“联动”们人小鬼大，当众这么做无疑是在指着江青鼻子骂：“你是小老婆！”这简直就是面对面的人身攻击。当中央文革其他人讲话时，他们就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毛泽东干吗？直到此时，他们每个人还在做着这样的政治梦：自己遭受的种种“迫害”都

是中央文革背着毛主席干的，毛主席早晚有一天会翻然醒悟，将他们和他们老爹的罪行一起赦免…… 被放出来的“联动”非但没有丝毫悔改，反倒变本加厉起来。毛主席对上海“一月风暴”的支持彻底砸碎了他们的“救爹”梦，此时他们在政治上彻底清醒了。他们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在天安门狂奔，并高呼“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再见！”鉴于没有枪杆就没有一切的教训，他们不但四处搜罗枪枝弹药，还利用大串联时在全国各地撒下的“火种”号召成立“铁血队”“红旗队”“红旗军”等武装力量做他们的保皇派。他们尚未被打倒的叔叔阿姨们更是别有用心地提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口号。 可历史规律决定了，这一切不过是螳臂当车。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他们残存的力量也被消灭殆尽，“联动”做为一个组织正式灭亡了。

二十一、照片的秘密 这是网上流行的一幅控诉文革血泪的照片，它给我们的直观印象是什么？愚昧、狂热、武斗？可是又有谁真正看懂了它。 请大家注意看墙上的标语：“欢呼毛主席关于派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红旗’《铁血队》死保‘联动’反动透顶！” “联动”做为一个组织已经被消灭了，但他的指导思想还在，在党内、军内仍有大批支持者。在“二月逆流”时就有某位党内大佬叫嚣：“‘联动’怎么会是反动组织，十五、六的孩子，能惹什么事！”与此相呼应，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保皇组织，名称五花八门，以“铁血队”“红旗军”等最为著名，这当然不是完全响应“联动”的号召，更多的是受冲击的各级党政负责人组织的宪兵队。于是，1967年成为文革史上最为混乱的一年，全国武斗成风。我们今天见到的“红卫兵公墓群”大半形成于那个时期。然而当我细细考证这些公墓群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当年的保皇派。怀着对党的忠诚，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他们心目中的“党代表”。可这些人有朝一日翻过身后，却异口同声地指责起两派的无知与狂热，躺在冰凉墓穴中的逝者哟，倘使有来生，你们还是否愿意为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一颗嫩芽破土而出，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及早分清它是鲜花还是毒草，大多数人还只是盲从。毛泽东——文革——动乱，用武断的木桩将似是而非的逻辑串联在一起，把毛泽东敌人的罪恶硬安在他头上，多年来，中国人民就这样被诱骗着一步步走上资本主义这条贼船。

后记 顽主天下 进入 1968 年以后，文革越来越是大人们的事了，“联动”的老红卫兵们一下子由“革命小将”又变成了半大孩子。这时期他们自称“顽主”，意思是顽劣之主，我们后来熟悉的那句“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死法院”就是从这时开始流行。其实让我看，他们更像“玩儿主”，玩乐之主。

首先是他们学会了“玩情调”。政治上的受压，使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过起了“逍遥派”“颓废派”的生活。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并且学写新旧体诗，这就成了文艺沙龙的雏形。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他们钱从哪来？实事求是地讲，还真不都是非法所得。当时国家有一项救济制度，什么意思？简单说，当时小青年刚上班一般是从 18 元工资拿起，以后逐步提高。假如有一老工人月工资 40 元，这在当时算相当高了。可他家里养六口人，一平均，他又成了困难户。这时他就可以享受国家的救济：从他年龄最大的子女中选一人，根据具体情况不同从 15、16、17 三个工资档中选一，当子女成年参加工作后再按 24 级工资制走。“联动”老红卫兵的父母此时大部分被打倒，家里是指望不上了，但国家对他们也按救济制度走。每月 15 元的工资吃饭倒没问题，可这些少爷们没事爱去趟“老莫”（莫斯科餐厅），这区区救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不过好在有以前抄家的存货，倒也勉强过日子。他们当年抄家还抄来了不少“资产阶级腐朽的、没落的精神垃圾”，此时倒成了他们宝贵的精神食粮。看黄书、听黄色歌曲成了他们的主要娱乐活动，80 年代开放初期国内就黄书泛滥，那主要不是外来的精神污染，更多的是老红卫兵手里“存货”的传播。

其次他们学会了“玩浪漫”。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后有美丽娇妻陪着，这让中国的“十二月党人”心里多少有些酸楚的感觉，尽管他们的“流放”环境比对方不知强多少倍。没人跟，自己主动出击总成了吧！于是北京城大街小巷总能见到不三不四的人围着年轻姑娘们转，警察问就说学雷锋做好事，送姑娘回家。可人家雷锋同志是帮助老大娘，可他们却只爱帮助大姑娘。不过那时年轻姑娘们的防御手段要比现在强，逼急了骂一句“臭流氓”对方一般会落荒而逃，否则就会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接受警察叔叔的问话。

但他们最主要的社会活动是打群架。“联动”的组织机构没了，但老红卫兵们的架子可没放下。此时他们的扮相更进一步，和“红八月”时大不相同：一身将校呢军装，脚蹬将官靴，头戴呢子军帽，只是臂上没有了“联动”的红袖章。（参见《血色

浪漫》钟跃民的扮相)这些都是老爹当年的军礼服,穿在身上仍能显示血统的高贵。可他们这身绿军装再也镇唬不住“黑五类”的狗崽子们了。最让他们郁闷的是,连一直贴在身边的“白乌鸦”们也造反,纷纷飞回自己的阵营中去了。他们想不明白:想当年“红八月”时,自己一顿大嘴巴抽过去,对方连眼都不敢瞪,怎么现如今就敢菜刀、板砖地跟自己干!挨了几顿暴打后,他们终于明白:当年自己之所以能横扫街头,完全是借了毛主席的威风,原来是狐假虎威!离开毛主席,自己连同自己老爹妈一块算上,在老百姓眼里连条宠物狗都算不上。“上山下乡”运动开展以后,他们被历史的洪流挟裹着,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自诩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大多数并没有接老爹的班走从政之路。80年代,当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完文革的“血腥”与“罪恶”后,这些当年打、砸、抢的闯将几乎清一色地投身商海。从此,“官倒”成为中国政治辞海里特有的名词。

二、遇罗克的《出身论》从反对阶级划分走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一) 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打着批判《血统论》的幌子反对阶级论

1967年1月18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

〔《中学文革报》编者按: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待毙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却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猖獗如故。这种现象,不由得使许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呢?

我们认为,不是别的,正是在社会上广有市场的唯出身论。

过去各中学所普遍执行过的那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子不是别的,也正是反动的唯出身论。

反动的唯出身论,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是反动的唯出身论,使一部份青年学生背上了“自来红”的大包袱,自以为老子是天生的革命者,其结果正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是反动的唯出身论,迫使另一部份青年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们甘居中游,使他们放弃对国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应尽的责任。还

是它，使许许多多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同志至今坚持其错误。还是罪恶的它，使多少同志至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面畏缩恐惧！

同志们，这样可恶的东西，不打倒它，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打倒它，哪里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不打倒它，中国的颜色就必将发生改变！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们，你们不是要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吗？你们不是要发动起千千万万群众共同战斗吗？那么，你们就掀起一个狂涛巨浪，彻底冲垮反动的唯出身论的堤岸吧！到了那一日，千百万群众就会冲决束缚他们的一切，和你们汇成一股不可抗御的力量。也只有到了那一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会彻底被葬入坟墓，中国的颜色才永远永远是鲜红的。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发表的〈出身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说，它的出现好得很！它宣告了反动的唯出身论的破产，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出身论〉敢于冲破社会上旧的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向尚有强大社会势力的反动唯出身论宣战，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

〈出身论〉的出现，不免要被一些人认为是株大毒草，但这算得了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也曾被认为是毒草，然而今天却成了世界人民的指导思想。真理只有在同谬误的斗争中才能发展，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们深信：反动的唯出身论虽然貌似强大，但它的反动本质决定了它只是一只腐朽的纸老虎，革命的〈出身论〉今日虽是星星之火，明日必成燎原之势。

同时，我们认为，由于作者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有限，由于对社会进行的调查研究不够全面，〈出身论〉必定存在不少缺点和不完美的地方。我们热切希望广大的革命同志用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武器来衡量它，并真挚地欢迎同志们对〈出身论〉提出批评。】

《出身论》之一：《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 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起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面我们就从毛主席著作和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阐述我们的观点。

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

先从一幅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幅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幅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幅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

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

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

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著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份。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不能忽视我们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正待彻底改革。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同属于一种错误路线，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

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二．重在表现问题

如果你没有理由驳倒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也驳不倒现在社会的好影响是

主流，也不得不赞同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重在表现”的几个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说“重在表现”是修正主义观点。后来听说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才慌忙改口。可见他们对这项政策根本不理解。让他们来解释这项政策，就必然会任意歪曲。限于篇幅，这里只检查三种提法，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1.，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

貌似公允的同志常对出身不好的青年这样讲：“一我们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

〔1〕这是不看对象。

江青同志解释过这句话。她说：这是对背叛本阶级的个别份子讲的。江青同志的解释是甚么意思呢？举例说，恩格斯本人是资本家，但他背叛了本阶级，成了共产主义的第一代公民，成了工人阶级杰出的领袖。巴黎公社中也有一些本人是资产阶级份子的委员，但他们是工人阶级公社的代表。我国革命时期也有这样的例证。我们能不能因为他们成份不好而抹煞他们的历史功绩呢？不能！我们要重在政治表现。这就叫“不唯成份论。”我们认为相反的情况也使用于这个公式。对成份是矿工，但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革命的份子，也要重在表现，也没有一点可以轻恕他的罪恶的理由。小而言之，李鼎铭是地主份子，但他向边区政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毛主席赞扬说：“不管甚么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就是不以人害言，亦即不唯成份论的具体表现。

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归为哪一范畴。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说：

“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这又是一个例证。

由此可知，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不见得就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这一点连阶级敌人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例如，运动期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上写道，一个反革命富农分子，因为三个儿子检举了他，夜间持凶器砍死、砍伤了他们。又据一份传单，市内某公社工厂书记（一个蜕化的变质分子，临自杀前，亲手溺毙了自己的孩子。他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也不会为自己报仇的。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甲（是个学生）：“你甚么出身？”

乙：“你呢？”

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

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说唯成份论都没有道理，那么为出身论又怎么能够存在？

有些人会引用毛主席的话反驳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地主、资本家他们长期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们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这也就是我们“有成份论”的根据。但是对他们的子女，就不能这样看了。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会。今天的社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份”，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我们必须划清出身和成份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虽然样子很“左”，但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

2.，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于是，公允派的同志不谈成份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即政治表现）……”

这是“出身即成份论”的翻版。两相比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

别。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我们在本文第一个问题已经分析过：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同一性。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连。

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见面问对方：“你是什么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简单又省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特别是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派来说，绝不相信你平时的表现，也不相信你大风大浪中的表现，既怀疑你过去的表现，也怀疑你现在的表现，并准备怀疑你将来的表现，直怀疑你个死而后已，才给你盖棺论定。终于连他们也怀疑腻了。如果看出身，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再说，表现这种东西，对于某些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准绳。爱奉承的人，认为拍马屁是最好的表现；爱虚伪的人，认为客套是最好的表现；爱错误路线的人，认为出身不好的青年终日超经验的忏悔是最好的表现。哪里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三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看一看毛主席怎样教导我们吧，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这唯一的标准是出身吗？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出身这一条吗？

十六条中的第五条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谈到要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有出身这个根据吗？

革命左派的三个标准，有出身这个标准吗？没有！完全没有！出身好坏与本

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出身不好，一样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

〔 2 〕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

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谁也不能说王杰的光辉程度就不及雷锋。

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里马常有，但认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形、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着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踏了千里马，就连普通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我们必须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你们真的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我们说，你表现不好，比如：顽固坚持反动路线，不学不用毛主席著作等等，就是出身于红五类中的前三类（革干、革军、革烈），也一点没有用处。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3. 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

公允派的同志这回换了口气：“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子……”言外之意，和红五类子女当然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功利主义这块法宝来了），因为：“他们不保险！”

可是，为什么不保险呢？“无论如何，他们受过坏影响！”外因决定论者这样说。且不谈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谈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那么，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社会影响再好，表现也要坏一些呢？这绝不是代数和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毛主席说：“不破不立”，又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不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又如何树立

得起来？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经不起风浪，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颇为令人羡慕的好汉们，后来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吗？他们保险吗？而领导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革干子弟不想复辟，不会革老子的命。”家庭观念极重的人这样说。往往，复辟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们保险吗？后来形“左”实右的工作队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时，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他们保险了吗？北京市中学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录音机等等，陈伯达同志还称之为假红卫兵。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古代有个女皇名叫武则天，她把大臣上官仪杀了，却把上官仪的女儿留做贴身秘书。有人为她担心。她说：“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悦诚服，这有什么关系？”看看那些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惧怕毛泽东思想，不贯彻党的政策，又怎么能相信革命的青年？可笑！他们连封建帝王的这点远见也没有，还自称为“无产阶级战士”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绝不会在接班人的条件中写上出身这一条的，因为他的政策最正确，路线最鲜明。在他领导下，青年也就最保险。否则，纵然如革命胜利后驱逐剥削阶级的苏联，所有青年出身都不错，也是不保险的。

提倡保险论的人并不少，象样的理由却没有。难道这就是“阶级观点”吗？不像！这是“阶级偏见”，它和无产阶级无缘，和小资产阶级倒挺亲近。这些人头脑里没有树立公字，私有意识浓厚，所以度己度人，没有不变样走形的，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

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3〕

我们必须相信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广大青年，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份人抬高一部份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我们不允许用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当然，任何一个有出息的青年都应该下定决心改造自己。这样即使影响不好，也能变坏事为好事，变阻力为鞭策。如果没有这种决心，那也就无所谓有好的政治表现，也就不堪设想了。

三. 受害问题

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应该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这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者吗？于是谭立夫也说他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象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新改组的《北京日报》也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一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一)“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二)“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当干部”；(三)“……”。假使这就算是受害，那么，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竟然这么颠倒黑白，那也无怪乎它寿终正寝了，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回想修正主义集团当政时，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成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立。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

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们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至于说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不好功课，那纯粹是对出身好的青年的诬蔑。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中学也如是，据前北京市教育局的调查乱班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注意，这里的“捣乱”和造反没有关系，材料中指的是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窃行为的），大多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前团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就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说，从未见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吗？那么贫下中农子弟表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这个娃出身好，又

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社会上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的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业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会有被分配的把握。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正是对他们的考验呀！”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过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样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够多么不道德！

“他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何等狭隘的血统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父亲破了产，儿子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想不到今天父子关系竟紧密到这个地步了，“左”得多么可爱啊！

算了！我们不再浪费笔墨于这种毫无见地的谬论了。让我们研究一下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吧！

这正是修正主义分子一手造成的。那么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要压迫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呢？这不奇怪吗？我们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这些青年和他们不属于同一阶级，所以他们才这样做。而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而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以后，这些阴谋家便慌了手脚。当前的阶级斗争，矛头指向谁呢？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他们所包庇的牛鬼蛇神。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

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不顾中央指示，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扰乱视听的金字招牌。党中央正确地指出了他们推行形“左”实右路线，这便是其中一个渊源。

他们干这种罪恶勾当，利用的是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别利用一些高干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划在一二三类，因为革军、革烈实际也就是革干，而工农子女便只好是第四、第五两类了）。他们还利用部分中下层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反动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这套做法，也正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前奏。我们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主要还是从右边抹杀了阶级路线，因为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入党内，给某些五类分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

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息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有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1966年7月初稿，9月定稿，11月修改。

~{转载自《中学文革报》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注释：

〔1〕〈出身论〉刚发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这样写。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在团中央九中全会上讲这个话的李雪峰及其一流人物，现在都成了怎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

〔2〕〈出身论〉刚刚张贴时，在这句话的旁边，写满了“大毒草”、“胡说八道”之类的话，发泄够了谭力夫之流的廉价的愤慨。他们有眼光，因为这正

是〈出身论〉的主题。可是历史毕竟是无情的。今天不少红卫兵组织已经引用这句话做为自己的组织纲领了。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宣言写道：“过去的红卫兵组织只能由所谓‘红五类’子女组织和参加，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是要造它的反。”谨向这些组织的大无畏的行动，致以革命的敬意。

〔3〕“自来红”是北京的一种月饼的名称。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1967年2月2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之二：《谈“纯”》

联动是声名狼藉了，但联动的原则还被某些人奉若神明。不是常常听得到这样的怪论吗？“你们组织的成员都是什么出身？”如果对方回答：“什么出身的都有。于是乎他们就会大摇其头，说：“不纯，不纯！”

“不纯”？这个词多么耳熟！

窃据了中央文革副组长、全军文革组长的刘志坚不是大讲红卫兵的出身要纯、纯、纯吗？谭力夫不是也要他们那一伙纯、纯、纯吗？联动更纯得可以。要是谁的老子没有福气当上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就连边也不要沾。可惜！提倡唯出身论的纯字号的人物，大都没落到好下场。不论他们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误下台的，我们推测，和唯出身论的思想基础总是沟通著的。这个推测有没有根据？假使有功夫，同志们可以研究研究。

这且不提。有趣的是：今天大力提倡“纯”的，已经不再是联动诸公了。他们的老子是英雄还是反动，实在大有讨论的必要。假使老子反动了，还偏要喊“老子反动儿混蛋”，混蛋的口号还能算数吗？所以除非是毫无羞耻之心的，多半不挂老子这块金字招牌了。实际上，今天继承联动衣钵的，往往是被联动排斥过的，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激烈反对联动的那样一伙人。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深思了。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危害大众的东西，大公无私的人要造它的反，私心杂念颇重的人有时也要造它的反。前者提出的口号是“造反有理”，后者的口号是“造反有利”；前者要粉碎的是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们说：“我们要取消一切特权阶层”，后者要取消的只是它的表面的一部份，他们说：“为什么你是特权阶层，而我不是”；前者要扩大革命队伍，并把表现杰出的同志吸收进来做中

坚，后者则采取关门主义，唯恐人多手杂碰掉他们自封的乌纱帽。一个坦荡荡，一个长戚戚，同是造反，本质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也。

那么，你们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不是反对纯洁阶级队伍吗？非也！我们是坚决提倡纯洁阶级队伍的。在我们的队伍里决不允许一个剥削阶级份子混入，但是我们的标准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你们的标准，唯一的就是出身；我们的标准，唯一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根本的分歧。

你们认为出身相同的人都是一个阶级的，出身不同的人都不是一个阶级的，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认为：是不是一个阶级的，要看他们有没有一致的目的、纲领、方向、行动，而不是看他们的出身。出身相同的人，以上这些不见得相同；出身不同的人，以上这些不见得不同。出身于高干家庭的就都是同一个阶级的吗？谭力夫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于贫民家庭的，就都是一个阶级吗？时传祥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就都是同一个阶级的吗？赫鲁晓夫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不好的人就跟你不是一个阶级了吗？王光华烈士也不跟你一个阶级吗？马、恩、列、斯、毛这些伟大的导师也不跟你一个阶级吗？按照你们的标准去纯洁你们的“阶级队伍”，势必把谭力夫、时传祥、赫鲁晓夫都拉进去了，势必把王光华这样优秀的战士都排斥走了。下过这么一番去粗取精的功夫，你们的队伍将会纯洁到何种程度，等你们冷静下来自己做结论去吧！

依照我们的标准纯洁阶级队伍，就不会发生你们的弊病。我们的标准就是一个，这就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拥护它的，我们吸收；反对它的，我们不要；执行它的，我们吸收；抵制它的，我们不要；特别是在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吸收，不高举的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的队伍就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坚硬如金刚，纯洁似水晶，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这就会是一支非常战斗化的革命队伍。

的确，我们的成员出身是不同的，不同的岂止是出身？性格、年龄、经历、性别等等不同之点还多的是。但是，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好象是一种元素，在这毛泽东思想的大熔炉中，经过一番冶炼，就会变成一块再也分不开的化合物。这个化合物比起以前单个的元素来，真不知要强硬几万倍。

的确，你们的成员都是相同的，但共同的思想基础却不见得相同。你们不能

熔炼成化合物，而只是一堆貌合神离的混合物。你们当然可以夸口说：“我们的颗粒都是圆的。”但也只是圆的而已。雨一淋就会流掉，风一吹就会扬开，实在成不了事业。

目前，正当左派大联合，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全面夺权的时候，还有人企图形“左”实“右”地混进阶级队伍，大讲唯出身论的“纯”，我们对他们的最好的回答就是：要做化合物，不做混合物！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二期 1967年2月2日

1967年2月10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之三：《“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兼驳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

去年十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舞台上，出现了几个跳梁小丑，这些小丑是西城、东城、海淀三个纠察队阴魂的化身，他们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诽谤中央文革小组，辱骂亲爱的江青同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挑动武斗，制造混乱，查抄革命组织，散发反动宣言，种种罪状，举不胜举。这些小丑，就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们以自己的滔天罪行，招致了革命组织的共同征讨，招致了西纠、东纠、海纠等反革命组织相同的命运。如今他们虽然还在负隅顽抗，但是在群众之中，“联动”已经成了反动集团的代名词。各种小报，无不罗列他们的丑事。唯有知音，也远在大洋彼岸，实在爱莫能助。用一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的话来讲，算是咎由自取。

从联动表演的乌烟瘴气的场面里能让我们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在我们与之几个搏斗的回合之中，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我们不由得想起列宁的一段话。他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示了一个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剖析一下联动的本质呢？

迄今为止，正因为没有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武器，从思想上击溃联动，所以他们还不服气，还在没落中挣扎，还在失败中狂吠，还在梦境中描绘凯旋的场面。正因为我们没有从本质上揭露他们，没有触动他们的灵魂，所以至今还有一批年幼无知的小家伙，心甘情愿地充当殉葬的金童玉女，并且还准备继纠察队和联动

之后，成立其它换汤不换药的组织。从理论上击溃联动，显然是一个急需解决的任务。

用阶级观点分析联动，对于那些只善于贴阶级标签而不会做阶级分析的同志是个难题。假使联动分子都是些黑七类狗崽子，那也就另当别论；可是，他们偏偏是出身在光辉耀眼的家庭里，他们的老子都是十三级以上的大干部。说他们要复辟，要阶级报复？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太坏，打上了资产阶级烙印？很不容易为这些同志所接受，于是只好存而不论了。

联动成员不但以自己的出身迷惑了别人，也迷惑了自己。他们坚持自己的本质是玉洁冰清的，他们犯错误是纯属偶然的。按照最近替联动的幽灵大唱挽歌，抛出“论〈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话来说：“虽然干了许多错事（即使现在仍在发生），但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好同志。”没有疑问，这种不要脸的腔调“表明幼稚比表明恶意更多些”（马克思）。我们批判联动的同时，也不能不对阐明联动思想基础的“评〈出身论〉”进行严肃的批驳。

毛主席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我们就根据这一教导，尝试一下，怎样应用阶级斗争学说来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课题。

联动的骚乱告诉我们：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是资产阶级复辟力量的最理想的继承人。

“革干子弟是修正主义的宠儿？”清华附中红卫兵受不住这样尖锐的论点，忍不住用谩骂代替了论证：“这些混蛋！”（显然这句话不象是骂自己）。但是谩骂摧不垮铁的事实。请看！

一．物质上的特权阶层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著教育部门的时候，给高干子弟安排了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造成了一个新型的少爷阶层。

最近被革命群众查抄的联动老窝——八一学校，就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其陈设之豪华，其生活之优越，完全是培养资产阶级幼苗的理想的温床。“他们住在花园式的校园里，校内有动物园、游泳池、假山、大观园等等。一般教职员工成了某些贵族少爷小姐的集体保姆，动辄遭到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辱骂。”（据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传单）每逢周末，小轿车排成一条长龙，

迎来送去，川流不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是一个小姐少爷的安乐窝。据云：每个学生除去国家负担吃、穿、住及生活用品之外，还要发给十八——二十五元零用钱。我们可以和下面几个数字做一比较。国营农场的一个人力工，每天工资八角；一个社员的收入比它还要低。一个工人，能够维持生活的费用是每口人每月十二元。但是军工大读书的一个普通学生，只零用钱一项，就达二十几元！这样的青年那里懂得艰苦朴素？怎么不大肆挥霍？只要看看联动开会时，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叼著烟卷，穿著呢子衣服，乱放花炮，大嚼特嚼酱肉、点心、水果糖，便很令人痛心了。此外，高干子女可以任意挑选“理想”的大学，上腻了，还可以任意调校。一些培养国家特殊人才的地方，不仅剥削阶级子女无权问津，就是广大工农子女也只占极少数。一个青年人，长时期在这样脱离劳动人民的环境里生活，就必然会象毛主席所说的：“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其中的一部份，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我们奉劝那些主张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

联动的成员之一——清华附中红卫兵不得不承认这一论断。但他们想用“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不可分割”的论点来分庭抗礼。他们说：张地主的儿子接触的必然是王地主、李地主。这个狗崽子看见自己的爸爸剥削贫农，“想来”是不会感动的。这实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大家都知道：〈出身论〉的读者群主要是今天的青年人。迄今为止，还真没有看到修正主义分子开办过“地主子弟专类学校”。所以张地主的儿子从上小学起，经常接触的必然不是一些地主。而且“想来”也没有“福气”见过自己的老子剥削贫农。但是，这群联动分子的论点对他们自己倒很合适。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囿于自己的集团之中，连十三级干部以下的子女都耻于交往。只有他们才有权力依靠父母的功勋，享受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因而也就很少接触到劳动人民，也就根本不能领会毛泽东思想。

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控制宣传和文化部门的时候，也拼命造就这些青年的贵族心理。

翻开以前的杂志、报刊，回顾以前的戏剧、电影，以教子为题材的故事多得惊人。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某甲，一个出身好的青年被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坏了。某甲的朋友（是个出身相同，而且一点缺点也没有的青年）和某甲的父亲（是个当权派）就开始帮助他了。怎么帮助呢？不是要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是要他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而是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晚上，带他到烈士陵园前，宣读一份血书，于是霹雳一声，这个青年就翻然醒悟了。前中宣部网罗成群的末流作家，大搞这类作品，难道不是别有企图吗？他们歪曲阶级斗争的规律，要人们相信：老一代死光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是敌对阶级了。而高干子弟是最理想的青年，即使暂时有个别人落后一些（那时无数事实迫使这群阿谀成性的作家也不得不客观一点），但只要等到打雷的时候一念血书，便可以臻于完美了。假若事情真这么理想，今天的联动问题也就用不著伤脑筋了。可能是血书丢了的缘故吧？旧中宣部如今是批臭了，可是由他们制造出来的盲目优越感却被接受下来。正如造谣者被抓住了，谣言却被相信了一样，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不少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是不够艰苦朴素的，个别的甚至到了腐化糜烂的程度，当然也有很值得敬仰的律己极严的首长，但是因为他们终日为国事操劳，对子女的教育未必是深入细致的，至于一般当权派，大家都深有体会，他们过去对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都是不够的，何况对子女？所以，一个青年人，长期在这种经济地位中生活，很容易养成奢侈、放纵的毛病。正如列宁在阐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特点时所说的那样：“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著的腐化活动制造著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我们奉劝那些大讲出身好家庭影响就一定好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联动的喉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只承认别人的家庭影响不好，不承认自己的不好。要是他们不把家庭影响神秘化，那么，他们成为特权阶层的“理论基础”不就动摇了吗？所以，他们就用上级的口吻教训说：“我们诚心诚意地告诫那些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要革命的青年……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千万不可粗心大意。”真正应该告诫的不是他们，而是你们！出身不好的青年几年以来承蒙帮闲文人讥讽嘲骂，承蒙好心的同志无休止的提醒，对自己的家庭总是存在戒心的。

大多数青年是要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往往老子说什么，他们就下意识地反对什么。我们应该相信这些青年人，是能够在他们的老子磨刀霍霍的时候，把老子揪出来的。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他们和你们一样，也接受了党十七年的培养；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主动地抄了自己的家，向毛主席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但是，对于相同的家庭影响，对于那些“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著的腐化活动”，谁的抵抗力更强呢？你们盲目崇拜自己的家庭，正象一个娇滴滴的姑娘所说的：“我的红爸爸、红妈妈，用通红通红的烙铁，给我打上了鲜红鲜红的烙印！”这样，当你们的爸爸妈妈没有红烙铁的时候，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用反感去抵制的东西，你们就用同感去接受。你们就容易饮鸩如蜜，夜郎自大，放松思想改造。你们根本不了解他们。在你们中间已经形成一道深沟，筑起一道高墙。你们的危险，不在哪一个莫须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你们，而就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之中，季孙之忧不在颡臾，而在萧墙之内，此之谓也！

三. 丑恶的灵魂

长期受修正主义的毒害，长期以贵族自居，长期放松思想改造，势必使一部份革干子弟的灵魂，变得十分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请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吧：

北京六中红卫兵，西纠一小撮，在武斗当中，制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例如：

浇、烫、烧——浇：被打的人昏死过去之后，用凉水猛浇其身，使其清醒，然后继续逼供拷打。烫：用滚开的水向被打的人头部猛浇，受此刑法后，人的头皮脱落，脸色红肿，胸前背后都是烫伤，惨不忍睹。烧：凶手最初是用一根火柴烧被打人的头发，后来竟发展到用整盒的火柴烧，另一做法是把火柴燃著后，向被打的人脸上按，或向嘴里塞。

吊、踩、刺——吊：凶手有时拿人命开玩笑，将活人做上吊的试验，用绳套套在被打人的脖子上，猛力踢倒他脚下的凳子，使其悬空，吊到半死，又猛一松绳子，使其重摔于地，再找人做人工呼吸使其苏醒继续受刑。踩：被打者躺在地下，几个人轮流踩之，受此害者往往内脏严重受伤，上吐下泄，大便不能自控。刺：凶手用木枪猛刺受害者，直至刺得对方躺下为止。

跪、刹——跪：凶手将凳子翻过来，令受害者跪在凳子上，长时间不得起来。有时令受害者跪煤渣，使跪者两膝疼痛难忍，鲜血直流。刹：凶手用刀刹受害者背部，直刹得血清渗出，方肯罢休。

磕响头：凶手令受害者给他磕响头，如果磕得不响，就用脚向他头上猛踩，受此刑后，受害者大都脑震荡，记忆力衰退。

诸如此类的刑罚，名目甚多，举不胜举。

再看一看他们是怎样杀死十九岁的学生王光华的，而他的全部罪过，只因为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王光华被带到六中“劳改所”，刚一进屋门，西纠头目之一姜××马上抽了他一巴掌，随后又被带入里屋，令王脱去上衣，解下皮带。这时屋里屋外都有看守，戒备森严，屋里的暴徒均为西纠队员，他们兽性大发，蜂拥而上，拳打脚踢，对王使用惨无人道的暴行。用木枪向王猛刺，并用枪托劈头盖脸向王打去，使之无法忍受，倒翻在地。十来个暴徒手持各种凶器进行为时三十分钟的毒打。王肋骨被打断三根，昏迷过去。这时，一个西纠队员一面踢王头部和颈部，一面恶狠狠地说：触及触及你的灵魂”。有的一边打一边大声怪叫：“要馒头不要窝头”。（即要武斗不要文斗）。就这样王光华被打死过去几回，后经“劳改所”中“黑帮”给予做人工呼吸，才免除一死。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王光华已经面部青肿，浑身重伤，危在旦夕。去厕所时还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上，小便出血。事态已这样严重，可是一小撮人还不死心，而后，粟××和陈××等又曾殴打王光华，逼他写材料。写不出来仍是一顿毒打。恶毒的看守也为虎作伥。在残酷的法西斯暴行下，就在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左右，王光华被这群暴徒活活打死了。夜晚，十二点多钟，趁夜深人静，就把王光华的尸体送到东郊火葬场焚尸灭迹。

还可以看一看，一个在旧社会颠沛流离的老工人是怎样被活活地害死的。

退休老工友徐霏田（七十六岁）于十月三日下午，被六中红卫兵领导，西纠队员王××和陈××带到淋浴室。他们说：“给你洗澡”于是这群暴徒们开始惨无人道的折磨这个老工人。先是用冷水泼身，只听老人惨叫：“冷啊！冷啊！”然后又用滚开的水向老人头上猛浇。王××，陈×× 等人一面浇一面狞笑著说：“老头子，今天让你洗个痛快！”老人被折磨的死去活来，连声惨叫“热啊！热

啊！饶了我吧，老祖宗！”这伙暴徒兽性更是大发，反而浇的更厉害了。老人的头皮被烫去一层。当老人勉强爬向宿舍时，已经奄奄一息了，不省人事了。四日早晨，徐要求医治，但他们不许出屋，不给医治。当天十点四十分徐又被王××，陈×× 等人拉到后院，进行种种毒打和戏弄。他们强迫七十六岁的老工人学哭，学笑，令其吃屎，喝尿，过够瘾后，又把徐嘴堵上，带到后院厕所中，将徐吊死。这群暴徒真是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竟扬言徐上吊自杀了。

老工人徐霏田在旧社会里，没有死在国民党侦缉处的手里，侥幸死里逃生。今天，这位有三、四十年工龄的老工人却死在西纠一小撮法西斯暴徒手里（以上均摘自北京六中红旗公社公布的材料）

无独有偶，一中的刑罚和刑具也足以说明与六中比美。而且打死了人，还得让“劳改犯”（大都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去和死人亲嘴。握手，说：“亲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见一中传单）这就是联动的前身，这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称之为“好同志”的那些人！

我们奉劝那些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的同志，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中的这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少。……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

为联动招魂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摆出一副让贤受禅的高姿态，说什么“随著运动越来越触及到党政军的领导机关，有一部份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已经不能充当革命的主力军了”。触及党政军的领导机关，碍高干子弟何事？说穿了，就是这些高干子弟的老子已经成了黑帮人物，再靠“老子反动儿混蛋”吃饭就该打自己的嘴巴了，只得忍痛把他们割爱。实际上，以前谁又承认你们这些“好同志”是主力军呢？这样一些嗜血成性的人配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吗？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清华附中红卫兵装腔作势地说什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二十年以后的今天。”算了吧！设想，二十年以后的今天，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不正是你们这些——西纠、东纠、海纠、联动这一伙人当政了吗？不正是今天没有暴露自己是杀人凶手但具备了那样心灵的人当政了吗？你们和你们的这些“好同志”不是在不久以前以当然左派的面孔担任了一切领导职务了吗？那么，二十年以后

的今天，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不仅中国的局面要葬送在你们的手里，世界的命运也要葬送在你们这群败类的手里！

“我们打人，动机是好的！”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你们打人，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的“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去打所谓的“反革命”的。不管你们打谁，在客观上就起到箝制了革命群众之口的作用。你们威胁著左派，吓唬住中间派，这是多么为大众所唾弃的效果！你们为了逃脱罪责，妄想求助于别人看不见的动机，那是站不住脚的。你们真的有为无产阶级事业贡献终身的动机吗？那么你们的联动就不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了，就不会大冲公安部，就不会高呼：“刘××万岁”了！今天都没有好的动机，难道当初就会有吗？很明显，你们的动机就是要做刘邓路线的宪兵队。就是要扑灭革命烈火的刽子手！

我们要郑重地指出：“评〈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不了整个革干子弟，更代表不了整个红卫兵。我们敬佩那些进行过刻苦的思想改造，不以出身当作包袱的革干子弟。这样的同志，总是革命子弟的多数。因为我们从来就承认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承认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我们是承认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我们是反对以出身来分界的，我们没有忘记，运动初期，一些优秀的红卫兵发表过“致爸爸妈妈的公开信”他们勇敢的承认自己的家庭影响不是鲜红的。我们也怀著十分的感激心情，铭记著一个来访者——某校高三年级同学的话，她对接待人员说：“我是革军的女儿。我完全同意〈出身论〉。”接待人员问说：“有人说〈出身论〉对出身好的有压力，那么，你不感到有压力吗？”“不，我不觉得。我只觉得十分高兴，因为有更多的青年又可以和我一起闹革命了！”听著！自以为血统高贵的小丑们！这是多么伟大，宽阔的胸怀啊！你们是不配替革干子弟说话的。让你们的大作和联动的在天之灵一起见上帝去吧！

{四．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不容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小撮处于贵族地位，具有卑鄙污浊的灵魂的高干子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宠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准选民。

正是这一小撮人，在“评〈出身论〉”中散布流言蜚语，杜撰最高指示，造

成一片假象，好象复辟力量的继承人不是他们，而是出身不好的青年。故说什么“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即使非常积极，也要拼命看他们的实质。”“不管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革命的重担反正不能落在他们身上。”言外之意，重担他们是挑定了。这显然是违抗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接班人条件的。我们不能不指出，哪些人会变成资产阶级最可靠的金童玉女，也是随著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固定是一些人的。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贯穿著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矛盾。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事物发展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往往互相区别。这时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期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那么，具体到文化大革命阶段，激化了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像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土改时期，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反右斗争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吗？是象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吗？不是，都不是。固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自有它特定的主要矛盾。十六条中的第一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五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条也指出：运动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可见，在目前主要矛盾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正在开展的广泛夺权斗争，说明了这个矛盾达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

在阶级斗争的新阶段，资产阶级必然会寻找新的机会，新的舞台，新的代理人又必然寻找新的御用工具，必然会使用新奇的、巧妙的、隐蔽的手段，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唆使他们，挑动他们，利用他们和自己一起演出复辟的丑剧。而不幸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正是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这样，

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顶峰，开始走向没落的时候，西纠、东纠、海纠、联动等反革命组织就应运而生了。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我们奉劝那些顽固地坚持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保险，出身越好越保险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复辟力量）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

“这真是奇谈怪论！”在联动的安魂术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这样喊道。他们或许会反问：“谁敢说我们要复辟？难道我们希望蒋介石回来吗？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吗？”替你们说句公道话吧，你们的确不希望蒋介石回来，的确不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但是，复辟不等于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尸。赫鲁晓夫复辟，沙皇尼古拉并没有上台；铁托复辟了，贝尔格莱德有限股份公司股东并没有被找回来当经理。同样的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等篡权分子，也并不打算请蒋介石回来实行独裁，也并不让原来的剥削分子发号施令。难道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不够用吗？他们不是早已建筑了八一学校，哈尔滨军工大这样的复辟温床了吗？西纠，东纠，海纠，联动不就是修正主义合格的苗子吗？你们在“评〈出身论〉”中，一口一个资产阶级屠刀，殊不知和平演变并不希望刀光剑影。而到了关键时刻，敌人的屠刀也绝不会落在你们的绿军衣上，正是你们用双手接过去，挥舞著它，砍死了王光华，砍死了徐霁田！这不是复辟吗？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益，或为了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队的利益，最后为了你们个人和你们反动小集团的利益，行凶、抢掠、捣乱、破坏，这种种行为，就是复辟！你们决不能因为自己不希望蒋介石回来，就不承认自己搞复辟活动。

联动就是自觉地搞复辟活动！当然，这是指他们整个组织而言。至于个别成员，总是有自觉和盲从的区别，自觉和受蒙蔽的区别，改正错误和坚持错误的区别。而清华附中红卫兵，过去是联动瘟神的膜拜者，不知闭门思过，却等待秋后算帐，不知痛改前非，却到厂矿农村捣乱，拒不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平等的革命权力，拒不放弃自己得天独厚的贵族地位，今天又妄想借批判〈出身论〉捞取发言的机会，当作一根救命的稻草，这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告诉你们；如若“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你们“抛到茅厕去”，那就

悔之莫及了！

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唯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你们读了我们的文章，不要以为这是侮辱你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当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某些部门占优势的时候，我们怜悯你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是一种怎样的脱离实际的教育，在家庭里过著怎样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的是怎样胡说八道的文艺作品，形成了怎样一种愚不可及的思想，并成了怎样一种荒唐的观点，办了怎样一些遗恨终身的傻事！多么危险！多么危险！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共同战斗，共同革命，共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吧！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三期 1967年2月10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之四：《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中学文革报》嘱咐我们写一篇悼念郑兆南烈士的文章，这个题目出得好。郑兆南同志的一生是一首壮烈的诗。她把自己年青的生命献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她的英雄业绩不朽！

一．记真正的大无畏精神

郑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员。运动初期，她不顾修正主义校领导的重重围攻，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于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正当敌我双方斗争激化的时刻，工作队进校了。从此，刘邓反动路线的混血儿——工作队、黑党委、保皇派联合在一起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耍尽阴谋诡计，分化、瓦解、利诱、威胁革命群众，孤立、诬陷、打击、斗争革命性最坚决的左派力量。文斗不行，又来武斗。他们殴打、折磨郑兆南同志，让她在非人的境地里渡过了四十七天。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她“释放”。但他们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最后四天里，勇敢的郑兆南同志仍然坚持战斗。她给党写了两封信，控诉了反动路线的罪行，对革命运动提出了不少好建议，信中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的怨艾。就这样，她以卓越的政治表现，写完自己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最后一页。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

还重。”毛主席早就为革命烈士做出过这样崇高的评价。郑兆南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的一段历史，应该说是一个英雄的历史。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写得出来的。而郑兆南同志要达到这一步，需要比一般的同志多花费一倍的勇气。她每向前一步，都更容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都更不容易为习惯势力承认与谅解，其本人也就很容易产生自卑、沮丧、失望乃至麻木的情绪而不能自拔。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无论是传单、是标语、是发言、是议论，我们不是听熟了这样的观点吗？“黑五类狗崽子，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彭真集团一贯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这股阴魂还大有可依附的躯壳。当时炙手可热的刘少奇、李雪峰也大讲革干子弟的优越性，秉承他们“圣旨”的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做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可是多么奇怪！一个地主狗崽子，竟然敢于冲破层层网罗，挺身而出，给黑司令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工作队的负责人，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有恃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有妨碍！”象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是的，是要老实。不过要看对谁老实。革命的青年要对毛泽东思想老实。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无穷无尽的热和光。请问唯出身论的同志们，你们何必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此偏爱？为什么只让他们独享毛泽东思想的光和热？你们可有这样的好心肠吗？没有！那么，你们就是要他们和你们一样，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忠实的工具、打手。这就是你们的“老实”！郑兆南同志不做这样的老实人，她就是要说，要动，就是要向你们的主子投以长矛和匕首。

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冲动，甚至撒娇、骄横、耍无赖。因此很难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宁可相信后一种人而不可轻信前

一种人。假如不具备炽热的无产阶级感情，假如不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郑兆南同志正是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人。她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岖。她在第二封遗书中分析过当时的思想动态：“拿我来说，家庭出身是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一个领头的‘假左派’；把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但是，郑兆南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她没有被这些制人于死命的包袱所压倒，她“听了动员报告，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天夜里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它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郑兆南同志就这样毅然决然地敲响了战鼓。

二．论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现

面对这样大无畏的宣战，牛鬼蛇神颤栗了。郑兆南同志在遗书中如实地描叙了这一时期修正主义当权派的活动：“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怎样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权派从自己乌七八糟的武库里，为工作队和保皇的赳赳武夫们寻找弹药了。那便是他们过去从小汇报中汇集起来的材料。这些材料无一不贯穿修正主义决策人所倾心的“重在表现”这样一条黑线。

先谈谈小汇报制度。单有一群“积极分子”，这是最受反动主子青睐的“大有可为”的人物。他们以搜寻小是小非、琐琐碎碎的新闻为能事。动辄运用他们的“天才”，加以夸大、渲染，以便于他们的上级随时利用，务使人人变成不敢造反的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后快。小汇报制度首当其冲的牺牲者，除去反对修正主义分子坚持正确立场的革命左派外，就是无论是否是左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汇报他们的情况，是很容易被认为有“阶级感情”的。郑兆南同志二者兼而得之，问题也就更严重”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她曾用苏联画报包过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再比如：她指导学生批判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油印时没有加按语。又比如：她曾在几年前的一堂课上说过一句错话（天晓得他们的记忆力怎么这样惊人？）有了诸如此类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独特的分析，巧妙的总结，聪明的臆测，精心的杜撰，无耻的捏造，就不难做出尖锐的结论了：“反党”

这就是修正主义集团最得意的“重在表面”政策。这条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上面所谈的只着眼一个人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们把教员和学生的矛盾，干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这些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到对抗性矛盾的地步，“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部分人。我们在《出身论》中谈到过，一些中下层干部和群众“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他们就是这样菽麦不分，把无限热爱党。无限忠于党的郑兆南同志打成“反党”分子！

《中学文革报》记者为我们走访了郑兆南同志的各届学生。其中有党团员，有革命造反派。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回忆烈士的吧！

一位同学说：“郑兆南同志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我入团的时候，是我思想

斗争最激烈最痛苦的时候。我到底在她的帮助下，检举了贪污的父亲！

又一位同学一往情深地说：“有一幕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有一次我们去过队日，给烈士墓献花圈。在出发前下起雨来。同学们犹豫了。可是郑老师脱下雨衣来盖在花圈上，淋着雨，领我们走了。这次队日活动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班上发生过一次丢钱的事，”一位同学陷入沉思中。“大家猜疑起来。郑老师知道了，便在晨会上给我们宣读几则毛主席语录。她说：‘请拿钱的同学再好好学习学习这几段语录。如果想通了，我劝你把花剩下来的钱不要再花了。如果彻底想通了，可以把钱交给我，我负责保守秘密，不损害你的名誉。因为这证明你提高了觉悟，还钱的勇气是大于拿钱的勇气的。’不到中午，钱就还到郑老师手里了。”

“郑老师在五年前就用主席语录批改作文了！”许多同学都这样说。这就是郑兆南！这是她多年以前刻苦改造自己的结果！这是她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结果！

这也许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是比较起五十二中黑支部所提供的“弹药”来，哪一个更能代表郑兆南同志的本质呢？哪一个应该算做“表面”，而哪一个又应该算做堪称本质的“政治表现”呢？天下竟也有这么一帮糊涂虫，会认为政治表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或者因为郑兆南同志是个“狗崽子”吧？难道因此她就不可能有好的表现吗？当然，我们没有忘记毛主席教导的：要在大风大浪中，要在群众斗争中识别干部。我们认为郑兆南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两封充满革命豪情的遗书，就已经雄辩地说明了她在大风大浪中的表现了，她完全够得上一个革命者的称号。最令人感动的是：郑兆南同志对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对于那些令人难堪的造谣诬蔑，并不想申辩澄清。在她交给党的遗书中，通篇只用了三句话高度概括了那把她打成“反革命”的种种流言蜚语：“这些材料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还用得着逐条驳斥那些谰言吗？用得着涕泪横流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隐衷吗？用不着，用不着！胸怀坦荡的郑兆南同志不肖于和制造谎言的无耻之徒打官司。她充分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战无

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信他们一定会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做出正确结论的。其实，她在与死亡搏斗的四天里，完全没有注意到个人的历史结论下得正确或不正确。那有什么关系呢？她所念念不忘的，是仍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学校，是整个中学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她在遗书中大谈特谈的就是这些。至于她个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她认为没有什么谈的必要，这就是郑兆南烈士的气魄！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所必须具备的气魄！这也就是她的表现，是麇集在反动路线麾下的苍蝇们所无法理解的政治表现！

三. 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郑兆南同志象挺拔屹立的青松，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阴风吹不倒她，工作队的暗箭也射不垮她。于是保皇势力伙同流氓和暴徒，带着皮鞭粉墨登场了。举凡控制了群众的“多数”，还采取武斗的，都是虚弱垂死的表现。五十二中也决不例外。

郑兆南的爱人唐锡阳同志沉痛地对记者说：“这一小撮人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着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载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打着鞭子，象对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后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里，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这样她得了痢疾，夜里为了允许她在盆里拉痢疾，要勒索两元钱！……同志们，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只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折磨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扯谎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深更半夜，她到底经历了多少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为了证实这些话，《中学文革报》的记者访问过亲眼目睹郑兆南同志受害的学生家长，其中有老工人，有干部，所谈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莫不唏嘘感叹！听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叙述，再想一想毛主席的话：“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

阶级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任何一个革命同志都会对罪恶的刘邓路线引起愤恨，这是一条多么残酷的路线啊！

然而，在当时，那些挥舞着皮鞭耀武扬威的流氓，那些在一旁煽风点火的篡夺革委会大权的保皇分子，那些默许行凶、遥控大局的工作队，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这一群张牙舞爪的活疯子用了这么多凌辱人格的酷刑要把政治头脑如此清醒的郑兆南同志逼到和他们一样疯狂的地步！你当真以为他们是在打“地主狗崽子”？你以为他们当真要让她“背叛家庭”！那才是梦呓！他们打她，是因为她紧紧跟着毛主席，打她，是因为她听了毛主席的话，起来闹革命了！而什么家庭出身黑七类八类的，那才是招摇撞骗的幌子！

但是，这些人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在这种情况下，象郑兆南同志这样的处境，很容易迷惑，张惶或者误解。但是，她非但没有为个人的安危所忧虑，反而为纯洁红卫兵的组织而担心。遗书中是这样写的：“我爱红卫兵，我恨流氓。在大量可爱的红卫兵和革命同学中间，也混杂了少数个别的流氓。我建议在以后，应当清理这样的流氓分子，不能允许他们沾污了光荣的红卫兵组织。不过话又说回来，运动中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流氓能如此得逞，这和革委会的无心真正革命，其中有人借机发泄私愤见死不救，因此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也是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阴魂不散的必然反映”。

再让我们回想一下，郑兆南同志一个人，关在阴暗腐臭的牢房之中。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忍受着刑后的创痛，忍受着精神上的刺激，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长夜，整整四十七天！也许她真的疯狂了？失望了？怀疑了？消沉了，不！她一直琢磨着怎样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真正能代表党的人。她坚信：“也许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革命势力正躁动于母腹之中，革命的光芒开始喷薄欲出。不管情况怎样，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革命的群众终究是要起来的。”这就是她对待阶级敌人的最好的回答！

我们再强调一遍，有这种思想的同志是一个地主出身的人！你可以不解释事实，但无权篡改事实。事实就如此。郑兆南同志的这种感情究竟算不算得无产阶级感情？你看她对毛主席、对党、对真正的红卫兵，是多么爱戴，多么关心。不

管处境多么恶劣，不管反动的东西把红旗打得多么高，伪装的多么好，而英雄的郑兆南同志总是最能听到党发出来的真正声音！同属于无产阶级的同志，不论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他们的思想总是沟通的。这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在起作用。我们简直不愿意再提起“联动”那一小撮败类。他们的出身倒不错，可是同郑兆南同志比较一下吧！一个是侏儒，一个是巨人；一个是粪土，一个是金石！在这里，又一次证明了，出身并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决心！

四．论致死不渝的战斗精神

按照革委会里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想法，郑兆南是被他们整个制服了。由于内脏损伤，她已经浑身浮肿，遍体疮痍，白血球接近到最低点，看来没有几天活头，更不会有斗志了。为了减轻罪责，他们就把郑兆南“释放”了。

到医院去治疗吧？第一句话就是“病人什么出身？”听了答复，便被拒之门外了。郑兆南同志感到胸口闷，想喘又喘不出来。特别是在晚上，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就在一个椅背上，放一个枕头躺在枕头上。她的面前放上纸笔，因为她“有许多许多的话（不只是我个人安危的问题）要向党说。”她要继续战斗！她要 and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尽管那时候外间还不知道刘邓受批判）进行浴血的战斗！但是白天她不能写，怕引起还不十分懂事的女儿的思想混乱，只有在晚上，她才向党倾吐自己的心曲。这时，她还对唐锡阳同志说：“即是市委不处理我这封信，将来轮到我不发言的时候，用大字报贴到学校去，也表明我对革命的态度。”她就是这样满怀胜利的信心，克服了难以形容的困难，把这封长信写下去了。

到了第四天头上，信还没有写完，郑兆南同志的病情恶化了。她咳嗽、吐血、坐不住了。锡阳同志把她送到第六医院，大夫先是不收。几经周旋，再和五十二中交涉，最后才勉强收下了。郑兆南同志躺在候诊室里，最后和死亡搏斗。她第一次喊叫起来。她是想把死神吓走？还是想倾吐她向党还没有说完的话？这就不得而知了。她的女儿唐桦劝她说：“妈妈，你学学麦贤得、刘英俊吧！”“妈妈，大夫答应给你看病了！”大夫走来了，开始听她的心胸。需要安静。郑兆南的眼睛已失去光泽，她的嘴唇发乌了，可是她还是咬紧嘴唇，有一刻没有出声。不过，这时候她已经不行了。一个年轻的、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就这样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折磨死了！

人死了，还没有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她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败坏她的光辉的名字！受蒙蔽的群众中，包括她的女儿，十三岁的小唐桦。她对父亲说：“你不应该哭！妈妈死得轻如鸿毛！”在她的眼睛里看来，妈妈是被“群众”打死的，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唐桦呀，你今天所以有这样的品质、好思想，其中不是也有你妈妈的一份功劳吗？你不是也清楚地记得，她在灯下和你一起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思想要求你，给你讲英雄人物的事迹吗？难道你从母亲那里受到过一丁点地主阶级的教育？锡阳同志为了不给女儿加重思想负担，几乎含着眼泪回答她：你要和妈妈划清界线，紧跟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这就是在反动路线的统治下，革命同志的“永世不得翻身”！不仅郑兆南本人要戴着“假左派”的帽子被“群众打死，连知情的爱人也要嘱咐女儿和她革命的母亲划清界线！

直到亲爱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召以后，锡阳同志才把这两封遗书给女儿读了。这天晚上唐桦哭了，第一次哭了，伤心地哭了。是党和毛主席给了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哭悼自己妈妈的权利！

可以想象，郑兆南同志是在怎样一种逆境里战斗的。但是是什么东西支持着她致死不渝地为党的事业战斗的呢？不是别的，正是毛泽东思想，正是她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正是她对党无限的忠贞！联系起她平时行动刻苦要求自己的精神来看，这决非偶然了。郑兆南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女儿。革命的同志不应该再套上修正主义集团制造的死框框，因为她的出身而贬低她。更不应该象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如庸人看历史底伟人，拿破仑是一个伟人，他做了许多好事，也做了许多坏事。”我们只能根据郑兆南同志的阶级立场，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和她的功绩来给她的一生做一个正确的评价。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谈到的：“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得到同志的纪念。”“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今天，五十二中的革命群众起来了，全市的革命群众起来了，郑兆南同志得到了昭雪了。其他单位受过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同志也得到了或将要得到昭雪。这种令人鼓舞的情景，使我们有理由设想，当革命群众真正夺权以后，那些出身

啦、职位啦、级别啦等等死框框是再也不会害人了。那些小汇报啦、只重表面不重表现啦等等修正主义统治手段，是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你的表现是革命的，群众自然会认可；你的表现是反动的，无论你的嘴巴多么伶俐、血统多么高贵、手腕多么圆滑，群众也会把你扔到垃圾箱里去。因为那时的天下，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天下。那时的人们，是敢想敢说敢干的真正大无畏的人们。那时的思想，是真正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的思想！

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鼓舞踏着她的足迹继续战斗的勇士，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从血的事件中吸取血的教训！

让我们把一首战歌献给郑兆南的忠魂吧：

春雷天降起东风，浩荡污浊横扫空。

恨黯苏修一片土，喜瞻马列最高峰。

千年大业奇勋建，九域熊焰异彩虹。

神鬼“何其毒”计破，雄兵誓死捣黄龙。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四期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1967年2月27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之五：《谈鸿沟》

编者按：在学校里，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以家庭出身为基础的对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种对立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并且延续到现在，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一步批判，阻碍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谈鸿沟〉一文是着重针对血统论进行探讨和分析的。现选登出供大家研究，希望同志们读后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进行辩论。

〈出身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热心的读者便写信来问，这位首长是谁？是不是黑帮分子？可以请同志们放心，这位首长是个“心直口快”的好同志，不是黑帮分子，你们查一查一九六一年的《中国青年》，就可以找到这段话。

引用这位首长的话，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现象不合理；

第二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事实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一九六一年就已经存在了。不但存在，而且已经“不可逾越”了。这对于今天多忘事的贵人，是一个最好的答复。他们不承认彭真集团歧视过出身不好的青年，勉强承认一点，也只承认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青年才受歧视。大概如果今天再没有人谈这个问题，过不了一年半载，他们就连这一点也不承认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即使不说这些贵人过去曾经为虎作伥吧，不说他们今天用不承认来逃脱罪责吧，起码也可以说他们本人体会不深，不懂得在反革命集团压制底下是什么味道。

有不少同志不理解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而这些同志往往在现象面前停住了。实质是什么？他们并不懂得。比如产生鸿沟的渊源是什么？反映在哪些方面？有什么危害作用？说明了什么问题？他们都不知道，自然也找不到填平鸿沟的方法了。的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蕴藏已久的矛盾激化了，爆发了。“对联”出来了，谭力夫出来了，红卫兵纠察队和联动也都出来了。面对无数丰富的事实，这些同志迷惑了。他们本来最善于责备别人没有阶级观点，但他们自己却不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些事实。他们认为，谭力夫就是谭力夫，好象这么一个上了三年大学的蠢学生有本事一手扭转乾坤似的。他们既闹不清谭力夫怎么会成为谭力夫的，也不想知道为数颇多的群众在当时接受它的思想基础。直到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发表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这是“血统论”在作祟。但也就到此为止。不少人还以为自己既不是联动的一员，也不是谭氏麾下的战将，大概血统论和自己毫无关系吧？于是，当那篇与血统论宣战的〈出身论〉出来的时候，这些同志便跳了起来。他们一方面高喊“打倒血统论！”（因为人民日报社这样写的，他们虽然还迷迷糊糊，但也是要喊几声避避嫌疑的），一方面又高喊“打倒出身论！”（这一回他们清醒了，因为这和他们头脑里的混蛋东西大相径庭了）。于是他们也继承了联动的衣钵，在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乱撒传单，大放二踢脚，大有联动少爷还魂之势。因此，如果说只是谭力夫和联动一小撮人有“血统论”观念，大部分人没有，那实在该为那一小撮人抱委屈了。血统论这种东西历时已经很久了，大约有四五千年了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

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自己头脑里有没有血统论的烙印，倒是值得深思的。

下面我们就系统的谈一谈血统论和有关鸿沟的几个问题。

一．血统论的历史渊源

在奴隶制社会，血统论这种东西就挺时髦了。比如在古希腊，那里的人起名字，先要把老子的名字冠在前面。比方老子叫贺拉斯，儿子就叫贺拉斯的×××。这和联动张口老子闭口老子是很相象的。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雅典城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都知道，希腊人对于体育运动是十分重视的，举行一次运动会就好像过一个最隆重的节日。在这次运动会上有兄弟二人得到两项冠军，哥俩就把老子抬起来，绕雅典城走一周。于是成千上万看热闹的人便对这个老头子喊：“喂，你得到这样的幸福，还不死吗？你还想得到更大的幸福吗？还想做天神吗？”于是乎老头子一高兴就呜呼哀哉了。这样的事情今天的人看来，实在荒唐。你儿子是冠军，碍得着你的事吗？但那时候的人就是这么个思想感情。

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相传那时有个叫做舜的皇帝，他的爸爸是个十分可恶的瞎老头子，几次要害死他，但他还是替自己的老子隐瞒这些事，直到他做了皇帝，也还是没有再提起。多半他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老子反动，他便是混蛋了。因此还是不说的好。

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的伦理关系发展到了极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社会的常纲，是定而不可移的伦理道德。据说有一个牧羊的人，看到自己父亲偷了羊，便揭发检举去了，这件事让圣人知道了，他便大摇其头说：不大对头。汉朝有个皇帝叫做刘邦的，他在当皇帝以前就是个大流氓，时常到他哥哥家去骗饭吃。有一天他哥哥家的饭熟了，但偏对他说没熟，好不给他吃。等到刘邦做了皇帝，应该分封诸侯了。照理说，姓刘的都得上是诸侯。可是他的哥哥分封不分封呢？刘邦一想，自己的长兄表现可不好，要是按重在表现的原则，那是不够资格的。不过后来到底是血统观念占了上风，他的哥哥还是被列为藩镇，只是叫做“剩饭侯”，多少还不能忘记表现。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记得，贾府有位凤姐。凤姐为了修缮大观园，得找个监工的。她明明知道贾府里的人没一个不贪污，可也偏得找姓贾的。找姓甄的不行吗？不行。因为封建的伦理观念不允许她这样做。明朝有一个叫做方孝儒的犯了罪，依我们的想法，他犯罪把他杀了就完了。

但是没那么容易，得“灭门十族”，连他的老子、老娘、再加上其他的亲戚，再加上亲戚的亲戚，都得杀掉。这下子可真是斩草除根了。封建统治阶级把他们的这一套伦常关系编进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二十四孝”，内容主要就是谈儿子、老子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归根到底一句话，便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不是英雄怎么办？儿子也偏得说他是英雄，即便老子反动透了顶，儿子也得象尊敬英雄那样尊敬他，其目的无非还是自己是个好汉。今天不是还有“共产党员”给自己反动的老子树碑立传吗？多半是读“二十四孝”读得太熟的缘故吧？现在似乎有一种风气，谁只要讲历史，谁就是别有用心。干脆告诉你们，省得你们猜测。我们讲这些，就是给明着暗着推崇血统论的人一面镜子，也照照你们的尊容，看和历史上的那些古董是不是有一二分相似？封建社会有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有怎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怎样的上层建筑；有怎样的上层建筑，就会有怎样的法律、习惯、道德和伦理观念。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阶级关系也不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样复杂。加之交通的闭塞，物物交换（而不是商品交换）所造成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就造成了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因此，血统论变成了统治阶级赖以维持统治的理论基础了。那时候出身和成份差不多是分不开的。老子打铁，儿子拉风箱。例外的情况很少。所以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习惯说法。比如：“这位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我是学生出身”等等，那并不是说我的爸爸就是学生。封建社会不象今天这样大分化、大变革、大动荡、大改组的时代，今天资本家的儿子已经不再做资本家，而出身挺好的联动诸位反倒变成了地富反坏右的一丘之貉，出身和成份完全不一样了。

这种封建时代的家庭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下面摘录《共产党宣言》的一大段，供大家参考。“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

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就把这些算作资产阶级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毛主席告诉我们，我国的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几乎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因此，几千年来维持封建社会生存的血统观念带到了今天，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剥削阶级传统观念都要破产的关键性时刻，它们更要进行垂死挣扎。变换各种面目（甚至是极“左”的面目）束缚革命、阻碍革命、破坏革命，那实在是必不可免的事。谭力夫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做为封建血统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命运必定是被革命的车轮碾碎！至于那时候为什么他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通。如果我们掌握了起码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应该由此证明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封建的东西还有广大的市场，还顽固地盘踞在一些人们的头脑之中。诚如主席所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他老人家又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正是这种剥削阶级的血统论，发展到了今天便是唯出身论，给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有时达到了不可逾越的程度！它在运动中自己蹦出来，让我们将消灭它的战斗部署提到议事日程上，因此，打破它的束缚，消除它的阻碍，防止它的破坏，填平它所制造的鸿沟，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亟待解决的任务之一，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都是责无旁贷的。

二．从三个方面看鸿沟

其一、家庭影响神秘化

一个人受不受家庭影响？肯定是受的。但是究竟什么家庭给予一个人什么影响？在一个人的表现中起到什么作用？答案是有原则性分歧的。由于家庭出身好的青年不理解家庭出身不好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也不理解家庭出身好的，往往将对方的家庭影响神秘化了。

不少同志忘记了今天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把家庭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

彩。比如一提到剥削阶级家庭，立刻就想到刀光剑影，以为这些家长每天就是教儿子怎样杀人。一提到高干家庭，立刻就想起有一份血书，每天都要给儿子讲怎样高深的道理。这些同志从修正主义分子一手炮制的小说、电影、戏剧、刊物上面承受了这个概念，信以为真。其实这些东西恶毒就恶毒在让青年人理解今天的阶级斗争的特点，不懂得和平演变是什么。假若出身不好的青年每天只提防磨刀霍霍，而忘记了糖衣炮弹；假若高干子弟只对自己的家庭一味迷信，而忘记了高等生活的侵蚀，那么，或者使他们放松警惕，或者走到极端，造成了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这都是对革命不利的。又有一些同志忘记了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以为家庭给了你什么影响，你就接受什么影响，似乎一个人没有一点可以选择的自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于一种影响，有乐于接受的，有勉强接受的，有引起反感拒不接受的，也有无动于衷的。对于家庭影响也如此。今天的青年人接受了党十七年的教育，对于拿枪的敌人是能够认识清楚的。如果还有哪一个不识时务的老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在家里磨刀，那个结果是不算太妙的。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青年，对于家庭一般说来是憎恨的，因此，对于家长的言论，他们就有了免疫的能力。他们时时将自己放在与家长对立的一方，这样，他们在克服坏的影响方面便有了一定的优越性。但是，那些出身高贵的少爷们，那些自认为最懂得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就是不在自己的家庭之中的少爷们，却很容易忽视自己家庭的坏影响。一旦他们自己的家庭真的有坏影响，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划清界限，他们甚至也会当作富有营养的东西接受下来。殊不知，我们的社会还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都有市场。对自己的家庭丧失警惕无疑是危险的。

更有一些同志把家庭影响夸大到了无可形容的地步。他们以为除去家庭影响就没有其他影响了，即使有，也得受家庭影响制约。毛主席有一段话，证明了这些同志的荒谬。他说：“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见，教育（社会影响）是大于家庭影响，并且能克服家庭影响的。毛主席说的还是解放以前的情况，解放以后，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情况会怎样呢？恩格斯在解答“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时说：“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勿需干涉的私事。

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和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失。”

正象马克思早在 1848 年就驳斥过的政治庸人那样，今天摇头晃脑的血统论者们念念不忘家庭，念念不忘老子，活脱脱是个封建社会的遗少。革命的导师是这样批判他们的：“你们却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难道你们（资产阶级）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里还谈到：把东方的家族形态看成绝对的，是不合理的。这种家族形态只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系列。~

我们所以要引用这样多的经典著作，无非是想证明今天大喊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大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们是群什么东西！他们的水平比起那些用资产阶级偏颇观念灌昏了脑袋的政客还不如！看到他们对家庭这样神秘化，简直让人想起宽袖方巾的时代，十足是一群蠢货！~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革命群众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说，这一不是将家庭当作社会上的细胞的那种关系，也不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目前我们国家的革命人民正处在一种无产阶级同志式的关系，这就象毛主席所说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反动的唯出身论妄图改变这种局面，分化革命队伍，以达到其复辟目的。

其二、政治表现神秘化

把家庭影响神秘化了，自然要把本人表现也神秘化。因为这样一来才符合封建时代的种种格言。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什么“将门出虎子”，这些陈词滥调都被血统论者奉为至宝。

他们首先认为血统高贵的人处处都了不起，行堪观止，字字珠玑，一举一动都值得记在将来的回忆录上。

这么一来，就造成这些青年盲目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贬低出身不好的青年。怀疑他们，轻视他们，处处以狭隘的偏见观察他们，把他们万分平凡的举动也看

得大有申陈。搞得他们紧张、麻木、自卑、甚至心理变了态。女十二中有几位出身不好的同学，长期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中，竟以为自己顺心的事都是错的，自己不满的事都是对的。他们看了某一篇文章，先是觉得挺高兴，可是立刻就责备自己，回去写了篇批判文章贴出来，不过后来听说这篇文章让某位领导人肯定了，他们可大大慌了手脚！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这还有什么朝气蓬勃可言！他们的心灵简直是经受了无可救药的残害！而残害者不是别的，正是封建的血统论，正是目前大大流行的唯出身论！何其毒也！手头还有一张铅印的传单，是四个学校在运动初期联合组织的红外围。红外围的组织当然都不是出身好的。他们写道：只有革命的左派才能加入自己的组织，可接下去便说，“这个组织要绝对地服从红卫兵的领导”，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格打勿论”！多么典型的奴才性格！你已经是革命的左派了，还要绝对服从一个既非党团，又非无产阶级先锋队，只不过出身好的红卫兵领导之下。大概领导你们的都是超左派了吧？以上这两个例子，说明了青年之间的这道鸿沟已经多么深，多么宽，多么不可逾越了！在学校里，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气氛，一派是专门汇报思想的，一派是专门听汇报的，前一派必然产生阿谀奉承，阳奉阴违的能手，后一派必然出现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老爷。真要问他们是怎样成了混蛋的？不是别的，还是万恶的唯出身论把他们逼出来的！

其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任何一种腐朽的思想，都会被剥削阶级所利用。过去修正主义集团大大利用了血统论，运动初期刘邓路线也在出身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把这道鸿沟越挖越深，务使我们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想把革命队伍缩小，以利于消灭之，二是想分而治之，三是想拉拢、利用一部分青年做他们顺从的复辟工具。有一段时期，他们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真是达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中学文革报》和其他中学生主办的报纸常常有这方面的报道，大家都看到了。这里有一张铅印的表格，是一位司机同志托人转交给我们的。他说：“请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人看一看，给他们做个参考。”不负盛意，我们把它抄在下面，以飨同好。

学习驾驶员的条件

（一）驾驶员的培养对象：

1., 驾驶员的培养对象要贯彻阶级路线, 以广大工农兵, 革命干部, 烈军属子弟为主; 对家庭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原则上不培养。

2., 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 看其政治表现, 如果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 经过有关部门审查确属没问题的, 可以适当吸收培养一些。

3., 所培养的机动车驾驶员, 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活学活用, 积极参加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 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好同志。

(其余两条从略)

这仅仅是培养一个驾驶员所需要的条件! 这张表很能说明问题。在第 1 款中, 是两个不问表现, 一不问“红五类”出身的表现, 哪怕这些人是联动的刽子手, 也要被“贯彻”进去; 二不问“黑六类”出身的表现, 哪怕是聂元梓、郑兆南、王光华、陈里宁, 也都拒之于门外, 第 2 款似乎是重在表现了。这一款是针对除去黑六类以外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 那不用说, 就是小业主出身的了。这回重在表现了~。可是, 一要划清(划清了还不相信), 二要审查(审查到了没有问题), 才能培养“一些”! 根据出身这么一鉴别, 于是乎再也用不着进一步审查了, 便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好同志”了! 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想一想: 这种现象究竟能不能容忍! 这不过是千万个例子中的很小的一个。凡是克服了偏见的革命同志都可以为我们证明这一点, 举出你亲身经历的更多事例来。

社会地位是这样悬殊, 还谈的上什么团结, 什么了解? 更谈不上共同战斗了。有的只是隔阂, 是生疏, 是淡漠, 出身真是压死人啊!

以上我们就从家庭影响神秘化这个方面, 从政治表现神秘化这个方面, 从社会地位的平等这个方面, 分析了在青年之中存在不存在的一道鸿沟。我们说, 是存在的。它的存在是由血统论, 唯出身论一手造成的。它严重地阻碍着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 阻碍着我们的前进, 到了彻底填平它的时候了!

三. 填平鸿沟的办法

我们必须用阶级论代替血统论,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干革命。阶级论就是“有成份, 不唯成份, 重在政治表现”。这里所说的成份不是出身。比如你成份是个工人, 是个学生, 这都可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不能唯成份, 不是说是个工人都是革命的, 还得看表现。象江青同志所说的, 要时时处处看一个

人的观点、立场。这和出身都毫无关系。让那些死抱着家庭粗腿不放的人见鬼去吧，这个鸿沟我们是填定了。

革命的同志要在斗争中填平这道鸿沟。过去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这道鸿沟把革命青年分开了，使他们站在天河的两岸，遥遥相望，几乎使运动夭折。现在，我们应该在彼岸此岸共同填土，让它变成一道通途。这道鸿沟只能在大联合中填平，在夺权斗争中填平，在斗批改中填平。只有共同斗争才能彼此了解，才能克服神秘化的倾向，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识别一个人表现的好坏，才能验证一个人所受影响如何。那些受过一些委屈躲在家里不愿出来的同志，应该鼓起勇气，重新投入战斗了！那些压制过别人，无形之中帮了修正主义分子的忙的同志，也应该扪心自问，努力改正了。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涤荡我们脑海中的剥削阶级观念，才能使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改造成一代新人。而要使这些都不至于变成空话，要使中学革命运动不至于冷冷清清，要使今后的革命能顺利开展，我们首先应该强调：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我们讲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要你委屈求全，恩赐给人家平等，而脑子里还认为比别人高出一头。那是假平等！我们认为一个人是不是比另一个人优越，不在于他的出身，不在于他的性格，不在于他的年龄，而在于他的表现，在于他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高不高？思想改造得好不好？通过大量的事实可以看出，决不是出身好的人一定比出身不好的人表现更好。联动的骚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党历来是主张革命青年应该平等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他亲手拟定的接班人五项条件中，并不曾提到“出身”二字。他的那篇足以鼓舞我们青年无限勇气的讲话中所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是对所有革命青年说的，不是对某一阶层的青年说的。我们的导师早已为我们指明了航程，谁要想扭转它，想阻碍它，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鸿沟等待着我们去填平，血统论、唯出身论等待我们消灭。革命的年青人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在斗争中相互了解，这样才能向一切腐朽的东西开战！胜利必将属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原载《中学论坛》创刊号 1967年2月27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之六：《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驳“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旭日战报》，不惜以六版篇幅，对《出身论》大肆攻击，发表了一篇又长又臭的文章，“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用他们的话说，他们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大联合大夺权的阶段出现，是必然的。~

大家总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当火势燎原的时候，是反动的血统论配合着刘邓路线将这场大火窒息的。随着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反动的血统论又找到了旧同志。它配合着保皇派别、联动分子、刘邓路线的忠实信徒，配合着社会上的习惯势力，再一次进行新反扑，这当然是“必然”的！

该文的作者实在没有时间概念。《出身论》出现在去年秋天，当时大联合，大夺权还不是高潮！有的却是西纠的猖獗，联动的骚乱。《出身论》敢于面向这些嗜血成性的反动组织下战表，敢于动摇他们的特权地位，即使缺点再多，也足以使庸人惭愧。而那时候你们这些好汉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谁人不知你们轻院东方红承认过谭力夫的讲话，承认过反动对联！你们可曾触动过你们的错误思想，哪怕是一丝一毫！即使是现在，指导今年运动的元旦社论明确地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又有哪个人看过你们的表态！如今你们在批判《出身论》——这个向反动的血统论的宣战书上充当英雄好汉了。你们和轻院“红爆队”大联合了。就连你们的编辑也不否认他们是保皇势力和执行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大杂烩，你们为了装门面，竟和血统论的崇拜者，联合在一起“批判”血统论了，岂非咄咄怪事？而发表于贵报的“红爆队”们的大作中，不知道从《出身论》的哪一节找出“男女关系”这一条罪状，这大概就是他们要批判的血统论吧？

该文（指“大毒草……”，下同），首先从理论上，继而从政治上否定《出身论》，我们有必要逐一批驳，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批驳，指出他们趁此机会攻击毛泽东思想，颠倒历史之真实目的，我们就是要暴露这些跳梁小丑们肮脏的灵魂。

一.《出身论》从理论上“铲除”不动

该文反驳《出身论》的第一个论点：“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并能克服家

庭影响”。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社会影响不大于家庭影响，社会影响不能克服家庭影响”。

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尤其（注意尤其这个词——笔者）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对于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将起很重要的作用。”又说：“家庭给予一个人的阶级烙印，对他的立场、观点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为他给人以认识问题的基础。”请看，家庭影响又起“很”重要的作用，又是“基础”，又不容“忽视”，显然家庭影响是远远大于社会影响的，是社会影响所无法克服的。

这是放屁！

该文的作者不会不知道江青同志去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讲话。她说：“尤其（注意尤其这个词，这决不是偶合）你们都还年青……大多数是在红旗下、新社会，受了党多年教育，所以出身对你们影响不大。”在这一篇讲话中，江青同志又说：“阶级出身是给人打烙印的，但是它不起决定作用，决定作用是人的努力，是人的思想革命化。

以该文作者之矛，攻该文作者之盾，请问你们的“矛头对准了谁”？

江青同志的这个讲话，也雄辩地说明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个人的努力”，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也就是《出身论》中所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否认内因也是由外因形成的；但我们必须同时指出，内因和外因有着质上的不同。我们处在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作为外因，是同时存在的。尽管从总的方面来说，一个是强大的，一个是相对弱小的。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情形又有异样。他总有自己的选择性。对于同一种影响，往往有的人起同感，有的人起反感；有的人爱好，有的厌恶，有的人强烈，有的人淡漠，有的人接受，有的人抗拒。这就是内因在起作用。即如你们，为什么和血统论的倡导者红爆队大搞联合，而不和反血统论的人搞联合，也是内因起了作用。

对于家庭影响也是这样。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上的好影响是强大的，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因此，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他从小受的社会教育，就是剥削可耻，劳动光荣的教育。长大以后又知道阶级斗争，知道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规律，再强调一遍，从小（照该文作者唯一清醒的时刻所说的话，即刚刚脱离“本能”，刚刚有了“思想”的年纪，亦即从7岁）起开始长期接受这种思想，这就形成了内因。这时对于自己的家庭影响就会是反感而不是同感，是厌恶而不是爱好，是抗拒而不是接受。当然这也是指一般情况，例外也是有的。不过不管诡辩论者怎样曲解例外，真正了解了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就不会把家庭影响看得神乎其神了。

江青同志的讲话当真是给了“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内因，什么叫外因”的“先生们”一记“耳光”！当真是给了只承认老子而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先生们”一记“耳光”。不但给了耳光，而且很响亮。

返回来再看社会影响是不是能够克服家庭影响，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了。为了证明该文作者对于毛主席著作是怎样的不学无术，我们摘录一段毛主席的话就足够了。毛主席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教育，是社会影响吧？可见，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不是家庭影响，而是社会影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社会教育儿童的结果。

但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却立论：家庭影响是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基础！

在发难的开头，他们本来说，《出身论》的这一段是“不值一驳”却驳了三千字。不幸的是那驳的结果，原来是他们自己违背了最高指示。

该文在做了这样的“文字游戏”之后，又反驳《出身论》的第二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大”。

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出身既然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就必然会对这个人的行动（即表现）发生作用……有着紧密联系的。”

发生作用，固然是对的。我们说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并没有说一点没有。但是“有着紧密的联系”，则大错而特错了。

上文，江青同志已经批驳过你们了，出身是不起决定作用的。但为了使你们再多享受一次耳光，把教训记得牢固一些起见，还可以就这个问题再多讲一讲。

出身和表现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有个中间物，那就是“影响”。

正如一位老工人所讲的，出身、影响（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表现是一个索链的几个环节，那边烧热了，这边不见得热。

表现和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和社会影响。因为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而思想是表现的根据。所以，表现是受社会影响制约的。

对于一个人的表现，家庭影响自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不过不是主要作用。毛主席和江青同志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只有家庭影响和一个青年的出身才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新社会，社会影响和出身是没有多大关系。今天的学校都是无产阶级开办的学校，并没有地主子弟学校或资本家子弟学校，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所受的教育同样是社会教育。当然，对于高干子女，出身和社会影响常常是有关系的。例如寄宿制高级学校，即那些只供高干子女享受的修正主义温床，就是和出身有关系的。不过，举出这个例子，对你们的结论实在太不利了。因为这只能证明出身好的有时社会影响并不好。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提的好。

出身只和家庭影响有关系，家庭影响又在表现中占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那么，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与表现关系甚小。

光是论证到这一点，已经足以动摇血统论的基础。但是，我们还要证明出身即使和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的同一性。——尽管这个论点会使“炮制”该文的“混蛋”们暴跳如雷。

“当然在部份工人贫下中农中也有着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甚至有极个别反动的。”——谢谢，这是该文作者神志不清时提供给我们的论据。

联动成员的出身都是最上乘的，但是陈伯达同志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并不好，因为这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相反的，列宁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但他从哥哥姐姐那里受到了很好的革命影响。毛主席在他的回忆中，也说，尽管他的父亲是个富农，但是他从母亲和家里的雇工那里，受到了许多好影响。无论血统论者多么一厢情愿，一个老子总是组成不了一个家庭的。

这就是《出身论》中所说的：“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

如何而定。

“这是少数！这是例外！这不是主流！”血统论者振振有词地念咒了。不过，既然已经承认是“少数”、是“例外”、是“支流”，那么，就是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有它存在的道理，就无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阶级敌人还是少数呢，但并不等于没有。那么，说明这些例子的道理是什么呢？该文作者说不出。别人说出来，他又跳脚！

这个道理，《出身论》说得很清楚：“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

如此说来，出身和构成表现的次要因素——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联系了，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出身只能作为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这几条气势汹汹的好汉，在两次碰壁之余，开始反驳《出身论》的第三个论点了：“出身不是成分”。按照辩论的原则，它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就是成分”。

它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我们必须坚持第一有成分论，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也即既要重视出身，但又不光看出身……”显然，作者是把成分当作出身了。

把成分当作出身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就是，老子是老地主，儿子是小地主；老子是老高干，儿子是小高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是也。~

我们在论证“出身不是成分”这个论点时，有这样一个论据：“毛主席在 1939 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哪一个范畴。”蒙作者费心，找到了原话。原话说：“从它们的家庭出身看，从它们的生活条件看，从它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于是它们便手舞足蹈起来：“殊不知毛主席在讲这一段话时首先就讲到了家庭出身。”按照他们“混蛋”（对不起，这是借用）的头脑所得到的“混蛋”的结论，便是“哪一个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就应划归哪一个阶级范畴。”真要给他们讲点初级历史了，可怜的大学生！请问，当时能上得起学

的知识分子，什么家庭出身的居多呢？显然，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居多。可是，他们的大多数偏偏不属于剥削阶级，而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前面援引过的毛主席的话：“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都雄辩地证明了：“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哪一个范畴。

出身不是成分，儿子的职业不是老子的职业，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浅显的道理吗？“出身不由己”，所以是死框框；成分可选择，比如，从前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放弃了继承权而参加革命的，如今也有成分不好的人改造好了摘帽子的，所以是活框框。既看成分，也看表现，是对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现是不对的。因为成分和表现是密不可分的。地主的表现和贫农的表现就是不一样。而出身和表现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有的，甚至是一点也没有关系（例如列宁）。所以，用一个死框框，同时又用一个活框框衡量一个人，是为《出身论》反对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们愿意对“出身”这个词做做正名的工作。“出身”有两个含义。今天普遍的用法是指父亲的职业，亦即家庭出身。我们文章里的“出身”，都是指家庭出身。出身还有传统用法，是指阶级出身，即本人过去的职业，亦即本人出身。例如：第一个发明电器的爱迪生是报童出身，不是说他父亲是报童，而是说他本人过去曾做过报童，在我们的文章里一般是用“成分”代替了。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常常有着不同阶级的属性。所以，在我们看到一些材料的时候，有必要分清哪个是出身的时兴用法，哪个是传统用法。

既然出身不是成分，请问铲除《出身论》的劳动能手们，你们何曾见过：“一、有出身论，二、不唯出身论，三、要重在政治表现”这样的阶级路线？你们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党的阶级路线！

由于你们连这样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所以就写出了那样狗屁不通的文章。的确，《出身论》是提倡“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对于过去长期受压抑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是会起一定积极作用的。但你们抗议了。你们说，这就是“他们还梦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出身不好的青年骑在人民头上来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何谈重新二字？显然，出身和成分又被你们混淆了，你们又说：剥削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正当权利，“这就是我们党的阶级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制度。”你们多么

恶毒地挑拨出身不好的青年与党的关系啊！请问，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专政吗？对地富反坏专政，难道对地富反坏家庭出身的人也专政吗？出身和成分又被你们混淆了！一个堂堂大学生，把影响也看成老子，把儿子也看成老子，横竖都是，老子，念念不忘的也只有这个老子，简直高举老子这面大旗死耍赖皮了。倘不是犯了偏热狂，就是中了修正主义流毒太深，大概快不可救药了。

你们想驳倒《出身论》这三个主要论点吗？遗憾的是你们只停留在谩骂的水平上，一个也驳不倒。你们在理论上“铲除”不动《出身论》，因为《出身论》是以毛主席著作作为依据的，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你们这几个神志昏溃，头脑混沌，思路紊乱，词不达意的家伙们妄想及锋而试，实在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到了极点。

二.《出身论》从政治上“铲除”不动~

有一些人信奉这样的原则：用理论打不垮人家，就希望能用帽子把人压垮。看来，北京轻工业学院就很有几个这一流人物。

帽子之一是：“挑拨各种不同出身的青年之间的关系，蓄意制造宗派对立。”这个帽子要是给反动对联戴上倒是合适。但我们何尝提出过“老子英雄儿混蛋，老子反动儿好汉”这样的“鬼见喜”来过？并没有。我们只是提倡“出身不同的青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而且我们深信这是党一贯所主张的政策。难道提倡平等，就是“制造对立”吗？你们真是到了发昏章第十一的地步了。~

挑拨关系的恰是你们。正是你们恶狠狠地说：“老实告诉你们”，（那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就是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和工农子女相同的待遇。”这是根据毛主席著作的哪一章哪一节？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哪一条哪一款？你们还煽惑说，“这是党的阶级政策”，用你们的话说：“作者用心之极，何其毒也！”

你们也许会诡辩说：我们是在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前面加了定语的啊！我们指的是“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原文如此不通，非笔者引错）之~云云的青年啊！

参照上下文意，那么不甘当“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剥削家庭阶级出身的青年，就可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了吗？显然，这也是要被你们否定的。所以加上

了那一大长串的定语，足以证明了你们逻辑上的混乱，思想上的空虚。这样你们就越来越糊涂。比如对于没有定语的，而又不是工农家庭出身的青年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是没有答案的。

退一步说，你们加上了定语，我们暂且认可吧。那么，试问：“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出身好的青年——例如联动分子——能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呢？无论现在你们和这帮家伙怎样联合组织“批判《出身论》联络站”，在那里暗递秋波，恐怕你们口头上也不敢承认这一点。用中国人的话，简洁地说：坚持反动立场的（哪怕是出身好的）青年，也不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可见，这里只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问题，而不是家庭问题。只是表现问题，而不是出身问题。只是定语问题，而不是主语问题。是你们把本质的东西变成了定语，把非本质的东西当成了主语。因为自己的谎谬，而在那里“怒不可遏”，这个脾气可真发得没道理。

你们或者会大叫：出身好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几乎没有呀，出身不好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几乎全部呀！应该说今天坚持反动立场的青年无论什么出身的都是少数。这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谈过了。现在再退让一步，就说即使如此吧，也只要提出“凡是不坚持反动立场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一个口号就可以了。因为照你们的结论，只要这样一提，自然而然就把出身不好的人排除了，把出身好的人留下了。你们既然认为出身是表现的唯一的原因，表现是出身的必然的结果，那么，表现之中已经包括出身了。用不着把这二者相提并论了。可是你们偏偏要齐头并进。其实，文化革命以来的表现，用不着问老子，自己最清楚。不过你们怕谈表现。因为一谈表现，你们就吃亏。对你们这一小撮人，不拉出身这面大旗做虎皮，岂不露出庐山真面目？特别是对于你们的联动“小将”，这就更不利。

那么，是谁“为害人虫混进革命阵线进行活动提供了组织路线”呢？不是别人，正是你们。

是谁在挑拨关系呢？不是别人，也正是你们。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请听你们自己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吧：“我们就是要考验你们！”“你们”——根据下文，是指出身不好的青年，那么，“我们”是谁呢？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吗？这些英雄哪里比得上郑兆南、王光华、陈里宁这样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

年！你们还要考验人家，配吗？如果，这里的“我们”是泛指出身好的青年，则又大错特错了。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应该接受党的考验。可是，他们中间，不存在什么特权，不存在一个是考验别人的阶层，你们分出了这样的阶层，不是挑拨关系又是什么呢？

帽子之二是“为彭氏路线喊冤叫屈”。什么是“彭氏路线”呢？照你们的说法是“抽掉了重在表现的政策中的阶级内容，而把‘重在表现’变成了‘重在表面’。”或者说，是“剥削阶级子女受修正主义宠爱”，是“不讲出身”。这是最疯狂地颠倒了历史！如果说什么是“重在表面”，那么，只问出身，不问表现就是最严重的“重在表面”。因为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出身和阶级内容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只有成分才是和阶级内容有关系的。即如你们，对于出身好的联动分子那样客气，而对于出身不好的不问其表现如何都那样霸道，实在就是典型的“重在表面”。

血统论既然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的那样顺手，那么，这个古已有之的东西，也不会不为修正主义集团所利用。血统论的作用，就是缩小革命队伍，扼杀革命热情，制造人为的对立，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哪一个反革命分子不欢迎这种东西！

我们在《出身论》中“受害问题”里举出了大量的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例，这都发生在彭真集团统治时期。今天本报发表的这一篇调查材料，也发生在文化革命之前。有无数事实证明旧团市委推行的是“唯出身论”的反动路线。这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和血统论结下了怎样的不解之缘。

我们控诉彭真集团形“左”实右地推行血统论，你们则说没有那么一回事。请问，这到底是谁“为彭氏路线喊冤叫屈”呢？是我们还是你们呢？

你们颠倒了历史，但历史是忘得了的吗？问题不在于历史，而在于现实。你们为彭真集团翻案，把他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罪行，美化为实行了一概平等；把他不讲党的阶级路线，美化为执行了党的阶级路线，其目的不是别的，正是为了让反动路线推行“血统论”，继续歧视、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并使它合法化，同时也为了减轻你们过去迫害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罪责！总之，你们是想推行比彭氏形更“左”实更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你们最恶毒的是，竟把修正主义集团欠下的这一笔血债记在党的帐上！

是谁告诉你们，彭真集团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是现实吗？非也！是中央文件吗，中央确实发表过一篇社论，谈到彭真的招降纳叛。可是，这里指的降和叛，不是出身，而是成分。指的是彭真招降了一些无耻叛徒，反动权威，蜕化分子，奴才走狗，哪里说的是出身？于是，头脑简单的除花勇士们又迷惘了，既然彭真招降的是一些资产阶级份子，又怎么可能迫害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呢？如果，你连这也迷惘，那么，你可以回答一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情景。这总没忘记吧？那是千真万确地迫害了剥削阶级子女了吧？告诉你们，这恰好证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和广大的剥削阶级子女不是一个阶级范畴的，正和广大的出身好的青年与修正主义集团不是一个阶级范畴的一样。那么，是谁告诉你们，彭真集团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

不是别人，是刘邓路线。是刘邓路线指使他们的喉舌，所谓新改组的《北京日报》告诉你们的。翻开那时候的报纸一看，北大的孔繁不是大喊陆平优待“狗崽子”们吗？从此开了先声。至于孔繁是什么东西，现在大家都了解了。随着《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的报道，大规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丑剧就演出了。“对联”问世了。血统论变本加厉了。回顾历史，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今天以《旭日战报》为首，召集了三十个学校，大为彭真翻案，莫须有地大讲出身不好的青年“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纷纷出笼，他们自称‘左派’，打着‘造反’的旗号借批判形‘左’实右为名，行攻击党的阶级路线，打击工农子女之实。”好一幅不准人家革命的赵太爷的劲头！今天有哪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专门打击工农子女了？工农子女也有左、中、右之分，工农子女和非工农子女一样，既不是一个阶级，也不是一个集团，假使有个别的工农子女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理应所有的子女（当然是要革命的女儿）共同打击之，其实这并不是打击工农子女，而是打击反动路线。你们把打击反动路线当成打击工农子女，这是对工农子女最大的诬蔑；你们又以工农子女为幌子，不许人家打击反动路线，实际上是肆无忌惮地包庇与袒护。你们颠倒历史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此。你们和修正主义集团，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

历史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小心你们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帽子之三是“拼命地鼓吹反动的‘阶级熄灭论’（疑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对于这帮不学无术的家伙们，错了一个术语也算不得什么怪事），

鼓吹荒谬的‘阶级调和论’。”

在我们的《出身论》中，一直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我们强调无产阶级与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斗争，强调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强调了与反动路线的斗争。我们所没有强调的，所不赞成的，所激烈反对的，是“出身好的青年与出身不好的青年之间的斗争”。我们说，这是人为的鸿沟，理应填平。

但是，“聪明”的该文作者，说我们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就是“阶级调和论”！在他们看来出身好与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两个对立着的阶级。

这个帽子，提出了一个很发人深省的问题：将来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什么？~

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将要贯串整个社会主义的始终，阶级斗争要持续五代到十代。

今天的阶级敌人诚然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剥削阶级分子。那么，下一代的阶级敌人是谁呢？解放快十八年了，上一代已经遵照自然法则而将近老迈了，下一代却成长起来，逐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部门唱主要角色了。对于下一代，阶级斗争的对象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反动对联告诉我们：“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阶级敌人有了。老一辈一死光，他们的儿子就会是阶级敌人的替死鬼！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点也不甘示弱，他们追随反动对联之后，继续把剥削阶级子女当作新的阶级敌人看待，谁替剥削阶级子女说话，谁就是“摇旗呐喊，为那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夺权制造舆论准备。

阶级斗争的规律当真是这样吗？

毛主席亲手拟定的十六条告诉我们，革命的依靠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看来，主力军并不只是出身好的人。

那么，革命的对象，即阶级敌人是谁呢？过去揭出来的敌人姑且不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来，这个新登台的阶级敌人，也还不是出身不好的人。

特别是通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泛滥时期，特别是通过西起、联动骚乱时期，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以出身来划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够多么荒唐！

歧视、排挤、打击出身不好的青年，绝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接班人）的阶级斗争。将来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什么？经验告诉我们，否定式的回答要比肯定式的回答容易一百倍，我们择易而行，可以这样回答，绝不能把唯出身论当作下一代阶级斗争的规律。而以轻院为首的这一小撮人却以“血统论”代替了阶级斗争的学说，以血统论代替了阶级观点。从而搅乱了阶级队伍，放跑了阶级敌人。这才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才是典型的“阶级调和论”。

我们记得林彪同志的教导：“没有阶级观点，没有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右倾思想的根源，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最根本的根源。”不难得出结论，所谓的“批判《出身论》联络站”正是一群满脑袋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蠢人。形“左”实右，是严重的立场问题，而不是认识问题。

《旭日战报》发表的这篇“臭文章”（这都是借用原话），通篇没有提血统论的一条罪状，没有列举血统论的一条表现。但为了遮掩他们色厉内荏的本质，在文末居然也喊出了“打倒反动的血统论！打倒反动的《出身论》！”足以使不明真相的人迷惑，以为《出身论》就是血统论。实际上，什么是血统论的活化身呢？这篇洋洋大观的铲花文章，就是血统论的活化身。它反血统论是假，反《出身论》是真。因为《出身论》嗅出了他们思想深处血腥的血统论的秽气。《出身论》当初可以作为进攻西趋、联动的武器，当然更不惧怕你们这群蟹将虾兵。我们既不怕你们的大帽子，也不怕你们的人身攻击，不怕你们沿街卑鄙的造谣！让你们在真理面前颤抖吧！

轻院东方红公社的“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不只是妄想消灭一篇《出身论》，它是要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继续受血统论的迫害，它是在挑拨广大的出身好的革命青年与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关系，它是在颠倒历史，替彭真翻案，它是在抹杀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没有忘记，前一阶段中央文革率领着革命小将，费了多么大的心血，才扭转了血统论猖獗一时，独霸一面的局面！可是，现在轻院东方红公社及红爆队这一小撮人却含沙射影炮打江青同志，竭力把已经前进的历史拖回来。我们说，他们完全不只是妄想消灭一篇《出身论》，而是怀着狼子野心，企图实现上述一系列丑恶目的。

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反动的血统论正在反扑，同志们千万要提高警惕！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五期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出身论》之七：《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再评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反动立场》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小撮人（即《旭日战报派》）摆出一副狗气杀的架式，与该院的另一小报联合起来，又拾起血统论的大刀，要和《出身论》血战到底了。

他们纠集了三十个学校不多的几个糊涂虫，其中包括他们的联动“小将”，要开“批判《出身论》誓师大会”了。遗憾的是响应者寥寥无几，终于没有告成。他们并不甘于失败，上窜下跳，妄想“以数量压倒质量”，大造声势。在他们特刊号上，用了六个版的篇幅，非要铲除《出身论》不可。

我们在《中学文革报》第五期上给了他们致命的批判。我们说：《出身论》在理论上是铲除不动的。

聪明编辑们果然不再在理论上碰壁了，他们开始反击《出身论》的第二部分：“受害问题”，我们还记得，是他们说“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这个理论是贯穿整个《出身论》的第一线。这次回避了理论，“受害问题”（这是实际问题）又成了“精髓之所在”了。

对于他们的朝令夕改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人总是顽而不会固的。

好，你们要辩论“受害问题”，我们就辩论“受害问题”。不过，事先告诉你们，稻草是捞不到的，这正好会暴露出你们的“精髓”。

“受害问题”这一节，举出了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等各方面大量的事例，证明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仅不象刘、邓路线控制的《北京日报》所说的，是受修正主义集团的宠爱，相反的，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你们承认不承认这些都是事实呢？这是根本没有办法否认的。但你们说这是“特例”，“特例就是诡辩”，于是你们就以阿Q精神得胜还朝了。

不过，要反驳我们，总得举出相反的例子呀！说起来令人寒心，你们有关社会方面的例子只有两个，我们原封抄在下面。

其一，“在控诉彭真集团时，京郊的贫下中农愤怒揭发道：彭真之流，在四清运动中大喊大叫什么以后地富子女叫什么名字，需要研究，总不能叫他们地富

子女吧？他们还别有用心的起了‘新式农民’之称。贫下中农还揭发了彭真之流在一个生产队以搞《青年联合会》为名，不仅吸收了百分之三、四十地富子女，而且还让一些地富子女掌握了《青年联合会》的各个环节。复查时，还改划了一批地富子女为‘劳动者’，企图使青年一代混淆阶级界限。”

其二，“有的贫下中农这样说：以前他们（指地主）的孩子上洋学，咱们上不起，现在还是他们的孩子能上学，咱们还是不能上……，这也许是个特例，但是值得深思！”

第三个例子呢？没有了。但他们的结论是得出来了：“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草率，而是因为人家“不必多费笔墨的缘故。”

无论是从我们长时期的社会调查的结果中，还是从全国各地广大农村青年的成千封来信中，本来很容易挑出大量事例证明你们在说谎。不过，因为我们的“特例”都是诡辩，不如你们的“特例”那样“值得深思”，看起来，这样作的结果，对你们的花岗岩脑袋不会有什么好处。

那么，请听我们问几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回答？

去年夏天，当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写出《出身论》，进攻猖獗一时的血统论的时候，你们还在沉睡，或者说正在帮凶。无论那时还是现在你们都没放过一个屁。谁都知道，你们轻工业学院在“辩论”对联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一边倒。在白色恐怖下，几乎没有一个“黑五类”子女不承认或不默认自己是“混蛋”，也没有一个“红五类”子女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好汉”的。当然了，你们东方红公社诸公也“绝对如此”。按理说，血统论统治得这样结实的地方，在今天大家都批判血统论的时候，应当有所作为，那怕写一篇文章，装装门面也好。但你们却连这一点表示也没有。这是为什么？

或许如你们所说：“谭氏路线要反，彭氏路线也不能放过呀！”先说说你们思路的糊涂。谭力夫不过和你们一样，是从蠢人堆里挑出来的区区大学生，他算得了“什么氏路线”？就说有个“谭氏路线”吧，它和“彭氏路线”究竟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可以告诉你们，“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围绕着我们党的每一次政策，都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里还有什么第三条路线呢？~再退一步，就如你们

所说吧!“谭氏路线是形‘左’实右路线,彭氏路线是形右实右的产物。我们总得杀退两边进攻的敌人啊!”为了给批判谭力夫讲话及其所代表的反动血统论的人加上一个罪名,你们不惜把彭真算作谭力夫的对立面,从而把他的“形”也变“右”了。你们真正觉得谭力夫形“左”实右吗?未必。不过事情相隔不远,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刚刚将“谭氏路线”置于死地。大家对谭力夫讲话的流毒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件也还记忆犹新,这时候,你们不得不咬着牙根说,这是从“左”边杀来的“敌人”。但彭真迫害这些青年的事件就数这一些了,大家的印象可能淡漠了,这时你们便指鹿为马,把彭真说成是形右的,以为搞了这样的把戏,就可以作为你们打击反对血统论的同志的借口了。不过,我们要问:彭氏路线真的形右实右吗?

党中央通过它的刊物告诉我们:彭真集团推行的是形“左”实右的路线。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请问,你们是和谁唱对台戏?

你们的那两个特例,是想说明彭氏路线不仅是本质上的右,也是外形的右。请问,这个形“左”又“左”在何处呢?

你们回答得了这几个问题吗?

颠倒历史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让我们回顾一下1964年以来的历史吧!

1964年5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又一次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

那么,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毛主席分析了几个大的方面。综合起来看,第一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的复辟活动、恢复封建的宗族活动和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的活动;第二是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第三是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活动;第四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的活动;第五是贪污盗窃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没有单单把地、富子女提出来呢?

没有,一条也没有。到了1964年9月,为了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

路线，由彭真亲手炮制，刘少奇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出笼了。在这株毒草里，就把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修正”得面目全非了。修正主义分子首先否认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该文件说，即使是那蜕化变质的5%， “他们同阶级敌人还有区别，对他们应当采取教育、改造、团结的方针。”只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劳动人民”。其次是否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的活动，并且不准许向雇工剥削等现象做斗争。该文件说，不应该给当时猖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富裕中农戴上资产阶级份子的帽子，甚至不应该和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百般包庇这些人，还让其中“公认能干”的，继续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接着又混乱无产阶级先锋队 and 阶级队伍。对于那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可以不讲“成份”（注意，是本人成份，而不是家庭出身），而只能根据抽象的“德”、“才”标准来衡量他们。同时，那些贪污盗窃、蜕化变质的“贫下中农”，也还可以是“依靠对象”。把修正主义分子提出来的政纲和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几大表现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他们把本质上的许多东西抽去了！那么，阶级斗争还剩下什么呢？只剩下他们不敢更改的“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这一方面了。

但是依照宇宙的自然法则，到了1964年，这群地富分子很多已经是垂暮之年了。他们一死，别的剥削分子又都被否认了，岂不是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吗？这和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公开顶牛了吗？为了掩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掩护他们自己），为了掩护真正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了迷惑视听，这群修正主义老爷便人为地造成了一个阶级，那就是“出身反动的青年”！该文件分析约占农村人口10%（其实远不只此）的地主、富农子女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态时说：少数人受家庭影响很深，或者有杀父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仇恨，进行阶级报复。这就是新的阶级敌人。多数呢？“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还站在十字路口”。这就是新的特殊“阶级”。当然也可能有极少数，“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即便是他们，也“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

职务。”不用说地富子女本人，就是和他们通婚的干部，也要“抓紧教育”。以上这些，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阶级斗争的“创造”。可见，最先提倡“血统论”的，最先提倡“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也正是修正主义分子。

《旭日战报》派说：“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是不是指的以上这些规定呢？你们还要“左”到什么地步呢？非得把地富子女全部搞成敌对阶级不可吗？

那么我们要问，究竟怎样划分阶级？毛主席告诉我们，划分阶级有两个标准。一是经济地位，二是对于革命的态度。难道在解放后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地位吗？没有。那些真正具有特殊经济地位的，比如投机倒把分子、雇主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反而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那么，是根据“对于革命的态度”才视出身反动的青年为敌人的吗？也不象。假使真的以此做标准，首先那些蜕化变质的干部，那些贪污盗窃分子，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人就应该算做敌人了。但这些人又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何况，把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大部分算做“站在十字路口”、“划不清界限”的集团，也是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的。他老人家和他的战友们多次告诉我们：大部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这样看来，把“出身反动的青年”算做下一代阶级斗争的对象便毫无道理了。其实，这也只是出自真正的阶级敌人的政治上的需要而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政治原则的。

把敌人拉进来，谓之“实右”，把自己人打出去，谓之形“左”，这就是我们在《出身论》中所分析的：“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进党内，给某些五类份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旭日战报》及其同伙清华附中的联动分子，两次为这一段“笑掉大牙”，但是我们偏偏把这一段再写出来，直到你们的大牙一个也不剩为止。

我们也觉得可笑。但我们笑的是：所谓谭氏与彭氏，所谓的彭氏与你们，是何其神似！更可笑的是，谭力夫和你们这群小丑，一起在那里拾彭真的余唾，却还把自己打扮成反彭的英雄！怪不得在最近一次辩论会上，你们还公开为谭力夫讲话辩护呢！

修正主义分子的好梦是不长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亲手拟定了“二十三条”，及时扭转了这个局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矛头不再指向出身不好的青年了，却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决策人和他们大大小小的喽罗！在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只字没有提出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怎样的走在十字路口，相反的，即使对于他们的老子，还规定：“要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又说，“十多年来，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已经戴上帽子的，可否摘掉帽子？没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给戴？”请看，二十三条中对待地富分子态度，恰好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待地富分子子女的态度！同样的文件，还有}1964年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标准，这里也丝毫没有提出出身。这就是说，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只要你按照五项标准去作，就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

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不禁高呼：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你是多么英明啊！

但是阶级敌人并不死心，他们还在煽阴风，点鬼火，他们的影响也远没有肃清。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殊死的搏斗，血统论、唯出身论这些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货色，就赤膊上阵了。请看：

刘少奇一九六六年八月的讲话吧：“他们（指地、富、反、坏、资）的儿女要报仇呀！有杀父之仇儿子不报孙子还得报。”又说，“对他们的子女……要提高警惕。”还说，“有些家庭出身不好，他们有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对在场谈话的多年革命的老干部，还这样讲：“你们情绪不对，有几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你们的思想感情不对，值得警惕。”（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的材料）我们都还记得刘涛的检举吧？她说：当她向刘少奇汇报“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被同学奉若神明的时候，“刘少奇微笑地听着。”按理说，出身地主家庭的刘少奇，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他的老婆，本来应该不爱听“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不过，他们听了还是很高兴。因为具体到自己，那是“值得人深思”的“特例”。当然，对于大多数人，可就“基本如此”了。要举出郑兆南、王光华这样的例子呢？那可又成了“诡辩”的特例了。

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这都说明家庭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强调家庭出身，

并不等于强调阶级斗争。再重复一遍，本人出身，即阶级出身，即过去的成份，当不在此例。我们反对血统论，就是反对修正主义，血统论和修正主义决不是毫不相关的东西。

可敬的《旭日战报》一小撮先生们，却张牙舞爪地大喊大叫：“把出身放在第一位，这是党的政策！这是阶级观点！”请问这是谁家的党？什么阶级的观点？当修正主义集团在出身问题上和毛主席对抗的时候，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围绕着阶级政策决战的时候，你们究竟是站在那一边？你们是为谁唱颂歌？

也许你们会不服气。“我们是为修正主义路线唱颂歌吗？我们不是把修正主义的头子彭真（的名字）排成了头朝下吗？”的确，你们是这样做了。我们早也没有把你们看得多高明。你们纵然很反动，但真的到了“抚哭叛徒的尸体”的时候，你们却还没有那样一分狗胆。你们有的只是“狼性”。据说阿拉斯加有成群奔驰的饿狼。当它们的头目因为多消耗了体力而精疲力尽的时候，它们就把它吃掉，再往前奔跑。你们正是这样做的。你们可以毁坏修正主义分子的外壳，但你们却拼命保存他的精神。你们的愿望就是，彭真可倒，刘少奇可倒，但他们印在你们头脑里的思想，他们为你们制定的反动路线，却要永远传下去。而你们竟说：这是“党”的声音！这难道不是为反动路线唱颂歌吗？

当我们的《出身论》到了农村的时候，革命的贫下中农子弟写信热情地支持我们，地富子弟也是十分赞同的。他们说：“读了《出身论》，知道党和毛主席是爱护我们的！迫害我们的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饱含热泪读着这些信件，但你们这一帮无耻的小丑，却嚎叫：“就是不给出身反动的青年以平等，就是要无限期地‘考验’他们！”而你们竟说，这就是党的政策！

你们的嚎叫根本不是党的声音，这是彭真 1964 年 9 月已经喊过的，是刘少奇 1966 年 8 月还在喊的，你们是为他们唱颂歌！可惜“时兮时兮不再来”，如今你们的颂歌已经是回光返照，已是无限空虚，无比忧郁的垂危着的挽歌了。不过你们也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你们在同党的政策对抗的时候，尽量把自己摆在“左”的位置上，认为失败以后，还可以落一个“认识问题”，而并非立场问题。你们错了！形“左”实右，本质上是右，还是立场问题。谭力夫不是立场问

题吗？他何尝不如你们聪明！你们的立场是十分反动的。

历史早就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1930年，当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立三路线”的“左”倾路线时，王明等假革命派却批判“立三路线”的“右”，从而庇护并发展了“立三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今天，毛主席又发起批判彭真集团执行的形“左”实右的路线，而刘少奇却利用他的宣传工具，说彭真执行的是形也没有什么“左”，倒是实右形也右的东西，接着便有《旭日{战报》、《教工战报》……一群英雄好汉，跟在刘善人屁股后面跑。请问，这究竟是为哪一条路线捧场呢？

若不彻底清算历史上的错误，就会有重演历史丑剧的可能。我们是不怕你们的各种卑鄙的攻击的。“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曙光即在前头。”

让暴风雨来得猛烈些吧！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六期 1967年4月1日~

《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

常洞瑶：齐声唤同志，你好！现在全市都在争论《出身论》了。上次和你谈过话以后，我简直把《出身论》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我甚至认为《出身论》的一切反对派都是坏蛋。不过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转过脸来，听见相反的意见，就认为《出身论》的作者是个透顶加双料的混蛋了。可是，我想这次我是再也不会动摇了。因为我刚才听见一大群人在议论，他们的论据又是那样有力。我想即使是你听到了，也会改变原来看法的。

齐声唤：是吗？什么样的论据让你这么信服？能讲给我听听吗？

常洞瑶：当然可以！这一大群人说：《出身论》在为修正主义集团翻案。

齐声唤：怎么证明《出身论》是为他们翻案呢？

常洞瑶：那你还用问我？《出身论》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修正主义集团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吗？不是写着：“修正主义集团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专政了”吗？

齐声唤：这就是说，谁主张出身不好的青年从前受迫害，谁就是替修正主义

集团翻案了？你的意见是这样吗？

常洞瑶：你是知道的，我本来没有什么意见。这是那一大群人的意见。不过截至目前为止，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意见。

齐声唤：好的。如果反过来，谁要主张出身不好的青年在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之下没有受迫害，没有被专政，谁就算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当然更不能算翻案了？

常洞瑶：这个推理是符合逻辑的，我想。

齐声唤：你刚才说的那一大群人，显然主张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迫害过出身不好的青年，没有对他们实行专政。是这样吗？常洞瑶同志。

常洞瑶：是的，他们是这样主张的。

齐声唤：好朋友！如果你认为那些人的观点和你一致，你能不能设身处地的代替他们回答我的几个问题？我不需要你长篇大论的解答，只希望你说同意或者不同意，这样对我们共同提高认识或许是有帮助的。怎么样？

常洞瑶：试试看吧。我不见得回答得好，不过这是很有趣的。

齐声唤：请听我的第一个论点：对于地富反坏分子，对于不属于人民范畴，而属于敌人范畴的，也就是说和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的人，我们的政府必须对他们实行专政，你看，才那一伙人会同意吗？

常洞瑶：这当然用不着怀疑了。

齐声唤：如果某甲说修正主义集团没有实行专政，而是对其中的一些人招降纳叛了，那么，我们就认为某甲是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并没有替他们翻案，对吗？

常洞瑶：我想，对你这个说法，别人是没办法反对的。

齐声唤：再比如，某乙说修正主义集团对所有的地富反坏份子都实行专政了，并没有招降纳叛，那么我们就认为某乙是在为修正主义集团涂脂抹粉了，是替他们翻案了，你看那群人同意这个说法吗？

常洞瑶：他们会同意的。

齐声唤：我们说：是地富反坏子女不等于是地富反坏分子，你该不会反对吧？

常洞瑶：不反对。

齐声唤：所以这些青年不属于敌人范畴，而属于人民范畴。

常洞瑶：不见得吧？比如他们杀了人呢？

齐声唤：那只能说因为他杀了人，所以成了敌人，不是因为他是剥削阶级份子的子女，而成了敌人的。同样的，出身好的也可以杀人，他们也可以成为敌人。在这里并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表现(或者说是行动)定罪的。对吗？

常洞瑶：似乎是这样的。

齐声唤：把话拉回来，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属于敌人范畴，而属于人民范畴，不属于敌我矛盾，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的同志们意见如何？

常洞瑶：他们也只能说同意。

齐声唤：“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这是最高指示，违反了它，就是犯罪，你们同意吗？

常洞瑶：当然同意，当然同意！

齐声唤：不会反对吧？

常洞瑶：不反对。

齐声唤：好了，我们马上就会得出结论来了。如果某甲说：修正主义集团对一部分人民实行了专政，那么，我们就认为某甲是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并没有替他们翻案，对吗？

常洞瑶：对。

齐声唤：如果某乙反对某甲，他偏要说：修正主义集团对这部分人民根本没有实行专政，人民能够享受的权利，修正主义集团都让这部分人享受了。那么，我们就会说某乙是在替修正主义份子涂脂抹粉了……

常洞瑶：岂止是涂脂抹粉？简直是替修正主义集团翻案，应该把他抓起来！

齐声唤：且慢！不要忘记，你一开始曾说过：那一大群人是主张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迫害过出身不好的青年，没有对他们实行过专政的。看来，替修正主义集团翻案的，不是《出身论》的作者，倒是诬蔑他为敌人翻案的那一伙人了？

常洞瑶：似乎，似乎是这样的。不过，也许修正主义集团并没有那么严重地迫害过出身不好的青年吧？

齐声唤：就算是这样，就退一步说，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迫害过他们吧，而作者偏要说迫害了，这只能说是增加了修正主义集团的一项罪名，尽管是不实事求是。

是的。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增加罪名算作翻案吧？至于修正主义集团是不是真的迫害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不是真的给他们精神以压力，肉体以摧残，是不是剥夺了他们做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享受的许多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许多权利，大家都可以调查。这一点，连《出身论》的最激烈的反对者都是公认不讳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批判文章就是这样，他们承认文章中所举的例子确是事实，确实有理，他们之所以还反对这篇文章，是因他们认为一部分人民受压迫，是合理的，是正确的。谭立夫的讲话也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连同他们的弟弟妹妹是没有政治前途的，但他也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的思想固然反动，可是到底还肯于面对现实的。而你所信服的那一伙，就连这一点勇气也没有了。

常洞瑶：啊呀！这么说，这一伙人是透顶加双料的大混蛋了？我又赞成《出身论》了。再见！

我们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反驳步曙明

大作经×××转交，已经拜读了。我们的头早有好多人预约要砸了，今天才蒙你来砸，实在是晚了一步。老实说，你算不得一条好汉。既然气势凶凶，为什么不署上名字呢？（按：步曙明，不署名的意思），还是色厉内荏吧？

实在没有答复你的必要。但你的论点还是流行的，特别是因为你在文章中而且就在标题上引用最高指标，大大地玩弄了捍辩法，竟然从绝对真理中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我们就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这比单纯维护《出身论》的观点，有着更深刻的意义。毛主席以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以他鲜明的无产阶级观点，告诉我们，“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可是，竟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分子，对此做了随心所欲的解释。这样的例子我们见得多了。当北京工业大学的革命左派要夺谭力夫的权的时候，他就喊叫：“我看见牛鬼蛇神笑了！”最近有人攻击××同志，也说：××同志的讲话使阶级敌人高兴了。今天你也继承了他们的伎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右派分子，说他手舞足蹈了。我们实在奇怪，为什么在你们讲不出道理的时候，总有敌人应声而出为你们服务呢？你们默契得这样好，多半是有勾搭的吧？看来我们不得不花费点篇幅，在你们混沌的头脑里加点辩证的东西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对于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存在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和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的解释。后一种解释只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务使最高指示僵死而后快。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指敌人本质上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如果敌人表面上拥护，实际上反对，我们就不仅不能反对，而且要拥护。例如国际修正主义集团也说要援助亚非拉人民，但那是口头的，实质上是压迫亚非拉人民的，我们当然就要援助这些人民。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对同一件事物而言的，切不可为同一名称不同概念的两件事物所迷惑。例如：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盛赞他在新三民主义中提出过“联俄”这一口号。我们指的“俄”，是列宁的苏联，绝不是今天变了颜色的苏联。苏修也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联俄”，他们却把“联俄”之“俄”，代换成今天的苏联。表面上看似都是拥护“联俄”，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

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指目的而言，不是指手段而言的。如果被手段的同一性所迷惑，就会歪曲这一英明论断。例如：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设想被斗的敌人何尝愿意武斗？但我们要文斗，是要触及他们的灵魂，他们要文斗，是想保住狗命，伺机反扑。看来手段都是一个——要文斗，但目的是不同的。

不了解本质和表面的区别，不了解同一名称不同概念的区别，不了解同一手段不同目的的区别，就不能解释上述这些情形，就不能判定敌人拥护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反对的是什么。就不懂得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在这里如何应用，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思想是怎样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让我们看一看，《出身论》中提倡，“出身不好的青年应该享受和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同等的政治权利”，这一口号，敌人是拥护还是反对？如果，有子女的剥削阶级分子只是从眼前狭隘的家庭观念（资产阶级的所谓父子感情、母子关系）来考虑，他们也许是拥护的。但是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口号，和他们的根本目的绝对不同。我们既不是要光耀他们的门楣，也不是要帮他们复辟。相反的，我们是要把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纳入无产阶级阵营，在政治上，而不是在肉体上，使剥削阶级断子绝孙。不用怀疑，从这个长远的利益考虑，阶级敌人是反对的。他们宁可让自己的子女受歧视，从而扩大他们的阵营；逼上他们的梁山，也决不愿意让这些青年加强我们无产阶级队伍。

步曙明做不出这样细致深刻的分析, 以为拉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右派分子来, 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是何等幼稚! 我们和步曙明的根本分歧, 决不是因为《出身论》有什么缺点, 而是对待出身不好的青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 这些青年是属于社会的, 还是属于家庭的? 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正如出身好的青年之中绝大部分一样)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 还是资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 按照《出身论》的话说, 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是否就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 如果你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理应属于无产阶级范畴, 理应是出身好的青年的阶级兄弟, 那么, 这里就不存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无产阶级夺权的问题。如果真的是夺权, 那也是向资产阶级老爷夺权。因这这帮老爷(无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队)都不给真正革命的青年以权利, 特别是他们为了装出一副左派面孔, 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 更不给这些青年以应有的权利。这样, 他们就把应该属于最广大群众的权利, 最大限度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怎么能不向他们夺权? 你步曙明非要说人家向你夺权, 岂不证明你这帮老爷是一个垃圾箱里的货色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们反对的是什么, 革命群众应该拥护的是什么, 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你可以夸口说: “我比你们‘左’; 你甚至可以说: “我左得比你们跨过了真理的界限!” (当然, 那就是荒谬绝伦了), 可是你没有理由说: “我比你们讲阶级路线。” 我们党的阶级路线, 是规定依靠什么人, 打击什么人的。如果把应该依靠的全部依靠了, 把应该打击的全部打击了, 就是讲阶级路线了。如果把应该依靠的打击了, 把应该打击的依靠了, 那就是破坏党的阶级路线了。既然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 你偏偏不给他们应有的平等的政治待遇, 偏偏让他们处在准备投降归顺的地位上, 还奢谈什么“阶级路线”, 简直胡扯!

阶级斗争也绝不是象你想象得那样, 只要人为地杜撰出一个敌对阶级, 比如把一部分青年硬性地算做是敌对阶级, 然后与之斗争, 这就是阶级斗争了, 以为这样一来社会就会向前发展了, 这真比荒唐还要荒唐! 在阶级社会中, 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通过这次文化革命, 我们看到, 新生的资产阶级不是出身不好的青年这一阶层, 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不承认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 只承认人为的阶级斗争, 这才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还

奢谈什么“阶级观点”，更是胡扯！

黔驴技穷，最后来个“我不懂！”不懂有什么光荣？无知怎么能是理由？不学无术算哪笔资本？好不知羞耻！

你的大作我们就拜读到这种程度吧，正如列宁说的，上帝是允许青年人在一定时期说这种蠢话的，你的愚蠢正是资产阶级路线给你造成的。假使你读了我们的这个反驳，还受不到启发，依旧执迷不悟，继续对我们挥拳呐喊（只因为我们替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说了话），那么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再容忍，整个无产阶级也是绝对不会饶恕你们的！

2，站在革命阶级立场上对《出身论》的评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

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是一株散发着修正主义臭味，企图用它腐朽的形而上学的诡辩在我们的阶级队伍中制造分裂，以便取而代之的大毒草。

这篇精心的创造利用许多在前一阶段受资产阶级形“左”实右的反动血统论的迫害而现在要起来革命，起来肃清其影响的人的正当的情绪，来进行挑拨离间，企图把水弄浑，从中渔利。

让我们揭开这篇文章披着的用时髦的“革命”词句，动人的“事实”编织的美丽外衣，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一具怎样的骷髅和灵魂吧！

一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抱怨出身不好“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然后不惜笔墨地用几乎一版的“受害问题”来说明他们怎么在“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下，受到“令人发指”的歧视和迫害。学不能上，“工农革干子弟优先”了。好容易上了，又“往往享受到不同等的政治待遇”，受人白眼。干什么事都得填那可恶的“出身”，结果干什么事都困难重重。城市如此，乡村更不好过。运动以来红卫兵又对他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在“与美国黑人、印度首陀罗、日本贱民等种姓制度”相近的摧残下，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等等、等等。

他们说了这许多（有些确是有理）。但是且慢，看其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帮助红卫兵认识、改正以前的错误吗？是为了让大家去同情他吗？不是！那又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它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受压抑最深（一定要注意‘最深’二字）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这就一下子泄出了自己的天机，这些人要造反，要翻天！

再让我们研究一下这受压抑最深的人是谁吧。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工农子弟不是；革干子弟是“修正主义宠儿”，这些混蛋！一般出身的吗？受压迫固然深，但还不配这个“最”字。很明白了，这些人就是指反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那么这些人怀着这么大的仇恨要造谁的反，翻谁的天，不是很明白了吗？！何其毒也!!!

更卑鄙的是《出身论》的作者在工农革干子弟中进行了恶毒的、不可饶恕的挑拨离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什么革干子弟是一、二、三类，工农子弟只是四、五类，后者也是受前者压迫的云云。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还不知羞耻地说出自己当这个队伍中坚的理由，“受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受谁的压迫？反抗谁？）并且他要“捍卫党的阶级路线了”。他们应该团结一切受压抑的人。在这里，他们狡猾地说受了和他们相同压抑的还有“工农出身的青年”，并且还可以团结那些虽“没受压抑也没偏见的青年和其他革命青年”。剩下就是没受压抑的（或压迫别人）有偏见的人了。一语道破，就是指革命干部子女，这是多么狡猾多么恶毒的挑拨啊！

文章的用心很明白了。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为这个黑中心服务的理论根据是什么，也就是裹在这个灵魂外面的皮肉是什么。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一切反动势力总是希望人们忘记阶级的存在，忘记阶级斗争；总是企图混淆阶级界线，扰乱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

这篇文章毫不掩饰自己对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的反感，竭力使人相信“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仿佛普天下的人不分什么阶级都列入“人”中，并且就像他们头上共有一个太阳那样共有一个真理了。这是多么荒谬！我想，作者一定很相信苏修的“和平竞赛”可以

使帝国主义者放弃剥削了吧！这种典型的修正主义观点早被驳得体无完肤了。在这里，我们只想告诉你们一个简单事实，即：帝国主义的“真理”是掠夺、金钱，修正主义的“真理”是投降、土豆烧牛肉，而马列主义的真理是对这些人“造反有理”！

《出身论》的作者又想出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于社会影响”。而不分你我，社会影响又都是一样的。我们认为，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是不可分割的，并且都是有它的阶级内容的。每个阶级都是由人和家庭组成的。每个人绝不可能像鱼一样超过阶级界限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一个人所受的家庭影响从属于他家庭所处那个阶级的影响。一个人所受的社会影响也首先并且最多地是受他家庭所在的那个阶级的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俗话说：富有富客，穷有穷客。张地主的儿子首先接触的是他爸爸的朋友王地主、李地主……及他们的儿子，受的影响当然是地主影响。后来张少爷看见贫农为他家种田交租子，但他并没因此“感动”，因为他爸爸告诉他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贫农的儿子首先和最多接触的是组成社会的贫农这一部分。总而言之，社会影响对每个人是有很大差别的，是有其阶级内容的。

这些人还理直气壮地质问：能说我们“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照此说法，在社会主义国家，剥削阶级就不存在吗？这种胡说八道实在不值一驳。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当然不能算剥削阶级。但是他们和自己的家庭在思想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绝不是一厢情愿的“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那么轻松。我们诚心诚意地告诫那些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要革命的青年：越是接近社会主义，剥削阶级自己复辟的可能越小，他们便更加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后代身上，千方百计，无孔不入地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他们头脑中。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出身论》作者毫不例外地用资本家出身的恩格斯成为无产阶级领袖来说明其也可如此。我们要说，如果恩格斯在世，他也绝不会给你们更好的待遇的。理由很简单，恩格斯正是因为认清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才成为无产阶级领袖的。作者又说，马恩列毛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绝不是偶然的”。我们要问：难道这是必然的吗？！

至于武则天用上官仪女儿当侍从一事只能说明这样一点：任何阶级内部的纠

纷都是服从他们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的。我们告诉《出身论》作者：和你们愿望相反，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恰恰是很重视出身这一条的。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因为想试试你们这些“千里马”能不能复辟而把大权让给你们的。

在这里《出身论》作者又搬出这样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拉入党内，给五类分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但是，“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即他们的后代）真是天下之奇谈！风马牛不相及，令人笑破肚皮的逻辑！然而作者却一本正经地说教道：“这不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也要问：这到底是谁和谁，哪个阶级和哪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呢？？？

“但是”，作者说，“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指反动剥削阶级）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我们说：不对，地主的变天账绝不会交给贫农儿子的，资产阶级的屠刀上却沾满了红卫兵的鲜血。

我们不必再去驳斥那些七拼八凑的逻辑了。我们大家已经很明白，《出身论》作者的关键在于抽去在人的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斗争这条纲。而我们却要牢牢地记住林彪同志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三

《出身论》观点所代表的那些人是远远不会满足于没有阶级的“人人平等”的，他们应当是“社会中坚”，但理由是什么呢？这时，他便笑吟吟地打出了他们的传统王牌“重在表现”。

这些人为了给自己壮胆，断章取义地说“重在表现”是毛主席的观点，但是毛主席的“重在表现”和你们的所谓“重在表现”是完全不同的，后面我们要告诉你们毛主席的重在表现是什么，让你们好好高兴高兴。

《出身论》先在出身和成份上进行了愚不可及然而自以为得意的咬文嚼字后得出结论说：“出身不是标准”“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然后干脆说：“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这真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照此推下去，岂不成了“儿子英雄爹好汉，儿子反动爹混蛋”了吗？让这些更糊涂更反动的人去批判血统论的“对联”，简单是岂有此理！

这些人还振振有词地为抹杀出身找出理由，因为“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好漂亮！真是谢谢你们的劝告！但是我们更懂得只看表现不看出身，我们会滑到修正主义泥坑里去，葬身于阶级敌人屠刀之下。

《出身论》作者之所以要人只看表现不看出身，是因为自以为表现好，而那些讲出身的人是“表现糟糕的人”。这论调并不新鲜。在学校里，有些人总是认为工农革干子弟调皮捣蛋，粗暴骄傲，而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却总是“非常积极，非常礼貌”。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他有两本日记，一本上尽是改造思想、毛选心得以及对一些人的无耻吹捧。这是给组织和大家看的。但另一本日记上却尽是名利、女人，充满了剥削阶级霉烂腐臭的味道。这才是他的灵魂！丑死了！丑死了！这些人就像画皮一样，其面极善而其心极伪也！难道我们能相信这种人的“表现”吗？！这些人还好。像那些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记反动日记，行凶杀人的剥削阶级后代不也是一个个笑容可掬，道貌岸然吗？这些当然是极少数，但他却是在一个总的水平上的产物。这些两面三刀的伎俩要党“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但这我们是看透了，请听：

“现在的革命干部子女，在学校里的表现是中等而且偏右的。最积极的往往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不管他们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的，反正革命的重担不能落到他们肩上。”真是一针见血，真是人间还有青霜剑呀！

《出身论》作者在这里抛出了一个新鲜的吓人的东西。即：剥削阶级子女是受“修正主义”压迫最深的。我们说，这有些是对的，因为你们到底过不上解放前你老子那种人上人的生活。现在到底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呀。你们所指责的主要罪行：大学“优先录取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正是无产阶级伟大的战略目标，我们的科学再也不能让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继承人统治下去了！但是修正主义分子却给这些人开了方便之门（当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大破坏和迟缓了这个战略。也正因为如此，你们才可以在这里这样嚣张地挑拨、谩骂、欢欣雀跃、得意忘形。修正主义分子总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工厂农村中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

能得以贯彻也正是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胜利之处。你们还指责“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我们说谢天谢地,如果这点再作不到,现在中国要成什么样子都难以想象了。你们对无产阶级国家这些正确的东西感到那么压抑那么不可容忍,表现了你们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一种什么样的本性呢?!

你们说:“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这一下道破了你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正居心,真是不打自招。

退一万步说吧,就算黑五类子女在学校受修正主义的打击最深吧!但照此理最初反抗的应该是剥削阶级子女了,但为什么逆风耸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奋勇宣战的是以红五类为主的红卫兵呢?《出身论》作者一定会说,他们(黑五类子女)受压抑太深,太自卑,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面前畏缩恐惧。但是我们要问:那么当时保卫修正主义领导、打击围剿红卫兵时,那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们怎么那么自信那么挺身而出,而没有一点自卑没有一点畏缩恐惧了呢?《出身论》作者,你们怎么回答呢?怎么为此辩解呢?

这些人又说:“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我们认为革委会的同志们确实很多受了利用,但是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出身好的缘故。

我们要指出:随着运动的迅速发展,随着运动越来越触及到党政军的领导机关,有一部分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已经不能充当革命的先锋和生力军了。在高干子弟身上有着不可饶恕的缺点,严重脱离群众就是其一。但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就是它使干部子弟第一次真正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致命的缺点: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如果干部子弟还不接受以往的教训改正自己的弱点,发愤图强,那么根本不用谁打击,很快就要完蛋了!

对于干部子弟的这些缺点,广大革命同学,尤其是工农子弟,这些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不记仇,不报复,尖锐地诚恳地对我们进行了批评。对此,我们深受感动。广大同学是通情达理的,广大同学是了解我们的!

但是，残酷的现实使我们不能不指出，一小撮怀有反动的阶级情绪的分子现在正乘机刮阴风，放暗箭，到处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带领一些不明真相的组织对红卫兵和革干子弟抄、杀、打、骂。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们这是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行阶级报复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

我们一千个相信，一万个相信，广大工农子弟，广大的革命同志们决不能看着红卫兵的鲜血染红绿色的军装（这鲜血曾染红我们共同的红卫兵的袖章），决不容许别有用心的人把脚踏在我们战友的身上！不会的！决不会的!!! 他们一定会揪出这些别有用心心的异己分子，严厉惩办他们的！

革干子弟干了许多错事（即使现在仍发生），但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好同志。（少数堕入修正主义泥坑的人当然不在此例）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视态度还是采取帮助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也只有文化大革命中，各种人才可以来各自“表现”一番，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革命的同志暴露了缺点，革命的异己分子暴露了他们肮脏的灵魂，这同样是两件大好事，同志们要好好用毛泽东思想鉴别一下各种“表现”，千万不要错过良机。

《出身论》的作者及它的吹捧者，我们希望你们放弃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如果你们不愿放弃，而且有胆量论战的话，我们决心奉陪到底，而且心甘情愿，我们应当是唯物论者。我们不指望从笔墨中赢得自己的胜利，我们要让历史来作证。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几十年以后的明天。

清华附中红卫兵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作战组、宣传组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前言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

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正当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大联合，大夺权的关键时刻，所谓“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在《中学文革报》抛出了《出身论》这株大毒草，绝非偶然！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体现。对此，我们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这些反动的家伙们，怀着对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心情，向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射出一支支毒箭。

他们拚命地鼓吹反动的“阶级熄灭论”，荒谬的“阶级调合论”，为××路线喊冤叫屈，摇旗呐喊，为那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夺权制造舆论准备。他们还梦想实现资本主义复辟，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反动的《出身论》借批判“血统论”这个形“左”实右为名，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矛头直接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用心之极，何其毒也！

目前，这个反动的逆流已经泛滥于全国，流毒甚广，影响极其恶劣。既然他们放了毒，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消毒！这个反动的思潮不肃清，他们的反革命的猖狂反扑不打退，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就不能实现。

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奋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将大毒草《出身论》砸它个稀巴烂！把它连根铲除！

一， 我们就是要讲“出身”

《出身论》的作者为了完全否定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拚命施展其形而上学的诡辩手法，来达到其险恶的目的。他们说什么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不应该过多地强调外因。而外因中又是“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这样就基本否定了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但是《出身论》的作者还觉得不过瘾，又进一步胡说什么“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一个人的出身对其世界观的形成的影响。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企图抽掉阶级内容，大谈所谓的“重在表现”，为××路线翻案，我们必须揭穿这个鬼把戏。

《出身论》作者的诡辩伎俩是不值一驳的，他们虽然提出了所谓内因与外因，但是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内因，什么叫外因。《出身论》的作者企图避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孤立地来谈“内因”，孤立地谈“主观能动性”，这是很荒谬的。

我们说，世界上没有超然的内因，一个人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思想是由于不断接触社会生活（这里包括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逐步形成的，尤其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对于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将起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孩子一出世，只有本能，而无思想，这时他首先直接地较多地接触的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接受这些事物的影响，所以说，一个人的家庭影响往往是为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打基础的。因此，想以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来否定家庭的影响，那只能是枉然。

可笑的是《出身论》的作者刚刚讲了“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以后，又自相矛盾地胡说什么“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触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又说，“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这时作者却只字不提本身的世界观也即内因对接受这些外因的决定作用了。这种片面强调社会影响，把一个青年看作没有思想的物体而可以任意加工的说法同样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用这种唯心论同样不能为你们否定家庭影响提供任何理论根据。

×××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月的总结中说到：“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毛主席和我们党从来都是特别重视人们的阶级成份，阶级出身的。同时也反对唯成份论。”又说“不重视阶级成份，阶级出身，是很错误的。唯成份论，不重视政治表现，也是很错误的。这些观点，必须批判。”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唯成份论，第三重在表现，也即既要重视出身，但又不光看其出身，还必须通过主观努力，通过阶级斗争的长期检验，这才能证实自己的世界观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出身论》的作者企图否定成份，否定出身，片面地强调“重在表现”那是永远办不到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家庭给予一个人的阶级烙印，对他的立场、观点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为他给人以认识问题的基础。

父母及亲人的言行是代表着某一阶级意识和作风的，当然他们对孩子的影响也就带有阶级性了。“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剥削阶级所影响给孩子的是剥削有

理，是对新社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满，以至于把他们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子女的身上，从地主和资本家那里是根本找不到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影响的。而工人和贫下中农所影响给自己孩子的则是翻身的喜悦，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当然在部分工人贫下中农中也有着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甚至有极个别反动的。但是这不是主流。两个阶级的家庭给予其子女的影响是完全对立的，这是铁一样的事实。一个反动家庭的思想意识与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本不是谁服从谁的问题，而只能是一个灭掉另一个。谁否定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列主义者，谁想反对这一点，谁就是反马列主义。

《出身论》作者不承认有“家庭影响”却说“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不好。”因此得出结论：“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一个思想反动的地主老子，能自己的孩子以什么好影响呢？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不仅没有与其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反而站在反动的老子立场上，美化了剥削阶级的家庭影响，贬低了工农家庭的影响。企图把所有不同的家庭影响拉到一个水平线上来，求得平衡，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出身论》中还有一个荒谬的地方就是否定阶级烙印，离开阶级分析，而去片面强调“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照此说法，社会上就不会有坏分子了。因为他们早被真理“感召”过来了。真是太令人可笑了！这纯粹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邪说”。我们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掌握。一般地说，那些地、富、反、坏、右是不会受其感召的，那些受剥削阶级家庭影响较深的人，也是不会很轻易地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须经过一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果离开了阶级分析，去谈什么真理具有“感召力”，那岂非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二、“重在表现”是有阶级内容的

《出身论》作者花了很大精力，在其臭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极力企图完全抹杀家庭影响，从而得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一前提下提出了所谓“重在表现”的问题。我们说：出身和家庭影响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看出身，就是要看不同阶级对其子女的影响，要看阶级烙印，决不是像作者先生所说“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

××的所谓“重在表现”之所以反动，就是因为他歪曲了毛主席提出的“重在表现”政策，他抽掉了这一政策中的阶级内容，而把“重在表现”变成了“重在表面”。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坚决造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政策的反。可是，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企图伺机翻案。今天，正当革命群众奋起批判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时，社会上的一小撮混蛋，以为机会来了。于是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妄想借机排斥打击工农子女取消党的阶级路线，搞反革命修正主义复辟阴谋。

《出身论》作者为了否定出身对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的影响，在使尽了形而上学的诡辩手法以后，竟公然歪曲主席思想，这是万万不可容忍的。毛主席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内。”可是作者先生说：“毛主席 1939 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那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那一个范畴。”炮制《出身论》的混蛋想用此来说明，你也是小资产阶级，我也是小资产阶级，要讲成份嘛，咱们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谁也不比谁强。即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殊不知毛主席在讲这一段话时首先就讲到了要看家庭出身。这只能是作者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

《出身论》作者为了反复证明其不讲成份的所谓“重在表现”是正确的，于是就挖空心思地找论据。他胡说什么，只有像地主、资本家那样处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的人才能在思想上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这就是他们所谓“‘有成份论’的根据”，而对于剥削阶级的子女，因为他们没有剥削，他们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因而就不应该给他们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了，这纯粹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难道剥削阶级腐朽的思想意识，不影响其子女吗？如果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不算剥削阶级烙印又算什么呢？作者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出身论》作者用“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为根据，得出出身和表现“毫无干涉”的荒谬结论。这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出身既然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阶级烙印，它就必然会对这个人的行动（即表现）发生作用，决不是和表现“毫

无干涉”而是有着紧密联系的，离开了阶级分析，就无所谓“表现”可谈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有些出身好的青年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一定要彻底批判，但《出身论》作者却以点带面，把少数人的错误夸大成所有工农子弟的错误，拚命贬低工农子弟。妄想批判形“左”实右时趁火打劫，把工农子弟压下去，非置于死地而后快。与此同时，《出身论》的作者还恶意地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如武则天。把阶级分析说成是“以人害言”，说我们的党“不识千里马”“糟踏了千里马”。这是从《三家村札记》中才能找到的黑话。他们把矛头指向谁不是很清楚了吗？

三、矛头对准了谁？

“出身论”假借批判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谭力夫为名，大肆诬蔑、谩骂工农子女，说工农子女是受修正主义宠爱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此来丑化工农子女，以便达到他们打倒工农子女的丑恶目的。奇怪得很，像谭立夫这样的人物在工农子女中能占多少？难道你们不承认大多数工农子女是好的吗？是革命的吗？

“出身论”的炮制者对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恨之入骨。他们反对党的阶级政策，反对学校向工农子女开办的正确方针，反对党的干部路线，反对兵役制……。

老实告诉你们，现在就是我们工人、贫下中农的天下，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那些还没有真正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那些仍然和他的反动老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就是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和工农子女相同的待遇。我们就是要让出身好、表现好的工农子女去掌握枪杆子，就是要让这些人去掌握国家的机密机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规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联。要像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这就是我们党的阶级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制度。我们若没有党的阶级路线，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我们的政权就不可能巩固，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那些反对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的混蛋们，任何谩骂和狂吠都是枉然的，都是不济于事的。我们就是要有这种“阶级偏见”，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这种“阶级偏见”怎么行呢？想否认阶级的烙印，否认自己受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不做痛苦的思想改造，不做脱胎换骨的变化，就想混入革命队伍，把自己打扮成为英雄，这是痴心妄想！

你们不是大喊：“收起你的考验吧！”告诉你们，我们就是要考验你们，就是要看你们是否真正的背叛了自己的反动家庭，是否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这是完全必要的考验。对你们不考验是不行的，你们越是害怕考验，就越是要考验你们，要革命的那还怕什么考验呢？

“出身论”的作者还恶狠狠地说：“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这正是修正主义一手造成的。”看！他们的用心是何等险恶呀！他们已经气势汹汹地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疯狂反扑了。已经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施展了“三家村”黑店老板的鬼把戏，含沙射影地向我们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假借反对形“左”实右、“血统论”，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为牛鬼蛇神喊冤叫屈。大叫：“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受压抑最深的青年勇敢战斗吧！”

看这杀气腾腾的叫嚣，不是十分明显地看出，他们要号召那些牛鬼蛇神、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起来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要大干特干了吗？！他们要翻天，要进行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反革命夺权了。看！“出身论”作者用心之极，何其毒也！

结束语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又说：“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阶级敌人是懂得这一点的，他们总要在政权问题上和无产阶级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企图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出身论》就是一篇公开号召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为反动势力夺权制造舆论准备。

《出身论》又是一篇杀气腾腾的反革命复仇书。目前在全市、全国不少地方有那么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孝子贤孙趁着批判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纷纷出笼，他们自称“左派”，打着“造反”的旗号借批判“形“左”实右”为名，行攻击党的阶级路线、打击工农子女之实。企图把犯了一些形“左”实右错误的工农子女不管轻重，都一棍子打死，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甚至这些混蛋企图把那些出身好的，从运动开始就一直按毛主席的教导，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组英勇斗争的闯将一脚踢开，把他们排斥在夺权组织之外，进行趁火打劫，混水摸鱼，扰乱我们的阶级队伍达到他们的篡权的目的。《出身论》正是配合这种反革命夺权而出笼的，以制造舆论，使其夺权合法化。《出身论》代表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我们务必提高革命警惕，揭穿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大联合大夺权的今天出现反动的《出身论》，是必然的，它告诉我们阶级敌人是不甘心于死亡的。毛主席说：“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既然《出身论》自己跳出来了，我们就坚决铲除它。铲除毒草好肥田。对于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潮必须痛加批判。打倒反动的“血统论”！打倒反动的“出身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出身论》这株大毒草彻底批判、批臭，把《出身论》的后台揪出来示众！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原载北京《旭日战报》1967年2月25日特刊）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第三研究小组：《唯出身论》和《出身论》都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一、社会影响、家庭影响，及两者关系

马列主义告诉我们：“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

——这一切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

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阶级还实际存在，阶级斗争规律也就依然起作用，所谓社会影响家庭影响也主要是阶级影响，父母的管教如何也会起到影响，前者形成阶级共性，后者形成个性，居次要从属地位。从家庭影响方面看，比如资本家在公私合营以后，他们还拿着定息，也就是说他们还有剥削，作为其子女，也是享受到的。反对取消定息的不只是资产阶级份子，他们的子女之中也大有人在，否认这种家庭出身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至于社会影响，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是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思想。另外由于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客观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也严重地存在着。前者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在社会的主要影响，这种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的关系，也有普遍的方面。即剥削阶级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另外也有阶级差别的主要方面，它与工人，贫下中农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为什么工人和贫下中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好的原因，从这里就可以得到阐明。而对于其他阶级，特别是剥削阶级，他们基于本身阶级的利益，往往对毛泽东思想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一些身在主席周围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虽受主席的教导最多，骨子里依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一事实不正是说明这种所谓社会影响的实在情况吗？从这里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的教导：“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二、关于重在表现的问题

《出身论》的作者为了极力抹杀阶级出身的影响，在“成份”和“出身”的字眼上也化了不少苦心。除了极力把成份和出身严格地加以区别，还特别作了正名工作，唯恐别人把成份和出身混淆起来。

的确，成份和出身是有区别的，家庭出身的实质是指阶级出身，因为不同家庭的不同经济政治等情况从属于不同的阶级，并不是指什么职业出身。出身应该只对青少年尚未脱离父母家庭获得独立经济地位这一段时间才适用，因为一个人参加了工作，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成家另过以后，他就在本身所处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形成自己的阶级成份。有的跟出身一样，有的跟出身不同。这时原来的出身才退居于参考从属的地位，因此成份和出身是有区别的。

但是不能因此就把成份和出身截然分开，人为地割断其中的联系。在阶级社

会中，人自出身以后就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青少年就生活在他父母所处的阶级地位中，从这里可以看到，父母的成份和儿子的出身有必然联系，不能截然分开。

至于《出身论》作者所作的正名，把职业说成了成份，其实是错误的。父亲以鞋匠为职业，其父亲的成份并非鞋匠而是工人，其儿子是工人出身不是鞋匠出身。有的职业也是成份的标帜，如职业是工人，其成份也是工人。有的不是成份的标帜，如鞋匠、其他如教员，职员，不应说成教员，职员成份。虽然现在有人把职员也当成成份的，其实是谬误。因为高级职员和小职员虽同是职员，它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并不相同。否则就会混淆阶级成份。这种阶级成份混淆现象，在《唯出身论》者制造的什么“红五类”，“黑七类”中也有同样情况，所谓的“红五类”，其实只有两类，即工人和贫下中农。所谓“黑七类”其实也只有地，富及资本家才是真正的阶级成份，其他反，坏，右，黑都是个人政治问题，它们都另有阶级成份。

其次关于重在表现，这的确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是毛主席的语言。是对阶级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所体现出来的某些阶级成员有互相转化的事实所作出的理论性概括。它具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如恩格斯本人是资本家，但他成了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和革命家。但应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所有资产阶级份子都能自觉地转化为无产阶级。如果企图用个别现象蒙蔽其整个阶级的反动本质的认识，就必须揭穿，不能上当。剥削阶级的被消灭过程，就是剥削阶级成员的被改造过程。（这是阶级本质的改造）他们在这一改造过程中的表现不可能一样。重在表现最本质的意思，也就是用来衡量他们这种阶级本质的改造过程的一个极为有用的方法。

另外，在现社会中，由于其他阶级还同时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仍然严重地存在着。在不同阶级思想并存的情况下，就不可能不互相影响，因而在工人中也会出现资产阶级份子。为了看清他们所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程度，也需要重在表现这个方法加以检验。因此对他们也适用。但也必须指出，重在表现是有深刻的阶级内容的。某些想利用重在表现对任何人都适用这一表面现象就企图抹杀阶级分析，进而想否定出身的区别的人，实际上是用重在表现这一武器，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

至于出身和表现的关系，真是甚小吗？只有表现是活的，出身是死的吗？解放前，地主，资本家因为有钱有势，他们的子女妖里妖气，胡作非为等的表现，难道不是这种出身的直接影响吗？解放以后，直至十七年了的今天，地主，资本家的子女有那么多的上完高中上大学，平时讲究吃穿打扮，难道不是这种出身的影响吗？为什么占人口数亿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上大学的人数还没有只占人口不能以亿计的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多呢？难道这不是出身的影响吗？再如今天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老爷们，他们的子女养尊处优，仗势欺人，横行一时，难道不是出身的影响吗？既然是出身的影响，也就是因他有那种出身才有那种表现，这难道出身是死的吗？表现之所以活，不正是出身在他血液里起作用吗？

作者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继又发问道：“这里提到出身了吗？”我们要问《出身论》的作者，一个出身地主、资本家家庭的人，在他没有把出身的严重影响，满脑子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去掉以前，他可能站在革命人民方面吗？君不见王光美她说她也没有剥削过人，并且在革命队伍里混了多年，还挂上了共产党员的招牌，如今不依然是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份子吗？能否认出身对她的影响不是很大的吗？

出身和表现有一致性，也有矛盾现象，如果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就应该做认真的阶级分析。那种看见出身和表现的矛盾现象，就企图抹杀出身对表现的关系，必然要混淆是非。

《唯出身论》之所以可恶，因为他们并不懂得出身和表现的关系，而把党的阶级路线任意歪曲，非把它变成僵死和生硬的公式，硬往别人头上乱套。

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基于以上分析，关于出身问题应该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

《唯出身论》之所以是反动的，这是因为它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分析的。但他却打着阶级路线的旗号混淆阶级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企图孤立革命派保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在现阶段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尖锐的情况下必然要出现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这种反动思潮之所以能横行一时，是因为它有以这种思潮为代表的阶级力量存在。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新冒出来的资产阶级力量。问题不是《唯出身论》，《反动对联》，《谭氏讲话》有什么了不起，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早在他们

出笼时就认清它的反动面目。而所以有不少人跟着它跑，是由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更多的青少年是受蒙蔽的），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而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反动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往往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什么鼓吹真理的感召力，却并不能感召那些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我们批判反动的《唯出身论》，不仅要在理论上彻底批判它，而且要用阶级斗争，把以这种思潮为代表的反动资产阶级力量彻底打垮。否则理论上的胜利还不等于阶级斗争的胜利。只要代表这种思潮的反动阶级力量还存在，那么即使他们口头认错，明里暗里却仍会那样干。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其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在以《唯出身论》为代表的新的资产阶级力量节节败退的同时，旧的剥削阶级力量又紧跟着蠢蠢欲动了。远在去年六、七月间就露了苗头，以后他们借着大家痛恨《唯出身论》，起来痛加批判的时候，他们认为时机合宜，终于公开抛出系统的所谓《出身论》。

凡是有一定影响的舆论的出来，它都代表一定阶级的潜在力量。

反动的资产阶级，为了斗争策略上的需要是会千变万化的，它会以种种迷惑人的形式出现，使人们一时眼花缭乱。事情是很清楚的，《出身论》一抛出来，有些人就迫不及待地手舞足蹈大声喝采，得意之形溢于言表，。他们都是什么人？除了受蒙蔽的以外，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其背后还有一切被打翻在地的剥削阶级分子，在暗暗拍手称快。因此《出身论》所代表的是什么阶级思潮，什么样的阶级力量，他向谁挑战，它要干什么，不已经很清楚了吗？他们为了达到他们的阶级目的，竟公然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前面已经一再说过，在阶级社会里，所谓社会影响，家庭影响，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而《出身论》的作者，虽然谈的是阶级出身，却不作真正的阶级分析，只是写到了一些表面的个别现象，就荒谬地下结论说：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从而否定阶级对一个人的影响。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他们把社会、家庭影响中，最本质的经济，政治的因素一笔抹杀，而大谈什么父母管教，朋友琢磨……等等。

最后居然否认真理的阶级性，从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性，企图把毛泽东

思想说成是全民的思想，是任何阶级都能自觉接受的思想。由此可见，《出身论》借批判《唯出身论》之名所贩卖的是“无阶级差别论”，“无阶级矛盾和无阶级斗争论”，公然与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针锋相对。并以此来麻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警惕，从而号召一切出身不好的人，以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为名，猖狂地向无产阶级掀起一场新的进攻。

《出身论》所代表的乃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坚决予以回击，痛加批判。

然而也不应不看到《出身论》还有很迷惑人的一面，他们为了迷惑别人，唤起反动阶级的阶级仇恨，不惜用了大量篇幅谈什么出身不好的子女如何受害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出身论》的作者们：难道你们不知道解放前地主，资本家血腥迫害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罄竹难书的活生生的事实吗？当剥削阶级压迫工人农民的时候，分过什么老子，儿子，成份，出身吗？百分之百的工农及其子女，不要说上大学的绝无仅有，能上小学的又有多少呢？他们在政治上有说话权利，当上什么官的有没有呢？如今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地主，资本家的子女有几个上不起小学，中学，大学的？工农子女到如今上小学有困难的又有多少？他们比起工农大众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受的迫害，算得上什么受害？如果你们承认社会主义仍然是有阶级的话，这不是必然的吗？在阶级还没有消灭的情况下，就要求人人平等，甚至在要求平等的背后，仍然想像解放前那样，骑在工农大众头上作威作福才不算受害，这乃是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十足的表现。

至于《唯出身论》者们，挥舞反动对联胡作非为，乃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另一表现形式，它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必须指出：谁要是借批判《唯出身论》的同时，肆意攻击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路线，企图通过批判《唯出身论》取消阶级差别，取消阶级分析，达到什么人人平等，在目前阶级还客观存在的情况下，那时绝对办不到的。

毛主席一再唤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阶级敌人每时每刻都一再从“左”方，右方及形“左”实右方面向无产阶级猖狂地进行斗争。

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在这样一场搏斗中，丧失警惕是危险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第三研究小组 1967 年 2 月 27 日 初稿（本报有删节）
（原载《东风报》1967 年 3 月 19 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戚本禹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时的讲话

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林彪同志最近有个录音报告，以后再讲。林彪同志说：共产党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共产党不搞阶级斗争就不是共产党。古今中外，一直存在着阶级斗争，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阶级烙印，我们要自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事物，指导行动，离开阶级斗争观点，就会犯绝大的错误，我们就容易看不清方向。对每一个问题的评价，对每一个问题的看法，如果离开了阶级观点就是错误的。如对待出身，青年等问题。青年有属于无产阶级的，也有资产阶级的，干部子弟有属于无产阶级的，也有属于资产阶级的，应该用阶级观点来贯穿中学运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知道，中学运动一直就围绕阶级路线在争论，开始是反动血统论，后来是反动的出身论。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仔细讲究了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也必须用阶级观点来对待成份。毛选一二七九页说得很清楚：“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的宣传……。”这两边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开始是反动对联的出现，唯出身论，伯达同志说，这是封建的。但这不是独创，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也讲血统论，它认为德国人血统高贵，日尔曼人血统高贵，蓝眼睛的人血统高贵，黄种人血统低贱。古代也有，帝王将相的儿子血统高贵，奴隶的儿子血统就低贱。由于这种宣传长期统治人们的头脑，劳动人民认为自己的命运不好，不敢造反，农民起义领袖认为要请姓刘的作皇帝，因为姓刘的命运好，这是骗人的。现在有些人，接受了这些反动的血统论。有些人长期做官当老爷，影响了自己的子女，使他们自己认为血统高贵。人家不同意他，他就“打、砸、抢”来压人，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他们生活条件优越，忘记了劳动人民，走上了反动血统论的道路，所有的同志，红卫兵，特别是老红卫兵，更要特别注意，但这悲剧还没有结束，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觉悟，还搞“打、砸、抢”，有些人被关到公安部，有些人还没有放出来。

清华附中红卫兵写过“三论”写得比较好，我对他们有感情，就到他们学校去了。找他们座谈。会后他们散发传单，说我没有汽车，坐王力的汽车，还不知

从哪儿听说我是十七级干部，说他们家趁俩。我没有汽车，我很高兴，他们分三、六、九等真可悲！“八一”学校的同学，连玻璃自己都不擦，出来见有人扣子没扣，就说是流氓，把人打一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确实很可悲！还和他老子一块看帝王将相的影戏受影响很深。做了廿世纪的唐吉柯德，他们还想翻案，说什么十年翻案，二十年掌权。我看他是掌不了权了！

我看《出身论》也不对，有很大错误，是大大错误的！它的错误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他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结果同血统论走到一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在我国产生了种性制度。否定阶级分析，抹煞阶级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抹煞阶级出身。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否定了阶级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个人家庭出身对他本人的影响，否定阶级地位。我们不少唯成分论者，我们号召不同出身的人都要在大风大浪中改造思想。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要背叛他们本家庭所处的阶级地位。而《出身论》却号召人们不讲这些，它实际上就是彭真反党集团所歪曲的“重在表现”，它煽动不要做外围，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们不要上当！（群众：中学文革报已被取缔。）光取缔不行，要批它的反动思想，（群众：现在有些学校，一提出身就是血统论），说明有些人在反对血统论时想混水摸鱼，进行煽动，我们要注意这些。我们要紧紧抓住主席的两点：既反对唯成分，又反对忽视成分。首先要看出身，但不光看这点，他们出身不好，但欢迎他们造反，但不能否定出身，不能否定阶级分析，不能否定一个人在阶级社会生活中所受的影响。

3 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上对《出身论》的评论

宋永毅：《遇罗克的《出身论》实质何在？——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

一九六六年七月至九月，正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伴随著老红卫兵皮带的呼啸声在社会上风行一时，红色恐怖下的人们连乘车、上医院都不得被迫报上自己的成份（即家庭出身）之际，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北京学徒工却对此既不以为然又忧心忡忡，为了向社会公开他的独立思考和向血统论发起正面挑战，他开始伏案潜心写作一篇名叫《出身论》的文章。他，就是遇罗克。

《出身论》初稿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开始只是几百份油印的传单。它们产生于遇罗克菲薄的学徒工每月二十元左右的薪水，是他用自己的工资买来钢板、蜡纸刻印而成。并由他弟弟遇罗文等帮忙张贴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及电线杆上的。遇罗克为自己起了一个“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在回答别人这一笔名缘起时他说：“我不喜欢什么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字。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万个家庭，希望每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

在一九六六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中，北京男四中中学生牟志京于极偶然中在一根电线杆上看到最初的《出身论》油印件，署名是‘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读过之后，牟志京觉得文章写得很好，他自己反对‘对联’的血统论，还只是出于天性和直觉，而《出身论》的作者则广征博引，条分缕析，颇具理论性和系统性。牟志京当即便按照油印文章上所附联系人地址，赶到六十五中。在那里他遇到了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参看本刊 z k 9 6 1 0 c：《从知识者的良心出发——访牟志京博士》一文）。

经商量后，他们决定把《出身论》变成铅印，广为散发。牟志京便向四中借了五百元钱，去解放军 1 2 0 1 印刷厂联系印刷。经牟志京、遇罗克修改后的《出身论》共有三万多字，在排版成一个对开四版的传单时竟空出了一大块，于是牟志京灵机一动，干脆取名《中学文革报》，主办单位的名称起了个更响亮的“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中国文革中第一份纯民间背景的报纸便如此诞生了。《出身论》如一声惊雷，炸开了当时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第一期三万份报纸竟在数天内一售而空。很快又出专刊六万份，正是一纸风行，京城纸贵。人民群众还自发地将它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在全国各地，大街小巷广为散发。这一情景，与血统论的代表作《谭力夫讲话》是由中共的各级省市下令广为印发形成了鲜明对照，也正好从中窥见民心向背。《中学文革报》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近万封全国除台湾和西藏外所有省市的群众来信，坚决支持《出身论》。《中学文革报》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创刊，至四月因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共出版了六期。遇罗克在上面共发表了六篇论文：

1. 出身论（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2. 谈“纯”（第二期，1967年2月2日）
3. “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第三期，1967年2月10日）

4.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第四期，1967年2月21日）

5.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第五期，1967年3月6日）~}

6.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第六期，1967年4月1日）~}

此外，他还有一篇《谈鸿沟》，发表在首都《中学论坛》的创刊号（1967年2月27日）上。这些论文构成了《出身论》的人权主义体系，又很快形成了一股为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思潮，自然也遭到血统论维护者“联动”等的反对。他们不断冲击辩论会场，抢砸报纸编辑部……毛泽东的追随者们从林彪、陈伯达到戚本禹之流都在他们当时的讲话中或正面或侧面地批判过《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大方向错了”，“有人利用出身问题挑拨我们党与广大青年群众的关系”。由此可见，《出身论》触动的不仅是十七年中共旧体制的维护者们的利益，它动摇的是包括文革派在内的整个中共的思想体系。它自然而然地成了统治者们要合力绞杀的异端邪说了。

即便对《出身论》只投去匆匆一瞥，也不难发现它的核心观点是两个字：“平等”——即为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受教育的平等。《出身论》等一系列论著认为：由于十七年中错误的“阶级路线”，在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的社会性的歧视制度——出身歧视（《出身论》）。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实际上已在十七年中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便在工厂农村，也同样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乃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得不到平等的权利。由此，作者犀利的笔锋还不露声色地进一步揭示了统治者进行出身歧视的真正目的：“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这样，中共当局为了自充“上帝”而制造“魔鬼”的神话；为了牢固地统治人民，进而把人民分裂，并进一步设置集体仇恨倾注对象——成份与出身不好的人的险恶用心便昭示于天下了。由于《出身论》是在与血统论的论战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对血统论的鼓吹者——那批狂热的大多为干部子弟的老红卫兵批判，必然使遇罗克的笔锋涉及到反特权这一敏感课题。从而使《出身论》等文章成了最早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对和批判中共党内特权阶层的文章。在遇罗克看来：十七年的官僚体制使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成了“物质上的特权阶层”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个新的特权

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遇罗克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遇罗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血统论的瓦解作用，并指出血统论完全是中共当局企图使“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谈鸿沟》）。

这样的思想在文革初期的中国真可谓惊视骇听，而它又非常接近现代民主主义的人权思想。在那段乌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中，遇罗克的《出身论》完全无愧为一份黑暗王国中耀眼的人权宣言书，而年仅二十余岁的遇罗克为此祭上了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如同后文革时期（1976—1982）的民主运动的思想家们在评论《出身论》时指出：“按照作者的逻辑，我们可以前进得很远，可是作者当时还不能明确地与官僚势力对立，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对于现存制度‘无比优越性’的肯定，对党及其领袖缺乏具体分析。显然《出身论》只能是六十年代的产物，若作者本人今日尚在也不会满意的”。

这一批评说对了一半，即“作者当时还不能明确地与官僚主义势力对立”。至于说作者“对现存制度‘无比优越性’的肯定”，恐怕更多的是遇罗克行文时的一种策略上的考虑。至于他大量引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语录，在更切近实际的意义上，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和当时流行的“打著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而已。遇罗克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先知先觉，他从一开始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决反对者。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舆论，遇罗克写了《论“清”官非“官”》（一万六千多字）《人们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万五千余字）和《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一万四千字）等论文投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文汇报》等，对姚文元进行全面反驳。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稿件自然遭到了退稿。遇罗克在收到陈伯达把持的《红旗》杂志退稿后在当天日记中嘲笑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1966年2月13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们需要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这篇文章里，他点名批判了姚文元的谬论。他在日记里为自己感到自豪：“敢道他

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终于降临，我们整个民族的行为与思想都陷入混乱之际，遇罗克却自始至终保持著清醒。他首先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早在1966年2月6日的日记中，他就批判了陈伯达不该用吹捧封建统治者的语言来吹捧毛泽东。在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遇罗克还一眼看穿所谓文化大革命幕后的权力斗争实质，他在6月6日日记中针对狂热的民众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他尤其反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煽动青少年斗老师、破四旧等反文化的野蛮行为。他在6月17日日记中写道：“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老师自杀了，小学生行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象新市委所认为：‘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8月23日他又写道：“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墙壁，门面牌号全砸了……还有人扬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好一个焚书坑儒”。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对十七年官僚体制的冲击，遇罗克持冷静的分析态度。一方面他肯定人民对官僚体制的冲击，另一方面他又批判这种冲击的巨大历史局限性和为毛泽东等人的利用性。在8月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志鑫的大会……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但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过。”

如同王希哲后来所评论的，遇罗克的目光鞭辟入里地看到了反官僚的群众运动背后的危机：“群众批斗干部，是因为干部的官僚化与群众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官僚化并不完全是干部个人的作风，它正是在毛泽东专制主义体制下人民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结果。但是人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给干部罗列的

‘罪状’首要的恰恰是，因为干部们反对了毛泽东（这真是冤枉）！这证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人民反官僚主义的利益还从属于毛泽东发展专制主义的利益，人民群众本能的反官僚制度的要求却被毛泽东披上了为国家更加专制独裁而战的战袍，‘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是林彪提出来的，谁高喊了它呢？是人民，但这根棍子最后把谁打痛了呢？还是人民！”

遇罗克之所以能“举世皆浊我独清”，和他在1960年因出身问题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但仍在社会大学里学习，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有关，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十九世纪的黑格尔，从苏格拉底、希庇何斯的美学到卢梭的人权平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他都下过苦功夫钻研。这些都培养了他对文革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对已变成现代迷信的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据《中学文革报》的实际主编牟志京回忆：“遇罗克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毛泽东虽也有许多赞赏之处，但也同时有许多批评之处”。

据与遇罗克一起坐过牢的张朗朗回忆，遇罗克在研究了《毛泽东选集》新旧版的修改后，露出他“习惯地嘲讽的笑容”，继而对张说：“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虽然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它的变异毛泽东思想不免是历史的嘲讽，但这又是中国年青一代在觉醒途中的一个必由的历史阶梯。

然而，疯狂的年代容不下一个独立思考的清醒者。如同遇罗克当年的伙伴们在回首当年时所言：“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是注定要做祭品的。”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为此，《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但遇罗克仍坚强不屈，五次上书反驳毛泽东的追随者们。1967年下半年，他又转而研究我国经济体制，准备撰写《工资论》，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由工龄形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分，其余部分按本人贡献发给。同时遇罗克估计到了自己的危险，他在1967年的总结中写道：“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著风浪前进……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以“企图暗杀毛主

席”~的完全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于1970年3月5日。那一年，他才27岁。人人知道他是因为《出身论》揭露了中共所谓“阶级路线”的现代种姓制度的本质而惨遭杀害。三十年岁月并没有尘封住《出身论》的光华，今天重读遇罗克的一系列论著，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在温和的言语后对“平等”的竭诚追求与现代人权思想的熠熠光辉。

宋永毅的另一段话说得更透彻：遇罗克所提出的出身问题，即不同出身的人应该有平等的选择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常识。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的词典里的常识是另外一套，讲穿了就是血统论。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谁敢说，我和一个出身高干的人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有平等的公民权，有平等的“提干”机会？谁敢讲这个话？阶级斗争本质就是不平等。

郑也夫：读《遇罗克》断想

《出身论》那年我十六岁。从此这个人与这篇文章永远存留在我心底。二十九年我曾苦苦想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杀死他？准确地说，一半是愤怒而缺席的质问；另一半则是真实的疑问，无法解开。他没有打砸抢，没有反江青和中央文革，没有在日记中攻击权势人物；就为了一篇文章、几个观点和他对出身与成份、社会影响与家庭影响的辨析？毛泽东曾对他的子女说，不要一上来就批判《红楼梦》，要先钻进去。我真的想读懂杀害遇罗克的真实思路，尽管我知道这思路上了不了台面。我那时可以读懂《出身论》的全部字面含义，却没有读懂文字背后的社会历史。

重读遇罗克的文章，我懂了。遇罗克说破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说破了十七年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我们的社会公然压迫着它的一部份成员：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及守法的地富反坏右们，其数量大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加上有海外关系者和历史反革命的子女，受歧视者接近五分之一。每朝每代都有歧视和压迫。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压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而使压迫明火直杖，十倍疯狂。遇罗克正是向着那神圣外衣——血统论的意识形态开战。

（这个郑也夫也坦白得可爱。他把遇罗克的政治、阶级本质暴露无遗：遇罗克说破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说破了十七年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我们的社会公然

压迫着它的一部份成员：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及守法的地富反坏右们。)

(二) 一个真实的遇罗克

1, 遇罗克的家庭出身和主要经历

遇罗克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六八年一月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执行，年仅二十七岁。

1957年，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是私营企业主，在“三反”“五反”中遇崇基是（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是贪污嫌疑对象，被关押、逮捕，母亲就要受到隔离审查。在反右派中遇崇基说：“人和人，冷冰冰”等等，被打成右派，母亲王秋琳（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也被划成右派。遇崇基劳改。80年代中期，他被通知得到“改正”，补发两年工资。但还保留着“汉奸”身份。

1960年夏末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人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一个是门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罗克。

1961年春节前夕，他自愿报名到京郊人民公社当农民。申请被批准了。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等不及过春节，遇罗克就来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报到。

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遇罗克积极应考，试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征兵开始了。遇罗克又立即报名。他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

1962年《北京晚报》发表了他写的短篇小说《蘑菇碉堡与菜花老人》，

1963年《大众电影》发表了他写的《评电影〈刘三姐〉》。

1964年初，他回城，个月以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在一所小学代课。

1964年秋，他与人合作将小说《播火记》改编成京剧剧本《绿林行》，请京剧院行家看过，认为不错。但因为牵涉路线问题，不能排演。他又写了梅花大鼓词《焦裕禄演戏》，立即被北京曲艺团采用。

1964年8月，他进入工厂当工人。

2, 从遇罗克的日记中反映出的政治立场

他这时的思想部分反映在他的日记中：

1966年1月2日，他写道：完成一篇约三千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主题批判近来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1966年1月27日，他写到：“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的原因是不学无术的。”。

1966年1月28日，他写道：“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全然否定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是反对的。但是如果在他的理论面前顶礼膜拜，也同样不正确。”

1966年1月29日，他写道：“今天，则过份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正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6日，他对陈伯达颂扬毛泽东不满，他写道：“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的理论家，其颂毛为‘智能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成了独裁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哉。”

1966年2月6日，他写道：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

“《谢瑶环》剧本文学性颇强，亦足具艺术魅力，今以左倾教条主义诋之，以过火的政治论之，则几成大恶不赦矣！”

1966年2月10日，他写道：寄去《红旗》的《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给悄无声息地退回来了，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我擗读一遍，又给日报寄去。

1966年2月15日，他写道：

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买来2月13日的《文汇报》，果然有。

（附录：《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姚文元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口碑传颂的清官们判了死刑。他认为《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是个假海瑞。他引证了几页史籍，并加以分析，说海瑞根本没干过好事。无怪乎有的同志读了这篇评论大摇其头，深感有划分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必要。

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

如果就剧论剧，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其缺点绝不是因为把海瑞写得太高大了，太英雄了，恰恰相反，吴晗同志多少还担心遭受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攻击，不客气讲，还有点怕，还不敢把海瑞写得更英雄些，更高大些；还拘于史料的限制，还没有把海瑞更理想化。让人莫名其妙的是，竟有人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大块儿文章，作者看到剧中海瑞讲了“何以对慈母、对皇上、对百姓”这么几句话，就认定吴晗同志有意在宣扬封建道德观！那不正是吴晗同志为了暴露海瑞的历史局限性才加上去的吗？

说假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真海瑞有没有可以赞扬的地方呢？姚文元同志既然把海瑞认定为地主阶级的一员，认定他每时每地都是地主阶级的自觉的忠实捍卫者，因此就无法解释海瑞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绩。在史实面前，他就采取了两种手法：一是否认，二是贬低。姚文元同志真武断得可以。他说平冤狱，那是惑人视听；退田，那是为小地主服务；实行一条鞭法，丈田纳税，那是徒有其名；修吴淞江，这总是真的了吧？不，姚同志偏偏盯住史书的“一月竣工”四个字上。说一个月根本不能完工，想必是张冠李戴，记错帐了；那么，或许海瑞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总不会太虚妄吧？姚同志却说：穷人无钱着白衣，因此大不可信。我看，若说有一种人曾犯过考证癖，姚同志大概就犯了否定癖了。

海瑞做了叛逆本阶级的事

封建社会中的道德观、伦理观是错综复杂的。封建正统观念不管是多么肤浅，也会有一点儿本来属于人民的东西，非如此就不能起到欺骗人民的作用。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傻到自缚手足的。正所谓“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但也许这一套会骗住一两个本阶级的“痴子”，真的相信了仁义礼智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甚至连皇帝也看着不顺眼了，上疏骂一骂，我们也不必非得说他是自觉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因为他的阶级观念还不很明确，我

们得原谅，他到底是四百年前的古人了。

海瑞在当时正是被称为“痴子”的。而这种痴子还是对人民有益的，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的。他虽算不得天下的救星，倒也无愧于一方的护法。不过请姚同志放心：这种人是不会推迟农民起义的。在矛盾尚未激化以前，部分的改良总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在漫漫长夜之中，在统治阶级的泥淖里骤然出现一个有棱角的人物，并且肯为对立阶级做一点事，哪怕只有个别人物吧，不也没有基础吗？这在某些人看来真是不好理解。但不善于理解历史的人却无权擅改历史。阶级斗争是尖锐的，阶级关系也是复杂的。我们不能把某一个人看做是一个阶级或是一个阶级的绝对代表。我们既应该看到反动阶级通过宣传、利诱、欺骗、暴力会给革命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一些不良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人数众多的革命阶级通过反抗、斗争、磨擦、接触会给反动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较好的影响。影响是相互的，尽管不是对等的。像海瑞这样一个出身非豪贵，处世很清廉的官僚，从人民之中接受了一些好影响，做几件叛逆本阶级的事，我看是用不着全盘否定的。这用阶级观点分析满可以说得过去，只不过使滥贴阶级标签的人感到困惑罢了。

正因为海瑞有功于农民，所以才有怨于统治集团。他几次被贬，一次几乎掉头，始终未成显官，被迫闲居达十六年之久，最后为了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影响，到古稀高龄才被起用，不久也就呜乎哀哉了。我想：这只能说海瑞在某些方面是站在农民立场说话的，否则也太冤枉了。

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

姚同志或许会问：你说海瑞是属于人民的，而皇帝却说海瑞是他的，海瑞死后被谥为忠介公，这又如何解释呢？难道人民不应该站在皇帝的反面吗？姚同志在上述那篇文章里就像得了把柄似的，很发挥了一番。不过倒要请问姚同志：我们的标准何苦去以封建阶级的标准为转移呢？他说谁坏，我们就非得说谁好不可；他说谁好，我们就非得说谁坏不可，这不容易上当吗？我们确认自己的分析方法是最科学的，我们的立场是最坚定的，那么我们自己要怎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可以怎样评价，何必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呢？其实，敌我两方面都推崇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常见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就以海瑞为例，皇帝一看自己的臣属被拉到人民那一边了，海瑞陡然一变，成了一个神话似的人物了。人民的海瑞和自

己的官僚唱了对台戏。放在明处一比较，人民的海瑞太高大了，自己的群僚也实在太污浊了。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把死去的海瑞夺回来，算在自己的名下。因为皇帝（也只有皇帝）认得真海瑞，他虽不大喜欢真海瑞，却也没什么太大的仇恨，海瑞生前已被人民神化，因此待其一死，赶紧加封，好乘机把假海瑞夺回来。他这时就忘记了当初排挤海瑞，想杀他的头了。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实际上纪念的是两个海瑞。这两个海瑞都不是真的，不过是皇帝那个比较真一些。

问题不在于皇帝怎样讲，史书怎样写。倒是我们今人该持何看法。一种是科学分析方法，一种是机械主义的方法。不分优劣，一古脑儿交给了皇帝，说这都是陛下的，我们不要了。我看这是赔本买卖。那样一来，四千年来的历史也就无一可继承了。从未见先进阶级有如此恨遗产者！也从未见不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而成为先进者！海瑞本人接受过人民的影响，史书上又夹杂着来自民间的传说，海瑞的形象就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你偏说曲折的我不继承，非要继承直接的，那么，对不住，这样的史书还不曾有过。我们大家都讲应该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和戏剧问题。姚同志说他是那样做的，我在这篇文章里也试图这样做的。但是我绝不能和姚同志得出同一结论。因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的很！不过，这在家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父亲和母亲以及来和父亲下棋的棋友都害怕起来。他们一见那标题《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生活在今天对我来讲，成了干干净净的零。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未来只有胜利，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既无胜利也无损失罢了。我要是害怕，那不十分可笑吗？

平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为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

〈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1966年4月30日，他写道：“今天的文化、哲学的发展不是人类史上进步的继续。”“哲学是只承认扬弃而不承认抛弃的。历史注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复，而反复的过程是痛苦的。”

1966年5月1日，他写道：看芭蕾舞剧《白毛女》，……就其所费的人力和所取的效果相比较，是所得甚微的。

每逢抒情就缩手缩脚……重事不重情，当今艺术之流弊。

1966年5月2日，他写道：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热爱。而且热爱宗教、遵奉宗教，决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和迫害不遵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1966年5月3日，他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1966年5月7日，他写道：目前开展美化帝王将相的运动，而毛主席的诗词中就出现了许多帝王将相，毛主席是歌颂他们呢？还是批判他们呢？今天一切都要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南，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利的，但也没有人敢提，因为这确实需要一定的魄力。

1966年5月10日，他写道：大力批判邓拓，必有更高级的人物倒了霉。

1966年5月13日，他在日记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子。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

1966年5月14日，他在日记写道：“看了受批判的电影《舞台姐妹》，正如影片中所说的（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禁演《祝福》）‘连这样的戏都不让演，还让演什么呢？’”

1966年5月22日，他在日记写道：

报刊上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革命，我是颇感触的。

一、工农兵参加论战。谁掌握报刊，谁就掌握了工农兵。工农兵批判的不是

言论本身，而是不许破坏社会主义，因此，报刊上所谓工农兵论文，现在看来是批判艰拓的，但不用掉换几个字就可以变成下一次运动批判其他人了。工农兵哲学的时代远没有到来。最大的障碍是幼而失学，现在又没有自修条件，要想在一天十多小时劳动之余，要想在民兵、会议等活动充斥之下，写出一篇文章来，那是十足的谎话。事实上，广大工农兵对这件事是不关心的。

二、……

三、争论双方：现在被批判的一方是过去代表党的。例如，邓拓是市委书记。《北京日报》是市委报刊，《前线》是市委杂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等。而开火的一方则是上海文联的姚文元、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文汇报》，即使是《解放军报》吧，也只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掘咕龠。……这么看来，要说攻击党，大概应该指那些民主党派的报纸。可是这时急急忙忙把工农兵搬出来了，如果不是确定了谁该受批判，是不肯轻易搬出这个法宝的。……内幕真复杂，只把局外人蒙在鼓里。

1966年5月23日

《解放军报》曰：政治好，业务也可以不好。……很显然，假使政治好的人反而不如私心杂念的人钻研业务时干劲足，不正说明政治的无力吗？事实上，比如说，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政治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主席著作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队败给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知道走错了路，而又不敢回头的人，必然用歪理来解释真理。

1966年5月31日

傍晚车间开会批判邓拓，老工人发言，回忆解放前痛苦生活，声泪俱下，但和邓拓毫无关系。

1966年6月3日

详读《人民日报》发表吴晗、胡适的通信，实在是一般学术问题，且有相当民族感情，可惜谬解。

1966年6月4日

市委易人……大家当然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谁也不知××、刘仁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吴德又是何许人也。看来，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会同样敲锣打鼓

的。棗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

1966年6月7日

这是给初出茅庐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礼，“群众运动”的洗礼！好一个“群众运动”！

不讲官面文章，谁也不会相信修正主义者会怕这样的大会！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

1966年6月12日

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

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做为明证。

1966年6月17日

听弟弟、又听母亲说，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李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的像新市委所云：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

1966年6月26日

读《中国散文选》，是五四诸家选本。……五四是出人才的时代，今天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没法比拟的。

1966年7月6日

工作是难耐的寂寞，幻想充满了脑际，对于我，革命的欲望是多么强烈呵！

1966年7月18日

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能够自由地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才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就不能真实地刻画一个时代的面貌。由此看来，今天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较之五四时代，真是相形见绌了。

1966年7月29日

开全厂大会，宣布中央两个文告，今后运动方向是直指当权派……所谓当权派云云，亦证明，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为什么群众行动起来？是积了多年的怨气，这次导而发之。正因为客观上解决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问题，社会才得以进步。才能出现某些大快人心的现象。可是，又因为口号提得不中肯，宫廷政变迅速，致使准备不足，而是呈现混乱状态。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

1966年8月3日

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玉鑫的大会，宋相当沉着……会上下雨了，群众多一半都找到了伞或是避雨的地方。宋挨淋，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鲁迅说：“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我同情他吗？不，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罪过，……把干群拉到敌我矛盾上来，害处多么大呵，既制服对方，又说不服自己。为此让他淋到大雨里，岂不枉哉？

1966年8月5日

近来听说“红卫兵”，亦即中学生，身穿军人服，戴领巾……都是革干子弟，今天给我们送来一张大字报，“资产阶级狗崽子”等词出现了好几处。说有人对他们行凶了。……谁敢哪？这都是流氓把戏罢了！……实在太嚣张了。

1966年8月8日

晚间开会斗宋玉鑫，但宋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种气节是值得学习的。假使他认为是对的，就死也不能说是错。革命，只能信托给有气节的人。

1966年8月31日

这个星期着力写出身方面的论文，改名为《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这几天所以搁笔，是因为毛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过分攻击红卫兵的话只得不说了。

1966年8月22日

听说红卫兵把王府井各个铺面全改名字了。现在市内叫东方红的大街不下五

条，叫红旗的铺面不下五十个。一切能引起旧的回忆的东西，统统消灭了，但新的东西又是这么贫乏，因此只好有五十多面红旗了！

1966年8月23日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了墙壁，门面字号全砸了。荣宝斋遭到最大的浩劫。还有人声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我又看了青年会(基督教)也站满了红卫兵，大改了模样。

据说红卫兵砸人的家，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别人的像，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1966年8月26日

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不说了。

1966年9月×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释放回家。小屋浩劫一空，破破杂杂，收拾干净，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75页，并记了笔记。壁上鲁迅的笔墨不禁使我扪心自问：难道，人们就此屈服了吗？回答是：不。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66年8月28日中午，遇罗克把妹妹喊到自己的小屋，指着床上堆着的东西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想把这些不必保留的日记、文稿、笔记都烧掉。在烧之前，真希望有个人能了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他又拿起一本蓝皮的“北京日记”，接着说：“这本日记，记的是我今年以来的思想，是我一生中最为成熟的一段思想，说什么也舍不得烧。你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过了抄家风就拿回来。”

妹妹答应了。第二天一早，她把哥哥的日记夹在自己的日记本中，出外寻觅存放的地方，可是，在当时的一片“红色恐怖”之下，哪有个安全处所啊！天快黑时，她才把东西暂且先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一个厕所里，不料第二天就被发现了。这些日记，被当做“变天账”出现在“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接着，又成了遇罗克的反革命罪证。

1967年4月13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点名批判了《出身论》。

4、5月间，他五次上书毛主席，表示：戚本禹“在4·14的会上说我（一个普通的学徒工）写的《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我不同意”。他汇报了《出身论》的主要论点，申明“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就是自己，表示还希望向中央系统汇报写这篇文章的大量依据和情况。

5月8日他在给弟弟罗文的信中说：“只恐血统论根除旷日，革命前途受挫，多少青年不能发挥积极性，终成我国隐患！诚可痛矣！”

一次，他与一群人辩论了一下午。他对家人说：“有了今天的锻炼，我以后不会叛变了。”也有好心的朋友劝遇罗克低头认个错，遇罗克回答：“我不能背弃自己的信念。……我的小市民家庭算得了什么，我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即使为此而进了监狱，若干年后也总会有人回忆起。”

他对《中学文革报》的女同学小陶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面毕竟是多的。

他在一份材料中还写道：“我是准备将自己的一生全部投入到最后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去的，这个志向我是很坚定的。”“我热爱党，是因为她解放了千百万被压迫的人民……我向往党所领导的战争年代。”

（三）遇罗克涉嫌刑事案件

当时北京市正发生一个散发传单的“黑旗军”案，遇罗克被列入“嫌疑对象”，但侦破结果，此案与遇罗克无关。接着又把对遇罗克的调查重点转到《出身论》问题上来，怀疑“研究出身问题的小组”是否构成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

1967年的冬天，遇罗克已感到危险临近了。他在给广东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

“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事，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的。即使将来会大白于天下，目前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损失了。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分配工作，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

他在给广东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

到底是失败)。” “我相信这个问题终久是会解决的，把一部份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份人的侮辱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也是维持不住的。”

1967年10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局长刘××对遇罗克案就作了两条指示：1. 中学红代会批判《出身论》，还是请红代会照旧批判；2. 批判后怎么办，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好好研究。

1967年10月20日，在一份《向刘××局长汇报时的指示》中说，要“发动群众破案”，认为“破案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位局长还说，遇罗克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典型的案件”。认为《出身论》是“在破坏瓦解我们的阵营，动摇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在争夺青年一代组织他们的反革命队伍”。并说遇罗克案“是一个胡风式的反革命集团，是陶铸式的人物”。对如何整理遇罗克的材料，他说：“把他的反动日记、信件和活动提出来，上网。可按毛主席编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办法来写。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来。”

1967年底，他写道，血统论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的抗议、强烈的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尽了历史必然规律性所负（赋）予我的任务，或者说由于主观的努力，比别的人先走了一步。即使我不做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人做的。” “这些文章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翻印的估计有一百万份以上，不知影响了多少人。“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 “假使我不是把生命置之不顾，我就绝不能写出这样的任何一篇来。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做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 “这就是战斗。任何惩罚是压不倒那些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

一天深夜，他对几个年轻伙伴说：“我早就想好了，第一我永远不会背叛祖国；第二我永远不会自杀，什么时候你们听说我自杀了，那准是谣言；第三我绝不会承认我是反革命，我永远说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1967年12月30日，公安部李×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即

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

1968年1月1日，谢富治批了“同意”两个字。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逮捕入狱。

1月5日对遇罗克进行第一次审讯。当审讯人员问遇罗克“有什么问题”时，遇罗克说：“我不知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当审讯人员说“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遇罗克说：“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当追问到《中学文革报》时，遇罗克说：“如毛主席知道我写《出身论》这件事，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从1月9日到1月16日，几乎每天都进行审讯。集中追查他的“反动日记”和“反革命小集团”。

关于日记问题

遇罗克说：“日记写时有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不和写文章一样，没有经过推敲。”当审讯人员说他日记内容反动时，他断然回答：“不反动。”“我这本日记由头到尾看，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

关于小集团问题

审讯人员追问“反革命小集团”，遇罗克回答：“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

关于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

审讯中，遇罗克回答说：“我认为《海瑞罢官》不是影射某某人。”“我也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预审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遇罗克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我希望政府实事求是。”

我“攻击过陈伯达”，“认为他是左倾教条主义”。

预审人员指责他，说他攻击戚本禹，实际上是攻击中央文革。遇罗克说：“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戚本禹是代表中央文革。”

审讯人员指控他攻击江青；他称“高炬”（江青化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高炬”。

遇罗克回答：“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

关于私藏武器问题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1967 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的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就这样被公安局盯上了。最后死刑判决书上写的也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详情请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徐晓、丁东、徐友渔编）

另一种说：我开始是因为年龄小，被“群众专政”，后来发现我有两颗上东北串联时带回的手榴弹，那时我是好奇，就没给上交也没扔了，后来有的人顶不住压力把这事说了出来，性质就升级了，怀疑我要有武装行为，一点点给我施加压力：从传讯到拘留一直到逮捕。当时我哥哥也给我说过，这种压力一步步升级，也是一种战术，让你越来越恐怖，这时就看谁能坚持得住了。他们当然很想让我说这手榴弹和我哥哥有关系，但我不能说，我一口咬定我哥哥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因为我清楚：这事搁我身上，最多判三年，但如果牵连到我哥哥，恐怕就要判十年二十年了。（遇罗文）

关于企图进行暗杀活动问题

判决书说遇罗克“扬言进行暗杀活动”。

遇罗克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他断然否认这件事，说“这是没有的事”，“我始终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的”。

苏双碧说：既然是“扬言”，也就没有构成该杀的罪行，这一点，审判人员自然也明白，他们“取证”了几份材料，说法也并不一，不足以为证。

有人说，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主席。有人说遇罗克的言论惹了大祸，这是对的。遇罗克的反革命言论直接改变了手榴弹这个物证的性质。遇罗克公开发表反政府言论，再加上私藏手榴弹也是违法。（网文）

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死刑号，他还是那样。直到六九年的时候还是定不了遇罗克的罪。

遇罗克材料中的判决书，概括起来有这样三条：一是“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书写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动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

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据此，“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下署“1970年3月5日”。

从这个判决书来看，三条罪名是：第一，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二，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第三，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其中没有一条是涉及《出身论》有关文章的问题。

遇罗文说：我就说这事太冤枉了，说他要暗杀毛泽东什么的，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暗杀？

宋永毅说：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以“企图暗杀毛主席”的完全莫须有的罪名枪杀。

总之，遇罗克是以“企图暗杀毛主席”的罪名，判处死刑的。1970年3月4日，遇罗克被执行死刑。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

二、研究资料

一九九九年第六月，苏双碧：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20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

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

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冤案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狱不昭雪就不足以快

人心。”没有想到这几句话又引出一桩公案。就在为《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发表后几天的一个晚上，一位老太太冒着呼啸的寒风走到我的家门。在问准我的姓名之后，她说：“你文章中说，凡是和姚文元《评新编》有关的冤案都要平反，那么，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老百姓你管不管，我的儿子就是和这个冤案有关被杀害的，你管不管？”说着，声泪俱下，话音哽咽。她叫王秋林，是遇罗克的母亲。我一下被问住了，和《海瑞罢官》案有关而被杀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况且，遇罗克能不能平反具体应由公安局来做。不过，作为一名记者，我只能伸张正义，替受害者鸣冤，并努力去促成这个冤案的平反。于是，我说：“根据党的政策，有错必纠。如果你儿子被杀果真是个冤案，也应该平反。”我记得很清楚，她听到我的话之后，她经受委屈、迫害到已经有点木然的眼神，突然闪出一缕微微的光芒。看来，她多么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啊！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我，希望我能替她儿子伸冤。信的内容很简单，记得是写了如下几点：

1. 她儿子遇罗克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因为写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点名批驳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谬论，即被当成反革命抓走

2. 遇罗克写过《出身论》是为反对当时盛极一时的血统论的，绝不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3. 她儿子被杀是冤案，要求为她儿子平反，还她儿子和受株连的家人一个清白。

信不长，只有三四百字，但字迹清秀工整。后来才知道，王秋林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曾经当选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全国妇代会代表，1957年反右派时因替一个“右派”辩护，被划成右派。而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原在水电部任工程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成“右派”。从此，这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变化，遇罗克兄妹都成了“右派”的子女。

我送走王秋林老太太之后，重读她留下的这封短信，心情沉重，竟然翻滚了一个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我向领导汇报后，并经领导批准，以记者身份携带《光明日报》介绍信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在他们热情的帮助下，下午四点钟，我来到了保存遇罗克全部档案的北京市中级法院。法院的工作人员把我带进一个存放“文革”中案件材料的办公室，办公桌和地上都铺满厚厚的一层灰尘，看起来已经好久无人接触这些材料了。他指着墙角的一大堆材料说：“这些都是有关遇

罗克的档案，够你看的。”说着，他帮我把这些材料搬到一台乒乓球桌旁边，一共 24 卷，堆在一起差不多有桌子那么高。

面对着这么多材料，我有点发怵。这么多材料，从何人手？同时，我又感到这么多材料足可以揭开遇罗克案子的秘密了，我倒显得有点兴奋了。赶在五点下班前，我草草地翻开了一些审讯记录、死者的日记、诗词、口供，以及侦破计划，最后的判决书等等。我认定这是个冤案，材料很典型，必须下工夫弄它个水落石出。第二天，我约请我的同事张义德、赵少平二位，又来到了中级人民法院。从此三人看了整整两天材料，才把材料看完，并对《出身论》以及遇罗克其他文章、日记、诗词、审讯记录作了一些必要的摘录。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认为遇罗克是被错杀的冤案，便以《光明日报》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说明派记者研究了全部档案材料，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为遇罗克平反。北京市公安局为遇罗克的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遇罗克是怎样被错杀的呢？

《出身论》触犯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遇罗克的《出身论》大约写于 1966 年冬季，文革初期曾经流传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这个论调曾经支配着一个时期的红卫兵运动。遇罗克为反对这种血统论，而撰写了《出身论》。这篇文章在《中学文革报》刊登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文章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在血统论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惟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着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可知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为了批判反动的血统论，是为了纠正当时的一种错误理论而造成的社会混乱。而这种错误理论却是来源于“左”的思潮在用人制度上的惟成份论。“文革”初期，全国青年何止千百万人背着“黑五类”的黑锅，从心灵到肉体遭到摧残。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便无法安定。遇罗克是怀着对国家对民族忠诚的愿望来写《出身论》的。

据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勉的回忆，《出身论》最早是由遇罗文在广州印刷的，并带回一部份到北京，随后在北京解放军报印刷厂印了三万份。报纸出来后，一抢而空，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加上传抄、复印，《出身论》流传非常广泛。每天都有大量信件从全国各地寄到北京，寄到遇罗克手中。不可一世的“四人帮”一伙，此时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的一篇文章吓呆了，中央文革成员戚

本禹于1967年4月13日点名批判了《出身论》，诬陷《出身论》是反动的。从此，遇罗克的行动就不自由了，出门时经常有人盯梢。而且这种监视、盯梢越来越严重。当时北京市正发生一个散发传单的“黑旗军”案，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把遇罗克列入“嫌疑对象”，但侦破结果，此案与遇罗克无关。但盯梢并没有放松，而是把对遇罗克迫害的重点又转到《出身论》上来，并把一个研究出身问题的小组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欲把遇罗克致于死地而后快。到1967年的冬天，遇罗克已感到“四人帮”一伙对他的迫害正在加紧步伐。他在给广东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经过一段磨练，他对有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他在信中说：“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事，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的。即使将来会大白于天下，目前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损失了。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分配工作，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他在给广东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心情非常沉重地写道：“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在“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年代，他已意识到，凭他所坚持的真理是无法抗衡这股恶势力的，他预感到：“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是失败）。”但他认为就社会历史进程来说，他不相信历史就会这样写下去，他信中说：“我相信这个问题终久是会解决的，把一部份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份人的侮辱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也是维持不住的。”

上面两封信是他被捕之前不久给朋友写的，说明他对当时的处境和形势已有充份认识和思想准备了。

当然，遇罗克的判断是对的，这时“四人帮”一伙，已经磨刀霍霍，正在制订逮捕和加害遇罗克的计划。1967年10月20日，在一份《向刘××局长汇报时的指示》中说，要“发动群众破案”，认为“破案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位局长还说，遇罗克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典型的案件”。认为《出身论》是“在破坏瓦解我们的阵营，动摇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在争夺青年一代组织他们的反革命队伍”。并说遇罗克案“是一个胡风式的反革命集团，是陶铸

式的人物”。对如何整理遇罗克的材料，他说：“把他的反动日记、信件和活动提出来，上网。可按毛主席编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办法来写。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来。”可见，对遇罗克的迫害，一开始就被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所重视，被上层所重视。对遇罗克定罪的调子，是在逮捕遇罗克前就定好的。这样，材料编写时可以上网，可以捕风捉影，不管搜集到什么材料，都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从这个“指示”看，“四人帮”一伙，确实对《出身论》怕得要命，一位善良的青年只不过写了一篇有见解的《出身论》，就被他们当成一个大案来抓。

在这之前，10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另一位局长刘××对遇罗克案就作了两条指示：1. 中学红代会批判《出身论》，还是请红代会照旧批判；2. 批判后怎么办，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好好研究。可见，当时对遇罗克所注意的仍然是《出身论》，至于如何处理遇罗克，“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作出决定，并不是由遇罗克本身是否有罪作出判断。在他们看来因为写《出身论》就铸成了他的“罪过”，这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了。

12月30日，公安部李×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即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了“同意”两个字。就这样，遇罗克被逮捕入狱。

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遇罗克起而迎战，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批驳了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歪曲和诬蔑。接着他又写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1966年2月13日，《文汇报》把它作为反面文章刊出。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遇罗克似乎很早就预感到，他对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一帮人，大多进行尖锐的批驳。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批驳姚文元，他除在报上写文章公开批判姚文元外，在日记中对姚文元在理论上的错误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1966年1月2日，他写了一篇《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姚文元“认为历史上无清官”的“机械主义观点”。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尽管《文汇报》把我的文章当成“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

了”，但他认为他是“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他为自己敢“全盘否定姚文元”感到自豪。在这一天日记的最后他写道：“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焚’，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而在5月13日的日记则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子。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这篇日记充满着对姚文元的蔑视，和对“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们任意愚弄群众的极度不满。

遇罗克被捕后，日记落到“四人帮”一伙手中。“四人帮”的审讯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并说：“当时就是要宣布《海瑞罢官》死刑，姚文元是革命左派，你不仅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且攻击姚文元。”遇罗克回答说：“我认为《海瑞罢官》不是影射某某人。”“我也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预审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遇罗克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我希望政府实事求是。”

在“文革”初期中另一个风云人物陈伯达，遇罗克对他也大不以为然。他读了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之后，写了这样一段话，读了此书“始知蒋何以从流氓爬上总统的高阶。蒋用两面手法，杀人行不义而为一己之私，实乃独夫也”。“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能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当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难哉！”打着批判资产阶级的旗号，宣扬封建主义，在当时盛极一时，陈伯达的言论显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林彪断章取义的语录本，同样是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行割裂毛泽东思想的行为。由于现代迷信盛行，社会上对领袖人物无原则的颂扬，成了风气，所以，遇罗克认为陈伯达的错误是“最起码的”，比起有些人来，也不过如此。

遇罗克这段话，本来是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但在被捕以后，这也成了一条大罪状。当预审员要他交代这个“罪行”时，他毫不隐讳地说：我“攻击过陈伯

达”，“认为他是左倾教条主义”。预审人员指责他，说他攻击戚本禹，实际上是攻击中央文革。遇罗克断然拒绝这种指控，他说：“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戚本禹是代表中央文革。”审讯人员指控他攻击江青时，遇罗克毫不掩饰地回答：“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从这些答话，可以看出遇罗克是敢作敢当的，他并不回避事实。而对那些无中生有的陷害，诸如什么遇罗克要仿效张良行凶等等罪名，遇罗克痛斥“四人帮”爪牙：“这是什么时代，怎么不实事求是呢？”

遇罗克在短暂的一生中，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探索，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他都有宽广的视野，有独到的建树。在“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过份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他对当时扭曲了的文化现实，指出：“今天的文化、哲学的发展不是人类史上进步的继续。”对当时的文化流弊，他痛苦地写道：“哲学只承认扬弃而不承认抛弃。历史注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复，而反复的过程是痛苦的。”当他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之后，颇有感慨地写道：“就其所费的人力和所取的效果相比较，是所得甚微的。”其原因是“重事不重情”，这是“当今艺术之流弊”。而对当时报上号召对毛主席要“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他反对这样的提法，认为这是“把真理当成宗教”。

综观遇罗克当时对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江青的某些言论的批评，以及当时他对经济、文化现状的一些批评，都是理智的、有远见的，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并不是什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多次拒绝“四人帮”一伙的无端指责。

为反对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献出短暂的一生~}

1970年3月4日，遇罗克在这一天被“四人帮”一伙杀害，成了因反对“四人帮”一伙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殉难者。遇罗克究竟犯了什么罪，非杀不可？笔者从遇罗克的有关材料中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觉得他的“罪行”都是上纲上上去的，全部记录构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冤案。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一个善于思考无罪可言的青年，竟成了“四人帮”的刀下鬼。那么，“四人帮”是以什么给遇罗克定罪呢？留在遇罗克材料中的判决书，概括起来有这样三条：一是“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书写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

产阶级司令部”；二是“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动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据此，“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下署“1970年3月5日”。

从这个判决书可以清楚地看到，通篇都是大帽子，是上纲上线的言词，并没有半点能构成犯罪的具体内容。至于气焰嚣张，态度的好坏本应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遇罗克的确不愧为一位坚持真理的战士。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样给遇罗克罗织罪名的。

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准逮捕遇罗克。1月5日对遇罗克进行第一次审讯。当审讯人员问遇罗克“有什么问题”时，遇罗克说：“我不知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当审讯人员说“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遇罗克说：“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当追问到《中学文革报》时，遇罗克说：“如毛主席知道我写《出身论》这件事，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这是第一次审讯，遇罗克心地坦然，并没有意识到他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随后从1月9日到1月16日，几乎每天都进行审讯。集中追查他的“反动日记”和“反革命小集团”。遇罗克有写日记的习惯，当他被跟踪、盯梢，处境危险时，他因为在日记中了许多人和事，怕自己说不清楚，也怕拖累别人，就都烧掉了。他只留下一本，托他妹妹遇罗锦保管。遇罗锦知道这本日记的重要性，曾东移西藏过，总感到不安全。最后转移到中山公园的公厕里，不幸，却被清洁工人发现了，最终落到审讯人员的手里。因为日记中确实攻击过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江青等中央文革要员，成了他们对遇罗克定罪的绝好证据，所以穷追不舍。遇罗克当然也明白日记已落入他们手中，他作了说明：“日记写时有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不和写文章一样，没有经过推敲。”当审讯人员说他日记内容反动时，他断然回答：“不反动。”“我这本日记由头到尾看，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遇罗克的争辩是无济于事的，最终还是以“反动日记”当作杀害遇罗克的罪状之一。接着审讯人员穷追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对此，遇罗克针锋相

对地回答：“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当审讯人员强加于罪时，遇罗克愤怒地指出：“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这本来是光明磊落的保证，但“四人帮”一伙既要置遇罗克于死地，黑白可以颠倒，有无也可以更替。“四人帮”一伙气急败坏地说：“只要你不投降，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这已经是定论。”

“四人帮”一伙对遇罗克一案，既不实事求是，也从来不听取遇罗克的任何申诉。他们指责遇罗克说过“如果日本能使中国工业化，有什么不可（指中日邦交）”这样的话，并因破口大骂遇罗克：“是反动，是卖国贼，叛徒！”遇罗克拒绝对他的诬蔑，说“这样的材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连影子也没有”。“四人帮”一伙竟然凶相毕露地叫嚷：“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给你定罪。”遇罗克说：“我不承认”，你们“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其实，事实不事实“四人帮”一伙已无所谓，不是事实也照样可以定“罪”。他们声称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既然遇罗克的“罪行”是用“思想”看穿的，也就不需要为一条材料是否事实进行争辩了。

至于判决书说的“扬言进行暗杀活动”，既然是“扬言”，也就没有构成该杀的罪行，这一点，审判人员自然也明白，他们“取证”了几份材料，说法也并不一，不足以为证。遇罗克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他断然否认这件事，说“这是没有的事”，“我始终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的”。

遇罗克确实没有估计到，就凭几条“莫须有”的材料，就会把他杀了。这是他对“四人帮”一伙的凶残估计不足。后来他听到审讯人员骂他是“死反革命”时，他才意识到“四人帮”一伙已对他露出“杀机”。当即给“四人帮”一伙写了一封信，要求“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他说：“我感到问题相当严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死反革命’。”这种最坦诚、最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遇罗克就这样被判处了死刑。~

当遇罗克预感到“四人帮”一伙就要对他下毒手时，他并不感到畏惧。他惟一感到遗憾的是，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读书计划上，还有几部哲学著作没有读完；在写作计划中，长篇《工资论》，还有待于修改；与朋友探讨的社会问题，还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而且，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极“左”思潮还在泛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伙还在横行……他只有把未竟

的事业，寄托于朋友，寄托于未来。

至于个人，死何足惜。他喜欢历史，历史上的无数先烈就是用头颅和热血开拓了社会前进的道路。他从容不迫，他潇洒自如，写下了临终的诗篇。他在《纪行》一诗中写到：“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充份反映出他是抱着为真理献身的激昂心情，而在《赠友人》一诗中则写下了“遗业艰难赖众英”，“乾坤持重我头轻”的不朽的诗句，坚信未竟的事业会有“众英”来完成，他所思虑的是社会、是祖国，至于个人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显示出一个思想解放先驱的胆识和英雄气概。

{□ 原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6期~}

遇罗文：关于《出身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65中上高一，那时我哥哥已经参加工作，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学徒工，在这之前，他在大兴县的红星农场当农工。小的时候对哥哥的记忆，就是他特别精力旺盛，也特别聪明。在家时，他会搞些恶作剧，编鬼故事吓唬人。我的姥姥很讲迷信，比如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不能吃荤了，但是他反对迷信，他就偷偷往菜里加点猪油。当时我们的家境特别困难，兄弟姐妹四个基本靠母亲的工资维持。他当农工时，工资只有二三十元，自己没有任何额外开销，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讲穿戴，几乎全部拿给家里，母亲说，你总得自己留点钱呀，每月给他留几块钱，而他唯一的花销，就是买书。后来他回到城里上班了，原来他在农村时怎么读书，我不太了解，到那时我才知道，他实在是太用功了。他到首都图书馆办了一个借书证，他和图书馆的关系特别好，办了一个集体阅览证，每次能借100本书的。我跟他到图书馆一起去借过书，他都借的是那种大部头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书。当时我看着他借的一摞摞的大部头书，觉得简直是永远也看不完的。

关于我哥哥写的最有名的文章《出身论》的前后，在这件事上我最有发言权，因为登载《出身论》的那张报纸是我办的，就是《中学文革报》。他是在报纸办起来以前就写出文章了，写的原因，就是看到在文革中因为出身问题造成的大量惨剧。许多人被活活地打死。他写完文章时，我和我弟弟正在广东串联，他当时写信给我说：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文章给我印出来？在当时的条件下，个人印东西

是很难的，当时只能油印，但是一套油印机又很贵，我们买不起。我到了广州，发现他们那里搞油印是用一种非常简便的方法，就是把蜡纸刻好蜡版以后，铺在纸上，只用一块木板夹着一条蘸了油墨的橡胶，就这么一刮就印出一张。发现这个方法以后，我马上写信告诉他说我能给你印，这样他就把写好的原稿给我寄了过来。这样我们就印了几百份，印好的一部份给他寄回北京，一部份就在广州街头贴了出来，想看看反映。结果当时就很轰动。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这种印刷方法介绍给我哥哥，他又用自己的工资买了很多纸，又印了不少，当时我在学校里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叫“北斗星战斗队”，我们又在北京的大街上贴了不少。当时我们就有四中的两个同学牟志京和王建复加入进来。牟志京是在街头的电线杆上看了贴的《出身论》后非常佩服，找上来的。他们俩找到我商量，说能不能办一个铅印的报纸，我当然很赞成。我们是和四中借的500元钱出的第一期。第一期印了3万份，《出身论》就登在这期上，卖2分钱一份，在街上一抢而光，又加印了6万份。以后我们又接着一共出了六期，每期都是靠上期卖报的钱来运转了。当时我们几个人我负责组稿、卖报；王建复主要是组织和财务工作；牟志京主要是编稿。这六期报纸，每一期的主要文章都是我哥哥写的，一些小文章也是他组的稿，或者他编的，他有时充当正反两方面的角色，在报纸上展开辩论。这份报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极大，读者来的信都是成麻袋成麻袋的，邮局都送不过来，得我们自己去取。有许多人在信中夹了钱要买报纸，我们就得给人家寄，工作非常忙。人手也增加到十来个。这期间，《红旗》杂志社的人也来找我们，慢慢也知道了文章是谁写的了，他们有一天就对我们的人说：这篇文章我们认为有问题，你们最好还是转转方向。当时我们的压力就很大了。而且那些红卫兵“联动”也捣乱，常常找到印刷厂去抢去砸，有一期报纸我们不得不跑到天津去印的。这种情况下有一部份人就撤了，但我们还是坚定地坚持，一直到第六期出来以后，“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点名说：《出身论》是大毒草，这时我们不得不停刊了。前前后后，从1月18日到4月14日，出六期报纸共印了40万份。我哥哥的主要东西都在这六期上。

恶运开始

在《中学文革报》之后，我哥哥还写了一些东西。其中有《工资论》，这是一篇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他已经在考虑改革中国的工资制度问题，他还有一个计

划，想把文革中那些惨无人道的事情收集起来，论述其中的剥夺人权不讲人性的东西。他还想写过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犯过错误的人，在中国当时是这种情况，如果你犯过一次错误，很可能你终生都会被打入另册，一辈子的前途也就完了，他想写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人可能比血统论涉及的人还要广。

但是这个时候风声已经很紧了。第一个征兆是我哥哥发现有人跟踪他。但是他并不怕，他还很乐观，因为他觉得他没做什么坏事。他对我说，有时候他还会迎着跟踪者上去问：你是找谁谁吗？他往哪哪去了！有一次，我们两人去东四人民市场，发现有两个女的跟踪，他就和我忽然就藏在一个柱子后面。那两个人不知道，还在往前走，他突然就出来问：你们找谁呢？那两人赶紧就走掉了。我哥就说：“你看多可笑，就这水平还跟着我！你别看我怎么跟他们逗，他们回去也不敢说，一说不是丢他们自己的脸吗？”那时候我们都没把这事看得多严重，总觉得我们干的事是光明正大的。我们所有的观点都在报纸上，你们都看得到的，没干什么偷偷摸摸的事。

没想到，到了1968年的1月5日，我哥哥被捕了，我是被“群众专政”，是被学校看管起来，到了三月份，也进了监狱。这个案子牵连了很多人。因为我们的报纸读者来信很多，有写得特别长很有水平的信，我哥哥都是亲笔回，也写得非常长，这样，就被怀疑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在外地的这些人也都被牵连进去，我记得有安徽的丁广武、沈阳的孙刚、广东的杨玉鉴、银川的云杰等，都被判了十几年的刑。我开始是因为年龄小，被“群众专政”，后来发现我有两颗上东北串联时带回的手榴弹，那时我是好奇，就没给上交也没扔了，后来有的人顶不住压力把这事说了出来，性质就升级了，怀疑我要有武装行为，一点点给我施加压力：从传讯到拘留一直到逮捕。当时我哥哥也给我说过，这种压力一步步升级，也是一种战术，让你越来越恐怖，这时就看谁能坚持得住了。他们当然很想让我说这手榴弹和我哥哥有关系，但我不能说，我一口咬定我哥哥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因为我清楚：这事搁我身上，最多判三年，但如果牵连到我哥哥，恐怕就要判十年二十年了。

在我被捕后，我们家曾经托人打听过，内部定的是给我判三年，我哥哥五年。但是我最后也没被判，转到一个少管所办的“学习班”，跟我在一个“学习班”里的什么人都有：有写反动标语的、当红卫兵“联动”打死人的、投敌叛国的、

“五·一六分子”等等。三个月后，我就放出来了。可是我哥哥却没能出来。

在我和哥哥被抓起来不久，我母亲和我弟弟也被“群众专政”。这种“群众专政”就是不关进公安局，而是由本单位来看管，同样没有人身自由，每天要劳动、交待问题。我被群众专政时，还没有受太大的罪，但是与我们一起办报的唯一一个大学生，名叫郝治，他受的罪就大了。他被关了一年，其中前半年每天只能吃到6两窝头和一点咸菜，关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屋里，每天都要被毒打一顿。到了半年的时候，他1米8的个子只剩下90斤的重量了，他到了这个时候，他觉得他已经不能有活的可能了，就宣布绝食。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就几乎要死了，这样关他的人才同意不打他，也允许他可以出屋子了。这时他才发现，他的棉袄已经被凝成了一个血壳。半年里他一直睡在水泥地的草帘子上，等到半年后出来时，一甩草帘子，是一层的臭虫。他的胡子有半尺多长，也被血凝在一起。他又被关了半年才放，他放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我家去慰问我妈。

我的弟弟是被“群众专政”了两个月后放回家的。那时我父亲在外地找了一份临时工，母亲还在被群众专政，我们都在监狱，我的姐姐遇罗锦在茶淀被劳动教养。我弟弟进了家门，看到屋里一片狼籍，所有的东西都蒙着厚厚一层土，米面已经长了虫。我弟弟先去看我母亲，我母亲被剃了阴阳头，正在监督劳动，见到我弟弟悲喜交加，说：我不要紧，这里能在食堂吃饭，饿不着，还是先去想法给你哥哥姐姐送点东西吧！我弟弟想给我们送东西，但那时我们都没被判刑，不让见面，也不能送吃的。他又去茶淀看我姐姐。临走在家里翻了很久，只找到了两元钱，也买不了什么吃的，只能把家里的面粉挑去虫子，炒了些炒面带去。到了茶淀，又费了很多口舌才被允许见到遇罗锦，一见面，姐弟俩就抱头痛哭。

当天晚上我弟弟住在了农场，但是农场规定亲属探望一月只能一次。这样，我弟弟就第二天一大早站在路边等，希望能再看到姐姐一面。上工的队伍过来了，终于，我姐姐看到了弟弟在招手，她一下子就哭了。我弟弟在回去的路上，到火车站要走十几里路，他来是走来的，回去还要走回去，这一路，他是一直哭着回去的。他那时是上初三，只是个十六七的孩子啊！

我从监狱放出来后，就去陕北插队了，后来我弟弟也来这里和我在一起。真正听到我哥哥的死讯是在陕北。我万没想到他会被判那么重。我记得我出来的时候，那个军代表还说，你看，你就出来了，你还不给你哥写封信，让他加强思想

改造，争取也早点放出来。我就真写了，那会儿觉得希望还是很大的。记得那年，就是在 1970 年春节时，我和弟弟、姐姐都从外地回到北京过年，这也是很难得的我们一家人又聚在一起。可是当时街道的人看见了就紧张起来，问：你们怎么忽然都回北京了？是不是想闹事啊？非得让我们回去，不许在这里多呆。我们怕他们再通知我们插队的地方，那样以后我们的处境可能会更不好，就只有回去了。临走前，姐弟三人照了张像，也不知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正是我哥哥要宣判，我父亲就和我们约定好暗语，写信以“霞”来指我哥哥，如果是最不好的消息，就是“霞走了”。没想到回到陕北不久，就接到父亲“霞走了”的信。当时怎么也不能相信，就在前不久回北京时，还有一个警察来我家调查过他的事，问我们对遇罗克的事有什么想法，我就说这事太冤枉了，说他要暗杀毛泽东什么的，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暗杀？这人也没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把我说的都记下来了，说向上汇报。我真以为我说的能有点什么作用呢！

后来我才知道，在公安局的人来宣布我哥哥死刑的消息时，当时我父亲一下子就哭了，人也坐到了地上，受不了了。而那些人并不同情你，还说哭什么？你们应该划清界限！可我母亲非常坚强，她就是不哭。她就是说，你不要当着他们哭！在她死了以后，我们看了她的日记才知道她受的打击有多大。她是因气管炎肺心病死的，最后一次发病，正是在我哥哥的生日那天，她想起了我哥哥，在日记里写了。宣判我哥哥的工人体育场，她从来不往那去。就是那天她犯病后，住进医院就再也没出来。

关于宽恕

1979 年，在为我哥哥平反时，公安局的人问我父母：有什么要求？我父母没提任何经济上的要求，只是说，你们把罗文给我们弄回来——那时，我因为哥哥的牵连，又第二次进了监狱。

我从东北监狱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公安局说安排很困难。这样最后我对他们说，能不能进我哥哥呆过的人民机器厂？他们说，只要你愿意，当然可以，这样，我进了人民机器厂，这个厂后来对我很好。后来，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中，我下了海，现在在一个公司里任总工程师。这些年，有一些当年曾经对我不起的人托人找我，比如当年检举我藏手榴弹的人，对我实行“群众专政”的“专案组”的人，请求我的原谅。比如当过我的“专案组”的同学，现

在美国，打听到我的电话后，从美国打电话给我，首先就是请我原谅，我毫不犹豫就原谅了。可能我回答的太快了，出乎他的意外，他觉得我可能在敷衍他，就说：“我希望你能认真地说这句话。我觉得我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坏事，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整人……”我觉得他们当时那么做也是本能的，上面要他们怎么干，他们就努力去干，但他们没有是更恶的那种，人家没让他去打人，他们却以打人整人为乐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可以原谅他。无知造成的错误，我可以原谅，我不能原谅的是人品质上坏的那种人。真正能忏悔的人，是有勇气的人。

我记得我哥哥当年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有一个人拿棍子打你，你想还击，你是打这个人，还是打这个棍子？对于一个个具体迫害我们的人，我不恨，他们也不值得我恨，有的时候，有些人并不是对我们不好，他们是对那些打入另册的、比如“黑五类”这样的人同样是很残忍，他们同样值得恨。其实任何社会都有这样的人，只是这个社会当时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要是恨，只能说恨给这些人机会的人，制定这种政策的人。如果还有这种政策，就还会冒出一大批这样干坏事的人。

2007 年 9 月 13 日初稿

2011 年 8 月 24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3）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三节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本节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接见新疆革命造反派代表讲话纪要

〔时间：晨 3：45 至 7：00〕

总理：你们冲进过新疆军区，没有引起什么问题，这很好。现在新疆军区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停了，这是中央的决定。应该以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不要被苏修利用。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只要我们的军队在，敌人是不会翻天的。不要这也怀疑那也怀疑的，毛主席有这样的信心，对你们这样信任。你们应该对中央军委有起码的信任，第一，新疆要把军队稳住，新疆这么多问题，先抽出一条来，什么应爱护？解放军嘛！

（群众谈到对区党委军区党委领导和兵团党委的看法时）

总理：人可以改造嘛！你们不能把持自治党委？应该给他们改造的时间，不要把他們看死了。人是可以改造的嘛！你们不能把自治区党委，军区领导一脚踢开，都要中央派人去管，让他们就地改造嘛！

我们的军队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只要我们的军队在，就好办了。你们对军区要有信心嘛！你们不能拿一件事来看大体嘛！我们发动大家，就是发扬大民主，“破旧立新”。但如果把每件事都看得不得了，那怎么行。对于过去有错误的组织，应该允许他们改嘛！中央下达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命令，他们要立即改变态度的嘛！只要相信军委，就要相信司令部，事实证明你们要夺权，军队不是三百人保卫你们吗？党和毛主席在军队中享有绝对的威信，只要有反对毛主席的人，不用你们砸他的狗头，他们自己会砸。你们怀疑新疆搞政变，多少人到新疆也没有把新疆拖跑。现在新疆有强大的国防工业，巩固的边防。这些你们应该好好想想。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嘛！

（群众汇报兵团，党委盗用中央名义，篡改中央电文时）

总理：你们留一两个可靠的左派组织，一两个联络站，有中央可靠消息时，我们直接和你们联络站联系。

（谈到革命造反大联合时。）

总理：你们要团结，不要有一个观点不同就分裂，左派一般在困难时期容易联合，在胜利时期容易分裂。只要大前提一致，都应该团结。

（谈到夺权时）

总理：夺权斗争，我很支持你们。

（夺权后不要党委公章）。

总理：不要用党委公章，还是用自己造反团的章子。夺了权可以成立夺权小组，夺权委员会，章子自己刻一个就可以。

（夺权后是不是要把武器掌握在造反派手里）。

总理：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了，再夺权，缴获武器，暂时封起来稳定，以后再作处理。

（夺权后，上级文件发下来应给谁？）

总理：上级文件发至夺权委员会。

（秘密文件应该怎样保管？）

总理：非常秘密的文件指定非常可靠的左派过问，一般的就不必要。

（兵团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怎样搞法？）

总理：搞比较对，已经搞了嘛！这样才可以把群众发动起来，兵团文化大革命除持枪单位外，按一般学校一般农垦区搞，但要和边境分开，边境农场不串连，这个问题可以商量。

（关于石河子问题，即“一·二五”血案）。

总理：关于石河子死伤人的问题，即使是反动的群众组织，也不能开枪，只能揪住头头，我立即起电报，给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命令停止撤出部队，立即派调查组去那里调查，新疆那位大学生死了，成了无头案，这次石河子事件不能搞个无头案，一定要调查清楚。

（关于张仲瀚问题）

总理：张仲瀚我本想挽救他，但他不努力，我在石河子，看到那样铺张浪费，

批评了他，本来想调他，但考虑给他个机会，他自己不想挽救，不接受批评，这次运动来，就把他的问题搞出来了，王震保了张仲瀚，又保自己，王震调了一个学生团体来保护他。

总理：夺权对象，现在北京有反党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处理方法各有不同：（1）撤职。（2）撤职查看留用。（3）撤职留用。（4）监督留用。（5）不加限制留用。新疆夺权问题，军区问题都很好处理，兵团问题很复杂，需我们很好研究。贵州夺权很好，它比山西夺权经验还好，准备把他们的经验介绍给各地。夺权你们要考虑民族干部。

（关于 12.19 绝食事件）

总理：12.19 绝食，停工是全出于激愤，可以理解。责任归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但不提倡。你们回去着重宣传我们这几条。

（徐立清说丁盛是革命左派，那我们怎么办？能不能批判？

总理：可以批判，有错误当然可以批判。

（右派问题怎样理解？）

总理：可能指中印边境打得好吧？这次偷偷跑到北京，就是错误的。

新疆军区兵团农学院<红色导弹>兵团整理哈师红色造反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京联络站翻印青海红宣兵战斗团驻京联络站子翻印 67.2.8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党委的电报

1967.01.28; 1967.02.11

“绝密

新疆军区党委：

军委认为王恩茂、郭鹏、左齐、张希钦、徐国贤、熊晃、丁盛、裴周玉等八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贺龙分子，望你们向大家作妥善解释。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石河子的指示
新疆自治区党委、人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自治区革命夺

权总指挥部：

（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如有群众夺取部队武器，首先应该劝阻；不听，也应向天放枪以示警告。对武装反革命分子和过境窜入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敌人首先开枪时，才能自卫还击。

（二）新疆军区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值班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务。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在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区已经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该立即停止和劝阻，已经抓了的群众，必须立即释放。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元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党委的电报

新疆军区并转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地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否则，一切后果，由冲击新疆军区的人员负完全责任。

中央军委 1967. 2. 1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不是一般的农垦队伍，而是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它处在边疆和反修、反帝斗争前线，负有保卫祖国边疆的繁重战备任务。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新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同时积极搞好本身的文化

大革命，使自己永远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人民，永远保持中国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革命部队。

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和战备的需要，决定在文化革命期间，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事管制。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许干预和串连。

二、毛主席一月二十八日批发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八条规定，在生产建设兵团完全适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三、由革命领导成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共同组成生产建设兵团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兵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新疆军区文革小组直接领导。

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各师、团（场）、矿、企业事业单位均应成立革命领导成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并受上级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

四、生产建设兵团革命群众可以在本连队（车间）和团以上机关的本部（处）建制内建立文化革命群众组织，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

五、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群众组织，对本单位领导有批评、建议权，没有监督权；对某些领导干部的错误，可提出检举，经过党委调查核实，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可以越级上告，听从上级处理。

六、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大、中学校、文艺团体、科研部门和医疗单位，一律按照原建制搞好本学校、本团体、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不干预领导机关和部队的文化大革命。

七、生产建设兵团所有革命师生、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及全体支边青年一律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在所在单位进行串连，不外出串连；有生产、工作任务的单位，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八、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研部门，凡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领导权的，应进行夺权；但事先要报上级党委、文化革命委员会批准。

生产建设兵团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有的单位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如有严重问题，可根据群众的意见，由上级党委采取改组、撤换的办法处理。已经夺了权的单位，要经过上级调查核实批准后生效。

凡群众认为是“三反”分子而要求定性、开除党籍、判刑，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应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按中央有关规定处理。

九、生产建设兵团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

十、凡夺取、盗窃枪枝、弹药分子，按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予以逮捕。零散和个人私存的武器，必须重新登记，统一集中保管，违者严格查究。

十一、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部队，受新疆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

十二、本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所有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的明电

新疆军区并转全体指战员和革命师生，革命群众：

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的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的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否则一切后果，由冲击新疆军区的人员负完全责任。

中央军委 1967 年 2 月 12 日

(来源：原载《新疆红卫兵》(北京) 1967 年 6 月 9 日，第二版)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周恩来在批判张仲瀚总结会上的讲话

〔张仲瀚：新疆军区副政委。〕

如果没有人讲话，就要结束这个会了。这个会议主要是军委常委叶剑英同志主持的，我就是头尾参加了一下，知道一些情况，现在要结束这个会，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个会议是开得好的，这个会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解决了生产兵团的关键性问题，这是一场夺权斗争，这场夺权斗争不只是表现在

这个会议上，几个月来表现在生产兵团的各个方面，表现在许多事件上，一直反映到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相当激烈尖锐，我们经过这次会议，关键性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会议之所以能解决，不仅仅是由于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反映了生产建设兵团各个方面的阶级斗争，真正的解决是在现场，以后解决还是在现场。生产建设兵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逐步深入揭发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问题，存在着一个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分子，若不把他们揪出来，在广大群众还受蒙蔽的时候，这样必然要出事件。运动实践证明，反映到中央的事件，刚才剑英同志说的，第一个事件是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绝食事件，这个事件使问题本质开始暴露，但是仅仅这个事件暴露还不够，还要继续发展。绝食事件发生后，我看到了征候，请来一些绝食代表到北京来会谈，在代表们填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绝食代表中有几个不绝食的，一问是生产建设兵团机关干部、是政法部、卫生部、组织部、干部部、都是干部，兵团的学生绝了食，支援生产建设兵团绝食斗争的地方学生也绝食，绝食的时候，有的多，有的少，四个干部没有绝食不能理解。我问他们没有绝食怎么能代表绝食的人呢？他们说他们是支援绝食的，是做奔走工作的，是兵团机关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与这次绝食大概有关系，我当时说你们既然赞成绝食又不绝食，我就不能理解了。

我是反对绝食的，我要是参加群众运动就要分三个步骤。这是我接触很多绝食代表得来的经验，第一步是劝他们，毛主席提倡要革命，吃饱饭、睡好觉闹革命，为什么要绝食呢？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挂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和解放军的保护下闹革命，这样好的条件下为什么要采取绝食的办法，把身体削弱，搞成生命危险的闹革命呢？我一定要说这段话。如果群众不同意这段话，因此绝食了，我要跟他们一道绝食，我快七十多岁的人了，大概可以绝食二至三天，到第三天就不行了，这个时候群众可能就劝我了，你这么大年纪还绝食。我就劝说群众不要绝食，同我一道复食。这些绝食代表听了就笑了，我这样一说，生产兵团的四个干部很难看，当时就站起来承认错误。他们是什么错误，当时还没有了解得这样深，但已经感觉到后头有人操纵。

在绝食发生的第三天，我找军区通过自治区党委都没有找到绝食代表，自治区党委要负责任，没有出面，当然他们说话人家也不听，所以我直接打电话给张

仲瀚，找到医院叫他到绝食群众当中去，把头头找出来，他回答说，我病了一个多月了，住在医院里，说话群众也不听了，我说不要你自己去，你代表我把绝食头头找到，我给他通电话，他没法拒绝，果然把头头找到了，接通了电话。这个电话是一条热线，当然不是美苏热线。我们找到他们的头子，群众代表，是张仲瀚给接通的，我觉得非他不能接通。我找他还是找对了，这样才把绝食代表找来，代表们上北京发生了分化。第一个接通的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叫王兵，他接到了电话，根本不顾支援他们本地的学生和工人，他就开了个小会，决定人数，派人到北京来，马上本地的学生和工人都很气愤，人家支援兵团绝食了，被他们抛弃了，这些支援绝食的人要求见生产兵团和自治区的人，他们不管，这些代表到北京来就分化了，一直等到今天。这件事办得慢些，有缺点，但是我也有意识地让他们暴露一下，所以后来生产兵团发生石河子事件。汽车二团革命群众起来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是对的。正是因为夺权行动可能早了一点，也带来了一个好处，发生了在这一小撮当权派和三反分子的操纵下造成的事件，正如剑英同志说的，石河子反革命事件形成，是大暴露。从一系列的事件中暴露，从一个绝食事件引导这一事件的暴露，到现在不到三个月，看起来这个夺权斗争在新疆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里同样很激烈。尽管如此，只要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一到，还是保证能够解决的。因为有这样的事件，引起一系列的文件。一月二十三日那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的八项命令，二月十一日七项规定，然后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四项规定，最后关于生产建设兵团的十二条规定，这五个文件一拿出去，新疆的问题就决定性的改变了，不管是冲军区，冲生产建设兵团的受蒙蔽的群众还是闹事的，马上都觉醒过来了。主席的声音，林副主席的威望，军委的命令，党的影响在生产建设兵团，在各族人民中是得到无限信任的。

当时主要领导人除赛福鼎外都在北京，王恩茂同志、郭鹏同志、张希钦同志、熊晃同志，自治区还有林渤民同志在北京，生产建设兵团裴周玉、丁盛同志也在北京，赛福鼎同志势孤，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不过你还沉着。军区也在动摇，生产兵团就闹起来了，就这样子，只要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一到，但广大群众还是沉得住气，马上响应，这不能不使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

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尽管今天还有些同志没有认识自己本质的错误，不管你怎么做，总是教育了新疆的广大干部，也教育了其它的干部。一切都是党给的，都是毛主席教育，毛主席领导的，离开了这个还有什么呢。新疆是最复杂的地方，三面有敌人，南边有印度反动派，西北有苏修，东面有蒙修，三面受敌，内部又那么复杂，有××多万反革命分子，有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也有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这么复杂，我们在北京隔这么远，只要毛主席的声音，林彪同志的威望，党的号召一到，问题就基本上扭转过来了。乌鲁木齐近万华里之外，一个在长城之东，一个在长城之西。这个问题的解决增强我们的信心，只要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党中央、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你就站不住，只是一诉诸群众就解决了。

当然，群众中也包含各级干部，我刚才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广大人民就不用说了，广大的干部也还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的。所以正如毛主席说的，广大人民，广大干部都是革命的，愿意革命的，这是文化大革命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的基础。我相信今后新疆的工作还是能够做得更好的。但是一定要说明清楚，尽管有这样的胜利，会议开得这么好，但这仅仅是揭露问题的开始，揭开盖子。刚才剑英同志说得对，是刚揭开生产建设兵团阶级斗争的盖子，绝不能骄傲自满，决不能满足这次的收获，大方向抓对了，即使是我们身上的毒瘤开了刀，还不等于我们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还遗留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我在这里特别号召自治区的，军区的，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同志，要看到这样的问题，有一系列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因为跟着一小撮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受蒙蔽的人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过来，说服过来的，绝对不要歧视他们、要教育他们、争取他们。即使有严重的错误也要改造他们嘛！何况群众呢？何况一般干部呢？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向着健康方面发展，才能使文化大革命健康地发展。这个问题对生产建设兵团要一分为二，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十七年的生产建设兵团，成绩还是主要的，伟大的成绩首先归功于毛主席的号召。部队一解放新疆，毛主席指示部队又要作战斗队，又要作工作队，要作很多宣传工作，参加建党建政的工作，又要作生产队，生产自给，这样的任务生产兵团基本上实现了。

刚才剑英同志把生产的成就说了，这方面是由于毛主席的号召和领导，我们

的路子走对了。另一方面是广大的群众。部队开始转业，入新疆后，转业的到现在还有×万多干部。但是起义部队也响应这个号召，到现在也还有×万多人，这是一个基础。在这×万多人的基础上，现在发展到××××多万人，包括家属、儿童，有很大的成绩。当然过去的基础人数还不止×万，大概×，×万人。就是这样也是二十倍地增加，这是十五、六年的事了。这种成绩的确是伟大的，广大群众响应号召，干部也有很大成绩，要靠两头，主席的号召、关怀、党中央和政府的支持，广大群众响应号召，许多复员军人、许多支边青年，盲流人员那么多，也愿意在那里安家，甚至劳改犯也在那里安家，造成现在这样大的部队。建成现在这样大的队伍，干部是做了艰苦的工作的，主要成绩归于两头，干部的努力也不能忽视，不这样估计就不全面。更全面地估计还有军区、自治区党委、兄弟部队的支援、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支援，虽然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不是没有缺点，生产建设兵团的缺点还不少，且不说一小撮人已经在位的要把持这个权，扩大职权，还要造成独立王国，这是大家揭发的。在毛泽东思想挂帅，艰苦朴素方面，东西对比，我是觉得有很大的差别。我到过大庆油田，又到生产兵团，在兵团到的地方很少，时间也很短，觉得到处铺张浪费，大手大脚，跟大庆油田一比，是差的。就拿生产投资来说，单是一九五六年归农垦部管以后，就投资××亿，归农垦部管以前，就很难算了。要算这笔帐，这几年还了过去的帐，有的还没有还清，而大庆油田，从一九六〇年就开始，到去年，只七年功夫投资××亿多，交的利润有××亿，折旧×亿，当然工业与农业不同，农业吃饭的人多，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还是有工业的，这两个单位不能完全相比，我只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方面和艰苦朴素方面对比，兵团不如大庆，我是一九六二年六三年到大庆去看的，一九六五年到生产建设兵团看的，当时我对张仲瀚说，你带着人到大庆去参观参观，你们的领导干部王震、王恩茂、余秋里这些同志都是过去一同战斗的，实际上他六五年去了，的确那里是两论起家，艰苦奋斗，口服心服，心悦诚服，我当时觉得大概有点认识了，后来证明并没有认真传达和学习，固然六五年的大庆已经有点变化，有点骄傲，大庆那边的同志只要一骄傲，两年就受了损失，骄傲在这两年，出事也在这两年，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摔了一跤，当然红旗不至于倒了，我们还应该扶持，这是一面好的红旗，他们稍有点铺张，但比起新疆来说，还是艰苦的。

生产建设兵团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这是丁盛同志在京讲的，很激昂慷慨，有根有据。大庆是两论起家，学习毛著的，在这方面可以看出不政治挂帅，不艰苦朴素，又不是解放军的传统，没有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我把这两个作个对照，大庆确实是好的，有点骄傲，摔了个跤，不是大跤，可是生产建设兵团在这方面现在就出了乱子，出这个乱子也好，不然，人家心里不服，你说生产建设兵团成绩确实很大，如人员发展到×××多万，生产粮食××亿斤，棉花××多万担，还有其它工业、加工，但是，只出了这个乱子，只要把一个事一对照，×××、×××稍微骄傲了一点，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摔了跤，拿张仲瀚来看一看，不只是骄傲而已，怎么能领导文化大革命？刚才说的大庆的积累不止××亿，而是××亿，投资不到××亿，就不能不说是苦干，就是这样子一骄傲就摔跤。

你们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由丁盛同志揭发的，那样子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学习毛主席著作，铺张浪费，有胜于此，组织小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回暴露就是毒瘤，非开刀不可，因为有人会不服，觉得王震同志一走就是张仲瀚在那里搞，王恩茂同志也只能兼管一下。刚才王恩茂同志也自我批评，有些事对他管理得不严，检查督促不严，军区也不好插手，因此一九五六年就归农垦部了，钩是挂在王震身上了嘛，也有点解释的，难道一点事也没做，没有功劳也有点苦劳，但是问题不在此，你做了点事，功劳有点份，但是你犯了这么严重的罪行，你就把那个盖过去了。高、饶也好，彭、黄也好，彭、罗、陆、杨也好，刘邓路线也好，难道这些人对党没有功？没有做过事吗？不能这样说，但是你过大于功，罪大于功，非低头认罪不可，有许多老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常常犯了错误，总是不服，象主席说的背了包袱，卸不下来，何况犯罪。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象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你愿意改造，我们党是不拒绝革命的，不应该不允许革命，这是主席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罪，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这次算是严重的教训，如果还想改，就还有改的机会，还有宽大的机会，希望现在还没有低头认罪的同志们，应该深刻想一想，不要不服气。所以，我做这样的分析，多说了几句。

第三个问题：生产建设兵团的基础×××多万人要加以分析，在成份上不那

么健康。第一，劳改犯就有×万人，当然，不是说劳动改造不好人，重新作人的不少，还有发明创造的，但是基础总是差些。第二，盲流××万，当然不能说都不好，有的是内地有困难，听说那里有好处，亲戚朋友都去了，要一分为二，大部分是好的，但总有一部分是不好的。第三，支边的青年××万，上海占×万，家庭出身，有许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不能说家庭出身不好就不能改造，但长期革命是可以改造的。我在石河子鼓励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叫他们改造，但是那篇报道不是一分为二的写法，没有经我看就发表了。当时，为了鼓励他们，没有去干涉，支边青年家庭出身不好的，改造是难一些，有的绝食要回上海。第四，起义人员，他们起义已经十七年了，按道理，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由于领导工作没有作好，叶剑英同志已经说了，大家已经批判了。张仲瀚没有把四个方面的工作都去作，团结，教育使用，改造要结合起来，偏于一边，只团结不教育，只使用不改造，结果就使他们从旧社会带来的许多旧习气，反动思想，没有改造，甚至是在许多地方还有滋长。如汽二团领导中这样的人多，一夺了大权就暴露出来了，心怀不满，造成流血事件，甚至军区的同志还同他们站到一边，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主席在二十多年前，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说，我们承认山头，然后消灭山头，这是辩证法。承认山头才能教育他，帮助他，然后消灭山头。如果在一个地方蹲久了，只是过去的一伙，没有新的血液进来，常常是久而不闻其臭。总有香有臭，是一分为二的，一个人的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林彪同志讲，我们既是革命的一分动力，也是革命的对象。常在一起，就只看到好的一面，互相欣赏，不看到缺点错误的方面。比如象霸道散漫，大家都如此，没有那个批评谁，去一个新的就觉到了。裴周玉、丁盛同志到兵团就发现很多缺点，就敢于说，于是张仲瀚就利用派性，反对裴、丁、李三个同志，为什么能煽动一批人，就是因为有一批人气味相投，没有认识人家的批评是善意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只要受得住，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整个生产建设兵团来自五湖四海，×××多万人复杂的成份都值得注意，对每一个方面都要做深刻的分析，这就会懂得我们要改变这个基础。中央要负责的是在一定的时期，比如五年吧，或者更长的时间，不把劳改犯送给你们，已经那么多，再继续增加就增加包袱。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不一定都送到你们那里去，过去把上海的交给你们，今后要换个地方。当然，

上海经过文化大革命也会起变化的。总之，你们经过政治思想上的改造，我们组织上也加以帮助，要从成份上有所改变，这种改变首先从成份改变，就是劳改犯在一些时期不给你们。还有干部的调整，对于干部的处理问题，现在打算搞个文件，即使犯了严重错误的，除去几个负责人，我们要留在这里学习一个时期，把思想搞通，其它你们自己消化，不要矛盾上交。去年六月首都工作组本来想把首都搞得安静一点，来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时有个问题，首都工作组将一些人清洗出去，特别是黑户口和机关一些过去有问题的人，后来报告主席，主席就不赞成，他说，你矛盾上交中央，没法处置，矛盾下放农村没法安置，他不知道情况怎么接收，接收了也没法改造，要给其它单位，不要以邻为壑！主席反对矛盾上交，反对矛盾下放，也不赞成以邻为壑。我说只有消化，主席说得对。回来后告诉剑英同志，后来就改变了。因此，对于我们生产建设兵团也是一样，给自治区的包袱就更大了，给军区也是一样，上交到中央不行，下放公社也不行，以邻为壑，也不行，自己消化可以，一度改变地区，改变工作岗位，对于其余的干部也打算决定几条处理的原则，还是留在本单位，生产兵团×××万是个大社会，自己能够消化嘛！对其余干部的处理也是一样，体制上要革命化。现在采取军事管制，这是暂时的，今后要改变，在军区领导下，生产建设兵团既是农又是兵，又是工，又是学，又是商，生产建设兵团是个社会，不仅工、农、兵、学、商，还有党政机关干部，这样的体制就要很好研究，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去解决。同时不要头重脚轻，现在生产兵团脚也不轻，但头太重，要把头搞得轻松一些，头大就昏昏然，头昏就容易发热，还是要头脑冷静。这样层次要减，要进行革命，所以领导权要紧紧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要你们回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一个师一个师的来搞好。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要改变领导，那就变成打倒一切，否定一切，那是不许可的。我们党的文件，二月份社论已经说清了，过去我们有些过×的想法。

第四个问题：生产建设兵团要建成社会主义的大厦，这是剑英同志要说的，没有说，我拿过来了，我们也很欣赏这两句，就不是要建成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大厦，如果象张仲瀚的那一套，那一条路线建设下去，就是修正主义大厦，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他们许多建设是不对头的，毛主席说既是农，又是工，又是兵，又是学，又是商这样一个队。

就象林彪同志说的，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们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设，要有一个认真确实的计划，务必执行毛主席的这样一个要求，对经营管理制度要进行彻底改革，这个问题不打算多说，只提一个问题，到底是以工为主还是以农为主，基本是农为主，但是工为辅。生产兵团这么大的一个社会，没有加工工业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个原则，原料要自己生产。比如有棉花自己办纺织厂，有丝可办丝织厂，有毛可以办毛纺厂，有油脂可以造肥皂，我那一次去看肥皂造的不好，现在改变了吗？（答：还不好）干部都买上海的肥皂，不买自己的肥皂，自己有烟叶子，不抽本厂的烟，却抽北京的烟。这个事情并不难，从上海调几个老师傅来，一教就行了，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干？这都是自己的材料。再如生产建设兵团担负着新疆那么一个矿，能够采出矿石，矿石的初步加工也可以负责，如粉碎、分解可以归他。煤也可以加工。再如机械，你们有那么多工业，还有农业拖拉机、汽车，当然可以建立汽车修配厂，有些原料、材料不能不交换，这是互通有无的问题。但是不允许另搞一套，跟自治区抢工业，一切都自己经营，那就不好了。特别是商业，内部的供应供销制度应该是供销社的作法，跑到乌鲁木齐市，把国家的商业也归生产建设兵团经营，这就喧宾夺主了。交通运输自己有汽车，空车回场，可以帮助地方运输，收取手续费也不能搞得很大，手续费够了就行了。都是公家的，为自己的利润把自治区的利润减少了就不好了，这是为私，是小团体主义。

第五个问题：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思想工作，过去来说，大大落后于客观的需要，现在更加证明了，揭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小集团。丁、裴、李三同志去大大地抓了，但遇到阻力，今后阻力会减少。就要按林彪同志所要求的，把兵团建设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切生活的地方，都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比那个地方都举得高，学得好。就是剑英同志所说的大学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运动。我再加一句，提倡解放军艰苦朴素的作风。当然，三句话八个字当中已经有了。一句话，就是以毛泽东思想来建设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第六个问题：夺权的斗争，取得初步的胜利，还要继续，这个继续不是一切都打倒，区别两类矛盾。真正那个单位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甚至三

反分子，就要群众揭发他们，按军管制度，要上级批准，予以调换。特殊的还是学校、工厂、文艺团体、还有医院，那是允许他们夺权的，但不是从上到下连一个车间都要那样去夺。打倒一切是不行的，否则，就会自己搞自己，正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利用的，进行反扑。经济主义的反扑失败了，他就搞政治上的打倒一切。我们要认真区别两类矛盾，最近中央文件，特别红旗杂志今年的一篇社论，要好好学习。红卫兵小将写的几篇文章，如“打倒私字夺私字的权”以及“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这些文章确实是可喜的现象。青年这一代，不仅比我们青年时胜过几十倍，我们老年这一代也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我们深愧不及，应该好好地学习这些文章，好好弄清楚，不然我们回去夺权又搞出新的毛病来，从右的走到极左的，但要防止右的反扑。总之，我们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化大革命是应该有领导地进行，这是中央最高领导人委托给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事管制，由下而上按主席指示，按照生产单位去搞。发动战斗组，把错误的东西，坏的东西去掉，坏的不是一下子都取光，坏的东西也还会发现。“四大”要有领导地进行，不要因为军管又变成另外一个极端，搞得冷冷清清，听不到职工的声音，那就不是用那么长的时间解决生产建设兵团的目的。希望在座的同志，首先要读毛主席的著作，不仅老三篇，还要读古田会议的决议，一直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许多文章，也要读文化大革命以来，也就是这本小册子上的许多文件。要认真地读一读。还有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一些社论、好好学习一下，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阶级斗争。我的话完了。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查）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与新疆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记录

〔时间：下午，地点：中南海。被接见单位：新疆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工司革命工人、革命干部”代表，兵团代表，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

（总理穿一身灰色的衣服快步走入会议厅，大家站起来，总理和代表一一握手）

总理：你们现在就十一位了？（指新疆自治区代表，总理点了名）其他外地同学都回来了吗？

北京同学：新疆军区把我们赶回来了，下令 3 月 10 日离开新疆，有隐瞒、

窝藏的受纪律处分，把我们当反革命了。

总理：十二月十九日以后去新疆的人最多，这一次四百名是二十三日到的，过去的四百名（同学们：是去保王恩茂的）现在你们整他们了吧！（对北航的同学讲）你们去了以后正碰上 1 月 26 日事件（同学：对的）你们刚去第一件事是碰到夺权，第二是石河子问题，第三是军区 2 月 11 日事件问题，复杂性就在这了。（总理看见同学桌上摆的东西）什么东西？（同学们递给总理军区政治部的造谣传单，和一些大标语的照片）你们这些传单很重要，我全要看，这些标语一看就是坏人写的，很显然是反动的。（同学们把照有“王恩茂万岁”的像片给总理看）传单应追，又通过印刷厂，不是一个搞的，即使不是军区搞的应把问题追查清楚。（同学们又递上了两张传单，要秘书仔细查一下，当看到一份中共中央指示的造谣传单时讲）（同志们又递上了军管后的报纸，总理看过后又到过去的报纸对照一下看）王恩茂住在北京很舒服还要保护做什么？

我问你们，你们是革命派夺权，自治区党委有一些坏人，对武光、吕剑人、祁果怎么看法？（大家讲了武光的问题……）

总理：武光参加石河子事件你们知道吗？（送上材料）

代表：根据我们调查，看不出石河子事件和武光有什么联系。

总理：噢！（接着看材料）听说武光去石河子两次。（交上清华顾立德写的武光在石河子活动时间表，陈志写的时间表。）（总理详细地看了时间表。）24 日上午去的？

代表：武光是首都三司叫到石河子去的。

总理：武光不是去过石河子两次？（同学：我们知道就一次，21 日武光根本没有去，是三干会讲的，这有 19~26 日的时间表）

总理：“你们整的材料是客观的，我粗看你们的材料也可以抓住把了，武光说：“有的解放军支持保守派”，兵团医学院在石河子问题是站在哪一派？（答：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那就更复杂了，武光支持了那儿的造反派，讲这话是有企图的，是说了一些煽风点火的话。（北航红旗：根据当时情况看，武光在石河子不支持造反派是犯罪的……）（兵团八野是保守派组织）

总理：八野夺汽二团坏人权是对的（兵团同学：汽二团夺权是造反派先夺权……）

总理：你们对石河子汽二团夺权问题也要推翻，那一下子全要推翻，让我站在中央地位怎么讲话，那就要进行全面重新调查。关于八野回去这样大吹大擂，我是反对的，这样是错误的，上一次我就讲应该解散，他们说已解散了，我一直追这个问题，这么搞还行！我叫张希钦发通令要解散。

三干会停止专搞武光是不对的，我们的意思祁果、武光、吕剑人他们反对军区召开三干会，可以在开完后批评一下。

代表：夺权指挥部和军区和武、吕、祁开会，武光说：是否由夺权指挥部和军区联合主持，夺权指挥部是最高权力机构……。

总理：我抓住你的这句话，武光这样说是煽动的。可以看出他没有努力去调解解放军和群众的关系。军区主持召开三干会，我们二十三日在京西宾馆传达主席的指示（代表：武光事先是不知道的），不会不知道的。

代表：凡参加了三干会的全是三结合对象，又恢复了原状。

总理：你一讲我就了解这个人了，这显然是挑拨，你们不要替他辩护，我要你们和他分开。

（武光、祁果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争论，现在还在进行，错误有多少，我不能说。）

总理：我不同意这个话。这样的话就错了，关于武光一个书记讲那个话是不对的，应做工作，不能挑拨军区与造反派的关系。26日武光从石河子回到王金波那里去没有？你们有办法证明没有。

北航红旗同学：谈了武光去王金波处的前后经过。

总理：三干会你们谁参加，情况怎样？

同学：三干会上只说郭鹏……

总理：当时还给你们采访自由了（总理十分关心生产会议讨论的事就记下来了，解放军报社记者李××）

同学：现有没有了。

总理：还有一个问题，2月11日事件。

北京同学：我们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的同学是“罪魁祸首”写了二条通令……（总理哈哈大笑）

总理：你们二司和北京三司去的是革命派，这是我一向肯定的，现在也是这

样的，你们夺权在初期没有三结合，初期没有三结合，初期没有经验，有些幼稚的行动，中央从来没有责备过你们，从来没有说你们的大方向错了，但提倡推广要慎重，上海第一个夺权，就一个名字就推到二月底才报导。因为没有三结合也掌不了权，主席一直抓夺权，有的一挑就夺。南京是如此，合肥是如此，要报导就要慎重了，夺权是不是肯定下来，中央各部里三结合的典型，也是一直没定下来，因为没有三结合就掌不了权（代表：我们夺权是听说王金波要夺权，所以我们先夺了）你们总爱受人挑吗？青年的革命组织夺权，我们从来没有批评，但夺权后的作法有些行动偏了就要说一下，提起注意。区党委内部的人正在斗争。武光、祁果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争论，现在还在进行，错误有多大我还不能说。

你们要分开，不要牵引他们上去，回去把两方面争论的都公布出来，你们客观地来看，不要与他们连在一起，一牵连进去，你们就容易上当。

还有“1月26日事件”。“12月19日事件”和“1月26日事件”完全是两回事，是根本不同性质的，对“12月19日事件”我们的看法完全不变，责任完全在自治区党委，兵团党委上。（总理念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给12月19日六条电文最后一条）现在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也承认错误。1月26日事件打了枪，打了枪是反革命事件，如果因为石河子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也说“12月19日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当然你们不这样看，保守派才这样看，其他还有一些糊涂人，甚至……，是不是武光去挑动了兵医？关于石河子事件，你们回去好好弄清楚。

军区2月11日事件，1月23日军队支持左派，28日中央八条出来了，军区内部人这样搞是不对的（同学说：中央八条发了，军区内的人给何家产戴高帽，把何家产斗了一顿，当然不对，但发起这件事是一些军区内的记录，等办的人，当时谁通知大家的弄不清了，可是逮捕的人和“2月11日事件”不符。）军区事件你们是偶然参加了，支持了造反派，要说错就是个别的，你说矛头指错了，承认错误就行了，你们革命派嘛！再追就不对了，这件事要分开，不要再追究，不影响你们的革命性，不影响你们的大方向，你们要划清界限，客观调查可以进行。不要牵进去。如果划不清就可能犯错误，你们二司这样一个左派组织，应该赶紧回去了。八一野战军这样气盛，我追了几次要解散，回去还这样搞走过了头，他们自己负责，你们不要根据这个压对方，犯错误，你们二司左派，造反派，你们

的报告我都看了，一、二月中央发了许多通知，把运动引上正轨上来。你们二司半年来有些左，一下子就可以纠正过来，讲一些政策不够，批评我们没有公开的。就是内部批评的，北京也有这样，这是难免的，这是一些左派组织，外部公开批评就是形左实右，保守派应该很好整风，站到毛主席一边来，我们不是不允许他们革命，也有些人借此反攻倒算，如果是这样肯定是错误，他们把革命说成不革命，不革命当革命的，这是不行的。我看了你们的材料，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错了。北京联动到乌市去和八一中学红造部联合起来这事要追，你们有没有他们的纲领，你们把材料给我搞来。（同学：他们把反动对联“基本如此”改成“绝对如此”，大量翻印“四问中央文革”。）

你们告诉我的吴鉴群我一直在追，他是哪个州的？（同学：昌吉）杨春芎以后可以把他叫来，（代表讲最近收到的吴鉴群材料和恐吓信）就这封信就够了，就是反攻倒算，（当念到信中“王恩茂是好书记”时，周总理耸了耸肩，风趣地笑了），王恩茂还是没骗你们（代表团3月5日问过王恩茂，王说吴鉴群没有政治问题。）你们3月5日和他谈话已掌握了吴鉴群的材料，他不知道，还是比较老实说了，（总理笑了）没有一手不算精明（代表：吴鉴群历史问题，王恩茂应该知道，州地委书记跟王恩茂最紧的是吴鉴群，他是王恩茂的红人，黄克诚，张士富跟得很紧，2月4日小报上也登了吴鉴群的材料，王恩茂应该知道的）。

（伊犁同志汇报了抓人，打人情况，交上了材料，总理当时详细观阅。）（总理对秘书说：给张希钦要个电话（6118）我说你们应该回去，回去后才能搞清楚，你们的二司的地位，他们三月十二日开了一个十万人的大会，不让你们参加是错误的，你们十九日开了一个三万人大会，开得很好嘛！他们很惊慌，我说不要怕嘛！开大会是他们先开的，你们完全可以开。（同学：讲了军区禁止开大会的通电）王恩茂我说先不定性，回去他检查，你们揭发，根据他的检查和你们的揭发，最后才能定性，你们也不要定性，你们要定性我也不赞成，总要先检查揭发，最后再定性（8120电话来了，总理打电话）新疆的事都是王恩茂捏造出来的，亦不一定，有的他不知道，有的新疆直接打电话来的，我顶回去了。

总理打完电话回来说：你们的消息真灵通了，他们的政治委员张希钦还不知道，你们花了三万元电话费，大家花了，一笔勾销了，这是毛主席给的自由，毛主席领导的时代，你们是多么幸福啊！不管怎样放人，伤的人赶快治疗，你们既

然是左派，开头造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区党委的问题，今后还要保持造反派，沿这条路走下去。你们回去了，王恩茂是要找你们的，我给了他十天时间写检查，在北京写总是写不好（这时大家说，检查是王恩茂女儿代写的）写的亦不怎么样吗！回去抓住要害，你们造反派要比一、三司他们看得高，看得远，一、三司是保守派，以前是保守派，不如你们，你们不要挖苦他们，你们最后也要搞红代会，我看时间最短要二个月工作。你们回去首先抓张希钦谈，什么黑二司！要批判，后大联合，但要在大方向一致下，不能和稀泥，有了各学校的初步联合，他们和北京三司交了朋友，可以通消息，搞革命的大联合。清华井冈山有八千多人。内部也有左、中、右，可以争论，有争论，有对立好嘛，学校里几个也可以只要是革命的。你们带头影响推动工人的大联合，机关的还有没有在呀！机关也用这样形式，一下子马上全面到本区也不可能，只要是革命的，不革命的不行，工人要抓革命促生产，在这点上赛。军事管制的目的是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首先要革命的三结合，政治上有代表性，但是革命的有一点保守的也要接管嘛。再有，你们要高姿态地促进大联合，最重要是对革命群众的态度，你们回去要把北京的新风气带回去，要批判打、砸、抢这种坏作风，北京也在批判。

黑材料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是黑材料搞到一起烧了。如果有机密文件打开和军区双方代表查看，是机密的交回去，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同学：他们把机密文件夹在黑材料中，政治陷害，石河子一交机密文件，他们就大抓起来了。

总理：抓进去的人，都要放出来。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对革命群众态度问题。

第二对各级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老鸦一片黑。第一，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新疆这么大，一定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甚至有个别是修正主义分子。第二，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时间很长，有的后执行，有的沾了边，没管文化大革命的事，这就要区别对待了，执行的有重，有轻，有多，有少。第三，错误矛头向上，向自治区，州委其次，分别利害，去年 5 月 16 日到现在，到底负多少责任，也要联系过去，其他是历史问题，有的是叛徒，这两种是少数的，要搞专案调查。执行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是多数的，一般只检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其它不能都搞。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叛徒，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改的，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果都列专案搞就变成一次全面审干了，这样所用的时间就很长了。把武光问题送给康生同志，他管这个事情，对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要排斥一切，打倒一切，这两个倾向，是两条路线斗争，这根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是受影响的。我十月底去清华，从支部书记，政治辅导员通通靠边站，工作组否定一切，说他们都是黑帮，是蒋南翔分子，哪有那么多黑帮，那么多蒋南翔分子，当然蒋除了和彭真有关系外，在清华也有宗派的。这是工作组留下的，不能怪群众革命组织。群众受影响现在也好了，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这是形左实右的。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一讲三结合，一切干部都出来了，都要结合，都要上台，对干部分四批，（1）要撤掉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不改，这是少数的。（2）留下一批，比撤的要多的，只要他低头认罪，有一定工作能力就可留用，有各种留法：撤职留用，监督留用，停职留用，一般留用。（3）调一批，调进调出。（4）要提一批。各机关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经审查同意的要提一批，这方面希望比较大。对干部要有分析，这是正确的。排斥一切，肯定一切，谁都结合，恢复旧秩序，革命白废了，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领导秩序要改变，要有人监督，要三结合，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权力机构。三结合要有群众监督，在临时权力机构中，群众代表占多数，是基础，革命干部是领导核心，是骨干，解放军是支柱。

军事管制是一个过渡形式，边疆可能时间长一些，将来就要三结合，大联合，你们过去夺权方向是对的，但管不了，这个夺权指挥部你们要不要，由你们自己处理，我不干涉，我相信你们会处理好的，主要是搞三结合，大联合，我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们杀了“回马枪”搞经济主义，大庆就是搞经济主义的，八千多个半工半读实际上是全天劳动，是学徒工，这次算了一下，领导上同意认帐，给他们政治上认错是对的，但经济主义不要过忙，好要他们算一下，每个人发了几百元，都出来了，结果工作全落于老工人身上，过去红旗手，劳动模范，老工人忙于工作，参加革命时间就少了，成了保守的，年青的外出串联干革命，但上了经济主义的当，红旗手，老工人忙于工作，也是干革命的嘛！谁造成的？是工委。经济主义是逆流。到夺权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是主要

的斗争目标。造反派内部有争论，这个好解决，多学习学习破私立公。干部不易想通，想不通过检查亮相就结合，这就是要注意了，还是原班人马，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私心杂念多，要很好分析，有些造反派的作法也不恰当，安徽就是这样。（同志们汇报了自治区抓人的情况）总理很气愤地说，通通放，除了杀人的、放火的、现行的，全放出来。（代表：造谣说我们抄家从王恩茂家抄出原子弹图，泄了出去）停一会，总理说：可能有吧！他是第一书记，我们可能发过，（又停了一会）总理做了一个手势说，就是发射冒烟的图，这对我们大家说这种图我们也有，学校上课还有这种挂图，说完大家都笑了，总理也笑了。

支左问题是容易犯错误的，最大的是捕人要放，你们都是造反派嘛！闹了半年多了，同学们做错事，可以座谈解决嘛！抓错了要放，要承认错误，支持错了是有的，把保守派当左派，把左派当保守派，有问题要协商，要高姿态。

王恩茂不定性，还是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叫他找你们谈话，也叫他找机关干部造反派谈话。

众：机关干部都垮了，现在军管单位都要把造反派组织解散，不能串联。

总理：不能解散，可以去串联。

众：有人说，我们过去造反错了。

总理：（很快并肯定地说）造反没造错！地方上的电报大楼，广播电台，业务单位不去，其他地方可以串联，象传达室、饭厅、宿舍，不搞大型串联。军管单位没有“三结合”，原来造反派掌权，吸收他们参加两个班子，文化革命领导班子，业务监督班子，现在都在摸索，没经验。

众：军管后，把造反派的权拿下，交给保守派。他们有个逻辑，解放军支持保守派，我们反对保守派，就是矛头指向解放军。

总理：那就不行。关键在于干部，要警惕，要避免复辟，解放军调查不够，支持的不对，犯了错误，特别提请新疆军区注意，要帮助你们，你们要采取主动，否则不利于三结合，推迟一点（时间）不要紧。会给资本主义复辟机会，关键在于王恩茂的检查，大事情要他说清楚，你们收集他的材料够细了，要他说三天三夜说不完，要检查主要的，宣传上新疆是特别的。如宣传大肆吹嘘王恩茂的那么大张传单，这是资产阶级作风，你们也要帮助王恩茂，同时你们回去也要搞整风，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嘛！把政治生活丰富起来，兵团同志回去要困难一些，四大

还有，但不如过去方便了，是解放军系统嘛，八一野战军写了公告命令他们解散，你们回去看看，我提了好几次了，他们不散是不对的。兵团的联总要解散，兵团武装都要搞纠察队。

众：兵团联总还成立了纠察队。

总理：（很生气和惊奇地说）！又成立了？！搞这个东西！

众：这个纠察队还到火车站去了。

总理：这要解放军去嘛，他们去干啥！？

众：乌鲁木齐好多是兵团商店，都不让我们在那墙上贴标语。

总理：兵团商店要缩小，我们批评他们了，兵团再不能搞这一套，兵团问题复杂。兵团不能再搞这一套了，要斗争，要作很大的艰苦工作，回去告诉王恩茂，张希钦这样做不对。

商店到是兵团的，但自治区太多了张仲瀚的手伸得长。他们为什么要去火车站？兵团比地方要复杂，对立也很厉害，不能再打，成分也有问题。

“支持左派”很容易错，我们讲了，十几年没有做群众工作，左右搞错是可能的，你们不要揪住不放。和解放军协作要高姿态。

王恩茂的问题，回去先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透，别的问题，如反修言论，再追，看是不是够定性。（送上五七年反右指示，总理看了摇头，又看了出版日期五七年六月）这肯定看了主席内部讲话了，外面也可能正式出版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只能承认错误了。

众：例如六通湾煤矿，造反派夺权之后，生产搞得很好，超额完成，军管后，交给保守派，生产下降。

总理：写一个材料交给我。

众：我们已经交了这样的两个材料。

众：军管后一派下去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整理造反派的材料，翻造反派的档案。

总理：（生气地说）还是这样。

众：八一农学院保守组织宣布红旗、伏虎是反革命组织。我们问他谁说的？保守组织说：“军区说的”。我们叫他把军区命令拿来。

总理：就是嘛！主要斗争。

众：我们不敢斗，一斗就是矛头指向解放军。

总理：你们带着新的精神去斗。军训，不要把各个组织解散，那还能解散？

众：他们也讲，通过军训要把我们搞垮。

总理：那不行（总理看着一张纸上的几件事说）上面几件事都可以解决。……

（总理又说了一件事，大家鼓掌。）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传达总理同新疆革命造反派来京代表谈话要点

〔注：此件为新疆军区文革办公室魏学武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九时五分，同全军文革办公室蒋培国通电话核对的。〕

一、新疆红二司是革命造反派，但要与石河子事件、自治区党委内部斗争划清界限。

二、你们不要对王恩茂同志的问题先定性。他已经回到乌鲁木齐准备检讨，并且准备找你们谈谈。

三、军管单位除机要部门外，根据规定，有的可以串连，进行四大，但不进行大串连。除军队方面另有规定外，地方上，各造反组织，不应解散。

四、所逮捕的人，除现行反革命外，其它由于政治原因而被逮捕的，要全部释放。

五、对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的事件，中央的看法不变，责任在兵团党委和自治区党委。

六、三月十二日的大会，不要二司及其他造反组织参加是错误的。听说三月十九日的大会开的不错嘛！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

2011年8月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4）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四节 内蒙军区的“二月黑风”

本节资料

一、中央领导人调查内蒙古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讲话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下午五点五十分至七点五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见人：总理、肖华。被接见人：内蒙古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红卫军四方面各五名代表。列席：刘华香（内蒙军区付司令员）。〕

（会议开始，总理一一询问了内蒙军区代表的姓名、成份、参军年限；问了内蒙古党委代表姓名、民族、在内蒙工作年限；问呼市三司代表姓名、年龄……）

总理：谁叫高树华。（高树华站起来）你是师范学院的教师？哪里毕业的？

高树华：师范学院。

总理：你们三司有一个同学被打死，怎么不让检验尸体？

高树华：因为他们要抢尸，毁灭罪证。

总理：是谁要抢尸？

高树华：红卫军。

总理：怎么能抢尸体呢？为什么搞得这么对立？人是怎么打死的？

高树华：当时韩桐正在喊话，希望军区刘昌出来辩论。

总理：找刘昌辩论可以写封信嘛！用现在这个办法包围军区怎么能行呢？

高树华：正在这时，一个军官提着手枪跑出来，韩桐同志喊：同志们现在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时候了。接着这个军官便开了枪，时间是二月五日中午 12 点 15 分。

总理：韩桐是几年级学生？

高树华：四年级学生。

总理：那里人？

高树华：托县。

总理：那个盟？

高树华：乌盟。到附属医院的时间是 12 点半。

总理：当时人已经死了。

高树华：当时还没有死。

总理：伤口在什么部位？

高树华：从左边第五根肋骨下打进去的，把肺动脉打穿，子弹还留在死者体内。

郝广德：我们当时已经拍了照，到医院以后，红卫军、革命战士的人包围了医院大门，要抢尸体。抢救了五个多小时，到五点五十分，当时给北京协和医院打电话，协和医院说：停氧 20 分钟已无法抢救。军区广播说，解放军不会开枪打革命学生。是“818”打的。

肖华：打的时候我不在，抢救时在。

总理：是你们的学生吗？

高树华：是的。

总理：（对军区）开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黄厚：我不了解这个情况，姜部长知道这个事情。

姜文启：那天十二点打死人，到了下午三点才听说。后来有个老工人反映说，他看见放了两个炮竹，还冒了一股烟……

总理：放炮竹怎么能打死人？他自己能把自己打死吗？你们检查枪膛子弹没有？

姜文启：没有。

总理：你们没有检查枪膛子弹，怎么能断定不是你们打死的？你们这就输了一着嘛！如果我是个司令员，我马上就把人集合起来，检查枪膛子弹，你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你们追查凶手了没有？

黄厚：没有查出。

总理：你们接到国务院、中央军委发的通知没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打伤了不开枪)

姜文启：见到了。

总理：见到了你们为什么还这样做呢？我们都是军人嘛！我是个老军人，后来退伍，现在因为工作需要，又穿上了军装。打死人很容易查清，一清点武器，弹药，就清楚了嘛！

姜文启：我们当时没有验枪，这是我们的疏忽。

总理：静坐有多少人？

刘文研：当时我在现场（接着揭发了姜文启的谎言）。

黄厚：下午四点才广播枪打死了人。

总理：你当时在现场吗？

黄厚：不在。

总理：（问姜）你在现场吗？

姜文启：不在。

敖长锁（军区代表）：我当时在现场。在迫不得已时发了三条通告，这个通告是在十一点多宣布的，我没有看到打倒的现象，要打倒，一定要哄起来冲击，在下午三点多钟才听到广播，因而军区没有检查枪支弹药。

总理：这个问题先停止到这里，派人进一步调查。

郝广德：必须查清，交出凶手。

总理：派谁都可以吗？

郝广德：只要总理派人去，我们就相信。

总理：中央派法医去检验，内务部去一个部长或付部长，带上个秘书和两名工作人员，乘飞机去。能不能夜航？（总理秘书立即打电话问能否夜航？回答说不能夜航。）那就明天拂晓起飞。

总理：你们（指三司）负责人是哪位呀？

郝广德：我，郝广德。

总理：飞机到了你们那边谁负责去机场接呀？

郝广德：薛贵元。

总理：军区谁去接呀？

黄厚：杨明先，训练部部长。

总理：由军区去个吉普车去接。公安厅夺权了吗？

郝广德：原来是造反派夺权，现在保皇派反夺过来了。

张三林（红卫军代表）：左派不是自封的。

总理：到底谁夺权，谁是保皇派，还要看看罗！红卫军方面要不要派人参加呀！（指验尸一事）

张三林：我们不参加，因为这件事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

总理：区党委要不要参加呀？

王铎：总理看，需要参加就参加，此事与我们没关系。

张三林：你们支持三司冲军区，怎么没关系？

总理：中央调查组、内蒙军区、呼市三司共同处理这件事，查清后将尸体火化，一定惩办凶手。

姜文启：韩桐的弟弟在军区后勤部工作，他要求看尸体。

郝广德：我们没有听到这个要求。

总理：死者的父、母、弟弟都可以参加验尸，把事实弄确实，如确实是枪伤，由政府负责抚恤。这个问题双方都不要再扩大宣传了，到中南海宣传很不象个样子，在北京在呼市都不要宣传了，查清后办案就是了。对待人民解放军要注意影响，不要丑化。你们（指三司代表）将来夺权还要靠解放军协助嘛！

（总理接着问了红卫军代表的姓名、职务）

总理：你们（指红卫军）这个组织有多少人？怎么组成的？

张三林：我们是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96%是工人、4%是干部。

总理：有转业军人吗？

张三林：有很少，个别的。

总理：你们谁负责的呀？

张三林：我负责。

总理：你们有多少人？

张三林：三万五千多人。

总理：光呼市吗？

张三林：光呼市。

总理：你们橡胶厂有多少人？

张三林：400 多人。

总理：总指挥部谁负责呀？

张三林：暂时也是我负责。

总理：一共有多少人？

张三林：二十二万人，其中红卫军三万多人。

总理：这个数字有出入吧！

张三林：还有小学生。

总理：这不可能，呼市一共有多少人呀？

王铎：不连郊区农民，有三十多万。

总理：共三十多万，你们就有二十二万，这样一算，平均一家要有两、三个参加了。北京几百万人，能组织起来的最多有一百万。

张三林：我们统计数字有出入。

总理：不是数字有出入的问题，你们以少报多，这不够实事求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指三司）有多少个组织？

郝广德：65 个组织。

总理：学校几个？

郝广德：大专院校六个、中专 16 个。

总理：你们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有多少人？怎么组成的？

樊俊智：共有四万多人，主要是农民，有六千多转业军人。

刘文研：一开始，他们是全国荣复军，他们成立的是全国性的，我们有充分资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们在去年十一月已经组织起来啦，有宣言、有纲领。他们的传单说是总理同意的，借着总理的名义，便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了，他们在农村，十三岁以上的都发展了。

樊俊智：我们是 12 月 30 日成立的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总理接见我们回去以后，就宣布第一个宣言作废。既然要摆，就摆一摆吧！不要说组织的名称，主要看组织的行动，摆摆么！有理不在言高，山高遮不住太阳，我们现在全国连个点也没有，和别的组织没有联系。

总理：你们把转业军人组织在一起，这我去年十二月份有个讲话，已经讲了应该逐步取消。应该按照产业、职业、行业来组织革命组织，不能把人从各方面

抽出来，单独组成全国、全省区性的组织，因为这样组织就成了一政党了。我们经常学习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只有按照产业、职业、行来、一个厂子、一个系统组织在一起，才能统一起来。存在决定意识嘛。你们这个组织各行各业都有，应该逐步取消，我劝你们逐步取消。因为不按产业、职业、行业组织、容易被坏人利用。有些组织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下令取消的。有些组织，如：荣复转业军人、一九六五年大专院校毕业实习生、临时工、合同工、半工半读、学徒工，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下放干部、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等等，有的要回上海，要回来搞全国组织，我也不同意，结果这些人就流来流去，甚至流到部里，最后被我们查出来了，共有七、八种，查也查不清。有些已经查清了，如：“红旗军”，有个黄老，工农兵有两个头子，是大流氓，这些组织是被反动头子利用的。第一次查出“红色职工造反总部”，后来，又查出个“荣复军”，湖南长沙又查出了“红卫军”等等，不论那一派，都要注意不能跨越产业、职业、行业来组织，这容易被坏人利用。

刘文研：现在他们这个组织与包头、全国有联系，第二个宣言仍说以荣复转业军人为主，北京有个“黄老”他们有个“潘老”，他们领导人白振玉、郑福田说是总理同意搞的。

樊俊智：白振玉不假，领导成员有四个，总理说不允许，12月28日发的宣言，有这么一句话不假。工人、农民大部分都在我们组织里，我们最近准备清理组织。看一看我们工农兵成立后砸了哪个组织，有哪些牛鬼蛇神，三司砸了那些组织，有哪些牛鬼蛇神，我们跟全国连一个联络站也没有，我们也可以把三司的成员摆摆。

总理：不要谈这些了（总理点郭长俊的名）。

曹文生：郭长俊没来，我替他，我是学习调度员的，五九年石家庄毕业，我原是铁路职工红卫兵，铁路局有个红色造反团三千人，铁路系统共六千人，呼市五千人，呼铁一千，在家的九百二十人左右，最近夺权是我们夺权。

总理：人家不是已经夺了吗？

曹文生：他们是假夺权，那派局处领导人就有46人。

总理：是不是军队帮你们夺的？

曹文生：我们是八日早五点夺权，部队在那儿有一个警卫班，因为他们要抢

枪支弹药，部队下午六点才去的。我们夺权后他们不上班，我们就发扬穷棒子精神，自己干，我们有准备，我们夺权的那一天生产任务完成的最好。

总理：局机关同意你们观点的有多少人？

曹文生：200 多人。

总理：是否发生过堵塞现象？

曹文生：暂时还没有。

总理：你们夺权是否有外援。

曹文生：有，因为我们是少数派，需要大联合支援，是无产阶级联合总部支援的。

总理：你们“无产者”有多少人？怎么组成的？

张启生：共有两万多人，机关干部两千，大中（专）院校学生一万二千，手工业工人四千，郊区农民三千。

总理：那你们就是极大的多数派了，你们几个组织有交叉，学生很多，你们的代表都是工人，干部。为什么没有学生。我建议你们找个学生代表，看看你们的学生属于哪一派？

郝广德：清华井冈山驻呼联络站的同志参与了这件事情，应该有代表参加。

总理：可以参加一个人（后决定宁奎喜参加）。高锦明同志放出来没有？你们（对区党委代表）还叫高锦明来吗？

郭以青：高锦明同志是我们首席代表，要叫他来。

姜文启：如果让高锦明来，王逸伦也应该来。

总理：你们几个方面有什么意见？

郭以青等：我们同意让高锦明同王逸伦一起来。

郝广德：我们也同意。

总理：那就明天一起来，都不要带秘书了，区党委派一个工作人员来就行了（三司代表递上“818”和军区红色造反团给总理的信）

总理🤔看了后问黄厚）你们那里还有造反派？怎么没有他们的代表？是不是怕他们？

黄厚：我们不怕。（最后决定让红色造反团派一名代表——王建荣来）

张三林：我们也应该增加代表？

总理：不谈了，不谈了，如果需要增加代表，以后再考虑，先搞打死人的问题，今天就谈到这里。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廿二时二十五分至十七日一点四十五分。地点：人大大会堂。接见人：总理、肖华、曾山同志。被接见人：内蒙古自治区军区、区党委负责人及内蒙三司、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代表 25 名，刘华香列席。〕

总理一开始询问了高锦明同志和王逸伦的情况，接着问军区文工团红色造反团的代表张淑琴同志。

总理：你是红色造反团的？

张淑琴：我们的代表是王建平（军区文工团员），他们在监狱里，到现在死活都不知道，这群匪徒……

总理：不要这样说嘛！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工团还有和你们对立的组织吗？

张淑琴：有。

总理：叫什么名字？

张淑琴：叫“尽朝晖”战斗队。

总理：什么“尽朝晖”？

张淑琴：芙蓉国里尽朝晖，主席诗词里的一句。

（肖华同志念了一遍）

总理：啊！明白了，芙蓉国里尽朝晖。

张淑琴：还有叫“争朝夕”战斗队的。

总理：能叫“争朝夕”，不能叫“尽朝晖”战斗队，这有动词形容词的关系。你知道芙蓉国在什么地方吗？

张淑琴：在湖南。

总理：还是知识分子知道的多。“尽朝晖”有多少人？

张淑琴：20 多人，他们参加了军区联合行动总部，叫联动。

总理：你没有看看它是不是有联动的思想。

张淑琴：我们叫它联动，除军区 3%的少数派以外，都参加了“联动”。这个组织的行动纲领是“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也就是对付三司。还有几句口号是：服从指挥、绝对保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

总理：这都是解放军的口号。

张淑琴：我们廿多人都被打过，有的已快被打死。他们用针扎、用脚踢、我被打成脑震荡。

总理：其它被捕的多少人？

张淑琴：现在下落不明的九人。据同情我们的人透露，这些人在里面被打的遍体鳞伤。

总理：清华“井冈山”的宁魁喜来了没有？

宁魁喜（北京清华井冈山驻呼联络站）：我来了。

总理：你就是宁左吗？你什么时候去的呼市。

宁魁喜：九月去过，到包头钢铁学校看了看，半个多月就回来了，一月十八日去的呼市。

总理：你们在哪里有个联络站？

宁魁喜：有一个联络站。

总理：多少人？

宁魁喜：开始 11 人，军区给我们造了不少谣，后来又去了 20 多人，现在有 40 多人。

总理：还有别的学校吗？

宁魁喜：还有清华附中的。

总理：（翻了翻面前放的内蒙古日报问三司代表）你们十日、十一日的内蒙古日报还有没有？

郝广德：邮局让他们夺了权，邮不出来。

总理：报纸我们扣了（手里拿着师院东纵出版的小报“东方红”），我今天就要和你们谈谈这个问题，你们公开在报纸上点解放军。你们完全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

郝广德：我们骂的只是一小撮。

总理：这样也不行，主席和林副主席看了以后很不安，你们的脑子有点热了，

你们想到没有，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人民解放军的保护，你们能实行大民主吗？我知道你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你们在给人民解放军脸上抹黑呀！（总理站起来，很激动）我今天是抑制着感情说这些话的，你们当中不少是左派，现在我还承认你们是左派，但是这件事你们错了，就是死了人也不能这样做呀！我们不知有多少人民解放军英勇地牺牲了，我们这样做了吗？他们可以忍受各种委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伤了就说一句话：同学们啊，你们打错了，你们打了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保卫中南海就是这样，北京的卫戍部队，一句话没说。尽管红卫兵错了，我们也不说我们的红卫兵，更没有登过报。我们不能骂他们，不能说他们，要保护无产阶级的荣誉，近来到处出现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昆明冲过军区大院，进驻了军区大院内，使我们军区很难堪，杭州也是这样。大概，正是这样，你们以为什么地方都可以冲。现在冲军事机关成了风，这怎么能行呢？长沙冲了，贵州贵阳要缴解放军的械。我们说有坏人指挥，长沙不仅冲了，而且占了军区大楼，最后我们下令抓头子。是“红旗军”和“湘江风雷”合起来搞的。广州、南京是军事院校文工团冲的，沈阳也是这样，肖主任去解决的。不久又扩大了，他们要捉我们几十年转战南北的陈锡联同志，还抄了家。北京冲中南海，冲三座门，不仅抄了肖主任的家，还要找徐向前同志出来辩论。一直搞了五、六天，那怎么能行呢？这是我们绝不答应的。这样做，就是对解放军不信任。如果有一小撮坏人，可以报军委嘛，我和首都三司也讲过。

就没有想一想，我们这样搞大民主，只有毛主席才能下这样大的决心。我就没有敢这样想过，也可能你们是先知先觉，我反正是后知后觉。过去农村包围城市，解放军席卷全国，解放全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夺权斗争是个长期的斗争，主席说这是长期的问题。从 49 年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三反五反的斗争，包括清匪反霸，57 年反右斗争，62 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矛盾，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63 年出来的前十条。这次是有领导地自下而上的夺权，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次夺权靠什么？靠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靠社会主义道路，靠 16 条。没有这个前提，革命组织怎么成立呢？怎么斗争，怎么夺权呀！我去年九月给首都三司讲过，九月我们强调路线斗争，三个月后强调夺权斗争。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力量，还有物质力量，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没

有解放军，无产阶级专政靠谁来保卫，有个“岿然不动”战斗队，没有解放军能岿然不动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为什么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呀？我们为什么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呀，这就是因为我们有伟大领袖，有人民群众，有人民解放军。当然，解放军的某一个人有错误，但不能给我们的解放军安上。八月初主席表扬过的清华附中那三位同学现在怎么样呀，（宁左：成了联动）我们的工作作的不够，我们应该帮助。你说蒯大富没有错误？聂元梓没有错误？要帮助嘛！红卫兵的领导成了联动，我们很痛心，我们是有责任的。他们有过功劳，我有时间还想找这三个同学谈谈。主席看得远，抓住了红卫兵这个新事物，8月18日接见，我们饮水思源，还不是清华附中带动起来的吗？他们首先冲向社会，震动全北京城，我们感到措手不及，这是历史的发展嘛！那时打人的、抄家的、荆阴阳头的也有，但那是初期。国庆以后，我们重视大学，中学就抓得少了，就出现了些问题。组织纠察队违法乱纪，我们也有责任。谭力夫的讲话，不但保守派受影响，对造反派也有影响。是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一个战斗队，首先大量印的谭力夫的讲话。陈伯达同志的那篇讲话后，才开始纠正。这个问题还要很快地作工作。现在联动发展到全国，不能光靠公安部门抓，另一方面坏人钻空子，所以才有红旗军，战备军等。群众是好的，这是内部问题，我们绝不在报上登，即使登也只登头子，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什么叫革命组织？接受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服从 16 条。谁要遵守这些就是革命组织。除非后期死保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才说他们的方向错了，比如：北京的红旗军，哈尔滨的“八·八”团，我们把头子找来谈，指出：如果再前进一步就反动了，他们都哭了，回到哈军工第二天就散了。现在，左派从政治上的优势已发展到组织上的优势。你们双方都在争取群众，将来要由你们的行动证明的。解放军出来支持关系很大。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了五条，解放军一出来，左派就从政治上的优势变成组织上的优势，象西安交大造反派占 98%，西安工大占 80%，左派组织内部也包含着左、中、右，这就需要正风，否则就容易被坏人利用。内部没有反对派是不行的，国民党宣传他们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毛主席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就是有党嘛，党内就是有派嘛！红卫兵做了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我们“老大难”的问题，红卫兵一下子就解决了，比如资本家的定息，今年就没有了，水到

渠成嘛。可是有些事红卫兵认为一封就行了，那怎么行呢？比如民主党派、政协，实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就有资产阶级政党，让他们公开存在比转入地下活动好。党外无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对的，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超过了斯大林，这是肯定的。斯大林后期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所以我们说他三七开。青年同志们很单纯，比如，砸烂XX的狗头。他又不是狗，你能砸烂他吗？还让“喷气式”的照片上了报，让外国人看到，很不好，你们无产阶级气魄不足，（肖华同志插话：现在不但有砸狗头的，还有砸猪头的）。这表明，斗争水平没有提高。我们很不安。拉萨、新疆甚至提到，叫解放军滚走，叫解放军掉转枪口。这说轻一点，是天真，重一点是走入歧途。韩桐同志牺牲了，我们派曾山同志去，电报写的很明白，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如果解放军有错误，你们可以提出来，中央可以解决。我们是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一旦敌人来了，首先冲锋陷阵的还是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我和解放军谈话几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和红卫兵则要好几个小时。青年人不能怪他们，让他们学习学习，只要你们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什么问题都会解决的，不能因牺牲了一个同学，一些同学被捕，你们就这个样子。事情闹成这样子，双方都有责任。现在你们把问题激化起来，这样怎么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文化大革命呀？怎样备战备荒？这样无法夺权，三缺一嘛！

郝广德：因为他们围攻。

总理：你们那些围攻都对吗？北京围攻，你们三司开始也支持过（对清华）。西安砸了光学仪器厂，这里边主要有坏人、工人、学生我不相信会去砸，这些军事工厂不能让外面的人去串连，现在出现的现象已经超过十六条所许可的范围。军区有军区的责任，两方面的群众组织要好好想想。总之，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人民解放军的保护，我们能这样吗？那样帝修反都会动起来。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才敢下这样的决心。今天任何人都不准动摇我们解放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声誉。当然，军队中也可能有坏人，但我们应该相信党和毛主席能够自上而下解决的，不要直接采取行动。尽管你们有千条万条道理，中央给你们的这份电报（指国务院、军委召集内蒙各方面代表赴京的电报）是内部的，你们把它登在报上，这样一登，拿出国外一散发，外蒙古马上就有了。我看了这个以后，很后悔，说老实话，后面的一段是我加的。当然是经过林副主席批准的。本来能够电话通知，

主要想把你们赶快叫来。不料，你们给登了报，同学们，你们年轻，就这样不爱拥我们解放军吗？这个问题我负责到底。你们登报这件事，我们是很不安的。我们已电话告诉军区，他们已停止宣传，地方还没有停止。

宁魁喜：他们也没有停止。

董玉华（三司）：今天下午三点，他们还在宣传，有 30 多辆军队宣传车，以给报社报喜为名，从新城游行到师院。当时师院同学说“欢迎解放军，”他们还宣传三司是反革命组织。至于我们韩桐同志的灵堂，我们已不接待了。韩桐同志的家属，曾山同志验尸以后，我们派人送了回去，但遭到军区的围攻和软禁。

张三林（红卫军）：周总理，我们根据您的指示，再没有搞宣传。可是他们，在呼市大量印发传单，还搞了假录音，15 日他们召开了二万人的大会，宣布了伪造的中央三项决定（说完将近几天收集到的三司方面的传单交给了总理。）

宁魁喜：这两天他们继续夺权，夺权都是拳打脚踢。军事院校的学生，红卫军见了就打，他们专打戴眼睛的。

郝广德：保守派在军区配合下，夺了邮电局的权。

张三林：说我们昨天游行示威，这是污蔑。

陈基隆（红卫军）：你们的袖章原来是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现在改成了革命造反司令部了。机关干部红卫兵属于你们观点的，戴的革命造反司令部袖章，我们单位属于你们观点的，挂的牌子就是三司令部东风的红卫兵，属于三司令部指挥。

张启生（无产者）：这些传单都不利于我们的，请总理考虑。

陈永华（三司）：军区把我们（工学院井冈山）两名战士给逮捕了。

总理：他们叫什么名字？

陈永华：叫梁志超，任福喜。2 月 4 日在军区门口逮捕的。

总理：都是你们派去的？

郝广德：有串连的，有派去的。

总理：可能你们联系时人家已经去了。

郝广德：不清楚。

总理：你当时在场吗？

陈永华：我当时参加静坐。

总理：这两个人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陈永华：还没有，我 15 号打电话，说还没有出来。

总理：师院还有没有？

郝广德：现在没有弄不清楚，需要进一步查正。三司在各盟市的联络站失踪了不少人。

总理：有几个人？

郝广德：正在查。

总理：你们三司在各盟市有多少人？

郝广德：不清楚。

总理：外地到呼市串连的人怎么样？

宁魁喜：截止 15 日 11 点，清华井冈山有三个人还没有下落，军事院校一个人也没有放出来。

军区代表：昨天有 30 多人，军区给买好火车票，用汽车送往车站，一下汽车，全跑了。

张淑琴：今天二医大回来 11 人，打得太厉害，住了三〇二医院。有一个吊起来打，把手脸给打坏了。

宁魁喜：我们现在打电话不灵。

总理：现在正在夺权，不要说你，我这个总理说了也不算罗。

张淑琴：三军院校也要派代表来。

总理：我派人去调查，不能都来，（总理问三司方面）工人方面，以及别的组织和你们有联系的有那些？

郝广德：有工人的、农民的、职工的、共有八个组织。

总理：能不能叫他们一个组织来一个代表？

郝广德：他们强烈要求来。三军院校也要求来，（写了一个单子给总理）。

总理：联络员同志通知，让他们八个组织各来一名代表。

姜文启（军区）：我们来京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要解决，得找一找根本问题。内蒙地区现在究竟执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总理：如果现在问区党委执行什么路线，对方也会提出军区执行什么路线。

姜文启：主要看看事态为什么形成的？

总理：你好象抓住了要害！好象我抓不住似的。如果象你那样，问题怎样解决？这不是用大帽子压我吗？得把事态先平息下来才行。你的意思无非是说后头有人指挥，指挥的就是区党委。你胆子小，我替你说，应该先把事态平息下来，以后再考虑下一步的问题。

曹文生：总理十日接见我们以后，指示不要把事态扩大。我们坚决执行了总理的指示。我们发现有一张传单是我们下面财贸系统的，我们马上进行了制止（说着将此传单交给总理），但三司却变本加厉，造谣生事，他们来了二百多人，他们打着来京告状的旗号，来到北京以后，他们把我们的联络站封闭了，抢走了东西。我们建议在北京的人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总理：我劝你们首先不要对骂。联络员，你负责以我的名义打电话，通知各方面，从十八号零点起停止对骂，宣传车、传单都停止，一切报纸都暂停几天，登中央消息，不然越骂越激动。这个问题要求你们负责。因为内蒙问题影响很大，不能搞亲痛仇快的事情。要停止互打，抓的人要放。如果 18 号再发生互打，我要查肇事者。双方暂时不要开游行示威大会，你们应该给我一个礼拜的功夫，从下礼拜起我们几个人分头做工作。内蒙报属于哪一派？

张三林：我们。

总理：你们可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不要登载攻击性的文章。

郝广德：他们军区尽搞武装游行和武装巡逻。

总理：要停止市内武装游行。

张三林：还有八大员，河西公司二十四个人，据说被“八一八”抓走了，还有六个人受伤的住了 253 医院。

郝广德：据说：应该实事求是。

总理：有可能。

张三林：另外，我们这里，有十七人是三司伙同区党委批准签名以后抓起来的。

郭以青：没这回事。

徐万陶：看看这是什么（当即站起来，举起由高锦明、李质、孟琦签字的拘留证）。

总理：拿来我看看。（徐把拘留证送给总理）

张三林：这 17 个人现在在北京，要求在总理面前控诉。

总理：可以考虑来两三名代表。

郝广德：我们要求军区不要用汽车拉农民到城市来，影响备耕生产。军区控制了粮库油库，以后每天只供给我们 600 斤粮食，对我们吃粮食都加以限制，还夺了火葬场的权，控制了血库。还有抗大是个反革命组织，提出了二十二问中央文革，总理看怎么处理。

徐万陶：抗大的问题，内蒙党委已作了调查，抗大同学早就要求公布调查结果，但是内蒙党委至今不公布，内蒙党委必须回答。

高锦明：因为他们想利用这个调查材料攻击三司，所以我们没有公布。

郭以青：而且这个调查组是由他们观点的一个人调查的，调查以后给他们的人看了。

徐万陶：郭以青刚才说是我们的人调查的，那你们为什么不早提出，你们为什么不找“公正”的人去调查？12、12 事件（提出抗大是反革命组织）发生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为什么至今才提出？调查结果不算数？

总理：有材料吗？（徐万陶：内蒙党委有。）

总理：拿来交给我（高锦明：现在没带着）。

张淑琴：我们要求释放军区的少数派，要求把王建平叫来，另外我们还要求来五名代表。

总理：对等？我还得研究研究。

张三林：抗大牵扯到乌兰夫的儿子力沙克，抗大也应该来人。解决抗大的问题，应该有抗大的受害者参加。

郝广德：力沙克是乌兰夫的儿子，已经打成黑帮。

总理：铁路局现在是不是军管？

曹文生：由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接管。

总理：现在还有没有军队？

曹文生：已经撤走了。

郝广德：还有军队撤到一楼了。

曹文生：那是军运处的。

总理：过去有吗？

曹文生：过去就有，那是负责转运的。

郝广德：现在到处都有军队，连火车上也有军队。

总理：那是我们派的。局势的发展，就看你们能不能执行我提出的四条。能不能执行四条，是听不听中央的话的问题。现在要首先共同维护解放军的荣誉，这是我们的最高利益。我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从明天起，分别派人和你们谈。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周恩来与呼和浩特市“三司”代表的谈话

〔地点：国务院秘书厅会议厅。参加者：总理联络员赵刚、朱文明、总理秘书张作文。代表：郝广德、刘文研、张淑琴、刘树立、金世魁、宁奎喜（中间才去）〕

（总理步入会议厅分别同代表握手）

总理：你们和军区关系没有搞好，那怎么能行呢？他们打电话说，你们还散发传单，继续闹对立，你们组织内部有没有人在挑动啊？

郝广德：我们查了，没有什么挑动，我们从十八日以后停止了一切宣传。

总理：你们学生都回学校整风不好吗？

郝广德：我们正在整风。我们总部被砸了，没有地方呆了。

总理：什么时候砸的？

郝广德：三月七日夜间一点。

总理：谁砸的？

郝广德：红卫军。

总理：有多少人？

郝广德：三万来人。

总理：打伤人了吗？

郝广德：抓走了八名，打了很多。

总理：谁带头？

郝广德：红卫军、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同时还包围了师范学院，有二十多辆军用汽车，十多辆军用摩托。

总理：包围师院什么理由？

郝广德：军区说我们藏了军区人，下通缉令抓陈树健。

总理：你们有没有？

郝广德：没有，保证没有（把军区给师院东纵的信及师院东纵回信交给总理看）

总理：（看完后）敖特根……这不是抓了四个吗？

郝广德：那是从工学院抓走的！

总理：陈树健是干什么的？

张淑琴：红色战士报的编辑。

总理：军区的事，你们不要管，你们保护他们，对他们没有好处，反而害了他们。回去检查一下就算了！

（张淑琴把军区通缉令递交给总理阅）

郝广德：他们包围师院时，有剧烈爆炸声，外面有探照灯，人员匍匐前进，喊冲啊，冲……

总理：这是精神战嘛！师院有多少人？

郝广德：有一千多。

总理：下乡、下厂的学生都要回学校整风。清华的来了没有？

众：没有。

总理：清华在呼市三市的同学回来了没有？

郝广德：回来了，被抓的还没有回来。

总理：押在什么地方？

张淑琴：在军区。

总理：谁？

郝广德：陈鼎。

总理：不是已经放了吗？

郝广德：军区还没有放，他家长写的信，你见到了没有？

总理：没有。（又问秘书。答：没有。）首都三司在呼市的其他人还有吗？

郝广德：等陈鼎的还有两名。

总理：陈鼎是怎么抓的？

郝广德：因为他路过静坐的地方，说他是头头。

总理：他多大岁数？

郝广德：十六岁。

总理：中学生？

郝广德：是清华附中的。

总理：你们三司总部在总工会？党委给你们拨过款，拨过汽车？

郝广德：在总工会。拨过。和一司、二司一样，拨过一辆汽车，一辆摩托。

（郝广德把逮捕医学院六名“现行反革命”公告递给总理看）

总理：那三十三人什么时间被抓的？

（郝广德详细汇报了抓人经过及被捕人名单）

总理：什么理由？

郝广德：他们说三司是反革命组织。他们正在开整风会。被抓的人，有的是抢救韩桐同志的医生。戴上手铐，有的五花大绑，把衣服撕烂。田光同志是转业军人，身体有病，现在有生命危险。

刘树立：抢救韩桐同志的汽车司机小高，他们也要抓。

总理：一共抓了多少人？学生多少？工人多少？（查看被捕人员名单）

（刘树立汇报了被捕总数）

总理：学生多，还是工人多？

郝广德：大部分是学生。

总理：十八号以前抓的吗？

刘树立：大部分是十八号以后抓的。

总理：押在什么地方？

刘树立：工人押在呼钢，有的押在军区、公安局。

总理：（记被捕人所在单位、分学校、厂矿、机关），抓人理由就是说三司是反革命吗？

刘树立：还有其它借口。

总理：工人抓了多少？

（刘树立汇报了呼钢、机床厂抓人情况）

总理：你们铁路上还有什么车？

金世魁：二月八日反夺权抓了我们二十多名同志，还有十二名同志至今未放，其中：有付局长邢骏、政治部主任张泽民。

总理：为什么抓的？

金世魁：就是因为邢骏在炮打司令部时给党委成员贴了一张大字报。

总理：这两名同情你们吗？

金世魁：对。

总理：现在押在什么地方？

金世魁：据说在军区。

总理：以前没上班的现在上班了没有？

金世魁：二月八日反夺权以后，我们有五百多人不能上班，经我们作思想工作，有八十名调度生产人员上班，现在有四百多名同志仍分组集训。

总理：现在有一半人没上班，机务运输怎么办？业务能正常进行吗？（问联络员说：问一下徐彬，呼市的运输情况到底怎么样？）（对张淑琴）就你一个人在这里有什么消息没有？

张淑琴：把以前在这的十六名同志都抓走了，五花大绑有个女同志喊毛主席万岁，他们就用手帕把嘴堵上。

总理：你怎么知道的？

郝广德：有我们代表亲眼看见了。他们还说奉军委和总理指示抓的。

总理：（生气地）我怎么能指示抓人呢！

张淑琴：（把通缉令交给总理看）现在工资和粮票都不给我了。

（宁奎喜五点五十分进入会议厅）

总理：陈鼎还没放？

宁奎喜：没有。

总理：谁叫你们静坐的？

郝广德：没有人（详细汇报 1.22，1.25 事件）

宁奎喜：（作补充）

总理：刘昌不出来作检查，你们可以写信么！不要登报么！你们一登报不就对立了么！

郝广德：我们登报错了，我们应该作检查。我们登报是 2 月 4 日后才登的。

总理：他们说你们以前就登过报！

郝广德：没有。

总理：（对秘书）内蒙日报收集全了没有？（秘书把报纸拿来，总理翻看几张）你们有什么材料？

郝广德：我们有。（送上军区等散发的传单和反夺权后出的内蒙古日报）他们在 1 月 27 日就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了（掏出 36 个组织的传单）。

总理：（详细看一遍）你们骂过肖华吗？

郝广德：没有。骂肖华的那张传单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卫兵中央委员会”散发的。

总理：你们骂过军区是罗瑞卿的部队？乌兰夫的部队、黄狗子？

郝广德：我们没有。可能有个别人骂过，其他都是造谣。

总理：有一些根据，你们两家对骂么，当然要扩大事实了。高锦明是你们的后台吗？

众：不是。

宁奎喜：说高锦明、李质是我们的后台，我们连样子都没有见过。

总理：你们为什么跑步进入军区？

郝广德：（介绍 2·5 事件经过和二医大在招待所被围情况）

总理：你们清华的到军区宣传了？

宁奎喜：去了。我们没进军区，在外边宣传了。

总理：你们对军区乱叫，哎，那怎么能行呢？看你们把这事件闹的，越来越复杂，二医大到处捅，捅完就走了，把负担加在别人身上。

郝广德：二医大被围攻，我们去援助。

总理：你们红卫兵就管得宽，什么都管。军区的事么，问题越搞越复杂，跟军区对立，使你们处于不利地位。

宁奎喜：（站起来）总理，我提个问题，“全红总”在内蒙很猖狂，要集合 50 万人到北京，怎么办？

总理：能能有 50 万？

宁奎喜：他们电报那样说的。

刘文研：“国际红卫军内蒙支队”、“中国红旗军第四纵队”、“联动”，这些在呼市都没有取缔。

总理：有材料吗？这些头目都是谁？

郝广德：正在整理材料（递上关于工农兵委员会材料一袋）。

总理：这些材料很有用嘛！（封完材料袋）你们学生回学校，工人回工厂，军区的回军区，进行整风，属于联合性的组织，暂停一切活动。

众：我们完全同意。

张淑琴：总理，我们的人都被捕，怎么办？

总理：还是放出来教育么！不要捕。

郝广德：总理，现在有人给乌兰夫翻案。

总理：那怎么翻得了！（带上纪录步入另一间房子）（郝广德：他们还老是夺权）夺来夺去，你让他们夺去吧。

郝广德：呼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军分区付参谋长马伯岩同志被军区逮捕，他是军队系统的干部，在运动初期派到地方的（总理纪录）。

张淑琴：就剩我一个人怎么办？

总理：我让你当代表住到这儿，你懂吗？

郝广德：全区各盟市现在都很紧张，各军分区说总理指示五天内适用，只适用于呼市，不适用于各盟市（总理作记录）。

（总理对整个谈话都亲自作了详细纪录）

（注：在本次接见的同时，总理也单独接见了红卫军方面代表，本集未收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早三点二十分至六点三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见人：总理、康生、肖华、李天佑、王力、关锋、戚本禹、徐立清等负责同志。被接见人：内蒙古军区：吴涛、肖应棠、刘昌、黄厚。内蒙古党委：高锦明、李树德、李质、郭以青、张鲁、王铎、王逸伦。呼市三司代表郝广德等五人。红卫军代表张三林等五人。〕

（总理、康老等中央负责同志进入会议室坐好后，即问郝广德同志最近回呼亲自看到的情况。郝广德同志哭诉红卫军等同军区某些人结合起来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情况。当汇报到军区派兵在北京抓军区造反派的同志时）

康老：在那里逮捕的？（答：在北京）逮捕的什么人？（答：内蒙古军区革

命造反派的同志)

(乔万宝、郝广德同志介绍了军区派人在北京政法干校和三机部招待所抓捕人的情况)那一部分解放军?查一下。

肖华:一个管理局长,带他老婆来北京,军区说失踪两个多月了,也派人抓走。

总理:你们派多少兵来北京?(肖应棠:一个班)经那里批准的?(黄应棠、黄厚:报军委了)你们派一个班进来,我们不知道,就是北京卫戍区同意就行吗?卫戍区是保卫毛主席的呀(告秘书:请卫戍区傅崇碧同志来)!跑来一些人,劝说回去是可以的,怎么能抓?把人家夫妻两口子在西单大街上抓走?

康老:怎么能在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派兵抓人?(查问了傅崇碧同志内蒙古军区派兵来京抓人的情况)

总理:你们派武装来北京街上捕人,这也是特殊的哩!这件事情,是在发生之后我们才知道的呀!

康老:你们把部队拿出来对付群众?

总理:你们一方面在家亮了政治态度;一方面在北京商谈,这样,还谈什么?你们(问刘昌)是怎么处理不要对群众组织(如对“818”)宣布是什么性质的组织的问题的?

刘昌:我们没有宣布“818”是反革命组织。

“818”代表杨民众同志:不光宣布了,还抓起来不少人,打了不少人。

戚本禹:在总理面前你都不讲事实,你怎么对待总理?(刘昌:你不要吓唬人!我听总理的)

关锋:你们胆子太大了!真是胆大妄为。你们把我们的记者都抓起来。你们知道不知道《红旗》、《解放军报》记者是中央文革派的?如果他们有问题,该枪毙回来枪毙,可是你们就扣押了起来。直到肖主任打了电话才放了回来!

康老:(念刘华香的电话记录)“十八号的大会暂时不开,什么时候开?以后再研究。”总理告诉你们不要开了,你们说什么时候开以后再研究。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总理的电话。倒是你们眼里有没有中央?你们眼里有没有毛主席?你们完全目无中央。

关于省市自治区一级夺权问题,总理都得请示主席。你们说你们研究。师范

学院不准围攻，也告诉你们了，有问题中央解决，你们不听。你们究竟愿不愿意中央来解决问题？还是你们自己解决问题。总理的电话，你们是怎么回答的？不让你们开会，你们还说“什么时候开再研究！”不回答中央的要求。三司有无错误？有错误。

王力：还不一定，就从他（指刘昌）今天的态度看，你倒是军阀？还是解放军？到底是那个错误严重，就象你们所说的也好。他们（指三司）不敢反对中央。

《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刊物你们竟敢扣押《红旗》的记者。你知道《解放军报》是谁领导的？（刘昌：解放军呗！）是林副主席，我们毛主席是最高统帅，你们把解放军报记者也扣了起来，把笔记本没收，至今不还！

总理：（问黄厚）有没有这件事：你们为什么不报告？这件事我今天才听说。把那两个记者请来。

戚本禹：倒是你大？还是中央大？是你大？还是毛主席大？是你大？还是肖主任大？肖主任打了电话才放了两个记者！

肖华：是派武装押送回来的。

徐立清：叶总办公室打过电话，我也给他们谈过。

王力：对我们都是这样，何况对群众？你们按主席思想、党的政策、人民解放军传统冷静地想一想。

总理：十八号你们要开会，十七号报告，还要飞机，这是先斩后奏，不让我们解决问题。“818”可能打人，组织可能不纯，但是几千人的组织怎么能宣布为反革命？军事管制河西公司是你们要求的。中央的话实际上你们不听，我们不能不耽心内蒙古军区站在什么立场？不让你们包围师范学院，你们不听。用这种方法是把三司瓦解不了的！

肖华：他们是独立王国，无组织无纪律。

关锋：他们是“中央”。

康老：夺权得中央、毛主席批准才行的。三司可能有错误（总理：他们已经作了检讨），但比起你们所犯的错误究竟那个大？他们不敢反中央。你们冷静地想一想，按照毛主席思想，党的原则，军队的光荣传统衡量一下，在具体问题上可能各有多少错误，但比起你们这种思想来，究竟怎么样？总理给你们讲的，究竟算数不算数？

总理：不算数。你们表面上似乎听中央的话，实际上你们不听。我们办事都得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但你们不是这样。你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耽心内蒙古军区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你们把那么多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同群众搞得那样对立。内蒙地处边防，背靠苏、蒙修正主义，我们怎能不耽心？吴涛同志，你是第一付政委，你应该两方面负责，派你去呼市看一下，你敢不敢？（吴涛：总理决定了我可以回去）中央文革也去人，联络员也去一个。

康老：你们要开大会，是要把你们的意见强加于中央。你们要飞机，还要登报？你们眼里有无中央？总理要在北京亲自主持解决问题，你们就要按你们的意见办？你们都是老干部、负责干部，我们对你们就要严格要求，一定要按毛主席思想办事嘛。

总理：由于学生在军区门口静坐，发生了问题，调你们来商谈解决问题，找你们几方面谈。二月十七号定了四条，你们是同意了。但一个月来你们并没有按这四条办事。找你们来商谈，是要把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搞大联合、夺权，但这一段你们不是按中央意见办事。

第一、你们竟然在军区门口把《红旗》和《解放军报》记者扣起来。四大自由嘛，记者没有这个自由？肖主任打了电话，你们还要押送回来。扣留了笔记本，在黄厚手上一个月不报告。记者报导如不符合实际，你们可向上反映嘛，怎么能扣留？这件事就是对抗中央，没遵守军委的命令。在军区门口发生学生静坐以前，刘华香就请示过要调兵的（徐立清同志：叶总办公室曾告诉过他们不要调兵）。

第二、刘华香开完会，本来想要留他商谈解决问题的，他不招呼就走了。他回去后一个来月，办事是不合乎中央意图的，越走越远。

第三、河西公司的事，提醒过你们，不让你们宣布“818”是反革命组织，表面上你们听中央命令，但你们在下面宣布，这是耍两面派么。

第四、宣布人家好多组织为反革命，怎么能这样压制？即使是保守的组织，也要教育提高，怎么能压制？完全不是对待群众组织应抱的态度。这是刘、邓路线（康老：这是反毛主席思想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五、你们派部队来北京，就是你们要指挥中央，你们目无中央。北京卫戍区是保护中央，保护毛主席的。你们派兵来大街上抓人，是要为所欲为。

第六、还有这样的传单（指军区印的陈鼎写的材料），还加上了按语。清华

附中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即使是他写的，也要劝说他不要写。你们还加上了按语，印发传单？如果是你们写的。这样做不是破坏解放军信誉吗？这怎么能这样对待红卫兵？何况对红卫兵，你们对中央文革的记者都那样对待，这是对抗中央！

第七、你们包围了师范学院，据这位同学（指郝广德）讲已经三天了。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那样对待？这是你们有指挥的，要把一个群众组织搞垮嘛。对这个问题，打电话你们没有回答，还要中央去调查！这一个月来你们进攻，不照中央的意图办事。清华附中同学的信，如调查属实是你们强迫写的话，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你们欺骗中央。

第八、开大会夺权，说是搞呼市的庆祝，实际上是夺区党委的权。权星桓、康修民实际上是让你们掌握的群众组织抓起来了。对区党委书记，你们军区政治部就定了性？你们比中央在先把名字点了，不夺权也等于夺权了，你们有这么大的权吗？七、八号夺权（指呼市）根本没有报来，十五号登报，明天要开大会，还要批准登报，都不是商议，是给我们下命令，统统是先斩后奏，你们犯了多大的错误！

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不能再忍了。这些你们都没请示过中央。你们想过了没有？这么做对不对？（郝广德：他们把十八号开会的事在广播电台广播了）噢！报纸、广播怎能有同中央不同的声音？你们掌握了报纸、广播，就登、就广播？广播问题的四点指示不生效了？（郝广德、高树华：他们把二十二问中央文革，在京参予反中央文革活动的“抗大”，在报纸上、广播上称为“左派”，要大家学习）这是反动的！你们（问《红旗》、《解放军》报记者）认为“抗大”是什么组织？（记者答：“抗大”炮轰中央文革，是反动组织！）

王力：这同他（指刘昌）思想一样，他也炮轰中央文革嘛！

总理：你们（问记者）的笔记本让他们没收几本？（记者答：一个三本，一个五本）把中央文革派的记者的笔记本都没收了！带来一个月不报不交（黄厚：这是我们的缺点）！什么缺点，这是反抗中央！

你们（问记者）有勇气再去呼市一趟吗？（记者答：有）好，吴涛同志带队。联络员也去一个（肖华，徐立清同志：军委文革也去一个）。

把你们抓的人都放出来（念了权、康、雷及三个秘书的名单）。

总理、王力：你（向吴涛）去了要按党的原则，实事求是办事。

总理：这是对你的一次考验。坐飞机去，可住在机场，调查方便。可找几方面的人谈，到现场去看，先到师范学院去看。

几派的人正在这里商谈解决问题，怎么能把一派压的垮了？你们这样做，我们怎么能信任你们。军区领导人你们面临很大的危险！你（问吴涛）是第一付政委吗？肖主任说了，我们信任你，立即恢复第一付政委职务。

王力：你们到呼市后，愿意到那里就那里，愿意找谁谈就找谁谈！

总理：这说明你们（指军区）的立场问题，是执行刘、邓反动路线。你们说群众大会不开了，还是要开向中央示威？是真不开了，还是搞什么？这都要看一看。对区党委的六位同志要立即恢复自由！

肖华：肖应棠你马上打电话，要保证中央调查团的安全，出了问题要由你负责）。

总理：今天会上谈的不能向外传，四方面各负其责。

戚本禹：今天是内部调查会，内容严格，不能向外传，一定要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声誉，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王力：问题到了今天，不能不严肃指出，但要用适当方式宣布。你们认识了，改正还来得及。

总理：你们回到京西宾馆好好讨论检讨。回头，肖主任、李付总长还找你们谈。

康老：一般的解决这些问题是，首先要承认错误，而后再区分性质；把矛头和群众分开来。

总理：李付总长你去一下呼市，不能多呆，可呆三、两天。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李天佑与内蒙古师范学院代表谈话纪要

〔地点：呼市新城宾馆。接见人：中央调查团团长李天佑付总长、吴涛政委、总参作战部付部长，《红旗》杂志记者于顺昌，《解放军报》记者宋学礼、总理联络员赵刚及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的同志。被接见人：师院《东纵》董玉华、郭是海、董文、戈志盛、杨永俊。〕

李天佑：我们是受总理和中央文革委托来解决问题的。师院这里问题很紧张，

我们到呼和浩特，特别是到内蒙师院来解决问题。听说你们被围困四天了，不能吃不能喝，总理很着急。总理和康生同志把我们叫去，开了一夜的会，今天早晨没有休息就坐飞机来了。我们到这儿，首先到“八一八”门口站了一会，就直接到你们师院。结果进了一楼就进不了二楼了。我们一看你们院里院外都是人，有几万人，一看就知道气氛不对。十六条下来了，八条命令也下来了，不许武斗。可是你们这里武斗仍然很厉害，双方对立情绪很大。当然了，这不能怨那一方，双方都有责任。我和军区的同志说了，要保证你们的安全。当然了，要按政策办事。过去你们在军区问题上有错误。有错误作个检讨就是了嘛！不会算旧帐。我相信军区不会把你们当反革命看待，我也相信其它组织也不会的。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要犯很大错误。所以你们之间要消除这种不必要的误会和隔阂，不要这样对骂。我们要采取紧急措施来解决问题。要你们自己解放自己，打开辕门，自己解放自己。

吴涛：李付总长要你们自己解放自己。

李天佑：你们有没有这种勇气？

众：有。

杨永俊：（向李付总长详细汇报了双方执行总理四点指示的情况）。

赵刚：你们院里有多少人？

董玉华：两千。

赵刚：才两千人？

众：还有其它造反派的战友。都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被砸坏了，家也被抄了，回不去，住在这里和我们一块战斗。

李天佑：你们打开大门嘛！我派一排人去徒手保护你们，保证你们的安全。看有没有人敢去冲你们。你们要解放自己，打开辕门。我明天去检查，看你们开放不开放。外单位的人，也要动员他们回去闹革命。

吴涛：那谁也不能抓人、打人。

李天佑：各群众组织不要再那么对立，对骂，武斗。在共同原则的基础上，找到共同的语言，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你们青年一代，比我们那时闹革命条件好多了。你们要更进一步。今晚你们就打开辕门。（回头对作战部长说）告警卫营，再去师院人就撵，要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要有这种胆量。我

们来就是支持你们的。当然，这种支持是政治上的支持，政治上的关怀，我们带来总理四点指示，不许抓人，不许打人，以前下的通令，通缉令都统统作废，不管是谁下的。我昨天晚上接见四个军事院校的学生，我要他们开门整风，总结经验，你们呢？为了进一步提高，也要开门整风。

杨永俊：我们今天下午看你们进院了，想接你们。有人看见里面有吴涛。我们以前听说吴涛被军区打成三反分子，不敢接他。

董玉华：我们怕军区搞阴谋。我们把吴涛接上来，他们就有借口了，可能冲上我们楼梯。

李天佑：吴涛不是三反分子，周总理、中央文革叫吴涛同志到你们这里来的。

中央文革同志：总理昨天晚上亲自点名叫吴涛同志来的，这是对他的信任。

郭是海：李付总长，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派人来解放我们，这样关怀我们，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代表一千二百名东方红战士托你向毛主席问好。我们一定誓死保卫毛主席他老人家。我们运动初就被打成反革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我们的，现在我们造军区刘昌的反，又被打成反革命了。他们叫我们“历史反革命……”

李天佑：如果把你们打成反革命，那是最大的错误。群众有错误，可以批评改正嘛！

董玉华：在军区问题上我们有错误。我们还用对待内蒙党委的作法对待军区的错误，在运动发展的关键时刻没有很好地跟上形势。特别是我们在报纸上点了刘昌的名，这是我们对毛主席犯下的罪过。但是，我们是有错无罪的。

杨永俊：军区内部也是有斗争的。看你们究竟是支持那一派。这次全国性的大反复，是资本主义复辟性质的。内蒙军区确实是支持了保皇派，王良太就大肆造谣。

众：我们就是有错无罪。

作战部长：这次李付总长来就是支持大家的，给大家解围，按十六条闹革命。刚才给大家念了总理的四点的指示，以前下的通令、通缉令一律作废。现在总理正在研究你们的问题，最后一定会得到很好处理的。在总理没作决定之前，找出一个好的办法解决问题。我们给他们（指红卫军、无产者、工农兵）指出了四条，你们也要那样去作。

刚才李付总长的讲话作为内部讲话，不要广播，不要印传单。因为这是开诚

布公谈的，传单搞出去就会把问题复杂化。刚才据他们说你们已经广播了，说中央支持你们，李天佑支持你们。他们对我们说：“三司说来，李付总长说三司是革命组织，抗大是反革命组织，要对他们专政。”

众：没有的事儿，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李付总长来。

作战部付部长：对抗大也不要采取那个作法，特别要按十六条办事。还说内大搞夺权，你们去人包围了他们。不管夺权、反夺权，都不要包围、反包围。这个情况反映得不一定对罗，不管有没有，都要注意。有了就改，没有就注意。特别要对下边作好这个工作。

李天佑：我有一个建议。一会儿我要马上打电话给北京汇报。今天总理打来两次电话了，问我。我们还有一个要求，去你们的楼上，看一看你们的同学，对同学们在精神上是个鼓舞和慰问。我和总理约定晚上十点汇报，十点以前去怎么样？

众：我们全市革命造反派热烈欢迎，这是我们最迫切希望的。

李：好吧！咱们吃饭去吧。

众：我们还有些事情。

郭是海：区党委领导干部权星桓，康修民，雷代夫被他们抓走毒打，我们要求立即释放他们。

李天佑：我和“无产者”他们谈过了，已经解决了。

郭是海：我们的战友还被关在狱中。

李天佑：还有？

众：还有很多呢？

李天佑：把名单提出来，明天我们要派人去看。

杨永俊：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支持三司而被捕的（符合公安六条的除外），一律都应该放。

郭是海：扣发工资的，冻结财经的，怎么办？

李天佑：这是错误的，我们跟他们（无产者）讲了，扣的工资要发，出去的人要欢迎他们回去。

众：回去还抓，还打。

于顺昌：先不要着急回去，过几天也行（李天佑点头）。

郭是海：你让他发工资，他不发怎么办？

李天佑：我要特别告诉自治区党委权星桓他们，给发。

郭是海：权星桓说话没人听，不管事。

众：他们（权、康）有职无权。

李天佑：他们解放了，有职有权嘛？

戈志盛、董文：我们的交通工具全被他们抢走了。

李天佑：这些具体问题，以后再解决。

郭是海：工学院井岗山，是我们最好的战友，他们要求接见。

李天佑：我们明天派人去看一看。

郭是海：我们要把双方执行李付总长的指示的情况及时向中央汇报。

李天佑：好。

董玉华：我们坚决执行，绝不以对方态度为转移。

赵刚：你们这种态度很好。

当晚李付总长、吴涛政委同调查团全体成员，机场军代表杨××乘车到了师院，并上了二楼。李付总长进院时又重申：你们要把辕门打开，跟平常一样，用不用给你们派一个排来保护？

杨永俊：我们一定马上把工事拆除，看明天的情况吧！

临走之前，李付总长说：时间来不及了，我要马上向总理汇报，请你们代向没接见的同志问好！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党委代表谈话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晚九时四十分至次日凌晨一时。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接见的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及中央文革、总理办公室、国务院秘书厅工作人员。被接见人：自治区党委代表中支持三司的有：高锦明、权星桓、王再天、李树德、康修民、李质、郭以青、张鲁；支持红卫军的有王逸伦、王铎。〕

（接见开始，总理一一问了区党委代表姓名，民族等，接着总理问最近呼市情况，由二十九日刚从呼市返京的李质、张鲁同志作了汇报。）

当汇报到“无产者”、“军代表”采取集训、写自白书等办法对待革命群众时）

康老：仅公安厅，公安局就集训 109 人。

王力、关锋：什么集训，就是集中营，思想犯训练班，学的国民党反省院那一套。

（区党委代表小组的同志汇报到××二师尤××说，中央调查团有八个右派时）

总理：调查团一共有九个人怎么有八个右派？（汇报到呼市街上三司开始贴出“打退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标语，军区曾派人照像，说是“反动标语”时。）

康老：连提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说成是反动宣传。在三月九日军区给中央的电报上就是这样说的。

（汇报到近日来呼市大放王逸伦攻击高锦明同志的录音时，总理要去，并看了王逸伦三月六日攻击高锦明同志的传单即“录音稿”。）

康老：你（指王逸伦）的讲话毫无检讨，顽固坚持刘、邓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问题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呼市这一时期发生那么多打人，抓人事件，你怎么看法？你表示过什么态度？向谁表示过态度？高锦明，权星桓同志的问题我们不做结论，你们辩论去，有他们的帐在。我就问你对群众的态度问题。

（王逸伦答：我不赞成；向家里打过电话；向军区、“无产者”都谈过。答话时口口声声康生同志、康生同志。）

伯达：“无产者”实际代表有产者。

江青：现在是我们在问你！我看你一口一个康生同志，是质问的口气，很不尊重康老，很嚣张！

（王逸伦：我怎么嚣张？）

江青：是你嚣张！

王力：你很嚣张！我看呼市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套，就是你指挥着干的，可恶！

康老：王逸伦，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在你的讲话里对路线问题怎么不表示态度呢？学生冲军区是错误的，三司已经承认了错误，做了检讨。但对柳青打死韩桐你怎么看？表示过态度没有？把解放军报社记者押起来你认为对不对？你和军区谁谈过这件事？军区派武装来北京，来毛主席住的地方捉人你认为对不对？你光相信军区的话，你相信不相信总理的话？你认为包围师范学院对不对？你为

什么在十八日早晨总理接见时不表示态度？

（王逸伦作了回答。当区党委的同志揭他的一些问题，王一再说“造谣”时，）

江青：人家提出问题，你就是“造谣”二字。有的是三对面都对清楚了，你怎么装糊涂！

总理：是顽固的坚持刘、邓路线，又是乌兰夫的人。乌兰夫保过你。

康老：是乌兰夫的暗藏分子。

（汇报到近日间仍然有的单位打人、抓人时，王逸伦说三司近来有活动，是三司挑起的。）

王力：你还让他们永远不活动吗？

（汇报提到王逸伦的二儿子在二中是打人凶手，被革命群众曾送公安局拘留，王逸伦的大儿子是二司的发起人时）

康老：你（指王逸伦）支持“无产者”看来是有血缘关系的。

康老、王力：内蒙古都象你这样的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里能贯彻？

（当王逸伦提到过去对各群众组织都是同等待遇，没有偏向时）

康老：那你对“抗大兵团”也是同等待遇的了！

总理：你不是说在二月六日以前你和区党委一致的吗？区党委支持三司分明以后你怎么样？

（王逸伦讲到三司砸、抢、打时，）

康老：那么“无产者”他们就那样好吗？

王力、关锋：近来“无产者”这么样的乱砸、乱打、乱抓时，你表示过什么态度？

总理：在你的这么长的报告里，对此根本没说一句话。是不是因为你和他们“三结合”了？你这个报告是不是“三结合”的纲领？

总理：（问王铎）你怎么到北京一个多月后又倒过去？你的信上为什么对军区的错误一句未提？

（王铎答：我的认识有改变。）

康老：他就投降了。

总理：是搞投机。

（王铎叙述他改变观点的三个理由：对学生冲军区的问题；对三司的看法；

对高锦明的问题。当他谈到学生冲军区，高、权、李质等同志没有坚定地做学生工作（工作时）

康老：你去作过工作没有？

（王铎答：我当时做别的群众的工作，以后也去作过工作。）

总理：你是要同他们“三结合”了。

伯达：你作工作，你代表什么阶级去作工作？你俩是代表地、富、资产阶级，戴了顶“无产者”的帽子。

（当王铎谈到他坚决执行主席革命路线时）

江青：那个主席？是我们的毛主席还是你们那个刘主席？

伯达：你们那个资产阶级立场不改变，其他都谈不上。

康老：在全国，向群众打第一枪的是内蒙×区！你们知道不知道？（王铎：不知道。）

总理：你怎么不知道？你的信是三月十五号写的嘛！你去做工作了没有？你是要同他们搞“三结合”的了。

康老：象王逸伦你们这样的人要是成为“三结合”的对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内蒙古就失败了。

（当区党委的同志谈到“无产者”现在正四面出击，声言要同三司搞“大联合”时）

伯达：（指二王）你们要搞什么大联合？我们谈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你们搞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大联合”。

总理：原来想听听你们有什么检讨，你们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不改变，怎么能检讨？

康老：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内蒙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吗？今天你们两个的表现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

总理：是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反扑，是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复辟。

康老：你们一点群众感情，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是没落的阶级，还谈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从当权派中把你们这些人清除出去，是很危险的；不清除出去，中国那有社会主义？那有共产主义前途？

伯达、康老：你们俩是没落的、死亡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

（当王逸伦不承认内蒙现在情况仍处于恐怖状态时，康老让中央文革张同志介绍调查团十八号去呼市宣布了中央对军区的批评后，遭到了军区一些军官和林蔚然等围攻情况时）

康老：这么一个大事实你硬不承认。你们看看这些，这都是你们支持的。你们是支持白色恐怖，这完全是反动统治，你们两个就是代表。

王力：是法西斯统治！

康老：高锦明、权星桓同志有错误，有他们的帐。我问你们：军区政治部宣布高锦明、权星桓同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同意不？你（指王铎）的信上提了没有？

（王铎：我不同意，我给军区谈过）

康老：我问你的信上提了没有？你们回答问题，一不讲中央，二不讲群众，你们对中央究竟是什么态度？你怎么对待中央？

总理：原来还想你们有点自我批评，但一点也没有，看来得见见群众。你（指王逸伦）不是说你们支持三司吗？要看看三司的同志们怎么说。

康老：王逸伦你那年入党？（王答：三二年）在那里入党？（王答：在北京）谁介绍的？（王答了介绍人名，一个死了，一个早就不知道下落。）在那个组织生活？有那个人可以证明？（王答：在内蒙特委，那时的人都已死了）还活着的同志没有吗？（王答：在上海住党训班时管事的一个赵大姐还在）你被捕过没有？

（王答：没有）（高锦明同志插问：你到苏联路过蒙古不是被扣过吗？）（王答：那是被扣留审查，是社会主义国家。）到苏联后谁审查的？（王答：我写过材料，好象记得是孔原审查的。）孔原？怎么审查的？（王答：那我不清楚了。）你不清楚？那时凡是去苏联的中共党员都要逐个面对面的审查，但是你没有经过审查。我听说你到过莫斯科，我就负责审查工作，但是我没审查过你。你住什么学校？送到那个学校，都是要经过我审查，经过中共代表团审查的，你和刘仁等在河套干什么我清楚。你是不是苏联情报机关送去的？你是有经验的了。怪不得你这样顽固。

总理：你（指王逸伦）的党籍问题说清说不清？（王逸伦：我认为说的清楚）

康老：王逸伦，我问你那一年从苏联回国的？

（王答：三八年从新疆回国，三九年四月到延安的。）谁送你回国的。

（王答：一个中国同志，名字忘了。孔原那时还在莫斯科。）

孔原那时还在莫斯科？

（王答：噢，那是三五年。）

康老：这就是说，在莫斯科时，我们没有承认你是中共党员。

（王逸伦：训练班承认是党员，一个叫墨尔曼的女同志，她是管训练班工作的。）

康老：那是一个外国人嘛。我问的是中国人。

（王答：我见过康生同志，我还到过莫斯科郊区。）

康老：你还到郊区去过？

（王答：不是人多的那个地方。）

康老：那就不是我们的地方了！

总理：你到延安后在乌兰夫办的中央民族学院工作过没有？

（王答：没有，那是王铎。）

总理：今天就谈到这里。

（转向区党委其他同志）这里支持三司观点的还有那些代表性的同志？

（区党委几个同志谈了些，提出家里有些同志还需要来）

总理：你们回去提个名单。同三司的同志商量一下。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二十时三十二分至七日二时十二分。地点：人大大会堂一楼西侧北会议厅。接见人：总理、伯达、康生、江青、肖华、张春桥、王力、戚本禹、叶群、徐立清、李天佑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共 25 人。被接见人：高锦明、权星桓、李质、张鲁、吴涛、刘华香、黄厚、王良太、杨德松、尤亚民、华民。呼三司等革命造反派代表共五十八人。红卫军代表九人。王铎、王逸伦没让参加。〕

二十点三十二分，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并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同志们，现在开会。以前的代表都讲过了，今天由新来的同志讲。军

队也来了几位。每件事一、两个代表讲讲就够了，已经讲过的就不用重复了。我们听新的，不用占得时间挺长。哪个开始呀？从军区开始吧！

王建平：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总理：冷静点，不要激动。

王建平详述“一·二五”事件（略）

总理：你们打过黄厚吗？

王建平：没有。

总理：有推推搡搡的现象吗？

张淑琴：那是二月三日晚上。

（王建平继续讲她和张淑琴被打、被斗经过）。

总理：你被剃了光头？

王建平：没有。那是军区造谣。

总理：是你们说的嘛！

张淑琴：当时，就剩下我一个人有自由，在北京，听军区内部传出来的。他们随便打人、抓人，剃光头还算什么，我就相信了。

总理：你们那三四位同志放出来没有？

王建平：分批放了，他们三月二十日还抓人，韩文达还是从南京逮捕回来的。

于喜渊（军区通讯总站付教导员）：揭露军区个别领导人预谋枪杀韩桐事件；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指示；向战士灌输三司是反革命等罪恶事实，并揭露了柳青（军训部付部长）枪杀韩桐同志经过。

侯凤英（于喜渊的爱人）：（哭诉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和一家人受迫害的经过。她又谈了冒死传递韩桐事件三封信的情况）军区有些人说，中央来的代表团有八个右派，李天佑是大右派；我们内蒙军区就是党，光听中央就是奴隶主义。王逸伦是左派书记等。

（总理、康生、王力、本禹、春桥大笑，并说：王逸伦是左派书记？戚本禹摇头。）

总理：锡盟代表许名扬同志。（许名扬站起来）你是什么报的记者？

许名扬：锡林郭勒日报！一个小学生说乌兰夫是黑帮，盟委的一个书记用枪对准小孩说：“再说枪毙你！”贴“打倒刘少奇”大字报的学生也被捕了。

于乐泉（昭盟代表，十七岁的学生）：叙述自己被斗、被打、被捕入狱的情况。

陈振中（巴盟代表）：揭露巴盟和乌达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

陈树键：揭露军区某些领导人对内部革命派的迫害。

总理：你在军队工作几年？

陈树键：六五年十月到内蒙军区。下连队当了一年兵，然后到战士报。一月二十三日正式参加运动，二月三日被打成反革命。

刘钧（军区管理局局长，长征干部）：揭露柳青开枪杀韩桐同志，以及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和在北京被逮捕经过等。他又说到自己被地方同志掩护来北京反映情况，军区某些领导人说他是逃跑投敌（中央首长全笑了，并议论纷纷。康老说：这是什么话呀！）

肖华山：（《八一八》代表）：略。

总理：你是前天来的？

肖华山：我是月底来的。

总理：抓你们的人放了吗？

肖华山：共逮捕 125 名，现在有两名未放，其他在四月三日放了。他们还说：“派调查团是总理派的，左中右都有，谁知道周总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总理大笑，全场都笑了。）

总理：你们多少人？

肖华山：二千人左右。河西公司军事接管以后，宣布“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要采取“政治攻势”，要分化。

总理：分化，中央讲的是对反革命组织，不是指“八一八”嘛！

张鸿喜（公安厅）：揭露了公安厅反夺权，以及公安厅成了资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情况，并揭发××二师宣传科科长、厅军事代表赵金宝说：北京商谈是“重庆谈判”。

总理：你们讲，站起来回答。（杨德松、尤亚民、华民三人都站了起来）你们把中央解决问题说成“重庆谈判”，你们是国民党，我们是国民党啊？（这时杨德松坐下了）

康老：（生气的站起来）那个（指杨）你叫什么？（大家回答：杨德松）你

就是那个师长，总理让你回答问题，怎么坐下啦？什么态度！

（杨德松站起来说：“这是造谣。”众纷纷说：我们那里也有这样说法。张鸿喜说：“你抵赖”。杨说：不是抵赖。郝广德说：王良太部署的。张鸿喜进一步揭露谈的时间、地点、当场人。）

总理：从你们嘴里说出来的嘛！公安厅是谁管的？

华民：我们。

总理：工学院还有你们多少人？

华民：四十四人。

总理：怎么还不撤？

华民：其他是派去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总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怎么住到学校去宣传啊！（总理接着念了铁路的一份材料。中心意思是“你谈你的，我夺我的。”其中有一句“中央文革干涉了我们”。）

江青：我们中央文革什么时候干涉了你们，我们派了两个记者还被你们捆起来！

总理：“你谈完了，我也夺完了”（放下材料又说）实际上也是如此，你们还宣传，抄家……你们回去好好考虑向中央交代。

侯凤英：王良太说：“你有你的少数，我有我的多数，多数没有了，还有警卫营”。

总理：这是什么口吻！

李雨楼：他们在审判我们时也说，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

马伯岩：（呼市军分区付参谋长、呼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揭露公安局资本主义复辟情况。

伊盟代表：三月五日，刘昌还去伊盟活动。（康老摆手让华民等三人坐下）

李雨楼：揭露红卫军、内蒙监狱保守派等在×区某些人指使下，迫害革命造反派的罪行。

总理：监狱还押多少人（指造反派）？

众：一百多人。（有答二百多人）

周权（医学院学生）：揭露自己在监狱里所受的迫害。

王海波（军区家属）：揭露迫害家属罪行。

黄宝玉（农牧学院）：我校军代表也宣传现在支持的没错，如果错了，丢下枪回家也不支持三司。

包头代表：军代表说包头夺权是向军委备过案，中央点了头的，谁再“反夺权”谁就是反革命。

总理：我们不知道，你们（指军区的同志）回答吧！

包头代表：军区有些人说李天佑来了刮了一股妖风（首长都笑了！李天佑没听到，张春桥后转身子告诉他，李天佑又大笑）当谈到夺权下半旗时。

总理：在那里、在那里？（当时全场气氛沉重）

包头代表：内蒙二机厂。

张鸿喜：杨××在澡堂说中央代表团有八个右派。都是谁！

众怒：指出名字来！站起来！

总理：我们还是摆事实讲道理。

杨德松：这是造谣。

众：你抵赖！

张鸿喜：我就是在雪地被划地为牢站了二十三个小时的。

华民：是不是让我讲？

总理：你回答嘛！

华民：为他们支持红革联在公安厅夺权问题上辩护，并说没有宣布他们（指公安厅革命造反派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只是说保守派。

霍道余（华建）：我见到公安厅院里大字报中写的反革命组织（华民继续辩护）。

总理：你说简单一点。

华民：是（后来检查说有错误）。

叶永凯（呼钢）：划地为牢我当时在场！

段建勋（二毛）：所谓抓解放军的问题，不是那回事！

华民：没有给反对派（指造反派）贴大字报！

总理：（没听清，以为他说反动派）反动派就是三司吗？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刚才已经让准备了，卫生系统的说吧！

郑建德：（内蒙医院）控诉内蒙医院反夺权后对三司观点的病人和医务人员的迫害。其中谈了有意不给一位阑尾炎病患者治疗，致使穿孔。

总理：结果怎样？

郑建德：没死。我们医院军代表名字还保密（全场笑了）。

霍道余：我们那里也是说是军事秘密（都笑了）。

康老：名字还保密？！

侯凤英：我去医院看病，有伤只好说为家务事两口子打架打的。只能说是爱人打的才能看病，不敢说××军打的。

总理：不仅仅是为了看病，你还维护了解放军的荣誉，宁肯说是爱人打的。今天只一方面讲，无产者递了一个条子要发言，谁呀？连个名字都没有。（一下站起来两个）（指张三林）你不是过去说过吗？

何贵（红卫军）：全区广播大会上宣布我被押。

总理：高锦明同志，有这事吗？

高锦明：全区广播大会上宣布的，一个被拘留，一个逮捕，后来放了。

张继功（铁一中）：他讲的不是那么回事，是他横冲直撞进会场，打了人。

何贵：请问你们总理，我要打人一拳坐十年劳改，踢人一脚判二十年徒刑（指手划脚）。

康老：一句话，你打人没打人吧？

总理：（看高锦明写的一封纠正信）这件事已经解决了，不是平反了嘛！

何贵：全区广播大会上宣布的。

总理：工资都发了，已经解决了。我们不是断案的。在座的被打的比你们厉害的多，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也不能一个一个解决。纠缠了大家很长时间，不继续说了。今天不能解决问题，今天不继续谈了。我们又听了第二第三批同志谈，还准备访问你们，节省一些时间，会后由联络员赵刚，记者找你们，也可提出材料。三司的也好，不是三司的也好，把情况用书面写来。

第二件事，内蒙×区开始有一点认识，有了点检讨，顺着这条路要继续认识，深刻检讨，吴涛同志带头。还有独×师、独×团，现在你们只在呼市，在各盟也有，而是带全区性的，要很好地检查。如十八号（3月18号）那天我约定放人，不要再捕人了，过去捕的要放，河西“八一八”的也要释放。我说了有二十天了

还有没放的。其它地方还有。你们一方面继续检讨，深刻认识错误，回到住处，马上打电话回去，都放出来。

有伤的好好治疗。你们支持一方，把另一方压下去宣布解散是错误的。你们应一方面深刻检讨，一方面很好的解决问题，但没有很好解决。回去的要给工作，工资要照发。时间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先解决这部分问题。就从这一点你们就是有想法的，看出一条线。中央在谈判，你们下面夺权，你们说中央是“重庆谈判”，这是反动思想，把中央放到哪里？把你们置于何地？要深刻的检查出来。

你们继续错误地支持一派夺权，把一派压下去，你们说夺了权，中央就承认，根本不可能。你们在全国放了第一枪，打死了革命群众，已经查清了！怎么能说中央同意呢？你们回到住地，要好好检讨，把责任负起来，要和各单位讲清。

打枪的人法办，当然把这事登在报上也是不妥当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可以信赖的。毛主席最近说：我们敢于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三个信任：一信任群众，二信任解放军，三信任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高度保持解放军荣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只要传达下去，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位女同志，侯凤英同志，很懂得保护解放军的荣誉，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在这个会场上可以这样讲，不在这个会场上就不要这样讲，平心静气把道理讲清楚。

解放军个别坏人是有的，开枪的人是犯法的，这是个别分子。解放军有个把坏人，但处理解放军的问题是内部的事情，不能对外宣传。

在这里是允许你们激烈地批评的，对外不要宣传，不要在内蒙以外的无关的人传达，不要宣传，不要打电话，不要出宣传车，不要广播，不要出传单，否则一搞，传到香港、外蒙、美国、日本都知道了，这是敌人喜欢的，让敌人高兴。革命组织的同志，要遵守纪律。

事情起来了，要慢慢解决。内蒙有民族团结问题，反修问题，有四千里长的反修前线，更应该注意。被打的同志是受了不该受的待遇，是为革命嘛！正义伸张就行了。今天就这样吧！

（郝广德提出经济封锁，被扣押的人问题）

总理：我马上下命令解决。

郝广德：哲盟、通辽出现“畏罪自杀”。

总理：以后再谈，否则会就开不完了。军代表（指学校的）要完全撤出来，学校不要去嘛！推迟一下。（对吴涛）现在军区什么事都管了吧？继续管吧！现在散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陈伯达康生与呼和浩特市农民代表周文孝的谈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下午三时至五时三十分。地点：中南海。接见人：伯达、康生、国务院联络员赵刚、朱文明。周文孝：贫农出身，是呼和浩特郊区农民革命造反公社参加总理主持的内蒙四方面会谈的代表，呼和浩特市东方红农民。〕

康生：你叫周文孝？昨天本来你想发言，但因时间关系没发成，你很守制度。如发言就恐怕把会场打乱，昨天的会议主要是让×区认错，昨天你没有发言，总理让我们今天和你个别谈话，你要谈的详细一点。

周文孝：我是代表郊区农民造反公社的。

康老：郊区共有多少人？

周文孝：原有十七万，经过六三年划出去的，留下十三万多了。

康老：他们那个组织叫什么名称？

周文孝：“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红卫军”。

伯达：他们共有多少人？

周文孝：农村共有四万多。

伯达，康老：你们现在有多少？

周文孝：原来有四千多，现在有六千多。

伯达：啊！三司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你们的人为啥还增加？

周文孝：根据二月十八日我们英明的领袖毛主席给全国贫下中农的一封信，我们要开抓革命促生产的万人大会，当时正是星期日，遭到了“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的很大打击。三司学生下去送肥，中午宣传毛泽东思想、十条、十六条，正在这时候受到“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的围攻，把学生送肥的汽车，摩托都砸烂。

康老：农村也是这样？

伯达：他们这个组织多会儿成立的？

周文孝：去年十二月底和今年元月初。

康老：他们组织以啥为主？

周文孝：以荣、复、转业军人为主，许多是旧社会当过傅作义的兵，解放时当了俘虏后转业回家的。拿我们村来说，荣复转退军人有地主、土匪的儿子、劳改犯、旧军官的儿子、富裕中农的儿子。象厂汉板大队，牛鬼蛇神甚至有地主翻天四不清干部上台，对贫下中农进行专政、镇压。三月十六日晚，我们一个同志叫岳万林从上海回来……

赵刚：去上海干啥去来？

周文孝：上海有一个农民总部，我们去上海学习“三结合”经验，回去遭受围攻，殴打，三月十六日晚“工农兵革命委员会”要开斗争大会，当场由王心宽（流氓）宣布：“让反革命，三司观点的岳万林交代去北京告状，去上海学习反革命经验的事实，让他老老实实交代。”这时岳万林掏出主席语录要念，有郊区公安局尹占山去抢了语录，给撕烂了，从板凳上揪下来殴打，四不清干部赵宽亲自拳打脚踢。岳文城跑去讲要文斗不要武斗，按总理四点指示办事。他们说总理四点指示是对你们专政的，就把岳文城捆了一绳。正在这时有三辈农民李顺顺喊坚持十六条、十条、按主席思想辩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由劳动大学拉来一汽车人，问李是什么观点，李答：三司观点，就被他们围攻、殴打、有一人往李顺顺嘴上打了一拳，他的拳头碰到李的牙上破了，反而说李咬了他的手，当即由郊区分局孙宝山出面把李逮捕了。晚上郊区分局尹占山对岳万林说：“球大个人，你干反革命闹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给你的小孩也立下这笔帐了。”他们还把四个耕读学校老师都拉去劳动改造。

康老：啊！农村也抓人？

伯达：真不象话！

周文孝：厂汉板大队情况就这样。“××公社小碾大队有一个妇女，被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围攻殴打，这个妇女说按毛主席十六条办事，另一个妇女叫董秀珍是个地主老婆，说毛主席十六条不管用了，我就代表毛主席。还有一个说，毛主席不打好人，还不打灰人？

康老：啊！他就代表毛主席，他叫什么名字？

周文孝：叫董秀珍，××板公社就这样。还有毫沁营公社毫沁营大队，有十

八个小队，有八个小队都被打成反革命。

康老：啊！农村有那么多反革命？

周文孝：不但打成反革命，连劳动都不让。每天让开会，“工农兵革命委员会”还撕烂窗户往家里扔土，不让学习主席著作。这些整人的就是四不清干部，还有四类分子。

赵刚：主席著作都不让学，真厉害。

周文孝：在桃花公社百什户大队，有十六岁的一个同学，被他们围攻殴打，还拉上游街。

康老：啊！还拉上游街，他叫什么名字？

周文孝：叫杨怀用。

赵刚：杨怀用不是来了吗？

周文孝：来了。

康老：他们谁主持这样做的？

周文孝：有公社的武装部逯福宝，大队妇联主任丁玉芝，他们俩人操纵整个主权，说游街就游街，说斗争就斗争，把十六岁的一个孩子还打成“现行反革命”、“三司的特务”、“人民公敌”、“社会的败类”、“民族分裂分子”。

康老：这么点小孩能成了人民公敌？能成了反革命？

伯达：岂有此理！

周文孝：还有百什户的杨全套，七十来岁，被他们围攻殴打。把三司观点的搞得很厉害。

康老：农村越来越不象话，郊区有人没有？

周文孝：有，军区抓郊区，自上而下，郊区武装部长白玉山抓公社武装部。

赵刚：自上而下抓的，由郊区抓的。

周文孝：不仅下去大砸、打、枪、还给“工农兵”头头都发了枪了。

康老：农村还发枪。

周文孝：桃花公社武装部给“工农兵”发了十七枝步枪，七十五发子弹。

康老：他们的枪是从哪来的？

周文孝：不知道，反正他们有枪，我有把握，有的人说军分区给的，有的说郊区武装部给的。他们每天还扬言说：谁敢来大队、公社造反，看不见老子有枪！

军区已经开枪了。老子怕什么！把社员镇压的不能活动。

康老：真不象话，真是个专政了，这个武装部长姓啥？

周文孝：叫逯福宝，还有土旗来人反映，他们来告状向我反映，铁帽大队有一个地主儿子，把一个贫农共产党员三等残废军人捆到马尾巴上，拉了三十里。

康老：啊！什么？说的清楚一点。

赵刚：把一个人捆到马尾巴上拉了十五公里。

康老：这么厉害。

周文孝：他们把原支部书记推下台去，把一个没入过党，没入过团的，真正当过二年土匪的人抬上去当了支部书记。

伯达：他们叫什么组织？

周文孝：叫“红卫军”。还有八拜公社，军区去了一个所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串连为名，实际去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民族分裂，搞得很严重。说三司是反革命，不要受蒙蔽了，立即退出。他们说蒙人没有好东西，原来这个村蒙汉团结很好，从他们宣传后，民族对立搞得很严重，小孩出来也骂蒙人，整天宣传蒙人没好人。

康老：这个军人姓啥？

周文孝：不知道。还有撬密梁村，他们组织了一个“坏人战斗队”。整个都是地富反坏右，有个支部书记没入过党，利用职权把自己的中农成分改为下中农，在他的策划下，让四类分子、下台干部对贫下中农进行专政，凡是三司观点的都被打成反革命，实行专政。

康老：你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介绍，什么叫“坏人战斗队”？

周文孝：就是地富反坏右，不只“坏人战斗队”，还有“捉鳖战斗队”、“捉鬼战斗队”。

康老：南甸的。

赵刚：以什么人组成的？

周文孝：以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四不清干部掌握，对贫下中农专政。他们去了一个军官给宣传：总理已经点头了，“工农兵”、“红卫军”、“无产者”是革命组织，总理已批准让我们支持，是左派组织，三司是反革命组织，你们受蒙蔽的立即退出，我们要抓三司的首要分子。也不知道是哪个中央批准的。

康老：真胡扯，谁批准他们的？！

伯达：岂有此理。

周文孝：这个时候有个不同观点的上去辩论，遭到他们村的“工农兵”围攻殴打，这个人就喊毛主席万岁，这时有个姓包的首长就说“不要拿纸老虎吓人”，这个同志说，我们要按总理的四项指示办事，姓包的首长又说：“四点指示是对你们专政的，总理只是代表他周恩来个人，中央那么多人，他代表不了。”

康老：哼，真无耻。

周文孝：这阵农村，拿郊区来说，普遍是这样的，凡是三司观点的都被打成了反革命，拘留的拘留，抓的抓，打的打。

康老：周文孝，你有什么要求？

周文孝：我忘了一个事，我们郊区三月十八日反夺权就把刘仁逮捕了，这是我们农民公社最主要的一个领导，他对郊区的情况最了解，他知道郊区有多少贫农，多少地主、多少反革命，郊区闹的挺凶，所以把他抓起来不放。要求康老、伯达同志，要求总理给往出放一放。

康老：你是不是让他来北京。

周文孝：就是。

康老：好，好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二十三时五分至十二日一时四十五分。地点：人大会议堂安徽厅。接见人：总理、伯达、康生、肖华、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及总政，总参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徐立清、李天佑、韩先楚、宋任穷、张国华、陈先瑞等。被接见人：区党委代表：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李树德、李质、郭以清、张鲁。军区代表：吴涛、刘华香、肖应棠、黄厚、刘昌、王良太、姜文启、诸方玉、敖长锁和独立二师杨饱松、尤亚民、华民等。军区造反派代表：邵仲康等 24 人。呼三司等革命造反派代表：高树华、郝广德等 57 人。红卫军等保守组织代表：张三林等 9 人。王铎、王逸伦没让参加。〕

总理：现在开会，内蒙古情况大致清楚了，已经两个多月了嘛！今天请后来的同志再谈谈。

郝广德：（给总理介绍）这是张孝同志。

总理：那个学校的（翻材料）？

郝广德：“火车头”的。

总理：有名字没有（指是否登记过）？

赵刚，宋学孔：没有，今天才来的。

总理：那一部分的？

郝广德：“火车头”的。（张孝说了一句，声音很低）

总理：你能说话吗？火车头代表替他说说。

张孝：能！（旁边两人扶起）

总理，康生：坐下吧！坐下吧！

总理：不是还有一位火车头的同志嘛？

包长胜：有，我叫包长胜。

总理：你替他谈一谈吧。（包讲张孝受迫害经过，谈到残废时）

总理：治不好了吗？快送到北京医院！

张孝：我说两句。

总理：坐着说吧！（总理抬起头）你谈吧！（对赵刚）快点送医院去看看。（张孝：控诉被迫害经过）

曹文生：他讲的与事实不符，他们写过反动标语。

总理：什么标语？

曹文生：“青松不怕火烧，‘火纵’不怕狗咬”，攻击解放军。

康生：就为这件事，应该不应该把人打成这个样子？

曹文生：谁打的，我不清楚。要严惩凶手，我们要为受害者申诉。（大家冷笑）

（包长胜：严厉驳斥曹文生等人在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等罪恶活动。）

总理：（对曹文生）我问你，现在为什么不放人？这是不是事实？！

曹文生：据说是放了。

总理：就因为这条标语就抓人？

曹文生：写的是反动标语。

总理：这样的标语，在北京都有，怎么能是反动标语呢？怎么能是攻击解放军呢？

康生：没有说解放军嘛！解放军你们说拥护，中央指示你们拥护不拥护？

曹文生：拥护！

康生：拥护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放人？

总理：拥护？！早就说了，你们到现在还不放人。

高利陶（军区宣传部干事）：揭发张三林造谣惑众的事实。

张三林：我不愿解释个人问题。（众笑）

总理：你是不是三司的？

张三林：不是，我是红卫军的，橡胶厂的。

总理：先说这件事，你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还不放人？

曹文生：下午曾打过加急长途电话。他们制造停车事件，他们是不符合公安六条的。

总理：那一条？你们扣了几个人？

曹文生：八、九个人。

总理：什么时候扣的？

曹文生：二月五日扣了两个，五个是二月八日扣的。

总理：二月八日到现在已有两个多月了，为什么到现在不放？

康生：中央命令在你们那里算数不算数？

总理：四点指示有效没效？

张三林：有效，今天又打电话回去了。

总理：有郊为什么还不放人？北京的同志来了没有？

李天佑：来了。（陈先瑞走到前面去）

总理：北京军区是一个小部队，军事接管呼和铁路局。（众：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你们为什么不放？就算有点嫌疑，已经扣了两个多月了嘛！

康生：抗拒两个多月了嘛！

总理：（对曹）你还有什么辩护的？（曹文生没吭声的坐下了。）（包长胜继续揭发铁路局两条路线的斗争及曹破坏生产的罪行。）

总理：铁路局问题知道了，现在由邮电局王连奎谈谈。王连奎揭×区控制邮电、非法偷听电话等罪行，谈了邮电局二月九日成立保守组织，十号就反夺权。这时总理、康生等首长都笑了）

总理：你们有几派？

王连奎：两派。

总理：你们三司观点的有多少人？

王连奎：我们三司观点的三百人，无产者一百多人。并说二月十号反夺权，他们叫“三结合”。

总理：他们叫“三结合”？

王连奎：邮电局还调动农民保权！

总理：保什么权？多少天？

王连奎：三天。

侯凤英：还搞录音。

众：（他们对打电话都偷听，还延续时间。）（王连奎继续揭发盗用中央名义打电话等）

总理：邮电局驻有多少军队？

王连奎：一个加强连。

总理：现在听听地方的。锡盟许名扬同志讲讲。

许名扬：现在还有十三人没放出来。

总理：你们那里还不放人？

许名扬：不放。

总理：什么时候问的？

许名扬：中午问的。

总理：吴涛同志，这个事情交给你解决。

（吴涛：马上打电话）

（乌盟玉宝讲扣押人的情况，哲盟郭玉讲一人“畏罪自杀”问题。黄宝玉补充哲盟农村资本主义复辟情况。）

陈振中（巴盟代表）：听说部队支持煤矿夺权后，现在停掌子面。现在三十多人未放，他们说是中央军委指示的。

肖华、王力：这是造谣！

总理：（叫起兰州司令员说）你们处理。（又对吴涛同志）注意，我们还要和你们单独谈谈。（又问了内蒙日报社情况。）

李雨楼：报社压制得很厉害，现在军队和红卫军非法占据报社。

总理：报社几派？

王力：报社有保守派吗？

李雨楼：两派。他们还有一百多人。

总理：报社谁管？

李雨楼：他们掌权着呢！

总理：登什么内容？

李雨楼：没听总理指示，登了地方问题。

众：登“抗大”，登军区。

总理：有报纸吗？

李雨楼：没有带，我是从监狱出来直接上火车的。（黄宝玉、高树华等送上两份报纸。）

总理：高树华同志谈谈“联动”情况。

（高树华谈了中学生中“联动”分子问题。）

总理：让二中讲讲。（二中代表任卫东讲了“联动”罪恶的枪的问题。）

高树华：他们还有电台。

总理：还有电台？有名单吗？给我，有多少人？

任卫东：十几个。

高树华：还有反动标语：“打倒康生”等。

梁音亭（军区后勤部）：他们游行时打着刘少奇的象。

黄宝玉：新华书店一千多张刘少奇的象都被他们拿出来了。

众：还举起象高呼口号。

张三林：我们从新华书店拿出来烧的。

康生：你们拿着刘少奇的象游行没有？有没有四个象？

张三林：不知道。（霍道余揭露他们批判刘少奇是假的）

高惠娟：二中赵玉花说，苏修、蒙修支持三司，周总理也支持三司。

总理：捏造！

韩文达：他们在火车上审问时说：王力是个大混蛋，是三司的后台，要挖王力的根子。（总理、王力等大笑）

曹燕玲（军区红色造反团）：军区文办正在整理王力同志的材料。

包力陶：怀疑中央的根子，这是军区某些人，他们要挖王力同志的根子。

总理：王逸伦的报告是不是都听了？

众：听了。有的是三月三十一日，有的在四月七日。

包力陶：（详细揭露×区问题）他们说造反派在“一·二二”、“一·二五”事件上是吃里爬外。（众站起来指王良太：说过没有？）

王良太：说过。

（包力陶揭露军区某些领导人造谣蒙蔽群众，刘昌传达反革命策略问题。）

康小春：德山（呼市军分区付参谋长）曾念过一个特好消息说：“中央叫各大军区学内蒙。”

总理：（手挥一份传单）我这里也有一份，纯属造谣。

陈永华：今天六点半来电话说：××二师协助保守派对工学院等革命造反派实行武斗。

张鸿喜：我也揭×师情况。……

总理：王志有谈谈。

王志有（八一八）：他们说有两条黑线，一个黑根，要揪李富春、李雪峰、要揪黑根！（回头质问王良太）你说黑根是谁？

众：（质问）王良太站起来！（总理没让王讲。）

总理：不要问了，很显然黑根就是中央嘛！

王志有：河西公司反夺权后，报喜时，我们提出意见，说不要让外边的人到厂子里来。他们说是总理点头，林彪同志也在场。

总理：真是！造这种谣言。（蔚洋：揭露电台军代表造谣和反夺权问题。）

总理：全部是造谣。

王力：造谣。

蔚洋：他们说，林副主席说：“你们打的不狠，手太软！不如青海，进度不快。”

总理：青海文件你们看到没有？

众：没有。

总理：（对于顺昌）你们记者有文件，明天给读一读。

蔚洋：他们造谣说：李天佑根本不支持三司。

李天佑：我白天去东纵，晚上又从东纵东门到楼上，他们纯属是造谣。

总理：电台有多少军队？

蔚洋：由一个班增至一个排。

总理：周文孝把农村发枪情况谈谈。

周文孝：给桃花公社发 17 枝枪，30 发子弹。

总理：今天会到此结束了。明天九点钟再开一次，内蒙问题就结束了。让肖华同志与军区同志谈一谈，还有记者和联络员同志同大家谈一谈，还有什么材料送上来，明天开会时间九点。不要再增加了，观点不要说了，已经很清楚了，已经两个多月了嘛！不然后人越来越多。群众不要互相对立，不要着急。你们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要等待一下。内蒙古自治区地区大，分区多，还有各旗县，还有牧区，电话传达不到的可以派人嘛！

铁路局去的部队明天天亮就到了。铁路那位同志，明天送到医院，总是可以治好的。

明天晚上九点开会，有材料还可以送上来。要等待中央的布置。同志们受苦了，这是为革命嘛！我们一定要把边疆的问题解决好。明天结束这个会，要靠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散会。

（全体起立，鼓掌欢送总理及各位首长，总理等招手致意，大家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

1967.04.13；中发 [67] 126 号

一、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

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至于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错误，应当接受群众批评，在斗争中改正。

内蒙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

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

二、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担任内蒙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

三、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四、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革命干部和战士）。对韩桐事件的凶手，要依法处理。

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王铎应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

六、帮助革命组织恢复和发展，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引导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

打击报复。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这样的跨行业的上层组织应当解散，有条件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应回到本单位去参加。一律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

七、结合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平反、释放被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要向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八、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原则，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时间：四月十三日廿三点卅分至十四日二点廿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人：总理、伯达、康生、肖华、王力、李天佑等中央首长。〕

总理：

同志们，现在开会。本来昨天说了，不增加人了，今天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进来听一听。两个多月了，我们已经都分别征求了意见，问题已经清楚了，不再发言了。根据占有的材料，我们得出来的决议，现在宣布。会后再由中央公布，不宜拖得太晚。我先讲一讲，讲完了以后再由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肖华同志补充。

两个月来，研究解决内蒙问题，我们掌握的材料都研究过了，分别和同志们多次接谈，我们现在认为有这样几点：

第一个问题：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不是所有的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持左派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从一月下旬报社问题后，本来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可以解决得很好，报社问题可以承认错误。刘昌开始先承认错误，可是回去一商量就变了。以后群众要求见刘昌，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不见，问题就大了。后来革命造反派还是退了，可是事情并没有解决，群众还有要求，还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同他们见一下，事情是可以很好解决的，根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和造反派结合。要支左嘛，对了就结合，错了

就改么！这还不是决定性质的时候，弄清了情况再支持。

到了二月五日，人们说的“二·五”事件发生了，性质就变了。“二·五”事件，一方面表明革命造反派，工人也好、学生也好、包括外地去的、北京三司去的、上海二医大的都是革命造反派，支左嘛，请愿也好，静坐也好、会见也好，无非还是要求军区首长接见，支持他们。他们相信军区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嘛。一月廿八日，虽然军委有了不让冲击军事机关的八条命令，但静坐是在门口嘛，不外乎是等待。内蒙的造反派和外地的造反派多次行动的精神，包含一部分河西公司“八一八”的，有吧？（答：有）都还是相信军区会支持他们的，军委指示下来了嘛！说明广大群众相信军区。可是军区不能控制自己，犯了方向错误。军区认为他们都是右派，不是革命的了，是反革命了，不可调和了。打了两发子弹，命中一发。韩桐同志他还以为军区会开枪嘛，这完全出乎革命群众的意料之外。

二月五日以来，还不承认错误，继续犯下去，还说是反革命组织，是反革命活动。军区内部造反派也受压迫，所以二月五日以来，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市三司、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到现在我手里还收到材料，成百的人没有放。除四川以外，其他地方都是中央决定以后就改了。内蒙拖了两个月。军区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要集中力量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要批判，内蒙当然是乌兰夫和他的一伙人，乌兰夫很早被拉下马来了，离开内蒙古，撤了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政委的职务，名义上留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席，留在北京反省。把他拉下来，不是问题就解决了。他下面有党羽，有他的代理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还在支持他。以王逸伦，王铎为首，确确实实就是他的代理人。在军区二月五日事件发生以来，他们很活跃。二月七日王逸伦就出来了，到军区和各处活动，本来生病嘛！不仅在内蒙，就是到北京来也是这样，还在继续指挥内蒙古。尤其王铎更加活跃，王铎的老婆在内蒙人委工作的喽（权星桓：内蒙人事局局长），不断打电话，还到北京劝降。

军区不是支持了左派，而是支持了乌兰夫的代理人，支持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也支持错了。跟革命造反派对立，被王逸伦、王铎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这是必然的。他们原支持的保守组织，本来可以教

育，一支持他们，就被利用了，就发展了，跟上来了，问题大了。比如说：“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是跨行业的组织，在北京会谈时变成了“无产阶级联合总指挥部”有工人、农民、机关、铁路、学校、实际上还是个跨行业的组织。等一下我下面还要说。为什么这样变化，总有人在后面指挥，所以指出：内蒙古军区内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他们在北京的六名党委委员也承认这一点。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领导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在乌兰夫下去后，吴涛不仅是第一付政委，他还是军区党委书记，他还是第一负责人。你们说是群众把他打成的，军区党委没写成决议，实际上是军区党委决定的。你们支持一部分人，名义上叫造反派，实际不能叫造反派。因为吴涛同志和军区的认识不一致了，因此就把吴涛同志打成了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行动受到限制，电话撤销了，不能办公了，不能行使职权，军区没有正式报告中央军委。青海司令员兼政委支持左派被免，形式上做了报告，内蒙军区还不如他们。你们看了青海的文件没有？（答：没有！）看了安徽的文件没有？（答：没有）联络员，把青海文件找几份今晚回去读一读。青海刘贤权也是司令员兼第一书记，把职撤了，他们还承担错误，可是内蒙军区，还不承认，说是群众打成的，是三反分子，没有撤职。

军区党委还完全能够控制局势，三十多人被军区党委捕了，说是群众组织搞的，事实上是军区领导人搞的。直到现在不仅在内蒙，还到外省，到北京、南京捕人。军区党委的权力不仅在内蒙，还能到外省，有的同志问他们的手怎么伸得那么长，怪不得群众说有后台，肖主任，这要有规定。不然军区滥用有危险。解放军是光荣伟大的，应该珍惜伟大的荣誉。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军区党委是错误的，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能把责任推到群众身上，这笔帐要算在军区某些同志的身上，要由军区党委负责。不仅如此，另一方面同样性质的错误，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中央批准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嘛！在组织上、在工作上某些方面，军区还得受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处理区党委这是中央的权利，军区既不向中央报告，也不经中央批准。怎么能宣布是三反分子，还逮捕他们。因为他们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保守派组织就赶他们、捉他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找造反派。

这两件事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军区在京的六位同志也承认这一点。

至于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错误，应当接受群众批评，在斗争中改正。他们也承认犯过错误，他们推行了刘邓路线。但逐步认识，逐步改正，站到革命路线上来。我一接触他们，看到他们的报告，感到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他们也向军区表过态，说明他们自己过去犯了错误，希望军区犯这个错误时间要短一些，劝军区改变态度，这种态度是诚恳的。可是军区听不进去，重复错误，时间更长，还不认识。尽管如此，到了北京还不认识。他们已经和造反派接近了，但不等于错误都改正了。应该接受群众的批评。即使是保守派，如果不是恶意的、是善意的，也应该接受，在斗争中改正。在这次斗争中他们已经有所表现。应该要求区党委领导同志继续有所表现。今后也一定会有所表现。

内蒙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两个月来仍继续采用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李天佑来了？忘了找曾山来。（前面坐）二月八日韩桐一死，曾山同志去了，去内蒙调查韩桐牺牲问题，已经查出来，是×区打的，弹头也拿出来了，口径与军区子弹相同。人证物证都在了嘛。两方组织去调查了两天，检查时对四方都说清楚了。回来后，把帮助化验的女医生马上逮捕起来，他们说是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不好，哪位女同志来了吗？（田光同志站起来）你身体好些吗？（答：好些！）押了多少天？（答：卅天）看！化验一下就押了卅天，这是内务部长叫她干的，你们就拘留审问。不是因为家庭关系不好，社会关系不好，就是让她说韩桐的死是学生打的，不是×区打的。这不是对抗中央吗？

（问田光）是不是这样？（田光答：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子，面对中央、中央文革，就是这样，完全是搞两面派。这件事最突出了，逮捕的人还不放，到今天才放出来（出来了吧），这就没法解释了。你看，这不是两面派？对这件事我们是很不满意的。拖了两个来月，远的地方扣人不讲，呼和呢？不能解释喽。铁路局还没放人嘛！直到今天我们部队人去才放出来，我们实行管制才行。这不是两面态度？我们对这个问题很不满意。我们解决各省问题，从来没遇到这么为难，用这么长时间。

无怪群众反映，证实了你们说的“重庆谈判”。重庆谈判是我们同国民党谈

判，你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你们认为是重庆谈判，以为只要夺了实权中央就承认，那才不会呢！中央怎么能这样，只有国民党才能那样呢！你们把中央看成什么！把你们置于何地！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党领导枪杆子出政权。党的最高指示是符合人民最高利益的，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

军区谈三司组织成份不纯。造反派组织扩大了是有不纯，纯也不是绝对的。

军区内部也不纯，要认识军区是多方面组成的。十七年了，内蒙二十年是一块一块解放的，东部是 1945 年日本投降解放的，最早嘛，二十一年半，我们吸收了许多旧的方面来的旧的立场，旧的思想，旧的作风，旧的习惯，这些都在军队领导人中生长出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海拉尔就吸收了很多旧的东西嘛！都影响你们，才说出这样的话。

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军区的某些领导人负责。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没有坏人煽风点火，不会把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开始是王逸伦，后来是王铎，王铎到北京还闹，王逸伦有些被中央看穿了。王逸伦、王铎要负主要责任。其次是军区某些领导人，在内部不完全点名，因为文件发表会到处传，我们要维护解放军整体的光荣，不都写出去好。我相信革命群众会理解的，我想这会得到革命群众的支持，这是第一部分问题。

王逸伦是个坏人，我们和王逸伦谈过话，康生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识破了他。下面请康生同志谈谈。

康生：

王逸伦是个坏人。军区某些负责同志认为他是革命左派。同时王逸伦也欺骗了一些群众和一些群众组织。同志们会想到，哪些群众组织被王逸伦所支持的，哪些组织的哪一些人支持王逸伦，要认识到是受了王逸伦这个坏东西的骗了。

军区一些群众组织，一些干部，你们要认识到受了骗了。你们把坏东西认为是革命的，军区支左，实际上支右，支持了坏人的。绝大多数被他支持和蒙蔽的群众是没有责任的。

这次宣布他是坏蛋大家应该觉悟起来，同他划清界限，彻底揭露他，把这个坏人揭出来。

我过去不认识王逸伦，一次在接见自治区党委会上，我见过他。一看，我见

他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一些表现，做法，神态，言行，我总觉得他象个特务。我问他：你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呢？他吞吞吐吐讲不清楚。我们这些人见共产党人多，接触国民党人也不少（总理：味道不对！）我问他：在哪入党？他吞吞吐吐的讲，日本占了赤峰，他不当小学教员，到北京就入了党。问他：“什么组织？”他说是特委会。内蒙有个特别委员会，那是工作组织，也不是党的组织。问他：你怎么入党的？介绍人是谁？他说叫李铁然、刘刚。李死了，刘在哪他不晓得。他入党又没有候补期，很奇怪。入党以后很快就到上海一个中央局训练班训练。为什么没有候补期？为什么一入党就要训练？入党的问题弄不清楚。这里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入党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有一个中统局（中央统计调查局），国民党特务机构在北京负责人李铁钟，前两字和他介绍人的名字一样。此人是他的外甥，是他培养入党的，是一个叛徒，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京的负责人。王逸伦是敌人，混进我们这里来，得审查，是历来怀疑的。

第二个问题，他去临河县委作工作，曾经跑到北京来，那时北京机关被破坏了。他在这个机关住了几天没被逮捕，别人都被捕了，唯独他没有被捕，我们花费了时间了解。这是第二点。

第三、以后他自己与另外两个人一道从内蒙经外蒙跑到苏联莫斯科。我没见过他，很奇怪。我问他：你到苏联干什么？他说跑到苏联去学习了。我问他在那里学习，他说在东方大学学习，更奇怪了。那时，我正在东方大学，当时有个制度，去苏联学习的，必须经过我审查。我不认识他，他说见过我，我们根本没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员，我看了他的履历表，根本不是在东方大学，而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研究院。我不晓得这个组织。我问他是不是在苏联特务机关工作，否则，怎么能不知道呢？非党员去了，如果没正式关系也是不可能的。

38 年他从苏联经新疆到延安，我问他，谁把你派回来的？他也说不清。在延安，组织审查过他，认为这人历史不明，党籍不清。他自己也要求做一些教育工作，接受审查，可能是在延安女大当教员（杨鸿文：我在延安女大，39 年没见过他），有可能没工作。

39 年组织部派他到敌后冀南，介绍说：“是个党员，问题没闹清楚，”这是 39 年，1940 年 4 月 15 日中央答复北方局：“此人过去历史不清，同时，还

隐瞒过材料，还没办法考查，孔原说他很有问题。”他说孔原了解他，这是孔原的意见。他自己要求做些群众工作，以待审查。他说，加入党是久远的一个组织。

再一条，1934年河北组织大破坏，他跑到被破坏的机关住了几天未逮捕，很怀疑。组织部给北方局说：“刘桐”（王逸伦化名）有几点：第一点，党籍不明；第二点，1934年1月间组织破坏可能被捕，没被捕；第三点，虽正式党员，但不宜做机要工作，可在坚强领导下，做一些文化教育工作。（大家笑）。

据他自己讲，32年冬从上海回北京，还找过这特务的外甥。据他讲，此人在台湾。他怎么到了热河？当时想打通同东北民主联军的关系，找在社会上与热河有关系的人，建立交通联络，北京市委黑帮刘仁在晋察冀，知道他家在热河住，从冀南把他调到热河，建立联络点，并不是叫他作党务工作。他到那里就组织了私塾房，做了私塾先生。后来又做了敌伪兴农创作社的董管事。现在你们有一位同志，叫赵子良，是内蒙古商管局办公室主任，写了一个材料讲：“王逸伦自称家庭是富农，实际上是地主。从冀南来赤峰搞交通，实际变节了。在他家乡的敌伪兴农合作社当起职员来了。王逸伦吹他所谓的光荣历史，甚至在××文章上写过，赤峰解放是王逸伦配合苏军进城的，说他是“土八路”，引以为荣。当时，我在赤峰，我是他这段历史的见证人。赤峰1945年8月9日苏军经过激烈战斗进城的，8月16日王逸伦才进赤峰，怎能谈他配合苏军进城？说他是“土八路”，根本没有的事，而是土匪头子。因为他会说点俄国话，和苏军搭上关系，在地富支持下，搞了二、三百土匪，成为省团，还有伪旗讨伐队姓包的，他自称司令，老百姓叫他是土匪头子。后来与八路军接了头，谈他是地下工作的，蒙蔽了热北第一书记兼司令。他的人大部叛变为还乡队。这就是王逸伦的光荣历史（大家都笑了）！后来在乌兰夫下当了付主席，自治区党委书记。

1964年，进高级党校，在高级党校不学习，每天晚上找地方跳舞，在跳舞中与女特务孙秀文睡觉去了。你们这个传单不是有照片吗？（拿出党委《井纵》揭露王逸伦的传单）（总理：还有裸体的照片！（康老拿出孙秀文的裸体照片让大家看，笑着说）太难看了，不能看！可是王逸伦还觉得很好看呢（大家都笑了）！

孙秀文绰号叫“洋野妓”，经常到保加利亚、印度大使馆睡觉。王逸伦对其父，敌伪人员，国大代表称兄道弟，王逸伦同这个女特务鬼混，职工对此事很气愤，对他们注意了。一天晚上搞鬼，把他捉住了，他说他是天津运输公司会计，

胡扯！挂电话问，没有。又扯，又没有。人家要把他送到公安局，他才说他在高级党校学习，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书记，付主席。高级党校半夜三更才接回去了。这件事林枫、贾震没有严肃处理，就把此问题转到乌兰夫那里。乌兰夫怎么处理的？（王永和：根本没处理，照片是从乌兰夫家里抄出来的）这个人一不是共产党员，二不是革命的，更不是军区谈的革命左派。受他蒙蔽的群众快觉醒。总理讲的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颠倒黑白，把他当成好同志。

总理：

王逸伦是代表一种人。四月五日有个传单解剖了一下，现在，康老解剖的更清楚了。

二、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调内蒙军区任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是被赵永夫罢了官的。这个同志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给中央写了信，很有立场，很有见解。当时，他就支持青海的革命造反派“八一八”。赵永夫已经查明，是反革命分子。把刘贤权同志调内蒙，青海还有另外同志担任。吴涛同志任政治委员。在华北局揭发乌兰夫时，首先是高锦明同志，吴涛在会上的立场很好。王铎很坏，和乌一起哭哭啼啼，当时在会上划分两方面嘛，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党委，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不要讲得太具体了，革命派会理解的，写在文件上就要出去，内蒙发生问题苏修、蒙修很快就知道了。在乌兰夫领导下的一小撮，还没有清理嘛，不仅是军区方面。但毕竟是一小撮，不要扩大，也要事实求是。对军区说的含蓄一些，军队还有高度集中，还有总政、总参、军委嘛。

刘贤权同志来之前，北京军区调一个付司令员代理一段工作。腾海清同志来了没有？请他来嘛，同大家见见面。

第三个问题，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样更会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派有资格。必须左派占优势。也不要忘记保守派改变立场态度，保守派经过开门整风，改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基层有代表性的，也可以吸收个别的人参加，这有好处。他承认错误检讨的好，也可以嘛！不要有对立情绪，特别是三司、《八一八》等革命造反派组织要考虑这个问题，今后情况变化了嘛。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作个良好的开端。

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他们犯过路线错误，经过检讨、斗争，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嘛。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第四、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干部和战士，包括地方和军队，包括各地区、各分区，统统按这个处理（鼓掌，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对杀死韩桐的凶手，要依法处理。二月五日出现，二月六日发出电报就要追查凶手，到现在已七十天才解决。枪杀韩桐的就是×区柳青，内蒙军区一直不承认，有的人还想替他辩护，而且造谣说是学生自己打死的。吴涛，你打个电话要严加管制起来！（侯凤英：军区还给他送酒送肉，还过礼拜六。）（吴涛：已经戴上手铐了。）不准跑掉！跑掉你要负责任喽。这个在文字上就不要写了，你们知道，群众知道就行了。上次的电报你们登了小报，犯了错误。但是你们态度很好。提醒你们造反派注意，千万不要再加注解登出去了。对韩桐同志可以悼念，开个追悼会，但不要把这件事过分扩大。悼念韩桐同志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三结合”搞得更好，这就是更好的纪念他。主席有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韩桐牺牲的有代价，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了，夺权了嘛！新生了！他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第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从各个方面揭深揭透。去年华北局会议就把他揭出来了，拉下马了，撤了第一书记。司令员兼政委，就剩下名义主席了。从策略出发，主要是考虑蒙修、苏修问题，没登报公开揭露。斗争是逐步深入的，现在公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天安门也有大字报了，去年我还劝，现在我就不劝了。

乌兰夫的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但不登报，从政策各方面考虑。（郝广德：我们要求把乌兰夫揪回去斗！）先不要把人揪回去，以后再说嘛！你们的斗争对象很多嘛！

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实际上今晚已逮捕了（掌声，热烈鼓掌声）。

王铎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热烈鼓掌声）。你们负责带回去，保证

按政策办事。

康老：王铎还要向王逸伦学习哩！（大笑）

郝广德：我们红卫兵带回去，保证安全。

总理：

第六个问题：帮助革命组织恢复和发展，筹备小组、军区支左等单位注意，如军管地区“八一八”等地按军管原则办事，“八一八”还是要存在。各基层组织上面也可以有个总的机构，不要搞跨行业组织。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很重要的，最高指示嘛。现在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要恢复发展，自己要有个整顿，不要一恢复就猛烈发展。否则内部就变成左中右。把根基搞好慢慢发展，既或少点，但斗争精神旺盛，真正推进造反精神。大联合以革命左派为基础。保守派的人改正了错误，也可以吸收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参加，保持左派占大多数，要保持左派组织的优势。引导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打击报复。一方面要批判刘邓反动路线极少数几个人，内蒙是乌兰夫，现又加上王逸伦、王铎了嘛！不准把矛头指向群众，对保守组织进行教育，有领导的帮助他们整风，不要包围某一个组织，要教育，要说服，要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在内蒙是批判乌兰夫及其王逸伦、王铎等一小撮。“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联合总部”这样跨行业的上层组织应当解散。我说的是上层，这是盖子，不是指基层。这个跨行业组织就是革命委员会了。承认无产者联合总部就代替了革命委员会。安徽的这样左派组织甚至也劝散了。

你们这个组织本身就是王逸伦、王铎利用的，受了蒙蔽，发展猛烈，方向错了，路子错了。要改变立场，改过来。底下的组织不要取缔，有条件的要回去参加造反组织，回去的要欢迎，要让他们分化。一时转不过来的，就先在原组织里。

（郝广德：反对中央文革的怎么办？）

反对中央文革的，也是个别人么！只抓几个头子。上层组织的头子解散，回到生产岗位上去，有条件解散，有条件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应回到本单位参加，不要他不参加。反动的另外法办。由筹备小组负责考虑，不要打击。一律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你们也有些缺点，不要增加错误，要减少，不要因为他们很残暴的打了你们，他们把我们的同志打的“脱臼”，这是野蛮残暴的办法，

不要报复。否则，那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气魄，把最后顽抗的孤立起来。十六条说：“右派最后处理”嘛。有联动思想，有行动，有责任送公安机关。你们不要用武斗报复。侯凤英来了吗？（侯站起），你维护解放军的荣誉，江青同志很赞扬你，大家应该向侯凤英同志学习（侯：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江青同志开会太晚，没有来（伯达带头鼓掌）。个人“私”字一点不要，这就是破“私”立“公”的行动。不要打、不要砸，他们自己宣布解散就更好了，考验他们，不应该占的材料，叫他们交出来。王铎、王逸伦的儿子也得按政策办事。

第七、结合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平反，释放被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拥军爱民的活动，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破坏军民关系。

刘贤权司令员去以前，派北京腾海清付司令员去内蒙军区做部队内部工作。青海完全是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搞的，逮捕了很大数目，比你们多。战士受蒙蔽，是坏分子干的事。××师不敢出来，怕群众，《八一八》学生给群众做工作。不是解放军错，而是有反革命坏人。北京三司也派了一些人去。解放军后来出去仍然受欢迎。我们应该学习青海《八一八》造反精神，希望你们这样做，做好。你们死人一个，打伤被捕比他们少，青海 200 万人，你们 1, 300 万人，你们是边境，地大，全国第二，140 万平方公里，青海也一百万左右，你们这一点掌握好，你们是不是真正革命造反派，这也是考验。要按产业，按系统组织，学生归学生，工人归工人，农民归农民。学生要开红代会，总不要搞盖子。三司做对了，不要都是三司，不要三司代替革命委员会。每一步都按政策办事。草案下达以后的许多政策文件，好好学习，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啊？（造反派众：有！，解放军还是功大过小，不要军区犯错误，就抓住不放，曾解放内蒙古么！解放军的人员还在那里么！应该把军民关系搞好，严防坏人挑拨。如王铎、王逸伦，还有没揭出的一小撮。

众：我们信任解放军！

康生：口头回答是一回事，还要看实际行动！

郝广德：我们接受考验。

总理：军队内部也要团结了。不要以为你们对了，回去打闹。要求军队一视同仁，不能歧视。甚至吴涛都有这错误，好的信任，不好的，有问题的靠边站，

这不对啊！

吴涛：不是我说的。

总理：记在你的帐上了，把这事说穿了好！要在新的基础上考验大家。要向广大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这是毛主席多次向我们说的。由四大、五大（大串连）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夺权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经济主义，搞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一一被击败了。更加相信毛主席这个指示。正因为我们这样做。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有群众我们才能进行史无前例的、从下而上的新阶段的伟大夺权斗争。在“三结合”中尤其要这样，解放军保卫运动。北京经验，毛主席接见 1, 200 万人，工人、农民、市民都参加接待了。前后不过四个月的时间，如果没有可信的广大群众，没有解放军保卫，秩序不能这样好，同时也相信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刘邓路线就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整广大群众。经过一些曲折反复，我们应该反其道。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

要通过实践，回去要考验，来的时间长，比青海来的人多。回去都要好好传达嘛！要派人出去宣传。

第八、要深入广泛宣传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原则。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和军委的八条命令（一月二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附注五点）。

针对当时倾向后补充的。主席指示。今年介入，当然早已介入。要支左。支右当然不对，错了，改正嘛。当然发展到这么严重就不好了。后来二月加了五点。

现在，支左、支农、支工发生了一些偏差，后来发十条，八条和十条结合在一起学习，防止另外新的倾向，不要把军队搞得灰溜溜的。

中央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坚决贯彻执行。当然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说了，比如跨行业组织问题，还有不只王逸伦、王铎嘛！你们回去还有事做的。夺权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解决。

铁路不是已经进行军事接管了，报社当然不能现在这样继续下去。

王力：被赶出来的造反派同志要回去。

总理：赶出来的先回去，外单位的也回去。邮电局那种方法就不允许了！不能带武器看管劳动，不能偷听。每个问题不能都靠我。你们用点脑筋嘛！原则回答就这些。请伯达同志讲几句。

伯达：

经过很长时间讨论，总理宣布了中央讨论的方案。这个方案在座的同志欢迎了，个别的不欢迎。（革命造反派热烈鼓掌）只有毛主席领导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只有无限信任人民群众，对人民群众充满信任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胜利！是人民群众的一个大胜利！是党的正确领导的大胜利！是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大胜利！

关于人民解放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刚才总理谈的很多，说的很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毛主席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看到这个问题，懂得这个问题，要看到整个人民解放军的保护作用。没有人民解放军的保护，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不可能搞起来的。所以要看到主流。要看到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成就。

有的坏人混到我们的队伍里边来。这些坏人终究是要被揭露的。象刚才周总理和康老所讲的，王逸伦，枪杀韩桐的凶手，这就是坏人，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来干坏事！当然，也有一些好人做了坏事。另外因为不了解情况，把事情看错了，对好人做了坏事就改，改了就算了！他们要把错误引为教训。这样，我们的事情就做得要好些。

要重复一下周总理刚才说的。

你们回去不要公开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嘛！人民是有权利向他们提意见的，要通过适当的途径提意见，不要公开在街上贴大字报。对人民解放军有损害的事都不要做，因为损害人民解放军的荣誉，是敌人喜欢的，毛主席不是告诉我们嘛，敌人所喜欢的，我们就不要做，我们对敌人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做敌人喜欢的事。刚才总理讲：要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军民团结。毛主席告诉我们，解放军最根本的是军民团结，

官兵团结。军民团结非常重要，这个团结，就象平常讲的鱼水关系。鱼没有水不能活的，人民解放军不能离开人民，人民解放军是生活在群众中的。

另外一方面，群众也要懂得，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有几百万，正象毛主席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现在又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有的是坏人做了坏事，有的是好人做了坏事，发生了这样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思考，懂得动脑子。对待人民解放军的问题，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你们现在是胜利者了！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说这样一条有好处。对个人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不要损害人民解放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要保护这个关系，象保护眼珠一样。（热烈鼓掌）

总理：下面请肖华同志讲话。

肖华：

我完全拥护中央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拥护总理和伯达同志的指示！

两个月来的座谈使我受到了很大教育。内蒙军区从一月份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个别领导人没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保守派，打击革命派，对军区内部持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实行压制、打击，使内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排斥。一些同志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我们听了很难过。如果再不改正，后果是严重的。

正如周总理传达说的，有坏人做坏事，有好人犯错误。坏人做坏事有王逸伦、柳青。王逸伦是埋在内蒙的一颗定时炸弹。柳青是第一个向革命群众开枪的，是坏人，性质十分严重，影响很坏。要严肃处理。

另一方面，好人犯错误，其原因是站错了立场，没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屁股坐在哪一边？矛头指向谁？是根本问题。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站在群众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革命派的对立面一边？是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乌兰夫、王逸伦等人？还是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立场站错了，就全盘错了！还有认识糊涂，不做调查研究，受了欺骗上了当，要好好接受教训。按毛主席教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犯了错误就改。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屡次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但不改，还采取两面手法，支持保守组织夺权。抓人问题，总理几次指出，未放，直到昨天夜，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特别说明一点，林彪同志和军委从来未支持内蒙军区的做

法，他们许多事都未请示报告。

中央做了决定，内蒙军区要坚决执行，不折不扣。连同青海等地区的命令、文件，在军区内传达学习。立即把立场站正过来。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坚决站到革命群众一边来。只有你们紧紧转过来，才能有效的说服广大革命干部、战士。

问题不在下面，在于领导。广大革命战士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只要你们领导干部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传达给他们，把一小撮坏人的欺骗戳穿！是会很快扭转的。事实上军区有许多干部、战士、家属、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同意某些领导人的做法。反而采取压制打击的办法，也是错误的。现在开始有所觉悟，特别是中央决定，负责同志的指示，为你们改正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相信，你们立场错了，很快能改正过来。某些同志虽有错误，你们是老同志，犯了一些错误，迅速改变过来的！很快改过。千万不要错上加错，使矛盾转化。

刚才总理说过：毛主席说第一相信和依靠群众；第二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第三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毛主席所赋予我们的职责，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非常艰巨，非常光荣。

支持左派，首先是思想上的支援。首先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的好不好，不只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在这方面应该平心静气，诚心诚意向小将们学习。他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表现在始终坚持了大方向。

同志们，战友们！特别是三司的同志们！你们对解放军的批评、斗争，是对解放军的爱护，如果没有你们的斗争，他们的错误就会越大，造成后果越大。今后，你们还应该采取适当的方式对部队同志提出批评，更好地互相帮助。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战斗的，要接受人民的监督，由于历史原因，内蒙地区的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又处于防修前线，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相信革命的左派，一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一定能彻底批判刘邓路线，彻底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斗垮。打退大反扑，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军民团结一致，把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
万万岁！！

（热烈鼓掌）

总理：

需要说明两点：

需要军事接管的要很好准备，河西公司也要调整。军区的同志不能回去，还要商量。三司的同志们也可晚走一天，你们多呆一天，不要过于急，已经七十多天了呢！

明天念几个文件，如青海问题的决定等，军委八条，五点补充，十条命令等，还要做一些工作。

在北京接洽一下好，包括北京军区付司令员滕海清同志，走马上任么！

另外一件事。财贸办公室林蔚然来了没有？（林站起来）向你说明清楚，你不是代表，叫你来是要核对王逸伦的问题的。你跟王逸伦多年么！因为我们情况都掌握了，就没向你了解，你也知道自己的地位。

郝广德：他（指林）是王逸伦的脑袋。

林蔚然：我好好检查错误。

总理：大家也了解他（指林），讲清楚，不然也说是作代表的。现在宣布散会。

（革命造反派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周总理也领着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造反派热烈鼓掌欢送总理和其他首长，中央首长招手致意。）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给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各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指战员同志们的一封信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各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同志们：

（一）中共中央四月十三日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批准的。一切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同志，一切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同志，团结起来，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

（二）一切受蒙蔽的人，应当擦亮眼睛，不要再受坏人的挑动，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这一小撮人，要同个别煽动对抗中央决定的坏人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一边来。

（三）中央已经正确地处理了内蒙问题，内蒙各方面到北京来反映情况的人，都应当迅速返回内蒙。各方面都不要继续派人到北京来。更不得拦阻火车，妨碍交通，破坏生产。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

五、贯彻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滕海清在呼和浩特庆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滕海清代司令员在“呼市革命派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暨坚决捍卫中央八条大会”上讲了话〕

呼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今天，我应邀参加这个隆重的庆祝大会，非常高兴，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欢呼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的伟大胜利！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红色信号，宣告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据点——旧北京市委、市人委彻底垮台了。这是一件震动全国、全世界的大喜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航道，取得

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伟大胜利，将大大地鼓舞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把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迅速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为我们内蒙人民，内蒙无产阶级革命派，闯出了路子，树立了榜样。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证明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创造了新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增添了不朽的篇章。

同志们：我们内蒙地区、特别呼市地区，自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下达后，革命形势的主流很好。但也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呼市的保守组织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操纵下，在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挑动捣乱和配合下，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以此对抗中央决定，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向中央施加压力，妄图使中央改变决定。在这一阴谋的支使下，自四月十五日以来，连续举行旨在反对中央决定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利用了“工农兵联合起来”“不忘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等等正确口号，蛊惑人心；他们公开怀疑中央决定，说什么“中央决定违背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内蒙地区的实际情况”。他们大肆制造谣言，大喊反动口号，把矛头指向中央，指向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他们还恶毒地煽动不明真相的大量工人、贫下中农，使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损失。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挑起事端，制造白色恐怖事件。例如四月十七日晚冲击新城宾馆，撕毁中央八条；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两次冲击自治区党委机关；二十一日冲击公安厅；二十二日晚冲击师范学院，妄图打击革命左派；十六日以来连续在铁路局军管会前三番五次的示威游行，大喊大叫。他们为什么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左派，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指向中共中央对内蒙问题的正确决定，掀起这股反革命逆流呢？就是为了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那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保护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不符合革命三结合原则的“政权”机构，保护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同志们，面对当前的严重事实，我们革命造反派，必须充分认识它，揭露它，

打退它，决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在击退当前这股反革命逆流中，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这股逆流还在发展着，还有恶化的可能。因此，我们在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必须认真学习北京市革命左派战斗的精神，首先要学习北京市革命左派在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打退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逆流。在这次战役中，进一步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其次，要学习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敢想、敢做、敢闯、敢革命的气概和战斗作风；把这种气概和作风用到这次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战役中去，我们要不怕冲、不怕围、不怕压、不怕打，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这些保守组织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下，他们的本事就是这么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把自己锻炼成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和优良战斗作风的队伍；第三，我们要学习他们既敢于革命又善于革命的斗争精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决战关键时刻，我们不仅要具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敢于革命，敢于胜利，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我们的政策水平，提高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善于斗争，善于识破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手法，在中央军委、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政策的指导下，冲破保守势力，彻底粉碎这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第四，我们还要学习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边打边整的革命措施，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战役中，边战斗边整风，边打边建，克服自己队伍里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增强团结，纯洁和巩固自己的队伍，积极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向解放军学习，维护内蒙军区的威信，在斗争中，巩固和扩大革命的大联合，为革命的夺权斗争创造条件，一句话，只要我们坚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高举革命的大旗，批评的大旗，高度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我们的队伍就一定会战无不胜，所向无敌！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人民解放军坚决响应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支持左派，支持你们，支持三司等所有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在这次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战役中，我们内蒙的部队，将受到严格的锻炼和考验，内蒙部队是一支好部队，在反修斗争中是有贡献的，通过这一次斗争，我们相信一定会坚决站在你们这一边支持你们的，一切受蒙蔽的同志，经过斗争，一定会回到毛主席革命

路线上来的。

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北京的革命火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遍全内蒙！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亲自开辟的航道上勇猛前进！

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作你们的后盾！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乌兰夫！打倒王逸伦！打倒王铎！

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赴京上访人员时的讲话

〔时间：四月二十七日，地点：人民大会堂。接见人：周总理、伯达、康生、谢富治、肖华、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内蒙军区吴涛、刘华香。被接见人：《无产者》方面数千人，呼三司数十人，北京“红代会”数千人。〕

周总理讲话

同志们！请坐好，退场的请回来，如果不愿意回来的嘛，你们就别回来。请坐好，凡是要回来的，把门打开，让他们回来（鼓掌）。把帘子拉开，不要挡住！

同志们！现在开会（鼓掌）。现在学习最高指示，打开主席语录第二百一十九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鼓掌）

最近这些天，因为内蒙古，特别是呼和浩特来了一些人，到北京来，一直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叫我们来给你们开一个会（鼓掌，长时间呼口号）。因为这个会不是简单的一个会，在北京

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以说还是头一次。所以我们也邀了在北京的红代会的各方面的人来听一听（鼓掌，呼口号）。这个问题是由于《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发表以后发生的。我们首先请内蒙军区付司令员刘华香同志把他们内蒙古军区所作的检讨先讲一讲。

（刘华香检讨附后）

同志们！（鼓掌）我现在把今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今天在会场上也发给大家了）再作一点解释（鼓掌）：

这个决定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商量起草，然后又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的副帅林彪同志批准的（长时间的鼓掌，呼口号，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喂！静一静！（继续口号）同志们！同志们！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继续鼓掌）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不要再鼓掌了，同志们，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你们听我讲嘛！同志们（鼓掌），不要鼓掌，听我讲嘛！内蒙问题是在二月初两声枪声从内蒙古军区打出来以后中央就过问了。从那时起，经过两个多月，我们经常把了解的情况都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报告过。我们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也经常交换意见。你们来到北京的各方面代表，我们都接触过。所以，经过各方面接触，研究，调查以后，并派了两次调查组去。经过研究以后，最后我们才起草了这个决定，才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批准的。这个内容我把它讲清楚，你们可以冷静的听一听嘛！听清楚以后，你们再有什么话，你们再要求、再提嘛！

这个决定一共是八条：

第一条，说明内蒙古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一直联系到它的责任。

第一段，“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这一段我首先说清楚，就是什么人负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这里就很清楚了。首先是乌兰夫和他的代理人王逸伦，他是操纵了这次事件的。你们大家都晓得，

乌兰夫已经早就揪出来了，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可以说在内蒙古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他揪出来以后，就没有回呼和浩特去了。但是它的代理人王逸伦，现在查明他是叛徒，是反党分子，他是什么时候加入党，经过调查以后也证明是假的，没有根据的，是混进党里来的，并且在日伪的时候，他就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伪满蒙，然后又成了苏修的情报员。当时日本投降以后，就是这样的货，就是这样的角色，混进党，窃踞了内蒙古负责的地位。在这次乌兰夫这个内蒙古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以后，他就在内蒙古起了代理人的作用。还加上一个助手，叫王铎，和王逸伦是一伙。在这样人的操纵下（长时间呼口号，还是有人喊，听不清），是啊！（继续呼口号）好了，好了，好了，同志们，你们弄清楚了，这次事件的最大的操纵的头头是乌兰夫和他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之流。这是主要的。你们要相信党中央的揭发。

那么，仅仅是他们这几个人还不行啊，他们一定要有一个依靠啊！所以他就利用内蒙古军区某些领导人的一些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立场，来操纵，来挑拨。因此，我们指出来内蒙军区个别的领导人。为什么不点名呢？我们照顾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荣誉，而且我们要考察个别领导人究竟他们承认错误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的比如说，这一次这个决定宣布以后，刚才刘华香同志宣读了他们五个同志的检讨，刘华香和吴涛同志留在这里开会，回去的肖应棠同志就站出来作了比较好的检讨，可是其他的还没有检讨。所以是考察考察，到底这些军区的个别领导人认识错误是诚恳的，还是不诚恳的，我们还要看一看。所以，当时不用点名的方法。这也是给群众通过斗争和运动来鉴别他们（长时间呼口号。有人喊：“我们想念毛主席”！）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现在（连续呼口号，有些人还在喊。康生同志插谈：不要捣乱！）同志们！同志们！（连续呼口号）喂！同志们！同志们！你们要听我讲，我们几个同志是受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委托给你们讲的嘛（鼓掌）。如果你们不听我们的（长时间呼口号），同志们！（继续呼口号，吹口哨）同志们！同志们！我再要求你们一次，你们是听话的吧！你们得听我讲完以后你们再喊口号嘛！（鼓掌）！（康生同志插话：你们要听党中央的话嘛！同志们，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们是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相信不相信？“群众答：相信”。如果不相信的，立刻走出去！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们不相信，立刻走出去！）同志们，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还继续讲。因为今天内蒙古军区部

队个别领导人站在错误的立场和错误的认识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错误。

从二月五日以来，为什么说二月五日以来呢，就是说二月五日就从军区里头打出来两声枪声，打死一位同学叫韩桐。现在清清楚楚查明了，军区自己也承认了，就是在军区外边，就是军区训练部副部长柳青打的，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派了内务部长曾山同志去，带上化验员亲自去验尸查明了的，这是真的嘛！所以，年轻的小将们，你们不要受蒙蔽。有人说，这个枪是“三司”他们自己打的，尽是造谣诬蔑，可是子弹头子在韩桐的身上，我们取出来了，子弹壳子也得到了，证明是军区内部打过来的，而且这个人就是军区的训练部副部长柳青，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么。但是有许多同志受蒙蔽，所以需要给你们讲清楚嘛。你们受骗了么，你们遭殃嘛！因为从那个时候以来，军区的负责人受了王逸伦，王铎他们的挑拨、操纵，打了枪，还不认帐，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错误。在支左工作上支错了，把本来的造反派，打击了，把他们的代表的人打死了，这不就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了吗！这不就和刘邓反动路线一样吗？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不能推掉这个错误、推掉这个责任！刚才刘华香副司令员，他自己给中央的检讨，清清楚楚在这儿念了嘛，白纸黑字，我们收到的嘛，而且在中央的决定之后嘛！是四月十六日他们开了会写的，念给你们听了嘛。所以，他们这种打击呼和浩特的，实际上不止呼和浩特一个地方，还有其他地方的“三司”等等的革命群众组织，这个事实在做错了的，不应该打击，不应该取缔的。比如，河西公司“八一八”就被取缔了，大批的逮捕了革命群众，这也是事实嘛！我们去人检查了。并且一直到四月份还有人被关着，命令他们才放了的！我们见了不少这样代表在北京，把手捆起来，受了伤，这样的人不少嘛！我们亲自见了的！这种作法，甚至有的被打得神经错乱了。这都不对嘛。可能现在还有个别地方没有放完，还要清查。军区支持了内蒙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就包括王铎了），这些都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拿枪杆子执行反动路线，多危险嘛！全国第一个从军区里打出枪来的是内蒙古军区。中央看到，立刻打了电报去了。当然，电报提出的那个话，左派登在小报上，我们批评他们不要登报，左派很快地承认错误，没有再登了，可以讲道理的嘛！事情是实际，要查清，现在查清了。

至于这一段最后一件事，就是他们操纵了一些保守组织，军区也支持了。我要讲一讲，这个保守组织，可能你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看清楚。什么叫保守组织

呢？就是本来一些组织，或者学生，或者工人，或者农民，或者机关里头的一些群众的组织，可能这里头大多数主观愿望还是要革命的，可是他的领导人，高级领导人，比如联合起来的组织，什么“工农兵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就是说上层领导人，他就跟王逸伦、王铎常常连在一起了，被他利用，被他操纵了。你们不晓得，他就操纵这些组织。号召这些组织去砸三司，砸那个“八一八”，把人家抓起来，说他们是反革命，说他们冲军区是反革命，把他们捆起来，抓到公安局或者捉到军区，就做了这些事。实际上呢，变成了保王逸伦了，保王铎了，保军区的错误了，这不就是保守派吗！所以，这个保守组织，由于这样，你们的行动，证明了它是保守组织。但是，我们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不因为你们是保守组织，就认为不能教育了，我们要教育你们，所以你们到北京来，来这么多人，当然有人纵容你们来的，我们先不管，对你们这些人，我们要说清楚，只要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是支持你们革命的（鼓掌），但是有一条，你们必须跟这些反动的头子，蒙蔽你们的头子要划清界线，应当把你们的头子揪出来（鼓掌）。你们看吧，今天这个会场上，我们得到主席、林副主席命令来召集这样大会，要给你们讲清道理，就有人吹哨子把你们搞走了，欺骗你们么，要把你们和中央隔离起来嘛（鼓掌），你们日夜想念毛主席，我们现在向你们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他都不让你们听（鼓掌），你们想想吹哨子的让你们走的对不对？（群众答：不对）是嘛，他们少数人就起哄，将来叫你们遭殃，他们在旁边看笑话。所以，我们说你们的组织犯了保守的错误，是受他们操纵的，一点不冤枉，你们并不清楚，给你们讲清楚，你们就会觉悟了（鼓掌，呼口号）。毛主席，林副主席让我们接见你们，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想革命的好意是好的，我们应该鼓励你们，但是你们必须要跟那些反动的家伙，反动的头子划清界限（鼓掌），至于保守的组织呢，那还是可以革命嘛，你们只要跟欺骗你们的头子划清界限，你们这个组织还会存在么，我们这个决定上没有说要取缔你们这个组织，只要是群众组织我们不采取取缔的办法（鼓掌），允许你们在行动中改正你们的错误么。

第二段，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付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组织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这点给你们解释一下，吴涛同志就在这，介绍一下（鼓掌），我告诉你们，吴涛同志他不是乌兰夫那个集团的分子，是有人诬蔑他，故意的要陷害他。他原来是在东北做工作的，曾经在我们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那里做工作的，他是蒙族，所以把他派到内蒙古作第二政委。去年夏天华北局揭发乌兰夫反党活动，修正主义的活动的時候，吴涛同志也是站在党的正确的革命的路线方面揭发乌兰夫的（鼓掌）。所以，内蒙古军区党委的一部分人陷害他，说他是乌兰夫分子，并且把他打成三反分子是错误的。现在内蒙古军区党委承认了这个错误，中央恢复了吴涛同志的工作（鼓掌）。而且这件事情做的非常无组织无纪律了。因为他们把吴涛同志作为三反分子隔离起来，抄了他的家，切断他的电话，都没有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报告过，你们想想吧，多大的无纪律行动。我们军队是最大的集中的组织嘛，他们这样的没有纪律。这回他们承认了。

第二就说到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就是在乌兰夫离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职务以后，我们因为乌兰夫的问题还要继续深入的揭发，所以自治区主席的名义还没有正式取消，当然他不能够做工作了，停止了他的工作，自治区党委就重新改组了，由高锦明同志来负责。这个时候王逸伦、王铎这些人就把高锦明说成是乌兰夫分子，这也是捏造。因为事实证明在去年华北局揭发乌兰夫是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当权派之前，高锦明同志是在内蒙古做工作的第一个揭发乌兰夫反党的。因为你们都不清楚，所以今天讲清一点，他第一个揭发的嘛。后来在华北局的会议上，他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跟乌兰夫公开的斗争，这怎么能说他是乌兰夫分子呢？是谁说的呢？就是刚才说的，王逸伦这个叛徒跟王铎这样的修正主义分子造谣诬蔑他的。在揭露乌兰夫的时候，王逸伦躲着就没有来，躲起来，说他病了。王铎跟刘景平两人在会议上跟乌兰夫哭了，兔死狐悲呀！这件事，我们中央是很清楚的！刚才康生同志说的一句话，我们开会前谈的，华北局如果说他们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有很多错误，但是，这次揭发内蒙古的乌兰夫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三反分子，这件事情是华北局，李雪峰同志一个很大的功劳，消除了我们对北方的边防，面对着苏修、蒙修的最大的隐患（鼓掌）。这一点，今天给在北京的革命同学来讲一讲有好处，因为你们也不懂得这件事（鼓掌）。关于权星桓、康修民，他们的态度很明朗。他们开始也是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七月的时候，是跟着刘邓反动路线走的，但是，党的十一中全会以

后，特别是十月工作会议以后，他们逐步认识了错误，他们就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了，自己检讨自己的错误，就站到革命派三司方面。这种态度是好的嘛，我们允许人家改错革命嘛（鼓掌）！而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站在三司革命派一起了。内蒙古军区党委反而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逮捕他们，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是自治区党委书记嘛，你这个军区怎么有权捉自治区党委书记，也不报告中央？所以，从军区犯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全国来说，除去青海反革命的赵永夫那个特殊的情况以外，可以说是很严重的错误。所以，刚才军区负责同志，他们承认了这个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底下一段，至于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错误，应当接受群众批评，在斗争中改正。就是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还有其他同志，他们过去所犯的 error，在某些方面还没有检讨的话，允许他们检讨，接受群众的批评嘛。当然了，今天他们既然已经站到革命派方面，我们就要采取欢迎他们的态度，允许他们改正错误，让他们在群众中跟我们一道，跟革命派一道，跟广大群众一道来首先揭发内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和他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这些人，也会联系到本人的错误，这有好处嘛。

第四段，“内蒙古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

这个事实检讨上也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二月五日发生，中央就找他们来开会，开了两个多月，中央解决过省市自治区的问题，最长的是这个地区，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为个问题复杂，牵连的很广，所以我们很有耐心的跟他们来讨论。当然，因为中央工作很忙，有工作，要开会，不能每天开会，因而在时间上可能拖了些。他们对这个事件，当面承认错误，背后又另外搞一套。比如说吧，很早我们就跟军区一方面，自治区党委一方面，三司一方面，另外的工农兵等等的组织一方面，还有无产者这一方面，我们说好的，我批准了九个要求，大家共同承认了的呀，可是过了一阵子就从自治区里头，从工农兵，无产者上层领导者嘴里说出来，周总理说话不算数，没有效了，弄得群众当然就会糊涂起来，受蒙蔽，认为真的是这样不算数了。后来，我们又派了一个正式调查团，就是由军委总参谋部副总长李天佑同志为组长、吴涛同志为副组长，去了九个人吧，九个人的代表团，去把师范学院被包围的情况调查清楚，也到军区调查站在哪一方

面，还调查河西公司的事情。这完全是根据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共同商定去作的。可是去了以后，从军区里头，从工农兵、无产者方面传出来，说九个人里头七八个人是右派。完全是造谣。因为那里头去了两个记者，两个记者就是在二月五日前后同情呼和浩特三司革命派的，他们也被捕了，这两个记者是中央文革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派出去的。军区不管他们是中央派的记者，也把他们逮捕起来了，并且还把他们的笔记本，日记本都没收了。中央打电话去叫他们放，军区还派人押解到北京来。我们叫他们回去把记者接过来以后，在北京的，他们的军区一位副司令员黄厚同志；他们正在北京作为代表会谈这个问题，他就带这么几个笔记本一直不给我们，等到三月下旬了，三月大概是二十号左右，咱们见到这两位记者了，才知道黄厚还带十几本日记本，等我们问他才承认，才交给我们。就是这样目无中央。不仅如此，他们调查的情形，就是代表团调查的时候，他们居然听信王逸伦那一派的人，弄了几个人向李天佑同志来示威，使他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很好进行。调查回来以后，居然从军区，从无产者、工农兵那方面放出空气说，是谈判了，北京我们是找各方面代表来会谈，商量办法，解决问题嘛，他们说北京的谈判是重庆谈判。你们懂不懂什么叫重庆谈判？重庆谈判是我们共产党跟蒋介石的国民党谈判，那个时候，我就是代表共产党去的。帮他们（鼓掌），那他们把我们中央看成什么？重庆谈判，我们跟蒋介石谈判，那是拖了，晓得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准备迎接他打内战，但是要争取时间，所以跟他谈判是拖。居然内蒙古有人，军队里的人，跟无产者、工农兵这些组织的头子还有王逸伦、王铎，还有他的妻子去宣传这样的话，说在北京谈判那么拖，只要我们这个组织扩大了，夺了权了，中央他们只能够承认既成事实。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那么，如果我们内蒙古的无产阶级的政权被反革命夺去了，难道我们也承认吗？（呼口号）是呀，你们受蒙蔽的同志想一想啊，把北京看成重庆，就是把中央看成蒋介石，他们是共产党，或者反过来他们是蒋介石，我们是共产党。你们想，他把内蒙古跟中央放在这么一个敌对地位，居然有人听，这还不是这一小撮坏人，反革命分子，还有一部分受蒙蔽、受操纵的人在那里活动的嘛！所以，我们会谈的时候遇到这些事情，就晓得这里不简单，这里有人操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军区某些负责人是耍了两面派的态度。这个两面派的态度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停止，等一下再说。所以，我们说他们是以两面派态度对抗中央。

最后一段，“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负责”。

只是把这个判断清楚了，首先是王逸伦、王铎这个叛党分子、反党分子，他们是主要的操纵人。其次是军区某些领导人，要看他这回在考验中最后暴露得怎么样，表现得怎么样！当时我们已经觉察出来有些人不妥当了。现在还继续再考察一下，最后总要宣布。

第二个问题，“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担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鼓掌）

刘贤权是怎么一位同志呢？他是在青海，他是司令员，被一个副司令赵永夫窃夺了军权，蒙蔽了一部分机关内部的同志，把刘贤权用三反分子名义打，也是没有得到他的上级军区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就把他免职了，把他关起来了。这位同志是受打击的，受反革命分子打击的。而刘贤权同志坚持了立场，对青海那次反革命活动，他是反对的，他是支持青海的革命派的（鼓掌），并且他给中央写了信（后来我们很迟才发现），立场也是清楚的。因为青海问题他现在去处理，处理得比较好。那个地方还有另外人可以接管他，因为内蒙是一个边防前线，所以，我们把刘贤权调到内蒙古来作军区司令员（鼓掌）。恢复吴涛同志政委的职务。他们两个合作起来，以他们两个为首改组内蒙古军区，处理这次事件。但是刘贤权同志不能马上就离开青海，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在他没有去以前，由北京军区派了一位副司令员腾海青同志赶到呼和浩特去，领导这个军区来处理这些事件。但是，情况如何呢？他到了呼和浩特以后，就向军区广大群众宣布了中央这个八条，当时响应他的有军区的肖应棠，也是副司令员吧？作了检讨。可是其他人的态度暧昧得很。因为这样使腾海青同志就很难行使职权，受到反中央八条决议的群众的围攻。这个地方可以单独分析的，带头的，一定有坏人，使广大群众受蒙蔽，受欺骗，就使腾海青同志不可能执行职务。军区的门，过去你们不让人家进嘛，好，现在把军区的门四门大开，不仅军区的军事人员，就是非军事人员也可以出出进进、穿堂若市，根本不可能办公了，使腾海青无法执行职权。所以，现在腾海青同志他的工作地点只能在呼和浩特铁路局，因为那个地方军管了。所以这个情况就说明内蒙古军区的一部分领导人还采取两面的态度。不仅是到北京

的人受他们蒙蔽，受他们欺骗，在内蒙古也有一小部分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跟你们讲清楚，军区机关嘛，中央的命令嘛，等一下子由肖主任讲一讲。事实证明，处理这件事情在军区的领导人中是有些阻力。有些继续搞两面派的态度，我们必须揭穿。中央和军委这个决定必须执行！（鼓掌）

第三个问题，“成立以刘贤权、吴涛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古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且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这一段是说今后的工作。就是军区改组了，那么内蒙古的工作怎么领导呢？我们决定要成立以刘贤权和吴涛两个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因为现在内蒙古通过大批判、大联合马上成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开始先搞一个筹备小组来推动这个工作。这个筹备小组，由刘贤权、吴涛两同志负责来组织的。首先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因为过去受了压迫，受了打击嘛，证明他们是革命的左派嘛！无产阶级革命派嘛！他们应该参加。次之。比如现在很多的保守组织，它的基层群众，我们相信绝大多数还是要革命的，是受了蒙蔽，受了欺骗。只要你们觉悟起来，跟反革命的头头，上层组织割断关系，你们又站到革命方面来，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有革命的表现，那么仍然可以参加革命的组织（鼓掌）。这样，你们也是有可能，在你们改变了立场、态度，承认错误以后，将来相应的有可能产生你们的代表，这是将来。至于你们这个前途，我们不堵死，我们应该帮助你们，告诉你们，要争取这个前途。（鼓掌）

关于革命干部呢？领导干部呢？自治区党委，我们认为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这几位同志只要经过革命群众的同意，那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因为他们回去，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给群众见面，进行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经过群众的同意，他们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筹备小组成立了就负责筹备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当然要有步骤的。所以现在首先决定的关键要跟第二个问题结合在一起，就必须把军队的领导机构改组好。现在中心一环是这个问题。

今天，不是来北京的人里头还有一部分军事同志嘛！等一会儿肖主任还要专门讲这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部被打击的革命干部和战士。对韩桐事件的凶手要依法处理。”就是说，由于二月五日前前后后的事件被打成反革命的是错误的嘛！所以应当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被捕的，被打伤的应当立刻释放，还要给他们治伤嘛！刚才说了，也许还有个别的地方没完全释放，我们还是让军区继续审查。因为内蒙古范围很广，东边一直到海拉尔，西边一直到接近新疆，许多军分区的地方，还有县里头人民武装部管的地方，也还有一些被捕的，我们还要继续清查这件事情。对韩桐事件的凶手，要依法处理。凶手已经查清了，我们所以没有在决定里写，因为人是个别的人，事情是军区指导思想、立场所引起的，所以人名字不要在这公布，实际上我们要从严处理这件事。

第五个问题，“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王铎应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鼓掌）

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在全中国要集中力量，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么在内蒙就要联系乌兰夫了，要联系王逸伦、王铎这伙人了。乌兰夫我们要在内蒙公开的揭露，要在群众中公开的讲这件事情，不仅在呼和浩特，要在所有的盟旗里头讲，要在所有县份里头讲，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我们一定要懂得，内蒙古这个隐患揭发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消除啊！我们北边蒙修、苏修他们还在那个地方企图挑拨，企图利用。乌兰夫领导内蒙的工作差不多近二十年，日本投降以后他就到东蒙去了这样长的时候不会没有他们的一小撮人跟着他们。这一次把王逸伦、王铎揪出来了，在这个揭发中还会继续揪出一小撮人。所以彻底的批判，公开的揭露乌兰夫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对巩固我们内蒙古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我们人民的团结十分必要，应该作为我们内蒙古大批判运动中首要的工作（鼓掌），同时也要检查我们过去的一些保守组织广大的群众，你们是不是参加，认真的参加这次对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的批判运动，你们要想革命的话，这是最好的考验！（鼓掌）（长时间呼口号，打倒乌兰夫，打倒王逸伦，打倒王铎！）同志们，这也就是你们拿这个问题，彻底的批判内蒙古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几个头子，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这一伙人，

就是成为你们跟欺骗你们的，蒙蔽你们的那些坏人，那些反动的头子，跟他们划清界限的一个最好的机会！（鼓掌）并且王逸伦，因为他是一个特务，叛党分子，所以对他的事情还要继续挖掘，还有可能挖深一些，王铎不仅他本人，他老婆也在活动，很可能你们回去对他批深一点，批透一点，还会揭出很多事情来。

第六个问题，“帮助革命组织恢复和发展，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引导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要作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打击报复。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这样的跨行业上层组织应当解散，有条件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应回到本单位去参加，一律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鼓掌）

同志们，你们好好读一段就晓得了嘛，中央是各方面都想到了的嘛，（鼓掌）一方面帮助革命组织恢复和发展，帮助他们整风，这样推动革命派大联合，并且告诉他们，斗争的矛头是要向上，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至于对保守组织应该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打击报复嘛（鼓掌），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跟“三司”的同志、学生同志、工人同志、也还有几个农民同志、机关同志，我们再三说，你们回去无论如何不要打击报复，要好好的团结他们，你们相信，他们里头负责的人，革命的会响应中央的号召嘛！（鼓掌）至于你们的上层组织，那个工农兵委员会，那个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那个跨行业组织，现在在全国都不适用，我们都劝他们解散，有的上层组织都劝了，回到本行业，回到工人里头。你们不能又是工人、又是学生、又是军队、又是服务性行业、又是机关，这不就变成革命委员会了吗？有革命委员会，底下再有跨行业组织，这不是二重政权嘛，那怎么允许，那不对嘛，许多跨行业组织，我们现在在夺权这个阶段不要搞这个，运动初期，不懂得，搞了一些，只要没有做坏事，有些还做好事了我们劝他们取消。现在对内蒙古也是这个办法，并不是专门对你们的，而且这里头确实有些坏人，操纵了你们，蒙蔽了你们，欺骗了你们，应该把他们抓出来。至于许多工人、学生、机关同志还要革命的话，回到本机关，本学校，本工厂里头去，在那里参加他们革命组织还是许可的嘛，所以，这些办法都想到了，而且我们主张，我们劝他们不要武斗，不要打、砸、抢、抄、抓。这件事情是要大家互相勉励。

第七个问题，结合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平反，释放被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要向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这个问题，我们照顾了军民关系。在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了这个问题，也解释了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的相互补充作用。一边说拥军，一边说爱民，结合在一起就对了。军区少数的领导人指挥、批准武装的人对革命的群众压了一下子，只要他们真正的认识了错误是允许他们改的，而且只要改就行了嘛！因为我们整个人民解放军还是伟大的，光荣的嘛！可靠的嘛！（鼓掌）我们可以说真正地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我们国防的，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子弟兵嘛（鼓掌），所以不要因为一两个或者两三个领导人犯错误就把我们整个解放军看成是不好的，那是最大的错误了。这个问题，凡是革命的组织、革命的群众一说就懂得。至于个别的人提的不适当的口号，我们劝他要把口号拿掉。这种事情在呼和浩特也发生过，在别的地方也发生过。只要我们把问题讲清楚，是讲得通的。许多同志，军队来的人，过去受上面蒙蔽犯了一点错误，广大群众不会责备。你们只要领导承认错误，这个弯子就转过来了，你们不要扭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青海那个事情，经过刘贤权同志回去以后，“八一八”的组织跟军队的同志互相融洽得很，军队走出来，他们欢迎他们，军民真正像鱼水一样，所以，我们相信内蒙古的人民和军队一定也会搞得这么好的（鼓掌）毛主席最近讲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就是我们伟大领袖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一定要依靠什么人把这个大运动掀起来，使它蓬蓬勃勃的前进呢？首先靠广大群众，次之靠人民解放军，劳动人民的子弟兵，也靠大多数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嘛！我们干部中犯错误的是一小撮嘛！

第八个问题，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原则。青海问题在这一次解决事情以前中央就有了决定，那一共是九条规定，原则上是要责成军队他们回去、革命组织去回宣传。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当时都给他们交代了，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这四个文件，当然还有其他的中央文件要广泛宣传。这四个文件和内蒙古直接有关的，就是一个八条命令，一个十条命令，一个青海问题决定原则，那里

数目字不要去宣传了，还有安徽问题的决定。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内蒙古。所以要求内蒙古广大的群众，广大的干部，我们人民解放军也要坚决地贯彻执行。

这就是我今天向大家解释的八条决定的精神（鼓掌）这个决定发表以后，内蒙古就来问了，说这个决定是不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副帅林副主席决定的，批准的？后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作了一个回答。我们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一讲。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周总理已经把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重新作了清楚的说明。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经过林副主席同意的，（鼓掌）这是不能够怀疑的！是不能怀疑的！（鼓掌）完全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鼓掌）决定以后在内蒙所发生的事情同样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这个决定基本精神就是支持内蒙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鼓掌），反对那一小撮坚决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边的那些坏人（鼓掌）乌兰夫、王逸伦、王铎是一小撮，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鼓掌），跟他们走的，那是走错了！（鼓掌）回过头来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鼓掌）这样作那还是及时的。希望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今天听了周总理的讲话以后，赶快回过头来（鼓掌）。刚才开会以前和开会以后，有少数人公然地煽动一部分人退出会场，采取恶劣的手段，吹口哨，等等，这是公然的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公开的对抗党中央的行动，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呼口号）后来开会以后，有些人觉得不对，又回来了，我们还是欢迎他们这样做的。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还是给那些犯错误的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鼓掌）。我感到今天这个会还是开得很好的（鼓掌）。在中央决定以后，鉴于内蒙古还有一小撮反抗中央的活动。所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同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为了让那些被蒙蔽的人懂得事情的真象，能够回头，所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就打了电报给呼和浩特各个群众组织，批了三条。这个三条今天仍然是有效的，现在来宣读一下，由王力同志宣读。（王力同志宣读三条；略）（鼓掌）

这个文件还可以发给大家。同志们！你们是从内蒙古来的。内蒙古是我们国防的最前线，在内蒙古那里，苏联修正主义者，外蒙古修正主义者正在千方百计

的破坏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涉我们的内政，乌兰夫、王逸伦这一类人就是他们的代理人，所以，要高度的警惕，要百倍的警惕，不要上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这些坏人的当。你们因为是站在国防北部的国防最前线，所以，你们的责任是重大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保卫我们的国防，我们要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团结起来，过去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群众，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欢迎他们进行自我批评，只要他们能够这样做，他们仍然是革命群众，要同他们合作。我们相信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坏人终归是会孤立的，是会很孤立的，他们不过是一小撮人，只要群众的眼睛擦亮了，他们就无所作为了，他们就会被群众所唾弃，他们就会一败涂地的。

我最后一句话，还是希望同志们回到内蒙去！

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紧密地团结起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肖华同志讲话

同志们。我完全拥护刚才周总理，伯达同志的讲话，拥护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鼓掌）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在支左的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内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挫折，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中央四月十三日发布的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所犯错误的性质和纠正错误的一系列措施。中央决定下达以后，立即得到了内蒙地区广大的革命群众、内蒙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但是，也有极少数的人坚持错误的立场，对抗中央的决定，有些人因为受了欺骗，上街游行，上北京告状。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军队同志更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这是严重的违犯军纪的行为。中央四月十三日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批准的，一切拥护毛主席，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必须自觉地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鼓掌）因为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林彪同志再三号召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鼓掌）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这个决定，中央通过了这个决定，我们就

应该不折不扣的，坚决拥护，坚决的执行！（鼓掌）我们宣传这个决定，我们执行这个决定，我们人民解放军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就捍卫这个决定。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拥护不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不是在口头上，而是要在行动上，（鼓掌）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是真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在行动中违背毛主席的话，执行这个决定，就是一个行动的考验。（鼓掌）

内蒙的事件主要的责任是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等人负责，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的错误也是严重的。但是他们同王逸伦还是有区别的。王逸伦是坏人做坏事，是叛徒，是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军区的某些领导人犯错误是上了他们的当，是好人犯错误，是受了骗，站错立场，只要他们迅速地把立场端正过来，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坚决改正错误，我们还是欢迎的，还是好同志。（鼓掌）那些受欺骗，蒙蔽的干部，他们也是因为不了解情况，也是受了蒙骗，受了坏人的挑拨，但是，只要认识清楚，我们是可以原谅他们的，他们是没有罪的。当然，这些同志应当从思想上，提高警惕性，接受经验教训，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大大地提高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来武装自己，使以后不要再重犯错误，再不要上他们的当。

我们军队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养的，我们军队是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觉悟的人民军队，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切行动听指挥。在当前内蒙地区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内蒙军区的全体指战员，必须进一步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一切军队的调动必须严格遵守军委的规定，参加地方集会和上街游行，示威必须经过军区的批准，不得擅离职位，不得擅自行动。一切内蒙军区的同志不要受坏人挑拨，受坏人利用。这一点同志们在政治上失去警惕性，在组织纪律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我们坚决不同意，我们坚决不允许，坚决反对！（鼓掌）人民解放军应当最遵守纪律，应该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任何违犯组织纪律和行为都是削弱我们军队战斗力。你们上街游行对抗中央决定，这都是对文化革命不利的，对保卫国防不利的。内蒙地区是处在一个反修斗争的最前线，阶级斗争是非常的复杂，内蒙军区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了更好地担负这个任务，执行这个政治任务，所以中央在决定上就决定了要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加强内蒙军区的领导。刚才

总理说过了，就是调刘贤权同志任内蒙军区的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很坚决的一个同志。所以，他到内蒙军区，对内蒙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对内蒙军区的工作一定会得到大大的加强。军区的吴涛同志，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过去长期在东北，在林彪副主席所领导下的第四野战军工作，一贯做政治工作，他是拥护毛主席的，是拥护林副主席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同乌兰夫的斗争中，他也是挺身而出的，斗争得最尖锐的一个战士。在刘贤权同志还没有到达以前，中央决定由腾海清同志去代理内蒙军区的司令员。腾海清同志是由中央军委决定的，中央军委派去到内蒙军区代理司令员的。在刘贤权同志没有到达以前内蒙军区同志应该服从腾海清同志的领导、指挥。希望内蒙军区的部队，内蒙军区的同志要团结在以刘贤权、吴涛同志，在目前是腾海清同志，吴涛同志军区党委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去完成毛主席所赋予的一切任务。

当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人民解放军担负着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我们希望内蒙军区部队的干部、战士同志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内蒙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摧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内蒙地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等，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鼓掌）把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鼓掌）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刚才周总理、陈伯达同志、肖华同志讲的话，把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思想，中央的决定和军委的命令，已经简单明了讲得很清楚了。我想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我希望我们全体到会的同志尊重我们的这个会议。我们的这个会议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示召开的，（鼓掌）是向同志们传达毛主席批准的、

林副主席批准的，党中央的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的一个会议。（鼓掌）是要我们大家一起坚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会议，（鼓掌）为此，周恩来同志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陈伯达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肖华同志代表军委以及军委文革小组的同志。全体同志，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江青同志，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全军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肖华同志，关锋同志，杨成武同志，还有谢富治同志都出席了。你们看，我们这个会是多么盛大的一个会议呀！（鼓掌）

同志们可以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工作这样忙，繁忙的中间来召集这么一个会呢？这么多的负责同志出席这个会议呢？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呼和浩特有多少人在街上示威，甚至还有几个部队的几个人参加，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把我吓得不得了，跑这来开会了？不是的！是不是因内内蒙古自治区来了这样多的，好像是几千人吧，三、四千人的同志跑到北京来，那就把我们吓住了，噫，赶快见见你们，开一个会吧，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也不是的！那么是不是因为同志们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把我们吓的不得了，所以，就来召集你们来开会呢？也不是的！同志们好好地想一想，不是因为这个东西，那么为什么呢？就是我才讲的，为的要贯彻，为的要宣传，为的要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为的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批准的对内蒙的八条决定，也为的使同志们真正的了解内蒙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同志们，你们以为我们不了解内蒙的情况，我这一点明确的告诉同志们说，我们了解的情况比每一个同志多。这一点请你们相信我们（鼓掌）。是为了使很多的受蒙蔽的同志觉悟起来，站在毛主席的路线方面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会对于同志们来说，是上了一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课的一个会议，（鼓掌）。也就是周总理所讲的，使我们有些同志受蒙蔽的同志向一小撮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人划清界限的最好的机会的一个会议。所以我希望同志们很珍视这个会议，在你们的政治生活中召开这么一个会议，记得这个会议，因为毛主席关心你们召开这么一个会议的，（鼓掌）但是，在这里边，我向同志们说一下，就在这个会议中间，有的同志还不了解，还有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有的人还要退出这个会议，那么，这当然是不对的了，好好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当然了，青年人，一时的冲动是难免的。所以，我看到了同志们这样一个会议上有着那样的行动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替你们难

过。所以，我就讲了，你们不愿意参加你们就回去，当然，看到了你们还是愿意听周总理的讲话，愿意听毛主席的声音的。所以，这一点可见同志们犯错误的时候是可以改正，是容易改正的。我们欢迎同志们改正错误（鼓掌）。

我讲第二个意见，内蒙古发生什么问题，刚才周总理讲了的，我们人民解放军个别的人开枪打死革命的人民。打的这一枪是从内蒙军区开始的。同志们，要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我们人民解放军什么时候曾经开枪打死革命的人民？这个周总理讲过的。内蒙发生什么问题？中央文革小组，解放军报派了记者去，这是中央派的记者嘛，竟然被内蒙古军区逮捕，内蒙军区逼供，毒打，甚至我们打电报还是押解到北京来。押解中间，他们的笔记一直到最后才交给我们。你们想一想。同志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了，一些同志不知道的，内蒙军区擅自派了武装进入到我们毛主席住的首都北京，派部队带枪在北京的街上抓人，就在那里呢？就在甘家口街上抓人。你们想一想，哪一个省，哪一个军队敢于这样作，他们可以派武装进入我们的首都，自己可以自由在北京市上抓人。同志们，你们想一想，这样的事情严重不严重！长期以来，内蒙军区个别的领导人，总起来一句话，就是下压群众，上抗中央，下边镇压群众，上边抵抗中央。周总理讲的，他们把中央召集他们来解决内蒙问题，他们把它看成是“重庆谈判”，看成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的。你们想一想，说这种话的是怎么样的错误，实在不是革命的话，是反革命的话。怎么这么一个共产党员，对待中央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同志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样的问题严重不严重！他们惯于用两面派手法的，表面上说执行中央、军委，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的，但是呢？在内蒙地区的时候，他们按照他们那一套做，甚至于他们公开的可以打这样的电报给周总理，给中央军委，给中央文革小组，给全军文革。什么电报呢？三月九日内蒙古军区来的电报。他的电报怎么说呢？他们说：最近呼市三司在所谓的传达“中央精神”的口号下，（中央精神打着括弧的）竟然制造谣言，进行一系列的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在大街上大量地张贴大幅标语，散发通告，发表声明，继续煽动群众反对解放军，妄图再次煽起反革命逆流。他们讲的反动宣传，大量张贴标语，什么样的标语呢？在这个电报上公开地写着，我念念同志们听一听，什么标语。这种大幅标语内容：第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鼓掌）同志们鼓掌了，问问同志们，这是反动标语呢？还是革命标语？（群众：革命标语。”喊口号声：“用鲜血和生命保

卫中央文革！”）好，第二，谁攻击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鼓掌）第三，誓死与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鼓掌）第四，谁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笑鼓掌）第五，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鼓掌）这样的革命标语，竟然使内蒙军区能够向军委发电报说这是反动宣传。同志们，你们看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群众：严重）这有电报为证，空话无凭，有电报为证。所以，同志们冷静地想一想，内蒙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刚才肖主任讲了，有些部队还上街游行，反对中央的这个决定。我觉得责任主要不在他们，而是在过去的内蒙军区个别的负责同志。同志们，我们可以严肃地问为什么中央军委改组内蒙军区，你们就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所以，今天这个会，周总理详详细细地把问题和同志们讲清楚了，这是对同志们非常必要的，使同志们从受蒙蔽中间觉悟起来。

第三，希望同志们，要知道，现在在内蒙地区，我们的敌人活动相当猖狂。什么是我们的敌人呢？苏联修正主义，外蒙古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台湾的蒋介石匪帮以及在我们内蒙的地富反坏右和屡教不改抱着阶级仇恨的分子，如乌兰夫、王逸伦、王铎就是他们的代表。在内蒙地区散布了许许多多的反革命谣言，同志们千万识别一下，千万不要受蒙蔽。比如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谣言，说是中央对内蒙古的决定是假的。这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是欺骗群众的，你们想一想，这样的决定怎么能够从北京发出不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准呢？这样的决定怎么能不经过毛主席的批准呢？问题不是这些，问题就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利用这些谣言欺骗人民，目的是反对中央这个决定，是这么一回事。这种谣言是很恶毒的，甚至于挑拨中央同志的关系，甚至于造周总理的各种谣言。同志们，这一点应该提高阶级的警惕。内蒙阶级斗争是最复杂的一个地方，是国防最前线。内蒙，我告诉同志们，内蒙今天发生问题，明天，后天莫斯科就可以报导的，今天发生问题的时候，明天，后天香港就报导的。我相信同志们大多数是革命的。但是，要革命，就必须要提高阶级的警惕，因为有事实，我可以告诉你们，王逸伦就是一个特务。在我的看法，王逸伦不仅是苏修特务，也是日本特务，也是国民党的特务。所以，这一点同志们千万要站稳阶级立场，千万对问题要有一个阶级的分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敌人在内蒙古的破

坏活动。因此我想，同志们必须分清敌我，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我们的同志，什么是我们的朋友，这一点是革命者首要的一个问题。同志们，你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像这几天内蒙古呼和浩特那种混乱情况，敌人高兴不高兴？苏修、蒙修、蒋介石匪帮、地富反坏、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人他们高兴不高兴。同志们要记得主席的话，敌人高兴的事我们就不做，敌人反对的事情我们就拥护，所以，希望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希望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了阶级，阶级斗争，千万不要有阶级仇恨、阶级警惕。这是第三点，从这一点我就要介绍一下。因为同志们要我介绍一下王逸伦到底是个什么人？

我不认识王逸伦，但是在中央一次接见的时候，我左看、右看，我看这个人不像共产党。因为什么呢？不管人家讲什么话，他就好像敌人的特务在我们的法庭上的那么一种态度，不管人家怎么批评，不管人家讲什么话，他就把头一摇，造谣，造谣，造谣。因此我就问他，你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嘿，一下子问住了。他说共产党。我说你在哪里加入共产党？他说在北京。我说在北京。那个组织加入共产党？他糊里糊涂说不出来。以后他说到莫斯科。我说那更怪了，凡是中国同志到莫斯科去，首先要经过我审查，我怎么没有看到过你呢？（笑声）他说他认得我，我说你认得我是一回事，我可不认得你呢。我说你在什么学校学习，他七讲八讲，讲一个什么学校，我根本不晓得那么一个学校。会后，我才知道他到了热河，他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中央组织部历次介绍这个人党籍不清楚，那么最后怎么到热河去的？是现在北京市黑帮刘仁把他派去的。到了那怎么样？到了那投降了敌人，后苏军到了赤峰，因为他会俄文，他俄文讲的不错，就替苏军做政治工作。苏军撤走的时候他和土匪搞到一道。就这样骗了党，并且好像他是一个抗日的，我只举一个例子同志们就知道。一九六四年他在党校学习的时候还同北京的一个女特务发生关系，直至现在这一次开会的时候还同女特务发生关系。同志们，你们看一看应不应该警惕呢？应不应该警惕呢？

另一方面，比如王铎，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我从前知道他是在延安民族学院，是经常同乌兰夫一道，替乌兰夫做秘书的，是乌兰夫的亲信，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实际上是地主、资产阶级代表。最近我们看到了香港特务来信，要同他发生关系。那么到底这个事情我们还不该断定王铎一定是特务。但是，这个人是什么呢？是王铎的学生，名字叫洁生。

另外一方面，你们晓得王逸伦他的亲戚，他的外甥是什么人？当他在北平的时候，就是此人也是他的家乡人，此人叫李铁忠，国民党特务调统局在北京地区的负责人。这样一些坏人，这样一些牛鬼蛇神，被我们军区认为是极左派，结合他们成为三结合的对象，还到处亮相，把王逸伦的报告录上音到各地方放，到连队放，北京也放了，所以，同志们受蒙蔽很久的，他们放毒，到处放毒（有人插话：今天消毒）现在消毒。我们这个会也就是一个消毒会议（鼓掌）。所以，忘掉了阶级，忘掉了敌人的时候，不把敌我分清楚的时候，我们非犯大错误。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记取教训。我这里有一大罗王逸伦的材料，你们看他和裸体特务睡觉的照片我们所有的。这一点我们要做为教训，要提高警惕。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把他揭露出来嘛！他还是自治区的副主席嘛，那么，同志们相信他也是合理的。但是，他已经长期混在革命队伍里边还没有揭露，那么，同志们受蒙蔽，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点，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些保守组织，有的受蒙蔽的同志，在内蒙文化大革命中间犯了这个错误。犯了错误只有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敢于承认错误，敢于改正错误。我想，同志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是雄心壮志的，绝大多数的人，青年人是这个抱负的。既然这样，有错误我们也等，我们有错误，勇敢的承认错误，有错误就同错误划清界限嘛，改正错误，不是夺权嘛，要把自己错误的权夺掉。这一点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要歧视他们。毛主席的办法就是一看二帮。一看是怎么样呢？要看他自己是不是觉悟，看他自己是不是改正错误，是要看了。那些坚持错误，甚至屡教不改的，个别也有了，但是大部分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所以要看。第二条，要帮，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所以，这一点，只要同志们承认错误，不要抓他这样的小辫子，那样的小辫子，应该在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团结起来，向着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向着内蒙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人作斗争。无论是造反派，无论是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应该采取这样一个态度。比如现在还有人抓三司冲击军区，现在中央不是讲了嘛，那个不要追究，人家犯了一个错误，允许人家犯错误嘛，你们现在不是有些保守组织，出入军区，出出进进那不是比三司还厉害吗！（鼓掌）到中南海门口静坐，你看是不是已经比三司高明咧！一时的错误，我们不责

备，不责备的，你们没有犯这个错误也不要来抓人家的这个小辫子。随便我讲一句话，我郑重地讲一句，在呼和浩特，在内蒙，有这样的标语：打倒康生！不怕这回事，不要抓这个辫子，不要抓这个辫子。打倒周总理的也有了（周总理：这个辫子不要去抓啊！）这个辫子不要去抓！（鼓掌）如果说我们违反毛泽东路线的，不执行毛主席路线，执行刘邓路线，不要你们打，他自己会倒的，如果我们坚决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你怎么打，也打不倒的！（鼓掌，呼口号）所以，你们去抓这个辫子干什么？不要抓。

最后一点，就是许多同志讲过的，希望同志们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面来，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总理、陈伯达同志、肖华同志讲过话了，时刻想到我们对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是不是言行一致，同时观察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假拥护毛主席，现在这本书差不多谁都有一本的，地富反坏也去买一本去，保守派也去买一本去。这里面你们不能单看外表了，不能单看讲的，要看行动，要看实践，要区别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当前的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手段，大家要善于区别这件事情，善于区别这件事情，话是要听了，听其言，但是要看实际行动，要观其行，讲话、读语录是一回事，做事情，实际行动是另外一回事，这就不行了。所以，这里有个真拥护毛主席，假拥护毛主席的问题，对内蒙当前来说什么是一个标准呢？拥护毛主席批准的内蒙决定的人，是真拥护毛主席的（鼓掌）是一个标准，当然，一个时候不大了解，一个是还没有弄清楚，一个是还有点怀疑，你不能给人家立刻戴上一个反毛主席的帽子，那个恐怕也不好，但是，这是一个标准。这里面我也讲到了，恐怕对内蒙三司的同志我也讲几句话。三司是一个革命组织，但是，革命组织逐渐扩大的话，必然就可能混进一些不纯的成分在内。你看看吧，我们共产党还混进来彭，罗、陆、杨、刘、邓、陶铸。有人提善意的批评，三司应该很好的检查。相反的，你那个无产者就那么无产呀？我看也不见得吧！反三司的人组织就那么纯了，不是吧！那个军区里面他们就那么纯？他还结合王逸伦呢。每一个组织中间都会有，必须随时在这方面整风，自我批评，清理组织，巩固组织。另外一方面，三司的同志，也不能因此骄傲起来，也要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所批准的内蒙问题的决定，而且要做模范。这里面不是讲嘛，反对打、砸、抢、抄、抓嘛，这一点，三司的同志一定要注意，你们自己要首先遵守，你才能去说服人嘛！所以说，执行毛主席路线一定要见诸

实践的，见诸实践中不可能没有这样的、那样的错误。有错误的就改。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同志，以及受蒙蔽的、不了解情况的同志，经过我们的这一次会议会了解的，会觉悟起来的，会坚决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反对那些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反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等坏分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一点我们相信是这样的，所以我很赞成。内蒙是我们国防的前线，我们有权利要求，同时也有义务把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面，在毛主席的号召下面，在毛主席的批准的决定的决定下面，把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把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人斗垮、斗臭，实现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鼓掌）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总理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同志们！

我们讲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已经把毛主席，我们伟大领袖委托我们的任务，已经在这个地方实现了，把毛主席的声音传达给你们了（鼓掌）。许多从内蒙古来的一些同志，你们口口声声说日夜的想念毛主席，我也相信你们这一番好的心意。那么，我们大家就是把毛主席的声音传达给你们了。（鼓掌）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只要你们听毛主席的话，赶快回到内蒙古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同蒙蔽你们的，欺骗你们的，使你们上当的，跟那些反动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鼓掌）你们坚决的，跟其他同志一道来闹革命。同时也希望站在呼市三司的观点的一切同志，你们要响应刚才康生同志的号召，你们也懂得过去你们受压迫，所以你们成为革命派，坚定的左派，那么现在你是平反了，你是革命了，你们可不能象执行反动路线那样，转过来去压迫他们，那就不对了。（鼓掌）所以，你们双方都应该把决定的第六条，第七条好好地读一读，我们大家站在一起，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这一伙人，团结起来闹革命力量就会更大。希望你们听到了我们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以后高高兴兴的，除了极少数挑拨者以外，大家携手一道回内蒙古去闹革命！（鼓掌）

让我们结束这个会议，让我们高呼：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坚决地站在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彻底批判内蒙古的反动路线的头子乌兰夫、王逸伦、王铎！把他们批倒、批臭、批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散会。

附件：

刘华香的检讨

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并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以及到会的全体同志们：

自从三月十八日以来，中央负责同志，军委负责同志以及内蒙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小将们，对我们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和诚恳的批评，使我们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尤其是四月十三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以后，使我们对所犯的错误的认识，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我们完全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鼓掌），我们一定不折不扣地，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鼓掌），按照中央的决定来处理内蒙问题。近一个时期，毛主席、林付主席把“三支”任务交给军区，我们没有完成毛主席和林付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辜负了毛主席和林付主席对我们的重托和信赖，给内蒙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们万分的惭愧。

这期间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指向了呼市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我们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阶级分析，没有看他的大方向，只看到他冲击了军区，便认为他们不是革命组织。我们把一时的现象当成了本质，把支流当成了主流，用感情代替政策，把呼市三司这个革命的群众组织当成了反革命组织，对他们实行了分化、瓦解的方针，反

而支持了保守派，把事情完全搞颠倒了。

这个期间我们违背了毛主席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教导，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逸伦当成了“三结合”的对象，把斗争锋芒指向一些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高锦明、权星桓等同志，非法地给他们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颠倒是非，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的界限，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甚至开枪打死了韩桐同学，进行了白色恐怖，犯了带枪杆子的刘邓路线的错误。

这个期间，我们还犯了一系列的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我们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对中央不尊重，执行中央指示很不坚决。中央派去的记者，我们私自扣留，呼市党委、人委夺权我们不请示报告，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决定召开几万人的庆祝大会，总理指示不要召开大会的时候，我们还想延期召开大会。我们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把吴涛同志当成了三反分子，抄了家，封了文件，停止了他的工作。这也是政治上和组织纪律上的错误。三月十八日以后，中央首长三令五申让我们释放被捕的同志，我们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贯彻执行。这是我们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的表现，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立场站错了，站在了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了革命群众，犯了带枪的刘邓路线错误，实际上是目无中央，目无军委，夺权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对中央指示采取两面态度，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思想上自以为是，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绝对化，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

这些错误的产生绝非偶然，我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政治挂帅的必然结果，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必然结果，是主观片面、骄傲自满的必然结果，这个时期所犯的 error，值得我们作为深刻的教训，我们对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我们有罪于党，有罪于人民，我们向党中央请罪。以后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阶级斗争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坚决的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一定坚定不移的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坚决支持革命组织呼市三司。我们一定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八条指示，军委的十条命令和八条命令，作好部队的思想工作，作好群众工作，搞好军民关系，妥善处理善后问题，帮助革命组织发展壮大，

对保守组织进行分化、瓦解、教育、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一律平反，贯彻主席三个指示，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停发工资者一律补给，不同观点的人不准打击报复。枪杀韩桐的凶手一定要依法惩办。

我们改正错误，和呼市三司革命小将，全区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在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全军文革领导下，把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坚强的反修前线，完成党中央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以上没有检查的地方望批评、帮助、教育、我们继续检查，今后坚决改正错误。

此致

敬礼

刘华香肖应棠刘昌黄厚王良太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总政治部给内蒙军区党委的指示

〔总政治部关于坚决处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给内蒙军区党委、政治部的指示〕

内蒙军区党委、政治部：

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操纵的保守组织，严重地打击了革命群众，使内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挫折，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中央四月十三日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所犯错误的性质和纠正错误的一系列措施。中央决定下达后，立即得到内蒙地区广大革命群众，内蒙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

但是，据反映仍有极少数人坚持错误立场，对抗中央决定，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另外，有些人因为受了欺骗蒙蔽、上街游行、上北京告状。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是违犯军纪的行为。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特作如下指示：

一、中央四月十三日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付主席批准的。一切拥护毛主席，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的同志，必须自觉地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人民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一定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二、要立即在内蒙军区所有机关、所有部队、所有单位全体指战员中，深入传达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以及军委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做到人人皆知，家喻户晓。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下去进行宣讲，原原本本地把中央决定和军委命令传下去，耐心地进行宣传教育，特别要注意抓活思想，切实解决部队中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部队中有一些人受了王逸伦等一小撮坏人的蒙蔽，受了前一时错误宣传的影响，对内蒙问题的真相不了解，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军区领导干部要挺身而出，要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主要是军区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坚决支持呼市三司、八一八等革命组织，并把军区过去支左工作中的错误，向干部、战士解释清楚，相信广大群众只要真正掌握中央决定和军委命令的精神，就会明辨是非，迅速解决思想问题的。

三、内蒙事件主要由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等等人负责。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的错误也是严重的，他们是好人犯错误，受了蒙蔽，站错了立场。只要他们迅速把立场端正过来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坚决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至于其他受王逸伦等一小撮坏人欺骗蒙蔽的干部、战士，他们是没有责任的。当然，这一事件对所有同志都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每一个同志要从这一事件接受教训，提高阶级斗争观念，把无产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一步。

四、内蒙地区由于一些历史原因，阶级斗争极为复杂，又是地处反修斗争前线，内蒙军区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艰巨任务。中央决定调刘贤权同志任内蒙军区司令员，以加强内蒙军区的领导。刘贤权同志在青海地区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无产阶级立场坚定，是一个好的领导干部。政治委员吴涛同志在这次内蒙地区文化大革命中，同乌兰夫的斗争是坚决的。他是一个好同志。内蒙军区部队要团结在以刘贤权、吴涛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领导下，共同努力，完成毛主席所赋予的一切任务。在目前刘贤权同志还未到职，中央决定腾海青同志代理司令员职务，军区的全体同志应该坚决拥护腾海青同志和吴涛同志领导。

五、我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人民军队，是有高度无产阶级觉悟和严密组织的军队，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切行动听指挥”。

在当前内蒙地区阶级斗争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军区的全体指战员必须进一步加强组织纪律性。一切军事调动，必须绝对遵守军委规定，按照规定报请上级批准。参加地方集会和上街游行示威，要经军区批准，不准擅自行动。

六、当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我军担着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内蒙军区部队，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内蒙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内蒙地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等人，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把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

此指示应传达到全体干部、战士。

总政治部一九六七年四月廿八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军区赴京人员的谈话

〔时间：五月十六日晚七时半，地点：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总理、康生、江青、徐向前、聂荣臻、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叶群、王新亭、徐立清、粟裕、郑维山、陈先瑞、傅崇碧、陆杨等负责同志。〕

总理讲话：今天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接见你们。这个会是上午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指示召开的（喊口号，我们想见毛主席。会场出现混乱）

江青同志：解放军要遵守纪律对不对？（众答：对。）

总理：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问候你们。（又喊口号：我们要见毛主席，打倒刘邓陶、打倒乌兰夫、打倒王逸伦、打倒王铎、打倒高锦明）我们很清楚你们想念毛主席，我今天上午报告了毛主席，今天才开这个会。（总理接着解释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当讲到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会场很混乱），人民解放军要遵守纪律，要听听中央的声音。

江青同志：你们要听总理讲吗！你们这样闹是不妥当的。（总理接着解释中央决定。）

总理：内蒙位置很重要，那里发生的每个问题，苏修很快就知道，前一段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错误，错捕了很多革命小将，他们生气勃勃，敢说敢干革命性很好，而被打成反革命。八条下来，没机会和他们讲，遇到了阻力，主要是王逸伦、王铎搞鬼，你们没责任，是无罪的。

江青同志：首先问你们好，我完全拥护总理对中央决定的解释，中央决定是经过中央讨论，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同志们是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是中国人民子弟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解放军为什么战无不胜，因为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相信同志们会坚决执行八条决定的（喊口号：打倒刘、邓、陶，打倒乌兰夫、打倒王逸伦、打倒高锦明）。同志们不要有什么难过，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相信大多数，前一时期内蒙军区少数同志犯了错误，你们是没有责任的，你们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搞不清楚，受了蒙蔽，只要向你们讲清楚，相信你们一定会坚决执行八条的。同志们，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遇上这场空前未有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幸福的。你们一定会坚决拥护十一中全会决定，拥护十六条的。相信你们大多数是要革命的。刚才总理讲，派一些代表，座谈听取你们的意见，还有一个办法，派一个代表团到内蒙去。你们想过没有啊！你们那里是战略要地，你们要回去，抓革命，促战备，抓好三支两军任务，应该回到内蒙去（喊口号：我们要见毛主席）。我非常体会会场的沸腾情绪，我懂得你们的心情，毛主席、林副主席，昼夜处理国家大事，还有国际斗争，如果每一个上访人员都要见，那有这么大精力呢！你们要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健康吗！你们要想一想，那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民主啊！但你们也要有高度的警惕性，你们要回到内蒙去闹革命，加强战备，你们要把枪口对外。

聂荣臻同志：中央对内蒙问题是经过两个多月调查研究后决定的，这个决定是经过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审查批准的，是完全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最听党中央的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绝对不能产生对抗中央的行动，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决定，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像林副主席指示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同志们对中央的决定，既然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就应当坚决执行。在执行中求得理解，一切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倾向都是不允许的，不然我们这个军

队就会成为涣散的一支部队，这怎么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内蒙古军区处在反修前线，位置很重要，要提高警惕，不要上敌人的当。各级领导，特别是政治干部应当立即动员起来，深入群众，教育大家坚决拥护贯彻八条，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林副主席说：立场错了，全盘都错了。希望大家不要受一些现象所蒙蔽，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斗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斗倒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志们，你们在这里听到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声音，应该回去忠实的传达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声音。

（台下一片混乱，递条子，送材料，这时江青、叶群同志接送来的条子和材料）

叶群同志：同志们、战友们，首先我完全拥护总理，江青同志的讲话，江青同志的讲话完全反映了我们的心情。我来之前，请示了林彪同志，他知道你们来了，知道你们都是想多作一些革命工作的，他嘱咐我向大家问好，向大家致敬。我完全拥护总理关于中央决定的解释，因为这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我们一定要坚决拥护，要听党的话。大家的革命热情是好的，不但在座的，就是在内蒙的全体指战员也是这样，中国有句老话“不知不罪”，广大指战员是无罪的，党中央、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说把指战员打成反革命，毛主席最关心解放军，党中央最关心解放军。周总理、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对内蒙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江青同志讲了，我们需要有革命性，需要有组织纪律性，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吸取这些教训，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希望不要辜负毛主席对解放军的期望。

总理：时间很晚了，明天大家不是分头座谈一下，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总政分头下去听听，我有时间一定也要去听听。

（台下高呼：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倒刘邓陶，打倒乌兰夫，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周恩来肖华接见内蒙军区警卫营代表的谈话纪要
〔时间：五月十九日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

总理讲话：

总的精神开了三次会了，连续开会该讲的都讲了。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内蒙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责任在王逸伦、王铎，他们挑拨是非，把军区也拉进去了，他们从中得到好处。这次是最大的收获，查明了王逸伦、王铎是什么人。过去军区也受蒙蔽了，上当了。这几个月中部队也受了蒙蔽，在支左工作上出现了问题，责任在王逸伦、王铎，其次是军区个别领导人。造反派有一些缺点可以原谅。比如红卫兵冲中南海，冲了八次，有时冲到第五道门了，还有用大卡车冲进去了，象这样的问题还不严重吗？还不是大事吗？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么，但我们并没有责怪他们，没有扣帽子，劝他们出去，指出这样做是不对的，冲无非是见我们嘛！那我们就出来见他们，造反派冲军区，想要军区支持他们，还是相信他们，你们不要太紧张了。邵德胜的问题，要调查清楚，但不要去宣传扩大，要保卫解放军的荣誉。韩桐死了，三司登在小报上，我们还说了他们。整个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世界上最好的部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是战无不胜的。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要提高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我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要逐步掌握政策，不要和红卫兵小将计较什么，中南海周围喇叭很多，我们这些人养成了个习惯，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办公办到天亮，准备休息，喇叭响了，但毛主席从来没讲一句话，有时我们说几句，中南海喇叭是否少安一点，但他们感情一来，就不管这些了，对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谅解嘛！军队要有组织纪律性。军队就不能和学生一样，要保持稳定。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所以机关院校要搞四大，武装部队搞正面教育，不能说走就走，要有组织纪律性。军队还有个备战任务。军队无论如何要巩固、要稳定。这次你们到北京来，除七十三位代表是我们请来的，还有自己来的十几位，起码这一点就不怎么讲纪律。你们在人大会堂也看到了，有两千七百人嘛！有许多是自己跑来的嘛，这就涣散了，这就不讲纪律了。这么多部队自由到北京来，还是第一次，但是我们没有责备你们，因为你们还是革命战士。

解放军不要带红袖章了，红卫兵给我们带袖章，是送给我们的嘛，就保存起来嘛！领章帽徽，人民解放军是最光荣嘛！解放军不要和其他战斗组织串连了，不准串连。前一阵呼市军区大院乱得象市场一样，这就忘掉了还有战备任务啦。你们是自己乱了一些阵。犯了一些纪律，我提一下就算了，也不要回去写什么检

讨了。

工厂的工人组织，农村的基层组织，学校里的学生组织，这些基层组织，都是要革命的，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们所主张的，是跨行业的。因为他们什么都管，就象北京的革命委员会。那是以后要搞的三结合。要是有一个联合组织都象革命委员会，那怎么能行呢？所以要解散。对上层的领导人，可以回到原单位参加基层组织。至于基层组织，就不要解散了。解放军就不要和这些基层组织在一起搞串连，看看他们的传单，同意他们的观点，也是可以的，有思想自由嘛，但不能有行动。因为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你们到北京来了，我们就要做工作的。警卫营要做模范，过去你们领导上犯了错误，你们是受骗的，所以认为三司是个反动组织。过去你们支持“无产者”，所以现在感情一时扭不过来。你们要集中在一起，整顿一下，要做模范嘛！部队还是可以更好地完成任务嘛！还是相信你们的嘛！我要是到呼和浩特，就住到你们那里去。青年人要有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要下决心改正过去的缺点，成为更可靠的人民军队，成为呼市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很好地学习中央公布的通知。一年以前，毛主席就有英明的论断，还要学习阶级、阶级斗争、政权等论述。要弄清这些，就会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自觉执行八条，做到打不还手，骂不张口。骂一句打一下算什么呢？这样就不会憋一肚子气了。

你们要去做模范，这一次教训，是要把过去不正确的观点端正过来，过去的责任不在你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八条和中央的通知。江青同志受林副主席委托起草的纪要，很快要公开发表，也要好好学习。你们要准备接受新的光荣任务，如果你们还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就要做模范，我们寄予你们很大的希望。你们要带头回去，起模范作用。到六个点上去宣传嘛，回去解决问题嘛。有些问题还要调查。军区的领导干部也都要回去，大家要检讨，检查错误，不要你几条，他几条，要思想一致，吸取教训。“五·二零”两个副司令员的命令口径就不一致，那一天我一直在这里等到你们天亮嘛，说明没有发生什么大乱子嘛，证明了毛主席的教导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现在是乱一些，包头工业生产受了一些影响。只要你们带头回去，提高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坚决贯彻八条，

就会把内蒙的形势扭转过来。我就讲到这里。

肖华同志讲话：

这次总理请你们来，三天的大会中做了许多指示，这次又亲自单独接见你们，这是对解放军的关心，是对内蒙军区，特别是对警卫营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这是同志们一生的光荣，是内蒙部队的光荣。因为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带来了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大家回去好好宣传。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不折不扣地坚决地执行八条，要做好拥政爱民工作，要处处关心群众利益，保卫国防，保卫边疆。对于小将要爱护，要看主流，看大方向，不要计较那些过头话，不要只看小问题。有一个地方，小将把解放军打了骂了，解放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这样感动了小将，第二天几百、几千的人去慰问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他们冲到国防部、中南海，我们也没有责备他们嘛！要关心他们，象雷锋、王杰一样，做好爱民工作，过去你们的认识有毛病，不能怪你们，要怪王逸伦、王铎，怪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你们要把认识改过来，把军民关系搞得更好，内蒙处在反修前线，任务很重，要警惕坏人挑拨离间，要有高度的阶级警惕性，要保证军区首长正常的进行工作，保证指挥体系，保证机关的工作秩序。对首长要尊重，不要轰，轰不能解决问题，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样会涣散部队。你们要求首长解答问题，要安排时间嘛，希望你们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这次，总理一再看望大家，只有无产阶级的总理、革命的总理、毛主席的好学生，才能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们。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期望，相信你们会做到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领导干部的谈话纪要

〔时间：五月二十一日晚八点到十一点，地点：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人：周总理、康生、徐向前、肖华、谢富治、王力、关锋、粟裕、郑维山等同志。被接见人：内蒙古军区腾海清、吴涛、刘昌、刘彬、黄厚、王良太、张德贵。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

总理：明天开一专车，你们都走，参谋长负责。又一次对你们考验。中央做

了这样的忍耐，警卫营行为不能不使人想：口头上拥护八条，但是不回去。是受了外界影响。有人故意歪曲调查组，要重新审定“八条”。“八条”是中央决定，根本不能改嘛！根本不能重新审定嘛！还有的说要搞什么“新八条”，这简直就是捣乱，显然里面有坏人，就看你们来揭了。无产者，工农兵等跨行业上层组织要解散，中央“八条”明文规定不能改变。明天要开好一个专车等着，如果再不服从命令，以自由脱离解放军，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要采取行动。

关锋同志：你们这些司令员、政委还有点威信没有？这一点威信都没有了？部队就带不回去？我就不相信。

总理：警卫营的干部那天我接见是一个一个让他们讲的，我讲了以后，下面的战士要发言，他们不让，我让他们说嘛！结果就是侯风英的问题嘛！刘彬、黄厚、王良太你们能把部队带回去吗？（刘、黄说：大部分能带回去。王说：坚决要带回去。）矛盾不能上交，问题就是军区党委了。昨天晚上还要抓吴涛，会是怎么组织的。

关锋同志：这是借口，什么时候都有借口。

总理：腾海清、吴涛处在困难地位，中央坚决支持他们，不行的话，我就陪他们指挥去，所以责令你们（刘彬、黄厚、刘昌、王良太、张德贵、郗端卿），你们要绝对负责任。军队个别坏人在煽动，大多数人莫名其妙的反对腾海青、吴涛，说什么腾海青的车轧死一个人，当场就有人起来做证，没有这回事。我在一所也有人提出来，当场我就批驳了他们，他们就没话说了，显然是有人捣乱。中央坚决支持腾海青、吴涛同志。腾海青到内蒙以后，问题处理得很正确，我在毛主席那里说了，实在不行我送他们回去。哪有这么回事，部队这么多人自由到北京来，马上开个军委党委会，军委去人，你们七个人都去，一起说话。我从十号以后一直等待，我去接见看望他们，现在不听说了。

关锋同志：这样闹下去会有什么结论，你们老同志要好好想一想嘛！

总理：显然不是大多数了，而是个别人的问题，要执行纪律了。现在要你们去执行纪律，准备一千五百人的专列，生火待命。这是一个考验，看他们到底是不是解放军。他们往南走，所以鼓励他们啦！如果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啊！要宣布几条命令，军队那有这样事嘛！做群众工作也不能这样嘛！他们提了那么多意见，还有书面的，我们要去研究嘛！新的问题要去调查嘛！还有什么意见啊？你

们说能够去传达，等一会军委会议后，决定了报告毛主席、林付主席批准了以后，你们去传达，你们一起去讲。你们回去还能不能把军区大院整顿得象一个战备的军区大院？不能让带袖章的随便出出进进。部队要备战嘛！王良太，以后军区大院的秩序能不能维持？在呼市的部队你们军区首长能不能控制在营房？军事机关不能与外面串联，过去军区自由让群众出入，后果很不好，只要一串联各种思想都来了，就会使机关受影响。要重申中央军委的命令，不能去军队串联，军队也不要到地方去串联，你们有没有这个把握说服机关和部队？不然的话，确实腾海青、吴涛没法在机关里办公。王良太你是机关首长，能不能做到啊？

谢富治同志：你们看总理、中央文革下这么大精力，你们不要再犯错误了。

关锋同志：不要一错再错了。

谢富治同志：他们越闹，你们的错误越大，并不能给你们带来什么资本。

总理：我们相信你们，所以没调部队去。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

谢富治同志：中央耐心是有限度的。

总理：串联连必须停止。要搞几条，必须恢复秩序，现在这样绝对不允许。

康生同志：随便到外边去，随便把武器丢了，是什么军队！我听到这情况以后，心里很难过。他们自己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是中毒最深的，长期受蒙蔽，看了心里很难过。你们这些干部，如果还有良心，第一要看到乌兰夫，第二要看到王逸伦，王铎，第三要看到自己的罪过。从井冈山到现在，什么时候看到过这样的军队！我很激愤！这样怎么能对得起毛主席、党中央？对得起人民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后果是多么严重啊！问题在哪里呢？就在你们这些干部下决心了。你们看这个部队怎么带的！那有这样的军队！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你们要拿出一切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总理：要规定几条，军队不要串联，不要上街，汽车不动，汽油不发，广播器材要严格控制。三司我们去正面说服嘛！三司是最听话的，只要军队稳定，三天就可以改观了嘛！无产者、工农兵要解散嘛！是上层组织嘛！下面的广大成员还是好的，就是有些坏人嘛！这些坏人，只要局势平定下来，就会查出来的。

康生同志：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的结果，就是因为背叛中央，欺骗中央，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的。搞上骗中央，下压群众，“重庆谈判”，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央表态。你们要下决心去解决，向北向南，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你们的行

动背叛了中央嘛！

王良太：我们矛盾不上交。

关锋同志：王良太同志，不是矛盾上交不上交的问题，是个决心问题。矛盾一定要上交，中央就只好管了。

总理：这是考验，如果不划清界限，就会和坏人混在一起。

康生同志：那一天的大会上，看的很清楚吗！哪是腾海清的问题啊？就是背叛中央嘛！中央的“八条”肯定了高锦明，他们当场就要打倒，象什么解放军呀！你们都是老干部吗？还要不要共产党员的原则？

总理：群众组织还听话呢！军队怎么还不如群众啊？

康生同志：你们惭愧吗？

谢富治同志：你们越走越远，不好收场了。

总理：还可以收场的，只要下决心。在那样的大会上，喊背叛中央的口号，象什么军队嘛！你们犯了错误，要好好批评，坏人是个别的。

关锋同志：只要下决心，部队是可以带好的，带了大半辈子的军队嘛！

康生同志：相信你们是会带好部队的。

总理：你们现在去开个会，腾海青同志主持一下，一个小时以后再谈。

（一个小时以后）

总理：这些人自由的离开部队是犯法的，再不听话，一犯再犯，就是散兵游勇，北京卫戍区就要执行纪律。战士这样做，只能使苏修、蒙修、乌兰夫、王逸伦、王铎之流高兴。解放军的战士，要拥护党中央，如果仍往南走，心向北，实际上就是帮助了蒙修。支持左派，这是个立场问题。还要教育争取被少数保守组织头头所蒙蔽的革命群众，否则就会打击一大片呀！而不是解放一大片呀！坚定的左派，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坚决支持左派，一个是教育争取保守派，缺一不可。这是毛主席教导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才能解放自己。军区党委常委内部，要亮开思想，有什么话都说出来，不要两面三刀。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对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命令的批示
主席批示：照办。

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的五条命令，很好。内蒙古军区全体干部和战士应该坚决贯彻执行。

内蒙古军区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的光荣任务，应该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的伟大号召，机关，部队应该恢复正常的革命秩序，所有人员应该坚守工作岗位和战斗岗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应该听毛主席的话，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坚决贯彻执行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更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命令

内蒙古军区部分干部，战士来京以后，中央军委首长两次接见，听取军区来京常委的汇报，对我们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并派负责同志到驻地分别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这是对内蒙古军区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信任。中央军委首长的谆谆教导，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为了切实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为了认真实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为了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的伟大号召，特发布以下五条命令：

第一，坚决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军区各单位到呼市和其他各地串联的人员必须于五月底以前一律返回原单位，不得在其他地方停留，过期不归的以自由离开部队处理。

第二，坚决贯彻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和中央军委的其他有关命令规定：

- 1，除步校，卫校，文工团，体工队和军乐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
- 2，不许军队内部相互串联，也不许军队到地方去串联，如地方群众到军队串联的应予劝阻。
- 3，进行正面教育的单位，不应有战斗组织，现有的战斗组织一律取消，以

确保领导机关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保证机关和部队的正常工作秩序。

4，军队未经军区批准不许随便参加游行和集会。

5，汽车，汽油的使用应由各级后勤部门严格控制，加强管理，各种宣传工作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工具及其补充器材等应由领导机关严格控制使用。

第三，坚决支持和维护，忠实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决定〉的单位和人员，对不满中央这些决定和言行不一，阳奉阴违的人，要进行教育和严格批评，对少数对抗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的屡教不改，坚持错误的人要给予纪律处分。

第四，全军区指战员一定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努力提高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提高政策水平，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绝对不准参加武斗。对待不同观点的人，不应歧视，更不应打击报复。

第五，坚决支持呼市三司和内蒙各地左派群众组织，要努力教育和团结保守组织中受蒙蔽和认识不清的广大革命群众及其基层组织。

全军区各级党委，各地领导，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身体力行模范地执行中央决定。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全军区指战员一起，坚决支持左派，教育团结受蒙蔽的广大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内蒙的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内蒙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希望。

代理司令员：滕海清 政治委员：吴涛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的决定

根据内蒙古军区在京人员这几天的行动，采取如下决定：

1，对黄厚，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刘昌，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停止与各方一切联络。

2，对二十四日捣乱会场，殴打吴涛，宣读五条反动要求的少数头子实行清查逮捕。

3，对现在六个招待所的 788 人（其中 150 人）宣布禁止外出，要他们自己

检举来京闹事的为首人员和后台指挥人员，这些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暂不回蒙。

4，准备调一师兵力移驻呼市，将不守纪律的警卫营，通讯营一部分人员，高炮营，测绘大队等调离呼市，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

5，宣布内蒙古军区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编制，滕海清，吴涛，刘彬立即随北京军区调进部队回呼市指挥。

为负责执行上述决定，由谢富治，xx，李天佑，郑维山，xxx五同志成立五人小组，以谢富治同志为组长，xx同志为副组长。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康生王力与呼和浩特市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时间：1967年5月26日22时50分~27日凌晨零点40分，地点：人大大会堂一楼西大厅。出席：呼市造反派代表30人，军人代表26人。】

（在热烈的掌声中，总理等领导人满面红光步入会场。）

周总理讲话：

你们等了很长时间了，吴涛同志挨打你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区党委的人没去，去更得挨打。

从4月13日宣布八条以后，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们来了许多人到北京闹事，24号达到高潮，军委开的会，李天佑参加了（李付总长），动手打人发展到高峰，有100多人冲上主席台，把吴涛打了半个多小时，让他签字，李天佑制止，他们不听，政治部付主任徐立清上来讲，他们也闹。刘昌掌握会场也不制止，王良太发言鼓掌很厉害，他发言很有煽动性，问：“今天的会开得好不好？”众：“好！”和中央唱反调，八百多人等不急了，不择手段，估计形势不足，闹事把他们暴露了。接见警卫营时说了，给他们以后的考验机会，把军队秩序建立起来。昨天我们决定采取五项措施，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已经说了，等待到一定程度。五项决定是经过林付主席的，经毛主席批准的，是根据内蒙形势采取的。（宣布了五条措施）

军队的留一半，清查一下，除了集训的，还有没有散兵游勇的，倾向你们的劝他们回去，中间的也要帮助他们回去，少数头头顽固的交卫戍司令部，三司也

可以留下三分之一，818 来了吧（818 王志有同志站起来，递照片），红联、八大员来了，你们不要赶，你们去说他们也不听，告诉中央接待站，叫他们去做工作。军区造反派回去要听吴涛政治委员的话，听腾司令员的话，他们先动手，我们后动手，这样才有理。毛主席对内蒙问题很关心，昨天还打电话问内蒙事态怎么样？三司很听话，就是很听话嘛！工会大楼先不要进，要孤立。于顺昌挨过打吗？三司要听筹备小组，军队的话，一步步走，发展的慢不要紧，容易巩固，否则左、中、右都进来了，就要打内战。下面的保守组织不要砸他们，他们开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派少数人参加，开的好可以鼓掌，他说的不对可以质问，政治上的优势不要马上想占组织上的优势，这样容易对立，呼市，包头交通方便，处于反修前哨，左派发展有步骤，要坚决学习五·一六通知，社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通过这次反复，左派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要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系内蒙乌兰夫、王逸伦。

筹备小组不要齐了再成立，几个人先成立起来工作，四川筹备小组才四个人，这是司令部嘛！

我就讲到这儿，下面由康生同志给大家讲一讲。

康生同志：

刚才总理把中央的措施讲了，详细情况没讲之前同志们不知道，不可能一点不知道吧（笑）。

（总理说高树华同志很守纪律呀）内蒙之所以这样，是乌兰夫的罪过。通过这件事更加暴露乌兰夫十几年的叛国罪恶，要宣传揭发乌兰夫的罪过，希望三司、东纵、“818”今后利用这点来批判乌兰夫，三司过去做了，但做得还不够，今后还要做，要指出乌兰夫是蒙族的叛徒，是中华民族的叛徒，三司要加紧做这个工作，彻底的揭露，要把斗争的大方向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内蒙就是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要彻底暴露，批深、斗臭、军区王良太、黄厚、张德贵从开始上抗中央，下压群众，最后把反革命（面目）暴露出来，革命群众也应得到教训，只要我们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管受多少挫折，最后还是要胜利的，因为我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三司、818、工厂的，东纵的也好，中共中央 5 月 16 日通知发表了，两个编

辑部发表了文章，和毛主席著作，明天还有，你们学得怎么样呀？我们要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什么做武器呢？要向林总所讲的那样，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个阶段三司是守纪律的，实行了毛主席的政策。我出一个问题，去年毛主席提出学习解放军有五点，哪五点？

高树华（站起来回答）：学军事、学政治、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总理、康生听后点头，并补充说还有三八作风。

康生同志：保守派闹事，王良太他们有三个目的，（1）对中央施加压力；（2）推翻八条；（3）保护保守组织的活动。

昨天收了他们的车票，有糊涂的人还高兴呢，以为他们胜利了。过去他们犯了错误，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我们是不希望你们犯错误，胜利了，要特别警惕，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千万要注意，斗争还没有完，各盟市还很紧张，毛主席说要戒骄戒躁。现在我就想这样一个问题，保乌兰夫的人会不会打到你们内部？我看你们要警惕，我看是有。内蒙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你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本单位的斗批改做好，不要骄傲，不要麻痹，不要放松警惕。

第二，我们要总结他们的错误，我们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这里存在着对保守派的策略问题，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联动就是在这里犯了错误，你们那儿还有那么大的保守势力，按马克思的话，你们还没有完全被解放。”不能只靠打，砸，抢，因为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包括在北京的提出了反动的五条，指向了党中央，毛主席，林付主席了，吴忠启这样的人就按法律制裁了。当然这是少数。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要帮助教育，真正的左派要掌握策略。毛主席说过：不但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尤其是注意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也不要因为别人挑动而犯错误。

毛主席提出三个依靠，三个相信。以前的经验证明，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保证，不能只看到黄厚、王良太。你们要听腾司令员、吴政委的话，同他们配合好，向他们学习。有缺点可以给他们提出来。内蒙是个很活的例子。不管发生什么问题，要相信解放军，不能动摇解放军。从这个事件更证明了解放军的作用。工学院的来了没有？（陈永华站起，以后郝广德把各学校代表向康老

作了介绍)我提一个问题,今后你们有打内战的危险,现在有没有苗头,我不知道,过去为什么没有打呢?因为外界有压力,现在中央支持了,外界压力小了,将来一天天你们的权就大了,就争权夺利了,北京有句话叫“摘桃子”嘛!你们那里的“桃子”也快熟了吧!(众笑)北京的经验教训,你们要吸取的,你们要大联合,有事情要商量,我要问你们打不打内战,你们都会说:不打,光嘴上说不行。

总理和王力同志讲了,你们筹备小组很久了还没有成立起来呢,希望你们商量一下,很快地搞起来,革命是需要的,所谓筹备小组,不是正式的革命委员会,有几个人就行,不用搞选举,人不要很多的,是筹备小组,以后群众有意见可以搞掉,人可以少些,快些搞起来。有的单位多了可以减少,有的单位要求增加,可以增加,增加一个师长,工学院没有,没有可以增加一个(工学院陈永华站起来说,我们不是那个意思)行了,不要那么谦虚了吗?一想起这个东西就打内战。

王力同志:乌兰夫不仅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爷,要充分估计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川大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团5月6号就打起来了,他们共同流了血,面对着产业大军,应该团结,前几天我去广州,原打算开50万人的大会,后来分成两摊,一个5万,一个2万,这就是宗派主义在作怪,是向英国人示威呢?还是向英国人示弱呢?当然不是和稀泥了。内蒙还是不可轻敌,你们在内蒙打内战,泽登巴尔高兴,勃列日涅夫高兴,乌兰夫、王逸伦高兴,王良太等人高兴,应该很好地检讨自己的缺点。

总理:在工会大楼打死一个人,还有一个人爬电线杆子掉下来了,死了。不管该死不该死就不用追究了,这个事让筹备小组去处理。中学生要一样做工作,军队有可能,可以下去军训,北京正在搞试点,大家可以帮助中学做。

联动抓了后,主席叫放了,考虑他们是青年人,可以教育,现在有不少人认识了错误,还有一小部分坚持观点,在北京的少了,他们到外地去了,到内蒙去的是和军区黑司令部联系,少数的顽固头头可以管教,分阶段。

“工农兵”底下的贫下中农、工人可以说他们是革命的吗!如果观点一样可以成为造反派。

乌兰夫、王逸伦不能放回去。王逸伦的案子没弄清,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从头就坏。乌兰夫在内蒙还有民族问题,运动还在发展,对少数民族要团结他们,

你们今天来的蒙族同志也有几个吧。

康生同志：我要讲几句，你们要研究了，你们提出要王逸伦，你们并没有汇报材料，搞这样一个老奸巨滑的人，材料要调查好！搞不好他就放毒。如果他说在东方大学有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已死了，你们找谁去？他说三二年在北京入的党，介绍人一个死了，一个下落不明，你们怎么办？乌兰夫也是这样，要调查，掌握了材料，有了材料才好作战，乌兰夫、王逸伦的材料要细致的调查研究，不能依靠大会轰，当然开大会可以造声势。

总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拥军爱民，你们要好好做，一个是对军队，一个是对保守组织，一个是对内部，这就看你们的了，对你们是一个很好的考验，死了人就不要太追究了。现在的话，那个该死，那个不该死就不要追究了。

王力同志：要抓住主要问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就是要死人的，咱们就谈到这儿吧，欢送你们回去。

总理：康生、王力同志同声说：“你们回去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总理手举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众随同高呼、鼓掌欢送首长。”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内蒙军区问题的通报

内蒙古军区少数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特别严重的是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以后，黄厚，王良太等人阳奉阴违，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战士，顽固地抗拒中央的决定，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违反党纪军纪和国法的犯罪行为。

今年二月以来，内蒙古军区少数领导人违反了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采取了上抗中央，下压群众的反动路线，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他们擅自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了已经开始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行垣，康修民等同志，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使内蒙古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中央为了解决内蒙问题，曾于二月至四月间，召集内蒙古军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到北京来汇报，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并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四月十三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即八条决定）。指出内蒙古的问题，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古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中央军委的负责同志对于军区少数领导人的错误，多次进行了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但是军区少数领导人，无视中央的八条决定，不仅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不向群众说明事实真相，反而煽动和纵容大批干部战士上街游行示威，大量印发反动传单，造成部队思想上的严重混乱。他们甚至公然反对和围斗中央军委派到内蒙军区工作的代司令员滕海清同志，散布流言蜚语，挑拨兄弟部队之间的关系，继续扩大事态。五月初，他们竟然指使和鼓动二千五百多干部战士，擅自离开战斗岗位和工作岗位，到北京闹事，制造声势，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八条决定。

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对来京的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十分关切，几次接见了他们，反复地说明了情况，耐心地进行了说服教育。大多数干部战士弄清了事实真相，提高了觉悟，陆续返回了内蒙。

但是，就在中央对受蒙蔽的群众进行教育的同时，内蒙军区少数领导人，继续操纵部分战士和群众，制造了更加严重的对抗中央的政治事件，在五月十六日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的大会上，他们无理取闹，不听总理讲话，多次高呼对抗中央决定的反动口号。还当场打伤了一位拥护中央决定的内蒙同志。在五月廿日的大会上，他们反抗中央的活动愈演愈烈。他们在大会上拍桌子，跺脚，起哄，抢夺扩音器，大喊大叫，冲上主席台，将内蒙军区政治委员吴涛同志毒打致伤，还殴打了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和会场服务人员，甚至公然在会场上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反对中央的五条反动要求，至此内蒙军区少数领导人所策划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罪恶活动达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为了严肃军纪，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中央军委采取断然措施，作出了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对在这次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的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军区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其他在京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同时，军委批准了内蒙古军

区五月二十五日的命令。中央军委作出的决定和措施，受到内蒙古军区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现在内蒙古军区机关部队已恢复正常秩序，内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经好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全军指战员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坚决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家必须从内蒙军区的问题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必须坚守岗位，加强战备，为更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赋予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作出新的贡献。

现将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命令和中央五月二十六日决定（第四条内蒙可不再传达）印发到全军团以上党委。全军各级党委应将上述文件连同中央四月十三日八条决定，立即在全军指战员和工作人员中普遍深入地进行传达教育。

2011 年 8 月 31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5）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五节 湖南省军区取缔“湘江风雷”

本节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总理：

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章伯森，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写报告说，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中央反映两点情况： 一、目前湖南文化革命运动形势越来越好。造反派在政治上已完全取得优势，保守派正在分化瓦解中。但省委工作暂时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顿。如何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目前有很多单位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罢官、开除党籍。自一月中旬以来，要求开除党籍的更是络绎不绝，如果这样处理下去，后果很难设想。

章伯森在电报中还请求中央批准他到北京作一次汇报，并请中央对以上两个问题给予指示。 （2）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处理贵州问题给周恩来的批语中指出，应将贵州有关各方的代表十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

三、中央处理湖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广州军区：

五月十一日晚，龙书金同志从广州打回电话，传达了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当即召集在家党委委员，首长和部门领导会议作了传达，十二日上午进行了研究讨论。

大家认为，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是正确的诚恳的，是对我们政治上的最大关心。深深感到我们的思想弯子转的太慢了，对上面跟的不紧，思想上右倾保守，因此对军委命令很不理解，贯彻不力，口头上拥护，行动却很迟缓，前瞻后顾，举棋不定，工作越来越被动，处于忙乱和消极应付之中。广州军区首长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如不悬崖勒马，必将越陷越深，甚至陷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不能自拔。大家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大破大立，改造思想，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做好工作，更好地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任务。

一，从上到下统一认识，加深对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解，加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用这个精神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正视错误，改正错误，下定决心，作好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与此同时，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亦相应地集中五至七天时间（时间太少，应有十至十四天-----毛注），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使部队提高思想，统一认识，接受锻炼，正确对待来自社会上的各种思潮的冲击。

二，纠正错误，作好工作。对于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 error，在自上而下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向全省人民作公开检讨，真诚地欢迎广大革命群众的批评，吸取教训，作好工作。同时本着有错必改的精神，认真作好对处理湘江风雷问题的善后工作，坚持高姿态，除了少数头头以外，宣布一律无罪，并立即印发公告，广为宣传张贴。对于在押人犯，坚决按照广州军区党委四月二十五日指示，继续进行清理，该放的迅速释放。对于在打击湘江风雷之后被解散的其他群众组织，坚决予以平反，决不含糊。我们坚定相信群众自己能够教育自己。

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根据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革命群众，相信和依靠革命干部，以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的教导，要从上到下统一

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支持对了的要坚定信心作好工作。对其他各个群众组织，继续作好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影响较大的群众组织，要去掉旧框框，重新作全面地，历史地阶级分析，明确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的阶级阵线，是左派就坚决支持。对于认错门，站错队的要坚决纠正，坚定支持左派，省军区原支持和依靠的"红联"，已不适应夺权需要，决定动员他们解散，对其中的各个组织，分别对待，是左派就支持。今后要重点帮助各战线各单位搞好自下而上的大联合，积极筹备各线代表会，为夺权作好准备。

四，加强领导。已经组织的驻长部队支左领导小组是适宜的。为了加强统一领导，搞好协作，根据当前出现的某些问题，我们商量决定发个联合声明，稳定人心，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在军队之间制造矛盾。同时，省军区也本着以我为主的精神，相应地加强领导力量，充实办公室，改进作风，改进方法，切实加强支左工作的领导。

以上如有不妥，请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

一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区分，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军委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二 恩来、林彪(2)、中央碰头会阅发。 三 时间太少，应有十至十四天。——毛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 指广东省军管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和中共湖南省军区委员会五月十二日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给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广州军区的报告。

广东省军管会的报告说，最近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受到一些革命小将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进慢，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得患失，不敢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为此，常委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

湖南省军区党委的报告说，五月十一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来电话，传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大家决心做到：一、从上到下统一认识，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也相应集中五至七天时间（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即本篇三），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二、纠正错误，做好工作。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要从上到下统一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四、加强领导。 (2) 恩来，即周恩来。林彪，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

1967.05.14； 中发 [67] 151 号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分区，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 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 凡犯了错误的必需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 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 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 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军委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某日，周恩来等接见湖南章伯森梁春阳詹才芳的谈话

一开始，总理、伯达、康老就热情地、以非常关怀的口吻问了章、梁被斗被打的情况，章、梁简要地如实汇报。

总理听了，面带笑容地问道：“怎么样？怕不怕？”

章、梁说：“不怕”这对我们是一场考验。”

在谈及军区的情况时，

总理面对章伯森同志说：“你们湖南军区搞得好凶啊！”

章没有完全明白问话的意思，便说：“怎么个凶法？”

总理说：军区搞了四道防线，一道如何，二道如何，三道四道又是如何……。

章、梁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便回答道：“不知道”。

总理笑了，说：“你们不知道，反正我们知道了。”

总理、伯达、康老把脸转向詹才芳同志，总理意味深长地说：“湖南是主席的故乡，文化大革命搞得很不好啊！”詹无言对答。

总理接着问：“听说部队战士练刺杀时，把章伯森、梁春阳当靶子，大喊杀杀杀，杀死章伯森、杀死梁春阳，有这回事吧？”

詹说：“有这样的事。”

中央首长听了气愤地说：“你们这样做，让战士们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

章是紧挨总理坐的，梁则同杨成武戚本禹等同志靠得近。当总理询问章时，杨向梁春阳说：“公检法有多少人？”

梁答：“有一千多人。”

又问：“高司有多少人？”

答“有两万左右。”

杨紧接着问：“那工联有多少人？”

梁答：“有一二十万人。”

杨成武同志笑着说：“还是工联人多嘛！力量大嘛！”

梁回答道：“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要挑起武斗……”

后来，当谈话涉及到“章、梁后台”时，

康老面朝着戚本禹同志，笑呵呵地说：“老戚呀，高司揪章伯森、梁春阳的后台，这个后台就是你，搞到你头上来啦！”

戚本禹含笑说道：“揪就揪吧，斗就斗吧！”

谈话中，总理告诉章、梁，说湖南军区的报告中说工联要搞掉章伯森和梁春阳。章、梁听了，啼笑皆非。

会上，詹才芳汇报“工联要冲军区，夺军权。”

梁立即向总理保证说：“我们革命造反派绝不会冲军区，绝不会夺军权！”

总理听了，对章、梁、詹三人说：“造反派冲击一下军区，有什么了不起！”

詹又汇报：长沙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宏强说：“军队不要支左了，让群众自己搞算了。”

章向总理解释道：情况不是这样。据我了解，老张的意见是那时军队没有支持真正的左派，而是支持保守派，应该把部队调回来整训一下，再去执行支左任务。”

总理听了，忙道：“情况是这样？那就把张宏强同志叫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军队代表谈话纪要

七月十日二十一时总理、康生、杨成武、关锋、戚本禹、叶群等中央首长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湖南军队代表。

总理问龙书金同志的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又问：你不是在广州发了个电报吗？

龙书金：我给家里打电话，家里发的。(指 5.12 检讨)

总理：思想还比较开朗吆，以后，你怎么变了？

龙书金：我没有变。

总理：你变了。

总理问谭文邦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是支持“工联”的？

(谭文邦正要回答问题时)

戚本禹同志说：他比较支持“工联”。

总理问黎原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对“工联”、“湘江风雷”了解一些？

黎原：了解一些。

总理问刘子云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又问了林国兴同志，说：老同志了！

总理问崔琳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是政治部副主任，你是“高司”观点吗？

崔琳：不是。

总理：你怎么不是？！

总理问史健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俩(指与崔)都是政治部副主任！你俩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吧？

史健：有的一致，有的不一致，基本上是一致的。

总理问张广弼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是反对“工联”，还是支持“工联”？

张广弼：我们意见差不多，我们支持“高司”，对“工联”是从下而上的支持的。

总理问田云、王恒一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问田云：你是“高司”观点？
(田没有回答。)

总理问王恒一：你们部队在那里？

王恒一：在韶关。

总理：你们是支工到湖南的？

詹才芳：湖南部队少，从广东调去一些支左的。

总理问刘顺文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章伯森同志请你找的，一找就找到了！

刘顺文：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才找到。

总理：我找他也打了好几次电话！

总理问张弘强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才三十九岁，年青！

接着，总理点到孙素洁同志的名字。卢润鲁答：派人找去了。

总理问工作人员年龄、籍贯后说：你们是“高司”观点吗？(没人回答)

总理：这次打个招呼，上次托黄永胜同志传达，要省军区、独立师、军分区的同志把不同的观点摆出来。你们开了几天会了？

詹才芳：两天。

总理：摆出些观点没有？军队同志观点要明确，叫你们来就是把观点摆出来，对立观点也要摆，要求你们摆出自己的观点。

湖南的问题是比较大的，两大派的群众也比较多，有“高司”，有“工联”，还有“湘江风雷”，又恢复组织了。

“湘江风雷”你们当时是怎么处理的？你们承认抓人抓多了，宣布为反动组织没有？

龙书金：没有。

史健：按中央“二·四批示”，对头目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受蒙蔽的群众，实质上就是取缔了“湘江风雷”，成了非法组织了。

总理：让你们放“湘江风雷”头头，你们不同意。主席意见将叶卫东放出来，一起讨论“湘江风雷”问题。几十万人你们没有压垮，现在又起来了。你们抓了多少人？你们报了五千人，恐怕有一万、两万、三万，绝非五千！而是上万！现在在押多少？

史健：四十六人。

总理：全省？

史健：是。

总理：据说还有些“高司”的代表没来，经调查只有一个代表没来。

史健：其他是工作人员。

总理：代表都来了嘛！你们给他多挂一个车箱，不买票，这不合法，当然抛

掉了。这是铁路局这么说的。

田云：是买了票的。

总理秘书：是买了票的，是军区帮助定的。

总理：代表只一个没来，其实可以开会了，今天排不上，明天排一排。今天见见军队代表。章伯森、梁春阳我见过了，华国锋还未见。

(这时孙素洁进来)

总理问孙素洁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是“工联”观点吗？

孙：我同情支持“工联”，但不完全是“工联”观点。

总理：支持“工联”好嘛！你在军内是少数，在外面就是多数了，不要怕！

你们开会要讨论的深刻一些。龙书金开始还比较好，我们收到了你们的电报，感到还比较明朗，为什么回去以后又变了？你们已经开了两天会，要把观点摆出来，尖锐对立也不要紧，不同观点不要紧。能不能明天把意见写出来？

詹才方：写不出。

总理：写个大纲给我，两种观点对立都可以写出来。

有个 XX 团，支持“高司”观点的，使工作困难了，与“工联”、“六号门”对立，要调动一下。

黎原：已经调换了！

总理：明天你们讨论，几种观点，几个问题写出来，写个大纲给我。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湖南代表团时的指示

〔时间：1967.7.12 夜 21：30 至 7.13 凌晨 2：30，地点：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的中央首长有：周总理、陈伯达、戚本禹等。三方代表：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红联高司派，军方代表。〕

总理亲自主持湖南问题辩论会。中央首长对湖南问题作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我们把首长的指示摘要刊登如下：

总理说：“中央找大家来，要解决湖南问题。”“中央现在要解决湖南的问题，

湖南的问题解决得晚一点。”

总理和中央文革非常关心《湘江风雷》，关心革命造反派。总理很关心《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叶卫东同志，一再询问他的情况。

伯达同志说：“久闻大名”。并且对省公检法说：“叶卫东同志关了五个月不是造谣吧！”

总理叫叶卫东同志汇报湖南文化大革命情况。叶卫东讲了两个小时。总理从未打断叶的发言，很注意听，不时记下要点。

戚本禹：“公检法干尽坏事！”

总理：“你们一方面是群众组织，一方面是专政机关，不象解放军。中央正在考虑你们的问题。”

“公检法好象在检举。双重身份可危险罗！你少说点！我想听听别人的。你作为红联方面的第一个代表发言可不好。”

总理与伯达同志相对面笑说，“当时我们认为湘江风雷闹得很凶，讲了半天并不重，一没死人，二损坏的东西也不过两千多元，比起现在这些武斗来，那就不算什么罗！因为这件事情才有那个“二·四”批示。当时弄得我们糊里糊涂，看来我们也受了蒙蔽！”

总理又说：“当务之急是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军队刚开始搞。军队早就介入了地方，有的从左介入，有的从右介入，支左支得不准。湖南问题解决较晚一点。四月六日以后湘江风雷又起来了，是很自然的，并不奇怪，七、八月要解决几个省的问题。要立即制止武斗。”

最后，总理指示：“每个地方来一两个人，各军分区也来一个人，要解决全省的问题。几件事：

1、双方达成一个临时协议，不夺枪，不动员农民进城，制止武斗。江西比你们先进。井冈山在江西，可主席是出身在湖南罗！不要忘记了湖南是主席的故乡。湖南，江西是两兄弟，要互相学习。总不能湖南比江西落后，明天把你们达成的协议给我看看。（我方代表事先拟好的协议草案给总理，总理很高兴。）

2、各地区把人找来。

3、把情况调查清楚。

4、军区负责人打电话通知人，可不能再扣留人。军区要好好坐下来检查错误。

5、省委来的四个同志再找时间跟你们谈。”

(摘自 67.8.14 《新北大报》、《湘江风雷》)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华初谈“湘江风雷”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地点：湖南剧院 编者按：毛华初同志是毛主席的亲侄儿(毛泽民烈士之子)，是党的好干部。现任湖南省档案局副局长。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大批判、大斗争的关键时刻，毛华初同志站出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湖南革命造反派。“湘江风雷”成立以后，发展很快，对当时湖南的文化革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湘江风雷”的斗争方向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于是“二·四”批示后大肆抓捕“湘江风雷”成员，甚至其它组织的人员也抓。抓了多少?他们自己承抓了五千二百，这就够多了。哈尔滨的“荣复军”20 万人，才只抓三个人。何况事实上并不止五千二呢!光是裕湘纱厂一千二百多人就抓了一百六十多个。按抓支队长以上的，就只应该抓十一个人嘛!有一位老工人，跟着毛主席干了几十年革命，六十多岁退休回家了，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老工人心想：“以前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现在快要死了，也还是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参加一个什么组织呢?红卫兵?一想年纪太老了，戴起袖章在街上走，给人家看见了不好意思，选来选去，选中了“湘江风雷”。于是他和他的儿女、媳妇都加入了“湘江风雷”。“二·四”批示一下来，老人被逮捕，关了四天。城里抓了，乡里也要抓!老人抓了，小孩也要抓。农村一个生产队里，有一些人参加了“湘江风雷”，大家商议要选个队长，选谁呢?二月四日晚上开会，他们选了一个高小毕业生，十六岁的小会计当队长。大家认为他识字，当队长合适些。这个小会计，散会后，睡在床上当了六个钟头的队长，就糊里糊涂被逮捕，拿到大会上斗了一场。还有一些地方就抓得更多了。如自治州吉首镇，造反派仅一千多人就抓了五十几个。毛主席教导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样抓就没有政策界线了接着又来一个肃“流毒”，明显的把矛头对准造反派，大肃造反派的造反精神，把造反派肃得灰溜溜的。这是什么政策界线呢?这是政治上的高压。为了把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又压下去，长沙的宣传车不够就从湘潭调来。一天出动那么多宣传车，大肆作“肃流毒”的宣传。大力扶植保皇势力。利用造反派开门整风的机会，大整造反派，说造反派的大方向错定了，谁退出造反派组织谁就是革命行动。保皇派翻天大叫好得很。把“建湘”一千多人的造反派组织一下子搞得只剩一百七十多人，对所有厂矿的几十个造反派组织都用高压压下去了。长沙如此，湘潭、衡阳、常德等地都是如此。我们说，只有刘、邓反动路线的流毒，而没有什么“湘江风雷”的“流毒”。《人民日报》四月八日的社论一出，“高司”马上就说是 一篇大毒草，而湖南的反动路线流毒这么深都不肃，这是为什么？ 现在我们要为“湘江风雷”平反，因为湖老谭搞假报告向中央文革谎报军情。说“湘江风雷”有枪枝，是假的，是展览馆的。说“矿冶”事件打死了六个人，姓氏名谁？住在哪里？家属是何人？交出来！可是至今还未交出。说“湘江风雷”搞经济主义用了二千四百多万元，实际上全湖南的文化革命费用，包括红卫兵串连费用在内，才一千七百多万元。到“二·四”批示前，“湘江风雷”只用了二万七千多元。同一时期内，“高司”用了二万四千多元，还不包括学校内开支的费用。“湘江风雷”八十万人用二万七千元是经济主义，而“高司”一万多人却用了二万四千元，这又是什么主义呢？至于打、砸、抢、抄，我们不提倡，但“湘江风雷”当时打砸的也只是“长保军”、“赤卫队”和“八一兵团”等保皇组织。“高司”当时也不例外，也参与了。特别是“二·四”批示后，包打包砸，“三联社”、“北航站”等外地组织就被他们砸了，还抓了二十多个人，这个大方向难道又是正确的吗？ 讲到株洲“湘江风雷”的罪状就更可笑了。说什么他们要上井冈山打游击，已经联系好了。还说准备了许多个麻袋，装人往河里丢等等。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到井冈山的红卫兵很多，当地的粮食，蔬菜都供应不上，要湖南省委支持，省委没人管。株洲的“湘江风雷”知道后，马上答应援助。于是借了三千多个麻袋准备粮食、蔬菜，这是好事嘛！冒想到倒成了一条罪状。（按：“冒”湖南话，即没有的意思） 再一方面，说组织不纯。当然，由于组织发展得很快，在某个基层内有一些不纯也是不奇怪的。但光凭这一点是不是就能全盘否定这个组织的大方向呢？当然不能。在决策人里面，有很多干部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月逆流除了镇压“湘江风雷”还把别的 40 多个造反组织打成是没有“湘江风雷”的“湘江风雷”“流毒”，说是“湘江风雷”的外围组织。株洲“一·二七”造反组织在“二·四”前就退出了“湘江风雷”，但“二·四”

后也被打成反动组织。常德有一个几万人的造反组织，也被打成反革命组织。

“湘江风雷”的问题牵涉到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应该搜集材料，上报中央，为“湘江风雷”彻底平反。这是不是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呢？不是的。因为湖老谭欺骗中央文革，骗取了“二·四”批示，我们应该造湖老谭的反。是他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至于有某些组织前一段所提出的不恰当的口号，已经改正了。我们相信中央会解决“湘江风雷”的问题的。

（《风雷》工联湖南湘江风雷赴沪联合兵团、井冈山上海高校支湘联络站编印 1967.9）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黎原在长沙“工联”大会上的讲话

黎原：湖南驻军第四十七军军长

地点：长沙市工人文化宫

同志们：

让我代表四十七军的同志，首先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对四十七军的信任！（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你们工联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长时间鼓掌），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鼓掌），是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鼓掌）。我代表我们四十七军全军同志向你们学习！（群众高呼：向解放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我们全军同志，坚决支持你们！（群众长时间鼓掌，高呼坚决支持四十七军的支左立场！）我们今后要团结在一起，要战斗在一起！我们相信，我们军民一定将长沙、湖南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群众高呼：打倒龙书金！）

我们四十七军在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的支左任务中，也有很多缺点，希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希望革命小将，多给我们提出意见。使我们在支左工作中少犯错误，或者不犯错误。这是我代表全军对同志们的诚恳的要求。

这次到京谈判，特别是昨天总理亲自交给我们的任务。特别是工联代表对我们的信任，热烈欢迎我回到长沙（鼓掌）！首先恢复铁路运输（鼓掌），然后停止

武斗（鼓掌）这个光荣的任务。今天同志们对我这么热烈的欢迎，我个人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愉快！我们今后要坚决地站在一起！（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坚决支持四十七军的正确立场！）

关于铁路恢复交通运输问题，我觉得同志们很好，坚决拥护总理的指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这一点，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群众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刚才胡勇同志讲，铁路造反派负责的同志讲，在今天（下午）六点钟以前，可以恢复铁路运输（鼓掌）。这就说明我们的大方向，对主席指示的认真执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当然，我可以理解，同志们确实有许多困难，比如说，安全问题，有人打了我们的同志，抢了我们同志的枪，（群众高呼：打倒龙、刘、崔！消灭红色怒火！消灭高司武工队！）受了一些委曲。但是同志们照顾大局，照顾湖南三千八百万人民，照顾到全国，照顾到援越抗美，照顾到战备，照顾到生产，同志们可以受些委曲。这一点，我感到工人同志们的风格高，姿态高，我们解放军应该向你们学习！（鼓掌高呼：向解放军学习！）

同志们刚才提了一些意见，我们解放军一定能够满足你们的要求，一定保证安全（热烈鼓掌），那里需要部队，只要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定派部队（长时间热烈鼓掌）。(28)

关于军管的问题，同志们也提出来了，我们可以研究一下（鼓掌），因为我刚下飞机，就来开会了，情况我不大了解，如果是需要军管的，我们也保证达到同志们的要求（热烈鼓掌）。总之，要急左派之所需，就是你们提出来的，只要我们四十七军能够作到的，我们一定要答复同志们的要求（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鼓掌），一定满足同志们的要求。这一点，请同志们放心！（鼓掌）

今天关于铁路恢复运输，只是一个开始。现在根据总理指示，中央谈判的精神，首先要停止武斗。当前急务之需，就是要停止武斗。我们四十七军也是责无旁贷的，也是应该挺身而出的。武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操纵的，我们不要上这个当，死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第二步的工作，我们要很快地进行，我们人民解放军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职责，特别是一月二十三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要我们支左，要我们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热烈鼓掌）。

当前我们四十七军的任务，第二步任务，就是要协助我们革命造反派，我们革命的左派，制止武斗，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昨天总理交给我们这个任务，两团

今天的谈判，也是这个问题，谈停止武斗，要达成协议。总理今天要听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是听火车复车，开出第一列车（鼓掌）；第二个消息是我们长沙工联与红联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总理办公室应该执行好。我的话讲完了。（群众欢呼，热烈鼓掌，高呼打倒龙书金……）

让我们高呼几个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热烈的掌声中欢送黎军长到火车北站）

（根据录音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军队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零时五十四分至一时三十五分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湖南军队代表和地方领导干部的谈话纪要：

（总理问王恒一同志关于铁路夺枪情况）

王答：“工联”派抓走了部队十一人，夺去十二支枪。

（中间总理联络员李彩五同志插进来汇报“高司”因有叶冬初在，拒绝总理接见）。

总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接见为何不来？叶卫东是毛主席请来的，看！你们把这个组织惯成什么样子了，如不来是对抗最高指示。（戚本禹：如不来，要在湖南三千八百万人民中公布）。李彩五、万达同志打电话批评教育，做工作。

总理继续谈铁路问题说：这样违抗中央精神，铁路断了不好。（这时万达同志打完电话回来。）“高司”代表来不来？（万达：学生年青，我给他们说，无论如何要来。）就是那天我对“公检法”批评了几句，（戚本禹说：我讲的。）我先讲的，你讲的更重些。他们（公检法）捣乱，可学生我一句也未批评啊！说我有倾向性，我是有倾向性，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就是有倾向性。

别的省，军队很快的明朗化了，为什么湖南这么久不明朗，詹才芳同志你来多久了？（詹答：一个月了。黄永胜答：我们开了几次会统一认识。）

总理：也要做做群众工作。

黄永胜：我们先把部队干部思想工作做好，再去做两方面的工作。

王恒一同志继续汇报：抓我们十一人是否让他们放出来？

总理：这不是十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铁路问题，我们大家一起解决铁路问题，解放军战士他总不敢怎样，不只是你们十一个人十二枝枪问题，两派要表现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江西现受考验。河南宣布取缔“二七公社”，湖北取缔工总是错误的。湖南“湘江风雷”问题，你们大肆捕人，相当严重，比湖北对“工总”抓人多。人民解放军要相信群众，三八作风，错了就改嘛！要痛痛快快的。山东省有三条经验，你们看了吧！早检查比晚检查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公开检查比躲躲闪闪好。即使是方向路线错误，也和刘、邓不同。如是方向路线错误就承认，要自觉，反正是支左中的错误，伟大领袖毛主席信任你们，将“三支”“两军”任务交给你们，所以下了“八条”，拥军。但军队没有经验，特别高级领导机关，接触群众少，支错了，全国二十八个省多多少少都有错误，军队与地方不同，摸不清楚，解散一些组织，抓些人，压了小将，所以又来了“十条”，爱民。受压的小将起哄了，有的抓人，抓谭式人物，你们湖南是湖老谭。六月又把这平衡一下，搞了“六·六通令”，想把武斗停下来。问题就是要反复，文化革命一年了，前半年是执行反动路线问题。军队有错就改，不会打成带枪刘、邓路线。这口号我不赞成。章伯森、梁春阳你们支持造反派我赞成，但一定要抓赵永夫式的人物，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不同意，你们赞成吗？(章、梁答：赞成。)赵永夫就是一个嘛。安徽打得凶，安庆分区开了枪，参谋长看不惯，打来电报。还是有看不惯的嘛。但绝大多数未开枪。军队错了就改，会得到人民拥护的。“湘江风雷”问题中央给你们分担责任的。

戚本禹：“二·四批示”要研究。

总理：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相信依靠群众大多数，相信依靠解放军，相信依靠干部大多数。对部队要进行教育。湖南原排在后面，我们腾不出手来，现在非抓不行。

黄永胜：我们想帮中央做点工作。

戚本禹：黄永胜同志做了不少工作。

华国锋建议：军队开会，我们参加。

总理：军队还是先自己开。全国刘、邓，中南陶、王，湖南还有个王，要大批判，要推动革命小将在毛主席旗帜下，在大方向一致下站到一起嘛！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军区责任很重，也麻烦，我们不为个人，为党的利益，这么一想个人受点批评就觉得没有什么了。黄永胜同志不是想通了？武汉武老谭还有个名称叫陈大麻子，小将口号这么提，我还要打倒呢！要懂得小将受了压抑，矛头不那么准的，首先看造反精神，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性是第一位，然后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有革命精神才能前进，当然革命要讲政策，咱们回忆年青当红军时，抗日时，那时思想那有现在的小将水平高？现在是毛泽东时代，但究竟还是小将，何需责备青年？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许多问题要客观调查清楚再处理，我们处在领导地位，每件事需要冷静考虑，就不犯片面性了。我们都在向群众学习，军队过去有丰功伟绩，在这方面军队要谦虚些，江青同志讲了要为人民立新功。要往前看。不管那方面抢的枪都要交还，铁路中断影响各个方面，希望军队和省的领导同志，想通这个问题，总不能把群众推在外面，一个工厂为何两派？主要是领导的问题。湖南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有可能，军队站出来推动，两方达成协议，在这方面就一致了。我们一道推动，包括章、梁、华、万同志都参加，尽管有的问题会影响全省，解决好可转过来的。

黄永胜：抢枪的事双方肯定都有。

总理：学习江西嘛！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代表团谈话纪要

七月二十日凌晨二时十分至二时五十分，总理、戚本禹、黄永胜等同志接见了湖南全体代表。

(总理走入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现在请你们来，主要是解决铁路夺枪的问题。两方谁的责任，我们搞不清，军区也搞不清。我们在这里解决，也不一定解决的好，谁先发言。

占先礼：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章伯森、梁春阳违反中央指示，在裕湘纱厂殴打农民；占领邮电大楼，中断通讯；“工联”召开控诉军区大会，大搞游行；

赶走河东高等学校学生。

总理：铁路夺枪问题你还没有回答。

占先礼：因邮电大楼被“工联”占领了，所以我们今天(十九号)联系不上。

刘国辉(真理军)：我们听了交通这样中断非常痛心，我们情况不明，这应记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章伯森、梁春阳的身上。

总理：不要戴帽子。

刘国辉：他们有个代表前几天回去了。

总理：叫什么名字？

刘答：谢若冰，这几天长沙发生了一系列问题，与她有关系。

戚本禹：是不是回去了？(“工联”答：回去了)代表回去为什么不经过我们？以后回去要经过联络员同意。

“工联”胡勇：十七号晚上“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二百余人到裕湘突然袭击；“工联”派十一人到农村贴中央通知，被抓走了，后来派三个代表去谈判也被抓去了，有一人当时用马刀砍死了。我们去追，农民架了机枪，打了一千多发子弹，打了一夜。南郊冻肉厂有八个工厂停工；十八号下午“高司武工队”，来四部卡车在大街上高速行驶，投了手榴弹，并向湖南日报社打了枪。在北站抢走了两挺机枪，十三支步枪。火车不通的问题，今天晚上九点钟(十九号)我们才知道。

总理：今天抢部队的枪，占领邮电大楼有没有这回事？

工联：有这回事。

占先礼：“工联”占领了邮电大楼。邮电局已经是造反派夺了权的，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抓走了七个人。

总理：铁路上你们哪边人多？

工联：南站、北站我们人多，东站、铁路局他们人多。

总理：双方对立起来很难解决问题。我问你，铁路是军管的，铁路上的群众都是阶级兄弟，双方都应该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铁路是全国性的，你停了，国内国际运输也断了。军管后，双方不介入行吗？(答：行)。电讯大楼也要军管起来，不搞对立，行吗？(高司：坚决拥护总理指示。)

(“工联”申述了他们占领邮电大楼的原因。)

总理：你们双方对四十七军好些，四十七军的同志跑一次赞不赞成？(双方答：

赞成！总理把黎原同志叫到前面坐，双方代表鼓掌)，大家拥护你，支持你，你就代表人民利益，请你跑一趟。你们长沙有多少部队(黎答：×个团)，现在×个团把长沙秩序维持起来。

现在是二十日，搞一架飞机，送黎军长回去，双方各派一名代表。铁道部派一人。铁路是国家的命脉，不能中断。

高司：他们抓我们九十七人今天还未放。

总理：他们证明是回家了，不愿来。去时把曾干农接来，谢若冰也接来。

双方不介入，铁路不串连，停止夺枪，马上恢复交通。人民大会堂也两派在一房服务，并不吵架。我们要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国有刘、邓，中南有陶、王，湖南也有嘛！如王延春两边都不要，除王延春，还有人嘛！中断交通，损失多大！主席讲我们是越南可靠的大后方，铁路不应中断。一去马上就要恢复交通。我们中断交通，关系到国际影响嘛！不管哪一派，你们自己去调查，到底枪是被谁抢走了。你们要争当毛主席的好学生，要光明磊落，不要学彭真、罗瑞卿搞两面派。青年人要光明磊落，干革命，要说真话，你们是年青小将，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如果说假话，造谣言，耍阴谋，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枪谁抢的？在什么地方抢的？放第二步解决，首先是不介入铁路。为人民利益，铁路不能再武斗了，不能再抢枪了。这是考验你们，看那派作的好。

对铁路两派不要介入，不要夺枪，铁路本身不武斗。恢复交通。

岳阳到衡阳、郴州这条线由部队管起来，邮电大楼，公用企业军管起来，军队绝对不介入你们两派武斗。

许多部队劝架受了伤，也是光荣的，会感动群众。

你们双方各派三人，今天去，搞好，后天就回来。把曾干农、谢若冰也带回来，行吗？

(答：行！)

第二件事，请双方像河南、江西一样，派也代表协商，停止武斗，停止夺枪，停止农民进城，今天二十号，下午会谈，希望有好消息。江西搞了“八条”，广西搞了“十条”，你们是主席故乡，不能落后，搞成协议就可以一起干革命了。

其它情况不谈了。下次再谈。

戚本禹：铁路的问题是那个组织搞的，要发个通报。

总理：各专区代表是否到了？

工联：交通断了，“高司”派把他们都赶出来了。

总理：你们的人不是都到北京吗？不能搞一派天下，一派天下不行嘛，就是要几种观点来比较。

工联：“高司”就只准有一派。

总理：你有些书生气，你是学生吗？我刚跟你讲了，就是要到北京解决嘛。

(“高司”汇报了大托公社大托大队“工联”“破坏”生产的情况，一生产队的社员来到了北京，要求总理接见一次。)

总理：(重复了一遍今晚所要解决的是铁路、夺枪、武斗问题。对单独接见未表态)。

(最后宣布散会。)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湖南代表谈话纪要

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二时十五分至五时十分总理、戚本禹、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接见湖南代表。

(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进入会场，全体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祝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身体健康！)

总理：祝你们健康！

现在我首先问一个问题。请黎原同志坐前边来！这次黎原同志回去顺利又不顺利！我们得到一个消息，马坡岭有个国家军火仓库，说有人去抢，到底是那一派的？现在不清楚。“工联”我们很相信了，你们知道是那一派？

工联：不知道。

总理：军区认为是“工联”派。我们接到总参作战部转广州军区的报告，二十六号晚十一点多二百多人冲进去，已经拿走三卡车东西。是不是有“工联”所属组织参加了？

工联派：我们到不了城外，设的有卡子。“工联”不会这样做。

总理：其他组织怎样？

工联派：不清楚。

红联派：都是与“工联”接近的组织“六号门”、“青年近卫军”搞的，是章伯森、梁春阳挑起的。

总理：“红联”有没有抢军火？

红联派：没有。

总理：“红色怒火”与你们接近，他们乱抢嘛！

红联派：“红色怒火”与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联系。“工联”都说我们与“红色怒火”搞在一块，不是这样，是他们被打的跑到我们那里去避难。

余定成：“红色怒火”就住在我们学校，不是什么避难。

总理：你们“高司”马坡岭没人去吗？你们打电话能问问吗？

红联派：可以问一问。

工联派：马坡岭附近有个农学院。

总理：程元公同志，要农学院电话。

如果两派都不承认，我们派军用直升飞机去，如果和两派都没有关系，那就是乌合之众，假借你们的名义。我们派军队去，不能开枪就捉他几个，好不好？(众：可以！)你们不是有了协议吗？写了协议又去破坏。你们不能这样搞法，臂章也没有，番号也没有。你们应该光明磊落，如果抢枪真是为了自卫，提出来可以考虑嘛！你们这样搞乱了。军队又不能开枪，你们不是欺侮军队吗？你们还承认最高司令部吗？你们看看，尽管武汉这样，独立师的参加了“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就是“百万雄师”，“三新”就是“三新”，“三钢”就是“三钢”。现在搞的长沙连武汉都赶不上，连臂章都没有。为什么长沙搞成这个样子呢？中苏大厦问题就是化装的“六号门”，现在又化装夺枪，这完全不是堂堂地搞革命。“百万雄师”犯了错误，但他也有臂章。长沙到底是那里搞的，黎军长也搞不清。你们愿意这样继续下去吗！不是你们的人，你们要发表声明。

“红联”代表那些组织？

占先礼：“红联”有“高司”……。

总理：你是占先礼？你能负全责？你说话要作数！

(总理问了“省委机关筹委”、省市“公检法”有多少人，负责人是谁。并接一次电话)

总理：“高司”实际多少人？

占先礼：两万多。

总理：“高司”红卫兵有多少？

占先礼：一万二千多。

总理：与红卫兵相同观点的有多少？有没有袖章？也是红卫兵？

占先礼：加上相同观点的两万多，有的有袖章，有的有证明。

余定成：他们没那么多人，实际上内部有不同意的，因压力很大不敢讲。他们(指相同观点的)没袖章，有胸章，是秘密的，在渡河时用。

总理：你们贫下中农是怎样组织的？湘南这么大也管得了？

(贫下中农造反军的代表，说明了这个组织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各地农民如何迫切加入这个组织。现在长沙地区的四个组织，已组成农代会筹备会，参加的有六十九万四千人。并说明他对这个组织可以负责。)

工联派农民：农代会我了解，是武装部的御用组织，到处对“工联”造谣！

总理：我正是因为它通过武装部组织的，所以才让他负责。你(指“红联”派农民)说了话要算数！

(当总理问到广播电台“红联”派有多少人，谁负责，以及警卫部队情况时。电台“红联”派反映“工联”冲击了电台)

工联派：不是我们冲电台。他们筹委会是反革命的假夺权。

总理：谈最近的。

工联派：我不晓得。

总理：夺权的问题，如果错了，可以改变。夺枪，就会发生连锁反映，造成无政府状态，对长沙有什么好处？军区瘫痪了，湖南军区没信用了，你们能把长沙治安维持好？

红联派：他们成立了治安指挥部。

总理：能维持了？

工联派：公安局的人已经跑了，流氓阿飞放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成立的治安指挥部。

总理：你们能制止已经发展起来的武斗？

工联派：“公检法”都把犯人放了，他们的口号是放弃工作，保存实力。

总理：你们能维持治安？

工联派：与四十七军合在一起能维持治安。

总理：是啊！没有军队你们怎么能维持！

工联派：当时我们捉的流氓阿飞那里也不收，才搞的治安指挥部。

总理：那时有作用！当前武斗大发展了，你们治安不能维持了，只能自卫。

(刘秀英说明“高司”与“红色怒火”有关，同时又肯定邮局的枪是“工联”夺的，并且说明“工联”如何说她是陶、张的黑线人物)

(戚本禹与总理耳语后)

总理：我问电台的事。

(电台“红联”派反映广播电台告急，并说“工联”派从六月底就成立了电台专案组，就想冲击了。“工联”派说明这是诬蔑，成立电台专案组，是搞电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本不是冲击)。

总理：你们要去冲击，就是要把那个连交械，不解除军队武装能冲进去吗？

工联派：我们没冲，我们不会夺枪，可以通过合法手续。

总理：不要辩论，这件事好办，叫中央广播电台打电话查一下。联络员同志打个电话。现在到处抢枪，这是当前要解决的。

(总理问“红联”所属组织“市委机关筹委”，“真理军”，“革命造反军”，以及“洪流”的组织情况。并去接一次电话。问到“洪流”时)

总理：你们是按贫下中农协会，还是单独组织的？

洪流：是单独组织的。长沙地区有四个组织合在一起了，共六十九万人。

总理：怎么有六十九万人？你们说法不一致，不是说独立的吗？你们合在一起也没有这么多人？有六十九万吗？

洪流：合在一起，统一喊做农代会。

总理：我知道。怎么有六十九万人？可能把小孩子也算在一起了，是号称吧！你们进城搞武斗的，你能负责吗？

洪流：我能负责。凡参加农代会的，没有一个搞武斗的。

总理：你们(指“红联”)不承认与“红色怒火”有联系。“红色怒火”有人来吗？

工联派：“红色怒火”特务连连长在北京，住在西苑旅社，叫王克俭。

总理：啊！特务连连长！联络员同志，派车把他接来。

占先礼：“红色怒火”情况我不清楚。中央要“红色怒火”的人，让“红色怒火”自己派人来。

(总理派人去找王克俭。)

总理：是跨行业的？

工联派：是。

总理：是专搞打砸抢的？“红色怒火”的基本力量是什么？

工联派：是“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坚定分子”。

总理：不是取缔了吗？

占先礼：报告总理，这个情况我给你说……。

总理：你不是不晓得吗？这个人怪得很！我搞调查，你又来插嘴，你这个人不是怪事！是“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我们不是取缔了吗？是谁组织的？有高干子弟，可能和“联动”差不多？

工联派：红色怒火在警备司令部备了案的。

总理：噢！在警备司令部备了案的！

(刘秀英一方面说明“红色怒火”与“高司”有关系，同时又说明“红色怒火”都是青年人，没什么政治目的，是打抱不平的，是专打“青年近卫军”的，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

工联派：“红色怒火”是李副司令的儿子李政、刘子云的女儿最初建立的。他们因为“红色政权保卫军”被解散，有满腔的怒火，所以才叫“红色怒火”！

(工联派谈了“红色怒火”的四点纲领后，总理问了“红色怒火”的人数和武装情况。)

总理：你们这边(指工联派)。“工联”是比较统一的。(总理问了“工联”人数，所在地区和一般情况)

总理：“长沙工人”是独立的？为什么单独组织？

工联：他们是区级工厂组织的。

总理：“长沙工人”的代表为什么没来？

工联：被抓去了。

总理：你们(指“红联”)为什么抓了他们？是黎军长带去的。刚才说黎军长顺利又不顺利，这个就是不顺利，你们拆他的台！这不好，为什么要这样做？

红联派：我们打了三次电话，要他们一定放人。

戚本禹：谢若冰被打死了没有？

(“工联”派的黄振东说了“洪流”拦车抓人过程)

总理：“洪流”的？是你们(指“红联”)的？你们说不搞武斗，怎么拦了汽车？要劝他们放人。

红联派：“七·七”事件打死了我们的人。

总理：这是黎军长带去的，应分开。

红联派：我们抓的，打回电话去，可以放人。但是谢若冰回去后，军区、电台、公检法抢的净光净光的。

总理：谢若冰回去没给我们打个招呼。这个女学生是很能干的。

红联派：武斗是“工联”挑起的。

总理：她不是“工联”的，她是学校的，年青能干。她回去是想把组织发展一下，年青人总是想搞出点成绩来。不管怎样，代表被扣被打总不对吧！我委托你们把谢若冰、张楚榭五人放出来。你们既然听中央的，听总理的，我委托你们打电话回去，把这五个人立即放出来，这也是对你们的考验！

你们(指“红联”派)这边，还有几个没有来？

红联派：我们的九十七人都没放。

总理：放出一部分来了。你们(指“红联”派)无论如何要把扣的人送到飞机场，我们去接。你们九十多人可能一部分没放。

工联派：我们有缺点错误。九十七人中有些是保守组织的头面人物，一部分洗手不干了，和“工联”合作很好，有的怕出来安全没保证，不敢回去。

(“红联”派反映九十多人中八十五人没放，有的在“工联”的工厂中挨打受折磨)。

总理：那有那么多！可能有的不愿出来。你们“工联”再打电话回去问问多少人没放出来？你们扣那节车，本来可以不干的，广州批了么！造反派么！左派么！应有宽大的胸怀，告诉“工联”，气量要大些，不要搞小动作。搞了点材料是吗？你让他搞黑材料！带到北京也不怕他！现在要大批判，要搞，搞刘少奇的，他有一本书就够批判的了。以后别干这些事！

(刘秀英、“红联”派的想发言，都被总理打断。并继续问“工联”派组织的情况。其中 问到能与“工联”配合行动吗？“长沙工人”答：有些一致，有些不一致；“红色新闻兵”答：能一致；“永向东”答：可以配合行动；“省直红勤站”答：观点一致，能配合行动。)

总理：余定成你们夺枪了吗？

余：我们是“高司”杀出来的，我们连自己也保不住，我们不会抢枪。(总理还问了他们组织的情况。)

(总理问完“八·一九造反有理军”和市公安局“誓卫东”组织情况后)

公检法：他们(指“誓卫东”)不但夺枪，而且把档案柜也打开了。

总理：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誓卫东”揭露“公检法”在这方面是要了阴谋。用枪引诱一些组织去冲档案室。)

总理：“农联”的，你们多少人？

农联：五万多。

总理：是按贫下中农组织，还是分开的？

农联：是分开的，是从基层联合起来的。

总理：你们这部分能保证不动员农民进城，不破坏交通吗？

农联：我们保证不搞武斗。

(“红联”农民代表借机攻击“农联”，说他们利用上山下乡青年不安心农村，挑动进城。“农联”有力的驳了回去)

总理：“湘江风雷”恢复起来有多少人？

叶卫东：有一万多。

总理：主要在那些地方？

叶卫东：株洲、湘潭、郴州都有。

红联派：吉首、零陵也有了。

叶卫东：你比我更知道？！

总理：“湘江风雷”是群众组织咿！恢复起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中央的批示措词不当。坏头头要抓几个，不能把整个组织看成不好的。中央也没说取消他们组织咿！你们看，现在就是对武汉“百万雄师”，我们也没有说要取消它的组织。他们炮打中央代表团，中央文革，炮打毛主席司令部，直接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林

副主席，我们现在都没有宣布解散他们嘛！

戚本禹：两个组织性质不一样。

总理：那当然，我只是说一下。他们过去压制你(指叶卫东)，你们是造反组织，我刚才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犯了那样大的错误的“百万雄师”还要分别对待，我们对群众和坏头头是分开的，何况你们“湘江风雷”！你们现在和“工联”行动一致，还是不完全一致？

叶卫东：基本上一致，不完全一致。

总理：不完全一致！你们是造反派，应该说清这一点，“工联”的同志就跟黎原同志讲过，他们都是不赞成夺枪的。但是，有些组织认为，你们军队有枪也不用。军队有“几不”嘛！不动气，很难做到了，不动口，不动手，不开枪，后两条就得保证了。他认为军队不动手，不开枪，拿着枪也没有用，借给我们保卫保卫吧！这当然也有一点道理。但是，也不好。有了枪，就要开枪死人，所以都不能抢枪。这是群众组织，如果有人冒充“湘江风雷”，冒充“高司”派，这样把枪落在谁手里？武汉这样乱，也没放枪，敢于承认自己，长沙就难辨别了！这不好。章伯森同志，你们在那里时有这个风吗？

章伯森：没有，我们六月就来了。

总理：这个风恐怕是从江西传去的。

(章伯森同志反映了全省各地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高司”派人去做报告，煽动农民对“工联”的仇恨。以后发生农民进城和造反派被赶出当地的情况。“工联”派又反映了造反派被围在洞庭湖四天四夜的情况)

占先礼：章伯森说“高司”下乡，我们没有。当着总理的面撒谎！“六·六”以后，我们被逼有的跑到湘潭，有的跑到广州。

(“工联”派农民举了“高司”到他们公社去的例子，有力地驳斥了占先礼。“红联”派农民进行反驳。“工联”派举了“高司”到常德的例子驳斥了占先礼。)

总理：不要详细谈了！

你们有几个组织是不是把军区司令部占了？

叶卫东：不是我们，是不明身份的人去的。

总理：龙书金同志，你们的消息是什么人进去的？

龙书金：我们有个报告，冲军区的有“工联”、“永向东”、“湘江风雷”挺进纵队、

“六号门”、“青年近卫军”、“孙大圣”、“韶山公社”、“红工会”、“长沙工人”……以及外地来长沙的。

总理：冲军区的多少人？

龙答：五千多人。

总理：现在还在吗？

龙答：还有二、三百多人。

总理：军区档案被拿走了吗？

龙答：有的被拿走了，正在查。

总理：密码拿走了吗？

龙答：拿走了一组。

总理：所有的地方都进去人了吗？

龙答：都进去了，宿舍都冲进去了。

总理：你们没武装？

龙答：有，统统被夺走了。

总理：你们不能守一下？

龙答：不能还手。

总理：江西也没开枪守住了。

龙：他们有些是从后墙来的。

总理：你们军区大院有多少人？

龙：一千人，连家属小孩。

孙素洁：我们来时已经驻了五个连，决不止一千多人。

总理：是独立师的？

孙素洁：是。我们是有布置的，战士都分片保卫那些房间。我们军区大院绝不止一千人。

龙：我说的是机关。那样的话就一千多了。

总理：人呢？

龙：人没走。

总理：有五个连？

龙：没有，只有两个连。

总理：那么没用！两个连连密码都保不住！

龙：把我们的人打伤了。

总理：家里没有负责的？

龙：有好几个副司令员。

总理：没有管事啰！

叶卫东：抢枪的不是我们，这是龙书金的阴谋。军区那么多人，我们每次游行在门口都有四、五十人，这次冲为什么那么容易？这是变相的发枪。到现在大街上还贴大字报说我是反动头目。

总理：给他抹掉！

戚本禹：不管他那一套！

工联派：龙书金很毒辣！刚才把造反派的名都点了。现在长沙街上有很多小孩子背着枪，这是那个组织的？！我们没有抢枪。

孙素洁：军区二十一天以前的情况我知道，警卫是森严的。“六·六”以前就准备了石头、木棒、铁棍……什么都有。这不是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我已向中央写了信。我们的一个宿舍，不到二百人，派了六十多个战士。并且还砌了墙，准备了吃的。球场、俱乐部、大礼堂驻的都有部队。五个连分三片，统一指挥是刘子云和芦副政委。这样的布置，进来几千人是可以努力守住的。我们军区的东西早就转移了。

总理：龙书金同志，你们军区的东西转移了？

龙：没有。

总理：一点都没有？

龙：没有！

总理：真话！查出来怎么办？

龙：查出来受处分。

总理：为什么我们这里得到了这个消息？

龙：四楼是保密楼，“红旗军”那时打上去了，这次调两个连进去，……另外调一个连驻招待所。

总理：以前一点准备也没有？

龙：有点，我们的楼是半边的，“六·六”以后，后边修了一个墙。

孙素洁：军区是做了准备的，……。

龙：准备了点沙包，因为楼板是木头的，怕和中阿友好馆一样，一放火就烧了。

总理：你们大楼一天就冲进去了！这还行？

龙：……。

总理：你再假设干什么？大楼那天冲的？

龙：前天。

总理：什么时候去的？

龙：下午六点。

总理：当晚就丢掉了，你这个司令员！我看不像个司令员！

龙：他们带着木棒子……。

总理：现在在里边的人能劝走吗？

龙：我们打电话回去。

总理：是不是你们有点像张平化、王延春的逃跑主义？

龙：没跑！

总理：你怎么知道？

龙：来电话说的。

总理：电话上也可以骗你嘛！

龙：有的保密柜被砸开了。

总理：密码拿到那去了？

龙：不清楚！

总理：黎军长你到军区没有？听到一点情况没有？

黎：没有。这是在我们离开长沙后发生的。(孙素洁想发言，被总理打断)。

工联派：刚才给家里打了电话，很奇怪，军区防守很周密，怎么一下子丢了？军区过去有准备，为什么突然变了，军区守卫不带枪，二十五号冲进去了，里边有很多孩子。附近的造反派用喇叭广播，说明这里有阴谋，不能进。马坡岭，我们哪个组织也没去，据了解是“红色怒火”和“高司武工队”的。现在形势很紧张。

总理：到底是军区引进的，还是你们(指“红联”派)进的？

红联派：不是我们。

(“工联”的同志揭露这次军区问题是刘子云回湖南一趟搞的鬼，是放长线钓大鱼)

总理：如果说是军区自己搞的，你们要拿出证明。现在还有二、三百人是什么人？在里边干什么？

(“工联”派揭露把流氓阿飞放出来，是刘子云的鬼。“工联”派农民揭露武装部把枪发给“红联”派。)

总理：不要说具体的了。你们(指“红联”派)有什么证明？

红联派：不是我们(指冲军区)。

总理：你们保证？这二、三百人到底是什么人？林国兴同志你知道这个问题吗？

林：我不清楚！

总理：你没接电话，谭文邦同志你怎么看法？

谭：今天开了一天会，不了解。

总理：就是龙书金一个人接电话了。詹才芳同志知道吗？

詹：不知道。

总理：你们丢了个司令部都不知道，真奇怪！

唐俊光：长沙形势很严重，请中央去调查。

总理：“红色怒火”的找来了吗？(王克俭站起来)你是“红色怒火”的？(之后，总理问了“红色怒火”的一般情况及成立和发展情况，并问了与“高司”有没有联系，干了些什么，还问了他们参加“六·六”武斗的情况，王克俭说明与“高司”有联系。其它问题也一一做了回答)。

总理：“工联”抗暴制止武斗指挥部是你们的？

工联：有两个。

总理：怎么不同？

工联：北区有一个。

总理：你们都有人？

工联：不是。我们开始成立的是治安指挥部，有三十多个组织，后来有六十二个组织。“工联”是其中的一个。

总理：“工联”有没有抗暴指挥部？

工联：没有，有个抗暴兵团。

总理：“六号门”有没有人来？

工联：它是“工联”的一个组织。

总理：在“工联”之下的？“青年近卫军”呢？

工联：不属于“工联”，参加了制止武斗指挥部。

总理：“红旗军”呢？

工联：我们来的时候，还没有恢复，最近有了。

总理：你们与这些组织在行动上是完全配合，还是不完全配合？

工联：不完全。

总理：医学院一直围在那里，你们是不是有权劝阻？

工联派：制止武斗指挥部不是权力机关。医学院的事情发生后，我们才知道。……。

总理：现在包围的情况怎样，是不是“工联”包围的？

工联派：有一部分人参加了，以后劝退了。

总理：现在是那些组织？

工联派：是其他的一些组织。

总理：已经六天了，断了水、电，你们不劝他们退出，里面的就要铤而走险。你们怎么不打电话？

工联：不但打了电话，而且与四十七军一块去做了工作。对他们说不通。

总理：我看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北京的组织达成协议，双方代表签字，大家共同保证，你们能不能达成协议？

工联派：我们完全有诚意，但“高司”不是这样。“高司”现在万炮齐轰戚本禹，发出什么中矿中央通知，公开与中央对抗。还有“专揪戚本禹战斗队”……。

总理：专揪戚本禹？！

(“工联”派那位同志念传单)

总理：把传单给我。(总理接过传单看)

余定成：湘潭军分区杨副司令员说向“百万雄师”学习。

工联派农民：湘潭军分区说“七·一三通知”对我们(指湘潭)是无效的。

总理：确实是他们干的(指传单)，是反动的！你们能不能达成协议？

工联派：我们一定根据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办事。“六·八通令”直接对抗中央，把“工联”、“永向东”……这些组织说成是非法组织，河西有自卫警备区司令部，他们完全不管。如果“六·八通令”不取消，协议达不成。

总理：“六·八通令”是什么内容？把它拿来。他说你们非法，我们中央说你合法嘛！协议前什么怪事情都有的，如果协议前和协议后都一样，还要协议干什么？不要再说了。

工联：我们坚决贯彻。

总理：那我就问他们。

高司：医学院还被包围住。

总理：外边多少人？什么人？

高司：有“工联”，有“红旗军”。现在只剩五楼，已经断水……。

总理：“工联”造反组织别搞这个名堂，是不是控制不了了？

红联派：他们说“红旗军”是造反派，要翻案！

工联派：“红旗军”就是造反派，就是要翻案！我们要恢复他本来的面目。

总理：你们不要恢复那么多，不要把过去的每一件事都翻案，想把对方统统压倒是不可能的。“湘江风雷”要恢复，但总有少数几个头头是坏的，有的组织不大纯，当然说整个组织不好是不对的。将来究竟怎么搞法？是不是要继续下去？跨行业的。“工联”已经很响亮了嘛！很有影响，应该把这面旗子举得高高的。别搞那么多，每个事都翻案，把对方都压下去，不可能。

我现在问你们(指“红联”)对协议是什么态度？(众答：坚决拥护)你们现在还有争论，就是第五条“已建立的群众性武斗组织和制止武斗组织一律撤消”这一句，你们要把“制止”二字打上括号。已经建立的武斗组织要取消，双方进行协议，把对方名字打上括号干什么？

红联派：制止武斗指挥部是指挥武斗的。

总理：你管那个干什么？！名称就是个名称嘛！

红联派：制止武斗是好事情，是不能取消的。所以要打括号。

总理：制止就有参加的意思，不要咬文嚼字。

(“工联”派想发言谈岳阳问题)

总理：又是这样，我解决这个问题。不光是你们省的，还有别的省，那有那

么多时间！这个字别搞了，没意思了，以后不取消再说嘛！

你们同意了，联络员作证，章伯森同志，华国锋同志，万达同志，四十七军同志做工作。你们签个字好不好？你们双方既然信任他们，他们也签个字。今天下午就搞这个。

你们十九号晚上达成了协议，双方派代表与黎原同志、铁道部的同志去解决铁路问题，交通解决了，又出现新的问题了。为什么黎原同志的汽车在你们(指“红联”)的地区也通不过了？这就不对嘛！这就输了理了嘛！你们现在承认打电话回去，无论如何要放人，不然不好说话嘛！

我现在再委托四十七军副军长郑波同志出面，你们“工联”、“红联”各推十个人，把主要组织都包括进去，搞调查。到军区院内看看，二、三百人是怎么回事？医学院是怎么回事？

刘秀英：总理，我要求回去。同时我希望协议上再加一条，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整风。

总理：整风当然好了，再加的话以后说。你们加好了，不加也不勉强。

首先到医学院看看，到底外面包围的是那个组织，是那方面的人那方面劝他们撤走；如果两方都不是，大家都劝好不好？(众：好！)

第二件，到医学院后，再到军区大院看看，二、三百人到底是什么人？如果是“工联”方面的，“工联”劝他们走，“红联”的，“红联”劝他们走，如果双方都不是，共同劝说。密码到那去了？要找到，总能找到个线索的。也可能你们到了，他们走了，走了也好。人撤走后，军区要自己负责，你们军区司令部不能随便再丢了！黎原同志马上通知郑波同志，你们也马上打电话告诉家里，马上把代表派出来。

第三件，对武器，许多地方都夺了武器，有些承认，有些不承认。我们现在来个号召，不管是那方面的武器，都要封存起来。现在不要马上交回，马上交回他不干，他说我要自卫。双方封存起来，不能乱用，乱放枪。

四十七军调部队来维持长沙的秩序。你俩要尊重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这是最高统帅批准的。现在由四十七军来负担整个湖南文化大革命的责任，你们信任不信任？(众答：信任！)章伯森同志，你信任不信任？(章答：信任！)梁春阳同志，信任不信任？(梁答：信任！)华国锋同志？(华答：信任！)万达同志？(万达答：信任！)龙书金同志，军区接不接受？(龙答：接受。)四十七军办事机关设在

政干学校，刘顺文同志！四十七军办事在你们学校，你们怎样？应该给予方便！
(刘：我们保证。)

四十七军马上调部队到长沙、株洲、岳阳、衡阳，保证铁路畅通。你们两派都要打回电话去，凡是四十七军的汽车。保证畅通无阻，不许扣留，扣了就是撕毁协议，谁扣留了就批评谁。

你们愿湖南乱下去吗？这种无政府主义倾向，拿枪乱放！你们把解放军的枪拿去行吗！马上到马坡岭去看看，到底是那里来的？

你们群众组织都要带臂章或胸章。把协议签订以后，你们打回电话去，任何组织都要带臂章、胸章。凡是没有臂章、胸章的都是冒充。

叶卫东：“湘江风雷”的臂章都被抄走了！

总理：你们弄一个胸章就可以了嘛！

叶卫东：有人冒充！

总理：冒充！你们想个办法，总有办法，你们想办法搞个记号，告诉四十七军备案就合法了！你们要保证执行十条协议，拿这一条来考验你们。你们应当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十条”，“六·六通令”，现在又加上你们的协议，我们在这方面来考验你们。

你们首先要签定协议。要信任郑副军长，他在政干校办起公来，十人代表住在那里，不称职的可以撤，按巴黎公社原则办事。双方各要十个人摆在那里，解决这么几件事：一件到医学院，劝他们解围；二是到军区大院看看到底是什么人；三是到马坡岭；四件，把枪枝封存；五件，四十七军的军车完全可以通行无阻，再不能扣人。以四十七军为首来解决湖南问题。

医学院、军区、马坡岭要去看看。邮电、电台，四十七军要派部队去，轮渡也是这样。

四十七军办公地方在政干学校，军区有事到四十七军办公地点去接洽。

今天又比十九号进了一步了，有了这个基础，就准备考虑怎么成立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搞大联合，不能这样长期无政府主义。

现在军区瘫痪了。

戚本禹：瘫痪是因为他犯了路线错误！

总理：今天下午军区再讨论一下，把错误检讨一下。中央军委决定由黎原同

志四十七军负起责任来。军委研究准备改组湖南军区，加强军区。你们赞成不赞成？（众：赞成！）

（总理站起来要走，叶卫东又一次指责“红联”派抓了人）

总理：叶卫东同志！恢复了你们的名誉，气量要大一点，刚有一点胜利，就骄傲起来，我很不放心！刚胜利一点，就把另一派压下去，他们就更要反抗！造反派么！就要像个造反派的像子！

（“红联”派代表说“工联”方面造了很多谣，要求总理单独接见）

总理：你们两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听了。你们是群众组织，就得像个群众组织的样子，我们承认你是群众组织嘛！第一次接见后，你们说我有倾向性（“红联”派站起来要辩驳），军区犯了路线错误，你们是受蒙蔽的，也是受害者。

（“红联”派说我们与军区没关系，又说“工联”派很狡猾，并要求将尚未撤出军区的二、三百人中的拘留几个，以便对质）

总理：为什么要拘留？

戚本禹：不拘留也可以弄清楚！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补充：

以下补充的部分，由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代表团秘书组整理。来源系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周恩来杨成武戚本禹吴法宪等中央负责同志第三次接见湖南赴京三方代表谈话纪要

周恩来 杨成武 戚本禹 吴法宪

1967.07.27

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二点十五分，周总理、杨成武、戚本禹、吴法宪等中央负责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次接见了湖南赴京三方代表。

接见时，中央负责同志作了重要指示，内容大意如下：

一、湖南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中央军委下令改组湖南省军区党委。

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派部队进驻长沙，负责主持湖南文化大革命。

三、“工联”等组织是左派组织，是造反派，我们是信得过的。“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是造反派组织，是左派，应该恢复名誉，恢复组织（按系统）。高司是受蒙蔽的群众组织。

四、下一步应该着手研究建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问题。

最后，周总理和戚本禹同志亲切地嘱咐我们：“你们刚取得胜利，不要骄傲。”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代表团）

xxx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二时十五分至五时五十分，周总理、杨成武、戚本禹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室接见湖南三方（无产阶级革命派、红联派、军方）代表。接见时在座的还有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四十七军军长黎源。

二时十五分，总理等首长进场。

工联派一位代表：首先，让我代表毛主席故乡工联派革命造反派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众：万寿无疆），敬祝各位中央首长身体健康（众：永远健康）。

总理：祝你们健康！黎源同志来了没有？请坐前面来！（黎源这时在总理左边坐下）现在，先问一个问题，四十七军黎军长这次回去处理问题，又顺利又不顺利。有些事情办了，有些事情没有办好。马坡岭有个军火仓库被抢了枪。是哪一派去抢的？当然，我们对你们工联是很相信的！你们工联知道不知道？

工联众答：不知道！

总理：军区说是工联搞的，在马坡岭拿走了三卡车东西，你们打个电话回去问一问，是不是有工联所属的组织参加了？

黄振东：我们根本不能去人，因为那里是“高司”、“红联”的天下。

红联派：这抢仓库事件是章伯森、梁春阳操纵“工联”、“六号门”、“青年近卫军”搞的，他们专门搞打砸抢抄抓。

总理：“红色怒火”是你们“高司”一起的吗？

王吉贤（红联）：“红色怒火”没有和我们一起。

余定成：总理，“红色怒火”是住在矿冶一起的。

总理：是嘛！

占先礼：报告总理，“红色怒火”根本不是我们一起的！只是他们六月份没有地方住，我们腾了些房子给他们，他们住在一舍。

余定成：“红色怒火”住在我们矿冶学生四舍。

总理：现在不要辩论。你们是不是可以打个电话回去问一问，马坡岭到底是谁抢的枪？如果两边都不是，那就是一群乌合之众。那我们就可以用直升飞机抓他几个。抢枪的人也不戴袖章，干事要光明磊落嘛！如果为了自卫，还可以反映一下。这些人抢枪，不戴袖章，无政府主义！不承认毛主席司令部，不承认毛主席的军队，这行吗？在武汉，××同志被打了。你们都参加了游行吧！长沙连武汉都比不上！现在搞得一个组织连袖章也不戴，抢了枪不承认，搞得军队无法工作。为什么长沙搞得这么个样子？“高司”搞了一批人化装“六号门”的。干革命是光明磊落的，为什么要冒充呢？这还象干革命吗！“百万雄师”还有臂章嘛！现在黎军长都不知道，这么多枪都被谁抢去了？到底被谁抢去了呢？“红联”到底包括那一些组织？

（占先礼站起来想发言）

总理：你是占先礼？你能代表全局？你是“高司”的，你代表“红联”就要作数，可要代表到底！

总理：“公检法”多少人？

吴菊聪：五百多人。

总理：是省的？

公检法：是省“公检法”。（这时有人进来和总理说话）

总理：我接个电话就来。（过了片刻，总理进来）

总理：市“公检法”有多少人？

公检法：有二千多人。

总理：“高司”有多少人？有没有袖章？

占先礼：一万三千多人，加上同观点的有两万多，有袖章。

余定成：现在他们用的是通行证，没有通行证就到不了河西。

总理：你们“贫下中农造反军”呢？

鲁庆祥（红联）：我们这个组织有数十万人。

总理：贫下中农那么多，你能管得了吗？

鲁庆祥：我们贫下中农造反军是去年十二月组织的，从许多地区的情况来看，很多人迫切要求加入我们这个组织。

总理：那么你们现在实际上有多少人？

鲁庆祥：我们成立了长沙地区农代会筹备委员会，有六十九万四千多人。

总理：那么多？我问你，你能对长沙市农代会负责吗？如果农民进城搞武斗你能负责吗？

鲁庆祥：我能负责。

总理：好，我就是要你负责。

总理：电台的情况呢？

电台（红联）：我们电台是军管单位，有三百多人，今天工联他们又冲了电台。

胡宜民：报告总理，省电台军管是陶铸一手批的。现在电台的负责人，也就是军管人员，是九·二四抓黑鬼的！对于这样反革命假夺权机构，我们就是可以冲。

总理：是的嘛！但是你们不应该冲，现在湖南军区完全失去了威信，街上的秩序很难维持，湖南军区已经瘫痪了。

红联：“工联”无视湖南军区和长沙警备司令部，成立所谓“革命治安指挥部”。

符子如：“公检法”的人都逃跑了。我们抓了凶手，军区不收，警备司令部不收，“公检法”也不收。我们就成立“治安指挥部”，这是革命行动。

总理：（点头）你们能维持治安吗？

黄振东：过去我们能够维持。“公检法”放出了五百多流氓阿飞，现在比较难维持了。

总理：现在武斗大发展，你们的制止武斗指挥部也管不了！

电台：昨天他们冲了电台，抢了枪！

总理：打个电话问一问，广播电台冲进去了没有？你们冲进去想接管武器吧？

朱顺祥：不是，我们是冲击电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总理：“红联”派中有多少工人组织？“真理军”有多少人？

王泽（红联）：有一万七千多人。

总理：还有个“革命工人造反军”，这个组织有多少人？

黎正海（红联）：我们有二万五千多人。

总理：这个“红流”与刚才那个组织（指贫下中农造反军）是一样的吗？

易浩然（红联）：不一样，我们有二十八万人。

刘友桂：长沙市郊区总共只有七万人。

总理：怎么有六十九万人？那儿来的这么多人！

刘友桂：很多农民都冒加入组织，他们是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收，大人小孩都收。

总理：我知道，他们是“号称”。把很多人都算在一起，大人、小孩都算！

总理：“红色怒火”的人来了吗？

占先礼：“红色怒火”与我们没关系。

总理：他们不是与你们同一观点吗？

叶财宝：有联系，有证明人。

总理：人在那里？

叶财宝：在北京。

总理：到了北京？把他找来。（这时叶财宝同志乘车去找被我造反派俘虏后教育过来的“红色怒火”特务连副连长黄克俭）

黄振东：我汇报一下“红色怒火”的问题。红色怒火就是“长保军”、“八一兵团”的变种。

（占先礼想插话）

总理（对占先礼）：你这个人真是怪里怪气的。你这个人真怪，你先说不知道，我一调查，你又出来讲。（指着黄振东）你继续讲！

黄振东：他们“红色怒火”里面都是“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坚定分子”。

刘秀英（作为“红联”代表进场的）：“红色怒火”肯定是和“高司”有联系的。我原来是支持“工联”的，六·六惨案后，我看见打死了许多“高司”的，我又不支持了。现在的“红色怒火”大部分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年青人，他们有些是原“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要正确引导。

朱顺祥：她刚才的发言是脱离两条路线的斗争来谈的。

黄振东：“红色怒火”在警备司令部备了案，造了名册，他们有四条纲领：①不

参加夺权；②不掌握斗争的大方向；③专门对付造反派；④运动后期背着背包去坐牢。

总理：这可能是他们说怪话吧！你们“工联”有多少人？

唐忠富：我们“工联”有十七、八万人。

总理：其他地区属不属于“工联”？

唐忠富：其他地区组织上与我们没有关系，但有联系。

总理：除长沙工联外，还有“长沙工人”。“长沙工人”如何？

唐忠富：“长沙工人”没来人！

总理：“长沙工人”为什么不来？

唐忠富：他们被“红联”抓去了，还抓了四个。

总理（对红联代表）：你们把他们抓了，你听吧！你们就是拆黎军长的台。

红联：我们打了三次电话回去了，叫他们赶快放人。

黄振东：我是从虎口里面逃出来的，昨天下午三时，我们去机场时，经过大托公社冻肉厂附近，我们被抓走五人（谢若冰、贾镛、张楚梗、熊瑞林、陈勇），谢若冰当场被打伤，头破了，血流满身，上衣撕烂了。张楚梗和其他同志也当场挨了打。

总理（对红联代表）：你说你们还不武斗！人家汽车过路，你们拦路。

红联：我们有一人被人用枪打死了，所以我们很气愤，于是就拦路，抓了他们五个人。现在，我们一定要他们放人。谢若冰他们回去是煽动群众组织武斗的。

总理：谢若冰回去也不打个招呼，这个女同志倒是能干，是不是她想回去发展一下组织，青年人总是这样想。

黄振东：不是，回去是解决一些问题。

总理（转对红联代表）：你们把他们打了，我托你们两位马上把那五个人放回来，曾干龙（红联代表）是不想来嘛！李志仁（红联代表）也不来了，胡少奇（红联代表）也不来了！

红联：你们七月七日抓了我们那一辆车厢的人还冒放。

总理（对工联派）：上次你们抓的人，可能还有些没放出来，你们回去查一查。

红联：上次有八十五个人还没放，只放了几个，还扣了我们很多材料！

总理：哪有那么多！你们工联是造反派，你们要宽大一点，气量要大一点，不要搞得那么小气。以前抄黑材料，抄了那么多，现在谁还要这些？

总理：“长沙工人”有多少人？

唐忠富：他们有几千人。

总理：他们和你们“工联”观点是不是一样？

唐忠富：基本上一样。

总理：“长沙工人”拿了枪没有？

黄振东：“长沙工人”拿了枪，但他们事后打了个借条！

总理：总算还打了个借条，但拿枪不对！

黄振东：我们也不同意拿枪！

总理：省委机关“永向东”有多少人？

尚春仁：六百四十人。

总理：你们和“工联”观点一致吗？

尚春仁：完全一样。

总理：你们“红色新闻兵”多少人？

黄振东：有一百八十多人。

总理：观点和“工联”一致吗？

黄振东：完全一样。

总理：你们“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有多少人？

胡宜民：报告总理，我们“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是从“长沙造反有理军”杀出来的。原来我们和“高司”关系最好；但是，在二月逆流中，我们上了龙书金的当，压制了造反派，因此，我带着一千多人杀出来了。

总理：你们和“工联”观点一致吗？

胡宜民：完全一样。

总理：“省直红勤站”有多少人？

王家根：一万多。

总理：你们和工联观点是不是一样？

众答：完全一样。

符子如（政法联络站）：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组织，如“青年敢死队”

等，在抢枪，把公安部门的机密档案抢走了，同时，红联、公检法又把大批枪枝放到机密箱去引诱造反派，好让造反派上当！

总理：“青年敢死队”有多少人？

众答：不知道。

总理：你们“农联”有多少人？

刘友桂：有一万多人。

总理：你们观点和“工联”一致吗？

刘友桂：完全一样。

总理：“湘江风雷”恢复了有多少人？

叶冬初：现在已有一万多人。在有些县份根本不能恢复，一打出旗子就撕烂了。

总理：这是因为你们受压制。

红联：报告总理，其他县都恢复了“湘江风雷”。

总理：那怕什么？恢复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湘江风雷”是群众组织，中央没有讲是反动组织，也没宣布要取缔嘛！就是“百万雄师”也没有宣布取缔嘛！

戚本禹：这两个组织性质不一样！（总理这时微笑着点点头）

总理：我刚才是这么说嘛！何况“湘江风雷”你们是造反组织。“工联”和“湘江风雷”是不是都是一致的？

叶冬初：基本观点一致，有些具体作法不一样。

总理：据黎军长说，“工联”是不赞成夺枪，但是有些人说要自卫就要有枪，军队拿了枪不做事，可以拿过枪来自卫。当然，这也有一面的道理。不过，解放军的枪是不能夺的。武汉各组织做了什么事还承认，现在长沙抢枪的事到底谁干的也搞不清。若坏人冒充“工联”、“湘江风雷”，那就更坏了，在长沙搞得没办法辨别了！现在请章伯森谈谈。

章伯森：最近，各县市召开了各级贫下中农干部会，高司都派了人去搞什么控诉，煽动农民对“工联”的仇恨，围攻革命造反派，在常德、益阳、湘潭都把造反派压下去了。现在约有一万多造反派被赶到长沙。

占先礼：我们没派人去！

刘友桂：他们派人到我们郊区煽动贫下中农进城，我们把他们赶跑的。

岳阳代表：报告总理，还有一千多人被保守派和农民围困在洞庭湖中，已经四天四晚了。他们并架起了机枪！

常德代表：我们常德地区，“红色怒火”去了三百多人，带头的是高司矿冶的张福喜，在常德挑起武斗，结果打死了许多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还打伤了许多人。萧士昌就是一个，他的头被打了五个洞，现在已来到了北京。

总理：你们哪些组织把军区占了？龙书金同志，你得到的消息是什么人进去的？

龙书金：有一个报告。这次冲军区抢枪是“工联”、省委“永向东”、“六号门”、“青年近卫军”、“湘江风雷”、“大专院校”、“长沙工人”、“孙大圣”……（念了三十几个组织）

总理：有多少人冲？

龙书金：共有五千多人，现在还有三百多人在里面没走。密码只有一组没拿走。大楼、宿舍冲进去了，武器都被抢走了。

总理：当他们冲进军区时，你们本身有多少人？

龙书金：连干部、职工、家属总共只有一千多人。

孙素洁：（很愤怒地站起来）不是的，我来时，我就看见我们那里就驻了五个连在里面。

龙书金：只有两个连。

总理：两个连密码都不能保住，真没有用。

叶冬初：龙书金真狡猾，他这是变相地发枪。两个连保卫，什么东西都保不住！“公检法”最近放出几百劳改犯，在社会上捣乱。现在“红联”还把我当成反动头目，还说“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我现在在总理面前，我看你抓！

工联派众人：他们“红联”现在还说，叶冬初是反动头目，不能当代表，还发了许多宣传品，写了许多大标语。

总理：你们把它涂掉啰！

叶财宝（孙大圣）：龙书金把我们这么多组织说成是夺了枪，这是欺骗党中央。我们“孙大圣”就没有一个人去冲军区。

孙素洁：二十一号以前军区的情况，我是知道的，那里面早准备好了铁棒、木棍、六六六粉、硫酸，我们门诊部就有这些东西。在我们办公楼前还砌了围墙，并且还有五个连分散在灯光球场、办公楼……等地。五个连分三片作保卫工作。

是刘副司令、鲁副司令布置的。我认为这是早有准备的。我们军区的东西的转移是很早就准备好了的。龙书金刚才说军区没有一点准备，这不对！

总理：龙书金同志，是不是你们把东西转移了？

龙书金：没有。

总理：将来查出来怎么办？

龙书金：查出来受处分吧！

总理：你们来以前，一点准备也没有？

（龙答不上话）

孙素洁：军区是做了准备的。

龙书金：是准备了一点。

孙素洁：不是一点，是准备了很多。

龙书金：我们看到中苏友好馆烧掉了，准备了一些沙袋。

总理：说怕楼烧了，这是假话，你还说假话干什么？我看你不象个司令员！

龙书金：……就这样，我们当晚就把军区丢了。

总理：你们是不是跟张平化、王延春一样，听到群众来了，害怕群众就逃了。

龙书金：不是，不是。

总理：密码到哪里去了？都应该回去查清楚。

王家根：军区里面是准备好了的，忽然间一下子把军区丢了，这样作是陷害四十七军。我刚打了电话，家里反映，是下午五时多，有些不明身份的人冲进了军区的。工联的宣传车和在军区对门的省气象局《红旗》兵团的宣传站在喊：“造反派不要进去，这是龙、刘、崔之流设的圈套。”群众反映，抢走军区东西的大卡车都是往榔梨市那边去了，那边本是红联、高司的天下。至于马坡岭军火库的问题，根据总理的指示，我打了电话，问了各造反派组织，没有人看到有造反派的车子和队伍往那边去！

总理：是军区自己引进去的，还是外边引进去的？

工联方面代表：是军区搞的鬼。

总理：林国兴同志，谭文邦同志，你们怎样看这个问题。

谭、林：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冲军区这回事。

总理：我看你们丢了个司令部都莫明其妙。（这时，“红色怒火”的特务连长被

带进会场)

总理：“红色怒火”有多少人？

黄克俭：“红色怒火”有一千多人。

总理：是不是都是从“红色政权保卫军”中出来的。

黄克俭：有一部分是“红政”的，一部分是“八一兵团”，头头都是的。“红色怒火”是十一月份成立的。

总理：“红色政权保卫军”是不是有联动思想？

黄克俭：是有的。

总理：跟“红旗军”有没有关系？

周国辉：湖南“红旗军”是造反组织，“八一兵团”才是保皇的。

总理：这跟“高司”有没有联系？

黄克俭：跟“高司”有联系，跟下面有联系。

总理：你“红色怒火”干些什么事？

黄克俭：我们是专门与“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六号门”唱对台戏的。我们不当左派，也不夺权，只顶“造反派的逆流”。

总理：你们进行了打砸抢抄了没有？

黄克俭：干了，从五月份开始。

总理：“六·六”事件你参加了吗？

黄克俭：参加了，在楼下。

总理：有好多人？

黄克俭：有七十多人。

总理：“高司”有多少人？

黄克俭：他们在楼上，不知道。

总理：“六号门”在外面有多少人？

黄克俭：“六号门”的只去了三十六个，“青年近卫军”的去了十几个。

总理：那么一点点人怎么攻？（对着工联）抗暴指挥部是你们“工联”组织的吗？

唐忠富：我们没有成立抗暴指挥部，成立了制止武斗指挥部。

总理：“六号门”来人没有？

众答：没有。

总理：“青年近卫军”呢？

众答：没有。

朱顺祥：高司现在“万炮齐轰戚本禹”，发出什么“中矿中央通知”，公开与中央和中央文革对抗。（当场念了高司写的一张反动大字报《想不通，要上北京》）（总理这时看了朱顺祥递上的《想不通，要上北京》的大字报）

总理：这个如果是他们写的，那当然是反动的啰！

王吉顺（红联）：现在湖医危急，“工联”从十八号起围住湖医，到现在已经有八天八晚了。来围的还有“红旗军”。

总理：“红旗军”打旗子了吗？

众答：打了。

总理：搞那么多名堂干什么？“湘江风雷”里边有几个头子不好！既然“工联”打得很响了，又都按系统组织起来了，就应该把这个旗子高举下去。“湘江风雷”应该恢复名誉。

（这时，唐忠富交上双方协议书）

总理：为什么要在协议上把制止武斗指挥部打引号？这又是在挑起矛盾。

戚本禹：没有道理！只是个标点符号问题。

总理：咬文嚼字没意思。你们今天白天就把这个问题解决。要达成协议，要四十七军签字。你们双方不是都表示信任他们吗？（对红联）为什么黎源同志通过你们的地方就通不过呢？我们现在委托郑波同志出面，你们双方都在家里派十个代表，共同调查，到军区去看看，做好几件事：

（一）看看军区内现在二、三百人到底是那些组织？是哪里的人？若双方都不是，双方就共同来劝他们回去。

（二）马坡岭的事情要查清楚，到底是谁夺的枪？

（三）去看看湖医是怎么回事。

（四）双方的武器统统封存起来，责成四十七军调队伍来维持。四十七军，你们双方都相信他，最高统帅也相信他，中央军委也相信他，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最高指示办事，你们接受不接受最高指示？

众齐声答：坚决接受。

（这时，总理依次问章伯森、梁春阳、华国锋、万达、林国兴、谭文邦、龙

书金他们接受不接受。他们一一回答：坚决接受。）

总理：两派都要说服农民，不许农民进城武斗。还有四十七军的军车不准拦，拦了就是撕毁协议，就要挨批评。现在两边群众组织，统统要带有臂章或胸章，凡是没有臂章或胸章的就是冒充，没有臂章就要想办法去做。

叶冬初：“湘江风雷”的袖章被抄去了。

总理：再做一批新的，做一个记号，到四十七军那里备个案，免得冒充。四十七军要完全通行无阻，不许阻拦。邮电局要四十(14)七军派人军管。首先要恢复铁路、公路、邮局、电台，现在湖南这样乱，中央决定早些解决湖南问题。过几天，要着手研究成立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区现在瘫痪了。

戚本禹：瘫痪了是因为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总理：（点点头）现在由四十七军负责湖南的文化革命。中央决定要改组湖南军区党委。

（众热烈鼓掌）

（这时高司找叶冬初同志争吵，并骂叶冬初是反动头目）

总理：叶冬初同志，不要吵，给你们恢复了名誉。造反派，要宽宏大量，不要因为我们支持你们，你们刚取得点胜利，就骄傲，怎么能叫我们放心呢？

叶冬初：我一定注意，听总理的话。

唐忠富：我们马上开门整风。

总理：天亮了，时间不早了，我要休息了。

（造反派代表十分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

“打倒龙书金！打倒刘子云！打倒崔琳！”）

（这时，红联、高司代表纠缠总理，提这样那样的问题）

占先礼：我们没有跟军区走。

总理：军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你们（指高司）是受了蒙蔽的。

（这时，造反派方面代表要求总理休息。再一次高呼：“毛主席万岁！”

“打倒龙书金！打倒刘子云！打倒崔琳！”）

（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代表团秘书组）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郑波在湖南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

以工联等左派组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造反派，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斗争最英勇、最顽强、最坚决。为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们省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去年“八·一九”就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运动，轰开了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织的所谓“赤卫队”的重重包围，粉碎了“三相信”的谬论。发扬了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大揭了省市的阶级斗争盖子，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张平化抛出了“九·二四”的反动报告之后，全省大抓黑鬼，把大批的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全省处于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围攻、不怕戴反革命的帽子，组织了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热烈鼓掌）。这些革命造反派奋起批判湖南省委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长保军等保守组织的围攻，使革命造反派队伍不断地发展壮大，孤立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他们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当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革命造反派并没有上当，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坚持贯彻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次猖狂进攻。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革命造反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夺权斗争。湖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勾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革命左派组织湘江风雷打成反革命（热烈鼓掌），大规模地逮捕了革命闯将，并提出了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反动口号，转移斗争大方向，镇压革命造反派。造成了一片白色恐怖。

由于湖南军区在支左工作中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决定由我们四十七军负责湖南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最大信任，也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

要深入地揭发和批判湖南军区在支左工作中间的方向路线错误，彻底批判龙、刘、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其恶劣影响（热烈鼓掌）。湖南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布的一切通令和通告等一律作废（热烈鼓掌，口号声）。湘江风雷是革命左派组织（最热烈鼓掌），应该恢复名誉，可以恢复组织，但不要跨行

业。对于湘江风雷和其他组织中受迫害的革命群众应该给予坚决地平反（热烈鼓掌），凡是被打成所谓反革命的应该坚决地给予恢复名誉。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七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湖南问题若干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 改了一点，其余都好。 毛 泽 东 八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已阅，同意。 毛 泽 东 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三 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分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稿共四条，主要是： 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省革委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

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

中央决定稿曾两次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二是分别对这两次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这个决定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决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戚本禹接见湖南“红联”代表谈话纪要

零点四十六分至三点半，戚本禹同志接见“红联”代表(包括专、市)全体成员。

戚本禹同志拿着名册一一点名，当点到胡少奇时，戚本禹同志说：你叫胡少奇，这次你回去干了一件坏事。

胡少奇：报告戚本禹同志，我正要同你汇报。

戚本禹同志说：好！等一下再说。

(点完名后)胡少奇站起来说：这次我和代表团回北京时，车子开到冻肉厂门前，车子被挡，当地工人和贫下中农发觉车上穿有便装的，非要留下不可，我去解释又解释不清，这样谢若冰等五人身份被暴露，在实在无法的情况下，我主张双方就地谈判。……

戚本禹同志说：黎正海同志你是当事人，把当时情况说一下。

黎正海：胡少奇讲的，全是假的，完全颠倒是非。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你从五连打电话给我，我说明天上午就飞回北京。黎原军长问我：“你告诉胡少奇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上午七点。”黎军长说：“你马上回一个电话，说代表到不齐，时间定不下来。”我后来打了电话。二十五日下午一时，郑波副军长叫我起来上汽车到飞机场，刚坐上汽车，你也来了。我们车子到冻肉厂前被拦住了。你下车去农民中煽动，最后你站在嘎斯六九车顶上公开煽动，提出三个谈判条件，不答应就把“工联”方面的代表扣下来。当时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违反周总理当面指示的行为，你不听，把人抓到冻肉厂毒打一顿，后又转到大托公社，我要求把谢若冰等五人莫抓到河西去，被一个矮麻子农民模样的人骂了一顿，问我代表谁。四十七军保卫处长王鹤然同志把我叫出来陪“新闻兵”代表黄振东同志和铁道部军管代表二人，去四十七军大托铺驻军处住下来。你又赶出来，要我监视黄振东同志。我们到那里，驻军刚吃完饭，你领着谢若冰等五同志和农民赶到这里。警卫发觉后，我们把黄振东同志转走了。你进来见我们就问黄振东到哪里去了。我不高兴地说：“不知道。”你对我发脾气，说为什么不把他看住。晚上你和王鹤然处长谈判，要把黎原军长和黄振东同志交出来一起谈判，否则就不谈。你们一直谈到晚上三点多，这时我早睡了。次日早晨六点多，我醒来时发现谢若冰等五同志不见，你也不见，我以为到其他地方去睡了。正在这时，王鹤然处长匆匆忙忙跑进来对我说：“你这小鬼，还在睡大觉，胡少奇早就打电话过河西去了，说你叛变了，今天早晨准备把你骗过河去干掉你。”这下把我急坏了，马上化装坐上汽车同正处长通过警戒线逃往机场。到机场后不久，黎军长也来了。不久外围岗哨打来电话，大托已戒严，到处抓逃走的二人。我们早饭也没有吃，观上坐飞机起飞。

胡少奇立即站起来说：这是欺骗中央和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同志说：他说的完全是事实，与黎原同志反映的是一样的，你干了坏事还不承认，这是什么态度？

高司龙彪站起来说：现在我们学习几段语录：“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戚本禹同志站起来说：你这条语录是对我说的，我就不接受。我们有调查，有证明。你干了坏事，还想倒打一耙！

胡少奇说：你这种态度我不接受，你要让我讲清。

戚本禹同志说：你干了坏事，不承认错误，有什么可讲。

(这时，胡少奇、龙彪都站起来辩驳)

戚本禹同志说：你们坐下。

(总理联络员也要胡、龙坐下。)

戚本禹同志说：根据你干的坏事和这种恶劣态度，我可以撤销你的代表资格。

胡少奇：你就撤吧，我还怕什么？

戚本禹：你这样恶劣的作风，我还可以对你采取专政措施。

(胡逼着戚本禹同志立即采取专政措施。代表团有些成员都指责胡少奇的恶劣态度。)

戚本禹同志问：“高司”几个代表？

占先礼答：我们有四个代表。

戚本禹问：哪一个代表比较开朗一些？

(全场都没有作声。)

戚本禹同志问黎正海同志：你说哪一个开朗一些？

黎正海说：他们四个人都是铁板一块。

戚本禹同志说：好吧，今天我找你们谈一个问题，就是要求你们不要走“百万雄师”的道路。从很多迹象表明，你们越来越危险，湘潭地区，“高司”炮轰周总理和我，而且游行示威！这是极端错误的。炮轰我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炮轰周总理呢？！轰周总理是极端错误的。这个消息是广州军区打来了电话。高司很多同学是好的，现在认识了错误。“二·四批示”我们有责任，军区有责任，“高司”广大同学是好的。现在中央担、军区担，如果你们坚持，那就有错误，因为文化大

革命是毛主席发动起来造反，反还没有造好，就抓了那么多人，这是什么错误呢？军区犯了错误，你们有意见就提吗。你胡少奇的态度那么恶劣，革命小将犯了错误是允许的，只要改正。谢若冰、叶东初你们认为是反动头目是站不住脚的。这个组织中有没有呢？那倒说不定。你们要反，反戚本禹吧，为什么要反总理呢？总理是国家领导人，应该保护。你们应该检讨自己的错误，站回来，起来造反，这才是对的。你们既是代表应该回去做工作，把群众带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上次有黎正海同志和另一个同志发言很好，这就是好态度。我们国家一开始就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不来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就要变颜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挂帅。关于合作化问题，河南和河北两个文件，刘少奇不肯发，毛主席要发，结果发出去了，这说明两条路线在中央斗争很激烈。刘少奇的组织路线就是被那些叛徒、特务把持着。他们这一系统，控制很多省、市，这种斗争很激烈，虽然只有一小撮，但就是这一小撮破坏我们国家。拿湖南省来说，张平化是陶铸的亲信，王延春是叛徒，从省委到基层有一些人跟他们跑，他们以此欺骗广大人民群众。这种斗争极复杂，如果我们在路线上站错了，就犯错误。例如龙书金并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但也站错了队。刘、邓提出“驯服工具论”培养一批人保他们，结果在群众中造成两派。我们思想稍为跟不上主席的思想就站错了队，这个起作用大的是公、检、法和武装部门，原来这些组织有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他们站错了队还认为自己站得对，他们还想维护张平化、王延春原来的政权，有的从专、县、市甚至还下一点，有他们的人，都要换掉，军区执行的反动路线，要打倒这条路线，湖南死了这么多人，就是军区错误路线。军区错了，中央有一定责任。“高司”跟着犯错误，现在要赶快改正错误。我们有错误，反正对不起你们，你们要造反造我的反，千万不要造总理的反，总理代表中央。现在研究怎样转变。“湘江风雷”不纯让他们自己清理，绝对纯是不行的，你们这派也不纯，反总理就是最大的不纯，如果继续下去，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现在湖南要马上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黎原同志担任主任。我们马上建立革命武装维持秩序。“红色怒火”应由你们宣布是非法的，因为他们观点与你们相同。胡少奇不承认错误，我们还可以采取措施。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

八月七日凌晨〇点三十分至二点三十分，总理、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湖南代表团。

总理、戚本禹、黄永胜同志入场，全体起立，呼“毛主席万岁！”总理入座。“工联”方面代表起立，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并请求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总理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问大家好，同意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转达大家的请求。接着，总理作如下指示：

刚才有事商量，去湖南的人回来了，听他们汇报，让大家久等了。

整个湖南形势应该说是大好的。矛盾暴露出来了，暴露得越彻底，解决得越好。虽然不是各地情况都清楚，也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清楚，大体上抓到了，也就初步解决了。

上次讨论了湘潭问题，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湘潭军分区犯了严重错误，他们发枪了。湘潭军分区承认了，司令员赵仁山写了坦白书。上次我当面问，他没说明，黄司令员又问一次，也没说。他的坦白书，准备印出来，给大家看看。各军分区有这种事的，要向黄司令员，向党中央交代。解放军同志要忠于毛主席。犯了错误要改，改得越快越好。龙书金同志五月十二日在广州开会时，给家里打电话，写了检讨。主席有五点批示，用中央、中央文革、军委文革名义转发到全国。(总理念了主席五条批语)从五月十四日，主席批湖南省军区党委检讨，到现在七十多天了。赵仁山尽管当面说谎，现在坦白了，还是好事。他正在负责收枪，已经收回了一部分，还要继续收。当然，光靠他一个还不行，在家的其他领导同志都要负责收。把湘潭、韶山这片地区，变成“高司”、“百万雄师”、“产业军”的集中地，这里不只是主席的故乡、主席的旧居，而是主席的出生地，怎能搞成这个样子呢？

希望其它军分区(总理一一点了名)自己先检查，再打电话作工作，把思想搞通，把事情搞清楚。

现在的趋势，长沙站不住了，是向外、向西。湖南面积大，人口多，到处活动，会引起新的问题。当然，出了新问题也没啥，不怕，矛盾更会暴露出来。我们相信，当地群众经过教育，会觉醒起来。长沙是个中心，问题已接近解决。长

沙已经实践了，其它地方不一定都要通过自己实践了。通过代表作工作，教育群众，反过来。群众教育他，做对的，群众相信，做错了，群众反对，受到孤立，就要接受教育。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

省军区继续检讨，书面检讨可能明天定稿。这次要写得更深刻些，军区、分区、武装部都应该有认识。在北京认识越深，回去改正越好。主要是北京的政治空气、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中国的赫鲁晓夫，使大家受到很大的教育。将来还可另来一批受教育。

解放军支左从今年起，湖南驻军支左从处理“湘江风雷”问题起。中央批件有错误。无论如何，各军分区、武装部不要再继续犯过去的错误。发的枪自己收回。有的地方所谓抢，实际上是发的。湘潭承认啦！是错误的。

群众组织方面，发现有这个趋势，特别是军分区发枪，为什么不抢枪？从江西影响到湖南，又影响到广州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造反派要求武装是正当的。今后按规定有组织的武装基干力量，毛主席有指示。但总不能因为要武装就抢枪，抢总是不对的。

江西纵容保守派，给了他们很大一部分枪。他们下到农村，与农民结合，发生了莲塘事件、赣州事件。赣州造反派死伤很多人，是长江流域最大的流血事件。因此，造反派觉得赤手空拳，处于挨打地位，他就要夺枪，首先夺警卫部队的枪。军区犯了严重错误，但一直没有开枪，让抢去了。后来，让两派来北京协商，达成了协议，最后不抢了。造反派最听中央的话，坚决执行协议，很快把武器集中封存起来，情况好转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失掉了威信。从××、××调野战军去，全省各地都要求派部队去，那么多军分区，部队一分散，保守派又来夺部队的枪。先出在萍乡，南昌城外青云铺师部的枪也夺了。我们严厉的说，这种枪你不能夺。这些部队支左有成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宣布：野战军的枪不能夺，人不能捉，更不能打，机关不能冲。真正造反派一定要坚定执行中央决定。冲机关，搞成无政府状态，任何人无法领导。部队支左难免犯错误，但支左的错误不同于黑司令部。对毛主席信任的部队要支持。借江西这个例子，告诉湖南的同志，由于分区发枪，调动农民，造反派要枪有理由。要肯定，因对他有压力。但象长沙，造反派占优势，在大批抢枪就不对了。长沙秩序很乱，有点无政府倾向，不要说的太严重了。（总理举了郑波副军

长坐车出去被抢车的事，大家笑了。)能不能允许?(大家同声回答：不能。)

工联代表插话：长沙过去就有几个人一个组织到处抢，有的是流氓阿飞。

总理说：已经给×××说了，组织要按单位，社会组织不好控制。

(“长沙工人”代表要求军队镇压这些组织。)

总理说：你的意见对。调军队去，可是，听说抢枪，只好全部徒手，这是从来没听说过的。你们想想，为什么把形势造成这样？当然，我们有责任，我们工作没作好，对不住伟大统帅和副统帅。造反派自己，如何自卫，你们研究个办法。

总理问刚才发言的人叫什么名字，接着说：说得很好。一个小孩子挂两支枪，谁也不能管。外宾要求去韶山参观，只好暂时劝阻。韶山是主席旧居、世界革命的圣地，不让参观啦！你们不感到难受吗？

工联代表插话：韶山已住上“红色怒火”和“高司武工队”。

总理说：首先是长沙要安定，一定要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还打算多派一点野战军部队去，由广州军区黄司令员筹划。乱抢枪、乱抢车，怎能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要相信和依靠他们，你们把军队的枪、车都抢了，你们还能比军队有威信？无组织的，成为乌合之众，有组织，就好办了。一定要懂得革命的进程，要有步骤、有计划。不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不符合毛主席提倡的大民主，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必须说清楚，凡是过去乱抢的，要加以整顿。

马坡岭、红山庙都去抢。“工联”挺身而出，组织人保护马坡岭。精神是好的，他们声明：你要抢，我就开枪，不抢，我不动，是好的。是无产阶级精神。是无产阶级风格。需要这样，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战士。值得学习，要提倡，群众组织会来学习。过去自由夺枪是错误的、是非法的。你们打电话回去，停止抢枪。这对所有群众组织都是个考验。到底谁不遵守纪律。乱抢枪、乱放枪，冲野战军，夺他的枪，打他的人，不遵守革命纪律，是不尊重解放军，不支持解放军，更说不上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四十七军原来驻长沙的部队有点错误，可以调换，可以写信提意见，军民一家，拥军爱民嘛！要贯彻军委“八条”和“十条”，改变现在的混乱现象。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派去的四十七军会支持你们的，给予信任，支持他们好不好？(同声回答：好。)

(接见的)头一天讲话，第一个是叶冬初，第二个是谢若冰，怎能说不重视？“红联”方面有情绪，我们对群众组织都一样看待，犯了错误，还可以造反嘛！当然，

造反派也会有缺点，要通过各自整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现在组织正在分化，有的发展，有的缩小，要好好整风，自己才能掌握。否则尽管组织发展很大，你们不容易掌握。群众组织犯了错误，只要改正了，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还可以存在嘛！

其它问题还要研究一下。运动要向前发展，正在商量能在北京谈判中，把湖南的领导机构、组织形式确定下来，整个面貌才能焕然一新。

正在起草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孙素洁同志要求军区开展四大。)

总理答：军委有规定，要商量。真正的造反派当军区受到冲击时。是否应该更好的把内部秩序维持住？

工联方面代表：黔阳告急，丁健司令员支“保”，发了七百多支枪，王副司令员带八百人退到邵阳，打死的已查出二十具尸体，几百人被关。旧社会土匪头子张平等的子弟又起来了，欢迎四十七军进驻湘西第二次剿匪。

总理答：请联络员散会后谈谈。

工联方面代表：常德造反派三百人从长沙杀回去，受到市武装部刘部长和关政委带领“红联”和大批农民围攻，已死四人。

总理答：应有组织的前进嘛！并不是拿着枪就能打仗。左派武装要好好研究，有计划有领导的进行。

(“工联”方面代表汇报衡阳以学毛著训练班为名，培养武工队。里应外合，抢军分区的枪。总理要衡阳分区周兴林注意，采取湘潭态度。“工联”方面代表汇报岳阳交通阻塞情况。)

总理要岳阳分区魏司令员注意，并说：铁路由野战军护路，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一致起来，不要和外面串连，各派都要想想整体利益、全局利益。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总理还说：收枪、劝阻农民进城武斗是军分区的主要责任。

(工联方面汇报了湘潭炮打中央情况。)

总理对戚本禹大笑说：我是定时炸弹，你是黑后台？

(红联方面辩解。)

戚本禹：不要光相信给你们打的电话。

红联刘秀英：贫下中农热爱毛主席，但对文化革命不理解。简单地说农民是保守派，是受挑动的，大家想不通。为什么会受挑动呢？希望中央作思想工作。

总理：谁说是保守派。

(郴州造反派汇报了株洲“铁道游击队”去二十多人夺枪的情况。“工联”方面衡阳代表汇报“衡革会”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产物。)

衡阳×××：谁说“湘江造反兵团”是保守派，坚决不同意。

占先礼：湖医被抓二百三十人劳改没放，七月六日抓八十五人没放。

戚本禹：总理还要找“湘江风雷”单独谈谈。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1967.8.7 凌晨 0：30 至 2：30，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接见的首长：周总理、戚本禹等。〕

总理说：

总的来看，湖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因为一切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暴露得愈彻底，解决得愈好，上次我们说到湘潭军分区的问题，湘潭军分区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发了枪，不仅高司、红色怒火去了人，而且四川的产业军，武汉的百万雄师都去了一些。有六百多人在湘潭，湘潭军分区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把枪发给保守派，是犯法的。

现在湘潭发出九百多枪，从湘潭、长沙以南到韶山，变成了高司、红色怒火、百万雄师的据点，主席家乡搞成这个样子还行？！

黔阳、常德、衡阳等地也有类似发枪的情况，这些地方的军分区也要象赵仁山一样，向黄永胜同志，向广州军区，向党中央交待这个错误。

希望其他军分区，衡阳、郴州、零陵、黔阳、常德，都要检查一下。

军区要继续检查。

这次要更深刻，各分区是一样，在京认识更深，回去才能改正。

中国人民解放军应永远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龙书金以前在广州写了个检讨，并打电话告诉省军区党委，写了个检查，毛主席 5 月 14 日批了几条（总理这时念五条），批示 70 多天了，那是五月，我们认为，改正错误要越快越好，现在想通了，赵仁山当面撒谎，背后坦白了，这很好，已经收回了一些枪支。

说说群众组织的问题，现在有这个趋势，军区可以发枪，我们为什么不能抢呢？这是从江西开始的，影响到湖南，刚才听说又影响到广州，保守派围攻造反派，加至派人挑动农民进城包围造反派，真正的左派要求武装是可以理解的，是必然的。

“造反派当然要求武装”，这是最高统帅的指示！还要跟同志们商量，但“抢”总是不合法的，江西的例子就是军区，分区怂恿，允许策划发枪给保守派，开枪打人，并且与农村结合包围城市，发生了莲塘、赣州最大的“7·10”流血惨案，军区的几个连的枪都被抢了，双方达成协议，说不抢了，造反派很遵守，不抢了，但我知道，保守派尚未交，我们建议就地封存。我们对造反派给予信任，保守派不敢动了，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因军区失去了威信，就另调野战军。如从山东、广西调到江西，因野战军不可能分到每一区，部队一分散，保守派又来夺野战军的枪，如萍乡、南昌，我们严厉规定，向所有的同志声明，野战军的枪不能夺，人不能抓，更不能打。不能冲机关，坚定的革命左派坚决遵守，在这个问题上考验坚定的左派。

国内调动野战军，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最高统帅的命令，林副主席同意去的。这样你还夺权，还要抓人，就无政府状态了，如果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不允许的。我今天举的江西这个例子，由于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保守派，造反派抢枪是有理由的，象其它地区造反派少，去抢还可以，长沙地区造反派那么多，还抢枪这不应该。

你们信任 47 军，但长沙秩序很乱，这就是无政府状态。

你们要武装自卫，是有道理的，但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怎么办？

现在长沙是造反派占优势，还是这种情况就不对了，结果只能将调去的一团全部徒手，84 团的枪也被抢了，徒手开入长沙，我们很难过，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武装自卫对，但得研究个办法，三人一队，五人一列，一小孩持二支枪，怎

么行？外宾去韶山参观，我们只好劝说。但不全怪下面，首先是湘潭军分区……一定要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自由地抢枪夺枪是不对的。是非法的，都是不支持，不拥护解放军的，更谈不上相信依靠解放军的。

总理最后说：你们要相信中央，现在出现人为的混乱，你们应当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派去的军队，相信他们，支持他们，我们要求你们这样作，好不好？（众说：好！）我们对你们是重视的。

（摘自 67.8.14 《新北大报》《湘江风雷》）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湖南“高司”代表给中央文革的书面检讨

主席、总理、伯达、江青、戚本禹同志：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在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我们的确喝了不少水，犯了不少错误，有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一定损失。我们决心修正错误、坚持真理，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值此，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检讨、请罪。

一、“二·四”批示以后，湖南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湖南军区龙书金、刘子云之流谎报情况，上欺中央，下瞒群众，又有意歪曲和扩展“二·四”批示精神，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了解放十七年来空前未有的对“湘江风雷”广大革命群众)大逮捕，在一段时间里(二、三月份)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因此，“二·四”以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就成为主要矛盾，在这两条路线斗争的生死关头，我们不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受了军区错误的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边去了，犯了路线错误。

二、“二·四”批示下达后，“高司”广大红卫兵战士出于对中央文革的坚定拥护，主动配合当地驻军抓了一百多名“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干部，还抓了在长的“三司”、“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的部分同志，并且，上述被抓人员不少被打(群众一时出于义愤)。二月七日由“高司”等九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起，召开了十余万人的批判、斗争“湘江风雷”、“红旗军”、“红色政权保卫军”反动头目大会。会议中由于群众的要求，又宣布把同“湘江风雷”关系密切的“国际红卫兵”、“湘江风暴”等七个革命组织的大旗取下，严重地打击了这些组织中的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这就是我们这次犯错误的开始。

不久后，湖南军区提出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反动口号，我们并没抵制。二月十一日到二月二十四日，由“高司”负责组织了千余名学生下到长沙的主要厂矿企业单位和机关，开展宣传和调查。也跟着去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在部分工厂客观上扶植了保守派来镇压革命造反派。

自二月起到二月中旬止，我们通过广播、宣传车、传单、大字报和展览等方式，公开揭发和批判了“湘江风雷”的错误，并且在社会上公布了有关“湘江风雷”的调查材料。在这段时间，还有少数学校的学生极端错误的把“湘江风雷”喊成“湘江疯狗”，把坚决支持“湘江风雷”的革命群众叫做“保狗派”，对于这些极端错误的口号，我们没有坚决制止。此时的“湘江风雷”，人们确信无疑地认为它是一个反动组织(中央军委二·九通知，三·一八文件上均提到了)。凡此种种，说明我们这次错误由开始又向前发展了一步，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压制了“湘江风雷”广大的革命群众。

三、三月底四月初，以“工联”为首的革命群众组织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推翻“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而我们却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二·四’批示，谁为“湘江风雷”翻案，谁就是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对立情绪严重，现在看来很清楚，这是继续压制“湘江风雷”中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反。

四、四月七日，“工联”等革命组织强行封闭了“新生”的《湖南日报》，本来这是革命行动，我们却站在错误的立场上，不看本质和主流，极力反对和贬低这种革命行动。于是，“工联”同“高司”之间的对立情绪日益加深。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六·六”惨案、“七·七”惨案，致使“工联”派同“高司”之同矛盾发展到了极其尖锐复杂的程度。

五、七月中旬以来，在“高司”内部，有极少数的学生极端错误地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中央和中央文革以及戚本禹同志。有些话是很反动，这是一种犯罪的反革命行为。我们没有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罪。

我们为什么犯这么严重错误呢？

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主要的。

一、千件事、万件事，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头等大事。我们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可是，在“二·四”以后一段时间里，我们放松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本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剧烈的，可是，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对湖南军区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直到最近才认识得比较深刻。军区支持我们，我们对军区也就失去了应有的警惕，看不到军区内有路线斗争，他们的话也比较容易听得进，这就容易产生奴隶主义。军区支持我们，使我们缩手缩脚，生怕闹出乱子，革命造反精神受到压抑。另一方面，政治地位改变了，自己没有受压迫，阶级感情不同，所以对别人起来造军区的反不可理解，甚至认为他们别有用心地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故意往解放军脸上抹黑。从根本上看，还是我们的世界观没改造好，有私心杂念。

二、毛主席一再强调指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可是，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斗争刚刚取得一点胜利之后，就骄傲自满起来，尤其是“二·四”批示后的一段时间，革命群众支持我们，而我们却飘飘然起来，同时还压制不同意见的同志，搞小山头主义，唯我最革命，这就使得我们同广大的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三、不走群众路线，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把感情当政策。“二·四”以后，我们未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有的学生虽说去了，但由于方法有偏(向)性，带着框框去搞调查研究的。因此，只调查“湘江风雷”干的坏事，未调查“湘江风雷”干了那些好事，其中多少革命群众无辜遭到政治迫害，所以调查后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对于反对派，对不同意见的人，不作阶级分析和具体分析，一概采取排斥和对立态度，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表现。

四、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摇摆性的恶劣作风还时常在我们脑子中作怪，特别是在胜利或者最困难的时候表现最突出。

诚然，“高司”犯的错误不能怪广大红卫兵战士，应该由我们“高司”负责人负责。

由于我们的思想没有改造好，私心杂念多，才犯这么严重错误的。这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我们很沉痛。

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高司”战士决不辜负您老人家的希望，有决心、有信心改正错误，接受新的斗争的考验。

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代表：詹先礼 黄绍贤 胡少奇 王吉贤 秦道纲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并广州军区党委：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我们在前段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错误地打击了“湘江风雷”和压制了“长沙工联”等革命造反派。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对这一错误又长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以致错上加错，越陷越深，不能自拔。造成了军民之间，两派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给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很大损失。这次来京汇报，经过总理和中央其他首长反复耐心教导，使我们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逐步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决心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毛主席说：“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我们对待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从一开始就是从右边介入的。我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来看待群众运动。认为“湖南省委是打不倒的。”耽心刚刚兴起的群众运动“会出现匈牙利事件。”因而在文化大革命初

期，做了许多错事，说了许多错话，支持了省委，压制了革命群众。

当我们担负起支左任务，一开始我们的大方向就错了。我们对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有反感，把“湘江风雷”这样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被取缔摧垮，抓了大批的人，把绝大多数支队长以上负责人关押起来。他们之中有的是运动初期被打成“黑鬼”的革命闯将，有的参加“湘江风雷”只几天，有的只有十几个人一个支队的支队长，这实质上是对革命群众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由于我们错误地把“湘江风雷”看成是反动组织，便在二月九日第二号通告中，提出了“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了“湘江风雷”的群众和曾经支持过“湘江风雷”的革命造反派，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批判斗争，严重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

我们既然对“湘江风雷”看法是错误的，对于与“湘江风雷”同观点的组织，自然也就看成了不好的组织，长期以来从思想感情上与他们抵触、对立、甚至总想把他们某些组织压倒、搞垮。省军区曾报请中央对三个群众组织加以取缔，未被中央批准，在全省范围内口头和文字宣布取缔和解散的群众组织×个。这样，就把广大的左派组织压了下去，把湖南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了下去。

压制左派，势必支持偏于保守和保守组织，因而在支左中认错了门、站错了队。我们所组织的“红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成的，所以它的大方向是错误的。

我们所犯错误，本来是有许多改正机会的，但是却长期没有改正过来，致使错误越陷越深，错上加错。

四月初，一方面，传达学习全军军级干部会议精神，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另一方面，曾受到压制的革命造反派于四月七日封闭《湖南日报》，起来公开抵制和批评我们的错误。这是我们改正错误的一次好机会。但是，我们对中央、军委这些重要的指示和决定没有很好学习和领会。传达军级干部会议精神抓得不紧，很不严肃，没有通过对中央、军委这些重要的指示、决定的学习和领会，检查支左工作的错误，重新识别左派，特别是没有审查对“湘江风雷”的处理问题。总认为自己支左的大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并不那么严重。因此，觉悟很迟，改正的决心不大。

由于坚持错误，引起了造反派对我们的严重不满，军民关系越来越紧张。在

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启示下，我们对错误有了一些认识。五月十二日我们向中央作了第三次检查报告。五月十四日，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了我们的报告，写了极为重要的五条指示，给我们改正错误指明了方向，是对我们伟大的关怀和爱护。但是由于我们对待革命造反派的态度和立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过来，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主席的批示作了错误的理解，认为“毛主席并没有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继续原谅和安慰自己，反过来则埋怨抵制我们错误的人，说造反派提出“一揪三打倒”大方向有问题，说有的人别有用心，想搞垮军队等等。这样一来，不仅没有坚决贯彻执行主席的指示，改正错误，相反却发展了错误。例如对“红联”没有决心动员其解散，对“工联”不仅没有坚决支持，相反继续给他们施加压力，甚至六月八日错误地发布了一个通令，点名批评了“工联”等革命造反组织，长保守派志气，灭造反派的威风，这是我们对造反派的真压制，假支持的一个总暴露。我们对站出来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章伯森同志不仅没有坚决支持，加以保护，相反对戚本禹同志肯定章伯森同志抱怀疑、抵触态度，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对经主席批示的报告中已经肯定的驻长部队支左领导小组，不仅没有加以维护，使之加强，相反却肆意地进行了改组，把在前段支左工作中做出的成绩的两个院校排斥在支左行列之外。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执行很不坚决，对毛泽东思想不忠诚，是最大最严重的政治错误。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有的群众组织执行了我们的一切错误决定，其责任完全在我们，各群众组织是没有责任的。

我们之所以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而且在长时间内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上加错，越陷越深，其根本原因是：

一、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在支左工作中很少带着问题学习主席著作，特别是对毛主席五月十四日的批示，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没有热情对待，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种极端错误的态度。因此，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在对待和处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是凭老经验，吃老本，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就事论事，看小节多，看大节少，讲小道理多，讲大道理少，

论小事小非多，讲大是大非少，以感情代替政策，颠倒了是非，颠倒了主流和支流，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往往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把坏人看得过多，甚至筑围墙、垒沙包、做铁门，门卫森严，如临大敌，说到底，就是害怕革命。在支左工作中，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也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只愿做群众的先生，不愿意当群众的学生，只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一分力量，不把自己同时看成是革命的对象，只强调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不强调相信和依靠群众大多数，只强调拥军，不强调爱民，只愿听顺耳之言，不顾听逆耳之言。在亿万群众参加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在前进中发生一些缺点错误，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对它看得过于严重，思想感情上有抵触，因而伤害了群众，造成了部队和群众的严重对立。

三、受黑“修养”的影响很深，在党委和部队内部，往往把组织原则置于政治原则之上。不把革命性放在首位，而是把组织纪律放在首位。不是强调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而是按自己的观点强调团结和统一。对于抵制错误路线的人特别强调纪律，对拥护错误路线的人则可放任自流。致使在党委内部或部队内部，少数人的正确意见不仅得不到支持和发扬，甚至还受到压制和打击，而错误思想，错误意见却得到支持和保护，致使错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四、领导姿态不高。省军区党委对支左工作的领导是不得力的，对于支持革命左派这样一项极其光荣伟大的任务，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重视不够，没有全力以赴，抓得不紧、屁股坐得很高，把许多精力花费在上层活动中，很少深入群众，很少调查研究，情况不明，被动应付，摇摆不定，措施很不得力，许多工作只是停留在会议上，不能落实。怕字当头，私心杂念很重，每到关键时刻，每遇重大问题，怕犯错误，怕担风险，不敢挺身而出，态度不明朗。对于所犯错误，不是高姿态的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及时纠正，而是怕丢面子，怕失威信，想改，决心又不大，羞羞答答，扭扭捏捏。一句话，我们领导姿态与我们所担负的支左任务极不相称。

我们所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当我们检查错误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伟

大的革命军队，湖南又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毛主席把湖南“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交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很好担负起来，对不起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委托，对不起湖南三千八百万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彻底地改正错误，决不含糊，决不动摇。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也坚决执行，不理解也要坚决执行，进一步提高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彻底改造世界观。坚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我们决心向山东省军区学习，诚恳地向群众作检讨，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大多数群众满意为止。我们坚决拥护总理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改组湖南军区的指示；拥护和支持四十七军领导湖南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坚决支持“长沙工联”、“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派，坚决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支持省委内站出来站出来的章伯森、梁春阳、华国锋、贾镛等革命领导干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二·四”批示，是根据我们所报的情况作出的，其责任完全在我们，因此，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收回“二·四”批示，给“湘江风雷”平反。撤消错误的“六·八”通令，通过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湖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尽最大的努力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当前，必须以武汉地区“七·二〇”事件作为鉴戒，加强思想工作，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努力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检查，如有不当，恳请指正。

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万疆！！

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湖南军区党委常委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另一来源说，此报告日期为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

1967.08.10； 中发 [67] 244 号

已阅，同意。

毛泽东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中央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查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敌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团结的阴谋；应该开展内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决不能打击报复，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积极地耐心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

群众起来革命，争取和团结受蒙蔽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湘江风雷”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八月十一日零时四十五分三十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总理、戚本禹接见湘江风雷方面代表。

总理：局势不能控制，你们很难解决。打电话回去，是按我们的方针，但底下不听，×××闹了一番。关于马坡岭问题、工程兵学院问题(指八月七日“工联”与“湘江风雷”在这里发生武斗)，原来反映的情况有点出入，不大。

谢若冰：到底谁有理？你所担心的内战已经起来了。

总理：两件事单独解决不难，如果连锁反应，发展下去，内战是可以设想的。对我们的方针过早宣布有反效果。事件情况有出入，要自我批评嘛！怎样控制局势？中心问题是让解放军站出来作支柱。这个不一致，分歧就大了。解放军出了赵永夫、王良太、陈再道，不过是极少数几个人，不能到处去揪。毛主席缔造的解放军有它的特点，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的光荣传统。平时是按“党团员好、劳模好、老工人听话好”这个规律办的。一月份接受了“三支”、“两军”任务，由于十几年没有作群众工作，没有经验，下到工厂、学校，不少党团员运动初期偏于保守，加上刘、邓的影响，多多少少有些错误，几乎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同志是干部，应该懂得解放军的这些特点，多向造反派作工作。对解放军在支左中的一般错误应该谅解。如果坚持错误，成为一个时期的方向路线错误，要抵制，批判，也要注意区别对待。湖南军区的错误，应由刘子云、崔琳负主要责任。龙书金过去打仗勇敢，五月份在广州作了检讨，后受别人影响，错过了改正的机会。昨天，林副主席说：“只有毛主席领导，才敢于发动这场大革命”。枪杆

子发生动摇，怎样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单靠你们没组织好、没训练好能行吗？解放军有四十年光荣传统，是打不垮的，现在美国要来，我们还有信心打败它。一些犯错误的老将，只要还有政治热情，还可能再战沙场，带你们去打仗，我可以保证的。不要承认了错误，还一定要打倒。戚本禹同志原来不认识龙书金，听说他很能打仗，现在犯了错误，都很同情，这是阶级感情。发动你们，就是要培养你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我们的确是帮助你们的。×××打电话是忠实的(×××：我们要求内部传达)但下面不能控制。作领导的，脑筋要冷静起来，敢闯好，但一定要学习。林副主席提出的三性，一定要学到。第一是革命性。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第二是科学性。极左就不好了。第三是组织纪律性。极少数坏人要清洗。如果把对解放军的基本信念动摇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让解放军受到冲击，内部涣散，那就更加危险。现在已经影响到这两个问题。四十七军的枪、他们看守的仓库，都去抢，他们这样怎能作好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呢？(谢若冰：我们打电话要求不抓不抢不打)但不能控制。

(总理念了一个关于抢军装的材料。)

一代表：已经查对落实了。是××抢的，××是流氓组织。

戚本禹：流氓要镇压。

一代表：××、×××都是流氓组织，长沙共有十多个。

总理：要依靠四十七军，个别错误，允许改正。两派都要支持。成立制止武斗指挥部，作为过渡。“工联”人多可多出代表。

一代表：投票是他们的担心。

总理：他们不在，我帮他们说几句话嘛。

一代表：“工联”另外成立一个抗暴指挥部，我建议共同搞，不要几个摊子。

叶卫东：估计八月十九日“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可能进攻长沙。

总理：共同搞的意见好，指挥部要四十七军作头子，好调动，将来转为人民武装指挥机关。

(其它代表介绍了“红艺会”戴利同志。)

总理：文工团员，你都敢于搞武斗。(笑)指挥部人员双方差不多，但也不要整整齐齐，“工联”单位多，可多一些。首先是造反派联合起来，“八·一九”进攻根本不在话下。还是文攻武卫，大家分工，帮助解放军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仓库。根

据北京的经验，调动时，由一派去，别的不去。一个组织保护一个工厂，别的就不去。

戴利：指挥部要加强，但“工联”不同意有些组织参加，说他们是社会组织。

总理：有个过渡，将来归口，可以说服。

谢若冰：组织内部矛盾比外部矛盾好解决。现在是大联合阶段，能否把工人组织合为一个组织。群众组织应该减少、集中，权力集中，才能恢复秩序，建立政权。现在这样下去会越打越大，文化大革命会夭折。

总理：不会夭折，可能曲折，全国是大好形势嘛！

一代表：每次打电话都说必须有无产阶级权威。但一部分人硬要走下去，一方面说服，一方面一小部分不专政不行。现在专政，打击面小，将来专政，打击面大。

总理：专政是对付敌人的。

谢若冰：湘派不是对中央，而是对×、×，个别对×有怀疑。联合有可能，在北京的，意见都一致，要联合制止内战。从长沙刚来北京的与我们交谈后都说我们“右”了。马坡岭问题与工程兵学院问题，要审查处理一下，谁是谁非，严厉批评一下。工程兵学院武斗，蔡爱卿在现场，但没指挥，现完全撇开不行，采取软禁。

戴利汇报了工程兵学院现场目睹的武斗情况。并说：七月十五日听了蔡爱卿的发言，我们发现有问题。现在蔡、段、萧、史都是软禁。

总理：工程兵学院武斗问题，可以单独解决。如果说工校武斗有预谋，那么马坡岭的误会更多，不要算老账，不要连在一起，要个别解决。往前看，促进自我批评，严于律己，宽于责人。下一步归口，要做基本功，厂里一派不压另一派，两派联合，推进大联合。基层不联合，上面联合不起来。

(一代表汇报长沙恢复“红旗军”时，喊了“红旗军一千个好一万个好”的口号。)

戚本禹：一千个好，一万个好，只有对毛主席才能这样说，对别人都不能这样说，怎能自己说自己？

(一代表汇报“红旗军”虽然吸收了一些非荣复转业军人，但领导核心还是复转业军人，顾虑不符合中央精神。)

总理：告诉商量一下，怎么迫不及待的钻出来了？

戚本禹：联络员找“红旗军”来京的人谈一谈。

叶卫东：湖南红旗军要求中央表态平反以后，本身可取消，参加别的组织。

戚本禹：“红旗军”的少数头头确实有问题，确与香港有联系。

(代表汇报了“红旗军”有报纸、有活动，与韩景平(蔡爱卿老婆)的关系。)

总理：电话讲早了，你们没料到，有反效果(指抓蔡游街)。

戴利：蔡提出“以武斗反武斗”、“杀到河西去”、“工厂可以停工，我负责”等等，我们觉得有问题。开始，我们对龙、刘、崔是区别对待的，后来，他讲龙的坏话，把斗争引向龙。

戚本禹：你态度好，认识到上当，我赞成。

(戴利汇报吴自立吹嘘自己，一有毛主席一九四五年的亲笔信，二反龙书金，三是贺龙打下来的，要平反。)

总理：吴是彭德怀的死党。一九四五年七大时，吴原是预选代表，后未当选，怀疑中央认为他是特务问题，主席关心红军干部，回信表示他不是特务问题。但他到一九六一年还要替彭德怀翻案。

戚本禹：他们可能有集团，一定有个大阴谋在里边，要查清楚。

总理：文攻武卫是指对保守的、被反动分子操纵的，联系两条路线的斗争而言，象对“百万雄师”。在左派内部之间不适用。

戚本禹：革命派之间应该联合作战，为何要攻呢？

戴利：建议成立长沙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民兵师或文攻武卫指挥部。

谢若冰：能否表态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外的武装组织不予承认？

总理：两个指挥部(指制止武斗指挥部和抗暴护厂指挥部)合成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其它的武装组织，要经过指挥部承认才算，游离的社会武装组织，要把枪支收回。本身也要清查一下。将来株洲、湘潭、衡阳都用这个办法。乱放枪的要缴了。

戚本禹：打死人要法办。

总理：这种乱，破坏阶级团结。

戚本禹：乱有阶级性。

总理：省军区由龙书金回去负责整理，岳衡线情况好了，军区开展内部“四大”，会揭发问题，你们不要去，军民界线还是要划清。

一代表：两件事，我们多作自我批评，但有一部分极左、过激的同志对立情

绪大。

总理：即使武斗几次，矛盾性质也不会变化，都是左派。两次都死了人，是误伤，打仗还误伤嘛！思想偏激可以教育，不教育、不帮助、不转变，矛盾才会转化。必须树立解放军的权威。

戚本禹：你们靠谁作支柱？这是大问题。抢郑波同志的车，他好说话，真是涵养不错。这个同志不容易，困难时支持你们。要求你们发通报查，一定要把抢的车追回来。(八月十五日，湘江风雷把车送还了，并表示歉意)

戚本禹：革命造反派一定要有新的作风。

总理：应该建立互相信任，对个别人有意见可以保留，但对整个组织要信任。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代表团谈话纪要

八月十二日晚九时二十分至十时二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姚文元、陈锡联、黄永胜、叶群等接见代表团

总理：我现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他细节回去由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商定。

这个文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八月七日已经批准了。(全场暴发出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并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随即逐条宣读《决定》，当读完第二条时)

总理：经多次研究，四十七军不仅能领导湖南的“三支”“两军”，也能组织筹备小组。章伯森、华国锋是经过考验的，特别是章伯森同志站出来较早。当然他们有缺点错误，但能自我批评。

(当读完第三条第一段时)

总理：开展大批判，要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中南的陶铸、王任重，湖南的王延春、张平化。要集中火力。

(当读到“警惕敌人……的阴谋”时)

总理：“湘江风雷”感到有这种情况的威胁，“工联”也同样感到这种威胁在面前，

要唤起停止内战，集中力量批判一小撮，抓革命促生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如果你们要分裂的话，敌人会利用。文攻武卫指的是对敌人，对一小撮挑拨者，不是造反派之间。

(当读完第三条第二段时)

总理：现在长沙的革命秩序还未建立起来，应该通过筹备小组的努力，促进大联合。

(当读完第三条第三段时)

总理：争取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最大限度的团结大多数。要推动他们觉醒起来，现在高司也有表示，这个工作，还要努力，有的军分区、人武部操纵他们，把枪发给他们，突出的是湘潭、常德、黔阳、益阳。“湘江风雷”、“工联”要去做工作，不要打击报复，要使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军区、军分区也要一分为二，也有好的。即使头头不好，下边也有好的，长沙军分区就有站出来嘛！

(当读完第四条第一段时)

总理：有些夺的枪不是落在有组织的人手里，而是散落在社会上，有的冒充你们，又没符号。抢军服，冒充解放军更不好。

(当总理宣读完后，大家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这个文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批准了，因有事，今天才宣布。关于“湘江风雷”问题，我们有责任，当然军区有自己的责任。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相信改组后的军区会更好的完成“三支”“两军”的任务。我们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中央文革的同志，除王力同志因负伤没有来外，其他同志都来了。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劳累，也勉强来了，我们建议她早退席。(大家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龙书金代表军区党委宣读完检讨后)

总理：刚才《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中已讲到“二·四批示”中央的责任了，你们建议收回“二·四批示”已不存在了。这句话不要了。是不是？叶卫东同志。(答：是)。

龙书金本人有一个检查，今天不读了，大家看一看，行不行？(众答：行)。

占先礼：中央的决定我们没意见。我们“高司”在“二·四”以前大方向是正确的，“二·四”以后犯了错误。我们建议我们的材料不发了，文字上再做些推敲！

总理：可以！××你把材料收回吧！

占先礼：总理说我们是受蒙蔽的。当时没说“二·四批示”是错误的，因此我们捍卫“二·四批示”是无罪的。说我们是受蒙蔽的，不是这样，我们从“八·一九”就造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叛徒王延春的材料也是我们调查的。我们很多话没说完，要求总理单独接见我们。

谢若冰：“高司”的这份检讨，我们还通不过。去年我和他一块到北京，那时我就发现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没时间我不多说了。

占先礼：希望给我们安排时间辩论！

刘秀英：我过去想当逃兵，不想搞革命了，想到新疆去。我错了，要打回老家去，接受批判，请革命造反派帮助我。我不是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要从零开始。

谢若冰：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必须做深刻检讨，你到底与陶铸、张平化是什么关系？我们有材料！

刘秀英：守着戚本禹同志的面，我要讲清与陶铸的关系。(造反派指责她)。

总理：你们问她嘛，让她讲！

刘秀英：我接受省委的任务，到湖大当过联络员，以后又与中央文革的周子明等同志联系，反映些情况，我也不知道与陶铸、张平化什么关系，……。请求中央对我做调查，我也不知道错在那里！（造反派又指责她）。

总理：她承认错了，愿意从零开始了嘛！她的个人问题，听听她的。你们是造反派嘛！（造反派：她是政治扒手！）她这么大小，你们怎么这样说呢？造反派应有造反派的气量！

占先礼同志，我问一问你，你们的检讨是八月八号，我提到“二·四批示”中央有责任是七月二十七号，我今天一正式宣布，你要把检讨收回！你们写了检讨，当时我们感到你们的态度还好，所以印发了。现在中央已承担责任了，你就收回了！你们不赞成散发给群众，我们收回，但你们的检讨书是白纸上写黑字交给中央的，这是不能收回的。

占先礼：我们认为给中央的检讨要在文字上好好搞搞。

戚本禹：你刚才讲到“二·四批示”的问题嘛！

占先礼：我们“高司”没有武工队，可以向总理保证。高司武工队员的自白是捏造的。我们要求中央首长对湖南问题进一步调查。

总理：刚才那个女同志(指刘秀英)的发言，的确很沉痛，她的错误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负，张平化负。人家从零做起了，不要斤斤计较，造反派要有造反派的气量，要高姿态，应该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对受蒙蔽的应该同情嘛！

总理对“高司”一个要发言的说：“今天结束会，你给联络员讲，把全文记下来。万达同志的检讨，发给你们，在这里不念了。”

(会场不安静，两派互相指责。大家鼓掌，总理等首长走出会场)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湖南“工联”代表谈话纪要

八月十三日晚十时半至十四日二时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客室接见“工联”方面代表。

总理：今天想和你们谈点政治(策)上的问题，不要老是纠缠在具体问题上，老是钻牛角。名单上的同志都来了吗？

联络员：来了。

胡勇：周国祥同志来了。

周：报告总理，是我。

总理：你是“工联”的常委，是干部？还是工人？

周：干部，工人出身。

总理：多少年工龄？

周：十五岁学徒，十八年工龄了。后来提拔当干部的。

总理：马坡岭的事情你了解？

周：我知道(谈马坡岭情况，略)

总理：好了。其它同志不是说也来了吗？

周：来了。在门外。

总理：请他们进来，先在房子里休息，我等一下去看他们。

周：报告总理，当前长沙社会秩序很乱，原来说武装我们“工联”，直到现在四十七军也没有发一枪一弹给我们，我要求总理给批一下。

总理：你这个人，一见面就是枪，枪。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怎么水平还没有提高多少呢？

我说过，我们是要武装工人同志的，但是你们双方有分歧，发了枪，互相打起来，就不好了。我说过几次了，既然双方大方向一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共同奋斗，就要团结起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那不可能。我要求你们求大同，存小异。我在你们之间总是想把你们的共同点找出来，而不是把矛盾挑出来。昨天会上，你们表现不良好，为“湘江风雷”说了几句，你们鼓掌就不热烈。

对待刘秀英那样的人，你们在昨天的会上，表现得不够好。你们不欢迎她，那一边(指“高司”)也反感她，这样就会长期对立。如果他发言之后，你们欢迎她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工联”、“湘江风雷”不但不歧视她，不打她，反而保护她，帮助教育她，就好了。你们在北京开了这样长时间的会，水平提得不高啊！

昨天崔琳一出来就打，这是谁搞的？(几位代表汇报了当时情况)

总理：他们这样搞不对。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风格比你们高。造反派要高姿态。昨天江西一千多人开大会，人家根本没有动手。他们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不要只想着捉人打人。捉人，打人有什么本事？！要搞批判才能触及灵魂。

尚春仁同志是那一位？

尚：报告总理，是我。

总理：你是湖南省委的甚么处长？

尚：省监委的处长。

总理：省委里面有几个组织？

尚：造反派组织是“永向东”，六百七十多人。“红联”派的是“机关筹委”。

总理：王家根同志是那一位？来了吗？

王：报告总理，来了。

总理：那个机关，担任什么职务？

王：省农垦局财务处长。

总理：过去在那里工作？

王：部队里转业的，原来在政治干校。

总理：你是“省直红勤站”的负责人吗？你们红勤站有多少人？包括那些单位？

王：“省直红勤站”是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起来的，共有二万多人。

总理：李劲祥同志来了吗？

李：报告总理，来了。

总理：噢，你是湖南日报的？北方人吗？

李：是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的，河北人。

总理：你在报社当编辑吗？那个大学毕业的？

李：工作职务是编辑。没有上过大学。

黄振东：他参加工作时只有十二、三岁，当时只有小学文化。

总理：噢！小学文化当编辑，不错嘛！我说了嘛，当记者、编辑不一定要大学毕业嘛！要有实际工作经验。你那一年调到报社工作的？

李：六三年。

黄振东：记错了，是六四年春。

总理：原来干什么工作。

李：在基层，大部分时间是做农村工作。

总理：你当编辑，要多动脑子，写点好文章出来。我就是要讲这个事。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斗争水平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走马灯，水平没有提高还行吗？要提高斗争水平，现在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搞什么喷气式，挂牌子，搞逼供信，这不解决问题，主席很反对搞这些东西。斗党内走资派要靠材料，要搞批判文章，要挖内心世界。象戚本禹同志那样的文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还有地方报纸写了不少好文章。在中南海斗刘少奇、邓小平那样的照片，不要拿出去，主要靠材料，文章才能把他批倒批臭。

黄振东：报告总理，《湖南日报》十一号又复刊了。

总理：又复刊了？好！要把报纸办好。

黄：报纸复刊后搞大批判，请示总理可不可以点张平化、王延春和龙、刘、

崔的名？

李劲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可不可以在《湖南日报》上面刊登？

总理：湖南日报不是群众小报。在湖南日报上点名要按十六条办事。点名批判张平化、王延春的问题我请示毛主席之后再专门通知你们。

中央的决定不要在《湖南日报》上登。

李劲祥：请总理指示我们怎么把《湖南日报》办好？

总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红旗，要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在革命的大联合中写出一些好文章来，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积极的贡献。

湖南有刘少奇，彭德怀是湘潭的，黄克诚是永兴的，陶铸是祁阳的。(问黄永胜)

黄永胜：是的。刘少奇是宁乡，彭德怀是湘潭的。

总理：是嘛！这些人在湖南有不少活动，要搞材料把他们批臭。

你们新闻兵有多少人呀？

李劲祥：一百七十多人。

总理：什么观点？

黄振东：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总理：我看也不一定都是一个观点，实际也不可能都一样。要吸收“工联”、“湘江风雷”这两派的同志参加办报。

在报纸上要宣传人民解放军，问题方面尽量少说。吴自立、蔡爱卿这些野心家就是想往解放军脸上抹黑，他想夺军权，说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他想夺军权，那是办不到的。军权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调一个营的解放军都要主席和我们的副统帅批准。蔡爱卿是想夺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人很坏的。五九年反右倾时，他公开说他是彭派，说别人是毛派，他是个大坏蛋、大阴谋家、野心家。吴自立写小说，搞电影公开为彭德怀翻案。这些人掌握了兵权、政权还行吗？不行，一天也不行，一个小时也不行。要对这些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政法方面来人吗？

符紫如：报告总理，来了。

总理：噢！你是符紫如同志。公安厅的吗？

符：是公安厅的。

总理：公安部门是什么组织？有多少人？

符：政法联络站，有四百七十多人。最近保守组织“省公检法”、“市政法公社”杀出来一些。保字号的大多逃跑了。

总理：你可要注意啊！不要把劳改犯也吸收进来参加造反组织啊！（笑）

符：那不会，那不会。

总理：你要注意，“公检法”的组织垮台后，他们转入暗地活动了。政法部门杀出来的，要对他们保持警惕。他们有传统思想，罗瑞卿传下的那一套在政法部门根子很深。原来彭真管政法，是保卫局的观点，他把苏联特务，蒋介石特务那套办法学来，又加上福尔摩斯那一套。十几年来就是搞这一套。你们公安系统必须过好斗批改这一关。斗当权派容易，要彻底砸烂公、检、法这个旧摊子，建立一套新东西，很不容易，你们要在斗、批、改方面下功夫，搞出成绩来，不然又是老一套。

符：好！我们一定遵照总理指示办。

(×××反映谢若冰给长沙打电话的情况，略)

总理：电话稿我看了，和我讲话精神没有出入。至于下边怎么说，那是下边的事，她管不了。

刘友桂：“首都红代会”的同学下去分两派观点，到处演说，使下面两派闹对立。

总理：要叫他们回来。

王家根：这里有蔡爱卿的一个讲话，请总理看一看。

总理：(看传单)这简直是反动的。本来昨天我想宣布他的问题，戚本禹同志把蔡爱卿的档案都拿来了，因为大会开的不理想，没有宣布了。

蔡爱卿很坏，原来在山西当副司令员，公开支持彭德怀反毛主席，退休回湖南后，仍然搞活动。要叫他暴露一下子，等群众起来反他的时候就好办了。我们再法办他。

(周国祥介绍湖南××组织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央的情况。)

总理：那他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王晓同志来了吗？

王晓：报告总理，来了。

总理：湖大的情况怎么样？

(王晓介绍湖大情况。)

总理：你们造反派有多少人？

王晓：二百多人。其他人大都回家了。学生二千多人也回家了，怕回来挨打。

总理：要做好争取教育工作。

黄子林同志来了吗？

黄子林：到了。

总理：你是省委的？干什么工作？什么组织？

黄：省委“永向东”。我是档案局的干部。

总理：同尚春仁同志一起的吗？

黄：是一个造反组织。

总理：多少人？

黄：六百七十多人。

胡勇：关于长沙局势问题(略)

总理：你们要同部队商量，配合起来。

胡：四十七军没有发枪给我们。

总理：产业工人是要武装的，机关里的也武装一下，双方的造反派都要武装，把“文攻武卫”拿过来放在省革筹小组领导之下，四十七军参加。有任务时，由指挥部派任务。“长沙工人”的同志也武装一下，分给他任务，保卫工厂。学校里也可以。我们搞有组织的。这样社会上没有组织的，游离分子掌握的枪就可以收回来。

你们先组织起来，编上番号，四十七军派同志去帮助训练。

但是一定要搞好大联合。不然一发枪枝，自己打内战就麻烦了。我先同你们说好，要保证不打内战，发了枪，要四十七军派人指挥。

李劲祥：听电话汇报，目前长沙很乱。

总理：你们报社，还有你们机关的，省委“永向东”尚春仁同志，还有王家根同志，王晓同志，还有公安系统的符紫如同志，你们要组织一批力量搞调查。长沙这样乱，背后有人出主意，除了蔡爱卿，吴自立还有×××、×××、×××、×××、×××，

你们要注意。

符紫如：×××有一个支部。

总理：组织干部、红卫兵小将去调查嘛！你们对形势要有一个估计；保守势力并不甘心，还要待机反攻，他等你们造反派内部先打，再反扑。

现在“极左派”大反黎、华、章。将来筹备小组成员一公布，还要大反特反。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但是人家刚刚上任，就要打倒，这是什么问题？我担心你们从北京回去，一下车就会被抓走。这是什么问题？你们想一想？

你们“工联”，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做小动作。在处理兄弟组织关系问题上要严以待己，宽以待人。有几次我说了话，你们把我的话顶回来。你们同“湘江风雷”同志的争论是观点之争，不是路线之争嘛，你们不要一听说人家社会组织就反感。这会犯错误的。人家有缺点、错误，可以改嘛。

周国祥同志，听说“工联”派你搞指挥部工作？

周：是的。

总理：要搞指挥部，姿态就要高，不要搞宗派。你是工人嘛！

周：工人出身的干部。

总理：今后，要保证，不管那一派，都不能冲击解放军。这样部队才能保证开展工作。要两派都来保卫，不要一派保，一派冲，结果打内战。

胡勇：军区怎么办？

总理：还叫龙书金同志回去，在军区内搞“四大”，好好检讨。军区要在省革筹小组领导之下。革筹小组由黎原同志负责。

黄永胜：省军区就在省革筹小组领导之下吧。

总理：关于走什么道路。有人说北京道路，有人说上海道路，青海道路，我看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各地方可以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创造，要有志气。

我讲了多少次，总是希望你们两派搞好团结。你们两边都开个生活会。

中央关于“湘江风雷”问题表了态，这是个大事，他们在昨天连态都不表一个，×××只晓得同刘秀英吵。革命派嘛，要气量大。

秘书：伯达同志请你过去讲话。

总理：他是常委嘛，他说了就行了。还非要我讲几句吗？

秘书：伯达同志请你去讲一下。

总理：我在这里还要讲一下，请他们等一会。

总理：占先礼在昨天会场上表现很不好。关于“二·四批示”，主席的意思是中央多担负责任，不要让地方为难。他一见中央决定，就把自己的错误也向中央身上推，这个态度不好。

对受蒙蔽的群众，要注意争取，不要打击报复。跑了的，也不要扣工资，主席最不同意这个办法。要用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政策，教育他们，帮助他们。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湖南代表团时的讲话

八月十五日晚十一时五十分至十六日三时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湖南代表团及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在京的有关群众的谈话记录。

周总理讲话

同志们：

关于湖南问题，在大前天我们已经结束了。不过，后来跟两方面的同志单独会谈、分别会谈的时候，还有一两千湖南来的同志，因此，我们今天补开这个会议，再见面一次。

既然有这么多同志来了，我想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问你们好！

因为许多同志已经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最近两三天分别跟你们“工联”和“湘江风雷”的两部分同志谈了话。我们还想对《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作一点解释。这个解释也是根据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对湖南问题的决定上提出来的。

我现在还是采用分段把中央决定原文念一下子，然后对每一段再加以某些解释。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共分四部分。

(一)

我先念第一部分：

“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这个书面检讨曾经在会上宣读过。现在省军区党委常委又作了一些修改，明天会印发给你们。

“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的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中央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查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这一段里面包含很多问题，我进一步作些解释。

所谓军区党委常委的书面检讨，刚才说了，修改以后，明天会印发给你们。你们如果来不及在这里讨论，当然可以回到湖南讨论。如果有意见，还可以向湖南省军区提出。就是说，应该允许广大革命群众对军区过去所犯错误提出自己的意见，用书面写大字报、小字报等送给军区，也可以开会批判，也可以采取背靠背的办法批评。但不管怎样，过去所犯错误，在省军区党委常委检讨以后，在中央指出这些错误以后，他们是决心改正的。而且，下一段我们还决定采取一些组织措施。所以，省军区党委会的责任，哪一个同志多一些，少一些，我们经过事实调查，同志们检举，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点名的这两位同志，是负更多的责任。但并不是说，龙书金同志就不负一些责任。他自己检讨里面也说了，他曾经在广州开会的时候，通知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开会讨论，承认自己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中央当时得到广州大军区、湖南省军区两个检查报告，都认为是检讨的比较好，所以曾有五点指示，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起草的，是鼓励他们改正错误，指出他们应该怎么样认识错误。可惜，湖南省军区后来又没有进一步检查自己的

错误，反而又动摇了。这就是说，湖南省军区有承认错误的认识，但是经过内部一些不同的意见一争论，又动摇了。这样，使错误揭发的过程就比较晚。在龙书金同志自己的检查上，说了这个问题。总之一句话，这个事情是过去了，是可以允许批评，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往前看。对省军区党委常委的问题，当时我们指出，除了军区负责外，这个错误还影响到中央，因为根据省军区二月三日的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中央也批准了，匆匆忙忙发出了“二·四批示”。这个“二·四批示”，是对省军区犯错误有影响的。这个批示。在湖南参加斗争的同志都晓得，是这样批的：“湖南军区对‘红旗军’、‘湘江风雷’的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中央接受了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估计，说应该对头目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中央要负责任的。虽然当时“湘江风雷”因为是人数发展比较多的跨行业的革命组织，在发展中免不了混进一些、也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怎么纯，出现了一些错误缺点，这个问题我们跟这次来京代表叶卫东、张楚梗、谢若冰等同志谈了一下，他们也承认这个情况。但我们应该说这只是一支支流、细节，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还是革命的。把这个组织的头头采取了专政措施，就等于说这个组织是非法的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我们用毛主席严于律己的精神，我们得到教训，中央没有得到自己的调查，就匆匆忙忙根据军区一面之词发出了“二·四批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我们根据毛主席的精神，我们不把这个责任推给军区，应该把这个责任分担。这是毛主席的解决问题、纠正错误的一向的精神，一向的态度。我们希望，军区也好，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也好，群众组织、尤其是左派组织，应该学习这精神，严于律己，上级多负责任。确实是从上面下去的。“湘江风雷”的问题，捕那么多人，当然责任不能全归省军区，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不是说中央负起主要责任，省军区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呢？应该指出，报告是由省军区来的，事实材料是由省军区供给的(当然另外的一些报道也有这方面的消息)，虽然中央“二·四批示”有一点笼统，但省军区拿这个笼统的批示，就把它扩大了，就好象整个“湘江风雷”是反革命组织，不仅解散“湘江风雷”及其所属基层组织，而且逮捕扩大化了，不仅逮捕头头，逮捕到底下很小的单位，十多个人的一个支队的头头也捕了，刚加入十几天的也捕了，不仅如此，甚至于

对与“湘江风雷”同观点的实行了叫“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也落入打击面。所以，压制、打击面就更宽了。这些责任，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恐怕要负更多的责任。

另一个问题，批示不是说了吗，有“红旗军”嘛。“红旗军”的问题比“湘江风雷”要复杂。因为“湘江风雷”仅仅是属于湖南的组织，负责人也来过北京，比较清楚一些。而“红旗军”比较复杂。在全国来说，是荣复转退一个跨行业的全国性组织，从这里往外地发展。这个组织，在去年十一月份，林副主席批的对南京军区的一个批示上就指出了：荣复转退军人不应该单独成立、也不应该成立跨行业组织，而应该参加所在生产单位、工作单位的战斗组织。不然，除解放军外，民兵系统外，还有另外一个军，全国还有另外一个军事组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批示。因此，我们就通报了全国军事部门，转告各群众组织。但是，当时荣复转退的代表在北京不大愿意接受这种意见，到中南海请愿。十二月份我见了他们的代表三、四百人，把林副主席的批示、主席批准了转告他们，建议他们不要成立这种组织，还是按照自己所在工作岗位分别参加自己本单位的战斗组织。当时他们同意了。但他们要搞全国联合。当时我说，全国不许有这种联合。可以根据大、中城市的情况，每个城市设一个联络站，由民政部门、动员武装部门负责那里的荣复转退的登记工作，一旦有事就动用，如果有困难，就帮助解决。当然这里也是一分为二，好人多，不服从中央决定的是少数。当时他们开了一个大会，借了军用卡车，在北京游行。有人带头，有三辆卡车一直冲进中南海西北门。有军队说服了他们，他们退出去了。对这种行动，由于北京的舆论不同情，他们就回到各地了，荣复转退的名义也少了。有的实行中央决定，参加到所在各单位的战斗组织里面去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改换了名称，其中就有一个叫“红旗军”的。这个组织，总部在北京，是由几个坏头子操纵的，在北京搞打砸抢，甚至在大连闹事，后来我们发现了这几个人，把头头捕起来了。他们夺我们的枪枝。我们搞政治攻势，谈话后，他们放下了武器。他们跟香港的特务有关系。他们在部门中、机关中有联系的。当时有的机关部门把他们扭送到专政机关，我们还是把人放了。因为只惩办几个头子，对受蒙蔽的群众我们没有追究。在大连也把坏头子捉了。哈尔滨一月份由造反派夺权了。他们改了名义，叫“后备军”，欺骗群众，勾结保守组织，搞反夺权。因为革命群众和解放军识破了，把他们瓦解了，群众觉悟过

来了。同样，他们在贵州也有人煽动革命群众来反对贵州革命委员会。有一个著名的头子叫李××，在北京我们也把他逮捕了。在浙江，也叫“红旗军”，也是跨行业的组织，我们说服了浙江造反派的同志，“红旗军”在浙江不合法。下属组织归口，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下，确实我们对湖南的“红旗军”头头也是跟其他地方“红旗军”头头同样看待的。据现在调查，据“湘江风雷”的同志说，还有其他革命组织的同志说，“红旗军”的下层还是好的，有的工厂里还是好的战斗组织。但他们的头头现在是不是也是好的？不是跟别的地方的“红旗军”毫无一点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央还要作一番调查。为什么？因为“红旗军”的关系不象“湘江风雷”，它的头头关系复杂。当时“红旗军”的头头，跟在湖南退休的不满的军人蔡爱卿有联系。他在军队里总不想做副职，五十多岁了，一定要做正职，掌权，甚至不满意分配他的工作，始终说怪话。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一九五九年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前后，公开站在彭德怀一边，反对我们的毛主席，他公开说他是彭派。别人是毛派，要把解放军分成两派，他这样狂妄已极！另外，他的医生周潜川，完全是用骗人的医疗办法，骗钱、骗地位，窃取情报。而蔡爱卿同周潜川打得火热，密切来往，最后成了儿女亲家。这样一个人在军队里面是一个败类。他不满意在山西当副司令员，闹退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军区让他退休了，住在长沙。他在长沙搞了很多地下的、不公开的活动。“红旗军”成立时，他的妻子韩景平，开始时是作“红旗军”的宣传部长，后来表面上辞职了。她这个辞职是不是真的还得调查。为什么？因为蔡爱卿在最近几个月(可能以前就是)跟另一个彭德怀的死党吴自立来往密切。吴自立原是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九年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以后，他仍然出来替彭德怀说话，以编写革命斗争史，编电影《怒潮》为名，明目张胆的宣传彭德怀。中央认为，吴自立是犯严重错误，甚至于是不能信任的，而蔡爱卿跟他来往密切。最近，他骗了“青年近卫军”小将，把他送到北京来了，“湘江风雷”把他逮捕起来了。蔡爱卿有一种暗中活动，据我们知道，蔡、吴他们在长沙的活动，还不止此。所以，“红旗军”的领导究竟是否还有蔡、吴党羽？当然我们还要作些调查，就是文件上所说的要调查清楚。我们希望，将要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造反派“工联”、“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等都帮助我们调查、弄清情况。至于原来“红旗军”下属各组织，毫无疑问，在工厂、机关、学校里，是革命组织，应该承认，过去取缔的，应该恢

复，跟“湘江风雷”一样。唯有“红旗军”这个名义，和现在的首脑，希望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各群众组织和中央调查清楚以后再作决定。这个问题，跟同志们说清楚。

另外，在长沙有几位退休军人和老干部，当然应该一分为二，不少是好的，但有个别做这种活动的值得我们革命小将们注意。因为他们会搞这一套。就在七月中旬谈判的时候，蔡爱卿还在革命群众组织中放毒，比如，他说：现在是武斗的时候了，要拿武装杀到河西(湘江以西)去，解放大湖南。还说工人生产可以停止，他可以负责，对毛主席负责。他说可以夺军权。这种说法，可以说原形毕露，被小将们识破了。但是听了他的话的识破了，没有听这些话的听不进去。所以后来造反派把他拉去游街了。这仅仅是一种行动，还应该把他们的底子搞清楚，他的活动内幕。根子调查清楚，这就更有利于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健康的发展。至于有人问：“二·四批示”以前，有没有拿中央等四个机关打过这么一个电话指出“红旗军”、“红导弹”问题。中央没有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如果说“红旗军”的问题，中央在一月确实说过“红旗军”这个组织是反动的。在一月二十二号中央常委和文革共同商量后，在人民大会堂，由我代表讲过一次话，讲了“红旗军”、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名字。四个单位讲湖南“红旗军”的问题，没有这个文件。是不是打电话说过？我们没有直接打过这样的电话。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委托黎原同志，请回到湖南继续调查。

因此，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把问题摆出来，跟大家说清楚了。所以，我们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查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中央有了错误，尽管有些客观原因，但我们总是把主观责任担起来了。这是毛主席的精神。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二)

“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这一段是组织措施，中央决定改组织南省军区，加强湖南省军区，调一些同志出来，加强一些同志进去。

在这里，我们要提一声的，龙书金同志在这次省军区犯的错误中，他是司令

员，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不过，应该说这个同志在广州大军区讨论时，认识了一些错误，但后来又一度动摇了。这个同志经过长期的战争考验是能够打仗的，是一个能够打仗的指挥员，这一点是得到我们伟大的统帅和副统帅信任的。同时在支左工作中，刘子云、崔琳同志负更多的实际的责任。这一点，我们昨天分别跟造反派谈话时，他们也承认这个情形。因此，处理上分别对待，根据我们伟大领袖的意见，还是把龙书金同志留在湖南省军区，将来在省军区内部，比方说在军区机关中司、政、后各部，他要负责的认真整顿，首先在一定的时机开展军区的“四大”，把湖南军区、军分区改造好，在这里面立新功。我曾经跟湖南军区的造反派孙素洁和张弘强同志甚至于一部分战士讲了。战士离开部队到北京来，他们的造反热情，我们是理解的，是同情的。同时也应该指出，这种方法是不能提倡的。你们想一想，军区不仅担负着“三支”“两军”的任务，还担负着保卫国防的战备的任务，全国都是如此，尤其是湖南是前线的近后方，一旦需要，随时就要动用的。所以我们的军队不能自由行动，必须要请假。上次内蒙也是自由行动来了一些，我们一方面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另一方面批评他们的这种行动。这次湖南来了二十多位战士，他们的造反精神，我们是同情的，但是不应当提倡这种方法，应当通过军区内部的“四大”来解决。

军区内部的“四大”应该由军区内部进行，外面的群众组织的意见，可以采取大字报、小字报、写信等适当方法向军队提出，由他们自己进行“四大”，不适合于军队内部和地方相互串连。因为军队有本身的任务，机关工作停几小时当然不对，但是还可以停，军队就不行，他们要随时备战，要保持通讯联络，一日不可中断；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亲手缔造和培养起来的一支战无不胜的、举世无双的革命工农子弟兵，他不仅是有很好的训练，主要是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既有物质的力量，更有精神力量来领导，这样的一支军队才能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支柱。在去年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党政各级领导机关大多数都瘫痪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决定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从省以下委托给军队一元化，这是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最受人民尊敬的。当然我们伟大领袖提出三相信三依靠，首先是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如果文化大革命没有广大群众的拥护，那当然不能进行。但是，更重要的是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因为这是由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有组织的、讲纪律的、有很高的阶级觉悟的

一个战斗部队，随时可以动用，有这个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三是相信和依靠大多数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干部也是一分为二，大多数是好的，要经过教育。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清楚，总的要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但总要通过有生力量，人，广大人民群众，还要有解放军来保卫，当然也要干部逐步觉悟起来，积极参加。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希望今天在座的湖南的同志们想一想这个问题，对人民解放军要有一个切实的认识，要给予充分的信任。不要因为出了几个坏人，如青海的赵永夫，反革命分子，假借中央名义，欺骗了广大指战员，残杀了我们一些革命小将，也就是这么一个人嘛！内蒙就是一个军区的二级部长（？未记清）打死一个革命学生，有那么几个两面派欺骗中央，虽然时间拖的长一点，内蒙的问题也解决了。甚至于后来又出现了陈再道。也就是这样几个人，这些人只要一旦被揭露，还是动摇不了我们伟大领袖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的。陈再道这个人没有什么威信，在红军里面就是以打败仗出名的，一旦被揭穿以后，他就只好乖乖地来北京，整个部队也不听他的了。所以，这跟地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小撮走资派不同，地方上的问题，你们小将斗争了很久还不能解决嘛！对于地方与解放军，要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估计。解放军的确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林副统帅提倡的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熟读毛主席语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等，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几十年的传统下来的，特别是七、八年来在林彪副帅直接指挥下，更加强了。所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才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引起我们的最高统帅和林副统帅的信任，敢于放手。当然还要看你是否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执行就要批评，就改正，不象地方领导干部顽抗。

同时，我们也要说明，因为解放军在胜利以后，在战场的时候只有抗美援朝、福建前线、中印边境打过一些仗，一般是处在和平环境里面，接触群众比较少了一些，所以这次新的出来跟群众接触，搞“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比较容易一些，因为发动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他们可以自己动手帮助农民搞生产，可以以身作则带头干，唯独支左不太容易弄得清楚，容易拿军队的一套办事，好象党团员听话，老同志、模范都是比较好的，而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老的有保守思想，敢闯、敢干、敢于起来批评的，是年青人。新生力量总是有点粗糙，但是它是可喜的力

量，是有生命力的力量。所以，我们军队支左犯一点误，就不能完全避免，我们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帮助他。我们只要举这样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我们的解放军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在文化革命初期，发生武斗，发生了一些需要保卫的事情。拿北京来说，一千二百万小将来北京等待毛主席接见，靠什么来组织呢？靠解放军。同时有三百万小将在北京，生活、活动很有秩序，走过天安门甚至毛主席乘车巡视的时候很有秩序，这些都证明我们的解放军不仅是战斗队，而且是工作队，它能够把大家组织好。更重要的是制止武斗的时候，解放军都是徒手去劝阻的，我们规定的“四不”(不动气、不动嘴、不动手、不开枪)，解放军确实这样做了，并且不带武器去，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全国不是以万计，而是数以几十万计的受了伤，挨了打，挨骂就不用说了，当然气会有一些，但是把毛主席语录一读。就没有什么气了。你们想想，我们的工农子弟兵经过毛泽东思想教育，能够这样爱护群众，受了伤而无怨言，世界上有这样的军队没有？我们可以肯定的回答：举世无双。这样的军队，可以肯定，任何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我们有力量可以把它全部消灭。我们没有一个省没有冲击过军队，没有一个省没有遇到军队去劝架而不挨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开枪，甚至很少还手，这就说明军队的情况不能和地方一样看待。

因此，我们对湖南军区改组采取区别对待，责成军区要在适当的时候开展军队的机关的“四大”，联系到检查军分区、人武部；同时派野战军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同志，还有他的助手郑波同志以及整个队伍来支援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是得到各种群众组织的欢迎的，我们现在正在部署这个工作，现在就需要你们信任他们，支持他们，来支持你们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真正把湖南的革命搞彻底。

现在，有一种形势分析是不对的，说武汉出了陈再道，现在全国的形势是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前夕。全国都要实行反革命复辟呀！这种估计完全是悲观的、右倾的思想，是机会主义的。我们说全国形势很好，陈再道的问题一暴露，武汉的问题解决得很好了嘛！“百万雄师”一下子就没有那么神气了，革命造反派“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都起来了，形势马上改了嘛！几十万人的游行得到武汉三镇广大群众的欢迎。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反正解决了。河南的问题，军区错误的领导，我们在北京开会，把他们撤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解决湖南的问题。

但是有人错误的估计，既然湖北出了个陈再道，大概中南各省都有陈再道。这种税法是错误的，毫无事实根据，不实事求是。就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或个别严重错误的，军队跟地方性质不同，不仅湖南如此，广东、广西也是如此，也要作具体分析。希望你们回去好好作宣传，不能这样看问题，形势是大好，问题暴露出来了，就更好解决了，毛泽东思想挂帅了。所以我们希望你们对新的改组的省军区、新的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给予信任，我们现在仅仅提了三个人，黎原同志，还提了两位亮相的干部，这两位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比较早的，当然还有其他，我们也议定了一些，“湘江风雷”、“工联”方面，还有军队方面，准备在今天大会以后，明天还开小会，作一些具体工作的部署，希望你们对新调进去的军队给予支持，对新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全体成员给予支持，可以不可以呀？(全场群众齐答：可以！)湖南是我们毛主席的故乡，希望你们真正把革命搞得更好。

(三)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午的工农业生产任务。”

这一段是对各革命群众组织讲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即将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之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指引下来团结，不是无原则的、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团结，否则，那就背道而驰，不可能团结。只要你们承认领导，受毛泽东思想的指引，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那就有团结的基础了，就有共同的方向了，就能够抓住共同的斗争目标，就能够求大同了。至于小异，有些个别问题的不同观点，那是可以存在的，人的思想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都是一样的看法，可以争论嘛！争论不解决，可以保留，以后再争论。但是可以朝着共同的大方向前进。这个大方向就是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首先是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从戚本禹同志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起到今天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大批判的文章很值得读，不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和《红旗》杂志社论的批判文章，地方上特别推荐上海《文汇报》《中国“议会迷”的破产》和《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了，也就是引导各地学习这样的批判。《湖南日报》不是复刊了吗？希望你们写湖南的批判性文章。刘少奇在一九六一年到湖南蹲点，也放了一些毒，什么“三自一包”，他是同意“三自一包”的，也同意包产到户，这种思想，联系到你们中南区陶铸、王任重，联系到你们本省的张平化、王延春，就足够你们批判的了。批判这些走资派，这就是批判的大方向，阐明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成绩、伟大力量，同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希望你们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一定要回厂、回校、回机关搞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促工作，这样来保证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革命既然前进了，丰收了，生产也应该丰收，湖南今年农业丰收，要继续争取秋冬作物的丰收。

“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敌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团结的阴谋；应该开展内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这一部分是讲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你们面临的问题，你们自己提出来了，叫做“内战”，有“内战”的危险。领导人根据出现的事实，提出了警惕，但是，是不是各革命群众组织所有的群众都了解了呢？没有。希望你们回去，不论属“湘江风雷”或属“工联”的观点的，大家都要了解这个问题，不应当有“内战”嘛！把力量消耗了嘛！你们有一部分武装，自己彼此对打，结果就把力量消耗了，首先是给敌人钻空子，长沙、株洲、湘潭、郴州、岳州等地还有你们的敌人，过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分子，还有钻到城市里面来的地富反坏分子，他们就会来挑拨离间，看到我们两个组织互不团结，他们就要来挑拨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满意地看到你们昨天在北京开了两派的团结大会，虽然我们没有人参加，听你们两派都说开得很好。我们现在高兴地庆贺你们。希望你们把这种精神带回到长沙去，到长沙也开这样的团结大会，在全省有机会也开这样的团结大会。但是，首先应该注意要内部整风，因为内部整风是最好的团结的基础，双方整风，加强自我批评，能够开门整风，还可以欢迎对方的批评，自己多批评自己，相互有利于团结，这是毛主席的整风的方法。希望你们学习毛主席在二十五年前所提倡的整风，一九四二年文艺座谈会开始提倡整风，对我党取

得全国胜利起了决定的作用，在思想上起决定作用，拿毛泽东思想把高级干部绝大多数思想统一起来了。如果你们都采取整风的办法，对相互团结、本身的健康发展都有极大的好处，也可以克服当前长沙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要承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要承认人民解放军的支柱的保卫力量，才不至于让保守派或坏人夺解放军手里的枪，如果解放军手里都没有枪，又怎么保卫？加强“三性”，首先，必须是革命性，同时“三性”都有。大方向，大批判，实现大联合，湖南有了这样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总要过渡到革命的“三结合”，这就要看全省的工作做的条件成熟了，才能实现。

“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决不能打击报复，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积极地、耐心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争取和团结受蒙蔽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同志们会懂得，其他的群众组织也有过去曾经是革命造反派，在文化革命初期也曾经参加过造反活动，不能把现在的“高司”看成过去的铁板一块，而且“高司”本身也有群众，尤其是在学校里面，高等院校中“高司”的人数就占不少；在地方上还有不少群众组织受了蒙蔽，尤其是过去受省军区、后来受军分区、人武部的蒙蔽，现在还没有完全觉悟，现在就需要由现在开会的“高司”的同志也要去做工作，教育他们不要再受蒙蔽了，不要再对抗了。所以，对只要有群众组织的地方，不应该采取对立的形式和打击报复的办法，把对方推的更远，而是欢迎他们站出来，承认错误，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承认错误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口头上承认错误，还在原地不动的；一种虽然没有说，可是他回到生产岗位上来了，努力生产。接受你们的领导。比较起来，实干比空谈更好，毛主席总是欢迎实践的革命家而不是口头的革命家。所以，如果有很多离开工厂、学校和工作岗位的受蒙蔽的群众回到长沙来了，他们愿意在实践中证明接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接受造反派的主张，就应该欢迎，更好地帮助他们，团结他们，向他们耐心的作政治工作，使他们用行动来证明他们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样就可以把大多数群众，包括在湘潭的“高司”的同志，现在不仅争取在湘潭的，而且到郴州、保靖、黔阳、益阳、常德等地的，都欢迎他们回来参加生产，参加工作，搞斗、批、改，这样就能团结更多的人。不要拒绝，因为你拒绝，一方面他不敢回来了，另一方面他感到没有出路

了，就铤而走险，更加对抗，这是不利的。对军区，我们可以下命令，如不准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等，更重要的是通过群众来做工作。你们应该认识湖南的今天，长沙、株洲的形势很好，但外地的形势还没有都转过来，还需要你们做更多的工作，特别是湘潭很紧张，希望你们督促协议的实现，首先是造反派要模范的遵守，如果他不执行，更暴露他，他更脱离群众。

另外，我们希望站在“高司”观点的同志，应该自觉，不要对立。你们想一想。不错，“高司”的原来在八月八日曾经有五位同志写信给我们，承认当时他们所认识的错误，不过经过十二号把决定宣读以后，写信的人的态度又有所改变。我们要提醒写信的同志，他觉得他一点责任也没有了，既然“二·四批示”是中央的，他们拥护中央批示，就是说军区作对了，他们没有错误，他们是革命派，把他们说成保守觉得冤枉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倒是值得讨论讨论，“二·四批示”对“湘江风雷”作了错误的估计，连今天我已经谈了三次了，也许是四次了。写信的同志应该想一想，中央批示写的很清楚，军区把它扩大化，少数头目就变成了几万个头目，组织就变成了全部是反动组织了，打击面这么大，这些责任不能都由中央来负嘛！特别是进行武斗，组织“红色怒火”，组织“武工队”进行武斗，这些中央都没有提倡嘛！现在军分区、人武部结合在一起，比方湘潭开了几辆坦克向易家湾、淶口进攻，这个中央也没有提倡嘛！所以，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要革命的话，就应该采取革命的态度，就是说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才是心情开阔，有革命的气概的人，是错了就敢于承认错误，而不要把原来承认的错误收回去，责备中央，责备军区，责备造反组织。我说这段话，把道理说清楚，回过头来。不能因为我说了话，造反派就追究谁写的，要斗他一场。希望他们能够逐步认识错误，他们自己组织的群众来批评他们的错误，而不要另一种组织来批评他们。

(四)

第四部分，最后一段：“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

“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

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这一段是说今后。这一段是说今后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来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当然首先要把现有的群众组织、较为可靠的群众组织以及拿着武器在手的，加以考核编组，不可靠的要收回，拿多了的要收回。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由解放军做头子，来把现有的武装以及武装组织加以整顿，然后把可靠的工厂里面的产业工人有组织、有训练的武装，在解放军的指导下，自卫和保卫国家财产，协助维护长沙比较乱的社会秩序。这样，有可能对流失在社会上的一些散乱枪枝、游离分子的武装收回，也可能防止再有人抢劫解放军枪枝弹药的事情，这种情况不能再允许，从你们回去以后，就要停止。

在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些事情都希望你们回去自己做。今天我们请来了北京六十多位大专院校的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你们六十多位是革命小将。我代表党中央，相信湖南的革命群众是很高兴你们去年到湖南煽风点火的，把文化革命之火点起来。那次大串连你们是建立了功勋的。湖南的革命群众是会感谢你们的，纪念你们的。这是去年。今年不要再搞一个大串连了。有人提倡今年要搞第三次大串连。中央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倡搞第三次大串连。因为现在串连不是去年那个时候了。去年去是点火，今年去串连就会帮倒忙。这句话是我们伟大领袖说的。这句话是出于好意。你们主观上是想帮忙，但是客观上是帮倒忙。北京是两派，如果你们把两派观点带到湖南去，湖南造反派本身是两派了，不是帮倒忙？因此，我们有一个要求，中央、中央文革作了一个决定，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知大学、中学红代会，无论如何请把联络站撤回来。还要暗查铁道部为什么要发免票，同时，也要求湖南革命群众组织、小将们，你们靠自己，你们已经行了，已经站出来了嘛。

这一点是附带说的。

主席在八月七号批准了这一个决定。

好，我讲的就完了。

戚本禹同志讲话

同志们：

四十多年以前，湖南省是大革命风暴的一个中心点；四十年后的今天，湖南省又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中心点。湖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

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功勋，他们在很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很多同志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为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写下了光荣的篇章。我在这里向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向湖南省红卫兵小将致敬！湖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同志们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初步胜利。我希望同志们珍惜这个胜利，巩固这个胜利。

在湖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我愿意同大家一起温习一下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语录》的第二百零四页第二段，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是毛主席在全中国解放前夕的二中全会上讲的。当然历史情况和现在不一样，但是毛主席的精神，我们胜利的时候要防止骄傲。要防止不愿意再求进步的情绪，我想，对我们今天的同志们，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教导。因为胜利，我们往往自己不容易看到我们自己的毛病，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缺点。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错误。但是，看不到自己的毛病、缺点和错误，我们就会满足于这个胜利。同志们刚才念了给毛主席的信，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报喜，说我们回去以后，一定能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作，把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但是，如果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能很好的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那么，我们就不能很好的实现我们的保证。同志们，我感觉到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有很多优点，作了很多贡献；但是，他们是有很多弱点的，很多同志是有很多弱点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说你们会不会生气？

你们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不善于掌握党的政策。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他还说：“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

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同志们，毛主席说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那么，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不是能执行正确的政策，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生命。它能不能活下去，存在下去，也就看它能不能掌握党的政策。总理讲话，讲了很多，我体会他的中心点，就是能不能掌握党的政策，执行正确的政策，能不能掌握《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我们党目前对湖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这个决定，对我们如何对待解放军，如何对待省军区的错误，如何对待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团结，如何对待敌人的挑拨离间，如何对待受蒙蔽的群众等，规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是不是能很好地执行这些政策，是关系到我们革命造反派能不能存在，能不能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在湖南取得完全胜利的重大问题。刚才三个同志的讲话非常好。但我就找出一点不足的地方：你们对解放军犯错误的干部定了性。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我，我不会包庇湖南省军区的坏人。湖南省军区里面，象刘子云、崔琳犯了很多错误，对革命小将，应该说有罪，他们把革命小将抓起来，拷了手铐，是有罪的。江青同志当时看了这些照片很激动，她很同情这些小将，她讲了很多话。我们总理，还有我们，大家看了后都很难过的。为什么我们为“湘江风雷”翻案？就是对湖南省军区违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作法有很大的不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同他们进行了斗争的，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斗争。但是，我们不赞成现在马上给他们定性。我不赞成，总理也不赞成。这就是一个政策问题。能不能掌握这个政策？解放军犯错误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犯错误的性质不是一样的。走资派，比如王延春、张平化这些人，他们在湖南有一套完整的路线，就是刘邓路线。他们不仅有一套完整的观点，一套完整的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对抗的观点；在组织上他们有一套为了保证实行他们的政治路线的一套组织路线。但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这样完整的走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没有这样完整的走资本主义的组织路线。这一点，是有根本不同的。

我们的军队里有坏人，象彭德怀、罗瑞卿、陈再道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是极少数的，他们在我们的军队里面不能起主要作用。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建立的。四十年来，是有它伟大的功绩的。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我们党的中央机构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很多部队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不跟他们走。是不是？总理！（总理：是的。）总理亲自参加了的。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军队直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了鲜血，立下了战功。解放以后，彭德怀在一个时期里篡夺了军队的领导权，推行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但在军队里面是有抵制的。以林副统帅为代表的我们的解放军抵制了彭德怀推行的这一套错误路线。后来军队在林彪同志的主持下作了很多事情，在生产建设上，在保卫祖国的事业上，他们是站在前面的，特别是军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总之作了很多事情。所以，毛主席发出了一个伟大的号召，就是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号召我们全国、全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同志们，毛主席没有号召向湖南省委学习、向中南局学习，而号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证明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军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军队。所以，对人民解放军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爱戴，要拥护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有少数人，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犯了路线错误。犯错误后，有些人对错误认识不足，经过斗争，认识了，愿意改正了，我们就看一看，一看二帮的办法，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象中央、周总理讲的：他们改正错误后，群众会拥护他们，中央相信，他们一定能认真改正错误，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我们要这样做。我们不是说整个湖南军区里面没有一个坏人，但我们绝对相信湖南军区里面绝大多数同志，包括犯了错误的同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他们会改正错误的，是会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他们已经作了很好的检讨。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回到湖南以后，能够很好地跟军队（不光是四十七军）站在一起，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只要他们检讨了，改正错误了，就应该欢迎。因为你们要看到，军队犯错误，跟党内走资派不一样，性质不同，是两个类型的矛盾。当然军队里面有极少数的坏人跟党内走资派有勾结，但是极个别人，象陈再道这样的人是极个别的。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全国各地都抓赵永夫，出了个陈再道，全国各地都抓陈再道，广州也抓陈再道，没有那么多陈再道。如果有那么

多，人民解放军怎么是伟大的军队？！那么毛主席号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错了吧？！不是象西北局、西南局都烂掉了。没有那么多。他们是认识上的错误，是对文化革命不理解，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犯的错误的。要这样看问题。不然会迷失我们的方向。有些同志对打击走资派积极性不那么高，而相反的把矛盾都集中到军队里面去。这是不对的。军队里面的错误绝大多数人是认识上的错误，跟地方上走资派有原则的不同，一个是认识问题，一个是立场、原则问题。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而我们部队的同志因为受了错误的影响，弄不清事情的性质，搞错了，犯了路线错误。这一点，一定要严格区别。

你们还有一个政策问题，就是对“高司”、“新联”中广大群众究竟怎么看。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还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我希望同志们回去，能提供这样的经验，这样的经验对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用处。

怎么样正确对待“高司”、“红联”犯了错误的广大群众？毛主席在接班人五条里面曾经告诉我们：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是我们能不能作接班人的重要条件。这一点，我跟总理议论过，我们不太放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昨天就看到你们的错误，一个活标本，就是“红联”有一个人表示愿意承认他的错误，愿意回去挨批评、挨斗争的时候，你们不欢迎他改正错误。当然，今天谢若冰作了检查。但我还是不大高兴。因为谢若冰是有名的革命小将，象这样的革命小将不欢迎、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你如果有代表性的话，我就很不放心。还有，这个检查错误的同志刚一出门，好多人蜂拥上去，就把他打了一顿。这是我不得不说的。这是号称掌握政策的“工联”做的。这不是光彩的事情，不是英勇的行动。你们抵制错误路线，英勇斗争，这是革命的行动。但是今天你们得到初步胜利以后，就去打过去反对过你们但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这不是英勇的行为。我赞成。总理是不是赞成？（总理：赞成。）起码有两票！后来，有同志说，没有打。这一点，我也觉得不大光彩。打了就打了，还不承认？是用救护车救出来的嘛！总理看见了，我也看见了。错了就错了，不对嘛！要有勇气承认，以后不要做了。如果你们回去不做好“高司”、“红联”受蒙蔽的人的工作，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很好的胜利前进。我已经听到一些消息，说你们在长沙把一些人抓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说，是违反中央决定的，是政策所不能允许的。你们今天得到了胜利，都很高兴，但我说了这么一些不太悦耳的话。但你们

要理解我，我是确实希望能做得更好一些。我跟你们是一个立场。你们要很好的团结他们，团结过去犯了错误的同志。当然有的跑了，有的是坚持错误跑的，有的是害怕跑的。对坚持错误跑的，他跑了就跑了。但对害怕的人跑了的，你们就要做工作。毛主席说过，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人。就是“高司”、“红联”里面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甚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也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我去过一个工厂，那里我认识过一些人。他们造反派告诉我说：你认识的人都不是好人，都是坏人。我顶了他一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是坏人了。为什么？因为这些同志同我一起劳动过。在困难时期是一起度过的。现在他们参加了保守组织。当时我不知道湖南的情况怎么样。那时碰到天灾，工厂里面工人自动压缩自己的粮食定量，每天劳动很紧张，苏修欺负我们，他们发奋图强，得了浮肿病，还忆苦思甜。现在，有的造反派说他们是坏人，我就很生气，当时就顶了他。造反派开始受反动路线的压制，我是支持的，现在你们打他们，我说是错误的。造反派我也有数，你们大概也有数的，有的过去有点跳皮捣蛋，有少数不好好劳动，不上班，你们里面有没有？我不知道，也可能个别的是有的。这些人，老师傅就是看不惯，说：这样的造反派我就是不服气。人家不服气，你还是没办法。你说你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是坚定的、光荣的造反派，你们刚才念的一大片，但是人家不是反革命，就是不服气，你怎么办？要使人服气，要作出榜样来。我们要很好地向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学习。你们知道，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四方面军，张国焘蒙蔽四方面军的战士、干部，要他们来反对毛主席，甚至打毛主席。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并不是因为你要消灭我，我就先消灭你。毛主席自己领着队伍向陕北继续前进。在毛主席正确政策的感动下，四方面军的广大战士跟上来了，他们从实践中识别了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张国焘是坏蛋。后来张国焘一个人孤家寡人跑了，没有一个人跟着他跑。毛主席的伟大榜样我们要学习，如果不学习毛主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当接班人，想当也不行，要被别人推翻的，要垮台的。我这样说是不是灭了我们的志气呢？不是的，那些少数坚持错误的人，他们利用我的话来攻击你们，你们不要怕，攻不倒你们，攻得倒你们的是你们自己，你们自己不掌握毛主席的政策，你们就自己把自己攻倒了。有些人如果不改正错误，还要顽固坚持错误，他自己会走上绝路，就会变成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因为他们脱离了群众，脱离了毛主席的

革命路线，不打就倒了，你们不要去武斗他就倒了。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希望同志们掌握政策。而这一点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有些事情作得很过份，什么叫过份，就是不符合党的政策，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希望我们能够改正这个缺点。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遵循毛主席指出的方向，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轨道，不能脱离这个方向、这个轨道，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湖南的革命造反派还有一个弱点，就是你们内部不那么团结。这个问题你们刚才讲了，胡勇同志念了一个加强团结的决定，我耽心这个决定会不会变成纸上的东西，我希望这个决定能够变成你们的行动，而不是一张纸。因为据说在你们宣布这个决定之前两个小时，湖南的造反派之间两派还在斗争。造反派不应该是两派，的确你们现在也有两派，要消灭两派。而且你们两派还武斗，这是很不应该的。我希望从你们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起，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造反派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我这个话不确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你们造反派之间不是敌我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嘛！在你们“湘江风雷”受压制、受打击的时候，“工联”很支持你们，“工联”支持你们也是为了支持他们自己。你们是亲兄弟，是并肩战斗的兄弟，你们不应该再闹分裂。我希望你们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搞一个工代会，一个红代会，不要搞很多很多的组织，因为大方向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搞小团体主义、工联主义，你们可是有工联主义，你们知道工联主义吗？你们和“湘江风雷”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什么以“湘江风雷”为中心，以“工联”为中心，哪里那么多的中心？中心只有一个，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有那么多的中心？以你为中心，就会发展成为唯我独“革”，发展发展，搞到最后，就什么中心也没有了！搞到最后，群众是不会同意的。我收到湖南的群众来信，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有革命秩序的局面，需要结束过去缺乏革命秩序的状态。所谓乱，乱是好事情，乱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乱的军区的反动路线，这个乱是正常的，没有乱，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取得胜利。但是，现在胜利局面已定，我们要走上一个正常的秩序，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现在，中央已经同意湖南省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央确定的人选有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其他的同志你们还可以讨论，赶快提名报中央批准。

我们要维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不要象过去一样。中央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新的航向，就要逐步建立起新的革命秩序，按照这个方向前进。如果有谁还要在湖南现在的情况下，用过去的办法来对待现在的革命派，互相之间还要闹，还要破坏革命秩序，他要被湖南省的群众所抛弃。因为湖南的群众所要求的不是这样，你们要懂得群众要求和愿望，要听取群众的呼声。湖南的“红色怒火”、“高司武工队”现在还用枪炮、坦克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群众是很反对的。如果你们还要这样打内战，湖南的群众要抛弃你们的，会有新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派来代替你们的。如果“湘江风雷”这样做，中央给“湘江风雷”翻了案，“湘江风雷”自己又会翻了过来！“工联”这样做，“工联”也会走向事物的反面！“湘江风雷”、“工联”的广大群众会起来造反，抛弃你们的领导人，建立起新的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组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头头、领导人切记不要脱离群众，切记不要背离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切记不要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里，希腊有个故事，安太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呢？当他打不过敌人的时候，他就落在地上，他的母亲大地给了他力量。后来有个敌人发现了他的弱点，在打仗的时候，就把他举在空中，让他脱离大地后把他掐死了。这是一个悲剧。同志们，湖南的革命造反派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你们要脱离群众，就会被敌人掐死就是。你们不是说你们是英雄吗？“湘江风雷”如果象安太一样，离开土地，离开母亲，离开群众，背离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也就会失败的。“工联”也是这样，“长沙工人”也是这样，“青年近卫军”也是这样，“青年近卫军”你这个海司令，如果脱离群众，背离群众的要求，你这个司令就当不成了，就会象安太一样被敌人打败。因此，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克服个人主义，克服小团体主义，克服无政府主义，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动力，也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不要以为现在自己是了不起了，是英雄了，就飘飘然，就骄傲起来，贪图安逸，希望人家捧场，出风头，这样的人要失败的。现在已经有了，我们在北京就可以看到，有的很有名的小将，当了权以后，当了领导以后，要住好房子，换一个不行，再换一个也不行，要把别人赶出来，自己住一个院子，要睡沙发床，要坐藤椅子，出门一定要坐汽车。有一个工厂的造反派，为了炫耀自己，可以从北京坐着小汽车到天津家里去，衣锦还乡，跟过去的楚霸王一样，回故乡摆威风，摆阔气。有的当领袖。排斥别人，为了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不惜搞打砸抢，破坏国家财产。

这样的事情不少，当然绝大多数小将是好的，象这样的人是个别的。你们过去是受压迫的，回去以后，你们的地位不一样了。我希望你们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你们还有一个弱点，就是容易轻信，缺乏警惕，缺乏调查，容易受别人的挑拨。具体来讲，就是周总理讲的，有的同志上了蔡爱卿的当，上了吴自立的当。你们有件事情，我说很不光彩，你们把反党分子吴自立护送到北京来，我看你们不要保密，公开检讨，革命造反派的风格，有错误就检讨。你们上当，这个问题不能怪你们，因为他拿着主席的一封信来招摇撞骗，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因为吴自立搞“平江史”，大家都知道，你们没有调查，结果上当了。我们愿意看到革命造反派有了错误就检讨，不断进步。你们看，我们中央的同志有了错误就作检讨，而且负主要责任。你们为什么不检讨呀？应该检讨，你们为什么不检讨？我看这一点，风格就不是很高的，光说自己光荣光荣的干什么！光荣要别人说，不要自己说，你就那么光荣？可是对自己的缺点、错误没有很好的检查。中央讲你们“湘江风雷”有不纯成份，这一点你们没有讲，中央讲这个问题是开了一次会的，而且是请示了毛主席的。根据大量的材料，你们在这里没有充分的认识。中央讲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这一点，现在你们的发言，没有很好的、深刻的认识，你们提了一点，很不深刻，你们主要的应该讲这个问题，而成绩应该由我们来讲，由别人来讲，我希望你们“工联”、“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等都不要多讲自己的成绩，要夹着尾巴做人，尾巴不要翘得高高的，要夹起来，有的同志尾巴已经翘得很高了！我有这个感觉，同志们，你们对我不满意也可以，但是我有这个感觉，什么我是老战士、我的部队，还有我的什么。我喜欢说不好听的，什么你的部队呀，什么老战士呀，好意思！你们想想看，如果是语病，那我还可以原谅，反映一种骄傲情绪就不好了。你们看周总理多次接见过你们，几时讲了他是老战士没有？当然我是一个新战士。你们就叫老战士了？那不跟北京“联动”一样，他是老红卫兵，去年“八·一八”到现在一年还差三天，就是老红卫兵了？你们回去以后，说我是老造反派，你是新参加的，同志们，那你们就糟糕了。你既然是老战士，那我就要问你一句：老战士对敌人这样没有警惕性？蔡爱卿这样的野心家，公开讲夺军权，我们的军权是谁的呀？是林副统帅指挥的，是最高统帅毛主席领导的，蔡爱卿不是说我们算老几吗？你们可以问他一句：你算老几

呀？你来夺军权！但是，我们的同志们非常没有警惕，居然还让他在会上讲话，讲了话你们还鼓掌，这个我看不象老战士，老战士打仗会侦察，你们不侦察？所谓不侦察，就是不调查，还要人家讲话，还鼓掌，他要你送人你就送？还有人在背后挑动，说什么中央文革、总理分两派，你们就上当了，湖南就有这样的大字报，这是从“左”的方面、“极左”的方面来动摇中央的领导，这是很大的政治进攻，反对我们国家的总理，这是很大的事情，同志们没有警惕，上了当，居然可以跟坏人跑，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当然不是说你们所有的同志，很多同志是很好的，就是这些同志，很多还是斗争相当勇敢的，但是，可惜就是缺乏警惕性，上了当。

我就这么三点希望。一个是希望大家回去能够很好的掌握政策；一个是希望你们加强内部团结，很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思想，去掉私字，克服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个是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不要迷失斗争的大方向。

今天的会议开完以后，同志们回到湖南，回到光荣的毛主席故乡，我们对湖南省来的同志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湖南是全世界人民所敬仰的地方。为什么湖南的问题开会开得特别多，每次开会开到天亮？就是希望把湖南省搞好，搞成象你们说的那样。真正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希望同志们回去以后，懂得这一点，不要辜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要辜负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央文革对湖南省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希望。

周总理总结

同志们，现在可以结束这个会了。今夫这个会开得很好，我把中央的决定作了解释，戚本禹同志对你们提了好的建议，同时你们表示了你们回去要做的事情，当然，一切的一切，要看你们在斗争实践中来证明，你们说是保证，毛主席的《实践论》所提供我们的一个知识，要由实践来证明，不能靠宣读来证明。我们希望湖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以黎原同志为首，华国锋同志、章伯森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团结湖南省的广大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湖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批臭批倒，这样就会真正地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就是真正的共同对敌，这样就能够在斗争中学会政策和策略，在斗争

中戒骄戒躁，掌握方向，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这样也就才能如同你们所希望的把湖南省建设成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才不愧为毛主席故乡出生的革命战士。

让我们高呼：湖南省的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讲话均系根据录音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团谈话纪要

八月十六日二十三点五十分至十七日五点三十分，周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了“湘江风雷”。

十六日二十三点五十分至十七日二点四十分，总理、戚本禹接见“湘江风雷”一方。

(总理翻阅名册，询问刚从长沙来的“湘江风雷”派八个人情况及各群众组织情况。)

总理：啊！××还有一个夺军权战斗队，这个口号就不对头，夺谁的军权！×××，你是×××的。×××要夺军权，夺军权是不对头的。

总理：去飞机接你们，但×××还不来，叫他来都不来！

总理看到邹定国(孙大圣负责人)的面部被汽枪打伤仍未痊愈，总理指示：你可以晚走几天，到反帝医院去检查一下，由联络员同志办一下。

李忠坤：当前长沙十分严重，形势很不好……。

总理：不要对形势看的那样悲观，要乐观吗！这些话昨天已经讲了，录音了，你们可以放录音听听，不重复说了。

李忠坤：我们发了公告，抓俘虏不打……。

总理：不要叫什么俘虏，不能当敌人看待，听了很不顺耳，我劝你们再不要这样说了。要劝他们(指受蒙蔽群众)都要回来，工厂的回工厂，学校的回学校。一道搞大批判，这样路子就顺了，回来就叫认罪。这样搞不顺，不利于争取群众。

李忠坤：我们怕他们走到湘西当土匪，所以把路拦住了。

总理：跑到山头就是死路一条，农民也会把他们赶出亲，不要拦路，要进行宣传，就可以争取过来。

李忠坤：长沙流氓阿飞很多，劳改犯冲出监狱，跑出七个人……。

总理：再不能冲军区。要组织文攻武卫指挥部。刚才看了你们的计划，组织起来二十个连。但要注意一点，组织起来的连，不要跨单位，各单位各自组织，然后联合组织起来，执行警卫，也要分担任务。有了指挥部，就一起来，部队也要把枪背起来，这是第一个环节。

一代表：“二·四后”，××没起好作用，他们保军区，××与“湘江风雷”，比××。不是左派。

总理：你是否说“湘江风雷”是左派，××不是吧。你讲这些事情，戚本禹同志是很清楚的(戚暂不在会场)。你们这样，要××说话了，少说点吧。你是大人了，二十八岁了，要带领小将向前跑，你这样算账，没法算老账的，这样没意思！贾镛、叶卫东，你们懂得这些情况，应该做他们的工作。

总理：现在，第一步先组织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群众代表双方各一半，由解放军负责指挥。

众：××把自己下面的当炮灰，枪口对自己。现在要联合必须坚持原则。筹备小组的名单长沙已贴出大字报，筹备小组不是自下而上来的，是包办代替，长沙有百分之六十群众不相信筹备小组，长沙市大联合必需以“湘江风雷”为核心。

戚本禹同志会中出去办事，回来听了这些问题后，讲话：

毛主席说，有些组织提出以自己为核心，这是很蠢的。我的理解，这是强迫别人承认自己，这怎么能行呢！当然，现在也不能提议“工联”为核心。只能提以

毛主席为核心。

你们可能说不理解。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不执行主席指示就不是左派组织。这样提出是很蠢的，你们要觉悟。

毛主席为核心，这是历史上形成的，群众拥护的。在历史上，王明、李立三提了以自己为核心，张国焘就更是了，还搞了第二个中央。凡是老是强调以个人为核心的，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凡是埋头苦干，想阶级问题，想中国问题，想世界问题，都是真正的核心。

毛主席这个指示，不要出小报，咀要牢些，可以宣传精神。

当然，你们不可能全部理解毛主席指示，但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你十八岁，是四八年生人吧，四八年时候，你的细胞还不存在的时候，毛主席已经领导全国胜利了。你什么时候生日？(答：十一月)。四八年十一月份，淮海战役已胜利了。所以，现在不理解，以后就理解了。不能个人提以自己为核心，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成为中心。我们中央不提以“工联”为核心，也不提你们为核心，现在提谁为核心，历史条件都不够。

你们互相都要进行整风，进行自我批评，现在有这个司令，那个司令，怎么不打架呢？比如抗日战争时期，那么多的司令，有真司令，也有假司令，最后形成核心的是毛主席的司令，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那个为核心？就是看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小团体服务，那是很大的问题，希望你们考虑。

中央《决定》是毛主席批的，经过中央讨论的。你们要执行。(有人说：第一个代表团有问题。)那是经过你们讨论的，并经黎军长报中央批的。黎原同志，华国锋同志，章伯森同志，这三人是毛主席批的。黎原同志是经过考验的，四十七军是优秀的部队。当然不是说下面没有缺点错误。特别对待陈再道的问题上，四十七军表现是很好的。你们对四十七军不能乱造反。黎原同志，郑波同志是经过考验的，是很好的。你们说你们是左派，我还要看一看，要看看你们掌握毛泽东思想到什么程度。你们才是半年多的左派，不要自封左派。我看到标语上写“戚本禹同志是左派”，我身上都出汗，感到紧张。自称是左派的，决不是左派。因为自封左派后，就飘飘然了。必然是，不是向左靠，就是向右靠。现在有两个左派，你们是左派，黎原是左派，我更相信黎原这个左派，我们要相信黎原同志，

因为你们没有参加过战争。战争的考验是最大的考验。你们还没有参加过战争。

华国锋、章伯森同志，我们认为在湖南是比较好的。我们中央是了解的。华国锋同志过去是有功的，能力还比较强，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华国锋同志表态支持左派，有的同志不信任，你们可以看看，现在还没登台表演，就不看、不信任这是不好的。要让他们表演表演，要一看二帮。不能做到一看二帮，就不能做一个好的接班人。对老干部要尊重，因为他们在长期斗争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没他们奋斗，那有今天。当然，首先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也有他们一分。走资派要打倒，但那是少数。多数是好的。若是没有他们，你谢若冰可能还是童养媳。你海司令还不知怎样！要尊重他们。听说你们一回去就要斗华国锋同志，我真担心你们！这样做很难说是革命的感情。你看一年嘛！还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再不行，再打倒！

×××你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答六三年)，以前谁在搞革命，是他们嘛！我对你有所了解，当然不一定准。你再不能用小资产阶级去影响别人。你有无产阶级的，也有小资产阶级的。你是有影响的人物，建议你考虑考虑。

还有章伯森同志，章伯森同志是有缺点有错误的，但他是你们湖南较早站出来的一位领导干部。湖南领导干部有个问题，就是逃跑。历史上的李维汉跑过，张平化跑了，都跑了，唯他不跑。你们说他狡猾，我看他很老实。他没有跑，可他自己说，当时是跑不了了，受到了教育不跑了。他还写信给中央，给你们“湘江风雷”翻案。那是冒着风险支持你们的。(有人问：他什么时候给中央写信？)那是三、四月份。但你们翻身后，就要打倒人家，起码这是不公平吧。

所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是合理的、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伟大领袖毛主席能批准吗？如果你们不能接受，我为你们担心，这样搞法能否受到群众拥护，是很可能要犯错误的。同样，“工联”不能很好举起大批判旗帜与你们大联合，也要犯错误。希望你们来了，就要扭转这种情绪。接受中央《决定》，如果听中央的话就是“右”了、“修”了，你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要做工作，不要怕别人说“右”了、“修”了。这不是说毛主席、中央“右”了、“修”了吗？我真担心呀！难道中央变成了修正主义堡垒了，就是你们革命，那还怎么相信中央、相信群众呢？

张楚榭：现在就是有人这样，一说不同意见，就说人家“右”了、“修”了。

×××：你说谁说了。(顶起来)

戚：你看！你们是一派的，还打架！希望你们和你们说的“右”了、“修”了的人谈谈，希望你们考虑三天，如果不通再写信来谈，事情总是复杂的，要从多方面想，不能解决，我还可以去谈谈。

叶才宝：在江水里放毒的人，我们抓到了三个。

戚：要法办！

叶才宝：大家要求筹备小组快回去。

总理：主席再三问贾镛，开始不清楚，现在清楚了。但你们说我是中间派，这怎么好说呢！

戚：你们看不行，那谁挂帅呢！

总理：筹备小组名单你们有意见，那是八月七日，谢若冰打回电话的，我看了他电话稿，那是对的，老实的。你们要信任她。不能因为他听了我们的话就“右”了、“修”了。这怎么能行呢？

×××：光靠上面恩赐是不行的，要有个认识过程，要民主选举。

戚：主席批示的，怎么叫恩赐呢？

总理：各派人选由各派去选。但不能搞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两方选出后，双方要协商，双方都不能强加于人。

×××：报告总理。我们来了一个宣传队，五十七人，要演“湘江风雷颂”，要求派人审查剧本。

总理：由戚本禹同志考虑。

戚：我不审查。等你们联合起来了。把湖南搞个好局面，毛主席满意了，那时一定请你们来，请你们演剧。并且放在最好的剧场演剧。现在我不看。并且，希望你们不要到处做报告，做事要留有余地嘛！不然，我脸上都感到发烧。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工联”代表，

“工联”代表做了检查，也给湘派提了些意见。

总理：现在要求你们双方合作，联合起来，首先停止内战。胡勇你们几位负责人要很好的说服工人，联合起来。内部一致了，才能把对外搞好。把秩序搞好，四十七军把枪支调来，才能维护社会秩序。刚才说服了半天“湘江风雷”，看来你

的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你们是工人阶级，要做模范，他们多是青年，多是学生。

总理：听说你们把“高校风雷”都赶跑了？

一代表：是因为他们反对你，我们认为这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司令部。

总理：那是少数人，不要那样搞吗！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看大方向，要讲团结，要把长沙建立一个革命新秩序，这是第一件大事。

（“工联”仍有人给湘派提意见。）

总理：你们是左派，要严格要求自己，多多批评自己，要求大同存小异，你们多是工人，应该把政策性提高一步。你们同意成立指挥部，应赶快搞起来。指挥部的人数双方要同等，双方各推选自己的，也要相互协商。华国锋、章伯林同志要多做他们的工作。

（“工联”提出八月十九日，“高司”可能要进攻长沙。）

总理：要看主流，最近林副主席报告中讲的很清楚，不要怕，要有信心。

戚：如果他们真来进攻，那好！他真打，四十七军也不是吃素的！

总理：现在要把指挥部组织起来，还有四十七军来保卫嘛！要是暴乱就可以解决嘛，要是开来了坦克，把履带搞掉，就可以活捉。

总理：你们首先是搞起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二十个连，三千人，规定几条，树立起威信，才能解决问题。现在你们找到了一个组织形式，赶快组织起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四点五十至五点三十五分，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工联”、“湘江风雷”的双方代表

做了如下指示：

总理：黎原同志、华国锋、章伯森同志为筹备小组领导人。黎原同志任主任。还有郑波同志、谭文邦同志、刘顺文同志，还有梁春阳，贾镛，万达怎么样？对！还有林国兴同志。

叶才宝：军方代表，有四十七军、政干校和省军区，三四一部队要来一人，三四一“红色硬骨头”比较好，×××，不！政治教员袁乃可好，可以到筹备小组。

总理：可以把袁乃可名字记下，回去商量。

一代表：万达不行。

戚：万达可以去另一派做工作，有好处。

总理：万达有严重错误，可以通过筹备工作考验。

群众参加筹备小组成员，你们双方来的人要同等数目。原来商量各三人，也可两方各五人。你们(“湘江风雷”)要有一个，“青年近卫军”也要有，代表一个方面。“孙大圣”，敢闯，也有代表性，还有“长沙工人”。各方选自己的，然后协商解决，要尊重对方的意见。这是领导机构，要尊重。

首先要搞文攻武卫指挥部。双方各一千五百人，发枪一千条。“工联”方面工厂大，双方的人数是相等的，但每个连的人数就不相等。怎么样组织法，戴利(“红艺会”负责人)你们懂吗？派出勤务的时候，在联席会议上决定。指挥部下设的各级也是双方各一半人。比如参谋五个人，双方各两个人，军队一人，提出意见，由领导小组郑波同志下命令。这也是向解放军学习的开始。权威树立后，不抢枪了，也可以收枪。

(有人提出学生也要发枪。)

总理：学生如何组织，看是否这个学校组织很好，如果组织很好，再经过训练，才能决定能否发枪。

有人提：有好多枪掌握在流氓阿飞手里怎么办？

工联提出：长沙邮电局已来人，刘秀英可回长沙，会安全。

戚本禹：刘秀英回去后不能打，也不能斗，因为是群众嘛：江青同志对此很不满意，说湖南造反派的政策水平怎么这样呢？

总理：如果组织好了，四十七军的枪也调来了，交通恢复，在这个条件下，再乱放枪，就把他的枪收回。再经过一段，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好了，秩序建立了，才能清查枪支。如果现在搞他，他会给你搞暗杀。首先把长沙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不许抢枪。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四十七军声明

最高指示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

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四十七军声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我们支持和参加的“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是在打击和取缔了左派组织“湘江风雷”，压制了一部分革命造反派的基础上成立的。在它成立以后，由于我们衡阳驻军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影响，“衡革会”又执行了打击、排斥革命造反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衡革会”不是真正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经我们与衡阳驻军各大单位研究，郑重宣布，驻军代表全部退出“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曾在“衡革会”工作的干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他们是受了我们的错误的蒙蔽，责任全在我们。我们希望他们赶快觉醒，不要再坚持我们过去的错误方向，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支持“湘江风雷”、“衡阳工总”等革命群众组织，和他们团结一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打倒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黎源等会见衡阳党政机关代表时的谈话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省革筹小组黎源、华国锋、梁春阳等领导同志，在省委大楼二楼小会议室会见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赴长代表。双方就当前衡阳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进行了交谈。

赴长代表向黎源等同志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赵川、李振军之流究竟在衡阳支保还是支左？（二）“衡革会”是“三结合”还是“三凑合”？（三）对当前衡阳地

区的严重局势你们采取何种态度？（四）要求将赵川、李振军交给衡阳广大革命群众批斗。

黎源同志就以上问题作了回答。

他说：对衡阳问题我也是有责任的。开始对“湘江兵团”也认为是造反的。对“二·四”批示并不太了解，只按省军区的执行。四月份以后才开始认为军区后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尽管我在衡阳时间少，对衡阳支左我是要负责的。三月二十二日后在北京学习了很多东西。四月二十七日回来后，对衡阳过问不多，只在长、株、潭三市调查了一些厂子，这时我的思想才真正转变，表示支持“工联”。但对衡阳还是认为有点特殊性，总认为“湘江兵团”是造反的，这个认识以后才开始转变，认识到了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尽管程度不同。这是我个人的认识过程。

这次在北京和李瑞林等同志交谈，似乎造反有理军还可以团结，你们现在看法如何？我是不太了解情况的。现在明确啰，在衡阳支持的是保守派，“衡革会”是个大杂会，可以打倒！部队应该声明不参加，撤出，我在北京就表明了态度。

我认为当前衡阳形势是好的。目前主要是发展壮大造反派，分化瓦解保守派，军队应该(30)坚决支持造反派，如支持不力，是对中央决定执行不力的问题。

关于赵、李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你们可以提意见，贴大字报，是不是一定要带回去，请同志们考虑。周总理多次指出，军队犯方向、路线错误是不自觉的，不象刘、邓是自觉的。

现在衡阳革筹小组是否可筹备起来，如能筹备起来比较好。你们回去研究一下。文攻武卫问题，组织指挥部，象警备司令部一样，保护仓库、桥梁，维护治安。

大方向问题，可深入开展大批判促进大联合，不能为一枝枪打内战，要吸取这方面教训。抓革命，促生产要放在重要地位，很多日用品供应不上，粮食计划入仓二十多亿斤，现在只进仓五亿斤，这些问题要引起造反派注意。

最后，黎源、梁春阳等同志同意四十七军派人去衡阳公开表态作检查，李、赵可先在长沙与代表见面。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

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衡阳军分区赵川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

驻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军代表赵川的检讨

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我是衡阳驻军领导小组派往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军方代表之一，驻军领导小组关于衡阳支左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的决定，很多都是通过我在衡革会传达贯彻的。驻军领导小组在前段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是具体执行者，我要负重要责任。

我在衡革会工作五个多月，由于衡阳驻军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所以衡革会的工作，也跟着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衡革会所犯的错误的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因为，群众组织负责人，领导干部和参加衡革会的工作人员，他们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受驻军错误路线蒙蔽，跟着部队犯了错误，他们没有责任。希望这些同志很快觉悟过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同广大的革命造反派一起，把衡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方向路线错了，就一错百错，所以，我的错误很多，今天主要检查如下：

一、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红旗》杂志六六年第十四期社论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在衡革会工作期间，我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而是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不同意见，压制了革命造反派。使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对广大革命造反派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如：

二月份，湖南军区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发出二·四批示，我们跟着一起打击了左派组织湘江风雷，我们虽然没有上报情况，只是二·四批示的执行者，但我们有责任。我当时参与了这一工作，我也有责任，是镇压革命左派的凶手之一。我

们的方向路线错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在这里向湘江风雷广大革命群众请罪。

三月份，脱离实际，片面照搬青岛、贵州经验，过急过早的撤销了湘江革命造反兵团和所有群众组织总部。撤销后，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没有跟上去，使一些造反派力量较弱的基层组织，一度出现保守势力抬头，造反派受到压制的现象。

四月份，誓保团、红暴动等革命小将开始炮轰衡革会，由于我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所以，对他们的革命行动，很不理解，也很反感，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反映。因此，用“炮轰衡革会就是反对解放军”等极端错误的话，对他们进行压制。虽经他们几次解释，说“炮轰衡革会不是打到，是轰缺点错误，炮轰衡革会不等于炮轰解放军”。但我总听不进去。在这里，向誓保团、红暴动等革命小将请罪。一次姜造反同志找我谈话，在谈到不如自己心意时，就态度横蛮地说：“咱们没有共同语言”，这完全是做官当老爷的作风，缺少起码的待人态度，衡阳工总找我联系，要求表态支持，要求批给活动经费，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可是，当时我听到一些片面反映，对他们另搞一套很不满意。因此，既没批给经费，又未表示支持。这说明对不同观点的不是通过工作达到联合，而是采取排斥、打击、压制的反动路线来处理这些问题。

五月份，绝食斗争，我很反感，思想上认为这是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因此，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只看到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看不到他们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造反精神，看不清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而使自己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汪子涛同志同我谈过几次，当时谈的很好，他很诚恳的指出衡革会的缺点错误，并希望衡革会公开检讨。我完全同意汪子涛同志的看法和意见。但原支持的一派坚决不同意把衡革会的缺点和错误公布于众，所以始终未向全国人民检查。后来由于听到一些片面反映和原湘江兵团向我提出抗议，所以同汪子涛同志的联系就逐渐冷淡下去了，我想这个问题，谁也不能怪，只怪自己立场错了，未站在真正的造反派一边，一切就都错了。

六月份，高魁、王光蔚同志要组织调查团，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我外表上虽未表示反对，但思想上是有抵触的。所以没有积极支持。在这里，特向高魁、

王光蔚同志请罪。六·七游行和农民进城游行，部队领导小组和我，主观上虽然是为了制止武斗，维护六·六通令，但实际上主要矛头是指向造反派的，用这种声势来争取群众，来压制造反派，使造反派在发挥革命性上，在壮大左派队伍上，均受到极大的约束。从游行的坏作用来看，说是反革命的游行并不过分。

我在对待湘江风雷平反的问题上，认识迟，觉悟慢。我是盲目维护二·四批示，在北京谈判精神未下来前，我是不同意平反的。为湘江风雷平反的革命小将，长期受到了压制，如撕湘江风雷的旗子，抢袖章，抢报纸，我虽未布置这样的任务，但这些我都是抱同情态度的，这个问题直至中央明确表示二·四批示错了以后，我才彻底的回过头来。

对长沙的问题，我没有作调查研究，没有对听到的一些片面反映，作阶级的分析。尤其六·六以后，认为工联的大方向错了，越走越远了。并误信六·六惨案的幕后指挥者是章伯森、梁春阳同志。由于偏听一方，片面地支持高司，压制打击了长沙工联和与其观点相同的革命群众组织。如长沙工联观点的同志到衡阳，多方受到刁难，高司观点的到衡阳，则受到多方照顾。

黎军长在长沙表示支持工联，以及中央表态长沙工联和湘江风雷是革命左派以后，衡革会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当时我对于原所支持的一派仍抱有幻想，思想上还认为衡革会是革命的三结合，因此，还想方设法保衡革会，因此，曾几次布置了要成立动态组，注意收集整理衡工联、誓保团的一些材料，目的是准备将来看长沙一样，上北京打官司，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

七月份，衡阳发生了不少武斗。当时我只看到武斗现象的直接原因，因此错误认为，武斗是工联、井冈山挑起来的，没有看到武斗的历史根源，没有看到这是革命左派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起来反抗的革命精神。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我对待群众在态度、立场上都犯了严重错误。可以看到，我对一个人一个群众组织，鉴别左、中、右的标准，确定支不支持，不是以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进行具体分析，而是以感情代替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看对待衡革会和军队的态度上。当革命造反派起来抵制和反对时，便错误的看成是逆流，是反夺权的问题，所以对这些真正的革命左派，不但不支持，相反的进行压制、打击，想把左派组织整垮。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不是无限忠于和无条件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是不自觉的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上，执行了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我对衡革会、地造总的看法和应负的责任

衡革会是在镇压左派组织湘江风雷之后开始筹备，于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我在衡革会成立以后，革与保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正确处理，革的方面考虑少了，保的方面考虑多了，思想上始终存在消极保权的右倾情绪。毛主席教导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彻底打乱旧的，就不可能建立新的，不采取革命的措施，总想着维持那样一个摊子搞下去是困难的。实质上思想是怕乱，怕乱就是怕群众，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怕革命就必然是保守的。衡革会的组织形成虽然是新的，但其内容主要还是旧的，如规章制度，思想作风等，有的学生或一般干部当了委员之后，出门总想坐汽车，也有的个别工作人员，为了宣扬一下自己，叫汽车把他送回家去；建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制度，委员坚持的最差；委员们多忙于事务工作，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很不够；大联合、三结合方面，要求过快过急，没有突出两条路线斗争，因此，有的单位，搞成了大杂会；在解放干部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但一股号召多，具体措施少，所以解决的不力。在今天提高认识来看，因为它是建立在镇压了左派的基础上，成立后，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衡革会不是革命的三结合，没有革命性，代表性也很缺乏，主要是没有真正革命派代表。长期没有农民委员，工人委员也不足数，权威性就更不够了，调不动人，决定的问题不算数。因此，衡革会不是革命的三结合，应该打倒。今天垮台比将来垮台好。在这里感谢同志们，使我早认识错误比晚认识错误好。

地造总，前身是湘江革命造反兵团。它是在衡革会派代表在贵州参观以后，学习贵州经验，为加强对群众组织领导而成立起来的。在贯彻中央二·四批示时，它跟着衡阳驻军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的责任应由驻军来负。在衡革会成立之后，对地造总的缺点错误，教育帮助不够，尤其是总部撤销之后由于忙于事务工作，曾一度出现在政治思想上无人管的状态。对地造总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往往怕弄僵关系，影响团结，而姑息迁就，因此他们的政策思想水平提高的不快，革命性不强，有维持现状和满足现状的保守情绪，同时掌权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利用自己一时的政治、组织优势，对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进行压制排斥，唯我革命，唯我独左的大组织派头很严重。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以极左的

面貌出现，好似越不解放，革命性越好的样子。他们实际上是衡革会打击、压制革命左派的御用工具，他们发的很多传单，现在分析起来是十分错误的。

以上衡革会、地造总的问题，主要责任由我来负。由于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理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衡革会全体同志和地造总所属组织受了蒙蔽，跟着犯了错误。现在回忆起来，很痛心。希望衡革会的同志和地造总的同志们，反戈一击，对我进一步进行揭发和批判。

三、我为什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呢？

一方面是因为二月份湖南军区从右的方面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刚介入不久，就谎报情况，片面支持高司，欺骗中央发出二·四批示，打击了革命左派湘江风雷，因而使湖南全省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路线错误已经定型，后来他们继续蒙蔽高司，压制革命左派长沙工联，使方向路线错误更加严重。我们的错误就产生在这个全省性的方向路线错误的背景上，我的错误也是产生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这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自己的立场错了，思想认识，思想方法，世界观上存有很多问题。

①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思想跟不上形势，是民主革命的思想，在做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作，在参加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所以跟不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领会不深。因此，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有时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作诸葛亮，按照自己的意志在那里运动群众，阻碍了革命的群众运动。

②思想上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不敏感不理解，条条框框多，夺权以后，怕乱求稳，急急忙忙整顿社会秩序，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的按照老规矩估计形势，因此，有时模糊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界限，看不清运动的本质主流，听不进不同意见，对革命左派的一些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看不惯，甚至很反感，对他们缺乏阶级感情。所以就不自觉的入错了门，站错了队，执行了错误路线。

③归根结蒂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看待一个人，一个群众组织，不是看他对待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而是以我为核心，这样就失去了唯一的客观标准，走上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我没有很好的触及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没有自觉的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之中，接受群众的监督和倾听多方的意见，而是高高在上，整天忙于事务，作官当老爷，主观世界是没有得到改造的，所以，犯了错误，是不奇怪的。如果今天还不犯错误，将来肯定会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同志们，我的错误是严重的，由于我的错误给衡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使在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受到蒙蔽，受到连累，使原支持的广大群众到受蒙蔽，误入歧途。今天，当我检讨错误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沉痛，在这里向他们请罪。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我诚恳希望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我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痛改前非，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衡阳工总、湘江风雷、井冈山等革命左派。坚决支持长沙工联、湘江风雷等左派组织，坚决支持章伯森、华国锋、梁春阳等革命领导干部的正确领导。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体现了全省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正是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某些所谓“过火”行动，触及人们的灵魂。锤炼人的意志，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向前发展，受部队和衡杂会蒙蔽的群众，希望你们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反戈一击，彻底批判湖南军区、衡阳驻军和衡革会和我的方向路线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同真正的革命左派衡阳工总、湘江风雷、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等革命左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最后，愿和广大革命左派一道，共同把衡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四十七军副军长郑波在省政法干校又接见衡阳代表，

六九五五部队桑副政委也参加了。

郑波同志谈的主要点是：（一）四十七军在衡阳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与在湘潭性质一样，军队要作深刻检查；（二）“衡革会”决不是革命的“三结合”，要打倒；（三）湘江大桥、仓库等重要地方，部队要派人协助造反派守护；（四）要尽快收回保守派枪枝；（五）军内和赵川的检讨，已搞了初稿，一定在最近搞出来；（六）同意三十日晚在长沙批斗赵川。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2011年9月3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6）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六节 青海省军区大规模屠杀群众

本节文献资料

一、青海省文革运动的开端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青海日报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

二、在一月夺权中爆发的斗争

三、镇压革命群众的二·二三事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晨八时，全城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表通令：

查青海省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自成立以来，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的操纵下，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铁的事实证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组织。

这个反革命组织大力排挤、打击革命力量，招降纳叛，纠集牛角蛇神和社会渣滓，积极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假批判，真包庇，假夺权，真保护，是青海省最大的保皇派；他们自封左派，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卑鄙行径，打击和瓦解革命群众组织，破坏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多次调动大批的车辆和不明真相的工人离厂；农牧民离乡，严重地破坏了工农牧业生产，造成城市生活供应紧张；大搞反

革命经济主义，利用金钱物质，封官许愿收买人心，拢络群众；私设公堂，非法审讯，采用围斗、殴打、绑架、抄家、抢劫、捣毁等野蛮行径和跟踪、盯哨等特务手段，身带石灰、硫酸、棍棒、匕首等凶器，打击、残害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冲击和围攻专政机关，抢劫犯人、殴打、绑架和迫害公安人员，积极为牛鬼蛇神翻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冲击、围攻军事领导机关。抗拒对《青海日报》和青海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殴打、围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甚至抢走武器弹药，绑架部队高级领导干部，抢劫军车。阻拦、破坏人民解放军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而举行的武装大游行，并公然喊“打倒解放军”、“撼解放军易，撼八·一八难”等反动口号！诱骗和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同胞，围攻革命群众组织，对抗人民解放军，企图制造民族分裂，制造流血事件；明目张胆地直接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直接攻击党中央，狂妄地提出“八·一八万岁”、“永远跟着八·一八闹革命”、“对八·一八红卫兵的态度是检验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等极端反动的口号。公开违抗党的方针政策，破坏十六条和二十三条，妄图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成果。盗用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名义，到处招摇撞骗，欺骗广大劳动人民，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庄严宣告：

一．从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该反革命组织中的小头目和指挥部门一般成员，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立功者将功折罪。

三．对受蒙蔽的群众一概不追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教育他们。使其擦亮眼睛，分清敌我，与那些反革命坏蛋彻底决裂，并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四．立即交出一切凶器、武器、电台及其他军用物品。破坏或拒交者，严加惩办。

五. 立即交出所有旗号、公章、证件、档案、材料、文件、信函、交通工具、广播器材、占用的房屋、积存的资金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违者依法严惩。

六. 自取缔之日起，不准更换名目，另建反动组织，有违者，罪上加罪。

七. “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派驻外省外地的办事机构，接到本通令后必须立即撤销，所有人员应即刻返宁回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有违抗者，依法逮捕严办。

八. 要求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积极支持和协助人民解放军及公安部门，坚决镇压反革命，团结教育受蒙骗的一般群众，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提高警惕，严防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青海《东方红》1967年2月25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年谱》条目记载：“在电话中听取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关于对冲击《青海日报》的造反派的处理情况报告后，肯定了部队的做法。”

四、中央文革召开青海问题调查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央文革召开第一次青海问题调查会。

关锋 戚本禹第一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地点：政协礼堂，接见者：关锋、戚本禹。〕

王相喜：（叙述自己在二月二十三日前后的见闻）

戚本禹：你们谁见过刘贤权？

张金莱 王滨友：谈判的最后一次他们推出了刘贤权。

（王相喜述说“孤儿事件”“民和事件”……）

冯国良：叙述“六·三社论”“民和”“孤儿”“胡天申”……

戚：“民和事件”就是那二十三麻袋材料？……

关锋：新青海日报刊登过。

金莱：名字是“风展红旗过大关”。

相喜：……

戚：“八·一八”把矛头对准谁？

冯：王昭、韩洪宾、午人、韩明……

相喜：……杨守礼。

戚：杨是“八·一八”开除的？

喜：对。（详细叙述“二·三”有关情况）

戚：（对关锋）捍卫队都说不是事实。

喜：二月十四军区要接管报社……抓青海日报的歪理……

戚：我们见了。

喜：……我骂捍卫队，有人硬讲我骂解放军……我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们不允许我喊，说我是“反革命”……我的耳朵都打流血了，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是公安厅（戚点头）……（又边听边点头）他们说我是冒牌三司我读了全称，他们说哪里是三司的？（戚、关付之一笑）……群众说，人家外地红卫兵来西宁革命，有缺点也不能把人家打成这样。……

戚：群众？

喜：……那个医院帮助我。

戚：那个医院同情你们？

喜：……二月二十三日……我的衣服被抢了，我现在的衣服都是别人的，……我喊“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他们说我不器张……那天十分冷，下雪，……两个无辜群众被抓，他们脱了皮大衣铺在地上叫我躺……（戚插问：哪里的？）……

（戚：二月二十四你已经不在报社了？）我还没讲完。……南滩监狱抓了八千多人……（关：八千多？）大院都满了……我可以保证八·一八没枪也没开枪……

（关：你在报社吗？）我们四十多个同学都在里面，我可以作证……“火车头”……咱们同学起先以为朝天放枪后来看人死了，流血了，倒下了七十多个，第二排又上去了，倒下了，第三排又上去了，又倒下了。（戚：为什么上？）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要保卫报社……我们的刘凤池也被打伤。

金莱：（对关锋）刘凤池你认得吧？（关点头）当时你接见我们了，（关又点头）

（关对戚：广播学院的）

喜：……他们讲这是林总来电……（戚：付之冷笑）

金莱：您看。（送上一份）

关锋：你们还有什么传单没有？

喜：……

滨友：××同志已经表了态？！

喜：把巩恩环同志定为“反革命”，巩最先为“六·三”社论平反。

冯国良：……章科伦、巩恩环等同学帮助组织了“八·一八”……

喜：……林总的……

喜：贫下中农红卫军。

滨友：他们中有地富反坏……

金莱：我们调查过有材料。

喜：……监狱的生活是很苦的，……一个老头讲：你到北京告诉毛主席（戚：那个老头是谁？）……夜间两碗稀饭……许多同学坚持不了……（我们在牢房里，那晚上军队去的特别多，传说白色恐怖加深了，狱里灯一会儿灭了一会儿亮了……我们就是死了，也有人能到北京去告诉毛主席）清华许宝生和我校的一个带了八天手拷，还带背拷……他们讲，你们不是坐牢，是集中审查……

戚：八·一八有机枪是怎么回事？！

喜：纯属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出于反革命政治目的的需要……

王敢雄：他们自己的。

戚：八·一八在报社内打死不同意他们的人是怎么回事？

众：（气愤不已，都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喜：……“火车头”真“勇敢”，有的“八·一八”打伤以后呻吟，“火车头”拿小锤一锤一个打死了……

戚：你们哪个在报社内？

张苗苗：我在二十三日上午五点还在报社，根本就没看见死人。

众：我们都在现场。

戚：有没有把解放军从墙里扔出去？

众：……

关：当时你们提引“红旗”的文章是不合适的……

金莱：我们诚恳地接受您的批评，“首都红卫兵”西宁分刊不应当把矛盾公开化。

（送交四份分刊）

戚：（翻阅）战士来信是真的吗？

喜、金：没错，我们有许多。张凯民被逮捕了。

喜：一个殷科长……

冯国良：我和王仲山在一起，为工作忙得不得了，眼睛都肿了。

戚：他没有搞妇女？！（就是那个……——对关锋）

喜：……

王振宇：军区还放出风……

戚：（拿出一迭估计是反面的材料提问题）报社有电台？（答：原来就有）报社有迫击炮、机关枪？（答：造谣？）报社内“八·一八”混进了坏人没有？（答：当时严格地审查过）

王相喜：抓我们人的时候，捍卫队有人背枪，我们同学亲眼见，这一点他们逃避不掉。

振宇：……

关锋：你们知道刘贤权这个同志怎样？

众：……

关：大街上已贴了罢刘的官？

戚：你们认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喜、众：我们认为他是好人，刘在三干会上揭王昭最厉害。

喜：二十三日军区内还开会，据了解开枪问题还不能一致。

戚：（问那里的组织）

关：“革命派内部打内战”口号是错误的。

戚：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

金美云：“二·二三”事件和王昭有关系。（详谈）（关重视）

戚：你讲的“二·二三”事件与王昭有关系根据是什么？

金：王先赞讲的。（他是公安厅工作人员）

戚：王从哪里来的话。

关：王先赞讲的。

（李、孔、胡、陈代海进来）

陈代海：（详述二·二三事件）

（关、戚异常重视）

戚：谁先开的枪？

陈：军区先开的。

戚：报社有没有枪？

陈：没有。

戚：没有迫击炮？（没有！）没有机关枪？（没有！）没有手榴弹！（没有）

陈：我们五个人，三个没举起手来，当场被打死（工人详谈）

戚：程××不在青海吗？

陈：……

关：青海日报社中有没有这回事，报社内不同意“八·一八”的人打死，烧死，有没有？

陈：没有。

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陈：没有！我厂捍卫队还讲：“江青同志两次到西宁。”

戚：关锋同志提的问题你能确切回答。

陈：没有，他们扬言叫我们去看尸体，至今未带去。

戚：你们支持“八·一八”就是和“八·一八”一个观点（一回事）。你们打了人家没有？

关：进来报社的有无年纪大的流氓？

戚：坏人。

陈：我们厂的没有。（陈曾下厂劳动）

冯国良：他们现在在北京还抓人。

戚：（十分气愤）北京不许抓，中央有通告。

金莱：他们是秘密抓人。

戚：（对金莱做手势，示意保护起来）

关锋：最后我说两句，我们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听，作调查研究，不能发表任何意见，不能回答任何问题，这一点同学们是理解的。我们绝对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三次强调）相信他们的英明，只要是革命

的就要坚持，真理可以战胜一切，我们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能在复杂的事物中，洞察一切……。我着重讲一点。今天在这儿谈，同学们回去以后不要讲青海的问题，我们相信革命的同志会遵守革命的纪律。我们会想一想对哪个阶级有利。

戚：不要印传单，你们也可以听听反面意见。

戚：你们的要求我们转告伯达同志。

关：我们回去研究。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记录

〔时间：夜至22日凌晨，地点：政协礼堂。出席：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肖华。〕

王力：宣布一条，这里什么话都可以讲。

陈代海：二十三日早上六点多钟戒严了，11点左右……

肖：两点左右，楼有多高？

陈：有五层多高……有爆炸声不是手榴弹就是……我们也不敢看了，过了一会儿，×××就都进来了。……我亲眼看见一个解放军讲：昨天你还和我辩论，捍卫队就打你。

戚：捍卫队打人？

陈：打，×××也有人打人……

张惠英：我在报社，哪里都可以去。事后他们对我讲，这些死人都是从帐篷里拉出来的。

戚：你多大？爸爸干什么？（答……）报社有没有枪？

张：没有。我有证件哪儿都可以去。

肖华：报社楼上有没有枪？

金莱：我在报社，楼上我都去过，没看见枪。

戚：二十三日你们谁在楼上？

王建义：我在。……没看见有枪。

戚：小桥死人最多？

陈存秀：我在小桥。……军区的喇叭先宣布八·一八是“反革命”。

戚：军队的车宣布的？

陈：……有人叫我把头低下，我就听到前面有枪从北向南打。

肖华：谁先开的枪？

陈：军队从北向南打。

王力：步枪？机关枪？

陈：步枪。

（肖、王、关看图）

关：第一枪喇叭没打坏？

陈：11 点停止广播。他们叫我们 11 点停止广播，否则一切后果由八·一八负责。

王力：他们 11 点 10 分开枪。

陈：……有四五排手挽手……（肖分外注意、戚微笑、关吸烟安祥视肖）

关：四五排？工人、学生？

陈：工人们都手挽手站着。……（突然咽住不讲）

关：讲吧。（无声）那些人怎么死的？

陈：……两点左右从宾馆打来两颗信号弹，两个教练弹，天空有炸开飞的纸机，听到的全是机枪声。

关：不是报社里先开的枪？

相喜：我们的同志在里面。

陈：工人们一排排的倒下，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撤……我们被抓，下午四点捍卫队来抓人，抓出的人都被打的鼻青脸肿，剩下的人，我们学“语录”，唱想念毛主席……后把我们红卫兵放了……

于桂梅：……那天形势紧张，我们有精神准备，因为知道 11 点要采取行动。

肖华：哪个宾馆住了队伍？

滨友：里面有机枪、探照灯，可以打到小桥。

关：为什么能打到？

王力：那个地方高？

肖华：几挺机枪？

滨友：两挺吧，不详。

戚：有照片。（送上王力、肖同来看）

于桂梅：……北邮的宣传队出去宣传……下一时，打起了枪，不知打到哪儿，只听枪声，报社里面的师傅指枪膛说：“你朝这儿打。”军队叫：不要慌，我们把枪对准一小撮反革命的。停了一会儿，一点多时，形势紧张，一会儿外面枪声紧，大家都去了，正看到一卡车×××在打枪，朝前面一堆人扫射。当时我想不会打死人，没关系，有假枪。后来倒了一排又一排，有人跑，跑到那边也倒。后来在倒下的一堆人上有一人起来了，脸上全是血，我们才知道人打死了。后来车上的人都下来冲进报社了，……叫报社里的人交证件、主席纪念章。……后来了人，照名单宣布反革命，（主要是坚守报社的八·一八和红宣兵）当时抓起一些人捆起来打一顿。一直没见的捍卫队这时全出来了，（关、戚冷笑）来一批老捍抓人，打人，一直到七点，押我们，勒令举手，我们不举，就×× ×××，半路叫我跪下报名……到了省委，他们叫我们按单位分开……后放了，路上见全城戒严。

关：这是二十四日了！

于：我们刚一进厂，捍卫队就喊“站住：”，我们没进，到兰州，想汇报中央。

肖华：（向小陈）你们那天广播了什么？

陈：“首都红卫兵报”“通令”

肖华：没别的？

陈：没有。（上交肖一份通令，肖看）

关：（问帐篷里的情况）（康老、伯达进厅，热烈鼓掌）（戚将麦克风头转向伯达，伯达又风趣地把麦克风头转向戚）

相喜：（重复 13 日汇报……康十分注意听）

（伯达翻阅青海日报）

王：……我挨了一拳。

戚：谁打的？

王：不知道……我清醒过来以后，有四个背枪的×××……他们打我，给我一张纸，我写了个强烈抗议，他们上来个人打了我个耳光，打完了以后提出了我这是 19 日。23 日就发生了事（重复十四日事）（李平安，孙祥梅入场）。在我们牢一个人受了伤，脸上挨了枪子儿，头被砸烂。我们的男、女同学都被绑起来。有的同学被打的厉害。我们听了第四期社论之后非常难过……给我们同学带上镣铐。每

天给两张纸，一张写交代，一张写揭发……。放风的时间一天就五分钟，阴森森的。我们的一个同志在现场也没回来。击倒了一个邮电管理局的同志，从腹部穿过。（康生、伯达一直注意听着）又击中刘凤池……有七十多个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刺刀刺了眼睛……那天大约有八千六百人被捕……我们没有看到“八·一八”有枪。他们讲“八·一八”有枪，又拿不出来。一个×××又讲没枪。三月一日下午五点钟，他们把我们 from 监狱里押了出来，送到了党校，进行“整训学习”。（实际上，当时党校是一个监狱外的监狱，首都三司和外地红卫兵并没有获得解放）当我们四十四个刚从南滩监狱里出来的同学，被押到党校，强迫我们去礼堂开会，听“卫戍区司令部首长”报告，我们刚进会场，一个“卫戍区司令部首长”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回答说：“南滩监狱里来的”！！当他听我们的口气不对时，他讲：你们不是从南滩监狱里出来的，你们回去后千万不要告诉你们的同学和老师。你们是“集中审查”的，是因为没有地方，借那里（指南滩监狱）的房子用。……（除康老外，众首长皆笑）我们大的二十二岁、三岁，最小的十五岁。（康老笑问张惠英多大？）

戚：他（指张）在报社，你谈谈吧？

张：……没想到我们是反革命。（众首长皆笑）我们听到是炮声，同学们讲是枪声。（众首长又笑）

肖华：你听过枪声吗？

张：连串的没听过。……三司的宣传车讲我们要坚守岗位。三司的念语录、演节目，许多工人同志都哭了。他们问大家怕不怕，工人答不怕，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两点左右枪声特别密。我们都吓醒了，……刺刀对准了我们，叫我们举手，我们不举，他们讲你们这样顽固，用枪托打我们……他们念名字许仲仁……这些都是反革命，叫我们互相检举，我们都不说话，他们就让进来的捍卫队、“火车头”认本单位的人，认出去打耳光、大皮鞋猛踢，抓完大头目，抓小头目，再抓广播员打……一个工人受了重伤，医院不给包，这个工人活活地打死了……跪不住就打，有的人就活活打死了，我们的同学有的都哭了，我要上厕所他们不叫，我就跑，骂我小顽固，（康老冷笑）我出来以后，他们就打。……我带你院里参观，朝里院说：“好，你们八·一八自己打死自己人，烧死，脑袋都打掉。”这时已经过了三、四个小时了，不叫别人看，只叫捍卫队看，对我讲：“你看这个小女

孩，脑袋都被砸烂了……”他们说：“你们打死自己想投降的人，看你们八·一八”！以后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们从帐篷里搜出来的，已经烧死好多天了。”……有些帐篷我经常去，根本就没有见过死人，他后来就叫我回去。我和同学讲了，同学们都不相信。一个×人上来就打，揪掉了我的头发，边打边骂，还抢我的纪念章，我装在口袋里不给，旁边一个人讲：“纪念章不要也可以。”（康老写条传与伯达，伯达传与戚、关……关唤人，关、戚交换意见，伯达过去了。）……他们不光有枪，还有圆盘的枪，（康老点头）……我们上了车……，

肖华：（向张）与你讲话的人（说八·一八打死解放军的人）从哪儿进来的。

王相喜：（答肖）……在火车上抓我们在车上的同志……他们讲打死了战士，用棺材游行，上面写着“×××烈士”，士兵们的脚趾头都受了伤，“火车头”真“勇敢”（重复 14 日情况）……一个子弹打伤了脖子的同志，本没死，被剪刀绞断了咽喉死了。

肖华：没开枪解放军怎么伤呢？

王相喜：（解释）

伯达：你们的同学回来没有？（答：没有。）应回来反映情况。

肖华：打了电话，昨天……。

康老：你们有数没有？

众：交了。（指同学名单）戚：（对康）给他（指肖）了。

肖华：（对金莱）我打了电话了。

戚：你们在场的人在报社看到枪了没有？

众：没有。……我们里面挤着睡。

戚：里面睡了两千多人。

康老：里面是哪个工厂的工人？

众：（对小张）你去帐篷里去看烧死的人有几个？

张：四个。

肖华：死人像几天了？什么样子？比如脸……

张：和别的死人的样子一样。

肖华：是烧死的吗？

张：×人讲是烧的。

贾：我们参观时，他们讲是硫酸烧死的……（戚对肖笑）一个××讲抄去四挺机枪、子弹是在地道里，我们要看，他讲地道口还没找到呢？……血还是鲜红的。

肖华：有枪眼没有？

贾：他们不叫去，划了一道白线，说是现场。

肖：是现场？

小张：我看时，他们从帐篷里找出来的，不是现场。

肖：你们参观尸体有多远？

小张：……

肖：几个烧死的？

小张：四个。

肖：（对贾）烧死几个？

贾：我见烧死的有一个，胸口有一滩血，其它都是打死的。（戚拿出一迭照片给参观过的人看）

戚：是不是你们参观过的？

小张：我看不出来。

（康老点几个有关的学院）

众：……

康老：（指了一下王相喜，问各学校的同学）（对农机三人）你们二十三日在现场，你们看到有枪没有？

三人：我们 14 日进去没看到。

康老：工人换班，有没有可能带进枪去？

众：没有。

王相喜：……（伯达出去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有几个××××同意开枪动武。

康老：是那个×××师。

众：×××部队。（肖对康耳语）

吕：我们怕××栽赃，我们进去时连小刀全不让带。……

相喜：根本没逮捕证，只要是同意“八·一八”全抓。

（金莱交穆欣一份“特大喜讯”，问：真的假的？穆：我不知道，我问肖主任。给肖华）

（金莱向穆欣答：林总那个是假的，兰州那个查一查，看是否青军欺骗兰军）

王建义：……

康老：……

王建义：我们厂的“老捍”，有人穿着军衣，领章一样不差，有四个人我们认识他，其它厂也可能有，我们厂的四个人我认的准。报社中的帐篷，我负责搭了一部分，每天都去帐篷里看一看，有没有烤火，烧坏了的，所以我保证里面没烧死人，联络点我也去，保证没有枪。

康老：他们有一种说法：……报社里有许多人原是八·一八，后不赞成八·一八，报社中的人就把他打死，是否在这 13 个人中有没有要出而被打死的？

众：没有，造谣。

王相义：……

（金莱向穆欣，难道烧死的还有血迹吗？穆对金莱耳语：他们军区做了许多假象，核对一下，可以驳倒他们）

相喜：……八·一八在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上非常好，当我们拖住报社里“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时，他们全有意见。（康频频点头）

王建义：解放军吃饼干时我们送水，他们问，你们那么多人怎么烧水？我讲就是我们不喝水，也要让解放军喝水。（当时他们的连长不在）他们讲你们好，不过我们是执行命令。

康老：你们怎么辩论“六·三”社论？这与我有关。

众：我们认为好，现在他们要翻案。

金莱：青海日报有个人要找您辩论。

康老：要把我抓走。（笑）陈逸怎样？在北京？

金莱：他在青海没有生命安全，现在要抓他。

康老：他现在在哪儿？

答：在地院。

康老：怎么在地院？

金莱：“民和”事件整理材料，老冯是地院东方红的，他谈一谈。

冯：（谈黑材料）

康老：是不是要烧？

冯：都要烧，据说已经烧掉了两车。

康老：陈逸那时就来了？

冯：……

康老：程光远怎样？

冯：……

金莱：赵永夫态度恶劣。（述谈判情况，去兰州情况）

康老：（问一些现象）轧死一个女工怎么回事？

（关、戚在一边谈笑自若，肖聚精会神）

康老：不是硬冲的！噢，噢……（康老关心二·三事件。谈得有些乱）

胡长生：（述二·三事件）

滨友：（介绍刘贤权，送上“简报”，关锋同志交给康老）

康老：杨植霖怎么样？

胡长生：（介绍杨）杨后来支持八·一八。（康点头）

康老：高克亭怎么样？

滨友：八·一八叫他写材料写了不少、……

胡：他被八·一八游过街，也被捍卫队游过街，他支持八·一八。

康老：为什么对高克亭游街？

胡：他搞经济主义，八·一八游了他一回。

滨友：李芳远也支持八·一八，原来他轰王昭，最近听说和军区发生冲突有点问题。

康老：韩明呢？

陈武军：……

康生：军队除了赵永夫以外，你们认为谁还不好？

滨友：××……

胡长生：一月三十日晚，××和刘贤权接见外地红卫兵时讲：我支持八·一八，我完全同意刘司令员，时隔不久，完全颠倒过来，大骂刘。

滨友：冯国良、相喜：电讯从二月二十三日断绝。

冯：2月23日我感觉……因为没电话了。

金莱：（递给肖主任一份要求，即被没收的红卫兵财物，请求肖指示青海军区归

还，肖阅后向金莱点头)

滨友：军区内支持八·一八的同志被打成反革命的，都百般折磨（戚：你对肖主任讲)

肖：多少人？

（答：十一人）。

康生：你们有几个中学生？（举手）这么多，都成了反革命了？（笑声）你是广东的。

吴：对。

康生：怎么串连串青海去的？

戚：青海好玩？……（场内十分活跃，……）

康生：八·一八发展组织街道上不纯？

胡长生：……八·一八组织大部分是纯的。

戚：有个王仲山搞有许多女人吗？

胡：有个人经常跟着他，但决没有这样的事。

戚：不是一个人！

康生：你们有人伪装解放军把枪运走了？

众：（十分气愤）根本没有！（金莱对穆欣：造谣造到这种程度了！穆欣笑）（康把麦克风转向肖）

金莱：“人民日报”三月十二日二版头条最后一段怎么办？

王力：恐怕要更正。

关：今天讲的大家出去不要说，什么那个同志参加了，……

康生：我们正在调查，你们不要给我们制造困难，你们一说中央文革支持你们，结果你们倒霉。你们造反有理，有理何必急呢？无理才急。在调查时间不要乱说，不要打电话，发信。

众：他们抓人！

康生：在北京不许抓人！要抓必须通过公安部、卫戍司令部，还有中央文革，这一点可以讲。

王力：今天就到这儿吧！（鼓掌欢送众首长）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时间：晚至 24 日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被接见单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代表，首都三司驻青海联络站代表，地院东方红代表，北航红旗赴青海战斗队成员。接见首长：周恩来、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杨成武、穆欣、曹轶欧等。〕

（总理依被接见名单逐个点名，在点名过程中，戚本禹同志和曹轶欧小声说：“机枪对这些小孩子打，真不象话”）

总理：张惠英。

张：我。

总理：你多大？（张答）

总理：黄建强。

黄：我。

总理：多大？

黄：十五。

总理：你更小。

（顺次点名，问姓名、单位、年龄）

总理：李春荣。

李：我。

总理：高个子，山东的。

江青：（指康老）两个山东的高个子。（众笑）（依次点名）

总理：都是北航的。

戚本禹：都是“反革命”。

（总理点名时，诸首长评论同学们的高矮）

总理：张苗苗。

张：我。

康老：多大？

张：十五。

戚本禹：（对众首长）她名字叫苗苗。

总理：北京占多数。

总理：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刘贤权同志来了嘛？张江霖同志来了嘛？

（刘、张回答）

总理：你们自由了！你们解放了！

总理：刘贤权同志多大了？

刘：五十二。

总理：张江霖同志多大了？

张：五十一。

总理：刘贤权你哪儿人？

刘：江西吉安。

总理：张江霖哪儿的？

张：四川。

江青：我都没有听过你们的诉说，今天我们都来了，文革小组、军委的同志来听你们意见，你们讲吧，青海的同志讲，不要重复。

总理：你们讲一讲吧！

戚本禹：（对张惠英）你讲讲吧！

（张惠英开始叙述二·二三事件见闻，在讲到被赶到报社大院里时。……）

总理：多少人？

王相喜：一千八百多人。

总理：报社原有多少人？

众：二百人左右。

（张惠英继续叙述，在讲到关于烧死人的问题时）

总理：是不是烧死的？

（张回答。我也没见过烧死的人什么样，烧的腿一面烂了，另一面还挺好的……

总理边听边点头）

（当张讲到持枪者威胁：“你再瞪眼睛，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时，康老冷笑）

（当张叙述到八·一八被迫跪了一大片人时）

总理：有多少人？

（张回答，并继续叙述暴徒毒打八·一八革命派情况）

（杨成武同志进来）

总理：你们的同学有死了的没有？

（张指陈存秀说）他弟弟被打死了！

总理：你弟弟叫什么？

陈存秀：陈存宣。

总理：（你们哪一位知道得更详细一些，补充一下。

（于桂梅同学补充，当她谈到守卫报社时）

总理：有多少人？

于：有两千人。

（康老对总理作解释）

总理：你们都在里面？

康老：他们都睡在里面，很拥挤。

（杨植霖同志于二十一时三十分进入厅内）

（于继续叙述，当她谈到八·一八革命派被迫用绳子捆绑下跪时）

戚本禹：（对江青）他们竟敢不执行八条！

（于继续叙述，当说到八·一八革命派被押解到省委时）

总理：省委？

于：由省委干部审问，审问的全是平时造反精神最强的。……我们在雪地上冻了一夜，有的工人几天也没吃，我们看到省委干部审问，这完全是反扑，过去被斗的，起来斗造反的。保皇派斗争造反派，一些中……都不敢讲话了。一些当权派纷纷倒向保皇派。那几天在大街上抓人、打人是很严重的。

总理：事后你看到被打死多少人？

（于继续叙述，讲到北桥头死人时）

总理：桥头在报社外面？

关锋：那儿死人最多。

张江霖：在报社西北角。

（于继续叙述）

总理：你在离桥头不远的地方？（于继续叙述）

总理：保卫报社的有多少人？（回答）

总理：二十多所学校，有多少人死了？

××：不清楚，消息都封锁了。

总理：你们都什么时候离开的？

××：二十四日。陈代海：我是三月六日离开的。

总理：有人抓到军队监狱里没有？

（王相喜叙述情况，说明监狱很大）

总理：那么大？国民党留下的，还是我们修的？（张江霖、王相喜分别回答）

总理：在哪儿？

康老：（对周总理）他们都在一个房间里。

（王继续叙述，讲到军人宣传“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前途光明”的内容时，戚本禹同志冷笑。当王讲到外地同学被关押到党校时）

总理：多少人？

王相喜：四十几个人。……

总理：什么地方？（王继续叙述党校内状况）

总理：外地同学有被打死的？（王继续叙述，说到《火车头》用锤子击伤员时）

总理：你知道的一死一伤……（王叙述到和军区赵永夫、××等发生争执时）

总理：你们和军区谈判的情况怎么样？（张金莱详细叙述谈判经过）

（杨成武同志小声对曹轶欧同志说：“赵永夫在搞鬼！”）

总理：军队哪天武装游行？

（王滨友、胡长生详述武装游行事）

总理：多少辆军车？（指二·三军队游行）

（回答：二百五十多辆）

康老：二百五十多辆？！

（胡长生谈到有公安厅车子时）

总理：公安厅几个车？（回答）

总理：张江霖同志，你们几号来的？（回答：三月九日）

总理：你知道 15 号搜枪的事？

（张回答，在谈到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支持了右派，打击了左派时，总理不住点头）（当张谈到王文英在谈判时被赶回来时）

康老：赵永夫去了。

(当时叙述到事态继续发展，要发生流血事件时，总理点头)

(张继续叙述，在谈到自己被轰时)

总理：刚才他(指金莱)讲的，“……

(当张叙述到“我也成了反革命”时，总理笑)

(当张叙述几次谈判时)

(戚本禹同志对身边张苗苗说：他也是按林总“指示”办事的。十号他把刘贤权推出当“替死鬼”了。)(众笑)

总理：刘贤权同志你是怎样被斗的？

(刘贤权叙述，在谈到军区党委讨论同意支持八·一八时)

总理：赵永夫同意了？

(刘继续叙述，说明赵是同意的，但刘对赵有警惕，并说：我看捍卫队一方进军区造我的反，揪我，斗我也算是冲击军区吧！)(首长们和同学大笑)

总理：赵永夫是第一副司令员吗？(刘回答，并继续叙述)

总理：军区有电报给军委吗？(刘继续讲，在讲到八·一八为主体的三十八个组织和人数时)

(江青同志向关锋同志表示赞许刘对情况的了解和熟悉)

(当刘谈到军区机关的“紧急倡议”时)

肖华：是不是事先写好，印好的传单？

(刘答不知道)看来是事先写好的！印好的！

(刘回答。刘在谈到军区机关成立所谓“三个团”时)

周总理：成立了三个团？

(刘继续叙述，谈到二月十日军区开会决定刘贤权接见八·一八和三司代表时)(总理问刘过程中，杨成武同志对曹轶欧同志说：“刘贤权是从东北四野调去的……赵永夫有问题，历史上有问题”。

总理：开会谁来主持？

(刘继续叙述，在谈到首都三司拒绝和刘谈，并说出自己的想法：“赵永夫不是说三司再三找我吗？”时，众首长大笑)

(当刘谈到二月二十三日赵永夫接电说林总支持，准备检查时，诸首长皆笑。刘继续谈，并说明是叶剑英调刘、张来京，后受青海军区监视情况)

戚本禹：总理呀！关锋同志那天见他，等了两个多小时。

（肖华作了插话）

（刘贤权说明：“许多重大问题赵永夫都自己作主而且态度很硬”时）

总理：同志们！今天不再继续开了，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全了解了，北京三司同志派两个代表再讲一讲，青海也派代表谈。除了这里讲以外，不要再向外讲了。

戚本禹：他们还是守纪律的。

总理：你们回来的同志住在一起，外地（指青海）的也是，住在一起。问题很快会解决了。你们一定会遵守革命的纪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杨植霖同志也是同情你们的。这个问题快要处理了。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打印...刷新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时间：24夜—25日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接见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杨成武、关锋、王力、戚本禹、穆欣、肖华。

被接见单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原首都三司驻青海联络站全体人员、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首都及外地赴青红卫兵。

青海方面人员：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张江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书记高克亭。

其他人员：赵永夫（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王昭（青海省委第二书记）、张晓川（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洪（×××副师长）。〕

（因去晚了，前边有一段话没听到）

总理：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楚了，首先，要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我们没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

总理：是他自己（指刘贤权同志）不工作吗？

赵：（结结巴巴，满头流汗）

总理：停止了刘贤权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二十多天了，难道你不知道嘛？……你

不是党委委员吗？你们成立了“指挥部”，上报了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没有？

赵：没有。（态度极不严肃极不老实）

总理：现在，你在中央同志面前回答问题，你态度必须老实！

康老：你到指挥部，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军区？

赵：我代表军区。

总理：你们没有得到军委批准，停止了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赵：我不知道。（态度相当恶劣）

总理：你代表军区嘛，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赵：（支支吾吾）

总理：兰州军区来的答复，你们认为怎样。

赵：（沉默）

总理：（十分愤怒）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

赵：他们都不同意。

总理：你同意吗？

赵：我也不同意。

总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赵：××、×××、××都不同意。

总理：围攻青海日报社谁下的命令？

赵：大家研究的……

总理：你是个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十分严厉）

赵：（沉默）

总理：赵永夫，你刚才没说清楚，刘贤权同志二十多天都没有自由，你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赵：刘贤权同志不敢工作，不敢负责任，有情绪。军区党委王文英负责，他在场。

总理：（声色严厉的）军区谁负责？

赵：（诡辩）王文英副政委……

总理：你没有责任吗？你们成立联合指挥部，你报了军委和兰州军区吗？（十分

严厉)

赵：报了，批没批不清楚。

总理：在中央面前，你要老实说！

赵：（支吾）我不清楚报没报。

总理：军区的指挥权让给指挥部了！你是军区副司令员嘛！那就把军区的指挥权让给联合指挥部了？

赵：不是让给，不让给已研究好了，我给常委汇报了。（支吾）

康生：你是代表军区还是代表个人？

赵：代表军区。

康生：你是代表军区了？！那文化大革命你就是代表了？

赵：我是军区代表。

总理：十六号电报兰州军区没回电就这样干了？谁派刘斯起到兰州军区去的，你不知道？林副主席给你的电话呢？二月二十三日对报社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镇压，（质问）指挥部谁指挥？

赵：×××指挥。

杨成武：（质问）

总理：×××部队张洪回答。

康老：（严厉）谁下的命令？

张洪：领导小组决定……

戚本禹：（生气，重令）谁下的命令。

张洪：……

赵：指挥部下的命令，我去执行。

总理：你的镇压反革命组织报告，你给我的信，白纸黑字，你负责。写报告，打刘贤权，汇报中央文革都是你赵永夫。

赵：我不知道。（支吾）

康老：你什么都不知道！

肖华：那天你还在楼上指挥。（总理、杨成武、康老同声追问赵永夫）

赵：（不正面回答，乱扯）

总理：你别谈了，别占时间。（问××师师长）你和赵永夫谁指挥谁？

××：不归他指挥。

总理：那天你们行动谁指挥的？

××：……我们派了两个排。

总理：谁派的？

××：共同研究的。

总理：你是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

××：当时×××、×××……

总理：你们都不老老实实的讲问题。刘贤权同志你简单的讲清楚。

刘贤权：十号上午开常委会，我们通知赵永夫开会，他单独行动不来。布置围攻报社的事，部队几乎全是军区的部队，主要是独立师、独立团的。主要是赵永夫调的。

总理：对于军区党委停止你的一切职务，你表示怎样？

刘：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刚听同学讲，才知道停止了我的职务。

总理：张江霖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张江霖：联合指挥部名为造反指挥部，实际上是赵永夫指挥。一月三十一日“机关造反派”叫我们答复问题，不答复就跪下。赵永夫在后边坐着。（总理：他是“造反派”的头子嘛！）……林山想提意见，王文英讲，提也不行了，部队已经调好，调了二百多辆车。

总理：（对二〇五张晓川）谁调的车？

张晓川：赵永夫。

总理：你的任务是青藏公路，为什么调车？总共有多少辆车？占多大比例？

张晓川：有××辆，接到中央关于支持左派的命令……（罗罗嗦嗦地从头说起）

总理：你把话说简要一点。

康老：组织指挥部是你先找赵永夫，找××师陈立英，怎么不讲这个问题呢？

张：是。我想讲的就是这个……（众讽刺地大笑）

康老：（不满的）我讲的是游行，那是组织指挥部。

张：……

康老：你们的指挥部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二月十八日。（总理：不对）是一月十八日。

康老：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一月十八日就组织了。

张：（重复，罗嗦地谈起来）（众首长不满）

总理：二月三日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联合指挥部讨论了？

张：讨论通过了。

总理：谁指挥？

张：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

总理：现场上谁指挥？

张：赵副司令员，×师长。×××在前场指挥，赵副司令员在宾馆楼上指挥。

总理：从指挥部成立你就参加活动，还是一月二十七、八号，你就参加联合行动了？

张：在以前就参加活动了。

总理：你对八·一八有什么看法？

张晓川：没调查之前，从整个来说，我对八·一八看法是印象较好，冲劲较大，但对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看法不一样。

总理：差别在那儿？

张：组织不纯。

康老：……有个别坏分子，就不是革命组织了？

张：大方向不对，对准贫下中农。

总理：谁见到了？

张：北小街……“四不要”，党团员不要。为四清翻案。

康老：有文件吗？你听谁说的，还是看见的？

张：调查的。

康老：谁调查的？

张：各兄弟部队。赵永夫的兄弟部队，张洪的兄弟部队。

康老：哪个兄弟部队？

张：刚才讲的。

康老：赵永夫的，是吧？

总理：你对青海日报有什么看法？

张：部队反映比较大，不能如实反映情况。在元月二十九日夺权，军队支持问题，实际上是送权，杨植霖同志几次开会，决定送给八·一八。那次报道不真实，开会一万一千多人，报导十几万人。我们认为没有按主席指示办报，青海日报变成八·一八战报。

关锋：不登捍卫队的就是八·一八战报？

总理：出了多少天报？

张：（支吾）三十二天。

关锋：三十四天！三十四天报都看了？

张：都看了，要背背不出来。

关锋：三十四天报纸，他有没有传达中央精神？你们讲，不登“人民日报”社论、“红旗”社论、“解放军报”社论，完全不是这回事！三十四天报纸我们都看到了、社论都登了。他们还自己出了文章反对经济主义。只有一天迟了一天。

总理：你们就是想找借口，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总理：简单点，你的报告上都有！）以前了解有枪。

总理、康老、关锋：现场有没有？

赵：（罗嗦，文不对题回答）

康老：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当时没搜出来。

戚：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语无伦次）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全场讽刺地大笑）但没搜出来。

总理：现场上怎样？

赵：有弹壳。

（众首长怒，王力、戚本禹拍桌子）

王力、戚本禹：（怒问）没枪，怎么汇报有枪？

赵：没搜出枪。

总理：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这么多群众！

（马浩：你说我们三司四人是机枪手）

赵：据一些人的口供。

（又一同学说：他们是逼打成招的！并举了一例子）

总理：（十分生气）没枪你说有枪，打死那么多群众！

赵：宾馆上有枪眼。

总理：制高点上有几个方面的枪交叉的，你回答！

杨成武：制高点都被你们控制了。

赵：以后布置我就知道了，我们看到从人民浴池打到宾馆的。

总理：打死那么多群众。

叶群：（气得流泪了）放枪，对革命群众那么残酷，还造谣，伪造林总来电。

总理：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愤怒地站了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不叫打，但管不住。

（总理拍桌子，叶群、关锋同志站了起来！）

叶群：（严厉地责问）你还说林总来电，还感动得满脸热泪，什么时候给你来的电？

赵：我接电话，问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说是。

叶群：林彪同志没有打电话！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有接到电话。24号听到此事，毛主席、林总非常气愤，下令调查此事。

伯达：你是造共产党的反，造无产阶级的反。

杨成武：纯粹是造谣！为什么造谣！

戚：当面造谣！

杨成武：（万分愤怒）没打嘛（指电话），你为什么说打。

总理：到底打死了多少人？

赵：死伤二百六。

总理：你去现场看了吗？

赵：没有。

总理：这么大的惨案，你身为副司令员还不到现场去看？

叶群：（愤怒）你没有人性！你玷污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没有你这样的！真正

的革命战士都哭了，你惨无人道。

总理：对！你只拣到一些弹壳。

（赵想推给兰州军区）

总理：你欺骗了兰州军区。他们也是根据你们的调查材料，也没有看到枪。

叶群：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知道不知道？

总理：到现在你还认为是对的吗？回答这个问题！

赵：经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通过常委共同研究，统一认识的。

刘贤权：我不同意。

总理：刘司令员就不同意。

赵：他不同意。据说是有机。

（众气愤）

总理：别说了。面对这么多群众，你还有点儿共产党的气味吗？

赵：（沉默）

康生：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赵不答）

总理：你是哪儿人？

赵：河北正定，参加了游击队。

戚：谁的游击队？那一年？

赵：三七年。

总理：你怎么到的江西？

（赵谈历史）

总理：你什么出身？哪个庄子？还有人吗？

赵：贫农。李家庄。还有父亲……

康老：母亲呢？

赵：母亲早死了。

康生：你小时候读过书吗？

赵：没有。

康老：怎么识的字？

赵：参军以后认的。

康生：参军以前干什么？

赵：务农。

康老：还干过什么？

赵：当过二年国民党的兵。

康生：所以我问你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戚：挤到了边才说。

康生：谁的军队？

赵：教导纵队。

总理：哪两年？

赵：三三年到三六年。

总理：三三年到三六年在什么地方？

赵：在南京。

总理：怎么跑南京去了？

赵：当地招兵。

康生：什么人招的？

赵：不知道。

康老：招到哪儿去了？

赵：检查身体后到了保定。

康生：你不是务农吗？怎么当兵？

赵：生活困难。

康老：多大岁数了？

赵：51岁。

康生：在南京受过训没有？

赵：受过训，教导纵队。

康生：加入国民党没有？

赵：加入了。

康生：在哪儿？

赵：在南京。

总理：你的教导纵队和我们打过仗没有？

赵：没有。

康老：受训多久？

赵：两年多。

总理：三六年？你哪一团队？

赵：（支吾）只有两个团，大概是一团。

总理：哪一连？

赵：记不清了！

总理：哪个团？哪个连？

（赵：答不出）

康老：原来你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人啊，教导纵队。

赵：哪一连我记不清了，团以下是营、连。

（康老直笑：你是军人怎么流这么多汗？）

康老：下文呢？36年以后呢！

赵：回家了。

康老：为什么回家？

赵：没钱给我。

总理：我问你，在西宁你捉了多少人？

赵：报社数字我不清楚，报社有两千多，后来大部队都放了。

总理：你几号离开的？

赵：24号到了兰州军区，以后到了这儿了。

总理：你们用了南滩监狱吗？

赵：不清楚。

总理：他们都是从南滩监狱出来的。

张洪：用了，在南滩。我以前去过，我们搞警卫，关的什么人我不清楚。

赵：可能……

总理：你知道“二·二三”后同学、工友共关了多少人？

张洪：不知道。

赵：统计是一千七、八百人。（众怒）

总理：十七、八天了，你的××师作警卫，关了多少人数都不清，你怎么这样回

答问题？

张洪：……到最后。

赵：总理请允许我讲。

总理：讲什么？

赵：军区。

总理：你不是来搞“三结合”吗？你在北京讲过。

赵：没有。

关锋：那天康老、伯达都听了，有录音，有记录。

康老：那天晚上你谈话有记录。“三结合”对象是谁？你认为那个好？

赵：我没说谁是，没这样讲。

康老：有记录，你怎么讲的？

伯达：你讲了一个人。

赵：王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他没讲什么。

康老：你这个人一点不说老实话。

戚本禹：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儿脸皮都不要？一点儿脸皮都不要。死不要脸！你讲王昭这个人好，有干劲、有魄力，群众拥护，说过没有？

赵：我说了。但是……

总理：王昭在吗？王昭你说，你原来认识不认识赵永夫？

王：不认识。

总理：你什么时候摔伤的，到哪儿去了？

王昭：在陆军第四医院，一月十二日离开西宁，以后到了洛阳。

总理：怎么到了洛阳？

王昭：到洛阳不用开刀。

总理：谁跟你去的？

王昭：一个秘书，姓宋。

总理：哪天到洛阳？

王：二月十三日。

总理：不对？

王：一月十三日。

总理：在西安呆多久？

王：二月六日离西安，二月七日到北京。

总理：写信（给我们）是几号？

王：三月十九日。

总理：你是个省委书记，中间这么长时间，中央不知道，家里也不知道。

王：家里和谁也联系不上。

总理：怎么不向中央报到？

康老：为何不向中央报告？我们还以为你在西宁呢？！一个多月，到处找不到，为何一点不向中央讲？

王：我养病……

康老：你一点儿也不说真话。

王：打电话说中央允许我休养二个月。

康老：什么时候？给谁打的？

王：给办公厅。

康老：办公厅就允许你了？

王：后来三月十九日和中央取得联系。（众笑）

康老：（笑）后来？后来才联系？！

总理：你老婆在北京干什么？

王：在北京市委市监委，休息了好几年了。

总理：光拿工资，不做事？

康老：包庇嘛！

（王昭旁一人：你不是说中央准你两个月假嘛？）

康老：八·一八红卫兵找你不在？

总理：这么说你很早就和八·一八作对了。

王：开始时是，以后我不介入了。双方都不介入。

（旁边的人：你昨天还讲八·一八要杀你！）

总理：在西宁时，公安、政法都归你管吗？

王：××师管公安。

总理：××师以前归你管吧！

刘贤权：军区都归他管。

总理：谁参加了联合指挥部？

王：公安厅厅长郑孝先、×××。

刘贤权：赵永夫也参加了。

总理：（对王）赵永夫参加你就不讲了，有王仲芳吗？

刘贤权：他停职反省。

伯达：青海这么大的流血事件你不知道？

王：三月六日我才知道。

总理：你同杨植霖同志分歧在哪儿？

王：对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总理：你是反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

王昭：我认为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不好。

康生：你仅仅认为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不好，你就为这一点反对他们？

王：组织不纯，作法上有点不讲政策，到后来才知道是反革命组织，……我讲八·一八要改正错误我才支持。

康生：也就是说你不支持？

（旁边两同志讲：你昨天还讲有三个人不支持！）

王：宋林、杨西林。

赵：我要讲清楚。

总理：你的报告很清楚了！

赵：（强行要讲）请总理允许我讲两句。

康生：你不要讲了。

伯达：你是造无产阶级反的头子，你是造共产党反的头子！

赵：……

总理：不听你的了，青海两位工友同志来了没有？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

王建议：我就把报社的情况谈一谈，我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公路局的负责人。（重复二十三日发言）我可以用我的头保证，帐篷里没有一个死人，我到处走，没有枪。

周总理：青海来的同学哪一位要讲一讲？

李涤环：……坐牢后期，我们和解放军熟了，他说“解放军当时也流了泪”，我说“我也流了泪”。那位解放军说：“他们流泪和你们不一样，因为他们知道马上就要开枪了。”有小孩要进报社，解放军不让进去，因为他们知道，马上就要开枪了。

康生：清华大学许宝生来了没有？

许宝生：到。

康生：听说他……

许：（叙述自己的遭遇）……一个×××要我们举手，我们手挽手站成一排，他头一低，往后一退，用机枪扫射过来，当时我旁边的一个同志就打死了，另一个同学旁边的一个女同志的脑袋都打碎了……。（他哭诉了抓后被斗情况）

总理：你知道不知道，还有多少外地同学被关在监狱里？

许：×××、×××（王建义补充了他们在公路局看见捍卫队穿解放军衣服的事）

总理：杨植霖同志讲一讲。

杨：我有许多错误，继续检查。过去支持八·一八，他们说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林总来电了，我是带着向毛主席请罪的心情来的。……讲八·一八有三挺轻机枪，“二·二三”以后，送我的二个干部讲，林副主席专门给赵永夫打电话，鼓励他，表扬他……。据他们说，抓了三千多人。

总理：不止，刚才同学们讲有一万多。

杨：我回去以后搞了一个万人斗争大会，挂铁牌子，说我是大叛徒。

（三司同学：那一天我们也参加了）

总理：谁主持大会斗你？

杨：有个常委韩明站出来了，公开站出来批判我，说我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主要内容是八·一八……。自由很难保证，生命也很难保证……小孩拿石头打……，口号不喊打倒王昭，第二个喊打倒高克亭。

总理：高克亭同志来了没有？

高：来了！

总理：哪儿的人？

高：陕北！

杨：现在人心惶惶……下一步怎么办？

总理：支持革命，反对反革命，坚决革命下去嘛！

叶群：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

总理：广播学院黄泽泉同学有什么情况要讲？

黄：赵永夫说八·一八先开枪，解放军还击，这是欺骗中央……。

×××：……一个女孩身上中了三枪，×××问谁打的，她说是×××打的。那个人讲，你说是八·一八打的，我给你养伤治疗，你讲×××打的就送你进监狱。那个小女孩讲，我看见是×××打的。于是被送进监狱……（底下陆续有人发言）。

康生：刘凤池同学来了没有？

刘：来了！

康生：你是怎样受伤的？

（刘讲述自己受伤经过）

总理：我问一下，张晓川！

张：有。

总理：你哪儿人？何时参军？

张：河北涿县，38年参加地方武装，十三旅。

总理：你何时到青海？

张：到青海一年多。65年11月由北京后勤学院去的。

总理：解放后在那儿工作？多大岁数？

张：在冀东，四十七岁。

总理：现在结束调查，青海情况开始不清，消息逐步透露出来，真象慢慢弄清，得到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同意，经过调查，搞清实质，宣布：

（一）赵永夫，青海军区内部的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玩弄了手段，欺骗了一些人，推倒了刘贤权同志，篡夺了无产阶级的党权、军权，就是他指挥的。

（二）赵永夫篡夺了党权、军权后，勾结了张晓川，二人从一月二十三日二月二十三日窜来窜去一个月，对西宁的革命组织八·一八进行了残酷的法西斯镇压。死伤百余人，逮捕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拷打、酷刑，完全是法西斯手段。

（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假说八·一八有枪，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向革命群众调查，根本没有枪支，现在证明毫无根据，这件事他自己也说不出。但他向中央汇报都说有，欺骗中央和群众。他说他也派人作调查，兰州军区派人调查，都没有找到枪。

（四）这件事把八·一八看成是反革命组织，和青海省委王昭是有关系的。

根据以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林彪副统帅，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将发布命令，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因为刘贤权同志没有被罢免，这是反党的人做的事。兰州军区也没承认，总政根本没有批准。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帮助调查。需要说明：林总根本没打过电话。

（戚本禹：林总很少打电话。

叶群：林副主席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接到电话，二十四日听到此事，死亡那么多，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气，他们下令调查此事，林彪同志执行主席指示，下令好好调查这个事件。他们是反革命“三结合”的经验。）

（二）在青海的部队由刘贤权同志指挥独立师、独立团。八零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零五部队，在此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同志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赵永夫一伙人，包括张晓川在内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抚恤烈士家属。受伤群众代为治疗。因为这一事件被捕、押的群众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对受欺骗的群众概不追究，青海的同志要有无产阶级风格，要带着无产阶级气概团结他们，教育他们。采用整风的形式来解决。

（五）应该说明：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光荣的，伟大的。应当相信解放军，这次受蒙蔽的十三个连包围了他们，这次事件中他们也流了泪，证明他们是好战士，革命的工友、同学、战士要团结在一起，揭露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这一小撮叛徒。

（六）刘贤权同志回去要成立军管会军管，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部实行军管，通过军管，帮助青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革命的三结合作好准备。

（七）赵永夫应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个带走！

（解放军上去揪赵永夫、张晓川、王昭的领章、帽徽，把他们押解下去。王昭在门口哀叫：“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在场同志热泪盈眶，高呼口号，总理和各位首长和同志们亲切握手退出会场)
(总理当时宣布决定时，被接见人员无比兴奋、激动，专注于听，所以记的不完整。请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关于青海问题的七条为准。整理者注)

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中发〔67〕110号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 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〇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 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

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戚本禹接见青海代表时的讲话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外地红卫兵及青海革命派赴京代表出席。〕

（因记录不完整，又来不及核对，有些不是原话，但意思基本不错。）

戚本禹：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昨天你们提出来要回青海，给总理提出来了，总理同意。（来了多少？……）你们有些同志身体有病或其他原因，不一定全部回去，你们组织商量一下，自愿的原则，有没有不回的？

众：没有。

戚本禹：都要求回去！？

同学：有的表现不好的，他们炮打中央文革的，不应回去。（鼓掌）但一般写了检查可不同。

戚本禹：什么炮打中央文革？是谁？

同学：××大学的。……

戚本禹：过去打，现在不打，就可以允许他改嘛！触及灵魂嘛！

众：那不能够。

戚本禹：几个？

众：三个，还有××学院二个。

戚本禹：看他以前犯错误，现在表现怎么样？如果表现好，与群众站在一起，允许他们革命，大家讨论一下，至于其他同志写点什么，可不算数，可要回来烧掉，

你们找刘贤权说一下。因为他们假借林彪同志的名义，是受蒙蔽的，烧掉算了，因为他们弄不清楚，允许他们改错。

同学：有的人……

戚：听说有一个人，××大学的，他说开了枪……包括他在内，允许改正错误，可以原谅，当然不能向他们学习。怎样？

众：讨论一下。

同学：有一个××学院的学生，把责任全推给别人。……他们不配再回青海。

戚：大家讨论，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

同学：在青海我们认为是反革命暴乱，我们应该有毛泽东思想，如××大学的××等……他们发表文章攻击三司。还有××学院的×××、×××，哭哭啼啼，他们为保自己，说电台是谁搞来的……进行政治陷害，所以不同意他们回青海。

戚：你们要有点分析态度，说是反革命暴乱，谁又是叛徒了，这不好。“检查”都写了吧！×××写了吧？

王：没写，我说的是×××写了，他是看了林总电报才写的，……我说一种人……

戚：这种人是否要他检查一下？

众：不同意他们回去。

戚：要你们讨论。这种人与赵永夫是有区别的。

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对这种人我们不欢迎他，我们希望革命造反派回西宁。

戚：不愿回不要勉强，自愿原则，可报名，名单给我看一下。你们回来有没有要回家休息的？

众：没有。

戚：可回家看看，料理生活，搞两天学习。什么时候走？

众：越快越好。

戚：你们要学习。我来决定，放假一天，学习两天。你们是否回过家？

众：没有。

戚：还是回家，就二十八号出发。

（有人递条子，戚看。意思是二十八号没车）

戚：可不写条子，没有造反精神，说一下就行，是不是因为被镇压过。你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不管是谁，谁说错了话，当面要提出来。我喜欢有造反劲头的人。

你们要回去这问题，提到伯达、康老、总理，讨论很久才决定。你们没有透露消息吧！我有点怀疑。

众：没有。

戚：因为有好多布置，要等中央宣布，贴出布告。……没参加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同学，可选出十人去青海，由红代会负责，不是每个到过青海的都去，那太多了。

哈军工同学：选出十个是北京的，其他……我们哈军工是……

戚：那由哈尔滨决定。如需要可由刘贤权写信给哈尔滨，我这里不能决定。

你们是作为北京红代会派到青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没有三司了，应作为红代会派去的，中学的跟中学红代会挂钩；大学跟大学红代会挂钩，要有联系。

青海八·一八红卫兵：要求与刘贤权座谈一次。……

戚：因为他马上坐飞机回去，不能……你们可回青海，……

（北京七中一同学提到荆起）

戚：荆起是不是联动？

××：不是联动也不是西纠。……

戚：是也不要紧……

戚：陈逸来了吗？

陈：来了。

戚：还在青海日报工作？你的文章写的不错嘛！文章写的好吗！要努力办好《青海日报》。要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如果跟刘邓走，脑袋早就没了。

陈：（表态）

戚：程光远来了吗？

众：被抓起来了。

戚：不要紧，很快会放出来。他还在青海日报工作！

戚：还有什么问题，同志们！

××：捍卫队、火车头、贫下中农红卫军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充当了急先锋，打人最残暴。捍卫队等是否是反革命组织？

众：不要这样说。

戚：他们意见对，不能随便宣布一个反革命组织，一个多数人的组织要宣布是反

革命组织要经中央批准。把昨天的决定再念一念：

秘书：（念）根据以上情况，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 3 月 24 日作如下决定……）

戚：关于你们去青海，我问伯达同志有什么指示，他写了三句话，我来将念给你们听：

- 1.做青海人民的小学生；
- 2.做青海人民的勤务员；
- 3.做青海人民的好儿女。

在去青海前，你们要学些文件：

- （1）《农村调查序言》八：如何做小学生。
- （2）《学习与时局》，防止骄傲自满。
- （3）《纠正党内错误思想》
- （4）《整顿党的作风》
- （5）《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你们自己再选些文章，还有中央文件、社论等，还有清华大学搞的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我给你们每人发一本。还有北京市斗争的发展，出现许多问题，也有许多发展。

好不好，下边讨论回青海怎么办？采取什么方针？应注意什么东西？你们还可以讨论，听你们的想法，现在十点半，可以讲一个小时。

你们不是都要求回去吗，回去怎么办？有什么想法？你们自己要抓活思想，怎么打这一仗，大家讨论。

（同学们发言）

戚：首先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戚本禹同志说完看毛主席像）。青海的事件是毛主席首先发现，二月二十四号毛主席就发现了问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非常关心也很难过，林彪同志说把革命群众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三月二十号毛主席有批示。

我们送些材料给林彪同志，赵永夫也送了些材料，他送的材料很多但一会儿两挺机关枪，一会儿三挺机关枪，互相矛盾。你们的信里写……在枪声中唱大海航行

靠舵手、东方红，被迫跪下时，大家跪向东方，林彪同志看着都哭了。

你们的信，毛主席也看过。是他要中央文革调查的，所以首先宣传这，不是那一个人，当然你们也有功勋，但首先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且毛主席对调查方法，对调查关键问题都作了具体指示，要首先向青海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他老人家亲自批，林彪同志非常关心，总理亲自处理，他给你们已谈过两次，他还有许多要处理的事，还要看材料，总理看的比我还仔细。青海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要给他们宣传，我想他们是忘不了的。你们不是想念毛主席吗？毛主席也想念你们。是军委命令你们（指被青海扣押的外地同学）回来的。

（同学们继续发言）

戚：赵永夫是罪魁祸首。

（同学们继续发言。讲到回去如何恢复八·一八等革命组织时，戚本禹同志插话：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一面战斗，一面整风。）

戚本禹同志插话：要做小学生、勤务员、好儿子，不要认为自己很高明，就包办代替。

（当同学发言中提到青海人民非常信任外地红卫兵，许多事情都说要“请示”外地红卫兵时）

戚：人家“请示”，是你们的光荣，还是你们的缺点？

众：缺点。

（同学继续发言）

戚：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军队。

（同学们继续发言）

戚：是不是大家谈到这里。

众：八·一八谈点。

（有的同学提出军队问题如何搞的问题）

戚：还是要军队自己搞。彭、罗、陆、杨在青海是有社会基础的，王昭是罗瑞卿、彭真、刘澜涛的人。

这个事件的细节还要调查，可以配合军队搞，如报社死人问题，你们要翻他的案，他也要翻你的案，阶级敌人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有些问题，内部矛盾很突出，要放到后期去处理，不要取得一点胜利，就打内战，……这说明你们不

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不要“反托派”，内部问题要调节，首先把大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枪口要对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问题要有意识的放到后期搞。你们研究一下……我说不清，水平不高，也不好说，不愿意说。王昭没斗倒，你们就打内战，不要轻易戴帽子。有些问题我不愿意说，要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是宗派主义思想。

（同学继续发言，谈到抓革命促生产时，戚本禹同志说：很好）

戚：是不是到这儿。我说些不好听的话，下次见面不要犯错误回来。主席说，经得起失败考验，经不起胜利考验。你们不知道有好多造反派，去年夏天是造反派，到冬天就是右派了。还有的造反派是名牌的，在夺权中成为保皇的工具。如果你们脱离毛泽东思想轨道，用资产阶级的就必然犯错误。列宁说，聪明人不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我担心你们，当然犯错误也不要紧，可以总结。好的革命者不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用刘邓的那一套，认为别人压迫了你们，你们也就那样。要做胜利准备，也要做错误准备，首先要做错误准备。你们是不是“五一”回来？

众：不行，回不来。

戚：不要包办代替，要依靠青海群众相信青海群众。你们还有任务，回来要斗批改，有的还要上学。

你们是特许外理的，中央给了指示，是特许，不要再特了，你们安排一下时间，如果“五一”不成，就再拖点。你们做一个月二个月打算。回来再欢迎你们一次，再听一次汇报。

不犯错误的根本保障，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处理每件事情紧紧跟着主席思想，就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无论对军队、群众、敌人、保守派都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不是群众的老爷，群众是父母，不要把群众当成阿斗，自己是诸葛亮，是我们造的反。“我”太多了，必然犯错误。你们是群众的小学生，是群众的儿女。×××出来时不是给你衣服吗，这还不是儿女。打枪时，工人掩护你们，你们要调查，写出来。不要把自己看的了不起。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不要看你们能讲，群众讲的不如你们流利，真正的好，不是讲的好。青海军区的调查员讲的流利，给我讲。看讲的什么，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真正的英雄要用他们的实践证明，所

以对群众不要包办代替，要做学生，不要把自己看成是解放群众的英雄，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俄国的民粹派认为群众是零，自己是一，没有一就成不了一百，一千……。对群众要尊敬，满腔热情，眼睛向下，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对自己要一分为二，特别是胜利时，要用优点克服缺点，要在严酷中经受锻炼，如果把锻炼当成了包袱，就把锻炼得来的东西失掉了。……不严格要求自己，就向对立面转化，要有组织性、纪律性，特别是这时，很重要。中央的决定，如果认为刘贤权不如我们，就不服从领导，如说六·三社论我们比他看出来的早。如果不服从他的领导，破坏中央决定的就会是你们。

（对革命组织八·一八说）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八·一八要一分为二，一边整顿，一边斗争，也不要有关门主义，搞得纯了又纯，是革命群众组织嘛。

要警惕坏人挑动，特别是你们自己里边的坏人，敌人也会打进你们里的，挑动你们转移斗争大方向。

（谈到军队），解放军是光荣的、伟大的。像赵永夫那只是一小撮。二·二三事件是这一小撮坏人制造的，广大驻军、干部、战士没有责任的，他们没有责任。不要回去后，认为自己的军队对待你们听了他们命令采取镇压措施，部队是受了坏人挑动，这不能怪战士，千万不要上当。军队中还有坏人，会处理的。你们自己不要去揪××什么的，因为赵永夫在北京已被扣起来，就去揪别人。哪些人是赵永夫一派的，都要处理。如何处置，到一定时候就会处置。要向解放军学习。……特别是对待执行任务的十三个连，要处理好。我们共产党人不记私仇。是反革命利用了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感情，当然他们是有责任的，他们会检查，但你们要原谅他们，责任不在他们，解放军很多是好的，要看到这一点。

怎样对待保守派，也要按照主席思想去办，对他们愤怒是正义的、革命的。但由于激动就容易偏激，在处理保守派时就会发生不符合政策的情况，这要防止。对待捍卫队、总部，大多数群众是可以争取教育的，不要报复，要提高他们的觉悟，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是考验你们了。也要说服八·一八。对受欺骗受蒙蔽的概不追究。对待群众组织……不要去考虑：马上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组织。他们那里边有坏人，把坏人孤立起来。争取进步的，团结中间的，孤立顽固的。你们只要执行正确的政策，他们就会垮台的。他们中也有进步的，要鼓励他们内部

造反，说他们是保字号组织较好。要讲究斗争方式，坚决执行军委八条，不戴高帽子，你们回去要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

对待敌人，坚决斗争。如果将来把赵永夫拉到青海去，如何斗，你们可以提出意见，如何斗，是游街？可与领导研究。

对捍卫队的坏分子不能同群众一样，对他们实行专政，但要按照法律，按照军事管制程序，不要乱抓人、打人，除现行的当时抓外，一般的要经过公安部门审查，依法处理。

对待他们要用正面教育政策，你们才能扩大队伍。青海有可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模范，像山西那样，因为暴露充分。有条件可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由落后变为先进。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据地。如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可能刚胜利就丢掉了。

要戒骄戒躁!!!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

地点：京西宾馆第一层会议室。

主持：由周总理主持会议。

青海问题很大，是个严重的事件。前几天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只听了赵永夫的谎言。原来他们把问题完全弄颠倒了。青海问题是一个大案件，是实行法西斯的大镇压，

元月二十三日青海军区接到中央的指示（五条），刘贤权同志召集常委开会，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并向群众表明态度，支持八·一八，本来是对的，是正确的，就在这个时候，赵永夫煽动机关造刘贤权同志的反，同时又勾结反党分子王昭，操纵支持保守组织捍卫队、红卫兵总部，来斗刘贤权同志。赵永夫这个坏蛋并停职（原文如此）刘贤权、张江霖同志的工作，然后就篡夺了军权。

后来，又勾结总后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非法组织了联合指挥部，反抗兰州军区，操纵了驻军镇压八·一八。对内代替了青海军区党委，对外代替了青海省委，独揽了青海省党政军大权。并不经军区讨论和上级批准，张晓川非法调动了二百多辆汽车游行。

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有三条指示，叫把部队撤出来，赵永夫又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到兰州搞“绝食斗争”。赵为了镇压八·一八，对八·一八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想尽一切办法找根据，谎报军情说：“群众有枪”、“群众先开枪的”，实际上部队先开枪的，二十三日调动了十三个连围攻报社，并开枪，抓了一万多人，打死打伤几百人，（有的群众面向东方，手挽手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残忍的反革命行动。赵造谣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总理也打了电话，（总理插话：根本没有那样的事）。他说打电话“打得好”，都是捏造。（呼口号：打倒赵永夫反革命分子）。

三月十一日青海问题，主席批了。经过调查已经查清楚了，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青海的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变。推翻了刘贤权同志的领导。

赵永夫这个家伙，一九三三年在国民党南京交警教导纵队受过几年反革命训练。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是隐藏在党内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分子。

刘贤权同志是个好同志，老红军，是支持八·一八的。去年反对王昭也是正确的，（叫刘贤权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叫张江霖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

张江霖同志是支持刘贤权同志的，也是好同志。

刘贤权同志也有个缺点呀！警惕性不高，你和老虎睡在一起，为什么没有发现。驻军其他同志也是警惕性不高，跟着跑，政治上麻痹，（犯了错误，未记清）也应吸取教训。驻军调动十三个连，包围青海日报社，对八·一八进行残酷的镇压，法西斯暴行，这是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是个典型，就是对于那些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的组织也不能开枪呀！除非是武装暴乱，只要是徒手群众就不要开枪。这一点你们回到部队要好好贯彻，开枪是没有好处的，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随便开枪，不能随便抓人，一定要抓住这一条死守线。（记不清）开枪就变成大血案，大刽子手。西藏不也是为报社问题，九千人包围了六天，经过耐心的政策宣传教育，没有开枪，把群众争取过来了，也解决了问题。这样的例子其他地方也有。为什么要采取镇压的行为呢？开枪只能说明：只有那些仇恨人民的人，才能干得出来。不然是不可理解的，是想不到的事。

赵永夫造了很多谣，说：“八·一八有枪，首先开枪，是百分之一百的反革命。”经调查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八·一八没有枪，怎么能首先开枪呢？就是事后也没有搜出一支枪，当时，青海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我们都很重视，觉得问题很大，

打死这些人就是问题。经过一查就是有问题，事情发生后震动很大，即使是反动的，也不能这样做，即使是反动的，也是头头反动，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是好的嘛！报告都有倾向性，对报告要慎重，不能以报告者的观点去听报告。

这件事是和王昭有关系的，王昭和罗瑞卿的关系很密切，和彭真、刘澜涛是有关系的，是个坏蛋！青海公安总队改编独立师时，王昭就把独立师交给了赵永夫掌握，不交给刘贤权同志，所以独立师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记不清）王昭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急先锋。是操纵保守组织与八·一八死做对，赵永夫在镇压八·一八以后就急于把王昭做为反革命的“三结合”对象。这个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根据上述情况，中央作出七条决定（中央决定已公布张贴）。中央这个决定很好，把青海问题作了正确的解决。从这件事中，我们要吸取教训，军队也是不纯的，有坏分子的，象赵永夫这样的人还存在，我们的部队大多数是好的，但确有坏人，不但青海有，总政、总参、总后，各军也有，他们要造反，要夺我们的权。文化大革命，他们这些坏蛋都跳出来了，对我们来说好得很，坏家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向革命份子进攻，如果不搞一下，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一轰而起。我们是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是可以信赖的，大部分是好的，有些是认识问题，但是确有一小撮坏家伙。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性。如三个总部、空军、海军确有坏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空军就会被坏人夺了权。他们不是把地位、人选都安排好了吗？海军主持工作的几个人也会被夺权。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向我们猛烈进攻。总后也是这样，黄克诚，洪学智和他们的爪牙，就抓了邱会作同志的小辫子，邱会作同志小偷小摸的事有，应该烧，但邱会作是个好同志。总政也有，总参也有，都是坏份子。从量上来看不多，但分量很重。比如，总政就有日本特务，国民党份子，总参不有夺权吗？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性，差不多我们这些组织中间，也是要一分为二。

但是青海的问题有它的特殊性，是国民党份子，法西斯份子，蒋介石份子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动派，他们乘机要夺我们的权。我们军队对刘邓反动路线的认识比地方差，比红卫兵差，与刘志坚的不介入是有关系的，现在要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对群众组织要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对那些冲击军区的，也不能一概而论，说是坏组织，比如左派冲击军区，也搞认罪，请罪那就不好了。主席在八条规定中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好好学，领会主席的思想，我们要把文化革命

搞好，就要依群众组织的大多数。靠解放军，靠大多数的革命干部。昨天主席又再次提出强调这个问题。特别是我们的解放军，一定要依靠群众，解放军和群众象鱼和水的关系，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永远是这样，离开了群众我们无法生活，有群众和没有群众，情况就大大不同。不是小小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好地进行群众工作，深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支持左派。只有和群众站在一起，即使万一支持错了，马上就改正，昨天晚上主席还讲：军队要支援农业，支援工业，要支援革命左派，训练革命师生，任务很重，很可能犯错误，但是我们不怕，也不要把矛盾上交，要好好干，只要我们好好按主席思想和主席指示办事，紧密和群众站在一起，肯定主流是主要的，就是有了问题，及时请示军委，这样可能三分之二对，错也是三分之一。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红卫兵比我们清楚。今天给主席打了电话，请示了一下，想把红卫兵出的报和传单，比如刘少奇一百例罪状，收集一下，印发下去，有了铁证如山，也能使人恨起来，不然光靠一般讲是不行的。没有群众观点，和人民没有感情，就会把群众当成坏人，就会随便开枪，就是和人民没有感情。总政要收集，快印发，要采取措施。（肖华同志说：我们印了第一册），一册还不行，还要继续印，思想上的转变，还是事实在前，没有事实，人家印象不深。还有总理、康生、伯达、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讲话，也要印发下去。这场文化革命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不是宗派斗争。空军的成均就是要夺权的，这是贺龙搞的，这些坏家伙，你不斗倒他，他就斗倒你，不是什么宗派斗争。你想躲也是不行的，想防御也是不行的，只有进攻，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青海的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血淋淋的典型。你不打倒赵永夫，他就要打倒你刘贤权，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了。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贰、本节研究资料

洗恒汉回忆录（摘录）

赵永夫事件

1967年1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的左派群众”的号召。1月22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省军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捍卫队”的围攻批斗。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常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令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的待遇。

刘贤权迫于无奈，于24日凌晨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扭转混乱局面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无论表态支持哪一派都难以稳定局面，于是决定，把原来支持“八一八”的提法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考虑这样提法笼统些，比明确支持某一派更好解释。

这个新的决定，并没有使各派群众组织满意，相反，事态越发严重。同时，省军区机关造反派也借势上街闹事，并在机关内部擅自将刘贤权软禁起来，不许他与外界接触，这实质上也就是篡夺了省军区的领导权。

刘贤权深感问题的严重，心急如焚，担心如此闹出大事来无法向中央军委交代。于是，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要向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报告情况。但机要员将电报稿退回，称：“赵副司令不同意发”。

1月25日，兰州军区指示，不同意由军队接管“青海日报”社。省军区机关造反派认为是刘贤权报告的，于是以此为借口，抄了他的家，撤了他的电话，并派武装战士看守，实际是将他关押起来。

1967年2月5日，赵永夫召集机关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出舆论说，“八一八”手中有七、八百支枪，并以自己划线，将省军区领导都划成了“敌人”。

此时的赵永夫利令智昏，将自己封为青海省军区第一把手。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会上由他宣布撤消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正式关押。他的这一切活动，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严重。

这里还要说一下，文革初期在西宁地区，围绕着倒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保

第二书记王昭和保杨倒王的斗争，西宁的群众组织分成了“捍卫队”和“八一八”两大派，对立情绪非常大。现在，省军区的机关造反派也加入了进去，致使局面更加复杂混乱。杨植霖、王昭看到形势严重，省委难以控制局面，便先后借故离开了西宁，使省委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由于赵永夫在省军区机关造反派的支持下，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又改变了支持“八一八”的决定，因此引起“八一八”群众组织的不满，每天都开着宣传车到省军区大院门口叫骂，赵永夫对此十分恼火，便借口由“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报”社有林彪漫画的所谓“反革命”事件，要军事接管报社。

由于赵永夫请示兰州军区遭拒绝，便擅自派出部队强行进入报社进行接管，激化了“八一八”群众的对立情绪，相互形成对峙。赵永夫再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赵永夫十分不满，派出副司令刘XX率领十几名机关造反派，连夜到兰州军区办公楼绝食静坐，胁迫还困身在“四大”余波中的我和张达志撤消不同意他们军事接管报社的批示。

尽管当时我和张达志同志自身处境还很困难，但我们还是坚决表态：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更不能强行进入报社，并且对他们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刘XX等人看到我们态度坚决，只好返回青海，向赵永夫汇报。赵永夫根本不予置理，仍一意孤行，于 2 月 23 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

23 日下午 1 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于发生。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现场惨不忍睹。报社内惊恐的群众四处躲藏，没有死伤的抓到就投入监狱。这就是曾经震惊全国的 1967 年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西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便立即给青海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的电话才接通了青海省军区的电话。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况，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

首先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

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

24 日上午，我和张达志电告青海，要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将赵永夫、王文英及 55 师师长陈如意接来兰州。在汇报中，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事后我和张达志为了证实军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向军委发电报请示确认，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在西宁，赵永夫为了掩人耳目、欺骗群众，将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让群众参观，说这是“走资派刘贤权支持的‘八一八’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是斑斑血迹，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薰人的恶臭。被丢弃的帽子、鞋子一大堆，但不见一支枪。

赵永夫把“八一八”搞成反革命组织，在西宁市进行大清查、大搜捕，全市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一些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西宁，到兰州和北京反映真实情况。

3 月 6 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付武装押送的。

3 月 8 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

3 月 29 日晚九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兰州军区是我和康健民同志参加，同时青海的刘贤权和张江霖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总理就亲自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大意如下：

1、青海问题是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推翻了司令员刘贤权，篡夺了军权；

2、赵永夫对西宁“八一八”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多人，逮捕群众近万人；

3、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经查，报社“八一八”群众并无一枪一弹；

4、此事件与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接着，总理宣布中央的处理办法：由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除独立师、独立团外，在处理青海问题上，再划归几个野战部队归刘贤权指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赵永夫负责；筹备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赵永夫隔离审查，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周总理宣读完中央决定后，当即命令北京卫戍部队武装战士把赵永夫等三人拷走，会场立刻欢声雷动，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

周总理同我、康健民、刘贤权和张江霖同志一一握手。

散会后，又把我们留下具体研究安排了青海省如何贯彻中央决定的问题。

我向总理报告说，兰州军区准备派康健民副司令员去青海协助刘贤权同志处理青海问题，总理同意。中央对青海“赵永夫事件”的处理，当时还以红头文件告示全党，人人皆知。

十年后，周总理逝世，军委叶剑英元帅曾经两次指示我，让我给青海的同志们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很为难。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我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但青海的同志们却有他们的道理：“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此事不了了之。

1976年夏季，叶剑英又亲自派遣总政的两个干部来兰州，向我传达他的指示，要我出面把张江霖、宋长庚找来兰州谈为赵永夫平反的事，总政的来人也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张江霖和宋长庚两位青海的领导同志来兰州，并请总政的来人向他们当面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尽快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张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仅凭叶帅个人一句话，我们不好办。我也觉得张

江霖的话有道理，便提议总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叶帅报告，最好请中央能下达个文件，便于下面执行，也好给群众解释。

这些意见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却直接触犯了叶元帅的尊严。在 1977 年 6 月处理甘肃问题时，叶帅几次提到我“不听”他的“话”，“不执行”他的“指示”。而肖华、韩先楚等也以此大做文章，不但将我打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张江霖也成了“四人帮”在青海的“挂帅人物”。可叹张江霖一个四方面军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在艰苦的青海地区辛苦工作几十年，落下一身病痛，最后被作“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对此，连总政、解放军纪委、兰州军区后来的几届党委都一致认为处理不当，但由于这是由“大人物”下的口喻，所以一直无法甄改。但愿我们党内这种“以言代法”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不再出现。

余汝信“赵永夫事件”浅析——冼恒汉回忆录补正

“赵永夫事件”，根据发生的日期，又被称之为“青海二·二三事件”。它是文革中震惊全国、被当时的中央定性为对内“篡夺军权”、对外武装镇压造反派的“反革命政变”事件。对此一事件，文革中及文革后各方的评价迥然不同。本文为对该事件过程的一个要点剖析。

一、青海省军区内的“反革命政变” 冼恒汉说，1967年“11月22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省军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捍卫队’的围攻批斗。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常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令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的待遇”（1）。显然，冼的立场是站在刘贤权一边的，并且认为赵在常委中是少数派。另冼文中的“造反派”，应解读为保守派。而据安绍杰（刘贤权夫人）主编的《刘贤权将军》中更详细的说法，这一天应为1月23日。该书称：“1月23日刘贤权主持召开了省军区常委会，学习中央决定以后，于下午6时，讨论确定支持左派群众的表态问题。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上报了兰州军区、党中央和军委。可是这表态消息刚一公布时，就立即引起了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强烈反对，而且随即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激烈行为。当晚9时许，另一派造反者冲进省军区机关揪斗刘贤权，一下扒掉了他的帽徽领章。与此同时，省军区

机关内部也出现混乱局面，一些人迎合军外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逼迫刘贤权和常委撤销军区常委的决定。这样一来，当地派性斗争的形势就更加激烈，局势更为混乱。为扭转这一局面，刘贤权于当夜零点再次召集常委紧急会议，商议举措，遂决定把支持一派群众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2）。根据上文，支持‘八·一八’的表态，是刘贤权主持的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既然“一致”，也就包括了赵永夫）。文中“另一派造反者”，亦应解读为保守派“捍卫队”。

文革后的青海省委，对这一天在省军区发生的事是另一说法：“1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之后，当天下午，刘贤权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谁是左派问题，并进一步提出支持‘八·一八’的七条理由，其中特别强调：‘八·一八’既反省委又反王昭，应当支持。多数常委为避免造成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不同意刘的意见，而一致同意交机关干部讨论后再决定支持准。会后，刘贤权却背着其他成员和机关干部，偷偷派他老婆去向‘八·一八’表态支持，要他们向军区‘报喜’，并私自指示省军区文革办公室通知驻军部队要一边倒，坚持支持‘八·一八’。由于刘贤权的阴谋活动，造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严重对立。其他群众组织到军区质问刘贤权为什么不支持他们，群情激奋，形势极为混乱。省军区机关和驻军部队为了稳定局势和维护西宁驻军部队的团结，一致要求军区党委纠正刘贤权的支派分裂活动”（3）。根据该说法，多数常委不同意刘的意见。“其他群众组织”，应指保守派“捍卫队”。

两种不同的说法，孰是孰非？据查证，当时的省军区党委常委为：第一书记杨植霖（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王昭（省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兼），第三书记刘贤权（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区司令员），副书记王文英（省军区副政委），常委曾征（副司令员）、赵永夫（副司令员）、刘斯起（副司令员）、吴士杰（副政委）（4）。杨植霖、王昭是省委领导兼职并已受到冲击不能与会，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常委至多六人（据另一材料王文英、吴士杰此时并非常委（5），应不确）。笔者认为，虽然刘的资历在与会者中是最老的，地位是最高的，但他的意见在常委（或常委扩大会议）中未能形成多数，常委中“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的说法，很值得怀疑，支持刘的似乎只有并非常委的副司令员张江霖。支持保守派、在常委中地位、资历比刘贤权（1955年少将）、曾征（1955年少将）、王文英（1964年晋升少将）都低的校级军官赵永夫，却在常委会中掌握了主导权。而这一现象也

符合当时的一个普遍规律——在全国省一级地方军事机关中，支持保守派的力量占优势。象刘贤权这样支持造反派的省军区司令员，在全国确为凤毛麟角。

《刘贤权将军》一书接下来说：“从1月23日起，刘贤权的工作开始受到限制。在2月15日至3月8日这段时间里，刘贤权的行动就完全失去了自由。他这位老红军被造反派（应为保守派——笔者注）揪到军区机关批斗、毒打、隔离、武装看押、抄家受到羞辱”（6）。至今我们尚未能得到答案的是：据洗恒汉说，赵永夫整倒刘贤权，“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严重”，既然没有上级的支持和同意，赵永夫哪来的劲头和底气？

二、《青海日报》社的枪声 早于1967年1月12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等二十七个造反派组织，即联合接管了《青海日报》。次日，这些组织称：决定暂时封闭《青海日报》，在封闭期间，将以特刊形式印发新华社播发的重要新闻（7）。1月29日，‘八·一八’造反派宣告夺取了青海省委、省人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以及其他一切权力。该夺权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

2月3日，以赵永夫为核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动用250多台战备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公安机关同时将从“八·一八”组织中逮捕的几名“反坏分子”，游街示众。2月14日，赵永夫等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名义发布公告称：《青海日报》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虚假的宣传报道，欺骗中央，欺骗青海省广大革命群众，对青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决定自即日起，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是日，部队包围了报社，要求报社中的造反派组织撤离，遭到拒绝，双方僵持九天九夜。

洗恒汉在《风雨八十载》中称，赵永夫曾多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8）。令人不解的是：赵永夫作为下级，为什么可以对兰州军区的指示“根本不予置理，仍一意孤行”？2月23日，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布通令：“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洗恒汉称，赵永夫“于2月23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

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2 3 日下午 1 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于发生”〔9〕。 文革后官方编纂的资料则称：“2 月 2 3 日，报社内外的人越来越多，在局势异常混乱的情况下，部队战士不慎枪支走火，误伤了自己的战士数人，误认为是占据报社的‘八·一八造反派’先对外开枪射击，遂导致了部队开枪。部队现场指挥所的负责人虽未下令开枪，但在部队开枪后，没有采取果断制止措施，以至酿成‘二·二三’流血事件（注：死伤群众 3 4 7 人，其中：亡 1 6 9 人，伤 1 7 8 人）”〔10〕。 洗恒汉说赵永夫下令开枪，文革后的青海官方称赵未下令开枪，又孰是孰非？ 一位现场目击者（报社女工作人员）的回忆可能更客观一些：“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在军区政治部工作的一个熟人悄悄透信给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切勿再去报社，那里将有重大行动。我立即意识到即将发生流血事件。第二天清晨，也即 1 9 6 7 年 2 月 2 3 日，我刚起床，就有一个同志神色仓皇地来我家告诉我，从北大街通向报社印刷厂（那时报社人都在印刷厂上班）的北门坡已经实行戒严，禁止人车通行。我急忙洗了把脸，随来人一起疾行至北门坡想看个究竟。在离北门坡大约还有 5 0 米的地方，就已感觉到气氛异常。坡上坡下布满了武装岗哨，战士们个个表情严肃，严密监视着周围动向。坡下通往报社的马路已被机枪严密封锁，除非有当时的特别通行证，否则，任何人休想通过。我和一些人只得站在坡头的封锁线外，挤在人群中踮脚翘首向下遥望。大约上午 1 0 点钟光景，报社方向忽然枪声大作，它告诉人们镇压行动确已开始了。我的心情不知为什么一下变得沉重起来。……我与‘造反派’虽格格不入，但他们中真正的坏人毕竟是极少数，尤其是那些数以千计的工人群众，他们中的大多数自以为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日夜守卫在报社。子弹无情，究竟打死了多少人，其中是否有我熟悉的？为了解确切情况，枪声一停，我便随着人流抄小路（小西门的城墙缺口）涌到报社印刷厂附近，这里正是多日来两军对垒的地方。我踮脚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排排尸首倒卧在血泊之中，沾满血迹和尘埃的衣服、鞋、帽，散落得到处都是，有的挂在树梢上，有的飞到低矮的屋顶上。可以想见那些手无寸铁的‘造反派’，一旦看到子弹真的向自己射来时，是如何地惊慌失措。我万没想到和平时期斗争竟会如此残酷！”〔11〕 三、谁说“打得好”？林彪还是叶剑英？ 洗

恒汉说，开枪之后，“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12）。所谓“有位军委领导”，洗其实指的是叶剑英。洗的说法从侧面证实，赵永夫与北京军委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窃以为不是以省军区的名义，更不是以赵个人的名义，而是以赵可以直接控制的“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名义。我们没有可靠证据的是，这种联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否从在支左问题上与刘贤权有分歧及至限制刘的自由时就已经得到军委的默认和同意？这倒可以解释赵为什么从那时起就底气十足。而这种联系，是刻意绕开倾向于刘贤权的兰州军区的。在“二·二三”以后一段短时间内，赵永夫仍然得到叶剑英等的肯定。惟中央的态度，在三月初发生了变化。洗说：“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副武装押送的。3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13）。张江霖本人的回忆说法有所不同：“3月8日，刘贤权和我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第三天，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来看我们，一见面就说：‘你们受惊了，到北京就自由了，好好休息！’”（14）。惟中央找赵永夫的对立面到京，是否对赵的一面之词已产生疑问？3月11日，毛泽东、林彪分别批示，要求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缘由据说是听了中央文革的反映。据称，毛的批示是：“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15）。3月13日、21日、23日及24日，中央有关负责人四次接见青海党、政、军有关领导及群众组织代表以调查了解基本情况，其中又以以后两次规格最高，后两次，周恩来均出席。3月24日（洗恒汉回忆误为3月29日），在调查开枪后军委来电一事时，叶群责问赵永夫：“你还说林总来电，你还感动得满脸流泪，什么时候给你的来电？”赵：“我接电话，问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说是。”叶群：“林彪同志没有打电话！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有接到电话，二十四日听到此事，毛主席、林总非常气愤，下令调查此事。”杨成武：“纯粹是造谣！为什么造谣？”戚本禹：“当面造谣！”杨成武：“完全是造谣！没打嘛！为什么说打了？”（16）“军委来电”与林彪无关，当时任林秘书的张云生的回忆可作

旁证：“在西宁的街头上，很快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林彪听讲这些情况后，还是无所表示。就连那个误传的‘林副主席来电’，他听后也只是一笑了事”（17）。而与叶剑英有关的依据，有近期官方编纂、公开出版的《叶剑英年谱》。其1967年2月23日条目提及：“在电话中听取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关于对冲击《青海日报》的造反派的处理情况报告后，肯定了部队的做法。三月，中央文革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把是非完全颠倒过来，将赵永夫逮捕，并逼迫叶剑英多次检讨”（18）。四十年之后，《叶剑英年谱》的作者重新肯定了开枪的做法，倒是“把是非完全颠倒”了。王力在回忆录中谈及青海问题时说：“青海出了个刘贤权，是军区司令员，一开始就支持造反派。后来，被赵永夫（副司令员）抓起来。副司令员抓了司令员。赵永夫开枪镇压群众，最早汇报到林彪那里，林彪讲‘打得好’。后来翻过来了，中央把赵永夫抓了，刘贤权抬起来了，成了了不起的人物，这时又说‘打得好’的话是叶剑英讲的。林彪打倒后，赵永夫升了官，可是一查档案，‘打得好’是林彪说的，赵永夫又降了官，现在也不得意”（19）。在“打得好”是谁说的及赵永夫以后的际遇问题上，王力所说与事实完全对不上号。

四、中央的调查与《决定》

3月11日毛、林批示之后，中央已着手调查了解了“二·二三”前后的大体情况。在3月24日晚至25日凌晨2时半的会议上，在周恩来等的严厉质问之下，又再查清了“二·二三”当天的一些细节（20）。

1、谁决定武装镇压？

康生：你们的指挥部（注：指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晓川：2月18日。（注：张晓川时任驻西宁的总后青藏办事处〔代号后字205部队，军级单位〕副主任，联合指挥部成员，据康生了解，组织指挥部是张先找赵永夫及驻西宁的陆军第五十五师。）

周恩来：嗯？

张晓川：是1月18日。

康生：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1月18日就组织了。

周恩来：23日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

联合指挥部讨论了？

张晓川：讨论通过了。

2、现场谁指挥？

周恩来：谁指挥？

张晓川：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

周恩来：现场上谁指挥？

张晓川：赵副司令员、陈师长。（注：指赵永夫、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师长陈明友。）

3、报社内的八·一八有没有枪支？

周恩来：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镇压时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永夫：……

周

恩来：简单点，你的报告上都有。 赵永夫：以前了解有枪。 周恩来等：现场有没有？ 赵永夫：……（回答文不对题）。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就说有、没有。 赵永夫：当时没搜出来。 …… 周恩来：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周愤怒地站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注：原文如此，似应为伪造假象。）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4、赵永夫有没有下令开枪？ 赵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 5、赵曾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 叶群：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是你，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不知道？ 会议最后由周恩来宣布结束调查，并当场宣布了青海问题的处理办法。处理办法能够当场迅速宣读，可见中央（包括毛、林）在这一次会议前已形成了统一的框架性意见。周并命令卫戍区人员将被宣布隔离受审的赵永夫、隔离反省的张晓川、王昭三人押出会场。 周恩来宣布并于当天形成正式文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称：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〇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

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21）

五、叶剑英与对赵永夫结论的变化 在“青海二·二三事件”之前的2月9日，经毛泽东同意并修改定稿，中央军委曾发布过《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规定》第四条称：“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定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22）。说是不准任意开枪，但这一条其实还是为开枪留了一个口子，提供了一个借口。“青海二·二三事件”是否有受到其“启发”的因素？

4月6日，中央军委再发布经毛审阅修改后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十条”），内称：“（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吸取了“青海二·二三事件”的教训，这一条将2月9日《规定》有关开枪的口子封死了。该命令第八条还点了赵永夫的名：“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23）。

文革结束后，对赵永夫的结论发生了极大变化。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24）。以冼恒汉的说法，《处理意见》的出台与叶剑英的态度很有关系。总政的《处理意见》称：“一九六七年二月，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将青海革命群众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四十七人（亡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的严重事件，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造成‘二·二三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联办’领导小组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和武装夺占报社的错误决定与行动”，“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副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处理意见》不公平地将“二·二三事件”的责任分了相当一部分给刘贤权：“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

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中央、军委在转发总政《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同意总政《处理意见》的请示，并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既然撤销了党内外职务，又如何“按正师职予以安排”？文字前后矛盾，难以理解。文革期间，叶剑英在稳定军队、抵御极左派以至粉碎“四人帮”斗争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堪称之谓厥功甚伟。惟称道赵永夫等谎报军情、以武装力量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造成巨大群体性伤亡的围攻《青海日报》社行动，诚为一大失察！叶有大功，未许否认。惟有功，并不能抵过；有过，也不会掩功。功是功，过是过，功过是非，不可混淆。（2008年5月）

二〇〇？年某月，青海日报记者孙正荃：《一个省记者的生命档案》

这天上午，我正在总编室主任陈均家商量报纸版面事，突然，住在楼下的李家瑞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今天情况有些异常，小桥（即报社北面湟水河上的桥）那边的部队硬是要往前逼过来，已经和守报社的群众发生冲突……话音未落，只听得外面已是枪声一片，我们不约而同跑到窗前，这里正面对操场，用现在一句时髦话说，真叫“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四面八方的人都朝我们这座楼房跑来，再一看，更使我们吓得面无人色：无数端着枪的解放军正在后面猛追，枪声过处，只见奔跑的人一个个扑面倒……这时，老陈说，快，把门打开！同时嘱咐我俩只要听到门外有人喊“有人吗”、“出来”之类，就赶紧答应，举起手往外走。情节的发展恰如老陈安排设计的那样，几分钟后，我们就被解放军押到了操场上，那里已是黑压压的一片。从我现在珍藏的这张照片上看，地面是已有白花花的样子，我和另外五个人并排跪在一起（却没有老陈和李），右侧是一位妇女，她怀里还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右上方远处就是我们刚才在的那座三层楼房，右边则是密密麻麻跪着的“反革命”，一眼望不到边。我前方的沙砾地上乱扔着几件棉袄和几顶帽子，周围是端着枪的解放军，看得出来，他们在不停地走动。我们五个人中，三个没低头，而我的头则高高的抬着，我正

是为此付出了代价：在监狱里，我才发现那棉衣上的斑斑血迹，好久好久之后，我一点一点地从头皮上剥落已经结了痂的血块，我记得，那是另一位解放军发现我没有低头而用枪托留给我的“教训”，完全不能责怪这些年轻人，他们是刚刚服从命令赶到西宁来“镇压反革命”的！

傍晚开始，雪越来越大了。大约到天擦黑的时候，我们一批人才被几个解放军带走，每个人都被捆绑着，然后用一根很粗的绳子“串”起来，出报社后门，沿着湟水岸边的小路，踏着嘎吱嘎吱的积雪，走走停停，只要停下来，马上命令“跪下”或“蹲下”。我们看到河对岸架着一挺又一挺机枪，心想，莫非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已经走到头？半夜时分，我们才到了其实和报社在同一条马路上的仅有四五百米距离的省公安厅大院。（记得这时我问了问身边的人：“有表吗？几点了？”他艰难地拉开棉袄，说：“11点多了。”）又不知跪了多长时间，终于，我们被先后推上或拉上了大卡车。车上，四周看看，朦朦胧胧中似乎没几个相识的，看模样，可能多是工人。在死寂的马路上“呜-呜-呜”地开了不久，便进了一个院子，接着再一拨一拨送进了黑乎乎的屋子。屋子不小，有上下两层联体木床，大家依次各就各位，后面还有站着的喊了一声“再挤进去点”，便又腾出了一点地方，最后各人都有了自己的三四十公分宽的一条安身之“床”。没想到半夜里有一根梁断裂，上面的人连同木板都压在了下层人的身上，当场就有一个倒霉的家伙血流满面，“报告政府”后被抬了出去，是死是活，再没下文。

那夜，没有月亮。牢房里高高挂起的灯一直在晃动着，我想，屋外的雪一定已经很厚了，可是，这洁白的雪能掩埋得住那腥红的血吗……

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牢狱体验。那时，我大学毕业不满十年，还不到三十足岁，怎么会想到，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党的喉舌”一夜之间竟成了反革命？

坐牢的人也要吃饭也要拉屎撒尿。第一夜，或许是一天没吃没喝，或许是又惊又累，也或许是“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心理支撑，倒也睡得比较安稳，早上看到满屋子认识和不认识的，更是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几乎所有的人都坚信，这个案子迟早要“翻”。可眼前的日子不好过呵。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大小便。怎么办？于是屋子里喊成一片。一个肩上背着枪的走过来：“不要乱叫，有事要喊‘报告’。”

“报告！”“报告尿尿！”“报告班长尿尿！”“报告政府大便！”煞是热闹。

“一个个来。”

“不行呵，我都憋不住了。”“我们都不行啦。”“要憋死人啦！”

第一批出去大小便的回来就带了不少新闻，有个家伙特别夸张地说：“满了，全满了，少说也得有上千。”有人马上补充：“我来过的，这里是新生皮毛厂，隔壁是印刷厂，服装厂，全是劳改厂子。”马上又有人接上话茬：“那这回抓了多少呵？”“我看保卫报社的肯定一个都逃不过，家里的头头脑脑还能放过？不也得抓一点？”“抓得越多才好哩！”“咱们算运道，死了的，有多少呵！”七嘴八舌的热闹迅即变为死一般的寂静。

或许是白天“报告尿尿”的实在太多，夜里就抬进来一个大木桶，原来就是厕所里的尿桶，那个臭呵没法说，尤其是跟前的几个真是得熏死。可是任凭大家怎么“抗议”，就是没人理睬。寒冷、紧张、休息不好，饮食失调……第二天就有不少人身体不适，有的感冒，有的还发烧，我的喉咙也干得难受。在起起落落的一片“报告”声中，终于同意有病的可以“报告”出去看病。我随大家一起走出屋子，没想到排队的人已经绵延曲折到了我们屋子门前。不过都特别开心，至少外面的空气要好一点。虽然不准说话，却都在寻寻觅觅，有时也能碰巧四目相对，那时就会做出一种动作或者一个暗示，然后就是会心的一笑。终于轮到了我。我艰难地对医生说：“我-不能-说话。”谁知他竟大声回答说：“不能说话就不要说，滚！”我只好向后转。回到屋子里，我看到睡在我旁边的老编辑刘醒华，五十多岁了，由于昨天铐子太紧时间又太长，现在十个手指发青发紫，手腕上那条印痕足有半公分深，他正轻轻地在揉搓，我为他“报告”来一杯开水，让他用热毛巾敷敷；我建议他出去看看医生，他说没用；我问他怎么抓进来的，他说因为凌晨来了“最高指示”，换稿子，时间拖长了，还没来得及回家，在车间里就给带走了。

又过了一天，突然命令全体到操场集合，原来是宣读一封“反革命家属”来信，这信是给我们报社一个记者的。“政府”的人叫这个人出列，说，现在由你来向大家宣读。这个家伙先还象个样子，越读越没样子了，后来竟由泣而哭，由哭而嚎，最后干脆放下信大喊起来：“妈妈呀，我对不起您呀，我一定听政府的话，彻底揭发反革命罪行，争取从宽处理重新做人……”然后，政府的人（看上去是个不小的干部）又谆谆教诲了一番，要大家“认清形势，回头是岸”，并且警告说，死

不悔改，死路一条。可是回到屋子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大家对那个家伙嗤之以鼻，还说，那不明摆着是在演戏嘛（平反后，那个痛哭流涕的竟不好意思在报社呆下去而换了个单位）。我记忆里，好象没见有人去“交代”“揭发”的，即使偶尔看到有人在写什么东西，凑过去一瞄，原来是“政府”让他在登记单位里“造反派”的名单，这不是什么“秘密”，当然更不能说是“出卖”。（后来才知道，由于逮捕的人太多，一时混乱不堪，他们需要逐步“清理”）。

记忆里只吃过一次肉，那是为了庆祝“三八妇女节”，每人在排队领取一勺白菜外，再在另一处领取一块肥肉。我从小不吃肥肉，即使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党的生日、国庆之类盛大节日时供应几两猪肉，大家都要肥的，唯我只要瘦的，要瘦到没有一丝肥的。这回我把这块肥肉给了一位工人，他人高马大，每天两个窝窝头让他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我常常省下那么一小块，说我吃不了，给他，他总要推辞再三，这次更不肯受，说，难得的，吃吧。我说，我从来不吃肥肉。他说，现在不一样，吃了吧。我坚持，他又在我碗里把上面那一点点瘦的夹了下来，嘴里还在说，实在不该，不该呵。

这一回坐牢，那真叫是“坐”牢，属于你的那几十公分宽的地方，根本无法舒展筋骨；这屋子原本是劳改犯的宿舍，上下铺，对面对，也就是装三十来号人吧，现在象沙丁鱼罐头似的挤了超过一倍的人，就别想再有地方可以活动一下身子，里面的人要出来也得注意小心踩了别人的脚。这常常让我想起梅里美在《塔曼果》中描写的场景，记得那是在一个饿着肚子的冬夜，我和早我半年被发配到青海的北大同学文秉勋围着火炉促膝畅谈，后来他又开始翻译这篇小说，炉盖边上是晚饭节省下来的两个馍（两人都只喝了稀糊糊），烤干的馍不是一口一口吃掉的，而是焦一层剥一层剥一层吃一层，分几次一点一点吃光的。三十年后，他为我一书写序中回忆了这终生难忘的一幕：

于是，在小屋里昏暗的灯光下，且把漫天风雪关在窗外，两人围炉而坐，我一边译，他一边看，待到译完，几乎已是一个通宵，竟不知东方之既白.....

而现在，我们就是奴隶就是鱼肉就是连那些“黑鬼”都不如的地狱里的小鬼！

前面已经写到，我们终于在一个多月后获得平反，此后，我作为省报资深记者，深入许多地方，包括部队领导层，对这个血腥的事件进行了细致的采访，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彻底揭开了真相。我把那些珍贵的资料装订为《文

化大革命资料（第 19 集）》（共四十集，2000 年我无偿赠送给了人民日报的李辉先生），其中有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解决青海问题的会议上，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以及林彪等人的讲话，特别是有事件发生后，部队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为了欺上瞒下，在一次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后来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罪证）。非常遗憾的是，这本资料从我第二次坐牢被释放后归还的资料中竟然不翼而飞了，那些混蛋们甚至不敢说被他们“没收”（当时有文件规定，文革资料必须上交）了，只是一口咬定“没见到过”。现在我只能凭记忆将一些重要的细节记述如下（当然，在国家、军队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档案馆里，肯定可以找到我丢失的这些资料的原件或复制件，所以我相信我这里记述的准确性一定可以得到证明）：

关于“第一枪”和“死了三个解放军”。

那场大屠杀不仅使善良的百姓无比震惊，死伤 500 多人空前惨烈的结果也使制造大屠杀的侩子手们惊慌失措。他们散布的最大的谎言就是守卫报社的“反革命”首先开枪打了解放军。确实，是死了三个解放军。问题在于他们是怎么死的？很快到来的由中央最高领导部门组成的“调查小组”，特别是军事专家组经过调查，毫不费力地就做出结论：完全是部队自己的误伤。在不足半平方公里的地方，竟然部署了如此多的重型武器，先头部队已经攻入报社，制高点上的机枪还在发威，死三个就算幸运。这是指挥上的重大错误。

关于“一麻袋一麻袋的枪支”。

既然是“反革命”开了“第一枪”，当然就得“寻枪”。材料中有相当部分是各种会议上要求迅速查找“反革命组织隐藏的枪支弹药”的讲话，说白了，就是要赶紧找到枪！报社那块地方自然是象篋子一样篋了一遍两遍三遍，家家户户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我住的那间 12 平米的平房连天花板也撬开了），可是没有；各个有“反革命”的单位也都反反复复地清查过了，有的甚至已经掘地三尺，但都令他们失望。与此同时，送到北京的“反革命材料”已经“一麻袋一麻袋”（北京的造反派，包括前面提及的北京地质学院的聂树人，在中央文革看到了这些材料，他们还把当时逃到北京的青海“反革命”藏在了学校图书馆的书库里），但是光有“材料”没用，关键是要枪。有一个文件是总后 205 部队政治处主任陈郁文的讲话，他在会上气急败坏地对那些至今没找到枪支的“蠢货”们说：有人说，我们在捞稻草，难道你们真的连稻草也捞不到？与会者立即醒悟，当天就有“一麻袋一麻袋”枪支

送到规定的地方。接着全省举行了空前的大游戏，而那些“反革命罪证”自然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后来，中央调查组一眼就看出，原来这是各单位民兵的枪支。

关于“反革命烧死自己的人”。

这是他们制造的又一个弥天大谎。他们拿出了照片，有些善良的人便信以为真了。其实很简单，那是地上一处处的煤火堆，是守卫报社的人冬夜取暖用的，当部队冲进去的时候，正好在火堆旁的人如果中弹倒下，自然极有可能就倒在火堆上，而在当时一片混乱之中，谁也根本不可能注意到这一情况的。即以常理想想，一条烧焦了的腿，或者一只胳膊，能证明这些人是因为反抗而惨遭“自己人”“火刑”的吗？那堆没有“火”的煤火堆能“烧死”人？还有，他们之中有人甚至已经身中数弹（调查组验尸所见），这该如何解释呢？当然，照片上是怎么也不看不出枪眼来的，再说了，在一片红色恐怖中，谁敢表示哪怕是一顶点儿怀疑呢？据说，在他们准备的终于没来得及展出的“青海 818 反革命罪行展览”上，这张照片的说明是这样的：“反革命丧尽天良，他们是一批比魔鬼还要残忍的家伙。他们把看出他们反革命阴谋，企图逃出报社的人，活活烧死。这是现场照片。”我猜不到，我那张跪着的照片会写上怎样的“说明”，可惜，我没看到。

关于总后勤部 205 政治处主任陈郁文及其赴京的前前后后。

为什么要专门记下这个陈某人，实在是因为在我看到的所有的材料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话最为精彩的是他，头脑最为清醒的还是他。前面说到的“捞稻草”那番话可以作为“精彩”证明，但千万别把他看成了一个小丑，不，他怎么说也是个“军级”，从他的多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怀着惴惴不安之心，特别是中央要青海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永夫、205 部队主任的张晓川和他进京汇报时，我相信，他的那颗灵魂肯定颤栗完全撕裂了。他为“赵副司令员”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汇报讲话”，自然是如何成功地镇压反革命之类，且总结了若干条“体会和经验”，这里需要插一笔：据后来张晓川“交代”（此人由于交代彻底，后来判的刑期最轻，记得是有期徒刑七年），他问陈某，此去京城如何？陈某答曰：“凶多吉少”。一行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汇报会是“林副主席”主持的，据说他们刚刚“介绍”完“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没等走下台，就被上来的警卫“带走”了，十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便发布《决定》，为青海“2.23 事件”彻底平反。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来青海的代表对我们说，为什么要用十天

工夫？中央也希望快一点呀，但是一定要把工作做得万无一失，要保证还关押在监狱里的上万革命群众的安全呵。他们的头头抓起来了，可青海还有他们的人在，如果透露一点点消息，就不得了呵，可能狗急跳墙大屠杀呵……。

二·二三事件亲历目睹记 1967年2月23号是个不吉利的一天，虽然这一天在顺序上不是13这个数，但仍带有3，可以说23这个数至少有一半不吉利。照此推论，那23号这一天也就至少有半天是不吉利的了。天刚亮就有人进宿舍喊起床，说是集合开会，这在以往是没有的，那时有人如果能睡觉的话，头睡偏了睡肿了，睡到太阳晒屁股，睡一天，也没有人喊他。所以今天老早就喊人起床有点反常。去水房打洗脸水，看到场院内有很多军人在走动，大门口门卫上站了持枪的军人，家属院房顶上也站了持枪的军人，从未有过这样，因而感到情况异常。随即也就了情，今天恐怕对八·一八不利，因为喊起床的是兵团人，个别兵团头子有着很高兴的样子。8点以后，所有在场内的人一个不少，全部集中到大门口指挥部办公室门前空地上。这里两辆汽车屁股对屁股靠墙停着，后车厢板和对人一面的车厢板已经放下。一个军人右手拿着铁皮卷成的喇叭，上了车厢站好，军人左手指挥，要指挥部人站他左边，兵团人站他右边，其他人站中间。随即左手从口袋拿出文件看着，右手把喇叭对着嘴。特定的年代，文件起头，开会发言，首先要引用四个伟大人的语录，称为最高指示，这个军人也不例外，他念开了：“最高指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看看群众，又念下去：“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的通令”。军人冷酷的令人可怕的目光扫视群众后，又继续念下去，内容列举八·一八打砸抢，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挑动群众斗群众，迫害无辜干部和群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罪行。通令念完后，左手拿着通令文件，指着兵团和逍遥派，严肃的说：“现在你们，”眼睛仍在看着兵团和逍遥派的同时，左手已经转向指挥部，边抖动左手边说：“把这里的头头一个个清理出来。”有兵大哥撑腰，八·一八已经是反革命了，于是喊这个名字，喊那个名字，平时有点不和的人，正好借机泄恨报一箭之仇，就连平常不讲话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现在都讲话喊起名字来了，被喊名字的人就从指挥

部人群里面出来，站前一点。在继续喊人名字时，八·一八人群里一个人转身，把指挥部办公室门口墙上挂的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牌子取下，拿到站出的人前面，攒到地下，使劲用穿的皮鞋踩下去，几下后牌子就坏了，这人大概意在表态，用实际行动反戈一击。仍在喊人，被喊到就站出来。我听着一个个人被喊，看着一个个站出来的人，思想开了小差：我来青海找工作被招工时就就是从人群里喊出来的，今天这些被喊名字的人不是被招工。藏民死了以后，你不能再喊他名字，因为死者灵魂已经去西方极乐世界享福，你喊他名字，他要返回人间继续遭受无穷尽的困苦和罪孽，喊死人名字是对死者后人最大的报仇雪恨，被喊名字的死者后人会和你拼刀子。今天这些被喊名字的人是阳间的大活人，会不会如同在西方极乐世界享福一样，只因为被喊名字又来人间遭受罪孽呢？受苦受难呢？小时候听老人说，白天是阳间，是人世界，黑夜是阴间，是鬼世界。天黑以后，阎王老头派阴差到人间来勾活人的魂，阴差到处跑，不小心能碰上，你如喊某人的名字，正好碰巧阴差在场，阴差也会偷懒，不愿再跑路，就把听到你喊名字人的魂勾走交差，这人魂被勾走后就活不成就会死，所以我的家乡天黑后不喊人名字。今天这些人名字被喊，不知道他们的魂会不会被阴差勾走，会不会死。今天我亲身经历在现场看到喊人名字，喊和被喊的不是亲人，还可以说平常有矛盾或仇恨，好在是白天，没有阴差在场，魂不会被勾走，死不了。也就在这时，广播响了，打断了我的思想开小差，广播播出解放军坚决支持兵团的声明，也真配合及时，恰到好处。我看着听着，思想又开起小差，想到昨晚，也就是 22 号晚间李场长在兵团大会上的表态，今天看来，事出有因。兵团开自己兵的大会，主持人号召自己的虾兵蟹将抓革命促生产，夺取文化大革命胜利，框框套话完了以后说道：“李场长要借兵团的大会说句话，不知什么话，现在就请李场长说吧。”早就被八·一八夺去权靠边站，只有戴高帽子接受批斗的李场长，就坐在主席台傍，于是就站起来走到话筒前，看了一下人群，说道：“同志们，你们大家好！现在我要郑重的宣布一件事。”这话自然吸引了所有在场人的注意，他看了一下会场，似乎把所有在场的人都浏览到了，表情非常严肃，大声的说道：“我以前对八·一八的支持表态，都是被迫的！现在声明：以前对八·一八所有的支持表态，一律作废！我今后坚决支持兵团！和兵团的同志们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彻底胜利而共同奋斗！”李

场长的话说过，主持会的人要他签字表态支持兵团，他当场签字，主持会的人把他签的字念给到会的人听，然后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就散会了。当时我心中就好生奇怪，兵团的会似乎是专为李场长发表声明而开似的。八·一八走下坡路是明摆的事，人人看出，个个知道，今天被打成反革命，李场长是否事先知道，局外人就不清楚了。不过，声明也及时，不是马后炮。指挥部的人集中一间房子登记，收缴袖套、队员证、队徽等例行手续。

以前从书中和报上看到有戒严，没有经历过，不知道戒严是什么一回事，现在城里戒严了。正好兵团有任务要派车去二十里铺拉人，进场部队给了两张通行证，我何不亲自随车外出去了解一下戒严呢？于是就身临其境去体验戒严了。三四场总大门外路边地上，放着一台和造房砖块大小差不多的如同收音机一样的玩艺，伸出的天线约有一公尺长，一个挎手枪的军人蹬在地上，拿着话筒在通话，另有一个年轻的军人持枪侍立一旁，表情冷漠严肃，似乎是军官的卫兵。

三场所在地的柴达木路，是青海一条主要的公路，平时汽车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现在冷冷清清，看不到汽车通行。西宁到二十里铺路上也冷冷清清没有汽车行驶，偶有汽车通行，风挡玻璃上都贴有通行证。看来戒严就是断绝交通，至少断绝交通或者交通管理也是戒严内容之一。二十里铺没有拉到人，空车返回到古城台二医院门口停下。前方有很多人，不知在干什么，自然要去看稀罕。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的成员被集中在大门外靠在墙边，另三面有军人端着装上刺刀的枪围着，军人表情严肃，怒目相视，刺刀寒光闪闪，似乎马上就要刺杀捅过去，或者子弹就要出枪膛射进人的身上，看着心中发毛，不寒而慄，一身鸡皮疙瘩。军人后面是套着红袖套而非八·一八观点的人围着，还有十多个住院的病人也来观看。学生们真坚强，胳膊挽着胳膊，紧紧的不松开，一个学生领头唱语录歌：“下定决心，唱。”于是众学生附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唱完后又异口同声的大声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唱语录歌和背诵语录，是当时的下里巴人，人人会唱，人人会念，也和附和，这是人的精神支柱，诚所谓千支歌，万支歌，战士最爱唱毛主席语录歌。然而，并不因为你唱语录歌念语录就等于有了护身符，就情有独

钟情有可原，仍然枪打出头鸟，领唱者、鼓动者、坚强者一个个被拉郎，虽然相互挽紧不放松，还是敌不过拉的人，如老鹰抓小鸡一样被拉出，绳捆索绑后被拥进车厢，等到车厢里下定决心的人到达一定数目时，就送去南滩监狱。我只看见一个学生似乎有不坚强之态，离开人群到墙边，背对军人，低着的头斜抵在墙上，一动也不动，不参加唱语录歌，也不念语录，似乎在思考什么，终于在交出证件后获准离开人群去学校。几十个学生经不起几次送，剩下七八个学生了，仍在下定决心，终于全部被捆绑后拥进车厢。这时忽然哭哭啼啼来了十多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异口同声的说：“我们都是八·一八，我们都是八·一八，把我们送到监狱去，把我们送到监狱去。”一个个不请自到，自投罗网，自我判刑，爬上车厢下不下车，要去监狱，汽车真的把她们和下定决心的人一齐送去南滩监狱，不是亲眼所见不会相信，她们为何要这样做则就不知道了，也可能是想体验一下吃饭不要钱的滋味吧？下定决心的人捆完了送完了，军人走了，围观的人散了。真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多捆人的绳子。食堂送饭来了，连碗筷都带来还有开水。兵团当家，当然给自己的兵送来果腹之物，而且早早就送来，虽然只有几个人。二医院喇叭忽然开始播音：“医护人员请注意！医护人员请注意！赶快全部到医院来集合！赶快全部到医院来集合！到报社去抢救受伤人员！到报社去抢救受伤人员！医护人员请……”播了四五遍。从连续多次紧迫的播音和语气能听出，报社似乎有什么非常之事发生，不然不会要这么多医护人员去。我站在车厢穷目四方，不一会红十字的救护车开进医院大门里停下，车门打开，被医护人员扶下车的人，左胳膊放在吊挂于脖子上的白布袋里，被人扶持着走进医院。有个人大腿缠着白布，被人搀扶下车，用担架抬进医院。还有几个人不同地方有伤，缠着白布，被人搀扶进去。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抬下车后没有抬进医院，从里面抬出一个就诊人员等候就诊时坐的那种长椅子，放到离我不到二十米远的大门内院子场地上，把女孩子仰面朝天躺椅子上，头和椅子一头齐平，长约一市尺的两条小辫子从颈后抽出挂在下面，随着微风一摆一摆，似乎是代替手在做哑语手势诉说冤屈。这姑娘年龄在十八九岁，正是豆蔻年华含苞欲放的花蕾，谁知就过早的红消香断离开人间旅店，魂归望乡台。人有死的一天，只是迟早而已，在全国死个把人算不了什么，可是，在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家来说，是一件大事，呜呼哀哉！悲者矣！凋谢的花儿躺在长椅子上，没有盖的，着妆单薄，也朴素，朴素，是特定

年代的普遍现象。我正看着想着，司机指着这一切告诉我，报社开枪了，拉来的这些受伤人都是守卫报社的，椅子上那个女的已经死了。下午三四点时车子去乐家湾拉人，有西门口拐进七一路，通过报社门口时冷冷清清，清清冷冷，军车一辆也没有，围观的人没有一个，看热闹的人一个没有。离报社门口约有三百公尺远的马路上怎么哪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汽车已经来到人群边，只见七八个人并排一字跪在七一路中心线的北边，双手垂下，低着头，如此一排排，一排排，前后距离至少有二百公尺，分成四五个人群，都面向东方。他们都是没有被子弹打中的守卫报社的有功之臣，真是九死一生了，有此也可见守报社的人有多少了。小时候大人教小孩子唱儿歌：“排排坐，分果果；果果多，分的多；果果少，分的少；果果分完了，大家拍手笑。”现在眼下这些人在马路上排排跪，他们分不到果子，解放军在左边端着枪对着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群，枪头上的刺刀明亮亮，光闪闪，发出前进进一步的口令，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就用膝盖代替脚朝前挪一步。前进一步又出口，兵大哥端枪对着的跪地长方形纵队又挪前一步。这些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是被赶到这里跪下，还是在报社门口就跪下，在前进一步又前进一步，一直在不停的前进一步口令中前进到这里，就不知道了。如果是在报社门口就开始练习跪地行进操一直行进到这里的话，他们膝盖处的皮肯定要磨破出血，甚至露出骨头来，因为报社离这里已经不近了。这些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都自觉革命，没有人说话。没有向左看齐和向右看齐的口令，但他们都排的很整齐。没有向前看的口令，但他们都低下头，目不斜视，看着胸前一小段路面，并且都没有表情。在这跪地以膝盖挪步的队伍里，也有花季少女，能遮掩耳朵的短发头，现在蓬头散发，如同喜鹊窝，而且垢面。双辫子长发头，辫子有的散了，成了乱蓬蓬披肩发。人要衣服马要鞍，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她们因为响应号召，进而誓死保卫，忙于文化大革命，没有时间去修饰打扮，或者太过份相信，认为修饰打扮漂亮好看是姓资不姓无，因为相信和爱的是姓无，也就不肖修饰打扮去姓资爱资了。认为越穷越朴素，就越光荣，反过来，就会更进一步越相信、越敬仰、越革命、越……越……，早把女为悦己者容忘了，或者不当一回事，并认为可耻而深刻批判之。然而，好心成了驴肝肺，没有想到会在大白天被赶到马路上强迫跪下，以膝盖代脚前进一步又前进一步练习跪地行进操。

早先看书报和电影，对革命志士戴镣长街行，实在佩服他们的气节，今天看

到这么多人练习跪地行进操，心中戚戚，我没有一睹为快的感觉，也没有因另一组织和人被整而高兴。这些被军人端着装有刺刀的枪对着，在军人口令声中，随着寒光闪闪的刺刀指挥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曾经在语录中摘其所需武装自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也高喊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曾经信誓旦旦：“头可断，血可流，报社不能丢。”他们所说的都兑现了，也可以说没有兑现：革命确实不是请客吃饭，从昨晚到现在太阳快落山了，这么长的 24 小时中间，没有人请他们当贵客去吃饭，甚至连一口水也没有喝，被枪击而死的人成了饿死鬼，侥幸活命来到这里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谅必也饿肚子。一身剐没有发生，膝盖代脚用来挪步，也不会好受，至于皇帝拉下马没有就不清楚了，看样子也没有拉下来。头可断，血可流兑现了，但报社还是丢了。在报社被枪击而死和伤残在医院治疗的人姑且不说，活着的人在此练习跪地行进操，人格的尊严扫地以尽，心灵上的创伤烙印将伴随终生，他们现在跪地长街行，不知心中想什么，也可能被报社枪击人的场面和死人吓昏了，神经麻木了，头脑一片空白，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愿想。年轻的花季少女将会比其他人更伤心，伴随她们的将是恐怖的回忆，甚至半夜惊恶梦，泪湿绣花枕。虔诚的教徒和朝圣者，临近圣地，甚至离圣地很远时，就双手合掌高举过头，低下到胸口，默默祈祷，弯下腰，双手落地，两脚移到手后。再站起来，再双手合掌高举过头，低下到胸口，默默祈祷，弯下腰，双手落地，两脚移到手后。如此反复，如屈身虫一样行进，用身体丈量路面。到达圣地后，不论见到见不到心目中的偶像真神，都能激动的哭出声来，甚至五体投地匍匐绕行。眼前这些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也曾经是虔诚的，甚至是盲目的崇拜偶像真神到了疯狂程度的教徒，为了弘扬宗教，宣传、动员别人也信仰崇拜自己心目中的偶像真神，豪言壮语，视死如归来保卫报社。想不到会被宣布为反革命，被赶鸭子一样赶到马路上跪下，兵大哥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对着，在斥责的口令声中前进一步又前进一步，不停的前进一步，如同屈身虫一样，虔诚的跪在地上朝圣地挪膝盖代步，简直激动的要哭出声来，只因兵大哥怒目相视不领情，才强忍怆然之泪，吞咽凄惨之声。其实，他们是在上演泄气君子计，也就是使用三十七计的泄气君子使他们上当吃亏受罪，造成这恒古未有的人间一幕活闹剧，也是一幕可耻的悲剧。汽车从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身后右边马路上过去，我看着黄昏的太阳说出声来：“昔李斯就诛兮，叹黄

犬而长吟。余友之伏法兮，顾日影而索琴。”司机问我说什么，我说：“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我亲眼见到的残暴、残酷、残忍事，亲身遭受到的凄惨、伤心事，都太多了，我神经麻木了，头脑里面什么也没有，一片空白。”司机说道：“二医院长椅子上死的丫头，不知道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跪在马路上的人也没有想到会受这样的罪，他们没有被枪打死，好死不如赖活，仍然活着在，比死去的人强，就该满足了。今天看到的比舞台演出还精彩，大饱眼福，人生幸事，有的人花钱也看不到。”

拉了贫下中农红卫军进到八场，这些农民下车后迅速武装起来，好在是汽车运输单位，木棍棒和铁条有的是，立马操握在手。柳河东笔下捕蛇者所说：“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现在这些都是青壮年的贫下中农红卫军们，一个个身强体壮，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头脑，去指挥用棍棒武装起来的双手，无疑是如虎添翼，使用起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而且又是名正言顺的在镇压反革命，就如同操握着皇上授予的尚方宝剑一样，也就有恃无恐，无所畏惧，随心所欲，一个个都成了如同来到吾乡的悍吏一样。如果和悍吏相比较的话，还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比悍吏还悍，满场院乱窜，大喊大叫“你爸呢？”“叫你爸出来！”

大约有内奸，要不怎么会直接问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呢？再不然就是瞎吓唬，别说孩子们被吓坏哭开了，就是大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一位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妇人，一手拉着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这两个女娃子吓坏了，哭的满脸是泪珠，浑身颤抖。老妇人身边还有几个中年女人，问什么事，我告诉她们城里发生的一切和亲眼所见，并关心的问她们亲人中有没有去守报社的，一个女人回答也不假：“我们是家属，成天在家不出门，哪晓得外面有什么事。”

贫下中农红卫军在场门口打一个八场工人，说他是八·一八，直到有人证明不是才歇手。这个倒霉不走运被打的人年龄在二十七八岁，身强体壮，但却招架不住那么多人围着打，满脸是血，一只耳朵下面和脸皮连接处已经被撕开一点，不停的在滴血，但他没有愤怒难过的表情，忍住愤懑和伤痛，强装笑脸和本单位人说笑。贫下中农红卫军要进一个房间找人，死活不开门，搞坏门上暗锁，屋内一个人也没有，桌子上大半碗面条还是热的。大概就食者看到这些如狼似虎的家伙进场，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想到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好汉不吃眼前亏，或者好大姐躲避瘟疫，只有暂时绝食锁门而去，任你去打破门乃至抢劫了。有贫下中农红卫军的作

为，想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到了什么程度，好得很和糟得很，不知该相信哪种说法。司机的话对乘客有点威信，我不是司机，但我坐驾驶室，农民搞不清，我说：“老乡，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响应中央号召，就是八·一八也不能随便打，他们只是一般群众，只是挂个名。”农民中有人说：“对对对。”扔掉了武器，其他人也纷纷效尤。三寸不烂之舌还起了作用，终生不忘这句话。送回农民，空车从大街返回，不知道跪地行进的虔诚的朝圣者教徒们如何了。

兵团掌权了，大权在握，就要发号施令，上午被喊名字的人，一部分已经绳索加身送去监狱，就连门卫都换成了兵团的人。到有人地方看看，都在谈今天发生的事，我也介绍亲眼所见。受了刺激，一夜睡不着。守报社的大队人马轮换去剧院，看同一观点的红宣兵和红艺兵演出鼓舞士气的节目，所以青海剧场始终人满满的。2月23号剧场大门有铁将军把守，解放军广播车喇叭对着大门播音，台上的表演者，也就是红宣兵和红艺兵，带领着看客们高喊：“造谣！”高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造反有理！”等等，豪言壮语简直掩盖了高音喇叭的声音。然而，肚子和人一样，也闹革命，也当造反派，真革命造反派被自己肚子革命造反搅闹的难受，感觉到饿的不行了，天快黑了，能不饿吗？终于拿来钥匙请铁将军走开。剧院里人多，放屁也是热的，出剧院首先感觉到冷，很长时间没吃东西，身上缺少卡路里，应该同情他们冷。从马路消息听到，这些走出剧院者，登记收缴证件一应例行公事不会少，有的被按图索骥铐走了，还有的领到了猫掌、鹅掌，甚至熊掌，都不须破费一文小钱。这个掌，那个掌，非但不能吃，反而有失体面，并有火辣辣之感，人格尊严受辱，体面丧失，也能使心胸不宽畅的人领尝后会痛不欲生。24号早餐后随着人们去三四场总大门外看看。三四场守报社的人，三个五个，十个八个，或多或少，陆陆续续，殊途同归回来。他们更自觉革命，车子拉他们到报社去，不接他们回来，也没有意见，开动自备11号车，顺公路走，沿铁路走，逆湟水

24号早餐后随着人们去三四场总大门外看看。三四场守报社的人，三个五个，十个八个，或多或少，陆陆续续，殊途同归回来。他们更自觉革命，车子拉他们到报社去，不接他们回来，也没有意见，开动自备11号车，顺公路走，沿铁路走，逆湟水河走，悉随尊便。这些守报社的有功之臣万万没有想到，在总大门外欢迎他们的人很多，老鹰抓小鸡一样，来一个抓一个，勒令跪到地下，前额抵到

地面，屁股撅的老高，后面来的人看见，不要人说，照猫画虎，自觉跪下。自觉、自觉、自觉，跪下、跪下、跪下。这些一字长蛇阵的跪地者，曾经在兵大哥刺刀下练习过跪地行进操，他们当中有的是盲目的几近疯狂的教徒，现在额头抵到地面做宗教仪式，是祈求曾经信仰崇拜的神保佑，还是咒骂被他三十七计坑害上当则不知了。做一会跪地仪式后获大赦回去写请罪书，跪地长蛇阵有陆续返回的教徒补充，三四场守报社人多，长蛇阵依然长蛇阵。现在已经是无政府主义了，法律已经不存在，就三场一偶之地来说，就是兵团政府，兵团法律。二蛋还在做跪地仪式时，就被人拉起弄到指挥部发号施令的办公室私设刑堂，被双臂扭后进行绳捆索绑，抽出背后双手上的绳头挂一处高的地方。兵团一个人审问他时拿着一个小棍棒，边问边敲击其头部，虽没有令他到休克的地步，但毕竟是在他们自我标榜为革命造反派自己的办公室接受私刑，也就是极大的讽刺了，不过现在这办公室归兵团所有。二蛋的回答得不到满意，审问人把绳子朝下一拉，绳子就带动双臂上升，直到两脚差不多悬空，二蛋急了，喊叫“我说，我说”，于是绳头放松，两脚落地，得不到满意回答时就拉绳子头，又使他差不多两脚悬空。兵团也武斗，也搞逼、供、信，真是为人不做官，做官都一般。你说一个嘴，他说一个眼，再有说耳朵鼻子，乃至身体四肢长相发肤，一个完整的人就勾画出来了。凯旋归来的守报社有功之臣，一个个都被吓的屁滚尿流，谈吐中无不痛骂李国扬和张金田，恨不得把他二人抽筋搓绳，再食肉寝皮方能解其恨，似乎三场死伤那么多人都应该归罪于他二人。然而，他二人已经撒手人间，人死债烂，没法找他二人了。不过，综合一下各人所说和请罪书内容，报社流血一幕也就展示的一清二楚。报社大门朝南，门口所对着的一段七一路面早先是土城墙，搬去城墙修路，路南边还存留着土城墙。报社大门到公路间停满了军车，围观的人山人海，给解放军支援、声援、助威的人车从这段七一路经过，八·一八游行队伍和拉人游行的汽车也从这段路经过。报社西墙外有一条土公路，连接七一路和柴达木路，土公路西到临近河滩地是白杨树林。报社北墙外是自西向东流的湟水河，和土公路相交处有座木桥，三场和五场守卫报社的大队人马就在桥的南边临河驻扎。三场和五场防地到大门之间有别的单位八·一八防守，报社东墙外是房子，北墙外是河，都无需防守。2月23号围观的人一个也没有，军车也早就开走，土城墙上架着机枪，枪口对准了该对的目标，军人端着冲锋枪对着守报社人，枪头上的

刺刀寒光闪闪，一个个虎视眈眈，令人发怵，胆颤心惊。军队喇叭播放着取缔八·一八的通令，可是，报社的高音喇叭比军队的喇叭声音更高，北京来的红卫兵张大海似乎掌握有尚方宝剑一样，在露天场地一辆汽车上，对着话筒大骂：“我们严重警告青海军区内部一小撮混蛋，你们把目标对准了谁？”他只会骂，只会问，没有想一想，今天的目标到底对准了谁，并且包括自己在内。三场带队李国扬，司机，三十多岁，正集中精力和人玩扑克牌，把身边的事态置之度外。一个军官朝李国扬身边一个工人招招手，这个工人去了，军官在白纸上写几个字，要工人交给李国扬，李国扬接到纸条看也不看，撕的粉碎，看着军官，拍着胸口说：“要命可以，有一条，要报社办不到！”又继续和他人玩扑克，军官摇摇头。过一会，这军官又写几个字在白纸上，招来刚才的工人交给李国扬，这次李国扬接到纸条未撕，用一个小石子压在地面，仍旧和人玩扑克，他没有想到，集中精力一心玩扑克时，也就是正在玩自己的命。纸条又一次交到李国扬手里，他看过后不玩扑克了，起身走走看看，张张望望，就在这时，军人开枪打坏了大骂一小撮混蛋的报社喇叭，这一下骂不成混蛋了，也警告不成了，也质问不成了。三场守报社领队张金田指挥队员胳膊挽胳膊，组建成三道人墙，说道：“谁松开手让解放军进来谁负责。”他自己站到人墙后，带头唱语录歌：“下定决心，唱。”特定的年代，语录歌就如同能治百病的甘草一样，药到病除，也和下里巴人歌一样，人人会唱，人人会附和，于是一齐附和唱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唱完后，又一同大声呼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唱法和喊法，是时代的产物，能鼓舞士气去排除万难，真能产生意料不到的效果，能争取到胜利。

五场和三场守卫报社的人在一起，五场带来的一辆汽车停在桥南路边，把四轮刹车拧死，再挂上档后拉紧手刹，然后锁门，车子推不动了，据说这是用来设置障碍阻挡解放军的，五场的人就在车边。这时气氛极为紧张，场面恐怖，差不多已经能闻到火药味，解放军广播喊着：“是真正的革命者，站到汽车那里去，通过桥离开。”喊了多遍，终于有一个五场工人离开人群站到汽车边，五场守报社的人喊叫：“欢迎我们的战友回到队伍里面来。”边喊边向这工人招手鼓掌，其实是在喊这个工人回去送死。是一个人站出来被人看不起，怕被骂为叛徒胆小鬼还是什么原因，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最终

这工人回到队伍里，继续参与在露天演出胳膊挽胳膊的活闹剧，实际上是一幕可耻残忍的悲剧。报社极其紧张恐怖的场面，阎王老头知道的一清二楚。阳间人捣人，有邦有派，阴间鬼捣鬼，有派有邦。阎老五的忠实信徒里面，还有更跟得紧跟得近的，拍鬼屁的当然不乏其鬼，把探到的消息及时汇报，所以阎老五消息灵通，对报社发生的一切就如同身临其境一样。于是，这里阳间正在混乱恐怖的进行喊魂演出，那里阴间也在有条不紊的做好勾魂准备，立即派出活人看不见的阴差到报社，做好有关接客的事宜。这些阴差，原是阳间活灵活现人的魂，他们的魂被阴差勾走而丢下躯壳不顾，到阴间后不仇恨勾他魂的阴差，反而仇将恩报，自己也加入到效忠阎老五的行列，充当阴差，返回阳间为虎作伥勾别的活人魂。不过，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既然易主，就要效忠新主，所以对这些阴差返回人间大胆勾魂的所作所为，也就无可指责。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空军有神风队，这些对天皇尽忠尽孝的人驾驶装满弹药的飞机，直向敌对方目标如航空母舰等等撞去，做到人、机、舰三合一同归于尽。现在被派到报社的阴差，都效忠阎老五，克尽职守，效仿神风队员，一个个扒附在兵大哥的子弹头上，对准好目标待命。我没有去过阴间，如何能了解阴间这等事呢？只是猜测想象，想当然而已，我相信肯定是这样。西门豹治邺，亲赴河伯娶媳现场，认为巫婆给河伯选的美女不美，要巫婆亲自去河伯处通报一声，等以后选到更美的送去，衙役把巫婆抬起扔进漳河。见巫婆久不返回，说巫婆是女子不更事，要小官吏亲自去河伯处通报。有谁不相信我的看法和猜测想象，不妨如法炮制，如同巫婆和小官吏去河伯处通报一样，也亲自去阴间调查核实，然后回来告诉世人我说的对不对。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十二点前集中到土公路至河滩间的白杨树林间，进行轻装，给每个战士发下纸和笔写请战书，向党表决心：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镇压反革命，保卫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表态的请战书事后返回原处。时间到了，军令如山倒，一点不假，兵大哥扔出一个手榴弹，烟一冒，立时枪声大作，土城墙上的机枪也如同鸭子一样嘎嘎的叫起来，现在不是四面楚歌，而是四面枪声，这恐怖的枪声，比大年初一开大门和办喜庆的炮竹声还响。扒附在子弹头上的阴差，操纵着子弹直向早就对准好的目标钻去，做到阴差、子弹和活人同归于尽。于是，子弹钻进谁的要害部位，此人就白眼一翻倒下，顷刻间就命归黄泉，鬼阴差领着死亡人的魂去阎罗殿上报到，而置丢

下的躯体不管了。有的仗鬼阴差技术不行，操纵着子弹偏离了方向，没有钻进目标的要害部位，被射中的人就不会死，可是却给造成了各种伤残留下。三场胳膊挽胳膊组建人墙的坚强战士们，正在高呼头可断，血可流，保卫报社，报社不能丢！继而高唱下定决心的语录歌，子弹令第一排人墙白眼一翻倒下了，唉呀！呼哒！呼哒！第二排人墙还没有反应过来，随即也就一翻白眼倒下了，唉呀！呼哒！呼哒！指挥人张金田和李国扬也倒下，没有人指挥了，有的挽胳膊人已经倒下挽不成了，蛇虫蚂蚁也惜命，没有倒下的一个个吓的屁滚尿流撒鸭子跑开了，朝兵大哥身后跑，不问也不看，朝桥下河里跳。体育比赛有跳高项目，没有听说过有跳低项目，这大概是守报社人自己发明创立的一个新的项目，也可说是急中生智不计成绩也不计后果的项目了，要知道，路面和桥下河水结的冰面距离不近，但是逃命要紧，顾不上了，哪有时间去考虑和研究能不能跳呢？穿黄衣服的大哥也没有调转枪头去对付逃命的叛徒。克尽职守，扒在子弹上对准好目标的阴差，也没有操纵子弹拐着弯去追杀逃兵。逃脱一命的坚强战士，一个个都成了相棋盘子上的过河卒子——有进无退，再也不退回去表演胳膊挽胳膊保卫什么劳什子报社了。

枪声停了，当然是军人胜利，守报社人失败。首要之事是要医务部门来人抢救受伤的人员，就是我站在二医院门口车厢里穷目四方，医院喇叭喊医护人员集合的时候。死了的大安身不动也就不说了。受伤的送到医院。逃脱一命又毫毛未损的，全被赶鸭子一样赶到马路上一排排一排排跪下，有兵大哥端着寒光闪闪刺刀枪对着，随着前进一步又前进一步口令练习跪地行进操。从始至终，毬蛋二人均不在人群里，更别说在人群里参与挽胳膊了，他二人在报社里，报社的大门关死，门外守报社的人也进不了里面去，三场在报社外的人拿着他二人的条子才能进报社，可见毬蛋二人还属于决策领导阶层。

生还者说到李国扬、张金田和首都红卫兵张大海，一个个咬牙切齿，无法解恨：军官写了三次纸条子给他，他不看，撕了，不和人商议讨论，不带着人离开，要队员们胳膊挽着胳膊组成人墙阻挡解放军，大骂解放军，拿我们生命做赌本开玩笑，把我们不当人，我尻他娘，我操他十八辈子祖奶奶。其实这三个人当场已经死亡，骂骂无妨，但也马后炮不起作用了。从生还者谈话中知道，谁死了，死了谁，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三场确实死了很多人，伤了很多。

24 号，军人打扫战场，对躺在地上已经死了的人一个个检查，每人一个硬纸袋，写上姓名、单位，内装查

出的物品，如手表、工作证、驾驶证、饭菜票、现金等等，天黑前一送到各人单位，同时通知死者单位晚间去人收尸。这时人们知道，三场死了三十一人，其中车队十九人，保养场十二人。重伤者已经住院，轻伤的人如擦破一点皮的早已经回场。问起报社总共打死多少人，军人回答是不知道。人们传说开了：公司有个小干部在报社走廊溜达，忽然听到枪声大作，并且看到从窗口射进来的子弹，急中生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即闪进一个房间把门关死，扒到墙角拐地上，任谁喊叫也不开门，直到军人强行打开门，喊他仍不吭声，装死，一个军人吓唬一声：“不起来开枪了！”他一下子爬起来朝军人跪下，吓坏了。

腥风血雨 2月24号晚间，兵团几个人会议，把指挥部里平时最积极的出头之鸟，也就是顽固不化分子，派去报社收尸，兵团去人压阵。我不知道战场是什么样子，何不亲自随车去看一下，这可是此生难逢的机会了。

高原天气冷，2月23号中午死的人，到第二天晚间冻的硬梆梆，有的仰面朝天直挺挺，有的爬在地上，有的侧面倒下，有的屈着身子，有的双手捂着伤口，各种姿势都有，都表情痛苦，咬牙咧齿，面无血色，有的已经难以认出。有一个外单位的女人，把扎头巾放进嘴里咬住，估计受伤后疼痛难忍，借咬住扎头巾来止痛，现在人冻硬了，扎头巾取不出来。还有一个外单位的死人倒在烧着的烤火煤上，煤已烧完了，火也灭了，但尸体也烧的难看。三场死人全部装进车厢，连夜送到火葬场背后的大酋山，那里事先雇老百姓挖好了坑，老乡仍在那里等着埋尸。因为天气太冷，地还未解冻，土挖不动，所以坑挖的也不深。一人一个坑，尸体放进坑后比地面还高，可见坑有多深了，把挖出的一点点土还坑，还难以把尸体全部掩盖，只好在周边地取上浮土添加，直到看不见尸体才罢。这样一排一排的小坟就形成了，坟也不大，每个坟脚下插一块小木片，写上人名，做好标记。三场人走后，已经走了的老百姓又返回，一一掘尸搜查，有的死者把手表套在胳膊窝里，军人打扫战场时未查出，现在被人发了洋财，还有其它军人未查出的东西，也为掘尸者所获了。25号上午，三场又派人去重新掩埋，直到眼不见为净才罢。回来的人说，有的死者衣服不全，怀疑他的衣服好，被人脱走了。钱越传越少，话越传越多，此话千真万确，一点不假。如说八·一八首先开枪，解放军被迫还击，这使人不能不信，有句话叫死老鼠坏害一锅汤，那么多人守卫报社，在混乱中有个别亡命之徒带去枪枝，并且向解放军开枪，引起解放军还击也

有可能。可是，有的消息和谣传也太离谱了，说八·一八要拖人马来祁连山打游击就离谱了。至于说八·一八在报社里开窑子店招待守报社人，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造谣中伤。又传出八·一八在水井里面放了毒药，只好派水车去城里拉自来水供应食堂和家属院。八·一八头面人物和积极分子的家都被搜查了，当然没有搜查证，原想搜出打解放军的枪枝，结果一无所获，虽然查出来几个子弹，却是老式步枪用的，老了没牙的古董，是司机从拉的废钢铁里面拣的，再就是进口车上装的闹钟等物，也有一些明显不属于私人所有的东西，当然也在带走之列。

26号上午开全场大会，把这些物品在会场展出让人看，扩大臭八·一八的宣传效果，生还者反戈一击，相继发言，痛悔过错，检举头头。因为对这种会没有兴趣，鬼使神差似的无意中去到小修工间看看，不进则已，一进大吃一惊，唉呀！呼哒！呼哒！两辆汽车车厢上横担一木，压死张桂兰的第二辆汽车司机薛宝山被双臂扭后，绳捆索绑，背后抽出绳子吊在横担木上，背朝上胸朝下，悬空的两脚划来划去，似乎在寻找支撑物。唉呀！呼哒！呼哒！遭罪遭罪，作孽作孽。他穿的单薄，脸又黑又瘦，没有血色，表情极为凄惨可怜，看着我一言不发，此时无声胜有声，他有求于我。我立即折返会场，边走边沉思：他薛宝山有杀头之罪，是法律问题，眼下不能让活人受罪。我对一位军官耳语：“有个人被吊着在，你知道吗？”军官吃惊的问：“不知道，在哪里？”我指着小修工间说：“在那里。”军官说：“你带我去。”站在身边的一个年轻军人大概是他卫兵，也随同前往，从会场里也出来了三四个人同行。

薛宝山见我带来了军官，眼里露出希望之光。军官下命令放下人，可怜的薛宝山放到地面后站不成，得到允许后带着绑索捆绳蹬下靠到汽车轮子上，随即侧身躺下，面无血色。这种吊人方式我从未见过，比《老残游记》里的酷吏站铁笼，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要平起平坐而不会逊色，看着心中戚戚。

1964年大通煤矿井下出瓦斯，我把中瓦斯毒的人揩扶到井底乘车上地面，我救过人。1967年2月23号当天夕阳西下时，我在汽车八场要打人的贫下中农红卫军们放下你的鞭子。2月26日，我在汽车三场找来军官放下被吊着的薛宝山。这三件事，都事关人命和皮肉之苦，我一想到此事，心中就得到宽慰，我从来没有暗害过或亏过人，可是为何有人要暗害我亏我呢？

下午在露天场地继续开全场大会，面对会场一字长蛇阵的板凳上，站着高举双手的人，举手是投降的表示，在这些举手者中，有那个河南人文革小组成员，八·一八不公

布名字的地下队员。军代表发言，首先指着板凳上的人说：“最好不要这样。”军代表一句话，这些人得到了大赦，板凳也撤走了。军代表表态：“坚决支持革命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这都是套话和口头禅。在仍有指挥部的人反戈一击立新功时，二蛋被捆绑面对群众跪下，二蛋个头不大，人也瘦，穿的也很单薄，满脸灰尘。要他交待干了什么坏事时，他承认在报社向解放军扔了颗手榴弹，可能炸死了十几个解放军，他的话确实令不明真相的人吃惊，并有气愤进而仇恨。这时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高个子大汉，双手抓着二蛋双臂从跪的地上提起离开人群，这时又跟上来一个大汉，抓住二蛋双脚，把二蛋悬空起来朝停在一旁的汽车走去。到了打开后门的汽车后面，抓双臂的大汉说：“准备好。”二人抓紧双臂双脚，使二蛋悬空如晃秋千一样，边晃边喊“一，二，”随着声音又大又长的“三——”出口，二蛋从两个大汉的手里飞了出去，被扔进了车厢里。二蛋落在车厢中间底板处和大汉之间距离，足有四五公尺远，虽是后背着板，并有捆身的绳子起弹黄缓解作用，但肯定跌的也不轻，如果是脸首先落碰车厢底板的话，定将会头破血流。二蛋也真是一条好汉，后背刚着落车厢底板时，就势一个鹞子翻身站了起来，走到车厢边板蹬下。我心想，二蛋这人如果在乱世豪杰争雄年代，必将会成为榜样，甚至受拥戴而为人杰。二蛋和另外几个人被送去监狱了。晚饭后继续捆绑认为是顽固的人，捆人的人是转业军人，似乎受过捆人的专业训练：命令被捆的人跪下，绳子从背后老鼠窝领子平肩膀放好，有胳膊窝起，从前到后绕着胳膊直到手关节，扭扳两手到背后，两个绳子头从领后绳子下穿过，绳子头一抽拽，被捆的人两手就到背后了。捆人的人面对下跪者，用脚踏着被捆人肩膀，再用力抽拽绳子，被捆人睁大双眼咬着牙，一声不吭，强忍一切疼痛。捆人的人左右脚轮换踏着被捆人的肩膀抽拽绳子，再踏再踏，再抽再抽，再拽再拽，不一会被捆的人两手就可以摸到自己的老鼠窝了。本场被捆的人没有喊叫的，其实喊叫也不行，不如坚强不屈当好汉。三场隔壁马坊村有一个农民，夺了生产队的权，自封队长，但官不是好做的，过了一下官瘾，这时被生产队捆住送来，随三场车送去监狱，回答人问的罪名是破坏生产。三场和马坊村，既是邻居又是工农联盟，马坊村的贫下中农红卫军和三场兵团观点一致，兵团开大会，该村这个军还来捧过场，现在当然要帮忙了。受人所托，忠人其事，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助人为乐，一点不假。老百姓不会捆人，绳子松松的，于是重新捆这个倒霉蛋，

由不得这个自封队长“啊哟！啊哟！妈呀！”喊叫开了。捆人的人似乎喜欢听喊叫声一样，越喊叫，绳子抽拽的越紧，捆的更厉害，凄惨的喊叫声伴随着刚天黑的冷风，听了浑身颤抖，一身鸡皮疙瘩。唉呀！呼哒！呼哒！遭罪遭罪，作孽作孽。这时聂兰来了，聂兰是指挥部的总头子，他已经在别处捆好，身上披着一件棉衣，跪下后说：“我把问题交待清，放下我行不行？”哀求声也可怜，但没有得到允许，被拥上车厢。就是他说过，被捕或死了有谁代理接替，导致一级级指定代理人，他的话应验了，但却没有人站出来代理他接替他，让八·一八红旗倒下了，可谓遗憾了。车子开去监狱了。 26 号下午，四场八·一八全部跪在场院内地上，其他组织人坐在地上，六场来人比车子被扣的上一次来人更多，是来报仇当初刁难来车的出头鸟。现在捆绑人的时间，正好是上次来车被刁难的时间，这大概是研究好的，只不过日期不同。有个女人，年龄在三十岁以上，几个男人提起抓住，两脚悬空进行捆绑，这女人没有一点声音，真是女中豪杰，捆好后落地说了什么，被解掉绳子。该捆的捆了，该绑的绑了，想抓的抓了，想骂的骂了，车子开走了，大概是送去监狱，如果不送监狱而留在六场的话，六场还要管饭，送监狱，诚为明者善举。不是公安部门，而是平级单位，没有逮捕证就来任意抓、捕、捆、绑，并且带走送进监狱，没有人阻止拦挡，没有人干涉说话，什么年代哟！ 27 号上午，场里组成清理小组，把被打死人的财物一一清点登记，参与人签名后集中包装捆好。也就在这时才明了，2 月 23 号报社共打死 172 人，加上 24 号不知什么原因在民族学院枪击两个学生，一共死 174 人。以死人多少排名次，冠军非汽车五场莫属，死去 35 人，三场因少死 4 人，屈居亚军；季军属哪个单位就不知道了。大概是领袖说的吧，说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多次进行，三场在下次文化大革命或变相叫什么革命运动中，能否超过五场死人数夺取冠军而报这次屈居亚军的一箭之仇，现在来说，当然言之过早了。 我没有被二蛋挖墙术挖走，如果转进指挥部，极有可能在报社被阴差把魂勾走，即使魂没有被勾走，小土地出租带有的原罪，加上眼下反革命新罪，一加一等于二，双料货，双重罪，那就吃不了带着走，身揣两付十字架将无法走了。

我班共十二个人，五个人属指挥部，一个没有带原罪的甘肃人在报社逃命时被子弹打掉了帽子，真是砍头就像风吹帽，以帽代头服刑了。俗话说，帽子落地，买田置地，要想发财，抓起再来，他伸手从地上抓起帽子戴上又跑，帽子再没挨

子弹，人也没有受伤。另四个人中两个是地主崽子，两个是富农儿子，就是在我下罪己诏和退位书前仍保我皇的人。我自适时自我罢官后，他们不保我皇了，也无皇可保，于是都背叛自己带有原罪的阶级，以实际行动重在表现，响应号召，参与运动，加入八·一八成为革命造反派，高喊保卫，说到做到。其实，他们也只是换一个皇在保，没法保我这个比蚂蚁还小的皇，转而去保另一个大皇。后来一个富农儿子请假回山东，另三个人都去守报社，终于以生命为代价，功德圆满，以保皇始，到保皇终。他们与生俱有就带到人间的原罪，应该随同人死债烂而赎清不存在了，如果说人死了原罪非但没有赎清，反而增加一条反革命新罪，但也没处找原罪加新罪的人，也就无奈原罪加新罪人何。我如不罪己，不退位，这三个人谅必仍会尽我忠继续保我皇，可能不会背叛我去参加什么劳什子革命党造反派八·一八了，不会去守卫什么报社，也就不会落得如同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样逃命，康梁尚且逃得一命，而他们三个人都没有逃出报社就饮弹倒地，命归黄泉。这三个人曾经保过我的皇，后因我罪己退位而不能保我皇，去保另一个皇，最终导致死亡，想到这里，深深的内疚，似乎欠了他们什么。不过也难说，戊戌六君子是保皇，结局却在被保之皇圣旨下达后，感恩戴德臣罪当诛今天皇圣明而身首分离，这三个死者步六君子后尘，死因相同，想到这里，内疚释然。

在报社经过枪林弹雨洗礼后回来的人，不是看破红尘，而是看破金钱，大吃大喝，平时不抽烟的人，现在成天把两寸长的电线杆刁在嘴里，吞云吐雾，满嘴烟直冒，酒气冲人，真是烟酒烟酒，研究研究。他们说：“要钱干什么？差一点点在报社被打死了。”“人活在世界上不如一根草。”“今后有钱也不存银行，就吃。”“我吃光、喝光、花光。”“我吃光、喝光、花光、抽光，我比你还多一光。”“我吃光、喝光、花光、抽光、用光、玩光、光光光，比你们都光，光他娘，什么也不要。”“我简直不想活了，怎么不在报社被打死？”说这些光光光话的人，都是死里逃生，神经受了极大的刺激，有的半夜蹬掉被子站在床上摸墙；有的无缘无故失声大叫；经济好的都吃的满嘴油光闪亮，酒气冲天，烟味呛人。实行三光政策或者是多少光政策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平时高喊舍得一身刚，敢把皇帝拉下马，真要被施以凌迟刑是会害怕的；高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真的死到临头，也会后悔的；李斯东门叹犬追兔，对生的留恋谁也一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悲，千真万确。

阴间鬼捣鬼，真不真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

过阴间，不能妄加断语。阳间人捣人，确实不假，亲眼看到有的人要借机整死人，缺德事做出来了。我以不欠阳间债，不被人指背而自律。大街上红纸黑字大字报贴出来，内容是林副主席来电，称讚报社干的好，镇压的好。被称为亲密的战友和副统帅的国防部长的来电，对报社开枪表态说好，并且讚扬，非同儿戏，八·一八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肯定无疑了。这来电是真是假不知道，马路消息传来，有人揭榜怀揣去北京。有个女人名叫肖素珍，和夫君张家仕都是甘肃人，婆家是地主，因为丈夫是地主崽子，也就带有原罪，她嫁给崽子，也就光头钻刺棵——自找苦头，因为沾染上原罪而被称为地主婆子。文革中这个组织这个派，那个组织那个派，这个派，那个派，派性能藏污纳垢，加入某组织，这组织就是该人的保护伞，指挥部对她加入八·一八的夫君也就欢迎重在表现，不计原罪了。该女人没有工作，在家当贤妻良母好了，她却响应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搞文化大革命，加入八·一八，并积极的在家属里和工人里发展八·一八。夫君张家仕在报社命归黄泉，她本人带三个孩子，没有收入，够可怜的了，被抓进吃饭不要钱的地方，住了一夜就被放回来，因为她家中还有三个孩子。被称为地主婆子的她回来后，被几个失去丈夫的女人揪住毒打，向她讨要丈夫，因为死去的男人是她发展加入八·一八的。她自己丈夫都没有了，又找谁去要？可怜这位肖女士，适值女人最麻烦的假期，被几个女人揪打时，大腿都染红了。第二天她丢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只身去北京反映青海情况。

我始终想不通而自问：一个女人嫁给地主儿子，被称为地主婆子对吗？这是女人争吵时喊出的，就和土改后穷家孩子骂地主儿孙为小地主一样，并不代表上级政策的认可。就和小孩子吵架一样，揭短臭骂对方尿床是尿床精，被臭骂一方反臭骂对方挂着鼻涕是龙鼻精。我又复思：土地改革时我年方十岁，只因家庭成份是小土地出租就带有莫名其妙的原罪，当义务邮差去送信，难道说是小孩子骂仗而不是上级意图吗？文革开始，北京传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是一种时代思潮吗？不是荒唐、可耻、可悲，而应该严厉鞭挞声讨的血统论吗？我们在破除迷信的同时，不是也在人为的造神吗？我们不是在宣扬重在表现的同时，也在更疯狂的搞血统论吗？布衣出身的皇帝，恩惠父祖，追封三代，泽披子孙，封王晋爵；一朝被推翻，祖陵被掘，先人丑化，父债子还，累及后代，凄风苦雨。夫荣妻贵，子荣母贵，名门小姐，荒野丫头，一朝君王侧，贵为皇后，甚

或皇母，就会受封、加封、追封、谥封不同尊号。肖素珍女士受封尊号为地主婆，是宣扬荣耀，还是丑化鞭挞都不可知。这么一想，我十岁时就受封尊号为义务邮差，也就想通了，并且沾沾自喜矣！

失去丈夫的女人，有的天黑以后跪在公路上呼天抢地的哭喊：“没有经济收入来源，今后日子怎么过啊？孩子怎带大？老天爷呀！你瞎了眼！”可怜的女人，你没有理解，不是老天爷不长眼，而是你的夫君在响应号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参与演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闹剧里扮演了死者的角色，终于在人为制造出这恒古未有的，在全国社会大舞台上演的一幕可耻的荒唐的该诅咒的闹剧里，把你当演员夫君的命要去了。想起青海民歌花开花败年年有，人老了再不能少年的深刻含意，人老了确实不能少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

因为响应号召而关心国家大事，加入某个组织参与文革这一闹剧、可耻剧，实乃荒诞剧的演出，导致受牵连迫害的演员和某些看客都冤枉，而所有被打死打成伤残者更冤枉。就三场来说，冤枉中的最冤枉者，要算那个四川人王久全。第一汽车制造厂专门造了三辆载重卡车，从长春一路拉货到拉萨，试验车子性能，三场有一位技术员和两名司机参与试验，王久全是司机之一，事后第一汽车制造厂把三场司机参加试验的两辆汽车赠送给了三场，王久全仍开他参与试验的车。2月20号前发动机拉缸了，不早不迟，22号下午车子拉回三场，晚间听到指挥部广播要去守报社，决定去看看，而置分别多日的娇妻挽留和孩子的可爱于不顾。当然他不会想到也不会知道去看看是去送死，如果知道去了会死的话，纵然是去金山、银山、钱山措金银钱财，去阿里巴巴山洞取宝，从而富甲天下，他也会弃而不就也。谁知去报社看看成了他的不归路，这一去真是成了老王送灯台——一去就不来，2月23号上午不明不白的当了冤死鬼。他参加八·一八只是挂个名，一直在外面跑车，迟一天回场就不会死，丢下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儿女，真可怜。

监狱人满为患，已经到了饱和状态，再也无法容纳，要放人，一再摧促各送人单位把送到监狱人的材料上报。

自2月24号开始，指挥部里被认为顽固、积极和有问题的，或者被有的人借故报私仇的人，有家的都不让回家，住在场里，有家中送饭，这大概就叫软禁吧？被软禁的一个四川人姓张，原是工人，后被提拔为技术员。返回到他学生时代，在回家途中被土匪掠去，要他参加入夥当响马，做记帐的干活，他不干，找机会偷跑了，就这样，一直有人说他是土匪而背黑锅。这

一晚保养场开会，把他叫出来站到人前，要他交待八·一八计划杀人一事，这种子虚乌有，如何交待？现在法律已经不存在，兵团也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立即绳索加身，五花大绑，他马上汗流满面，我相信，就在这片刻之间，他内衣肯定也会湿透，他站不住了，东倒西歪，结结巴巴的说：“我交待，我交待。”绳子解开取走，他的汗就和雾气一样，从衣服领子里和脸上散发而出，仍然说不出所以然来，没有的事情如何能说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必有招供，没有事实可供招供，也会因为皮肉忍受不了疼痛的极限而胡言乱语瞎编一通。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三日，孙言诚《青海二·二三事件》

1967年发生在青海的二·二三事件，是文革中首次爆发的大规模血案。四十多年过去了，事件的经过连同死去的冤魂，都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得无影无踪。也许，只有那些幸存者，还忘却不了心中的痛，但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它已化作一缕飘渺的轻烟。这样一件血案如果任其湮没，那么，我们为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也就白费了。

文革中青海的两大派

文革初期，和全国各地一样，青海省的革命群众也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是造反派，一派是保守派。两派是随着文革的进程逐步形成和对立起来的。

实事求是地讲，那时候两派群众都是要“紧跟毛主席，誓死闹革命”的。他们的口号是：“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那么，党指向哪里呢？

文革发动者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提出，矛头应指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的走资派。为了树立样板，中央下令广播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那张大字报的矛头是对着北大党委的。青海虽然偏居西北，却阻挡不了党的声音，得风气之先的人纷纷起来造党委的反。例如：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刘明乾等五名师生给院党委贴大字报，格尔木机关干部给县委贴大字报，民族学院教师傅承信给院长贴大字报等等。

造反的人遭到保守群众的迎头痛击。保守群众根据反右的经验，认为矛头指向党委的人就是右派，他们像1957年那样奋起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与此同时，党也传来了反右的声音。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面对混乱局面，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万——40万右派”（据王任重笔记）。对西北地区，更有具体指

示，在《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中央批示：

“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打击面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只打击个别最坏的……”

据此，王昭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划分左、中、右”，“要在大学生中抓百分之一的右派。”于是，和全国同步，青海省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保守群众声威大震，造反者陷入灭顶之灾。畜牧兽医学院刘明乾等，连同支持他们的副院长达洛，都被揪出来批斗。格尔木县机关干部被定为“小匈牙利事件”，省委责成海西州派工作组前往，把贴大字报和支持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

全省运动的焦点，集中在《青海日报》社，导火索是“六·三社论”。起草社论的陈逸这样回忆：

1966年6月2日下午2点多，当时《青海日报》社总编程光远（他同时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把我和政文部副主任雷经农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一项紧急任务，要马上写一篇社论，贯彻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精神，发动群众参加即将全面铺开的大文化大革命。

程光远向我们传达了当时仍属高级机密的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的大致情况，比较完整、详细地复述了1966年4月24日上海（按：应为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草稿）”（《昨夜星辰昨夜风》）。

接受任务后，陈逸把自己锁进办公室，奋笔疾书，写成了“六·三社论”。题目是《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内容是号召造反。

社论一发表，西宁市炸了锅。编辑部电话不断，学生、干部、工人一拨一拨地涌进报社，高呼口号，四处张贴大字报，批判大毒草。6月12日，省委书记杨植霖、省长王昭经西北局批准，把“六·三社论”定为“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同时派出以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报社。程光远软禁在家，陈逸隔离反省，雷经农反戈一击，一个“程陈反党集团”浮出水面。

陈逸满腹委屈，他认为社论不过是篇职务作品。之前他也曾奉宣传部长之命，写过批黄静涛的文章，尽管他对黄一无所知；写过批“三家村”的文章，尽管他对邓拓还怀有敬仰之心；作为一支笔杆子，他已经习惯了奉旨撰文。这一次明明是传达中央的精神，怎么就奉错了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他打成了“混进新闻界

的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他经历了一番冰火地狱般的右派生活。

1966 年的反右派，完全是 1957 年的翻版。一样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各级党委写大字报，一样地打成了反党右派。正是这场反右，在当权派、保守群众和造反者之间播下了第一批仇恨的种子。文革之所以那样激烈、惨痛，其源盖出于此。大家都主张反思文革，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反思文革中的这场反右。

8 月底 9 月初，一批批红卫兵到青海串联，带来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对于已经是反革命的造反派，这不啻天外纶音。他们咸鱼翻身、东山再起，纷纷成立战斗队，最后汇合成“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西宁市迎来了第二次革命高潮。一拨一拨的红卫兵、工人涌进省委，大字报贴满省委大楼。这次不批大毒草了，是批省委，而且高呼“六·三社论’好得很”。广大群众一股脑儿地倒向八·一八，声势浩大的造反派形成了，保守群众纷纷倒戈。

然而，保守群众多数是党团骨干，历次运动他们都是革别人命的，如今岂容乾坤倒转！于是，他们也揭竿而起，拉起队伍，最后汇合成“红卫兵总部”、“贫下中农红卫军”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八·一八声言“大方向始终正确”，保守派组织则宣称：“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两派围绕着“六·三社论”和平反、追黑材料，发生激烈冲突。从 10 月份开始，爆发了一连串大规模的武斗，如：10 月底的 136 厂事件、一二·五的大通桥头事件、一二·九的民和事件、一二·一四的毛纺厂事件……在不断升级的武斗中，两派群众积累了冲天的怨气，甚至是刻骨的仇恨。

省委书记杨植霖因为参加了中央文革，知道毛主席的意图，所以很快就转变了对“六·三社论”的看法，并在省委传达了康生肯定“六·三社论”的指示，坚决支持八·一八；省长王昭根据多年政治斗争的经验，认为八·一八队伍不纯，坚决支持捍卫队。两派均有恃无恐，自封左派。但是，在全国批判资反路线的大形势下，省委终于在 12 月 2 日作出“撤销关于《青海日报》6 月 3 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的声明”，省委陷于瘫痪，王昭也去外地治病去了。

1967 年初，一月风暴袭来，青海省也面临着夺权。谁来夺权，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正如《人民日报》社论说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新年伊始，两派武斗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激战阶段。恰在此时，中央决定军队介入文革，支持左派。

军队支左

毛主席敢于放手发动文革，是因为手中有一支强大的解放军。在文革夺权的关键时刻，他决定启用手中的王牌，让解放军支持左派。1967年1月21日，他在《军委收电》上批示：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毛主席要军队支持的左派，当然是造反派，批示就是批在安徽造反派要求驻军支持的电文上。但是，军队的干部和毛主席的看法并不相同。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看得很清楚：

各部队也有眼力识别自己应当支持的左派广大群众。他们认为，真正的革命派即左派，决不会是那些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分复杂、动机可疑的所谓造反派。而对那些出身好、根基正、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深厚感情、人数占压倒多数的群众组织，他们的心与之靠得很近，因此很自然地认为这便是需要支持的真正革命派。（《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这种情况，毛主席心里非常清楚。2月9日，他在一件文稿上批示：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然而军委并没有速办，相反的，此前却连续出台了两项维护军队的规定。一项是1月14日的《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项是1月28日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命令在不许冲击的前提下，又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的基石。毛主席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委关于维护军队权威的通知和命令，毫无疑问都是获得毛泽

东的支持的。有了这通知和命令，各地驻军对于那些敢于冒犯军队的“右派”（不幸这恰恰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左派”）毫不留情地采取了专政措施。

一月底二月初，湖南省军区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宣布“湘江风雷”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支队长以上的所有头目，数量达到几万。

二月中旬，成都军区镇反，单成都市就抓了两万多。同一时间武汉军区也开始镇反，武汉市抓了三千多。此外，广州、福建、内蒙、新疆、云南等地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镇压反革命。福州军区抓人后，《解放军报》还配发了《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社论，《人民日报》及各地省报均予转载。

二·二三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赵永夫军区造反

1月23日，支左决定下达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召集军区党委开会，决定支持八·一八。这个决定虽然符合毛主席意图，却不符合军内大趋势，尤其是不为省军区内多数干部所接受。正如张云生所说，他们绝不会认为成分复杂的造反派是左派，更何况不少干部的家属，在地方上都已参加了保守派。军区党委会后不到三小时，军区机关干部便召集会议，选出15名代表，成立了“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副司令员赵永夫当场亮相，说：“你们造反我当然支持。”于是，赵成了指挥部的顾问。是夜，指挥部印发“紧急通告”，出动宣传车上街广播，宣布刘贤权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

指挥部成立了秘书组、联络组、宣传组等机构，实际上夺了军区的权。刘贤权被软禁，电话切断，门口放双岗，警卫、秘书均不能接触。

1月25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在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的拥戴下，赵永夫取得各部队的支持。1月28日，张晓川联合各驻军部队，亮出了“部队统一行动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青海省的军队，基本上取得了一致。

军区风云突变以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声言“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他的指挥，还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了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

青海省委也发生了分裂。王昭到外地治病，多数省委领导仍和他通气，策划

支持捍卫队夺权。杨植霖则召开了几次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1月29日，八·一八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

由于捍卫队和省委、军区的干部都指责八·一八队伍不纯，夺权后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开门整风。他们将杨守礼等几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送交公安机关，要求严肃处理，以示革命，不料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月2日，张晓川在205部队召开青海驻军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逮捕仓门街、兴海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9名成员，派部队和“贫下中农红卫军”一起召开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2月3日上午，控诉大会在南门外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兴海路等地举行。12时，队伍上街。205部队抽调250辆军车，各部队抽调4000多名战士，和贫下中农红卫军、捍卫队联合举行了一次镇压反革命、支持左派的武装大游行。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守礼等，脸上画着八·一八，胳膊上带着八·一八袖套，头上戴着八·一八高帽，游街示众。镇压的矛头直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2月4日，青海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省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言“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软禁中的刘贤权，深感问题严重，亲自起草了电报：“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一八。”他要求发给中央，机要员却把电报稿退了回来，答复是：“赵副司令不同意发。”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把电报稿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了兰州。兰州军区把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没有回音。

2月13日，北小街、南小街、兴海路、仓门街等地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明令取缔。

2月17日夜，赵永夫、张晓川在驻军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成立“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合办公室”，获通过。后来办公室改名“联合指挥部”，赵永夫、张晓川都是核心领导小组成员。

《青海日报》社的流血事件

《青海日报》社始终是青海文革的中心。报社里八·一八占绝对优势，编辑

部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八·一八。1967年1月12日，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报社的权。夺权后的报纸，称作“新生的青海日报”，它旗帜鲜明地支持八·一八。

2月8日，赵永夫、张晓川准备对报社实行军管，但军区党委两次开会都没通过。11日晚，军区副政委张文英向兰州军区请示，兰州军区也不同意军管。张让兰州军区请示中央军委，兰州军区请示了，答复是：“需要请示”。

两派剑拔弩张，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捍卫队贴出大字报，说夺权后的《青海日报》“为反革命呐喊叫好，必须立即把权交还给真正的革命派”，并拉出大标语：“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2月14日，赵永夫召开军区党委会议，通过了《军管青海日报社公告》，组成军管小组进驻报社。但军管遭到了八·一八的抵制，进入报社的军管人员被八·一八的人赶出来，有的人甚至被从墙上扔了出来。上午11时，部队包围了报社。

从这天开始，一场《青海日报》争夺战打响了。军队要进驻，八·一八则抵制。民族学院红卫兵一马当先，“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像一股势不可挡的滚滚红色巨流，冲破道道防线，冲进报社。接着八·一八的战友也一队队地风驰电掣地赶来了。”（《湟水岸边的日日夜夜》）

“一批又一批以工人为主要骨干的群众陆续来到青海日报社”，他们“沿着报社围墙，一层又一层，有的脸上一副倦容，显得特别疲惫，显然是刚下班赶来。有的一面啃着干馍，一面还在向周围的人讲演……”（孙正荃：《1966—1976实录》）

保卫报社的人，开始是倒班，来一批走一批，进进出出。后来干脆安营扎寨，在报社周围搭起了帐篷，划区分片，昼夜轮班，吃睡都在其中。青海的2月，地冻天寒，经常是零下一二十度。军队只许人员进出，不许物资输送，吃喝、取暖都成问题。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印刷厂的工人拿出家里的煤砖让他们烤火，把刚出笼的蒸馍送到他们手中。

部队的汽车、装甲车把报社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南面占领了西宁市北门城墙，东面占领了宾馆顶层的晒台，西面在民房屋顶上架起了机枪，北面湟水桥上站着从草原调来的荷枪实弹的士兵。

2月15日，捍卫队上街游行，支持军管《青海日报》社。但兰州军区来电

作了三点指示，不同意军管，要部队撤出报社。赵永夫派副司令员刘斯起率 6081、205、8122 部队 12 名干部，连夜到兰州军区大楼前绝食静坐，要求收回成命。兰州军区一天之内开了八次常委会，研究《青海日报》问题。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态度坚决：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刘贤权派人给报社送条子，告知兰州军区的指示，并写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八·一八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2 月 19 日，八·一八上街游行，反对军管。途经报社时，捍卫队前去阻截，八·一八的车辆轧死了捍卫队队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准备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2 月 20 日、21 日，捍卫队 10 万人抬着张桂兰的尸体环城游行，沿途砸烂八·一八办事机构。赵永夫主持军区党委常委会，确定 23 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常委除刘贤权外，全部赞成。

22 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轧死人。”23 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动员：“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张晓川说：“难道我们手中的枪是吃素的吗？”

23 日上午八时，西宁全城戒严，街上空无人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

一、自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兵站部政委陈郁、205 部队副军长张晓川指挥调动了 13 个连围攻报社。11 时 10 分，军队枪击八·一八的广播站，所有喇叭登时全哑。下午 2 时，宾馆（赵永夫的指挥所）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十几分钟，几百人就倒在了血泊中。

守卫报社前门大院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 3 人首先倒下，一人当场死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手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枪声中第

一排工人倒下了，20 几人仅三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诵。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 名工人死在枪口下。

二十几分钟，战斗结束，部队轻松地占领了两千多人守卫的报社大院。接下来是这样一幕：

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即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孙正荃：《一个省记者的生命档案》）

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熏人的恶臭。（冼恒汉《风雨八十载》）

镇压反革命

攻打报社的当天，军队在保守组织的配合下，包围了八·一八的重点组织：青大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人民剧院红宣兵团部、党校红色造反团等。“红色公安”（公安厅的群众组织）按照开列的名单，把八·一八的头目一一逮捕归案。第二天，一千多捍卫队员包围了青海民族学院，双方对峙了一天。夜 12 时，两个连的部队开进民院，包围了西边四幢学生宿舍楼。一名排长带一个班进入楼房搜查，学生拒绝开门，战士鸣枪示警。楼外的部队以为红卫兵开枪了，遂向楼上开火，打死三人、打伤九人。当晚逮捕了 20 多名十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把 800 多红卫兵赶出大楼，在刺骨的寒风中，高举双手，跪了五个多小时，天亮后才予释放。

接下来的日子，捕人的汽车在西宁街道往来奔驰，汽车站、火车站布满便衣警察，严防反革命外逃。牢房塞满，监狱还在不断扩大……

最恐怖的是“群众专政”。在逮捕了第一批反革命后，剩下的八·一八成员，就交给了“群众专政”。把誓不两立的两派中的一派群众，交给另一派群众去专政，其后果可想而知。大小单位都成立了类似“镇反指挥部”之类的专政机构，设立了“劳改队”、“临时拘留所”和“牢房”。他们要在八·一八组织中“收集枪支”、查获“暴动计划”、寻找“杀人黑名单”。他们的口号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决不施仁政”。于是捆绑、吊打、大头皮鞋踢（甚至出现了互借大头皮鞋的闹剧）、跪雪地、跪

三角铁、烟头烧、火烤、烙铁烫、针扎、过电、穿针、手指夹筷子、活人打夯……种种无师自通的刑罚，都被花样翻新地施展出来。

西宁铁路局八·一八铁道造反团共三千人，被斗的 1884 人，打成轻伤的 214 人，重伤 54 人，监督劳动 544 人，被捕入狱 114 人，抄家 114 户，逼死 1 人，被打流产三人。青海氮肥厂只有 150 名八·一八，逮捕的就达 60 人。就连高等院校，镇压也很惊人。青海民族学院把 150 名师生排为四类，轮番批斗。一类拟送监狱的 37 人，二类戴上反革命帽子、开除公职回乡劳动的 47 人，三类批判斗争给予处分、留校监督改造的 39 人，四类经过批判斗争予以解放的 27 人。

最后，引述一下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

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

1967 年 7 月 15 日

中央调查会

八·一八和军队在《青海日报》社对峙的九天中，赵永夫不断地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张云生这样记述：

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青海的告急电文不断来往北京，形势剑拔弩张。我及时将最新的情况报告林彪，他仍然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2 月 23 日下午攻打报社之后，赵永夫给军委、总理、中央文革都发了加急电报。晚上他还和军委通了电话，电话中军委人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是

一个很漂亮的仗。”当晚，西宁大街上贴出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对此，张云生也有记述：

最后，青海的枪声终于打响了。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林彪听讲这些情况之后，还是无所表示。就连那个误传的“林副主席来电”，他听后也是一笑了事。

据张云生分析，中央文革开始也保持沉默，“八成是由于他们对林副主席来电不敢贸然作出反应。”为此，笔者走访过戚本禹。戚讲：“为落实此事，我曾打电话给叶群，询问是否确实，叶群郑重否认。她说：‘林总的秘书我管得很严，不通过我，谁也不敢表态，我们绝对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她甚至把电话记录本拿给我看。”

林副主席没有来电是事实，但军委支持赵永夫也是事实。三月初，总政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两人在京西宾馆惴惴不安了十几天。赵永夫却多次在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说：“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他组织的，二·二三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做了记录和录音。”（1967年4月20日在青海大学畜牧医学院的讲话）在中央调查会上，叶群也说：“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知道不知道！”

青海问题的翻转，源于中央文革的一个报告，戚本禹这样回忆：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我觉着问题严重，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快报》组记者找来。记者按照军区报告说八·一八先开枪，八·一八在报社杀人等等。我问他：‘你在不在现场？是亲眼看到的吗？’他不敢回答。我告诉他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要实话实说，他吓得腿都打颤，这才承认不是亲眼看到的。

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查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由我和关锋署名，后来文元、春桥回京，我们向他俩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署了名。报告打印后，经由陈伯达、江青转报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根据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参加会议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事情叙述得具体、真实。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萧华参加，调查的仍是逃回来的红卫兵。戚本禹说：“这两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主席提出的谁先开枪的问题进行的，调查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很仔细。在汇报会上，总理曾反复核对赵永夫组织专人，搜查八·一八组织的枪支、结果一无所获的情况。他听后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你干嘛还要开枪呢！’接着又问反映这一情况的学生姓名，用笔记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总理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戚本禹说：“调查会尚未开完，总理就给主席写了报告，总理把报告推给我看了一下，内说：‘看来开枪有问题，详细情况容后再报。’下署：周恩来。调查会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总理说，经过几次调查会，二·二三事件的主要问题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谁先开枪的问题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就连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

永夫。事后又谎报军情，假造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的问题。我和关锋听了都吃了一惊。这时叶群说‘林总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没回过电，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总理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主席起床后向主席汇报一切。”

第四次调查会是 3 月 24 日夜 11 点 35 分到 25 日凌晨，主持人仍是总理，江青、叶群、杨成武都来了。调查的范围除前三次的人外，还有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亨、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次会上，总理和赵永夫面对面地落实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下面引几段对话：

总理：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了。首先要请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我们没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

总理：是他自己不工作吗？

赵：（结结巴巴，满头大汗）

总理：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

赵：他们不同意。

总理：你同意吗？

赵：我也不同意。

总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总理：2 月 23 日对报社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镇压，指挥部谁指挥？

赵：×××指挥。

总理：×××部队张洪回答。

康生：谁下的命令？

张洪：领导小组决定……

戚本禹：谁下的命令？

赵：指挥部下的命令，我执行。

总理：你的镇压反革命组织的报告，你给我的信，白纸黑字，你负责。写报告，打刘贤权，汇报中央文革都是你赵永夫。

赵：我不知道。

康生：你什么也不知道。

萧华：那天你还在楼上指挥。

总理：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以前了解有枪。

总理、康生、关锋：现场有没有？

赵：……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当时没搜出来。

戚本禹：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全场大笑）但没搜出来。

总理：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这么多群众！……

总理：全部把他们包围了，你还没搜出来！（愤怒地站了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不叫打，但管不住。

会议结束时，总理宣布了中央的决定：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

（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人带走！

解放军上去撕掉三人的领章、帽徽，把他们押下去。王昭在门口大声喊道：“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余波

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又一次开了锅。八·一八成了坚定左派，捍卫队虽然没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刽子手的帮凶，“坏头头”们遭到残酷批斗。《红灯记》中有句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在肆意鼓吹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可是人

们铭记在心的信条。经历了血的洗礼，青海省两派斗争的激烈，不言而喻。一个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种种残酷刑罚，如今轮到了捍卫队。一次，近 200 个“坏头头”被带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横飞。

最惨的是“走资派”，他们都被定为镇压群众的黑后台，横遭摧残。民族学院院长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缢身亡。

王昭是 1961 年派到青海解决饥饿问题的，事后留任省长。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理顺经济，解民倒悬，被老百姓称为“王青天”。就连写“六·三社论”的陈逸，也说他是难得的好干部。此时沦为二·二三事件黑后台，以带病之躯，被批斗数十次。1970 年 2 月，年仅 53 岁的王昭，死于南滩监狱。

1976 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洗恒汉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洗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1979 年 3 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 1967 年 3 月 24 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

八·一八的头头，不少人在清队、清查五·一六和清理三种人中，第三次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还关进监狱。

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 1987 年 10 月 18 日病逝。

刘贤权和张江霖，1977 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职务。张江霖同时免去省军区司令员职务，行政级别由十级降为十四级，改离休为退休。1999 年 10 月 18 日在兰州去世。

当年被打死的上百名红卫兵，除少数家长冒着当反革命家属的危险深夜挖出的以外，大部分成了西宁北山脚下的孤魂野鬼。

（来源：《炎黄春秋》2009 年第 10 期 本文作者为齐鲁书社原总编辑）

二 00 九年某月，卜伟华《也谈青海“二·二三”事件》

2009 年第 10 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孙言诚的《青海二·二三事件》

（以下简称《孙文》）一文，这在文革史几乎成为国内绝大多数期刊禁区的今天，是很难得的。正如作者所说，“这样一件血案如果任其湮没，那么，我们为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也就白费了。”《孙文》大致讲清了青海“二·二三”事件的来龙去脉，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瑕疵，如把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和政委冼恒汉说成是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把后字 2 0 5 部队（即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张晓川的职务说成是副军长（应为副主任）。笔者根据现有的资料，也来谈一谈有关青海“二·二三”事件的问题，同时，对《孙文》做一些补充与订正。

一、青海“二·二三”事件是 1 9 6 7 年“二月镇反”中最典型的案例

青海“二·二三”事件在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大多数军队干部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群众造反行动的不理解以至抵制情绪的爆发；另一方面，它也是 1 9 6 7 年春发生的“二月镇反”中最典型的案例。

1 9 6 7 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1 9 6 7 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此号召下，发生了使全国性动乱进一步加剧的“全面夺权”运动。毛泽东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预想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全面夺权”必然造成全国已经很混乱的政治局面更加恶化，这一点毛泽东当然明白，他敢于走这一步险棋，是他认为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乱子再大也可以收拾。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大部分支左的军队并没有支持他所钟爱的“左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军队与造反派的严重对立。

全国多数地区的支左部队并不真正支持造反派，尤其是最早介入各地支左工作的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更是与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二月镇反”中，各地驻军大多都参与了镇压造反派的行动。

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做了限制，规定不许冲击军队，使一批军队干部感觉有了对抗造反派的尚方宝剑。

2、3月间，各地陆续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内蒙古、湖南、湖北、江苏、广东、吉林、四川、福建、青海等地比较突出。

在内蒙古，1月中旬以来，围绕《内蒙古日报》社的夺权问题，军区与造反派发生多次冲突，矛盾日益尖锐。2月5日，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将在军区门口静坐示威的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韩桐打死。此事引起中共中央重视，开始介入解决内蒙问题。

在湖南，2月4日，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批示〔1〕（简称“二·四批示”）后，湖南省军区立即行动，于2月5日开始抓捕“湘江风雷”大小头目，两三天内长沙抓捕约千人。〔2〕2月7日，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湘江风雷”头头的大会。“湘江风雷”组织庞大，号称百万之众，被抓捕的各级头目上万人。〔3〕

在湖北，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责“工总”、“二司”、“九一三”等造反派组织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武汉部队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造反派激烈反对武汉军区的声明，攻击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3月3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开信》，警告造反派，不要与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为

敌，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下场。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人〔4〕。

3

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所属组织。

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把坦克开进了南京城。〔5〕许世友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特别强调军以下不搞“四大”。许世友说，没有叫你搞“四大”，你偏搞“四大”，把你抓起来，那有什么可说的！南京军区把政治部领导的“三团两队”（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下放到各野战军，由部队代管搞正面教育。责令《人民前线》报停刊。拆散步兵学校，疏散人员，连同有造反倾向的军区机关干部，一律派往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去参加“三支两军”。对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组织和造反派，采取了硬性措施。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的所属部队共有22人被逮捕、8人被开除、475人被看管或隔离反省。

南京市有10个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有330多个造反派头头被关押。所有被看管、被隔离、被关押的人都要写检讨，交代问题，向毛主席请罪。〔6〕

广州军区对一些冲击过军区的造反派组织进行了镇压。被镇压的组织包括“八一兵团”、“老红军”、“千钧棒”、“大中红旗”等，大部分为工人组织。广州军区在广州逮捕各组织头头450人，在广州以外地区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238人。在“广交会”开幕前的3月22日至28日的一周内，又逮捕了造反派头头508人。这样，广州军区前后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1196人〔7〕。

在吉林，驻军（包括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对省内比较激进的造反派“长春公社”施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军事压力。驻军公开表态支持“二总部”，而不承认“长春公社”。3月4日，驻军对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出兵实行纪律制

裁，抓了他们的头头。在驻军强大的压力下，“长春公社”等组织被迫打着白旗请罪，组织被压垮了。在组织“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整风时，驻军又提出了“三个彻底”，即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最终使这三大组织瓦解。（8）

在四川，2月11日，成都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50余人。当天，“造反兵团”和“八二六”在成都市举行“声援成都军区造反派”的示威游行，并冲击成都军区，企图揪斗成都军区领导人，开始围困成都军区，封锁军区南营门和东营门。2月18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叶剑英17日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兵团同志们的信》（后称《二一七信件》），信中要求“造反兵团”和“八二六”不要围堵、冲击军区，同时警告造反组织头头，如果不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继续煽动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冲击军区机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他们全部负责。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飞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广播后，围困军区的造反派开始撤离。下午，“八二六”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针锋相对，血战到底。2月19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至22日，仅成都地区公安机关就收容337人。2月21日，成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数万人在人民南路搞大规模的集体请罪活动。2月28日，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颁布。到3月4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5000余人。3月2日，四川省公安厅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向四川省各市、专、州、县发出《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3月5日，成都市公安局发布《紧急通告》指出：“造反兵团”、“八二六”等少数造反派头头，“打着造反派旗号，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此后，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在镇反中，四川全省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8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3000余人。（9）

福州军区在军委八条颁布后，对多次冲击军区的造反派进行了严厉地镇压。2月11日，福州20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次新反扑誓师大会”，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大会上批判了造反派冲击军区的行为，他在讲话中说：“福建省、福州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然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10）3月9日，“红九二”总部负责人王泉金、福建省教工赤卫军头头蔡肇基、吴邱陵等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逮捕。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林乃清宣读解散公告，勒令解散“红九二”、“革委会师院分部”、“教工赤卫军师院分部”等组织。3月22日，福建中医学院召开“声讨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逮捕张志耀等8人，拘留了林要火、吴梅英等14人。据福建省军管会统计，“全省各地军队、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逮捕和拘留两千多人，取缔和解散了80多个大小组织。对军内四大单位和军区机关中少数人违反军委八条命令问题的处理，逮捕8人，拘留65人，解散了几个组织。”（11）

在全国各地的“二月镇反”中，抓人最多的是四川，而打死人最多的则是青海。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共打死169人，打伤178人。

二、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孙文》中说：“1967年发生在青海的二·二三事件，是文革中首次爆发的大规模血案。”

实际上，“文革中首次爆发的大规模血案”当数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1月12日，新疆日报社造反派宣布夺了新疆日报社的权，改出造字号的《新疆

日报》。1月19日，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二司”）等群众组织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出《紧急呼吁》、《紧急通告》，呼吁新疆造反派组织实现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1月25日，“红二司”等造反组织宣布夺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乌鲁木齐市委、市人委的权，向全国、全疆发表了《夺权声明》，成立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12〕随后，自治区各单位、各地、州（市）、县也先后被夺权。自治区各级领导机关完全陷于瘫痪，全疆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

1月26日，在石河子市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

1月19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主要领导人丁盛、裴周玉所支持的一派夺取了兵团机关各部门的领导权，继而，从兵团到各师、团场、连队层层夺权。

26日凌晨3点到下午3点，兵团独立团和农八师武装处调集的6个武装值班连队，先后在石河子八一毛纺厂、工四团木工厂、农八师师部等地，与前来夺权的另一派群众发生冲突，冲突中共打死27人，打伤78人〔13〕。

对此事件兵团、军区、新华社记者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观点大相径庭。

以裴周玉为主任的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电报说：“一·二六事件是武光、张仲翰〔14〕等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旧军官、旧军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反夺权、夺军权的反革命事件。”

军区认为是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

中央文革小组在1月31日的《文化革命动向》上刊登了《新华社记者评述石河子反革命事件》，认为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毛泽东可能是出于边境安全的考虑，在此事上没有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而是支持了军区的意见。〔15〕

后来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逮捕所谓“一·二六”犯罪分子46人。〔16〕

2月7日、8日，在毛泽东的催促下，周恩来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新疆夺权条件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

2月10日，新疆军区的造反派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批斗军区参谋长何家产，强行给何戴上高帽子，实行了变相体罚。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拘留了有关这一事件的策划者和肇事者。

2月11日，“自治区夺权指挥部”组织几千名学生和群众包围了军区大院，要求军区将何家产停职检查，把军权交给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领导人。中央军委及时制止了这一乱军的行为，并明电指出：“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的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决定将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和四个部长调北京学习。事件才得以平息。

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二条）。规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不许干预和串连”；除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研部门外，“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等。

三、1966年的反右派与1957年反右派

《孙文》中说：“1966年的反右派，完全是1957年的翻版。一样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各级党委写大字报，一样地打成了反党右派。正是这场反右，在当权派、保守群众和造反者之间播下了第一批仇恨的种子。文革之所以那样激烈、惨痛，其源盖出于此。大家都主张反思文革，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反思文革中的这场反右。”

这种说法并不确切。1957年的国际国内形势与1966年有很大差别。1957年时，中共中央高层在反右问题上还是比较统一的，反右派运动基本上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来进行的。毛泽东搞反右派运动主要针对的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形式还是通过各级党委的领导。而1966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已经转移到党内高层，他认为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他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把刘邓等原中央一线领导人打下去，并清除他们的影响，在全党全国推行他自己的一套更左的方针政策。刘邓并不理解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他们还想按照过去的传统的一套做法来搞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毛泽东远在外地，让刘邓在北京相机处理，实际上是把刘邓放在这场大火上烤，结果真把刘邓给烤焦了。刘邓虽然还在前台指挥，但在所有的大政方针上他们都要事先向毛泽东请示，所有的重要决策都需要经毛泽东的批准才能付诸实施，而最终决定权完全掌握在幕后的毛泽东手中。

文革初期，在刘、邓主持下，在所谓“五十多天里”的情况，现在确实很少有人提及。（17）但这一段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对以后文革运动的发展关系重大，不搞清楚这一段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就很难真正深刻理解以后发生的诸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群众组织分裂为势不两立的派性组织等重大问题。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想用工作组这种形式来保证局势的稳定和党的领导不致中断。从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批转的北京市委和各中央局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请示报告来看，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大搞阶级斗争，揪出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物。刘、邓把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理解为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18），在他们亲自过问的北京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的运动中，都把一些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打成了反革命。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搞了“反蒯”斗争，对蒯大富等反工作组的师生进行

斗争。全国各地发生了不计其数的把给单位领导人或工作组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坏人”的事件。

文革初期，刘、邓的一套做法是沿续过去反右派运动的做法，但当时全国的形势比 1957 已大不相同了。一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二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已经在全社会泛滥成灾，毛泽东的话被称为“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为“最高指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之类的口号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在这样的形势下，沿用 1957 年反右派的做法，其结果可能更为可怕，最后被打成右派的人数要比 1957 年更多。

毛泽东反对刘邓在文革初期的做法，并不说明他反对过去反右派的做法。毛泽东要走得更远。毛泽东认为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他要搞一场天翻地覆的“政治大革命”，声称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其严重后果不止十倍于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

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孙文》说：“8月底9月初，一批批红卫兵到青海串联，带来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这个说法不对，把时间搞错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红旗》杂志 1966 年 10 月 1 日发表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中正式提出来的。8月底9月初开始有在“炮打司令部”的口号下把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群众运动。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开展，各地的造反派逐渐发展壮大，到 1966 年底或 1967 年初左右的时间，造反派的力量压倒了保守派的力量，开始成为运动的主流。

五、戚本禹、关锋推动“二·二三”事件的逆转

“二·二三”事件前后，西宁政治局势大起大落。

1月29日，“八一八”派的40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在西宁召开了夺权大会，宣布夺了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党、政大权。

1月30日，《青海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夺权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随后，又相继发表了“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通告第一号、第二号以及《告全省农民书》等。（19）此时的“八一八”，顺水满帆，风头正健。

但从2月3日起，形势就起了变化。当天，西宁驻军动用250多台战备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公安机关同时将从“八一八”组织中逮捕的几名“反革命”游街示众。

到2月23日，“八一八”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坚持在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成员遭到武装镇压，死伤惨重。被抓捕的“八一八”派群众达13000多人。此时的“八一八”跌到了谷底。

一个月后，中央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将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八一八”绝处逢生，重新崛起。

按照戚本禹接受孙言诚访问时的说法，“二·二三”事件的逆转，是由戚本禹、关锋推动的。

戚本禹回忆说：“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我觉着问题严重，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快报》组记者找来。记者按照军区报告说八一八先开枪，八一八在报社杀人等等。我问他：‘你在不在现场？是亲眼看到的吗？’他不敢回答。我告诉他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要实话实说，他吓得腿都打颤，这才承认不是亲眼看到的。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

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查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由我和关锋署名，后来文元、春桥回京，我们向他俩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署了名。报告打印后，经由陈伯达、江青转报主席。”

如此，才有了毛泽东下令调查，以及后面的大逆转。

但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如把彭德怀从四川抓回来往死里整他，是从戚本禹等人写信开始的一样，其实是江青影响下的结果，而江青的言行又是很难和毛泽东分得清楚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排除毛泽东、江青主动要逆转青海局势的可能性。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戚本禹等人的报告中提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而毛泽东则在批示中表示：“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开枪”问题上的态度。

六、刘贤权、赵永夫等人后来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22日，批转青海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的请示报告，同意撤销1967年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20〕。

3月31日，中共青海省委通知，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刘贤权在青海工作期间所犯错误在群众中进行公开揭发批判。（21）10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批示，青海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对刘贤权的继任者张江霖等人开展揭发批判。（22）

在青海开始批判刘贤权的时候，他已经退居二线，在济南军区当顾问。1982年6月离职休养。1992年6月15日逝世，终年77岁。

赵永夫在被关押10年之后获释出狱。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中央的批语说：“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赵永夫后来被任命为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1987年10月18日逝世，终年72岁。

总政治部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中对青海“二·二三事件”的责任问题是这样说的：“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副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看起来，赵永夫晚年的处境要比刘贤权好一些，至少赵永夫没有被拿到群众中去进行公开的揭发批判。因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原来加在赵永夫头上的许多罪名都被取消了，但是他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开枪的行为却是永远都不应该被原谅的。

注释：

〔1〕批示的内容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

〔2〕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编：《中共长沙党史大事年表》，第174页。

〔3〕据“湘江风雷”负责人叶卫东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大学“声援两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会”的讲话说，“湘江风雷”被逮捕的人数达五、六万之多。

〔4〕据王力1967年8月15日接见新华社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说，武汉军区把“工总”的头头抓了516人。而据1967年5月15日戚本禹、王力与湖北代表座谈时武汉造反派学生代表反映，武汉共抓了2600多人。

〔5〕肖思科：《王平上将奉命两进北京城》，载于《中华儿女》1998年第7期。

〔6〕李文卿：《近看许世友》，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第29—30页。

〔7〕见周恩来在广州珠江宾馆的讲话，1967年4月18日晚至19日凌晨。

〔8〕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信”（1967年8月17日）。

〔 9 〕 参见《四川省志·大事记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 9 9 9 ）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 2 0 0 0 ）。据周恩来和康生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四川抓了有十万人。

〔 1 0 〕 《八·二九战报》第 2 期。

〔 1 1 〕 《福州军区党委常委关于在福建“支左”工作中错误的检查报告》，转引自叶青：《福建“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研究》，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 2 0 0 3 \ k 2 9 \ 2 0 。

〔 1 2 〕 新疆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代表自治区党委发表了简短的交权讲话，并将一布包印章交给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尽管新疆军区是反对这一派夺权的，但“夺权指挥部”的领导成员中还是有一位新疆军区机关二级部的副部长。

（李近川：《中央文革记者让赴西北调查琐记》，《中共党史资料》 2 0 0 7 年第 3 辑
总第 1 0 3 辑）

〔 1 3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
乌鲁
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 9 9 8 ，第 2 8 2 页。

〔 1 4 〕 武光当时为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兼政府第一副主席，张仲翰为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文革前主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工作的第二书记、兵团第二政委。

〔 1 5 〕 1 9 6 8 年 5 月 4 日，周恩来在接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时说：“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我的意见，完全是主席的。王关戚几次想翻石河子的案，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干，石河子问题是主席亲自处理的。”

〔16〕1979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布：“对因此事件无辜死难、受诬陷和曾被捕入狱的同志，应公开彻底平反昭雪。”

〔17〕萧喜东先生在好多年以前就曾在《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一文中，将这“五十天”的历史称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历史”。

〔18〕参见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惠庶昌整理的《刘少奇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

〔19〕陈云峰主编：《当代青海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版，第195页。

〔20〕孙言诚在《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将时间误为1979年3月。

〔21〕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青海党史大事记》，1997年内部发行版，第259页。

〔22〕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7卷。

□ 选自卜伟华博客

2007年10月4日初稿

2011 年 8 月 26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7）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七节 成都军区的“二月镇反”事件

本节资料

一、四川“二月镇反”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王力与炮轰四川省委组织部联络站赴京战斗队座谈纪要

〔时间：六七年元月廿四日 2：12~4：00，地点：人大会议小会议室。被接见者：炮轰四川省委组织部联络站赴京战斗队全体同志，四川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民。〕

当同学们谈到关于苗前民事件时提到了廖井丹（成都市委书记）梁岐山（四川省监委书记）时，王力同志说：廖井丹还指挥得动人吗？成都搞得那么糟。梁岐山这么厉害，他这样对待群众，这个梁岐山很成问题。

王力：你们是否回成都夺权？

同学：早就想回去了，回去一定要夺权。

王力：把苗前民带回去，让他们（指苗前民、梁岐山等人）耍花招，在运动中让他们各表演各人的，抓苗前民抓的不对。

最后王力同志说：你们做得好，四川就是要彻底大乱，成都将有希望。

首先由苗前民谈他被捕经过和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接着王力同志说：西南文化大革命搞的真不象话。从开始以来就是那样，成都、重庆、贵阳、昆明（众：还有南充）啊！还有南充。李井泉、李大章俩比怎样？

苗答：这两个人都是一样。

同学：是否中央批准李井泉养病？

王力：没有，原来听说他血压升高，当时说过让他进医院看病，没叫他长期

修养，然后给大西南作检查。是他自己跑到上海，他老婆打电报要他回成都，被红卫兵抓了，这是前两天的事。

（对苗）你现在还觉得李井泉不错吧！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他还能当第一书记吗？（苗答：不行了！）他们红卫兵总部不要李井泉了。将来不要什么由上而下任命什么官，要由群众自己挑选。你们这些干部要到群众中去，立点新功，不能靠老本钱吃饭，有的连老本钱都没有。

李井泉、廖志高都退到幕后了，李大章也不得了吗？还有些部长级的干部呢？（同学：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时候都不是铁板一块，现在要做工作，如果是真正认识到了反毛主席，就会觉醒的，总会分化一部分。

十二月份成都还在打架（同学：现在还在打）那些血案都看到了吗？我看成都都要大打，一打好让群众和干部都受教育，因为是他们搞的嘛！比如上海工人100多万，上月的上半月才一千多人，这个历史潮流起来了，是不可阻挡的。

什么叫革命造反？就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们（指苗前民之流）对李井泉还有幻想，西南局的问题还没解决，压力也很大。把你（指苗）的党籍都开除了，还顾什么？你够不够一个党员，你要不要党籍能靠李井泉给你恢复吗？只能靠群众。过去组织部的那一套，就是安子文干了廿多年的那一套，是反毛主席的，他的那一套哪里来的，都不是毛主席的。你当了十三年组织部长，看来他们不是那么喜欢你的，你们（指苗前民之流）过去就没有感觉到西南局问题的严重，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就没有感到西南问题的严重，搞得什么东西！（此时王力同志生气）只要当个官就没上劲了，是资产阶级的，不但自己不革命，还不要别人革命，现在要赶紧投入革命，不是搞两面派，不要搞假的。如果你过去是李井泉的死党，是反毛主席的死党，可就不可能救药了。如果你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的精神面貌就会得到改变要揭发问题，对李井泉不要抱幻想。李井泉、邓小平、刘少奇也可能要反过来，我们准备掉脑袋，但这也不行，这是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你（指苗前民）的思想状态还是不好的，还不是积极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一提到李井泉你用词就不对，什么缺点呀！什么缺点呀！你根本没有仇恨，对革

命群众受打击，受迫害不同情，对反对毛主席还不愤慨，你应站过来，把立场彻底改变，把那些坏东西揭出来，为文化大革命立新功，只要真正站过来了，群众是会相信你的。

（问苗）：你对宜宾地委张西挺的案子经手了吗？我见过那四位同志，他们比你们高明，他们的精神面貌比你高，他们拥护毛主席，彻底跟李井泉斗，现在你还不敢起来，还不是一个战士，你是否还是看到红卫兵青年人的缺点啦（答：没有），那不一定，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来，勇敢地同他们斗争，他们把手拷给你带上，进一步无非是杀头，看来他们对你并不是因为你是革命派而捉你，是否是李井泉的死党也不是，可能是李井泉的忠实走狗，对吗？你估计是因为你好像是揭了他（指梁岐山）的假造反，把你捉起来，那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但你又没有真造反的决心，和红卫兵一起，跟他干到底。如果是前一种情况，你光荣，是第二种情况，捉得对，如果是第三、第四，他是真造反，因为你说他是假的，抓了你他是不对的。

对你（指苗）说实话，原来我们还认为你是革命派，他们（指梁岐山之流）捉了你，很想把你调来谈清楚，看来并不是那么回事。

苗前民同志你是否有决心跟小将一起造反，不要当这个官了。（答：思想上是这样想）应该这样，十三年的组织部长，把他（指李井泉推行的干部路线、组织路线及其他问题）那一套揭出来就没你的事了。

将来不一定要搞一个什么部了，要搞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的新形式，过去那套是从苏联学来的，不要那一套，不要认为熬过运动这一关后又当官。

红卫兵也要注意，不要看成铁板一快，要做工作，保守派的工作要做，做了错事，犯了错误的也要做，不要采用一种方法，不要老是当学生，想整个的国家的命运，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学一点本事，懂的更多一些。尤其对原来的干部要区别对待，要有个政策，恐怕有一些老一点的干部去参加更好些，全部打倒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要造反成功，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注意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运动，不能老是学生运动，这仅仅是开始，紧接着就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也要动，不要以为干部都是铁板一快，是铁杆保皇，他们知道的比你们多，你们的本事也大，到处调查了许多材料，但不能忘记广大机关干部，要做他

们的工作，不能靠外力，要内部形成造反派，青年小将是会干起来的，我看盟委一个廿四级的干部比一个四级干部强得多，比 20 级的干部还高明，他还拥护毛主席，说的头头是道。定了这么多级压力很大，这一套本来就不要了。当然不是指平均主义，他们借口生活待遇，其实不是这样。现在文件发下去，有级别限制，革命人民看不到，不革命的倒看到了，结果文件如石沉大海。

同学问：刘澜涛是否叛徒？

王力：你西北局（有一西安同学在场）的刘澜涛坏得很，不是叛徒是什么！

同学：学联、妇联之类组织还要不要？

王力：我是主张通通打倒！重新组织，由红卫兵代替，不是打倒人，是指打倒机构。

同学：李井泉、廖志高的老婆样样工作不搞。

王力：你说的不对，他们也干了不少坏事（王力看了李井泉反毛主席的一张传单）我给你们（指在场红卫兵）提出一点，要分别对待，现在叫你们红卫兵推选一个省委书记还是不行的，还是要经过大革命锻炼的干部，将来谁当省委第一书记，省委名单，厅局长名单应由群众讨论，酝酿，不要形式的代表会，而是要真正的代表会讨论，要制定方式，上海工人就提出了谁当第一书记兼市长，第二书记兼副市长，他们提得好，给我们很大启发，叫他们提出方案，提一套名单，现在暂不公布。要由工人来定乾坤，由工人来发挥领导作用，学生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军队、中央马上就要发下指示，军队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凡是真正的革命左派要求军队帮忙，军队都要按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支持，我们主张在内部传达到红卫兵。

保皇派打了造反派，造反派无法解决时，可要求军队支援。如南京的造反派被打了三千多人，死了几个人，后来军队出动，抓了两千人，南京问题就解决了。

同学：成都造反派打得很厉害。

王力：左派要提高，学生运动中要整风，要参加联合斗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反对小团体主义，要树立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同工人、农民相结合，不要光想出风头，不要老想抢官做。不要养成坏习气，老干部的这些坏习气你们不要捡起来。

同学：简单谈了成都情况，说造反派间斗争很尖锐。

王力：这没关系，这是大的潮流、大的风暴，各种思潮都要登台表演，这是事物的发展，是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有些原来站在前面的，后来跟不上这样的大革命，这样大的革命，有分化这是正常的，但对左派队伍自己来讲，要严重注意，不要掉队。

同学：梁岐山的问题是否中央文革交给“北地东方红公社”搞？

王力：我们没有，我们不会这样搞，是不是我们办公室要过材料啊！（王力同志问右边坐着的文革办公室瞧玉山同志，答：没有）真假在群众中来辨别，让他们在群众中自己来表演，谁革命不革命不能由北京来决定，从北京来封也不行。

同学：成都经济主义很严重。

王力：成都的这个经济主义早就很有本事，十二月就听反映化了很多钱。

同学：关于夺权问题。

王力：联合起来才能夺权，一个夺了另一个又去夺，要有适当地联合，组织和纪律，现在已出现有上海 32 个革命组织夺权，山西成立了联合指挥部，接管了省委。

同学：抄总部好不好？

王力：抄总部我们没有提倡嘛！

同学：外地到本地串连的关系怎样处理？

王力：你们说呢？（同学：应该以本地为主，外地为辅）那是大串连时期，现在住下的是有威信的，或者当地欢迎的就留下。

同学：留在本地的是想整垮一个组织，而成立另一个组织。

王力：外地只能帮助本地革命组织，不论什么三司也好，北航红旗也好，不能充当领导，搞个联络，通通消息，中央的任何决定不是凭空想，而是根据客观存在，不能乱下令。

同学：扣留人对不对？

王力：扣什么人，如果有民愤的黑帮可以扣，如彭、陆、罗、杨、另外也可以用一下，但不能普遍用，你们不要都抓了，并不是保皇派都抓，应抓凶手和幕后指挥者，反对毛主席的要抓。

同学：同意李洪山的观点可不可以抓？

王力：当然可以抓罗！

王力：关于成都军区接管广播电台的事，造反派不同意，成都军区不得力，群众信不过，所以中央这次发了指示，就是根据成都和沈阳发出的。只要是军队接管，只能广播造反派的，不能广播保守派的。军队接管只能是暂时的，过渡的，造反派真正掌权了，军队就撤出，如果造反派已经掌了权，就不用军队去接管

同学：有人说毛主席元月初到成都，8号返回北京，有此事吗？

王力：主席都在北京，没有出去。

同学：对苗前民的问题怎么办？

王力：宣布对苗前民的处理一律无效，恢复他的党籍，你们就回去宣布嘛！你们有权力宣布！苗前民你跟学生一起闹革命就好了！就年轻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信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应革命群众的请求，派出部队协助公安机关逮捕抢劫成都市公安局几名首要罪犯的行动，是正确的，你们应给予支持。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区内极少数严重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人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这是军队内部的事，请你们不要介入，不要干涉。请你们自觉执行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和最高统帅毛主席所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不要违堵、冲击军区，不要干涉军人行动的自由，以利于部队执行国防战备任务和保卫四川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相信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分是革命的师生组成的，一定能够做出执行最高统帅命令的榜样。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中共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政委江海云在成都被捕入狱。

（1967年4月14日，江海云出狱后在欢迎集会上的讲话：《坐牢杀头何所惧 誓死保卫毛主席》

亲爱的同患难共甘苦的战友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英勇斗争的战友们：
你们辛苦了！狱中的战友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重新回到可爱的川大，我无比高兴，无比幸福！让我们一千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要控诉省公安厅黑司令部对我的迫害。

二月二十三号晚上，下着大雪，我就是那晚上入狱的。公安局的人是从十九中把我带到公安局的。到了后，一个大胖子对我说：“你人小野心大，干的坏事多！”我问：“我们啥子罪状？你们凭什么抓我？”他说：“你的罪状多得很，我要杀了你！”我说：“你杀了我，毛主席饶不了你！”他说：“你还凶，还猖狂，好反动！”叫把我的衣服剥下来，另一个人不叫剥，就把我捆了起来，送到××监。在狱中，他们对我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甚至没有学习毛主席语录，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自由！

他们说我在狱中闹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闹了什么呢？就是这么几件事：

狱中一个孕妇快小产了，情况很危急，我就哇啦哇啦地叫，要医生快来，他们就说我有意煽动，这是一条罪状；

《红旗》五期社论发表后，听到街上在游行，就向他们要，不给，我们就叫：“我们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他们说这是又一次有意煽动，就是第二条罪状；

同学送来了毛主席著作和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我向他们要了十二次，都没有给我，说语录上批了字，不利于我反省。我问：“你是相信那钢笔字呢？还是相信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他答不上来，却说：“对于你们，没有民主。难道人都可以拘，书就不可以拘吗？”我就说他害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登载郭嘉宏英雄事迹的前一天，公安局一个啥子科长来训了一次话，说，你们的性质已经定了，你们就是反革命！群众把你们抓来，就要好好反省，交待才

是唯一出路。我在下面笑，冷笑，他说：“你笑什么？站起来！”“站起来就站起来！”他又要我立正，我就昂起头，挺起胸，偏不立正。他没法，就恶狠狠地说：“江海云，这笔账是要跟你算的！”果然第二天就算账来了。也完全是冤枉塞进来的一个难友，明明是贫农出身，证明上也是贫农出身，他们却偏说成地主出身，我就跟他们辩论，他们说我就是反革命，没有权利管。我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是要管！”后来另一个人就用脚踢我，我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说：“什么文斗武斗？对于你，就是要斗，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什么是乱说乱动？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才叫乱说乱动！你给我分析，我哪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分析不出，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为啥要闹。我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是要闹！我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死作毛主席的红小鬼！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就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哪个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反对他！他说：“你好嚣张！好反动！”他又讲不清我有哪一点反动，说日本帝国主义那时比我猖狂得多，我当即指出，他立场根本错了，我要他跟我到中央首长面前辩论，

他说，你算得什么？我说，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他说：“你还是红小兵啊！把她拷起来！”就这样，把我单独拷了五天五夜，连书报都看不成！这还不算，又组织扒手、小偷到监狱来斗争我，斗了两个半天，我说：这个监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这也是一条罪状。我说“八·二六”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也是一条罪状。我唱“抬头望见北斗星”，也是罪状。他们说我专门煽动，勾引人家往火里跳，说：不要看我年纪轻，其实坏得很！说：“你反对我越起劲，就说明我们干得越好，我们就感到越高兴！”我们唱语录歌、朗诵语录，他们就来镇压，就骂我们，要揪头头！他们出去后，我又唱“下定决心”，他说：“你的决心还没下够哇！共产主义监狱还存在，你就顶嘛，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但是，毛主席救了我！

放出来时，他问我：“你打算怎么样？”我回答说：“老子就是要造反！准备第二次进监狱！因为马克思说过，我们要经过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国内国际冲突嘛！谁晓得资本主义还会不会复辟呢？”不久前，保皇狗还在骂我：“江海云闹嘛，枪毙还不够条件吗？”资本主义复辟，就有可能。搞革命就要有这种思想。

在监牢里，很多难友斗争得很英勇，很坚决，别人来镇压时，他们就唱语录歌，高声朗诵主席语录。

难友们还在战斗，我们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定能胜利！公安厅、公安局这个黑司令部一定要砸烂！一定能砸烂！

这次还是要感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教育，给了我很大的锻炼，使我懂得了以前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我原来就想不通，为啥子要抓我呢？现在才搞通了，因为我要革命，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他们就要镇压。这些道理都是毛主席早就告诉了我们的，我也饱饱地尝到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味道，深深地懂得了，如果不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要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就是拼下这条命，也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相信，胜利一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让我们战斗到最后，不管产业军，不管大大小小的黑司令部都要彻底砸烂！

胜利一定属于顽强战斗的革命人民！

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改，原载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川大支队主办《八·二六炮声》第六号，1967年4月14日出版，4月22日再版。）

二、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转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的批语 林彪、恩来〔1〕、文革小组： 此件〔2〕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毛泽东 三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党委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转发的四川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报告。

报告说，以铁五师为主组成的支左部队来到渡口后，把支持左派的工作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下功夫到群众斗争中去识别真正的左派。在对左派的支持上，又坚持首先从政治思想上帮助他们成长壮大。具体做法是：1．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2．帮助他们抓好活思想，做好团结教育工作，使

之成为思想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集体。3. 帮助他们保持清醒头脑，坚持斗争大方向。

铁道兵党委在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首先要从政治上支持，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将渡口驻军的经验和铁道兵党委的批语一起转发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并指出：“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很重要的问题，并且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是值得全国全军学习的，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都应参照执行”。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一份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1）上的批语 中央文革小组：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2）也应来。请商总理（3）酌办为盼！ 毛泽东 三月廿七日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三五期，题为《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简报摘要登载了四川省宜宾县田禾三月十四日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来信。（2）甘渭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3）总理，指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康生 江青在四川汇报会上的讲话

有的同志说：他们人用枪押着我们的同志。

江青同志说：他们带的枪没收！

有的同志说：他们抓了我们好多人。

康生同志说：谁抓人把谁抓起来！

有的同志谈到所谓二·一七中央军委给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团和川大东方红八·二六的信。

康生同志说：二·一七号所谓的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是不晓得，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叶群同志说：为了证实这个信，我刚才坐车到林彪同志那儿去了，这个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根本是造谣。林彪同志说：他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他也根本不

会写出这个信！我也亲自问过林彪同志办公室的同志，他们都说没有见到过这封信，这封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会议结束后，总理与康生同志讲话。

总理：四川问题不是一个晚上能解决的，但是既然抓起来了，就要解决。北京的一些同学要打回去，当然需要你们去战斗，中央正在考虑，当然是我们陪着你们去！下面有几件事说一下（从略）明天不要都来了，我们分头去解决，一个个地解决，同志们放心好了，我们就要追到底。

康生同志说：有这么几点请同志们注意。

1. 是抓了人的，请同志们交上名单，凡交上名单的，我们会立刻办；立刻打电话，要他们放人，并且要禁止继续捕人。

2. 我们不允许四川的任何人到北京来抓人，请同志们注意一下，如果有人来抓，你们要坚决拒绝。我们说清楚，如果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一定不准抓，即使是公安部批准的也不行。

3. 大家对接待站的意见，我们要转告。（王力同志插话：以后开这样的会也叫他们来，受教育。总理问：是那个接待站，是不是国务院那个接待站？）

4. 所有你们听说的，看到的所谓中央军委给四川的什么信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四川那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统统是谣言。同志们要帮助辟谣。

5. 请同志们注意，特别是三司联络站的同志们注意。毛主席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第一要相信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第三要相信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建立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一支人民军队，有了这支军队，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才能顺利地进行。我们的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缺点是支流，不是主流。军队里头有坏人，但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同志讲话中不要讲“黑军队”、“黑军区”，我们的部队绝大多数是好的。

同志们不要到外面去谈这个问题，到外面去谈四川军队的问题。（总理插话：更不要写大字报）不能在红卫兵报、井冈山报上登载这样的消息报导，昨天清华井冈山报打电话请示我们，他们问有关军队的问题能不能登？我们回答：是不可以的！如果这样做，对我们解决四川问题是有阻碍的，今天谈的，也不要打电话、写信回去，打电话、写信也谈不清楚，也不要乱出去传。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 年 4 月。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康生江青在接见四川赴京代表时的讲话纪要

〔到会首长：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肖华、杨成武、叶群、姚文元等。参加会者：四川廿个市、县中央点名请的被打成“反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告状代表和镇压革命群众的市、县的党、政、军负责人及首都大专院校的部分人员。〕

康生：现在开会了，中央事情很多，时间紧张，各地来的人也很多。前几天解决了内蒙问题……四川的问题要用一定的时间来解决，我们中央工作也要用一些时间。由于工作忙，我们有好几天没有见面了，今天会议只能开到六点半，下面我们还有会议要去参加。发言的不要重复，以前讲的现在不用讲了，下面准备发言，谁发言？

自贡市的一个同志举手“我发言”！……（略）

成都代表发言（1）……（略）发言（2）……（略）

江青：廖井舟同志来了没有？（成都市委副书记）

答：来了！

康生插话，你今天能发言吧？不能发言休息两天再发言！

江青接着说：你身体怎么样？什么时候到的，住在哪里？（看样子身体遭到严重摧残）

答：“我……住在西苑大旅社（他用左手指头按住大脑壳）今天不讲也行……”

江青：你今天不能讲下次讲吗！你可以中途退场。肖华同志：请你安排医院，赶快让他住院去，找个好点的医院……。

成都军区造反派×××发言和成都军区××歌舞团发言……（略）

康生：万县专区来的 14 岁小将何如愚同学讲一讲：

（何如愚在发言中全场二百余人一瞬间都集目观注着这位革命小将的发言，当他讲到吊打三次昏迷过去中，“我还看见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我面前对着我暖

和的笑脸说：孩子，你一定很坚强！我又醒过来和凶手做斗争，后来又是一顿毒打就昏过去了，他们用凉水泼在我的头和身上。”全场无不气愤，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这个小将说：“万县市公安局局长：王杰就是镇压我们的刽子手！”全场都喊，王杰站起来！王杰脸色苍白惊慌地站了起来，双眼直望着中央首长，全场高喊：“打倒王杰！打倒甘渭汉！”等口号，把王杰吓得发抖。）

康生：下面由万县市《主力军》负责人熊道生同志发言……。

熊道生：我来控诉万县地、市委和军分区内的一些坏家伙对我们《主力军》的血腥镇压……万县军分区盗用中央名义说：“万县市《主力军》是中央军委批准为‘反革命’组织”。还有成都军区给万县军分区转去的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现还在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那皮包里，要求他立即交给中央首长！（这时，全场高喊：交出来！交出来！王贵章的脸色像黄瓜一样，双手发抖，在拉皮包拉锁时，一连拉了几下都未拉开，全场又喊，把皮包一起交上去！这时王贵章双手抱着皮包，交给了警卫员。）

熊道生同志继续发言……。

康生：说你二月十七将 116 人装在船上准备沉水，就是把船弄去翻在江中……。

熊道生：他们简直是放屁！当时我听到他们对我这样的栽赃，顿时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子来嫁祸于我啊……我有一个要求，请求中央首长；因万县问题很复杂，抽个时间详细汇报。

康生（直点头）：好！好！

江青：下面让成都刚来到的×××发言（川大 8·26 的一个女学生）……（略）

康生：今天会就开到这里，下面说三件事：

一、这次发言没有讲完的，下次再继续发言。

二、我们已经给军区说好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捕革命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律释放。（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达三分钟之久）

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冤枉和错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

（这时全场又高呼毛主席万岁！达到最高峰，有的举起双手跳起一米多高。最后全场在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声中散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2）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林、周（3）阅后办。（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1）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写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四川地区截至四月十九日止，已释放被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共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批示将这个报告“印发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参加四川会议各同志”。毛泽东审阅时，写了这个批语。（2）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3）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代表时的谈话

〔中央首长：江青、王力、戚本禹、关锋、杨成武、谢富治也参加了接见〕
陈伯达：周总理、康生有点事，等一会来，请大家发言。

代表控诉：（川大8·26）

王力：同志们，四川的材料，各个县的我们都印出来了，交给中央首长去看了，是不是大家发言，各专区推选一个代表。

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造反军代表黄廉发言：揭露李井泉收买8·15头头，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242 代表发言：问有没有军委命令撤销红总？楚平、韦杰答复（韦杰站起来不语）

江青：中央没有过。

众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

王力：刚才有同志提出，请韦杰副司令员答复，是不是中央军委有取缔后字 242 的命令？

韦杰：这个命令没有，工程学院这个事情是军区党委研究的。

问：为什么盗用中央军委命令？

韦杰：我们没有这样做，可能是军里没有听清（群众纷纷揭露他们盗用中央军委的名誉）

王力：天保放出来没有？（重庆代表揭露还有许多同志没有放出来，关在中美合作所监狱。）

江青：韦副司令，你听到没有？马上释放。

众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重庆地区揭发）

王力：请大家简单点，四川的情况中央已经清楚了，重庆也很清楚。

江青：请乐山代表发言。（乐山代表发言略）

十时十分总理、康生同志到会，会场高呼毛主席万岁！

乐山代表谈昨天还抓了五人。

总理：昨天还抓五个人吗？（大家要求发言）

康生：大家心情激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听不清，讲的慢一点，声音不要太大。

乐山代表：有一军分区支持的反动组织一面旗子还有江青同志的私章。

江青：我没有私章。

总理：有个张家口军事学校的王行虎同志要求见中央军委，就这里谈吧！

王行虎：有人说，江青同志说：甘渭汉是好人，办了坏事，我决不相信江青同志能说这样的话。（江青笑了）

总理：南充军分区司令员自己来揭发，好不好？（鼓掌）

南充：揭发对牛鬼蛇神，大扫除，要多抓，抓头头，这就是布署，南充代表谈到还有公安局和保守派的人来北京。

总理：他们住在哪儿？

南充：住西直门，具体住哪儿，他们不告诉我们。

总理：把名单开来。现在谈万县问题。

万县代表：军分区用机枪扫射学生，最小的才六岁，叫举手，有一个学生提裤子被打了一枪，肠子打出来了，这学生临死前用手指沾血写了“我是革命的人”几个字。

新北大万县调查组：韦杰在西苑旅社开黑会，四点指示：（一）原则坚持；（二）错误检查；（三）支左工作他们说错了，我们说对了；（四）总的由军区负责。

万县公安局打电话回去说：我们一到站就被包围了。因此，许多保字号组织打死人不下五十人，军分区第一次就打死五人，伤九人。

万县的发了言。

总理：请涪陵的发言。

广元部队：我是总参三部派往广元的部队，（1）绵阳军分区一月份突然增加了六个科；（2）二月二十一日军委（成都军区电报）说：这是绝密文件，内容：各部队修筑坚强工事准备一个月粮食设置指挥员。（3）调一个营到绵阳镇压造反派，部队打电话询问中央，军分区对他们大不满。（4）派人控制火车站，抓告状的，组织政法小组。十条以后，军分区派人去控制 7012 部队一个营。

总理：今天开会到这儿，明天请梁新初司令员开个小会，大家谈谈。

林跃东：控诉新华社四川分社，受成都军区迫害的情况。

林：韦等质问我，为什么要报导成都兵团？要我们报导发行主席著作，说我们配合反革命，小心你们的狗头。

伯达：今天开到这里，后天再开。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梁兴初张国华接见成都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上午 10：25～1：30·京西宾馆；参加代表：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五人，川大“8·26”三人，川医 101 战斗团一人，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铁二七，新都机械制造公司“星火”各一名。梁、张司令员亲切地和大家握手，当张司令

员和江海云握手时，亲切地拍着江海云的肩膀说，“小鬼，你好？”】

梁司令员：

成都地区的情况可能也知道，现在武斗的现象在成都相当严重，我们今天找大家来，就是要商量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喽，解放军要解决支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造反派的问题。（这时，江海云同志把四月十八日所谓署名为“成都军区广大指战员给产业军的信”拿给梁司令员看。）这些人代表解放军吗？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几个极少数的人，他们能代表什么广大指战员？我就是支持兵团和“8·26”的，不支持产业军。他们（指张司令员和新调往成都军区去的一个部长）也坚决反对产业军，坚决不支持他们。现在有少数人受了老产观点的影响（大家笑起来了），在脑子里还一时拐不过弯来，这中间还需要一个教育过程，转变过程。我们希望和你们合作，共同工作促使这些同志转变过来。总之我们的态度就是支持你们，毫不含糊地支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甘渭汉的秘书他一方面支持造反派，另一方面却又同情产业军。原来因为他老婆是产业军，被抓活该。（大家拍手）

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主要从政治上支持你们，另外还可以从军事上支持你们。如你们开会他们要捣乱，我们可以派军队来保护你们，对产业军上层的几个反动头头我们要打击，对产业军下层的分化瓦解工作主要靠你们来做。对产业军中受蒙蔽的群众，你们要团结和争取。他们最近在成都地区的武斗严重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欺骗和挑动大批不明真象的贫下中农进城，这些贫下中农大多数都是受蒙蔽的，你们商量一下，由军区、红代会、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红卫兵成都部队联合组织一个庞大的几千人、几万人的宣传队伍，动员被欺骗到成都的贫下中农回农村回本地去“抓革命、促生产”，你们说好不好？（大家拍手欢呼好！好！好得很！）对，那就打电话回去吧！我打电话给邓少车同志（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叫他和你们在成都联系。

张国华司令员讲话：

支持产业军的就是那么几个人。军区有，地方有，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成都地区的武斗那么严重，规模那么大，没有后台是不行的。这些后台就是要我们大家去揪。军队里的坏家伙我们去捉，地方上的由你们去搞，去揪去追。产业军大部分群众都是受蒙蔽的，你们要作好争取他们团结他们的工作。这次我

们和他们合作，大力做好动员受蒙蔽的贫下中农回乡生产的宣传工作，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希望你们帮助我们和我们很好的合作，这次希望你们打电话给你们家里的同志，叫他们去找邓少车付司令员联系。邓少车同志是个老同志，对党很忠诚，虽然由于脑子拐不过弯会犯错误（如这次支左工作中一度支持了产业军，但是一经组织指出改正错误也非常快，邓少车同志是听中央的话的，听毛主席的话的。他过去受黄新庭的排斥和压制。邓是认识问题（指错误），他今后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的向大家认错，这样行不行？（大家说：行。）（兵团李声金拿了一份产业军造谣传单给梁司令看。梁司令看了说，这是谣言，你们要辟谣嘛！前天成重红旗和产业军两个人坐飞机到北京来告状，告你们革命派的状。要求见我，我根本不理他们。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打内仗，再吵架，川大“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应当联合嘛！（又对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代表薛文彬说）你们要整风，犯了错误就要承认就改正嘛！

（梁司令员又问起曾希圣同志的情况。）他说：昨天总理打电话，说曾希圣同志亮相后，被斗，现在下落不明，到底是怎么回事？

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薛文彬说：“曾希圣同志在我们那里，昨天接到中央的电话后，已经交出了，我们是支持曾希圣同志的。”

梁司令员最后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是个团结的会，团结对敌的会”。

兵团代表李声全说：“兵团的同志想和梁、张司令员见见面。”

张司令员说：好吧！这两天我抽时间到北地（兵团到北京的人都住那儿）去看看大家，有人说我不支持他们，让他们看行动吧。好，现在一点过了，大家就谈到这里吧！

（会后张国华同志和兵团代表签名留念。）

（根据“外贸部井冈山公社资料组翻印件·1967年5月7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1967.05.07；中发 [67] 147 号

一、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

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所职务。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挺、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

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六、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要向全体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省军队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处理当前的问题和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起来。

八、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严格执行。

九、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作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肖华江青周恩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的讲话

肖华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成都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追随者黄新亭、郭林祥的斗争是正确的，军区在支援地方的斗争特别是支工、支农是有成绩的。但是从二月下旬以来，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幕后操纵的保守组织，而把不少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并且错误地搞镇反运动，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镇压了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尤其严重的是在万县发生了枪杀流血惨案。

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卫人民的，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竟动用武装镇压革命群众，使四川文化革命受到挫折，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和林副主席指示。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四川地区成都军区的最大关怀。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刚到北京，对所犯错误认识是很不够的，经中央严肃提出和革命小将尖锐批评，你们认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改正，并采取措施来纠正，这是值得欢迎的。主席在四川一个文件中批示说：“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但是必须看到，由于四川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文化革命中，他们又坚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川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的错误，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也是较深的，因此，要彻底贯彻中央决定，必须作很多艰苦工作。军区犯错误首先要作自我批评，应检讨错误，端正立场，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广大干部、战士要原原本本传达中央决定，做到家喻户晓。大抓活思想、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人民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只要领导人态度鲜明，对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广大群众监视，是会

很快扭转局势，自觉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人民解放军是有高度组织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要进行加强组织纪律教育，一切行动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央军委决定的，就坚决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央军委决定的，就坚决不作。

这里，我还要提到，据说成都地区武斗严重，我们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武斗很容易被敌人利用，有的地方武斗就是敌人煽动的，敌人利用武斗把斗争大方向捣乱，我们决不能上当。五月六日流血事件极少数坏人开枪杀人，我们解放军坚决反对，对开枪杀死革命群众的凶手，特别是策划者，一定要依法处理。我们人民解放军永远和革命派站在一起，坚决拥护革命小将，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搞绝食斗争的办法，我们也从来是不赞成的，把身体搞坏是不利于革命的，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吃好饭，睡好觉，好好闹革命。

同志们，毛主席号召我们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是非常光荣繁重的，我们只能作好，不能作坏，不辜负伟大领袖对我们的信任。今天是毛主席关于把人民解放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伟大指示发表一周年纪念。这指示是马列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的新高峰。这在我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出现、反对帝国主义、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本色、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国防、永远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国防、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侵略，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这指示是我军建设的永恒指针，在当前贯彻，就是要很好完成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全面贯彻“五·七”指示，把全军全国办成革命化大学校的重大措施。

要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贯彻主席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指示，要响应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严防坏人挑拨。革命小将成都军区批评，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爱护，今后你们还要用适当方式，对我军支左进行批评。我们是人民军队，为人民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群众批评和监督。

四川是祖国大后方，又是国防建设重要基地，一定要把文化革命搞好。

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有中央指示，现在又有《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又快建立起来，中央又快派张国华、梁兴初加强成都军区领导。他们都是跟随毛主席久经考验的好同志，是可以信任的。这使我们对搞好四川文化革命更加有充分信心，希望四川广大群众在毛

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把他们彻底斗倒、斗垮、斗臭，把四川文化大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青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同意肖华同志的讲话。我没有更多的话讲，我只讲一点。（非常亲切地）我们有这么好的军队，不要因为他们有错误，在一个地区一个问题上的错误，就一切都错了。要记住，要爱护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们犯了错误会很快地改正，要原谅他们，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革命派内部，听说内部也吵得很厉害（关切地笑了）。在组织内部分不清敌我，采取了甚至比对敌人还厉害，这就不好了。今后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很难说。但是大敌当前，四川就是李井泉，我们不能松懈，要时刻记得批判斗争，斗倒斗臭，如果一松懈，内部就会吵起来。今天，总理、伯达、康生找川大和其他一些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嘛，大家都笑了。少打一些内战，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忘记了这个大方向就要犯错误。我希望同志们记住这一点，把精力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我们就不会迷失大方向。

第三、对保守组织，一个组织几十人，甭说几千几万，不要随便对他们的群众采取歧视的态度，这里有个群众问题。革命派要善于做群众工作，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这一点，对你们可能有点恼火，他们对我们打、砸，我们还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要作。除了个别的头头外，一般的应做群众工作、思想工作，才能

把群众争取过来，这才能孤立头头，打胜仗。西南保守组织势力是不小的，对保守组织采取什么态度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和策略。

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的讲话

战友们、同志们：

刚才伯达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我们完全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成都军区部队，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指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共同闹革命，搞好四川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成都军区部队一定和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对于前一段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和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根据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我们回去立即处理，一律平反。

刚才肖主任和江青同志的讲话，对成都军区部队作了很重要的指示。我们回去坚决执行肖主任和江青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在我部队中普遍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一次爱民运动，搞好军民关系，与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欢迎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帮助，使我们的工作得到改进。特别是在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和帮助。

同志们、战友们：我和梁司令员是刚到四川的，对四川的情况不够了解，希望同志们多加帮助，把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四川的军民关系搞好。今天就讲到此，今后见面的机会很多，向同志们学习的机会很多，今后再共同研究。

周总理的讲话

今天开的是结束会。伯达同志刚才已经把《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讲了，解释了，大家都是支持的，拥护的。现在四川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张国华同志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决定，领导大家一起把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是很好的表示。肖主任，江青同志讲了，是很好，大家也支持。

韦杰、甘渭汉两位同志的检讨，有部分同志不满意，因为你们受了压抑可以理解。虽然我们看来态度是诚恳的，但不深刻，认识有个过程。你们要求再检讨，我同意，但不一定在北京。检讨要通过实践，听其言，观其行。没有现场观察，在实践中去认识，不可能一次比一次深刻，你们听他们说，也要看行动。还是回

去，在张国华的领导下，在新司令员的帮助下，给以改过的机会。毛主席历来主张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对四川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成都的同志有的来了几个月了，有的来了一个多月，也有几天的，要估计形势。有的同志刚从监狱释放出来，有的还没有出来，听了五月六月的流血事件，激愤是可以理解的，把形势看得很乱。可是，冷静点看，还是大好形势，是好形势。大家想：去年十二月是什么形势，那个时候，你们喊“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还只是喊，没有打倒，现在被你们揪下马来嘛。四个多月取得了胜利，在西南开始解放，这样的好形势。成都军区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反运动，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现在平反了嘛。伯达同志代表党中央宣读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就讲了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如象万县的主力军，当然是革命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刚才有人递条子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解决。这是胜利。要使胜利继续发展。过去你们受压抑，受压制，把你们监禁起来，不能活动，现在你们平了反，翻了身，要负责任，做主人。群众组织的代表，“三结合”的代表，对今后大西南、四川要负责。

解放大西南，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矛头对准谁？要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在四川、西南头头是李井泉及一小撮人。对刘、邓、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在一起批判，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把他们拉下马。要在批判中来考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解放军。集中火力，对准目标，彻底批判全国的最大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大批判中考验大家，考验犯错误的干部。他们知道的情况多，站出来批判，就可以看揭得深还是不深，支持还是不支持，不是说说能解决的。应当同他们决裂，彻底批判，划清界线，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在批判中可以看出革命群众组织，那些表现更坚决坚定，解放军也好在批判中来看应当支持那个。这是最好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方向摆正，对准头头及其一伙，解决问题抓住要害，不会犯方向错误。五月六日的事件要把背后操纵人，他们和李井泉的联系找出来，通过现象去看本质，找根源，这样斗争就集中了，革命组织团结了。各个革命造反派过去有些差异，有的犯错误多点，有的犯错误少点，现在站在一条战线上嘛。五月六日在坏人操纵下，打了枪，造反派站在一起，川大

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二七红卫东、零二八部队都是站在一条战线，证明是战友，是同志。过去的错误可以用自我批评解决。矛头对谁非常重要，不要分散目标，才能使开始的胜利继续下去，这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革命组织一律平反，回去要解决。有的地方如德阳、江油、雅安，还有些人没放，“决定”宣布后，他们负责打电话。军分区、地委的同志在场嘛，命令他们一律打电话，他们错打错捕的人都要释放，立即执行。考验他们，如果他们拥护中央的决定，要以行动来表现。不要担心，即使有的人有点阳奉阴违，新的军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会解决，有了负责人，找他们解决。

第三、关于对待解放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个别领导人犯错误，应当允许改过，允许革命。毛主席对待犯错误的人总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原地，通过斗争实践来考验。新的司令员、政委都没有在四川工作过，情况不熟悉，犯错误的同志熟悉情况，要证明他们在中央、在群众面前表示改正，在斗争中、工作中去改正。要弄清楚军区内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关于十七个军分区、一百七十多个县武装部、多少独立师、团，总有些过去受李井泉、黄新亭一伙影响的，要通过他们熟悉的人研究，把其中最顽固的人孤立起来，允许军分区的个别领导人，给他们一个改的过程，不要希望一下全部改观，那是主观主义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事物的变化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现在在新的情况下要有数的积累，现在开始，要给以时间，这么多地方，这么大的面积，要加以分析，不能把这些问题罗列在一起，一片黑暗。一时的现象，中央已经抓起来，一定能改，要有时间。党政方面，省委、市委、地委、县委，政府方面，特别是公安系统、公安厅、公安局，总有些坏人，一分为二嘛。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有个别坏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军队，已有命令下去，新领导去了，犯错误的同志作检讨，经过群众揭发，给机会改正错误，给军分区开个会，讲讲道理。回去以后好好把一月二十八日的军委八条、四月六日的军委十条、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示加上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好好读一读。请把三个文件印成册子，每人送一本，包括没有到会的。一定要把拥军爱民结合在一起，相信解放军这一伟大的

军队，部分错误一定能改正。包括军队内部的造反派，领导改了嘛，保护你们了。但总会有一小撮人起破坏作用，要给时间才能发现，要有步骤地进行工作，希望大家站在拥护解放军，帮助解放军，同解放军抓好工作。

就讲这些，还有几个具体问题。

“五·六”事件专案，责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回去以后就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吸收造反派参加，什么都能查清。其他地方，万县、涪陵，已经听了汇报，看了材料，也责成革委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去解决。

重庆问题，作为专案，毛主席批示叫重庆的两方，军队方面、地方的“八·一五”，有两种看法，对革联会怎么算，都找来了，单独研究搞清楚，然后作出决定。其他地区有了问题，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去进行处理。

三线问题，那里有文化革命问题，有建设问题，过去是西南局抓，现在李井泉撤了西南局第一书记职务，西南局实际瓦解了，中央直接抓三线，找了曾希圣同志来就是谈这个问题。

北京联络站，大专院校同学，新的不要再去了，已去的要逐步收回。四川造反派很多，一开始就起来造反，都来过北京，锻炼出来了，相信他们自己，七千万人等于一个大国，还不能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

北京医学院的同学自告奋勇，组织了医疗队，同意派三十个人去，代表党、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慰问他们。

“北地东方红”，牺牲了两个同志，尸体运回来干什么？可以把家属带去，把尸体烧了运回来。（有人插话说：产业军已经接管了火葬场）请梁兴初、张国华同志马上打电话调野战军接管火葬场。把骨灰运回来。

专门问题有联络员负责找人谈，广大群众就回去了。车费、旅费有困难的，联系解决。分住在外面各地的，把“决定”印发给他们，并把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转告他们。

大家回去轰轰烈烈闹革命，把西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1）的批语 一 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中央军委 五月二十七日 二 林彪、恩来（2）同志阅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给成都军区并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这个电报说，近几天，军的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在重庆先后十多次约见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等组织的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此外，通过接待来访，对反对派的一般群众进行了工作，并同有的组织搞了军民联欢。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消除了一些误解，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思想感情较前有所接近。反对派表示拥护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愿意接受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原则上同意实现两派联合。但要真正实现两派联合，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小组给成都军区的电报

张国华、梁兴初、刘洁挺，请转告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四川的同学：

中共中央已经作了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已经成立，他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四川问题，请同学们相信四川的广大群众，一定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根据中央四月二十日重申停止大串连的决定，所有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四川的同学们应当立即返回本地区、本校，参加本地区、本校的斗批改。希望同学们成为执行中央指示的模范。

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

三、中央关于解决宜宾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出席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

姚文元、谢富治、肖华、杨成武、李天佑、叶群。】

总理：现在开会，今天就根据前几天主席的指示，我们找你们来关于宜宾问题，叫党政负责人，群众代表都来，四川军区，成都的都来在这里，刘结挺同志控诉，来检查四川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北京到四川各地串联的同学，回来反映了许多问题，到北京告状的反映许多问题，宜宾、万县、古灵、成都、重庆，看来不单是宜宾了，原来也不认为单是宜宾，成都有个镇反报告也牵连到各地区，先要解决一下宜宾的问题，先请刘结挺同志讲一下。（刘结挺开始控诉……接待我们时说：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

康生：谁讲的？

总理：几号讲的？（刘结挺：中央办公厅的人讲的，九月十二日，说什么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他们要我们赶快离开北京，不然事会闹大……）

康生：电话讲的吗？（刘结挺：是直接接见讲的，二十七个被接见的人揭发了这件事，就被军分区抓了……）

康生：二十七个人中间一个揭露了这件事，被军分区抓到监狱，叫什么名字？

（刘结挺：叫高玉文。）

总理：办公厅接见的人叫什么名字，你们不晓得？（刘结挺：我们没参加。）你们没参加，接见了他们。（刘结挺：对，接见了他们。）高玉文是谁抓的？（众：王富德。高玉文还在关着。）王富德同志，高玉文还抓着呢？（王富德：高玉文是地方革命组织抓的，我还不知道呢。）你马上去叫把他放了，叫到北京来。（……郭林川没有来）郭林川在那里？（众：在宜宾。）

康生：怎么没找到？让王富德同志找他来，把他送来，保证他的安全。（众：王富德要抓他……）

总理：（问王学明）你说在什么公社？（答：郭林川在xx公社）（王富德：接到电话，我们找了，没找到。）甘渭汉同志，今天晚上你要保证高玉文同志、郭林川同志，保证送到北京来。（……）

（谈到用飞机散传单，抓人一事）

王力：（对陈伯达同志）飞机一来，下面就抓。

伯达：甘渭汉同志，散传单是谁批准的？（甘渭汉：叶副主席。）

康生：用飞机散发传单是谁同意的？（甘渭汉：叶副主席。）

康生：飞机散发也是吗？（甘渭汉：飞机散发没有说。）

（会议争论很激烈）

总理：同志们冷静一下，我们现在在这里把问题讲清楚，他们原来那样对你们，你们不要那样对待他们，摆事实，讲道理！

甘渭汉同志，电报讲，在监狱的请负责放出来，在外地的请负责找来，以上人员，请甘渭汉同志在成都召集，北京 3 月 30 日派飞机来接，可你们，把底下这些人还看着，当犯人，到了北京还这样。

杨成武：打电话给他们，昨天才知道，说这些人是犯人，不发出入证，他们是中央请来的客人。打电报时也打了电话，你们根本问题是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

（众：还有四个没有来……）

总理：哪四个？是哪儿的？李良在哪里？（众：李良和郭林川在一起……）甘渭汉同志，给你四个名字，加上高玉文，（众：刘结挺的女儿也被抓了。）几个？

（众：三个）有人照顾吗？（众：刘结挺的家被抄了二十多次。）甘渭汉同志，要把这五个同志找回来，三个孩子，告诉他们送回家。（汪宗清：三个孩子没有抓。）你军管了嘛！你去查，限你二天。

（王茂聚控诉）

康生：牟海秀在这里吗？你晓得宜宾抓了多少人？（牟海秀：我不晓得。）你不晓得，你在中央面前声明你一点不晓得？记下来。沈学理你对抓人的情况晓得不晓得？（沈学理：我 3 月 5 日才放出来……）你到处作报告，你成了三结合的对象，抓了人没有？（沈学理：我在中央面前声明抓多少我不知道，听说是抓反革命。）好，记下来。

总理：讲你放出来以后嘛，出来四十多天了嘛，（沈学理：宣布了几个反革命组织，方面军，反修战斗团，前哨，觉醒，现在地委没有工作。）不知道抓了多少人，是嘛？记下来！（……）（有人说：四川有人讲，李井泉还是李政委，牟海秀还是政委。）

康生：现在还是“他们的政委”嘛！（……）

（谈到军分区到京抓张西挺一事）

王力：军分区派的公安部的三个干部，来抓张西挺，他们以为刘结挺不在这里，我和关锋同志通知把这三个人抓起来，后来我们了解这三个干部原来是支持

刘结挺、张西挺的，是带功立罪的，就放了他们，让肖华同志办公室通知宜宾专区。(1) 刘、张、王、郭不是反革命。(2) 抓人怎么样，后来回去就找到了。(温国良：到公安局，就不让我们出来。) 总政下了通知嘛！军阀十足军阀！

(……)

(王富德：我没有派人，在中央面前敢负责，没派人，我抓工农业生产去了。)

(争论激烈)

(王富德：我们都可以说话嘛，元月 25 日方面军跑到我们那里要我们派军队，军队根据文件只能军管。1 月 28 日把一万多人包围军分区，把我拉出来打了一顿，打坏了，养了一个多月，有医生证明，后来省里让我管生产，我就抓生产去了。)

王力：你讲话要讲事实。

(王富德：在中央面前我不敢讲假话，抓人我不晓得。)

(汪宗清：抓人的事是这样的，开始我不知道，在军区开会时，甘渭汉同我有三个人去北京抓人才知道。)

总理：谁派去的？

(汪宗清：军管小组，参谋李勤然，他是市武装部、政治部，主任，他是组长。) 他自己决定的？没有上面命令？

(汪宗清：没有。)(……)

(谈到 2 月 17 日和荣复军)

总理：这个问题和军分区和荣复军没关系？

(王富德：我们不同意成立荣复军。)

总理：有没有关系？

(王富德：我们对他们做正面教育……我们没关系。)

总理：又没关系了？！(……)

总理：今天结束这个会，这个会还要继续开，军分区，地委的要申明他们的意见，控诉地委的同志也要回去，一个一个的问题弄清，你们激动心情我们理解，你们回去，今晚，明天上午开个小组会，哪个同志谈哪个问题，不要谈细节，中央文革、中央常委事情很多要集中，不要分散。

1 月 28 日，2 月 10 日到京抓人，刘、王、张、郭问题都清楚了，以前他们

也有材料，毫无疑问要平反，不光是这个问题，还有四川全面开展斗争，三个省份的问题，刘结挺、张西挺、王聚茂三位同志把问题集中一下，四川要镇反这个问题，集中在那里。

康生：我们得到消息，甘渭汉同志说 19 日去的飞机，我们听说 18 日去的飞机，要搞清楚，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飞机散发所谓中央这封信，是有人假造的，散发这封信以后据说 20 分钟开始大逮捕。韦杰，在不在？散发传单的事你晓得不晓得？（韦杰：军区决定的。）万县开枪开死人，你们报告没有？（韦杰：当时没报告，大约五、六天后报告的。）五、六天是不是？还没有报告，什么形式报告的？什么名誉发出的？（韦杰：电报式，以军区名誉。）

王力：打死多少人？（韦杰：五个。）一直到现在还没报告名单。

关锋：是否是五个？就是五个？

总理：你们打了报告，镇反的报告，说还不够，还要继续，离座谈情况差太远了，今天就停止，因为刘结挺提出，从宜宾情况到全省在我们看，拿宜宾来说，先镇压革命群众，革命组织，2 月底到三月集中揭发大的事件。万县、左灵、自贡、成都、重庆，通告包括地方很广了，要化一点时间，不是一、二天解决的。

第一件事：成都军区要负全责，赶快把这个事停止，梁新忠同志监督，马上打电话去，今后如这样文化大革命事情，不能抓，要放出来，也不要马上就放，不然会不知下落了，你们一个一个军分区打电话，军管电话给你们，一个个军分区传达到武装部，对革命群众不能再歧视了，对真正反革命组织要区别头头和群众，明后天要发通知。

第二，请在座的解决这个事，是局部问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看大形势，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搞文化革命要相信什么力量呢？第一相信群众，第二相信解放军，第三要相信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搞革命的三结合嘛！

解放军起了保卫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柱石，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解放军的个人犯严重错误是个人责任，我们要相信群众会听主席、林副统帅的命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嘛，过去的情况揭发就可以解决，不要对解放军抱情绪。

未解决以前，回招待所，北京的回校，只能在本单位讲，在这里可以谈，把问题谈清楚，在外面要谈，对联络员，记者可以谈，更不要在报上，井冈山报，

红卫兵报上登，也不要写大字报。军区打电话，你们不要打，四川很紧张，你们打了，大字报就出来了，这样复杂紧张了。全国七千万人的一个省，李井泉是我们揭发的，对党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彻底解决。

康生：请同志们注意，我有几点说明：

1、有一同学说：成都有传说林副主席曾到成都，坐镇成都指导镇反，这完全是诬蔑，造谣。

2、二月二十七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林副主席昨天才看到，林副主席是完全反对这封信的。

3、听了这个情况，林副主席很生气，亲自拟了几个命令寄报中央，坚决禁止开枪杀人，坚决禁止乱抓人，坚决禁止任意宣布某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要经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发下去，这是中央林副主席对解放军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

总理：会就到这儿。

高呼：毛主席万岁！

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肖华、叶群等。〕

周总理：现在开大会，今天先由军分区、地委讲一下，讲完再讲。严重的可以插一两句，要尽快一点。军分区哪个同志？

（汪宗清讲……）

（王府德讲……）

（沈学理讲……）

王力：（对姚文元）沈学理，革命干部三结合的对象呢？

周总理：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简短一点。

王力：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省委的材料都看了。

周总理：你好一点嘛，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讲的。

康生：你讲一下现在的情况，你总知道些嘛，你要亮相嘛。

姚文元：你是三结合对象嘛（冷笑）（对沈学理发言）

王力：三结合第一对象是他（冷笑）

杨成武：不亮相怎么结合？

姚文元：你在这里也可以亮相嘛（说着就笑起来进里面去了）

王力：你可以亮相嘛，对于李井泉这个黑帮你可以亮相嘛？

周总理：你讲些什么，你对四川省委，李井泉有什么意见，你说嘛，没有说的就算了。

牟海秀：……

周总理：过去的事简单一点，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

康生：你对李井泉有什么看法（牟海秀：接触的少……）

张春桥：你对他现在怎么看（牟海秀：根本问题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王志敏：……

王力：冲军区的问题我插一句。

毛主席在最近一两天有一个指示：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进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区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下看得太严重了。

康生：（对王志敏）你讲了半天，而且要认罪，而且犯了严重错误，你犯了什么错误，你没有讲，要具体点，犯什么错误，抽象化。（王……）

王力：四川有一个同学递条子让把毛主席批示再说一下（重复读一遍）

康生：我补充说明一下，这是中央向各地发的中央解决安徽问题，中央的批语是毛主席批的，是中央批的第二条。第二条是不得整群众，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反正是因为冲军分区或者对军区有不同的意见，或者对各地区，各单位，夺权有不同意见，而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逮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下面是毛主席批示就是刚才王力念的（念一遍）。

（郑光华讲……）

康生：同志，你讲一讲 2 月 17 日以后，16 日以后，19 日中间到外地捉人，实行白色恐怖，你 32111 什么态度？

康生：你简单讲一讲，32111 参加捉人没有参加捉人，参加打人没有参加打人？

周总理：抓人 2 月 19 日以后参加了？打人呢？

（郑光华：抓人参加了，打人不清楚。）

周总理：参加抓人，抓了多少？

王力：2 月 19 日以后你不是在宜宾吗？军分区、公安局和 32111 抓了 5 人，你在哪儿嘛。（郑光华：我不清楚）估计一下。

周总理：你不要讲了，

（谢永福同志，高玉文同志讲话）（……）

周总理：省委的同志还有什么讲的，韦杰同志还有讲的嘛？你讲几句。

（韦杰……）（储彬同志讲）

周总理：你写给我有多少人？军队内部的，你代表他们来了，你休养一下，以后写出来，以后还要提意见。韦杰同志你快结束吧！你要回答第一个问题。你在 1 月 29 日同时报总参、军委，同时派了一个团（是二个营）到宜宾军分区，说对劳改犯坚决镇压，实际上是先派后报，镇压革命群众，你根本忘记了，军人还不懂？

宜宾的情况清楚了，先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我代表中央文革讲几句话，这次会议是毛主席指示召开的，毛主席看到了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送给他的宜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宜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猖狂的反扑，残酷斗争革命群众，这样的一分材料他指示应该加以处理，找各方面的代表来北京谈，这几天听了大家的发言，问题大体上是清楚了。

王府德、汪学清、牟海秀、沈学理，这些人的发言虽然是不老实的，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一切牛鬼蛇神都暴露的，逃脱不了的。经过多年的斗争，刘结挺同志的案子，他和张西挺同志冤屈终于揭发出来了，揭出了宜宾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将是揭开整个四川省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重要序幕，将是揭开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序幕，我们认为同志们继续斗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全西南，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有充分信心，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

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胜利必然属于毛泽东思想，属于无产阶级，属于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一伙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是必败无疑的。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总理：现在请杨成武同志讲话。

杨成武：革命造反派的大干将们，你们讲了很多了，原成都军队的司令员，贺××60年死的，当时成都军分区没有司令员，当时林彪副主席提出从广州军分区福建军分区调一个拥护毛主席的好同志当司令员，当时受到李井泉和后台这个人坚决反对，邓小平也反对，另找一个司令员，就是黄新廷，成都军区，所谓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这个情况，材料反映很多，活动也很多。我们看了很多材料，有从北京到成都串联的，有成都到北京串联的，过去邓小平、彭真这些人都到四川去活动，刘邓、彭真、罗瑞卿都到那里去串联活动，中央把它们盖子揭开的，刚才有的同志批评军区是很需要的，刚才说调到宜宾一个团（是二个营）飞机散发传单，都不报，空军司令不同意。

康生：同志们，我简单讲几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宜宾问题有关方面的人到北京，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宜宾问题是多么关心，同时，我们林副主席还研究了青海问题，以及其它军区的问题，也包括四川成都军区以及宜宾军分区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致坚持这个看法，毛主席1月21日的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历史意义的事，毛主席一直说，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第三要相信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不管解放军某些少数人犯错误，或者是青海的赵××那样混入解放军的坏分子。无理制造镇压革命群众事件，但总是极少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在这些问题中间，林副主席讲究了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问题，认为中间有的做得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林副主席建议，支左问题提到中央讨论，

毛主席批准，不久文件要发到各地。

我们的解放军能掌握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支持左派的伟大任务取得了胜利。

当然，支持左派问题犯了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容易改正的。希望解放军、广大群众理解，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有重大作用。

宜宾地区是典型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刘结挺的报告看到这个斗争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是从七千人大会后，62年开始的，说早一点是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开始的，所以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尖锐。也反映四川斗争怎样复杂曲折，摆在前面很明显，我们不能说刘张没有缺点，问题，可是看到一个事实，坚决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刘少奇，反对邓小平的被打成反革命，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当然军分区、地委讲了几句，重点要我们派工作组，调查组，到宜宾调查，意见是这个问题还不清楚，加上不痛不痒的话，四、五个人一致提出这个问题，调查我们过去调查过，现在还在作调查，但有一点要承认，宜宾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还要调查什么？军分区没有讲，地委也没有讲，省委一句话也不提。

我们希望军分区、地委、省委，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要解决大方向问题，到底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坚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明显，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白色恐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清楚，今天不用再调查，可以做结论。

当然革命组织有没有错误，你们自己也要作检查，对解放军，骂解放军，你们不能因为他们犯错误，你们就这样，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他们的问题，开除党籍是经原中央监委讨论了，由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讨论决定是完全错误的。中央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并且要成文件，开除党籍事没有文件传达到县委，在宜宾要传达到全体党员。

这是可以看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井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一时可以使一些同志受迫害，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

获得彻底胜利，从宜宾可以看出。

周总理：谢副总理讲一讲，解放四川才能解放大西南，讲一讲嘛。告诉同志们，全军增加他一个职务，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

周总理：同志们，结束关于宜宾问题三天的会，当然，不是很全面的结束，要从宜宾突破到整个四川，先把四月一日中央文件念给大家。

（念文件）

周总理：四川问题军委还要根据林副主席的提议，宣布十条命令，从对的，错的经验中得出东西，加以总结。解放军中一部分人犯了错误，群众也有错误，比如：冲军区什么，把负责人拉出来弯腰跪着，这是不对的，对坏分子也不这样。比如说：八条命令中央 2 月 21 日附了五条，转发了。即使对三反分子也不搞体罚，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同志早就说过，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所以冲军区把领导人拉出来跪，低头认罪，甚至戴高帽，挂黑牌，讲解放军是“保皇兵”，黑司令是军区，不对！这中央文件给你们，要好好宣传，学习。你们大方向是对的，要改正错误，有错就自我批评，造反派要自我批评，保守派要认清立场错了，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有根据中央那五条，许多事成都军区要及时处理，不能再捕一个人了，不能再取缔一个群众组织了，违背的，被抓的人要保证健康，成都军区要保证，新的司令员已介绍过一次梁兴初同志，请他监督办好，放出来，健康不好就更不好了。捕人的事确实数目很大，单在成都抓了二万多人，宜宾也有这样的情况，你们不是讲前门进后门出嘛！空军学校就抓了好多人，这是不允许的，现在有的人说有问题，还再三要迫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斗争是好的。

这个口头通知可以在当地同志中宣读，以后有文件……。今天会就到这里。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

1967. 04. 04；中发 [67] 154 号

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我们根据主席指示，研究了刘结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也研究了西南局、四川省委

和中央监委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档案，听取了有关宜宾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问题是很清楚的：

一、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例如，对于刘结挺同志坚持要划为右派的李鹏，“省委明确指示，李鹏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这是四川省委监委《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同志的检查报告》中公然这样写的。

二、刘结挺案应予平反。所有因为这个案件而受处分的同志，应一律取消处分，开除党籍的应恢复党籍，关在监狱里的，应当一律放出。

三、受陷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他们对右派分子郭一等人，对李井泉等人的翻案风，坚持革命原则的斗争，是完全对的。这些同志和其他同志有权参加四川省和宜宾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要协助他们，支持他们闹革命。

四、这个通知，可在当地群众中宣读，对这一冤案，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桥工联、红工联、32111 野战兵团，向宜宾革命造反派发起了反扑，死伤多人，其中有两名北京来宜宾串连的学生被打死。

“这一天，有一二百人自发地到市中心“大观楼”旁集中，因多数人是搞搬运的抬工，故临时取名为“抬工队”，举行游行示威。集合好后，整队向西门出发，所经之处又有不少群众加入到游行示威的行列。

当队伍行进到西门外铁路大桥下时，桥上大桥队思想派的人竟用道渣、鹅卵石朝队伍打来。桥上边叫骂边继续朝桥下扔石子，游行人群照样行进，照样喊着口号井然有序地游行。

刚过翠屏山转入人民路时，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它们相隔近百米）楼上，如暴雨般的砖头、石块向队伍打来。队伍受到如此大的前后夹击，顿时大乱。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冲出好几百头带藤帽，手持木棒、钢钎的凶汉向队伍袭来。为不扩大事态，队伍向军分区方向撤退进行避让。

北京赴宜的“红卫兵”看到如此大规模的武斗发生了，造反派是赤手空拳，

处于挨打的境地，于是他（她）们就到军分区内去请求解放军出面来制止武斗。不料军分区门卫不但没答应学生些的请求，反而有个别人将他们推出军分区大门（这时军分区外已被红色派的人手持棍棒、钢钎占据了）。可怜被推出军分区的首都“红卫兵”张玄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王俊英（同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两位同学，竟被红色派围在军分区大门口的人乱棒和钢钎活生生地杀害了。很快就从西门、北门方向一条街一条巷地退下来。西方的麻线街、童子街、三倒拐；北方的北毫巷、鲁家圆；东方的崇报寺、咸西街等，是双方几经反复争夺的“战场”。武斗持续了一周左右。“八·二六”派的告急电报和电话源源不断地发往北京，发给党中央。在京的刘、张他们也很着急宜宾的事态，郭林川、王茂聚还亲自到过北京电报大楼给党中央、周总理发电报求援。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一三”事件。”（有关宜宾材料引自《谢富英回忆录》）

（1967年7月17日《首都红代会赴宜红旗造反兵团〈宜宾专刊〉》文章记录了这件事：《为有牺牲多壮志——北京红代会张玄杰、王俊英烈士宜宾遇难记》：
雨更大，风更紧。黑云翻滚压戎城。

在四川地区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直接指使下，五月十四日，桥工联、红工联、32111野战兵团，向宜宾革命造反派发起了猖狂的反扑，一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多少红旗派的战士遭到石块的攻击。多少红旗派的战士受到木棍、铁棒的毒打；多少红旗派的战士死在暴徒的砍刀下。刚刚抵戎的我红代会北工大东方红战士心血在沸腾，怒火在燃烧，为了制止事态的发展，一批批红代会战士走到x分区要求接见，却遭到门岗的无理拒绝。

制止事态的发展是x分区的起码的职责。要求x分区制止事态的发展是我们红代会每个战士的责任。经过我们充分地讨论，统一了思想，十二时左右整队到了x分区门前，再次要求接见。但是x分区某负责人百般刁难，始终没有答应我们提出的起码要求。

四点五十分左右，桥工联、红工联、32111野战兵团等暴徒数千人从翠屏山上冲下来，直冲到x分区门前，一些无组织的群众边撤退，边阻击，但终究是寡不敌众，伤亡十分惨重。面对这种情景，“与宜宾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伟大誓言在每个战士的耳边回响。我东方红战士主动把队伍分成两组：一组站在x分区门前，防止群众与x分区发生冲突；一组高举着“红

代会北工大东方红”的大旗横排在马路上，组织群众。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重伤躺在马路上，躺在暴徒队伍的前边，能不抢救吗？不能！不能！张玄杰同志把东方红的大旗交给了其他同志，第一个走出了队伍，毅然地向暴徒走了过去，接着其他三个同志也跟了上去。未经交涉完毕，穷凶极恶的暴徒一棍打在张玄杰的头上，接着又是几棍，张玄杰头负重伤，倒在地上。

在x分区门前的王俊英同志，领着群众流着眼泪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一个人民的一切”，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冲到分区门口的暴徒在群众中乱打、乱砍，人们躲闪着，后退着，王俊英同志的一只脚刚刚退到x分区门内，就被一个人猛推了出来，暴徒看见王俊英带着红代会的臂章，狠打起来，王俊英同志倒在血泊中。

暴徒们退走了，张玄杰、王俊英同志分别被送进了第一、第二医院。医院的大夫们，为了抢救红代会的战士，千方百计优先给他们医治，但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次日光荣牺牲了。

大夫们，红旗派战士们，含着眼泪传送着张玄杰、王俊英牺牲的消息。岷江在翻滚，金沙江在咆哮，整个宜宾爆炸了

张玄杰、王俊英同志实现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伟大誓言，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张玄杰、王俊英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在“八·二六”派即将全军覆没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奉命赶到宜宾支左，暂时制止住了武斗。

但部队只是将双方在他们来时的状况下隔离开（实际双方仍只在城区四分之一不到的南方一隅），而局部性的武斗仍然不断地由对立派在西、北、东三个方面进行。最为激烈的一次是东北方的崇报寺、咸熙街一带，数百名头带藤帽、手持钢钎的对立派人，想冲到造反派占据的南方来打杀。造反派将冲在最前面的一两百名由数十里外的金坪、象鼻农村调来的“农民大军”，分割包围地全部俘虏了下来。被俘的农民纷纷哀求造反派放他们回去，说他们不明白真相，受当官的

蒙蔽才进城来搞武斗的，今后决不再来当炮灰，妻室儿女指望着他们。他们说上面领导调他们来的，不仅包吃包住，而且还照样有工分（报酬）拿，更何况是当官的来喊的，他们也不敢不来。事先也没向他们说是来城里搞武斗的（而是说叫他们来保护地、市委的），来城里后发钢钎、藤帽给他们后才知是弄他们来搞武斗的。现在他们知道错了，违背了中央精神，今后再也不会受骗来武斗当炮灰了。

进入六月，对立派的武斗攻势减弱了（因为不少人知道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总体情况，纷纷退出红色派组织，离开武斗场地），但还有相当部分不明真相或坚持错误的人，则撤退盘踞在翠屏山、真武山上，并在宜宾山上的制高点（翠屏山顶部）架设了当时最大功率的高音喇叭，专门在夜深人静之时开播，叫骂红旗派，攻击刘、张等人。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是假的，反诬宜宾武斗是红旗派挑起的等等。其音量之大，完全可以覆盖整个市区，吵得人们根本无法安寝。”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刘结挺文章：《李井泉是大西南的赫鲁晓夫》

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前言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西南局第一书记。一九六五年前还兼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这是他的表面，他的实质是什么？他是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大西南的“土皇帝”，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实力派，是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李井泉有极大的政治野心，阴谋把西南变成他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独立王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李井泉狡猾的狐狸尾巴越露越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面貌再也隐藏不住了。我发现李井泉的问题，是在一九六二年。

那一年，国内阶级斗争异常紧张，帝国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勾结起来，进行疯狂的反华勾当，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帮叫嚷要窜犯大陆，阶级敌人气焰嚣张，妄图乘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在这个时刻，李井泉配合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党活动更加猖狂了。

李井泉疯狂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

一九五九年四月，毛主席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指示信，广大干部、社员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就在这时，李井泉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发出了黑指示，这个黑指示说，“对毛主席的信要从积极方面理解，不要消极的理解。”致使毛主席的指示不能贯彻，造了极端严重的后果。

一九六二年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井泉又借机攻击、诬蔑毛主席的指示信。他胡说什么：一九五九年之所以在毛主席的指示信上加批语，是想多打点粮食，与修正主义斗争争口气，怕毛主席的指示信下去起消极作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他对李井泉明目张胆地诬蔑毛主席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副主席有一个极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在讲话中，对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同志作了批评。林副主席还从我党各个革命历史阶段论述了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性，号召全党学习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的这篇讲话，对到会的同志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育。可是李井泉在林副主席这个讲话后，专挑了一份大会简报叫四川各小组传读。这份简报刊登了有关向林副主席提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又属于一般性的工作意见。李井泉不让传读中央各部局对四川提的意见，借以教育四川到会同志，却专挑那么一份对四川干部毫无特殊意义的材料，而且选择在林副主席发表上述讲话以后。很明显，这是一个反党阴谋。尤其恶毒的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李井泉的亲信、反革命分子张黎群配合李井泉的活动，针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写了一篇“不是八九不离十，而是离十太远”的极端反动的杂文，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林副主席和毛主席。李井泉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二、李井泉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破坏人民公社

一九六一年，毛主席再次指示人民公社实行三级管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在重庆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同志，热烈拥护毛主席这一英明、正确的指示，并要求按毛主席指示去办。但李井泉却以各种借口抵制毛主席的指示，拒绝同志们的

要求。他散布说：“四川的问题，是粮食问题，不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问题。”他指责、压制坚决要求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同志说：“有些人为什么对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那么感兴趣！”他醉心于在四川继续推行自己搞的“三包一奖”的“经验”，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破坏人民公社。直到一九六三年，李井泉的追随者×××，还在大肆攻击、诬蔑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指示是“右倾”。李井泉之流就是这样顽固地对抗最高指示。

三、李井泉大刮单干风，鼓动“退回去”

一九六一年李井泉搞了一个大划田边角谁种谁收的“指示”，把大量的集体土地变成了私有，大刮单干风。一九六二年六月九日，李井泉对六个专区的六个重点公社干部介绍他“点”上的“经验”，鼓动“退回去”。他吹嘘说：“第一，公社和大队干部都要压下去，凡是过去老社的一律归生产队。第二，退回去，按高级社办事，现在看来退了一步，还没有退够。第三，把生产队的副业班子搭起来，凡一九五八年建立起来的副业建设一律归生产队。第四，一九五八年以前是不是年年增产了？（众答：是年年增产了）如果是年年增产，这样退下去，没有问题，搞它几年再说。”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宜宾地区县委书记会议上，又积极鼓吹“退回去”。×××等在他的鼓吹下，大肆进行“退回去”的复辟资本主义阴谋活动。

在×××的“点”上，自留地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上。在××直接指挥的宜宾市：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下令解散全民所有制的渔场，叫工人搞单干。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又下令并限期解散宜宾市国营运销单位。他说什么：“划若干小组和调配站，由需要工人的单位挑选雇请工人。”这样没有几个月，全市就出现了二十多个把头。

——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他叫嚷：“仔猪市场干脆全放。”助长富裕农户走资本主义道路，影响贫下中农养不起猪，给生产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为了鼓动单干，他规定，国家机关下农村的工作组干部，每人在公社划一分菜地自由种植，规定家住农村的公社干部除本人在家划一分自留地以外，还可以在公社划一分菜地自由种植。

——他大肆提倡中医“随父学艺”，说什么：“只有随父学艺才能把老医生

的本事学到手。”

——他公开叫嚷“要向资本家学习”，说什么：“人家做生意能赚钱，我们不行，赚不到钱，应向人家学本事。”

李井泉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不是很清楚了吗？

四、李井泉散布修正主义毒素，诬蔑和攻击党“犯了路线错误”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选了一部分大会简报让四川省小组传读，其中有一篇大意是，今后工厂可不搞政治运动，只搞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很明显，李井泉这是配合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报告，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李井泉及其追随者，一方面勾结阶级敌人大搞反攻倒算，一方面大肆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他们说什么：“在医院、文化艺术、科学团体搞政治运动是错误的。……以后不搞了，你们放心吧！只要搞好本行业务就行了。”

一九六二年三月初，李井泉在自贡别有用心地说：“有人说我们这几年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对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应该如何回答？”李井泉这是有意识地借别人之口诬蔑党“犯了路线错误”，以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煽动。

五、李井泉公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之流开脱罪责，恶毒地煽动反对毛主席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反右倾运动中，批判斗争××时，××说：“彭德怀等只不过是议论了一下，就成了反党集团了。”××说，这句话是李井泉说的。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一口一个“彭老总”。庐山会议后，李井泉又散布这么一个反动言论，可见他早就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

一九六二年，李井泉刮起了“翻案风”，他拼命地替反党、反毛主席的×和地、富、反、坏、右翻案。在翻案中，他捏造了许多谎言，制造了种种借口，私设监狱把我和张西挺关押长达两年之久。李井泉在一九六三年八月，派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到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劝我同意替××翻案。他说：××那些问题，你们不要老坚持说什么反党、反毛主席。还恶毒地说：“对毛主席是怎么看，现在有许多新情况，你们不了解，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错误。”省监委副书记××也向王茂聚同志说：“××那些问题（指××反党、反毛主席的许多罪恶言行），我们认为不是错误，你如果认为是错误，你可以写信问毛主席。”李井泉让监委主

要负责人进行这样的“劝说”，不仅是为李井泉的反党言论辩护开脱，而且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宣传，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活动。

六、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串通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抛出了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他还别有用心地强调“甄别”问题，为替牛鬼蛇神翻案制造了许多荒谬的理论。他说，“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错误看法和错误言行的，只要没有背景，就不算错。”他还以总结工作为名，攻击三面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叫嚷什么：我们现在是这样总结，总结不够的以后还可以总结，十年二十年后可以再认识，就是将来我们死了，还会有人替我们总结的。他这里不是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为大“翻案”埋下伏笔吗？在他的煽动下，大刮起“翻案风”、“单干风”，一时乌云满天。

李井泉紧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发起的翻案，公开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一九六二年他专程赴宜宾，策划布置后，又亲自组织了兩股翻案力量。

一股由省公安厅厅长带领，到劳改农场、茶场、四类分子集中劳动的菜场以及两个劳改煤矿，以登记询问、个别谈话、座谈、调案审查等方式；发动劳改犯、现管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贪污分子等反攻倒算。

另一股由××X统帅，在地专机关以座谈会、个别谈话动员、批示翻案、调查审查、提供反攻倒算材料、打印反攻倒算材料等方式，发动四类分子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反攻倒算。

李井泉等所执行的翻案方针是：只要本人有申诉，组织上认为有必要，或者有其它人提出，就可以进行甄别（甄别二字应用作“翻案”）。他们的口号是：“甄别”以后，应该得到组织上重用提拔。

有翻案方针口号的鼓舞，又通过他们内外发动，五类分子的反动气焰异常嚣张，有的右派分子说：蒋介石不反攻大陆，我就不写申诉，蒋介石反攻大陆了，我就要写申诉（看，李井泉与蒋介石配合得多么密切，右派分子与李井泉配合得多么密切！）。有的右派分子公然拍桌子公开大骂积极分子。翻案加倒算，大批

革命同志遭受到种种的迫害和镇压。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批评了“翻案风”，强调了阶级斗争。李井泉竟然反对毛主席的指示，继续上下勾结串通，坚持翻案。他在传达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时，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私货，说什么对外斗争是地富反，对内斗争是刘结挺、张西挺。事实上，则是把对敌斗争转移在革命派头上。一九六三年还把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推行到江安县和宜宾县。

在宜宾的反革命复辟事件中，翻案涉及的案件达、几百件，直接遭受各种打击、迫害的革命同志达百人，受牵连的人数则更多。

李井泉之所以有恃无恐地进行反革命倒算是因为有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屏障，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依靠，有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和配合。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彭真等，一不准我到中央控告，二把我和张西挺等揭发李井泉的材料转给李井泉，三扣压宜宾革命同志给党中央和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信。他们从一九六二年起这样干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的一九六六年九月，仍然把我和张西挺、王茂聚、李良等上报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常委的材料扣在手里不予转报。一九六五年二月，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站在反革命立场上，串通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等批准了李井泉的修正主义报告——即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党籍的报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里所批准的，不是刘、张二人的党籍问题，而是批准了李井泉勾结敌人所干的全部翻案加倒算。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李井泉的亲密关系是很多人很早就知道的。平时李井泉在中央开会期间，每天晚上不是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家里，就是在××家里。李井泉在中央开会回四川传达会议精神时，常常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何说，如何讲。从李井泉的话里听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会外对他还有特别指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串通彭真等批准李井泉的报告，除了他们本来就有这种亲密的勾搭以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在××案件上直接牵连到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

时，××说：“跟着彭老总走不会错。”这句话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说的。李井泉起劲地替××翻案就是为了替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的反党言论翻案，从××的案件里抹掉这笔账，以便得到长期掩盖，以达到进行隐蔽反党活动的目的。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等批准李井泉的报告的秘密就在这里。

七、李井泉执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李井泉在南充搞“点”，那里的地富子女对李井泉寄予很大的希望。社教中，他们给李井泉写了一封信，要解决入党入团的问题。李井泉竟作为重大问题，加上批语印发全省。批示的大意是只要经过考验是可以入党的，说“重在表现”嘛！

李井泉在干部路线上也是如此，一九六五年大小会都传达讨论贯彻“重在表现”的干部路线，根本不强调和不讲阶级路线。

李井泉的“重在表现”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他是重在反党的表现。如：黑帮分子马识途，因为写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被李井泉提拔为省委委员、西南局的宣传部副部长。

反革命黑帮分子张黎群，恶毒地攻击和百般地咒骂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李井泉把他安排到绵阳地委任副书记。

有的阶级敌对分子和右派分子最恶毒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李井泉不但替他们翻案，而且都提到重要岗位上去了。

家庭和美国有关系，反革命分子的女婿×××，因为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攻倒算有功，而被提拔为省监委的兼职委员。

李井泉就是这样执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把翻了案的牛鬼蛇种，地、富、反、坏、右都作为他的基本力量，把许多坚持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干部一个一个地打下去。据我了解，李井泉迫害这样的干部是不少的。

八、李井泉与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勾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一九六六年三月，彭真到成都与李井泉、×××进行反革命的密谈。李井泉为了抬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的身份，拉着彭真与四川贫下中农代表一起照像。此像经印刷后发到各县、市、地委。宜宾地委还把他挂在地委会议室里。

李井泉为了扩散彭真的毒素，一九六六年四月，还布置大学反革命集团头子

彭真抛出的反革命《二月提纲》。

九、李井泉串通、勾结、网罗反革命修正主义力量，妄图把大西南作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大后方

多年来，李井泉、XXX等结成巩固联盟，发展宗派控制了西南局和省、市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是大叛徒×××安插在西南的钉子，深受李井泉赏识。一九六五年，李井泉便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位子让给他。从此，×××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置于领袖的地位。他经常讲：“李政委如何如何，一再教导我们。”对这种肉麻的吹捧，李井泉自以为得意。李井泉自己也常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居，说什么我也算个小国务院嘛。因此，他在中学读书的儿子也常以李井泉的话作为中央首长的指示压制革命学生。

南充是李井泉的常到之地，那里居然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像与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像并列挂在一起，李井泉的画像还高出毛主席画像一个头。李井泉泰然置之，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李井泉排斥异己，把既无能力又无干劲的亲信和旧人一个一个地都安排在重要岗位上，如协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贾启允镇压贵州文化大革命的×××是李井泉在晋绥的旧人，虽毫无能力，但也成了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协助李井泉镇压重庆文化大革命的×××，是李井泉从晋绥带来的老部下，越级提拔当了西南局的宣传部部长，散布大量毒素的四川日报总编辑XX也是李井泉的亲信；在贵州大刮翻案风，镇压贵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贾启允，因为是李井泉的老部下，就当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李井泉与黑帮祖师爷周扬也挂了线。如黑帮分子马识途，周扬称赞他，李井泉就马上重用他。任白戈是周扬的吹鼓手，李井泉提拔重用他在前，又包庇他在后。

李井泉为了勾结反革命集团头子彭真、黑帮分子×××，对彭真和××双方表示尊重，还常给他们送礼品。

李井泉上下串通，对党中央进行封锁。一九六三年八月，中央监委的一个同志在成都找我和张西挺谈话，李井泉害怕暴露了他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竟派公安厅一处的干部公开监视。这个同志对案件表示有某些疑义，认为不应该关押，

被李井泉和×××告到黑司令部那里。××为此无理地批评了这个同志。李井泉的追随者，在宜宾大张旗鼓地宣扬，对我和张西挺的案子，中央监委来的同志都受了批评，都作了检讨，以此炫耀他们的反党势力的雄厚。

李井泉与黑帮联系之密切，勾结之紧，从下面这份材料里也可以看出。

宜宾地委招待所长写的材料说(摘录)：

1、一九六五年十月份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等人悄悄地来到泸州(宜宾专区所管的泸州市)。当时有×××陪同。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些人来干什么？

2、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突然来宜宾，当时×××接待，住地专机关第一招待所，×××与之密谈，这其中有什么鬼？

3、一九六六年大约六、七月份，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李井泉等人突然到自贡，在自贡开了会。这些人来干什么？

4、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到了自贡。

5、一九六六年九月份省公安厅厅长突然来宜宾，住地专第二招待所。是专门来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是带有任务来的。他还去泸州了解情况。

6、一九六六年十月份，×××(副省长)突然来宜宾，×××等人接谈。

7、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也突然来宜，突然而去。

8、一九六六年十月份至十二月份前一段时间里，李井泉的女儿常来宜宾，×××亲自与她密谈。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宜宾是一个小地方，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如此多的“大头头”先后“光临”此地？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一九六六年九月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看来宜宾这个问题(指一九六二年搞翻案倒算)是李井泉的导火线。对了！宜宾问题如被揭发出来，李井泉的问题就包不住了，李井泉的问题包不住，当然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也就会暴露出来。李井泉这道防线如被摧毁，那么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个大西南的后方就存不住了。宜宾怪不得有这么多黑线上的人物往来，怪不得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关心李井泉派来捉我们(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李良等四人)的人的安全问题，害怕他们被北京的革命同志扣留下来，因而给他们通情

报，叫他们走，说如不走，安全有问题，问题就会闹大。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李井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个大黑帮分子，是镇压西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追击，穷追猛打，把李井泉批透、批臭，斗垮、斗倒！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张西挺的文章《愤怒声讨李井泉的滔天罪行》

首先，我要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一）

一九六二年，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一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合伙，猖狂地进行反华；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帮叫嚷要反攻大陆；国内的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妄图恢复他们已失去的“天堂”。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于 1962 年初抛出了他的放弃阶级斗争、反对毛主席思想的报告，为“翻案风”“单干风”制造了理论依据。“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就是从这个报告开始而猖獗一时的。

在这样的阶级斗争背景下，四川省宜宾地区发生了一个阶级敌人翻案、复辟、反攻倒算的反革命事件。在这个反革命事件中，翻案范围涉及地富反坏右及右倾机会主义等，翻案的案件达数百件，内容涉及到 1955 年的肃反、1957 年的反右斗争和 1959 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及镇反运动等。与此同时，大批革命左派则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从那时起，五年来宜宾地区笼罩着白色恐怖，实行着资产阶级专政。

在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李井泉把我和我的爱人刘结挺斗争了四年多，处理四次，关押两年，最后开除了党籍。1962 年 10 月我们两人一起被停职审查，次年三月一起被开除党籍，

一起释放出狱。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刘结挺又分别受到降七级和降八级的处分。

在这长达四年多的斗争中间，我们无数次地给党中央写材料，揭发李井泉等人的罪行。我们无数次地给中央写信，要求到北京去谈李井泉的重大问题，我们还给中央打过电报。但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把我们写给中央的材料，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李井泉。我们写给中央的信，他根本不理睬，给中央打的电报呢，他就回电说：刘结挺呀，不必来中央，有问题可向中央监委写材料。在这个回电之后，我和刘结挺就被秘密逮捕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六三年四月份，我和刘结挺正在按这个回电，写揭发材料的时候，有一天，刘结挺突然省委要找他去谈话的通知，说是两天就回来。刘结挺没有带任何东西，当天就离开了宜宾。到成都一下火车，就被两个彪形大汉挟持着，送进了等候在车站的汽车，拉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去关起来。他们把这种非法关押，美其名曰“对党负责，防止意外”。防止什么意外呢？刘结挺讲：“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外，如果有意外的话，那就是你们没有想到目前我仍然坚持要到中央去揭发你们的问题。”省监委的一位副书记就讲：“我们不是怕你这个意外。”刘结挺就说：“你不怕我这个意外就好哇！那就请你给我自由，让我到北京去，或者你们押送我到北京去！”他们对刘结挺要到中央去的正当要求，狼狈地答不出话来，只好拿中央不许去来堵他的嘴。

在非法关押刘结挺的第五天，我也被骗到成都关押起来了。和刘结挺一样，照例受到侮辱性的全身搜查。他们搜走了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和许多材料底稿。

（二）

我和刘结挺被骗到成都关押后，宜宾地区谣言随之四起。李井泉等也乘机造谣欺骗群众，说什么“刘结挺、张西挺住在省委招待所里，每天光吃好的，不干好事。”

我们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因为我们不是坐的普通监狱，而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私设的一个秘密监狱

我们进监狱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如何让外面的革命同志晓得我们被关押了，以便通过他们在外面的斗争把我们营救出来，或者由他们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把我们解救出来。这件事情没有办到。因为我们给外面写信，要经过三道关口检查：要经过看押我们的组长检查，要经过省监委检查，最后还要通过李井泉检查。信中话说得明白了，他们不给发；用隐语，自己人又看不懂。例如我给孩子写过一封信，我说：我在离开宜宾的时候带了几尺布票，本想给你买件衣服，现在我不好买了，由你自己买吧！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孩子，我已经没有自由了！我想孩子一定会把信交给宜宾的战友，可是他们没有看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李井泉会把我们秘密关押。第二件事，就是想办法搞清楚我们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不弄清这一点，我们心里很不落实。用什么办法呢？一个是听看管人员谈话，看能不能从谈话中听出来。很明显，看押我们的人是经过严格挑选或严格训练过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写信，了解回信的地点。我对看押我们的人讲：“我们两个人一起被关，事先对孩子未作任何安排，想给孩子写信，并希望得到孩子们的回信，不知回信该寄到哪里？”看押我们的组长回答说：“回信就寄到省委或省监委。”我说寄到省监委要转，很麻烦，是不是直接寄到这个地方？他说：“那不行，你嫌麻烦就不要寄！”第三个办法就是给孩子寄钱，我心想从邮局的回条上可以知道关押的地方。但是他们把钱拿到城里寄去了。邮局收条邮戳盖的是：“成都”两个字。李井泉所设的这个秘密监狱，不但对我们两个人保密，而且对群众也是保密的。

（三）

我们在那个地方被关了整整两年。后来了解，这就是成都西南郊红牌楼镇的那个派出所。但是那里的群众，不管是居民，或是机关干部、工人，没有一个晓得红牌楼的原派出所里曾经关过两个人，而且关押了长达两年之久。因为这里对外的名称是个“机关”，具体名称叫“成都市委工作组”。可是看押我们的人都是省公安厅的人，没有一个是成都市委的人。这和解放前重庆那个中美合作所有什么区别呢。

李井泉关押我们，为什么对内对外都这样保密？很明显，他这种秘密关押是想搞秘密杀害。为什么他又没有搞呢？这里面有个很偶然的情况，打破了他秘密杀害的计划。当时他们制造舆论准备杀害我们。例如说什么张西挺畏罪自杀了，

刘结挺又如何如何。他们正在制造舆论的时候，中央监委有个常委到成都来了解四清运动的情况。因为刘结挺给中央打过电报，要求到中央谈问题，因此这位常委顺便问起了这件事。李井泉就叫西南局监察处、省监委和审查刘结挺、张西挺专案组，向这位常委汇报所谓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这位常委到成都没有这个任务，但他想听一听另一方面的意见，几次要和我们谈。都被李井泉拒绝了。最后他要求和我们见一面，李井泉才被迫同意。但是见面的时间却安排在他的飞机票已买好，准备起飞前的那段时间里面。这一天，十几个人把我们两人押送到这位常委的住处。这里不仅门口有几个秘密岗哨，而且还公开派了一个干部作记录。我们进去以后，他很奇怪地说：“我找的是两个人，怎么来了三个人呢？”他还不晓得派了一个记录。当时我们向他提出来，要求单独谈情况，这个“记录”就被撵走了。“记录”被撵走后，我们首先向他谈的就是李井泉对我们的秘密关押，揭露秘密关押的目的就是想搞秘密杀害的阴谋。我们要求在没有开除我们党籍以前，给我们讲话的自由。我们还提出如果需要关押的话，就请他把我们带到中央去，关在北京。他听后同意把我们放出来，他说他向西南局、省委谈一谈。他跟西南局和省委谈后，西南局、省委不同意放人。他又要求放一个，问是否可以把刘结挺放出去呢？他们说：把刘结挺放出去他要杀人！他又问，是不是可以把张西挺放出去呢？女同志嘛，回去照顾照顾孩子，他们说也不行，把张西挺放出去，她要翻案。这样谈了以后，他们不但没有放我们出去，相反在监狱里对我们的监视更严了，对我们的咒骂声更是不断。而这位常委也因此被李井泉等人告到了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里去，受到了批评。就是这件意外的发生，打破了李井泉秘密杀人的计划。

关押我们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批准的，是李井泉亲自掌握情况决定的。李井泉把我和刘结挺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关押我们的地方戒备森严，围墙很高，四面有警卫把守。很小的一个院子，有十几盏电灯照得黑夜比白天还亮。十几个民警日夜监视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例如咳嗽一声，去厕所或去厕所的路上的片刻停留，他们都有记录。李井泉原来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安窃听器，据说研究了几次，最后说心安了。窃听器虽然心安了，却派了一个公安厅侦察处的技术科长和我们住在一起，搞什么技术鉴定。

(四)

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四川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牛鬼蛇神，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革命派，把四川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不仅私设监狱，而且还在监狱里施行一整套法西斯政策。我们在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过的是不折不扣的李井泉独立王国里的犯人生活。他们明明知道刘结挺患有严重的风湿性脊椎关节炎，却偏偏把他安排在一间非常潮湿的房子里。我住的房子有五个窗户却钉死了四个，只剩一个面向监视哨的小窗，屋里空气非常齷齪，夏天也不许打开另外的窗户。

关押期间，我们两人不许接近。我病了或者刘结挺病了，也不准我们互相照顾，互相看望。李井泉还采取断绝水源的办法来折磨我们。不管是冬天、夏天，每天除了给小半盆脸水外，其它任何水也不给。所以，我们在狱中两年没有洗过一次澡，没有洗过一次被子，连女同志卫生用水都不给。平时，我们只能接点雨水洗洗衣服。看守我们的人中有一个贫农的儿子，当他值班的时候，我找他要点水，他还是给的。他假装自己用水，提了半桶水放在我的门口，我趁别人不注意就把半桶水拿到屋里去用了。就这样两次，被他们发觉了，借故把这个同志斗争了两个月。他们还常常逼着我们吃已经烂了的臭肉来摧残我们的身体。我们不吃，他们骂：你们连肉都不吃，还要吃什么？有一天，刘结挺被逼吃了一盘烂肉，结果病了十几天。即使关在监狱里边，他们还不放心，经常进行突然检查和搜身，哪怕片纸只字也不放过。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材料被他们扣下多少我们不知道，因为在监狱里我们的材料被他们没收了几次。经过三道关口检查过的几岁孩子写的信也“不许毁坏”，他们要随时检查。他们还用资产阶级母爱和父子之情来折磨我们，妄图使我们念及儿女情长放弃阶级斗争。

有一天吃过晚饭，我突然看见我两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四岁多，一个五岁多）站在院子里。我很奇怪，就问“组长”：孩子怎么进来了？“组长”说：是上级叫来的，你叫他到屋里去嘛！我就把孩子牵到房子里来。孩子见了我不哭也不闹，连声“妈妈”也不喊。我问他们：“孩子，你们怎么来的？是哪一个送你们来的？”孩子们不说话。我说：“不认得妈妈啦？你们怎么不说话啊？”孩子张着两个大眼睛到处看，我说：“你们到处看什么呢？”孩子说：“我怕叔叔。”我说：“不要怕，妈妈在这儿。”大一点的孩子这是就哭起来了。不知道他们怎样

折磨孩子，在孩子进监狱的当天晚上就发高烧。孩子只在监狱里住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晚上九点多钟，孩子都已经睡了，突然接到通知：刘结挺、张西挺的孩子必须马上离开住地。我要求孩子病好了以后再走，他们说：“不行！”我说：“孩子病了，是不是明天再走？”他们说：“不行，必须马上离开住地！”没有办法，我就把孩子喊醒，给他们穿好衣服。大点的孩子听了不愿意走，最小的孩子叫爸爸妈妈跟他一块回家。这时候，面对这么小的孩子我说什么呢？我只好说：“不要哭。你们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吗？不是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吗？毛主席的好孩子在坏人面前是不哭的。你们看妈妈都不在坏人面前哭。”孩子讲：“我害怕，怕叔叔。”我说：“不要怕，没关系，他们不会整你们，你们都是孩子，如果他们整你们，毛主席知道了不会答应。”这时，孩子就不哭了。把孩子交给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我在电影里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当共产党员在监狱里坚贞不屈进行斗争的时候，敌人会突然把你的亲人推到你面前，妄图软化你的斗志，分散你的斗争精力。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堕落到这种程度。

他们还常常用死来威胁我们，经常对我们说一些无法捉摸的话，预示我们马上就有被杀害的可能，妄图使用这些手法来搅乱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能安静的写揭发材料，分散我们向他们斗争的精力。李井泉这个目的没有达到。我们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集中精力夜以继日地写材料，把我们要向当说的话，要向毛主席说的话，在没有被杀害以前全部写出来。李井泉为了骗口供，什么可耻的手段都使用了。1964年5月，他们用药物使我中毒，我头昏眼花，浑身痉挛，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的头发大部分脱落了，连续七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只靠点开水维持生命。正在这样的时刻，李井泉派省监委副书记带领十几个人乘机闯进牢房把我从床上拖下来，整整斗争了我三天。他们斗争我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监狱里面不断地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揭露他们勾结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罪行。他们说：“你们不是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说我们替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翻案吗？”我说：“是写过。”他们说：“你现在怎么认识？”我说：“我现在还这样认识。”他们就说：“那么就请你谈谈，替哪些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了？”一九六二年李井泉在四川大刮翻案风，仅在宜宾地区替地富反坏右翻案及涉及的案件就有三百余件，他们好象不知道似的。当时我举了两个案例之后说：“你们不仅替他们翻了案，而且还升了他们的官，还对过去反右派斗争中的骨干

分子进行倒算。替右派分子翻案，就是右派行为！”他们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因为药物中毒以后，我七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刘结挺就给他们写报告，要求把我送到医院里，他们就这样讲：“你不是要求住院吗？我们同意你住院，不过我们得把你的问题审查清楚，统一认识以后，才能住医院，不然的话就不行。”他们妄图用住院来换取口供，想在我临死之前，趁我神志不太清楚的时候，捞点稻草。可是，他们的阴谋又一次可耻地失败了。

在这个秘密监狱里，李井泉还常常使用资产阶级的政客手法，对我们打、拉、逼，软硬兼施。1963年9月份，李井泉派省监委书记找刘结挺谈判。那个监委书记对刘结挺说：“老刘啊，你不要老是扭着那个问题不放好不好？翻了就翻了，你不要管他，承认自己有什么缺点、错误就行了。”刘结挺讲：“不是我扭住问题不放，是你们非翻案不可嘛。”他又说“你老刘是个聪明人嘛，你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过去的都不算，重新来好不好？只要你和省委合作，保证不给处分，这话李政委早就说过了嘛！”当李井泉这个阴谋没有得逞的时候，他又派西南局监察组组长找我们谈。那个监察组长说：“你们不要再扯这些案子了，越扯越复杂。你们说真理在你们手里，这个问题就算真理在你们手里也难办得很啊！你们的档案有几十箱子，以后哪个去看呢？”刘结挺讲：“你们编造的材料再多，问题再复杂，但是用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来考察，再复杂的案件也能搞清楚的。”李井泉看软的不行，又派省监委副书记对刘结挺进行威胁：“你一定得按省委的决定检讨，不然的话，你想捞根稻草也办不到。”话里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杀害我们。

在革命同志之间挑拨离间，也是李井泉惯用的手法。他一方面叫王茂聚、郭林川和我们划清界限，揭露我们的所谓问题，一方面又找刘结挺谈话：“老刘啊，我看你相当孤立呀！你以为宜宾还有人支持你，其实，我看除了张西挺外再也没有人支持你了。”又说什么：“那十几个案子，根据我们了解并不都是你搞的，有些是王茂聚、**搞的.....。别人搞的你不要都担起来。我也当过第一书记嘛，很多事情我都不清楚嘛！特别是处理案子有专案人员，第一书记哪能管那么多。”刘结挺说：“即使不是我搞的，甚至也不是宜宾的案子，只要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要你们替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我就不能不管，我都要进行揭发。

（五）

在监狱中，李井泉对我们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但是他既骗不了我们，也没有压倒我们，相反，我们对他反党反毛主席的面目看得更清楚了，造他反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在监狱里，我们怀着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我们忍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种种折磨摧残。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写了许多检举和揭发的材料，揭发李井泉从一九六二年起，顽固地推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李井泉所散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露和控诉他们勾结阶级敌人大规模地替阶级敌人翻案，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滔天罪行。这场翻案反翻案，倒算反倒算，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在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面进行了两年。对敌人的阴谋和罪恶必须进行充分的揭露才能够在政治上压倒他。李井泉私设监狱关押我们已经是他的一条大罪状。他在监狱里对我们进行折磨和摧残，这是他的又一条大罪状。对李井泉这些罪状必须进行揭露，必须把它一桩桩、一件件记载下来，以便在我们被杀害之后，革命同志和他清算。“用什么办法才能保存李井泉这些罪状呢？用日记的形式可以记载下来，但不容易保存，因为他们可以毁掉它。那么用什么办法呢，我们想，通过给他写信这样一个合法的形式才能记载下他的罪状。于是我们就不断地给他写信。例如，为了揭露他让我们吃烂肉，我就给李井泉写信说，刘结挺因为吃了烂肉已经病了几天了，请“李政委”批准不要给我们吃这样的烂肉，给我们吃青菜白饭。我住的房子五个窗户不是给他们钉死了四个吗？我就给李井泉写信说：“李政委”，我住的房子五个窗子被他们钉死四个，只留下一个面向监视哨的窗子。女同志在里面活动不方便，这个窗子我不愿意打开。现在天气热了，请允许我多开一个窗户。或者拿这个窗户换另一个窗户。是否有当？请“李政委”批示。我离开宜宾的时候带了两瓶药，一瓶是眼药，一瓶是治疗肾脏炎的药。但都被他们搜走了。为了要这两瓶药，我给李井泉写了好几封信。本来一封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写几封呢？我有个想法，给他找点麻烦！我要眼药给他写封信，要治疗肾脏炎的药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要药要了半年都不给我，结果药都坏了，他们就告诉我药已经坏了，你不要再要了。以后，我又给李井泉写了一封信，说：就是坏药也请“李政委”批准发给我，因为我现在连坏药也没有吃的。他们不准我们两个接近，说是一个案子的不能接近。我们就给李井泉写信说：就是因为我们的

人是一个案子，究竟有没有错误，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在一起谈谈才行，不然的话，我们不好写检查。刘结挺离开宜宾时，只带了一把牙刷，一条毛巾，我离开宜宾时，连毛巾也没有带一条。我没有毛巾洗脸，就给李井泉写信，要求“李政委”批准我每天向刘结挺借洗脸毛巾。

总之，我们和李井泉保持“密切联系”，随时“请示报告”。一事一报，进行充分的揭露。写不写“综合报告”呢？写！在一九六五年放我们出来以后，我们给他写了一个“综合报告”。“报告”上讲：我们被放出来了，现在住在什么地方。过去在红牌楼，不管写信、吃饭等等，一切都有人具体管理。现在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应该和谁联系’由谁管理，我们不清楚。这些事情请“李政委”给明确一下。另外，我们给孩子写了一封信，过去这种信都是交给“工作组长”，检查了以后送到上面代发。现在这封信该交给谁检查呢？是不是送给“李政委”检查了以后请“李政委”代发呢？刘结挺还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两年没洗澡了，准备进城洗次澡，是否恰当，请“李政委”批示。我们还抓住他非法对我们逮捕、拘留这一点向他展开进攻。因为，他对我们关押没有拘留证，又没有逮捕证，这不能不是他的包袱。抓住这一点，我们又要求他准许我们到外面来活动。我们知道他不会答应，但这是斗争，也是揭露。布票发下来以后，我们就给他写信说：我们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发给了我们多少布票。既然发了布票，我们要求“李政委”批准我们出去买布。夏天来了，我们写信给李井泉要求出去做一件夏衣穿。“七一”来了，我们要求出去参加党的生日的庆祝，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国庆节来了，我们要求参加国庆活动，因为我们是普通的公民。国务院规定春节放假三天，我们写信给李井泉，要求他贯彻执行国务院的规定，放我们三天假……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后来给李井泉发觉了，就把处理这些问题的权力下放给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叫人来骂我们：“你们怎么经常给首长写信？你们写信还写什么[李政委亲启]，亲字下面还划个圈，好象很重要似的，其实就那些小事。比如打开窗户这种问题，你们跟我们讲一讲不就行了？”我说：“怕你们为难，给李政委批了，你们照办不就行了？”他说：“你们写封信，我们拿去给收发，收发要登记，登记了交省委办公厅，办公厅又交秘书室，秘书室再转交李政委秘书，李政委看了要批，李政委一批就成文件了。”我说：“用不着麻烦李政委，他可

以不批嘛。”他说：“就是李政委不批，只要写上[李政委已阅]几个字，这就成了省委文件了，就要作档案保存。你们都是做领导工作的，你们不懂啊？”我当时心想，就是懂得这个才这样干的啊。

李井泉把权力下放，我们不承认，我们只承认你这个李井泉领导，只看得起你李井泉。所以，我们不下放，我们有什么事还是直接向李井泉打报告，向李井泉请示，就是要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就是要扭着你不放，揭露到底。

(六)

五年来的迫害并没有把我们压垮，两年的秘密监狱生活我们也过来了。每当我们回忆这段斗争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斗争的紧张，也感到斗争的幸福和愉快。

我们出来以后，特别是到北京去以后，有的同志问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运动经验来看，当一股逆流冲来的时候，顶十天八天还可以，顶一个月两个月问题也不大，时间再长一点我们就怀疑所坚持的是不是正确，对斗争能否胜利就发生了怀疑。你们经历了那么长时间，整整五年，你们动摇过没有？你们对斗争的胜利发生过怀疑没有？是什么力量支持你们坚持了长达五年的斗争呢？两年的秘密监狱生活，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呢？

是的，当一股逆流冲来的时候，十天八天和二个月两个月是可以顶住的。坚持不懈地顶上几年，确实不容易。特别是李井泉的来头很大，他不仅控制着从宜宾市委到宜宾地委、四川省委、西南局这样一个四级组织，代表着“党”，而且他又是党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进行斗争，顶住这样一股长达五年之久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实在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坚持的不是什么小是小非的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我们没有动摇过，我们从来没有按照他的决定写过一个字的检查。

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我们进行长达五年之久的斗争呢？是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宜宾的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着我们，宜宾的历次政治运动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和我们心连心，我们的斗争并不孤立。从一九六二年起，宜宾的革命同志就常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揭露李井泉等人所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活动。从宜宾我们又想到全国，全国的革命同志也会支持我们斗争的。

在五年的斗争中，我们总是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时时回忆着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特别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反对翻案风。毛主席的教导，不仅给了我们斗争的勇气，而且给了我们斗争的智慧。李井泉等可以搜走我们的“毛选”，但是，太阳的光辉他是挡不住的。每当灿烂的阳光照进阴暗潮湿的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见到了毛主席。在寒冷的夜晚，我们仰望着北斗星，想念着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想到毛主席，我们就浑身是劲，想到毛主席，就增强了斗争的必胜信心。

对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我们作了充分估计。一个估计是，他可能杀害我们。这个估计并没有错。他们的确写了杀害我们的报告。只因为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有过指示，他们才不敢马上下毒手。从当时关押我们的情况来看，要么就是向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投降，和他们一起搞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一起替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这样，不但可以保命，而且可以保官，说不定还可以升官。要么，就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保卫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果，向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进行坚决斗争。这样就有杀头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下了这个决心后，刘结挺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好以后，就把抽屉打开，反贴在板子上，以便在我们被害之后，一旦有同志发现，就会交给我们的亲人毛主席。第二个估计，他可能判我们徒刑。当时我们估计可能判二十年徒刑。我们计算了一下，二十年出来以后，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有毛主席在，我们的斗争就一定会得到胜利。我在监狱里写的日记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状况的。这些日记早就被他们抄走了。抄走以后，他们从日记上摘抄了一些片断，安上了一个题目叫做：“反革命分子张西挺的罪恶记实”。红卫兵小将抄黑材料时抄到了这份材料，看了以后非常奇怪。他们说，这明明是一心向着党，向着毛主席的日记嘛，怎么叫“反革命罪恶记实”呢？然而，在李井泉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来，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谁反对党，反对毛主席，谁就是他的“好党员”、“好干部”。这就是李井泉对“反革命”和“好党员”的定义。下面是几段日记摘抄：

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

十多年来，党把我培养成人。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受过党的任何处分，

历次政治运动，党把我作为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使用。母亲养育我十三年，而党把我养育成人，党比母亲亲，党对我的恩情，我无法计算。亲爱的党啊！我永远不忘您的教导：记住阶级和阶级斗争，挺身和修正主义作斗争。

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

我们的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她不能允许牛鬼蛇神翻案，绝不能允许资本主义复辟。即使宜宾专区这么一个小地方，发现以后也会立即粉碎这种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在今天的中国永远不会得逞，革命同志有一天会揪出他们来的。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

国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九六二年配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的需要大搞翻案，终究要遭到可耻的下场。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当我看到《人民日报》公布苏联《真理报》捏造谣言攻击我们党的材料以后，写了一段日记。）

《真理报》为什么使用希特勒和戈培尔使用的伎俩呢？……出于一个原则，就是造谣重复三次，别人就会相信。怪不得这两年几十个“演唱家”到处演唱。（这里讲的“演唱家”是指李井泉专门组织搞我们的所谓专案组，他们编造材料，到处作报告，制造舆论。）他们是深深懂得这种伎俩的效果的。不过我相信谎言终究是要暴露的。在毛泽东时代，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必将被揭露。我们就是怀着这种信念，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热爱进行斗争的。虽然我们与世隔绝，见不到自己的同志，但是我们的斗争既不孤立也不盲目。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领导的国际原修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读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赫鲁晓夫下台等消息时，我们激动得夜里睡不着觉。当时我们想，大大小小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终究会被人民赶下台来，扔到垃圾堆里去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所写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篇文章，指导着国际反修斗争，也指导着我们和李井泉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在监狱里面的生活很紧张，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几百万字的揭发控诉材料，大部分就是在这个秘密监狱里写出来的。因此，两年的监狱生活，我们从来不感到寂寞，我们所感到的是斗争的幸福和愉快。当时我们想，李

井泉既然把我们“调”到这个地方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岗位，我们就要在这里和他斗争，就要在这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身体健康是坚持斗争的一个重要条件，要有能坚持斗争的身体，就必须加强体质的锻炼。一九六四年八月份，我们发现由于活动范围小，活动少，我们的腿部肌肉开始萎缩，走路不大方便，如果不采取措施锻炼身体，就无法坚持斗争。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从入党那天起就是属于党的，我们有责任把它锻炼好，和李井泉斗争是长期的，尤其需要一个能够坚持斗争的身体。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每天做二十分钟的腿部活动，做四十分钟的腿部体操，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列入到和李井泉斗争的议程。

(七)

一九六四年六月份，李井泉写出了他的修正主义的报告，就是关于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党籍的报告。在李井泉亲自主持改写的这个修正主义报告中，他不仅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我和刘结挺横加罪名，而且大肆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肆攻击三面红旗，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报告，竟然被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批准了。这就是批准了李井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对三面红旗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所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全部活动！这个报告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批准的。

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省监委向我们宣布。宣布以后就把我和刘结挺送到省委罗家碾招待所去了。在罗家碾招待所里面虽然有人监视、盯梢，但活动总算有点自由了。这个时候李井泉就大造舆论，说什么刘结挺的案子通了天了，一辈子也翻不了。甚至还捏造说，毛主席都说刘结挺、张西挺的案子是全国的典型。和我们一起斗争的个别同志听了这些消息后，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还有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们，不要再斗争了，胳膊总是扭不过大腿，刘结挺你这个小小的地委书记能斗过有权有势的李井泉吗？李井泉上面有上面的人，下面有下面的人，你不要再找麻烦了。还有的同志讲，你过去是个地委书记，属于中央管理的、现在你是一个普通的小干部，进一步给你一个什么处分，要杀要关那就不用报中央，他就处理了。还有的同志提醒我们：既然中央都批示下来了，那就不是李井泉的

问题了，你再告那就是告中央了。叫我们考虑考虑后果。甚至还有人劝我们，受点委屈算了，想不通吗，看看《修养》，就会想通的。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你争个什么嘛！有碗饭吃就行。你看你们的孩子四、五年没有跟你们在一块，你们要对孩子负责，不要丢下孩子什么都不管了。等等。我们把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作为斗争中的困难和不利条件加以考虑，但是我们决不能放弃斗争，决不能不相信党，决不能不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是批了，但我们对这种批有怀疑。当时想可能是一个什么书记批的，这个书记可能和彭德怀有关系。因为在我们的案子里突出反映了××的问题，而X×是拥护彭德怀的。我们想，决不会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更不会毛主席批的！几年来，我们坚持的不是小是小非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相信我们的斗争一定会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因此我们回答这些同志：“要告！一定要告！一直告到毛主席那里去！”

为了使毛主席了解四川问题，为了揭开四川阶级斗争的盖子，必须想办法离开四川。而李井泉紧紧地控制了我們，不让我们离开四川。于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就开始了。这个斗争是 1962 年斗争的继续，也是 1962 年斗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刚放出来不久，李井泉就分配我们工作，把我们分到万县专区一个县里。我们算了一下，从那个地方到北京要十天的时间，一动身，李井泉马上就晓得了，马上就可以抓回去。这样就可以给你加罪名，说你畏罪潜逃，甚至说你潜逃外国，判你的刑。所以我们就是不去，劝说不去，打也不去，就是不听你的摆布，不服从你的分配，不让你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牵着鼻子走。我们提出要求回北方工作。他们不准。我们就给中央组织部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被开除了党籍，但是我们没犯任何错误。我们是因为热爱毛主席、坚持毛主席的路线而被开除党籍的。我们要求把我们调到北方工作。这封信结果被转到李井泉那里去了。省委组织部就找我们谈话，说中央组织部长看过信了，要我们服从四川省委安排，在哪里犯错误就在那里改正嘛，我们不听从。这时，刘结挺接到他侄子一封信，说他哥哥病得很厉害，叫他回去看一看。刘结挺就去请。假，请假也不准。怎么办呢？最后我们提出回乡搞农业生产去，回到农村作一个普通的社员去。我们分别写了报告，又、合写了一个报告。李井泉就派省委书记处书记×××

找刘结挺谈话，他说：你的报告我看到了，你要劳动，你不革命啦？刘结挺听了发笑，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许多老红军，不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农业第一线参加劳动吗？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业第一线，这怎么叫不革命呢？你们想叫我们不革命是办不到的。二十三条上讲得很清楚，不能当干部的可以当员。”×××讲，“二十三条不适合你刘结挺。”刘结挺就开了他一个玩笑，说：“×书记，我看到中央只有二十三条，是不是还有二十四条说，以上二十三条不适合刘结挺？”这位书记说不出话来。在这一年多的斗争中间，我们没有向他们让步，没有接受他们的工作分配，而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妥协，也没有让我们离开四川。在这一年多中间，我们又通过各种途径给中央寄发了不少材料。

（八）

下面我谈一谈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六年十月，我们在北京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情况，以及毛主席、党中央对宜宾问题的关怀。

一九六六年六月，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公布后，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下定决心，冲破这个黑框框到北京去。我们商量后决定刘结挺先去，我留下来掩护。刘结挺走，就怕在半路上被抓回来，怎么办呢？我们就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写了封信，刘结挺自己带着。信的大意是：我到北京揭露李井泉的问题，不料在半路上被抓回去了。张西挺还在成都，宜宾还有很多革命同志，他们晓得李井泉的问题，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些同志调到北京。刘结挺带着这封信，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个夜晚，翻墙、越河离开了成都，在六月底第一次到了北京。刘结挺离开成都以后，忙坏了李井泉，他一方面派人对我进行了几次审讯。问我：“刘结挺到哪里去啦？”我说：“到中央去了。”问：“到中央干什么？”我说：“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呀，”“到中央哪里去呀，”我说：“到中央嘛！”他说：“中央单位多咧！到中央监委，还是中央组织部？到中央书记处，还是到中央文革？”我说：“那他没有说，他说他找毛主席去了！”他一方面用省委和公安厅的名义，打电报给党中央和公安部，要把刘结挺抓回去。省公安厅还用传真把刘结挺的像片传到公安部，要公安部寻找刘结挺。刘结挺在北京住了一个月，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写了两万多字材料，交给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这个接待室里有个组长，他看了材料后说，“这几年来，我们经常接到宜宾来的很多信，和你谈的差不多。

我们准备把这些材料和你写的材料汇总一下报告给中央领导同志。你是不是到中央监委谈一谈。”经过他的介绍，刘结挺到中央监委谈后，他们劝刘结挺回四川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也要刘结挺回四川，说材料已经转报给中央了，回去听后处理就行了。刘结挺要求找中央领导同志谈一谈，都遭到拒绝。正在这个时候，刘结挺听说江青同志经常到北大去，就到北大去找江青同志。但是没有找到。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公安部门查出了刘结挺的住址，勒令他在七月底以前立即离开北京。刘结挺在八月一日回到了成都。

(九)

刘结挺回成都后，我们一方面给李井泉等人写信，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特别要求回宜宾参加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我们写小字报给他，揭露他的问题，并且要求他转给毛主席。当然我们晓得他不会转，不转就是他扣押给毛主席的信，这又是一条罪状。大概因为我们要求到宜宾麻痹了他，或者因为北京红卫兵小将南下串连，对他们有威胁，他们对我们的监视不是那么很严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经常到城里去对付学生。这时，我们便决定一起走。八月二十五日一个大雨的夜晚，我们翻墙跑出来了。二十七日到了北京。在北京和宜宾的革命战友王茂聚、李良同志会合了。因为我们到北京揭发李井泉等人的问题，加上王茂聚、李良他们来北京以前写了揭发李井泉等的大字报，我和刘结挺写了揭发李井泉的小字报，李井泉等便把我们打成了“反革命”，打成了“刘张王郭反革命集团”。李井泉还故弄玄虚，把我和刘结挺的照片用传真传到北京和国防边境上，捉拿“越境逃犯”。我们四人住在一起，和那个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组长取得了联系。他对我们很热情，叫我们打破顾虑，把李井泉的问题全部揭发出来，并对我们说，据我们了解，李井泉的问题不少，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不把李井泉的问题揭发出来，以后就只好办了。我们四个人很受鼓舞，就连夜赶写材料，边写边送，边送边写。到九月中旬，我们就写出了五万多字的材料。那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组长了解到我们所写的材料基本告一段落后，态度马上变了。他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看了我们写的材料，叫我们要相信四川省委是革命的，李井泉是革命的。他还要我们把掌握的李井泉的原始材料都交给他，以便中央办公厅转交四川省委保存，说这些材料个人保存不安全等等。这个人的面貌完全暴露了。我们要求把我们所写的材料交给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

看，并请求这些同志接见我们一次。这个人怎么回答呢？他说：“接见不可能，他们忙得很。材料嘛，既已交给我了，给谁看，由我来安排。”他并下令限期要我们离开北京。

(十)

在我们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那个组长联系的这段时间里，李井泉布置他的忠实打手宜宾地委书记×××在宜宾、成都大造“刘张王郭反革命集团”的舆论，把他们捏造了五年多的谣言一古脑儿倒了出来。他还下令动员各级组织给中央书记处打加急电报，要求把我们送回四川。他们给中央书记处打电报的同时，还给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公安部以及中央文革打了电报。几天的电报费就用去将近一万元的样子。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我们还在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联系时，李井泉就派了二十八人的代表团到北京去捉我们。这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个是极右分子和一个劳改犯。这一天中午，同志们都休息了，我想出去买点东西，刚到门口就发现被包围了。我赶快退回来，叫刘结挺他们快点起来，想办法把材料转移出去。我和李良同志就往外冲，门上有十几个人把守着，冲不出去。我们就找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给他们说，他们不但不理，反而把招待所工作人员监视起来了。幸好有一个湖南的同志和我们住在一起，也是来上访的，我们就把材料交给了他，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一定要找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后，把信和材料交给毛主席。这个同志是革命的同志，革命同志心连心，他接受了我们的委托，还建议我们向北京的革命同志呼吁，要他们来支持，他主动表示要替我们去贴呼吁书。我们就赶快写了一个十二万分紧急呼吁书，呼吁书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在西南搞独立王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正当我们向党中央揭露他的问题的时候，他派了二十多个人来捉拿我们，这是破坏十六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行为，我们呼吁革命派声援我们，制止这一现行反革命活动。这个紧急呼吁在北京兵马司联合文革接待站贴出不久，就有几十个红卫兵小将和上访的革命同志赶到我们的住地，把那二十八个人赶跑了。但是这二十八个人并没有离开北京，他们在商业部招待所住了下来。第二天即九月九日，他们把带来的打印好的小字报和他们连夜写的大字报贴满了兵马司联合文革接待站。大字报、小字报中说什么“刘张王郭一贯反党”。反什么

党呢？那上面没有一条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事实，说的全是反李井泉的事。他们甚至把刘结挺不和李井泉握手。都作为“反党”的一条罪状写上去。说什么刘结挺傲慢，“李政委’伸手去和刘结挺握手，刘结挺把帽子一拿就走了，等等。我们也要贴大字报，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对我们横加阻拦，说什么“你们都是作过领导工作的，应该懂得解决你们的问题要靠组织，而不是靠群众，不应把这个问题提到群众面前”。我们不答应。他就威胁我们说：“现在每天有几十万学生到北京，象李井泉这样的大字报一贴出去，不到两个钟头就传遍全城，就会引起大辩论，如果引起大辩论，一切后果由你们负！”但是我们没有被吓倒。在革命同志的帮助下，在九月十日我们贴出了十二张大字报，揭露了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罪行。大字报贴出后很受革命同志的欢迎，尤其是四川学生，很快就把大字报抄回四川张贴。而李井泉派来的人写的大字报则受到革命群众的指责。革命群众质问他们：“反对李井泉怎么叫做反党？李井泉就代表党吗？”革命小将质问他们：十六条公布后，来北京抓人，对吗？他们非常狼狈。同时，住在商业部招待所的上访的革命群众酝酿斗争他们，计划斗争后把“代表团”团长和那个右派、劳改犯扣下来，其余的撵出北京。斗争会安排在九月十二日。不料在九月十一日夜晚，有人叫他们“代表团”全体成员第二天到中南海去。第二天一早他们到了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有两个人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安全表示非常关怀，劝他们离开北京。并透露说：“你们的安全已经有问题，再过两天就不行了。这个事情某某某(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晓得了，希望你们赶快走。再不赶快走，问题就要在北京闹大了！”这样就在当天把他们掩护走了。由于这样掩护了一下，宜宾的文化大革命至少推迟了一个月。如果把他们扣下来，那对宜宾革命造反派的鼓舞就大了，他们很快就会行动起来。

这以后我们就中断了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宾的那个组长的联系。我们觉得原住处也不能呆了，因为有危险。到哪里去呢？当时北航《红旗》；北地《东方红》及清华《井冈山》等革命造反组织还处于困难时期，新北大的形势还比较好，我们就决定到北大找聂元梓同志，没有找到，只找到联络站。联络站的同志说不好安排住宿，因为我们不是学生。叫我们到北京市委开个介绍信，才好安排住处。但是到北京市委，他们不给办。后来，经过一位上访同志介绍，到联合接待站去登记，联合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还分配一个接待员和我们接谈。

这个接待员第一次跟我们交谈就向我们发脾气，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来搞翻案的。我们明明是来揭发李井泉的，怎么说我们是来搞翻案的呢？双方谈不下去了，他便要材料，说看了以后再确定时间谈。我们给了他一份材料，请他转送给江青同志。于是，他走了。后来了解，这个人原来和李井泉派到北京去做情报工作的一个联络员有密切联系。

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正以各种途径寻找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商业部进驻了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里有一个人经常来找我们“聊天”，说什么你们怎么还不回去？该回去了吧？在北京住着不是个法子，等等。有一次他干脆对我们进行威胁：“你们住在这里群众有反映，你们都有工作岗位，住在这里不工作，不搞文化大革命还行啊！”又对王茂聚同志说：“你是个地委副书记吧。还是个当权派，你应回四川受群众监督，接受考验嘛！”又对我们说：“刘结挺、张西挺，你们都是开除党籍的，是不是？开除了党籍应该找中央监委嘛！找我们干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开除了党籍，但是我们从来不谈个人党籍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李井泉的问题。”我们把李井泉的问题大体给他谈了一下，他听人说：“不会吧，李井泉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了解他嘛！”原来这个人过去是李井泉的老部下。通过这些事情，我们晓得李井泉的黑手已经从四川伸到北京来了。他派他的警卫员在北京建立了反革命组织“红旗军”，而且还通过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控制我们。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经常受到检查，也无法找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后来，成都地质学院有五百多人到北京告状，告他们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们便和他们联系，告诉他们，只有先打倒西南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学院党委书记的问题才好解决。他们材料不多，我们就供给材料。不久，听说周总理要接见他们，我们便请他们带几份材料给周总理。不料到接见那天，周总理没去，材料交到××的手里去了。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写给毛主席的材料，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材料，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最后都落到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去了。没有一件送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手里。

（十一）

十月三日，三司开了个大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都出席了大会，并且讲了话。这时，我们才知道北京有个第三司令部。在这个大会上，北

航《红旗》谈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们学习了这个发言，认为这个发言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于是，我们认定了北航《红旗》是一个革命的左派组织，并想法和他们联系。我们找到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同志，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对我们谈的问题很重视，也很支持我们的行动。这样，在十月十一日，我们便把材料交给他们。十月十七日，王力同志就接见了我们。我们终于找到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欣喜若狂。十月二十日，王力和关锋同志一起接见我们。十月三十日，周总理又接见了我们。十二月三十日，王力同志告诉我们有关四川的情况，并叫我们回四川和工人、学生一起闹革命。于是在今年一月份，刘结挺、王茂聚和李良便回四川了，我留在北京整理和印刷李井泉的材料。

(十二)

今年二月份，四川出现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我们又重新被打成了“反革命”。刘结挺被打成“反革命头头”。说刘结挺不仅控制了宜宾，而且控制了大西南。凡和刘结挺、王茂聚联系过的造反组织和个人都受到追查和斗争。他们还抄我们的家，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小孩换洗的衣服、被子、鞋袜都抄走了。在这次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造反派组织几乎全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造反派的头头，无论大小全都被抓，造反派的战士一个一个被斗争受迫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被斗争过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一个都跑出来了，他们大叫解放了，有的在背后出谋划策，镇压造反派，有的赤膊上阵，指挥抓人。他们还控制外地来串连的学生，特别是北京的学生，以及首都来的记者，封锁消息。有的到北京去，在车上就被抓回送进监狱。这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特点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保守派组织，动用专政工具，对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大镇压、大逮捕。这时，刘结挺、王茂聚等在成都不能呆了，便在二月底离开成都，到了北京。他们刚离开成都，便有人去抓他们，晚走一点就不能脱身。我一直住在北京，但他们又把我打成“反革命”，并派了三个人带着手铐到北京抓我，但未得逞。

(十三)

刘结挺等来北京后，就把成都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情况向中央文革作了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接见了我们，肯定了宜宾革命同志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和李井泉等人进行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全国两条路线斗争在宜宾

的一个典型反映。决定召开会议，以解决宜宾问题。揭开四川阶级斗争的盖子。并给我们平了反。这一切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鼓舞。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宜宾问题斗争的胜利充分地证明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可以实一些同志受到迫害，斗争中虽有某些困难和曲折，但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终一定取得彻底的胜利，宜宾问题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是今后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这个教导千真万确，宜宾当前的情况正是如此。造反派的同志在毛主席和中央关怀下，从监里放出来了，但是回到本单位又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抓去斗争，被限制自由，单位上不发给工资，使这些同志的家庭生活发生极大的困难。他们还威胁革命造反派“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中央对宜宾问题的平反，他们扬言不承认，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还在作垂死的挣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轻易放弃他们这个西南大后方的。而宜宾这个地方，李井泉是这样说的：“西南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而宜宾则是关键的关键。”关键他们是要抓的，关键的关键他们更要抓。他们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地方的。所以，我们今后的斗争任务仍很艰巨。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团结在一起，继续斗争，彻底粉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大西南！我们一定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黑《修养》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把西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斗垮，斗倒，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贵州报》文章《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访问记》

川西平原红旗招展，长江两岸凯歌高奏！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在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为首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走访了成都军区副政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同志和筹备小组成员张西挺同志。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是原四川省宜宾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委书记。一九六二年以来，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西南地区“土皇帝”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们分别写的《李井泉是西南的赫鲁晓夫》和《愤怒声讨李井泉的滔天罪行》的文章，在《新贵州报》上发表和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后，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祖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纷纷来稿来信，说看了这两篇革命文章，是上了“一次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课”，给他们“增添了很大的勇气和力量”，表示“一定要好好向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学习，做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战士。”

同时，广大读者也很希望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宜宾问题的斗争，是全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典型？李井泉之流为什么特别害怕宜宾问题这个缺口被突破？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为什么能够坚持这样长期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是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等等。我们根据读者的这些要求，从贵阳到成都，从成都到宜宾，访问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他们的战友以及红卫兵革命小将。他们在百忙中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回答了读者提出的问题。

（一）

“忆往昔峥嵘岁月调”

一九六二年，宜宾地区风云突变，一时乌云翻滚，掀起阵阵黑风——

地富反坏右分子从劳改场所跑到城里，住进招待所，出没于地市委机关，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地叫嚣：“现在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我们要翻案写材料了。”

在我们的专政机关里，一小撮混蛋竟公然和四类分子开座谈会，胡说什么”

你们的案件是谁处理的？谁批准的？有意见都可以提！”

看！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何等的嚣张！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是何等的猖獗！这是一幅多么严重的阶级斗争画图啊！反革命复辟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谈到这里时，愤慨地说：“那个时候呀，硬是右派翻天，资产阶级专政，宜宾已经改变颜色了。”

水有源，树有根。宜宾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绝不是孤立的，它是全国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反映。

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神圣同盟”，更加疯狂地掀起了反华反共反人民的逆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余部的那班家伙们，以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已到，便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牛鬼蛇神，大造反革命舆论，大刮“翻案风”，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命部在大西南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同伙和他的黑后台一唱一和，大刮特刮“翻案风”，策动了自上而下的全面的反革命复辟活动。郭一案件就是李井泉替阶级敌人翻案的集中、露骨的表现。

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党的庐山会议以后，宜宾地专机关革命的党员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出混进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郭一。可是，时隔二年半后，当资产阶级司命部的总头目公然替彭德怀反党集团翻案时，李井泉同中国的赫鲁晓夫密锣紧鼓，亲自登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郭一涂脂抹粉，赞美他是什么“好党员、好干部”。

被李井泉吹捧为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的郭一是什么货色呢？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在一九五六年肃反运动中，公然包庇反革命分子，并恶毒地攻击、诬蔑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在一九五九年底中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党内传达后，他公开跳出来与毛主席和党中央大唱对台戏，同意并赞扬彭德怀的《意见书》，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喊冤叫屈，并且明目张胆地散布什么“跟着彭老总走没有错”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造谣言，放暗箭，胡说“共产党就是厉害，

说你这个人好就是好得很，说你这个人有问题，把材料一整就够了。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大肆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借机攻击总路线“要多快就不能好省。”

李井泉那样狂热地吹捧郭一，郭一又那样卖劲地为彭德怀喊冤叫屈，说明他们是一根黑藤上的瓜，是一路货色！郭一正是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货真价实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李井泉之流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就是否定庐山会议的伟大功绩，反对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为了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庐山会议上反右倾斗争的成果，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要坚决与李井泉、郭一之流斗争到底！”

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下定决心要与李井泉、郭一之流斗争到底。他们一方面赶写控告材料，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李井泉替阶级敌人翻案的反革命罪行；另一方面，再次以地委的名义，向省委写报告，提出了对郭一案件的处理意见。

李井泉施展了一系列的反革命伎俩。他将宜宾地委的“报告”原封不动地退回，并强令“重新讨论”，更恶劣的是李井泉竟然利用他窃踞的职权就在这时给郭一提级、升官。

李井泉耍出的这一系列反革命伎俩，大大激怒了宜宾地区的广大革命干部。大家认识到，这已不只是什么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了，而是一场尖锐、复杂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大搏斗。

不出所料，一场怵目惊心的事件爆发了。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九日，在宜宾地委常委会上。当讨论到郭一案件时，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李井泉打出的所谓“重新讨论”招牌，其实质就是要替郭一之流翻案，这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会议决定维持原议。这下，郭一便歇斯底里大发作，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下毒手殴打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这就是震惊宜宾地区的“八·一九”流血事件。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坚贞不屈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在炽热的阶级斗争中愈战愈强了。他们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他们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

下定决立下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谁替阶级敌人翻案，就和他决一死战！

狼，终究还是狼。狼子野心的李井泉，紧密配合着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刮起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妖风，以百倍的疯狂和卑鄙手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了全面的进攻。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不但把反右倾斗争的伟大成果一风吹，而且还进一步把翻案范围扩展到反右派斗争，扩展到肃反运动。

无限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干部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彻底戳穿了李井泉之流妄图全盘否定历次伟大政治运动的阴谋诡计。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制订下的政策、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的，成绩伟大，好得很！好得很！李井泉之流替阶级敌人翻案，否定历次政治运动，就是把矛头指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于是，这场阶级斗争，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了。

李井泉为了替李鹏等右派分子翻案，提出了一个反动透顶的理论：“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

“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逻辑又是什么？！这不是中外赫鲁晓夫之流的修正主义理论又是什么？！这句话彻底暴露了李井泉的反革命丑恶嘴脸！

但是，阴险毒辣的李井泉，竟然把“罪名”强加于人，说什么李鹏是被刘结挺、张西挺利用运动“打击陷害”的。

看！李井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何等程度！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宜宾地专机关许多革命干部，人人义愤填膺，肺都气炸了。

怎么办？刘结挺、张西挺和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同志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判断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他们根据毛主席指出的“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路和党的领导两条”的教导，反复研究了李鹏案件，坚定地认为过去处理李鹏，没错，完全符合毛主席指示的鉴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李井泉要为，右派翻案，坚决顶住！

就是这样，从反右倾运动到反右派斗争，从郭一案件到李鹏案件，李井泉采

取各种卑鄙的手段，拼命地替阶级敌人翻呀！翻呀！前后翻了上百个案件。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激动地对我们说：“通过郭一、李鹏等案件与李井泉展开的一系列斗争，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李井泉的反革命丑恶嘴脸，认清了他的本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霹雳一声震天响，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英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陈济民、李良、田禾等同志听到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后，兴奋得雀跃狂跳，奔走相告，情不自禁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们还立即通知在成都治病的刘结挺同志赶回宜宾。战友们久别重逢，集聚在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家里，兴高彩烈地畅：

“毛主席的指示，句句是真理！毛主席的号召，字字说在我们心坎上！”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伟大战斗号召给我们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您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

“我们一定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坚决与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斗争到底！”

“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属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

大家齐声朗读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举国上下欢呼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的时候，李井泉之流对公报的发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凭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预感到“李氏王朝”的日子越来越不好了。他绝望，他挣扎，变本加厉地、不择手段地对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进行打击、陷害、斗争。公报九月底发表，十月二十三日就宣布对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停职审查”；非法剥夺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对他们开展大规模的“揭发、批判、清理”；甚至违反党纪国法，限制人身自由，无理进行抄家；到十二月，竟公开派人监视、盯梢……。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里压迫越厉害，那里反抗越强烈。在那乌云笼罩着天空的艰苦斗争中，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

且是能够打败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他们抱病夜以继日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赶写了一份关于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宜宾大搞反革命复辟的罪恶材料，一针见血地指出李井泉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地富反坏右在党内的代理人”。

在五年以前，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就能认识到李井泉这个“庞然大物”的反动本质，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啊！他们不愧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不愧是党和毛主席的好干部！

（二）

毛主席说“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对刘结挺、张西挺进行了种种打击、陷害还不满足，竟在一九六三年四月以“省委找去谈话”为借口，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骗到成都关进秘密监狱。

“李井泉把我们抓起来，想达到几个目的”，张西挺同志指出：“第一，割断我们和毛主席、党中央的联系，第二，割断我们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联系，特别是把我们和王茂聚、郭林川等战友分开，妄图各个击破；第三，通过关押我们，把宜宾革命派压下去，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扫除障碍；第四，一旦时机到来就进行杀害。因此，关押我们的地方非常秘密，在狱中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被关在什么地方，附近群众也不知道这里关着人。因为比较秘密，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为了逃避革命群众斗争，还把这座监狱改作他的‘避风港’，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张西挺同志接着说：“关我们的时候，戒备森严，很小的一个院子，有十几盏电灯，照得夜间比白天还亮。十几个人日夜监视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连咳嗽一声，去厕所或在去厕所路上的片刻停留，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关我的房子有五个窗户，被钉死了四个，只剩下一个面向监视哨的小窗，屋里空气非常齷齪。刘结挺患有严重的风湿脊椎性关节炎，他们是知道的，却偏偏把他关在一间非常潮湿的房子里。……”

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并没有被李井泉的反动气焰所吓倒，相反，敌人的疯狂镇压使他们更加坚定。他们把阴森的监狱当作战斗岗位。

李井泉妄图割断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联系，这是痴心妄想！毛主席的好战士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从入狱的第一天起，就夜以继日地向毛主席、党中央写揭发李井泉罪行的材料，每天写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深信自己的斗争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狱中写作条件极端困难。缺少纸，刘结挺同志就把香烟盒翻过来写。有一次，看管他们的“组长”的孩子在院坝拉屎，用几大张纸擦屁股，张西挺同志就把他擦第二次的纸拾起来写材料。晚上，关押他们的房间里，只有一盏二十五瓦的电灯，还是装在天花板上的，又昏又暗，和室外照得通明的警戒灯形成鲜明对比。但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灯光暗算得了什么，照样写！

凭着忠于毛主席的赤诚之心，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两年写的揭发、控诉李井泉罪行的材料有两百万字左右。两百万字啊！请同志们算一算，如果广播，整整要八天八夜才能播完。如果登报，整张报纸都登它，要连续登五十天才能登完。

这些材料，深刻地、系统地揭发、批判了李井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发、控诉了李井泉为地富反坏右翻案，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每一个字都是一颗射向李井泉的子弹，每一句话都是一把投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手榴弹。

对这些揭发、控诉材料，李井泉之流害怕得要死，根本不许他们往外寄、更不许直接寄给毛主席、党中央，每个字都要经过看押他们的小组、省委监委、甚至李井泉检查，层层检查，材料也层层被扣下来了。但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并没有停止斗争，你今天扣，我明天写，你扣下来不往上转就增加你一条“扣压给毛主席的信”的罪状，总有一天要新账、老账一齐算。

当然，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对所写的材料，也根据斗争需要作了多种准备。刘结挺同志说：“李井泉这样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防他几手。”当时，他们曾经估计，李井泉可能杀害他们，这个估计并没有错。李井泉之流确实写了杀害他们的报告，只因为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有过指示，才不敢马上下毒手。但是，他们仍然作了牺牲的准备。刘结挺同志曾经专门写了两封给毛主席的信，一封带在身上，准备在被杀害时，把它丢在刑场上，他说：“我相信执刑的人不是铁板一块，忠于毛主席的同志看到这

封信，一定会交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和李井泉的斗争仍然可以取得胜利！”另一封信，反贴在抽屉的板子上，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交给毛主席，李井泉的罪恶终久会得到清算。

狱中斗争是多方面的。李井泉为了软化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分散他们的斗争精力，曾经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最小的两个孩子送到狱中住了两天。但在阴谋未得逞时，就在半夜下令把已经睡熟、正在发高烧的两个孩子抢走。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在孩子身上还有一场斗争。五岁多的女孩岷沙，一到张西挺身边，就急急忙忙地把裤带解下来递给她，她仔细一摸，从带子中摸出一张纸条。这是十二岁的大女儿写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看完条子，就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李井泉之流发觉这张条子没有？孩子只穿了一个背心，一条短裤，这种条子是很容易被惯作特务工作的李井泉的爪牙发觉的。如果发觉了，为什么又留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据当事人揭发，他们很早就从孩子身上搜出了条子，估计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会用同样的办法和狱外战友联系，让它带进狱中，是为了抓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反党新罪证”。但是，李井泉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识破了这个阴谋。同时，他们也没有失掉这个和狱外战友联系的机会。他们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大女儿，作为回信，叫看管小组转。这封信被扣下来了，但也起了麻痹敌人的作用。张西挺同志把另一封信（实际上是一张小条子）精细地缝在岷沙的鞋袜里。这封信是给宜宾战友王茂聚、郭林川等同志的，只有一句话：“只要坚持斗争，就能取得胜利。希望注意身体。”岷沙到了宜宾，急忙找到郭林川同志，把鞋子脱下来给他。这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两年里送出去的唯一没有受到检查的信，也是直接写给战友的、对方亲自收到的唯一的信。这封信把狱中狱外战友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造反更知北京近，斗争倍觉毛主席亲”。这是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同体。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被李井泉关进秘密监狱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更是时时刻刻想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张西挺同志说：“李井泉之流可以搜走我们的毛主席著作，但是，太阳的光辉是挡不住的，我们想念毛主席的心情是隔不断的。每当灿烂的阳光照进阴暗潮湿的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见到了毛主席。在寒冷的夜晚，我们仰望着北斗星，想念着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想到毛主席，我们就浑身是劲，想到毛主席，我们就增加了斗争的必胜信心。”所以，尽管他们

在监狱里受到种种折磨和摧残，仍然那样乐观，那样信心百倍。当他们从看管人员的收音机里听到电台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派人来》这些革命歌曲时，也忘记了自己是四十岁左右的、平时又很少唱歌的人，兴奋得象小学生一样，跟着收音机一句一句的学，千遍万遍地放声歌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刘结挺同志说：“我们一唱这首歌，心里感到无限幸福，好象就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正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乘风破浪前进！”

有一次，凌晨四点多钟，刘结挺同志突然从床上摔下地来。原来，他又在梦中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入狱以后，他们已经不知有多少次在梦中见到毛主席了。这一次，刘结挺同志又梦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伸出巨大而温暖的手要和他握手，他赶忙迎上前去……。他从地上起来，还久久地回味着这幸福的时刻，激动得流下了兴奋的热泪。带着这种深厚的感情，他动笔写了想念毛主席的长诗《向往北京》。可恶的是，李井泉却把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句当作反党材料。李井泉罪该万死！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唯一的学习材料，是一份经过多次斗争才准订阅的《人民日报》。这份党中央的机关报，每天给他们带来了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舌，鼓舞着他们前进再前进。《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所写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篇文章，指导着国际反修斗争，也指导着他们和李井泉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特别是报上刊登的每一幅毛主席的照片，每一则报道毛主席的活动的消息，每一次毛主席的讲话，他们都反复学反复看，越学越看越亲切。

一九六四年元旦的报上，发表了毛主席的十首诗词，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欣喜若狂，读啊，背啊，联系狱内狱外、国内国外阶级斗争形势推敲啊，领会啊，从中吸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在那阴暗的监狱里，不时传来洪亮、有力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朗读毛主席诗词，听：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这不正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之流的写照吗？！

“蚍蜉撼树谈何易。”

李井泉及其后台和爪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不正是蚍蜉撼树吗？！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决心在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湖震荡风雷激”的时代，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扫除一切害人虫”，“敢教日月换新天”，攀登无限风光的险峰！

（三）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对李井泉之流的斗争，不是小是小非问题，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从斗争一开始，就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他们并肩战斗，和他们一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刘结挺同志说：“我们从来没有感到孤立过。就是在两年关押期中！也有许许多多战友在狱外坚持战斗。他们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我们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大规模地给地富反坏右翻案时，宜宾地区的党政财文大权就被李井泉的爪牙篡夺了，整个宜宾一片白色恐怖。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写的揭发、控诉材料是寄不出去的。有一次，张西挺同志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询问那一段时期先后寄给中央的十几份揭发李井泉的材料收到没有。不久，在斗争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时候，李井泉之流竟把这封信拿出来，作为他们的又一“反党”罪证。

宜宾寄不出信件，许多革命同志就冒着危险，把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写的揭发材料带到自贡、内江、泸州等地去寄。有一份揭发材料，是由刘结挺同志的警卫员的一个亲戚坐火车带到内江，然后步行了十几里路，在一个小场上寄交的。另一份揭发材料，是张西挺同志的母亲在被抄家时急中生智，把材料缠在腰上带出来，交给一个同志带出宜宾寄出的。

象这样的事，不是一件两件，不是一人两人。还有许多同志，不仅帮助他们寄信，还直接向中央控告李井泉。据张西挺同志回忆，在一九六二年以后的白色恐怖时间里，先后给他们带信到外地去寄的达二三十人。这些人中，有干部、工人、公社社员、学生、街道居民，有相识的，也有不相识的，是捍卫毛主席革命

路线的共同决心和坚决打倒李井泉的共同意志，使革命同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一九六四年夏天，李井泉之流用药物使狱中的张西挺同志中毒，头昏眼花，周身痉挛，在短时期内头发大部分脱落，连续七天没有吃东西。李井泉乘人之危，派了省委监委副书记带了十几个人闯进牢房，把张西挺同志拉下来斗争了三天，企图在她神志不清的时候骗取他们需要的口供。经过刘结挺同志的多次抗议，李井泉才不得不把张西挺同志送入医院，而她在医院里的一切行动都有人监视

从宜宾到成都学习的一个护士长，在医院里偶然发现了张西挺同志，她十分关心张西挺同志的病情，但很快就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觉了，不许她再进张西挺的病房。一天，护士长训练班的学员集体查病房，她借给张西挺同志掖被子的机会，摆脱监视，把一张早已写好的纸条送到张西挺同志手中。上面写道：“我们相信你和刘结挺不是坏人，我们心里明白。宜宾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支持你们。一定要把身体搞好。你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给你送来。”在那乌云压城的日子，在李井泉欲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时刻，在层层监视下的医院里，出现这样的信，这是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多么难忘的战斗友谊啊！张西挺同志现在谈到这件事还很激动，她说：“只有在艰苦斗争中才能体会这种阶级感情的重量。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条，它代表千千万万革命人民和李井泉斗争到底的决心。”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以及和和他们并肩战斗的许多同志，更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场较长期的斗争，要作好各种准备。特别是在李井泉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秘密关押起来以后，大家认为斗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个更加激烈的阶段。狱外的王茂聚、郭林川、田禾、陈济民、李良等同志商量，决定作斗争十年到二十年的准备，这一代斗不完，下一代接着干！直到彻底取得胜利为止。

为了适应长期斗争的需要，大家决定要很好地整理揭发材料，妥善地保存原始材料，并在生活上节衣缩食，把钱积聚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王茂聚同志和爱人每月的收入不少，从这时起，他们就把大部分工资存入银行，一家六口每月生活费控制在四十元左右。连王茂聚同志抽了许多年的香烟也戒了。他说：“这是斗争的需要！”

王学明同志一家老小十口，每月收入只有八十多元，本来开支就比较紧，但他们把生活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到文化革命开展时，在银行已存了三百多元，他说：“为了国家不变颜色，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生活苦一点算什么！”

象这样的同志，在宜宾有一大批。去年八月，当王茂聚同志把历年节衣缩食的存款两千元从银行取出来，到北京告状时，把宜宾地委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吓得要死，马上通知银行，冻结了和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等人有联系的七十多人的存款，不许这些同志提取，并诬蔑说这是“反革命活动经费”。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活动经费”，是真真实实的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

李井泉之流为了维护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卑劣的伎俩都能够使出来，他们的面孔千变万化，手段阴险毒辣，但在革命者面前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刚入狱，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书记就找生病住院的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谈话，动员他们“起义”，揭发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同志大怒，指着这个家伙的鼻子大骂。“你叫我出卖同志，办不到！”不久，省委监委一个副书记也找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谈话，更露骨地对他们说：“把问题推到刘结挺身上，也不是个人主义。”多么无耻。当然，他遭到的是严厉驳斥。刘、张、王、郭这个战斗的集体不仅没有被分化瓦解，反而在斗争的风暴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准了李井泉关于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党籍的报告。李井泉抓住这个机会大造舆论，说刘结挺、张西挺的案子通了天了，一辈子也翻不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定这个案子是中央书记处中和彭德怀有关系的人批的，绝不会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更不会是以毛主席亲自批的，因此，他们的态度很鲜明：要告！一要告！告到毛主席那里去。

宜宾的战友对这一问题又是什么态度呢？王茂聚、郭林川、田禾、陈济民、李良等同志反复作了研究，也得出结论：绝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坚决和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共同斗争到底！

那时候，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宜宾的战友已经两年多没有见面了，为了共商下一步斗争大计，住在医院里的王茂聚同志以到成都检查病情为名，设法找到了刘结挺同志。当时，李井泉不仅开除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党籍，还分别降

了七级、八级，调刘结挺同志到一个边远县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对待这些问题，两个老战友认为必须坚决抵制，决不领工资、不去报到，否则就等于承认了李井泉的处理。再说，到了边远地区后，李井泉更容易控制，到北京找毛主席更加不方便。两人商定：一定要冲破重重阻力，不惜一切牺牲，到北京控告，向毛主席报告，誓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斗争到底！

(四)

一声霹雳惊天地。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发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点燃了。

当时，还被李井泉软禁在成都罗家碾招待所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看着报纸，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毛主席呵毛主席，我们日盼夜盼的这场反修斗争，在您老人家的英明领导下，比我们设想的大大提前来到了。毛主席呵毛主席，只要您老人家知道我们这些年来和李井泉之流的斗争，就一定会大大支持我们的。

“到北京去！到毛主席那里去！”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回忆当时的心情说：那时，我们什么都不顾了，只有一个念头：离开成都，到北京去，越快越好。

“到北京去！”这是李井泉最怕的。为了阻止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到北京，他们不是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关进了私设的监狱吗？不是要把他们分到离北京更远的县里去工作吗？现在，不是又把他们软禁在这个招待所里吗？

面对眼前的处境，刘结挺和张西挺同志经过一番商量，下定决心，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到北京去。为了防止万一，张西挺同志留在成都作掩护，由刘结挺同志一人先去。走前，他们写好一封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信揣在刘结挺同志怀里，如果在半路遭到不幸，他们相信其他革命同志一定会把这封信转上去的。六月下旬的一天夜晚，刘结挺同志想法摆脱了监视，翻墙、过河，坐上火车只身往北京去了。

在宜宾，和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一道战斗多年的王茂聚、郭林川等许多革命同志，也是一样的激动，他们从心底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王茂聚，这个木工出身、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的老同志，心里有多少话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倾诉呵！自己从小没有读过什么书，身体又多病，但他和郭林川同志一道，从早到晚废寝忘食地写呵！写呵！一直写了两个月，修改了八次，最后向

中央写了将近四万字的报告。当他知道刘结挺同志已经到了北京，立即派他的女儿亲自把材料送给刘结挺同志，再转交给党中央。事后查明，这些材料都落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去了。

不久，张西挺同志回到了宜宾，他们一起商量，决定王茂聚和李良同志再到北京去，其他同志则留在宜宾坚持斗争。王茂聚把他和郭林川同志写的揭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罪行的三十张大字报，公布出来后，便于八月中旬，和李良同志先后离开了宜宾，到达西安再会合。他们向党中央报告的材料，则由李良的弟弟秘密带往成都，在火车上转交给他们。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和李井泉之流的斗争一开始，我们这些同志就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早已下定决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的决心更大，信心更足了”。

李井泉这一小撮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也十分敏感。他们深知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他们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特别害怕宜宾问题这个缺口被突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这样说过：“看来宜宾这个问题，是李井泉的导火线。”李井泉也说：“西南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宜宾是关键的关键。”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书记上也写着：“西南的问题，宜宾是突破口。”

是的，宜宾是突破口，是导火线，是关键的关键。这个关键的关键一旦被突破了，这个导火线一旦被点燃了，这个关键的关键一旦被抓住了，那么，上至他们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至他们的黑爪牙，一切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统统都要完蛋了。他们在西南多年苦心经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就要宣告彻底破产了。宜宾问题的斗争为什么这样尖锐、激烈？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这就是宜宾问题的实质所在。

就是四川问题的实质所在。”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批黑线上的“大人物”，什么彭真啦，彭德怀啦，李井泉啦，等等，不断来到成都、宜宾，互相勾结，密谋策划。千方百计要把刘结挺、张西挺等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置之死地，想方设法要把刚点燃的革命烈火扑灭下

去，妄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

还在去年三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在他们炮制的反革命“二月提纲”刚刚出笼后到了成都，李井泉就指定他的心腹、宜宾地委书记亲自向彭真汇报了刘结挺、张西挺的案件。人们不禁要问：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案件”一年以前已经处理，他们的党籍早已被开除，他们早已不掌权了，为什么此时此地还要拿他们的“案件”向他们的主子汇报呢？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更加慌了手脚，更加歇斯底里大发作。他们运用还窃踞在他们手里的党、政、财、文大权，疯狂地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镇压、大围剿。

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串通一气，四处游说，大造特造反革命舆论。说什么：“刘结挺过去处理轻了，要重新揭发，要重新处理。”“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的问题很多，过去只处理了一个问题，而且他们不服，还在那里闹翻案，有必要组织人再把他们的问题揭发开。”他们曾经作了“小乱、中乱、大乱”的准备。所谓“大乱”，就是“刘结挺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当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写的三十张大字报公布后，他们吓得脸发黄，心发慌。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咬牙切齿地说：“我们不把他们（指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打成反革命，他们就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他们白天黑夜，紧张地召开各种会议，阴谋策划进行疯狂反扑。为了先下手为强，他们通过自己的御用工具——原宜宾地委旧文革办公室，把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写的一封信和三十张大字报，加上按语，发给地、专、县、市级机关全体干部。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这三十张革命大字报说成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宣布“刘、张、王、郭”是“反党反革命集团”，是“宜宾地区最大的黑帮，最深的黑线，最危险的敌人。”要“彻底揭发、坚决打倒。”一时乌云滚滚，黑云压城，宜宾地区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对于他们所谓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特别是所谓“反革命头头”刘结挺同志，更加恨之入骨。一方面，他们组织了大批的“专案”人员，抬出早已被驳得体无完肤的刘结挺、张西挺“打击陷害”的十三个“冤案”，一再叮嘱要把其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郭一、右派分子李鹏等主要案件搞“扎实”，还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编造了大量的所谓“其他问题”。单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所谓“作风部

分”，就搞了三十多期大字报，并且印发给各个单位“学习”。这些所谓的“其他问题”，极尽造谣侮蔑、丑化之能事。比如他们造谣说：张西挺同志家里存有很多麻油，吃不完，生霉倒掉了。麻油会生霉？这确实是天下奇闻。可见这般资产阶级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了何种惊人的程度。另一方面，由宜宾地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亲自出面，组织庞大的所谓“缉拿团”，分别到成都、北京“追捕”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等同志。“缉拿团”到了成都、北京，都得到了李井泉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力支持。这个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分“关心”这件事，他通过他在中央接待站的爪牙，极力“安慰”“缉拿团”的人，说什么“待刘结挺把申诉材料写完后即要他回宜宾”，因此，他们十分“热情”接待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一再催促他们赶快写材料。所以，李井泉的心腹、宜宾地委书记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缉拿团”绝对服从“中央”。所谓“中央”，就是指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成都，李井泉的一小撮同伙，更加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把刘结挺同志的照片传真到北京，送到边防；一会儿又打电话到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老家，询问他们的下落，等等。真是乌云压城城欲摧！

留在宜宾的同志，无一幸免。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家和在成都的住所，被他们一抄再抄，甚至连小孩的尿布都抄走了。更加命人气愤的是他们抄家时，把毛主席著作到处乱丢，任意践踏。他们恨不能把所有的革命造反派斩尽杀绝。给张西挺同志看过病、打过针的医生、护士，教过他们小孩的老师，刘结挺同志的警卫员，警卫员的爱人，爱人的亲戚，等等，凡是和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多少有过来往的人，都要遭到他们的怀疑、监视、直至抄家、斗争，甚至送进监狱。仅在宜宾一个地区，就有三百多名职工，被他们打成“张、王、郭反党集团”的成员、“爪牙”、“爪牙的爪牙”。有一个刚满三岁的小孩，因为学着大人，在街上说了一句“刘结挺是受迫害的好干部”，也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取消了上幼儿园的权利！心黑手毒，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事实正是这样。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对刘结挺、张西挺等革命同志的迫害越残酷，越使

更多的革命群众看清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凶恶面目。在许许多多的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革命同志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斗争信念。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少同志冒着坐牢、被斗、被抄家的危险，响亮地提出：敢不敢为刘、张、王、郭翻案，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水岭！很多同志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战斗组织，和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走在斗争最前列冲锋陷阵的，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他们天不怕，地不怕，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直捣李家王朝。打得它落花流水，打得它人仰马翻！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正是那乌云密布的日子里，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处在斗争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是红卫兵小将帮助他们找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找到了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没有住的，他们找，没有吃的，他们安排。刻印传单，搜集材料，许多红卫兵小将熬红了眼，跑酸了腿。不少红卫兵因此被无情斗争，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关进了监狱。

我们在宜宾，就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所有的革命组织名字前面都要加上“红旗”两个字，或者干脆叫做“红旗”派。这是什么原因？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他们说：原来一中有个红旗红卫兵战斗组织，他们成立以来，就遵循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教导，集中火力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猛烈开火。在李井泉之流掀起的“二月黑风”中，竟丧心病狂地宣布这个红卫兵组织为“反动”组织，把一些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监狱。什么“罪名”呢？仅仅一条，就是他们坚决要为所谓的“刘、张、王、郭反党集团”翻案。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革命的红卫兵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向敌人展开了更加顽强的斗争。办公室被砸了，算什么？到街上搭起个棚子照样干。你不准贴大字报，偏要贴。早上撕了，晚上贴；黑夜撕了，白天贴。你不用“红旗”的名字吗？休想！什么“红旗漫卷”、“红旗如画”，越用越多。你要抓吗？好吧！四五十人一起，要抓就一齐抓。他们问：“谁是头头？”小将们齐声回答：“我们全都是。”弄得那些家伙瞠目结舌，难以对付。

革命小将们这种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教育和鼓舞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

战士，他们以红旗战士为榜样，以当一名红旗战士为荣。大家自豪地说：“红旗战士抓不完，吓不倒，一杆红旗倒下了，千万杆红旗立起来。”就这样，宜宾城内红旗林立，红旗招展！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嘲弄着李井泉之流这批蠢人。这些年来，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李井泉之流的“庞然大物”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全国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的大力支持下，由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刘结挺冤案，党中央亲自平反了，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接见了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对他们的斗争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们“是坚贞不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事实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尽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猖獗一时，尽管斗争有许多困难和曲折，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

在访问结束时，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十分谦虚地说：我们只不过起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应该起的作用。成绩和功劳完全归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归于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宜宾的阶级斗争盖子已经揭开，我们四川的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李井泉之流，他们还不是“死老虎”，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扑，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批深批透，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四川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坚强阵地！

（原载 1967 年 9 月 2 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四、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黄廉从北京回到重庆被捕。

“到重庆之后，我的警卫员项永福要回南岸，我们就分手了。下火车看到的第一条标语就是“坚决镇压造反军，对他们不施仁政”，落款是革联会。另外一

条标语是“绞死黄廉”，在菜园坝我单位墙上写了一条标语“坚决砸烂廉罗站”，我想还是把他也牵扯进来了，另外一条标语是“对造反军必须斩尽杀绝”，落款是政法学院的一个组织。向阳路上写着“反对革联会绝无好下场”“砸派，留下你们的遗书吧”。我走到总工会门口一看，秩序井然，不复从前的热闹场面。我想要回家去看看，走到牛角沱车站的时候，看到一个标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用刺刀挑起革联会”“砸派反军绝无好下场”“反对革联会就是反对解放军”落款是五十四军。总算看到一个砸派写的标语“我们坚决反对拉郎配的假联合假夺权”落款是造反军轻工兵团。街上再也看不到戴造反军袖章的人了，完全是一派压一派，见到就抓。我感到问题很严重。正在我准备等车回大坪的时候，所谓的革联会的执法大队，大概有一两百中学生蜂拥而上，把我推进一辆嘎斯车。一个政法学院的人坐在我的旁边说：你今天还跑得了吗？不一会就有学生动手动脚，解放军都招呼不了，他们说你本身就是反革命，打了还用负责任吗？后来一个干部跟另外两个人商量了，就换了一辆华沙车，将我送到看守所关起来了。

我一进看守所，就听到一片悲愤的歌声，一片骂声；什么“打倒法西斯保皇派”，“八一五是叛徒”等等；唱歌的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隔了三天，我就抗议，要求见他们的负责人，他们把我喊到正规的审讯室，来了七八军人，中间一个胖子自我介绍叫刘润泉，是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还有曾辉平和李凡，他们笑嘻嘻地对我说：黄廉，你们搞文革无非是夺权吗，给你官当你不要，你们造反军要砸烂革联会，硬要反对，我们几个今天来找你，是告诉你，我们在革联会还给你留着位子的。我说你们谈的我一点都不懂，我只要你们回答我，我到底犯了那一条王法。曾辉平说明黄廉刚刚下火车，就抓进来了，你是不知道，我们这是镇压反革命，你们反对革联会就是反革命。我说你们算啥子东西，毛主席说还是要建立革命委员会，你们的革联会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抗议生活不好，他们表示立即改善伙食，晚上就给我送两份菜来了。那个时候公安局已经不管事了，已经军管了，是五十四军说了算。

又过了三天，54军的曾辉平又来找我，说今天找你是准备放你出去，你出去之后不能再回文联那边了，罗广斌自杀了，你不了解，也不要过多介入，革联会是经过群众推选，也有市委干部，是革命的三结合，就是现在的权力机构，也为你们留了席位，你们不派人来，八一五就比较听话，各组织都派了人。另外，

你老婆在七军医大学，105 那个组织也比较被动，就象你们现在这个情况，受了些委屈，你要正确对待，还是要跟我们合作。我们是镇压文革中间的坏人，你们那个组织是反对革联会的，都当作反革命镇压，要做解释，也算是道歉。省委写的信你为什么不出来，这是你的不对，你从北京回来为什么不到五十四军来报到，所以才发生这种误会。你们砸派的大小头目都是抓了的，听曾辉平介绍以后，我愤怒无比，我说你们完全是强盗逻辑，你们就那个水平，喊中学生来抓我。他还说“你不要直接回家，五点钟左右车子直接来接你。”曾辉平走后，公安局的人说：“黄廉，是五十四军和革联会与你们的矛盾，不要怪我们咯。”

接我的华沙车，直接开到 54 军军部里头，在一个会客室门前，参谋长耿志刚站在门口，伸出手来，我拒绝跟他握手，他说：“你受苦了，对不起了，在大巴山张国焘搞肃反的时候……。”我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说：“你们到今天还是处在学习张国焘的水平上”。他很尴尬，一会儿韦统泰进来了，说：“黄廉，这是个误会，学生把你捉起来，我们发现晚了，是我们的不对，看你还要点什么东西不？在我们招待所先洗个澡，理个发，现在北方天气很冷，你穿的太少，你这点衣服抗不了寒。”我说我刚刚从北京回来，还去北京干啥？他们说这是总理叫你去，还叫成都军区派飞机送你去，他们明天才能安排，今晚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启程。一会儿有个军官急急忙忙走进来，说马上要走。这个时候，他们要我写个条子给我老婆，要什么东西他们马上派人去取。

不到二十分钟，我老婆就坐个军用三轮摩托车进来了，她很生气，一进来就骂他们：你们给我们解放军丢人，韦统泰说：政治斗争嘛，就是那么回事。我老婆这才系统告诉我重庆发生了什么事，在我回来之前，他们搞了一派夺权，利用叶剑英搞的二月镇反，四川一个晚上就抓了十二万人，他们还把标语贴在我的门上，抄了我们的家，砸派起码有上万人去北京告状，全国的“逆流”四川最厉害。周总理晓得你回重庆之后被抓了，亲自指示他们要用飞机把你送到北京去。她还告诉罗广斌被他们害死了，没有讲完耿志刚就追着喊我上车。接着后勤学院的张龙宝也来了，胡子老长，已经被关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革联会一成立就被抓进军人监狱了，他抱着我哭，说感谢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心。过了一会，前副市长段大明也来了，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军队喊我来，准备解放我。”韦统泰说你要和段大明结合，我说你是不是走资派，错误要不要改，段大明连连点头

说“重罪在身，当然要改。”（有关重庆的材料引自《黄廉访谈录》）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周恩来等在关于重庆问题第一次专案会议上的讲话
〔时间：1967年5月13日晚10：30到14日凌晨；地点：人大大会堂西厅。
接见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萧华、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梁兴初、张国华、刘结挺、张西挺。〕

会议开始，总理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康生同志：（风趣地说）听起来都是一致的嘛！

总理：没有准备，听听两方面的意见，先听反革联会方面同志的意见。

代表们首先控诉革联会镇压山城造反派血腥罪行，当谈到革联会搞“三凑合”、“拉郎配”时，总理笑弯了腰。在汇报过程中，康生同志也边听边阅我们上报材料，突然指着一处对总理、伯达同志说，“这是一个新发现”，伯达同志点了点头。

以后，对方开始发言。

总理问：“你说叫周家喻吗？听说你来了很久了吧？”

周答：四月廿五日来的。

总理：你们不要再来人罗。

答：我们已经回去人了。

总理：回去是好事嘛。听说你们（革联会）给八·一兵团发枪，发了的要收回来。

周家喻（重庆大学“8·15”负责人）比较轻浮，由于周家喻的空话连篇，空洞无物，大声叫嚷。总理说（很不在意地）：你声音大把麦克风搁下讲嘛，甚至在伯达面前讲起“社论”来了。总理再三催促，“不要讲得太多！真罗嗦！快点！快点！”后来干脆停止了他的发言，另外指定了一位。

总理：我对李井泉很感兴趣，你们把李井泉关在重大为什么不拉出来斗？说说抓到你们那里去的情况。

8·15成员辩解说，他们将李井泉送到贵州去斗过。当场被我代表以铁的事实，驳得哑口无言坐了下去。当接着王某某发言时，首长各看各的材料。新华社一个记者起立准备为其辩护。

总理：你参加革联会了吗？

记者答：我是支持他们的。

接着总理挥挥手，制止他发言。

此时总理秘书问砸派某某某同志要发言提纲，说：“总理要看看”。因没有准备，便将五月七日的重庆来电手抄底稿送上。手稿虽然较乱总理仍看得很细致，并在上面划线。

我代表递上纸条问：“重庆近日盛传王力同志有一个对重庆表态的录音报告，有三个内容：（1）重庆革联会的大方向正确不能砸。（2）重庆的镇反与成都性质不同，成都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重庆是一般的缺点。（3）重大 8·15 是左派组织不是保守集团。王力同志看后，立即在上面批了“没有这回事”五个字，并传给总理和伯达同志。总理要他当众辟谣。王力同志说：“重庆问题不是正在解决嘛！我没有什么录音报告。”会议进行中，代表高呼口号“打倒辛易亏”。辛两次站起来低着头。

总理：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

1967.05.16；中发 [67] 159 号

中共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关于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第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在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

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附：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对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小组：

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和重庆市的实际情况，我们对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如下：

一，以任白戈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受到李井泉的支持，庇护，他们互相勾结，在重庆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任白戈追随李井泉坚持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事实证明，任白戈早已堕落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意见，应当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二，重庆警备区司令部，重庆军分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渝部队，在支左，支工，支农，工作中是有成绩的。但是，在二，三月份的支左工作中，由于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的错误决定，还是出了一些差错。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各革命组织的关系问题上，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慎重处理争端，而是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加深了双方的对立情绪，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三，我们认为，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军分区和驻渝部队的同志，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持有不同意见的各革命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好革命派内部之间的团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部，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在这一批判中，促使各革命组织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四，我们建议成立重庆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当吸收革命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至于哪些单位搞军管，哪些单位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应当由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都军区批准。军管单位的军管代表，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支持革命左派，做好革命派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大方向一致的原则下，团结起来。

五，要帮助受压抑的革命群众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被错误宣布成非法的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

六，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学习〈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有关社论。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搞好“拥军，爱民”作；正确的对待犯有错误的干部；在革命左派内部，正确的对待不同意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七，“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立即建立重庆市的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领导班子的成员，应当征求各革命组织的意见。在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成立的同时，迅速作出进行工作的计划，把工，农业生产抓起来。坚持四个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工农业生产的思想灵魂，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使精神变物质，从而使工，农业生产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

八，解放军，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都要对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大多数群众觉悟过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者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革命派应当最听毛主席的话，最能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界限打击报复。一切群众组织，都只准文斗，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周恩来康生第二次接见重庆代表讲话记录

〔时间：1967年5月16日凌晨1：30—3：33；地点：人民大会堂西北厅。参加大会的中央首长有：总理、康生、关锋、王力、杨成武及五十四军首长谢家祥、白斌副军长，蓝亦农副政委也在场。〕

总理：

对不住，你们来了好久了，今天五月十六日，你们记不记得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通知发出一周年，大家都在庆祝。

四川的问题比较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他们都先回成都去了。今天结束重庆问题。先听听八·一五观点的意见。请八一兵团张益同志谈谈。

（八一兵团张益发言后，江陵厂军工造反团一代表发言说：革联会成立以来，

对抓革命促生产不是起了积极作用，而是起了消极作用。)

总理：

你们反革联会的写来了十六条意见，我们看了。你们写了不少材料来了。……

我来读一下《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稍加解释。

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回成都后写来的关于重庆问题的报告，中央同意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有五条意见，刚才毛主席亲自批准了。

第一、重庆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和群众中，都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在军队内和群众中进行充分揭露、批判。这就解决了矛头指向谁的问题。我们看在座的两边组织一般都是革命组织，当然有的错误严重些，有的轻些。总还是革命组织，既然都是革命组织，斗争的主要矛头就应该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你们都学了《红旗》的文章了。从全国来讲，斗争矛头应指向刘、邓；从四川来说，斗争矛头应指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从重庆来说，斗争矛头应指向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这是大方向。斗争中要考验锻炼你们，要明确大方向。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的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的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了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驻川野战军（五十四军）曾参加抗美援朝，六二年参加中印边界反击战，是

全国很好的野战军之一，是有红军传统的一支部队。今年，党和毛主席，下给了部队很大的光荣任务，任务非常重，“三支两军”的任务同时并举。任何一个部队，不犯错误是不容易的。五十四军一开始就支持了左派，但压制了另一派革命组织。这与成都军区性质不同，成都军区是方向性错误，支持了“产业军”。因此，他们错误性质是不同的。重庆警备司令部支农、支工很努力，还担当了部分军管任务，还有军训试点也取得一定经验。我在这里替五十四军讲一句，五十四军被李井泉割裂得非常分散，从中印边境回来就分了四十多个地方，我没想到，今天早上我报告了主席，主席也没想到。这是不许可的。李井泉把他们分散住在四十多处，李井泉有意识把正规军住分散了，地方好影响他。另外，地方独立团扩大，这是李的坏注意。五十四军处在这种很不利的环境下，却支持了左派，不是支持了保守派复辟，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了镇反运动，重庆受了成都的影响。成都军区派公安厅长杨刚到重庆开片会，布置镇反，五十四军没有完全顶住。捕人就捕多了。当然这不是多少问题，问题是不应捕不应该捕的人。文化大革命要搞四大，发动群众，对有过激行为的人，应帮助提高他，为什么要当成反革命？这是方向路线错误。这是成都军区犯的，重庆受了影响。重庆与成都要区分，重庆与成都不同。此外，在处理不同意见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是参加了革联会的，交院九·一五、西师八·三一不赞成夺权，有不同意见，对革联会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在当时军队应考虑，却支持了一方，而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把部分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错误。

这种错误五十四军领导已开始认真的改正，毛主席看了他们的电报，重庆情况和成都不同。五月四日，五十四军电报提出：只要主席说我们支左支持错了，我们就立即改正。原来没有想到这点，没有想到支持了一方，而没有支持另一方。中央指出后，恍然大悟，正在认真地改。他们已经在宜宾问题之前开始改了，认真在改，坚决地改。成绩还是显著的，错误已指出了，应让解放军有改正的机会，错捕了就放。五十四军在重庆人数不多，任务又重，解放军多少年又没作群众工作了，解放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只要坚决改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解放军是具有伟大光荣传统的，最受群众信赖的，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你们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在文件中避开革联会，是不是和稀泥？不是的，如果涉及革联会，争论就没有结果的，一月革命以来，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可是必须要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才能夺得好。重庆大联合没有联合好，有一派同意，有一派反对。开始没有意识到“三结合”，“三结合”是后来才发展的。革联会吸收几个人（过去负责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在群众中真正“亮相”，所以有争论。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不能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摇身一变。尤其体现革联会是野战军领导的。解放军是支持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后有了权对另一派压制，形成对立，形成二、三月的紧张。说革联会对了，但条件不成熟；说不对，那时又做什么？革联会是军队领导的、支持的。解决安徽、江苏问题都是这样讲的，但是重庆不必这样作。江苏改为军管，安徽最后也军管，文件上没写。如果争论下去，就是吵架，如果再这样吵下去，三天三夜都吵不完。我们应向前看，在四川作出表率，就是由军队领导人出面组织临时筹备小组，向前进，促进其联合，把争论停止下来，再要争论就会不能前进，影响生产任务，广大劳动人民是不同意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向前看，由重庆市的军事领导同志出面筹备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把争论就停止下来，这点很重要。如果同意中央决定，回去就不要吵这个了，甚至影响了生产。

为什么没有提谢家祥同志（五十四军政委）？因为他不久要调动工作。筹备小组由蓝亦农同志作主任（组长），白斌作副组长。吸收有代表性的组织主要负责人，不只一方。同时有其他适当干部。干部回去征求群众意见再定。同时，也要有适当负责人，我们了解多数人对辛易之（市委书记，是“革联”夺权后的“三结合”对象）有意见，我们是不能批的，回去商量，找适当的负责人参加。刘结挺、张西挺是被李井泉长期打击的，经过考验，我们把他们提到省的革命委员会

筹备小组。重庆条件不成熟，我们没有提名。重庆筹备小组成立后，立即抓革命、促生产，把各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组织起来。如象上海建立后就发紧急十条。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右派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当然，一个革命组织宣布另一个革命组织是非法组织、反动组织的，也要取消。错捕的要放，但现行反革命不在此例。

凡被错打的要恢复名誉。对立现象要解除。受压制的一方，前次让他们先发言，先出出气。现在你们（指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等）要反过来压他们，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会犯错误。

夺权的一方要多负一些责任，重庆大学八·一五的错误要大些，你们是当权派嘛！过去“八·一五”压了“八·三一”，不要反过来再压，那就永远没完了。这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作风。另外的一方也要自我批评，错误只是小一些，只有通过大批判运动才会大联合，通过抓革命、促生产，促进大联合；通过整风，自我批评，就可以眼睛向前，而不是向后，希望你们在大联合方面作个典型。

“产业军”是保守的，头头还有坏的。川大“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去年见他们时是一致的，今年分歧很厉害，“红卫兵成都部队”站在军区一边。我还个别找他们开过小会，五月六日事件中，他们都在一三二厂前流了血，血都流在一起了，都是被“产业军”打的，这可以在一起了吧，据说一回去吵得更厉害。

对你们，我们很担心，没和你们开过小会，所以再三叮咛，你们要做出模范。如重大“八·一五”，错误多些嘛，总有错误嘛。如李井泉关在你们学校，总给人有口实。这是过去的事，不深究了。李井泉已经接到北京来了。希望“八·一五”先做自我批评，另一方也要做自我批评，就好办了。至于不要武斗，重庆组织作出模范来。你们送给我的关于武斗情况的照片、材料都是指责对方的，我们看后心里不好过。十四、十五日宜宾事件中，死了二三十人，伤了几百，“产业军”保守派向造反派进攻，后五十四军军队才隔开了。希望重庆山城不要出现。

即使过去有一些事实没弄清楚，组织小组调查，把坏人抓出后也不要武斗。即使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不要抓去放在学校。你们重大八·一五能把李井泉管起来还很不容易，是因为当了权。在北京还不行。北京开始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哪一个红卫兵也不好看管，像个刺猬，交给了卫戍区。

不要搞打、砸、抢，要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透批臭，不仅要把威风打下，还要触及灵魂。当然，对煽动武斗的坏人要处理。

这个问题，我说多一点，多寄托希望在你们身上。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阐明了道理，八条讲的是拥军，十条讲的是爱民，结合在一起就全面了。

这个文件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我们一直等到毛主席看了，才来向你们宣读和解释。

（一代表说，重庆接到一个中央八条，现在还在游行）这是谣言，批件我刚拿到，还没印呢。

我们委托军队成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川问题决定在重庆原则适用，但是具体意见要按照五项规定办。我们相信干部总会出来“亮相”的，集中力量斗争任白戈一小撮及各单位，也有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结合。

康生同志讲话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意见。同志们知道这个意见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批准的。文件完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解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第一条告诉了我们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就是

以刘、邓为代表实行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四川就是李井泉及其同伙，重庆就是任白戈及其同伙，所以无论在军内，群众中对李井泉和任白戈的罪恶都要充分的批判揭露，这点要充分注意。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革联会的，会后谈文化革命中的问题，都要看在反对刘、邓路线作了些什么。

两个编辑部的文章，要害是打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你们研究得如何，掌握得如何？在北京，我问了一下，有的学校，特别是打内战的学校，来不及去学习。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彻底揭露。李井泉、任白戈作了很多罪恶，在报纸上要彻底揭露。

同志们知道五月十六日是什么日子吗？一年前，党内发了《通知》这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有历史意义的通知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今天（指十六日）马路上结队游行，庆祝文革小组成立。一年的工作，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我想同志们要了解第一段，就要大大加强学习，解放军同志也不例外。

第二个问题更是重要；如何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问题。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领导干部。这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语录上也有：没有人民解放军，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怎能进行到今天这样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支柱。哪怕哪个人，哪件事出了错误，但总的原则不能动摇。

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说话，五十四军三支两军工作，看到他们的成绩，实事求是地看到他们的错误。他们工作是有成绩的，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不是支持了右派、保守派。错误缺点，首先在于没有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成镇反运动，这种方向路线错误，主要不在军内，而在刘、邓、李，在四川以李井泉为首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八·一五同志谈大方向，没有谈到这个大方向，刘、邓路线是把群众镇压下去，成都前段时间也是把群众镇压下去，成都红卫兵部队、重庆八·一五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犯过没犯过错误。有些人有些怨言，他们是革命的受到镇压，受了害，八·一五同志也间接受了害，被蒙蔽了，要有自我批评，现在一些组织受镇压，而另一些没有，甚至盲目支持镇反，但不能因此说八·一五不是革命组织，这样说也是错误的。受镇压的不满意，不要因为平了反，反过来打击报复，骄傲，又去压八·一五，这样你们更要

更要犯错误，两方面同志都应该吸取教训，军队同志支持的不是保守派，而是革命群众组织，缺点是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杨刚，但他刚认识了错误就改。开始我就感到五十四军总比成都军区认识错误早些快一些。不能动摇对人民解放军的信任。这支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战都很有成绩的，这样的军队该不该拥护？（众：应该）

第三、第四，总理解释很清楚了。革命组织之间如何团结的问题，大家都要进行整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记得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吗？这是根据主席语言写的通知，主席讲，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军训，比不训大不一样，军训，可以跟解放军学许多好的经验，所以提出五种学习。你们是大学生，我考考你们，五种学习是学什么？“八·一五”不是最拥护解放军吗？周家喻讲讲。（周：弄不大清楚）考住了吧！（笑）忙于打内战，对这些就不注意了。（反对派笑）你们不要笑，考你，你也一样。五种学习，一学政治，二学军事，三学四个第一，四学三八作风，五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有那么多优良传统，到底要不要学？要学。

你们那里还没军训吧（有四个学校开始了）要学十五个文件，你们学得怎样？

（总理：建院不是军训了吗？沈志清，你学得怎样？沈答：开始还好，以后忙于打内战，学不下去了。）

说的实话，好。同学这话很深刻：忙于打内战、没有学，所以要整风，加强自我批评。

不用考你们了，十五个文件题目可能都不知道。（总理：“老三篇”还学一些吧？）忙于打内战，没有武器不是混战一场吗？要自我批评。接班人五个条件中有一条要自我批评。看看五条，很有好处。打内战，你们看第三条怎么说的，“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我不是和稀泥，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要打倒。第四条讲民主集中，第五条讲自我批评。现在年青人批评人马列主义不少，批评自己马列主义不多，这是通病。要整风、整思想、整组织，以理服人，不要武斗，不要打、砸、抢、抄、抓。四川打得厉害，是惨痛的经验。

第五、要把中央军委八条和十条结合起来，要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大联合，“三结合”，把斗批改任务完成。今天晚上广播了明天就登五月十六日通知，希望同志们好好深入学习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马列主义文献，希望大家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总理、康生同志讲完话以后，五十四军的代表、重大“八·一五”周家喻同志、“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黄廉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意见。周家喻同志还说，要很快返回重庆，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去进行工作，对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不说，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不做。前一段出现些缺点错误，愿意听取其他革命组织的意见，诚恳接受批评。）

（周家喻表态后）

康生：我有个问题问周家喻同志，你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话很好。“产业军”你敢去做工作吗？（周答：敢）要靠说服，教育，分化。对保守派要有策略，艰苦耐心的工作。主席这段话在去年八月三十一日提出，今年三月七日又提出，到现在有些学生还不懂得，说解放军和稀泥。你讲得很好，要实践。你去做“产业军”工作，开始还有可能挨打，还会有人说你右倾呢！好多话都讲了。这种革命劲好但却没有很好的理解“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今后要看你们的实践。（周家喻：今后一定做到。）不要怕人说右倾。

总理：我问周家喻同志第二个问题，你说愿意接受其他革命组织的批评，自我批评不容易，听取不同意见更不容易。你面对着“八·三一”、“九·一五”给你提意见，你有没有勇气听？（周答：有。）希望你带头做模范。不要一听就说“扯谎”，“造谣”。以后要有这样精神。今后，你们只要有这样的精神，重庆文化大革命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康生：总理讲的不光是对重大八·一五，对你们（指反革联派）也适合。

总理：我对重庆是很有感情的，在那里同反动派斗争了七、八年。过去重庆是雾重庆，现在重庆是光明的重庆，一字不改地传回去，希望你们快快回去，杀回老家，就地闹革命。

吴庆举：总理，今天发生了一件严重违背十六条的事件，今天下午首都红代会在火车站抢去了我们八箱揭发批判李井泉的材料，每集四册，共一万五千册，

还有罗文斌的材料。这些材料被他们污蔑为“黑材料”。请看这是他们抢走材料的声明。（随手递给总理）

总理：红代会抢去的材料，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副总理解决。（把红代会的抢材料的混蛋声明转给杨成武同志）

杨成武同志问吴庆举：材料现在什么地方，你们有什么要求？

吴庆举：坚决要求追回，红代会抢我们的材料已不止一次了。

（周总理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会在歌声中结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学习五十四军做群众组织工作的通知

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

54 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严重的，则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五、重庆造反派内部八·二六与八·一五两派之间内战不休

2007 年 10 月 31 日初稿

2011 年 8 月 28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8）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八节 武汉军区解散武汉“工总”

本节资料

一、湖北造反派批判王任重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二、四日，武汉数十万造反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判斗争王任重

张体学、赵修等省市领导被带来参加陪斗。会场上的巨幅标语是“枪打出头鸟油炸九头鸟”！

患着严重肝炎的王任重脸色发青，耷拉着头；1966年冬天奇寒，那几天飘着大雪，省委领导在主席台上都穿着军棉大衣，也冻的禁不住淌着鼻涕。会议组织人只有让他们轮流在台上示众，轮流到后面小房间暖和一下。又为防止在场走动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抢走王任重，主导会议组织联络的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让一名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生，假扮王任重，穿同样衣物，坐同样汽车先走，摆开迷魂阵；王本人则闷在车里，在武汉三镇兜好大圈子，回到住地，已是精疲力竭。事情马上就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总理要求保护王的健康和安全，并亲自指示南下造反大队和武汉群众把王就留在本地批判。

批斗王任重，激发了武汉批斗犯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热潮。一时，各级干部站在汽车上被带向三镇游斗。被斗者头戴高帽。

王力回忆：“王任重回去时没有思想准备，认为局面可以维持，可是一回去就不行了。特别是陶铸问题爆发，王任重就顶不住了，戴了高帽子游街，香港报上登了。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叫我起草个指示，戴高帽子游街绝对禁止登报。不应该这样作。把王任重围斗十天，王任重肝不好，对他残酷斗争不对。王任重确是比较优秀，能动脑子，爱读书，会写文章。毛主席对人都是两面的，不执行他的路线他不能容忍，特别是在重要的岗位上不能容忍，另一方面他对人还是比较

宽的，我快打倒时王任重给我写了个条子，我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叹口气说：‘王任重到底有多大的罪呀？’毛主席看来，王任重并没有被抹掉，只要改正错误站到他的路线上来还是可以用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对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1.29 下午，周总理进来后，和同志们一一握手）

总理：把你们等了这么久，你们卅多个单位都没有走？（答：都没有走）（然后，总理一一点名）。

总理：最早的什么时候来的？（答：最早是十月。一般是元月月中，月初）工人有那些造反派组织？（答：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毛泽东思想工人造反司令部，毛泽东思想九一三兵团）手工业在里面吗？（答：在）商业在里面吗？（答：在）（代表讲：工人分成两大阵营，旗帜很鲜明）

前些时来了些保守派，一千多人卧轨，我打电报，让他们派几十个代表，结果宋侃夫批了一百多个，既然答应了，我就委托李副总理接见他们，他们要辩论，我说，去你的吧，别理他。

（代表：我们夺权后，当权派大搞阴谋）是否他们在搞经济主义？（答：是）他们想破坏生产，阻碍我们夺权。

（武钢老工人控诉他三次被打成反革命，讲武钢干部地富反坏右占 80%）这么坏。你们（指造反派）有多少人？（答：卅多万）联合会的有多少人？（答：开始比我们人多，现在已改名了）他们叫什么名字？（答：有红旗军）什么？也叫红旗军？（代表：已抓到他们一个头头）怎么只抓了一个？那么你们回去和他们斗嘛！

总理问：你们还有多少人？（答：十万人）红旗军有活动吗？（活动都很猖狂）为什么不斗争？（是斗争呀，他们也转入地下。）（代表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三次新反扑）军队对你们怎么样？（不好，代表讲了组织夜袭队，飞虎队在军区训练的情况，中学生多）你（指卅六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张××）回去应把中学生组织起来。

（代表汇报造反派大联合中的问题）为什么你们不联合起来呢？（二司，三

司)大方向一致嘛，回去应该联合起来，进行夺权，进行批判。你们批判王任重
大方向一致嘛，王任重又吹又写报告，说武汉文化大革命搞得最健康，吹捉了一些人，有四、五百人，主要是学生中的一些小毛病，好象武汉是全国一面红旗一样，我们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红旗为什么捉那么多人？当时北京就没抓，实质上武汉情况没有揭穿。所以，是一个“先进红旗”到北京来吹，做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插手北大，清华，当了北京市的顾问。

实际上，武汉的革命派受苦最深。七月下旬北大赶走了工作组，八月初，我亲自去北大，清华闹起来了，但武汉十月份才动起来，才收到你们的材料，可是陶铸，王任重又把你们哄回去了。以前，陶铸包庇王任重，武汉大学五月下旬就搞文化大革命，你们那时一个女的叫什么名字？（答：陆舒端）是典型的名字，不过现在是一个反面的典型的名字。

张体学主要是王任重拉坏的。王任重到北京来斗了几个小阿飞，非常恶劣，你们武汉很受影响，王任重自吹自擂，一大车，一看，真不象样子。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点了张体学的名字。我特地看了王任重一眼，他好象满不在乎。下来，我向王任重说：“你要好好帮助一下张体学同志，他太不象话了”。他连忙点头“是呀！是呀！”其实都是他搞的，真是两面派。

王任重到广州养病，你们把他揪回来了。你们到北京找陶铸诉苦，陶铸还发脾气。

王任重是 12 月回武汉的，你们进行批判斗争刚刚开始斗一个月，你们就争论，闹意气了。为什么要分开呢？大联合搞嘛。斗了几次（三次），武斗了没有？（没有）要大小会结合。

批判材料要准备充分些，赶快回去联合行动。你们既可以联合干，也可以分开干。不要互相指责，总觉得比别人强，你说我，我说你，要在斗争中比长短，看谁在斗争中争取群众，批得深，三司，二司都要比。我劝你们赶快回去。你们来了三个礼拜了吗，（是）到现在矛盾越来越大可能是在北京呆久了。赶快回去吧。

（代表讲要揪陶铸的问题。代表：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你们是不是想把他揪去来斗？还是让他呆在中南海里。

一、形势发展很快，现在是夺权。

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不甘心他们的死亡，他们以各种反扑，经济主义，矛盾上交，分散主义。他们就是要少数派越少越好。少数派越来越多，从思想上来说，少数战胜多数。多数中又产生新的少数，但组织上不能这样，要少数变成多数。

斗争的方法可以背靠背，当前面对面斗争把陶铸揪出来中央不同意，我不能违背中央指示，我还应服从党的纪律，但我可不是保他，要根据形势发展再看。

（代表反映省委干部的情况，说省委干部保得很厉害）

你们揭得不深。应当分化瓦解嘛！（代表反映：张体学说：“火烧张体学烧不死。油炸王任重炸不烂。”）（省委干部说：“要犯错误就一起犯。”）后句话不对，以前张体学还是做过一些工作的。如果你们材料全部揭出来了，摧毁他的信心了，他就低头认罪了。

（代表反映湖北省春节一百五十万农民要来武汉）你提醒了我，春节不放假，革命放啥假呢？（问警卫员通知发出了没有）

（代表谈到在《湖北日报》上是否可以点王任重的名）

总理：报纸都掌握在你们手上，大权在你们手里嘛。（代表讲：十六条规定要上级党委批准，总理笑了）

（代表反映：春节保皇派将停电、肉、蔬菜，进行大反扑。）

总理：你们回去准备反对经济主义，武汉落后了，建议你们联合起来。我有一个想法，每个省建立一个联络站。派两、三个联络员。联络站少好照顾。

（代表问：以后中央开座谈会时我们外地的也应该派代表参加）

总理：好，可以。希望你们要联合起来，夺权范例我们准备发表，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可能你们现在还感觉不到，等那天发表贵州的情况，你们就会感到武汉落后了。你们要在二月份赶上去。（最后，对二司，三司人讲）你们应该团结，联合起来，

（三司答：可能搞大杂烩）象你们这样争论不休，联合不起来，武汉的运动要落后两个月。

总理在会上还讲：邓小平自杀，罗瑞卿自杀死了，陶铸死了，都是造谣，可能是保他们的人讲出来的。

（来源：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林杰和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的谈话

〔地点：《红旗》编辑部某办公室。林杰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四位代表谈了话。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查，仅供参考。〕

林：你们是武汉第二司令部的吧！

同学：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

（林杰同志和同志们握手，并问了姓名。同学送上材料，林杰同志一边看一边询问，当看到其中一张极端反动的照片时说）

林：这留着干什么？（当看到一些猫——王任重养的——照片时说）精神世界！

（同学送了一些材料，并反映×××，×××自杀了）

林：为什么自杀？（同学反映了有关问题）哦！

同学：张体学说：“王任重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林：谁说的？

同学：张体学说的。（同学反映了武汉地区当前的夺权问题）

林：当前中央指示：《红旗》社论第三期说了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新任务就是夺权。上海市，山西省的经验总结，就是夺权中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机关革命干部和当地驻军三方面结合临时成立一个指挥机构，先把大权夺过来，然后改组——则新的斗争组织形式，把旧的资产阶级堡垒摧毁。过去的社论也说了，这期社论很重要。

（同学谈到武汉三司的一些情况）

林：形势慢慢在变化，慢慢夺权，哪儿条件成熟了，那儿就夺权！上海条件成熟了，上海就夺！山西条件成熟了，山西就夺！要大联合，不要搞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北京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影响了大局。

林：现在你们住在清华吧？

（同学反映了有关情况）

林：你们可以到北师大去住，到石油学院去住。（又反映了有关情况）

林：这次开枪杀死了几个人？打死了保守派吧？

同学：因为他们要夺军区的枪。

林：武汉有个计委书记，是辽宁省的，那个人的情况怎么样？

同学：党员干部不过来，党内有党，还有地下党……。

林：武汉市委、省委没有明显地分化是不是？（答：没有）看这期社论发表后是否有变化。

同学：武汉有的所谓造反派，平常不干，夺权就大夺，情况复杂……湖北省组织了大套人马，不理解为什么党员不……。（不清）

林：武汉地区被张（体学）王（任重）控制得很严。

同学：还有“中国××党中央委员会。”

林：反动组织！“中国××党中央委员会”有多少成员？

同学：……活动（不清）

林：你们联络站还剩多少人？（答：六人）（同学又反映了武汉夺权的情况）武钢夺权了没有？（答：很难）武汉有几个单位夺了权？（答：有一×、重型……）学校夺了没有？（答：学校基本上由我们掌握）车站夺了没有？（答：没有）（同学又反映了武汉广播电台情况）伪造中央指示，军区有没有反对派？（答：有）你们要军队、工人、学生联合起来，（同学又反映了夺权问题）不是夺印的问题，成立联合指挥部，省委听我们的市委办公。对保皇派要打击镇压，取缔一切反革命组织，对自来水厂、发电厂、火车站、轮船码头、广播局等要害部门要派出军队严加组织控制。抓革命、促生产，逐步使生产正常化。使生产系统照常工作，一个个接管。夺权不是夺大印，当官。是要担革命担子的问题。（湖北省委）社论发表以后，可能有转变。（同学反映武汉三司联合会的一些事例）

林：联合会是保字号的没问题。将来对其头头要采取措施。抓几个没问题。

同学：保字号也打起造反旗号了……。

林：许多保字号的都改名造反派了。（反映张体学与其秘书的情况，该秘书要造反）

林：（笑）造反很好吔！权夺了以后就可以处理张体学，张体学这次也暴露得很清楚。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武汉的报纸呢？（答：《长江日报》完全在我们手里。）很好！每天都出吗？（答：对！）

同学：武汉晚报即《长江日报》革命职工点名要我们去。

林：去了与工人结合，向工人学习，不要去指挥，自作高明，认为自己比工农高明，其实工农比我们高明，在前一段运动中，知识分子要敏感一些，但是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容易动摇。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只有真正和工农结合了，树

立真正为工农服务的观点，才能真正革命。你们看“五四”运动的风流人物，后来一个都不行了。只有真正与工农结合的，象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样才能革命到底。（同学反映党权问题）现在不要理它！开除了的算了，现在要与工农、军队、革命干部结合夺权！向山西学习！向上海学习！夺了权，以后如何按照巴黎公社那样全面选举，使我们国家机构出现崭新的形式。运动的发展，群众自有办法，现在不去考虑它。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京联络站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红旗兵战斗队翻印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王任重写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等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委领导人的信

再道、东山、姜一同志：

一、自从去年 12 月 25 日回到武汉之后，我就失去了行动自由，一直在革命造反派的监督和管理之下生活。从一开始革命群众就把我当作敌人对待，给我加了许多大帽子。

原来省直机关的干部大多数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自从 1 月 20 日前后开始发生了变化，省直机关的造反派也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了。那些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被称作“保皇派”，有的被戴高帽子游街，受到很大的压力，于是“一边倒”的情况出现了。现在几乎没有人敢为我说一句公道话。

原来省委常委和部委厅局的干部绝大部分还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一片“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的舆论压力之下为了和我划清界限，也起来把我当作敌人对待，省委一批领导同志（以张华为最活跃）开了我一次斗争会，对我和张体学，王树成三人也是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罚站，低头。他们喊的口号是：“打倒湖北黑省委”、“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张体学”等等。我对他们这样做法觉得很难理解，难道他们真的不了解湖北省委的情况？真的不了解我和张体学的情况？对于革命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同时由于对我们所犯的路线错误的严重性很气愤，他们认识问题有片面性，有偏激情绪，是不能责备他们的。狠批狠斗，过火一些，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对于打掉我的官气和骄傲大有好处，对于促进我认识

错误，改正错误，改造世界观是大有好处的。因此我对于群众不仅没有什么埋怨和对立情绪，我确实感激他们。不然我就不能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但是对于省委领导同志的这种态度我是有意见的。特别是像张体学这样的人，把错误推给别人，把功劳归于自己，不惜歪曲事实，以达到混关的目的。省直厅局长一级和部委一级也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起来以极左的姿态出现，到底是真革命真造反，还是个人出风头，或者是牺牲别人保护自己，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湖北省委因错误严重要改组是肯定的，但新的省委到底如何组成，望你们注意。现在应当争取迅速地把省一级市一级、地县一级的临时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搞起来，以改变目前的无政府状态，比如对革命和生产都是不利的。我建议由钟汉华同志出面挂帅，吸收原省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军队哪些人参加请再道、东山等同志考虑，并由武汉军区党委决定，省委省人委我建议由姜一、杨锐、韩宁夫、王海山、张旺午、阎钧、张超、陈扶生、邓祥、饶兴礼等同志参加。群众革命组织的负责人我不了解，可以由孔庆德、张竞等同志分别与各组织协商，哪些革命组织同意参加的要首先吸收，暂时不愿参加的革命组织，留下名额，还要做好工作争取他参加。

现在武汉地区的革命组织分为两大派，双方斗争很尖锐。我希望湖北军区学习山西的经验，派出一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若干大单位（如武钢、重型、锅炉厂、肉联、一纱国棉、武大、水利水电学院、新华工、华师等）去进行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拥护武汉部队的严正声明和通告。在争取了大多数群众的基础上，推动各个革命组织开门整风。有些革命组织的领导成员，凡坚持错误的，由群众自己撤换更选（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应当逮捕。）这样才能比较快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以改变各个革命组织之间互斗的状态。对于职工联合会一类的组织要命令解散，争取其群众分别参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是否可行请考虑。

二、我因为被当作敌人看待，失去了发言权，连我的检查交代材料也无处印发。最近我用了十天时间写了一个书面检查，派人送给了姚淳同志，希望他代转交省直革命造反司令部印发，我估计他们仍然不会印发。是不是由武汉军区或湖北军区代为印发？一月二十日我向中央、主席写了第二次检讨报告，是请湖北军区转发的，不知发出没有？我现在的处境比十几天前好多了。但是我的检讨不能

印发，群众不知道我的态度或意见，这是一个大困难。六七月份，我在武汉的时间只有 42 天，从去年 12 月 25 日到今年 2 月 24 日整整五十天，开了我十次斗争大会（黄石市和孝感各一次，其余都在武汉）报纸、传单、标语、口号、有线广播、大字报、漫画、歌曲，各种斗争形式都用上了，一直把我当敌人搞了几个月。可是既不给我为自己申辩的机会，连作检查交代的权利也给我剥夺了，这怎么能把我的问题搞清楚呢？这个情况我已经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并给主席写了信，不知再道、汉华在北京听到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的看法如何？到底打算对我如何处理？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可以告诉我！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交代和说明？在湖北目前的情况下，我的意见无处说。因此我想用写信的方法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在湖北省委当中或在厅局一级干部当中印发或传阅。我写给你们信，必要时也可以在机关干部中印发，以便使大家分析批判和查证落实我的问题。

三、人们为什么把我当作敌人对待？

我想有下面几个原因：

（1）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引起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愤恨。

（2）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但是我不仅在“十六条”以前犯了路线错误，又没有及时地作出深刻的检讨，工作会议之后，没有回武汉而是到广东休养去了。这样就引起了人们对我的怀疑，怀疑我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是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等。

（3）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从关锋、戚本禹同志开始点我的名，后来江青同志几次点我的名，这样许多人（包括我的女儿王小平）就肯定我是一个大坏人了。人们不知道我在北京工作期间的具体情况，连江青同志也听到一些群众反映而点我的名。（如东城区、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老板问题）我已经向伯达、江青同志和主席、林彪同志写过三次信，说明情况，请中央调查核实。前几天我又专门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解释她批评我的一些主要事实。我的这些事实都不便对群众说，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但是我可以向你们说明情况，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知道事实的真相。我相信中央可以把这些事实查清的，绝不会冤枉我的。

（4）我在过去的工作中，办过错事，说过错话，写过一些不好的有错误的文

章。在揭发批判的时候，人们只抓错误的一面，或者只抓一句话、几句话、不讲全文，不讲当时的具体情况，把所有这些错误的东西罗列起来；甚至加以夸大，这样当然显得特别严重了。还有些人是有意歪曲事实；也有的人捏造事实，甚至栽赃诬陷（如蒋介石的照片）我不知道这些人故意这样搞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是为了自己过关。

对于一般干部来说，在这样大的压力下面，是情有可原的。我不怪他们，（如司机老彭和保姆所讲的都是大大夸大了的，是有人动员指使的。）但是我怀疑有阶级敌人，故意制造混乱，乘机举行阶级报复。我听说那些地、富、反、坏，或者没有改造好的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的子女对于斗争我特别高兴。这是一种阶级动向，你们可以主动调查一下这方面的材料。还有些过去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人，以及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被吸收入党、没有提拔的人，对于斗争我特别积极。你们查一查看有没有这种情况？这说明什么？

至于在运动初期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或“右派分子”的人，他们的积极性则是革命的正义行动，只能欢迎和支持，而不能责备他们。斗争过火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

（5）陶铸同志的问题被揭露，说他包庇我，他是我的后台。这就更加重了人们对我的怀疑，人们肯定刘、邓、陶、王等是一条黑线的人物。

如此等等。

但是我自己明白，我的世界观虽然没有改造好，“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绝对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确实是盲目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自觉的，也不是顽固不化的。凡是我认识到了的错误，我就检讨就改正。我对毛主席是无限崇拜，无限热爱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永远如此，绝对不会有半点动摇。多少年来我都是原原本本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有记录可查），有谁听到我说过半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没有？

十几年来我跟主席接近的机会很多。我对主席的爱护、尊敬，他自己和他的随从都会有深刻印象的。我相信毛主席绝对不会怀疑我是反对他的。至于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那么湖北省十七年来的成就如何解释？湖北在全国是不是最落后的地区？我尽管犯过“左”的或

右的错误，但基本上执行的还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才有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四年连续大丰收，粮食在受旱灾的情况下达到XXX亿斤左右，棉花收购达到XXX万担以上，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一倍。搞资本主义复辟能有这样的成就？那不成了刘少奇的理论“坏人当权也能搞好生产？！”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事？

四、我打算对于上述这些问题，分别写信给你们，或者写出检查交待材料，供你们参考。

这是我写给你们的第一封信。我因精力有限，没有留底稿，望阅后保存。或者人抄一份，以便以后有必要呈送中央主席、林副主席审阅。

五、我有几个要求，请你们考虑能否办理？

(1) 把我被批判的文章、诗歌、党内讲话、文件送一份给我，以便检查反省。不然凭记忆是不准确的，有的记不起来，无法检查。

(2) 把所有批判我的材料（重复不要）入小册子、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红卫兵报纸、传单都搜集一份给我。不然我怎么进行检查呢？现在我手上有一点，但很不完全。

(3) 中央有什么文件或会议讲话记录，或中央同志对革命群众的讲话记录，望也送给我看一下。

(4) 能否把小曹或者另外选一个老实可靠的同志来帮助我抄写我的检讨？不然我一个人起草抄写搞得很累（腰酸背痛肝痛）也很慢。如机关不好抽人出来，把王三宝派来帮助我抄东西也可以。

(5) 我有一个小箱子，原放在东湖老沈处保管，其中有我的十几年的日记和相片本子。希望叫刘文西找人去拿放回军区保管，其中有党的机密，不可遗失。

其他生活上和治病的问题，这里都可以负责。只是缺“导眠能”（安眠药）。在这里买不到，望设法给我搞一瓶来。张体学的身体也很不好，望设法让他休息一些天，这个同志经过斗争，还是应当争取的，政治水平太低。能把赵辛初同志要回来就最好。

（注：因为你们是省委常委，所以我写给你们，至于此信是否给其他人看，由你们决定。）

此致

敬礼

并代问全家好

王任重 1967 年 3 月 2 日

【根据“钢二司武汉测绘学院所编《红武测》增刊 / 第 8 期（1967 年 9 月 22 日）”刊印】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王任重：《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红旗》杂志 1966 年第十二期社论正确指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是无产阶级。在党政军各部门，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的工作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

《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四期社论又正确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

应当怎样估计湖北省委十七年来工作呢？

我以为十七年来，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以外，湖北省委十七年来基本上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湖北省和大多数兄弟省一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特别是 1963-1966 这四年农业生产连续获得了丰收。棉花产量比 1957 年增加一倍，由占全国总产量的八分之一跃进到占全国总产量的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平均亩产超过了八十斤，总产量达到八百万担以上。粮食生产在旱灾的袭击下，仍然比上一年度增多粮食上调任务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五亿斤左右，这四年平均每年上调十亿斤左右。贫下中农生活在大部分地区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所发展。从 1963 年起现代戏基本上占领了舞台。这些成就就是全省广大干部、党团员和广大劳动人民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

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结果。所有这些成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在 1965 年 12 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过这个问题。在 1966 年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也讲过这个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犯错过“左”的或右的错误，不是说我们没有受到过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而是说，从 17 年的历史来看，我们省委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湖北省委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假如说湖北省的党政大权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把持，那么怎样解释这些成就的来源？那不变成刘少奇的理论“坏人当权也能搞好社会主义生产”吗？天下哪有这样的怪事？请看苏修和东欧“修”字号国家，哪一个不是缺粮的？

以上是我对湖北省委工作的一个基本估计，如果大家在基本估计上有了统一认识，那么关于具体问题的看法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了。请省委和省人委的领导同志和省直机关的革命干部同志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充分的讨论，以便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请省直统计局供大家必要的材料（本省和兄弟省的统计资料关于省委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情况，在下一二次再作重要说明。

这么说，是不是否认湖北省委内部有少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不！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把李达，曾惇、陈一新，这些坏蛋揪出来了，还有刘济荪这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也应当从党内清洗出去。在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我和张体学同志的问题，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认为绝对不是，无数具体事实可以证明，而且从理论上也说通，假如说我们两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谁是省委内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当权派，有这样的事实和这样的人吗？能够把具体问题上的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看做两条路的斗争吗？不能，能够把我们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所犯的 errors 和偏向，说成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吗？也不能，对具体问题必须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进行分析，不然就会否定实践——认识的赤程，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我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认为张体学同志也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认为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揭发的一些材料，有很大的片面性，这在群众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不能责备他们；但是对省委的领导同志，

应当要实事求是，力求和避免减少片面性；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能“随风倒”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革命领导干部应具有的电性和风格。

《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社论正确的指出：“对于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看到他的错误，又要看到他们的成绩，要看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又指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错误的一面任意夸大，轻率的扣大帽子这是一种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一切革命的同志应避免这样的错误”。

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在对我和张体学的揭发和批判中，有没有这种偏向，如果有，就请改正。

张体学的政治思想水平是比较低的。（我也是很低的）和他担负的职务是不相称的，有时看的比较偏于保守，在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右倾是过多些，但是经过批评，特别是经过毛主席指出以后，就坚决改正，张体学同志工作是抓得紧的，是实干家，有组织能力，张体学同志作风不民主，不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听不进批评，好发脾气，有时偏听偏信，自以为是，这是一个大缺点，非痛改不可。但张体学为人是正派的，不拉拉扯扯，不在背后搞鬼，不搞宗派主义，小集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是盲目的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转变较迟，但仍然属于认识问题，不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对毛主席是无限崇拜，无限信仰的，当然所谓认识是和世界观，阶级立场分不开的，他的世界观也是没有改造好的，还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风头主义。社会主义这一关没有过。

我认为我和张体学同志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我比他更严重）应当受到党的严厉处罚以“惩前毖后”但是仍然要实行“治病救人”的方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正，鼓励他们立功赎罪。《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从二月上旬经过十天的接触，我看张体学有痛改前非，将功续罪的决心。

对省委同志，我不一一评价了，但是我认为省委和省直机关不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的把持而烂掉了，大多数高、中、干部和一般干部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95%以上的干部是愿意革命的是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

以上意见是否正确请批评指正。

1967.3.4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王任重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的信
再道、东山、姜一同志：

这个材料，复写了三份，请转送中央一份，送中南局一份，留下一份。你们看是否印给省委委员和各部委、厅局党组一份？我希望印发以便大家通过讨论来统一认识。并建议交给武汉军区党委同志各一份，湖北军区党委各一份。如何办？请你们三人商量决定。至少也要让省委常委（包括体学在内）同志传阅一下。关于十七年来湖北省委领导工作的简要叙述正在起草中，大约三五天就可以写好，送给你们，也望按照上述办法处理。

附我个人简历一份。

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王任重 1967 年 3 月 5 日

【根据“钢二司武汉测绘学院所编《红武测》增刊 / 第 8 期（1967 年 9 月 22 日）”刊印】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王任重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的信
再道、东山、姜一同志：

一、上次送去的信收到否？关于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你们有什么意见？你们如何处理的？二月底我送给姚淳同志的公开检讨和大字报是否印发了？大字报我已抄送中央一份（写在给总理和伯达、江青同志的信中了），给周总理的两封信送走了没有？都望告诉我。我自己做好安排。如果这些东西都不能印发，我暂时也就不必再写了。我就用学主席著作、写读书笔记的办法，在改造自己的思想上下功夫就是了。上次我送给姚淳同志的那份检讨，如果印出来，请代送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文革各十份，送中南局陈郁同志几份，也请送我一份，以便进一步检查。

二、这次我写的“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同时送周总理一份。我主张这材料只印发给厅局长和省直造反派的负责人（因为有党的机密，不要到群众中去发，不要张贴），印出来后也给我一份。因为手上没有材料，可能记不清楚，

去年（六六年）棉花收购多少？总产量多少？某百万担是体学同志告诉我的。如不对，望更正一下。

三、你们和省军区把工作抓起来了很好。再道同志在省直机关大会上的讲话也很好。但有一句值得研究，即“去年工作会议之前，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对这个提法有不同看法：

（1）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我们是盲目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虽然觉悟较迟，改正不力，但不是自觉的，也不是忠实与刘邓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在中南地区小组会上，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刘、邓一贯的错误和他们反对毛主席的言行。再道、汉华同志都在场。你们不能不知道。虽然过去我是把刘、邓作为主席培养的接班人尊敬，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我对毛主席的信仰和尊敬。十几年来毛主席到湖北不下几十次，有时住三四十天。一切警卫、招待、生活、参观、游泳等等，都是我亲自负责抓的。主席对我的教导和关怀是很多的。说我这个人反对毛主席，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一个人犯错误，甚至犯连续错误，这也和一贯反对毛主席的反党集团、个人野心家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次写的一个比较长的材料，就是为了说明我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其中，错误可能写少了，以后再做检查。但我叙述的十七年来的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连革命造反派的一些工人、学生他们也并不主张对我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政策。他们等待主席最后作决定。

请同志们把湖北省的各项工作同全国各兄弟省比较一下，我们是比较先进？还是比较落后？这要看实质，不是看说话。

四、还有说我包庇李达、曾淳，你们都知道，是我积极主张揭发批判斗争他们的。对于斗争曾淳，萧慧纳也是很积极的。现在把萧慧纳当作敌人来斗争有什么根据？即使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在我身上，也不能牵连老婆。我对于这样做是有意见的。请再道同志找史子荣谈一下，这不是讲情面而是讲原则。老子犯了错误，连儿子也好像变成了小右派！王三宝是一个好孩子，不应该歧视他，使孩子在精神上遭到折磨。群众的缺点，我们绝不能责备。问题在于领导者要出来说话、讲原则。

五、我是一个闲人，写这么些东西打扰你们。你们如有意见，也请告诉我，不再写这些东西。你们对我有什么怀疑，要我交待什么问题，也望告诉我。今后我如何行动？叫我搞些什么？写什么检讨、交待材料？都望告诉我。中央有什么指示，望告诉我。我这里好像世外桃源，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听广播、看书看报。这里最大好处是安静，好休养。近来身体还好，小毛病不断，咳嗽好了，又闹牙痛。

代问汉华等同志好。代问全家好。体学是否已经休息了！

敬礼

王任重 1967 年 3 月 11 日

【根据“钢二司武汉测绘学院所编《红武测》增刊 / 第 8 期（1967 年 9 月 22 日）”刊印】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王任重：《关于本人“文革前错误”的检查》

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对于我的错误言论的揭发批判，是一件大好事。这不仅帮助我认识错误，提高觉悟；而且对于湖北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自己头脑中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大立毛泽东思想是很有好处的。同志们，同学们对我的错误言论的揭发批判，涉及的面很广，其中有我公开发表过的作品，也有在党的会议上的讲话，还有用龚同文笔名发表的文章（写作小组的作品）。大家批判最多的是一首诗，读书笔记和龚同文的文章。在批判中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是：关于政治挂帅与抓生产、抓生活的关系问题，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问题；关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关于文艺创作的问题；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关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最近写了两分书面检讨，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以后还要写补充检讨。现在我着手写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我的错误言论的检查。由于我的错误言论很多，不可能一次检查交代清楚，因此要分几次，按作品和按问题进行检查交代。

这次写的是：（一）关于一首诗的问题。（二）关于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的问题。（三）关于龚同文的问题。

(一) 从一首诗的问题检查起

(1) 一九五九年六月下旬，我随毛主席到了韶山，在招待所的留言簿上写了这样一首诗：

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

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

这首诗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

(2) 我是不会写诗的，过去写过一些自由体的新诗，自己也觉得不像诗。对于旧诗词我更是一窍不通，不懂得平仄韵律。写的所谓旧体诗，不过是打油诗而已。

(3) 这首诗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我是用旧的和旧的词句来歌颂我们伟大的领袖，但效果是歪曲了和贬低了毛主席的高大形象。

(4) 当时写这首诗的原意是什么呢？毛主席离开家乡已经三十二年了，第一次回韶山，衣着朴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和蔼可亲，受到了韶山人民群众最热烈的欢迎。毛主席一走出来房子，男女老少就围拢来，欢呼不止。主席和乡亲们谈过去、谈现在、谈公社、谈生产。到贫农家里探望，亲切地关怀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主席还对我谈过他的父母和为革命而牺牲了的兄弟、妹妹，还谈到国内战争、长征的一些情况。以上这些事使我非常激动，于是信手写下了这样四句话。

我的原意是这样的：韶山（山的名称）的自然面貌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主席领导我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领导我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但是毛主席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同人民打成一片的革命传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努力学习的优良作风。正如许多同志批评的那样，这首诗是写得很不好的。

(5) 我还写过一些歌颂主席的诗，也写得不好。如一九五九年为湖北省报封面的题词和同年九月二十二日写的“我们要唱东方红。我们歌颂毛泽东”（见谈心集），现在检查起来也是有错误的。例如一九八九年七·一为湖北省报封面——毛泽东半身像，写了这样一首诗：

我们热情歌颂，亲爱的毛泽东。

是领袖又是朋友，是同志又是先生。

我们热情歌颂，亲爱的毛泽东，
你和人民心连心，你是我们的引路人。

同年九月二十二日写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诗：

我们要唱东方红，我们歌颂毛泽东，
他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的头脑；
他的声音，永远是我们前进的号角！

前一首诗的内容很浅薄，没有表现出伟大领袖的作用和广大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无限信仰和无限热爱。后一首，把毛主席仅仅说成“他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的头脑”。这是不对的；特别是和本文中所引用的马雅可夫斯基歌颂列宁的诗对照起来看，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性的错误。如马诗是这样写的：

在世界上
出现了
巨大的头脑——列宁

事实早已证明毛主席是活着的列宁，是被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爱戴的领袖。毛主席无论在革命实践方面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不仅超过了马克思，也超过了列宁。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杰出最伟大的领袖。

（6）同志们还批判了我写过的几首诗：如杂感诗苏小小，白蛇何去耶？这是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流露。在看了苏联新西北利亚芭蕾舞团在汉口演出的天鹅湖之后，我也写过一首不好的诗：欢迎你，天鹅……踏着天国的旋律，歌颂爱情的纯贞。这说明我是欣赏才子佳人的。这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写这样的诗并且发表出来，其影响是恶劣的。在一九五八年还写过几首鼓吹浮夸的诗，其影响也是很坏的。

（二）关于《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的问题

（1）正如许多同志指出的那样，这个“读书笔记”是一株大毒草，应当彻底批判以肃清其流毒。最近我又读了几遍杨家志同志写给我的那封信，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他以满腔革命热情给我写了那封信，在信中对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严格的要求，我当时应当虚心地听取他的批评，和诚恳地感谢他，但是我由于个人主义的思想作怪，拒绝了他的批评，并且把信转下去要在咸宁参加四清的武大同

学讨论一下，以便消毒，结果使杨家志同志和同他观点相同的张健同志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我的罪过。虽然当时曾经对地委书记交待过不要斗争，不要处分，但是既然把信转下去了，（对）杨家志同志的打击，我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金科等同志的受打击迫害，我是要负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的。我违背了毛主席教导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对于向中央检举控告我对金科等同志采取打击报复的手段更是违法乱律的行为，我再一次向杨家志同志和金科等同志低头认罪，赔礼道歉。

（2）在“读书笔记”中有许多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最主要的错误是违背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惟一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我陷入了二元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在封建社会，只有农民的革命战争，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动力，我在序言中却胡说什么“有道明君”，对于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按语中更大大地美化了帝、王、将、相。这是替封建僵尸唱赞歌。还把“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种封建阶级的“御民术”，也不加思索的加以引用，简直是荒谬绝伦了。

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鼓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之外，在他包庇和支持下的一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战线上大搞崇古崇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几乎占领了整个舞台，连话剧也演起武则天、越王勾践等死人来。在学术界、出版界也刮起了一股复古的黑风，各种古书大量重新出版。我不仅没有向这股黑风进行斗争，而且受了它的影响。在一九六一年春买了一部线装的《资治通鉴》读起来了。自己读不大懂，又自不量力地从中摘录一些段落推荐给干部阅读，这就大错特错了。革命同志们怀疑我是不是吴晗、邓拓之流唱的是一个调子，不是没有根据的。

（3）我在“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这篇短文章中，所作的自我批评是非常肤浅的。目的是一为消毒，二为带头。但修改的序言和按语都没有达到消毒的目的。因此也就起不到带头的作用。在文章里写了“我们共产党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在斗争中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把一切落后的、陈旧的、错误的东西，统统从自己头脑里清洗出去。不破不立，只有在斗争中前进！”在这里可以看出我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杨家志同志说得对：“这些已经足够证明你

对封建统治者御用文人编的历史毫不加批判的拿到今天。在全省干部中散布历史的唯心主义毒素。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批判的时候了。”我十分欢迎批判，我要认真地阅读这些批判，进一步检查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观点。

(4) 当时写这个读书笔记的动机确实是：“①为了使我们的干部增加一点历史知识；②是为了使我们的同志懂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挑选干部以及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清理一下自己思想）。重点在于批判“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特殊化风）的错误倾向。按语的绝大部分是针对我们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批评或自我批评的。例如读书笔记之一，第五页“解决小偷小摸的问题，要从关心群众生活着眼，不要滥加处罚。”当时湖北省的确有对小偷小摸滥加处罚的现象，我们的错误是没有首先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再如第九页“我们这几年来，大办水利虽然过多，群众怨言不多；而大兴土木盖办公大楼、招待所等等，则群众甚为不满，所以今后要严禁修建这些东西，丰收之后也不要忘记，要首先帮助工人、农民解决住宅问题。我们领导机关艰苦朴素的作风，要能保持五十年就好了。”这些话我在党的干部会议上也讲过许多次，但我的生活就不是艰苦朴素的，而是贪图安逸和享受的。这表现出我的言行不一。

再如读书笔记之二，第三页按语，关于秦始皇这一段按语写得很不好，用意还是和前边一样：“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爱惜人民群众的热情，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要节约使用民力，要尽量少搞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这种教导，我们应当永记勿忘。”

再如第五十一页，按语“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必须对农民实行合理的负担政策。同时还必须坚决走农业集体化、机械化的道路。”

在各种会议上，我曾经作过许多次自我批评，直到一九六四年春在全省农业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我还讲过，我是第一个大混人。

上述举例，说明我不是像吴晗、邓拓之流一样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更不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但是我的错误仍然是十分严肃的。写这种“大毒草”是一种政治性的错误。这说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谬论使我中毒不浅。刘少奇的论《修养》也使我中了毒。我还没有从他们散布的谎言和偏见中解放出来，而且还用这种谬论去害人。我不是满腔热情地提倡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以身作则的带领大家向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英雄人物学习，而号召大家去学习那

些封建僵尸，所谓“明君”“忠臣”；这就大大地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

杨家志同志说：“你说共产党员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我们不仅仅和外界的一切牛鬼蛇神战斗，而且还要和自己脑子里的牛鬼蛇神斗。否则，只会是一个口头革命派！”这话很对，我要坚决和自己头脑中的牛鬼蛇神斗，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三）关于龚同文的问题

（1）龚同文是省委机关的一个写作小组的笔名，参加写作的人，有省委书记处书记，也有省委办公厅的一般干部。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开始，到一九六二年一月止，大约一共写了二百多篇。写得最多的是梅白，他写的大约占一半以上，其次是我写的一共有几十篇。梅白这个人品质恶劣道德败坏，被开除了党籍的。他的思想方法非常片面，忽“左”忽右，一九六二年在荆门，背着省委地委大搞分田单干，这个人旧的思想意识很浓厚，骄傲自大盛气凌人，许多干部对他很不满意。我当时看中了他有“才”，能说会写，信任他，器重他，这是非常错误的。在他被开除党籍之后，我还让他到湖北日报当记者写文章，也是错误的。其他同志如张平化、赵辛初、许道琦、王树成每人都写过几篇。龚同文的文章，虽然大部分是梅白写的，但是其中的错误，我仍然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因为：第一，有些文章是我授意他写的，或者是他根据省委会议的精神写的；第二，有些文章是经我审查过的；第三，没有授意没有审查过的我也要负责任，因为我是这个写作小组的组长。

（2）成立这个写作小组的动机，是为了推动全省广大干部写作，在我们的带动之下，省直机关和一些地委、县委也建立了写作小组。一九五八年省委作过决定：以工作为中心，把学习、工作、写作三结合。我们写的文章，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且针对本省干部中的思想问题，进行思想工作，我们这个写作小组写的文章，有的是写得比较好的，起了好作用的；也有的是写得不好的，起了坏作用，龚同文的文章，有许多反映了我们省委当时的指导思想。我们认识上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有许多可以从龚同文的文章中看出来。例如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和“命令风”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同志们对龚同文的文章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对我们省委过去工作的检查批判。因为我是前湖北省

委的第一书记。省委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是负主要责任的。同志们把批制龚同文的矛头对准我，是应该的。龚同文的文章，有的对同志采用训斥命令甚至讽刺挖苦的方式，这是错误的。我在“论压力”一文中没有作自我批评是不对的。

(3) 有的同志质问，龚同文写作小组是不是中央下令解散的？不是，是我们小组自动解散的。当然也与前中宣传部阎王们施加的压力有关。一九六二年一月陆定一、许立群等阎王除了对我进行污蔑和打击之外，还指责我用龚同文笔名写的“公与私”、“母子谈心”被苏修、南修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借口，指责我写的“母子谈心”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还说，龚同文已经引起了苏修、南修通讯社的注意。我当时抗议和反驳了他们的污蔑和打击。后来经小组同志讨论决定解散了这个写作小组。我们笔名改为思谦。我用这个笔名大约写了十来篇短文，一篇论文，有什么错误希望同志们批判，我另行检讨。

(4) 同志们批判龚同文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就是关于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政治与生产、政治工作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九六零年我们在干部会议上曾经学习和讨论过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一九六四年我们又三级干部会议上学习了解放军关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开展“五好社员”、“五好生产队”的比学赶帮运动。但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政治思想工作都抓得不够突出，不够落实，直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全省农村政治工作会议，关于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问题，才有了比较深刻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时我们还提出了改变农村的评工记分办法，取消企业的奖金制度，纠正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工分挂帅”和“奖金挂帅”的偏向，以便突出政治，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正确地认识和贯彻执行政治挂帅，对于我们广大干部来说，仍然有着迫切的和现实的意义。

大家批判的三篇“如何打百分？”都是梅白写的。他说，“什么是永远的中心工作呢？生产、生产再生产。”这显然是错误的。又说“没有生产观点”就是没有政治观点，就更加荒谬绝伦了。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政治与经济、业务、技术是对立的统一；要用政治统帅经济、业务、技术，要又红又专，以红带专，我们省委当时讨论过，中心工作与部门工作的关系问题；在整风反右以后的工、农业生产高潮中，把发展生产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要求各个部门的工作为生产建设服务

这本来是正确的。当时为了反对齐头并进、百废俱兴的偏向，提出要“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这也是正确的。但作者把它夸大的那样的程度，就变成荒谬的了。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曾经这样教导我们：“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的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么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这里说的是各个部门的日常工作与生产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不是指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不是指政治工作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问题。毛主席是历来教导我们要政治挂帅的。他指示说：“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又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一贯的战略思想。十七年来毛主席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种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搞革命斗争单纯地化生产论生产，不做政治思想工作，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大搞计件工资、物质刺激，个人名利以及束缚群众创造性的繁琐的规章制度等等，则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我们在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是不够清醒的，是缺乏自觉性的，因而常常“左”右摇摆。有时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也有时跟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一段的，经过毛主席的纠正，又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这些错误都使我们的工作遭受到不少的损失。但是从十七年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说，我认为湖北省委基本上是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外）湖北省十七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成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我在湖北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初步总结了我們十七年来的经验教训，除了某些提法上以及个别观点上的错误以外。我以为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湖北省

的实际情况的。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还有揭得不深、批得不透的地方，我们必须和广大革命群众干部一起进行检查批判。特别是要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过程中。提高我们的自觉性，以便彻底纠正我们的错误，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5）同志们在批判中，提到我写的文章约有上百篇。其中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有“群众的干劲越大，越是要关心群众生活”“提倡什么？鼓励什么？”“公与私”“交心谈心”等等。

在“群众的干劲越大，越是要关心群众生活”这篇文章中，我是这样说的：“我们党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领导些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领导思想，就是要政治挂帅。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第二件事情是领导生产。第三件事情是领导生活。领导思想，领导生产，领导生活，就是领导人，关心人。……我们领导工作的好坏，不仅要看生产增加了多少，人民收入增加了多少，而且要看群众的思想觉悟是否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是否过得好。”（一九五八年十月）

在“提倡什么？鼓励什么？”这篇文章中我这样写的：“我们主张政治挂帅为主，使物质鼓励服从于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的目的，使物质鼓励成为激发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英勇劳动的一种必要的辅助手段。提倡什么？鼓励什么？提倡共产主义精神！鼓励共产主义精神！”（一九五九年一月九日）

在“交心谈心”这篇文章中说到了我所写的几篇论“公与私”和生活集体化的文章这样写的：“我那几篇文章当中的错误是什么呢？我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认识不够；第二，因此，对于逐步的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增加共产主义因素这一方面强调过多，而对于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这两个社会主义分配的原则强调不够；第三，强调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正确的，但是没有注意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物质鼓励的作用。第四，提倡生活集体化是对的，但是没有说明生活集体化的程度，只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的政治思想水平，文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发展；第五，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家庭不仅作为消费单位保存着，而且对于少数个体手工业来说，家庭还是一个生产单位。对于人民公社社员来说，他们主要是参加集体生产，不再是个体农民了；但是还有小量的自留地和小农具，私人养猪种菜还是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在上面提到的这几篇文章中都提到物质鼓励，这是不妥当的，“物质鼓励”的说法很容易与赫鲁晓夫的“物质刺激”相混同。在去年我用思谦笔名发表的批判赫鲁晓夫的物质刺激的时候，也用过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话，这是不确切的。正确的科学的提法是毛主席讲的，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第一位，还必须实行必要的按劳分配。所谓必要的按劳分配，就是说，既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斤斤计较。

我强调了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提倡大公无私，不计报酬的劳动，热爱集体热爱国家批判自私自利观点这是对的；但是没有强调向资产阶级思想，向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作斗争这是错误的。这说明我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很不理解的，以为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春季整风反右以后党的中心任务是技术革命，是生产建设了。把政治挂帅仅仅看作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很不理解，因此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对于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猖狂进攻不闻不问，这是十分错误的。

在讲政治挂帅的时候，没有提倡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没有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提倡学习“老三篇”，这样所讲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群众就落空了。这个问题直到一九六六年贯彻执行林彪同志的号召，才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6) 关于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党的正确方针。为此正确地处理分配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请看毛主席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合作社正在经历着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又说：“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之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

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在农村工作中，要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同时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永远坚定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办事。

我的错误在于有时把改善生活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如一九五六年元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篇文章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描写为“青山绿水，花花世界，丰衣足食，人面桃花”。这就脱离了无产阶级政治，看不到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的精神面貌了。在强调搞好人民公社的年终分配时，我提过“抓分配，促生产”的错误口号；在灾荒年强调安排好群众生活是对的，但提“右手抓生活左手抓生产”的口号也是错误的。以上这个口号，虽然是作为暂的工作安排提出的也是错误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能用抓分配、抓生活来代替抓革命、抓人的思想革命化。虽然我们省委十七年来的工作，基本上是按照毛主席亲自制订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进行的，但是我们在政治挂帅、在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方面仍然有许多缺点错误。在这场触及人民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应当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全面地系统地检查总结工作，充分地揭露我们认识上与工作上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以便肃清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个领域中的流毒。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彻底纠正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使我们能够坚定地更好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

以上是关于我的一部分错误言论的初步检讨，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初稿

造反派组织宣布夺权，武汉军区宣布解散工总、二司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

毛主席最近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它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决派，这是革命派通过“斗私批修”，从造反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产物。决派，这是一个牢记着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它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的教导的勇敢的大军。在这个的最后分界线上，一切犹豫的，徘徊的，被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拖累得精疲力竭了的人决不能与决派同伍而分道扬镳。决派这是要同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一代新人。……

决派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

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运动，中国最大的运动，无不是农民的运动。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将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地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脏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伟大的中国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活力。……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1967年2月10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红武兵”（百万雄师主力）“造反大队”、“二·一八”红星军、“中学红卫兵”等7组织，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组织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王任重、宋侃夫大会”，有三万人参加。

他们改变以往保皇派的面貌，和工总、工造一样，也组织批斗省、市领导人的批斗大会，这样一来，又有不少原来职工联合会的群众聚集起来。这些组织和三新、工造总司等，同属毒草派，所以有些人认定他们是属工造三新一方的造反

派组织，他们游行和工造、三新一道，观点基本相同，但二者也有明显分歧。

双方一致认为，军区 2.18 声明是正确的，支持军队，孟夫唐是修正主义分子是走资派，不能参加三结合；二者分歧在于对待“工总”问题上。工造总司三新认为，工总是革命群众组织，头头大多数是好的，但后来少数头头修了，只要换上头头，工总才有前途，继续革命。而红武兵等 7 个组织认为，工总是由坏人操纵的坏组织，是五类分子，牛、鬼、蛇、神占主要地位的“反动保守组织”，“保刘真、保张华（省委秘书长）、保他们的干爹朱鸿霞”。不是造反组织，是历次运动批斗的对象，决不允许这个组织参加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后，武汉军区镇压军内造反派

二月二十一日，军区副司令员杨××，副政委叶×亲自率领二十多个连的兵力、五十辆大大小小不同的军事车辆，还有囚车，配有轻重机枪、大炮、高射炮等大型武器，在夜色的掩护下，突然袭击高级步校，围剿「红旗」、「红色」等革命造反组织。先后捕人十六人，第一个被捕的人高喊呼：「毛主席万岁！」刚喊一声就有人钳住这个战士的喉头，口里强行塞进手帕，然后，五花大绑。杨××、叶×公开宣布红色造反团、红旗为反革命组织，宣布黄×、郑×等二十五人为「反动组织」骨干，除逮捕的人外，其余都交群众监督，对一般人员大搞人人过关，个个检查，原「红旗」、「抗大职工造反团」、「反修」、「满江红」等战斗队都得交待跟着「红色」、「红旗」所干的坏事。副司令员杨××在二月二十三日全校人员会议上说：「军区采取这么大的行动，你们想军委不知道吗？军区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要经过军委批准！」，「黄×、郑×是军委点名要抓的」。

二月二十一日，空军部队副司令员×××带领两千名全副武装人员并配合各种轻重武器，突然包围「雷校」，当场逮捕了十八人，并宣布「红总」为「反革命组织」。对各级勤务员进行大会轰，小会斗，被斗的达一百六十人，共三百三十六人次被斗。

二月廿三日，派八二零一部队一个加强连分乘四辆卡车，枪上刺刀，车头架上机枪，长驱直入后字二四八部队。进校后，校内部执行军事管制，接管广播台，到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会场每个门都站了哨，大门第一排逼着刺刀，第二排则架起机枪，校内外来往断绝，当时逮捕九人，后被打进劳改队，由带着刺刀和

冲锋枪的战士看守，连上厕所也有人跟哨，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二月二十四日凌晨，派出二十多辆军车大批全副武装人员，把护校围得水泄不通，大门、小门、窗门都布满了带枪的岗哨。当场逮捕十余人，事后派进工作组，三月十日又召开了「愤怒声讨红色造反派大会」，军区副司令员杨××说：「你们后勤不能搞温良主义呀！」「好一个反革命骨气，要低头不低头，你们好大的胆子，.....给我捆起来！」当场杨××副主任就宣布：「根据群众的要求，把×××依法逮捕！」马上就把这位战士的军大衣剥下，领章、帽徽被拉掉，绳子勒到喉下，一低头气都透不过来。那天还捆了另外七位同志，其中有十七、八岁的女同志，都戴上了手铐。军区副司令员杨××说：「.....你们（指革命造反派）把军区搞得好苦啊，把这个拉出来斗，那个拉出来斗，跟你们说好话都不行，.....专搞打、砸、抢、抄我们的家，.....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就是要报，不是秋后算帐，而是春前算帐！」

据不完全统计，二十四个革命造反组织一律解散，非法逮捕了一百七十五名革命群众，宣布行政管制四十三人，监督检查的二千零九名，提出警告的更是不计其数，逼迫自杀四人（二人被救未死）、开除军籍一人，上台示众约有一千零二十五人。

采取突然袭击，深更半夜重兵包围，多至二团少至二个加强连。领导人亲临现场指挥，架起迫击炮、重机枪，带上火焰喷射器、收发报机、绳索、手铐、刺刀上枪，子弹上膛，层层包围疯狂捕人。如为了抓两个仅十六岁的青年学员，对造反派仅有六十余人的空军护校竟然出动了二十四辆大卡车的全副武装战士，冲进去后将革命小将从被窝里揪起来，戴上手铐，架上车就走，就连十九岁的女学员也被戴上了手铐，送进了监狱，每到一地捕人的同时宣布通令：我们请示军委，徐向前副主席批准，××组织为反动组织，立即解散。徐副主席讲，陈、钟首长不是三反份子，如炮轰陈、钟首长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徐（向前）副主席说：李迎希、张广才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组织与李迎希、张广才勾结阴谋篡军。××组织是反动组织，所有成员是专政对象，在没有解放之前，不能叫同志，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立即交出反动纲领，反动传单，反动材料，交出一切文化大革命用品，否则查出严加处理。任何人不得外出，外逃人员三天不回来，开除军籍，不能改头换面，成

立组织，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反省交待，违者以纪律论处。对一些军事院校还专门派飞机散发传单和散发解散××组织的通令。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陈再道接见湖北“三新”“三司”代表的讲话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当前的革命形势好得很。

我们在北京开了五十多天的会，受了很大的教育，特别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教育很大。毛主席、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要到群众中去“亮相”。我们就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不光是我一人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我们整个军队要站在左派一边。

我们回来一个月了。我们回来，首先整顿了内部，稳定了自己。抓了支援地方革命左派，抓了支援春耕生产，抓了支援农业，还有军管、军训工作。支左工作虽然抓了，由于地方和军队内一小撮坏人捣乱和破坏，因此，影响武汉地区形势的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是第一梯队，现在上阵了。我们站在左派一边，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工人总部号称四十万，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解散工人总部，对你们就是很大的支持，不然，他们可能把你们砸了。工人总部的九个头头，七个是政治严重不纯分子，干了很多坏事，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组织，我们还没有宣布反动组织，只宣布解散。因为广大群众是好的，是要革命的，要打倒的只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二司，同对工人总部不同，二司成员绝大部分是好的、只是二司做了很多坏事，我们不是没有材料。让他们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把坏人搞出来。我们是历史的看问题的。二司以前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中，是有成绩的。但以后干了很多坏事。工人总部干了的他干了，工人总部没干的他也干了。但二司广大群众是好的，头头也有好的，他们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

现在的总部，在实现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大联合以后，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你们怀疑我们不依靠你们，不依靠你们依靠谁啊？什么事情不是同你们商量过呢？你们说有人想把你们整垮，谁想把你们整垮，你们不同意，我们也不同意，我们要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望你们这些组织，去团结其他革命组织，

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达到团结大多数。革命嘛！要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敌人孤立的越小越好。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教导我们：“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政策”。当然，不能搞“大杂烩”，要团结革命的、以及犯过错误愿意改正的人，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就是对其余的百分之五的人，全国就是三千五百万，我们也要改造他们，给他们吃饭。

对三字红卫兵，我们过去表了态。在运动初期，他们同你们一起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还是有成绩的，以后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他们受蒙蔽犯了路线错误，保省委、保王任重、保张体学犯了错误。但我们要看那是在什么情况下，那时候许多干部都没有认识到，他们都是青年学生，也没有认识到那是错误的。这个责任不能由他们负，不怪他们，应该由省委负、王任重、张体学负，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负，罪在他们。去年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张体学的检讨也承认了，他们还不承认啊！他们也检讨了也批判了么，你们湖大那个漆林，过去确实是死保，我们到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张体学也带上了嘛！这个人也批斗了嘛！如果改正了，也不要抓住不放。这些人也得给个出路，容许他们改正错误么！我们有些革命群众组织又有些关门主义情绪，不要他们，我们就讲了几条，同意他们现有基层组织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也可以建立新的革命组织或参加其它革命群众组织，但不要恢复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的总部。给他们个出路。我们这些革命几十年了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还有盲目性吗，他们都是二十来岁青年，政治还不成熟，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嘛！我们革命同志，要从各方面考虑问题，对中等学校更是这样。他们起来应该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二·八声明”，不能把矛头指向你们。你们说他们整了你们的材料，想整你们，打倒你们。如果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但不要怕，你们只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是打不倒的。你们自己的问题，可以发动群众，在整风中解决。对他们我们还要做工作。你们也要帮助他们。要象帮助小弟弟一样帮助他们，不要冷眼看他们，把矛头指向他们，要帮助他们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团结他们一起闹革命。革命派善于团结大多数，团结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还要团结反对过自己而被实践证明犯了错误的人。

你们对二司的看法很慎重，我们同意你们这种慎重。刘邓路线是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这个案是翻不了的。当然还有人企图翻，我们坚决反对。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清敌我。军队内也有阶级斗争，也有坏人，罗瑞卿就是嘛！你们的组织就那么好吗？人人都是左派？（钟政委：共产党是左派，但党内也有混进来的右派分子。）你们也要警惕坏人。不要认为左派就久远是左派了，你们有成绩，但不能骄傲不能吃老本，躺在成绩上。我们革命四十年了，还不说就革好了，还要继续革，要成为坚定的真正的左派，要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我们对己要严，对人要宽，对敌要恨，对友要和。对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对反革命逆流，你们得警惕，我们也要警惕。现在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帝修反在我国边境搞鬼，我们不能麻痹，要搞好战备。我们要准备对付拿枪的敌人，还要准备对付不拿枪的敌人。

你们几个组织之间也有分歧，这是正常的现象，不同观点要允许，谁对谁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会证明的。

搞好运动还要靠你们，靠广大革命群众，我们不能包起来，也包不起来。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搞人的思想革命化，搞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抓了工农业生产，生产搞不好，要影响国民经济。影响文化大革命，影响世界革命。为什么不搞全市性的大活动、大游行，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还要节约闹革命，如新华工开会不坐车，步行几十里。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的经济主义恶果很大。现在还有人坐不下来，要做思想工作，回到本单位进行整风，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我们还要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总结经验，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你们说工厂的情况怎么样？据我了解，情况是好的，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指挥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正在实现，生产在上升。

毛主席提出：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群众，我们全力以赴，抽调了大批的人支持地方。学校的军训，你们反映时间长了，可以搞四个钟头，其余的时间搞革命。四个钟头中，一个钟头搞军训，三个钟头学毛著。我们去搞军训的同志总是好的，但工作没有经验，民主作风不够，方式不够好，如果有，今后要多同他

们商量，以你们为主，不对的地方，你们可以提出来改进。去军训的同志，主要是支援毛泽东思想，训练中，以毛主席著作为主，和群众一起学习。搞训练，以你们为主，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也包不了，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上有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下有广大革命群众，我们去训练的同志，一要依靠群众，二要请示报告。

三结合、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我们什么时候搞起来，开各方面代表大会，靠大家努力。

搞三结合，你们对干部有意见，可以提，可以批判。现在省里出来几个人不是解放了，说我们保，我们不保。三反分子坚决不能用，有严重错误的，群众要求检讨，还是回去检讨。边工作边检讨。

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毛主席指示我们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这么大的任务，又没有经验，不可能工作中没有缺点错误，欢迎你们提出我们改。今天你们提了，很好。这个会以后还要开。在学校工作的军队同志，要满腔热情搞好，没有经验，要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同他们商量，依靠他们，他们做主。

今天就讲这些。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陈再道钟汉华对湖北军训团及群众组织的讲话

（传达者的说明：三月二十八日陈再道、钟汉华，召集了湖北军训团的同志，以及新华工、新湖大，武大三司的同志座谈，上午分开谈，下午一块谈，陈、钟作了讲话。这两天街上有些大字报，对首长的指示有些反映，有些反映是正确的，有的歪曲了原意，我的传达根据我的记录，内容和次序可能有出入，但基本观点变化不大，以后如果发了正式文件就以正式文件为准。）

提到刘邓路线时，钟汉华讲：

刘邓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刘邓路线就是不相信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谁为刘邓翻案，我们就要抓谁。这是不允许的。革命造反派内部不要搞小动作，要

讲事实摆道理。

钟汉华对参加座谈的同学代表讲，你们是先锋，工农兵是主力，现在主力用上，学校里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没有揪出来，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还没有批判，要把学校办成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任务还很繁重。军队到学校里来没有经验，军队的任务很重，军队有五大任务，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去是帮助你们，也是帮助我们改造思想，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上午有的同志说得好，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拥护，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反对，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在斗争中要提高警惕，要防止坏人制造事件，有个中学要复课，有的人不干，把桌子、椅子都破坏了。把灯也打坏了，矛盾是会转化的。

大字报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要用阶级观点来看问题，认为马路消息就是正确的就会犯错误。参加抓革命、促生产班子的有的还没有过关，还没有检查，这个向同志们讲清楚，现在不是三结合，是要这些人出来干工作，不是说没有问题，他们的问题该检查的还要检查，可以监视他们工作嘛！

“二八声明”必须彻底批判，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结合起来搞的，你们要扛起批判“二八声明”的旗帜，要批深批透，“二八声明”远没有批倒。

对原来保守组织的成员，要允许他们革命，要积极支持他们起来革命，包括高级干部在内，改正就好了，要把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区别开，不区别就还是打倒一切，“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现在不提了，有些人老检查，老不能触及灵魂，打击面就宽了。原来大专院校红卫兵，大多数是工农子弟，是好同志，看一个人要看某一事，还要看全部历史。

（下面谈到了对二司的看法问题）工人总部做的，二司差不多都做了，工人总部没做的，二司他做了，二司广大群众不要人人过关，（团长讲话：对二司的问题，我们部队的态度是明确的，广大战士无罪，是受蒙蔽的；相信他们会起来革命，在批判揭发炮制者中受到教育。）

文化革命的三个目的不要忘记了，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完成斗批改嘛！

我们没有什么偏心，工人总部有我们的家属，我们也抓了嘛！先革命的好，但躺在床上睡大觉就不好了，陈独秀共产主义小组就有他，后来他成了叛徒。不要吃老本，过去有功就骄傲，老子天下第一，我们老家伙不能吃老本、革命小将也是如此，革命者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左派队伍中也有左、中、右，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是少数，中间的是多数，保守的也可能有。

（钟汉华对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讲）大联合你们要好好宣传，责任交给你们，搞不成由你们负责，有些话你们不要讲，你们要起模范作用，带动其他人。

陈再道讲：

我们坚决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整个部队也是这样，有人说，我们不是支持左派，解散工人总部就是最大的支持嘛，工人总部很不纯，九个人就有七个坏分子，工人总部是群众强烈要求解散的，没有宣传是反动组织，只解散，因为下面大多数是好的，只打击一小撮。

二司成员大多数是好的，但也做了些坏事，我们掌握了些材料，要他们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把坏人揪出来，二司以前做了工作，是正确的，但以后大方向错了。干了许多坏事，工人总部干的二司都干了，工人总部没有干的，二司也干了，头头大部分出身是好的，广大群众是团结对象。

我们还是依靠你们嘛，不要怀疑，靠得越近越好，依靠你们，团结中间派，孤立一小撮，对犯错误的允许改，允许革命，要团结 95%，就是 5%，全国七亿人口也有三千五百万，要区别对待，要改造斗争。

“三字兵”这个组织是犯过错误的，确实保卫了省委，但当时的情况要考虑，那时很多干部认识不清，责任在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问题你们（指与会者）对我们起了很大的怀疑，甚至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他们从十月份后就觉得错了，责任不在他们身上，要帮助他们掌握大方向。

要把批判“二八声明”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刘邓，很多人犯错误是盲目的。（以第二次革命战争为例——略）

大专院校红卫兵年纪也不大，也是青年人，（有人提他们起来搞我们的黑材料）你们怕什么，打不倒的，有材料收集一点也好吗！没有就收集不到。（代表讲对二司广大战士态度应慎重）这是好的。

左派中也有右派，共产党中也有右派，我们革命四十年了，现在起来也很吃

力，四十多年的老本也不能啃，要锻炼，要考验，上面讲的对不对，实践会证明。

为什么不搞全市性的活动呢？因为现在正在搞抓革命促生产，武汉地区，湖北省这段抓革命、促生产有很大收获，大活动牵涉面很广，影响大。要节约闹革命，新华工到新华路开会，跑去跑回这很好。过去我们打仗走小路，现在你们走大路。（这段是大意）有很多地方有很大浪费，原来有一千吨纸印毛主席著作的，被这些单位动用了七百吨，有的把不能动用的战备物资也动用了，生产上去了，对国际名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援国际革命都有巨大的影响。

学校要好好整风，好好提高，不好的抛掉，用毛泽东思想好好总结。

（谈到军训问题，有的同志讲训练时间长了，有人提部队不来他们学校，联合早搞好了）训练时间多了，可以少搞一点，一天四小时，你们说我们去的不好，可以退出来，到其他的地方去嘛，训练是毛主席指示要搞的，现在不搞，以后还要搞，去的人总起来是好的，但有缺点，民主作风差一点，跟你们商量，以你们为主，不能包办代替。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年9月）

三、武汉造反派提出为工人总部翻案、炮轰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陈再道在湖北“省司”与“省人司”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月三日《省司》召开会议传达陈再道的讲话。《省司》：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群众组织，《省人司》：湖北省人委机关群众组织】

陈再道问：你们斗了王任重没有，这人要搞一下，会要开大些，是否把厅局长开个会。（江局长说，人太多了，是否分两层开，书记、秘书分开，上下揭，内外揭。）二司与工人总部把他们关起来，实际上是保起来。王任重写了几个东西，还要通过军区转发到地县。光写成绩，成绩是如何取得的，说他为什么是三反分子，抓住成绩不放，对错误没有认识，未触及灵魂，把张体学与他关在一起，要张体学揭王任重，张说：“你像不像三反分子，我看不像”。

（另一首长插话说：可以让三司、新湖大联合起来一起搞。）

陈再道说：要准备材料，原来打下马是可以的，今后就不能这样了。

（人委有人提出：有人有右倾，张体学搞来搞去还是二类干部，斗韩宁夫连口号都喊不起来，到九点人就走了很多。汇报后，）

陈再道说：站出来的干部要树立一定威信，否则，抓也抓不起来。工农业问题很大，武锅四月份要造八十个锅炉，现在才搞了两个。国务院还布置移民问题，抓省委抓不到就抓我们，国务院通知要办。原来韩宁夫，夏世厚不出去了，有的没有大错误是否出来抓工作，革命是要把问题弄清，一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可救药的人，二是混进潜入队伍的坏人，要打倒，其他犯错误的斗争一下，批判一下，批判斗争范围如何划，我看斗批差不多，一般说批判的方法好些。

省委、人委，开始几个同志搞起来的，有的，领导错误不大是否可吸收入兵团，把坏人最大限度孤立起来，我们要不断地扩大，不断地发展巩固，不是和稀泥。有的好干部出来抓工作，群众也了解，如把他放到一边，群众不了解，出来后就感到突然，你们抓毛著学习抓得及时你们的领导是否还在扫厕所？曾惇扫厕所是可以的。（江政委说：都在改）各单位派了值班，要通过革命更好地观察干部，看他是否站在毛主席一边，是否和革命派站在一起，要把能团结的都团结起来，把坏分子孤立起来，最后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当然具体到各个单位也可以多几个，少几个，站出来的干部要信任他们，群众不了解就要解释。

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武装每个人的头脑，把干部重新排队，把错误澄清，使他们改正错误。教育改造干部，要丢掉过去不民主的作风，通过批判把革命的积极性引到工作中去，把私字打倒，工作就会搞好。

革命的另一任务就是要把坏人揪出来，把党政财文大权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夺坏人的权，厅、局长要重新排队。

革命的目的是揪坏人，培养教育干部，把权夺到造反派手里，还要发现人材，在革命中把坏人搞出来，把好人提上来，当前是大革命，群众是好的，要发现涌现出来的人材，掌握毛泽东思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以后就要这些人出来工作，罢官也要罢一些，有些人工作能力很差，也可能调整，不要他们搞那么多工作，掌那么大的权，把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干劲大的、作风好的同志推出来工作。

革命队伍要纯洁，特别是领导更应该好些，有的人私心杂念重，这么大的运

动，斗争，有少数个别人要注意，历史问题可能有个别人是严重的。老实说，这样的人不要他参加全面搞，按公安六条，要他老老实实劳动。所以你们这一工作是光荣的，你们要抓两头，抓中央指示，抓学习毛著，抓动态，抓活思想。

现在要调查研究，找事实，找根据，要定案，要他们翻不了案，所以我们的斗争艺术、策略、方法也要提高。看干部要看大节，看立场观点，看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界限是否清楚，对毛主席是否无限忠诚。

现在形势好的很。现在有个文件写好了，大专院校对“二八声明”认识不够，与刘邓路线分开来看，新湖大坚持不批判“二八”声明，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他有看法。大专兵保省委犯了错误不能怪他们，怪王任重、张体学。他说他是党的好儿子，这是用来迷惑人的，所以抓“南下一小撮”犯了错误。开始。他们没有把握，后来他们打出来，你们不要他们，他们就下厂下乡，现在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为什么不可以？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是要注意的，今后也要注意，有人把“三字兵”当作敌人是不对的，要允许别人改正错误，欢迎别人革命。现在有一小撮人造谣表演跳出来，华农有一幅画，画的是一手拿左派，一手拿右派，锋芒所向是清楚的。

生产下降了，怎么听外国人说，学生不搞军训、不管工农，还要出去，“二八”声明也不让批判。为什么要把串联取消，也是要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二司批判“二八”声明不下，说谁批判“二八”声明就没有好下场。有的说：为什么不让去工厂？就是不让去！在学校搞斗批改冷冷清清，学生就喜欢轰，打旗子，再搞就不行了，过去搞是必要的。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陈再道钟汉华给湖北“新华工”等组织的电话

陈再道：要求你们少数人坐下来谈，我们有错误就改嘛！那么多人影响不好，无论怎么样，咱们都是一家人，革命，我们有缺点，有错误就改嘛，你们要考虑影响，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是不动摇的，要求你们团结那些受蒙蔽的同志，希望你们正确的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我们依靠你们新华工、新湖大、二司战士，是不会动摇的。受蒙蔽的，你们要争取他们，用瓦解的方法争取他们，团结他们，

我们一定会在今后跟你们站在一起，这个政治影响是会挽回的，解放军要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要相信我们，对受蒙蔽的同志要瓦解他们，解放军要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的同志可能犯了一些错误，但不能因为少数人的错误而影响我们的关系，这样搞很不好，我们应该团结得更紧一些，你们是左派应紧紧地和我们团结在一起，重在表现嘛，你们要看我们的行动。

你们应该和我们商量，我们要站在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有错误就改正，就转变，你们以后看我们的行动，要叫我们改嘛，要照顾影响。

这个问题（矛头指向解放军的问题）我们负责，不怪你们，要想办法弥补这个损失，你们要原谅两天。

钟汉华：刚才陈司令员说你们是左派，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有缺点、错误就改正，《湖北日报》要搞个报刊监督小组。新华工、新湖大、三司、二司各一人，你们协商一下，监督报纸办好一些。

希望你们能写一些比较好的文章，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写的文章在报纸上登，在政治上树立你们的威信，结合批判刘邓，要批判王任重，搞一个筹备小组，对刘少奇的问题要批深批透，要使广大革命群众知道刘的罪恶。

我们的错误在内部可以解决，我们的错误多，跟不上形势，我们很多没有经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不够，可能犯了错误，你们要原谅，我们可以作检查，我们回去后，再征求你们的意见，再跟信部长谈谈，有错误就改正，我们自己检查，工作上的缺点，你们帮助我们改正。

陈再道的秘书：

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内部可以解决，明天有支左的首长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支持你们左派是坚定不移的。你们要看行动是否改正，请你们看行动，报纸问题，你们几个左派组织要商量研究，成立一个监督小组，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你们要批判刘少奇，登在湖北日报上，从政治上树立你们的威信，要抽出一些人来写批判刘少奇、王任重的文章，要高举批判的旗帜，和批判本地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起来，我们那里王任重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写龚同文文章要批判，把他批倒批臭，我们支持你们是没有错误的。红卫兵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错误要改正，要分化、瓦解、争取他们，不要打砸抢，对

受蒙蔽的群众要争取教育他们，要把群众争取过来，壮大我们的队伍，革命的大联合才有希望，你们要做工作，相信你们整风是有提高的，你们要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团结大多数。

陈再道：我们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你们要注意影响，不要叫人家认为和左派闹冲突，希望你们相信我们，你跟他们讲一下，人多不好，解放军搞不好敌人很高兴，我们是一家人的问题，我们的态度和立场是明确的，（关于叫孔庆德出来的问题，）他出来，你们大家叫他回答也回答不成，明天再谈，人家影响不好，你们要考虑孔副司令，可能说过一些错话，他从来就是这样，要注意原谅，不要他来算了，我们要从全党全国利益出发，人多对你们对我们都不好，你们左派要气魄大，你们应该从大的方面想一想，咱们是一家人，你们让他答复，他也不敢答复，要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们派代表明天来，有什么意见再提。

秘书：明天派代表当面与孔副司令谈，他保证解决。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钟汉华给武汉军区电话传达中央首长指示

今天总理、伯达、江青等首长接见了陈、钟，中央除戚本禹同志外，都到了。我们向中央文革检讨了，工人总部的材料全部上报了，但中央没有批下来，我们就宣布解散了，从组织观点讲是有错误的。

中央文革讲：这不算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说等中央批了以后再宣布解散。现在有这个规定，以后按这个规定办。

工人总部肯定不能恢复！

关于“三字兵”问题，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解散，昨天他们游行，口号是：打倒刘邓陶王！我们就是要革命！分化瓦解三字兵是指大专院校红卫兵。

新一中问题向中央文革报汇了。江青同志说：我收到了一个假情况，说有三万人绝食。经军区调查只有 300 人绝食，连支持他们的在内只有 3000 多人绝食。

（陈、钟首长讲：我们可能抓多了些。）

江青同志说：人抓多了些，武汉地区情况复杂，我了解，真正的反革命不能

放。

从整个来讲，我们武汉地区不存在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抢的刘、邓路线。

三司是左派，对解放军的态度没有错，大方向没有错。要给三司谈一谈，叫他们积极准备斗争王任重。三司派人到中央要揪陶铸回来斗，中央不同意，同意把赵辛初带回来斗。

把派到工厂、学校的干部抽回来学习一下，进行调整，中央同意。军管这一条线，一定要守住，不能叫冲。

河南问题，总理说：“河南日报有两派，叫他们到北京来谈一谈，没有来，想把另一派打下去，现在已经打下去了，还没有来北京，分左、中、右，以反不反刘建勋，冲没有冲省军区作标准是错误的。”

要抓紧对刘邓的批判，开大会、作大报告。各单位负责人，要抓紧抓好，可以到街上写大标语，但不能乱写。

要教育干部站出来，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要耐心细心，不能搞对立，他们说了我们一些话，不要搞偏了。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陈再道钟汉华与武汉“钢二司”等对话

[我们为了查实所谓特大号外“北京来电”，于四月二十五日找陈再道与钟汉华在京西宾馆当场对质，现将对话记录如下：]

同学：现在武汉到处流传着陈再道十九号的讲话，并且影响很大，三字兵活动猖狂，我们希望证实澄清一下。

（念特大号外“北京来电”）

特大号外（特大喜讯）（北京来电）

- 1、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没有错。
- 2、工人总部不能翻案。
- 3、江青同志说：武汉的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解散。

4、武汉军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陈：我根本没从北京打电话回去，是我们的政委给家里打的。

同学：内容是什么？

陈：内容是中学红卫兵与大专院校红卫兵有区别，要许他们存在。不能解散，要允许他们起来革命，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同学：还有什么？

陈：他们（指中学三字兵）18 号游行喊“打倒刘、邓”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喊口号是要革命，不解散是对的。

同学：是你授意打的吗？

陈：不是，是钟政委打的。

同学：反正武汉造成很大影响，希望你对传单上几条表态，不要含糊。

（念到号外中，武汉支左信部长向专揪王任重的红卫兵小将传达了陈司令与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电话时）

陈：（插话）那是他（信部长）搞错了，我没有打。

同学：我看还是把这个问题落实下来（念特大号外）

陈：（急答）没有，没有打这个电话，

同学：事实上是这样讲的（指传单）

陈：不是江青讲的，是我们政委讲的，这样是不对的。

同学：（漏）

陈：确实江青没有讲过，我回去查查。

同学：那你要表态，究竟哪儿条是你们讲的。

陈：表态就表，哪条是我们讲的。把这个搞清楚，是我们政治委员讲的，不是江青讲的。

下午与钟汉华谈话记要

同学：相信你已经知道上午的谈话内容了吧，你们讨论得怎么样？

钟：你们的行动很好，你们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的威望，很感谢你们，那两条不是江青讲的，是我讲的，电话不是陈司令打的，是我打的。我们每天都和中央文革开会；那天我到中央文革汇报回来以后，理会的，给家里讲的。家里同志可能听错了，也可能传错了，我们可以向江青同志道歉，你们怎么看，可以批评

我。中等学校红卫兵不应该解散，应该让他们起来革命，那个大会的大方向是对的。

同学：你讲了半天了，我们觉得你有的讲得不清楚。

钟：对工人总部问题，工人总部是跨行组织，过去连基层组织都解散，那就错了，错了就改正嘛。

同学：还谈谈电话问题吧！

钟：我们说的三字兵是中学的三字兵，他们喊打倒刘、邓，大方向是对的，大专兵就不一样了，是保守组织，应该取缔，现在是他们把我的意见当成江青同志的意见，这就错了。这由传错的负责。

同学：这里可能传错了，但也可能是别有用心的，往江青脸上抹黑，一定要追查。

钟：是否有别有用心的人，回去追查，总之责任由军区负。

同学：好象你是说江青讲的，你理解错了，到底怎么回事？

钟：那天晚上打电话说那个哪个到了，江青也到了，他们就听错了，以为是江青讲的。

同学：你们要追查，我们也要追查，一方面要消除影响，另一方面也要惩办往江青脸上抹黑的人。

钟：有错误，我们可以向江青同志检查。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你们造反派有意见可以提，我们接受，我们要团结起来搞，我看今天晚上或明天通知家里，召集各派，不管保守派也好，把问题搞清楚。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陈再道与武汉革命造反派的辩论

（按：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为了向中央反映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于四月廿八日在北京与陈再道进行了一场辩论，我们根据这次辩论的实况录音整理出这份材料。这次辩论实际上就是揭发、控诉、斗争。这个录音告诉我们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前究竟有无两条路线的斗争？武汉地区究竟有无谭振

林？我们整理这份是供没有听到录音的同志们及时一阅，也让那些受蒙蔽和不明真象的同志了解问题的实质，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由于辩论会开的激烈，人多声杂，可能记录与原话有差别，还有些遗漏之外。错误由整理者负责，并请批评指正。）

会议于上午十时开始，由武汉革命造反派小将（下简称小）主持先学最高指示。

小：我们是受武汉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委托来北京的。我们从昨天上午八点钟来这里，等了二十多小时，目的是解决问题，搞好武汉文化大革命。请今天到会的军区同志自我介绍一下，认识认识，（会场骚动，人声嘈杂“我们都是解放军”“你们是战斗队，我们也是战斗队啊！”……）好好好，你们不要介绍算了，我们都是武汉二司的，各校都有，我们主要是促进军民团结，互相了解，交心交底。

（军区有人说下午要到中央军委开会，因此这个会可能开半个到一个小时。当即遭到反对）

陈再道（下简称陈）：我还有大问题嘛！

小：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也不小嘛！

小：好，不扯久，我先谈：第一点，在你们的《严正声明》《公告》以及你们在广播电台湖北日报上都正式宣布过：“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现在请你们把炮制者交出来。（会场骚动，有人说：“快一点，陈再道你谈一谈。”）

陈：这个问题嘛……你们也找，我们也找嘛！

小：你们不是已下了结论。

陈：我现在不讲，没有足够的材料！

小：不够？你们当时在湖北日报上发表，开动大批宣传车，甚至用飞机撒传单。毛主席说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你结论下了，再来调查，你们这样做不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吗。

陈：我们正在核实材料，材料还不够。

雷志茂（武汉水利电力学校学生，二·八声明的起草人）：你们在各种宣传机器里下了结论。武汉军区还把我叫去了两次，我要把你们谈的都向中央军委、中央

文革汇报。要向全市人民公布。你们的谈话卑鄙肮脏，你们的意图是什么？你们的结论就是下在调查的先头，而不是结尾。

陈：我不回答。

小：让陈再道回答。

陈：炮制者我们将来要找，已经在找……慢慢在找。他（指雷）不是炮制者。

雷：我，一个普通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不是共产党员，更谈不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我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抓。

小：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陈：我现在不是唯物主义者。（众声责问）我现在在北京开会，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在首都嘛！

小：支左的李良（在座）说过“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制的。我们已掌握充分材料，准备拉出来公开斗。三月一日刘文治（支左办公室人员）在接见我们的头头时也说过“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已抓到手里了，准备在武汉公开斗。三月九日刘文治又讲过这番话。而且你们在各个公共场合都说过。你过去肯定，现在又不交，在玩弄什么手段？（众：你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人声嘈杂）李良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

李良：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首长都来了。

小：我们是这个会议的发起者，我们掌握会场，不要扯远了，浪费时间你们负责。你们现在干脆交出这个炮制者。

雷：我们认为“二·八声明”不是什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而是革命造反派内一种思潮的反映，而你们偏偏认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你们既然发了这个言，一定有理论根据，事实根据，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相信你们一定有足够事实抓出来了！因这关系到支左方向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追。现在，我们两个写文章的炮制者在这里。

陈：你们注意，“二·八声明”是不是符合当时中央社论大团结、大联合的精神？

小：那这是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制的呢？

陈：王任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可以调查一下，我们在调查、摸底。我们从来没有下过结论，什么下结论。

小：刘文治亲自对我说过“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就是刘真。二月末还说过，过三

天就把刘真拉出来斗。而今天你们说从来没这样讲，这不是前言不对后语。说的话，做的事不认帐还行。（众声嘈杂，人声：“你们考虑一分钟，你们说的话还不算数？”，“你们还有人说二·八声明炮制者是王任重！”）

陈：（无奈何）我已答复了嘛，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个提法有没有错误？

小：（气极）这个话连三岁小孩也不会说错，现在问题的实质是，你们说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这是问题的本质，离开这个前提空谈一小撮，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臭《修养》的观点。其它几个军区到会的人，希望你们挺起腰杆来回答。你们不是说向革命小将学习吗？革命小将就有这种气概，自己说的话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

陈：（想走）啊，时间不早了。（众嘈）你们要去军委就去，反正你们已来北京了！我是在这里开会嘛！（众嘈）我回答，我回答，我没有说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是说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话没有错。（众嘈）什么大帽子都行。我们来谈谈《人民日报》社论好吧！

小：离开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去空谈中央社论精神，这不正是黑《修养》的典型表现吗？

陈：这个是你说的。

小：是，就是我说的，我不怕！

陈：那就还有什么说的，我还说什么！

小：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靠毛泽东思想，现在不摆事实，不讲道理的恰恰是你陈再道。

陈：对！就是我。

小：发什么态度？

陈：我不是态度不好。

小：你敢不敢到中央文革小组见面！

陈：可以嘛，我态度怎样，我又没有发脾气我答复了，你们还要我讲，（众：答复了什么！）你逼我答，我答复不到。

小：我们再说一遍，武汉军区在你们一系列的正式文件、讲话、湖北日报上面，都肯定过“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

炮制的，现在我们就是要求你把这个炮制者交出来，我们要斗。

陈：现在问题是有没有“二·八声明”？（人所共知，怎么没有呢？）那有没有错误呢？

（众：那怎么没有呢？）

小：你们说它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我们说是革命小将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我们说有什么错误要教育帮助，使小将成长起来，你们是要把他们打下去，不容调解。这有本质的区别。两个月了，要把炮制者交出来。

陈：要我交出来？（众：怎么不要交呢？）那么后等我把材料掌握落实了再交给你们，作为一个思想问题，批评是可以的嘛！我说省委一小撮，没有错嘛！这是大方向嘛。

小：为什么你们不调查清楚就下结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陈：我是说一小撮嘛！调查嘛！你们不要再问了。

小：你们说这是不是阴谋，这一小撮是谁？亲手炮制是谁？

陈：是谁，我们来搞清楚！（嘈杂，人声：“不要吵，让陈再道讲”）我不讲了，我要开会去了。（人声！不行！欠帐是要还的）（沉默）我们错了负责嘛！

小：我们别了整整两个月了，我们对这个炮制者恨之入骨，我们也一直在抓这个炮制者。今天你们一定要交出来，我们坚决把他斗倒，斗臭！你们要是不交，就说明你们过去是搞政治迫害，居心何其毒也，究竟什么人在搞鬼，到底是谁？

（沉默）

小：李良同志，你们是否可以提示一下，你们支左的都在这里，陈再道讲不出来，你们给他提示一下嘛！你们讲嘛！你们认为如果不是一小撮，也可以讲嘛！表明自己的态度嘛！

陈：我们是根据中央打倒无政府主义，斗争最大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个斗争的基础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慢慢实现三结合，再夺权，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彻底胜利。

小：炮制者要是交不出来，这些问题就谈不上。党中央号召说大大小小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要斗，我们是斗定了。现在有一小撮炮制二·八声明，那还不斗？

陈：把炮制者斗倒斗臭我们是不主张的，作为思潮，批判一下是必要的，（人

声：那你们不是说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那你们这样不是包庇了他们吗？）有嘛！（人声：那你交出来！）我们说了我们的材料不够嘛！调查研究还不够嘛！

小：根据你们正式文件办事。李良同志，你说他这样有无诚意？（不答）不要紧，回答问题，你不是很会说话的吗，“精心策划，亲手炮制”如何理解，怎么亲手，是谁？问题是你们提出来的，即然是一小撮，为什么不揪，你们当时是把炮制者当作敌我矛盾来搞的，反革命宣言书嘛，你们正式文件不是提得很清楚吗？

陈：我们没有说揪！

小：那你们的正式文件是怎么写的？

陈：是根据这个思潮和当时中央文件精神来写的。（人声：那一小撮呢？）那一小撮当然是有的。（人声：是不是炮制者呢？）我先声明一个问题……（人声：用不着看表，看表有什么用，耽误了时间你自己负责。这个问题一定要回答，要一直追下去。）（吵杂）

陈：我们来这里开会，你们这样态度！

雷：好！同志们，陈再道现在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作了两个答复，一个：一小撮总是有的，没有错；一个是：材料未搞清楚，未掌握还要继续调查。但前两个月就下了结论，支左的刘文治，张××两个月前就叫我去了的，还点了名的，你们玩了什么手法点了谁的名，怎样上纲，你们心里明白。你们当时一再要我上纲，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这是严重的政治陷害案。

陈：作了结论就算了嘛！我们已回答了。

小：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你们说要不要交出来？

陈：我们不要交。

小：你们不是老要吗！你们不要我们要！

陈？你们去要嘛？去调查嘛！我们没有说嘛！只是说一小撮嘛！没错嘛！

小：这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但也很重要，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底下问题还多，不好谈。你们白纸上写黑字，赖不掉，当初到处宣传，到处撒传单，简直要把人置于死地。

陈：我不讲。

小：（气愤地）陈再道！你们说究竟谁是炮制“二·八声明”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今天揪定了。

陈：我们没有说要揪嘛..

小：既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为什么不揪。

陈：那你们去揪嘛。

小：你不是下了结论吗？你们根据什么下的？既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什么不揪。

陈：我没有说不揪，在调查。

小：你刚才不是说不揪吗？要不要我们把你的录音放给你听？告诉你：我们要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揪定了，这是大方向。

陈：当前大方向是大联合，大团结，三结合、夺权。

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打/

陈：我们要斗王任重。

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打倒。

小：现在大家看看语录，等他回答，看有什么可以活学活用的，马上大家一起学。（人声：201 页）好，最高指示：（集体读）“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就这一句，你陈再道能不能活学活用，你的答复合不合毛泽东思想。

陈：你们说合就合，你们说不合就不合。

雷：你，武汉军区司令员在这里，我们、二司两个“二·八声明”炮制者也在这里，而你偏要说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你有你们的炮制者，我们有我们的炮制者，你们要交出来。

小：李良你不是说过，马上三天就揪出来，你说要把二·八声明批倒批臭，才能大联合，现在你们为什么不说了？你们讲了省里市里都有，三天就要揪出来的话，犯了罪，现在要回答，.....不要耍无赖！（沉默）李良，你是支左办公室的有名人物，你讲嘛！依然沉默，

陈：我们有了错误一定改正。

小：你这是改正错误的态度吗？共产党员，每句话，每件事，都要向人民负责。你们说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

的，话讲了，文件发了，把我们当反革命打了，改正，就是要交出炮制者，交不出，就是要认错，这就是向人民负责。没有那个东西硬要说有，怎么行？

陈：我没有说揪出来交给你们斗嘛。

小：这次运动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就应该斗。

陈：要斗！我们认为“二·八声明”搞分裂，这种思潮要批判一下

小：当时你们不是批判二·八声明，而是把矛头指向群众。

陈：那是你们以为，我有错误，改正嘛。

小：你有罪。

陈：犯罪？我有罪向中央文革检讨，我没认识这一点，（人声嘈杂），（陈想走）

李良：已十一点多了，军委会议都有安排，一个一个活动，我们还接见。同志们来了，我们接见一下，（众打断：不是接见。）

陈：好，好，是来谈问题！（众：要你交出“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已说了嘛！你们还要争嘛。

李良：你们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有些问题还要研究，你们调查，我们也要调查。

小：李良！从昨天到今天等了二十多小时，你们没有诚意，昨晚你们说了，不是接见，是辩论。

陈：我们政委也来了，一共五次，我们有诚意。你们对解放军态度如何？（众：你能代表解放军吗？）你们这么厉害，再厉害，我不说，你们没办法。

小：（气极）我们厉害？！你们搞政治迫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把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去。我们从昨天到现在等了廿四小时（陈：不都来了嘛！）我们多次指出是来解决问题的，而你们却毫无解决的诚意！拿出主席语录都不能活学活用。（众：读最高指示 201 页）

陈：我说我已答复了。

小：交出来。

陈：我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材料，还没有调查清楚，以后再告诉你们。

小：毛主席说一切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的末尾，你们答复究竟“二·八声明”是不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你还可以说嘛。

陈：我答复了，不要再说了嘛。

小：你没有答复。

陈：你们说没有答复就没有答复。

小：你们不敢答复，你们怕。

陈：我们怕什么？

小：你们怕这，怕那，归根结底怕群众。

陈：好，你们结论已下了。我讲了我并没有说要抓这个人，我们结论并没有说要斗臭，只是说肯定有。

小：（气极）军区的同志们，如果你们还有毛泽东思想，应该对他的话表态，如果军区首长这样不作正面回答，是这样子，你们对得起毛主席吗？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什么不揪，不斗？你们配在这里开会吗？

陈：中央要我来开会我能不来，你叫我不开，我就不开。

小：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为什么不揪，是不是投降主义？不揪、不斗，不能说明你们投降了？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陈：（沉默半晌）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就揪。

小：不允许你歪曲篡改人民日报社论精神。

陈：我们有缺点，但总的说来，我们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

小：最大的才揪，那王任重算不算最大的，你揪不揪？

陈：怎么不揪，怎么不大！昨天还要斗，屋里还在布置嘛。

小：你不是只揪最大的吗。

陈：你们不揪王任重吗？

小：“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我们就要斗倒斗臭，这是大方向，你说是不是？你的大方向是矛头对准革命群众，把他们关进监狱。

小：你们的监狱关的谁？你们不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关一些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小将，还戴上脚镣手铐，这是大方向？

陈：我们有缺点改正。

小：我们今天来的是一个支队，一个方面军，我们对大大小小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要揪，我们来这里是配合军委开好会议。我们大事不说了，让陈再道交出炮制者。（众读最高指示：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我们用

得怎样，我们用得不好，学得不好，可以批评提意见。

陈：我们也学得不好，不如你们学得好一些，向你们学习。

小：你这个态度很好，我们也要向你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揪炮制“二·八声明”当权派是揪定了的。希望你们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炮制者交出来，究竟是张三、李四？是王麻子？究竟是谁交出来嘛？你们说嘛，耽误时间由你们负责。

陈：你们到北京来干什么？

小：我们到北京来是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汇报的，并配合中央军委会议，揪出武汉内谭震林，把“二·八声明”的炮制者斗倒斗臭，把武汉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陈：你们不是要揪武汉谭震林吗？要揪就揪嘛。

小：现在不是揪不揪的问题，是交不交的问题。

陈：我们现在掌握材料不够。

小：不够，该不该下结论？你们现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陈：讲了的话我们当然要负责任，我们要调查研究，要掌握材料嘛！看错误的东西，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关系嘛。

小：什么关系？

陈：（沉默许久）你们要揪去揪揪嘛。

小：你们讲了，全武汉都跟着揪，成了大方向了。

陈：当时思潮要批判一下嘛。

小：那时老保都纷纷说，陈司令员说的，“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陈笑）你笑什么？不要耍赖，你不说就靠边站，你要赖干什么？

小：李良，你回答，隐瞒炮制者是谁？究竟拖延时间的是谁？急于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谁？而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又是谁？你在这个会上看得很清楚。

陈：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多少万人一下子投入了这个战线，省委瘫痪了，我们抓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五大任务，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发现也有一些缺点错误，你们提的意见都很好，我们接受你们的批评，我们也在改，我们在加强阶

级教育，政策教育。

小将：现在是问你，“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这句话错了没有？（陈：有没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但二·八声明是不是他们炮制的？

陈：我们掌握的材料还不充分，揪不揪以后再看嘛！也没有说揪出来交给你们嘛。

小将：你们不是说要揪出二司头头中的反革命分子吗？这是你亲自对杨道远说的，你有些健忘吧（陈：我们有多方面工作，还有其它方面，已经答复了，三天三夜讲不完。）这第一个问题，钉子钉死了，一个一个问来。

陈：（无奈何）你们再说我就要走了（众：你走，你走不了。）你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会场沸腾）。你们今天态度不是商量问题，你们不讲道理嘛！（众：怎么不讲？问你炮制者是谁你不答复。）是我是我，好不好？（吵杂）……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小将：还有很多人靠边站，二·八声明炮制者还要斗吗？）我们有错误我们改，你们不满意，向我们的领导，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讲，我们还有领导嘛！（会场较多时间乱了起来，对话较多，听不清楚。）

小将：大家坐好！坐好！把会议开下去。

小将：如果有确实证据二·八声明是刘真搞的，我们马上回去斗刘真，（陈：我没有说嘛！）我们调查，是不是你陈司令员下的结论。请问，刘真是什么时候看过二·八声明的。是不是他炮制的？要说看过的就是炮制者，那看过的人多得很，连你陈再道也看过。

陈：谁说你们不是左派，你们……哈哈

小将：这个会是个很严肃的会，谁叫你们笑？（陈：不笑，你们不叫笑。我哭。我哭你们又说态度不好，笑又不对……）你说刘真看过二·八声明，我问你，什么时候看的？（陈：我未调查。）

小将：他们首先讲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以后又向很多人说是刘真看过的，后来又说是听别人说的。那么，我们就问，究竟是听谁说的？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的人很多，是不是他看了就是他炮制的？问题是谁炮制的。（吵杂一段，此时陈再道又说要去开会，有人说：如果是中央军委点名要陈去开会，保证放他去。建议马上打电话和军委联系，证实此事。）

小将：你们在武汉讲了多少次二·八声明炮制者，在武汉敢讲的话，在北京不讲而且不敢讲，这是为什么？这个阴谋在什么地方？你们说有，又不交出，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你们打击革命组织，革命群众，而保护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你们是什么司令部的人？你们自己说一说。

小将：你们说刘真看过，是在发表之前还是发表之后看的？你们为什么都不回答？你们交出二·八声明炮制者，也算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一个功劳。

陈：我们未下这个结论。；

小将：未下结论就发公告，是为什么？什么事都想否认。如果是我们下的结论，我们交出来，你们下的结论，你们交出来。没有炮制者为什么在武汉地区那样搞？目的何在？你耍赖。敢说，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比你多一点。

陈：我向你们学习嘛。

小将：你们专门抓革命小将去坐牢。这就是你们的大方向？

陈：我们都是第一次搞文化大革命，都还要学习嘛。

小将：现在就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就抓出来，没有就承认错误。你是武汉的司令员，堂堂上将；你还有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笑。

陈：好嘛！你们骂我我也听着嘛！你们怎么说我都可以。

小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揪，你以得起革命群众吗？以前革命现在不革命一样要打倒。)那你们就打倒嘛！(小将、你穿解放军衣服就应干解放军应干的事，中央叫你支左，你干的什么？毛主席叫你实事求是，你怎样做的？)我是有缺点，有错误，抓革命促生产，支工、支农、搞军训、搞军管，一下子几万人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是新的，理解不够嘛！犯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和革命群众商量不够，有些地方有些包办代替，现在要改嘛！回武汉以后召回干部好好再搞，接受经验教训改正错误，学习毛著活学活用并衷心希望你们提意见，我们一定接受，并在实际工作中去改.....“二·八声明”有错误，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批判一下，责任不在革命小将，归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他们搞的，至于我们揪不揪，由我们决定，(众：那么是谁呢？)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们真正有错误我们也改(众：你的结论就下错了嘛！)

小：现在一齐读两段语录（齐读）“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

党……”“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P221)

今天这个会，仅仅谈了第一个问题，我们到这儿来，是因为你们的支左犯了方向错误，又一系列地对抗了毛泽东思想和军委指示，因此我们提出质问，这是革命行动，造反有理。他们到北京来开了很久会，应该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许阳奉阴违，今天陈再道态度不好，比起以前没有多大进步，比较顽固。继续坚持错误路线，希望他认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是要坚决按上级军委命令办事的。

现在有一个紧急信，说明今天军委根本没有通知他去开会。简直胡说八道！我们可以念一下（念信，大意是：武汉二司革命同学们。武汉军区陈再道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现会议已结束，陈再道要立即回去传达贯彻林副统帅指示，即将离汉，你们对武汉支左工作有意见，可向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反映，也可回武汉地区向军区领导提出，商量解决。希在北京不要再找陈再道辩论。中央军委办公厅，四月二十八日盖章）。

我们从上午十时起开会，昨天起已等了二十四小时，陈再道说下午有会，实际上中央军委说会议已经结束，这封信充分揭露了他的谎言，他欺骗了革命小将，但是我们还是按上级指示办事，不再留他。

陈：我们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到大联合，三结合夺权的关键时刻介入了运动，支工、支农、支左、军训、军管，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立即行动几万人上去了，到学校、到农村，作了些工作，因为对运动意义认识理解不够，工作中产生了问题，我们毛主席思想学的不够，铺开了，同志们到学校、工厂，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是有的，民主作风不好，与革命群众商量不够，有的是当先生，而不是很好向革命群众学习，下面同志又有包办代替，甚至有的感情与革命群众有抵触情绪，不同群众商量，有些事情没有搞清楚，如这一派，哪一派，有些派别，如像有的为老保组织说了话，有的干部认为保守组织听话一些，于是模糊了一些界线，所以犯下了一些错误，现在要把干部的一半收回，好好训练半个月，再下去把作风改变，把运动伟大意义学一学，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对运动中缺点错误，你们提意见，批判、都可以，我们诚恳的听取接受而且在行动上改正……，犯错误，我们要负责，今天你们等久了，昨天我们确实找干部谈了话，还有河南问题，你们等久了……有什么问题，

我负责任。

雷：陈再道他们马上回武汉，应该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办事，不许再两面三刀，从今天的会议看，你态度不好，回武汉后要按主席路线办事，武汉地区学生运动是瓦解不了的，谁想压制革命群众运动是压不下去的。

（会议至此，转入到揭发，控诉武汉地区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种种事实，以下估计是有工人、学生、干部各方面代表，以下简称“代表”。）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 年 9 月）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

〔时间：1967 年 5 月 15 日下午 3：30 分—5：50；地点：政协礼堂东池会议厅。接见单位：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二司、工总、九一三、一始工人造反司令部、黄石代表、天门代表、解放军文艺代表团、卫校代表、三司红色造反团、三司。〕

（在我新华农进来以前，三司可以在里面，新华工、新湖大等进来后为了前面的座位和三司吵了起来，因为前面靠桌子的座位每一单位一个记录者，可三司四人座在前面，要他们退下来二个，让工人和解放军，他们不让，结果吵了起来。正在吵得很凶的时候，王力、戚本禹进来）

戚：你们吵，吵我就不接见你们了。（笑着说）

戚：（坐下后）噢！我见过你们一次，（看见代表们带的袖章后说）新华工、新华农……（这时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等单位纷纷献了袖章，新华工代表把“新华工”别在王力同志的军装胸前）。你们给了，你们没有了。上次我说要见你们一次，一直没有时间。

同学：（这时武汉军事院校代表进来了）他们都是被抓过的，都进过牢的。

戚：那不要紧。

戚：王力同志来见你们。（介绍王力。）

王：这是戚本禹同志。（鼓掌）

戚：我们今天来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主要是来调查研究的，今天来的有

没有两派？

同学：有，有三司的！

王力：刚才不是在吵架嘛（指他们进来时我们和三司吵架）。

同学：（介绍刚才吵架的问题）略。

戚：这点事你们就吵，吵得不可开交，你们的造反精神太大了。（笑）我五点半还有会，现在三点半，开到五点半。你们商量商量怎么开，他们谈听你们的意见。上次已经给记者（谈）过这些问题，武汉的问题主要靠武汉的老百姓解决。我不讲了，你们谈。

同学：我们先谈一个多钟头，然后请首长指示。（三司指示要两派各谈一半时间。）

戚：你们可以多谈点。

王：你们现在就谈吧！

武汉代表：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鼓掌）

王：你叫什么名字？

同学：（介绍）叫某某某。

戚：你们呆在这里不好，要和群众一起战斗。

同学：首长做指示后，我们马上回去。

戚：今天来两派。

（武汉革命造反派开始向首长汇报武汉地区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武汉运动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革命造反派惨遭残酷镇压，抓、取缔……当谈到军队内部问题，军区机关 24 个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抓了 200 多人，谈到雷达兵问题时。）

王：雷达兵学校抓人是什么时间？

同学：3 月 21 日

王：这是从 2 月开始的？（指武汉抓人，搞资本主义复辟。）

同学：二月就开始了。

（同学接着谈，当谈到武汉“二八”声明后，抓人时。）

王：武汉抓了多少？

同学：2600 多人。

（当同学谈到敢死队，抓了人坐牢，又指着敢死队人说，坐牢挨打的人来了。这时敢死队战士起来。戚、王连连点头。）

同学：当谈到二司问题时，军区谭（震林）式人物说：学生现在不抓以后要抓。

（王叹了一口气。）

同学：当谈到抓人时，他们还说抓人这是通过江青同志的。

王：（微笑）哈，县里什么时候开始抓的。

（同学谈韩东山，黄石，天门问题，论韩东山。）

戚：我知道。

同学：天门二人来等见首长，可是没见到，正准备走时，家里又来人说家里又在抓人。

（王点了头。）

同志：有的逼的妻离子散，有的急得跑到新疆！

（王长叹一口气。）

（同学：当谈到某某地一个人头上钉了三颗钉子，可在上吊后派出所还检查说，这是自杀的，同学说：这不很怪？那有这样事？）

（王摆手。）

（同学谈到绍宇锐时。）

同学（介绍说）：就是武汉的“红卫兵”。

（戚点点头。）

（同学谈到北京有联动，武汉有几动：特动、军动……）

戚：（轻微地）哼！

（同志谈到一张保字号的反动大字报，共 48 张时，念：“周总理是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戚：（打断话）不要念了，这我看了。（这时王力接过看）

同：三字兵还说王任重“秋后算账”提的过早了，王任重是内部问题。

（王力轻微地笑。）

同：前几天在北京抓了武汉的特动，他们偷东西，搞到北京来了，

（王力笑……。）

同：武汉特动尽是高干子弟组成，王任重儿子，张体学女儿，韩东山儿子。

（王力点点头。）

同：有的特动说。过去我爸爸用这（铁鞭）打鬼子，我今天用它打思想兵。

（王力点点头。）

同：解放军战士、武汉军区某些人、武装部都散布“秋后算账”论。

（王力连连点头。）

（同学谈到武汉军区内有—直站在毛主席路线的一边，如某某某。）

王力：谁？

同：张静。

王力：是什么人？

同：湖北军区副政委。

同：军区内坏蛋还造谣，如：通过……（不清）给新华工三点指示。

戚：（举手）我知道。

同：江青同志讲话他们篡改（解放军举起材料给戚看）

戚：点头。

同：陈再道从北京回汉，武斗不减少，反而增加，三天之内发生 150 多次。

戚：点头。

同：谈韩东山在黄……（不清）

戚：算了，不谈了，你们材料我看了。

同：（这时代表讲完了）我讲（新华工）。

戚：让不同意见发表，不是有个三司吗？三司在这里！

（三司代表发言，略）

（三司造反派发言，略）

（二司发言，略）

（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联合发言，略）

（工人总部发言，略）

（卫生学校发言，略）

（解放军发言，略）

解放军代表：斗他们时，腰弯 90 度（作姿式）

戚：点头。

戚：你们 100 多少人？

解：抓 77 个人，共 164 人。

戚：武汉卫生学校。

（解放军代表念一份血书，是一位解放军同志的，念完后交给首长。）

（戚接过血书，王力点点头，接过看。）

解：你看直升机散的传单。

戚：是，是，是……。（接过）

戚本禹：今天我们听了你们很多话，看了很多材料，我们很感谢大家。王力跟我看了材料，听了你们发言，我们三个意见（不代表中央文革）

第一、湖北来京工人、学生，赶紧回去到群众中去，参加运动，中央对湖北问题正在调查研究，以后再解决。如果中央再需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再来。

（问：你们来了多少人？）（答：五、六百人）你们赶快回去，因为你们都是勤务员，中央对这个问题，正在研究。

第二、军区在支工、支农、支左中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错误，这主要是在支左上。现在他们正在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再看一看，有缺点错误都要改正，不要越陷越深，改正了就好了。有意见可以说，方式要适当。

（指军区）希望你们回去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的情况形势斗争制定斗争方案、政策。

第三、应当坚决执行军委十条命令、中央对安徽问题五条命令、五条指示。凡是错误地打成反革命的组织，应一律平反。逮捕的，应立即释放。各群众组织应当整风，着重自我批评（王力：着重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王力：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各群众组织之间的争论只许摆事实，讲道理，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

一华工同志问：陈再道大字报上街可以不可以？

戚：可以采取其他方式，送上门。

同学：“打倒陈大麻子”是反动口号。

王力：以后不要这样喊就行了。我们的意见你们可能不满足，但我们只能讲

这么一点，我们还要调查研究，以后解决湖北问题时再请你们来。

（以上稿指示根据首长和我战友对话一节一节合起来的，所以当中有不全之处，有错误我们本人负责，供参考用）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红武兵等组合成号称有一百三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总联络站”。

红武兵标榜自己是以基干民兵为主体的“造反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和人武部军区关系密切，一方坚决拥军，同意解散工总和逮捕工总头头，一方需一个全市性群众组织，按中央要求，建立三结合的省、市革委会，二者一拍即合，红武兵在军区的支持下发展很快，将全市七十几个保守组织（原职工联合会基层组织变种）纷纷加入。红武兵变成百万雄师后，由 3 万人猛增到 47 万人，（后加入 15 万农民，最高时 62 万人，7.20 后统计数）。

在市人武部巴方亭部长的全力支持和撮合下，人武部推荐武汉市机械局人武部干事俞文斌为头（俞和原职工联合会无关），经过讨论，一致通过，由于组织多，最后总部由俞文斌、杨道安、孙运东、谢敏华、刘敬胜、汤忠云、孙德州、章迪杰、蔡俊善、李本富、陈德松、耿汉卿、纪登清等十三人组成，至于总的名称，是由“中学红卫兵”头头刘涛提示，应像当年百万雄师进入南京城一样。所以正式名称就定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是其宗旨。之所以叫“联络站”不叫总部，是因为下面山头太多，不服谁为头，除俞文斌外，其它都以实力为本钱。

1967 年 5 月 16 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了有五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人武部派员祝贺。人武部派专人到联络站指导工作，军区领导人叶明等经常找他们开会，加强联络，联络站按区共分 8 个分支机构，江岸区陈文，江汉区沈浩然，硚口区马德才，汉阳区张学清，武昌区刘喜春，东西湖罗明发，青山区汪家玉，汉桥区孙运来为各区负责人，为安全起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 127 部队派张有富、杨爱忠二个连级干部穿便衣到总站协助工作，并保卫俞文斌等负责人安全，有事随时调动部队增援。

此时，造反派们还在紧跟党中央闹革命、归口大联合，按行业成立战斗队，搞革司、联司，37 万人的跨行业全市性组织工造，当时按党中央、归口大联合

要求，总司被分解成长办联司、新一冶、武船联司、汉纸联司、三棉革司、汽标联司、铁机联司等……只剩下 8 万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陈再道在武汉军区的讲话

这七条（指新公校绝食斗争要求的七条）的签字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的。现在问题是我们对待这七条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承认了他们，就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就实际上是保护了几万人压了几十万人的问题，而搞的这些东西是不正确，是错误的，是省委内一小撮策划二司内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的，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军队搞垮。三新、二司只准他们一小撮讲话，不准人民讲话，这是什么大民主呢？这是完全违背中央文化大革命方针、路线、政策。现在他们这七条要产生严重后果，看来否认这七条比较有利，他们已经干了不好的事情，冲击军事机关和军管单位，围攻军代表，方向完全错了。这不是对缺点错误提意见嘛，他们冲击军区，打伤副司令员、参谋长，绑架钟政委，而且强逼签字，至于近来对其它群众性组织的态度，那就更多了。他们这些错误，我一再指出教育过，现在不仅我们讲不听，而且连毛主席、党中央讲的都不听。我们一再忍让，一再说服他们，仍然坚持错误做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公开表示，就是公开表态以前，今天下午我们再找他们谈一次，但是对他们的做法，还是要宣传、要教育，不仅教育了他们，而且教育了广大群众，这是他们造成的。

签字是强迫的，同时也是单方的，这个签字无效，必须经过党委。现在的问题，是把内部思想统一起来，军区不是没有指出他们的错误，还只是内部跟他们提，现在不公开批评不行，要公开批判否则就不能挽救他们，要大搞舆论，利用一切宣传工具。

刘真、孟夫唐要公开点名，（有人插话：刘真是否等一等呢？）这是逆流，什么对解放军提意见？这是逆流，要公开批判，但要防止武斗。其他组织也要公开宣传，精神要振作起来，不要灰溜溜的，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再怎么讲，不过是那点。现在要大反无政府主义。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 年 9 月）

四、武汉军区六·四公告引发两派大规模武斗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武汉军区邀请“百万雄师”头头到军区开会

（以前未公开正式请到军区，这次是第一次），会议在军区二号楼二楼会议室举行。会议中新议题是“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出席会议的军区负责人（没有陈再道）叶明，副政委杨秀山、姚喆、孔庆德（副司令员）以及夏奎部长、李良、马明副部长，独立师蔡炳，等；百万雄师方有：俞文斌、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孙浩洲、章迪杰等。

叶明讲话：“现在有少数坏人要夺权，你们要提高警惕，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捍卫无产阶级的政权，维护社会治安，要加强军民团结，坚持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号召起带头作用。”

6.4 公告后，“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武力驱赶静坐学生，工造总司为了保卫学生人身安全，保卫静坐现场而和百万雄师发生了小规模武斗，当时，造反派在市内有不少广播站，宣传静坐目的，要求为工总翻案，强烈要求军政府放人，和百万雄师的广播站互相辩论，漫骂。6.4 公告后，百万雄师不再辩论，也不漫骂，只用武力驱赶广播站，因而发生武斗连连升级。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武汉钢二司《千刀万剐陈再道》 最高指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前言 我们怀着对伟大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比热爱，怀着对拿枪的刘邓路线、对武老谭——陈再道等一小撮混蛋的刻骨仇恨，汇编了这本关于陈再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军队罪恶史。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个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大淫棍、大军阀、大土匪、大恶霸、大流氓、大奸贼，是混进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对抗毛

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最高指示，公开跳出来镇压湖北、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

陈再道是原湖北省省委常委，文化大革命中，省委一切重要会议他都参加，去年湖北省委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再道有不容推卸的罪责。但是因为他的特殊地位，而没有对他进行认真的清算。当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他就怀着封革命造反派刻骨的仇恨，赤膊上阵了。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更顽固地坚持已破产的刘邓路线，疯狂镇压军内外革命左派，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盗用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利用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执行了一条带枪的刘邓路线。由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湖北地区几乎要葬送在他的手上，从武汉到专县，从工厂到机关、学校、整个湖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遭到严重的打击，在一度时期内，我省的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变成星星之火，全省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依靠的是黑武兵、三字兵、乌拉稀、大专兵、康小三等保守势力，打击的是工总、工造、九.一三、钢二司、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中学红联等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对新起的三司革联和红卫兵革联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迫害，对敢于站出来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进行打击迫害。更加恶毒的是纵容和唆使「联动」、「特动」、「黑乌龟」、「百万熊尸」制造武斗流血事件，策划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疯狂围剿革命造反派。是可忍孰不可忍！陈大麻子的滔天罪恶，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陈大麻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人，历史的罪人，真是罪该万死！

伟大的历史文件五.一六《通知》的发表，吹响了埋葬党、政、军、文中的刘家王朝的号角，陈再道的末日快到了。但是，正如毛主席析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要严阵以待，应付更大的反复，准备更大的牺牲，用鲜血与生命，迎接与陈再道的生死决战。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打倒陈大麻子！解放全中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第一部份 陈再道「三反」罪行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再告诉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陈再道就是混进军内的反革命修

正主义份子，我们现在就揪他出来示众，看看他究竟是什么货色。 一、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公然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陈再道作为军区司令部、党委第二书记，从来没有原原本本传达过毛主席的指示。党委中心组的学习制度遭到破坏，对中心组、机关和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过问，不检查。前几年陈再道连毛主席著作也没有。 六六年五月，陈与某司令员去滨江饭店，一进房间就大发雷霆说：「房间里的山水画到什么地方去了？」一服务员说：「那些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拿走了，换上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陈破口大骂：「混蛋，挂风景画就是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搞得那么紧张！」还气势汹汹地说：「人修嘛，东西也修了？」第二天陈把管理局的刘××叫去了一顿，结果又把这些画挂在房子里。看！陈大麻子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多么仇视！警告陈再道：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 陈明目张胆地篡改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抹煞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在十八级以上的干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提纲中，公然抛出所谓「我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未接受和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谬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公然反对毛泽东思想，企图掩盖他们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妄图蒙混过关。 武汉军区党委特地转发了王任重 63 年在湖北省常委会上的讲话，转发了王任重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超过毛泽东」极其反动的谬论（据说王任重因此问题在七千人的大会上作过检讨，受过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军区还要求学习思谦（王任重笔名）的文章（大毒草）。（按：对个人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王任重大加吹捧、极力宣扬。） 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全军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陈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召开军区四级干部会议（在军区礼堂），他主持会议却常忘了带毛主席语录。 一九六六年二月，军区党委开会学习和讨论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极为重要的讲话，作为第二书记的陈再道，宁可安居于汤池疗养院，而拒不回来参加会议。不仅他自己不回来，也不同意让当时在农村「蹲点」的钟汉华、孔庆德回来参加会议。 一九六五年夏季，他同王任重一起上庐山避暑时，乱七八糟的古书塞满了小汽车的后箱，唯独不带毛主席著作。一九六六年夏天带着夫人、小姐以养病为名，周游北京、天津、北戴河等地。在此期间有几次跟他服务的秘书、副官、医生、护士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陈再道却通过他的夫人张××出面干涉：「首长的皮鞋擦了

吗?针头消毒了吗?还不去给首长读报!.....」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就这样被冲掉了。六六年，一些女同志唱为毛主席诗词谱曲的歌：「.....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陈无耻地说：「年轻的姑娘谁不爱。」肆意践踏毛主席的光辉诗篇。看!陈再道就是这样顽固地抵制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极力反对毛泽东思想。 对抗林副统帅，反对突出政治，鼓吹技术挂帅 陈大麻子在彭德怀被罢官后曾说：「彭德怀是好人，为什么要罢他的官。林彪算老几，在朝鲜战场上，没有彭德怀，林彪打得赢?」警告陈大麻子，谁反对林副统帅，我们就打倒谁。 六四年，陈带领大批人马去×军参加「四好」、「五好」积极份子代表大会，会议开了七、八天，他不参加会议，却把参加会议的所谓技术尖子挑出来大搞比赛。会议结束时，他作了长达几小时的讲话，大讲特讲突出军事训练的过硬本领，却闭口不谈要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六四年，陈又把最欣赏的技术最过硬的××连调至步校专题训练单、双杠技术，与林副主席的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指示相对抗。 六四年，当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指出：六四年军事冲击政治是方向、路线的错误。陈再道却对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在六五年的一次报告中（六四年工作总结报告）恶狠狠地说：对六四年的问题，也要一分为二。并有一次陈当着林副主席面说：「技术也要照顾一下。」公然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某步校的广大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揭发六四年军事冲击政治的罪恶时，陈百般阻挠，负隅顽抗，曾多次用电话和面谈，迫使步校党委对六四年的问题作出结论，并穷凶极恶地质问校党委说：「你们为什么老是提六四年的问题，领导也没说你们转向，要提转向干吗?」（按：陈再道之流惯用的欺下瞒上的手法，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六四年军事冲击政治的正确批评，企图蒙混过关）并说：「你们的后台老板是孔庆德，那么孔庆德的后台还不是我吗?」（按：陈再道为什么如此害怕揭发六四年的问题，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从这里可追到他及他的主子罗瑞卿的头上，击中他的要害。） 贺龙、罗瑞卿军事冲击政治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军区及时贯彻，而林副主席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的指示迟迟不执行，后来在形势迫使下才由某些人一手炮制了一个所谓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实际上还是突出军事的。） 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陈在一次讲话中谈到：「那有不犯错误的。我革命几十年了，王

明统治时期，我跟着执行错误路线，罗总参在没有揭发出来之前，还是按罗的办。对有些问题有怀疑，也不敢讲。」（按：真是不打自招，可见陈从来就没有执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 六七年元月四日，刘志坚被揪出来后，军区党委马上召集会议，统一口径说：「我们执行了刘志坚的，也执行了军委的、林总的。」（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水火不容的，既然你陈大麻子执行了刘志坚的反动军事路线，又怎么能执行林总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执行刘志坚的是真的，执行军委的、林总的是假的。） 六一年后，军委、林副主席一再指示要防止高级干部特殊化，要反腐化堕落之风。而陈再道却把军委、林副主席的指示当作耳边风，继续搞特殊化，小病大休养，无病也休养：消极怠工，生活腐化，搞女人却非常积极（见第五部份）陈大麻子是什么人不是很清楚了？ 二、陈大麻子是贺、罗篡军集团伸进武汉军区的黑爪牙 六三年陈再道派孔庆德到军区某步校「蹲点」，大搞单杠过硬，军事挂帅，陈也经常「亲临指导」，罗瑞卿非常欣赏这一套，于是派八一电影制片厂人员把陈再道这套「经验」拍成电影，流毒全军、全国。（按：陈大麻子不愧为罗的得意门生，忠实的走狗。） 六四年，大野心家、反党份子罗瑞卿搞全军大比武，军事冲击政治，首先是从武汉军区搞起来的，并在武汉军区、北京军区设立试点，而对大军区（沈阳、南京）都信不过。 陈大麻子是紧跟罗的，在一次军委会上，反党份子罗瑞卿大谈特谈比武成绩，陈随声附和道：「对比武成绩也不能估计过低。」（按：陈为主子罗瑞卿效劳大唱颂歌，故得主子重用。） 六二年反党篡军头子罗瑞卿来汉到底与陈大麻子密谋些什么？陈为讨好主子，当时组织专场舞会，陈搂罗妾，罗抱陈妻，翩翩起舞。（按：何等亲热，他们到底有何奥妙的关系?!） 当贺龙被揪出来后，陈惊恐万分，突然从北京打电话回来，叫××逼军区党委对贺龙问题表态，暗中施加压力，想保自己过关。 陈、孔、韩是徐向前的部下（直接），叶明也是的，杨秀山是二方面军（贺龙的）。（按：难怪陈、孔、韩与徐如出一辙，何其相似也!） 陈再道是徐向前的老部下，陈再道自一九二七年混进红军以后，便一直在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所控制的四方面军，陈再道在这一段时间内连年高升，到了一九三二年便当上了师长，三四年便当上了军长，可见张、徐是非常重用和信任陈的。 在无产文化大革命中，徐、陈又勾结起来，破坏文化大革命。今年二月，徐来汉亲自主持会议镇压革命造反派，公然为

陈再道之流撑腰。军区副司令员孔××在二月×日的一次讲话中说：陈司令员在北京开会，他们（指李迎希、张广才）说会已经开完了，已经回来了，使群众到处找。各大军区都在保毛主席（显然是借口）。徐向前（当时在武汉）问：「武汉军区为什么听不下来？」我说：「我们的腰杆子不硬。」徐向前说：「反对面怎么办？」我说：「抓？」徐向前说：「对！各总部、各军部都要抓。」看！他们一唱一和，配合得何等好！孔还说，徐向前副主席讲：陈（再道）、钟（汉华）有错误，但和李（迎希）、张（广才）不一样，不是三反份子。军区文化大革命，革命造反派揭发了陈再道不少严重问题，很多人，其中包括不少高级军官也认为陈是三反份子，是无疑的。而徐向前却为之打保票，这说明什么问题？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再道之流怕得要死，千方百计地想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他们制定了两个黑七条。第一次是陈再道从北京打电话回来的七条黑指示，后来军区党委根据这七条制定了黑七条，内容有：取消军区的一切组织；唐金龙、吕炳安事件由军区组成调查团调查，其它任何人不得干涉；不准贴大字报；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错误等等。对于这样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指示，造反派奋起批判，而徐向前却质问李迎希：「黑七条在哪里？」极力阻止对黑七条的批判，为陈再道推销黑货。在一次会议上徐向前说：「别的军区有反革命（他认为反革命恰恰是造反派）。难道你们武汉军区就没有？我不相信！要抓，你们还下不得手，不要怕，有武汉军区作后台！」在徐向前的这个黑指示下，支持造反派的李迎希副司令和张广才副政委以及其它许多真正支左的负责同志相继被软禁和靠边站了；军区内的革命造反派政治干事、文化工作人员、秘书、司机等大批革命群众无辜地被关进监狱。可见，徐向前是陈再道的黑后台，陈再道是徐向前的黑爪牙。在军事会议上，徐向前保陈再道，说陈「不是三反份子，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而当徐向前靠边站的消息传到武汉后，陈再道急忙开动大批宣传车，在武汉三镇大肆「辟谣」。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主子保救奴才，奴才效忠主子。这一切不是清楚地说明了陈再道的后台就是徐向前吗？刘志坚在任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期间，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再道就是这条反动路线的积极推行者。六五年五月与八月两次军区党委会议纪要，完全是推行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按刘志坚的黑指示制定的。

五月、六月初，军区党委会议纪要，按照刘志坚的黑指示制定了「所属人员

包括领导干部在内，分期分批进行整顿」、「摸底排队」、「审查作品和教材」，抽调参加四清人员的原则等等。都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的。八月的纪要，规定了「谁有问题揭谁」，「动员家属职工给干部提意见」等等，极力把矛头向下。陈再道和刘志坚早就是同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陈曾任冀南东进纵队司令和冀南军分区司令时，刘曾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等职。陈对人讲：刘志坚与陈再道是冀南的。有一次刘志坚被俘，陈再道下决心，打了一个伏击，把刘志坚抢了回来，刘念念不忘此事。一九六五年九月陈、钟传达军委一次办公会议时，宣传罗瑞卿一套折衷主义的东西。说过去关于大保证，小保证的提法，还要研究。三、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重用坏人，纵子叛国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是二野的政委，陈再道是纵队司令，刘志坚是纵队政委，钟汉华是政治部主任，王任重是行署主任，他们很早就是一个山头的人。（按：原来他们有如此奥妙的关系。）吹捧、包庇王任重，和王任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六五年王任重兼武汉军区政委时，陈、钟大肆散布崇拜王任重的思想：「王任重跟毛主席跟得很紧。」并在军区散布：「王任重是我们的好政委。」在今年三月中旬，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党委开会讨论王任重、张体学的问题，党委一致认为王任重是三类干部，张是二类干部。陈再道与王任重是老同事，在党委常委会上表态是紧跟王任重的（有记录可查，记录在军区。）六五年陈和王任重同在庐山休养，六六年又同在东海休养。 窦洪年与陈勾结密切，军区无论什么会议总要窦参加，窦也说：「军区的指示一个字也不能错。」（按：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却是阳奉阴违）六四年春，刘志坚、陈、钟将窦安插在高级步校，并任步校第二书记。（按：窦何许人也??他前为步校政委，运动中，革命造反派揭发了他不少三反言行，准备斗争，由于陈再道施加压力，至今斗争会未开成。）六×年，三反份子黄克诚用飞机把三反份子谭政的地主父亲的尸体运往烈士陵园，以后军委发觉追查时，陈公开与军委对抗，压下不管，迄今未作处理。 纵子叛国，罪责难逃 六二年三月十五日，陈再道长子陈东平与敌台挂钩，企图叛国投敌，被我专政机关捕获，并依法判刑两年。可是身为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不但不支持，反而百般刁难，横加阻拦，给专政机关施加压力，胡说什么：「处理重了。」公然庇护长子叛国投敌的罪恶行为。叛国有罪，叛国犯之父该当何罪！ 陈再道有罪，罪该万死！

最高指示 他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第二部份 陈再道疯狂镇压军内文化大革命 陈再道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拚命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贯彻执行刘志坚的反动路线，大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挑起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的大串联。当刘志坚被揪出来后，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到了以陈再道为首的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身上，他们处于四面楚歌、朝不保夕的境地时，便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盗用专政工具和中央军委的名义，赤膊上阵，大打出手，疯狂地镇压军事院校、文艺团体的革命造反派，把大批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个人野心家」，将军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何其毒也！

一、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军区党委常委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的会议记录上公然提出了「有什么问题揭什么问题，谁有问题揭谁的问题，有多少问题揭多少问题」三句反动门号，在这反动思想指导下，在团以上宣传、文化、报社、院校、文艺等开展了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大揭、大整、大斗革命群众。 陈再道利用职权，抗拒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镇压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步校的革命造反派揭发的事实就可说明这个问题： 反对毛主席所倡导的革命大串联，规定外出串联的比例，限制外出串联的人数，审查外出串联人员的出身成份，历史问题及运动中的表现等等，不准学校派出联络人员驻京直接吸取各兄弟单位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及时传达中央有关指示。中央军委三令五申，工作组被迫撤销后，又派往步校三名「记者」。三名「记者」在步校神秘莫测，记黑名单，准备「秋后单账」，他们专线向上联系，为了「保密」，躲在衣柜里打电话。在十月十七日还向体工队派出工作组，后又改为「工作人员」以后又改成临时党委，顽固地对抗中央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陈再道听到××步校革命造反派来军区造反的消息后，百般刁难，九小时内打了三次电话进行阻止，责令当权派向革命造反派做思想工作，不准来汉；造反派来汉后，又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认人头、记人名，企图进行政治迫害，并以「犯错误」

「谨防政治扒手」等进行威胁；甚至布置警卫分队，不准革命造反派在军内贴大字报揭发问题；同时陈慌忙打电话给步校副政委王万声，又慌忙召见该校的政委李党民、校长杨力勇，出谋献策，对领导干部进行恐吓，强迫写检查。

篡改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抹煞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在给十八级以上干部的传达提纲中公然抛出所谓「我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未接受和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谬论，企图掩盖其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陈再道在四级干部会议上，公开批评步校没有制止职工去军区送大字报，说：「若再来，你们就脱掉军装来见我。」院校和文化系统广大群众，揭发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恶事实，军区本应大力支持和向上反映，而陈再道却以「这些事，领导干部搞不好会伤害感情，不好继续工作」为理由，不让上送，经多次催促，也不上报，这是为什么？说穿了，就是因为这些人与陈再道等人有瓜葛，有牵连，怕报上去露了自己的马脚。因此，就把广大群众揭发的大量材料打入「冷宫」。为了掩盖自己和包庇各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实行对下压制，实行「愚民政策」，元月份就提出所谓「八不准」：不准看大字报，不准看传单，不准翻印传单，不准贴大字报，不准议论地方文化大革命等等，企图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步校党委委员之间，相互写大字报揭发问题，这本来是应该的，而陈再道等人却怕得要命，专门打电话加以制止。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文化大革命曾一度出现冷冷清清的场面。在陈再道的指使下，军区后勤上作总队一部队职工提出改成现役军人，军区党委未经总部批准就私自决定了。工程总队全部职工也纷纷要求改成现役军人，陈还擅自批给某些战斗组织汽车和几十辆自行车，批准某医院半工半读班六十多人单独成立一个学校，给两辆汽车，批准机关某部门人员到北京串联等等，企图用经济主义收买腐蚀群众的革命精神，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贺龙之事，唐金龙向叶×讲了，事后唐就死了。唐金龙、吕炳安之死，充分暴露了军区党委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唐、吕死后，陈再道不仅不把现场保护好，而且未经充分调查研究，就草率地作出「畏罪自杀」的结论。以后，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同意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成立调查委员会，同事又两面三刀，出尔反尔，在革命组织之间，制造摩擦，挑起武斗，转移斗争大方向，使调查唐、吕之死的事迟迟不能进行。党革命群众起来批判军区内资产阶级反对路线时，起初陈再道竭力诡辩，说什么

「军区党委是革命的、正确的，是跟着毛主席路线走的」。一月四日，刘志坚被揪出来，他还说：「我们执行了刘志坚的，也执行了军委、林总的。军区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能定。」当各院校文艺团体和军区机关起来造反时，大揭军区阶级斗争的盖子的时候，他们又躲避群众，节节抵抗，甚至采取群众斗群众的手段，转移目标，掩盖自己。一月二十八日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军区党委在陈授意下，匆忙制定了七点指示，篡改军委命令，出了决定：解散各机关革命群众组织，收回已贴出的大字报，由党委包办唐、吕之死的调查，到军区造反派代表并经允许才能去等等，掀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妄图扼杀军事院校和文艺团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骇人听闻的武装镇压残酷迫害革命小将

在二月黑风中，陈再道之流抓住革命小将的缺点下放，借「镇压反革命」、「粉碎反革命逆流」为名，从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分三批对军事院校、文艺团体等等革命造反派进行了极端残酷的武装镇压。据不完全统计，二十四四个革命造反组织一律解散，非法逮捕了一百七十五名革命群众，宣布行政管制四十三人，监督检查的二千零九名，提出警告的更是不计其数，逼迫自杀四人（二人被救未死）、开除军籍一人，上台示众约有一千零二十五人。

陈再道之流实行武装镇压，采取突然袭击，深更半夜重兵包围，多至二团少至二个加强连。陈再道之流赤膊上阵，亲临现场指挥，架起迫击炮、重机枪，带上火焰喷射器、收发报机、绳索、手铐、刺刀上枪，子弹上膛，层层包围疯狂捕人。如为了抓两个仅十六岁的青年学员，对造反派仅有六十余人的空军护校竟然出动了二十四辆大卡车的全副武装战士，冲进去后将革命小将从被窝里揪起来，戴上手铐，架上车就走，就连十九岁的女学员也被戴上了手铐，送进了监狱，每到一地捕人的同时宣布通令：我们请示军委，徐向前副主席批准，××组织为反动组织，立即解散。

徐副主席讲，陈、钟首长不是三反份子，如炮轰陈、钟首长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徐（向前）副主席说：李迎希、张广才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组织与李迎希、张广才勾结阴谋篡军。

××组织是反动组织，所有成员是专政对象，在没有解放之前，不能叫同志，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立即交出反动纲领，反动传单，反动材料，交出一切文化大革命用品，否则查出严加处理。

任何人不得外出，外逃人员三天不回来，开除军籍，不能改头换面，成立组织，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反省交待，违者以纪律论处。

对一些军事

院校还专门派飞机散发传单和散发解散××组织的通令。

三、残酷镇压军区内的文化大革命

打击迫害张竞等军区内的革命派

张竞同志是湖北军区副政委，贫农出身，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支持左派的革命群众，在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他一直在搞支左的工作，工作中，他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深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决支持新华工、新湖大、钢二司、新华农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深入新湖大调查研究。可是他却于三月十七日曾一度失踪，后停职反省、检讨，对他进行政治迫害，他被软禁起来，不准会客，不准与造反派联系。

镇压了军区大院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镇压军区革命造反派

陈一手把军区大院里最早的造反组织，如：「古田」、「老三篇」、「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打成「反革命组织」，逮捕了这些组织的勤务员及一般战士，军区里的造反组织全部被整垮，未捕的成员受到监视。

三月份，在武汉军区大礼堂召开了文工团、体工队、军乐队的大会（这次没有政治部），宣布了他们的罪行后，又抓了六个同志，其中四个男同志，两个女同志。当时两个女同志说：「我没罪，我不去。」士兵就推她们、拉她们，她们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望着台上的毛主席像痛哭。会议主持者就命令拉上幕布遮着毛主席画像，演员们和被捕的人都流着泪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一时悲壮的口号声震撼着礼堂，最后士兵用绳子将两个女同志五花大绑拖走了……。留下的同志含泪目送着她们，嘴里不断呼喊：「保护八条，不许打人……」

请看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陈再道就是这样对待我们军区的革命造反派的。

对胜利文工团的革命小将的政治迫害

胜利文工团（包括歌舞团）共二百二十人，「核爆炸」、「造反有理」、「一二·二六」等革命造反组织，共一百三十人。

二月二十四日军区通知造反派到军区礼堂听报告，一个人也不准缺席，不准外出，会场上造反派被保守派包围，台上架有机枪，一个连的战士负责警卫戒备森严。陈再道又指使副司令员孔××、叶×、韩××亲自主持大会，会上孔××把几个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说他们是「反革命小将」、「小牛鬼蛇神」等，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们头上。随后，军区副司令员叶×、韩××都控诉、训斥革命造反派为「假左派、真右派」、「纸老虎」等等的时候就有十几个人被揪上台示众，斗后就当场抓走了三个同志，有一个同志要求公布被抓人的罪状，一个保卫科长跑上来就打了他两个耳光。当场的一些造反派战士十分气愤，高喊「要按

军委八条办事」，「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他们硬是不听。会后，造反派不肯走，坚持在会场、院子里演出，好多战士看了演出的节目都感动得哭了。在文工团共开了六次控诉造反派的罪行的大会，小会检讨，请罪不计其数，文工团共抓二十二人，大会斗争时坐土飞机，带手铐，大会「亮相」一百八十七人次，行政看管二人，警告五人。下面举几例说明：

话剧团的李××同志是三代贫农的后代，本人出身工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团内一贯表现好，共青团员。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敢」字当头，坚定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边，支持军内造反派。在这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这个普普通通的话剧演员就被陈大麻子关了一个多月。

歌舞团的「造反有理」战斗队的张××，此人系贫农出身共青团员连续几年被评为五好团员、五好战士，曾任团支部书记，评为学习毛着积极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造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在《湖北日报》「三·四社论」后，他叫该队播送了一次两次，也被非法逮捕、关押起来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此期间还斗争了多次，最近才被释放。释放后仍然被老保监视，拒绝为之平反。直到现在胜利文工团还有二人没有释放，这两人根本没有问题，只因为他们掌握了武汉部队内部的大量材料。如果放出来，武老谭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镇压空政文工团的文化大革命 空政文工团工一百人，有「缚苍龙」、「先锋」、「从头越」、「反到底」、「红色战士」等造反组织共六十多人。自从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压制很利害。文化大革命以来，矛头一直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陈大麻子，揭发了陈大麻子的不少问题，于是陈再道之流就将「缚苍龙」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说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因为都是学生），「有其反动性的一面」，「是学生型的牛鬼蛇神」，「要把他们打倒，专他们的政」等等。二月十四日空司派一营战士抓了两人（他们原有广播台在空司），李××关了十四天，陈××（勤务员）关了四十天。

将「缚苍龙」等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后，大搞请罪活动，人人过关，开控诉大会等等。有一次文工团在×工厂演出时喊了一句「支左不支保」结果工厂里老保对此提出抗议，回校后还挨了批评，并写了检查。陈再道对揭发他的材料的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武汉军区逮捕了六个秘书，原因是为他们系统地揭发了陈再道一批材料的「罪恶」而被逮捕。

四、在军事院校搞白色恐怖，大斗、大捕军内革命造反派 高级步校的「红旗」、「红色」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把矛头对准军区党委内以陈再道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发了军区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陈大麻子的材料，陈再道就对高步的革命造反派恨之入骨。 二月二十一日时许，在陈大麻子的策划下，派军区副司令员杨××，副政委叶×亲自率领二十多个连的兵力、五十辆大大小小不同的军事车辆，还有囚车，配有轻重机枪、大炮、高射炮等大型武器，在夜色的掩护下，突然袭击高级步校，围剿「红旗」、「红色」等革命造反组织。先后捕人十六人，第一个被捕的人高喊呼：「毛主席万岁！」刚喊一声就有人钳住这个战士的喉头，口里强行塞进手帕，然后，五花大绑，惨不忍睹。杨××、叶×公开宣布红色造反团、红旗为反革命组织，宣布黄×、郑×等二十五人为「反动组织」骨干，除逮捕的人外，其余都交群众监督，对一般人员大搞人人过关，个个检查，原「红旗」、「抗大职工造反团」、「反修」、「满江红」等战斗队都得交待跟着「红色」、「红旗」所干的坏事，副司令员杨××在二月二十三日全校人员会议上公开盗用中央军委的名义，炮打中央军委，镇压群众运动。他说：「军区采取这么大的行动，你们想军委不知道吗？军区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要经过军委批准！」，「黄×、郑×是军委点名要抓的」。这是天大的谎言，最无耻的手段。 空字×××雷校革命派被镇压 该校原有师生一千三百多人，参加「红色造反总部」的有一千一百多人，占全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三，三结合的班子已基本形成，绝大多数革命干部都站在「红总」一边，足见「红总」是一个无可非议的革命左派组织。在被镇压的前两三天军区一要人不得不假惺惺地说：「现在整风靠你们，将来军区文化大革命还要靠你们。」陈再道这个反革命两面三刀的家伙不到三天（二·二一）就指派空军部队副司令员×××亲自挂帅上阵，带领两千名全副武装人员并配合各种轻重武器，突然包围「雷校」，当场逮捕了十八人，并宣布「红总」为「反革命组织」。对各级勤务员进行残酷斗争，大会轰，小会斗，被斗的达一百六十人，共三百三十六人次被斗，请罪检讨的不计其数。该校未参加「红总」的只有一百八十人，他们进校后为了「镇反」就出谋献策，把这些人扶植成立了一个所谓「临委会」，这个保守组织成立后在校大搞「镇反」，大整革命群众，就这样，一个个革命造反组织被无辜地镇压下去了。 武字×××部队护士学校被镇压的情况 原来的「从中笑」、「铁军」、「一·五红色造反团」等

六个组织，就是因为支持二司，并抄了军区孔副司令的家，被打成「反革命」，而勒令解散，其中一负责人被开除军籍（现已恢复）。二月二十四日凌晨，陈大麻子派出二十多辆军车大批全副武装人员，把护校围得水泄不通，大门、小门、窗门都布满了带枪的岗哨。当场逮捕十余人，事后派进工作组，纠合保守势力成立「护校指挥部」，在「镇压反革命逆流」、「整顿护校」的口号下，对革命群众大整大斗，开批判「二·八声明」的流毒大会时，也要派专车到关押的地方把「犯人」拉到会场示众、斗争。三月十日老保们又召开了「愤怒声讨红色造反派大会」，会上老保在台上控诉，当点到一个造反战士的名时，台下老保狂叫：「拉上去！」，这位战友被迫拉上台示众，斗争，老保疯狂地叫喊：「低头认罪，低头，……」这位战士不低头，当时由陈大麻子派去的军区副司令员杨××竟然挑衅地说：「你们后勤不能搞温良主义呀！」肆意挑起武斗，又说：「好一个反革命骨气，要低头不低头，你们好大的胆子，……给我捆起来！」当场杨××副主任就宣布：「根据群众的要求，把×××依法逮捕！」马上就把这位战士的军大衣剥下，领章、帽徽被拉掉，绳子勒到喉下，一低头气都透不过来，老保们高喊：「打倒×××！」那天还捆了另外七位同志，其中有十七、八岁的女同志，都戴上了手铐，就是这天陈大麻子，副司令员杨××、叶×及政治部、后勤部政委、正副主任都去了，在陈大麻子的指使下，军区副司令员杨××说：「……你们（指革命造反派）把军区搞得苦啊，把这个拉出来斗，那个拉出来斗，跟你们说好话都不行，……专搞打、砸、抢、抄我们的家，……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就是要报，不是秋后算帐，而是春前算帐！」×××副部长还骂道：「你们什么事都干了，就是没强奸妇女，还想要强奸妇女?!」还威胁革命造反派说：「搞土改的时候，就像割韭菜一样。（指杀人）」陈大麻子指使手下人，一方面扶植保守势力，另一方面将所有干部官复原职，连一个跳楼自杀的、一个问题严重的干部也不例外。而革命造反派被监视、看管。有一个学员写了一张条子：「坚持下去，我们一定会胜利！」就被戴上手铐监禁三天，另一个教员说过：「我知道军区的问题」而被打成「野心家」捆起来，这些活生生的事例说明了陈大麻子不是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 某部卫生学校共一百多人，在三月黑风中，被抓走的竟达三十余人，连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也被诬为要篡夺军权，被打成「反革命」。总之不管你人多人少，年纪大小，只要你反对我陈大麻子，你就跑不了。后字二四八部队「红

司」最早支持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武汉三镇影响很大，陈再道对此恨之入骨，于二月廿三日派八二零一部队一个加强连分乘四辆卡车，枪上刺刀，车头架上机枪，长驱直入后字二四八部队。美其名「帮助整风」。进校后，校内部执行军事管制，接管广播台，到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会场每个门都站了哨，大门第一排逼着刺刀，第二排则架起机枪，校内外来往断绝，白色恐怖笼罩着全校，当时被逮捕的达九人，后被打进劳改队，由带着刺刀和冲锋枪的战士看守，连上厕所也有人跟哨，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总字×××部队（炮校）革命派受迫害 该校有一个红色革命造反团由于支持二司，因此在三月二十二日后就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并勒令解散了。三月二十二日军区派的工作组进校，上午抓了十一人，（四月五日放了五个，十七日全放）下午就开控诉「红总」的罪行大会，在会上×司令员讲话说：「红总是一个反动的坏组织，我看应解散。」控诉会把所有参加过「红总」的四五十人都拉上台，站了一大排，并将帽徽、领章都统统取下来，喝令低头，合脚，否则就用武斗，踢脚，完全把这些人当敌人来看待，比斗黑帮黑厉害。这个「控诉」会一直持续了一天半。因此以后「红总」的人一律不准外出，校内贴满了「请罪书」，校内并组织了一个控诉「红总」从罪行展览。直到四月二十三日以前，支持过「红总」的亮相较早的干部孙××还在请罪，写出长达二十一页纸的请罪书，上了纲还被认为是假的。通讯兵学校原来有一个革命组织，「红总」在三月中旬被解散了。这个组织在「二·八」声明上也表过态，没有叫大香花，也无辜被解散。解散时还把该组织的大小头头四十余人叫上台去，进行斗争，后行动受到限制，星期天外出都要受到比例限制。陆军医院的革命派也受到打击迫害 该院有一个造反兵团，占全院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只因支持过二司，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被勒令解散了。该组织五个负责人抓了四个，现放了三个，另一个女的还未放，据悉准备判刑，五个领导人中有四个党员四个贫农出身一个下中农出身，一个主要领导人李××还是六五年中从学校毕业的，此人虽未抓去，但已被斗过几次。信阳空字零零五部队文化大革命被镇压情况 陈大麻子镇压武汉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时，又指使河南军区的何××镇压河南军区内外的文化大革命，为了实现陈大麻子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对河南还不放心，就亲自派军区的副司令员孔××亲自赴豫监督镇压革命造反派，孔××带着陈大麻子的黑指示三月九日由武汉乘直升飞机专程来到信阳，

大搞白色恐怖，孔××一来就宣布该校「红色造反团」为反革命组织，剥夺「红色造反团」二百人的一切政治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we nge wang.org 三月十一日，率领部队在信阳学校大量抓人，宣布两个组织为反动组织，同时宣布该校校长和政治主任为右派份子。三月十一日晚和三月十二日（星期天）全校戒严，「红色造反团」人员一律不准外出，上午八点左右，大约三个营的兵力武装包围，在九点钟开大会。在大会上，孔××说：「我是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来挽救你们的，你们犯了罪」，并宣布「红色造反团」是「反动组织」，又说：「有人说是江青来了，不是的，是我来了，你们把我怎么样？」「这次运动就是要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跳出笼来表演，你们现在表演够了，如果你们不老老实实，就杀了你们的头肥田，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是专你们的政的时候了！今后一律不准上街，如再去就用手铐铐起来，没有绳子就用被包带捆，跳出一个捆一个」孔××还说：「毛主席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主席是在几十年以前写的，是对地主劣绅讲的，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在他的黑报告讲完后，就疯狂地围剿革命小将，三月十二、十四、十七日连续三次共捕十四名，拘留二十九名，看管九名，还有二十五名在抓、捕之内，抓、捕、拘留的拉到大街上去游街示众。以后陈大麻子又派武汉空军司令员×××到该校安队整顿，造成人人请罪，人人过关，逼迫上网，除去哭声就是「不老实，顽固到底，死路一条」的斥骂声，许多人彻夜不眠，面向毛主席像哭，有的逼得想自杀。

五、搞新阴谋、对抗军委命令，企图蒙混过关 当武汉的革命造反派要揪出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时，陈大麻子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保自己过关，对部队强行造武汉没有谭震林的舆论。如布置呼口号问题都作了交待：「打倒谭震林」，「揪出武汉的谭震林」这类口号是把矛头对准解放军的，不能呼。四月十八日新华路体育场开会时，所有解放军均不能呼这些口号，连「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之类口号也不呼，这显然是陈大麻子统一布置的。

对抗军委十条命令 对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进行压制，限制外出，也不许各地方革命造反派与军事院校造反派联系，像高级步校等院校「不准串联」，进去会客找人也受到监视。对高级步校中两个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不平反。还说：「对高级步校的造反组织不存在什么平反不平反的问题」，根据「八条」解散他们；取消他们「反动」二字是根据十条。军委十条和补充规定下达后，在形势所迫之下，不得不释放被捕

的革命闯将，但是陈大麻子仍在玩弄反革命两手，对放的人讲：「根据八条，拘留是对的，现根据十条，教育释放。」放了的革命群众不公开平反，不公开认错，另外还有一些革命闯将仍被关押，像陆军医院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也不平反。这充分地暴露了陈大麻子顽固地坚持反动路线，对抗军委指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真面目。军委十条下达后，军事院校、文工团体的革命造反派又一次冲杀出来，但陈大麻子千方百计企图把他们打下去，进行各方面的迫害。例如：在五月初一个支左人员×××在新湖大讲革命左派怎样识别，保字号的特点怎样，当时被另一支左人员发现，立即派了值勤战士三人来抓，由于被革命学生当场反对才未抓。五月下旬××文工团的战士在新湖大门口看大字报，当时群众叫：「打倒陈大麻子！」他鼓了掌，武汉部队的宣传车的人碰巧发现了，即跳下来抓这位战士，因被革命学生所防拦中未成。诸如此类的事经常发生。外地军事院校革命派来汉受迫害 陈大麻子不仅压制本地军事院校造反派，对外地来汉点火的解放军，陈大麻子也进行迫害，一方面不准在汉，赶外地解放军走，另一方面只要发表不同意见就随便捕人。西安二二一部队红总赴汉调查团住在长江饭店，由于他们对外打电话被偷听，该店的军管人员就监视他们，赶他们走，没有办法，调查团只好另找地方院校住下。六月七日，外地赴汉斗罗筹备处的解放军借一辆宣传车在支左门前宣传毛泽东思想，由于反对陈大麻子炮制的「六.四公告」这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陈大麻子对这些解放军的宣传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竟然出动解放军包围宣传车，给这些宣传的战士扣上「进行了反宣传」的帽子，就围攻宣传车，非法拘留斗罗筹备处的解放军达十人。诸如此类的事发生多次，这仅几例说明了陈再道是顽固不化的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备注：一、逮捕：宣布为反革命份子，被五花大绑，载上手铐，有的剃光头，每天向毛主席请罪多次，关在牢房非人待遇，残酷斗争。二、拘留 关押多天，强迫认罪。三、行政看管 除不绑不铐外，其余同捕。四、上台示众 上台低头认罪，或有武装人员强行压头，宣布由群众监督，勒令请罪、检查。一个学员写血书四份。第三部份 陈再道与王任重、张体学一小撮狼狈为奸，相互勾结，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革命小将炮轰湖北省委、陈大麻子为王任重大唱赞歌 正当首都南下革命小将点燃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革命群众奋起揭发湖北省委的问题时，陈再道四处奔走，

八方游说，为湖北省委唱赞歌。 仅从去年九月十二日到九月十六日的五天内，陈再道先后五次出席张体学安排的「庆祝会」「欢迎会」，如九月十二日庆祝武大新校庆，九月十三日庆贺毛主席视察武钢八周年，九月十六日「欢迎首都红卫兵大会」等等。 在这次大会上，陈再道公开地亲自给保省委得力抓一小撮有功的老保们论功行赏，以鼓励。在这些大会上，陈不遗余力地吹捧湖北省委，吹捧王任重、张体学说他们领导「正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湖北省委的文化大革命「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等等。 这还不算，陈再道在省委会上也是为湖北省委歌功颂德，多次肉麻地吹捧「省委领导运动总的方面是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运动是正常的，也取得了胜利，有些歪风，我们暂时顶住了。」胡说什么「省委本身没有多大的问题，是紧跟中央走的，主席的旗帜总在举，到底举得高不高，有时举得高有时不高，省委没多大问题。」 窦洪年曾正式传达过：「陈再道，钟汉华亲自说过，武汉军区同湖北省委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关系处理得最好。既坚持了原则，又照顾了团结。」这句话的后面，不就充分看出，陈再道之类同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原湖北省委狼狈为奸、相互勾结，镇压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吗?! 二、常委会上出谋划策，充当王、张狗头军师 很少参加常委会的陈再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反常态，活动频繁，出点子献计策。不仅是会议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湖北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者。为了整垮革命造反派，陈再道是狠得了心，下得了手，真是黑心烂肝。

「任重同志的五点指示我完全同意」 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王任重为了达到保自己，保刘、邓，镇压革命群众的罪恶目的，曾给湖北省委下达过五点黑指示。（即：省委的骄傲自满的问题；对待南下同学的问题；省委不作检讨；保护省委的问题，……）在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的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陈说：「任重同志的五点指示我完全同意。」（按：陈与王是一丘之貉） 「多数派也要依靠」 六六年十月份，中央及中央文革明确表示，支持革命的少数派，依靠革命的少数派。可是陈在这以后还说：「少数派要依靠，对多数派也要依靠。」（按：与中央精神唱对台戏，混淆两条路线斗争实质，混淆「革」与「保」的界线，支持保守组织，压制造反派。） 千方百计地阻挠封闭原修字号的《湖北日报》 当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封原修字号的旧《湖北日报》时，陈再道在十二月

二十七日省委常委会上向张体学献计说：「光与他们谈.....把他们拖住，不要占《湖北日报》」（按：企图拖、拉，用马拉松谈判战术来麻痹革命造反派的斗志），「闹得不出版这个风不好。」（按：不准对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进行诬蔑。）「不成功就拖住！」（按：这是在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湖北日报》新生问题时讲的。陈再道这样搞，使旧《湖北日报》迟迟不能新生，使广大读者，特别是《湖北日报》的订户看不到报纸，从而向造反派施加压力，用心何其毒也!）

「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现在主要省市方面紧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有了准备什么都不怕。」（按：给小喽罗吃定心丸。此话是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的） 「敌人还没有出来」 六六年九月三十日，陈在

省委常委会上讲：「现在还闹得不厉害，敌人还没有出来，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

第四部份 疯狂镇压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二·二八声明前」 陈

再道一直参与地方文化大革命。去年八、九月份，他经常出席湖北省委常委会议，十分卖力地为王任重、张体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出谋献策。早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陈再道就抽调大批军队干部充当省委工作组，仅武汉地区就抽调二百四十二名。在中央八月发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后陈竟然还把参加工厂四清的三百七十八名干部在四清结束后留在原单位，镇压群众运动。在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后，陈还抽调空军干部六百多名集训准备派往各院校充当「三员」，党有的同志向军区党委和省委提出批评要求按中央指示办事时，竟遭政治迫害。 去年九月十三日，在参加毛主席视察武钢八周年的大会上，张体学要求陈让湖北军区派十名干部，以《解放军报》记者身份到南下串联的同学中去窥察情况，陈马上照办了。当露了马脚被革命师生识破其诡计后，陈再道慌了手脚，急忙下达命令：「此事不准涉及省委、张体学，湖北军区造一个假报告直接承担责任算了。」看陈大麻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卖命又何其毒也!陈大麻子是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崇高声誉和军民血肉关系的罪魁祸首。 今年元月底，伟大统帅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陈大麻子也趁机以合法身份更加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远在元月二十日，他就伪造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突然强行接管了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为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 林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早就指出，支左人员不能是保守派，而应是左派，但是陈再道所安插的支「左」人员尽是些什么人呢?请看： 刘××：空军支左办公室副主任，原武汉外专的

「三员」，曾被群众批斗过。 杨××：空军支左办公室人员，原武工工作组成员，后又作过三员，被群众批斗过。 齐××：空军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原湖艺工作组副组长。 王××：支左办公室资料员，原东湖中学专门整理学生黑材料材料员。 牛××：空军支左办公室人员，原华师政治系工作组成员，后为三员。 张××：湖北军区支左办公室要员，原华师工作组副组长，被群众斗争过。 黄××：空后支左办公室要员，原华工工作组副组长，曾被批斗过，后又为武机工作组成员。 王××：空军支左办公室，原为三员。 这些压制群众运动颇有经验的人员，现任支左的要职，陈再道安的什么心就很清楚了。

二、从「二·一八」到「三·廿一」 今年二、三月间，全国普遍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湖北武汉地区，以陈再道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充当了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急先锋。 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 首先他利用二·八声明这个大圈套，把所有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全打下去了。陈再道在二·一八严正声明中扬言「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但是在两个多月的「大批判」中，他始终没有揪出这个炮制者。四月下旬，武汉造反派在北京找到陈再道，当面要他交出二·八声明炮制者，陈大耍赖皮，说什么「我们正在调查」。这不但证明陈再道反毛泽东思想——他的结论得出于调查之先——而且充分暴露出他借批判二·八声明之名，行镇压群众运动之实的真实面目。 陈再道镇压群众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先整垮工总，再搞臭二司，红教工，最后再整新华工、新湖大等，这样，保守派自然而然起来。实际上在三月初到四月底，他的第一步已完全实施，第二步正在进行，第三步也已开始了。 陈大麻子对工人总部的残酷镇压陈再道曾对红卫兵的头头讲：「对工人总部，我们在作报告写文章时都要注意，不明显提反革命组织，但群众可以说。有了舆论准备之后，我们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把二司打成比工总更坏的反革命。」 他又说：「在战斗队员中，只提一小撮，实际上我们不能这样，而应该让他们靠边站，不给任何权力。如果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就说是二·八声明流毒没有肃清。」 陈再道还说过：「工人总部号称四十万，被反革命份子掌握了。工总九个头头，七个是严重不纯份子，干了很多坏事，破坏了文化大革命。」「工总、二司把省委扣起来，实际上是把省委保起来。」 三月十五日陈再道在全市「抓革命，促生产」运动大会上，为「三·二

一通告」出笼作最后的准备，他宣称：「当前一股反革命逆流被粉碎，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实行大联合，右派组织正在土崩瓦解，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正在被夺回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 在这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极其露骨的黑话之后，「三．二一通告」终于出笼了。这个混蛋通告竟丧心病狂地勒令工总所属的组织一律解散，扬言工总被「一小撮反革命份子」操纵了，然后就开始了蓄谋已久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逮捕，在半个月时间里，仅在武汉地区逮捕了三千人以上。例如在电信分部一千零七十人中，逮捕四人，拘留十二人，军事登记一百多人。在那段时间内，夜间四出捕人，一片白色恐怖。有一次，陈大麻子「参观」井冈山大楼，大楼总指挥梅传和正被迫写检讨，陈大麻子看见他后，出门时恶狠狠地说：「这种人真该枪毙！」于是梅马上就被捕了。 在这种反动势力沉重压迫下，并未正式宣布解散的九．一三红教工等也被迫解散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严重摧残。 陈大麻子对二司政治迫害 陈大麻子对二司的问题曾有过四点指示： 二司过去做了一些事情，但后来大方向错了，特别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二司犯了严重错误，曾和工总互相勾结作了许多坏事，要把反革命份子揪出来。 二司的头头要对二司所犯的错误负责，要彻底揭发批判，要做出深刻检查。要把反动思想和反动份子揭发出来，办了坏事，要公开讲、到处讲，公布于众，表现出自己的革命精神，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 二司的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都是青年，积极性高，他们有的犯了错误，也是受蒙蔽的，难免的，他们会觉悟的，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 如果说，这些话还只是公开讲的，还比较客气（当然仍可以嗅出其中的杀气），那么在暗地里就更加杀气腾腾了：「工总干的，二司干了，工总没干的，二司也干了」。这么一来，二司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组织必无疑了。 陈再道对新华工等革命组织的恶毒打击 有些糊涂人，以为陈大麻子真的分什么「香花派」、「毒草派」，其实他根本不管这些，对保守派，他就拼命扶植，对造反派就残酷镇压。例如「八．一七」在「二．八」声明上是毒草派，陈大麻子仍不客气把他解散了。对新华工等造反派，他大耍两面手法，明里说要依靠，背地里要打倒。 对各专县革命派的血腥镇压 天门：全县造反派人数达七十余万，现所有造反组织被解散，打成反革命组织，一共逮捕了一千三百六十五人，轻者五花大绑，重者脚镣手铐。该县通告是在武汉部队「三．二一通告」后出来

的。 汉川：汉川县仅有一个最大的农民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军汉川县革命造反委员会」，达六万人之多，军区派出的支左指挥部去后不几天，就与县武装部发出通告，宣告为反革命组织，不准改头换面，化整为零，由武汉去的七二零部队（空军的）成立了支农办公室，专门对付汉川县革命造反委员会。在全县实行白色恐怖，逮捕三百余人，未被逮捕者均请罪和游街、斗争。 黄石市：黄石市共三十个革命造反组织，其中革命职工红色造反联络总部、学生二司、三司、小教红色造反团是全市最大的革命造反组织（达三万人），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其它则被勒令解散。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在全市群众大会上讲：「武汉有个鸟工人总部，黄石又有个鸟联络总部，不管你几十万，我一个通令叫你完蛋。」自然白色恐怖就不言而喻了。 大力扶植保守派势力 堂堂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三月二十六日在黄石一次讲话中说：「什么保皇派，都是好同志」。这几句话代表了被陈大麻子控制的军区支左的意见。陈大麻子对造反派恨之入骨，对保守派却亲如家人，请听他的高论： 「红卫兵（指三字兵）在运动初期，他们和你们一起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还是有成绩的」。（与新湖大、新华上的一次谈话）「大专兵起来，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复辟，他们的前途大得很」。「大专兵成份好，听话，积极分子多，不要整他们，有时还要依靠他们。造反派对大专兵采取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们的支左方针没有变，只是更明朗，对红卫兵（即三字兵）的看法没有变」。 四月十九日，陈大麻子要钟汉华从北京打电话给军区，竟盗用江青同志的名义，胡说什么「红卫兵」不解散，中学红卫兵与大专院校红卫兵不同等等。 武汉军区支左就是根据陈大麻子这些话作为支持保守派的指导方针。他们还指示武装部出面，自上而下地组织了一个什么「红武兵」，使得原职工联合会得以改头换面，死灰复燃。 三、「六·四通告」的前前后后 尽管陈大麻子利用他手中控制着一部份军权，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但他终于抵抗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月初，中央发表一系列反复辟文件，敲响了陈大麻子的丧钟。陈大麻子见势不利，慌忙改变策略，企图蒙混过关。 陈再道放屁说：「我是打倒之列么？」「我从来就不是在打倒之列，敌人总是想打倒我。」「你们造反派就是想当官，你们把我整垮，让你们来当司令员。」——这是硬的。 陈再道又「亲热」地说：「你们（指三新）都是革命左派，你们怀疑我们不依靠你们，不依靠你们依靠谁呢？什么事情不是都同你们商量吗？」——

这是软的。 软硬兼施不能奏效，他就来个金蝉脱壳，往下推。他四月二十日在京辩论时说：「我没叫他们（指保守派）搞你们，这是群众下面搞的。」（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最后，陈大麻子为塞住造反派的口，公然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说：「我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也执行了刘志坚以毛主席名义发下来的错误东西。」陈大麻子尽造谣言，真是罪该万死！ 打击亮相干部，破坏革命的三结合 设立伪抓办，搞资本主义复辟： 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班子的名单，是王任重、张体学推荐并亲手拟制名单，并与陈再道商量过，「抓办」，原来提六人：姜一、张旺午、夏世厚、林木森、江汉华、徐立三（这六个人都是张体学信得过的人）。因夏世厚民愤太大经过省委革命干部三次谈判才将夏从「抓办」中拉出来，后又把张体学的心腹许道琦、韩宁夫、李夫全、严钧、陶泽东拉进「抓办」。韩宁夫原被军区定为打倒对象，只因张信得过他，也拉进「抓办」。姜一的问题很严重，却是陈再道亲自点名进「抓办」的。夏世厚的民愤很大，可是陈再道一再为他打保票。三月下旬，陈再道、韩东山对省人委造反派组织负责人说：「你们不要夏进抓办，不太对吧！我看夏世厚同志没有多大的问题，他很有干劲。」还说什么：「夏年纪都五、六十岁了，不会再搞女人的了，再不出来就只能退休了。」 更令人气愤的是，陈大麻子对张旺午这个大叛徒也是百般庇护，极力往他脸上贴金。在一次接见中，陈大麻子对代表说：「张旺午脑子很活，能力强，湖北省十几年来来的计划数字，都背得出来，是个活算盘。」湖北军区副司令戴×，在一次会议上说：「刚才请上台的，（指韩宁夫、许道琦、张旺午、姜一）都是站出来革命的，你们都得听他们的，他们还是你们的领导，他们怎么说，你们就得怎么做」。这实际上是代表陈大麻子讲的这番话的。此外，很多人问题非常严重。这些进抓办的人好象进了一个保险箱，他们吃住都在宾馆，只抓生产，不管革命，根本不可能亮相。 陈大麻子曾说：「现在形势要求我们抓一下生产，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做出成绩，才能得到中央的支持，才能争取群众。」一句话泄露了天机。 除了省级抓办外，其它他各级情况相似，都是原班人马上台，他们上台之后，对革命造反派实行反攻倒算，气焰极其嚣张，资本主义复辟在湖北武汉是非常严重的了。 以各种手段，打击亮相干部： 陈大麻子一面向省委干部施加压力，搞个什么 64 人集体亮相：另一方面用各种方法，打击亮相到革命造反派一边的领导干部，出来一个打击一个。 年迈花甲

的老干部孟夫唐同志，前不久，明确表示支持造反派，给陈大麻子极大的威胁。故他迫不及待地擅自几次公开点了孟夫唐同志的名，把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名推到孟头上。在武汉部队五·二一文件中公开点了孟夫唐同志的名说：「……目前省市以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王任重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孟夫唐之流已经赤膊上阵了，他们在幕后煽阴风，点鬼火，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在五月下旬陈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声嘶力竭地叫嚷：「刘真、孟夫唐要公开点名，这是逆流！什么对解放军提意见？就是逆流！要公开批判。」明目张胆地炮打周总理，伪造四点指示，企图将孟夫唐一棍打死，以杀鸡儆猴，压制其它革命干部，出来亮相。任爱生、刘真、张华等同志出来亮相以后，也不断遭到陈大麻子的迫害。在陈大麻子指使下，特动份子多次抄他们的家，还把任爱生同志强行绑架，残酷殴打，非法审讯，逼得他跳楼自杀，生命垂危。薛朴若同志最近毅然辞去市「抓办」副总指挥的职，坚决支持造反派，更击中了陈大麻子要害，于是又对薛朴若同志施加压力，却找不到借口，便企图对薛下毒手，有一次，几十个特动份子去抓薛朴若同志，幸亏薛不在家，才得以幸免。但是威胁、恫吓、抄家、绑架、白色恐怖，吓不倒真正的革命领导干部，在广大造反派支持下，革命领导干部的队伍日益壮大。陈大麻子贼心不死，垂死挣扎。陈在五月下旬一次内部会议上说：「现在问题是我们对七条（注：指新公校与钟汉华签订的七条协议）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承认了，他们就继续进攻。」看陈再道对革命造反派是寸步不让，寸利必争。那么，我们就应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寸权必夺。六月四日，陈大麻子盗用武汉部队名义，抛出一个臭名昭著的「六·四公告」，公然为自己开脱罪责，并且以守为功，变本加厉，更猖狂地向造反派出击。「六·四公告」是挑起大规模武斗黑风和反革命暴乱的黑色信号弹；在「六·四公告」的背后，陈大麻子唆使《百碗熊屎》有组织、有计划地纠集黑武兵暴徒配合专政机构袭击革命造反派，并公然派出整连整连的解放军全部化装穿便衣到郊区农村用金钱收买、物质利诱等可耻手段组织不明真相的农民拿起大刀长矛冲担等屠杀我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战友的鲜血染红了江城。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景象！陈大麻子认为可以用屠杀的办法来消灭革命，他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力量就会越小。但事实相反，我们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有党中央，有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在反革命的围剿和屠杀面前决不

会吓倒，被征服。我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又坚强地战斗了。红司令毛主席指出：「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天快亮，路更黑，陈大麻子在作垂死的挣扎，他的末日到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第五部份 生活腐化，骄侈淫逸（略） （选自《打倒陈再道 第一辑》，武汉钢二司《仙人洞》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 编写，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钟汉华在湖北“省司”与“省人司”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七月二日传达记录。《省司》：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群众组织，《省人司》：湖北省人委机关群众组织。）

社会上谣言很多，过去辟谣，现在不辟，北京从不辟谣。社会上叫百匪，踏平什么，骂是骂不倒的，谣言被戳穿了，可以教育老百姓。红卫兵有的喊：“解散工总，欢迎受蒙蔽的起来革命”。很好。牛鬼蛇神要抓，但重点是对一小撮。问题要在后期处理，王任重的秋后算帐不对，但有人的帐，还是要算的。

有人说：“四不”没有阶级性。“四不”是对待群众的问题，一开枪，就会误伤群众。部队有人也说徒手送去挨打，说看着战士挨打。上级没有阶级感情。不是的，当官的不爱兵那还算解放军！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一小撮，同志们对“四不”不理解。

那些所谓造反派“三新”、“二司”不听我们的话，中央的话也不听，中央社论说成是大毒草。对“三新”、“二司”同意你们的看法，原来是革命造反派。现在大方向错了，特别是二司滑得更远，时间更长。他们内部分化很厉害。

“百万雄师”如能再克制一下，对他们的分化更有好处。

对“百万雄师”写信，不是那个情况（指单方面写信）。我们也给“三新”、“二司”写过很多信，有时一个小时一封信，这次给“百万雄师”写信是提希望，说希望你方把凶手交出来，不是勒令。即是提你方，也有另一方。缺点是不该把四封信一起交出去。“百万雄师”开始是批判刘、邓、陶、王联络站，二月四号后，我们开始作他们的工作。对“百万雄师”的错误，我们及时的指出来了。如六月六号“百万雄师”发出紧急动员令，我们就提出了批评，伯达同志看了，批“请陈再道同志设法制止武斗”。后来青山汽车修配厂被抢，大武斗就开始了，对“三新”二司的错误，

我们是要进行斗争的，但要讲究策略。如把真相公布于众，把他们搞垮了好不好？他们自己垮了是另一回事。

历次运动学生打先锋，工农是主力。小资产阶级思潮、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风头主义……如发展下去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省司、省人司大方向是对的。军区犯不犯错误，你们不要管，你们只考虑你们不要犯错误，必须掌握：一、斗一小撮，二、解放一大片。你们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有可能和稀泥。你们还要作少数派的工作，作不作得成功，你们都要去作，这样才能打击一小撮，团结大多数，过去立三路线，就怕赤白对立，打来打去，打了基本群众，“三新”、二司、工总加起来七、八万人，不能说都是牛鬼蛇神，多数要争取，要团结他们中的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思潮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有流氓无产阶级，据说新华工、新湖大也不承认钢八司。阶级斗争会有反复，会有动摇分化，要作少数派的工作。你们批评我们“和稀泥”，有时候不可能不和稀泥。说我们措施不力，他们都不听话，你说怎么办？对“三新”、二司，部队也有一肚子气。真正坏人是要抓的，但武斗时抓不住，不管怎样，这些问题，将来还是要处理的。

我们作外边工作，还要作内部工作，我们战士牺牲了，是难过的，但是不能报复，革命群众组织也不要采取谩骂，也要讲策略。我们吃了很多亏，这也有很多好处。总而言之，政治上一定要站住脚，政治上站住脚，就是最大胜利。

中央对陈再道同志是相信的，毛主席批过文件，河南、湖北的问题，交陈再道同志处理。陈跟我们一样，是有缺点错误的。现在外边的大字报，还是元月李迎希搞的那些东西，很多是无中生有，造谣诬蔑。

你们要从最坏处着想，万一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你们也要在政治上站得住脚，即使有人动摇分化，也不要怕。抗日战争，41——42年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钻窑洞，往往最困难的时候，也是胜利快来了。你们是司令部负责人，精神状况很重要，要三相信三依靠，对我们对的就照办，不对的就不办，照按江青同志指示办事。

中央对部队是严格的，也是积极支持的，军队有个好处，坚决按主席指示办事，错了就坚决改。我们犯没犯方向错误？我们还是“六、四”公告的观点，谁是敌人、朋友，必须弄清楚，这就不会犯错误。

当前形势特点：一、分化；二、对立。一对立就有一方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再就是武斗。根源是阶级敌人，无政府主义思潮，工作缺点错误。

以后不要提什么工总复活分子，工总中群众要起来革命，还是要欢迎的。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武汉公安联司负责人田学勤关于工总问题的报告

在工总问题的处理上，我们一直是参预其事的。三月份取缔工总，我们参加了，我本人也参加了，三月十七日全面大逮捕时，我是副总指挥

（一）工人总部的性质问题：可以肯定的讲，工人总部不是被少数反革命操纵的组织，不是反动组织，更不是反革命组织。今年二月，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掀起了反革命复辟逆流，解散了工人总部，扣留、扣压了大批的上层、中层工人总部负责人以及工人战斗队员，这是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处理工人总部的事实，可以充分说明武老谭把工总打下去，达到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

三月十四日至十五日，我参加了 8201 部队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很明显地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他们的政委讲：“工总从总部到分部到战斗队都做了不少坏事，我们再不能等待了。”又说“在执行上宁肯左一点，宁肯多抓一些，也不能放走一个。”当时拿出来的材料少得可怜，拿来了一个名册上面登记了很多人的名字、出身以及有什么问题。有的栏里面只有一个名字，别的什么也没有。当时我们受蒙蔽，没有能力辨别。当天晚上(17日)开始大批逮捕人。陈再道本人也开过一次大会(省直机关)。我还说一次，工人总部自成立以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成为武汉地区运动的主力军。他们的成绩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领导权的问题：工人总部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呢？据我调查了解，对照公安六条和军委八条、十条以及历来逮捕人的规定，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我们认为朱鸿霞同志等九位勤务员绝大多数是好人，决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尽管有个别勤务员有严重错误，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的!

我们认为这样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应该坚决给予支持，支左嘛，就应该支持左派。

(三)关于“3. 21 公告”中的十大罪状问题：(略)

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我们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为工总翻案做出贡献。工人总部的问题，我们是有材料的!如果陈再道之流继续顽固下去，我们将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汇报、控诉，我们郑重宣布：工人总部的案是一定要翻过来的!一定要把工总案彻底翻过来!请同志们相信我们，我们说话是要负责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汉口电车公司门前——第三次大武斗

6月25日，民众乐园和其它九个据点全部撤出汉口城区，武昌大部份也被占领，造反派唯一能活动的范围只剩下武昌几所大学，武昌各高校路口也设有路障，从6月24日至7月14日这二十天，全市风平浪静，特别是中央对武汉“6.24”日流血事件所发来的电报，“百万雄师”平静了一下，为避开中央批评，暂无武斗发生。

7月16日，是毛泽东在汉游泳周年纪念，高校学生想借这一机会到武昌江边游泳，横渡长江。估计这一理由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不好拒绝，如果出现血案，可能毛泽东本人也会注意。并作了准备，印制了标语、横幅。此时，“百万雄师”胜利者也想借机游泳，横渡长江。军区一看，这两派到武昌江边游泳，肯定会发生武斗，中央“6.26”电报对军区压力很大，再发生流血事件，不好向中央交待，所以军区派叶明副政委出面做“百万雄师”工作，认为你们已经是胜利者，学生16日来游泳你们不要同时搞，哪知胜利了的“百万雄师”此时也不一定听指挥，坚持要16日搞，经军区首长叶明亲自做工作，决定“百万雄师”15日提前搞，照样显示忠于毛主席。

消息传到高校，高校学生们决定乘“百万雄师”15日渡江之机，游行到汉口，给受压迫造反派鼓鼓气，标语口号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打倒陈再道”、“工总翻案，老保完蛋”、“造反派永立江城”的口号。

从华中工学院步行到汉口，全长二十余公里，包括返回，共40公里，80华里，

完全学习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学生唱着革命歌曲，鼓着勇气，在烈日下前行。7月15日，是武汉最热天气，游行队伍全长三公里，沿途群众水果、茶水、鼓掌夹道欢迎。

当游行队伍返回武昌经过汉口电车公司门口时，突然电车公司内“百万雄师”“闪电兵”武斗队冲入游行队伍，说队伍中混有“黑工总反革命份子”，一时队伍大乱，实际上被指的这个“黑工总反革命份子”是华工校工王兴武（“百万雄师”包围搜查后，将王兴武查出杀死，另又杀死了几人，为了毁灭罪证，将这几位同志遗体埋于东西湖，东心农场桃树林中，“百万雄师”农民总部所在地），并不是市区工厂工人，但“百万雄师”“闪电兵”硬要强行将他抓走，自然游行同学不同意，一时拉拉扯扯开始，“闪电兵”越来越多，游行学生也是有备而来，早已通知保卫人员，很快，学生中大个子、大块头组成的保卫人员在队长李长亮的带领下，赶到现场，上前围起王兴武不让拉走，双方发生武斗，此时，电车公司楼上砖头像雨点一样向下，由于此处正值铁路路口、街道狭窄，很快一些女同学头被打破，但都齐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

此时队伍已大乱，男同学冲在前面，双方用拳头打斗，最后，电车公司内“闪电兵”拿出长矛、大刀赶来，一时同学害怕，到处逃窜。当时，电车公司对面是宿舍区，学生为保命纷纷逃到居民楼，要求避难。

半小时后，十几辆满载长矛、大刀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将周围街道全部封锁，到处追杀没有地方躲的学生，另一些就挨家挨户搜查，所谓“挑起武斗”“打死、打伤电车公司女职工，侮辱路过妇女，又打伤正在上班的老工人的杀人凶手”。

原来，当天百万雄师在武昌中华路举办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活动，军区“百万雄师”为了安全起见，将全市武装保卫人员全部集中到武昌中华路（下水处）、汉口滨江公园（起水处）二处保卫安全，当时“百万雄师”有六大武装集团，他们分别是：闪电兵（刘天喜）、翻江龙（彭汉洲）、霸王鞭（×××）、雷达兵（×××）、反到底（学生，叶跛子）等，其中，电车公司是闪电兵总部，当天大部份人都调到江边，守在电车公司的不到五十几人，“7.15”血案并不是“百万雄师”有组织有计划（像“6.24”）那样策划的，当时，当游行队伍游到电车公司门口时，对胜利者“百万雄师”来说，认为这就是一种挑衅，敢在老子门口游行喊口号，

口号中，笔者不敢担保没有同学喊“打倒陈再道”或“公鸡下蛋，老保完蛋”的口号，本来双方就对立，双方火气都大，人人为火上加油，有一个年纪大的人在队伍中，“百万雄师”认定，那个人一定是“黑工总”的反革命成员，所以尽管只有五十几人的电车公司“闪电兵”敢冲进队伍抓人，由于游行学生占多数，闪电兵占了上风，挨了打，人未抓走，最后拿出长矛、大刀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弄得队伍大乱，学生逃窜，紧接着，电话告知指挥部，百万雄师作战部部长刘敬胜和副部长汤忠云在汉口滨江公园马上调人援救。

汤忠云调来的武斗人员来后，学生已经逃散，于是汤下令，全部包围，各街口设堵阻援，要捉拿凶手。

搜查并不顺利，哪家没有儿女上学，同情学生的人比较多，此为其一。第二是居民并非都是“百万雄师”观点的，有些中间派什么都不怕，不准进屋查，因此发生打斗，“百万雄师”不敢用刀对付这些人，另外还有人本身是造反派，又不是头头，是群众，也不许进屋搜，有些屋根本不开门，除五类份子害怕不敢藏学生外，“百万雄师”观点的居民尽管自己不藏，但也不敢检举，所以搜查一直到晚上 11 点才结束，搜查出的学生 200 余人集体到电车公司，大个子关进大会议室，块头小的关进食堂，先放块头大的边打边审问是否保卫人员……此时，区公安局出面审讯学生，要他们承认挑起武斗的责任，交待后台。当时，一冶一个叫黄继元的工人，手制了一把木手枪，平时用来吓唬人，这一次被邴局长抓住，以反革命持枪杀人犯被捕，“百万雄师”和硚口区公安局连夜审讯并照出的照片，7 月 17 日在汉口电车公司开展照片展，说明“7.15”造反派杀人和破坏电车公司物品，阻碍公交秩序的事实。

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汉新华农东方红战士 吴克强《放开我，妈妈！》 面对着“百匪”的大规模屠杀，妈妈怕我到学校去被“百匪”杀害，拉住我。我说：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我们的战友遍天下，

“百匪”的长矛、匕首算得了啥？

我不愿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我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学游泳，
去迎接暴风雨的冲刷！

放开我，妈妈！
你可还记得哥哥和爸爸，
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十年前，爸爸牺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
人民政权的奠基石呵，
洒满了革命烈士晶莹的血花！
而今天，在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
哥哥高举工人战斗队的大旗，
却惨死在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下，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的生命迸射出了光辉的火花！
想一想吧，妈妈，
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
难道父兄的鲜血能够白流？
难道能够让武老谭把革命造反派任意屠杀？
难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捍卫？
难道能让资产阶级重新统治我们的国家？
革命者从来不在困难面前低头；
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和水龙，
又怎能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惧怕！

我走了，妈妈！
请您转告隔壁的苏蒙蔽和马大哈，
叫他们别再为陈再道卖命，
五元钱的贿赂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叫他们转告"百万雄师"的操纵者，
人类的罪犯绝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刽子手的痉挛，
显示出病入膏肓的虚弱，
魔鬼的疯狂，
只是死神的最后挣扎，
光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革命造反派永远也杀不绝、压不垮！

再见吧，妈妈！
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催令我整装速发，
阶级斗争的疆场，任我驰骋，
门庭梨院怎能跑马跃枪？
等着我们胜利的捷报吧！
让我们欢聚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
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儿誓做千秋雄鬼永不还家！

武汉新华农东方张红战士 吴克强 1967 年 7 月

2011 年 9 月 5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9）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九节 南京军区镇压“倒许乱军”分子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说：“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来了二十一名代表，我们决定你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你们对军区领导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上提出来。无论是哪方面的意见，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你们是解放军，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作风。中央要求你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不要把军内的问题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造反派搞在一起”。

你们有意见可以到军队会议上提，但不能到地方去串联，不能把它带到地方上去扩散。军事院校的同志应该回去搞斗批改，你们到处扩散就不好。军区，军事院校不干涉地方，地方也不介入军队，这是军队的事情。中央早有指示了。（军区同志：我们要求参加京西宾馆的会议。）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参加军区的会议，有意见在那个会议上提，你们要守纪律。你们遵守不遵守呀？（答：遵守，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希望你们不要到西苑旅社去扩散。（曾邦元插话：也不能参加地方武斗。）对罗，更不要参加地方武斗。（军区同志有人讲：我们司，政，后的代表也都到了。）你们都参加军队会议，不能挑动武斗，你们要守纪律。联络组同志要注意监督。

他们立即高声回答：“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执行总理指示，遵守纪律，保持军队优良传统。”

随后，总理又说：“让你们到西苑大旅社去住，那里条件不错，有什么问题同联络员联系。要注意搞好军民关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中央首长对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的指示
总理：

你们明知许世友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一月以来多次……许世友同志讲话。同志们知道，主席、林付主席讲了，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哪一个没有一点缺点！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有缺点嘛！但他是忠于毛主席的，这是大节嘛！当然，你们 21 个人年青，我们不怪你们，但是你们有些老同志嘛！

康老：不要听信谣言。

杨代总长：主席讲：许世友在延安没有反对过我嘛！

总理：四方面军的事情，那是张国焘指挥他们东杀西打，下面不负责任嘛！罗瑞卿为了制造分裂，把张国焘问题扩大化，利用这个制造派性，把许世友同志关起来了，是毛主席放出来的。他性子暴，说几句错话，好训人，但是他不是江苏刘邓的代理人，江苏的走资派是江渭清、彭冲、陈光嘛，还有其他的，不是他嘛。

康老：许世友同志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这是一个大节嘛！你们的“决定”，实际上是针对他的嘛！他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从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看，对干部要全面看，从历史看，看大节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总理：大节好嘛！我们敢于出来保他，就是看到他的大节好嘛。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

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作如下检讨。

一、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镇压了革命群众。十条命令下达后，又迟迟不检查、不平反。……把群众的某些革命行动，看成是“坏人暴动，右派翻天”。……

八条命令下来后，我们错误地认为“时机到了，有权抓人了”，于是就带着“镇反”的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在南京，在军区内部，我们怕把军区领导机关搞乱了，把部队搞乱了，没法保卫文化大革命，有了情况，没法打仗了；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失掉尊严，丢了面子。对群众给我们的指责和体罚，又思想不通，情绪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反革命”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帽子和罪名，进行了压制和镇压。二、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逮捕 22 人，开除 8 人，看管、隔离反省的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以整顿机关、整顿纪律为名，指名检查，重点批判，搞“请罪”活动，大整革命群众，一度造成恐怖气氛。

更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夭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风雷激”，说成是反动组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搞“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视……。

十条命令下达之后，我们却错误地认为，错误不大，迟迟不作检查，以致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没有为那些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以及这些同志的家属子女，设身处地想一想。因而，平反工作进行得很慢，很不彻底。

我们所以犯错误，……我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功臣自居，靠老本吃饭，既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架子很大，官气很重，往往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动不动就发脾气，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

我们的检讨还很不深刻，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

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中共中央 [68] 18 号文件

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自从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中央希望，南京军区能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希望你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首先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大力促进、巩固和发展南京和江苏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光荣任务中，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首先应该提到的，南京军区“三支”“两军”进行一年了，这次他们作了一个书面检讨，经过中央批准，今天发给你们了。这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有些问题要解释一下，现在宣读一下。

总理在宣读了中央对军区党委“检讨报告”批示的第一段后说：请同志们注意，头一句话肯定了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在许世友同志，杜平同志领导下的部队，过去是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你们大家也听说了，我们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的有些话在群众组织也传达了。南京军区是长江的门户，江、浙、皖、上海三省一市，地处重要地位。最高统帅毛主席委任许世友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他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好同志，在这一点上必须肯定。当然，部队进行四大的一些单位和地方进行革命运动的小将们不了解历史，有一个时期

觉得军区犯了一些错误，提出一些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对军队同志必须有全面的认识。许世友同志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在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有很大功劳。我们康老跟他一起战斗过的，作过他的政治委员。这个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忠于林副主席的，忠于党的，忠于党的事业的，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这是肯定的。他领导的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你们看十二军在安徽。二十军在浙江，六十军、二十七军在江苏，工作不是做得很好吗？当然也有错误，听到主席一声号令，有错就改了嘛！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多说几句。

在军管，军训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去年一个时期，由于缺乏经验，群众工作生疏了，不象过去又打仗，又做群众工作，又宣传。对群众工作生疏了，就不免站错了队，有一段时间过早表了态，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犯了错误。同时，在部队内部，总是要求有个稳定的局面，部队领导同志总是要考虑海防，边防，舟山还接近台湾，有美蒋敌人，所以总想部队稳定。部队四大单位造反精神旺盛的时候，不顾军区的要求，造成对立，一对立，军区在处理上做了一些错误的措施。这只是讲对待军内开展四大的单位的处理上，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就应按军委指示办事，不搞四大。这一点，我上次在京西宾馆都讲了，二十一位同志都表示了态度，很好。大军区犯的 error 已经做了检讨了，中央认为态度是诚恳的，他们的错误已经或正在改正，有的地方已经做出显著成绩。

南京军区的检讨报告是经过许世友同志，张春桥同志看过的，都同意这个检讨。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好的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我们同意这个检讨，你们应该欢迎这个检讨。（群众热烈鼓掌。）但这不是说军队就没有个别犯错误严重的，军队有派性，首先在军内自己检讨，犯了错误自己检讨好了，再与群众见面，不然要把自己的派性带到群众中去。

康老：

我同意总理这个讲话，完全同意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我提醒同志们注意，这个批示，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大家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批示，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中央在批示中讲，南京军区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军区犯了一些

错误，影响到对革命群众组织的看法，因此派性发展了，军队内部一个时候也不一致了。因为有这些错误，一个时候南京地区“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报很多。但是，尽管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批示说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我对许世友同志说好话，今天是第三次了。

我曾讲过，南京有人讲，许世友反对毛主席，这恰恰相反，许世友同志在历次重大斗争的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多功绩的。这一方面，我同他一道工作过，有责任向同志们介绍。许世友同志我觉得应该向他学习。他在延安遭受罗瑞卿的严重迫害打击，在华东受到饶漱石歧视排斥，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起来，动摇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诚。他照顾大局，讲求团结，不闹分裂，那个时候只有团结才能打仗。他虽然受了坏人的打击，挑拨，但是，他是很坚定的。当然我不是说他没有一点错误，他自己也承认的。

中央的批示中说是信任这个军区，这是很重要的。军区在座的王必成同志犯了错误，只要检讨就好了。他的检讨还是诚恳的，他也是在解放战争中有功劳的。南京有些好同志，我认识的很多，如周冠五同志、钱钧同志、廖容标同志、杜平同志，都应该从全面的来看，不要从一时一事来看。

江青：

有一个问题，我有几次没有说，今天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康老也讲，读了毛主席的语录，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这个我就不说了。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年春季，他就有揭发。他揭发上海陈丕显他们如何在主席，林副主席，总理，我住的地方装窃听器。他的揭发你们不知道。另外他还揭发江苏李××，洪××，为了保护反革命，叛徒，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受命于北京的反革命分子，烧掉××卷档案，邮检，你们知道不知道？不要只看到他说过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而要看到他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他是热爱党，热爱我们军队的。去年，有一个时期忽然又揪许世友同志，一个同敌人作战那样勇敢有人，被揪的钻工事，我知道了，打了两次电话要他来，他在国庆节来到了北京。有人抄了他的家，他说，抄了家日子更好过，这个态度很好。当然，抄家是不对的。

总理：许世友同志一开始就支持“八·二七”，他给我打过电话，他是支持“八·二七”的，在当时是不容易的。

江青：他的揭发，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都不知道。这应该记人家的功，不要光记人家的过。有些人就是趁火打劫，这是很恶劣的，不允许的。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是不允许这样的人，是不允许趁火打劫的人的。当然，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要取得经验，不要搞武斗，搞喷气式。我觉得应该很好地讲道理，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摆事实，讲道理。

总理：

最后一点，还有军队的问题，搞四大的单位的两派也要联合起来，再不要继续派斗下去了。二十一位代表在京西表现很好，继续保持下去。在军队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三团两队等搞四大单位，能不能联合？（众答：能！）不要再搞什么平反团，平反组织了，王必成同志已作了检讨，搞那五条是错误的，改了就好了，不要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了，什么一级级平反，什么戴红花，一个个的赔礼道歉！

江青：那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的！

总理：我们代表中央文革，对过去受压制的，搞错了的，宣布一律平反。你们回去都传达一下，平反组织不要再进行了。（有人答：我们坚决遵照总理的指示办事。）这样才象解放军战士嘛！你们不要把派性搞到地方革命群众组织里去。什么“高参团”，“心中司令部”，“地下司令部”，这是国民党那一套，统统取消，打倒派性。

二、研究资料

《石头城的风雷》 艾汉美著

第一章 狂风暴雨 惊涛骇浪

一、响应毛主席号召，聆听许司令动员

群情激奋，闻风而动

我于一九六四年八月，调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时年三十一岁。在此之前，一九五一年，我在“抗美援朝”的歌声中，投笔从戎。在军校里，学了三年军事专业。随后，在十二军干了十年作训参谋。我这次调动，从军事改行搞政治，也是巧合。当年，军区政治部组建新闻科，除科长、副科长外，其他成员多数是从下属部队挑选上来的。我因那年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而被选中。这次调动使我成为军区机关的一员新兵，也是新闻战线上的一名新手。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以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之势，席卷神州大地，震撼了我们所在的石头城，也震荡着人们的心灵。

军队文化大革命，与地方上有所不同。由中央军委统一布署，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分批分期进行。由于军队性质的需要，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要保持部队稳定。

六六年下半年，我们宣传部，根据军委指示，属于军队开展“四大”的先行单位。我们新闻科，年青人较多，思想活跃、性格开朗、有朝气、有闯劲。毛主席号召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搞好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是一个心愿：积极响应，全身投入。我们深信不疑：通过文化大革命，必定促进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促进人们思想革命化；必定推动我们的国家更加昌盛，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几个月来，宣传部的全体同志，团结一致，口诛笔伐，在批评、批判宣传部部长赵瑾的过程中，既教育了领导，又锻炼和提高了自己。

与我们同时先行开展“四大”的单位，还有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文艺团体、部队医院、军事院校。

几个先行开展“四大”的单位，毕竟是“小部队”，我们军区政治部、整个南京军区机关，何时开展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群众正满腔热情、翘首期盼这一天的到来。

六六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南京军区党委在南京军人俱乐部召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这次动员大会，改变了以往“政治运动由政委做报告”的惯例，而是由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出面做动员报告。这一点，不能不引起广大指战员

的高度关注。而引起大家更加关注的是，许司令做报告时的精神状态。

就以我自己的感受为例吧！平时，我们能直接听到许司令讲话的机会不多。在过去的十年间，近距离聆听许司令讲话，总共只有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七月，许司令到十二军驻地——浙江金华视察工作。李德生军长召开干部大会，请许司令作指示。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初次见到许司令，非常认真，聚精会神地倾听许司令的指示。没想到，许司令一上来，劈头盖脑地讲了这么几句：“有的人工作不安心，闹情绪，我看这些狗娘养的，不识相，原来还不是挑大粪的，有什么好闹的？再闹叫他滚蛋，还是回去挑大粪。”大概不到5分钟就完了，既无“前言”，也无“后语”；既没有官腔，也没有客套话。我听了以后的第一印象：“许司令的话音我好耳熟啊！”原来许司令是河南新县人，我是湖北红安人，“我们是靠近大别山的老乡嘛！”我心里自言自语地说：“许司令讲话，好比‘巷子里赶猪’，直来直去！”散会后，有的同志私下嘀咕：“许司令讲话好粗鲁呀！开口就骂人！”

第二次，是一九六四年初。时任我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根据邓小平总书记、叶剑英元帅的指意，在南京召开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会议规格很高，全军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军区、各野战军的负责人汇集南京。我作为李德生军长随员，也参加了这个会。与此同时，全国全军还在学习南京军区的另外两个典型：一个是“南京路上好八连”；一个是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在这次现场会的最后一天，许司令应罗总长的要求，临场即席讲话。他说：“我们南京军区的同志们千万不能翘尾巴！不要以为在我们这里开现场会，好像我们的工作就怎么好啦！如果不注意，我们的“好八连”就不好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就不红了，“郭兴福”就不兴了。我听了这番话之后，心里一亮：“讲得好！很有针对性，很有哲理性，通俗易懂，言简意明”。对许司令这次讲话的印象，同上次比较大不相同。

许司令在军人俱乐部的动员报告，是我第三次听他讲话，这时，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是大非面前，作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动员报告。这次，他的讲话风格，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本来，许司令讲话一向是有突出的“个人特色”：单刀直入，开门见山；不照本宣科，不照别人写的稿子念，语言“口语化”、“大众化”；不引经据典，不搞长篇大论。可是，这次动员报告完全打破常规。他在报告中，

大段大段地宣读毛主席的“讲话”、“语录”、“指示”一字不漏地传达党中央的有关决议、方针、政策。他从头到尾，不离开讲稿，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的照着念。给他精心准备的讲稿，文字又大又粗，每一页纸上写不了多少话。我们在台下就能清楚地看到许司令一边讲，一边不停地翻着讲稿。他对这种方式很不习惯，很不自然，如果是其他场合，他早不耐烦了，早把讲话稿甩到一边，发挥他的“个人特长”。可这一次，他始终耐着性子，一字一句，一板一眼的地念下去。最后，他还特别强调，全军区的广大指战员，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要求大家多写大字报，给军区领导提意见，帮助军区领导搞好文化大革命。

在这次动员报告之前，政治部机关内部，广泛传开了毛主席对许司令的重要谈话，毛主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许司令响亮回答：“带兵打到北京，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在这次动员报告中，许司令所展示的新姿态，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许司令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对文化大革命的高度重视，真可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大家纷纷表示：许司令的动员报告，就是给我们下达的动员令、进军令，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响应毛主席号召，听从许司令动员，踊跃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

二、大鸣，大放，大字报

向军区领导“开炮”

我原以为，许司令动员过后，军区政治部的文化大革命，就要拉开序幕了。其实不然。许司令作动员报告时，尽管慷慨陈词，可他的内心，并不是真的要发动群众“引火烧身”；而是故作姿态，装装“面子”，做做“样子”、以取悦“上边”和“下面”。时间过去两个月了，我们还是原地待命，整装待发。那段日子里，上层领导由于种种耽心和困扰，发出的信息是“等一等”，“再等一等”；而发动起来了的群众，如同被点燃了的烈火，一再强烈呼吁：“毛主席发了号召，中央军委下达了指示，许司令又发出了动员令，我们还要等什么呢？”于是，在领导不力，而群众革命激情高涨的氛围中，军区政治部的“四大”掀起来了。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八日，宣传部的全体人员，按照“志同道合，自愿结合”的原则，分别成立了两个“战斗队”（造反派组织），一个叫“只争朝夕”，一个叫“捍卫东”。“人民前线报”社成立了一个“风雷激”战斗队，其他各部门

也纷纷组成了自己的“战斗队”。这是在开展“四大”的热潮中，实行“群众自治、民主管理”，而迈出的一步。

我们“只争朝夕”战斗队，有数十人。民主选举产生了五名“勤务员”：新闻科干事艾汉美，摄影记者陈时秋、施关彬，战士教育科副科长顾少杰，宣传科干事谈世茂。大家推举我为“1号勤务员”。

在群众献策献计的民主会上，我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作为战斗队“约法三章”：

第一，我们的行动准则：紧张而有秩序，积极而又慎重；

第二，坚持文斗，不搞武斗，不搞“下跪”、“戴高帽”、“坐飞机”、“游街”等动作；

第三，对军区领导写大字报，当前只能“炮轰”，不能随意提“打倒”；

第四，只在军区机关内部开展“四大”，不与外界各种势力搞联合；

第五，不打“横炮”，不把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群众。

这次，军区政治部“四大”一开场，短短几天之内，贴出了空前规模的大字报。政治部大楼的前大厅四周墙壁，上上下下，贴满了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有的以部门名义，有的是“战斗队”署名，也有个人写的。有些大字报颇有“气派”，从一层楼一直“糊”到四层楼上，可谓“壮观”。全政治部大字报数量之多，居军区各首脑机关之冠。这些大字报上的意见，并非偶然。很多问题早就聚蓄于群众之中，只是没有机会讲出来，长期“憋着”、“捂着”；如今“机会”来了，一下子就爆发了。再说，文化大革命实行“大鸣”、“大放”、“大民主”，发动群众的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大字报“声势空前”也就不足为怪了。

许多同志向军区领导“开炮”的大字报，直呼“尊姓大名”，敢于碰硬。特别是有些胆大的同志，敢于“点”许世友的名，向许世友“开炮”！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早有耳闻，许世友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物，过去给他提意见的人，倒大霉的屡见不鲜。但是，往往事情也怪，有些人偏偏不信邪、不怕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许世友是不能碰的“老虎”，偏要碰一碰。据说，这类大字报，当时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指派专人“跟踪”登记，直接呈送许司令“过目”审查。后来，凡写过这类大字报的人，一个也跑不了，都上了许世友“秋后算账”的“黑名单”。

这次军区政治部，还有不少老将上阵、部长出面写的大字报。例如：秘书处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等人，都给军区领导写了大字报。这种现象也是过去少见的。对此，许世友极为恼火，他说：写过大字报的部长“罪加一等”。

从大字报的内容来看，大多是结合各部门的工作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真诚善意地提出批评，发表意见、建议，期盼和要求。有些大字报属于表态性、宣传性、口号式的，借以造声势，掀高潮。还没有出现乘开展“四大”之机，进行恶毒攻击之类的大字报。

三、左得出奇，批判大会一团糟

严重失控，闹出不可收拾的乱子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四日，以宣传部、文化部和“人民前线报”社几个战斗队为主体，召开了第一次批判大会，也是军区政治部造反派召开的最后一次批判大会。

这次大会在军区政治部二楼小礼堂举行。主持人是文化部干事方泽浦和“人民前线报”社编辑高丕忠。出席大会的军区领导人有：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委鲍先志，政治部主任王六生，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符确坚。这些领导人在主席台上站成一排，接受群众批判。大会前二十分钟，气氛严肃但秩序井然。

会议中间从外面闯进了几十人，自称军区“三团两队”（前线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的造反派，还有什么北京南下的军内造反派。这群不速之客来干什么？我们一无所知。本来，我们与他们之间，是各造各的反，各走各的路，相互是不搭界的。突然间，他们的头头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大喊大叫：“你们这叫什么批判大会呀！太温和了，一点火药味都没有。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逛马路”。指责我们太“右”了，完全没有造反派的“脾气”。接着，就看这些造反的“左派们”大显身手。他们不顾王必成、鲍先志等老将们，年大体弱，强令这些领导人“低头”、“弯腰”、“请罪”。这样一来，批判大会的原计划全“砸”了，乱套了，会场一片哗然。我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顿时膛目结舌，不知所措。我们十分反感他们的行动，但又无可奈何。

正当我们进退两难之际，那些“左派”们更加发狂。他们强令老将们“跪下”、“跪下”接受批判。老将们不服，他们就动手迫使老将们“跪下”。面对这种羞辱领导人的恶劣行径，我们再也待不下去了，立即走开。政治部的同志很快撤离会场，让他们自闹没趣。可是，他们还不肯收场。批判大会被他冲散了，冲垮了，只好让军区领导人也离开了会场。他们继续找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算帐”，说什么：政治部的人对老将们批斗不狠，“这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他们竟然把文化部的方泽浦同志揪住不放，也要方泽浦“下跪认错、请罪”。

批判大会，开成如此糟糕的局面，闹成不可收拾的乱子。军区政治部机关首当其冲，给政治机关的正常秩序和政治声誉带来很坏影响。特别是那么多军区领导人直接受到冲击和伤害。同时，给军区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带头作用。就在这次批判大会之后第三天，即六七年元月二十六日，军区后勤部一部分同志，也召开了类似的批判大会。会上，也出现了强令后勤部领导人“下跪”、“游楼”的要求和行为。

“一、二四”批判大会的结局，使我们感到十分不安。这次“乱子”的肇事者，虽然不是我们；但这次大会是由我们几个战斗队联合召开的，特别是我们几个“头头”（文化部的方泽浦、人民前线报社的高丕忠、洪期钧、宣传部的艾汉美），对“乱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事件，显露了我们自身存在着许多问题。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股“潮流”。我们也跟着“潮流”走。作为大军区政治机关，召开大会，又有那么多军区领导人参加接受批判，事关重大，必须认真对待。但我们盲目自信，草率从事。结果，被人钻了空子，由“盲动”演变成了“乱动”，最后，陷于一场无政府主义的行动。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沉重教训。

我们从这次“乱子”中，对各种不同型号的“造反派”，有所见识。文革期间，什么“造反派”、“保守派”，什么“左派”、“右派”，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人们擦亮眼睛至关重要，不能只听他的口号喊得如何震天响，关键要看他的实际行动是怎么回事？只有实际行动，才能证明一切。

我们承认，“一、二四”批判大会的错误，是我们在文革初期的一次重大过失。但是，有的人借此大做文章，一度大肆炒作、轮换炒作，把这件事描绘成“轰动性”的新闻，说成是“军区政治部发生了反革命叛乱”，并以此作为给我们定

罪的主要证据。这就成了另外性质的问题了。历史证明，某些人的恶意炒作愚蠢可笑。

四、正当群众风风火火开展“四大”之日

正是许世友密谋布置镇压群众之时

六七年元月，正当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写大字报，开批判会的时间里，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杜平，不在南京，而去北京开会了，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军事碰头会——专题研究如何开展军内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会议。

许世友虽然不在南京，可他对南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当他听到军区政治部大楼的大厅里糊满了大字报，有些大字报指名道姓，“向许世友开炮”；听到“一、二四”大会的情况，他气得暴跳如雷：“这还得了，这些乌龟王八蛋造反造到我头上来了，真是要翻天啦！”他一再给在南京主持工作的王必成付司令打电话，要求王必成“立即把那些造反的人抓起来，首先把政治部那几个造反头头抓起来”。但是王必成感到“抓人”这样的大事要慎重，不敢下手。杜平政委，鲍先志付政委，林维先付司令员都不赞成。

也正是这个时候的北京，中央上层领导之间，政治空气极度紧张，斗争异常激烈。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军队的老师们同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等人，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公开论战。一方是，要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推动文化大革命加快步伐，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军队要随时准备打仗，要保卫文化大革命，军队不能乱，军队要保持稳定。

与此同时，在京西宾馆的小礼堂里，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和身为军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一起商量军队问题怎么办？在这个会上，许世友大发脾气，进一步向中央文革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许世友说：“南京的局势一团糟，再这样乱下去，军队怎么打仗？我这个司令怎么指挥？”他强烈要求采取“抓人”的断然措施。气愤地说：“抓几个造反派有啥了不起？杀两个也不碍事。

怀仁堂和京西宾馆两个会上的激烈交锋，反映到毛主席哪里。毛主席身为文化大革命的总决策人和总指挥，既要坚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既定决心和方针，又要依靠军队作为支柱，必须认真考虑老师们老将们的意见与要求。经过综合平衡，毛主席和几位老师商定出了“军委八条命令”。这“八条”内容是

毛主席与几位老师逐条逐句、斟酌修改成的。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由毛主席亲自定稿，批示：“所订八条，很好，照发”。

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许世友的心情大为舒展，似乎获得很大的满足感。他认为“八条命令”就是对付造反派的“尚方宝剑”，事情就好办了，可以放手大胆干了。他争分夺秒，连夜布置军区有关领导认真学习，统一思想。凭着他早年在红四方面军，跟着张国涛搞“肃反”的老经验，加上近来深思熟虑、很快提出了一套类似“镇反运动”的行动方案。

——对跳得高，闹得凶的造反派头头，抓一批，关一批，隔离审查，而后定罪判刑；

——“抓人”的标准和对象：谁写大字报，谁造反，谁就是反革命，就把谁抓起来；

——动用部队：六十军 181 师；

——指定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等人具体负责“抓人”行动，指定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军训部长蒋科等人参加这次行动，并要求司令部接管政治部；

——军区党委“第一线指挥”：付司令员王必成坐阵指挥，直接负责组织实施。

许世友的这一行动方案，当时处于领导层的运筹之中，高度保密。那些天真而单纯的基层群众，统统蒙在鼓里。他们只顾一心一意地“响应毛主席号召、听从许司令动员”，风风火火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的深渊即将降临到自己头上。

五、风云突变，平地惊雷

许世友一声令下：“抓人”

六七年二月，军区政治部上上下下，认真学习贯彻军委“八条命令”。

我们结合前段时间的情况，对照“八条命令”，逐条逐句地进行分析讨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按照我们的思维和理解，认为：“八条命令”是毛主席、党中央根据运动的新情况，采取的新措施，当前要特别强调保持部队稳定，以保证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要搞好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根据“分期分批”的要求，我们宣传部等先行单位，继续开展“四大”，其他部门一律停止“四大”。领导和群众都照此执行，一切都很自然，都很正常，似乎顺理成章，风平

浪静。

在这表面平静的掩盖下，许世友向我们发出了突然袭击的第一枪。

二月十八日下午，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在二楼小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就贯彻军委八条命令的问题，王主任亲自听取造反派的意见。与会人员有：宣传部艾汉美，文化部方泽浦，“人民前线报”社洪期钧，高丕忠及各战斗队的头头们全到场了。还有两位军区付司令员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气氛平和，大家情绪活跃，相继发言，各抒己见。同志们说，领导和群众如此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很多问题就能及时解决。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点半左右，听到二楼走廊里，人员来往频繁，急促的脚步声一阵接一阵。这时，王六生主任的眼神向与会人员扫视一下，再转向门外点头示意某种信号，然后从座位上“唰”地一下站立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提高嗓门大声宣布，“现在，我传达军区党委决定：”

“鉴于军区政治部的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等人，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勾结，冲击军区领导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正常工作秩序，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搞乱部队，乘机夺权。为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加强部队纪律，现决定对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四人，采取断然措施，进行行政看管”。

王六生主任这一宣布，使会议室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们听了王主任的宣布后，感到突然，感到意外，感到愤慨，感到不可“理喻”；

但是，我们没有惊慌，没有失态，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我们都很冷静，都很平静，都很镇静。

王六生的话音刚落，军区保卫部保卫队队长史书清，带着七、八名保卫队员，迅速到了我们身边，两个押一个，当即押着我们四人登上停在大楼后门的“囚车”（一辆军用大卡车）上。

“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四个头头被抓起来了！”当时这一爆炸性的新闻，就像“轰”地一声巨响的“惊雷”，把整个政治部大楼都震动起来了！这一新闻，立刻传向四面八方，传到军区各领导机关，传到军区家属大院，传到有关的亲人、朋友耳朵里……。

军区政治部的各办公室，听到我们四人被抓起来的消息后，就像炸了锅一样，

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来。我们新闻科的同志情绪激愤，十分不满。新闻科付科长李少白，山东人，豪爽性格，心直口快，肚子里憋不住话，他说：“怎么能这样干？我们犯了什么法？是毛主席号召我们开展四大的，是许司令动员我们写大字报的，凭哪一条抓人？我想不通！我抗议！”

有些胆小的同志，听说“抓人”了，一下被吓蒙了，脸色都白了，沉默不语。

许世友对我们四人“突然袭击”的第一枪仅仅是这场“镇反”运动的“前哨战”，还有第二枪、第三枪……。

事实果然如此。二月十八日以后的日子里，几乎天天抓人。抓了一批又一批，一波又一波，像滚雪球似的，越抓越多；抓了一般干部，再抓科长；抓了科长，再抓部长，抓秘书长。

我被抓走以后，与我一起工作的施关彬、陈时秋，于第二批、第三批被抓走了。

新闻科李少白付科长，因为说过“想不通”，不服气的话，也被抓走了，许世友说：“谁不服气，就把谁抓起来”。

宣传部战士教育科付科长杨炳仁，因为过去犯过某种错误，这次也被抓起来了！

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秘书处付秘书长孙海云……等等，一个又一个，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步军区政治部后尘，许世友下令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及“三团两队”，部队医院、军事院校，同时大批抓人。

短短几天之内，许世友抓捕了多少人，按他的“官方统计”，总共只有 505 人。纯属一本假帐，一派欺人之谈。实际上究竟抓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这里，略举两个实例，就不难看出许世友抓人的规模有多大。

实例一：许世友原安排六十军 181 师师部所在地，作为被抓的“反革命”关押地（临时牢房），以为宽宽有余。可是几天后，这里“囚犯”爆满，装不下了，不得已又到镇江附近的小移庄营房另开辟一处关押“囚犯”的牢房。仅一个师部营区关押的人数也大大超过数百人。

实例二：军区后勤部被抓的“反革命”，集中关在南京上新河的军队速成中学里。仅在这里被关押的人数，就达到 700 多人。

这次，许世友镇压群众有两手策略：一手硬，一手软；有两套班底：一套以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为首的“抓捕班子”，专门负责“抓人”、“关压”，直到“判刑”、“坐牢”；另一套以司令部军训部部长蒋科为首的“舆论班子”，负责大造政治舆论。许世友说：“军区政治部烂透了、瘫痪了，取消政治部，用司令部接管政治部”。他说到做到。蒋科能文能武，会说会写。许世友就用蒋科这样的“笔杆子”，为其“镇反”行动大造声势。

二月十八日，许世友下令抓捕“洪、高、方、艾”四人的当天下午，以军区党委的名义，用军内电文形式，给各野战军，各省军区的师以上党委，发出逮捕“洪、高、方、艾”四人的“通知”、“通报”，正式宣布：“洪、高、方、艾”这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必将严惩不怠”。

紧接着，司令部的“舆论班子”，大量炮制各种各样的“公告”、“通告”、“公开信”、“揭发信”、“控告信”，对军区政治部以“洪、高、方、艾”为首的“造反派”猛烈开火；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展开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声讨。在这些“批判”、“声讨”材料中，把“洪、高、方、艾”等人，描绘成“张牙舞爪”、凶神恶杀的“暴徒”，把政治部的“一·二四”大会，说成是“疯狂迫害军区首长，与地方上反动势力相勾结，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制造混乱，是一起严重地反革命叛乱事件”。这些舆论材料，在全军区所属部队中大量散发，广泛传播，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上呼下应，各部队纷纷上书军区领导献忠心、表决心，对“洪、高、方、艾”等人进行口诛笔伐，就像当年全国揭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那样。一时间对“洪、高、方、艾”造反派头头的揭批会、声讨会，搞得沸沸扬扬，轰轰烈烈。

常言道：“有理不在声高”、“事实胜于雄辩”。许世友如此大肆炒作“镇反”舆论，企图借以显示他“大批抓人”的正确性与合法性。其实恰恰暴露了他的虚伪性与欺骗性。镇压群众永远不得人心，只能激起人民的愤怒与仇恨，遭到人民的谴责。

六、身居“囚车，不忘学习毛主席语录”

我们不是“教徒”，胜似“教徒”

那天，我和“洪、高、方”四人，被押上“囚车”，谁也没有吭声，各自站

在“囚车”两边。押送我们的几名保卫队队员，紧靠着我们身旁。此时，我的大脑似乎一片空白：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遭逮捕；第一次“当囚犯”、“坐囚车”；也是第一次听到“行政看管”的新名词。我的人生之路，将要面临很多很多的“第一次”。

“囚车”开动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车往哪儿开？是把我们送去“关禁闭”（部队禁闭室），还是送我们去“蹲大牢”？所谓的“行政看管”是个啥玩意？是个啥滋味？……。

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高丕忠开腔了，打破了车上的沉闷空气。他说：“请大家掏出毛主席语录。”听了这话，我心里暗自嘀咕：“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是什么处境，还有心思学习毛主席语录”？但在口头上又不好说不学。我看着，高丕忠虽然身为“囚犯”，被押在“囚车”上，仍然不顾艰险，不忘坚持随时随地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也赶紧把毛主席语录掏出来。我们四人一起，跟平常一样，翻开语录，一条一条，一字一句地朗读起来。

首先，学习语录的开头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接着，有重点地选读几段：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千万注意。”

“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最基本的道理。”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

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从毛主席语录中吸取精神力量，迎战“行政看管”的严峻考验。

我至今十分清晰地记得，在那个历史年代，“早请示”、“晚汇报”，每当吃饭前，开会前，每逢重要活动，关键时刻，总要先学习几条毛主席语录。这一度成为风靡全国的新气象，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作为共产党员的基本信念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在那个年代，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身居“囚车”的逆境之中，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毛主席语录。共产党不信神，也不信教。我们不是宗教信徒，但我们是“毛主席的战士”，是

毛泽东思想的信徒。就像我们在“囚车”之上，坚持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执着精神，并不亚于宗教信徒祈祷上帝的虔诚态度。现在想一想，当年我们那种忠于毛主席，信仰毛泽东思想的热情和痴迷，实际上有失理智和科学精神，感染某种“神化”色彩，也显露了我们自身的无知和盲从。

在那个年代，还有一种“奇特”现象。文革中的各种势力，各个派系，都是一样的旗号：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照此推理，都是同源于一根，同属于一个派系。然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文化大革命，应该是理直气壮的；可是，许世友身为“毛主席的爱将”，他以毛主席下达的“八条命令”，作为对付造反派的“尚方宝剑”，把我们一个个地抓起来，他也是有根有据的。这其中的奥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困惑不解。

七、“行政看管的见面礼”

刺刀之下进“牢房”

押送我们的“囚车”，开到南京东郊的白水桥停下。这是六十军 181 师驻地，就是许世友关押我们政治部的“反革命分子”所在地。

181 师师部营区，有师部领导机关办公楼，有通讯营、高炮营、卫生营等部队营房，前面是一片广场，后面是宽阔的军事训练场，还有部队耕耘的大片菜地。如今这里大部分营房已经腾空，作为关押“反革命”的临时“牢房”。我们四人是此地接收的第一批“囚犯”。

“囚车”停在营区的进门处。我从“囚车”上举目一望，只见营区内四处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营房外墙上张贴着醒目的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决不手软，毫不留情”、“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洪期钧先下车，身子还没站稳，几个战士围上来，立刻就是雨点似的拳头，打在他的脸上、身上。一边打，一边吼叫：“老实点，把狗头低下来”。“你们不是要造反吗？你们对军区领导那么凶”。“现在我们给点厉害你们尝尝，看你们还造不造反？”我下车后抬头看了一眼，战士们的拳头马上就挥过来了：“不准东张西望，不准抬头”。押送我们行走的道路两旁，各站着一排荷枪实弹、身强力壮的战士，他们俩手端着钢枪，枪膛里上了子弹，枪头间上了明晃晃的刺刀。这阵容看上去就像是一列全副武装的“特别仪仗队”。战士们用恶狠狠的目光，

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不准抬头”、“不准说话”、“不准乱动”、“谁要不老实，就对谁不客气”。我们在一片怒吼声中，在两边钢枪刺刀的威逼下，只能低着头，弯着腰，一步一步向前挪动。

猛然一看，这架势，这场面，真叫人惊心动魄，这更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既没有经历过，也没有见到过。在电影里，在书本上见过，当年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国民党枪杀共产党，“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不就是这般场面吗？我心想：“这营区的后面，就有一个打靶场，难道许世友今天就要在我们头上开杀戒？那可死的太冤啦！”“事临头，不自由”。人到了这份上，被逼急了，胆子反而大起来了。“要杀要剐，不在乎，听天由命！”

两边押送我们的战士，一直用枪刺逼着我们，满脸杀气，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我们一枪“嘣”啦！这些战士和我们四人，素不相识，一无仇，二无冤，为何对我们如此深仇大恨呢？在这之前，李树和同“抓捕班子”的“前线”代表方立德，到这里对战士们进行了“特别教育”和专项训练。因而，战士们的心目中，装满了我们这些人的“反革命罪行”：把我们说成是“迫害军区首长、冲击军区机关的魔鬼”，是“制造一、二四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妄图乱军夺权的野心家”，如此等等。在战士们看来，我们四人是许司令亲自下令要镇压的反革命，是“重犯”，是“要犯”；对我们的斗争，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点不能含糊，必须拿出对敌斗争的最佳表现。

不管许世友把我们“吹”的怎么“神”，怎么“坏”，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几个赤手空拳的文化人，是人们根本瞧不上眼的无名小卒。那许世友为何要动用这么多兵力，为此大动干戈，真的是要“杀鸡用牛刀”？在许世友看来，镇压我们四个小人物，成败如何，关系到这场“镇反运动”的全局。他先抓我们四人，接着要抓几十人，几百人，乃至几千人。所以说，抓我们四人，是这次镇压群众的第一仗，首战必胜。许世友不愧是“肃反运动”的老手，又是大军区司令员，对付我们这些人，他有足够的智谋和力量。在许世友，李树和的精心策划、布置下，这次对我们几个人动真格的，实施重拳出击，一拳就把我们置于死地，叫我们不寒而慄。

我们在刺刀之下的“入场式”，大约经历半小时，把我们押送到营区中的一排平房，即我们的“牢房”。这是我们到达“行政看管”之地的第一课，也算

是“见面礼”。

由于我们四人是到此地的首批“囚犯”，“见面礼”的规格高一点，后面抓来的“囚犯”，就改变了方式，“重在实效”。每次“囚犯”一到，不用那么多兵力真枪实弹和刺刀，而是三、五名战士冲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枪托砸，走一路，打一路，打得你眼冒金花、鼻青脸肿、浑身伤痕，即使不留下终身残疾，也要你留下终身记忆。

八、深受“行政看管”的折磨迫害

我一生中最黑暗的四十天

何谓“行政看管”？翻开党章、党纪、军纪，查阅宪法、法律、法规，都没有看到这么一说。文革中，各种史无前例的奇特怪异之物，纷纷登台亮相。许世友开创的“行政看管”，就是其中之一。

那天下午，我们四人进入“行政看管”所在地，一人一小间房，房里有一张小床，床上有盖的、垫的，还有条桌、板凳。每间房门口有一名武装战士，专门给我们“站岗”。开始我心里默着：“这条件不错嘛，政治犯待遇，又安静、又安全，有利于闭门思过做检讨。”岂知，我又太天真了，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

我刚进这小房间不久，“抓捕班子”的方立德出现在我面前。他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艾汉美！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吗？”

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你该清醒清醒啦！好好想想自己的问题，交代你们的罪行！”

我听他这话的口气，就说：“现在，我的脑子有点乱，请你给我提示一下”。

“你们造反的胆子够大的，竟敢反到许司令头上来了！许司令是你们随便反的吗？许司令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许司令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

我听他这番趾高气扬的高论，当时我是身居“囚室”的“囚犯”，那敢与他辩论，只有默默听着。

此前，我根本不知道方立德是何方人士，后来多次领教了他的训斥和指示，才晓得他是李树和“抓捕班子”中直接“看管”我们的重要官员。

当天夜里，我几乎一夜未能入睡。“我们究竟错在哪里？难道真的成了反革

命？！”“要我交代罪行，从何说起”。我思前想后，脑子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第二天下午，方立德见我一个字的交待材料也没有写，勃然大怒：“艾汉美！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悟，还不认罪”。“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他转身就走了。

经过两天折腾，第二天夜里，我有点熬不住了，躺在床上，很快发出轻轻地鼾声。此时，在房门口看管我的战士，立刻以“触犯囚规”为由，对我一阵“噼啪啪”地拳头猛击过来。因我正在睡眠中，被打得昏头转向，莫名其妙，不知为何遭到毒打。那个战士边打边吼：“你倒睡的挺香呀！这里成了你的安乐窝”，“睡觉不准打鼾”。原来是我的鼾声惹的祸。

午夜时分，看管我的战士换班，来了一名大个子战士，称得上是“彪形大汉”。这战士一上来，就用凶狠的目光，瞪了我一眼。这“眼神”告诉我“来者不善”！“需要格外小心”。因为怕再发出鼾声，我迟迟不敢入睡。正当心神不定之时，我翻了一下身子，由“平卧”转为“侧卧”。不料我的这个“翻身”动作，即刻触怒了看管我的那个战士，他二话没说，冲到我身边，拳打脚踢，枪托砸，一齐上阵。我赶紧从床上坐起来抱住头，其他部位随他打了。这次毒打的力度，比上一个战士要重的多。

那位“彪形大汉”，施展了一阵打人的本事之后，似乎要喘息片刻，冒出了一句话：“你们这些家伙，到了这里还这么顽固，态度还不老实”；“告诉你们，我们对反革命就是要狠狠打击，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

我再次遭到毒打之后，又不知道为什么？便小声地说了一句：“我在床上睡觉，没有什么乱说乱动”。

他大声一吼：“你刚才翻身为什么不报告”。

“睡觉翻身，要先报告”，这是我从未听到过的蹊跷事，又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晚上睡觉翻身，往往是不知不觉的，怎么报告法？”

我这么轻声一问，又把那“彪形大汉”激怒了：“你还敢狡辩！你还不服”！他一不做、二不休，更来劲了，接连抽了我几个耳光，把我打得趴倒在床上，等我坐起来，又是一巴掌，又把我打倒了。这场毒打，打得我鼻青脸肿，满身伤痕，打得我神情幌忽，东倒西歪。

正当我遭此毒打之时，左邻右舍，前排后排的“牢房”里，连续地爆发出了一阵又一阵地歇斯底里的吼叫声、训斥声，“劈历啪啦”地拳击声、耳光声……。事实证明，在我身上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统一组织、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的行动。

这一个晚上的毒打、折磨，使我似乎有所“清醒”：这正好印证了方立德的训话：“敬酒不吃吃罚酒”。这是对我“顽固态度”的惩罚。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惩罚折磨还在继续。夜晚打过了，白天还有新的“招数”。

晚上，给我执行了“睡觉翻身要先报告”的“囚规”。第二天早上，看管我的战士，又宣布了白天不许我们乱说乱动的“囚规细则”：

“头部不能自由转动”；

“身子不能自由挪动”；

“手不能自由移动”；

“脚不能自由走动”。

按此“囚规”，我的整个身躯，只有三个部位可以自由活动：

“大脑还可以自由转动”；

“呼吸可以自由进行”；

“心脏可以自由跳动”。

除这三点外，其他部位如要活动一下，就要先报告，得到允许，才能动。否则，就是违反“囚规”，轻者“挨训”，重者“挨打”。

按此“囚规”，不仅我们的行动自由权被剥夺了，就连我们的生活权、生存权，也统统被剥夺了。这样一来，我这个大活人，不是要变成一个“木头人”、“植物人”了吗？

许世友在白水桥创办的“行政看管”，从字面上看，披着一层巧装打扮的外衣，如同家庭看管子女一般，它与执法性质的“逮捕”、“拘留”、“隔离审查”、“判刑坐牢”，根本沾不上边；就同“关禁闭”的军纪处分也谈不上。但其内幕真相，当我们身临其境，才深切感受到“行政看管”的实质，完全是蓄意整人、折磨人、迫害人，是彻头彻尾地把我们当作“反革命”实施专政。

“行政看管”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操纵手中大权，利用年轻战士的纯朴

与天真，加上“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施以煽动和教唆，促使战士们拿出对敌斗争的杀气和狠劲，在我们身上制造出一幕幕凶神恶杀的打人场面。把我们打伤了、打残了！打死了，也会被掩盖得结结实实的，无人知晓，无处查证。许世友一再声称：“杀几个造反派也不碍事”。那么，在我们“牢房”里的这点事，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从“抓人”到“看管”，一整套打击迫害我们的战略战术，乃是某些居心叵测、诡计多端之人，精心策划、炮制出来的产物。所以说，这“奇特怪异”的“行政看管”，堪称“世界一绝”。

“吃一亏，长一智”。我在“牢房”里待了几天后，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油然而生。从险境中求生存。“好汉不吃眼前亏”，必须从长计议。“不能硬顶，只能软磨”。于是，把我们的“造反”过程，有保留地写了一份检查材料，交给方立德。对奉命行事的看管战士，不顶撞、不抱怨。“坐牢”，失去了自由，得到了安静。在那激烈动荡的年代里，在“牢房”平静下来，认真地读点书、冷静地思考问题，大有好处。我把家里托人带来的“毛选”、“鲁迅文集”，通篇阅读，细嚼慢咽，别有一番滋味。

“坐牢”成天不见阳光，与世隔绝。室内空气确实闷人。轮到我打扫厕所、打扫马路的时候，才有机会吸收一下新鲜空气。一天下午，全体“囚犯”都到营区后面的菜地劳动。我一抬头，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这不是赵付部长吗？他怎么也被抓起来了？”心想：把部长都抓来了，肯定不只抓了他一个部长。再看整个菜地上，黑压压一片人，分不清张三李四。我琢磨：“许世友的胃口真不小，抓的人真不少呀！”“抓人越多，他身上的包袱也就越重。”

这时候的许世友，正是春风得意，“胜利冲昏头脑”。他在南京的“AB”大楼，大摆庆功宴，款待各方有功之臣。平时难得见到一笑的许世友，这天他满脸笑容，大声宣布：这一个月以来，我们把那些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派人物，抓了一批，关了一批，判了一批，还清洗下去了一批。整个行动进展神速，战果辉煌。他特意把他平时最喜欢喝的茅台酒拿出来，同大家举杯畅饮，一醉方休。

许世友高兴得太早了，他原以为，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由他来收拾残局。可是在他的庆功酒喝了不几天，出乎他预料的情况出现了。许世友在南京的抓人行动及全国其他地方的类似情况，引起北京的叶剑英元帅、徐向前元帅十分不满，

毛主席也感到吃惊。在“军委八条命令”颁布之后不久，毛主席又于四月六日，签发了“纠偏”性的“军委十条命令”。

三月底，“军委十条命令”尚未正式下达之前，许世友已经从北京上层领导得到指示：“不准随便抓人，更不准大批抓人”。这一消息迫使许世友不得不赶快刹车，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尽快把抓捕的人放出去。按照许世友原计划，除了第一批四人（孙海云、杨炳仁、洪期钧、方泽浦）经军事法庭宣判，关进大牢之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关进大牢的人，就是高丕忠、艾汉美等人。其他的人，有的要“戴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遣送回乡；有的要去农场“劳改”。现在这一计划已经行不通了。

当时，上层形势的急剧变化，我们这些身陷白水桥“牢房”的人不可能了解。不过，我从某些细微末节上也能猜出几分。例如，三月下旬方立德很少同我们见面了，也没有那么神气了。“牢房”门口的战士，看管我们的力度也越来越松了。这些迹象告诉我：重见天日的时刻不会很久了。果然，三月二十九日下午，方立德匆忙到我面前说：“艾汉美，把东西收拾一下，跟我走”。听了这话，我心里猛然一震：“这一天终于到了！”

从二月十八日，到三月二十九日，我在这间“牢房”里整整待了四十天！此时此刻，我骤然感到压在身上的一块巨石终于落地了，整个身心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许多。但是我的心情又十分沉重，悲愤，无限感慨，一言难尽！

这四十天，是我无端遭受打击，迫害的四十天！

是我刻骨铭心，切齿痛恨的四十天！

是我一生之中最黑暗地、终身不忘的四十天！

是我全家世代永远牢记的四十天！

九、七旬老母被吓呆了，不吃不喝不睡

导致心率衰竭，命送黄泉

我离开白水桥“牢房”，坐上军用吉普车，直奔南京三牌楼——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此时归心似箭，我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

我在白水桥的四十天里，家里情况怎么样，我最担心的是年过七旬的老母亲，

半年前刚从湖北老家来到南京。遭遇这场政治风暴的袭击，老人能承受得了吗？

当我快临近家门时，一眼看到老母独自呆呆地坐在家门口。我走到老母面前，连声呼喊：“妈妈，妈妈”，老人似乎没有听出我的声音，也没有认出我的相貌，反问我：“你是哪个”。我见此状，赶忙提高嗓门：“我是您儿子——汉美呀！”“我回来了！我回来了！”这时，老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才认出我来了。老人一边看着我，一边激动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汉美呀！你到哪里去了！”。当老人发现我面黄肌瘦、蓬头垢面的模样，又惊讶、又痛心地说：“你这次离家几十天，怎么变成另外一个人啦，我都认不出来了，你受的什么罪？怎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我对老人说什么好呢？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把老人扶到房内床上躺着，把话题岔开，说了几句宽慰性的话：“我回来了，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的。”“您老人家要多多保重身体，不要为我过多操心”。

老人接着对我说，我离家几十天，她老人家天天坐在家门口盼着我回来。老人动情地说：“我的双眼快望穿了，如果你再不回来，我恐怕就等不到了，你可能就永远见不到老娘啦！”我看着老人痛苦地诉说，泪流满面，我感到心如刀绞，万分愧疚：“老母亲一辈子含辛茹苦，把我哺养成人，临到垂暮之年，非但享不到一点福，反而让老人受到不该承受的伤害。”

傍晚，我爱人朱德美下班到家了，孩子们也放学回来了。

他们见到我，又意外，又高兴，又亲切，又气愤，又胆怯。灾难中的家人见面，真是百感交集。我被“行政看管”的四十天，全家人由于我而蒙受着意想不到的打击和伤害。

我被抓走的那天下午，我爱人接到一位“无名人士”的紧急电话：“老艾有急事，你快回来”。她接过电话后，立马往家赶。她是一个月前，刚从外地调到南京工作，人地生疏。她从“紧急电话”中已经察觉到事情不妙，心就蹦蹦跳。她回家没见到我，转身就去找新闻科孙科长。

孙科长性情温和。开头以平静的口气说：“老艾今日下午临时出差了，来不及给你打招呼，需要一段日子。”

“孙科长，我感到情况不正常，如果出差，怎么连洗刷用具、换洗衣服都没有带上，我估计老艾出了什么事？请孙科长如实告诉我”。

于是，孙科长即把我被“行政看管”的情况如实相告。朱德美提出：“行政看管”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坐牢”？老艾被送到哪里去了？我们能不能去看看？这些，孙科长同样一无所知，只好安慰她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过于着急，你身上的担子很重，要把老人和小孩子招扶好。”

原来艾汉美、朱德美夫妇及其全家，在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是不为人知的无名之辈，如今双方一起出名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议论的中心，传言四起，闲话更多。只要艾汉美的家人一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有人指指点点，滴滴咕咕。

有的说：“这次许世友要发威了，艾汉美他们几个人碰到许世友的枪口上了。这一下他们全完啦！恐怕小命都难保！”

有的说：“艾汉美戴上了反革命帽子，他老婆就倒大霉啦！刚调到南京来，就成了反革命家属”。

那段时间，我们家的小孩子，简直不敢出门，不敢上街，不敢上学；在外面，他们常常挨骂声，挨拳头，甚至挨石头。什么“艾汉美家的小反革命”，“反革命的狗崽子”等污言恶语，使他们的幼小心灵，留下难忘的伤痛。

受伤痛更深的是七旬老母。由于年老、体弱多病、胆子小、耳又聋，很少出门，对外部世界一片茫然。我在家时，工作再忙，每天总要抽点时间，同老人谈谈心，拉拉家常。这次，我突然“失踪”，音信全无，就像“蒸发”了，因而不能不使老人心急如焚。朱德美考虑到老人心脏不好，再受不了更大的精神刺激，不敢把我被抓的真相告诉老人。而老人眼睛很管用，她看到全家人紧张不安的神态，活蹦乱跳的孙子们、也失去了平日的欢笑；又看到过路行人对我家投以怪异的眼神。这种种迹象，不能不使老母更加惶恐焦虑。连续数日，老人不说话，不吃饭，不喝水，也不睡觉，天天独自一人地坐在家门口盼望儿子归来，喃喃自语：“汉美呀！你再不回来，老娘就等不到了……。”

老母的表现，可把朱德美急坏了，进一步增加了她的危机感，我被抓进去了，已经使她提心吊胆，加上老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如果出现什么不测，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她赶忙去把孙科长夫妇请来，把邻居好心人石嫂子请来，帮助做老人的思想工作。在他们的多方劝导下，老人的情绪慢慢有所缓解。

那段时间，艾汉美的“反革命家庭”，日日夜夜生活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真像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每时每刻都是在磨难中煎熬。在煎熬中的朱德美，

瘦弱的身躯承担着全家的千斤重担，白天她在同事们面前，在老人、孩子们面前，只好强打精神，支撑着内外的事，每到夜深人静、躺在床上，满肚子的苦水一齐拥上心头，白天强忍耐着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一刹间止不住的泪水把枕头毛巾都湿透了。

我从白水桥回家的头两天，老母的心情似乎好转一些。但实际上由于四十天的煎熬，已经使年老多病的身体状况大大恶化，我们最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一天深夜，老人突然鼻子流血、胸闷、吐不出气来。我们连夜把老母送到南京军区“八一”医院治疗。医院连夜进行抢救。第二天即下达了“病危通知单”。医生告诉我：老人心率衰竭，病情危急，能否抢救过来没有把握，要为老人的后事做准备。

正当这时，军区政治部直工科领导给我传达上级指示：“艾汉美属于敌我矛盾，听候处理。先去浙江执行支农任务，在支农中接受改造，将功赎罪”。

我表态说：“去浙江，没有问题。目前由于母亲病危，正抢救，请求延迟几天”。

那位领导说：“这是组织决定，你要坚决执行。家里事你想办法处理”。我一听这话的言下之意：我是“带罪”之人，没有二话可讲，母亲病危也罢，病死也好，一概不管。

经过一周时间的抢救、治疗，老母的生命总算救过来了。医生说：“这只是暂时好一些，病情没有根本好转，还需要继续住院治疗”。

这样，难题又摆在我面前了：一方面，我要留下来，继续招扶老人治病；另一方面，军令不可违抗，我要尽快离开南京去浙江。我的处境，身为“带罪”之人，迫使我不得不狠狠心、咬咬牙，缩短老母住院时间。通知我的长兄速来南京把老母接回湖北老家治病。结果，老母回去不久，即传来病逝的噩耗。

噩耗传来，我的愧疚之心，无地置容；我的仇恨之心，难于言表；我的双眼在流泪，我的内心在流血！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老母之死，就是许世友一手制造的灾难折磨致死。这笔账总有一天要找许世友清算；此账不算，誓不为人！

十、身背“黑锅”，流放龙泉古镇

忍辱负重，奔赴深山野岭

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我奉命赶赴浙江省的龙泉县人武部报到。根据许世友的决定，军区政治部大部分人员，已于我去浙江之前，分赴浙江各地，名曰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实为“清洗出门”。凡是贴过大字报的人，造过反的人，以及支持、同情造反派的人，或者对造反派斗争不力的人，均列入“清洗”名单。

对我这一类的造反派头头，另有一套“特殊”政策。规定我们要远离“三线”：即“大城市一线”、“铁路沿线”和“海防前线”，尽可能地把我们流放到“山区”、“边陲”地方去。我所去的龙泉县，就是位于浙江省西南角最边远的一个山区县。这里盛产陶器和宝箭而闻名，是一座有数百年历史的古镇。交通十分不便，我从南京出发，经上海、杭州、金华，到丽水，共花去两天；然后从丽水沿盘山公路，翻越几座大山，第三天下午才到达龙泉。

军区政治部李树和等人，在我的档案里，塞进了“艾汉美造反罪行材料”，还特别醒目地记录下列文字：“艾汉美系重要的造反派头头，犯有严重错误，要严加看管，不能重用，不能支左，不能支工，要放到山区去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在劳动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改造”。根据“档案”的这一指令，龙泉县人武部领导，当即把我再下放到远离县城的位于大山里的梅岭公社。我到了梅岭，按照公社干部的安排，一头扎进了一位社员家里安顿下来。

梅岭——大山里的一座小镇，周围群山环抱，山上遍布森林，翠竹，一片绿色海洋。小镇的居房建筑，沿着一条小河旁错落摆开。小河河面不宽而平坦，河水不深而清亮。时值夏天，常常看到三五成群的儿童在小河中间戏水游玩。小河岸边有三三两两的妇女，一边洗衣服，一边说说笑笑。河对岸，拉木排的纤夫们，时而发出劳动号子的阵阵吆喝声。河这边，梅岭中心小学里，传来学生们的朗朗读书声。我初来这里，被这优雅自然的山区风光所陶醉。此景此情，不禁使我联想起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陶渊明在《桃花源记》所描写的美景。此景此情，还使我不禁产生了“乱中取静”、“因祸得福”的感慨。

我从白水桥“牢房”里刚放出来，我的老母又是刚被折磨致死。在这双重打击下，在我充满愤怒与仇恨的心态下，被许世友发配到龙泉县的深山野岭之中。

我的这一处境，好比京剧“野猪林”中，林冲遭到高俅所害的那种剧情，那种场面。古代的高俅，陷害林冲，步步紧逼，把林冲发配沧州仍不肯放手，欲置于死地不可。今天的许世友陷害我们也是一计不成又来一计，把我打成反革命之后，又将我发配到深山野岭，其用心就是要困死整死我们。

当我亲临梅岭之后，心情豁然开朗。我目睹梅岭良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再对照当时动荡不安的外部世界，对照乱哄哄的大城市，简直是“两重天”。真要“感谢”许世友把我发配到这块宝地来，实在难得！难得！值得庆幸！庆幸！所以颇有“乱中取静”、“因祸得福”之感。

我到梅岭之初，最有兴趣的是，跟着公社干部或者社员一道，到那高高地半山腰间的农田里干活，既可以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又可以爬山路，练身体；还可以观赏到高山之上的参天大树，奇花异草；偶尔还能看到活跃在悬崖峭壁之间的猴子，真叫赏心悦目。

劳动之余，就去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由于我人地生疏，本地方言又难懂。每次走访，都得请人当向导，做翻译。这里村落分散在大山之间，稀稀拉拉。走访时，就要沿着山间小路，穿密林，爬陡坡，翻山越岭，一个来回就是一身汗。山区群众，常年难得见到解放军，如今看到我头戴军帽，身穿军装，来到他们面前，他们所表现的那种热乎劲，也是难以想像的。他们言谈之间，对解放军的那股亲切感，信任感，兴奋感，使我深受教育。每次走访的过程，贴近群众生活，聆听群众心声，把自己置于平民百姓之中，就是一次自我教育，自我洗礼的过程。这种自我教育，自我洗礼，与许世友等人把我当作“反革命案犯”，所谓的“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是根本性质完成不同的两码事。

我的行动，很快成为梅岭山区广泛流传的新闻。同时，也得到县人武部领导的赞扬。人们又听说我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派下来的解放军”，更加名声大振。一时间，方方面面的找上门来，纷纷要求“解放军”出面接谈。有农村社员，汽车站工人；有学校老师、学生；有部队转业干部、退伍士兵；还有来自上海、杭州的知识青年。因而，一度忙得我不亦乐乎，白天谈不完，晚上接着谈，有时谈到深夜十二点。我的任务是当好“三员”：党的路线、政策“广播员”、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广大群众反映情况的“记录员”。

我刚刚扎根梅岭，许世友又来“关照”我了。七月上旬的一天，龙泉县人武

部领导电话通知我，即日到县。开始，我不知何事。当我回到县里一见面，立刻明白了：许世友派来了“钦差大臣方大人”，即李树和“抓捕班子”的重要成员方立德。就是他，在白水桥“行政看管”期间，专门负责抓捕我，看管我。从南京白水桥，到浙江龙泉县，我与他在那段狂风暴雨的日子里，双方的身份、处境及心态，反差是那么大，对立是那么强烈，导致我们的再次见面是那么的尴尬而难堪。当时，我脑子里敏感地意识到，他是奉许世友之命而来，来者不善，用心何在？我本来是从白水桥“牢房”里放出来的“带罪之人”，流放到龙泉县的深山野岭是“接受劳动改造”、“听候处理”。方立德这次来，是不是要给我“定罪”、“定案”？是不是还要把我再次抓起来“判刑、坐牢”？

方立德此次专程找我究竟干什么？名义上是“传达军区领导指示”。我一听，所谓“军区领导”，说穿了，就是“许世友的指示”。“指示”的内容是：我们这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问题性质还没有作结论”，要看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情况”，“接受改造的表现而定”。要求我们“相信党的政策，相信军区党委的决定”，“不要听信谣传，不要受到外界影响”。这番“指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许世友急忙派方立德下来，就是为了对我们进一步实施“高压”，继续控制我们，说明许世友“处境不妙”，“内心空虚”，对我们极不放心，唯恐我们“兴风作浪”、“犯上作乱”。

许世友对我们这些人的智商和能量，估计也过低了。他可以把我流放到深山野岭，但我的心他是控制不住的。虽然我人在山区，但我的心时刻和外部时局的发展息息相通，紧密相连。各方面的信息告诉我，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以后，南京的形势变化很大。许世友二、三月间疯狂镇压群众的行踪劣迹，日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上上下下的批评和谴责。我们申冤的日子快到了。

第二章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十一、西子湖畔“揭竿而起”

成立“批资总部”，向许世友讨还公道

南京军区政治部二百多名干部，被许世友“清洗出门”，流放到浙江各地。几个月来，我们相同的经历，相同的处境，相同的命运，促使我们不约而同地思

考着同一个问题：面对许世友的打击迫害，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出路何在？

战友之间的书信来往，相互交流、沟通、磋商，酝酿，大家发出一个共同的呼声：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有所作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顾少杰（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付科长）等同志先行一步，多方联络。当时，我们在浙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隶属于浙江军管会领导，而主持浙江军管会工作的主要力量是陆军二十军。顾少杰同志在取得二十军领导的同情与支持下，通知部分人员举行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选：有被许世友“抓捕”、“关压”的造反派头头，有一部分科长、部长，有不同部门的代表，共计 40—50 人。会议地点：杭州云和路 2 号，市委招待所。

这次座谈会非常“特别”。没有正式领导，顾少杰只是个临时召集人。也没有动员，没有设想框架。大家共同饱受了许世友的打击、迫害之苦，就是这次座谈会的最有力地动员和准备。

与会人员，原在南京同一座大楼工作，但相互很少交往，这次汇集西子湖畔，似曾相见而不相识。只因许世友的镇压风暴，使我们有了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命运，走到一起来了。相互之间，自然而然地有了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斗志，共同的语言，不管原来是哪个部门的，不管相识不相识，也不管职务的高和低，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奋斗在一起。可以说是，许世友把我们逼到一条路上来了。

在这场风暴中，我们认识了许世友，也认识了我们自己。从白水桥到浙江，饱受狂风暴雨的袭击，我们挨了整，受了苦，遭了罪，但我们并没有被压垮。相反地，使我们得到了最宝贵、最难得的锻炼和考验，使我们增长了智慧，勇气和力量。

许世友军权在手，他还敢调动军队，再把我们抓起来吗？我们坚信，共产党的军队是“党指挥枪”，而不允许“枪指挥党”。人民解放军绝不是“许家军”。许世友以执行“八条命令”为借口，大砍大杀；后来，毛主席下了“十条命令”，给他套上了“紧箍咒”，他还敢那么疯狂吗？

我们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中华民族的“义勇军进行曲”。“起来！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我们万众一心”，“前进！前进！”“不靠神仙”、“不靠上帝”，“就靠我们自己救自己”。

通过座谈，各抒己见，集思广益，群情激奋、众口一声：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成立“批资总部”（全称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部”），向许世友公开宣战！向许世友讨还公道！

我们军区政治部赴浙江的二百多名干部，正式成立“批资总部”，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是一次对许世友的造反！严格地说，我们原来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只是出于拥护毛主席的革命热情，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一次就不同了，目标明确具体，就是要造许世友“镇压群众、迫害人民”的反。

我们这次造反行动，就不怕带来更大的危险吗？以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说，我头上的“反革命”罪名早已注定了，我在白水桥的大牢里已经蹲过几十天了，我等于在许世友的阎王殿里走了一趟，我的老母被搭上了一条老命，小孩子也变成了“反革命”的小鬼子，我被逼进了深山野岭仍不放手……。我被逼到这份上了，也就不管什么怕不怕了，“逼上梁山”，别无选择，横下一条心，豁出去了，要为我们的生存而斗争，为免遭迫害而斗争，为维护正当权利而斗争。

经过与会人员投票选举，选出了“批资总部”领导小组九人。即：

高琏章（群工部“民兵专刊”编辑）

王元仁（干部部科长）

孟祥海（青年部付部长）

陈永安（“人民前线报”社记者）

夏继诚（“人民前线报”社记者）

顾少杰（宣传部付科长）

陈培光（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文化干事）

陈时秋（宣传部新闻科摄影记者）

艾汉美（宣传部新闻科干事）

这个领导小组的召集人，开始大家推选陈时秋，过了两天，陈时秋提议把这付担子转交给我。我与陈同在一个科工作多年，并肩战斗，合作共事、相互信任，不分彼此。“批资总部”这个临时性的群众组织，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就是了。就这样，我就成了“批资总部”的一号头头。

“批资总部”成立后，主要开展两项活动：一是要求军区领导改错、平反；二是赴京告状。除领导小组成员外，另外抽调了一部分年轻的同志参与“批资总

部”的活动，比如：秘书处的李永宽、许文杰，青年部的周自求、孙宅巍：“人民前线报”社的张炳奎、陆时准、朱占君；宣传部的高岳言、施关彬等等（其他同志我不记得了）。军区政治部赴浙江的二百多干部中，除上述人员外，多数人继续参加省军管会及浙江各地“三支”、“两军”工作。

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和“批资总部”成立，得到二十军领导的有力支持和帮助。我们作为军区政治部赴浙江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二十军作为下级对待上级，只能本着“尊重”和“照顾”的态度。二十军政委南萍原来就是军区干部部的部长，他与我们中间的很多同志是老朋友，老熟人。加上那个年代的特殊性，政治上的复杂性，当时二十军的同志对我们给以谨慎的支持和帮助是可以理解的。在座谈会期间，南萍政委以浙江军管会主任身份，和另一位军管会付主任陈励云（空五军政委），在杭州市新新饭店，接见了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人员。他们俩人的讲话，总的精神是对我们表示“关心和信任”，希望我们积极作好浙江的“三支”、“两军”工作。没有涉及“批资总部”的问题。

十二、南京“急电”，调回精英四十人

义正词严，拒不执行调令

我们在杭州的座谈会尚未结束之时，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给二十军发来一份“急电”。电文内容是：奉军区首长指示，为加强军区政治机关力量，决定从下放到浙江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二百多名干部中，紧急抽调一批精英回南京工作，并列出了抽调的 40 人名单。

这份调令不寻常，为何迟不来、早不来，偏偏此时发来这份调令？

为何此时紧急调回 40 名精英？果真是为了加强政治机关的力量？那么又为何当初“一脚踢开”二百多名干部呢？

我们在杭州成立“批资总部”的消息，连夜传到南京。这一消息，很快传到军区的上上下下，传到机关的四面八方。

不久前，许世友突然一声令下：“抓人”，就像一声惊雷巨响，震动了石头城；

如今，“批资总部”成立了，公开向许世友宣战，就像一颗定时炸弹，突然一声爆炸，又一次震动了石头城。

这时候，许世友已躲到大别山里去了，但“批资总部”的消息，也迅速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气得他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就是一个劲地破口大骂：“他娘的，政治部的这些乌龟王八羔子，又跳出来造反啦！真的要翻天啦！”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政治部的这伙人被他抓的抓，关的关，清洗的清洗，整的死去活来，还没有整服贴，这么快又“卷土重来”了。更使他吃惊的是，原先他把我们政治部的二百多人，统统赶到浙江去，赶到边远山区去，就是为了把我们整的稀巴烂，现在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让我们凑到一起、抱成一团。他似乎感到这一步棋有点失策。于是许世友决定改变策略，另拿主意。在他的指使下，军区干部部便立即向二十军下发了抽调 40 名精英的电令。

面对这一调令，我们怎么办？许世友这一次可以说是一步暗藏杀机的狠棋。如果不执行他的调令吧！就要被扣上“违抗军令”的大帽子，就有可能被再次“抓起来”的风险。如果执行他的调令吧，那正中许世友的下怀。我们成立“批资总部”，是要造许世友的反。如果调走了 40 名精英，对我们实施“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那么，我们的造反不就落空了吗？

对此，我们在座谈会上，经过认真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回电拒绝，我们目前不能执行这一调令。理由有三条：

第一，我们奉军区之命，到浙江执行毛主席下达的“三支”、“两军”任务。几个月来，我们这批 200 多名干部，分赴浙江全省各地城市、农村、工厂、学校，与当地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尽管我们头上顶着“罪名”，身上背着“黑锅”，但我们仍然忍辱负重，不计得失，不讲条件，埋头苦干，全心全力投入“三支”“两军”工作。我们这批人中，有不少同志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骨干力量，获得各方面的信任和赞誉。当前，正是“三支”、“两军”的关键时刻，如果此时调走“精英”，中途“撤军”，势必造成诸多不利影响，这与军区赋予我们的任务和要求，岂不是背道而驰？

第二，正常的组织调动，我们应该无条件服从。但军区此次调令，我们感到诸多质疑。调令说，抽调 40 名精英，是为了加强政治机关力量。这种“外交”词令可信吗？照此说来，许世友还是“很重视军区政治部的建设”，而且，还是

要“重用原军区政治部的精英”。

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实际情况是，许世友恨透了军区政治部，一直在咒骂军区政治部。他不停地叫嚷：“军区政治部烂透了，要取消政治部、要用司令部接管政治部”。正是按照这一指导思想，一九六七年三、四月间，许世友借“三支”、“两军”之机，把军区政治部的二百多名干部，统统赶到浙江去。这次在座谈会期间，浙江省区军的有关同志告诉我们，当初南京干部部长杨映雪传达许世友的指示说，“这二百多人，军区统统不要了，把他们放到第一线去，其中问题严重的人要放到边远山区去”。

本来，我们参加“三支”、“两军”，看作是完成毛主席赋予的一项政治任务。可是，许世友却把它变成了“排斥异己”、“打击、陷害我们”的另一种手段。他原来把我们这批人“一脚踢出去”、“统统不要”。现在又打着“加强政治机关力量”的旗号，再把我们调回去，以达到“分化瓦解”“批资总部”的目的。总之，许世友“翻过来、复过去”，怎么做都是有理的，我们这些人，成了他“随意摆布”、“任意宰割”的羔羊。

第三，更严重的问题是，许世友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种种罪名，李树和等人在我们的档案里塞进去的黑材料，不纠正、不平反、不清算、不还我们以清白，那又如何谈论工作呢？

基于上述三条，我们用“赴浙江干部”的名义，直接向军区干部部回答了一份“不能执行调令”的电报。

十三、王必成说：“二月抓人肯定错了”。

许世友反驳说：“我是执行纪律，没有错”。

当年，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有一句名言：“七、八、九三个月，全国形势大好”。可是，许世友这三个月并不好过。曾几何时，他在南京“AB”楼大摆庆功酒，欢庆“二月抓人”的“辉煌战果”；如今，此项战果变成了镇压群众的沉重包袱，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在南京待不下去，无可奈何跑到大别山的“三线”工事去躲风。

同年七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时，对许世友作出了一项具有深谋远虑的安排；

派自己的专机，指定张春桥前往合肥，把许世友从大别山接到上海。毛主席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个别谈话。毛主席为什么给许世友如此高规格的特殊待遇？我们早有耳闻：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如何把许世友从张国涛的错误道路上教育、挽救过来的故事。这次，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正是运用延安整风经验，再次对许世友费尽心机，以他老人家对许世友所特有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进行教育和帮助，使他从错误中醒悟过来，改正错误，轻装前进。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毛主席的良苦用心，为许世友认错、改错，给足了面子，搭好了梯子。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许世友的自身表现。

这段时间，南京军区领导班子成员，都在认真思考同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二月抓人事件”。许世友不在南京，身为军区第一付司令员的王必成主持日常工作。二月抓人时，王必成是前线指挥官。对此，他认识错误较早，态度转变较好。他在接见受压的同志时，诚恳地说：“二月抓人肯定错了。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指挥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同王必成的认识态度比较一致的领导，有军区付政委鲍先志，还有付司令员林维先。

但是，南京军区“二月抓人”的总决策者，总指挥许世友与王必成等人的态度大相径庭，他对王必成的表态当即反唇相讥：“二月抓人没有错”。他说：“我在上海问过毛主席，部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毛主席说要，那些造反的人不听招呼，我执行纪律有什么错？”许世友就是这个“特性”：他在上海见毛主席时，声泪俱下，下跪求饶，连声说：“我错了，我错了，我愿意检讨”。当他转过身来，面向公众时，就变脸了，腔调也变了。他不但辜负了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反而把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当成了坚持错误的政治资本。

由于许世友根本不认错，更谈不上作检讨了。由军区政委杜平，付司令员王必成等人，以军区党委名义，起草了一份向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检讨报告。因主要负责人——许世友一直躲在大别山上，以“养病”之名，不下山、不发话、不表态，前后写了好几遍，一稿、二稿、三稿，每次都是无果而终。

许世友迟迟不认错，不改错，平反工作更是无从谈起。广大受压的干部、群众按捺不住胸中的怒气，强烈要求军区平反。“批资总部”的同志们不等待，不抱幻想，也不急躁行事。九月中旬，派出一部分代表回到南京军区机关。经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同意，从浙江回来的同志与原在南京的洪期钧、高丕忠、方泽

浦等人联合一起，成立了群众性的“平反小组”，活动地点设在政治部大楼二楼原文化部的办公室。这一回，我们不搞“大呼隆”式地“大鸣、大放、大字报”，也不开批判大会，而是开展“求真务实”的小型活动。比如：在政治部大楼二楼的楼梯口，开办了一处“平反专栏”；由“人民前线”报社的同志，创办了一份“平反小报”；分别走访军区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通过这些“和风细雨”地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反映受压同志的实情和呼声，为平反做些舆论宣传和思想交流。

在此期间，军区司令部被赶到江苏各地的同志、后勤部被赶到安徽各地的同志，也纷纷“杀”回南京，各自成立了本部门的“平反小组”，开展“平反”活动。

十四、联合“司、政、后”受压群众

千里迢迢赴京告状

我们成立“批资总部”之初，就立志“赴京告状”。我们在开展平反活动的同时，就着手“赴京告状”的准备工作。

“批资总部”的同志们，早就有所预测。南京问题——实质上就是许世友的问题，要想在南京解决，恐怕是难上加难了。从许世友的历史、地位、个性及其所犯错误的情况来看，没有毛主席、党中央直接出面，许世友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对我们的打击迫害就不可能平反。

因此，“批资总部”成立不多时，一九六七年九月上旬，我们在杭州召开了军区“司、政、后”三方代表联系会。会议主题：就是筹划“赴京告状”的有关事宜。参加的人员有：司令部参谋张波涛、高国涛；后勤部助理员赵玉祥、王树雨；政治部新闻干事艾汉美，摄影记者陈时秋，人民前线记者陈荣安，还有秘书处的李永宽，宣传部的施关彬等人。为保证“赴京告状”的安全性，这次“司、政、后”代表联系会在秘密状况下进行。事前，我们与司令部、后勤部的代表个别串连约定分头到杭州集合。为开好这个会，李永宽同志选择了一处条件极好的会议地点——位于西子湖畔的密林深处、环境优美的三三〇医院。两天会议及其

吃、住全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会议室内。李永宽还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福建武夷茶品尝。这次会上大家交流情报，统一认识，取得一致意见：军区“司、政、后”联合起来赴京告状。首先分头准备告状材料，寻找上告渠道，于适当时机启程赴京。

正当我们准备上京告状之际，党中央派来了调查组，由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付政委刘锦平中将和周总理秘书宋臬同志带领。他们于十月上旬在南京等地，除调查地方上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外，还非常重视、广泛听取了南京军区受压同志的意见，单独同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军区党委书记尤亮，保卫队队长史书清等同志作了个别交谈，并于十月六日晚上，在南京空军招待所，专门召开了南京驻军受压人员座谈会。我和陈时秋作为军区政治部赴浙江 200 多干部的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会上，刘锦平同志深情地对我们说：“我在北京临走的时候，周总理嘱咐我，要我来看看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们，听听你们的意见，毛主席，周总理很关心你们啊！”“听了这些话，我们无不万分感动。

中央调查组的到来，更加增添了我们的“赴京告状”的信心和力量，给我们极大的激励和推动。加快了告状材料的准备。“批资总部”的夏继诚、张炳奎二同志专门负责整理告状材料，迅速完成了许世友镇压群众的三大本备忘录，名为“大逮捕”、“大迫害”、“大清洗”。军区司令部参谋于定提供了一份许世友二、三月间亲自下令大批抓人的原始记录。政治部秘书处李永宽在舟山要塞区搞到了一本许世友指挥黄朝天（要塞区司令）抓人的电话录音资料。

选择何时上北京？十一月上旬，我们得到信息：中央领导即将召开解决江苏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会议，江苏军管会负责同志及各派头头都去北京了。我与司令部、后勤部的同志们商定，就在此时机起程。动身之前，我和陈时秋又与孙海云、赵树湘、洪期钧等同志，就赴京告状的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我们每人分头购买车票，于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在南京浦口会合，一共二十多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南京军事院校的告状人员），终于踏上了赴京告状的征途。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上北京告状！

是我第一次向毛主席、向党中央告许世友的状！

这次上京告状的路程，如何具体走下去？我们能不能见到中央领导？会不会

“吃闭门羹”？

这次告状的前景，是坦途，还是险路？

这次告状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一切的一切，我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不可预测的未知数！

我们这次上京告状，在许世友看来，更是一次不能容允，不可饶恕的大逆不道的造反行动。

既然走上这条路了，不管那么多了，还是那句话：“横下一条心，豁出去了！”“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往前走”。

十五、人民大会堂前“击鼓申冤”

惊动了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一行二十多人，于十一月十七日抵达北京，临时在建设部招待所住下。我们中很多人还是头一回闯北京。尽管怀着强烈的告状愿望，但面对这偌大的北京城，到哪里寻找告状的门，并不容易。我们到北京的头两天，毫无进展。

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当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江苏军管会的负责同志及江苏各派头头。这给我们提供了机会。吃罢晚饭，我们全体集合，直奔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的安全保卫制度很严，由于我们不是与会人员，根本没有资格进入。按照北京卫戍区的规定，我们只能在人民大会堂的警戒线——100 米以外等候。相距这么远，总理来了，我们既见不着，也无法靠近，岂不是白等一场。这怎么办？

“急中生智”。大家一合计，决定仿效古人“击鼓申冤”的办法，我们在靠近“警戒线”的广场上，二十多人站成前后两排，做好准备，全神关注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到来。大约晚上九点左右，人民大会堂南门处，接连驶来了好几部黑色小轿车。我们判断：总理等中央首长到了。此时，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由李英武统一指挥下口令：“一、二、三”，大家立即齐声高呼：

“我们要求见首长！”

“我们要求见首长!!”

“我们要求见首长!!”

……

如此连声高呼，一声高过一声，连续呼喊了七、八句。这呼喊声果然起到了“击鼓申冤”的作用，顿时惊动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清楚地看到，总理下车后，转过身来朝我们站位的地方看了看，对秘书说：“派人去问问情况”。

接着，一位军队干部来到我们跟前说：他是杨代总参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我们得知他是杨成武代总参谋长的秘书），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要求。当他了解到我们是南京军区司、政、后及南京军事院校的上访人员后，就转身回去了。此时此刻，我们翘首盼望佳音的二十多颗心，简直快要“崩”出来了。

不一会儿，杨代总长的秘书又来了。他笑眯眯地对我们说：“总理同意接见你们”、“你们把人数、名单报上来”。

这一喜出望外的佳音，真叫我们难以置信，没有想到这一佳音来得这样快！来得这样及时！大家高兴地又蹦又跳，又喊又叫，又唱又笑！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感谢总理接见！”“向总理致敬！”

我们即时把当晚在场的人数和名单报给杨代总长的秘书：

实到人数二十一人（另有陈时秋临时有病未到，高国涛因其他事而缺席）。

其中：

张波涛：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

艾汉美：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干事；

陈荣安：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记者；

赵玉祥：南京军区后勤部运输部长助理；

沈文琛：南京军区后勤部助理员；

锋 锐：南京军区后勤部某部教导员；

邓启樵：上海 916 油库政委；

柯如仙：南京军区总医院医生；

张阿夙：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员；

童静芬：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员；

麦佩佩：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员；

蒋俐俐：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员；

华家瑛：南京军区 125 医院医生；

李英式：南京海军学院学员；

遐金城：南京炮校教员；

徐慧堂：南京工程兵学校教员；

王文中：南京步校教员；

张××：南京工程兵学校教员；

邓××：南京军区八三医院医生。

（还有两人姓名不记得了）

我们上报名单后，杨代总长的秘书带领我们步入雄伟壮观的人民大会堂。我平生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

我跨入大门，举目张望。“啊！这建筑真是高大宽敞，华丽堂皇”。心里不禁发出感叹！眼前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往前走不远，就到了福建厅，一眼看到仰望已久的周总理：黑发、浓眉、目光如炬，风采夺人，不愧是一位名震中外的伟人。总理坐在主席台中央，在他两边分别是康生、张春桥和杨成武、余立金。大厅里，参加接见的有许多是在江苏省军管会工作的军队同志，例如：江苏省军区政委梁辑卿，南京军区政治部群工部部长杜方平，南京军区后勤部付部长吴大胜，以及军训部部长蒋科等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我们身上，引起各种不同的表情和反映：有的笑脸相迎，喜形相见；有的冷眼相视；个别的怒目仇视。由此可见，我们这二十一人，突然在人民大会堂出现，受到周总理接见，忽然激起一阵高低起伏的波浪。

总理看过我们上报的名单后说：“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来了二十一名代表，我们决定你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你们对军区领导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上提出来。无论是哪方面的意见，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你们是解放军，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作风。中央要求你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不要把军内的问题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造反派搞在一起”。

我们立即高声回答：“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执行总理指示，遵守纪律，保持军队优良传统。”

随后，总理又说：“让你们到西苑大旅社去住，那里条件不错，有什么问题同联络员联系。要注意搞好军民关系。”

总理会见结束后，由联络员带领我们住进了西苑大旅社。我们二十一人占居了该旅社 2 号楼二层楼的一半住房。房间设施良好，管理规范，有电话，有暖气，一天 24 小时有热水，住房宽敞舒适，生活方便，我们非常满意。

我们在旅社安顿下来，已经是深夜时分了。但同志们的心情根本平静不下来，仍然沉浸在总理会见的兴奋、欢乐之中。这一夜，让我们能够面对面地领会总理关怀备至，谆谆善诱的教诲！面对面地聆听总理平易近人，平和亲切的话语！面对面地感受总理体贴入微，周密安排的爱心！此景此情，不能不使我们每个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这一夜，是我们终身难忘之夜！是我们永远值得纪念之夜！！

虽然已经深夜了，但谁也没有睡意。有的三三两两自由漫谈总理会见的观感，心得体会；有的埋头伏案书写总理会见的日记。我们作为“二十一名代表”的集体，由陈荣安同志连夜整理“总理会见实况”的喜讯，连夜向南京军区司、政、后受压的同志们报喜！向南京的军事院校、医院等所有受压的干部、群众报喜！向我们的家人、亲属报喜！

总理会见二十一名代表的喜讯，在南京是被“官方”严密封锁的。我们赴京告状是“民告官”，由许世友把持的“官方”怎么能容忍二十一名代表的喜讯呢？因此，我们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传播喜讯，传播二十一名代表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由于我们住在北京西苑大旅社，要与南京电话联系，只有通过地方线路，很不方便，也付不起那么多电话费。我们就由南京的“平反小组”联系人施关彬同志，每天深夜 2—3 点，先由他通过军用电话，构通北京二十一名代表住处。北京这头由陈荣安同志负责向南京传播有关讯息。在那两个多月内，几乎每天深夜，南京施关彬——北京陈荣安，都要通过这种特殊方式传达讯息。想想看，他们俩该是牺牲了多少睡眠，付出了多少辛勤劳动！

十六、各方代表汇集京西宾馆

周总理亲自领导“南京军区学习班”

总理会见时，指示我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开始，我们对这一指示的含义并不理解。后来，我们逐步认识到中央举办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是在我们二十一名代表到了北京，进了人民大会堂之后，遵照毛主席关于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指意和决策，费尽心心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反映了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二十一名代表的高度关爱和重视。

会见我们之后，十一月下旬，总理亲自筹划、布置“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学习班”的有关事宜，由军委办事组具体组织落实。

南京军区在家主持工作的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接到军委办事组通知：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南京军区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也被军委办事组“点名”；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十二月五日晚饭后，中央联络员老田同志带领我们二十一名代表，乘上大轿车，前往京西宾馆礼堂楼上会议室。今天，周总理第二次会见我们。这次参加会见的人员还有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及军区政治部的孙海云，赵树湘、徐玉田等同志；还有江苏军管会的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及蒋科等人。

晚 8 时左右，周总理及军委办事组成员：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司令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空军付政委刘锦平走进会议室。参加会见的人员，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总理到来。总理满面笑容，和蔼可亲，挥手示意大家坐下。

这次会见，二十一名代表被安排在会议室正面中央位置上，同主席台上的总理等领导人正好面对面，正在眼前，总理的神态、笑容、语言、举止，我们看的更真切、听的更清晰。

总理把到会人员扫视一番后，问了一声：“同志们都来了吧！”“报告总理，全部到齐”。总理顺手拿起“二十一名代表”的花名册，开口就念第一名：“张波涛”！

我们的“花名册”是按照军区司、政、后及军事院校、医院人员的顺序排列的，因而司令部的张波涛就排在“花名册”第一名。

张波涛突然听到总理点他的名字，声色有点紧张“唰”地一下站起来，答应：

“到”！

“你老家在哪里？”

“报告总理，我是山东人（营）”，他以十足的胶东口音回答。

“你叫张波涛，可不是张国涛，这一字之差，就是天地之别啊！”

总理这句俏皮话，引起会上一阵笑声。

按照“花名册”的顺序，张波涛之后，就是我的名字啦。我正准备回应总理的问话，忽然会上出现一个插曲：

“报告总理”：从江苏军管会的一位官员座位处“崩”出来的声音：“这里有一张南京军区另一部分群众递进来的条子，要求交给总理”

总理接过“条子”一看，反应灵敏的总理，立刻明白了“条子”的“内含”，便与坐在他旁边的杨成武磋商两句后，表态说：“我同意这部分群众派代表来”

“来多少人呢？”

“也来二十一人”，那位递条子的官员提出。

总理略加思考，说：“派七名代表来好了”。

一锤定音。这意外的“插曲”很有意识！总理事先并不知情，军委办事组也没有料到。总理的处理非常巧妙，公正，恰到好处。

“插曲”结束。言归正传，今天总理会见南京军区的领导和群众，亲自布置解决军区内部问题的学习班。总理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办好这个学习班。群众对领导有意见，要让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在学习班上把意见都谈出来。军队的问题要在军内解决，不要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上搅在一起。要顾全大局，保持部队稳定。

总理说，这个学习班由军委办事组负责组织实施。学习班成立领导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中央联络员联系。

“小杨！”（周总理这样称呼杨成武）“我先走一步，你们继续开会。”

大家起立，鼓掌欢送总理离开会议室。

杨代总长接着同我们进一步安排了学习班的有关事项。

根据总理指示，十二月八日，学习班的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十人组成，杜平政委任组长，参加人员有：南京军区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政委梁辑卿、军区后勤付部长吴大胜、军需部部长王挺，“二

十一名代表”有两人：我和李英武，“七名代表”有一人。

从周总理的第一次会见，到第二次会见，通过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使我大大加深了对总理的敬佩之情。为解决南京军区的问题，为办好学习班，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总理该是付出了多少心血啊！这些天来，从南京到北京，从军区领导到广大群众，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大大小小，该有多少事情，多少问题，是由总理亲自策划、部署的！或者是由总理直接指挥、调度的！或者是由总理现场解决，现场处理的！比如，“二十一名代表”和“七名代表”参加学习班的过程，不正是鲜活的事例吗？总理啊！总理！真是太忙、太累、太辛苦啦！面对这亲民爱民的好总理，我们能不万分敬佩吗？

可是，敬爱的总理费尽心血筹办的南京军区学习班，存在着一个人所共知的缺陷。这就是学习班的主角——许世友，始终没有出现。我们在南京也好，到北京也罢，根本见不着许世友的一举一动，也听不到他的一言半句。我们对照一下：总理日夜操劳，正是为给许世友“搭梯子下台”，而许世友又到哪里去了？据说，许世友正在中南海里“养病”。难道说“病”得一句话都不能开口？究竟是“真病”？还是“心病？”在总理第二次会见我们的会议室内，当时我看到出席“南京军区学习班”的阵容非同一般：上至总理，总参谋长，三军司令，下至军区主要领导及群众代表，有关各方面的人物都到齐了，唯一缺席的人物，正是学习班的“主角”许世友。没有“主角”的戏剧，能不能演好？我不懂；没有“主角”的学习班能不能办好呢？我那时候只能心里存在很大疑问，但口头上不敢说出来。

十七、面对面：“杜、王、鲍”硬着头皮“挨板子”

背靠背：许世友不露面，“隔靴搔痒”

在总理亲自领导下，南京军区学习班正式开场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学习班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听取二十一名代表的意见。

我们千里迢迢，从南京到北京，正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总理一再指示我们：“对军区领导的意见，在学习班上都提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理给我们提供的这一千载难逢的宝贵机会，我们倍加珍惜。作为南京军区广大受压干部，群众的代表，我们肩负的担子非同寻常。为此，我们事先有重点，有选择地精心

准备了几个专题发言材料。在大会上，分别由军区司、政、后的代表和军事院校及部队医院的代表，当着中央领导的面，当着军区领导的面，当着各方代表的面，以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沉痛诉说我们在二、三月“抓人事件”中，深受打击迫害的冤情苦水。

二十一名代表的申诉，只是全军区受压群众中为数很小的一部分，就许世友镇压群众的全貌来说，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我们所反映的问题，毛主席、党中央早就有所了解。但是，今天我们在周总理领导的学习班上，通过现身说法，直接向中央进行申诉，其意义就大不一样了。我们申诉时，虽然每个同志满腹苦水，满腔愤恨，但是大家非常注重讲事实、摆道理；非常注意掌握政策、讲分寸，不点许世友的名，不随意戴大帽子。会场气氛严肃而平静。代表周总理出席会议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等，全神贯注地听取我们的申诉。坐在“被告”席位上的军区领导人杜平、王必成、鲍先志，态度不错，尚能认真对待群众的揭发、批判。尽管他们不是“二月抓人”事件的决策人和指挥者，但他们意识到身为军区党委集体领导的一名成员，还是有一定责任的。因而，他们在会上诚恳地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会后还能和群众相互交谈，相互问候。

学习班的会议上，也曾出现过某种不和谐的怪异之音。有一天，正当二十一名代表准备继续申诉的时候，突然“七名代表”的席位上，站起一个人来，抢先一步发言，打断我们的申诉，仔细一看，那位发言的官员，根本不是“七人代表”，而是南京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付主任钱永清，显然是一个冒牌的“群众代表”。这位“官员”的发言，名义上是给“王、林、鲍”提意见，实际上是在“学习班”上公然“发难”，是一次“挑衅”。钱永清在发言中，把广大群众“开展四大”、“要求平反”、“赴京告状”等活动，一概诬陷为“有预谋、有组织地倒许、乱军、压权”，说我们是什么“害群之马”、“不法之徒”。还诬陷我们“欺骗总理，混进人民大会堂”，“在总理面前告黑状”。进而指责“王、林、鲍”在南京接见要求平反的群众，是“投降造反派”；叫嚣“王、林、鲍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他一人发言，坐在旁边的一伙官员：军训部部长蒋科，军训部参谋袁刚、秘书科科长肖海等人，相互“帮腔”、“附和”，“添油加醋”，“火上浇油”。这伙人的一派胡言乱语，不能不激起二十一名代表的强烈不满和愤然反驳。顿时，会场上你一言，我一语，唇枪舌战，互不相让。几天来的良好

秩序，演变成一场混战。主持会议的邱会作部长，不得不赶快宣布：“散会！”

散会后，我们连夜研究，如何应对钱永清等人的疯狂挑衅和攻击。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商定：用无情的事实粉碎那伙人的谎言。

第二天，学习班大会上，由二十一名代表之一、南京军区总医院军医柯如仙发言。她用自己及同事们在“二月抓人”事件中，遭受血腥镇压的事例进行控诉。她所在的南京军区总医院是中央军委指定开展“四大”的单位。该医院院长耿希晨是许世友的“心腹”，平时仗势欺人，严重脱离群众，歧视和打击知识分子，生活腐化堕落。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他的意见爆发了。柯如仙与他一起工作的干部、医生等六人，带头写大字报，揭露了那位院长的所作所为。这一下触怒了那位院长，触怒了许世友，把柯如仙等六人，统统抓起来。其中，五人定为“现行反革命”正式逮捕，另一个拘留审查。柯如仙被逮捕后，把她的双手用手拷加以反拷，叫她无法吃饭，无法入睡，无法大小便。遭受迫害更惨的是该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我军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共产党员沈威廉。

沈威廉教授并没有“造反”，只是同情和支持柯如仙等人的“造反”行动，替他们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你们去革命我来顶替你们工作”之类的话。就凭这，那位院长就把沈威廉定为该医院“反革命篡权黑手”，“柯如仙等人的黑后台”；而且把沈威廉打成“双料反革命”：“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因此，对他加倍惩罚：逮捕、脚擦手拷。由于严重折磨，致使沈威廉原有的肝病、胃病急剧恶化，爆发成胃溃疡穿孔。在此危急关头，那位院长利用手中职权，置沈威廉生命于不顾，拒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措施，致使沈威廉教授惨死在手术台上。死后，既不对尸体进行护理，而且手拷还拷在手上，让带着手拷的尸体凉在手术台上好几天，简直惨不忍睹。

柯如仙的血泪控诉，惊心动魄。整个会场静悄悄，大家陷于一片沉思悲痛之中。

柯如仙的这一控诉，是对许世友残酷打击、迫害群众的无情揭露，是对钱永清等人疯狂挑衅的有力回击。

还有其他几位同志相继发言，大家联系各人、各单位的实际情况，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我们“开展四大”、“要求平反”、“赴京告状”等行动，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革命行动，是党章国法所赋予的正当权利，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

的正义行为。某些人捏造的所谓“倒许、乱军、夺权”的罪名，纯粹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诬告。

十八、毛主席指示：“三个不能打倒”

我们的态度：“三个转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孙海云、赵树湘二同志从京西宾馆专程来到二十一名代表驻地——西苑大旅社，给我们传达毛主席指示，即“三个不能打倒”：

“许世友同志不能打倒”；

“杜平同志不能打倒”；

“南京军区不能打倒”。

“许世友有错误，让他作检查”。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由军委办事组成员刘锦平同志于前一天晚上传达给孙海云、赵树湘二位同志的。

“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精神，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和突然。此前，多种迹象使我们了解到，毛主席“保许”的态度。周总理、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都对许世友说过一些“赞美”之词。所有这些，就是“保许过关”的明确信号。

现在，由军委办事组的领导，直接向我们传达毛主席“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就有更加深层的含义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几天来，我们二十一名代表，对毛主席这一指示，连续地展开学习讨论，从思想上、态度上、行动上，逐步做到“三个转变”：

第一，我们要学会用全面的、历史的观点，看待许世友。许世友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特点突出，个性鲜明，战功显赫，错误严重。毛主席深知其人。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把他从张国涛的错误路线泥潭里挽救过来，使他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战将。今天，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条件下，再次运用延安整风经验，对他进行教育和保护，让他有机会为人民再立新功，我党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证明，毛主席对许世友的一系列决策，是利党、利国、利民的良策。

我们对许世友的不满与反感，主要是由于他在“二月抓人事件”中所犯的错误，使我们深受其害而造成的。但我们不能因为他一时一事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历史和全貌，不能否定他的功劳和贡献。我们也不能因个人的冤屈而舍弃大局和整体。

大家表示：毛主席的话，“许世友同志不能打倒”，我们一百个相信，一百个照办！

第二，我们要充分认识保持部队稳定的重要性。

这次，毛主席发出“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意味十分深长。为什么不只提“许世友”一个人不能打倒，而要同时提出“杜平”也不能打倒。按照实际情况来说，问题的焦点是许世友，杜平的矛盾并不突出，各方都无多大意见。那么毛主席又为什么要把许世友和杜平联在一起呢？除了“司令”和“政委”不能打倒以外，还要加上一条“南京军区不能打倒”。这其中，毛主席确有深谋远虑的大文章。

开始，我们对此认识不足。通过深入学习，联系军队性质、任务，分析国家整体形势和根本利益，逐步清醒一些。大家说，我们要跳出某一个领导人的局限性。“三个不能打倒”的实质是南京军区集体领导班子要保护，要稳定；南京军区几十万部队要保护，要稳定。南京军区面对台湾、面临台海、面临台海战区第一线。因此，我们在解决军区个别领导人的错误时，必须特别注重保持部队的稳定性。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关系人民根本利益的大问题。

第三，我们要注意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和偏急情绪。

我们对许世友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真诚地拥护许世友的领导。文化大革命初期，虽然不少人写了大字报，给他提意见，但并没有一个人要打倒许世友。只是他在六七年镇压群众之后，那么多人被他打成反革命，挨整、遭罪，连同家庭、朋友一起遭殃受压。因而，大家对许世友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无比气愤之下，发出了“打倒许世友”的呼声，有的说：“不能把他打倒，也要打跑”。

我们通过学习毛主席“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体会到这一指示与当时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当年夏天，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 7.20 事件”，掀起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浪，军队受到严重冲击，危及到党和国家

的根本利益。毛主席提出“三个不能打倒”，正是针对这一形势所采取的“紧急刹车”措施。那时候，我们还不十分理解毛主席的深谋远虑，但是，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要注意：对许世友的态度，不能因为个人受了冤屈，容易出现片面性和偏急情绪。

上述“三个转变”，我正式写成发言稿，先在二十一名代表内部展开讨论，听取大家意见。而后，我作为二十一名代表的发言人，在“学习班”的全体会议上公开发表，当即受到军委办事组领导的赞扬。

十九、早也盼，晚也盼，终于盼来了

中央红头文件：军区领导的“检讨书”

历史车轮跨入了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中央联络员给参加“学习班”的每一个人，送来一份中央红头文件。该文件经毛主席圈阅，分两个部分：文件的正文是“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在正文的前面，加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二十一名代表，见到这份中央红头文件，如获至宝，激动万分。从南京到北京，几个月来都在盼望这份文件。“南京军区学习班”也有一个多月了，天天也在盼望这份文件。大家说，“我们早也盼，晚也盼，盼得深山出太阳，终于盼来了中央红头文件。”

这份文件来之不易。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是对南京军区党委在文件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而言的，实际上应该是许世友的“检讨报告”。早在六七年八月，杜平政委和王必成付司令等人，就开始组织人员起草文件初稿。可是，躲在大别山里的许世友，压根儿就不承认他有什么错？更谈不上写“检讨报告”。

“检讨报告”先后写了好几稿，许世友根本不看、不理。

杜平政委又去北京开会了，在南京主持工作的就是王必成付司令员。这一来，王必成面临的压力更大了。受压群众要求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央也要求尽快解决军区“二月抓人”事件的错误。原来，许世友在北京电话下命令，王必成在

南京直接负责“抓人”，而如今又是王必成在南京“检讨错误”。眼前，当务之急是要拿出“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可是，这份“检讨报告”谈何容易？

正当军区面临困境之时，周总理决定在北京举办“南京军区学习班”，有关各方汇集“学习班”上解决问题，这正是总理的高明之举。

总理亲自领导的学习班，办了一个多月，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仍然过不了许世友这一关。一天，“检讨报告”拟稿人之一的军训部部长蒋科，再次把“检讨报告”（草稿），送给住在中南海的许世友审阅、定稿、签字。许世友一看，草稿上写着如下错误：“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镇压了革命群众”，“军区机关和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抓捕了五百多人”，“对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现行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和罪名”。

他立刻满脸的不高兴，他看不下去了，把草稿往桌子上一摔，说：“什么方向，路线错误？是谁叫这样写的？谁承认方向、路线错误，谁去检讨”。他还说：“我没有镇压群众，我要抓的人都是坏人，没有错。”许世友仍然不认帐，不签字。蒋科又一次吃了“闭门羹”。

“检讨报告”又搁浅了，怎么办？这给杜平政委出了大难题，他是主持起草“检讨报告”的负责人。中央规定解决问题的最后期限：六八年元月底之前，包括江苏问题，南京军区问题，全部结束。这就是说，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刻不容缓，必须当即完稿上报中央。杜平与蒋科等人商定：只有一个办法，直接请示总理。众所周知，总理是我党善于解决各种难题的高手。总理看了他们送去的“检讨报告”（草稿）之后，心明眼亮。根据毛主席有关指示，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总理立马明确表态，就按此稿定案。

总理拍板了，许世友无可奈何之下，勉强同意了“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

这份“检讨报告”，最后以中央红头文件的名义，于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正式完稿、印发，六八年元月二十八日正式发往各地、各单位贯彻落实。

这份红头文件，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经过半年多时间，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内到军外，从领导到群众，多方调查研究，吸收各方意见，取得广泛一致（个别领导人除外）的产物。

我们二十一名代表，反复学习，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份红头文件，

是对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重要历史阶段的总结和结论，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其中：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和政策都包括进去了，把南京军区几十万部队干部、群众所要反映的情况、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都包括进去了；包括军区领导所犯的错误及中央对他们的态度都包括进去了。

这份红头文件，对南京军区广大受压的干部、群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对南京军区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历史关头、有关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同争论所作出的鉴定书和裁决书，是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见证书。若干年后，再回过头看，就更能显示出这份红头文件的历史价值。

二十、毛主席亲切接见，周总理庄严宣布

“南京军区受压同志一律平反”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我们见到中央红头文件，“南京军区学习班”临近尾声。六八年春节即将来临（六八年元月三十一日）。此时的北京城，正值严冬腊月，雪花飞扬，寒气袭人。但我们的学习班，二十一名代表驻地西苑大旅社，却是春意盎然，生气勃勃，充满祥和，欢乐的气氛。这几天，喜讯频传，重要活动一项接一项，我们一会儿去人民大会堂，一会儿去京西宾馆：

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下午，我们参加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群众代表的大会；

六八年元月二十八日晚上，我们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接见江苏地方群众代表和南京军区群众代表的大会；

六八年元月二十九日晚上，我们前往京西宾馆，参加军委办事组领导召开的“南京军区学习班”总结会议。

二十一名代表，刚听到要去会见毛主席的消息，高兴极了！我们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盼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学生、红卫兵、造反派、干部、群众，到北京能见到毛主席，是一种时尚，一种政治待遇，政治荣誉。二十一名代表作为赴京告状的身份，会见毛主席，更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

元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我们满怀兴奋之情，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厅灯

火辉煌，歌声嘹亮。来自祖国各地参加接见的群众，你唱一首，他唱一首，自发地展开歌唱比赛。

大厅左边席位上的一群湖南乡亲们，以特有的湖南民歌味，唱起了《浏阳河》：

“浏阳河！穿过了九道弯，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湘江有个湘潭县，出了个毛主席，领导我们得解放……”。

大厅中间席位上，坐着解放军指战员，他们高声齐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领导人民得解放，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大厅右边席位上是来自福建的男男女女，他们亲切、响亮地唱着：

“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思想闪金光，太阳照得人身暖，毛主席的思想光辉照得我心里亮……”。

这里歌唱比赛，没有统一组织，也没有统一指挥，完全是群众即兴而发、激情而唱，此起彼伏，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场景如昼，歌声如潮，既动听，又感人。

我们置身于高大、宽敞、华丽的人民大会堂，在此会见毛主席的难忘时刻，歌唱毛主席、歌唱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感受格外不一样，这歌声的感染力格外不一样——

这歌声，唱得人们热泪盈眶；

这歌声，唱得人们心明眼亮；

这歌声，唱得人们浑身充满力量。

下午四时许，歌声平静下来。参加接见的人们屏住呼吸，瞪大双眼，紧紧盯着大厅的主席台。

“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

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毛主席的高大身材、光辉形象，出现在大厅主席台上，他老人家微笑的面容，慈祥的眼神，稳健的步伐，从右边走到左边，再从左边走到右边，举起右手不停地向群众挥手致意。

跟随毛主席接见群众的中央领导人有：林彪、周总理、董必武、陈毅、叶剑英、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

整个大厅，人们的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响成一片。

会见结束了，但我们的思潮却像大海的波涛一样，奔腾不息。不久前，在南京我们这些人深受许世友的打击迫害，到北京后，我们一次再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关怀，这不能不使我们的无限感激之情，终身难忘之意，又推向到一个新高潮。

我们受到毛主席接见后的第二天，元月二十八日晚上，又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我们同时到达的还有江苏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及江苏各派群众代表。晚 8 时左右，周总理及康生、江青、张春桥、杨成武等人到了。这次会见，总理首先宣读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中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总理就江苏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讲过后，把话题转向军队。他说：京西宾馆的“南京军区学习班圆满结束。”“二十一名代表表现很好”。总理这一简要评语，使我们倍感欣慰。

接着，总理加重语气：“现在，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宣布，南京军区所有受压制的同志，一律平反”“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在南京军区党委领导下，在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领导下，搞好战备，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听了总理这段话，大家深为感动！“总理亲自给我们平反，我们还耽心什么呢？”“一定不能辜负总理的期望和要求”。

陪同总理接见我们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对南京军区问题一言未发。看得出来，他们对许世友十分谨慎。会上，康生、江青点了杜方平的名，批评他“支一派，压一派”。

这天晚上，我惊奇地看到：江青做了一次“威严而专横”的表演。她突然对一名担任“联络员”的军官查问某件事的细节，那位军官一时回答不够明确具体，她当场大发雷霆，不容那位军官申辩，竟然说：“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联络员，不允许含糊糊地回答问题”。责令那位军官“下去检查”。这样一来，会场气氛由“平和”变“紧张”。周总理见此场面，当即接过话题，说：“江青

同志对联络员要求高、批评严，工作有缺点，注意改进就是了。”

元月二十九日晚上，军委办事组领导，在京西宾馆召开“南京军区学习班”总结会议，各方代表和军区领导人都参加了。刘锦平同志代表军委办事组，根据总理关于“南京军区学习班圆满结束，二十一名代表表现很好”的讲话精神，作了全面性总结。我们二十一名代表和七人代表，分别作了表态性的发言。由于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我们已经买好了第二天返回南京的火车票，这次总结会议结束时，军委办事组的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等人，与我们一一握手，并祝贺大家“春节愉快”，“合家幸福！”这天晚上，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王必成付司令员，他同我们每人握手话别的时候，以亲善的态度，温和的语气，问候我们的情况，一再祝贺我们回南京和家人团聚，欢度春节。“不打不相识”。一年来，我们和王必成付司令员之间，从“抓人”到“平反”，从南京到北京，从“对立面”变成了相互“知情、知音”的好朋友；使我们感到：王付司令员是值得我们更加尊重的好领导！

元月三十日，按照预定计划，我们告别了北京西苑大旅社，满怀喜悦的心情，踏上了返回南京的列车。我们回顾在北京的这段时光，真是感慨万千。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一名代表赴京告状的里程，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三章 否定之否定 反反复复

二十一、巧装“胜利者”的姿态

许世友“凯旋”回到南京

党中央关于解决南京问题的红头文件下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相关指示也很明确了。究竟如何贯彻落实呢……。

六八年元月二十八日晚上，周总理刚刚宣布，“南京军区学习班”圆满结束，第二天，许世友带着随员“飞”到上海过春节。他此时的心情如释重负。半年多来，从大别山到中南海，“二月抓人”事件，使许世友的心头，憋着满肚子的气。如今，有毛主席为他保驾护航，又有周总理给他加了不少“赞美”之词，不仅让他的“检讨报告”顺利“过关”，而且，“因祸得福”。他颇为得意地说，造反派帮了他的大忙，使他身价倍增，名扬天下。

因此，在这值得特别庆贺的春节，许世友免不了又一次“举杯痛饮，一醉方休”。当时，在他身边的随员，一共只有 4 名男士。他们一口气喝完了 4 瓶茅台酒，又喝了两瓶自己泡的人参酒。结果，4 名男士醉倒了 3 人。正当许世友庆贺胜利的时刻，南京的李树和派人给他送来了一包标明“许司令亲阅”的重要材料。打开一看，使他大为恼火。原来这包材料，就是军区付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及付政委鲍先志六七年十月在南京 AB 楼接见要求平反的群众代表会议记录。

接见中，王必成以诚恳的态度，对大家说：“二、三月间，军区党委犯了错误，同志们受了委屈，现在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要求平反，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本人在二、三月间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多批评。”

他还说：“由于军区主要负责同志不在南京，同志们的问题，有的我能答复，有的我不能答复、要等军区党委集体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请大家谅解”。

林维先、鲍先志也一致表态：二月抓人肯定是错的，把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肯定也是错的，应该平反。

王、林、鲍的接见和表态，深深地刺痛了许世友敏感的神经。他愤怒地说：“王、林、鲍乘我不在南京，和我唱反调，投靠造反派，妄图乱军夺权！”“他们想在文革中捞稻草，这是做梦！我叫他们稻草捞不到，捞到一手屎，又脏又臭，洗都洗不掉！”

许世友的霸道心目中，那能容忍王、林、鲍如此公开的“叛逆行为”。他在上海几天，一直盘算着如何报王、林、鲍“一箭之仇”。

春节过去了，许世友急不可待，登上了从上海开往南京的列车。这天，他穿上一套新军装，腰间扎着武装皮带、掖着小手枪。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看这幅装束，就断定：许司令肯定是别有用意。列车到达终点站——南京下关。许世友一反常态，不急于回军区大院，也不去坐专程接他的小轿车。而是迈开双腿，步行走出火车站。只见他英姿焕发，精神抖擞，很像是打了胜仗“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雄纠纠气昂昂地快步行走在南京大街上。跟随着他身后及两旁的大小官员，还有军队和地方上的安全保卫人员，加上跟在官员们后面慢慢行驶的各类小轿车，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形成了一道颇为壮观的风景区。

许世友的出现，吸引了大批南京市民，纷纷拥上街头看热闹。街道两旁很快

排成夹道欢迎的人群。有人还喊着口号：“许司令是我们的好司令”，“向许司令学习！向许司令致敬！”此景此情，使许世友也很受感动，频频点头微笑，挥手致意。洋洋得意地说：“我离开南京半年多了，今天总算回来啦！有一派要打倒我，有一派要保我，究竟许世友是个啥样子，恐怕许多人都没见到过，现在就让大家亲眼见识见识吧！”

许世友步行在南京街头的消息，立即传遍了石头城，引起种种不同的反响和评论。

一种是赞扬的声音：这是许世友仿效毛主席当年身着军装、臂带袖章、接见广大红卫兵，是展现他相信群众，贴近群众，同群众站在一起的新姿态。

另一种是疑惑的问号：这是许世友“抖威风”、“显傲气”、“露真容”。他似乎是向广大群众表白：“我许世友回来啦！”你们打不倒的”，我回来后，就要反攻倒算！”

许世友究竟何去何从？人们拭目以待。

二十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红头文件墨汁未干，许世友全部推翻

一九六八年的南京，进入“早春二月”。本以为即将迎来“春意满园”，“春暖花开”的的睛好日子，没料到“人心昼夜转，天变一时间”，一场罕见的“倒春寒”风雪天，席卷而来，使得石头城的大地和天空，显得格外寒冷，真可谓“春冷心冷”。

大自然气候极不正常。同样，这年头的政治气候也是变化无常。春节前夕，杜平政委。从北京回来以后，一直忙着布置军区司、政、后机关及军事院校、医院，认真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红头文件及毛主席、周总理关于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指示精神。大家以中央文件为依据，统一思想，消除纷争。各部门、各单位迅速恢复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我们原来受压的同志，都已撤消“平反小组”，走上工作岗位，有一部分人继续参加“三支”、“两军”。我们满怀希望，有了中央红头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就会出现“烟消云散”、“雨过天晴”的局面。

但是，许世友一回南京，就像“倒春寒”的天气一样，形势急转直下。许世

友“变脸”了，一切跟着“变调”了。

按照许世友指示，召开军区机关干部大会。在这个会上，许世友发表重要讲话。他一开口，火药味就很浓，他说：“这几个月，我不在南京，军区某些领导人不怀好心，跟造反派站在一起，妄想乱军夺权。今天我要公开点名了，就是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他们未经军区党委讨论，也未向中央报告，私自抢先表态，同那些乱军分子穿一条裤子，唱一个调子，说我们去年二月抓人错了。我说，没有错。部队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头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不听指挥，我还不能执行纪律吗？我要抓的那些乱军分子是坏人，抓起来有什么错？”

许世友就凭着他这套自吹、自擂的“高论”，把毛主席亲自圈阅过的中央红头文件推翻了，把毛主席、周总理关于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一系列指示推翻了。他自己上交中央的“检讨报告”中明明写着：“二、三月间大批抓人，镇压群众，犯了严重错误”。现在，这个“检讨报告”，墨汁未干，许世友就翻脸不认账了，统统推翻了。

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副政委鲍先志，都是老红军，是我军第一批授予中将军衔的老将军。许世友胆大妄为，不报告中央，竟敢擅自决定点名批判“王、林、鲍”，要求军区机关，部队开会、办学习班，把“王、林、鲍”同“乱军分子”一起作为批斗目标。南京大街上，贴出大标语：“王、林、鲍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一时间，在许世友的指挥下，南京城掀起了一股大批“王、林、鲍”的黑风。

六七年八、九、十月间，南京军区领导处于认错改错的困境之中，面临着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许世友见势不妙，躲到大别山里去了。杜平又到北京开会去了。留在南京主持工作的就是王、林、鲍。他们论职论权，论事论理，在许、杜两位主管都不在南京的条件下，要处理“二月抓人”事件这样难度极大的问题是非常不容易的。但王、林、鲍面对困难，不退缩，不回避，不推诿，勇挑重担，知难而上。

当时，王、林、鲍看到，广大受压群众强烈要求军区领导认错改错，要求平反。他们在“二月抓人”事件中，尽管只是“参与者”，“执行人”，但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勇于站到第一线，通过接见群众开座谈会的形式，接受群众批评，

听取群众呼声，主动承担责任，做检讨，积极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同时，他们十分注意要处理好与许、杜两位主管之间的关系，说话，做事十分注意掌握分寸，不超越职权，不随意表态，不擅自处理问题。

后来，王、鲍两位领导人，又到北京参加“南京军区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南京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其主要责任就是许世友。此时的许世友在干什么？我们每次在北京开会，或参加学习班，他有一条“原则性的指示”：“到北京后，一切听中央的，中央说了算”。此外别无下文。我们这次长达两个多月的学习班，他待在中南海，却没有露一次面，也没有说一句话。在学习班上，还是只有王必成，鲍先志，代表军区领导，代表许世友，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只有他们面向群众做检讨。态度十分认真、诚恳，没有怨言，没有不满。他们以共产党员的革命胸怀，以党的利益为重，以维护军区党委集体领导为重，以保护军区两位主管的威望为重。他们的修养和风格，获得广大群众的尊重和好评。

奇怪的是，许世友对“王、林、鲍”的正当行为，不领情，不买帐，反目为仇，反咬一口。他最忌恨，最不能容忍的是：“王、林、鲍”在南京“AB”大楼接见受压群众代表，并向群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他说“王、林、鲍这是投降造反派，支持乱军”。按照许世友的这一思维逻辑，那么，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二十一名代表并亲自为南京军区所有受压的同志宣布平反”岂不是成了更加不能容忍地“投降造反派”、“支持乱军”的行为吗？所以说，许世友公开点名批判“王、林、鲍”，其实他的矛头是指向周总理，指向党中央，是要全盘推翻中央红头文件。

在文革中，我们不仅领教了许世友的思维逻辑，同时也摸透了许世友的行为逻辑，这就是：“到北京去，一切听中央的，中央说了算”（这是无可奈何的假话）。“回南京后，一切听许世友的，许世友说了算”（中央的指示文件，到了南京就不管用了）。照此逻辑，“南京就成了北京以外的另一个中央了”；或者说“南京就成了与北京平起平坐的独立王国了”。

二十三、捕风捉影、借机发乱

许世友捏造“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

六八年的春天，正当许世友大批“倒许乱军的黑后台”“王、林、鲍”之际，林彪一手炮制出了一个所谓的“杨、余、付”事件。文化大革命中就是怪事多多，今天揪出“一伙又一伙反革命”，明天揪出“一个又一个黑后台”。风起云涌，南北呼应。

在北京的一次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林彪宣布：“杨成武同余立金、付崇碧勾结，要打倒吴法宪，打倒谢富治，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中央决定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许世友听到这个消息，倍加兴奋。“杨成武倒了”，对他十分有利。他马上把“南京的打倒许世友”，同“杨成武的排挤许世友”，联成“一条黑线”。他自以为“许多疑团”找到了答案，比如：“二十一人到北京告状”，不正是“杨成武的秘书带进人民大会堂”的吗？京西宾馆的“学习班”，不正是军委办事组的杨成武等人“背后操纵”的吗？他果断决定：“倒许乱军的黑后台，不只是南京的王、林、鲍，还有北京的杨、余、付，“这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要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

在许世友的导演下，把“倒许乱军”与“王、林、鲍”拉扯在一起，又把“倒许乱军”与“杨、余、付”拼凑在一起，似乎果真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转眼间，南京的大街小巷、大会小会，出现了大量的大标语，大字报：“打倒杨、余、付”，“打倒王、林、鲍”，“彻底揭发批判倒许乱军的罪行”。

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是浙江省革委会诞生的日子。许世友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一天特赴杭州祝贺。第二天，在浙江省军区礼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由许世友训话。这次训话，才是许世友杭州之行的“重头戏”，也是他从南京到杭州，进一步借机发乱，鼓吹他的“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论”，煽动部队深挖“倒许乱军的黑头目、黑干将、黑后台”。

许世友这次憋着满肚子的恶气来杭州的。一年前，他把军区政治部的二百多名干部，一脚踢开，赶到浙江。他没料到，这二百多人，竟然成立“批资总部”，同他对着干，更恨那些同情、支持这帮人造反的二十军领导人南萍、熊应堂等人。许世友来杭州就是要出出这口恶气。

许世友这次训话有备而来，来者不善。他表情严肃，平常就很难看的脸面，今天又增加了几分杀气，更给人一幅凶狠的样子。到会的干部有二十军、浙江省

军区及军区政治部的干部，整个礼堂坐满了人，装不下，还有一些干部在礼堂外的广场上，把扩音器牵到外面听。二十军，浙江省军区的南萍，熊应堂等负责人坐在第一排位置上。礼堂内外鸦雀无声。许世友直言快语：“今天我讲的话，有的人可能不大喜欢听。南京出了‘王、林、鲍’北京出了‘杨、余、付’，这条黑线又粗又长，已经伸到我们部队里来了，去年以来，我们部队为什么跳出来那么多乱军分子，就是因为这条黑线捣乱”“他们的黑手伸出来了，就别想再缩回去啦！我们要捉住它！斩断它！”

他越讲越生气，越讲嗓门越大。他说：“还有一些小爬虫爬出来了，也别想溜走了，统统要揪出来！”讲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用眼睛瞅瞅坐在前排的南萍、熊应堂，又扫视了一下他能认出来的军区政治部的部长、某些造反人物。他这番话，加上这幅眼神的意思是说：“我讲的这些话，就是冲着你们来的，就是要找你们算账啦！你们谁也跑不掉！”

许世友训话，当场就引起不同反应。会议开始秩序井然。后来就不大安宁了。有的摇头晃脑，越听越不耐烦，干脆不听，愤然离去。有的私自交头接耳，小声嘀咕：“许世友又要抓人啦！”

这次许世友的训话，就是他向我们反攻倒算的宣战书。当时，我们军区政治部的二百多干部，又面临着一场政治风暴的袭击。首当其冲的目标，是我们这些“批资总部”的头头。特别是我和陈时秋、陈荣安等同志，又是赴京告状的代表，更是许世友的心头之恨。其实，我们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反正我们已经领教过许世友的迫害之苦，蹲过许世友的大牢。如今，我们比起一年前要成熟多了。我们经受过暴风雨的锻炼，就有经验迎战暴风雨的再次袭击。那段时间，陈荣安常常唱着毛主席的一首语录歌：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

我们面对许世友掀起的“滚滚寒流”并没有被吓倒。我们平日继续完成担负的“三支”、“两军”任务；休息期间聚结在西子湖畔，一边观赏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一边谈论着对付许世友的办法。我们坚信，毛主席，周总理下达的中央红头文件，许世友不可能一手遮天。他把“杨、余、付”和我们说成是“一条又

粗又长的黑线”，纯粹是胡说八道。我们是亲临其境的当事人，见证人，是周总理亲自招呼我们进入人民大会堂；又是周总理亲自主持“京西宾馆的学习班”。许世友要否定这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那只能是痴心妄想。

二十四、变质变味的“积代会” 多中心论的“学习班”

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为适应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采取灵活善变的战略战术。六八年，他为了深挖“杨、余、付”——“王、林、鲍”——倒许乱军分子这条黑线，改变了六七年的那些“抓捕”、“关押”、“坐牢”的手段，采用了毛主席倡导的，林彪推行的新办法：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代表会”（简称“积代会”），“讲用会”、“报告会”、“座谈会”，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许世友从杭州回到南京不久，召开了全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代会”。过去，他对这类会议不感兴趣，本身不学、不懂、更不问。这次大不同。他亲自领导，亲自决定这次“积代会”，以揭批“杨、余、付”、“王、林、鲍”这条黑线为主题，揭批的“活靶子”就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及参加江苏军管会的“支左”干部杜方平；联系实际就是揭批本单位的“倒许乱军分子”。

我们没有资格观赏这次“积代会”的现场，后来，军区政治部召开报告会，播放“积代会”的录音实况，我们才领略了其中精彩场面的一幕。这一幕的表演者，就是响当当的“保许大功臣”——军区政治部直工科干部许某人。此人不愧为许世友的忠实代言人，他在“积代会”上作了一次活学活用的典型报告。他竭尽全身解数，把整人、害人、坑人的“十八般武艺”都搬出来了，把所有诬陷、丑化的词汇全用上了，把军区政治部的所谓“倒许乱军分子”，作了一番魔鬼化的描绘和刻划，把他们列出了一长串的黑名单，并在这个会上，一个一个点名，亮相，低头，罚站，“认罪”：从史景班，杜方平，孙海云，赵树湘，到“批资总部”及其他造反派头头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等等，好几十人，一个不漏、给每个人头上扣上一顶黑帽子：什么“黑后台”，“黑干将”，“黑头目”，“黑抓牙”等等。他们还有一套班子，许某人在台上点到某个人的名字时，台下就有

一伙“助威的啦啦队”，立即发出吼叫声：“站起来！”“低下狗头”，旁边还有一群“附和，加油的预备队”，临场吆喝一阵。

这叫什么“活学活用的典型报告”？只能说是一场令人作呕、让人耻笑的恶作剧。

这叫什么“积代会”？只能是地地道道的批斗会，是一场精心组织地反攻倒算的审判会。

按照许世友的部署，“积代会”一结束，就大办各种型号的学习班。学习班规模空前，声势浩大。军区司、政、后、“三团两队”，军事院校，医院、分头各办各的学习班，还有舟乘班、浙江班、上井班，炮兵班，工程兵班，等等。诸多的学习班，唯有军区政治部学习班是“重中之重”，是“领头羊”。许世友一再叫嚷“政治部是重灾区”。带头“造反”的，带头“赴京告状”的，带头反许的，都是政治部的“乱军分子”。

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顾名思义就是要按照毛泽东思想，按照中央有关指示，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南京军区如此众多的学习班，又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六七年、二、三月大批抓人，究竟应该怎么看？中央红头文件上，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上，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镇压群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许世友非常不服，不认账。他认为：毛主席说过，“三个不能打倒”；中央红头文件的指示也指出：“南京军区是中央信任的，是跟着毛主席走的”。这说明：“我许世友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我抓人就没有错”，“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于是，他就按照他的“为我所用”的毛泽东思想，要求所有学习班的任务，都是“彻底揭发批判倒许、乱军、夺权的罪行”；批斗目标还是许世友六七年二、三月下令抓的那些人。尽管，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代表中央为这些人平了反；现在，在南京许世友说了算，就要听许世友的，这些人又被打成“乱军分子”。这样，中央红头文件的结论，就被许世友“翻了烧饼”。我们不难看出，按照许世友的个人意志，按照“倒许乱军”的标准办学习班，名义上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挂羊头卖狗肉”，说白了，只能是实实在在的“许世友思想学习班”。因而，不能不遭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迎头痛击，严厉批评许世友，这是典型的“多中心论”。

二十五、重返白水桥，再次进“牢房”

许世友亲自指挥，困剿“批资总部”

六八年五月上旬，我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参加“三支”、“两军”的二百多人，奉命调回南京，重返白水桥，参加学习班。

白水桥，我们怀有不可磨灭的印象。一年前，我们被许世友抓起来之后，就被关押在白水桥“行政看管”几十天，深受牢房生活之苦。今天，许世友又选择在白水桥办我们的学习班，其用心不说自明。白水桥这块宝地，似乎同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我们与许世友之间反复较量，生死搏斗的一块“圣地”。

前面说过，军区政治部学习班，是南京军区众多学习班的“重中之重”，而我本人早被政治部学习班领导人李树和盯上了。鉴于我的造反历史：六七年二月，我是第一批被抓的“四个头头”之一；杭州成立“批资总部”，我是一号头头；赴京告状二十一名代表，我又是主要头头之一。因此，李树和等人策划这次学习班的批斗“大名单”时，便把我列为“重中之重”的目标，并给我戴上了“三顶桂冠”：“头头中的头头”，“关键中的关键”（人物），“核心中的核心”。在学习班未开始之前，李树和等人指使“三团两队”的造反派，对我连砍了“三斧头”：

一天晚上，正当我家临近睡眠之时，突然从外面闯进二十来个凶神恶杀的陌生人。自称“三团两队的造反派”，“找艾汉美清算倒许乱军的罪行”。我感到莫名其妙，简直“祸从天降”。对他们说：“我与你们既不相识，又无来往，无冤无仇，有什么问题好清算的？”这帮人气势汹汹，扬言要把我“抓走”。他们又吼又闹，惊动了家属大院，我家四周围满了群众。有的气愤地说：“这不是搞打、砸、抢吗？”他们得不到群众支持，闹到深更半夜才收场。

第二天中午，我们全家正在吃午饭，那帮人又冲过来了。这回，他们真的动手啦！对我拳打脚踢，把我家碗筷饭菜、桌椅、家俱，砸的稀巴烂。接着，又把我和陈时秋两人一起绑架到“军区军人俱乐部”会议室，召开现场批斗会，强迫我们“低头”，“弯腰”，“下跪”，“架飞机”，折磨了半天。

第三天上午，我们乘坐卡车，前往白水桥。当汽车到南京中山东门外的卫岗时，又被“三团两队”的造反派拦截下来，声嘶力竭地吼叫着：“艾汉美滚下

来”“批资总部的头头滚下来”，我又一次被揪到“三团两队”的小礼堂里，又是低头、弯腰、架飞机，又是一番批斗。

“三团两队”的造反派，这样接二连三地砍我几“斧头”，究竟用意何在？我们第一次被抓到白水桥的时候，是用全副武装的战士押送我们，是用钢枪，刺刀逼着我们，是用“拳头”，“枪托”接待我们。如今，我们再次去白水桥参加学习班，是用造反派的“打、砸、抢”接待我们，叫我们晚上不能睡觉，白天不能吃饭，用“批斗会”，“低头、下跪、架飞机”的方式对待我们。这前后两次“白水桥”的不同待遇，反映了李树和等人的同一个用意，造成一种白色恐怖气氛，一开始就让我们处于极度紧张、恐慌的高压之下，早日瓦解我们的精神意志。

这次，白水桥政治部学习班，与六七年的白水桥“行政看管”，还是有所不同。那时候，我们是一人一间“小牢房”，日夜没有行动自由。这次是十多人合住一间大房子。晚上睡觉可以打呼噜，可以翻身。在学习班营区内，还是有一定自由的。就是不准回家，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通讯、不准接见亲友。进了这个学习班，如同进了一个大铁桶，几百人全捂在这个大铁桶里；或者说如同进了一座集中营式的“牢管区”，这里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绝状态。

赴浙江“三支”、“两军”的 200 多名干部，在这个学习班里受到“特别关注”，尤其是“批资总部”的成员可谓“众矢之的”。他们被精心编排在不同的班组里。每个班组由李树和挑选的“精英强将”担任领导骨干。“重点”人物被分割包围在各个班组中。每个“重点人”都有专案班子负责内查外调。

政治部学习班的最大特点，是领导人物不一般。李树和虽然只是保卫部的副部长，但他凭借其对许世友的绝对忠诚而赢得许世友的高度信任，成为学习班的唯一负责人。他在“二月抓人”事件中“一马当先”，立下汗马功劳。然后，紧跟许世友揭批“王、林、鲍”，清剿“乱军分子”，起到了无人替代的作用。因而，许世友撇开其他领导人，直接授予李树和领导大权。政治部有许多比他资历深、能力强、威望高的秘书长和部长，统统扒在一边。唯有李树和“出类拔萃”，“独领风骚”。而李树和的领导方式也很规范，无论大会小会、大事小事，总是：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再传达“许司令指示”，然后再说“我们怎么办”。他和许世友之间有“热线电话”，几乎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一切听许司令的”。

这个学习班，在关键时候，关键问题上，许世友亲自出马，直接指挥。学习班初期，进展不像他们所预想的那么顺利，“乱军”分子没有那么“俯首贴耳”，“缴械投降”。许世友不耐烦了，他就亲自到学习班发号施令：“你们不要抱什么幻想，不要指望谁来保你们，救你们。我说过，杨、余、付的黑手伸出来了，就别想再缩回去了！不管是谁？都要揪出来。这个学习班不把问题搞清楚就不收兵”。他还说：“反对我个人，没什么，反对毛主席，那就不行，我就不答应”。“我曾对毛主席表过态，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带兵打到北京去保卫毛主席！”“今天，我在这里把话说明白，谁要想造反变天，我的子弹不是吃素的，我就要开杀戒了！”

许世友这类话，不止一次的讲过。今天这些话，更有针对性。就是要当面对政治部的人，对那些“跳得高”，“闹得凶”的人，对“批资总部”的头头们，发出警告，就是要给予“震撼力”、“威慑力”，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政治部学习班，可以说是许世友一手包办，一切听他的。军区其他领导人，一概插不上手。身为军区政治委员的杜平从没有到过白水桥学习班看一看，也听不到他对学习班说过什么话。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也被剥夺了对政治部学习班的领导权，根本见不到他的影子。政治部的两位副主任：一位是史景班，被许世友定为批斗的黑后台，另一位是符确坚，他是许世友的得力助手；但是，这个学习班符确坚同样没有发言权。

二十六、依仗权势、肆意诬陷

把同志当敌人，把好人当坏人

许世友训话后，政治部学习班的“气温”急剧上升，批斗“乱军分子”的火力迅猛加强。

根据学习班领导的安排，由宣传部的一位小青年谈某和我俩人，结成“一帮一”，实际上是指派他监视我的动向，随时打“小报告”。一天晚饭后，谈某邀我在附近散步“转一转”，我随即答应了。我俩边“转”边聊。当“转到一片平房时，谈问了我一句：“老艾，听说你们去年被行政看管的地方，也是在白水桥，就是这一片营区吗”？我应声答了一句：“对呀！就是这里，我被关在第二排平

房里”。这样“一问一答”之后，我俩就“转到”别处去了。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问一答”的话题，竟然成了我的“重大罪行”！

第二天，我所在的宣传部小组学习会议上，刚刚开始，支部书记肖某大吼一声：“艾汉美！站起来！”

这当头一闷棍，使我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啦？”

“同往常一样，准备检查材料”。这样答非所问。

肖某十分不满地说：“你心怀鬼胎，装蒜！”

“我来揭发”！这位“揭发”我的发言人，正是昨晚同我“一问一答”的谈某。

他信誓旦旦地说：“昨天晚饭后，艾汉美别有用心地把我带到他们去年行政看管的地方去，给我指明他被关在哪一间房子里，介绍他们怎么挨整！怎么受罪！对我进行现场说教。我感到他讲话的味道不对，赶快离开了。”

接着，对我展开了辟头盖脑地“上纲上线”的大批判。堪称“重型炮弹”的发言人，学习小组组长王某人高马大，嗓门又粗又大，他声色俱厉地说：“艾汉美昨晚对谈某的现场说教，是公开地同我们学习班搞对抗，我们在学习班里清算倒许乱军的罪行，而艾汉美却在行政看管现场，控诉我们这个学习班还在继续镇压群众，这不是公开地进行反动宣传又是什么？毛主席说过，反动势力人还在，心不死。艾汉美的这次现场说教，就是一次活生生地两个阶级，两股势力的较量和斗争。现在倒许乱军的黑干将，黑头目野心不死，仍在继续活动。我们的同志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及时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把他们批倒批臭”。

这场批斗会，我毫无思想准备，但又可以说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以后，我要准备经受更加激烈地“短兵相接”、“刺刀见红”的批斗会，迎接更大规模地暴风雨袭击。今天的批斗会，给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许世友对于我这一类黑干将、黑头目的政策，已经提升档次了，把我们定为“阶级敌人”、“反动势力”，作为学习班里彻底孤立，无情打击的重点目标。我们的问题，就是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

政治部学习班，在围剿“批资总部”的斗争中，不仅要重点打击“头头们”，同时，对“头头”周围的一群青年人，也同样是不放松、不手软。“批资总部”

的成员，确有一群二十多岁的青年干部，例如，宣传部的施关彬，高岳言，青年部的周自求，孙宅巍，秘书处的李永宽等等。他们是我们政治部里，一批富有朝气、年轻有为的革命小将。我们政治部的造反派，年长的也好，年轻的也好，都是在遭受许世友打击迫害的共同经历中走在一起来了。我们政治上一致，思想上相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患难之交。针对这一情况，许世友、李树和就采取攻打敌人碉堡的办法，先把外层小碉堡端掉，然后集中力量攻打核心碉堡。于是，学习班里第一轮挨批挨斗的人物，就是这些青年人了。

青年部的孙宅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来到部队。由于他没有什么造反活动，批判他的班组会上，显得火力不足。学习小组副组长吕某，了解到孙宅巍的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干过一段钱粮处的小雇员。他抓住这一“重要线索”，立马提高批判调门：“孙宅巍，你别以为你头上没有小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似乎可以轻松过关。告诉你，你父亲身为国民党反动政府钱粮处的职员，收来的钱粮，供养国民党八百万军队，这些军队吃饱了喝足了，再来屠杀共产党员、屠杀中国人民。这就表明，你的父亲就是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罪人！这一点，难道你心里没有数吗？”听了他这番“高调”。孙宅巍心里纳闷：“按此逻辑，当年在国民党统治下，农民种的粮食，工人盖的房屋，生产的棉布、钢铁，都要用以供应军队吃、穿、用，那岂不是都变成了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吗？”

吕某的批斗调门一路飙升，会场上气氛为之一震，对孙越批越来劲。孙在小组会上曾经说过：出于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自己参加造反，就是要立志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天地。当时，他的女儿刚出世，就给女儿取名“孙彤”。批斗会上，联系这件事，有人竟然说这是“孙宅巍借给女儿取名之机，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其理由是：孙造反是“倒许乱军”。造反的结果，决不是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天地，而必然是反革命复辟的旧世界。当场“勒令”孙宅巍改换女儿的名字。这样批来批去，批得孙宅巍胆颤心惊：“由于自己造反，父亲被批成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革命；连刚出世的女儿，也被批成反革命的后代”。

在许世友亲自领导的学习班里，像对孙宅巍这样的批判会，遍地开花，比比皆是。如今流行的是“财大气粗”；当年时髦的是“权大气粗”。那时候，学习班的“精英强将”们，依仗许世友的权势，毫无顾及，所向披靡。他们对“批资

总部”大小头头，不论“上纲上线”怎么荒唐，也不为过；不管批斗怎么胡来，也不为错。

许世友说过：“凡是参加造反的科长、部长罪加一等”。军区政治部里，被许世友赶到浙江去的科长、部长为数不少。这些科长，部长，有的写过大字报；有的只是有一定倾向造反的思想，并没有什么造反行动。我们“批资总部”的队伍中，有些科长，部长是被许世友“逼上梁山”的。到了学习班后，不论有过无过，有罪无罪，统统被列入了黑名单。按照许世友“罪加一等”的指意，一律“从严批判”，“从重处置”。

我们新闻科的科长孙皓月，是在政治部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是一位公认的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好干部，既有才华，又有修养，为人正直，办事稳重。对于这样一位好同志，在学习班里开了一次又一次批判会，仍然不能过关。他们翻箱倒柜，挖地三尺，终于从孙皓月去世的老母亲身上，挖出了一个带致命性的问题。孙的母亲被划为地主成份，这本来是组织上早已审查认定的问题。可是，老问题可以变出新花样，“老根”可以冒出“新芽”。他们把孙母去世时，孙给母亲写了一篇“祭文”，翻出来加以上纲，大批一通。孙年幼失去父亲，依靠母亲抚养成人。他母亲为人善良，爱国爱党，送子参军，获得众人称赞。在老母亲过世之时，孙为表达儿子对母亲的怀念之情，特写了一篇“祭文”。在批判会上，学习小组组长李某人声嘶力竭地叫喊：“孙皓月的这篇祭文，为地主分子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充当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丧失共产党员的阶级立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他们以这篇“祭文”为证据，把种种诬陷之词，塞进孙的档案里。

二十七、“倒许、乱军、夺权”——

这一错误口号的崛起和破产

我与谈某的“一帮一”，从上次批斗会之后，我对他采取了“相视无言、守口如瓶”的策略。这一情况促使学习班领导把他的位置，换上了另一个同志。该同志名叫范传典，是刚调进宣传部的“新手”，我与他素不相识，互不了解。由

于他是“新手”，没有介入政治部前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为人又比较随和，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他开始同我交往，也是“奉命行事”。经过学习班头几个月的亲身体验、实际考察之后，他的思想倾向变了，态度也跟着变了，逐步对我采取“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监视我的动向，我到哪里，他跟到哪里，给领导上打“小报告”之前，先与我“统一口径”；暗地里及时向我通风报信，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保护我。

大约是六八年八月中旬的一天，吃罢晚饭后，老范急匆匆地小声对我说：“有重要消息告诉你！”

“什么消息？”

他边走边示意，“走，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再谈。”

我们在一处僻静的位置，席地而坐。他以兴奋的口吻说：“这个消息对你太重要了！”

“别卖关子啦！有话快说。”

我听他的口气，猜测是“上头有什么重要精神”。老范平时比较“稀拉”，很少谈“政治”，在会上“口头”比较紧，但和我个别交谈学习班的重大问题，他不跟随许世友的调子起舞，很有主见。

老范对我说：“今天，李树和召开学习班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中央电报指示，许世友又挨批了！”

“批他什么？”我急切地问。

“李树和还只是给骨干分子传达，不公开，我是旁边听他们（学习班的精英们）露了两句，大概意识是，中央批评南京的‘倒许、乱军、夺权’这个口号，是多中心论的口号，是帮倒忙。”

“那中央电报的全文内容哩？”我又问。

“现在还不清楚！”

“好！太好了！”我一听，心里一震，喜出望外。我真没想到党中央的电文来得这样及时，又给许世友当头一棒！我们又可以得救了！

党中央的这一重要指示，李树和做贼心虚，不敢公开传达，学习班的大多数同志都还被蒙在鼓里。我们一时无法了解中央电报全文，但从老范所听到的“大概意思”，引起了我许多的联想。接连几天，我同老范利用休闲时间做出了

我们的分析和判断。我把这个“口号”从北京到南京的起源和发展情况，前前后后“摆”了一番。

“倒许、乱军、夺权”这个口号，据我所知，最早出现在六七年十二月的北京“京西宾馆学习班”上。当时，我们“二十一名代表”正在揭发批判许世友镇压群众的错误，归纳为“大逮捕、大镇压、大清洗”。与我们唱反调的蒋科，肖海等人，经过密谋策划，针锋相对，攻击“王、林、鲍”及其受压的群众，炮制出了这个“倒许、乱军、夺权”的口号。

六八年春节过后，许世友怀着强烈报复的心态回到南京。而此时军区司令部的蒋科、肖海，政治部的李树和等人，自认为是许世友的“精英”，“干将”，“保许”有功，现在是继续“讨伐造反派”的大好时机，更加起劲地鼓吹“倒许、乱军、夺权”的口号。他们的行动，与许世友反攻倒算的愿望一拍即合。因而，许世友对“倒许、乱军、夺权”的口号，欣然接受，大加赞赏，成为讨伐“王、林、鲍”，讨伐史景班，讨伐“乱军分子”的中心口号。这个口号“压倒一切”，轰动一时，响彻南京城，传遍整个南京军区。

这样一来，在南京判断真理和错误，识别革命与反革命，就是以许世友为中心。“保许”的人，就是保卫毛主席，就是保卫解放军；“反许”的人，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

错误口号喊的越响，破产的也就越快。党中央一针见血地斥之为“多中心论”的口号，责令许世友立即纠正这一错误。可是，许世友阳奉阴违，要他改正自己的错误，那是难如“上青天”了。

李树和不敢公开传达中央电文，又何谈得上改正错误？不过，偷偷地改动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我注意到：学习班的会议上，关于这一口号出现了两种提法：一种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仍然高喊“倒许、乱军、夺权”；另一种是学习班的“精英强将”们，则一律只喊“乱军、夺权”四个字。我悄悄打听老范：“这是何意？”据他所知，这是李树和统一规定的：“以后把原来六个字的口号，去掉倒许两个字”，保留‘乱军、夺权’四个字。”打这以后，学习班就再也见不到许世友“训话”了，也很少听到李树和传达“许司令的指示”了。

我和老范私下交谈，一致感到许世友如此改正错误的伎俩，多么滑稽可笑，自欺欺人！难道说一个“多中心论”的错误口号，只要“去掉两个字”，就能解

决问题吗？

军区政治部的白水桥学习班，本来是以“倒许、乱军、夺权”这一口号为宗旨，它要揭批的对象就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头目、黑干将、黑后台，如今这个口号错了，那么，这个学习班还能办下去吗？李树和不愧为许世友高度信任的干将，不仅在许得势的时候能冲得上去，在许失利的情况下，也能遮遮盖盖地掩护退却。

这个学习班一开始，我就被李树和定为“重中之重”的批斗目标。到了学习班中期，根据许世友的指意，我的问题已经上升为“敌我矛盾”了。当中央批评了许世友的“多中心论”口号以后，学习班仍然按照“许世友的既定方针办”，除了原来六个字的口号减掉两个字以外，实际内容没有任何改变。不过，具体操作作了一点“微调”。李树和原打算对我是要召开高规格的全体人员批斗大会，后来，规格降低了。大约在六八年十一月间，由宣传部召开对我的批斗大会，其他各部派少数代表参加，总共约有 50—60 人。这次大会持续三天。其中，我作检查两天，对我批判一天。这次我作检查也很有意思。事先学习班支部书记肖某告诉我作检查不怕内容多，不怕时间长。再说，六个字的口号没有公开传达中央指示，也没有说要改变。因此，我按照学习班原来的要求，把每一个故事过程讲完之后，归纳小结，“上纲上线”，都是六个字：“倒许、乱军、夺权”，这是一个照搬照套的格式。对我的批判发言，比较平和，与学习班开头对我的那几次批斗会，气氛大不相同，没有低头、弯腰、下跪、“驾飞机”等动作。

在许世友领导的学习班里，表面上装装样子，应付党中央关于“多中心论”的批评，实际上我行我素，继续推行以许世友为中心的那一套。

二十八、戏剧性变化——

学习班大搬家，从白水桥迁往北京

六八年元旦到了。学习班已经办了八个月，该批的批了，该斗的斗了。多数人已经得到“解放”过关，可以回家探亲了。只有我和少数人仍然没有“解放”过关。这就是说，我是一个“带罪”之人，是一个没有行动自由的人，是一个不能回家探亲的人。从进入学习班那一天起，八个多月我没有离开学习班一步。

眼看学习班快近尾声了，我的去向何方？据老范得到的信息，李树和原打算对我批斗之后，把我送进大牢“隔离审查”；后来改为把我放到安徽劳改农场去。对此，我是作好最坏去向的思想准备。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六八年元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学习班召开全体人员紧急会议，李树和没头没脑地宣布：“奉上级指示，我们学习班搬到北京去办，全体人员，全部材料，原封不动地搬到北京去。大家收拾行装，今天先回南京，何时上北京，听候通知”。

“这是咋回事呢”？学习班一下子炸开了锅。

这次李树和的表现有点失常。原来，他在学习班的会议上讲话总是有板有眼，有条有理。开口总是“许司令指示”如何，如何，然后我们怎么“坚决照办”。如今，学习班突然大搬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究竟是哪里决定的？为什么要搬到北京去？总归有个原因吧，难道是许世友心血来潮，一时冲动！李树和可能有难言之隐，不便明说，难道大家就不会想吗？就是一个“傻瓜”，也能看得出，这个大动作的背后，肯定有大文章。

当天下午，我意外的回到家里，给全家人一个莫大的惊喜！孩子们高兴地又跳又笑，把这当作特大喜讯告诉邻居们，告诉小朋友们；“我的爸爸回来啦！”，“我的爸爸回来啦！”

在那个历史年代，我们这些参加白水桥学习班的人，能不能回家，是一个政治待遇的标志，是表明一个人有没有得到“解放”的标志，是证明好人或坏人的标志。我在这个时候，回到家来，更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意义。我在学习班里，至今还是一个“带罪”之人，按照许世友，李树和的打算，要么把我关进“大牢”，要么把我送去劳改。如今学习班大搬家。我顺便“沾点光”，被“解放出来”。上一次我被许世友关在白水桥“行政看管”四十天，是靠军委“十条禁令”得到“解放”的。回想起来，我一次又一次地从许世友的“白宫馆”里获得“新生”，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政治生命的大转折。免遭“坐牢”、“劳改”之难，突然间，“拨开乌云见太阳“，不能不令我和我们全家千呼万唤：感谢“苍天有眼”！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我们休息两天之后，第二天上午，学习班全体成员在南京湖南路口集合，准备过江到浦口，再乘火车去北京。临上火车之前，李树和给大家传达许世友的话：

“学习班到北京去，一切听中央的，按中央的指示办”。这些话我们早就领教过了，已经成了许世友“政治游戏规则”的一套“术语”。几年的反反复复，我深深感受到许世友的这些话有两层意思。一是他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学习班从白水桥迁往北京，按中央的指示办学习班；二是“回到南京后，一切就要听我许世友的。在南京就是我说了算！”

到达北京后，我们被安排在解放军后勤学院。此时，学习班除原班人马外，增加了两名新成员，一个是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另一个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这俩位领导人突然出现在学习班，引起大家特别关注和猜测。“他俩人是来领导学习班的吗？”不是。他俩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许世友的“左、右膀”，是紧跟许世友“镇压群众”，推行“多中心论”的“高参”和“干将”，这次由中央点名调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说得明白一点，他俩人是来北京接受大家的揭发批判，是“代表”许世友作为学习班的揭批目标。王蕴瑞分配在宣传部学习小组，与我们一样，而符确坚则分配在干部部学习小组，过着“受监护”的学习生活。中央指定南京军区另一位副司令员廖容标直接领导我们的学习班。

我们进驻后勤学院的第二天晚上，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李树和正式宣布：“我们的学习班从白水桥迁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此话一出口，会场上立即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李树和又在会上慎重其事的宣布说：“经学习班研究决定：艾汉美等同志，从今日起正式获得解放”。他这么一宣布，又引起大家一片窃窃私语。我乍一听，感到又奇怪！又茫然！简直把我弄糊涂了。原来，我自以为前几天离开白水桥学习班之日，自然而然就是我获得“解放”之时：不然，我又怎么能回家探亲，怎么能到北京呢？看来，那个“解放”是未经组织批准，是“自己解放自己”，也是不“合法”的；只有今天李树和宣布组织决定的“解放”，才有“合法”效力。

照此说来，现在我真的要感谢许世友“开恩”，还是要靠许世友获得“解放”。呸！见鬼去吧！我要真的指望许世友，早就没命啦！这两年，他对我们这些人，不是咬牙切齿，恨透了！不是一再扬言要把我们一枪崩了！这一次，白水桥学习班八个多月，也不让我“解放”，为什么一到北京，第二天就宣布我获得“解放”？答案只有一个：正是毛主席、党中央推翻了他的“多中心论”，否定了他的白水桥学习班。这么想来想去我才想明白了：李树和现在宣布我获得“解

放”这是大势所趋，无可奈何。

二十九、在白水桥，我被定为重点批斗目标
到北京，我被选为领导班子成员

廖容标副司令亲自坐镇学习班，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的学习计划，报经毛主席亲自圈阅。该计划的核心，就是彻底批判许世友鼓吹的“倒许、乱军、夺权”的“多中心论”口号，彻底批判人为地制造“稳军派、”“乱军派”的分裂军队的错误言行。

白水桥学习班，是由许世友一手包办的，李树和等“精英强将”是许世友亲自指定、挑选的。如今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批准地学习计划，批判许世友的“多中心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学习班的领导成员“大换血”，组织新的领导班子。

如何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到了北京，按中央指示办”。改变上级指定，上级挑选的办法，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先由各部门的学习小组，分别选出候选人。然后，由学习班全体成员对候选人投票选举。最后，由得票最多的七人，组成新的学习班领导小组。

在两轮选举中，第一轮我被提名为宣传部学习小组的候选人；第二轮，我又被选为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选举后，七人名单报请上级批准后，正式组成“北京学习班领导小组”。这七人的名字是：

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树湘（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成员 李广中（文化部科长）

成员 纪国城（政治部军事法院法官）

成员 艾汉美（宣传部新闻干事）

成员 郭群生（青年部干事）

成员 井洪寿（组织部干事）

这次民主选举产生的七人领导小组，与白水桥的领导班子，具有鲜明的不同

特点。原来，许世友挑选的李树和等一批“精英强将”，这一次，一个也没有选上来。这七人，既不是“上头”圈定的，也不是个别长官意志决定的。这次选举，透明度高，民主性强，真正体现了群众意愿，摆脱了许世友的控制，也超出了“派性”的束缚。符合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新选举出来的七人领导小组，有部长、副部长、科长，又有一般干部；有持“造反派”观点的人，也有持“保守派”观点的人，还有持“中立”观点的人。七人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本来是保卫部正部长，是一位久经锻炼、能力强、威望高的老部长。然而他在白水桥，他的下级、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却成了他的“上司”，他反而成了李树和的“下属”，常常要听取李树和的批评教育。什么原因呢？正是许世友认为他对造反派“心慈手软、斗争不力”，还有某些同情、支持造反派的倾向，没有像李树和那样对许世友“顶礼莫拜”、“紧跟照办”，结果不得被许世友眨下去，免得“碍事”、“挡道”。到北京后，通过选举，群众把他两人“对调”了，何宁兆被“调到台上”，李树和被“调到台下”，这“一上一下”，正好表达了白水桥学习班与北京学习班的“一反一正”。这次选举，学习班的同志们一致推选何宁兆部长担任学习班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相信他是顺民意，得人心的合适人选，相信他能主持公道，带领大家圆满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

这个“七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中，倍受瞩目的赵树湘、纪国城和我。赵树湘作为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他和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是许世友要打击的部长一级的代表人物。纪国城和我则是“造反派”的头面人物。特别是我的目标大，在白水桥学习班就是被李树和揪住不放的重点人物。这次选举，我们三人被群众选进了领导班子，引起不小的震动。在白水桥，我们被批成“罪人”、“坏人”；到了北京后，我们一下子变成“同志”、“好人”。变化之大，一目了然。这次选举，这样的变化，对许世友推行的“多中心论”，就是一个无情的批判，对广大受打击、受压制的同志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三十、王蕴瑞、符确坚的命运

昔日“马前卒”、今天“替罪羊”

根据中央指示，北京学习班的任务就是要揭批许世友的“多中心论”。可是，许世友又不参加学习班，根本不露面，不吭声，听说他的“老病”又发了，不知道他又躲到哪里“养病”去了？那么，我们的学习班，岂不是要“空对空”地批一通吗？那又有何意义呢？当然不是！中央“点名”调到学习班的王蕴瑞、符确坚二人，就是顶替许世友，作为大家揭批的目标。

明明是许世友推行“多中心论”，为什么要让王、符二人顶替他挨批？明明是许世友犯了错误，为什么总是要让别人给他当“替罪羊”？符确坚身为军区政治部的一名副主任，虽然有一些坚决支持许世友的言行，但充其量只是一名“马前卒”而已。王蕴瑞身为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为什么要他来参加政治部的学习班接收批判？这岂不是成了“张冠李戴”吗？他会很不服气，我们要批他也很棘手。这里，一连串的谜团，一时无法找到答案。

六九年元月间，党中央“点名”，王蕴瑞、符确坚二人到北京参加政治部学习班的电文，一传到南京，立即引起许世友及其有关领导人的“神经”紧张起来。这一年来，只有王、符二人成为许世友的得力助手；“王、林、鲍”已被许世友“轰走”了！杜平和王六生也不敢“插手”。这时候，感到“神经”紧张的也是他们三人。许世友怀疑：“这是张春桥搞的鬼，”使用的“清君侧”阴谋，把“多中心论”的帽子压在他头上。他想：“我有毛主席保护，任何人也整我不倒”。符确坚心里嘀咕：自己既不是头，又不是尾，推行“多中心论”的账怎么也算不到他头上来。而王蕴瑞一听说要去北京参加政治部的学习班，感到又委屈，又心慌！“我又不是政治部的头头，怎么要我去参加政治部学习班呢？这回去北京挨批挨斗，怕是凶多吉少，去了再也回不来！”

许世友完全理解王、符二人的心思，在他两人临去北京之前，特摆“送行宴”，拿出他的茅台酒招待王、符二人。他的茅台酒是不随意招待人的。许世友原打算在春节前，为了庆贺白水桥学习班大功告成，大摆庆功宴，招待李树和等“精英强将”的。看来这个庆功宴摆不成了，改成了今天的送行宴。许世友为了给王、符二人吃个“定心丸”，一边举杯饮酒，一边安慰他们二人说：“这次中央要调你们去北京学习，我又不能不同意。目标还是对着我来的，他们要公开地整我还整不动，只好拿你们开刀。你们放心去好了，只要我不倒，也不能把你们

二人怎么样？”符确坚满不在乎，一身轻松。只有王蕴瑞忧心忡忡、眼泪汪汪地说：“这次去北京，还能不能回南京，就很难说了”。

这一次，北京学习班里，共有三名军区一级的领导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原来和我们一起在白水桥度过了八个多月，又和我们一起来北京。现在再加上王蕴瑞，符确坚。不过他们三人中，在北京学习班挨批判的不再是史景班了，而是王、符二人。史景班在白水桥学习班，被许世友定为“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不仅失去人身自由，每天都要接受惩罚性劳动，几百人吃饭的大食堂，每天由他一人清扫三次，只见他扛着大扫把，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埋头苦干，扫得满头大汗，完全同普通劳动者一样。到北京后，他就被“解放”了，既不挨批了，也没有任何“惩罚性”劳动了，同我们参加学习班的全体干部一个样。王蕴瑞、符确坚尽管是中央“点名”到学习班接受群众批判，但他们二人的处境与史景班在白水桥的待遇大不相同。王蕴瑞刚从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发号施令”的位置上，放到我们宣传部学习小组，显得很不自在，沉闷不语，缩手缩脚，生怕我们用“造反派的脾气”揪他、批他、整他。后来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心态大错特错了。他和我们同学习，同生活，他睡觉的床铺同我的床铺紧挨着，我与他朝夕相处。看到他岁数比我们大一些，他的“身份”又特殊一点，我们尽可能平和的对待他，凡是劳动事务（如打扫卫生）不要他干。平时与我们一样行动自如。由于我们不掌握他支持许世友推行“多中心论”的具体事实，我们既不要他“交待”，又不动员他“揭发”，无论在小会、大会上，从来没有点过他的名，不给他施加任何“压力”，完全由他自己接受教育。他慢慢地感到轻松自如。一个星期天，他想去看望他在北京上大学的女儿，我们热情支持他去。他下午回来后，我看他情绪低沉，垂头不语，就小声的问他一句：“看到你的女儿还好吧！”他回答：“女儿还好，就是我在路上倒霉！”原来是他在公交车上，口袋里的六十元人民币被“扒手”偷跑了，弄得他心疼了半天。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老王，以前小车坐惯了，没有碰到过这种事，今天是头一回坐公交车吧！难免出事。”“吃一亏，长一智，舍财免灾呀！”他点着头说：“这也是我难得的一次锻炼啊！”

符确坚到了学习班驻地，听说对他实行“监护”，大感意外，大为恼火，怪话连篇：“我犯了什么法？把我当作犯人看管？”“许世友犯了错误，为什么要

我来顶罪？”……

符确坚满口的“半官半土”的海南岛语言，其他同志似懂非懂。符确坚究竟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对他实行“监护”？听说他的历史有点问题，但并没有中央的文件、指示，我们不能瞎猜瞎说。就现实情况而言，符确坚确实是许世友“镇压群众”的得力助手，揭批“王、林、鲍”，揭批史景班，推行“多中心论”的错误口号，他是非常积极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习班应该对他进行必要的揭发、批判。

这一天，召开对符确坚的批判大会，领导小组成员，轮到我担任这场大会的主持人。

大会开始，我大声宣布：“符确坚！上台来接受群众批判！”顿时，全场人的目光一齐投向坐在前排的符确坚，只见他正在抽着“大中华”的香烟，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一招，十分诧异。因为他岁数较大，反应迟钝一些，也是情有可缘的。其实他心里在想：“凭什么要我上台挨批呢？”当他慢步走到台上，正准备向毛主席像鞠躬致敬之时，我一眼看到他手里还夹着正在冒烟的香烟，立即呼喊他：“符确坚！你一边向毛主席像敬礼，一边还在抽烟，这是什么态度呀！”

他听了我的话音，吃了一惊！赶快把手指头夹着的香烟扔了，表态说：“我错了！我错了！”规规矩矩地坐到“受批判”的位置上。

符确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失礼”的表现呢？正是由于他心里“不服”、“不满”。他说“自己的错误，接受批判教育，那是应该的，但要把许世友干的那些事，统统加到我头上，要我当他的替罪羊，那就太冤了！”

尽管符确坚是中央“点名”批判的重点人物，我们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谁的错误，由谁承担，不能“张冠李戴”，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我们在批判中，坚持做到“四不”：不随意上纲上线，不乱扣政治帽子，不搞任何体罚，不搞惩罚性劳动。

北京学习班除了王蕴瑞、符确坚之外，我们再没有“点名”批判其他任何人。这种做法，同许世友、李树和在白水桥学习班搞的“批斗大名单”相比，就是截然不同的鲜明对照。不少人强烈提出，李树和紧跟许世友镇压群众，实际地位比符确坚高得多，干的坏事也比符确坚多，对他应该进行公开批判，否则，难以平民愤！学习班领导小组说服大家：我们不要“以牙还牙”，不求“报复”，坚持

按中央指示办事。李树和在白水桥“张牙舞爪”，仗势欺人，把同志当敌人，把好人当坏人。我们对他宽大为怀，始终没有批他，也没有发生任何找他“算帐”“出气”的事情。

上一次，京西宾馆学习班，这一次北京学习班，中心问题都是为了解决许世友的错误。而许世友两次学习班他都不沾边。上一次，挨批判的是“王、林、鲍”；这一次，当“替罪羊”的是王蕴瑞、符确坚。因而，他毫无认错之心，更无悔改之意。他是“心安理得”，“得意忘形”，功劳是他的，错误是别人的；错误越犯越大，官也越当越大。他从“中央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更有资本自我吹嘘啦！我们在北京批判符确坚不久，许世友就在南京一次大会上，公然对符确坚“落井下石”。本来，符确坚的历史问题，中央尚无定论，而许世友却擅自宣布：“符确坚不是个东西，帮倒忙！符确坚是日本特务”。以后，康生受到批判，许世友则又改口说，符确坚的特务问题，是康生造的谣。那么，他就是跟着康生造谣了。

三十一、“下和棋”，讲团结 宽容相待，和谐相处

北京学习班的后半期，重心问题就是解决群众之间的团结问题。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同于地方上的两派那样，不存在着造反派，保守派之间那么尖锐、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群众之间，没有发生什么直接的利害冲突，更没有发生“政权争夺”、“武力争斗”之类的问题。

我们军区政治部的实际情况是，在许世友的指挥操纵下，实行排除异己，打击一部分人，拉拢一部分人，用这一部分人去整另一部分人的错误政策，人为地制造矛盾，分裂群众，致使群众之中出现不应有的分歧、隔阂和裂痕。文化大革命之初，军区政治部只有宣传部等三个部门开展“四大”，根本没有“造反派”，“保守派”之分，其他没有开展“四大”的单位更没有这个问题了。至于人的思想“激进”或“平稳”之分那是很正常的。只有“二月抓人”事件之后，许世友指使李树和等人，对他所认为的“坏人”、“反革命”、抓一批，关一批，清洗一批。这才开始出现了“反许派”和“保许派”之分，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以李

树和等少数人代表的“保许派”，以被抓捕，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为代表的“反许派”。在白水桥学习班里，许世友继续指挥操纵李树和为代表的保许派（即“精英强将”们），对“反许派”大力围剿。在这两派之间的大多数干部、群众，其思想倾向是站在受压者这一方的。跟着许世友，李树和走的人数很少。因此，北京学习班所要解决的群众之间的团结问题，就是指的那些“精英强将”们同受压者一方之间的分歧和裂痕。

我们这些人，在白水桥是处于受压制，挨批斗的地位。到了北京之后，通过批判“多中心论”的错误口号，批判人为地制造“稳军派”、“乱军派”的错误言行，压在我们头上的大石头被搬掉了，挡在群众之间的障碍被排除了。如此一来，我们这些受压者的政治地位和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可以说是“天亮”了，“解放”了，可以扬眉吐气了。

在白水桥的那些“精英强将”们，到了北京之后他们的处境和心态有了不小的变化。这几年，他们跟着许世友的指挥棒转，有权、有势、又有利，不亦乐乎。他们习惯于以“正确者”、“胜利者”的姿态自居。现在，他们所信奉的“多中心论”受到批判，感到舆论上的某种压力。他们担心的是会不会再来一次“翻烧饼”（许世友已经翻了一次“烧饼”：把中央红头文件推翻了），会不会要他们挨批、挨斗。

北京学习班的实践证明，没有“翻烧饼”，没有用这一部分群众去整另一部分群众，完全改变了那种群众斗群众的局面。我们除了批判符确坚、王蕴瑞以外，再没有批判任何人。包括李树和在内的所有“精英强将”，没有一人挨批挨斗。大家在学习班都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平等相待。群众自身的问题，完全由群众各自总结经验，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群众之间不搞批判，不搞人人过关。

北京学习班期间正逢党的九大会议召开之时。毛主席在九大会议上，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号召。我们的学习班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批判，群众之间的团结问题，从大面子上看有所改善，对立情绪有所缓解。但是，这几年积累下来的分歧、隔阂、怨气，在短时期内难以消除。学习班高举“团结、胜利”的旗帜，讲宽容，讲和解，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谈心，交心活动，大力促进群众间的和谐、团结气氛。

负责领导学习班的廖容标副司令员，非常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一天上午，专

门找到他的办公室谈心。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许多基本道理，大家都很熟悉，对敌人要狠，对同志要和，严以责己、宽以待人，群众之间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矛盾呢？希望学习班出现团结的好结局。廖副司令同我谈心的用意，就是希望我在团结上有个高姿态，起个带头作用。

中央派往学习班的联络员，也从多方面做工作。有一次，中央联络员老王同志与我和纪国城交谈，他说：“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各方面都采取下和棋的态度，不争输赢，不计高低，这样事情就比较办好”。

“下和棋”，这个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很难听得到的词语和概念，使我眼前一亮，心里很受启发，非常感谢中央联络员给我们送来了“及时雨”。

我把廖副司令员的希望和中央联络员的开导，传达给周围的同志，传到方方面面。“下和棋”的思想，逐渐变成大家的实际行动，给学习班带来许多新气象：和风细雨，平心静气的语言增多了；唇枪舌战、激烈争辩的场面不见了；不算旧账，不争输赢的心态与言行越来越被人们采纳了；宽容相待、友好相处的新局面开始抬头了……。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北京学习班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交心大会，团结大会。这次大会，按照领导小组的预先安排，由各部门的代表介绍本部门前一阶段总结经验，促进团结的心得、体会。会议开始不久，有一些同志不满足于这种“泛泛而谈”，主动上台，自由发言，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心声，展现大家的真情实感。这样一来，群众情绪高涨，会场气氛骤然活跃起来。领导小组因势利导、“顺水推舟”，使会议迅速掀起了群策群力地“消除分歧、促进团结”的高潮。

我在这次大会上，也是带头上台“讲团结”的一员。我向军区政治部的全体同志发出誓言：“从今以后，我们要把同志间的分歧，裂痕甩到太平洋去！”

“从今以后，我们要与群众中的恩恩怨怨一刀两断！”

我在台上的表态和誓言，当场引起许多同志的共鸣，陈时秋，施关彬等坐在台下的同志们当即站起来振臂高呼：

“我们要与过去的恩恩怨怨一刀两断！”

“我们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

此时，坐在台下的另一位同志王某，也是我们宣传部的。在白水桥学习班，他是我们学习小组的头头，是批斗我的积极分子。他在我发言之际，“唰”的一下站立起来，高声急呼：“听了艾汉美同志的发言，我很受感动，在白水桥的时候，我批判他言词过激，调子过高，他不计较这些，我现在也表个态，今后再不要在群众中分这一派那一派，不要群众斗群众”。

我与王某在会上的表态，当场又带动其他同志、接二连三纷纷表示“团结一致向前进”的愿望和决心。整个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敞开心怀说真话，说出了心里话，确实教育人，鼓舞人，感动人！原来计划这个会开半天，结果开了一整天。最后，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同志总结时，非常高兴地说：“今天这个会开的好！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好！确确实实地开成了一个交心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是近几年来很少能见到的动人场面。”

廖副司令员也非常满意地说：“南京军区政治部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开的好！体现了团结的新局面！”

中央联络员老王翘起大拇指，对我说“军区政治部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开的成功！说明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水平不一般”。

不过，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许世友没有参加这个大会，如果他在现场，不知他有何感想？我们也没有听到李树和是何评估？他是在场的，但没有听到他一言半语。我们可以断言，许世友，李树和同我们对这个大会，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还有一些同志说：“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在北京开的确实好！到了南京，那就又不一样啰！”

第四章 复员回乡 解甲归田

三十二、窥视可乘之机，借干部复员之名

许世友再次对我们进行打击报复

一九六九年六月上旬，南京军区政治部“北京学习班”圆满结束。我们于六月九日高高兴兴回到南京。半年前，我们的学习班从白水桥迁往北京，那时我还是一个没有得到“解放”的“戴罪之人”。半年后，终于还我一个清清白白的本来面貌回到南京，怎不令人高兴呢？回想一下，从一九六七年以来，许世友对我

们的打击迫害，我们对许世友的抗争，从南京到北京，再从北京回南京，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我们深深摸透了许世友所玩弄的一套政治游戏规则。

到北京，一切听中央的；回南京，一切听许世友的。

到北京，许世友做检讨；回南京，他就翻案。

现在，我们又从北京回到南京了。且看许世友下一步如何再次翻案。

我和政治部的同志们，经过几年的较量和搏斗，终于名正言顺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全心投入到各自工作中去。只有这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回到各自家里，同自己的家人团聚。我们头上没有“政治帽子”（各种罪名），身后也没有背着“黑锅”（从白水桥带到北京去的各种黑材料，已经在北京烧掉了），感到一身轻松了。

新闻科的孙皓月科长，李少白付科长，分头带领大家赴无锡、去无湖，奔合肥，到淮南，积极完成各项新闻报导。

正当我们迈开手脚投入工作之际，许世友又在我们头上“开动脑筋”、“制造事端”了。他好久没有同我们见面了，也没有给我们训话了。这一天上午，许世友在南京部队体育馆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既不谈白水桥学习班的事，也不谈北京学习班的事，而是大谈一通“整顿机关”的问题。他说，最近毛主席签发了一份关于军队干部复员的文件，军区机关要精简，给大家打个招呼。已有不少传闻，凡是反对许世友的人，就是复员清洗的对象。

果然不出所料，许世友又要在我们头上下毒手了，一场新的斗争又开始了。

其实，毛主席签发的这份中央文件精神，我们有所了解。该文件规定：复员干部对象是连、排两级，不包括营以上干部。复员政策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历史发展证明，这份所谓的中央文件，从制定到实施，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错误。我党我军历来精简部队的政策和传统是“干部转业”、“战士退伍”（复员）。这一次别出心裁，变成了“干部复员”。所谓“复员”，就是“脱下军装，解甲归田”，“你是从哪里参军的，还是回到参军的哪里去”。作为一个干部，这样“复员”处理，实质上是因为犯了严重错误，被开除，被清洗的一种待遇。这种“干部复员”的政策，对军队广大基层干部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和伤害，在军内军外，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十年后，党中央不得不加以纠正，把当初错误地当作“复员”处理的几十万干部，重新作为“转业”安排。虽然有所补救，但为时已晚，

其严重后果是无法挽回的。

这份错误的中央文件，使我们深受其害。许世友正是见了这份文件，如获至宝，把它作为对我们再次进行打击报复的“尚方宝剑”。许世友挥舞着这份文件，高喊着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其实分明是许世友利用这份文件而玩弄的一场政治阴谋：他借“干部复员”之名，把反对过他的人统统“扫地出门”，彻底清洗出去。几年来，他要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未能得逞，这一次正好给他提供了报仇解恨的机会。我们是“哑巴吃黄莲”，有口难言，有理难辨，喊天不应，叫地无门。按照正常的干部“转业”，“复员”条件，对照我们的年龄、身体、工作、能力及家庭、历史，不论哪一条都对不上号。许世友在政治上定不了我们的罪名，不甘心于一败再败，恼羞成怒，只好找个借口，将我们“一脚踢开”，“滚蛋”。

从一九六九年八月起，我和我的战友们，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地复员回乡了。我们尽管眼含热泪，满腔愤慨，默默不语，心照不宣，但我们在政治上，人格上，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说走就走、不说二话、不讲价钱，走的昂首挺胸，干脆利索。新闻科第一批离开部队的是陈时秋、施关彬，他俩回浙江故乡去了；

第二批离开部队的是刚从大学毕业，分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不久的黄灿霞、文传梅，他俩回江西老家去了；

第三批走的是孙皓月科长。他是中校，是年青有为、德才兼备的老资格科长，当然不属于“复员”对象，但许世友又以“精简机关人员”为名，与“复员”对象一起“滚蛋”。孙科长被流放到安徽皖南深山里的一个县人武部去了。李少白付科长也难逃噩运，稍晚一些时候，也被赶到安徽的县人武部去了。

组织上正式宣布我“复员”的决定是在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前后，我是军区政治部复员干部中离开较晚的一批人员。

关于我们新闻科干部当年遭许世友清洗的情况，我在这里补充一个我事后听到的奇闻。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复员干部离开部队半年以后。故事的主人是与我同在新闻科工作的胡士弘同志。由于种种原因，他是一个幸运者，没有卷入到我们同许世友之间的政治漩涡中来。他为人正直，给我们多方面帮助。新闻科的多数老成员（包括科长、付科长）被清洗后，他就成了顶梁柱，工作很出色，受到

军区政委杜平的赏识，宣传部部长张昌（原杜平秘书）已告诉胡士弘，准备由他担任新闻科付科长。就在此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胡士弘由于“一个电话”而横遭“天祸”。当时，南京军区要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代会”。他奉领导指示，打电话给北京“解放军报社”，邀请他们派记者到南京采访报道这次“积代会”。报社研究后答复：确定派“解放军报社”驻南京记者站的记者龚德同志来南京完成报道任务。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名龚记者得罪了许世友（据说他说过对许世友不满的话），现在，许世友听说要派龚德来采访，他火冒三丈，说：“这个记者，我们不欢迎。”因而，胡士弘受到严厉批评：“不该打电话邀请许司令不欢迎的记者来。”不只是龚德不能来，许世友还下令：“这个打电话的干部也不能留在政治部工作。”

许世友这道命令迫使杜平政委和张昌部长不得不把胡士弘调离政治部，下放到苏北的一个县人武部工作。胡士弘同志就这样仅仅凭一个电话被清洗，这叫什么叫罪？真是冤啊！以后由于胡士弘同志自身努力，又被调往北京国防科委工作。

三十三、我的安置去向成了大难题

四处无门，陷入困境

当年，部队复员政策：你从哪里来，还是回到哪里去。这就是说，你参军的时候，是城市人，现在回城市；是农村人，那就回农村去。

组织上宣布我复员的第二天，就派了一位机关干部，火速赶往我的故乡——湖北省。他到省里、市里、县里的各级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联系我的安置去向。每到一处，打开我的档案一看，我的老家是在湖北省红安县里的一个偏僻山村。得到同样的答案：城市里不能安排，只有到农村去。

“我老家无人，父母早已去世，我又该往哪里去？”按照政策，我还可以选择几个去向：随同爱人工作的地方安置，或到爱人故乡，或到其他愿意接受我的地方安排工作。

本来，我党对于干部的调离去向，一贯是由党组织负责安排的，特别是遇到难题时，更应该由组织上出面解决。可是，我们在许世友的特定政策下，另当别论。自那位机关干部带回的答复后，军区政治部的有关部门就把我“除名”了。

从六九年十月份起，停发我的工资。他们说：艾汉美已经不是军区政治部的人了，组织上已经派人给他联系好了安置去向（到农村去），他去不去，或去其他地方，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实际上，我对他们也不抱任何幻想，今后的路怎么走，一切就是要靠自己了。

我自己的安置问题，我亲自回故乡去闯一闯。我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快二十年了，如今踏上故乡故土，就象异乡人，一切都是陌生的。由于长期的军涯生活，初到地方上办事，显得“笨头笨脑”、“笨手笨脚”，很不适应。我刚到武汉市，连路都不会走，尽闹笑话。参军前的老同学、老朋友，多年缺少联系，也不知去向何方。只有个“穷亲戚”（爱人的姐姐家），作为临时“落脚点”。就是这个“穷亲戚”以极大的热情，给我当向导，托熟人，亲戚托亲戚，朋友托朋友，四处求援，多方找关系。但往往不得要领，费了老大的劲，忙乎了好几天，结果还是“没门”。尽管如此，在我人生遭难之时，能够得到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的真诚相助，我的内心深处十分感激。

大城市“摸不到门”，我就到红安县城去试试看。在公交汽车上，我看到公路两旁的山头光秃秃的、河塘的水也干涸了。心想：原来的青山绿水，怎么变成“穷山”缺水了。此景此情，不禁使我的心凉了半截。在县城巧遇到曾在十二军一起工作过的老战友，那时他当连长，我是军司令部参谋，我和他是同乡，他几年前从部队转业回红安，分配到县工商管理局工作。我们是老朋友相见，又是“故乡遇故知”，交谈自然融洽。我向他说明我的来意，他如实地对我说：红安县既是全国闻名的将军县，又是很有名的贫困县，现今安置回乡的复员军人，能力很有限，如果我要回到红安来，困难较大，不仅我的工作不好办，全家人的住房、吃饭、子女上学、爱人工作，都存在很多问题。他提醒我还是在外地另谋生路好一些。我从其他渠道进一步证实了这位战友的忠告。

回故乡安置的路走不通，另想办法。我爱人朱德美所在工厂的周厂长，原来对我有所了解。他听到我回湖北安置工作遇到困难的消息。就主动地对朱德美说：“我们厂非常需要老艾这样的干部，如果他愿意，我就请求上级机关把老艾要过来。”

我们非常感激这位周厂长的一片好心。本来，复员干部随同爱人单位安置，这是我党的一贯政策，利国利民，这次很多复员干部就是随同爱人工作单位，在

南京安置下来。开始，我是否在南京安置，有所顾虑：第一，我们身份特殊，恐怕过不了许世友这一关；第二，离开南京远一点更好，免得以后遇到风吹草动，又带来麻烦。没有想到回故乡安置这么困难，如今不得不走这条路。但这条路又能否行得通呢？过了几天，周厂长带着苦笑给我们传来了失望的消息：他给上面的报告被打了回来，上级的批示是：“此人不能留在南京。”

这条路又行不通了，只好再想别的办法。我爱人老家是江苏宿迁县城。朱德美先请她哥哥帮助联系了一下，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接收安置。当朱德美连忙赶到哪里时，宿迁的有关部门却“变脸”了，他们刚接到上级电话指示：“艾汉美不能在宿迁安置。”这一来，我去宿迁的路也被堵死了。

接连碰鼻，使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我安置的道路上，背后有一只“黑手”在盯着我的行踪，操纵我的去向，我走到哪里，他们就把哪里的路堵死。原来，我对此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事情不会做的那么绝。同我一起“造反”的同志，不少人已在南京安置下来，我为什么就不行呢？南京军区后勤部的赵玉祥同志，和我都是赴京告状的二十一名代表中的成员。他复员时，后勤部领导给他两条去向：一是回福建老家，二是留在南京（他爱人在南京工作）。老赵很快分配到南京变压器厂。但是，现在事实证明，我的估计失误，别人能走通的路，我就走不通。

军区政治部复员的同志，行动迅速，先后都已离开部队，各奔前程，家室也纷纷搬出军区大院。唯有我的安置去向，“八”字还没有一撇，很多关心我的同志为我的处境捏了一把汗。军区政治部已经停发我的工资，不只是我没有生活费了，我们全家人面临着“断炊”的危险，为解燃眉之急，我先从后勤部的老赵那里借来人民币 400 元，熬它一段日子再说。有一天，我在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碰见宣传部的付涛少校，他热情的鼓励我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眼前的这点困难没啥了不起！想想我们在白水桥过的什么日子呀！差点儿连命都没有了，我们还不是挺过来了！要有信心，老天爷总会给我们出路的！”

三十四、损人坑人的“招数”步步紧逼

处心积虑逼我全家下农村

毛主席说过：“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本来，按照党的政策，我从部队复员，老家无人，我是有好几条出路可走的。可是我却一条路也走不通。九月份宣布我复员，十月份就停发我的工资。没有工资，就等于切断了我的活路，也威胁到我们全家人的活路。这一“招”够“损”的吧！没有想到，更“损”的“招数”还在后头。

六九年十月下旬，军区政治部的行政部门通知我，要我尽快把家搬出政治部家属大院。我向他们提出：“我的安置去向，尚无着落，我的家又往哪儿搬呢？”

得到的答复是：“要你们搬走，这是上面的指示，你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军的成员了，就不应该住在部队营区，不应该再享受军队的待遇。”他们还说：“城市里不能安置，就到农村去嘛！”

话说到这份上，已经很明白啦！给我下“逐客令”，要我到农村去，要我们全家都搬到农村去。

面对这些“损人”、“坑人”的“招数”，一步接一步，迫使我和我爱人不得不重新考虑搬家问题。在许世友排斥异己、打击报复的乌云笼罩下，这军区家属大院，肯定不是我们的容身之地，安身之处。再待下去，麻烦会越来越多，迟搬不如早搬。于是，我们改变原来“先安置、后搬家”的计划，打算“先搬家，后安置”。

第二天，朱德美就去向他们厂的周厂长如实反映情况，请求厂里给我们安排临时居房，帮我们度过难关。周厂长听说我们被“扫地出门”，寻求“避难所”，深表同情，非常爽快地说：“没有问题，这个困难可以帮你们解决一下，把家搬到厂里来”。厂里行政管理部门当即给我们安排一套职工宿舍，并配备相关的桌椅，床铺等家具。给我们的子女就近安排上学。在我们全家遭难之际，得到厂里领导及职工们如此热情、宝贵的紧急援助，真使我们感激不尽。

说走就走，十一月初，全家人乘坐一辆大卡车，毅然决然离开军区家属大院，把家搬到南京远郊的工厂里安顿下来。

我们这次搬家，慌忙火急，如同逃难一般。几年来，由于我受到许世友打击迫害，给全家人带来种种磨难，特别是给我爱人朱德美造成很大压力。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不对！我们在灾难面前，不是“同林鸟”，而是同生共死，同呼吸、共命运的患难夫妻，是同心同德，共度难关的战友。

我们突然搬家，子女们的心态一下子转不过弯，又要他（她）们中途转学，影响他（她）们的学业。特别是大女儿的思想工作难得做通，她是南京师范一附中的尖子生，又是班干部，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喜欢她，她也非常舍不得离开学校。她含着眼泪对我说：“爸爸，你们搬走，就让我留在这个学校吧！”

我深感内疚，连累全家，耽误子女上学，但又非走不可。此时此刻，我和朱德美就用自己“面对困难不低头”的坚强意志影响子女；同时，结合我们自身童年时代的艰苦经历，既激励自己，又教育子女。解放前，我五岁起，跟着父母四处逃乱，逃日本人的乱，逃国民党军队的乱，家里一贫如洗，靠借债度日，又要逃高利贷债主的乱，远走他乡，过着流浪者的生活，根本无钱上学，直到解放后，我靠人民助学金，才有可能读到初中。朱德美老家更穷更苦。她祖父逃饭出身，母亲给地主家当了十多年使唤丫头。由于她家没有一分土地，没有一粒粮食收入，她从很小就跟着母亲四处挖野菜充饥，摘树叶当口粮，凡是能吃的野菜、树叶，她都吃过了，她家常年靠收拾别人土地上剩余的麦子、豆子、红薯、高粱过日子，常常是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有时一天两天没进一粒粮食，就靠喝凉水充饥，饿得头昏眼花腿发软。她身上的单衣，棉衣全靠救济，补丁摞补丁。她没进过一天正规的校园门，而是靠“扫盲”、“速成识字班”、“工人夜校”，逐步得到一些文化知识。回想我们的童年，真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对照过去，看看眼前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眼前的这点困难，还能难倒我们吗？

我们离开军区家属大院之后，按照常规，我被复员处理，一切复员手续都已办完，人也走了，家也搬了，可以说，我和南京军区已经“一刀两断”了，互不相干。

但是，许世友不答应，我们家搬到工厂里之后，他还不放手，不罢休。

我们刚到厂里不久，军区即派人跟踪而来。一天、两个身穿便服的部队干部乘坐一辆黑色小轿车，找到厂里保卫科。他两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该厂保卫科干事陈福庚、何立两同志很客气地接待他们，问：“你们来我厂有何事？”那两个干部说：“最近，我们军区政治部有个复员干部，叫艾汉美，听说把家搬到你们厂来了”。

“是呀！他是我厂朱德美同志的爱人，刚搬过来”。

“这不行！他是军区政治部的造反派一号头头，犯有严重错误。军区领导决定他复员，就是要他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改造。”

“你们有部队介绍信吗？”

“没有”。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有正式文件吗？”

“也没有”。

厂保卫科的陈、何二同志，感到万分惊讶，仍然耐心地说：“你们既无介绍信，又无正式文件，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的话？”“再说，你们是军区系统，我们是地方工厂，你们也无权干涉我们厂的事呀！”“你们说老艾犯了严重错误，那是部队的事，现在他复员了，成了老百姓，即使他是地、富、反、坏、右，没有判刑，没有坐牢，也要给他出路，他是我们厂的职工家属，在我厂安家，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那两个干部又说：“我们是部队领导派来的，希望你们厂配合一下”，“我们部队领导的意见，你们厂的朱德美也要随同艾汉美一起下农村，他们全家都要下农村”。

这番话把陈、何两同志说得火筋直冒，大声说：“我们厂的朱德美，老家世代贫农，本人共产党员，表现很好，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竟然要她随同老艾一起下农村，还要他们全家统统下农村，这是哪一家的政策？……”。

越说越生气，干脆把那两个干部轰走了！南京军区政治部的那两名干部碰了一鼻子灰，还不甘心。过了几天，那两个人又来了，仍然是穿着便服、开着黑色小轿车，似乎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一次，厂保卫科的同志，看到他们还是没有带介绍信，感到迷惑不解地说：“你们是堂堂的大军区领导机关，你们所谈的又是关系一家人命运、前途的大问题，为什么不带介绍信？”

那两人吱吱唔唔，不明说。

“对不起！你们没有介绍信，我们不便接谈”。厂保卫科的同志只好“关门”，免谈。

这时，朱德美听说许世友又派人来了，立马往厂保卫科赶。边走边喊：“许世友要逼我们全家下农村，我们究竟犯了什么法？”

军区政治部的那两个干部，听到朱德美的喊话声，坐不住了，连忙起身往外

走。

朱德美看到他们两人离开保卫科了，就说：“别走嘛！你们不是要我们下农村吗？那我来与你们当面谈”。

那两人装聋作哑没听见，一声不吭，一头钻进黑色小轿车，灰溜溜地跑掉了！

这两个人一次再次的鬼鬼崇崇，偷偷摸摸的行为，使我联想起自决定我复员以来的这段日子里，种种迹象表明，某些人搞的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恶意陷害：

第一，把“干部复员”的政策当作一把刀，用以“杀害”我们这些反对过许世友的人。许世友、李树和六七年把我们当作“反革命”镇压失败了；六八年把我们定为“乱军分子”又失败了。这一次，借用“干部复员”这把刀，再次把我们作为“犯了严重错误的坏人”加以“杀掉”。他们表面上“冠冕堂皇”，合理合法，暗地里别有用心，秘密布置。他们做贼心虚，见不得阳光，只能鬼鬼崇崇、偷偷摸摸，阳一套、阴一套。

第二，利用手中特权，破坏党的政策，堵死我的出路。我党我军的一贯传统，对复员、转业的干部是有许多优惠政策的，由组织上专门负责，妥善安排。以我的实际情况而论，完全有条件、有理由在南京，在江苏安置适当的工作。可是，许世友，李树和公然与党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管我安置与否，反而，通过“暗箱操作”，横加罪名，强行堵死我的一处又一处的安置出路。实际上把我当作坏人扫地出门，叫我无处安身，走投无路。

第三，人为地制造陷阱，妄图把我们全家推入无底深渊。不惜动用违法手段，千方百计地不让我在城市安家，硬要把我和我爱人及全家子女统统赶到农村去。我在农村一无住房，二无土地，三无职业，连我爱人也要失去工作，叫我们全家如何生存呢？许世友、李树和就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就是要使我们全家陷入无底深渊。他们为何对我下如此毒手？由于我是“反许派”的头面人物，只要把我置于死地般的处境，就可以让世人看到“反许派”的悲惨下场，这就是他们的险恶居心。

三十五、“山穷水尽疑无路”

王浩同志一封信，救了我们全家的命

我的家暂时有了“避难所”，但是，我的安置出路又在何方？仍然是个未知数，南京、江苏这块宝地，我是无路可走了，只有另到别的地方去找出路。许多关心我的同志和朋友，帮我想办法。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卞庸中，听说我复员安置遇到“麻烦”，既感到气愤，又为我担心，他就主动地写信给他曾经工作过的浙江绍兴军分区，帮我联系“去向”。因人事关系发生变化，没有联系上。

由于我的安置迟迟没有着落，面临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尽管地域辽阔，却找不到我的立足安身之地。我这个参军近二十年的解放军干部，转眼之间，变成了中国七十年代的“下岗老兵”、“失业军人”、“无业游民”。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里，安排人员，分配工作，都是由单位介绍，组织分配的，是没有私人活动空间的，如果仅凭个人去闯、去碰，那个难度就好比古时代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般，真是叫人望而生畏。我没有工作单位，就没法上“户口”；没有“户口”，就不供应“粮、棉、油”，不供应副食品及生活用品。这样，不只是我一个人难以生活下去，而且直接威胁到全家人的生存。原来，全家人的生活开支，主要是靠我的工资收入负担，现在只有我爱人的微薄收入（每月工资三十多元），那怎么承受得了？即使给我补助了一笔复员安置费四千元，如果坐吃山空，那也无济于事。

正当我一筹莫展，面临“山穷水尽”之际，一个意外的转机来到了。

一天，我在南京山西路口，迎面碰见了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一位科长，名叫王浩，他一见到我，十分热情地问我：“老艾，听说你复员啦，安置在哪儿？”

我回答：“感谢您的关心，还没有找到安置的地方哩！”

“你是湖北人吧！不能在武汉找个合适的工作吗？”

“我当然希望安置在武汉，我也去了武汉，可是我在哪里没有熟人，没有门路，进不去呀！”

他接着对我说：“你别着急，我来帮你找个关系，或许有点帮助。”

“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

他说：现在武汉市的一把手，市革委会主任叫方铭，是空降十五军军长，他和方军长曾在二十军一起工作多年，相互很熟，他同方铭同志的爱人还是同乡。王浩同志提出：他直接给方铭军长的爱人写一封信，交给我带到武汉去找她，请

她帮帮忙。

第二天，王浩同志把写好的信交给我，并鼓励我说：“天底下的路宽得很，我不相信许世友就能一手遮天！他的手再长也管不到武汉去！”

我接过王浩同志写的信，连声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当时，这封信就像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我真的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带着王浩同志写的信，兴致勃勃地赶到武汉，当天下午，顺利地见到了方铭军长的爱人，把王浩同志写的信交给她。她看过信后说：“我们和王浩同志是老朋友，信中所说的事，我会尽力帮忙”。我又把自己的一份“干部履历表”交给她，让她了解我的基本情况：我从十七岁入伍，十九岁入党，三年军校生活，十年作训参谋，六年新闻干事，多次立功受奖，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我的历史，家属及社会关系没有任何污点。

后来我了解到，方铭同志的爱人是在武汉市革委会政工组工作。她利用一次会议机会，找到武汉市“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负责人，把我的基本情况一起研究后，达成一致共识，同意我在武汉安置工作。一九六九年元旦之前，我被分配到武汉市的一座大型化工厂。元旦一过，我到厂里报到，厂里领导一看，我是从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科复员到地方上来的，非常高兴，当即决定我被分配在厂宣传科，专门负责宣传报道工作。本来，我按“复员”身份，是要去车间当工人，但厂里硬要我“以工代干”。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厂里还答应：连我爱人及全家子女，一齐从南京迁到武汉来，分配居房，安排爱人工作，子女就近上学。

此次我到武汉，一路顺风，马到成功。几个月来，我的复员安置之路，何等艰难曲折，有时波涛起伏，有时恶浪翻滚，终于赢来了“峰回路转”、“绝处逢生”的局面，悬在我心上、我们全家人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我带着喜讯，返回南京，全家人欢天喜地，特别是孩子们兴奋地跳啊！叫啊！

“我们要回湖北老家了！”

“我们要回武汉了！”

我爱人厂里的领导及职工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表示祝贺，为我们高兴。

“饮水思源”。面对这一喜讯，我们全家人不能不想到王浩同志的信。在我们全家被许世友逼到山穷水尽的时刻，得到王浩同志这封信，该是何等及时！何

等珍贵！

不妨回想一下，如果那时没有王浩同志这封信，我又能往哪儿去呢？很有可能再过一年半载，我还在黑暗中四处奔波，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流浪汉；那么，我的处境，我们全家的命运，将是一个什么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我们终生不会忘记王浩同志这封信的价值和份量。

这封信是我们“久旱之后的甘露雨！”

这封信是我们在危难关头的救命信！

与此同时，我们全家人也不能不联想起许世友、李树和，几个月来是如何费尽心力，不遗余力地断我出路，断我活路的所作所为，该是多么可恶！多么可恨！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和我爱人专程前往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同老朋友道别。又碰见了宣传部的付涛及政治部的许多同志，他们十分惊喜，担心地问我：“几个月没有见到你，你怎么样啦？”有的同志好奇地说：“某领导在大会上宣布，艾汉美四处碰壁，走途无路了，反许世友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造谣可耻”！我哈哈一笑，“大家看，我这不是活得好好地吗？有的人确实是要把我们置于死地，恨不得把我们全家斩尽杀绝，这是痴心妄想”。我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在武汉安置的情况，同志们听了非常高兴。有的连声说：“好！好！！好！！！”“这正是得道多助”！“好人总会有好报！”

一九七〇年三月一日，我们正式启程前往武汉，全家人精神饱满，非常开心。今天，我们终于跨越了许世友设置的障碍和陷阱，昂首挺胸，轻松地奔赴新的岗位，走向新的生活。

三十六、复员回到故乡，一切从零开始

“雄关漫道从头越”

经过三天两夜轮船航行，一九七〇年三月三日，我们顺利回到湖北故乡，抵达武汉。在亲戚家停留一天，三月五日，奔向我工作的新单位——葛店化工厂。该厂位于武汉郊区，长江之滨，是中南地区的最大化工企业。全厂数千职工，设有医院、学校、商业区、社区管理机构，配套设施齐全，号称化工城。

我们初来乍到，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开始。

我们到厂里后，负责后勤工作的副厂长才某和行政科长马上给我安排一套居住房，这房子是为解决职工居房困难而新建的一排宿舍，厂里优待复员军人，我家是最先进住的第一家，位置由我们自选。我们老小三代人、房子不够住。看到这房子内空较高，才副厂长当即拍板给我们搭暗楼。行政科长亲自用板车给我们送来搭暗楼的废旧钢管和木板材料。工人师傅还专门制作了上下楼的轻便梯子。孩子们高兴地说：“我们家住上了两层楼的房子啦！”事后我才了解，这是厂里特意照顾从外地回乡的复员军人，给予我们特殊优待。

我们刚到厂时，许多生活用品一时没有备齐，吃饭的锅、碗、勺、盆都不够用，缺这样，少那样。住在我们附近的工人和家属，尽管我们之间互不相识，也不知道姓什名谁，但他们把我们当成一家人一样，主动地把我们所需要的物品送上门来。一位人称“刘嫂子”的中年女工，待人热心，助人为乐，她把自己家的锅、盆等厨房器具及吃饭的碗，筷等用品，装了一大篮子，送到我们手上，笑呵呵地说：“这些都是干净的，你们用吧！”这样，我们处处受到照顾，事事有人帮助，真使我们深深感到：“故乡人，格外亲”，浑身充满了温暖和力量。

我在军营内待了近二十年，现在转到地方工厂来，几乎是两世界“两重天”。在这之前，我对工厂一无所知。原来所学的，干的，熟悉的东西，现在都用不上了。面对新的环境，新的工作，新的生活，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从头干起，从头熟悉。开始，我对厂里的化工产品专业名词，什么“五硫化二磷”、“五氯氛钠”，什么“烧碱”、“电石”……，好像听“天书”一样，听不懂，记不住。通过跟着车间干部和工人师傅，一道参加劳动，拜师学艺，逐步有所了解。整个厂区，布满了各种不同型号的管道，像蜘蛛网似的伸向四面八方，伸向各个车间、班组；多品种，多层次的生产结构，工艺流程，环环紧扣，井井有条；严密而有效地生产指挥系统，经营供销网络，如此等等，真叫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迫使我不得不如饥似渴地多学多问，力求尽快地成为一名合格的企业职工。

我进厂不久，深深感到这个厂人力资源十分丰富。五十年代建厂以来，前几任厂领导，都是几位抗日的或南下的老同志，既有资历，又有才学，留下了许多好传统，好作风。文化大革命中，进厂“支左”的军代表是武汉空军政治部宣传部派来的科长和干事，富有解放军的许多优秀品质。当年我在部队和他们是“同行”，如今我虽是一名工人，但与他们相处得很融洽，相互理解和支持。近年来，

从清华大学等院校毕业进厂的大学生，加上从部队复员的排、连干部，先后来了好几批，共有几十人，成为厂里的重要技术骨干和优秀人才。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常委的吴官正，比我早一年进厂，工作很出色，很快被选入厂领导班子。这期间，还有一大批“老三届”下放农村而被抽调进厂的知识青年，他们是给厂里及时输送的新鲜血液。上述情况表明，这个厂成了广集人才的“聚宝盆”，其中不少人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使我受益匪浅。

一九七〇年，是我离开南京军区，复员回到湖北故乡，投身工厂建设的第一年。这一年，我在闯过前几年的大风大浪，历尽许世友的欺压磨难之后，过得比较平静而轻松的一年。这一年，我的身心获得完全解脱，我们全家人都是一样，就好像是从国民党的统治区进入共产党的解放区。尽管物质条件比在部队差多了，日子过的清苦一些。收入减少一大半，我是三级工每月工资 43.8 元，我和爱人两人每月工资总共七十多元，平均每人每月生活开支只有八元多，只能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但我们现在身上没有背“黑锅”，头上没有“政治帽子”，思想上如释重负，过得非常舒坦，生活上紧紧巴巴，工作上紧紧张张，去掉了压抑感，换来了安全感。我们和许世友之间彻底地“一刀两断”，他当他的大军区司令，我当我的平民小百姓，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谁也不犯谁。有了这种心态，我们在工作上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干，甩开膀子干。

一九七〇年，是我人生道路上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我从一名解放军干部，变成一名普通工人。一年来，我边学边干，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同时，把我在部队掌握的知识和本领，用到我所担负的宣传报导任务中，深入生产一线，贴近群众生活，下大力气搞好调查研究，不计得失，日夜加班加点，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成绩。这一年，葛店化工厂由于全厂职工团结一心，奋力拼搏，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扭转“十年亏损”，实现“一年巨变”。这中间，我也付出了微薄之力，厂内厂外的宣传报道工作十分活跃。一时间《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及电台，连续不断地宣传葛店化工厂的事迹，乃至《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也多次来厂采访报道。这样一来。该厂名声大振，成为武汉市、湖北省赫赫有名的先进企业。这一年，我把自己命运的转变，同工厂面貌的巨变，紧紧地融合

在一起，深感欣慰，深受教育和鼓舞。

第五章 众人援助 一路平安

三十七、亡我之心不死，许世友故伎重演

众人鼎力援助，使我免遭一难

我复员到葛店化工厂，一年来，同工厂融为一体，与工人们打成一片，总算迈开了“雄关漫道从头越”的第一步，自我感觉良好，可喜可贺！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原以为，我们复员后，远离南京军区，远离许世友，即可相安无事了。那晓得，我又犯了幼稚病，太单纯、太天真了。许世友没有把我们置于死地，没有把我们斩草除根，没有把我们地球上铲除掉，他就时时刻刻不放心，不安心，不死心，不放手，不罢休！

一九七一年初，葛化厂的党委副书记张琦同志对我说：“我们党委研究了一下，认为你复员到厂里，表现不错，工作很有成绩，打算让你挑起更重的担子，希望你继续努力，干的更好。”正当组织上准备重用我的时候，突然间，李树和按照许世友的指意，派人来了，又要对我下毒手啦！

一天，南京军区政治部两名军官：一名科长，一名干事，来到武汉化工局，找到该局下属的葛店化工厂党委书记张瑛及保卫科干部。他们取出专案袋子的“绝密材料”——“5.16”分子艾汉美的严重问题，以极其神秘的口气，向葛化领导人大谈一通“艾汉美在南京的罪行”。而后，以“上级”的口吻要求：武汉化工局及其葛化工厂的领导，要立即对艾汉美采取断然措施，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实行“隔离审查”。

他们如此没头没脑、断章取义的介绍情况，使化工局和葛化厂的领导根本听不明白，当场提出种种质疑。

“根据介绍，艾汉美的问题主要在文革初期，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他复员时档案里只字未提，现在又突然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你们所说的，南京军区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们搞不清楚；这些情况同‘5.16’问题又是什么关系？”这言下之意，就是怀疑：“反对许世友，就是‘5.16’分子吗？”

对这些问题，南京军区的两位军官吱吱唔唔，含糊其词，不作正面答复。

接着，葛化党委书记张瑛说：“本着对人的处理持慎重、负责的态度，我们认为，艾汉美同志复员到地方上，表现很好，现在是我厂政工部门的重要骨干，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没有作出结论之前，我们不能对他贸然举办‘五不准’学习班，更不能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

南京军区的两位军官，听了这番表态后，大为不满。他们没料到，葛化厂领导人竟敢对南京军区这样的大机关不买帐。于是，他们就合盘托出“许世友”这张“王牌”，说“我们所表达的意见，实际上是我们许司令的意见，艾汉美的问题，是许司令亲自拍板决定的”。

他两原以为，只要抬出“许世友”来，谁敢不屈服？那晓得，张瑛同志回答是：“不管是哪个领导人的意见，都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军内的事情军区内解决；地方上的问题，由地方上负责”。

南京军区的那两位军官，只好“扫兴而归”，葛化党委书记张瑛的态度，得到党委副书记张琦及党委成员吴官正等同志的一致支持，没有按照许世友的指意去办。在这之后，南京又给葛化寄来了一批又一批所谓群众揭发的“艾汉美‘5.16’材料”。葛化领导仍然坚持不办学习班，听候南京的审查结果。当然，本来打算重用我的计划也只能“暂停”了。

当时，我对南京怎么抓“5.16”的情况不得而知。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深感震惊。万万没有想到，在我“解甲归田”，远离南京之后，许世友又给我戴上“5.16”的大帽子，使我刚刚获得的平静生活，又受到强烈的震荡。

许世友究竟凭什么把我定为“5.16”分子呢？一九七〇年，毛主席亲自批示，党中央正式下达文件，全国清查“5.16”反革命集团。历史证明，这次清查被林彪、江青一伙利用，阴谋陷害周总理，演变成了全国性的大灾难。这期间，许世友也同样是借用这次清查，在南京，在江苏制造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劫难。他说：“清查‘5.16’，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放手大胆地干。”实际上，他是故伎重演，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借用中央文件的名义，推行他个人的一套“私货”。他所清查的“5.16”分子，就是他六七年要抓的反革命，六八年要抓的“乱军分子”。不幸中的万幸，这一次许世友对我的清查，指挥不灵。我在葛化党委领导人张瑛，张琦及吴官正等同志的鼎力援助和保护下，免遭“隔离审

查”的劫难。当年同我一起“反许”的几位战友，如：南京的赵玉祥同志，杭州的陈时秋，高丕忠等同志，由于处于许世友的权力控制下，一个个在劫难逃。如果，我在南京或在江苏，至少要蹲三年大牢。

回想起来，我这几年在同许世友的斗争中，在一次又一次危难关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四面八方的许许多多的好心人，热心人的关怀，保护，支持和帮助。正是由于这些帮助，我和我们全家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摆脱困境，度过难关，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些帮助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大恩人，就是我们的“上帝”。对此，我和我们全家人，从内心深处万分感激，衷心祝愿这些好人，一生平安。

三十八、赤膊上阵，狠狠地抽史景班一耳光

充分暴露了许世友的真面目

一九七一年，南京的清查“5.16”运动，进入白热化阶段。

文化大革命以来，军区政治部一直是许世友亲自抓的“重灾区”。“擒贼先擒王”。许世友一向认定，军区政治部“倒许乱军”的黑后台是史景班；那么，“5.16”分子的头，自然也是史景班。

谈起史景班，真是不知何故，与许世友结下了不解之冤，史景班从十二军到南京军区，都是我的老领导。他是五十年代调到十二军当副政委、大校，不久便升任军政委、少将，是当时比较年轻能干的军政委（不到40岁），与李德生军长共事多年。我是十二军司令部作训参谋，他虽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在一起工作的机会很多。六四年以后，他调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之职，我被调到军区政治部当新闻干事。我们之间的交往更多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许世友同史景班和我本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个人恩怨之争。

文革中的史景班。他是最先受到造反派冲击的领导人之一。六七年初，军区政治部的那次批判大会上，史景班和王必成，鲍先志，王六生等领导人一起挨批挨斗。一起被“三团两队”的造反派强行下跪。六七年“二月抓人”事件，他没有参予，也不赞成许世友镇压群众的行为。六七年下半年，他与王必成，鲍先志

等人的态度一样，对受压群众的平反要求表示理解和支持。也就是这一点，得罪了许世友，被视为不可饶恕的头号大敌。一九六八年挨批挨斗了一整年。没有任何结果，被挂了起来。

清查“5.16”开始后，许世友认为：这是定史景班死罪的最好机会，只要攻下史景班这个堡垒，整个政治部的“5.16”问题便可以顺藤摸瓜、迎刃而解了。由于求胜心切，许世友决定短兵相接，亲自审问史景班。

这天，由李树和陪同，许世友与史景班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交锋：

“史景班！你跟‘5.16’组织是什么关系？”许世友开门见山、单刀直通要害。

史景班毫无思想准备，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发问搞懵了，不知如何回答好？只是慢条斯理地说：“我不明白许司令这话的意思”。

许世友火爆脾气，一听史景班这吱吱唔唔的答话，很不耐烦了。

“你别装算！‘5.16’是什么货色，你不清楚吗？军区政治部那些跳得高的家伙，不是‘5.16’吗？你跟他们没有联系？现在我不讲明，让你自己坦白交代，早交代早主动。”

许世友这番话，史景班听明白了，回答说：“我与军区政治部造反的那些人，是工作上的关系，他们中间有没有‘5.16’，我不知道。”

接着，许世友问道：“批资总部的头头，上北京告状的那些人，他们参加‘5.16’的活动，你能不知道吗？”

“我确实不知道。”

“你这不知道，那不知道”，许世友听史景班的这种口气，简直五脏六腑都要气炸了！他急不可待，感到史景班在同他“软磨”。“这不是办法”，他决定改变审问方式，上前两步，直逼史景班跟前，把桌子一拍，大吼一声：“史景班！你什么都不知道，别人已经供出了你的‘5.16’罪行，现在给你坦白机会，你还嘴硬，我看你是死到临头，还不认罪！”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实事求是嘛！我与‘5.16’毫无关系。”史景班坚定自信，理直气壮地同许世友顶了几句。

“这还了得！”许世友心想：“史景班讲话竟敢这样放肆！”顿时，多年来憋在肚子里的仇恨、痛恨和愤恨，一起涌上心头，怒火冲天，怒不可遏，当即拿

出他的“少林武功”，说时迟，那时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啪”地一声！狠狠地朝史景班的脸上，抽了一耳光！

这“啪”的一声，立马惊动了许世友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快从后屋跑来一看，只见审问室的三个人，谁也没吭声。许世友两眼直挺挺地瞪着史景班，心里感到舒坦多了，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他的意思是说：“今天我打了你，你又能怎么样？”这时史景班脸部被打得通红，眼镜也被打掉在地上，但他显得很有修养，没有惊慌，没有失态，仍然平稳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样沉默了好几分钟。还是李树和把眼镜捡起来，交给史景班。那些工作人员看到这一场面，没有发生意外，才松了口气。他们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史景班当场不服，提出抗议，那许世友怎么办？很有可能马上掏出他的左轮手枪，当场把史景班“崩”了，岂不是要爆发一场血案吗？

人们难以相信，当今举世闻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号称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队伍中，居然有这样一位高级将领，堂堂的大军区司令许世友，竟然动手打大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史景班！这样的怪事，真可谓是天下奇闻！

许世友的这一耳光，给我们，给当代人，给后代人上了活生生的一课！令人深思的一课！

这一耳光，表明许世友急于把史景班打成“5.16”分子，完全不讲党性，不讲政策，不讲纪律，不择手段，不顾后果，赤膊上阵，凶相毕露，何等愚蠢！何等疯狂！

这一耳光，给许世友的“传奇故事”，又增添了一项新的“传奇纪录”。在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绝”！

一九七四年，史景班摆脱了南京的磨难岁月，走向新的工作岗位——被中央任命为昆明军区副政委，宣告许世友的阴谋彻底破产。

三十九、许世友制造那么多冤假错案

人民永远不会原谅

南京的清查“5.16”运动，从一九七〇年四月起，在许世友一手指挥下，历

时三年多，对广大无辜的干部、群众，比六七年二、三月间实行更大规模的大抓捕、大镇压，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制造的冤假错案之多，堪称史无前例。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毛主席的这一重大决策，深深触动了许世友的神经，迫使他不得不离开南京，不得不离开他经营多年的“许家天下”。

许世友一拍屁股走了，可是他留下来的烂摊子，谁来收拾。究竟清查出多少“5.16”？列举下面几个数据看看。

1971年，许世友亲自写信，向毛主席报功：已经挖出“5.16”分子1190人，还有嫌疑对象2000人。

被许世友委任为“前线总指挥”的吴大胜上报数字是：隔离审查一万多人，全省清查“5.16”分子二、三万人。

当许世友调走后，江苏省委的正式调查结果：三年多清查，江苏省共有十三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死亡两千多人，伤残人数更多。

据江苏省委调查，南京军区被打成“5.16”的军级以上干部达84人之多，仅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人。至于整个南京军区有多少“5.16”，谁也说不清，道不明。

南京的“5.16”问题堆集如山。我们这些身居外地被许世友诬陷为“5.16”的人员，更是无人问津。一九七四年春节后，我同复员到湖南的洪期钩，南京的赵玉祥，浙江的陈时秋、高丕忠、陈永安等同志通过书信约定到南京讨个说法。当年五月中旬，我们从各地汇集南京。此时的南京军区领导已经大换班了。

我们的冤假错案谁来了断？许世友的大红人——李树和已经变成了“缩头乌龟”，再也不露面了。派了两个小干事对付我们。我们提出：“军区清查我们的‘5.16’问题，已有好几年啦，总该有个结果吧！”

“究竟有什么事实证据，说我们是‘5.16’呢？”

“军区不是早就要对我们隔离审查，现在我们送上门来，要抓要杀请便吧！”

那两个小干事“无可奉告”，只能是“向上汇报”。

“磨”了几天，终究给了一个“巧妙”的答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艾汉美的‘5.16’问题予以排除，有关‘5.16’的材料由各单位自行销毁”。洪期钩等同志也得到同样口径的答复。

当初，许世友下令，清查我们的“5.16”，是那么声势浩大，气壮如牛，把我们描绘成“有根有据、活神活现的‘5.16’分子”；如今，就用这几十个字的“遮羞布”，偷偷摸摸地交差了事，把他们疯狂整人、害人，诬陷人的罪恶行径“一风吹”了。

我和军区后勤部的赵玉祥同志，同是赴京告状的成员，同是许世友清查“5.16”的重点对象，由于我复员回湖北，他复员在南京，结果我两人在清查中的命运就有很大不同。这次我重返南京之后，我才了解到老赵这几年的悲惨遭遇，真是骇人听闻。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五日深夜，老赵在家中被当地派出所秘密逮捕，直接投入南京市娃娃桥监狱。此时，对他没有宣布任何罪名，也没有经历任何法律程序。老赵和五花八门的刑事罪犯关在一起，经受了数不尽、说不完的苦难、折磨和摧残，直到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被“无罪释放”。这样无端地蹲了三年大牢之后，由南京市委出面，下达了一份掩耳盗铃的“平反通知书”，说是“南京军管会，错误地把赵玉祥当作“5.16”进行拘留审查。这纯属一派谎言，明明是把老赵当作“百分之百地反革命”，经历三年“百分之百地罪犯生活”，应该说是“百分之百地冤假错案”。

这次，我们汇集南京的同志，都是当年造反的主要头头；如今，我们又来南京造许世友的反了！虽然他已被调离南京，可是他在南京一次再次地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造他的反！我们这次来南京的同志又给许世友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许家天下，究竟是谁家天下”？我们每个人在大字报上写上自己的真姓大名：高丕忠、陈时秋、陈荣安、赵玉祥、洪期钧、艾汉美。这张大字报贴在南京军区大院靠近正门不远的院墙上，非常引人注目。这张大字报向世人表明：许世友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的阴谋，永远不会得逞！

我们此次南京之行，多亏老赵及其全家人的接待和帮助。我和洪期钧同志先到南京几天，吃喝住宿全在老赵家里。其他外地的和本地的各位战友来来往往，也都是由老赵负责联络和接待。那段时间，老赵家里成了我们这些患难战友的“联络站”和“接待站”。此时老赵刚从娃娃桥监狱出来不久，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他们全家老小住的两间小房子，还要接待我们这么多人。这付重担，可把老赵的爱人——老郭同志忙得团团转，实在太辛苦了。我至今难忘的是，当时南京正值新鲜鲢鱼上市，老郭就尽可能购买这种鱼，或蒸或烧，味道十分鲜美，让我

们吃起来又香又甜。不管多忙多累，老郭总是一脸微笑，一声不响，任劳任怨，我们众口同声，非常感谢善良、贤慧、勤劳的老郭同志。

我回武汉后，常常向我爱人朱德美介绍老郭给我们做鲥鱼吃的情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一次我们与老郭的离别，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永别。老郭于二十世纪 90 年代初，过早地离开人世了！老郭过早去逝，不能不引起我的联想和沉思！不能不引起我的悲痛和愤怒。我想到，在老赵三年坐牢的岁月里，老郭过的是什么日子！她要承担多么巨大的压力！要承受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那么，她的身心健康不能不受到致命的伤害和摧残。从老赵的一家遭遇，我又联想到在许世友称王称霸的年代里，在他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中，该有多少家庭、多少亲人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那时候，一人受压，全家遭殃！一人被打成反革命，全家就跟着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我们被大会批，小会斗，妻子就陪着挨批挨斗，全家人就跟着受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欺凌、侮辱、冷嘲热讽、偏见、歧视，什么升学、参军、谈朋友，找工作等等，无不受到“株连”。每当我想起这些伤心事，内心隐隐作痛，深深感到愧疚自责，“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妻子、儿女”！我们的家庭，家家都有一本灾难史；我们的亲人，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

这一切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许世友一手造成的。这笔账也一定要清算！话不说不明，账不算不清。否则，人心不服，历史不清。我们就是要还原历史的真实和公正。

第六章 十年风雨 万千感慨

四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抗争

南京军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出特点，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对许世友一次又一次地压制和迫害，展开了不屈不挠地反压制、反迫害的抗争。这是一场激烈地短兵相接，反复多次地生死大搏斗。

许世友从始至终，把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压反革命”、“反击右派”那样的政治运动。在许世友的心目中，共产党的天下，在南京军区范围内，就是他许世友的天下，他就是“许家天下”的“黄帝老子”，唯我独尊，至高无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自始至终总是把那些给他写过中字报的人，

反对过他的人当作“坏人捣乱”，当作“右派翻天”，当作“反革命暴乱”。肆意动用部队、动用真枪真刀，采取专政手段，把那些人统统抓起来，大批大批的抓人，成千上万的抓人。凡是能够用上的种种罪名，统统套在那些人头上，施行“坐牢”、“判刑”、“劳改”、“开除”、“清洗、滚蛋”、“扫地出门”，株连家庭亲友，制造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在南京军区历史上，造成空前规模的大劫难、大灾难，致使整个南京军区不计其数的干部、群众蒙受深重的冤屈、痛苦和伤害。

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许世友既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加上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多项头衔，党政军大权，一人独揽。他疯狂推行“多中心论”，公然标榜“以我为中心”，以“拥许”、“反许”划分敌我，判断是非，凡是拥护许世友的人，就是革命派，就是大左派；凡是反对许世友的人，就是反革命，就是大坏蛋。

在当年的“许家天下”，许世友的指示，就是“最高指示”；许世友的话，就是“王法”，就是“圣旨”。他一再扬言：谁要造他的反，他就把谁抓起来，就专谁的政。我们新闻科的摄影记者陈时秋同志，是一位十三岁起跟着父亲南征北战的红小鬼。从一九六四年起，成为许世友的随身摄影记者。陈时秋以其优秀的思想品质和出色的工作表现，获得许世友的高度信任和欣赏。陈时秋偏胖，许世友喜欢称他“胖子”。那几年，陈时秋成了许世友走到哪、带到哪，形影不离的随员。文化大革命中，陈时秋出于爱护领导的良好愿望，给许世友写了一张希望许司令保持优良作风的大字报。李树和把这张大字报汇报给许世友，他勃然大怒，不问长短，不分青红皂白，冲口而出：“胖子造我的反，我就专他的政”。许世友“金口”一开，陈时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5.16’分子”，被开除党籍，先在南京的白水桥被“行政看管”五十多天，后又在浙江蹲大牢三年多。

南京军区文革期间，不只是广大的基层干部、群众，遭到许世友肆无忌惮的压制迫害，还有众多的高级干部，也是一样在劫难逃。某省军区少将司令员，是一位老红军，许世友仅凭着道听途说，无证无据的“揭发”，亲自出马，多次审问逼供，硬要这位少将承认自己是“‘5.16’分子”。该少将坚强不屈、拒不就范。许世友理屈词穷，气急败坏，大骂一声：“给我滚！滚！”就是这么一个“滚”

字，使这位少将回到原单位，大会批，小会斗，被整得死去活来。有人向许世友反映：“这位老红军，从小参加革命，久经考验，一向忠于党，忠于人民，怎么可能是‘5.16分子’呢”？许世友一听，马上改口说：“那好吧！不是就不是”。由于许世友“开恩”，这位少将的命运才算出现了转机。请看：许世友的话多“神”！他一字可以送“死”，一字可以送“生”，他岂不是成了当今的“皇上”吗？

当年，面对许世友的横行霸道，我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尽管深受其害，饱受苦难，但我们没有吓倒，没有畏惧，没有屈服，而是凭着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心，凭着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坚定信念，挺身而出，奋起抗争。在南京贴许世友的大字报，在抗州造许世友的反，到北京告许世友的状。明知征途有风险，迎着风险勇向前，不顾个人安危，不惜身家性命，与许世友的压制迫害作坚决斗争。为保护自身的生存而斗争，为履行党章、宪法赋予我们的正当权利而斗争，为伸张正义、维护真理而斗争。

我们这些无权无势、赤手空拳的无名小卒，在许世友的强权势力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弱势群体。用许世友的话来说：是一群只需他“一脚就能踢死”的“乌龟王八蛋”，哪能经得起他的“少林武功”、“用脚一踢”呢？但是，我们反压制、反迫害的抗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鼎力相助。我亲身经历就有着特别深切的体会。我每当危难关头，或在关键时刻，总是有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总有许许多多地好心人，和我心连心，手挽手地站在一起、同心协力、并肩战斗。

六八年，在白水桥“围剿批资总部”的学习班里，我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之际，与我素不相识的范传典同志，本来是“奉命”负责“监视”我的动向，他却反而“倒向”我这一边，冒着“投敌”的风险，变成我的“内线”，充当我的“秘密情报员”，给我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帮助。

六九年，当我被复员“扫地出门”，四处安置无门，又被逼着我们全家下农村，面临奔波流浪之时，幸好军区政治部的卞庸中秘书长、文化部的王浩科长、还有我爱人所在工厂的周厂长等人，他们与我非亲非故，既不是领导，又不是同事；就是靠他们对受压群众的同情与仗义、对许世友蓄意整人害人的不满和愤慨，及时给我提供了“避难所”，给我“救命信”，帮我闯过难关，使我全家顺利走

向新生活。

我复员到武汉之后，又被许世友诬陷为“5.16”反革命，再次面临“铁窗”之灾。又是幸亏我所在的厂方领导张瑛等同志，这些同志对我在南京的情况并不清楚，然而他们靠着共产党员的正气和良知，识破了南京军区某些人的不良用心，毅然顶住南京军区的“命令”，才使得我免遭一难。

事实充分说明，普天下的人民大众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我们对许世友的抗争，是顺民意、得人心的正义行动。我们赢得人心，“得道多助”。因而我们的抗争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群策群力地群体抗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风雨，我们经历了十年抗争。许世友的压制、迫害，使我们经受了痛苦与磨难的煎熬，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这场灾难，使我们受了苦，遭了罪，损失了很多、很多；也使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多；把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增添了更多的智慧和勇敢。这是一部珍贵的“百科全书”，是一笔世代受益的精神财富。当年，许世友一再狂叫：“造反的人，都是坏蛋，都是反革命！”他要“统统杀光！”他恨不得把我们斩尽杀绝。但是，历史的发展同许世友的痴心妄想、诬陷、咒骂，恰恰相反，我们这些人有“上帝”保佑，“苍天”照应，我们并没有被整倒、整死，我们命大、福大、造化大。二〇〇一年以来，我数次去南京、上海、杭州，见到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许多老战友、老领导；南京的孙海云、赵树湘、季遐年、纪国城、冯玉章、尤亮、夏继诚、孙宅巍、陈培光；上海的赵玉祥、张炳奎、周自求、方源瑾、吴燕京；杭州的陈时秋、高丕忠、施关彬等等。除了因病过逝的洪期钧、陈荣安等同志外，我们相见的这些同志，可以说是南京军区当年造许世友反的主要代表。四十年后，我们亲切相见，欢聚一堂，举杯畅饮，谈笑风生，百感交集，无比兴奋。四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人变老了，头发变白了，多数人已经是七十多岁了，有些已经八十以上的高龄啦！我们从大难中闯过来，还能活到今天，而且活的很硬朗，一个个容光焕发，心情舒畅，堂堂正正，健健康康。这件事本身就是值得庆贺的胜利！我们这些人中间，还没有出现一个像许世友所宣判的那种“坏蛋”、“反革命”。历史是一面镜子。四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我们这些同志不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不愧是人民解放军的好战士！

四十一、究竟谁是南京军区“乱军”的祸首

许世友推行“多中心论”，给我们头上捏造了“乱军分子”、“乱军派”的罪名。这一罪名的逻辑是：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反对许世友，就是反对南京军区，就是“乱军”。这一逻辑的荒谬性就在于：它把许世友与南京军区等同起来，把许世友与人民解放军等同起来。

毛主席、党中央明确指出：所谓“稳军派”、“乱军派”，是许世友“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十年文革中，我们自始至终，非常认真遵照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及有关稳定部队的规定，认真执行周总理的指示，从来没有与地方上的造反派搅在一起，没有把军内问题扩散到地方上去；没有冲击过任何军事机关；没有搞过“打、砸、抢”；更没有搞过“武斗”。我们不管是开展“四大”、还是成立“批资总部”，要求军区平反、或者是到北京告状，十分注意把许世友的个人错误同军区党委集体领导严格区别开来，把许世友的错误同军区部队指战员的行动严格区别开来。比如：“二月抓人”事件的错误，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里，由集体领导承担责任。我们认为：许世友是“二月抓人”事件的决策者、应当由他主要负责，其他党委成员只是“参与者”和“执行者”的问题。当年，白水桥“行政看管”的“牢房”里，以及白水桥学习班的“集中营”里，那些看管我们，批斗我们的部队战士，机关干部，尽管给我们造成了冤屈和伤害，但我们在揭批许世友镇压群众错误的过程中，对这些部队战士和机关干部的言行予以保护，不涉及、不抱怨、不责怪、不伤害，我们非常注重维护军区党委领导的权威，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声誉。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同许世友的“乱军”谎言对照一下，不是一目了然吗？

在哪动乱的年代，确有一股“乱军”的思潮。我们南京军区也受到某种影响和冲击。如：有的连队自动搞起“四大”；有的军事院校乱揪乱斗，戴高帽、游大街；我们军区政治部的批判大会，被“三团两队”的造反派冲垮了，还强迫王必成、鲍先志等军区领导人下跪、低头认罪。我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自身也有经验教训。但是，许世友、李树和等人，不顾基本事实，

而是抓住一点、无限夸大，甚至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把“乱军”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这是别有用心之人的陷害。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看待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高喊别人“乱军”的许世友，实际行动在干什么？我们不能只是表面上看他的口号喊得如何震天响，关键是要看他的实际行动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是怎么回事。那几年，许世友对他所认定的“乱军分子”、“乱军派”，其中包括众多的高级将领，成千上万的广大干部、群众，施行大抓捕、大镇压、大清洗；对军区司、政、后机关、“三团两队”、部队医院、军事院校，实行“大砍、大杀”，有的被砸烂，有的被撤消。结果，使南京军区的部队素质遭到严重损失，部队战斗力大为削弱。由此来看，不管许世友如何打着反对别人“乱军”的旗号，其实真正“乱军”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自己。

我说许世友“乱军”，决非危言耸听，而是有大量事实为证。就以他疯狂砸烂军区政治部的事例来说吧！

正当文化大革命高潮之时，林彪、江青在北京一再叫嚣：“总政是闫王殿”、“要砸烂总政”。此时许世友在南京公然叫嚷：“军区政治部烂掉了，瘫痪了”、“要取消军区政治部”、“用司令部接管政治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间，许世友在大会、小会上，喋喋不休地咒骂、诬蔑军区政治部：“哪些跳得高、闹得凶的人，是一群乌龟王八蛋，是要变天，是坏人，统统抓起来！”“哪些人想在文革中捞乌纱帽，我叫他们戴草帽”（滚蛋到农村去），“我要他们什么也捞不到，捞到的是臭狗屎，洗都洗不掉！”

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舆论上把军区政治部搞倒搞臭，许世友以“南京军区党委”的名义，向所属部队散发决议、指示、通报；他又指派军训部长蒋科等人，大量炮制公告，揭发信，声讨书，一齐向军区政治部“开火”，口诛笔伐，“狂轰乱炸”。他还通过召开“活学活用”的“积代会”，报告会，以及对史景班、杜方平的批斗会，把我们军区政治部的造反派“魔鬼化”，大肆诬陷我们是“乱军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一时间，使军区政治部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成为群起而攻之的目标。不明真相的军区广大部队指战员，自以为是热烈响应军区党委号召，一哄而起，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师以上单位纷纷发电文，写书信，演变成一场围攻军区政治部的闹剧。

许世友声称：“军区政治部是重灾区”，是他重中之重的打击目标。他亲自指挥，并由李树和组成“专政班子”，负责对军区政治部的“围剿”，“全歼”之战。“二月抓人”的第一枪，就是把政治部的“方、洪、高、艾”四人抓起来，作为镇压群众的突破口；而后，又把政治部的“孙、杨、方、洪”四人判罪，坐牢，作为“压轴戏”收场。那几年间，我们先后两次被关押在白水桥（近一年时间）、三次被打成“反革命”（一次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次乱军分子、一次“5.16”分子），两次去北京（近十个月）、两次“翻烧饼”、两次“大清洗”（一次下放浙江一年、一次复员回乡）、加上清查“5.16”三年多，有些同志还在大牢里蹲了三年多。我们被许世友整来整去，反反复复，不少人被整得致伤致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简直没有一处安身之地，没有一刻安宁之日。

南京军区政治部，作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政治领导机关，决非许家天下的私有财产。我们军区政治部的数百名干部，是从军区几十万部队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经过长期培养和考验，确有不少精英人才，无疑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可是，霸王成性的许世友，却把我们当成他的家奴一般，任意宰割，打击迫害。他给我们每个干部头上，几乎都戴上一顶黑帽子：政治部付主任（史景班）是“黑后台”、秘书长、部长、科长是“黑干将”、“黑高参”；造反派头头是“黑头头”、“黑骨干”；其他干部是“黑爪牙”、“小爬虫”等等。批斗我们的会场上，被点名站立低头认罪的人数，往往是黑压压一大片，就像是一片树林，简直变成了昔日“洪洞县里无好人”。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等部门，“大换血”、“一锅端”、“连根拔”。一个好端端地大军区政治机关，被许世友砸的稀巴烂、百孔千疮，面目全非。

军区政治部早就是许世友的心头之恨。他说：“军区政治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些人又狡又猾”。他往往把军区政治部的知识分子，同五七年的“右派分子”联系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最看不上眼的知识分子，却被毛主席所重用。比如：一个陈伯达，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另一个张春桥，居然爬到他头上，当上了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他对这两个知识分子微词颇多、但又无可奈何。于是许世友就把军区政治部造反的知识分子，同陈伯达、张春桥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我们同陈伯达、张春桥，就是“一丘之貉”。因此，许世友对知识分子的“旧恨”加上“新仇”，就像原子弹爆炸那样的巨大威力，一股

脑地在我们头上爆发出来。

我们知道，许世友的讲话风格：三言两语，没有闲话。然而他在文革中也有反常的表现。一九六八年，他到白水桥政治部学习班给我们训话时，大谈了一番他对军区政治部知识分子的评价。他说：“政治部的知识分子多，花花肠子多”，还朗颂了一首描述知识分子特点的打油诗：

“戴眼镜，夹提包”；

“能总结，会提高”；

“论思想，一团糟”；

“打起仗来往后跑”。

我听了他的朗颂之后，不禁大吃一惊，心想：“许世友为何还有这种朗颂诗歌的雅兴！”他到军区机关三大部及其他部队视察时，也曾多次高声朗颂这首打油诗。他在这里，把我们军区政治部的知识分子，刻意勾划成“戴眼镜，夹提包”的“文人墨客”；十分露骨地影射我们这些人，就是一伙“阴险狡猾，诡计多端，贪生怕死，叛变投敌”之人。他在这里，既反映了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无知，又表明了对知识分子的丑化、诬蔑，甚至发展到对知识分子的敌视、仇视。

许世友就在那次白水桥的学习班上，对军区政治部的知识分子训斥一通之后，紧接着就用凶恶的眼神，盯着我们这些造他反的人，咬牙切齿，声色俱厉地说：“我的子弹不是吃素的，我早就想开杀戒了！”简直是磨刀霍霍，杀气腾腾，恨不得当场举起屠刀，朝我们砍过来！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后怕。那时候他一再狂叫：“要开杀戒”、“杀几个造反的，不碍事”。他一旦发疯了，什么事都能干出来，首当其冲的刀下鬼，必定是我们军区政治部的造反派！

军区政治部被许世友打击迫害最狠最惨的就是史景班主任。许世友为何对史景班那样深仇大恨，把史景班整了那么多年，整得家破人亡，仍不放手，不肯罢休。后来，我从许世友仇视知识分子的态度中察觉到，史景班恰恰是许世友所描绘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戴眼镜，夹皮包的文人”。这样，史景班在许世友的心目中，既是“倒许乱军”的黑后台，又是政治部知识分子的总代表。这一点，史景班本人也是心明眼亮的。一九六七年，史景班同我和陈时秋交谈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许世友最痛恨的就是知识分子”。因此，许世友砸烂军区政治部首先要“斩首”，对史景班无情打击务必置于死地。

当年，许世友何止是砸烂军区政治部！同时被他取缔的、解散的、砸得支离破碎的，遍体伤痕的，还有其他军区领导机关、文艺团体、部队医院、军事院校。

被他整的死去活来的高级将领，又何止是一个史景班！据统计，南京军区被他作为“5.16”分子陷害的军级干部，就有近百人之多！

许世友口口声声叫喊别人“乱军”。但是，历史事实证明，他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乱军”，还能说是对军队的保护吗？

四十二、许世友的“尚方宝剑”

十年文革中的许世友，敢于那么放肆地上抗中央、下压群众，横扫“左臣右相”，其权势之大，不可一世。原因何在？众所周知，许世友“尚方宝剑”在手——毛主席撑腰。

有关毛主席与许世友之间的故事，过去听到一些传闻，总觉得模模糊糊，懵懵懂懂。直到文革期间，我们在同许世友的抗争中，从毛主席、周总理及党中央在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过程中，通过亲身经历，耳闻目见，对毛主席与许世友之间的特殊关系，才算有了比较真切、清楚的了解。

一九六七年，许世友犯了镇压群众的严重错误之后，躲到大别山里去了。毛主席要求他检讨错误的同时，亲自出面保他过关，给他提供“下楼”的阶梯。八月间，他老人家用自己的专机，派张春桥到大别山去把许世友接到上海，同他进行长时间个别谈话。九月间，周总理又按照毛主席指意，派飞机把许世友接到北京，并特地安排在中南海里“养病”。接着，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再次同许世友接见谈话。

毋庸讳言地说，毛主席对于许世友的关怀备至，一向有着不同寻常的深情，他老人家给予许世友得天独厚的特殊待遇。文革期间能够单独会见毛主席的高级将领，屈指可数；就连中央政治局委员，要见毛主席也不容易。唯有许世友“一枝独秀”，可以单独到中南海去见毛主席，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情况，请示问题，可以当面聆听毛主席“口喻”，当面领取“尚方宝剑”。许世友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往往充分利用他独有的这一特权，达到他的个人目的。

一九六八年夏天，白水桥政治部学习班的一个下午，李树和临时召开紧急会

议，神秘兮兮地宣布：“今天，许司令刚从北京回来，一下飞机直奔我们学习班，带来毛主席、林付主席的重要指示”。

此时的许世友刚当上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在军内军外全面推行“多中心论”，春风得意，趾高气扬。他并没有传达什么“重要指示”，而是着重地介绍了他此次上北京会见毛主席、林付主席的往返细节。他说：“前天我×时×分到达北京，昨天我×时×分到中南海见到毛主席，×时×分离开中南海；接着，我×时×分到林付主席居地；会见后，×时×分从林付主席居地出来”。他还说：当面向毛主席、林付主席汇报了如何解决江苏两派问题，如何办好部队学习班的简要情况。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许世友这么绘声绘色地介绍会见的细节过程，充斥着许多弦外之音，引起人们种种猜测和联想，必然产生不可小看的社会效果。想想看，当今的中国，能有几个人像许世友这样自由进出会见毛主席、会见林付统帅？这不正是突出表明了许世友的显赫地位吗？

毛主席对待许世友的一系列“惊人之举”，无疑地成为罩在许世友身上的熠熠闪亮的光环，给他增添了丰厚的政治资本。那时，许世友头脑发热，以毛主席的“爱将”、“忠臣”自居，个人权势欲望膨胀，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不请示，不报告，根本不把军区党委集体领导放在眼里，不顾事实真相如何，一口气把军区的三位老红军、老中将——“王、林、鲍”打倒在地；一下子把近百名军级干部诬陷为“5.16分子”，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成了他任意宰割的羔羊。

南京军区政委杜平，论职务，同许世友是平级。可是实际上，在许世友面前，杜政委处处谨小慎微，就像“小媳妇”似的。有人曾经冒昧地对他说：“杜政委，你和许司令是同级，该说的就说，该拍板的就拍板，不能什么事都要许司令说了算”。可杜平却说：“我是把许司令当作上级看待的，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能直接见到毛主席，我就见不着，我怎么能同他一样呢？”杜平的这番话，也道出了军区其他领导人的共同心声。

毛主席曾经不点名地批评说：“有的政治委员不起作用”。事后，杜平公开承认说：“毛主席所批评的这个政治委员就是我”。然而，我倒是为杜平鸣不平。我想，毛主席的批评不够客观，不公平。从职务上看，从理论上讲，政治委员对司令员有着“政治保证”和“政治监督”的双重作用。可是实际上，由于许世友

得到毛主席的“宠爱”，给他种种特权，这个因素比职务上的份量，那就重要得多。这样，杜平的话，许世友能“买帐”吗？

许世友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过：“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永远忠于毛主席”。也有人吹嘘许世友“对毛主席是忠贞不二的”。现在我还是通过亲身经历的事实，来看看许世友的“忠心”，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年，军委“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都是由毛主席亲自起草、审定、签发的两份重要文件。高喊“忠于毛主席”的许世友是怎么对待这两份文件的。“八条命令”一下达，许世友兴高采烈，视为法宝。他说：“有了尚方宝剑，我就可以大胆抓人了”。他斩头去尾，只抓住“八条命令”的第一条中的半句话：“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而这一条的原文是：“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许世友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这一条歪曲为“造反派就是反革命组织”，“造反者就是反革命分子”。于是他一声令下，把造反的人统统抓起来。如此执行“八条命令”，也能说是“忠于毛主席”吗？

军委“十条命令”，正好击中了许世友的要害，“不准随便抓人，更不准大批抓人”。这一来，许世友垂头丧气，不理睬，不执行，不认错，不改错。同样是毛主席颁发的两道命令，而许世友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能证明他对毛主席是“忠贞不二”吗？

还有一份毛主席签发的中央红头文件，就是六八年初中央转发的“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这份文件与许世友，与我们关系更直接，更密切。而许世友对待这份文件的态度，更能说明他对毛主席的所谓“忠心”，究竟是真是假？

不用多费口舌，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这份中央红头文件的由来和本意，正是由于许世友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错误而做检讨。毛主席、周总理下发这份文件，正是为了帮助许世友改正错误，又能统一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 and 行动，以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正常开展。可是，许世友却与这份文件背道而驰。他根本不承认这份文件，更谈不上执行，而且明目张胆地对着干，反攻倒算。

中央文件上明明写着：军区领导二月抓人“镇压群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许世友却用毛主席给他的“口喻”，来否定毛主席签发的中央文件。他说：“在上海的时候，我问过毛主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毛主席说要，那我抓人就不错了，三大纪律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我抓的那些人不

听指挥，我执行纪律有什么错？”他不厌其烦地四处宣讲毛主席给他的这一“口谕”。表面看来，许世友说的，似乎有根有据，理直气壮。毛主席在上海同他的谈话，你能不相信吗？即使有问题，你也无法考证呀！还不是他说了算。但是，仔细一分析，他所津津乐道地“口谕”，肯定有“诈”。难道毛主席对他就只说过这一句话吗？他为什么只要这一句？就算是毛主席说了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话，也不等于许世友就可以随便抓人。“执行纪律”与“随便抓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怎么能混为一谈呢？很显然，许世友的所谓“口谕”，实际上是凭藉他受毛主席“宠爱”的特权，自编自演，自唱自和，自圆其说的骗局。

在毛主席一度被“神化”的年代里，受到毛主席宠爱的许世友似乎也跟着“神化”了。他自以为，只要把毛主席这张“王牌”一亮出来，就能压倒一切，他怎么说也不错，怎么做都是对的。从他口里出来的“毛主席指示”，既不是中央文件上的，也不是书本上，报纸上的，而是他自己“独创”的，是他“自产自销”的。究竟可信不可信？只有“天知、地知、他知”。许世友曾经口出狂言：“在南京，谁再造反，就把谁抓起来，还要判刑、枪毙！”“我向毛主席报告过，我可以先斩后奏”。可见，许世友的权势之大，真可谓天下无比，举世无双。历史是无情的，假的就是假的。许世友当年披着“神化”的外衣，玩弄的什么毛主席的“口谕”也好，“尚方宝剑”也罢，只不过是故弄玄虚，危言耸听的鬼把戏，如今成了天下人的笑柄。

事实胜于雄辩。不管许世友口头上怎么喊“忠于毛主席”，而他的实际行动却是忠于他自己，充分利用毛主席对他的宠爱，千方百计地树立他称王称霸的权势。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许世友一次又一次掀起镇压群众的风暴，毛主席一次又一次保他过关。他的官位越来越高，而他对群众的打击报复力度也越来越大。他从来不认错，也不做检讨（据说他在毛主席面前做过检讨），总是由别人一次又一次地为他顶罪，多位付司令，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都成了他的“替罪羊”。这一局面于理不通，于法不容，人心不服，党心不平。为什么会造成这一局面？我思前想后，不能不从毛主席对许世友的态度和政策上找原因。在文化大革命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毛主席对许世友关爱过度、变成宠爱；保护而缺

乏严教，变成迁就、袒护。

毛主席说过：“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成了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钟馗”。当年，林彪可谓是“借助钟馗”，阴谋篡党夺权的典范；而许世友也不愧是“借助钟馗”、称王称霸的高手。反过来说，毛主席那么宠爱许世友、抬高许世友，难道没有“借助钟馗”“打鬼”的政治含意吗？

《真实的历史记忆》

陈时秋

著名文人余秋雨说：“世上最惊人的是真实，最感人的是说出真实。中国已经有人敢于这样说了，一切才有了希望。”

我撰写的《真实的历史记忆》说出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历史是真理，是颠扑不破的，是光辉的。杜撰的历史是谬误，是经不起检验的，是耻辱的。多行不义必自毙。

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在我国是最大的权力，长官意志就是“法”，一被滥用，就是灾难性的。当今，用权力制造的冤、假、错案无处申诉，还谈什么“以人为本”、“社会和谐”？

一旦“神州无冤魂，人间少暴虐”，一旦制造“红色恐怖”与制造“白色恐怖”同样受到追究，一旦广大工农劳苦大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那么，社会的公平、公正，社会的和谐才能达到新的境界。

历史是公正的，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

真实的历史记忆

——红色少年郎 心中毛泽东

一张大字报 引起连锁冤案

一张大字报 决定悲情人生

目 录

前言	0
（一）天地转悠悠 红色少年郎.....	1
（二）从小学革命 心中毛泽东.....	5
（三）参军文工团 服务工农兵.....	7
（四）反腐不间断 继续革命永向前.....	13

(五) 四清下海岛 许清喜喝茅台酒·····	35
(六) 十年文革史 反修防修炼金刚·····	41
(七) 学习十六条 勇敢撰写大字报·····	46
(八) 第一次劫难 许世友搞多中心·····	54
(九) 常委作检讨 司令转脸就推倒·····	63
(十) 借复员之名 许再次打击报复·····	69
(十一) 第二次劫难 许世友草菅人命·····	76
(十二) 许势力范围 难逃许世友手心·····	81
(十三) 华国锋上台 冤假错案又重来·····	86
(十四) 第三次劫难 铁书记铁面有私·····	91
(十五) 陈荣安已亡 含冤灵魂归何方·····	96
(十六) 千秋功过罪 自有历史来评说·····	103
(十七) 天天讲和谐 冤假错案何时平·····	110
(十八) 生命不止息 继续奋斗永不停·····	121
后记 ·····	124

前 言

“人之初，性本善”这一千年之说，是儿时慢慢懂得的道理：做人要与人
为善，宽厚待人，绝不能无辜伤害别人。

苍天赐给我一个革命的家庭，从小学革命，对剥削、私有制的信念：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格格不入。只要你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就要认真思考“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个严肃的问题。

我很感激父辈们引领的正确航向——跟着毛泽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
业，为解放全人类事业奋斗终生。这就是我的人生观、世界观。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
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
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65 页）我认为，共
产党人应该为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为了这个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

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所以，在我国，上至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下至普通党员、普通百姓，应该是人人平等的，大家都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人要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毛主席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党是假共产党；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党员是假党员；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假马克思主义者。1962年，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上升到政治高度。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毛主席是广大工农群众、劳苦大众利益的真正代表。毛主席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最热爱群众、保护群众。毛主席的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劳苦大众的思想，就是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在井冈山是这样，在战争和经济建设中都是这样。因此在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上，是相信、依靠、热爱、保护群众，还是不相信、不依靠、不热爱、不保护群众，甚至镇压群众！这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共产党人、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震撼了世界，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当年跟着毛主席争当红卫兵、造反派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亿万工农兵群众、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出于对党和毛主席充满信任，自然要热血沸腾积极参加，为反修防修作斗争，甚至不怕牺牲、血染九州。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文工团有的“战斗队”发出：“只要中国不变修，死了也甘心！”的豪言壮语。当时盛行的毛主席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唱遍了整个中国大地。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生前曾说，他一生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另一件就是搞了个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质上，就是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后，继续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能否继续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句话：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共产党之所以称共产党，自身的清正廉洁是基本要求，消灭剥削制度是其根本宗旨。

我不因为一家人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被流放、下大狱，妻子、子女受到株连而去否定“文革”。应该如毛主席所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比较公允。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人哪有不犯错误的？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胜过神，是广大工农群众、劳苦大众的保护神。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信，欢呼文革的“伟大胜利”；文革“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并保证“永不翻案”；还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表示了刻骨仇恨。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人时依然坚持以下观点：“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并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邓小平文选》二卷149、172页）。

我作为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科的一名摄影记者，在许世友上将身边工作多年。在“文革”中，可以说是奉命“造反”。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的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以及前线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等单位开展“四大”；是许世友司令员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这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可是许世友凭着已往的“政治经验”，以为事态又要像1957年反右派那样发展，借口执行军委“八条命令”，不顾军区党委的一致反对，一意孤行，镇压群众，在军内外大批抓人！江苏省清查“5.16”运动期间，许世友又一意孤行，镇压群众，使13万人遭受了无辜迫害！！1976年10月，开始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清查运动。铁瑛在浙江省搞“以派划线”，一方面对一派实行法西斯式的残酷镇压，而对另一派，实行“鸡

犬升天”的保护政策。致使 400 万人横遭劫难!!!

人间正道是沧桑，公理终在人心间。

（一）天地转悠悠 红色少年郎

我的家乡在浙江省、湖州地区、安吉县、梅溪镇、荆湾村。中国竹乡安吉县的西部，青山环抱、竹涛起伏，山泉萦绕、水声叮咚，风光秀丽，景色迷人。西苕溪河从梅溪镇方向顺流而下五里路，到我们村拐了个弯，村庄的两面是西苕溪水怀抱着，所以叫“荆湾”。

1933 年 10 月 2 日是农历 8 月 13 日，我出身在荆湾村，父亲陈学明，给我取名：陈时秋。

当年荆湾村是个热闹的小码头：有绸布、南货、粮油、茶馆、理发、豆腐店；大批毛竹运输，主要靠西苕溪河水路一直运到上海；西苕溪拐弯的地方，积聚起大量细沙子，是有名的“荆沙”产地。荆湾村的下街头，过了石灰桥就是关帝庙，庙里有两尊关帝菩萨，关平、周仓菩萨立两旁。久旱无雨时，人们把稍小的关帝菩萨抬出，仪仗队身穿类似义和团的服装，手拿标枪，鼓乐声声、敲敲打打，到七里外的长兴县辖区，赵村、空隐寺后面龙山上求雨。我曾参加过一次仪仗队。我的生母赵林娣就是赵村人氏。虔诚的祖母刘桂佳，常带我到关帝庙烧香拜佛。荆湾村还有陈、沈、管三座祠堂，解放后，祠堂成了供销社。关帝庙早就被拆除，盖起了洋楼，成了人民公社办公室，如今成了乡、村政府。我父亲是荆湾村有名的禁赌者，只要他在村里，就没有人敢赌。现今的农村，赌博成风，耶稣教泛滥。

父亲陈学明，姑妈陈文霞，姑父郎玉麟，都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信徒，通过办乡村教育，办养蚕合作社，为农民办好事，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在潘店村创办乡村小学，在荆湾村创办了荆溪小学，父亲任校长，姑妈任教师，我在学校是个优等生，每个学期考试都是第一名，曾代表学校去梅溪镇参加考试比赛，得了第二名；小学还组织文艺演出，宣传抗日，我演被俘日本鬼子；还有军乐队，我是司号的。荆溪小学坐落在西苕溪水的拐弯处，校大门外的两棵大榆树，见证着荆湾村的历史沧桑。

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不论在南京郊区办晓庄师范期间，还是在

上海郊区办工学团时，他都在学生中进行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愿望很好，可惜在现实的中国行不通。后来，我的父辈们才悟出：必须走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只有追随共产党，拿起枪杆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国家民族才有希望。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初，原红二方面军模范师政委彭林（原名彭栋才、1955年授海军中将军衔）和其他三位红军师级将领，奉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派遣，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具体安排，在张爱萍将军率领下，从延安奔赴上海前线抗日。

次日，他们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为了旅途的方便，办事处让他们脱下红军服装，换上国民革命军的军官服装，张爱萍佩上校军衔，其余四人都是上尉军衔。他们在西安得知上海战况激烈，当天就乘火车直奔南京。出了潼关，事有凑巧，在同一列车上见到了董必武同志。董老是党中央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任职的。张爱萍等人抵达南京，在南京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换上便衣，改乘京沪线火车奔向上海。

他们在上海龙华车站下车，早有李克农同志开来汽车接站。原上海市委书记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同志（建国后任驻苏联大使）接待他们，把上海的战况大致作了介绍：自从上月下旬开始，日军大批陆军师团陆续渡海到达上海，在海、空军协同配合下在狮子林、川沙口、蕴藻浜和吴淞等地强行登陆。我方承受着敌人强大炮火和飞机炸弹的轰击，很快就遭到全军覆灭。

张爱萍说：“以中国军队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与具有现代武器的日本军队作战，单靠阵地战是难以取胜的，非得有敌后游击战的配合才行。”又说：“中央接到上海市委的报告后，毛主席亲自找我谈了话。上海要成立江苏省委，叫我来担任省委军事部长。毛主席说，上海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上海失守后，就要在郊区和江浙两省广大农村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刘晓说：“是啊，我们预计上海坚持不了多久，正等着你来担任省委军事部长，尽快作好沦陷后开展游击战的准备。”

张爱萍问：“不知省委作了哪些准备？”

刘晓说：“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正在作难民的工作，对难民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同时组织他们陆续向郊区各村和江浙一带农村疏散。我们已在难民中组织了一支

抗日义勇队，正在加紧训练。”

次日，按照刘晓、张爱萍对其他四人的工作分配，彭林被分配到游击干部训练班讲课。

淞沪战役，日军先后投入 14 个半师团兵力，约 28 万人，军舰三四十艘，飞机 400 余架，海陆空联合作战。我方投入 70 多个师的兵力，约百万人，在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以血肉之躯奋勇抗击，虽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其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但我方伤亡惨重，终将难以支持。

11 月上旬，彭林被请到江苏省委的办公处。除省委领导以外，还有一位青年，此人修长个子，一头长发，戴着近视眼镜，言谈举止文质彬彬，显然是一个有素养的知识分子。他们见彭林进来，都起立表示欢迎。省委领导首先介绍彭林，“这位就是延安党中央派来的彭林同志。”然后又把长发青年介绍给彭林，“这位就是王文林同志。”两人热烈握手。

省委领导说：“上海的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省委决定派你们两位到青浦县去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武装。王文林任青浦中心县委书记，彭林为县委委员，任军事部长。希望你们两位亲密合作。”省委领导对彭林说：“王文林是河北保定人华北大学肄业，东北沦陷后，他毅然奔赴东北参加抗日联军赵尚志部队。后来被国民党逮捕，解押南京。直到抗战爆发，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彭林对这位历经艰苦奋斗的知识分子干部不胜钦佩。省委领导，接着向王文林介绍彭林的情况。王文林想不到这位不过二十出头的人，竟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模范师政委，心中对他肃然起敬。两人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再一次握住对方的手紧紧不放。

第二天，他俩就从上海乘船西行，向青浦进发，不料才到半途，就传来青浦县沦陷的消息。省委鉴于青浦一带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比较好，指示他们可以绕道宁波、杭州、嘉兴去青浦，万一青浦联络点找不到，可以到吴县去找。王文林、彭林先坐船到宁波，再乘杭甬线火车到达杭州南星桥车站。这时已是 11 月 13 日，日军已在杭州湾金山卫一带大举登陆，攻占平湖、嘉兴，迂回包围上海。杭州全城一片惊恐，百姓纷纷逃难。两人匆匆赶到卖鱼桥轮船码头，买了去江苏吴县的船票，15 日下午乘船北上。当船快到湖州时，传来吴县也告沦陷的消息。他俩无奈，由于战事遽变、交通受阻，彭林、王文林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滞

留在浙江省湖州市。他们无意中看到一份油印小报《战时消息》，报上标明：“郎玉麟、贵诵芬编，陈文霞、贵畹兰刻印，地址：金婆弄X号贵诵芬家。”这一偶然发现，使王文林喜出望外，说：“贵诵芬，我在上海难民收容所见过，他是收容所的主要骨干。”彭林、王文林通过贵诵芬认识了郎玉麟夫妻。从此，就在湖州组建了浙西第一支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郎玉麟为大队长，在湖州、长兴、安吉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他们依靠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运用游击战术英勇机智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成为浙西一支著名的抗日游击队，老百姓亲昵地称为“郎玉麟部队”。

1938年春夏，在浙西一带各式各样的游击队、自卫队蜂拥而起的同时，打着“治匪抗日”或“治匪安民”旗号的迷信武装团体“红枪会”应运而生。红枪会的主要头目费冠英，是勾结日寇的汉奸。有一天深夜，红枪会近千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吴兴西乡楂树坞村。红枪会坛主下令：“郎部队是土匪部队，戳死他们！”一群红枪会的会徒用红缨枪戳向王文林，最后被最凶恶的红枪会头头戳死。王文林惨遭红枪会杀害的噩耗，激起了“郎部队”全体指战员的无比悲痛和极大的愤慨，纷纷要求为王政训员报仇。

郎玉麟和彭林召集陈学明、周少兰、温永之、许斐文、许斐然等开会。大家认为：根据已有的情报，下庄、薛家兜等村的红枪会确实已同日寇勾结一起与我抗日部队为敌。打击的方法是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双管齐下，主要打击红枪会头目费冠英。汉奸费贼不敢回西乡，只身来到东乡在长超部队（1938年2月李泉生组织的抗日义勇军）附近摆小摊，为日寇搜集情报。郎玉麟通过在长超的李泉生捉拿首犯费冠英。李泉生抓住费冠英，宣布其罪状后就地枪决，为王文林报了仇，为人民除了害。一提起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郎玉麟脑子里浮现出王文林，王文林到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关心他人、善于做思想工作的种种情景，历历在目。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布置一个“文林室”。几天后，经过刘芾亭等同志的精心布置，纪念室布置得庄严肃穆，堂前挂着一幅栩栩如生的文林遗像，两旁是纪念王文林的两幅对联：

满腔热情爱人民，碧血染大地；

一片丹心报国家，浩气壮山河。

无杂念私心，个人生死一已得失轻如鸿毛；

惟忠肝义胆，国家安危民众疾苦重于泰山。

墙上挂着介绍王文林英雄事迹的画图，桌面陈列着王文林生前用的遗物，激起人们无尽哀思。

全国解放以后，在潘店村后面的梅花山上建了陵墓“郎部公墓”，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王文林、刘芾亭、周少兰、许斐然等 23 位烈士，长眠在此地。

1939 年 3 月 24 日，“郎部队”派我父亲陈学明（指导员），到临安西天目山禅源寺百子堂，聆听周恩来演讲，回来向部队传达。当今，临安西天目山禅源寺、周恩来演讲纪念亭，成了观光、避暑、休闲的圣地。

荆湾村顺流而下，就是潘店村。梅溪、荆湾、潘店，成了抗日游击队“郎部队”的集散地。地下党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经常光顾我家，只知道他手拿剪刀、尺的“卖布客人”。我父亲受地下党的派遣，任国民党的区长，专供“卖布客人”文件看。我们家的楼梯下面，都是打鬼子缴获的一些战利品，钢盔、望远镜、坏手枪、坏手榴弹等。我们小孩拿这些战利品武装到牙齿，在村口石灰桥上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我的小伯伯陈学廉只大我四岁，是荆湾村的小孩头头，我们都听他的指挥。还有吴爱民，好似他的警卫员，他们两个人舞起“狮子”来，可是一等工夫，我小伯伯在上海解放后到军政大学学习，后分配到空军通信部门，他们俩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小伯伯是离休干部，吴爱民是昆铜公社、晓墅镇人武部部长。

1943 年 10 月，日寇向浙西天目山一带发动进攻，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向后撤退，行署、专署，吴兴、长兴、安吉三县政府都逃进深山里去了。“郎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4 年 4 月开始，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当时归属国民党浙西行署第二特务大队，是一支新的抗日部队。我姑父郎玉麟任大队长，父亲陈学明任副大队长，吴小土、贺文铨分任一、二中队长。浙西行署贺扬灵、第二专署於树峦担心郎玉麟、陈学明把部队拉出去投奔新四军。密令专员朱希要杀郎玉麟等人。郎玉麟几经周折，到了十区专署，专员朱希宴请郎玉麟等人。酒席间，朱希酒后吐真言：“於树峦打来电报，要我把你抓起来，秘密地杀掉，我能对你下手吗？”郎玉麟大吃一惊，心想：要赶快脱身。刚好国民党在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乘机打电报给贺扬灵请求从军。贺扬灵也怕承担杀害著名抗日分子的罪名，如今借刀杀人

不成，让郎玉麟从军离开浙西去了事。二、三天后接到贺的复电，批准他从军，还勉励了几句，并委任他为浙西从军青年第二队队长，还在《浙西日报》上大肆宣扬一番。郎玉麟心想：等我逃走了，你们就枉费心机喽！

与此同时，国民党到处寻找我父亲陈学明的下落。我们一家四口，躲到我的级任老师范绍赓老家，后面的高山上。山顶上只有一户农民，一位眼瞎的爷爷老年丧子，和媳妇、孙子艰难度日。我们的生活，主要靠舅舅沈文祥肩挑几十里路，把粮、油等生活用品送上山。

1944年8月23日，新四军十六旅在宜兴、长兴、吴兴一线发起长兴战役，对浙西日伪军展开全线进攻。经过一个多月战斗，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大片土地，解放人口十余万。新四军在浙西创建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一样，建立吴、长、安边区革命根据地。

1945年期间，我家在湖州埭溪镇以西的盛家坞居住，我和小伯伯陈学廉在茅坞上学，祖母在茅坞居住专门照顾我俩。一天深夜，父亲突然回家，带领全家连夜到盛家坞以西，不到十里的安吉县境内上舍村新四军驻地。第二天，看到几位女的新四军，女的当兵，感到很好奇，她们在包馄饨，可是又不像馄饨，她们告诉我，这是饺子，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饺子。

1945年4月1日，成立吴兴县民主政府，郎玉麟任县长，顾玉良任中共县委书记。“郎部队”的一批老部下都到民主政府任职：陈学明、孙厥谋、李泉生、胡志平等人，分别任埭溪、妙西、菱湖、和平区区长。组建了县警卫营，曾被省保安处长宣铁吾追捕的共产党员吴德全化名吴小土，和贺文铨、王云清等人，成了警卫营的骨干。

（二）从小学革命 心中毛泽东

我从小跟随父亲陈学明在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郎部队”中生活；十二岁到新四军部队。听着革命故事：毛泽东、朱德同志在井冈山上会师，朱德总司令《一根扁担》、贺龙军长《两把菜刀起本》故事，……。

唱着抗日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

的一天来到了！……。”

“毛泽东同志，带着头走，跟在后面是我们大家，反动派疯狂来进攻，打破它脑袋，赶它回家！”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人，为我中华民族，要作自由人！”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了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于1945年8月14日至23日，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谁都清楚，这是国民党蒋介石设计的“鸿门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重庆谈判四十三天，谈判的焦点是解放区政权与人民军队整编问题。我党为了争取国内实现和平，让人民休养生息，主动撤出几个抗日根据地。浙东、浙西新四军奉党中央命令北撤到长江以北的苏北解放区。

1945年秋末，浙东新四军奉命渡杭州湾北撤；浙西新四军从湖州、长兴、安吉北撤。随军家属和孩子不能留在国民党占领区，“骗”我们小孩是到江苏宜兴去上学。祖母坚持不走，只好留下小伯伯陈学廉照顾她。不久，国民党当局到处抓我祖母刘桂佳和年仅十六岁的小伯伯，在我家大门上张贴通缉令和悬赏；祖母只好投奔远亲，小伯伯改名朱复元，他们常在坟地躲藏受了惊吓，还朝思暮想记挂着北撤的七个亲人，祖母才五十岁出头，于1947年病故了。

我们在荆湾村码头，匆匆忙忙分乘几艘小船，从西苕溪河顺流而下，船上只能吃饱饭，没有菜蔬。一路上，我学会了摇撻、划船、背牵，经太湖到达沪宁铁路常州奔牛站附近，遭遇四个还没缴械投降的日本鬼子，大摇大摆地在铁路上行走，在新四军兵站的掩护下，鬼子才没敢动手。在杨中县附近渡长江，一时找不到大船，好不容易等来一艘大船，不肯停下来，危急之下，兵站潘大兵只好朝天鸣枪，船老大才肯把船靠岸。和我们一起过江的还有吴小土、孙厥谋的家属。渡过长江后到达东台解放区，所见所闻都是新鲜事，看了部队文工团演出的话剧《甲

申三百年祭》。

1945 年 11 月，到了淮阴，父亲任清江市王营区区长，后调淮安县工作。虽然生活很艰苦，但精神非常快乐舒畅。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1946 年 6 月，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了。我们在淮安县已听到敌人的机枪声，才撤出淮安地区，经郟城到达山东境内，父亲在鲁中二专署工作。鲁中比苏北生活更加艰苦，有的同志开玩笑发点牢骚：“反攻反攻，反到山东，胜利果实煎饼大葱”。南方人啃高粱煎饼的确是个苦差事。

1946 年冬，我十三岁告别父母、小弟、通讯员沈连法，到华东党校找姑父郎玉麟。正值过年，南方新四军的同志供给一碗大米饭。年后，姑父和警卫员陈乃知，送我和表弟郎民苏、姑母陈文霞，到沂蒙山区刘家道口村，鲁中军属子弟学校读书，由姑母照顾。学校设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生活艰苦，没有条件洗澡，人人都长虱子，头发长了，姑母用剪刀胡乱剪一下。我父母带着四岁小弟陈时枫来校看过一次。

有一天，学校来了两位骑马的军人，看他们的穿着可以肯定，一位是团、师级干部，一位是警卫员。晚上，那位长着兜腮胡子的军人和方老师举行婚礼。所谓婚礼，就是老师们和两位军人在一起喝白开水，吃点长生果、瓜子而已。因战事紧急，蜜月变成了蜜日，新郎官第二天就走了。战争年代的生活，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又有一天，被我军俘虏的 26 师一批军官来校参观，师长马励武、副参谋长牛犇，还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有同学问他们：为什么吃了败仗？马励武说：天气太坏，下大雨，大炮拉不动。一股不服输的样子。同学们异口同声说：不是天气太坏吧，是蒋介石的良心太坏了，中国人为啥打中国人？他们答不上来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学校要我把此事画成连环画在校中展览。

学校有个文艺宣传队，我是宣传队员。宣传队的保留节目还不少呢。有《大联唱》、《兄妹开荒》、《打花棍》、《小放牛》、《放小脚》、《识字班》、《良女劝母》、《改造二流子》、《张德宝归队》等节目，我在《张德宝归队》中饰演张德华。宣传队除了为学校演出外，还经常为当地群众演出，起到了宣传群众、鼓舞斗志的

作用。

学校有一把双拐弯的紫铜号，没人会吹，我原来在荆溪小学军乐队是司号员，所以我成了学校的作息司号员；又是墙报员，为各班级画《满天飞》墙报头。新泰、蒙阴一带，我军和蒋军展开“拉锯战”，我军的标语和蒋军的标语满墙都是，老百姓经常遭受地主还乡团的洗劫。

我们学校也常常转移，我参加了护校队，护校队每人发一颗手榴弹，听到敌人机枪声才能离开学校。当时我十三岁立了两个三等功，事隔六十多年了，我还珍藏着这份立功奖状。后来为纪念新四军将领彭雪枫而命名的“雪枫干部子弟学校”读书，解放济南、徐州后，学校更名为“华东干部子弟学校”。

（三）参军文工团 服务工农兵

1947年初，蒋介石调动20万精锐部队，向我各个解放区大举进攻。陈、粟大军在华东战场鲁南战役歼灭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后，1947年3月18日，在山东沂水建立我军自己的快速纵队——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

1947年5月，姑父郎玉麟任特纵政治部秘书科长，姑妈在《特种兵报》工作。姑父让警卫员陈乃知骑他的马到学校接我和表弟。三人一匹马轮流骑，一次轮到我骑马，天下雨了，因被子都在马袋里，我把缰绳一放令马大跑起来向村庄猛跑。北方的村庄一般都有土圩和土城门，在过土城门时差一点从马背上刮下来。走了几天到了平度县东高家村特纵机关所在地。

特纵文工团团长于丁，看到我们两个小孩常来看他们排戏，要我们饰演儿童团。于丁团长动员我俩参加文工团，在征得姑父母同意后，我俩参加了特纵政治部文工团。我被分配在美术组，组长刘一平，郎民苏分配在戏剧组，学习、生活上由两位女同志徐桂荣、冯琦大姐照顾。

特纵建立后，特纵文工团在战火中应运而生。团员以十二人为骨干，不断发展壮大。后来，山东大学、防空兵文工团合并到特纵文工团，到1952年6月，拥有近300名团员。特纵文工团随军参加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舟山等重大战役。在战火中，团员们认真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高举革命文艺旗帜，宣传群众，激励战士，鼓舞斗志，瓦解敌人，充分发挥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战争服务的巨大作用。

1947年7月1日，特纵机关在东高家村开晚会，纵队首长都来了，到后台

来看望大家。晚会开始，听到坦克声震天响，大地被震动了，多辆坦克绕场一圈，坦克上的机枪朝天鸣枪，庆贺特纵成立后第一个党的生日。文工团演出节目，我演第一个节目：《跳将官》，庆贺党的生日。

秋天，蒋介石重点进攻胶东，特纵部队转移到渤海地区。三野政治部文工团导演天然在烟台招了邱仲康、文卜东（电影《东进序曲》中饰演周明哲）、白沙、朗宁、陶真等三男两女五位演员，因找部队，和我们文工团相遇一起行军。途中两次过黄河，遭遇国民党飞机的低空扫射，五位演员中的一位男同志白沙，军装还没穿上就牺牲了，还打死了一匹运输幕布汽灯用的骡子。只好改在夜间行军。夜行军很容易疲劳，朦朦胧胧看到前面人的背包在晃动，一面走一面还做梦哩。有一次宿营时我倒下就睡，醒来时才知睡在牛棚里了。后来邱仲康、文卜东两位留在我们团。

部队到达渤海地区，文工团住在张施滨家村。部队展开了冬季大练兵，特纵副参谋长董尧卿任总指挥，大练兵结束时进行了各项技能表演。工兵团表演坑道爆炸，像电影地道战那样，事前计算好方位、距离，挖地道到敌人营垒，放好炸药然后起爆。戏剧股长白文作词，音乐股长东锋作曲的《特种兵之歌》唱道：“我们是人民的解放军，是光荣的特种兵，在毛泽东红旗的引导下，向着胜利勇敢前进！不怕前面有任何障碍，我们有大炮把它轰平，假如敌人敢来侵犯，我们还有坦克骑兵，工兵同志架桥修路，山高水深任我通行，坑道爆炸，把敌人化成灰烬！……”

我最爱看骑兵团的马术表演，马在飞跑中表演马上马下、马上倒立、马上隐避、马上射击、马上救护等，煞是好看。我也最高兴文工团去骑兵团演出，因为骑兵团用很多马来接送，每人一匹马。

不久，开始了“三查三整”、“土改学习”运动。运动中有的同志被打成“特务”、“托派”、“阶级异己分子”。一个解放入伍的刘平，怀疑他是“特务”，在坦白会上突然拿出菜刀要自杀；另一个也是解放入伍的华奇和我一个组，怀疑他是“托派”，看他整天哀声叹气以泪洗面写交代，我也跟着流泪，借钢笔给他写交代。有一天，开诉苦大会，雇农出身的姜超，诉说苦难家史时痛哭流涕、气愤难当，拿出木匠用的大斧子（房东是木匠），向“出身不好”的王甦砍去。看到运动这么可怕，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很难磨灭。虽然事后都得到平反，可战

友间的感情、友谊受到了伤害。

1947 年冬，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特纵机关转移到临清一带。机关驻大界牌村，文工团驻小界牌村。文工团为当地群众演《白毛女》，参观了武训家柳林村。部队出征前都要召开诉苦大会，文工团就演出《白毛女》。由于我自学二胡成功，从美术组被调到音乐组，在组长胡子指导下，学会了坠子、板胡、三弦、月琴、大阮等民间乐器以及曼德铃西洋乐器。战争年代物质匮乏，小提琴坏了，琴弦用光了无处可买，我们用鱼鳔胶粘修复小提琴和仿制小提琴弦。从电话线中抽出钢丝，从司令部三科要来粗、细漆包线，自制一台木质绞合机，终于制出了琴弦。土办法解决了大问题。在小界牌村排演了由白文编剧、东锋作曲的歌剧《大榆林》。那时开展满缸运动，每天要把老乡的水缸挑满，把院子扫干净。指导员田超，小提琴拉得很好，因下巴长了一颗颗粒，得了破伤风，因缺医少药，就这么走了；曾任我组长的施新华大姐，是我安吉县同乡，也因缺医少药，离开了我们。

1949 年 5 月下旬，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结束后，驻军江阴、上海，招了两批文工团员。特纵全力投入打扫战场、接管重装备和整编部队工作。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污泥浊水泛滥，“国际饭店”、“远东饭店”、四马路等地段，妓女拉客现象时有发生，是我们亲眼所见。我姑父在上海军管会工作，他的警卫员金九龄专门负责“国际饭店”的警卫工作，晚上带我们参观，电梯只到十八层，上面六层都要爬楼梯，最顶层塔楼上，是蒋介石题写的“礼义廉耻”霓虹灯大匾。

特纵文工团驻扎在复旦大学园内。遭受台风袭击，饭堂倒塌，长时间停电。在校学生罗中和著名演员黄宗江夫妇报名参加文工团。著名电影演员、导演石挥，是团长白文在上海的老同行，也要参加文工团，条件是：如果感觉不好就离开。白文回答很干脆：那就根本不要来，参军怎么好随随便便的。老团员们都到吴淞口炮十二团开展文化工作，我立四等功一次。最近，战友李翔、胡静璞夫妇来杭旅游，李翔说：我翻看日记，看到我们在吴淞口炮十二团下连队的一段描写，好像就在眼前，真是日月如梭啊！

1949 年 8 月，特纵司政后机关移驻南京汤山，下属部队共三万余人部署在上海、南京及沿沪宁铁路各城镇地区，一个炮团配合兄弟部队在前方作战。文工团奉命赶赴江西上饶为前方部队演出，在上饶乘水陆两用汽车过江时，我不慎

把“回力牌”新球鞋一只掉进江里，气得我只好把另一只丢进江里。这是在上海工作的二叔陈学清送我的，还有一支钢笔。

江西上饶集中营是国民党 1941 年 1 月初，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在上饶的周田、茅家岭、李村、七峰岩等地设立的一座规模庞大的法西斯式人间地狱。文工团员们瞻仰、缅怀在集中营牺牲的近 200 名革命烈士墓，参观了当年四周布满铁丝网和机枪的集中营。

文工团回上海后，立即到安亭车站为部队演出。装置组刚装好舞台，王光堂、蒋先经两位战友到河沟里洗澡，大概是山东小伙子不识南方小河沟的深浅，由于老百姓年复一年挖污泥积肥，水可深着呢！两个人大概都不适水性，一个下去上不来，一个去救，呜呼！直到晚上演出，才知少了两个人。沿沪宁铁路一路上演出到达龙潭车站，夜间行军至南京以东 28 公里的汤山地区，原国民党陆军步兵学校狼山营房和特纵司、政、后机关汇合。凌晨看到主楼顶部有蒋介石题写的“军人魂”三个大字，“军”字写成中间出头，意在“军人有出头之日”。

不久，文工团从狼山营房迁到汤山镇过去一公里炮兵特科学学校附近的西营房。文工团队伍不断壮大，分两个队，一队排练《解放》，二队排练《刘胡兰》。我是一队男、女“小鬼组”组长，正排待遇。副组长李爱菊。

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被日寇占领也有十五年之久，敌情复杂。汤山镇一带是国民党模范区，常有人放冷枪，夜间外出要带枪。我的手枪是“老爷货”，日本 14 年式，易走火，一次走火差一点把驾驶员老冯的腿给打了，直到 1955 年授军衔后，我才佩带我国制造的 54 式手枪。

汤山镇以温泉著称，是含氡的硫酸盐中温钙镁泉，具有健身、益体、治病的效能，是全国四大温泉疗养地区之一。蒋介石、宋美龄在这里建有豪华“美龄池公馆”。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医院移驻在汤山镇。全国总工会在全国建有 12 个工人疗养院，汤山工人疗养院是 1956 年建造的。

刚解放的城市娼妓猖獗，赌毒泛滥。毛主席领导的新政权几乎是一夜之间禁绝娼毒，人民拍手称快。南京解放不久政府就着手改造妓女，汤山镇百货店营业员中就有她们的身影，使其自食其力。共产党执政下的新中国，哪能让妓女存在呢？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大特色。现今，包二奶满天飞、妓女成群，堪称世界第一。某些领导、共产党员嫖娼，有关领导给他包了起来，换个单位照样当官。

最近，2007年5月18日我与老伴和她二姐专程去汤山狼山营房、作厂镇炮兵特科学学校参观，现在已改为“炮兵学院”。旧地重游感慨万端，心情特别舒畅。老伴刘炳春、二姐刘炳南、三姐刘炳娣，先后在1949、1950年到“特科学学校”参军。距今已57年，风风雨雨岁月过去了，我们已到了古稀之年，还坚强地活着。参观“炮兵学院”时看到展览图片，正是院庆60周年刚过两月（1947.3.18.—2007.3.18.），看到第一任特种纵队司令员102岁的陈锐霆将军在院庆大会上讲话。99年9月和05年5月我和老伴去北京时，军委炮兵的周放、顾亚萍夫妇，二炮的康视华、周华敏夫妇（他们与我们都是特纵司令部政治部的战友）一同去看望陈司令，他已是94岁和百岁高龄的老寿星，还记得我老伴1950年是司令部的打字员，几乎每天都要和组长到陈司令小楼打印文件和“口令”。他讲起特纵部队参加过的战役战例时，记忆、思维能力特别强。我拍下了珍贵的照片。告别时，陈司令对我们说：“我要向一百二十岁进军！”我们祝愿他进军成功！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人民万岁！

特纵奉命在南京新街口孙中山铜像周围，摆一圈美式105口径榴弹炮。驻军南京所有文工团，组成浩浩荡荡的腰鼓大队参加大游行。我团晚上在玄武湖演出歌剧《解放》，还在长江路“国民大会堂”把仿真105口径榴弹炮推上舞台，演出《胜利渡长江》。

1949年12月，文工团初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杨荣兴战友在入伍前就是老团员，是我入团的介绍人。我入团后，立即介绍其他小同志入团。

1950年2月初，春节快到了。我父亲还没有南下，在中南行政委员会任秘书科长。自从随新四军北撤到山东，经淮海、渡江战役打回南方，顾不上回故乡省亲、拜谒祖母亡灵。所以，父母亲和小弟陈时枫来到汤山，约我同回梅溪、荆湾过春节。可是，因工作太忙请不了假，最后请示纵队刘春副政委，批示：“快去快回”。刘春政委1961年9月奉命转入外交战线工作，是第一任驻老挝大使，1982年从埃及调回国内工作。1986年冬，我出差去北京，文工团老战友徐挥大姐陪我去看望刘春政委。他和原驻苏联大使刘晓共住一个四合大院。政委说：工作很忙，今天正好休息一下，上午的时间都给你们了。在谈到“文革”时，刘政

委很关心我的遭遇，要我详细地说一说。最后刘政委说：你吃苦头了。

回故乡过春节，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自从跟随新四军北撤到苏北、山东，参加特纵文工团，北战南征，已有五个年头了。故乡之行看到了阔别多年的父老乡亲们，看到了荆溪小学大门外的两棵饱经风霜的大榆树，看到了当年乘船北撤的那个码头，令人激动万分，感慨万端。这五年来，我从一个不懂世事的少年，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战士，肩负着随时随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使命。我向父老乡亲们宣传：农民要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生产的道路。我还大讲特讲苏联集体农庄的美好远景。

春节刚过，文工团排以上干部从汤山西营房驱车到南京明故宫教练场，聆听粟裕司令作形势报告。粟司令雄姿英发，昂首阔步的神采，至今还历历在目。不久，朱总司令下命令，部署华东炮兵部队参加舟山战役。

1950年3月，文工团奉命，带着《解放》、《刘胡兰》两个剧组赴舟山前线。途经杭州时，拜谒了灵隐寺；经过绍兴时，能喝酒的人，水壶中都灌了绍兴黄酒。到达镇海刚要上船，遭遇蒋军空军的低空扫射、轰炸。战斗英雄林茂成牺牲了。我军的木船常遭遇蒋军炮舰的突然袭击，被挂钩到台湾。团长白文动员说：“万一我们的木船被挂钩到台湾，我们要学习英雄刘胡兰宁死不屈！”在金塘、大榭岛可以看到定海马目岛蒋军活动情况。我是歌剧《解放》拉首把二胡的，乐队指挥赵道悦。《刘胡兰》剧组弹三弦的小同志索菲去上学，让我顶替她的工作。在工作中立四等功一次，《立功事实简述》中写道：“以很短时间突击《宝山参军》曲子完成演出工作，在行政组领导上有明显进步，帮助同志学习业务，……。”我十七岁，组里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同志，大家都昵称“小鬼组”。

5月1日，我军解放了海南岛，国民党军惊恐万状，因此，5月13日，蒋军秘密撤出舟山群岛。文工团在岛上发放仿苏式新军装，从此取消了打绑腿。海岛风特别大，新发的大盖帽很容易被风吹走，在地上直滚。从舟山前线回到汤山西营房，原来营房被炮校新学员占了，只好移驻东营房。

1950年5月下旬，后勤部长顾寒星化装成商人去香港购买坦克、汽车材料，余款买了一台美国第弗来35毫米电影放映机交给文工团。电影是新鲜事，可无人会摆弄。文工团有一台缴获的美国35毫米幻灯机，我负责刻画彩色幻灯片，配合《白毛女》、《解放》、《刘胡兰》等歌剧的演出。团长凌竞亚要我试用电影放

映机，后来调我到特纵文化部成立电影放映队。35 毫米放映机，单机放映 10 分钟要换一次片很麻烦，所以在上海仿制了一台。为了提高电影放映技能，顾部长从后勤部汽车修配厂，调一位叫李廷的技师，举办电影放映训练班。顾部长非常关心，常来训练班看望大家。李廷技师高超的技术让我很羡慕，从电影机械、扩音机、收音机等修理，他都很精通。从此，我喜欢上无线电。我从矿石收音机开始学，到会自制和修理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修理电影放映机、扩音机；到自制和修理彩色电视机和修理录像机。自学的道路是艰辛的，人家休息我不休息，蚊子叮咬照样学习。通过自学，李廷技师的一套技能我都达到了。我干一行爱一行，在工作中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由于顾寒星部长的“心血来潮”，买了一台电影放映机，使我从一个文艺工作者，改变为电影放映工作者。干什么工作无所谓，只要是为工农兵服务就行。但我怀念特纵文工团在战争年代的日日夜夜。

1987 年 10 月 7 日，由原特纵文工团在北京的离休干部张仲璧、徐桂荣、田丁、徐挥等战友倡议，为纪念特纵文工团成立四十周年，在山东兖州六十七集团军地炮旅聚会。我和在湖州工作的表弟郎民苏应邀参加。

原特纵司令员陈锐霆、政委刘春，为老战友聚会题词：

三野特纵文工团老战友兖州六十七集团军炮兵旅

战争之神

聚会纪念 八七年仲秋 陈锐霆 印章

快速王牌快速歼 特纵一建虎翼添 人心向背决胜负 可笑敌酋妄怨天

弹指一挥四十年 战略转变更向前 温故知新奋接力 欣看后起逾前贤

丁卯仲秋原华东特纵文工团老同志

聚首兖州地炮旅题诗一首为纪念 刘 春 印章

六十七集团军炮兵旅，年轻的旅长、政委到会讲话，热烈欢迎老同志们到兖州聚会。聚会领导小组，原文工团团团长于丁、唐庆华，把装裱好的两大幅陈锐霆、刘春题字、题诗，赠送给地炮旅全体官兵。在开了一天的聚会上，老战友都畅谈了阔别四十年的悲欢历程；会上念读了白文、姜曼璞夫妇以及高奋等战友的来信。这次聚会，看到了近四十年不见的老战友，悲喜交集，感慨万端。聊天时了解到被整过的不在少数。第一任老团长于丁，在石挥导演并主演的电影《关连长》被

打成“毒草”时，于丁在剧中饰演指导员，受到批判；二任团长白文，调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后，因写一个剧本，成了“反党”分子，被南京军区下放到江苏丹阳，夫人姜曼璞也受到了株连；三任团长唐庆华被打成“右派”，夫人被迫离婚；战友赵国璋被打成“右派”，被《人民日报》点名；战友肖路，在福州军区被打成“倒韩（先楚）乱军”分子；战友赵道悦，在江苏被打成“5.16”分子，关押整三年；……。会上，我的老组长徐桂荣大姐，诉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徐君萱战友关心照顾我一家人事。桂荣大姐说：“这是战争年代战友间的真情实意。”徐君萱战友，从江阴参加特纵文工团的，和我同在一个“小鬼组”，抗美援朝回国后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就读，成为油画系教授。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受逮捕，老伴被隔离审查，三个孩子和一位老人被扫地出门的情况下，徐君萱战友和夫人郑键（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经常关心照顾我的一家，也受到了株连。

聚会正值中秋佳节，举行中秋晚会，演出了不少战争年代的歌舞节目。王桂生是当年军乐队队长，也拉得一手好手风琴。战友们以地区、城市为歌队，唱起了战争年代的歌曲，仿佛回到了战地文工团的战斗生活。也联想起济南战役，在济南、泰山、兖州、徐州等地，看到被俘蒋军的狼狈相。第二天，驱车到曲阜瞻仰孔庙。曲阜，在两千多年前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都城，也是著名思想家孔子的故乡。还游览了泰山。泰山是中国五岳之首，古名岱山，又称岱宗；泰山矗立在鲁中群山间，主峰玉皇顶，海拔 1454 米；泰山山体雄伟壮观，景色秀丽。我们多数战友徒步爬山至主峰玉皇顶“五狱独尊”。老团长于丁，是我和表弟郎民苏四十年前，参加文工团的介绍人，我们三人在泰山合影，并邀请我们在上海下车，到他家里做客。

这次聚会，我责无旁贷担当起聚会的摄影任务。兖州聚会的整个过程，我拿照相机都一一记录在案。事后，我将扩印好的照片寄往聚会战友手中。不少大姐还来信加印照片，说：“你拍的照片，把我们拍得年轻、漂亮了。”

为了缅怀这支革命文艺团体中献出生命的先烈，为了激励分散在北疆南国的各位战友，一致提议：编印一册比较齐全的特纵文工团“战友通讯录”，借以加强联系，增进友谊，并作永久留念。委托，胡静璞、杨荣兴、陈胜荣、费德薰、谢穆如战友操办。后来，新找到近 50 多位战友的信息，上海战友，杨梦致、冯

琦、周星海、王尧搞了个增补“老战友通讯录”。

（四）革命没完成 反腐岂可停 （1） 建国以来，一系列运动不间断。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党中央、毛主席，每每发动一次政治运动，都是有的放矢的。不是毛主席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人类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些运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防止几千万烈士牺牲得来的工农政权，蜕变成官僚资产阶级政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了党内外反对派明里暗里的有力破坏。特别是某些执掌权力的人，有的不想继续革命了，他们有意搞扩大化，有的利用运动公报私仇。因此，冤假错案连连发生，伤害不少无辜的同志及其亲属。然后，他们把运动出现的问题，一股脑儿都推到毛主席头上，这是对真实历史的反动！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思考着胜利后防止共产党人腐化变质的大课题，七届二中全会上还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建国初对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处治，更将反腐防变提到新的高度。苏联赫鲁晓夫篡党夺权的惨痛事实，使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前途充满忧虑。他敏锐觉察到：党内确有一些官员搞特权、搞官僚主义，懒、馋、占、贪、变、腐败了起来；有些高级干部，甚至被党培养为他的接班人，一有机会就离开马列主义，去迎合苏联修正主义；党的干部路线、组织路线上那种“唯上是从”的奴隶主义思潮极度泛滥，“驯服工具论”充塞到党、团生活的一切角落；在中国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仍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于是，他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担心他百年后苏联解体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毛主席的一生，最擅长于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他把大民主这个武器交还了群众，把反修防修的使命交给群众，于是就有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真正出发点，就是要创造一种革命方式，一种大民主的模式，一种全新的机制，一旦中央出现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就能够群起而攻之，并且有权力罢免他们。他坚定地相信，文化大革命能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历史学家们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难道就可以因其失败而全盘否定毛主席反修防修的理论 and 实践？

由于毛主席的健康原因，由于来自党内外极端分子的干扰，文化大革命“反

修防修”的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致使不少当权者把资产阶级法权、把资本主义思想、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念头带进了改革开放年代。1982年，邓小平就发现了腐败暴发的恶疾，邓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邓选》三卷 357 页）

看看当今的党员干部队伍和社会治安现状，“盛世”之下的种种丑恶行径：贪官成堆、成串，前腐后继，“十个贪官九个淫，还有一个在调情”；二奶盛行，娼妓猖獗，赌毒泛滥；建国前土匪在山上，现今土匪在街上。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撰写的《大变化》一书，用大量事实和数字，说明、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原因和对策提出了初步意见。向全国人民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书中强调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大变化，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在所有制结构上，私有制经济已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2006年私有制经济在全国GDP的比重已占 63%，公有制经济仅占 37%，而且私有制的比重还在进一步提高。

（二）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作为贫富差距数量标识的我国的基尼系数，2004年已高达 0.467，超过了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俄罗斯等由社会主义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在 22 个亚洲国家中贫富差距中国排第一）。

（三）在阶级阶层结构上，已形成了“金字塔”型，新生资产阶级兴起，工农大众弱势化。2005年已形成 430 万户、雇工 4700 万人、资本 6 万多亿元（近年已超 10 万亿元）的新资产阶级。工农大众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在工人阶级最集中、拥有工运光荣传统并且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上海市，据调查，现在只有 1%的人愿意做工人。

（四）在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高速度带来了高能耗、高污染，使GDP的增长大打折扣。全球污染最严重的 20 个城市中，我国占 16 个。我国每年环境污染的损失占到GDP的 3-8%（不完全统计），生态破坏的损失约占GDP的 6%-7%，两项合计占GDP的 9%到 15%。如果扣除过高的环境代价，实际发展不是高

速度，而是低速度。高污染还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五）在内外经济关系上，我国国民经济正面临着日趋庸俗化的严重危险。我国 2005 年对外贸易的依存度高达 64%，远远超过美日等外贸大国 18%-20% 的对外依存度。对外技术的依存度高达 50%，是世界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跨国公司正在“井喷式”地并购我国优质的国有企业、重点行业的排头兵。在我国对外开放的产业中，许多产业排名的前 5 位企业由外资控制。

我对“改革开放”，一开始抱有很大希望，但后来发生了违背《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决不能复辟资本主义；坚持开放，只能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开放，决不能走庸俗化、殖民化的道路。改革精英们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争论”，做了不说，说了不做等手段复辟资本主义。事实胜于雄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改革方向不对头了，为什么广大人民不愿看到的事情连连发生？！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党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斜路了。……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0-111 页）“邓小平理论”，应该是检验改革成功还是失败的唯一标准吧？

（2）民谣说：“毛泽东思想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邓小平理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把《邓选》与《内部言谈录》相比较，就一目了然了。“理论”的核心是“先富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狠批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三十年来的纲，就是以复辟资本主义剥削劳动为纲。实际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是“反过来斗”而已。

内部言谈录：“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只能说一半，不能全说。全说出去就坏事了，就没人听了，就没人信了。例如，‘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就是对外只能讲一半，而且不能争论，一争论底子就会露出来。”

“我们说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会理解为所有其他人以后都有机会跟着富起来，这样就制造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有个奔头的境地。等到他们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培养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环境下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富起来的任务了。他们一旦有了社会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力量，再要改变就已经不容易了。在这个问题上也曾有人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要求争论一下。提出争论的人特别对那个‘让’字有意见，认为如果这样提出的话，就等于说是我们以前不让人们富，不让人们过好日子，这等于否定了我们党建国以来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我认为，一争论，时间就争没了，一争论，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到头来还是大家一样穷。还不如干完了，等到真的有了富人了，看到时社会会是个什么样子再争论也不迟嘛。”

“以前搞共同富裕，虽然大家享受到了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工作铁饭碗、治安环境好等好处，享受到不直接受资本家剥削的主人公劳动地位的责任感。但我们人民生活普遍的生活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太多了。国门打开以后，人民群众用国外的生活水平与自己的生活水平一比，就会自觉地认为还是资本主义好。我们要与资本主义竞争，用富裕的生活水平作标准是最有说服力的。”“既然我们要在短时间内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主要是指衣食住行）提高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就有必要学习西方和日本的发展方式，遵循他们的经济发展规律办事，补资本主义的课，走一段资本主义的道路。只要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保证国家政权在共产党的手里，避免与帝国主义在国际事务上发生冲突摩擦，避免战争，韬光养晦，争取时间发展经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期。不牢牢把握这个机遇期迅速将经济发展起来，我们将要犯重大的错误。”

“既然我们要保证外资企业、新兴私营企业能赚到钱，能够发展起来，我们在上交税率上就要给予他们一些优惠政策。国家在这些方面减少了收入，那么在社会其他福利上边就不能够像以往那样负担全民的劳保福利，公费医疗就要改革。既然国家允许国有企业在利润提成方面留下了扩大再生产的份额，那么这些企业就应该将职工的退休劳保福利也承担起来，国家将不再负担这些方面的开支。一些企业的设备落后，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职工人口又多，企业向国家银

行贷款去给工人发工资，造成严重的‘三角债’，国家负担非常大，而且这些企业还占据着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的黄金地带，又是城市的主要污染源，像这类企业应该想办法把它们尽快处理掉，要尽快制定‘破产法’。这些企业破产后能够有外资收购是最理想的途径，私营企业有能力也应该允许它们收购。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三角债’脱身了。我们这样做更加符合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提出的标准和要求。”

“我们搞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就是要突破原有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要让经济速度加快发展起来。这就需要我们鼓励一部分人打破框框，放下架子，直接投身到经济交易的市场活动中去。我们对外开放需要大批能够适应生产经济运作的企业管理人员，填补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这方面人员空缺。”

“关于富起来的人是否就是西方经常强调的中产阶级呢？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所要培养的富起来的人必须是大富起来的人，他们的富应该是发达国家的垄断大资本家，他们的富应该是富可敌国的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事国际间的大宗交易。中产阶级是什么样子的阶级，我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但我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麻烦事特多，他们的人一多就管不了了。他们有人说，为什么你们让一些人富而不让我富？他们说富的人都是共产党让出来的。在谁富的途径上没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条件，这将成为社会动乱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对于脱贫问题。我们一直说在本世纪末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这样提未免太可怜了一点。还是把脱贫就算是能过上小康生活水平，这样的提法比较科学。要严格区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宣导。因为这两句话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要严格避免舆论导向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解为国家只为少数人服务，在社会上造成这句话是贫富差距的根源的认识。”

“私人个体户靠拼命奋斗，挣扎得很辛苦，今天能过上比工人和干部更好的生活也可算是小富了，我们可以统统把他们说成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样的话，那些大富的人的目标就不突出了。”“我们不但要定出小康生活水平分标准，对富起来的人也要有一个标准去衡量。”

“我认为，富起来的人应该是那些，他们的个人收入大大超过享受富裕生活消费水平的需要，他们有大量的剩余资金（包括国家银行贷款）可作为再生产再

投资的本钱，他们有能力掌控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当然，大型矿产、金融银行是否像东欧那样向他们开放，那还是有待研究后决定。”“我们让他们赚钱，向他们让利（当然让利的对象还包括港澳台侨资和外资）他们就要遵守我们所制定的政策，依法缴税，不能做违法的事。”

“在目前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也不能对他们提出太高的要求，我们又不能够讲得太清楚，因此只好依靠他们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和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看他们是否能够做得合情合理，是否有能力将各方面的关系摆平而又不漏漏洞、不出问题，是否能想出一些我们还来不及考虑到的问题，能够自扫门前雪。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出色成功人士，他们也将是我们最可靠的接班人。”

“至于富起来的人，他们将来要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我们就不要去管得太严太多了。这些应该是属于个人的私事，老百姓都在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也在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一管就会在社会上造成影响，造成矛盾和斗争。我们大家应该达成共识了，不能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了。”“由于有了富起来的人，他们的生活标准肯定会比普通老百姓高很多，目前生活上的商品品种需求肯定不符合他们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适当地在超高标准消费方面也要做些投资规划。这种消费同样会刺激经济的繁荣，增加就业机会也是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就缩小了。”

“对富起来的人要有专门的人负责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个工作可以交给统战部去负责，他们不是一直在负责工商联的工作吗？我们要研究他们的需求，研究他们的思想，保护他们的利益，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我们的政策，制定新的法规。要关心他们在政治上的成长壮大，及时发挥他们对国家发展的作用，给予他们更多的管理国家的机会，国家领导人的选拔也要考虑从他们那里挑选。”“我们是否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呢？这是共产党是否能够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的关键。我认为，我们是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三十年来所有的顽疾、绝症，都可以从“言谈录”中找到病毒、祸根。

在“内部言谈录”引导下：“在中国 0.4%的家庭占有 70%的国民财富；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只是 5%的家庭占有 50%的财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引自《2006 全球财富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说，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高干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 2.1 倍”。国务院、中央党校、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今年 3 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财产）超过 5000 万以上的有 27310 人，超过 1 亿元以上的有 3220 人。超过 1 亿元以上者，有 2932 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 20450 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中国亿万富翁中竟有 91% 是高干子女。引人深思！

(3) 现今的社会，实际上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宗旨，连孙中山的“天下为公”还不如。总书记视察大包干典型示范村——小岗村名扬中外。至今依然贫穷的小岗村支书严德友，在土地私有化中成了葡萄园庄园主，而坚持毛泽东思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南街村，在主流媒体上难得一见。最近看到“毛泽东旗帜网”：《陈云之女陈伟华来到南街村》的报道：

陈伟华握着班长（南街村党委书记、十七大代表王宏斌）的手，说：“我听后感非常激动，觉得你很有水平、很有思想、很有信仰、很有勇气。南街村能在大环境下，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很不容易、很简单，也很了不起。现在像你这样的共产党员太少了，如果再多些就好了。”说到这里，陈伟华的声音哽咽了。班长接过话说：“我们这样做，也是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下去。大姐深受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对他们的思想理解得深刻，要多帮助南街村发展。”陈伟华回忆着说：“我以前读过《共产党宣言》，当时爸爸问我其核心是什么，我说是消灭私有制。南街人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也抓住了要害，就是‘两个彻底决裂’。我特别赞同那些老将军的话：‘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你们一定要大胆地干，坚持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陈云女儿陈伟华与王宏斌的一段谈话，更引人深思！

伟人毛泽东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

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1-282 页）

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出现最大问题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非毛、反毛、去毛，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否认阶级斗争，搞私有制、包产到户，剥削者可以参加共产党。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因此，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党旗中的“镰刀锤子”所代表的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

工厂私有化：带来了大批工人下岗，带来了黑窑工、矿难（2009 年 2 月 20 日《法制日报》报道：陕西安康：黑砖厂凶残虐工“不听话”就殴打。2009 年 2 月 22 日凌晨，山西古交市屯兰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当班入井 436 人，导致 78 人遇难。03 年 11 月至 09 年 2 月矿难死亡 1485 人。）；

土地私有化：带来了重新制造一批地主和贫雇农（大包干典型小岗村村支书严德友就是新地主，他在央视台公开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更滑稽的是：剥削者可以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一面党旗下“共存‘共荣’”（07 年底“新社会阶层”党员总数为 400 多万）；

在培养教育下一代的讲台上：将毛主席语录、政治经济学、鲁迅文学、狼牙山五壮士、谁是最可爱的人、纪念白求恩、包身工、鸡毛信等民族英雄主义的范文撤出教材。取而代之的是：周杰伦的三节棍、比尔·盖茨的童年、“猫论”等内容塞进教材。这是在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吗？！

四清下海岛 许清喜茅台 （1） 1965 年 2、3 月，我跟随许世友，他改名许清、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改名王政，政治部部分干部以及前线歌剧团全班人马（许最爱看歌剧团演出《刘三姐》骂秀才的戏），改穿便装，奔赴舟山嵊泗岛参加“四清”运动。许说：“中央规定，参加‘四清’不准吃肉，我们到海岛去吃鱼。”舟山地区派出部分干部和三名大学生，参加以许清、王政为领导的“四清”工作队。

什么是“四清”运动呢？

1963 年至 1966 年，党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周恩来总理于 1971 年 11 月 14 日清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美] 作家韩丁（原名威廉·辛顿）一家时的谈话记录：（韩丁写出了著名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和《深翻》二书）

总理：毛主席在 1963 年“四清”时制定的前十条，刘少奇和陈伯达都反对。刘少奇搞了个后十条，繁琐哲学，根本不搞走资派。他要区分“四清”、“四不清”，党内党外矛盾交叉，“四不清”全打击，面太大了。

农村干部私字现象是有的，拿点东西都算上，都打倒。东西丢在地上，他拿走了，算不算贪污？如果这都算贪污，那就不得了了，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只能算是小偷小摸，城市工厂里的干部也有这种现象。比如说拿公家的纸写私信。社会还没到达共产主义，很多人公私不太分明。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所以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而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韩丁你前“十条”、“二十三条”都看了吧。

韩丁：没有，我要了好几个月，他们不给。

总理：前十条，二十三条都可以送给韩丁。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评了“后十条”。但是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已经到桃源蹲点去了，搞得完全是刘少奇后十条的那一套，而后她到处演讲，也不经过中央，毛主席的批准。……

总理：1962 年起，八届十中全会，其实是“文革”的先导，实际上批评了刘少奇，但没有点名。随后，在 1963 年毛主席为社教运动制定了前十条。当刘少奇抛出他的后十条，主席在 1965 年又发布了二十三条。同时，江青提倡京剧改革，造就了今天的样板戏，文艺革命开始。1965 年冬，姚文元写的批判海瑞罢官发表了。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与，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文化革命”才正式开始。

这一系列都是反对刘少奇路线的斗争。这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斗争，是长期的。当然严重的，激烈的是在 1966 年 8 月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动了亿万群众。这个路线斗争一直继续还没结束，斗批改还在深入。

你们在的地方也发现了问题。但斗争的主攻方面是反对修正主义，坚持马列

主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修正主义要分裂党，党的路线是反对任何分裂党和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办法是公开向群众讲明党内的斗争，宣传主席的路线，开展“四大”。而修正主义不敢公开分裂党，而是造谣，破坏，在这里，坏人，走资派暴露了，被群众批判了，有的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治病救人，再立新功，有些人不甘心于失败，他们藏起来，不改正错误，搞阴谋。……

为什么唱三大纪律八大纪律，“五不”从哪里来的？第一条说话要和气，不动气，头一条听指挥，有人就是要破坏纪律。这个斗争一直到现在。但主席的思想还是胜利了。只要把事情向群众讲清楚，绝大多数群众是会站在主席一边的。要团结，不要分裂，凡是分裂的都失败了。最后总是团结起来的。这说明了群众的愿望，斗争虽没有结束，但可看出胜利一天比一天大。

阴谋家总是要失败，武斗也是阴谋集团挑起的，正确路线是斗党内走资派，不是斗群众，但是修正主义分子要分裂党，就挑起群众斗群众。

凡是阴谋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他总是打着革命的口号，用极左的思潮欺骗群众，表面上支持文革，拥护主席，拥护共产党，拥护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暗中是反革命的，但也可看出他们的口号是极左的，他们反对主席的外交路线，他们烧英代办，炸印尼，印度使馆，这样的事以后也有，但常常被发现了。

文化革命中的秩序很好，坏人要破坏就得用一些口号，坏人从两面挑，文化革命总的是路线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对于走资派要惩前毖后，如不改就要打倒。

(2) 1963年5月，毛主席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

1963年5月20日，中央把“前十条”作为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前十条”对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文件传达了毛主席的话：“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9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贯彻“前十条”的指导思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又指出了团结 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政策。

1963 年 11 月 14 日，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规定将两个“十条”印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并在党内外宣读。“四清”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

1964 年 12 月，中央召开社教运动工作会议，毛主席批评有那么多地方将坏分子划成 20%；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会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在周总理的协调下刘少奇作了检讨。

1965 年 1 月，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主席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四清”运动对于解决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作风、经济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的处理和打击。毛主席试图用“四清”的和平方法解决党内分歧。但由于刘少奇坚持推行王光美（刘少奇亲自指挥）的“桃园经验”整下不整上，“四清，四不清问题”，与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相违背。用和平方法解决不了党内路线分歧，进而强化了毛主席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心理动因。

“许清”领导的“四清”工作队和渔家同吃同住，每餐有鱼吃，所以，没有吃什么苦。“四清”的主要矛头是大队支部书记，小会大会开了多次，不了了之；还有个成份不好的人，借腹生子，被制止。“四清”，老是大会小会，没完没了，“许清”领导坐不住了，说：“我们几个领导，带上歌剧团小分队，到其他岛屿去看看。”于是，命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普陀守备区司令张明，立即赶赴嵎泗岛。战斗英雄张明，当年是“洛阳营”营长，我曾在普陀山岛采访他海上练兵的事迹，这是《解放军报》要的特稿。

(3) 嵎泗列岛在上海的东南方向，嵎泗本岛距上海吴淞口 60 海里。嵎泗渔业盛产小黄鱼、墨鱼、带鱼、鳗鱼和鲳鱼。打起的各类鱼立即冷藏，直送上海销售。1985 年，上海市旅游局与嵎泗县政府联合开发嵎泗岛上的基湖海滨浴场，每年接待中外游客 6 万多人次。

陶勇带领东海舰队指挥舰，两艘登陆艇，乘风破浪向嵎泗进发。跟随许世友到各岛“巡视”的人员有 50 多人，我们都换上军装，等候出发命令。记得是中午时分，管理参谋胡宝亮下达出发命令。上舰时，舰上水兵列队呼喊：“首长好！”，许世友答：“同志们好！”舰上伙食很好，还有水果供应，黄岩橘子可以随便吃。如果晕船的话，那就没有口福了，吐起来可苦了，连黄胆水都要吐出来，幸好我没尝过吐的味道。

许世友命我在指挥舰上给全体人员拍合影留念。为了我能拍进去，我把快门、速度弄好，请一位战士替我拍。这幅合影已收入 1994 年 8 月出版《许世友将军影集》中。影集中有我拍摄的十二幅照片，由于派性作祟，惟独我拍摄的十二幅照片没有署名。其中，第 30 页，第 11 幅照片的说明是“假冒伪劣”。我拍的这幅照片，是我跟随许世友在上海外围的“鸡骨礁”上拍摄的小灯塔。“鸡骨礁”很小，潮水来了只看见灯塔，潮水退去才看见“鸡骨礁”石。影集说明写着：“许司令员冒雨带头登上花鸟国际灯塔。”花鸟岛上的国际灯塔很大，在公海上能看到它的光芒。拿小小的“鸡骨礁”灯塔，冒充花鸟岛上的国际灯塔，好比蚂蚁和大象之别，是不是假冒伪劣？

影集的编委有十七人之多，但在文字上不够实事求是；在照片剪裁、修正上没有下大工夫，致使不少照片划痕累累，影响了影集的质量。这本《影集》可以是“粗制滥造”。许上将地下有知的话，一定会暴跳如雷的。

还有一点，《影集》最后第 84 页，“许世友将军的最后一战”，文中说：“1977 年 12 月，年已 74 岁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广西战区陆海空军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许世友将军把自己毕生的战斗经验和才智，统统溶入到这场战斗，使之发挥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尽管在战场上他是一位‘暴君’，但，作为这一仗的军事指挥官，他是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事实果真如此吗？战场上是不能吹牛的，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许世友在指挥上就露了原形，在许上将的传统教条穿插战术思想指挥下部队死伤惨

重，虽然最后惨胜，可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技术含量十分的不高。所谓“自卫还击”战，是非正义之战！

许世友这次“巡视”，几乎走遍了东海前哨重点岛屿，最远靠近公海的浪岗山列岛。许世友也吃遍了各类海鲜和红烧狗肉，也离不开茅台酒。人家说茅台酒都是自己买的；我说都是公家埋单。不信？可以问问生活管理参谋胡宝亮。许世友不像周总理，喝杯茶都要自己埋单。

听许世友讲，他年轻时喝两斤老白干不误事。张国焘不准干部喝酒，只有他例外。别人有意见，问为什么许世友能喝，我们不能喝？张国焘说，你要能当敢死队长，你也可以喝。许世友六、七十岁时喝一斤茅台很轻松。一日三餐，除了早餐，午餐和晚餐都要以酒下饭，一喝至少三四两。请客吃饭，如果人不多，干脆他喝一瓶，自斟自饮，喝完为止。他喝酒很实在，不管是他敬酒还是别人敬他酒，举杯就喝，喝就喝干。若你不喝酒，说你不会喝，他说你怕死。

（4）有一次，在东海舰队指挥舰的会议室，许世友和陶勇在聊天，我在场。许世友突然问陶勇：毛主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没想到陶勇问起我来：陈记者，你说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我跟两位司令员走。我想，我们党的领导人，都是经过战争年代考验的，不会像苏联那样出修正主义。“四清”结束回上海，住在延安饭店，四楼有为许世友专住的套房，不许他人居住。那天，许世友找我和保健医生高复运（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胡宝亮，说：“陶勇设家宴请我吃饭，陶勇要报复，在舰艇上都是我把他灌醉。他的儿子陶小勇从舰艇上回来，和陶勇夫人（曾是文工团员）都会喝酒。今天要丢车保帅，你们三人要把他们全家灌醉”。高复运、胡宝亮的酒量不如我，我事先把带去物件收拾好，怕他们喝醉了丢三落四。许世友很高兴，陶勇的一家人都被灌醉了。许世友回来要看电影，在会议室为他放映专场电影。许发现胡宝亮不在场，要我去看看。我到房间一看，在卫生间发现胡参谋骑在抽水马桶上呼呼大睡。我把他拖上床，他又把床上的被褥吐得一塌糊涂。胡后来当上了延安饭店总经理。

接着一天，在吴淞口，许、陶陪同粟裕大将参观最新研制的汽垫艇演习。粟裕大将为什么身穿便装？原来 58 年 5 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以突然袭击的手段，集中全军师以上 1500 多人，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大会、小会对粟裕进行批斗，给他戴上了“反党、反领导，向国防部争权，有野心、告洋状、资产阶

级极端个人主义，将帅不和、里通外国”等等大帽子。结果，总参谋长也被撤了，调到国防科委工作。这一切，都是彭德怀整他的，而邓小平是领导小组组长。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粟裕在会上没有趁机推波助澜、落井下石，可见粟裕的为人。1984年2月5日，粟裕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人世。粟裕蒙冤36年，在粟裕夫人楚青15年的不懈努力下，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刘华清、张震文章《追忆粟裕同志》，算是平反昭雪了。

1966年1月，应《解放军画报》社约稿，我赶赴舟嵎要塞区部队的工兵修理连采访。该连的口号是：“大修不出岛，中修不下山”的勤俭创业路子。2月3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该修理连“勤俭创业修理连”荣誉称号。4月20日，南京军区在舟山定海本岛召开命名大会，许世友司令员代表国防部授旗。我拍下了授旗的照片，给新华社发传真。此照已收入许上将《影集》。

1966年2月14日，小儿子出生，取名陈朝晖。

由于我在六十军“临汾旅”采访夜间神枪手陈光玉排长时，在构思、构图、用光上有独到之处，《解放军画报》很快以《“夜间猎手”陈光玉》刊登出来。另一次，我到十二军采访“郭兴福教学法”郭兴福连长时，李德生军长要我拍摄一幅全排夜间泄光弹射击的大幅照片交给他。再一次，同浙江省军区政治部摄影干事潘耀中一起，到洞头岛，采访军民联防女民兵连长汪月霞，以《四好女民兵连长汪月霞》的夜间巡逻摄影作品，受到江苏省第五届摄影艺术展览优秀奖。为此，北京《中国摄影》约我撰写夜间摄影的体会文章，以《实践第一》为题，刊登在1966年1月号上。不久，《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报》社，商调我去北京工作，组织上同意我去《解放军报》社工作，我当即写信告知在北京工作的父亲。正当我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家有一件“珍宝”，是老战友从南街村带回来送给我的一个台钟，内有毛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的讲话录音。……。

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

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毛主席用了三个“永垂不朽”，总结了近代革命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千百万革命先烈、人民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真是来之不易啊！《08 宪章》出笼了，这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纲领，他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宪政的“普世价值”欺骗人民，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并在美国建立了“临时政府”。台湾、新疆、西藏……当然就是其联邦成员，台独、疆独、藏独就合法化了，这将造成国家分裂，军阀混战，百姓遭殃，怎不叫人心急如焚呢？

联想到毛主席逝世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取消“阶级斗争为纲”，进而在清算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清算“文化大革命”的揭批查运动中，在云南，不管是老红军、老干部，老将军，还是基层干部，只要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就是云南“四人帮”派体系的“后台”“黑手”；只要进入各级革委会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甚至生产队长，都是帮派头目、骨干，以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颠覆政府罪”，判刑入狱达五万多人，枪杀 2 人。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对《08 宪章》派和对“文革派”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实践检验着执政党的阶级立场和执政理念。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人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反动的《08 宪章》，决不能放任自流，危害国家安全，要求党中央发动全党、全民进行彻底批判。

好端端的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好端端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弄成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的地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 75 年党龄的共产党员，1933 年跟着毛主席长征的老红军。能无动于衷，孰视无睹吗？

私有制是滋生贪污腐败的土壤

许多老同志来看我们讲到，官员贪污腐败人民深恶痛绝，多年来的反腐倡廉也取得一定成绩，但反腐形势仍日益严峻。贪官的数量不减反增，贪官的级别越来越高，贪官们的贪污受贿的款额越来越大，贪官外逃的数目越来越多，贪污受贿涉及的部门越来越广。法官，检察官、纪检干部，反腐败官员的腐败，对党和

国家的伤害日益加深，连教师，医生等到清水部门的腐败也让人吃惊，官员贪污腐败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贪污受贿、串案、窝案不断发展，犹如人体免疫功能细胞被感染，得了癌症，艾滋病等不治之症了。我认为：老同志们忧虑是发自内心的，比喻也很恰当。

过去也有贪官，毛主席亲批处决刘青山、张子善，这是典型的例子，毛主席处理张、刘时，也有人提出，刘青山、张子善是党的高级干部，而且有很大的战功，要求将功补过，毛主席说：“越是职位高、功劳大的干部，就越不能贪污人民的财产，搞腐败，处决刘青山和张子善两个人，是为挽救 20 人、200 人、2000 人……。”

毛主席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对党内的贪污腐败的资产阶级分子刘青山，张子善两人处决，目的是惩治贪污腐败分子，挽救犯错误的干部，更重要的是培养、造就一代不谋私利、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忠诚干部队伍。……。

在改革开放“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指导下进而实行“市场经济”、“国企改革”、“国退民进”的一系列改革中，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中国产生和发展了一批新生的资产阶级。资本家可以入党，当党代表，当党委委员，书记，甚至到高层。资本家和共产党同朝为官，成了上下级关系，“同志”关系。资本家仰慕官员的权力，官员羡慕资本家的财富和生活方式，他们相互勾结，贪污受贿，互相包庇，造成串案、窝案、集体作案、携款外逃。据我所知的，有资料可查的云南外逃贪官有：

罗庆昌，国企，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42 岁，在美国，携款 3385 万元。

陈传伯，国企，昆明卷烟厂厂长，61 岁，在美国，携款 1600 万元。

陆海莺，国企，云南省证券公司总经理，49 岁，在美国，8000 万元。

闭东晨，国企，云南省五矿公司分公司副经理，27 岁，不详，携款 3263.2 万元。

大批贪官污吏外逃成功：《人民日报》曾经有过一篇报道：“我国自 1992 年以来，至 2007 年 6 月底，外逃省部级（包括副省部级），87 人，正地厅级，320 人；副地厅级，1920 人；处级，8250 人；副处级，11340 人。共计 16000

多人。这些人侵吞、携带出境资金就有一万亿元以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2008 年，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境内外追逃工作，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1200 名。

改革开放三十来，改革精英们在高叫着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政治运动，反对折腾的同时，他们却在在大折腾，把几十年来国家积累的资产运动到了他们的腰包里，把广大工农劳苦大众折腾得极端贫困化。这是不争的事实。

2800 万先烈忠魂在哭泣，老革命们在悲痛愤怒！“枪林弹雨几十年，一觉睡到解放前”。这些，都是被“理论”、“代表”给搞颠倒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热衷于搞私有制的道理？！这就想到，伟人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是何等正确、英明、伟大了！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调兵遣将，以 18 国集团为核心，共出兵 51 万 3000 人，坦克 2400 辆，战机 4000 架，火炮 50000 门，并且动用了四大航母舰队群，以排山之势杀向北朝鲜，并疯狂北犯，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边。抗美援朝战争，是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北朝鲜的侵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美国侵略者明白，中国军队没有制空权，缺少重武器，那些老式卡宾枪，手榴弹，在他们看来无法抵挡联合国军的立体进攻。可是美国侵略者不明白，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是正义之战，有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中国人民不仅敢于参战而且敢于取胜。志愿军入朝后迅即发起激风暴雨般连续的，大规模的对敌迂围歼灭战役，其来势之迅猛，战法之凶狠，风格之顽强，战略把握之精到，战术进退之灵活，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充分领教了中国军队非凡的战斗力。尤其是上甘岭战役，把美国人都打懵了。按美军奇才李奇微将军的看法，如果志愿军哪怕有美军一半的武器装备，或者志愿军的给养能够不间断供给，联合国军恐怕早被赶下大海了。

特纵司、政、后机关人人都报名，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电影队都报了名，政治部文化部领导只批准三人，马少雄、陈万有随炮七师电影队入朝；女同志王冰如随炮三师电影队入朝。

驻南京东郊朱庄营房一个炮团的火炮，是解放战争缴获的美式 105 口径榴弹炮，奉命连夜改换成苏式 122 口径榴弹炮；驻无锡梅园营房一个炮 201 团，是苏式“喀秋沙”火箭炮团，火箭弹多发、依次离开滑轨时的呼啸声，爆炸声，令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联军和南朝鲜军闻风丧胆。华东炮兵赴朝作战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战争之神”巨大威力！历时三年零三十二天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抗美援朝期间，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任务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三反”又称“打老虎”，刮起了 12 级反腐风暴，每天广播公布“打老虎”的战况，电影队的大小“老虎”榜上有名。当时规定凡贪污 1000 元以上即称为“老虎”。就电影队来说平时化钱不少，物资器材多多。首先拿驾驶员老冯开涮，保卫处罗副处长来坐镇，说：“今晚一定要拿下这只老虎！”疲劳战术一直到深夜，老冯没法子，只好承认私自卖了多少加仑汽油。一算，超过了 1000 元，是只“大老虎”。电影队共 15 人，分三个组，我是第一组长，经手买过一些器材。电影队的四位女“武松”，分别找我谈话，轮流给我打疲劳战，最后也是没法子，只好承认我二叔送我的钢笔是用公款买的，不够 1000 元，算是“小老虎”。

电影队长张相云，他经受的公款最多，当然是攻击的对象。可是，这个“碉堡”很难攻下来。张队长发誓说：“我根本没有贪污公款的行为，我可以剁掉自己的手指作保证！”罗副处长说：“这是顽抗到底的表现！”张相云是个硬汉子，回家去就把一个手指剁了。我们都同情他，可是，谁敢为他辩护？在运动中，由于私心作祟，“左”一点比“右”一点好，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三反”、“五反”揭发出资产阶级不法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在抗美援朝物资供应上造假，特别在医疗用品上假冒伪劣，真是伤尽天良。当年历史上最响的枪声，在河北保定东关大校场上的两声枪响，杀了刘青山、张子善，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教育干部千千万。无欲则刚，共产党，政治清明几十年没有腐败。

1950 年 7 月，姑父郎玉麟在特纵后勤部任军械处处长。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必须保证车辆“开得动”。到香港采购军用物资成了军械处的重要工作。他的下属李少泉接受了这个任务，经常出入在上海香港两地，在上海经不起十里洋场的诱惑，堕入了沾花问柳“舞女”的泥坑。李少泉用银行转汇的手法，骗走

了三亿元人民币（折合 52 年币制改革时三万元），带枪出逃到香港，与其姘妇渡蜜月。这一大案惊动了陈毅司令员和党中央。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命香港地下党就地吧李少泉控制起来，不许暴露，不许处决。其目的要追回巨款，避免外交纠纷。通过上海党组织做通“舞女”父母的工作，命其配合政府缉拿罪犯归案，其女可得宽大处理。

1951 年开春，军械部政委马尔东为首，保卫干事王进峰等人，及“舞女”的父母南下广州。由其父母通知“舞女”前来探亲会面，探亲结束返港时，通知李少泉来界桥迎接。李少泉果然被女色所迷惑，在界口大陆一侧被抓获。某日，在特纵司政机关驻地狼山营房后山上，枪毙腐化堕落分子李少泉，我们都到刑场去看。回想起淮海战役，我军解放徐州城，军民进行大游行庆祝徐州解放。我们住在徐州新新饭店，和李少泉住在一起。此人很凶暴，他经常喝酒，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李少泉就追着打我，这是小事一桩。大事，李少泉也不在乎，《李闯王进京》给他敲的警钟，他压根儿没有听进去，很快走上了不归路是迟早的事情。在徐州，文工团演出《甲申三百年祭》，部队都要去看，这是政治任务。在李闯王进京的三百年后，即 1944 年，郭沫若写成了史论话剧《甲申祭》，认真地分析了李闯王由胜利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为后人敲响了警钟。警钟长鸣，这是毛主席要将《甲申祭》作为延安整风的必学材料之一的原因。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戒全党，我们的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愧英雄的称号，进城后可能有的人会经不住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毛主席从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往北京的路上又告戒党的领导人，这是上北京赶考。警钟总在长鸣!!!

1950 年起，地方上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由于大批南下干部掌握政策有误，姑父郎玉麟的三哥郎玉祥（小学教师），被工作队诬陷为“杀人、放火、暴动”罪。姑父的侄子郎民先火速到部队求救。姑父写信给政府，表示他的三哥决不会杀人，恳求政府要慎之又慎。结果，政府不采纳意见，于农历 12 月 24 日郎玉祥被枪杀在潘店村附近的瓜山村。郎民先被株连判了五年徒刑。郎民先至今还是个单身汉。当局还将信寄到部队，组织上以“阶级立场不稳”，姑父被开除党籍，转业到太原山西省交通厅当一名劳资科长。一个团级干部，1937 年 12 月 16 日入党，抗日寇、歼蒋魔，南征北战，就这样被“废了”。“文革”中被“打回老

家”潘店村监护劳动。幸亏有村书记常其良（原“郎部队”姑父的警卫员）照顾。直至“文革”后才恢复党籍。湖州市有关当局承认，他三哥是被错杀的。呜呼哀哉！

1950年12月某日，三野特种纵队，组建为华东军区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在南京汤山作厂镇，华东炮兵特科学学校大院内，举行授旗典礼。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莅会授旗。

1952年6月15日，华东军区炮兵领导机关从汤山狼山营房迁入南京市长江路288号（“总统府”隔壁）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旧址。炮兵党委规定：不许乘车，都要步行到南京。少数同志偷着乘车溜走了，领导知晓后，用车把他们拉回到汤山镇再步行到南京。和平时期干部养尊处优，肚子大起来了，富贵病也多起来了，这是炮兵党委的一番苦心吧。干部参加劳动，部队都有自己的农场，每年夏季都要帮老百姓抢收抢种。毛主席发号召：从军区司令员起，军官下连队当兵。毛主席也是煞费苦心吧。

1952年6月18日，陈锐霆司令员调任军委炮兵参谋长，周纯麟继任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刘春为政治委员。到54年秋，刘春政委调任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委，欧阳平、秦化龙先后继任南京军区炮兵政治委员。军委号召政工干部学军事。秦化龙政委带领政治部一批干部，到汤山军事干部训练班学军事，我也在其中。在毕业考核中，炮兵连长在指挥所，指挥炮阵地四门火炮射击的一套动作，我考了个优秀。

当时，炮兵训练都是按照苏军模式，按照苏军炮兵顾问的指令行事。司政后机关干部都要背诵部队《纪律条令》和《内务条令》；干部都要学习俄语；在文化生活上，主要是看苏联电影，唱苏联歌曲，每周六晚举行一次舞会。从那时起，我开始学拉手风琴，给舞会、合唱队伴奏。

1953年8月1日，组织上要我和王尧同志分别到附近小学，给小学生讲讲在战争年代艰苦环境下，如何坚持学习的故事。勉励他们从小就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现今，八个大字在小学里看不到了。

1954年1月，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荣立三等功三次。

1954年4月的一天，组织上交给我一个绝密的任务：给炮兵机关师以上干部放录音。内容是陈毅司令员传达“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事件，到会的同志

听了都很震惊，哑口无言。我想，我们的党中央、高级领导人，都是经过艰难曲折的战争年代、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浴血奋战考验出来的，怎么会有人反党呢？真不可思议！

1954 年 11 月底，和全军一样，炮兵机关的女同志大批转业。我爱人刘炳春是司令部的文印室组长，被转业到安徽省工业部工作。

1955 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薪金制，炮兵机关授衔时，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中将，来炮兵大院授衔祝酒。毛主席曾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评衔时”。毛主席表扬了粟裕（常胜将军）、许光达和贺炳炎（独臂将军）。粟裕、许光达不要大将要上将，贺炳炎不要上将要中将。1955 年授衔“含金量”很高。不像江泽民时代，弄个上将、中将、少将那么方便。比如，原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巴某人，因在位时生活作风问题被南京军区罢官，江泽民上台后很快被重新起用，任中国武装警察部队中将司令员。现今，军事史上罕见的中国文艺兵，跳舞、唱歌当将军。根据官方披露的资料，官拜将军的中国文艺兵，有跳舞的、唱歌的、作词的、拉二胡的、打球的、画画的，可谓五花八门，人数总共达到三十多人。

1956 年 3 月，我被调到驻汤山镇、作厂镇之间的南京军区炮兵射击场（师级单位）任俱乐部主任。炮兵射击场是按照苏军的模式扩建的，业务上受军委炮兵直接领导。发了一架德国造的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在《人民前线》报编辑丁星的指导下，我拍摄不少反映部队生活的照片，被报社刊登了。从此，走上了热爱摄影艺术这一行。

1956 年 7 月，我爱人考取了上海华东政法学院。7 月 21 日，我到安徽合肥与战友刘炳春结婚，并送她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报到，61 年本科毕业，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理化研究所工作。我俩在政治风云变幻中，风雨同舟，不屈不挠，坚强地活了下来，已超过了“金婚”年代。

1956 年冬季，军委炮兵在南京汤山组织“全国炮兵连长射击竞赛”，射击场全力以赴。派我负责竞赛期间的文娱生活；因部队在野外野营都住帐篷，没有电源，还要负责广播和夜间照明问题。正巧侯宝林曲艺团在南京演出。我向领导小组提出，请曲艺团来演出，经领导同意，我找该团负责人说明来意，他们满口答应，并说：为全国炮兵连长演出是我们的光荣。还说：就一个条件，其他团员

可以乘大车，侯宝林先生要坐小车。我也满口答应：没问题。演出很成功，特别是侯宝林的节目，引得大家捧腹大笑。为了活跃野营部队文娱生活，除了广播、电影之外，政治处干事陈九行作词，由我作曲的《野营之歌》，在广播里教唱，并组织比赛。

于此同时，射击场领导发现司令部中尉参谋侯里，与在汤山镇休养的一位老红军夫人有暧昧关系。因此，侯里受汤山镇派出所的监控，夜间我们都要轮流放哨监控侯里。一天，那位夫人去南京，一看侯里刚去南京。因保卫干事不在，上校主任刘竹溪命我穿便衣，乘三轮摩托火速赶往南京。车到孝陵卫农科所路段时突遭车祸，差一点追尾撞在大卡车上，幸亏我帮驾驶员的车龙头向左猛打，撞在路边大树上，两人都飞了出去。我的双腿膝盖撞在车斗上很快肿胀起来，立即送“八三”医院救治。住院期间，院内大字报很多，反右派开始了。出院时驾驶员腰部残疾，我的双腿关节落下了终身病痛。出院后，投入反右斗争。我抱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心情去关心政治，结果在一次党委会上，两位大尉衔的同志，不尊重中校政委高镇的最后决定，争吵起来。我说了句：“会开得一团糟”。没想到他们组织人多次开我的会，要上纲上线到“党委一团糟”是“右派言论”。我一个中尉，怎能敌得过二位大尉联合整人之势？多亏高镇政委说了话，才逃过这一劫。中尉财务主任于心敬同志为人正直，也受到了劫难。

国际上，苏共 20 大召开和波、匈事件等几方面原因，1957 年 4 月 30 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 月 1 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部的整风运动。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毛主席试图用和平方式，解决党内分歧和官僚化的重要努力，其结果，以基本失败而告终。官僚力量不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更加膨胀起来。相反，反右扩大化累及多少无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利用反右公报私仇，使人民的发言权受到极大限制。

1959 年春，我被调回到南京军区炮兵政治部宣传处，我和沈竹眠同志分管炮兵部队俱乐部工作。为了继承革命传统，我们收集编印了红军、抗战时期歌曲

集，发到部队传唱，并组织比赛。那时中苏关系很紧张，苏联专家、炮兵顾问大批撤走。为了给炮兵顾问送行，领导上指示我组织舞会，邀请江苏省歌舞团、军区总医院的演员和护士伴舞。叶剑英元帅、李先念副总理到会送行。专家、顾问和他们的夫人，没有心情跳舞，洒泪告别。

1959年7月17日，我的女儿降生，取名陈晓萍。

1959年9月，炮兵政治部一批干部下连当兵，我和宣传处干事周川，秘书处秘书倬军等同志，一起下到炮兵连队当一名炮手，正巧遇到炮兵连经常夜间拉练，风雨无阻。夜间拉练，一般是半夜紧急集合，五分钟以内打好背包、持枪到达操场炮位，准备上车。我的班长是位浙江温州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当年下连当兵我二十六岁，身体还扛得住折腾。

有一天，炮兵团排以上干部集合，传达重要文件。当听到彭大将军在庐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继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事件后，又一次“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事件。作为军人，除了朱总司令，彭总是我第二个崇拜的人。以前听传言，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主席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错误提出批评，毛主席容不得彭德怀，才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有些人还大肆渲染毛主席独裁，破坏民主集中制，打击彭德怀。这些看法是否有失史实？有失公正？有资料表明：

1959年7月2日至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会议开始，毛主席提出18个问题要大家讨论：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

毛主席在讲话中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计划。

7月13日晚，彭德怀起草给毛主席的信，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14日，将信呈送毛主席。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

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毛主席息事宁人的态度，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一方面刘少奇一些人心怀叵测，欲置彭于死地。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后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刘少奇的发言，是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会议进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8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8月2日，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委员75人，候补委员74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保护了刘少奇等人。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来一直未向下传达。

毛泽东何故改变主张？据毛泽东贴身卫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看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会议于8月16日结束。

这次会议是党内对毛主席社会主义路线的一次考评。经过激烈斗争，表面上保住了毛主席社会主义路线的沿续权，实际上大打了折扣。随之而来的政策调整，到了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公开宣判大跃进前后出的问题产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影射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同年，鉴于党内斗争实际，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上升到政治高度。

1960年8月，第二次干部下连当兵，我分在气象连。气象，对炮兵来说至关重要，特别是风向、风速，对炮弹的命中率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每天都要施放探空仪，然后，将探空仪发回的无线电信号，用手工快速抄下信号的滴答声和秒数，工作量很大。我试着用短波频率接收信号，将信号转变成电能，推动两支小笔在滚动的纸带上记录，一支记录电报，一支记秒时。《奖状》上写着：“创造了‘探空信号自动记录仪’”，并去北京参加军委炮兵技术革新大会。在会上施放探空气球，进行探空抄报演示，受军委炮兵技术革新二等奖。为此，延长了下连当兵的时间。随着年岁的增长，感到在战争年代不能很好读书，正好用搞“政治运动”的时间拼命学习，提高业务能力。为此，党小组开会批评我“不关心政治，单纯业务观点”。我生气了，说：调我去学习好了。

1961年9月，在江阴炮三团搞“两忆三查”教育。宣传处来电话，命我火速回南京，到长沙“解放军第一政治干部学校”报到。我赶到长沙黄土岭时，学校已开学了。学习内容：以毛泽东选集为基本教材，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工作等为主要课程。那时，正值生活困难时期，要生产自救，去农场劳动强度很大。因为要保证我们第六期学员的瓜、菜代，还要给下一期学员留下足够的瓜菜。在劳动中学会了用盖子肥种植菠菜。回到南京军区炮兵宣传处，选我当生产小组长。我们种的菠菜、青菜、蕃茄、莴笋、黄瓜等蔬菜获得了丰收。

学校每天唱着抗大校歌：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

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

当时，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纠正前进中的错误、战胜自然灾害之际，来自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篡党夺权之后，对中国共产党发起攻击；来自蒋介石妄图趁机反攻大陆。所以，学员们除了坚持学习外，每天都坚持念读关于苏共“22大”的新闻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有关文章；每天坚持军事训练，每天坚持劳动生产，每天坚持打拳、游泳。

1961年10月，苏共“22大”第一次出现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做法，此后，中苏两党的分歧进一步发展。苏联的报刊上每年都要发表几百篇攻击中国的文章。为了回击苏共对中共的各种攻击，中共于1962年12月5日到1963年3月8日，陆续发表了7篇重要文章，对苏共领导等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阐述了中共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的观点。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中苏两党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公开论战。

1962年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想趁我国与苏联不和，有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认为此时是千载难逢进犯大陆的好时机。他在台湾厉兵秣马，积极备战，准备反攻大陆。并成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反攻行动委员会”。我们学校给学员都配发了步枪，参加军事训练。

学校还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每天打拳、游泳，我报名参加校铜管、管弦乐队，演奏大阮乐器。在长沙市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晚会上，校管弦乐队的演奏获得一等奖。

政治干校组织学员到韶山冲毛主席旧居、长沙清水塘纪念馆等地参观，作为辅助教学的一部分。通过学习，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一至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等战例的学习，从理性上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毕业后晋升为上尉军衔。回到炮兵宣传处不久，参加了《政治经济学》读书班。读书班是培训小教员的。

1963年5月11日大儿子出生。为纪念长沙政干校学习，取名陈东晖。

1962年9月，随同炮兵副政委陈德先少将、宣传处长韦弦少校、干事孙磊大尉，到南京东郊朱庄营房高炮团检查战备工作。正值高炮团接受周总理的命令：

部队立即出发，昼夜兼程赶赴江苏大丰县境内，守候、击落，台湾国民党空军美制P2V-7U型低空、夜航电子侦察机的侵袭。检查组跟部队同行。敌机利用雷达死区，在沿海作低空飞行。所以，构筑炮阵地时，用土先堆积成小山，把炮推到小山上，以免击毁附近老百姓房屋。每个连四门炮，一门炮为值班炮，不论烈日刮风下雨，都要昼夜坐炮严阵以待。战士们以班为单位挖一个地洞，只能和衣睡觉。地洞内很潮湿，我的关节炎就是那时造下的病。为了美化阵地，鼓舞士气，我用随手沾来的大小海贝壳，在阵地斜坡做成横幅，镶嵌：“以阵地为家，以苦为荣，严阵以待！”、“坚决击毁敢于入侵的敌机”等大幅标语。一个月过去了，中秋、国庆节到了，南京送来的一点猪肉都变味了，因困难时期，大家还是吃得很香。

一天傍晚，警报器终于响了，战士们像小老虎一样快速奔跑到炮位。只见一架四个引擎螺旋桨喷气式大型敌机，从阵地的东南角超低空飞来，“开炮”！连长下达命令。四门37高炮一阵急速射，只见“P2V”摇摇晃晃飞走了，飞机的尾灯给打下来了。

1964年初，南京军区政治部从各军指名调了一批年轻干部，充实到机关各个部门，调我到宣传部新闻科任摄影记者。新闻科长孙皓月，副科长李少白；新华社驻军区记者组，组长徐学增；《解放军报》驻军区记者组，组长栾保俊，兼任新闻科长。三单位合署办公，对全国报刊杂志发稿。政治部主任王六生说：“你们是机关的‘新鲜血液’”。我的任务：下部队采访先进典型；跟随许世友司令员下部队蹲点、视察工作，许司令接待中央、军委首长和国外军事代表团的摄影报道。在工作中受《解放军报》三等、一等奖各一次。许世友司令员是一位有名的战将，他率领部队激战拼杀、所向披靡，立下了赫赫战功，我很敬重他，鞍前马后、全心全意为他服务。

1964年4月开春，新华通讯社约稿，为了配合沪剧、京剧在北京演出《芦荡火种》，要报道当年36名伤病员的情况。要三天内完成。我火速从南京赶往杭州市留下镇20军59师，采访栗亚师长，他取出新四军时的大刀，讲述36名伤病员的故事。采访结束，师部用车把我送省军区政治部，找潘耀中冲洗胶卷、放大照片；赶到上海警备区政治部，找周立顺发传真照片给新华通讯社。4月27日，刘少奇、周恩来、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观看北京京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后来，毛主席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

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戏是好的，剧名可叫《沙家浜》。”

（六）十年文革史 反修防修炼金刚

1966年1月，毛主席诗词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南京军区杜平政委向机关师以上干部作报告，新闻科记者参加了。会上气氛好似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杜平政委说：“现在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主席讲话没人听，彭真搞了个‘二月提纲’，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彭真的？我们要人人表态。”我想，许世友司令讲的毛主席问他，“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果然出事了。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震撼了世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1966年5月19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67号文件的形式，发出了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发到县团级，这是以党内文件的方式发出的，一直到1967年5月17日，一周年以后，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刊出。

毛主席批准颁布执行的《5.16通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通知》强调指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

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当时，政治形势突变，特别是对中央《5.16 通知》指出的严重问题：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怎么党内还有走资派？我感到惊愕和迷惘。

1966 年 6、7 月“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为“文革”的主导权，以中央的名义转发过 7、8 个指导运动的文件，如《关于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央转发西北局 [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等等。在这些文件中提出在大学生和高中生中抓 1% “右派学生”的指标，还在全国范围内抛出一大批中央和省市级主要在文化宣传部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

毛主席对此义愤填膺！发表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宣告了他们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

1966 年 7 月 18 日，毛主席离开武汉，直达北京，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8 月 1 日至 12 日，毛主席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全文如下：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会讨论和批准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

国内

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近四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引下，展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公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国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正在出现新的全面跃进的局面。

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已经胜利实现。从今年起，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战线上，不但产品的数量，而且品种，质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农业战线上，连续四年获得了好收成。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的成功，集中表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新水平。

近几年来，在全国的农村、城市和军队，广泛地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我国兴起。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开创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

全会完全同意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两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农村和城市，应该继续按照这两个文件，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四清”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主要的是：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的问题，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关于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的号召。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全会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要热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全会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近四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证我国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国际

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当前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形势是大好的。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各种政治力量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对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疯狂进攻和收买欺骗，都不能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相反，只能进一步地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觉醒。

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苏共新领导集团，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他们的路线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大的列宁，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咒骂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其实，他们所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正在联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可是，这种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是注定要破产的，现在已经陷于分崩离析。

全会认为，近几年来，我们党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进行的全面的公开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是一个纲领性文献。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这个文件，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评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以及林彪同志《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等等，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全会认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对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必须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工贼的真面目，不可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

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全会热烈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正义斗争，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全会最强烈地谴责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罪行。全会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的《告全国同胞书》，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打到底，直到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全会完全同意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同越南方面商定的关于援越抗美的一切已经采取的措施和将要采取的行动。

全会强烈谴责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越南抗美斗争的问题上，执行假支持、真出卖的反革命两面政策。

全会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

线。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

我们一定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人们，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要同全世界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对毛泽东同志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我们的党，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我们的党，是经历了历史上最激烈、最艰苦、最长期、最复杂的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我们坚信，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军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障碍，一定能够完成历史

赋予我们的使命，一定不辜负世界革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我们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我们一定要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好，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突然袭击。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七亿中国人民，就一定要打断侵略者的脊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主席诗词一首：七绝 · 炮打司令部 1966年8月 人民胜利今何在？
满路新贵满目衰。

核弹高置昆仑巅，摧尽腐朽方释怀。

（七）学习十六条 勇敢撰写大字报

1966年8月8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9日《人民日报》就全文刊登。“十六条”的意义：可以说是所有“文

革”文献中，最重要的一篇。在“文革”群众运动期间，具有文化大革命宪法的地位。“十六条”中，法律性最强、最具创新意义也最受群众欢迎的一条，是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这实际上是对广大群众赋予“豁免权”，使他们能放心大胆、打消顾虑向领导提意见。按照 1966 年 8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十六条“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为了不断章取义，全文引用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坏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

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

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

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

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的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文革”初，我到“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访，由上海警备区摄影干事周立顺陪同。这个连队，1949年5月进驻上海南京路，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批准授予驻守上海某部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毛主席为“好八连”题诗一首：《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

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

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剧中部队以原上海警备区某团八连为原型。《霓》剧的编剧是军区文化部长沈西蒙（执笔）、漠雁、吕兴臣，导演：漠雁。196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优秀的战斗故事片。从我们特纵文工团调到前线话剧团的有：白文、姜曼璞、文卜东、张哲、桂

步云等同志。姜曼璞在《霓》剧中饰演女特务曼丽，桂步云饰演小混混菲菲。

我和周立顺同志住在“好八连”招待所，闲谈中周干事说：“前不久，南京军区军以上干部带着老婆孩子，在延安饭店开避暑会，和我们采访的主题思想《‘好八连’艰苦朴素作风代代传》相违背的。”他说：“上午开会下午到吴淞口游泳，让工兵连搭建休息、更衣室，要我给他们各家各户拍照片，还说我拍得不好，真气人。在回延安饭店的路上，由于‘红卫兵’游行造成堵车，引起车上一片骂声，他们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南京路上好八连，在一场特殊的“战争”中反腐倡廉，保持革命的纯洁性，是反腐倡廉的榜样，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现今，“南京路上好八连”已离开了南京路，被武警八连替代了。

采访还没有结束，我被紧急召回南京参加“四大”。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所属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三团二队（前线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等单位开展“四大”。

1966年11月12日，在军人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许世友司令员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并规定每天每人要写若干张大字报，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经过长沙政干校学习，懂得要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写大字报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不能落后。想来想去没有事情好写的，后来把在“好八连”采访时，周立顺说的吴淞口游泳的事写成大字报《神仙避暑会》。就是一念之差，如果那时不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不遵照许司令的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而是吸取反右派的教训，不是“太平无事”了吗？果真，许世友当年反右派一样，早作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安排。保卫部副部长李书和，派人摘抄大字报，直接向许世友汇报。我的一张大字报引来了“杀身之祸！”被莫名其妙地划为“倒许乱军”。周总理及时指出：“反许不对，但不等于乱军，二者不能画等号。”后来，许世友干脆提高规格，把“倒许”改成“反党”。我们是奉命开展“四大”，谁要“倒许”？没有的事。我写大字报的目的很明确：一不是“倒许”，二没有“反党”，是为了反对不正之风，给军区党委提意见。这是铁的事实。

然而，悲剧就在这里。在某些党的高级领导人看来，真理属于权力，属于掌握权力的人。权，大于法。党，大于法。许世友就是“法”。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从上到下，不少党的领导干部，把自己比作“党”的化身，老虎屁股摸不得，反对他们的错误，就是“反党”。他们满脑子充斥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专制思想。这是“反党”、“反革命”的大帽子满天飞的主要原因。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文化科长、作曲家梅滨，干事杨震轮，先后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胡风分子”。我是后来居上，三项特大的帽子：“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像三座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我一生痴情，对党无限忠诚，成了“反党”、“反革命”，开除党籍。想想革命革到这个份上，怎能不寒心？

许世友在“文革”时期的秘书李文卿，近年在《宁波日报》上刊登长篇连载《近看许世友》。尽管此文在不少方面事实不真实，观点不准确，但也说了一些有份量的哲理，可惜这种哲理没有贯串到全文。文中针对许世友怀疑副参谋长李元、党办副主任李平凡对他“不忠”，写道：“领导干部对下属人员的看法是不是客观公正，往往决定他们一生的前途命运，来不得一点‘形而上学’！识人要看他的一时一事，更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切忌一时不顺眼，一事不遂意就给他下结论。否则的话，难免会误人、伤人，给团结和事业带来深层的损失。”真是至理名言。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一句话能置人于死地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做到上述箴言，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而不是口头上的，就不会出现一大批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了。

许世友在“文革”中，单是清查“5.16”一事，到底整了多少人？整死了多少人？李文卿在文中不得不提到挨整的几个人，那是凤毛麟角。被整死的人，一个没有提及。我的冤案的起因，就是许世友对我的一句话。据许的护士许莲娥透露，许得知我写了大字报，说：“胖子造反，专他的政！”（许平时叫我“胖子”）。真是金口玉言，大首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谁会想到，在“四大”期间，我的一张大字报，换来了“无产阶级专政”。

我跟随他下部队视察、蹲点、“四清”等活动，深知他的火暴脾气。一次在海岛，亲眼目睹他多次训斥军至连级干部那种狠劲，有位炮兵连长被训斥哭了。过后，王良恩副主任替他做善后解释工作。所以，岛上有些领导干部得知许世友要上岛，就编造各种理由闻风而溜。又一次，上嵯山岛，部队列队等待合影。许世友上岛三件事：那个山最高，定要爬；下伙房看看伙食怎么样；和部队拍合影

留念。那一天，许看见避风港停泊的渔船很好看，要我拍下来。我建议说：“相机只剩二张底片，拍大场面接片不够，请许司令先拍合影，换个胶卷再来拍渔船。”谁知他火冒三丈，训斥说：“你罗嗦什么？这是命令！再罗嗦把照相机丢到海里去。”“你不要做假，回去我要看照片的。”虽说是小事一桩，却很能说明问题。许的随从有秘书、警卫、医生、护士、厨师、招待员、驾驶员、管理参谋、记者等人。有事都得小跑步为他服务，稍有怠慢，轻者，瞪你一眼；重者，训斥你抬不起头来，还不准回嘴。谁要是解释一下，你就倒霉了。

1965 年夏，我跟随许世友、杜平在安徽三界装甲兵演习场蹲点，亲眼目睹部队首长向许世友汇报情况。会开始不久，许突然责问：“你们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回答：“是真的。”许进一步责问：“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汇报人傻了眼，不知如何回答。冷场。汇报人好象突然想起来，说：“我汇报的情况是经过党委讨论的。”汇报人以为这样回答总可以了？他那里知道许世友的脾气，你越解释越糟糕。许马上站起来说：“你给我签字！”在许世友眼里，没有平等待人这一说。

在三界靶场，许世友闲时坐不住的，白天乘坐苏式越野车出去打野鸡、野兔。他的双筒猎枪是伏罗希洛夫元帅送给叶帅，叶帅转送给许世友。晚上叫我们随从出去打兔子，几乎天天如此。有一次轮到我和警卫员王排长去打兔子，小王用汽车探照灯照明，在黄豆地附近驱车追赶兔子，黄豆地的野兔最多。我举枪射击时，因铁靠背刚好在我右臂，当枪托后坐时坐出了紫血泡，留下了疤痕。打回来的兔子有一麻袋，除了赏一个兔子后腿吃以外，都由小王负责剥皮、晒皮，兔肉做成肉松，全归许世友。许世友很有经济学头脑：在南京的住处，有个小鱼塘，自己有个打鱼的鱼网，想吃鱼了，就自己网鱼，弄得一身泥水也不在乎；警卫人员、厨师、保姆等人帮他种植蔬菜；加上打猎的野鸡、野兔，生活上都能自给自足，薪金基本不花。可是，夫人田普买了块手表没有通过他，他从楼上追到楼下要打她，田普只好逃出家，去找政委唐亮上将求救。

（八）第一次劫难 许世友搞多中心

——被打成“倒许乱军”，后改为“反党乱军”分子

我是中共党员、革命军人，在“文革”中，可以说是“奉命造反”。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开展“四大”；是许世友司令员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在“文革”中，我自始至终遵照党中央“5.16”通知和“十六条”行事，从来没有打砸抢，从来没有整过人，从来没有违反党纪国法，只是写了一张反对不正之风的大字报。从此，政治陷害不断，被许世友、铁瑛等人，打成“倒许乱军”、“5.16”、“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打入大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四十多年来，始终被纠缠于“文革”的“旧帐”中；始终未能逃离噩梦的缠绕；始终未能逃出许世友、铁瑛“长官意志”的追杀，被整得死去活来，还要“株连九族”。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风暴。对此，毛主席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月11日，毛主席授意，党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造反派组织发贺电，祝贺他们的胜利。《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在这种形势下，1月23日，毛主席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左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至于后来许多军队支持了保守派也是无法预料的。

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对中央军委下达“八条命令”作了批示：“所订八条，很好，照发。”军委八条命令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

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一律不允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七、军以上机关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

1967年1月29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都主动停止了“四大”，等待着党委的新部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可是，政治部党委，一没有传达“八条”，二没有新的部署，做梦也没有想到等来的是大批抓人。纵览“八条”的全文，有哪一条规定，让许世友在军内外大批抓人？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凭着已往的政治经验，许司令以为事态又要像1957年反右派那样发展。‘八条命令’一出台，抓右派的时候到了，这场运动也该收场了。”李文卿这种说法，是给许世友违反党纪国法，违反中央“十六条”，在军内外大批抓人，镇压群众的严重错误，开脱罪责。

毛主席早已给许世友打招呼：“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许世友答：“主席指到哪，我打到哪”。可是，许世友违反了中央“5.16.”通知和“十六条”——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违背了“八条命令”第三条规定：“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毛主席要放手群众，许世友却一意孤行镇压群众，不经过军区党委常委讨论、决定，迫不及待在北京京西宾馆电话指挥，命令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在南京军内外大批抓人，犯了严重错误。最后，不得不给党中央写检讨。为此，中央发了[68]18号文件。这叫“主席指到哪，我打到哪”吗？

赵玉祥同志撰写的《柳营梦》回忆录中写道：

1967年1月28日，南京军区司令部首长办公室，长途电话呼唤着。林维先副司令员养病去了，鲍先志副政委因事外出，只有王必成副司令员留守主持军区日常工作。党委常委只有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一个人在家。许世友、杜平都在北京开会。王必成将军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个天大的问题，不经过常委讨论怎么能行？”又说：“真他妈的难办，要我在家里主持抓人！还叫我拿出虎劲来！”一句话才讲完，他霍地站起来，快步走向办公桌拿起内线电话直通北京。

“接京西，6楼18间！你是肖海吗？许司令在不在？”

“许、杜首长在小会议室，正在开会。”

“把电话给我转过去！”

“是！”党委办公室中校秘书科长肖海诚惶诚恐。

京西宾馆小会议室，一色的紫红丝绒小靠椅上坐满了人，有30多位。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张才千、刘锦平等都在座。各大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也在座。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王平，政治学院政治委员莫文骅，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也在座。身着白衣的女服务员，不时地把热毛巾和热茶放在一个白色瓷碟上，送到首长面前，轻轻地放在茶几上。

军委办公厅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聂济峰、路扬等也在座。他们不断记录，有时凑到杨成武跟前轻轻地说些什么，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老叶，这八条命令一定要坚决贯彻，抓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杀他妈的两个也不碍事！”许世友向叶剑英发话。

“群众运动你要正确对待，党纪、军纪要执行，但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家吃‘米子’，你要干你负责，我有话在先。”叶剑英严肃地回答。

“徐老总你表个态，你是军委文革组长，八条命令我双手拥护，不能放空炮，南京乱得一团糟，不抓人不行。我这个司令员讲话还算数不算数？打起仗来，你指挥还是我指挥？”许世友向徐向前问话。

“许军长，你的脾气还是在四军那个样子。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抓人！你火气小点嘛！”徐向前同样严肃地批评了许世友。

“你是老右倾，老豆腐渣。红四方面军的账，我们还没有算清！”许世友激

动了，冲着徐帅发脾气，右手的拳头几乎把茶几上的茶杯捶翻。

“杜平同志，你是政治委员，你要帮助他（指许世友）掌舵，不要把车开到山沟里去！”叶剑英对杜平说。

“请叶帅、徐帅放心，我们不会越轨，我保证，我保证。”杜平用清脆而松软的湖南口音，规规矩矩地回答叶剑英元帅的嘱咐。

正当许世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批准抓人，大批逮捕军队“造反”军官的时，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都一致赞同抓人。

“许司令员，你的电话，南京来的。”一位年轻的女军官轻轻地报告。

“田崽子，你给我去接一下，又是老虎来讲情！他妈的，他手软怕死！”南京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上校立即站起来，快步走出小会议室。

“王副司令，他正在发脾气，要我来接，你看行吗？”徐玉田回话。

“不行，非要他来不可！”王必成不耐烦了。

“是！”徐玉田毕恭毕敬，他同样怕王必成。

“许司令，王副司令电话，……有要紧事请示你，非要你接不可。”徐玉田抖声抖气地说。

许世友听说“有要紧事情请示”，这才忽地站起来走进电话间，徐玉田也跟着进去。

“你给我抓，通通抓起来！政治部那些乌龟王八秀才知识分子，不老实的一起抓起来。什么政治工作，见他妈的鬼。叫司令部来接管政治部。”最后，他又加了一句，“王六生（政治部主任）也是草包！”“叫王蕴瑞（司令部参谋长），蒋科（司令部军训科长）大胆干，一切我承担。”又说，“部队不够用，从 60 军调。179 师不能动，从 181 师调。你不要手软，你手软，你就给滚蛋！不要请示，也不要报告。”“什么？孙海云（政治部副秘书长）造反了？逮捕法办！一起抓！”“知识分子最坏，又尖又滑，不可靠。尾巴翘上天了，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连草帽也不给他们戴，政治部瘫痪了，那就干脆取消政治部。什么政治部，是造反部。通通抓，一个不留。”

徐玉田告诉肖海，叫他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用密码，等级核心机密，用党委的名义。要求师以上部队，接到电文后再以原电文发

给军区党委，声援军区党委，保卫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声讨造反派，镇压反革命！要大造舆论，明白了没有？

“是！马上就办。”肖海回答。

许世友居然能在非法大逮捕之前，弄出一份自产自销的假电报，发动部队大造政治攻势来声援军区首长，使抓人合法化，抓人是应野战部队广大指战员的请求不得已而为之的！包装得多么巧妙。

在二月大逮捕中，杜平政委的行政秘书杜荣上尉，张才千副司令的秘书刘东敏中校，王必成的机要秘书尹中元少校，军区党委常委保密员徐英杰中尉，全部进了监狱，享受过铁窗的滋味。许世友抓人的瘾头过足了，乱子也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1967年4月，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了，规定“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许世友大批抓人犯了严重错误。

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是军委总政治部批准的合法“四大”单位。

1967年2月，春节刚过，许世友命令王必成首先在政治部抓人。首批抓了宣、文、报的艾、方、洪、高四个人，并对抓人的事件要人人表态。新闻科讨论时一致认为：“‘四大’秩序本来很正常，是北京南下的军队院校‘杀气腾腾战斗队’冲击军区机关时说：政治部是‘池浅王八多’（此话是毛主席讲北京大学的），是‘一潭死水’，要搅一搅这潭死水，才把机关搞乱了。许司令突然大批抓人，不符合‘八条’精神”。汇报时支部问我：你是小组长，你对抓人什么态度？我说：“从小道听说的‘八条’，大家就自动停止了‘四大’，等待党委传达‘八条’和部署下一步运动，突然抓人是不对的。”其实，许世友早有指示：“谁反对抓人就抓谁！”第二批抓人更多了，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战士教科科长杨炳仁、新闻科副科长李少白和摄影记者施关彬等人。我根据小组讨论精神表态，反对抓人说了真话，是第三批被抓的。

不久，副秘书长孙海云，战教科科长杨炳仁、报社编辑洪期钧、文化部干事方泽甫被逮捕。后来扩大到秘书长卞庸中、青年部部长季遐年。被抓的军以上干部，有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少将（曾任陆军12军政委，李德生为军长）。后来扩大到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副政委鲍先志三位中将。许世友抓人抓红了眼。与此同时，后勤部、司令部也开始了大批抓人。军区总医院著名胸外科主任（专

家)沈威廉中校，中共党员，48岁，被许世友残酷迫害致死。沈威廉被逮捕不到一个月就死在八一医院手术台上，尸体上盖着的白布下面双手还带着手铐。实际上沈威廉并没有“造反”，只是替他人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你们去革命，我来顶替你们工作”之类的话而已。军区总医院是合法的“四大”单位，在许世友看来是不合他的“法”。

许世友搞“多中心”和封建专制思想，必然带着镇反情绪来对待群众，那有不滥杀无辜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事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帅当面警告许世友：“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家吃‘米子’”。徐帅也警告许世友：“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乱抓人!”

许世友打着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旗号，违背“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人不准调动一兵一卒”的命令，擅自调动野战部队60军181师，用来镇压群众。给部队灌输，南京军区机关有“反革命暴乱”的谎言。

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总政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宣文报开展“四大”；是许世友自己动员要“四大”单位人人都要写大字报。我写大字报，依理，依法都是对的。所以，我没有违反党纪、军纪、国法。倒是许世友自己，做事独断专行，助长了他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的霸道作风。不听从周总理指示，不听叶帅警告，不听徐帅劝说，违反军委“八条命令”的精神实质，撇开军区党委常委一意孤行，在军内外大批抓人，累及无辜的家属和子女，违反了党纪、军纪、国法。这是铁的事实。

南京东郊百水桥营房，原先是特纵后勤部的供给部所在地，成了“许记法西斯集中营”。没想到我一下车就遭到看守战士的枪托、拳头一顿毒打，从马路上一直拖打到房间里。我回头看了一眼战士打人的嘴脸，被一拳头狠狠砸在右脸上，打得眼睛直冒金星，几天吃饭都很困难。因为抓人太多，我被关押在没有天花板的马棚平房里。正值下大雪，棚内下小雪。睡觉翻身要叫“报告”，才敢把脸上的雪花抹掉。实在疲倦睡着了，看守用脚蹬床把你弄醒。看守战士换岗时退子弹、装子弹，立正、稍息、正步走，这就是许世友一手制造的“红色恐怖”气氛。我不得不起当年看苏联电影，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白色恐怖”气氛。白天只准双手放在膝盖上，背诵毛主席关于反革命的语录。那年天气特别冷，对面关押的人，要求原地跑跑步暖和一下身子，看守不准许。那人说了句：“你们这种搞法，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看守战士罚他原地跑步不让停下来，直到晕倒为止。

后来，武装押解秘密转移。押解时用多辆大卡车，每车有四名端着冲锋枪的战士端坐在车厢四方，“反革命”们被押上车坐在中间，一车大约有二十人左右。“许记集中营”由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李书和一手操办，他们精心策划，同车“反革命”们不能相互认识，可是我认出了同车的有当年一起跟随许世友赴海岛参加“四清”运动的前线歌剧团的张少楼等人。押解到那里？只有鬼知道！车厢四周用篷布蒙的严严实实。只有凭感觉，车开出营门往右是南京方向，往左是汤山、句容、宜兴和镇江方向，我对南京东郊一带地形太熟悉了。结果是出得营门向左转弯，是去汤山方向了。感觉过了汤山车没停，大约车开了两个多小时，下车一看，到小衣庄营房，这里距离镇江不很远。这种“法西斯式集中营”被称作“行政看管”。

五十天后释放。宣传部副部长吴甲申对我说：你是“小将犯错误”。事后才知道，军委下达了“十条命令”。

1967年4月6日，毛主席对林彪送审的军委十条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

《十条命令》规定：

“不准随意抓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南京军区不得已才大批放人。毛主席在河南省军区在抓人问题上的检查报告批示：“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可是，许世友不甘心，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的心目中，被抓的这批人已经被他“打入另册”。

1967年7月，武汉闹得很凶，毛主席在上海召见许世友。实际上毛主席要做他的工作，要他承认错误做检讨。杨成武说：“我去吧？”毛主席把手一拂，“你不能去，叫张春桥去。”在电话上许世友对张春桥说：“我有错误，在两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上，都作过检查。”又说：“我是司令员，我都作过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审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的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许世友当天被接到上海。推开客厅门，许刚见到毛的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地，一头磕下，嚎啕大哭。毛主席说：“莫哭，莫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换来了毛主席一句话：“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当然还有一句“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许从客厅出来，对杨成武说：“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谢谢你，老杨。”但事隔一年，1968年8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成“杨余傅反党集团”，余立金当场被捕。南京军区又一次掀起大揪“倒许乱军”分子的浊浪。许世友说：“这些人的后面有一根又粗又长的根子，他们的后台就是杨、余、傅！”许世友在毛主席面前，可以扑通跪地，泪流满面地求饶，但回过头来还是老方一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仍旧搞他的“多中心”，继续镇压群众！实足是个两面派人物。

1967年5月初，政治部调我到浙江永康县人武部参加“支左”工作。在金华军分区遇见政治部的人，才知政治部下来250名干部参加“支左”。因义乌县分成义乌、浦江两县，军分区要我去义乌人武部报到。人武部赵政委要我和陈荣安（《人民前线》通联干事）负责文教卫系统的“支左”工作，我主要负责文化系统。我和陈荣安住在义乌消防队楼上的两个小房间里。剧团女同志占多数，我规定，凡是女同志到我房间要求谈话的，要两人以上。听说文化馆的施馆长多次被斗，有自杀的念头，我几次找他谈心做工作，使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广播站余同志和越剧团、婺剧团的部分群众找我，说他们想成立“红大司”组织，和省“红暴”挂钩。我说：解放军“支左”的原则，不管哪一派，凡是正确的我们都支持，成立“红大司”群众组织是你们的权力。越剧、婺剧团都在演样板戏。越剧团的同志向我提出，要排练类似“义和团”事迹的“红灯照”，我大力支持。

金华的武斗步步升级，造成邮路不通，我们组织力量疏通邮路，保证了邮路畅通。听说江山县人武部政委死了，消息传来，赵政委怕出事，他对我说：“现在人武部没有威信了，你和陈荣安是南京军区下来‘支左’的，有事情你们好说话。”所以，赵政委有事外出，都要我跟着他，平时还要我在值班室值夜班。

1967年6、7月间，江苏“红总”、“八.二七”两大派武斗升级。我老伴参加的所谓保许世友“八.二七”派受压，在厂里被打，只好带着八岁女儿到义乌来避风头。此时，在杭州“支左”的《人民前线》记者陆时准来电话，要陈荣安立即去杭州开会。不久，又来电话，要我立即赶到杭州仁和路招待所开会。

在东阳县“支左”的，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的陈培光，约我一同到杭州开会。车到诸暨站时被“红暴”造反派拦截下车接受检查。看我的军官身份证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记者，说我是许世友派来镇压他们的，不让走。所以，到杭州时会议已开始几天了。

仁和路会议的起因：周总理批准浙江省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干部处刘干事写大字报，揭发南京军区政治部 250 多名干部到浙“三支、两军”的内幕。刘干事还到会揭发，说：“我跟罗晴涛主任到政治部干部部领受任务，部长杨映雪说，政治部调到浙江‘支左’的干部要控制使用，这些人员中，有的不能在东海、铁路沿线，这批干部政治部不要了。”刘干事说：“你们的档案里都有黑材料。”与会者听了非常气愤，一致认为，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下来“支左”，没想到，干部部竟然在后面搞这些名堂，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致要求平反。会议上要我诉说“行政看管”被毒打、虐待的情况。所以，成立了“批资总部”，会上选出：孟祥海、王元仁、艾汉美、顾少杰、陈培光、高连章、陈荣安、夏继诚、陈时秋等九人为勤务员，分工我负责平反小组的工作。

1967 年 10 月初，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政后平反小组，联合走访南京军区党委，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三位中将出面接待。走访者要求：南京军区党委借“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作出解释。三位中将一致表示：大批抓人“行政看管”是错误的，受害人要求平反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等许司令、杜政委回来后才能确定。

1967 年 10 月中旬，南京地区的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军区司政后等部门，被抓的人最多，成立了“告状团”。10 月 18 日“告状团”联合司政后机关受迫害人员的代表，要求王必成副司令员批准成立“平反小组”，在党委领导下，监督和帮助进行平反工作。

10 月 21 日在 AB 大楼，第二次走访军区党委，要求军区党委在军内外大批抓人做出解释。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和鲍先志副政委接待听取意见。王必成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了解。军区党委犯了错误，你们受了委屈。现在同志们要求平反，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本人在今年二、三月份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

王必成，号称“王老虎”，就是当年歼灭国民党王牌军 74 师的。蒋介石的干儿子张灵甫不可一世，也是在王必成手下见阎王的。孟良崮一战威名天下扬。我们特纵文工团那个时候经常唱：“孟良崮的树儿青又青，孟良崮的花儿岭上香，孟良崮是个好地方，孟良崮上 74 师全部消灭光！”南京军区文化部长吴强编写的电影《红日》，就是讲的这个故事。

鲍先志中将，原先是军委总政组织部长，平易近人，他曾在 1967 年 11 月接见军区后勤部走访人员时，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他说：“1934 年长征途中，由于张国涛的叛变，株连了一大批干部。我是四方面军的，也受到牵连，被关了起来。一直到 1942 年才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组织上给我平反，向我道歉。时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个时候全国尚未解放，又处在战争年代，拖了八年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现在很幸福，全国统一，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用不着等八年。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北京，同志们受了冤屈，中央立即纠正，你们都幸福啊！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给你们落实政策的，军区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五个多月后，鲍副政委的这番话成了“倒许乱军”的罪证。

许世友说，王、林、鲍，史、杜、孙、赵，是我们的黑后台。于是，“保许派”一批人呼喊：“打倒王林鲍，揪出黑后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许世友又说，我们都是刘、邓、陶，彭、罗、陆、杨，杨余傅的小爬虫。凡是一串串“坏人”出来，都是我们的“黑后台”。

1967 年 10 月，毛主席、周总理派军委办事组政工组负责人、空军副政委刘锦平将军和总理秘书宋皋同志，带领工作组赶赴江苏南京、无锡等地阻止农民进城，制止可能暴发的南京、无锡地区大武斗。10 月 6 日晚 8 时 10 分，刘锦平在南空接见南京军区机关直属队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有关人员。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主持接见。

刘锦平说：“我和宋皋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是遵照总理的指示，来到江苏南京的。总理给我们的任务是促进江苏的革命群众组织消除分歧和对立，尽快地联合起来。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的时候，说 7、8、9 三个月形势大好，江苏也不例外。明天，我们就要回北京去了。

可是，我们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在北京临走的时候，总理对我有交

代，要我来看看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们，听听你们的意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很关心你们啊！任务不完成，我们不能走。所以，把同志们请来，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我还要把意见带回去，向总理汇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第一个发言是后勤部锋锐，他说：“今年二月，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军区首长许世友的错误，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七个月。仅司政后机关直属队被逮捕关押 340 人。师以上干部被逮捕、批斗、停职的 20 人。其中有孙海云、赵树湘、等人。83 医院临产孕妇也要弯腰接受请罪批斗。总医院胸外科专家沈威廉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还带着手铐。总医院院长刘万祥和上海 916 油库政委邓启樵被打成后勤的‘刘、邓’。邓启樵在集中营里被几个武装战士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总医院护校入伍不到一年的学员，十八、九岁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开除军籍押送回家……。”汇报进行到凌晨 2 时 15 分。

刘锦平作了长时间的讲话。他说：“同志们讲得很好，很深刻，很生动。你们在座的都会写文章，很多是秘书。把这些情况分门别类写成专题材料，文字不要太多，要简明。我们保证把这些材料带到北京，送到毛主席那里，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我们天天都有飞机很方便嘛！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一定把同志们受到的委屈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又说：“许世友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他现在在养病，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创造一些条件，……。我们希望他能取得群众的谅解。”

毛主席英明果断，严令许世友去大别山“养病”。

1967 年 11 月 13 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司政后平反小组代表组成“告状团”奔赴北京。周总理接见了“告状团”21 人，被安排在西苑旅社住下。12 月 8 日，中央决定用“学习班”形式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南京军区在家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都接到军委办事组通知：上北京参加“南京军区学习班”。

周总理亲自领导“南京军区学习班”。总理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办好这个学习班。群众对领导有意见，要让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在学习班上把意见都谈出来。军队的问题要在军内解决，不要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上搅在一起。要顾全大局，保持部队稳定。”总理说：“这个学习班由军

委办事组负责组织实施。学习班成立领导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中央联络员联系。”

总理决定学习班领导班子由 10 人组成：杜平、梁揖卿（27 军政委）、赵俊（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王挺（军区后勤军需部长）、艾汉美（军区政治部新闻科记者告状团成员）、李英武（南京海军学院学员告状团成员）等人。12 月 13 日下午 1 时，21 人“告状团”被接到京西宾馆小会议室。

主席台依次就座的为军区司令部军训科长蒋科，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秘书科长肖海，军区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钱永清，军训部参谋袁刚。另有周总理特请的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赵树湘。“告状团”21 人也在主席台就座。这个会议对“告状团”来说，更是春意浓浓。广大受许世友迫害的干部、战士、文职人员、家属等，翘首以待，关心着北京京西会议，等待着真理的降临，迎接着彻底平反的佳音。江苏、安徽、浙江省军区，上海警备区，舟嵎要塞区，五个军以上机关都有人被逮捕关押、批斗，劳改、清洗出军队。在北京期间，周总理多次接见“告状团”，接见过了夜 11 时，总理同我们一样发一包小饼干，喝开水吃饼干。

（九）常委作检讨 司令转脸就推倒

1967 年 12 月 26 日，毛主席寿辰，中央联络组徐、李两位秘书来西苑旅社，告诉我们好消息。两位秘书带来了《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和党中央对“检讨报告”的批示（草稿），要我们学习讨论。12 月 31 日，下午 4 时 17 分，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解放军团以上干部，“告状团”全体成员也参加了，见到了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1968 年 1 月 28 日，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最后一次接见江苏群众组织代表和军内“告状团”。总理全文宣读中央 [68] 18 号文件：《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和“检讨报告”全文（15 页）。摘要如下：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 [68] 18 号（摘要）

党中央批示：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走

的，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

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作如下检讨。

一、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镇压了革命群众。十条命令下达后，又迟迟不检查、不平反。……把群众的某些革命行动，看成是“坏人暴动，右派翻天”。……

八条命令下来后，我们错误地认为“时机到了，有权抓人了”，于是就带着“镇反”的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在南京，在军区内部，我们怕把军区领导机关搞乱了，把部队搞乱了，没法保卫文化大革命，有了情况，没法打仗了；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失掉尊严，丢了面子。对群众给我们的指责和体罚，又思想不通，情绪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反革命”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帽子和罪名，进行了压制和镇压。二、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逮捕 22 人，开除 8 人，看管、隔离反省的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以整顿机关、整顿纪律为名，指名检查，重点批判，搞“请罪”活动，大整革命群众，一度造成恐怖气氛。

更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夭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风雷激”，说成是反动组

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搞“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视……。

十条命令下达之后，我们却错误地认为，错误不大，迟迟不作检查，以致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没有为那些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以及这些同志的家属子女，设身处地想一想。因而，平反工作进行得很慢，很不彻底。

我们所以犯错误，……我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功臣自居，靠老本吃饭，既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架子很大，官气很重，往往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动不动就发脾气，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

我们的检讨还很不深刻，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

总理宣布：“江苏和南京军区的问题圆满解决了，希望江苏三派代表回去之后，搞好大联合，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军区的同志回去之后，在南京军区党委、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领导下，搞好战备，搞好‘三支、两军’工作。”最后，总理笑嘻嘻地大声宣布：“我代表党中央，为你们平反了。”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代表们人手一册。总理为我们平了反，大家十分高兴，立即回到第一线，投入繁忙的“三支、两军”工作。

1968年3月，许世友一意孤行，推翻了周总理宣读的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否定军区党委向中央作的“检讨报告”，继续搞他的“多中心”，又开始整人了。南京军区党委决定：司政后机关；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各部；三团二队；驻南京军事院校全体人员。除机关少数人员坚持战备外，其余人员分别隔离在南京东郊百水桥某师营房（机关）、城西湖农场（三团二队）、南京海福巷营房（工程兵学校）、南京岔路口营房（步兵学校），……。举办大规模“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隔离“学习班”并不是学习中央[68]18号文件，而是推翻[68]18号文件：党中央的批示和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

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我被调到“三支办公室”，举办各县人武部学习班，解决派性等问题。许世友采用釜底抽薪的伎俩，把在浙江“支左”的250多名干

部，调回南京军区办所谓的“学习班”。李书和怂恿前线歌剧团的保许派，章兆琪（“四清”时和我一个组）为头儿的一批男女到政治部宿舍三牌楼大院，对浙江刚回南京的人实行纠斗、抄家。到我家对我实行纠斗、抄家时，我的小儿子刚满二岁，被他（她）们的粗暴行为吓得哭叫起来。第二天，政治部命令 250 多名干部集中，上五辆大卡车，向城东方向出中山门，车队经卫岗前线歌剧团驻地时遭到阻拦，早已守候在那里的歌剧团保许派一批人，气势汹汹地爬上车来，点了十几个人的名字，命令他们立即下车。当点到我的名时，由于宣传部傅涛有意掩护我，并说：“他已经下车了”，我才免去这一劫。据回来的人讲：他们被揪到歌剧团礼堂开批斗会，会上要低头认罪，背诵毛主席关于敌我矛盾的语录，批斗会上口号声不断，乱作一团。这是李书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又一罪证。

百水桥营房，就是当年的“许记法西斯式集中营”所在地。现如今变成了“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分“南政班”和“舟嵎班”。“南政班”军师以上学员：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和政治部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吴健、副部长赵树湘，保卫部长何林兆，青年部长季遐年、副部长孟祥海，群工部长丁华国等人。“舟嵎班”军师以上学员：舟嵎要塞区第二政委铁瑛、第三政委丁锐、副司令员沈萍（原军区炮兵参谋长，喜欢摄影，和我很熟）等人。“舟嵎班”在马路对面，有洗澡堂，我们去洗澡时，有一次见到铁瑛，没精打采在晒太阳。

“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整就是八个多月。史景斑和部长们，“批资总部”勤务员等人是重点的重点。凡是重点，不能回南京，不能离开营房一步。“学习班”上，大会批小会斗，被整得精神恍惚不可终日。史景斑少将最惨，八个多月来，要他顿顿饭后打扫大食堂，夏天满头大汗，冬天一身冷汗。许世友不时来训话。有一次，他杀气腾腾地说：“我在毛主席那里备了案的，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林副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我到北京，去看望林副主席，你们要打倒我，中央要提高我。”很显然，这是许世友自己伪造的先斩后奏生杀特权，用来吓唬老百姓的。

“学习班”中途，许世友命令 20 军在浙江省革委会“支左”的军代表，朱后年、孟昭玉速来“南政班”接受批判。许世友还不解恨，又命令 20 军沈云章

副政委速来“南政班”。组长李静波对我说：“20 军沈云章要来我们组。”要我让出下铺，睡上铺。后来不来了，不知何故。

毛主席指派 20 集团军、空五军，在浙江省和杭州市，参加“三支、两军”工作。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听从周总理的指示。浙江的两大派，“省联总”、“红暴”，毛主席、周总理都有评说。毛主席说：“红暴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张永生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总理还要周建人介绍张永生入党。

1967 年 2 月 12 日要召开批判江华大会。江华警卫员把江华秘密送到张永生那里，张把江华藏在美院的小楼上，并报告总理，说：江华生病了。总理考虑到安全问题，派飞机到嘉兴机场接江到北京治病，要张亲自护送。张把江华从楼上背下来，江跪下来向张道谢。张冒着风险，在到处戒严的情况下把江护送到嘉兴机场，才知江华是装病。由于张永生保了江华，使江华在“文革”中没有受到过批判。可是，江华当上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竟然恩将仇报，把张永生打成“现行反革命”，冤狱 33 年。张坚持不穿囚服、不剃光头，被狱警用电警棍强行塞进嘴巴，致使满口牙齿被打光。现如今，无工作、无住房，弄得家破人亡。这是真实的历史。

阴险毒辣的学习组长李静波，突然召开全组会议，传看一张废报纸，上面写了“无寿无疆”四个字，我一看是我的笔迹。宣传部秘书张玉琪记录，逼我交代是攻击毛主席。在那“三忠于”、“四无限”狂热之时，突如其来的政治诬陷“攻击毛主席”，好像天要塌下来了，脑子一片空白。当时，我被整得精神恍惚、记忆力衰退，怎么也想不起“四个字”的原由。天天逼我交代，逼得我快要发疯了。由于心里万分憋屈，常常躺在草地上流泪，真想一死了之。

“南政班”有人自杀了，李书和在早操时宣布：“畏罪自杀，开除党籍！”了事。想来想去自己死了是解脱了，得到的是“畏罪自杀”，更苦了亲人们，才打消了死的念头。其实，他们早知道“四个字”是怎么回事：讲师冯勃从南京回学习班，说他爱人单位有人写大标语时把万寿无疆错写成“无寿无疆”被打成“反革命”。事后，《解放军报》驻军区记者蒋乃修问我，冯勃说的是怎么回事？因忌讳说出“无寿无疆”，我就在废报纸上写了“四个字”给他看。事隔数月后，就发生了上述一幕。到北京学习班，高岳言告诉我“四个字”的真相，说：“幸亏你想不起来没有承认，蒋乃修给你作证也不行，反而要审查他，学习班还作了

要逮捕你的准备哩！”许世友说他有生杀特权，说不定让他给毙了也难说，许世友早就想杀人了。

1969年3月，百水桥“南政班”、“舟嵬班”、“上警班”，党中央命令一锅端到北京办学习班。“学习班”领导早就知道这个命令，突然宣布我被“解放”，准许我回南京三牌楼大院休息几天，老伴见到我直流眼泪。她说：“八个多月来听不到你们的消息，看你整个人都畏了，人有点浮肿。”我说：“能够活着回家就不错了，在‘学习班’好象被扒了一层皮的感觉。”

“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人马浩浩荡荡乘火车北上。在南京站月台上传达了许世友、杜平的指示：“到北京好好学习，一切听党中央的。”在车上真有被解放的感觉。车到天津站时，早有预定好的“狗不理”包子和高汤等着大家吃。车到北京站，月台上有“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工作人员，打着横幅欢迎“毛主席请来客人”。饱尝“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残酷折磨的人见了此情此景，眼泪潸然而下。还是那句话：“金水桥暖，百水桥寒！”

中央办的学习班，在总后勤部大院。中央联络员说：“学习班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计划经毛主席圈阅”。联络员传达了毛主席批评许世友搞多中心的指示：“‘倒许乱军夺权’的提法是错误的，是多中心论。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党中央”。毛主席又说：“学习班要办成和棋班。”联络员说：“你们都是党中央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一块钱。”那时候的物价很便宜，一桌十个人，可以吃到海鲜。

“倒许乱军夺权”的说法，被毛主席定为“多中心”的错误口号受到批判。史景斑副主任挨批的位子，让给了另一位专门会整人的副主任符确坚，他成了许世友推行“多中心”的替罪羊。

毛主席对待两派，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法，“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学习班请来了南口机车车辆厂两大派代表，讲述消除派性的故事和经验。其中一位女工讲述她两口子不是一派，家里的东西都画上派的记号，对方绝对不能动。学员们听了都哄堂大笑。

中央办的学习班，要大家不同观点的同志搞“一对红”。在百水桥挨整的同志，为了顾全大局，都是高姿态，没有为难整过人的同志。经过四个多月学习，消除了派性增强了党性，销毁了百水桥学习班整人的材料，增强了团结。五一节

在天安门广场观看焰火。5月18日，游览长城。5月1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我在楼下右面18排，舞台就在眼前。领先出来的是陈老总，除个别中央领导外，都到齐了。我的位置看毛主席很清楚。

回南京后，李书和立即把北京学习班的情况向许世友汇报。按理说，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应该体会毛主席对他的苦口婆心。但他仍是反其道而行之，许世友又一次搞他的“多中心”，不承认中央学习班消除派性的成果。立即在军人俱乐部召开政治部机关大会，拍桌子、瞪眼睛，大骂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是个特务；大骂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是个骗子，廖政国说他自己从小放牛，其实是个中学生；大骂政治部新闻科长孙浩月，在中央学习班说什么“金水桥的饭好吃，百水桥的水难喝”。听了许世友大发雷霆的讲话，一句话：准备“炒冷饭”、“翻烧饼”！

许世友就是这样说话不算数的，他早忘记了我们离开南京时，在月台上传达他和杜平的指示：“到北京好好学习，一切听党中央的。”结果，还是搞他的“多中心”，一切听许世友的。

政治部通知，各人回“四大”前的工作岗位。我立即下部队到长江大桥、中山陵别墅的警卫部队等三个单位采访；到南京（镇江）炼油厂，采访一位长年驻厂军代表的先进事迹。《解放军画报》以《八路军作风代代传》为题，很快就刊用了。

1969年8、9月间，许世友又一次大批清洗干部。把受到毛主席批判的“倒许乱军夺权”提高为“反党乱军夺权”。开始大批处理所谓“倒许”的干部。命令我一周内到江苏省军区政治部报到，正要起程又突然作复员处理。宣传部副部长吴甲申找我谈话：“你父亲是‘刘、邓路线’上的人，在‘牛棚’受审查，今后填表不能填‘革命家庭’了”。此时，姑父郎玉麟（湖州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原单位山西省交通厅专案组找我谈话，说我姑父不是抗日的，是“土匪部队”，要我提供情况。我说：“海军中将彭林是老红军，是‘郎部队’的党代表，难道他也是土匪？”我的父辈们，都是“叛徒”、“土匪”，我的日子还会好过吗？

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出版了张爱萍将军题写书名的，“一个老红军和他的战友在浙江抗日的故事《潜龙归海》”一书，写的是，抗战时期发生在浙江大地上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2006 年 12 月 17 日，晨 7 点 20 分，姑父郎玉麟与世长辞，享年 96 岁。

写诗一首缅怀姑父：七律·忆姑父郎玉麟

浙西淮水逝悠悠，惊闻噩耗热泪流。

游击浙西抗日寇，纵横苏鲁歼蒋魔。

坎坷一生亮高风，更留肝胆沥丹枫。

九十六年苍松劲，潜龙归海战旗红。

侄儿 陈时秋 2006. 12. 19.

（十）借复员之名 许再次打击报复

1969 年 9 月，我被非法复员处理。为什么说是非法呢？

1980 年 1 月，中央发了 [80] 3 号文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错误地将 41 万军队干部做了复员处理（随同回籍的家属约二、三十万人）。其中还有 8 万多名经受过革命战争的考验，他们为党和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

军委总政规定：复员干部对象是连、排两级，不包括营以上干部。建国前参军的更不属复员之列。我被非法复员处理，完全是许世友、田普夫妇干的。田普原在江苏省级机关工作，行政 17 级，许世友让她穿上军装，还非法当上了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没有任命），部长杨映雪都要听她的指挥。这和封建制度“封妻荫子”有什么两样？表现了封建家族式的专制，党的干部被许世友夫妇当作囊中之物。把所谓“倒许”的都作复员处理，背离了党的干部政策。这是命令我到江苏省军区政治部报到，又拉回来作复员处理的主要原因。

人们决不会知道，就是这位女副部长，1967 年秋天，给中央文革写了揭发信，说谭震林 1932 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揭发信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多长时间，供出了什么等等，写得有板有眼。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总理。总理对这封信感到震惊，很是重视。随后，由任中央专案审查组组长周恩来、副组长陈伯达签名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副主席林彪，写了一份关于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的请示报告。毛、林都圈阅了。这就是许世友夫人、“许办”主任兼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干的“好事”。田普诬告谭震

林案以及搞“以许划线”造成的很多冤案，按照邓小平“三种人”的标准，为什么不追究？共产党人难道也不能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时并没有人逼她“说违心话”诬告谭震林！此事，如果发生在我的头上，可想而知，许世友早把我逮捕法办、牢底坐穿了！

复员规定，那里参军回那里去。我是浙江安吉县人，老家无家可归，父亲一家七口都在北京市工作。最后，政治部派人把我安置在《杭州日报》社，四级工工资 47 元，以工代干，任摄影记者。

我复员时，除了保留下一个共产党员外，其他通通都被 6000 元复员费卖断了。我含着热泪领出复员费。想来想去是许世友夫人田普穿上了军装，我才被他们扒掉军装。虽然脱了从小穿着的军装，工资少了一半多（原 96 元），但我仍然拼命地工作，想把部队整人的事情尽快忘掉。

与此同时，同在新闻科工作的艾汉美同志是最后一个被复员。艾汉美原是 12 军李德生军长身边的上尉作训参谋，也同我一样被指名调到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科任文字记者。保卫部副部长李书和，秉承许世友的旨意，对艾汉美的复员安置设下了重重障碍，欲置人死地而后快。艾汉美撰写的《石头城的风雷》，其中写了一段被复员安置的遭遇经历，读后令人愤慨，许世友哪有个共产党人的气质？！活脱脱一个南霸天。现摘录如下：

到北京，一切听中央的；回南京，一切听许世友的。

到北京，许世友做检讨；回南京，他就翻案。……

从一九六九年八月起，我和我的战友们，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地复员回乡了。我们尽管眼含热泪，满腔愤慨，默默不语，心照不宣，但我们在政治上，人格上，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说走就走、不说二话、不讲价钱，走的昂首挺胸，干脆利索。新闻科第一批离开部队的是陈时秋、施关彬，他俩回浙江故乡去了；

第二批离开部队的是刚从大学毕业，分到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科工作不久的黄灿霞、文传梅，他俩回江西老家去了；……

组织上宣布我复员的第二天，就派了一位机关干部，火速赶往我的故乡——湖北省。他……每到一处，打开我的档案一看，我的老家是在湖北省红安县里的一个偏僻山村。得到同样的答案：城市里不能安排，只有到农村去。……自那

位机关干部带回的答复后，军区政治部的有关部门就把我“除名”了。从六九年十月份起，停发我的工资。……实际上，我对他们也不抱任何幻想，今后的路怎么走，一切就是要靠自己了。

我自己的安置问题，我亲自回故乡去闯一闯。我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快二十年了，……只有个“穷亲戚”，作为临时“落脚点”。就是这个“穷亲戚”以极大的热情，给我当向导，托熟人，亲戚托亲戚，朋友托朋友，四处求援，多方找关系。……尽管如此，在我人生遭难之时，能够得到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的真诚相助，我的内心深处十分感激。……

回故乡安置的路走不通，另想办法。我爱人朱德美所在工厂的周厂长，原来对我有所了解。他听到我回湖北安置工作遇到困难的消息。就主动地对朱德美说：“我们厂非常需要老艾这样的干部，如果他愿意，我就请求上级机关把老艾要过来。”

我们非常感激这位周厂长的一片好心。本来，复员干部随同爱人单位安置，这是我党的一贯政策，利国利民，这次很多复员干部就是随同爱人工作单位，在南京安置下来。开始，我是否在南京安置，有所顾虑：第一，我们身份特殊，恐怕过不了许世友这一关；第二，离开南京远一点更好，免得以后遇到风吹草动，又带来麻烦。没有想到回故乡安置这么困难，如今不得不走这条路。但这条路又能否行得通呢？过了几天，周厂长带着苦笑给我们传来了失望的消息：他给上面的报告被打了回来，上级的批示是：“此人不能留在南京。”

这条路又行不通了，只好再想别的办法。我爱人老家是江苏宿迁县城。朱德美先请她哥哥帮助联系了一下，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接收安置。当朱德美连忙赶到那里时，宿迁的有关部门却“变脸”了，他们刚接到上级电话指示：“艾汉美不能在宿迁安置。”这一来，我去宿迁的路也被堵死了。

接连碰鼻，使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我安置的道路上，背后有一只“黑手”在盯着我的行踪，操纵我的去向，我走到那里，他们就把那里的路堵死。……

军区政治部被复员的同志，行动迅速，先后都已离开部队，各奔前程，家室也纷纷搬出军区大院。唯有我的安置去向，“八”字还没有一撇，很多关心我的同志为我的处境捏了一把汗。军区政治部已经停发我的工资，不只是我没有生活费了，我们全家人面临着“断炊”的危险，为解燃眉之急，我先从后勤部的老赵

那里借来人民币 400 元，熬它一段日子再说。有一天，我在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碰见宣传部的傅涛少校，他热情的鼓励我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眼前的这点困难没啥了不起！想想我们在百水桥‘学习班’过的什么日子呀！差点儿连命都没有了，我们还不是挺过来了！要有信心，老天爷总会给我们出路的！”……

毛主席说过：“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九月份宣布我复员，十月份就停发我的工资。没有工资，就等于切断了我的活路，也威胁到我们全家人（三代九口人）的活路。……没有想到，更“损”的“招数”还在后头。

六九年十月下旬，军区政治部的行政部门通知我，要我尽快把家搬出政治部家属大院。我向他们提出：“我的安置去向，尚无着落，我的家又往哪儿搬呢？”得到的答复是：“要你们搬走，这是上面的指示，你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军的成员了，就不应该住在部队营区，不应该再享受军队的待遇。”他们还说：“城市里不能安置，就到农村去嘛！”……这军区家属大院，肯定不是我们的容身之地，安身之处。再待下去，麻烦会越来越多，迟搬不如早搬。……

第二天，朱德美就去向他们厂的周厂长如实反映情况，请求厂里给我们安排临时居房，帮我们度过难关。周厂长听说我们被“扫地出门”，寻求“避难所”，深表同情，非常爽快地说：“没有问题，这个困难可以帮你们解决一下，把家搬到厂里来”。厂里行政管理部门当即给我们安排一套职工宿舍，并配备相关的桌椅，床铺等家具。给我们的子女就近安排上学。在我们全家遭难之际，得到厂里领导及职工们如此热情、宝贵的紧急援助，真使我们感激不尽。……

……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不对！我们在灾难面前，不是“同林鸟”，而是同生共死，同呼吸、共命运的患难夫妻，是同心同德，共度难关的战友。

……我深感内疚，连累全家，耽误子女上学，但又非走不可。此时此刻，我和朱德美就用自己“面对困难不低头”的坚强意志影响子女；同时，结合我们自身童年时代的艰苦经历，既激励自己，又教育子女。解放前，我五岁起，跟着父母四处逃难，逃日本人的难，逃国民党军队的难，家里一贫如洗，靠借债度日，又要逃高利贷债主的难，远走他乡，过着流浪者的生活，根本无钱上学，直到解

放后，我靠人民助学金，才有可能读到初中。朱德美老家更穷更苦。她祖父讨饭出身，母亲给地主家当了十多年使唤丫头。由于她家没有一分土地，没有一粒粮食收入，她从很小就跟着母亲四处挖野菜充饥，摘树叶当口粮，凡是能吃的野菜、树叶，她都吃过了，她家常年靠收拾别人土地上剩余的麦子、豆子、红薯、高粱过日子，常常是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有时一天两天没进一粒粮食，就靠喝凉水充饥，饿得头昏眼花腿发软。她身上的单衣，棉衣全靠救济，补丁擦补丁。……回想我们的童年，真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对照过去，看看眼前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离开军区家属大院之后，按照常规，我被复员处理，一切复员手续都已办完，人也走了，家也搬了，可以说，我和南京军区已经“一刀两断”了，互不相干。

但是，许世友不答应，我们家搬到工厂里之后，他还不放手，不罢休。

我们刚到厂里不久，军区即派人跟踪而来。一天、两个身穿便服的部队干部乘坐一辆黑色小轿车，找到厂里保卫科。他俩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该厂保卫科干事陈福庚、何立两同志很客气地接待他们，问：“你们来我厂有何事？”那两个干部说：“最近，我们军区政治部有个复员干部，叫艾汉美，听说把家搬到你们厂来了”。

“是呀！他是我厂朱德美同志的爱人，刚搬过来”。

“这不行！他是军区政治部的造反派一号头头，犯有严重错误。军区领导决定他复员，就是要他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改造。”

“你们有部队介绍信吗？”

“没有”。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有正式文件吗？”

“也没有”。

厂保卫科的陈、何二同志，感到万分惊讶，仍然耐心地说：“你们既无介绍信，又无正式文件，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的话？”“再说，你们是军区系统，我们是地方工厂，你们也无权干涉我们厂的事呀！”“你们说老艾犯了严重错误，那是部队的事，现在他复员了，成了老百姓，即使他是地、富、反、坏、右，没有判刑，没有坐牢，也要给他出路，他是我们厂的职工家属，在我厂安家，有什

么不合适的吗？”

那两个干部又说：“我们是部队领导派来的，希望你们厂配合一下”，“我们部队领导的意见，你们厂的朱德美也要随同艾汉美一起下农村，他们全家都要下农村”。

这番话把陈、何两同志说得火筋直冒，大声说：“我们厂的朱德美，老家世代贫农，本人共产党员，表现很好，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竟然要她随同老艾一起下农村，还要他们全家统统下农村，这是哪一家的政策？……”。

越说越生气，干脆把那两个干部轰走了！南京军区政治部的那两名干部碰了一鼻子灰，还不甘心。过了几天，那两个人又来了，仍然是穿着便服、开着黑色小轿车，似乎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一次，厂保卫科的同志，看到他们还是没有带介绍信，感到迷惑不解地说：“你们是堂堂的大军区领导机关，你们所谈的又是关系一家人命运、前途的大问题，为什么不带介绍信？”

那两人吱吱唔唔，不明说。

“对不起！你们没有介绍信，我们不便接谈”。厂保卫科的同志只好“关门”，免谈。

这时，朱德美听说许世友又派人来了，立马往厂保卫科赶。边走边喊：“许世友要逼我们全家下农村，我们究竟犯了什么法？”

军区政治部的那两个干部，听到朱德美的喊话声，坐不住了，连忙起身往外走。朱德美看到他们两人离开保卫科了，就说：“别走嘛！你们不是要我们下农村吗？那我来与你们当面谈”。那两人装聋作哑没听见，一声不吭，一头钻进黑色小轿车，灰溜溜地跑掉了！……

王昊同志一封信，救了我们全家的命。

我的家暂时有了“避难所”，但是，我的安置出路又在何方？仍然是个未知数，南京、江苏这块宝地，我是无路可走了，只有另到别的地方去找出路。许多关心我的同志和朋友，帮我想办法。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卞庸中，听说我复员安置遇到“麻烦”，既感到气愤，又为我担心，他就主动地写信给他曾经工作过的浙江绍兴军分区，帮我联系“去向”。因人事关系发生变化，没有联系上。

……中国尽管地域辽阔，却找不到我的立足安身之地。我这个参军近二十年的解放军干部，转眼之间，变成了中国七十年代的“下岗老兵”、“失业军人”、

“无业游民”。……我没有工作单位，就没法上“户口”；没有“户口”，就不供应“粮、棉、油”，不供应副食品及生活用品。这样，不只是我一个人难以生活下去，而且直接威胁到全家人的生存。原来，全家人的生活开支，主要是靠我的工资收入负担，现在只有我爱人的微薄收入（每月工资三十多元），那怎么承受得了？即使给我补助了一笔复员安置费四千元，如果坐吃山空，那也无济于事。

正当我一筹莫展，面临“山穷水尽”之际，一个意外的转机来到了。

一天，我在南京山西路口，迎面碰见了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一位科长，名叫王昊，他一见到我，十分热情地问我：“老艾，听说你复员啦，安置在哪儿？”我回答：“感谢您的关心，还没有找到安置的地方哩！”

“你是湖北人吧！不能在武汉找个合适的工作吗？”

“我当然希望安置在武汉，我也去了武汉，可是我在哪里没有熟人，没有门路，进不去呀！”

他接着对我说：“你别着急，我来帮你找个关系，或许有点帮助。”

“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

他说：现在武汉市的一把手，市革委会主任叫方铭，是空降十五军军长，他和方军长曾在二十军一起工作多年，相互很熟，他同方铭同志的爱人还是同乡。王昊同志提出：他直接给方铭军长的爱人写一封信，交给我带到武汉去找她，请她帮帮忙。

第二天，王昊同志把写好的信交给我，并鼓励我说：“天底下的路宽得很，我不相信许世友就能一手遮天！他的手再长也管不到武汉去！”

我接过王昊同志写的信，连声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当时，这封信就像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我真的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带着王昊同志写的信，兴致勃勃地赶到武汉，当天下午，顺利地见到了方铭军长的爱人，把王昊同志写的信交给她。她看过信后说：“我们和王昊同志是老朋友，信中所说的事，我会尽力帮忙”。我又把自己的一份“干部履历表”交给她，让她了解我的基本情况：我从十七岁入伍，十九岁入党，三年军校生活，十年作训参谋，六年新闻干事，多次立功受奖，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我的历史，家属及社会关系没有任何污点。

后来我了解到，方铭同志的爱人是在武汉市革委会政工组工作。她利用一次

会议机会，找到武汉市“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负责人，……同意我在武汉安置工作。一九七〇年元旦之前，我被分配到武汉市的一座大型化工厂。元旦一过，我到厂里报到，厂里领导一看，我是从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科复员到地方上来的，非常高兴，当即决定我被分配在厂宣传科，专门负责宣传报道工作。……厂里还答应：连我爱人及全家子女，一齐从南京迁到武汉来，分配居房，安排爱人工作，子女就近上学。

此次我到武汉，一路顺风，马到成功。几个月来，我的复员安置之路，何等艰难曲折，有时波涛起伏，有时恶浪翻滚，终于赢来了“峰回路转”、“绝处逢生”的局面，悬在我心上、我们全家人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我带着喜讯，返回南京，全家人欢天喜地，特别是孩子们兴奋地跳啊！叫啊！“我们要回湖北老家了！”“我们要回武汉了！”

我爱人厂里的领导及职工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表示祝贺，为我们高兴。“饮水思源”。面对这一喜讯，我们全家人不能不想到王昊同志的信。在我们全家被许世友逼到山穷水尽的时刻，得到王昊同志这封信，该是何等及时！何等珍贵！……

这封信是我们“久旱之后的甘露雨！”

这封信是我们在危难关头的救命信！

与此同时，我们全家人也不能不联想起许世友、李书和，几个月来是如何费尽苦心，不遗余力地断我出路，断我活路的所作所为，该是多么可恶！多么可恨！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和我爱人专程前往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同老朋友道别。又碰见了宣传部的傅涛及政治部的许多同志，他们十分惊喜，担心地问我：“几个月没有见到你，你怎么样啦？”有的同志好奇地说：“某领导在大会上宣布，艾汉美四处碰壁，走途无路了，反许世友的人不会有好下场”。“造谣可耻”！我哈哈一笑，“大家看，我这不是活得好好地吗？有的人确实是要把我们置于死地，恨不得把我们全家斩尽杀绝，这是痴心妄想”。我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在武汉安置的情况，同志们听了非常高兴。有的连声说：“好！好！！好！！！”“这正是得道多助”！“好人总会有好报！”

一九七〇年三月一日，我们正式启程前往武汉，全家人精神饱满，非常开心。今天，我们终于跨越了许世友设置的障碍和陷阱，昂首挺胸，轻松自在地奔赴新

的岗位，走向新的生活。

……

葛店化工厂由于全厂职工团结一心，奋力拼搏，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扭转“十年亏损”，实现“一年巨变”。这中间，我也付出了微薄之力，厂内厂外的宣传报道工作十分活跃。一时间《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及电台，连续不断地宣传葛店化工厂的事迹，乃至《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也多次来厂采访报道。这样一来。该厂名声大振，成为武汉市、湖北省赫赫有名的先进企业。这一年，我把自己命运的转变，同工厂面貌的巨变，紧紧地融合在一起，深感欣慰，深受教育和鼓舞。……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原以为，我们复员后，远离南京军区，远离许世友，即可相安无事了。那晓得，……许世友没有把我们置于死地，没有把我们斩草除根，没有把我们地球上铲除掉，他就时时刻刻不放心，不安心，不死心，不放手，不罢休！……

一天，南京军区政治部两名军官：一名科长，一名干事，来到武汉化工局，找到该局下属的葛店化工厂党委书记张瑛及保卫科干部。他们取出专案袋子的“绝密材料”——“5.16”分子艾汉美的严重问题，……以“上级”的口吻要求：武汉化工局及其葛化工厂的领导，要立即对艾汉美采取断然措施，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实行“隔离审查”。

他们如此没头没脑、断章取义的介绍情况，使化工局和葛化厂的领导根本听不明白，当场提出种种质疑。

“根据介绍，艾汉美的问题主要在文革初期，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他复员时档案里只字未提，现在又突然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你们所说的，南京军区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们搞不清楚；这些情况同‘5.16’问题又是什么关系？”

这言下之意，就是怀疑：“反对许世友，就是‘5.16’分子吗？”……两位军官吱吱唔唔，含糊其词，不作正面答复。接着，葛化党委书记张瑛说：“本着对人的处理持慎重、负责的态度，我们认为，艾汉美同志复员到地方上表现很好，现在是我厂政工部门的重要骨干，……我们不能对他贸然举办‘五不准’学习班，更不能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

我在《杭州日报》摄影组工作，第一次承担出画刊的任务，就是采访南堡大队。被周总理誉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桐庐县印渚公社南堡大队，被洪水冲得只剩下一棵苦楝树。我随同记者组徐汉波等三人，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风餐露宿，按时完成了摄影画刊任务。为采访农村小型水电站，只身到淳安县高山区，身负沉重的摄影、灯光器材，爬山涉水步行几十里，按时完成了任务。在工业方面采访先进，杭钢、杭玻、杭氧、杭丝联、杭州发动机厂、杭州缝纫机厂等单位，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轮到夜班，我尽心尽力完成任务，夜餐两角钱的阳春面吃得很香甜。没有署名，没有稿费，照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在杭报的日日夜夜，发扬了部队战地记者的工作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是有目共睹的。

2005 年 10 月 30 日上午，我参加了杭报 50 周年老报人茶话会，与查淼顺、余洪、徐汉波等老记者以及转业干部任振泰相见，感到分外亲切，非常高兴。徐汉波说：他写的回忆录中，写了报道南堡大队的详细实情，这个典型现在还是站得住脚的。可是当我翻阅《春华秋实五十载》，曾经在杭报工作过的员工名录时，却没有我的名字。大概是某些人现在还受派性影响，有意抹煞我在杭报这段历史，怪不得有些人装做不认识我。我在《杭州日报》社的这段历史，有《杭州日报》的版面给我作证。

后来，我从《杭州日报》被借调到省委报道组，完成《人民画报》的约稿：《浙江粮棉跨‘纲要’》。为突出主题，表现浙江大地的园田化水平，“安 2”飞机两次起飞到嘉兴曹庄一带航拍，《人民画报》刊登了八个版。不久，《人民中国》杂志（日文版）、《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约稿，要报道农民姜汝旺学哲学，工农兵上大学的事迹。接着，广州交易会筹备，摄影、布置展厅任务很繁重。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杭州，领导要我担任主要摄影任务。我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为此，我被正式调到省政工组宣传办公室，成立摄影办公室。万没想到，一个飞来横祸又降临到我的头上。

（十一）第二次劫难 许世友草菅人命

——被南京军区政治部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

1970 年 3 月 27 日，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南京军区和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市，掀起了来势猛烈的大挖“5.16”分子。许世友在无锡讲话，传达林彪 1971 年 2 月 28 日对清查“5.16”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5.16”，一个也不能漏掉。”

早就听说许世友坐镇南京清查“5.16”骇人听闻的故事，仍然是搞“以许划线”，把所谓“倒许”的都打成“5.16”分子。复员在全国各地的干部都受到审查、逮捕。“红色恐怖”又笼罩着江、浙、皖、沪以及全国各地。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清查‘5.16’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随意制造的‘阶级斗争’，很多干部和群众无辜获罪，枉受牵连，遭受了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又难逃其厄运。文中说：许世友“跳不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窠臼，”亲自审问史景斑。史景斑坚持实事求是。许世友盛怒之下，“一个耳光，把他的眼镜也打掉了。”这位还俗的少林高手出手不凡，打得史景斑眼冒金花，站立不稳。陪审人员都惊愕得呆若木鸡。史景斑强忍侮辱和皮肉之苦，默然不语。人民解放军自盘古开天地，那有司令员打政治部主任的！在历史上许世友要扇毛主席的耳光，带枪去见毛主席，打你史景斑那是小菜一碟。史景斑将军挨整期间，史夫人和三个女儿，都受到牵连和迫害，在化粪池里发现了史夫人的尸体。史景斑得到平反后，王必成把他要了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王必成是司令员。按许世友的说法，他们两人都是我的黑后台。

红色军械专家、国防科委副主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李仲麟将军，被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单间牢房。李将军被关押不久，因高血压中风，他撑着趴到牢房门口撞击牢门，被看守听到，送医院抢救才免一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将军被隔离审查，……。

前线歌剧团著名演员蔡佩莹（电影《红霞》女主角、江苏政协委员）、独唱演员李惠兰、演员修蕴、王建修、陈家骏、夏小明、李源、贾佩华等三团二队一批人员都被逮捕入狱。

我姑父郎玉麟的老部下、我的挚友赵玉祥大尉，被复员在南京变压器厂当工人，又遭到劫难，关押在娃娃桥监狱长达三年之久，狱号“3002”号。监狱看守要他跪下读监规，被赵玉祥拒绝了，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凶神恶煞的监狱长、监狱指导员，都是 60 军来的。一位看守对指导员说：“他高呼毛主席万岁！岂不是把我们放在国民党特务镇压共产党的

位置上了？！”为此，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赵玉祥被反手铐住，一铐就是七天，生活不能自理，都靠犯人们的帮助。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造成了一种既紧张又滑稽的怪异气氛。有的单位几乎人人争着上台‘坦白交代’，惟恐落后了被怀疑或被别人供出来，觉得只有自己承认是‘5.16’分子才有安全感。”“江苏省和南京军区到底错整了多少人？据最保守的估计，总数有二、三万人之多。仅军职以上的领导干部，先后有 100 人被打成了‘5.16’分子，或者与‘5.16’有牵连的嫌疑分子。”“那么多领导干部被咬，闹得人人自危。”“混乱不堪的‘清查’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许叹道：“‘唉，上当了！’马上找杜政委商量补救办法。”

南京流传的顺口溜：“‘5.16’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我老伴的小弟刘栋是南京仪表厂工人，被打成“5.16”，成了伤残人，还不给工伤待遇。

江苏省和南京市清查“5.16”的特大冤案，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文中，不得不像蜻蜓点水一样披露一点，并有意隐瞒实情，把江苏省和南京军区清查“5.16”的人数共计 13 万多人，说成只有二、三万，隐讳了整十万人。清查“5.16”运动，实际上是在军队干部的主持之下，把革命干部、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整成“5.16”，本质上是执行对“文革”造反派的秋后算帐。

2007 年 11 月，《炎黄春秋》杂志第 11 期，刊登潘祝平同志撰写的纪实文章《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摘要如下：

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5·16”组织。然而自 1970 年 4 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1971 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的。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十三万人被打成“5·16”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许世友）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

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5·16”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

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1970年4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5·16”说不过去。

1975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当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13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万多。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5·16”的突破口 南大被认为是“5·16”敌情最严重的单位。1970年4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5·16”108人，点名“5·16”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5·16”漩涡。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13个昼夜）攻下“顽固堡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5·16”，也逼出了人命。“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5·16”。……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5·16”骨干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查。……。

据1975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

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 298 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 84 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 11 名。此举，……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职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江苏清查“5·16”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 5000 人左右。……“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人员”，另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经过“春季攻势”，被打成“5·16”的占 33.4%。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 55.5%，处级干部占 42%，一般干部占 30%。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 2400 余人，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 70%以上。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 人中有 25 人打成“5·16”，其中有 8 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5·16”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 43 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5·16”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5·16”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

省科技局被视为“5·16”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5·16”的重点。1000 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5·16”关押 100 多人，逼死 5 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 400 多人。有的科研单位 100%的科以上干部和 80%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5·16”。……

1971 年 4 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 100 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5·16”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 10 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其他涉嫌“5·16”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到 1971 年年底，干校 3000 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 1600 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 400 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 80%以上。……

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5·16”、批臭“5·16”、深挖

“5·16”、全歼“5·16”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段，罚站最长 19 小时，更是常见。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是“5·16”，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干校内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1971 年下半年，干校多次召开宽严大会。9 月份的一次宽严大会要宣布对几名“5·16”顽固分子从严处理。为大造声势，动员干校周边农村的部分干部群众参加。一些农民见会场周围有荷枪武装警戒，误以为干校要杀人。虽未杀人，但超越司法职权，给从严处理者戴上手铐宣布法办。

清查“5·16”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 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将清查“5·16”作为头等大事，……组织了 2 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 3900 多个、2 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 20 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 1200 多场，……到 1972 年底，2 万多人打成“5·16”，逼死 300 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 33 人自杀身亡。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5·16”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5·16”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5·1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5·1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 300 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市级机关清查“5·16”，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检法机关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强攻的结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5·16”。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600 多干警，159 人打成“5·16”，逼死 4 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 400 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没。……南京市各系统的基层单位，清查“5·16”也搞得“轰轰烈烈”。如华东电子管厂在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5·16”问题，……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5·16”干部名单。

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5·16”。又如江南光学仪器厂，要求所有干部职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5·16”问题，人人都要过“5·16”关，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干部职工稀里糊涂地成了“5·16”。其他地市清查“5·16”也不甘落后。以盐城为例。原地委常委 13 人，打成“5·16”的 6 人；中层干部 84 人，打成“5·16”的 43 人。公检法 500 余干警，打成“5·16”的 327 人，占 65%。

有人说：“有一意孤行的领导，必有百般逢迎的下属。”在军内，许世友最相信保卫部副部长李书和汇报的情况。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政治部大批抓人时，李书和汇报一个抓一个，汇报十双抓二十，被提为正部长。在军外，许世友最相信军代表、省革委副主任吴大胜汇报的情况。

江苏清查“5.16”时，《近看许世友》文中说：“吴大胜报什么许司令批什么。不管涉及什么人，吴大胜一报上来，许司令就批示他抓起来审查。吴大胜也为难，当面又不敢讲，怕许司令怪罪他‘右’。结果是抓了一批，又抓一批，像滚雪球，被审查的人越来越多。”李文卿曾对吴大胜说：“这样搞危险哪！‘好派’抓了，‘屁派’也抓了，再抓该抓到你了！”江苏两大派的头头是南京大学的老师、学生，“红总”头头文风来被整死；“八.二七”头头曾邦元被整得死去活来。吴大胜面对人命关天的大事，轻轻松松、轻描淡写地检讨说：“对法西斯的审查方式没有严肃对待，出现了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我没有制止”，“搞乱了阶级阵线，伤害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一贯做后勤工作的老红军吴大胜，当了许世友的替罪羊。

1972 年 10 月下旬，在南京军区清查“5.16”已“上当了”的情况下，浙江省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还是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来函，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被停职审查。由省军区军代表、宣办副主任田传箴和宣办干部郑汝培为专案组，同时受到派出所的监控。过去在南京百水桥“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说我反林彪，现在要交代和林彪有什么关系。大概是我曾说过，我父亲住在北京市西四人大常委会宿舍，楼下住的林彪卫队，我从来没有和卫队来往过，只是进出大门而已。真是捕风捉影。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许世友向毛主席写检讨：“我看过林秃子几次，和他照过一次相，要警卫员打野鸡、野兔送过他。”许世友和夫人田普没有少跑过

苏州太仓林彪的行宫，没有少送过阳澄湖大闸蟹。林彪儿子林立果选美，南京军区谁跑得最勤？许世友要和林彪攀亲家，大家都知道。 请读一读纪登奎的谈话实录： 许世友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如何？1970年8月23日下午，全会开幕，林彪作了讲话。所有的人都听林彪的讲话录音，连放两遍。25日上午讨论时许世友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十分重要，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象林副主席那样地来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陈励耘说：“现在就是有人胆敢反对林副主席，他们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反对林副主席关于称天才的伟大理论就是反对毛主席。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是些什么狗东西！还要反对我们军队的干部。”这时，许世友也大声地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坚决支持你！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参见师东兵：访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的谈话实录） 按常理，“林副主席”上了《党章》，尊敬他有什么罪呢？同理，“四人帮”都是毛主席圈定的人，尊敬他们有什么罪呢？只要不是搞阴谋诡计，应该是无罪的。然而，很多事情都是违背常理的，都是搞极“左”，搞形而上学。 宣传部专案组还要我交代，为什么写信给南京军区司令部复员在“上海无线电五厂”的于定，要他对抗“5.16”审查。一个中共党员，写信给另一个中共党员，要他有冤屈向党中央申诉，这有什么罪错呢？事后才知，于定的哥哥是万里副总理的秘书，于定一家四口人被调到北京，调出许世友的势力范围圈。于定同志被分配要害部门，任命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管理处处长。 林彪爆炸后，党中央林彪专案组明确指出：抓“5.16”是林彪制造出来的，其矛头是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林彪反革命集团 571 工程纪要》指出，“南京军区是争取力量”。《571 工程纪要》为什么不把北京、沈阳、昆明、福州、济南等军区列为争取力量；而单把广州、南京军区列为争取力量呢？ 1973年12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毛主席此举的目的，是抑制新军阀的产生。毛主席提议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步调一致，不一致就不行”。“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 毛主席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

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5.16’、‘反革命’。”

毛主席这段话，好似针对着许世友说的。我只是奉命写了一张大字报，引起连锁冤案，被许世友、铁瑛，戴“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三项大帽子，被开除党籍。这些莫须有“罪行”，决定了我的一家悲情人生。许世友暮年，离开了广州军区，在南京中山陵 8 号别墅居住（孙中山先生儿子孙科的公馆）。院内草坪开阔，花树繁茂，围墙四周种植长刺的“鬼见愁”。可是，他怕南京的人民群众，深知他借军委“八条命令”大批抓军内外干部和群众；特别是他坐镇清查“5.16”分子期间，进一步制造“红色恐怖”，进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欠下了 13 万多人的血泪债。为此，他自己设计，在园中修建起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楼碉堡，警卫班在上层岗楼上可观察到园内外各个角落。一位大军区司令员的公馆戒备够森严了，可是，许世友还不放心，还要自己设计造碉堡。我想，这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了。一位共产党的军事高官走到惧怕人民群众的地步，真是可悲！

8 号别墅占地几十亩，自许世友搬进后，将草坪挖掉，种植小麦、高粱、玉米、红薯和蔬菜。盖起了猪圈、兔笼，原有的三四亩池塘饲养鱼类。劳动者就是警卫班。许世友当起了“土地主”。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归国省亲，想看看乃父孙科的旧居。孙女士旧地重游，仔细地看了一遍，看到院子被搞得面目全非，弄得哭笑不得。

许世友晚年的生活非常悲惨，除了午、晚餐两顿都喝茅台酒外，感到很孤独，很寂寞，老伴田普分居在无锡，一个儿子在新疆服刑，加上痛风、肝癌病的剧痛折磨，真是生不如死。1985 年 10 月 22 日，因肝癌，许世友溘然长逝，终年 80 岁。消息传出，南京市不少人民群众喝酒、放鞭炮。古人云：“一将成名万骨枯，尊卑皆为一孤冢”，如此而已。

回想在“文革”前夕，叶剑英元帅住在 8 号别墅，检验 20 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的图板作业水平。我和《解放军报》驻南京军区记者组组长栾保俊，《人民前线》报记者高丕忠在 8 号别墅采访。突然许世友赶到，对叶说：“我刚从阿尔巴尼亚回国，一下飞机就来看你，你明天不能走，留下来吃狗肉、喝酒、跳舞。”叶帅说：“好说、好说。”没想到 8 号别墅成了许世友的归宿。南

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不得不给浙江省政工组来函：“查陈时秋同志‘5.16’的材料是假的、错误的，请你们做好善后工作。”整人的人多轻松，一纸公文就解脱了。可是，这件事远没有完，整我“5.16”的材料，却成了省委宣传部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头条“罪状”：“1972年10月下旬，鉴于陈时秋在南京军区所犯严重错误，经省委政工组党委决定，对他实行停职审查。”专案组复手为云、翻手是雨，明明“5.16”是冤案，却变成了“犯严重错误”。同在宣传办公室工作的原《光明日报》社记者高正生，也因“5.16”问题受审查，想不通，从办公大楼五楼跳下，一命呜呼！他一死是解脱了，再不要受煎熬了！可活着的亲人们还要面对更加痛苦的生活。事实证明，清查“5.16”，根子还在林彪，许世友搞扩大化，我又是受害者。由于“支左”军代表大批调走，政工组党委决定宣办增加五名临时负责人，当商景才在宣办宣布时，才知有我的名字。我的任务是：继续搞好摄影报道，抓好全省摄影工作；经支部大会选为委员、副书记；负责《宣传通讯》审阅；参加政工组“批林批孔小组”；协助严永洁（省委书记谭启龙夫人）从中央文化部领受的文艺批判等工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完全按照中央、省委、政工组党委的文件、指示办事，没有自己的“发明创造”。1975年7月下旬，省委调我到舟山定海本岛马目“学习班”学习。到大华招待所报到时，看到都是同观点的，大家都思想不通，认为不符合中央[75]16号文件的规定，“办原两派群众组织头头拆墙、填沟、解疙瘩的学习班”的精神。都是一种观点，怎么拆墙、填沟、解疙瘩呢？要求省委作出解释。省委不予理睬。“学习班”设在马目公社北岙大队。学员中年龄最大的是省广电局领导周林同志，他是浙江省第一任纪委书记，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其他有广电局记者徐运灼、宗伯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陶汇章，《浙江日报》编辑杜勇进，省法院审判员余荣夫，火车司机谢志明，杭钢工人张小定，汽车厂工人孔汉茂，杭大学生李显通等约二十多人。后来为做做样子，派来一位“省红暴”派的农民伯伯张来根，和大家相处得很好。学习、劳动、看病无人问津，只好推举一人找大队联系劳动事宜。还听说调拨了木料做床盖房子，要长期在那里生活。因马目公社地处定海岛的最西北角，当地群众称为“西北利亚”。很自然，发牢骚时大家说到这里就是充军、流放。事也凑巧，马目的西南面就是金塘、大榭岛。回忆起参加舟山战役时，从炮队镜中可以看到蒋军固守马目的活动情况。想不到自己

被充军、流放到马目岛上来了。经过三个多月的无人管理的所谓“学习班”，只有靠自觉，自己学习、自己劳动。11月初，“学习班”集中到地委党校，集中揭发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永生的问题，要上纲上线到“反党、篡权、复辟”。据说，张永生入党是周总理委托周建人老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浙江省委常委、鲁迅先生的胞弟）做张永生的入党介绍人。浙江在“文革”期间很多重大问题，都是周总理的指示和直接过问下解决的。难道是周总理怂恿张永生“反党、篡权、复辟”？所以，我的思想认识上不去“反党、篡权、复辟”这个纲，问题就揭发不出来。历史已经证明，究竟是谁在反党、篡权、复辟？！1976年1月8日，9点57分，周总理走了。噩耗传来，大家都很悲痛，要求开会哀悼。坐镇马目“学习班”的领导商景才不同意，只好作罢。我心灵深处默默念叨：敬仰的周总理一路走好。回想周恩来总理一字一句地念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念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的批示，并代表党中央为我们平反，打心眼里敬重总理的为人。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一个一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的革命家。他坚信，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是为了防止今后在中国重蹈苏共出现修正主义的覆辙，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保证千百万革命先烈为之浴血奋斗，流血牺牲而得来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英特耐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和目标，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因此，重病染身，已是风烛残年的毛主席，依然鞠躬尽瘁地为中国的前途在日日夜夜辛勤操劳着。1974年，毛主席诗词一首：诉衷情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之东流？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避免在血雨腥风中交班，是毛主席暮年追求的目标。毛主席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利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中央文件》1976年

第 4 号) 1976 年 6 月 15 日，重病中的毛主席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谈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参见时事出版社《新中央机密》268 页)。毛主席这些谈话，是他老人家的泣血心声！振聋发聩！读后让人感悟很深。再回头重读毛主席在“文革”前夕 1974 年写的诗词“诉衷情”，就全都明白了。1976 年是多事之秋的一年。1976 年 1 月 8 日，9 点 57 分，周总理走了。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 3 点 42 分 54 秒，河北唐山发生 7.8 级强烈大地震！1976 年 9 月 9 日，零点 10 分，毛主席走了！叶剑英说：“他带着一肚子问题走了。”1976 年 9 月 12 日，21 点 7.55 分，朱德总司令也走了！1976 年 10 月 6 日，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开始了毛主席所担心的“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

(十二)第三次劫难 铁书记铁面有私 ——被浙江省委、宣传部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乔冠华夫人章含之的新著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中说：1976 年 4 月 30 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子，叫我去办。……。五个月后的 10 月 6 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在参加完联

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于是，在乔冠华回到祖国时，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着他。……毛主席真是料事如神，“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在全国上下，特别在浙江省，在省委书记铁瑛的主持下，以一派清查另一派的非法做法，开始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清查运动。1976年12月15日，省委宣传部对我执行隔离审查，关押在浙江展览馆三楼讲解员休息室，多次拉我到宣传部批斗。为达到政治陷害的目的，宣传部领导商景才出主意：“要从‘攻击性言论’入手才能搞出问题。”于是，专案组长谢兰生为头儿的七、八个人，多次在展览馆小会议室开会，采用诱供、指供、逼供等手段，逼我交代“恶毒攻击华主席”的言论，逼得我精神恍惚不可终日。谢兰生不甘心，非要逼我交代攻击华主席。我恍恍惚惚地说了句：“华国锋是个傀儡！”谢兰生为头儿的专案组，算是达到了逼供信的目的，从此不找我了。省委宣传部专案组，还从被审查的毛杰、刘士华、周靖、张高星等同志那里，搞到我的所谓“攻击性言论”。铁瑛、商景才、谢兰生等人，使用逼供信的手段，达到了要逮捕我的目的。纪登奎副总理曾经说过：“专案组的工作我很熟悉，里面的成员大都是些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且又心毒手狠的家伙。他们能够采取一切措施，让被审查者写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1977年6月10日，经省委批准，以“现行反革命”罪，将我逮捕打入大牢，羁押在过去关押国民党战犯的米市巷看守所。6月14日，在体育馆召开两千多人的“从严批斗大会”，剃光头、挂大牌，气氛严酷，一片“红色恐怖”。专案组组长谢兰生代表省委宣传部发言，罗织了“十大罪状”，能致人于死命。（1）“恶毒攻击伟大导师毛主席。”专案组指供告诉我：说我去值班室，周靖一个人在，说去看看墙上毛主席像问周靖：“毛主席洞察一切，为什么连江青也看不出来？”这是搞逼供、指供弄出来的材料。谢兰生批判说，毛主席这么这么看清江青，这么这么看清江青，……。（2）“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指供

告诉我说：有个人到我家问我，为什么华国峰当总理，张春桥没有当上？说我说，“华国峰当总理老师们通得过，张春桥当总理老师们通不过，华是中间偏右的人”。谢批判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诬蔑我们的大救星、英明领袖华主席是个大右派！

(3) “为右派翻案。”说我为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秘书吕清滨翻案。“文革”中，吕清滨夫妇上访政治部来信来访接待室，支部要我去接待。吕说：原宣传部长的前妻山东大嫂（离婚不离家），带着孩子来找部长，讨要孩子的抚养费，因部长入城后另有新欢，不接待她（活脱脱一个陈世美）。吕说：我这个秘书不能不管，给她们在招待所住下。事后，向部长提出意见，部长怀恨在心，利用“反右”的机会，将我整成“右派”。我表态说：材料我收下，你说的情况是一面之词，“文革”中不能搞“右派翻案”，“文革”结束后你再来吧。这是“为右派翻案”吗？可在当时听到“为右派翻案”是很吓人的！

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使我晕厥过去。同时被批斗的还有杭钢老干部张树森、铁路工人谢志明。事后，我对看守所陈所长说：“从严批判大会”上宣传部的发言，“十大罪状”都是政治诬陷，都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张冠李戴、胡编乱造的。所长说：群众运动就是这样的啦！你自己要实事求是，想开一点。我说：宣传部不是群众组织，说话、做事要负责的！

谢兰生整人有功，荣升为省政协秘书长，还嫌官不够大，向省委要更大的官。可是好景不长，得肺癌去世了。呜呼哀哉！6月30日，《浙江日报》摄影记者谭铁民一伙也来凑热闹，再踏上一只脚！在米市巷招待所召开浙江省摄影界会议，把我拉去批斗。会上的批判发言，也都是些驴唇不对马嘴的发言。比如，毛主席号召唱两首歌：《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省影展缺这个题材，我立即和汪建安（原27军摄影干事）赶到杭钢、杭一棉，拍摄唱两首歌的彩色照片，《把炉火烧得通红》、《一切行动听指挥》。会上批判说这两幅照片，“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那天，天下着瓢泼大雨，雷电交加，雷声、闪电声，压倒了批判声，好似苍天老爷在给我鸣不平。时隔不久，谭铁民老婆提早“开放”，跟人家当“二奶”去了，老谭一气之下旧病复发，含恨离开了等待他升官发财的年代。阿弥陀佛！

毛主席说：“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杭州是人间天堂，我却下了人间地狱。在狱中三易春秋，使我认识、体验到《中央“5.16”通知》中所说：“……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

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铁窗生活的滋味，使我大开眼界，使我认识到专政、社会、法律、和道德是怎么回事。这对我更深一层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有用处。我无非是相信党中央、毛主席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怎么成了“现行反革命”？我一名普通中共党员，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看看真实的历史记载，我才渐渐地明白过来。

原国防科委情报所核心组副组长，四届人大代表，恽仁祥撰写的《关于给邓小平平反问题》，文中说：……华国锋、汪东兴为一派，叶剑英、邓小平为一派，两派间的唇枪舌战，也是关键的一战，两派几乎人人“上战场”，在此仅介绍几个关键人物参战情况。

这一派斗或内讧，从 1976 年 10 月 7 日起，即两派联合抓捕了“四人帮”而接着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在汪东兴、叶剑英精心安排下，以武装压阵，谁持反对意见就抓谁，而“通过了”他们抓捕了“四人帮”的行动，并决定华国锋当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至中共十一大的召开为止。其性质，属于两派联合宫廷政变，抓捕了江青等四人后，两派分赃不均、也不可能均而引起的。关于那次政治局会议武装压阵的详情，将在以后的文章中介绍，武装压阵开政治局会议，在党史上是空前的、“中国特色”的会议。汪东兴自政变后华国锋当了“英明领袖”，为了保护华国锋“英明领袖”的宝座，以兑现华已承诺他自己在十一大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在“活捉江青等人以后，所谓揭批和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成了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压倒一切的急迫大事。汪东兴总担心他竭力要保护的这个领袖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危险，日夜担心江青的保护者们会在一个晚上造起反来，所以预定了用三年的时间把被称之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统统揪下台，赶出去，能打倒的打倒，不能打倒的给予清洗。”（参见《汪东兴传》第 200 页）。恽仁祥：“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说：不久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 年 12 月 18—22 日）。大小会上重点点名批判汪东兴：“你汪东兴以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几年就觉得了不起，……。我们这些老家伙，……，（对你）不了解吗？你过去和现在你在毛主席身边，不就是当个警卫吗？而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是参与重大机密！哪个不是和毛主席同起同坐地在一起研究大事！要是论起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多少来，我们那个不比你强？……”、“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那么坚定，好

像他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其实还不是一个骗局，你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难道就没有（做）手脚？毛主席难道真的没有说过‘按既定方针办’的话？毛主席难道真的授意过你们粉碎江青一伙了？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人（的）指示难道都是像你们说的那么样，你们就没有修改和断章取义的地方？你们传达的毛主席关于信任你们的话难道没有假，这些问题大家都不和你们计较，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嘛，……”。华国锋在场一言不发。“……。你（指华国锋）太自私了，你为了你自己落好，自己的安全，……。你以为你这样能保住自己吗？错了！你在一些人看来，毛主席对你那么好，亲手把你提拔和重用起来，但是，你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能当上党和国家领导，竟然把毛泽东的一家抓的抓、关的关、批的批、压的压，人家才认为你是最大的两面派和阴谋家呢。对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小人，谁还敢和你相交？汪东兴到了这个时候，是什么念头都有了……”。……叶剑英对华、汪二人说：“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都不能批评，这样一来，好多问题都不能批了。因为几乎‘四人帮’所干的坏事，毛主席都点过头。我仔细地查了一下，‘四人帮’几乎没有不经过毛主席批准而自己干的东西，问题在于对不对，是不是他们欺骗了毛主席，所以华主席说的四条恐怕还得作一些修改才好。”对此华、汪一派大发议论。陈永贵：“真不像话，毛主席刚刚去世，他们就要这样干，真像赫鲁晓夫一样了。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作那个秘密报告了。……，如果我听到那个报告，我将是第一个站出来骂他们狗日的！”吴德：“原来我们总是说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在诬陷邓小平，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人家那一条是诬陷他？那一条没有被事实所证明？”纪登奎：“现在看起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吃不开了，中央是要开始执行刘、邓路线了吧？那我们这些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干部怎么办？一个个都被邓小平们批了个一塌糊涂，现在‘两个凡是’的帽子快和反革命的帽子一样了，扣在我们头上压得直不起腰来”。华国锋：“我也挡不住了，现在政治局里邓小平那些人已经占了多数。只要邓小平他们一提建议，大家就都跟着响应，我说什么话也不顶用了。原来你们说我是傀儡，我还不服气，现在我可以实事求是地讲，我连傀儡也不如了。现在人家已经从经济工作上尽找我的毛病，说不定还真要把我赶下台了。”（以上参见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汪东兴传》第 254 至 422 页）。对我的拘捕是秘密进行的。1977 年 6 月 10 日上午，省委宣传部专案组张耀洲陪同

省公安局，从浙江展览馆隔离室把我铐走，羁押在米市巷看守所，我老伴立即被隔离审查。两个多月以后的8月17日，才发出《对被捕人家属通知书》，不让家属探视。“政治犯”的待遇极差，单身囚禁，无人说话，伙食极差，没有澡洗，且一年多没有放风，见不到阳光。看着双手雪白雪白，只有苦涩的泪水伴我艰难度日。坐牢坐牢要坐得牢，老是想出去是要发疯的。我思想上准备坐十年牢，甚至会更长。这不足八平米的监房，要和我长期共存，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要改造生存环境，因为，米市巷看守所过去是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年代久了水泥墙上都是痰渍。所以，要把水泥墙、蹲坑的很多痰渍去除干净，心情也好多了。为了能把牢底坐穿，我开始锻炼身体，每天在监房内原地跑步，等微微出汗后，擦洗冷水澡。我还自娱自乐，哼唱几句《四郎探母》、《甘露寺》等京戏：“我好比笼中鸟……”；“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刘备本是靖王的后，汉帝玄孙一脉流，……你杀刘备不要紧，他弟兄闻知怎肯罢休，……。”在狱中整天写交代，只好把过去写的材料重复默写一遍。材料写完了，开始自学英语。有的时候玩弄玩弄监房内另一种动物，蚂蚁。更多的是常回忆起跟随父辈们，到新四军部队南征北战的情景。这种回忆，是痛苦遭遇的止痛剂，也是驱散愤懑、委屈、忧郁的最有效灵丹妙药。在狱中，先后有人精神失常了，省委组织部的范波同志，原地跑步不肯止；省文化局的杨明，喃喃自语，被反铐吊起来，再加上脚镣；……。铁瑛在清查运动中，说浙江是“四人帮”的“重灾区”。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他组织庞大的专案队伍，以清查“四人帮”在浙江的帮派骨干为名行收集、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之实。因为他深知，浙江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杭丝联事件，萧山、诸暨问题，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两个改组，省革委会的建立以及张永生的入党问题等等，都是在周总理亲自主持或直接过问下处理决定的。周总理曾在一次接见中说过：“浙江的问题我必须直接处理和过问，原因有二：其一，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蒋介石的老巢，是与美蒋斗争的前哨阵地；其二，浙江是我的祖籍，按辈份排起来，周建老是我的叔叔辈。”有一天，我被提审了一整天，要我详细交代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和秘书冯仰澄同志的关系。为此，专案组定我罪中有“浙江通向‘四人帮’的渠道”这一条。铁瑛为了搞出周老和“四人帮”的所谓“关系”，因铁瑛的手还钩不到副委员长，只好把冯仰澄从北京骗到杭州，秘密关押在米市巷看守所，并召开几千人的

批斗大会批斗冯仰澄。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1977年第14期，整期刊登省委办公室、《浙江日报》、省广播局、省委宣传部、杭州大学等大批判组，批斗冯仰澄的批判发言。冯仰澄的老伴是北京电信局先进工作者，被弄到绍兴某酱菜店里卖酱菜。为什么对“政治犯”如此暴虐？还要“株连九族”？宣传部《宣传通讯》编者按作了注解：“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投入这场斗争。就是这个铁瑛，当年呼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比谁都响亮；还几次三番地恳求冯仰澄托关系，给他引见王洪文。有一次，原来同我在新闻科工作的张文龙，也来捞点稻草。此人没啥本事，可他专会整人、充任打手。后来到温州军分区当政委、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但好景不长，怎么年轻的就死了呢？

当时，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清查工作做不少官样文章，三令五申连连在《人民日报》刊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和大量重要文章，强调清查工作要十分注意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可是，从中央到各省市县并不执行。以下仅举七例：

（一）、1977年10月6日，我被捕后四个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指出：“清查工作要抓紧。要注意党的政策，……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学会辩证法，……坚持按照唯物论辩证法办事。”

1977年10月18日，省委宣传部用上述社论为主题，出版了《宣传通讯》第14期，编者按就是不引用社论对清查工作的指导思想。同“群众组织”小报一个样子，用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刊登权威单位的大批判发言。白纸黑字，多处点“反革命分子陈时秋”、“反革命分子陈时秋的父亲农林部XXX办公室”成了国民党特务那样的联络点。我父亲是个“笔杆子”，仰慕鲁迅先生，只是看望了一次鲁迅先生的胞弟周建人老人，何罪之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种捕风捉影、造谣中伤的发言，难道是“坚持按照唯物论辩证法办事”？

（二）、197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强调指出：“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运动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就要正确对待犯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我们坚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省委铁瑛书记（政委）在清查运动中，接过许世友“以人（许）划线”的接力棒，一开始就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运动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对着干。省委、省委宣传部，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采用栽赃陷害、

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法西斯手段，还要“株连九族”。如此严重的冤案，不但不平反，反而诬陷我“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来按照《刑法》找不着“罪行”的情况下，还要“从宽处理”。在严重违反《党章》程序下，开除我的党籍。把浙宣干 [85] 38 号文件塞进我档案里，至今不给本人见面。这不是政治迫害又能是什么？许世友、铁瑛，想一手遮天，用违反党纪国法的手段，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可党的传统干部政策的阳光，还是照耀到我的身上。我虽被铁瑛等人强行开除党籍！但我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离休干部、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

（三）、1979 年 1 月 4 日至 22 日，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主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委员九十七人出席了全会。 同年 3 月 25 日，《人民日报》刊登全会《通告》并发表社论。《通告》强调指出：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各项原则。

一、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必须严格地实行这个原则，不能把它仅仅挂在口头上。……特别是要严格划分党内错误和反革命活动的界限，决不容许混淆这些界限。……严禁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来对待党内同志。

二、反倾向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 不能采取急风暴雨式的、压服式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和风细雨，以理服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

三、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逼供信是法西斯式的反动统治阶级办案取证的一种野蛮手段，……今后必须坚决地永远地禁止这种非法作法。……审查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和保留意见。……

四、对人的处理要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要对犯错误的同志作全面的、历史的、客观的分析，不能只看一时一事的错误而否定一切。对于在错误路线影响下犯错误的同志，应多帮助他们分析犯错误的原因，……不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凡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法办的，更要慎之又慎，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不论被审查、受处理的人问题多大，决不能株连其无辜的家属和亲友。

五、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冤案、错案、假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不尊重客观事实，只凭“长官

意志”办事，为了维护个人尊严而知错不改，都是严重的问题，都必须坚决纠正。

六、敢于斗争，刚直不阿。 所有担任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要严格按照党的章程办事，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 铁瑛对陈云主持召开中纪委全会，发出的《通告》视而不见。《通告》第四、五项强调指出：“凡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更要慎之又慎，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不论被审查、受处理的人问题多大，决不能株连其无辜的家属和亲友。”“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不尊重客观事实，只凭‘长官意志’办事，为了维护个人尊严而知错不改，都是严重的错误，都必须坚决纠正。”

（四）、1979年3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使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成为路线斗争的新典范》指出：“对人的处理，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近些年来，干部所犯的错误，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要求我们，对他们犯错误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根源，作出正确分析。不但要团结95%，而且要争取团结98%、99%以上，最后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全党的目的。”请问铁书记，你清查工作中做出了什么“新典范”？还不是继续推行许世友整人的那一套！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197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反革命罪”要货真价实》指出：“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决不允许像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那样，任意颠倒敌我，滥用‘反革命罪’的罪名，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悲剧重演。”“决不能凭某个大人物说谁是反革命，就得按反革命治罪”。

铁瑛在清查运动中，在全省整了400多万人，难道不是“任意颠倒敌我，滥用‘反革命罪’的罪名，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悲剧重演”？所以，宣传部商景才和专案组谢兰生等少数人，有恃无恐，敢于违背《通告》必须遵循的各项原则，导致新的冤假错案的不断产生，在共产党的脸上抹黑！“大人物说谁是反革命，就得按反革命治罪”。许世友、铁瑛都是大人物，他们的一句话，能致人于死命，我被打成“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被整得死去活来！这是证据确凿的事实。

（六）、197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各级纪委要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严肃性》，报道：中纪委召开纪律检查工作会议，研究搞好党风，严肃党纪，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为着克服派性，必须强调看实际行动，用实践来检验人们是按党性办事，还是按派性办事。……对

那些至今仍然闹派性的人，……对那些坚持不改的要以违犯党纪论处。”

“文革”中形成的两大派，都忠于毛主席、共产党的，但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互相厮杀！毛主席对于两派斗争是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法，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所以，派性问题在“文革”后期已基本消除。例如：南京百水桥“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与北京金水桥“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比较，最能说明问题。在清查运动中，铁瑛采用一派清一派，一派升天、一派坐监。对一派采取：除恶务尽，斩尽杀绝，一个不留的非法手段。致使“现行反革命”抓了一大把，有的被逼疯、逼死，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枪决。而“正确派”中有些人得到步步高升，包括铁瑛的秘书方文。现今，当上了省委副书记、政协副主席的梁平波，还是 1966 年 8 月 26 日带头炸毁了岳坟，还要砸毁千年古刹灵隐寺的打砸抢分子。幸亏有张永生组织了约 3000 名教师和红卫兵前往保护灵隐寺，并向周总理报告情况。总理明确指示：“灵隐寺不是‘四旧’，是世界闻名的宗教胜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其暂加封闭”。后来，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杭州时，周总理指示，灵隐寺专为亲王开放一天。保护灵隐寺的张永生，倒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判了重刑，冤狱 33 年。受铁瑛青睐的像杨秀珠那样的极端腐败分子，当上了省建设厅副厅长，洗钱逃往国外。这是她自己暴露了，有些人虽然暴露了，包括方文，却被有关上级保护起来了。“正确路线”、“正确派”不是自封的，同样要用实践、历史来检验。

（七）、1979 年 11 月 27 日《人民日报》刊登《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文章强调指出：“对案件全部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决不许草率从事或主观臆断，更不许弄虚作假。”许世友坐镇南京，清查“5.16”整了 13 万人。铁瑛坐镇杭州，仿效许世友搞“以派划线”，在清查运动中整了 400 万人。清查中完全不顾事实，都是靠主观臆断、弄虚作假、罗织罪名、锻炼成案，还要“株连九族”。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有确凿证据吗？绝对没有。铁瑛抓了那么多“反革命”，土牢冤狱比比皆是，进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逼自杀，有的被逼疯，还要株连无辜的家属孩子和亲友。到头来有哪几个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我一家三代人深受其害。难道清查运动，可以无法无天吗？铁瑛不执行中纪委《通告》、《人民日报》社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文章，把人往死里整才有罪哩！

我被隔离、逮捕，三年后才知道，宣传部对我搞“株连九族”真是一等。我被捕后的当天上午，宣传部、公安局抄了我的家，拿走我和老伴的私人信件 46 封、照片 10 张，至今没有归还；第三天老伴刘炳春（1950 年参军，分在华东军区炮兵司令部工作，华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被隔离审查，作为厂内的“四人帮”多次批斗，长期在车间劳动；家里三个孩子和近 80 岁的姑母，从户口所在地被扫地出门；更丧尽天良的是宣传部把三个孩子的医疗卡都拿走，小儿子气喘病经常发作，年逾古稀的老人只好跪地求菩萨保佑；后来女儿、大儿子考取大学、参军，不准许去。

省委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说：“冯仰澄设的这个‘四人帮’的秘密联络点，完全采用了国民党特务那一套，有秘密的联络员，有秘密的联络地点和特殊的联络方法。某部歌舞团（总政话剧团）的彭XX那里，反革命分子陈时秋的父亲农林部办公室XXX那里等。”我在部队时，组织上通知我：我父亲是“刘、邓路线上的人”，在“牛棚”受审查，株连我被复员处理；我被省委宣传部打成“现行反革命”，宣传部反过来又株连我的父亲。我父亲成了：“刘、邓路线上的人”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父亲”再加上“国民党特务联络点”等于？请问铁瑛，等于什么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号召广大党员和群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经风雨见世面”，“要反修防修”，“要斗私批修”。这是当年最响亮的口号。我期待通过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变得更美好更强大。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论其正确与否，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投了赞成票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合法通过的。党中央连连发出重要文件：中发〔66〕267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1966年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1966年8月8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2日通过）。

请问：中央发这么多文件是开玩笑吗？！中国共产党党内，还有政治诚信可言吗？！即使是“文革”错了，也错在党中央集体，责怪我一个执行中央文件的普通党员，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是不公正的。

现如今，把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内乱”、“浩劫”，而全面彻底“否定文革”。我认为，

这样的结论是极不认真、极不严肃的，这是共产党内的某些人往共产党脸上抹黑。十年“文革”史，是个重大的历史课题，绝不能让某些人篡改党的历史！我坚定地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显露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陈云与胡乔木有一段谈话，他说：（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陈云的谈话，既没有斗私，更没有批修。“文革”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陈云都是投赞成票的，怎么是毛主席“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呢？现今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亡党、亡国；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以及波兰、格鲁吉亚等国家，成了美帝国主义的桥头堡；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中国，变为私有制已取代公有制地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竟然有了一面共同的党旗！资本家中，共产党员的比例，2004年达到33.9%（据全国工商联调查资料）。这一切的一切说明了什么呢？！我是一名专业业务干部，只知道拼命地工作。人生苦短，去日无多。多么希望政治平稳，不要再整人了，太好的时光，让我多干几年工作有多好。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难道不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搞“以许划线”，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惹出的祸患？工作干得好好的被停职审查，惹起了以后很多的麻烦事情来。实际上，许世友、李书和等人，又把批臭了的“倒许乱军”口号，和新制造的“5.16”分子的祸水，又一次泼洒到我的头上，人为制造新的冤假错案。“文革”中，在如此复杂、风云变幻的阶级斗争中，我始终一贯按照中央文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文章的精神行事。大军区的政治部，省一级的宣传部，照理说，应该模范地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唯物论。摒弃栽赃陷害、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摒弃形而上学，尤其在人的问题上，来不得一点形而上学。1979年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可是，1979年11月12日，省委宣传部专案组不顾党纪国法，还一心要置我死地而后快，炮制了一份《陈时秋的主要罪行》材料。列举五条：罪状

一：“投靠‘四人帮’，勾结张永生，猖狂向党进攻。” 说我“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猖狂向党进攻”。 这是省委宣传部、检察院对我极大的政治陷害！我和高丕忠、蒋宇鸿在复员干部蔡衍家里遇见张永生（他们是邻居），才知我们因南京军区政治部寄来材料，诬陷我们是“5.16”分子，被停职审查。他建议我们向党中央申诉。这有什么罪呢？我们三人复员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介入哪一派的活动。停职审查，不让工作，闲来无事，只好参加“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这些运动，哪一个不是中央号召发动的？我的言行没有脱离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文章的精神。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峰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呢！“‘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运动中的专案组，往往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戴帽子、打棍子，搞扩大化，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种恶性循环，免不了产生恶性案件。 罪状二：“依仗王洪文的黑批示，攻击省委，多次窜到南京军区和浙江省军区‘放火烧荒’”。 我们这批被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将军，称赞为“新鲜血液”的年轻、专业干部，都是从各个军种，指名调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工作的。在“文革”中都是奉命“造反”。 任何事情都讲一个前因后果，难道不是许世友搞“以许划线”，在江苏军内外制造了 13 万“5.16”分子惹的祸吗？许世友按照林彪搞的部队干部大批复员，又对复员在全国各地的干部寄了假材料，查我和高丕忠、蒋宇鸿、施关彬、陈荣安等所谓“5.16”问题，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复员在湖州市广播站的原《人民前线》报记者陈荣安，被关在楼梯下铁笼般的隔离室里。陈荣安申诉了 300 多封信，都是泥牛入海，有去无回。1997 年 7 月，陈荣安同志由于长期挨整，无罪致灾，心情压抑，妻子和两个儿子受到无辜株连，在贫病交加中含冤离开了这个不公正的人间！ 读一读陈荣安生前写的申诉书，想一想，某些共产党人整了人，事实证明是整错了的，非但不平反冤假错案，还要等待时机再一次继续整，非要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只能说明他们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许世友把自己的夫人田普提拔为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执掌“以许划线”更加得心应手，把党的干部政策当儿戏。陈荣安同志反对林彪搞唯心主义先验论，事实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但只要你“得罪”过许世友，他仍要置你死地而后快！实际上，许世友和林彪的关系非同一般。

许世友的封建专制思想和行为，要的是奴颜婢膝的干部，刚直不阿的干部是吃不开的，是要吃尽苦头的。陈荣安同志生前写的申诉书，就是一个真实的、典型的事例，为了告慰英灵，择其重要问题摘录如下： 关于要求平反冤假错案 认真落实政策的申诉书 1976年2月以来，我蒙受种种冤屈，为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1977年10月以来，我已经向各级党组织写了三百余件、约一百万字的申诉信。可是，直到现在，仍未解决。现重新申诉如下： （一） 1967年2月9日，南京发生了八一医院事件。当晚，林彪就这事件作了完全违背事实真相的结论：“南京军区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八一医院维持秩序是正确的。”当时我作为南京军区报社的新闻工作者，在和其他同志联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致党中央的《关于南京八一医院事件的调查报告》，以揭露林彪在这一事件中搞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针对林彪所作的错误结论，我写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派到八一医院去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步兵团（缺炮营和三个迫击炮连），根本不是“一个小分队”；这个步兵团，由60军181师某团魏团长带领，来到八一医院后，团团包围了八一医院，步枪装上刺刀，……如临大敌，这算什么“维持秩序”？……由于南京军区某领导同志采取了不谨慎的措施，使矛盾激化，甚至发展到驻宁军事院校群众组织同军区派出的步兵团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引起了军内外群众的强烈不满，……这就清楚地揭露了林彪所作的关于南京军区在这一事件中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这唯心主义结论的荒谬实质。这份《调查报告》……作为我反对林彪的“罪证”。……在南京军区政治部百水桥学习班，……把我宣布为“反对林副主席的反革命”。…… 1969年9月，南京军区政治部根据我上述反对林彪……所谓“罪行”，强行将我作复员处理。……上述冤案，南京军区政治部至今没有平反，没有就我在1967年、1968年因反对林彪遭受一系列打击迫害的问题作出明确结论，没有恢复名誉，没有落实政策。 （二） 1969年10月初，我复员到浙江湖州。我持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开具的《行政关系介绍信》，到吴兴县革委会组织办公室报到。县“组办”开具《行政关系介绍信》，将我分配在吴兴县革委会报道组工作（直到如今，任何组织、人事部门，都没有开具过《行政关系介绍信》将我调出机关）。……从1970年7、8月间开始，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和南京军区清查“5.16”办公室，经浙江省公安机关，多次向我所在的吴兴县机关，寄送了用

逼、供、信等手段搞出来的关于本人的“5.16”假材料，以及本人反对林彪、江青的所谓“罪行”材料，导致“5.16”假案。不仅本人在全县万人干部大会上遭受诬蔑、攻击，被驱赶出吴兴县机关，被抄家、隔离审查，家属也受株连，我妻子被迫害致精神病。1975年4月，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致函浙江省吴兴县委，承认寄了关于我的“5.16”假材料，并表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向你们并请转告受审查的同志表示歉意。”……然而，说归说，做归做，……至今没有宣布平反这一假案，……没有恢复本人在“5.16”假案前的工作。……是否坚持认为强加于我的“参加‘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案”不是假案？是否坚持认为在吴兴县万人干部大会上给我强加上“5.16重大嫌疑分子”等种种诬蔑不实之词，破坏一个共产党人的名誉，并将我排挤出吴兴县机关是“大方向正确”？是否坚持认为动用专政机关，对我进行抄家，并在居民中散布关于本人的种种政治谣言是“革命行动”？是不是坚持认为因我的“5.16”假案，株连我的妻子，对她进行盯梢、监视、拖推辱骂，对她采取不准加工资等种种措施，将她迫害成精神病是“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时至今日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没有对这些问题表明态度？为什么至今不采取措施，彻底平反这一假案？为什么直到如今，还在某些问题上（如1985年的工资改革）继续发展“5.16”假案的恶劣后果？

对于上述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必须表明态度，并迅速采取措施，彻底平反“5.16”假案。

（三） 经过“5.16”假案的专案审查，到1973年底，除一份《关于陈荣安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材料》属于“孤证”）未能否定外，其余材料全部被否定。实践证明，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和浙江省吴兴县委清查“5.16”领导小组合作制造的“陈荣安参加”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完全是一个假案。然而，有关方面却迟迟不为我平反。鉴于上述情况，1973年底至1976年期间，我通过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申诉信，去南京军区政治部上访等形式，要求南京军区政治部和原浙江省吴兴县委为我平反假案，落实政策，是合乎情理的。可是，在1977年的清查运动中，原吴兴县机关的某些领导人，却把我申诉活动，说成是“要翻清查‘5.16’的案”。是什么“反党乱军”，是“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以此为开端，对我采取了一系列违反党章、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措施。……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后，我

以切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向一些同志宣传周总理的高尚品格；1976年春对《文汇报》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报道表示不满，并鼓励有的同志写信去责问《文汇报》编辑部，等等）。后来，我又就上述内容，从十六个方面，给吴兴县委办公室写了更详细的材料，如实报告了有关情况。这些事实，都确有证据。既然有关领导对我立案审查，要查清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那么，对于这样的关键性内容，理应彻底查清，作出明确结论。可是，原湖州市委办公室对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表现所作的结论，只讲我“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对上述内容却只字不提。这样片面的结论，显然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实际的结论，当然应该甄别、复查，重新作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四） 我从事专职新闻工作约二十多年。曾在《新华社新闻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战士》、《人民通讯兵》杂志、《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浙江日报》南京军区《工作通讯》、《人民前线》报等军内外报刊上发表过数百篇稿件；曾在中央和地方党报的《内参》刊物上发表过内部情况资料。我一直表示希望能继续发挥我的专业特长，继续为党的新闻事业工作。在吴兴县报道组，我确曾写过一些“内参”资料，反映了吴兴县的一些真实情况。为此，就难免要触犯一些人，甚至触犯某些“父母官”，从而达不到事事听有的领导者指挥的要求。举个例子吧！七十年代，李先念同志曾对浙江吴兴县菱湖化学厂“三废”危害当地人民健康、危害水产资源、危害农业生产的问题，给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谢正浩同志作过一个批示。反映这一情况的“内参”资料是我写的。……由于吴兴县某些领导人将国家所拨治理“三废”的费用移作他用（造干部宿舍等），致使菱湖化学厂在生产极毒农药时所排放出来的“三废”未能得到治理，造成了危害。有鉴于此，我写了一则“内参”资料，……被《人民日报》社编的“内参”刊物所采用。李先念同志看到这则“内参”资料后，作了重要批示，……《批示》下达后，省里拨了款，派来了治理“三废”的专门人才，帮助“菱化”治理“三废”，使“三废”得到了控制。这样的事，对人民大有好处。可是，……触犯了某些“父母官”。十多年来，某些领导人一再对我大加讨伐，拒不为我落实政策，拒不恢复我作为专职新闻干部的工作。……我要求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迅速地、妥善地、实事求是地解决好。起码应当实现下列五项基本要求： 一）对于我1967年2月以后被打成“反林副主席的反革命”，在经南京军区政治部党

委批准召开的“批斗大会”上，被作为犯有反对林彪、反对江青的“反革命罪”的“阶级敌人”，受到残酷批斗，并遭受种种迫害这一冤案，应由南京军区政治部认真甄别，澄清历史事实，作出明确结论，彻底平反这一冤案。

二) 对于因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向地方寄送本人的“5.16”假案材料而导致的“5.16”假案南京军区政治部应会同浙江省湖州市委，彻底平反，并消除这一假案所造成的后果：

(1)、南京军区政治部会同湖州市委，研究平反这一假案的措施，由湖州市委有关部门作出《关于为陈荣安同志彻底平反“5.16”假案的决定》，确认这是一起假案，原吴兴县委在全县万人干部大会上强加于我的“‘5.16’重大嫌疑分子”等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我采取的隔离审查、抄家等措施都是错误的。

(2)、将上述《决定》列入本人档案，并送参预审查、抄家的湖州市城区公安局（原吴兴县公安局之一部）、湖州城区第一街道派出所、湖州丝厂、道场供销社等单位，以挽回影响。

(3)、我爱人的工作单位道场供销社，应明确宣布，对我爱人采取盯梢、监视、不许加工资等措施都是错误的，并采取措施，弥补她的经济损失。

(4)、恢复本人在“5.16”假案前（即1970年7、8月间前）的职务工作（相应的）。

(5)、1985年12月工资改革中，对我以“企业干部十一级”定级，是“5.16”假案后果的继续发展，应予以纠正。

三) 按照历史事实真相和党的干部政策，恢复本人作为专职新闻干部的工作，如果有关部门决意不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不允许我发挥专业特长，坚持要将我调到湖州丝厂工作，湖州市组织、人事部门应按照干部调动的正常手续，正式开具《行政关系介绍信》，将我的行政关系从原吴兴县机关转到湖州丝厂。决不能把干部当“皮球”，随意踢来踢去。

四) 对于原吴兴县委及其组织部门于1970年5、6月间任命本人担任的吴兴县报道组副组长这一职务，如果有关部门决意不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不予恢复本人在“5.16”假案前实际担任的这一职务，不予分配相应的工作，湖州市委组织部应按照正常的干部任免手续，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免去我的上述职务。决不应不明不白地不了了之。

原吴兴县革委会办事组个别领导人“代表组织”，于1977年夏在群众大会上强加于我的“1975年，陈荣安伸手要官，想当县报道组副组长，是个资产阶级野心家”等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应彻底推倒。

五) 原浙江省湖州市委办公室对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表现所作的审查结论，是片面的，不合实际的。湖州市委有关

部门应会同南京军区政治部，认真甄别、复查，重新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对于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一系列事实，应在结论中作出准确的反映。希望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能认真按党章和《准则》办事，使上述各项落实政策问题，迅速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上述申诉，请及时审理。

中共党员、复员改转业军人 原南京军区政治部
《人民前线》报社干事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原中共浙江省吴兴县委
报道组副组长 目前在浙江省湖州丝厂做职工教师的工作 陈荣安 198X
年 月 日 清查“5.16”的材料，还是那些“旧账”，都是中央学习班规定要
销毁的，现在怎么死灰复燃了呢？为什么周总理宣读的，为解决南京军区许世友
大批抓人的中央 [68] 18 号文件，被许世友推翻了？为什么毛主席批准的中央
学习班，重点批判“多中心”论，消除派性不算数了？为此，我和高丕忠、
蒋宇鸿认为，有必要向党中央写信，希望得到党中央的答复：中央[68] 18 号文
件和中央办的学习班作的结论还算不算数？信被王洪文批示下来：“过去中央做
过的结论不能推翻。”这封信还分送周总理信访室、江青信访室、总政李德生主
任，省委、政工组。党员有冤向党申诉，给党中央写信是《党章》允许的。
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对部队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我们才去南京军区政
治部送大字报，为“5.16”冤案要求平反何罪之有？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
姓点灯？百姓“点灯”也有罪吗！罪行三：“向‘四人帮’转送过小报告或
黑材料，成了我省帮派体系通往‘四人帮’的一条重要渠道。”1974年11
月在北京，我和高丕忠去看望周老，他的秘书冯仰澄同志先后两次对我说：周老
很关心浙江问题，省委很少给他文件看，几天听不到消息就来问，所以，你们有
什么材料和情况就送来好了。后来才知道，冯秘书上送材料，事先都给周老看过，
有的是周老亲笔签署意见才送的（包括朱雷的申诉材料），都是通过正常途径，
送中央办公厅和邓大姐转周总理的。按常理，就是给“四人帮”送了材料，那时
他们以中央文革首长的头衔出现，普通人怎么知道？例如，省政工组材料组，吕
根土给江青寄材料，诬告政工组党委书记沈策“攻击毛主席”，是不是黑材料
呢？后来吕根土因诬告沈策有功，荣升为民政厅厅长。罪状四：“1974年2
月12日给铁瑛同志写恫吓信，说舟嵎要塞区开除朱雷军籍，‘是一场迫害与反
迫害的斗争’，如朱雷一家‘发生什么意外，一切后果均由你，铁瑛政委负

责’。” 朱雷，山东泰安人，贫农家庭，工人出身，1948 年参军。舟嵎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战斗英雄张明司令员的作战参谋，学毛著积极分子。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参加抗美援朝，经历了一次和五次战役。又经历了 51 年防御战役，53 年的反美军登陆作战、反击战、抗细菌战等多次战役。与铁瑛同是南京百水桥“舟嵎班”的学员。 领导上要他复员，因肝病住院，没及时办手续。就这样被开除党、军籍，一家四口（妻子张志敏是舟山人）被押送回山东原籍。朱雷去总政上访，我提供父母在京的住址，有困难的事可以帮帮忙。总政要他回南京军区、舟嵎部队解决。一回去就当“5.16”抓起来，关押在桃花岛。妻子张志敏抱着小儿子去看朱雷，三个人只给一份饭菜。后来，把朱雷转移单独关押在普陀山九个月，搞刑讯逼供，跪木棍，头也被打破。一家四口人没有粮油票没有钱，日子难过，我怕他们想不开，真的会出什么事，才凭着做人的良心和党性，给铁瑛写信。那天在杭州饭店小礼堂开会，遇见铁瑛，信是当场写的，也是朱雷几次托我向部队老首长反映他的情况。再说，一名党员给省委书记写信，那怕是言词过激，怎能说是“犯罪”呢？铁瑛把朱雷一家四口往死里整才有罪呢！铁瑛在清查运动中，继续推行“以人（许）划线”、“以派划线”。先后把我和朱雷等一批复员干部打成“现行反革命”，打入大牢。把朱雷投入小车桥监狱三年之久，受尽了人间苦难。政治犯受到法西斯式的暴虐，无辜的家属、孩子都受到了株连。难道铁瑛真的是铁石心肠？整了 400 多万人，有的被整死，这个统计数字难道不知道？自己还心安理得？多亏总政和张明司令员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朱雷平反，恢复党籍、军籍，收回部队，在杭州某部队干休所团级待遇离休。罪行五：“利用杭州‘四.四事件’大揪所谓‘反革命’，围攻领导，陷害同志。1976 年清明节前夕，陈时秋写信诬蔑杭州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革命行动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并把解放街至人民大会堂门前一带的花圈位置，标语内容，画了一张草图附在信里，一起寄给冯仰澄转送王洪文。” 听中国美术学院杜英信说，解放路百货公司附近全是大标语、花圈、大字报。我下午去看时，已经很多了。当我看到其中最大的标语“沉痛怀念杨开慧烈士”，感到这不是只为了悼念周总理。我就想，这样搞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当时我只以为是杭州发生这种事情，感到很不理解。我就给在北京的冯仰澄、章婴可、彭志义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是把矛头

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问他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希望他们来信谈谈看法。为了能说明情况，便于他们分析，信又不至写得太长，我画了个草图，说明现场的情况。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去向王洪文反映情况，完全是一封私人信件，怎么成了“罪行”呢！难道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内、国内发生重大事件，不闻不问是正确的态度吗？

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主席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参见恽仁祥：《关于给邓小平平反问题》一文）

中央关于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决议广播后，天安门“四.四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杭州“四.四事件”被定为“类似天安门事件”。这远远超出我给冯仰澄、章婴可、彭志义信中所说的“政治事件”的看法。万万没想到会出全国性的，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定的案，当然要认真追查。这是关系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重大原则问题。

看一看真实的历史记载：

关于天安门事件某些关键情节：

1976年4月2、3日左右，即天安门事件暴发前夕，邓小平已靠边站了，但还没有被撤职。那天晚上，胡耀邦被人陪着从北京饭店到邓小平的客厅，这位领导人正在等他。胡耀邦将几份文件和材料递到老头子面前。

他（邓小平）看了一遍（文件和材料），把材料放下，说：“参与者并不多”。

胡耀邦：“是的，但广大群众肯定会卷进来的。第一、总理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威望，群众都知道那几个人是反总理的，而你正是总理最信任的；第二、发动悼念总理的计划极其保密。连我的悼词也是孩子们送去的，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的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用几个月，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几小时之内”。

邓小平慢慢点着头：“那么，你认为这样做能起什么效果吗？”

“整个行动的关键，是向中央显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赞成他的这一套计划的。他老了，糊涂了，以为他的任何决定人民都会俯首地喊拥护，不见得：总理一死问题全暴露了”。

邓小平笑笑：“说，翻案不得人心”。

“我看，正是人心所向”。

“你说这话要注意呢，你的缺点就是说话总让人抓住

把柄，搞得太过火不行，就是来我这里也要注意。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我和天安门广场的事有什么关系。我已嘱咐我的孩子谁也不能到广场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没说完）”。他把面前那几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里，划着一根火柴，把它们点燃了。“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能像维吾尔族姑娘似的，满头小辫子，那几个笔杆子，最喜欢抓人的小辫子，而我，也是小辫子最多的一个人”。（以上参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文化大革命纪实》第 534 页）。当时，叶剑英对天安门广场及全国各地的悼念周的活动极为关注，不仅每天派人去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抄录诗词，还冒着风险，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看群众抄录诗词，看小字报，了解事态的发展。解放军三零一医院护士周美华说：在清明节那天，首长起床以后，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就悄悄地拉着我和“马头”（警卫参谋马西金），让我们陪着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悼念周总理的盛大场面。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车开得很慢，天气也比较阴沉，这时候我们绕纪念碑转了一大圈。在这过程中，首长几次要下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们劝止了。叶剑英的一个颇有诗才的孩子馨儿跑到天安门广场贴上自己的哀诗。词曰：人生七十不为天，唯到君归偏恨早。尸骨未曾寒，风雨漫如磬。五十年来事，锤炼人民志。泣血酹中魂，济济后来人。公元 1976 年 4 月 2 日在天安门。（参见《新中央机密》第 229 至 230 页）。当时中央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情况也随之公开：1976 年 4 月 4 日，当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在后，北京市对天安门广场事件作了处理。6 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的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件事“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导。4 月 6 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政治局的处理意见。4 月 7 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导，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

打。性质变了。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导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下册第 1775 至 1777 页）。1979 年国庆节，在看守所接待室，三年来第一次见到老伴，她带来了父亲病故的噩耗。她说：水产部治丧委员会来电，你是长子，去北京奔丧怎么办？我提出，押解我去北京见父亲最后一面。不准许！回想从小跟随父亲在抗日游击队、新四军部队一路走来，父子俩忠心耿耿、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父亲陈学明，改名为“陈实为”，一心为党、为人民。我止不住伤心的泪水在监房大哭一场来祭奠父亲，却被看守训斥了一顿。同监的香港陈先生气愤地回击看守：“他的父亲故世了，难道你没有父亲？”父亲曾在司法部、最高法院、农林部、水产部等单位工作。在“五·七”干校被隔离审查，株连我被复员处理；大弟在空军被复员处理；大妹参军不准许。父亲眼看着大儿子坐牢，二儿子、三儿子、大女儿被逐出北京，却无能为力。残酷的现实，使父亲 66 岁含冤离开了我们。治丧委员会悼词说：“陈实为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他襟怀坦白，坚持原则，坚持斗争，顾全大局。”葬在八宝山公墓。由于铁瑛对我人为制造的“现行反革命”冤案，致使父亲精神上极大的悲痛，临终前不能见面，故世后不准奔丧。这种人间悲剧，难道不是铁瑛“任意颠倒敌我，滥用‘反革命罪’的罪名”造成的恶果吗？在有关部门领导和母亲沈文芳（广安门医院离休干部）的努力下，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三个弟妹调回北京市，二妹有了工作，小妹安排在最高法院当公务员。就是我的冤案，“天高皇帝远”，为恢复党籍等问题，向铁瑛、省纪委、宣传部长达 30 多年的申诉，都是石沉大海。1979 年 12 月 6 日宣传部发文，省宣政 [1979] 120 号：“陈时秋定为‘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仍按复员规定当工人，下放基层劳动，保留原五级工工资待遇，行政留用察看一年。”哪有工人下放劳动之理？12 月 21 日，省检察院发文，浙检一起 [79] 11 号，《免于起诉决定书》。“陈时秋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猖狂进行反党乱军活动”，“是‘四人帮’的骨干分子。”有确凿的证据吗？绝对没有！宣传部、检察院闭着眼睛说瞎话。12 月 25 日，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198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之前，我被匆匆释放。

1980 年 1 月 15 日，专案组郑汝培送我去故乡安吉县红旗林场劳动。那天直到傍

晚无人理睬我，只好自己找张竹床，床上都是鸡屎，用井水冲洗一下，天很冷床又湿，想来想去一夜没好睡。我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要遭此劫难？古人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把党来比母亲”，是我的心声！这好比孩子有了错，母亲就把他一棍子打死，有这样的道理吗？想来想去睡不着。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组织上要大家积极投入运动，但是，最终反被运动吞没。想想不寒而栗，只有默默地咀嚼着苦涩的泪水，泪水湿透了被头。我真就怕在以后的生活中，牢狱里的噩梦伴随着我的后半生。忆往事像过电影历历在目：一个“红小鬼”，1945年12岁跟着新四军，过长江、渡黄河；1947年6月，14岁参军，南征北战，1954年1月入党；十年“文革”中，只凭许世友“长官意志”一句话，被打成“反党乱军”、“5.16”，最后，被铁瑛打成“现行反革命”下了大狱！80年1月被押解回故乡劳动改造。“文革”前填表：成份，革命家庭；出身，革命军人。一夜之间变成“黑五类”。从小跟随父亲提着脑袋干革命，成了“反革命”。共产党员坐共产党的牢，真是滑稽可笑！人生在世，草木不如，任人宰割罢了！

林场有我陈家的亲戚，知道我父亲在这一带打游击的故事，加上我拼命地干活，职工们待我如亲人。林场历次运动受难者劳改的地方，职工们见怪不怪了。

1980年7月21日，宣传部专案组周永祥（干部处长），和一位姓邓的女同志不时来林场了解情况。周永祥要我写《劳动、思想小结》我如期交出。摘要如下：

劳动、思想小结 陈时秋 1980.7.21.（摘要） 1980年1月15日，省委宣传部决定我到安吉县红旗林放下放劳动，分配在总场综合加工厂机修组。……机修组的修理任务繁锁，什么都修。……首先完成的是修理三台汽油发动机，一台是果木治虫用的。据说，……送递铺（县城）也修不好。……将发动机全部拆开检修，换了一些另配件，排除了油路电路的故障，经过多次调整，机器很好发动，修复了这台汽油机。今年果木队、竹种园，都是用它治虫，运转正常。另一台175F汽油发动机，可以用来抽水、消防等用处。据场里同志说，去年仓库起火，急需用它救火，可就是发不动，汽油机变成了“气煞机”。经过全部拆修，主要的油路缺少配件，汽油不经滤清而直接供油，常常造成油路阻塞，但又买不到配件。我想方设法，用竹管做了油杯，代替玻璃油杯。又将油、电路，汽缸全部调整，使这台机器恢复了运转。有时场里停电，用它抽水、打井，冲刷晒谷场

等。平时加足油，随时待用，作为消防备件。 还有一台汽油机，经检查是高压线圈断路，又无备件。我想，把“死马当活马医”吧。我用环氧树脂封固，把漆包线比头发还细的高压线圈拆开，经过精心检修找到了断头，终于将这台发动机修复了。 一次在检修化油器时，用中号镙丝起子上一只镙丝时，由于用力大，镙丝起子滑脱，正好扎进了左手虎口，有一公分多深，鲜血直流。到医务室包扎时竟晕了过去。事后，左手肿得像馒头一般。为了早日把汽油机修复，我一直坚持用一只手和同志们一起干，没有因工伤休息过一天。平时在车间或水田间修理柴油机，手扶拖拉机，在炎热的室外修理，就是汗流浹背，也坚持完成任务为止。每天修理工作结束，我都坚持把车间打扫干净。有时没有机修任务，就坚持看书学习。有一次，我还和机修组两位同志帮果木队去插秧。 附近生产队买了三台汽油机、喷雾喷粉治虫机，领导上要我去讲讲课。我和机修组一位同志一同去，为他们讲了使用、保养知识和发动机简单的原理。 为了让职工能收看好电视，我做了两付五单元的电视天线，……爬到礼堂顶上架好三付天线，把电视机调整好，保证了正常收看电视节目。场领导还要我到灵峰寺、章村分场解决收看不到电视问题，我都是尽力去办好。周围有的生产队的电视机坏了，……我也尽力为他们修复电视机，……。场内职工的收音机有故障，送给我修，我都用业余休息时间尽快为他们修好。半年来已修了近三十台收音机。有的职工缝纫机、拷边机有故障来找我，我也尽力帮助排除故障。 在林场半年多来，在劳动、学习中，思想基本是稳定的，……但有时也考虑一点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清查运动中，于 77 年 6 月 10 日，以“现行反革命”罪，突然将我逮捕，是不符合清查运动的政策。……宣传部在省体育馆大会上宣布的几条“现行反革命”罪状，有的是无限上纲，有的是张冠李戴，有的是编造的，是莫须有的，根本不存在现行反革命罪的问题。 我从十二岁（1945 年）跟新四军北撤到山东，十四岁参军，父母都是老干部。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周总理，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几十年来一贯立功受奖，工作勤勤恳恳。在我身上渗透的是要革命的血液，没有丝毫反革命的需求。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只认为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号召，反修、防修，才积极参加的。……怎么可以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呢？又作为全省的三个从严典型，在省体育馆挂牌批斗。事实上，批斗会上公布的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由于现行反革命罪不能

成立，省检察院的《免于起诉决定书》中，不少内容也就不实事求是了。例如：《免于起诉决定书》中，还把南京军区政治部，以假的、错误的材料，硬要把我打成“5.16”分子的事，作为我的主要罪状开列。我认为，如果能真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办案，就应该认定72年10月下旬，省政工组党委，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寄来的清查“5.16”分子的材料，对我进行审查，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对我的诬陷。……如果不割裂历史的话，没有72年对我进行停职审查，查什么“5.16”问题的事，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上书周总理等当时的中央领导和参加批林批孔，到马目学习班等一系列问题。我希望，省委宣传部组织上要考虑到事物的历史原因，前因后果，决不能再把72年按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假材料对我的审查，还认为是正确的了。第二个问题：释放后，宣传部定我为“四人帮”骨干分子。我认为，定性过高。……希望宣传部组织上能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在我身上体现党的政策。有一次，我把写好的《批判劳动惩罚论》文章交给周永祥，要求在《宣传通讯》上刊登。再一次，周永祥来林场对我说：“文章写得不错，还是不登为好，我们研究了一下，你在这里可以不要劳动了。”我说：“那我可以回杭州了？”周说：“那不行，省委规定不能回杭州，林场对你反映很好，以后在技术上帮帮他们。”不要劳动了我在这里干什么？留下一张草席，回杭州了。1981年8月28日给省委宣传部、检察院写申诉信。石沉大海。1981年11月15日，接到“家中有急事”的电报，我火速赶回杭州，看到家中大门被卸掉，窗户被砸破，家中空无一物。老姑妈和孩子们都席地而坐，对着我痛哭。原由是：国庆我回家休息，老伴提出，一家六口三代房子太挤，我们原先的房子空着，户口仍在原住址，这里住了四年多没有户口。我向宣传部提出要求搬回原住址。办公室主任说：四年前要你们搬家我们不知道，是机关事务管理局搞的，现在你们要搬回去我们不管。我说：1975年事务管理局分给宣传部三套房子，我当时是宣传办公室支部副书记，带着党小组长们一家一户调查，最后讨论决定：我家六口三代同堂人口最多，要我交出复员干部分配的岳王新村一套房子，搬到保俶路192号4组3号居住，有户口簿为证，这是有法律保护的。于是，10月5日搬回到户口所在地的房子住下。11月9日上午，事务管理局派出三位处长、书记，派出所户籍警（女）、“治安纠察”，以及七、八十号戴安全帽的人，将我家全部东西强行搬走，把大床从二楼摔下去，卸大门、

砸窗户，断电、断水。致使很多群众围观，楼上楼下挤满了人，保俶路段交通阻塞达二个小时之多。粉碎“四人帮”已经五个年头了，省委机关竟然出现我户口地的房屋被砸事件！ 11月16日，我去宣传部找政治处解决问题，他们仍要我到无户口的房子去住。我说，在中共六中全会文件学习后的今天，趁我和老伴不在家，竟发生了“文革”中那样的抢劫式搬家事件，你们把事情做绝了。我的女儿23岁，儿子19岁、16岁，向我哭诉：爸爸，如果宣传部仍定你是“反革命”，低着头过日子，因为我们铁了心，我们是“反革命”的子女；如果你是被错打的“反革命”，我们都这么大了，再搬回去住，邻居、群众不明真相，均在议论纷纷，我们怎么过日子？听了孩子们的诉说，只好向中纪委求救！我的三个孩子都在部队出生，从小就憧憬着有个美好的人生。铁瑛和省委宣传部，以莫须有罪名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还要“株连九族”，无辜的孩子们的理想成了泡影。 11月17日，就省委宣传部将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和强行搬家事件，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申诉信，以求得我的一家能有起码的人生权利。送给在杭州的中纪委刘顾问。 11月18日，机关事务管理局通过西湖区北山派出所，发出《迁移户粮关系通知》：“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80]277号文件精神，认真搞好户口整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条例》有关规定：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为此，刘炳春等人，请于11月30日前，来我处办理户粮迁移手续，迁入常住地。” 我的住房是宣传部在我交出复员干部部分的房子之后新分配的，1975年以来有常住户口簿为证。是机关事务管理局某些人无法无天，株连我的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派出所不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反倒要我们“迁移户粮关系”，这种做法有公正可言吗？

（十三）天天讲和谐 冤假错案何时平 据目前部分省市揭露的情况看，全国上下在这场揭批查以及清理“三种人”的特大运动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全国有四千多万人被残酷迫害，其中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是中共党史上最严重、最残酷，迫害新老干部、群众（包括未成年中、小学生），一大批共产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涉及面之广、迫害人之多，时间之久，其中不少人被判了长期徒刑，均创中华历史之最。光是浙江省就有400多万人遭受迫害。这在解决党内外矛盾是前所未有的，引起了广大群众和干部及社会各界强烈不

满，以至党威、军威，一落千丈。 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信访工作会议上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胡耀邦这段“两个不管”的讲话，讲得冠冕堂皇，句句在理，但并不实行，因为当权者离“彻底的唯物主义”还相差十万八千里，是骗骗老百姓的。实际上，都是搞“以人划线”，搞双重标准。一句话，还是“长官意志”说了算。 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应约拜访邓小平，向邓小平建议补上肃清封建遗毒的一课。他说：“共产党应该与过去彻底决裂，做到了没有？没有。现在看，是不是家长制、等级制？等级很严，真是严得很。……我想要兴无灭封，这是主要的。”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像许世友、铁瑛那样有严重封建专制思想和行为，如果不彻底铲除这种思想和行为，中国共产党将走向反面。尽管中央颁布了《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可有谁敢于刚正不阿来执行呢？ 1981年11月21日，胡耀邦在全国第五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说：“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揭呀、批呀、查呀，兵荒马乱，不可能不出一些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左’的影响还相当严重，就是那么一种思想状况。组织上，什么这一派、那一派，问题很多。……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总是认为他们那里的揭批查百分之百正确，怎么能够这样想呢？”

胡耀邦说：“陈云同志关于‘两案’审理工作有个批件，应该成为‘两案’审理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全党的认识也要在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上统一起来。”

陈云批件说：“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因而在这场斗争中有很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外处理以外，对于其它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

胡耀邦说：“什么是‘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比如说，对有些犯错误的人，考虑到他的历史表现并不那么坏，只要他交代、检讨一下，问题基本清楚

了，就算了。……如果一下子就开除党籍，或者一下子就判刑，一点余地也不留，那就不那么好。特别是对于那些几十年的老党员，我觉得，匆匆忙忙地开除党籍，是不好的。”（参见上海市委《宣传通讯》1982年第5期）。省“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规定：“对受审查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要慎重掌握。要开除党籍的，只限于犯有较严重的罪行，实行从宽处理，不给刑事处分，态度又不好的；错误严重，品质很坏，蓄意诬陷别人，造成严重后果、丧失共产党员品质的；党龄不长，入党后尽干坏事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入党又一直不干好事，根本不够共产党员条件的。”

请问，我哪一条符合要开除党籍的？宣传部领导商景才和专案组谢兰生，不但不按照胡耀邦总书记在“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陈云的批件精神办案；就是近在咫尺的省“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关于开除党籍规定也不执行。这是党性还是派性？不言而喻。浙江省“两案”领导小组人员有：王芳、薛驹、王耀庭、李朝龙、王宇等人组成。有关方面已承认，清查工作受到派性的干扰。

我和浙江日报社的高丕忠、浙江展览馆的蒋宇鸿三个人都是建国前参军。许世友违背军委总政规定（建国前参军的干部不属复员之例）而被强行复员的。李朝龙和蒋宇鸿，原来都在舟嵎要塞区政治部工作，都是铁瑛政委的老部下。李朝龙当了省委常委、公安厅长，对蒋宇鸿恢复党籍很关心，建议浙江展览馆党支部恢复蒋宇鸿的党籍。浙江展览馆支部也多次上报省委宣传部，被宣传部某些人压下。我们三人的问题，根本不属于涉嫌“两案”的问题；就是经过了“两案”的严格审查，也不符合省“两案”领导小组关于开除党籍的规定。历史将证明，我们都是被铁瑛、商景才等人政治陷害的。

1982年2月4日，中央批转中纪委“两案”会议纪要，中央发了[1982]9号文件：“清查中的问题是，定性偏高、处分偏重、有的搞错了”。“审查结论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经得起历史检验。”“事实材料要与本人核实，审查结论要同本人见面。”

宣传部对我的定性结论，浙宣干[85]38号文件，塞进我的档案里二十多年，至今本人没看到过。省委宣传部，理应模范地执行中央文件、党章和国法。开除我的党籍为什么不按照党章的程序办理？审查定性结论，为什么偷偷地塞进我的档案里，至今不同本人见面？这只能说明宣传部某些领导人心中有鬼！

8月18日，专案组从浙江日报调来的人找我谈话：“你看了中央[1982]9号文件，

有什么想法？考虑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你从宽处理。不是一风吹，更不是平反。你的问题和‘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根本不同。”我说：“为什么‘根本不同’？不是事实，就是冤假错案，冤假错案就得平反！”不是常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要么这是骗人口号。一面说对我是“从宽处理”，我理解有罪才从宽处理；一面给我一份《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要我提出意见。在《刑法》颁布实施，中央发出 [1982] 9 号文件，宣传部对我的冤案，罪与非罪还没分清。

省委宣传部定我“犯错误”，有十条。后来改为“犯严重错误”还是这十条。这里举例说明一、二：

一、“74 年 5 月，陈时秋与高丕忠、蒋宇鸿策划去南京军区所谓送大字报”，“攻击南京军区。”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对部队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作为“5.16”冤案的受害者，到南京军区政治部送大字报，要求平反有什么错呢？很多人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难道他们犯错误也会变成正确了？《近看许世友》文中说：“这次清查对江苏省广大军民来说，无疑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飞来横祸。惹出这么大的乱子，造成严重的后果，教训是很沉痛的。”在江苏军内外“5.16”冤案都得到了彻底平反。在浙江军内外“5.16”冤案不但不平反，反而要记录在案。那么，江苏省清查“5.16”，致使 13 万多人受害、致死，这本账该记录在谁的档案里？请专案组查一查许世友的档案里有没有？

二、“为沈策的错误辩解”，“攻击政工组材料组‘搞阴谋’。”政工组材料组吕根土给江青的材料上，把沈策（政工组党委书记）给朋友写信中的几句话，说是“攻击毛主席”。材料被江青批下来要查清楚。省委书记谭启龙，决定召开政工组党委扩大会议，解决沈策问题。我是在扩大会议上发言，是光明正大的事。我发言，建议把沈策的信全文公开，让到会的同志来认定。此事是我“犯严重错误”，还是吕根土犯严重错误？宣传部专案组这样搞定性材料，还把江青的批示抬出来，是党性还是派性？不是很清楚了吗？这种搞专案的方法，还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

1982 年 8 月 20 日，我对《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的意见，交专案组。11 月 27 日，省检察院发文，检刑诉字 [1982] 75 号：“陈时秋的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根据从宽政策的精神，决定撤销本院浙检一起 [79] 11 号《免于起诉决定书》。”同专案组一样，检察院的 75 号文，罪与非罪也没分清。 1984

年 2 月 20 日，宣传部发文，浙宣干 [1984] 11 号：《关于陈时秋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复议报告的批复》决定撤销省宣政 [1979] 120 号文，“党籍问题留待整党后期再复议处理。”宣传部领导周群对我说：“你的问题，组织上会一揽子解决的。” 1984 年 4 月某日，宣传部专案组沈秉钧向我宣布定性结论：“从‘两案’办公室转清查‘三种人’办公室，你的问题定性为犯严重错误，维持原来开除党籍，行政上不予处理。”我要文字决定，不给！就这样，一不让参加任何会议，剥夺了我的申辩权；二不给任何文字决定，就把宣传部刚发的浙宣干 [1984] 11 号文件，“犯错误”提高为“犯严重错误”。省委宣传部党组织，只凭“长官意志”办事，把一个从小在部队锻炼成长的老党员，被草草剥夺了政治生命。这种做法符合《党章》规定吗？这是践踏党的法规的典型表现。 1984 年 5 月上旬，宣传部专案组周永祥（干部处长）找我谈工作问题，要我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上班。我说：“‘现行反革命’案引起的开除党籍，冤狱两年半的工资不补发，抄家的东西没归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绝不能离开宣传部。”周说：“你可以先去上班，党籍和其它问题，看你在学校的表现，我们会对你负责到底的。”我相信组织说的话不会骗我的。可我不谙世事，太单纯了，没想到，堂堂正正省委宣传部，竟然会在我上班一年之后，发了浙宣干 [85] 38 号文件，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我的档案里。至今我不知道这个文件是啥样子。我想，个人的历史曲折反映了我们国家几十年的历史，我虽历经多次坎坷磨难，仍不坠青云之志，要为“四化”贡献力量。 1984 年 6 月 1 日，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更名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上班。我是背了政治包袱到“杭电”上班的，校领导和老师们待我很公正。在校工作十多年，先后得到三次处、系级先进奖，一次院级先进奖，我照片上了光荣榜。我非常感激校领导对我的关怀和保护。 1980 年 7 月至 1986 年 7 月，我三次给省委宣传部写申诉。不予理睬。专案组靠整人起家的沈秉钧，从省委宣传部调到“杭电”任组织部长，难道我在学校的表现不好吗？直到我离休，省委宣传部也没有兑现“负责到底”的承诺。其实专案组有的同志对我表示同情，田传箴、郑汝培是最早搞我“5.16”专案的，他们先后向我表示道歉；朱桂育任浙江展览馆副馆长，遇见我时赶快跑了，怕丢面子；我到“杭电”上班后，为普加一级工资，找专案组、干部处处长周永祥，他积极为我解决问题，后来他调到教育学院任党委书记，还要我去看他。 1993 年 10 月

25 日，办理离休手续，“杭电”党委 [1993] 24 号文件：“该同志离休后享受处级政治、生活待遇，工资照发。”返聘一年到 1994 年 10 月离休。

1986 年 7 月 31 日，万里副总理指出：“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我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对待批评的崭新认识。无论批评得对不对，都不能大搞文字狱、以言治罪。我在“文革”中，只写了一张反对不正之风的大字报，被许世友打成“反党乱军”分子；林彪搞的部队干部 41 万复员，我被复员处理；林彪制造的清查“5.16”，南京军区来材料说我是填了表的“5.16”，被停职审查；粉碎“四人帮”，我跟“四人帮”没有任何关联，却被铁瑛、省委宣传部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切的一切，难道还不是政治陷害？！省委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1977 年第 14 期，白纸黑字——“现行反革命分子陈时秋”；公安局、宣传部四个人签字的“抄家收条”；“对被捕人家属通知书”等材料，现在倒成了铁瑛、商景才、谢兰生等人，残酷迫害我一家人的确凿罪证！三十多年过去了，多次向宣传部、省纪委、中纪委、总书记申诉，都是石沉大海。一个离休干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处可以“击鼓升堂、滚丁板！”，这不是连封建社会还不如吗？！

2004 年 10 月 24 日，新华社电：中共中央颁布实施《党员权利保障条例》。10 月 25 日，11 月 25 日，给中共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挂号邮寄《我的申诉》。11 月 29 日，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张同志来电话，说：你的申诉收到了，由我负责处理，现在正在查找过去的文件，宣传部发的浙宣干 [84] 11 号文件找不着了，查到浙宣干 [84] 11 号文件是发给广播局的。张把联系电话告诉我，有事可以找他。11 月 30 日，我把专案组给的浙宣干 [84] 11 号文件的复印件，在省委大楼后大门交给张同志。2005 年 3 月 10 日、4 月 19 日，给中共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寄《我的申诉》、一封信。6 月 10 日，给省委宣传部干部处负责同志，寄去电脑打印的《陈时秋的主要罪行》、对定案《陈时秋的主要罪行》的申辩意见、《劳动、思想小结》、《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对《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的申辩意见等材料、资料、申诉等共 11 份，供省委宣传部备查。7 月 7 日，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张同志来电话，我不在家。第二天我给张同志回电话。他说：你的申诉按照程序，今年三月已交教育厅高教工

委处理，他们找你没有？ 我说：没有。我问：浙宣干 [84] 11 号文件有没有找到？ 张说：文件没有了，在你的档案里找到 1985 年 6 月 7 日宣传部发了浙宣干 [85] 38 号文件。 我说：我是 84 年 6 月 1 日到“杭电”上班的，从来没有向我传达过 [85] 38 号文件。 张说：那是学校的问题。 我说：不是学校的问题，是省委宣传部专案组沈秉钧调到“杭电”任组织部长搞的名堂。 张说：现在我在电话上给你念一遍 [85] 38 号文件：……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严重错误，维持原来开除党籍。 我说：你们先把抄家的东西还给我吧。 张说：是“文革”中抄的家，找不着了。 我说：不是群众组织抄家，是宣传部、公安局抄的家，不会丢的，抄家拿走的都是私人信件和照片，按照法律应该如数归还本人。你们把《我的申诉》推给高教工委，你们总有个意见吧？ 张说：我们和组织部研究认为，维持原来 [85] 38 号文件的结论。 我说：也就是维持原来的“长官意志”的结论。 “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年要置我于死地的是省委书记铁瑛和宣传部的商景才、谢兰生等人，不是高教工委。像当年高正生同志一样，我就是跳楼，也要从省委宣传部大楼上跳下去！ 2005 年 10 月 25 日，给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寄《我的申诉（二）》、《‘政治运动’回忆录》第二稿、《对陈时秋家进行了搜查》凭证复印件等文件。 2006 年 1 月 10 日、3 月 28 日，给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干部处挂号寄《我的申诉（三）》、《我的申诉（四）》。迄今为止，2007 年即将过去，又都是石沉大海。省委宣传部放着《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于不顾，继续维护浙宣干 [85] 38 号文件的结论，而且至今不给本人见面。按照党规，我信访多年，宣传部党组织应甄别出：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有没有确凿证据？还是政治陷害的？ 我的冤案起因并不复杂：

- （1）、南京军区政治部开展“四大”，我只写了一张反对不正之风的大字报，被打成“倒许乱军”，被抓、被毒打，为此，中央对南京军区在军内外大批抓人，发出 [68] 18 号文件，《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 （2）、南京军区在清查“5.16”中搞法西斯审查，逼迫南京军区后勤部锋锐交代，说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南京军区来函给省政工组，我被停职审查，后来，南京军区保卫部来函承认，材料是假的、错误的；
- （3）、粉碎“四人帮”后，我被铁瑛以莫须有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

“倒许乱军”、“5.16”、“现行反革命”三项特大帽子，都是许世友、铁瑛，违犯党纪国法，特别是违反中央

《十六条》中的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严正警告，而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万事都有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哪一条犯了《刑法》规定的罪行？请用《党章》、《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衡量。对我执行“从宽处理”、“维持原来开除党籍”的理由究竟是什么？请一条一条地摆出事实和证据来。没想到，当今的省委宣传部仍然没有超脱派性的干扰，把从来没有同本人见面、塞进我档案里二十多年的浙宣干 [85] 38 号文件，在电话中读了一遍了事。我怀疑专案组还在档案里塞了什么东西？让我晚年背着黑锅！例如，“三种人”。宣传部从来没有向我宣布我是“三种人”。可是，从突然取消浙宣干 [84] 11 号文件，把“犯错误”拔高为“犯严重错误”，是把我当“三种人”、“黑五类”处理的。这种做法，有不光明正大之嫌。就是死刑犯，也知道为什么判死刑。我被强行开除党籍，至今还不知道我违反了哪一条党纪？恳请宣传部党组织告诉我。“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宣传部对我长达三十年的申诉保持沉默，更是错误的。

什么是“三种人”？1981年11月21日，胡耀邦总书记，在“两案”审理工作会议上说：去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样说：“我在今年1月16日的讲话中说过，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我们在这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总书记说：“请同志们注意，小平同志这里讲了三种人不能上来，已经上来的要撤下去，但是并没有讲都要开除党籍。”清查“三种人”，胡耀邦主张冷处理，尤其是某些省的一把手，历史上有过功绩的更要慎重，从宽为好。于光远教授说：“我认为是否是‘三种人’不能以某人在文革中的头衔或者参加哪个组织为根据，而要看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政治本质”。可是，在清查“三种人”中，不少地方是按照“文革”中的头衔定罪，并且把造反派和“三种人”等同起来。商景才、谢兰生等人很清楚，我与林彪、江青根本没有任何关联，宣传部本来要给我恢复党籍的。就是清查“三种人”之后，商景才等人以为机会难得，虽然没有宣布我是“三种人”，但从我工作一年后，宣传部改发浙宣干 [85] 38 号文件，偷偷塞进我的档案来看，实际上是把当“三种人”处理的。在国家刚刚颁布正式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情况

下，一个政党中的邓小平，提出所谓“三种人”，可以不通过任何法定程序，来刑罚成千上万的党内外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清查“三种人”运动一开始，还只是党内整党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 1981年开始的清查“三种人”运动，就把一场新的“清理阶级队伍”非法地推向了全国。 1982年，中央 [82] 55号文件规定：“对‘三种人’要做结论，同本人见面，连同本人意见一并归入本人档案。” 82年12月30日和84年7月31日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什么是“三种人”？按这两个文件的解释，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83年底，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简报》中，“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打砸抢分子和其它坏分子。” 1983年4月23日，中央向全国颁发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 文件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 “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 换句话说，这些被“黑材料”记录在案的年轻人成了隐性的“黑五类”，起码丧失了“被选拔”和“出国”两项重要的公民权。从中央文件定义的“三种人”来看，除了“打砸抢分子”尚可能依法追究实实在在的刑事责任外，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严重”都没有触犯刑律：前者不符合起码的历史常识；后者以思想定罪，必然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而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即便对“打砸抢分子”的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这里也有一个追诉的法律“时效性”的界限。除了合法性之外，清查“三种人”的政治运动，还缺乏公平性和公信力。如果是清查“打砸抢分子”，那么无论他们在“文革”中属于哪一个派别，无论他们的现在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如何，都应当一视同仁地清查处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实际上这一运动，只是针对曾经造过他们反的造反派群众而来。 在1966年北京“红色恐怖”中，

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可谓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央，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任要职的孔丹等人。不料，陈云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由此，这批高干子弟被包庇了下来。邓小平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查“打砸抢”，会有公正可言吗？

例如： 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韦国清在“文革”中，直接指挥军队和他操纵的保守派组织“联指”，屠杀了近 20 万群众。其中，既有反对他的“4.22”造反派，又有从不卷入两派斗争的“黑五类”。“文革”后，数十万群众和受害者家属上书中央，要求清查这一广西最大的“三种人”。但是，因为韦国清和邓小平私交甚笃，非但被包庇下来，还一路官至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 内蒙古原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滕海清是一手制造“内人党”罪魁祸首之一。1968 年在内蒙整莫须有的“新内人党”就有 34.6 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占 75%），仅据中央发的文件承认：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这一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中，共打死 16, 222 人，致残 87, 188 人。但因为滕海清是在军内很有人脉的“老干部”，暮年照样在他的大军区副司令级别上颐养天年。相反，内蒙古师院学生造反派东方红纵队的头头之一的高树华，在当时仅是内蒙革委会党委，更曾经对这一冤案公开提出过异议。但却在揭批查和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被逮捕入狱四年，作为滕海清等老干部罪行的替罪羊。结果在查了四年都无法查出他任何“打砸抢”问题的情况下，才于 1983 年 7 月 5 日被迫以“不予起诉”的名义释放。比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清查”标准，这场运动有什么法律公正可言？ 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借军委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犯了严重错误，向中央作了检讨墨迹未干，又开始整人。自 1970 年 4 月起，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许世友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

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3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13万人被打成“5.16”分子，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江苏省两大派头头，文风来、曾邦元，一个被整死，一个被整得死去活来。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省革委副主任、老红军吴大胜当了许世友的替罪羊。许世友暮年在南京中山陵8号别墅颐养天年，一个共产党的高官，死后睡棺材，运河南还乡土葬。邓小平特批：“下不为例。”

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在揭批查运动中，挨整人数达400多万人。对部队复员干部所谓“倒许乱军”的，不问青红皂白就往死里整；对一派实行残酷镇压：有的被直接枪决，洞头县原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枪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将其喉管割断，可见铁瑛心之狠毒，手段之残忍，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马目学习班”学员张小定，在杭州钢铁厂被另一派活活打死，塞在阴沟洞里；学员孔汉茂，在汽车制造厂被另一派活活逼死。仅以台州地区为例，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11人被逼死、23人被判刑、50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3200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临海县被逼死的有20人、被判刑的有46人；黄岩县当时有20人被逼致死，38人判了刑，其中1人被判死缓；仙居县被逼死22人，被判反革命罪38人；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4人，判刑39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44人。另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662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7个“反革命罪”。金华地、县有190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4人被判处了死刑。就在铁瑛眼皮底下的杭州市，一个不到2000人的杭州机床厂，就有3人被逼致死，1人被逼疯，3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38人；另一家仅有300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3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16人被无辜关入土牢。

与此同时，浙江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全面砍杀先进典型人物的恶流：毛主席亲自批示：“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劳动模范应四官（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文革”前夕，还专门向他打招呼，要他支持革命造反派。仅仅因为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任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期间镇压群众一事提出批评，铁瑛却对此怀恨在心，直接指使该县县委副书记刘

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 298 次之多。并被定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还株连了下面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甚至连当年报道他“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记者都不放过，使他蒙受了“不揭发”的莫须有罪名，将他置于死地而不择手段。被周总理誉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桐庐县印渚公社南堡大队，被突发的特大洪水冲毁，全村只剩下一棵苦楝树。罗马尼亚也因洪灾，提出要我国支援，周总理向他们介绍我国浙江有一个南堡大队，以“泰山压顶不弯”的精神，自力更生战胜洪灾的事迹鼓励他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为题大力表彰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与山洪作斗争中舍己为人，不惜牺牲自家十几条生命而一心为公的好支书李金荣。在揭批查中被铁瑛等人打成帮派骨干而遭逮捕判刑。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扬的农民学哲学的带头人，江山县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被作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遭关押批斗，最后以所谓写“黑文章”、作“黑报告”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五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全省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些农业战线上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根据《人民画报》社、《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人民中国报道》等报刊杂志的约稿，我都进行过多次报道。诚然，如果这些被处理的人真的是罪有应得，也无话可说。事实却不是这样。如能进行一下调查研究就会发现，许多被处理的所谓“三种人”，都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现在案中人和无辜受牵连的家属，一部分已经去世，但多数还健在，有的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生活保障，在贫困交加中艰难地活着！这种违犯人权、违犯宪法、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必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是建国以来手段最残暴、迫害人最多、时间最长，可创世界之最！

铁瑛在揭批查中，一方面对一派实行残酷镇压，而对另一派，实行“鸡犬升天”的保护政策。像方剑文、姚国麟、杨秀珠等人，这些扶不起来的阿斗为什么不是“三种人”？铁瑛心中最清楚。方剑文、姚国麟、杨秀珠等人，都是劣迹斑斑的坏头头。铁瑛对他们关怀备至，百般呵护，给他（她）们升官晋级，委以重任：

如方剑文，原杭运段工人，1969 年 2 月 8 日，带头冲击舟山战备武器仓库，抢劫枪支 3000 多支，子弹 50000 万多发。当晚，方剑文主持将枪支弹药发给各地的一些组织；同年 6 月 12 日，方剑文带领“赴京代表汇报团”近二百人包围新华社，中央指示，对方剑文的问

题进行公开批判（参见《浙江方志》编辑部编印的《浙江“文革”纪事》第 123、128、130 页）。这样的人，却被铁瑛提到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的高位。后因倒卖钢材而被判刑五年。与方剑文一起策划抢劫枪支、弹药，包围新华社的原杭运段职工邵素珍，也受到铁瑛的重用，并享受正处级待遇退休。又如温州的打砸抢总头目姚国麟，在“文革”期间抢劫枪支、弹药和船只，到处挑起武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震动了中央，周总理为此专门作过指示。姚国麟也被铁瑛提拔为温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兼打击走私贩私办公室主任。后因跟市公安局局长搞走私活动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更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卖馒头女孩，16 岁就当姚国麟小情妇的杨秀珠，被铁瑛看中，一下子就当上了温州市副市长，后来，又提拔她为省建设厅副厅长。当再次要提拔她为厅长时，杨秀珠却突然携巨款外逃，至今人们不知道她的下落。此事震动了中央、中纪委领导同志。在许世友、铁瑛这些大人物看来，我是个小人物，一个普通的离休干部，冤屈死可以不作数。但是共产党一贯强调：“坚持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党员享有特权。”有谁能做到？政治诚信是基本的政治道德，一个政党，党的组织，如果缺乏诚信，就难以说得上有什么威信，就不可能赢得人心。戒除不诚信政治行为，社会和谐才有基础。请叩问良知，大家都是来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的，为什么动不动就整人家是“反革命”？有那么多反革命吗？！对揭批查运动中打击面太大，定性太高的问题，胡耀邦总书记曾两次出台文件试图“纠偏”，但由于邓小平“二十年不议”的旨意，加上地方派性干扰，使中央[82]9 号等文件最终变成废纸。难道邓的一句话就是法律？后来的执政者就把“两案”作为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三十多年过去了，远远超过了“二十年不议”的时效，党中央总不该再回避建国以来最大冤假错案了吧？！在另一面，对刘少奇 61 人叛徒案，在邓小平的旨意下，得到了超高速平反。汪东兴说：“……1936 年 8 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义，指使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里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多人，‘履行国民党政府必须规定的出狱手续’，即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后，才能给予释放的条文，同意他们这样做。后来，薄一波等人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这样做而出狱。……毛泽东看了他们出狱时发表的《反共启事》后，气愤地说：‘这明明就是自首书，什么出狱手续’。我如果被捕了，就是宁可把牢底

坐穿，也不能服从这样的叛变决定。就凭这一条，定刘少奇是叛徒头子，就不为之过分！”（参见《汪东兴传》第 357 至 362）。我从十二岁跟着新四军，不顾生命危险追随党，到六十一岁离休，十八次立功受奖，这是我人生轨迹的重要见证。在部队中锻炼成：勤恳厚实、宽容大度，从不整人、同情弱者，直言不讳、不说假话，倔强直率、刚直不阿，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共产党人品格。我原是一名中共党员、军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和中央保持一致，是党员的天职；执行军委总政、军区政治部开展“四大”，是军人的职责。在风云突变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始终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行事。为什么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倒成了“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而写了自首书，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们，反倒得到了快速平反！这不是正反颠倒了吗？！回想我以往做的事，一贯都是按党的政策、原则办事的：

（1）、1974 年某月，宣传部干部谢兰生的孩子需政审，支部要我去看档案，我写政审材料时，不因“文革”中的观点不同，我按照党对干部的一贯政策，只字没提及孩子爷爷的重大历史问题。谢兰生在清查工作中当了我的专案组长，采用诱供、指供、逼供等手段，逼迫我交代所谓“恶毒攻击华主席”的言论，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

（2）、1976 年 4 月，天安门“四.四”事件，党中央发出两个决议，全国党政军纷纷表态的情况下，被中央定为反革命事件。听说要追查宣传部文声“反革命”时，我多次劝说张高星：“追查反革命不是开玩笑，这是领导上的事。”劝他个人不要插手。《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总则第二条规定：“党员享有的党章规定的各项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党的任何一级组织、任何党员都无权剥夺。”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党员对于党组织给予本人的处分、鉴定、审查结论或者其它处理不服的，有权向本人所在党组织、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申诉；……党员有权要求有关党组织对其提出的请求、申诉和控告给予负责的答复。”因此，我有权要求对以下五个问题，请省委宣传部党组织给予负责的答复。

（1）、省委宣传部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有确凿的证据吗？还是政治陷害？

（2）、“现行反革命”不能成立，公安机关和宣传部抄家拿走的私人信件 46 封、照片 10 张，为什么至今不归还？冤狱两年半的工资为什么不补发？

（3）、开除党籍为什么不按《党章》程序办事？一不让参加任何会议，二不给任何文字决定；只凭“长官意志”强行把我的党籍拿掉，这是哪家的规矩？

(4)、1984年2月20日，宣传部发的浙宣干[84]11号文件，定我“犯错误”，并要我抄录11号文件；一年后改为浙宣干[85]38号文件，提高为“犯严重错误”，偷偷塞进我的档案里不让本人知道。这种做法，是光明正大吗？还是搞阴谋诡计？

(5)、2005年7月8日，宣传部干部处张同志，从电话上给我读了二十多年前的浙宣干[85]38号文件就不了了之。这种不负责任的答复，是根据《党章》哪一条规定？

这些问题是生命攸关的问题。罪与非罪是原则问题，绝不能含糊。宣传部不应回避这些问题，应带头模范地遵守、贯彻、维护党章，执行党对干部的一贯政策。用一个电话就打发了沉冤三十多年的冤案，这是在继续剥夺《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在继续维护“长官意志”酿成的恶果。

共产党人到底怎么啦？无辜把人往死里整！整完了还不承认整错了，这些人还有党性可言吗？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人权问题已写进当今的《宪法》里。宣传部仍然维护塞进我的档案里二十多年的浙宣干[85]38号文件的错误结论，这种做法符合《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宪法》和《信访条例》等党规、法规哪一条？这只能说明在宣传部党组织那里，党规、法规形同虚设！

上述真实的历史记忆，都有党纪国法、中央文件、历史实录为依据，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而原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政治部，浙江省委铁瑛书记、宣传部，违犯党纪国法，不顾事实真相，没有确凿的证据，人为制造的“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等三项特大号的帽子，由此开除我的党籍，是经不起党纪国法和历史检验的。

对于十七大代表的选举，中央通知规定：十七大代表必须是“优秀共产党员”。铁瑛优秀什么？他是镇压人民群众的指挥者！他在揭批查运动中，派性实足，亲一派压一派，累及400多万人及其无辜的家属孩子，欠下了累累血债！怎么成了“优秀共产党员”？怎么也是十七大代表？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继续在共产党脸上抹黑吗？现今，不是强调“依法治国”吗？究竟是法大还是权大？在法律面前设置禁区，哪有公平可言？构建和谐社会，不平反冤假错案，和谐从何而来？我期盼着毛泽东思想能够回归十七大——正确认识、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理性求索13亿人口和谐之路。胡锦涛总书记关注民生、注重信访工作，我日夜期盼着能见之于行动，将南京军区党委、政治部，浙江省委、宣传部，对我制造的“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冤假错案予以平反，还我一个公正，恢复我的党籍，解决遗留问题。

毛主席在迟暮之年，奋力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旨在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土壤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 1966 年 6 月说过：“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1973 年 8 月 24 日，周恩来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指出：“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牢记这三项原则，坚持这三项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 毛主席晚年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毛主席虽然走了，可是，他一生的丰功伟绩，都印刻在中国人民劳苦大众的脑海里，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撒下了继续革命的种子。中国人民反对剥削压迫、坚持民族独立的决心，将是空前坚定的。我时刻怀念着那位对此做出伟大贡献的，文治武功举世无双的人民英雄——毛泽东。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历史事件，再漫长的岁月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千秋功过，自有历史评说。我坚信，时间可以检验一切的，我的冤案终久会得到申冤！ 我是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感到无尚光荣！对自己十二岁就跟随父辈们参加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的选择，绝不会动摇！我应抛弃个人恩怨得失，以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为捍卫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继续奉献我的余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离休干部 陈时秋 2006 年 6 月 16 日杭州 2008 年 8 月 18 日修改

后记 《真实的历史记忆》这部回忆录，是在我 2000 年 5 月 8 日突发中风，脑子受到较大创伤，住院一月后突发奇想开始撰写的。为了康复记忆、失言、写字等功能，我采取不少有效措施，以防止二次中风。其中，最重要的是多用脑，多读报，多炼字。一开始，我买了稿纸，从炼钢笔字开始，还坚持过去的炼书法。后来，我买了电脑，开始学打字，上网看看新闻。凡是有利于康复脑部功能的事，我都刻意去做好。中风八年多了，我的康复锻炼已见成效，受益匪浅。人生苦短，去日无多。想动笔写点什么？撰写回忆录，给亲朋好友、后代和我的一生有个交代。我在长沙解放军第一政治干校，比较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结合“改革开放”30 年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像照妖镜一样，剖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出现的罪恶与灾难，再大的政治骗子、汉奸、卖国贼，必将显露出他们的原形。我认为，共产党人应该“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地位不能给人以智慧，权力也不能使人拥有真理。大人物才能写回忆录，小人物写回忆录有什么用呢？这是历史的偏见。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被某些大人物打成“反革命”，又非法、强行开除党籍。现在我把这段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我在“文革”中的连锁冤案真实地再现出来，以反证法，揭穿某些大人物的回忆录违背历史真实，掩盖其违反党纪国法的种种丑恶行径。回忆录中，很难免有不周之处，恳请老首长、老领导、老战友和亲朋好友批评、指正。

《柳营梦》（摘录） 赵玉祥著

（五十五）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

要介入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

5 个月的“文化大革命”实践，没有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什么好处，相反造成了全国大动乱。毛泽东同志也处于困境之中。“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很快波及到军队。尤其在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下，军队也开始动乱起来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以及南京地区所属军队院校如南京军事学院、南京步兵学校、南京工程兵学院，南京

炮兵学校，南京军区“三团二队”（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全面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1966年11月12日，在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并规定每人每天要写多少张。并说“这是对毛主席态度问题”。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暂不开展“四大”的部门有组织有领导地专辟一室，允许写小字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涉及“横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派”之类的内容。小字报涉及的都是鸡毛蒜皮和小人物。军区机关干部的思想，基本上并存着二个问题：一是对地方造反派冲击省市委机关，搞夺权斗争不予支持，认为它是错误行为。二是，对军区党委和二级首长“怕群众”“不让机关干部鸣放揭发批判问题”感到怀疑和不满。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感到迷惘不解。在地方工作的家属，带回机关的大字报内容和“小道消息”，严重地影响机关干部的思想稳定，部分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正在逐渐变化。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直属队，被告知：“聂元梓和蒯大富借‘12.9’运动要南下南京，煽风点火，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搞夺权”。机关党组织暗中做了严密布署。防止突发事件发生。我记得“12.9”夜，我和其他同志深夜都还没有睡觉，冒着严寒在机关宿舍轮流值班巡逻，防备万一。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把矛盾对准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但是，这个高潮没有持续多久，就跌入深谷了。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以王洪文为头目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8月，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对此大加称赞。他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月11日，经毛泽东授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各造反派团体发贺电，祝贺他们的胜利。夺权之风，盛行全国。各单位的群众纷纷分裂为两派，而且日益对立。

斗争逐步升级。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在1967年1月23日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

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文革成员刘志坚被打倒了。肖华被说成是“扶不起来的猪大肠”，也被打倒了。形势急转直下，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干部，纷纷成立“战斗队”，要求军区首长、司政后首长出来澄清“不介入”的理由，批评、指责性的大字报贴出来了，群众中两种不同观点出现了。军区机关很多干部都不愿意当保皇派，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要介入“文化大革命”，要支持地方和军队革命左派。但，也有部分同志，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坚持部队不能乱，何时开展“文化大革命”，何时大鸣大放，何时搞大批判要听中央军委的命令，要等总政部的通知。在此期间，全国所有媒体，都在宣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鼓动当“造反派”，当“反潮流勇士”。要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党指到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本着对党的忠心，对毛泽东同志的爱戴和拥护，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热情地投入到这场“莫名其妙”的运动中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运动中产生不同观点和认识也是正常的。

1967年1月26日，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分同志串联了后勤司令部、政治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等，自行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后勤首长澄清问题。大会由军械部王家恩主持，被请到会场的后勤首长有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等。我也被王家恩临时推到台前讲话。大会设在后勤部办公大楼前面广场上，广场上人群密集，气氛热烈，声势很大，“打倒刘邓陶”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干部家属们也参加了。会上，群众要求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两位首长，没有满足群众的要求，对大会召开也没有表态支持，引起与会人员愤慨和不满。在一片喧闹声中，部分群众要求给郭钟两位首长戴高帽子并要求他俩下跪。王家恩应台下群众要求，令首长下跪，旋即起立，接受群众批斗。各业务部部长都被勒令到会，站立两旁陪斗。大会群众要求到会首长戴高帽子游街，运输部周乃馨出来打圆场，劝说群众改为游办公大楼。钟贤文副部长被迫游了办公大楼。这种错误做法，是受当时极

左思潮的影响，“中央文革”竭力推行极“左”路线密切相关的。

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部分同志，1967年1月25日，27日也分别召开了类似大会。南京军区领导机关自发性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场了。在此期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杜平都在北京开会。军区两位主要负责同志，在北京不断打电话，要求机关干部不要急噪，一定要服从命令，不准擅自开展“文化大革命”。否则，要执行纪律。这个要求是正确的，应该执行。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劝阻无效。许世友得知司政后机关召开大会，批斗首长，搞戴高帽子，下跪、游楼等，十分恼火。他带着镇反情绪打电话给在家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对造反的骨干分子，“执行纪律”，大规模抓人。然而，王必成、鲍先志、林维先三位军区首长没有执行许世友的错误命令，对起来造反的人员，坚持采取劝说和教育的做法。杜平政委也不同意许世友司令员过激的断然措施。后来我们在进行“平反”斗争中，才知道其他大军区如福州、武汉、广州、沈阳、北京等大军区也开展了自发的“文化大革命”。南京军区机关和直属队在王、林、鲍和后勤首长劝说下，南京军区后勤部机关的各战斗队停止了活动，很快大字报也不写了。恢复了正常秩序。但是，驻宁各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从北京南下“点火”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造反派，他们串联一起，天天把宣传车开进机关，利用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煽动性的消息和毛泽东语录歌。这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和破坏，对南京军区机关的冲击起了很坏的作用。

（五十六）各老师反对军队搞“四大”

军委八条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稳定

1966年11月13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在会上，老师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毅说，“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起”。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军人”（按心脏病倒下指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1967年1月28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提出的八条命令，作了批示。“所订八条，很好，

照发”。“八条”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允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七、军以上机关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

1967年1月29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所有大字报不复存在，写大字报的人主动把大字报揭了下来。群情不再激昂了，人心不再浮动了。工作全面转入正常状态。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是听党的话的，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司政后机关平静了。

1967年2月26日上午8时，运输部被通知集合干部到后勤礼堂听传达文件，听报告，军官家属们也去了。会场拉起一长条横幅上书“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我一到场就知道了，后勤机关和直属队都来了。机关幼儿园、工程队、小卖部、食堂、浴室、理发店等员工都到场了。九时正，南京军区后勤部各位首长登上主席台，各业务部首长也登上了主席台第二排就坐。大会由副部长钟贤文少将主持，张祥副部长宣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讲话。他的“讲话”充满了火药味。他说，“机关有少数人员，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配合，冲击后勤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战备，破坏正常工作。企图把部队搞乱，乘机夺权。他们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使

亲者痛仇者快”。张祥副部长的讲话，给大会定了调子，会场骤然紧张了起来。我知道要出事了，但我没有料到竟会出到我头上。张祥继续讲到，“为了给文化大革命护航，必须保证军队稳定。根据军区党委的决定，对一小撮违反纪律的人员采取断然措施，对以下人员实行行政看管”。大会会场空气一下子凝结了。自发开展“四大”的人脸色苍白，反对开展“四大”的人，幸灾乐祸，他们发出得意的微笑。被看管人员的名单，由直工处处长宣布。后勤司令部被看管的有傅跃宗、张德隆，军械部被看管的有王家恩、薛桦、朱祖祚、陈登泉。运输部油料部被看管的有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赵玉祥。物资部被看管的有沈文琛、王树雨。除财务部、军需部没有人被看管外，各部、下属直属队都有人被看管，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被看管的人更多。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胸外科著名医生（专家）沈威廉、龙启明（唐亮政委保健医生）均被看管。所谓行政看管，实际上就是逮捕关押。我和龙启明被关在一个房间里。许世友司令员没有请示报告总参谋部，擅自动用野战部队，调 60 集团军 181 师某部，来南京军区机关执行看管任务。181 师某团指战员被告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开始我被关押在南京军区后勤部警卫连，战士们对发生的事情都很明白，他们同情我们，在执行看管任务中，为我们通风报信，买香烟、买食品等。被察觉后，许世友调来了 181 师野战部队，取代了机关警卫连。这个部队的干部战士闻说军区机关“反革命暴乱”首长被批被斗、被戴高帽，被游街、被下跪，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以镇压反革命的战斗士气，开进机关。每个牢房门口都有如临大敌的上刺刀持枪战士站岗，他们全副武装。巡逻班长则横胸悬挂着冲锋枪，时不时叫我们出去打扫厕所，我们说，“没有工具无法打扫”，班长说，“用手”！这些战士把我们当做阶级敌人看待。

被看管的人不断地被“提审”，接着就是写揭发材料，被看管的人越来越多。后勤警卫连地方太小，人满为患，集中营被移徙到南京市上新河一所军队速成中学里。仅南京军区后勤部被行政看管的官兵、文职人员、职工达 700 多人。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大部被逮捕的人员，统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李树和部长主持审讯和管理。凡被捕入狱的人一律取下帽徽领章，手表钢笔、系裤子的皮带、鞋带一律收缴统一登记保管。红军长征时期，肃反扩大化运动又重新出现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打着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旗号，

擅自调动野战部队、私设监狱，非法对大批所谓“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进行审讯、批斗、下放军队农场劳动改造。被看管的干部中有军区政治部主任史景班将军（陆军第 12 集团军政治委员，李德生为军长），后来扩大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将军、林维先将军、副政治委员鲍先志将军。师以上干部被看管的有：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赵树湘，后来扩大到秘书长卞庸中、青年部长季遐年都受到审查。后勤部师以上干部有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委员后勤部部长刘万祥、人民解放军 916 油料仓库政治委员邓启樵。团以上干部被看管或被涉嫌清洗回原籍农村，监督劳动降为 21 级 22 级的不在少数。后勤营房部有一位 13 级正团级叶慈处长，被降为 21 级全家遣送回河南原籍，受尽折磨。后勤行政管理处处长田某，被打成假党员、地主还乡团之后，亦被遣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受到南京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下达后第二天，南京军区机关自发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遵照《八条命令》停止活动。然而，许世友司令员，却背着党中央、中央军委，背着毛泽东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违背“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人不准调动一兵一卒的命令”，自作主张调动军队，对出于革命热情的广大干部、战士、文职人员进行逮捕、关押、审讯、批斗、劳改、遣返回乡等。

许世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给党和军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损失。他提的口号和划线标准：凡“倒许乱军”即定性为反革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对待“出于认识问题”而违反纪律的同志。

（五十七）武装关押大会批小会斗

认识问题竟作敌我矛盾处理

1967 年 2 月，南京显得特别寒冷，春节失去了祺祥和温馨，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队被笼罩在紧张而恐惧的气氛之中。3 月 10 日，两部交通车停在南京上新河原南京军区速成中学礼堂前的空坪上。我和龙启明被喊了出来，两位上了刺刀的持枪战士，把我们押走了。我看到走廊上布满了岗哨，每个临时牢房的门口都有持枪上刺刀战士站岗。下了楼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还有荷着冲锋枪的流动哨。

上了车依次坐定，每一位被押送的同志座旁都配置一位带枪战士，一个看一个。车门车窗全扯下帘布，掩掩实实，不透风也不透光，叫你看不到外面是什么景。车门处站着一名带冲锋枪的战士把门，车厢尾部又有一位带冲锋枪战士断后。这种严密的武装押送措施，叫人感到是上刑场。到了目的地，战士令我下车，我才知道是后勤大礼堂。下车的“反革命”们一个战士押一个“犯人”，刺刀顶着腰鱼贯进入会场。我抬头一看，昔日我经常出入的大礼堂，密密麻麻坐满了人，绝大多数我都认识，还有很多家属。他（她）们见到这些失踪多日的，昨日还是同志今天成了“敌人”的“老熟人”，甚至还有“亲人”，居然须发蓬乱，面色苍白，既无裤带又无鞋带，蹒跚地走进会场，都惊呆了。有一位家属当场昏厥了过去。我看到有的同志在用手擦眼泪；有的同志低下头来不再想看到我们；有的同志面部表情严峻惊恐万分地看着我们……。也有少数同志矜持自得幸灾乐祸地在交头密语。大会主席台上方一副横幅，老规矩红布白底黑字，大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这种横幅和标语，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流行色，也是一道风景线。

后勤首长谭友夫部长郭金林政委来了，坐定之后，“批斗大会”主持人宣布纪律，其中有严格保密的规定。也就是说这类“批斗大会”严禁外传，绝不允许泄露出去。理由是为了防止军内外造反派来冲击，来破坏，来抢人。其实“保密”还有重要因素，对党中央毛主席封锁消息。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这种胡作非为不让党中央毛主席和总部得知，无异于唐柳宗元的《封建论》里所讲的，“骄兵悍将尾大不掉”的典型。批斗会开始之前，主持人示意“专职人员”，高喊革命口号。其中有“坚决镇压反革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究，立功受奖”之类的口号。大会定性为“敌我矛盾”。

3月10日批斗会没有把我当目标，仅是陪绑。醉翁之意不在酒，吓吓我。3月12日，我又被押解到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批斗，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都被请到了。

田从洵，1945年兵，抗日战争干部。胶东人，原第32集团军政治指导员，他干过炮兵。1953年人民解放军上海汽车学校学员队指导员，我妻子郭泽俭是他的兵。田从洵水平较高工作能力强。任运输部组织计划处副处长，时年37岁，我是他的部下。田从洵被看管毫无根据，也毫无理由。他根本没有“造反”，“稳

军”派大人指控他是机关动乱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说他是地主阶级“本性”，是“阶级报复”等等，一派胡言。

于国城 1946 年兵，红小鬼，原第 22 集团军机要人员。指控他富农分子长期对党不满，终于“跳出来”了。

被批斗的 4 位“反革命”一位团职，二位营职，一位连职。

批斗我，始终说不出“子丑寅卯”来，在骄傲自满上兜圈子。喊口号的人，怎么也不肯喊“打倒赵玉祥”，“赵玉祥老实交代”的口号也不喊。

在上新河集中营里，我和龙启明关在一个牢房里，睡的是地铺，有一块铺板，一条席子，二床军用被子，一个枕头。一日三餐有战士送来。伙食还不错，二菜一汤。因为我们是“反革命”，战士对我们很仇恨。有一次，有一位班长带着冲锋枪闯进我的牢房，手里拿着一根麻绳，命令龙启明把我反手绑起来，龙启明不肯，下不了手。我对龙启明说，“你绑吧！我不怪你”。龙无奈，只好把我捆了起来，那位班长在旁边笑得开心，5 分钟后，他又命令龙启明给我松绑。他拿我们作乐取笑。

人民解放军上海 916 油库政治委员邓启樵，被批斗时吓得小便失禁尿了一裤子。

龙启明被批斗后，在浴室里洗澡，见到专案组人员便倒头下跪求饶。

有一位女职工被批斗后流产了。

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医生沈威廉，在关押中肝病发作出现黄疸，死在手术台上。批斗大会上，指控他取名“威廉”，是企图“变天”。因为“威廉”是德国皇帝的名字。所谓“批倒批够批臭”已到了无聊的地步。

龙启明 1945 年兵胶东人，三代贫农，唐亮政委的保健医生，红根子正得很，为什么会造反呢？说他想当军区总医院院长，是野心家。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许世友司令员公开发问“龙院长来了没有”？吓得龙启明老娘，也给医院领导人磕头，请求宽恕。

南京军区后勤部机关和直属队就造了三天反，《八条命令》宣布之后，竟遭到如此严厉的对待。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曾不点名批评许世友时说，“老虎屁股摸不得，群众给他提点意见，他如丧考妣，就像挖了他家的祖坟，把提他意见的人说是‘516’反革命”。

我被关押 45 天之后被释放了。运输部任曾部长对我说，“你是最早被解除看管的。我们这些人讲话还是有点用处的”。意思是，运输部首长保了我。我听了之后“感激涕零”。

1967 年 4 月 6 日，毛泽东主席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命令》规定，“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这个命令共十条，通常称“军委十条”。这个命令的调子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的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于“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于“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军委十条》发布之后，南京军区大批放人了。

1967 年 7 月 14 日，凌晨三时毛泽东主席在列车上，同同行的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谈话，毛泽东谈兴很足。他说“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又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个反复”。“反复好……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毛泽东主席道出了一个“压”字，强调“来个反复”，并说“反复好”。这意味深长。

1967 年 9 月，毛泽东主席又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毛主席说：“龙潜（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他又说，“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毛泽东明确指出：①群众有气。②许世友不能打倒。③把打倒许世友的人打成反革命是犯错误。然而，许世友对党中央毛主席的讲话，断章取义，阳奉阴违，充耳不闻，背着党中央毛主席，一意孤行仍在搞他的那一套“倒许乱军”，把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同许世友个人等同了起来。许世友批评不得，谁批评许世友，谁就是“乱军”分子，“倒许乱军分子”就是反革命，就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许世友太霸道了！

1967 年 4 月《军委十条》之后，南京军区后勤部第一批被释放的“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被下放到安徽和县，后勤部某工程团劳动改造去了。和我一起去的有于国城、陈登泉，朱祖祚等人。南京军区总医院刘万祥政委也去了。四月间，安徽和县（江北）还是很冷的，我们冒着寒冷在军垦农场的水田里耕地，在农场里盖营房，在场里挖沟搞水利。我们到来之前，南京军区政治部遵照许世友的指示，“告知部队，这些乌七八糟的知识分子都是反革命，他们要搞动乱，他们批斗首长。对他们要严加看管，监督劳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战士们听了，当然又是“咬牙切齿”一番。比如抬大土的时候，战士叫我抬小头（距离短的一头）年青力壮的战士抬大头，把我压得直不起腰来。你可别小看这些战士，整起人来也满够你呛的。问题更严重的，《军委十条》下达之后，集中营并未撤消解散，仍关押着一大批自己的同志。这批同志所以迟迟没有被释放，因为他们成份不好，大都为地主富农出身，有的有复杂社会关系。唯成份论害死了这批好同志。许世友拿着“唯成份论”这根鸡毛当令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在“四方面军”，许世友早把这批人当做肃反对象给杀了！这些事情，又被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党中央毛主席严厉批评了许世友，许世友被迫又做起“假检讨”，并且扮演刘备演了一场哭戏！1967 年 7 月，武汉闹得很凶，毛泽东主席曾让张春桥跟许世友谈谈。毛泽东淡淡一笑，抬起一个手指：“你们把许世友接到上海来”。杨成武说，“我去吧？”毛泽东把手一拂，“你不能去，叫张春桥去”。在电话中许世友对张春桥说：“我有错误，在两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都做过检查”。“我是司令员，我都做过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许世友又说：“检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毛泽东主席在思考，怎么解决许世友和南京军区的问题。许世友虽是一个人犯错误，却关系全局。许世友当天被接到上海了。推开客厅门，许世友刚见到毛主席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放声大哭。毛泽东忙从沙发里站起身，快步赶过来，用双手扶他起来，眼圈也红了。连声说，“莫哭，不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其他人见此情景，都自觉退出门外。时间不长，那扇门又打开了，许世友一脸精神地走出来。他对杨成武说，“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谢谢你，老杨”。但是，事隔一年之后，1968 年 8 月，杨成

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陷害，被打成“杨余傅反党集团”，余立金当场被逮捕，杨成武、傅崇碧被隔离审查。帽徽领章都被拿掉了。南京军区又一次掀起大揪“倒许乱军分子”浊浪。许世友说，“这些人（指倒许乱军分子）的后面有一根又粗又长的根子，他们的后台就是杨余傅！”这个时候许世友忘记了他还要打只豹子送给杨成武哩！“四人帮”垮台之后，许世友标榜自己是一贯反“四人帮”的，显得十分活跃。他嘲笑张春桥，“夹皮包黑报告，戴眼镜瞎放炮”。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四人帮”在台上时，许世友没有少喊“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人们也不会忘记，张春桥的女儿在南京军区后勤第 16 分部当过政治宣传干事深得器重和照顾。人们更不会忘记，许世友和田普没有少跑过苏州太仓林彪的行宫，没有少送过阳澄湖大闸蟹。人们也没有忘记，在江苏南京大学支左的“梁杜吴”（梁辑卿为第 27 集团军政治委员，杜方平为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吴大胜为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由于支持造反派夺权，受到“中央文革”表扬，许世友洋洋得意地公开宣布，“我许世友支持‘梁杜吴’的革命行动”。人们也不会忘记，当年江苏省造反派头头曾邦元（南京大学学生），曾是许世友家中的堂上常客。人们决不会知道，1967 年秋天，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一位女副部长给中央文革写来一封揭发信。说谭震林 1932 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这位干部部女副部长的信中，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多长时间，供出了什么等等，写得有板有眼。江青接到这封信，喜出望外，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这封信感到震惊，很是重视。这不仅因为揭发者是一位老同志，而且她又在大军区政治部任干部部副部长，对干部历史关节上的政治问题，是很懂得其重要性的。对这样的人亲自写的揭发信，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何况，被揭发的人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堂堂正正，大义凛然的谭震林。随后，由任中共中央专案审查组组长周恩来，副组长陈伯达联合签名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副主席林彪，写了一份关于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的请示报告。毛、林阅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用铅笔重重的画了圈，以示同意。1968 年 3 月 24 日晚，江青手里拿着南京军区干部部女副部长揭发的“证据”，大声宣布谭震林是大叛徒。由此，谭老板吃尽了“文革”浩劫铁窗的苦头。人们要问这位女副部长她是谁？告诉您，她名叫田普，许世友的老婆，“许办”主任兼南京军区政治

部干部部副部长。干部部部长杨映雪同志还要听她的呢。“文革”中杨映雪向浙江省军区打招呼，在浙江支左的南京军区政治部 250 名干部，“这批干部政治部不要了”，就是遵照许世友、田普的意愿做出的决定。

田普，胶东人，原胶东军区被服厂女工，任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之前（总干部部没有任命），在江苏省级机关工作，行政 17 级。她当干部部副部长控制南京军区干部，是许世友搞独立王国“以人划线”的需要，表现了封建的家族式的专横和专制，背离了共产党传统的干部政策原则。

（五十八）许世友假检讨有错不纠正

受迫害要平反正义词严理所当然

1967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乘飞机离开武汉到了上海，住进虹桥宾馆。7 月 24 日晚，毛泽东同杨成武对话：

毛：“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杨：“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毛：“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

杨：“他们不会反对您”。

毛：“对！对！对！”。

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连说三个“对”字。

第二天（7 月 25 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有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然而，林彪对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候，唱起了反调。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他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号召：“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林彪做出的这个决定十分险恶。他对各大军区司令员，搞的是韬晦策略，先打后保，其目的是同毛泽东主席争夺军队中握有兵权的骄兵悍将们。

在这种形势下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受过许世友迫害的同志，又反复了。他们纷纷自发地成立群众性平反小组，整理受迫害的材料，向司政后党委提出申诉，要求平反，肃清影响。

1967年7月，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在南京海军学院成立了赴京告状团。8月，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平反小组派代表参加了这个告状团。1967年8月，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任曾部长找我谈话，组织上决定，让我到南京军区工程兵某团任后勤处长。这个团在皖北山区施工，承担南京军区后方大型工程任务。我拒绝了 this 任命。我不但拒绝了任命，而且参加了南京后勤机关的平反组工作。不久，我接受了后勤党委的“指定”，要我负责平反小组的工作。在我主持负责后勤机关平反小组工作期间，我采取了温和的态度，没有为难各级首长，没有为难后勤政治部保卫处，维护了机关的稳定和正常工作。在7、8、9三个月平反工作中，我没有离职，仍然坚持做好本职工作。期间，我奉命二次下部队检查工作。一次到上海警备区，同行的有南京军区后勤油料部组织计划科副科长周化泽。第二次，我独自到无锡炮九师。在主持平反组工作期间（三个月），我组织一次走访后勤党委书记郭金林同志，副书记谭友夫同志。方式都很温和。搞走访活动的主要目的，要求平反，消除影响，彻底销毁二月武装关押、批斗、下放劳动改造的黑材料。后勤党委的态度，仅限于承认“行政看管”是错误的，答应销毁黑材料，承诺凡被看管的人员一律不加以歧视。后勤党委的态度是南京军区党委定的调子，实质上是许世友司令员的态度，后勤首长不敢越雷池一步。后勤党委认为行政看管（不承认武装关押），是工作错误，不是政治错误。

1967年10月，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政后平反小组，联合走访南京军区党委。出面接待的有王必成、林维先和鲍先志。三位军区首长（中将），都一致表示，行政看管是错误的，认为要求平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表示要等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回来之后，才能确定。王必成将军是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许世友长期主持南京军区工作期间，我们只知有许司令，几位副

司令员如王必成、郭化若、张才千知道得不多。见到他们就更少了。张才千分管后勤，我在后勤大楼见过他二次。郭化若 1968 年夏天我天天见到他，那个时候他是“死老虎”。王必成的帅气和虎气不亚于许世友，中央首长都叫他王老虎。王副司令个头不大，讲起话来手背在身后，上身不断前后左右摆动。讲话不罗嗦，干脆果断。许世友借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令武装关押我们，王必成坚决反对。“走访”结束，王、林、鲍三位首长在 AB 大楼餐厅，招待告状团全体成员吃饭。告状团对此加以肯定。在大别山“避难打猎”的许世友闻之，大为不满，说王矮子不讲原则，向造反派投降，屁股坐歪了。王必成也不买帐，反唇相讥说：“我王矮子不行，你许和尚行，有胆量你回来同造反派打交道”。从此，许世友就存心要整王、林、鲍了。

在走访王、林、鲍首长中，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提出，南京军区政治部四位被逮捕的孙海云，赵树湘，方泽浦、洪期钧的平反问题。王必成等三位首长明确表示，逮捕他们四位是错误的，欢迎他们随时回来，恢复工作。孙海云（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赵树湘（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方泽浦（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干事）洪期钧（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编辑），《军委八条命令》发布后，许世友下令逮捕关押，后被南京海军学院造反派冲击机关抢出来的。

1967 年 9 月 16 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到北京。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1967 年 9 月 20 日，他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纪青谈话时，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1967 年 9 月 23 日毛泽东同志回到北京。这里我抄录毛泽东主席一首七律诗《有所思》，供大家共同研读，以体察毛泽东同志在“文革”高潮时，他老人家的“有所思”涵蓄那些政治意义。

正是神都有事时，

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池。
阵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萧萧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

故国人民有所思，思什么呢？是不是在“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他举起手上的那支笔，一下子上海人民的养命钱 34 个亿不翼而飞了！是否在“思”：陈良宇的儿子依仗其父之官势搞“高衙内”，从上海市工商银行一下子贷走了又是多少个亿人民币，这位得到巨款的资本家，回报陈良宇儿子每月难以想象的高额工资。故国人民应该有“有所思”。

故国人民是否又在“思”胡锦涛同志为什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陈良宇给抓了起来？为什么把他的老婆也抓了起来？把陈良宇一类的贪官污吏都要抓起来，绳之以法，以平民愤。40 年前毛泽东同志“有所思”，40 年后中国人民也在“深思”，中国人民和毛泽东同志心连心啊！思连思啊！希望锦涛同志和党中央和故国人民也相思啊！

（五十九）军委办事组刘锦平南京行之迷
告状团受接见不明底里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刘锦平中将，奉毛泽东主席之命，于 1967 年 10 月前来南京，驻节南京空军招待所。10 月某日，刘锦平召见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全体成员，我做为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平反小组负责人之一，应邀参加接见。告状团一行，一到南京梅园南京空军驻地，气氛顿然不同。接待我们的全是空军军官，他们热情、亲切，招呼我们坐定，端茶送水，还准备了点心。《军委八条》下达之后，南京军区空军、海军都没有抓人，所以太平无事。直到林彪 9.13 出逃事件发生之后，海空军在清查林彪贼船的案件中，依然正常。南京空军挖出了林彪死党江腾蛟，并把他押上了审判台，

从此南京空军揭了盖子，改组了班子，空军系统进行组织上的大清理。刘锦平当年在军委办事组分工主管政治工作，其职务相当总政治部主任。林彪反革命集团灭亡之后，刘锦平是否受到审查，如何处理我不得而知。

刘锦平接见我们时，口气很大。他说，他是奉毛泽东指示和林彪的指派来南京了解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问题的。同时，受毛主席和林彪的嘱托来看望我们的。他说，“你们的委屈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详细，很具体”。他说，“你们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圆满解决的。你们要耐心”。他说，“你们受到了极为宝贵的锻炼，是黄金买不到的锻炼。你们将来都是建军骨干，而且不是一般的骨干。希望你们有什么意见都讲出来，我保证把你们的意见和要求带到北京，带到党中央，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我保证要亲自把你们的意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你们今天讲不完，或不便讲，可以写成材料，文字不要长，明天我就坐飞机回北京。我保证把你们的材料带到党中央去，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40年过去了，刘锦平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1967年12月，我在北京京西宾馆经常遇见到他，他客气地同我们打招呼。

1967年11月到1968年2月，我们在北京，参与军委办事组举办的学习班，解决南京军区和许世友的问题，证明刘锦平讲的话是真实的。学习班结束之后，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南京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检讨和党中央的批示。

刘锦平南京之行的目的是个迷，他究竟来干什么，我们这些一般干部，不可能知道。林彪摔死之前，林彪和江青联手制造了大抓“5.16”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冤案，又一次伤害了大批老干部和群众。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在二次整“倒许乱军”分子均告失败之后，又在南京军区和江苏南京等地，乘机大抓“5.16”分子。把“倒许乱军分子”重新炒冷饭，翻烧饼，打成“5.16”分子。许世友说：“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挖出来”。在制造我的冤案中，把1967年刘锦平接见列入我的罪行之内。林彪爆炸之后，没有自上而下层层揪小林彪，我很快被无罪释放了。南京军区授意南京市委，以南京市委组织部的名义给我平反，承认把我打成“5.16骨干分子”收监关押是错误的。

谈到刘锦平，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他似乎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中将军衔。他任总部空军副政委外，兼任中国民航局副政委。他文质彬彬，

说话斯文，和蔼可亲，没有架子。我们向他反映的问题大都是老问题，其中重要的核心机密，是南京军区党委在“文革”期间多次党委会议记录，这个党委会议记录，翔实记录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二位主要领导同志许世友、杜平，对“文革”的态度和发言。当然，包括对党中央的态度及抓人等重大决定和布署。许世友唱主角，铁证在此，抵赖不了。因此，许世友对刘锦平南京之行，在南京空军接见告状团及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干部中的知情人，向刘锦平提供的“内情”，十分恼火，恨之入骨。

许世友没有想到，他的后院篱笆经营了十几年竟会如此不牢，一冲即垮。毛泽东讲得好，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跟任何人走的。许世友根本没有认识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权利越级甚至直接向党中央主席反映任何问题。这是党章规定的，是党内民主权利。篱笆扎得再紧也无济于事。共产党员不是某一个大人物的家奴。刘锦平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他在南京空军找些人谈话，了解南京军区一些情况，是正常的。与会人员向他汇报情况，反映问题也是正常的，何错之有？但许世友却耿耿于怀，大骂刘锦平在南京，背着收集他的军内外黑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告他的黑状。许世友将军未免失去了大将风度和气量。

（六十）南京军区机关院校告状团赴京告状

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

1967年11月16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组织23人赴京告状。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平反组各派2—3位代表参加。司令部张破涛，高国涛，政治部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后勤部赵玉祥，沈文琛。1967年11月19日晚告状团事先得知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要接见江苏省造反派两派代表。晚7时正，告状团全体成员（高国涛、陈时秋有事未到）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党中央领导人接见。大会堂警卫人员不让我们靠近，只允许我们在广场对面的马路边等候。时钟敲过21点，大会堂东门出来一位解放军，他向我们招手叫我们过去。这位解放军对我们十分客气，热情地对我们说，“我是杨代总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总理叫你们进去！”消息传开，我们立即举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向总理致敬！等口号。群情激动，很多人流泪了。南京军区总医院8个小

护士，都不满 18 岁，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习，她们出于革命热情，成立了战斗队，起来造了反。《军委八条》发布后，全部被逮捕关押。她们中张阿凤，童静芬、蒋黎黎、夏蓓蓓四人参加了告状团。四个小姑娘来自上海工人家庭对共产党解放军怀有深厚感情，听到周总理接见，相互拥抱，哭成一团。

我们被领进了灯火辉煌宽敞华丽的福建厅。总理身穿一套深色中山装，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胸前别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支钢笔。在座的还有康生、张春桥、杨成武、余立金。看得出，周恩来严肃的表情中带有倦容。工作人员给他送上茶水和热毛巾。他客气地对康生说，“康老你先说说吧”！这是总理的谦逊，康生当然不会先说的。周恩来发话了：“你们都是南京军区的吧？司政后都有人来了”。告状团中有人插话，“还有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总理说，“都来了都来了！”。“我们同意你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你们对南京军区领导人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上提出来，把意见说出来。言无不尽嘛！但是，你们要遵守纪律，这是中央对你们的要求。不要把军区的问题扩散到地方去。不要同地方（江苏）造反派搞在一起。材料不准扩散到地方造反派手里。你们是解放军，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起模范作用。在北京也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作风。这是纪律！你们要遵守”。接着周恩来离开了座位，走到台前来，顺手拉了一把靠背椅，把靠背贴近他，他用双肘靠在靠背上同我们讲话。看得出，他借助椅背的撑托，讲话时少费点力气。周恩来太累了。

他继续讲：“我很高兴见到你们，特别亲切。因为你们是解放军。我们之间讲话可以随便一点”。他对着我说：“我好像在那里见过你，脸很熟嘛！你是那里的？”我站起来回答说，“报告总理，我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的。我第一次见总理，很高兴，很光荣。我们保证遵守纪律，保持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作风。请总理放心！”总理满意地用手势招呼我，连讲“坐下坐下”！

在这种场合下，告状团的同志们都不敢随意讲话，很小心，很谨慎。大家知道在总理面前不能留下不良印象。总理最后嘱咐说：“你们安排到西苑去住，那里的条件不错。有什么问题同联络员联系。在那里住要注意军民关系，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他回过头来问康生、张春桥，“你们还有话吗”？康、张二人摇摇头。总理第一个走了，我们都站起来鼓掌。

周总理一行走后，已是深夜 11 时了。工作人员解放军立即要我们把名字写出来。写好之后，工作人员（解放军）核对名单。领我们坐上事先准备好的一辆大型交通车，把我们送到北京西郊西苑旅社住下。我们到了西苑，各自住进自己的房间，但，谁也不想睡觉。首先一件事，由陈荣安（军区政治部前线报记者）起草接见全过程和总理的讲话，用电话通知了南京。这就是后来许世友给我们定罪的第一大罪状——21 人告状团赴北京告黑状，“倒许乱军，毁我长城”。清查“5.16”时，又揪出来炒冷饭翻烧饼，21 人告状团是“杨余傅”反党乱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

1967 年 11 月 21 日总理秘书孙岳通知：“南京军区 21 名代表作为特许代表留京”。同时告知：“双方代表不经中央同意不得增加任何一人”。11 月 23 日，中央联络员田同志说：“你们这两天都在干什么？其他军区都下来见群众，杜平就不下来，你们到京西宾馆，他也不会来见你们，我们也不满意他”。11 月 24 日下午三时至午夜 12 时 50 分，告状团到京西宾馆走访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他顽固地不承认告状团 21 位代表，参加中央为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京西会议的合法权利。我们向他提问题，他一言不发，趴在桌上假装睡觉。做为位大军区政治委员，竟然一点风度和胆略都没有。我们明白这是许世友的态度，杜平不敢越雷池一步。杜平不得不做出这种不死不活的姿态。

走访之后，总理秘书孙岳对我们说，“你们平时最好不要到京西宾馆去”。我们明白了中央的意思。

1967 年 12 月 5 日晚，周恩来总理，杨成武等人又一次接见南京部队、江苏省军管会全体在京人员，党中央极其关心我们 21 位代表。1967 年 12 月 8 日，中央决定用“集训班”形式解决南京军区问题。总理决定集训班领导班子由 10 人组成，10 人班子如下：杜平、梁辑卿（27 集团军政委）、赵俊（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王挺（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艾汉美（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干事，告状团成员）、李英武（南京海军学院学员告状团成员）等。告状团积极准备发言稿和书面材料，在中央举办的“集训班”上揭发和批判许世友的错误。“集训班”开班前夕，孙海云传达毛泽东主席指示：“许世友同志不能打倒，杜平同志不能打倒，南京军区不能打倒。许世友有错，将来要检查”。毛泽东主席给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定了性质和方向。告状团热烈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和布署。

（六十一）古幽州寒气逼人

京西地温暖女儿春

北京，春秋战国时，燕国封地。古称幽州，金、元、明、清四代京都，又称蓟。它在长城脚下，出长城即为塞外。古汉人称其为“胡人”之地。也就是内蒙古蒙古族所在之地，过阴山通戈壁，直抵贝加尔湖，是苏武牧羊的地方，汉唐称匈奴突厥，明清称蒙古，也就是现在的蒙古国。其首府叫乌兰巴托，独立前叫库伦唐奴乌梁海。古幽州出塞外东北一地有白山黑水，天荒地老，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休养生息着另一个民族，女真族，也就是现在的满族。唐宋时称辽，后改金。1644 年清兵入关，满族入主中原后，建立大清帝国，定都北京。

北京城蓟州大都，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派代表所组成的 21 人告状团，下榻西苑旅社。1967 年 12 月 13 日，北京城天气晴朗，但寒气逼人，下午 1 时，我 21 人告状团，被京西宾馆派来的交通车接走，进入京西宾馆小会议室依次坐定，主席台左面就座的为南京军区司政后领导机关人员，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长蒋科，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秘书科长肖海，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钱永清，军训部参谋袁刚。另有总理请来的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赵树湘。主席台右面就座的为告状团全体人员。集训班主席台置一长条桌（由多张长条桌拼成），上置绿色台布。集训班会场，庄严朴素，有茶水供应。室内暖气开放，温暖如春。这个会议对告状团来说，更是春意浓浓。南京军区除集团军外，广大受许世友迫害的干部、战士、文职人员、家属等，翘首以待，他（她）们关心着北京的京西会议，等待着真理的降临，迎接着彻底平反的佳音。江苏省军区、安徽省军区、浙江省军区，上海警备区，舟嵎要塞区，五个军以上机关都有人被逮捕关押、批斗，都有人被送去劳动改造，都有人被“清洗”出军队，他们都有黑材料，都背上“倒许乱军”、“反革命”的黑锅。舟嵎要塞区司令部参谋朱雷同志，1947 年入伍，矿工出身，上尉军衔，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只因给舟嵎要塞区黄朝天司令员提了点意见，作为“反革命”被逮捕关押，清洗回山东老家当农民。朱雷不服，坚持斗争 4 年，申诉信写了数百封，多次上访北京总政

治部，要求要塞区党委分清是非，予以彻底平反。终于得见天日，得到平反。重新穿上军装，团职离休，现定居在杭州。

下午 2 时正，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刘锦平来了。他们三位端坐在主席台上，邱会作说：“南京军区问题，毛主席早有指示，现在我们就是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邱会作请出了“上方宝剑”，宣布“奉旨办差”。接着，他征求意见，会议如何开法。会议自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26 日 历时 14 天，充分发扬民主，双方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事求是。主持会议的除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外，还有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山。14 天当中，除了第一天邱会作讲了几句话外，其余 13 天，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张秀山 4 人没有讲过一句话。都是坐在那里听。在会议期间，吴大胜政委来看过我和沈文琛。他叮嘱我要顾全大局，实事求是，遵守纪律。问题解决之后，回南京在军区党委、后勤党委领导下好好工作。此时的吴大胜已是江苏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了。我向老首长做了保证。

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饭都在那里吃。用餐不用集体方式，按标准发用餐券，然后自选主副食。在京西宾馆餐厅就餐，经常可以看到吴法宪、刘锦平、李作鹏、杨成武、韩先楚、陈锡联、余立金、傅崇碧这些人。有一次，我还见到叶群。然而，从来没有看见过许世友、杜平在这里吃饭。我想这可能是中央有意安排“回避”措施，以免发生碰撞火花。有一次，晚饭前我上厕所方便，不期吴法宪也来如厕，我和他并排“一轻松”，他笑着同我打招呼，问我是那个单位的。然后含笑点头离开。

在北京期间，周恩来总理多次接见我们。接见过了夜 11 时，有夜宵供应，每次发一小包饼干，总理不特殊，同我们一起吃饼干，喝白开水。有二次，我们同总理在京西宾馆食堂一起用晚餐，总理也同我们一样，二菜一汤，三个小馒头。周恩来吃完了，还掰开馒头，把菜碟上的油汤刮干净吃下去，一点也不浪费。有一次接见，江青迟来，她一身黄色细呢军服，领章帽徽整齐，头发梳理又光又亮，戴一副银丝眼镜，披着一件军黄呢子大衣，挺胸直腰，目不斜视，快步而行。她手中不携带任何妇女用品，身后跟着一位着陆军军服的年轻护士。一般她都提前离场。离场前，服好药就走了。离场时不同任何人打招呼，包括总理在内。一副

高贵傲慢态度。最后一次总理接见时，她也在场。她破天荒地把杜方平（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骂了一通。我就记得一句话，“杜方平，你一点也不公平。你不要跟我摆豆腐帐，你给我回江苏好好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最后一次接见，周恩来总理宣布：“江苏和南京军区问题圆满解决了，希望江苏三派代表回去之后，搞好大联合，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军区的同志，回去之后在南京军区党委、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领导下，搞好战备，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在场的南京军区机关人员，军队院校人员，文体工作人员，江苏省军区、安徽省军区、浙江省军区人员，一致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等口号。周恩来频频招手满面笑容，祝大家顺利返回南京和其他各地。这时，告状团 21 人代表商量，赶快给总理递条子，要求总理当场宣布给我们平反。总理笑嘻嘻地大声宣布“我代表党中央给你们平反”。告状团 21 人又一次高呼毛主席万岁！

1967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寿辰。告状团 21 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一天京西宾馆休会。中央联络组徐、李两位秘书来西苑旅社，告诉我们好消息。二位秘书带来了《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和党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草稿）要我们学习讨论。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极其关怀和保护！刘锦平在南京召见我们时说：“你们的委屈党中央毛主席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详细，很具体。我受毛主席嘱托来看望你们的”。这些话无时无刻地体现出，党中央毛主席就在我们的身边！古幽州寒气逼人，京西地温暖女儿春。

（六十二）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毛泽东接见气象万千

1967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4 时 17 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解放军团以上干部，告状团全体成员也参加了被接见。

12 月 30 日我们得到通知，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通知规定：着装整齐，理发刮胡子，擦亮皮鞋，随身不准携带小刀等利器。在北京期间我们一直想望着毛主席接见，我们带着兴奋的心情，做了二天准备，终于盼到了这一时刻。下午 1 时上车，2 时到达。进入大会堂安排在楼上距主席台较远的区域，静静地等候着。

手里拿着红小书，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这是杨成武代表军委办事组送给告状团 21 人的。这一件事，许世友也把它列为我们的罪状。

毛泽东主席其实早就到了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有一条地下通道直达中南海。毛主席到来之后，在休息室休息。4 时 17 分毛泽东和陪同接见的周总理、陈毅、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还有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毛主席高大的身材，穿一套银灰色中山装大步走在前面，林彪紧随其后，周恩来和其他人依次而出，站列在一边。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照射得如同白昼。毛主席挥动右手在主席台前向群众致意，从右边走到左边，再从左边走到右边。接见即告结束，进入后台休息室。接见全过程最多 5 分钟，主席露面挥手，只有 2 分钟。然而，人民大会堂楼上楼下，人们热泪盈眶，手举红宝书，置于胸前（规定）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纪律严格规定，受接见的人不准越位，不准乱呼口号，不准振臂高呼。毛主席进场之前退场之后，若大的大会堂里，人们引吭高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地位，任何人都无法超越。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任何人不能取代。

有的人搞什么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实际上企图同毛泽东同志分庭抗礼，取而代之。我以为他们太梦痴！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毛泽东同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毛泽东思想依然在指导着我们党的伟大的实践斗争。胡锦涛同志领导的中共中央所创导的“和谐”理念，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思想”在毛泽东同志在世时，早已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所实践的方向。每一位老共产党员、老干部、老教育工作者，老科技工作者，工人农民中的老劳动模范，谁都不会否定这个共识。“三个代表”不是新倡导！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为胡锦涛同志所提倡的“和谐”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方针。中国古老的经学古笈《易经》中，也有和谐的思想。《易经》对“和谐”叫“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同人于门，无咎。”“同人于郊，无悔。”意思是说：“和谐了可以共享太平；可以战胜大自然大河大江也能过得去；可以把有贤德的人熏陶得更加完美。”“出门就讲和谐，可以保证你平安无事”。“在四乡开展人际交往，讲和谐可以心想事成”。锦涛同志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不愧为毛泽东同志和中央老一辈领导人的好学生，好继承人。我们这些老党员、老同志，对锦涛同志所带领的党中央

领导核心是信得过的。

1948年，我在福州格致中学（美国人创办）读书时，就受校友大哥哥们的影响和家兄朋友（地下党员）的引导，开始接触共产党的地下书籍和刊物。1949年参加了中共福州市委城市工作部外围组织读书会，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在我的心灵中扎下了根。我经常在我家后院里独自歌唱《你是灯塔》这首歌。参军之后，在陆军31集团军青年干部教导大队学习，在政治思想上，我由朴素的阶级感情，通过学习自觉地转变为理性的阶级感情和政治感情。也就是说，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成为我政治信仰上唯一的政党和领袖。任何政党和政治团体都不能动摇我的信念。毛泽东同志固然也存在着错误，但他的思想，他的品德，他伟大不朽的功绩，他的生活，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以及他博大渊深的中国文化底蕴，是任何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所不能项背的。这是历史和现实客观存在所决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不能违背或否定这个规律。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不仅局限于感情问题，更重要的是尊重和捍卫他的思想和理论；尊重和怀念他崇高的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他生前和身后没有巨大财富，他的子女和亲人也只有为国为民做出奉献和牺牲，而没有搞“鸡犬升天”和“窃国大盗”。五十七年来，无论遇到什么政治上磨难和不愉快，我始终如一，忠于共产党忠于领袖毛泽东同志。无论我们党内出现了什么问题，或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犯有什么错误，我都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去正确理解和正确对待，一点也不会含糊，一点也不会糊涂，一点也没有动摇，更不会乘机攻击毛泽东同志。我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即使近年来，我们党内出现了类似陈希同、陈良宇这类变色龙，党内出现许许多多大大小小陈希同和陈良宇，都不能动摇我的政治信念和对党的感情。我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总有一天能把自己身上的癌细胞清除干净，在中国人民面前重新树立起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让人民来评价我们的党，让人民来选择我们的党。我坚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定有能力实现我这个政治愿望。我等待着人民重新信赖我们的党，拥护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党，依靠我们的党。我期盼着，在我有生之年，再次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清廉、正确，联系群众，艰苦奋斗，有所作为的伟大政党。

陈希同、陈良宇这些人，他们是假共产党人，他们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

子。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蜕化变质分子，也不是什么腐败堕落分子，更没有资格称他们是犯有错误的同志。他们包括他们一类的暂时戴着共产党员帽子的异己分子，是我们全党全民共同敌人。我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一点也不扩大，更没有冤枉他们。他们混进共产党内，投机取巧，刁奸钻营，互相勾结，形成黑帮；他们利用手中摄取的权力，向劳动人民疯狂进攻。他们把中国人民纳税的血汗钱、养命钱不仅滥加挥霍，过着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而且把这些钱吞噬殆尽，转移到国外银行储存起来，准备好给自己和家族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在国外享受奢侈的生活。这那是共产党人犯错误！他们是我们的共同敌人！这批敌人必须消灭，必须肃清！毛泽东同志在 1952 年“三反五反”运动中愤而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从而维护了我们党的纯洁，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者，取得了巩固人民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什么不能杀了他们以平民愤呢？！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已经到了危险的时刻，我期盼着：党中央依靠群众，排除万难，排除一切不和谐的因素，采取英明而果断的措施，肃清腐败！捉拿大大小小的陈良宇把他们绳之以法，押上审判台，让人民来公正的审判他们，以挽回我们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已失去的威信。

（六十三）公正的历史永恒的真理正确的结论

中共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8〕18 号

党中央批示：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的，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摘要）

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作如下检讨。

一、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镇压了革命群众。十条命令下达后，又迟迟不检查、不平反。……把群众的某些革命行动，看成是“坏人暴动，右派翻天”。前年十二月八日，我们在南京听到一些谣言，就连夜开会，要正在进行“四大”的驻宁军队院校的领导干部，也参加了会议，布置巡逻，加强警戒，实际上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八条命令下来后，我们错误地认为“时机到了，有权抓人了”，于是就带着“镇反”的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在南京，在军区内部，我们怕把军区领导机关搞乱了，把部队搞乱了，没法保卫文化大革命，有了情况，没法打仗了；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失掉尊严，丢了面子。对群众给我们的指责和体罚，又思想不通，情绪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反革命”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帽子和罪名，进行了压制和镇压。二、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逮捕 22 人，开除 8 人，看管、隔离反省的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以整顿机关、整顿纪律为名，指名检查，重点批判，搞“请罪”活动，大整革命群众，一度造成恐怖气氛。

更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夭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风雷激”，说成是反革命组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搞“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视……。十条命令下达之后，我们却错误地认为，错误不大，迟迟不作检查，以致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没有为那些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同志，以及这些同志

的家属子女，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因而，平反工作进行得很慢，很不彻底。我们所以犯错误，……我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功臣自居，靠老本吃饭，既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架子很大，官气很重，往往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动不动就发脾气，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

我们的检讨还很不深刻，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

1968年1月某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接见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群众代表和军队在京人员时，代表党中央宣布给南京军区受打击迫害的广大革命同志平反，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赴京告状团21位代表，每人发了一份，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8」18号编文的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可惜，1970年12月，南京军区借南京市军管会的名义，以“5·16”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逮捕我入狱时，作为“罪证”被抄家抄走了。历史又一次被许世友颠倒了，权大于法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六十四）春节无春气紫气不东来

许世友检讨墨汁未干又反攻倒算

1968年春节，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充满着不和谐的气氛。昔日的欢乐、祥和、团结、友好的气氛没有了，取而代之是不欢乐、不祥和、不团结、不友好的气氛。春节期间，我买了个老母鸡炖成汤，请艾汉美（军区政治部新闻干事）来吃饭，我们在交谈中认为，有可能出现反复。许世友有可能瞒着党中央毛主席，在南京军区搞独立王国，变换手法再整群众。艾汉美说，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坚持党中央「68」18号文件精神，坚持在南京军区党委领导下好好工作，坚持原则，反对许世友否定中央批示的错误做法，

果然不出所料，1968年3月，南京军区党委作出决定：南京军区司令部、

政治部、后勤部；炮兵司令部、工程兵部、装甲兵司令部；三团二队（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在宁军事院校，全体人员，除机关留下少数人员坚持战备外，其余分别集中在南京白水桥 181 师营房（机关）、城西湖农场（三团二队）、南京海福巷（工程兵学校）、南京岔路口（步兵学校）开展大规模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动。“学习班”并不是学习党中央「68」18 号文件，而是反其道而学之，深刻检查“非法开展四大”“搞乱军队”“毁我长城”“支一派打一派”“破坏大联合”等问题。重点批判对象有：史景班（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和杜方平（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说杜方平不仅“乱军”而且支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说史景班是杜方平的后台。杜方平不仅在军内批，而且到地方接受批判，批的时候照样“坐飞机”。

在这个继续整人的学习班中，许世友点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三位军区首长的名，把“王林鲍”定性为“倒许乱军”的黑后台。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目标明确，联系实际就是批判史景班和杜方平，批判非法四大和搞乱军队。开始时，和风细雨，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也作了检讨，虽然出于革命热情，但在客观上影响了军队的稳定，对战备不利，应吸取教训。这样的检讨，同志们能够接受，我自己也能接受，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党中央「68」18 号文件精神。主持学习班的是南京军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之一杜平同志。参与学习班的人员一致认为杜平政委的作法是正确的。通过学习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大家心情都很舒畅，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决心在南京军区党委领导下，在许世友、杜平同志领导下，好好工作。党中央、中央军委，北京京西会议结束之后也是这个意图。岂知事出变化，曹营的事情很难办。

杜平的正确做法，受到许世友批评，许司令对杜平表示不满，批评他思想右倾，迁就了“乱军分子”。甚至批评杜平“立场有问题，屁股坐歪了”。杜平同志原在四野，调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前，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他在许世友面前不敢讲话，他一贯把许世友当作上级看待。平时，许世友不把杜平、王必成、林维先、张才千、郭化若、鲍先志、周贯五这几位大军区副职放在眼里。除王必成和郭化若外，其他人都把许当作“领导”“伺候”着。在许面前唯唯诺诺，唯许之命是法。这也难怪，林维先原为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周贯五原

为浙江省军区政委，本是下级。鲍先志原在总政治部当组织部长，也应是下级。所以，许世友在军区党委常委会议上，或党委会议上，很霸道。据了解内情的同志说，有一次开党委会，许世友熊黄朝天（舟嵎要塞区司令员），熊应堂（第 20 集团军军长），郭金林（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就好像熊儿子一样。他们头都不敢抬，屁都不敢放。毛主席说“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讲的就是许世友。

许世友认为杜平主持的学习班办得不合格，不能结束，要从头来。杜平无奈只好重来。重来之后，火药味道浓得很，大批杜方平，大揪“倒许乱军”分子。许世友善于拿着鸡毛当令箭，借批杜方平，批“乱军分子”。一星期后，工程兵政治部主任白某某被逼得上吊自杀了。南京军区后勤部训练科吴俊科长，撞墙死了。军马部军马科长李旭东自杀了。副部长苏国勤被逼疯了。吴俊红小鬼出身，为人正直，心直口快，有啥说啥，路见不平，出言相助。后勤司令部小组批他好几天，临死那一天早上，他溜着狗在 181 师营房里跑步，我也在跑步。他还对我说笑话：“我运动了，狗也运动了”！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听了之后，对他说“吴科长，你不要跑得太快啊！跑得太快了狗吃不消”！那里知道，4 个小时之后，他就一命呜呼了。吴俊同志用死来抗争许世友的专制。吴死后火化时，穿什么衣服，又引起了一场争论。“稳军派”大人说，这是叛徒行为，尸体不能穿军装。吴的老婆说，不行，吴俊是被你们逼死的，不但要穿军装，还要开追悼会。最后，郭金林部长说：“让他穿军装走吧，领章帽徽就不要戴了”！

吴俊、白某某、李旭东受许世友迫害冤屈而亡，死后还背上“叛党”罪名，太不公平了！他们死后不久，“杨、余、傅”事件发生了，“学习班”形势急转直下，许世友说：“杨、余、傅”是“倒许乱军”的总后台，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三团二队和军事院校造反派的后面有一根又粗又长的尾巴！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所作的检讨报告，被许世友推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被许世友否定了。有的同志气愤地说，在北京一个样，到了南京就变样了。1973 年八大军区司令员调换时，毛泽东主席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好呢”！一针见血，点出了问题的症结。许世友从广州军区司令员位置上下来之后，对邓小平憋一肚子气，回南京住在中山陵 8 号，成天打猎钓鱼。园子里还专门为他修

了个二层楼碉堡，挖了一个大鱼塘。修碉堡是怕南京二万多名“516们”来向他讨还血泪债。修鱼塘是供他钓鱼取乐。在中山陵四郊打猎，把老百姓的狗打死了，他对工作人员说：“快跑，不要叫老百姓抓住！”他喝茅台酒，从来不花钱，不是公家报销，就是下属“进贡”。说许世友喝茅台都是自己掏腰包，那是放屁！邓小平来南京去看望他，走时，他连送都不送。华国锋来南京去看他，他送到大门口，算是给了点面子。

（六十五）骄兵悍将向长安

尾大不掉华东王

1968年6月，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重新启动。杜平政委“下岗了”。中将周贯五副政委上任了。南京军区后勤部“学习班”的领导班子也随之改组了，原学习班党支部书记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张思温因讲了一句：“今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还要加上倒许乱军分子”，被许世友掳掉了。换上了许世友认为得力的“铁疙瘩”后勤司令部副参谋长上校张蕴茂。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史景班被锁定为“大鱼”。郭化若被划定为“死老虎”，死老虎也要尝尝滚水烫的味道。大鱼以下还有中鱼、小鱼，“目标”通通浮出水面，下面的文章就是下水抓鱼了。许世友胃口很大，他张开大网，准备把“倒许乱军分子”自上而下一网打尽，全歼“敌人”。他下令：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司政后三大部；南京军区炮兵部、工程兵部、装甲兵部；南京地区军队院校；“三团二队”以及三个省军区，舟嵎要塞区、上海警备区；原地不动，在新班子领导下，再翻“烧饼”，炒“冷饭”。同时，借贯彻江青“指示”之机，调集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市力量猛批杜方平和杜的后台史景班。并上挂下联，大抓大批“倒许乱军分子”。在整史景班的期间，史夫人受到牵连和迫害，在化粪池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史景班平反后，王必成把他要了去，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王必成是司令员。史景班三个女儿在史受迫害期间，长期插队落户，三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许世友部署已定，全线出击，大规模围歼“倒许乱军分子”。他要求通过这个“战役”，把“倒许乱军分子”的阴谋诡计、组织策划，策略手段，目的企图彻底清查清楚。“挖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挖出来！”同志们说：“许大马棒下山了”！我人民解放

军的一员战将，敬爱的许世友将军，脑子发烧到了 45 度。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许世友，在 1967 年 1 月 28 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前后，他是带着什么情绪和目的来对付敢于批评他的革命群众。他受到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严厉批评之后，又是怎样假检讨，变换手法哭跪在毛主席面前，以示忠心的。

1967 年 1 月 28 日，南京军区司令部首长办公室，机要室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工作着，数十部电话机在忙碌着，长途电话呼唤着。林维先副司令员养病去了，鲍先志副政委因事外出。只有王必成副司令员留守，主持军区日常工作。王必成不断离开座椅，取下老花眼镜紧锁双眉，仰着头沉思着，像是在临战前周密地思索着“决心”。战争年代王必成作战决心形成快，指挥果断，为什么和平时期如此踌躇不决，左右为难呢？党委常委只有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一个人在家。许世友、杜平都在北京开会，王必成将军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个天大的问题，不经过常委讨论怎么能行？”他又慢慢叹了一口气，落坐在墨绿色丝绒沙发上，他把头靠在高高的沙发靠背上，一只手垂在沙发外面，双脚伸展开来，他很疲劳。他一目微闭，一目全张，样子可怕。打孟良崮战役时，也是这副样子。“真他妈的难办，要我在家里主持抓人！还叫我拿出虎劲来！”一句话才讲完，他霍地站起来，快步走向办公桌拿起内线电话直通北京。

“接京西，6 楼 18 间！”

“你是肖海吗？许司令在不在？”

“许杜首长在小会议室，正在开会”。

“把电话给我转过去！”

“是！”。党委办公室中校秘书科长肖海诚惶诚恐。

京西宾馆小会议室，一色的紫红丝绒小靠椅上坐满了人，有 30 多位。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张才干、刘锦平等都在坐。各大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也在坐。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王平，政治学院政治委员莫文骅，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也在坐。身着白衣的女服务员，不时地把热毛巾和热茶放在一个白色瓷碟上，送到首长面前，轻轻地放在茶几上。军委办公厅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聂济峯、路扬等也在坐。他们不断记录，有时凑到杨成武跟前轻轻地说些什么，又回到自己的

座位上。

“老叶，这八条命令一定要坚决贯彻，抓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杀他妈的两个也不碍事！”许世友向叶剑英发话。

“群众运动你要正确对待，党纪、军纪要执行，但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吃‘米子’，你要干你负责，我有话在先”叶剑英严肃地回答。

“徐老总你表个态，你是军委文革组长，八条命令我双手拥护，不能放空炮，南京乱得一团糟，不抓人不行。我这个司令员讲话还算数不算数？打起仗来，你指挥还是我指挥？”许世友向徐向前问话。

“许军长，你的脾气还像在四军里那个样子。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抓人！你火气小点嘛！”徐向前同样严肃地批评了许世友。

“你是老右倾，老豆腐渣。红四方面军的帐，我们还没有算清”！许世友激动了，冲着徐帅发脾气，右手的拳头几乎把茶几上的茶杯搥翻。

“杜平同志，你是政治委员，你要帮助他（指许世友）掌舵，不要把车开到山沟里去！”叶剑英对杜平。

“请叶帅、徐帅放心，我们不会越轨，我保证，我保证”。杜平用清脆而松软的湖南口音，规规矩矩地回答叶剑英元帅的嘱咐。

正当许世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批准抓人，大批逮捕军队“造反”军官的时候，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都一致赞同抓人。特别是韩拐子和陈三两分外起劲。

“许司令员，你的电话，南京来的”一位年轻的女军官轻轻地报告。

“田崽子，你给我去接一下，又是老虎来讲情！他妈的，他手软怕死！”南京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上校立即站起来，快步走出小会议室。

“许司令在那里？请他通话！”王必成声音。

“王副司令，他正在发脾气，要我来接，你看行吗？”徐玉田回话。

“不行，非要他来不可！”王必成不耐烦了。

“是”徐玉田毕恭毕敬，他同样怕王必成。

徐玉田应了声“是”，不敢多言，轻轻放下话筒，慢慢地走了出去，快进小会议室时，他又停了下来。心想，这下好了，我是老鼠进了风箱两头窜吧！他在

门口，正听见许世友粗声粗气地在骂娘：

“什么红卫兵，吊卫兵。什么‘换新天’战斗队，要他妈的变天！华东三省一市归我管，听我的。你们害怕，我一人承担！”喊得会议室山响。

“许司令，王副司令电话，要你接”。徐玉田抖声抖气地说，“他说（指王必成）有要紧事请示你，非要你接不可”。这一句话是徐玉田自己编出来的，他为了解脱自己。大凡秘书出身的军官，都知道如何适应首长的脾气和好恶。许世友听说“有要紧事情请示”，这才忽地站起来，走进电话间，徐玉田也跟着进去。

“你给我抓，通通抓起来！政治部那些乌龟王八秀才知识分子，不老实的一起抓起来。什么政治工作，见他妈的鬼。司令部要管政治部。叫司令部来接管政治部”。

最后，他又加了一句，“王六生也是草包”！

又说，“叫王蕴瑞（南京军区参谋长），蒋科（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大胆干，一切我承担”。

又说，“部队不够用，从 60 军调。179 师不能动，从 181 师调。你不要手软，你手软，你就给我滚蛋！不要请示，也不要报告”。

“什么？孙海云造反了？逮捕法办！一起抓”！

“知识分子最坏，又尖有滑，不可靠。尾巴翘上天了，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连草帽也不给他们戴，政治部瘫痪了，那就干脆取消政治部。什么政治部，是造反部。通通抓，一个不留”。

讲完，啪的一声把话筒摔在桌上，话筒里的嘟嘟忙音，不停地传出来。徐玉田习惯地过去把话筒轻轻地放在话机上。

徐玉田告诉肖海，叫他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用密码，等级核心机密，用党委的名义。要求师以上部队，接到电文后再以原电文发给军区党委，声援军区党委，保卫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声讨造反派，镇压反革命！要大造舆论，明白了没有？

“是，马上就办”。肖海回答。徐玉田清秀的脸上露出了钦佩的神色。他思忖着，人家都说许司令是大老粗，只会打仗，不习政治；只会骂人，没有文气。其实不然，他是能文能武的军事政治家。徐玉田想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句感佩许世友的话来：“为将之道，贵在攻心！”许司令确有大将之风，真是我们

的好司令，好领导。徐玉田为我南京部队 40 万指战员有这样一位能文能武的司令员而感到幸福和骄傲。许世友居然能在非法大逮捕之前，弄出一份自产自销的假电报，发动部队大造政治攻势来声援军区首长，使抓人合法化，抓人是应野战部队广大指战员的请求不得已而为之的！包装得多么巧妙。

许世友抓人的瘾头过足了，乱子也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1967 年 4 月《军委十条》下达了，规定“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许世友大批抓人犯了严重的错误。1967 年 7 月，毛主席在上海召见许世友，实际上，毛主席要做他的工作，要他承认错误，做检讨。许世友被接到上海，到了毛主席住处，刚见到毛的身影，就一头跪下，嚎啕大哭。演了一出“大保国”，换来了毛主席一句话：“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当然还有一句“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许世友虽粗，但粗中有细，他的下跪和眼泪感动了毛泽东。

诸葛亮对刘备说：“三将军（指张飞）能用计谋，乃主公之福也！”许世友虽粗暴，谁知他粗中有细，关键时刻也能用计谋。呜呼，一笑。这里，徐玉田、肖海等人给许世友司令员出了一个馊主意，愚蠢之极。试想，动用部队来“保卫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用来保卫你许世友的吗？许世友飞扬跋扈，凌驾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岂不昭然若揭了？把这句话换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就不会有原则错误了！南京军区党委和首长难道要调集动用人民解放军来保卫吗？还有一句话“倒许乱军”，难道“打倒”许世友就搞乱了人民解放军吗？那些要拍许世友马屁的人，把许世友个人同人民解放军划起了等号。害得许世友接二连三地检讨，弄得毛泽东主席也十分不高兴。许世友不等于人民解放军。1969 年 1 月，毛泽东在北京圈阅南京军区政治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计划时，明确批评许世友搞“倒许乱军”是多中心，极其错误。毛泽东说：“搞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六十六）三代贫农痛诉家史

保卫队长细说忠诚

一辆绿色军用吉普车，二名武装战士押着一位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的山东汉子，来到一座郁郁葱葱，乔灌木交错覆盖着的白色别墅。20 世纪中叶西欧流行的建筑风格，西班牙式的既古老又现代。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老红军俞新华将军住在这里。老红军是从大别山出来的，属鄂豫皖根据地，四方面军的，他和善可亲，后勤部有名的老好人，他分工管干部。有 8 个子女。许世友脾气暴烈，经常批评后勤，但从不批评他。这座别墅坐落在南京市华侨路 81 号小山的山坡上。点缀在姹紫嫣红之中。俞副政委原是个放牛娃，经过长征，活着过来，授少将军衔，住在别墅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美好生活。他非常节俭，长年一套军装，一双圆口布鞋，烟酒不嗜。在后勤部他威信很高。我曾在后勤政治部帮助工作，俞新华又兼任政治部主任，见到我总要问长问短，他知道我是福建人，他说福建闽西老区老红军多，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上井冈上，多在中央红军里，领导人是邓子恢和张鼎丞。小红山的山脚下，有一片小平房，红砖黛瓦，后勤警卫连的营房。守卫南京军区后勤部办公大楼，给首长站岗放哨是他们的任务。囚车停下来，上着刺刀的 M66 半自动步枪，顶着这位山东汉子的腰背，进了小平房的临时牢房，门口站上了岗，从这天起我有了一位亲密的囚友。

龙启明，山东胶东人，三代贫农，8 岁丧父。1945 年 12 岁的龙启明，被母亲送到部队要求参加八路军，当了一名卫生员。受尽生活折磨的革命母亲，把龙启明交给部队之后，含着热泪叮嘱小启明，你在部队上要好好干哟！要听首长的话哟！龙启明抱着骨瘦嶙峋又是缠脚的母亲，啜泣不已，跪在母亲的膝前，说：“老娘你放心，我一定把八路军当作自己的家，带着大红花回来给你老人家看”。

龙启明向我痛诉家史：

“我八岁上殁了父亲，家贫如洗，三代给地主扛活，还吃不饱，穿不暖。12 岁参军，因为年龄小，分配我当卫生员。12 岁的小孩子能顶啥用，我只好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干。我抢着给伤病员端屎端尿，擦血擦脏，洗衣洗脚……脏活累活我抢着干。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打上海，我都参加了，在战场上，我冒死救护伤员，护理伤员，有一次我负伤了，坚持把伤员从火线上抢下来，包扎好送去后方医院，到了医院这才知道自己挂了花。上级叫我到后方休养，我不去，硬顶着在前方不下来”。

“在这些风风雨雨的年代里，我经常从一个死尸堆里，爬到另一个死尸堆里，

从没有叫声苦，说个怕。也不想起老娘。如今，过上了和平生活，全家团圆，想想这些，我感激党和首长，往往会激动得流下泪来。有时候，我因肾病住院，在医生护士热情温暖的治疗和照料下，我的病逐步痊愈，在安静的病房里，在病榻前，由于感激同志们的温暖和照应，往往也会落下热泪来。有时候，由于工作做出了点成绩，党和人民为了鼓励我，给我立功受奖，给我优厚的待遇和荣誉，当我去领受这些荣誉和待遇时，在荣誉面前，出于真诚的感激也会热泪盈眶。有时候，外出工作，在行军途中，在野营路上，在部队营房里，在夜深人静，明月当空的时候，往往会由于寂静和安宁而想起亲人来，也会默然湿襟。或是想起贤慧的妻子，娇嫩可爱的孩子，或是想起风烛残年的老娘，撑着小脚在操持家务，也会泪珠滚动……。”

“我的老娘是革命母亲，战争年代，她踊跃支前，缠着小脚不能抬担架，就做军鞋，磨炒面，做拥军优属工作。善良的老人。温存厚实。由于长期操劳，体弱多病，虽然如此，她还特别体贴媳妇，疼爱二个小孙子和一个小孙女。儿子虽然是三十好几的大尉军官了，老娘还是把我看做是小孩子。我的一日三餐都要由她亲自准备，看着儿子吃完一餐饭，她才肯走开，然后自己才吃。母子感情无比深厚。体现出我中华民族母子相依为命的特有感情”。

龙启明讲着讲着又流泪了。我也跟着他一起流泪。因为我和他有共同感受。

“老母亲虽然爱子如命，视家如归。但，对革命道理十分通达。经常勉励儿子要为人民、为首长（龙启明是首长保健医生）尽力工作，以公为首。她教育孙子辈要热爱劳动，忠厚为人。对媳妇则扬功饰过，多为袒护，从不责备。我龙启明一家人，在南京军区总医院，赢得了四邻称赞。”

龙启明对我说：“你可能先我出去，你出去之后一定到我家走一趟，看看我的老母妻儿。告诉我的老娘，她的儿子龙启明不是坏人，不是反革命，也没有做坏事。她的儿子还是她的儿子，是一个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

我和龙启明在牢房里成为知己战友了。我对他说：“你放心，你不会有事的。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一定做好你母亲的工作，叫她放心就是了。”

龙启明的老母亲，在龙启明被逮捕当天，当场昏厥过去，后经邻居抢救才苏醒过来，龙在关押期间，她终日缄言废食，夜不成寐，容颜憔悴，瘦骨嶙嶙。老

人日夜祈求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主席，希望儿子平安归来。

1967 年 3 月，我出狱之后，当天即去看望龙的一家人，并向老人叙述龙启明在狱中的表现和生活情况，目的是安慰老人和龙启明的妻子儿女。老母亲听了之后，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惊中有喜，喜中有忧。老人一双粗糙枯干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断地道谢称好。当我讲到组织上不会把龙启明当作坏人处理时，老人又一次落泪，连声说：“共产党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恩人。”

在狱中，龙启明对我说，每逢星期日，他们全家包饺子，在吃饺子之前，全家六口人，都要讲一声“感谢共产党，感谢恩人毛主席！”

龙启明对工作是极端负责的。1966 年 12 月 9 日前夕，南京军区机关部队紧急动员戒备，防止造反派冲击机关。许世友司令员特派参谋长段焕竞到步兵 181 师驻地视察戒备情况，由于夜间行车，撞到大树上，段参谋长脾脏出血。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医疗条件是可以处理的，但，许世友固执己见，命令总医院派人到北京、武汉等地请专家会诊处理。龙启明奉命到了北京、武汉请了四位专家来到南京。专家到时，段参谋长已肠坏死，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不得已采取切除措施，装上了排便漏管，段焕竞终身残疾。龙启明每谈及此，悔愧不已。我对他说，你尽职尽责了，你没有过错。

史书清，胶东人，1945 年参加八路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直爬到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保卫队长，正团职。1967 年 1 月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自发开展“四大”，2 月许世友大捕人，史书清率领保卫队人员执行捕人任务。保卫队成员，个个都是“大内高手”，身强力壮，训练有素，擒拿搏斗，各种姿势射击，各种武器使用；骑马、开汽车、游泳、水中格斗，无不精通。相当于现在的特种部队。史书清本人就能双手射击，百发百中。但是，到了 8 月份史书清“变了”，他屁股坐到“倒许乱军分子”这边来了。而且“反戈一击”，把矛头指向了许世友。刘锦平来了之后，单独召见了史书清，老史“竹筒倒豆子”，一个不留，统统向“毛主席派来的人”揭发了军区的问题，揭发了许世友大批抓人和虐待“犯人”的错误。因此他也戴上了“倒许乱军分子”帽子。大军区政治部保卫队的位置和任务十分重要。保卫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是他们的唯一重任。他护送过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叶剑英元帅，刘伯承元帅和罗瑞卿大将。有一次他护送刘伯承从南京到济南，一路精心周到，十分辛苦，刘伯承很满意。到

了济南下榻在周恩来住的楼里，为了奖励他，刘帅叫史书清住到总理的套房里去。刘帅说：“你当二天总理，我到楼下睡板床，给你站岗，放哨。”临走时，刘帅吩咐济南军区首长，送二篓苹果给老史作为奖励和感谢。任务完成后，返回南京，许世友一高兴，叫他陪着喝茅台酒。史书清细表忠心侃侃而谈，十分感人。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的共产党员竟会成为“乱军分子”“反革命”。史书清感慨万千，唏嘘不已。林彪爆炸之后，他虽然得到平反，但还是被许世友老婆，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田普，打发到某偏远山区去当县人武部副政治委员去了！

许世友说：“杀他二个也不碍事。”要不是有党中央毛主席管着他，他真的会大开杀戒。70年前红军长征中，发生在红四方面军里，张国焘一伙发动镇反，诬蔑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是AB团，是托洛茨基分子，是反革命，加以酷刑和杀害。被杀害的数以千计，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做了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情，亲者痛仇者快。张国焘一伙对党对红军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张国焘封建主义的军阀专制和个人野心，最后走向人民的反面，堕落为蒋介石的特务走狗，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要是没有党中央、毛主席三令五申，龙启明和史书清以及南京军区多少个龙启明、史书清都有可能成为许世友枪下的AB团了！现在想想，十分后怕。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历史悲剧和现实悲剧呢？归根到底，中国是个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国家，缺乏民主和科学。封建专制的帝王和诸侯（军阀），他们认为“老子天下第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生杀予夺大权操在老子手上，是天经地义的。许世友说，“不老实的通通抓起来！”并清洗出部队。党和人民长期培育出来的，属于党和人民宝贵财富的，大批英才、人才就这样被丢弃到垃圾箱里去了！许世友一句话，数以千计的“倒许乱军分子”和主持正义敢说公道话的干部，统统通过他的老婆田普被逐出部队了！这批干部每人档案里都有不实之词的黑材料。

（六十七）南山出了一头熊

一口吃了两条龙

公元 1967 年 9 月，毛泽东同志在杨成武代总长陪同下来到浙江视察，驻节杭州。驻浙部队第 20 集团军和空军第 4 军领导人熊应堂军长、南萍政委。空 4 军政委江腾蛟、军长白某某应招晋见。毛泽东对南萍（前南京军区干部部长）说：“南山出了一头熊，一口吃了两条龙”。“南山出了一头熊”指南萍和熊应堂，“一口吃了两条龙”指浙江省军区张秀龙司令员和龙潜政治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条龙”唯许世友之命是听，大肆在军内外捕人，造成严重后果，第 20 集团军和空 4 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表扬。空 4 军在浙江某地击落美国 U2 飞机，毛泽东非常高兴。在召见说话时，毛泽东要抽烟，南萍给他划火柴，他对南萍说，“你们辛苦了，你们两个军要互相团结，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他接过南萍手里的火柴，说：“还是我来吧，我自力更生吧！”南萍感动得泪流满面。在杭州，杨成武带去的专家，发现“两头龙”对毛泽东搞窃听，主席很生气。但，没有追究。他老人家替龙潜讲了好话，也批评了龙潜。他说，“龙潜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们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

在“文革”期间，张秀龙的儿子打死人，周恩来总理指示依法逮捕审判，可是人到南京被许世友藏了起来。总理知道了非常生气，下令许世友立即把人交给地方公安司法部门依法处理。还有一件趣事，1967 年 2 月，南京军区机关大规模抓人时，熊应堂要带一个连到南京来帮助许世友抓人，被周恩来制止了。原因是第 20 集团军 59 师师长朱铁谷在人民解放军第 86 医院住院，对许世友抓人，说了二句公道话，竟然被许世友抓起来了。熊军长知道事件真相之后，态度转变了。许世友获悉 20 集团军支持在浙江“支左”的南京军区政治部受迫害的人员，要把熊应堂、南萍也抓起来，毛主席表扬了熊、南二人，许才不敢动手。

1967 年 9 月，杭州疗养院将军楼，顾名思义是将军们疗养时居住的地方。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支左”的人员在杭州成立了批许联络站，并召开批许联络会。政治部、司令部、后勤部都派人参加了，我代表后勤来的。会议讨论许世友该批不该批？能批不能批？一致认为，许世友犯有严重错误，应该批判，允许批判。会议认为，批判必须同平反结合起来进行。这个会议，熊应堂、南萍是支

持的。会议决定：1967年9月，军区政治部在浙“支左”人员，除留少数在浙“支左”外，其余全部返回南京，开展“批许”活动。他们希望在江苏“支左”的南京军区司令部人员，在安徽“支左”的后勤部人员，同时回南京参加批许活动。

许世友讲过：“政治部都是一些乌龟王八蛋，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又说，“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偏要给他们戴草帽（当老百姓去），司令部接管政治部，干脆撤销政治部”。总之，许世友对政治工作，对知识分子存有歧视。

南京军区政治部批许联络站提出：许世友错误必须批判，受迫害的人员必须平反，许世友不能打倒，也把他打“跑”。1973年12月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只身一人调到广州军区。终于被打“跑”了。毛泽东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人员，他们长期在党和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军队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各项政策。政治工作和政工干部是我党在军队中的生命线。没有政治工作，这支军队就是军阀的军队。没有政治工作，就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我军政工干部不能容忍任何人歧视或贬低政治工作，他们绝不允许一切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行为，在军队中横行霸道。许世友必须认错，必须检讨，必须改正错误。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支左”人员的批许活动，得到了“南山出了一头熊”的支持。

在1967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派军委办事组政治工作组负责人，空军副政治委员刘锦平将军和总理秘书宋皋同志，带领工作组来到江苏南京无锡等地，他们的任务是阻止农民进城，制止有可能即将爆发的南京、无锡地区大武斗。

1967年10月6日晚8时10分，刘锦平在南京空军接见南京军区机关直属队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有关人员。刘锦平进入接见大厅时，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带领大家起立鼓掌，刘锦平也鼓掌。

孙海云说：“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江苏的文化大革命，为了江苏4450万人民的利益，中央派刘政委率领工作团来江苏。刘政委代表中央来的，今天晚上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同大家见面，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的关怀，为了表达我们的心情，请同志们再热烈鼓掌。现在，请刘政委给我们作指

示，请同志们欢迎”。

“同志们，我和宋皋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是遵照总理的指示，来到江苏南京的。总理给我们的任务是促进江苏的革命群众组织消除分歧和对立，尽快地联合起来。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的时候，说 7、8、9 三个月形势大好，江苏也不例外。现在，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江苏两派对立情绪有了好转，开始接触协商，讨论大联合。明天，我们就要回北京去了。可是，我们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在北京临走的时候，总理对我有交代，要我来看看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们，听听你们的意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很关心你们啊！”与会人员情绪激动热烈鼓掌。

“任务没完成，我们不能走。所以，今天晚上把同志们请来，一是看看同志们，二是来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我还要把这些意见带回去，向总理汇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现在就请同志们发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南京军区后勤部锋锐，他说：“今年二月份，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军区首长许世友的错误，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七个月。仅司政后机关直属队被逮捕关押的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有 340 人之多。师以上干部被逮捕关押、批斗、勒令停职检讨交待的有 20 多人。其中有朱铁谷、孙海云、赵树湘等人。团以上干部被逮捕关押有 60 多人，营以下更多，后勤技工学校把“造反”士兵绑在卡车上游街。83 医院临产孕妇也要弯腰接受请罪批斗。125 医院有的军官和士兵在浴室里被抓走。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专家沈威廉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还带着手铐。军区总医院政委刘万祥和上海 916 油库政委邓启樵被打成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刘邓。邓启樵在集中营里被几个武装士兵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军区总医院护校入伍不到一年的学员，十八、九岁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开除军籍押送回家……。”

汇报工作进行到凌晨二时。午夜时，休息半小时，空军招待人员送来了热气腾腾的面条。

凌晨二时十五分，刘锦平作了长时间的讲话。他说：“同志们讲得很好，很深刻，很生动。你们在座的都会写文章，很多是秘书。把这些情况分门别类写成专题材料，文字不要太多，要简明。我保证把这些材料带到北京，送到毛主席那里，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我们天天都有飞机很方便嘛！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一

定把同志们受到的委屈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他又说：“许世友同志有错误可以批判。他现在在养病，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创造一些条件，同志们不能操之过急。提‘打倒’的口号是不恰当的。我们希望他能取得群众的谅解。”

周总理秘书宋皋是工作团副团长，10月6日晚接见，他没有出席。但他单独接见了孙海云、尤亮等人，交谈了多次，而且带走了材料，当然完全是许世友的事。

刘锦平、宋皋走后，1967年11月13日，南京军区（含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告状团就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告状团。

毛泽东同志说“南山出了一头熊，一口吃了两条龙”，看来幽默有趣，但其意味深长。

（六十八）王必成替许世友还债积极主张平反

党中央严令许世友养病大别山

1967年10月，刘锦平飞回北京之后，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驻宁医院、学校、文体单位，立即沸腾了起来。刘锦平的讲话三天之后就传遍了各单位。很多师、军以上的高级干部都改变了态度，同情和支持受打击迫害的军官要求平反的愿望。首先是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和鲍先志副政委。王必成是二月抓人的指挥官，林维先、鲍先志副政委没有怎么介入此事。因此，从浙江“杀”回来的近三百名政治部支左人员，首先向王必成开炮。许世友在大别山“养病”，杜平被总理请去北京开会，商讨解决江苏两派联合问题。王必成是军区党委副书记，第一副司令员，在南京主持军区党委日常工作，他责无旁贷，必须承担责任。

10月18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告状团联合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受迫害人员的代表，对王必成进行第一个回合交锋，要求王必成批准三大部和直属单位成立平反小组。平反小组在党委领导下，监督和帮助进行平反工作。

10月21日，在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著名的AB大楼（解放前美军顾问团住的地方）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端坐着我人民解放军前第九兵团司令员王必成将军。这一位威震孟良崮战役和莱芜战役的虎将，纹丝不动地坐在雪白干净的长条

会议桌的正中央，他的军帽放在会议桌的右上方。银色的传声器对着他的面孔，随时准备替他扬声。一个淡蓝色的托盘，托着一个白色盖着盖子的茶杯，放在他的眼前。杯子下方有一本黑色大笔记本敞开着，钢笔就在笔记本上。王必成将军是年过花甲的人了，花白的短发剪得十分整齐。他不时昂起头来鹰一般的目光，扫视着围坐在会议桌上和其它座位上的男女军官。看上去，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将军更加消瘦了，在本来就干巴的脸上，更加棱角分明，令人望而生畏。他依然精神抖擞，威风凛凛。军容和威仪丝毫不减。坐在他旁边的是王六生将军，他面有采色，还是那样肥胖。参加“走访”的人员共有 30 多人。“走访”王必成将军前一天就将走访的内容和要求告知了王副司令，以便他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有个准备。

“同志们！我们开会好不好？王副司令工作很忙，担子很重，今天应同志们要求，同大家见见面，同志们有什么意见请讲吧！”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主持会议。王必成把宽边老花眼镜戴上，认真地看着那张事先给他的走访提纲。

“我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驻宁院校、文体单位的同志都来了。我们来走访军区党委和王副司令，要提出来的问题，事先都通知了，现在我们就按题目一个一个来吧！”李英武（海军学院学员）讲的一口东北普通话。

“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了解。军区党委犯了错误，你们受了委屈。现在同志们要求平反，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本人在今年二、三月份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多多批评。你们提的问题，有的我能答复，有的我不能答复，有的要经过军区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请同志们谅解”。王必成以少有的温和语调讲话，使在座的军官们以及他的秘书感到惊讶和好笑。坐在我后面的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编辑高丕忠，轻轻地对我说：“王老虎今天成了美娇娘了！”

“我们欢迎王副司令的态度，那怕有一点点进步和转变我们也欢迎。您是军区首长，现在是我们的首长，将来打起来仗来还是我们的首长。正因为如此，我们衷心地希望您和军区其它负责同志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能站到群众一边来。不要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转变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方泽甫（政治部文化部干事）用标准的四川话，说得十分诚恳。

“王副司令刚才说，有些问题能答复，有些问题不能答复，有些问题要经过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试问，今天的走访，党委没有研究讨论就同意召开了么？”王树雨（后勤物质部助理员）发问。

王必成摘下眼镜，用眼睛斜视了一下发问者，沉默不语。王六生见机不妙，立即插话解脱：“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党委怎么会不作研究，在家的党委常委只有王必成同志、鲍先志同志、林维先同志和我。我们碰过头研究过。至于一些问题，因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不在家，不便作出决定，请同志们谅解”。

“党委对走访做了专门研究，对走访表示重视。如果党委只研究开会不开会，对会议内容不做研究，比如对我们提的问题不研究，岂不是舍本求末吗？这种做法岂不是又在哄骗我们吗？党中央三令五申，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改的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如果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不愿意改正，到头来还得改正，那时候损失就大了，威信就扫地了。这是毛主席对第 27 集团军在江苏无锡三支两军犯错误检讨报告的批示。王副司令不会不知道吧！党委同意接见我们，对实质性问题不研究不回答，岂不是等于还在坚持错误，起码说是态度不积极。”王必成和王六生听了赵玉祥的发言。都沉着脸一言不发。

“我们知道首长有难处，过去的一些事不能全由军区党委来承担，因为那是个人决定的。比如抓人，抓得那么多，抓得眼红，那就不是党委的决定，是个人决定的，这件事现在说由党委来负责不妥当。个人闯的乱子为什么要集体来挨板子呢？王副司令您当时在家里主持工作，抓人的主意不是您出的，我们认为您不必负责任。可是您现在主持党委工作，可以对这件事进行讨论研究，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就是您应该负的责任”。王必成和王六生以及工作人员都低着头，对赵玉祥的发言认真做记录。

赵玉祥知道王必成的心思，所以，在发言中很注意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分清是非界线，分清责任界线，给王必成吃定心丸，给他搭梯子让他下楼，争取王必成“屁股坐过来”。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和军区其它领导人转变了态度，平反才能顺利进行。赵玉祥的发言机关三大部的同志一致认同，但军队院校和直属队的同志不认同。他们批评机关平反组是“只会吹气的策略派”，缺乏“造反派的脾气”。因此，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的平反组同南京地区军事院校告状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同志们今天来走访军区党委，对我本人教育很大，我欢迎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二月抓人肯定错了，毛主席党中央批评了我们，并督促我们尽快改正错误。我们的检讨已经送到北京去了，杜平同志看了之后，再送×××政委看看。他们都同意了再呈送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党中央批了，我们就好说话了，现在，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好表态”。

“同志们不必心急，很多问题总能慢慢解决的，要给我们一点时间，要允许我们做工作。很多干部的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要有一个过程。同志们，你们要耐心。我保证军区党委一定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合情合理的彻底解决你们的问题”。王必成的态度和语气是郑重的温和的。

“王副司令今天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还有王六生主任也来了，我们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反革命”。今天王副司令同“反革命”坐在一起谈谈心，说说心里话，我们的确感到光荣”。方泽甫的四川话才开了个头、王必成将军就笑上眉梢了。他连忙摆手表示歉意。“什么反革命，不要再这样讲了，我们冤屈了同志们，我们有错误，严重错误！”

“王副司令到军区来工作快十年了，我们平时也不大看得见首长，只听说首长很厉害，爱骂人。在九兵团工作的时候，消灭过国民党王牌军 74 师，蒋介石的干儿子张灵甫不可一世，也是在王副司令手下见阎王的。孟良崮一战威名天下扬。党中央毛主席很看重王副司令的，还发表了文章和谈话。电影《红日》就是描写您的。”方泽甫继续吹他。

“那是过去的事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嘛，讲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干什么。过去的功劳和历史不能代替现在的错误和现实。我老了，糊涂了，下半辈子做了一件蠢事。同志们年轻力壮，有见识有本事，毛主席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王必成不愧为王老虎，老虎能如此谦逊达理明白，是共产党的伟大，老将新春太可爱了。

“人家都说王副司令是王老虎，这是形容首长在反革命武装斗争时勇猛如虎。今天虽然不打仗了，在和平环境中，王副司令也勇如当年，勇挑重担。刚才王副司令讲的话，我们认为是积极的、进步的。所以，我们表示欢迎。不过，有一些重大问题，王副司令还缺乏勇气，拐弯抹角，不敢直言。我们同意王副司令的看法，要有一个过程，要给一点时间，要创造一些条件。为此，我建议今天

暂时休会，有些问题可以在下次走访会上解决。”

王必成一听方泽甫讲了这么一段话，如释重负，脸上浮出轻松的笑容，不住的点头表示同意。王六生也不断点头，如鱼入海，如去桎梏。

十月的石头城，阳光灿烂，枫叶红遍，苍翠的塔松矗立在宽广的道路两旁，令人感慨而兴奋！人们在思索：如果许世友司令员在南京，我们的走访又将会是如何呢！党中央毛主席英明果断，严令许世友在大别山上“养病”“打猎钓鱼”“深居简出”，免得他再闯出祸来给党中央添麻烦！“文革”期间青海省军区某司令员开枪打死群众，国内外影响极坏，给党中央制造了大麻烦。

(六十九)刘锦平火烧连营七百里

许世友割须弃袍走华阴

《刘锦平 10.6 讲话》、《王必成 10.21 走访纪要》、《司政后首长走访纪要》全部铅印大量发行。散发的目的，是进一步争取和发动那些了解内情而思想有顾虑的军官起来参加批许活动。尤其动员军、师、团三级主官，敦促他们迅速转变立场，把屁股坐过来。经过二个月的努力，98%的团、师、军干部站到受迫害军官一边，积极参加批许活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一二五医院，前线歌舞团、前线话剧团、前线歌剧团，体育工作队、军乐队都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局限于揭发许世友在二月份大逮捕、大批斗、大清洗、大提拔的“四大”错误。南京军区后勤部 9 位将军全部上台揭发和表态，30 多名上校大校全部倒戈向平反组靠拢，有的主动把二月抓人的内幕机密向平反组提供。比如，许世友要枪决 86 医院护校教员李明，就是一位上校副部长透露的。南京军区政治部师以上干部更为活跃，文化部部长何秋征、群工部长丁华国都写大字报质问许世友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到浙江去？秘书长卞庸中、副秘书长李干，青年部长季遐年都参与了平反组的具体工作。

1968?年 10 月 31 日晚 7 时 30 分，在南京军区第二招待所小客厅里，林维先副司令员召见了艾汉美和赵玉祥。

小客厅灯火通明，四盏壁灯贴在奶油色的墙壁上，天花板上还悬挂着一盏四

灯头的吊灯。淡黄色的地毯上摆着六张软沙发。墨绿色台布罩在茶几上，茶几后面竖着一架立式罩灯。小客厅的陈设十分雅致和谧静。林副司令来到之前，他的秘书林启桐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并互致问候。在二月大逮捕中，林启桐也被关押了起来，我们观点一致，十分相投。杜平政委的行政秘书杜荣上尉，张才千副司令的秘书刘东敏中校，王必成的机要秘书尹中元少校，军区党委常委保密员徐英杰中尉，全部进了监狱，享受过铁窗的滋味。南京军区首长的秘书全都“造反”了！掌管党委常委核心机密的人也起来揭发批判了，许世友气愤填膺怒不可遏，是可以理解的。

7 时 40 分，林维先满面笑容走进了小客厅，他手里挟着带烟嘴的卷烟，对赵玉祥和艾汉美说“同志们久等了！”我和艾汉美立即站起来，立正向首长敬礼。林副司令和我们亲切握手，招呼我们坐下。“今天晚上请同志们来谈谈心，我们（指王林鲍三位首长）前天找王六生主任谈过了，很多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志们不要急，要一步一步地解决。他们（指许世友）思想不转过来，反是平不好的。我们希望把反平好，不留尾巴，尽可能满足同志们的要求。昨天，中央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南京军区现在还有压制，要求我们正确对待群众。中央对军区党委的检讨不满意，羞羞答答，不敢揭短。现在我们真正感到压力很大。王副司令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许世友同志有病，杜平同志在北京，很多重大问题我们不了解，党委会上也有争论。是谁的板子就是谁的板子，板子不能瞎打。我们也感到有苦衷。这是和同志们谈心，说说心里话，你们都是好同志”。林维先的谈话很低调，也很亲切。首长的目的很清楚，做我和艾汉美的工作，缓解群众和党委的对立情绪。

“最近我们看了一些材料，听了同志们的申诉，对我们震动很大，教育很深。很多情况我们不了解，对同志们的迫害竟然会搞到如此地步。那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我们也怀疑。孙海云同志、赵树湘同志跟我们在一起工作多年了，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嘛！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集团！逮捕关押，还要划清界线，还要批斗，株连家属子女，真是打击一大片啊！”林维先动了真情。

“林秘书在我身边工作几年了，表现很好嘛，他也被抓起来了，事先也不跟我打招呼，就把人抓起来了，我事后才知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个副司令嘛！军区领导机关的干部都是经过历次运动锻炼过的，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才可在

机关工作的。都是可以信赖的嘛。现在问题成堆，怎么办？只有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坚决改正错误。今天，我把同志们请来，就是谈谈心或者说是向你们交交心，你们看看有什么意见和想法随便谈谈，希望你们帮助军区党委改正错误，我相信同志们是通情达理的，是顾全大局的”。林维先将军衷恳亲切的谈话，使小客厅气氛更加协调、和谐、融洽、愉快。林启桐秘书用速记全部记下了他的谈话。谈话持续了 4 个小时。时针指向 11 时 40 分钟，已临近午夜。

“你们是好同志，建军靠你们”。

“首长还是我们的首长，将来打起仗来，还要带领我们向前冲”。

握手告别时，林维先叫秘书派车把我俩送回家。深秋的南京城，可以身着棉衣的午夜，就是坐在汽车里面也还有些寒意。路灯格外明亮，宽敞的柏油马路显得更加豁达，一眼可以看到底的中山北路，洁净、坦坦、磊落、亮堂。

小华沙奔驰在这条通向微妙的大路上，令人安抚而又感慨。我思絮纷飞。人生最大的愉快莫过于此，过去把自己当成敌人加以打击迫害的领导人，现在转而把自己当成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加以器重。一个真正的人，无论他经受多么大的艰难困苦和冤枉委屈，而他始终如一的、坚定地为真理而斗争，是最愉快最幸福的。这不是“受宠若惊”，是党组织的信任。

林维先将军作为大军区的副司令员，身经百战，伤病缠身，在“文革”中，他无论在精神上、尊严上、身体上、生活上都受到冲击，然而，他并没有积怨在心企图报复。他秉公无私，实事求是。他没有任何个人私利，也没有什么个人目的，他出于道义和同情，作为高级领导人，不回避矛盾，出面做群众工作，讲一些公道话，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你们的申诉教育了我”。他如果有私心的话，他完全可以找个借口躲进医院，患上个“政治病”而逃避是非；如果他有野心的话，他决不会对受迫害群众采取安抚态度。

可是，现实并不如此。五个月之后，中共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之后，许世友不但不感谢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在他“困难”时代他当了“替罪羊”，承担了责任，相反的，把“王林鲍”打成“倒许乱军的黑后台”，诬蔑有“政治野心”，企图利用二月抓人事件，有意蛊惑人心，把许世友打倒，并取而代之。鲍先志将军是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原先是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平易近人。他曾在 1967 年 11 月接见军区后勤部一批走访人员时，他讲了一段非常

感人的话。他说，“1934 年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的叛变，株连了一大批干部。我是四方面军的，也受到了牵连，被关了起来。一直到 1942 年才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组织上给我平反，向我道歉。时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个时候全国尚未解放，又处于战争年代，拖了八年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现在很幸福，全国统一，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用不着等八年。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北京，同志们受了冤屈，中央立即就出来纠正，你们多幸运啊！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给你们落实政策的，军区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问题也一定会得到正确解决的”。五个月之后，鲍先志这番话成了他“反许乱军的罪证”。打倒“王林鲍”，揪出黑后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1968 年 1969 年，在南京军区除了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杨余傅的口号喊个不停，又加上了“打倒王林鲍！”许世友的胡作非为又受到党中央毛主席严厉批评。毛泽东同志对许世友说：“你要读红楼梦，你要学习哥白尼的天演论。”意思是许世友不懂唯物论和辩证法。二年之后，王必成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史景班任副政治委员，许世友要打倒的人都升了官。

（七十）许世友持权报复再整“倒许乱军分子”

竟公然出手打政治部主任耳光

1968 年 6 月—12 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人们称他为“传奇将军”，其实他一点也不“传奇”，如果把“传奇”改为“专制”，那倒是恰如其份。一代名将，全然不顾党中央毛主席对他的批评教育，全盘否定他首肯的《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以及中央对“报告”的批示，阳奉阴违变本加厉，持权报复，再次大整“倒许乱军夺权分子。”

1968 年 4 月，整死了南京军区工程兵部政治部主任白某某和南京军区后勤部训练科长吴俊、军马部军马科长李旭东之后，不但不“收兵回营”亡羊补牢，相反的，错误犯得更大更严重。军区后勤部被点名批斗、检查交待、下放劳动改造的，师以上干部有后勤司令部参谋长王子乔，副参谋长穆增祥、孙章，军械部长宫范九，副部长张友夫，军区总医院政委刘万祥等。团以下干部更多。

我是重点对象，调配精兵强将整我 120 天（6、7、8、9 四个月），给我定了

七条纪律：不准回家不准通信，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除毛主席著作外，不准看其他书报，指定二个人专门“看护”我，我到那里他们跟到那里。每日三餐数百人用餐后，地面卫生由我包干打扫干净。每天不是小会攻就是大会轰，要我交待问题。交待了还不算，还要挖思想根源，还要检举揭发，戴罪立功。“打手们”对我猛烈炮轰时，每每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人身攻击侮辱人格。副科长吴某，跳出来诬蔑我是“阶级异己分子”“从黑窝里爬出来的”。极尽“不实之词”。学习班党支部给我戴上 7 顶帽子：①小爬虫变色龙②阴谋家野心家③倒许乱军夺权骨干分子④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⑤阶级异己分子⑥黑窝里爬出来的⑦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帽子满天飞，全都是空心汤团，没有一项有具体事实。整我很起劲的一些人，有的属认识问题，有的是别有用心。“官本位”是推动他们充当打手的重要因素。有的人本身在历史上，屁股上有屎，想乘机表现一下，洗刷掉自己的丑恶形象和劣迹。但，他们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他们得到的“好处”仅仅是一句话，自身党性不纯。不少整人的人，后来都犯了错误，突出的是在支左中乱搞男女关系并受到处分。1968 年 9 月，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开始了。周贯五政委宣布：赵玉祥下放劳动锻炼，不必参加清队学习了。1968 年 11 月，我第二次下放到后勤某工程团劳动。1969 年 1 月因肝病，经周贯五批准回南京治疗在家养病。机关党支部派老红军冯福铭部长找我谈话，冯对我说，“根据上级指示，你属于推一推过去，拉一拉过来的人”。暗示我，我可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属站错队的，七顶帽子快要取消了。

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打击面更宽。政治部主任史景班为重点。史景班，山西人，早年参加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反阎抗日”队伍。陆军第 12 集团军政治委员，调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12 军军长李德生因在安徽“支左”有功，制止了武斗，毛泽东大加赞扬，任命他为党中央副主席、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红极一时。林彪爆炸之后，“四人帮”诬陷李德生上贼船，毛泽东对他经过二年审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免去了党中央副主席和总政主任职务，降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主政后，李改任国防大学校长，授上将衔，这是后话。

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批许平反”的主要动力来自政治部，比如：刘锦平来宁调查研究，唱主旋律的是政治部，上北京告状的主力是政治部。因此，许世

友对政治部“批许”的人恨之入骨。许要是开杀戒，政治部人员首当其冲。许世友说：“政治部烂透了，是重灾区”。他认为史景班是“黑后台、大黑手，大爬虫”。许亲自审讯史景班，史景班坚持实事求是，既不承认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也不检举揭发其他无辜者。许世友盛怒之下，奔到史景班面前，出手狠狠打了他一记重量级耳光。这位还俗的少林和尚，出手不凡，打得史景班眼冒金花，站立不稳。陪审的人员都惊愕得呆若木鸡。史景班强忍侮辱和皮肉之苦，默然不语。我人民解放军自盘古开天地，那有司令员打政治部主任的！尤其大军区，空前绝后，可是许世友干上了。在历史上，许世友还打过毛泽东同志一记耳光。打你史景班，那是小菜一碟。人们盛传许世友的“传奇故事”，我想，他“奇”就“奇”在这里。什么开枪打死老婆啦，飞檐走壁轻功了得啦，破石如泥啦，力举千钧啦、少林比武啦、十八般兵器件件精通啦……吹得神乎其神。许世友是我军一员战将，作战勇敢，对中国革命做出贡献。这是事实应予以肯定。但在历史上他犯过错误，尤其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也是事实。我认为不能以“传奇”为“彩色涂料”把他的严重错误掩盖起来。更不能在“传奇”的幌子下，大肆渲染其所谓的传奇事迹。这种用“彩色涂料”的写作手段来美化许世友，往往会误导不明真相的善良的人们。从出手打史景班这件事上看，许世友的“传奇故事”就如洞观火了。我们批评他“骄兵悍将”、“军阀作风”、“独立王国”、“一言堂”、“专制霸道”，“封建忠君”，“封功拜将思想”等等，不是空穴来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领导人对许世友是爱护的。但，他居功自傲，骄横不度。在中央首长中他畏惧三分的只有6个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罗瑞卿和林彪，其他人都不在他眼里。他嗜酒成癖，一喝茅台准发酒疯。在他的心目中不知道尊重人是什么概念。稍不顺心如意就骂人，往死里骂。不仅骂人而且大发淫威。他的世界观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老子天下第一。毛泽东经常批评教育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毛泽东问他，“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许世友答，“我带兵北伐！”。毛泽东说：“周勃重厚少文”，“安刘者必勃也”。实际上是批评许世友“不学习，没有文化，不懂马列主义不懂辩证法唯物论”。许世友不懂什么“周勃少文”、“绛侯安刘”；更闹不清楚“安刘”“柳营兵”是咋回事？许世友手下那些姓“马”姓“牛”的人，乘机对许说：“毛主席讲党中央出现危机只有靠你来扛了！只有你能转危为安”。许世友听了大喜过望，“对

呀！毛主席是问过我这件事”。许世友把另一句话“周勃少文”给丢了，只听到“安刘必勃”一句。所以，他敢搞独立王国那一套。在一次会上，毛主席问许世友：“许世友你看过《红楼梦》没有？”许世友莫名其妙，什么红楼梦、黑楼梦、白楼梦的。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回南京要读《红楼梦》，要读哥白尼的《天演论》”。许世友懵懵懂懂，唯唯诺诺。回南京之后，他吩咐政治部到新华书店大量购买《红楼梦》、《天演论》营以上干部每人各发一套。下命令每人至少看三遍，上班时也准看，不算违纪。吹许世友是“传奇将军”的人，为什么不把这些“奇”事也大书特书地“传”进去呢？

1969年1月，我在后勤工程团劳动改造，因病在家休养，南京军区政治部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连锅端到北京去办了。办学场所设在总后勤部的后勤学院。到了北京，学习班立即“换了人间”。毛泽东主席亲自圈阅学习班计划。挨批挨斗的人，被勒令检查交待的人，变成动力了，学习班的领导班子改组了，“倒许乱军夺权骨干分子”艾汉美、纪国城被党中央指定进了学习班的领导班子。“倒许乱军夺权”的说法被定为“多中心”的错误口号挨批判了。史景班挨批斗的位子，让给了南京军区另一位政治部主任符确坚和参谋长王蕴瑞了！符确坚海南人，老红军参加过长征。讲一口别人听不懂的海南岛北京话。符确坚曾任军区后勤部政委，他认识我。为什么要批他呢，他是许世友推行“多中心论”的替罪羊。毛泽东同志说：“‘倒许乱军夺权’的提法是错误的，是多中心论。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党中央”。毛泽东说：“南京军区政治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办成和棋班”。党中央毛主席又一次批评教育了许世友，又一次纠正了许世友的错误。毛泽东的话讲得很重了！许世友算是听懂了。他下令赶快把“倒许”二个字去掉，但无济于事，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必须执行，背靠背批了他6个月。1969年6月，军区政治部学习班全体人员奉命返回南京。

1969年4月，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立即上班，并且派我到上海警备区检查工作，工作组长是周化泽科长，同我关系很好。在出差之前，南京军区后勤部运输部党支部，派一位科长一位代科长找我谈话。阮克栋和陶春和笑嘻嘻地对我说：“赵玉祥同志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军区指示，你自己写的检查交待材料还给你本人，检举揭发你的材料当面销毁。你的错误一

笔勾销了”。阮、陶二位在推行“倒许乱军夺权”错误口号中，都很积极。陶春和代理科长的职务不知何故被吊销了。阮克栋升了官。

1968 年的反复是许世友挑起来的，结果以许世友挨批评再一次做检讨而告终。我们同许世友的“摸老虎屁股”游戏，第二次交锋又胜利了。但是，我们吃尽了苦头。辛弃疾说：“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读词悟人，不胜唏嘘。

刻下，我也有点同情古代遗恨的英雄豪杰们，他们为什么不自量力。辛弃疾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民为本”，封建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官为本”。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内，不可能彻底消灭“官本位”。有官本位思想的政客们视人民群众（老百姓）为草芥。他们对上，推崇“吾皇万岁”和“天聪圣明”。许世友虽然是老共产党员，但他的思想体系依然停留在封建社会里。民主和科学对他来说是“怪异”。不能容忍“怪异”的大小官员岂止是许世友一个人！21 世纪来临了，中国共产党出现了新的领导集体，他们看到了“官本位”的本质和它的危害性、反动性，因而极力倡导“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和思想路线上的科学发展观。这是胡锦涛同志的英明。他把握和遵循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

（七十一）春光无限好细雨化无声

赤子报国心沉沙落雁飞

1969 年 4 月，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二位科长找我谈话。“部长最近不在家，我和阮科长在家负责。领导上决定你到上海警备区去检查工作，出一趟差。周化泽科长带你们去，共 4 个人，时间一个月，具体任务周科长会传达”。陶春和代理科长吩咐我。

“我在农场劳动一个月就病了，没有完成任务，理当再去补课，善始善终”。赵玉祥回答。

“不，不必去了，到农场劳动的同志不久都要撤回来的。你们的劳动任务已经完成了。噢！还有一件事，根据军区首长指示，你写的那些交待材料要送还给你；别人揭发检举的材料，当你的面通通烧掉”。陶春和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赵玉祥迟疑了一会之后，急切地问陶春和。

“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许司令指示，凡是检查交待彻底的，态度好的就一笔勾销，从今以后还是好同志。讲到“好同志”三个字时，阮大头双眼笑成了一条缝，大嘴里露出了两排大白牙。正当阮克栋在说话的时候，陶春和从保险柜里取出一袋卷宗。卷宗里分别有两叠材料，一叠上写着“赵玉祥交待供词”；另一叠写着“检举揭发赵玉祥材料”。扉页下方括弧里写着 1—567 页，时间：1967 年 6 月 5 日。陶春和把“供词”那一叠递给了我，把另一叠放在簸箕里，划一根火柴，慢慢地焚烧着。不大一会儿簸箕里火焰喷舌，纸灰飞扬，整个办公室里充满着焦烟味道。那些细屑纸灰有的点洒在办公桌上，有的飞出了窗户，飘洒不知去向。还有一些细屑飘落在我自己的头发上……。

赵玉祥手捧着自己在 10 个月以前，洒着眼泪疾书而成的“请罪”材料，心里激动万分。那些浸有泪水的“供词”，一点也没有褪色，流利的钢笔字，一行行展现在他的眼前，他信手翻看着，一张又一张，一本又一本，挨着日期顺序，装订得整整齐齐。

“啊那有那么多？”我吃惊地脱口而出，每页以 500 字计算，那就是 25 万字。在集中营里关押了 45 天，平均每天写 5600 字的交代罪行、检讨错误的材料。如果从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指示开始算起，到《军委八条》下达止，前后“造反”不过 5 天，却被逼写出了 25 万字的“罪行”材料。这是我军历史上在历次运动中出现的罕见奇迹！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见许世友对自己的“好同志”，实行打击的力度是何等的强大！“官为本”的影响何等嚣张！

列车飞奔在宁沪线上。四月的江南，青山绿水，红黄蓝白褐，交相辉映，景色万千。我们一行 4 人在周化泽科长带领下，从南京出发向上海进发。在车窗前，远山近水，农田树荫像印刷机里吐出来的报纸一样，闪闪而过。我倚着车窗，低声呻吟着平时爱唱的抒情歌曲“马儿啊！你慢点跑。风吹啊，草低见牛羊……”。我习惯地把军帽挂在衣帽钩上，抬望眼，看到祖国大好河山和勤劳的人民，思绪

万千，似有所思。此时此刻的心情，同我在集中营被武装关押，被批斗，带病被下放到农场里劳动，因病而归，孤独在家养病，不准工作，没有任何人敢接近我，走到那里昔日的战友都不敢同我讲一句话……。今天和昨天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互相交织在一起，我无比悲感伤感！洒进车厢里的阳光，轰轰作响的车轮，摇曳婀娜的路旁杨柳，粼粼闪光的太湖之波……这些自由、美好、纯洁、伟大的大自然，不断收进我的眼帘。凄感悲凉的往事，现下眼前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慄无限惊愕。惊涛骇浪，暴风骤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世态炎凉；海晏河清，和谐细腻，相扶相济，风晴月朗和人间柔情，这两类截然不可同日共语的感情境界和思维空间，令人感慨不已！爱和恨，善和恶，忠和奸，美和丑，真和佞冲击着善良人们的心脏和中枢神经。

到了上海，我们住进了延安饭店—南京军区上海招待所。我和周化泽住一个房间。在我当部长助理时，恰好他也是油料部部长助理，我俩经常在一起开会，业务上经常接触。两个部合并之后，他晋升为科长，我仍然当部长助理。“赵玉祥同志，事情过去了不要再计较了，向前看”。“你写的检查交代材料我全部都看过了，当时的形势，谁都很难料到，吃了点苦头，正确对待吧！”周化泽在劝慰我。延安饭店条件好，两个人一个房间，没有第三个人在场。我对他说，我走时阮克栋找我谈话，他说：“许司令说了，凡是检查交待彻底的，态度好的就一笔勾销，从今以后还是好同志。”“是的，本来都是好同志嘛，谁能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周化泽也和我一样感叹不已！

在延安饭店二楼，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女青年服务员，正在使用吸尘器，努力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我用拖布协助她们把打蜡地板上的垢物去净，淡黄色花边地毯服贴地伏在地板中间。电话就在房间里，随时可以和全国各地通话。时针指向 9 时，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翻阅上海市的《大黄页》。411356，“喂！你是××公司吗？请你找黄灿同志接电话。怎么？她不在，她中午才能回来……。我是上海延安饭店，我是她的战友，请您转告她，她回来时，请她打电话给我。我的电话号码是 478281。好的，谢谢！”。过了一天，下午二时，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喂！啊是我。昨天电话没有找到您，您都好吗？又是八年没有见面了。好的，明天我不出去了，下午三点钟，在房间里等你，延安饭店二楼 36 号房间。再见！”。

一位身材修长，姿态婀娜，服装考究的年青妇女，挽着我喜笑颜开地从饭店门卫室走了进来，她穿一件藏青色小领西服上装，下着一条米色小口长裤，润滑笔挺合身。下颌之下，开放式白底红点衬衣领头，那领头也是笔挺的，一丝皱纹也没有。她乌黑油亮的头发，好像才经过发型师梳理过。她脚上那双黑色扣带半尖皮鞋也顶合脚。她的一身装束和举止投入，一看便知是海派气势和风格。好一位八年没有见面的原炮兵司令部后勤军械部财务科的黄灿同志。

“八年了，怎么你又来找我？我老了吧？你看看是不是一个老太婆？”我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您还是那个样子，这八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以为你退伍了！”她接着讲。

“你看你一点没有长肉，你还是一把骨头，排骨！”说着，她用她柔软的手指轻轻地在我左臂上捏了一下。她继续挽着我一步一步地上了楼。“请坐”。我把她带进房门，热情地招呼她坐下。然后给她倒上一杯热茶，随手在小壁橱里取出二只苹果，先在盥洗间里洗了一下，然后慢慢地给她削皮。她坐了下来，把随身携带的精致的小提包放在我的床脚，然后端起茶杯微微地品了一下。品茶的瞬间，她乘我低头削苹果，迅速地把我又看了一眼。然后，把嘴闭起来，端着茶杯仔细地打量着我的房间。看了一会儿又转睛凝视着我，直到我把苹果送到她的手里，她才放下茶杯，笑了一笑，接过苹果轻轻地咬了一小口。“你爱人都好吗？孩子也好吗？”我一边削另一个苹果一边同她攀谈着：“满好”。

“你还是干老本行？当财神爷，满惬意的，不像我成年劳累和奔波，马不停蹄，常年累月一套老军装”。

“你是大军官，我们是老百姓。全国学习解放军，我要好好向你学习才是”。说着，她用眼睛狠狠盯了我一眼。

“小芳（她原名黄秀芳）你还记得 1951 年到 1952 年的军队生活吗？那时候你才 16 岁，你是青年团小组长，我是青年团支部书记，你经常向我汇报团小组思想情况”。

“你的记性真不错嘛，15 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得清楚”。她笑容柔和。

“你忘了吗？‘三反五反’的时候，你查帐在南京候家塘，我当时出差在上海，有人陷害我，你急得暗地淌眼泪，后来那个诬陷我的人自投罗网，受到军法处置，你才把心放下。我从上海回来，你守口如瓶，不透一点。等你离开军队到

上海工作之前，我才听别人告诉我。你为了替我辩白，日夜查帐，终于用事实证明我是清白的。真相大白的时候，你已经整装待发了，我们告别于仓促之中。那时，你 17 岁，我 20 岁”。我深怀感激之情，娓娓叙说 15 年前的往事。

“你的记性真好，可我倒有点记不清了。不过我替你结毛线衣的事我至今没有忘掉。你买多少毛线，什么颜色的，我结什么样式的，腰身多大，我至今记忆犹新”。她十分动情。

“这件毛衣穿 15 年了，我还穿在身上，不过它已经改织了二次”。

我们愉快地彼此交谈着建国初期那场“三反五反”运动情况。她又怎能知道，15 年后的 1967 年，我刚刚从武装关押的集中营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的呢！如果她知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和它的残酷性，她又会为我流泪的。一个人在经受苦难和浩劫之后，重新沐浴在阳光之下，同昔日的战友，尤其是同异性伙伴叙旧，对他那颗受创伤的心，会得到极大的慰抚和修补的。

我们一行 4 人，在上海警备区呆了一个星期就回南京交差了。这一次到上警来没有什么重要任务，纯粹是走一下过场，了解一下二月抓人之后的部队思想和工作情况。我意识到这是来自北京总部的关怀。我被关押之后，三省一市的军队后勤系统，野战集团军后勤系统都知道了，老熟人看到我“亮相”了，都为我高兴。

（七十二）手术刀上也有“阶级斗争”

沈威廉死亡调查纪实

1967 年 9 月，金陵古城灼人的热浪冲击着善良的人群，人们被烘烤得透不过气来。南京中山门半山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院 89 楼二楼住着一家凄凄惨惨戚戚的临时人家。主人叫朱顺潭，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共产党员中校沈威廉教授的妻子。她带着一双儿女，从嘉兴野战医院被告状团接来，揭发控诉许世友残酷迫害她丈夫致死的罪行。

1967 年 3 月春寒料峭。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处办公室，朱顺潭被通知到这里谈话。政治处主任张恭通知她，沈威廉死了。要她去看一下，把一些遗物领回来。

“我当时听到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几乎昏死过去，半晌说不出话来。顺不过气来”。“自从二月他被逮捕，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关押在什么地方。我带着二个孩子，提心吊胆守在家里。我胆子很小，他到底犯了什么大罪，我感到十分突然。白天上班生怕出事故，出了事故我怕也被抓起来，因为孩子都小”。“他被逮捕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我问政治处领导人，沈威廉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这才告诉我在八一医院。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站起来就往八一医院跑，他们怕我出事，赶忙派二个人追我。我那时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劲，也不知道什么叫伤心和悲哀，只是像天昏地暗一样，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到了八一医院，追赶我的那二个人也到了，他们拦住我，要我等一等，要把我带进八一医院政治处，他们怕我看到真相。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一秒钟也不能等待，只有一股炽烈的火焰，就是要马上见到沈威廉的尸体。我对他们大声喊叫，要他们把沈威廉的尸体立刻还给我。我当时确像一个疯子。我的脑子倒是格外清醒，别的什么都不想，就是一个，我丈夫沈威廉的模样，一丝不动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好像他就在我眼前，一切都像是昨天……”。

“不知是那个护士还是医生，在旁边插了一句‘在手术室你快去’！我听说在手术室，满以为人没有死，是他们哄骗我的。沈威廉还活着的剧烈愿望夺取了我整个心脏和思维。我几步就冲到手术室。到了那里，门口围着一堆的人，他们不知道我是亲属，不在意我，我进了手术室没有遭到阻拦。我三步两步扑近病床，他没有活着，真的死了。我见到了他，我也不知道是那里来的那股自我克制的力量。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我把自己的眼睛闭了一下，不自禁地牙齿咬得紧紧的。很快睁开眼睛仔细察看一切。尸体安详地平卧着，一看便知是死在手术台上，死后尸体还没有护理过。因为他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死了是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进行尸体护理的。也就是说，死了还不如一条狗！”

“尸体上盖着一床白色的被单子，两只手放在腹部，双脚直挺挺。我把被单掀开，准备观察一下刀口情况，可是，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双手竟然还带着手铐。我见到这般情景明白了一切。我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他冰冷的手，把手铐轻轻地挪动一下，心想最好不要压在他切开的腹腔上，免得他的尸体再承受压力。我观察半晌之后，又把被单盖好。他的面孔已经浮肿而且蜡黄，脚也肿得像冬瓜一样，蜡黄发亮……。”

“我在尸体旁呆痴了很长时间，我的脑子里还是很单调，并且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只是想：什么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我走吧！回去吧！回家去吧！这里不能再呆下去了。”

“回到南京军区总医院，他们对我讲，沈威廉是胃溃疡穿孔，八一医院采取保守疗法，结果引起黄疸，最后导致肝病变坏死，抢救无效死亡。并且说，他们是尽力抢救的，无奈沈威廉身体过于虚弱，医院已尽了全力”。朱顺潭讲到这里眼睛稍有红润，她站起来倒了一杯开水，喝了二口之后又恢复了正常，继续和我交谈。

“沈威廉身体不好他们都知道。两个医院（指军区总医院和八一医院）都知道他肝硬化并有胃溃疡病。逮捕之前，本来就要住院治疗，他希望避免胃切除，只要没有穿孔就不要动手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既然已经穿孔那就该立即手术，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医疗常识。那有明知穿孔还不手术，搞什么保守疗法，那有明知他肝硬化，轻度腹水，又在胃穿孔的情况下，还引出胃液，引起腹腔脓化，导致大量黄疸，促使肝坏死，逼着生命死亡。”

朱顺潭愤怒地说：“所谓保守疗法，实际上是阴险凶狠的谋杀。在医学上，为医之辈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利用疾病和医术杀人的并非无人！赵玉祥同志你要叫我谈沈威廉死亡的真实情况，这就是真实情况。”我全神贯注听她一句话一口血的诉说。我屏住呼吸，忘记炎热，用我的全部记忆力和记录本领，把朱大姐的血泪控诉收录起来。她谈完了，她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离开八一医院手术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尸体怎么处理的我也不清楚，我也不过问。不久，他们把我调离了总医院，到嘉兴野战医院工作，直到现在。”\

朱顺潭告诉我，她原来体重 140 斤，现在（1967）只有一百零几斤了。她的双眸凹陷在清瘦的脸庞上，面容憔悴苍老，心事重重。然而，她的思维清晰，语言利索准确。举止动作也敏捷了当，并没有由于过多地悲痛所造成的呆板和迟钝的表现。在谈话过程中，我观察到，朱顺潭具有超人的毅力和克制力。同时，也意识到她对沈威廉缅怀绵绵的无限深情，这种深沉内向的性格是罕见的，她越是无泪不泣，越是说明她创伤之深，悲哀之切是无与伦比的，即大哀无恸之说。她的眼泪已经枯竭了！大凡欲哭无泪的人是最伤痛的！

“朱顺潭同志，你能写点东西吗？”

“我是一个普通护士怎么能写东西呢？”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把你要向大家说的心里话，都写出来，也就是说都倒出来，怎么想就怎么写。写好了，我再给你整理和修改。”

我受告状团之托义不容辞，接受了为朱顺潭整理控诉材料。后来，这件事成了我的一大罪状。罪状的性质是站在反革命立场上，替反革命分子翻案。

1967年8、9、10、11四个月，朱顺潭同志连续做了十几场控诉报告，无论男女老少听了她的控诉，无不泣不成声。可是，她在台上，纹丝不动，台下一片抽泣之声，她一滴眼泪也没有，真情感人不在声泪之如何。没有多久，在正义的呼声中，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同志被迫同意成立沈威廉死亡讨论会。讨论会由告状团发起，邀请军队和地方医院有关专家教授和医生，对沈威廉胸外科主任医生的死因展开热烈的、道德的、科学的、法律的、公开的讨论。

宽敞明亮的乳白色的小会议厅里，陈列着双人和单人的沙发，用白色的套布套着，显得圣洁和高雅。茶几上放着普通的茶杯和烟缸。小厅的两个对角上各有一台风扇，不时向四周转动，送出一阵阵热风。在一张茶几上，有一叠厚厚的纸张，摆得不太整齐，上面印着《南京军区总医院病历》和《人民解放军八一医院病历》字样，病历号码为“32514”。病历下方的格子里，分别钢笔草书：“沈威廉，男，48岁，中校，科主任”等信息。沙发上端坐着表情严肃而又和蔼可亲的医学专家教授和医生。他们是：吴公良教授、陈肖凯教授、李鸿书教授、王子沂教授、陈伟达教授及胸外科高元普副主任医师、周才彰主治军医、林从吾主治军医、秦力军医，汪宝琴护士、沈晓凤护士等。他们分别为泌尿科、消化科、胸外科、神经科和传染病教研室的主任医师。周才彰是胸外科军医，林从吾、秦力是内科军医。专家们讨论的一致结论，认为：保守治疗是错误的措施。根据沈威廉当时的病情，应在出现黄疸之前立即手术抢救。所谓“保守治疗”实际上是驱使胃液大量外溢，感染腹腔，引起腹腔化脓，导致肝坏死，造成死亡。专家们还认为沈威廉身体虚弱不是死亡直接原因，造成死亡直接原因，是医疗措施上的有意失误。

后来经过调查证实：八一医院医生们都提出立即手术抢救方案，可是没有得到军区总医院院长耿希晨和政治委员某某某的同意，他们批评八一医院军医“过

分紧张”“小题大做”。他们指示，只要“保守疗法”可以控制病情，就可以对沈威廉继续进行政治审查。也就是说治病必须服从“办案”，治疗要服从阶级斗争。耿希晨批评“八一医院”不懂得“手术刀上有阶级斗争”的道理。院长和政委认为：自然科学必须服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统帅和灵魂。顺便提一下，耿希晨原为第 27 集团军的卫生部长，同许世友关系密切，“文革”期间他死保许世友，秉承许世友的旨意，疯狂镇压军区总医院敢于批评领导的群众。耿希晨本人平时严重脱离群众，歧视和打击知识分子，搞崇派主义，在生活上腐化堕落，群众对他十分不满，机会来了就“造反”了。

沈威廉之死是一个大悲剧。实际上沈威廉并没有“造反”，他只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替“造反派”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你们去革命我来顶替你们的工作”之类的话。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合法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写大字报，搞“四大”是完全合法的。但是长官意志否定了“合法化”。在这种形势下，许世友的“多中心”和封建专制思想，必然带着镇反情绪来对待群众，那有不滥杀无辜的，逆我者亡嘛！

封建诸侯和骄兵悍将，何言民主和科学，许世友的意志就是法律

（七十三）南京军区总医院高悬霸主鞭

沈威廉冤魂和他的六位战友

《沈威廉死亡调查实况》还要继续。

沈威廉湖南人，1919 年生，旧知识分子。1944 年毕业于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国民党南京总医院胸外科医生，著名“胸外科一把刀”。1949 年南京解放，我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接管了这所医院，更名为华东军区总医院，1955 年正名为南京军区总医院。沈威廉这把“刀”，从 1949 年到 1967 年，18 年来救治了我军数以千计的干部、战士、家属、子女的生命，其中还有许多高级干部。使患者转危为安，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出于他的表现和政治上的进步与要求，经过党组织对他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考验，批准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成为中共党员。授中校（正团）军衔，出任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他是我军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在全国医疗系统也赫赫有名。在沈威廉身上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对知识分子，尤其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性和威力。

南京军区总医院专家学者数以百计，闻名于世的有著名妇科专家何碧辉，传染病科专家陈伟达，泌尿科专家吴公良等。陈毅、唐亮、郭化若、张才千、林维先对这些专家十分尊重，把他们当作党的瑰宝加以爱护。有的专家同军区首长关系密切，甚至成为至交。比如世界著名与林巧稚齐名的何碧辉和郭化若、唐亮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何碧辉曾多次对我讲过，她同唐亮政委和郭化若副司令员的故事。林豆豆和郭化若的女儿都是何碧辉副院长亲自接生的。何碧辉授上校军衔，副师级，行政上是副院长，并享受专家津贴。老太婆脾气古怪，非常执着认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怀有深厚感情；对干部、战士、家属患者一贯精心治疗，极其关心，医德高尚。在军区总院，无论院长、政委都得让她三分。后勤首长也十分尊重她。她遇到医疗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就直接去找郭化若和唐亮，找郭化若的居多。她和林巧稚一样终生未嫁。何院长家里不用保姆，坚持亲自打饭打菜，我劝她你七十多岁了，过马路很危险，让别人代你打饭打菜不行吗？她执拗自己去。军区总医院，经常组织专家义诊，在马路上摆“摊子”，何碧辉每次参加这种活动，一次不拉。很多怀孕的妇女都找她“听胎”，判断是男婴女婴。老人有求必应，十分忙碌。老人节俭成风，常年一套军装，很少看到她穿便衣。家里一台福日牌 14 吋彩色电视机，用到她去世还是这一台。家中陈设简单，两张单人小沙发一个茶几都是旧的。她考究卫生，卫生间一尘不染，吃的蔬菜要用牙刷一叶一叶的洗刷。我每到她家，必备一碗福建人口味的甜点心招待我。我吃完了，她习惯地说一句“再吃也没有了！下次再吃”。老人很欢迎我到她家做客，一次至少三个钟头，大都谈她 1935—1949 年之间的经历和趣事。抗日战争那一段，在美国留学那一段，说得最起劲。她告诉我，她是福州陶淑女子学院和文山女子中学毕业的。我说，我是格致中学的，她哈哈大笑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是老同学”。我到总医院看病，一般不找她，如果找她帮忙，她必亲自带我去找专家看。有一次我要看腰关节病，她就把我领到骨科主任林恩及那里去，对林恩及说“你给他看看要紧不要紧”。林恩及同志是厦门海沧人，见到何碧辉就说闽南话，我听不懂，干着急。老人看我着急，就得意地笑，说我的“福州话不好听，要学闽南话”。林恩及对人说“赵玉祥是何院长的干儿子”。

老人家家里不用保姆，有二位亲人照顾她。一位是姑侄女，一位是姨侄女。姨侄女是军区总医院的供应室护士，姑侄女是南京博物院的讲解员。她俩和何碧

辉院长一样，都没有结婚。何碧辉离休后，回到老家福建厦门鼓浪屿。逝世于东南沿海风光旖旎的花园城市厦门鼓浪屿，和林巧稚都葬在鼓浪屿。

沈威廉之死，何碧辉表示愤慨和惋惜。提起许世友，她就眉头皱起来，眼睛看着我直摇头，嘴里没有一句关于许世友的话。

龙启明在关押期间，向我透露：“说沈威廉是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我不能接受。我对总医院的行政和医务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十分清楚，当年我参与了对这些人的政历审查工作”。他说：“沈威廉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按国民党政府的规定，必须接受民团训练，他被迫参加了民团。国民党政府规定，训练结束要当一段时间的伪乡长。他确实当过半年左右的伪副乡长。在他接受民团训练和任伪副乡长期间，没有任何活动和罪行，例行公事而已。这些政治历史情况，在他入党时，都做了严格审查，并且都有结论。结论和他自己在自传中向党组织交代的完全一致。各级党委在批准他入党时，十分慎重，对他这些历史问题都经过认真核实和讨论，认为是属于一般性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且是被迫的，不予追究，同意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于在大会上批斗他的时候，说他取名‘威廉’，是向往美帝国主义，梦想变天，那更是十足的唯心主义。沈威廉就读湘雅医学院，为了纪念外籍老师，更名‘威廉’这完全可以理解的”。龙启明说到这里，流露出极为不满的容态。他说：“我们党的政策今天怎么会被那些领导人执行得这么糟糕了！”。龙启明继续说：“沈威廉是旧知识分子这不错，他酷爱书画和花鸟也是事实。他喜欢同旧知识分子谈今论古是常事，而他对待工作却十分严肃认真，对我军胸外科医学有贡献，他那把手术刀打开了人体的禁区，挽救了不知多少生命垂危的心脏病人。他是军内外公认的胸外科专家，像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呢？为什么这样的人就不能革命呢？何况他还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帮助青年军医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些‘你们去革命，我多承担一些工作’的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并且是历史加现行双料‘反革命’，加以逮捕法办，这能说得上是公平合理吗？”。龙启明继续对我说“他有胃溃疡病，肝硬化，还有其他疾病，能带病工作，一贯不为自己的疾病叫苦，这一点每年都有公论，都给他立了功评了奖。他出席过我南京军区先进工作者大会，军区后勤党委授予他红色专家的光荣称号。一夜之间这些红色的东西都变成‘黑色’的了，说他是南京军区总医院反革命篡权黑手，是‘邵马龙李居

柯’的黑后台，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现在他被逮捕了，这本身就是非法的，对他搞逼供信也是非法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世界观没有改造的领导人，他们满脑子充斥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专制思想，他们权力在手，没有民主和科学监督，随心所欲制造冤假错案，草菅人命，在封建主义的哲学里，是天然合法的。我说，“南京军区总医院高悬霸主鞭”，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定论。

“文革”中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合法的“四大”单位，广大干部、战士、职工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以及思想作风不正的领导人，开展批评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做为领导人应持谦虚欢迎的态度。然而，这些领导人对群众的批评持逆反心态和报复做法，应予批判，涉及法律的应追究法律责任。

1967年2月军区总医院有六个人“造反”很积极：政治处宣传干事邵炳泉上尉，组织干事马永来上尉，首长保健医生龙启明大尉，李克昭军医，居秀萍军医，柯如仙军医。这六个人中，5人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龙启明因成分好被拘留。人们称之为南京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逮捕他们的根据为：

邵炳泉父亲当过国民党伪县长，是共产党的敌人。

马永来当过伪警察，入党手续不全，属混进党内的假党员。

龙启明有野心企图夺权当院长。

李克昭父亲是国民党中将，傅作义将军的亲信，跟共产党打过仗，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

居秀萍的舅父在台湾属海外复杂关系分子。

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国民党海军下级军官，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舰撤离黄浦江时，跳江留在上海，是从黄浦江里冒出来的敌特分子。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这是众所皆知的。南京军区总医院党委，属于高级党委，对党的一贯政策是清楚的，“文革前”也是这样执行的，怎么到了“文化大革命”，受到群众批评和冲击的领导人，就一反常态呢？就可以颠倒是非，明知故犯呢？他们为了自身的尊严和利益，就可以践踏党的方针政策，为所欲为，把好人当坏人来处理呢？这不是犯错误，这是犯罪。

邵炳泉的父亲是我党老地下工作者，为了党的利益，遵照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党指派他出任敌伪县长。通过这个职务，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营救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马永来在农村入党，战争年代手续不全是正常的。在审干中，证明人都查到了，都有证明，他根本不是什么假党员。当伪警察，那是因为生活无着，去冒名顶替当了二天警察。这种事还是他自己交待的。

李克昭父亲国民党中将不假，但是，是我党的统战对象，是进步人士，傅作义将军起义，他起了很大作用。北平解放他是有贡献的，他的家由解放军站岗放哨，列为保护对象。

居秀萍的舅父不是亲舅父是“隔墙舅父”，居秀萍从没有见到过这位舅父，解放前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都不来往。这样的海外关系不能被视为复杂的社会关系。

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那是祖父外祖父的事，与她无关。她生身父亲早年亡故，没有什么剥削行为。她的继父柯蔚林，上海解放前夕没有逃往台湾，跳江留在上海，同柯如仙守寡母亲结婚，十几年安分守己，没有任何政治活动，四邻皆知。审干中做一般性政治历史问题处理。

邵马龙李居柯，除了柯如仙有骄傲自满情绪不是共产党员外，其余 5 位都是党员。正是因为他们造了“领导人”的反，批评了领导人的错误和缺点，触犯了领导人，因而被强加为“犯上作乱”的罪名，逮捕法办。利用权力有意颠倒是非，颠倒黑白诬陷好人，令人发指。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代表不了党中央，代表不了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更代表不了共产党。在我们党的历史中，在某一个时期，出现“左”倾机会主义，出现肃反扩大化，出现滥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事件，从根源上讲，有的属于极左思潮问题，有的是中了敌人的奸计，有的属于“莫须有”。所谓“莫须有”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白了，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披着革命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外衣有意杀害或陷害异己者或背叛者。这些“有意杀害、有意陷害、有意整人”，制造冤假错案的人事实上已是犯罪，但是出于政治利益或个人利害上的原因大搞宗派主义，它的性质往往被掩盖了，轻描淡写地被涂上一层保护色，用轻飘飘的六个字“犯了严重错误”被保护了下来。这种权术性的做法，较之明

火执杖的杀人犯罪，

更为恶劣，其欺骗性更大！被杀害的好人包括被逼自杀的好人，往往申冤无门，昭雪无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这种事例很多。但是，我们的党从未认真杜绝这类事件，历史上张国焘在长征中，冤杀优秀的红军干部和普通战士；延安“三查三整”中逼死过人；在白区地下党负责人冤杀错杀自己的同志等等，屡见不绝。许世友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他反而当上了政治局委员，这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我闹不清！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许世友知道毛泽东需要他，许世友有恃无恐，心中有了底。因此，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屡次“犯严重错误”，敢于屡次往死里整人，而不受到党纪、军纪、国法的制裁，相反的还升官。在当时党内斗争尖锐的形势下，毛泽东需要南京军区的几十万大军。我们这些犯“左倾幼稚病”的人，一直被蒙在鼓里，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七十四）林彪<1 号令>项庄舞剑

许世友借剑乘机伤人

1969 年 3 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事件发生后，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不断发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苏联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得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应。

六月间，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9 月 23. 29 日，我国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10 月 1 日，国庆 20 周年，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强调战备。10 月 15 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苏州。根据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10 月 18 日（星期六）林彪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 1

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引起极大震动。

林彪的这个“紧急指示”，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自行作出这样的紧急决定，并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没有出现过这种做法。

此时，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主席，每日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做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作出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回忆说：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是主席让我拿去烧了，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文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毛泽东后来曾说过这样的话：“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很多人嘛！”意思是，人民解放军只有林彪一人可以直接指挥了。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毛泽东不允许睡榻之旁又睡了一只凶险的老虎。毛泽东同志一向极其重视抓枪杆子，拉住人民解放军高层将领，拉住许世友等高级将领，他就可以安稳地睡觉，这是大局

的大局。

1969年3月2日中苏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1969年8月13日，苏联在新疆裕民县列克提地区制造报复性的流血事件，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全党、全军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早在“九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5月上旬，党中央召开战备工作座谈会。6月、7月，召开“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作战会议。8月27日，中央作出成立全国各级防空领导小组，同时展开了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9月，中央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次日林彪说：“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在中苏谈判前夕，根据苏联的战略动向和情报资料，党中央做出在1969年10月20日之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全国各地。疏散中央领导人是毛泽东做出的决定，周恩来主持安排，疏散安排的报告，由汪东兴、王良恩签署的，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下达的。毛泽东同志抢先了一步，把共产党的核心骨干，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们紧紧地抓在手上。这样毛泽东和林彪斗，就棋胜一筹了。

作为副统帅直接管军队的林彪，理所当然，要做出紧急的军事布署，问题是不能“先斩后奏”。毛泽东离京去武汉，二天后的1969年10月17日林彪疏散到苏州太仓，10月18日，“第一号令”诞生了，并下达全军执行。《第一号令》“四个字”的发明者是阎仲川，并不是林彪，此人是从某大军区，林彪指名调到总参谋部任总参作战部长的，后升任副总长兼作战部长，主管全军作战工作。“1号令”六条内容，是林彪口授的。后来“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和“加紧武器装备生产”二条不向其他部队传达，剩下了四条。这里谈一下疏散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到邯郸。其他领导人不叙述了。众所周知，刘少奇、陶铸、贺龙、彭德怀等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整死的，而且死的很惨。整死这四位领导人，罪魁祸首是林彪和江青，毛泽东则装聋作哑。贺龙和陶铸之死，毛泽东是为之叹息的，因为，贺龙可以抗衡林彪，陶铸可以派大用场。

林彪《第一号令》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说的沛公当然是毛泽东。林彪口授六条决非做秀，是动真格的，无可厚非。任何一位主持军委工作的老帅，都会做出这样的布署。以林彪军事战略家和副统帅的位置做出这个决定是正常的。但是，林彪的做法是“先斩后奏”，却意味深长，这里蕴藏着极为深刻的危险和阴鸷韬晦的用心。以林彪的为人和他同毛泽东相处 40 年的“相知”，难道他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但是，他这么做了。毛泽东的反应呢？面有愠色，当场烧了。我不敢妄自猜测，林彪明知山有虎而偏向虎山行，其用意何在呢？我和某些人以为他在向毛泽东示威，他在威胁毛泽东。实质上是向毛泽东要权要位，他借战备之名，一夜之间调动千军万马，大展其副统帅的威力。他要当韩信，他同韩信一样，“我这个三齐王怎么样？你老毛看着办罢！”毛泽东雄才大略岂能不知林彪的用心，但他和刘邦一样，功高震主者，必除之。人家说，林彪的性格内向，终日不语专门揣摩问题。有人形容他“静如处女，动如脱兔”，的确如此。林彪和毛泽东的碰撞和摊牌已昭然若揭。林彪去毛之心已呼之欲出。许世友虽是粗人，但这一点他不可能看不清楚。1967 年 7 月在上海，许世友在毛泽东面前演完哭戏之后，曾不打自招地说：你们告状团告我的状，你们捞了一把屎。我许世友却捞了三把。江青同志派专机把我接到北京，林副主席接见我并和我合影，我还要当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很吃香，他在毛和林之间充当了左右逢源的角色。人们都说许世友“粗”，充满传奇色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他是“韩复榘”式的人物。既是军阀，又是政治投机家。

1969 年 6、7 月间，因政治空气回暖了些，人们之间的友谊、感情，亲友之间的亲情又开始升温了。那种儿子批斗父亲，妻子和丈夫划清界线的气氛慢慢的销声匿迹了。南京军区总医院很多开明和正义的医生，继续坚持“救死扶伤”的精神。我被安排住院治疗了。

1969 年 8 月 1 日，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郭金林，副参谋长官宗礼专程来看望我。二位将军都是老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郭政委对我说：“赵玉祥同志你要好好养病，不要胡思乱想，更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出院后，好好工作”。我对首长的关怀，深为感动，含泪对二位首长说：“首长放心，我一定听党的话，不背思想包袱，争取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工作”。

我在医院里很开心和医生护士们聊天，饭后在草坪上散步，不时还可以溜回

家看看。我家到总医院只有三站路。1969 年国庆节前夕我康复出院了，但没有分配工作，要我在家休养。此时，部队开始大整编，合并机关，裁减人员，进行大换血，大换班。总政治部下达通知，编余人员有 7 条出路：①支左、②去生产兵团、③去人武部、④下放军分区充实基层、⑤连以下干部复员、⑥轮番下放劳动锻炼、⑦营以上转业。组织上找我谈话，“组织决定你到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我当场拒绝，“我不去生产建设兵团”。我意识到“政治空气”又紧张了，郭金林政委的话有了变化。我很气愤，我知道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许世友身上，那个时候田普当上了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她说了算，党的干部被许世友夫妻俩当作囊中物了！

机关政治协理员又一次找我谈话，敦促我到生产建设兵团去，我仍然拒不服从。南京军区运输部部长任曾同志对我说，“你去吧，我也去的。王子乔参谋长也去的，傅东岩处长也去的，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汪运祖少将——也是老同志，参谋长还是王子乔。我们一道去修理地球。”任曾部长态度诚恳，甚至对我说：“我放鸭子，也带着你一道放鸭子”。我脾气犟，坚决不去。现在想想甚为后悔，如果去了就不会脱军装。

1969 年 11 月，机关政治协理员对我说：“你不去生产兵团，其他的路没有只有复员一条”。我回答很干脆：“那就复员吧！”协理员说：“你打个报告说清楚，是自愿要求复员的”。南京军区后勤部遵照许世友、田普的意图，违背总政治部“营以上干部建国前入伍不复员的规定”，我被作复员处理。我复员之后，陶春和征求我意见“你复员到哪里去？回福建老家呢？还是就地安置？按总政规定，那里来那里去，你应该回福州去。但，组织上可以照顾你，如果你愿意可以就地安置。军区支左的干部都在南京，安置在南京那个单位(工厂)任你挑选”。我心里明白，只要我肯复员，肯脱军装，他们什么条件都答应。一句话，他们要把我赶快撵走。1969 年 11 月份，我和郑日雄、郑道沂回福州一趟，看看福州有什么好工厂。福州工业条件差，军事学院把郑日雄安排在一家小商店里当营业员，据说是卖肉类食品的。我立即返回南京，要求安置在南京。1969 年 12 月，我正式办了复员手续，脱了军装，被安排在一个只有 100 多人的小厂里当刨床工人，每月工资 36 元。我复员时，除了保留下一个共产党员外，其他通通都被 5500 元的复员费卖掉了。我含着热泪到南京军区后勤部司令部管理科去领了复员费，

当天我把复员费全部存入银行，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就这样我被许世友清除出我热爱并为之献身的人民解放军！37 年过去了，我仍然热爱着教育培养我成长的人民解放军，日夜思念着我的老首长，我的老战友。37 年来，我舍不得脱掉这身军装，夜里做梦我还在军队里工作，醒来原来是一个梦！

（七十五）脱军装进工厂当刨工

抓“5·16 反革命”大祸又降临

南京变压器厂是一个只有百多人的小厂，我选中了它。办好手续分配到机械加工车间，当刨工。月试用工资 36 元。所谓试用工资，就是试用期三个月内“不合格”还没有 36 元。我参军 20 年零四个月，大尉正营，被“文革之风”吹得一干二净，除了保留党员外，5500 元复员费买断了我的一切待遇。1969 年 12 月，我成了一名普通工人，那年我 37 岁。与此同时，出于紧急战备，城乡掀起上山下乡大迁徙、大流放运动。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知识分子、教育科技工作者、学校教员通通到农村、山区或边远地区接受再教育。顿时间，大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沸腾了，人们壮怀激烈，毁家荡产，携妻带子，或独自一身高唱东方红太阳升歌曲，“打起背包就出发”，“接受再教育”去了。

复员后第一件使我痛心的事，我永志不忘。复员后第二天，我的第 31 集团军战友杨思谦的大公子，要我送他一顶军用冬季毡绒帽，后来这顶旧军帽被人抢走了，思谦向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追查这顶帽子的来源，我去作证，我穿着军装去了，填写工作单位是南京军区后勤部。兰园派出所打电话给后勤部查证，后勤部回答说，“赵玉祥犯了错误已复员，非军人。”我被派出所训斥了一顿，说我是犯了错误被清除出部队的。下次再冒充军人，就拘留我。我唯唯诺诺，承认错误，才被放走。杨思谦为这件事，对我十分负疚。我为这件事，塞心、伤心一辈子。

我的师傅叫兰济强，问我在部队是什么官，我说是大尉。工人们对我很尊重，师傅也不教我技术，成天拿着“维丝”擦刨床，擦得雪亮。在军队月工资为 108 元，到了工厂 36 元，还属于“试用”。我那个时候真傻，没有考虑那么多。什么地位呀，待遇呀，脱军装呀，没有房子呀，生活重新安排呀等等。就是咬住一

口气，横下一条心，到那里都是革命。脑子太简单。在车间没干两个月，我就被调上去了，到生产组当统计员去了。堂堂一个大尉部长助理，去干统计员，我实在憋气。领导我的是一位采购员，不是干部，是从工人里调上来的。我按捺着气愤，把工作担下来了。又过了二个月，厂长回来了，问我在部队干什么工作？我说组织计划。厂长书记一商量，好！你去协助搞生产计划吧！这位主管是女同志，我跟她当助手，她又成了我的师傅。到工厂 6 个月，换了三位师傅，一位姓兰，一位姓王，一位姓沈。

1970 年，全国开展“一打五反”运动，各单位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大抓流氓、反革命和坏分子。我又被调往政工组，帮助搞政治运动。政工组组长姓王，是济南部队复员回来的班长。部队复员回来的一大批战士，都成了运动骨干，他们思想“左”，没有政策观念，作风粗暴，很会乱整人，伤害了很多人，有的工人被整死了，有的工人被打伤了，有的工人伤残终身……。至于隔离、逼供信、抄家、干重活、漫骂等那是家常便饭。任所欲为，随心所欲。根本没有政策、没有人道、没有公理、没有公正。我看到这一切，真是触目惊心，“文化大革命”四年，竟会把工厂、社会搞成这个样子，非常之黑暗！100 多人的小厂分成三派，谁掌权谁就无法无天，大整对立派。我就眼看着一派整一派的残酷做法。工人候锡良（钣金工）、郭仁锦（车工）、蒋学成（刨工）、董光志（档案员）等被毒打、被批斗、被强迫干重活。从部队复员回来的一批干部，虽然政策水平高一些，不同意这种胡作非为，但无能为力。在极“左”的大气候下，谁也不敢去找麻烦，引火烧身。1970 年 11 月，我和另一位部队复员回来的排级干部，出差到山东潍坊搞外调。这期间全国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掀起了又一个大规模阴谋篡权的政治运动。把矛头指向党政军老一辈革命家和周恩来总理。林彪、江青捏造出来一个“‘5.16’反革命造反军团”。他们把这个所谓“5.16 反革命军团”描绘为：这个军团的黑后台是二月逆流的老帅们，在前台指挥的是“杨余傅”。这个军团的成员是各级被打倒的走资派和他们子女以及黑五类。冲锋陷阵是“黑五类”。“军团”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他们采取积蓄力量长期隐蔽，保存骨干待机而动的反革命韬晦策略。他们重点进攻的目标是毁我长城。周恩来总理曾说：“清查 516 是冲着我来”的。

1970年9月，在林彪、江青操纵下，南京军区和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市掀起了来势猛烈的大挖“5.16反革命军团分子”。1970年10月，原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演员，告状团头头之一修蕴被许世友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接着前线歌剧团著名演员江苏政协委员蔡佩莹、歌剧演员李源、小提琴手王建修、歌舞团舞蹈演员陈家骏，歌唱演员李惠兰都被许世友通过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入狱。被捕入狱的这些人都是“倒许乱军分子”，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一律逮捕归案，进行审查。我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我做好了思想准备，知道在劫难逃。我出差到山东潍坊，12月份回到南京。此时，南京抓“5.16”的风声已经很紧，我有随时被捕的可能。军内正义的同志向我透露消息，并劝我赶快“逃走”。我认为我没有罪，为什么要逃走？万一逃走若再被捕，那就会授人以柄，小命难保了。我决心静坐待变，再一次经受考验。这个时候，我已被赶出了部队营房，暂住在岳父家中。离开营房时，管理科派了一辆嘎斯51运输车，又派了四位战士帮我搬家。我的二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上车时闹着不肯离开，他们说：“爸爸我们为什么要搬家？为什么要离开这里？这里有很多小朋友，有小涛、小明、小胖子，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好嘛！”我回答说：“我们搬家是暂时的，将来还要回来的”。我的爱人郭泽俭同志，默默无言，向家属们打个招呼，道声再见就上车了！我这里的家没有了，这里的食堂没有了，这里的操场没有了，这里的绿化和营区通道也没有了……。我穿一身工人服装，领着二个幼小的孩子，在贤慧的妻子陪同下，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飓风把我吹得“冰天雪地两茫茫！”。

一个四口之家，好端端的人家，为了响应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号召，在“党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做党的驯服工具”，“解放军战士最听党的话”等思想指导下，参加了“史无前例”和“轰轰烈烈”，犯了左派幼稚病的赵玉祥和他的战友们，正如陈毅同志所讲的，“你们这些娃娃，懂得什么？你们懂得什么叫路线斗争吗？你们能搞路线斗争吗？”的确如此，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路线斗争中，所以吃尽了苦头，几乎被搞得家破人亡，正是因为我们太幼稚了，太天真了，太单纯了！但是，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是不问什么幼稚、天真、单纯的，既然你卷进了这个漩涡，那就很难自拔了。

在暴风狂雨之中，一叶扁舟，好不容易逃脱了浪吞礁触的危险，暂时躲进了一个小小的避风港湾。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呵护着一双未成年的孩子，惊恐动荡的心绪甫甫乍定，等待他们全家的另一场更大的劫难即将降临了！三十七年后的今天，我在写这段历史回忆录时，心绪虽然平静，但是，我心里依然很难过的。我能有今天，真的要感谢上苍！我命不该绝。感谢党、感谢毛主席，那是一句空话！老天爷安排林彪爆炸，我才得救。林彪爆炸之后，许世友大喊“上当了，上当了！”他说，在南京军区和三省一市大抓‘5·16’是上了林彪的当。他和杜平商量，赶快采取补救办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有政治运动，“倒许乱军”分子就被上挂下联。“倒许乱军”又被联上了“5·16”反革命集团。林彪爆炸了，许世友把清查“5·16”的罪责一股脑儿推给了林彪，把尿盆子扣在林彪头上。他充好人，搞“什么补救办法”。什么叫“补救办法”呢？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李树和，在许世友授意下，发出一纸公文“查某某同志，‘5·16’材料是假的，错误的，请你们做好善后工作”。许世友把好人关押了三年，整得死去活来，有的人甚至被整得家破人亡，一纸公文轻松了事。天下有这种好事吗？许世友疯狂整人，双手血泪，推托罪责，轻松了事。这就是上将军的传奇故事吗？吹捧许世友的同志们，你不觉得惭愧和负疚吗？你吹捧了一个人，却欺负了数万人，良心过得去吗？

（七十六）威武不屈义正辞严斗狱司

三载沉冤铁窗樊笼心向党

1970年12月5日晚11时，南京市白下区红花地居委会主任张兰，带领五老村派出所一位警员到我家，对我说：“你岳父有些政治历史问题，要和你谈谈，请你到派出所来一趟”。我知道有情况，我没有惊动老人，走到二个孩子床前，用手轻轻地抚摸孩子的头发，亲了亲他俩的小脸，顺手给他们掖了掖被子。我拿起一件棉大衣，向爱妻郭泽俭同志道别，就跟着他们走了。一走就是三年。1973年11月1日，我被通知无罪释放，回到家二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15岁另一个13岁。郭泽俭事先不知道，她还没有下班。孩子见到我相对无言，这是后话，在此不赘。

我到了派出所，看到一辆军用戈斯 69 停在门口，我明白那是为我准备的。军代表向我宣布了逮捕令，要我在逮捕证上签字，被我拒绝了。接着上来四位狱警给我反手戴上铐子，把我架上警车跪按在车上，军大衣摔在一边。从我家到娃娃桥监狱其实很近，他们故意迷惑我，开着车子兜来兜去，到了监狱，我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娃娃桥监狱是一所正规监狱，到了“柜台”，他们解开了手铐，叫我跪下读犯人必须遵守的监规，我拒绝下跪，拒绝读监规，我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监狱指导员是军代表姓孙，他是第 60 集团军某部的连指导员，监狱长姓张也是从 60 军来的。姓孙的军代表像凶神恶煞一样。我高呼口号时，监狱“号子”里的犯人都听到了。“柜台”周围聚积的狱警都惊呆了。他们说，进来的犯人都老老实实的，你赵玉祥胆子大敢闹监狱，态度极其嚣张！这些狱警都是第 60 集团军复员来的老兵，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观念“极强”，年轻力壮，很会整犯人。军代表指导员狠狠地对我说：“赵玉祥你放老实点，这里是什么地方！否则，有你的苦头吃”。有一位看守说：“太嚣张了，他高呼毛主席万岁，岂不是把我们放在国民党特务镇压共产党的位置上了！”。我大声对他讲：“我是堂堂正正的人民解放军大尉军官，共产党员。我刚从北京回来，毛主席接见过我，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亲自给我们平反。你们胆大包天，敢把我抓进来，将来一切后果你们必须承担！”姓孙的指导员气急败坏地走了，自言自语道：“极其嚣张，极其嚣张！”姓张的军代表狱长始终一言不发，一直盯着我看。看守们也不叫读“监规”了，取出一张犯人入狱登记表，叫我填写，又被我拒绝了。我对他们说，“你们去问南京军区后勤部去！那里有我的档案”。看守们无奈，只好自己填写。看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不回答。又问：“你家地址在什么地方？门牌几号？”我见机会来了：“我家住在红花地 24 号”。看守：“怎么写？”我回答：“一颗红心向着党的‘红’。花是葵花向太阳的‘花’。地是红旗插遍祖国大地的‘地’。看守们笑了，说了一句“你赵玉祥真会宣传”。

登记表填好，叫我把鞋带、裤带、手表、钢笔、钥匙、指甲刀、零碎钱留下，看守一一登记，放在一个犯人专用的口袋里。最后，发一块小布块给我，上面印着“3002”字样，看守说，进了“号子”不准说出自己的姓名，“3002”是你的

“犯号”，以后你就叫“3002”。这些“动作”结束之后，一名看守把我带走了，我提着裤子拖着鞋，拿着军大衣跟他到了牢房（号子）门口，他开了锁，命我“进去”！他咣的一声把牢房门锁起来了。他又打开“老虎洞”看看牢房里动静，一分钟后，他关上“老虎洞”走了。我进了“号子”，一盏昏暗的电灯吸在天花板上，号子里的犯人足有十七、八个，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眼神呆滞，愣愣地盯着我看。这个时候，我才有点“煨了”。心想，这下完了到了这么个鬼地方，可怕。顿时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感。我夹着大衣，痴痴地站在门里不动。犯人全都坐起来了，争着给我让地方。带班员说，“就在裁缝旁边吧！”带班员就是号子里的犯人头目，睡在第一个位置上。我进来只带一件军大衣，铺的盖的什么都没有，12月的南京城冷得很，怎么办？裁缝和旁边的另一位犯人，让出了一席之地，拿出一床被单借给我铺在稻草上面，我把军大衣当作被子，把军棉衣棉裤脱下压在军大衣上，身上的毛衣和军卫生衣裤就不脱了，这一夜就这样过下来的。

这一夜，我无法入眠。不冷。牢房里有一个炕光溜溜的，可以容纳18人睡眠，每个犯人的睡眠空间宽60公分，长1.5米，插足而眠，不能抵足而眠，屈膝而眠也不行。翻身也很费劲。“号子”里有一个抽水马桶，这是唯一的设备，轮流如厕，限制时间，否则影响下一个用厕。谁个用厕后，必须把地上和便桶上的垢污擦拭干净，以保持清洁。牢房里有一扇百叶窗方圆为1.2 m×0.7m。18人就靠这个小窗子呼吸。用百叶窗是为了防止犯人向外窥测动静。牢门也不大但很厚实，牢门上方开有一个1寸宽6寸长的小活门，供看守在外面随时打开小活门监视牢内的动静。犯人称之为老虎洞。看守们如狼似虎，对付犯人很不人道。打、骂、体罚、刑罚、侮辱人格常有的事。看守们还会搞心理战。比如在深夜，他们故意把重犯拉出来，带着脚镣和手铐在牢房前走动，叫犯人在深夜沉睡时，听到脚镣和手铐声，受惊而醒。有的犯人特别是女犯人，意志脆弱或心理状况不佳者，经不起这种恐吓而精神失常。他们用这种不人道的做法，来迫使犯人交代罪行或揭发别人的罪行。

我躺下来心里翻江倒海一般，思念家里这一夜和今后将会怎样？这里是什么地方？要关我多长时间？家里人是否知道我在这里？看守们将会怎么对待我等等。我在想，抓我进来的根子在南京军区保卫部，保卫部又是秉承许世友旨意办的。我在想，他们会给我按个什么罪名呢？这些事1967、1968二年不是都弄清

楚了吗？为什么还要把我请到这里来呢？我胡思乱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六时，值班看守吹哨子起床，犯友们纷纷问我，你犯的什么科进来的？你是军人吗？他们交头接耳，互相猜测。他们感到我这个犯人是有点来头的，而且很神秘。我告诉他们，我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别的什么也没有说。犯人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大闹公堂高呼口号，我们都听到了，你胆子真大，我们无论如何不敢这样。我向他们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他们说是娃娃桥，我听了大吃一惊。顿时，我清醒了许多，我意识到，再不能胡思乱想了，要立即做好应对的思想准备，尤其政治上要高度警觉，不要在这里犯错误，授人以柄，没有罪弄出罪来。20 年的军队生活和历次政治运动帮了我大忙，我给自己定下几条必须遵守的规则，①坚信党的政策，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总有出头之日；②不谈政治问题，不扩散军区内部任何情况；③不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透露自己的姓名和个人的情况；④遵守监规严戒急躁情绪和烦躁心态，避免吃眼前亏；⑤注意身体健康，避免生病；⑥同犯人搞好关系，但又要有界线，不能轻信别人。我正式坐牢了，我感谢许世友请我进监狱，好好为我补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课。使我认识到、体验到，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对我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极有用处。三年监狱生活使我大开眼界，我认识到专政、社会、法律和道德。

（七十七）人间的一个黑暗群体

人性被炼狱成兽性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至言真理。我在南京娃娃桥监狱蹲了三年，进出这个牢房的犯人，三年中不下数百人。有的被处决了，有的被判刑了，有的被释放了，有的走着进来，抬着出去的……。我蹲的这个牢房有这样几种人：无罪被错捕进来的；小偷和盗窃；强奸诱奸；打架斗殴；政治犯包括破坏生产和坏分子等，其中小偷最多。有的犯人一关就是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人被关押变形了，思想脾气变怪了，精神情绪变紧张了烦躁了；有的犯人被关傻了；有的犯人被关押后变得更坏了。

“号子”里犯人生活的点滴情况：

早中晚三餐 1970 年的监狱犯人伙食标准为每月 7 元，1973 年增加到 9 元。

平均每天二角三分到三角钱。早餐稀饭，中晚餐干饭。早餐每人一小钵（像栽花的盆子）稀饭。一点点卤咸菜，大多是胡萝卜或萝卜干。犯人对稀饭的形容说：“一吹三尺浪，一吸三条沟”意思是稀饭稀得能兴风作浪。中晚餐每四人一小瓷盆米饭，画十字每人四分之一和菜一起分到钵子里，少得可怜。抓阄分食。至于菜肴大多为萝卜青菜，菜汤是开水冲青菜，抓把盐倒点油就“ok”了。一个月吃1—2次肉，每人可以分到7—8块。都是萝卜烧肉。犯人形容肉的大小三级风就可以把肉吹飞起来。犯人分肉的方法绝对平均主义。肉打进来之后，把肉先拣出来，按肉的大小块分成3——5个等次。18个钵子摆成二排，用筷子先大后小依等次挟到每个钵子里。肉分好后再数萝卜块数，一块一块地分到钵子里。分菜时，犯人们的眼睛瞪得像“桂圆”，目不转睛地盯在分菜人的筷子上。分停当后，带班员临时任意指定一个钵子为第一号，依次1—18号。同时摔下18个纸团子，每个纸团子里写一个阿拉伯数字1—18，每个犯人都去抢一个，打开一看依号取钵。分汤也如此。犯人为了分菜分饭不均，大打出手是常有的事。犯人在“号子”里打架，都是往死里打，而且是“闷打”，打死了也不准透露出去，那个犯人向看守透露出去，他就是“叛徒”，他必遭犯人毒打。“号子”里的这种黑道似的规矩非常之严，执行得很认真。

我在娃娃桥监狱关押了三年，从来没有吃过鱼，也没有吃过带着骨头的肉；更没有吃过面条、馒头之类的面食。这是为了防止犯人吞刺吞骨头自杀。监狱里不准用筷子，因为可以用筷子自杀，一支筷子从耳朵里穿过去，就可以致命。犯人都用调羹，用后自己洗存。

如厕 用过早餐值日犯人统一洗钵子，擦干净，放摆得整整齐齐，炕台也擦得亮堂堂的，各就各位坐好。带班员发话：“报名大便！”18个犯人相继举手，集体承诺谁第一个用，谁第二个用，井然有序。“号子”里有位湖南籍在江西工作的犯人，犯号“3393”，他三十多岁，满脸络腮胡子，人却长得满有样子，脾气也好，知识分子。三年中我搞不清楚他犯了什么罪进来的。他患有痔疮，每便秘必出血，十分痛苦。狱医根本不给他治疗，听其自然，狱医说痔疮死不了人。每天早餐后用厕，“3393”总是第一个报名，原因就是痔疮。他不能坐用，只能蹲用，犯友们很同情照顾他，从不急他，让他慢慢来。我用厕很有规律，上午一次大便，四次小便，可能稀饭太稀的原故。犯人用过抽水马桶后，必须用手纸把便

桶和地面上的尿迹擦干净，不把邋遢留给下一个人。

洗漱和洗涤衣服 早晨起床后要把被子（含垫被）叠成四方块，其大小要在 60 公分以内，不能“侵略”别人的空间。坐牢就是坐在被子上，被子下面垫着高高一叠草纸。上午 4 小时，下午 4 小时，晚上 3 小时，自己的“坐位”不搞好，坐得不自在那是很疲劳的。老犯人很有经验，靠他们传帮带。

洗漱二人一组，各用各的面盆，用后的水，倒入便桶。“号子”里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和一个不大的水斗，供犯人洗漱洗衣服使用。夏天洗澡也靠他。

糊火柴盒子 娃娃桥监狱是关押未决犯的，因此，不叫犯人“劳动改造”，只是审查和坐牢。这比送到农场、水泥场、挖煤采石场、机床厂（全是有技术的犯人）等劳改场所苦得多。犯人宁可判刑去劳改，也不愿长年坐牢。我体会到，世界上最苦的事是失去自由，包括吃不饱肚子、没有新鲜空气和不见阳光。长年累月关在一个牢房里，坐在一个小小的位子上，不准动，不准大声讲话，是什么滋味。糊火柴盒不叫“劳改”。每个号子，每天指标 8000 个。上午 9 时，看守把浆糊、刷子、毛坯、二块操作板（1.2m×1.2m）和一个箩筐放在号子门口，然后逐个打开牢门，叫带班员一个人出门取进牢房，很快又把牢门上了锁。这时“号子”里十分活跃，几个犯人很快把自己的“坐位”推出来拼成矮桌子，放上操作板，立即动手“糊起来”。个个犯人都是熟练工，新来的犯人不要几天就糊得闪快，我也如此。其实，犯人都很聪明，智商低于 50%的人不可能进监狱的。

犯人之间的欺凌和打鬥 刑事犯罪分子都是社会渣子或亡命之徒。有一个江西籍破门入室的盗窃犯，在号子里称王称霸，带班员管不了他，也不敢管他，更不敢在看守面前说他。他的主要劣行是欺凌新犯人，尤其是未成年的犯人。欺凌的手段是威胁对方依附他，同时多吃对方的饭菜。监牢里伙食本来就很差，犯人们半饥半饱，再分给他吃岂不要饿死在牢房里。如果你不从，他就寻事挑衅，进而殴打。有一次我看不下去，出来制止他，他立即动手凌辱我，摸我的头，抬我的下巴，刮我的鼻子，我不堪凌辱起而反抗，他出拳猛击我的胸部。犯友立即报告看守，给他上了铐子，他悻悻的扬言要打死我。没多久，此人被判 20 年徒刑送往劳改场所。有一个湖北惯偷和一个四川惯偷，开始他俩相投甚密，在监内“交流作案技艺和经验”，后来因一句话引起冲突，二人在监内大打出手，其他犯人在旁袖手旁观，既不报告也不拉架。犯人坐牢无以取乐，以看打架来寻找刺激。

打架者多以流氓、小偷、盗贼居多，一般政治犯和其他刑事犯不会打架。我蹲的这个“号子”主要关押刑事犯，他们把我和这些人关在一起是出于政治原因和有意整我。

放风、理发、洗澡和凉衣裳 “放风”这个词，是监狱里专用的，其他地方用不上。娃娃桥监狱对犯人看管特别严格，对犯人的非人肆虐也特别严重，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一道“新菜肴”。天气好，放风通常一周一次。每次放风，固定二个“号子”在一起。跑三圈，停下来再走走。时间限制 10 分钟。戒备森严，塔楼上的机枪对着院子，哨兵走来走去，好像猫儿盯着老鼠。一个月理一次发，主要是看守给犯人理，也有犯人给犯人理，就在“号子”门口。速度快 5 分钟一个。也不洗也不刮，理短就行。理完之后，犯人相视而笑。你看我好笑，我看你好笑。笑对方的头发被理得像狗啃的模样。洗澡主要在冬天，一个月洗二次，也是二个放风的号子在一起洗。洗澡之前就开始准备把衣服全脱光，就套一身棉衣裤，到了浴池，一秒钟就可以下池。看守拿着一根竹竿，在池子上面，不断高喊“快！快！快！”如同赶鸭子。犯人还没有洗好，就叫“上来！上来！”有时上一班还没有洗好出来，我们就蹲在地上等，有的犯人感冒了。洗一次澡，最多 10 分钟。不如狗彘。凉衣裳就在“号子”外一步之遥。三年中，我一次没有出去凉过衣裳，打过饭。不是我不出去，而是“上面”有交代 3002 号不准出牢房门一步。凉衣服动作不能慢，慢了就要挨“熊”。犯人养成了一个特点，什么都“快”。慢性子的人，到了监狱都变成急性子了。

监狱生活丰富多彩，听我慢慢向您道来！

（七十八）“文革”中是人民民主专政吗？

专政工具矛头究竟指向谁？

（一）高级干部的遭遇

1970 年原华东军区军械部部长、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少将军李仲麟，被许世友扣上“516”帽子，逮捕入狱，关押在娃娃桥监狱。许世友逮捕关押军以上干部竟然不通过党中央、毛主席。李仲麟的待遇比我好不了多少，他关在一个单人牢房里，其它的和我们都一样。李仲麟是我的老首

长，1952 年我就在军械部工作。李仲麟部长宁波人，1938 年参加新四军，红色军械专家。1938 年兵 1955 年授少将军衔全军没有几个。他同张震将军关系密切，他和李先念、谭震林、叶飞、王必成都很熟悉，南京宁海路住房（别墅型）就是军事学院张震院长送给他的。淮海战役结束，前委首长命他为打扫战场总负责人。李仲麟被关押不久，即因高血压引起中风，幸亏发病时他强撑着身体趴到牢房门口，用头撞牢门，看守发现，送到某医院抢救，才得以保全。抢救时戒备森严，病房门口布置了哨兵，不许家人探视。基本痊愈后，许世友知道利害关系，批准他保释回家继续治疗。但，他还是落得个半身不遂的病症。我出狱后，经常到他家探望他，他全家我都很熟悉。因受李仲麟的影响，子女都放下了没有一个穿军装的。我记得大女儿在南京新华日报当排字工。

李仲麟出狱后，带着病残身体只身上北京告状，据说通过孔从周（炮兵工程学院前院长，毛泽东的亲家）的关系，把申诉信送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告了许世友一状。毛主席气愤地批评许世友“人家给你提意见，你就如丧考妣，就像挖了你的祖坟，把人家打成“516 反革命”。

（二）长期关押不审讯，审讯颠倒黑白

我进了娃娃桥一个月之后，看守给我一张单子，叫我在上面打钩。这张单子上面印了日常生活用品的名称。我如法炮制：被子、换洗的内衣内裤、牙刷牙膏肥皂、草纸、面盆之类，打了钩。其它的东西一律不准要。“反革命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予以制裁”。“反革命分子，还想享受吗？”，这是看守对我经常进行教育改造的话。我在号子里一关就是 29 个月，就是说关了二年零五个月，有一天突然看守打开号子门在门口高喊：“3002 出来！”。看守把我带到提审室，我明白了，他们要审讯我。关了 29 个月才审讯，在拿破仑的法典里找不到这一条。提审室有 15 个平方大小，几张审讯人员就座的靠背椅和一张桌子，面对审讯人员，设有一张方凳子，这是犯人的位置。我到提审室，主审台上已坐定了 5 位解放军。他们的年龄比我大，看样子都是营团干部，架势很大如临大敌。他们很客气，主审人说了一声“坐”。然后问我：“你是赵玉祥吗？你抽烟吗？”“不，我不抽烟”。气氛还可以。

正式审讯开始了：

问：“你的罪行很严重，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你认罪吗？监护你为了爱护

你教育你。关了你这几天，你该反省过来了。谈谈你对你所犯下的毁我长城，反党乱军的罪行”。

他们居然用“监护”这个词，而且修饰以“爱护和教育”这两个词。我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这一套我运用得可能比他们还要高明。我暗自好笑。

答：“我没有罪。我的问题，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问题，1968年在北京京西宾馆学习班上都解决了，党中央早有定论，毛主席接见过我们，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接见大会上当众给我们平反。如果你们说我有罪的话，你们把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摆在什么位置上？我建议你们三思，你们不要犯严重错误！”

五位主审和陪审愕然。

问：“你狡辩！关了你这29个月，你的肝火还这么旺，脾气一点也没有改，看来还要给你服败火的药。今天我们来就是要给你吃败火的药，为了挽救你，希望你转变立场，认罪！”

答：“你们秘密诱捕我，关押我长达二年五个月，长期不审讯，这些都是非法的。你们滥用权力，胡作非为，这笔帐一定要清算的！”。

问：“我们对你很清楚，你辜负了党对你的长期培养，个人主义膨胀，走上了犯罪道路，现在还不悔悟，我们为你惋惜，你能说，也能写，有水平，具有一定水平的阶级斗争经验。我们对你是有备而来的，希望你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答：“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有备也好无备也好，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把专政方向搞错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把矛头对准我的吗？这是大前提，大前提错了，你们把我当成敌人看待，当然认定我态度不好”。

问：“今天是我们审讯你，不是你对我们进行说教。这样吧，你回到号子里再好好想想，写份材料给我们，明天就交上来”。

五位“都察院”来的小卒黔驴技穷了，审不下去了，宣布退堂。

答：“可以”

第二天我就把材料交了上去。过了几天这5个人又来了，还增加了一个，6个人对付我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第60集团军的还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后勤部肯定没有人来。第二轮审讯又开始了：

问：“你写的材料我们拜读了，那不是交代罪行、低头认罪的材料，那是一份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评功摆好的材料。你的立场根本没有转变。还有一个问题，

你要揭发你的同伙，争取立功和宽大处理”。

答：“我实事求是，一贯如此。这是一。第二，我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写的材料，不能同党中央唱反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不搞实用主义。你们同党中央毛主席唱反调，这是你们的事。至于检举揭发别人，这一个我不能乱来，共产党员不能在政治上、道德品质上，为了自己“活命”而无中生有去诬陷好人。我至死也不干这种勾当。对不起，不能遵命”。

第二轮审讯又结束了。“号子”里的人，见我连续二次提审，都向我打听事委和情况，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在三年关押的日子里，度日如年，家里亲人的面孔我都模糊了。三年中，每月一次“接件”，只能通过“接件”，看到家人给我送来的日用品如牙膏、草纸、肥皂之类。但，仅限于“接件”而不能“见面”。不允许家人给犯人送食品。草纸送进来之前，狱方用电风扇吹起来检查，看看有否夹带禁品。被子也要检查看看里面有没有夹带饼干、糖果之类的食品。一经查出，不但没收而且还要对犯人进行斥责。

（三）所谓刑具教育就是用刑逼供

1973年3月，我第二次被提审后的当天晚上，因为我“火气大”，关了29个月还顽固不化，惹恼了专案组。他们要求狱方对我进行“刑具教育”，给我进一步败败火。看守曹管，第60集团军复员来的班长，犯人见到他都像老鼠见到猫。晚上七、八点钟，我和犯人发生口角，这是家常便饭的事，被值班看守发现了，因为他们已“处心积虑”要整我，给我“败火”，所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管以“大声喧哗违反号规”为借口把我喊出去，训斥一番之后，给我反手戴上了铐子（双手腕铐在腰背后面），一铐就是七天。我七天不能睡觉，洗漱饮食，大小便均不能自理，都由犯友帮助。我身上或头上痒痒了，只能像猪狗一样在牢房里的墙上蹭蹭。曹看守对我说：“你太顽固，有必要对你施行刑具教育”。在娃娃桥监狱里，对犯人施行刑具教育的屡见不鲜，有一个小偷，被反手铐在手腕上方近关节处，二小时之后犯人痛得在地上打滚，脸上发青（血液滞留），不断呼叫求饶。还有一个四川盗窃犯，给他反手戴上铐子，他居然能用一根牙签大小的棒棒把铐子打开。被发现后，看守把他一只手反手吊铐起来，锁铐在肩关节下方胳膊肌肉突出的位置上。监狱规定，这个部位绝对禁止上铐子的，因为它接近

心脏动脉，供血不畅有生命危险。这些没有人性的狱卒竟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

（四）打骂污辱犯人人权何在？

“号子”里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的犯人，是部队复员回来的坦克兵，原是某工厂的机械工人，因一句口号喊错误了，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关了进来。此君脾气暴躁成天喊叫、撞门，要求“放我出去”！看守们说他有神经病，多次被拖出去毒打，毒打时用毛巾把他嘴堵上，不叫他喊出声来。有一次竟把他吊起来。把他放回“号子”时，浑身伤痕，大汗淋漓，话都说不出来。但他仍不低头，精神和体力恢复过来，又大喊大叫。我释放出狱后，多次碰到他，他见到我就笑，什么也不讲。听说，监狱里有个王管也是 60 军复员来的，他曾把一个犯人堵上嘴吊起来打死了，然后做正常生病死亡上报了事。这个姓王的刽子手很快被处理回家了，事情就被闷下来了

（五）搞心理战恐吓摧残犯人灵魂

那个年代，经常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一批死刑犯，判处一批徒刑犯，也有当场宽大的释放犯。用这种手段表达“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每逢召开这种“轰轰烈烈”的大会，每个号子里都要拉线听实况。这些实况无非是①大唱镇压反革命的毛主席语录歌；②大呼镇压反革命的口号，比如“坚决镇压反革命，反革命不投降就叫他灭亡”；③当场宣判当场处理，判杀的当场带到刑场上去执行，徒刑的当场带到劳改场所，释放的也当场宣布自由。我们在“号子”里，早饭后就知道有公审大会了，甚至前一天就知道了，因为“号子”里有人被带出去不回来了。徒刑的，东西也随身带走了，死刑的，公审大会后东西被看守拿出去了。这一天，犯人们很紧张，宣判前后“号子”里死气沉沉，相对无言，宣判结束犯人们兔死狐悲，纷纷议论，当然这些议论都是灰色的。浸泡在恐怖和沮丧气氛之中。听实况广播，看守们把公审判决大幅告示，当天送进“号子”里。公告上有打“红钩钩”的，告示这些犯人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们称之为“勾魂笔”。带班员奉命组织“号子”里的犯人进行讨论，然后向看守汇报。

我出狱后碰到蔡珮莹、李源，她对我说，“每次公审我的心都砰砰跳，夜里做恶梦，看了几次判决告示，我们俩都‘闭经’了”。惨！真惨！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来对付犯人已属不法，何况对付的是自己人，是好人！天理不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其实是法西斯专政，搞得天怒人怨。我

感谢许世友，是他提供给我如此难得的机会，看看我国“文革”无法制时期专政工具的真面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以及那个潘汉年就是这样被整死的。

（七十九）林彪爆炸我获救

怒斥文王酬子厚

1973年4月，我被指定当带班员，成了犯人的头目。犯人对我说：“3002你很快就要出去了”。我暗自欢喜，知道快要出这个牢房了。但是，出这个牢房，又进另一个牢房，是否会被判刑送去劳改呢？心里犯嘀咕。我的主管看守姓王，浙江余姚人，第60集团军复员来的老兵，他有一个口头禅，凡事都要“快、快、快”。放风“快、快、快”，洗澡“快、快、快”，打饭打菜“快、快、快”。犯人送他一个绰号“快快快王管”。此人颇有头脑和见地，关押后期，他经常寻找机会喊我出去同我谈话。问我家庭情况，问我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做什么工作，叫我谈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等等。这种迹象表明我在娃娃桥监狱，呆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从他找我谈的内容和态度看，不像被判刑劳改的样子。我出狱之后，他曾到我家来看我，他对我说，他因同情无罪犯人而被调离了，要回浙江宁波炼油厂工作。他又对我说“老赵你是好样的，你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乱给自己戴帽子，胡编乱造，也不无中生有检举别人，你在狱中表现很好。很多人甚至级别较高的干部也做不到，他们到了监狱就胡说八道”。

1973年9月下旬，“快快快”又一次找我谈话，把我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客气地叫我坐下来谈。按监狱规定，看守找犯人谈话，犯人只能蹲着。我不明白这个规定是何用意？是有意侮辱犯人人格呢？还是惧怕犯人攻击。“快快快”对我说：“林彪爆炸了！他死了！”。他要我在“号子”里不要说出去。

1973年11月1日下午，看守突然呼叫我的犯号，“3002出来，把东西全部带出来！”我喜不自禁，把日用品都分送给了“号子”里外地的犯人，我就带走被子。犯人裁缝给我做的护腰和一双吃饭的筷子也带了出去，这是永久的纪念品。我出狱时，可怜的裁缝还没有走，他们关押的时间比我还要长。

回家之前，我又进了提审室，6位“同志”端坐在那里，他们请我坐下。主

审对我说：“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你属于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你属于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对你宽大处理。出狱后，要继续交代问题，监狱里的情况不准外传，要严格保密。有问题我们还会找你，还看你的表现”。他们代表许世友放我出去了，还要给我系上一条尾巴！我回敬了他们一句：“谢谢你们的关照！”。

南京变压器厂政工组长王云勇奉命来接我，他带了一辆三轮车，把我送到红花地 24 号我的家。到了家，他替我把坐牢的被子拿上楼就走了。左邻右舍都以惊愕的目光看着我，怎么“反革命”回来了？我的岳父是位老学究，他见我回来了自然高兴，但我入狱也大大伤害了他，使他偌大年纪蒙受羞耻和担惊受怕，我对他极为负疚。1970 年 12 月 5 日我被捕，当即抄了我的家（实际上是岳父的家）。这在当时是何等震惊的事啊！老人家一辈子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三年了，他默默地忍受着、担待着。日夜念叨着“我的 4 本照相簿，那里有我祖宗的照片！”。被抄走的物品有：相片簿 4 本，笔记簿 4 本，信 20 封，小报传单等杂纸若干。

搜查人：陆树明

见证人居委会主任：张莲

这份搜查笔录复印件，至今我还保存着。

不多久我就上班了，变压器厂的人看见我都为我庆贺。我的师傅沈玉玲告诉我，你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在那里也不知道，厂长、书记和工人都以为你失踪了。过了好几个月，才知道你进了娃娃桥。三年了，你怎么过的？说给我们听听。过了一年多，1975 年 1 月 18 日，中共南京市委给我平反了，按每月 36 元补发了三年工资，娃娃桥监狱得知我补发工资，寄来一张发票，要求工厂财务，在补发的工资内，把三年关押我的伙食费扣下来。工厂财务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把三年非法关押的伙食费给了他们。现在法制健全了，凡搞错的不仅要平反，补发工资，还要依法赔偿各种损失，如精神损失、名誉损失、福利损失等等。那有搞错了，反过来还要叫受害人交伙食费的。

我的平反通知书如下：

赵玉祥同志作为“五.一六”于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五日至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拘留审查，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

员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日“对赵玉祥的处理决定”。其材料由组织统一销毁，如有遗漏，一律作废。

中共南京市委

一九七五年元月十八日

这份平反决定写得很不痛快，是被迫作出的。写得干巴巴，一点认错的态度都没有，赔礼道歉之类的词汇通篇找不到。这说明，许世友手下的人如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李树和部长和田普这些人不甘心失败。他们认错了，“既得利益”统统没有了。他们就要被请到被告席上了。在清查“5.16”中，南京市受害的干部、群众达数万人之多，民谣说：“5.16 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如果许世友公开认错，那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吴大胜后来成了“替罪羊”。

平反决定中有一句话很蹊跷。“撤销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日对赵玉祥的处理决定”。下达“处理决定”和下达“平反通知”时间相差仅一个晚上。可见南京市委作出平反决定，是何等的匆忙和火急。1973年，南京市军管会是第60集团军负责组建的，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方敏任军管会主任，南京市抓“5.16”是他主持搞的，一批南京军区机关复员干部，都是他经手抓的，这批干部是不好惹的。搞不好他要为许世友当替罪羊，方敏难辞其咎。一夜之间决定为我平反反映了许世友和方敏的紧张心态。林彪爆炸后，党中央林彪专案组在清理林彪死党和他们的罪行中，明确指出：抓“5.16”是林彪制造出来的，其矛头是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林彪反革命集团571工程纪要》指出，“南京军区是争取力量”。对林彪来说，许世友是争取力量。许世友具备“争取的条件”。《571工程纪要》为什么不把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昆明军区、福州军区、济南军区……列为争取的力量，而单把广州军区和南京军区列为争取的力量呢？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主席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林彪步调不

一致，所以不能胜利”。

1973 年 12 月 21 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用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的人一一握手，几乎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很久了”。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又说：“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

毛泽东又说：“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反革命”。

毛泽东还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毛泽东主席老了。

1973 年 12 月 22 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采取了很多中央集权的措施，另一方面在党内军内尤其在军队内部的高级干部中做了一系列安抚工作，以安定团结为重。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的老人家，力难从心，内心矛盾重重，心情也极为沉重，直至 1976 年 9 月逝世。叶剑英说：“他带着一肚子问题（矛盾）走了”。

狱后一个月，应杭州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之邀赴杭小甜，偶读辛弃疾《南乡

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一词，感慨有加：

何处望神州？ 年少万兜鍪。

满眼风光北固楼，坐断东南战未休。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不尽长江滚滚流。生子当如孙仲谋。

从 1967 年 2 月到 1973 年 12 月折腾了七年。我二次被许世友抓起来坐牢，二次被下放到施工部队劳动改造，被大会小会批斗无数次，最后被清除出部队作复员处理（违反总政治部营以上干部、建国前参军不复员的规定）。坐牢了，又被释放了，级别、职务、待遇、又被恢复了。许世友呢？也调离到广州军区了。邓小平复出之后，许世友什么都不是了，广州军区司令员不是了，政治局委员不是了，中央委员也不是了，军委委员不是了，国防部副部长不是了。我这里一连串用了 10 个“了”字，步曹雪芹后尘“好了歌”。虽然远不及曹雪芹，但也有点那种感慨！邓小平送给许世友一顶乌纱帽“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许世友气得很，蹲在广州不自在，没有人给他前呼后拥，没有人给他抬轿子吹喇叭。要求回南京，邓小平批准了，他回南京后住在中山陵八号。南京军区专门给他修了一个供他钓鱼的鱼池。他成天钓鱼、打猎、喝茅台。有一次他到 3503 厂定做军服，发了一通脾气，讲了一些话。后来党中央发了一个通知给南京军区党委，说：“许世友同志现在主要任务养病，中央没有赋予他其他任务”。

小平同志十分照顾许世友，要他好好安心养病，不要他再多管其他的事了，免得影响他的健康。田普也同他分居了，一个人到无锡去了。许世友死了之后，她回南京一趟，主要是借死人在处理后事中同中央和南京军区讨价还价。许的大儿子在新疆服刑，也从新疆的服刑单位回来看了他一眼，据说大儿子回南京见到老父的尸体并不悲痛。古人云：“一将成名万骨枯，尊卑皆为一孤冢”。如此而已。患“左”派幼稚病的同志要接受教训，但党内存在严重的封建专制思想，尤其体现在高级领导人中的封建专制思想和行为，这个严重教训如果不彻底铲除，中国共产党将要走向反面。

（全文完）

《朱雷历险记》 作者朱雷 2000 年

作者简介：朱雷，山东泰安人，1931 年生。贫农家庭，工人出身。1948 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1950 年第一批随志愿军宋时轮将军的第九兵团入朝作战。他经历了志愿军入朝后一次和五次战役。又经历了 1951 年防御战役，1953 年的反美军登陆作战、夏季反击战和抗细菌战等多次战役。他在九兵团司令部作战处任测绘参谋。

他在淮海、渡江及入朝作战期间，多次立功受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军官。志愿军回国后，1955 年朱雷被调往人民解放军第 22 军，后改为人民解放军舟嵎要塞区。朱雷在要塞区司令部作战处工作。1960 年调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学习。文革期间，朱雷同志奉命参加浙江舟山地区的“支左”工作。在八个月支左工作期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8 年 4 月，朱雷突然被许世友打成“倒许乱军”分子，备受迫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1 年至 1975 年又被许世友打成反林彪反江青的“5·16”反革命集团成员。长期被关押、迫害，几近家破人亡。朱雷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申诉，艰苦奋斗长达 18 年之久。1989 年 1 月，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纪委书记张明同志的督促下，南京军区政治部才给朱雷落实了政策。朱雷同志作为人民解放军团职离休干部定居在杭州市市长乐干休所，安度晚年。

(1)

1968 年 4 月，我被选定为出席南京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舟嵎代表。一个小小的营职参谋，被突然调离支左的军管岗位来到南京白水桥某部营房，与王必成副司令员、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治委员，还有舟嵎要塞区丁锐副政治委员，沈萍副司令员，吴健政治部副主任等一大批南京军区、舟嵎要塞区领导干部一起，被许世友司令员定为“杨、余、傅黑线上的人”打入另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真是祸从天降！

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多次到白水桥向我们训话：“我在毛主席那里备了案，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林副主席，我就先杀他的

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俨然以有先斩后奏特权的许世友，杀气腾腾，不可一世！

那些派性特强、心怀叵测，一心要踏着别人向上爬，自封“稳军派”的人，一面极其肉麻地一口一个我们的“红司令”“我们的好司令”地叫着；一面叫嚷“北京有‘杨、余、傅’，南京有‘王、林、鲍’，舟嵎有‘丁、沈、吴’，一条黑线”。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都被戴上了野心家、阴谋家、变色龙、反革命的帽子。

我家也被抄了，南京白水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个月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意犹未尽，我和丁锐副政委、沈萍副司令员、吴健政治部副主任，普陀守备区政委钱毅等 12 人又被许世友作为反面教员“留级”再学，接受第二批学习班的批斗。

一个参加革命 20 年，多次立功受奖的中共党员、营职干部，就这样眼睛一眨成了反革命！正当我和丁锐副政委等 12 人被监管失去自由时，第二期学习班开始了。整人的打手们洋洋得意，他们准备继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双手沾满自己同志的鲜血往上爬。

1969 年 3 月，党中央决定将南京军区政治部、舟嵎要塞区、上海警备区三个学习班（整人班）统称为南京部队学习班调到北京去办，情况有了很大的转机。在北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学习班转为批判许世友的错误口号“倒许乱军”。

舟嵎要塞区政治委员曹思明将军，于 1969 年 3 月 3 日、3 月 13 日、4 月 3 日，先后三次在舟嵎要塞区 700 多人的大会上，痛哭流涕作了检讨，一再向在南京白水桥被打击的丁锐、沈萍、吴健、钱毅、朱雷、刘志毅等同志赔礼道歉。

舟嵎班办公室主任整人打手李朝龙一反常态，他来个 180 度转弯，一再动员我在大会上作批判发言。并明确对我宣称“这是党交给你的一项政治任务”。我的发言稿经过李朝龙润色修改后，呈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审查批准，在舟嵎班 700 多人大会上揭发批判了许世友“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和对广大干部的迫害。我的发言一再被热烈掌声打断。我朱雷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揭发批判许世友的发言和我八个月的支左工作，竟成了我和一家人的罪状，被整了 20 年，几乎被整得家破人亡！

1969年6月,学习班结束,廖容标、曹思明首长带领我们回到南京,回到舟山定海。行前,廖副司令代表南京军区党委一再表态,绝对不会对发言批判的同志打击报复。廖、曹首长回到南京之后,受到许世友的严厉批评,并把曹思明留在南京。许世友推行的“倒许乱军”错误口号,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更加恶性发展蔓延起来。那些被戴上“倒许乱军”帽子的人,一律被清洗出部队,复员回家,有的甚至被押解回家交由地方监管。

1970年9月15日,我被舟嵎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等人骗出380医院(我因肝病住院),回到普陀守备区驻地桃花岛。当即在守备区司令部机关党员人数不到三分之一的“支部大会”上,在政治部主任栾经诚、副参谋长刘宪华指挥下,给我戴上“内奸”、“走狗”、“定时炸弹”、“杨余傅黑爪牙”、“国民党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等多顶黑帽子和莫须有罪名后,宣布开除我党籍,并不准我申辩。1970年10月5日,作出了开除朱雷党籍的“决定”,并勒令我限期离开部队和舟山。

1970年11月25日,舟嵎要塞区普陀守备区两位负责人,派遣副连长XXX率2名战士强行押送我一家回山东老家。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里,那位连长盛气凌人,挥舞着押送书信,在大庭广众之前,宣布朱雷一家是被部队开除的坏人,他们是执行部队首长交给的押送任务,要把朱雷一家押到山东泰安,交给地方强制劳改!在“倒许乱军”错误口号毒害下,不明真相的基层干部执行者,他们怀着对“反革命”的仇恨,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这是可以原谅的。但舟嵎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某些领导人出于个人的既得利益和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做出欺人太甚的伤天害理之事。

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里,我和妻子张志敏慷慨陈词与押送我的执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宁波火车站任孝连站长和全站乘务人员以及全体旅客全站在受迫害的一边,一致谴责这种非法押送。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XXX连长灰溜溜离开现场,十万火急打电话向普陀警备区求援。普陀警备区政治委员宋干接到电话后,立即派保卫科长顾永年率6位战士乘专艇连夜赶来宁波,强化对我的押送措施。顾永年同志头脑清醒,党性未泯缓解了非法的强行押送措施。他先是让我家属携二个幼子逃脱。我被押解到上海后,乘机逃到杭州与妻儿汇合后,向党的九届中央委员浙江省农业劳模莫显跃求援,向他报告了受迫害的情况,并请他转呈

给周恩来总理一封申诉信。接着，我又上访北京状告舟嵯要塞区的违法行为。

文革时期，一大批批评许世友的人都被扣上“倒许乱军”“反革命”帽子，横加迫害，其遭遇不亚于我朱雷。

1970 年底，北京，朔风吼，大雪飞。在绳子胡同副 2 号的一个房间里，军委总政接待了我。接待人员说，“我们打电话给南京军区政治部，给你平反落实政策”。并给我写了公函。我回到南京军区，又被南京军区推给了舟嵯要塞区。万万没有想到，当我携带军委总政的公函，根据南京军区的指示偕妻携四岁幼子，回到舟山平反落实政策时，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等人如临大敌，他们在舟嵯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等人的支持下，调兵遣将，严密监视着港口、车站、码头，和我的一举一动。他们派一名干部率领 5 名战士，在 1971 年 5 月 5 日夜，隐藏埋伏在东门里招待所大门口附近的阴暗角落里，是夜 8 时，他们用极其卑劣的手段，公然将我绑架到普陀守备区沈家门陆军招待所，由二名荷枪实弹上刺刀武装战士监押起来。深夜 11 点 30 分，普陀警备区军管会打人凶手吴掌林对我进行法西斯毒打。在毒打的同时，辱爹骂娘，一再责问我还敢不敢再去中央告状！翌日，一艘专艇，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将我从沈家门转移到桃花岛，关押在位于蚂蟥坑有三道门二道岗哨的土牢里。

注：“杨、余、傅”指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将军

“王、林、鲍”指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将军

“丁、沈、吴”指舟嵯要塞区丁锐副政委、沈萍副司令员和吴健同志

(2)

我被绑架关押在桃花岛的蚂蟥坑的第二天，我妻抱着四岁幼子朱浩，焦急地等候在舟嵯要塞区铁瑛政委的大门口，向铁瑛要人。铁瑛否认对我的绑架事实，花言巧语，借给我妻五元路费，要她和孩子到桃花岛看我。可怜老实天真的她，轻信铁瑛，娘俩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到桃花岛就中了圈套落入虎口，跟我一块被非法关押起来。

在铁瑛等人的支持下，宋干、栾经诚等人将我一家三口，秘密囚禁在密不透风仅有 12 平方米的土牢里。试问：新中国成立后，有那个单位，那个部队乃至

那个监狱，胆敢关押一个年仅四岁的娃娃?!，可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身居师职领导地位的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经诚，在铁瑛支持下竟丧尽天良的这么干了!他们不仅这么干了，还恣意对我朱雷咒骂、侮辱、搜抄、拷打。在 35° 高温下，依然把，我一家三口人锁在臭气熏天，蒸笼般的土牢里!不给通风，不给放风，每天中下午最热之时，三口人张着嘴大口大口喘气。尽管土牢门上加了锁，土牢门外设了二道岗，依然 24 小时不分昼夜搞突然搜抄!搜抄次数一昼夜起码七、八次，多达十七、八次。有多少次，四岁的朱浩被这恐怖气氛吓得浑身发抖!他们还卑劣无耻地挑拨我妻跟我划清界限，离婚!当达不到目的时，竟然指使四名人高马大的战士，对我秘密审讯和毒打，边拳打脚踢，边恣意辱骂，把我打倒后揪起来继续再打，甚至多次用手枪敲我的头，推上子弹顶着我的胸口要枪毙我!

令人更加难以容忍的是，宋干、栾经诚等人，用饿饭手段摧残我三口。有时一天只给我们三口人二餐饭，有时一天只给我们三口人中的二个人的一餐饭，到后来一连十多天只给一至二小碗饭。就在三口人靠一天一至二小碗饭维持生命十多天后，突然两昼夜不给我们一点东西吃，三口人躺在土牢里奄奄一息……。可怜年仅四岁的朱浩，用小嘴巴贪婪舔着已无一点饭迹的饭碗，开始还能说“妈妈我饿”，后来连“妈妈我饿”也无力说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四岁孩子遭此摧残折磨，心如刀割!天若有情天亦愤啊!!!

宋干、栾经诚等人，心中很清楚，朱雷一旦获得自由，他肯定会再到北京，向军委总政揭发他们丧心病狂的罪行的。因此，他们是不想让我获得自由，不愿我活着离开舟山。正当朱雷一家三口饿以待毙的时候，突然牢门打开，送进来一小桶稀饭，和一碟咸菜。这点稀饭和咸菜，将朱雷三口踏入黄泉路的那只脚拉了回来。事隔九个月多月后，我才知晓，原来给我们稀饭和咸菜的那一天，竟是被划为“杨、余、傅黑线上的”，普陀守备区副政委钱毅同志被折磨而死(也许是被暗害而死)的翌日。可以认定，由于这一位 1940 年入党、行政十三级的钱毅副政委的悲壮殉职，朱雷三口才侥幸获得生机。

时间过去三年之后，1974 年 6 月的一天在杭州市四宜路 136 号，那间权且借给我们一家安身的破房子里，钱毅政委的夫人过丽华，当面向我陈述钱毅同志被迫害致死的经过。钱毅政委的死，换来了一小桶稀饭救了我一家三口人的性命。

我对钱毅同志的悲壮殉难，表达了深深的哀悼。许世友制造“清查 5·16”冤案，又夺走了人民解放军一位优秀高级干部的生命，钱毅同志死得好惨！

我在土牢里被折磨了二个月之后，他们正式认定我是“反对林副统帅”、“反对江青同志”的“5·16 反革命”。1971 年 6 月 30 日，宋干等人突然把我一家三口拆散，把我一个人秘密由桃花岛转移到了普陀山，关押在大乘庵长达九个月之久，其中半年多，我的亲人不知我生死下落。

普陀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大乘庵乃佛门慈悲之地。但是，那时的大乘庵却成了宋干、栾经诚等人非法关押、摧残共产党人的秘密场所。他们派遣两名荷枪实弹的武装战士，昼夜不停、寸步不离监管着我。同时，精心挑选了排、连、营，团职的十多名军官，对我大搞逼供信，大搞体罚肉刑！朱雷刚刚脱离桃花岛上的火坑，又掉进了普陀岛的炼狱！直到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叛逃爆炸半个多月后，1971 年 9 月 30 日，这伙人还狂呼着“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江青同志，就砸烂谁的狗头！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永远不得翻身！”打手们逼我跪在三角木上，狭窄的条凳上，有棱角的石头上，他们轮番“轰炸”对我拳打脚踢，皮带抽、木棍敲，从清晨折磨到黄昏，打得我脑震荡、口吐鲜血、两便失禁，拉血尿血、遍体鳞伤、几度休克、双目模糊、脑袋肿大、嘴张不开、耳听不到、后脑勺一条伤口血流不止……。我堂堂正正经受严峻而残酷的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朱雷，在战场上没有死，竟然被许世友以人划线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指使下，几乎被披着人民解放军军装的打手们整死！在“文革中”有不计其数的正直的共产党员、劳动模范、老干部、老科学家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被这些坏人整得惨死！在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是林彪、江青的大红人，他靠文化大革命当上政治局委员，他要整人甚至杀人，那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我朱雷在“文革支左”中没有执行许世友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做法，导致身陷囹圄。可怜身陷炼狱的朱雷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任凭狂徒们折磨摧残而束手无策。直致林彪摔死的信息传到舟嵎要塞区，任人宰割的朱雷才侥幸保住了这条命，

这一桩桩一件件，不是发生在敌人的监狱里，也不是在被俘的疆场上，而是我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回部队平反落实政策时，发生在天高皇帝

远南京军区舟嵯要塞区那个独立王国里。天亦有情天亦恨啊！

宋干、栾经诚眼看“林副主席”完蛋了，把朱雷打成“反对林副主席”的反革命的阴谋陷阱破产了。他们竟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翻过来倒打一耙，又诬陷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爪牙”，继续关押我。打手们清楚，如果我平反了，他们就要被请到被告席上，戴上一顶制造冤案的帽子，承担打砸抢的罪责。在军委总政一再追查下，直到 1972 年 3 月 9 日，宋、栾等人又派出群工科长刘永莹、营长高继圣，对我进行第二次非法押送。为阻止我再去北京向军委总政揭发控告他们的罪行，刘、高二人秉承“上级领导”的旨意，在押送途中对我恐吓威胁，一再扬言“如果你朱雷再去北京控告，定叫你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毛泽东同志说：“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他又为人民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数十年来，这支军队素以“文明之师，仁义之师，雄武之师”而昭告于世。但是，在“文革”中，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背离了这个原则，把人民军队看成是他私人的武装力量，“倒许”就是“乱军”！南京军区的防区三省一市成为许世友的独立王国。许世友在军队中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军阀作风导致了我朱雷遭此惨劫。1973 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毛泽东对韦国清说：“你不是韦国清吗？老朋友了，你长胖了。你要帮助许世友同志啊”。毛泽东又说：“有的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说了算……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年了”。毛泽东主席的话不是空穴来风！

山当我六十多岁的老娘亲得知我的历险遭遇后，从山东泰安千里迢迢赶到舟山，找到部队，要求见我一面。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同志又欺骗了我的母亲。他对我母亲说：“老嫂子，我们是人民军队，就是对投降了的敌人，我们还优待哩，何况您儿子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您放心，我们不会关他，更不会打他，您可不要听信您儿媳妇的谣言受骗上当”。随即派人把我母亲送回山东泰安，本性善良，易于上当受骗的老母亲，在没有见到我的情况下回到了东老家后，对我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们说：“俺儿在部队里很好：根本就没有受过打骂，这都是儿媳张志敏不好，她不愿到咱山东来，想留在杭州，就写信来骗俺们”。就这样，铁瑛同志的骗术成功了。山东沂蒙山区老革命根据地的乡亲们都对铁瑛、宋干、栾经诚等解放军首长们感恩戴德无以复加。

“老八路怎么会这样对待俺的子弟兵呢”！谁能料到，正当乡亲们感恩戴德的当口，他们的子弟兵朱雷正在许世友制造出来的“倒许乱军”清查“5·16”反革命的炼狱里受煎熬！

《聊斋》里的妖魔鬼怪在害人的时候，往往打扮成美女或善良的老妪、长老出现！许世友虽然是老红军，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但他的世界观和灵魂仍然停留在封建专制的王国里，在他的脑子里塞满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集生杀予夺大权于一身的军阀思想。军区党委制约不了他，杜平政委要听他的，党委一班人要听他的，他凌驾于军区党委之上，南京军区不是党委一元化领导，而是许世友一个人专制。在“文革”时期这一特殊的政治条件下，“封建诸侯”们都会显露其真面目，而疯狂于世的。铁瑛同志不是许世友，但军令如山。铁瑛虽然是我军的高级干部，出于各种因素和个人利害，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他必然会充当不光彩的角色，他抛弃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成了推行许世友“倒许乱军”错误口号和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帮凶。

(3)

面对封建专制强权迫害，朱雷冒着“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的危险，舍命抗争，再去北京，向军委总政控告。朱雷深刻认识到，这桩公案，绝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或一家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法尊严、党性原则、军队建设、人间正义；同利用人民赋予的职权而积极执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恶势力作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怀着悲壮的浩然正气，朱雷乘车北上。去北京，去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办公的地方，申诉冤屈，讨回公道。

当朱雷刚踏进北京总政军人上访接待站驻地绳子胡同时，未曾料到的景象出现在面前，数以百计的身着陆海空三军不同军服的男女上访者，或立或坐或躺或卧在绳子胡同里。他(她)们和朱雷一样，都是受林彪反革命路线所迫害的无辜的人民解放军军官！男儿有泪不轻弹，在绳子胡同2号总政接待室里，朱雷含着热泪实事求是的控诉了南京军区舟嵎要塞区，在许世友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和“清查‘5·16’反革命”的指令下，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

经诚等人，在舟嵎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等人的支持下，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我一家人的罪行。一身正气，满怀同情的接待站主任赵渭忠同志、卢淑琴干事等，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站在受迫害的一边。

正当军委总政将朱雷一家所遭受的迫害事实，作为全军一个典型刊登在总政的信访简报上，通告全军引以为戒时，铁瑛、宋干、栾经诚等人，则同军委总政针锋相对。他们在杭州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上，认定朱雷是被部队开除党籍，押解回乡管制劳动的坏人，并将其诬陷内容刊登在这次扩大会议的第四和第五期简报上，通告全省。明目张胆同军委总政对着干，令人发指！铁瑛目无军纪擅自把军队内部情况倚仗权力无原则地扩散到地方去。在浙江，特别是在舟山，有多少善良的人们受到了蒙蔽！封建主义极权专制的残渣余孽，他们披着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的外衣，如许世友、铁瑛之流，他们仗着权力和组织力量，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残酷打击迫害敢于同他们的错误作抗争的正义的人们。自古“奸佞当道，忠良遭殃”确实如此，其实质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决不是什么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也不是执行纪律上的错误，更不是工作上的错误，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当时的党中央是无产阶级的，所以我朱雷才能战胜许世友、铁瑛、宋干、栾经诚这些人推行的错误做法。迫使他们作检讨（那怕是假检讨）迫使他们给我落实政策，迫使他们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经过艰辛顽强的抗争，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经诚等人，终于在 1973 年 2 月 2 日；以中共普陀守备区委员会的名义，作出了《关于恢复朱雷同志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尽管对宋干、栾经诚等人用卑鄙无耻手段，强迫任绵绥、柴纪时等人作伪证等非法行为只字不提，推脱责任嫁祸于人，但毕竟是反迫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胜利！

逼供等一系列迫害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至少要有一个说法，要赔礼道歉，要搞好善后，这是党的原则和政策所规定的。但是，宋干等人拒不执行。他们坚持要把朱雷复员遣返到被他们造谣诬蔑，造成极坏影响的山东泰安原籍进行劳动改造。舟嵎要塞区领导人铁瑛等人，再一次支持了宋、栾等人的错误做法。朱雷无奈只得再次赴北京上访，要求平反落实政策。

“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我先后两次写信向他申诉。这两次书面申诉都是通过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转呈的。刚正不

阿，主持正义的周建人副委员长，先后两次附了亲笔信。小平同志都做了批示，他指示军委总政直接给朱雷平反并落实政策。小平的批示引起了南京军区的重视。南京军区党委专门开会作了研究，并于 1974 年 8 月 23 日下达了三条决定。

1974 年 8 月 24 日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连生和干事蒋慎帮，在军区第二招待所向朱雷传达了南京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

①舟嵎要塞区和普陀区二级党委对朱雷同志的处理有严重错误，由南京军区搞个平反决定；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销毁一切黑材料。

②给朱雷同志恢复军籍，计算军龄，补发薪金物资，包括家属子女的粮油布棉证票。

③动员朱雷同志不要再坚持回部队工作，按正常情况办理复员，由军区负责去浙江杭州朱雷同志家属所在地妥为安置，妥善做好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的善后工作。

张连生副部长口头传达完这三条后，朱雷当即要求将这三条给本人一份文本。张连生明确告知：“军区党委的这‘三条’是军区党委的决定，只能装入你的档案，不能给你本人，向你传达过就行了”。当我将上述三条记录念给他听后，他讲：“你记得没错”。由于没经验，当时没有请他在记录上签字确认。我想一个堂堂大军区组织部副部长，总不致赖掉吧！张连生现住南京中山北路 212 号南京军区政治部干休所。当时组织部干事许湘东现为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少将主任亦应记得这件事的。

军委总政接到小平同志给朱雷平反落实政策的批示后，迅速派出以信访处长薛恒庆为首的工作组，深入舟山部队，通过艰苦的细致的工作，查明朱雷的指控完全属实，并严肃批评了铁瑛、宋干等人的错误。1974 年 9 月 20 日军委总政工作组在南京军区第三招待所 13 号楼，210 室；当面向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张连生副部长和纪委办公室陈绪论主任明确表示：军委总政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第三条由军区组织部负责具体落实。

按理说，这桩公案事到如此应该圆满了。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在军委总政工作组离开南京返回北京之后，朱雷一家人眼巴巴渴望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迅速落实。结果事与愿违，事物又向反向逆转，出现了一系列咄咄怪事，导致南京军区党委给朱雷落实政策的三条决定又付之东流了！个中的咄咄怪事，里手的微

妙因素，实质上“倒许乱军”错误口号仍在作祟！许世友司令员虽然已调往广州军区，但他所建立起来的“派性”仍在起作用。“文革”中靠整人升官的人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行

(4)

咄咄怪事出现了：“部门意见”推翻“党委决定”。1974年10月30日，南京军区政治部出台了一个“对朱雷同志申诉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这个复查处理意见未同本人见面，就逼朱雷接受。“部门意见”，有意混淆视听，不平反，不恢复名誉，不消除影响，也不销毁黑材料。其次，在复员安置问题上，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暗地通知浙江省民政厅，拆散朱雷的家庭。把家属放在杭州，把朱雷发配到浙江镇海，相隔六百里。当国务院民政部指示浙江民政厅，按政策把朱雷安置在杭州时，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非但阻扰，而且向朱雷发出“如不服从一切后果由你本人负责”！的无理警告。南京军区政治部本是贯彻落实党委决定的办事机关，理应严格执行党的政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但是，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阳奉阴违，搞原则肯定具体否定。充分暴露了南京军区党委为朱雷落实政策是假的，继续整人是真的！这种咄咄怪事，在我军历史上只有在“文革”期间，在南京军区“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下，才能出现。

1974年5月16日，我向浙江省委写了信，揭发了铁瑛迫害我一家的事实，浙江省委全会秘书处印发了这份材料。我妻张志敏也向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书记写了信，要求落实粮油政策，信中也揭发批判了铁瑛。谭启龙书记于5月13日作了批示：“这是对铁瑛同志的最好批判，请政工组确定予以解决”。万万没有想到，铁瑛为此怀恨在心，当他接任浙江省委书记职位之后，1977年3月23日指使舟嵎要塞区宋干等人，把诬陷我的黑材料送给杭州市公安局，又指使由舟嵎要塞65师保卫科长上任浙江公安厅厅长的李朝龙对我进行非法拘留，使我再次身陷囹圄，罪名是“思想反动的现行反革命”！他们抄了我的家，把张志敏定为“反属”，18岁长子被解雇了工作。铁瑛又一次把我一家推向家破人亡的边缘！

在狱中，公安局对我大搞逼供信，乃至多次以枪毙相恐吓，在狱外搞“张志敏专案组”日以继夜逼迫张志敏揭发“朱雷的反革命罪行！”狱内狱外紧密配

合，滥施淫威，搞白色恐怖，制造冤案，迫害无辜，卑劣至极！这个专案组除上述公开的一手外，还搞暗的一手。他们把朱雷档案中那些证明我光荣历史的材料，如多次立功受奖，被评为军、师两级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材料，多次授予荣誉称号的材料，以及历来的鉴定、任职令、自传乃至入党志愿书等统统被抽出盗走，至今一份也没归还。“文革”中制造冤案的“左派革命同志”的卑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面对淫威，我和我妻对这伙恶棍打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抗争！张志敏被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三个多月，从未屈服。恢复自由后，更是不断抗争，直到向党中央工作组当面多次告诉。我被突然拘留时，就对公安局严重违法犯法，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提出抗议，要他们承担一切后果的责任，我拒绝在拘留证上签字。2 年零 7 个月，杭州市公安局在舟嵎要塞区禀行南京军区转寄的黑材料指使下，对我大搞迫害性的逼供信。

但他们非但没有得到我片纸只字的“检讨”和“交代”材料，相反地得到了我向党中央、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纪委等呈交的大量的血泪控告信和义正词严的抗争信。遗憾的是，这些申诉材料，都被杭州市公安局或公安厅非法扣压了！这充分反映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其流毒远远没有肃清。

1979 年 2 月 23 日，国家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公安局拘留一个公民最多时限只有 7 天。铁瑛、李朝龙，根本不把国家颁发的这个《条例》放在眼里，让公安局继续对我非法拘留，直到该《条例》公布施行了七个月后，而且是在中央来浙江平反冤案假案的工作组蓝孝永组长直接追究下，目无党纪国法的铁瑛、李朝龙等，才叫公安局在 1979 年 9 月 29 日，向我发出“释放证明”。杭州市公安局明确告诉我：拘留我二年七个月，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I 反对过铁瑛书记。

为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维护革命军人的荣誉，维护中共党员的贞操和公民的权利，在公安局发出“释放证明”后，朱雷拒绝出狱，坚持在狱中讨个公道。杭州市公安局面对其在拘留所中出现的前所未有的这种情况，派其副局长周衡葆、办公室主任邵其锋，一再屈驾监狱，动员朱雷出狱。他俩代表杭州市公安局再三向我保证，在我出狱后即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在公

安局信誓旦旦保证下，特别是中央工作组蓝孝永组长，向我传达出狱后平反的指示后，朱雷才于 1979 年 10 月 13 日上午，让专案组转交给公安厅厅长李朝龙一封信后，以一个革命军人和中共党员应有的磊落坦荡姿态，在监狱工作人员的热情欢送之下，堂堂正正的走出了监狱大门。

中国共产党党的纪律规定：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付党员，严格禁止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身为中共党员朱雷，没有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保护。他被杭州市公安局非法监禁二年七个月，受到了非法审讯和迫害。这究竟为什么？身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铁瑛，在文化大革命中，乘全国动乱之机，持权挟私，对中共党员人民解放军的军官进行“专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实质上铁瑛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把持人民给他的权力，搞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说：混在党里军队里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跳出来对人民实行专政。

(5)

我在监狱足蹲了二年七个月，我带头遵守监规，体验逆境人生，增强高风亮节。我反复学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同时，忍辱负重协助公安机关，对数以百计的同狱人犯做了大量颇有成就的转化工作和破案工作。在押人犯说：“要是早就和这样的共产党员在一起，我们也不会落得今天蹲大狱的地步。”在他们很多人中，不相信我跟他们一样确实实蹲大狱的人，很多人一直怀疑我是打入监狱执行任务的公安人员。凡是关押在其它监房的犯人都想调换到我所在的二狱B室中来。我所在的狱室，不论释放、劳改或判刑，都会到我面前，有的紧紧握手，有的深度鞠躬，有匍匐下跪，有的痛苦流涕，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和我送别。就连“狱霸”们使工作人员伤透脑筋的亡命之徒，放在我所在的狱室中，时间稍久竟也被教育感化过来。每逢有危险人犯送到拘留所来，监狱长都是个别向我交代任务，要我监管好他，防止出问题。每逢有老弱残疾或少年人犯送到监所来，工作人员都把他们放在我所在的监室，要我关照他们不受欺辱。我朱雷不辱使命，认认真真做好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工作。我朱雷蹲监狱蹲到这种份上，苍天可鉴！

正由于这样，所以在我的牢狱之灾结束后，离开监狱时，拘留所领导、狱警及至烧饭菜的大师傅们，一起热烈将我送到监狱大门口。这是铁瑛、李朝龙等人所绝对没有想到的，也是杭州市公安局历史上所绝对没有过的。

当朱雷为讨回公道，还在狱中绝食抗争的时候，铁瑛以其人格和党性，向中央工作组蓝孝永组长保证，保证在朱雷出狱后，即给予平反，落实政策。杭州市公安局也通过其副局长周衡葆、办公室主任邵其锋，再三向朱雷保证，朱雷出狱后即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中央工作组信了铁瑛的保证，离开杭州返回北京。

朱雷出狱后，身心交瘁，家徒四壁，负债累累。母患病、子待哺、一家五口、政治、经济、生活陷入极度窘境。朱雷去杭州市公安局要求其兑现保证，没想到堂堂杭州市公安局竟然赖帐了。他们信誓旦旦的保证，竟是骗我出狱鬼话，我找铁瑛要求兑现保证，给我平反落实政策，他避而不见，写信给他，他置之不理，原来他以党性和人格向中央工作组作出的保证，竟然也是欺上瞒下的手法。去省公安厅告诉，竟然遭威胁和恫吓：“你朱雷如果还上窜下跳到处告状，当心叫你粉身碎骨”！负屈含冤，浩气凛然的朱雷，不信那个邪，置公安厅的警告不顾，毅然再次赴京上访。依靠党中央，相信党中央一定能够以正压邪，最终讨回人间正道。

在北京，我踏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等中央机关，最后归口于公安部。公安部听到我的告诉甚感惊奇，一再追问：“是拘留吗”？“是真的拘留二年七个月吗”？当确信考查无疑后，给我写信，叫我回浙江省公安厅平反，落实政策。省公安厅不听公安部的。于是，我在困难的情况下，被迫再次、三次、四次、五次、一而再，再而三的频频进京告状。公安部也再三再四的给我写信，要浙江省公安厅给我落实政策。最后检察院也一再批转我的告诉信。1983年3月26日上午，朱雷和张志敏被召到杭州市公安局，说是给我平反落实政策。在坐的除公安局的三位代表外，还有省公安厅的三位代表和下城公安分局的一位代表。当时我理直气壮要求公安局兑现保证时，三级公安机关竟然否定了自己的“保证”。他们公然向我宣布：“朱雷不存在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问题；不存在赔偿损失问题；不存在给受珠连的家属处理善后问题”。理由呢？很简单：“这是在清查运动中搞的，就是搞错了，中央也没有

给清查中搞错了的平反指示”，“三个不存在”的棍子又向朱雷袭来。州官放火、制造冤案，竟然还要受害者默然俯首贴耳不准喊冤！浩然苍天，昭昭日月，岂有此理！

朱雷继续抗争，不断上访喊冤。1988年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致函朱雷：“你到北京公安部上访的材料已转给我局，关于你在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本局在1981年11月19日以公群(81)12号文作过复查结论，并找你本人谈过话，如你同意此结论，请来局信访室时面谈，以妥善处理有关善后问题。”公安局用词造句简单明确，只有朱雷同意他们的结论，才可妥善处理善后。这是前提，是先决条件。公安局对我们非法拘留审查的结论是：“朱雷因涉及现行反革张永生一案和攻击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于1977年3月23日被我局拘留审查。经审查，朱雷的问题未构成犯罪，故于1979年9月29日释放”。很明显，公安局在收到此批转下来的材料后，不仅不承认错误，予以纠正，而是继续污陷我！

1988年快要过去了，朱雷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1988年11月28日，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纪委书记张明同志的关怀下，朱雷的问题有了转机，张明同志作了如下批示：“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楼部长按政策予以落实。”南京军区政治部下达了《(1988)政干字318》文件。舟嵎要塞区《(1988)党字第35号》请示报告获得批准。

1989年1月朱雷办理了军内离休手续。至此朱雷及家人终于结束了水深火热，不堪回首的困境，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自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党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我朱雷奉命支左，到1968年4月林彪，江青制造“杨、余、傅”反革命事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推行“倒许乱军”错误口号，我朱雷和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大批干部被无辜打成“倒许乱军”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杨、余、傅”黑线上的人，“阶级异己分子”，“坏人”等等，历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苦难，遍尝了冤狱之灾，亲身体会了在错误路线主导下，资产阶级专政的残酷性，株连了家属亲友达20年之久。人的一生有几个20年？我朱雷永远不会忘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人民、革命干部镇压的历史教训！朱雷全家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党的恩德，永远铭记周恩来、邓小平、周建人、谭启龙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明同志的恩德！

中国有句古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要报”。这虽然是一句唯心的话，但有时，也会显灵的。请看：当我在承受着皮带抽、木棒拷打时，我冷不防被普陀守备区打手刘秀玄当胸重重一拳击中，从桌子上打倒在地，仰面朝天，后脑撞在大乘庵佛殿堂前的红木柱的石础上，当场昏死，一条伤口流血不止。当我苏醒过来时，发现本应救死扶伤，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的军医刘秀玄，竟然一边踢我，一边骂我该死！几年后，没有想到他在普陀山上手持猎枪打鸟时，枪柱后座竟会击中他自己的头颅，当场死亡！那个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负责押送我的警卫连副连长，在大庭广众之前侮辱我一家人，积极充当宋干、栾经诚打手的张加录，本是年轻力壮，体质如牛，不知怎的，竟会死于肝癌。

(全文完)2000 年于杭州市

《许世友外传》 作者陈廷一 1996 年 11 月

卷尾语 功过评说（摘录）

在军区招待所里，我见到许世友的保健医生高复运同志，他是 60 年代跟随许世友的，一直到将军弥留人世，他对将军了如指掌。当我把街头听到的消息反馈给他时，他笑了，说：“‘文化革命’是一场大灾难。谁也把握不住谁，正如我们自己一样。今天是明天非，像翻饼子似的没有好人。许世友也有受难的时候。”接着他便给我讲出了一个生动传奇的故事…8943 .

1967 年，一个烦躁不安的夏夜。

在一间雅致的小餐厅里，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酒菜。许世友将军端起了一杯茅台酒：“你们再好好想一想？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有幸参加这次酒宴的均是将军的随从——秘书、参谋、保卫干事、保健医生、警卫员、炊事员等。他们纷纷举起酒杯表态，虽然言辞不一，但意思是相同的——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决不离首长！

第二天，当南京市的造反派、红卫兵小将包围军区司令部，把“打倒大军阀许世友！”“揪出张国焘的黑干将！”等标语口号贴到将军的官邸时，将军早已率领一个全副武装的人马在大别山的一座野战医院安营扎寨下来。

与此同时，将军口述了一份电报发给党中央，声称如果造反派红卫兵继续冲来，要我戴高帽子，我就开枪开炮，格杀勿论！

这是继兰州军区司令赵永夫、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被打倒后，各大军区中第一个公开亮出反抗旗帜的声明。将军已经把自己置于死地了。他已经做好重上大别山“打游击”的一切准备。然而正是这一“武装反抗”的声明，却使将军的困境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不久，林彪委托陈锡联打来电话，劝许世友出山。不久，周恩来派人捎来问候，并对南京的造反派说：“不准揪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个小时内就赶到南京去。”

不久，毛主席传令，要在上海接见许世友同志。

毛主席来到上海后，刚刚住下来，便问杨成武：“许世友现在哪里？”

杨成武回答：“大别山里。”

“快把他给我接来！”主席下令。

“是，我现在就去！”杨成武回答。

“不——”杨成武刚要转身，毛主席挥挥手：“派张春桥去。你晓得这是什么意思？”主席哈哈一笑道：“张是反许的。”实际是毛主席多了个心眼。

许世友来了，一见主席便跪下大哭，委屈得像个孩子似的：“家被抄，儿子被打，老婆受气……8943。”

毛主席扶他起来：“老许，没事，你的司令还是你的司令，回去好好干。”

许世友高兴了，他向在场的杨成武表示：“成武，我要打只豹子送给你。”

他又对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说：“你们派车接我，我也要打只兔子送给你们俩。”

毛主席对在场的人说：“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了许，其他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皮定钧等都得倒。”

从此后，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在党的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在毛泽东的庇护下，许是唯一敢于拥兵反叛并从反叛中得到“好处”的将军。这一传说固不可信，它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许的个性。

高复运说到这里，无不感慨地说：“‘文化革命’初期，许受到冲击，吃了

苦头。后来受到毛的保护，在稳定南京局势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期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他又立了大功，这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

许世友同志生平

十年动乱中，许世友同志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反对造反夺权，重视保持部队稳定，林彪、“四人帮”视他为眼中钉，阴谋将他打倒。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他才幸免于难。林彪反革命阴谋败露后，许世友同志奉命迅速逮捕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华东的几个死党，为人民除了害。（新华社 1985 年 10 月 30 日讯）

楚歌：《猛将许世友安然度文革》

一

1966 年 11 月，北京红卫兵浪潮席卷全国之后，上海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安亭卧轨拦车。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他先斩后奏，擅自表态支持造反派，把上海市委推到了对立面，完全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但张春桥的阴谋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直接为“一月风暴”埋下定时炸弹。1967 年 1 月初，张春桥、姚文元在幕后指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大权。接着，南京的造反派也夺了江苏省委的大权。来自全国全军的造反派云集南京，一夜间，南京街头贴满打倒“许大马棒”的大字报。第一批大字报，对许世友还算“温和”，但造反派很快升级，抄了许世友的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而这一切，又得到了张春桥的支持。许世友躲进大别山，但危险并没有过去。在张春桥策划下，造反派给许世友定了调子：许世友在延安就要杀毛主席，搞暴动，现在他又要做六省一市的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许世友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很快，毛泽东南巡到了上海，明确表示要保许世友。毛泽东说，他没有谋害我嘛，我把他从（延安）监狱找出来的嘛。毛泽东还叫张春桥坐空军的飞机去接许世友。许世友恨透了张春桥，他认定北京有奸臣，第一奸臣就是张春桥。这回毛主席派张春桥来接，是毛主席的意思？还是张春桥的阴谋呢？路上被他害了怎么办？

许世友想了又想，不见不行，见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和张春桥在房间里单独谈了十多分钟，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许世友借机溜到隔壁，关紧门窗，压低声音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我对主席忠心耿耿，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杀，你们帮我办两件事，一是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二是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不等对方答应，许世友匆匆走了。

二 一路平安到了上海，许世友与毛泽东足足谈了两三个小时。一见面，毛泽东说，世友啊，你还好吗？许世友二话不说，扑通跪倒在地，磕了很响的一个头，放声大哭。满腹的痛苦都在这滚滚的泪水中。毛泽东连忙把大哭的许世友搀扶起来。许世友说：“天下大乱，从未乱到这种程度啊，军人手中的武器连烧火棍也不如了，这是什么世道？毛主席啊，你该管一管了。你知道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吗？”毛泽东顿了片刻说：“世友，我信任你，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你还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不许揪许世友，这是我的意见，我派人打电话给他们，你回去也传达我的意思，你看这样行吗？”“不，什么时候打仗，我什么时候下山。”“那你先到北京学习。”许世友还是没有同意。他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不一般，毛泽东批示对萧华（总政治部主任）要保，但萧华仍被抓了，家也被抄；“720 事件”后，毛泽东请陈再道和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到北京谈话，最后还是被关起来了；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和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也先后失去自由……

虽然有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当面承诺，许世友已经不敢相信，还是返回了大别山。

三

“文革”愈演愈烈，全国开始揪“军内一小撮”。1967 年 1 月 3 日，刘志坚（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被江青点名打倒。1 月 11 日，贺龙成了“大土匪”，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被阻在中央政治局的门外。彭德怀、黄克诚、王尚荣、袁子钦等被抓走；北京召开了十万人批斗大会，陈毅、贺龙、李达等被公开批斗，聂荣臻、徐向前也“榜”上有名。7 月底，总后大院召开 5 万人批斗大会，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许光达、杨勇等 20 多名军队高级将领。

造反派有人撑腰，连中南海、国防部大楼都敢冲，各地的军事机关更不在话

下。许世友情绪非常不好，经常喝酒，声言如果有人揪他，他就开枪。

南京来了六七百名造反派抓许世友。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进不去，他们就赖在墙外。到了造反派手里，不死也要扒掉几层皮。许世友挥着子弹上膛的美式左轮手枪，大喊：我可不客气了，谁敢冲，来一个枪毙一个。但是这么大的京西宾馆，除了许世友，只有韩先楚随身带着枪，一两把手枪怎么行？许世友坐镇中间大厅，把皮定均、韩先楚等将军和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就地取材，把宾馆的热水瓶灌满开水，集中在两个楼梯口，同时关闭电梯，只要造反派冲到楼上，就扔“水雷”。准备好了，许世友电话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并请他们转告毛主席，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我不怕，抓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开枪！周恩来深知许世友说到做到的脾气，马上派傅崇碧跟元帅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撤回南京。傅崇碧事后说，要不是周总理工作及时，那一天非出事不可。四 很快到了“二月逆流”，老师们成了批判的对象。张春桥黑手遮天，许世友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虽然事先得到造反派要冲击军区办公楼的情报，但戴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紧箍咒，正在召开工作会议的许世友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他无奈地给韩先楚打电话，说我们现在是走在山谷里，两面下来的石头都能打着我们，我们却是谁也碰不得，只能挺着挨打。落到造反派手里，只有死路一条。许世友下定决心，宁可跳崖，也不能进“虎口”，老子惹不起他们，还躲不起吗？

他带着手下爱将陶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和聂凤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一起躲到无锡太湖边上的小镇荣巷。躲到小镇荣巷的军部招待所 40 多天后，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员在一起，目标太大，风声传了出去。无锡军管会打来紧急电话，说南京来了几百名造反派，扬言要活捉许世友。无锡又呆不住了，许世友边骂边翻地图，看了好一会儿，对军长尤太忠说，这里紧靠上海不安全，我还是到大别山去。安徽六安至金寨间的独山，30 年代我们红四方面军在那里打过好几仗，那里的地形我熟悉。一旦造反派追到那里，我可以上山打游击。许世友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说到大别山检查战备工作。许世友叫陶勇和聂凤智和他一起走，可是这两位爱将不想跟着许世友犯“错误”，执意回去。果不出许世友所料，他们回去都惨遭

迫害。聂凤智受尽各种污辱，被打掉 8 颗牙齿，甚至被装进麻袋，要扔进长江。要不是许世友派警卫营半路“打劫”，聂凤智必死无疑。陶勇更惨，1967 年 1 月 21 日，被害死在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的井中，遗体还被打上黑叉。陶勇的 8 个孩子中 4 个大的参加了工作，4 个小的跪着求许伯伯救命。一片哭声中，许世友的眼睛湿了，说你们就是我的孩子，不管外面说什么，我要管。我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还是当兵吧(当年不招兵)，我的部队招兵。许世友把包括他自己孩子在内的 40 落难子弟统统“锁”进“红色保险箱”。

五 许世友指挥吉普车开了一天，顺利开进了大别山。到路口，他跳下车，前后左右仔细观察了地形，命令机枪封锁，说谁敢登这个坡，格杀勿论。造反派追来，看见黑压压的枪口和“军事禁区，不得靠近”的大字，只好虚张声势地喊几句“打倒许世友”的口号，乖乖地退了回去。许世友“名正言顺”住进了一二六医院(南京军区的后方医院)。他给中央军委发了第二封电报，说他神经性呕吐，顺便到医院住院治疗。他知道，电报发给中央，让张春桥那些内奸看到，等于向造反派公开了自己的行踪。许世友不敢怠慢，登山头看地形，拟订武装自卫方案，在医院内外布置好部队，时刻准备战斗。

狡兔三窟，大别山深处有三个军队单位。几天后，许世友搬到五局，晚上又突然搬到军区工程兵工区。许世友对工区主任柴树林说，什么造反派?土匪流氓!一旦被他们捉住，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工区人人都要拿枪，一旦造反派来了，咱们打一个小规模的淮海战役。柴树林说，首长，上边再三强调，开枪……行吗?许世友一愣，转口说当然，上边的规定还要执行，真要开枪还要经中央军委批准。这样，过几天你派人到六安向军管会打招呼，要他们说服造反派，不要随便冲击工区和医院，不然碰到我老许的枪口下，叫他们站着进来躺着回去!

好家伙，竟敢武装对抗造反派。第三天晚上，中央文革的电话“杀”了过来。许世友说，我有错误，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把我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审查可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污辱，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中央文革横行一时，但此时借给他们三个胆子也不敢进大别山。

六 1967 年 8 月，南京借批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的“东风”，正在筹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批斗许世友的十万人大会。9 月 1 日，周恩来打电

话给江苏造反派，说中央要保许世友，这是毛主席的指示。9月底，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许世友，说毛主席请你来北京参加国庆。自从“文革”以来，许世友一直对北京敬而远之。晚年他病重，怎么劝也不去北京住院。他说北京是政治漩涡，路窄人多，我吵不过他们。他深知自己火药筒的性格，一点就炸。表面看许世友是大老粗，直线思维，实际上心非常细，警惕性非常高。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刺杀后，许世友的警惕性更高了。医生用压舌板给他检查口腔，他以为是凶器，甩手就走，连病也不看了。许世友在住宅大院的东北角设计了一个两层“炮楼”，整个院子都在眼里。1966年11月12日，南京军区召开“文革”动员会。平时开大会，许世友总是念一两页稿子就扔开，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官兵的欢迎。这一回，他原原本本地照着稿子念，念完后马上闭嘴，不再多说一句。军区常委开交心会，许世友说，把心交给别人，还能活命？许世友早就看出“文革”来之不善，要留得青山在，只有天高皇帝远。周恩来怕许世友不相信，叫陈锡联跟他讲。周恩来深知许世友和陈锡联的生死之交。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曾三过草地，一次遭遇敌人，许世友抱起机枪就扫，陈锡联把许世友推到一边，抢过机枪，刚打一梭子，就负了重伤。许世友挑了30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抬，说陈锡联要有闪失，我枪毙了你们。陈锡联对许世友说，我们都在中南海，你也来吧。许世友保证，我一定去北京。你报告总理，我身体不好，爬也要爬上飞机。1967年国庆节，许世友被毛泽东请上天安门城楼，谈了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这在文革中非同一般，表明许世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也不敢再找他的麻烦。之后许世友住进中南海40多天。每天没事，与李先念、陈锡联、余秋里等一大批避难的老将在棋盘上“杀”得不亦乐乎，过了一段“打仗”的日子。1968年1月28日，周恩来为许世友上台大造舆论。他接见江苏省军区和地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要解放干部，三结合要有领导干部参加。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时说，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是最主要的，他们已经检查或改正军队在支左中犯的“错误”，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许世友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很重大的功劳。这一点必须肯定。3月20日，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许世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

友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江苏省境内的各种造反组织，并在一份文件上批：
谁再造反，先杀后报！

2011 年 9 月 18 日初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10）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十节 广州军区解散省革联

本节资料

一、省革联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全家学语录》

在收割晚造期间，广东省恩平县横陂公社横平大队严村第一生产队的社员，订了一条公约：禾地塘晒的谷没有收起来以前，社员饲养的三鸟一律不得放出来。一天，不知是那家的鸡闯出了笼子，走到禾地塘里去了。社员罗仙，以为是别人放的鸡，便把自己的鸡也放了出来。社员们看见了，意见很大。有人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罗仙的丈夫郑栋。

当天吃晚饭的时候，郑栋对家里人说，咱们先学一段毛主席语录，再吃饭。然后叫他的一个儿子领读。儿子读一句，大家跟一句：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读了语录后，郑栋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可是，今天我们家却违反队里的公约，把鸡放出去，吃了集体的谷。这是什么思想？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吗？”罗仙不好意思地说：“鸡是我放的。今天早上，我看到禾地塘里有几只鸡，以为是别人放的，便也把鸡放了出来。这说明，我还有私心，没有学到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她的儿子郑盛准接着说：“妈！你这样做可不对呀！就是别人放了鸡，我们也不能放呀！这就是自私自利。”罗仙虚心地接受了儿子的批评。

郑栋见妻子认识了错误，高兴地说：“今晚我们结合实际学习毛主席语录，学得好，用得好。现在咱们开始吃饭吧！”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对冲击广州军区各造反派的命令
命令（一）

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

我人民解放军应该坚决捍卫和执行最高指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昨晚部分同志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和无命令自由抓人打人，是直接违犯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的，是一种错误行为。广州军区坚决维护军委命令，是完全正确的。希望你们分清是非，立即离开军区机关营区。

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昨晚所发生的事情，纯属于军队内部的事情，请你们不要介入。请你们自觉捍卫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立即离开军队营区。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十七时三十分

命令（二）

一、军队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今天下午十七时三十分军委已经下了命令，要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你们没有执行，现再命令你们立即撤退。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立即向北京打电话或派代表来北京解决。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二、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广州面临港澳，情况非常复杂，希望你们提高警惕，不要介入这场冲击，应该坚决拥护最高统帅的八条命令。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二十时三十分

（来源：根据台湾《中共研究》编辑部编《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台北：1973年4月出版）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关于了解广东省委领导干部情况等问题的批语

一总理：

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

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黄永胜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

毛泽东 二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二 总理： 同意这样做。 毛泽东 二月廿八日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毛泽东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报告后写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广东方面同志有黄永胜、陈郁、赵紫阳、陈德（当时任广东省军区政委）、区梦觉等七人。 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阅后，又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2） 赵紫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三政委。区梦觉，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 （3） 陈郁，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广东省省长。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广州市警备司令部宣布对广州市公安局实行军管
 军管布告宣称：

一、军事管制之后，必须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保护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二、军事管制小组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支持公安厅、公安局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贯彻“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实行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建立以毛泽东思想统帅的非常革命化的无产阶级公安机关。

三、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的全体革命干、警和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必须在军事管制小组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坚守各自战斗岗位，认真履行职责。对于抗拒军事管制，消极怠工、擅离职守、自由行动、违抗命令以及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者，则一律依法惩处。

四、从军事管制开始之日起，外部群众组织派驻公安厅、公安局及其所属机构的代表应立即撤离。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冲击和扰乱军事管制的公安机关。外部群众，一律不要到公安部门进行串联。

五、全市革命人民，各革命群众组织，应积极协助军管小组和公安机关维持社会秩序。革命群众对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有意见，可向军管小组反映处理。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擅自抓走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

市公安局宣布军管一小时后，省革联驻公安局监督小组，即交出了小组的印章。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

当天下午 3 时，广州市隆重召开有部队、群众组织、干部代表五千多人参加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大会。

黄永胜在大会上讲话，他说：“今天这个会议，是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正式宣布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从今天起，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全省，对全市实行军事管制和统一领导。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我们表示最热烈地拥护！最坚决地贯彻执行！”

黄永胜公开批评了省革联：“省、市人委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广东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得较晚，革命左派还需要在斗争中成长和联合起来；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站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就把一个省的大权轻率地让给了‘省革联’的一小撮人，而‘省革联’在接权以后，又唯我独‘左’排斥革命左派和人民解放军，抵制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这不仅妨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而且也对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黄永胜宣布军管的任务是：

“一、坚决贯彻执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的作用，积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早日实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建立起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胜利地实现夺权斗争，彻底地完成斗、批、改的任务。

“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掀起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生产的班子，狠抓工农业生产的关键性措施，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工农业生产计划，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坚决反对和彻底肃清反革命经济主义。

“三、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坚决反对右派，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彻底粉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逆流，保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正常进行，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黄永胜、刘兴元、詹才芳、温玉成、陈发洪、邱国光、江燮元、阎仲川、任思忠、吴富善、吴瑞林、陈德、黄荣海、王道全、邓秀芳。主任黄永胜，副主任刘兴元、陈德。

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组织小组、宣传小组、无产阶级专政小组、文化革命小组、文教小组、统战小组。生产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计划小组、农林水小组、工交小组、财贸小组、卫生小组。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黄荣海、江贤玉、阳震、罗兴洲、张鸣夫、鱼鉴、高宋卿、汤林、徐良、江田。主任黄荣海，副主任江贤玉、阳震、罗兴洲。

省军管会部队干部总人数为 1519 人，军职以上八人，师职 44 人，团职 253 人，营职 315 人，连职以下 899 人。市军管会部队干部总人数 132 人，师职以上 14 人，团职 27 人，营职 52 人，连以下 39 人（不包括在省军管会内）。

全广州一片沸腾，“毛主席万岁！”“向解放军学习、致敬！”“热烈祝贺省、市军管会成立！”的口号声，响彻全城。拥护和支持省、市军管会成立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贴满街头。各群众组织举行五花八门的庆祝活动，到军事机关、省、市军管会报喜的队伍，络绎不绝，仅当天晚上，就有 21 万人到省军管会报喜。

刚好在广州访问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也兴致勃勃地跑出来接见报喜的群众。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广州市军管会发布第 1 号布告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广州市自 1967 年 3 月 15 日起，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

事管制委员会，在广东省军事管破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全市实行统一领导。为了贯彻执行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第 1 号布告的要求，必须：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依靠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把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踞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二、坚决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生产的班子，组织和领导好生产。当前首先动员一切力量，大力支援春耕生产，多、快、好、省地完成工业生产计划，积极搞好财经管理、交通运输和市场供应工作，保障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需要。

三、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做好治安保卫工作，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对过去清理回乡而又窜回城市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应坚决清理回农村，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之下，进行生产劳动。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治安，破坏生产、交通和扰乱市场者，依法惩办。

四、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决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翻案，违者，必予制裁。

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把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彻底。

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以及回乡生产的干部，都应当遵照中央指示，迅速离开广州市，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好春耕生产。

七、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希望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提高警惕，坚决支持和维护军事管制。对那些抗拒与破坏军事管制者，依法惩办。

八、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把广州市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努力奋斗！

此布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军管小组陆续进驻各重要地区和单位。

单位名称	军管时间	军管小组人数
省委办公厅机要局	3月15日	5
花县	3月15日	30
从化县	3月15日	16
文冲造船厂	3月25日	15
省航运厅	3月29日	34
中科院中南分院	3月23日	10
广州海关	3月26日	13
南方日报社	3月30日	7
省水产厅	3月30日	17
第二轻工业厅	4月2日	7

（三）中央处理广东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主要内容是：

一、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

二、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了派往交易会的工作人员以外，不要另外组织人员去交易会参观。

三、所有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和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在交易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

四、在交易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来商人的宾馆、旅店张

贴大字报。

五、交易会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不要再作变动。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的讲话

同志们、革命战友们：

首先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战斗敬礼！

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问候你们！（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今天偶然的机，把我带到广州来了。现在，我把来的原因给大家讲一讲：

明天就要开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了，今天我就来讲一讲这个问题。中央很关心这件事情，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了个通知。我与外贸部的造反派商量，因为情况比较紧张，他们要我来，我就下定决心飞来了。来了以后，已跟参加广州交易会的造反派战友们谈过一下，但是，小范围谈的，广大的造反派战友们没有听到，这是个抱歉的事情，所以又下了个决心，把你们请来了，现在向你们解释这个通知，借这个机会将有关问题加在里边也一起讲一讲。

这个通知是发给广东省军管会的，并发中南财委、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

现将这个通知的第一段念一下：“今年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四月十五日开幕。这届交易会是在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抓革命促生产获得巨大成绩的大好形势下举行的。因此，一定要把这届交易会开得更好，一定要通过交易会把我政治上、经济上的崭新面貌体现出来，以扩大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谣污蔑。为此，中央要求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师生和红卫兵、革命群众以及参加大会的工作人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做好工作，共同努力开好这届交易会。”

前言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讲这届交易会是在什么情况下举行的。去年秋季交易会是在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时举行的。今年的春季交易会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举行的。

第二点是在抓革命促生产取得伟大成就的大好形势下举行的，这就要联系目前的形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十个多月了，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推动了运动开展，特别是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转了聂元梓等七个同志的大字报，一声炮响轰动了全国。这张大字报轰动全国后，各地纷纷跟着起来，首先在大专院校进行“四大”，接着机关、企业、事业、工矿也起来了，形成第一个高潮。由于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个时候占据了五十多天的领导地位，派出了工作组，全国各地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内都派出了工作组，正象八月五日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说的那样，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实行白色恐怖。这时，毛主席在外地审查了一些大字报，看了一些中央文件，马上回到北京，撤销工作组，召开十一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和通过了十六条，宣布了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从那以后，北京几个中学组织了红卫兵，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形成了红卫兵发展高潮，从北京到全国各地，从学校到社会，后来发展了，又有个大串连，林彪同志称为“五大”。以后展开了两条路线斗争，十月一日林彪同志在国庆节报告以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不断的宣传报导，形成了第一个阶段两条路线的斗争高潮，持续了三个月，揭露和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认识错误，已经作了检讨，但是有的还不甘心，负隅顽抗，这又形成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斗争，后来，又采取了经济主义的新反扑，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要给予回击，

后三个月比前四个月展开了更深入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说这三个月的斗争是全国阶级斗争全面展开。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是从上海以工人为代表的十一个组织（后来又发展到三十多个组织），发表了二个通告，一个是反击经济主义，十条措施，一个是夺权宣言，上海工人不愧为工人阶级最大的队伍。又被毛主席发现，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宣布了，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到现在所说的全面的

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个新阶段，斗争浪潮席卷全国，不断发展，拿这两个阶段作比较，第一阶段是发动的阶段，把红卫兵青年突击队的精神带到全国，带到社会、机关、企业、工矿、农村、部队军事院校和文艺单位，都卷起来，大串连，形成了“五大”高潮，进行了两条路线斗争，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了三四个月之久，这个是组织力量的形成，是夺权的准备阶段。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不改。群众觉悟提高了，工人力量就在这时候显示出来了，对经济主义新反扑进行反击，因此，提出了夺权，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改的顽固分子（实际上已经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一伙）的权夺过来，这个斗争不是轻而易举的。全国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了，就应回到原地区、原单位进行斗争。从毛主席号召大串连到徒步串连，到过北京 1200 万人，有个时期在京停留人数 300 余万，那时，一方面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检阅，另一方面参观、取经，学习交流经验，回到本地区把运动搞起来，北京的同学和一部分干部也到各地串连，把各地的运动串连起来，相互促进，相互帮帮，相互作用，形成了全国性的革命力量，这就不需要大串连了，而应回到本单位去进行斗批改，集中力量批判斗争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问题上各地还有些争论，但总的趋势是肯定了，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了，但不平衡，有些地方力量大，有些现在还小，有的组织比较早，有的组织比较晚，但革命总要靠自己，所以，毛主席下决心，宣布停止大串连，包括徒步串连，和取消今年四月春暖后恢复串连的决定。如果继续大串连，势必影响斗批改。运动起来反而不相信自己，过低估计自己，过高估计别人，好象非要别人不可，这是不符合各地发展情况的。某些地方发生些问题，北京红代会派一些人去是可以的，但不需要大串连。今年我们是要通过大批判进行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临时委员会，这一阶段斗争比前一阶段还要艰巨复杂些。以造反派为核心，是基本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最后达到团结 95%以上的广大群众。要帮助与考察革命干部，也要逐步做到团结 95%以上的干部。

需要人民解放军支持。去年有个错误通知，军队不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个运动来说是不可能不波及和影响军队的。我们部队是劳动人民的

子弟兵，与劳动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又怎能不介入呢？所以，毛主席提出，军队要介入，坚定的支持革命左派，依靠左派实行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军队的支持是新阶段的新因素。

夺权斗争既然是尖锐、复杂的，靠什么呢？毛主席说要依靠三种力量。

第一要相信和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这是基本力量，是一切革命智慧的源泉。通过直接号召——报纸社论，中央文件、大字报抄传把全国几亿的革命人民发动起来。这是史无前例的，浩浩荡荡、空前伟大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是解放全国的武装力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及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如果说去年第一阶段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年以后就是参加与支持夺权斗争，参加与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对解放军来说，这个任务是光荣的艰巨的。现在任务很多要支左、支农、支工。广东春季插秧要在清明后谷雨前全部插下去，没有解放军的支援和动员学校、机关、居民参加这个任务是不可能迅速完成的。部队下工厂宣传文化大革命、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了潜在力量，使工业生产节节上升，甚至有些工人前一阶段耽误了生产，觉悟提高后带着家属去加班；有些工厂生产成绩是很大的，听说十天完成一个月的任务，这是群众创造的奇迹，这样的力量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抓革命来的。去年十二月中央下达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宣传这个十条即是思想挂了帅，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工人潜在力量发挥出来了。

军管是一种过渡的形式。一些地方造反派起来，还未采取一致行动，几种意见未达成协议，或者几派意见还未分清楚，特别是干部亮相不够，与以前错误没有严格划清界限和彻底决裂，干部不易结合起来，夺权、三结合有待于做准备。为了恢复革命新秩序，所以实行军管，现在的军管与解放初期的军管是不一样的。解放初期我们接管了国民党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保留旧人员，那时还有反动分子进行活动捣乱，对他们还要管起来。现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十七年了，十七年来……也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有些敌人钻进来，拉出去，党内也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也要夺权，以前斗争是自上而下的发动，农村清匪反霸是夺权，五反有些人被腐蚀了，成了代理人了要夺权，三大改造是所有制的改变，执行社会主义所有制，五七年反右，六二年批判右倾

机会主义、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刘，邓思想。十中全会上主席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63 年搞了社教、四清这一切都是夺权，有些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夺权。现在我们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所以，去年从下而上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次搞得最彻底，是全面的夺权斗争，同时也是艰巨的。依靠群众的威力，把党内一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炮轰，轰不一定准，不准也没什么，不对也不要紧，可以帮助他改正缺点错误，不准改了就是了，但轰准了就很有效，就是很大的功劳。群众的威力是无穷的，逃不了的。在此期间，革命胜利进行，生产增长，要恢复执行，建立革命新秩序。军管是过渡的，军管后地方上还要继续进行四大，发动群众，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革命的三结合。

尤其是边防地区，四面受敌人围攻，除越南是兄弟邻邦外，从海上说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印度反动派、苏修、蒙修也在窥伺我们，处于这种情况，必须要有巩固的国防。广东是边防地区，还有两个口，香港、澳门可以自由出入，它们随时可以钻进来，要依靠群众和军管建立革命秩序，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军管是促进大联合三结合，不是推迟，更不是代替。

第三要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革命干部。干部中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是因为刘，邓炮制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了毒以后，干部受了影响和蒙蔽，一下子扭不过来。现在要帮助他们，要与这条错误路线决裂，划清界限，从历史上揭发检查刘、邓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实，这样来锻炼我们的干部。这一条是根据革命历史总结出来的。

第二阶段要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斗争水平，要好好的思考，不能停留在第一个阶段了。我们的主要矛头应首先对准党内头号和二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主要火力集中对准头号和二号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我们就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文章里提到的是七大开始到现在二十二年来提了个纲，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还要靠全国广大群众，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同学，因为你们是放假闹革命，你们有时间调查，领导干部从亲身的经历中揭发。这样夺权才能彻底，使我们党的领导权真正的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必须做好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才能更好进行夺权。那么，仅仅集中一、二个人，其他是不是就放过去了？不会的，揭发批判一两个人，必然联系到地方上一小撮，

联系到本单位，看看那些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造反派是遭到迫害的，是处于反抗批判的地位，保守派受蒙蔽也是受迫害，受了蒙蔽后“保”了，两方面必须讲清楚，沟通了，也就明白了，造反派应该欢迎保守派的同志起来革命，对犯了错误的干部，我们还允许他改正，我们应允许群众犯错误，也允许他们改正错误，同时要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承认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使他们增加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仇恨，就能团结起来，这个团结是有基础的，是有原则的团结，不是和稀泥，不是合二为一。批判应有核心，批判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联系本地的，广大群众才能串连起来，目标明确了，共同进行斗争，才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这样才能团结 95%以上的群众，否则，革命大联合只是少数。联合是政治行动，争取多数，在思想一致基础上团结，但并不是联合了就没有保守思想了。联合的形式，一个学校只保留一个组织，如清华井冈山有一万多人，我对他们的负责人蒯大富同志说，你们要注意，你们组织这样大，组织内就有左、中、右了，过去是外部，现在是在内部展开斗争。有的，也可以几个不同观点组织同时存在，树立对立面也好。政治上团结了，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统一是暂时的，矛盾会不断的发生。统一后又会出现新生力量，又是少数教育多数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断循环，不断发展，人民内部矛盾是对立的统一，这是主席的精辟辩证法。这是个法则，敌人愈打愈少，我们愈打愈强。（注：这一段意思记录不很清楚）

刘少奇、邓小平所以错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他们却要保持新民主主义的秩序，所以，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矛头应当向上而不应向群众，群众是团结的对象，不是打击的对象，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对干部态度问题，已经有多篇社论了，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有两种偏向，打倒否定排斥一切，这不是群众的创造，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者创造出来的，工作组进校后把原来的党委干部都靠边站，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干部及领导瘫痪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责任不在群众，群众是公道的。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干部听说要三结合了，就急于要结合，忘记了清算自己的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从领导上来的，但是，你执行了也有错误，要和错误决裂，彻底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大的当权派，也要和自己的错误告别，在实际中经受群众

考验，批准。否则，变成都返回原岗位，恢复旧秩序，那还不是资本主义复辟。革命就是要前进，不前进怎么行，要建立新秩序，领导干部有的要撤换，有的留下来监督使用，有的要调动，有的提升，这样干部才能有新的血液，加上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再有解放军参加才能有新气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掌握的牢靠。这是百年大事。两种偏向中当前主要防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逆流。解放军参加了三结合是建立革命新秩序的保证，三结合才能牢靠。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因此，从集体的意义上说，解放军是最可信赖的力量。当然，并不是说解放军部队的领导者是不犯错误的，任何战线的负责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我们应该相信，他们错误是会克服的，人民解放军是集中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只要中央一抓就可以解决了，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即使发生了青海事件那样的问题，一到北京事情就很快解决了。赵永夫逮捕起来，把受压抑和委曲的人平反了，军民关系还是非常好，说明人民是热爱军队的。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失败，挑拨是非，把斗争矛头引向群众，指向解放军，指向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许多地方有这样的征候。本来这些领导干部是很好的，但也有矛头对准他们，如山西的刘格平同志，山东、黑龙江、贵州，更不用说上海和北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夺权斗争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大家都没有经验。这三方面都可能犯些错误的，新的领导是可能有缺点的，解放军领导干部也会有缺点的，但不能照抄，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各地要揪赵永夫之流，不根据客观情况出发，而是照抄，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在北京接见了许多省分的同志情况都是不同的，安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拨，军队上了当。

夺权，毛主席曾说过：今年二三四月份可以看出个眉目。全国 29 个省、市（天津划为中央直辖市）都实现夺权这不可能，全国明年才能看出结果。这个问题很复杂的，不是所有地区都要夺权，有个连锁反映，都要试一试，要很好考虑，区别对待，并不是每一个省市第一书记都需要撤换。机关情况就更不同了，国务院各部的权，比如外交部的外交大权是属于中央的权，不能夺，监督，这要说清楚的。夺权的时间要长一些，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这是运动的总的形势，形势是大好的。

抓革命促生产，搞了七个月，结果工农业生产超过任何一年，粮、棉、油、糖等都超额完成任务，工业、交通除一、二项外也是超额完成任务的，特别是交通，去年负担繁重任务。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各方面的任务都完成的很好。今年第一季度进行了夺权斗争，主要是经济主义搞新反扑，造成了一些暂时的损失，但由于中央的号召和工农群众的觉悟，事情很快的扭转过来了，三月份情况转变了，我们相信今后三个季度一定可以补足。广东一季度生产是增长的趋势，广东有更好的条件，更会夺得更大的胜利。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形势很好，一定要将这一届交易会开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抓革命促生产获得巨大成绩的大好形势体现出来。广州接近港澳很多人要到广州来看看，他们到我国南方的最大城市来看看，广州要反映出全国的形势。这个月的交易会，我们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战役要把这仗打好、开好。参加交易会工作的造反派，已经保证要打好这一仗，我们相信，广大革命派的战友、革命小将们、工友、农友、革命干部、同学也一定会保证打好这一仗。

我们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是为了进行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把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保证国家不变颜色，不变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主要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为了团结几亿人民象一个人一样，进行备战，一旦美帝国主义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来我们便坚决粉碎，彻底消灭它！

你们不是问毛主席身体怎么样吗？我告诉你们毛主席身体好得很！（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又问我们副帅的身体怎么样，我告诉你们，我们副帅身体也很健康。（欢呼：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

在毛主席健在，林副主席辅助得力的时候，敌人进犯便更可以消灭得干干净净。

正因为这样我现在要联系的谈一谈国际形势问题。出口商品交易会要体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上经济上的新面貌，扩大影响。

支援越南反美战争，只有我们是全力支持的。今天真正能抓住美帝国主义痛打的就是南越，南越只有 1400 万人口，面积只有一个浙江加上半个江苏那样大，却拖住了一百万反动军队，美国侵略军除了海空军外有四十三万人，今后还有增加的趋势，南朝鲜伪军五万人，共五十万，南越伪军号称七十万，实际只有五十

万人，南越坚持战斗，越南人民在胡主席的领导下，他们的豪言壮语，不管打十年或者廿年都要打下去，一定要消灭美帝侵略军，统一越南南北方。他们的英勇壮志我们是钦佩的。越南南方解放区的人民战争比我们的抗日战争发展了，一个人打十个人，自力更生都是很好的。但也需要我们支援，除了中国支持外，其他国家是不过问的，现在侵越美军超过了朝鲜战争时的人数，而且还要增加，在朝鲜战场上南朝鲜伪军是主要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军队，土耳其也可以打一打。南越主要靠美国侵略军，他们是少爷兵，装备很多也很重，可是不经打，占据一个据点，什么也都得靠直升飞机运去，连吃水和洗澡水也得要运去，他们怕血吸虫。越南的天时地利对他们也很不利，天气潮湿，地利呢？水网地带，蚂蝗、蚊子，疟疾横行，马蜂和蝎子也很多，美国兵到越南都受不了，一百多人中有廿多人生病，住院的占美军人数 25%，里边有真病和怕死装病的，但是，南越人民有个嗜好，专门爱打美国兵。时间对越南人民有利。战争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打不下去退出越南，一种继续打下去，扩大到东南亚，整个印度支那，进攻中国，两个前途。妥协，可能性不大，但不排斥。南越要打，人民要解放，别人不能作主。支援越南人民是最大的国际主义任务，除了物资援助外，外汇援助最有力。

总之，这次交易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的成绩表现出来，对应尽的国际主义任务搞得更好，中央提出的要求，交易会的几项通知已有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共同努力，把交易会开好。

现在我把这个通知解释一下：

“（一）为了集中精力搞好交易会，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可在交易会结束后，有计划地组织几天参观），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这只是一个月的时间，去年在大串连时期，外地参观安排到晚上，现在大串连停止了，也不能这样了，如果再搞晚上参观，又会引起很多人到广州来，这个事情不应重复了。现在有这个征候，冲火车的，抢上火车又有了，这是不好的。影响运输，过去有个时期黄浦、湛江、上海、天津等几个港口，货物堆积，运不出去，现在情况改变了，堆积货物现象没有了。这样做不利于革命运动，比如派几千到北京去，一个观点，派一个人去就行了，去年是组织运动初期，接见后讲一讲，满意的回去了，现在不一样了。要谈夺权问题，坐下来谈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如我们谈内蒙古问题就谈了二个半月，昨天才解决。如果还

是那样就影响国际信誉。现在北京要求出来串连又有个苗头，红代会跟我讲，我当时说个别事情可以，一松口又纷纷出来了，这就不符合我们协商的意见了，我与造反派也谈过，你们掌权了，对维持正常秩序也有责任，工作很忙，安排不好，抓了业务，忘了政治，只管政治，不管业务也不行了，政治，业务要结合的很好。现在是新阶段，新水平来要求大家。

本地的要参观，可以在闭幕后组织几天，不招待外地的了。

“（二）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了派往交易会的工作人员以外，由于广州接待任务繁重，不要另外组织人员去交易会参观。”交易会外的人不去参观了。

“（三）所有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和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在交易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可在交易会结束后进行补课。”

一个月非常紧张，面对着各种客人，客人也要一分为二。按照外贸政策办事，资本主义国家平等相待，欺负我们，搞鬼都不行，如果他腐蚀干部，我们就要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有些国家是不行往来的，美国、南非、以色列、葡萄牙等，除美国外，其他几个都是根据国际协定办事的，我们是遵守应尽的义务。对外商也要一分为二，有些是完全为了做买卖，互通有无，平等互利。也有友好商人，如日本和东南亚商人中有些是与我们友好的，对华侨商人也要一分为二，有一些是唯利是图的，把我们的出口商品换个商标转卖赚钱的，也有爱国商人。要区别对待。一般的互通有无，平等相待；对友好爱国商人，要给以优惠。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爱国商人要多做工作，中日友好的做工作可以起作用，甚至西方有些商人受了影响也可以多做些工作；有些成见很深，思想反动的，做工作也不起作用，不要勉强，我们就不做，要把这些工作做到友好商人身上就能够起作用。我们还应该学会毛主席的基本功，用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方法宣传好毛泽东思想。工作业务很忙，工作以外还要学习，还要讨论问题，这就没有时间再搞“四大”了，要搞四大就要影响工作，如北京有个例子，服务人员在开饭时候辩论起不同观点来了，争论不休，放下客人也不管了。这一个月要打大仗，暂停一下，以后再补课，没有什么损失。今年水平要比去年水平提高。一般也不实行内外串连，工作忙，个别访问搞些调查是可以的，但大串连是不行的，妨碍工作，

听说这里有个静坐运动，你们如果去参加，不知道要坐几个小时，那就影响工作，如果要表示支持，可写张大字报派人送去表示同情就可以了。外面去串连，也会影响他们的工作。

“（四）在交易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来商人的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

下午就提出要求了。再次提出要求不要贴，对外商也不要送大字报，对象是外商，个别谈话效果更好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搞自己，所以，这个方式对外国人不适用。我们提出要搞革命新秩序整市容，要求大字报大标语贴得好一些，看来这就不大容易啦！再有个连锁反映，北京有什么这里很快也有了，北京揪什么人，这里也要揪什么人，这就没谱了。

“（五）交易会安排演出文艺节目，是经过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审查批准的，不要再作变动。”

我们批了二个革命现代戏：一个是智取威虎山，一个是奇袭白虎团，二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地方要搞小节目，各派意见不同，你不准我演，我不准你演，为了避免争论小节目都不演了，如果节目不够，就把交响乐团沙家浜调来。

“以上通知，可由负责同志向交易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并向有关革命群众组织做必要的说明（不要张贴）。 ”

现在我来作说明。因为中央很重视这个事，所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个名义发。

本文讲完了，现在再讲讲另外的问题。

第一讲讲群众运动。夺权斗争，斗、批、改，主要矛头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针对他们的反动言行，批深、批透、批臭，要全部力量进行。去年六、七月份刘、邓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偶然，对他们的东西不系统研究，就不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清楚。今年三、四月开始了实质性的批判，从“清宫秘史”到“修养”，批判系统了，但这还不够，大革命以来刘少奇的言论那是很多的，资产阶级系统思想散布到各个报告，系统揭发，批判，对于我国进行深入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很有必要了。刘少奇在四九年发表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三月毛主席在西北坡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决定，要限制资本主

义的发展，指出全国解放后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而不久刘少奇就讲，中国资本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剥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就是高小毕业生看了也会感到愤慨！民主革命时期因为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左派的政党，只有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是代表买办阶级的，蒋介石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一点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就连他党内也有人讽刺蒋介石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所以，在马列主义发展的影响下，要革命的、反对蒋介石的都跑到共产党内来了，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进来不少。一大批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有民主主义思想，而无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参加到我们党内来，刘少奇是个老党员，他就是这样的党员，资产阶级思想根本没有转变过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出来不久后，他就违犯了，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即是社会主义的开始，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刘少奇却要搞另一个过渡，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剥削，不是限制它。有那样一伙，不认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如果相反，就要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毛主席早就指出：在廿世纪，不可能搞起资本主义国家，土耳其“基马尔”只有一个。可是党内有许多党员很不清楚，现在就是要在群众中进行斗争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高认识。现在的问题是要在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革命靠自己，群众未发动时，我们有发动的责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起来后，由他们自己做主了，否则：就是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一个城市内，交流经验是必要的，正确的，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思想言论，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带有共同性的，我们都是受毒害的，应在一个战线上，共同批判，达到新的团结。

组织问题也应按口，按行业，不应该跨行业。跨行业只能是革命委员会、红代会，不错，现在临时权力机构以革命造反派为基础，保守派改变的也要有一定的人参加，但不要占优势，造反派不但在政治上要占优势，还应取得领导地位，今天会场上两派都有，我们不是合稀泥，中央要我多留一天，帮助广东解决一些问题。

大批判中矛头对着谁？应该共同对着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过去受蒙蔽，现在彼此说穿，造反派有功，保守派有错误，造反派应该站稳立场，人家改正错误就应该欢迎，保守派承认错误站回来，就很好吗！因此，组织上不应该再跨行业组织，成立政党式的跨行业组织，就成了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了，如荣、复、转、退军人组织，要在全中国发展，去北京请愿，当时，南京已经有一个报告，林副主席已做了三点批示，其中一点就是不同意成立全国性组织，因为各单位都有人，都可以回到基层单位去参加革命组织，如果需要统一登记的，可以由民政部去做。有些听了的，取消了，有些不听的，改名换姓，搞红卫军、红旗军，犯了错误，有的做了好事的，也都取消了，安徽合肥的红卫军是支持造反派的，做过好事，夺权后受了压制，解散了，现在为他们平反了，但跟他们说清楚，做了好事情的也不恢复了。还是要解散。我不了解广东的组织，比方说，一个单位有几个组织，有的叫“八三一”，有的叫“东方红”（随便举例这样说的），都到工厂各地去发展组织，这是不对的，应该取消这样的组织。初期，我们提倡学生去工厂，去点火，但今年情况不一样了。如夺权时，铁路局夺权，学生是不应该参加的，已经参加的，我们不要责备，任何人也没有经验。林副主席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要看很多文件，工作比出面的更忙、更累）。你们经验不足，就帮你们认识错误。

夺权十全十美的，不可能没有缺点。夺权也是有反复的，不要因为一次夺权不大完全，就把夺权否定了。不要绝对化，毛主席是最反对绝对化的。

革命群众组织集中归口是必要的，基层单位是不是马上都回到各班、各车间？战斗小组可以回班，回车间，科室里面，上面有个领导机关，这样有好处。目前的状态是这样的为多，为好。归口是毛主席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革命前进有利，但如何归口，同志们还要回去研究。

第二，对待解放军的问题。对待解放军应该尊重、信任。对个别的错误，可以用善意的态度，提醒，进行批评。如广州日报登了错误的文章，中央文革小组四点意见，四月十一日发下来的。根据这四点指示，改进工作组织版面小组共同负责，用商量合作的办法。军管后，各项工作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但是可以商量改进，不但对报纸，对其他事情，都应该这样子，不要轻易上纲，一上纲就变成斗争对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把对解放军领导批评的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马上传到港、澳，和世界其他地方上去了。不利于人

民解放军的荣誉，造成不良影响。有意见可以采取同志式的，友爱的态度写信，派少数代表个别谈，这是革命的态度，负责的态度，这也是最光荣的任务。

第三是对干部。需要利用原有的干部做工作，只要他们和反动路线决裂，划清界线，深刻检讨，我们就应该欢迎。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斗争经验，好的就发扬，错的就改正，不然工作就难以继续。我们应帮助他们认识错误，站出来，更好的工作，领导经验就发展起来了。领导经验是必须的。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将所有干部都恢复到原来的岗位，这是不容许的，那就是复辟了，就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付诸流水了。但总需要有群众的推动，军队的启发，帮助他们亮相，使他们站出来工作是必要的。属于那一类的问题，现在不要先定调子。

广东的革命三结合、大联合条件怎样？现在是逐步成熟，我接触了全国廿九个省、市的一半以上省、市，条件都是逐步成熟的，就是象上海这个首创的地方，据张春桥同志介绍经验时，也曾说还有很多问题。如上海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领导的，后来学校一参加，就发了宣言。革命造反派占了优势，开代表会，成立全市的临时机构。北京、天津，（中央属市）正在搞试验，以后北京，天津就发展到先经过由下而上的发动，有领导的经过红代会，这样时间需要长些，但是酝酿就更民主。不论需不需要夺权，都要搞“三结合”。

看问题不能绝对化，不能简单化，不要夺权对了就是革命的，夺权错了，就是反革命，看待一切事物，绝对化是不对的。

革命派的战友们。广东的运动并不落后，发展是晚了些，但也可以迎头赶上的。我们国家在世界上，都可以迎头赶上嘛！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上呢？要有这个信心。坚持原则，你们是能够经过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然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不用太长的时间了。我号召你们，要迎头赶上去。

军管会是要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最后齐唱《大海航行舵手》。

附注：此件仅根据两位同志所做的原始记录整理而成，未经和录音校对，因此错漏之处可能不少。仅供同志们参考，不要张贴大字报，不要引用并请听过报告和听过录音的同志予以校正。

（来源：1967年5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4）》）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很久没有到广州来了。我首先向在座的、在场子里的广州军区直属队的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群众热烈鼓掌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你们问好！（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昨天向广州市的大中学校代表、红卫兵小将们和机关的革命造反派，还有工友农友们谈了一次话，今天下午已经向你们放了录音了，你们都听了，不要再重复这些话了。刚才看到军区政治部收集了你们的意见，那么多意见我怎么回答呀！我想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大家问，现在国内外形势大好，应当怎样看？特别是国际形势，应当怎样看？第二个问题关于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五大工作中，有什么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一个问题，主要谈谈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国际阶级斗争，当然很复杂很尖锐。但是，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应该从复杂尖锐的斗争中抓到要害，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本质。抓住中心环节，就会了解国际形势的概况。目前，国际阶级斗争的中心环节，即主要焦点是在越南，因为那个地方进行着武装斗争。现在全世界的注意力都看着越南，在越南战场上打着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除了越南以外，虽然在非洲，在拉

丁美洲，也进行着一些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但都是比较小规模。美帝国主义正是在越南这个战场上被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撤退，还是继续把这个战争打下去，扩大到东南亚，一直扩大到中国？这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越南的战争，对敌人来说是一场侵略的战争，对人民来说是一场反殖民地的战争，人民战争，民族革命战争。这样一场战争，不仅关系到越南人民的命运，印度支那人民的命运，亚洲人民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命运。这话是不是夸大了一些呢？不是！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看一看越南南方这块土地，面积仅仅是十五万平方公里，不晓得广东省是不是十五万平方公里？（黄永胜司令员插话：广东二十万平方公里）。就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地区，上边住着南越人民一千四百万，可是，他们抗击了一百万的敌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四十三万美军，这个数目还要继续增加；还有以南朝鲜为主的仆从国家的军队五万多人。这两项加在一起接近五十万。另外，就是美帝利用的南越傀儡军队，号称七十万，实际上五十万左右。总共加在一起一百万。这就是说，越南南方人民十四个人要抗击一个敌人，进行人民战争。

这个战争，大规模发展起来是在最近两年多，武装斗争开始是在一九六零年。头两年，越南南方人民几乎没有几条枪，人民拿起锄头来，拿起刀斧来，跟伪军，跟美国的顾问进行武装斗争，这样发展到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就渐渐地形成了人民的武装部队。美军直接参战是在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柯西金经过北京到河内去会谈的时候。正在这个时候，美军大举轰炸越南北方，跟着派正规部队在越南南方登陆。苏修新领导集团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在美帝国主义狂轰滥炸之下，吓破了胆，没有进行抗议、示威，所以就使美帝国主义敢于公开地大举出兵南越，轰炸北越。就在这两年内，美国侵略军从几万人增加到二十万、四十三万人，今年到年底有可能增加到七、八十万。越南人民对付这个世界上第一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毫无畏惧，越打越强，各界了经验，摸到了战争的规律，摸到了怎样在强大敌人压境的时候，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式的人民战争。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战役上，在一个地区，以多胜少，不断地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最近在美国关岛会议将开幕的时候，威斯特摩兰这个侵略南越的总司令，动员了一个师几万人去进攻西贡西北部（他认为是南越人民解放军的指挥部）。战争的结果，人民军队的指挥部

没找到，美军被消灭了一千多人，而人民武装只牺牲七十多人。这一仗打得好。南越人民武装就是高度地集中兵力，分割敌人，然后歼灭大量的敌人，而保存了自己。

南越人民在劳动党和胡主席的领导下抗战，处在一个最困难的环境。海路是没有办法支援的，陆路要通过所谓胡志明小道，辗转地才能送到需要的弹药、补给，因此送到南越的东西数量总是很少的。但是敌人的困难就更大了。拿美军来说，一个人每个月要消耗三吨东西，一年要三十六吨东西，拿五十万人来计算，一年就要运输一千八百万吨东西到南越。你们想一想，这个运输量多大！如果按一万吨一条船计算，每天就要五条万吨船进港。尽管美帝国主义在南越千方百计地开辟港口，也是没法子满足这个需要的。而美军打仗，又离不开后方供应。它在一个地方空降一支部队，紧跟着就要送一切补给，从弹药一直到喝的水，洗澡的水都要送。因为怕喝了脏水生病，怕洗澡水有血吸虫传染。那个地方天时、地利、人和都对它不利。天气如是雨季，常常几个月阴雨连天，蚊虫疟疾、水、马蜂，都和它作战。你们想一想，五十万美军，在供应上就有这么大的困难，那么，准备它扩大到一百万吧，也不过是一百五十万敌人。它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南越的战争有一条规律，美军来得越多，越不想打仗，伪军更不想打仗。而美军如果没有伪军帮助带路，就成了瞎子、哑巴。因此，美军越多越分散，就越容易打，它的士气就越低。据越南同志们说，美军比日本军队、法国军队都不如。所以现在南越人民有这样一句口号：“专找美国鬼子打”。这样，美国即使出兵一百万，也不能解决南越问题，更不要说扩大战争了。一百万的美军需要多少的供应呢？如果五十万人需要一千八百万吨，那么加一倍就要三千六百万吨，就是每天要送十万吨东西到南越港口。除此没有别的办法。把轰炸机改为运输机，也戴不了多少东西，而且路途又那么远。即使用日本作它的后方补给地，也供应不了这么多。你们想一想，这样一个地区的战争就把美国抓住了，而美国后方呢，单单直接作侵略南越美军后勤工作的，现在需要一百万人，就是说五十万人在前方，后方直接作供应运输的要一百万人，间接的还不算。如果将来增加到一百万，后方就需要二百万，合起来等于三百万人直接参加了战争。所花的经费呢，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的预算，单单用在越南战争的是一百三十多亿，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预算用了二百四十亿。可以想一下，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直接用在

越南战场的经费,决不会少过四百亿。这就加重了美国劳动人民直接间接的负担,国内的内债也就渐渐上升,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现在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的宣传,总是说战争快结束了,不敢说扩大了。因为南越一个小地方,就把号称强大的美帝拖住了,要花这么多的经费。如果战争再扩大,就要增加兵源,扩大供应,增加预算,其他方面都要受到影响。在南越前方一百万,后方就要二百万人搞运输供应,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东南亚,扩大到中国,怎堪设想呢?前方五百万,后方直接服务的就要一千万。如果把后方间接地为军事生产服务的人员都加在内,就更多了。美国怎么能作这样一个动员呢?现在在美国人民中间,在劳动人民中间,在革命的青年中间,反战的情绪日益增长,反对侵略战争的口号,到处宣传着,动员着。美国政府面临着明年度的总统选举,一九六八年究竟如何过这个关,现在是没有把握的。美国关岛会议的结论说:在南越打着一场“令人烦恼的、漫无边际的战争”。大家还记得,一九五二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盛行着这样的说法,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个口号是美国人叫出来的,结果一九五三年他不得不结束这场战争,打不下去了。如果说朝鲜战争只能打三年结束,那么美国在南越已经打了两年半,将来扩大侵略的话,能够继续多久呢?如果继续打下去,那他更加陷入泥坑里,没有出路。最近,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泰勒将军,后来在南越当大使又失败了,回国退休写了一本书,他说根据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经验,美国人最好不要在亚洲登陆。这是他的结论。大概在亚洲打败了的美国将军,从麦克阿瑟起到泰勒,都是同一个腔调。但是,我们听到他们这样讲,有点不大高兴了。不高兴什么呢?不是说他认输了不高兴,而是说这样一搞,他不来了,我们不高兴。我们不是在准备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备战,你们不是已经手痒了吗?越南人民打得那么欢,他们反帝的革命精神的确值得我们敬佩。现在越南农村劳动的力量,百分之八十是妇女,男人多半投入各种战争准备工作。他们每个村子都组成战斗村。一旦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到北越,北越将采取南越一样的做法,每一个村子都能自己独立作战,能够对空射击,能够进行丛林战、地道战,也能够生产自给。这种战争准备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要说全国了,就拿我们沿海地区、接近越南的地区来说,我们的战备工作,从人民战争的要求来看,准备得还不够。当然我们沿海的民兵是比较好的,在消灭美蒋特务方面取得了成绩。但是

广泛的动员还没有做到，还需要加紧战备，特别是广州军区担负着更重大的任务。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五大任务，还要加上备战的任务，还有战斗的任务。因为敌人从空中侵入，从海上侵入，我们都要打嘛！这是直接的战斗任务，需要有广泛的备战。所以说，我们广州军区，从领导到指战员，到一切工作人员，都负有相当重大的责任。从这点来说，我们应该向你们表示敬意！（热烈鼓掌）

我们还可以说到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形势。世界形势，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是国际阶级斗争。今天代表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已经不是苏联，因为那里修正主义当了道。中国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着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应当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正因为这样，美帝国主义把我们看成它的主要敌人。而我们也把它作为国际阶级斗争的主要敌人。从武器装备简单的数字对比，我们可能是不及它，但是我们最根本的条件是人多过它，团结的力量大过它，大过它不知多少万倍！美国两亿人口，真正愿意为帝国主义效命的有几个呢？美国兵在南越打仗，完全是少爷兵的打法，离开火力就不知所措。美国动员入伍的都是新兵，规定一年一换。如果一年不换，下一年就动员不起来了。没有办法，只好用速成的办法来训练新兵。美国训练士兵，完全是机械性的。新兵从检查身体完了以后，穿上军衣，先是接受枪枝，练拆卸，然后练瞄准，然后练冲锋，然后练发射，然后配合其他火力作战。从班的动作，到排、连最多到营的动作吧，就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教室里，就象工厂的车间似的连起来，一道一道工序出去，就算毕业了。最长的三个月，速成的更短。他们把一个人当成一副机器，就象当年卓别林演机械化吃饭似的，流水式的。这样把人当成机器训练，如何能够消化呢？如何能熟练呢？如何能养成勇气呢？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说政治上，本来它就是被动的。美国的士兵是不自觉的，不是象我们为人民的利益。为民族独立的利益而战斗的。他们是为帝国主义卖命的。到了前方，到了越南，士兵想方设法消极怠工。害病的，或者装病的，比例就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住在医院里，疗养院里，卫生所里。再加上美军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很多守卫部队，所以真正拿出机动作战的兵力不到一半。在这一半里边又有分别，把黑人摆在前头，把白人摆在后头，这个战斗力就更差了。黑人为什么要为帝国主义效命呢？黑人当然不肯干。黑人在前面一溃退，后面的就要垮下

来。离开火力，离开供应，就缩成一团，被动挨打。就如同在训练时就训练好了一样，两手举起，乖乖投降！所以这样的战斗力，的确是兵越多就越散，士气就越低，死伤就越大。

美国不仅把国内的兵员，按照七个适合的名额动员起来了，而且把现有的国外的兵力也调动了。主要是从欧洲调到亚洲，从西德把军队一个师一个师地抽调到南越。现在的南越战场上，连仆从军队算在一起，已经有三十五个旅。这么多的兵力，在南越战场上是不是布满了呢？没有。现在的兵力布署，在西贡地区集中了十三个旅。从西贡往东北海岸走，一个海港叫金兰湾，那边到归仁，就这两头，集中了十三个旅，再往北走到岷港，直到十七度，摆八个旅。共三十四个旅，还剩下一个旅在湄公河三角洲，而金瓯半岛还没有美军。所以，他的兵力只能够在一个小堆的据点，不能离开海岸线和运输线。这样就没有法子取胜，只能吃败仗，就是再加五十万，情况也不会改观。而现在越南人民打出经验来了，懂得战争的性质，是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这个战争的特点是人民战争，敌人是反人民战争。战争的形式，采取游击战为主，必要的时候，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运动战、阵地战，消灭更多的敌人。一般的都是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地消灭敌人。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有人问：刘少奇这么多错误，为什么不早批判？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批判？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同志看问题就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把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串起来看。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是一下子从犯错误那天起，就把他的错误定下性质。除非是现行犯，那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现行杀人犯，一刀下去就定了性了。凡是犯政治错误的，都是逐渐发展的。如果改了他就好了，把错误变成反面教员了。毛主席指示我们：不仅要总结正面的经验，还要总结反面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才完全。犯错误是允许的，有时甚至于总结错误的经验也是需要的，能够总结起来也是好的嘛，其实大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也要多次观察才能定论。不能一下犯了大错误，就下棍子打死？我们无产阶级是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要把一切阶级都消灭了的最先进的阶级，所以最有政治度量。它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要改造全人类，解放全人类，自己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这是无产阶级的心胸嘛。推翻了资产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彻底解放自己。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话。毛主席常常讲，最近还讲这个问题，最近在一个介绍军训的批语上，又引了这段话。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无产阶级的心胸是应该宽广的，应该从各个角度来考验每个领导人。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时候，团结了包括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一方面要和他作斗争，一方面团结他，为了推行革命运动。巴黎公社主要成员并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共产党，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等等。但是当巴黎公社起义后，马克思马上表示支持，并不因他是别一派而不支持，总希望他能搞成功。失败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列宁当着党内争论的时候，他团结了一切赞成和支持他的人，所以变成了一个时候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在一次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上变成多数，以后又变为少数。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夜，决定十月革命起义的时候，党的政治局加米涅夫、季若维也夫，这两个政治委员出卖了革命，他们在党外的报纸上泄露了起义日期这个机密，等于是叛徒。他们承认错误后，列宁还把他们留在政治局里头。托洛茨基参加了十月革命，他并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也他吸收他在俄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里头，差不多整个列宁在世的时候，政治局里头是几派的，不是都跟列宁思想一致的。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差不多十年以内，都是按照列宁的路线，团结这些不同意见的人。经过激烈的争论，这些人承认错误以后，都容纳下来了。这说明判断一个人，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考察，斯大林也曾经在民族问题上犯过一次错误，他自己承认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一书中所批判的孟什维克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后来也承认了错误，他说列宁的指示是对的，列宁那时说的是真理，而他自己当时等于一个鬼，说了完全是反动的的话，现在承认错误。斯大林还是把他容纳在共产国际里做工作。这都是允许的。对犯错误的人，你还得经过多次考察，这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斯大林在苏联宪法公布以后，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熄灭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一切党内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而且都是来自国外，通通说成是人民公敌，这个当然不妥当，所以肃反就扩大化了。在中国毛主席的组织路线、干部政策一向是马列主义的，而且有发展。思想斗争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团结——批评——团结，成为党内斗争的一个规律。对于犯「左」倾路线错

误的人，毛主席用这个政策，对于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也用这个政策。即使是解放以后受高饶集团影响的和彭黄集团影响的，都是采用这个政策，这样就孤立了反党头子和犯有严重错误而又不改的头子，而多数人争取过来了，这使我们党能把民主革命斗争领导到胜利，现在又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是经过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的。譬如拿刘少奇来说，他的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遵义会议以后到「七大」以前，十年之间，就用了三年功夫整风。当时整风是在战争的年月中的进行的，只能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而且当时在高级干部中，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算多，真正学习毛主席著作，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也不多。所以就要通过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这样做，就是好同志了。当时看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犯错误较少，甚至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是一般的说，现在应该再深一步地看这个问题了）。相反地，当时把刘少奇看是白区工作的代表，他也以白区工作「模范」自居。邓小平当时又成为江西执行「左」倾路线中受打击的人物，当时「左」倾路线所反对的，在名称上叫做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古×。后三位都牺牲了。唯有邓小平还在，又居首位，结果他就变成了好象是个正确的了。因此在「七大」以后，对这两个人不得不给予信任，很自然地要给予信任。并且在「七大」的党章报告中，刘少奇提出要学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在那个时候当然要给予信任。这就说明，对刘少奇、邓小平需要进行二十多年的考察，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能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以后还会有报告。我只是提醒一下，刘少奇的错误是逐步发展的。戚本禹同志从《清宫秘史》这个电影说起，追溯到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讲具体内容。如果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就是「七大」以后，日本投降那时间，原子弹出现，有许多人被原子弹吓倒了，当时连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震动，生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写了那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说一个时期不会有反苏战争的，反苏战争是一种借口，真正受美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是中间地带。这个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那篇文章实际上是毛主席通篇改过了的，只是发表时还是用陆定一名字。编《毛选》四卷的时候，我们对陆定一说，最好你写个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他根本不吭声。因为这样一来，他的面貌

不早就暴露了吗？毛主席一向不愿意强加别人，既然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了，现在又把它收回不好。毛主席不赞成我们的意见。当时就是那么一种情况。后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昨天讲了这个事，毛主席那个时候到重庆去，完全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中国共产党要争取和平，要暴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一点。因为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战，你如果说他不是抗战的人物，有人不信，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暴露。但是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少奇九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第二年一月发表了一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

日本投降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

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少奇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

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

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组织报告。这两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个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忘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后许多年的事实我就不说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我们许多设备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这时正如庐山会议决定所说的，引起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别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社会主义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根据这个学说写了十中全会的公报。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实右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

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埋藏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作总结了。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的林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一人。最近几年，不管罗瑞卿怎么干扰，由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我们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成绩是不能抹煞的。许多英雄伟绩的创造可以证明，从雷锋、王杰、欧阳海一直到蔡永祥都可以证明，这些均出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以后的英雄伟绩，说明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一样可以出英雄人物。精神可以变物质，如果人人学雷锋、王杰，人人学欧阳海、蔡永祥，我们人民解放军更举世无双、世界无敌了。一旦帝国主义敢来侵犯我们，解放军完全可以配合广大人民，依靠广大人民干净的消灭来犯的敌人。这是完全肯定的。像林副主席这样经过考验的领袖，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们不在法律上肯定下来呢？所以去年召开十一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犯错误的经过多次挽救已经不行了，另一方面，经过考验的全党全国全军所信任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当然就应该推选出来。毛主席的这个组织路线，干部政策，完全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按道理讲，这样一个党内的斗争大问题，应该专门来讲讲，我今天把它作为三个问题之一来讲，没有法子讲得太多。我想这个问题你们有这么多司令员、政治委员，要他们讲讲嘛。我仅开了头就是了，我看可以结束了。

（来源：《刘少奇问题资料专辑》（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原载1967一九六七年11月29日《红战报》第15号（广东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大联合总部主办）；《华夏文摘增刊》（www.cnd.org）第三九九期（二〇〇四年十月十八日出版）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市各组织代表座谈纪要

总理：今天来开个座谈会。先认识一下；华工“红旗”来了没有？你们是造反派。

（了解华南工学院各组织情况。华工红旗介绍情况略。）

总理：本来解决完交易会的事就走，既然来了，不接见你们心里也不安，留下就过问一下你们的事情。……（问到华工共有多少班，华工代表答不上来）进入斗批改了，还不知道全校有多少班？看来你们是毫无斗批改的诚意，学校的情况也不关心，斗批改也是大方向之一。……（谈到各派之间、一派内部之间都有对立），这是自然的，尤其是青年。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对立统一规律嘛。不能把所有的思潮对立都看成两条路线斗争，两个阶级斗争，太严重了。（问华工红旗）你们的方针如何？今天来向你们学习，请教。（华工红旗，继续介绍，略）

总理：在赵紫阳假让权的时候，你们怎么样？

华工红旗：我们与“东方红”是共同战斗的，但后来出现一些流言蜚语。

总理：赵紫阳让权实际是逃避责任。你们（指华工红旗）没参加，很好。我们当时在北京听说你们“夺印”，都很可笑，没有权，先夺印。听说后来只好把印送军区去了，谁也不要。

华工红旗：我们对赵紫阳的阴谋是揭发斗争的。

总理：很好。三月份中央处理了这件事，纠正了，实行了军管，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华工红旗：在冲军区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你们没有冲军区？（华工红旗：我们当时请罪……）军区没有让你们请罪。（黄永胜、陈德：没有。）

华工红旗：可是社会上压力很大，我们开门整风了一个多月，请罪几次都通不过……

总理：黄永胜同志在北京时，那时还有赵紫阳、陈郁、林李明、陈德、冠庆延……我们谈到夺权的问题，冲军区的问题，都没有提到你们，他们（指黄永胜、陈德等）认为你们是左派，这是肯定的，这个我要替他们说话。

华工红旗：（继续发言，略）

总理：群众之间的斗争，不要一下子就上纲，这样就庸俗化，要分清主次，要把表面现象和本质区分开来。大方向不能受干扰。（又问了关于班级大联合的情况，对红旗代表说）你是不是一直处在领导地位？是否经常下去？可不要脱离

群众，有些领导同志从思想上就和群众运动对立，他们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一些是不自觉地对立，对他们要帮助，我们做领导工作很久了，你们才十个月，年纪轻轻，就这样了，回到群众中去是不容易的，象毛主席那样，是不容易的。我们脱离群众久了，回去就很难，所以犯了错误，要允许他改，对军队的同志也是如此，领导工作做久了，要给他一个摸索的时期，取得经验。不要斗争矛头一动就上纲，这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希望你们培养好的工作作风，传至后世。（问红旗代表）你们对另两派的看法怎样？

华工红旗：我们认为与“八·一八”之矛盾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斗争到底。

总理：是不是每个问题都能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华工“八·一八”：我要发言。

总理：好啊！我今天就是请两方面都来，不能只听一面的，毛主席的方针就是要听不同意见。……各种思想都允许发表，这是大民主。

华工“八·一八”：我们认为“红旗”不是造反派。

总理：哦！他们“三面红旗”是攻守同盟，你们要攻破？

华工“八·一八”阐明自己观点（略）。

总理：我们年青时比你们幼稚得多，你们现在好多了，在毛泽东时代。年青人犯错误是不奇怪的。我不象你们，上纲。可能这是你们的优点，原则性强。

华工“八·一八”谈到有人说，党、团员多，干部多，保守性就强。

总理：对这种理论，我部分地同意，不是全部同意。党团员嘛，保了，以为是热爱党。（介绍了廿多年来对刘少奇从信任到揭发的过程……（继续听）看来你们要承认初期保。……（讲到“北京来信”中第一个观点，“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以外都可以轰”）这是陶铸的观点，他当时到处讲，很得意，流毒全国。……（讲到对“地总”“红总”的看法）工人阶级的组织，要让工人阶级自己说话。十个月来有个真理：在运动初期，学生起先锋作用，但后来就越来越看出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决定作用。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相结合，还是要犯错误。（热烈鼓掌）……有时大方向对了，也会犯严重错误（举了“南昌起义”后来失败的历史教训）你们要谦虚、谨慎。（指着华工“红旗”）他们是造反派，比较起来也是左派（鼓掌）你们不要骄傲，不要那么满足于“造反派”“左派”的名称，否则

要摔大跟头。（又举了“广州起义”的例子）

华工“八·一八”（坚持说“红旗”是保省市委的，并举了一些事实）

总理：就这一、二件事嘛，好了，你们不要再谈了，我还要接着问，三司包括多少学校，多少人？

三司：介绍，略。

总理：看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你们三司不可能包括全部的大学，也不可能只有三司才是左派，必须搞大联合。

三司：对，我们正是在向大联合方向努力。

总理：好，这就是我们要从华工“红旗”这个问题上所得到的结论。下一个，广医“红旗”谈一谈，两派都上来。

广医“红旗”：举出与其对立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群众组织及驻军代表的讲话

广州一司的同志有个提议，在我离开广州以前，再召开一个人数更多的会议。这一点，很遗憾，做不到了。十四日晚上已经开了一个相当多的人的会议了，那个会上主要谈了交易会的问题，也联系到别的问题。

我们这几天的座谈是很好的，使我受益很多。据广州军区的同志们说，这个方式在广州用得还少，当然以后可以参考采用，但也不一定要各个方面都来。我为了节约时间，请来了工人代表同志们，贫下中农代表同志们，学生革命组织的代表们，还有中南局和省、市机关群众组织的代表们，还有解放军的各级负责同志，最后还邀了中南局、省委的几个负责同志来听，是范围相当广的座谈会。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能听到各方面的意见；也确实听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见。第一天谈学生革命运动，第二天谈工人革命运动；第三天谈农民革命运动，还谈了广州铁路分局的问题，珠影的问题，和中南局的以及省级机关革命运动问题。除开面对面的谈以外，北京来的四位记者同志也找了一些同志个别谈了。他们还向我反映了一些材料，也看了你们一小部分信件和材料。也只能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的材料还来不及也不可能都看，这应该说老实话。你们当然希望我每一份材料都过过目，如果这样的话，我别的工作就得停下来。回去以后，还得把材料给主管部门，主要是中央文革，找几个工作人员分头去看，看完了搞摘要，我

们再过目。主要的我们要向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报告。这三次座谈和所有的反映，我都要如实地集中地向他们两位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的有关同志以及军委有关的同志反映。这是我在讲话前要说明的。

我十四号到广州来，本来是处理交易会的问题，准备处理完了就走的。以后主席觉得我既然来了，还是帮助军区，帮助黄永胜同志把一些问题推动解决一下。解决问题主要依靠你们，你们是群众中奋斗出来的代表；同时也依靠军区的领导同志。我只是作些建议，供你们参考。当然，我所要说的话有许多是引了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文件上的话，那是要提醒你们坚决贯彻执行的。下面我讲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国际国内的形势。

我在中山纪念堂那天的会上，已经大体上讲了。今天我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要把越南战争看成是国际阶级斗争的焦点。我们几年来都是这么看的，特别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即从一九六五年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一群人上台以后，越南战争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加剧了。首先是敌人把轰炸使用到北方，把大批的军队调入南方。也就是说，美帝国主义看准了，现在苏联修正主义插手越南事件，十分有利于美帝在越南的侵略和“和谈”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极大地考验了英雄的兄弟的越南人民。越南人民是经得起考验的。战争越打越胜，越战越强。今天报纸就证明了，在广治地区一下子消灭了美军一千五百人，在另外一个地方二百人，共消灭了一千七百多人。以游击战争为主的南越人民战争，能够这样集中地歼灭敌人，这是伟大的胜利，是在这个旱季所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我上次估计，如果说前个旱季消灭美军四万多人的话，那么，这个旱季肯定会超过五万人。集中消灭，一口一口吃掉它。用毛主席的话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就是成建制地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地消灭它，比打溃它、打散它好。每次消灭它一个指头或者半个指头，十次二十次，两个手就都没有了。我们期待着下一个旱季，今年十一月到明年五月，就是美国选举年的前夜，能取得更大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即使增兵到八十万、九十万、一百万也不能解决越南的问题，而且要输得更惨，败得更大，是个死胡同，越走越窄。要么扩大战争，进攻中国；要么认输，退出南越；再不就是拖延时间。当然，他还有另一手罗，就是压迫越南人民进行“和谈”，中途妥协，半途而废。

这个可能不排除。但是对英雄的越南人民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撤出或者是扩大，都是打乱和破坏了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所以我们需要用极大的注意力，要给予最大的援助。中国的援助，中国的支持，对越南的民族抗战，是起很大的作用的。越南的同志很谦虚，说没有中国就没有越南这样的抗战。毛主席回答说：不能这样说。小小的古巴还不是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吗？虽然，那是带偶然性的，那是美帝国主义没有预料到的。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帝国主义侵入南越以后，出现这样大的武装抗战，也是美帝所未料到的。当然，没有中国的援助，这个抗战的规模会小，时间会长，取得胜利的道路上会有更多的曲折。恐怕这样子来说，比较客观。越南人民依靠我们作大后方，我们则是支援这个抗美战争的前方。今天的越南抗美战争，很象我们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内，军内，人民中，都有民族主义的伙伴，他只是具有民主革命阶段的思想，在那时候他还是出生入死的，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军队内我们也吸收了一些起义的军队，他们不愿受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压迫，而愿意接受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就过来了。人民中更不要说了，我们联合了爱国的师生，还联合着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统一战线，应该说从人民中一直到我们党内都存在。我在插话中说过，中国只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党，一个是买办资产阶级法西斯党，一个是共产党，其他的中间党派是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才出来的。所谓需要是两党团结了，团结抗战，他们就会出来。当着两党代表两个阶级斗争的时候，武斗的时候，就没有他们的余地了，他们只好或者在旁边站，或者就出头了。这是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工党，也没有资产阶级左派政党，也没有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政党。所以，当我们民族抗战的阶段，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党内就有这样的民主主义分子。陈独秀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一开始就参加了党嘛。刘、邓也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参加了党。刘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罗，譬如他主张让一批在监狱的人用集体自首的办法出狱，窃取党的重要职位。这是另外一个性质了。我不谈他这一部分了。从思想上看，当你们更进一步彻底批判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在民主革命阶段中，不少这样的领导人，没有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或争取从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思想。这样的人还是有一些，还不少。同样的，来看今天的越南，特别是南越的民族抗战，这样的思想也一定会有的，这样

是不是我们就不支持呢？历史的发展需要经过这个阶段。如果出现这个阶段，首先应该是支持，然后要注意它的发展。不要等同起来；以为它进行民族抗美战争了，就跟我们社会主义阶段动员全国人民来准备战争一样。有共同性，就是抗美，这是统一的。但是从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世界观来说有不同。历史的发展不能超阶段，我们既是主张不断革命论，又是反对超阶段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把越南的抗战看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红卫兵、年轻的小将们，坚决要求赴越抗美，这种革命性，我认为第一应该是称赞，第二我们是不支持的，如果支持，都纷纷过去了，那我们的国界线都没有了。你们回去宣传，说我称赞了，纷纷跑过去，说是周某人讲的，那我不负这个责任。所以，我第一是称赞他们是英勇的，第二要教育他们，我们不能支持。这件事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这些年轻的闯将，如果把他们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方面来，像“主义兵”的问题，你们的弟弟妹妹，绝大多数是很可以教育过来的。如果我们不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只是责备他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批评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开导他们，使他们知道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才能使人的思想一分为二，以积极的因素反对消极的因素。

越南战争是在我们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我们应该做他们的巩固的后方。主席最近说的，中国是他们可靠的后方。我们伟大领袖说的可靠这两个字，可是一语千斤啊！越南同志听了，他们说不是千斤，是万斤。主席这句话，我们要负起责任来。为什么我放着北京那么多复杂问题没解决，却跑到广州来解决交易会的问题，而这又是个别的问题。就是因为交易会是与越南战争密切联系着的。我来是得到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的。他们叫我多留几天，顺便把广东的问题谈一谈。支持越南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全球战略中心是在欧洲，不是亚洲，因为欧洲是它投资最多的地方，也是市场最大的地方，它要跟英法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那个地方的投资利润和市场。它不能把那些市场让给英法甚至苏联。它退出，美帝国主义政策的制订者垄断资本家是不许可的。但是，由于我们支持了越南战争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它把世界能够动用的兵力都集中到印度支那来，这是它被迫的。这个战争取得了胜利，我们不是打断它的脊梁骨，也打断它一个臂膀，或者两只手。如果他不认输退出，要扩大，那我们就要准备作战。因此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既是思想革命，

是最彻底的、从下而上发动群众革命的运动，也是最彻底地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斗争，这是对国内。对国际来说，这是最广泛的战争动员、备战行动。这样，思想一致了，在我们伟大领袖的领导和号召下，对任何敌人我们都能无坚不摧，都可以消灭。我们对国际问题就要这么看，要有这样的决心。有人说现在只有阿尔巴尼亚宣传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不能这么看。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越南战争，这世界两大事件，暴露了一切现代修正主义。他们无法藏身了，他们怕战争，不支持世界革命运动，进行修正主义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暴露在世界人民当中。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在越南战场上。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争取世界上更多的革命朋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党成立了，或者从原来的党分裂出来了，世界革命人民对毛主席更向往了，对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无限热爱，这都是伟大的胜利。对越南人民的战争的支持，也和前两年不同。责备美帝的人数多起来了，应该把这个看成是最好的形势。过去是蕴藏在人们的心中的，现在逐步地迸发出来了。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我们可以团结的，现在这种人一天天增加，而那百分之十不到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那些人，他们的反革命的面目一天天暴露，这又推动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革命的决心一天天高起来。这也包含民族的觉醒，民族革命运动也包含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觉醒，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这是国际形势的有利的方面。

第二个问题，

我们国内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是宣传、动员、组织亿万革命群众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说的，是真正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真正可以依靠的，可以把人们的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旧风俗去掉，可以建立起我们无产阶级的新的思想作风，风俗习惯。从头脑里开始，也就是林彪同志所说的，我们要成为革命的力量，革命的一个螺丝钉，同时要把我们头脑里的旧的东西作为革命的对象。这样就最有力量在今天来进行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的夺权斗争；明天敌人一旦来进攻，我们就能够全部地、彻底地、干净地消灭它。宣传、动员、组织这个力量，是用什么来进行的呢？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地支持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打击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斗争第一阶段深入以后，就进入了今年

一月革命风暴，掀起全面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夺权斗争。这个斗争已经进行三个半月了。照毛主席的看法，今年二、三、四、五月，也许能看出一个眉目来；明年同期可能看出个结果来，也许更长一点时间。什么叫眉目？什么叫结果？就是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个阶段，由于敌人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负隅顽抗，坚持反动路线，进行经济主义的反扑，有机会它就要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进行全面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全面的内战，不流血的内战，也是我们红卫兵小将们说的，是不流血的人民战争。这个阶段的任务，既是思想革命，关系到每一个人；又是夺权斗争，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年二、三、四、五月，我们还只能在各地把省一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建立起来。就是说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建立起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而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时间，我们开始看得比较容易了些。现在真正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只有五个省市：上海、黑龙江、山东、山西、贵州。我们期待已久的北京、天津两个直属市的革命委员会，还迟迟没有成立。当然这两个市的工作我们又有新的尝试。上海进行的是直接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从两千多有组织的革命工人，去年十一月安亭事件起，到今年一月，不过是两个月的功夫，就发展到能够动员百万的工人开起会来，支持夺权的斗争，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济主义新反扑，这是上海工人阶级重大的贡献。但是它的临时权力机构的成立比较仓促，是直接选出的，没有经过各方面代表会议。等到北京筹备成立临时权力机构的时候，毛主席就考虑到有可能通过召开各方面都参加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会议来实现，首先尝试在北京，然后尝试在天津，开工人代表会议，贫下中农的代表会议，大学的革命造反组织代表会议，中学的革命造反组织代表会议，天津还加了个机关革命组织代表会议。由于毛主席的提示和启发，这些会议三月前后都已经开了。不过，尽管代表会议开了，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宣告成立。为什么呢？这里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初次的试点不一定会完全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五个省市的夺权斗争，也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大体可以分为五种类型：一种是已经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第二是即将成立的，象北京、天津，或者还有个别省；第三是曾经夺权的，但没有夺好，发生了严重错误，造成领导机构瘫痪，只好实行军管，通过军管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三结

合”，还有一些边疆省、区，也实行了军管；第四种是准备实行军管的；第五种是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的。大概分这五类。过去我们也曾做过部署，我记得二月初的时候，在第一次军区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就说过。那时分类是：七个已经成立或将要成立“三结合”权力机构的（把北京、天津算在一起），加上有十个准备要成立的，这就十七个了；还有两类，一是实行军管的，一是准备实行军管的。那是二月的方案。实践的结果把我们原来的方案推翻了，要修正，这很自然的。毛主席的思想一贯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绝不拘泥于方案，拘泥于计划。计划是主观与客观结合订出来的，但常常是主观的想象多，行不通。行不通，改就是了。这是毛主席的精神。根据目前的形势，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到五月底是不是能全部解决？现在看来是慢得很。广东已实行军管了，要通过大批判促进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可我这次到广东来了五天，看出这个形势还会有反复，不是那么容易。这只是一个省呀，才二十九分之一。我们在北京，一个内蒙古问题谈了两个多月才解决。所以，五月底是不是能在各省、市、区看出眉目来，有可能还要推一推。至于地、县，那就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下推罗。所以要到明年，一直到公社那就要到明年才能全部实现。还有中央各部，我们本来企图最好能做到以革命组织的代表为基础，结合中级革命领导干部，上层革命领导干部，通过批判，自我批评亮相，得到群众同意的站出来，实行这样上中下三结合。不行的话，就派军事代表进去，实行横的三结合，以革命组织代表和军事代表加上各级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群众同意。这种三结合或者叫文化革命委员会。既然叫做部门的，那它就不能全面夺权罗，就是领导文化革命，监督业务，某些单位也许可能领导业务，组织个业务班子。这要看具体情况。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三个多月了，还没有摸出一个典型来，有的还要经过反复。所以到现在机关文化革命的决定还不成熟。同样的，今天上午听机关代表说的，广东机关文化革命先进行了一步，可能在时间上革命组织成立得早一些，但是做起来还是很复杂，在会上反映的他们争执的意见不下于学生的革命组织。但是这种反复，我们应该认为这是摸索一次新的经验，创造一次新的经验，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上海的工人和其他的革命组织首创进行了夺权斗争，以后也有反复嘛！各届代表会议，革命组织的代表会议，张春桥同志两次到北京说，不是那么容易，也是争执不休的。毛主席把问题看到了，说是明年二、三、四、五月，或明年上半年才能看出结果，或许还

要更长一点。主席在这方面是留有余地的, 这是有道理的, 有根据的。但是又必须说明, 必须定出计划, 你总不能老拖下去。大概我们同学们觉得, 这个倒好, 最好再长一点, 再放一年假。你们可以放一年假, 工人同志、农民同志就不赞成呀, 军队同志也不赞成, 我们机关的同志也不赞成。我们抓革命还要促生产, 促业务, 促战备, 促工作, 我们不能放下来, 而且你们也不能长期这样子, 不搞本单位的斗批改呀! 世界上最长的罢工就是省港罢工了, 就是英勇的光荣的香港、广州工人的罢工。省港罢工从一九二五年五、六月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七年才基本结束。我们学生闹革命, 放假一个时候, 中学原来说放到暑假, 后来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改成复课闹革命了。这是根据经验的总结, 需要修改嘛, 不能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中央或者同国务院, 或者同中央军委, 或者是中央文革小组, 或者是中央几个单位联合签署的东西, 就是一成不变的。有变的, 有的原则不改, 要加以补充, 加以丰富。这是根据实践的斗争前进。我们必须要有个程序来推动。但是, 这一点无论如何, 一句话,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到底这句话我们一定要认识, 一个是现阶段的, 我们把全面的阶级斗争和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进行到底。进行到底要有个期限。到时要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 按照革命的新秩序来进行生产、工作(当然没有完成以前也要进行生产业务), 抓革命, 促生产。比如学校实现斗批改, 实行新的学制, 新的教育方针, 新的教学方法, 这都要告一段落。可是人们思想上的革命, 决不能说两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就能搞干净, 那是长期的, 长期就不能天天这样子闹。现在是狂风暴雨, 急风骤雨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 告一个段落以后, 那就转入和风细雨的办法。但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大民主的生活, 四大的权利, 四大的民主可以经常地进行。有时就会象波浪式的起伏, 由比较不是那么猛烈的进行, 到了一定的时候又会起采。这是不断革命的思想。决不要相信这一次的彻底的革命就那么彻底了。永远不会的。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一直推广到全世界, 都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 共同地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那个时候还有新的革命, 新的思想革命, 肃清剥削阶级的思想残余, 肃清旧的习惯势力。那个时候所谓旧的, 大概包括我们现在所谓新的在内。还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 新的与旧的斗争, 还有其他的斗争, 人民内部的, 还对自然作斗争, 还有科学实验。我们这样一想, 眼界就开阔了, 心胸就开阔了, 敌情观念就明确了。我

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支持什么，打倒什么，什么是敌我的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就会清楚了。

不同时期敌情的内容也有变化的。在民主革命阶段许多是我们的同志，他可以在进行民族民主斗争的时候和我们站在一起，到时候也可以付出生命。可是留下来的，象我们这些人，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思想跟不上，立场站错了，如果说在民主革命阶段即使犯路线错误坚持不改，他还可以在集中统一领导之下打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没有触及他的私有制，可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不可能了。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得很清楚了，一旦我们取得全国胜利，民主革命阶段胜利了，就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个时候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你如果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还是想发展资本主义，那就是敌对的思想了，从我们无产阶级观点来看，这种思想就是反动的了。所以路线的斗争也就成为革命路线与反动路线的斗争。这就跟民主革命阶段不同了，这就需要以彻底的思想革命才能把他转过来。

毛主席历来主张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这个原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所以在对待干部问题上，说了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界限本来就清楚了，如果是，就不能够争取他了，不然，主席还加了一条，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还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允许他们将功赎罪，这个界限就很宽了嘛。就是批判从严，处理还是从宽。合乎主席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我们看，主席说我们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要允许人家改过自新，将功赎罪，如果他愿意改的话。顽抗不改，累教不改，那当然最后是在打倒之列，但总是把敌人缩小到极少数。我们集中力量打垮最主要的敌人，然后再有新的敌人起来又继续打。争取多数，孤立少数，打击主要敌人，各个击破。我们要这样的认识。现在这个问题是发展不平衡的。

我刚才把这个全面阶级斗争和夺权斗争的情况说了一下。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主席提出我们依靠什么的问题，朋友敌人都弄清楚。到底我们依靠什么？主席讲三个信任和依靠，就是相信和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最后团结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是基础，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支柱，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革命干部，我们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最后争取团结到百分之

九十五。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当然要经过教育斗争的过程。这是我们所相信和依靠的。毫无问题，要在最高的领导毛主席为代表的执行无产阶级硬是被打了。那样对待我们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这两个同志，我都保了的呀！说了话的呀！的确，群众就是这样子。我们没有过分责备群众，但错误确实严重，你不能不承认错误，那有那样的斗法，打的几乎休克嘛，邱会作有心脏病嘛，（黄永胜同志：我们肖副政委也休克了，连氧气都不给输）这也是一个大的经验教训罗。（大笑）

第三个问题，

三月初，我们实行军管，执行日子是三月十五日，到我来的时候不过一个月，这个时间也出了几件事。这几件事是不是都把它扭在一起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逆流呢？在我看不能下这个断语。（热烈鼓掌）

当然这个事情要有解释。我有什么根据呢？我有个比较嘛，你办事总有个标准嘛，你不能那个地方说是，这个地方说不是，那就变成不公了，或者说一切都说不是，那不是变成和稀泥呀？那我不能做这个事。

第一，你们说的四大事件，在军区还找不到这样的文件，把四大事件罗织在一起说谁要参加这四大事件的就是反革命。如果这样说当然不妥罗。至于军区底下的干部和执行军管的个别人说过这样的话，那他自己负责，应该批评他，他应该检讨错误。所谓四大事件，就是“1·22 夺权”，1·25 在公安局反夺权，还有个冲广播电台，最后一个，就是二月七号八号冲军区。就是这四件大事。所谓四大事件我开始弄不清什么叫四大事件，后来搞清楚了，从你们学到东西了。（笑声）四大事件每个事件都有它的特点，不能把这四大事件等量齐观。有的事件是有联系的罗，有的没有联系，当然当时整个空气是有联系的罗。如果军区的正式文件中拿出四大事件作为革命、反革命的标准当然不妥罗。因为“1·22 夺权”大方向还是对的，这夺权的方法当时的作法是极严重的错误，逐步地脱离群众，又上了旧省委的当，我看还是上了当，没有经验，急于夺权。这是全国的影响，恐怕我们在北京的讲话也算一条吧。当时我们在人大大会堂，中央文革宣布，我站在舞台上说嘛，对你们也起了催促作用，我们要负点责任。二月七、八号是另外一个问题，冲军区，地方同志也没进去嘛，除了个别的刚才说的以外。所以这个

情况也不同。公安局夺权是另外一个情况，先夺权的是外来的进去的，而且还有北京政法公社参加的，军管后证明他们在那里的的工作，做得是不大好的。这个不责备他，我们还是把他送走了，安全送走了嘛。因为对地方来说，他们的个别措施是会引起公安局群众不满意的，但是对他来说他不知道轻重嘛，不能怪他嘛。因为北京政法公社夺了北京公安局的权嘛，你们北京来的几位同学晓得嘛，他们是证明。这里有没有政法学院的同学呀？（答：没有）哎，来了就好了，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夺了权，我们的谢富治副总理当时让他们看一看，我们报了中央也是等一等看，结果他掌不下来这个权。因为他夺了权要掌权，结果他掌权了，周围就包围他罗。过去我们想把内部的造反派搞起来，到了他掌权以后，全部的内部一致对外，来一个消息说，那个地方欺负派出所了，他们就去支援，结果跟群众造成对立，上了当了。后来搞了一个月吧，我们看也是不能继续了，还是军管，结果政法公社也支持，这问题很好地解决了，因为我们做了工作。现在没有那个去责备政法公社，他自己取得了经验，政法公社在外地也是取得这个经验。因此，广州的结果也必然要军管的。我们的确有这个意思，如果当时公安局内部的造反派和外部的造反派去试一试，把那个坏人揭发出来也好嘛。不过不容易。譬如天津被坏人夺取了权，反而好人受压迫，最后也是走到军管，把坏人抓出来。另外公安局过去长期受彭真、罗瑞卿的控制，虽然我们有很好的部长谢富治同志，但是他因为去得晚，同时他这个人的工作守纪律，对原有的人没有根据不好换他的，所以彭、罗的影响还是很大，所以有一部分坏人就暗藏下去。这次逐步地揭发出来，这是一大收获。但这还要靠本机关内部的揭发，也不能急，要逐步地揭。夺权以后反夺权，这是另外一个性质，必须要长期才能够揭发出来。所以这次我没有要公安系统几部分来讲话，将来你们做报告好了，这部分是复杂的事情，我知道一些，但是不完全清楚，我是拿北京、天津做例子来说的。广播电台刚才说了一点了。广播电台的问题，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广播学院的几个同学揭露出来的，本来是支持造反派的，摸了以后证明这两个少数人的造反派不仅成份不纯，主要是作风，他的做法、方向都错了。北京来的广播学院同学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站在它对立的方面，发动了群众，群众把他们揭开来了，是这么一个情形。至于二月七、八日的事情，刚才说过了。所以这四种情形不能够等量齐观，虽然是一时期互相影响。这么一个情形，军区并没有因为这个情形把它作为标准。尤

其是二·八以后，虽然有请罪的事情，这个倒也不完全是军区要求，我在中南海就晓得，我叫他不要请罪，他们来的时候，还要送个请罪书，说我冲了中南海了。冲中南海的事情原来是一直没有提的，这回中央发的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决定，上面才说了叫大家不必看成太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冲中南海，每一次我们劝他们走了以后，我再见他们都是送上请罪书的，你叫他不送他还要送，你退还给他，他还是要留下来的。实际上也不完全是提倡，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提倡请罪书嘛。你们不信，我那里收的请罪书，有一大篓子，你总不能说我要他请罪的，我从来没有宣布这个事情。冲中南海六次，这一次才把它计算下来，天津两次，郑州一次，北京几次，也包括荣复转退军人。最凶的是荣复转退军人，拿汽车一冲，就冲进去了。他们冲中南海的目的，就是要求你见他。第一晓得你不会怎么样他，所以他就试一下子。我们中南海的警卫部队，的确是照我们规定的几条，就是：第一不动气，他怎么骂也不动气，第二不动手。骂不回口，打不回手，打伤不开枪，最后说，同志们哪，你们打错人了，我们是毛主席的解放军，你最后会承认错误，会懂得是错误的。凡是用这个方法说服，多数是被感动的，再打不出去了，手也放下了，他也不搞了。但是也有那些人他不管，他还是要试一试，最后总是把我们迫出来见一见。但是这个不能说中南海如此，别的地方就一定出来就不受整，不挨揍，不敢说。你看嘛，冲军区时肖副政委出来，他就不行呀！他出来受了整了。的确情况也不完全相同，我觉得应该客观一点。因为我在的中南海，中南海有毛主席，我一句话就把他说服了：难道你还要冲毛主席所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吗？这句话一说，他就闹不下去了。你这个广州军区排老几啊？他才不管你。（笑声）你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他说你是自封的，（笑声）他还闹起来。所以这个情况不能完全等同，不然我们就不公了，是不是？这一点要说明。我觉得广州的情形比别处还是好一些的。四大事件没有把它作为革命反革命的标准，但是底下确实有人这样讲，是不好的。这一点我希望偏于保守的，好心肠的，好象维护党的利益和军队利益的同志，拿这四条作分界线还是不对的。如果军队干部里头有说这个话的，应该承认这是错误，我们应该承认嘛。应该向群众交代，这事我们坦率得很，承认错误就算了嘛，你不承认错误就揪在那个地方嘛。我现在正式宣告，这个不能作为分界线，是错误的。这是第一。

4

第二，来了个《颠倒》的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个东西也是到广州学到的。那是“新北大”搞的。在座有“新北大”的同学吗？啊，来了。这是你们的贵同学惹起的这场祸，把他的观点出在《新北大》广州版。这篇文章其实发表很早，它是在二月二十八日就发表了，那个时候大家也不闹，因为它是个小报，大家并不闹。错误就在于先是《南方日报》，后是《广州日报》，一个三月十二日登了，一个十四日加了编者按。我看了半天，以为文章本身也是《广州日

报》写的，看到最后才知道是转载的。那个标题不清楚，好象就是你《广州日报》的意见。我看那个意见是不大对啊！那里头观点比较杂。它是要得出一个它所要定的结论，意思就是整个都错了，没有加分析。我们说“省革联”也好，一·二二也好，“省革联”本身总还是个群众联合的组织嘛，不过他范围小了，夺权他这个方向是对的，不过他做的错了。你不能不分析，不能不分为二。他那个就笼统了，都说不对了，错了，这当然是广东的造反派不能接受的了。再加上《广州日报》的按语一摆，虽然晚了半个月，但是按语一出就跳起来了。但当时也没有闹，又争论了很久，晚了差不多一个月才闹起来了，闹起来就围攻了。先是《广州日报》吧？对这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来了四点建议，虽然中央文革很谦虚，说是建议，我看这四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认真地执行。他这个四点建议的好处就是军管小组对报纸的军管应该继续，否则就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不利于对敌斗争。因为广东是华南的门户，所以肯定了军管应该继续，否则不利于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因为他是要在报纸上批判的。第二条是维护和支持了军管。但是军管的成员里可以作必要的调整，并且建议要组织版面小组，协助军管办好报纸。希望各学校的革命造反派积极支持。我底下建议的时候还要说这一点。第三是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向军管会提出，商量解决，不要反过来又要报社的军管小组向你们请罪。请罪来请罪去，不是半斤八两吗？！我们不赞成这个请罪的办法。第四条说文章是错误的。文革小组他下断语也是很谨慎，就说是错误，不象你们，一出口就说是大毒草。这样就没有余地了。但是他底下说了，可以在报上进行讨论和批判。讨论也好，批判也好，各讲各的见解，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大辩论的风气。我们提倡四大，四大里有个大辩论，而且在报纸上开辟一个园地。不过现在忙，这几天还没有写出文章来批判，希望你们写。有好的可以先登嘛。

还有一件事，就是一声“春雷”。这也是我到这个地方看报纸才看到的，你们宣扬太多罗！我们今天早上用了很长的时间听，我也看了几个材料。不过是一声春雷而已。春雷嘛，大概就是一声，我刚才听到一声，(笑声)不是夏雷那样轰隆隆不断的，只是一声而已，可是这一声不那么响亮。这没有什么嘛！不响就是了。每一声雷都得响，不见得。在军区方面，有部分同志急于想搞一个“三结合”。因为我们给军管的任务，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任务，要通过批判——当时

还没有强调批判，当时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也就是批判了。因为林彪同志在工交会议上就说了嘛，我们要进行一个大批判运动，通过批判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然后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这是给军事管制的一个任务，在华南能够早一点很好。当然，我们也设想，如果不能早，也不能急。有些管这事情的军管的同志也急一点罗。他们也是试一个点，觉得广州铁路局别的地方已经实行军管了，好象长沙分局已经军管了，他想这个地方(广州铁路分局)是不是可以不必经过军管，提早一点，所以比较急了一点，条件就不够成熟，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都不太那么够。从材料看出来，他想“三结合”，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你们不是讲大方向吗？为什么这个就不讲大方向了呢？！所以一切的问题都得有个前提。军管的同志是一个好意，他想试验一下，搞一个“三结合”，方向还是向着“三结合”，他并没有要复辟嘛！但是急了一点，不够成熟。第一就是一部分革命派没有吸收进来，你不能说另外全部是老保嘛。我在底下还要讲这个问题，一动就给大老保三个字，偶然吵架吵急了给这个名字，固然我也不好反对，变成口头语了嘛。但是把这个加给人家，打击一大堆，这个不是办法。你首先打击群众了嘛。比如广州分局，南站的造反派，是叫火车头吧，是多数。那么整个广州分局连外地的算起来他还占不少嘛，也是过半数了嘛。就是这个情形，也是一个广大的群众组织，你给他一个名叫大老保，就把群众统统对立起来了。你说他思想某一点有些保守，那改正嘛。从革命力量不够，一部分革命造反派没有吸收进来，因而代表性不全面，无产阶级权威嘛，军事代表确实是够的，亮相的干部也可能多了一点，或者是杂了一点，这些都可以议论。有议论，改进就是了。就是说这个事情，方向还是想搞好，但是做起来有些错误，所以不好拿来提倡。那么你们问现在已经登了报怎么办呢？登了报的这些事情地方报纸可多罗，这些事情办起来都要给他一个罪名，那就不胜其办了。我告诉你一月风暴的首创者上海，它就搞了一个人民公社。因为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我们一直把上海的消息推迟到二月底才登。你看上海夺权斗争群众大会开得那么好，可是没登报。不但是外地不懂什么道理，国际上也怀疑这个事情。但是国际上西方记者，他很快就说恐怕是人民公社这个词有问题。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讨论，等到二月中，主席约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位同志去讨论的时候，连他们两位同志都觉得上海工人恐怕不容易接受，已经拿出来了嘛，登了报了嘛，

怎么能取消呢？毕竟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威信高，道理足，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回去一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把道理一讲，当场没有一个不赞成的声音，一下子就通过改成革命委员会。这样子我们把上海宣布了，上海夺权几乎晚了两个月才宣布。上海的报纸，后来不是就改了吗，也没有什么嘛。将来总有一天我们全国都要叫公社的，如果现在就叫人民公社，上海报纸一登管保各省都叫人民公社。你们广州更是人民公社，因为广州暴动就叫广州公社嘛，那你们还抢先了，把广州暴动的光荣传统还拿出来，一定要首先拿出去了。那还不是都要跟着改。各省都是，各部委也学了，什么铁道部他叫人民铁道公社，那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笑声)这样出现以后外交系统统统要改变。我们现在国家的性质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进入到更进一步，这样改变也不那么需要，反而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象这样的事情，已经夺权的省分，有许多事情，我们都改变了，劝他们不登。只是一个铁路分局的夺权，登报登错了一些，这声春雷不那么响，就让他不那么响过去吧，不要这样认真，把这个问题搞的这样子。当然你们说了，这是一个象征，是一个征候，这个征候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这一闹，就没有再搞了嘛，而且他本身还在提问题嘛！我一来就听说，南站就不同意嘛。南站不同意那个地方只好继续军管罗。还是劝大家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批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能够团结起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是个错误，搞了就搞了嘛！再逐步加强嘛。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呢？有的。有的地方已经都夺了权了，并且已经成立了夺权委员会了，有的地方已经成立了革命的组织了，是联合的，江苏就成立了联合组织，安徽成立了夺权委员会，我们都没有劝他取消。我们说你们这个革命委员会，将来把它扩大，现在还不能起真正的作用，将来到了成熟的时候，我们再开各界代表会议，再来把它充实起来，才算正式的权力机构，现在还不成立权力机关，因为只是一派，另一派不赞成，都是左派。安徽它叫夺权委员会，当然现在不能承认它那个夺权，它那个夺权不像你们这个夺权，你们这个夺权夺了以后还没有掌权，你们自己就放弃了，所以你们等于改正了一部分错误。他那个地方还行使，行不通，我们现在军管以后，对那个夺权委员会让它慢慢地自生自灭的改变，不要去下命令取消。因此说铁路局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也不要急于马上登报取消，这个也不好，在群众面前失掉信用。因为初生的事物一定要犯些错误的，犯了错

误就马上登报把它取消，将来谁都不敢进行创造性的尝试了，每一件什么事情都得极其成熟以后才敢做，那么我们的敢闯的革命精神就要打折扣了，这个不利。所以凡是方向是对头的，虽然做错了，组织形式也弄错了，慢慢的改变，不要在报纸上把它一棍子打死，这对新生事物不利。做错了就把它改变嘛。比如铁路分局的三结合如果扩大不下去，一部分革命造反派无论如何不同意，那我们只好把它军管起来。革命委员会能扩大最好，如果不能扩大，它只管一部分文化大革命，另一部分可以不管，业务还是军管来管，也可以这样来做。因为目的是利于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利于抓革命，促生产。铁道的运输在华南，比任何地方任务都重，因为还要支援越南，还要海上出口，铁路公路和航运，还要准备作战，这个地方一切的弹药粮秣都要准备充足。所以不能因为这样子影响铁路的工作。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华南的铁路，军管以后二月到三月到四月的情况是上升的。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军管以后的事情，就是工人大联合。这个工人大联合，我们看起来也是还没有成熟的。我十七日天亮以前认真的听了工人中的辩论，现在看起来，工人的组织是分成六个组织，“工联”、（现在你们也用这个名称了，我也是很高兴呀，是我建议的，经过群众嘛，不然又是我由上而下了）、（笑声）“地总”、“红总”、“红旗”、“广东红旗工人”、“广州工人”，这六个工人组织。当然里头还包含其他的，先说这六个组织。铁路是不属于那一派的，铁路是独立的。这六种组织，现在只有“地总”、“红总”赞成大联合，“红旗工人”大概只有一派，比较少数的，其他都不赞成。所以现在大联合过早地作为筹备会就不成熟。不成熟他就要停顿。当然下命令取消也不必，现在还需要做准备工作。照现在看起来，在工人中，我觉得我所发现的，首先要承认“工联”。它经过一个发展然后又缩小，由四、五万人，曾经在三月中旬缩小到三千人，现在又发展到一万人，现在看来它是坚持革命造反精神的，它受了压迫以后，有这么一个发展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承认它是一个革命造反派。红旗工人现在分成两派，他们争论比较多。本来军管会对他们倒是一向支持的，但是现在它分裂了，一派压一派，发生了争论，现在也是得到一个锻炼，照他们现在说，一派比较发展，一派缩小了。总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自己内部的争论，能够解决自己的团结和统一问题，如果不可能只好分成两个。分成两个你们总是要在革命上见

高低嘛，一个多数派，一个少数派。当然这还是不稳定的，也许改名字或者怎么样罗。这一派在军区指导思想还认为它是造反派的，希望你们再努力。据我所接触的，那天是我个人的谈话的印象，一个“广东红旗工人”，一个“广州工人”，这两部分，他们很能谈出一些问题，并且承认现在发展还不必急，甚至缩小一点也不要紧，要坚持。“广州工人”原来是一万多的，现在六千人，“广东红旗工人”现在是一万人左右，他们还是坚持，并且看得出来他们还是受另一方面的压制的。比如“广州工人”那天林XX讲了，还有一个女同志叫林丽彩，很有说服力，这两个组织我们看起来现在它这个情形也应该看成造反派。

“地总”、“红总”问题。“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这两个组织和其他工人造反派组织之间的争论，只能通过各自的整风，通过企业、事业单位中对党内、省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运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求得解决，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而不能以一派压倒另一派。压是压不垮的。如果他坚持革命，一定要革命，现在还是坚持要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发陶（铸）呀、赵（紫阳）呀等等，结合本单位斗批改，那就站得住，反对打砸抢，那就站得住。所以今天还不能下定义说那一个是彻头彻尾的大老保，这样子就是把广大革命群众一棍子打死的方法，这个是不合适的。现在厂内两派斗争比较严重，两派斗争严重，这不仅工人同志要注意，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同学们在帮助串连的时候，交流经验时也要在这方面给以推动，不要支持一派打一派，打“老保”。这样会使人家灰溜溜的。另一方面，原来那一个造反派被另一方面反对。我看那个标语不能说是有什么错。标语说：“打倒灰溜溜，紧跟毛主席，昂首挺胸闹革命。”这个气概有什么不好的？不过因为在造船厂，就联系到海军的衣裳灰溜溜的。这就有点过了。我看你们许多联系太敏感了。你们对这个非常敏感，为什么对于我们国内外面临着帝国主义、蒋介石这些敌人，就没有几个人提呢？你们不是不敏感，就是不想提，眼睛太注意内争了。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今天要帮助美帝、台蒋的，在国内能起作用的，还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的一伙子，这是主要的敌人。不能够针对群众嘛！群众提什么口号，就算是有一点点毛病，也不算什么，你把人家都牵连起来，那还得

了！这样就是红彤彤的也会成问题了。比如说，你把红彤彤的放在不恰当的地方，你也可以说他是侮辱了什么。比如你们这个地方，电梯上放主席像，我就不赞成，但我只能说这个地方放得不恰当。因为这是一个电梯，来往上下，主席的像怎么能放在这个地方呢？这是不尊重。但我绝不能推论到其他的问题上。那个展览馆很好，我一提议他们就拿掉了。就是不恰当，不能给他戴什么帽子嘛！说他故意污辱主席，那不就变成反革命了？是不能这么说的，他的意思还是好意，他没有想到。象这类的事不是主流。最近林彪同志在军事会议上有一个演说。讲了三个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主流和支流、军队支左。报告将来都要发给红卫兵看的，要好好地学一学。这是支流的一些问题。即使有一点错误，也是支流而不是主流。所以我觉得象工人代表会这样的问题，工人大联合筹委会，即使现在条件还不够成熟，也不必取消。当然四月下旬开会也只是一种设想，现在不可能开。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如果要开代表会就一定是学生在先，我看这个也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学生在先？你可以在先，因为运动是他们首先搞起来的，应该成熟一些。如果他们闹别扭开不成了，工人总等着他还成？我看农民就比较成熟一点，因为在支部以下并不夺权，他如果确实是贫下中农的代表，来开一次会为什么不可以？你说一定要按次序，北京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北京首先是大学生，然后是农民、工人、中学生这样一个次序。次序可以不同。因为北京、天津都是大学生先开，因此你们都要先开。我想这个不能援例。但是如果学生成熟了，当然可以先开。工人现在看起来还不大成熟，那你们学生就要努力了。现在学生争吵又多起来了，还要看大家工作做得成熟不成熟。

军管会就那么几件事；第一个是“四大事件”。军区并不负责的。但过去没有注意解释这个问题，现在可以起来解释了嘛。第二是《颠倒》一文问题。是主持报纸的同志犯了一个错误，这是个别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提出办法来了。第三是“一声春雷”。本是一番好意，心急，搞得不成熟。那么这可以等待一下了嘛，搞一个更好的革命“三结合”嘛！工人大联合比较还不成熟，但也不能取消这个组织，先放在那里，先搞好六个工人革命组织，使他革命化，各个组织自己开门整风，等等。所以，军管前的几件事，军管后的几件事，都是个别事件。就是工人这个问题稍为大一点，但他也没有被别的组织完全拒绝。所以是很容易改的。这都是个别问题的错误，有些个别问题错误严重一点。总之，在这方面支

左的工作，过去还没有完全做好。但是，你们一定要了解，军管这个问题，仅仅是军队所担负的五大任务之一，而且就广州军区来说，还有两方面的任务，加在一起是七大任务之一。那么他不可能象我们专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同志们那样，你们放假闹革命，你可以从早到晚精神旺盛，比如我这个人三天不睡觉我就不行了，你们大概三天不睡觉还可以。这就说明了精力不够嘛！军区做工作的同志都是四、五、六十岁以上的人。还要照顾到这里是前线的军区。前线的军区中央的看法也不同嘛！他们现在不仅有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五大任务，还有备战的任务、作战的任务。有些地方只有备战任务没有作战任务。这个地方既有备战又有作战的任务。比如刚才我们听到了，越南的海岸上美国打了常规导弹，不是核武器导弹，是常规导弹，那我们就要注意啦！海军就要去侦察，空军也要帮助侦察，这个地方的作战动员是一刻也不能松懈的。你看在座的，他们的司令员，除了刘政委身体不太好没有到以外，其他都到了，一边听报告，一边还要想他们的问题！你们的脑筋里敌情观念暂时不存在不要紧，我们可不能不存在呀！所以要从全局想一想。你们读毛主席著作，上面不是经常讲到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这个问题吗？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海陆空军，广州军区摆的多。同时任务也重。就学生工作说，广州也是一个大学相当多的地方，一共十七所，四万多人。中、小学生有三十多万。所以，在支左当中，应该说是成绩的，但也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样看才公道。为什么会有缺点错误，因为没有经验。

到今天止，军管仅仅一个月，首先把广东的支农，支工先做了。军管一个月，秩序就比较很清楚了。铁道和航运就是军管以后搞得蒸蒸日上嘛。昨日林昌文同志讲的出事故问题，一查还是军管以前的事。事情就是要弄清楚，实事求是。成绩还是肯定的，主要的。但是不是犯了一些个别的错误；有些甚至是相当严重的呢？有。改就是了。比如对有的左派摸得不是那么准，支错了一点，错了可以改嘛。主席就说过几次。军队十几年没有做群众工作了，情况不熟悉，任务又这么重，全部的责任都堆在军队身上了。我们过去就是个工、农业生产，现在还加一个支左，这是党的工作。还有军训，过去是部分军训，现在是全面军训，不仅是对大学、中学，将来还要对小学的高年级、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都要进行军训，一年无论如何完成不了。军管是政府的任务。这样就是把党、政、军的任务，军队都负起来了，由中央直接领导。除此以外，在广东来说，还有备战、作

战的任务。这样巨大的任务，能够在一个月內见诸成绩，这就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成绩是主要的。而缺点是难免的，因为没有经验，要摸索。个别问题严重一点，也是难免的。但是错误不是不可以改的。

既然“1·22 夺权”方向是对的，但是“省革联”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可以改，就不要去责备“省革联”。认为支持“省革联”就是错的、就是反革命，反对“省革联”就是革命，这都不行。这还不在于“四大”事件里的，还在以外。这种标准都是错的，不应该成立，应该取消。

有的同志急得很，问“红总”、“地总”保守表现在那里。我只是说有些事情偏于保守，我并没有说你是“大老保”。我对人家加给你们“大老保”的帽子，我不赞成，我替你们辩护的。你们过去有些事情偏于保守，以后可以改。偏于保守为什么不可以改！

至于说“复课闹革命就要压制了革命”，我看这个话逻辑不通。因为在第一个阶段是全国串连闹革命，特别是中学生，从八、九月以后就满天飞，就没有在本校斗、批、改了。过去执行了反动路线，打了一大伙人，打了一大批，保了一小撮，以后就走了。有的破“四旧”立“四新”建立了功勋。然后到全国串连了，就是大学也是全国串连。为此，现在中学要复课闹革命，要安下心来。在学校里，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有时参加本地方的活动，有什么不好！只有这样才可以整理思想、整理组织、整理作风。中学生不集中到一个学校里来复课，你没有办法教育他。比如说“主义兵”吧！你们不去教育他们，他们就会滑到犯严重的反动思想，行动就会发展，这就不利了。你们也承认“主义兵”至少有五六千人，多则上万，是个群众组织。对群众组织就不能以那个笼统的名称待遇，就象刚才说的工人组织，叫他“大老保”就不对了。我听说“主义兵”有六千人以上，甚至一万两万，还办了报。这样的群众组织我们就应该谨慎。我们可以批判“联动”的反动思想、反动行动，如果他接受了这个思想行为，就是错的，就是反动的，就要批判。但是，不能因为一个人或一小撮人，把一大堆人都算在一起。所以，复课闹革命，才是认真的对中学的同学，好好进行革命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一点，我希望大学的同学要帮助他们。如果你们对工厂运动很感兴趣，对农村运动很感兴趣，为什么你们对比自己小几岁的同时代的人，就不注意呢？我看如果“主义兵”多数(现在还是少数)发展到一个坏的方向去的话，不仅我们要负责

任，你们也要负责任。我们要共同负责，特别是革命的同学要负责。为什么？这件事我是得到蒯大富同志的响应的。他很坦率，他说对清华附中的“联动”，他们也要负责。就在家门口的一些弟弟、妹妹都不管嘛！而这些将来都是反对自己的，为什么让他们这样嚣张呢？北京市的几个附中都是这样，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到现在还没有改过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个头子，师大附中，还有其他附中。我觉得大学的同学很可以对这个问题想一想。我们是时常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身上的。对这一辈青年，看到他们这样，自己心里就觉得不安，没有教育好他们。所以陈伯达同志和我说过多次，要把他们找来教育一次，我支持他这个意见。如果能把“联动”的头子找到一百人上下，除了应该关的关起来以外，我们把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找来一道开个会，和他们辩论一番，最后教育他们，我就不相信多数不可以教育过来。当然，少数顽固不化的总会有。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是去把他们推到反动方面去，而是应该援之以手，应该帮助他们。“帮助”两个字，有个“手”有个“力”字，要用力帮助，用力推动他们，教育他们。所以，不能说复课闹革命就是压了革命，这是小将们不懂得这个话。

还说军训是阴谋。军训的文件都是主席批准了的，主席、林彪同志特别强调军训。因为他在天安门检阅时，看到军训以后，非常有秩序，他就觉得军训是灵的，搞了一个星期，出来游行的速度就加快。有一次十个钟头只走了二、三十万人，军训了以后，有很大的不同，不到十个钟头就走了七十多万人，缩短了时间。正如林彪同志在批示中所说的，第一是革命性，没有革命性不能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是科学性，讲政策；第三是组织纪律性。有了革命干劲，又有了政策水平，这样就是依靠了群众，依靠了政策，正确的路线，依靠自觉。所以组织纪律性就会搞得好。同样，抓革命、促生产，也不会压了革命，今天报纸上还讲了这个问题。

为了进一步搞好军管、军训工作，广州军区已经决定调回一批军管、军训的干部，有几百人，重新进行训练。他们就在这个楼上，今天同样听我这个讲话。他们过去没有来得及进行训练。主席和林彪同志常说，我们进行任何一件新的事情，如果政策不讲透，就盲目地去执行，终究是会犯错误的。又加上没有经验，对这方面没有知识。我们不能过分地责备他们。不仅允许年轻人犯错误，也允许没有经验，没有正确理解的人犯错误。有些工作组犯错误，除了那些头头以外，

一般工作组员，我们也不主张过分地责备他们。他也是跟着做的嘛。所以，现在广州军区决定分期训练，把政策跟这些干部讲清楚。军训的干部，他有时候注重一点形式，慢慢的引导到政策教育方面，政治教育方面。有个时候，把归口的办法机械化了一些。主席三月七日所说的归口的办法，是讲的“延安中学”的那个经验，这个经验应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学生归班，工人归车间，作为学习单位、生产单位是应该的。不然无法训练，无法生产。可是对革命的组织不宜急，要有个过程。比如战斗小组，在一个班或一个车间里，他的人数多，他可以成立一个战斗组。不要跨车间，跨班。他的总的战斗组织、革命组织的名义还不能把它取消，它还要领导。班上可以讲联合，车间也可以讲联合，但总的联合也需要。有些地方执行机械了一点。一军训，就学生归班，战斗小组在班上去联合，上边不要了。因此，上边的领导组织没有了，涣散了，等于那个组织取消了，这两天不是有同志说到这个问题吗？这种情形大学少一点，在中学很多。他的组织等于没有了。而“主义兵”是跨学校的，不是一个学校的。因此，在广州就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就突出了。在组织上我们没有注意够，从这里得出一个教训，革命组织还得允许它存在。第一，允许它在学校里存在，也允许它有联合，中学联合中学的，不跟工人、大学混在一起。或者由大学组织个中学部来管这件事。革命运动时期允许它这个组织来领导，不然它就等于瓦解了。特别中学，到了班上它的作用就不大了，没有领导。这些支左的工作上发生错误，组织上，军训问题发生错误，军管发生错误，按照毛主席的话，一个字，错了就“改”。允许改。因为都没有经验，任务这么重嘛。

最后，军管问题我还要解释一下两个命令，一个是一月二十八号的八条命令，一个是四月六号的十条命令。这两项命令不是矛盾的，不是一个代替一个的，是发展的，各有针对性的，互相连贯的。只有个别的地方，后者把前者即后十条把前八条有些话冲淡了。比如说，前八条重点是不要再冲军区了，以前冲的，反革命的要追究，左派冲的不要管了，以后不要再冲了，重点放在那个上面。到了十条，就另外一个说法了。就是说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这就宽了，连右的也不追究了。当然右不一定是地富反坏右了，“右”和“反”也还有一点区别。重点是放在比较宽大的处理，但是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还要追究，不过要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认为后十条上没有今后一律不准冲击这句

话，好象是可以冲击了，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昨天中南局的造反派说得很好，今后也不能冲击。但有些年轻人就不是这样子，他又冲击了。是否是这个例子又要开了呢？大概是正反合吧！使用这样一个规律吧。那不能这样。辩证法的正反合，合就是前进了，不是正反合在一起，合二而一。所以，前进了就不要看得过分，看得太严重了。已有两次经验，一次冲，我们禁止了；一次宽大，又得了经验。就是说两种经验都有了。今后我们就是说理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到军区去讲理，去当面谈。这个问题一定要说清楚。就是请军区也下决心，军管会也下决心，你们有什么事情要找黄永胜同志，刘兴元同志，温玉成同志，还有军管会陈德同志。找他们，他们会商量办理。你们可以多接头嘛！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全国的斗争矛头大方向清楚了，广州怎么结合实际？就是斗争大方向、矛头指向谁？

1、矛头要直接指向刘、邓、陶。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系到中南、广东，当然就联系到陶铸，陶铸底下还有赵紫阳他们几个人。结合到本地，陶铸也算本地、半本地了。所以要指向刘，邓，因为刘是最大的，要系统地批判。过去没有系统地批判，过去逐步地认识，现在把它联合起来认识就清楚了。把他批透，就把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头头暴露出来了，就可以作为全国的典型，大家以此为戒，以他作为靶子，也就挖到每个人头脑里或多或少的，那怕是很少的这种修正主义苗子了。那么在广东来说，当然必须结合到陶、赵这些人，也要结合本单位，本机关，本学校的斗、批、改。学校的斗批改时间也不长了，现在已经四月中旬快完了，还有五、六，七、八四个月了。到八月底是十五个月，我们总要告一段落。

2、回答谁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不能够那么样说法；好象解放军那样做，或者解放军某几个负责人这么做。我现在不这么看。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已呼之欲出啦。那天座谈会上不是有的同志问到底是谁？也没有那位说出来。说明这个问题似乎象似乎不象的样子，没有人能说出来。因此，说明这是大家并没有把握的事情。全国二、三月分是有那么一股逆流，就是因为干部亮相，有些干部想借这个机会混水摸鱼，不经过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彻底揭露，然后揭发自己的错误，亮相，取得群众信任，得到群众同意。在这里有些人就想混水摸鱼，或者想混过关，这种情形是有的。至于拿广州军区来说，特别是广州来说，

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嘛。每一个人能不能过关，都要通过群众。现在广州地区站出来工作的没有几个人，省委常委中也就是他们四个人，也还没有完全过关，还要检讨嘛，就要跟机关说，跟群众说。因此，广东这个地方，首先应该指向省委中以赵紫阳、区梦觉为代表的这些人。他们现在处在旁观地位了，有时候还要嚣张几下子。现在工作这么繁忙的军区、军管会反倒受到责备，而他们却从旁说冷话。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要翻老帐，要复辟过去地方主义的错误，这倒象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股逆流。逆流是存在的，但是也不要把它说得过分严重，好象到处都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记得去年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我同一些大学的同学比较熟，他们从上海，从别的地方打电话回来问我说：“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到底还有几个人支持呀？怎么样呀？你告诉我呀！”简直惶惶不可终日了。那有这样的事情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深入群众的，它是从群众中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屡试不爽的嘛。只要主席一个号召出来了，其他的错误的东西就如同太阳一出，冰消瓦解了。多少次历史的关键时刻，从主席进入中央的领导，从遵义会议以来三十二年都是如此，加上以前十四年，在每次关键时刻的斗争中，主席都站在正确的方面。毛泽东思想是这样发展起来发扬光大的，毛主席成为世界所仰望的领袖。怎么能这样担心呢，最后他们问我，要不要他们回来。当然他们青年人热情可嘉，我也不能给他们泼冷水。我告诉他们：你们放心，你还在那个地方好好工作吧！所以，说得过分了没有好处的。特别在广州，你们把北京、全国的口号拿翻版。昨天天亮前后，广东工学院的易作才同志，他讲的那几句话是对的。把广东的解放军，特别是把解放军的负责人，象黄永胜同志，陈德同志（问军区同志：温玉成同志上榜没有？刘政委呢？答：没有。）这样子没有好处，这里是面临着敌人的呀。你说军队没有信用，说解放军怎么样。的确，如果说北京可以这么贴，而广州这样贴就没有道理。比如福建前线，我们就不允许这么做。中央军委有个公告你们都看了，那是支持韩先楚同志的。因为面临台湾前线。所以要实事求是，要区别对待。同志！面对强大的敌人呀！今天不提这个，我是感到最大的、最遗憾的一件事。我是最反对说这个话的。所以我觉得，说什么“式”的，揪出广州的什么的，那些口号也不见得准确。北京的口号换来换去，经常要变换的，你们跟着他团团转吗？十天前是一个人，十天后又又是另外几个人，反正你们跟着转，我看把你的独立思考也就削弱了。经过十个多月的运动，广州革命

的同志都锻炼出来了嘛，都有自己的见解了，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嘛，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看广东的阶级斗争盖子，像陶、赵这样的，在广东是头号的，问题确实还没有认真的揭发出来，还停留在口号上，认真地揭发还有更多的可以揭发的，还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警惕阴谋不是拿这个东西去攻击另一方面，而是要拿这个东西去揭发他们在广东做了些什么隐蔽的活动。要防止地方主义复辟。当然，十几年前我们在批判广东的地方主义时，工作中确实也有些缺点，我不隐蔽这些缺点，不掩盖这些缺点，但是，总的方面是对的。那是主席亲自过问的，在中央讨论过的，不能翻案，要防止这两种复辟的逆流。

3、个别的事件，个别人的错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能就下结论。要用主席思想，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要学习和实践。调查研究是深入实际，学习主席著作，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林彪同志说的吃透“两头”，然后在实践中再考验，这样结论就会正确了，就不会总是打空了，甚至引起一番虚惊。

4、要求你们要维护和支持解放军的地位，光荣和重要的地位。今天，华南的解放军担负很重大的责任。如果过去我们的战略的方向认为东北重要，现在看来最重的是西南、华南，特别是华南。因为海上、空中、陆上都是跟越南接壤的。西边跟越南接壤，东边是福建同台湾隔海相望，这两方面都是敌人，而本身又是支援越南的门户，陆上运输要经过广州军区，海上也完全要从广东几个海口出口，责任非常重大。所以不仅它在五大任务中是重要地位，对敌斗争也是重要的方面。一向来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都给以极大的注意力，不然我不会在这里停留五天。因为不能忽视。我相信你们是会认识这个重要性的，你们每一个步骤都要想一想。我们对你们的革命行动出了偏差，出了严重的错误，都不责备你们，只是要你们总结经验，自我批评，并不多责备，并不改变你们过去在斗争中有贡献的革命左派的地位。但是你们自己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因为你们还不全面。特别你们晓得解放军是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高的，军队的行动是这样光荣、模范的，我们应该把这个放在主流方面，放在大前提方面。发现了个别的错误，应该放到次要的地位，这才能分别主流、支流。逆流是有的，在广东是有一股暗流的，但不是这个，不是解放军，不是广州铁路分局的“三结合”，或者工人大联合。这是个别的错误。错误你们也同样犯了嘛！至于暗流倒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我刚才指出的，资本主

义复辟的两个暗流。一个是并没有被彻底批判的领导广东十五、六年的陶、赵这个暗流，另外一个就是地方主义复辟的暗流。这两股暗流倒值得重视。在这方面你们提得并不太多，这点我希望你们特别要注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方每个行动，香港反应最快、最敏感。而每个反应都影响我们国际的信誉，特别是敌人拿这个来估计我们情况。如果我来这个地方五天，除了头一天你们公布以外，以后不再公布了，敌人就会猜想，大概我在这个地方跟军区商量作战的事情了。好，天天都报导我跟你们座谈，这就很清楚不是讨论作战问题了。其实也不见得，你们不会知道，他更不会知道，我们总还有别的时间可以谈嘛！怎么知道我不谈作战的事情呢？我们刚才休息的时间还谈了嘛。但是把你们那个时间一算，十几个钟头一次，七、八个钟头一次，人家说周某人在这里这么用功夫，大概这个地方问题紧张了。他就作另外一个估计了。所以我们年轻的小将们，在这个方面你们经验不够了，不能责备你们，但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来，告诉你们，我们如果见到不说，那我们就错了。

第五个问题：如何实现现在中央提出来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这样一个公式。就是说我们要实现夺权的斗争，一定要通过革命的大批判，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然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个我们已经摸出经验来了。那么，广东怎么做呢？我想，第一、也是和全国一样，但是你们这个地方更要着重；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为纲。要上这个纲。照这个来定我们的基调，就是我们这个革命大批判到底是不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对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联结到广东的陶、赵这些人，联结到本单位的“三结合”。是不是合乎这一个标准，就看你是不是合乎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

第二、左派的标准。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是左派。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一般的革命造反派，要有更进一步的要求。革命造反派他可以是在这个时间造反，或者造得不那么准。要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要经过长期的考验。这一点，我想大家的标准都不那么准。有的说，支持“省革联”一·二二夺权就是革命的，反对“1·22夺权”是反革命的。或者反过来说，支持“省革联”的是不革命的，反对“省革联”的是革命的。都不对。同样的，还有“四大事件”和其他一些标准。比如去年的“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那是在六月，是广东革命群

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压迫，也是受陶铸的压迫。至于封《红卫报》，封的当然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工人觉悟慢了一点，宣传工作慢了一点，行动也慢了一点，同时，他们的运动搞得晚一点，组织也建立得晚一点，因此有些工人不完全懂得这个道理，而且他们看惯了《红卫报》，因而反对封《红卫报》。所以笼统地把主张封《红卫报》的群众组织说是革命派，反对封的都是保守派，这样的划分，是不恰当的。同样，今年一月的夺权、“省革联”问题、《颠倒》这篇文章和“一声春雷”，现在叫“颠倒派”、“春雷派”、“省革联派”，都是拿一件事情来划分左、中、右。还有关于大联合问题。因此，我觉得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革命左派，要经过长期的考验。文化大革命已经十个月了，要看十个月的经验。我也不赞成只看是否受过压迫，因为情况是变化的，一开始受压迫的，以后也有态度变了的。如果开始受压迫的都是左派，那以后变了怎么算呢？我曾跟许多省的左派谈过话，其中有些后来就起了变化。因此，就不能说得那么固定。要在十个月一系列的斗争中来观察，是不是坚定的，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需要有个整体的看法，系统的看法。这样子革命造反派里头，也会有一些保守分子，反过来你们所谓偏于保守的，或者那些确实是保守派的，里面也会有一些革命左派的分子跳出来。那就得允许人家跳，允许人家站出来。甚至在一个组织里，它的领导的多数承认过去保守的错误，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起来批判它，检讨自己的错误。那为什么不允许人家站过来呢？整个组织站过来，多几个左派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只有瓦解一途，就没有允许人家改进的一途？两种都可以，一种是瓦解的，一种是转化的。就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根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标准来看。因此，左派的标准，要整个地系统地来看，对一个组织、一个人来说，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会起变化，左派如果犯的错误太多了，又不敢，坚持、辩护，那就会走到反面去了。中央文革小组，我也参加过，就曾对北京某些左派组织的同志，提出过警告：你们如果再不改，那就回走到相反的方面去。主席常说这个，凡是一件事情做过了头。就会走到反面了。这是我们有经验的嘛！

第三：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现在对立情绪很深，我们希望引导保守派转向革命，达到团结。这就要通过批判、斗争，而这个批判、斗争，要首先批判党内

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系到广东的陶、赵，然后结合本省的“三结合”。矛头向上，向全国的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矛头向本省的，及与全国有关的陶，联系到赵和其他一伙。还有本单位、本学校的斗、批、改，也是对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许有的地方本身没有，上面有，就向上。拿这个来作观察的标准。如果保守派或者偏于保守的，他就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应该欢迎他，革命派应该欢迎他。甚至他本身就产生了改正错误的革命分子，虽然他革命晚了一点，但他变成革命了，我们应当欢迎他。或者合在一起，或者仍然保持两个组织，都是许可的。定一条：总之不能用群众斗群众。只能用说服教育的办法，用批判错误路线的方式，批判反动路线的方式。自觉地通过整风的办法，自我批判的办法来实现。我们对于许多地方都这样强调：各派组织通过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当然，这里头有的都是左派，通过整风了，有的保守派，有的革命派，两个路线不同了。只有这样，才能把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共同地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这样把错误就转移过来了，转移到革命路线方面来，就可以进行共同的斗争了。也就是改造他自己嘛！

第四，革命造反派之间的问题，在这地方也是同样存在的。总是互相不服。我们这几天提出来了。三个“红旗”是革命左派，这就是“中大红旗”和“八·三一”、“华工红旗”、“广医红旗”。但不仅仅是这三个“红旗”是革命左派，其他都不是，如果这样传出去，那我就提倡宗派主义了，要犯极大的错误。我是提出三个例子。三个“红旗”的确是广东一向来承认的，军区一向支持的，尽管犯了严重错误。象中大的“八·三一”，在夺权斗争中就是犯了极严重错误，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责备它。初期也许是支持慢了一点，但是一旦军区认识了，马上就出来支持嘛！虽然引起了中大另一方面，就是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不满，但是还是支持嘛！并不因为你们的数目比他们的数目少，他们共有三千多人，你们才两千多人，并不因为这个就不支持你们嘛！这说明军区的立场是对的。他们也支持了华工红旗嘛！同样对广医红旗一向也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因为你们这三个“红旗”是广东有斗争历史的革命造反派，左派，另外别的就不是了，或者自己就可以骄傲了，我说这两个都不对。第一，自己不能骄傲，更要谦虚谨慎，所以我对你们左派特别说了两句反话。就是在今天天亮以前，你们当时给了我很好的回答。工人同志，也有学生同志给我的信，都承认我的意思是诚恳的，是希望

你们好的，说明你们多数还是赞成和同意这样意见的。不要骄傲，要谦虚，要有自我批评。不骄傲，自我批评，是左派很重要的一个标志。这是讲无产阶级左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说，看你是不是有自我批评，如果没有自我批评那就是骄傲，没有不犯错误的。在青年时代，要没有自我批评，阻塞了你的进步，那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必然是与左派的本质不相称。左派不能永远是左派，要不断地进步，不进则退。另外一条，也不能排斥其他的左派，本校也可能产生另一个左派组织，产生了也不要紧嘛！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攻击，要互相取长补短，这样来推动前进！至于别的学校，都有造反派嘛！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进行说理的斗争，但是不能排斥，比如一司的问题，最近就出现一派排斥一派，甚至不让人家到会，这个就不好。今天没有发生了。我不是一来的时候就跟你们讲了，北京也出现了，不能认为北京出现了，你们就照抄一下，这些事情何必照抄呢？我看北京来的同学也不会赞成你们内战的。如果他们把这个坏习气带来，我请他们就不要再在这里串连了。我想他们不会。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到你们这里来串连，但不支持他们这样的态度。他们不会这样的。因此，在左派之间提出反对“右倾”，反对“托派”，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对左派可以允许他在某些见解上慎重一些。这是许可的。到了社会斗争以后，他们看问题就比较慎重了嘛！实事求是了嘛！这怎么叫右倾呢？凡是左派有长期斗争的历史，忽然被说成是右倾，常常是估计错了的。我们在西安的问题上，发现“交大”的李世英被“西工大”、“西电”多数说成是右倾的。后来经我们全面审查的结果证明，这个攻击是错的。因为“西工大”、“西电”的多数是支持打、砸、抢的。说打、砸、抢是革命的打砸抢。我们批判了。打砸抢还有革命的？是敌人就消灭他嘛！也无所谓砸，无所谓抢了，就是要消灭他嘛！如果是人民内部的，为什么要打砸抢呢？拿这个造声势就不对。另一个是南京的“南大”革命造反派甄邦元，就是南大“八·二七”，那一派夺权占多数，这一派南大本身和南京的“八·二七”他们不赞成夺权。那一派就说南大的“八·二七”甄邦元是右倾了，后来我们约他到北京，谈的结果，证明了甄邦元并不是右倾，而是他们批评得不对了，批评也带着打砸抢来了。当然，也不一定这里照抄了。总之，现在革命派中，稍微慎重的，也许他的观点不都是正确的，甄邦元的观点也不都是正确的。李世英那一派的也有些意见，但总的趋势是对的，总的看法是对的，但也有个别错误，有些措词有

些错误。所以我们一般地不宜批评谁右倾，我们不赞成。说左的是“托派”，也不对，这两种说法我们都批判了。我想在这个地方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第五、长期保反动路线，这是保守派。这要在实际行动中看是不是有这种组织，如果确实有这样的组织，应该说是保守派了；如果他已经改过来了，已经支持革命路线，站在革命路线这一边，批判了当权派中坚持反动路线的错误，应该说他已经向革命路线靠拢了嘛！他已经改变了保守立场了嘛！你不能说他开始是保守，就是命定的，永远不能改变了嘛！要一分为二，有的是坚持到底、坚持下去的，有的是改了的，要分别对待。保守倾向，即使是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左派里边也会有的。保守倾向是对于造反倾向这个对立面说的。有的时候造反倾向是对的，有的时候造反倾向过火了，那么，另外一方保守一点，就会有针对性地来纠偏，即使是革命左派组织也不能免的。我们的革命左派就不允许有任何保守倾向，这个说法是主观主义的。我们这个大联合里边一个保守组织也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比如工人组织，拿这个地方说，现在大概有一千多个企业单位，北京是一千八百个，天津是一千七百个，估计这个地方会少一点。现在“地总”据说包括九百多个单位，“红总”是包括二百多个单位。我看可能广州就是一千多个单位了。一千多个单位都参加工代会的话（不是现在筹备，现在不可能做，也不应该做了，要推迟了），将来各方面都参加了，肯定每个厂子都有代表，如果那个厂子就有保守组织，没有别的组织，为什么不能吸收他参加，慢慢影响他呢？这个事情天津也好，北京也好，我们可以肯定那里头有保守组织，有保守倾向的组织，北京是一千八百多个厂，百分之八十参加了市工代会，天津一千七百多个厂，百分之六十多参加了工代会。有几个左派组织它挑剔这个，说有保守派。我们报告主席，主席说一个都没有才怪咧，有了倒是合理的。不过我们也说明了，总要使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占优势，取得领导地位，这个是要保证的。这才是在革命造反派的基础上进行大联合。另外，你这个大联合只能是初步的嘛，你在这个大联合中还要进行斗争、批判嘛、批判反动路线嘛，联合工人阶级本身的斗批改嘛！它就可以推进很多人走向革命路线方面，批判自己过去的错误了嘛。

第六、群众斗群众，要坚决反对。我看我们这个地方有些行动是象群众斗群众的形势，一吵起来就非常激昂慷慨。对立得厉害，这就没法避免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头子都是这样，那一到了群众场合，还不是打呀！因为没有听到你们对

打砸抢进行批评，我就很担心。这个打砸抢，在中央文件里已被否定了的。我们多少地方是反对打砸抢的。军委八条命令上批评了，十条里面又是批评了体罚的。中央二月二十一日通知，还支持了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嘛！另外在其他的文件里也提了。在转发安徽的文件里又说到这个问题，要反对。安徽问题的第六点决定就说，有原则上不同的意见，要正常地进行讨论、辩论，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我们不仅对打砸抢不赞成，抄家也不赞成，抓人也不赞成，不准武斗。中央在许多文件里都肯定了这一点。有些地方还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打砸抢有什么革命的，这是不许可的嘛！这是错误的口号。我希望你们这个地方不再发生这个问题。打砸抢，抄哇！抓哇！这肯定是错误的。

第七、“联动”的反动思想、“联动”的反动行动和“联动”的反动组织，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不能列入青年人犯错误所允许的范畴里，因为这是有一种反动的血统论作理论基础，通过大人影响着青年，使青年受了骗，受了蒙蔽。拿感性代替理性，凭一些传说的话，凭一些他们听不惯的话，看不惯的事，就激动起来。就对于“联动”的反动思想、言论、行动寄予同情。这很危险，这是不能容许的。我们在文件里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批判了这个问题。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里就谈了这个问题。特别是管军训的同志要特别注意：我们特别强调把它写上。这个文件的第三条就讲，在学校中不准成立反动组织，象联动、红色恐怖队这类反动组织一律解散。对于受蒙蔽而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学生，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允许和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军委八条命令的第八条也讲了这个问题，这一条是主席特别加上去的。它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司法机关处理。”你看群众性教育，如果他犯法了应该交给公安司法机关，而干部子女，家属应该负责教育他。整个是教育，对组织应该取缔。这是讲“联动”这类的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希望我们几方面的人，在座的，军队负责军训的，特别是中学军训的，干部对子女，包括工农干部，还有大学的同学，对于自己所接触的中学生，都应该注意。

至于更进一步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问题，四月十五号《人民日报》的

社论已经讲清楚了。要通过大批判运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第六个问题；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我希望革命学生中的左派，即革命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尊重自己已经取得的地位。要保持革命造反派的地位，要靠自己的奋斗，自强不息。要照毛主席说的，不断地总结经验，经常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要停滞不前，吃老本。我们老干部不能吃老本，年青人老本不多，更不能吃老本，更要不断前进。这样才能够真正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这点上，我们对你们寄以希望的。就是要戒骄戒躁。戒骄是对自己说的，也是对别人说的。因为对人家骄就看人不起，戒躁，是对事情说的，也是对人喽！容易发脾气，容易急躁，骄傲急躁。毛主席在我们党七次代表大会特别讲了这样两个警戒，要我们谦虚，谨慎，他感觉到党要快胜利了，就容易发生骄傲急躁的毛病。果然，我们这个党在七大以后三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胜利以后，许多人就骄傲起来了。象高、饶反党集团，很快就伸手，很快就跌跤，就跌垮。刘、邓这些人，又骄傲得不听毛主席的话，不认真学毛主席著作，结果就成了现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这不是偶然的。一切事情起于微末，慢慢地积少成多发展的。因此，希望我们的学生运动中，工人运动中，各方面运动中的左派，要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被人家批评偏于保守的，或者是被人家随便说成是“大老保”等等，也不要气馁。革命不分先后，只要肯革命，会赶上去。因为今天各方面的同志都在，我不能不从几方面来说。有些人对于过去旧的领导确实有些留恋，对于旧的秩序有些留恋，这不单是对中央的刘、邓，也不单是对广东的陶、赵或者其他，就是你本单位的领导中有保守的，你跟他站在一起，也就是偏于保守了嘛！有点留恋了嘛！对旧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有点留恋，不敢打破成规，不敢大破大立，闯出一条革命的规律来，这就是保守嘛！但不要紧，这比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就要小一些嘛！就是维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改嘛！你肯改了，就回头了嘛！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你就站在正确路线上说话了嘛！对你自己过去就批判了嘛！跟过去的反动路线决裂了嘛！对新鲜事物就接受了嘛！就这么个精神嘛！甚至你带动一个组织都转变过来就更好。要有这个勇气，不要气馁。所以，如果说革命左派不要骄傲急躁，偏于保守的就不要气馁，不要只是对立。气馁、对立就不能改了嘛！气

馁就没志气了嘛！对立就不能转化了，不能改变了。还有其他，那天头一次座谈不是还有第三势力吗？也的确还有些派别还站在中间，或者偏左，或者偏右，他看不惯两种做法，一种骄傲、自满，排斥别人，一方面气馁，或者一方面对立的很厉害。他看不惯人家的一些弱点，没看到人家的长处。敢于造反的总还是革命性强了，就是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差一点。那么这样子，你就该帮助造反派，这是前提嘛！革命性是第一位嘛！你帮助他研究政策，帮助他讲组织纪律，这样就可以弄在一起，不会站在中间了嘛！保守派和偏于保守的，也可能组织纪律性很强，但是，我们不提倡这样的党员，我们不提倡这样的群众，主席最不赞成黑“修养”那样的思想。确实如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所说的越养越修。唯心主义的修养，还不是脱离实际，脱离斗争，没有前途。所以列宁讲纪律的三条，《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讲的嘛！毛主席也用过，毛主席提倡自觉地执行纪律，毛主席不赞成把军队说是“驯服的工具”。最近有篇文章驳了的，不是什么无条件服从，而是有条件服从的，自觉地遵守纪律。所以，保守派有它的短处，它以遵守组织纪律当先，这就主次颠倒了。你得先有革命精神，你才能有创造性；你有科学性，才能掌握政策；然后才是组织纪律性。所以，常常保守的，所以犯错误，站错了立场，就是因为它偏重于组织纪律。我生产搞得很好，听话，纪律很服从，为什么还说我不好？我们的军队同志下去支左，有时支错了，就是犯这个毛病，就觉得这不是很好吗？他就忘掉了，如果革命精神旺盛还会搞得更好，我们拿这个还可以考验革命派嘛！如果说靠保守派生产搞得很好，革命派参加进来反而搞不好，那么，这个革命派也不能算是革命派了。革命派它参加进来一定会搞得更好，而且，这样子就使造反派带头，保守派就服了嘛，他就可以改变它的保守思想了嘛。这个就需要我们军管同志带头了，把这两种结合起来。大概所谓“第三势力”，总是最容易在政策上斤斤计较、讲求细节。这样子呢，两种都看不惯。其实你没有革命性，你那个政策无法实施，无法独立思考，无法创造奇迹出来，结果是跟随大流，不能有所作为。各方面都要看到自己的弱点来改进。左派不急躁，不骄傲，就应该研究政策了，科学性了，自觉地遵守纪律了，也就不赞成打砸抢了，也不赞成随便骂人家大老保了。当然一下子叫广州都改变恐怕也不容易。譬如挖苦人家“八一八”叫“老八”（有人回答：是“八一八”他们自己叫的），自己叫的，对方叫的，两种都有，不去争论了，反正是不那么郑重。政治斗争不要

采取这种不严肃的态度，叫人家反感，这是第一点。这是不是和稀泥呢？我还没有看出来。我还是以革命性为第一嘛，按照林彪同志的定义嘛。保守的就是革命性不强嘛！他只讲组织纪律性不行嘛！

第二，革命学生中的三司和一司的问题。革命学生中几个组织联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组织，或者两种组织，或者三种组织，这在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不一定急于取消。它各有各的特点。这是不是提倡分散主义呢？不是，因为它还是联合性质。也不是分裂主义。反正大学的革命派最后总要形成一个联合组织，总要有一个代表性的组织。这个代表性的组织要在革命派的基础上，吸收一些革命性差一些的参加；但一定要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来团结。保守思想总会有一些的。因此，三司、一司就是存在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在北京，我们是劝他们三个司合起来了。虽然合起来，但实际上那个三司还是有它自己的关系存在。并不可能完全打消。这个事情，主席是早有预见的。有一次，他问二个同志：你们说是北京的大学大联合了，成立个红代会，很好呀，那三个司令部呢！这个同志说：没有了，都取消了。主席说：啊，为什么要取消呀？我才不相信呢，已经取消了？我看，主席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今天拿主席的思想告诉你们，你们不必急于要一司和三司合并。倒是要努力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以革命路线为纲，这样子跟各派的革命组织来谈论，在这上面来较量各方面的革命性到底多强，在这方面讲联合，重点放在刚才说的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本地的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这上面来考验。不必过分强调马上联合。

第三，学生串连。大串连现在不提倡了。一般的不进行，个别的北京学生可以到各地方看看，时间也不能长。比如说，最近北京来了二十多位。几个学校？（有人答：五个）五个？不止吧？（有人又答：九个，“哈军工”也来了）。这是一时的现象，不能象去年的大串连，也不能象去年那样煽风点火，因为现在本地的革命学生组织已经成熟了，你们只能来交流经验。这一次来交流经验，把你们好的经验提出来，错的也告诉他嘛，是革命同志嘛，同时要学人家的长处，互相学习，学一段时间就回去。这种串连，只能是少数的。现在北京出来的人太多了，超过原来的设想了。我回到北京还要跟你们商量，不宜出来太多。有些地方还不宜去的，因为那里已经很复杂了，你们去了，如果确实根据党中央的政策掌握得

很好，去帮助解决当然很好，有些地方还不如晚一点去或不去为好。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还要跟中央文革商量。学生串连要和工农结合，以本地串连为主，基本上是本地串连。本地串连，也是学校相互之间串连，到工农中去，那就要去劳动。比如农忙的时候，军管会或革命委员会动员下去劳动，与农民结合，与农民三同、五同，不这样就不能取得贫下中农的信任。到工人中去也是一样，你到车间去，不能象过去那个办法，去一大堆，特别是中学生，到一个车间，人都挤满了，弄得熟练工人操作非常困难，甚至出了事故，这就不好嘛。现在要人家赞成，商量好了才能进去。工人、农民欢迎学生去交流经验。但是有一条，不论外地象北京来串连的，本地学生串连的，相互串连的，结合工农串连的，都不要包办代替，这是中央文件几次规定的。那个学校的革命，要靠那个学校本身的革命派为主。机关如此，工厂如此，农村公社也是如此。这一点，今天早晨农民同志讲的对，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学生只能去交流经验，支持一下，不能包办代替。因此，组织问题，顺便说一说。我们现在组织是分产业的，工人就是工人的组织，工人可以有几个工联，就跟学校的几个司令部一样。比如刚才说的工人有六个组织(其中有一个分成两个)：“工联”、“地总”、“红总”、“广东红旗工人”、“广州工人”、“红旗工人赤卫队”，这是大的；还有小的联合组织。现在有的小的合在里头，有的没有合，这个不去管了。总之，工人只限于工人的联合。组织太多了，将来总要合几个，不能分得太细了，太细就没办法做工作了。学生就归学生，大学归大学，中学归中学。当然，大学可以设中学部做工作。农民，还是贫下中农的代表会议，这个是主要的，或者红卫兵。农村的十条，是这样规定的。至于石井那个地方，还存在“红农友”的战斗组织，是不是可以作为红卫兵，我不大清楚。如果作为红卫兵，那也可以的；可以让它存在一下子看一看。我提议，农民同志，学生同志，记者都去看一看，看那个组织是不是确是战斗组织，群众又需要，那它就可以转为红卫兵的组织了，不叫红卫兵名字也未尝不可。总之，它是那种性质的组织。农民代表会，还是以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为主，因为十条上规定了的。要真正以贫下中农为主，干部是参加，干部也要贫下中农出身的参加，参加一部分做工作。还有机关，也不一定只有一种组织，也可以有两种组织，多种组织。这样存在一个时期，可以有个比赛、竞赛嘛。这些组织，一定要时机成熟了联合起来才可靠。所以，“省革联”暂时不存在，有它的发展规律，因为它

是不能存在了，它没有办法把各种人联合起来。因此，同样的设想，省里不是有个“省联总”吗？看来时机也还不成熟，真正的大联合还没到成熟的条件。所以，广东这地方，恐怕军管时间太短了还不行，太短了不能把各种工作做得好。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促战备，促工作，恐怕还需要一个时期，太急了还不行。现在的“省联总”，还不成熟，将来才能形成。所以现在也不能搞另外一种不经过同军管会商量的组织，就是单独的工农联合组织，或工农学联合组织，这还不成熟。所以，老红军也好，还有什么荣复转退的革命委员会，这些我们都不赞成；有些这样跨行业的组织，尽管它做对了，支持左派对了，我们还是把它取消了。

第四，“主义兵”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形成这么大的群众性组织了，它又没有明确的纲领，因此，在目前还要进行一段工作，就是集合一些能够找到的头头，比如说军训这方面已经召集成千人开过会，还出了一个报嘛。当然，在这个报上，我们军训的代表同志讲的话是有错误的，把它肯定起来，说现在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已经觉醒了，并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了。这个估计不正确，不合实际的。现在我们的革命学生（指大学生）、革命的工人，都没有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只能是长期的，最后的结果，那能现在就说；现在就这样说，那么，这三天，连今天是第四天，我们的这个会就不会这样对立了嘛。鼓掌是这一派鼓，那一派不鼓，那一派鼓，这一派不鼓。如果能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那能这样子鼓掌呢？我的话有的也是这一方面拿去用了，有的那一方面拿去用了。当然，有些话全体都鼓掌了，祝主席万寿无疆，大家都鼓掌了！这不管你说他大老保他也还是得鼓掌，{笑声}当然，这是在这个地方，如果出去了也很难说。对立情绪在鼓掌这方面太阵线分明了，就说明不那么全面了。我有一些话是按中央的话说的，为什么分成两种鼓掌呢？就说明对立情绪太强了，政策性就不那么强了。所以，对“主义兵”我觉得现在还要做一段工作。我是没有可能在这里做工作了，北京还没有做好嘛。如果能够找一、二百人和他们座谈，我看是可以谈的。我刚才碰到三个干部的女儿，一位黄永胜同志的（黄永胜同志：是陈发洪同志的，我没有女儿），一位是杨梅生同志的，一位是詹才芳同志的，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我跟他们说“联动”怎么反动，怎么要不得。我把事实告诉她们，并且鼓励她们应该站在毛主席的红旗底下，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不要靠感情办事，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研究政策，不要特殊化。

还是说得通的嘛！我问她们三个是不是“主义兵”，她们承认是“主义兵”，可见我随时可以碰到嘛，我住在这里一定要做这个工作。我看这比北京还容易些嘛。在北京，“联动”找也找不到，因为它是反动的。这里“主义兵”到处都是，怎么能叫做反动组织呢？所以我劝你们左派，你们这样子把他们赶到一边，这是很不利的，而且不可能赶到一边。你们压他，他就抵抗，有压迫就有抵抗，造成了对立，这样很不利嘛！是不是？我们见到“主义兵”就拦头一棒，骂他们一顿，那我还怎么能算是他们的长一代的人呢？所以，必须要把它揭穿，说穿，他们是能够接受的，会认识“联动”那样的思想是反动的，是错误的。我说你们自己要建立一个纲来，一个斗争的纲。因为他们刚回来不久，他们对许多问题认识还很笼统的，所以，这样的教育就不够了。我看了《小兵》的这篇演说，就是没有事前做好调查研究，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才说自己的意见。我想你们即使晚上看到了“主义兵”的活动——不过那天说了以后，到今天还没有捉到人，东西、武器是给我带来一大堆罗！那北京比这里凶得多了。这里是棒棒居多，只有两三根铁棍，我只看到一根，后来又看到一根，那北京“联动”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了。但是我相信会有一部分是这样子的。那你们要教育，要采取教育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这样的方针。你们自己也有弟弟妹妹嘛！或者亲戚嘛，还要做工作，不应该造成这样的长期的对立，这是不利的。对“联动”的思想、“联动”的组织、“联动”的行动都要反对；但是对广大的青年组织里受影响的部分，要区别对待。刚才碰到三个女孩子问我：“是不是你要取缔‘主义兵’”？我说我没有笼统说要取消，不过“联动”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我是反对的。如果你们接受它，我就要站出来反对。但是普遍的取缔群众组织的方法不能采用。即使是有一小撮是“联动”，也要对他们教育批判。这点我希望你们冷静地做调查工作，做到有分析，学习主席一分为二的方法。我们军委的十条命令就是用的一分为二的办法。

第五，工人造反的组织，刚才我已经说了，各个组织需要开门整风，学生也要这么做。特别是工人的组织，十几个组织，你们各自开门整风。首先自己批评自己，特别在工厂，两个对立的组织，自己开门整风，这样比较好。批评自己，人家来批评也欢迎，但是对方不要忙于批评别人，还是先批评自己，双方自我批评。然后站稳了立场，站到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这方面来，把矛头向上，共同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国的，广东的，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样子，

就慢慢找到共同点，慢慢就能大同小异，最后就能达到联合，现在还不成熟，现在要经过这么一个步骤。但是有一条标准，总之你不能够再支持反动路线，要站到革命路线方面来。总之，你要矛头向上，不能群众斗群众。群众斗群众是反动路线的一个特点，打击一大批，维护一小撮也是反动路线。

第六，农村的组织，贫下中农代表组织，即使是由军管会或者是军管会派干部下去组织的，如果它确是贫下中农代表，还是要承认，这个不能叫由上而下。因为现在农村大队和支部是不夺权，并且承认，过去四清如果深入的地方不需要再夺权，四清下台的干部不许再上台：地富反坏右不许乱说乱动，农忙的时候“四大”应该暂停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召集代表会当然是上级召集，只要代表是贫下中农代表，那就得承认它。所以，在这里头串连，由贫下中农本身发展，“红农友”也好，红卫兵也好，总之学生不能参加，只能帮助，只能串连，交流经验。由他们自己组织是许可的，去石井试验也是许可的。

第七，机关的革命组织的前途。总之机关长期闹革命不找出一个发展的前途来，那不行。你闹革命到一定程度，总得指出个前途来嘛！你到底批评什么，彼此批评一两个人，甚至出那样大的海报，我觉得这个矛头不对。就拿省人委机关里的造反派说，叫机关联络站，他加“省革联”了，支持夺权了，后来作了自我批评了，我觉得他的态度是好的，还要出那么大的报，题目是很醒人的，结果抓一些小节，是不是事实我不去管它，这样子把事件扩大，用那样一种批评方式，我觉得不那么妥当，这样的斗争就没完了。对立面是需要，但要在大的问题上对立，主流方面对立、斗争才行；在支流上对立就是抓细节了，见了树木不见森林。机关的斗争，我看水平应该提高，因为他总还得转上业务呀！抓革命促业务呀！你不能长期不搞业务，你总得订出一个计划来嘛。现在机关里面，就是响应全国的号召，把大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刘、邓，然后再结合本地的陶、赵，还有跟他一伙的人，这样来结合斗批改。机关总得有前途，学生放假到暑假，机关不能等到第三季度，第二季度有个结果就好了。比如中南局八百多人，总得有个出路呀，就是这样闹革命？只是少数人做工作，多数人跟你们同学差不多，也是放假闹革命，这个情况不能再继续多久了，今天已经四月十八日，我要求这个月底至少五月要得出个结论，到底抽出多少人来做工作，造反派要给我回答。抽出一部分人来，包括处、科级，司、局级的干部，能够站出来的部分。不能站出来的那当然

要继续作检讨，叫群众考察。中南局不起作用了，但中南局还有计划、财贸、三线、交通运输，可做的事情多咧。还可以抽出一部分人来支援各省嘛。省市机关也要有这个打算。你们造反派也要有个打算，总还要有个斗争计划，有个前途。

第八，干部参加工作和检讨、亮相的问题。这好象有点矛盾。是有点矛盾。就是领导干部还没有完全检讨完，他又在做工作。军管会里有个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可能不会找他们工作了，但是生产委员会总要找他们工作。这样还没有完全亮相又要他做工作，就会影响一批干部，大家比了。这个问题，恐怕请各级军管会订出个计划，帮助省、市各级领导干部，跟省、市机关造反派商量，指定几个人商量。象这样的座谈会不能常开，偶然开一次可以。还是分头开，跟学生开，工人开，农民开，机关开。机关还有中南局的，可以另外作一个口子，省、市委两个口子，这么来解决，这点请军管会抓住。总要有一批干部能够通过群众同意的，亮相，首先是要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揭露领导人，省的、市的，自己深刻地检讨，在工作中表现，同时也要揭发现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暗流，知道的就要揭露。这样不会影响揭盖子，因为这个盖子共同都要揭的嘛。要揭中央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省、市为数有限的几个人，这就是共同性，大家来跟他决裂，揭露嘛。

第九，外地来串连的同学不宜太多。已经来的八、九个单位，希望你们采取我刚才说的意见工作，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把北京好的作风传来，我们非常高兴，但不要把不好的作风也传来，变成北京的翻版。现在斗争水平提高了，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

对这些问题，都是不完全成熟的意见。听了你们三天汇报，我不能不讲一点。我讲的都是重复的，虽然整理了一下，还是有些重复。本来最好用一种决定的形式，提到中央去，再发给你们，那是很简单的几条啦，那不适宜。因为中央只我一个人听到，黄永胜同志听到。这个不能作为根据。而且现在只是改进工作，因为军管这个过渡的办法，还要实行嘛，不变嘛，希望你们给予信任嘛，这点是很重要的。我全部的精神，一个是敌情，其他你们都有经验了。我要增加的就是两条。说到最后，总结起来说六个问题，一个是增强敌情观念，你们不是没有的，你们是没有作为重点，现在你们要把它唤醒，每件事情要跟敌情摆在一起想一想，国外的敌人虎视眈眈面对着我们，想趁机蠢动。另外就是面对着敌人斗争的时候，

广州军区它不仅执行军管的任务，而要执行七项艰巨的任务，军管仅仅是一种，因此，在初期不免要发生一些缺点、错误，甚至个别严重的错误。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衡量他的错误性质。何况我们左派也犯过这样严重错误嘛，夺了权又掌不起来嘛，并且形成了组织，而这个组织又不能起作用，在群众中也失掉一点信用，但是我们还是支持你们嘛，就说明要照顾大局，以大局为重嘛。这个大局不是强加于你们的，是全体劳动人民、全民族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的。这一点我觉得还值得说一说的，我上面没说，你们也没有说，我觉得还应该提出来。应该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空气，提高这个空气，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文件，《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特别是《红旗》杂志社论。这样几个要求，这是一头。这样才能毛主席思想挂帅，政治挂帅。政治挂帅依靠什么？就是学习主席著作，带着问题来学。解放军是按照这个要求办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广东面临这么多的问题，都是主席著作上解决了的，你们如果能活学活用，就会得到解答的。现实的一些问题，从去年十六条起，有一大堆的文件，有这么多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很值得我们学习。还有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林彪同志已经发表两篇报告，还有第三篇。大家要好好读，今天我只是帮助大家整理一下子问题，这些都是文件上有了的。我们都是跟别方面谈过了的。就是吃透两头，上头请教于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下头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求教于群众，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要有一种深入群众的精神，向群众请教。我向你们请教，学到了一点东西；还通过你们向群众请教。凡是你们的语言从群众来的，一听就可以感觉到，仅仅是凭一时感想说出来的你们的语言，也可以辨别出来。这就说明还要深入群众。两头吃透了，你们就解决问题了。第三也是林彪同志所说的，自己立场态度如何，上请教于主席，下求教于群众，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要站在革命路线这一边，对待革命群众就是朋友，就是你的老师，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就以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能当敌我矛盾来处理。这些问题分析清楚了，就很好解决了。几天来，我和同志们的四次谈话和一次讲话，总是希望你们，信心也在你们。我觉得广东问题是能够解决得好的，能够迎头赶上的。所以我跟军区同志谈话，都是鼓他们的气，他们能够领导好的，他们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边的。

当然，个别的人犯错误，或犯严重的错误，那是个别的问题。从整体上说，从领导上说，他们是努力想搞好的。要搞好也不能光靠一方，领导必须和群众相结合，他们首先要向群众靠近。常开这样分片的会，个别谈话，指定专人经常接触，经常交往，就能把群众的脉搏，经常计算在领导的讨论当中，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中学生，机关革命干部等等，就可以经常计算了。我想这样做，一定可以把毛主席、林彪同志、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国务院的指导、指示贯彻下去，相信我们是会搞得好的。我现在号召在座的同志，通过你们号召我们革命的工人、农民同志、革命的学生同志、红卫兵战友、革命的机关干部同志，解放军的领导同志和广大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彻底批判、坚决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样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在这样的革命大批判的运动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通过这些斗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广东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这样伟大的光荣任务，我相信通过你们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和协助下，一定能够在今年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现在我们大家来高呼：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彻底粉碎和打倒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说 明

一，总理讲话中，有几处涉及机密的地方，付印时从略。

二，总理对“地总”、“红总”的评价部分，根据总理指示，改用了四月十九日二十时四十分由总理办公室周家鼎秘书从北京传来的电话稿。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报告的批语

林彪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以上，请酌定。 毛 泽 东 五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指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说，最近，我们对派出广州地区支左、支工、军管的一千七百多名干部，分两批进行了集训（第一期十天，第二期八天），并通过集训调整了一些干部。这次集训的主要经验是：一、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突出解决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二、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三、针对干部的活思想，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中央军委转发到团级以上党委。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最近，黄永胜，刘兴元，温玉成等军管会主要领导同志，分别邀请广州市大专院校，工人等革命造反组织的代表和部队支左人员，部分武装部的同志举行了一系列座谈会，诚恳地听取了他们对部队支左工作的批评和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现简报如下：

常委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也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贯彻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够，没能正确地识别和坚定地依靠真正的革命左派。军区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较晚，情况不了解；介入时，正值一些革命左派在省革联夺权，市公安局反夺权，冲击军区和军管广播电台中犯了错误的时候，

正值粉碎社会上一度出现的指向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逆流的时候，当时我们对造反派的错误看得过重，许多同志带着对某些革命造反派极不好的印象，以感情代替政策，以对待省革联夺权和冲击军区等“四大事件”的态度去鉴别左中右，而没有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以致模糊了识别左中右的界限。例如对于一时犯了严重错误的革命左派，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甚至不适当地取缔，解散了一些群众组织，错误地抓了一些人。反之，对于某些偏于保守的组织，则认为听话，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没有参与“四大事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这就在实际上，起了压抑革命左派的作用。正如一些小将批评的：“你们对一些革命左派的支持，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对一些有保守倾向的组织，态度暧昧，脚踏两只船”。这是一针见血的批评。其次，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正慢。三月底四月初，中央关于青海，安徽，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命令颁布后，我们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但是决心不是很大，措施不很有力，很多思想，组织工作不落实，因此，弯子转的很慢。集中地表现是：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得患失，不敢勇于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一些支左人员对上级决定不理解，埋怨对造反派“五原则让步”。因此，对偏保或保守组织感情“难舍难分”，对左派组织将信将疑。而一些偏保或保守组织，对我们突然改变态度，反映强烈，甚至围攻质问，更使一些支左人员和领导干部犹豫不决，感到无所适从。

产生以上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军管会领导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认真吃透两头，对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还很不理解，领导工作很不得力。例如，没有把革命组织在斗争中所体现的大方向与某些缺点错误严格区分，混淆了主流和支流的关系；在调查研究工作中，没有认真贯彻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全面地历史地考察每个群众组织，特别是对大专院校武装部和区武装部的工作没做好，往往凭着他们提供的一些未经核实，倾向性很大（他们中很多人参加了一些偏保或保守组织）的片断材料作结论，下判断，轻易表示支持和反对；纠正错误时政治思想工作没有紧紧跟上，工作一度比较被动。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常委认为，以上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能不能迅速彻底扭转，这是关系到整个支左工作成败的关键。为了吸取教训，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任务，我们决心遵照林副主席关于吃透两头的教导，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领会党

的方针政策，大力突出政治，通过集训支左干部和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邀请造反派开座谈会，邀请革命左派代表作报告等办法，认真总结前段的支左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全体人员的思想，首先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克服保守情绪和私心杂念，彻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紧紧跟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带头，政治挂帅，到群众里边去，广泛同广大群众和支左人员接触，加强调查研究，虚心向他们学习，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坚定地站到左派组织一边，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对一些犯了缺点错误的左派组织，从爱护出发，满腔热情地给予帮助；对过去取缔，解散的群众组织和抓错了的人，经过全面复查，凡是做错了的，立即坚决给以平反；对偏保的组织，积极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加强革命性，引导他们掌握斗争大方向，努力争取各革命组织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以上如有不当，请指正。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区分，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军委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二 恩来、林彪

(2)、中央碰头会阅发。 三 时间太少，应有十至十四天。——毛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 指广东省军管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和中共湖南省军区委员会五月十二日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给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广州军区的报告。广东省军管会的报告说，最近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受到一些革命小将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进慢，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得患失，不敢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为此，常委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湖南省军区党委的报告说，五月十一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来电话，传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大家决心做到：一、从上到下统一认识，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也相应集中五至七天时间（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即本篇三），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二、纠正错误，做好工作。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要从上到下统一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四、加强领导。 (2) 恩来，即周恩来。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

1967.05.14； 中发 [67] 151 号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分区，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 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 凡犯了错误的必需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军委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三集）》，北京：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康生对广州军区黄永胜等人的讲话

〔地点：广州。康生同志于五月十九日接见了广州军区黄永胜、刘兴元、孔石泉、温玉成等同志，作了重要指示。〕

康生同志说，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军政训练，主席非常重视。

军政训练有四大成绩，第一是把学生集合起来了；第二是组织学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第三是左派发展了；第四是在有的学校促成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在军训工作中也有缺点，主要是四个字：“急”、“硬”、“死”、“多”。

你们知道不知道主席给了解放军什么任务？主席要解放军“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主席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联动”的错误，就是违背了主席的这个指示，搞血统论，说自己是红五类，别人是黑七类、狗崽子。主席在一个批示中说：“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年老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这是主席交给解放军的任务，怎么能说解放军右倾、和稀泥呢？

在当前，结合文化大革命斗争形势，学好主席著作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五月八日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主席看过了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我直接参加了。主席是五月二日讲“引言”，五月二十三

日讲“结论”。当中二十一天找了很多谈话，进行了调查研究。

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文艺方面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学习这篇文章，是从哲学方面去理解的。

《讲话》涉及许多哲学命题，如存在与意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专家与群众的关系，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动机与效果的关系等，主席有意地用哲学来说明一系列问题。从政治方面来讲，讲了阶级斗争，策略思想，讲了革命文艺的五个问题，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立场。态度，讲对三种人有三种态度，对敌人，要彻底揭露、打倒。对朋友，要有批评，有团结。对自己，对人民解放军，要赞扬。

在当前，我们发表这些重要文件，目的是引导革命群众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掌握斗争大方向，有力地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工人的工作，除上海外，都作得不好。现在是学生领导工人，不是工人领导学生，这个问题很大，如果不解决，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不仅不能克服而且会影响工人。

主席要我们首先注意政权问题。五四运动好就好在提出了打倒卖国政府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首先起来了，他们是先锋，但必须向工农兵学习。北京革命群众组织的四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都是学生。为什么没有工人的领袖呢？肯定会有，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现在有一些问题发了指示，但研究贯彻这些指示不够，具体措施没有跟上。常常不能解决问题。结果发一个指示不行，又发一个，越发越疲。大字报越写越大，浆糊越用越多，农民很有意见说我们吃都吃不上，你们成桶成桶往墙上糊。

（来源：1967年6月2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65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黄永胜与“广州工联”造反派座谈时讲话摘要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并告文革小组：

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

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

如同意，请酌处。 毛 泽 东 五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一三一期上。这期快报登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温玉成等五月十日与“广州工联”八位造反派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摘要。黄永胜在讲话中检查了“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彻底给被打击迫害的革命造反派平反，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华工东方红、红旗 516 纵队：《〈北京来信〉事件始末》

去年六月二十四日，高翔等同志贴出了《北京来信》和《告全院学生党员书》，顿时，平静的华工校园沸腾起来了，同学们奔走相告，争相传抄。很快 7059 班同学贴出一张呼吁在广州地区建立一个由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联合指挥部的倡议书，同学们的革命激情被唤起来了，到处可以看到一堆堆的人群在谈论，华工校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的气氛，预示着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就要到来。

可是，小将们没有想到，在革命烈火就要燃烧起来的时候，有人就策划于密室，要对他们下毒手，要扑灭这场革命烈火了。 在省委的一个密室里，赵紫阳在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只见赵紫阳咬牙切齿地说：“《北京来信》是反动的，是大毒草，要进行批判。”随后，张云、王兰西就奉命来华工对工作队长叶向荣面授机宜，说“今晚学生要暴动，立即做好准备。”院保卫处副处长邱盛花马上到广州警备司令部调兵遣将。准备随时镇压。叶向荣还命令全院所有武装警卫人员全副武装，一等战备，通宵守候。三个工作队长也身带手枪，杀气腾腾。只等一声令下，就要对小将们开刀！ 当晚，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现已查明，

区是个大叛徒)彻夜未眠,守候在电话机旁,紧张地听取华工的情况,如临大敌。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左右,在省委工作队和张进(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我院头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策划和布置下,只把工人贫下中农、革干子弟从床上叫起,开紧急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给《北京来信》定调子,危言耸听地煽动说:“敌人已冒出来了,我们要进行反击,必要时要付出鲜血和生命。”在工作队布置下,不少同学连夜写大字报,写批判文章,什么“《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斐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等等,铺天盖地而来,连牛鬼蛇神也出来写“批判文章”,对革命小将进行大规模的围攻。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同学进行跟踪,盯梢,偷听电话……一时阴风四起,妖雾迷漫。白色恐怖笼罩华工校园。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那黑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六月二十六日,五位革命小将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冲破黑省委的重重阻挠上北京告那些混蛋老爷们的状了。小将们的无畏精神吓坏了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赵紫阳一伙。他们使出种种卑劣手段,打电话给沿途单位,布置对五位革命小将的拦截和监视,赵紫阳还指令白云起(省公安厅副厅长)给公安部打电话,说“广州有五个反动分子要去北京闹事,要求派人跟踪,并监视他们的行动”。六月底,经赵紫阳同意,王兰西,焦林义,白云起等签名向广州公安局交办:要控制华南工学院高翔的《北京来信》,七月初,赵紫阳还亲自给王宁(公安厅厅长)一个批示,要他布置有关部门对高翔等几位同学之间互寄的信件进行邮检,并确定由白云起和十处长挂帅,把《北京来信》当作大案抓。六月二十九日,公安厅侦察处向厅党委写了个报告,题目是:“广州市大专院校开展技术侦察工作的意见”内容说“为了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拟在石牌成立一个临时侦察组,对六间大专院校进行侦察。”七月七日省委批示说“同意这个报告,可增加中山医学院。”工作时间为三个月。七月三日,公安厅又向省委写了一个《关于对华南工学院七种人进行侦察工作的报告》,提出对 200 名对象进行技术侦察,有学生,教师,干部等。上述工作直至八月份中央公安部通报某省利用技术侦察进行违法乱纪事件之后才被迫停止。他们还把贴《北京来信》的 1016 班和呼吁建立联合指挥的 7059 班档案逐一审查,认为里面有“反革命”,工作队特别对 1016、1026、1038 和 7059 班进行严密控制。当时,工作队关于情况的报告有如下纪实:“工作队发现后(即对《北京来

信》)立即采取措施,了解各系情况,封锁消息,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当晚召开工作队员会议,进行布置,串联骨干活动,同时将原信抄送王兰西(副省长,三反分子,已停职)和文教政治部”。为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黑省委竟以对付敌人的专政手段来对付革命同学,真是恶毒至极!高翔同志更是受到非人的迫害,《北京来信》事件发生后,他们派人对高翔进行跟踪,监视,剥夺高翔和其它许多同学应有的政治权利,不准他们参加援越抗美游行,阻挠他们在学代会上发言。他们还通过了解高翔父母的政治情况,以找到借口把高翔的材料送到公安厅,列举了高翔六大罪状:(1)召集党员写《告全院学生党员书》(2)张贴反动信件,到处煽风点火;(3)成立统一行动指挥部;(4)举行接待会,反对工作组;(5)组织退却,伺机反扑;(6)坚持错误,坚决反对工作队。必须指出,陶记黑店中南局一小搬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镇压《北京来信》事件的主谋者,在七月一日中南文化革命简讯(增刊)第七期中,报导“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中南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这份情报发到各级党委,声称“北京医学院寄来的煽动学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信件,就是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标本”。布置各级党委准备抓“右派”,准备随时镇压,海南岛红岛大学几个学生由于赞同了《北京来信》的观点,遭到残酷的镇压。铁的事实证明,陶、赵及其死党就是镇压《北京来信》事件的罪魁祸首,他“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今天,陶、赵已经被广大革命派揪出来了,我们要彻底清算陶、赵疯狂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镇压革命派的滔天罪行,把陶、赵死党统统揪出来,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能翻身。周总理在四月十八日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压迫,也是受陶铸的压迫”。陶、赵及其死党对革命群众种种迫害,只能促进革命群众更加剧烈的反抗,加速他们的灭亡。在《北京来信》事件斗争中,锻炼了革命小将,华南工学院革命派在与陶、赵及其死党的斗争中,已经成长和壮大起来了,现在他们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高举革命批判大旗,发扬“六·二四”革命造反精神,以千军万马的雄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总攻击，直捣陶、赵黑窝。 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华工东方红、红旗 516 纵队 华工机关红旗兵团农奴戟 （广州三司华南工学院《红旗报》1967 年 6 月 24 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戚本禹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判陶铸的指示

〔按：7 月 11 日下午，《南方日报》接管派（新闻尖兵）在编辑部会议上由罗妙传达了中央文革关于批陶的指示和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陶的计划和意见。此件是根据记录整理而成，仅供参考。〕

最近，广东省军管会派人去北京请示批陶的一些问题。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接见了他们，并且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内容如下：

（一）批陶的问题全国怎样部署？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地区发起，中南各省跟上。将来看批判的情况，听听反映再说。中央目前还没有打算在全国范围批判。

（二）什么时候开始批判？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军区、江青同志请示毛主席，在报上批判是毛主席批准的。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批。七月中旬看行不行？

（三）批陶的要害是什么？重点应放在哪里？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先从三本书开始，《随行记谈》、《思想、感情、文采》、《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三本书都是大毒草。流毒甚广。可以从这开始。然后，逐步加深，逐步提高。

（四）批判的角度怎么样？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作为中南第一书记来批判。但在广东搞了十几年，就可以从广东开始。

（五）给陶戴什么帽子？

戚本禹同志说：由广州军区定。想提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最后决定。

（六）批陶的文章由哪里调查？

戚本禹同志说：作为地区的批判，可以由军区决定。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只有两篇是中央审查的。一篇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篇是《修养的要害是

背叛资产阶级专政》。文章要掌握斗争大方向。

（七）批判计划由谁定？

戚本禹同志说：计划也由军区决定。批陶要发动群众，要打人民战争。陶铸在广东流毒很深，要发动广大群众批。批判对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意义很大。

金敬迈同志在场补充说，最好七月中旬开始，越早越好，但先要有个计划。军区写了一批文章送中央文革审查。军区的文章是指路子的，不一定太多。批判要由大报领路，这点很重要，同时也等发动小报一齐配合。

（来源：1967年8月25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32期）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州赴京代表团时讲话

〔参加人员：戚本禹同志，广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代表团 52 人，地总派 58 人，陈郁、王首道、赵卓云、黄永胜及广州军区其他代表。〕

今天多来了几位，是我主张的，上次占劣势的一派多来了几位（指地总派），人多并不是占优势，多来几个好说服他们吗！

今天旗派开了一个大会（指广州工人联合大会），听说开得不错，首先我们祝贺你们，但你们要注意，不要骄傲。不然会走向反面。今天让不是旗派的多来几个是我主张的。不能说你们就是造反派，他们就是不革命的，造反不分先后么，听说你们连工交红旗都不愿意联合，你们要做工作，连地总红总今后还是要走到一块，我不能老奉承你们，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运动一定要以工人为基础，我们要问旗派，你们是不是毛泽东思想，运动一定要以工人为基础呀。

应该以工人为基础，过去国民党挑动工人打架闹分裂，我们就是去做工作，让工人联合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现在社会主义时代，特别是广州面临敌人，工人为什么不能联合呢？就是因为观点不同，过去就有隔阂，四月初到你们那里去就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是这个问题，你们要加强联合，在什么基础上联合呢？就是要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工业十条）为基础，以大批判，批判刘、邓、陶、王、赵为基础，只要搞大批判，是完全可以联合的，上次和你们说了，达成了四项协议，结果有一方面，封存了枪支，另一方不封，而封的一方面又要起封，结果双

方又打起来，打得没有道理，在黄埔打起来，子弹飞到外国轮船上，有个越南船，也挨了子弹，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工人阶级不痛心，你们就是要打，只顾派别利益，不顾国家利益，连起码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都没有。今天你们开了一个大会，十万人，但是我还是不放心，听说你们发了一个宣言，你们把矛头指向谁呀？！

有没有指向解放军？有没有指向不同观点的群众？如果矛头不对，我们就不提出，人民日报也不会发表，尽管你们大方向是对的，但也不能把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群众，工人阶级应该联合起来，运动搞了一年多了，应该这样么！上海就是这样，所以运动比较健康，虽然有坏人挑动，但毕竟是少数。工人的工作还比较好做，学生不同，学生思潮起伏，容易产生派别观点，工人阶级是最懂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爱护国家财产，你们对立情绪那么深，这是不能容许的，一定要提倡工人大联合，在十六条的基础上，在工业十条的基础上，工人阶级的大联合，只有工人联合起来，才能推动运动。

请你们来后，人不少，但武斗没有停止，那个冷藏库，我跟你们讲了，不要去占领，可是你们还是要去占领。

（地总：现在旗派进攻水厂，一定要打倒现在。）

（三司：这是地总挑起来的，他们打死了我们五十多名战士。）

那黄埔是谁挑起的？

（三司：是地总）

（红海员：不对，我是红海员的，刚才接到广州来电，旗派占领冷藏库大楼，用机枪扫射海面，使我们不能工作。）

（珠江红司：他完全是造谣，自地总占领黄埔岛后，用两艘炮艇封锁海面，我们的船只无法出海。）

（红海员：我们说一点。）

你们再说，我不听了，刚才还说工人要大联合么！你们就是这样子。我要大声呼吁，反对打内战，这样才不愧为广州公社的后代，不愧为省港大罢工工人的后代。那时工人多团结，四十年后今天，这样斗不团结，我们要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奋斗么！英美就在对面，看着敌人不管，而对阶级弟兄这样对立，就是只看见眼前利益，没有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利益。（对红海员）你们为什么要把占少数

的旗派包围呢？

（红海员：我们根本没有包围旗派。）

（珠江红司：我们一直坚持了抓革命促生产，但地总两部炮艇封锁了海面，我们出不去。）

（地总：我们根本没有炮艇）

（珠江红司：我们南海 107 船出港，结果是遇到地总炮艇的机枪扫射。）

（地总：我们根本没有炮艇也没有机枪。）

你们扫射了没有？

（地总：我们根本没有）

不要说得那么肯定吧！对海港我们要采取军管，军管后就不同了，再违反就要抓人。（坚决支持对海港实行军管）你们这样赞成军管，那你们对野战军的枪还抢不抢。我们要严正指出，广州再也不能发生抢枪这样的问题，我们要用这一条来考验你们。（我们保证不抢枪）好！那马上签，解放军的枪你们都夺，你们能保卫祖国吗？我们多少老同志，身负敌人枪弹，你们这样做过得去吗？我现在不要责备学生，首先要求工人带头，陈郁是老工人，现在要站出来，首先讲工人大联合，不能站在派别观点上，要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农民也要联合起来。（八一兵团：我们八一兵团决定带头把枪交给解放军。）好哇。

不管那一些，都要如此，我上次对你们要求不高么，先封存起来，不要再打么，那是敌我斗争，工人阶级为什么要打呢？即使是反动路线可以批判反动路线么，我们呼吁是：各派的同志保证不再打了。

（红旗农民：郊贫联现在发枪。

郊贫联：我们已经封存起来了，根本没动枪。两派争吵起来）

（敲桌子）你们还吵，你们吵吧！我说了嘛，从现在×点开始不再打了，赞成不赞成。

（赞成）（工联：我们保证把枪交给解放军）

第一步是要求你们先封存，不启用，这样才能保证制止武斗。

（地总：工人联合组织排除了大多数工人，我们不承认。）

他作为一个组织，不要什么人承认，就是一个客观存在。

（地总：我们大多数工人被排挤在外面。）

你们有你们的组织嘛，我要求你们：1、把所有枪支弹药全部封存起来，包括车辆，不要开着到处跑；2、就是不要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3、支持解放军在市区到车站码头进行巡逻。如何人不许干涉，以后不得违反。否则，以破坏“六六”通令来处理。我一定要把广州这几条定下来，双方签字。我现在马上派人出去调查，今天会上的表示我还不能完全相信，因为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定要求你们做到这一点，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

好，现在谈谈学生的问题，你们怎么办呢？

（红司：我们保证走工人的道路）

（三司：总理对我们的批评，对我们造反派教育很大，我们说口头表态是容易的，但行动上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一定按总理的指示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省直红旗：地总扣了我们的三个人已从二十七日开始绝食，他们至今不放。）

（地总：我们准备放）

当然要放，在这里重申，不管那一派扣的人都要放。

（文艺总部：请总理批准我们打电话立即回去，立即宣传。）

对嘛，人的思想转变都有个过程，我们说话都要客观一些，不要说得那么×，中南局好办，王首道不会带你们去抢枪，但青年人就很难说，要做艰苦的工作，首先是要下定决心，你们首先要达成协议，制止武斗，你们留下一部分代表，我们还要谈，关于筹备三结合问题，广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北京的红卫兵劝回来，现在有很多人替冒红代会的名誉去的，他们给你们增加不少负担，去年他们去煽风点火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就不同了。主席说：现在到各地串联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帮了倒忙。我们要求你们去把他们劝回来，现在绝不能包办代替，要把他们劝回来，同时还要在你们那里造成舆论，一致对外的空气，你们回去要立即制止武斗，我们派人下去调查，首先工人大联合，农民大联合，知识分子大联合，解放军作后盾，铁路一定要联合起来，要严明一条纪律，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如果再抢，就会被坏人利用。特务、流氓、烂仔也会来抢枪，那就会不清楚了，坏人打死我们的人，使我们更加对立，实际上是被坏人利用。今天大家同意，我们达成了协议，大家签字，然后每一个单位派一个人回去，通过你们宣传，把枪封起来，不要再用了，大家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这样，才能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有些组织是要费点功夫，象主义兵，年轻人嘛，思想起伏。（主义兵：我们

坚决按总理指示办事）那就由你们回去说服下面的群众。

（红总：现在医院成了派别医院）

（机关红司：他们造谣）

我看你们派别观点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你们这样已经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很远了，不管那一派都要立即回头，医院怎么能因观点不同不开刀呢？

（总理念协议书）

如果大家同意，签字后马上打印出来，下午就派飞机把你们送回广州，回去后，住在一起，开会调查，你们要容许解放军派兵保护，不要互相抓人，这样做，无论如何，是不好的。我相信广州一定要做出个榜样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周恩来就广州各派执行“制止武斗四项协议”发的贺电

广州军区转中央调查组魏国印同志、调查组全体同志并广州地区各群众组织由京返穗代表同志：

广州地区各群众组织代表九月四日关于贯彻执行“拥军爱民和制止武斗的四项协议”的决定收悉，并且听说正在付诸实施。你们所取得的这一成就使我们感到很高兴。你们的决定不仅直接有助于制止广州地区的武斗，而且对于促进广州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通过大批判走向大联合，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热忱地希望你们能够真正按照这一决定，以实际行动保证五项措施的全部实现，并预祝你们不断取得胜利。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广州“贫联”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说：

你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应独立思考，凡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应该支持。前天你们去参加了大会（指“地总”举行的工革会）介入了武斗，这不好，对方就有理由批评你们。他们说你们是偏保组织，我们没有这样说嘛，事后你们又怪军区，你们去军区是借口，我不相信你们前天晚上不能回去，那么多人去军区，这又违犯了“九·五命令”。

你们要有独立性，要有独立位置，成立独立组织。打电话回去通知广州，1. 不要开大会，“九·五命令”发表后，发生武斗是不对的，刚刚发生武斗，你们又开大会，这样容易引起更大规模的武斗。2. 把留在军区警卫营大院内的贫下中农劝回去，前天武斗打伤打死 180 多人，都是阶级兄弟。这些事中央调查组和广州军区是会弄清楚的，也是会正确处理的，目前不仅你们要撤出来，也要“地总”的人撤，在回去的路上，要再发生武斗，由军区做工作，“郊贫联”的同志可以从东山绕回去。

你们要和中央调查组合作，你们执行了四条协议，执行了“九·五命令”，队就站对啦，就是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了。我们就是拿这些来考验你们，希望在这两方面做出成绩来。

“郊贫联”的人数很多，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让广大农民进城，只要你们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执行四条协议，执行“九·五命令”，你们的组织就站住了脚，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黄永胜在接见广东各地代表时的讲话

〔地点：京西宾馆。摘要〕

在当前的关键时刻，对每个组织、每个人都是个很好的考验。是否能紧跟毛主席的部署，搞好大批判，如有一个组织没有搞好大批判，而是在那里搞武斗，不沿着毛主席所开辟的航道前进，就不是一个好组织。

造反派要做出榜样，要立新功，尽管分成两派，但两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这里还有坏人，在国内还存在走资派，坏人，在外部还有敌人。总理每次接见都很强调敌情，特别是海丰那里有个莲花山，经常有敌情已很出名了。现在我们两派打起来，打死的几乎都是好人，真正的坏人倒没有打死。这两派有些造反精神好些，有些造反精神差些，有些觉悟快些，有些觉悟慢些，有些跟中央精神紧些，有的跟得没那么紧，造反精神好的要帮助造反精神差些的组织，觉悟快的组织要帮助觉悟慢的组织，紧跟中央精神的组织要帮助跟得不那么紧的组织，使他们改正错误。两派都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

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有些部队支左犯了错误，屁股没有坐正。我们

要相信他们会检查错误，屁股会转过来的，经过检查后，你们要相信他们解放军犯错误与走资派是不同的。

最后还是具体解决几个问题：

1. 要为韶关“八一工农兵总部”平反。谁出面的就由谁出面平反。如果军区出面的，那就由军区出面为你们平反。

2. 要派部队（带枪）到四会，保护你们（造反派）回广宁。要把被关的人都放出来。

3. 海南那个冒充中央文革联络员的，要调查。你们把他抓起来，送交军分区，我们责令他们处理。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广州“旗派”五名代表时的讲话

极左思潮不光你们那里有，全国普遍都有，你们也受了一些影响。主席视察后，集中地提出了四个字“斗私批修”，你们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吗？是主席回来时在列车上找三派谈话，什么道理都讲了，最后送给他们四个字。斗私批修你们是第一次实践，才能体会到这四个字的伟大意义。但联合也可能有反复，但也不要怕。

要大胆地解放一批干部。革筹小组、造反派作基础，加一些军事干部和领导干部。现在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团结教育东风派问题，你们要高姿态。

搞学习班这个办法很好。河南、湖北正在北京集训，老将们检查很深刻，小将们感动得哭了。小将说：我们过去都把老干部看得太坏了。

联合并不等于旗帜倒下，第一步没有这个要求，没有绝对的大统一。组织可以存在，只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要搞复课，具体办法你们想，你们对解决干部问题不放心，是可以理解的。有些问题革筹小组成立以后解决，干部子弟学校要解散，学生要分批到各学校去，中小学派军训团，大学派军代表，帮助三结合。

大学要帮助中小学。

总理指出：广州的户口保留证和下乡落户四年是骗人的。

（农村大联合问题）干部下乡参加劳动是重要的，但农村还是以贫下中农为

主体，干部下去把权就拿过来，贫下中农是不会同意的，知识青年只要和贫下中农结合得好，也是可以掌权的。

文化大革命使每个组织、每个人，包括军队在内，都受着严峻的考验。你们是青年，缺乏经验，我们随时提醒你们，你们犯了错误与我们老年人不同，我们可以原谅你们。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工交红旗”和“地总”代表的讲话

〔时间：晚，陪同接见者：戚本禹、吴法宪、黄永胜。摘要〕

周总理问：“工人联合的情况怎样？”

（“地总”汇报了 26 号签订六点协议）

不坏嘛！

（“工交红旗”汇报了广州冶金行业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和地总分裂大联合的情况）

总理说：在大联合中还挖墙脚，这样搞是不对的。你们（指“地总”）过去是有派性的，军区在四月份要是急转直下，就可以把你们的保守倾向扭转过来。但是军区工作做慢了一些。军区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两件事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改了就行了，比如八一战斗兵团平反问题。

（代表汇报了情况）

总理说：他们究竟还有多少人？

军代表说：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

黄永胜：他们说有几万。

军代表汇报说：他们分三个口：工交、财贸、文艺。

总理说：跨行业不行嘛！不是开平反大会嘛！

黄永胜：还搞了平反联络站，要层层平反，

“地总”代表：还要群众组织给他平反。

总理说：群众组织要给他平反？那不是群众斗群众嘛？层层平反等于要帮他们发展组织，珠影东方红我四月份就帮他们平反了，要他们回去搞革命比赛吗？

你们工人先把局面稳定下来，现在最难的是铁路等一下解决，现在是第二个年度了，无论如何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做个模范。

总理说：老保翻天是指党内走资派，把老保加在群众头上我不同意。

（汇报到斗私批修进行联合情况时）

总理说：要破旧立新，把不合理的制度要打碎，要革命化。中南局除了那几个走资派和叛徒清楚了，省委除赵紫阳外还有哪些要批判，要打倒的，揭发出来没有？

代表汇报了区梦觉是叛徒时，

总理说：有证据吧？他自己承认吗？

（代表一一回答）

总理说：如果确实那就定性了。

当汇报到戈枫是文化大革命黑手时，

总理问戈枫，

戚本禹同志说：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戈枫

（并摆手向总理示意不行。）

代表还谈到赵卓云前天来对我们说他是穷富农时，

总理惊讶地问：赵卓云来了吗？

（答：来了）

是他们（旗派）把他们拉来的。干部问题你们回去审查。

总理问：上山下乡的青年怎么样？

（代表们汇报了情况）

总理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红线，不是刘少奇的黑线。

当谈到支农青年要造反时，

总理说：“支农青年”四个字很好嘛！不支农回来造反，造谁的反，中央有个通知，你们要做他们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广铁分局两派关于维护广铁分局军管的协议
军管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对周总理指示广铁分局实行军管的决定，我们热

烈欢呼、坚决拥护，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了保证军管后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坚决相信、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冲击广铁分局军管会。对广铁分局军管会的指示、决定，坚决执行、坚决照办。

二、坚决执行广州地区两派在北京签订的十二条协议。

三、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学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彻底革命精神。

四、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积极支持和协助军管会搞好各项工作，在任何情况下双方组织坚决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无阻。

本协议自军管之日起生效。

广州铁路分局群众组织代表签字：广州铁路分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唐国良 广州铁路分局春雷红色总部 李德权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于北京

附件（四）

最高指示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关于实现广州铁路分局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实现革命大联合，中央又发出了“十·一七通知”。我们坚决照办。

在革命大批判的新形势下，必须集中全力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及其在铁路上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促进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和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双方代表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各级军管会的正确领导下，立即着手建立“广铁

分局革命大联合筹备小组”。由双方各派三至五名代表组成。筹备小组下设办事机构，亦由双方派出同等代表组成。分局所属基层单位两派组织经过协商相应成立上述革命大联合的机构。

二、革命大联合筹备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以斗私批修为纲，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火力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通过大批判首先实现双方组织的革命大联合，并逐步实现全分局的按行政部门的革命大联合。

三、正确对待干部。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教育干部大多数，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投敌叛变自首分子，只要他们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对干部要实行轮训学习，并让他们在工作中得到改造，经受考验。

对犯错误的领导干部，由双方协商批斗，如意见有分歧时，对方不得阻拦和干扰另一方批斗。

四、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拥护各级军管会的正确领导，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和护路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五、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九·五”命令，以及双方代表签订的“四项协议”，尚未上交的枪支、弹药和一切武器，必须在大联合筹备小组成立后五天内，交回中国人民解放军，逾期不交者，革命群众有权扭送军管会，严肃处理。

六、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保证“九·二一”九条协议的贯彻执行。坚持节约闹革命，业余闹革命，更好地完成广州铁路运输任务，完成进出口物资、支港物资和战备物资的运输任务，确保秋季交易会的顺利召开。凡离开工作岗位的干部和职工，应由双方动员他们返回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双方应热情欢迎。

七、坚决执行中央二四一号命令，铁路不介入地方，地方不介入铁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双方不参加地方的群众组织，目前尚留在双方组织中的学生，应

动员他们回校复课闹革命。

八、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性，时刻不忘广州地处边防、面临港澳，严防敌特和地富反坏右及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维持革命秩序，对本组织内的坏人要依靠和发动本组织内的群众去揭发处理。

九、为了迅速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双立应增强团结，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不做，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不说。

十、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广州铁路分局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签字：广州铁路分局春雷红色总部 李德权 广铁分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唐国良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二十三点于北京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双方代表的谈话

〔陪同接见的首长有：戚本禹、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陈郁、王首道。总理满面笑容，步入接见厅和双方代表一一握手。〕

总理高兴地说，广州三个工人组织联合起来了，十万人大会不要延期了吧？

（工革联控答：定下来了，明天上午九点）

总理说：好？中央发个贺电去！

总理：海员联合了，铁路联合了，现在就是革筹小组问题了。你们赞成搞个革筹小组回去推动呢，还是回去搞军管呢？

总理首先问工革联控代表，然后又问工革会代表。

工人代表们回答：赞成搞革筹小组回去推动。

总理又问旗派机关干部代表，

代表回答：我们代表团昨晚讨论过了，紧跟中央，拥护中央决定成立革筹小组。

总理：革筹小组还是五个人，陈郁同志不是主要的嘛，孔石泉同志在下面搞得还不错。你们提了赵卓云，他们提了马甫，一方推了一个，双方都不能接受，都还要考察一下嘛！

“红旗”派代表汇报了广州现在又出现了抓领导干部现象，“总派”冲了军管会办的干部训练班，抓了戈枫、王维、田明等干部。总理记下了他们的名字。

总理在记下田明时说：听说田明还不错嘛，为什么把他也抓了，抓人不对嘛！抓戈枫也是错误的，谁抓的？

“地总”：是我们下面一个分部抓的。

总理：立即打电话回去放人！戈枫我们是不同意马上结合，但也不要抓嘛！戈枫有些问题难道比陈再道还严重吗？陈再道还在训练班里嘛！立即打电话回去放人！

（联络员带“地总”代表去打电话，回来后，“地总”代表告诉说，已打了电话，叫把戈枫送去警司。）

总理：为什么送警司呢？马上送回学习班嘛！

（联络员又带“地总”代表去打电话。）

总理：军管会要保护参加学习班的人，任何人不准动。

代表们汇报说，刚刚签订了协议，在北京的总派代表却把革命领导干部赵卓云同志抓去斗争、侮辱。你们在北京代表斗争赵卓云同志，在家里也抓人，这就不对嘛！

（“总派”代表：抓戈枫是“地总”一个分部，在这里斗赵卓云是一部分代表，我们是不同意的。）

总理：不管怎样，不能抓人，要讲道理嘛，你们的协议里面有的嘛，你们刚刚签订了协议还要这样搞。

（总派代表汇报了旗派也有抓人的事情）

总理说，两派都不能抓人。

总理说：革筹小组就这样定了，你们要是相信中央的话，就是那五个人，我们发扬民主够多的了，先成立起来，他们是五个头头，他们提赵卓云有他们的道理。你们提马甫通不过，既然双方不能通过，只好都不能参加。你们回去之后要加强党性，反对派性，要解放干部，现在是你们支持，他们打倒，他们支持，你们打倒，这叫干部怎么活呢？干部怎么能过关呢？解放干部只能搞党性，不能搞派性。现在湖北的陈再道、钟汉华、蔡炳臣等都在训练班，都没有打嘛！应该文明一些嘛！对立情绪不要都集中在干部身上。广东总要比湖北文明一些。

现在两广要赶快赶上来，两广都在前线，你们广东我本来已向主席报告，月底可以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又拖了十天。

主席最近指示，“包括你们要打倒的陈再道在内，只要他承认错误，认真改正，得到群众谅解之后，可以站出来，重新站到革命队伍的行列里。”

（旗派代表说，亮相干部不管亮在哪一边，都不要以派性来看待，要对革命负责。）

总理：对！现在推动你们签了字，达成了协议，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今天民主就少了一点。工人阶级总是要革命的，群众总是要革命的。解放十八年了，但组成几派之后，就有了先进和落后的区别，领导层就要分析了，少数组织被利用了，现在已不能和过去走资派完全当道时相比了。现在军队支左形势就完全不同了，军队主观上总是支左的，军队支错了改得很快嘛。

今年夺权斗争中发生了新的问题，一月份激进的一部分组织先夺了权，但很多没有夺好，没有联合另一派来夺权，一派夺了权，把另派排除在外，这是搞不成的，从一月份到现在，取得了经验，就是推动联合。现在存在的问题，两派中有一派是偏于保守的，当然，这个联合中有的可能激进些，有的可能保守些，都是群众组织嘛！不和群众组织联合和谁去联合呢？以左派为核心是肯定的，但不能以哪一派为核心，自封左派是可笑的，是愚蠢的，一定要通过斗争实践来考验，考验是不是百分之百地执行自己签定的协议。以前保守现在不保守了，前进了就好了。左派不能吃老本，老同志几十年的老本，几下子就吃光了，你们才一年半的功劳，不是一下子就吃光了吗？

群众联合起来之后，里面是有先进保守之分的，按照科学的术语来说，组织内总有左、中、右之分，但为了不造成错觉，我们用保守两个字，与资产阶级右派差别很大。去年有些人保了一下走资派，就叫人家铁杆保皇，我不喜欢说铁杆两个字，你们总是要我们来定各个组织的性质，定性要靠自己长期实践来定性，不要中央给你们定性，好象保险箱，伯达同志说，超过份量就走向反面了。有些造反派，一旦定了性，就觉得我是造反派了，就无往而不造反了，以为什么事都任意干了，可以胡来。

（红旗派代表请示，民主人士搞不搞四大的问题。）

总理：不搞了吧，现在主要是搞党内走资派。

（代表汇报了公安系统组织劳动人员最近情况）

总理：要军管会去做工作。（黄永胜：可以。）你们回去之后，减少派性，联合起来发表声明，事情就好办了。

主席最近批示：什么叫牛鬼蛇神呢？就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组织劳动人员本来是应该改造的，陶铸却把他们作为工人看待，陶铸对他这一点非常得意。对支农青年你们应该发表声明，上山下乡是大方向，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们要联合发表声明，要他们回农村去。

（工革联代表汇报市内交通问题）

总理：要撤出一切制高点，保证交通安全，市内交通部门要多派解放军去军管，（黄永胜连连点头，说可以）码头也要管起来，（关于拨款修车问题，陈郁同志说回去再解决）

（代表汇报交易会文艺演出问题。）

总理：上海、北京要去演出，你们就不要搞了。

旗派说：“东风”派排了一个“白毛女”，硬说是总理批准的。

总理说：我那里知道东风派排了个“白毛女”呢？！

“广铁总司”代表请示总理：铁路军管问题是否可以公布？

总理：签了字就可以公布嘛！

总理又问黄永胜同志：可以马上军管了吗？（黄永胜答：可以！）

红旗贫下中农代表汇报了郊贫联以民兵的名义还有一些枪支没有上交，红旗贫下中农有很多是民兵都把枪支上交了。协议上有嘛，都要上交嘛！

总理最后说：后天开个大会，你们双方都找几个人讲讲话，不要又吵起来，要创造革命大联合的气氛，后天派飞机送你们回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国务院，中央文革给广州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贺电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广州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广州地区工人革命委员会，广州工交红旗，你们三大工人组织积极响应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这是广州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重点胜利，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国务院、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1967. 11. 12；中发 [67] 341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一、广州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他们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从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某些地方的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一些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有改正，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希望广州军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二、广州地处边防前沿，美蒋英日苏修特务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革命警惕性，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九·五”命令，加强军民团结，大力支持军区做好支左工作。

三、中央认为，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的《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很好，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书。当地驻军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广为散发和宣传这一协议书，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中央高兴地看到，广州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特别是广大工人，海员和铁路员工已经分别以不同形式，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了。

四、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

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要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和林彪同志的十月一日国庆节讲话，警惕阶级敌人从极左方面或右的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斗私，批修”，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广东地区两派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晚八点十五分至十时二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参加接见的全体代表，刚刚在大会堂渡过自己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刻——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之后，来到安徽厅参加中央首长对广东地区同志在京最后一次接见。代表们笑容满面，兴致勃勃，大家的喜悦心情使整个接见大厅呈现革命大联合的欢乐气氛。当总理、伯达、康老、江青、春桥等中央首长神采奕奕、精神焕发地健步走进大厅时，代表们起立，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心情，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今天是你最高兴的日子，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和我们的副统帅。（全场沸腾，全体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总理转向右边，一一介绍。）

总理：这是伯达同志。（众高呼：向伯达同志致敬，向伯达同志学习！）

总理：这是江青同志。（众高呼：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

江青：向革命同志致敬，向革命同志学习！

总理：这是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谢富治同志、杨成武同志、吴法宪同志、叶群同志。

（总理又转向左边，一一介绍，全体代表热烈鼓掌）

总理：这是康老同志。

康生：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

这是张春桥同志，黄永胜同志，李作鹏同志，刘兴元同志。

总理：昨天我说过了，庆贺你们达成了十二条协议，今天凌晨又达成了告广州市人民书。根据“十二条”精神，这是个好的文件。现在，今天这个结束的会议，首先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宣读一下。这是经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批准的。（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宣读《决定》第一条，（记录从略，详见《决定》本文）

总理：这一段是讲总的，是讲对军区的评价。八月二十日的检查，经过一段修正，认识错误要有个过程。我们给你们开了几次会，黄永胜同志也参加了，刘兴元同志也参加了。大家都很晓得广州军区管三个省军区，野战军也是比较多的地区，有援越抗美斗争的任务，不仅本身有自己的工作，还有援外任务。自从今年一月，接受了党交给的“三支、两军”的伟大任务。当然因为任务是新的，过去部队也作过群众工作，但过去是协助工作，而今天是领导工作。由于经验少，需要重新摸索经验。但成绩还是很大的，特别是从支工、支农方面来看。广东今年虽有灾情，但仍然获得了丰收；工业因为本身有限制，稍差一点。由于经验少，犯了一些错误，在军区的检查中也说了：（总理念军区的《检查》）“但是，在支左工作中，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有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四月份以后，我们仍然觉悟得迟，没有痛痛快快地彻底改正错误，致使广州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应该肯定人民解放军的成绩，指出缺点。军队，当然所有的解放军都是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队伍。广东尤其是这样，过去解放华南，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部队，这点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也是一样。我们还要求他们立新功，这就是江青同志在一次对军队领导同志讲话中所讲的。这是一次很深刻的讲话。所以，我们号召广州军区、各级军队领导机关、各野战部队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在广东，不仅在“三支”、“两军”方面要立新功，更重要的是援外战备任务，支援越南前线。譬如湛江，军分区不仅有“三支”、“两军”的任务，而且还有备战任务。所以，要求军区本身要更

广泛地联系群众，深入开展阶级教育、战备教育，这样可以增加力量，这是关键问题。希望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注意。

因为人民发动起来了，又有敌情，需要提高警惕，这就要我们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提到形势问题，最近有这么个估计，总会有人这样想，认为形势不那么好；但多数人认为形势还是大好的。因为敌情教育了我们，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我们讲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全胜。怎么能说广东不是好形势呢？说这种话的人，是急躁的、有派性的。这些人想那一派还在，对立派还在，这是从派性出发。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们全国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之下，这怎么还能说形势不大好呢？不会的嘛！广州的工人阶级响应了号召，实现了大联合。在大联合初期，旗帜还可以不倒。一定要这一派把那一派吃下去，消灭掉，这是小资产阶级派性，不是无产阶级党性，一派独霸，这样就变成小资产阶级。观点是会有不同的，在革命路线下也是会有不同的，这是允许的。一派独霸，这是不允许的。就是一派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有激进的，缓进的。在政治上有分歧，若没有分歧，那才怪呢！一个问题达成一致了，又有新的问题产生了。这怎么能叫形势不好呢？正是大好的，悲观论是站不住脚的。希望你们回去批判悲观论。虽然有走资派，特务，美、蒋间谍，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存在，但是大局已定。所以，对形势不能说不好。不能听走资派，特务分子，坏人的挑拨。

协议首先提拥军爱民，这个问题，江青同志四月二十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你们好好读一下。把军委的“八条”、“十条”联系起来读，它们是相互的。在新形势下，在文化大革命下，更要依靠群众，搞好运动。广大群众也要依靠解放军。在“人民解放军万岁！”这个口号下，把军区错误的性质弄清，要军爱民、民拥军，表示我们强大的力量，表示我们一致对外。我们面临强大的敌人——美、蒋，要把交易会开好，这样表示我们是一致的，表示我们强大，这一点在你们文件上写了，这次要作的更好。把你们过去的什么“广老谭”、“一小撮”等错误口号全部肃清，你们说能不能？（众雄壮有力地回答：能！）好嘛！

总理宣读《决定》第二条（记录从略，详见《决定》本文）。

总理：刚才讲的那段实际上把这段联系上了，要提高警惕，贯穿敌情观念。但是我们的战友们、小将们常抓住一点，把其他就忽略了。若他们从广州来，不仅是进入广州的问题了。广州与海外联系多，很容易进来，敌人进来是不难的。所以，你们敌情观念要加强，因为他在这里一动，港九反应最快。昨天你们讲的，你们的小报就不应出那么多，应把矛头对准敌人。尤其要防止破坏捣乱。因为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我们不能让交易会破坏。交易会是要开一个月，但还有支援港九的长期斗争，要防止敌人破坏。防止谣言，使我们互相争吵，而他们却在旁边看笑话。我们需要的是革命的新秩序，旧的不好的应该打破。一年半了，应摸到一些规律。要严防敌人捣乱，这点广州比别的地方更为重要。你们的文件上也说了，要严禁武斗。

广州过去曾有些学校搞无线电广播、无线电台，这相当于把打内战的消息让敌人听。还有无线电台、电报、密码，这更不允许，是非法的。今后凡是遇这类事件，要立即报公安机关，采取专政措施。这是不允许的，是反革命行动。放毒药、暗杀，这都让群众注意，光靠专政机关是不够的。最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专政最重要的要靠群众，若发现了，让群众揭发出来，可以保持群众组织的健康。若在社会上搞破坏活动，不管是那一派，要把他揭发出来，扭送他到专政机关。所以，专政机关一定要依靠群众，与群众相结合，才能作得好。这一点，遇到群众相互争吵时，常常把它忘记了，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总理：宣读《决定》第三条（记录从略，详见《决定》本文）

总理：这一条是讲，最近你们全面协议虽然晚了些，但有好处，把它搞得更丰富、更完全了。协议今天军区都散发了，问题就在于实践；要实践这个协议，这很重要。应该说在这协议还未达成前，海员首先大联合了，组成了一个组织。其次是铁路工人，先是铁路局的大联合，然后是分局的大联合，这都是很成功的。这些都说明有大联合的基础。当然，大联合最重要的是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下，以“斗私，批修”为纲，在十二条协议基础上嘛！在实践十二条协议中，考验你们是否是真正的革命组织。不要因为过去是造反组织，曾反过走资派——陶（铸）、赵（紫阳）。有这么一点本钱就够了？事物是向前发展的，我们不能向前推动呢？

若少数领导人不执行，群众就可以改换、撤掉他，这样还仍旧是革命派。另一种情况，过去批判走资派弱一点的，但一旦了解了，赶上来了，就好嘛！偏于保守一点，我们说是指在大方向上。真正保走资派的，是极少数，真正的“百万雄师”，也是其中极少数人，多数还是受蒙蔽的。尤其在军队“三支”、“两军”中，革命群众组织都参加大批判了，所以，这种保守倾向容易改变。过去落后的，现在赶上来了，甚至超过去了，这就要看谁站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以“斗私，批修”为纲，贯彻“十二条”。不能老是只争论过去。过去的大是大非，应该是看他是不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陶，这是最大的原则，这才是真正的大是大非。现在就看谁走的好，否则有了协议，但没行动，不就变成了空谈家了吗？所以拿这“十二条”考验你们。你们成立监督小组，可以有总的，分的，这很有必要。不可能想象一天功夫就可以实现的，还要有一个宣传过程。双方要互相信任，相互监督，不然的话，光抓对方小辫子，这就不好办了。当然，整个运动的重点，应该引导到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上去。实践中考验你们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如果都称的起的话，联合的基础也就有了。现在广州的工人阶级已经带头了。所以，实践非常重要，希望你们回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实行“十二条”协议。

总理：宣读《决定》第四条（记录从略，详见《决定》本文）

总理：这一条是各组织经过协商，决定有五位同志领导工作。作军事工作的三位，黄永胜同志多年来为党工作，跟林副主席多年了，是个好同志，是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当然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党中央是信任他的，信任他能够领导工作的。本来由省军区来领导工作就可以了，但因为广东省有特殊重要的原因，就应该有更高一级的领导同志。孔石泉同志是第三政委，现在也要由他负责工作。陈德同志，你们都熟悉，广东人，有一些错误，与你们不是那么融洽，他来京开过会，中央是信任他的，作第一线的工作是需要大家支持的。地方的工作同志、中南局的同志支持的有陈郁、王首道同志。陈郁是个老同志，这次他认识了自己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站在了造反派一边。王首道同志，认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站出来了，你们同意他。过去，他在交通部工作中犯了错误，以前历史上也犯过错误，中央还是信任他的，他自己也表示要更好地工作，来弥补过去所犯的错误。

你们尤其要相信解放军。领导同志五位，还必须把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吸收进来，现在来不及在这搞好，你们回去协商一下。广州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四位，工革会四位，工交红旗两位，由你们回去协商。铁路、海员都要有人，相应的农民两派也要有人，要照顾双方。学校的五个方面，红司、三司、新一司、中山医三〇一，二，二，二，一；另外，红一司二个不满足，可以三个，共计十位。这样，可以组成广州大专院校红代会。另外，剩下的机关也好解决嘛！这样，就不难解决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问题。

另外，昨天提议的，康生同志在山西省，用联席会议的办法，让各派都有人。一个星期可以召开定期会议。大家组织联合行动。都是你们本身的事情，就更易取得一致的意见。这里还有几件事，要学习，整风，可以派一些人到北京来学习，大军区，省军区，地方县、地委干部，红卫兵、军队里的干部，商量好就来。今天主席、林副主席接见学习班有八个省的，还有在京协商问题的八个省的代表，坐满了大会堂。学习，不管是开门还是关门，首先要作自我批评。象湛江两派谈的就不那么愉快，你们要帮他们。所以，一定要多谈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把对方的长处看到了。当然，原则是毛泽东思想，以“斗私，批修”为纲，通过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必须解放一大批干部，象广东省陈郁，是什么原因解放不了一大批干部呢？最重要的是有走资派象赵紫阳等挑拨，和其他因素。赵紫阳是叛徒喽！第二种原因是地方主义，这次认识多一些，以×××为首的一小撮，把中央批的人，排在外边，南下的干部起带头作用这是好的。不能拿缺点来否定主流。地方主义不应该翻案。批判地方主义，就是批陶铸的，不然陶铸怎么能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呢！怎么能叫他两面派呢！受地方主义影响就容易造成小资产阶级派性。

第三个原因是坏分子，例如郭风、黄士民挑拨你们。他们不把你们向好的方向引导，而故意挑拨，这不能怪群众，怪他们。黄与香港有关系。“五·一六”中也有这样的人，对“五·一六”我们只是把一小撮坏头头揪出来，不要扩大化。不能说那个组织就不好了，不要人人去揪，最好由他本单位本组织的人把他揪出来。另外，我们反对象“揪军内一小撮”这类极“左”口号，但不能让右的思潮复活，即不能让老保翻天。再有不能让坏人复活，兴风作浪。这样才能使广东的文化大革命向前进，走向前，赶上去。我们表示希望，你们能不能达到这个希望？

（全体代表雄壮有力地回答：能！）好！

底下是署名喽！经文革批准，最后由我们最伟大的统帅批准。（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代表们起立，高呼：向总理致敬！向总理学习！）

总理笑着向同志们说：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此时，各组织代表纷纷起来，高声宣读保证书。）

总理：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讲话！（代表们起立，呼口号：向江青同志致敬，学习！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江青同志笑着说：这我可不敢当啊！

总理笑着小声对江青同志说：祝你身体健康，这有什么不敢当的！

江青同志：同志们！欢迎你们！你们回去以后，要好好地以“斗私，批修”为纲，进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不这样作，就不能搞斗批改，就不能搞大批判。要说的话刚才总理都讲了。我就祝同志们良好的开端。如果再来北京，我们欢迎！（一旗派代表说：江青同志，下次我们再来，就不这样来了，革命大联合在一起来了。代表们纷纷站起，高呼：请康老讲话！）

康生同志：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刚才有同志讲，再来北京就是大联合来，我看今天的大会就是大联合的会议，是革命大联合的会议。有一点，我要说一句，文件上讲，我五月份到广州，去是去了，那是接受中央专门任务秘密去的，没有什么重要指示，因为当时不能公开，只是最后在夜间，临上飞机前才与黄永胜同志谈了谈，因为是专门任务去的。文件这样写，我实在是惭愧得很，向同志们抱歉。但是，如果要是说错了，我还是负责的。（代表高呼，总理笑着说：欢迎康老再去广州。康老是很想去广州的，下次让他公开去。代表热烈鼓掌、欢迎。）

康老高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打倒刘、邓、陶！（代表们又起立，高呼让伯达同志讲话）

伯达：先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普通话讲的比我好，听的懂吗？（众答：听的懂！）拥护总理的讲话，庆祝你们在毛泽东思想下联合起来了，庆祝你们的会议成功。希望同志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把刘、邓、陶特别是陶的流毒肃清。

毛主席万岁！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张春桥：刚才总理、江青、康老、伯达同志的讲话都很好。大家让我讲话，祝贺你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希望广东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基础上，再向前进一步。

戚本禹：我建议休会，你们不是照顾首长休息吗！以后有机会再讲。

总理：广州交易会，把酒会推到明天晚上进行，你们准备好，胜利地回去，搞交易会，要把协议实行好。我们高呼，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以“斗私，批修”为纲，希望你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高呼：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代表们热烈鼓掌，欢迎总理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总理欣然同意，随即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

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广州军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空前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掀起更大规模的拥军爱民的号召，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九·五”命令，紧跟伟大统帅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及其在广州地区的代理人赵紫阳之流，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坚决执行伟大导师的最新指示，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达成如下协议：

一、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迅速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新

高潮。最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以“斗私，批修”为纲，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在革命大批判高潮中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各群众组织立即进行开门整风，破私立公，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为革命大联合扫清障碍。

二、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九·五”命令，迅速掀起拥军爱民新高潮，迅速与广州地区驻军订立拥军爱民公约。坚决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群众组织要正确对待广州军区，拥护广州军区、省、市军管会的正确领导，今后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把矛头指向广州军区和省、市军管会。

三、彻底制止武斗。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各群众组织要严格遵守双方签订的有关制止武斗的各项协议，还必须做到：

1. 彻底收交流散在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手中的一切武器、弹药、车辆、装备、器材和其它武斗工具，从本协议签定之日起，七日以内必须彻底清交。如逾期仍然藏匿不交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依其情节轻重论罪。今后，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不许制造任何武器，如匕首、长矛、土制炸弹等等。

2. 严禁打、砸、抢、抄、抓。不准调动人员、车辆参与武斗，不准煽动农民进城武斗。双方抓捕的人员要无条件立即释放，并绝对保证其人身安全，不准殴打、侮辱、迫害。严禁抢劫、破坏国家财产，抢劫、占用的一切公私财物，应如数退还。

3. 一旦发生武斗，广州军区、广州警备司令部、省、市军管会在得到任何一方的报告后，应火速赶赴现场，采取有效措施，立即制止武斗，进行现场调查，依法惩办武斗挑动者和杀人凶手。各群众组织应大力支持、协助，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阻挠、破坏。

4. 彻底拆除一切武斗工事、路障，撤除所占有的制高点、据点，取消居民联防。

5. 任何群众组织都不得私设电台。

6. 任何群众组织不得侵犯通讯自由。

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加强敌情观念，时刻不忘广州地处前线、面临港澳，要坚决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敌特等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严防他们挑拨离间、制造混乱、煽起武斗、混水摸鱼。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和其它刑事犯罪分子。各群众组织要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和专政机关，维护社会治安。外单位不得介入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公安人员要坚守工作岗位。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准干扰人民解放军武装巡逻。

各群众组织要发动群众，根据公安六条的规定，立即清除混入组织内部的坏人。

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九·一三”通知，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离开本单位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十天内返回原单位，学生十五天内返回本校。否则，工人、机关干部不发工资，农民不记工分，学生开除学籍，大中专毕业生不予分配工作。

各群众组织要热情欢迎不同观点的同志返回原单位，并且不准歧视、围攻、殴打他们，不准寻找任何借口克扣工资、助学金，不准剥夺其开展“四大”的权利。

六、保障城乡交通运输畅通。任何组织不得设置路障、关卡、擅自戒严，立即把一切生产或业务运输工具归还原单位，并保证今后不得拦截、抢劫、袭击、占用生产或业务运输工具。

保证铁路、水上运输，不准袭击、占领、抢劫车站、港口，拦阻列车、船舶。不准干扰铁路、水上运输，要保证铁路员工、海员、旅客的人身安全，抢劫车站、港口的物资要一律送回。外单位不行介入铁路、水运部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违者依法处理。

七、坚决贯彻中央“七·一三”通知，不准煽动农民进城，不准到农村去挑动派别斗争，要在军管会的统一安排下，大力协助农民搞好“三秋”，农民组织应该独立自主，不要参与其它组织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区、县以上机关干部、工人、学生不能参加贫下中农组织，不要干预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社、场干部经贫下中农同意，也可以参加贫下中农组织，领导核心以贫下中农为主。

八、进驻工厂、企业、农村、机关、报社、电台、医院、学校、公共场所的

外单位人员应立即撤出，今后不准以任何理由袭击、进驻。各群众组织应立即撤出在外单位设立的联络站。

九、各群众组织的广播站、小报、大批判专栏等，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准作为攻击另一组织的工具。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通过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加以解决。

十、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各群众组织取消一切宣传车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外单位和街头设立的高音喇叭。

十一、国防军工企业，应严格执行中央“二·四”通知，不得与地方企业、工厂、机关、学校串连，不得参加地方群众组织，已经参加者，劝其退出。

十二、双方各派出五名代表（工人二人、农民一人、学生一人、干部一人）与省、市军管会共同组成监督小组，在广大群众的监督和支持下，监督本协议的贯彻实施。双方要绝对保证监督小组工作方便和人身安全。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立即生效。

群众组织代表签字：（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各派代表的讲十二条协议主席说：大联合旗子不能倒。工人实现了大联合，开了个会，开得好，明天人民日报给你们报导，但会场出了个小风波，你们事先没商量好，不知那个组织打了旗，你们想不通还吵架。因为打了组织的旗，就出了个小风波，旗子打上很好么，主席说大联合旗子不能倒……12 条协议要执行，按照毛泽东思想联合起来，可以打旗帜，红旗招展有什么不好，要在共同纲领上，革命原则下联合起来，就不一定是等于把组织都解散，就是联合起来一个组织还是有激进、缓进，保守的，公开打旗帜，没有什么坏处么，现在联合起来要共同斗私批修，要求联合消灭势不两立的敌对情绪，广州出现了工人带头推动农民各派联合。各派是以 12 条为基础促进大联合，联合比较慢的是学校机关，一步步来么！

上山下乡是毛泽东思想。你们群众内遗留下一些问题未解决，首先是支农青年问题，不尽你们地区有武汉、上海、南京、长沙也有。有人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这一点首先不成立。上山下乡是主席思想，本来我国城乡是畸形发展的，现

在要消灭城乡差别，要工农结合，面向农村。我国农村地区辽阔，搞结合在农村的容量比工厂大得多，不能城市的青年都在工厂，农村的青年在农村，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应该更多的青年走到农村。有一部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有一部分干部子弟不安心在农村，有些尽管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也不安心在农村，因此想利用这个机会返回城市，特别是广州下乡青年还有一个户口保留这是陶铸搞的。现在毕业生还没有完全安排工作，要工作农村是广阔天地，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的人，本身就是还留恋城市，是受陶铸毒害的。下乡就应安心于农村。当然有的地方生活安排不够好，应该由各机关安排解决。第二个原因我替你们解释一下，是武斗要帮手时，给这些人一点钱粮，就容易出来，夺枪用了他们，当然我不是指责哪个组织，谁有就自己批评了，你们不要指责某些组织，现在搞复课闹革命，按系统、行业大联合，曾经帮助过你们的朋友成了你们的包袱，你们也不好处理，但是都不要指责对方。

现在有人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对中央文件挑三挑四，对中央文件怎么能怀疑呢？对中央文件，指示攻击诽谤的人都是错误的。说黑指示的人是有坏人在煽动，也有立场问题。说这种话的人就是错误的，现在广州支农青年有三万人左右，这个统计可能高了一些“10.8”文件下达后，回去一些，少了一点，大概还有一万多。

关于交易会问题，现在还有第二种人，有消息说这些人准备明天或后天晚上到交易会门口静坐，这不是有意破坏国家威信，有意破坏交易会吗？到军区已没必要，还要到交易会门口静坐，出这种主意的人，不管主观愿望怎样，客观效果很坏，为什么要到交易会静坐？出主意的人是走资派牛鬼蛇神、香港特务、苏修特务。

另外还有一种人是陶铸搞的。在郊区……工厂这里有劳改期满的人，港澳同胞回来的，本来这些工厂不开展四大，但这些人拿了工资就不生产，进城闹事，这里坏人更多。他们一定要在明天或后天去静坐闹事，这些人有些亡命之徒，这里一定有坏人插手。这是香港特务、美蒋特务、苏修、日本特务收买香港烂仔混进来，混个工作证很容易，这里肯定后头是有人的。这种人比第一种人还要坏，他们说学上海，但上海完全不一样，他们有许多活可以分到家庭帮做尼龙等活，有的人可以到工厂，有的在家，有活就干，没活就不干。而广州没那么多活干，

却临时设置这几个工厂，没有管理，没有严格的纪律，又不象劳改的地方。这些地方要军管，一军管他们就闹事。这种人是和他们划清界限。

第三种是侨民，有三百人从越南跑回来，他们借口说那边不能很好学语录，经过我们调查，里边有小商贩，因中越边境经常有轰炸，他们怕死就跑回家，因为边界线长，边防军拦阻不住，劝他们回去他们不走，跑了几百人来广州。但他要表示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要开会批判越修。越南是有修正主义的，但是要靠他们的人民起来。中国也有修正主义，所以现在要批修，越南现在打仗，在流血，为什么不在越南打美帝，这些人找借口跑回来，……从这点上看就不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这些人多数找借口在中国批越修，这不是革命行动，这部分人要看出他们找借口，劝他们回去，他们不回，应向他们说清楚，应该回去援越抗美。……

今天的人数特别多，有两个原因，有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因为毛主席说七、八、九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到底中国文化大革命形势怎样，有人要看个究竟，还有一种是找机会破坏，比如从欧洲来的，他们不直接破坏，他们可以通过港澳特务进行破坏，他们表面还可以做点生意。第二有经济任务，由于战争，他们生产不好，特别是农产品生产下降，而我们农业不仅去年丰产，今年也有更大的丰产，今年我们也准备在农产品上做一点交易，今年农产品增加 5%—6%，这还是保守一点，不单粮食增产，经济作物也大增产，棉花、糖、烟等，今年粮价特别高，不仅战争的地方，反动统治的地方，原来产米国现在都要进口，而且大米也要进口。这场文化大革命推动了农业增产。

这次交易会我们要很好地做工作，要区别对待，比如日本来说，大资本家签定协议，今年订了，明年也要订，因为他们接了蒋经国到日本。我们给他点压力，他推回去了，所以这次要给他们点压力。另外一些多数的是跟我们做交易的，要分开。我们要一致对外，就需要广州的工农兵学商干部等团结一致，党政机关要全力搞好这个工作，不应在这个时候打内战，刚才对黄永胜说要打电话回去给广州军管会马上将十二条印出来，中央发表文件支持你们，宣传慢一点，要发动群众一致拥护协议，但是走资派不甘心死亡还要破坏。所以提议你们搞一个全市人民书，不允许他们破坏。但以上三种人如果没有外因，第一种人是好处理的，但是走资派不甘心失败，美蒋、苏修、日本特务还要破坏，这就需要你们各群众组

织一致起来，搞个告全市人民书发下去，由群众搞好交易会，要组织宣传队，到处宣传要互相支持，如果有人挑衅，就要讲理不打架，象那些跑出来的劳改犯，军管会要抓起来，群众要支持，在交易会场所和住地行凶破坏的，军管会、警司要抓，有破坏的人押送，扣留。

代表问：这次交易会的宣传要点是什么？

总理：应加强宣传反帝反修，小报也要注意宣传反帝反修。特别是广州更应该反帝反修，不要搞一些内部的问题搞在小报上，因为这样容易传出去。广州有个纸厂，现在的小报，纸张特别好，你们真是神通广大，以后纸张一定要控制起来，要成立专门小组，要节约闹革命，我们已电话给外办，明晚宴会要节约，当然他们到小食店花钱我们欢迎罗！关于九大问题你们讨论过没有，（代表答：没有）应组织讨论，听听你们的意见。（红一司对支农青年表示态度）大学的同学要多做一些工作，有困难军管会帮助。现在还有这样一个问题要说。刚才宣传方针已经讲了，接待外宾的旅店，还有三百多外地人员不走，各地都有些学生，几十个地方加起来就有几百，有湘江风雷，武汉钢派，河南二七公社等，这就需要你们去劝说，最好的是接近的一些人去做工作。我不知道这样大的旅馆外地学生有办法开支。（黄永胜：他们向我要。）要黄永胜开支，还有湖南的要张平化开支，广东的要赵紫阳开支。现在我们宣布赵紫阳开支无效，这是公家的资财，你们同他们那样有感情呀！你们要他们开支，不是承认张平化、赵紫阳是自己的同志吗？这纯粹是个流氓的行径。

总理念十二条中的八条。这些组织办公地方，第一要节约闹革命，不要搞排场，陈伯达同志说不要太多的工作人员，你们工革会有多少人办公，我看不少。列宁说：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毛主席加上一个对官僚主义的惩罚。毛主席说，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学校中无政府主义这样重，是由于过去官僚主义造成的，还有资产阶级的教育造成。

你们一动就搞大机关、占地方，不过只要下决心就能改的，现在这小头目，将来当了大头目就容易脱离群众，就会被群众抛弃。人少，要几间房子办公室可以同军管会协商，（代表反映市一宫的情况。）根据协议，按协议办事。

我们要替广东成立革筹小组，是主席、林付主席同意时，军管会、机关干部、群众组织选出代表组成。比如工人已经有个大联合机构，可以选出人员、机关、

农民是两派，组织较容易，也是这样。

我们要军管会一星期开二次会，讨论革筹小组人选，这样机构多了就好解决。群众组织，只要有群众就要承认，有坏人由他们自己抓，坏头头可以撤换，当然有群众组织就要有一个办事机构，比如建筑工人有二、三个办事就行了。建筑工人有多少？就算你有十几万人，面临着敌情，我看两派都有派性，得有一点敌情，（并指示由军管会及广州调查组派一小组协助处理湛江问题。）

（最后总理指示铁道系统要单独处理，还要发文件）

2011 年 9 月 20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11）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十一节 吉林省军区瓦解三大造反组织

本节资料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及吉林省委的电报
东北局并吉林省委：

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中 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周恩来）给吉林师大红卫兵组织的一封信电报

来电均悉。关于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电复东北局并吉林省委，请他们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如果你们还发现新的材料和线索可以继续查清，并将新的材料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希望你们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来源：根据群众组织出版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上册）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信

全市的工农兵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我们吉林省军区和驻长春的部队，立即响应，全力以赴，介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半年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广大干部战士积极努力，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我们支持了一个革命造反派——红革会，二总部，这是对的，但是压制了另一个革命造反派——地、工、光、野和他们串连革命工人组织等成立的长春公社，这就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对于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又迟迟没有认识，没有改正，给长春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曲折和严重损失，现在感到十分痛心。

我们所犯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二月初，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和光机八·一五这几个革命群众组织，退出了二总部。我们把这件事情看重了。认为这是搞“分裂主义”。我们口头上承认地、工、光、野是造反派，实际上没有给予支持。对于地工光串连组成的长春公社更错误地看成是“分裂主义的产物”，不予承认。这样，就形成了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错误。

长春公社在军区门前集会游行，表示对军队支左工作有意见时，我们没有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却错误地认为这是适应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伤害了解放军的尊严。由于感情上的对立，我们就派人上街参加辩论，印发传单，以及在广播和接待来访中，都散布过“长春公社大方向错了”等错误观点，给长春公社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除舆论压力之外，我们又施加军事压力。二月二十六日，我们派部队参加了对“二·二三事件的控诉大会”，并出动飞机散传单，会后又派部队参加了对“公安联总”负责人的游斗。这样做，实际上向长春公社示威，给东方红公社施加压力。

三月四日对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出兵实行纪律制裁，抓了他们的负责人和肇事人，这不只对“红色造反团”的问题看重了，处理有错误，更严重的是使长春公社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受到了很大的军事压力，一时许多群众被迫打着白旗请罪，长春公社也被压垮了。这更是极端错误的。

紧接着，我们在组织地工光整风时，又错误地提出了“三个彻底”（彻底揭

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使“工大造大”、“地院兵团”、“光机八·一五”的组织解体了。三结合筹备工作也没有吸收他们参加。

四月初，中央五条指示和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以后，地、工、光、野和长春公社先后恢复了组织，我们不仅没有及时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他们还在继续犯错误。所以，对他们仍不表态支持。对他们的革命行动，甚至给予冷遇。现在检查起来，深深感到我们的姿态比革命小将低得多，我们的胸怀比革命小将窄得多。内心感到十分惭愧。

我们所犯的错误，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由于压制了地、工、光、野和长春公社，使二、三月份的斗批改，以后的大批判都受到了影响。我们支持一派，压制一派，使群众组织之间矛盾更加激化，并且波及到了我省的一些地区，影响了当地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

我们所犯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责任在吉林省军区、三〇〇九部队、七三一一部队的党委。我们所以犯如此严重的错误，根本原因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没有真正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薄弱，没有念念不忘主要敌人，没有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把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看得太重，甚至压制了群众。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根子扎得不深，对来自群众的不同意见，企图用简单强制的手段压下去。我们缺乏谦虚谨慎、老老实实的态度，盲目自满，自以为是，自以为高，群众的意见不合自己的心愿就去压制群众。我们缺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急于求成，不做艰苦的工作，遇到了问题，就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解决。

总之，我们犯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辜负了最高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信赖和期望。在这里，我们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认错，向受我们压制的地、工、光、野的革命小将和长春公社的广大革命群众赔礼道歉。向全市革命群众诚恳检讨，并欢迎大家对我们的错误，提出批评，监督我们改正错误。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改正错误，在继续

坚决支持红革会、二总部一切革命行动的同时，坚决支持长春公社的一切革命行动，支持东方红公社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的革命行动。希望红革会、二总部、地、工、光、野，长春公社和东方红公社，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地区的斗批改中逐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路线觉悟，增强群众观念，彻底改造世界观，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吉林省长春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应有的贡献。

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坚决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信”

1967. 08. 17； 中发 [67] 256 号

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并告沈阳军区和辽宁省军区，各大军区、省军区和各军：

中央认为，你们《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是正确的，你们的检讨是“痛痛快快”的，而不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检讨了错误、改正了错误，一定能够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中央认为，在吉林应该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加强军民团结，“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的同志和“红革会”、“二总部”的同志要注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共同对敌，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注意“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2011 年 9 月 20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12）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十二节 福州军区打压造反派

本节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最近，正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实行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进行造谣诬蔑、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事机关，他们违背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规定，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两次冲进会场非法夺取大会领导权，破坏会场设备，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特别是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公布之后，三十日仍然有人明知故犯，乱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实行体罚，侮辱人格等等。公开违抗最高统帅毛主席批发的中央军委的命令，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应当受到纪律制裁。

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工具，是人民利益最忠实的保卫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忠实保卫者，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忠实保卫者，谁违抗毛主席的命令，谁就是反对毛主席！

我们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

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坚决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

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一集）》，北京：1967年2月）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基地，并各总部：

兹将福建前线公告转发你们，望参照执行。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

海防前线福建，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福建省、福州市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尖锐激烈的搏斗，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英勇地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新贡献。

我们热烈欢呼福建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辉煌的胜利！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开展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起来，刮起反革命妖风，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人民解放军福州三军部队，向革命老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发动了新的反扑。

这个反扑的特点是：拚命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他们造谣诬蔑，制造混乱，妄图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阶级敌人拚命反对“三结合”，这正说明他们最害怕“三结合”，正说明“三结合”好得很，威力大得很！正说明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执行“三结合”的方针！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人由于头脑里无政府主义思想作怪，他们不是“公”字当头，而是“私”字当头；他们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是热中于小团体主义；他们不是谦虚谨慎，乘胜前进，而是被过去的成绩冲昏头脑，骄傲自满；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想笼统地打倒一切权威，排斥一切领导干部，反对一切专政。其结果，正中了无产阶级的敌人的奸计，跟着无产阶级的敌人反对“三结合”，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绊脚石。这些人如果不立即改正错误，那就可能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这是很危险的。全国各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要从福建的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加坚定地捍卫和执行闪耀着毛泽东思想伟大光辉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

人民解放军福州三军部队广大指战员，在错综复杂的阶级大搏斗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定地支持了革命左派。他们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坚决打垮了无产阶级的敌人的疯狂反扑，教育和争取了受蒙骗的群众，加强了军民团结。这再一次显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英勇保卫者的巨大威力，有力地证明了人民解放军是“三结合”的强大支柱。

我们正告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你们把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指向支持真正革命左派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是绝没有好下场的！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的疯狂反扑，表明他们灭亡的日子已经更加临近了。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让我们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争取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斗争的新的伟大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与福建省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地点：人民大会堂。首都三司、北大、科大 11·23 等南下赴榕回校同学参加接见。在座的还有康生、江青、叶群、王力、张春桥、关锋、戚本禹、肖华、杨成武、曹耿等。〕

总理：收到你们一封信，你们很急，一直没有排上队，一方面想多些同志来谈谈，昨晚到了几位同志，所以今天见了大家，先请廖海光同志谈谈筹备情况。

廖海光：根据山西、贵州经验，准备夺权，当时最突出的是干部问题，一致同意的是金水、黄亚光、刘家生。经过调查，范式人等同志过去有的受过叶飞打击，与叶飞斗争是坚决的。（像叶松、高盘九、任洪萍、王禹）。当时革命群众对他们有怀疑，因为运动初期还很不理解，对红卫兵运动有抵触，和稀泥，与叶飞斗争不坚决，经过摆开来说，是解决了。群众组织经过运动，福州有些革命群众组织出了毛病。有的冲了一下军区，比较好的是“2·29”以及小的单位。群众基础在“1·26”以后这一段，只剩下“2·29”，后来工人，机关，一部分学校又起来和一部分同志合起来，力量这还不够雄厚，特别是福州，经陈伯达同志建议又来了九位同志，现在检查起来，我们的做法有问题。对1·26问题处理上，现在看来1·26冲击军区当然不好，不应该冲，当时毛著积极分子会时，当时部队未开展四大，冲是不对的，当时冲了以后，特别是陈伯达同志指示以后，很多群众团体表示要请罪。

伯达：那个电报不可能关系到请罪的问题，为什么请罪呢？1·26找你们谈话，不要把群众找你们谈话都看作坏事，是件好事嘛！

廖海光：当时还消毒……

伯达：消什么毒哪？

廖海光：这样问题就大了，就发生了批判斗争。

总理：有勒令解散的吗？那几个？

廖海光：我们勒令解散12个红卫军，交通系统革命造反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没有解散。

伯达：有没有提黑组织、传单中有说过这话，为什么要提黑组织？不能叫黑组织，领导上要表示态度嘛。

廖海光：领导上没提过黑组织，也表示过不行，随便把一个组织打成黑组织，当时还有师院“红联师”，他们群众提出了解散这个组织，福建军区表示支持。这样就出了毛病，打击面过宽，下面再谈，当时，地富反坏右出来活动要打击，但掌握不好，在下两面……

伯达：不是开了很多声讨会，当场抓人示众？

廖海光：姜观问题开了一次会。

伯达：不要开这样的大会。

王力：福建从 1·26 以后抓了多少人？

同学：“17·8”抓了 300 多人，泉州有逮捕证的是 74 人，福建中医学院 400 多人抓了 11 个，扣留了 14 个，3 月 26 日召开声讨大会，大会上取缔了革命职工造反团……，会上宣布以前造反派掌握权是篡政。联合总部仅参加 2·7 大会也被解散。当时 2·11 大会宣布二十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不许打旗号参加，我们 2·11 请罪了，要求参加大会。

伯达：为什么要请罪？

王力：不要请罪嘛，军区应出来讲话。

康生：同志们到中央开会，第一召集了各方面意见的同志来开会，可能有的同志，特别是军区同志不习惯了，这恰恰是毛泽东思想。

王力：你们认为是左派，右派，反革命的，抓到监狱里来的都要来。

康老：你们要学习这种方法，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到中央来。在我们这个会上，各种意见都可以讲，各种问题都可以批评，不存在打击，反对解放军的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第三条在外面不要传播。

同学：2·11 开大会，宣布二十几个组织不能参加。

总理：你们把二十几个组织对一下。

廖：红卫兵小将犯错误了，我们采用不原谅的态度，这是不行的，以后国家怎么办？冲击军区当然不是好事，本来中央给我们很大支持，但我们处理不当。本来应保卫革命锐气，保卫革命小将，革命小将有小错就严追……

伯达：把抓的人都放掉，把关的人全放出来！（很气愤）

王力：还要写检讨，有什么检讨可写的。左派犯错误嘛！

廖：犯了这个大错，对保卫革命小将这一点思想认识不足，混淆了两类矛盾。

总理：左和右，革命和反革命，合法和犯法的界限要划清啰！

同学：汇报玻璃厂的情况。

康老：玻璃厂的方元官来了没有？

答：没有。

康老：方元官抓起来了没有？

……（同学读到了伯达给韩先楚同志电报问题）

仙游：“南下同学说军区扣留了 12 个同学，2.13—2.22 开三次全县大会，

到 3 月 5 日已捆起来游街武斗、挂牌子。“你们三司是右派组织”，“三司红旗永远不倒！”在福州是反动口号，还揪到农村去斗，在庙里每天关有一百多人，六点左右，抓了 12 人出去打，他们要我们受“阶级教育”，部队发通令，部队执行任务抓右派时，任何人不得阻碍，要让群众来收拾右派。”

总理：抓人这件事军区有关吧？朱跃华（朱是福建军区司令员）。

朱：（站起来）到！

康老：抓人怎么会没有呢？是你们知道不告诉我们！

总理：这种情况下不制止是很危险的。你们马上发电报。今天晚上就发。

廖：前几天已经发了。

总理：发了？那你把命令交给我，满足我的要求，按那四点：（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释放，（4）写了检查的要全部交还本人。马上打电报给全省所有的县。（扬成武：还有江西的）1·26 被打成右派的统统放出来，写检查书的停止，检查一律交还本人烧掉，这一些都是工作组搞的，我们不要搞。

叶群：主席教导“言者无罪”，这是主席思想，请罪是不对的。福州军区应该引起严重注意。

康老：错误是掩盖不住的，越掩盖，越严重。你们现在是掩盖错误，必须悬崖勒马，改正错误。

廖：是！（汽车学校“福建前线红卫兵”发言：讲话同学被搜身的。）

王力：搜身是封建制度，不搜身是小民主，现在不但大民主不给，连小民主也不谈了。

叶群：搜身是包身工制度。

（沈义德发言）……

王力：现在福建都在抓姜观之流，不要用这个口号。

康老：一个参谋就能宣布一个组织解散？！

（福州七个代表谈到：东海兵战要武战斗队，回家坐车过年，平常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睡懒觉，打扑克，划船等）。

周总理笑问：那是东海兵吧！

答：全是！而这些人现在是左派，因为他们没有喊 1·26 好得很！

总理：“哦”！

谈到有的干部不愿到造反派中亮相，而只到东海兵那儿时，

总理大笑：那也好嘛！混在一起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此时三司同学递上了 1·26 福建日报上刊登福建军区政治部写的八篇文章。

周总理看了看很生气，敲着报对朱说：这是你们政治部写的，把 1·26 做为标准，人家说你是有证据的。（总理念了一段报）讲你们 28 日来的，26 日还写这样的文章。

王力：白纸写黑字！

总理：好！现在 8·29 谈谈！

柯纠耿：1·26 以来两个月心里很痛苦。一方面坚信毛主席亲手缔造的解放军，另一方面看到原造反派不能和我们一起战斗，被打下去了。我们一再把这些意见反映给军区，军区一直站在保守派一边，军区处理 1·26 问题粗暴，简单化。军区屁股没有坐在造反派一边。对事态没有制止。只剩下一个光秃秃 8·29 有什么用？发现的问题跟军区提都没有得到支持，晋江专区问题特别严重。希望引起注意。我们在福州有很高的威信，我们群众基础很单薄，造反派不起来，我们就没有群众基础。例如师院联合应以“追穷寇”为核心力量，却以《红联师》为依靠来组织联合。当时我把责任全归罪三司，认为他们害的。

如何对待农民运动是当前一个大问题，现在对老臣态度是不对头的，老臣被搞进城犯了缺点错误，但应看到他们支持了革命的红卫兵暴露了这次运动是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产物。可是军区做的是简单粗暴，解散回家，甚至打击他们，这种做法不妥当。军区对老臣问题有原则性的错误的。

三司：念语录（接班人五条最后一条）

科大：柯的发言文过饰非，把一切罪过都推给军区身上，新北大干到底也是怎样，屁股坐在东海兵一边。柯苏，张莉莉，都是这样热衷于组织革委会，听不进去我们的意见，在福州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问题，柯处理不对的。

工业：肃清 1·26 遗毒有必要，有好处，比如有益学毛选，现在有一个铁打的毛选学习时间，再一个解放军威信空前提高。什么都是部队说了算的……

康老：你刚才讲话被敌人利用，敌人抬高的是谁，解放军威信提高了？解放军说错了话算数，做错了错高了，到处抓人也提高了？1·26 遗毒出现了这么多

件事？这算肃清 1·26 遗毒的。

总理：今天不能再继续了，也不可能多方面全听。军区可能有意见，这有几个人要来，可能要隔二、三天，这时期可以准备材料。造反派被压制的，可以多写材料来。刚才四点再加二点。

(1) 在 1·26 事件及 2·7 事件上被停止工作，受歧视的要把他们统统立即取消，如周振祥，刚才（递条）有两次提到周振祥，不同意见允许嘛。

（廖：他现在没有具体工作，本来把他调到其他单位去。）

他不是福大工作组嘛！不同意调离，应该让在原单位工作嘛！不同意见可以发表嘛！不要歧视。（同学，还有军区文革办公室张宝炎）不仅军区的，任何机关都要这样。

由大军区通知省、县、江西、福建军区。

(2) 彼此之间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抄，俘虏还不搜腰包呢？何况同志。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 年 4 月。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听取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等汇报谈福建问题

〔接见时陈伯达在座。会后伯达同志又单独接见了惠安地区的学生〕

二十二日接见时，总理布置南下同学准备汇报二个问题：

1. 对“一·二六”、“二·四”、“二·六”、“二·七”的看法。
2. 总理三月卅一日的六点指示发出后执行的情况。

总理说：下面听南下同学讲讲，他们概括性地讲好些。

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新北大校文革福州联络站、哈军工鬼见愁战斗队代表联合发言，以充分的理由，坚决要求为所谓“一·二六”反革命事件平反，重申“一·二六”几十名革命造反派学生要求首长接见，大方向是正确的，提出姜观、王（全）泉金绝不是现行反革命，如果摆不出证据，必须立即释放，代表以大量事实和血泪的控诉，无可辩驳地说明，目前福建根本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总理的六点指示。发言被一阵阵掌声和口号声打断。

科技大一同学发表了反对意见，坚持认为“一·二六”是逆流，甚至颠倒是

非把破坏大联合的罪名加到三司、新北大联络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革命委员会的身上。

会上福建群众发言要求为“一·二六”平反，给“一·二六”定性。

总理说“说‘一·二六’是反革命逆流这是错误的”。（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不是已经发了六点指示吗？给革命组织平反，那就是下结论。就是定性了嘛！（热烈鼓掌）

群众在发言中，控诉了借抓“姜观之流”，行打击革命群众之实，

伯达同志插话，姜观个人问题我们还没有闹清楚，而他个人与群众更要分清，姜观之流的提法是不恰当的。

总理插话：不能随便扣群众的帽子，个人也不能乱扣帽子。

总理还说：姜观之流这样提不合逻辑。（热烈鼓掌）

有的同志发言说：我们的组织被解散了。

总理说：解散了再搞起来嘛！

这同志说：搞不起来了，

总理高声说：搞得起来！

这是总理对革命造反派的极大支持和鼓励（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罗源、诏安、惠安、东山岛、永春、吾江、仙游等地区的代表都以血泪的遭遇控诉了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的迫害。

福建革命造反派两次提出要求中央首长例外的允许首都三司，新北大的同学再回福建去战斗，（首长们笑了）

伯达同志说：“再商量商量嘛”。（热烈鼓掌）

最后，总理讲了六个问题：

1. 福建确实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我们要唤起福建，福建军区的注意，特别是福建军区，你们回头就打电话，要按十六条要求重新检查，一个县一个县的检查，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还要给人家革命的机会，下面县人武部，武装部那些人本来就与地方的当权派很熟悉，你们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不管什么上级指示不指示，这种事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还总发生，各省都有，特别是你们省军区不要光相信下面的报告，对十六条要求再一次检查。

2. 老区问题：今天我们有意背靠背开了，广大群众是受骗的，少数坏人冒充头子，如林白就是冒充头子，搞经济主义，但是决不能把经济主义分子的帽子乱扣，搞群众，明天可以请联络员，记者（军校）听听你们的意见。

3. 军区卫校革字派没机会发言了，明天请联络员、军报记者、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听听你们的意见。

4. “八·二九”还是造反组织嘛！因为他们在外县还是做了好事嘛！

5. 姜观之流什么都加补充，姜观这个问题我还没弄清楚，要重新审查。

6. 福建日报问题，南下同学说退出来了，打来电话不久封报社还没退出，要赶快退出来，好实行军管，报社有两派意见，有争论，不要登本地的东西，还是要转载中央的精神。

你们还要特别注意，你们是前线，面临着敌人，刚才有同学递条子，讲到这个问题，你们脑子要有一个最大的敌人是蒋匪，他们搞敌探，往我们这派人、空投，这些革命小将，一提醒就会注意。我们内部有敌我，是一小撮，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台、澎、金、马是最大的敌我矛盾。后天或大后天再接见。散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

1967. 04. 30； 中发 [67] 142 号

一，这次会议，听取了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许多宝贵意见，对于解决福建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一面在北京开会，一面就根据同志们所提的正确意见，及时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二，福建处在美蒋敌人的最前线。人民解放军在边防执行保卫祖国的任务中，有很大贡献。在粉碎美蒋特务的工作方面，成绩也是显著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福建前线的军民，必须更好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团结起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一致对敌。

三，福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批判了以叶飞为代表的福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福建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实现自己的大联合，实现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大联合。要民拥军，军爱民，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必要

的，良好的条件。

四，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用“一·二六事件”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是不妥当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最近，他还向驻福建部队发出指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

五，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有些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中央认为，遇到这种场合，应该通过协商或联席会议的途径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暂且搁下，先解决那些能够很快解决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粗暴的作法，强加于人，或者对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和个人，进行围攻。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六，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不要只看到对方的短处，只强调自己的长处。要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用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私”字，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唯我独尊”的错误倾向，实现各革命派的大联合。

七，对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有意见，可以提。写信，送大字报，派代表，这些方式都可以，但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但对“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予追究。

八，福建有个别干部（例如林白）强调所谓“老区”问题。应该把那里的农民群众同这些个别干部严格区别开来。农民群众没有过错，有一批人进城，是被蒙蔽的。那些用经济主义鼓动农民成批进城的个别干部，必须向农民群众承认这种鼓动是错误的。同时，各县人民武装部因为有的地方农民成批进城而擅自逮捕许多人，这是不能允许的，军队有关同志对此要表示态度，消除自己同群众的对立。

九，建议来京的福建群众组织的代表在这里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回去，就地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十，鉴于当前福建成立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宣布，在那里先实行军管，以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责成军管机构按照中央的精神，处理近

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待条件成熟时，再成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性，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讲话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出席〕

总理：明天过“五一”节，我们今天接见福建，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你们留在北京过“五一”节，祝你们好！祝你们节日好！

总理：先根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研究，关于福建问题提十点意见。

1、这次会议听取了福建革命群众代表许多宝贵意见，对解决福建问题起了重大作用。一面开会，一面根据你们的意见解决了很多问题。会议虽长，共开了四次，在会内会外与同志们接触，研究你们送来的材料，解决了很多问题，同志们对解决福建问题起了重要作用。军区一来就了解了很多情况，引起了军区同志们的注意，第一次会包括北京同学和福建同学一同来的，第一次会上廖淑光同志作了汇报，当中插了很多话，当场就定了六点意见，引起了军区的注意，初步的解决了一些问题，以后又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后来你们又举出了很多事实，我们就逐步解决，书面的和座谈也解决了一些问题，40天我们解决的问题应当肯定。

2、福建处在反对美蒋敌人的最前线，人民解放军在边防保卫中是有很大贡献的，在粉碎美蒋特务上成绩也是显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进一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军民一致，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致对敌。

同志们，特别是北京等地同学到过福建、厦门等地就很清楚，对面就是美蒋敌人，我相信一提起就知道，就会注意，不会忘掉这些。并且值得提出的是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方面是有很大成绩的。不仅要备战，而且要作战，要严防美蒋特务的偷袭，在敌人面前我们不会放松警惕性，三军和民兵都有注意到这一点，敌人也肯定会趁文化大革命来钻空子，但这当然是徒劳的。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相信你们会抓住一致对敌这一点，希望你们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加强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好抓革命促生产。我相信你们懂得这一点。

在厦门、晋江等地我们贴出的标语口号如果被敌人利用，敌人高兴就不好了，这种事我们要少做，敌人高兴就不好了。当我们当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争论时不要

忘记阶级敌人，这是福建军民面临的一个更迫切的任务。

3、福建的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批判了以叶飞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福建的革命派应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民爱军，军爱民，为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创造条件。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叶飞揪出来揭露他，批判他，这是一件大事，中央肯定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想一想在你们都批判过叶飞，在批叶上，有先努力的，有后努力的，包括“八二九”在内有成绩，后来犯了错误，但是只要参加斗争，成绩要肯定，这是你们很大的功勋，革命不分先后。

全国要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系福建，你们确实批了福建头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叶飞，这就是很大的功绩嘛！在这点上你们就有团结的基础，在继续批判叶飞的这个斗争矛头上你们有前提，这一点提醒你们。这里点了叶飞的名，希望你们回去后在大字报上不要写出来罗！小报当然情况不同了。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我们点了某些人的名字，但在报上不见了，要留有余地，我们党的正式机关报上不要点名，这是毛主席的思想，这点请同志们注意。

在本省你们有了共同的基础，联系到全国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要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还要和解放军大联合，结合干部亮相把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革命三结合创造条件，福建的干部条件不成熟，革命群众左派组织条件还不够成熟。

你们要特别注意拥军爱民，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方针，江青同志讲过把十条、八条把拥军爱民结合起来，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一篇社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

4、“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划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标准。把“一·二六”、“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是不对的，被逮捕的人应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反革命分子待查明后除外，被打成反革命的组织一律平反。最近韩先楚表示把“一·二六”事件，“二·七”事件当成唯一的标准是不妥当的，表示要采取措施，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这个态度是好的，革命群众应当拥护韩先楚同志这个行动，这个态度。（鼓

掌)

不能说“一·二六”冲了军区就是反革命，也不能说没有冲就是保守，要在斗争中长期考验嘛！不要把“一·二六”看得太严重了，看得太严重是不对的。除个别确有证据的应扣留，总有个别坏人。对姜观有很多材料说明确实比较严重，所以不要马上作结论。台湾的报纸喜欢他的东西，说明他是在被敌人利用，他的问题还待查明，一般应立即释放。

要为军区说几句，军区对“一·二六”事件还是有认识的，28日曾作出决议把“一·二六”事件看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是不正确的，他们已经在改了，当然认识有个过程，但主观愿望还是与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的。他们是逐渐在改变嘛！

5、各革命组织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中央认为应通过协商和联席会议来解决，解决不了可暂时留下来，先解决可能解决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对不同意见的组织进行围攻，不许武斗。各革命组织矛头都是指向叶飞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共同的大前提嘛！办法上、观点上有不同的争论是正常的现象，应当允许这种现象，不要认为这派占上风就把另一派压下去，如果说冲军区不对，“二·七”会开坏了就压下去，搞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这不对。我们现在已经平反了，被压制这方面抬起头来了，但我们也不要反过来压人家，没有冲军区的过去也是狠斗叶飞的，不能说是保守派，不要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连宿舍都贴了大字报，我们都抄来了（笑），有争论通过协商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留下来嘛，先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只能说服人，不要压服人，压服是不能持久的，不要用粗暴的方法，不要把意见强加于人，粗暴压制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主席的工作作风，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因为你们面临美蒋，还有省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叶飞，要大批判，任务很重嘛！

6、各革命组织间不要只看别人的短处，不看自己的短处，只看自己的长处，不看别人的长处，要进行自我批评，克服私字，要大反无政府主义，唯我独尊的错误思想，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各人观点不同，如果只争吵就不能一致对敌，对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采用自我批评来克服私字，我们既要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又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嘛！只有克服私字，克服无政府主义才能实现革命派大联合。革命派都要进行整风。

7、对解放军负责人有意见可提，送大字报，派代表都可以，但不要冲军区，冲是无益的，是不对的。但对“一·二六”事件不要追究，这讲了过去也讲了未来。解放军在前线不仅担负支工、支农、支左等任务，而且还担负备战、作战的任务，24小时不能停止侦察，待命，民兵，渔民也有这样的任务，所以要首先重视人民解放军的地位和任务，解放军是光荣伟大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叶飞在福建搞了十几年，确实有不少问题。但首先要对解放军有很大的信任，反过来，解放军是真的、实事求是的支持福建各革命派。我们提醒你们重视解放军，但不是说解放军没错误，有个别地区可能严重一些，但在文字上不说，福建是个大军区，不仅指挥前线，而且还指挥后备部队，随时准备海陆空三军作战。不仅在62年，现在也是紧张的。

大区主要是指挥作战的，跟地方接触较多的是省军区人武部，当然大区也有缺点，但要区别开。有问题要解决，叶飞搞了十七年，干部受影响，有意见提，革命造反派要敢提意见，坦率地说，但方法要注意，不要大标语、大字报上街，这与北京不一样，福建不能这样搞，可以写信，反映情况的方法，我相信大军区会支持你们，会互相了解。提醒你们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开大会，什么万炮齐轰，并不是不可炮轰，而是要注意方法，这与北京不太一样，在北京轰我两下也没关系，反正是空炮嘛！福建对面就是台湾，消息很快就传过去，如果军队失去人民信任就不好了。

8、福建有个别干部如林白强调所谓老区人民，应把农民群众与林白分开，广大农民进城是受蒙蔽的，随进城的干部应向农民群众道歉，因此人武部逮捕大批人是不对的。林白是犯严重错误，煽动农民，经济主义进城。真正的老区是闽西，闽北这次来的大都是沿海的。真正老区来得很少。要用毛泽东思想方法来解决，人武部应主动消除与群众的对立。

9、赴京的群众组织代表，会议结束立即会本地，（当然罗，明天是“五一”在这里过！）有问题就地解决，我们只能作这样的决议，我们的口号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10、鉴于当前福建革命三结合条件不成熟，中央决定宣布在那里实行军管，并责成军管会解决“1·26”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待条件成熟后成立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军管是过渡时期的机构，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大批判，

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

以上十个问题，是经主席研究后作出的决定，作出的组织措施。

再说几句：

1、姜观的问题是存在的，我们将继续研究，将来还派人去，再把意见提供给军管会。

2、北京同学对福建的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肯定你们的成绩，但福建的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十个月了，福建的同学要有信心嘛！不要再进行串连了，中央已三令五申了，首都红代会也发表了声明，所以希望你们赶快回去。

现在请韩先楚讲几句。

韩：

总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首都南下和福建的革命派战友们：我们军区在前段时期处理支左问题上有缺点，有错误，使福建文化大革命一度受到影响，使一些造反派革命小将受到某些委曲。中央、中央文革的负责同志花了不少时间亲自处理，十分忙还要来作政治思想工作，这使我们十分不安，在这里我表示完全拥护总理的讲话，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十条决定。

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对福建作了很多重要指示，革命造反派同志也对我们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和鞭策。

我们的主要错误有三点：

1. 对“1·26”事件看得过重，要求肃清影响，消除流毒，揪幕后策划者，实际上使“1·26”成了左右派的分界线，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了空子，使革命小将受到打击。

2. 错抓了一些人和解散了一些组织，我们仓促上阵，有的调研不够，处理不慎，控制不严，有少数人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人事上的关系，这样就错解散了一些组织，错抓了一些人，在这重大的政策上犯了错误。

3. 机械地搬用归口大联合，削弱了造反派，使保守派乘机抬头。以上三个问题，使造反派受到了打击和压制。

三结合问题上，现在看来阶级斗争盖子还未充分揭开，左派还未大联合就搞，是操之过急。

错误的原因是：

1. 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对小将保护不够，对叶飞十七年搞的东西和对地、富、反、坏、右警惕不够。一些问题已经采取措施。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毛选，总结经验教训，彻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虚心接受意见，将中央指示落实。要迅速地改，彻底地改。

2. 我们历次说明：凡被军区错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一律平反，被逮捕的革命群众一律释放，革命组织一律恢复，凡以“1·26”作革命与反革命分界线的一律无效。

3. 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斗群众的恶劣影响，促进革命派的大联合，把矛头对准刘、邓、叶飞，集中火力把他们彻底斗臭、斗垮。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4. 尽量努力完成五支任务，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充分发动群众，扩大左派组织，为三结合的实现创造条件。

5. 按主席、林副主席指示作好爱民工作，不断加强军队与革命群众的关系，我们与革命群众心连心，肩并肩的战友，我们有着血肉关系。阶级敌人随时在破坏这个团结。左派的批评是对我们最好的爱护，我们现在正在整顿支左工作，调换不适当的人员，希望与同志们一起作好支左工作。

我们决心改正错误，跟着毛主席与广大革命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伯达：我拥护总理代表中央对福建很明确的讲话，拥护韩先楚同志自我检讨的很诚恳的讲话。

革命群众同解放军团结起来！

抓革命，促生产！

一致对敌！

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故乡福建胜利万岁！

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在我们的故乡胜利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总理：最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任韩先楚为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最后总理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2011 年 9 月 21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13）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十三节 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本节资料

（一）一九六七年一月重点批判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刊登的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像大海的怒涛一样，猛烈地冲刷着那些阴暗的毒蛇的巢穴。

轰！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中央宣传部这个阎王殿倒垮了。

在最近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江青同志指出：“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对旧中宣部周扬等人的揭发和清算，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关系到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关系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必须搞深搞透。

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贯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他是我们现在和今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最后的一个公开报告，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题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这个报告，忠实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的旨意，极力抵制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这个报告，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伪装下，对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捏造。这个报告，把周扬这个修正主义分子，伪装成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执行人，完全颠倒了历史。特别使人愤慨的是，周扬在这个报告里，十分卑鄙地篡改了毛泽东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对周扬和他控制下的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是对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一个严厉的批判和打击。这个指示彻底揭露了全国解放以来，旧中央宣传部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文化战线上大多数的机关、团体和刊物，一直被修正主义集团所控制，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全面进攻的工具，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彻底揭露了周扬这伙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分子，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在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的导演下，演出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政变。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当作正式文件发给了各级党组织，推动了全国的文化革命。但是，一贯抗拒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周扬，竟敢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明目张胆地篡改成：“他指出，一些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十五年来”这个长时间的期限删掉了，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大多数”文化部门和刊物，减少成“一些”文化部门和刊物，千方百计掩盖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罪恶。毛泽东同志揭露他们这一伙人“做官当老爷”，就是当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来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也被周扬删掉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把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话，即指出周扬控制下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精确的科

学论断和严厉的政治警告，一刀砍掉，统统删去。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伪装下，玩弄了一个篡改、歪曲、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偷天换日的大阴谋。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决不是周扬的黑手所能涂抹得了的。下面，我们将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为指针，通过对十六年来阶级斗争历史的分析，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来揭露周扬反革命两面派的真实面貌。

一部反革命两面派的历史

周扬在对青年业余作者的报告中，伪装出“一贯正确”的姿态，跳出来“总结”解放以来“五次大辩论、大批判”。他竟把自己打扮成是“全面地正确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

这是假的。这是撒谎。这是颠倒黑白。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历史。

真相如何呢？

请看周扬在历次思想战线上的大斗争前后的真实面貌：

第一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当时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全面展开，资产阶级同封建残余势力相勾结，向年轻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他们抛出了《武训传》。这是一部狂热地歌颂地主阶级及其走狗，狂热地宣扬最无耻的奴才主义、投降主义，狂热地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极端丑恶的反革命电影。远在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的伪“中国电影制片厂”就动手拍制这部影片，他们没有来得及拍完，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响了。解放以后，周扬修正主义集团的另一个头目夏衍继承了国民党反动派未完成的事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拍完了这部反革命电影。电影一放映，立刻就受到一批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号召学习武训和“武训精神”，也就是要无产阶级像武训那样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他在为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写的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中，尖锐地指出了文艺界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投降的错误，严肃地责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毛主席所说的“一些共产党员”，为首的就包括周扬。周扬当时担任中央宣

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他自称“我自己很早就看了电影《武训传》”，这部电影是经过他批准后在全国范围放映的。这部反动电影一出来，立刻被毛泽东同志发现了。当时，中央有的同志通知周扬，《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电影，必须批判，还没有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就被周扬顶了回来。周扬趾高气扬地摆出一副十足的贵族老爷架子，十分轻蔑地说：“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严厉责问下，周扬被迫出来做了几句假检讨。实际上他一直阳奉阴违，寻找机会反扑。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武训传》批判刚开始，周扬立刻就写了一封黑信给他的一员大将于伶，指示于伶“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并焦急地说：“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实情况”。于伶当时窃踞了上海文化局副局长，他包庇和勾结着一批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所谓“慎重，仔细”，就是要于伶注意“仔细”保护资产阶级力量，保护那些披着文艺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所谓“不可急躁鲁莽”，就是指示文化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量削弱毛主席批评中尖锐的政治内容，采取拖延的策略，以便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最后化为一个“认识”问题。周扬在信中加了圈的所谓“真实情况”，就是要收集保护资产阶级右翼的种种材料，进行反党活动。这是周扬一伙在《武训传》批判过程中的一次反党大阴谋。

在毛泽东同志发起下，突破了周扬的重重抵抗，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团克服了周扬派来的他的秘书锺惦 f ě i @①的总工破坏，依靠广大群众开展了工作。这个团的调查结果，就是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这篇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文章，以铁的事实揭开了武训这个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反动面目，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这时周扬见铁证如山，再抵抗下去不行了，立刻变换了策略，赶紧换一副面孔，出来写文章，捞资本。他在八月发表的文章中，先说了两句什么自己“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然后摇身一变，出来做“系统的”总结，好像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者，不是别人，而是他周扬！

当然，周扬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决不甘心的。批判的高潮刚过去，周扬就

迫不及待地站到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发动反攻，为《武训传》批判“纠偏”。他在题名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声色俱厉地说：“自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的批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向”，“应当加以纠正”。接着就猛烈地攻击什么“从教条公式出发”的“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意见”（即广大工农兵的革命批评），再加上党的领导不“支持”所谓“创作事业”，“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这种情绪是需要设法转变的。”

请看，周扬在这里“纠偏”纠得多么彻底！他实际上把由毛泽东同志发动的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彻底否定了，把工农兵的批评一把扼杀了，也把毛泽东同志对周扬等“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批判推翻了！无产阶级刚刚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周扬就大喊大叫“苦恼”了，“压抑”了，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映他那个阶级的呼声是多么敏锐啊！

请看，《武训传》批判前后，周扬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开头，他以文艺界“老头子”的身份，领着他那一伙放毒，大反毛泽东思想，大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战斗一打响，他连忙来个假检讨，蒙混过去，欺骗党、欺骗人民。然后，他装出“正确”的姿态来“总结”斗争，把功劳算在自己账上。接着，他就逐步把运动拉向右转，向革命人民发动反攻倒算。同志们，请注意，周扬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老手，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周扬在各次斗争中的基本面貌。也可以看清楚其他已经揭露和尚未揭露的“两面人”的特征。

第二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展开的重要时期。随着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不甘心死亡的资产阶级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并且加紧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彻底揭露了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篡党阴谋。斯大林逝世后，现代修正主义逆流开始泛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我国文艺界，使党内外的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活跃起来。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利用他们垄断的刊物和报纸，大力吹捧和支持资产阶级“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则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压制和打击。他们全力支持极端反动

的胡适派的唯心论，毒辣地镇压一切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为资产阶级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服务。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文艺界黑线专政的严重形势，又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深刻地批评了以“大人物”自命而镇压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某些人”，他愤慨地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①，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同志尖锐批评的以“大人物”自命而压制“小人物”的“某些人”，反对在《人民日报》转载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的“某些人”，为首的就包括周扬，也包括丁玲、冯雪峰支配的《文艺报》。

正是周扬，一贯执行一条吹捧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反动路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他在《文汇报》发表的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就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说什么离开了他们“革命就搞不成”，胡说什么进城的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这一方面的缺陷，就需要城市的知识分子来填补。”他又一再叫喊要“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用所谓“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一九五三年《文艺报》第十九期），不许无产阶级插手资产阶级“权威”控制的“团体”。周扬就是这样把资产阶级“权威”、叛徒、反革命分子安排、“填补”到文化界的各界里，去作“领导力量”，压制一切革命者对他们的批判。

正是周扬，直到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批判展开前夕，还专门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五体投地地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什么“民主倾向”，什么“有思想、有才能”，什么有“抱负和理想”，什么“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你们看，这不是简直把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吗？

正是周扬，还在这篇文章中大捧特捧“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文化思想”，这里的“西方”，是指欧美资产阶级的文化，就是形形色色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宇宙观，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派的唯心论，即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把资产阶级反动哲学说得那么神圣，这不是对俞平伯之流的资产阶级“权威”最大的撑腰吗？这不是十足地“甘心”作资产阶级代言人吗？

正是周扬，在这场大斗争中又重演了一次反革命两面派的角色。战斗刚刚开始，周扬就尽力想把这场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化为一场所谓“纯”学术讨论。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去研究“包含复杂的内容”的所谓“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开了大批题目，要人们去搞烦琐考证。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周扬看看形势不妙，马上及时制造假检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他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全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等等。这个“检讨”，拆穿了说，不过是“错误人人有份”而已。他根本不想稍为清算一下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只是想借此蒙混过关。什么“我们”“进一步展开了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人们都清楚：这个“我们”是不包括你周扬的。你的所谓“全面批判”不过是摇身一变的故技重演，这是为了保持你窃踞的领导地位，以便把斗争拉向右转，开展反攻倒算。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们不是连续发表了成百万字的曹雪芹死年考据、祖宗考据、大观园地址考据……等等奇谈怪论，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图，为胡适派唯心论实行了一次大复辟吗？

第三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是一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亲自领导之下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尖锐斗争。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个严重打击。周扬的思想同胡风思想本质上是一样的，他同胡风一样，反复鼓吹“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一九五二年），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同胡风一样，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作家深入到工农兵斗争中去，甚至狂妄地说

“不去，也还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和工农是要分工的”（一九四九年），公然以贵族老爷自居。他同胡风一样，反对写重大题材，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力鼓吹所谓“选择题材”上要有“完全自由”，要“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一九五三年）。他同胡风一样，主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反对阶级分析，用所谓“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一九四九年）之类人性论的语言，来歪曲劳动人民的阶级面貌和阶级性格。他同胡风一样，提倡“创作就是一个作家与生活格斗的过程”、就是“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物我一体”（一九四一年）之类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论的创作方法。他同胡风一样，把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奉作至高无上的祖师。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周扬都有，只是伪装得更巧妙些。一九五二年，周扬、林默涵等人召开过一个所谓“批判”胡风的座谈会，在会上就吹捧胡风是“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斗争上”，是“同党站在一起的”，甚至把这个反革命头目捧做“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暴露了周扬一伙同胡风“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所以要攻击周扬等人，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攻击周扬的这一套。正如《人民日报》编者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指出的：“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我们的党，是毛泽东思想。可是周扬却利用反胡风斗争投了一个机，他抓住胡风攻击他周扬这个假象，把自己打扮成好像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从此就神气起来了。从此就更加露骨地使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了。其实，拆穿了，这是一场政治投机，是一个大骗局。（(2)(3)）

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果然，对胡适、胡风批判的革命硝烟还没有消失，周扬就急忙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拉向右转。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周扬写了一篇《纪念（草叶集）和（堂·吉诃德）》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同志坚决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发表，中国农村正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间。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农村中去，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大写“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周扬却针锋相对地狂热地鼓吹堂·吉诃德的什么“高度的道德原则”，即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他特别狂热地吹捧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诗人惠特曼，要作家把他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他还从惠特曼著作中抬出了一种“新型的人”，当作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请看：

惠特曼的奇异贡献是他在他的诗篇中创造了“人”的一种光辉形象。

读了他的诗，人们就好像能够看见一种惠特曼式的人，一种新型的人，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创造的手，并且永远乐观。

惠特曼式的人，肯定的说，是一种新的人，是一种足资我们学习、模仿的光辉榜样的人。

在这里，周扬用“劳动创造的手”这样一个迷惑人的短句，好像惠特曼歌颂的是劳动人民。不，《草叶集》中所歌颂的“人”，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更不是劳动人民，而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化身。我们查了一下，发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周扬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早就吹捧过美国资产阶级。那时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所欣赏和赞美的惠特曼式的“人”，是“充满信心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肉体地健壮，胸怀广阔”。丑死了，丑死了，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狭窄心肠捧做“胸怀广阔”，不觉得肉麻吗？在六亿工人农民兴起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刻，在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成千上万地涌现的时刻，周扬再一次把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捧做“崇高理想”，把惠特曼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把“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叫做“新型的人”，当作“光辉榜样”，把堂·吉珂德的骑士道德捧作“高度的道德原则”，要人民去“学习、模仿”，这不是公开同毛泽东思想对抗吗？这不是对于六亿工人农民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个猛烈的反扑吗？这不是要城乡资产阶级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永远乐观”，坚决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这还不够。紧接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吹捧，一九五六年三月，周扬就迫不及待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破天荒地一次封了五位所谓“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用双手奉上“大师”的皇冠，表现了自己是资产阶级“权威”忠实的代理人。这也是从外国学来的。这是命令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权威”跪倒投降，这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历次指示的猖狂大反攻。这项帽子封了许多人的嘴。当一九五八年、五九年，有一些要求革命的“小人物”冲破了周扬的禁令，甘冒挨打的风险，对其中某几位“大师”进行了一点批评时，周扬马上出来为这些“大师”保镖，多次用最刻毒的语言打击批评者。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在对“老剧作家”的讲话中愤恨地反驳道：“有人对有些作家被称为语言艺术

大师不满意，说是捧场。……要不要学语言？要不要跟大师学？”这不是要青年死心塌地做资产阶级“大师”的奴仆吗？连对资产阶级表示一点“不满”都不准，真是蛮横极了。

第四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七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经济战线上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修正主义的大出笼大泛滥，直接促使了国内的修正主义逆流的发展。周扬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连串的讲话和文章，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提供了精神武器。

一九五六年三月，苏共“二十大”刚开过，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赤裸裸地说：

一定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我们不只学习苏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进步的艺术。……比如《居里夫人》就是很好的片子，思想性或艺术性都是很高的，这是十几年以前的美国片子，虽然不是正面宣传共产主义，但是那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吸收他们的好的东西，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影响他们，而他们也会影响我们。

这是一篇搞“和平演变”的计划书。《居里夫人》是美国罗斯福执政时拍摄的一部反动影片。它通过居里夫人的一生，集中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个人奋斗、成名成家、阶级调和的反动观点，宣传了科学家的活动是超阶级、超政治的，要为“全人类”服务，实际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榨取高额利润服务。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拍出这种“传记片”，是想用比较隐蔽的形式，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影响”和腐蚀美国劳动人民，使他们放弃阶级斗争的道路而幻想爬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用心极为恶毒。它比那些色情片、“西部片”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周扬把它当作宝贝，称颂它是“进步的艺术”，是要做美帝国主义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即用西方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来“影响我们”，使我们的艺术变成挂社会主义羊头，卖资本主义狗肉的修正主义艺术，为培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同志们只要看一看，这些年来，在周扬一伙控制下出了多少坏电影，这些坏电影同西方资产阶级艺术有多少“密切的关系”，就会懂得向美国这种“进步电影”学习的结果是什么了。

周扬说，“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这是一大发明。你们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讲“一致”，说明你们这伙“共产主义者”嘴上的“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即修正主义。这难道不是暴露了你们的一个大秘密吗？请看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是同周扬一样，到处同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讲“一致”吗？

不久，周扬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文。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纲领，这是一篇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宣言书。

周扬在文章中大反“庸俗化”“简单化”“清规戒律”“宣传作用”，认为党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由是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反党口号。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有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由。周扬向党伸手要“创作自由”，是为资产阶级争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由，让牛鬼蛇神解除“束缚”，自由地搞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周扬所攻击的所谓“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的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原则；他所攻击的“宣传作用”，就是反对文艺宣传无产阶级的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创作自由”和所谓“反教条主义”这两个反党口号，后来成为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主要武器。直到一九六二年、六三年，不是还有人用“尊重创作自由”之类的老谱，来为各种毒草催生吗？

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越凶，周扬反革命的真面目就暴露得越清楚。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周扬在《文汇报》上发表讲话，眉飞色舞地欢呼“剧目开放是戏曲界的一件大事”，为舞台上乱舞的群魔助威；极力赞美右派分子刘宾雁等从苏修那里搬来的所谓“干预生活”的一批大毒草，认为“尖锐地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作品，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在四月间，周扬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呼风唤雨，煽风点火，反对所谓“春寒”，要求“春暖”，鼓动右派起来争取“春天”

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到来。五月十三日，他在一次报告中疯狂地诬蔑共产党员“像特务一样”“像木头一样”，极力称赞当时成为章罗联盟喉舌的《文汇报》放火“胆子大”。他说，讲要杀几百万共产党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真是毒牙毕露。这完全证实他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

反右派斗争一打响，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的周扬，立刻又见风转舵，巧妙地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大右派的狰狞面目藏起来。在整风开始的时候，周扬和旧中宣部负责人，十分热心地积极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翻案，要摘掉他们反党的帽子，直接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可是反右派斗争一起，周扬却立刻利用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批判，把自己这个大右派打扮成左派，俨然用“一贯正确”的姿态出来总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中，他把“我们这些人”分成“两种人”，一种人是“同党不是一条心”，“不肯按照集体主义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另一种人就是他周扬，说是已经“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同党一条心了”。对照一下那些恶毒的右派言论吧，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是多么卑鄙呵！前次，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扬用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这次，在反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周扬又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他用这两次投机，把自己的罪恶掩藏了过去，包庇了一批右派、叛徒混过关，把他黑线中的一伙人安插到文艺界各种领导岗位上去，扩大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这还不算，他又乘机翻案，篡改他在三十年代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的一段历史，反诬鲁迅是“宗派主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耍了多少花招！

有一些人总爱写什么三部曲。总起来看，周扬的一套把戏，原来玩的也是三部曲：向党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然后马上用假检讨或者伪装积极一变而站在正确方面；然后大搞反攻倒算，发动新的进攻。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就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史。然而，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扬混过了这四次大斗争，在第五次大斗争中，三部曲还没有演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就彻底暴露了，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利剑彻底戳穿了。

大风大浪中的大暴露

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

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一九五九年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在这场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周扬自以为自己的势力更大了，政治资本更多了，加上有了旧北京市委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作后台，有了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的支持，可以更加放肆了。在这种估计下，他就抛掉了伪装的一面，赤裸裸地摆出了他反革命的本来面目，更加恶毒、更加疯狂、更加嚣张地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毛泽东思想发动进攻。

一九五九年一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我国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在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下，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在这个过程中，周扬猖狂地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积极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政治需要服务。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牡丹》二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洛阳宣教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说什么经过了一九五八年的批判，“有一种被压抑的情绪”，现在要颠倒过来，“要使人人敢于讲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人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周扬要动员起来的“人人”是什么阶级的人呢？就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被资产阶级“压抑”，就是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压抑”，有阶级对立存在，就根本没有什么“人人”平等、“人人”不受“压抑”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对广大革命人民实行最广泛的大民主，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分子就要进行坚决的专政。只有对敌人进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周扬所谓要“人人敢于讲话”，就是要把那些被批判的牛鬼蛇神重新扶起来，只准他们“讲话”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总路线，不准无产阶级“讲话”批判他们。“也要让少数人讲话，因为他代表某种社会力量”。这是混淆黑白。对所谓“多数”和“少数”，都必须作阶级分析。坚定的左派和顽固的右派都是少数。右派是极少数。左派争取、团结了中间派才成为多

数。你周扬残酷地压迫无产阶级左派这个“少数”，却支持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登台夺权，这分明是要他们来专革命人民的政。

一九五九年初春，周扬为了贯彻他鼓动牛鬼蛇神“敢于讲话”的反动纲领，向周信芳推荐《海瑞上疏》的题材，并且提供了具体材料。他向周信芳说：现在“大家不敢讲话，演一演这类戏是需要的”。“少数人”到了两个反党分子私下对话的时候，变成了“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他们所代表的极少数地富反坏右。他要通过《海瑞上疏》，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牛鬼蛇神打气。一九五九年，他到处宣传“海瑞精神”，还广泛动员各地来京的艺术团体的干部和演员，要求他们“选择海瑞、包公”作为“今天写历史剧”的主角。吴晗不是说写反党的“海瑞戏”也要“全国一盘棋”吗？这“一盘棋”的指挥者就是周扬。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疯狂地攻击大跃进，奴颜婢膝地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艺术叫做“国际水平”。他咒骂我们的党说：“有了一千万吨钢，就以为了不起了，连苏联也不放在眼里了。”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眼里”有五大洲的革命风云和全世界的阶级兄弟，就敢于蔑视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包括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内，敢于同一切妖魔鬼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鄙视它们，压倒它们，战胜它们。周扬“眼里”只有几个修正主义的狐群狗党，他当然要对着大无畏的中国人民狂吠了。他还攻击我们的党“违背国际主义”。这证明了他所谓的“国际主义”，就是把修正主义奉为“老子党”，跟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这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奴才主义。

一九五九年六、七月间，周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作了讲话。这个报告，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久之后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反革命路线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他诬蔑我们歌颂大跃进是“搽粉”，是“乱用群众的积极性”；他攻击群众运动，咒骂唱革命歌曲是“老太婆唱歌没有人听”；他咒骂劳动人民不配作诗，因为“做诗本来是要灵感的”；咒骂“中学生是些小娃娃，十二三岁”，根本没有资格过问政治，如果要他们学习政治，是“庸俗的了解为政治服务”。一谈到大跃进，一谈到群众运动，包括工农兵起来掌握文化的群众运动，他就冷嘲热讽，指手划脚，极尽其挖苦打击之能事，这是出于他的资产阶级憎恨社会主义、憎恨革命群众的阶级本性。这种站在群众运动对面的人，

不管多高的职位，到头来总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事实无情地驳斥了周扬，今天，不但从“老太婆”到青少年都齐声高唱革命歌曲，“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也正以空前高涨的“积极性”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资产阶级发动一场全面的总进攻！

周扬在这个报告中还极端狂妄地攻击说：“十年来”，有我们自己的“科学著作”没有？周扬妄想把解放以后十年中，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伟大发展，一笔抹杀，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周扬这个家伙，你低头听着：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以来，党中央出版了光芒万丈的《毛泽东选集》，成为我国和全世界人民进行革命的指南针，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等等伟大的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进一步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思想战线上的历次伟大斗争，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等著名文章，包括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直接批判你周扬的那些重要指示，这算不算“科学著作”？你的反革命面目难道还不清楚吗？

其实，拆穿了，你们所谓“科学著作”，就是现代修正主义那些又臭又长七拼八凑的“条条”、“本本”、“教科书”，就是那些“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牛皮，你们眼睛里只有洋菩萨的修正主义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群众手中的活哲学、活科学，你们一概疯狂地反对。这充分暴露了旧中宣部一伙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恶本质。这种罪恶，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达到了高潮。现代修正主义者联合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加紧对我国我党进行封锁、包围、诬蔑、渗透、颠覆。妖魔鬼怪纷纷出笼，修正主义逆流泛滥一时。周扬不但积极组织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为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作舆论准备；也是一个发了狂、红了眼、自己出来打头阵的主将。他

连续召开许多专业会议，抛出了一个接一个的修正主义纲领；他还拔脚在全国乱跑，上海、长春、杭州、大连、福州、厦门……，到处开会，到处做报告，四面点火，八方煽风，鼓动和策划牛鬼蛇神起来夺权，起来翻案，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艺界的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几乎都是从周扬一伙那里拿到通行证，按周扬的信号弹行动的。一切接近灭亡的反动阶级，总是利令智昏地来个自我大暴露，以便革命人民看出他们的真相，群起而灭之。下面我们只举出几个突出的方面：

周扬疯狂地反对和咒骂毛泽东思想。周扬一贯反毛泽东思想，但过去总要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披上一件伪装。一九六一年以后，他以为形势对自己有利，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就要得逞了，索性抛掉伪装，赤膊上阵，跳了出来破口大骂。

一九六一年二月，周扬跑到上海，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攻击有的戏“把‘感谢毛主席’这句话直接表现出来，一遍还不够，感谢了三遍四遍”。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永远跟毛主席走，跟党走，这是几万万中国劳动人民从心里喊出来的，是每一个从剥削阶级压迫下得到解放的劳动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头等大事，为什么你周扬这样深恶痛绝？这完全表现了周扬反革命的阶级本性。

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扬跑到福建去大骂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一条红线，太多了就不是红线，而是红布了。政治是灵魂，灵魂不是肉体……灵魂不占地方，来去无踪。”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一根“来去无踪”、“不占地方”的线，这不是明明要把毛泽东思想赶出各个领域，让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去挂帅么？这一段十分刻毒的黑话，他到处讲，翻来覆去不知讲了多少遍。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恐吓说：“广播电视里不要老宣传拥护毛主席”。这是旧中宣部的阎王殿里的黑话。这充分显示了他的反革命嘴脸。你们反对宣传“拥护毛主席”，你们要宣传“拥护”什么人呢？岂不是想把一小撮被全党全国人民唾弃的反党分子“拥”上台，实现反革命复辟么？你们这种打算，只能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又跑到东北去反对“天天讲毛主席”。我们就是要天天讲毛主席，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天天温习毛主席的指示，天天学毛主席思想。“天天讲毛主席”，一切牛鬼蛇神就没有空子好钻了，一出来就被识破了，一活动就被抓住了。

周扬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些冠冕堂皇的话统统是骗人的。上面这些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真面目是多么反动么？

周扬疯狂地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鼓动和组织过去被打倒的形形色色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权威”向党进攻。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燕山夜话》开张了。只隔一周，三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立刻抛出了一篇题名为《题材问题》的专论。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它是在周扬、林默涵授意、指导之下写的，并经过他们精心修改。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煽动性的口号，叫做“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

他们要“广开”什么“文路”呢？

没有什么抽象的“文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开”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资本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他们说，“广开文路”是为了“不使任何有志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冷淡或压抑”，对了，这就暴露了他们原来是要“用一切办法”为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冷淡或压抑”的反革命分子翻案，好让那些怀有反革命之“志”的牛鬼蛇神，利用报刊、文艺的工具，通行无阻、横冲直撞地进行反革命宣传。你看：反革命复辟可以走“武路”，也可以走“文路”，我们一定要“用一切办法”粉碎他们由“文路”实行复辟的梦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请看周扬是怎样在各种“座谈会”上，接二连三地那些被“压抑”的“有志之士”翻案，狂热地鼓动他们向党进攻：（(3)(4)）

他狂热地歌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说：右派中“有些很有头脑的人”，十分“宝贵”，那些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青年人“很有学问”，要“注意培养他们”。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把一批穷凶极恶、腐朽不堪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扶起来，当作“宝贝”，网罗进他控制下的各种机构中去，高官厚禄，关怀无微不至。连老汉奸、大流氓周作人，也批给他一个月几百元，帮他吮吸劳动人民的鲜血！相反，周扬、林默涵一伙对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青年，对无产

阶级左派，刻骨仇恨，咒骂他们是“头脑简单、情感简单、趣味简单”的人，因为他心目中“有头脑的人”，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

他极力附和胡风的反革命言论，为胡风翻案，完全暴露了他同胡风站在同一个立场。他说：“胡风说，机械论统治了中国文艺界二十年。……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双百方针不贯彻，都是一些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的这两句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这是多么毒辣的黑话！胡风是一个凶恶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周扬却把胡风的话当成祖宗的“家训”一样“一直记着”，就因为他十分欣赏胡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刻骨仇恨，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

“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是有所指的，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那些坚持王明路线的人“言必称希腊”，其中包括了周扬，周扬一直怀恨在心，现在就破口骂出来了。你对“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感到“恼火”，因为你是个资产阶级，你是个洋买办，你要言必称洋人，言必称“别、车、杜”（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才觉得舒服。周扬还在一次吹捧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论，要作家根据胡风的反革命理论，去大写劳动人民的“落后、迷信、偏见、猜忌”等等，丑化和侮辱劳动人民。什么“批判”过胡风，统统是假的，是骗人的。还有什么“红衣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这种胡风式恶毒至极的语言真是叫人怒火直冒，念不下去！周扬用这种黑话来辱骂无产阶级左派，辱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工农兵，只不过使人们看清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者的黑心黑肺。其实，把“红衣主教”这顶帽子回敬给周扬，倒是很适合的，当时披着红袍子，打着黑旗子，抓着文化战线印把子的，不就是你们吗！？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又提出“我们要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这正是《海瑞罢官》演出之后，“三家村”的“兄弟”们“破门而出”“失败了再干”的进攻的时期。在周扬伙同文化部前党组书记齐燕铭的指挥下，《谢瑶环》《李慧娘》等大批毒草正在先后出笼。周扬一再鼓吹“海瑞精神”，是为了组织一场大进攻，把矛头指向党中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一九六二年，旧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又一次提倡要学习魏征，他们一个“海瑞精神”，一个“魏征精神”，找到了反革命的共同语言。

周扬还说：“首先要改变这种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就

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周扬的目的是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让“被统治”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海瑞，魏征，等等，变成“统治”者，一窝风上台专政，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

周扬到处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要把各个协会、各个文艺团体、机关统统变成裴多菲俱乐部。周扬等人一九六一年七月抛出、八月一日又修改印发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所谓“文艺十条”，其中心就是推翻毛泽东文艺路线，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艺十条”中攻击“在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存在着所谓“狭隘的、片面的、不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周扬黑话原封不动的翻版。周扬所痛恨的“狭隘理解”，就是文艺紧密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把文艺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周扬所谓的“广阔”，就是“十条”中一再叫嚣的“对于题材，不应作任何限制”，就是《文艺报》在《题材问题》专论中所说的“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历史的规律性和生活的复杂性”。

“不应作任何限制”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任何事物都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不受“任何限制”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是革命的限制还是反革命的限制，进步的限制还是反动的限制。无产阶级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一定要接受无产阶级政治的限制，政治统帅文艺，自觉地从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来考虑题材问题；不接受这种限制，就会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的限制，变成资产阶级文艺。“借古讽今”“崇洋非中”的毒草盛行一时，“离经叛道”“写中间人物”等等反社会主义的坏电影、坏戏、坏小说争相出笼，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治限制的结果。揭破在“限制”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欺骗，是为了使人们看清周扬所谓“不应作任何限制”，其实是要求文艺不受六条政治标准的限制，不受为工农兵服务的限制，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各种大毒草统治文艺界，实行反革命的大复辟。

他们所谓“世界的多样性”，其实只有一样，就是要美化和歌颂那些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多种“多样”的丑态。在周扬看来，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歌颂无限壮丽的工农兵生活是“狭隘”的、“单调”的，只有大力地去描写资产阶级糜烂不堪的生活方式，才叫“多样”，才有什

“美的享受”。他们所谓“生活的复杂性”，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的红军战士同反革命白匪拥抱之类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投降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美化叛徒、奴才、阿飞、地富反坏右的肮脏手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欣赏剥削阶级阴暗心理和精神分裂的丑恶笔墨！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无耻地吹捧肖洛霍夫时，就说什么《一个人的遭遇》的“伟大意义”是“表现了普通人的复杂的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赫鲁晓夫的应声虫们要我们去写什么“生活的复杂性”，不就是要我们去向肖洛霍夫之流的叛徒文学看齐吗？

周扬大力推销现代修正主义的黑货，提出了“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口号。一九六一年十月开始的苏共“二十二大”，公开宣布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赤裸裸暴露了自己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面目。周扬急忙响应。他借一九六二年五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机会，又玩弄了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阴谋。他把他手下的资产阶级“权威”，集中到北京，以“写文章”“总结经验”为名，发动了一个反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高潮。这伙人在周扬、林默涵的领导下，过着贵族老爷的生活，一天到晚密谋如何打击左派，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最后抛出了《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文艺报》社论）、《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何其芳）、《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陈荒煤）、《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瞿白音）……等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对毛泽东文艺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极其恶毒的歪曲和攻击。周扬亲自抓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三月十五日，周扬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对“社论”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定下了调子。后来又仔细修改。这篇发表时名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中心就是用赫鲁晓夫的“全民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文艺，用为“全体人民”服务来篡改为工农兵服务的毛泽东文艺方向。

“全民文艺”是周扬一贯的修正主义思想。他多次提出过“全民的文学”“全民的文化”这类修正主义口号。到了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他觉得有了洋主子作靠山，又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的批准，就干脆把这个口号变成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强加给全党。

文章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这是对于毛泽东思想极其恶劣的篡改。毛泽

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又指出：“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为工农兵服务，以工农兵为对象，这是二十年来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是阶级路线，是决定文艺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是这样。周扬企图用所谓的“统一战线”来偷换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硬要把资产阶级作为我们文艺的服务对象，这是要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性质，使它变成资产阶级手里的反革命工具。周扬把资产阶级等革命的对象当成“工作的对象”，是要我们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改变成对资产阶级的歌颂，用这条“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反掉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为资产阶级复辟“广开文路”！

文章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加强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原封不动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修正主义口号。赫鲁晓夫做过一个报告，题目就叫做《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搞假共产主义的所谓《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就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写上：“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是加强同人民生活的联系。”为什么苏修这样欣赏和热衷于“联系人民生活”的口号呢？因为这个口号就是抛弃革命，就是抬高反革命。第一，它把作家、艺术家放到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的位置，只是要求他们“联系”一下“人民”，完全反对同工农兵结合；第二，赫鲁晓夫所谓“人民”，就是“全民”，就是那些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密切联系人民”就是密切联系资产阶级、高薪阶层，为资产阶级服务；第三，它取消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资产阶级作家可以完整地保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放手写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品；第四，裴多菲俱乐部也可以变成所谓“加强同人民联系”的一种形式，使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活动合法化。周扬把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当作“主要路线”的口号搬过来，是为了取消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指示，使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统治中国的文艺界。

够了。此人是一个报告狂，我们不可能列举这几年周扬多如牛毛的大小报告中所有反动内容，从这一部分事实中，已经足以看出周扬的真面目。平时以两面派面貌出现的周扬，在这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大风大浪中，完全暴露了

反革命一面派的本质。然而，“物极必反”，反革命派趾高气扬的充分暴露，反过来为革命派的反击提供了致命的子弹，周扬一伙就这样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摧毁黑线的顽强抵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周扬还在积极参加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阴谋活动。他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他亲自接见写这本书的反党分子，亲自审阅了这部小说，称赞这本书“做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

他们的反党阴谋很快被党中央和毛主席识破了。在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直接批评了周扬等人。

毛泽东同志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周扬等人，又一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等待。但是周扬却又一次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十中全会之后，他利用职权，依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窃踞重要职务的反党野心家的支持，压制左派的反击，力图再一次使用两面派的伎俩，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力量保存下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于是，在广阔的思想阵地上，接连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

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开过，周扬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党罪行，急匆匆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向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人作了一次所谓“传达”。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是“不能说精神准备很充分”的左派；一面歪曲十中全会精神，说什么文艺界“基本情况是好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发表得……不多”，力图把许多大毒草都说成是香花，麻痹革命人民。又说什么“也不要走向另一极端”。就是说不要批判资产阶级，不要铲除毒草。无产阶级刚要开始反攻，他就决心抵抗到底了。

二、紧接着，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周扬的批准、指示和亲自策划下，在山东召开了所谓“孔子讨论会”。这是周扬伙同一大批牛鬼蛇神对十中全会革命精神的一次反攻。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嚣张得发了狂的黑会，演出了解放以来所未曾出现过的向封建祖宗鞠躬致敬的丑剧。

三、一九六三年元旦，柯庆施同志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向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写十三年”的倡议，希望文艺创作大力反映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歌颂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这个革命的倡议马上受到了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的抵制和攻击。一九六三年四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扬组织林默涵、邵荃麟等一伙人，从小组会到大会，围攻“写十三年”的口号。在这次会上，和接着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全国文联委员扩大会上，周扬还亲自出马，大讲“不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反映时代精神”，“不要以为只有描写现在，才是主导的”。到了一九六五年底，当他向青年业余作者作报告的时候，他却板起面孔批评什么“三年前”提出“写十三年”的时候，“有的同志就曾经表示不能接受”。好像他当时还是个积极分子。这真是虚伪透顶了！怎么能够这样子厚颜无耻，用撒谎来吹嘘自己呢？

四、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对“鬼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严厉指出周扬、齐燕铭、夏衍、林默涵领导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周扬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关于戏曲工作的讲话中，却说什么“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竭力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周扬还根据他投靠的反党野心家的谬论，公开提出所谓“分工论”，说什么“特别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制造反对革命现代戏的理论根据。他还吹嘘什么戏曲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妄想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罪恶掩盖起来。

五、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扬专门召开了一次包括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和各报刊负责人的会议，带头围攻戚本禹同志《评李秀成自述》这篇革命文章。他在会议上喊叫“李秀成是一个民族英雄，把他说成叛徒是完全错误的。”指挥邓拓、翦伯赞之流出来“反驳戚本禹”。这个阴谋被毛主席及时发觉和制止了。

六、一九六三年十月，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做了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是讲国内任务的，根本不谈当时思想战线上严重的战斗任务，相反，

却大谈“整理和研究历史遗产”。他拿出了旧中宣部一伙人的黑话，拚命攻击所谓“用简单化的办法乱贴标签”。“标签”就是指阶级分析。他在会上排斥左派，捧出了一大批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权威”来控制这次会议，在历史组做“反修报告”的就有邓拓。要邓拓来充当“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这不是开玩笑吗？不，这是做政治交易。周扬要投靠反革命的野心家，就一定要支持他们手下的“三家村”。

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针对反党黑线对文艺界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尖锐地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泽东同志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个指示，同上面周扬吹捧戏曲“巨大成绩”的谎话，针锋相对，当头一棒，完全揭穿了周扬的反动立场。周扬却继续狡辩，妄想蒙混过关。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扬就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他说：“文化部的错误不一定是路线错误。”“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包括文艺部门的领导成员和我自己在内。”他以为这样一“包括”，他们就可以重演检讨几句、变为正确的那套反革命两面派把戏了。

八、由于周扬等人一再抗拒中央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又一次向文艺界的修正主义领导人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向周扬等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这就是本文开始时提到的被周扬篡改的那次指示。周扬见势不妙，再抗拒下去自己有灭顶的危险，于是在文化部搞了一次所谓“整风”。这是一次欺骗群众、压制左派、包庇坏人、掩护自己的假“整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周扬在一次“报告”中就利用“批评”夏衍等的机会，吹嘘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就是“在主席教导下工作的”。“我的错误和你们的路线错误不同”，是“没有经验”。对他周扬是不准批判了，对别人的批判也要“有领导”，即“一律要经过”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的“批准”。这是《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手段：不准革命。

九、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一九六四年七月，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一贯反对京剧革命现代戏的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突然假装热心起来。

周扬又扮演了作“总结发言”的角色。这篇修改了多少遍的讲话，虽然想尽量装得革命些，却仍然露了马脚，他把夏衍向香港报纸记者发表歪曲京剧革命的谈话，说成是“对京剧演现代戏估计不足”；他还公开宣称：“不是说《谢瑶环》整个的都反动”，尽量开脱田汉的反革命罪行。

十、一九六五年初，在毛主席的号召之下，对于杨献珍、周谷城的反动观点和一批坏电影的批判正在展开。周扬深知这些批判深入开展下去会危及自己的反革命统治，千方百计加以扑灭。他用的还是反革命两面派的老办法：一面假装赞成批判；一面窥测时机，一有机会，就一下子把运动拉向右转。二月下旬，正当一个批判高潮起来，周扬、林默涵立刻以“总结”为名，在北京召集几个主要报刊的负责人谈话，气势汹汹地指责这个时期发表的批判各种毒草的文章“打空炮”、“缺乏分析”、“教条主义”、“乱猜”、“夸大”、“光扣帽子”，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还攻击和嘲笑工农兵群众的评论文章“简单化”，“不能代替专家评论”，想把工农兵的批评打下去。他们公开说：“批判夏衍、田汉等人，过去与现在要分开，政治与学术要分开。”又说什么“有些人家已经不谈了，……就算了”。一个“分开”，一个“算了”，这是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革命的反噬，是要强使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此刹车。此计果然奏效，大批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就此被死死扣押在他们的阎王殿里。

十一、一九六五年九月，周扬等人以为他们已经把革命群众压了下去，稳住了阵脚，可以演三部曲的第三部曲了，马上迫不及待地向党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一齐登台，疯狂诬蔑毛泽东同志。他们还把夏衍、阳翰笙等人请上主席台去，趾高气扬地坐在那里继续专无产阶级的政，周扬在作报告时一再安慰他们：“不要老是想到我挨了批评，批评得多一点，少一点……批评得过重或是不够，总是有的”。向他们暗示批评得太“多”太“重”是可以翻案的，只要我周扬不倒，你们总是不会垮的，以后可以东山再起。并再一次把自己说成只是“觉察很迟，纠正很慢”，是“认识问题”。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他们这一伙人全部保护过关，继续对无产阶级专政了。

十二、最后，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扬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做的这一个报告。这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展十九天之后，

无产阶级左派同资产阶级右派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严重时刻。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坚决抗拒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疯狂地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妄想扑灭迫在眉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周扬决心寸步不让，抗拒毛泽东同志彻底革命的指示。在他的报告中，只字不提眼前这场风雷激荡的斗争，就当世界上根本没有批判《海瑞罢官》这回事。一九六六年一月，周扬的报告正式发表了。这时，距离他作报告的日子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革命人民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已经进一步展开，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则在作最后的顽抗。周扬在他公开发表的报告里，公然继续篡改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表示他决心抗拒到底。

同志们请看：他们是多么顽固地抵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啊！他们对无产阶级左派是抱着多么刻骨的仇恨啊！革命的火焰要烧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就死也不肯后退了！他们就要动员黑线、黑店的所有力量反扑过来了！

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毛泽东文艺路线，是红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斗争，把文化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挖进周扬一伙的老巢。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他们内部不同集团之间尽管会发生各种争吵和排斥，但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立场。“批判”胡风的周扬又采用了胡风的恶毒语言，是他们本来就立场一致的缘故。周扬一伙用一打一拉、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相互吹捧等等卑劣手段，把一批叛徒，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极端个人主义者，都收罗进来，安插到各种岗位上去，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们还竭力用种种方法，使青年中毒，变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罪恶地把一批青年作者拖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这条黑线控制了文化界，控制了各个协会，又伸展到各地，用所谓“会员”制度和重重迭迭的“协会”组

织，养了一批资产阶级作家，排斥打击工农兵，搞了大大小小一批“裴多菲俱乐部”。这条黑线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今天，我们一定要砸烂他们一切“裴多菲俱乐部”，捣毁他们修正主义的阎王殿！我们一定要把所有文艺单位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彻底夺过来！要把那些腐朽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封建关系，坚决地加以摧毁！

周扬不是曾经自封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由于周扬窃踞了党在文化方面的领导岗位，并利用党阀兼学阀的地位，把自己装成党在文艺方面的代表，不断吹嘘自己，吓唬别人，造成了这种假象。事物是作为过程而展开的，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常常需要一个观察的过程，需要一段让隐藏着的本质充分暴露出来的时间。这并不奇怪。这种情况，过去有，今后还可能发生。然而，当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大人物”的真面目暴露之后，回过头一看他们的历史，便会从庞大的假象中发现渺小的本质。周扬公开的文章和内部讲话，只要仔细一查，充满反动的谬论，错误百出，一戳就破。至于周扬自己的所谓“文艺理论”，不过是鸡零狗碎地从洋书中抄一些句子罢了。有什么了不起呢？

周扬不是吹嘘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吗？其实，在延安的时候，他同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等托派分子、叛徒、反党分子是一路货色。周扬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分子。三十年代，周扬是王明路线的执行人，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反对者。四十年代初在延安，他仍旧顽强地宣告“在美学上，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他到了革命根据地，却极端厌恶革命根据地。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反党杂文《文学与生活漫谈》，诬蔑和攻击“延安也自有它一个圈子，它的一套。都穿同样的制服，拿相差不多的津贴，……你在路上走，会从前后左右到处听得见挂在人们嘴上的老一套的革命术语。多么的千篇一律，丝毫没有变化啊！”他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反革命语言，攻击延安“太窄狭”，“太呆板”，“容不下自己”，狂妄之极地要求“延安也决不能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一套，而必须力求改进，使自己成为更广阔，更包罗万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九日）。这是在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在全中国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写出来的话啊！这样恶毒，同王实味的腔调有什么两样！一到无产阶级掌权的地方，周扬的资产阶级本性就爆发成仇恨的反党叫嚣了！“包罗万

有”，就是要把牛鬼蛇神也“包罗”进来！果然，在周扬这三篇反党杂文带头之下，冒出了“包罗”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在内的一批反革命的奇文。周扬这种反动立场和思想，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尖锐批评。但是，他始终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死也不肯同工农兵结合。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屡教不改，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进一步发展为全面的修正主义路线。

周扬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他之所以能长期蒙蔽一些人，同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有很大关系。要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够混下去。阴一面，阳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词句，贩的是修正主义黑货，在不利时退却，在有利时进攻，用假检讨来躲藏，用真进攻来反扑，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他们的一整套策略。识别这种两面派，要看他在重大关键时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时的政治立场，不能相信那些顺风转向的表面文章。揭露这种两面派，要靠群众运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不就烧掉了周扬的伪装，暴露出他丑恶的灵魂了吗？

揭发出周扬这条黑线，文艺界就万事大吉了吗？也不是。揭发出来，并不等于挖掉，更不等于肃清影响；挖掉了这条黑线还会有今后的黑线，还得再斗争。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总是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到文艺上来的。战斗的路还很长。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向自己提出新的更高的斗争任务，决不能因为一个战役的胜利就麻痹起来，陶醉起来。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种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但胜利必将属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善于学习的、团结群众的、革命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实践、认识、再实

践、再认识”，只要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认真去做，善于总结经验，使我们的认识跟着客观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就能练出一身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真本事。被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洗掉的，是一小撮旧世界的残渣余孽，是剥削阶级遗留下的各种腐朽制度和精神枷锁。中国人民将空前巩固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迈着革命的大步，朝气蓬勃地去创造一个红通通的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①《清宫秘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影片。一九五〇年三月开始在北京放映。它一面无耻地宣扬屈膝投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奴才思想，美化光绪皇帝和地主阶级中的保皇党，疯狂地叫嚣要依靠“洋人”打进来“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一面狂热地诬蔑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是“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拳匪”，极尽其丑化之能事。这个影片同美帝国主义一个腔调，完全适合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完全适合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需要，而同毛泽东同志《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相对抗。可是这部卖国主义电影出来后，由于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鼓吹，不但没有被批判，反而被捧成是“爱国主义”影片。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竭力阻挠对这个影片的批判。他们实际上“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他们用以观察问题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们是真正的“保皇党”，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周恩来对各地到中南海请愿的群众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凌晨三时，周总理在（全国中等学校革命教工联战斗总部）工作人员、（首都战斗团）部分战士与首都革命造反者到中南海揪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型代表人物——陶铸时的讲话

你们提出的和没有提出的比如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等这些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确实某些方面，一些时候，说了一些错话。作了一些错事，写了一些坏文章，犯了原则错误。

但是我们应当告诉你们。这些同志的错误是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犯的。而提出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而不是刚才提出的这些同志，对于他们的问题，我们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作过结论。但是有错误还得检查。有的作过检查，有的正在准备作检查。必须保证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因为这些同志主持一定的工作。

问题在于我们进行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一定要辨明方向。不要把方向搞错了。你们不要把矛头不指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指向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同志。也不指向反党集团。比如现在斗争的彭、陆、罗、杨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围绕这个集团的比如经济事务方面的薄一波。而不是余秋里；在党的工作上安子文同彭真一样。有反党罪行。斗争的矛头一定要对准。一定要把批判反党罪行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深刻地批判主要人物。肃清他们的影响。

你们要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你们要批判陶铸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都是对的。但是你积极要到中南海揪他们。现在党中央、毛主席规定不要揪他们。他们的问题我们还要在党中央内部批评的。有些公开的材料。你们可以进行批判。不要硬去揪。我告诉你们。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也在这里么。不同意你们这个办法。

（以上材料系中组部只争朝夕兵团根据“全国中等学校革命教工联合战斗总部”记录整理。仅供参考）

（来源：中组部（只争朝夕）兵团 一九六七年元月九日

中国科学院 计划局 政策研究室 革命造反派翻印 一九六七年元月九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文章：《“孔子讨论会”是牛鬼蛇神向党进攻的黑会》

《人民日报》编者按：毛主席在一九四〇年指出：“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把孔子说成是什么“圣人”，一直用反动的孔子思想来欺骗和

愚弄劳动人民，以维持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孔子思想成为压在劳动人民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

全国解放以后，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和他们在革命阵营里的代理人，为了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千方百计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维护和散布封建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我们的文化阵地。他们还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结合起来，用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毒害劳动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之流，伙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召开的“孔子讨论会”，公开地鼓吹“尊孔复古”，便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一大罪行。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绝不能有为剥削阶级效劳的孔子思想以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立身之地。不把它们连根拔除，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能建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孔老二这具封建僵尸，彻底铲除反动透顶的孔子思想，是我们一项重要任务。一批红卫兵小将们当了大破孔子思想的急先锋，他们在广大工农兵密切配合下，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斗倒斗垮斗臭，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

*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怀着保卫毛主席，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决心，到山东曲阜，大造封建主义老巢孔家店的反。孔老是反动透顶的儒家思想的鼻祖，阶级敌人总想利用“复古尊孔”来搞反革命复辟。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了。毛主席在这次会上又一次向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专家”、“权威”，经过周密策划，以纪念孔子逝世二千四百四十年为名，在山东开了一个“孔子讨论会”。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革命精神进行反攻的大黑会，是对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的大黑会。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解放十几年来，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为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一刻也没有停止制造舆论。“孔子讨论会”就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公开猖狂地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大集会。

这个会名义上由山东历史学会和山东历史研究所发起召开，实际上，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是它的后台老板。在这次会上，刘导生、余修、冯友兰、吕振羽、李景春、金景芳、高赞非等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反动“专家”、“权威”，摇旗呐喊，大放毒箭，恶云毒雾一时广为弥漫。会后，这些坏家伙又到曲阜“朝圣”，对着封建祖宗孔老二的偶像顶礼膜拜，演出了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尊孔”丑剧。

在“孔子讨论会”上，资产阶级右派大放厥词，极力抬高孔老二这具封建僵尸，美化这个封建祖宗，把他捧上了天。他们胡诌什么“孔子是古代世界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绝无溢美”，“‘伟大’二字，完全可以加到孔子身上”。说什么孔子的“理论”“一直在哺育我们伟大民族和伟大人民，鼓舞他们在黑暗统治中，为坚持‘正义’而进行不屈的斗争”。说什么“人类的幸福，关系于孔子的一言半语”。他们还胡说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好像一条红线似的贯串在孔夫子一生的言论中”，孔子的思想“正是马列主义的精神”了。说什么“孔子若干理论，在今日，犹射异彩”。他们妄图把这个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用来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最反动的孔子思想，又继续压到劳动人民头上，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

参加“孔子讨论会”的牛鬼蛇神，这样煞费心地往孔老二这具封建僵尸脸上贴金，其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

林彪同志指出：“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但是，他们这批牛鬼蛇神却妄图以反动的封建理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他们说什么“基本上人们长期都以孔子所编著的书籍为经典……事实上，人们已经有了统一的中心，从此，大家彼此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生活习惯，这对于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团结、统一的关系，该有多么重

大呢？”并说“孔子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代表，成了统一中国民族思想的重心”。很明白，他们竭力诋毁毛泽东思想，妄图用孔子的思想来代替毛泽东思想，这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命根子。我们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造他的反，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参加“孔子讨论会”的牛鬼蛇神还大肆鼓吹什么“仁政”、“德治”，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公开煽动反革命复辟。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什么“仁者爱人”，说什么孔子的“仁”“是以全民为对象”。宣扬什么“孔子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球上就不会有什么斗争了。”什么“人与人彼此相安，尔不虞，我不诈，相交以恕，彼此相爱，互相拥抱”。

毛主席早就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至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用毛主席的话照一照那些牛鬼蛇神的嘴脸，就可以看出他们所鼓吹的“仁政”“德治”，就是要混淆阶级界限，调和阶级矛盾。他们的滥调不过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翻版。

在这次会上，牛鬼蛇神们明目张胆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仁”，胡说无产阶级专政“已有意无意间侵犯了他人的生存”。这些资产阶级右派梦想以“仁”来瓦解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办不到的。这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们对于阶级敌人决不能施“仁政”，就是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大肆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参加“孔子讨论会”的牛鬼蛇神的又一罪状。他们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穿一条裤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鼓气、翻案。他们骂我们党“自高自大”，“不懂装懂，强不知以为知”，攻击我们党“茫茫无知就胡乱发号施令”，是“乱讲蛮干”。他们恶毒地诅咒我们“招来更大的错误，遭到更大的恶果”，是“不可以长久下去的”。他们咬牙

切齿恨不得我们“倾败其室”，“泣血涟如”。然而他们这种叫嚣不过是恶犬吠日，无济于事。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获得的伟大成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在伟大的三面红旗面前，全国人民齐声欢呼，一切反动派只能向隅而泣。

这些牛鬼蛇神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演出这幕“尊孔”丑剧并不奇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二千多年来，反动的剥削阶级总是利用孔子的思想来为他们服务。他们掌权的时候，就用孔子的思想来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在他们被推翻以后，又要抬出孔子这具封建僵尸，企图借助它在社会上的影响，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准备。远的不说，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做皇帝时，就掀起过一股“复古尊孔”的逆流。反动军阀张勋在拥清朝皇帝复辟之前，也肉麻地吹捧孔子。人民公敌蒋介石，为镇压革命运动，巩固其反动统治，更是把孔子奉为他的“祖师爷”。直到一九六〇年，蒋介石还亲自出场，在台湾演出成立“孔孟学会”的丑剧，叫嚣这是对中国人民进行“全面的思想战，文化战，主义战”，“其意义非常重大”。这一切都说明，孔子思想，孔老二这具僵尸究竟对谁有利，为谁所欢迎；也说明一切形式的“复古尊孔”究竟是什么反动货色。

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我们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对一切毒草进行无情的批判。我们要打倒孔子思想，打倒孔老二这具封建僵尸，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复古尊孔”，粉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反革命复辟企图。我们要大立毛泽东思想。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不管他是人是鬼，不管他地位多高，资格多老，我们都坚决和他斗争，打倒他，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让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文章《牛鬼蛇神在“孔子讨论会”上放了些什么毒》

在周扬策划下召开的“孔子讨论会”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李景春、冯友兰、吕振羽、金景芳、高赞非、刘节、金兆梓等人嚣张得发了

狂，放出了大量的毒草，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为了让大家认清他们的反革命狰狞面目，现在把他们的反动谬论综合摘出一小部分来示众。

一、狂热地歌颂、美化孔老二，恶毒地污蔑、攻击毛泽东思想。

“‘伟大’二字，完全可以加到孔子身上。”

“孔子是古代世界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绝无溢美，而孔子若干理论，在今日，犹射异彩，亦非偶然。”

“孔子实为至圣至贤的哲学家，人类的幸福，关系于孔子的一言半语。”

“为什么世界上独有中国这样大？它是怎样形成的？……我认为孔子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试想，二千年之久，几万里之内，基本上人们长期都以孔子所编著的书籍为经典，这是小事情吗？事实上，人们已经有了统一的中心，从此，大家彼此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生活习惯，这对于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团结、统一的关系，该有多么重大呢？”

“孔子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代表，成了统一中国民族思想的重心。‘至圣先师’的称号，不但长期存在于祀典的牌位上，也长期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和口中。”

按：他们歌颂孔老二，美化孔老二，简直达到了极其狂热的程度。他们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就是要树立孔老二的绝对权威，妄图用孔老二的思想来统一七亿人民的思想、语言、情感和习惯。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诋毁、攻击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搞反革命复辟。这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我们一定要彻底打倒孔子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二、大肆宣扬孔老二的“仁政”“德治”，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公开煽动反革命复辟。

“政治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呢？是行‘仁政’，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有耻且格’。”

“克己是什么呢？……复礼，当然是要以‘平等’待人，要尊重别人，决不是一味的压迫别人，决不是摧残别人，决不是进行吃人的行动。”

“……这‘仁’字的意义，决不单是‘爱人’，而是搞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时随事都会想到他人。这不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不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吗？人人能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无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所说的‘人’，……意思就是‘别 g è@①’，或者是‘人家’。例如我们说：‘人家苏联，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忠恕之道’的消极方面就是说：你自己不愿人家怎样待你，你也不要那样待人家。……‘忠恕之道’的积极方面就是说：你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你也就那样待人家。”

“历史车轮越往前进，并立的国家，即敌对的方面就越少，这应该是进步的现象。反之，并立的国家越多，也即敌对的方面越多，战争也越多，天下也越乱，这应该是退化的现象。”

按：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给人民以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因此他们辱骂我们“不仁”，他们要我们对反动派实行“仁政”，就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就要亡党亡国，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

三、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辱骂党的领导。

“盲目乱干，这完全是由于贪得无厌的欲望所驱使；从欲就会把事作坏。……不顾具体环境，单凭主观主义，是不能把事作好的，如果还要坚持错误，让个人主义的贪心不受约束地发展，那就愈陷愈深，招来更大的错误，尝到更大的恶果。”

“偏执自信，不纳人言，只知直线的发展，不量力，不审势，不顾环境，不管条件，这样过刚必折，就造成栋挠，造成倾败其室的恶果。”

“要发展社会的意识形态必须先解决吃饭、穿衣等等社会问题。社会上的吃饭问题，饮食问题，是有其重要性，决不可等闲视之的。”

“自高自大的人自称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则全知，这样的人并不见得真正全知全能，恰恰相反，他的真知灼见可能很少。”

“肯定的方面是毁灭的，有成就有毁，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从霜到坚冰，正是这种发展。因为在坚冰以后，春暖花开，那时春光明媚，春水溶溶，就到了坚冰溶化的时候了。”

“若大臣仕于淫乱之期，以直言谏君致死，无论当权的奴隶主阶级或当权的封建领主阶级都以为是好事，所谓‘忠臣不怕死，怕死岂为忠’是也。”

按：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却骂我们是“盲目乱干”，“造成倾败其室的

恶果”。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们越是攻击，我们越是要把三面红旗更高高地举起。

四、妄图把孔老二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打扮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我以为孔夫子的世界观还不但是唯物主义，似乎还有点辩证唯物主义的味儿。这味儿简直还好像一条红线似的贯串在孔夫子一生的言论中。”

“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这是什么观点呢？我看它不是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也不能说是什么第三种观点，最恰当的称呼，应该是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

“儒家对于某些高深的玄理，是不轻于谈论的，这话虽非孔子说，但自是说出孔学的优点，和我们所谈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没有什么很大抵触的。”

“据我看（孔子的）‘切问近思’正是马列主义的精神。”

“孔孟这些思想，现在已被批判吸收，重新塑造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刘少奇同志在他的卓越理论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非常杰出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按：他们居然把孔老二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说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他们竟然还要共产党员将它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五、鼓吹人与人“彼此相爱，互相拥抱”，妄图模糊阶级界限，抹煞阶级斗争。

“事实上，孔子的‘仁’……是以全民为对象。而其本质特点，尤在于‘仁民’。”

“‘仁’就是要人去‘爱人’。”

“‘仁’的最普通的意义是‘爱人’，是承认人的生存权利。”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说要自己好，也要别人好。”

“‘仁’是‘相人偶’，人与人彼此相安，尔不虞，我不诈，相交以恕，彼此相爱，互相拥抱。”

“孔子的‘爱人’，在主观愿望上是爱统治阶级，在客观效果上，也‘爱’了‘小人’。”

“‘仁者爱人’，这是孔子对‘仁’具有最高概括性的提法。为要‘爱人’，就必须消极的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不能说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社会不需要‘仁’。”

“把古代的历史事实样样都纠缠在阶级观点上去，也是不容易搞得通的。”

“有些人偏要把‘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两句话抽出来，加以曲解，说孔子轻视劳动人民，把好好一段美好的意见白白糟踏掉了。”

按：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他们之间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绝不可能“彼此相爱”“互相拥抱”。在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些牛鬼蛇神公开宣扬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互相拥抱”，其根本目的是妄图模糊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他们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唱的不正是同一个调子吗？

（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供稿）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胡乔木关于电影《清宫秘史》问题的检查

〔按：早在 1950 年，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大搏斗！由于刘少奇、陆定一、周扬、胡乔木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使《清宫秘史》至今没有得到批判。刘少奇、胡乔木等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下面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检查中有关《清宫秘史》问题的部分。〕

“我在管理《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曾经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示。1950 年，毛主席指出，美化八国联军，光绪皇帝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应当批判。这本来应当成为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第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我在事前接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刘少奇

说它（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的反动观点，不让批判这部电影。”

（二）一九六七年三月重点批判刘少奇包庇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 * *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朝霞照亮了东方的大地，灾难深重的祖国像巨人一样地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无数次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全国的解放。

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洗荡着中国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动统治阶级并不甘心死亡，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继续进行着疯狂的大反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尤其复杂，充斥于文化阵地上的反动影片、戏剧、歌曲、书刊，是配合反动统治阶级向革命人民进行大反扑的重要宣传工具。一九五〇年还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反动文化的大反扑面前，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还是同大肆泛滥的反动文化妥协投降？每一个革命同志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和考验。

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胆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

××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重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文化思想战线上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斗争。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另一次重大的斗争，即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同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曾经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批判了党内的一些“大人物”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开火，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并且再一次地提出了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问题。毛主席就两个青年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文章指出：

“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

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毛主席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之后，以陆定一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仍然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四年到现在，十二年过去了，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还是一直没有得到批判。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欠帐总是要还的。解放以后一直没有被批判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一定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对抗毛主席指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一定要在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他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受到彻底的清算。革命群众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这是一家反动的电影公司，它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国魂》，就是借文天祥的幽灵，来为垂死的蒋家王朝招魂。它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清宫秘史》。作者姚克，是一个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文人。他曾经编辑过反动的《天下》月刊，反对中国革命，积极为英、

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效劳。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断写点反动的、黄色的剧本。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条小走狗。全国解放前夕，逃亡香港。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人写出一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丝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衣的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和某几个副部长，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对这样一部极其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如此垂青，把它誉之为“爱国主义”的影片，积极充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

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歌颂为“爱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完全是一副极端可耻的恐帝、崇帝、亲帝的奴才面孔。

影片对所谓英、美、德、俄、日、法、意、奥“八国联军”的帝国主义侵略害怕得要死，在影片中大肆宣扬恐帝思想。叫嚷什么“中国从甲午之战以后，财力亏损，兵力单薄，……众寡不敌，强弱悬殊”，“外衅必不可开”。大臣许景澄被帝国主义吓得放声大哭。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野兽面前，革命的人民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但是在电影的作者及其歌颂者们看来，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除了举手投降之外，没有别的出路。——这是赤裸裸的民族投降主义，十足的亡国奴论调！

与此同时，影片又大肆宣扬崇帝、亲帝思想，极力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公开贩卖卖国主义理论。作者公然通过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之口，欢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说什么“各国一定会原谅皇上”，“我相信各

国非但不会伤害皇上，还会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大臣孙家鼐也声称：“东西各国的使臣，也都向着皇上。”如果对照一下当时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反革命宣传，就可以看出，影片所宣扬的论调同帝国主义所宣扬的论调简直是同出一辙。例如沙皇俄国就欺骗国内人民说：它“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只是在平定暴乱，镇压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列宁早在一九〇〇年写的第一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国的战争》中，就无情地驳斥了侵略者的这种反革命论调。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宣扬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原来他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就是影片里所描写的光绪皇帝等人那种不惜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的所谓“爱国主义”。他们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还提倡人们去学习那种为了恢复和巩固剥削阶级对人民的统治，而不惜当卖国贼的所谓“爱国主义”，其用心何其毒也！

毛主席教导我们：“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1）〕同样，对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倡的所谓“爱国主义”（即彻底的卖国主义），也是我们所必须坚决反对的。

影片宣扬的欢迎帝国主义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卖国主义理论，同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是一路货色。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在一九四九年曾经操着当年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同一个腔调，在《白皮书》里大谈什么美国如何“关心”中国，把侵略说成“友谊”。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中，早已对这种反革命的强盗逻辑，给予了严厉的驳斥。毛主席指出：将侵略说成“友谊”，是“美国老爷的逻辑”。但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帝国主义害怕得要命。他们幻想同帝国主义妥协，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谅解”和“帮助”，他们对毛主席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极端不满，他们大肆吹捧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

实际上是公开抗拒毛主席对艾奇逊《白皮书》的批判，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猖狂进攻。

十分明显，在全国解放前夕，反动的电影公司和反动文人所以要制作这种宣扬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影片，就是要通过电影制造反动舆论，公开鼓吹依靠美帝国主义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为处于崩溃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出谋划策。影片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迎合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效劳，企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口头挂着“反帝”招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这样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不正是暴露了他们假反帝、真投降的真面目吗？他们爱的是什么国？爱的是帝国主义的国，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而不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祖国。他们所歌颂的“爱国主义”，正是全国革命人民所要打倒的卖国主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这决不是偶然的。他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面前吓倒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绝望，在党内积极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号召我们丢掉幻想，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他却大肆散布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和平幻想，公然在报上发表文章，感谢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所谓“帮助”，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和平”，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还欺骗人民，说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转变”，“一切政治问题要和平解决”。毛主席说：敌人在磨刀了，我们也要磨刀。他却要人民交出自己手里的武装。他大肆宣扬卖国主义理论，认贼作父，心甘情愿地要去当帝国主义的奴才，说什么：“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买办就是买办，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什么“红色买办”！全是骗人的鬼话。在这种早就想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卑鄙无耻的奴才思想的支配下，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成了最适合他们口味的影片。因为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所宣扬的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

纲”的理论，恰恰反映了他们热衷于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卖国心理！（(1)(2)）

“心有灵犀一点通”。影片里光绪皇帝望湖兴叹的一句诗，正好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光绪、珍妃之流心心相印的写照。在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六十多年以前的地主、资产阶级发生了共鸣，这就是他们要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2)〕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当时，几乎整个中国的北方，无论是城市或者乡村，到处都有义和团在进行革命活动。在敌人统治最严密的政治中心北京城内，义和团就设坛八百余所，景山后面的宫墙下，每天都有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在操练。

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一开始就在大街小巷，贴出各种标语，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决心：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有的吓得躲进棺材，雇人吹打着，企图逃出城外。

一九〇〇年的六月，义和团的革命活动达到高潮，京郊各县的义和团三五十一人一队，不分昼夜，一天数十起地涌进北京城内，守卫城门口的士兵，向他们致敬礼，为他们喝道让路。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铺里，炉火熊

熊，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赶制各种刀枪。

当帝国主义侵略军疯狂镇压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的革命群众用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同以洋枪、洋炮武装的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搏斗，显示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革命战斗精神。在著名的“廊坊阻击战”中，英国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的一千五百多人的联军，被义和团“直逼火车，持矛猛触”，死伤将近一半，最后狼狈地逃回天津。后来西摩尔胆战心惊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义和团同侵略军进行肉搏战，在火车站一仗，就把一支二千人的俄国侵略军，打死打伤了五百多名。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此次天津华军与西兵苦战月余，西人咸谓如此死战，实为从来所未见”。在杨村的战斗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被义和团战士打得落花流水。帝国主义侵略军一听到义和团的军号声，就惶恐万状，惊呼：“闻此声，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

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惊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

“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的欢，一个心，杀洋官。”

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瘵，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自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头子瓦德西为此向德皇威廉报告说：“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不应忘去者，……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

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热情歌颂的。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中，曾经一再高度评价和赞扬义和团运动的英雄业绩，他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毛主席指出：义和团战争是反抗压迫者的义战，它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历次的革命战争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3）〕；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4）〕“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5）〕

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歌颂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对义和团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影片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描写为一种野蛮的骚乱。并且尽量地丑化义和团，恶毒地攻击义和团是什么“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乌合之众”，是什么专搞“邪术妖法”的“无知愚民”。

影片及其歌颂者对义和团的这种恶毒污蔑同帝国主义者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当时美帝国主义头目艾奇逊就在《白皮书》中咒骂义和团是“中国的排外骚动”，是“拳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御用学者也大肆攻击义和团是“无知迷信与暴民歇斯底里的产物”，是“没有理性的行动”，是杀人放火的“拳匪”。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真正的杀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据帝国主义侵略军头子瓦德西自供：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破坏文明，无恶不作。帝国主义军队在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上自宫廷王府，下至民间百姓的财物均被洗劫一空。“曲槛临湖面面开，内官惊看骆驼来。”封建皇帝的宝库颐和园所贮藏的历朝文

物，被侵略者用骆驼运至天津，累月不尽。中国几千年保留下来的许多文物，其中包括《永乐大典》，都被帝国主义烧抢殆尽。瓦德西还供称：“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至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义和团的屠杀和镇压，更是惨无人道。

列宁曾经怀着满腔的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杀人放火的罪行。他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6）〕而影片及其歌颂者却颠倒黑白，为虎作伥，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化为文明的使者，把坚决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英勇不屈的义和团污蔑为“野蛮的骚乱”。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的哲学。

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义和团的战斗口号是：“杀洋人，灭赃官。”当时流传的歌谣说：“砍洋头，杀官兽，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先夺洋鬼头，后把贪官揍”。这些都是他们提出的朴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恨之入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间，清朝的在京衙门、亲贵王公的住宅，大多数都被义和团成员把守监视。义和团时常抓住一些罪恶昭著的官吏，特别是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官吏，强迫他们到拳坛去叩头焚表，罪大恶极的官吏就被杀掉。

但是，影片却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清朝大臣赵舒翘之口说：“请老佛爷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慈禧太后听了，欣然采纳。就这样把义和团污蔑为慈禧太后的一党，可谓恶毒之极。

在一个短时间内，清朝统治者对义和团采取了欺骗、软化的政策，这个政策一度发生了作用，义和团的一部分成员受了蒙蔽，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有些组织提出过“扶清灭洋”的口号。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人民大众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由感性认识向理

性认识发展的。“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7）〕所以，绝不可以因为当时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就把义和团污蔑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如前所述，义和团在反帝的同时，“抗清”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就在“扶清灭洋”的口号出现之后，义和团的首领朱红灯还制定“攻打北京”的计划，始终坚持了反封建的斗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大肆污蔑和攻击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完全是出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他们对义和团革命群众的污蔑和攻击，反映了阶级敌人对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刻骨仇恨，反映了阶级敌人对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刻骨仇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唱着同一个调子，为一部反对中国革命，侮辱革命群众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拍手叫好。他们这样做，不折不扣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使我们更加懂得了：在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为什么要勾结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他为什么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抱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抱什么态度的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根本问题上，早已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全国解放以后，这种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怎样对待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这个分歧的一个爆发点，

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锋。在这次交锋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个电影的评价问题上，各自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赞美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反动影片，其目的是为了请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企图借用它们的名字、口号和服装，在中国宣扬资本主义。

影片歌颂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是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人物和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开始分化出来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革命风暴和亡国大祸的威胁下，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办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戊戌变法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网罗，在解放思想上起了一些启蒙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来是承认的。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决不是无原则地对戊戌变法运动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歌功颂德。戊戌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本身就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他们改良主义的目的，从来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人民和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所要改变的只是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而不是旧事物的质。他们所幻想的只是以渐变的形式，使地主经济逶迤曲折地改变为半地主、半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并企图以此来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所以，改良主义即使在当时也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

十九世纪的末叶，中国的社会改革已经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即企图用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的办法通向资本主义。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一条虚伪的、行不通的反动的道路。因为中国没有西欧和日本那样维新改良的历史条件。当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正在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却恰好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他们幻想投靠帝国主义，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实现他们维新变法的主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加速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而根本谈不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另一条道路是广大群众起来，用武装斗争的办法进行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走的都是这条道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的革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我自横刀向天笑”。戊戌变法运动最悲壮的一幕是一个勇敢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之死，他的死宣告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夭折，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而在半个世纪以后，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却还在鼓吹早已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片极力宣扬“如果要中国富强，必须要维新变法！”还通过光绪皇帝之口，大肆赞扬维新变法，把改良主义吹得天花乱坠，什么“明治维新”，什么“变法上谕”，什么“中国这样改革起来，不到三十年，就可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啦！”等等。这是疯狂地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呼喊，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呼喊，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呼喊，革命人民是决不允许的！

影片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尤其光绪皇帝，捧到了九天之上。说他“为了国家，为了百姓”，“用尽了心机，受尽了闲气”，“只要国事有办法”“身体倒不在乎”。

特别恶毒的是，影片在大肆吹捧帝王将相和美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丑化劳动人民，把群众污蔑为“群氓”。在电影的末场，作者通过被歪曲、被丑化了的村民、村妇的形象，大肆美化光绪皇帝，称颂光绪皇帝是个“好皇帝”，“他是帮我们老百姓的”，“我们都惦着皇上呢！”村民、村妇把鸡蛋、饽饽“献给”光绪皇帝吃。临别时，“民众夹道跪送”。影片还污蔑说什么“老百姓是最听话的，也是最容易满足的”。难道人民群众就是这样恭顺服从、卑贱丑陋的群氓吗？绝对不许污蔑劳动人民！毛主席教导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此歌颂这部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恰恰暴露了他们彻头彻尾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当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获得革命胜利之后，当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亲自为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作了总结，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宣告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

明,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 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 一齐破了产”之后,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竟然还把这部大肆歌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作为“爱国主义”影片, 不加批判地在各地大量放映,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 先进的中国人, 经过千辛万苦, 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 求进步的中国人认为, “要救国, 只有维新, 要维新, 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 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但是,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 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 但是行不通, 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 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 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 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 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 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外国有过的, 中国不能有, 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9)〕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视历史事实, 无视毛主席的警告, 仍然借着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 美化西方资产阶级文明, 美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美化资产阶级共和国, 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 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 妄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所以全力歌颂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就是因为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影片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工具。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通过古人来赞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 并利用这部影片来迷惑群众, 来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 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使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

围绕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 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 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国究竟往哪里去？胜利的果实究竟归于谁？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所浇灌、生长起来的桃子究竟由哪个阶级来摘？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斗争的焦点。

资产阶级要从人民的手中争夺胜利的果实，他们要摘桃子。他们要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表资产阶级来摘桃子的人物。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解放以后仍旧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大唱反调，极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0）〕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

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唱的颂歌，就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义的辩护士们，也都望尘莫及。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彻底粉碎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

“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穷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穷追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堡垒，让毛泽东思想占据一切阵地。正像林彪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中国，让她永远永远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万岁！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第五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清华大学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某人亲自掌握的一个典型。本刊调查员，关于清华大学工作组对待干部问题的情况调查，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煞费苦心地把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他们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指使工作组，一方面打击广大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一方面打击广大干部，把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打成“黑帮”。这一切，都是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的，都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特别有必要着重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在干部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实行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路线，就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批判他们的。二十三条指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贯串着这个精神。

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总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顽固在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广大群众，打击广大干部，保护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的当权派，最害怕革命群众，最害怕革命干部，特别最害怕革命干部同革命群众相结合。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一方面挑动群众斗干部，一方面挑动干部整群众，企图一箭双雕，既整了革命群众，又整了革命干部。他们企图使干部不能站出来革命，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严重对立。因此，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企图把对干部“打倒一切”的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他们装出关心干部的样子，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挑拨干部同革命小将的关系，挑拨干部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他们妄图破坏革命的“三结合”，排斥真正的革命干部，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他们自己也梳装打扮起来，千方百计地妄图钻进“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这

是一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广大的群众和广大的干部，都必须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干部，许多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些同志要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身心地投入这个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样，才能同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在夺权斗争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又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第五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三）一九六七年四月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上海《解放日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开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斗臭！》

新的战斗号角响了！

《红旗》杂志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三篇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某人，如何疯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猖狂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滔天罪行；揭露了他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

把这样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揪出来示众，是全国革命人民的大喜事！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我们热烈欢呼这一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一九五〇年围绕反动电影《清宫秘史》而展开的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对一部影片的评价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指示，把彻底的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吹捧成是“爱国主义”的影片，拚命抵制对它的批判，就是为了美化帝国主义，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攻击革命群众运动，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不仅如此，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在抗日战争前后犯了一系列严重罪行以外，建国十七年来，还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内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欠下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一大笔债。现在，是我们向他算总账的时候了。我们不但要彻底批判《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而且更要彻底批判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好地肃清各个领域里的修正主义流毒，彻底粉碎阶级敌人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阴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一场从思想上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大革命。当前开展的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标志着这场思想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阶段。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深刻地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被他们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还要从思想上展开夺权斗争。我们必须通过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把资产阶级思想批透、批臭。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所掌握的大权才是牢不可破的、不可动摇的。

毛主席说：“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

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进行着尖锐激烈的斗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现在，我们要进一步从思想上彻底肃清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场大决战，我们一定要在这场大决战中夺取完全的、彻底的胜利。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正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胜利地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这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提出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不会分散力量、妨碍夺权斗争呢？不会！恰恰相反，通过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把他的罪行充分暴露出来，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矛头对准这一小撮开火，从而在共同的斗争中，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更好地奠定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也正因为彻底批判了这一小撮，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划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犯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界限，划清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同执行这条反动路线的人的界限，从而促使更多的干部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大大推动革命的“三结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广泛、空前深入的群众运动，自始至终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现在，在这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同样要发动最广大的革命群众参加批判，参加斗争。我们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发动总攻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大立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这样一个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最好的大学校。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阶段。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器，彻底批判和肃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彻底粉碎这一小撮的猖狂进攻。我们坚

信，通过这一场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战无不胜的、光芒万丈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必将大大普及！亿万革命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必将大大提高！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的文章：《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王洪文）

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吹响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号角。

戚本禹同志揭发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话，充分暴露了他那一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丑恶嘴脸。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感到舒服”，这真是混帐逻辑，把我们工人阶级的肺都气炸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十足的奴才相！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最关心伟大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最关心保证我国永不变颜色。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继续招摇撞骗，要坚决把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拉下马，让他靠边站，把他彻底批臭！

我们要揭露他背着毛主席盗用职权，网罗党羽，搞全国范围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把他在上海的党羽，彻底斗倒，斗臭。

我们要彻底批臭他提出并全力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发他和他的党羽在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们要彻底揭露他几十年来的反动言行，揭他的老底，同他算总帐。特别要

清算他和他的党羽为上海反动资产阶级服务，迫害上海工人阶级的罪恶活动。

我们要彻底批判他的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夺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修养》，彻底清除它在上海的流毒。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我们认清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假革命、反革命本质，我们要更加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挑拨离间，大搞群众斗群众，我们就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他要保护他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党徒，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我们就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他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虚伪的处世哲学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来腐蚀我们，我们就坚决照毛主席的教导，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要发动一场人人动脑、人人动口、人人动笔的搞臭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群众性批判运动。

我们上海工人阶级最最崇拜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最热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党内头号资产阶级代理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彻底批倒他，彻底搞臭他，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凯歌声中，一个新的伟大战役开始了。

我国亿万革命群众，奋起千钧棒，以笔作刀枪，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总攻击，对他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所著的大毒草《修养》，展开了革命的大批判。

《红旗》杂志发表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打

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戚本禹同志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三篇文章，吹响了这次伟大战役的进军号。

早在去年五月，毛主席就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就必将给予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致命的打击，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推动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斗争，必将带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处在决战阶段。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着重批判他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彻底肃清它的流毒，把大批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革命干部解放出来。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从来是针锋相对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和十六条都明确指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大批革命干部打成“黑帮”、“反党分子”，竭力阻挡干部起来革命，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严重对立。这种情况，今天还在极大地妨碍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在这场伟大的批判斗争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干部，要勇敢地站出来革命。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干部，要立即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

权派划清界限，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一切要革命的干部，都要坚决支持广大革命群众，和他们一起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火力揭露和打击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革命的“三结合”，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形成的。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干部，是在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洪流中考验出来的。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斗、批、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十七年来，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在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扶植和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在关键时刻，这些牛鬼蛇神总要在他们的后台老板鼓动下，纷纷出笼，跳出来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而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骨干力量。一定要看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集中火力斗争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斩断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伸向各个领域的黑手；而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必将把各单位的斗、批、改提到更高的水平。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彻底清算十七年来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党内占据着统治地位。它象一条红线，贯穿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中。在这条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由来已久，从未间断。十七年来，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定地引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主席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适应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需要，同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妄图实现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就是这个人，为资本家剥削喝采，为富农经济叫好。就是这个人，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拚命鼓吹“四大自由”。就是这个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主张阶级调和。就是这个人，反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竭力鼓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就是这个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就是这个人，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内向无产阶级发动的猖狂进攻，鸣锣开道。这个人的野心，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要把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因此，彻底批判和清算十七年来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面前的一个战斗任务。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只有彻底批判和清算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在各个领域内的流毒，才能使广大革命群众懂得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必要性和艰巨性，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自觉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要深入批判他的欺人之谈的《修养》。这本书，是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对《修养》这本书的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修养》这本书，完全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本书，是要资产阶级“修养”，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本书，宣扬唯心主义，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这本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按照这本书，舒舒服服地关在小屋子里去“修身养性”，就只能是舒舒服服地演变成修正主义。这本书一版再版，

不仅流毒全党全国，甚至流毒世界，害人不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干部由于受了《修养》的骗，中了《修养》的毒，妨碍他们积极投身于革命的群众运动，盲目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受蒙蔽、受毒害的同志，不要再上《修养》这本书的当了。一定要全身心地投入群众运动的火热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对这本书的彻底批判，一定要联系自己的思想，触及灵魂的深处，大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粉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套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这是一场破私立公的革命，是用毛泽东思想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革命。只有打碎这个精神枷锁，才能轻装前进，真正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这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就是一场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群众运动。亿万群众在批判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过程中，在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散布的修正主义毒素的过程中，一定能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斗的武器，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编辑部文章：《批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红旗》杂志发表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三篇文章，吹响了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发起总攻击的战斗号角！一场埋葬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空前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兴起。

毛主席说：“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

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打着“红旗”反红旗，提出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妄图扭转中国革命的航向，千方百计地要把中国革命引向歧途。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他利用他所窃踞的党政要职，变本加厉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系列罪恶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篡党、篡政，夺无产阶级的权，专无产阶级的政。如果让他的阴谋得逞，那末，人民的江山就要改变颜色，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就会付之东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在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针锋相对地同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批判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掌稳了航船，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破浪前进！现在，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的流毒的决战时刻，已经来到了。这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大批判、大斗争。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大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大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大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和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中国的赫鲁晓夫，也是不打不倒的。我们必须穷追猛打，打他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

要彻底批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就必须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只有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才能使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才能使他们原形毕露，才能把他们长期以来所散布的大量毒素统统挖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才能肃清他们的流毒，铲除他们的影响，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

要搞好这场大批判，首先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纲，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它在各个领域内的恶劣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大破剥削阶级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大革命，是从思想上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大革命。当前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性的战役。

长期以来，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在文化领域的文、史、哲、经等各个部门，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和扶植了一伙人，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只有彻底摧垮中国修正主义的总后台，才能把这一批反动的家伙挖出来，才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历史使命。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制者。这条反动路线，一方面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另一方面，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只有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才能有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思想革命化，肃清反动路线在革命派内部的流毒，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只有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才能把受打击的大批干部解放出来，才能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唯一正确的干部路线，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在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斗争中，特别要批判他的修正主义代表作：《修养》。在一九六二年再版的这本书，是他篡党篡政的总纲领，是他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他炮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这本书，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

毒草。我们必须把它彻底批深，批透！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进行大批判的最强大最锐利的武器。在当前这场大批判、大斗争的群众运动中，我们必须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更新的高潮，把我国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毛泽东思想的万丈光芒，永远照耀全世界。

革命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少年，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让我们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倒，批臭！

（载《光明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是一个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党永不变质，保证我国永不变色的伟大政治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揭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出了他们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红旗》杂志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等三篇文章，吹响了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号角。一个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运动，正在全国全军广泛深入地展开。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一再推行投降资产阶级的路线。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就大肆宣扬活命哲学、叛徒哲学，指使某些被

捕的“共产党员”投降阶级敌人。以后，又把他们包庇下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让他们窃踞要位。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准备向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屈膝投降。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他就拚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他提出欢迎资本家剥削，发展资本主义。一九五〇年，他把卖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称之为“爱国主义”的；他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富农，反对变工队、互助组，反对发展集体经济，叫嚷“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发展资本主义，提倡“四大自由”。后来，他又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一九五六年，他迎合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大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二年，他大刮单干风，鼓吹什么“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时，大量印发他的《修养》。一九六四年，他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长期以来，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他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没收了他们的物资，没有也不可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力图复辟。他们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极力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内部，有些人也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蜕化变质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总之，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社会上有资产阶级，他们就会渗透到上层建筑中来，渗透到党和政权中来，形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不奇怪的，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总后台，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总司令。如果不把他揭露出来，让他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党和国家就要改变颜色，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象苏联那样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那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我们就要吃二遍苦，走回头路，就要大大推迟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进程。现在，我们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所代表的被推翻的阶级，决不会甘心自己的死亡。要夺回长期以来被他们所盘踞的一切阵地，肃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散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还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一定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透。

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我们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疯狂反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革命战士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一定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和广大的工农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革命干部一起，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诛笔伐，猛烈开火，坚决把他打倒！

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旗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揭露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滔天罪行，剥掉他的所谓“老革命”、“一贯正确”的画皮，彻底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他的修正主义代表作《修养》，把他不要革命，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宣扬资产阶级唯心哲学的种种谬论，批倒批臭，把他的反动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军在执行支左、支工、支农等项光荣任务中，要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所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要通过群众性的大批判，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形式的反扑，打垮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好权，掌好权，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全军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要把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要广泛搜集、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交给干部战士，使大家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自觉性。我们要紧密结合群众性的批判的斗争实践，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进一步推动部队的思想革命化，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过程，就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的过程。我们要通过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把毛泽东思想更深入地贯彻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使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全体指战员和全国革命人民的行动准则。这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永不变色的最根本的保证。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胜利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本报十三日刊登了上海市第六女中革命小将，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批判、大斗争中，实现了全校革命的大联合的消息。同时，转载了《文汇报》《再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的社论。这个消息和社论，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上海市第六女中的经验和《文汇报》的社论指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

命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当前革命斗争的大方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当前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主要障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把矛头直指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把这场斗争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共同的斗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是正确的，普遍适用的。

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制造群众与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他们在干部问题上，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包庇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阴谋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因此，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如果我们把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那就会放跑了真正的敌人，妨碍了革命的大联合，减弱和分散了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批判的火力。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必须指出，我们说的大联合，是革命的大联合，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联合，是在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共同斗争中的大联合；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守派组织的大杂烩。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参加保守派组织的群众，应当按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耐心地帮助他们。在控诉和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争取、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从而起来造保守派组织的反，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对于保守派组织中顽固坚持错误观点的极少数头头，则应当加以揭露、批判，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对“联动”那样的反动组织，应该坚决打击，彻底瓦解，对其首恶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当前，我们特别要牢记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

革命的大联合，必须旗帜鲜明，坚持斗争，具备条件，讲究方法。

旗帜鲜明，就是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必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批判的战斗武器，必须以坚定的革命左派作为大联合的领导核心。

坚持斗争，就是必须在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推进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具备条件，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占优势，并且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讲究方法，就是要大力提倡，认真引导，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愿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散革命群众组织，搞“合二而一”的大合并。

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和犯了错误的干部，都必须在这场大批判中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毒害，必须坚决支持革命派，向革命派学习，向革命派靠拢。如果对革命派抱着抵触和不满情绪，那就不但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甚至可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充当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批判的共同战斗中，紧密地联合起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大道上阔步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社论）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在当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的群众性的大批判中，着重批判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方面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另一方面对干部“打击一大片”，这都是为了“保护一小撮”。如果我们只是批判了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忽视了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不可能真正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深批透，就不可能真正贯彻对干部“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这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会极大地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妨碍革命的“三结合”，妨碍夺权斗争的胜利，妨碍“抓革命，促生产”，也就不可能最终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进行到底。

干革命，必须依靠广大群众。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要想取得胜利，要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非有在政治上比较成熟、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不可。经验还证明，在揭露和批判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广大革命干部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还要看到，不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可能做到对干部状况心中有数，就不知道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彻底批判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是把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结合起来的一个重要环节。

因此，干部问题是当前斗争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对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绝不是什么“转移目标”，而是正中目标；这个批判同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绝不是什么“毫不相干”，而是关系大得很。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把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咬革命派。现在，不是又有人趁我们党提出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大嚷什么“革命派是

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起家”的吗？不是又有人在胡说什么“我们执行了压制群众的反动路线，你们执行了打击干部的反动路线；我们保护了一小撮，你们打击了一大片，大家彼此彼此”吗？对于这些谬论，必须痛加驳斥！

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他们从来就是这样干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我们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锋芒所向。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强烈憎恨。他们从来就是狠狠地“打击一小撮”，从来就不会“保护一小撮”。在猛打猛冲的群众运动中，有时会出现某些过火的行动，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这和“打击一大片”以便“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绝对扣不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这条反动路线的批判，就是理直气壮！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推行对干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除了亲自“蹲点”、直接指挥之外，还利用广大群众对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的憎恨，提出许多形“左”实右的口号，极力在群众中散布“一概怀疑、一概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假手于群众，来扩大打击面。这是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主要手段，也是更加阴险的手段。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往往也反映到革命队伍内部来，妨碍一些人勇敢地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牢牢掌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狠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彻底肃清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把干部队伍看成是“一片黑”、“烂光了”，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极端错误的概念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内部继续存在。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和阶级分析，而不是宁“左”勿右。

《红旗》杂志第五期《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篇重要文章的发表，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拥护。这正说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具有无比强大的威力。然而，有少数人，却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作任何阶级分析，不区别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而笼统地区分

什么“群众”和“当权派”，认为“凡是当权派拥护的自己就要反对”，“干部起来了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因而，就不去积极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极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坚决捍卫毛主席在干部问题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须挺起腰杆来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在斗争中把“一大片”真正解放出来，才能把“一小撮”彻底孤立，彻底打倒。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粉碎那“一小撮”搞反攻倒算，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要落实到行动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做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模范。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过程，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首先，要善于正确地识别干部。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掌握阶级分析的武器，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里来考察和识别干部。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整理材料是不行的。我们应当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放手发动群众，对干部的全部工作和全部历史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讨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出正确的结论。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

必须认识到，广大的革命干部在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和革命群众的目标是一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愿意起来革命的干部应当“一看二帮”，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跟上形势，积极耐心地支持他们出来“亮相”，鼓励他们到群众中去，在斗争中经受考验。通过斗争，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

革命干部应该到群众中去，投身到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的洪流中，建新功，立新劳，真正取得群众的信任。绝不能消极等待，脱离斗争，按照《修养》那本书的说教，去“闭门思过”，幻想那一天会有人突然把自己“解放”出来，同自己搞“三结合”。真正要革命的干部，应该不怕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各种保守势力的打击，坚定地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来，站到革命小将一边来。这需要艰苦的思想斗争，需要触及灵魂的革命。一切革命干部，都必须经

受住这个根本立场的考验。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不仅敢于“打击一小撮”，而且敢于“解放一大片”，团结大多数。现在，许多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在干部问题上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并且积极落实到行动中来。任务重大，时间紧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们，广大革命干部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社论）

（四）一九六七年五月着重批判黑《修养》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世界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毛泽东

* * *

《修养》一书，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流毒全国，流毒世界。对它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

《修养》一书的关键是什么呢？

它的关键，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指出：

“至于讲到我呢，那末无论是发现近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彼此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了这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则早已作过对于各个阶级的经济解剖了。我所作出的新东西就在于证明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是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卫登麦尔》（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四五二页）

列宁在五十年以前又强调指出：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策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三九八——三九九页）

《修养》的作者，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从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割裂和歪曲。他在这本长达近五万字的书里，虽然也堆积了一些抽象的阶级斗争的词句，但是闭口不谈现实的阶级斗争，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不要无产阶级专政，那些阶级斗争的词句当然只是骗人的鬼话，当然是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接受的。

《修养》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出版，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多次重印。在几种版本里，根本不谈抗日战争、不谈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注），根本不谈解放战争、不谈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这样的

《修养》，触动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根毫毛，触动不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国民党的一根毫毛。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很显然，抛开革命战争，抛开武装夺取政权，就根本谈不到党的发展、巩固和建设，谈不到党员的思想改造。可是，就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的年代里，夺取政权的年代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要人们忘记武装夺取政权的根本任务去进行“自我修养”。这样去“修养”，岂不是要人们“修”成不干革命战争，不要夺取政权的庸人！这样“修”出来的庸人，绝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

《修养》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修订再版，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大加增删，重新出版，仍然是原来的那套货色。在这个时期修订再版、重新出版的《修养》，不但根本不谈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而且仍然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同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伟大著作唱对台戏，公然反对毛泽东思想，要人们忘记社会主义革命，忘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去进行“自我修养”。这样的“修养”，岂不是让人们“修”成不搞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的布哈林式的人物，“修”成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修养》多次重印和再版，都不提武装夺取政权，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偶然的疏忽呢？不是。

《修养》一书讲了国家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讲国家问题的时候，是绝对不会不讲国家的阶级性质，绝对不会不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是，《修养》一书偏偏抛开无产阶级专政，而象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那样，抽象地讲国家问题。

《修养》一书的作者说：无产阶级“能够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及国家机关，来和一切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断从党内与国家机关中清洗那些已经在自己的工作中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的分子出去”，“而保持

党与国家机关的纯洁”。试问，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关呢？难道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吗？可以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吗？《修养》一书恰恰是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根本原理。照《修养》一书作者看来，只要共产党人努力进行“自我修养”，就会从天上掉下一个什么“理想国”来。他梦寐以求的，不是别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

一九六二年再版的《修养》，在上面引的这一段话中，特意增加了“建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国家机关”。这种特意的增加，表明作者对我们国家性质的看法。可是，在这里，在全书，他根本不提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毛主席说：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对于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修养》一书的作者，把我们的国家，说成仅仅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向敌人实行专政的国家，这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论，主张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呢？

《修养》一书用了很长的篇幅描绘“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一定要讲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可是，作者却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主义事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党员到底要怎样去进行我们的事业？”作者回答说：“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及黑暗、愚蠢、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者，人类中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危害、互相残杀及战争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作者又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人类最伟大的气魄与革命的决心。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愉快而严肃地下定自己的决心，来担负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人类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任务。”作者在作了类似种种一连串的牧师式的祈祷和祝愿之后，做出结论说：“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事业，就是这么一回事。”在作者的回答里，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所了解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所主张的怎样去进行共产主义事业，原来就是这样！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在《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

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十一页）

列宁说：“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四四八页）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修养》一书里着重讲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胜利以后，“还须经过社会主义的长期的改造时代，最后才能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一个稍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人，在这里总会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吧！没有，没有，还是一句也没有！可见，他所说的“长期的改造时代”，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他所说的“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很显然，《修养》一书的作者，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去“进行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修养》一书的作者，不仅自己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时，也把无产阶级专政剝掉了。

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

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1)(2)）

《修养》一书的各种版本，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却是这样引用的：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修养》一书的作者，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拦腰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砍掉了。难道这是偶然的疏忽吗！很明白，在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必要的。

另外一段，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

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修养》一书的各种版本，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却是这样引用的：

“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修养》的作者，又明目张胆地拦腰砍掉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连共产党的领导也给砍掉了。难道这又是偶然的疏忽吗！

《修养》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为什么仍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删掉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完全可以证明，这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对头，他是绝对不能容忍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要把它砍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无耻地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灵魂的。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而讲什么“作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最好的学生”，这简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莫大侮辱。

一九六二年再版的《修养》，把“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最好的学生”，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还把原来引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的三段话全部删去了。这三段话是：

“人们和自然界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资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而是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来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以及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生产时，也就建立彼此间在生产内部的某种相互关系，即某种生产关系”。

“生产底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更和发展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中的变更，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观念、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底变更，即引起全部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底改造”。

“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很明显，《修养》的作者，在一九六二年删掉斯大林，删掉原来引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的全部引文，完全是为了迎合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需要，反斯大林，也就是反列宁主义。

他为了删掉斯大林，恩格斯也被陪绑，恩格斯也被删掉了。

《修养》一书在多次重印和再版中，根本不讲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也说明《修养》的作者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真修正主义者。因为，在我们的时代，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一样，离开了列宁主义，也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今年的选举》）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反其道而行之，不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把世界上的一切归结为“自我修养”。

“修养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就是《修养》一书的公式。这个公式，同老叛徒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公式一样，都是十足的修正主义货色。

真的没有目的吗？当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老叛徒伯恩斯坦一样，有其阴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企图瓦解无产阶级队伍，使人们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在全国胜利以前，他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全国胜利以后，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修养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个反动公式的目的。

（注）《修养》一书，在一九六二年以前的各种版本里，都没有谈抗日战争。一九六二年的新版中，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一节里，作为举例，加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段。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刘少奇《修养》的通知

1967.05.11；中发〔67〕153号

各革命委员会，各军区，各级党委，各革命组织：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革命的批判精神万岁——欢呼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的发表》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

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现在公开发表了。这些重要文件的彻底革命的批判精神，大破大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象一根光彩夺目的红线，贯彻始终。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批判的，战斗的，革命的。它是在最广阔的规模上和最大的深度上对旧世界、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批判和斗争中，在大破大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战斗。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彻底的科学的批判态度时说：“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共青团的任务》《列宁全集》三十一卷二百五十三至二百五十四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毛主席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最大的破，最大的立。

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大破旧戏舞台上和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那种否定工农兵、颠倒历史的反动现象，尖锐地指出：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要再颠倒过来。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在狠抓武装斗争的同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是为我国无产阶级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夺取全国胜利作舆论的准备。

毛主席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时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大破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大破奴隶主义的《武训传》，大破唯心主义的《红楼梦研究》，大破戏剧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大破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全国解放以来，毛主席关于思想、文艺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什么贯彻不

了呢？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是因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窃取了文化界领导权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等人，公然抵制和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专了我们的政。如果我们不发动一场有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荡涤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就不可能摧毁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破大立，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大破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混到党和政权领导机关内部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揭露出了“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即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他们进行大批判，大斗争。这是最根本的破，最中心的破。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抓住这个根本，这个中心，大破大立，把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阵地夺回来。

毛泽东同志在他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谁和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这个大破大立的问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最广大的群众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里，进行大破大立的最好的形式。

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大破大立的斗争，这就要自下而上地把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充分地发动起来，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相信群众能够大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破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破修正主义思想。如果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就不可能彻底的破，也就不可能真正的立；就不可能大破大立。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了。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大斗争。这是一场更全面、更深刻的大破大立。一切革命同志，都应当认真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大批判、大斗争的目标，对准党内最大的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拿起笔杆握紧枪，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

一九六六年二月，正当我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紧要时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支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强大反击。这是我国文化革命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座谈会纪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武器，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

《座谈会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坚持和保卫了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

《座谈会纪要》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发出的战斗号令，是号召我军指战员拿起笔杆握紧枪，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动员令。它预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色风暴的来临。

这个座谈会，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委托文化战线上最勇敢的战士江青同志主持召开的。《座谈会纪要》要求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重要作用。这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的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鼓舞。这是我军建军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是我军全体指战员的无上光荣。

《座谈会纪要》的矛头，直接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支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其总后台，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复辟，长期以来，疯狂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拚命地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黑线。他们把持和

控制了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阳奉阴违，横行霸道，在文艺界专了我们的政。十七年来，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丑化工农兵，美化帝、封、修，从吹捧《清宫秘史》到炮制《海瑞罢官》，干尽坏事，罪恶滔天。

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间，毛主席提出要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晗及其大毒草《海瑞罢官》进行批判。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一伙，肆无忌惮地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在江青同志的直接指导下，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姚文元同志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彭真、陆定一这些坏家伙，不准北京的报纸转载这篇重要文章，上海出的小册子也不准在北京发行。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盗窃党中央的名义，抛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汇报提纲》，明目张胆地打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旗，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左派进行猖狂进攻，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他们反革命的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就在这个时候，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我军干部战士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根据《座谈会纪要》的要求，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积极地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口诛笔伐，叱咤风云。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其总后台，被打得阵脚大乱，丢盔卸甲。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梦破灭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打胜了文化大革命的头一仗。

从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当中，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阶级斗争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人民解放军，必须最坚决地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使自己成为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进攻的最勇敢的一支突击队。

我军是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副统帅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毛主席号召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重要作用，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要完成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就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最近发表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五篇光辉历史文献；认真学习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

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和毛主席亲自审阅修改的《座谈会纪要》，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资产阶级总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法，利用“文艺”之类的糖衣炮弹来征服人心。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这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中，必须争夺的前哨阵地。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混到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要篡党、篡军、篡政，总要先作舆论准备。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敌人反革命的舆论准备，就要高度重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彻底揭露和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及其总后台，夺回他们窃取的领导权。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正如《座谈会纪要》指出的，“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不仅要用枪杆子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要拿起笔杆子，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泛滥。我们既要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作冲锋陷阵的勇士，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作勇敢坚强的突击手。伟大统帅毛主席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拿起枪杆子，又拿起笔杆子，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紧紧站在一起，任何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都将被我们彻底粉碎。

我们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战斗到底！

（原载《解放军报》1967年5月29日）

（五）一九七六年六月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新华社报道：中央直属文艺系统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 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陈伯达同志出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批判大会，并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热烈祝贺

数百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万四千多名文艺战士满怀革命豪情地表示：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全力以赴，共同对敌，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 * *

新华社十日讯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奏凯歌、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关键时刻，中央直属文艺系统的数百个革命群众组织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斗号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了！

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艺术院校、电影、图书、博物、文物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万四千多名文艺战士，今天满怀革命豪情，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齐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他们大联合后的第一次战斗的大检阅——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出席了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批判的盛会，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同志对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文艺界的革命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你们今天的大会，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模范。你们应该继续成为大联合大批判的模范。”陈伯达同志祝革命文艺工作者大联合、大批判及各项工作取得胜利，并向全体文

艺战士发出号召：“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成员金敬迈、李英儒、舒世俊、陆公达、刘巨成，也出席了今天的大会。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标志着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首都文艺战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战时刻联合起来，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一革命壮举，必将极大地促进整个文艺界以至于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批判，推动当前的大批判运动更深入的发展。

在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各单位产生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它们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由于观点上的一些分歧和无政府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在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影响，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不少矛盾和争论。这种情况，使得文艺界的文化革命大军兵力分散，步调不一，严重地影响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总结了前一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决心改变这一状况。他们说：“我们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再大，也大不过我们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千条道理，万条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千重要，万重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最重要！”“大敌当前，我们一定要分清敌我，把所有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文艺工作者都联合起来，把斗争的矛头狠狠地、准准地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为了开好大联合后的第一次斗批大会，连日来许多单位都成立了联合作战指挥部和筹备小组，一些过去互相对立的革命群众组织成员，现在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共同研究作战方案，共同研究发言提纲。不少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为了准备这次斗批，还联合召开誓师大会或联合进行街头宣传演出。大家决心要在大联合大批判中，尖锐地、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通过大批判进一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

今天，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联合起来的中央直属文艺系统的文艺战士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清早就源源不断地涌向北京工人体育馆。大会主席台正中，高挂着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整个大厅，红旗林立，布满了鲜红的毛主席语录和表达革命文艺工作者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的革命决心的大字标语。大厅里到处洋溢着大联合、大批判的革命战斗气氛。文艺战士们，群情激昂，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会开始之前，全场齐声朗读毛主席的语录：“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成员金敬迈同志在会上讲话，高度评价了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的重大意义。他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为无产阶级夺权。因为我们的目标一致，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联合来，完全有必要联合起来，完全有可能联合起来。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集中火力，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的猛烈的总进攻，在大斗争大批判中促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文艺界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斗、批、改，这就是当前我们首要的战斗任务，也就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地掌握住这个大方向。

金敬迈说，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我们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只有动员最广大的革命群众，才能进行这场“人民战争”，才能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他指出，各系统各单位的斗、批、改的艰巨任务，还等待着我们去完成，困难还有待我们去一个个地战胜，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大斗争大批判中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首都文艺界四大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造反派砸烂文化部联合委员会、首都革命文艺造反总部、北京工农兵文艺公社、首都文艺界红色造反总部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了联合发言，热烈欢呼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他们坚决表示：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全力以赴，共同对敌，斗倒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陈伯达在文艺界“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大会”上的讲话

〔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艺术院校、电影、图博文物系统召开“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大会”，陈伯达、金敬迈出席讲话〕

陈伯达的讲话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向同志们问好！我代表江青同志向你们问好！

文艺界的革命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你们今天的大会，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模范。你们应该继续成为大联合、大批判的模范，成为文斗、不要武斗的模范。我庆祝你们大联合、大批判及各项工作取得胜利，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岁！

金敬迈的讲话

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友们！

真心诚意愿意联合起来向中国的赫鲁晓夫猛烈开火的战士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今天，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艺术院校、电影和图书博物文物系统，召开斗争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我们祝大会胜利，成功！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

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了总攻击。我们这次召开的大会，是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支持包庇的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起总攻击、总清算的信号。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在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严正指出：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文艺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建国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什么在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总是得不到贯彻呢？为什么彭真、陆定一、周扬、夏衍、齐燕铭、林默涵、肖望东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竟敢如此胆大包天，为所欲为呢？不为别的，就因为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有个总根子，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个总后台。这个总根子、这个总后台；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我国修正主义总头目，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代表，是全国革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是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文艺界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一切罪恶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资本主义大复辟。

革命同志们！如果他的这个阴谋得逞，毛主席领导我们打下来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就会象今天的苏联那样改变颜色，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革命成果就将废于一旦，世界革命将会出现一个大倒退。我们能够容许吗？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

正是为了避免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正是为了铲除修正主义的毒根，正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世界人民的天才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斗垮，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彻底铲除，就得先斗那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那个资产阶级黑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头头，也就是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最最猛烈的总攻击，彻底粉碎他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江山！

我们要以最大的仇恨、最强的火力，奋起口诛笔伐，把枪口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清算他在文艺界犯下的滔天罪行，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根子彻底挖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现在正在进行着的这一场大斗争大批判，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继续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摧毁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夏衍、林默涵、齐燕铭、肖望东等等文艺界黑线的头目，一个一个地揪出来，一个一个地斗，斗倒、斗垮、斗臭！斗得没有一个人再敢保他们，斗得想保他们的人再也不敢吱声，这样，我们就能够彻底粉碎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盘踞的一切堡垒，把他们所窃踞的一切领导大权统统夺回到我们无产阶级手中来！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我们是为无产阶级夺权。我们联合起来，就是为了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把权夺回来。我们中央所属的文艺系统中，有几百个战斗组织，成立这几百个战斗组织，不是为了你打我，我打你，让亲者痛，仇者快。我们成立这几百个战斗组织，不是为了你夺我的权，我夺你的权。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权可夺。一切革命的战斗组织，都是为了斗黑帮而组织起来的，都是为了为无产阶级夺权而组织起来的。正因为我们的目标一致，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联合起来，完全有必要联合起来，完全有可能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什么？联合起来斗、批、改，联合起来为无产阶级夺权。要是有什么战斗组织，只是为了他自己那一个具体战斗组夺权，为了为自己夺权，他是想压倒别人，抬高自己；为了为自己夺权，他把自己做的任何一点工作，都当作抬高自己、压倒别人的一种资本，这样的战斗组织，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因为背离了

毛主席指出的正确方向，因为他忘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自己把自己排斥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之外去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集中火力，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的猛烈的总进攻，在大斗争大批判中促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文艺界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斗、批、改，这就是当前我们首要的战斗任务，也就是当前的斗争大方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地掌握住这个大方向。

掌握了这个大方向，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敌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试想一下，一旦我们团结得象一个人，不断地壮大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奈我何！

为了不断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必须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原则问题，寸步不让，一丝不苟，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有了错也绝不遮遮盖盖，强词夺理，制造纠纷。而是严格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任何革命组织或个人，不敢正视错误，修正错误，他也绝对做不到坚持真理。要是他敢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他就必然能逐步地掌握真理。

为了不断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我们对兄弟组织和阶级兄弟的错误，也必须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坦荡胸怀，看到他们的错误，就积极地帮，热情地帮，而不是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巴不得他们垮台。因为阶级兄弟的错误，也就是我们的损失，也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的削弱。在向敌人冲锋肉搏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怎么能眼看着自己的战友掉队呢？怎么能为自己的战友摔了一跤而高兴呢？应该是携起手来并肩向敌人奔杀过去。

同样的，为了不断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任何犯过错误而愿意改正错误的阶级兄弟，对走过岔道而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兄弟组织，都只能拍手欢迎，而决不应揪住他们过去的小辫子不放，讥笑、讽刺，甚至排斥，打击他们，因为对任何革命同志，不管他们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他们现在敢于向黑帮进行斗争，愿意为保卫毛主席而战，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战，他就是我们的新战友，他们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壮大一分。同志们，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一切革命的战斗组织，都必须不断地立

新功，建新劳，不能吃老本。不仅自己要这样做，而且应该欢迎兄弟组织为革命立新功，建新劳。

有人会说，你们这是“和稀泥”，你们这是“捏合”。不对！什么叫和稀泥？不抓大方向，不讲原则，不分是非才叫和稀泥。今天的大方向就是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今天最大的原则，就是要牢牢掌握住这个大方向；今天最大的是非，就是掌握这个大方向的是和违背这个大方向的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握住大方向，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斗争大批判，怎么叫“和稀泥”？

同志们，看看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脸吧！看看他们，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和稀泥”，这样的“捏合”正是敌人最害怕的。因为只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他们的末日就更近了。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革命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只有动员最广大的革命群众，才能进行这场人民战争，才能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

为了彻底斗垮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一定要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我们队伍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要严禁武斗，不能搞打、砸、抢、抄、抓。打、砸、抢、抄、抓决不是战斗。靠打、砸、抢、抄、抓起家的组织也决不是一个革命组织。在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钻我们的空子。

被推翻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还在垂死挣扎。他们进行反夺权的一个特别阴险的手段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弱点，煽动分裂，挑动武斗，毁坏国家财产，破坏革命的新秩序，极力转移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迷失斗争的大方向，走到邪路上去。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今天，我们中央所属的文艺系统联合起来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一件大好事，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

这也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已，各系统各单位的斗、批、改的艰巨任务，还等待我们去完成，困难还有待我们去一个个地战胜，让我们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大斗争大批判中进一步联合起来，高举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让我们高呼：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彻底批判以陆定一、周扬、夏衍、林默涵、齐燕铭、肖望东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林杰的文章《打倒奴隶主义，严格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

一

革命，斗争，批判，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每个革命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须具有革命的战斗风格和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奴隶主义，却要人们向剥削阶级老爷卑躬屈膝，逆来顺受，只能绝对服从，不能丝毫怀疑。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推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把反动透顶的奴隶主义搬到党内来，妄图扼杀党员的革命精神，把党员变成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驯服工具。他在大毒草《修养》和其他言论中，把奴隶主义奉为法典，当作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准则。他说：

“我们主张组织上的绝对服从。”“所有一切附有条件的服从都是不对的，应该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服从”，以“上级和多数在原则上、政治上先要正

确”“为服从的条件”“是不对的”。

“即使大多数和上级或中央真错了，你也还要服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只要是大多数，是上级或中央通过和决定了的，就要服从，就是不对也要服从”。

这是不折不扣的奴隶主义！

毛主席早就对奴隶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修养》发表不久，毛主席即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光辉的著作中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群众，要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服从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领导时，毛主席更针锋相对地指出：“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同样，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团结、服从，都是有条件的，只有党内斗争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认为，组织上的服从，必须以政治上、原则上的正确为先决条件。无产阶级的组织路线，必须服从政治路线。

毛主席在谈到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时，首先指出，党的领导“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

列宁也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依靠什么来维持的呢？列宁回答说：第一，“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第二，依靠先锋队“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第三，依靠“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正确……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①。

共产党员的最高原则是革命。如果某一个党的领导人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我们就是要“无组织，无纪律”，造他的反，决不能“无条件的绝对服从”；牺牲党的政治原则，而侈谈什么组织纪律，那就是背叛。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顽固地推行奴隶主义。他自封为党的“领袖”，“朕即党”。谁如果对他不是“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他就搬出奴隶

主的王法来，打棍子，戴帽子，什么“无组织，无纪律”，什么“破坏民主集中制”，“反抗多数意志”，反党”，等等，不一而足。

“破坏民主集中制”吗？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集中，就是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错误的集中，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反对错误的集中，绝不是反对民主集中制，而正是维护民主集中制。

“真理在少数人方面，也要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吗？绝对不能。牺牲真理，出卖原则，向错误的“多数”投降，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我们决不能抛弃这个最高标准而去服从什么“多数”。违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多数”，实际上是少数，是一小撮。

毛主席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当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时，那么，掌握真理的少数人就应该坚持真理，不怕打击，为真理而不屈不挠地斗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光辉的榜样。当机会主义者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人，利用所谓的“多数”打击他的时候，毛主席始终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立场，同他们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列宁也是这样。斯大林说：“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内多数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②

“反党”吗？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们是无比热爱的。对于叛卖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的变节“领袖”，我们就是要造他们的反，就是要坚决揭露，使他们威风扫地，把他们打倒。这正是为了保卫党。那些篡党的家伙们，才是不折不扣的反党分子。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一不朽著作中，号召德国工人说：“抛弃谢德曼分子和考茨基分子，推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

使人庸俗的说教，违背他们的愿望，不理睬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③列宁这段话说得多好啊！全世界无产阶级，奋发起来，坚决抛弃现代的谢德曼和考茨基，踢开一切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领袖”！

二

一九五八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倒奴隶主义的伟大号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对抗毛主席，宣扬反动的“驯服工具”论。他说，“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叫奴隶是活工具”。他还说人都是“活工具”，要共产党员做象奴隶那样的“驯服的工具”。这纯粹是奴隶主的观点！

奴隶主义不是奴隶阶级的思想，而是剥削阶级用来欺骗、愚弄被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驯服”决不是奴隶阶级的本性。那里有剥削和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古代罗马帝国的奴隶大起义，雄辩地证明，奴隶阶级是敢于造反，敢于革命的。这次大起义的领袖斯巴达克的英雄形象，一直在鼓舞着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战斗。

列宁说过：“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④无产阶级革命家，总是满腔热情地赞扬被剥削阶级的冲天革命精神，鼓励他们起来战斗。而剥削阶级总是别有用心地把“驯服”强加在被剥削阶级身上，并当作他们的“美德”加以宣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此不遗余力地宣扬奴隶主义，这表明，他完完全全站在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上。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贩卖奴隶主义，甚至肆意歪曲我们党的光荣历史，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他在接见某党代表时，竟说：“即使在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时期，我们全党亦统一在陈独秀的路线下，以后统一在‘左’倾路线之下，……我们党无论何时都保持党的统一不分裂，保持党的纪律，……就是说无论党的路线正确或错误，党都保持统一。”

这完全是撒谎！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斗争性最强、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论在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统治时期，还是在“左”倾机会主义者李立三、王明等统治时期，毛主席对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始终坚持了斗争，坚决进行抵制。正是由于毛主席的坚决斗争和抵制，才清除了叛徒陈独秀，结束了李立三、王明等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我们党就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一个党，如果修正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那么，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应该坚决起来造反，或者推翻修正主义的统治，或者建立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决不能统一在修正主义领导之下。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只能一方“吃掉”一方，是不可调和的，不能统一的。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宣扬反动的奴隶主义，还公然污蔑伟大的列宁。他说什么，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组织上并没有同第二国际决裂”。

这是睁眼说瞎话！

一九一五年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会议”，难道不是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在组织上的公开决裂吗？没有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决裂，就根本不会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历史的真实。无产阶级的叛徒，千方百计地企图篡改历史，只能进一步暴露他们的丑恶面目。

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宣扬奴隶主义，完全是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服务的。他所说的“纪律”，就是资产阶级的纪律。

他不是经常大肆吹嘘自己在安源的所谓“功绩”吗？其实，他的最大“功绩”就是向工人灌输奴隶主义的毒素，出卖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以安源工人俱乐部代表的身份与安源矿务局签订的协定规定：“矿局所订工人通守规则，无论何处工人及代表，皆应共同遵守”，工人“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你看，他竟这样赤裸裸地宣扬资产阶级的吃人纪律，不准工人革命。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资产阶级的“组织纪律”，视若神明；而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则肆无忌惮地加以破坏。他要党员对他的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但是，他自己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对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却阳奉阴违，拒不执行。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阶级投降主义。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了毛主席的这个伟大战略思想。

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大谈党的组织纪律“修养”的人，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他大肆鼓吹阶级投降主义，主张各个地区的游击战“在战略上必须实行中央军事委员会（按：他所说的中央都是指国民党的中央）统一的战略意旨，在政策上必须实行中央政府统一的抗日政策”，华北的一切抗日武装“必须尽可能的统一在当地的、华北的以及中央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直接指挥之下”。同年七月十日，他写信给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彭真，对他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党代表大会上宣扬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个投降主义谬论，不仅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反而指示他要适应大军阀阎锡山的需要，要用阎锡山的腔调来说话。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天才著作。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的方针是打内战。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必须“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主席告诫全党、全军：“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毛主席说的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听了的，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毛主席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时，他是举了手的。但是对我们伟大领袖的话，对于党的决定，他又是采取什么态度呢？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他授意《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散布和平幻想，说什么：“只要不是疯子，不是白痴，不管他是那一个阶级，那一个民族，在今天这种环境之下，一定会要求和平”。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他又作了一个时局问题的报告，断言：“内战挑拨者

和主战派已失败，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势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在报告中，他大肆鼓吹所谓“六相信”：“相信内战会停止”；“相信国民党蒋介石不打我们了”；“相信国民党与蒋介石能搞民主改革”；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和我们办民主建国”；“相信中国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还有一个相信，相信美帝国主义头子“杜鲁门声明”。据此，他还提出所谓“三交换”：交出军队，“统一于国防部”，“换得全国民主化”；交出党权，“换得了我党的合法地位”；交出伟大的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所得来的胜利果实，换得有些人“去作官，中央政府的官”，换得“美国借的二十万美金”。

这个“报告”真是丑死了，臭死了！这那里是什么时局报告，这是彻头彻尾的大叛卖！

他所说的那些话，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已经讲过多次。美帝国主义向我们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蒋介石说：“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这些“好话”，毛主席早已作了严正的驳斥。毛主席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很清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说的“党性”，乃是国民党的党性，美国民主党的党性；他所绝对服从的纪律，乃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所谓“军令政令”。

他的立场就是这样鲜明：对杜鲁门和蒋介石，一副奴才相，不愧是一个奴性十足的“驯服工具”；而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广大革命人民，则是桀骜顽劣，一副老爷架式。这就是他所宣扬的奴隶主义的阶级实质。

例子不必再举了。

总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是这样对抗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践踏党的决议，而竭力维护资产阶级的纪律，修正主义的纪律。

四

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组织纪律。一个人只能遵守本阶级的组织纪律。无条件地遵守一切组织纪律，或者反对一切组织纪律的提法，都是极端虚伪的，骗人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严酷的阶级斗争，

使无产阶级懂得，只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才能形成为步调整齐、意志统一的坚强有力的队伍，才能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把无产阶级的力量集中起来，指向一个共同的打击目标，战胜强大的敌人。我们反对奴隶主义，决不是反对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恰恰相反，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组织纪律。

对于以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句句照办。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毛泽东思想是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过的普遍真理，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我们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我们的最高纪律。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自己的真正的、杰出的领袖，必须在全党树立领袖的绝对的革命权威。没有这个条件，党的纪律就不能成为钢铁的纪律，党的事业就没有胜利的保证。列宁说，没有“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⑤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毛主席这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这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

对于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机关，一定要维护它的威信，树立它的权威。对于它的正确指示和决定，应该自觉遵守，坚决执行。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但是，决不能用对待修正主义的组织、纪律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对各级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决定是否服从，应该以它是否符合无阶级的革命利益，是否符合于毛泽东思想为标准，而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合我胃口的就执行，不合的就不执行。不能把遵守革命的组织纪律当作奴隶主义来反对。反对一切领导、一切权威、一切组织、一切纪律，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必须坚决批判。

不能用无政府主义来反对奴隶主义。奴隶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是极端相反的，但是，在本质上却是相通的。两者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在世界观上，都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奴隶主义主张盲从，不要真理；无政府主义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把无政府主义奉为绝对，同样是不承认真理，主张盲从。我们既反对奴隶主义，也反对无政府主义；更反对用打倒一切政权、反对

一切组织纪律的无政府主义去代替奴隶主义。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来的反动思想。在他们掌权的时候，他们就宣扬奴隶主义，搞愚民政策来维持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专政。而在他们失去权力的时候，他们就抛出无政府主义，来制造混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里，奴隶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维护修正主义统治的思想武器。

目前，有些人在反对奴隶主义的时候，宣扬并且奉行无政府主义，他们唯我独尊，只有“我”是绝对正确的，凡是不符合“我”的，就是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反革命复辟的最后阵地”，要统统打倒。在这里，奉劝一声，主张打倒一切的人，坚持下去，自己也会被打倒的。

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去批判奴隶主义，去反对无政府主义。对任何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既不要盲目接受，也不要盲目反对。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一切东西都要由革命的实践来检验，用毛泽东思想来审查。

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是革命的需要。

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坚决同一切违反党的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行为作斗争。

今天，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我们必须象伟大的人民解放军那样，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铁的纪律，大大提高我们的组织纪律性，坚决执行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发生。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

（六）一九六七年七月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刘少奇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书面检查

〔按语：刘少奇这个“检查”，根本不是什么检查！这是刘少奇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最恶毒攻击！这是刘少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疯狂的反扑。这是刘少奇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妄图翻案的铁证！这是一篇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反革命复辟宣言书！

刘少奇的猖狂反扑丝毫不说明他的强大，恰恰相反，正暴露了他背离人民，垂死挣扎的虚弱的纸老虎本性，以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本质。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立即联合起来，行动起来！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打倒刘少奇！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现将刘少奇的“检查”公布于众，供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全体革命师生员工们：

七月四日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通知我说，党中央的意见，要我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写一个检查。现特检查如下：

（一）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和各地来到北京的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认识。我就是在毛主席的这个号召下，在去年八月一日到李雪峰同志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那个学校去？经过研究后，一致确定，我到建筑工业学院去。李雪峰同志也决定一同去。由于建筑材料工业部是归口由国家建委领导的，所以谷牧同志也到你们学院参加

文化大革命。当时我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戚本禹同志来参加。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要创造什么经验，向全国推广的意思。

八月二日晚，我到你们学院参加你们的大会，上述各同志都来了。此外，还有刘澜涛及其他外地来北京的同志也有几位来了，他们是临时决定来参加的，我事先不知道。

参加你们八月二日的大会，主要是听取你们中一些不同的意见。最后，我讲了几句话。

八月三日晚，我和李雪峰、谷牧、戚本禹同志等再次到你们学院，先找“八一团”的代表谈话，后找“革命团”的代表谈话。主要也是听取意见。最后，我分别向“八一团”和“革命团”的代表谈了我的几点意见。

八月四日晚，我在中南海找工作组负责同志谈话，主要是问了一些情况，最后我也说了一些话。

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时候，我已感觉到我再不能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当天下午，我用电话告诉李雪峰同志说，我以后不再去建工学院，也不再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八月五日李雪峰同志的讲话，以后吴兴峰在建工学院的活动，我都不知道。八月五日以后，建工学院有几位同学给我来过信，并接到过几份简报，但是，我都没有答复。有的送给了李雪峰同志，有的处理了。

以上就是我参加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简单经过。

（二）

在去年（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经毛主席批准在全国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以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可是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却发生了错误路线，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和一些机关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

制定出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内外有别，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给各地党委，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在建筑工业学院这种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就变成所谓“抓游鱼”的斗争，虽然我在事先完全不知道，在中央会议上也没有听到过有“抓游鱼”这回事。由于这种斗争，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过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游鱼”等。这样，就在一段时间内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一般还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地向群众学

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面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的这种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也违背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

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由于我在去年八月五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所以我到建工学院几次讲话中，都没有主动地承担责任，没有正式地站出来向建工学院全体师生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以便减轻当时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建筑材料工业部和工作组的责任。当时，我只是笼统地说，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的责任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来负担，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工作组在你们学院所犯了错误，你们清楚，你们可以讨论，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错误，你们也可以讨论，谁的错误谁负责。在这里，没有说明，我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也没有说明，当时的党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这样，就模糊了当时所犯错误谁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当时我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参加你们八月二日全院的辩论大会，听了两种不同意见的辩论，此外，同学们还给我递条子，提出了第三种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虽然包括一些原则问题、方向问题在内，但是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问题，应该经过正常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就可以团结起来。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依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去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以学生为主来搞。我认为这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基础上的团结，恰恰是当时所需要的，不能说这样的团结是“合二而一”的。当然在这里我应检讨，我当时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得有些不够完全、不够确切的地方。

经过去年八月二日和八月三日听取各方面意见的结果，又在八月四日听了工作组领导同志的谈话，在我的脑子中已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八一战斗团”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坚决反对原来的院党委和工作组的错误领导的，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而“革命团”虽然也说院党委和工作组领导有缺点错误，但他们由于受了蒙蔽，基本上是保院党委的、保工作组的。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不是指向院党委和工作组，而是主要指向“八一团”。因此，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不正确的。我的这种看法，同北京新市委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向建工学院的师生员工们宣布我的这种看法，只是在八月四日找工作组的同志谈话时，略微地透露过这个意思，但也是很全面的。

此外，我在同各方面接触中还发现建工学院的党团组织还是原班人马地在进行活动，既没有经过改选，也没有停止活动。因此，党团组织的活动常常是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造反行动的。因此，我曾建议改选党团组织，如果一时选不出来，就推举临时召集人。党团员一般不开秘密会，开会时要找一倍非党团员参加。我这个建议的目的，是想使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致受原来党团组织的操纵，阻碍运动的发展。至于我这个建议是否在以后付之实行？在以后的实行过程中，是否使建工学院的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我就知道了。如果在以后因为实行我这个建议而使建工学院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的话，那就应该由我来担负主要责任。

我在几次谈话中，还谈到以下一些问题：

一、有人起来闹事，起来向我们党委和工作组造反，不要害怕，而要支持他们起来闹事，起来造反。即使有少数坏人参加，也不要怕。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好人，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如果害怕人家起来闹事，不让人家起来造我们的反，那就一定要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我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话讲得过多，以至说过“不要怕坏人上台，坏

人上台一个时候有好处。蛇完全出了洞，才能打着。”这些话是错误的。应加以批驳。

二、在几次谈话中我都强调了要团结多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没有说明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没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条件，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都是实现不了的。即使实现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三、在几次谈话中，我都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它自己。”在解释全人类包括一些什么人时，首先我指出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学生、知识分子，这是人类的绝大多数，但也包括那些没有处死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及已经处死者的家属子女等，都要改造他们。而要改造这些人需要做很多工作。因此，在讲到改造这些剥削阶级的残余时，讲得过多，过重了。这就引起人们有本末倒置之感，这也是错误的。

对于我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所犯错误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指导思想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的其他言论和行动，凡不符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也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并给以彻底的批判。

最后，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了的革命师生员工赔礼道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受错误路线蒙蔽而犯了不同程度错误的革命师生员工和广大工作组员，他们责任甚小，主要责任在我，他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我也要向他们赔礼道歉！

希望同志们在对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少奇（签名）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

（此为刘少奇的“认罪”书的标准件，如有与此不符者，一律以此为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北京日报》编辑部文章：《痛打落水狗！》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全市革命人民发出了战斗号召：立即行动起来，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为彻底摧毁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斗争！这是当前北京市一切工作的纲，是全市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毛主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亿万革命人民揪出来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总代表。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就是他们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急先锋。

北京，是伟大七亿中国人民的首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在地。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包庇下，把北京市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妄图把它变成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基地。因此，彻底摧毁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就是摧毁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对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就是直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当前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这场大批判、大斗争，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就是要最充分、最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最广泛的革命大联合，紧紧把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的锋芒集中指向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其总后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革命的大批判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地结合起来，打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

对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大批判、大斗争，深入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是极其艰巨复杂的政治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地思考问题，把革命热情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它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它在各个领域里的一切流毒。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毛主席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就是大破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立毛泽东思想。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我们要把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当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课堂。

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用自己的革命英雄主义正在创造自己的新历史。我们坚信，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将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穷追猛打，彻底埋葬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摧毁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彻底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建立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

（七月十四日）（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北京日报》社论：《革命大批判的模范》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联合斗争、批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萧望东之后，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又开辟了十几个战场，举行了几百次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对文艺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萧望东、陈荒煤、张致祥、邵荃麟等，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短兵相接的总攻击、总批判、总清算，批得他们体无完肤，狼狈不堪。这一场广泛深入的人民战争，打得漂亮！打得好！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首都文艺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愧是革命大联合的模范，革命大批判的榜样！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决战的关键时刻。能不能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使他们真正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巩固和加强的头等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也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世界革命的命运的头等大事。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的政治任务，最大的历史使命。

形势逼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是联合起来，一致对敌，还是热衷于打“内战”？首都文艺界的革命小将说得好：“一千个矛盾，一万个矛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最大的矛盾；一千条原则，一万条原则，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倒是最大的原则！”“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思想，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既然我们有共同的决心——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我们有什么理由打‘内战’？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敌人在一旁看笑话？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在对敌斗争中联合起来？”这些深刻的豪言壮语，不但表达了广大革命文艺战士的心声，而且已经变成了他们的自觉行动。

首都文艺界的实践证明：大联合必须以大批判为动力，大批判又必须以大联合合作保证。离开了革命的大批判，就谈不到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革命的大联合，也不可能彻底进行革命的大批判。

过去曾经受蒙蔽而站错队的同志，今天只要能够勇敢地站起来，正视错误，改正错误，把仇恨集中到阶级敌人身上，狠杀回马枪，那么，他就会回到毛主席

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相反，某些过去造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对的同志，如果今天在脑子里丧失了警惕，没有了敌情观念，不把矛头对准敌人，而仍然热衷于打“内战”，那就说明他已经逐渐背离斗争的大方向，就不能算作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总之，死抱住小团体利益不放，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在一边，热衷于打“内战”的人，迟早总会垮台，发展下去，那就是对革命的犯罪，那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背叛！

有人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被罢了官，有些已经在报上被点了名，早已成了“死老虎”，打不打不吃劲。我们说，同志，你错了。你这种看法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中国有一句古语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孔子虽然死了几千年，他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更何况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决不甘心于他们灭亡的命运，他们必然要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作垂死的挣扎。最近，不是有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抛出了一个名为“认罪”、实为反扑的所谓“检查”书吗？毛主席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的同志绝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阶级斗争为纲，打一场广泛深入的大批判的人民战争。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倒，打得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北京日报》编辑部社论《伟大的历史任务》

在我们英雄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亿万革命人民按照天才统帅

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正在进行一场震撼世界的伟大战斗——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革命的大批判。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这是广大中国人民的壮志豪情。革命大批判的滚滚洪流，使那些政治庸人为之目瞪口呆，使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之胆颤心惊。

这场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历史任务，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是经过一番艰苦斗争的；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倒、批垮、批臭，叫他们遗臭万年，永无翻身之日，则是更加艰巨、更加严重的斗争。

毛主席早就指出：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近抛出来的名为“认罪”、实为反攻的“检查”书，不是再一次从反面教育了我们许多同志吗？！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是始终存在的。如果我们不搞革命的大批判，不彻底清除修正主义的流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千方百计要出来为自己翻案的；即使他们自己翻案不成，将来，新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会为他们翻案，实行反革命复辟。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托洛茨基死了几十年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还为之翻案；老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被罢官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也还妄图为之翻案。难道我们不应该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吗？！

这场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是向旧世界发动的一次总攻击，是对剥削阶级腐朽意识形态的一次大扫荡，是清除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垃圾堆的一场攻坚战。

毛主席经常强调：“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只有大破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才能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进一步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否则，我们就不能在意

识形态领域中完全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革命的大批判，正是为了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奠定思想基础。

这场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接班人的大熔炉。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他老人家在《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曾经提到清代诗人龚自珍的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这个“天公”，造就了数以千百万计的“人材”。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一年来，千百万红卫兵小将，紧紧跟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赤胆忠心干革命。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大造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了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广大工农兵是革命大批判的主力军，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杀”上战场，是这场革命大批判必将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红卫兵小将应该虚心地向工农兵学习，同工农兵结合，和工农兵并肩战斗。

“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希望红卫兵小将，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要善于思索，学会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作出新的贡献，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一百多年以前，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为完成革命大批判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而英勇奋斗！

（七月十九日）（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社论《红卫兵小将要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狂飙骤起，怒涛澎湃。一个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风暴，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

这一派大好形势，对于一向奋战不息的红卫兵小将，该是何等的欢欣鼓舞！

一年来，千百万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紧紧跟着伟大统帅毛主席，横空出世，雄姿英发，“杀”上历史舞台，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叱咤风云的勇敢闯将。

红卫兵小将们，满怀革命的豪情，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挥动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上扫九天残云，下斗四海恶浪，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

红卫兵小将们，赤胆忠心，不怕牺牲，以革命的大无畏的精神，横扫群魔，力挽狂澜，大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红卫兵小将们，同广大工农兵一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直捣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巢，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了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红卫兵小将们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惊天动地的不朽功勋，将永远彪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史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英雄的红卫兵小将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加艰巨的战斗任务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将革命进行到底！

被打落水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是一群吃人的鬼蜮、喝血的豺狼，是卖国求荣、杀人不眨眼的殃国大盗，是地地道道的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的本性是至死不会改变的，总是妄图在将来的某一天把革命人民淹没在血泊中。

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沉痛的教训。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难道能忘记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忘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忘记赫鲁晓夫的反革命政变吗？不能，绝对不能！在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战的关

键时刻，忘记这些就意味着背叛！

革命的大批判，是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是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次大决战。

革命的大批判，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创举，是对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大扫荡，是为共产主义奠定思想基础的崇高事业。

广大红卫兵小将一定要在革命大批判的硝烟烈火中大显身手，再展英姿，“杀”出新的威风。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就必须敢字当头，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集中智慧，集中力量，集中目标，痛打“落水狗”，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批垮、批臭，使他们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就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善于思索”，要“多思”。在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多思出智慧，多思长才干，多思有希望。革命小将，既能冲得上去，横刀策马，纵横驰骋，砸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阎王殿；也能坐得下来，艰苦细致、扎扎实实地彻底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红卫兵小将就必须向工农兵学习。广大工农兵立场最坚定，爱憎最分明，他们是这场革命大批判的主力军。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红卫兵小将只有同工农兵结合，和工农兵并肩战斗，才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上谱写出革命大批判的壮丽篇章。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归根结底，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思想武器，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彻底批判旧世界，把革命大批判变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课堂。

恩格斯在评价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说过：“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比欧洲文艺复兴伟大千百倍的革命，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无法比拟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样伟大的革命，这样伟大的时代，

更是需要和产生千百万无产阶级的“巨人”。革命的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在对旧世界的大批判、大斗争中，一定能够成为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巨人”，成为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巨人”。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青年时代的峥嵘岁月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虎狼当道的旧世界进行了最无情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多么广阔的胸怀，何等伟大的气魄！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一定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榜样，在革命大批判中做冲锋陷阵的急先锋！

（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人民日报编者按：

红尖兵的文章，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但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任务，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是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思想革命运动，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拉下马，让他们靠边站。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但是，正如红尖兵的文章所说的，从组织上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就是说，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仅仅从组织上打倒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一场大批判、大揭露、大斗争，对他们这些腐朽的垃圾堆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不打不倒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毒根扎得很深。不彻底批判，他们的流毒就不可能肃清。弄得不好，随时有复辟的可能。因此，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能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绝对“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

进行这场大批判，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在大批判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边学习，边战斗。在大破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大立毛泽东思想，在思想理论阵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吧！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调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运动的斗争大方向。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把他们彻底粉碎。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他们混进无产阶级政权机构内部，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机构，从而造成了两个政权、两个司令部激烈斗争的局面。当然，就我们整个国家来说，是无产阶级政权占统治地位，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领导权而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机构，只是某个局部、某个方面。但是，如果我们让其存在，任其发展，“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粉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极其复杂、极其深刻、极其激烈的大搏斗。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争夺政权的斗争，不能不强烈地表现在政治思想战线方面。我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无产阶级政权机构内部揭露出来，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这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把组织上的胜利，扩大到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胜利，还需要继续作艰苦的斗争。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林副主席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极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无数事实也告诉我们，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组织上打倒并不等于从政治上思想上打倒，撤职并不等于完全夺权，夺权也不简单地就是撤职。职和权是联系着的，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有职固然有权，无职仍然可能有权。

什么叫有权？有权，不仅是指有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而且意味着有政治上、思想上的指挥权。在政治上有势力，在群众中有影响，就会有人听他的指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转化为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权，主要表现在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是他们利用职权，打着红旗反红旗，在群众中进行欺骗活动的结果，也是由于他们多年来利用宣传机构，利用笔杆子，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思想教育阵地，在群众中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结果。这种政治上、思想上的权，采取自上而下地撤职、罢官等组织手段是剥夺不了的，必须通过自下而上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大揭露、大批判，把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以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流毒和影响，才能剥夺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权，使他们今后再也不能欺骗群众。

从组织上打倒和从政治上、思想上打倒，从组织上夺权和从政治上、思想上夺权，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比较地来说，后者比前者更复杂、更重要。如果只是从组织上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组织上夺他们的权，而不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打倒，夺他们的权，这还不是彻底的打倒，不是彻底的夺权。而且，没有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胜利作保证，组织上的胜利也不会巩固，甚至随时可能被他们推翻；因为组织是人建立的，是受人的思想和意志支配的。“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不仅有决心有力量从组织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从组织上夺他们的权，而且有决心有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打倒，从政治上、思想上夺他们的权，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的“政治资本”是骗来的，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彻底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防止我们国家变颜色的关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不能东山再起；并且使我们革命群众警惕今后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果一旦出现了，就很快地认清他们的真面目，坚决把他们打倒。因此，我们一定不仅要狠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他们连人带思想统统打倒，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后台、总代表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埋葬，一定要狠挖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因此，我们在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之前和揪出来之后，必须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他们。有人说这是打“死老虎”，是“浪费弹药”。他们认为只有揪“活老虎”才是运动的重点，才能立汗马功劳，才符合斗争大方向。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一切阶级敌人一样，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决不

会甘心灭亡。“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1)(3) 他们当中有些人在组织上“死”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死”，还不是“死老虎”，他们是“受伤的老虎”，有的还是“装死的老虎”、“假死的老虎”；而且有的人在组织上也没有“死”，还正在那里咬人。那些已被揪出来但还没有真正被打死的“老虎”，他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革命群众更加仇恨，不仅妄图“秋后算账”、“十年报仇”，而且就在目前运动中，也都时刻利用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影响进行反扑，直接或间接地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这种挣扎，比被揪出来之前更加疯狂，更加狠毒。我们如果不把“受伤的老虎”、“装死的老虎”、“假死的老虎”和组织上也没有“死”的“老虎”统统打死，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会被老虎吃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前功尽弃，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为了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必须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开展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采用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寸权必夺”、“寸土必争”的反复搏斗。在战略上敢于藐视他们，在战术上肯于重视他们；在战略上有决心打持久战，在战术上有办法打速决战。

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最根本的是依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依靠毛主席领导我们创建的无产阶级政权。因此，我们要始终强调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权威，在斗争中锻炼革命的阶级队伍，在斗争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

经过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我们揭露和打倒了党内最大的最腐朽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了一批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取得的成就，是震惊世界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了呢？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彻底完蛋”了呢？

不能！

被揪出来的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落水的恶狗，是受伤的老虎，是感到冬天威胁但还未冻僵的毒蛇。

正象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所指出的：“这个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达到了疯狂程度的反动集团，绝不是真正放下武器，而是企图继续用两面派的方式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我们不是已经千真万确地看到了这种现象吗？

有些家伙虽然已经被打倒了，但是他们对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还是死不认账，一有机会就穷凶极恶地进行反攻倒算。有的还恶毒地抛出了名为“认罪”、实为反扑的反革命宣言书。

有些家伙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怀着刻骨仇恨，他们为了挽救自己将要灭亡的命运，总是操纵和利用一些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蒙蔽一部分群众，拚命地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他们张牙舞爪，赤膊上阵，甚至不惜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下毒手。

还有些家伙竭力装着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妄想骗取人民对他们的同情，以便蒙混过关。他们削尖脑袋往里钻，就是为了从内部来腐蚀和瓦解我们的革命的队伍，搞资本主义复辟。

因此，我们决不能怜惜恶人，我们决不能丧失警惕，我们决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我们一定要发动亿万群众，以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对那些仇恨党、

仇恨人民、仇恨革命的反动势力，展开革命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

林彪同志说：“推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政权是在较短时间可以完成的。推翻它的所有制，短时间也可以完成。可是，推翻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在思想里面的阵地，这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这个战线上如果不打胜仗的话，那么，政权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可以前功尽弃……”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总代表，是钻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大大小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总后台，是资产阶级和新老修正主义反动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最大的维护者。

就是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地、系统地、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全国胜利以前，他竭力宣扬“议会道路”，主张交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全国解放以后，他大肆鼓吹“剥削有功”，主张发展城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拚命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在国际上，他积极推行“三降一灭”的投降主义路线，千方百计地迎合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扼杀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长期以来，他窃据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职权，利用他骗取的政治影响，打着“红旗”反红旗，大肆推销他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

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大造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把他们拉下马，叫他们靠边站，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从组织上打倒，并不等于从政治思想上打倒。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里的流毒，把他们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反动的思想体系，彻底揭发出来，使他们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他们彻底打倒。

如果只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行政的权，组织的权，而没有夺政治思想上的权，那么，我们的夺权斗争就不是彻底的，我们夺到的权就不是巩固的；已经夺到的权，也还有重新被夺走的危险。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

争如果进行得不彻底，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列宁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我们如果不发动亿万群众进行革命的大批判，把剥削阶级思想的毒根拔掉，把剥削阶级留藏在各个角落里的垃圾打扫干净，它们就会继续散布臭气，继续传播毒菌，继续危害人民。那些老牌修正主义者，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不是早已呜呼哀哉了吗？但是，他们的修正主义破烂货色，并没有埋入坟墓。中国的赫鲁晓夫所贩卖的那一套，正是从他的老祖宗那里拣来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思想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就是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大破修正主义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必须高举所向无敌的毛泽东思想大旗，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七亿人民都来投入这场大批判运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有世界意义的大事。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这个最迫切、最重大的战斗任务。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每一场政治大论战，每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都必然带来革命的大发展和历史的大飞跃。在全世界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中国人民进行的这场规模空前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必将促进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飞跃发展，必将大大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将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朝气蓬勃的新局面，也必将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

中南海革命群众：

现按你们七月二十四日夜提出的五项问题交待如下：

问一、你的家庭是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什么有意隐瞒说成是民族资产阶级？你父亲是大官僚、大卖国贼，为什么说“进步”，有“爱国心”？你和国

民党反动军官王叔铭的关系？

我父亲王治昌，又名王槐青，在北洋军阀政府中当过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曾代理过部长。据他过去说他曾长期做教员，孙中山先生到北京时参加了当时的政府工作，开始当职员、签事，直至爬到司长、代理部长。后来在北伐战争以前一年左右，为一个叫邢逸三（又名邢瑞）的所代替，就闲在家里，有时也为人（当然是剥削阶级）做短期的会计师或律师。在他在当司长或代理部长时，他当然是个反动官僚。在一九二一年他出席过华盛顿会议，做为中国代表团（不知当时怎么称法）的成员或随员，出席过巴拿马博览会可能是主要代表。是否出席过巴黎和会和善后经济会议我不大清楚，可由那时报纸查出，但，我不记得他说去过巴黎或法国。如果他代表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了卖国条约，他当然是大卖国贼；如果，他是一般成员或随员，则也是参与了卖国勾当。他在北洋军阀政府中向上爬的时期，大概是我出生到我几岁的时候，听说他最高时每月薪一千元，家中雇工五、六人。解放时，我家所住的旧刑部街三十二号房子就是在一九二一年我出生前买的，共四十六或五十间（包括厕所，门洞在内，具体房数可由房管局查出，房契是我母亲黄洁如在一九五几年交公时交给房管局的）。后来，又在三十二号房子东边买了一所是二十八号还是二十九号我记不清了，此处有一个四合院和一个大院子，长期出租，日帝占领时卖出。我父王槐青的剥削财产主要是他在当司长时购置的，除房子外，还有些手饰、古董、字画和衣物。从这些方面看，王槐青的成分应为官僚。但，这是四十多年前的情况。王槐青当过北洋政府的官僚和我家财产情况，我过去填表和写材料时都讲过，没有向党隐瞒。为什么我添（填？）家庭成分为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呢？我们党并没有在城市划成分，我们参考我们在农村划阶级的办法衡量的，如以解放前三年算或更长一些时间算，一、肯定是剥削阶级，虽然当时有几个兄妹任医生、助产士、……自由职业者，补贴我的父母一些收入，但，他们的主要收入是变卖房子、手饰后把钱存入银行，银行利息的收入应属资本主义剥削。二、王槐青当官僚是解放前二十多年前的事。在解放前三年或更长时间内，他没有与官僚或帝国主义分子合伙搞过工矿企业，也没有开过商店，农村中没有土地，所以，我认为够不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更沾不上地主的边。以上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即生产资料占有和剥削收入大体的数量和比例来分析的）。由思想上分析，王槐青青年时代及他当反动官僚时，当

然有封建思想，在我记事以后，他在某些事上也不时暴露出有家长制统治，受到我母亲的抵制。但，因为他留学日本，对日帝明治维新搞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套赞扬过，对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很钦佩，当官僚时又是管的工商司，资产阶级思想更多；虽他曾在四、五十年前加入过基督教（是否是在日本学习时入的我不大清楚，但，我听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曾在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夜校教过英文），自我记事起没有看他或听说他去过教堂，没有在家中祈祷过，没有叫我们读过圣经。但也没看他拜过财神、灶王爷之类等封建迷信玩意。没有叫我们跪拜过，表面上对我们兄弟姐妹上学、学什么、参加什么党派、宗教、与什么人结婚均采所谓由我们自由决定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资产阶级的一套“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我父母中是较多，也给我们较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烙印。根据上面这些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分析，我认为我的家庭成分订为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是较恰当的。如果，没有发现有我所不知道的王槐青与帝国主义分子或大官僚勾结合伙干了什么经济企业或他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大量剥削勾当和财产，我现在仍认为我的家庭成分定不成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更不是京津首富或京津两大富豪之一等等，所以，我没有有意向党组织隐瞒成份和我所知道的家庭情况。我认为城市划成份，确实比远离城市的农村划成份复杂。革命群众如经调查有充分材料证明王槐青在解放前三年或更长些的时间有更多的剥削罪恶，或有什么构成国际资产阶级附庸的材料，并告诉我，我才能改变我对我家庭成份的看法。

虽然，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我的家庭成份是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反正是资产阶级，是靠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吃穿的，是可耻的，是有罪的。我自己幼年和青年上学时期也是吃的剥削来的饭、穿的剥削来的衣，是劳动人民供养我上的学校。在学校中我又受了多年资产阶级的教育，所以，我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

问我为什么说我父亲“进步”，有“爱国心”？我对我父亲各个时期是有个分析的。他初参加孙中山的政府时还是有进步的一面，正如主席说过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初期是进步的，以后又会走向反动。王槐青在北洋军阀政府任司长、代理部长一段是极端反动的，这段历史是丑恶的。从他不当官僚到抗日战争前一段，他基本上过的是没落腐朽的绅士生活，虽然也参加一些家庭内的微弱劳动。在日

本占领北京初期，有许多人来找他参加日伪维持会并给他以威胁、利诱，他都拒绝了，我认为这点证明他还是有爱国之心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当然，他是资产阶级，爱的也是资产阶级之国，但，反正没当汉奸，要比当汉奸要好些。抗日战争时期，他也尝到了做亡国奴的滋味。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更关心战局的发展，他盼望打败日帝，那是中苏美英联合反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他还是愿意反法西斯的民主阵营胜利的。从他那时期对战局的议论中，可看出他对美国 and 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后期他曾在北京交易所搞过买空卖空的粮食交易。这种交易所为日寇操纵粮食的场所，王槐青这类行为是作了对日寇有利的事，实际上也是参与了卖国行为。但，同时，他也与我党地下党开始有了接触（主要是我母亲比我父亲好些）。抗战胜利后，他父亲经过王光琦的关系，对李宗仁是很巴结的，恰象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所说的在敌占区有相当多的人对国民党有幻想，蒋介石也在散布这种幻想。王槐青的巴结李宗仁即证明他对国民党有幻想。在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接着又举行了旧政协会议，发布了停战协定，共产党的威信在原国民党统治区和原敌占区的人民中威信大增，他父亲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有变化。由于国民党统治的反动腐败，物价飞涨，美帝和国民党匪帮的接受大员的胡作非为，使北京许多人非常不满，逐渐丧失对国民党的信任，逐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加上我的家庭中参加革命方面工作的人的力量增加，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据说我父亲给予我党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同志一些帮助（主要是我母亲的作用多）。这也是过去我说过他有进步一面的原因。他也看了一些进步书（如，我在一九四六年曾给过我父母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和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书）。解放后，毛主席所领导的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口口声声赞扬；特别是对共同纲领和新政协的召开等（当然那时我们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和过渡时期，没有触动他的利益）。特别在吸收他参加北京文史馆为馆员后，中央负责同志请过他一次，又有些负责同志和他谈过话，对他有很大鼓励和教育。文史馆每月给他若干元补贴，他的生活有固定收入这是几十年来没有的，而且是共产党给的，他是感谢的。对他这段时间，他是既有剥削人民的一面（据说拿过两年定息，每年二、三百元），又有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的一面。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自一九四九年，我鼓励我母亲开办婴儿托儿所以来，我父亲在他病倒以前，也是赞成的。如

果，我在那儿说过王槐青“进步”的话，是指他在民族资产阶级中还算比较进步的，支持我母亲响应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号召开办托儿所，力图为人民做点好事。

就王槐青的整个一生讲，他当过反动官僚，长期过剥削生活。骂他为吸血鬼，砸了他的墓碑，我完全同意。我母亲也过了几十年剥削生活、寄生虫的生活，但，她在解放前后确给我地下党以一些有利的帮助，解放后积极拿出房子，家具等办托儿所，还是办的好事，记得毛主席在第一次新政协会上讲过，在我们困难时期，响应党的号召，拥护共产党，而做过一些好事的人，我们是不会忘掉他们、丢弃他们的（原话记不清了）。所以，党和革命群众对我母亲还会与我父亲有所区别的，她在托儿所工作一定有错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但是，我相信敬爱的毛主席和革命群众对她还是会一分为二的看待的。

关于我和王匪叔铭的关系，以前在清理中层运动中和整党运动，我专门写过详细材料，见过几次，说过什么全部都报告支部了。那时比现在记得还清楚，在我档案材料中一定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干爸爸。我与王叔铭既无不正当关系，更无政治关系。现把我见过他几次的情况向革命群众再交代一次。

一九四五年秋，王匪叔铭以什么国民党空军王副主任的名义，请了一些国民党飞行员的家属吃饭，名为“慰问”，实为拉拢人心。地点可能在王府井一带的一个饭馆里，主客共有三、四桌人。我家被“请”去的有我父亲和我。我父亲与王同桌，我在另一桌上，饭后告辞时是我父亲给我介绍的。王匪叔铭说：听说你是学原子物理的，这很重要。没说别的。他为什么在我们那么多兄妹中单请我呢？因在他请吃饭以前，王光俊（我的五哥，当时在徐州匪空军当中队长）托两个人给我家送了一封信，我由学校回家正在门口碰上他们，他们中有一个叫做吴晓铃（？），也是个中队长。是我把他们带进家里见了我的父母的，他们主要讲了王光俊抗日战争以来的情况等。我是在门口叫门时问了他们的姓名来历等，他们也问了我。王匪叔铭请客有我，可能是这两个人汇报或“推荐”的。这个吴晓铃后来还找过我几次，我也写过材料，这儿不多说。在新年前后，王匪叔铭曾请我出席过他举行的几次晚会，一次在南池子一带他们住地看烟火（可能是在这次晚会上，我听说蒋匪经国曾经过北京去沈阳一事，我报告了当时地下党领导我的崔月犁），一次在怀仁堂的舞会（王本人不跳舞，至少我没有与他跳过），这两次参加的均为国民党的飞行员什么的。以后，又参加过一次晚宴和舞会，地点是在和

平门内公部口一带（是否是大官僚资本家周作民的风子里我弄不大清楚），那次主要是王匪请美帝的“顾问”军官的，有一些蒋匪空军和一些妇女参加，我坐在离王匪主人位子很远的地方，我旁边坐的是美蒋低级军官，我不知他们是哪个单位的，还有一位妇女据说是燕大学生。明显这次宴会上请的女客，是为了饭后的舞会。这次，与王匪也没有说什么。以后不久，吴晓铃前后给我打了两次电话，第一次说王匪叔铭要“请”我去给他当秘书，我拒绝了，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文学能力不行，当不了。第二次他又打电话很紧张地说，王匪交代让他办的，我拒绝他很难交差，并说秘书也只要我抄抄写写，甚至站在他的反动立场上说：只让抄一些王匪给蒋匪的报告等，以此表示很“信任”我，话中意思是想夸耀王匪同蒋匪有亲密关系。我断然拒绝了，我说我的字写得不好，更不能干了。最后，吴晓铃就很生气地挂上了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找过我。大概在春节以后，王匪叔铭突然带了他的老婆，到我家来拜了一次年，我父母和我都在座，王匪只谈了一些问候的话，他的老婆根本没说话就走了。以后我再就没有见过王匪叔铭。当时，我拒绝去王匪处，是我怀疑王对我不怀好意，那时，他老婆没有来北京。以后，我把这件事向当时地下党领导我的崔月犁讲过，在执行部向李克农同志讲过，如果我那时要是个政治强的共产党员，去干那个工作或可给党弄到不少情报。解放后，有一次我听刘少奇谈起胡宗南的秘书，夫妻俩均为我党党员，起了不少作用时，我也曾说过我若早是个共产党员也许可能地下党会派我去当王匪叔铭的秘书了，这类的话。我与王匪叔铭，只有这些来往。

问二：在桃园“蹲点”中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罪行？你为什么打击革命群众、迫害革命干部、包庇反革命分子关景东？

我参加桃园四清的五个月工作中有错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没有号召组织大学毛主席著作、强调工作队的作用大，工作队有包办代替、贯彻和宣扬了扎根串连的错误作法和我个人在三同方面有不如其他工作队员的方面等。但，我去桃园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当时中央的第二个十条即关于农村社教运动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才发出，（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间揭发出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后，我才知道这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跑了几个省以后，由彭真、和反革命分子田家英等搞的），我参加的河北省委卢王庄四清工作队和桃园工作组是根据党中央、省委指示，以“双十条”为武器武装群众搞四清的。我们

先后向群众和干部宣讲了“双十条”（草案），桃园四清基本上是贯彻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草案）的精神：即彻底革命精神的，在实践中和我的汇报总结中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讲的。在我们实践中深感后十条（草案）清规戒律太多，妨碍发动群众，也有些不好的干部借此抵制前十条的精神，所以，我一方面向刘少奇反映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反复强调彻底革命精神，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我不知道我在桃园有什么罪行。我的上述错误和意见，对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修改和制定第二个十条（修正草案）有不好影响，在加上其他因素，形成了一九六四年冬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严厉批判的，应由刘少奇负责。受桃园经验和总结中的错误影响的，我负责。

我去桃园前，曾问刘我应注意什么？怎么工作？他答“除了要有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要贯彻党中央的政策外，不要先有框框，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原话见我的汇报总结）他的这个说法我当时只觉很抽象，没有感觉有什么错误，报告中又自以为这个“指示”重要而宣扬过，因为我当时理解党中央的政策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所制定的“双十条”（草案）和人民公社六十条，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关于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等等。我根本想也不曾想到我们党中央的重要政策决定会有不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或有些甚至是伟大的毛主席所不同意的。现在看来，刘少奇为什么当时不指示我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大学主席著作呢？这是刘少奇的严重错误。我虽只带了一套毛选下去，也只是自己读用，与个别工作组员讨论过。向少数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讲用过。而造成我在桃园工作的第一大错误，就是没有提倡和组织大学主席著作，而只广泛、反复宣讲上述各件中央指示“双十条”等，而且宣传过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声音，当时贫下中农就曾反映过“毛主席真了解我们啊！”（原话见我的总结报告），而且在春节后就自动、积极地挂出了毛主席的象片。

在桃园我没有打击革命群众，没有迫害革命干部，也没有包庇反革命。

桃园四清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底结束，工作组撤出的，以后省委又指派了一个巩固组，省委给他们的任务是摸索如何巩固四清的经验和学习解放军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的办法。我曾与个别工作组员谈过，我们四清虽搞得基本还好，但有些人认为捣动买卖，费力小，来钱易，因而资本主义还搞得不够臭，值得注意。一

九六四年夏秋间我接到巩固组寄来的几份简报，有一份讲搞了一次大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但内容不具体。我很想了解他们是如何搞的，经刘少奇同意我又去了一次桃园，大概是九月份。那几天，我住在北戴河河北办事处，找了一些材料看，又分别接来一些工作组员、贫协代表，大队干部谈话。除了好的情况外，发现有的大队却借大反资本主义而反了社员群众。有的大队定出了资本主义形形色色多少样：如拔草喂羊、拆炕积肥等等，有的大队甚至要群众对照检查名为“对号入座”，……这些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凡“认真”执行的，就搞的群众人人自危。而他们罗列的这个所谓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中，如投机倒把、挑轻工、抢高分、……现象，经过四清已经解决了。我曾严肃地批评了巩固组的负责人（发生这段事情时有些巩固组的负责人回天津了）建议他们要认真检讨并应向社员道歉。巩固组的负责人开始思想不大通，直到一九六五年总结巩固组工作时才写了一份不太深刻的检讨。至于各组特别是反社员搞的特别“认真”地方是否向社员做了检讨道歉我就知道了。桃园对借口“大反资本主义”而整了社员，据说还算搞得马糊，只要大家检讨了检讨；但在我去桃园与贫下中农、社员群众代表和干部的座谈会上，我还代替巩固组做了道歉，并批评了这样做是错误的。我没有打击革命群众。

关于迫害革命干部的问题，在桃园四清中只打击了三个人，一个是原支书吴臣是个坏分子，一个是原工委副书记苏长吉（是吴臣上面的根子，当时我们认为他是蜕化变质分子，据说后来查出他有现行反革命行为，而订为反革命分子），一个是原大队会计赵学汉（是个漏划的地主，吴臣下面的根子）。除他们外，在评审四类（地、富、反、坏）中，还斗了一些不老实改造的四类分子。对于其他干部，开始时是叫他们根据“双十条”检查自己的错误、交代问题，改正，以挽救他们，贯彻主席所教导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以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四清是个重新教育人的运动的精神。在他们检查交代时，有些干部态度不老实，曾发生叫干部站着，低头、弯腰，甚至发生有一起一夜不叫回家搞连续作战的事（对四队原队长李克明）。我们工作组当即制止了这样的搞法。这段我们对犯错误的干部虽也有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不够的错误，但后来他们检讨了，改正了，经济退赔了以后，干群关系大为改善，大多数干部是团结对象，另有两名干部因态度不好或问题严重，一个开除党籍，一个给以处分，但未戴帽子，还

是让他们当社员，仍是团结对象。

七月二十四日斗争我的大会上，那位来自抚宁县县大队的原会计的发言中提到我迫害了县水利科长喻仁的事。我在桃园确实批评过喻仁，内容见我桃园四清报告，是否有我了解情况不确而批评错了的情况，可能（因我后来也感到桃园水利投资数太多了，特别在四清后，违背毛主席自力更生的方针），但喻仁对群众态度等等是我亲自看到的，批评不会全是错的。但，是否因我在桃园报告中点名批评了他，而使他在一九六四年冬县直四清时挨了整，或整错了，我就知道了。在县直四清中，清理一次水利投资完全必要，一九六五年夏我在定兴搞县直四清时，就有一个水利科科员经过宣讲二十三条和工作组、革命群众对他做政治思想教育，交出了贪污的七千元（约数）现款的事。当然，如果不对喻仁做政治思想工作，而给他关在小屋里叫他反省，甚至限制了他的自由，如二十四日发言者说的那样，至少方法是错误的。

关于关景东。我们入村时他是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家庭成份中农，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群众和干部反映他的四不清问题不少，但，这个人错了敢于承认。在我和工作组的同志找他的几次谈话中，他比较主动检讨、交代了一些问题，并说了有些事做得不好，好象又不应当算错误。我曾帮助他分析上纲，并鼓励坚决改正（其他大队的主要干部我也分别找他们谈过，他们没有关检讨的痛快，而且有的不想检讨）。在全公社召开的第一次三级干部会（有贫协代表参加）时，我们动员了大、小队干部在会上检讨放包袱，以起个带头作用。吴臣是不想讲的（当时还不知他是坏分子），工作组分工由我着重帮助了关景东和女大队长袁秀英，他们表示愿意检讨，我就要他们各写个检讨稿，稿子我看过，根据他们过去同我谈话的情况，得到他们的同意，我曾替他们修改过。（这是我的错误）会上，有几个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发言（他们是讲欢迎干部改正的话），讲得很好，受到工作队领导的鼓励，对各大队开展四清有推动作用。桃园大队只有关景东在大会上检讨了，袁秀英说她不好意思讲，就没讲。关也是受工作队鼓励的一个。这可能给群众和干部以我保护他过了关的印象，那责任由我负。以后我们工作组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共同调查，与关景东交代的基本相符，大约是双七百（即贪污多占七百元，七百斤粮——均为约数，六百几十我记不清了）。后来，吴臣散布关景东问题严重，我们又做了调查，大体仍是那么多，而且由于他退赔积极，

努力抓生产等等，所以受到从宽处理，而且在最后选举时反而被选为大队长。

关景东这个人我过去认识，可是不记得了。在一九五八年刘少奇、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到抚宁县东方红合作社参观过多穗高粱的高产试验田，长的确实好，受到不少同志称赞，当时基层干部估产数字很高，数字我不记得了。当我们参观养兔场时，当地干部送给我的小孩一对安格拉兔子。小孩们把两个小兔带回北戴河海滨住地，没过几天，一只小兔就因钻到水管里卡死了。我想养不了，再死一只太可惜了，于是我在海滨商店买了一些玩具并带了活着的一只兔子，同我的孩子们又去了一次东方红公社，说明把兔子退回的原因，并在参观托儿所时把买的玩具送给了那里的小朋友。在这次参观中，我给幼儿园的孩子，基层干部和社员都照了几张象。在临走时有个社干部对我说希望帮他们社里买一台电影放映机，他说他们有钱就是买不到。我回家后，报告了刘少奇，他说我们不是有两部小放映机么，一部交放映组（捷克送的），一部可以送给他们，算我们全家加入东方红合作社的投资，以后小孩可以去那里劳动。我不知向我提要求的人叫什么名字（反正不是关景东），只记得有个接待过我们的妇女主任的名字叫陈瑞芝（？），我写了封信给她讲了上述意思，连信及苏联制的一台十六毫米的小电影机一并交由河北省办事处转交。以后，虽曾再到北戴河，因东方红公社离我们住地较远，孩子们是在别的社参加劳动的，就没再去东方红合作社。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东方红合作社改为东方红公社，后来又建立了东风大公社。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冬，东风公社派了两个人到北京向刘少奇汇报，带了公社或县里的介绍信，刘少奇和我见了他们，他们两个人我们都不认识，主要是汇报公社化情况和增产情况，刘听了他们的汇报，我不记得他讲了什么。这两个人中有一个就是关景东，他自称我们参观时他是东方红合作社副主任，公社化后担任什么我记不清楚了。这次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后来听说，河北省委知道当时各公社找负责同志要东西或托买东西的较多，曾以刘少奇的名义赠送给东风公社一只蓝开夏种猪，并告他们不许再找我们了。这就是所谓我与关景东的“旧谊”。在我参加四清时，并不知卢王庄公社卢王庄大队和桃园大队就是原东方红公社。在我参加工作组入村前集中学习时，公安厅同志反映说我去过卢王庄，最好不要到卢王庄去搞四清，工作队领导和我商量后，就挑了个桃园大队，以为既不在卢王庄，又与队部较近，联系方便。那晓得到了桃园不久才知道桃园有好几个干部都是原东方红合作社的，

如赵树春（副支书，四清后开除党籍的）、关复顺（原东方红合作社的治保主任，四清中清出有严重错误）和关景东等。在工作组和我自己同他们谈话后，也发现他们见过我但均没认出我，所以我活动很随便。当有人说过关景东到过我家时，我还不信，后来，与关谈话时，他也谈起，我问了他当时的具体情况，才想了起来。在东方红合作社时，关景东等确有夸大话的地方，我们对多穗高粱也不懂行。以后，参观的负责同志愈来愈多，他们的估产也愈来愈高，甚至发展到县委来抢收时，他们大搞了弄虚作假。这些情况，是关景东和其他原东方红合作社干部在四清后期向我讲的。刘少奇和我并没有欣赏过他们的浮夸和作假，更不会因此而包庇关景东。

至于关景东是否是反革命分子，我们在桃园时，他肯定的不是；是否他在担任大队长后堕落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看不象，因不断有人到桃园去，桃园也常有人到省里开会，还有些人到定兴县来过，我都问起过桃园情况，大家反映关景东还不错。当然他不是最好干部，支书卢伦政治上、生产上比他更好。至于他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什么错误言行，我就知道了，如果做了够得上反革命分子的事情，就该定为反革命分子。

问三：戚本禹同志评《清宫秘史》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哪些不符合事实？你为什么反对对刘少奇的大批判？

戚本禹同志这篇文章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批判得好得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的。对照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清宫秘史》剧本来看，更感到戚本禹同志的批判是抓住了该电影的三个要害问题：怎样对待帝国主义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事实、有分析、上纲很尖锐明确，文章也写得活泼，符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多次教导的写文章的要求；鲜明性、严肃性与生动性（原话我记不清了）。

戚本禹这篇文章不仅是评那部影片，而主要是揭发和批判刘少奇的。我完全赞成对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建国十七年以来的错误和几十年来他的一切错误言行，一切违反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狠批、批透。把他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所散布的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彻底批倒、批臭；以树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各个领域里的绝对权威，使我们伟大的红色祖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并为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树立良好的榜

样。

我对刘少奇辜负了我们伟大领袖、党中央、全国人民的重托，未把工作做好，说过许多错话，做了许多错事，甚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有些话，有些事，简直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失，刘少奇应向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受他的错误路线伤害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请罪，向受他蒙蔽的革命干部请罪，向全国革命人民请罪。

但是，我还没有认识到刘少奇是个“假革命”、“老反革命”、“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吃人的野兽”、“蛇一样的恶人”……。我愿努力提高认识。我相信伟大的毛主席是最了解刘少奇的，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亲自领导的、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群众，对什么事都能调查清楚，并给以正确的结论。

对戚本禹同志上述文章，在清华大学革命小将审问我时，以及在家中几个小孩向我们进行面对面斗争和质问时，我都讲过有些事实可能有调查不周之处，不符合事实。但，未详细讲，现将我的这些看法向中南海的革命群众交代如下：

一、胡乔木说：“少奇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我就不大相信。我是同刘少奇一起看这部电影的，当时不知谁动员他看的。说是香港片在北京已上映完毕就要拿走了。当晚恰在毛主席处开会，开完会已后半夜，有几位负责同志（可能也有胡乔木）一起看的，看到后半部，天已大亮，看不清楚。在看电影时，和以后多年，刘少奇从没有向我夸奖过这部影片，更没有说过是“爱国主义的”。大概在二、三月间我从乔木处革命群众所写的大字报中，看到乔木借刘少奇的话，使《清宫秘史》广泛上演、大为宣传、压制批判等情况。那时刘少奇生病或生病刚好，是我一个人去看的大字报，我看了非常惊讶，回来就质问了刘少奇，他说他没有说过。戚本禹文章出来后，我又钉问过他几次， he 都说肯定没有说过。即使他没说过，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严重错误的。虽只看清的半部，为什么没有发现有问題，留下片子认真看看。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批评了“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刘少奇为什么不督促和重视对这个片子的批判，为什么不找中宣部或文化部等管文艺宣传的负责人调查一下，主席所说的“被人称为……”这个人或这些人是谁。我不知道刘少奇当时是怎么看

法，但，仅只这种不重视毛主席的亲笔信件指示的态度就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二、关于刘少奇讲“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我先是由大字报和造反报上看到过这个说法，就问过刘少奇，他说根本没讲过，这次戚本禹文章又引了这个话，我又问过刘少奇，他简单地答复我：肯定没讲过。我同他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二十年中，他没有讲过这个话，也没有讲过带这种意思的话。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或一个略有爱国心的人（爱社会主义之国的人），也讲不出这类的话；反之，如果刘少奇是个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他更不会公开讲出这样的话，那不也太露骨了么？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是很重要的，很有分量的，而且，引用这句话还用了引号。不知是引自什么人的揭发材料，我百思不解。

三、关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据我了解，我们党对富农的政策在每个历史时期政策是不同的。在第一、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是“打土豪分田地”农民主要的打击目标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那时的土地革命可能对我们红色政权巩固的地方，对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是采取没收分配的办法。抗日战争时，为了争取更多的人与我们一起抗日，采取了减租减息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自我党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后老解放区由减租减息改为搞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我参加的一年土改中，对富农是没收和征收其土地和多余财产的。全国解放后，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主要是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党中央曾决定改变我们对富农的政策，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保护富农，以安定中农，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记得一九五〇年党的三中全会上，对这个问题曾有过讨论和结论，并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原话我不记得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里也是这样定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法报告也讲了这个问题。（原话我也不记得了）后来实践证明，有的地方土改中，富农的土地、财产是分了的，有的地方实行了保护政策，但，在以后的土改复查、合作化运动中，实际上对富农还是动了、分了。在一部分和平土改区，漏划的富农、或被保护了的富农问题，在四清运动中也进行了民主补课。所以，所谓“保护富农”只在一些新区暂时保护了一个短时期，根本就没有按“长期保护富农”去做。如果刘少奇在土改报告中，有与三中全会决议不符合的，应由刘少奇负责，如当时，决定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和理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刘少奇也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他做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意了这种政策改变并做过报告。但，我记得这个政策的改变不是刘少奇提出的。即使如此，如果刘少奇特别欣赏这项政策的改变，而到处大肆宣扬，也是错误的。

革命群众既要我交代我在那些问题上想不通，我如实地向革命群众交代了我的意见。我到现在还相信刘少奇不会说谎话，所以，我是过分地信任了刘少奇，也过分地相信我自己这些年看到和听到事，老使我扭不过弯来。我承认，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水火不相容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针锋相对的，绝不能调和。所以，我同意对刘少奇展开大批判。

我对刘少奇是有个认识过程的。我经常接触的刘少奇，过去给我的印象似乎是“紧跟毛主席的”、“埋头工作，忘我劳动，一切为了革命”，而现在大量事实证明，他经常违背毛泽东思想。我曾想过刘少奇是否象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讲的那样：“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而如果刘少奇是这样的人就绝不能做负责工作，应将他拉下马，让他靠边站。最近我又考虑，刘少奇过去比我们一般干部，接触毛主席机会要多得多，直接听到主席的指示要比一般干部要多得多，而许多重大问题他也是请示报告了毛主席的，但，为什么他不能正确地传达、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正确地运用毛主席的思想呢？而实践中不是这样，就是夹杂他的私货？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毛主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马列主义现在已进入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思想体系，而刘少奇因为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他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决定了他不能正确地贯彻毛泽东思想，经常违反毛泽东思想，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他若是这种情况而又死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放，就应该把他打倒，并且彻底肃清他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所散布的流毒。并经过对刘少奇的大揭发、大批判，在各个战线上树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我现在就认识到这个程度，望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帮助。

问四：为什么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写了多少回忆录？都是什么内容？保存了

刘少奇哪些实物？

答：在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同刘少奇结婚后不久，有一次我曾向刘少奇提出要求，希望他在休息时给我讲讲他过去多年的革命斗争经历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了解他和学习他，一方面我也想将来把积累的材料写个传记什么的。当时，刘少奇即严肃地向我讲：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应从我今后给党做的工作了解我。不要写我的什么，不许记录我的材料。你也写不了什么，你既还不了解我们党的许多基本知识，又缺乏实际革命锻炼，还根本不了解我们党的历史。写不了，写不好写了也没用。我当时是完全从正面去理解他这些话的，还以为他很“谦虚”，而检查了我自己怎么那么轻妄和而不自量。他的这些话，到现在对我还有影响，妨碍我认识他的本质，也就是直到现在我还不能认识到刘少奇是个大野心家的原因之一。

以后二十年来，他的确很少向我和孩子们讲他的历史。只有在随刘少奇到各地时，他的老战友们和他谈起过去在某地学习和工作时，我听到一些；有些旧谊亲友同他谈话时他说一些，偶尔大孩子们问到个别事情时也说一点，这些我听过一些。只有一次他和我谈过他的家庭、幼时学习，五四运动时期到北京，后又去保定育德中学半工半读、去上海俄文补习班后中国共青团（C·Y）派他去苏联学习等情况。那是在一九五几年我忘了，我靠回忆零乱地记在一个本子上了。这个本子是个黑色皮活页本，原在我办公室的柜子里，前几个月开始清交文件时，我把它拿出放在我办公桌左角处，原准备拿出再看看，后来因看批判文章，几次写检讨，也没顾得看，都记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请查我那个本子。

过去档案馆曾要我问刘少奇过去曾用过什么笔名，他说他也记不太清楚了，他说了几个，我转告给了档案馆，我自己也留了个底子，是否夹在上述本子中或在那个抽屉中，记不清了。

随他外出时，听地方各同志汇报和刘少奇插话时，我曾做过记录，都在我的笔记本上，因刘少奇不许我整理，我也没有整理过。

刘少奇到各地讲话记录，有的地方给过我，有的是机要室给我的，前些日子清文件时，我曾汇集了一些放在刘少奇办公室的圆桌上，准备供他清理思想之用。

去各地视察时，有的地方有公开报道，我前些日子曾从办公室旁小屋中清出一部分，准备清理思想时用，还未来及看，现在我床头一堆报纸下面。

我到乡下工作两年间，刘少奇给我的信，和去前，回来时给过我的指示，有的经回忆记在日记本上，有的记在零碎纸上，夹在两个本子中，是黑皮笔记本，都在我办公桌中间的抽屉中，但，那本子中夹的，不全是刘少奇的话。

在我下乡工作的两年中，刘少奇说孩子们由他管，他曾同几个大孩子谈过几次，有的他的大孩子刘允斌曾做过回忆记录。有时我在场时，我也简单记过一些，做为我改造思想之用。这些均在我办公桌右手的抽屉里或在桌子上。

经我保存的还有刘少奇过去的一些报告，文件的手稿，都在我办公室的黄色柜子中。

过去刘少奇用过的东西，我保存的有他少年时读的一套古书（名叫凡纲鉴），是我一九六一年到湖南宁乡花明楼时看见的，因刘少奇不叫在那展览，我说由我保管就要了来。这套书我没看过，原想看看，没读成，只翻了几处刘少奇加过圈点处。这套书现在我办公室黄色柜子中。另，我同刘少奇结婚时他的东西，保留下来的只有三件，一件是灰色布面羊皮大衣（一直在卫士同志处保存），一只旧表，一只旧钢笔（大概都在我办公桌中间的抽屉里）。

问五：为什么要两次销毁罪证？销毁了哪些东西？

我销毁了一些东西，不只两次。对党是犯罪行为。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行为。是没有彻底革命决心，对彻底揭露自己丑恶灵魂怕痛，不管动机如何，为了怕多出丑反而增加了错误，使事情复杂化，更出了大丑，甚至是犯罪行为。现将我几次销毁的内容和大体时间交代如下：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底九月初，我处理了一些清华工作组时的材料：有学生写的揭发、交代材料，如新水楼会和荒岛会议等材料（均系复写的），还有校、系工作组编的动态（印的）。是我分两批撕毁由抽水马桶冲走的。

（其余清华大学工作组发的材料中，关于揭发和整理校党委的材料和我们工作组内部材料、大字报选编等，均在十月下旬（？）经总理办公室转工作组叶林同志了。）

在一九六六年底或一九六七年初，我撕毁了一些旧象片，把我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产假时贴过两本象片本，我又翻看了一遍，撕掉了一些象片，分两回冲走的，以后我又翻看了一些零散的象片，又撕了一些，也冲走了。其中，有我小时和学生时代的照片，还有几张一九五二年陪同刘少奇在苏联休养时的照片等

等。现在象片本和其他很多照片均放在我床头小柜里。其中小孩子们的照片本是他们自己整理的，我的清理，是在他们清理以后一段时候。零散的照片很多，我只看了一部分，都有些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另，在我办公桌抽屉里还可能有些，办公室旁小屋柜子里还有一些。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即马桶堵塞那次，我是冲了一些小孩子们过去演“采茶捕蝶”、“织女穿梭”等节目用的一些假饰物，如项链、别针和假花等，还有刘允斌送我的一个淡蓝色项链（玻璃的）和我在一九五二年去苏联时带的一个假别针。原来这批东西，我在破四旧时曾说过什么时候我清交保育员和孩子们去处理，那时因我经常在写检查没找出，在清华革命闯将“智擒王光美”以后我感到还是扔掉好。

在四月十日清华大学斗争我以后，我把清华学生过去给我的来信清理了一次（也不全），把七月底、八月初保工作组，和写给所谓“敬爱的王光美同志”的信，连信和信封全撕了，冲了两回。以后我又清了我去清华工作时带过的小灰箱子和黄背包，又发现有一些思想不通（当时的保守派写给我的信和条子）我又撕掉冲走了。

最后一次，即七月十八日，我发现在我桌子上还有一封信，过去看过没撕，那大概是十月左右，重庆大学一个学生给我写的信，转抄了两份清华南下串连会在重庆给我贴的大字报。我当时看后在信封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好像是“寄来两张大字报”或“抄来两张大字报”。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四月清理一部分信件中，就没有看它。十八日我拿出一看，其中也有写给所谓“敬爱的王光美同志”的一封信，意思是说清华的这两张大字报在重庆山城引起轰动，他联想到重庆的情况，觉得不可能或有怀疑，要我回信给他。信内有他的系别和名字，我记不得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他那时想不通也不奇怪，但，我当天听说要面对面开会斗争我和刘少奇的情况下，感到我的问题更严重了，还是少牵连一个人为好，我把这封信拿出和另一张别人给我抄的大字报（即匕首两只）一齐撕了，冲掉了。原来想把信封扔在厕所的纸筐内，后来又看到有王光美同志亲启的字样，就叫我给撕得粉碎扔在厕所里，还未来及冲下去小贾同志就闯了进来。碎片我后来捞了出来，要交给南海卫东造反派，他们不要，我就把它晾干后包起放在衣袋里，十九日我发现这个小包没有了，据值班同志说已交给革命群众了。原来写的两张大字

报在七月十八日这件事发生后，我交给南海卫东造反派李智敏同志了。我原想少牵联一个人，这个人我又不认识。但，因为事情恰恰发生在知道要斗争刘少奇和我的那天上午，不能不引起革命群众怀疑这个人与我有什么特殊关系。现在信封、大字报均在，终可查清是什么人写的，这个人当时对我犯了严重错误有怀疑，并不奇怪，最多不过是个保守派的学生群众，也许他现在已是造反派了。我和他有什么特殊关系，也是不难查明的。我现在也没法解释为什么当时要撕掉这封完全不应扔去的信。办了极蠢极蠢的事。

撕毁和冲掉上述这些东西的思想动机和行动都是极端错误的，我没话讲只能向革命群众、向党、向伟大的毛主席低头认罪。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王光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夜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彭真给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的信
北大革命委员会：

我廿四日参加北大群众斗争大会，会后即决心努力争取三天把检讨认罪书写出来，至少先写出个初稿，再作修改。但事与愿违，实际怎么也不可能做到，因为北大群众斗争我的大会，第二天、第三天接连是工人、农民方面，群众斗争我的大会。今日上午、下午是政法方面群众斗争我的大会。我的脑筋、精神，无论如何，不能不跟着群众斗争我的大会跑，会后，我既竭力把思想集中到北大问题上，但总是不能很快集中，而是感到脑筋很迟钝，发木，工作效率极低，同时体力也来不及了。中间只有二天（廿七、廿八）没有参加群众大会，一天我奉命继续写前几天党中央办公厅要我写的材料，昨日才集中精力写关于北大问题的检讨，只写了一部分（初稿），现遵命送上一阅，这一部分我自己觉得需要重写（意

思还要用)，需要把我在北大问题上所犯错误，通盘考虑后，才好一气写下去。如果明后日没有群众斗争大会的话，我努力争取写出，至少争取写出个初稿，但时间确实太紧了，很不够。因为我不愿意匆促地敷衍了事地写检讨给你们或中央。我请求延长二天到三天时间，不知可否？因时间紧迫，初稿和信都写得很潦草，原谅。

此 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彭 真 1967 年 7 月 29 日

此系一段初稿。还要改写，现遵命送上一阅

工作组在北大进行工作时期，我的主要错误罪过是支持陆平等人的领导，既包庇陆平等，同时压制了北大的革命群众，压制了阻挠了已开始起来的群众运动。我在北大所犯的错误罪过，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或仅在一些个别性的具体问题上的错误，而是一种根本性质的错误，特殊性质的错误罪过。实际上，我当时不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是实行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政策，是实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动政策。是以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为指导。这样我就在当时北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站错了边，站错了部、走错了路、堕入了群众革命斗争对象的泥坑，反动窝子了。根本问题错了，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言论行动中，既不可能不错。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我当时实际上就是实行的这样的政策。这样，许力群、邓拓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的工作错了，都做了坏事，犯了错误罪过。当然，他们各有他们的责任，但工作组和国际饭店会议的主要责任在我，主要罪过在我，因为他们在上述错误、反动的指导思想路线、政策下进行工作的，而这种指导思想、路线、政策——它集中表现在对当时北大领导陆平等人的态度即方针上。这虽然是集体的意见，但在确定时，实际是我起决定作用的，而且我又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所以错误、罪过的主要责任在我。当然，我不是说，北大问题上的一切错误，都由我一个人包下来，不是，参与北大问题的其他犯错误的负责人，各有各的责任。但不管他们对错误的责任大小，也不管我对解决北大问题的具体工作参加得多少，都不能减轻我的罪过。

(七) 一九六七年八月公开发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年前的今天，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日子。

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里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以集中的火力，炮打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张大字报，揭露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在党内，有个隐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张大字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进军的号角。

《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豁然开朗了。原来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存在着两个根本对抗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对抗和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深刻的斗争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曙光从地平线上一升起，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能出发，预感到这场革命敲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覆灭的丧钟，他们就拚死拚活地进行疯狂的挣扎。

长期隐蔽在党内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打着红旗作掩护，埋伏在毛主席的身边。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活动，上层下层都有，上层是主要的。最大的危险就出在上层。苏联出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全国很快就变了颜色。前车之覆，不可不鉴。

隐蔽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由一小撮混进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互勾结拼凑而成的。他们是窃取实权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国家机器，一部分党权，一部分政权，一部分军权，在很大的程度上掌握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其他如彭德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文的，有武的，有抓党权的，有抓笔杆子的，有抓枪杆子的。总之，他们的手伸得很长，凡是搞反革命政变、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所需要的一套，都拚命去抓，抓住不放。对于这样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如果我们无产阶级丧失警惕，麻木不仁，任其存在，听其发展，那就会象毛主席所尖锐指出的，“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们最伟大的天才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在我国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的关键时刻，尖锐地、深刻地洞察了党内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部颠覆阴谋，准确而及时地捉住了他们的反革命黑手。

毛主席研究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的历史教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动员亿万群众，揭露和打倒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就是要彻底摧毁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代理人，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最伟大创造和最新发展。

经过天翻地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拉下了马。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得七零八落了。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他们还在利用力所能及的影响，蒙蔽一部分群众，纠合保守势力，进行疯狂的反扑。最近在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就是一次大暴露。

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我们必须懂得，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已经被剥夺了，但是，他们长期以来所推行的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很深，影响很广。如果不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以中国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可能死灰复燃，还可能利用他们政治思想上的影响继续地毒害人民群众，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现在，这些顽固的阶级敌人不是还在负隅顽抗，疯狂反扑吗？因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就是给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最彻底、最致命的摧毁。

我们必须懂得，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斗，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绝对领导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应当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真正做到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战斗到哪里。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团结广大革命群众，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建立新的伟大功勋，把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
中南海的革命群众：

在八月三日批判斗争我的大会上，革命群众要我就五个问题，做出检查交代。

现已写出，送上请审阅。

由于我所犯的许多错误和严重错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为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我愿再一次向革命群众、向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向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太阳毛主席请罪。

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付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王光美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一、关于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的错误。

1963年11月底到1964年4月底参加桃园大队四清革命中的错误：

1、没有在运动中号召和组织干部、社员和其他工作队员们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而只是反复宣传党中央的“双十条”（草案）、党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即十二条）、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六十条和发展农业生产纲要四十条。我们当时认为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敢想过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搞的。我们在运动中主要还是贯彻了第一个十条（草案）的精神，但没有随着运动的进展组织大学毛主席的其他著作，促使群众和干部思想革命化，把四清搞得更好，使经过四清革命，在群众和干部中真正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

2、过分强调工作队的作用。

我参加的河北省委试点工作队人数很多，因它既有试点摸经验的任务，又有培养干部的任务。大工作队必然会发生包办代替的错误。我在桃园四清总结中，又加以宣扬，影响各地在1964年冬搞大工作队的错误。

3、过分强调根子要扎正，基础要打好，采用了第二个十条草案中扎根串连的错误作法，虽然我们是在向群众、干部大讲双十条（草案）时，同时物色根子

的，仍有神秘化的作法。在一个被坏分子把持的党支部领导的大队中这样做有一定的必要。我在桃园总结中对扎根串连讲得很具体，对错误的扎根串连作法加以宣扬，造成了坏的影响。

4、我个人在“三同”方面有特殊化，有的方面有不如其他组员的地方，造成不好影响。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中，批评了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倾向。我理解是指1964年冬至1965年1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的一段时间发生的问题。那段时期在全国四清运动中较普遍地存在着形“左”而实右的倾向，主要应由刘少奇负责。

其中受桃园经验错误影响的部分，我负责。我认为，桃园经验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也不是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

我去河北参加四清革命是刘少奇叫我下去锻炼的，并没有要我下去摸经验的意思。离京前，我问过刘少奇下去该怎么做，他简单地答复我几句，就是桃园总结中引的那几句，“除了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思想、方法，要贯彻党中央的政策以外，不要先带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当时因不理解这句话的意义，也没有向工作队负责人传达，直到总结时，才讲出。刘少奇没有指示我好好贯彻毛泽东思想是他的最大错误，但，我不认为他所说的不要带框框的意思是不要毛泽东思想，因为他要我贯彻党的政治，而四清中的主要政策文件，即双十条（草案）等，我们当时，都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而第一个十条（草案）明明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而我们在桃园时，也主要是贯彻了第一个十条（草案）的放手发动群众，以彻底革命精神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理解刘少奇讲的不要带框框，是要我不要再先想好下去会遇到什么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我在八月初，在清华大学工物系一个班参加批评工作组的辩论会上，也曾讲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框框。

以后，我又搞四清的几个地方，基本上是贯彻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和第一个十条（草案）的。但，我没有完全否定第二个十条（修正草案），有时还采用了其中的一些有关政策界限规定。在我参加的一些讨论四清工作部署的会上或我修正定稿的工作计划或文件中，大都讲是以二十三条为纲，以“双十条”的有关部分和其他文件和随着运动的进展大学主席其他有关著作来武装群众和

干部。因为，我当时只知道第二个十条太长、有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等错误。不知道党中央已否定这个文件，而二十三条前的通知中有一句：“过去发出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我一直认为第二个十条中，还是有些不与二十三条抵触的部分，仍有用。这是我的错误。

在 23 条下达前，1964（年）冬季河北新城的四清，确有形“左”实右倾向。大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片面强调根子要选正，而使工作组员不敢接触中农，不敢接触干部，领导上反复强调沉下去，再沉下去，以致缺少革命声势。宣讲 23 条，都是给贫农、中农、干部分别宣讲的，而且要干部（除由少数干部同工作组和贫下中农组成生产班子抓生产外）集体学习二十三条，普遍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缺点，给干部很大压力，等错误做法。我因有外事任务，下去较晚。我曾向保定地委总团反映并研究了改进的办法。以后，我立即回北京向刘少奇汇报了新城情况（因那次下去以前，他曾要我两个月内不许提意见），他同意了我们的打开局面的一些办法，但，新城发生的问题，并没有太引起他的注意。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时，他还认为保定地委工作团的这一段错误原因来自华北局的某个领导同志的指示，而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二十三条，才扭转了那时在全国四清运动的形“左”而实右的倾向。在看了毛主席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个光辉的历史文献以后，刘少奇才认识到 1964 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主要来自他的错误指导思想。

新城的四清在毛主席批评后，立即召开了几次万人大会贯彻二十三条的精神并将工作队一分为二，分出一半去涿县搞四清。以后的几次四清我认为基本上是遵照二十三条进行的，但，仍存在工作队大，有包办代替等错误。我个人在三同方面较之在桃园有些方面做得更差些（如：因我生了浮肿病，查不出原因，去社员家吃饭时，我自带了碗筷等），影响很不好。

关于 1966 年初，人民日报发表的江苏省方巷大队在社教中如何学毛主席著作的报导和短评。我对这两篇文章的看法，上次就做过检查。我认为是关于如何在四清革命中学毛主席著作的方法问题之争论，也就是如何贯彻林彪付主席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指示的问题，却造成我反对在四清革命中学毛主席著作的错觉，我不想再辩解。

二、关于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参加北京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期间，忠实地推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清华大学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镇压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首先我一参加工作组，就站在工作组的立场上，想各种方法巩固工作组的领导地位，以一些不适合的框框条条限制群众运动，以我们主观设想的搞法去要求群众运动，自然遭到革命闯将们的抵制；接着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方面，把一些非主流的事情当为主流；提出“排除干扰”的错误口号，把一些革命小闯将当做“假左派”，并提出与之辩论，必要时反击的完全错误的决定。这样，就发生严重的学生斗学生的事件。从6月24日到7月12日一段时间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特别对三次全校性的辩论和批判学生的大会，我亲自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对蒯大富同学六月二十七日的辩论会和七月八日批判会，对王铁成同学七月十二日的批判会）由于这三次全校性大会，在全校群众中造成极不正常的压力。我在七月初参加组织批判蒯大富同学的准备工作时，向工作组领导和当时的文革筹委会主任等都讲过要通过我们在运动中揪出的黑线人物和跳出来的“假左派”做为活靶子，通过对他们所反映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言行进行批判，通过批判极少数以团结、教育、提高大多数（群众、干部和我们工作组自己）。这样就把当时怀疑工作组，要向工作夺权的蒯大富同学当成了活靶子去批判。这些严重错误的主要责任在我。由于我片面强调提高辩论和批判的水平，层层选拔大会发言人，并在大会前召开了练兵会，既造成各系各单位大抓“蒯”式人物，又对群众施行了国民党的“训政”办法，发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错误，是不相信群众自己能解放自己，又没有虚心去当小学生向革命群众请教。由于这三次批判大会所造成的极不正常的压力，不仅伤害了被批判的蒯大富、王铁成、刘泉、陈继芳（后二者是在他们本系批判的）等人，并发生了不允许蒯大富同学半夜时到中央办公厅接待室而逼得他绝食抗议。在这段时期内还发生了一位青年教师史明远自杀身死和学生朱德义轧（卧）轨自杀伤一腿的严重事件，更为严重的是压制了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我应向革命群众请罪、向我们伟大的党请罪、向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错误确象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严厉批评的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轰轰烈烈

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在这段时期，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之道而行之，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

清华工作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我负重要责任，上述那些重大错误我负主要责任。我们工作组是属北京新市委直接领导的，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也有一定责任，但第一位要负责的是刘少奇。因为：

（一）是刘少奇所主持的中央常委汇报会议上决定匆匆忙忙地派出大批工作组，而又没有对工作组派出后如何工作给以正确的指导，并同意了一些错误汇报和意见，做了不少错误指示。

（二）在大批工作组派出后，在去年六月九日至十三日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曾指示“不要匆匆忙忙地派出大批工作组，不要怕乱，乱了以后，再一分为二”。（这个指示我是离开清华大学以后，从揭发某些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时才知道的，原话可能不准确）刘少奇当时为什么不请示主席，已派出工作组应如何办？为什么回北京后，刘少奇不在他主持的常委汇报会上研究如何贯彻主席这个指示。在工作组受到革命小将较普遍的抵制以后，还不考虑是否工作组的工作有问题，反而同意了“排除干扰”的极端错误的意见。如果是对毛主席的上述指示的意义不理解，为什么不能按林彪付主席所指示的那样，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以后，陈伯达等同志一而再地提出撤销工作组正确意见，刘、邓又根本听不进去，未加考虑，即给回绝了，这又是怎样的不尊重中央文革领导同志的不同意见啊！直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回到北京，才亲自决定有问题、没问题的工作组一律撤销，并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亲自扭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航道，亲自写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最光辉的革命文献“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亲自主持制定了伟大的革命的纲领“十六条”决定。

（三）刘少奇叫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是六月十九日，那时他的意见是让我先去看一次大字报，再参加工作组，补办手续，如可以住，当晚可住女宿舍。我当晚没住成，六月二十一日参加了工作组。虽然，他叫我去是为到第一线去锻炼，当时交代我：（1）下去同群众一齐搞好文化大革命，经受锻炼；（2）联系一个班或一个系；（3）反映些情况。但是，他为什么在主席讲过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

的指示以后，还同意我参加工作组，而又没有向我传达主席的指示。在七月二十左右，陈伯达同志曾找我谈了一次话，除谈了些别的问题以外，着重谈了对外文委和广播学院发生情况，说他们斗了第一批揭校党委的学生，并把他们订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把他们的后台追到林杰同志等人身上，并说这不是个别现象。我当时，不仅不觉悟到清华大学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反而讲了清华大学的情况与那两个单位不一样。我讲了：我们工作组在不让蒯大富同学上中央接待室，和以保护为名限制了他的自由，是错误的；但，蒯不是反校党委的，对他进行批判还是必要的，而且我们也没有把他订为反革命分子，现在我们已进入批判校党委等等。我坚持了我的错误看法，辜负了伯达同志对我的帮助。而在我后来简单地向刘少奇报告了伯达同志找我谈话后，刘少奇也没有告诉我伯达同志曾提出过撤工作组的意见。

（四）在我参加清华工作组的四十多天里，我几乎是每夜回家住。我常常零碎地把我在清华大学接触到的情况和意见和我个人的意见告诉刘少奇。刘少奇发表意见较少。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刘少奇确实批评过我们，并鉴于我们在辩论中发生的问题，要我们拟出个辩论手册，以保护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但，他在我们搞“排除干扰”，批判蒯大富同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都没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刘少奇是同意我们的基本做法的。直到知道中央文革有些同志对蒯大富同学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时，他还集中看了清华工作组编辑的一些大字报选、清华工作组长的几次讲话，和清华工作组写给周总理的关于蒯大富问题报告草稿，七月二十日左右还去清华大学看过一次大字报。直到七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时，刘少奇和我还认为清华工作组是属于错误不大那类的工作组，根本就认识到是他经过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

我讲上面这四个方面，来说明对清华大学工作组在文化大革命犯严重错误中，刘少奇所负的责任，并不是想推卸我的责任。因为，我所经常反映的情况，多来自工作组领导、当时我们所依靠的积极分子和我个人的意见，而我反映的错误情况和意见，恰恰同刘少奇在当时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汇报会上听到的情况和意见比较一致，因而使他同意和批准了一些重大的错误意见。在这方面，我是起了坏作用的。

关于我犯严重错误的根源，几次检查已讲过，根本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

得到改造。没话可以再讲，只有今后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三、关于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那篇文章的看法。

我上次已写过材料。

戚本禹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我读过他几篇非常出色的文章和报告。“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对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批判得非常好，从三个根本方面：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批得深、批得透、击中要害。文字写得非常生动。

关于刘少奇是否说成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问题，我过分地相信了我自己和刘少奇。觉得他不可能说过这个话或给过这样的评语。这是我的错误。

刘少奇看这部影片时，是已在北京上映完毕，据动员他看的人说第二天就要拿走。我怎么也想不起是什么人动员他看的了，而看前和看时也没有人向他反映过对这部影片有争论，更不知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对这部影片已提出严厉的批判。现在我仍然想是否有可能是赞扬和欣赏这部反动影片、反对江青同志正确批评的人，故意动员刘少奇看的。而刘少奇看了没讲话，他们也就用刘少奇来抵制江青同志。

即使刘少奇没讲过反对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严重错误的。

（一）虽然只看了前半部，为什么没有看出这是部反动影片，和不应让这样坏的香港影片在全国上映、毒害人民。他过去看电影和看其他文娱节目，很多次都是别人或我和孩子们在他因病休养时或工作较多时要他休息一下而动员他看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我讲过选些轻松愉快的片子给他看，而不是让他审查片子。对一些很坏的影片他也提出过批评，但，大多数他都不发表态度。而鉴于他当时在党内工作的身份，他一看过，别人就可以说刘少奇看过或审查过，而造成不良影响。在这方面，我认为有两大错误：（1）对于电影、戏剧……是很重要的阶级斗争的武器，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无产阶级的宣传武器，就是资产阶级的宣传武器，长期认识不够。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后，虽认识有所提高，却没有引出应有的教训。（2）我曾长期有过这种想法，对我们

一般党员、群众和我的孩子们应多看受无产阶级教育的片子，而对我们的一些负责干部，他们似乎不会受不好的文艺节目的坏影响和腐蚀。他们看看各国、各种影片和文艺节目，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各国的、各阶级的动态。好象看“内部参考资料”一样。刘少奇可能也有这种错误想法。

（二）在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明确提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以后，为什么刘少奇不找当时主管文艺电影方面的负责人调查是谁称赞了这部反动影片，并阻挠了对它的批判。为什么不请示毛主席是谁称赞了这部影片，并就应该如何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请主席指示。据揭发材料讲，毛主席以后还讲过这个问题，刘少奇一直未领导和组织对这部影片的批判，确实到了雷打不动的程度。对待毛主席的指示，采取这样不认真的态度，不管他讲有什么理由，也是不能容忍的。

刘少奇在许多报告和讲话中，虽然也多次讲过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宣传工作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革命战线；但，他对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不仅不抓紧，反而由于我上述他的种种错误态度造成了文艺界资本主义思想大泛滥，这里也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也是没有得到根本、彻底改造的。

四、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刘少奇曾在一九四六年初，做过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我没有听过，也没有听过传达。根据揭发，和八月三日斗争我的大会上，一位革命群众叫我念一些内容来看，刘少奇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是极端错误的，说什么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将要到来，鼓吹议会道路，散布对国民党匪帮的和平幻想，说要对我们的军队采取整军，并改变我党对军队的领导形式等等。我现在认识到刘少奇的报告是极端错误的，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不仅是讲错话的问题，整个讲话的精神是极端错误的，是右倾投降路线错误。而过去我曾认为这是一篇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对我党当时面临的形势和整个工作的安排的报告；而这样重要的报告，关系到我们全党工作形式的改变，刘少奇怎么可能不经过党中央讨论，而只讲他个人的意见呢？当时，旧政协才开完，停战协定刚发表，我党和国民党匪帮均分别发表了停战命令。我曾想是否在多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国内外均有许多国要求和平，我党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抓住和平、民

主的旗帜。如果，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由于国际国内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党的努力，使蒋匪帮还不敢发动全面内战，或拖延内战爆发时间，或只限于局部的范围内，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如果，经过我们努力而国民党匪帮仍胆敢发动全面内战（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而且它对反共内战从来没有停止过），将更清楚地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它们的反动面目。所以，当时，我党曾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分析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的地位，我党也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并准备如果这种可能出现，我党应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而且准备做一些让步，如让出一些解放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的军队，……。在我党采取了这些妥协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它。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赴重庆参加谈判是取得巨大胜利的，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间，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威信大大上升。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中，在讲到国共谈判时，除了讲“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从来都强调蒋匪介石和国民党匪帮的本质就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的。“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就是为了争取和平”。“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守，不能交出去”。“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那个时期，为了争取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在公开的讲话、协定、命令……中，我们党着重表示我们坚持和平、民主的愿望，是正确的，对革命事业是有利的。刘少奇做内部报告却只讲谈判、议会道路一种可能性，而不讲两种可能性；而把工作部署和工作方式完全按可能存在一段“和平民主新阶段”去安排；既散布了和平幻想，又给我们的实际工作造成严重损失；在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他做这个报告，并没有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批准，那么，在组织上也是极端错误的。怎么能对这样关系全局的形势分析和全部工作安排的报告，擅自去讲呢！也太胆大妄为了。

基于上述我曾存在一些错误的看法和认识（即这样重要的报告，不可能不经

过中央讨论等)，在革命群众追问我时，我的答复，必然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作用，这是我的严重错误。

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一) 在一九五零年或一九五一年初，山西省的王谦有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刘少奇看后，加了个极端错误的批语，发给了马列学院第一班毕业生。批语中说“把农业互助组提高到农业合作社，以此做为新因素，去战胜农业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批语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据我回忆，他当时的工作和思想情况。他正组织和领导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强调打倒地主，有的地方搞的是清匪反霸斗争，使贫下中农翻身，保护农村资本主义——富农，以稳定中农，有利于农业发展，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孤立最主要的敌人：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他那时满脑子广大新区的情况，而且赞成保护富农。使他完全忽视了在老解放区把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极重要的示范作用。他的这个批语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二) 在组织合作社问题上，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二年他比较注意强调先组织供销合作社。强调了在流通环节上的合作化的重要，而忽视组织生产合作社是错误的。强调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有了强大的重工业，有了农业机器，才能组织集体农庄，搞农业社会化，因而对农业社会化曾认为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因而，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一直是保守的。

(三) 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广大农民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原定计划。在这种新鲜事物的大大发展中免不了出些偏差，也是不难纠正的。而当时有些舆论反映认为合作社发展太快了，引起不少问题。在一次刘少奇主持的西楼的中央常委汇报会上邓子恢集中了反映了这种意见，认为合作社的大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等等错误论调，刘少奇不仅对此没有痛加驳斥，反而同意了对农业合作社“适当收缩，停止发展”的错误方针，因而就发生了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的严重情况。大大挫伤了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刘少奇要负责的。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上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是马列主义关于农业改造方面的第一部最完整、最系统、最正确的天才的伟大著作，狠狠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大大推动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具有极伟大的意义。过去，我学过主席这篇光辉著作，以为主要是批评邓子恢等的，并曾以主席指示，在支部检查了我们自己的糊涂认识。最近，我又重读了主席这篇光辉著作，结合大字报上的揭发和批判，才认识到主要是批判刘少奇为代表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某些同志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对五亿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应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并指示“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并批评了“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是看见了较少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贫农和非富裕农民的错误思想。批评了“超过干部的经验水平”的论调，指出干部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是要“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主席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失了方向”。在这篇光辉著作中，伟大的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第一次提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社，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对于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应当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想适应的问题，有了很大的发展。毛主席并尖锐地批评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当时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当时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这里毛主席提出了路线的分歧。过去我一直以为是批评以邓子恢等直接提出下马的人，现在我认识到，那次西楼常委会，即是刘少奇主持的会上，未批驳邓等谬论，而决定“适当收缩、停止发展”，就使邓子恢等大加“发挥”而

砍掉了二十万合作社，造成了在农业合作社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应由刘少奇负指导思想上的责任。我过去在革命群众向我进行的面对面斗争时，说过砍二十万合作社是邓子恢干的，而在一九五五年前，和主席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指示后，刘少奇对发展农业合作社还是积极的。这就是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恶劣影响，是我的严重错误。

至于“剥削有功”的话，不论在什么情况，在什么地方，刘少奇讲了这个话或有这个想法，都是极端错误的，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丧失共产党立场的。

过去，有革命群众置（质）问我时，我曾讲过，刘少奇没有直接讲过这个话，而讲过近于这句话的许多错话。而且强调，他讲这类话的时间、条件和作用。一九四九年党中央搬进北京不久，大概是四月初，有同志反映，在天津有一种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党中央派刘少奇去解决。因当时，我们正大军南下，京津刚解放不久，经济上接收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烂摊子，经济上困难不小，所以，决定保存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刘少奇在天津工作了一个月时间，在批评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和有一种不敢接触民族资产阶级，并讲对国计民生有利的资产（本）主义允许发展时，讲了许多错话，做了错事。有些话，孤立地摘录来看，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丧失共产党员立场的。

当有革命群众置（质）问我时，我根据我的了解作过上述说明和解释，似乎刘少奇天津之行是根据党中央的委托，总的还是解决了当时的一些重要问题，只是说过错话，做过错事，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作用。这是我的错误。

《揪刘战报》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揪刘战报》编辑部增刊 1967 年 8 月 27 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怒涛，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一个又一个地拉下了马。轰然一声，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出了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多至几十个人的大叛徒集团。这帮可耻的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岗位。把这一小撮家伙揪出来，

消除了党内的一大隐患，一大祸害，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大庆祝的好事。这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丰功伟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是谁？现已查明，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一方面大肆宣扬叛徒哲学，一方面策划和决定一些人自首变节。一九三六年，他利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机会，通过当时窃据中央领导职务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向狱中传达他的“指示”，允许写自首书出狱，允许写《反共启事》登报。这个叛卖革命的“指示”下达后，遭到狱中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坚决抵制，他们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但是，那一伙叛徒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中国赫鲁晓夫的“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于是，这一伙无耻的叛徒，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庇护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这一段时间内，陆续发表了反动透顶的《反共启事》，拜倒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敌人面前，表示“诚心悔悟”，并履行了签名、打手印及参加“自新仪式”、领取“自新证书”等叛卖革命的“手续”，从反动派“恩赐”开放的狗洞里爬了出来。这一小撮无耻之徒，比起在我们党的光荣的历史上成千成万革命先烈来，比起他们在强暴的敌人面前，那种气吞山河、光照日月的革命气概来，显得何等渺小、何等卑鄙可耻啊！我们的革命先烈是耸入云霄的高山，而这一小撮叛徒只不过是一 p ó u @①黄土。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倾东海之水也洗刷不掉你们的羞耻，历史将判定你们遗臭万年！

中国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指使这一批家伙叛党呢？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就是为了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结成死党，为有朝一日篡党、篡政、篡军服务。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包庇叛徒集团的要害。

中国赫鲁晓夫是多么害怕被人戳到这个要害问题啊！他凭借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预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将烧掉他的一切伪装，什么“老革命”，什么“党的权威”，什么“工人运动模范”，统统都将化为灰烬，赤裸裸地暴露他的假革命、反革命、大叛徒的真面目。他绝望，他挣扎，要来一番最后的登台表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兴起之后，他就去勾结另一个当事的大叛

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反咬一口，嫁祸于人，把赃栽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身上。真是卑鄙之极！无耻之极！他们忘了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在，忘了有件件在案的铁的事实在，任何人休想一手遮天！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从来就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这个大叛徒集团中的一些人作过严肃的尖锐的斗争。早在一九三六年就被柯庆施同志斥之为“老机会主义者”的中国赫鲁晓夫，如此恶毒地污蔑我们敬爱的柯庆施同志，并无损于柯庆施同志的一丝一毫，恰恰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嘴脸。

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个叛徒集团的大揭露，吓得中国赫鲁晓夫丧魂落魄，于是又来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辩解：

叛徒也不过是“一念之差”。

说得倒轻松！“一念之差”，就可以向敌人屈膝投降？“一念之差”，就可以用千百万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的头颅和鲜血去换取自己的狗命？这是什么哲学？这是洪承畴的哲学！汪精卫的哲学！陈独秀的哲学！赫鲁晓夫的哲学！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汉奸、大叛徒的哲学！

如果是“一念之差”，那么试问：

为什么早在一九三九年，你就在臭名昭著的黑《修养》里公开宣扬：“在反动派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

为什么在一九四三年，你又借什么总结敌后工作经验的机会鼓吹逃跑主义，说什么：“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织逃跑”？

为什么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期间，你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妄图在报告中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也可以做中央委员”的字句？

我们还完全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中国的赫鲁晓夫：你这样起劲地贩卖叛徒哲学，包庇一小撮叛徒，是不是由于同病相怜、物伤其类？你在白区工作期间，是不是也有过什么“一念之差”？

革命，是新生的阶级与垂死的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这场斗争面前，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每时每刻，念念不忘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念念不忘的是为了完成这种革命事业所必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他们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暗无天日的敌牢里，都是头可

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的斧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它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与天地共久长，与日月争光辉。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是一些什么货色呢？他们原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些满脑子个人主义的投机分子。一旦考验来临，就马上现出了原形。这些没有骨气的奴才，为了卑怯地求活，竟不惜丢掉革命者最宝贵的气节，只要三十个银币就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绝不是什么“一念之差”，而是“一生之差”。他们就是从头到脚的反革命，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臭气。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替这批叛徒开脱，又胡说什么这是“假自首”、“骗敌人”。

自首就是自首，自首就没有什么假的。对于一个落在敌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来说，他面临的抉择就是：为革命而牺牲个人，还是为个人而出卖革命。舍此以外，决无第三条道路可走。敌人杀害一个落在手中的革命者，并不能感到满足。敌人所需要的是软化和制服革命者，使他成为投降变节分子的带头羊，用来瓦解和分化革命的力量。一九三六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率领下，高举起抗日的大旗，领导全中国人民积极准备开展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恰恰就在这时，这群卑怯的叛徒却可耻地向敌人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革命事业，玷污了伟大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他们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难道还不够严重吗？

一切“假自首”都是真叛变。所谓“骗敌人”，与其说是“骗敌人”，倒不如说是骗党骗人民。倘若不然，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大小爪牙们，为什么事先要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事后又一再隐瞒事实真相，欺骗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解放后要利用你们所窃据的党政大权，强行销毁有关这个叛徒集团的敌伪档案，企图瞒天过海？为什么要利用职权，破坏党的审干工作？为什么要假借中央名义，把这个叛徒集团的名单当作“组织秘密”，“备案了事”？这种种情况，联系到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时所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岂不是足以发人深醒的吗？

至于说叛变是为了“保存同志”、解决“干部缺乏”的需要之类，更是胡说

八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但是，革命事业决不需要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软骨虫。“许多最好的干部”，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只有坚持革命，才能保存、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干部的队伍。要革命，必然会有牺牲。可是，我们决不会被牺牲所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我们要在革命斗争中保存的是这样的力量，我们要保存的是这样的好同志和这样的好干部。

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伙叛徒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们看来，脑袋就是一切。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用处？他们要保存的“同志”，就是这些捧着脑袋过日子的狐群狗党，就是这些出卖原则的叛徒。中国赫鲁晓夫依靠这样一些“干部”，作为叛党的资本。所以，他的所谓“保存同志”，说穿了，保存革命同志是假，保存反党力量是真。这种“保存同志”论，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之流的“曲线救国论”的老调重弹。

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这已不是假设性的问题，而是现实性的问题。中国赫鲁晓夫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已经在这样干了。这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画图啊！

你看，这些猪狗不如的大叛徒，一个个从狗洞里爬出来以后，中国赫鲁晓夫为了保住他的这个反革命班底，为他篡党、篡政、篡军服务，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起来。他们相互吹捧，相互提携，一个个飞黄腾达，窃取党政大权，组成了一个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个地下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将相俱全，文武兼备，只待时机成熟，变天上台。他们有理论，有纲领，有行动，实行了一条完整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近几年来，这一小撮人在中国赫鲁晓夫的统一指挥下，适应了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的需要，上呼下应，八方配合，对无产阶级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如果我们不加反击，“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

危险的情景啊！”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避免了在我国出现这样危险的情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赫鲁晓夫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以毁灭性的打击。任何抵赖、狡辩、反诬，都是枉然。中国赫鲁晓夫是历史的罪人。他绝对逃脱不了七亿革命人民对他的最严厉的审判！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才加不*****

（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

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革命转变的各个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一条路线：坚持中国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另一条路线：取消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使中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老路上去。这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一直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脉相承地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条反动路线最集中的代表。

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决定着中国革命两种截然相反的前途和命运。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披荆斩棘，胜利前进的。

这个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也就是由哪个阶级来实行专政的问题。

(一)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劈头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他在这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中，全面地、深刻地、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的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并且彻底地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说：“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主席严厉驳斥了那种妄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他明确指出：从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如果有人梦想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只能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依然使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毛主席痛加驳斥的，不仅是早已臭名昭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明，而且也是现在被揭露出来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个老牌的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是混入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他的论调就同叛徒陈独秀的论调一模一样。他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说什么实行夺取政权，“以中国现在的情势看来，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当然说不上马上就拿来实行。既是很远的事实，也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它。”^①

“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他又在武汉直接追随叛徒陈独秀，勒令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交出几千枝枪。并且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召集的会上，去报告所谓“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之意义和经过。”^②

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后，他又跳出来，直接攻击毛主席，同《新民主主义论》大唱反调。他竟然吹捧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还说“我以为中国革命能在国民党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进行，至少是民主革命这一段，要比用其他的旗子顺利得多”^③。他恶狠狠地说：“我们为什么不说是实行三民主义，而硬要另搞一套呢？”^④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在这里，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反对革命、出卖革命的叛徒嘴脸！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利用它的走狗蒋介石，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这时候，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正在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这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政权的问题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提到了无产阶级面前。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这一点。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光辉的讲演中，指出：“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主席还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毛主席在这里批判的机会主义的代表，不是别人，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在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的历史关头，又一次系统地提出他那反对革命、出卖革命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他鼓吹“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⑤。要我们党向蒋介石完全交出军队，交出武装，“成为国军、国防军、保安队、自卫队”，在军队中“取消党的组织”，要我们党“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统一于国防部”^⑥（按：即国民党的国防部）。他就是想用这一套，向蒋介石献媚，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他恬不知耻地说：要“会作选举运动，要大家投你的票”，“我们成为政府党（按：指国民党政府的政府党）之一，不是在野而是在朝了，有些人要去作官。中央政府的官，一九二七年作过，人家一打取消了，这次作不会一打取消的”^⑦。这真是一语道破了他内心

的秘密！

无产阶级的叛徒右翼社会党人、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都是以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来充当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装饰品和帮凶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是一路货色！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在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军队，并且已经在一亿三千多万人口的地区内建立起人民政权的时候，还要把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军队双手交出去。这种大投降，大出卖，就更加卑鄙，更加恶毒！

正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抗日战争胜利果实进行大出卖的时候，在法国、意大利就有这样的“共产党”的头头，例如多列士、陶里亚蒂之流，在那里以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果实同资产阶级作政治交易，他们向资产阶级交出几十万枝枪——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来换取资产阶级国家“副总理”之类的一官半职，成了历史的罪人！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顶住了国际范围内投降“交枪”的逆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显示了无限威力。

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正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沿着正确的方向，紧握枪杆子，冲破一切阻力，在革命大道上胜利前进，终于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历史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作出的无情判决！

（二）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时，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斗争，归根到底，是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篇光辉著作中，明确地指出：“中国

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随后，毛主席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讲话中又指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在这样一个新的大转变的时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一次跳了出来，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他猖狂地为发展城乡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他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口号，^⑧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⑨；“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历史功劳是永垂不朽的”^⑩！他主张在农村发展和长期保存富农经济。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经彻底破产后，仍然提出了一条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路线。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竭力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什么：“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①①}，要花二十年、三十年，时间说法不一，反正要和资本家合伙几十年，先实现工业化，再搞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将来工业化了，工厂多了，出产的东西也就多了，那就要搞社会主义了。”^{①②}总之，“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①③}。好一个“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工业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这里，一语道破了他发展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事实上，他这一套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正是苏联建国初期被列宁、斯大林粉碎了的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等老修正主义者的“生产力论”的破烂。他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根本否认工农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眼里只有

那些资本家先生们，一心要依靠他们去建立“永垂不朽”的“功绩”，建设他的“理想国”！

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请看他下面的这段奇文：“现在，在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 f ě i @^①卿先生（按：天津东亚毛纺织厂经理，顽固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被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吹捧上天，不久，即逃往国外）谈过，我说：‘你现在才只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笑眼开的来开会的。”^{①④}

妙极了！资本家这只手把八个工厂卖给国家，那只手又从国家那里赚得十六个工厂，这就叫做“社会主义”！当时，一群资本家果然“眉笑眼开”地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奴颜婢膝地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摸，你们要什么样的底，我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底”^{①⑤}。这真是拱手作揖，送货上门！新老修正主义者不是都说什么要“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吗？这就是一个活龙活现的标本。他们倒是千真万确地“长入”了资本主义！这个“长入”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头号代理人的丑恶面目，不是自我暴露得淋漓尽致了吗？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掩人耳目，也曾经假惺惺地说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词句，但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假无产阶级专政，真资产阶级专政。

他极端仇视工人阶级，叫嚣什么“工人阶级也是有不可靠的。”“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①⑥}。他一笔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以限制和反限制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斗争，公然叫嚷：“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①⑦}。大肆宣扬：“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

共同分配”，“有钱大家赚”①⑧。他还公开号召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斗争”，说：“你们必须要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①⑨。看，在他的心目中，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竟然不是要对付资产阶级，而却要对付工人阶级。他还公然说什么“今天我们不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我们要代表全体人民”②⑩。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地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吗？

他疯狂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破坏农业合作化，诬蔑带头要求组织起来的贫农不过是破了产的“不能去单干的贫农”②⑪；诬蔑要把农业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②⑫。他伙同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砍合作社，先后砍掉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十万个。他还恶狠狠地说：“什么是放任自流？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他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去干涉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②⑬就这样，他只许富农有发展剥削的自由，不许贫下中农有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自由，妄想把广大的农村变成富农的天下，变成资产阶级反抗无产阶级的阵地。

政权，从来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如果这个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权不去发展社会主义，却去发展资本主义，不去限制资产阶级，却去限制无产阶级，不去限制富农，却去限制贫农，不去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却去同无产阶级作“斗争”，从而根本放弃它应有的镇压资产阶级反抗，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职能。这样，新中国政权的性质不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吗？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是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是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又一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这些划时代的光辉文献，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崭新的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毛主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极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在我国再也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②④。“以后，革命斗争也没有了，土地改革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再没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给我们消灭了”②⑤。

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同赫鲁晓夫之流用来篡党、篡国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路货色，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最无耻的、最彻底的背叛！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烟幕下，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时期，有时在台前，有时在幕后，向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大肆进攻之前，他就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认为只有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别的都不妥当的，那是不好的”②⑥。他鼓吹资产阶级的“两院制”，说：“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点上议院、下议院的性质”，“不过宪法上没有规定”②⑦。妄图把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变成资产阶级的上议院和下议院，这和章罗联盟的“政治设计院”完全是一个调调。在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上，他积极支持自命“海瑞”的大阴谋

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梦想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当彭德怀的问题在会上被揭发以后，他仍然和彭德怀相策应，在暗地里煽风点火，阴谋把原来准备的会议纪要篡改为一个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左”文件。后来，他又公开攻击庐山会议，胡说什么：“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不应反右”②⑧，“反右是不对的”，“搞的全国后遗症”②⑨。尤其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伙同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更加疯狂地大搞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他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叫嚷：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目前“不是大好形势”③⑩，“经济失调”③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工农联盟发生了很尖锐的矛盾”；并别有用心地煽动说：现在农民的心情“不舒畅”，工人的心情“不舒畅”，干部的心情“也不会舒畅”③②，等等。他还大肆叫嚷：“要有反对派，人民中间也好，党内也好，要有公开的反对派”③③，这样来为资产阶级的上台准备舆论。他鼓吹“三自一包”，大刮单干风，说什么“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③④“社会上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③⑤。

在国际斗争中，他鼓吹“三降一灭”、“三和一少”，说什么“就是美国，我们也希望同它搞好关系”，还要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③⑥。他还说什么赫鲁晓夫“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赫鲁晓夫反对帝国主义是“真的”，“我们要同他们联合”，“求同存异”，“共同反对帝国主义”③⑦。他公然要缅甸共产党放下武器，说：“可以不要这些武器，可以埋在地下，或将部队改编成国防军”③⑧；和奈温“合作”，“合作干什么？”“搞社会主义革命”③⑨。

一九六二年八月，他把他那本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教人越养越修的黑《修养》重新抛了出来，成为当时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一支“主题歌”！

所有这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事实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被基本摧垮以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特别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凶相毕露地打出了“要有反对派”、要走回头路的反党黑旗，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战线，全面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给无产阶级政权造成极其严重的威胁。如果按照他的那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在农村，就会出现阶级大分化；在城市，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会大量出现；

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就要受“二遍苦”，重新坠入做奴隶、当牛马的苦难生活；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将彻底破坏，无产阶级政权就要根本变质，历史就将重新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这是一幅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一九六二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吹起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全面大反击的进军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象一只“秋后的蚂蚱”，一天天走向了末日！

（四）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仍然是政权问题。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丰富的历史经验，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阴谋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事实，亲自发动和领导亿万革命群众，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大决战。

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主席揭露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不断遭到抵制和抗拒？资本主义复辟的暗流为什么一阵又一阵地泛起？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暗藏着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威胁，是社会主义江山的最大祸害。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丧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权派，以垂死的疯狂，进行着挣扎，制订并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违抗毛主席的指示，派出大量的工作组，去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在中国的赫鲁晓夫亲自掌握的清华大学和师大一附中，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他批转北京大学工作组的一期简报，把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且要全国仿效办理，制造白色恐怖，围剿革命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扑灭这场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且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彻底揭露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宣告了他一手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又一个伟大贡献。

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全国广大革命群众掀起了更加波澜壮阔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终于把这个党内资产阶级头号代理人和他那伙狐群狗党揪了出来。在全国掀起的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他们已经陷入亿万革命军民的天罗地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庞然大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自己四十多年假革命、反革命的罪恶历史已经作出了无可辩驳的回答。所有这一切，罪证确凿，铁案如山，能赖得了、顶得住、抗得过去吗？“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人民的伟大节日。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无数面红旗的海洋在激荡，亿万群众在战斗，在学习，在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思想成了亿万群众的粮食、武器和方向盘。他们誓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誓保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泽东思想把亿万群众团结成一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伟大物质力量，震撼着旧世界，创造着新世界。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几十年间，统帅着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追穷寇，缚苍龙，起宏图，征腐恶，引导着中国革命的航船，冲过激流，绕过暗礁，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崭新

新的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是毛主席，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必须毫不间断地把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

是毛主席，指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是毛主席，指出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时期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方向。毛主席开辟的道路，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道路。

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历史的车轮，正在沿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滚滚向

③⑨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同外国同志的谈话。

（载《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的高潮中，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大进军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国内外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它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阴谋，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

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在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之后，一九五八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在农村中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全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社会主义正气高度发扬，资本主义邪气受到沉重的打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激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激烈、最卑鄙、最疯狂的反抗。

在这种阶级斗争形势下，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急先锋彭德怀，赤膊上阵了。他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撮反党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他还抛出了一个所谓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纲领。

彭德怀这些家伙，充当了杜勒斯、赫鲁晓夫之流的应声虫。他们恶毒地攻击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他们把毛主席领导的几亿人民的伟大群众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们还叫嚷什么政治挂帅与经济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他们所谓“两者并重”，就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政治挂帅，主张钞票挂帅，搞物质刺激。他们还恶毒地攻击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总而言之，他们就是妄图推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推翻人民公社，对大跃进进行反攻倒算，就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妄图把中国拉上修正主义的轨道。

庐山会议所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彭德怀这一伙，完全是一个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篡党篡军的阴谋集团。

《决议》指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庐山会议揭露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篡党篡军的大阴谋，夺了他们的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学生、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主持了军委工作，使军权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彭德怀一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党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在十年内战时期，他反对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忠实执行李立三、王明的冒险主义、机会主义路线。((1)(3))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顽固地推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还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极端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无耻地吹捧蒋介石是“领导抗战的英明领袖”。在中国人民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抗日战争中，他用这一套来欺骗和愚弄群众，这就充分暴露了他是革命人民的敌人。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就更加猖狂了。一九五三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刚开始，他就伙同大野心家高岗、反革命分子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高饶联盟的实际领袖是彭德怀。他们里通外国，搞两面手法，阴谋篡党篡军。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反党活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主席的这段话，极其深刻地说明了我们党同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庐山会议以来的阶级斗争进程，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一天才的科学论断。

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一次大交锋。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和包庇之下进行的。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也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彭德怀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党急先锋。当时，他们认为有机可乘，彭德怀就恶狠狠地冲了出来，而中国的赫鲁晓夫

也亲自打起“反左”的旗子，来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经过一番较量，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打败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看到形势不妙，就连忙掩护彭德怀退却，并且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制造混乱，阴谋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背信弃义，对我国进行经济破坏，由于遭受自然灾害，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了“神圣同盟”，又一次掀起了反共、反华、反人民的逆流。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那班老爷们看来，天快要塌下来了，神州快要陆沉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他们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牛鬼蛇神，大造反革命舆论。

美蒋反动派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座上客吴晗，首先披挂上阵，大喊大叫，替彭德怀翻案。在《海瑞罢官》这株大毒草中，吴晗为彭德怀被罢官鸣冤叫屈，说“将我罢职理不公”，吹捧他是“昂然挺立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励他“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叫喊“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就是要为彭德怀进行反攻倒算作舆论准备。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将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人以及臭名远扬的“三家村”狐群狗党，也鼓噪而起，大肆吹捧《海瑞罢官》，在全国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海瑞精神”，为彭德怀翻案，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在这场反革命舆论的锣鼓声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目、中国的赫鲁晓夫亲自出场了。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公然替彭德怀翻案。他为彭德怀辩护说，彭德怀的反党纲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他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在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抛出了一个洋洋八万言的翻案书。在这个翻案书里，他再一次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唱一和。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号召。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伟大理论的指引下，奋起迎战，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挑起的这场进攻予以迎头痛击。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毛主席亲自抓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毛主席指出：

《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主席对《海瑞罢官》的这一批判，不仅打中了《海瑞罢官》的要害，而且打中了整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害。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海瑞罢官》打开一个缺口，揪出了“三家村”的后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揪出了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进一步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亿万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挖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各个战线上的流毒，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破产了。这是我们党的最伟大、最辉煌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四月，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过大江的时候，毛主席写了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其中有四句：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在今天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我们重读这首诗，感到倍加亲切。我们要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进一步磨砺革命的锐气，团结最广大群众，彻底清算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彻底清算中国赫鲁晓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全面地、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第十三期，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

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公开发表了。这对于彻底打倒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对于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推动当前革命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个文件，是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取得伟大胜利的产物。庐山会议，揭露和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保卫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保卫了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

毛主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在建国以后的短时期内，我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是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而提出的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亿万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实现了国民经济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引起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极端恐慌和拚死反抗。在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华歇斯底里大发作，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就在这个时候，老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伙，慌忙披挂上阵，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反党集团头目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抛出的所谓的《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他野心勃勃，反骨毕露，死命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革命群众运动，反对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党的领导 and 政治挂帅，反对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在庐山会议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彭德怀等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场大搏斗。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它是灭亡中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疯狂的绝望的进攻。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次反革命进攻的黑后台。

就是他，在庐山会议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积极支持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当彭德怀的阴谋被揭穿以后，他仍然在暗地里煽风点火，阴谋把原来准备的会议纪要篡改为一个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左”文件。在庐山会议以后，他又赤膊上阵，污蔑总路线的提出有盲目性，大跃进是“一轰而起”，造成“经济失调”，“人民公社办早了”，“现在发生一种瓦解的危机”。他胡说什么“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反右是不对的”。他还极力鼓吹“海瑞”精神，大刮“翻案风”，为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妄图让彭德怀死灰复燃，重掌军权，实现他篡党、篡军、篡国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较量中的一次大战役。

彭德怀的反党活动，不仅有中国的赫鲁晓夫作后台，而且有苏联的赫鲁晓夫撑腰打气。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跳出来以后，苏联赫鲁晓夫就公然无耻地吹捧彭德怀是“正确的”、“勇敢的”，是他“最好的朋友”。事实十分清楚，彭德怀就是配合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里通外国分子。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指出：“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由来已久的反党活动，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

彭德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带着“入股”的投机心理，混入党内、军内的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大军阀，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几十年来，他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长期以来，他利用自己在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中所窃取的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篡军的阴谋活动，成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军内的代理人。

庐山会议挖掉了这颗埋在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这是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打击，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在当前革命的大批判中，把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揪到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群众性的深入的大批判、大斗争，这是彻底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一定要发扬猛追穷寇、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彻底清算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所散布的修正主义流毒，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今天，全国正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个时候，公开发表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有着重大的意义。

八年前，在党的庐山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揭露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粉碎了他们篡军篡党，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庐山会议之后，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林彪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彭德怀，这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从来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是“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支持者和追随者。抗日战争中，他积极推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建国以后，他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站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他实际上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头头。他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积极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军事路线。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贬低和削弱政治思想工作。他抗拒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反对全民皆兵。一九五九年，正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取得伟大胜利，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极端恐慌，联合起来对我们进行疯狂攻击的时候，彭德怀在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支持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纠集了一小撮反党分子，在庐山会议上抛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纲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叫嚷要改变党的路线。他的一套修正主义主张同中国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

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一次激烈搏斗，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一次严重较量。彭德怀及其一伙窃踞着军队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很大一笔赌注押在他们身上。因此，党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是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沉重打击。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曾经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充分证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论断的英明正确。

彭德怀这条“落水狗”，绝不会改变它的本性。什么“改正错误”的保证，什么“不会翻案”的诺言，统统都是鬼话。庐山会议以后的八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党活动。一九六二年，正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大刮“翻案风”、“单干风”，大搞“三自一包”、“三降一天”，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彭德怀抛出了长达八万言的翻案书，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彭德怀这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是得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积极支持的，是同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密切配合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开为彭德怀的翻案制造舆论，企图让他重新上台。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串通一气，狼狈为奸，穿的是一条连裆裤，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展开了总攻击。亿万革命群众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叱咤风云，

所向披靡，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个揪了出来，叫他们显出了原形。他们的末日到来了。无产阶级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

但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他们是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现在，他们已经成了“落水狗”，但随时还会爬上岸来反口咬人。他们是纸老虎，但不是死老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口诛笔伐，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猛烈开火！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清除他们的一切流毒，一切影响，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原载《解放军报》1967年8月16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建设自己的国家，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一条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只强调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这条路线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抹煞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照这条路线走去，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而只能走向资本主义。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及其继承人，就是这条路线的狂热的鼓吹者。中国赫鲁晓夫同苏联赫鲁晓夫一唱一和，也拚命地在我国推行这条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批判了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提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提出了要“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逐步进行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道路。一九五八年，毛主席进一步集中反映了我国七亿人民的坚定决心和伟大智慧，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崭新局面。一九六〇年，毛主席亲自总结了大跃进中先进企业创造的经验，提出了同苏修“马钢宪法”相对立的著名的“鞍钢宪法”，确定了五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毛主席的一系列光辉指示，指明了建设我们国家的正确航道。这条路线，强调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抓革命，促生产”。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保证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建国以来，在我国经济战线上，这两条路线一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就是：要不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不是按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斗争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搞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搞资本主义经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主席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从来都把人的革命化放在首要地位。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办法有千条万条，而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抓政治思想的革命。这一条搞上去了，粮、棉、油、钢铁、煤炭都能上去。这一条搞不上去，什么都上不去。把毛泽东思想传播给群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赫鲁晓夫却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污蔑我们国家领导经济建设的办法是“超经济的办法”，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恶狠狠地指责说：“为什么非按行政办法管理，不按经济办法管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属于一定的政治的单纯的经济。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会是真空的。任何部门、任何领域，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

级政治挂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必然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挂帅。中国赫鲁晓夫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要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其目的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再来剖析一下中国赫鲁晓夫所谓“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这张药方，究竟包罗了一些什么货色呢？

这就是“利润挂帅”，一切为了赚钱，赚钱就是一切。中国赫鲁晓夫公然宣称：“一个工厂一定要赚钱，不赚钱就应关门，停发工资。”为了赚钱，可以不顾国家统一计划，不顾整体利益，干出种种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勾当来。

这就是铜臭熏天的“物质刺激”。中国赫鲁晓夫用资本家的腔调说：“老老实实劳动的好好奖励他一下”，“不加点钱，生产积极性不够，不好好给你生产”。他企图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来腐蚀群众，转移群众对政治的注意力，扩大收入的差别，造成特殊阶层。这是对革命的职工群众的一种莫大侮辱，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这就是无耻地美化资本主义。中国赫鲁晓夫无耻地说什么“资本主义经济灵活、多样”，“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他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向资本家“认真学习”，说他们的“管理能力超过我们的共产党员”。在中国赫鲁晓夫眼里，利欲熏心的资本家竟比共产党员高明一百倍。

所谓“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说穿了，这就是让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支配一切，发展自由竞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如果照着中国赫鲁晓夫这一套“经济办法”办事，愁眉苦脸的资本家又将眼笑眉开，已经翻身了的工人阶级又得当牛做马，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将重新在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筑起他们的“天堂”。

中国赫鲁晓夫反对政治挂帅，还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大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革命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就必须发动和依靠最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要不要大搞群众运动，这是实行不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两条经济建设路线根本对立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教导我们：“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

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正因为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我们才有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才能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文化等各条战线上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1)(2))

中国赫鲁晓夫，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十分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拚命鼓吹“一长制”和反动的“专家路线”。一九四九年，他跑到天津，对国营企业职工说：“你们是国家在工厂中的组织者”，搞建设要“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一九五二年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说：“建设工业有很多困难，中国是有钱，有劳动力，有机器（在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帮助下基本可解决），就是没有工程师。”他对一九五八年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更是拚命攻击，大放冷箭，胡说大搞群众运动是“一轰而起”，“只是从那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新闻，就轰起来了”。

在中国赫鲁晓夫看来，搞经济建设只能依靠少数“专家”，“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由他们这些人发号施令，而广大的革命群众只是“劳动力”，是“一轰而起”的“群氓”，只能乖乖地“服从指挥”。他们挖空心思地制定了一套修正主义的办法、条例，处处搞管人、卡人的规章制度，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这样干，不仅束缚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且使少数干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同工人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逐步演变成为骑在群众头上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使社会主义企业逐步变质。

这就是我国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蜕变必然导致政治上资本主义的复辟。中国赫鲁晓夫多年来在经济战线上鼓吹的一套路线、方针、政策、措施，都是为了扶植城乡的资本主义势力，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企图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经济一旦蜕变，必然会逐步地使我们党，我们国家都改变颜色，在整个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因而两条经济建设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中国命运的斗争。

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是搞政治、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如果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主张，一头埋在经济建设里，不搞政治，不搞阶级斗争，不

搞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我们的党，岂不也成了单纯组织经济生活的工具，成了苏修叛徒集团那样的“工业党”和“农业党”了吗？政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世界上哪里有只搞生产建设、不搞阶级斗争的政党呢？所谓“工业党”、“农业党”，无非就是要党成为经济建设的附庸，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成天跟着“利润”的屁股打转转。这个党的唯一宗旨，就是搞钞票，搞剥削，搞资本主义。这样的党，不也成了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党了吗？

经济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教育我们，必须永远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突出政治，任何时候都要把政治放在首位。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当代，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最强大的战斗力，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那种只看到物质力量的人，在战争年代，就会被敌人的一两件新式武器吓得浑身发抖，无耻地屈膝投降；在建设时期，就会迷信洋人，跟着洋人的脚印爬行，服服贴贴地做洋人的奴隶。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会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大课堂，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彻底肃清了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不断巩固和加强，必将出现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一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都必将远远地抛在我们后面！

（新华社上海二十四日电）（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从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是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的分水岭。

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面临着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或者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宣布阶级斗争已经熄灭，阶级已不存在，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和一系列重要指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全面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一个光辉灿烂的新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

毛主席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却在这个关键时刻跳出来，公然反对毛泽东思想，放肆地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也解决了”，“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

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改造了所有制，剥夺了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难道阶级就消灭了吗？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吗？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大骗局。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最赤裸裸的大背叛！

阶级，不仅是个经济概念，更主要的还是个政治概念。剥削阶级在几千年的统治过程中，不仅占有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并且占有政治、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因此，阶级的存在，不仅取决于经济地位，同时也还受着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的支配和影响。阶级斗争，包括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这样几种形

式，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比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激烈得多，残酷得多。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地主无地”，“富农不富”，“资本家没有资本”，好得很！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结果。他们的生产资料没有了，政治上也失去了统治地位，但是，剥削阶级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照样可以依附于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或其传统影响而继续存在。只搞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搞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彻底改造剥削阶级分子，就不能最后消灭阶级。

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分子尽管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但他们还在拿定息，还没有脱离剥削根子。“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地主已被剥夺了土地，但他们仍在藏地契、续家谱，时刻都在掂着那本变天帐。就是富农，又何尝忘得了昔日的剥削生活呢！毛主席指出：“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及其影响的存在，还必然会侵蚀无产阶级的队伍，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寻找它的代理人。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最主要的、最危险的阶级敌人。他们窃据领导岗位，把领导的职权变为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特权；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妄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岂不就是一批新的资本家，新的地主、富农吗？中国赫鲁晓夫所说的“新式”的资本家，岂不就是他的夫子自道吗？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只是斗争的形式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罢了。这种斗争形式变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敌人钻到了我们的肝脏里，他们妄图从内部打开缺口，搞宫廷政变，篡党、篡军、篡政。因此，阶级斗争越发尖锐复杂了。

不要以为“地主无地”，“富农不富”，“资本家没有资本”，就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一旦这帮最危险的敌人篡夺了政权，到那时，“没有土地的地主”就会重新转化为拥有土地的地主，“不富的富农”又可以剥削致富，“没有资本

的资本家”又会重新转化为拥有资本的资本家。

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东欧的一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这已经是无庸辩驳的现实。

中国赫鲁晓夫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国家消亡”论，必然导致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一个证据是，中国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修养》时，他又一次在引用列宁的一段话中，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句话拦腰砍掉了。他还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反革命分子少了，刑事犯也少了，所以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了，……今后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

好一个“组织社会生活”！

试问：所谓“组织社会生活”，究竟是“组织”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在阶级社会里，究竟有没有超阶级的“社会”？存在不存在没有烟火气的“社会生活”？这种“组织社会生活”的国家又究竟是怎样一种“国家”？

什么是国家？毛主席说，我们的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同时，“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

我们的国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机器，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在整个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国家机器的专政的职能，不能削弱，只能加强。中国赫鲁晓夫把所谓“组织社会生活”同国家的专政职能对立起来，强调“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实质上就是竭力攻击和抹煞国家的专政职能，用所谓“全民国家”来代替社会主义国家，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组织社会生活”，也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地、富、反、坏、右，广大革命群众要对他们进行斗争，要“组织”他们劳动改造，要迫使他们低头认罪，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在人民内部，也要不断运用“四大民主”，开展灭资兴无的斗争，不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资产阶级梦寐以求，一心想搞垮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就必须反其道而行

之，千百倍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早在十八年前毛主席就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干净地消灭之后，必然将逐步地消亡下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将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必须大大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将来国家的消亡，现在必须大大强化国家机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清除混到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阶级敌人，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肃清他们在政治、思想、理论、组织等各方面的流毒，从根本上强化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人们将看到，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锻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真正成为坚如磐石的铁打江山。

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什么“国家消亡”论，都是弥天大谎。不讲阶级斗争，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疯狂进攻的一种形式。主张“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就是希望缩小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而大大扩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在资产阶级方面，挂帅的人物始终是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的“理论”是他提供的，反革命的活动是他策划的，他是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后台。

在这次空前宏伟、空前深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赫鲁晓夫再也藏不住了，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迫使他从幕后转到台前，亲自披挂上阵。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小喽罗，也倾巢而出。这很好。有了总决战，才有大胜利。总决战的结果，在强大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资产阶级的梯队一批又一批倒了下去。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全线出击的进军号中，他们溃不成军了。按照无情的历史辩证法，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必定要全军覆灭，彻底摧毁。

斗争在深入，我们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一刻也不能松气。正如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指出的：“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目的。”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插上鲜红鲜红的共产主义的红旗，让我们对这个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叛徒，继续展开“无情的战斗”吧！

（新华社上海二十五日电）（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以来，一直激烈地进行着斗争。

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本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一红一黑，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水火不相容的。

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对群众的态度上。

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如何对待群众，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的根本分歧。

中国赫鲁晓夫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只是相信资产阶级，依靠资产阶级，把广大群众和干部看作俯首贴耳、靠别人“恩赐”的阿斗，把自己看作救世主。他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阶级一样，把群众看作是“群氓”，是“渣滓”，是赌博用的“筹码”。完全是一脉相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这种极端仇视群众的反革命立场，得到了彻底的大暴露。

但是，不久前中国赫鲁晓夫却假痴假呆地说，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反对人民创造

历史的观点，一以贯之，从来就是这样的。他卑躬屈膝地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把大军阀头子阎锡山的话奉若“圣旨”，以为离开这些“大人物”，中国就会生存不下去。他无耻地拜倒在“资本家先生”跟前请求“剥削”，说：“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不让我工作，那就不得了！”在中国赫鲁晓夫看来，创造历史的不是亿万革命人民，倒是一两个骑在人民头上的暴君；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倒是资本家养活工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人民群众几十年如一日，怎么能说“不清楚”呢？中国赫鲁晓夫用这种以守为攻的策略，实在太蹩脚了。他越是说“不清楚”，广大革命群众非但没有被他弄糊涂，反而越发清楚地识破了这个独夫民贼的反革命真面目。

中国赫鲁晓夫对于人民群众的看法，完全颠倒了历史。这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是注定要灭亡的。他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他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是头脚倒置的。古人说：“戴盆何以望天？”他看不见客观存在的广阔的天空！他当然不会懂得，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天空只会更加晴朗，世界只会更加美好！他的反动的阶级本能，的确使他看不清楚许多在我们看来十分清楚的事情。

从这个反动立场出发，中国赫鲁晓夫必然反对群众运动，镇压群众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咒骂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坏人捣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是“干扰”，是“小流氓”、“小反革命”的痞子运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他的反动本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正如林彪同志所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早在四十多年前，毛主席就以最大的热情欢呼农民运动的兴起，欢呼农民起来造反“好得很”，并痛斥了把农民革命运动污蔑为所谓“痞子运动”的反革命言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支持了新生的红卫兵运动，支持了“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毛主席就是这样无

限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并及时把群众的创造加以总结提高，推动了整个运动的发展。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位真正同人民血肉相连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样一位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舵手！

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就是反对革命。列宁说：“要革命，但又不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革命从来也没有过。”资产阶级从来不可能也不肯搞真正的群众运动。一旦群众起来了，越出雷池一步，触及他们的阶级利益时，就迫不及待地回过头来镇压。中国赫鲁晓夫有时也空谈什么群众运动，但是，当群众真正起来时，他就慌了手脚，大骂群众是“暴徒”，到处抓“右派”，抓“反革命”。他干的完全是蒋介石的那一套，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就反过来进行疯狂的镇压。他挂了“革命”的招牌，干的却是同蒋介石一样的反革命勾当。

反对群众运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是空前宏伟的革命事业，没有广泛而深入的群众运动，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赫鲁晓夫的镇压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仅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还打击广大要求革命的干部起来革命，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当他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总攻击面前，陷入穷途末路的时候，又施展故技，把他在土改运动中那一套“搬石头”，以及四清运动中要干部“大换班”、“统统罢官”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全盘搬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了。他不仅到处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而且公然叫嚷要中央文革小组“退到二线去”。甚至丧心病狂地鼓动反革命分子“多活动一点，多写一点反动标语，多发表一些反动言论”，猖狂地直接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靠了边以后，还继续以各种形式，通过他安插在各地的爪牙，挑动武斗，制造混乱，同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较量。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继续。看来，这场斗争，还将继续一个相当的时期。（(1)(3)）

可是中国赫鲁晓夫却胡说什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对，你是老反革命，老机会主义分子，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你几十年来的“老问题”！五十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你十年、二十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续；五十天，

就是为了掩护十年、二十年所坚持的资本主义道路。早在民主革命中，你就跟在陈独秀的屁股后面，咒骂工人运动“过分”，“‘左’倾得岂有此理”，并且咬牙切齿要北洋政府“开除几个冒进的工人领袖”，目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你命令“工人不要捣乱”，要农民“反一下冒进”，教训党“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目的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你贼性不改，恶毒地攻击大跃进是“发疯”，污蔑群众运动是“一轰而起”，“实际上是空空洞洞”。在四清运动中，宣扬“群众象野马一样，发动起来就会出乱子”，目的仍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你四十年如一日，群众运动一起来，就拚命镇压，轻车熟路，一无例外，这算得了什么“新问题”呢？你怎么可能在这一阵薄薄的烟幕下溜掉呢？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镇压群众运动，蒋介石也镇压群众运动，他们最后都落得个被群众运动的怒涛所埋葬。中国赫鲁晓夫的下场，也不会比他的前辈好一些。

中国赫鲁晓夫现在还不是一只“死老虎”，他仍在咬人。最近，他又别有用心地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为什么”。

不错，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由于自己立场、世界观有问题，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但是，主要的责任要由你这个老反革命负！是你，盗用了党中央名义，发布黑指示，使广大干部上了大当！是你，长期宣扬黑《修养》，使广大干部受到奴隶主义的荼毒！又是你，提出和推行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对立！这笔账，一定要同你算清楚！他们犯错误，同你进行的反革命活动，绝对扯不到一块去。你想在这里拖人下水，那是徒劳的。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他们共同的反革命立场所决定的。但是，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犯有不同程度的路线错误的人，只要不坚持这种错误，不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愿意在群众的帮助之下，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仍然可以成为党的好干部。

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这场斗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

不要以为，把中国赫鲁晓夫拉下了马，他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可以连根

铲除了。正如列宁所说，“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夺权，光夺了组织上的权是不行的。只有把思想上的权也同时夺下来，才能巩固已经夺到手的组织上的权。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几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八年来，流毒很广，贻害很深，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形成一股习惯力量。要彻底肃清这一套东西，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它彻底批倒、批臭！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更不要以为，搞掉了这条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没有那回事！只要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有可能产生新的黑线。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掌权以后，面临着两条可能的选择：一个可能是，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可能是，在胜利中逐渐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反对的意见逐渐听不进去了，甚至加以压制，脱离了群众，做官当老爷，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这样，就会稀里糊涂地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去，有可能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然要搞资产阶级专政，搞资本主义复辟。中国赫鲁晓夫还在那里招手哩！“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

（八）一九六七年九月重点是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革命大批判专栏好得很》

在全国展开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高潮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驻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以革命大字报的锋利武器，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猛烈批判，把大批判专栏变成学

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课堂。现在，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举办的街头大批判专栏，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些专栏，气势磅礴，充分展现了亿万军民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同仇敌忾；热烈地表达了亿万军民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崇敬。人人称赞大批判专栏好得很。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毛主席号召我们：军队和各行各业都要批判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批判，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各条战线上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关键所在。革命大批判专栏，是广大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发明创造，是文化大革命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的又一个标志。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革命的大批判专栏，是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课堂，是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有力武器，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重要阵地。

革命的大批判专栏，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它组织动员起亿万群众批判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集中火力，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规模巨大的围剿，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他们陷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汪洋大海。

革命的大批判专栏内容丰富容量大，形式活泼花样多，千字文，诗画配，使严肃的政治、思想、理论的斗争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得到了统一，大家爱办，大家爱看，大家都关心，大家受教育。

我们在革命大批判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办革命大批判专栏，办好革命大批判专栏。在节约闹革命的原则下，把革命大批判专栏办得更扎实，更讲究实效。

驻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办大批判专栏，办好大批判专栏，靠的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千万颗红心。他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展开了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为我军各部队作出了榜样。我军广大指战员，要热

烈响应林彪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的最新号召，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以最大的革命热情，投入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原载《解放军报》1967年9月4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解放军报》记者、新华社记者：《假四清真复辟：关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导演的桃园大队“四清”情况的调查》

前言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提出和推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毛主席同这条反动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同这条反动路线斗争胜利的结果。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推行他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曾经指派他的老婆、资产阶级分子王××，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所谓“蹲点”。

王××在桃园搞所谓“蹲点”，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底，先后五个月。在这期间，王××前台表演，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幕后指挥，通过面授机宜、书信往来、电话遥控，从原则到具体，从步骤到方法，从整谁到保谁，都作了精心策划、具体部署。

出村后，王××还两次重返桃园复查。她留下的“巩固组”，又搞了两年零四个月，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底，王××在北京被赶出清华大学后，才仓惶撤走。

所谓桃园“蹲点”，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试验场，是假四清，真复辟。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煞费苦心炮制的所谓“桃园经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这个黑经验，由王××在北京、天津吹嘘

放毒之后，接着，他们又到许多省市兜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盗用中央名义，把这个黑“经验”批发全国。这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篡党篡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彻底批判。

让我们看看他们在桃园究竟干了些什么。

一、把社会主义农村形势说得漆黑一团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整个农村的形势已经大大好转”，“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同时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资产阶级分子王××到桃园大队搞假四清以前，桃园大队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

一、被推翻的地富反坏分子不甘心失败，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攻击人民公社，进行反攻倒算，破坏集体生产。例如：富农分子岳××攻击人民公社不如单干好，故意赶大车压坏队里庄稼；反革命分子赵××借口工分少，暗中煽动群众罢工；富农分子郭××擅自拆卖了土改时已被没收的房屋。此外，有几个地主、富农分子长期隐瞒成份，有的还混进了干部队伍。

二、一些富裕农民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抬头，热衷于小开荒小自由，有的还羡慕单干，议论包产到户好。

三、一九六一年公社体制下放，一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聚赌抽头的关景东和他的堂兄关××，回到桃园，钻进党支部委员会（关景东任支部委员、大队治保主任兼民兵连长，关××任副支部书记兼大队长），继续进行贪污盗窃等活动，并且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阴谋夺取党支部的领导权。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以支部书记吴臣、副支部书记赵树椿等为核心的桃园大队党支部，团结和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主要表现在：

一、大讲人民公社好，大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讲热爱国家、热爱集体。在三年困难时期，克服困难，胜利度过了灾荒，顶住了单干风，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

二、发动群众，通过辩论会和斗争会，对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揭露

和斗争。追回了富农分子反攻倒算的财产，加强了对他们的管制。

三、在党内，一九六二年七月、一九六三年五月，专门召开会议，集中地对关景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进行了揭发、批判和斗争。一九六三年三月，通过选举罢免了关××的大队长职务，并在党内撤销了他的副支部书记职务。

但是，党支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党员干部阶级斗争观念不够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关景东斗争不力；对隐蔽较深的漏划地主富农分子，未能及早发现；有些党员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存在着小量贪污、多吃多占、打人骂人等缺点和错误。

在生产方面，党支部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广大社员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积极发展生产，集体经济日益巩固。

一、农业生产不断上升：粮食亩产量，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七年高级社时提高百分之二十左右，比解放初期提高一倍以上。

二、连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共超额七万六千多斤。同时，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还超额完成国家当时规定的蔬菜交售任务，是抚宁地区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比较突出的几个大队之一。

三、大牲畜饲养好、繁殖多。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繁殖三十一头马、骡、牛。到一九六一年，集体和社员养猪达到每户平均一头半。

四、公共积累相应增加。其中公积金一九六一年三千八百零九元，一九六二年六千六百八十四元，一九六三年六千三百四十二元。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生活不断改善。特别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社员生活安排得比较好。

桃园大队党支部从一九五九年成立到一九六三年“四清”前，一直是抚宁地区先进的支部之一，曾获得地（市）、县、区、公社的多次表扬和奖励，出席过地（市）先进单位的代表会议。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形势看得漆黑一团，也把桃园大队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他在给王××的信中硬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基本上是反革命两面政权”。王××也说：“桃园这个支部……不是变颜色的问题，根本它就不是红色的。”完全是一派胡说八道。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桃园四清应当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多数，依

靠干部大多数，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关景东等一小撮人，团结和教育犯有错误的干部，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王××，却把矛头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指向广大社员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二、大搞神秘化扎根串连，疯狂反对用阶级分析方法作社会调查，疯狂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这次运动要有坚强的领导，要依靠贫下中农组织，要在群众中做好调查研究，要放手发动群众。”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既不相信基层的党组织，更不相信广大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他疯狂反对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反对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胡说什么“贫下中农不向我们说真话”，“用开调查会的办法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行了。……调查会调查不出问题来。”还说：“工作队进村以后，要进行一些秘密工作，只有扎根串连，他们不怕了，才能讲话。”

资产阶级分子王××，一进桃园，就象到了“敌占区”一样，化名董朴，乔装打扮，捂个大口罩，包个大头巾，保卫人员暗中随从，私查暗访，鬼鬼祟祟，进行扎根串连，大搞秘密活动。有时屋里开会，屋外还放“暗哨”。谁要去见王××，还得由警卫人员通报，象进衙门一样。整个的“选根”、“审根”、“定根”、“用根”，都由她一人独断。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神乎其神。贫下中农愤怒地说：“解放十多年了，还把我们桃园看成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

王××通过扎根串连，物色和培植了亲信，作为她进行假四清、真复辟的御用工具。现行反革命分子岳绍田，就是她入村后最先扎下的一个“主根”。岳绍田从小游手好闲，不爱劳动，招摇撞骗，流氓成性，思想反动。一九五八年因毁坏队里禾苗，在村里受到群众批判。一九六二年，私刻公章，冒充解放军某部军需科长，到哈尔滨倒卖油粮作物，被当地公安部门拘留。同年，还把偷盗的上千斤粮食，和四类分子勾结倒卖。此外，多次打骂群众，横行霸道，群众称他“万人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因写反动传单，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被逮捕法办。这样一个坏蛋，王××竟分外喜爱，倍加栽培，“四清”中用他当打

手，又一手提拔他当大队治保副主任、小队贫协副主任。

王××在“四清”中，操纵几个“根子”替她当打手。无论大会小会，都是预先布置好的少数人发言。完全是工作组专政，包办代替，运动群众，包打天下。

三、用“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掩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相对抗，胡说什么：“四清运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王××到桃园也说：“我们必须用‘四清’去改造‘四不清’。”“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她还说：“我们认真研究了桃园大队的斗争形势，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连结在一起。”她污蔑桃园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就缝了两个大裤兜。”在动员干部交代问题时也说：“你是忠于四清，还是忠于四不清？”这样，就把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论问题大小、性质如何，都用“四不清”大棒加以打击。

运动一开始，他们就实行钱粮挂帅。大抓“粮、款、物、斤、元、尺”。为了追钱追粮，把干部通通赶上楼，说什么“有枣没枣打三竿，有鱼没鱼淘干了看。”群众反映：“挂点‘衔’的都得挨整”，“过了粗罗过细罗，过了大筛过小筛”。

王××一进村就说：“穷队有问题，富队问题一定更大。”又说：“这个村这么富，还不搞它个一万八千的！”后来，又提出了“双两万”（两万块钱、两万斤粮）的指标。

她还向群众许愿：“只要大家好好干，每家能分到六七十块钱，六七十斤粮。”春节前又提出：“分果实，鼓斗志，过个革命年。”

王××还搞荒谬的“估产”，主观估计每个干部的贪污数字。例如，估计一亩地种多少棵茄秧，一棵茄秧结多少茄子，总共能产多少斤，卖多少钱。这样，一个管理五亩菜地的生产队副队长，三年就被估计贪污上万元。

为了完成既定指标，王××亲自督战，给工作队员“加压”，给被斗对象“加温”。对干部：“先打外围，后打攻坚”，“大会剥皮，小会攻心”，“慢火煎鱼，车轮战术”，“敲山震虎，顺藤摸瓜”，罚站罚跪，低头变腰，“燕飞”，拘留，甚至还用手枪对干部进行威胁，大搞逼、供、信。

这样做的结果，混淆了两类矛盾，搅乱了阶级阵线，打击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引上了单纯追钱追粮的邪路，把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包庇过了关。

四、打击一大片，把矛头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其中有些人犯了一些毛病，经过领导和群众的帮助，是可以改好的。应当而且可以团结这些同志共同做好工作，以利进一步地孤立敌对分子”，并强调指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资产阶级分子王××根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干部得有压力”的黑指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把广大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都当作打击对象。

这里，我们举几个例子，就可以充分说明王××在桃园搞所谓“蹲点”时，她的主要矛头是指向谁的：

（一）吴臣

资产阶级分子王××按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指示，把支部书记吴臣当作头号打击目标。

吴臣虽有缺点和错误，但群众公认，他是一个比较好的干部。

土改时，他是农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积极领导贫下中农坚决斗争恶霸地主，清出了地主窝藏的武器和大量浮财。土改末期，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桃园最早入党的党员之一。合作化运动中，他表现积极。一九五四年他组织了互助组，被选为组长。当时有的组员不愿吸收劳力弱的困难户入组。吴臣便动员说：“不能把阶级兄弟甩在外边。”这户贫农入组后感动地说：“没有互助组，我的地怎么也种不好。”办初级社时，有几户富裕中农和中农要看一年再说，吴臣反复向他们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动员他们入社。接着，他被选为初级社主任。转

高级社时，有的社员说：“人多了怕干不好。”吴臣说：“人多力量大。”以后，这些户都愉快地转了社。吴臣被选为生产队长。

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他担任筹备委员，满腔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公社建立后，被选为桃园大队队长。一九五九年，被选为桃园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他担任支部书记以后的五年中，工作认真负责，关心群众疾苦。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时期，他积极向社员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说明困难是暂时的，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造成的。在最困难时，他顶住了单干风，和社员一道同甘共苦，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困难，度过灾荒。吴臣起早贪黑，深入田间，对集体生产抓得紧，指挥得好，干劲十足，雷厉风行。有一年，麦收季节，因一部分劳力支援国家基本建设，队里壮年劳力很少，又遇涝灾，吴臣带领男女社员，冒着连日阴雨，昼夜奋战，终于抢收了八百亩地的小麦，并及时完成了夏种任务。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中，他领导社员向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分子和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进行了斗争。他对富农分子岳××攻击人民公社、赶大车压坏地里庄稼的破坏行为，立即组织社员进行了批判和斗争；对煽动群众罢工的反革命分子赵××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在党内，吴臣对钻进支委会的关景东等也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关景东想拉吴臣下水，对吴臣说：用机器轧挂面卖，赚钱多。他劝吴臣和他一起开挂面房。吴臣立即愤怒地批评关景东说：“你这是什么话！想个人发财？我不干！”使关景东的坏主意没有得逞。过不久，关景东在代社员买小猪的时候，又假公济私，为自己搞了头大猪，为了拉吴臣下水，也给吴臣搞了一头。吴臣知道后，又对关景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坚决拒绝收下这头猪。在这以后，吴臣多次对关景东贪污盗窃、聚赌抽头等行为作了斗争，并积极向上级党委反映。正是由于吴臣、赵树椿等革命干部、广大党员和贫下中农对关景东等一小撮的斗争和抵制，关景东等妄图篡夺桃园大队领导权的阴谋在“四清”前才没有得逞。

但是，资产阶级分子王××秉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旨意，不惜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对吴臣进行残酷的政治陷害。

一、篡改成份。吴臣出身贫农，从小受苦，拉过大网，扛过小活，当过木工，做过小贩。而王××却造谣说：“吴臣原来就是一个坏分子，是一个流氓”，硬把他小贩成份篡改为“流氓”成份。

二、无限上纲。吴臣在工作中存在着简单粗暴、打骂群众的缺点和错误，王××却任意上纲，歪曲错误性质，硬说吴臣是在进行“阶级报复”。社员托吴臣代买了几台缝纫机，吴臣没有多要一分钱，王××硬说这是投机倒把的活动。

副区长苏××是吴臣入党的介绍人，后来蜕化变质，王××就说苏是吴臣上面的根子。

大队现金保管赵××，“四清”后期群众揭发出来他是一个从东北逃回的漏划地主。吴臣和赵仅是工作关系，而王××却硬说，赵是吴臣的后台。

三、颠倒黑白。在工作组进村前，河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附近普兰大队搞所谓四清试点，吴臣在开公社党委会和大队干部会时和别人议论过普兰“四清”中打击一大片干部，把生产搞糟了的一些问题。王××混淆是非，说“吴臣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污蔑普兰的‘四清’”，硬给吴臣扣上“千方百计抵抗四清运动”的帽子。

四、捏造罪证。王××授意她的爪牙关景东说：“你应当大胆揭发吴臣的问题，要从政治上想他的问题。”于是，关景东就捏造“吴臣在一九五一年当干部时放走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事实是吴臣当时并没有当干部，这个反革命分子不是他放走的。关景东还四处活动，唆使别人写假证明，诬告陷害吴臣。他还指使人写匿名信造谣吴臣在桃园有五个姘头。

王××还派人跑到外地制造了一些假调查材料，诬赖“吴臣勾结过伪警察，开过大烟馆”。事实是吴臣既没有勾结过伪警察，也没有开过大烟馆，仅仅摆过小纸烟摊。

五、体罚逼供。王××工作组还硬逼吴臣承认放走过反革命，当过特务，腰里挂过“洋手铐”。王××六次专找吴臣，逼他交代所谓政治问题。吴臣说：“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没有的事我不能瞎说。”王××说：“什么实事求是，你就是抵抗‘四清’，你就是国民党作风，你们的支部就是国民党支部，是黑支部。”吴臣义正词严地反驳说：“十多年来，我们支部党员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都带头，征购任务年年超额完成，各项工作一直走在前头，还得到上级党委和政府多次奖励，怎能说我们是国民党支部、黑支部呢？”王××说：“你很不老实！”吴臣说：“难道承认就老实？不承认就不老实？”以后，王××工作组又组织了围斗，逼吴臣低头、弯腰，甚至还要他把头低到火炉上去烤，烤昏了再拉

到屋外去冻。连压带诈，吴臣仍不屈服。王××就批评工作组说：“火力不猛，太右，加强火力再斗！”这样连续围斗了四十五天。军属陈大娘的儿子回家探亲，看了这般情景，对王××的这种做法，表示不满，他对工作组说：“你们要了解情况，这样要出偏差的。”王××听了大怒说：“这小子忘本了，觉悟太低，假如他思想扭不过来，就给他所在单位去信。”

六、置于死地。“四清”后期，在党员大会讨论大队干部候选人时，吴臣不同意王××内定她的爪牙关景东当大队长，吴臣说：“关景东问题不小，怎么能当大队长？”他提出另外一个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候选人。这就大大激怒了王××。她向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汇报了吴臣的情况。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于三月二十七日 and 四月十一日连续两次去信，就“制服吴臣”问题，专门作了黑指示。他在信中恶狠狠地说：“吴臣一伙要复辟，以便彻底推翻四清成果。”“是一种实际上的反革命活动”，要“剥夺发言权”，“以后煽动，随时加以揭露和斗争”。王××按照这些黑指示，就宣布说：“吴臣戴着党员的帽子，在支部里要起破坏作用，就可能比任何反革命分子所起的破坏作用都要大。”又说：“要不开除他的党籍，过几年他又上去了。”“要不定成坏分子，就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于是，未经全体党员讨论，就宣布开除吴臣党籍，硬给吴臣戴上坏分子的帽子。

王××整吴臣是：先撤职，后找材料，先戴坏分子帽子，后捏造罪证。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撤了吴臣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半个月后才制定出所谓“搞清吴臣问题工作计划”。四月十一日给吴臣戴上坏分子帽子，由于做贼心虚，过了五个月，她又再进桃园，亲自指挥工作组继续捏造罪证。

吴臣虽然不识字，在被王××打成坏分子期间，还在他十二岁小女儿的帮助下，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他已能背诵几十条毛主席语录并经常应用，表现了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

（二）赵树椿

王××在打击陷害吴臣的同时，还残酷打击了副支部书记赵树椿。赵树椿也是比较好的干部，王××却胡说：“支部书记有问题，副支书问题也少不了。”赵树椿在“四清”中，因胆结石病，卧床不起，王××就说：“赵树椿有意对抗工作组，装病。”并捕风捉影地说：“这个人不老实，肯定有问题。”他指挥工

工作组对赵树椿进行残酷围斗，百般折磨，并毫无理由地给他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最后干脆开除了他的党籍。

桃园“四清”结束五个月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一份社教简报中，看到有个叫赵树椿的，在广西倒卖手表、自行车的事。这个揭发材料本来就是假的，揭发材料上也明明写着“未经查对，仅供参考”的字样，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立即要他的老婆王××赶回桃园重新追查赵树椿的问题。王××星夜召回了原工作组的全体人员，说：“桃园还有一个大贪污犯没有搞出来。这个大贪污犯就是赵树椿。”接着就组织了专案组，逼赵交代投机倒把事实，整整搞了半个多月。从赵树椿的出身历史到社会关系反复追查，都没有发现任何疑点。后来，工作组打电话到出简报的单位查对，这才发现，是把河北省威县的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毫不相干的事，硬拉到桃园的赵树椿头上。王××才悄悄地撤了专案组，偷偷溜回北京。

赵树椿经过他们这样残酷的陷害和打击，病情恶化，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含冤死去。赵树椿临死的时候还再三嘱咐他的女儿，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要永远相信党，世世代代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个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党员，就这样屈死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老婆王××的威逼之下。

（三）袁秀英

原大队长、党支部委员袁秀英（女），由于在化名来桃园的王××面前，揭露了关景东在一九五八年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假报产量，浮夸吹牛的事实，说：“关景东最能吹牛，把×××（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王××都吹来了。”这就触犯了王××，从此，便成了被打击迫害的对象，整了她两个月，最后搞掉了她的大队长职务。

（四）赵品三

原一队队长、党支部委员赵品三，在运动后期，王××要让他当支部书记。赵因不同意王××扶植她的爪牙关景东上台当大队长，不愿和关搭班子，说：“有关景东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关景东，他干我就不干。”王××就大为恼火，先拉后打。说：“赵品三不干，不能让他白白下去，非把他搞臭不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给王××来信说：“赵品三坚决不当支书……是否已经是一种严重的反党活动。”于是，王××就组织专人搜集整赵品三的材料，并

撤了他队长的职务。

五、保护一小撮，扶植坏人当政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分子王××打击一大片好干部，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扶植坏人上台当政，为他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社会基础。

他们在桃园保护的重点人物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景东。

关景东出身中农，父亲是个经纪人，本人从学校出来就当干部。一九五四年带着浓厚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混进了党内。

一九五五年任初级社主任时，因破坏春耕生产，违反政府法令私杀耕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在初级社转高级社时，又违反党的政策，变卖生产资料，把两头骡子，一辆胶轮大车，卖款私分。当高级社主任时，他又利用职权，私抽入社股金。他一再破坏合作化运动的行为，遭到广大群众的反对。有人说：“关景东这样挖社会主义墙脚，是无心干社会主义的。”

一九五八年，关景东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挂上了钩。这年秋天，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到卢王庄高级社，大刮浮夸风。他指着地里的高粱问关景东：“多穗高粱最高每亩能产多少斤？”关景东答：“能产一万斤。”

又问：“还能不能再高些，能产一万五千斤吗？”关景东说：“尽量争取。”于是这个浮夸风的祖师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连连点头称赞说：“那就好了。”这时，他的老婆王××立即掏出笔记本，把关景东等人的名字记了下来。不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送来了电影机和种猪、种兔等，声称作为“股金”，全家入了关所在的高级社，捞了一个“名誉社员”的头衔。

同年，人民公社建立后，关景东去北京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汇报建社情况，成了他家的座上客。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向关景东大讲黑话，疯狂攻击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是不是建得太匆忙了？”“太匆忙是要摔跤的。没有群众基础，早晚也要垮台。”“办事不要凭脑子一热就

办。”这些黑话，充分暴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反对人民公社的罪魁祸首。

关景东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里领受黑指示回来之后，反动气焰格外嚣张，恶毒攻击人民公社。他胡说什么：“公社不如合作社，合作社不如互助组。”又说：“我家单干的时候，粮食有的是，愿意卖多少就卖多少，钱没有憋住过。”他还说：“队越小越好，人多心不齐，地多不长粮，人多出懒蛋。”

一九五九年到“四清”以前，关景东先后窃踞了卢王庄公社一分支（相当于大队支部）副书记、公社采购员、桃园大队民兵连长、治保主任等职。在这期间，他常常打着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招牌，利用职权，大干坏事：

1、贪污盗窃。关景东的贪污盗窃不仅是大队干部中数量最大的，而且情节极其恶劣。在高级社当副主任时，他多次偷油偷面，有一次偷油之后，为了洗刷罪责，竟限令治保副股长五天破案。在当民兵连长时，和大队长、副支书关××勾结，大偷玉米。还和反革命分子岳绍田跑到邻队去偷棉花。在任公社采购员期间，偷公社的铜线一百多斤，被抓住后，停职反省了十八天。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利用职权明抢暗偷，派大车往家里拉粮拉菜，生产队里照顾孕妇、病人的细粮他也拿走，甚至幼儿园小孩田间拣回的小麦也要去吃了。他还以极低的代价，强行霸占已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地主房屋两间半。

2、投机倒把。一九六〇年，关景东勾结大贪污犯祖××，盗用公社名义，骗取唐山铁路工务段支援公社木材，高价变卖分赃。一九六一年，队里买小猪给社员养猪积肥，他乘机从中倒卖牟利。同年，又借卖大队薯秧的机会，进行投机倒把，获暴利五百多元。

3、聚赌抽头。关景东从一九五三年起就聚赌抽头。他赌的次数最多，款数最大。仅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就赌博二百余次，抽头达数百元。一九五七年任高级社副主任时，他还利用职权，设赌抓赌，把自己输掉的钱捞回来。当上级警告他时，他说：“我不要钱不行，宁可不要党籍也要耍钱。”

4、横行霸道，欺压贫下中农。关景东依仗权势，打骂群众多人。有一次他竟和他的堂兄关××一起组织几个四类分子毒打贫农王兆荣，打得王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血肉模糊。

5、拉拢腐蚀干部，阴谋篡夺支部领导权。关景东对上吹拍逢迎，送礼行贿，

对下腐蚀拉拢。为了巴结上边的一个干部，他多次请吃请喝，还送去花生、豆子、猪肉等。他钻进桃园支部以后，经常拉拢几个干部，从大队拿油拿面，大吃大喝。他身为治保主任，对四类分子竟然三年不开一次训话会。支部书记吴臣埋头苦干，他反而攻击吴臣“揽权过多”。在支部内，他两面三刀，挑拨离间，拉一批人，打一批人，千方百计要把吴臣整下台。他曾对人说：“不把吴臣整下台，我不姓关。”

对关景东这样一个坏家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的老婆王××，却是不遗余力地保他过关，扶他上台。

王××到桃园不久，在一个戒备森严的小屋里，取下了头巾和大口罩，和关景东见面。关景东说：“我犯了错误，对不起×××（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说：“你不要怕，你过去的情况，我都知道，我很信任你，我保你下楼，从轻处理。”

为保关景东过关上台当政，王××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

定调子。广大贫下中农说：“关景东是桃园的害人虫，他的问题最大。”王××却说：“看问题不能那么看，问题大的还是吴臣。”有些人向工作组检举了关景东的一些严重问题，王××不仅不让追，不让斗，还叫工作组向广大群众保密。

出点子。王××对关景东说：“你交代的问题能不能站住脚？你准备准备，我要派对你有意见的人去调查，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关景东领会了她的意思，赶忙同合伙搞投机倒把的人订了攻守同盟。

搭梯子。群众刚刚开始揭发关景东的问题，王××就急急忙忙叫关景东带头在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检查，帮他下楼过关。王××亲自替他修改检讨稿。

拉上台。选举干部开始，王××提出要安排关景东当大队长，遭到了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的激烈反对。她就抬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说：“这个问题，我给××去过信。××说，‘还是关景东当大队长’。”接着召开了三次党支部大会，强令党员保证关景东当选。

关景东当上大队长以后，又经王××批准，把因犯了严重错误，在“四清”前夕已被撤职的他的堂兄关××，重新拉上台，当上了大队治保主任。又把民愤极大的岳绍田，提拔为大队治保副主任。从此，关景东等一小撮在王××工作组

的支撑之下，把持了桃园的党政大权，对贫下中农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六、大搞独立王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一、打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旗，散布修正主义毒素

王××在桃园，不放过一切机会大肆吹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无论大会小会，她开口就是“××指示”，“××派我来的”，“××对大家很关心”，“××给你们撑腰”。对于王××这种无耻吹捧，社员们非常愤怒，他们说：“王××来桃园搞四清，张口闭口总是×××（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不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王××在整个“蹲点”过程中，从来不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却到处贩卖《修养》黑货。她经常散布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她动员干部退赔时说：“退赔了几个钱，经济上吃点小亏，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和信任，还选你当干部，到头来占个大便宜。”

王××厚颜无耻地到处吹嘘她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其实她的所谓“三同”，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她东挑西拣，选了一栋清洁僻静的厢房作宿舍，专派了公安处长等四个人给她保驾。她在社员家吃饭，“蜻蜓点水”，应付两口，回到宿舍，大吃鸡蛋、花生、高级点心。装装样子“劳动”一下，也要跟上一个照相的，这里摸摸，那里转转，照完相就走。并把这些假“三同”的相片大量散发给社员。在大队、公社以及县领导机关的办公室，也挂起了王××的照片。凡是她装模作样“劳动”过一下的地方，以及她住过的地方都分别竖起了纪念碑。招徕了国内外近万人的参观，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她自己树碑立传，捞取政治资本。

二、对外严密封锁，对内加强控制

王××唯恐她搞的假四清、真复辟阴谋败露，离开桃园以后，专门搞了个“巩固组”，为她看“点”，把持桃园党政大权。“巩固组”设有专线电话，直通北京，接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王××的遥控指挥。

王××特别关照“巩固组”和她的亲信说：“桃园是‘中央’的点，是××的点”，“我和××是支持你们的，是给你们撑腰的。”“桃园的四清经验传出去了，我怕的就是你们顶不住。”“今后不论哪级干部来，他们要是不信任桃园‘群众’，就把他顶回去！”

在王××一手遮天的反动统治下，对桃园的事情，别人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县、区很多干部都不敢过问。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往往要加上一句话：“桃园可根据本村情况自行安排。”

吴臣问题始终是王××的一块心病。“巩固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镇压吴臣不准翻案。每次评审四类分子，都把吴臣作为重点，并布置四类分子对他严密监视。一九六四年秋天，王××专门找原桃园“四清”工作组组长说：“今后时间长了，坏分子可能翻案，这个问题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记，桃园出了问题，我那报告已经出去了，就会出问题的。”又说：“千万不能让他们翻案呀！”

地、县监委派人到桃园核实吴臣的问题，王××知道后勃然大怒说：“这些人吃了喝了不干事，就是给四不清翻案！”县监委的干部，竟因此被迫作了多次检讨。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亲自出马，就“四清”复查问题，对中央监委说：“监委审批只有同意，不许翻案，有的可以加重，不许减轻。这样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让他冤枉一两年再说。”

三、培植亲信爪牙，竭力巩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

关景东等一小撮坏人，在王××扶植上台以后，遭到社员们强烈反对。

王××明知她的爪牙关景东很不得人心，便格外嘱咐他说：“今后你要把一帮人团结住。”

“四清”后，有的根本不够党员条件的“根子”，很快发展入党。由王××一手扶植起来的大队贫协主席，本来在群众中没有威信，但在王××的一再指令下，硬是拉入党内。

王××和她的亲信对敢于斗争和反抗的革命群众，采取了种种手段，进行打击和迫害。

有一个共产党员在一九六二年就写信向上级检举过关景东的问题，“四清”中又进一步作了揭发。“四清”后，被加上了打击“好干部”的罪名，整了三个晚上，并给了党内警告处分。

有一个社员对关景东倚仗职权欺压群众不满。一九六五年二月，队里死了一头牛，关景东就趁机嫁祸于他，别有用心地说他的家庭成份有问题，是有意破坏，暗中煽动人要把他的成份由中农提高到富农，借以压制许多敢于反抗的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王××的爪牙关景东等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群众。

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利用地主分子栽赃诬陷，把一个犯有错误早已作了处理的下台干部拉出来，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斗。私设公堂，严刑吊打，整了三十八天。并把他七十多岁的姑妈扒光衣服，毒打逼供，致使重伤，终于死亡。

北京等地革命小将来桃园串连，王××的亲信威胁群众说，学生问到“四清”情况，只准说好，不准说坏，谁说错了谁负责任。他们还还对革命小将盯梢监视。

王××的爪牙关景东狂妄叫嚣：“这里是桃园，不是北京，在桃园就得听我的！”

七、大刮经济主义黑风，美化桃园，对抗大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分子王××，在桃园还大刮经济主义黑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企图给桃园披上一件虚假繁荣的外衣，以他们的所谓“桃园点”，对抗大寨精神，同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唱对台戏。

王××曾狂妄地说：“全国都在学大寨，桃园要在政治上超过大寨，叫全国也要学习桃园。”

他们利用窃取的政治特权，硬把国家的钱，国家的东西，拿到桃园来。把全民所有，变为小集体所有。

为了美化王××的“桃园点”，先后修了两个电力扬水站，两个电力扬水点，三眼机井。同时，架设了通向桃园的高压输电线四十二里，低压配电线三十四里，开挖了一条六里长的灌溉干渠。为了招揽外人参观和王××行车方便，还专修了一条九里长的“娘娘路”。这些工程，共占用国家建设资金六十四万四千元。群众说：“王××蹲点，是腰里揣着钱来的。”

桃园大队的水利建设，本来应该按自力更生、经费自筹的方针办事。王××来桃园后，听说没有给桃园安排水利投资，大为不满，指责县水利科“不支持四清，与四清对抗”。原水利科长仅仅做了一点解释，背后说了一句“中央来的首长也得按政策办事”，就触犯了王××的“尊严”，遭到政治迫害，扣上“给四

清刮冷风”的帽子，停职反省九个月，最后被撤职。

由于王××在桃园“蹲点”，在物资供应上，竟然出现了这样一条奇怪的规定：“满足需要，及时供应，优先桃园。”

国家调拨的化肥，除了在县里分配时就已经特殊照顾以外，还从省里直接调拨。邻队社员说：“桃园施肥大把抓，我们施肥用手掐。”“桃园地里的化肥水，流到我们地里也长好庄稼。”

桃园要耕地，按合同正在给邻队耕地的拖拉机也要调来；桃园要打麦子，邻队正在使用的打麦机也要抽来；桃园要灭虫，邻队正在使用的喷雾器也要调来“支援”。理由是：“别的队减产没关系，桃园减产就交代不了。”“要保王××的点。”

反革命经济主义严重腐蚀了群众的革命意志，助长了单纯依赖国家的思想。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的三年中，虽然国家大量投资，水电设备样样俱全，但生产很不稳定。一九六六年产量大幅度下降，比一九六五年减产三成。

“四清”前，桃园大队年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而在“四清”后的三年中，有两年没有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王××“蹲点”所在的第四生产队，“四清”前是个余粮队，一九六四年因粮食减产，口粮下降，王××逼着国家粮站，把已经征购入库的粮食又退回了一万八千斤。

国家投资设备的折旧费无力按比例逐年扣除，国家贷款还逐年增加。社员们说，“这实际上是把国家的钱拿来分红了。”

桃园大队社员们，身受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祸害，看穿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分子王××的反动面目。他们说：“王妖婆搞四清，生产越搞越不中。光搞物质刺激打强心针，把国家钱撒在桃园，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害了社员，损了集体，坑了国家。”

× ×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丧钟。桃园大队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造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分子王××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桃园大队的革命造反派揪出了王××一手扶植上台的桃园大队党内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景东。

不久前，在解放军支左、支农部队的支援下，在桃园举行了万人大会。革命造反派和受到迫害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愤怒控诉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王××在桃园犯下的滔天罪行。

革命群众为吴臣、赵树椿同志彻底平了反。

桃园大队的革命群众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王××“桃园经验”的流毒，彻底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桃园大队建设成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揭开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

今天，本报发表的关于桃园大队“四清”情况的调查报告，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滔天罪行。

这个调查报告，是桃园大队贫下中农的一份血泪控诉书，是中国赫鲁晓夫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铁的罪证。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为四清运动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四清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在毛主席制定的这两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中指出：这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重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主席制定的这条路线，就是要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极端

重要的问题，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

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站在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代表了那些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益，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这一场伟大的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拚命地反对这场革命。他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全面的进攻。他指派他的老婆资产阶级分子王××到桃园搞所谓“蹲点”，就是要把桃园变成他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黑试验场。他还精心地炮制了一个所谓“桃园经验”，大吹大擂，敲锣打鼓，恬不知耻地到处兜售；甚至盗用中央的名义，把它向全国推广。这完全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篡党篡国的大阴谋。

中国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推行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究竟是什么货色，在桃园大队的“四清”运动中，暴露得最彻底。

中国赫鲁晓夫的所谓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就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四清运动的性质，故意掩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中国赫鲁晓夫的所谓什么“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要制造借口，大整干部，大整社员，镇压革命群众，把四清运动引到邪路上去。

中国赫鲁晓夫的所谓什么“扎根串连”，就是疯狂反对毛主席历来主张、历来实行的用阶级分析方法去向社会作调查，疯狂反对革命群众运动，以便他们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培植和发展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要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挽救剥削阶级的最后灭亡。

这是一套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货。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失去了政权的剥削阶级和代表他们的反革命势力，总是要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从无产阶级手里把政权夺回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全国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后台，是被打倒的剥削阶

级在党内的总代表。他所以要推行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其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的精心策划下，桃园大队政权落到了坏人手里，他们为所欲为，实行法西斯统治。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处于受打击受迫害的地位。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活样板。中国的赫鲁晓夫还要把这样的“桃园经验”推广到全国。不难设想，他的这个阴谋一旦得逞，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出现大倒退，我们国家就要改变颜色，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就要重新被推到苦海之中。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呀！我们怎能不引起高度的警惕，怎能掉以轻心！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一场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一场极其激烈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之间的一场极其激烈的大搏斗。在这一场大搏斗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了，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失败了。

事实完全证明：隐藏在我们党内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总头目的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无产阶级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是一群凶恶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每个重要关头，他们都要跳出来，兴风作浪，破坏捣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他们的命，就是要把他们彻底打倒。不仅要从组织上夺他们的权，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只有这样，才能使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大倒退，不致在我国重演。

当前，全国正在展开对中国赫鲁晓夫全面的革命大批判，对于这样恶贯满盈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的黑账我们必须一笔一笔地清算。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革命的大批判运动，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的彻底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阵阵疾风骤雨，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

界。

形势大好。从文化领域中的大批判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一年激动人心的战斗，现在正胜利地进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的大批判。这个大批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深入发展，是清除修正主义毒素的重大步骤，是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斗、批、改的思想动力，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深入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斗争。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本书：一九六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简称《理想》)，和一九六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简称《思想》)，就是我们展开大批判极好的反面教材。它们是黑《修养》的“姊妹篇”，活龙活现地刻划出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历史的前进，总是使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挥拳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加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我是一贯革命的。”好，我们就用这两本书为主要材料，看一看这个“一贯革命”的人物到底“一贯”跟谁走，是在“革”什么“命”，到底在坚持什么“理想”，在鼓吹什么“情操”，在宣扬哪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

陶铸是那一“派”？书中鼓吹的“理想”是那一派的“理想”？只要看看他的自画招供就足够了：

一九五五年八月，正当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陶铸跳出来拍着胸膛宣布：“我们大家都是一派，这一派叫做中国人民派，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大家都要很亲切地团结起来”①。“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大家”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为一方，资产阶级为一方。陶铸恶毒地诬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侮辱人格”，胡说什么胡适的反动思想仅仅是属于“思想方法问题”，“等三十年、四十年”以后“才看得清楚”②，很明显，他说的“我们大家”，指的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胡适之流的人物。陶铸所吹嘘的要“很亲切地”拥抱在一起的什么“中国人民派”，实际上就是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在同一个报告中，陶铸还无限同情地说：“目前大陆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的处境是可怜的，心情是痛苦的”，言为心声，一个“可怜”，一个“痛苦”，一笔勾销了反革命分子的可恨和残暴，把他同反革命分子心心相印的“精神生活”，活活地刻划了出来。这样精彩的“表态”，在收入本书时作为“摘要”以外的部分被删去了。

过了两年，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陶铸立刻在报上写文章大叫大喊，“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要减弱”，要“转”到“领导生产”“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去③。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统统成了一个“大家庭”中的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只管“领导生产”的“全民国家”即可实现。这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腔调，完全是一付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的嘴脸。

再过两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正当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鼓吹“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④；在《革命的坚定性》中

鼓吹什么要“面对大海”，经得起“狂风暴雨的侵袭”^⑤。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英雄壮志，被他叫做“恶劣的环境”；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打击了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彭德怀反党集团，他却狂叫“要经得起狂风暴雨的打击”。不须多加一字，反革命立场昭然若揭。

再过六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在伟大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及陶铸之流，则发狂地反对和抵抗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当批判《海瑞罢官》刚开始，一场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生死搏斗迫在眉睫的时刻，陶铸在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文艺报》上又一次“亮相”。他说：“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⑥说什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公然抹杀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徒、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当做“人民内部”的问题，掩盖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好把钻进党内的一批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统统包庇下来。

什么“一贯革命”？一贯的反革命！可以说，每个历史关键时刻，他都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吹得五花八门的什么“理想”，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理想，是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痴心妄想。

请看：

其一曰：“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⑦。照这种反动透顶的“社会主义”理论，岂不是工业化了的美国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了吗？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办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依靠突出政治，依靠毛泽东思想所唤起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书中反复鼓吹的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依靠“物质刺激”，依靠保守派，使企业的领导权为代表资

产阶级利益的特权阶层所篡夺。所谓用“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尽是挨打的历史，原因就是自己没有工业”^⑧。陶铸俨然以一个蹩脚的历史教师的口吻向我们讲一篇中国近代史，当然是颠倒了的历史。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百零九年，中国人所以“挨打”，主要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业，而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的走狗即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到蒋介石这些卖国贼手里。自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帝国主义再想打我们，就得先想想自己的猪爪子有多硬。文化大革命越搞得彻底，毛泽东思想越是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越巩固，打起仗来就越无敌于天下。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把过去“挨打”统统归诸“没有工业”，这就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的罪行统统掩盖了，这就美化了那些在“发展工业”幌子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走狗，这是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模一样的卖国主义腔调！

其二曰：“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⑨一句话，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享乐主义。什么人给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可以出卖自己灵魂，而且还可以廉价奉送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真是最卑鄙的叛徒哲学！“共产主义”的外衣，极端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陶铸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定义。照这个定义，美国资产阶级生活岂不是最符合“共产主义理想”了吗？

其三曰：“崇高的理想”就是念念不忘地“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⑩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低层，永世不得翻身。而摆得很高很高以至极其“崇高”的，是那些一大串资产阶级的“家”。“资产阶级参加过民主运动，他们搞工业有知识，不比地主那么腐败”^{⑪⑪}。对了，这就招供出你这些“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专门家，而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你所谓的“知识”，就是资本家如何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工人之类的知识。陶铸的“崇高理想”就是通过这一批爬得很“高”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行反革命复辟。今天，

一批很“高”的资产阶级“权威”被革命小将拉下来了。

还有一种：伟大的理想，就是所谓要“真正做到大家心情舒畅”。一九六二年，正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妖魔乱舞，毒草丛生的时刻，为了资产阶级能“心情舒畅”，陶铸在《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一文中，就胡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一定要发挥劳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①②}（按：查陶铸的报告原文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给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呵！什么“三家村”，什么田汉、夏衍、吴晗、翦伯赞，什么海瑞、魏征、李慧娘之流，统统“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他们经过这一番脱帽加冕，不是就可以更“起劲”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了吗？乐陶陶地“大家很融洽、很舒畅”，不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了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总有一家不“舒畅”，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无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日，就是资产阶级倒霉之时。资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时，就是无产阶级痛苦之日。二者必居其一。为资产阶级不“舒畅”而喊冤叫屈的人，只能证明他自己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

陶铸说：他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是“对所有的人”包括资产阶级“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怎么会对资产阶级“有好处”呢？所谓“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是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是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全民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

够了！上述这些材料，已足够使我们看清楚这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他坚持的是一条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他爱的、想的、颂的是资本主义，他恨的、怕的、骂的是社会主义。这些文章中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改造党。

这位人物有一句“名言”：“确立社会主义思想”或理想，就是“起码也要使社会主义思想占整个思想的百分之五十以上”^{①③}。人的世界观怎么可以用百分比来计算呢？真是荒谬绝伦。拆穿了，其实是一场十分拙劣的大骗局。这是

在告诉资产阶级以伪装的形式出现，把“百分之五十”的语言披上“社会主义思想”的外衣，来掩盖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这是最典型的修正主义。这两本书就是用此法写出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过这样向资产阶级“交心”的话：“资产阶级”只要“学会马克思主义”词句，就可以“眉笑眼开”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名、利双收。这就是所谓“百分之五十九”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好的注解。“理想”！“理想”！资产阶级看见这样忠实的代理人，真要感激涕零了。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你要知道这两本书中宣扬一种什么“精神生活”吗？不须多看，取其“精华”就够了。这就是——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加上奴才的“思想”。

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说过：“讲到政治的意义，总理已经明白告诉我们：‘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所以‘政治’的意义：就是要达到全国总动员之科学的方法，来管理众人的事，而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最大的福利。”①④

陶铸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政治。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我们‘管理众人的事’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事，讲清道理，使大家懂得道理，心悦诚服地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①⑤

陶铸无耻地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更准确一些，是奴才。你看他这种言论象不象奴才！？

把政治叫做“管理众人之事”，这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反动观点。没有抽象的“众人”，“众人”在阶级社会里，是划分为阶级的。也没有什么抽象的“管理”，“管理”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处理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哪一个阶级掌握和运用政权的问题。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深刻地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①⑥。用毛主席这个

观点去分析，政治，就是为巩固或推翻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的政权而斗争；为保护或摧毁这一种所有制或那一种所有制而斗争；为夺取或维护这一阶级（集团）的利益或那一阶级（集团）的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压迫、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就不但代表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它政治活动的阶级内容，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就把反革命政治抽象地说成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从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直到搞“全民国家”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共同的手法。蒋介石所谓“管理众人”，就是血腥地使用反革命的国家机器去镇压和屠杀广大的劳动人民，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说成是“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幸福”，还要用什么“总动员”去欺骗，卑鄙无耻到了极点。而奴才陶铸搬出这一套，则是要实现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把为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派利益效劳的奴才行为，说成是“为人民谋利益”，还要用什么“讲清道理”去欺骗，同样是卑鄙到了极点。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鼓吹什么“亲爱精诚的精神”，鼓吹什么“先知先觉”。陶铸原封不动地用上了：

“我们并不完全否认孙中山先生的所谓‘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社会上是有这种情况的：有些人进步快一些，有些人进步慢一些，只要他有上进之心，终归是可以进步的……”①⑦；

“马克思主义者应要求人宽，要求己严……对党外人士不是要求很高，应象孙中山讲的‘精诚团结’……。”①⑧

“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是抽去了阶级内容、脱离社会实践的历史唯心论的反动观点。毛主席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⑨那些死不回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些累教不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死硬派，并不是因为他们什么“后知后觉”，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杀人犯和苏共叛徒集团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上进之心”，而是因为他们是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所执行的路线不管有多少花招，只能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苏联

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反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能够冲破重重障碍、突破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沉重的以至残酷的压迫而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们“先知先觉”，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这个集中了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最高智慧的理论武器，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能越战越强，万难不屈，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今天陶铸吹捧这种反动的唯心论，是要使人们相信资产阶级“终归可以进步”，麻痹人民的革命警惕，帮助资产阶级混进无产阶级内部进行破坏。

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纯粹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语言！同一个词汇，不同的阶级赋予不同的解释。我们偶而也用这个词，那是指在一定革命目标下的团结，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而斗争。我们从来是讲：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团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然而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却是抛弃原则、背叛社会主义方向、适合资产阶级要求的“精诚团结”！团结和斗争是统一体的两个相互矛盾着的侧面，没有斗争，也就无所谓团结。团结是相对的、过渡的，斗争是绝对的。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发展中一分为二，人们的认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②⑩}哪里有陶铸那种永恒不变的“精诚团结”。算命先生挂出一块牌子说：“诚则灵”，那是骗人的把戏。蒋介石用什么“精诚团结”掩盖内部的狗咬狗，作为灌输法西斯思想的工具，陶铸则破天荒地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用来瓦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书中还说：“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初期之所以能获得胜利，是由于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顺应’了当时革命的客观规律”^{②①}。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胜利，不是归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政策，不是归于革命人民的斗争，而是统统归于国民党，这完全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说话。把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胜利果实送给国民党作捧场，这不是叛徒的腔调是什么？

够了！够了！这些肮脏的言论，难道不是暴露出陶铸“精神生活”深处是一个国民党反动哲学的世界吗？

除了国民党反动哲学外，剩下的“思想”完全是黑《修养》中的垃圾。

《理想》一书不是欺骗青年说，什么“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不可分的”，只要装做“把工作做好”，就会得到“重视”“器重”“赞扬”以至“闻名全中国、全世界”吗？这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投机商的市侩哲学原封不动的翻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九六〇年二月接见民建会、工商联常务委员时，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献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就会来。”②②这句话相当精练地总结了资产阶级野心家几十年“做人”的经验，概括了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人生哲学的“精髓”。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集体利益”，在他们这一小撮人统统是假的、骗人的，装出来给别人看的，是手段；而捞取“个人利益”、个人权力、个人享受则是真的，是目的，是丑恶灵魂的本质。这是资产阶级反革命两面派混进革命内部夺取权力的诡计。现在用来毒害青年一代，这种软刀子杀人的罪恶我们难道能容忍吗？

《理想》一书不是还欺骗青年说：“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②③吗？这也是从中国的赫鲁晓夫那里贩来的货色。在阶级社会中，是、非都有鲜明的阶级标准，所谓“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用抽象的“是非”来掩盖人们看问题时的阶级立场，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的”特性。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他在天津向资产阶级屈膝跪拜的丑行时，恬不知耻地说：“资本家反映说我们的报纸不好，我说的确有点不大好，我也承认这个错误，……以后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②④。你看他多么“从实际出发”啊！“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这是多么“公平”的法官啊！这个工贼的“是非”是多么鲜明啊！这个资产阶级的恶奴才对自己的主子的“好”处是多么念念不忘啊！他训斥工人“不好”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态又是多么清晰啊！而《理想》一书作者对某氏的出卖灵魂的哲学，真是背得熟透了啊！

《理想》一书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

主观第二” ②⑤。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完全抹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们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这决不是什么“辩证唯物论”，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奋斗，“客观第一”岂不成了一纸空文！但仅仅这样批判，还是不够的，须知他之所以要宣传这种机械唯物论或庸俗唯物论，就是要宣传一种随波逐流、随时可以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不是吗？资产阶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可以从资产阶级出发，听资产阶级的话，以资产阶级利益为标准，“是就是，非就非”，于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可以冒充“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了。拆穿西洋镜，就是这么一个把戏。

陶铸不是还眉飞色舞地向青年说：“世界上有男的，有女的，就会有恋爱” ②⑥吗？这立刻使人想起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句荒谬的“名言”，“一条牛加一条牛仍是牛……但是一条公牛加一条母牛就形成了新的关系，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便成了夫妻的关系。一切东西都必须是矛盾的统一体。” ②⑦在他们这一伙人看来，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公牛同母牛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是按阶级划分的、按阶级关系结合的。男女关系也不例外。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就说过：“饥区的灾民，总不会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个基本事实，被他们抹杀了，践踏了。他们这种庸俗透顶的语言，不能够损害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一根毫毛，只能反映出他们一伙心目中的相互关系及其“修养”，就是“公牛加母牛”“男人加女人”之类资产阶级的丑恶不堪的东西。君不见大谈“修养”的那一伙人，无一不是腐烂已极的伪君子吗？

书中说，“一个人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决定其“成功与失败”，“就在于主观与客观的是否一致” ②⑧，你在国民党统治下究竟是怎样奴颜婢膝地把“主观”同“客观”去“一致”的，这“几十年”的“成功”中又是怎样同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资产阶级“一致”的，难道还不该拿到光天化日下来吗？

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

一九五九年五月，正当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抛出他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黑纲领的前夕，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中，摆出一付“海瑞”的架式，公开地、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他一面说，人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蓬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一面公然借攻击“太阳”的“过失”，指桑骂槐地说：“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②⑨

“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在你眼睛里，岂但是“黑点”，社会主义简直就是漆黑一团。用资产阶级的眼睛看问题的人，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他们比瞎子还要瞎。在这位修正主义者看来，“太阳”的社会主义光辉晒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不了，现形了，“流汗了”，“过份了”，这就是“太阳”的“过失”所在。其实，这正是“太阳”伟大的地方。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牛鬼蛇神、臭虫虱子、细菌病毒，只有让它们见一见“太阳”的光和热，才会死亡；真正的劳动人民，正是在太阳光辉下锻炼得坚强起来的。不晒太阳，不流汗，身体怎么会健壮起来？咒骂“太阳”的“光和热”，其实就是咒骂无产阶级“过火了”，咒骂社会主义、人民公社“过份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黑话，正好暴露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鬼物。

陶铸不是在《松树的风格》中赞美“松树”“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③⑩吗？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是抵挡不住的，硬要向光明宣战，只能使自己从黑暗中堕落进更黑暗的地方去。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五年《理想》再版时，“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这句话，忽然改成了“以太阳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真是欲盖弥彰，绝妙地自我暴露出作贼心虚的贼子心肠！你删去“领袖”二字，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矛头是针对伟大的领袖的吗？如若不然，何必慌慌张张地删去？你在“党”前面添上“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了吗？如若不然，何必急急忙忙地添上？心中有鬼，脸上变色，就这样手忙脚乱了。一九五九年五月，陶铸不是在汕头一次报告中大喊“要学习海瑞的风格”以配合彭

德怀的进攻吗？看来这个“海瑞”的“风格”并不那么“高”，本事也很拙劣。然而这一改，配合彭德怀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却是不打自招，铁证如山，无可抵赖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下旬，庐山会议开过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揭露了出来，修正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被彻底粉碎了。这位修正主义者在《胜利得来不易》一文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对“一小部分人”的“热衷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③①}表示了不满。可是，这“一小部分人”是谁呢？不就有你吗？不正是你在文章中命令报纸上必须“刊登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尽管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应该刊登”^{③②}吗？不就是你热衷于暴露社会主义的所谓“黑暗”“黑点”吗？这是赖不掉的。正因为有他一份，这篇文章中，他对这“一小部分人”表示了无限的同情，说什么“我们提起这些人，是希望他们转变立场，首先把身心都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里来”^{③③}。这是劝告破了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伪装成“转变立场”，混进革命的“行列”中来继续干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对无产阶级咬牙切齿的仇恨，对资产阶级无微不至的爱护，这就是陶铸的“感情”。剥去伪装的画皮，站着的就是这么一个恶鬼。

腐朽不堪的“文采”

装腔作势的文风，歪七歪八念都念不通的文字，硬要自封有什么“文采”，真是丑死了！活象那些附庸风雅的土地主，明明一窍不通，硬要摇头晃脑哼哼几句八股调一样。

虽然没有什么“文采”，书中却十分卖力地宣扬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陶铸忠实地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文艺纲领，同陆定一，周扬完全是一丘之貉。((2)(3))一九六〇年春，旧文化部夏衍、陈荒煤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开所谓“全国新闻纪录电影创作会议”时，就把《思想·感情·文采》这棵大毒草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给大家“学习”。可见他们勾结之深。为了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陶铸几乎把文艺界流传的各种反动论点，什么人性论、“写真实”论、“创作自由”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统统收罗进他的黑店中。下面略举一二，稍加驳斥：

“共产党员是讲感情的……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③④}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感情，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感情。这里的“感情”

指的是“爱”。“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要爱一切人”，就是要爱剥削阶级，爱叛徒，爱奴才，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向反动派屈膝跪拜的最无耻的行径。

“要充分发挥作家创作上的自由。作家的笔是他自己的，作家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我们应该让作家独立创作。”③⑤这是赤裸裸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体的自由。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一切文艺创作，都是为一定的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脱离阶级的政治而“自由”的文艺。任何一个人，包括作家，他的思想不管具有何种特殊的形式，都不是什么孤立的“自己的思想”，而是一定阶级思想的表现。是一定阶级的利益、愿望的表现，是一定社会阶级关系的反映。七亿中国人民有七亿种“自己的”思想吗？当然不是，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一种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即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的什么“创作自由”，什么“独立创作”，就是鼓动牛鬼蛇神“自由”地去攻击社会主义，宣传资本主义，而剥夺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他们的一切自由，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勾当服务。什么“创作自由”，不过是死心塌地当资产阶级奴才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生活是多方面的，不拘一格，不要划一个框框。”③⑥这就是那个“反题材决定论”，其目的是在反对“框框”的借口下，反对革命作家努力去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反对努力去歌颂工农兵，反对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生活是多方面的”，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斗争生活，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抵抗历史前进的腐朽反动生活。我们应当以真正意识到自己历史责任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生活为主体，为方向，为歌颂和描绘的中心，通过这样的典型的英雄人物，来反映我们这个史无前例的英雄时代，来反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和伟大胜利。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生活，只能作为批判、鞭挞、揭露的对象，决不能作为创作的主要的“方面”。“不拘一格”，总有一格，你心目中的“生活”，其实就是你赞不绝口的《三家巷》中那些资产阶级的下流情绪和靡靡之音，是一些在历史的垃圾堆中霉烂了的渣滓，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文艺作品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我看，它的作用有时也不在社论与

报告之下。”③⑦这又是胡风“写真实”论原封不动的翻版。任何文艺作品所塑造的形象中，都表现着作者的政治的倾向性，表现着作者的阶级的爱和憎，没有什么抽象的、旁观的“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够从本质上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进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歪曲工农兵、歪曲现实，则是它们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必然结果。提倡抽象的“写真实”，就是要反对文艺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文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抹杀和掩盖文艺的阶级性，替那些美化剥削阶级、丑化无产阶级的大毒草找一个“理论”根据。这已经是资产阶级文艺武库中最破烂最陈腐的货色了。

“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了。”③⑧这就是“暴露黑暗”论，这是毛主席早就痛斥过的“光明与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的反动理论的翻版。我们应当区别生活中的主流和支流。只有抓住主流方面，才能典型地反映出社会前进的本质。支流只能作为主流的一种陪衬，作为表现本质的一种手段，作为全局的次要的侧面，作为前进过程中局部的、暂时的曲折，不能当作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应当以写光明为主，以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即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主，以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震天撼地的英雄气概和斗争智慧为主，以塑造我们时代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而不是什么“好的方面”“坏的方面”一半对一半。写人民公社，当然要充分歌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难道还需要把各种发展过程中的缺点错误统统罗列出来吗？有一支歌，叫“人民公社就是好”，难道还需要同时再加上一句“人民公社有缺点”吗？夸大、渲染和恶毒地捏造那些局部的、个别的现象，这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造谣诽谤的老谱，这位老右派不过依样画葫芦罢了。以歌颂光明为主需要回避矛盾吗？需要回避敌人的挣扎和反扑吗？需要降低冲突尖锐性吗？不需要。社会是在阶级斗争中前进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总是在同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剧烈斗争中开辟前进的道路的，只有通过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典型的历史概括，才能够深刻地而不是表面地、雄伟地而不是贫弱地把光明、胜利、英雄人物写出来。陶铸的“暴露黑暗”论，将同他黑暗的灵魂一起，被革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要识别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

从以上的几个方面，人们不难看出，陶铸完全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是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是一个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书中贩卖的那一套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和其他毒素，要进行彻底的消毒。

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向。他极端仇恨社会主义，他日夜向往资本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但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不被揭露，他不得不包上一点革命的外衣来伪装自己。此人极不老实。两面三刀，夸夸其谈，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转弯抹角，是他的惯常的表演。但是，只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这种伪装就立刻会拆穿，原形就会毕现。这两本书，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吗？

凡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都是篡党的阴谋家。他们为了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用各种阴谋手法扩大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手中的权力，无耻地自我吹嘘。陶铸抛出这两本书，不但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也是扩大他们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权力的一种手段。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西行记谈序言》，这《西行记谈》原来叫做《随行记谈》，就是他带着几个黑秀才“随”着他出去四处游荡，然后他信口开河议论一番，黑秀才们就当作圣旨一样“记”下来，加以修饰，在报上发表。

“记谈”，就是“记”他的“谈”话。这样，居然“共得二十七篇”！居然都拿出来发表！居然由他本人定名、作序、题字！这不是明明自己想当“南霸天”吗？

《理想》及《思想》，在宣传那些反动观点时，充满了这类炫耀权力的自我吹嘘。他是要用这些“作品”，作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的舆论准备。陶铸从地方到中央之后，手伸得那样长，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狂热在几个月中暴露得那样突出，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收买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坏人，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革命派，以致任何两面派的手法也掩盖不住这种反革命野心。从这个反面教员中，我们不是可以找到识别赫鲁晓夫式人物的一个重要教训吗？

陶铸是一个卑劣的实用主义者。他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为了推销修正主

义，为了攻击和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忽而显出极右，然而装作极“左”，以腐蚀、迷惑和欺骗那些不坚定的中间群众，以保护自己不被揭露。陶铸在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执行者。他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他竭力保护那些牛鬼蛇神。可是当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摇身一变，立刻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大大“创造性”地“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左”得出奇，其实是形“左”实右，其目的还是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区别，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在混乱声中蒙混过关。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他们越是要掩盖已经暴露的部分，貌似特别“过火”或“公平”，便越是更充分地暴露自己野心家的面貌，如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明明是贼，偏要装圣贤，明明是极右的公开宣布同资产阶级“心连心”，偏要忽而跳到极“左”的“怀疑一

切”。然而矛头却始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把他野心家的面貌揭露得一清二楚了。

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当一种反革命阴谋被识破后，敌人又会使出另一手，交替而用之。然而这些败类是逃不过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的。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在大批判中，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应当更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

《红楼梦》第五回里有一首曲子，叫做“聪明累”，头两句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自以为“聪明”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在暗底里玩弄了许多“机关”，一直到陶铸发明的“著名”的“换头术”（即为了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在照片上突出第二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把他的头像剪下来装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可算登峰造极了，但到头来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这样一种头脑简单、思想反动的蠢人。玩弄阴谋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广大群众一起来，什么坏事也隐藏不了。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坏蛋们必然垮台，这就是历史的判决。这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无论如何挣扎，如何诡辩，决计逃不过这个历史的判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毛泽东思想的闪闪金光照耀着全中国、全世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革命的人民是勇敢的。我们一定要把这场大革命进行到底。来自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扑、攻击、造谣、挑拨，来自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种种诬蔑、歪曲、诽谤、叫喊，决不能阻止我们的前进，只能够证明他们自己无比的愚蠢和日暮途穷。同志们，举起双手欢呼这涤荡中国大地的大风雨吧！毛泽东思想是无敌的。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将会看见：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段伟大而曲折的道路后，一个空前强大、巩固和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如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给予二十世纪的

吃人魔鬼们以更沉重的打击。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社论《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无情地揭露和深刻地批判了党内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姚文元同志这篇文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以泼辣、生动、有力的笔，刻画出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鬼脸。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头目。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陶铸继续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时而显得极右，时而装作极“左”。批判陶铸，批判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追随者，对于当前集中火力，集中目标，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这是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一个重要部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斗争的锋芒对了，就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斗争的锋芒错了，就会走错路。

当前革命形势之所以空前大好，主要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年头，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锋芒始终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使他们的反革命阵线在群众觉醒的威力面前，全面崩溃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不懈地掌握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并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中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得他们比当年的托洛茨基还臭，比眼前的赫鲁晓夫还臭，让他们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伟大历史任务。

革命的大批判，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革命的大批判，这是当前最重要的原则。

革命的大批判，这是检验一切人们的试金石。

你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吗？你就必然关心最大的政治，对无产阶级负责，对祖国的前途负责，对世界革命负责，毫不动摇地将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

你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吗？你就会摇摆不定，东刮一股风往东跑，西刮一股风往西跑，被小团体的派性所左右，把革命大批判这个最大的政治置之脑后，背离斗争的大方向。

目前，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从极“左”的方面和从右的方面来搅乱斗争大方向的倾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节胜利，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迫使一小撮阶级敌人，经常改变他们的做法。目前，他们所使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革命队伍中的某些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以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面目出现，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妄图破坏和分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支柱。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搅乱我们的阶级阵线，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近被广大革命群众揭露出来的、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五·一六”，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革命小集团。一切革命同志，务必充分提高革命警惕性，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们要防止和警惕来自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的破坏活动，我们绝不能允许党内已被打倒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守势力，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打击报复，反攻倒算。

毛主席教导我们：“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在当前大好的胜利形势下，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以百倍昂扬的斗志，精神抖擞地投入革命大批判的极其雄伟的事业中去吧！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上海时代中学学生陆荣根的文章《炮轰陶铸》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者按：我国亿万人民正在胜利地开展着空前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个运动，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重要文章的发表，从政治上对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追随者，作了历史的判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炮轰陶铸》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根据革命小将陆荣根同志去年炮轰陶铸的几张大字报整理而成的。全文都是原话。作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材料，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战斗武器，一针见血地揭露和批判了陶铸一贯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

陆荣根同志是上海市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他同千百万革命小将一样，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颗红心，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报刊一再揭发陶铸的反革命言行。后来，他又冲破重重阻力，来到北京，于去年十一月二十日贴出了第一批炮轰陶铸的革命大字报。当时，陶铸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一面亲自组织人写大字报对他围攻，一面指使旧上海市委调查他的材料，进行政治迫害。但是，陆荣根同志英勇不屈，坚持斗争，十二月一日在北京又贴出了第二批炮轰陶铸的长篇大字报。

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和迫害，使陆荣根同志的身心遭受了严重损害。在他被迫离京的途中，就病倒了，经抢救无效，于今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逝世。陆荣根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威

武雄壮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不仅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而且还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掌握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把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中，能够象陆荣根同志《炮轰陶铸》一文那样，怀着一颗热爱毛主席的红心，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扎扎实实，抓住中心，击中要害，以摧毁性的火力，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猛烈的进攻。

革命的、勇敢的“小人物”战胜反动的、腐朽的“大人物”，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辩证法。曾几何时，自称“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风云一时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已经连同他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事实证明，玩弄阴谋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陆荣根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为人民立新功！

* * *

前言

列宁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陶铸自己说不替共产党和毛主席做事。他埋怨毛主席和共产党有“过失”，大跃进“过火”，要人们议论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错误”，说社会主义制度“阴森森”、“没前途”。他反对搞阶级斗争，推行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千方百计地腐蚀青年，使青年去做资产阶级接班人。对于这样的人，必须重炮猛轰。

—

《太阳的光辉》是陶铸猖狂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是《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里第一号大毒草。这篇文章要全国人民议论，还要在报刊上议论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错误”。

陶铸说：广大人民群众“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

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是，又有谁说过太阳毫无缺点呢？尽管太阳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但总还是有人批评太阳的某些过失。譬如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

把领袖比作太阳，只有毛主席。大概陶铸觉得还不够明显，用了“东方红，太阳升”，因为谁都知道这首歌，跟着的一句就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陶铸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埋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这才是事实。陶铸说的“过失”、“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这是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受到了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好得很！陶铸扬言要广大人民公开议论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过失”、“错误”，这一切只能表明陶铸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广大人民能允许他这样做吗？不能！一万个不能！

陶铸一面攻击毛主席、共产党有“错误”，一方面又攻击某些同志“不愿听别人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缺少一种革命者所必须具有的宽阔胸襟”，等等。

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见，陶铸攻击的是毛主席和其他高举三面红旗的党员同志。毛主席的革命胸襟是最最宽阔的。毛主席最信任群众，和群众在一起，毛主席也最最谦虚，最善于听群众的意见。毛主席是全党的模范。中国共产党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谁都心里明白，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是最大公无私的。

陶铸对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攻击，丝毫挡不住万丈光芒，只能暴露陶铸的本来面目。

中国人民跟毛主席和共产党走的决心，谁也改变不了。一切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在大毒草《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中，陶铸说：“党的领导……并不是不论什么东西，事无巨细都来领导。”“如果要作家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创作，要作家看着你的眼色去修改，甚至创造出‘我领导出思想，你作家出技巧’的‘理论’来，这怎么能不乱指挥？怎么能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听一听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话：“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

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两个人的语言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都爱看眼色，都恨共产党。

陶铸攻击党员同志说：“对历史并不很熟悉，对生活并不很理解，对文艺创作也并不那么内行，却偏偏爱乱发号施令，要人家照着他的想法来创作。在这种情况下，要创作出好作品来是有困难的。”这就是有名的高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陶铸三次用了黑帮分子夏衍用来攻击党的领导的相声《关公战秦琼》。这个相声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军阀韩复榘的家请人演戏。当演员演到关公过五关斩六将时，韩复榘的父亲说，关公是山西人，是阎锡山的部下，不准到山东他儿子管辖的地方去杀人。山东好汉秦琼，是他儿子的部下，一定要秦琼打败关公。陶铸把那些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的，而所谓“不尊重创作的”所有权，不尊重作家，干预太多，瞎指挥”的同志，比喻成韩复榘的父亲。

陶铸说：“这些部门（人事部门）最大的缺点是在对非党干部的看法上，对非党的团结问题上有严重的偏差。我们对干部的看法，要建立在德、才兼备上面。干部当然要政治可靠，也要有才能才行，反之，一点才能也没有，这个人有什么大用呢？”

那位储安平说：“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

一位要急需调整，一个说有严重偏差，一位说不相称，一个说要才能，话挺投机，都是一丘之貉。

陶铸说：“有了政权而不很好联系群众，也可以使我们滋长官僚主义。对于这点，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不要因为有了政权便产生特权思想。”他攻击党的领导同志，“不真正以平等态度待人，不真正发扬民主”，“总是有那么一点‘优越感’”，“高人一等”，“架子十足”，“搞特殊化”，“盛气凌人”，“把党的政策理解为很空洞的东西，又不讲道理，还硬是要人家信服，那怎么能够呢！”

这些东西是从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那里批发下来的。

陶铸说：“不能人家一谈工作上的缺点就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帽子一扣，谁也不敢说话了。这还有什么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呢？这还叫什么党的领导呢？”

这和右派分子攻击我们“空气沉闷、乱扣政治帽子，大家不敢讲话”唱了一出双簧戏！怪不得陶铸把这篇文章收进书时，把这段话删掉了。

陶铸说：“今天我们做的事业，不是替共产党做的，当然更不是替个人做的，做的都是人民的事业。”

大家都明白，为党为人民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和人民是血肉不可分离的。陶铸所谓的“个人”指的就是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陶铸把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对立起来，多么恶毒！让我们听一听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话：“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从储安平的话里也可以听出个人是指毛主席。再听一听右派分子曲北韦的话：“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这是对陶铸的话的最好的注解。

二

大毒草《太阳的光辉》是一九五九年写的，正是大跃进时期。文章里说：“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

“大暑天”就是大跃进的代名词。按照陶铸的那个混账逻辑，就是大跃进使人们流汗太多，太苦了。我们可以发现，那个比喻上用的名词本身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某些过失”，“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指的就是大跃进“过火”。陶铸胆子倒真不小，竟然明目张胆地说毛主席和共产党有“过失”，大跃进“过火”，要议论大跃进的“错误”。这不正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和邓拓的论调？陶铸和他们一伙一个鼻孔出气！

陶铸的《松树的风格》也攻击了大跃进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朝气。他把中国人民在大跃进时期冲天的革命干劲，都比成“松树的风格”。而其松树的风格充满了“粉身碎骨”，“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吃的是草”，“不顾个人的健康”（注意“多少人”）“苦干着”，等等，等等。多么奇妙的语言，多么恶毒的攻击和诽谤！难道在大跃进时期，中国人民就生活在恶劣环境中吗？七拼八凑，指桑骂槐，资格够老的了。

陶铸还借一个农民家里墙上“天官赐福”四个字，说现在农村还有《抓壮丁》戏里地主李老栓的“天地君亲师”，攻击解放十几年和人民公社八年来我们思想工作太差。他还说广州三元宫烧香，前面中山堂，科学馆讲科学和革命道理，而反动的迷信的三元宫“吃得开”，以致说这是个“极大的讽刺”。极大的讽刺是针对人民的吗？不是。是针对敌人的。陶铸对人民如此恨之入骨，哪有一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陶铸把革命现代戏里所反映出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悲观，没前途，阴森森”，一团漆黑。陶铸说社会主义制度“没前途，阴森森”，资本主义制度岂不是“有前途”、“光明”了吗？陶铸长着的正是一副死心塌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面孔！

在大毒草《革命的坚定性》中，陶铸还散播了对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的怀疑。他说：“确实有一部分人，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信心，对能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尽快地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表示怀疑。这主要是表现在对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看法上。”又说：“哪怕他是坚决反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也模糊地有点相信社会主义”。这是陶铸反对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的供状。

在《松树的风格》中，陶铸又大谈松树的“冻不死”，“旱不坏”，“淹不没”，“吹不倒”，不管“严寒霜雪”、“盛夏烈日”，“不知道什么叫做忧郁和畏惧”，“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宣扬反革命气节，借此给右派分子打气。

陶铸企图鼓动作家反对我们的政权，他先说创作不繁荣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马上又说古代杜甫在越苦时越悲愤，越同情人民，越能写出文章来。随后就说，“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不能鼓动人民起来憎恨和反对我们自己的政权。”马上又反过来说经济不繁荣，受三年自然灾害，创作繁荣很困难。就这样颠三倒四，欲吐又不吐。收进书时删了中间一大段，真是心中有鬼！

三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

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毛主席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陶铸在《思想·感情·文采》一书中说：“自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农村中的土地私有制、剥削阶级，基本上是被消灭了。”

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了？这是两个大问题！照陶铸的说法，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在这本书的《〈西行纪谈〉序言》上，陶铸竟胡说发展生产是一切问题的中心。他说：“目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生产就是最直接最主要的群众利益。”没有生产观点“就难于明晰地和锐敏地分辨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正确与谬误、许可做与不许可做的界限，也就难于自觉地和勇敢地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就极容易为主观主义（按：实际上攻击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的思想所蒙蔽，或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做出一些蠢事或坏事来。”

陶铸的话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一日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时说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着重提出这个问题后，陶铸在一九六四年出书时，对其它文章进行了大量增删，而对此却不动不删，当然是有意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如果按照陶铸的说教，成了“生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一种比“只抓粮棉油，不抓敌我友”更危险的调子。谁都知道，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正确与错误，应不应该做的界限，只有用阶级观点才能分清。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那末为什么有些同志办了坏事呢？为什么有些人不理解党的政策？因为他们没有牢牢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没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放松了阶级斗争，生产也搞不好，难道这种例子大家听到的还少吗？如果照陶铸说法去做，没有不把事情闹坏的。陶铸把一切都拉到发展生产中去了，把生产说成了一切问题的中心。他之所以制造这些荒唐的言论，就是要使党和人民忘掉阶级斗争，让阶级敌人放手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推翻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中，陶铸有这么一段话：“至于说老是搞运动，这要看怎样理解。动不动就是搞运动，当然不好（但是否定运动，这是错误的）。”而在一九六二年四月第一版时，括号内十一个字是没有的，却是：“今后应当尽量少搞运动，但是完全否定运动，也是不妥当的。”

这些话针对谁说的呢？请看此话的前面：“有些教师有这样的意见：‘肃清反

革命斗争我不怕，我又不是反革命分子，我心中有数；就是共产党老是搞运动不好。搞运动，思想批判，老是要检讨。中国古语说：士可杀，不可辱。这样搞，我便吃不消，受不了。’”

陶铸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大喊大叫“士可杀，不可辱”干什么？这不是标明他们反对共产党？士可杀——反革命知识分子不愿受共产党领导，宁可死，也“不可辱”——共产党不要搞运动，不要批判，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去毒害中国下一代和中国人民的灵魂。既然不是反革命，为何怕运动？胡风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吗？和这一伙相似极了。“士可杀，不可辱”是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的毒气，影片《桃花扇》充满了这种毒气。陶铸和他们一伙一个鼻孔出气，和这些极右分子一齐叫嚷少搞运动和所谓“自由、平等、博爱”，说明了什么？陶铸保护他们过关。

陶铸说：“老是搞运动”、“动不动就是搞运动”、“当然不好”。实际上，解放后，的的确确是“老是搞运动”，“动不动就是搞运动”。党内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斗争。我国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反右、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齐声欢呼好得很！广大工农兵、学生、革命干部揪出了一个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大大地巩固了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地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说好得很，陶铸却说“当然不好”，意思是糟得很。陶铸反对搞阶级斗争的面目露出来了！

四

在文艺战线上，陶铸配合了周扬一伙，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推行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陶铸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繁荣创作的意见》，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后来收入《思想·感情·文采》一书中，作了许多删改，达几十处，二、三千字之多。怎么不令人怀疑？

一开头，就把“田汉同志”改成了“全国剧协的负责同志”，“一定要我谈谈有关戏剧方面的问题。”在同本书里，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次讲话里说周扬、陆定一两个人报告很重要，要大家好好学习。为什么把田汉的名字划掉，而没把周扬、

陆定一的名字划掉？按照常识来说，田汉请陶铸讲话，如果两人没有内线，不必划掉，因陶铸讲话准确，和其关系不大，理解为一般的请人发言；而说周扬、陆定一讲话很重要，标明了一定程度上陶铸的支持。这只能表明陶铸心中有鬼。陶铸要隐掉这条线，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开会时期的线。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羊城晚报》上，有对田汉的假批判材料。陶铸以为大约周扬、陆定一揪不出来。但是他想瞒，瞒不过孙猴子的火眼金睛。

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主席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在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时又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陶铸对抗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他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作的《关于文艺下乡》中说：“这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是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去做的”。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陶铸在一次讲话里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切文化工具都掌握在我们手里。”

书是一九六四年二月印的，话是一九六五年二月说的，会没有听到毛主席指示吗？肯定不会的。

陶铸沿周扬的脚步走路。周扬说：“我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革命阶级的，是无产阶级的，不是资产阶级的。”陶铸也说，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意思是作家是劳动人民的作家。这是十足的谎言。对于文艺界那些受批评、挨斗争的资产阶级分子，周扬说：“他们是好同志。”陶铸也说：“作家要求有合理的政治待遇。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正是许多作家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表现。”“合乎共产党员标准的，就可以吸收到党内来。他们当中，在历次运动中有批判得不当的，就应当实事求是地改变原来的决定。”

这不是明明在攻击我们党没有给作家合理待遇，压迫作家吗？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界揪出那么些牛鬼蛇神，其中有的是混入党内的。陶铸还嫌混进不够多，还要拉进一批来。什么“改变原来的决定”，就是替右派分子翻案。对于那些实在没法为之辩护者，也一律得拉进队伍之中。

陶铸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文艺批评。他提出：“首先，要尊重作家创作上的自由。”后来改成了首先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又把作品分成有益、无害、有害三种。实际上正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陶铸把毛主席说的六条政治标准提了一提，马上又提出打破条条框框。其实正是要打破毛主席说的六条标准。陶铸还说要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准备一个“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形成一种宜于创作的‘创作气氛’”。为什么呢？因为文艺工作有特殊性，文艺工作的领导“简单粗暴”，“乱扣帽子”。这是闭眼不看事实。一九五九——一九六三年，毒草放得够多了，陶铸还觉得不够，似乎特别爱脏东西。“简单粗暴”、“乱扣政治帽子”、“不顾特殊性”，等等，正是周扬攻击革命同志时惯用的。

陶铸提出一种什么样的批评呢？“写出东西来，先在小范围内请些专家来看看”。党委书记和人民，提意见只能作参考，作者有不按你的意见办的权利。这样一来，文艺批评等于取消了。文艺批评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只有坚持批评，才能捍卫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放弃文艺批评，就会让资产阶级思想找到合适的气候和土壤。这个斗争必须要坚持下去。

陶铸不提为工农兵创作，全文找不到为工农兵服务，写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字样。原文里只提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要深入生活，与工农兵打成一片”一句，随后又说：“要写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写自己真实的感情”，把前面否定掉了。因为他所提出的“自己真实的感情”，就不必写工农兵真实的感情，就不必宣传毛泽东思想。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就是不多写工农兵。陶铸反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胡说什么到工厂、农村去是为了“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所长来充实生活”。他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次讲话里，对下乡演出人员说：“不要过多地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就不参加也可以，因为演出本身就是一种相当强度的劳动了。”陶铸就是反对和工农结合。

陶铸说：“不能把为政治服务理解得太狭窄”，“作品的题材要广泛一些”。“党委写一个决定，发一个指示，就马上写个剧本、写篇小说为它服务，这是不行

的。“陶铸还大力宣传”有益、无害、有害”三类作品。他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和周扬在一起鼓吹“题材广泛论”与“间接配合论”。这是反动的理论，必须彻底批判。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部分从事戏剧改革工作的文艺工作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戏剧来了个大革命。大批革命现代戏出现了。社会主义和火热的阶级斗争生活在舞台上得到了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牛鬼蛇神被赶下了台。广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上台做了主人。本来很喜欢看戏的陶铸却觉得“味道不大”。

他说：“我们有些戏的词就不好，尽是什么‘搞生产’，‘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怎么搞’等等。平常说话还可以，唱词就应该力求准确、优美，要有思想、感情、文采。”“我们有些戏就不是这样，有不少标语口号和空洞的概念。”

常把社会主义等带有政治性的词一概叫做“空洞的概念、标语口号”的，是周扬一伙。陶铸和他们同音。戏里唱社会主义，难道就是标语口号式？戏里有标语口号式的话（事实上至少是陶铸一伙硬给安上的），只是没有艺术力量，但政治观点是正确的，陶铸却认为不正确（不去分辨两词）。唱社会主义，当然有思想感情——热爱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没有思想感情，不就是有那么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吗？陶铸连我们平常说话都定了框框：说社会主义“还可以”，当然更不用挂在嘴上，记在脑子里。戏里唱社会主义，陶铸更反对。陶铸对社会主义如此恨，如此怕干什么？

他说：现在舞台上有两种倾向，一是脱离现实，再就是把现实作自然主义的理解。《红灯记》里正面人物衣服“尽是灰的黑的有什么好看？”“《红鸾禧》中的叫化头子，也穿绸的衣服……为什么有些现代戏把劳动人民总是打扮得那么难看呢？”

乍一看，陶铸真关心劳动人民，衣服穿得差一点，就提意见了，其实是扯蛋！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陶铸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说的话，才是他内心话。他替大毒草《胆剑篇》里侮辱劳动人民的行为——使劳动人民下跪作辩护。叫化子穿绸衣服，严重脱离了现实，抹煞了阶级差别。在革命现代戏里，劳动人民打扮得并不难看，只是穿了合乎生活的朴素的衣服，这不很好吗？布景化装也是这样，非如此怎么能反映劳动人民的本色，怎么能体现他们的革命精神！解放前铁

路工人李玉和家穿灰的黑的合乎事实吗？不，合乎事实。他的家也应贫苦一些，否则还象穷工人、象革命者吗？……穿好衣服，住好房子，就是美，这是资产阶级的的美。现代戏很好地反映了现实。我们做了很多艺术加工和处理，陶铸诬之为“自然主义”。陶铸从有色眼镜看出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人物”——工农兵是不美的，陶铸的“耳朵眼睛都不舒畅”。

陶铸还说：“这个时候一般就是不让演传统戏，逼大家演现代戏。梁山一百零八将都是逼上去的，有哪个是自觉的？”陶铸在下边还大谈其历代统治者在文化上所采取的措施和残暴手段，又加了一段我们为革命阶级利益应该宣传自己的主张、思想，意思是也粗暴了。陶铸的说法真是太恶毒了。

陶铸把毛主席和共产党比做“宋朝的统治者”，把文艺工作者比做受压迫者，把毛主席演革命现代戏的号召称为“逼上梁山”，而把大家都说成不喜欢现代戏，都不愿意走这条路，没有一个是“自觉的”，都是一个个走投无路，因为不准演牛鬼蛇神，被逼着走社会主义的路。

广大工农兵欢迎现代戏。一部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自觉的，他们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高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文艺界有一批右派分子，逼与不逼，刺激与否，都改变不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本性。他们一伙右派分子要妄想翻天，我们就坚决镇压。现在他们的美梦正在一个个地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陶铸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再版《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还有一个目的：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引入纯学术讨论的圈套，为“三家村”打掩护。

在六十七页上确是妙趣横生：“有人说：‘关于《红楼梦》问题，俞平伯只写一篇文章，你们写了一篇又一篇，为什么你们把对《红楼梦》有研究的俞平伯骂得这样，把俞平伯搞得几乎混不下去？’我们也认为，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是有研究的；但他的思想观点是错误的，必须批判的。当然，这只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学术思想论争问题，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如果俞平伯先生愿意再讲，他可以讲的，愿意发表文章，他可以发表的，如果他不讲，也可以反驳的。”

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雷，陶铸就下大雨。前面说有研究，点头称是；后面说骂得厉害。陶铸暗里应声：问题不大，人民内部问题也还可反驳。真太照顾。这可以说纯学术问题，同理可得《海瑞罢官》也是这样。

陶铸把胡风、胡适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的事也列入“思想方法”和“人民内部”问题。既然陶铸出版此书是经过本人同意的，而当时正在开展的讨论他一定知道的，如果改正错误还来得及，为什么这时要坚持下去呢？岂非和吴晗穿一条裤子！

陶铸说：“在还未揭发胡风是反革命以前……这时我们还是作为人民内部问题，作为学术思想问题来对待的。”“中山大学一个老师说：‘胡适的论点是否错误，要等到二十年后才看得清楚。’我认为可以，就是等三十年、四十年也可以。”“学术思想论争，是作为学术思想上个人的意见。”

胡风在暴露以前就散播了大量反革命言论。胡适是老牌反共反人民的家伙。他们的思想全是反共反人民。在陶铸嘴里一化，马上变为思想方法和人民内部问题。那位中山大学先生说胡适观点不错误，当然包括反共反人民。那位先生要坚持一、二十年反对立场。因为都是不替共产党做事的，所以狮子大开口，三、四十年也可以。陶铸还加了一个特别重要条件：学术问题是个人的小事，不关系到国家大事。胡风、胡适可以作为纯学术问题，吴晗当然也是纯学术问题，不必兴师动众，声讨牛鬼蛇神，这样，陶铸的朋友就过关了。让牛鬼蛇神自由泛滥，中国不就是要变颜色了吗？

五

毛主席最关心和爱护青年，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成长，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陶铸千方百计地腐蚀青年，使青年去做资产阶级接班人。

毛主席在“老三篇”里要我们大立“公”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的事应该管，每个人要管。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主席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陶铸却拚命要立“私”字，让青年和人们圈在个人小圈子里，不管国家集体，大力宣扬个人成名成家和不要思想改造的陈腔滥调。

最近大家都知道蔡永祥同志抢救列车的事迹吧！可陶铸却认为不救也可以。他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命名“欧阳海班”会上说：“欧阳海同志既不是驭手，也不是炮兵连的人，要是他没有去抢救，也不会负什么责任，领导上也不会因此批评他。”“象他这样的优秀青年……有可能成为我们部队的将军。”

照此逻辑，蔡永祥也根本不用去救列车。欧阳海如果老念着当将军，不会负责任，不会受批评，会去救吗？蔡永祥会去救吗？混账话！这是个人主义！

陶铸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明目张胆地和毛泽东思想对抗。

每一个人必须从小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陶铸妄想使下一代不去接受无产阶级思想，让资产阶级思想在下一代中间自由泛滥，他说：“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在小学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中学也早了一些，到了大学……是提出这个问题的的时候了。”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陶铸唱反调：“青年人与成年人不同”，“青年人是比较单纯的（纯洁的——一九六一年版），尽管有些人（他们的——一九六二年版）家庭是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家庭”，“港澳来的学生……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纯洁的、力求进步的青年人。”地主、资产阶级家庭，资本主义世界出来的青年人“纯洁”得了吗？在《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里，一说到青年人，总是纯洁的。这种东西是资产阶级谣言公司放出来的，陶铸为什么也放此气？只有为了达到使青年不改造思想，以便实现和平演变。

陶铸把毛主席提出的学习好变为功课好，鼓吹读书第一位，说政治不好，功课可以学好，至多“不完全”。这是唯有读书高的老古董。参加一点体力劳动，并且不让多，叫做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吗？就连这点时间，也反对和工农结合，去专心学最重要的生产知识，以便发明创造。劳动好只是一些“鼓励法”。算什么话？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照陶铸的话，大学生是高劳动人民一等的，是“孔夫子”（这恰好是对旧教育制度的讽刺），都是要成名成家，都是讲私人感情的自由主义者。这是一条白专道路，是走向死胡同里的，万万不可走！

看了上面这些东西，你们觉得陶铸是一个左派吗？我们能容忍他公开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吗？不能！一万个不能！我说陶铸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必须把他打倒！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解放军报》社论《在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前进》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是投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

阶级司令部的一颗重磅炸弹。

这篇文章向我们指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在当前尖锐复杂的阶级大搏斗中，一定要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识破敌人的新阴谋。

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最重要的课题。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从右的方面或极“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妄图转移我们的大方向，搅乱我们的阵线。陶铸这个反革命两面派，这条反革命的变色龙，就是这样干的。他是从极右的方面到极“左”的方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例子。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展，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土崩瓦解，迫使那些垂死挣扎的阶级敌人经常改变自己的策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正在勾结起来，以种种面貌出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用陶铸的那套鬼把戏，极力煽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挑拨离间，混水摸鱼。这一小撮坏人妄图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破坏和分裂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支柱；妄图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团结。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革命群众，都应该从姚文元同志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得到启发，受到教育。要懂得阶级敌人并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斗争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百倍地加强敌情观念，牢牢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显微镜，随时揭穿敌人的阴谋，斩断敌人的黑手。对于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这样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搞阴谋的反革命小集团，必须彻底揭露，彻底粉碎。

群众队伍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潮，最容易被阶级敌人利用。敌人从右的方面或极“左”方面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常常从这里寻找弱点，冲破缺口。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样，才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

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在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得到了很大的锻炼，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只要我们进一步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武器，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紧紧跟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敌人不管采取什么狡猾的策略，玩弄什么花招，都逃脱不了被埋葬的命运。

人民解放军是保卫国防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长城。我军广大指战员誓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战斗在一起，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为保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奋斗到底！

让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必将冲破一切阻拦，走向彻底胜利！

（原载《解放军报》1967年9月11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丁学雷的文章《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好！——驳斥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污蔑》

正在深入进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是响彻云霄的共产主义凯歌！这首凯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下，亿万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谱写出来的，因而显得如此汹涌澎湃、威武雄壮，它振奋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它一经出世，就在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方面表现了无可匹敌的威力。正因为这样，全世界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而一小撮帝、修、反反动势力惧之犹如洪水猛兽，拚死命地反对。尤其是苏修叛徒集团，他们歇斯底里大发作，破口大骂我们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文化革命大军是什么“一群流氓”、“胡作非为”！他们造谣污蔑，胡说什么中国人民已经享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红卫兵“到处制造恐怖气氛”，干部和居民遭到了“大灾难”！“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是一幅可怕的古怪画、阴郁的幻想作品”。这是一幅极妙的群丑悲鸣图。

正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敌人如此起劲地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恰恰证明我们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太好了，好极了！我们不仅现在要搞无产阶级大民主，今后也要正确地运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真正大民主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苏修叛徒集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硬说中国人民享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这恰恰证明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享有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真正大民主！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从来是最相信群众，最了解群众的心愿，最能看到群众的伟大作用，最善于发现和调动群众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力，最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突出群众，一切走群众路线。在一年多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彻底的群众路线得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展。就在这条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我国，出现了生气蓬勃的革命群众运动。亿万革命人民，纷纷起来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他们享有言论上的民主，集会游行的民主，出版刊物的民主，自由结社的民主；可以大鸣大放辩论，可以贴大字报，可以进行革命大串连。于是，蕴藏在普通革命人民中间伟大的创造力，犹如火山爆发，一下子烈焰熊熊地迸发了出来，吓死了中外一切反动势力，吓呆了一大批政治庸人。翻开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国家实行过这样的大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有吗？修正主义国家有吗？没有，绝对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恬不知耻地天天在那里高唱“民主”、“自由”的赞美诗，但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不过是遭受剥削、压迫、摧残和屠杀的代名词！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确实有一小部分人感到大难临头，夜夜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这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对这样一小撮人，莫说大民主，连小民主也一点不给，半点

不给！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民主的特点，就是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实行专政，给广大革命人民以充分民主。对敌人的专政，正是为了让人民有真正的民主。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做靠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连脑袋也保不住了，还谈得上什么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因为我们一小撮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无情的专政，才保证了革命人民享有真正的大民主。两个阶级，两种民主，一个吃掉一个，不是你吃掉我，便是我吃掉你，从来都是如此。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老爷大叫中国人民享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吹嘘苏联实现了据说是当今世界上最美妙的“真正的全民民主”，这只能当作二十世纪的天方夜谭来欣赏。查一查老祖宗，所谓的全民牌“民主”，原来就是早已被列宁批臭了的托洛茨基的“纯粹民主”这具僵尸的复活。世界上哪里有不分阶级的“纯粹民主”或“全民民主”这个怪物呢？当前苏联的现实，根本谈不上这个民主，那个民主，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专政，不折不扣的白色恐怖。在伟大列宁的故乡，在洒满了十月革命英雄鲜血的莫斯科红场上，今天，谁要是敢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说话，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盯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抛进“疯人院”，或是莫名其妙地忽然“失踪”……这就是苏修叛徒集团所吹嘘的“真正的全民民主”！

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我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展起来的大民主，也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怎样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胜利地完成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样一个大问题。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进行革命？如何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大问题，是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者没有遇到过，或者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能够解决的。正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天才的领袖毛主席，不仅从理论上、实践上，也从方法上解决了这个大问题。这个方法，就是实行自下而上的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大民主。

这样的大民主，对无产阶级政权最危险的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次歼灭性的总攻击，把他们隐蔽地设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统统揪出来，彻底批臭，彻底打倒，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康庄大道前进。

这样的大民主，对广大革命干部是一次空前深刻的大审查，大锻炼。打倒了一小撮坏人，发现了一大批好人。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会最深刻，贯彻最坚决，捍卫最勇敢。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除此以外，还挽救了一批半好半坏、差一点要滑下去的人。他们受了一次大震动，立即悬崖勒马，迅速赶了上来。

这样的大民主，对广大革命人民是一个学习革命最好的大课堂。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扬。他们敢于改造客观世界，也勇于改造主观世界，决心把自己逐步锻炼成为共产主义新人。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在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如此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实行这样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需要有多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啊！证明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多么强大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敢这样做吗？其他修正主义国家敢这样做吗？不敢，都不敢。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便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在你们这些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根本不可能也永远不敢搞什么大民主。不信，就请你们试试吧！保险不到二十四小时，就都一个一个从“宝座”上掉下来。只有在历史上经历了最长期最复杂最激烈最多方面锻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有了举世无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的伟大长城，有了坚如磐石的中国无产阶级政权，才敢于下这样大的决心，勇于挑起这副历史的重担。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主席用最大的热情支持了刚刚出现的红卫兵，毛主席先后亲自接见了一千多万文化革命大军……他老人家总是在最关键时刻最及时发出英明指示，推动文化大革命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使亿万文化大军始终处于高昂的革命激情之中。无产阶级大民主把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发展到新的高峰。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毛主席解决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一个伟

大创造，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一伟大贡献，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个空前伟大的创举！全世界革命人民都高兴地看到，经受了这次伟大运动的严峻考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空前团结，空前壮大；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灯塔，正在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全世界革命人民坚信，新中国的存在，是全世界的希望；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中国人民的斗争，为世界人民开辟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

共产主义的凯歌和修正主义的丧钟

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种种诽谤、污蔑，只能证明它正处在极度恐惧之中。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早已远远超出了一国的影响，敲响了国际上修正主义的丧钟。

请听苏修叛徒集团的供词：

“中国的事态确实不只涉及到这个国家，而且涉及到整个世界社会主义，涉及到所有共产党人……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理所当然的忧虑。”

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事态”，何以会引起莫斯科一小撮人的“忧虑”，而且又是“理所当然”的呢？

整整一百年前，马克思为《资本论》作初版序言的时候写道：“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正是这样，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象是一柄闪光的利剑，无情地揭开了苏修叛徒集团统治、迫害苏联人民的黑幕，因而激起了这一撮暴君“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的叫骂和反抗。黑幕一揭开，人们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只是一小撮，从来没有占据过统治地位；在苏联，自从赫鲁晓夫上台后，就已经形成一个特权阶层，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政治上残酷地迫害人民，经济上敲骨吸髓地剥削人民，思想上用腐朽的文化毒害人民，就是他们，把曾经在列宁的教导下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伟大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又抛入了暗无天日的苦难深渊。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起来了，亿万人民的眼睛进一步擦亮了，苏修集团的叛徒嘴脸进一步暴露出来了，这一小撮人惊慌了，绝望了，于是便“理所当然”地堕入了

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

整整五十年前，“阿芙乐尔”巡洋舰上一声炮响，宣告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新纪元的开始，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感到多么振奋和鼓舞啊！而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都咬牙切齿地发狂叫骂，甚至发动武装干涉，企图把苏维埃扼死在摇篮之中。为什么？这因为俄国无产阶级为全世界饥寒交迫的奴隶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十月革命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斯大林写道：“现在已经不能再把世界劳动群众看做在黑暗中徘徊的前途茫然的‘盲目人群’了，因为十月革命给他们建立了一座照耀道路并指出前途的灯塔。”同样，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大民主，为伟大的十月革命发源地的广大苏联人民，提供了一条重新把祖国从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轰然一声，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亿万文化大军的总攻战中倒台了！苏联人民多么高兴呵！他们亲眼看到，修正主义也不过是纸老虎，只要亿万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大无畏精神，自下而上地来一个大革命，社会主义的命运，祖国前途的命运，完全可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苏修叛徒集团多么恐慌呵！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中国赫鲁晓夫的倒台，对他们来说，就是自己行将遭受灭顶之灾的预兆，他们自然要更加惊慌了，更加绝望了，于是便“理所当然”地更加堕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

应当明白地告诉苏修叛徒集团，警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你们的估计又错了！中国大地上的“事态”，“理所当然”地引起的不是你们的“忧虑”，而是你们的灭亡！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道：“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苏修叛徒集团的末日即将来临了，苏联人民彻底实行自下而上的大革命之日，就是这个叛徒集团灭亡之时。到那时，世界人民将看到，克里姆林宫上已经失去了光泽的红星将重新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制造武斗的祸首》

中国赫鲁晓夫导演的臭名昭著的桃园“蹲点”，是采用法西斯手段，搞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丑恶典型。

在这方面，他们搞了许多野蛮的做法。“燕飞”（又称“喷气式”），就是资产阶级分子王××一手创造出来的。

王××在桃园“蹲点”时，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她一再亲自“加温”“加压”，大搞什么“慢火煎鱼”，“车轮战术”，罚站罚跪，低头弯腰，火烤，冷冻，“燕飞”，拘留，甚至用手枪威胁，大搞逼、供、信。可见，中国赫鲁晓夫和王××，是进行武斗的罪魁祸首。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指出：“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中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来不主张武斗，不赞成武斗。因为真理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完全可以用文斗的办法，用革命大批判的办法，战胜敌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才能彻底暴露敌人的反革命面目，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倒、斗垮、斗臭。也只有文斗，才能教育群众擦亮眼睛，提高觉悟。

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武斗，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张。他们不但自己动手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武斗，而且千方百计地挑动群众进行武斗，来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妄图把武斗的罪名加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完全是徒劳的。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我们要把一切资产阶级的东西，连同他们“发明”的“燕飞”等等，一起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刘少奇》

（这是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第一个问题是国际形势；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军队现在所担负的任务，从略。讲话日期可能有误。）

有人问：刘少奇这么多错误，为什么不早批判？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批判？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同志看问题就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把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串起来看。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是一下子从犯错误那天起，就把他的错误定下性质。除非是现行犯，那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现行杀人犯，一刀下去就定了性了。凡是犯政治错误的，都是逐渐发展的。如果改了他就好了，把错误变成反面教员了。毛主席指示我们：不仅要总结正面的经验，还要总结反面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才完全。犯错误是允许的，有时甚至于总结错误的经验也是需要的，能够总结起来也是好的嘛，其实大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也要多次观察才能定论。不能一下犯了大错误，就下棍子打死？我们无产阶级是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要把一切阶级都消灭了的最先进的阶级，所以最有政治度量。它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要改造全人类，解放全人类，自己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这是无产阶级的心胸嘛。推翻了资产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彻底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话。毛主席常常讲，最近还讲这个问题，最近在一个介绍军训的批语上，又引了这段话。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无产阶级的心胸是应该宽广的，应该从各个角度来考验每个领导人。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时候，团结了包括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一方面要和他作斗争，一方面团结他，为了推行革命运动。巴黎公社主要成员并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共产党，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等等。但是当巴黎公社起义后，马克思马上表示支持，并不因他是别一派而不支持，总希望他能搞成功。失败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列宁当着党内争论的时候，他团结了一切赞成和支持他的人，所以变成了一个时候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在一次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上变成多数，以后又变为少数。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夜，决定十月革命起义的时候，党的政治局加米涅夫、季若维也夫，这两个政治委员出卖了革命，他们在党外的报纸上泄露了起义日期这个机密，等于是叛徒。他们承认错误后，列宁还把他们留在政治局里头。托洛茨基参加了十月革命，他并不是真正的布

尔什维克，但是也他吸收他在俄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里头，差不多整个列宁在世的时候，政治局里头是几派的，不是都跟列宁思想一致的。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差不多十年以内，都是按照列宁的路线，团结这些不同意见的人。经过激烈的争论，这些人承认错误以后，都容纳下来了。这说明判断一个人，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考察，斯大林也曾经在民族问题上犯过一次错误，他自己承认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一书中所批判的孟什维克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后来也承认了错误，他说列宁的指示是对的，列宁那时说的是真理，而他自己当时等于一个鬼，说了完全是反动的話，现在承认错误。斯大林还是把他容纳在共产国际里做工作。这都是允许的。对犯错误的人，你还得经过多次考察，这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斯大林在苏联宪法公布以后，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熄灭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一切党内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而且都是来自国外，通通说成是人民公敌，这个当然不妥当，所以肃反就扩大化了。在中国毛主席的组织路线、干部政策一向是马列主义的，而且有发展。思想斗争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团结——批评——团结，成为党内斗争的一个规律。对于犯「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毛主席用这个政策，对于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也用这个政策。即使是解放以后受高饶集团影响的和彭黄集团影响的，都是采用这个政策，这样就孤立了反党头子和犯有严重错误而又不改的头子，而多数人争取过来了，这使我们党能把民主革命斗争领导到胜利，现在又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是经过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的。譬如拿刘少奇来说，他的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遵义会议以后到「七大」以前，十年之间，就用了三年功夫整风。当时整风是在战争的年月中的进行的，只能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而且当时在高级干部中，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算多，真正学习毛主席著作，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也不多。所以就要通过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这样做，就是好同志了。当时看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犯错误较少，甚至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是一般的说，现在应该再深一步地看这个问题了）。相反地，当时把刘少奇看是白区工作的代表，他也以白区工作「模范」自居。邓小平当时又成为江西执行「左」倾路线中受打击的人物，当时「左」倾路

线所反对的，在名称上叫做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古×。后三位都牺牲了。唯有邓小平还在，又居首位，结果他就变成了好象是个正确的了。因此在「七大」以后，对这两个人不得不给予信任，很自然地要给予信任。并且在「七大」的党章报告中，刘少奇提出要学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在那个时候当然要给予信任。这就说明，对刘少奇、邓小平需要进行二十多年的考察，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能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以后还会有报告。我只是提醒一下，刘少奇的错误是逐步发展的。戚本禹同志从《清宫秘史》这个电影说起，追溯到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讲具体内容。如果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就是「七大」以后，日本投降那时间，原子弹出现，有许多人被原子弹吓倒了，当时连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震动，生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写了那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说一个时期不会有反苏战争的，反苏战争是一种借口，真正受美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是中间地带。这个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那篇文章实际上是毛主席通篇改过了的，只是发表时还是用陆定一名字。编《毛选》四卷的时候，我们对陆定一说，最好你写个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他根本不吭声。因为这样一来，他的面貌不早就暴露了吗？毛主席一向不愿意强加别人，既然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了，现在又把它收回不好。毛主席不赞成我们的意见。当时就是那么一种情况。后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昨天讲了这个事，毛主席那个时候到重庆去，完全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中国共产党要争取和平，要暴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一点。因为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战，你如果说他不是抗战的人物，有人不信，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暴露。但是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少奇九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第二年一月发表了一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

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

日本投降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少奇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

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

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组织报告。这两

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个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忘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后许多年的事实我就不说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我们许多设备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这时正如庐山会议决定所说的，引起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别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社会主义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根据这个学说写了十中全会的公报。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实右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埋藏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作总结了。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的林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一人。最近几年，不管罗瑞卿怎么干扰，由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我们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成绩是不能抹煞的。许多英雄伟绩的创造可以证明，从雷锋、王杰、欧阳海一直到蔡永祥都可以证明，这些均出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以后的英雄伟绩，说明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一样可以出英雄人物。精神可

以变物质，如果人人学雷锋、王杰，人人学欧阳海、蔡永祥，我们人民解放军更举世无双、世界无敌了。一旦帝国主义敢来侵犯我们，解放军完全可以配合广大人民，依靠广大人民干净的消灭来犯的敌人。这是完全肯定的。像林副主席这样经过考验的领袖，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们不在法律上肯定下来呢？所以去年召开十一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犯错误的经过多次挽救已经不行了，另一方面，经过考验的全党全国全军所信任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当然就应该推选出来。毛主席的这个组织路线，干部政策，完全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按道理讲，这样一个党内的斗争大问题，应该专门来讲讲，我今天把它作为三个问题之一来讲，没有法子讲得太多。我想这个问题你们有这么多司令员、政治委员，要他们讲讲嘛。我仅开了头就是了，我看可以结束了。

（来源：一九六七年 11 月 29 日《红战报》第 15 号（广东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大联合总部主办））

（九）一九六七年十月毛泽东对大批判的新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负责人的指示

〔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联络站勤务组、三报一刊写作班负责人的指示〕

大批判，北京、上海负有很大任务。大家可以思索一下，从各种意见中得到启发。主席提出要斗私批修，现在要坚决执行，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按着主席思想，不断和头脑里“私”字斗争的，能够思索的，才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现在关键是照主席的话去做。搞大批判首先要有敌情观念，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大批判也是一场尖锐的斗争，为小山头搞大批判也是不行的。只有发动广大群众搞大批判，才能把彭、罗、陆、杨批深批透，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他们就不能复辟，要复辟也没有市场。

这次文化大革命成绩是最大最大的，而损失是最小最小的，报刊上刊登刘、邓、陶后有各种反映，这不是文字斗争，而是政治斗争，不批判刘的东西，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不能确立，只有把刘彻底批深批透，才能大立毛泽东思想，现在组织上夺了权，但是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的一定要搞深搞透。

不把大批判搞好，就不能痛切感到本单位的斗批改非搞不可。有些学生只想到分配，不想到教育改革，这怎么行呢？斗私本身就是防修。私字发展起来，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老三篇，毛泽东思想就是无私的么，私字发展起来，就要被糖衣炮弹打中了，就要产生修正主义了，不能搞人人过关，自觉起来斗私，自觉革命，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相信群众的创造性。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批刘邓陶的文章，要扎扎实实充分占有材料，抓住中心击中要害，采取严肃认真态度，写一篇算一篇。”文章写好后，不要怕多修改，多征求群众的意见，毛主席对批判的文章，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放过的，文章应该具有准确、生动、鲜明的战斗风格。关键有三个：

1、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搞大批判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被敌人占领的阵地。文章的深度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深度，用毛泽东思想去揭露批判他们是代表那一个阶级利益的，把学习毛著放在第一位，重要文章经常看，在斗争中看，领会就能深刻。

2、还要联系群众，针对当前阶级斗争动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正在激烈的进行着，我们要懂得社会的阶级斗争刘、邓、陶有什么表现，国际国内的动态都要了解。主席指示要落实到文章中去，要把自己管的那一部分工作，搞清哪是主席革命路线，哪些是刘邓反动路线。……

（来源：1967年10月19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19期。）

（十）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发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

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人类进入了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进入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新时代。

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世界上有两面旗帜。一面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高举着的鲜红的革命大旗，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正集合在这面大旗下胜利前进。一面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帮凶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集团支撑着的反革命黑旗，一切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麇集在这面破旗下垂死挣扎。你是革命者，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就必然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是反革命，你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就必然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已经成为革命和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最灵验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于反革命复辟阴谋的需要，疯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罗瑞卿，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他的根本罪恶，就是长期以来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恶毒诽谤毛主席，攻击和歪曲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反对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妄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我们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武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代理人罗瑞卿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流毒。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要由最有威信、最有经验的卓越的伟大领袖来领导，才能完成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列宁指出：“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的顽强的斗争以争取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

的。……每一个国家的无产者都需要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权威。”①他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②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就是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推举出来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就是当代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权威。他有最坚定、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最巧妙、最灵活的斗争艺术，他有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智慧和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他在全中国和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他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彪同志一贯地全力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全力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林彪同志对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最正确、最科学、最崇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评价，几十年如一日地忠实捍卫、执行、宣传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英勇地捍卫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他指出：毛主席是我们时代的代表，是党的代表，是群众的代表，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灵魂。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罗瑞卿这个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于反革命的阶级本能，长期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是王明路线的追随者。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彭德怀进行反党活动的同谋。全国解放以后，他参与了彭、高、饶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社会主义革命步步深入，他反对毛主席的活动也变本加厉。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但是，罗瑞卿却恬不知耻地、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毛主席的伟大天才，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卑鄙无耻的攻击，正是他配合国际上帝、修、反疯狂反华，妄图在国内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逆流的阴谋大暴露！正是他妄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的大暴露！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重视无产阶级领袖的个人天才，而且认为这是推举领袖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自己的领袖。恩格斯高度颂扬马克思的伟大的天才，他说：“我们之所以有今

天，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都应当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直到现在还会在黑暗中徘徊。”③列宁也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毛主席的言论、著作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他解决了当代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攀登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新的高峰，他站得最高，看得最远，最善于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把群众的革命斗争引向胜利。林彪同志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罗瑞卿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反对“提个人天才”，而且特别说明是反对“再提个人天才”。这就暴露了他是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的狂热追随者和忠实的门徒，他是用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同样手法，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诽谤无产阶级的领袖，破坏无产阶级事业，是新老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用这类口号咒骂过马克思。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用这类口号咒骂过列宁。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用这类口号咒骂过斯大林。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用这类口号大反特反斯大林，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对于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更是肆无忌惮地用“反对个人迷信”这类口号加以攻击。罗瑞卿秉承我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旨意，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一唱一和，也用这类口号恶毒诋毁、反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充分证明，罗瑞卿和历史上新、老修正主义者是一丘之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卑鄙的叛徒，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危险的敌人。

列宁指出：“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地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④罗瑞卿大反毛主席，就是为了抬出他们那个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黑司令——中国的赫鲁晓夫，达到他们篡党、篡军、篡国的罪恶目的。他经常别有用心地使用“两个主席”的提法，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捧场、讴歌。在一次元旦团拜时，他竟公然为中国赫鲁晓夫高喊“万岁”。一九六四年，正当中国赫鲁晓夫到处作报告，大反毛主席的调查研

究，公开叫嚷要毛主席“下台”、“让位”的时候，罗瑞卿就多次盗用军委、总政的名义，亲自起草批示，要部队学习、讨论中国赫鲁晓夫的这些黑报告。一九六五年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罗瑞卿更明目张胆地在发言稿中把中国赫鲁晓夫同毛主席并列为党的领袖。罗瑞卿之流妄图把中国赫鲁晓夫强加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头上，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毛主席永远是我们的最高领袖，永远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永远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没有我们这样一支伟大的军队，就没有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一切，就没有世界人民的翻身解放。罗瑞卿之流越是疯狂地反对毛主席，我们就越要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永远紧跟毛主席，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牢固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统治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⑤

列宁也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⑦

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导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指导当代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林彪同志精辟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⑧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切修正主义分子阴谋搞反革命活动的最大障碍。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往往采取表面拥护，实际反对的反革命两

面手法，反对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罗瑞卿正是这样。他阉割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诋毁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大肆散布中国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他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抵制和破坏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他玩弄折中主义机会主义的卑劣手段，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阉割毛主席建军思想的核心，反对我军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⑨罗瑞卿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胡说什么：“不能这样讲。”林彪同志提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她解决了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者没有遇到过，或者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能够解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没有象毛主席这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重大的政治战役、军事战役；都没有象毛主席经历过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毛主席的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最高概括和最新总结。古今中外哪里有这样高的理论？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

林彪同志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⑩而罗瑞卿竟用“国家体制”，反对我军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真是反动透顶！毛主席教导我们：国体问题，“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⑪①}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不仅包括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来，尤其重要的是包括思想方面。历史上，每一个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都建立自己阶级思想的统治，用以巩固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封建社会建立了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不仅要同旧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

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牢固地建立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在我们的时代，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统治，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夺取政权靠毛泽东思想，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强化政权也必须靠毛泽东思想。不这样做，我们在政权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我们二十八年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果，都可能付之东流，毁于一旦。所以，用毛泽东思想作最高指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对于我们，是天经地义的、绝对必要的，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体制所要求于我们的；而不用毛泽东思想作最高指示，不去建立毛泽东思想的统治，则恰恰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体制，恰恰是从意识形态领域颠覆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的所谓“不合国体”论，正是出于这个罪恶的阴谋目的。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柱石。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人民解放军的灵魂，是我军建设的根本。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我军，武装我军广大指战员的头脑，是决定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因素，是我军永远保持鲜红旗帜的绝对保证。罗瑞卿反对把毛主席的著作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拼命地反对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同时又在军队中大肆推销黑《修养》，吹捧黑《修养》是什么“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并亲自下令要全军当作必修课，要“认真地、反复地学”，“活学活用”，“对照检查”，千方百计地妄图为中国赫鲁晓夫树立“权威”，极力妄图用反革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和瓦解我们，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党、篡政服务。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每当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军内取得领导地位的时候，革命事业就发展，就胜利；每当这种领导地位遭到破坏的时候，革命事业就遭受挫折和失败；即便只是受到干扰，也会带来很大损失。当代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也同样证明：只有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才能取得胜利。中国要兴旺，世界人民要解放，都要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列宁曾经说过，我们需要全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罗瑞卿之流越是疯狂地反对毛泽

东思想，仇视毛泽东思想，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就越要热爱她、坚信她、依靠她、学习她、宣传她、实现她、捍卫她；越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分析一切，批判一切，改造一切。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她实现；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坚决同他斗争到底。在全党、全军、全国、全世界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在全党、全军、全国牢固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统治。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是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根本途径

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②}他又说：“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①③}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使亿万革命群众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成为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英勇战士，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保证；是彻底埋葬一切剥削制度，使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阶级敌人清楚地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群众中传播和灌输，对他们是致命的威胁。从十九世纪奥匈帝国的梅特涅，到二十世纪的世界宪兵美帝国主义；从第二国际的叛徒伯恩斯坦、考茨基，到现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都十分害怕并疯狂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灌输。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灌输，本身就是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

阶级敌人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灌输上，除了使用警棍和监狱以外，还使用了种种污蔑和欺骗的卑鄙手法。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罗瑞卿，在反对毛泽东思想传播上，也正是这样。

警棍和监狱，是敌人的基本手法。在他们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要坐牢，要杀头。看到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枚毛主席像章，他们都惊恐万状，调来武装军警进行搜捕和殴打。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罗瑞卿，虽然不能象他们那样放肆，但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窃取的职权，胆大妄为地阻挠和破坏毛泽东思想的传播。罗瑞卿禁止广泛宣传毛主席语录，指责《解放军报》“刊载毛主席语录太多了”。他借口发到连队的东西太多，不准给战士印发毛主席的指示。他还竭力反对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指针，而且是世界人民革命的指针，我们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最根本、最重要的支援就是支援毛泽东思想。罗瑞卿反对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对世界革命的彻底背叛。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说成不符合实际的偏见和空论，说成与劳动人民无关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是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者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欺骗劳动人民惯用的手法。它们起着警棍和监狱所起不到的作用。十九世纪末叶，俄国的经济主义者用崇拜自发运动的欺骗手法来反对向工人群众灌输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御用学者胡适，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欺骗口号来阻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老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御用学者一样，中国的赫鲁晓夫也大力推行经济主义，胡说什么“职工运动之方针应作各种经济斗争”。罗瑞卿也用同样手法，一方面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污蔑为“教条主义”，公开叫嚣：“中国教条主义的东西可不少，军队也有嘛！”意思是说，你们根本不该学，学了也没有用。一方面则散布折中主义的谬论，胡说什么“军事就是政治”，用大比武冲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妄图把军队引向单纯军事观点的歧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自发运动的产物。无产阶级如果不学习理论，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列宁指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罗瑞卿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军脱离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听任资产阶级思想的愚弄和摆布，只注意单纯的军事技术和实际事务，而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腐蚀和瓦解我们的军队，以达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迫使它的敌人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

“红旗”反红旗。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历来如此。中国的赫鲁晓夫同他们一脉相承，打着学习马恩列斯的幌子，反对向毛主席学习。他的代理人罗瑞卿，在表面上规定高级干部只学习马恩列著作，这完全是骗人的，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是统一的、一致的，是更高级的更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的时代，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的代理人罗瑞卿，却硬要把它们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他们玩弄的这种卑劣手法，正如列宁所说的：“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①④}中国赫鲁晓夫和他的代理人罗瑞卿规定只学马恩列斯原著，也正象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那样，是为了把已经逝世的伟大革命家变成无害的神象，来“安慰”和愚弄群众。而对于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却疯狂地进行诽谤、攻击、篡改和歪曲。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千方百计阻挠毛泽东思想传播，扼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狰狞面目。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用毛泽东思想总结了社会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面对着国内外敌人特别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的事实，以惊人的魄力和决心，在全军、全党和全国坚定不移地积极倡导、全力推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开辟了亿万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广阔道路，创造了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根本途径。他最全面、最深刻、最精辟地阐述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意义。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强调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他提出了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一整套学习原则和方法。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中国、全世界得到空前规模的大普及、大传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出现了空前宏伟的思想

革命运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⑤

全军指战员在林彪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思想革命化获得巨大成果，出现了雷锋、欧阳海、王杰、麦贤得、刘英俊等毛主席的好战士。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正在迅速地成长。先进集体大量涌现。我军的战斗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我国国防科学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和导弹核武器。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号召，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亿万群众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工业持续跃进，农业连年丰收，科学技术不断攀登新的高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作武器，以“斗私，批修”为纲，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展开大批判、大斗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大大促进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正在变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世界革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越来越多的革命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世界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武装斗争的烈火，在越南，在老挝，在印尼，在缅甸，在泰国，在印度，在整个东南亚，在非洲，在拉丁美洲等地区，正在熊熊燃烧。西欧北美的工人阶级有了新的觉醒。美国黑人英勇地拿起了武器，世界头号反动堡垒的内部响起了革命的枪声。修正主义国家的革命人民逐渐看清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叛徒面目，他们一定会起来推翻叛徒集团的统治。

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一旦被亿万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林彪同志开创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道路无比正确，并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效。我们要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在全中国、全世界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以及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罪恶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每当马克思主义取得历史性的胜利，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一切机会主义者就联合起来，攻击和谩骂无产阶级领袖及其伟大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就是树立和反对树立无产阶级领袖和领袖思想权威的斗争史。

马克思和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战胜了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恩格斯以毕生的精力，大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第二国际的头头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在恩格斯去世以后，公开背叛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上了邪路。列宁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了列宁主义的阶段，在俄国和世界革命人民中赢得了崇高威望，缔造了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粉碎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猖狂进攻，捍卫了列宁主义。但是，他去世不久，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就践踏了伟大列宁的旗帜，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造成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触目惊心的大悲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树立了无产阶级领袖及其天才思想的权威，就能够极大地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前进；树立得不够，或者是受到了干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要遭受损失。而每当这种权威被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所破坏，就必将招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倒退。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是关系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命运的头等大事，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极其光

荣而伟大的任务。

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以最坚强的革命毅力，战胜了阶级敌人的种种破坏和干扰，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是林彪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林彪同志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作了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的评价。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积极倡导、全力推进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并把这个伟大运动推向全世界。他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毛泽东思想，用他的伟大实践为我们作出了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光辉榜样。

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伟大历史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到了我们的肩上。我们要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伟大号召，要一千倍一万倍地提高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自觉性，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要一千倍一万倍地加强反击国内外敌人破坏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战斗，为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把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中国、全世界而奋斗！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当前农村形势大好。亿万贫农、下中农和城市的广大革命群众一样，充分地发动起来了。他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斗私，批修，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伟大的革命运动带来了生产的新高涨，今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农村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进一步深入地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在农村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是当前发展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战斗任务。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亿多农民的大国。能不能正确地解决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民主革命成败的关键，又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成败的关键。在全国胜利以后，把中国农民引向社会主义，还是引向资本主义，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

正是在这样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上，解放十几年来，一直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全国解放前夕，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是一条消灭农村资本主义剥削，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路线，是一条彻底完成农业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路线。

而那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十几年来在农业问题上又干了些什么呢？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他竭力保护和发展富农经济，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疯狂地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广大贫农、下中农。他推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一条妄图在农村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也就是地、富、反、坏、右复辟的路线。

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系统地、彻底地批判中国赫鲁晓夫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是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中国赫鲁晓夫是富农经济的狂热鼓吹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民主革命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毛主席还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

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按照毛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思想，即不间断地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思想，在土地改革以后，必须趁热打铁，及时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

同毛主席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针锋相对，中国赫鲁晓夫代表了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立刻跳出来狂热地宣扬资本主义，拚命地反对社会主义。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才一个多月，这个中国赫鲁晓夫就跑到天津，卑鄙无耻地吹捧资本家，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剥削有功”论。

全国刚刚解放，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又大力鼓吹发展富农经济。一九五〇年一月，他在对大叛徒安子文的黑“指示”中，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①

他针对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对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不能“任其自流”的论点，大唱反调说：“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流出点富农来好”。他还宣传雇人种地“不要限制”②，是“合法的”，“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③。

他还疯狂地叫嚷：“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在数年后应发展到百分之八十”。④

他在同年六月的讲话中还说，“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一种长期的政策”。⑤

从这一阵阵吸血鬼的嚎叫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中资本主义势力妄想吞掉社会主义的那种剥削阶级的贪婪和疯狂。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吃人哲学！

什么“剥削是救人”！什么“雇工是合法的”！它“救”的是资产阶级的人，“合”的是资本主义的法。内头号走资派，如此狂热地歌颂剥削制度，把万恶的雇佣奴役制，描绘得象“极乐世界”一样，他的五脏六腑里装的是什么黑货，不是昭然若揭吗？！

什么“发展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广大农村，拥有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决不是中农，而是富农。所谓发展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就是要发展富农经济，让资本主义占领农村阵地，使广大贫农、下中农重新

沦于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境地，破坏工农联盟，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什么“不要限制”！这个头号走资派狂热地赞美富农经济，正是为了“限制”、扼杀广大贫农、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为资本主义势力鸣锣开道。他叫嚣“不要限制”的仅仅是资本主义剥削而已。这就是他所谓“自由”的阶级内容！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欺骗群众，竟然颠倒黑白地说：“有了百分之七十有三匹马的农户，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⑥

他切齿仇恨地诬蔑贫农：“不要认为反对单干的就都是集体主义者”。⑦

这是对贫农的莫大污辱，这是对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极大歪曲！毛主席指出：广大贫农、下中农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过去深受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对剥削制度充满了深仇大恨。土地改革以后，他们的生活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许多人的经济地位还很困难（贫农），或者仍然不富裕（下中农），这就决定他们坚决反对单干，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积极要求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他们是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依靠富农去搞什么“集体农庄”，就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百分之一百的资本主义。所谓要到“有了百分之七十有三匹马的农户”才能搞集体化的荒谬“理论”，不过是替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加上一块遮羞布而已。要百分之七十、八十的单干农民都变成富农，这完全是骗人的，根本是不可能的。并且谁都知道，富农经济控制农村之日，就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在地、富、反、坏、右的压迫下重新陷于赤贫的痛苦生活之时。这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对“穷人”的所谓“好处”。

中国赫鲁晓夫把他这套反社会主义的理论，概括成一个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⑧

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是要发展城乡资本主义。说到底，也就是要把解放了的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

这个反动纲领，遭到了毛主席的痛斥。一九五三年六月，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针锋相对地指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他深刻地指出：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

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揭穿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的反动本质，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一场几万万农民参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一场更尖锐更剧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开始了！

中国赫鲁晓夫是扼杀农业合作化的头号走资派

无产阶级革命党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就发出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深刻地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全国解放以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在毛主席这条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九五一年，山西等地广大贫农、下中农，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提出把互助组提高一步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要求。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然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却背着毛主席，在一个报告上恶狠狠地批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⑨

请看：这个扼杀农业合作化的头号走资派，是多么仇恨贫农、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啊！

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这个“批语”，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极端仇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自供状。他竟敢把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路线，诬蔑为“幻想”；他竟敢把现实生活中冲破资本主义势力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诬蔑为“危险”的“空想”。他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立场，在这里暴露得再清楚也没有了！我们简直可以听见他咬牙切齿仇恨社会主义的声音！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看到这个批语以后，以极大的愤慨对这种谬论进行了坚决的回击。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农业合作化的极其完整的理论，并亲自制定了党中央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胜利地引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向前发展。中国赫鲁晓夫的阴谋破产了。

一九五三年，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和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毛主席提出了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他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1)(2)）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灯塔照耀下，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面对这种大好形势，党内头号走资派及其同伙，吓慌了手脚，赶忙下命令，叫喊什么“反冒进”，强迫已入社的农民“退社转组”。一些刚办起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就这样被扼杀了。

一九五五年，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农业合作化的高潮遍及全国。可是，中国赫鲁晓夫又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再次策划了“反冒进”的罪恶活动。同年五月，他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合谋制订了“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并亲自批准了大砍合作社的计划。两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就有二十万个合作社被砍掉了。

直到现在，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还死不认罪。但是，铁证如山，赖是赖不掉的。中国的赫鲁晓夫百般狡辩，只能更加充分地暴露他顽固不化、恶贯满盈的反动嘴脸。

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给他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寻找“理论”根据，从他的老祖宗伯恩斯坦、考茨基、布哈林之流的修正主义垃圾堆里翻出了“生产力论”这个破烂武器。他鼓吹什么“有了工业的国有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⑩？

他的这种“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理论”，在我们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运动中早已可耻地破产了。他否认作为生产力中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的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在他那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伟大促进作用等等，都统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按照他的这种“理论”，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及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必须先让资本主义发展。没有机器，受资本家和富农剥削也是活该。

如果真的按照他的这种“理论”办事，那就必然是既断送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又断送社会主义工业化。

如果真的按照他的这种“理论”办事，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岂不早就被断送，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岂不早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了吗？

事情很清楚，所谓“先机械化，后合作化”，不过是中国赫鲁晓夫用来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借口。他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在我国农村发展资本主义，让地、富、反、坏、右复辟，使广大贫农、下中农去给地主、富农当牛做马。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面临被党内头号走资派扼杀的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著名报告，接着又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和按语。毛主席在这些天才的、划时代的伟大文献中，科学地、系统地、完整地解决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的猖狂进攻。

毛主席高度地赞扬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以极大的热情歌颂说：“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

毛主席痛斥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妄图阻挡历史潮流的机会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

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农业集体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辩证关系，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荒谬“理论”。毛主席指出：“在我国的

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解决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必须而且可能及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在工业还不能提供大量的农业机械的情况下，可能而且必须调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先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开辟广阔的道路。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在毛主席的光辉理论的指导下，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了，几万万农民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怒涛，把中国赫鲁晓夫等一小撮妖魔鬼怪的修正主义路线迅速冲垮了，卷走了。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嘴脸在大浪潮中被照得一清二楚。农业合作化伟大的群众运动，以空前迅猛之势向前发展。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只经过一年多时间，就在全国提前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获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

中国赫鲁晓夫是“三自一包”黑风的总根子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照耀下，国民经济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我国广大农村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使农业集体化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加速了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灭亡。

阶级敌人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对社会主义在农村的新胜利，恨得咬牙切齿，做梦都在想着复辟资本主义。

就在我国国民经济由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破坏和连续三年自然灾害，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反华大合唱的时候，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为这一下可该“变天”了，于是

指挥他们的大小娄罗，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向社会主义发起了全面的猖狂进攻。

党内头号走资派大肆攻击人民公社说，“农民这几年从集体经济中间没有得到好处”^{①①}。在他的煽动下，我国农村刮起了一股“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黑风。这是他妄图瓦解人民公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大表演。

他公然叫嚣：“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①②}，“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①③}

对这一点，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发挥得更形象。他说：“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促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还派出亲信爪牙，四处“调查”“包产到户”的所谓“经验”，妄图搜罗“炮弹”，攻击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假“增产”之名，行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实，恢复单干，让资本主义在农村自由泛滥，这就是他们提出的“三自一包”的反动实质。

想当初，为了推行“三自一包”，中国赫鲁晓夫发“指示”，作“报告”，多么神气十足！可是现在，这“修养”到家的“大人物”却居然厚颜无耻地赖账说，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没有攻击”人民公社。

事实俱在，还想抵赖。真不要脸！

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三自一包”，迎合了农村中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助长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为投机倒把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大开绿灯。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黑指示强制推行“包产到户”的少数地方，什么“责任田”，什么“分田到户”，什么“产量责任制”等等复辟资本主义的花样，统统冒了出来，严重影响和削弱了集体经济。

在刮起“三自一包”黑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赫鲁晓夫卵翼下的一小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得意忘形，以为在绝望之中又终于找到了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妙计。他们摇头晃脑地说：“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中国赫鲁晓夫极力鼓吹的“三自一包”，是撮合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向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发动猖狂进攻的一股黑风。这是为了破坏人民公

社集体经济，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把红色的中国变为黑色的中国。这是替他们篡党篡政作准备的一场资本主义大复辟活动。

无独有偶。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鼓吹的这一套，同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在苏联农村搞的那一套，是一模一样的。

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头们大肆推行“产品自由售卖的原则”，下令禁止对市场价格实行“行政调节”。他们宣布“赢利水平应当成为客观上评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营活动的基础。”他们一再放宽对“自留地”的限制，纵容私分公有土地。他们大搞分田到组、到户，公然把国有化的土地“从法律上”固定给小组长期耕种，而一家只要有两三个以上的劳动力，就可以是一个小组。

正是在这样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在苏联的农村，私有经济泛滥成灾，社会主义经济完全瓦解，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

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让中国赫鲁晓夫的阴谋得逞，在我国农村，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呵！

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场大搏斗

正当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严重关头，一九六二年秋天，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煞住了中国赫鲁晓夫刮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任务，吹响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全面反击的号角。它如一声惊雷，震撼了一切牛鬼蛇神。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开展起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发展。围绕着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集中地体现在两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中，这就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

二十三条)。

按照毛主席这条路线，就是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按照毛主席这条路线，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按照毛主席这条路线，“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触到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痛处，打破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他们见势不妙，就采取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口号接过去，抛出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首先跳出来的，就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这个家伙，一贯和中国赫鲁晓夫狼狈为奸，反对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大砍合作社有他，鼓吹“三自一包”有他，这次又有他。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发布不过四个月，他就急不可耐地炮制出了一个“后十条”（草案），同“十条”直接相对抗。

这个“后十条”（草案），用反革命釜底抽薪的手法，抽掉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一根本内容，把毛主席在“十条”中所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丢得一干二净。它打着要划清“具体的政策界限”的幌子，千方百计地为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开脱罪责，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竭力包庇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假“社会主义教育”之名，把斗争矛头指向贫农、下中农。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抛出这棵大毒草，就是妄图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扑灭由毛主席亲自点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革命烈火。这是他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之一。

接着，中国的赫鲁晓夫指派他老婆王××下去“蹲点”，搞了一个臭不可闻的“桃园经验”，恬不知耻地到全国大吹大擂，自卖自夸，并且根据这个“经验”

对“后十条”（草案）作了一番加工修改，搞出一个“修正草案”。这是一个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纲领。

中国赫鲁晓夫抛出这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要阴谋篡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权，把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引入歧途。这是中国赫鲁晓夫一场残酷地镇压贫农、下中农，向无产阶级手中夺权的大阴谋。在他操纵的一定地方、一段时期内，在这条形“左”实右路线的毒害下，不少贫农、下中农被打成“反革命”，被夺了权。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成果曾经因此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中国赫鲁晓夫极力回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大谈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等。他玩弄这种“障眼法”，一是妄图使革命人民忘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二是为了把矛头指向广大贫农、下中农，指向广大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以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被揭露。这是极其恶毒的阴谋。

中国赫鲁晓夫极端害怕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真正发动起来，掌握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就会把他的娄罗挖出来。因此，他拿出国民党的“训政”手段，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干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妄图把阶级斗争的盖子紧紧盖住，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走过场”。((2)(3))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抹杀两条道路斗争也好，压制群众也好，打击革命干部也好，归根到底，就是要把水搅浑，搞乱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打击一大片，以便保护党内的走资派，保护他们自己。

中国赫鲁晓夫这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条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纳入复辟资本主义轨道的路线，是一条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这条路线一出笼，就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广大革命干部的抵制和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的发布，宣告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人民公社进一

步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进一步加强了。接着而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又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以“斗私，批修”为纲，把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国五亿农民，紧跟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绕过暗礁险滩，战胜妖风迷雾，沿着社会主义的航道走过了十八年光辉的战斗历程。

十八年来农村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农村，由于被推翻的地主、富农不甘心于灭亡，总是企图复辟，由于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由于存在着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阶级斗争一直是非常复杂、非常尖锐的，在每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是十分激烈的。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就是这种斗争在党内的集中反映。广大贫农、下中农和革命干部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流毒。

第二、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农村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到底，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敌人为了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总是要采取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软硬兼施的办法，在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广大贫农、下中农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中国赫鲁晓夫是他们的总后台。他在农村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他妄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如果让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政权，那就要走回头路，吃二遍苦。

第三、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巩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同破坏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的斗争，仍然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大搞“三自一包”，就是阶级敌人腐蚀和瓦解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

一种重要形式。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四、广大贫农、下中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是在农村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依靠力量。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实现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总是坚持依靠地、富、反、坏、右，打击贫农、下中农的资产阶级阶级路线。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坚持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使印把子牢牢地掌握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手中。

第五、“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党在农村“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而中国赫鲁晓夫则要拚命打击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搞物质刺激，竭力诱发和利用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这是一场争夺对农民的思想领导权的严重斗争。广大农民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在狠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同时，狠斗资产阶级的“私”字，逐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十八年来，中国赫鲁晓夫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同广大贫农、下中农为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遭到了彻底的灭亡。他那条对抗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正在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农村中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定要进行到底。广大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进行到底。

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祖国的农村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社论）

2007年11月18日初稿

2011年9月21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14）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十四节 抓叛徒

本节资料

一、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布署

（一）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康生谈抓叛徒的问题

抓叛徒的问题，我不详细讲，以后中央要发文件。红卫兵做了大量的工作，挖出了许多叛徒，变节分子，做了许多贡献。中央发了一个通知，关于刘少奇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照片也发了下去，大家很重视这件事，做了调查工作。外事口也好，其他学校也好，但是最近发现存在一些偏向，就是到处都抓叛徒。我们希望你们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工作，可成立调查组，深入调查。你用一个“抓叛徒小组”的名称，去调查别人，一听这个组名就有意见，很不好。

另外这件事情不简单，做结论要慎重，这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不能根据未核实的材料，宣布某一个人是叛徒，这实际上制定了一个人政治上的死刑，要负政治上的责任。这和西方新闻记者抢新闻不一样，你也抓，他也抓，被利用了。我们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党，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若都有问题那不就推翻了吗？

进监狱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个很好的考验，也很光荣。不要一进监狱就怀疑人家是叛徒。不要随便贴大字报，有些群众组织做得比较好，得到材料交给中央，不立刻宣布结论，这是好的。你们革命组织要掌握方向。不要丧失警惕，也不要特务如麻。对历史上有政治结论的，凡是中央管理的干部，历史问题的决定权绝对在中央，必须由中央决定。彭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去年成立彭真专案小组的时候，就怀疑过他是叛徒。但我们没有宣布，没有贴大字报。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我们今天可以向同志们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一个特务。今天我们可以向同志们讲，因为我们经过了调查研究。就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调查要结合本单位文化大革命，不要超越本单位，偏向的去搞叛徒。这样会把文化大革命方向改变了。四川军区个别同志为什么犯错误？就是因为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反运动。因此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同志们，要清醒地估计这个问题。

关于李先念，总理讲，李先念不是叛徒。即使有这个问题，也只是个大错误，是个立场错误。

为什么要将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材料那时发下去呢？那是为了证明，刘、邓不但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还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现在同志们有了偏向，故向同志们交待一下。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总部《对各“抓叛徒”战斗队的命令》

战斗在全国各地的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抓叛徒”战斗队：

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鼓舞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和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一起，一路血战，冲破了刘邓们设下的道道防线，击退了保守势力的围追堵截和层层封锁障碍，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终于揪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隐藏在党内达三十年之久的大叛徒集团，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除了一大害。这是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今年三月十六日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亲自批转了关于六十一个叛徒的文件，大长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刘记叛徒集团的威风；她庄严地宣判了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死刑！是向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发起全面总攻击的动员令。目前，全国各地已经调动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掀起了一个彻底砸烂批判刘、邓、陶的新高潮。亿万革命人民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坚决彻底砸烂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彻底埋葬刘邓王朝！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

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们并不甘心自己

的失败，还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在这斗争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叛徒集团及其徒弟徒孙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耍阴谋，放暗箭，煽阴风，点鬼火，挥舞起他们主子刘少奇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大棒，利用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潮，操纵和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组织和群众，捕风捉影地一会儿说这个是叛徒，一会儿又说那个是叛徒，极力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一方面是为了颠倒历史事实，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另一方面企图搅乱阶级阵线，把水搅混，扭转斗争的大方向，并且将这一罪名强加在我们革命小将的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对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必须彻底揭穿，给以迎头痛击！为此，总部命令你们：

1.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继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奋勇向前，穷追猛打，坚决、干净、彻底、全部地把刘少奇大叛徒集团一网打尽，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深、揭透、批倒、斗臭，制服。一定要把抓叛徒工作同当前揭发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地结合起来，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2.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混进党内的变节自首分子仅仅只是一小撮。我们要坚信“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广大革命干部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中华民族、忠于世界革命人民的。我们必须粉碎在新形势下刘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3. 要大破大立，破中有立。对于一小撮民族败类，无耻的无产阶级叛徒，要发动群众彻底查清，坚决打倒。要充分揭露他们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出卖同志、出卖组织、奴颜婢膝、卖身投敌的丑恶灵魂，彻底批判他们形形色色的叛徒哲学，活命哲学；同时对于那些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他们英勇顽强、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要大学特学，大树特树。

4. 在“敢”字当头的同时，要加强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抓叛徒工作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每个同志既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又要善于斗争、善于胜利。必须提高阶级警惕，严

防阶级敌人破坏。继续发扬踏踏实实，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的科学精神，加强保密安全工作。

5. 要充分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我们要坚决地相信和依靠当地革命造反派，坚决地相信和依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干部。坚决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以上各项，必须认真执行。

打倒刘少奇！

砸烂刘少奇叛徒集团！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原载天津大专院校红代会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派编印：《彻底粉碎刘少奇大叛徒集团》，一九六七年十月，青岛。青岛市红代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学校《红革司》《红联》联合翻印。）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1967. 06. 28； 中发 [67] 200 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挖出了一批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分子，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这项工作，中央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其他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起干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区别对待。

(三) 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区别开来。

(四) 各群众组织不要借“抓叛徒”的名义，进行宗派斗争，互相攻击，转移斗争大方向。

(五) 有些群众组织，混入个别的叛徒，特务，应当清查，但别的群众组织，不得借此来打击这些群众组织。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打倒叛徒哲学》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叛徒集团的总后台，是叛徒哲学的积极提倡者！他的《修养》就炮制、宣扬了叛徒哲学。我们必须予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是为了党的利益，还是为了保命？

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深入，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卖国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可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干下了罪恶的勾当。1936年，他出卖党和民族的利益，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需要，先后几次给被拘禁在伪“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共产党员，下达了可以履行“反共自首”手续的黑指示。他明目张胆地指使被捕的共产党人发表《反共启事》、《反共声明》，叛党投敌。

这个黑指示，遭到“反省院”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的坚决抵制。但是，有一伙怕死鬼，接到这个黑指示，正中下怀。他们对敌人屈膝求降，写了《反共启事》、“自白书”、反共文章，从“反省院”的狗洞里爬了出来，成为狗屎不如的叛徒。他们出狱以后，紧紧地勾结在一起，相互包庇提携，形成了一个叛徒集团。这个叛徒集团的总后台，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干下了罪恶滔天的勾当，心里有鬼，千方百计为叛卖变节进行辩护。他抛出的《修养》就宣扬、鼓吹了叛徒哲学。他恬不知耻地写道：党“在反动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保存同志等。然而，这些都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他还胡说：“在某种转变关头，在某种情况下，他们（指共产党员——引者）中间的某些动摇和变化，也是很自然的。……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这就是说，“活着就是一切”；至于党的工作，是可以“牺牲”或者“放弃”的；而且，一些人在斗争的严重关头动摇变节，“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这是十足的包庇叛徒、美化叛徒的反革命谬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叛徒们辩护说，这“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呀；那些现在已被揪出来的叛徒们也叫嚷，“我们是假自首，是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呀，“我们打着黑旗保红旗”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句话，这是他们的“灵活性”。

保存同志，保存革命实力，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党决不允许抛弃共产主义理想，丢掉无产阶级立场，叛变投敌，来保存“同志”。对我们来说，革命就是一切，一个人既然叛变了革命，他的狗命也就一钱不值。当然，我们并不反对灵活性。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灵活性是为了保证原则性的实现才有必要，借口“灵活性”而丢掉原则，向敌人乞求活命，是地道的叛徒逻辑。

我们无数革命的先烈，为了党的荣誉，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保护同志，在狱中坚定不移地和敌人进行斗争，抛头颅，洒热血。他们“部分的暂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只有坚贞不屈的斗争，才能保存革命实力。没有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壮大

这些叛徒为了能从“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他们出卖了灵魂，写了《反共启事》、反共文章。他们照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腔调恶毒地咒骂：“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共产党的路线政策行不通”；“将马克思主义抛到茅厕去，对共产党毫无留恋”等等。有的叛徒更向国民党反动派摇尾乞怜：“若有他用，当效犬马之力。”这些卑鄙无耻的家伙的反革命叫嚣，助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使我们党在政治上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政治围攻的马前卒。

一些叛徒出卖了党的组织和同志，甚至出卖了党的负责同志。他们得到“自由”后，还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经常保持联系，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力量的鹰犬。这些叛徒使多少党的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使多少党的优秀儿女惨遭敌人

的杀害！

有这样的“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吗？！

有这样的“保存同志”、“保存革命实力”吗？！

有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同流合污，不仅在解放前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服务，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长期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吗？！

这是“打着黑旗保红旗”吗？！

叛卖变节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的莫大损害，粉碎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大大小小的叛徒们无耻的反革命谰言！

抚爱的是革命战士，还是叛徒？

如何对待叛徒问题，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反对毛主席，竭力推行一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路线。他在 1936 年就指示叛徒们：“这个事不要向外说”，“填表时填个组织营救就行了，不要具体地填”。他干了这样罪恶的勾当，见不得人，千方百计地掩掩盖盖。他在《修养》中为叛徒们辩护道：“这些同志一般都是很好的同志，因为他坚决地和反革命斗争，他把自己的党作温情满怀的母亲。当他在和反革命进行了各种艰难困苦的战斗之后，回到自己伟大母亲的怀抱中，是应该受到鼓励，安慰与抚爱的，而不应该再受到任何打击，批评与委屈。”

好一个“回到自己伟大母亲的怀抱”！一句话泄露了天机。原来，这些“同志”确确实实投入了敌人的怀抱！

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场合，只要他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进行斗争，他就从来没有离开组织，始终与党血肉相连，根本不存在什么“回到”、“不回到”党的怀抱的问题。

真的“和反革命进行了各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的“很好的同志”，难道会“再受到任何打击、批评与委屈”吗？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反常的问题呢？

原因在于：他害怕这些叛徒出狱后，受到党的怀疑和审查；他害怕以他为首的叛徒集团被革命人民彻底揭露；他害怕自己的叛党罪行受到党和人民的惩罚。

他为了使这些叛徒们能长期隐蔽，不致因一时沉不住气，自己跳出来，在《修养》中告诫他们：“应该受得起打击、批评，以至冤枉、误会。尤其不要为别人一些不负责任的、甚至不正确的批评与流言所刺激而冲动起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叛徒们想得多么周到！他还费尽心机地包庇叛徒，为他们争党籍，争权势，争地位。与此相反，他对那些拒绝写“反共启事”、宁肯坐穿牢底的优秀共产党员，不仅没有丝毫的“鼓励、安慰与抚爱”，反而进行无情的打击和排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爱的是叛徒，恨的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正暴露了他的叛徒嘴脸。弄巧成拙，欲盖弥彰。本来想用《修养》来掩盖他的罪恶勾当，结果《修养》却成了包庇叛徒的罪证！

（二）中央关于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

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充份依靠和广泛发动革命群众组织，大打人民战争，积极开展深挖叛徒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通过彻查敌伪档案和群众检举揭发，共发现叛徒线索七千二百七十三名，经过这一段的调查核实，基本可以定为叛徒的一百五十八名，其中有叛徒、特务双重身份的二十六名；现在我省的一百五十六名叛徒线索中，经查实基本可以定性的叛徒有一百一十二名，其中有叛徒、特务双重身份的二十名。在这一百一十二名叛徒中，窃据厅局级以上重要职务的有十八名。

这些叛徒，大多数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捕被俘投敌叛变的，他们在敌人面前，贪生怕死，屈膝投降，向敌人写了“悔过书”、“自首书”、“反共启事”。出卖了组织和同志。有的充当了日伪特务和官员。原东北林业总局副局长、党委委员石惠轩，一九四〇年在冀南地下党工作时被日寇逮捕，为了换取自己活命，不仅向敌人写了“悔过书”，并且向敌人供述了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及所属组织

的情况。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人委视察室厅级视察员孙耕野，一九三五年是北平大学救国组织的负责人，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东北宪兵队逮捕后，变节自首，写了“共党无产阶级专政政策，久认为不合国情，此次见羈，已蒙谅解，嗣后仍本初衷，安心向学，并坚决反共”的“反共启事”，被当时的北平世界日报连载三天。原哈尔滨热电厂厂长陈伯村，不仅是高岗反党集团的余孽，还是一个隐藏多年的叛徒。他早在一九三七年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期间，就参加了陶铸叛徒集团，与陶铸等人合写了投降国民党的反革命“呈文”。原东北林学院副院长贾其敏，一九四三年任我晋察冀边区定唐县委书记兼支队长，在一次被敌包围中，率警卫员、区干部等四人交枪投降，充当日寇特务后，审讯我其他被俘人员，出庭作证，亲自劝降，以及到日寇集中营指认我方人员，使我遭到严重损失。后来又重新打入我内部，贾向敌人递交我军事情报。原牡丹江地委统战部长王润丰，一九三八年、一九四二年两次被日寇逮捕，叛变投敌后王与大汉奸、大特务李兴波接受了负责调查集中营内发生的一次四百人计划越狱事件，交出了组织者徐凤歧、高凤海等三人。在王的证明下，将这三个人砍头示众。之后，王润丰从集中营里变节分子中为日寇选了四批特务。据初步发现，由王润丰为敌人挑选的叛徒、特务的线索一百二十五名，有下落的九十名，其中特务三十七名。现在这些人，有的在中央干校、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地下铁道党委，有的混入兰州、河北军事机关，以及其他二十五个省市。

这些叛徒、特务分子，所以能够滑过历次政治运动，长期潜藏下来，并爬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主要是由于：

第一，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包庇。中央公布的六十一名叛徒集团中，就有三名安插在我省。

第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包庇。我省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欧阳钦、李范五，多年来极力推行刘邓黑司令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和建党路线，为了大搞独立王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招降纳叛，把一批叛徒拉入党内，安插在重要领导岗位。如大叛徒、日寇、蒋匪的忠实走狗、苏修的老情报员于天放，就是欧阳钦、李范五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庇下来的。原宁安县委书记田仲樵等五人的叛徒集团，田在一九四一年被捕叛变投敌，充当了日寇特务，光复后多次被李范五庇护过关，并拉入党内。

第三，叛徒之间互相包庇。一些叛徒，为了长期隐瞒叛变自首的罪行，订立攻守同盟，互相贴金，互相作证，达到互相包庇的目的。如叛徒、日本特务分子张发，一九四一年被捕投敌，带领日寇逮捕了我晋察冀边区派来的地工孔力，并按敌人旨意，亲自向孔力劝降，孔投降后也当上了日寇的忠实特务。多年来张、孔一直是互相包庇，互相作证，长期隐瞒重大罪恶，滑过了历次政治运动。

第四，假造历史，欺骗组织。有些叛徒、特务分子，为欺骗组织蒙蔽群众，就假造历史，为自己树碑立传。如于天放在日寇投降前夕，以假越狱为掩护潜伏下来。解放后又精心炮制了一本《牢门脱险记》，出版九十万册，发行东北各地，蒙蔽了许多群众，钻到党内、军内，窃据了重要职务。

第五、宣扬叛徒哲学，寻求合法掩护。有些叛徒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叛徒哲学当作保护伞，他们宣扬什么“……声明是组织同意的”，“别人起个草，我只签个名”，“口降心不降”，“我是假投降，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继续革命”，甚至有的公然自称是“战略战术”等等，为他们的活命哲学服务，千方百计地为其叛徒罪恶狡辩。

几个月来的深挖叛徒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是：一是深挖叛徒工作开展得还不够平衡，有的地方由于领导不力，广泛发动群众不够，进展比较迟缓。二是有的地方仅限于几个专案，忽略了面上的工作，踏踏实实地做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差。三是从敌伪档案中发现的叛徒，抓紧人头对号、下落落实不够。

为了在全省范围内更深入地开展深挖叛徒的工作，彻底清除埋藏在内部的定时炸弹，消除隐患，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迎接“九大”的胜利召开。

第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组织彻查人员和广大革命干部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彻底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一步提高对深挖叛徒工作的重大意义的认识，激发阶级觉悟，自觉地承担和胜利地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以便纯洁党的组织，迎接“九大”的胜利召开，巩固革命的三结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第二，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使广大群众踊跃投入深挖叛徒工作中来。深挖工作的重点：一是党内，二是县以上干部，三是

历史上被捕被俘过的。发现的叛徒线索，要迅速建立专案，认真调查，作出结论。对已查实的叛徒要清除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

第三，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加强调查研究。未结论定案之前要注意保密，防止逼供信。对已经定性的叛徒，主要依靠群众，实行专政，不轻易捕人。对极少数罪恶严重，有行凶、自杀、逃跑危险，群众要求捕办的，交公安部门履行手续，依法处理。

第四，加强领导。鉴于我省深挖叛徒、特务的任务相当繁重，为了全面深入的开展深挖工作，省革委拟成立深挖领导小组，以便加强对全省深挖工作的领导。原省直各单位，凡没有设深挖班子的，都要成立起来，在省革委深挖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深挖工作。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

1968.02.05；中发〔68〕25号

刘、邓、陶及其同夥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他们推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使叛徒、特务得以混进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机关，长期窃据要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这些叛徒、特务揭露了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很好。现将这一报告转发给你们，以引起你们进一步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做好这一工作。

黑龙江省深挖叛徒工作所以取得很大的成绩，最重要的是由于：（1）领导重视，军队负责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这项工作。（2）贯彻群众路线，采取以军队为中心，调集了一批干部，结合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不是一派）和革命干部，共同一道，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联合进行这项工作。（3）认真清查敌伪档案，加强调查研究，注意贯彻党的政策。既彻底清查，狠挖深挖，

又实事求是，注意查证核实工作。

希望你们参照黑龙江的做法，加强敌情观念，采取调集一批军队中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各派革命群众组织联合的代表和革命干部三结合的办法，定出规划，抓住重点，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以根除隐患，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请将你们目前进行这项工作的情况及今后部署电告中央。

（三）中央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

1967. 10. 08；中发 [67] 312 号

为了保障现存的敌伪档案不再遗失、毁坏、散乱，现决定对全国各地，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南京、重庆、成都、西安、沈阳、长春、大连、太原、济南、青岛、唐山、保定、苏州、乌鲁木齐等重点地区的敌伪档案，实行集中管理，统一领导，统一使用，以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办法如下：

一、上述重点地区的敌伪档案（包括中央档案馆系统的、法院和公安部门管理的），由北京卫戍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江苏军管会，天津警备区，成都、沈阳、河北、广州、武汉及其他有关军区，立即派军队查封、看护，确保安全。其他各地的敌伪档案，由各地有关军区负责查封，看护。

二、在当地军区、卫戍区、军管会、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从军队选调一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政治上绝对可靠的、有一定研究分析能力的干部为骨干，吸收一些经过严格审查的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参加（有外文档案的地方，还要选调一些懂外文的师生参加）组成专门班子，进行清查整理工作。

原有的档案工作人员，经过审查，其中可靠的，可留下参加清理工作。

三、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领导下，设立清查敌伪档案的专门小组，负责指导敌伪档案的清查工作。上述重点地区也应立即成立敌伪档案清查小组，各军区、卫戍区、军管会、革命委员会，要有一个负责同志亲自领导。

四、清查工作，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当前的任务：（1）重点清查敌伪党、政、军、警、宪、特、法院、监狱的政治档案（包括案卷材料、文书档案和汇编的资料）；（2）汇编资料，呈送领导参考；（3）接待和帮助有关单位查阅档案。

五、发现有烧毁和用其他方法破坏敌伪档案者，按现行反革命分子拘留审讯，依法惩办。

另外，各省市学校图书馆存的敌伪时期的报刊，应妥善保管，不得遗失，不得损坏，不得剪掉。这些报刊只能在图书馆里看，不能借出。

此件应向各革命群众组织传达。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清查敌伪档案工作的指示

1968.02.06；中发〔68〕27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

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下达后，不少地区都着手进行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东北地区有的省市最近在清查敌伪档案中，挖出了一批叛徒自首分子和特务分子。他们在工作中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解放军为核心，依靠群众，注意调查研究，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而获得了较显著的成效。但从全国来看，有些地区还抓得不紧，或者措施没有落实，应引起注意。

为了使清查敌伪档案工作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中央希望各地，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南京、苏州、重庆、西安、太原、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济南、青岛、保定、张家口、乌鲁木齐等重点地区，仿照东北的作法，继续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按照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指示精神，抓紧落实清查的措施。组织好班子，从大军区、省军区以及野战军中选派得力干部作为核心，吸收当地经过锻炼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参加，组成若干小组（每组五至七人）切实做好敌伪档案清查工作。

各地对已查出的投敌、叛变自首分子和特务、情报人员，要进行分类排队（包

括党、政、军和群众团体)。已查出的问题，凡属中央管理的干部，上报中央处理。属于本地区管理的干部，由本地区负责处理，并报中央审查，清理敌伪档案小组备案。属于外地区的干部，上报中央审查，清理敌伪档案小组转各省、市、自治区调查处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

2，中共中央文件中有关瞿秋白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月七日，中央第十二号文件中说：瞿秋白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了”。

3，瞿秋白：《多余的话》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

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麼“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

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〇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末及一九二七年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麼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〇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辘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病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〇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瞆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

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

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头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直到胡适

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么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〇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

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麼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〇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

为什麼简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麼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麼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武汉分裂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

基础。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有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

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〇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压抑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路线错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均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时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

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是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的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消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担负了一部分的工作，虽然不用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议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吧。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奋斗，为站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些，说“奋斗”是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都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一九三五·五·二十）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文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

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地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清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队伍里就

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在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为什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总会有的。即时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他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象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然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累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

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象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候，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者清理一本帐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知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地，我学着比较精细地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

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书是乱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兴趣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

讲到我只有的几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了。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告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清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

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〇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弱，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

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的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

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三）

4，陆定一访谈

陆定一谈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

陈清泉

大约在 1990 年前后，陆定一著文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有其事。之前，大家都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几乎已成定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了陆老，他说：“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20 世纪 60 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我，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你看买不买？我说，这份所谓瞿秋白遗书，我看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了。不久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但是瞿秋白为什么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遗书呢？陆定一接着说：“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情绪低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

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可惜我已经不能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了。”

陆定一这个论断是有说服力的。因为陆定一与瞿秋白关系非常密切，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在党中央做宣传工作，陆定一在团中央做宣传工作，他们俩经常见面。有一次，瞿秋白对陆定一说：“同志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党内有斗争。”这话对涉世未深的陆定一震动很大。他想：“我们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生死都置之度外，党内还有什么斗争？”后来参加党的“五大”，陆定一终于了解党内斗争的事实，他对瞿秋白很信服，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

1928 年的“六大”闭幕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陆定一也被团的“五大”选为驻少共国际代表，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他们两人同住在刘克思旅馆，朝夕相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信任王明一伙，与中共代表团矛盾尖锐。尽管瞿秋白对共产国际几乎是言听计从，还是经常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他，最后代表团被排挤回国。1931 年 1 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来上海，扶植王明一伙上台，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不久陆定一也被撤销共青团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长的职务。陆定一说：“从那时起就知道，我们同王明之间有分歧，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客观事实迫得你不能不承认。”

瞿秋白为什么没有同王明路线进行斗争呢？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扶植起来的，投鼠忌器，反对王明路线，很容易会被看成是反对共产国际。这在当时也不会被党内多数同志所赞同。所以陆定一说：“反对王明路线比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的米夫作为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党对共产国际有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党还没有这种理论水平，不能分别马列主义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蒙。三，他们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分歧。”所以王明路线能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

这些情况瞿秋白在中央苏区都亲所目睹，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央苏区呆不下去，被迫进行长征，这不能不使瞿秋白感到万分痛心，在遗书中，他不能谴责王明等人，因为这毕竟是党内的事情，不能向敌人暴露，只能用委婉、低沉的词句，表示出他当了党的领袖而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的内疚。

5，一九八〇年中央纪委的复查报告

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央责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瞿秋白同志被捕的问题进行复查。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

中央书记处：

瞿秋白同志，江苏省常州市人，生于一八九九年。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〇年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以新闻记者身份访问苏联，是最早向我国人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曾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回国。在党的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瞿秋白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央“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提出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主张。“八七”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主持中央工作，曾经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一九三五年二月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被枪杀，时年三十六岁。

一九四五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对瞿秋白同志作过历史评价，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操纵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掀起“讨瞿”活动，把瞿秋白同志说成“叛徒”；还编印了所谓“罪证”材料，以《多余的话》为依据，给瞿秋白同志强加上“贪生怕死”、“投降了敌人”、

“叛变了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等罪名。一九七二年十月七日印发到全党各支部的第十二号中央文件中，也说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央责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瞿秋白同志被捕的问题进行复查。现将复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被捕经过

一九三五年初，瞿秋白同志经党中央批准，由江西苏区经福建省去上海治病。二月二十四日晨，在福建省上杭县濯田区被敌围攻，瞿秋白同志和张亮、周月林同时被捕，于二月二十六日押送上杭县监狱关押。被捕初期，瞿秋白同志化名林琪祥，乔装医生，虽经敌人刑讯逼供，并未暴露身份。

同年四月十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成同志的妻子被国民党第八师俘虏，供出瞿秋白同志在濯田被捕。四月下旬，瞿秋白同志被解送长汀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张亮、周月林则被解送龙岩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在解送途中张亮、周月林供出林琪祥就是瞿秋白。随后，在叛徒郑大鹏出面指认的情况下，瞿秋白同志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二、受审情况

瞿秋白同志身份未暴露前，在上杭县监狱以林琪祥的化名，三月九日写过一份《自供》，四月十五日又写过一份要求保释的《呈文》，《自供》和《呈文》中写了几句贬斥共产党的话。但这种自供与呈文，是以非党员医生的面目假造经历，以求脱身，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策略行动。“文化大革命”中的“讨瞿”文章，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具体情节，断章取义，把上述《自供》和《呈文》说成是共产党员自首变节的行为，是不符合事实的。

瞿秋白同志解送长汀并被叛徒指认后，在五月九日敌人追问中央红军去向时，回答说：“在二月初有过一次会议，决定了三条路线”，“项英、陈毅、梁柏台、何自立等就是在决定的几条路线去活动了。至于何人担任何路线，我却不明白了”。“讨瞿”文章据此认定，瞿秋白同志“出卖我党我军重要机密”。现在经详细调查，这不是事实。据军事科学院汇编的历史资料中项英、陈毅等同志生前写的材料，以及当时负责向湘赣边突围的独立三团政委张凯同志（现任民政部党组成员）写的材料，上述瞿秋白同志所说兵分三路的事以及三路的方向，并非事实。这就证明，这个口供是编造的。至于口供中提到的项英、陈毅等同志的

名字，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因此，不存在出卖机密的问题。

“讨瞿”文章还说，瞿秋白同志被捕后“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经详细调查，这也不是事实。据温仰春同志（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任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现在上海市委工作）证明：“福建党组织对秋白同志不幸被俘，非常关怀，从各方面设法打听他的安危问题，从未听到他对党有什么不忠实、不利的反映。按原来的计划，秋白同志要经福建、广东、香港、上海这条秘密交通线，出去继续为党工作。这条秘密交通线，没有因为秋白同志被捕而受到破坏，一直保持到一九三七年底，安全无损。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负责证明。”

五月十三日，瞿秋白同志又写过一份《自供》。这份笔供中说，中央苏区“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种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经济建设方面“也有可惊的成绩”。“至于民众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方面，只看一九三四年五月扩大红军，九月又扩大，计划都完成了，六月和八月收集粮食也完成了”。笔供中还说，苏区人民生活安定充足，只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加紧军事“围剿”和破坏，才使苏区人民生活一天天苦起来。由于瞿秋白同志在这份笔供中宣传中央苏区的成绩，否定了敌人的诬蔑，一九三七年七月，国民党御用文人赵庸夫在《关于瞿秋白之种种》一文中，评论这篇《自供》说“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以上引文，载于一九三七年七月《逸经》杂志第三十四期）

关于瞿秋白同志在狱中的表现，据宋希濂（关押和审问瞿秋白同志的原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现为全国政协常委）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和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两次回忆材料：一九三五年瞿秋白同志被关押“在三十六师时，我根据孙中山‘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不适合于阶级斗争’之说，与瞿先生辩论，瞿先生批评三民主义学说，他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是不彻底的。”又据原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同志（即陈农菲，已故）一九六二年回忆材料：瞿秋白同志对看守他的下级军官公开宣传：“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清道夫，蒋委员长是清道夫的头子。”

一九三五年在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任狱医的陈炎冰同志（大革命时期为共产党员，后脱党，解放后重新入党，现退休在广州）证明，瞿秋白同志在狱中对他说：“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同志的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进而解放全中国，这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此外，瞿秋白同志在狱中，写过一份《中国苏维埃组织概要》和一份《未成稿目录》（是拟写自传性作品的题目），内容均未涉及党的机密。

三、拒绝劝降

由于瞿秋白同志是有名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五年六月，特务头子陈立夫派遣中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叛徒陈建中前往长汀对他进行劝降，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也参与其事（注：王、朱二人均在全国解放后被我逮捕，陈于解放前逃往台湾）。这次劝降，遭到瞿秋白同志的严词拒绝。据公安部门的档案记载，王杰夫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七日交代，陈立夫向他说：“你如能说降瞿秋白叛变自首，这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并布置他通过瞿秋白同志查明我党在上海、香港的组织关系和在江西的潜伏计划。

王杰夫等人到长汀后，多次同瞿秋白同志谈话。王问红军北上的目的，瞿秋白同志答：“红军北上的真正目的是抗日”；“我肯定我是相信红军一定能够渡过长江天险，北上抗日目的一定可以达到”。王又问：“假设瞿先生不幸牺牲了，你是否希望中共中央为你举行盛大的追悼会呢？”瞿答：“我死则死耳，你何必谈什么中共中央开不开追悼会呢？”王还交代，在一次谈话中，陈建中问瞿秋白同志去香港、上海打算住在什么地方？还有什么关系？瞿“对陈怒形于色，没有回答什么”。

另一次谈话，王杰夫问：中共中央过去发动过几次大暴动，你瞿先生要不要负责？瞿答：“这些大暴动，都是中共中央发动的，也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发动这些革命运动的责任，在中共中央方面，我应当负责任的。”王又问中共中央和红军西上后，江西等地的善后潜伏计划，瞿秋白同志拒不回答。

又据朱培璜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亲笔供词，王杰夫在劝降中曾经企图用亲友之情打动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明白表示：“事实上没有附有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

会给他们长期带来耻辱和痛苦。”王杰夫劝瞿秋白同志“识时务为俊杰”，要他效法叛徒顾建中（注：据朱供，此人曾任中共政治局保卫局长，应是顾顺章）等人。瞿秋白同志“厉声说：……‘我不是顾建中，……我是瞿秋白。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朱培璜在供词的最后说：这次劝降，“由于瞿秋白先生忠贞不屈，严词拒绝，致无结果而返。”

王杰夫、朱培璜是被我政府关押的历史特务，他们的供词当然不是原始的证明材料；但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正常情况下的供述，把它同瞿秋白同志后来终于被国民党杀害联系起来看，仍然可以作为一种佐证。

四、从容就义

在瞿秋白同志抵制了敌人的劝降阴谋后，国民党第三十六师遂执行蒋介石“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的电令，将他杀害。

据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大公报》、七月七日《福建民报》的报道，以及当时的知情人证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晨，国民党第三十六师特务连长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同志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并在去刑场途中，唱《国际歌》、《红军歌》，呼喊“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他盘膝坐在草坪上，点头微笑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五、关于《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这本小册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有些人说成是瞿秋白同志“叛变”的主要根据。

《多余的话》一向传说是瞿秋白同志在狱中写的自述，最先刊登在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上。一九五四年以来，经反复查找，迄今国内外从未发现《多余的话》手稿，它是否为瞿秋白同志所写和是否经过敌人篡改，历来有人怀疑。目前流传的这个《多余的话》，即使是真的，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多余的话》里，虽然也有些消沉的语言，但是，客观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决不能认为是叛变投降的自首书。

由此可见，把《多余的话》作为瞿秋白同志叛变投敌的根据，是不能成立的。

以上复查的结果确凿表明：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

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瞿秋白同志所作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为瞿秋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五日

（来源：原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编《纪律检查工作文件选编（1978.12-1980）》，北京：1981年）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的通知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已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鉴于瞿秋白同志被捕自首的说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甚广，现将这个复查报告转发给你们，请采取适当方式告诉党员和群众，以恢复瞿秋白同志的名誉。

（此件发至县、团级）

（二）关于把陶铸定为叛徒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毛泽东接见叶剑英的谈话

毛泽东说：陶铸同志很难保住啊。据一些材料证明，他历史上有叛变投敌行为。我们党有过这样的规定，遇到处理叛徒和现行破坏问题时，我们的党都有权力采取紧急措施。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若干决定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也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

予平反。陶铸同志已于 1969 年 11 月 30 日病逝，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三)关于定彭真为叛徒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康生谈抓叛徒的问题

彭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去年成立彭真专案小组的时候，就怀疑过他是叛徒。但我们没有宣布，没有贴大字报。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我们今天可以向同志们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一个特务。今天我们可以向同志们讲，因为我们经过了调查研究。就联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作出结论，定彭真为叛徒、反党分子，报到中央，中央没有审批。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

经中央组织部复查，彭真同志一九二九年六月在顺直省委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彭真同志被捕后政治上坚定的，不存在叛变问题。他在敌人监狱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几次参与领导绝食斗争，直至一九三五年坐满刑期后获释。

(四)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

1，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批示一些干部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将回复中共西北局的电报送毛泽东批发时附的信

送上西北局来电和刘澜涛来信……因这一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现拟电如另纸。如妥，请批发。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给西北局的电报

西北局：

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中 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并吉林省委的电报

东北局并吉林省委：

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中 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周恩来）给吉林师大红卫兵组织的一封电报

来电均悉。关于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电复东北局并吉林省委，请他们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如果你们还发现新的材料和线索可以继续查清，并将新的材料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希望你们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2，红卫兵的调查揭发材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戚本禹同总政文工团部分同志谈话

“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

奇。”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关锋对军训解放军代表的讲话

“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

张闻天交待材料——关于 1936 年“自首案”真相（摘录）

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

我现在交待以下三个问题：

1、立场问题……

2、事实真相：……刘少奇初去北方局（1936 年春）不久，就给我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此外他还附带着寄来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3、责任问题：根据以上的立场和具体情况，即可看出，关于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这方面，也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玷污了我们共产党人永不变节，忠贞不屈的光荣传统，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

张闻天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某日，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如何揪出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

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我南开大学八一八战士，遵照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发扬了敢想、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精神，南征北战，东杀西闯，历时九个月，先后出动八千人次，行程约计一百二十万公里，转战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几个大区，战斗在天津、北京、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太原、济南、青岛、吉林、沈阳、长春、大连、西安、兰州、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南京、镇江、苏州、上海、杭州、南昌、武汉、长沙、广州、海口、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等几十个大中城市，从大巴山下到东海之滨，从海南岛到黑龙江边，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踏遍六亿神州，走访全国各地，历尽千辛万苦，战胜重重阻力，猛冲猛打，上追下揪，打了一场大规模的人民战争，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打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迎头痛击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坏“三结合”的反动逆流，终于揪出了隐藏在党内达三十年之久的刘少奇大叛徒集团！革命小将把刘记叛徒集团打得落花流水，把刘家王朝杀得人仰马翻，剥开它的画皮，撕掉它的伪装，我们向全世界严正宣判“刘克思”的死刑！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这是一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一曲响彻云霄的毛泽东思想的凯歌！

二、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远在去年八、九月间，我们就掌握了一些前南开大学党委书记、现河北省政协副主席高仰云的问题线索，还听说他和叛徒有联系。为了彻底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盖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我们闯入社会，开始了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

同学们在临行之前，聚集在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对高仰云问题进行细致分析研究。大家提出三条重要的黑线：①杨献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

高仰云与杨献珍交往很深，还听说杨在狱中喂过高仰云饭；②薄一波插手工交口的文化大革命，拼命镇压革命派，包庇叛徒和右派，而高仰云与薄一波是朋友，文化大革命中仍有来往；③安子文是黑帮，而高仰云与安子文关系密切，经常是“安部长”长，“安部长”短地吹捧安子文。面对这些线索，耳边响起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说：“世界上只有猫和猫作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作朋友的事。”“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毛主席的教导大大提高了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我们满怀着彻底革命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来到西安和北京。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核心，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北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是革命的红卫兵诞生的故乡。在这里干革命，我们感到浑身是劲，一身是胆。革命的小将一连走访了组织部、劳动部、高教部、化工学院、高级党校等机关，虽然获得了一些线索，但阻力很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给我们制造了种种障碍。要审安子文不成，要审薄一波，又听说薄一波逃往广州“休养”去了，于是便直逼哲学研究所，向杨献珍杀将过去。

第一回合，杨贼装作一付可怜巴巴又糊里糊涂的样子，未审先封口说：“我年岁大了，什么事都记不清了。”

这时我们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毛主席的教导使我们早已识破杨贼的本质，大声斥骂：“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你们的逻辑！”强大的政治压力，使老贼心惊肉跳，倒在凳子上，嘴一歪一邪地说：“你们问什么，我知道的都老实交待！”我们问杨贼和高仰云有什么联系，什么时候认识的。杨贼一口咬定没什么联系，只是一般认识。

我们想以小饵钓大鱼，于是沉着地、胸有成竹地说：“既然你不想交待，那也好，限你五分钟考虑时间，五分钟后我们再来！”说完，甩袖而去。这一下可把杨贼打入闷葫芦里了。

再度和杨贼交锋，杨贼被迫交待了他和高仰云一起坐过狱。我们知道只能从杨贼的交待中找矛盾，故意让他说下去。杨贼见我们年少无知，便洋洋得意、信口开河地讲起他在狱中斗争的所谓“光荣史”。什么“立场如何坚定”，“不怕

牺牲”呀，什么“我们都是好党员”呀，什么“上级都知道”呀，如此等等，大谈不已。谈完后，得意忘形，封口瞑目。

杨贼的欺人之谈激怒了红卫兵小将。大家义愤填膺，大声怒斥：“你是如何出狱的？如果不老实交待，小心你的狗脑袋！”

老贼自知马脚已露，企图把乌龟头缩回去，起身想溜。我们把他抓住，声色俱厉地斥道：“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

老贼见大势不好，连忙说：“我有罪，我有罪！”这样就交待了他和高仰云都是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罪行，并交待了与他一起写“反共启事”的有安子文、薄一波、廖鲁言等九人。接着他又百般辩护，胡说什么“上级有指示”，“组织决定”，“有了结论”，“这是假自首”。时过半天，我们听不得老贼的辩解，又离开了哲学研究所，回到住处我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语录》：“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多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复辟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毛主席的教导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鼓舞了我们的斗争勇气。叛徒就是叛徒，就是反革命！这个叛徒集团就是“地下独立王国”，就是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黑司令部，于是我们立即向党中央、中央文革写了请示报告。

在七审杨献珍的同时，我们再审廖鲁言、怒斥徐冰、大闹孔祥祯、激战朱则民，经过多方查证，证明刘少奇就是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就是“地下独立王国”的“国王”。

当时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刘少奇还欺骗毛主席和广大革命群众，仍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天安门上，但是想起毛主席关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伟大教导，就天不怕地不怕，认定“造反有理”！不打倒刘少奇叛徒集团，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能彻底粉碎，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进行到底！中国就会亡党亡国，复辟资本主义，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就会倒退。因此，与叛徒

搏斗这是世界上头等大事的大事。我们决心与刘少奇大叛徒集团血战到底！决心下定，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再次点出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并且说明：“这是个庞大的叛徒集团，他们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涉及面很广，根子很硬，危害甚大，建议党中央立刻成立专案组，我们要协助党中央把这个叛徒集团铲除净尽！”同时制定了作战方案，先扫除在祖国心脏、在毛主席身边的大小叛徒，然后踏遍全中国，彻底砸烂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十一月九日我们写了“看高仰云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叛徒嘴脸”的大字报，点了彭、薄、安、廖、杨的名。随后又发了《告全国人民书》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奋起砸烂刘少奇大叛徒集团！

正在这时，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接见我们全国红卫兵小将。我们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给了我们最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我们誓以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撒下“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方向明、决心大。根据毛主席抓主要矛盾的教导，分析孔祥祯是这个叛徒集团的关键人物，是个知情人。他是从狱中出来的，刘少奇的黑指示是他传给薄一波的，因此，我们抓住他，准备大干一场。

同学们联合第一轻工业部的革命造反派，以大军压境之势，揪住孔祥祯不放，在孔祥祯部长办公室安了录音机让他交待传达刘少奇黑指示和叛徒出狱情况。孔祥祯狡猾抵赖，并谈这是“组织秘密不能说以及党中央没指示不能讲”的老调，革命者怒不可遏，大声质问：“哪个组织的秘密？”“你说的党中央是哪个党中央？刘少奇的黑司令部我们坚决砸烂！”

一急之下，我们踢了孔祥祯的“部长办公室”，成立了抓叛徒指挥部和联络站。革命小将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吓得孔祥祯心惊肉跳，失魂落魄！

在战斗中我们与首都三司等革命造反派的战友紧密结合在一起，持续了九个月奋斗，智擒周仲英，夜袭马辉之，大战章汉夫，活捉张闻天，在北京打了一个歼灭战，揪出了大小叛徒一百余人。

三、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间，正是两条路线斗争最尖锐最激烈的时候。

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甘心灭亡，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迎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风恶浪，我们一面在北京继续与刘记叛徒搏斗，一面分兵祖

国四面八方，南下、北上、西杀、东闯，向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九个重要据点，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冲杀而去。

“梅花欢喜漫天雪”。我们不怕艰难险阻，不怕冰天雪地，不怕围攻毒打，不怕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成“反革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坚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只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只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冲到东北的同学们，与早到东北的先遣部队会师后，打出了吉林省代理书记赵林是个大叛徒的大字报，顿时轰动了吉林省，此刻，东北监察组长王鹤峰闻知大叛徒高仰云已被揪出，赵林已成瓮中之鳖，吓得魂不附体，竟装到大连去休养，妄想滑过去。我们乘胜追击，长途跋涉，直奔大连。

在大连，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我们单刀直入，大喝一声：“你是汪德光！”这当头一棒，吓得老贼失颜变色，汗流浹背（按：汪德光是王鹤峰在狱中用过的名字。）但是他很快就以反革命的经验，故作镇静，抵赖不答。革命的小将想起毛主席的教导，采取了“以退为攻”“欲擒先纵”的策略，让这个反动家伙进一步表演。

果然不出所料。叛徒王鹤峰自知马脚已露，老底被揭穿，死期即将临头，便孤注一掷。一月二十九日，他从大连给东北局组织部李治文打急电：“东北局组织部李治文同志：请即从电台用急电（或通过中央组织部李楚离同志）帮助转告北京市委冯基平、陕西省刘文蔚、华东局魏文伯、赵明新、天津南大高仰云、吉林赵林等，如果红卫兵他们问我和殷鉴在监狱中的名字时，务请绝对不要告诉他们。”

电报发出，老贼仍觉不妥，便赤膊上阵，亲自回到东北局，当夜叫他老婆何定找出叛徒的合影照片，乘班机直飞北京。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一切，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即刻乘坐火车追将上来。王鹤峰在北京与叛徒们广泛接触再次暗订同盟。“冤家路窄”，在中央组织部，我们再次与王贼交锋。叛徒王鹤峰见大势已去，无法抵赖，被迫交待了罪行。但态度极不老实，又带罪潜逃。

王鹤峰躲藏在东北局一个候补书记家里，躺在小孩床上，蒙头大睡。我们随即赶到，识破狐狸尾巴，当场就擒，送交当地造反派。进行批斗。

大叛徒赵林和王鹤峰被揪出后，大长了东北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同学们跟踪追击，杀奔大庆油田。大庆油田副总指挥王心波这个可耻的大叛徒，看四面楚歌，大势已去，只好举起双手，投降认输，被迫交待出刘少奇和张闻天互相勾结，合营刘记大叛徒集团的滔天罪行！

四、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西北地区是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黑窝子，是刘少奇储备和训练反革命势力的大本营。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伙狐群狗党为了保住黑窝子，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千方百计镇压群众运动。青海的“六·三事件”，西安的“六·六事件”，兰州的“六·七事件”，流血惨案相继发生。

我们远在去年七、八月间，就有许多师生到西北调查，大家早就对刘澜涛恨之入骨了。同志们想到，在刘澜涛这个大叛徒的迫害下，不知有多少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不知有多少干部被打成了黑帮，不知有多少红卫兵小将被残害而牺牲！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信念促使我们冲向西北地区。

十一月中旬，我们再次向西北进军！临行之前，我们朗读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下定决心，要打一场西北大会战。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我们到大西北地区，这一革命行动却受到了百般刁难和无理迫害。我们行则有哨，动则得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指使其爪牙打手，不给饭吃，不给房住。但是同学们牢记主席的教导，“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心中有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就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坚信胜利就在前头！

经过重重周折，战胜重重困难，一百六十多人的队伍终于来到了西北局。大叛徒刘澜涛多次指使爪牙对我们施加压力，我们三十名小将决不示弱，静坐示威一天一夜，等了二十多天，终于揪住了刘澜涛，审问了他的叛徒历史问题，刘澜涛装模作样地说：“我的历史中央都知道，要不中央不会让我作西北局第一书记。”至于别的，他一概不说。

叛徒刘澜涛虽然老奸巨滑，但是一句话泄露了天机。他指的“中央”，就是

刘少奇的黑司令部，刘澜涛就是刘少奇的得力干将，就是西北一霸。

我们贴出“打倒大叛徒刘澜涛”的大标语之后，西北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抄了刘澜涛的黑狗窝，查出大批反党罪行，我们在下面仅揭示他的一封黑信。在西北地区，我们揪出了陕西省委书记大叛徒冯基平，西北局文教书记大叛徒胡锡奎，陕西省工会主席刘文蔚，特务高敏夫等一大批坏蛋，并把大叛徒高仰云的党羽打得落花流水！

在西北地区，我们浴血战斗九个月。四月二十日，在西北局批斗大叛徒刘澜涛的万人大会上，愤怒声讨了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滔天罪行！宣判了刘澜涛的死刑！（下附黑信一封）

澜涛：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了，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就是仍以怕字当头，现在就要以敢字代替怕字，才不会落为霸王的下场。

至于方法问题是有的，你也完全会运用，×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以我看首先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工农兵真的实际行动支持学生，这样一个省，西北地区形成高潮后，即可将责任往上一推，打击高岗的消息，西北、东北、华北就马上响应，如反掌，天下可得矣！千万要记取高、彭、习的教训，悔之晚矣！

五、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一月革命》风暴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高潮中，无产阶级的大叛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起“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颠倒黑白，转移目标，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巧装打扮，削尖了脑袋，力图钻进“三结合”，向无产阶级夺权，在这革命的关键时刻，对毛主席无限忠心的革命小将，岂能允许这伙无耻的叛徒鱼目混珠，再把持革命领导权！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磨拳擦掌，斗志昂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次分赴祖国各地，新的战斗又开始了。

我们冲杀于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北、四川、安徽等地，和“北航红旗”、“北农大东方红”、“西安交大文革”、“地质东方红”等革命战友，结合当地革命造反派，在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打了一

个又一个的漂亮仗。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叛徒魏文伯、曹荻秋大搞经济主义，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反扑。我们到达上海之后，与当地革命造反派一起，剥开魏文伯“取保就医”的画皮，揭发了他勾结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一起叛党自首的叛徒嘴脸，揭发了无产阶级大叛徒曹荻秋的罪恶历史，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叛徒管文蔚（江苏省副省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伪装革命派，混入革命队伍，并准备篡夺江苏省委的大权。为了拔掉这个“钉子”，我们审问了大叛徒蔡暹、匡亚明、潘遂初，掌握了大量材料，然后出奇制胜，一击则中，揪出了这个阴险狡猾的大叛徒，打碎了他企图篡权的美梦。

叛徒方立凡是江苏省化学公司政治部主任，这个九级“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蒙骗了广大工人同志，包庇右派，打击真正的左派，妄图夺权。我们急革命派之急，恨革命派之恨，与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密切联合，浴血奋斗，揭发了他的反动历史，把他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革命造反派同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关心国家大事，坚决把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彻底铲除干净！哪里有叛徒，我们就打向哪里，就胜利在哪里！我们不仅揭发了企图篡夺领导权的大小叛徒，而且把上欺中央，下瞒群众，已经钻入夺权委员会的叛徒拉下了马。山东省常委、副省长李××，山西总工会主席何××就是其中的两个。

在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时候，我们常常缅怀死难的烈士！每到一地我们都要到烈士陵园扫墓、致哀，悼念革命先烈，激发革命热情，聆听革命气节教育。清明节我们在雨花台给先烈敬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敬悼！死难烈士万岁！”在烈士碑前我们宣誓：不杀刘邓不瞑目！“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现在，革命小将正以“不杀刘邓不瞑目！”的决心继续战斗在祖国各地，西南战役已取得初步胜利，中原战役开始打响；有的同志奋战在国防前线，有的同志回师搞万张反党集团！……

六、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中，我们顶住了种种反革命黑风，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从 66 年九月起到 67 年初，我们向中央、中央文革汇报的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上报材料，大部分都卡在大叛徒陶铸、杨放之手里，卡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荣鑫、童小鹏手里。他们上骗中央，下欺群众，包庇叛徒，千方百计地阻拦我们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

在这段艰苦的斗争过程里，在西北、东北、华北等地区，我们遭遇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种种迫害。在北京、上海、天津我们多次遭到“联动”分子的打、砸、抢！

在这艰苦的斗争过程中，我们也听到种种为叛徒辩护的论调。同学们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为指导材料，痛斥了那些荒谬的叛徒哲学。

政治迫害，封锁打击，舆论压力，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决心和意志。为了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任凭有天大的风险，坚定不移向前进！

一月中旬，我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

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

当叛徒们阴谋陷害柯庆施同志的时候，中央文革指示我们：“柯庆施同志是好同志，华北一批人叛变自首的问题，柯庆施同志没有责任。”

当大叛徒马辉之勾结“联动”分子迫害革命小将的时候，中央文革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南开大学八·一八同学是革命行动，我们完全支持他们，‘联动’的问题，责任在你，一切后果均由你负责。”

当抓叛徒在北京遇到很大阻力的时候，谢副总理指示：35 年到 36 年叛变自

首的没有一个人好人，你们认为有必要抄家就抄家，你们认为有必要提审就提审；我们支持你们。要和当地造反派结合好。”

当在南京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康生同志指示：“南京的问题，我给你们解决了。……”

在战斗中，我们还得到解放军及革命干部刘格平、王效禹等同志的大力支持。

每当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禁不住千百次的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每当听到中央首长对我们的鼓励，我们就学习“老三篇”，总结一次经验，检查一次缺点。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揪出了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归功于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归功于中央的关怀，归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大力支持，归功于全国革命造反派战友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只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七、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在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的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发表，吹响了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总攻击的冲锋号，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掀起了彻底埋葬中国赫鲁晓夫革命斗争的新高潮！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在党内埋藏的时间之久，人数之多，地区之广，根子之深，都是空前的，他们绝不甘心灭亡。“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在大批判中联合起来，穷追猛打。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铲除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中国。红遍全世界！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肯定薄一波等人出狱属于自首叛变性质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周恩来在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夺权委员会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安子文是黑帮分子，是一位学生调查出来的。南开大学发现了二十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变，是经刘少奇批准，集体自首。入城之后，组织部长是安子文，就不把这一部分材料拿出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

1967.03.16；中发〔67〕96号

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张闻天的材料中说到在狱中的人提出过“三个条件”，同案的许多人都否认这件事，看来是靠不住的，不可信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张良云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他们不但自己叛变，还诱使和迫使别人同他们一道叛变。

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

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最近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现将张闻天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及附件，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负责同志。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叛徒集团的揭露，应当引起我们全党极大的警惕。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怒涛，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一个又一个地拉下了马。轰然一声，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出了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多至几十个人的大叛徒集团。这帮可耻的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岗位。把这一小撮家伙揪出来，消除了党内的一大隐患，一大祸害，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大庆祝的好事。这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丰功伟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是谁？现已查明，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一方面大肆宣扬叛徒哲学，一方面策划和决定一些人自首变节。一九三六年，他利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机会，通过当时窃据中央领导职务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向狱中传达他的“指示”，允许写自首书出狱，允许写《反共启事》登报。这个叛卖革命的“指示”下达后，遭到狱中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坚决抵制，他们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但是，那一伙叛徒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中国赫鲁晓夫的“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于是，这一伙无耻的叛徒，在中

国赫鲁晓夫的庇护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这一段时间内，陆续发表了反动透顶的《反共启事》，拜倒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敌人面前，表示“诚心悔悟”，并履行了签名、打手印及参加“自新仪式”、领取“自新证书”等叛卖革命的“手续”，从反动派“恩赐”开放的狗洞里爬了出来。这一小撮无耻之徒，比起在我们党的光荣的历史上成千成万革命先烈来，比起他们在强暴的敌人面前，那种气吞山河、光照日月的革命气概来，显得何等渺小、何等卑鄙可耻啊！我们的革命先烈是耸入云霄的高山，而这一小撮叛徒只不过是一抔黄土。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倾东海之水也洗刷不掉你们的羞耻，历史将判定你们遗臭万年！

中国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指使这一批家伙叛党呢？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就是为了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结成死党，为有朝一日篡党、篡政、篡军服务。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包庇叛徒集团的要害。

中国赫鲁晓夫是多么害怕被人戳到这个要害问题啊！他凭借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预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将烧掉他的一切伪装，什么“老革命”，什么“党的权威”，什么“工人运动模范”，统统都将化为灰烬，赤裸裸地暴露他的假革命、反革命、大叛徒的真面目。他绝望，他挣扎，要来一番最后的登台表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兴起之后，他就去勾结另一个当事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反咬一口，嫁祸于人，把赃栽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身上。真是卑鄙之极！无耻之极！他们忘了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在，忘了有件件在案的铁的事实在，任何人休想一手遮天！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从来就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这个大叛徒集团中的一些人作过严肃的尖锐的斗争。早在一九三六年就被柯庆施同志斥之为“老机会主义者”的中国赫鲁晓夫，如此恶毒地污蔑我们敬爱的柯庆施同志，并无损于柯庆施同志的一丝一毫，恰恰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嘴脸。

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个叛徒集团的大揭露，吓得中国赫鲁晓夫丧魂落魄，于是又来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辩解：

叛徒也不过是“一念之差”。

说得倒轻松！“一念之差”，就可以向敌人屈膝投降？“一念之差”，就可以用千百万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的头颅和鲜血去换取自己的狗命？这是什么哲学？这是洪承畴的哲学！汪精卫的哲学！陈独秀的哲学！赫鲁晓夫的哲学！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汉奸、大叛徒的哲学！

如果是“一念之差”，那么试问：

为什么早在一九三九年，你就在臭名昭著的黑《修养》里公开宣扬：“在反动派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

为什么在一九四三年，你又借什么总结敌后工作经验的机会鼓吹逃跑主义，说什么：“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织逃跑”？

为什么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期间，你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妄图在报告中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也可以做中央委员”的字句？

我们还完全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中国的赫鲁晓夫：你这样起劲地贩卖叛徒哲学，包庇一小撮叛徒，是不是由于同病相怜、物伤其类？你在白区工作期间，是不是也有过什么“一念之差”？

革命，是新生的阶级与垂死的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这场斗争面前，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每时每刻，念念不忘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念念不忘的是为了完成这种革命事业所必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他们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暗无天日的敌牢里，都是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的斧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它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与天地共久长，与日月争光辉。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是一些什么货色呢？他们原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些满脑子个人主义的投机分子。一旦考验来临，就马上现出了原形。这些没有骨气的奴才，为了卑怯地求活，竟不惜丢掉革命者最宝贵的气节，只要三十个银币就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绝不是什么“一念之差”，而是“一生之差”。他们就是从头到脚的反革命，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臭气。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替这批叛徒开脱，又胡说什么这是“假自首”、“骗敌人”。

自首就是自首，自首就没有什么假的。对于一个落在敌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来说，他面临的抉择就是：为革命而牺牲个人，还是为个人而出卖革命。舍此以外，决无第三条道路可走。敌人杀害一个落在手中的革命者，并不能感到满足。敌人所需要的是软化和制服革命者，使他成为投降变节分子的带头羊，用来瓦解和分化革命的力量。一九三六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率领下，高举起抗日的大旗，领导全中国人民积极准备开展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恰恰就在这时，这群卑怯的叛徒却可耻地向敌人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革命事业，玷污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他们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难道还不够严重吗？

一切“假自首”都是真叛变。所谓“骗敌人”，与其说是“骗敌人”，倒不如说是骗党骗人民。倘若不然，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大小爪牙们，为什么事先要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事后又一再隐瞒事实真相，欺骗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解放后要利用你们所窃据的党政大权，强行销毁有关这个叛徒集团的敌伪档案，企图瞒天过海？为什么要利用职权，破坏党的审干工作？为什么要假借中央名义，把这个叛徒集团的名单当作“组织秘密”，“备案了事”？这种种情况，联系到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时所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岂不是很足以发人深醒的吗？

至于说叛变是为了“保存同志”、解决“干部缺乏”的需要之类，更是胡说八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但是，革命事业决不需要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软骨虫。“许多最好的干部”，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只有坚持革命，才能保存、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干部的队伍。要革命，必然会有牺牲。可是，我们决不会被牺牲所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我们要在革命斗争中保存的是这样的力量，我们要保存的是这样的好同志和这样的好干部。

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伙叛徒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们看来，脑袋就是一切。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用处？他们要保存的“同志”，就是这

些捧着脑袋过日子的狐群狗党，就是这些出卖原则的叛徒。中国赫鲁晓夫依靠这样一些“干部”，作为叛党的资本。所以，他的所谓“保存同志”，说穿了，保存革命同志是假，保存反党力量是真。这种“保存同志”论，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之流的“曲线救国论”的老调重弹。

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这已不是假设性的问题，而是现实性的问题。中国赫鲁晓夫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已经在这样干了。这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画图啊！

你看，这些猪狗不如的大叛徒，一个个从狗洞里爬出来以后，中国赫鲁晓夫为了保住他的这个反革命班底，为他篡党、篡政、篡军服务，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起来。他们相互吹捧，相互提携，一个个飞黄腾达，窃取党政大权，组成了一个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个地下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将相俱全，文武兼备，只待时机成熟，变天上台。他们有理论，有纲领，有行动，实行了一条完整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近几年来，这一小撮人在中国赫鲁晓夫的统一指挥下，适应了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的需要，上呼下应，八方配合，对无产阶级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如果我们不加反击，“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避免了在我国出现这样危险的情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赫鲁晓夫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以毁灭性的打击。任何抵赖、狡辩、反诬，都是枉然。中国赫鲁晓夫是历史的罪人。他绝对逃脱不了七亿革命人民对他的最严厉的审判！

（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

4，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

报告》

华主席并党中央：

遵照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央组织部从今年七月开始，对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申诉材料（已收到二十三件），查阅了我部保存的二十五人的干部档案，调阅了敌伪档案和天津市、陕西、吉林省档案馆有关档案，并向部分有关人员作了查证。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

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因为一九三六年登“反共启示”出反省院的问题被定为“叛徒集团”一案，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案件。这个案件，不仅涉及到担任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领导职务的一大批老干部，而且关系到一些在革命战争中已经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文化大革命前三十年中，也就是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六六年，对这批党员出反省院的问题，由于已有结论，没有当作问题。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让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搞调查。当时中央文革的康生、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以及谢富治等人，到处支持一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斗这批党员。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戚本禹同总政文工团部分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关锋对军训解放军代表的讲话中说：“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一九六七年四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叫嚷：“要是没有他们（指红卫兵），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康生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康生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时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即六十一人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由于他们的煽动，从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各地纷纷成立“揪叛徒”的组织，把过去已经结论的问题，统统翻腾出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制造了一大批冤案、假案、错案。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央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了彭真专案审查小组

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据此，将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薄一波同志等对这个结论一直不服，多次提出申辩。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健在，邓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时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由于“四人帮”的捣乱和破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粉碎“四人帮”以后，薄一波同志等及其家属子女向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再次提出申诉，党内外干部、群众十分关心这个案件，要求澄清问题的真相，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邓副主席在一封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华主席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指示胡耀邦同志：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遵照华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们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查，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

二、六十一人在反省院的表现

六十一人是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据我部档案材料，其中三十二人入党入团的时间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入党的十六人，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六年入党入团的十六人（包括在反省院入党和重新入党的二人，由团转党的五人）。这批党员被捕以前，有许多同志担任省委、市委、特委的书记、秘书长、部长、科长，团中央候补委员和团市委书记等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二十二名，他们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马辉之、徐子荣、傅雨田、王鹤峰、李楚离、王德、侯振亚、王其梅、刘有光、胡锡奎、廖鲁言、张玺、李力果、刘锡五、彭德、刘子久、赵林；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和司局级职务的十三人，他们是：吴云甫、刘聚奎、刘慎之、赵明新、刘文蔚、刘尚之、冯乐进、唐方雷、王新波、朱则民、高仰云、胡敬一、贺致平；担任一般职务的五人，他们是：张振声、王玉堂、刘昭、杨彩、丁子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十人，他们是：董天知、冼维勋、殷明道、张友清、张曼萍、赵（金字旁加‘傅’的右半侧）、王墉、夏富海、马玉堂、王振林；解放前去世的五人，他们是：殷鉴、邱少山、高

廷凯、杜伯阳、郝景波；自杀一人（韩钧）；出狱工作以后，投敌叛变，被我处决一人（刘克让），管制一人（扶平）；下落不明三人（周庠、阎导黎、乔健双）。

在这六十一人中，现在在世的二十六人，他们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马辉之、傅雨田、王鹤峰、王玉堂、吴云甫、李楚离、刘聚奎、王德、彭德、刘子久、刘尚之、冯乐进、刘有光、刘昭、唐方雷、朱则民、杨彩、赵林、张振声、贺致平、丁子珍。

一九三一年前后，这批党员大部分是因河北省遭破坏而被捕，长期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从一九三一年反省院建立到一九三六年八月，这个反省院先后关进政治犯约四百人。这些人中，除一九三二年大赦减刑无条件释放和因病保外就医的二十多人外，有三百多人已经自愿或由家属动员发表“反共启事”出狱。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四五年中，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据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记忆，当时狱中党支部党员不是六十一人，实为五十来人），同外面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坚持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拒不在敌人事先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出狱。其中周仲英、赵林、马辉之、刘慎之、彭德等同志早已坐满刑期，因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出狱，一直坐到一九三六年。王玉堂、张玺、赵明新、王鹤峰、刘聚奎等团员和群众，由于在反省院对敌斗争坚决，拒不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出狱，而被狱中党支部发展为党员或由团转党。有的党员不听劝阻，自愿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狱中党支部当即宣布开除其党籍。他们在反省院期间，还坚持秘密学习马列主义和其他书籍，在生活上团结互助，家属送来的钱，由党支部指定专人管理，给有病的同志和生活真正困难的同志买些必要的东西。为了反对敌人的虐待和迫害，他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底的绝食斗争坚持了七天七夜。据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一日由宋哲元签发的训令中记载：“案据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呈略称查本院押犯内有周斌（即周仲英）等三十余名均系因共党案被判处罪刑并受反省处分均早满期依照条例皆应具悔过书保释出院乃该犯等仍执迷不悟坚不履行反共手续……是以宁死院中亦不愿反省……。”（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呈文的具体时间，在敌档中没有查到，因此，出现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的训令时间比周仲英同志等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第一批登“反共启事”日期晚十一天。）说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投降国民党

叛变共产党，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当时北方局的负责干部有柯庆施（组织部长）、林枫、李大章等同志。在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作出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的决定，并报告了党中央。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柯庆施同志通过徐冰同志让孔祥祯同志写信秘密通知反省院党支部的。柯庆施同志还让李葆华同志转告徐冰同志抓紧办这件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徐冰同志给李富春、康生、周总理并报党中央的报告中说：“三十年前的旧案子，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提出来了。一九三六年我在北京，我的组织关系在柯庆施手里。有一天（大概是三六年七月间），他告诉我，在陆军监狱囚着一些同志，可以通知他们，叫他们写一个声明书（当然是有反共的话）可以出狱，为党工作，……你手下有一个关系（指孔祥祯同志）同他们熟悉，可以叫（他）写信到狱中去。……柯老说，这是中央指示叫这样办的，你执行中央指示嘛，……随后，他（指孔祥祯同志）写了一封信给狱里的同志，说明中央指示叫这样办的，你们应当执行中央指示。……这件事情的结论只能请中央决定。”据李葆华同志证明：“一九三六年四月，我调到北平市委书记。六月份，柯庆施同志代表北方局到北平领导市委。当时听柯庆施同志说过：何、梅协定后，北平很可能被日本占领，要想办法把监狱的同志救出来，否则将来会被日本人杀害”，“八九月份，柯庆施同志与我在吴德同志住处碰头。碰头后，我说：我要到北海与徐冰碰头去。柯庆施同志说：你见到徐冰时转告他，中央已批准叫监狱同志办一个简单手续出来。还可能说过叫徐冰抓紧办。我见到徐冰后，将柯老讲的话转告了徐。”孔祥祯同志证明：一九三六年七月间，徐冰同志对他说，现在形势很好，到处需要干部，北平军人反省院还有几十个党员，“现在中央有指示，叫他们可以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来”，“政治上由中央负责”。孔祥祯同志按照徐冰同志的口述，先后给反省院党支部写过两封信，由王伯平（魏文伯的侄）送给了殷鉴同志。反省院党支部接到第一封来信时，支部书记是薄一波，支部委员是殷鉴、刘澜涛，他们对来信有怀疑，认为中央和北方局不会作出这样的指示，担心

是敌人搞的圈套，因而未作正式传达，没有执行。过了一段时间，接到孔祥祜写来的第二封信。信中说，是中央指示要你们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在政治上、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不执行，就要犯更大的错误。这时支部已改选，支部书记是赵（金字旁加‘傅’的右半侧），支委是张友清、杨献珍，他们认定确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便分头向全体党员作了传达并组织执行。有的党员虽仍有疑虑，但也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如刘锡五同志听到传达后表示同意执行，但又要先出反省院的同志进一步核实情况，相约如确实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给他送一只鸡。后来，北方局派人给送去一只鸡，他就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了反省院。北方局为了组织这批党员出狱，还通过统战关系，向反省院安插了一位管理员，暗中帮助他们办理出狱手续。从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他们分九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连登“反共启事”两三天，出了反省院。“反共启事”是敌人事先拟好的，内容相同。薄一波同志等出狱后，柯庆施同志还对他们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事实证明，这批党员同意发表“反共启事”出狱，并非他们的本意，不是他们屈服敌人，而是服从组织决定。

四、六十一人出狱的情况

这批党员出反省院后，立即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及时分配了他们的工作。当时，亲自接待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以及徐冰等同志。薄一波、杨献珍、周仲英、王鹤峰、韩钧等到山西作统一战线工作；安子文到北平市委任组织部长；刘澜涛到绥东开辟工作，后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张友清到山西任工委书记，后任北方局统战部长；张玺到冀鲁豫特委任宣传部长，后任特委书记；刘锡五到中央组织部任地方科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这批党员中的绝大多数同志表现是好的。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下，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有十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赵（金字旁加‘傅’的右半侧）同志于一九四一年在鲁南被敌活埋，党和人民为纪念他，曾将其就义的地方苍山县改名为赵（金字旁加‘傅’的右半侧）县；洗维勋、夏福海、马玉堂、殷明道、王振林等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董天知同志任决死三纵队政委时牺牲于“百团大战”；张友清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反扫荡斗争中被俘，坚贞不屈，牺牲于狱中；王

塘同志（临汾旅旅长）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于临汾战役；张曼萍同志一九四七年夏在安徽宿县地区被国民党还乡团杀害，一九六四年追认为烈士。几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些同志经受住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的考验，在斗争中逐步成长为党的一部分骨干力量。

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变节行为或有政治错误。如刘子久同志一九三一年四月在北平被捕后有叛变性的行为，对党隐瞒了十八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向中央报告。因此，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子久同志的候补中央委员职务，保留其党籍。出反省院后，投敌叛变的有刘克让和扶平二人。

薄一波同志等出狱后，对于他们出反省院前后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交代。据查阅的档案材料证明，赵林等十位同志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五六年写的自传中，都比较详细地交代了在反省院对敌斗争和经中央、北方局指示履行手续出狱的情况。赵林等十六位同志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六四年填写干部履历时，多数同志填：党允许、北方局决定登“反共启事”出狱或根据中央和北方局指示履行手续登报出狱；有的同志填北方局营救出狱。薄一波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给陕西省委写材料证明同狱人刘聚奎这段历史时，说：“刘一九三六年出狱，系根据党的（北方局）命令，履行出狱手续出来的。所谓出狱手续，即是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个手印，这件事是经党组织（北方局并中央）指示办理。”这些情况说明，薄一波同志等对他们的出狱情况已作过交代，不存在“长期欺瞒组织”，“串通一气，互相包庇”的问题。

五、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审查六十一人这段历史的情况

党的“七大”时，中央对薄一波同志等出反省院问题进行过审查，有明确的结论。据现有材料，在这批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补代表二人。从中组部保存的“七大”有关档案材料查明，“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他们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作了“本人不能负责”的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日对吴云甫同志的结论是：“在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时曾写了反共启事，这是由党决定的，无问题。决定：适合代表资格。”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对赵明新同志的结论是：赵“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与王德（王得山）同志等履行手续出狱。在监狱与

反省院表现尚好”，“至履行出狱手续，他本人不能负责（此事中央组织部清楚），因此，适合代表资格。”

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王鹤寿同志证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秋，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任干部科长。在审查干部的过程中，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白色区域的北京监狱坐牢的一批共产党员，他们出狱时在报纸上登了‘反共启事’一类的东西。他们在自传中及谈话中都提到了这件事，并且声明说：这是党通知他们这样做的，并非他们自己要这样做的，……关于这个问题，中组部作了调查，证明事实确实如此。……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以上说的那批共产党员中，有一些是党中央机关及各地党组织选出的代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任弼时同志（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也说明了这件事，他说：这批同志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登‘反共启事’一类东西出狱，是北方局决定的，中央回电同意的，所以完全不影响他们的代表资格。”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工作的王从吾同志证明：“一九四五年‘七大’召开以前，从前方来的‘七大’代表都集中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和审查。以后各代表团对每个代表进行了认真的代表资格审查，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是刘伯承，副团长是薄一波、王从吾。薄一波、安子文等是晋冀鲁豫代表团的代表，他们从监狱出来的问题，经代表团审查：一九三六年，他们从北平监狱出来是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指示他们登‘反共启事’出来的，他们自己没有责任，他们不是自首变节。因此，代表团同意了他们的代表资格，并经中央批准参加了‘七大’。”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为劝阻一些红卫兵组织因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揪斗刘澜涛（原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原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同志，中央曾发出两封电报：一封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西北局的，内容是：“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一封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给东北局并吉林省委的，内容是：“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总理亲自给吉林师大红卫兵发电，重申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给东北局并吉林省

委的电报内容，并指出：“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据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周仲英同志交代，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和一九五零年，他们曾分别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当毛主席问到他们的经历时，他们汇报过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的情况。毛主席在一九四三年听了薄一波同志汇报后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毛主席还在薄一波同志事后整理的谈话记录上批示：个人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据薄一波同志说，此记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抄走）。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听了周仲英同志汇报后说：这件事我知道；一九五零年听了安子文同志汇报后说：任作民出狱后到延安，我听说他是经过党的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就派他到西北局担任宣传部长，不久他就病死了，后来才知道他在牢里任支部书记，是支部自己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这和你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过人已死了，这件事就不必再提了。

以上情况证明，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问题是审查过的，对他们的这段历史是知道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六、文化大革命期间，专案审查中的问题

三十年来，中央并未追究六十一人出反省院这件事。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的初步调查说，他们是根据康生的指示进行调查的，但有人证明，康生对这件事本来也是清楚的。据于光远、曾彦修同志证明：一九四八年，当时以康生为团长的中央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当时渤海区党委所在地过春节，康生曾说起一九三六年平津一批党员出狱的问题。“康说，一九三六年，中央分析当时华北形势危急，抗日高潮又已经到来，需要大量干部出来工作，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都在平津狱中，如不及时把他们营救出来，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解往南京。另外，如果敌人很快占领平津，或者华北政权汉奸化后，这批同志就只有全部牺牲。考虑结果，当时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出狱手续（指登报脱党，自一九四三年审干到一九四五年‘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前后，延安一般已使用‘办理出狱手续’一语代表得到组织允许的登报脱党一事，康生用此语，我们都知道其中的含义，因此用不著解释）。”最近，刘英（张闻天同志爱人）同志写材料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南开大学红卫兵追查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履行手续出狱的问题，……逼张写具体材料交代，张以时间经过太长，具体情况需要仔细回忆，

但为了慎重起见，曾将回忆的情况，先给康生同志（当时文革顾问）写了封信，并请他转呈毛主席，同时还请康查查中央原来的档案，证实当时情况，以便向红卫兵交代，张两次去信，但康一直不作答复，最后张以为当时中央不便表态，因此，只好决定由他个人承担责任，承认是他批准的，并写了份材料交给红卫兵，避免涉及中央。”康生明明知道这件事是中央和北方局党组织同意的，却指使人“进行调查”，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在专案审查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妥当的作法。据刘英同志说：“一九六八年四五月间，有一天张闻天从经济研究所受审回来后对我说：今天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自称是康生同志派来的，说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是我（张闻天）从中把水搅混了，这案件是刘少奇背著中央干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薄一波、刘澜涛等同志交代，一九六七年他们向中央写的材料写了一九三六年他们出狱的事毛主席知道。专案组的同志对薄一波同志说：“你讲这个问题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党有利，讲了对党不利。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考虑”；对刘澜涛同志说：不要写一九三六年履行敌人反共自首手续出狱中央同志知道，要刘把这一历史事实去掉重写。

中央 [67] 96 号文件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给人的印象是针对六十一人讲的。据了解，这段指示是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谭震林同志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农林口运动情况报告上的批示，并不是针对六十一人讲的。

七、调查的结论的处理意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的处理意见是：

（一）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

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末，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人。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其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人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对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的另作结论。

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若干决定

（四）关于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当时由于“四人帮”的捣乱和破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今年1月间，中央常委就议过要为这一案件平反的问题；六、七月间，中央要组织部对这一案件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于今年11月3日向中央提出报告，

其中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一个正式文件。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现发给你们，望即向全党传达。

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

中央书记处：

中央（1978）75号文件转发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以后，我们从接收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的档案和查阅中央档案馆的材料中，又发现有四份文、电，进一步证明党中央、毛主席对“六十一人”履行自首手续出敌反省院问题是早就知道的。同时，有些同志对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几件事情，要求更正，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现将新查到的四份文、电和调查报告中需要更正的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一、新查到的四份文、电的内容。

（1）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中央书记处给胡服（注：即刘少奇同志）的电报，内称：“出狱同志请开始分批分期送西安。我们交通即日出发专接。”

（2）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参加会议的有：毛、任、刘、康、周、朱、彭德怀、彭真、高岗。康生在汇报关于反特斗争问题时说到：“河南红旗政策下，假圣旨自首者（如X X X），有真旨自首者（如少奇允许薄一波自首）。”

(3) 薄一波同志一九四五年一月写给毛主席的一九三六年秋季与他同时出狱者名单。毛主席阅后批：“北方出狱干部，一九四五年一月薄一波写出，存。”

(4) 刘澜涛同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写给周总理、陶铸同志的信和周总理于一月二十四日写给毛主席的报告。周总理的报告说：“经与陶铸、康生两同志商量，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主席批示：“照办”。

二、需要更正的几个问题。

(1) 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工作的时间问题。根据张闻天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写的补充材料，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说刘少奇同志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北方局工作的。

经查，据当时在北方局工作的李大章、高文华、安建平、王林、王伯华，与刘少奇同志同行的谢飞等同志证明，和刘少奇同志简历表底稿记载，刘少奇同志到达北方局工作的时间实为一九三六年春。

(2) 关于任作民同志出敌反省院的问题。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引用了安子文同志关于毛主席对任作民同志的说法：“我听说他是经过党的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后来才知道他在牢里任支部书记，是支部自己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这和你们的情况完全不同”。

经查，任作民同志一九三七年十月出敌反省院的问题，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月四日作过审查决定，认定“（任）作民同志在反省院中确是最后无条件释放”。董必武同志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给任作民同志爱人丁祝华同志复信说：“董老说，任作民同志是经过武汉办事处交涉后从湖北反省院释放出来的。”安子文同志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写信说：看来董老办公室所写的材料是比较可靠的。但是毛主席的确向我说过任作民同志出狱的事。究竟主席听谁说的？还是有人向主席书面反映的？我无从猜测。

据此，任作民同志出敌反省院问题，应以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月四日所作审查决定和董必武同志的证明为准。

(3) 关于刘尊祺同志出敌反省院的问题。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附件之 十七、十八，薄一波、刘澜涛同志谈一九三六年出敌反省院

的情况说，刘尊祺是叛变出狱的。

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小组一九七九年一月关于刘尊祺同志的复查结论，刘被捕后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一九三三年五月经王卓然等人无条件保释出反省院，决定恢复刘的党籍。刘澜涛同志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写信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外文出版社的同志介绍，刘尊祺是由当时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保释出狱的。因之，一波、子文和我三人向组织写了说明，刘尊祺不是自首叛变出狱。

据此，刘尊祺同志一九三三年出敌反省院的问题，应以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小组的复查结论为准。

此外，有关同志写信和来电话证明，杜伯阳同志是一九五七年三月在西安病故的，不是解放前去世的；王墉同志牺牲前任临汾八纵队二十三旅旅长，不是“临汾旅旅长”。

以上补充报告妥否，请批示。

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八〇年四月二日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的通知

(1980.4.21)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

我部《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业经中央批准，现印发给你们。

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2007年11月28日初稿

2011年9月22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15）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十五节 武汉“七·二〇事件”

本节资料

七、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十四、十月政变后对革命派实行镇压、翻“七·二〇”事件的案

一、毛泽东到武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1967.07.13； 中发 [67] 218 号

各级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级人民武装部，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并转各群众组织：

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争。

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现在决定：

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杆弹药。

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

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

产”，所发的武器一律收回。

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所谓“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概由挑动者负责。

五、从《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错误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的人，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

这个《通知》应该在生产队向农民群众宣传。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三集）》，北京：1967年9月）

二、毛泽东周恩来着手解决武汉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谢富治王力接见武汉三钢代表的谈话

今天(17日)凌晨1时20分，谢副总理、王力等八位同志乘车来红武测2号楼前(即钢二司司令部所在地)，谢副总理下车后，对我钢二司值班战士说：“我们是北京来的，来找钢二司勤务组的。”我钢二司战士立即认出是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于是情不自禁地喊出来：“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来了！”谢副总理一面用手制止，一面说：“不要喊，不要叫喇叭！去找几个负责人来！”于是，我钢二司战士就将首长引至1号楼201室我钢二司参谋部办公室。一会儿，我钢二司司令部几位负责同志就来到参谋部，首长和他们一一握手，并开始了亲切的交谈。

谢富治副总理(以下简称谢)：“你们有几个勤务员同志？”

二司：“我们有五个勤务员同志。”

王力同志(以下简称王)：“把名字写出来，写大一些！”

二司同学将名字写好交给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

谢：“你们杨道远是那里人？那个学校？”

二司：“是河南人，武测的。”

谢：“啊！又是河南人，我昨天遇见的也是河南人。”

二司：“前面三个勤务员都是河南人。”

谢：(极为风趣地)“河南人都来我们湖北当官，我们湖北成了空架子！”

(大笑)(注：谢副总理是湖北红安人。)

二司××：“我是湖北人，麻城的。”

谢：“麻城，哦！”。

二司：“我们二司是除了华工、湖大以外，所有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 100 多个总部组成的，其中有 15 个常委学校。”

谢：“常委，那好，就把常委学校名单给我。”

二司同学将名单写好给谢副总理，并简单介绍了司令部的各级组织情况。

谢：“你们二司管工人吗？”

二司：“除院校工人外，其他造反派工人都参加工总、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组织。”

谢：“啊！工总、九·一三在那儿？”

二司：“他们被赶出来没有固定地方，现在可能在水电。”

谢：“能找到他们吗？”

二司：“可能找得到。”

谢：“好，把他们叫来，用电话找，不要说是我们来了。”

王：“你们这座楼都住的钢二司吗？”

二司：“有三司的同志。”

王：“哦！你们两个搞在一起，好！和平共处。”

谢：“你们能不能找两个来一起谈谈？”

二司：“这个地方可能没有住人，白天在这儿办公。”

王：“到司令部（指三司）去找两个来。”（指着 4 号楼）

谢：（对同来一个同志和一个二司战士）“去，你们一同去找。”

二司：“我们今天上午游泳的同志还没有回，有的还是八点钟才下水咧！现在回不来，被堵在新一中。”

谢：“听说新一中有一千多人，还准备搞游行！”

二司：“我们今天下午渡江，一只保护船都没有。”

谢：“没有淹死人吧？”

二司：“可能没有。”

此外，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还询问了其他一些情况，二司同学都一一作了详

细回答。接着两个三司的负责人被引来了。谢副总理和他俩握手，并问了他俩的名字。

三司：“我叫许谦，他叫李永金，我是总负责的，他是政宣部长。”

王：“好，把名字写出来。”

三司：“首长来了很高兴，我们都在准备欢迎，同志们都希望见到首长。我们明天召开一个斗争刘少奇大会，请首长到会作指示。（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沉默一阵未答，三司接着说）“我们非常希望听首长的指示，大家都恳切要求首长作指示。”

谢：“哦！开大会，我们不能去，我刚到武汉来，还不了解情况，现在是在学习的，大会最好不要开。”

王：“你们开会要我们参加，他们开会也要我们参加，武汉的问题怎么解决？靠大家来解决。不要开什么大会，不要搞什么游行。我们到这儿来，就是要找大家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求回原单位，所有的人都回原单位，原机关，都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保证四大，那怕只有一个人也行，要允许他们为一派。”

二司：“首长来汉，我们高兴，但是也很惭愧。我们很早就盼望首长来解决武汉的问题。我们没有作好工作，没有完成好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心里很难过。我们首先有一个要求，要求能回原单位，（其他战士插话：我们很多中学生战士被赶出来，无家可归。）现在不能回去怎么办？”

谢：“今天我们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向你们学习，这个要求很合理，目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制止武斗。”

二司：“武汉机床厂，有个战斗队员被赶出来，后来，他妈妈送他回厂上班，结果还是被百万雄师打伤了。”

谢：“这样的事天天都有，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这一次要解决。”

谢：“我们昨天到华工你们知道吗？”

二司：“我们不知道。”

谢：“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向大家学习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我们来的。我们首先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周恩来同志、中央文革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关锋、戚本禹同志向你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并希望你们转告全体战士及武汉地区、湖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希望你们在制止

武斗方面作出贡献，采取措施。我们伟大的领袖在制订《十六条》时就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敌斗”。这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后来林副主席作了发挥，你们都是学生，是革命小将，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你们最听毛主席的话。今天，我跟王力同志来，和你们商量两件事：

一、应该立即停止武斗，制造和平气氛，为解决武汉地区问题创造条件。你们二司是有名的，我们是知道的。你们应该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立即停止武斗。我们希望你们根据中央六条达成协议，能达成几条就达成几条，或者不能就单独发表声明。你们二司是很有影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有风格，要站得高看得远，（三司插话：我们从来不搞武斗。）可能少些吧！你们三司不同意武斗，那也好。武斗停下来以后，造成和平气氛了，就请你们来谈问题，原则的分歧，路线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你们二司有很多好的意见嘛，三司也有嘛！

二、希望你们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和社论，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周年重新发表，不是一个简单十周年的问题。而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有许多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你们要好好学习。学好了，就有了锐利武器。认清当前形势，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这时，工总、九一三同志赶来了，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与他们一一握手，王力同志说请签名字。工总、九·一三同志签名见上面是三司的名字，不和他们签在一起，要和二司写在一起。谢副总理见了大笑：“怎么，不愿和三司在一起，哈哈……！”此时，中央来的另一同志对谢副总理说外面还有三位同志。

谢副总理问：“是那个组织的？”

工总回答：“是送我们来的战斗队员。”

谢：“叫他们都进来。”

二司：“军区现在还不承认工总。百万雄师写大字报，说中央叫军区不通知工总。”

王力：“我们没有说。我们到武汉来，各种意见都可谈。”

二司：“我们二司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是一直受压制的。这次百万雄师搞武斗，打死我们好多人，制造很多血案，我们一再和军区交涉，但是他们听

不进我们的话。过去王任重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现在还把我们当“牛鬼蛇神”打。所以，百万雄师杀我们就杀得下手。”

谢：“这个作法是错误的，是牛鬼蛇神，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还向你们问好，但是你们要正确地分析形势，现在不要把这个问题上纲上得太高了。”

王：（对工总、九·一三）刚才你们未到，现在大家都来了，就再把谢副总理意见说一遍。昨天我们到新华工，今天又到你们这里来。我重复一遍，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的其他同志，向武汉地区，湖北地区的革命造反派问好！并请你们转告全体同志，毛主席、林副主席很关心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希望武汉地区文化革命顺利前进。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怎样分析，怎样把运动推向前进，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和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主席派谢副总理和我们来，是来帮忙的，主要靠你们，我们起的作用很小。要看到全国的形势，全世界的形势。不要整天钻在牛角尖里。要抓大方向，武斗是交流问题。（谢插话：不要被武斗干扰了大方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能解决，我们是小学生。我们准备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此要创造一个在武汉解决问题的条件，创造一个便于谈判的气氛和条件。所以向你们提出两条建议：一、你们就中央六条达成协议。能达成几条就达成几条，不能就单独发表声明。我已到过百万雄师那儿，和他们订了几条，要他们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的宣传，拆除所有武斗工事，不能动用交通工具搞武斗，不许挑动农民进城，不许拦车检查，所有岗哨都要撤消，武器要销毁，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权利。二、你们现在就开始坐下来学习，特别是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按主席的思想、路线、方针办事，如何分析形式，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然后检查一下你们的口号，斗争的策略，如叫“百匪”就不利于做工作，也不会因你骂就会增加什么，不能因为你骂得到什么！（大笑）你们湖北人骂的很不象话，（谢副总理一面大笑，一面插话：四川成都、重庆骂的更难听，要有一个高级的革命阶段，不能太低级、太庸俗了，你们是大学生了嘛！不能用。）口号检查一下，斗争的方法检查一下，正确处理好。集中一个目的，号召全体战士学习，研究。具体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少，主要是对问题的看法。你们是能解决的，你们需要我们帮点忙，我们就帮助解决。主席有个最新指示，“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是

反动组织，也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是最新最高指示。

谢：“坚持按主席教导，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去年八月毛主席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高度地评价他们，热情地支持他们，赞扬他们，他们是一批老红卫兵，但是只记住了主席的前面的话，忘记了后面的话，骂人家黑七类、狗×子，走向自己的反面。今年主席的三·七指示，再次提醒我们，所以要记住主席的教导，团结大多数。”

“听说百万雄师就要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你们马上采取紧急行动，要积极主动。”

中央来的一同志：“你们要主动。不能拦车，我们这几个人是打不跑的，打伤了我们不要紧，那时，你们可被动了。”

二司：（指着王力同志放在桌子上的军帽说）有了这，我们革命造反派是不会拦你们的。

中央一同志问：“不一定吧，我们坐军车走路时，就有人喊：解放军好，解放军！陈大麻子坏透了！”

二司：“这个口号很有阶级性。（谢富治副总理笑了笑）。

中央一同志：“还有‘麻子兵’这种说法。”

谢：（站起来）“把解放军战士说成是‘麻子’，是不行的，应该制止。”

二司：“我们从来就没有把解放军战士说成是‘麻子兵’，我们是指三字兵、大专兵，是根据‘体学兵’，‘任重兵’来的，那种说法完全是挑拨我钢二司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血肉关系。”

谢：“‘任重兵’、‘体学兵’也是不对的，应该坚决制止”。

二司：“在上次红代会上我们就提出制止这种问题。”

谢：“希望你们高姿态，否则低姿态就要输一着。不要附加条体，要首先采取行动。我们到汉四天时间来你们这儿两次了，我们可不是‘支保’罗；我们是为你们好嘛！上次我来你们这儿，和你们辩论过，为什么在三司前面加个‘康’字，骂‘康三×子’那就错了。（二司插话：还有骂‘二癞子’的）那更不对。

（转向三司）上次来，你们三司喇叭太吵了，你们改掉没有，是司令部，还是学校的，应该拆掉一些，太吵人。”

三司：“只有二十八个。”

二司“有三十多个。”

谢：“现在你们整天在考虑如何防守，如何进攻，（二司插话：我们不进攻。）你们不是有个‘文攻’吗？如何试‘氢弹’？你们谁管作战的？谁呀？”

二司：“我就是作战部长。”

谢：“你整天俯在地图上研究什么？是不是打仗？制造武器？”

二司：“不，我主管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会，批判大会。（谢插话：这就对了。）不过，自卫性武斗也管一些。”

谢：“主要是这个问题，要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

二司：关于武斗的情况，我们多次与军区交换意见，但毫无效果，以前我们敢提、现在首长在这儿，我们更敢提，血债我们一定要讨还的。”

九·一三：“我们是工人，是个老粗，我只说直的。毛主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并不是我们工人好斗，而是为了自卫，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我们认为现在不是一般的武斗，而是陈大麻子挑起的反革命武斗。铁道四院，武机，……都被砸。连八、九岁的孩子也不放过。如果我们不自卫，不行，我们武钢战士不少被赶出来，无家可归，现在，他们搞绑架、暗杀，7.11 事件，我们损失很大。”

谢：“你是什么工人？”

九·一三：“我们以前占 70%，他们有长矛又有汽车，象汽运六站……”

谢：“我知道，动用了 100 多辆，对吗？”

二司：“对！”

九·一三：“我们三钢是怎样来的呢？就是被他们骂的黑工总，黑九·一三，黑二司。”

工总：“现在他们搞‘护厂队’，实际上是把他们的力量集中起来搞武斗。每次都是他们挑起的，他们守在门口不让我们进。”

谢：“什么‘护厂队’，以后要取消岗哨。武斗可能是一方面主要的，但是也不能都怪他们。我到过成都、重庆，云南等地，主要是靠大家解决。我们作了工作，关于 7.15 游行，我们批评了军区，没有批评你们，以后武装游行、游行都不要搞了。”

工总：“我们能回去的一定回去，现在我们有厂不能归，有家不能回，我们

革命造反派从来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谢：“你们能回去就回，不能回就暂时不回，等武斗停止了再回。”

二司：“我们还有许多被抓了没有放，希望能放出来。”

谢：“把名单全部交给我，在什么地方被抓的写上，我明天派人来拿。”

二司：“谢副总理是不是到水运去看看。”

谢：“我们已经派人去看过了。”

二司：“还有很多地方，你们可以去看看，如红卫纱厂……。”

谢：“还有什么，（对工作人员）记下来。”

工总：“江汉公园、新公校、汽运六站、汉阳铁中、桥口，……等。”

谢、王：“我们不怕，都去看。”

王：“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再谈。”

2 点 25 分，我们送别首长。在送首长下楼梯时，谢副总理拍着二司一战士臂膀讲：“我这个老乡不象湖北人了，很久没有回家了。”

二司：“多少年没有回来了？”

谢：“四十多年了。”

二司：“武汉问题解决后，可以回去一次。”

谢：“不行啦太忙。”

最后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再一次和我们三钢战士一一握手告别。大家以热烈掌声送别了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附）参加接见人员：

钢工总：沈复礼，三个战斗队员。

钢九·一三：陈×。

钢二司：方保林、鲁性祥、杨运年、王驳清、朱振铎、唐正国。

三司：许谦、李永金。

钢二司宣传部整理 1967. 7. 17

（来源：武汉革命造反派赴宁宣传团《武汉战报》1967 年 7 月 27 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谢富治在武汉“二司”司令部的讲话
我们昨天到了新华工，今天来看望你们。

再说一遍，我们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来向武汉地区、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问好，希望你们转告全体战士。毛主席很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武汉的问题怎样分析，怎样解决，怎样向前推进，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依靠你们和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我们是来帮忙的，我们起的作用很小，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使毛泽东思想占领整个世界、整个中国。你们要看到全国的形势，全世界的形势。武斗只是一个支流，不要因为支流干扰了运动大方向。希望你们在武斗方面采取措施，对解决武汉问题制造和平气氛。你们都是红卫兵小将，你们二司是有名的，我们是知道的。你们三司我们也知道。你们应该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文斗，不用武斗。立即停止武斗。我们希望你们根据中央六条达成协议，或单独发表声明。你们二司是武汉很有影响的革命派组织，要有风格，站得高，看得远。你们三司不同意武斗那也好。

我建议你们：第一，首先能停止武斗，能够达成协议更好，不能，就单方面发表声明。造成和平气氛再来谈。有原则路线问题要分析、解决。第二，就是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这次重新发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你们要好好学习，学好了文件就有解决问题的锐利武器。你们在武斗的问题上与“百万雄师”达成协议，对工总的问题可以谈谈嘛，是可以解决的。

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也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这是最新的最高指示。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要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明白，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决自己。去年八月份毛主席给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小将一封信，高度评价他们，热情支持和赞扬革命小将，这批人是老红卫兵。但他们只记住毛主席前面的话，忘记了后面的话，骂人家狗崽子，所以走向反面。今年毛主席“三·七”指示，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

我们来汉四天，就来你们这儿二次了，我们可不是支保了。我们希望你们好。

我们要求大家首先回原单位，所有的人都回原单位、原机关，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保证“四大”。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保证他们的“四大”权利，也

允许他们成为一派。你们（指“工总”、“九·一三”）不能回厂的，可以暂不回去，武斗停下来再说。

今天我就谈到这里，以后再谈。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是军区连续几天会议的总结讲话，也是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正式、基本态度；讲话稿由周恩来在东湖亲自拟订，且由毛泽东在 17 日看过。

周恩来说：“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12]，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13]，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14]。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

“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指责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

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像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

“‘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16]。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17]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18]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19]。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按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20]。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

最后，周恩来说：“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会后，周恩来带陈、钟去见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凌晨，谢富治、王力及刘丰、萧前到武汉水利学院，向在场的五千群众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

王力强调：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并激情地表示“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

武汉空军的刘丰与萧前（政委）也在大会上诚恳表态，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支持革命左派。

谢富治讲话：

亲爱的同学们，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代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所有武汉市的革命派同志们问好！（群众激动，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付统帅向同志们问好！（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林付统帅身体健康！）

我代表党中央、周恩来总理向同志们问好！（欢呼、热烈掌声）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向同志们问好！（欢呼、热烈掌声）也向武汉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最热烈的敬礼！（热烈掌声、呼口号）

同志们，我们临行的时候，我们见到了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呼口号）非常关心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长时间欢呼，热烈掌声）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付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欢呼，热烈掌声）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武汉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我和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还有一些革命小将同志是三结合，我们来武汉是向武汉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来学习的。是当小学生的。

今天，我们到了水利电力学院，我们是来看大字报的，我们是来学习的，但是大字报没有好好看，学习也还没有开始呢，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讲，只是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向同志们的关心，我们带来了。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讲，我们要从现在起，我们就开始向你们学习，先当小学生。（口号、掌声）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毛主席、党中央告诉了我们，武汉市、湖北省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一方面是一片大好形势，好的很，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武汉市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你们自己来解放！（掌声）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三相信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首先是相信武汉市的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热烈鼓掌）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热烈鼓掌，呼口号）相信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我们支持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激动地长时间热烈鼓掌、呼口号）同志们，我们没有话讲了，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们在你们的总部（实际上是司令部），还有其他方面我们再三提过了，今天再一次向你们建议。

第一条：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所有的群众组织，为了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

良好气氛和良好条件，停止一切武斗。（鼓掌，呼口号）

第二条：我们好好坐下来学习。我们掌握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就是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以来一些重要指示，和报纸上的社论，特别是要学习我们伟大领袖在十年前所著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部伟大的光辉著作。（呼口号）拿这一个伟大的著作，作为我们解决当前武汉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许多矛盾，作为一锐利的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呼口号）同志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内战，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精力集中到我们反对和进攻那些主要的敌人。（鼓掌，呼口号）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各方面去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高声呼口号）

同志们，我们记住我们解决主要矛盾。同志们，这样，我们还要团结多数，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几次，在去年八月份，给清华附中一封非常热情的歌颂当时红卫兵的信，那是最高度最热情的歌颂和评价，当时的这一件新生事物——红卫兵，但是同时提出了，要当时的红卫兵同志们要注意团结多数，只有无产阶级，只有全人类解放了，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够得到解放。可是当时的红卫兵小将同志们，把前半截都接受了，后半句没有接受，只有什么红五类，把别人说成什么黑七类、黑五类、狗崽子、狗孙子，后来有一小部人走向反面，甚至有极少的就走到了反动组织联动，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伟大领袖今年在三七指示中又再一次提出了这个口号，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我们伟大领袖为什么再三提出这个问题，这就需要深思考，要仔仔细细地考虑一下，想一想，（呼口号）我们支持所有的革命同志们，我们要支持你们团结多数，（鼓掌）我的话说完了，现在让王力同志来讲，（热烈鼓掌）

让我们喊几个口号：

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呼口号）

（根据录音整理）

王力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口号，掌声）

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一篇很好的讲话，他已经代表了我們，把我们的话都说完了，你们赞成吗（大笑）。同志们是不是赞成谢富治同志说的那些话？（众答赞成！）

第一不是首长，第二没有指示，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是来……（大笑口号）毛主席派我们来是当小学生的（掌声），第一是来问候你们，第二是来向你们学习！（掌声）。在武汉地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掌声）。我们相信武汉的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掌声）是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的！（掌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解决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欢呼声，口号声）。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欢呼声，掌声，口号声）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掌声）。同志们！（掌声）同志们！毛主席、林付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掌声，口号：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毛主席万岁！）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热烈掌声，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口号声不断）

同志们，毛主席、林付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同志们提出要求（掌声），就是要求同志们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道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掌声）。

同志们，这不是策略问题，这不是一时的措施，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的保证（口号声）。这也是同志们能够把毛主席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红旗永远高高举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掌声）。我们必须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把它翻过来！（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对别人，对别的阶级弟兄，对群众来采取压制，打击报复，我们决不能采取这样做法（掌声、口号声）。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一点压迫有好处(掌声)。我们不能够因为个人受打击，我们就动个人的情感，同志们，我们不能够动个人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掌声)。只要同志们牢牢地记住毛主席这样的教导，我们武汉的问题就能解决得好!(掌声)。为了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二条建议：第一停止武斗，第二坐下来学习!(掌声、口号)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新的里程碑，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要用毛主席这些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想一想，这一年多来的斗争，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正确的认识武汉的形势，正确地抓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检查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所提出的口号，那一些是正确的，那一些是不怎么正确的，检查一下，我们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特别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有没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这叫做学习，学习就是斗争。

(掌声)。学习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带着问题学，就必须找活思想，就必须解决我们武汉地区以及我们每一个团体当前正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同志们，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掌声、口号)。同志们，我们要把主席在今年四月间强调地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这个旗帜，这个口号举起来，好不好(众答：好!掌声、口号)。同志们，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口号不是在平时提的，不是每年春节那样的一般的“拥军爱民”，而是作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介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口号提出来的!(掌声)。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认识矛盾的性质，正确地提出口号，正确地处理矛盾的问题。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掌声)。检查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热烈掌声)。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掌声、口号)。至于武汉地区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我们还要专门找同志们的代表，找各方面的代表，要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向同志们学习(掌声)。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来向同志们问候问候。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根据录音整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三点多钟，武汉军区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

谢富治讲话：

1、武汉支左大方向错了，错在“三·二一”、“二·一八”、“六·四”等通告都是不符合

毛泽东思想的。八条下来你们打击造反派，十条下来了，你们却不执行，我们等待你们两个月了。

2、百万雄师人多，队伍要大到什么范围？你们连军工厂都设联络站，军工厂是保密单位，又是军管单位，你们还要搞，不是穿一条裤子，也是穿一条裤子。打到现在造反派还是比你们人多，这点，我不用调查就晓得。

3、三新、二司大方向没有错，揪武老谭是把矛头对当权派，是对的，有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你们怎能抓住一些缺点打击革命小将呢？（当时谢发了脾气，眼睛一瞪）你们要 180 度大转弯，不扭转，你们自己考虑。

王力讲话：

（先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讲到军区。）

谢副总理在北京讲话，小将们误会了，要揪他，在他房间里装了几个喇叭，他还是向革命小将赔礼。现在人家写了几张大字报，骂了陈大麻子，你就抓人家反革命，如果你们是谢副总理，还不把人家枪毙了。

孟夫唐是什么人，你们要打倒。他是退休了的人，又不是当权派，就是支持三新二司，你们就要打倒他，薛朴若你们也要打倒，这些人都是好干部。

工人总部要彻底翻案，朱鸿霞没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打他反革命，把他以前的作品的一些错误搬到现在来。“二八声明”抓的人要放。

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你们起了很大作用，才发展到现在这么多。你们现在要作工作。最拥护解放军的是革命小将，不信你们调过头来，百万雄师就要打你。

红卫兵在初期还是积极的。但是他利用了刘少奇的血统论，没有跟上毛主席，成为保守组织。红三司是偏右的。

会议开了八个多小时：

谢讲了二个多小时，

王讲了三个多小时，

余立金讲了半个小时，

陈再道检查了二个多小时，

钟汉华检查了一个半小时。

会上决定放朱鸿霞。

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师长继而也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散会后，陈再道和钟汉华送走谢富治和王力，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

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一些人冲击武昌东湖宾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会上的讲话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公安部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大会，欢迎谢富治同志从武汉光荣归来。谢富治同志在与会群众的热烈掌声和口号声中，健步走上主席台，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当大会主席读慰问词，读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谢副总理热烈鼓掌，鼓掌幅度很大，也很用劲，不像身体不好的样子。会上，谢副总理作了讲话，现摘录于下。〕

谢副总理说：这次我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和中央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及北航红旗的同学，是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与周

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组成了一个“三结合”的班子，我们这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向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了解情况，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做些工作。

我们到外地，受到了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欢迎，所有的造反派对我们感情很深，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央文革很有感情，这一点一见面就知道了。

我们到武汉，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处理问题。我们到造反派那里去了，也到“百万雄师”那里去了。

武汉有一个造反派组织“工总”被军区宣布为非法的。这组织号称四十万人，实际也有二十万人吧！被逮捕了五百多人，被迫解散。这是一个较大的组织。我们到武汉去，要为“工总”平反。

九·一三也是一个造反组织。

钢二司虽没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由于是“工总”的观点，受到压制。这是一个学生组织，是一个造反派组织。

“百万雄师”那里我也去了，人很多，在人数上占很大优势，号称一百四十万人，实际上也有几十万人吧！这是个群众组织。他们头戴钢盔、柳条帽、手里拿着大刀、梭标、步枪、也有机枪，杀气腾腾的。

给我们开车的司机，保卫科长，都是“百万雄师”的。这个科长跟了我们几天，都不敢到造反派那里去。军区把“百万雄师”捧上了天，说有十大好处。实际上都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百万雄师”有三大派力量：

(1) 独立师（番号××）带头。这次主要是独立师搞的。它以前是××部队，有×个纵队。

(2) 人民武装部。××个大厂子都有人民武装部，有枪杆子的，他们百分之百是“百万雄师”的。“百万雄师”九个头头，其中四个是人民武装部的。

(3) 公（公安局）检（检察官）法（法院）已被军管，但是，是独立师军管的，其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百万雄师”。

两次来围攻我们的都是独立师和公检法。第一次来围攻我们，开始来两百多“百万雄师”的。我们做了些工作，他们后来就走了，这些人多数还是比较好的。后来来的都是独立师，不讲理，说也不听，就是他们把王力同志拉走的，并制造

了许多谣言。

这件事暴露了他们这次行动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他们与四川的产业军，与河南、湖南、江西的保守组织都有联系。

别把“百万雄师”看得不得了，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造谣过日子的。靠造谣是靠不住的！这次下去，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

看到公检法受彭、罗、徐（子荣）的毒很深，大多数人都是保字号的。在公检法系统中，必须进行大批判，特别是要彻底肃清彭、罗、徐的影响，从各个地方、各个角落铲除余毒，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把他们彻底打倒，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阵地。

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中央文革的同志是非常恨的。我们一定要爱护中央文革，保卫中央文革，誓与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

（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就中央关于武汉“七二零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

一

“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 毛泽东 七月二十五日十七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2）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 （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 （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3）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4）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 （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 （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中央 七月二十五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

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2〕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并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和所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公告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毛主席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这一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陈再道等人“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公告于七月二十六日公开张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经过长期调查，证明‘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后，林彪、‘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七·二〇事件’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利用所控制的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实行反革命围剿。他们栽诬王任重、陈再道同志是‘七·二〇事件’的‘后台’，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八二〇一部队诬蔑为‘叛军’，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同志被打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许多部队同志的家属也被诬蔑为‘叛军家属’；把‘百万雄师’诬蔑为‘百匪’、‘反革命组织’，这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被打成‘一小撮坏头头’，不少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家属被诬蔑为‘百匪家属’；甚至连同情八二〇一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惨遭迫害。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还有的被打伤、打死。”“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〇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凡因‘七·二〇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被打伤、打死的人员，应按照党的政策，继续处

理好抚恤等遗留问题。”〔3〕 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4〕 “百万雄师”，是当时武汉市的一个群众组织。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召集揭发批判陈再道、钟汉华反党叛变事件会议。

周总理、中央文革、谢副总理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周总理、康生同志、谢副总理及其它同志以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陈、钟之流步张国焘后尘，煽动策划反党叛变的罪行。

陈再道不满中央蓄谋已久。“八大”时没有选上中央委员他很不满意。其子叛国事件后中央要他检查也怀恨在心。过去凡是与他合作的政委他都不满意。只有这个钟汉华，甘当他的走狗，两人十分合拍。他到处搜罗坏人，这次叛乱起重要作用的独立师师长就是广州军区不要了的坏干部。真是物以类聚。

这次事变中，当总理第二次去武汉时，陈、钟埋伏了二十八辆卡车，企图在机场挟持总理以要挟中央，还是其秘书偷偷转告空军再电告飞机转移降落机场才得以防止。陈贼真是狗胆包天。

我光荣的解放军干部、战士是忠于毛主席的。绑架王力同志期间负责看守的保卫科长和警卫营长的转变立功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陈再道调动独立师(8201 部队)包围抢救王力同志的二十九师(8199 部队)时，二十九师坚决保卫党中央，保卫王力同志也说明了这一点。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当中央勒令陈贼保证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安全时，他竟敢猖狂地说：“现在这个局面要你们中央负责。你们中央派人来，搞得这么乱，我保证不了。”真是花岗石脑袋，死不回头。

陈再道目无中央，胆敢纵容独立师长公开抗拒谢副总理指示。过去长征时，他任师长，谢富治同志在他手下任政委，因此，现在就要军阀作风，摆老资格，纯粹是国民党作风，哪有一个共产党人的气味。

这次事件中，陈再道和王任重息息相通，贼心一致。在陈贼阴谋镇压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时，王贼就趁湖大成立革临委会之机，给新湖大写了一封所谓的“贺信”。陈贼就立刻配合，说什么新湖大和三反分子王任重暗中勾结，从此作为镇压左派的口实。

在镇压左派时，为了达到他控制利用部队的目的，通过其爪牙大量散布对中

中央文革的不满，挑拨群众、军队与中央的关系的反动言论。如陈大麻子说：“中央文革只不过是几个秀才。”还攻击江青同志，说什么只听学生的，不听军队的。说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性的革命派夺权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夺权；对中央四月六日十条命令不公布不宣传；对中央六·六通令加以歪曲，甚至公然叫要坚决、干净、彻底地消灭煽动武斗的人（指武汉造反派）。陈再道反党活动达到极点时，煽动不明真相的战士和群众在一小撮坏人的带领下，喊“陈再道（政权）万岁！”的反动口号，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

会议中间，陈再道态度十分不老实，企图利用主席复电第二点来捞取一根稻草，当即遭到康生同志的斥责。康老说：你不要以为毛主席讲了什么同志，里面还有那么一句：“并要为广大革命群众谅解之后”。

在会议休息的近一小时中，闻讯而来守候的革命小将一拥而上，狠狠地斗争了这个双手沾满了武汉三镇革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把他的反革命气焰打得落花流水，真是大快人心。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会上批判了陈再道，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武汉军区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指定在第一排“就坐”。

会议开始，周恩来主持会议，说“七二零事件”是“叛逆行为”。

听到常委会开始的这一宣判，对自己命运已有思想准备的陈再道和钟汉华，也几乎当场瘫倒在地。

谢富治首先发言说：“七·二〇”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吴法宪发言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

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吴法宪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据吴法宪后来交代，这天早上 4 点多钟，叶群打电话给他，要他开会之前和张秀川串连一下，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帅，同徐帅划清界限，让徐帅对“七·二〇事件”表态，把揪徐帅的“旗帜”抢到手，不要为三军造反派抹黑。）

徐向前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说完，徐向前写了张条子送给总理，离开了会场。

会上，陈再道申辩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他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人冲过来，抓掉他们五个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许讲话。

会议中间休息时，一些服务人员对他们五人进行武斗。总理在休息室听了秘书周家鼎同志报告，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且跑着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但这时人已经走掉了。

会议从中午开到吃晚饭，吃过晚饭又接着开。

陈再道说：“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

康生说道：“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康生说：党里有坏人，军队里也有坏人，张国焘、彭德怀、罗瑞卿就是坏人，是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煽动部队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中央、中央文革，也是解放军的败类，是解放军的奇耻大辱等等。

所有到会的人都发言表明自己对“七·二〇事件”的态度。

陈毅和谭震林没有发言，中途离开会场。

（据《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
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

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陈
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三军负责人出席

新华社（1967.07.26）

革命群众、三军指战员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讲话一致表示：坚决
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
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
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红旗飘扬，口号震天，北京全城呈现一派沸腾的革命景
象。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广大革命群众一百万人，
高举着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今天下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
行，并且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从武汉胜利
地、光荣地回到北京，回到毛主席身边，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
派。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中央文革小
组和其他方面的负责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
富治、刘宁一、江青、萧华、杨成武、粟裕、邓颖超、张春桥、王力、关锋、戚
本禹、姚文元、汪东兴、刘建勋、吴德、赵毅敏、叶群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同
首都百万革命群众一起，参加了今天的大会。

参加今天大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以及驻京部
队的负责人李天佑、王新亭、邱会作、萧劲光、王宏坤、吴法宪、郑维山、李天
焕、陈先瑞、傅崇碧、邝任农、王辉球、黄志勇、谭辅仁、刘华清、江文、张秀
川、黄作珍、罗元发、李真、叶运高、胡炳云，参加大会的还有在北京的一些军
区的负责人黄永胜、陈锡联、冼恒汉。

参加大会的还有，同谢富治、王力同志从武汉光荣归来的工作人员张根成同
志，以及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士井冈山、尹聚平、吴介之、胡慧娟同志。

首都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指战员，欢呼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回到毛主席身边、大力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活动，今天达到了新的高潮。从上午开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三支”、“两军”中取得巨大成绩的驻京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胜利前进的首都革命工人、革命农民、红卫兵小将、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结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从营地、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和机关，走上大街，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来自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同首都的战友一起，参加了游行和大会。革命群众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到处发出雷鸣般的口号声，向武汉革命造反派致敬，表示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誓与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在整个北京街头，无数面红旗迎风招展，无数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在空中挥动，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颗颗红心向着毛主席，他们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垮、批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大街，一片红色的海洋。天安门城楼正中高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广场上空升起的巨大红色气球下面，挂着用红色大字写的标语：“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归来！”“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下午五时许，林彪副主席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谢富治和王力同志，走上天安门城楼。这时，广场上红旗挥舞，欢声雷动。百万革命群众有力地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振臂高呼：“向谢富治、王力同志致敬！”“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下午五时半，大会宣布开始，全场三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一百万人齐声高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并且手捧红光闪闪的革命宝书《毛主席语录》，学习伟大领袖的教导。

随同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去武汉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士井冈山同志在大会上讲话。他热烈赞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战斗。他说，无产阶级反对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斗争的大风暴，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这是多么值得欢呼的大好形势！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威力横扫着江城！

他还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必然被革命的人民彻底打倒，受蒙蔽的群众，一定会觉悟起来，大杀回马枪。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武汉广大革命群众的后盾。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取得彻底胜利。

接着，首都工代会和农代会的代表徐铠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北京军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驻京领导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陆海空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全体革命文体战士的代表周维兴同志，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的代表王大宾同志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等同志胜利地回到毛主席身边，一致表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致表示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也在大会上讲了话，表示不把武汉地区那些党内、军内、政府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出来，斗倒斗臭，誓不罢休，一定要用战斗的双手，去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还说：参加过保守组织的、受蒙蔽的群众，一旦觉醒过来，就必然猛烈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所有的讲话都受到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鼓掌欢迎。人们不断挥动红光闪耀的《毛主席语录》，激动地高呼：“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大会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中通过了一项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的通电。通电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战的关键时刻，在举国上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群众性的大批判的新高潮中，你们在同武汉地区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一小撮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杀出来了。

大会通电以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向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致以崇高的敬礼。

通电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压不倒、吓不退的。你们在艰苦的日子里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了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毛主席又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通电说，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让我们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斗争矛头牢牢地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革命大批判运动推向新高潮。

大会在《国际歌》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随后，百万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排成整齐的行列，意气风发地继续举行示威游行。“百万工农齐踊跃”，“六月天兵征腐恶”。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歌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响彻首都上空。

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大会的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负责人聂元梓、丁国钰、周景方、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老民、鲁文阁、邓万田、李冬民，以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其他许多常委和委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有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杨奇清、李震、于桑、张本、唐平铸、曹轶欧、李广文、赵易亚、王唯真、金敬迈、萧孟、申健、李英儒、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金铁群、王良恩、康树集等，也参加了大会。

（附图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刘宁一、江青、萧华、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叶群等中央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与谢富治、王力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新华社记者 刘少山 张家骅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时刻，一个个地跳了出来，大表演，大暴露，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反扑。他们洋洋自得，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扑灭下去。

无产阶级的敌人要顽强地出来表演，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几个跳梁小丑，出来表演一番，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都是纸老虎，虚弱得很。让它们表演去吧！表演得愈起劲，就暴露得愈充分，也就垮台得愈快，愈彻底。看起来，仿佛是坏事，实际上是大大的好事。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进行的。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世界上最有权威、最有威望、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司令部。它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真理，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谁胆敢反对这个伟大的革命司令部，就一定要遭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革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的痛击，一定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一定没有好下场！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就是信任群众的力量，依靠群众的力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由于自己手中握有真理的旗帜，所以能够随时公开地向广大群众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动的方向，进行公开和严肃的斗争来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他们的立场坚定正确，他们的行动光明磊落。

相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一小撮，他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违背真理，因此，他们只能靠谎言过日子。谣言是腿短的，造谣造得愈离奇，就破产得愈快。他们妄图挑起群众武斗，他们搞得愈凶，就愈是脱离群众，使群众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一时受蒙蔽的群众，一定会醒悟过来，反戈一击，起来造他们的反。

我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三军指战员，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们就打倒谁！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永远坚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坚信毛泽东思想威力无穷，坚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向无敌。在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揪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从而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北京支持你们！》

昨天下午，在我们伟大的祖国首都，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三军指战员，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最热烈地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最坚决地声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参加了这次大会。

这次大会，体现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的关怀，显示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武汉地区战友们的最大的支持。

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武汉地区的战友们，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你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支持你们！党中央支持你们！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你们！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你们！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是天下无敌的，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尽管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还在耍出种种花招，玩弄种种阴谋，用残暴的手段进行垂死挣扎，但是他们终究逃不脱失败的命运。武汉地区“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已经极端孤立了，他们的失败是完全注定了的。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胜利一定属于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属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全国军民大集会大示威 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欢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利 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武汉地区代理人 全国军民大集会大示威庆贺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回京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新华社（1967.07.27）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连日来纷纷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欢呼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了毛主席身边。各地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满怀革命激情，热烈庆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滔天罪行，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黑龙江畔到云贵高原，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广阔土地上，这几天到处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到处都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怒吼声：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各地的盛大集会和示威游行，集中地表达了全国亿万革命群众钢铁般的共同意志：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连日来，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成都、哈尔滨、济南、青岛、太原、贵

阳、西宁、昆明、长沙、乌鲁木齐、西安等许多地方，都有几万、几十万以至百万人集会游行，表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大后盾。参加游行的人们高举毛主席巨幅画像，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千遍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参加集会游行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指出，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将继续引导全国革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坚定地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更加猛烈的总攻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今天，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驻军陆海空三军五十万人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来自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也参加了集会和游行。几十万革命群众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当大会在大雨中开始时，全场三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高唱《东方红》。驻军负责人刘政代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天津市驻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在大会上讲话，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和决定，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天津和武汉地区的革命派代表也讲了话。会后，五十万革命群众和陆海空三军排着整齐的行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和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驻成都部队六十多万人，今天下午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党中央派谢富治、王力同志到武汉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最大关怀和支持，也是对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巨大鼓舞。我们成都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强烈谴责和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滔天罪行；以最大的决心，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司令员梁兴初，四川省

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副政治委员刘结挺，以及其他负责同志和革命群众的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一致表示，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支持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斗垮斗倒斗臭，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哈尔滨，过去几天已有三十多万革命群众和驻军指战员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今天又有三十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万春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配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新反扑，对抗党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说明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已经达到疯狂的程度，同时也说明这是他们末日来临的垂死挣扎。哈尔滨市各革命群众团体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代表也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一致表示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

在济南市和青岛市，昨天和今天分别有三十万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举行盛大集会。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效禹同志和济南部队负责人杨得志同志，在济南的大会上讲了话。他们指出，山东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军广大指战员，坚决地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声援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他们一致认为，不管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斗争多么复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会后，革命群众在通衢大道上举行了示威游行。解放军指战员同时举行了威武庄严的武装示威游行。

山西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工农兵革命群众，连日来纷纷举行游行集会，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滔天罪行。今天，太原市又有十多万革命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人民解放军驻山西部队的指战员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表示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在发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中指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垂死挣扎，他们决

不会有好下场。

青海省西宁地区“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和在“三支”、“两军”中作出贡献的西宁驻军指战员，连日来举行了规模盛大集会游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刘贤权在今天的大会上讲话时表示，青海军民将永远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参加大会的广大军民一致发出誓言：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旗帜，口诛笔伐，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确保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贵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军指战员，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连续举行了分别有十多万人参加的大会和游行示威。昆明部队副政委、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再含同志在一次会上讲话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在进行最后的挣扎，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革命大批判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彻底肃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各条战线上所散布的一切流毒，把它们彻底打倒。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昆明部队指战员和昆明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三十多万人，二十五日下午在昆明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人民解放军驻昆明部队指战员表示，坚决和云南省、昆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并通过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昆明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们，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共同表示，一定要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共同对敌。

长沙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长沙驻军十多万人，二十三日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驻军代表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都在大会上讲了话。驻军代表在讲话中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坚决把他打倒。会后，参加大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二十四日下午，新疆的各族革命小将，各族革命工人、革命干部和市民群众，在乌鲁木齐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群众高举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

像，手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不断振臂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代表们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不管我们面前的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一定会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喜讯传来，西安地区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连日来纷纷集会游行，欢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集会上发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出，我们从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深刻地懂得，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最关心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最能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愿望。他们表示，一定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批臭，使中国革命永远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

这几天来，呼和浩特、郑州、广州、重庆、沈阳、长春、南宁、福州、杭州、合肥、南京、南昌、兰州、拉萨、银川、保定等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以及许多地方的驻军指战员，也纷纷举行集会或游行示威，欢呼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并且表示全力支持武汉地区革命派的斗争，誓作他们的强大后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编辑部《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巨大支持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他们在两个阶级的大搏斗中，取得了新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愈战愈勇，愈战愈强，愈战愈有智慧。受蒙蔽的群众一批又一批地起来造反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越来越孤立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威力，震撼着武汉三镇。这是值得我们热烈欢呼的大好形势！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还要经过艰巨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决不能因为形势好转，而松懈斗志，忽视斗争策略。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斗争越是尖锐，越是复杂，就越要注意这一点。

摆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群众还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一时做了一些错事，是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欺骗和蒙蔽下干的。我们要把仇恨集中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身上。要欢迎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孤立、彻底垮台、彻底灭亡的重要条件。我们要对受蒙蔽的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政治思想工作，把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就能彻底孤立敌人，使敌人陷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团结就是力量。在革命胜利前进的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派特别要注意加强内部团结。敌人并没有最后灭亡，他们还在拚死挣扎。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更好地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紧紧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他们的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你们做得好，做得对！你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你们为人民立下了新功！今后要永远和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心连心，肩并肩，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你们要坚决保护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支持他们，和他们一道，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同志们，让我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的新胜利！

（载《解放军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上海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最热烈欢呼谢富治和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 上海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新华社（1967.07.27）

驻沪三军指战员和上海革命群众誓同武汉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混进武汉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

新华社上海二十六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和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一百万人，今天隆重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和游行，最热烈地欢呼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大会集中地反映了上海革命人民的坚强意志：最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方面的负责同志出席首都百万军民支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的喜讯传到上海，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指战员和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受到了极其巨大的鼓舞。他们激动地指出，这是毛主席对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的关怀和最大的支持！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

今天，在上海这个红色的城市，从白天到夜晚，人如潮涌，歌声震天。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英姿勃发，斗志昂扬，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中心人民广场。人们举着毛主席画像，手捧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唱毛主席语录歌，不断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向谢富治、王力同志致敬！”“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的斗争！”“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万岁！”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廖政国、王少庸、马天水、李彬山、高志荣、姬应五、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陆文才、陈琳瑚、冯国柱、李研吾、朱锡琪等参加了今天的大会。

参加大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负责人李世焱、刘文学、饶守坤、梅嘉生、王维国、余光茂、陈士法、张宜爱、吉世堂、谷红、谢正浩、李宏钧等。

出席大会的还有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在上海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李世焱代表驻沪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在大会上发言。他说，正当全国掀起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大批判的新高潮的关键时刻，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挽救其灭亡的命运，竟然操纵武汉地区“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疯狂的反扑，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但是，他们的反扑，只不过是阶级敌人的垂死挣扎。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上海市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在发言中最坚决地表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及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抡起无产阶级的铁拳，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这次曾经随同谢富治、王力同志到过一些地区，了解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文汇报》邵传烈同志，在今天的大会上极为兴奋地说，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思想的新曙光，照亮了长江岸边的江城。武汉地

区革命派战士越战越强。受蒙蔽的群众已经开始觉醒起来。那些反对毛主席的人，越来越孤立了。我们最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在上海，要拿起笔作刀枪，和他们并肩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在大会上介绍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他表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永远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以更加勇猛的姿态，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乘胜追击，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大会上的所有发言，都受到百万军民热烈的鼓掌。

接着，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给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援电。声援电说：“武汉地区革命派战友们！你们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你们！党中央支持你们！中央文革支持你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你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全体指战员支持你们！全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你们！”声援电强调说：“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都是呼吸相通，患难与共的。你们和我们共饮一江水，是我们亲密的战友和阶级兄弟！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与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不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不彻底打倒混进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誓不罢休，决不收兵！”

大会结束以后，由驻沪三军指战员乘坐二百多辆大卡车为前导，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大游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和驻沪三军负责人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了游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粟裕传达中央扩大会议斗争陈再道的情况

〔中央扩大会议时间：7月26日12：—00—21：00，传达时间：7月27日上午。参加人员：在京中央委员、军委常委、各大军区负责同志。〕

这次从武汉共来了五个人：陈再道、钟汉华、8201部队的牛师长、蔡政委、武装部长。住在京西宾馆，前两天北京同学到宾馆去揪陈，冲上了九楼。谢副总理出面做了工作，才没再揪。

武汉白色恐怖由来已久，陈再道大批抓人，已抓起来 500 多人，并竭力散布对中央的不满，他们反对毛主席发动和支持的夺权斗争，军委八条也不传达，恶毒地攻击总理，他支持组织“百万雄师”，这个组织共九个头头，其中有四个是 8201 部队的负责人，如牛师长等，还有武汉杂技团的夏菊花、王玉珍，市委组织部长辛甫等。他们从 1 月开始就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立。就是在中央的“六·六”通令下达后，他们还大肆挑起武斗，陈再道提出的以武斗制止武斗，彻底消灭革命，六、七月份武斗最厉害。

周总理在 7 月 14 日去武汉处理这些问题，对双方做了工作，当时造反派表现很好。谢富治、王力等同志从昆明抵武汉（7.15）后，总理委托谢、王留下；继续处理一些问题。总理返京后，谢、王分别接见了造反派和“百万雄师”。20 日开会时，谢、王指出“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场牛师长跳起来指责谢、王，后来派来独立师（8201）包围会场、闹事，并绑架了王力同志，殴打谢、王，王力同志一只眼睛被打充血，身上打青多处，一只脚被打骨折，还把王力同志、北航红旗战士扭去游街，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三点。21 日，陈再道还派保卫科长和两连战士监视谢王，后来谢、王对保卫科长做了工作，他觉醒了。绑架王力的一个营长也觉悟了。他们表示要用生命保卫首长。东海舰队闻讯调了十艘军舰开进武汉。这时杨代总长交待陈再道，必须绝对保证王力同志的生命安全。在斗争王力时，陈再道还向谢副总理施加压力说：“这次我是无能为力了，看你们的了！”

中央得知消息后，周总理亲自带两架飞机（一架周总理坐，另一架准备接谢、王等人）周总理秘密通知军区，别人是不知道的。但在周总理专机离武汉 100 公里时，陈再道派了 25 辆汽车，载着“百万雄师”的人和战士，亲自到了机场，当时空军发现情况不对，马上给总理拍电报，改降在另一机场，另一架空机降在原机场。陈再道一看没有总理，他说要“欢迎”，实是想扣留总理。陈的秘书说，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武汉，就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陈再道真是嚣张之极。

这次会上，很多人揭发了陈再道，粟裕代表国防工业部揭发了陈。河南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发言吞吞吐吐，总理制止说：“叫你来是要你揭发问题，你不想说就不要说了。”

这次总理表扬了转变过来的保卫科长，独立师的营长、两连战士和空军，在会上大家谴责陈再道：你为什么反对中央？他只答：我是个老粗。

陈再道一直对中央不满，在八届二中全会没被选为中央委员就怀恨在心。他对中央精神不传达，他搞的完全是张国焘那一套。那个牛师长本来是广州军区不要的，他拉去任独立师师长。

这次武汉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治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这件事，是很严重的。要把陈再道斗倒、斗臭，会上已定陈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次他在武汉蒙蔽了許多人，流毒很广，要尽快消毒消毒。现在要向“百万雄师”做工作，同时也要向革命派做工作，一定要维持革命秩序。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武汉市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农兵，一切忠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忠于我们伟大的党的事业的指战员们！

近几日来，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我们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的轨道上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当然，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妄图

垂死挣扎，还妄图镇压。因此，你们不能粗心大意，要千百倍地保持高度的警惕。

你们要善于团结一切群众。

你们要善于启发、教育一切受蒙蔽的人。

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都要欢迎他们，并肩战斗。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

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查办。

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绝对不是孤立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属于广大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属于我们的伟大的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属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党中央号召：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来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号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武汉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谈在武汉的亲身经历
同志们，这次和谢付总理、王力同志到武汉，做了些应做的事。这首先应归功于毛主席的教导。

今天X X X同志们要我来讲一讲，没有准备，也没有稿子，讲嘛，主要是在武汉经历的事情给同志们介绍一下。在讲的过程中，可能有错误，希望同志们予以批评。

这次到武汉，武汉的形势是怎么样的呢？武汉地区的革命左派，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确实展开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勇猛夺权，他们也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当然，那时夺权，还没提大联合和以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革命小将在当时情况下的大方向，应当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待。当然在武汉就不是这样罗。从那时就镇压造反派，打击造反派。五月份《百万雄师》成立。《百万雄师》是怎么搞起来的呢？基本上是总结了四川、内蒙的一些反革命经验。一个是 8201，也就是独立师，一个是公、检、法系统。再一个是武装干部、武装部这一些。武汉军区连续发表了几个声明，解散了工总。凡是不属于《百万雄师》

的统统都赶走。他们在汉阳还有一条“先进”经验。就是把造反派统统赶出去，而且还要推广。太恶毒了。

在武汉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在武昌，有几个主要的大学，这些地方造反派叫做解放区，汉阳，因为把造反派赶走了，是清一色的《百万雄师》，造反派叫敌占区；汉口呢？《百万雄师》势力比较大，造反派有《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造反派叫游击区。其实也不是这样。实际上是形成了几个红色据点。有华工、湖大，水利电力学院，还有几个，都是武装保卫。因为不是这样没别的办法，造反派叫“文攻武守”。我们在到华工的时候，很远就被卡住了，长矛对准了我们。问我们是哪儿的，是不是军区的。我们说不是，问是不是支左办公室的，我们说也不是。他们一看，知道是中央来的人，这一下围了很多人。革命小将一看中央来的人，眼泪刷刷地向下淌。我们的造反派非常可爱，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一直不散。去以后，准备先听军区的汇报，然后听两方面谈，包括《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的。然后准备通过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犯错误的回头转意。以后召开扩大会议，师以上的干部；29 师的，空军的都参加。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研究确定重点做军队的工作。军区的好同志，要求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要求中央首长作报告。十九号下午，在军区大院作报告，二级部长以上的都参加了。王力同志主要讲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如何同彭、罗、陆、杨作斗争，如何把刘少奇揪出来，通过这些，让他们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重大意义，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通过听报告，一些同志反映很好。军区大院的战士，两次围到楼前，有四五百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两次去见这些同志，这些同志表现很好，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学习！”武汉军区绝大部分同志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只有少数坏人，蒙蔽群众。十九号晚十二点同到住地。这个报告从下午两点到十一点作完。回住地以后不久，有公、检、法三辆车子，冲到住地第一道门，带有支左办公室的介绍信，一直冲的。我们住地有两道门，第一道与第二道之间有一里路，第二道门离住的地方约有八、九十公尺。在住地警卫的部队是独立师的；我们住地周围负责军管的，也是独立师的。三辆车冲进去后，我们报告军区，一定要劝回去。我们说：今晚就要见“百万雄师”的代表，听你们的意见。从十

二点劝到三点，无效。当时我也出去帮着讲。他们说：“我们来就是准备闯祸的”，我一听不对头。到四点钟，因为他们仍不撤，我就打电话给陈再道、钟汉华，叫他们来商量事情。在这以前四点左右，军区大院同时有七十部车把军区占领，要找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要澄清，工总不能翻案，支左大方向是对的。陈再道一进门对我们讲：“看你们去做工作了！”当时没理他，后来一想，他讲这话有原因。当时群众喊打倒陈再道，我们讲不要打倒，就是说要保一保，只要改就好。陈再道说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不要你们保，我还要保你们呢！陈再道进门后基本上没讲话。约二十分钟后，即五点钟，突然冲进来三十多个人，手持大刀长矛。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当时在屋里谈话，他们进一道门，二道门到楼里，我们一直不知道，到了门口才知道。我和北航的几位同志，走到外面将他们挡住。这些人都戴个口罩，拿着梭标、大刀，气势凶凶。我们让他们坐下来，慢慢谈。他们说要找王力，到军区大院去。我们一听不对头。这时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出来，谢副总理说：“我就是谢富治！”王力同志说：“我就是王力”。他们说：“到军区大院去！”谢副总理说：“你们难道要绑架不成？”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下了楼，走到院子里和他们谈。形势很紧张，我就把机密文件转移了。我出去时，《百万雄师》的人和王力谈话，开始他们听不进去，谈了一会，他们感到还有道理。在这时，突然冲进很多战士，端着冲锋枪，有的端着刺刀，也有机枪，还有提着手枪的。一来就喊：“把王力揪出来！”因为在武汉王力同志讲的话比较多，观点明确，他们一开始，矛头就对准王力，要揪王力。我和北航二十几个岁的女孩子在王力周围，保卫王力。这时，有几个人，他们就一个个拉、打。我抱住王力，向屋里拥，因为外面人多，拥到屋可以谈；一进屋，从后面过来一些人，我感到问题严重，就喊：“王力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你们要犯大错谈的！中央派的人你们这样对待，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的人！”我喊了十来声，从我后面过来一人，掐住我的脖子，我喊不出来了。四个人把我架到旁边，又推又打。我说：“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派来的”！不说还好，一说一下子又来了二十几个人，又推又打，手也曾背上了——坐上飞机了。此时王力被架走，一边打一边推着，从此就和王力分开了。

分开后，把我架上了车，又是打、推。主要是骂，说什么：“中央文革干了些什么事？把八十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在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

放军打成保皇派！”当时一看，性质变了，我一句话也不说了。思想上做了准备：第一，不变节，第二，准备牺牲。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准中央文革；把问题提到那样的程度，讲什么也没用了！在这过程中，一边斗，一边骂。还让我戴“百万雄师”的袖章，我把手背得紧紧的，他们没拉开。当时他们给我戴袖章，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的侮辱。

以后就开始游街。载我的是第一辆，后面有几百辆全副武装的。战士坐的上面架了机枪；两旁都摆满了，除军车外，其余的上面全是梭标。车前头还放一排梭标，比汽车还长，完全是法西斯！上午六点开始。下午三点，谢副总理、于立金同志，知道这是独立师搞的。就下命令给独立师，说如果不把人给送回来，一切后果由独立师负责！下午三点，把我送到独立师师部。两个人看着我，一边一个。一下车，我问到那儿去，他们说。到地方就知道了。到独立师师部一进门，有很多人，有军人，有百万雄师，有便衣。听他们讲：“听说周总理、陈伯达要来”有人就说：“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这是非常反动的。到后来，师政委出来了，叫蔡炳臣。他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认识这个人，坏透了。我一定要他把北航的三位词学找到。北航的三位同志很勇敢，把我架去后，就向我坐的车上冲。他们说：“死也死到一块！你们走了，我们不能留下！”冲上来后，我说：“一定要下去，不能去！”他们下去了，一想不对，又冲。我让他非找到不可，当时他问是在哪辆车上坐的，我给他讲过后，他打电话问。从他打电话可以看出，那天出多少车，哪些车在哪里，有多少人，车上的人是哪个单位的，他都一清二楚。这时，我要求到王力那儿去，因为我知道王力在军区。他说军区有几千，进不去。我要求打电话，他说打不通。我问他王力在什么地方，他说在宣传办公室。我说，我就要宣传办公室。他看不行，就要电话。一要，通了，就是王力在的地方。那里人很多，接电话的是一个保卫科长。这个保卫科长原也是百万雄师观点的，因为王力同志给他谈过几次话。特别是有一件事对他教育很大。有一次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在群众大会上检讨自己的错误，说在支左中犯了错误，今后一定要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就这几句话，造反派群众流出了眼泪，坚决拥军。因为空军也是执行了陈再道的那一套，在河口地区，解散了工总，扶植保守势力。空军认识

到了，检讨了仅仅几句，造反派就非常欢迎。这个保卫科长看到，造反派最讲道理，他们绝不是把犯错误的干部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打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因此，决心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同造反派一起战斗。我问保卫科长，王力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我要去，他说：“不要来”。我一听，觉得王力那里很紧张，要去。姓蔡的这个政委说去不了，就走了。他一走，两个人又把我看起来，一个是作战科长，一个是干部科长；边问边骂，实际上是审我。问我，王力的爱人是否在华工当教师，我说，这简直是荒唐。他又问，我不理。他又骂，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非常荒唐。就是用这些煽动群众！我面对面看着他，看他还讲什么谬论。在这屋里还有一个师指挥部的政委，连裤子都没穿，仅穿个裤叉、汗衫。后来进来一个人，问这个人王力那里情况怎样，他说还根紧张。这位指挥部政委非常傲慢地说：“王力不是很轻松吗？”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王力在谈到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时曾说过：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他们会回心转意的。这个政委这样说，完全是挖苦性质的，后来这位师政委骂了一通，我不理他，最后他走了。我的事暂时说到这。

再说王力的情况。王力被绑架到军区大院后，百万雄师对他进行了人身侮辱和殴打。把领章给撕了，军帽拿走了，军衣扒了，上衣下衣都扒了。这还不够，王力同志里面还穿一件象这样的衬衣，也给了。这已到头了吧？不！最后把王力仅有的一件汗衫也扒了。后来换的短裤也是借别人的。百万雄师用带钉的鞋踏王力同志的脚，王力当时鞋也没有了，脚趾骨被打碎，现在打上石膏了。一直斗到下午四点钟，在这过程中，有些人跑到楼上，用碎玻璃打王力同志。有人用拳头专打太阳穴，所以王力同志的眼充血很厉害。膝盖软骨被打伤，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当时有的要用刺刀刺，有的要开抢。这过程中，军区保卫队有五、六个人，开始也是百万雄师观点的，后来由于百万雄师这样的表演，觉悟了，暗藏着保护王力，把这些都挡开了。不然的话，王力同志就很危险了。

在这期间，他们还逼王力同志签字，要王力同志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派组织，是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工总是反革命组织，不能翻案。王方同志一直坚持说：武汉的问题还要和各派谈，要由武汉市的人民作结论。（口号：向王力同志学习）

这时，北京来电话给百万雄师，说说武汉的有些问题如果不能在武汉解决，也可以到北京来解决，他们说，没有什么问题要到北京的，武汉的问题就在武汉解决。他们也知道，到北京没有他们好吃的果子。陈再道一直没到军区去。一开始，架王力时，把他当成王力打了一拳，这一下他可有理由了，躺在地上不起，装死狗。把王力架走了，这么严重的情况，他连动都没动，一句话也没说，就这么坏！（打倒陈再道）陈再道到下午四点，没采取任何行动。钟汉华到了军区只是个窝囊肺！人家不理他，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看样子不行了，谢副总理、余立金同志要孔庆德、二十九师师长、政委马上想办法救王力同志。后来用部队把路趟开，从后门转走，送到二十九师师部。本来，百万雄师、独立师都不知道，一下子把路趟开，就转走了。准备在这休息一下，再转移到安全地带。后来不行了，发现他们已知道了。二十九师师长、政委，还有那个保卫科长，提议干脆马上转移。于是用两个连的兵力保护，向山上转移，本来想转移到山洞里去，后来发现他们也知道了那个山洞，就只好向山上转移，王力刚走，“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就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以后开始搜查，都搜遍了，洞也搜了。没找到就开始搜山。当时情况非常紧张。王力他们只有三人。二十九师师长回来取东西，被围，出不去了。本来是准备从山上再转移到水利电力学院，因为那是解放区。后发现路口被挡死，用卡车挡的。到处是他们的人，很危急。王力同志就在山上打游击，和他们转山头，一直转。他到这里，王力就到那儿，一直转到第二天天亮。武汉当时非常热，他们百万雄师休息，王方同志几个也休息。这时，二十九师政委想到这个山上还有两个排，就偷偷地向那两个排做工作，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什么，应当怎样对待中央派的代表。二十分钟，战士们痛哭流涕，这两个排的每个战士都写了决心书，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王力同志的安全。以后，把王力同志转移到这两个排这里。

再说那个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在机场把北航一女同志转移到了安全地方，问那女同志王力有什么生活习惯。他说他进山去找王力，在那里可以照顾一下王力，因为进去就可能出不来。刘丰用两辆卡车，进了山。事先大车，小车是计划好路线的，王力的吉普车在中间，前后是大卡车，向外冲。王力刚一走，有人喊：“王力跑了”。当时刘丰很激动，猛地把吉普车开到大卡车前，跑了。大卡车仍按原路线走，百万雄师去追大卡车，王力同志方才脱险境。转移到空军一个营，这里

比较安全，周围都是他们的人。早晨四点钟车上打起红旗，装做游行的样子，把王力同志转移到一个机场去了。到这里，王力同志才安全脱离险境。

他们还成立了专揪王力的联合指挥部(口号：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然后大造舆论。这个指挥部就在军区对面铁道局。他们造谣说周总理陈伯达指示了，王力说的话不算数，同意在武汉斗争王力……，造的谣非常多，来蒙蔽群众。后来又在武汉造谣言，进行大搜查，说王力还没有跑出武汉。后来我从独立师师部回到住地，首先把独立师遇到的听到的向家里汇报，再就是销毁机密文件，准备第二次被抓。再就是跟我们一起的一个女同志被抓走，我托空军同志把她转移到机场。当时她不走，她说，死也要死到一块，王力同志不知哪里去了，我不能自己走。后来把她拖到车上。三点到机场。六点钟它又步行近二十里回到水利电力学院。开始她准备闯百万雄师的总部，后来想那是自投罗网，才决定到水电学院找造反派同志一起想办法。走到水院刚好遇见尹X X，北航的尹X X是怎样到水电的呢?王力被抓到军区大院时，它拚命想进军区大院向王力同志靠拢，后来钻不进去了。这时有一个小孩告诉他说：“有人把你盯上了，你赶快走”。于是她回到了水电，向家里汇报情况。

他们两人(北航的)在水电学院造反派的帮助下——水电学院的学生在暗中保护他们回到住地，看到他们来了，我们都高兴得跳起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就准备百万雄师他们来第二次。我们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分些人守，第二道是把些椅子、沙发堆起来，准备斗了。

后来他们又几万人全部包围了我们的住地。这时谢副总理、于立金同志就打电话给陈再道，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搞，你要负完全责任!”陈再道的秘书就打电话给《百万雄师》说：“现在你们应该撤了。”结果《百万雄师》就撤了。

《百万雄师》三点钟包围我们，四点钟打的电话，五点钟就撤了。这说明他们完全听陈再道的指挥。

当时已经很清楚，——我们是撤不出去了。另外我们还有两个人没有回来。我们也睡不着，坐在一起想。把王力安全救出以后，我们才能离开这里。当天晚上知道王力同志已安全转移，就准备撤退。这时已很困难。在包围的同时，他们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就是想一个夜晚把我们周围的所有学校搞掉。在我们撤退前三个小时，把湖大全部占领了，有《百万雄师》，也有独立师的，开了五十

多枪。这边是湖大，这边是水利电力学院，这一边是武大。武大很高，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可以看到。他们准备占领了武大再搞医学院，医学院也是造反派，那样，就离我们更近，就全部被他们控制。另外，在大东门，他们摆了五辆大卡车，大卡车上装满人，都拿着很长的长矛。我们要走的路，都堵死了。这怎么办呢？当时设想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搞直升飞机，一个就是让能走的走，我们能冲出去就冲出去，最后，想了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用部队掩护着出去。当时就从二十里外的机场调来七辆卡车——七辆还是六辆我记不清了。车上装着人，打着红旗，摆上标语牌、毛主席像，装作游行的样子一直冲到我们住的院子里。一点四十五分到的。以后，我们就把吉普车夹在两辆大卡车中间浩浩荡荡冲出来了。

出去后，我们走的是小道，是空军侦察好的，没过长江大桥，从郊区绕过去的。但就是这样的小道，他们也派了人。不过当时他们看到又是军车，又是游行，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我们就过去了。到机场后他们打电话，问是哪个部队的，我们说是到郊区搞生产的。五点钟和王力汇合。以后我们就坐飞机转移到另一个机场。然后找到陈再道和军区的他们的人，对他们说，第一，武汉有几个造反派，要派部队保卫，而且、要空军保卫，因为在武汉有二十九独立师，其余就是空军比较多。第二，因为他们把我们的记者都抓了，打了。所以一定要放，送到二十九师，要二十九师保卫。我们和王力一起休息了一下，就回来了。

过程就是这样，介绍完了。

这前前后后，说明了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反革命暴乱。他们攻击的目标，并不是王力我们几个。他们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指向毛主席，指向中央文革的。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这样搞，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知道，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一到武汉，广大革命群众就要造他们的反，他们的地位就要动摇，《百万雄师》就要破产。所以他们就采取法西斯暴徒那一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马上要在武汉占领全部阵地，他们看到自己的灭亡已成定局。毛主席的革命线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要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他们不得不作最后挣扎。坏人只是少数，只是《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后来也可以看到，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他们的反。武汉地区，有一支非常好的革命队伍，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这支队伍是久经考验的，不怕流血牺牲的。有了这支队伍，就是我们的希望。

现在还有一些部队向他们提出了警告，起来造他们的反。《百万雄师》已不是他们所说的百万雄师了，已变成狗熊了。《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已起来造反，内部头头也在分化。一派说他们错了，另一派要坚持到底，当然最后一定完蛋，一个也跑不掉的。武汉形势很好，当时我们看到武汉是那个样子，由于他们的这样的表演，武汉的形势变得比其他地方的还要好。一是武汉地区有非常强大的革命队伍，再加上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他们都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他们一时受蒙蔽，当他们一旦觉醒，自己也会把他们的头头揪出来，。昨天中央的两个文件就像氢弹一样在武汉爆炸了，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口号：毛主席万岁！打倒倒刘、邓、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昨天，武汉地区驻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决心掀起一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这个会开得好！它表明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表明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胜利前进。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长期白色恐怖下冲杀出来的。他们不畏强暴，艰苦奋斗，一往无前，冲破了重重阻力，经受了严重考验，英勇地坚持和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创造出今天这样的胜利局面。在最近这场两个阶级的大搏斗中，他们又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好样的！他们不愧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硬骨头！

我们向在惊涛骇浪中锻炼出来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致以战斗的敬礼！

在一派大好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清醒地看到，要夺取彻底的胜利，还要准备进行艰巨的斗争。但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胜利一定属于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我们完全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有勇气、有智慧、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的，是一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把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打倒的。只要他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提高斗争艺术，就一定能够夺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受蒙蔽的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一定会觉醒过来，反戈一击，也一定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对受蒙蔽的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今后要继续坚持这样做，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

紧紧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的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你们一定要紧紧地站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急他们所急，想他们所想，全心全意地、满腔热情地、毫不含糊地从各个方面支援他们，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去夺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人民作出新贡献！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在河南湖北两省军队干部斗争陈再道大会上的讲话

〔七月二十八日十七点三十分至二十九日凌晨四点，河南、湖北两省军区和两省驻军在京西宾馆召开了批判斗争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延的大会。会上群情激愤，怒不可遏，愤怒声讨了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滔天罪行，大会由康生同志主持，中央负责同志陈伯达以及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刘建勋、曹轶欧同志出席了大会，康老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康：现在开会了，河南军区、一军和驻军领导干部来开会，揭发反革命分子

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同志们要求陈再道、钟汉华彻底交待问题，同时揭发陈再道、钟汉华反革命罪恶。河南军区是武汉军区领导的，我一接触到河南问题，就觉得与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有关系，武汉问题不解决，河南问题就解决不了。河南有的人不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而是听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的话。武汉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经常打电报、打电话同河南军区某些人保持密切联系，同样一军方面也是这样，徐文礼同志知道得很清楚，那天揭露了一些，今天这个会要开好，大家要进行揭露，刚才报名发言的名单，武汉的，两省的，驻军的同志都有，又开好了，徐文礼同志先讲。

何运洪发言后，吴法宪司令员讲：你到现在还不老实，你同陈再道、钟汉华搞的什么勾当，在文化大革命中，你们电报电话来往多的是，你一手遮天，不听毛主席的话，听陈再道的话。你们的总后台是刘、邓、陶、王。你反对毛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的同志，把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捧上了天，听他们的，不听毛主席的，陈再道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策划叛乱第二天晚上，你兴高采烈，不去参加会。

当陈端、彭辉等同志揭发何运洪的问题后，吴法宪司令员讲：本来将给何运洪一个机会叫他揭发，他不揭发河南的错误。同武汉一样，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是一样的！造谣诬蔑中央文革是一样的！搞武斗镇压造反派是一样的！在办公大楼筑工事堵门窗是一样的！顽固坚持错误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没有搞“七·二零”事件，因为他到中央来了，如果中央首长到河南同样要被围攻、绑架。

当李国秀同志发言时，康老讲：李国秀同志请你检查一下，你是执行何运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是支持了造反派，还是支持了保守派？新乡武斗这么严重，你们分区有没有责任？

（李答：我们有错误，我们要向毛主席请罪。）

你反对不反对百万雄师？

（李答：反对。）

你发表声明了没有？（李答：没有。）

你看你们把新乡八·一八搞成啥样子，武斗搞成啥样子，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工具破坏楼房，这是什么行为，我讲过这是反革命的行为。

（吴法宪司令员插话：你既不检查自己，又不揭发别人。）

你揭发自己嘛，不要讲空话，要讲具体的，你们新乡还动枪了。

（李答：没有）

在河南会议上你彻底检查好了。你们这个地区可以看到何运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但你们省军区的同志总是不愿讲这个，不愿交待这个。武汉还没有动吊车拆房子，这个问题是严重的，你的问题作为河南一个题目，专门在河南会议上去讲。

当余嗣贵同志发言时，康老讲：在我们着手了解和解决河南问题时，就感到有一只黑手从武汉军区伸到了河南。武汉问题不解决，河南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因为何运洪等人一面对抗主席、中央的指示，一面接受陈再道、钟汉华等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现在情况大家看得很清楚。因为这样，我们同意，总理也同意，把武汉军区杨秀山同志带到北京来，叫他来干什么，不是叫他来主持河南会议的。是要他来看武汉错误在河南造成什么结果，不是要他代表武汉军区来领导河南军区、一军的文化大革命和工作的，杨秀山同志，我今天向你说明这点。我刚才接到一封信，对杨秀山同志发言反映很不好，认为态度很不正确，同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没有划清界限，对杨秀山有很大的怀疑，并揭发了如下事实，说杨秀山十九号到北京以后，同河南驻军一些领导人谈话时，极力美化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说是总理到武汉提出武汉军区的错误后，陈再道、钟汉华检讨得很好。给人一个印象，武汉军区转变得很快。因时间关系，我不多说，这封信的下面有这个建议：杨秀山不能再继续主持河南的会议，我们接受同志们的这个建议。现在武汉军区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杨秀山不需要再参加河南的会议了，更不需要他来主持河南的会议，自己回武汉去检查去，仔细检查自己，检查划清界限，检举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在党委会上，有的人反对中央文革你表态了没有？

（杨答：我说了，我不同意，但没有坚决反对。）

有错误检查好了。还有的同志说，一军的错误，杨秀山是有影响的。

余嗣贵发言当中，吴法宪司令员插话：你也是何运洪的帮凶。当余嗣贵讲到在北京汇报期间何运洪同陈再道经常有电话联系时，吴法宪司令员插话：他联系的什么，给你讲了没有？

（余答：他没有给我讲。）

你和他关系那么密切，他不给你讲？

余嗣贵同志发言结束时，康老讲：你对自己的错误一句不讲好不好？

（余答：我现在检查一下。）

你到河南会议上去检查好了。

当魏家祯同志发言念毛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时，

康老讲：这个语录对你最合适，你实际干些什么，你怎样支持保守派打二七公社造反派的。不要说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了，你检查你自己。

（魏：我还没有准备好，要检查可以，检查不系统。）

你自己对检查错误还没有准备好，你来北京开会干什么？你在背后指挥武斗没有？

（魏答：没有。）

将来叫群众问你好了。

当魏家祯揭发郑州武斗的严重情况时，

康老讲：我问你一句，你在郑州饭店召开过铁军负责人会议没有？

（魏答：没有。）

你讲过二七公社是反动组织没有？

（魏答：没有。）

你讲：二七公社、河造总是造反派，铁军是保守派，我想不通，讲过没有？

（魏答：没有。）

你换上便衣同十大总部一起指挥武斗没有？

（魏答：没有。）

军区承认错误，你的态度怎样？你支持过铁军没有？

（魏答：没有。）

你支持过工人总部没有？

（魏答：我讲过国棉三厂东方红是造反派。）

你的回答说明了一条，就是语录讲得满好，实际行动恰恰相反，你在河南会议上要彻底检查交待。

会议结束时，康老作了指示：

今天会议开得很好，大家反对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的滔天罪行，表示极大的无产阶级的义愤，这表现了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最可信赖、最可依靠的，暴露了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愚弄欺骗人民解放军，必然碰得头破血流。在这里，今天的会议以及前天的会议，同志们可以进一步领会毛主席所讲的武汉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反革命叛乱事件，可以使全党全军从中得到教育。得到些什么教育呢？

首先，从我们会场上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军内来。有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曾经说过，军队没有阶级斗争。同志们，从今天的会议上清楚地看到了，阶级斗争在军内尖锐地存在，以致发展到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举行暴乱。正如林副主席所讲的，一切问题要从阶级斗争、阶级观点来看，离开了阶级斗争和阶级观点，就看不清任何问题。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代表了敌对阶级向我们进攻，绑架、殴打谢富治、王力同志这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报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钻进党内，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是极端的仇恨的。同志们高喊打倒刘、邓、陶、王，打倒彭、罗、陆、杨，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是完全对的。这反映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愤怒的回击，这代表了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声音。

二、少数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维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公开诬蔑中央文革要搞垮人民解放军，他们狂妄地说你们到底要不要解放军，如果不要解放军，我们就回家去。同志们，你们看到底是谁要搞垮解放军，是谁不要解放军。真正爱护解放军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的同志。象刘、邓、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人要瓦解人民解放军的，不要人民解放军的。

三、一小撮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造谣诬蔑说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同志们清楚，这完全是诬蔑。谁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发动的，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能有这样震动世界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吗？他们讲这话的意思，才是不要党的领导，而是要的刘、邓那个党的领导。难道要刘、邓那个黑党的领导吗？陈再道是党委第一书记，钟汉华是第二书记，我

们是否要他们领导的这种党呢？反革命分子是要刘、邓的党，陈再道的党，我们能允许吗？！（众答：不能。）

四、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恶毒反对文化大革命，恶毒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造谣说文化大革命尽是整几个老干部，他们好象代表我们老干部，质问说你们到底还要不要老干部？他们妄图在那些思想意识不好的、对党有怨气的老干部中间进行煽动。我们要问要什么样的老干部，离开阶级分析，离开毛泽东思想，抽象讲老干部，这是马列主义呢？这样讲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保护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用“老革命”三个字招降纳叛，招摇撞骗。陈再道讲他革命四十年了，同志们看看，我们要不要这样的老干部？（众答：不要。）他们能不能代表我们的老干部？（众答：不能，他们是解放军的败类。）是的，他们不能代表老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用各种谣言诬蔑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所以同志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对一切事情一定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

五、武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乱中间，有一种手段，到处讲中央文革小组不能代表中央，直到今天百万雄师一小撮头头还造谣说毛主席受蒙蔽了……。同志们要警惕，不仅在武汉，而且在很多省内，这是反革命分子一个共同手法，他们打着拥护毛主席的红旗反对毛主席，他们想把毛主席同中央文革分开，把中央同中央文革分开。同志们，他们能不能达到目的？（众答：不能。）他们痴心妄想，到头来众叛亲离。反革命分子不甘心灭亡，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面临决战阶段，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这并不是说斗争没有了。刘、邓、陶、王、彭、罗、杨被打倒了，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延被揪出来了，但同志们不能太天真，刘、邓、陶、王、彭、罗、陆、杨的阴魂并没有死，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阴魂并没有死，需要我们去彻底肃清。武汉百万雄师最近还活动，他们计划分散到农村去。我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斗争还没有完，还要更加努力，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某些军区的同志犯了错误，毛主席讲：“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犯错误是难免的，但某些同志犯错误同某些反革命分子犯错误的性质不同，只要认真改正，还能够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最后，还要关照你们这五个坏蛋，必须低头认罪，彻底向党交待，想顽固抵赖，人民是不答应的，是逃不过去的。想玩弄各种手段能行吗？陈再道讲不识字，是老粗，表示他是劳动人民出身。同志们，他能不能代表劳动人民？（众答：不能，他是劳动人民的叛徒。）对！他是劳动人民的叛徒，背叛了劳动人民的阶级立场。

同志们，中央的复电你们看到了吗？（众答：看到了。）主席讲：“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同志们，对于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研究学习，不是一看就懂了的。一方面看到毛主席还给他一个最后出路，另一方面他已经不是站在革命人民行列里，而是站在反革命行列里了。从两次会议来看，陈再道还是坚持错误。你们看他现在有没有改正的样？（众答：没有。）他现在能取得群众的谅解吗？（众答：不能。）在坐的同志们就不谅解他。他要取得上面三个条件很不容易。同志们，那三条他可不可以作到？（众答：现在看来作不到。）好啦！现在看来作不到，将来能不能作到很怀疑。如果能作到，三天内把叛乱阴谋计划写出来，说出来，看你们的行动。

最后同志们高呼口号：

打倒刘、邓、陶、王！

打倒彭、罗、陆、杨！

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

打倒反革命分子钟汉华！

严惩绑架王力同志的凶手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河南二七公社省革联翻印八月五日河南二七公社省银行太阳升兵

团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

在武汉地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大决战的重要关头，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英勇斗争，粉碎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的时候，一些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醒，纷纷站起来造反了。他们擦亮眼睛，认清方向，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对准“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反戈一击，大杀回马枪，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坚决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来。

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

这种革命的行动，我们坚决支持！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怀着刻骨的仇恨。他们为了挽救自己即将灭亡的命运，拚命作垂死挣扎。他们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在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制造白色恐怖的同时，还玩弄各种卑劣的手段，千方百计地欺骗群众，蒙蔽群众，胁迫群众，毒害群众，硬是把群众往火坑里推。这一小撮坏家伙，同广大群众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也是受蒙蔽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

受蒙蔽欺骗的群众，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根本的区别。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是要革命的。他们在阶级敌人的欺骗毒害下，一时不明真相，站错了队，迷失了方向，受了骗，上了当。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他们会迅速觉醒起来，识破阶级敌人的狰狞面目和罪恶阴谋，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我们一定要相信，受蒙蔽的群众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革命派的。这个条件，就是他们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切受蒙蔽欺骗的群众站出来革命，同一小撮坏家伙毅然决裂，划清界限，我们都应当欢迎，应当支持。

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必然要经过一场严重的斗争，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有些人由于对两条路线的斗争认识不清，站错了队，一时还扭不过来；有的也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顾虑，担心群众不信任他们，犯了错误面子不好看，等等。特别是那一小撮坚持反动立场的坏头头，当看到反动势力即将土崩瓦解之时，必然要施展各种伎俩，阻挠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一切暂时受蒙蔽的群众，必须识破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在这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关键时刻，认清方向，端正立场，下定决心，鼓起勇气，毫不动摇，毫不迟疑，果敢地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这是光荣的革命行动。只要你们以实际行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同志们一定会信任你们的。对于欺骗毒害你们的阶级敌人，必须彻底揭露他们的罪恶，戳穿他们的画皮，坚决把他们打翻在地，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伟大指示，争取和团结那些受蒙蔽的群众，欢迎和鼓励他们起来革命，起来造反，对他们绝对不能打击报复。

我们要积极地向受蒙蔽的群众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受蒙蔽的群众觉悟了，起来造反，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近几天来，武汉地区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工农兵，为着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毛主席亲自动和领导的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搏斗，创造了非常巨大的业绩。

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粉碎了“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罪恶阴谋，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利。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中“杀”出来的。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武汉地区最广泛的革命大联合的核心，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希望，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的榜样。

现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敌人已经在政治上孤立了。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

无产阶级的敌人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为了挽救自己的灭顶之灾，他们不仅会进行疯狂的抵抗，而且还会造谣惑众，使出新的花样，策划新的阴谋。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千百倍地保持高度的警惕。

大敌当前，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进一步地巩固地联合起来，集中目标，集中火力，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特别警惕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善于启发、教育和争取一切受蒙蔽的群众，促使他们反戈一击，大造一小撮坏头头及其幕后操纵者的反，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而不能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鲁迅说过：“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受蒙蔽的群众从小撮坏头头影响和控制下解脱出来，加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行列，这是使一小撮至死不悟的反动家伙彻底孤立的一个重要条件。

武汉，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武汉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锻炼了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而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的坚决支持下，必将赢得这场伟大斗争的彻底胜利！

向英勇的武汉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新的伟大胜利

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新的伟大胜利 誓同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到底 坚决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批倒批臭

新华社(1967. 07. 28)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坚决地支持你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坚决地支持你们！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广阔土地上，这几天到处都发出了这样的强大声音。

自从谢富治、王力同志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的喜讯传来，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个个欢欣鼓舞，斗志昂扬，连日来已有上千万人次举行盛大集会和示威游行，热烈庆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的伟大胜利。一个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愤怒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武汉地区代理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城乡各地继续展开。

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指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出席首都百万军民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会，这是对武汉地区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关怀和最大支持。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撑腰，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障碍，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到底，把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和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相继举行了有一百万人参加的盛大集会和示威游行之后，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驻军指战员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正在更加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

连日来，首都广大工农兵群众、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纷纷举行声援会、批判会和誓师大会，愤怒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声讨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操纵的“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进行猖狂反扑的罪行。在各

种集会上，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同声表示：最最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誓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人们一致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不是死老虎，我们决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我们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上海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指战员，今天继续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更加有力地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从早到晚，在全市各条主要街道上，一队队斗志昂扬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高呼口号，迈着雄健的步伐，进行示威。许多工厂、企业、机关和学校，纷纷举行声讨会和批判会，猛烈展开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他们决心以彻底斗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实际行动，全力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在重庆市，几天来已经有数十万人冒着酷暑上街游行，二十六日驻军指战员又举行了雄壮的武装示威。参加示威的驻军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出，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小小的蚍蜉撼不动参天大树，武汉地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猖狂反扑，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们坚定地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南京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和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今天又有四十万人分别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从清晨到夜晚，大街上游行队伍络绎不绝。驻南京部队负责人杜平、梁辑卿、杜方平，分别在三军指战员大会和军民群众大会上讲了话。他们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疯狂反扑，只能激起全国人民对他们的更大仇恨，加速他们的灭亡。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彪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我们坚决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南京各条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和来自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表示，一定要把党内军内一小撮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垮、斗倒、斗臭。

浙江省和杭州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杭州驻军指战员十五万人，二十六日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驻军负责人和当地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们，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指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疯狂反扑，是他们反动本性的大暴露。这些坏家伙总是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狠狠地、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打击。

海防前线的福州市，昨天和今天都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集会游行。当地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驻军代表在大会上讲话，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他们热烈赞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一定要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战斗到底。

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今天又有驻军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各族各界革命群众十五万人集会游行。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内蒙古军区政治委员吴涛在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扑，再一次告诉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我们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抓住要害，穷追猛打，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把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不获全胜，决不能收兵。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也在会上愤怒声讨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犯下的滔天罪行。

这几天，除了各省省会和自治区首府所在的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以外，许多中小城市、集镇和农村，也纷纷集会游行。在山东省的淄博、烟台、昌潍、德州、惠民、菏泽、泰安等地，在吉林省长白山区和西部草原的一些边远城镇，都传来了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强大声音。驻守西南边疆的云南边防部队指战员，这几天也同驻地的边疆各族革命群众一起，召开大会，示威游行，声援武汉地区的革命战友。他们说：“千座山，万条水，也隔不断边疆军民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血肉联系，分割不

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同斗争。”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武汉三军和革命派联合举行誓师大会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武汉三军
和革命派联合举行誓师大会

新华社（1967.07.28）

在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您的亲切关怀和抚育下，斗志更加昂扬，进一步巩固、发展、壮大。保守势力正在土崩瓦解，受蒙蔽群众迅速觉醒。中国的赫鲁晓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新华社武汉二十七日电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威力，震撼着武汉三镇。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陆海空三军紧紧与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的广大指战员、军事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联合举行誓师大会，决心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控诉和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最坚决地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迅速掀起革命的大批判的新高潮，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誓师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口号声震天。越战越强越战越勇的革命闯将们，个个英姿焕发，斗志昂扬。“打倒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震撼着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武汉江城。革命闯将们用他们的伟大实践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表明：他们

没有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期望，没有辜负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他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战斗了！他们正在乘胜前进！

在大会会场上，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语录：“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大会通过了给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表达了革命闯将们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致敬电说：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前武汉地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您的亲切关怀和抚育下，在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坚强领导和支持下，在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的强大支持下，斗志更加昂扬，意气更为风发，卷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在激烈的斗争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左派队伍，进一步巩固、发展、壮大；保守势力正在土崩瓦解，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醒。中国的赫鲁晓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我们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我们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武汉地区、在全中国、在全世界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参加大会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会后冒雨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谢富治陈伯达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讲话
谢富治副总理：

这是陈伯达同志，这是周景芳同志，我是谢富治。我代表北京市革委会，中央文革，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同志向大家问好！陈再道一贯反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这一次面目终于暴露出来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参谋部，中央文革在人民当中威信最高。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

小组、就坚决把他打倒。我到了好多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中央文革小组无限热爱，可是一小撮走资派，反革命对文革小组却害怕得要命，恨得要死。

王力同志在军区的四点指示是总理的意见，当时总理也在武汉，只是没有出面，他们将这几件事主要加给王力同志，要绞死王力，而我只是打倒，这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中央文革的，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现在军队内造反了，受蒙蔽的一些群众也觉悟了，武汉是一片大好形势，革命派扬眉吐气，反动派垮台了，所以什么百万雄师，管他多少万，都是纸老虎，只要听从跟着毛主席、中央文革，那是不可战胜的，只要他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要垮台。

今天来找你们谈一件所事，你们比我们还清楚，就是杀回武汉区。武汉现在来了三千多人。希望你们统统杀回去。武汉的形势是好的，希望大家打回去，回去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要给大家讲几句话，希望大家按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政策办事：

第一件事，革命派本身要大联合，第二件事对少数坏分子要恨、要斗争，象刘邓陶王陈牛蔡这些人。革命造反派内部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对保守组织我们要作工作，武汉形势虽然很好，但保守组织并没有垮，你们应该联合起来，不要为这个事，那个问题争论不休。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当然对走资派要算总帐。我是湖北人，是真的又是假的，我生在湖北，但什么也不知道。我们都有毛病，缺点，错误。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骂了托派、投机商，我看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托派，那不算错误，不要抓小辫子。

陈再道专门收集什么十大罪状，《百万雄师》十大好处，全是造谣。你们对一小撮要狠狠地批判，联合起来做好保守组织的思想工作。我今天将北大、清华、北航、地院、师大、矿院叫来了一些，你们按照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教导，帮助武汉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只要是革命派就联合起来，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北京的同志千万千万要注意。

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革命的大团结，这都是伟大领袖提出来了，革命派最听毛主席的话，如果在北京就干上了，那怎么得了呢？云南、四川的造反派分为两派，保守派还没有打完，你们就打起来了。希望武汉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

分为典型的几派不太好。要读毛主席的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是不要武斗，二是所有造反派读这本书。武汉造反派受了相当时间的压力，特别是工总，九·一三，你们刚刚还没有翻身，还要做很多工作，对百万雄师也要作工作。把武斗停下来，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团结左派，同陈、王斗争，作《百万雄师》的工作要摆事实讲道理，夺“私”字的权。我们不是个人，一个小团体，而是一个整体，我的欢迎词讲完了。请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伯达同志作指示。

陈伯达同志：

我是作为你们的小学生到这儿来的，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是你们的小学生。在任何时候同志们集体智慧，我永远是赶不上的。是你们的小学生。

这次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到武汉，同武汉的造反派战斗在一起，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资产阶级的走资派陈再道打倒了。

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来到北京的武汉革命造反派到处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我作为北京的公民向你们表示欢迎。欢迎你们对毛主席的忠心，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业的英勇，欢迎你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愿望。

我完全拥护谢副总理的讲话。

我非常非常地希望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光辉著作，把毛主席思想在行动上表现出来！

武汉造反派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驻北航红旗武汉钢三司战士整理 7 月 28 日（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我们坚决支持你们！》

海靠着山，山靠着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心向着无产阶级革命派；海靠着山，山靠着海，毛泽东思想把我们东方红战士和武汉革命派紧紧地联接起来！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时刻鼓舞着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直是我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士的亲密战友。

最近，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操纵的“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向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反扑，并且猖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我广大东方红战士无不义愤填膺，怒火万丈。我们出大字报，开群众大会，举行盛大的游行示威，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武汉地区革命派的战友。

武汉地区的革命战友们，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进行坚决斗争。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谁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打倒谁！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彻底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具有革命传统的武汉人民，是压不服，吓不倒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使得他们更加聪明起来。他们一定能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全国革命群众一道，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清除了垃圾之后，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必将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的武汉！

（人民日报 1967.07.28）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同武汉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反动的围攻，锻炼出坚强的左派。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反动的围攻之中，锻炼出来的一支砸不烂、冲不垮的革命派队伍。他们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坚，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优秀代表之一。他们在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和关怀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向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

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利用受蒙蔽的群众，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了残酷的镇压，他们简直是疯狂到了极点。但是，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为反动派的汹汹气势所吓倒，他们不断总结经验，整顿队伍，在扬子江边坚持战斗，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唯物主义辩证法总是无情地嘲弄历史舞台上那些喧嚣一时的小丑！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是天下无敌的，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尽管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还在耍出种种花招，玩弄种种阴谋，用残暴的手段进行垂死挣扎，但是他们终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我们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士，从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和他们站在一起，共同战斗！“反革命”的帽子没有吓倒我们，反动的围攻没有把我们整垮。我们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不管什么狂风暴雨，永远同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要向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我们要向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人民日报（1967.07.28））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玩火者必自焚》
毛主席的红卫兵，热血流在一起，脉搏跳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首都中学红代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密地注视着武汉战友的斗争。我们肩并肩，心连心，共同为了在全中国、全世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斗！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武汉的代理人，他们长期以来就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的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操纵“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疯狂镇压和迫害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近，他们竟公然把矛头指向了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指向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对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猖狂挑衅。面对着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爪牙这样疯狂凶恶的敌人，怎能不激起我们毛主席红卫兵的怒火万丈？！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砸个稀巴烂，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

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专政下，在比长江还要汹涌险恶的政治风浪中，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怀着一颗颗赤诚的红心，昂首挺胸，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他们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而那一小撮阶级敌人只不过是几只就要被冻死的苍蝇！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曾经一时气势汹汹，杀气腾腾，但他们只不过是纸老虎，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铜墙铁壁面前，终将化为粪土。玩火者必自焚，凡是反对毛主席，凡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对的人，必定失败，必定灭亡！

我们首都中学红代会的全体战士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小组。我们中学红代会的战士们誓做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们就坚决打倒他！叫他彻底垮台！

（人民日报（1967.07.28））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红司新华工代表聂年生同志讲话

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首先敬祝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我代表红司新华工和“三新”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向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鼓掌）

（谢副总理插话：“可以向王力同志敬礼。不准向谢富治敬礼，我要发表一项声明。”群众高呼：“向谢富治同志学习！向谢富治同志致敬！”谢副总理带笑地说：“我要发表个声明。不准向谢富治学习，不准向谢富治致敬，不准什么什么这些事情，统统不准）

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光荣地回到了我们的首都北京，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掌声）我们向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由衷的敬意（掌声）

今天晚上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同志和谢富治同志接见我们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对我们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是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鞭策，最大的鼓舞。（掌声）

我们回想武汉地区的情况来，都感到很惭愧。在处理“工人总部”的问题方面，处理“二司”的问题方面。我们犯了些错误，存在些缺点。在这个中央首长接见我们的大会上，我们公开的向“工总”，“二司”的同志表示歉意，公开向他们承认错误（热烈的掌声，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双方相互呼口号：“向‘二司’学习！向‘三钢’学习！”“向‘新华工’学习！向‘三新’学习！”）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我们一定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道前进！我们一定要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好的联合起来！只有联合起来，我们才有力量！原来是刘、邓在湖北地区的黑爪牙，贺龙的死党陈再道之流，一手把“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这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能容忍的。现在“工人总部”在中央文革、中央首长的支持下。在全国广大的革命造反派的支持下，已经把这个案翻过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今后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遵循中央首长的教导，永远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它在湖北地区的爪牙，以王任重、陈再道之流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我们要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把他们批深、批倒、批臭！不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对不起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

主席，对不起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的支持。对不起武汉地区广大的革命群众对我们的期望，对不起首都革命造反派以及全国革命造反派对我们的支持。对不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我们要在斗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它在湖北武汉的爪牙。以王任重、陈再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过程当中，实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一定要把湖北地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进行到底，我们誓不罢休！（掌声）

在我们革命造反派内部，我们今后将更多的高举自我批评的旗帜，更多的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革命造反派有些原则分歧。我们决定采取内部协商的方法，绝对不要把矛盾公开化，因为我们把矛盾公开化，阶级敌人王任重、陈再道之流就要钻我们的空子，就要破坏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就要破坏湖北地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每个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应该深思的。

我今天见到中央首长陈伯达同志和谢富治同志。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我希望我们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永远的团结起来，永远的战斗在一起。一定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气，一定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掌声）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钢二司代表杨道远同志讲话

我首先代表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向谢富治总理、王力同志问好，向陈伯达同志问好，向其它首长问好。希望首长同志们代我们向毛主席问好！

我们武汉造反派是在党的一手扶植下，一手培养起来的。在与敌人的斗争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党最了解我们。毛主席最了解我们。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是党拉着我们走的，所以我们跟敌人进行斗争，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完全是毛主席的思想哺育的结果。

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回家以后，我们必须搞好大联合（热烈掌声）。只有联合起来，我们才有力量，才能把走资派彻底打倒。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自武汉地区新闻界造反派《武汉烈火》第四期，1967. 7. 29 日北京出版）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领导机关二十六日发表公告，向群众公开承认，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要坚决、彻底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公告对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反扑的种种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还表示，要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武汉部队领导机关的这个公告，表明他们是愿意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因此受到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受到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最近武汉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陆海空三军的广大干部、战士，紧紧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坚决执行党中央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粉碎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猖狂进攻。他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诚保卫者，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及他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干了大量的坏事。他们制造种种谣言，歪曲事实真相，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欺骗和蒙蔽

群众，把武汉驻军的支左工作推上了错误的道路。一些干部战士一时不明真相，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责任完全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身上。受蒙蔽的干部和战士是无罪的。现在，他们已经擦亮眼睛，端正方向，大杀回马枪，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他们这样做了，表明他们是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相信这些同志，包括一些犯过方向、路线错误而决心改正的领导干部，在今后的支左工作中是能够为人民立新功的。

人民解放军是最热爱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过去受蒙蔽的干部战士，一旦广泛接触了革命小将，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就会在共同的战斗中，迅速地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起深厚的阶级感情。

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最热爱人民解放军的。他们最通情达理，最能够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了错误，把立场改变过来，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拥护。

对于某些一时思想不通的同志，我们要耐心地做工作，帮助他们转变过来。

目前，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武汉驻军的支左工作，都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斗争还是艰巨的。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加强军民团结，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七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发表公告，公开检讨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坚决把他们打倒。同时，表示要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做好“三支”“两军”的工作。

武汉部队在这个公告中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因而受到武汉地区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是对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为沉重的打击。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利。

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正在更高地举起“拥军爱民”的伟大旗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紧紧与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的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为打退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所掀起的反动逆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些受蒙蔽的干部和战士，在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清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面目，迅速地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事实又一次证明，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愧为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了这样坚强的后盾，坚强的靠山，就一定能无往而不胜。

人民解放军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三支”“两军”的工作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为人民立下了新功。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不很理解，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犯了错误，甚至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改了就好。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广大战士和大多数干部是没有责任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诚恳地检讨错误，认真地改正，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支持左派，坚决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也是应该热烈欢迎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在今后的支左工作中为人民立新功。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加强团结，正确处理同军队的关系，密切合作，共同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武汉“百万雄师”基层组织土崩瓦解
在毛主席英明政策感召下，受蒙蔽群众纷纷觉醒 武汉“百万雄师”基层组织土崩瓦解 受蒙蔽群众擦亮了眼睛，回戈反击，愤怒揭露和控诉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 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欢迎受蒙蔽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新华社（1967. 07. 29）

新华社武汉二十八日电 “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武汉地区“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政策的感召下，纷纷退出这个组织，起来造反。他们满怀革命激情地说：我们一定要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彻底决裂，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誓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全市各个工厂企业里，一时受蒙蔽参加“百万雄师”的群众纷纷觉醒。“百万雄师”在工厂企业中的基层组织，正在迅速土崩瓦解。受蒙蔽的群众成批地退出这个组织，并且纷纷写大字报愤怒揭露和控诉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揭露和控诉“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湖北省建筑公司六公司一些参加过“百万雄师”的受蒙蔽的群众，现在擦亮了眼睛，认清了方向，纷纷揭发本单位“百万雄师”的内幕。武汉重型机床厂厂区的的大字报栏内，贴了许多表示退出“百万雄师”的声明和“造反公告”。这个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受蒙蔽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进行家庭访问，个别串连，耐心说服受蒙蔽的群众，希望他们迅速地、彻底地同“百万雄师”决裂，认清方向，反戈一击，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一些受蒙蔽的干部和群众说：过去我们受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操纵的“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的蒙蔽、胁迫和毒害，使我们受了骗，上了当。这些坏家伙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最凶恶的敌人，也是我们受蒙蔽群众最凶恶的敌人。现在，大家这样热情地对待我们，

真不愧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今后，我们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把“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坚决斗倒、斗垮、斗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长江航运公司驻武汉单位的一些参加“百万雄师”的职工，连日来纷纷写出“造反公告”，表示和“百万雄师”一刀两断，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他们说，党中央派谢富治、王力同志到武汉地区处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对武汉人民的最大关怀和最大支持。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钻进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最危险的敌人，他们终于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现了原形。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示众，斗倒斗臭。

长江航运公司驻武汉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开始起来造反的受蒙蔽群众，纷纷写出大字报，热烈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无产阶级革命派说，受蒙蔽的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支持、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对那些受蒙蔽的群众，耐心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他们，把斗争矛头牢牢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

原来同“百万雄师”靠在一起的湖北省直属机关联司的成员，也纷纷发表声明，退出或自行解散他们原来的组织。他们说，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认识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狰狞面目。他们深深感激毛主席把他们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火坑中救了出来。他们正在纷纷揭发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滔天罪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武汉五十万军民大集会

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发表检查错误公告拥军爱民 并肩战斗 共同对敌 武汉五十万军民大集会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 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发表检查错误公告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新华社(1967. 07. 29)

新华社武汉二十八日电 武汉市欢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伟大胜利和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罪行的活动，今天进入了新的高潮。当地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共五十万人，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大会在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坚决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乘胜前进，夺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的新胜利。

今天清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武汉人民解放军三军指战员，从收音机中听到了《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和《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决心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更加猛烈地开火，用这个实际行动来回答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们的巨大关怀，回答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他们的支持。

今天，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驻武汉三军指战员，个个英姿焕发，精神抖擞。他们高举着毛主席的画像，手捧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从四面八方涌向汉口的中心会场。“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口号声，震天动地。整个武汉三镇沉浸在火热的革命气氛和节日般的欢乐中。

上午十一时许，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负责人首先在大会上发言。他说：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援下，不怕一切打击，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阻力，从白色恐怖中杀了出来。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把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了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的伟大胜利！他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把彻底解决武汉问题的重担交给了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部队的广大指战员，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真正做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人。他说：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勇气，有魄力，敢于解放一大片，狠狠打击最坏的一小撮。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要正确对待“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使他们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把混进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把他们斗垮斗倒斗臭，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解放军驻武汉支左部队代表在大会上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革命军队。毛主席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是要全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想革命左派所想，急革命左派所急，爱革命左派所爱，恨革命左派所恨，永远同他们心连心。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人民解放军驻武汉支左部队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今天的大会。省市机关的一些革命领导干部，也参加了大会。

会后，群众队伍顶着烈日，冒着盛暑，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大游行。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民解放军驻武汉三军的负责人，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了游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领导机关，七月二十六日发表一项检查错误的公告。

公告检讨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表示坚决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并表示立即改正错误，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紧密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驻武汉地区陆海空三军紧紧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的广大指战员、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对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公开检查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态度表示热烈欢迎。他们一致指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响彻长江两岸。

公告公开向受打击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承认错误，对“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表示坚决支持。公告还强调指出：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一定要坚决彻底改正错误，坚决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公告的发表是对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为严重的打击。

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看到“公告”，纷纷说，这是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派谢富治和王力同志到武汉处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胜利，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胜利。邱少云生前所在连指战员说：“公告”的发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宣判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政治破产。我们是毛主席的战士，永远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心连心，爱左派所爱，恨左派所恨，急左派所急，想左派所想，更好地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任务。((1)(2))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们指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反扑，不表明他们强大，只表明他们虚弱。阶级敌人表演得愈

起劲，暴露得就愈充分，失败得就愈彻底。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都表示决心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加强团结，对“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尽早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他们说，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没有一个人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一定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誓做拥军的模范，坚决和人民解放军驻武汉的广大指战员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集中火力，向中国的赫鲁晓夫猛烈开火，向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把他们彻底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关怀，有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关怀，有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有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将继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一定要取得彻底胜利！也一定能够取得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领导机关二十六日发表公告，向群众公开承认，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要坚决、彻底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公告对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反扑的种种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还表示，要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武汉部队领导机关的这个公告，表明他们是愿意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因此受到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受到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最近武汉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陆海空三军的广大干部、战士，紧紧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坚决执行党中央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粉碎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猖狂进攻。他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诚保卫者，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及他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干了大量的坏事。他们制造种种谣言，歪曲事实真相，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欺骗和蒙蔽群众，把武汉驻军的支左工作推上了错误的道路。一些干部战士一时不明真相，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责任完全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身上。受蒙蔽的干部和战士是无罪的。现在，他们已经擦亮眼睛，端正方向，大杀回马枪，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他们这样做了，表明他们是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相信这些同志，包括一些犯过方向、路线错误而决心改正的领导干部，在今后的支左工作中是能够为人民立新功的。

人民解放军是最热爱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过去受蒙蔽的干部战士，一旦广泛接触了革命小将，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就会在共同的战斗中，迅速地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起深厚的阶级感情。

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最热爱人民解放军的。他们最通情达理，最能够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了错误，把立场改变过来，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拥护。

对于某些一时思想不通的同志，我们要耐心地做工作，帮助他们转变过来。

目前，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武汉驻军的支左工作，都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斗争还是艰巨的。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加强军民团结，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近几天来，全国亿万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举行空前规模的集会游行，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愤怒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滔天罪行，坚决支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的伟大胜利。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现在，那一小撮同人民为敌的反动家伙，已经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全国人民中有着无比崇高的威望，有着不可动摇的无产阶级绝对权威。不管是什么样的“大人物”，什么样的“老资格”，只要他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胆敢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到头来，只会落得个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有着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他们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认识最清楚，爱憎最分明。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要坚决拥护，誓死保卫。对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要坚决打倒，彻底摧毁。因此，当一小撮反动家伙跳出来登台表演的时候，广大革命群众就群起而攻之，给以致命的痛击。

这一小撮反动家伙，是革命人民最好的反面教员。他们演的蹩脚的丑剧，不仅激起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最大的仇恨，同时也教育了受蒙蔽的群众，使他们认清了谁是自己真正的敌人，纷纷起来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反戈一击，在无产阶级的敌人看来，当然是“背叛”。但是，从人民的立场看来，这是革命的行动，是光荣的事情。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妄图依靠谎言和欺骗，把受蒙蔽的群众变成他们忠实的奴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则是要通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发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彻底打碎奴隶主义的精神枷锁。造反不分先后，我们希望每一个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

受蒙蔽的群众觉醒过来了，起来造反，这就使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陷于彻底孤立的绝境。

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比人们预料的快得多。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正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迅速地发展、壮大，进一步巩固地联合起来，形成坚强有力的革命的铁拳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

处在新的革命高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同时，还要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乘胜前进。人人痛打过街的老鼠，人人口诛笔伐，彻底批判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彻底肃清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流毒，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伟大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

前些时候，在乌云笼罩着武汉上空的艰难日子里，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各个组织，始终相互鼓舞，相互支持，同呼吸，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打败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狂妄进攻。

在当前大好形势下，英勇的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进一步紧密地团结起来，团结得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这个大团结好得很。

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清醒地看到，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远没有冻僵的毒蛇。阶级敌人一定还要反扑，作垂死的挣扎。大敌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进一步团结起来，向敌人展开更为猛烈的反击。

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当敌人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总是要采用“分化革命

阵线的内部”的手段。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现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在他们操纵和支持下的“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仍在耍弄阴谋权术，制造谣言，挑拨离间，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团结。我们切切不可上当，切切不可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

在斗争中，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是正常的现象，不足为奇的。对于这些分歧和矛盾，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加以解决。在战斗的道路上，我们必须不断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伟大的著作，我们要读了又读、用了又用，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对阶级敌人，要算总账，新账老账一起算。在革命派内部，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算老账。千仇万恨，只能集中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身上。

广大的革命小将，在向那些看来是“庞然大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冲杀的时候，不愧是英雄好汉。今天，在特别需要千百万革命派结成一个更加坚强的铁拳，以便把阶级敌人彻底打倒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革命的小将一定会更高地举起团结战斗的大旗，做革命大团结的模范。

全国亿万人的心飞向武汉，亿万人的眼睛注视着武汉。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不会辜负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的期望，不会辜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社论）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新的考验》

长江在沸腾。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巨大支援下，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搏斗的关键时刻，武汉驻军紧紧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广大指战员，挺身而出，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司令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汉部队领导机关最近发出公告，承认前一时期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要坚决改正错误。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决心迅速地变为实际行动，果敢地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而不要迟疑动摇。这是一个新的考验。我们希望这些同志，决不要辜负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殷切期望。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犯有路线错误的干部，应该认真检查，切实改正，坚决地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在今后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实际上不肯改正，那就很危险了。

毛主席最近指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主席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这样关怀，这样宽大，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正视自己的错误和坚决改正错误呢？

我们看一个犯了路线错误的干部，是否真正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要看实际行动。就是说，从实际行动上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滔天罪行；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彻底肃清它的流毒；从实际行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社论）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再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光辉照耀下，武汉地区“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起来造反。“百万雄师”正在迅速土崩瓦解。受蒙蔽的群众，回戈反击，愤怒控诉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 and “百

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事实又一次证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威力无穷，所向披靡。一小撮坏家伙妄图用欺骗蒙蔽群众的卑劣手段，来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只不过是蚍蜉撼树，螳臂档车！

受蒙蔽的群众是无罪的。罪责完全归于欺骗和蒙蔽他们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受蒙蔽的群众，应当擦亮眼睛，认清形势，认清方向，认清敌人。必须看到，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比毒蛇还毒，比豺狼还狠，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改变颜色，劳动人民就要遭殃，受蒙蔽的群众也不例外。

受蒙蔽的群众在这一小撮坏家伙的欺骗蒙蔽下，受了骗，上了当，站错了队，迷失了方向，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继续跟着他们走下去，就会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受蒙蔽是无罪的，不觉悟是危险的。你们要当机立断，迅速同坑害你们的一小撮坏家伙，一刀两断，彻底决裂，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一切受蒙蔽的群众，都应当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犯了错误，就要赶快改，改得越快越好，改得越早越好。革命不能观望，造反不可迟疑。早一天觉悟，就能早一天回到毛主席的队伍中来。早一天造反，就能早一天为人民立功。

反戈一击，就是为人民立功，就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的光荣的革命行动。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当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对准“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狠杀回马枪，揭露他们的罪恶，控诉他们的罪行，彻底把他们斗垮、斗倒、斗臭！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要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起来造反。对受蒙蔽的群众，一定要积极地耐心地细致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对他们决不要讽刺挖苦，决不要打击报复。多争取团结一个受蒙蔽的阶级弟兄，就多增

加一分革命的力量。把所有受蒙蔽的群众争取团结过来，阶级敌人就会彻底孤立起来，就要彻底完蛋。

机不可失！受蒙蔽的群众，都应当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勇敢地站起来革命，站起来造反，用反戈一击的实际行动，坚决地、迅速地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行列中来！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传达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复电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

中央决定，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复电可内部传达到连队和公社武装干事（地方上可传达到与部队相应的干部），但不要对外张贴，现将复电全文发去，请即遵照办理。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国张贴武汉军区 1967.07.26 公告的通知

1967.07.30；中发〔67〕228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

中央决定：武汉军区一九六七年七月廿六日公告在全国城乡广泛张贴，但除湖北外不要登其他报纸。现将公告原文发去，请即遵照办理。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武汉部队空军副司令员 刘丰：《永远忠于伟大统帅

毛主席》

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好得很！武汉地区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与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有力支持，得到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力支持，得到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军指战员的有力支持，越战越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乘风破浪地胜利前进！

在武汉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搏斗的重要时刻，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公开跳了出来，反对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这紧急关头，我们武汉部队空军广大指战员，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一起，向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的广大指战员，无限热爱毛主席，热爱林副主席，热爱无产阶级司令部，热爱中央文革小组，热爱无产阶级革命派。许多指战员，在这一场大搏斗中，挺身而出，勇往直前，不畏强暴，不怕围攻，不顾疲劳，英勇奋斗，冲破种种阻力，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指战员共同的誓言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谁就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就要把他打倒！我们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敌人的疯狂，只会加速他们自己的灭亡。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活生生地教育了我们，对毛主席和毛泽

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采取什么态度，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要无限信仰，坚决照办。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有时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有的是在执行过程中逐渐理解的，有的是要经过反复实践才能理解的，有的是要在执行了以后许多年才能理解的。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必须坚信，必须紧跟，必须坚决照办。对于毛主席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英明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认真贯彻，努力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少犯错误，并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地加深对毛主席的指示的理解，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又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对于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我们虽然学习过许多次，我们虽然跟着毛主席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可是，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理解毛主席的教导。武汉地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使我们进一步领会到，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一切现象的总根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对立、对抗和斗争，是今天我们全部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总根源。离开这个总根源去观察社会现象，就观察不出来，就会观察错了。我们必须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反复领会毛主席的教导，用来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千方百计要抓枪杆子。他们不仅要蒙蔽一部分群众，他们还采用造谣、欺骗、挑拨离间等种种卑鄙手法，挖空心思地企图欺骗和蒙蔽我军的一些指战员，制造广大革命群众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制造混乱，以便从中渔利。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们擦亮了眼睛，没有上敌人的当，向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爱民，民拥军，永远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有了我军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广大革命群众的紧密团结，就注定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灭亡的命运。

千条经验，万条教训，集中到一条，就是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支左工作首先是用毛泽东思想支援。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过程，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我们必须切切实实地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指导一切，带动一切，改造一切。

我们武汉部队空军广大指战员，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在过去半年的支左工作中，由于我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理解不深，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对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抵制不够有力，在他们的欺骗和影响下，我们也犯过一些错误。我们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我们坚决地支持和保护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同他们肩并肩，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锋芒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胆敢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坚决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人民日报（1967.07.30））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紧急通告》正当无产阶级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夺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猖狂反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彻底粉碎混进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罪恶阴谋，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赤胆忠心，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全力支持下，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打败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狂妄的进攻。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于七月二十七日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这是对我们武汉地区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巨大支持和亲切关怀，是对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个沉重打击。这封信，是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是我们武汉地区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行动指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些指示最热烈的拥护，一定要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坚决执行。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的指示，为了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新高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伟大的新胜利，特发出紧急通告如下：

一、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掀起一个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斗倒、斗垮、斗臭。

二、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把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勇敢地挑起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作“节约闹革命”的模范。

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爱解放军，我们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作拥军爱民的模范，要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共同担负起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担，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一般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对他们决不能采取讽刺谩骂、打击报复的态度，更不能抓人，要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耐心、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团结他们，热情地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把仇恨和斗争矛头狠狠集中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五、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都是把“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严格区别开来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们热情地欢迎“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迅速猛醒，起来造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造反派工人一起抓革命促生产。

六、对于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只要他们不再为武

汉地区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卖力，改邪归正，我们同样给予出路。如果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将给予严厉的打击，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依法惩处。

此告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武汉军民最热烈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
旗帜鲜明不折不扣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最大的“爱民” 坚决相信坚决依靠解放军进行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拥军” 武汉军民最热烈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

新华社（1967.07.31）

新华社三十日讯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陆、海、空三军紧紧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的广大指战员，在粉碎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的猖狂反扑中，结成了更加深厚的友谊。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前夕，武汉军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拥军爱民”活动。人民解放军最热爱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热爱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说：旗帜鲜明地、不折不扣地、毫不含糊地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最大的“爱民”。无产阶级革命派说：紧紧地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肩战斗，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最大的“拥军”。

连日来，武汉三镇，大江两岸，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出现了许多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场面。军民一起学习，同劳动，同联欢，一起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一起控诉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在武汉“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武汉地区军事院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武汉市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指战员举行的军民联欢大会上，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

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执行支左任务的解放军代表激动地说：是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你们是武汉地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我们坚决站在你们一边，毫不含糊地支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你们的坚强后盾。“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以及许多工厂、学校、机关，连日来也纷纷与驻地解放军指战员举行联欢、座谈，畅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收获、体会。“钢二司”、“新华工”等革命群众组织还专门成立了“拥军爱民”办公室，组织了向解放军汇报团，到部队向指战员介绍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情况，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反击武汉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反扑的斗争中，武汉钢铁公司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地解放军指战员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谊。“钢九·一三”战斗兵团的战士说：“在乌云笼罩武汉三镇的日子里，解放军指战员和我们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和指战员们结成了鱼水不能分离的感情。我们深深体会到，革命造反派一步也不能离开解放军。”

省直属机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近同解放军指战员举行座谈。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们在会上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解放军一向心连心。当前我们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没有解放军作坚强后盾，是不能胜利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过程中，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玩弄种种花招，妄图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解放军的血肉关系，他们的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解放军战士也在会上表示，要坚决支持革命派，做革命派的坚强后盾。驻武汉的支左部队，最近还积极开展了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的活动，他们邀请革命小将到部队报告英勇斗争的事迹，控诉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干部、战士听了报告，更加深了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感情，增强了支持左派的决心。

“拥军爱民”活动的开展，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他们共同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坏军民关系的罪恶阴谋，共同欢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邱

少云生前所在班班长甘永万激动地说：越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接触，越从内心感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亲，越与他们谈心，越与他们心连心。无产阶级革命派说：越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接触，越体会到人民解放军不愧为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我们一定要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共同把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斗倒、斗垮、斗臭，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长江在怒吼，汉水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从东海之滨到天山之麓，从海南岛到长白山，大江两岸，长城内外，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无数的抗议书，指向武汉地区一小撮坏人。大批的致敬电，飞向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制造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陷入了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阶级敌人越接近死亡，就越要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作拚死的挣扎。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而是他们垂死挣扎的一个突出表现。

一切阶级敌人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力量，轻视人民的力量。想当初，他们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不可一世，妄图一口吃掉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举扑灭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但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曾几何时，他们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切阶级敌人，看起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只不过是银样 l à@①枪尖一根，纸老虎、泥足人一个，

虚弱得很。

在我们的时代，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后台多硬，只要你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一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还正在玩弄新的阴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妄图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新的反扑。我们要千百倍地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揭穿和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坏人只是一小撮。武汉地区的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把一小撮坏人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对制造武汉地区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打倒，严加追查，依法惩办。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善于启发，耐心帮助，支持和鼓励他们站出来，大杀回马枪，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对敌，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能够这样做，就是好同志。

最近，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公开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已经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欢迎。我们热情地希望他们、并且相信他们能够按照这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勇敢，队伍更加壮大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经受了这一次严峻的考验，觉悟大大提高。武汉地区的这次严重的政治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历史在飞跃，革命在前进。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

武汉三镇的胜利凯歌鼓舞着全国人民，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了。

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风暴吧！

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第十二期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 加邈去掉走底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文革中南组对武汉干部问题报告的批示

一、过去有三反言行，且性质比较严重，不算革命领导干部，但文化大革命中，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支持造反派，立场比较坚定，旗帜比较鲜明，积极揭发斗争走资派，造反派对他要进行帮助，主动结合。

二、有些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在文化大革命逆流中干了不少坏事，只要他承认错误，敢于揭发，取得群众组织谅解，可以结合，但如果在七·二〇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坚持打倒。

三、生活小节十分严重（生活、两性、其它），不属大节问题，不是文化大革命处理对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政治路线，认大节。

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经过群众斗争，交代彻底，态度诚恳，造反派要给出路。

五、动摇不定，看风使舵，那边势力大就靠那一边，不坚持原则，立场不坚定，要进行阶级立场教育，使之改正错误。

六、走资派和顽固家伙特别是反革命两面派，要坚持斗争，坚决打倒。

七、受蒙蔽群众，在中央表态后，采取积极态度，起来造反者，按“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办事，按十六条办事。

八、基层组织中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者，只要不是杀人凶手，应允许自己教育自己。

九、杀人凶手、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严办，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十、基层干部中，一般头头，除极坏和顽固不化者外，应热情帮助，使他迅

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十一、原文革成员，过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未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逆流中，是镇压群众运动的急先锋、打手，虽不是坏头头，也要按坏头头处理。

十二、人事保卫部门，被“百万雄师”操纵的，应该派人暂时接管，弄清后再作处理。

十三、对坏头头严惩的规定（不准公开，略）。

十四、对受蒙蔽参加武斗，围攻别人，死亡的家属，按中央规定处理，双方一样。

十五、基层组织坏头头，民愤不大，改邪归正，应给予出路，不按坏分子处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毛主席为我们撑腰 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喜讯传来，武汉三镇，长江两岸，一片沸腾。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无不兴奋激动，纵情欢呼。这是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音。它象一声春雷，震动了武汉的大地，极大地鼓舞着武汉地区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以更加高昂的英雄姿态，投入新的战斗。

这封信，深刻地分析了武汉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明确地指出了今后斗争的方向和任务。它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指南，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向我们发出的新的战斗号令。

这封信，给正在蓬勃发展的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无比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它体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武汉地区“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最深切的关怀，最坚决的支持，最有力的领导。它是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的致命打击。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阶段。

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掀起一股公开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逆流的严重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始终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以英明的决策，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狂妄进攻。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形势到来的时候，北京又传来了毛主席、党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为我们指明了胜利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毛主席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撑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

我们坚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会在斗争中，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中提出的一系列指示。一定会紧紧掌握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地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他们破坏社会秩序。一定会坚持不懈地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团结，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和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实现巩固的革命的大联合。一定会耐心地向“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受蒙蔽的群众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反戈一击；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拥军爱民”的伟大旗帜，和人民解放军紧密合作，共同对敌。

我们坚信，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一定会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武汉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是一次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鼓舞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投入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深、批透、斗倒、斗臭，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解放军各单位批斗陈再道

八月四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海陆空三军机关和文体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部分代表斗争了武汉“7·20”暴乱事件的罪魁祸首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陪斗的反革命分子钟汉华、牛怀龙（前独立师师长）、蔡炳臣（前独立师政委）、巴方庭（前湖北军区人武部长）。

打得敌人狼狈不堪，昏头昏脑，又抹鼻涕又擦泪不知所措。初战告捷，大快人心，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充分显示了三军革命造反派的强大战斗力。

“把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押上来！”会议负责同志的话刚落，会场上立即响起了一片“打倒刘、邓、陶！”“打倒陈再道！”等口号声，陈再道这些家伙见来势凶猛，只好乖乖地低头弯腰 90 度，吓得两腿不停打抖。

三军造反派首先宣布：“陈再道你一手策划和制造了武汉军区‘7·20’反革命暴乱事件，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我们要跟你清算，你必须老实交待！”接着问陈再道：“7·20 是什么事件？”

陈答：“我犯了罪，7·20 是个反革命事件。”

问：“你根据什么说是反革命事件？”

陈答：“反对毛主席派去的代表，那还不是反革命事件啊！但到底是谁煽动，我也知道。”这个老混蛋想大帽子下开小差，真是白日做梦！造反派代表大喝一声：“你这个混蛋，你老实交待你在这次事件中担当了什么角色？！”陈听了，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连忙说：“我要承担责任，我，我……”

问：“你说，你有什么罪？！”

答：“我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一直顽固坚持，造成恶果。”

问：“你是怎样策划 7·20 事件的？”

陈狡辩说：“我没有策划。”

问：“你承认有罪，罪在什么地方？”

陈答：“群众受了我们的欺骗，我们的蒙蔽，我们说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些都是错误的。”

问：“你一手策划的 7·20 事件，你为什么说没有？”

答：“我没有策划嘛！我跟谁说过？跟谁开过会？”

口号声象千万发重炮弹向陈再道轰去……，一阵哭哭啼啼，连连求饶，这是陈贯彻始终的手法，在造反派的怒斥下，他就装着象个“可怜”的样子，哭哭啼啼，而且哭得很“伤心”，可是哭声再大，却一滴泪也没有。

问：“你老实不老实？！”

答：“我怎么还不老实，我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话不能讲。

问他怎么策划“7·20事件”的？他还是推说没有，并且说：“这个反革命事件里面有没有坏人在策划，我也说有人在策划。百万雄师独立师到底怎么一下子起来，我也弄不清楚，我也挨了他们的打。

“他们后来为什么不打你了？”造反派问道

答：“我也不晓得他们要打就打，不打就不打。

问：“你挨打时说了什么话？！”

答：“我说你们这个要不得，你们犯法了。

一位代表在场发言，陈挨打时喊：“我是陈再道，不是王力。”这时百万雄师才把他放了。原来百万雄师一些人之所以打陈再道是因为搞误会了。

陈答：“我是坏蛋头子

问：“你对中央代表说：我们的文化革命搞的不好，你们到街上看一看。这句话你讲了没有？！”

答：“讲了，讲了。

问：“你要中央代表看什么？你是什么意思？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答：“我那时候没有什么目的。

后来陈又说：“当时这个思想，就是说他们（指中央代表）光是看了几个造反派的情况，其它地方没有看，所以说你们到街上看一看。

问：“你让中央代表去了解谁的情况？！”

答：“对其它组织，……，到红武兵，百万雄师去了解一下。

问：“你认为中央不了解百万雄师的什么情况？”

答：“我没想那些，我是让他们了解全部情况。

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答：“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了解全面情况，我这就是对抗中央文革。

问：“你认为中央的指示是不全面的？”

答：“是对中央了解武汉的情况不满，不是对中央决定不满。

问：“你要中央派去的代表到街上去看什么？街上都搞了些什么？”

陈象脚踩住了刀子似的大叫大喊：“我可不知道街上发生了什么呀……”一位代表说：“中央代表到武汉的第二天他们就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武斗。”陈却说没有这回事。

问：“你怎么知道没有？！”

答：（无法抵赖，改口说：）“有，有。”

问：你为什么说没有？

答：我是说 16 日没有大规模武斗，就是工总和电车站的打了一下。

（鉴于陈态度恶劣，继续负隅顽抗，造反派代表向陈宣判：你让中央代表到街上看看，其目的是：第一……，第二……，事实俱在，陈不敢反抗。接着又向陈审问了第二个问题。）

问：总理到武汉后，你鼓动下边的干部，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给周总理提意见，有没有？

答：没有，没有。

问：揭露出来怎么办？

答：揭露出来我认罪。

问：你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干了些什么？

答：这个会议是在总理来以前开的，那时候对我们有指示，我们下面思想混乱，有的说《百万雄师》好，有的说三新、工总好，我们开个会，叫师的单位每个来两个人，我说把你们党委的意见拿出来，不要受军区框框的限制。有什么意见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然后写个东西，把各单位的意见综合起来，将跟北京谈判做个基础。

问：中央 6、7 月份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有过什么指示？

答：制止武斗，对百万雄师有指示。要百万雄师撤兵。

问：什么时间的指示？

答：六月十天左右。

问：中央对百万雄师是支持还是批评？

答：当然是批评。

问：你是支持还是反对百万雄师？

答：百万雄师我没有支持。……。没有明支持，我所作所为都是帮了百万雄师的。

问：中央对百万雄师的态度，你已经知道了，你还发动师以上的干部提自己的看法，以后好到北京和中央谈判，这是什么意思？

问：你在总理召集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怎样挑动下面的干部给总理提意见？

答：我没有哇。

问：胡说！空军 15 军政委王新同志揭发你了！你煽动下面的干部在会上提意见，企图压中央改变态度，有没有？

答：我没有跟他讲，我怎么敢讲这个话呀！我的天，我想也不敢想呀！……

革命造反派说：“人、物俱在，你休想赖掉。…”陈无言可答，狼狈不堪。

又问第三个问题。

问：谢副总理对你们讲：武汉地区的军队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你是怎么回答谢副总理的？

答：当时我们说，我过去也是支持他们的。

问：你支持谁。

答：三新二司，我们过去也是支持三新二司，到现在支持的方针不变，那是我们党委的方针。

问：如果你是支持三新二司，那你为什么说，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呢？

答：我们支持三新二司是以前，以后他们向我们进行斗争，我们现认识到错了。

问：你怎么支持三新二司的？

答：现在看起来我们实际上是打击了造反派，我们以前也真正支持，现在打击是事实，以前支持也是事实。

问：你说，工总干的坏事二司干了，工总没干的二司也干了，有没有这回事？

答：我讲了。（陈只得承认支持百万雄师。）

问：你支持了百万雄师，你是不是想翻案？

答：不翻案。

代表们又回头追问，陈是怎样对抗谢副总理指示，陈一口咬定说没有。）

一位代表揭发说：“谢副总理指示说，武汉地区军队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你说，“武汉只有一派，没有两派，你说了没有？”

答：我什么时候讲过是一派呢？好几派嘛！

问：上面问到你的这些做法都是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是不是？

答：是。

（问陈再道第四问题是独立师绑架、围攻、殴打王力同志的经过。陈再道矢口否认自己的罪恶，拒不交待事情发生的经过。……专门审问了牛怀龙，一位代表揭发说：王力同志被绑架以后，陈再道却说不要怕群众嘛！这时他还带着老婆到东湖睡大觉，对这事实不敢承认，顽固抵赖。）

同志们气极了说：“你这个老家伙，简直要带着脑袋进棺材。

陈再道对抗说：“进棺材吧！”

当问到是谁把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部队时，陈答：是蔡炳臣。

问：是谁批准他传达的？

陈：我不知道。

问：你是吃干饭的？

代表们警告陈：“你这是解放军的败类，现在武汉地区的军民起来造你的反了，你不要抱幻想了，你不要欺骗，那是妄想。”所以陈听说武汉军民造他的反连说：好，好。

问：他们为什么造你的反呢？

答：我执行了反动路线。

问：你不是支持三新二司吗？

答：那只是口头上说说。

问：谁喊：“陈再道政权万岁”？

答：我不知道。

问：是不是百万雄师喊的。

答：他们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

问：他们就在你的跟前喊的，你怎么不知道。

答：我听也不敢听。

问：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百万雄师为什么那样爱你？

答：我也不要他们爱。

（紧接着三军造反派又审问了第五个问题。）

问：七月十日上午，你们开了一个会，你在会上讲了些什么？

答：讲武汉地区文化革命形势大好。

问：什么大好，你杀的人还少？

答：报纸都那么讲大好，大好。

问：还讲了什么？

答：三新二司是造反派，犯了错误，要团结，要斗争，要他们转变，以后还要依靠。

问：你说三新二司天天打我们的战士，算什么鸡巴革命，说了没有？

答：没有。

这时把蔡炳臣拉上来审问。

问：陈再道对三新二司怎么讲的？

蔡答：七月十日，他们（指陈再道）召开了一个会，是驻武汉部队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我是牛怀龙传达的，陈再道首先讲了三新二司以前我们支持他们。现在天天搞我们部队，这算鸡巴革命派。

问：他说的对不对？

答：他讲的这些都是我讲的。

问：你对百万雄师还有什么？

（陈东拉西扯，根本不交待。）

问：你在会上对大家说过，你们说百万雄师不好，但是群众都向着他们，干部亮相都亮在他们那里，百万雄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等等，说了没有？

答：说了，说了。

问：你亮相亮到那一边？

陈一会说亮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一会又说亮到邓、刘路线一边，一会又说亮在百万雄师一边。

问：你还说《百万雄师》这个组织，全国最少有的，不能再好了。

（陈先说不是这个意思，后来一听说要蔡炳臣来交待，他又连声说是这，是这。

最后，三军造反派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巴万庭五个反革命分子一起带到台前，排成一排进行了集体宣判，这几个坏蛋，站在那里，丧魂落魄

三军革命造反派共提了以下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勒令这三个坏蛋回答。

一、“7·20”武汉地区发生了绑架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富治、王力同志，这是什么性质的条件？

陈答：是反革命事件。

钟答：是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反党反毛主席的。

蔡答：是个军事政变，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同志。

牛答：是反革命暴乱事件。

二、你们这一小撮人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陈答：我是操纵者，我是这个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

蔡答：我是凶手。

牛答：我扮演了陈、钟的帮凶的角色。

三、“7·20”事件，是你们这一小撮坏蛋长期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个暴露，你们武汉军区是一个反革命窝子，是不是这样？

陈等五个反革命分子供认武汉军区是个反革命窝子，并分别报了其它一些反革命分子名单。

这次战斗近十个小时。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高举“拥军爱民”的伟大旗帜》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奔腾向前。

在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中，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指战员最热烈地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军民团结战斗，共同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一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推向波澜壮阔的新高潮。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一支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的军队。这支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坚强的柱石，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坚强的后盾。这支军队，坚决响应毛主席“三支”“两军”的伟大号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立下了新的功劳。

在武汉地区的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中，紧紧地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挺身而出，坚决支持和保卫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打败了一小撮反动家伙。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人民解放军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诚保卫者，不愧为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战士！

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在“支左”工作中曾经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但是，他们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和政策，向广大革命群众公开作了检讨；并且表示要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武汉部队领导机关的这个革命行动，立即得到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热烈欢迎。这有力地证明了人民解放军在广大群众中的崇高威信，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人民军队的支持和爱护。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任何时候，都要牢记毛主席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一伟大教导。应当加强同人民解放军的紧密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应当满腔热情地帮助和支持军队的同志，帮助他们了解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应当学习人民解放军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在处理军民关系中，也要作认真的自我批评，严防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军队的同志有了错误，“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而不要无根据地无限上纲，不要不许革命。

“拥军爱民”是毛主席一贯的光辉思想。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它具有更新的内容，更伟大的意义。它是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口号，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确处理军队和革命群众之间关系的总原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当前，武汉地区一小撮反动家伙，在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正在采取更加阴险、毒辣的手段，来挑拨人民解放军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松懈。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拥军爱民”的伟大旗帜，把军民团结搞得牢牢的，把军民关系处理得好好的，粉碎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伟大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力对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的指示

〔八月四日下午五点五十分，王力同志委托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王道明同志和中央文革宣传组韩玉贤同志，亲切探望来京的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和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武汉电视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转达了王力同志的亲切问候，并转达了王力同志的五点重要指示。〕

一、第一位的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团结，三钢、三新一定要团结，大敌当前，毛主席这样关心，革命派没有任何理由搞分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要搞联合，要搞团结。这个问题是决定武汉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规的关键。三钢对三新，三新对三钢，都要互相看长处，多做自我批评。办报一定要牢牢掌握这个问题。

二、武汉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武汉各工厂、学校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把革命、生产两付重担同时挑起来。

三、拥军爱民。这个时候比任何时候都要拥军爱民。军区改编了，独立师调走了，这是毛主席采取的一个根本措施，这是对武汉人民最大的关怀。武汉军区作了检讨，这个时候造反派应当把拥军爱民的旗帜高高举起来。对待武汉军区，应该欢迎他们检讨，主动向他们介绍造反派内部情况。拥军爱民的口号应作为武汉地区正确处理军民关系的一个标志。

四、对百万雄师、公检法及犯了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处理，正确对待，不能打击、报复，不能提刺激性口号。他们大多数是好人，是阶级兄弟，不能歧视他们，

把仇恨集中到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身上。一定要团结的方针、教育的方针，政治工作的方针，这样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才能扩大，对站过来的同志要欢迎。

五、警惕坏人。对个别坏人要注意，不许他们破坏社会秩序。对个别坏人要同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对个别坏人，也要少抓人。要抓最好通过他们（保守组织）自己觉悟起来抓。要少抓人，主要是政治攻势。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军委各单位斗争陈再道

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国防科委、北京军区、海陆空军、第二炮兵、防化兵、通讯兵、工程兵、装甲兵直属机关和文体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高等军事院校“红联”兵团、政治学院“无产者革命造反兵团”共 1200 余人，第二次斗争了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同时，对反革命分子钟汉华（前武汉军区政委）、牛怀龙（前 8201 部队师长）、蔡炳臣（前 8201 部队政委）、巴方廷（前武汉市人武部部长）的部分罪行也进行了审问和斗争。国防工办无产阶级革命派应邀参加了斗争大会。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前一次斗争陈再道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和穷追猛打、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奋起毛泽东尽想千钧棒，向陈再道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发动了一次围歼战，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战斗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节节胜利，越战越强，阶级敌人步步败退，惨遭失败的结果而告终。这次战斗的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它证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是不可战胜的。

大会开始，到会的全体同志首先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敬礼，然后高唱《东方红》和《造反有理》，学习最高指示。

大会执行勤务员宣布：“把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押上来！”全场顿时轰动起来，愤怒的口号声震荡着整个大厅，全体代表对阶级敌人的强烈愤恨、满腔怒火一起迸发出来。“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打倒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陈再道！”“打倒第二个张国焘——陈再道！”“打倒刘、邓的帮凶和打手陈再道！”“打倒‘七·二零’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陈再道！”“打倒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打倒中国人民的叛徒陈再道！”“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

中央!” “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等口号声此起彼落。陈再道在八月四日下午就尝到了三军造反派的厉害，今天一上台就吓得手脚不灵，浑身冒冷汗，站在那里活象一堆没了筋骨的死肉。

战斗一开始，三军造反派就宣判陈再道在“七·二零”反革命暴乱事件中的罪行，并令其老实交待。陈再道一开口就给自己戴上了几顶大帽子，用以掩盖其具体事实。他供认：“我犯了大罪，我反了党中央，反了毛主席，反了林副主席，反了中央文革。”

三军造反派代表说：“陈再道，你这个老反革命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欠下了人民的血债，就是把你千刀万剐也无法抵偿，但是毛主席还是给你出路。你说，毛主席对你有什么指示?”

陈再道答：“我犯了罪，要彻底改过。”

问：“毛主席要你不坚持错误。有没有?”

答：“有。”

问：“要你认真改正。有没有?”

答：“有。”

问：“要你取得群众的谅解。有没有?”

答：“有。”

问：“这几天你交待了些什么?”

答：“我交待啊，我执行了反动路线……我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党反毛主席。”

陈再道把他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仅仅说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陈再道为自己开脱罪责向造反派反扑的第一张牌。三军造反派一眼看穿了他的阴谋，用雄辩的事实把这张牌撕的粉碎。陈再道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当了刘、邓的帮凶和打手，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大流氓，老反革命! 张国焘反党反毛主席，陈再道出力卖命；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陈又跳出来，为彭德怀吹喇叭、抬轿子。彭德怀被罢官以后，陈大抱不平，狂妄地叫嚣：“彭德怀是个好人，为什么要罢他的官?” 真是反动透顶，三军造反派的代表揭发了陈再道的这些罪行后，全场同志怒不可遏，纷纷地站起来高呼口号：“打倒老反革命分子陈再道!”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

文革！”三军革命造反派揭了许多事实证明：陈再道一贯是那里最臭他往那里跳，那里最脏他往那里靠，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东西！

一九六三年王任重在省常委会上有个讲话说：“学习毛泽东，超过毛泽东。”陈再道把这株特大毒草视若珍宝，奉若神明，在今年还下令要武汉军区指战员学习这个讲话。更力口可恶的是：一九六六年九月陈再道和三反分子张体学在武汉接见红卫兵时，竟然胆大妄为，学着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的办法，在《东方红》乐曲声中，乘着敞篷车，招着手，检阅武汉市的红卫兵。这个老混蛋真是无耻到了极点，狂妄到了极点！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再道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甚至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三军造反派就这一反革命罪行狠狠地斗争了陈再道，并审问了钟汉华。

三军革命造反派问陈再道：“四月十六日江青同志在人大大会堂有个讲话，你知道不知道？”

答：“有哇。

问：“怎么讲的？”答：“说成都和武汉问题严重，应该冲一下。

问：“你什么时候听到的？”

答：“我们开会，当时就知道。

问：“谁在北京？”

答：“各大军区都有人来。武汉军区有我和钟汉华。

问：“你对江青同志的讲话有什么感触？”

答：“没有什么感触。

问：“你们同意吗？”

答：“当时我们对这讲话有点感觉，我们感觉还没有成都那么严重。

问：“你跟谁论的？”

答：“我们两个都有这样感觉。

问：“你跟钟汉华在一起，还说了些什么东西？”

答：“没有说什么。

这时，陈再道非常紧张，满身汗水直淌，衣服很快就湿透了，但是，他还是矢口抵赖，死不交待。他作贼心虚地叫喊：“那个问题我没说。”大家问他哪个

问题。他吞吞吐吐地说：“就是说扩大中央文革，每个省都派人来这句话我没说，如果说了就杀我的头。”三军造反派把他押到一边，开始审问钟汉华。

问：“四月十六日江青同志讲话以后，你们两个怎么说的？”

答：“我们两个说，我们的情况不同，没有带枪啊。另外讲，我们不好办，要冲了，日子不好过。”

问：“去年四月，关于中央文革问题，陈再道怎么说的？”

答：“陈再道说北京好办，有人救火，下面不好办，我们要想办法扩大中央文革，最好各省都要有人来。”

三军造反派又问陈再道：“这些话，你说了没有？”

陈再道答：“我说了，我说了，我这是反中央文革。”

三军造反派乘胜追击，厉声斥问陈再道：“刚才你为什么抵赖，还以杀头来威胁，你要顽抗到底吗？你还说了什么？”

答：“还说，武汉问题听造反派多一些，听我们意见少一些。感觉中央文革对下面的情况了解不是那么多。”

审问之后，造反派代表进一步揭发说，江青同志四月十六日的讲话发到全国都是一样的，唯独武汉军区私自涂改了这个文件，把成都、武汉问题严重那句话里武汉两字徐掉。另外，陈再道还说：“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积极，我要放炮了。我想，最好扩大中央文革，现在中央文革光听学生的，不听我们的，这样不行！”他甚至还想方设法诬蔑攻击陈伯达同志，诬蔑陈伯达同志讲话不辩证、不全面。陈再道真是个十恶不赦的老反革命！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谁胆敢反对毛主席，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打倒谁，我们就把他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对于陈再道这样一条反革命老狗，我们就是要把他斗倒、斗垮、斗臭！

毛主席教导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陈再道跟着张国焘、刘少奇、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也同样彻底失败了，真正成了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但是，陈再道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他垂死

之前，竟敢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猖狂进攻，在武汉三镇大搞白色恐怖，血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更不可饶恕的是，陈再道一手策划了“七·二零反革命暴乱”事件，三军造反派责令其交待这个问题。问了半天陈再道就是不交待具体罪行。这是陈再道向造反派反扑亮出的第二张牌：口头上认罪，实际上拒不交待。老混蛋，这张牌救不了你的命，罪证俱在，你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问：“六月廿六日中央和中央文革对武汉文化大革命作了些什么指示？”

答：“说‘百万雄师’武斗不正常，要很快制止。”

问：“你们是怎样执行的？”

答：“我们坚决执行了。”

问：“那么为什么武汉地区的武斗继续发生，而且越来越大？”

答：“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

问：“中央文革代表去了以后，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怎么解释？‘七·二零’事件怎么解释？”

答：“我们有文化革命办公室，还有个支左指挥部，由他们管。”

陈再道在三军造反派的强大攻势面前，步步退却，退到死胡同以后，就抛出了第三张牌。他妄想把他所干的一切反革命罪恶勾当，全都推说是下面干的。陈再道说的倒轻巧，你骗得了谁？全场同志纷纷质问他：“你这个司令员是干什么的？”陈再道说：“我罪责难逃。”

接着，三军造反派问陈再道：“你在七月十日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说了些什么？关于三新二司又说了些什么？”陈再道这个老狗一听又要他交待这个问题，就又蹦又跳，又哭又叫，大耍无赖，似乎人们冤枉了他。这时，三军造反派便把蔡炳臣拉上来审问。

问：“蔡炳臣，陈再道七月十日说了些什么？”

答：“他说现在街上出现了三新二司的大标语，要打倒我（指陈再道），我是不能同意的。他还讲三新二司我们以前支持他们，现在也没讲不支持，他们天天搞我们的战士，这算什么鸡巴革命派，方向完全错了。他们不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我革命四十年，我不相信他们能够胜利，他们垮了由他们自己负责。他还给三新二司列了十大罪状。还说，‘百万雄师’是个问题，为什么群众向着他们，干部亮相亮在他们一边？前几天他们搞了个十条，我看符合大方向，他们的方向

对头是好的，现在他们抓防汛又抓生产，‘百万雄师’是全国少有的组织。他讲了‘百万雄师’的八大‘好处’以后，又说，我也没有支持他们，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支持他们也没有错。另外还讲，将来到北京，你们这些人都去，你们可以带些三新、二司的材料。陈再道这句话，不是想支持三新、二司，而是想把人家整垮。

过了一会蔡炳臣又补充了一句：“他还说干革命有什么话就讲，何必把意见都咽在肚子里。

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答：“这是煽动人，主要是号召大家支持‘百万雄师’。我看也是煽动大家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

蔡炳臣交待的这些问题，跟陈再道对质后，陈再道承认说：“我都讲了。”这时他不蹦了，也不哭不叫了。但要他重复一遍时，他又耍赖了，说：“我忘了，我忘了，我现在记不起来，什么都是我讲的，你们把材料拿来我念一念。”这个老混蛋真是一个赖皮狗，无赖至极，可恶至极。

“我忘了”这是陈再道在事实面前赖也赖不掉，逃也逃不了的情况下，甩出来的第四张牌，以此找借口，并且在话里按钉子、设埋伏，这同样是一次恶毒的反扑。陈再道的这次反扑，把三军造反派愤怒的火煽得更旺了，更加激起了造反派的阶级仇恨，一阵口号声，把陈再道轰得晕头转向无法招架。

问：“你们七月十号会议精神，符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

答：“不符合，反对中央嘛。

问：“六月廿六号中央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肯定还是批评‘百万雄师’？”

答：“那是批评嘛。

问：“你是批评还是表扬。

答：“我没有表扬。

问：“你说‘百万雄师’有八大‘好处’是干什么的？”

答：“这是表扬。

问：“中央批评‘百万雄师’而你表扬他们，你是不是对抗中央？”

答：“是对抗中央。

问：“中央在了解了武汉的情况以后，已经作了明确的指示，你还让中央代表问，这是什么意思？”

答：“所以我是混蛋哪。”

问：“你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是对中央指示不满，对我们批评不满。”

问：“你对街上的情况很满意，是不是！”

答：“当时认为街上是不错，武斗死人还不多，我们没有逮捕一个学生，没有公开打击造反派，造反派还有很大的力量(指三新、二司等)，‘百万雄师’是对的，群众相信它，向着它。”

问：“中央对武汉地区武斗有什么指示？是表扬你们武斗不厉害吗？”

答：“武斗得厉害。”

问：“你是不是认为不厉害？”

答：“是啊。”

问：“工总是谁解散的？”

答：“我们解散的。”

问：“那你为什么还说没有打击造反派？你抓了学生没有？”

答：“没有抓学生。”

问：“你们先在空军就抓了一百多名，你抓的还少吗？”

答：“我都不知道，以后才知道。”

问：“街上还有什么情况？”

答：“街上有‘百万雄师’游行，但没有报告我。”

一位代表揭发说：“当时街上贴有许多矛头指向中央的反动标语。还有‘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百万雄师’挑起大规模武斗……，这就是你对中央首长的欢迎吗？”

陈再道答：“是啊，是啊。”

问：“七月十九日晚，‘百万雄师’绑架王力同志是什么问题？”

答：“是反革命行为。”

问：“你当时干什么去了？”

答：“我跟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在一起。”

问：“你采取了什么措施？”

答：“那个时候乱得很哪！”

问：“你走时说：‘我是无能为力了，现在就看你们的了。’是不是？”

答：“我当时是无能为力了，我没有这个能力。”

问：“你为什么不调部队来处理？”

答：“他们不听我的。”

果真是这样吗？一位代表揭发了一个事实，完全戳穿了他的鬼话。廿一日晨，王力同志已经被绑架走了，‘百万雄师’有一部分人不知道，有四十多个暴徒又冲到王力同志的住处。这时，陈再道给独立师(8201 部队)打了一个电话，独立师就派人给‘百万雄师’做工作。以后‘百万雄师’汉阳分部便派人乘吉普车赶到现场，把人调走了。陈再道对这个事实供认不讳。

另有一位代表接着说：王力同志被绑架以后，周总理打电话给陈再道，要他把王力同志找回来。陈再道不仅拒不执行，还说“不要害怕群众嘛。”

大量的事实证明，陈再道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七·二零”反革命暴乱事件的罪魁祸首，无论陈再道怎样耍阴谋、演把戏，亮出多少张牌，都逃脱不了罪责，最后只能得到加倍的惩罚！

最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逐个审问和斗争了反革命分子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

钟汉华供认不讳：周总理关于要为工总平反，要他们释放被抓的工总战士等四点指示，是他违反周总理不准向下面传达的规定，擅自叫蔡炳臣传达的。蔡炳臣也交待了：首先向团以上干部传达，然后又向排以上干部以至全体战士传达了。他们向下传达的目的就是要掀起下面的不满，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在传达时他们还进行了恶毒的煽动，说：当陈再道汇报“百万雄师”的情况时，周总理听不进去，当汇报新华工、新湖大等情况时，王力很反感。说中央代表不愿听他们汇报等等。这就是他们煽动“七·二零”反革命叛乱的一种舆论准备，是他们打出的反革命叛乱的一个信号枪。

这次战斗从八月七日晚七点半开始，到八日晨七点半结束，历时十二小时。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高呼口号，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后，大会胜利结束。

陈再道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我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同

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继续深入地向陈再道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及其后台发起总攻击，彻底粉碎反革命新反扑，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奋勇前进！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这几天，我们公安部的同志们在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要在我们公安系统、政法系统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这件事情作得很好，很对，我热烈赞成这种革命行动，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我也听到一些情况。我想这个批判应该继续下去，大会批判，大会斗争这很重要，可以调动每一个同志的积极性，可以揭发很多问题，可以介绍许多情况。这两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公安系统的流毒很深，他们反对党，反对毛主席，搞修正主义，搞格伯乌的一套，要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这个工作仅仅依靠几次大会还不够，应该彻底批判，彻底斗争，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这件事希望我们公安部的全体同志，下定决心，来办这件伟大的事情。要转变政法战线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搞苏修那一套，要下很大功夫，要先从我们公安部开始。

我们有一个好条件，就是我们在北京，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在一起，这样就便于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教导，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但是，彭、罗在政法方面的流毒很深，这一点，我们大家在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可以看出来，我们拿每一个公安民警来讲，大多数人都是好同志，这一点在整个公安机关也是如此。但是，作为领导，作为公安战线上，因为有彭、罗流毒，在建国十七年来，有的甚至时间更长一些，已成了习惯势力，所以毛主席的许多东西，尽管口头上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拥护林副主席，拥护毛主席的司令部，拥护中央文革，但是，行动上往往违背。公安机关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了，一直到现在，这个局面没有改变。我们公安部也和下面脱离了关系，我们不知道下面什么人在领导。现在大多数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了军事管制，由军队系统管，但

是军队他原来也不大懂得公安业务，还是由公安系统当参谋。结果，整个公安系统真正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少数，一直到今天为止，支持保守派的是多数，或者在革命派的两大派中，他支持毛病比较多的，革命性弱一点的，压制革命性强的一派。这个专政机关很多地方的公安部门不是站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司令部一边，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尽一份力量，相反，往往站在对立面，而且死也不觉悟，到现在还不觉悟。归根结底，归到彭真、罗瑞卿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身上，中他们黑“修养”和“驯服工具”的毒很深，包括我们这些人。他们搞的“驯服工具”，不是为了我们毛主席，不是为了毛主席的司令部。林副主席讲：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可是实际上却做了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驯服工具”，甚至跟着他们一起镇压群众。这个文化革命的历史很有意思，在去年，从文化革命开始，一直到今年一月风暴以前，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当然里边还是有些造反派，但是作为领导来讲，绝大多数是这种情况，也有少数不是这种情况，这中间公安系统作的坏些，抓造反派，镇压革命群众。这样做，省、市机关的造反派，公安机关造反派造反了。今年一月份以后，所有公安机关都造了反，这个反造得对。当然。这不一定每个人都靠边站，有些是犯了错误的好同志。大多数公安机关都实行了军管，我们相信伟大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军队。但是，军队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和我们一样，不大理解，有一些干部不理解，在认识上犯了错误，也有少数坏人，如青海的赵永夫，武汉的陈再道、钟汉华，还有什么牛师长，什么蔡政委，这都是坏人。坏人在军队里是极少数的，是个别的。但是，认识上的错误比较多，我们这个公安机关又当了“驯服工具”。四川抓了三万五千人，川大一个学校就抓了五百多人。这不是公安机关出的点子？湖北大家知道，有三钢（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三新。钢工总是一个有四十多万人的革命群众组织。独立师、公、检、法少数坏头头出点子，军区下命令，陈再道闭着眼睛不看材料，也不审查，一句话就抓了钢工总五百人，公安机关不仅不加抵制，而且出谋划策，所以公安机关在那里臭得很，成了被打倒对象，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我们没有接触武汉的公、检、法，他们都是曾经造了一次反甚至两次反的，可是思想没有转

过来，他们的本事就是抓人。最可笑的是，最近我们看到了新派到武汉军区的一个新班子反映了专政方面的一份材料，要在八个方面抓人，从“百万雄师”的什么头头起，通通都抓，污辱谢富治的要抓，污辱王力同志的要抓，一共八个方面的人要抓。我没有注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材料，说不行，要我们研究。这个材料还是军队系统反映的，过了两天，看到了原始材料，是武汉公安机关的一个造反派，叫什么革联的提的，他造了一家伙反，地位变了，同样抓人。当然，抓人有阶级性，是右派当权，就抓革命造反派，左派、革命造反派当权，当然抓右派。但是文化革命里面的有些问题你闹不清楚，自己不了解，不加分析。当然，现在肯定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派，是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但是我们不能靠抓人的办法，抓人解决不了问题，主要靠群众专政，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所以，毛主席根据这个情况指出了政府、军队、革命左派抓人都不是好办法，都不要随便抓人，应该是群众专政，这是我们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武汉的“百万雄师”，军队、左派对他们一个人也不要抓，要让他们自己造反，把坏头头扭送上来。四川产业军自己起来造反，抓了十二个头头，这做得对。不要军队，更不要公安机关抓人。毛主席讲：北京大体上是按照这样做。是群众扭送的多，公安机关抓的少。但是有点没有做到，就是群众左派扭送的多，现在来看，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自己送，象联动分子大多数是革命群众扭送的，保守势力送来的一个也没有，都是左派送来的，这比公安机关就先进了一大步。如果做到保守势力自己抓，这个工作还很艰巨。政府可以在广大群众要求下，加以协助，抓少数坏头头。这个我们不是没有做过，有些学校要我们抓人，我们派了人去，但主要还是靠他们，我们主要是协助。这样做有没有群众反对？北京造反派对我有意见。说我太软，不抓人。反正有意见，你这样做有意见，那样做也有意见，但不管怎样，总要合乎毛主席思想。从长久来谈，群众是会否定自己不正确的意见的。那么多的公安机关为什么老是支持保守派不支持造反派？这个根源，要归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特别是彭、罗。整个十七年来的公安工作，当然不能说所有事情都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但相当多的是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的，是按照修正主义办的，还有斯大林时代的某种错误做法，以及国民党的很多坏东西，这方面没有彻底革命，没有彻底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去办。毛主席思想在我们公安政

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没有树立起绝对权威。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始终跟不上毛主席思想，不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主席思想。就是今天革命明天夺权，从组织行政把它砸烂了，但整个的思想体系没有改变，什么厅长、局长呀换成勤务组，根本没有改造，他还是抓人，不懂得搞群众路线，不懂得支持左派、依靠左派、相信左派。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当然我们说的是群众性的，特别是几派斗争，主要靠群众自己解决。至于什么强奸犯、杀人犯、个别隐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帝国主义特务、修正主义特务，当然专政机关有权力处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也要保证我们一定的机密性，但也要经常通过群众。凡是能够通过群众的，应该通过群众，不要搞得那么神秘化，不能通过群众的是极少数。第一、二次镇压反革命都是毛主席领导的，都是采用群众路线的办法。主席总结了，走群众路线，犯错误总要比少数人搞犯得少，犯了也容易纠正。苏联那一套，公安机关、保卫机关特殊化、特殊地位，凌驾于群众之上，不是群众监督公安机关，而是公安机关监督群众，这对我们公安机关的影响深得很。我们公安机关不是在广大群众监督之下，而是搞特殊，去监督别人，这个东西老也转不过来，再加一个“驯服工具”的毒害。当然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应该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谁要我们这个专政工具去镇压群众，我们就不干，就造他的反；如果谁要用专政工具去包庇坏人，我们也不干，就造他的反。利用专政工具去镇压群众，包庇坏人，在苏联是修正主义的特点。那个谢列平，当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连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当了，可见这个安全委员会的权力比中央书记还大多了，他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包庇坏人，专群众的政，凌驾于一切之上。我看，以后公安部的地位要把它降到一个普通勤务员，现在讲的勤务员实际上权力还是很大，要当真正的勤务员，什么人都可以领导、指挥，权力很小，象芝麻大那么一点。这个权力的大小问题，我和罗瑞卿曾经争论过，我说公安部的权力太大了，罗瑞卿说这是中央赋予我们的，在中央开会两个人争起来。“罗长子”这个人手太长，所有权都交给他，他还不够。我没有能力，办不了那么多事情，权力不要那么大，老百姓可以管我们，只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什么人都可以管我们。公安部能不能彻底变，要权力很小，工作很多。有些人迷信公安机关，我才不迷信。无非是搞

黑名单、抓人，当然不是所有的公安机关。现在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你推翻一层，搞一个勤务组，还是一样。当然我们公安部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林副主席身边，中央文革的身边。公安部革命派的同志们！通过一年揭发大党阀彭真、大军阀罗瑞卿，大叛徒徐子荣，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我们受到了很大教育。冲公安部时，有的同志发脾气了，说我太软，发就发了，那些“联动”到公安部胡闹，这些事不要看的严重了，公安部可以冲的，可以进进出出，这件事我受过批评，但有好处，公安部成了特殊，神圣不可侵犯是不行的。所以这几天批判大党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大军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批判得好！批判得对！但跟着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以及作风上把他们彻底推翻彻底打倒，再搞他半年到一年，不要疲倦，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彻底批判，要调动公安机关干部，犯了错误的干部要和革命派一起，彻底清算公安机关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彭、罗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彻底清算，这和我们大多数群众都有关系，过去没有找到机会，这次是很好的机会。彻底清算，这样才能使我们公安部永远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跟毛主席走，跟着林副主席走，跟着中央文革走，誓师保卫毛主席，誓师保卫林副主席，誓师保卫中央文革，成为一个完全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革命的公安部，总是支持革命的，同保守势力作斗争，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公安部，这里说一下，各省的那些公安机关的保守势力找到公安部，你们不要理他，要理他就要同他作斗争，千万不要使公安部成为包庇坏人的场所。我们招待所就住过“百万雄师”的人，被我们革命造反派撵走了。这次汉口有人要打倒谢富治，就是公安机关带头，打倒王力，也是公安机关带头。王力同志被绑架后，我到军区去，在军区门口看到一百多辆卡车，几十辆消防车，有几个穿消防服装的人凶恶得很，他们喊：陈再道是好人，谢富治是大坏蛋，拿刀子来，把他拉出来，杀了他！有几个大个子凶恶得很呀！大家都看到嘛！我没有得罪你，我们也不认识，你这样凶恶！？倒是下面青年人好，群众好，还是他们帮忙，保护我们把车开走了。最凶恶的人就是穿消防服的几个家伙。我一个人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他们不单是对王力同志和我，他们是针对毛主席，针对林副主席，针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针对中央文革小组。针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针对毛主席，这一点我们公安部的同志要清醒。现在反

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他不敢公开反对，而是写匿名信，把矛头针对中央文革小组。北京也有一股逆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革命派都是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地方，就是把矛头针对中央文革小组，这一点公安部的同志要清醒。要保卫文化大革命，首先要保卫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反对，就和他作斗争。公安部是专政机关，我们要支持革命派，从各方面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保守势力作斗争，特别是同反革命作斗争。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坚决捍卫和维护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听林副主席的话。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参谋部，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有丰功伟绩的，我们要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跟他们走。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要把他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都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他们把中央文革小组更不看在眼里。

今天讲两件事：一件是讲把公安部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接受下边公安机关的经验教训，不要随便抓人，特别是不能抓革命派，要保护革命派。如果我们要当“驯服工具”，只能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来讲，我们对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加以反对，不能当“驯服工具”，我们要彻底清算十七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公安部流传的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东西，要坚决支持革命派。要同那些保守势力、反革命作坚决斗争（这时有人要给谢副总理照相，谢副总理说：不要照相，不搞那一套），要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件事，我们除了把自己的革命搞到底以外，还要把中央交给的案子办得好，办得快。过去犯了错误，我们要建立新的功勋。配合文化大革命，挖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老底子。我们公安部参加了许多专政，我们要在这里建立新的功勋，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走群众路线，坚决办快办好。在北京市，我们了解的，要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给予方便条件。凡是保守的我们要限制，要斗争。但属于革命派内部两大派之间的争论，我们不参与。他们那一派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我们就支持。如果属于同保守势力和反革命作斗争，需要我们配合的话，我们就支持，别的事我们不管。

我没有准备，今天的讲话可能有错误。但总的精神，是有毛主席的指示作依据的。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的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这完全证明毛

主席英明的预见性，还没有发现那一个地方的公、检、法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当然，作为某些成员来讲，支持左派的那个地方都有，但作为一个组织来讲，都是支持保守派的，这是在大城市。县公安局支持保守派的有八成，不管造反没有造反，夺权没有夺权的都是这样。还有人武部，支持保守派的也是八成，是不是这样，你们可以调查。这是作为领导思想来讲的，作为广大群众不是这样的，问题是在领导。你不能说公安部百分之八十是支持保守派的，我们不承认这一点。公安部也有错，就是办错了事的，也是我们领导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下边公安机关没有联系。有，他们也不听你的，所以我说今天讲话用什么小报、非正式的报纸，给下边送一些去。当然，这一送，打倒谢富治就更多了，你这个公安部长，专讲公安机关的坏话，其实不是坏话，是好话。要提醒他们，方向要搞对头，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跟着毛主席走，跟着林副主席走，跟着中央文革小组走，要支持革命派，不能支持保守派。大多数同志是认识问题，少数是坏人。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行了。武汉公安机关的头头也不要捉，让他们自己捉，这不是靠捉人解决问题，要解决思想问题，个别实在坏得很的，由他们自己觉悟起来造反。我想，公、检、法的这些问题首先要归罪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和我们广大干部也有点关系，但只要我们觉悟了，彻底清算他们就办好。没有什么话好讲了，喊几句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真！打倒罗瑞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公安部批判刘、邓联络站整理。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继续奋勇前进》

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象万里长江，一日千里，滚滚向前。今天，我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无比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来纪念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发表一周年。今天，我们有多少心里话要对毛主席讲啊！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一年来，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伟

大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在“十六条”这盏指路明灯指引下，冲破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重重阻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是不甘心自己的灭亡的，他们趁谢富治、王力同志到武汉处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时，操纵“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决战时刻，我们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军民的支持下，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武汉地区的解放军指战员，再一次粉碎了敌人的疯狂反扑，并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把他们打翻在地。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也识破了敌人的真面目，纷纷起来反戈一击。敌人已经众叛亲离，日趋孤立。

如何对待“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坚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我们认为“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是无罪的，他们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他们是要革命的，是我们的阶级弟兄。只有争取了受蒙蔽的群众，才能彻底孤立“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只有争取了受蒙蔽的群众，才能不断扩大自己的阶级队伍，集中火力打击敌人。只有争取了受蒙蔽的群众，才能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团结，这是集中力量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关键问题。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希望，一定要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对于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我们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互相谅解，求大同，存小异，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革命组织之间的团结，决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决不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决心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坚决响应“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前一阶段，武汉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他们在改正之中，决心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最近，武汉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武汉部队的革命行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最

坚决的支持。当前，我们一定要警惕阶级敌人离间军民关系的阴谋活动。我们决心掀起“拥军爱民”活动的新高潮，把“拥军爱民”的工作搞得更好上加好。

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头可断，血可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可丢。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将一如既往，努力学习“十六条”，坚决执行“十六条”，勇敢捍卫“十六条”。我们永远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迎着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奋勇前进，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1967.08.08））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

（一）林副主席在听取曾思玉、刘丰同志汇报时的插话：

（汇报“百万雄师”分化瓦解情况时）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指示，向坏人专政问题，专政机关和左派都不要抓人，发动右派组织的群众自己处理。在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和坏人，我们专政机关不要抓，解放军不要抓，让右派内部群众发动起来去抓。这样能促进内部分化。

（当××谈到武汉部队现在同小将关系亲密，请些造反派来连队作报告效果很好时）

林副主席说：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应该请地方左派来当教员，要借这个东风。我们过去就是请贫、下中农来作报告嘛。内蒙请保守派作报告，所以把部队引到邪路上去了。

（当郑维山同志谈到内蒙部队中收到女的来信很多，一个连有七十几个战士同女人有关系，有信件来往，有的一个人收到几个女人来信时）

林副主席说：这是有计划地腐蚀部队，（康生：这是乌兰夫搞的。）这是阶级敌人搞的腐蚀政策，是阶级斗争中敌人的一种计策。

（林副主席问沈阳、广州、福州有没有这个情况，陈、黄、刘答，没有发现。林副主席说：可见是个别现象。）

乌兰夫、王铎、陈再道支持反动组织积极打击左派，他们的观点是很明确的。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

（二）林副主席听汇报后的指示：

你们讲了很多情况，我没有你们熟悉。各大区、各地区都比较紧张，具体的由总理、中央文革来解决。他们日夜工作。各地区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方法。武汉的问题已经请示过主席，我没有什么具体措施，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

毛主席指示我们，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会变好事。武汉事件是很坏的事情，现在变成很好的事情，对全国各地有很大的推动，教育意义很大。这一次把陈再道的反动路线彻底暴露了，把反革命暴露出来，也暴露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

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事物的规律是坏到了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毛主席说，烂透了就会很快好转。革命的力量总是前进的，反动的力量总是要失败的。陈再道不管怎么样反动，总顶不过革命洪流。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毛主席指示，烂透了就会很快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问题没有解决，不完全暴露就没有理由把他打下去。

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已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样两个条件下，我们才敢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它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没有这两个条件，特别是毛主席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条件，是不行的。在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才有这个胆量和气魄。现在有毛主席健在，亲自领导，亲自掌舵，在文化大革命中，让各种坏人充分暴露出来，各种隐患诱发出来。经过文化大革命阶段，使坏事和反革命统统暴露出来，使他们转化为有利无产阶级的事，转化为好事，使我们的政权更加巩固，破除了旧的阶段，转化为新的胜利阶段。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表面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路线搞乱了，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出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倒了。现在党、政府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不乱，反动东西就不能暴露。我们敢于这样做，正是有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有这样的条件，不让他们暴

露什么时候暴露呢？乱，在毛主席领导下是不怕的。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斗坏人，这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象北京、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是这样，好人挨整，吃了苦头，尝到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损失，但这是内部矛盾，容易解决。只有第三种情况，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李、王、张也是被整。吴法宪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到甜头。如果是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王、张、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很有利，这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惩罚。就是踢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

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现在出了陈再道、不要再出陈再道，李再道，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也不希望垮下去，连×××在内。×××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不通，落后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不通。但他几十年来还是一员战将，现在还是想办法不让他犯错误，不要因为他对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垮台了。中央请他到北京来他不来，前次来，江青同志亲自给他做工作，中央又派张春桥同志去看他。要交待政策，使他不垮。有的干部犯错误，只要能挽救的，就尽量使他不要垮。但是自己应该下决心改正错误，如果自己不下决心改正错误，硬要往垮的路上走，就没有办法。

要不垮，办法有三条：

第一、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毛主席说：调查研究是基本功。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提出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第二、紧跟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打电话看到的人少，又传得慢，打电报大家都可以看到，还可以自己坐飞机来嘛，一两个小时就可到，不要自己想当然，自作聪明，自作主张。这是我反复要讲的，是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

第三、现在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左派一边，站在群众一边。不要单纯从成分纯不纯，党员多不多，干部多不多来分左右派，来看问题。成分是需要，但不能唯成分论，主要要看站在什么路线上。对待保守派要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工作，要进行分化争取工作，不要使他们长期对立，要争取广大受蒙蔽群众过来，使他们站到革命派一边。对保守派的头头，要按照主席指示的精神，发动群众把他们抓出来。要坚决支持左派，把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左派本身有问题应该强调联合，说明他们不要打内战，不要搞本位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主义不利于左派，而有利于右派。不要镇压群众，出了问题，出了事情，要报告请示中央，不要急，要慢慢地有步骤地解决，“四快一慢”，把情况弄清楚了，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工作作风。

现在老实讲，担心我们同志担负这样重的任务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现在依靠军队，军队不犯错误就好。要不犯错误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众，最重要的是请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犯了错误就要高姿态，早认错早检讨，改正的越快越好，群众就会满意，就会谅解。有错误不认错，遮遮盖盖，拖拖拉拉是不好的，坚持不改错误是危险的，抗拒的办法是不行的。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都是仓促上阵的，情况不了解，难免犯错误，错了不认错，就被抓住辫子，错了改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共产党人要有这个风格。

过去的革命也是仓促上阵的。土地革命、秋收暴动、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都是仓促上阵的。经过几十年，农村情况已经熟悉，这些问题都清楚了。革命胜利之后，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制度，发生了新情况，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没有研究过，理论上、思想上没有准备。过去推倒三座大山，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一套。胜利后就变了，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干过革命的命。这种革命，没有准备，没有认识，只有我们毛主席理论水平最高，在理论路线上、思想上、方针政策上高瞻远瞩，胸有成竹，早有准备，或者思想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有准备，其他一般的同志都没有思想准备。过去我们对农村土地革命熟悉，对资本主义不熟

悉。在美、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侵略看得清楚，一个普通工人都知道，但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我们过去又是在农村，没有看到什么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理解很少。假如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那一套旧思想、政策、理论来看今天的革命，就难免要犯错误，就不能理解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过去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的办法搬到今天就不能不犯错误。犯错误有两种，一是肯改，一是不肯改，不肯改对党的损失太大了。十八年来犯错误的大都是这样。犯了错误的，改了都欢迎。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问题，对社会主义革命有伟大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伟大发展，但是我们很不理解，作的新的事，脑子里还是老一套。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但过去的领导班子只有领导核心才是真正马列主义的，除骨干外不少人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分子，所以犯错误非改不行，不改就会使我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家就会变颜色，个人就会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政治大革命，没有政治大革命就变成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没有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理论上、思想上还不知道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对了错了还搞不清楚，只有好好学习毛主席的理论才能搞清楚。只有把毛泽东思想搞通了才能走到社会主义。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世界观，不然就要犯错误，把毛主席思想学习领会通了，就是懂了马列主义，才能不犯错误。

现在一方面看到一些地区的同志犯错误，就怕起来了，怕就是要接受教训。的确，我们怕大区的同志犯错误，怕部队犯错误。搞好文化大革命要靠毛主席缔造的解放军，要避免犯错误，就要多请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另一方面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要政治挂帅，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要使我们朝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前进，不要朝着资本主义发展。要用毛主席思想挂帅，部队工作千头万绪，只要抓住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搞好这个，就会镇压人民，象内蒙一样。总政治部反谭政以后一段时期抓学毛著还可以，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差了，跟不上形势。主要领导干部一再犯错误，我们一再不让他垮，现在还要想办法让他搞好。学毛著主要依靠各大军区、军、师、团、营、连，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是个法宝。工作

主要是靠各大军区，主要是抓好毛著学习，两条路线教育，教育部队正确对待革命左派，红卫兵小将，革命群众。

当前要抓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把干部战士的头脑搞清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才能完成“三支”“两军”任务。三支、两军，是在地方党政机关都垮了的情况下，要军队去接管，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的干部参加三结合，有的干部要调到地方工作。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政权的严重性，对领导班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头脑不清醒。过去十八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控制着一部分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的班子垮了，部分国家机器不灵，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领导班子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就是国家机器，过去旧的当权派领导班子不能成为国家机器，垮掉了，军队去接管。我们的国家机器中，有很多东西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就让它垮。我们的领导班子，应该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走毛主席革命道路的人组成。军队接管不要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就按毛主席教导立即改正，军区、省军区、人武部犯了错误的干部要照毛主席的指示调来集训，让革命造反派当教员，把错误当教材，来接受经验教训。过去的党政人员思想不通的，也要进行教育。不通，通过教育转变过来的就是好事，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就欢迎。应该按照主席教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来对待干部。就是暂时被打倒的人，教育过来也是好嘛。大多数干部是可以争取过来的，思想不通的也可以争取过来，使他们改头换面。错误改了还可以工作。还有思想不通的可以换下来，能不打倒就不打倒，打倒的还可以重新教育过来。领导班子是国家机器，必须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否则就要撤换，但不能不教而诛。

（总理：集训由邱会作、王新亭、王宏坤同志负责，抽出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空军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负责接收学员，把文化大革命材料编成教材。）

刚才讲了，我对情况没有同志们熟悉，我说的话供参考。许多问题，总理、中央文革都解决了。

一再告诉你们：三个条件，特别是第二条。怕你们犯错误，事情宁可慢些，

凡事要多考虑，不要急，拖几天，天塌不下来。总理、伯达、江青同志日夜干，希望上上下下都注意请示报告。

（康生：林副主席指示太重要了，上上下下要大讲特讲，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要搞个教育纲目。）

（伯达：林总指示很重要，对我们也是个最大的教育。过去，我们请示报告不够。有的同志提按林副主席指示写个宣传提纲在部队进行教育。）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

〔时间：凌晨和晚上，地点：人大会堂甘肃厅、福建厅。〕

八月八日，中央用专机将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主要负责人朱洪霞、夏帮银、丁家显、方保林、李想玉、但功荣、张立国、郭保安、谢帮柱、彭勋、高玉泽、魏梅森、雪湘明接来北京商讨大团结、大联合、拥军爱民、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

九日凌晨三时二十五分至六时三十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在人大会堂甘肃厅接见了大家。听取初步汇报并做了指示。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北航红旗井冈山、吴介之同志。

九日晚十一时三十五分至十日凌晨四时，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再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上述单位的代表，进一步听取了武汉情况的汇报，首长们又一次作了重要指示。这次参加接见的除有上次到会的同志外，还有三司革联的另一代表曾庆元同志、武汉军区曾司令员、刘政委、十五军赵军长、方副军长、二十九师张政委及空军和北京、沈阳、广州、福建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吴法宪、郑维山、陈锡联、黄永胜、刘培善等。

现将首长两次接见时的讲话精神纪要如下：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报刊就武汉问题发表的社论比那一个省都多。毛主席抓住了武汉这个典型的例子，把坏事变成顶好顶好的事情，武汉出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的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武汉这样关怀，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搞得更好、更好。

现在武汉的形势大好，这应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归功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支援，大家可不要把功劳都算到自己的身上。已经取得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许多艰巨的任务还摆在大家的面前。比如“百万雄师”吧，他们在全省的势力还不可低估，斗争还可能会出现反复。当然，不管怎么反复，我们必须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必然战胜一切。

二、武汉的右派势力还很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武汉对长江两岸，对全国影响都很大。大家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过去并肩战斗，共过患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批评。中央首长一再指出，不要因为内战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要站得高、看得远，看到全省，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你们要对武汉负责，对湖北一共三千二百万人负责。国际上如援越抗美，武汉铁路不通，物资就过不去了。人家越南三千万人浴血抗战对付一个美帝国主义，如果你们三千万人打起内战来，跟人家比一比！

“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二六夺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一个革命的夺权演习，大方向是对的。要支持。“二·八声明”还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大方向还是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它虽然存在着有缺点有错误的口号，如反托派（而且这些口号不是武汉的特产，是从北京传去的）但都是夺权时期的新生胎儿，毛里毛糙、并不漂亮，却富有生命力。陈再道抓住这个声明的非本质的方面，作为镇压革命的一个主要依据，“三·二一通告”就是他对待“二·八声明”的反革命行为的继续。一边是革命，一边是反革命、镇压革命，在这样的问题上，应当立场鲜明，支持革命的。“二·八声明”把一些造反派同志当作成托派，所以，三新的同志提出了批评。如果这个批评的限度是“反托派”不对，但支持它要革命的大方向，就对了。然而，你们（指三新）的错误是超出了这个限度，客观上支持了军区的“二·一八严正声明”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对三新同志这个认识的错误，三钢的同志应当谅解，不能与陈再道的问题混淆起来。事实上，三新的同志很快发觉不对头了，在大风大浪中站在了革命方面，在对待军区的“三·二一通告”及工总的问题上，你们（指三新）也还是

一个思想支配的。小将在复杂的情况下,把形势看错了,这没有关系。而“七·二零事件”是个最重要的考验,主要看“七·二零”。过去的帐不要算了,对待“二·八声明”应当批评支流,支持主流,光说“香花”、“毒草”这两个绝对概念是不行的。

革命派一定要实行大联合。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了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北京、上海只是一种方式。武汉有武汉自己的特点嘛!应当创造自己的经验,回去后,先搞个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把文化革命领导起来。在武钢,不支持九·一三就是不支持革命。武钢树九·一三,这是革命的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当然,九·一三也要团结联合其他革命组织,不要歧视人家。中央对武汉造反派的组织不能个个都点名,点名只能是一些出名的组织,不能说未点名就不是造反派组织。搞大联合必须以左派为核心。

三、“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中央非常关心武汉的生产问题。“百万雄师”总工,我们造反派要顶起来。一月革命中,上海在抓生产上做出了榜样,大批学生到码头上去。你们现在要动员军队、工人、学生去疏通航道码头。现在是收割季节,还应动员学生到郊区去帮助收割,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铁道运输部门必须把生产抓好,这不仅是关系到武汉,而且是关系到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注意节约闹革命,不要搞那么多那么大的袖章。你们的袖章太精致了。

四、革命派一定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的旗帜。陈再道、钟汉华,不能代表解放军,他们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解放军的败类。他们的爪牙还是有的,但要相信解放军指战员百分之九十九是好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子弟兵。没有解放军作坚强的后盾,决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么彻底。美帝、苏修为什么不敢动,就是由于我们有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和你们共过患难,你们要做拥军的模范。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选择派出和任命的曾司令员、刘政委,你们要信任他们,大力支持他们,要注意维护他们的威信。我们已决定武汉原军区党委改组,由新班子来领导。现在外面又传出什么“曾司令员在沈阳是支保的”,这

是谣言。你们要回去辟谣，不要什么都怀疑。军队里边自己搞整风，他们会揭发出坏蛋来的。有错误你们可以揭发，但不要去冲击。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这毕竟是少数个别的，不要全国到处都抓陈再道。现在有股风，到处都在揪军内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军内一小撮，没有调查研究就到处揪，到处揪陈再道，这是由武汉这个事件引起的，这是不对的，一定要真拥军，即使解放军负责同志一时支持错了，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只要改正了，你们就要拥护。对他们的缺点要热情帮助。我们解放军有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一旦知道错了，就立即改过来。三支两军工作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你们要坚决支持。乱夺枪也是不对的，不能形成夺权风。枪杆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来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首先是武装工人，学校里应该搞军训。但要强调指出，人民武装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它应由解放军来领导来指挥，首先要搞好大联合，然后才能武装起来。不联合就不发枪。

五、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了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三司垮台了，这表明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因为是彻底解决，所以武汉的革命三结合的条件比别的地方要好。现在请大家来商量一下建立一个省革委会的筹备小组问题，你们提一提地方上有那些干部可以结合，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可以考虑一下。

从王任重、院党委、工作组到陈再道，搞逼、供、信，群众写了检讨，不能算“叛徒”不能用他们检讨材料来攻击别人。因为他们是用共产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来搞的。这些材料不论在谁手里，应当一律退回本人，本人也不检讨，按去年十月五日中央决定处理。

公检法要一分为二，有人想造反，但是思想、工作方法还是旧的，好抓人，好抓小辫子。公检法的最大的任务是保护革命派嘛！想造反的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改造旧的一套。

武汉不是有个联合指挥部吗？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嘛，当然有的大组织也才有一个委员，但是在革委会建立以前，还应当起过渡的作用，将来要取消，由革筹小组代替。

六、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

始终把矛头对准刘、邓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对于“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及证据确凿的杀人凶手要实行专政。专政机关不抓，造反派也不要抓，要发动“百万雄师”中的群众起来揭，起来抓，这点要千万记住。专政机关在群众的要求和协助下，只抓极少数。对“百万雄师”必须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充分揭发一小撮坏头头的罪恶，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要帮助，争取教育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来。

七、有的组织提到杀向社会，下厂、下乡问题，现在武汉问题还未彻底解决，现在仍然要以搞好武汉为主，有些地方需要下去的话，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去，下去的各革命组织要团结，要互相配合，不要单枪匹马地到造反派力量很弱的地方去，下去要与新的武汉军区联系。你们学生不要干涉、操纵工人运动，不要当保姆，要相信工人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要向工人学习，做他们的小学生，要促进他们。工人组织不要包括机关干部，要实现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

总之，你们回去主要是抓两个方面，一个是团结、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建立筹委会，一个是拥军。

最后各革命组织的勤务员，纷纷向中央首长表态：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希望，一定按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办事，一定为毛主席争气。

对这次接见的传达以此文件为准，其他传达和传单一律无效。

武汉钢工总 朱洪霞 夏帮银 武汉钢二司 丁家显 方保林 钢九·一三
李想玉 但功荣 新华工 张立国 郭保安 新湖大 谢帮柱 彭勋 新华
农 高玉泽 魏梅森 三司革联 雪湘明 曾庆元 军区负责人 曾思玉 刘丰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整理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朱洪霞夏邦银等《永远忠于毛主席》

（武汉地区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组织负责人 朱洪霞 夏邦银 丁家显 方宝林 李想玉 但功荣 张立国 郭宝安 谢邦柱 彭勋 高玉泽 魏梅森 雪湘明 曾庆元）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三军指战员的大力支持下，武

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激烈的搏斗，粉碎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的猖狂反扑，从根本上扭转了武汉的局势，把大坏事变成了大好事。通过这场大搏斗，出现了伟大的七月革命怒涛，通过严峻的考验，检查了每一个党员、干部，每一个群众组织，每一种社会政治力量。阶级阵线非常分明。这为彻底解决武汉地区问题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使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深受迫害而又得到彻底翻身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恩万谢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们深深懂得：已经取得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艰巨的任务正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绝不辜负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一颗红心誓死保卫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闹革命，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

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高举革命的大联合的大旗，加强革命派内部的团结，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多作自我批评，虚心向兄弟组织学习，多看别人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顾大局、识大体，处处以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为重。

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拥军的大旗，争当拥军的模范，坚决和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对于毛主席、林副主席委派的武汉部队曾思玉司令员和刘丰政治委员，坚决信任，大力支持。

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抓革命，促生产。一些到现在还不觉悟的或别有用心的人要怠工，我们坚决顶上去，和解放军、工人同志一起，去维护革命的秩序和生产的秩序；到郊区去帮助收割，学习贫下中农的优良品质。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反动派是不打不倒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千百倍地提高警惕，针锋相对，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如何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

权，破私立公，彻底革命。我们必须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天天读，天天用。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是多么的亲切啊！我们一定要永远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我们要站得高，看得远。武汉的问题关系重大，不是我们一个地方几个组织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利益，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想到整个革命事业，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

毛主席为我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撑腰，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

（人民日报（1967.08.14））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王力接见新华社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谈话

〔八月十五日凌晨二时半至五时半，王力同志接见了新华社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谈了关于武汉反革命暴乱事件的一些情况和看法。现根据记录稿摘要刊登如下。记录稿未经王力同志本人审阅，仅供读者参考。〕

新华社各群众组织的代表们首先向王力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并祝王力同志早日恢复健康，王力同志说：

我的脚一根骨头再长一个月就好了。我全身被打了，但没有内伤，不会成为残废。我的身体很好。谢谢同志们，并向同志们问好。

武汉的事情变成了好事。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好解决。现在湖南、河南的问题也解决了。武汉是反革命暴乱，右派作了充分表演，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声讨。

毛主席要谢副总理和我去武汉，原来想象还不能象现在这样彻底解决问题。现在不是彻底解决了吗？原来毛主席指示，只要陈再道、钟汉华改正错误，发一个文件，把抓的人放了，保证革命派的人身安全，我们还是要保他们的，要革命组织不揪他（指陈再道），拥护陈司令员。但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对“百万雄师”，中央原来的方针还是保留他们的名称。他们没有百万，也有十万嘛。参加“百万雄师”的群众大多数是好人，是受蒙蔽的阶级兄弟。希望他们转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本来协商时要他们作为谈判的一方，征求他们

的意见，等待群众觉悟，现在他们是垮台了。他们的头头干了坏事。我们到武汉时，满街说他们是“百匪”，老太婆说他们比日本鬼子还坏。我们说服革命派不要叫他们“百匪”。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受蒙蔽的群众。

武汉的“三司”，人们叫它“康老三”。根据材料看，三司是中间偏保的组织。我们原想争取它站到革命派这边来。在“七·二〇”事件中，每个政治派别，每个人都要表明态度，而三司同“百万雄师”唱一个调子。这说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独立师（即 8201 部队）要打倒王力，抓王力，说“中央把王力交给武汉斗争，明天要开斗争大会”，三司也广播了一夜，甚至说，“王力就是王力，不是中央文革”，“要把王力同中央文革区别开来”。后来中央发表第一条消息，三司就彻底垮台了。

工总的翻案问题是焦点。“百万雄师”说“谢富治、王力是下车伊始，乱表态”。其实我们是经过长期调查的，如工人领袖朱洪霞，我们就有一万字的调查材料。只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才会这样讲话。

“一·二六”夺权没有成功，但它是上海经验的继续。毛主席总结的“一月革命风暴”的产物是新生事物，是初生的犊儿，开头不那么漂亮，慢慢就会长得漂亮。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出来就那么完善。而陈再道把革命的事物定为反革命复辟，这就不对。二月八日，工总等二十多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这个声明大方向是对的，有缺点，有错误，如反托派，大乱特乱，大分化等这些口号，但也不是武汉的特产，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报纸上就有过。“二·八声明”是一月夺权的继续，它的大方向就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革命派内部有批评，革命派对“二·八声明”的批评是对的。人家是革命派，你说他是托派是不对的。而陈再道却把“二·八声明”定为“反革命复辟总纲领”，分什么“香花派”、“毒草派”。在陈再道的支持下，对“三新”进行了人人“洗澡”，搞了两个月的批判，人人过关，写认罪书。陈再道在两个月当中镇压了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九十万人要人人写检讨……。

三月二十一日，军区发公告，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从总部到分部全都解放。工总当时有四十万人，掌握了一些工厂的大权。三月十七日，军区就把工总的头头抓了五百一十六人。我们问陈再道抓的是什么人，陈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别人请示他要抓三百五十人，他说抓三百就够了。这说明陈再道是“百万雄

师”的头头。

陈再道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在武汉抓了五百多人，在全省抓了几千人，方向完全错了，路线完全错了。四月六日，中央发了十条，那时他转过来就好了。陈来中央文革谈，他竟然伪造江青同志四点指示，继续坚持错误，还认为不能为工总翻案。“百万雄师”是他的错误思想的产物。陈再道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有一批秀才，给他搞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为他的错误辩护，说什么武汉特殊，牛鬼蛇神最多，民主改革不彻底，社会渣滓都沉淀在这里，所以陈再道要搞镇压反革命。他们说，不走北京道路，不走上海道路，要搞个武汉方法，把所有的人都收留起来，组成联络站，干部集体“亮相”。

“百万雄师”有四个支柱：独立师（8201 部队）原是公安部队，共有九千多名战士，只有两千人支持陈再道闹事；人民武装部，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公检法”，是司法系统；“百万雄师”。他们用全套专政工具来搞全面复辟。脓疮出来好，因为有毛主席在，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有两个条件，一切坏事都可以变成好事。现在军区改组，独立师调出武汉整训，人武部、“公检法”彻底改组，“百万雄师”彻底瓦解，革命阵线分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各方面来支持，形势大好。

你们在新华社工作，看到很多消息，这里告急，那里流血，可能认为形势不好。其实形势很好，对形势作悲观的估计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北京有的学生分析目前全国形势认为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夕”；现在各地都在抓“陈再道”，这是错误的。军区坏的司令员，全国只有四个：杨勇、陈再道、乌兰夫、黄新亭。而搞反革命暴乱的，只有一个陈再道。所谓到军区去抓一小撮，这里抓陈再道，那里抓陈再道，都是不对的。北京有的学生对形势的分析不对，没有看主流，没有看事物的本质。对形势的分析不对，处理问题的方针就不会对，会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对待。这个大好形势，可是就有人看不清楚。这些人过几个月就看清楚了。

军队的错误与地方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错误不同，犯方向错误只要改了就好了，还是认识上的错误。有的人有反动言论，攻击毛主席司令部，攻击中央文革小组，说“你们文人就那么高明”，其实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谁也没有说过自己高明。中央文革是在毛主席、林彪同志和其他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认识到，经过长期斗争的革命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些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农村的阶级界线是清楚的，依靠谁，打倒谁，是非判断是清楚的。当革命发展到新阶段，大多数干部在理论上准备不足，也缺乏事实的教育，这次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既无理论的准备，又缺乏事实上的教育，因而判断正确与错误是比较难，敌我也分不大清楚。他们看作朋友的，却是走资派，他们认为是敌人的，却是造反派。所以较多的干部犯了错误。

是不是较多的干部犯了错误就不革命了呢？不继续革命就会走到资本主义，走到苏联修正主义那条路上去。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的干部都是我们的敌人吗？只要他们承认错误，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不是走狗，不是一小撮，那么我们对大多数的人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对所有没有垮台的干部，我们都希望他们不要垮台；对于那些不要打倒的干部，都不打倒，要团结他们。当然，真正扶不起来的，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们的斗争矛头，必须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面不能扩大，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要三相信、三依靠（即相信和依靠群众、人民解放军、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说：“凡是有群众的组织，就不要说是反动组织，保守组织，要对他们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哪里有那么多的坏人？坏人只是一小撮。“百万雄师”也是一样。我和“百万雄师”接触过，可以举个例子：我们一到武汉，陈再道派了一个保卫科长跟我们。和我们一起的小将经常挖苦他，说他是“铁杆百万雄师”。他最害怕到革命派的地方去。他跟我们到水院去，见到造反派并不可怕，后来他成了保卫我的人。绑架我的汽车上有三十多个战士。我给他们做了工作，后来有人打我时，这些战士都护着我。可见，要相信群众，哪有那么多的坏人！陈再道把中央文革当敌人来宣传，许多人受到蒙蔽，认为他所做的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一支部队，四个营已经上街了，后来有两个排，他们的政委只作了一刻钟的工作，战士就痛哭流涕。军队转过来了，这说明我们的军队是可靠的，我们向军队的高级干部作了四天工作，最后野战军除个别的以外，全部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所以，对于毛主席说的“三相信、三依靠”，决不能动摇。武汉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

总社的同志，大量的要下去，到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去，向中央反映情况，在

总社和好的分社的直接领导下，也在我们的直接指挥下，你们要下去，赶快下去。

下去以后，不要指手划脚，不要参加他们派别的斗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发表自己的政见，千万不要指手划脚。要进行调查研究，向中央反映情况。就是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人家就不允许，要准备挨打。

到哪里去，都要把中央已经知道的情况讲一讲，不清楚的，自己去摸去，犯错误也不要紧。

搞国际斗争的一定要知道国内。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场最高级的斗争。国内问题搞清楚了，国际斗争就好解决了。事情总是那样，高级的解决了，反过来看低级的东西就好解决。什么外交部的国际斗争，光是吓人。

我对每一个新闻战士都有这样一个要求，首先是革命的战士，第二才是新闻战士。不能颠倒。如果我们（指中央文革）不是直接地投入到运动中去，作一个革命战士，我们就没法写文章。我同人民日报讲过这个事情，我们到运动中去，和群众相连，文章写起来比较容易。相反有些报馆的人，关起门来，整天写呀写，写不出东西，天天搞无米之炊，那怎么行呢？

下去应该是“三结合”。我们这一次到武汉去，就是这样的。一般干部，还有革命小将，同时也有革命的领导干部。我们下去以后，没有任何等级观念。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做革命大联合的模范》

最近，武汉“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共聚一堂，一致表示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紧密地联合起来，为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而斗争。这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联合战斗的道路上迈出的新的一大步。这是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的沉重打击。

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大联合的热潮中，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起了带头作用。这个头带得及时，带得好！

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对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负有重大的责任。他们应当站在群众的前头，排除来自各方的干扰，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积极地推进革命的大

联合。应当看到，广大革命群众是迫切要求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谁要违背群众的意愿，热衷于打“内战”，硬要把严肃的政治斗争拉到宗派斗争的歧途上去，那就必然会受到革命群众的抵制和反对。

在革命的大联合过程中，每个革命同志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克服自己头脑中的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提出的战略口号。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联合起来，才能胜利地进行夺权和掌权。如果把个人的和小团体的利益置于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之上，陷于为个人和小团体争权夺利，这样势必越夺越没有权，越脱离革命群众，以至使自己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他们从自己切身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革命大联合的重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把新仇旧恨集中到无产阶级的主要的敌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身上；而对于革命队伍内部以往出现的分歧，做到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双方多作自我批评，多看对方长处，珍惜在共同斗争中所凝结成的战斗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个友谊，使武汉地区革命大联合出现了崭新的大好形势。

毛主席教导我们：“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当前，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是我们一切言论和行动的最高标准。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从思想上、组织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是决定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关键。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三军广大指战员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全力支持下，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完全有条件，而且应该成为革命大团结、大联合的模范，成为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模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搞好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行动，支援湖北三千万革命人民的

斗争，支援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

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横刀跃马，奋勇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武汉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带头推进大联合
坚决遵循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导 绝不辜负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 武汉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带头推进大联合

新华社（1967.08.17）

他们团聚一堂，亲切座谈，一致表示，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地团结起来，集中火力，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推向新阶段。

新华社武汉十四日电 在亿万军民满怀战斗豪情热烈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日子里，在举国上下掀起彻底摧毁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新高潮中，英勇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武汉“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和“三司革联”等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团聚一堂，进行了亲切的座谈。他们一致表示，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紧密地团结起来，进一步巩固地联合起来，集中目标，集中火力，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共同的革命目标要求我们大团结、大联合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看到，敌人虽然在政治上孤立了，但他们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他们还会施出新的花招，策划新的阴谋，进行疯狂的抵抗。我们千万不要丧失革命警惕，掉以轻心，否则，就会吃大亏，上大当。历史赋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使命，就是要彻底摧毁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

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揪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斗臭。共同的革命目标迫切要求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只有团结战斗，联合对敌，才能置阶级敌人于死地，才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完全胜利。

“钢工总”和“新华农”负责人说：中国的赫鲁晓夫被揪出来了，他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也被揪出来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伟大的胜利，最辉煌的成果。但是，必须看到，他们是没有冻僵的毒蛇，是落水的恶狗，还会作垂死的挣扎。阶级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当敌人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总是要采用分化革命阵线内部的手段。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还很艰巨，斗争的道路还很长。我们应该更好地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一致对敌，穷追猛打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广大革命群众的共同呼声。

“新湖大”负责人说：当前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迫不及待地需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最广泛的革命大联合。一年多来的阶级斗争教育了我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虽然已经威风扫地，但他们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还会梳妆打扮，寻找机会向我们进攻。大敌当前，一切革命组织，必须进一步巩固地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狠狠地打击敌人。

“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和“三司革联”的负责人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更好地团结起来，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殷切希望，也是全国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没有理由不更好地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敌人最害怕我们革命派的大团结，我们越是要加倍增强团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要永远牢记这个真理，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破坏和挑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迈开更大的步伐，挑起更重的担子，团结武汉地区广大的革命群众，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猛烈开火。

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七个革命组织的负责人说，当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实行长时间白色恐怖，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时候，正是遵循

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同呼吸，共患难，互相鼓舞，互相支持，坚持团结战斗，战胜了貌似强大的阶级敌人，因而赢得了胜利。我们的团结和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这是进一步实现和巩固大联合、大团结的基础，也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保证。

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和巩固大团结、大联合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

在长期阶级斗争反复较量的实践中，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凝聚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深仇大恨。特别是最近，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制造了严重的政治事件，使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仇上加仇，恨上加恨。他们一致表示，目前必须更高地举起革命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大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促进更加广泛的大联合，以更加坚强的铁拳头狠狠地痛击“落水狗”。

“新湖大”和“新华农”的负责人说，我们一定要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把大批判推向一个新阶段。我们要通过大批判来教育群众，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在斗争中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在对敌斗争中求团结，团结起来对敌进行斗争；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臭；要彻底揭发、批判、斗争“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的罪行。我们要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把广大群众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共同对敌。

“钢二司”和“钢九·一三”的负责人说，只有通过革命的大批判，才能实现和巩固更广泛的革命大联合。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革命派和解放军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结成更加坚强的铁拳，把千仇万恨集中在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解放一大片，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彻底打倒他们，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新华工”和“三司革联”的负责人也都一再强调，只有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革命派才能真正的团结起来，才能争取和团结绝大多数的群众。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更深入更彻底地进行大批

判。“钢工总”负责人说，我们应当更好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结成更加巩固的铜墙铁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高举“破私立公”的大旗巩固和发展大团结、大联合

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认为，在战斗的道路上，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是正常的现象，不足为奇的。解决这些分歧和矛盾的根本途径，是不断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破私立公”的大旗，狠斗私字，大立公字，多做自我批评。

“钢工总”和“钢九·一三”的负责人说：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革命组织之间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是难免的，是正常的现象，用不着大惊小怪。我们完全能够在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求大同，存小异，通过适当的机会，交换意见。我们有许多缺点，希望各兄弟组织多给我们批评。我们还准备邀请各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在一起交换意见，听取对我们的批评，达到加强团结的目的。我们自己更是要多做自我批评，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在革命组织内部，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算老账。千仇万恨，统统集中到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身上。对他们，就账要算，老账也要算，要算总账，算个彻底，算个痛快。

“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负责人说，千条矛盾，万条矛盾，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矛盾，是最大的矛盾。我们应该把这个敌我矛盾看得大大的，把革命组织内部的矛盾看得小小的。对阶级敌人要狠，对自己的同志要和。革命组织内部存在的问题，可以互相协商，互相谅解，互相让步，在枝节问题上可以和点稀泥。我们团结得更坚强了，就是对阶级敌人的致命打击。我们学生要向工人学习，向各兄弟组织学习，要多做自我批评。过去，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也有不少缺点错误，希望各兄弟组织批评帮助。今后，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看别人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向“私”字猛烈开火，一反到底。我们不仅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到

底，同时要对自己头脑里“私”字造反到底。

“钢二司”和“三司革联”的负责人说，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树立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实现和巩固发展大团结、大联合的根本。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一定要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做大联合的模范。凡是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团结的大字报不贴。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多做自我批评，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为促进更加广泛的革命大联合作出新的贡献。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8201 部队干部揭发《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8201 部队干部揭发武汉“七·二〇事件”的黑幕 《七月风暴》编辑部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一场举国罕见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冲击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派往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住地，推打和围攻了谢富治副总理，绑架和殴打了王力同志及其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进行了长达三天的荷枪实弹的大规模武装游行。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围攻、殴打和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以及围攻新湖大，鸣枪示威，镇压革命造反派等严重政治事件。一霎时，黑云盖天，鬼叫狼嚎，一片阴森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陈再道、钟汉华及其同伙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更是活动频繁，或幕后策划，或亲临指挥，嚣张万分。现就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对现行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〇”叛变事件中的罪恶活动作如下揭发：

一、一次策划对抗中央的黑会

七月十日，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主持下，在武汉军区内，召开了驻军各军事单位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在这个黑会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作了黑指示，到会的干部都发言表示支持，共同给军区支左工作定

了调子，并根据陈再道的黑指示统一了三条口径：一是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对他们不能糊里糊涂地支持，他们如果坚持错误，垮了自己负责；二是“百万雄师”是客观存在，是革命群众组织，对他们要帮助、教育、提高，我们赞成这个组织，支持这个组织；三是三、五天内，各单位要把对武汉地区各群众组织的看法的材料准备好。在这次黑会上，钟汉华与陈再道一唱一和，一再强调：“对外口径一定要一致，要用大量事实来说明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对各革命群众的看法。”并要求“尽快把新华工的作战计划拿到手”。

会后，牛怀龙秉承主子的旨意，急急忙忙连夜向师党委常委作了传达，并于七月十一日向正在进行的师党委扩大会议（科团以上干部）作了详细传达，还集中讨论了三天，把原来总结上半年工作、布置下半年工作的会议，变成一个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策划对抗中央的黑会。与此同时，还指示各团根据所统一的口径，组织机关干部进行讨论，统一认识。很显然，“七·一〇”“七·一一”会议，就是一次为“七·二〇”反革命叛乱事件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黑会。

二、恶毒歪曲中央首长指示，蓄意煽动群众对抗中央

七月十八日，牛蔡在听取了周总理、王力同志处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后，竟敢违背总理的指示，急急忙忙于当晚私自向部分师党委和正副科长作了传达。十九日上午，蔡又擅自将此内容传达到师直排级以上干部及各团、营以上干部和从我师派出的各军管会代表，并指示军代表向所在单位群众组织传达。不到一天时间，就分别传达到了部分单位的战士和市公检法群众组织的成员，传达范围如此之广，传达时间如此之快，是牛蔡别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乱所玩弄的卑鄙伎俩。

传达中，反革命分子蔡炳臣又恣意歪曲中央首长指示，蓄意煽动部队对抗中央，在介绍会议情况时，说什么“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的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表示态度”。“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只好都表示态度”，又说：“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的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什么：“我们的思想是不通的，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我们准备了四句话，如果他们问时，我就

说：第一，我思想通了；第二，有毛泽东思想我什么也不怕；第三，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第四，保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很显然，这是以介绍会议情况为名、攻击中央是带框框来的，不作调查研究，不愿听取大家意见，强行作出决定，迫使军队表态。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部队对中央不满。在具体传达周总理和王力同志的指示时，为了进一步激起部队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蔡对总理和王力同志反复阐明的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和军区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道理一带而过，而对王力同志将军区整理的“百万雄师”十大优点逐条驳斥和对武汉地区各群众组织的结论性看法，却添油加醋讲的很具体，很详细。甚至捏造说：“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这时，会场上议论纷纷，不满情绪已经十分明显。牛怀龙又火上加油地再三表态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上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因此还跟我谈了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通，个人意见保留”，还说：“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的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希望大家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有意见按组织提”，这样会场上更是吵吵嚷嚷，气愤和埋怨，激动和丧气的不满情绪充满了整个会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牛蔡又心怀鬼胎，别有用心地反复强调，要求大家：“对外不要提是周总理讲的”，把对抗中央的矛头引向了王力同志。

牛蔡在整个传达过程中，只字不提如何正确对待和坚决贯彻中央首长指示，怎样稳定部队，怎样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各类人员的活思想，却连篇累牍地大搞煽动，还一再示意不要对准周总理，而要对准王力同志。这一切，充分暴露了牛、蔡这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策划和挑动部队反抗中央的狼子野心。

三、赤膊上阵、亲自指挥

牛蔡秉承其主子陈再道、钟汉华的旨意，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在制造反革命舆论之后，亲自出马，赤膊上阵，直接指挥和参与了“七·二〇”反革命叛变事件。

1、千方百计指挥和纵容反革命暴乱

在牛蔡的煽动下，各团宣传车经过串联，于十九日晚十一时三十分左右到师部集中准备上街闹事。蔡不但不加制止，反而慷慨应允，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于是，六台宣传车倾巢而出，沿途大喊大叫，半个晚上跑遍了武汉三镇，

大点反革命暴乱之火。

十九日晚十二时许，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露骨地表露了他怂恿部队上街闹事的狰狞面目。

二十日晚八时许，机关部分干部看到了所谓 8201 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特急呼吁”这个反革命宣言书后（经调查，实属五团八连三个战士盗用全体指战员的名义写了，“百万雄师”铅印的），曾积极建议，立即发表声明辟谣，蔡却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一分为二嘛！”后来，又有几个干部多次提出类似要求，蔡仍置之不理，任其流毒全国。

二十一日上午，蔡指使其爪牙赫文德将“百万雄师”捏造的中央来电（王力同志的四点指示是他自己搞的，不能代表中央，中央迅速派总理、伯达同志来汉处理）通知各团，并要求向部队传达，妄图煽动部队人员揪王力同志，把事态扩大。

二十一日上午，蔡向机关干部询问对“七·二〇”事件的看法，当大家指出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的后果时，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又十分得意地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还说什么“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副教授，儿子是二司的头头”，“王力是国民党员，是东北军方毅部下的人”。牛也说：“王力是国民党员，这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又说什么“王力是‘二月提纲’的起草人之一”，一句话，牛蔡散布流言蜚语，企图继续蒙蔽和煽动群众顽固与中央对抗。

请看！牛蔡直接指挥和纵容部队部分人员暴乱的丑恶面目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2、围攻绑架，亲自出马

部队上街闹事，要揪王力同志的事，军区孔庆德和牛蔡是完全知道的，不但不采取任何制止措施，更没有通知负责警卫中央首长的人员加强保卫，从二十日零时三十分左右起，“百万雄师”、“武汉公安”和一些部队人员先后冲击了中央首长住地。在中央首长的安全收到严重威胁的紧急关头，我师执行警卫人员曾

陆续多次向牛蔡报告过冲击情况，而牛蔡无动于衷，不向军区报告，也不积极设法制止，直至凌晨六时许，牛才到现场。牛到时，暴徒们正在围攻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并不采取果断措施营救中央首长，只向执行警卫的人员说：“我们的宣传车和部队马上就到”。不到十分钟果然到了。到后，便伙同其他部队和“百万雄师”、“武汉公安”的人员去围攻、绑架王力同志。当一些暴徒将王力同志绑架上车时，我师警卫人员竭力营救，而牛却说：“让王力上车吧，上了车还好些！”这时警卫人员向牛说：“王力同志被绑架走了怎么办？”牛回答说“我自有安排”，就这样，王力同志被一群暴徒绑架到了武汉军区大院，可见，绑架王力同志是陈、钟、牛、蔡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已安排好的。

王力同志被绑架至军区大院后，军队内部的“百万雄师”、“武汉公安”的一群凶手轮番进行围攻和殴打，王力同志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牛怀龙这个混蛋，于八时许又来到军区大院，假惺惺地东跑西跑，装出一副保护王力同志的样子，实际上是到处串联，赤膊上阵，向王力同志施加压力，妄图迫使王力同志收回其指示。当“百万雄师”不断地广播他们伪造的所谓中央来电时，王力同志要牛去制止，说“根本没有的事，叫他们不要再广播了。”牛去后不但没有执行王力同志的指示，反而带回一张外面谣传的四点指示的纸条，强迫王力同志表态，被拒绝后，牛仍不死心，又带去一军人，气势汹汹地要挟王力同志对其四点指示或签字承认，或声明辟谣，也同样被王力同志严词拒绝。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牛几次要王力去看所谓“武汉公安”被新湖大、二司打伤的人，还装出一副正经相，说：“只要去看看那几个被打伤的人，‘武汉公安’马上可以撤走，这样也可以立即转移”，企图再次迫害王力同志。直至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在 8199 部队的积极营救下，将王力同志转移出军区大院为止，牛一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蔡炳臣一直龟缩在机关，与其爪牙赫文德，在司令部作战室稳坐钓鱼台，任其事态发展，还同牛通过电话，行踪十分可疑。不言而喻，牛怀龙、蔡炳臣是这次直接指挥并亲自出马围攻、绑架和殴打王力同志的凶手，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3、玩弄伎俩，负隅顽抗

冲击中央首长住地，殴打中央首长及其随行人员，围攻绑架王力同志，荷枪实弹大规模武装游行、绑架《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记者，围攻新湖大……

等一个个严重政治事件陆续发生，陈、钟、牛、蔡、巴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高兴之余，又恐其反革命罪恶勾当过于暴露，还阴谋嫁祸于群众。于是挖空心思，玩弄他们惯用的两面三刀伎俩，妄图继续蒙骗和挑动部队人员与中央对抗。

二十一日深夜，牛蔡为了避人耳目，假意稳定部队，经蔡口述并以党委名义下发了六件决定。这个决定只字不提“七·二〇”叛变事件的性质，却强调提出“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二十二日晚，又经蔡口述，并连夜派干部下部队传达了四条紧急命令，除了再次规定：六条决定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之外，通篇都是一面责怪群众，一面树立牛蔡个人的绝对威信，说什么要相信师党委，要坚信师党委的六条决定是正确的。企图利用个人的所谓威信组织部队人员进行负隅顽抗。这个所谓决定和命令是地地道道的彻头彻尾的大毒草。其阴谋在于再次恶毒地攻击王力同志的指示不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进一步挑动群众继续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并以此做护身符，把责任推给指战员以保他们过关。

为了紧紧控制宣传队为牛、蔡反革命目的效劳，于二十二日上午，借坐思想工作为名，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全师六台宣传车约五十余人到师部四楼会议室开会，在会上，蔡对宣传队员大点反革命之火大加赞扬，还作了新布置，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大意是：（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你们能不能在五天之内，最好三天搞一个响当当硬梆梆的材料，越快越好。这个任务并不比前两天发动群众的任务轻；（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在讲这些话的过程中，还不断激起大家鼓掌叫好。周忠这个牛蔡的忠实爪牙，在这个会上也鹦鹉学舌地重复了主子蔡炳臣讲话的主要内容，还大言不惭地说：“我谈我的看法，你们的行动我是支持的，并为此感到高兴”，还进一步拉到会

人员跟牛蔡反革命到底。说：“要跟他们干到底，要好也好到一起，要坏也坏到一起”，很清楚，根本不是做什么思想工作，明明是为他们一手策划的反革命叛变事件大唱赞歌，评功摆好，上弦打气，继续欺骗和煽动宣传队员执行他们的黑指示，替他们的反革命罪恶勾当卖力。

二十日晚和二十二日上午，蔡炳臣还多次催促支左办公室秘书组尽快地重新准备材料，遭到秘书组成员抵制后，蔡很不高兴地说：“写材料哪有那么好的事，既符合上面的精神，又符合下面的情况又符合你们的想法，你们老是这来那去，什么时候才能写出来”。还顽固地提出，仍按原来的观点写，越快越好。幻想拿着吹捧主子陈再道，侮蔑控诉造反派到北京去向中央施加压力，实现反革命的罪恶企图。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1、牛、蔡“七·二〇”叛变事件中的反革命罪行罄竹难书，仅上述活生生的事例，就足以处分证明陈、钟、牛、蔡、巴等一小撮军内走资派一手策划制造了“七·二〇”叛变事件，其阴谋在于疯狂煽动部分指战员和群众反抗中央，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对武汉问题的决定，然后窃取湖北省、武汉市的党政军文大权，妄图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2、“七·二〇”事件是陈、钟、牛、蔡、巴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蓄谋已久的，经过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暴乱，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的叛逆行为，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政治事件。

3、制造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钟汉华，而牛怀龙、蔡炳臣则是这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和挑动者，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4、陈、钟、牛、蔡、巴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恶滔天，最该万死！我们强烈要求，把他们揪回来斗倒、斗垮、斗臭，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能翻身！

口号（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原载钢二司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联合编印一九六七年九月增刊之一，P4—17】

一九六七年九月某日，8201 部队干部揭发：《“七·二〇”冲击东湖客舍反革命事件的真相》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勾结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的坏头头，煽动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在武汉冲击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的反革命事件。谢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事件。冲击东湖客舍是这个叛变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将事实真相揭露如下：

一、冲击东湖客舍的经过

七月二十日零时三十分许，武昌公安局的“武汉公安”武昌分部，在军管小组组长王福（我师六团政治处主任）的操纵、煽动下，由坏头头何某（刑警队照相的）、肖某、刘某（肖刘二人均系东湖公安派出所的干警，过去曾执行过东湖警卫任务，了解客舍情况）带领十二名暴徒，分乘一辆轿车、二辆吉普车冲到客舍北门，被我哨兵阻拦门外。这伙暴徒说：“要见谢部长，谢部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见谢部长是合情合理的。”哨兵回答：“谢副总理不在这里住”。暴徒说：“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侦察，谢部长肯定住在这里。”问题发生后，警卫队队长秦堂春、政教张守本、师作战科副科长徐福兴、师作战科参谋吕宗贵、师保卫干事蒋建隆同志先后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处理问题。暴徒们声称：军官小组向我们传达了王力的四点指示，工总要翻案，工总翻案我们就要人头落地；军官小组要我们明天就放人，工总的案是我们办的，我们最了解情况，我们要问谢部长，要不要执行公安六条……等等。我们对他们讲，谢副总理不住这里，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有意见应通过军区支左指挥部反映，要见首长由军区支左指挥部统一安排。这伙暴徒见阴谋不能得逞就扬言威胁说：“谢部长今天晚上不见，天亮武汉公安将有三四千人来冲，暴露了这

里的目标，或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概不负责。”我们警告这伙暴徒：你们都是搞公安工作的，有的过去还在这里搞过警卫工作，知道这个目标的重要性。暴徒十分嚣张地说：“中南海都冲了，这里有什么了不起！”

从冲击开始，到我们说服劝阻约两个半小时的过程中，秦堂春同志分别向牛、蔡、中央警卫团卫兵队丁队长、武汉军区负责保卫工作的王副秘书长报告了情况；蒋建隆同志向蔡并向武汉军区王副秘书长、王科长报告了情况，徐福兴向牛报告了情况，在我们反复多次的报告中，牛蔡都是满不在乎，哼哼哈哈地不作指示，只以“注意一下”和“有什么变化再报告”搪塞过去。只有丁队长传达了汪东兴主任的指示“请王力和谢富治同志出面处理”。我们当即将这个指示报告了武汉军区王副秘书长。

二时四十分许，这伙暴徒乘车由小北大门冲进院内约五十公尺，被警卫队的同志拦住，三时许，军区王副秘书长、王科长在蒋建隆同志的再三要求下，来到现场；劝阻无效，僵持不下。

五时四十分左右，“百万雄师”“武汉公安”在一小撮坏头头的带领下，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同武昌公安局的一伙暴徒相结合，封锁了北大门柳堤，其余四辆冲进风光大门，这伙暴徒不仅不听哨兵的劝阻和警告，反而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包围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住房，张守本同志带领警卫队同志将冲进的暴徒组织好坐在一草坪上，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出来接见和解答问题。

问题发生后，秦堂春、吕宗贵、蒋建隆同志分别打电话向牛、蔡报告，但却找不到牛、蔡（经事后查实牛在宿舍不接电话）只好破例地向司令部值勤室报告并要求他们找牛、蔡到东湖处理问题。

五时五十分左右，据说是在军区的指示下，牛才勉强地驱车来到东湖。牛到东湖不到十分钟，部队的车辆接踵而来，我师五团五连两卡车人打头阵，车子架着轻机枪、步枪、刺刀，随后即有海军一车、空军一部分、“武汉公安”的一部消防车，师、团宣传车六部、三零七医院，“百万雄师”共约千余人，杀气腾腾，反动气焰不可一世，他们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好、百万雄师就是好”“王力在哪里、老子要揪你、枪毙你、挑了你”等反动口号，冲入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住地。警卫战士拦车时，他们大

骂拦车的战士是“老保”、“8201 的叛徒”、“不躲开、老子用刺刀捅了你”，迫使拦车的战士躲避不及而爬在汽车头上。这些暴徒冲进“百花”后，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正在接见第一批冲进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公安”。他们像土匪一样闯入会场，拖开警卫战士，围攻、推打谢副总理，并将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误认为是王力，七手八脚把陈打了一顿，后有人说：“打错了，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才住手。暴徒们找到了王力同志就将其推上车绑架走了。王力同志的秘书张根成同志、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尹聚平（女）据理力争，也遭到围攻、打骂和绑架。王力同志被绑架的时间是七时二十分。

现行反革命分子牛怀龙到东湖后，既没有向警卫人员作安全措施方面的指示，也没有将部队要挟冲击的情况告诉任何人，只是东遛遛，西转转，看样子很焦急，实际是应付差事。最可恶的是当暴徒们绑架王力同志，警卫战士拖住王力不让上车，车上的暴徒拉着王力的手往车上拖，双方争执不下，牛怀龙不仅没有站在警卫战士一边制止暴徒绑架王力同志，反而劝说警卫战士：“让他上车。上了车就好了”。就这样王力同志被暴徒拖上了车。为了不让王力同志脱身，这个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还专门对宣传车上的人作了布置。为了保卫王力同志的安全，警卫队派了三个战士随车保护王力同志，又派三个同志乘坐其他车辆观察王力同志的去向，以便随时反应情况。

部队、百万雄师撤走后，武昌、汉阳公安分局的一伙暴徒，继续围攻谢副总理，经说服、劝阻于九时二十分左右离开。

七月二十日下午八时左右，徐福兴同志前往军区了解情况时，听到部队和“百万雄师”呼喊“周恩来来武汉，王力靠边站”，“我们要见周总理”等口号，分析有再次冲击客舍的可能，徐福兴即回师部将情况报告给蔡炳臣，说明了再次冲击的严重性，并要求采取措施。蔡答应：“给百万雄师打个电话，叫他们不要再冲东湖。”徐说行，徐继续补充说：“你还要给公检法军管会打电话，要他们下令公安分局、派出所不要去冲。”蔡也说“可以”。并假惺惺地说：“回去后还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打了电话就不去了。”徐见牛怀龙，牛小声告诉徐：“今天晚上‘百万雄师汉阳联络站’要冲东湖”，没有作指示。徐回到东湖，即同秦堂春同志交换了意见，研究了警卫布置，并同秦一起找卫兵丁队长报告了“百万雄师”要冲东湖的情况，建议首长转移。

二十日晚十时许，周总理到。徐福兴同志向牛报告：“总理到”，牛说“我去”。徐十时许问牛为什么没有来？牛答“不舒服，等一会就去”。下两点（即二十一日二时）又问牛怎么没有来？牛说“有事，等一会就到”。以后根本就没有去东湖。

二十一日三时四十分左右（某首长刚离开客舍二十分钟），“百万雄师”汉阳联络站在其坏头头蔡某、张某的带领下，千余人，分乘二十六辆卡车冲东湖，被警卫队全体人员阻止于“百花”（周总理、谢副总理住地）门外，他们声称：“我们是来揪王力的，王力答应十二点与我们谈判，现在三点多了，还不见王力去。”警卫人员找他们的坏头头，同他们谈判，说明王力同志昨天就被你们抓走，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你们最清楚，并严肃指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对待中央代表的态度，就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昨天冲抓了王力，犯了严正的政治错误，今天又来冲就错上加错了，你们不是说三新、二司、工总坏吗？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他们没有冲过一次，而你们却敢来冲。”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判仍无结果，坚持要冲。此时，“百万雄师”联络站坏头头肖某数人赶来，我们又从政治上说明冲击首长住地的利害关系，并警告他们：老实告诉你们，王力不在，谢副总理在，我们已经布置好了警戒，你们要冲，我们就保，你们只有将我们全部打死，才能把首长抓走，否则是办不到的。经过劝说警告，才答应撤走，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二、陈、钟、牛、蔡，罪责难逃

从两次冲击东湖客舍的经过情况可以看出，“七·二〇”反革命叛变，在现行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及其反革命头目陈再道、钟汉华的指使下，有组织、有计划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证据确凿，罪责难逃。

（1）执行东湖客舍住地警卫任务，以往师党委有个原则分工，任务一来就由一师级干部带领机关干部到东湖加强对警卫工作的领导。此次中央首长来汉，正值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剧烈的关键时刻，保卫首长安全比任何时期都重要。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特别是牛怀龙原来是警卫师副师长，有一定的警卫工作经验，明知此次警卫工作的重要性，自己不出马，也不叫分管此任务的其他师级干部去领导，反而派从来没有执行过此项任务的作战科副科长徐福兴同志去担任。十五日上午确定徐福兴一人去，后经再三说明此次

任务的重要性后，牛、蔡才勉强决定由执行此项任务的吕宗贵、蒋建隆同志前往。这时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有意削弱警卫工作的领导，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条件。

(2) 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长期以来忠实积极、不折不扣地执行其反革命头目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操纵“百万雄师”和“公检法”等反动组织，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七月十八日，周总理、王力同志的指示，敲响了这伙反革命分子的丧钟，反革命分子蔡炳臣说：“我们想法相反，三新二司是左派，工总要翻案，通过这也算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说：“杨代总长怕我不通，还专门给我个别上了一堂课。”看牛、蔡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何等仇视，于是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在一天之内将总理和王力同志的指示贯彻下去，在传达时，按其所需断章取义，尽力歪曲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挑起部队、“百万雄师”“公检法”对首长的不满，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传达中央首长指示是名，行反革命叛变动员是实。

(3) 师团宣传车从七月十九日二十时上街串联煽动起，到二十日五时四十分“百万雄师”、部队冲击东湖客舍止，在这九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四个人先后向牛蔡反映情况多次，他们一不做指示，二不通报外部情况，有意封锁消息，让中央首长处于无准备状态，以便突然袭击，达到反革命政变之目的。牛怀龙二十日得知汉阳“百万雄师”要冲东湖的情报，为什么不劝阻抵制？结果还是去了千余人冲击。蔡二十日答应给“百万雄师”“公检法”打电话不叫他们再去冲击东湖，为什么在这以前不打电话劝阻、抵制。二十日上午，蔡一个人在作战室打秘密电话，作战科长马兴家同志进去被蔡斥出，这足以说明“七·二〇”反革命叛变是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一手策划的。

(4) 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好出风头，处处事事树立个人权威。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毛主席来汉时，另一师的干部负责警卫工作，牛蔡东奔西跑到车站去迎接毛主席，严重违犯了警卫纪律，今年同样是中央首长来汉，他们首先削弱警卫工作的领导，对警卫工作不作指示，我们请都请不去。王力同志被人绑架到军区大院后，中央代表，空军政委余立金同志找到蔡，要蔡设法保证王力同志的安全。蔡从东湖返师后，在作战室正给军区大院的牛打电话：“余立金找我，要我们保证王力的安全，我想人在军区大院，首先应由军区负责，我们没

有兵力。”看，这个反革命分子何等恶毒！汉阳公安局被冲，市电信局被冲，牛蔡分别前往坐镇指挥，党和国家领导人驻地被冲，牛蔡却龟缩在屋里无动于衷。以上事实表明，反革命分子牛蔡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他们策划的反革命叛变事件不能按计划实现！

还有很多事实证明“七·二〇”反革命叛变是陈钟一手策划的，如指使暴徒冲击军用机场，不让周总理飞机着陆等，将有专题揭发！

口号略

【原载钢二司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联合编印一九六七年九月增刊之一，P4—17】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王宏坤接见武汉钢二司赴京展览团全体战士的讲话

〔海军政委王宏坤接见武汉钢二司赴京展览团全体战士时，批判陈再道摘要如下。〕

现在把陈再道揪出来了，陈再道搞的武汉叛乱，这是他的反革命本质发展到最后暴露了原形，这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这个人，我和他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个人历来就不爱学习，从历史上很早就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对毛主席不满。到了陕北他就不满，张国焘的观点没有改变。到陕北时，我是政委，他是军长。我给他提出，张国焘犯了错误不要执行他的。他不听，最后到（？）张国焘就失败了。后来派两个军去营救，当时他就不执行中央的命令：“为什么要我们去呢？一方面军怎么不去呢？”我说：“一方面军在这里的时间长，熟悉这里的情况，应该我们去。”

你们可能看到传单上，他在抗日战争时候也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陈再道当时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当时又在一起，他是 366 旅旅长，他先到，我后到冀南。毛主席提出当时要以游击战为主，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当时他就采取反对毛主席很长时间。彭德怀当时就采取运动战为主。当时我们是在平原，在冀南，不是山东的济南，是河北的。我和陈再道是一个区的，在一个大山上，他在山西面，我在山东面，相距不到十五里路。他当司

令员，我当付司令员。我就提出，你这指导思想有错误。在冀南的反击是很激烈的，敌人的实力很大，就必须游击战，这是合乎实际的。可是斗了半年他的思想也没解决，你们看主席提的要精兵简战吗？就是说，人要少，但是要精干，政治上要强嘛，机关要小嘛。他当时也是不执行，当时的机关都要人保护，没有人就不行。他就说机关大，我说这样不行，这样机关打掉了，兵也打散了。他不听，结果好几次被敌人包围了，受了很大的损失，他也不执行主席的，这也是个战略方针嘛。部队太大，这样人民的负担就太重，要持久战，人多了人民负担不起。持久就是时间打的长，就是要消耗敌人，达到最后把敌人消灭。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是反对的。

我们当时的条件很困难，敌人建立很多地堡封锁我们，把我们分成一块一块的，那时他就搞大兵团，把游击队集中起来，这样我们就丢了很多地方，那时我们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当时敌人变了我们也应该变。他也是反对毛主席的。通过这几件事就说明他是反对主席的。在张国焘领导下他是执行张国焘的啊，后来毛主席直接领导我们，他也是反对主席的。

武汉事件，主席派谢副总理、王力、余立金代表来汉后，总理去了，叫他承认错误，把人放出来，你们看了主席的批示。结果他不但不承认，还要绞死王力，打倒谢富治，还喊什么陈再道万岁，围攻绑架。他有“百万雄师”，有他的嫡系部队。这是整中央，这不是和张国焘一样？所以叫第二次张国焘事件。张国焘就是这个手段，中央还是想教育他，他本性不改，就是走向反革命。这不是偶然的事件，这是有历史的，就这样解释一下。叫他承认错误，他不改嘛！中央派去的同志他要绞死，他的口号表面是中央文革，实际是反毛主席、反林付主席。

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所以这个人本性不变，一直发展这样。这个人长期不学习，吃喝玩乐，堕落腐化。他的儿子当上反革命，想跑到外国去。这与家庭有关系嘛！这是个根本原因。全国胜利以后，不是有这么个牌子（做手势，指军衔），他自己要个中将。后来没有了，评级评了六级，他也不满意，他还嫌官小，还是个人的原因。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他没和我谈，我知道这一点。这是个人主义，他不好好工作，也没有什么办法，没什么好主意，就靠下边干。（有人插话：靠老资格吃饭。）对。（有人插话：他说他是十八勇士之一。）他撒谎，我们根本不是一方面军的，那是一方面军的。

（又有人插话：老保们都说是的。）他就是靠造谣吃饭。他原来在李先念那个师，后来来的。我当军长，他当师长。我经常批评他说：“你的部队就是好看不好吃。”他的部队就是带不出个作风，他也不下连队，当时我比他了解他的部队还多。就是贪玩不干正事。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在冀南分散在敌人的后面。我去组织起来几个团，他就坐飞机带他们到太行山，我没赶上。结果，组织了一个团，这团后来成了他的主力，他就没打多少仗。后来一个团全被敌人消灭，这是打仗中少有的。这个人并不能打仗。今天给你们讲讲：他这个个人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搞资本主义，他的本性不改，他的根，他的反革命面目就暴露。

现在武汉的形势很好，全国的形势也好的很，出现了几个反复，但是毛主席的思想一定要胜利，群众一定会觉悟的。当然问题也很复杂，八月一日，渡江不是有问题吗？死了不少人嘛！（有人说：捞上来的 180 多人。）

我们派人去捞了，我们专门派潜水员去捞尸体，就在一块……么多，有的还用绳子捆起来了，有的还是用刀子杀死的……这里面还有坏人破坏。

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胜利，世界革命也要靠这个。但是一定胜利，你们不是胜利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你们的努力。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曾思玉刘丰传达毛泽东视察湖北时的指示

〔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武汉军区政委〕

刘丰政委：我们这次很幸福，毛主席对我们很关心。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毛主席这次视察了三区六省，在武汉呆的时间最多。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咱们这个地方也到了。在这个地方停留了两天多三夜。两次出去都是白天，我们出于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劝他下半夜去，主席说不行，要白天出去看市容，而且是坐吉普车，他老人家看了之后很高兴。他老人家夜里二点钟回来，讲到两点十分，春桥同志说主席该休息了，又讲了几句。我们在他讲话时不插话，总是听他老人家讲，那里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讲话中，主席经常看语录，讲语录，边讲边笑，一直很高兴。二十三号一时我们上街去看了一下很痛心，大字报都划掉了，在国庆节之前应搞起来，搞得更好。按毛主席讲：武汉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不象某些人估计的那样，形势那么严重。

1) 首先只能讲精神，慢慢传达原文。

2) 不准大字报上街。

曾司令员：主席总的讲党的历史，从讲党的历史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主席他老人家总是用马列主义、党的历史教育群众，我们的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们军队也是如此。讲到整个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从历史上说明问题，说明我们整个社会是怎么一回事，教育我们。我们回忆起来，有：

1) 主席对湖北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形势大好，空前大好，出了一个七·二〇事件，问题就是不破不立，坏事变好事，烂透了就会好，当权派搞的一些鬼看得很清楚。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彻底打倒了。无人权，无文权，无财权，主席看是一个好事情。文化大革命在湖北的情况主席说好得很，很乐观。主席要到市面去看一看，我们要晚上走，他一定要第二天早上走。主席看了之后，说湖北问题基本解决了。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一步一步地解决，第一批解决了七个省市，第二批，我们就是第二批，我们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今冬明春搞什么，主席是走群众路线的。主席认为大势已定。主席问我们：“美国人会不会打起来？”主席就很乐观：“我看不成，它打不起来。”“南越原来只有九条步枪，后来越南搞得美国骑虎难下，”主席说：“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主席总是看大问题，今年又风调雨顺，主席是很高兴的。乱透了就好，好解决问题。所以讲基本解决了。“三结合”问题基本解决了，七大组织是造反派，造反派组织是现成的，军队是现成的，地方干部如何，我们心里也没有把握，形势好得很。主席考虑到战略部署，考虑到大问题，如果我们错过了机会就不行了。主席讲：“这个机会错过了，那以后超不上。”国庆前后应联合起来，再搞臭走资派，搞斗批改。

基本解决并不等于（完全）解决问题，我们还要作艰苦工作，离革命委员会还有一段路，主席对武汉寄有很大希望，我们应该谦虚谨慎。

2) 解放一大批干部，主席又从历史上讲起，从中央苏区讲到延安整风，主席讲，犯错误的干部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不能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党不利。主席原文：“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在古田，陈总对军队问题解决不了，又把主席请回来，开了古田会议，讲了十条，从正面批评了那些“主义”。主席没有到过外国，主席就是根据马列主义。朱德、李德不听主席的话，

打了败仗，后来才长征，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主席一票，主席为核心，所以核心不能自封，以主席为核心一直到今天胜利。

主席讲：“八一南昌起义是首先向国民党开第一枪，所以是革命行动。”“我这个人五次是被人家排挤的，后来又要请我回来。”所以群众领袖不是自封的，是在群众斗争中成长的。什么叫长征，长征是打出来的，是追出来的。长征之后质量就高了。就是现在这些干部，哪个在战场上没有受伤，在革命中不犯错误，我下一道命令，这些人还是会上战场打仗的。允许人家革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不好，对党不利。

主席讲：“对百万雄师怎么样，听说对百万雄师独立师揪得太厉害了，这样不好。”主席每个事情都知道，主席光注意看小报，你们的每一个小报他都看了，中央的一些大文章都是按他的思想写的。你们揪得太凶，就有可能脱离群众，这样不好。主席对我们说：“你来时不是有人要打倒你吗？”我说打倒没关系。（刘丰：今天有人写信给我，要为百万雄师翻案，不翻案就没有好下场。署名狂人）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广大群众是好的，好多战士，看到了主席，就是不往外传。凡事要请示报告，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一个个来决定，决定错了怎么办呀。

3) 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主席（原文）：“体罚这个作法我反感，是不是把我考察报告里打土豪劣绅的那一套办法都拉出来了，那是对付敌人的，现在是文化革命要触及灵魂，这样搞会脱离群众。

“凡是要整人的人，整来整去就整到自己头上来。”

4) 团结——批评——团结

主席说：“我有三句话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这里又谈到团结问题。我们这些人叫什么勤务员，有的是大司令，比我们还大。（众笑）官一大了，有时就不民主。”主席对我讲：“你这个人太急躁了。”又对刘政委讲：“他要是急躁起来，你这个政委就给他泼点冷水。”（刘政委：江青九·五讲话可能是主席的。）

“要全面的看问题，要历史的看问题，又要比较的看问题。他承认山头，这是历史问题，要消灭山头，是要团结问题。反面教员要几个，没有几个反面教员叫独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当了权之后，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盛势凌人。”

5) 广播车喇叭问题：康老对这个问题不满意。

那天三司革联开大会，很多车子，都被主席碰上了，主席说这些车子都该全去拉粮食，粮食都没拉回来。我对刘政委说，“今天是三司革联开大会。”主席才没作声，给你们解了围。

你们要有一个战略部署，国庆前后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再怎么办。

曾司令员：联合不起来是主席早就发觉了。主席七月十八号就发觉了，就提出最新批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是在咱们武汉发现的，现在给大家交个底。）

联合不起来有三个原因：一、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干扰和破坏。二、地、富、反、坏、右不甘心死亡。三、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以派性代替党性。我们支左不支派性。形“左”实右，“左”右夹击，我们也要注意。

要扫除一切非法的宣传品。作什么思想工作总要做上前。（一）矛盾不能上交。（二）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不要搞经济主义。

刘政委：形势大好，湖北、河南形势他看了都很满意。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辜负他老人家，要为他老人家争气，我们七大组织都在他老人家那里挂了号的，武汉解决的好坏关键在于你们。他老人家对我们这里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他来之前就了解了不少，他对你们各个小报都看了，好坏在他老人家都有评价，有些小报派特别强，纸又特别好。解放大多数干部，确实要做到：“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坏人总是少数，广大群众是好的，独立师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受蒙蔽的。”

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武汉文化革命确实十分关心，他特别强调工人必须联合起来。他老人家讲：“工人阶级分两派，我就想不通。”不要吞并，群众要加入你那是没有办法，如果不加入你，也要跟别人联合，不要吞并，要联合。那个“九·一三”加入工总我就有点想不通，中央点名的，为什么他们取消？百万雄师还没转过来的，就硬把他弄到我们组织里来，这不是件好事。

主席教育我们：“多给你们讲讲历史。”“过去一个苏区里面打内战，无非

是一个马列主义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

干部要训练，你们工人在国庆后可不可以开个工代会，使工人团结起来。

张体学这个人如果今后检讨了，划清了界限，你们看可不可以用，你们考虑考虑。

在大好形势下，要搞好大批判，大联合。

按照他老人家的想法，解决问题是七个省市，河南、湖北是基本解决，领导班子都换了。大家考虑一下，十月份搞一些人出来，搞个筹备小组，争取在元旦开个会，再在腊月十五左右开个会，春节放假，好好让大家过个年。

大联合应该是无条件的，一讲条件就搞不成，我们大家都要向前看。响应总理“联合起来！过好国庆节”的号召。要警惕，防止有黑手。联合起来揪后台。

“五·一六”我们这里有，我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希望大家警惕。主席讲：“现在是轮到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防止坏人利用山头主义，用更左的口号来搞得我们犯错误。

那天把主席送走，回来看到大字报都搞坏了，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总怀疑这里面不一定是小将搞的，很可能有坏人以更“左”的口号挑动我们犯错误。

我个人意见：我们红卫兵小将不要多去干涉工人的事情。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座谈

十月八日晚上 7·30 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部队曾、刘首长，警备司令部首长，武汉地区革命派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中学红联、新一冶、湖北电台、湖北日报等共二十个组织参加。

周总理先一个个点名，点到的组织站起来，工总有八位，总理问有没有女的，答：没有。二司有女同志，九一三有几位，二位女同志，新华工六位。问：为什么差一位（因为一个人矮小未看见）看到后叫坐下。总理问：三新多少人？答：一万三千多。问女的有多少，答：至少有八百，总理说至少来一个女同志嘛！江青同志来了一定要批评。总理问新湖大有没有女的，答女的少。总理问新华农有没有女的，答：新华农三千多人女的占四分之一。总理说三新不行啰！女的太少

了。总理问三司革联、工造，工造一个姓丁女同志站出来说“我是工人”，总理说工造还有女同志，总理说“工造到底是个造反派嘛！”湖北电台有个女同志，总理问：“那位掉下来的女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总理说“大家担心你”，答：还好。总理对曾、刘首长说：“会怎么开法？”

刘丰：“亲爱的阿尔巴尼亚同志到武汉，武汉部队、武汉地区革命派热烈地欢迎、热烈欢迎谢胡、阿利雅同志，热烈欢迎阿尔巴尼亚同志，欢迎周总理、康老、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等中央首长给我们提意见，作指示，再次表示欢迎。今晚各个组织与阿尔巴尼亚谢胡、阿利雅同志，与周总理、康老等首长汇报武汉情况，武汉大联合未实现，但拥军爱民做得很好，7·20有损失，武斗有伤亡，7·20以后武斗少，现在枪支收回四万多”。

谢胡插话：“不要受我的影响，继续讲。”

刘丰继续说：“手枪收回×××支，子弹几十万发，武汉没有用枪对枪，对‘百万雄师’坏头头，走资派‘干部’斗争时戴高帽等，指出后，造反派接受了就不这样干了。现在搞大批判，以斗私批修为纲，批判专栏，我们出了些问题。与造反派有些分歧，我们有个想法，10月搞筹备小组、12月建立革命委员会。“湖北今年是特大丰收，群众着急没有地方装。

康生：“今晚有没有“百万雄师”转变过来的代表参加座谈？”

总理：“工造有没有？”答：“工造没有。

总理：“工总有没有？”答：“工总没有”

总理：“九·一三有没有？”答：“有，没有来”

刘丰：“解放干部跟不上，湖北干部问题不好抓。”

接着，武汉地区各代表谈情况（没有记录）

朱洪霞：“阿尔巴尼亚同志来武汉，感到特别高兴，阿尔巴尼亚同志造反早，我代表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示热烈欢迎！我工总是最早造反派之一，造修字派的反。学生先造，工人支持，他们打学生。三新二司下乡下厂点火，我们到京告状，他们诬我们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拉一派打一派，把我们打入狱。工造、三新为工总翻案，走资派唆使“百匪”搞武斗，7·20全国支持我们。最近我们的缺点是有“私”字，我们正在发号召，斗私批修，我们要同解放军搞“三结合”。

总理向阿利雅介绍：“他是7·19从沙阳农场放出来的。”

谢胡问朱：“你是什么工？”朱答：“锻工”

谢胡问：“父亲干什么？”朱迟迟答：“卖烧饼的！”

谢胡问：“多少工资？”朱答“63元”

谢胡问：“读多少书”。朱答：“四年”

李湘玉：代表武钢汇报，“韩宁夫搞修正主义一套，为纪念9·13成立九·一三兵团……发表了二八声明，陈再道借此压我们，我们是被压垮的。”（总理看材料，康老与三司革联同学谈话）

总理：“谈谈联合问题，武钢有几个组织，各个组织有多少人？”

李湘玉：“武钢红旗只有一千多，都是知识分子。工总一百多人，他们是八月八日成立的。九·一三是产业工人，是掌权的”

总理：“为什么联合不起来？”

李湘玉：“他们大都是百万雄师过来的，都是知识分子，现在知识分子要掌权。”

总理：“为什么联合不起来？都是工人嘛！”

李湘玉：“他们有坏头头”

总理：“他们有“百万雄师”坏头头？”

李湘玉：“有！”

总理：“是否你们组织大，有骄傲情绪，看不起人家？”

总理对李富春：“你明天到武钢把各组织都找来，每个组织派10人，你们（九·一三）今天参加了，可以少来些。多听听其他人的意见，组织不分大小，平等待人。”

李湘玉：“好好好”

总理：“你们联合得怎么样？工总有一千多单位，你们有二百多单位，是不是交叉了？”

李湘玉：“没有，我们与工总穿一条裤子，现在联合得不好，是下面的不联合。”

总理：“你们不是参加工总？”

李湘玉：“是的。”

总理：“为什么戴九·一三袖章？”李湘玉说不出话了。

刘丰：“他们就是要一个‘钢’字”。

总理：“先临时联合，你钢工总，他钢九·三，都是一个‘钢’字，搞个钢工代会好不好？”（三钢使劲鼓掌，总理看到了。）

总理：“工造有没有代表？”答：“有”。

总理：“三钢同意，工造同意否？请工造的同志发言”。

吴炎金发言，总理问其姓名，刘丰说其本子上有。

总理：“没有”，让吴自写名字。

吴炎金检讨了二八声明上的错误并向工总赔礼道歉，总理带头鼓掌。

总理：“二八声明是有许多缺点错误，我们是从大方向看”“他们盼望和你们联合，同意吗？”

朱洪霞：“同意”。

谢胡：“你留一手”。

吴炎金后来说到坚决为工总翻案。

总理：“很好嘛！工造当外宾的面承认错误，都是造反派嘛！你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如何联合？”

吴炎金：“在武汉军区曾、刘首长领导下，按单位，按部门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最广泛的大联合。”

总理：“你们三个组织可以搞个工代会”。

吴炎金：“我同意搞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

总理：“组织名称由群众决定，上面如何联合？”

朱洪霞：“看群众”。

总理：“具体点”。

朱洪霞：“我们搞个钢工联”。

总理：“搞钢工联不是除了新字，你们不要因为有分歧，把新派去掉，新派也是革命造反派嘛！”

李湘玉：“我们是大联合，他们学生干扰”。

总理：“你的话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你刚刚才说三新到你们厂里点过火吗？你们不要忘记在你们困难时是三新顶住了。你们有战斗友谊，不可丢掉人家，最好搞革命的工代会。我刚才提钢工代会你们鼓掌，三新不高兴。你们不要认为

二司站在你们一边就好，三新不是支持过你们吗？你们还提出什么“不钢必康”，康老也是康，他就是不错嘛，康有为是七十年前的事，这些都是骂街的话。你们三家联合搞革命工代会筹备小组好不好”？

众：“同意”。

康生：“根据以前经验，当面同意，出了门就打架，我建议以后你们搞第一，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二，自我批评。对其它组织一压二打，这是山头主义。我举例：青岛大组织检查了大国沙文主义，另一派整风，检讨，联合起来了。要分清延安还是西安，武汉没有西安，都是革命造反派。光谈不成，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是大道理服从小道理。外面传安徽二派火炮轰，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后各做自我批评，联合起来了。你们为什么不联合？”

总理：“你们明天谈联合。”

朱洪霞：“我们同意搞革工会。”

康生：“思想要通，思想不通名字再好也不成。”

新湖大龙铭鑫代表三新发言。他首先对阿贵宾表示欢迎，他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二八声明问题上压过工总和二司，向三钢道歉，同意搞工、农、红代会。“有人搞司令部我们不同意，中学生走自己的道路——中学红联。”

总理：“大中学校如何联合？”

龙铭鑫：“参加二司是行不通的，改名是可以的。”

总理：“不要考虑名称，武大不是垮了吗？”

龙铭鑫：“我们主要建立红代会。”总理先后问新华工、新华农、三司革联等同意吗？都答同意。

总理：“武大有代表吗？（有）你们参加红代会吗？（参加！）现在看二司了。刚才康老讲，开会赞成，下去不赞成，联合快，散伙也快。你们是革命造反派，不要以为自己大，越大越是要虚心。”

丁家显：（总理说：简单点）“……刚才工造、三新向我们道歉了，我们担当不起，我们在二八声明上也有错误，把矛头指向了新华工，在这里检讨。”

朱洪霞和李湘玉：“这句话也代表我们。”

丁家显接着说：“我们不要‘以我为核心’”，

康生：“你们有‘以我为核心’的思想？”

丁家显：“有。”

康生：“以我为核心，这是愚蠢的，谁想以我为核心，谁就成不了核心。这是主席说的。”

总理：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权威，三钢以为自己大些，高人一头，现在又较大，你们骄傲了，以大压小这不对，这是大国沙文主义。今后有困难、有考验，那就是能否经得考验，真正有出息的人是谦虚谨慎人。蒙哥马利六一年来中国访问时把中国看得漆黑一团，毛主席说：“那时攻打×城时，先是六万人，被打了，后来只有四千人，却反而打胜了你说是六万人强还是四千人强！”

三司革联：“我们一定要借阿尔巴尼亚同志来汉的东风把大联合搞好。”（鼓掌）

总理在看材料，取下眼镜鼓掌说：“毛主席提议阿尔巴尼亚同志到武汉来，这个东风推动你们，现在看你们的了。”

三司革联：“保证借这个东风搞好大联合。有的要以我为核心，我们坚决抵制，我们愿意不要自己的名字，搞好大联合。”

总理：“没搞好联合是内因，主席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有中学生吗？（有）讲一讲。”

中学红联：（新东中）“我们是独立的组织。向总理，康老问好。”

总理：“应先向阿尔巴尼亚同志问好。”

大家要求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作指示。

总理说：“还是让谢胡同志说。”

谢胡：“亲爱的周恩来同志，康生、李富春同志，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们：

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领导的这场震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武汉的成就决不仅仅是武汉的成就，你们的成就是我们的成就。在座的代表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相信你们都是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保证，尽管阿尔巴尼亚身受帝修双重层层包围，但是阿尔巴尼亚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道路走下去。毛泽东同志说：“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们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友谊是真诚的，是久经考验的，我们决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坚决地和您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谢胡的讲话被一阵一阵的热烈的掌声打断。

总理说：“阿尔巴尼亚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和朋友，谢胡同志刚才的真诚热情的讲话，我们表示非常感谢。阿尔巴尼亚贵宾的到来是一般强大的东风，这股东风一定能够促进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从刚才的掌声看，说明了这股东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谢胡同志和周总理的讲话不时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

在欢迎贵宾的宴会上，新一冶、交通联司等兄弟组织代表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向贵宾和总理，康生，李富春同志敬了酒，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人民亲密朋友恩维尔·霍查、祝愿中央首长和谢胡同志身体健康。

新一冶把袖章献给了谢胡同志和康生同志。

曾思玉司令员代表武汉军区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欢迎词。

阿尔巴尼亚贵宾也致了答词，座谈一直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来源：湖北武汉《新武重》、《新一冶战报》 1967. 10. 17 第二版）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周恩来谢胡在武汉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在宴会上的讲话

亲爱的谢胡同志：

亲爱的阿利雅同志亲爱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全体贵宾：

亲爱的曾思玉同志，刘丰同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同志：

我们今天三路来武汉，一路是阿利亚同志带领的，李富春同志陪同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由延安飞来武汉。一路是谢胡同志率领的，康生同志、刘宁一同志陪同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部分成员由青岛飞来武汉。我这一路是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陪同毛主席邀请的谢胡同志到武汉来，来鼓舞你们。

一到机场，就表示出来你们的热烈欢呼，沿途一百万人，热烈欢迎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今天晚上我们召开的座谈会，请来了革命的东风谢胡同志，首先听了你们的报告，都表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现在可以说，我的第一天任务完成的不错，我希望明天，后天还要有发展，明天将分头参观工厂，学校，举行欢迎大会。

我相信武汉的革命同志们，会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响应谢胡同志刚才的号召迅速地联合起来，造反派的头头们迅速的联合起来，按刚才的方针联合起来。

革命大联合的目的，就是通过革命大联合，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三结合，特别是结合本单位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合的方法，我同意刚才康生同志的讲话，一是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另一是整风，做自我批评。

我现在应该结束这个讲话了，谢谢今天会议的主人，人民解放军同志，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你们这样热烈的欢迎，希望你们借这个东风迅速联合起来。（祝酒略）

谢胡同志在宴会上的讲话

亲爱的周恩来同志：

亲爱的康生同志：

亲爱的李富春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非常荣幸地感谢毛主席派我们到武汉来，我们听到你们省、市开展文化大革命情况，我们有可能从遥远的地方注意到你们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在一起进行全面地、详细地座谈，进一步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特别是你们市的情况。

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命运，也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命运。

同全中国人民一样，你们省市也取得了伟大成就，你们的成就和我们的成就一样，我们同样感到高兴。我们相信，你们在座所有革命组织代表都是革命的，都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给你们带来了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合作社社员、劳动青年联盟、劳动党，全国人民，人民军的热烈的革命的战斗敬礼，衷心祝愿，祝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我们今天参加这一个革命会议，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我们得到了巨大的鼓舞，我们表示最大的感谢。

同志们，我们不了解情况，无权给你们做什么指示，这要由你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代表周总理、康生同志转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阿利雅同志说：我们将完全同意他们的指示。）

我们的印象是，你们已经为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市革委会成立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所有发言的同志，都提出要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第一位，都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自下而上的联合起来。

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向你们保证，在距武汉两万公里的地方，阿尔巴尼亚人民将永远高举马列主义的伟大旗帜，把反帝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最后周总理讲话：

非常感谢谢胡同志，支持我们，鼓舞我们的话，这是我们的朋友热情的、鼓舞的话，从刚才鼓掌的情况来看，借这个东风，毛主席邀请谢胡同志到武汉来的东风已有了效果。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康生在武汉东湖长天大楼座谈会上的指示：

你们都要联合起来，要联合好，我讲两点，一点是你们开会时，我提出另一个开法，针对你们的问题，把毛主席著作学好，破私立公，不能会上谈得很好，会下又去吵。第二是，各派都自我批评，有了这两条才能谈到真正大联合，人家缺点让人家批评，你自己批评自己有大国沙文主义，而且另一派也批评自己，在整风基础上，一个礼拜就联合起来了。你有你的道理，他有他的道理，问题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比如安徽比你们打得厉害，都开枪开炮了，但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各自做自我批评，自己把内部坏人揪出来，很快就联合起来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武汉市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

亲爱的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亲爱的拉米兹·阿利雅同志，

亲爱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同志们，

武汉市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红卫兵的战友们，同志们：

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满载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深厚的革命情谊，来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这几天，代表团分路访问了济南、青岛和大寨、太原、延安，现在汇合到了武汉，我们向他们再一次表示衷心、最热烈的欢迎。

同志们，战友们！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最大的喜讯。谢胡同志、阿利雅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全体同志，这次是应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专门邀请来到武汉的。毛主席请他们亲自来看看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谢胡同志，阿利雅同志，他们也很想来看看这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对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

武汉，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在这里乘风破浪，畅游长江。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直是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你们又经受了新的考验。今天，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里举行盛大集会，欢迎来自反帝反修斗争前线的阿尔巴尼亚战友，我们感到分外亲切，无比兴奋。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红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出现了新的修正主义。首先在南斯拉夫出现了铁托叛徒集团。接着，在具有伟大的十月革命光荣传统的苏联，又产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也堕落成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欧洲首先举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不畏强暴，不怕困难，不怕孤立，坚贞不屈，同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铁托叛徒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毫不调和的斗争。

当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颜色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滋长，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四面包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最近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革命化措施：反对官僚主义；宣传无神论；解放妇女；提倡

精神鼓励；缩减高工资和低工资的差距；减少自留地和自留牲畜；农业全面合作化；发展山区，争取粮食自给；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实行干部轮换制度；全国民兵化；枪和镐走上文艺舞台，等等。阿尔巴尼亚同志们在革命化运动中说到做到，雷厉风行，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欧洲最年轻的共产党之一。但是，它坚持真理，朝气蓬勃，不断前进，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世界革命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去年年底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把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事业建立了新的功勋，使阿尔巴尼亚这面欧洲的革命红旗更加光彩夺目。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只要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后来居上。

毛泽东主席在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高度赞扬说：“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捧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中国人民以有阿尔巴尼这样伟大的战友，而深深地感到自豪。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在国内外阶级斗争中，依靠广大群众，不断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从它诞生的时刻时，就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展开武装斗争，反对意大利——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和卖国贼。当欧洲一些大大小小的“议会迷”，为了在战后资产阶级政府中求得一官半职而准备向敌人交枪投降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毫不动摇地紧握枪杆子，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祖国，并且支援了希腊和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的斗争。解放以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不断加强国防，警惕地保卫着社会主义祖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历史经验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所指出的伟大真理：“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千方百计地企图颠覆和侵占阿尔巴尼亚。

最近，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上台，更是虎视眈眈，妄图侵犯阿尔巴尼亚。霍查同志在九月召开的民主阵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对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和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提出了严厉的警告，指出如果他们胆敢冒险闯进阿尔巴尼亚，他们将遭到严厉的惩罚。我们完全支持霍查同志代表阿尔巴尼亚人民所表示的这一严正立场。我们相信，富有武装斗争传统的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充满着旺盛的战斗精神，是不可战胜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决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站在阿尔巴尼亚一边，阿尔巴尼亚的朋友遍天下。中阿两国虽然远隔万里，但是，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是永远并肩战斗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必须把中阿两国计算在一起。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执行革命的对外政策。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阿尔巴尼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普遍赞扬，使阿尔巴尼亚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结束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任务。越南人民站在反美武装斗争的最前线，牵制了美帝国主义很大的一部分力量，沉重地打击了它的侵略气焰。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国际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与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出卖各国人民利益的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但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美力量。只要我们不断巩固和扩大反美统一战线，坚持斗争，那末，不管现代修正主义怎样为它效劳，全世界人民打败美帝国主义的日子就一定会早日到来。

同志们、战友们！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亿万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普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了。被他们

篡夺了的权力重新回到了无产阶级的手里。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武汉地区也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两个多月以前，曾经乌云翻腾，阶级敌人猖狂一时。现在，敌人已经土崩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武汉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乱子有二重性”、“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的论断的英明正确。

现在看得很清楚：凡是出乱子的地方，有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挑动的，有的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者敌特分子暗中捣鬼的。同时，社会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和影响，也为阶级敌人挑起事端，进行破坏提供了土壤。我们并不赞成出乱子，但是，阶级敌人硬要制造乱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他们这样做，正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经过这么一乱，阶级敌人彻底暴露了他们自己的真面目。这就从反面更加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愤怒和觉悟，擦亮了受蒙蔽群众的眼睛，把广大群众进一步动员起来了。

乱得厉害的地方，实际是更加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问题反而可以解决得更彻底。武汉地区的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被击败了。暗藏在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在这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更加坚强和壮大了。建立新的革命秩序，变成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自觉要求和行动。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当然，坏事变成好事，要有一定的条件。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崇高威望。我们有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广大群众，我们有可以相信和依靠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有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干部大多数。而解放军是具有长期革命战斗传统，并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劳动人民子弟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可靠支柱。正是由于我们有了这些最根本的条件，即使阶级敌人想乱得厉害一些，时间长一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摆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方面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特别是各单位的斗批改，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开始。而要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很重要

的关键。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武汉地区经过前一段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大是大非分清了，坏人孤立了，保守组织瓦解了。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组织就具备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条件。这次，你们联合起来欢度国庆，又联合起来欢迎和接待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是走向革命大联合的一个良好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以“斗私，批修”为纲，更好、更快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

为了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最高指示，开门整风，多作自我批评，多看别人的优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各革命群众组织中如有人破坏在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大联合，要靠那个组织的革命群众自己揭发处理，别的组织不要去揪斗。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驻军和领导机关，应该多做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和促进各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就更能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到，今年农业又将是一个丰收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又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包括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和一次氢弹试验。在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运动中，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在生产上付出一定代价，这是早在预计之内的。特别是在有乱子的地方，生产当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只是暂时现象。一旦乱化为治，生产很快就能恢复上升。人的思想的革命化，势必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相信，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飞跃发展的高潮。

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多快好省完成国家计划创造新成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有的雄心壮志和光荣任务。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每一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生产中经受考验。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职工和公社社员一定会这样做的，而且也一定能够做到的。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各级干部来说，是一场全面的审查和严峻的考验。经过一年多来的运动，揪出了一小撮坏人，发现了一大批好干部，也暴露了我们干部队伍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些干部官作大了，自以为了不起，好摆架子，喜欢训人，因而严重地脱离群众，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是中国赫鲁晓夫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现在，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对干部的教育，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改善干部同群众的关系。

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即使犯有错误，甚至犯有严重错误，多数也是可以教育过来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我们都要容许他们将功补过，带罪立功，都应该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帮助和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使他们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相信，经过群众的批评和帮助，是应该而且也可以解放一大批干部的。

各级干部要自觉地接受群众的审查和批评。对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我们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抵触的乃至对立的态度。我们应该上请教于毛主席，象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所谆谆教导我们的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应该下请教于群众，到群众中去，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谅解和信任，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向我们发出了“斗私，批修”的伟大战斗号令。这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纲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大破资产阶级世界观，大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私”字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修正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思想根源。只有从头脑中彻底铲除“私”字，才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才能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必须在

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战友们，同志们！

中阿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阿尔巴尼亚的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亲自缔造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的，是经过急风暴雨的严峻考验的。这种友谊是革命的、战斗的友谊，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珍贵的友谊。

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共同斗争中，一贯相互支持，并肩前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在联合国内外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正确立场，挺身而出，勇敢地痛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的阴谋。

现在，阿尔巴尼亚的战友们又坚决地支持和热情地赞扬我国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恩维尔·霍查同志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全世界一切革命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是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度评价，这是对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人民的极大鼓舞。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一贯给予我们最坚决、最热情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支援，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再一次表示真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更加紧密地同英雄的阿尔巴尼亚兄弟团结起来，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

命人民团结起来，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对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高呼：

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岁！

坚强的阿尔巴亚劳动党万岁！

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万岁！

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最亲密战友恩维尔·霍查同志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最亲密战友毛主席万岁！

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新华工”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地点：武汉。“新华工”为华中工学院〕

总理：林付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成绩很大很大很大，损失很小很小很小，抗日战争时期，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都牺牲了很多好的同志。一百多年以来，不知有多少革命烈士牺牲了，（讲到这里，总理就很严肃了）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主席全家牺牲了那么多人，弟弟、爱人、三个老人都牺牲了。但主席只找了杨柳两位烈士代表千千万万的烈士，歌颂他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没有一点损失也是不可能的。淮海战役，那一个战役就是几十万，死了的烈士建了个烈士纪念馆。辽沈战役、平型关战役都没建纪念馆。所以淮海战役纪念馆也没开放了。一百多年来牺牲的革命志士和革命烈士毛主席已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了。

（总理记忆力很好，背诵主席“答李淑一”词。并逐句解释。还用手势比划。）

（关于大联合、大批判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搞好本单位斗批改。）

总理讲：“你们要作斗批改的模范，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在外同学都要回来，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关于教改，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及当前大批判和教育革命如何结合起来。）

总理讲：你们要复课闹革命，也要结合大批判。大批判也和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要批判刘、邓、陶，还要从两本书中狠挖东西。你们主要是搞王任重。在北京的同志离中央首长近，发生什么事情，中央首长马上就作指示，你们这里就要靠造反派，靠自己闯。主席讲：“你们自己闯很好嘛！……（不清）反而不好。”

还要团结大多数一道干革命。思想上有个准备还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客观的。集中、分散、到集中，这都是有反复的。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这是符合辩证法的。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都是经典的马列主义著作，这里边道理很清楚。主席还提到不断斗争经验，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为了证实实践道理，主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是主席加的，特别引起你们注意。

等你们联合好了，有了眉目了，把王任重带回来，搞一次或几次就够了。一个学校一个单位的搞，一年也搞不完。还不让他休息一天啊？不让他休息，把他斗死了，那湖北就没批判对象了。不一定每个组织都斗一次。武汉有电视没有？（有）你们要向上海学习，照他们的办法，搞电视批判，让他站在中间，你们批判，这样都看得到了。

你们的批判，一定要作好准备，内容不要重复，批判王任重，着重批判王任重。武汉的大联合，到年底就差不多了，不要着急。到年底……（不清）搞好革命委员会，就差不多了，先成立委员会筹备小组。

现在主要是在本单位斗批改，可以说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都没有很好的搞。你们要搞好本单位的事。

（要总理对校内斗批改作具体指示）

总理讲：靠你们自己创造……（不清）那没有什么好处，靠你们自己闯，要好些。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周恩来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10：50—12：20，地点：汉口飞机场休息室。〕

主席说，现在是大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原来建立革命委员会有七个省，包括青海。六、七、八月一下子就解决了八个省，有湖北、河南、四川、江西、浙江、内蒙、甘肃，这说明速度快了。过去一到五月解决了七个省，成立了革委会，但还有些反复，如黑龙江。

革委会还需要维护。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录音你们听了没有？（答：听了）每个人都要听，革委会是新生事物要维护。要加强发展，不能轰，新生幼儿都是粗糙的，毛手毛脚的，总有缺点。七个省市革委会，八个省成立了革委会筹备小组，我们正在解决十一个省的问题。广东、广西、福建、江苏、安徽、辽宁、吉林（黑龙江算是补课的）河北、天津、陕西、宁夏共十一个。如果在十月、十一月解决的话，就共解决了廿六个，剩下来的就只有新疆和西藏、云南了。估计十二月份可能解决。

主席给我们的时间很宽，说是春节前争取初步或基本的全部解决。所以大体上就要到明年四、五月份。还有中央各部现在只有一个科学院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国防科委不大成熟，还有反复，其它的还没有树立典型，还要抓。各省、地、县由军区解决。也要由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地县革委会或筹备小组，这样子就全部解决。还剩一个年头，明年六月份到后年，就是扫尾，准备三年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阶段的胜利。

我们三年的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三年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我们这次再用三年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深、批透、打倒，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战略性的阶段，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你们有了经验，因为你们参加了。你们今年 23，24 岁大的 30 岁，我们总算对你们交待了嘛！毛主席健在的时候直接领导你们，工人也好，学生也好，农民也好，军队也好，都得到了自己实践的经验。

主席说：文化革命不止是一次，要搞几次、几十次。因为世界范围内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解决。他就会影响到我们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嘛！影响我们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搞复辟嘛！即使世界问题解决了，全世界没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到那时还有思想问题，还有政治问题，还有人野心篡夺领导。主席说了：实现巩固共产主义这是几百年的事情，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嘛！哪里那

么容易。你们取得的经验还是初步的。你们幸福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一犯错误主席就提醒，主席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时候了，要把你们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告诉给他们。

要犯很多错误，我是说现在不行，将来还有希望，要经过无数次的锻炼，犯了不少错误，希望不犯大错误。只大方向对政策掌握不好，同样还不是要犯错误，可以使大方向失败。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总结那么几条，成绩固然要总结，但大家是知道的，只要几句话带过去就可以了，但更重要的是要总结那些缺点、错误的经验，以使吸取教训，有所改进，有所前进，这是我在六五年政府工作报告发表的时候，毛主席在我们报告中加的两段话。你们要学总结经验，特别是总结错误的经验可是不容易啊！总结成绩可容易。要人家说你的成绩。自己说自己缺点错误，这就有希望了，才能前进，不然就不能前进！自己说自己成绩怎么行？你们不总结你们犯错误的经验是不行的呀！背一个大包袱怎么能前进呢？轻装上阵就能立新功。

不要只看到自己对。人家不对。怎么大联合的问题，要有步骤有目的的进行大联合。所谓有步骤就是不要急，一步登天不行，一下子大联合把各种组织都取消，这是主观主义，因为群众还没有通，特别是群众的头头还接受不了，他们的山头还没有解决。

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就说过：要承认山头，然后才可以消灭山头，承认山头，尊重山头，然后才可以消灭山头。这三句话你们记着。我们是各个解放区各个方面军客观存在的事实嘛！不要主观主义的。第二叫尊重山头，自己的山头靠在一起总是亲热得很，受了一点委屈马上就支持。主席常说，一个山头的见到，什么话都能说，骂自己都可以。要是别人说一句话就不得了，就要火了。你们（对二司）自己骂自己不要紧。如果新华工骂你们一两句话，你们就不得了，轻轻的都要计较的，这不叫山头呀！主席有一个办法就是尊重山头。各人说自己山头的缺点，不说对方，第一，承认客观现实，第二尊重对方，只说自己不说对方。然后才做到逐渐的消灭山头，还不是一下子消灭。我们主席指挥的解放军是最统一的，但也要非常注意，有些老将都在山头问题上犯错误。我这是老将，何况你们小将，我们不能主观主义，我不是责备你们，只告诉你们注意这个问题，总结经验教训。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刘丰接见湖北三司革联代表谈话

〔地点：武汉东湖。刘丰：武汉军区政委〕

下面给大家把林付主席的指示谈一下。（宣读中共中央转发林付主席对曾思玉、刘丰同志谈话全文）

过去，我们讲过精神，原文没有传达过，外面以前转抄的不准确，当时参加会议的除主席以外，中央主要负责人，差不多都到了。我们汇报完了之后，总理又向林付主席汇报，最后林付主席讲了这些。林付主席身体很健康。

斗争是曲折的，联合不好不要灰心。灰心不对，你们三司革联人不少，比那时毛主席带到陕北的还要多呢！关键是真理，是毛泽东思想。遵义会议上是四票对三票，主席一票，王稼祥一票，张闻天当时是动摇的，也投了一票，对方本来是三个人，后来又加了一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德国人。当时博古作了一个报告，主席写了一个报告在会上念了一遍，推翻了他们的报告，取得了胜利。所以，关键在于真理。从遵义会议到七大，主席整整等了十年，最后大家才认识到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你们一万八千人还少呀？张国焘当时是十万人，毛主席带了八千人走了，最后还是跟毛主席那条路走，张国焘还是垮了。中央苏区当时正规部队近十万人，西安事变时我们三万人，在渡黄河后扩大到四万人，张国焘把三个军都葬送了。没有真理，没有毛泽东思想，什么事也办不好。红军由毛主席从江西拉到闽西，号称一、二、三、四纵队，实际上每纵队只一千人左右。当时林付主席是一纵队，毛主席是三纵队，朱德不打招呼把一、二纵队带到广东，搞走了以后主席才发现，接着给林付主席写了一封信，林付主席一知道这不是毛主席的意思，就把一纵队拉回来了。二纵队不回来，后来全军覆没，党七、八次代表大会都没有开好，谁为首？就是朱德、陈毅。主席当时被赶走了，到汀州养病，后来，他们老打败仗，陈毅就跑到上海。他想要请主席回去，主席说回去可以，但定要把问题搞清楚，陈毅亲自去请主席来开会，才解决了问题。

三、四次反围剿，我们都参加了。当时苏区很困难，最后还是把敌人打败了，我们当时在江西宁都搞了个暴动，规模很大，一暴动，国民党就退出了二十几个县，结束了三次围剿。后来彭德怀又闹独立性，当时主席把彭留在井冈山，但他

却来了个逃跑主义，把主席沿途留下的部队和干部全部收编了。当时立三路线在继续，要打城市，三军团打赣州，结果碰了个钉子，连长都叫人捉去了，接着就是林付主席指挥我们打福建一家伙就打了一大片，把红军补充了一下，中央从上海搬到苏区，一直到长征时期，我们脑子里还是毛主席。

总之，斗争是曲折的，阶级敌人和走资派绝不会马上放下屠刀。

对于敌人专政，毛主席讲专政要依靠群众，不搞罗瑞卿那一套。我们有这样强大的党，有毛主席，不用怕，要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克服困难，我们过草地时，没吃的，没穿的，少数民族打我们，还有骑兵袭击，敌人的骑兵不可怕，这个歌就是过草地时编的。

李达不能翻案。现在为李达翻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调查。林付主席讲过，“什么李达、康斯坦丁……”翻过得来，说明毛主席路线不冤枉一个好人，有些坏人让他暴露出来也好，还是不露出来？暴露出来么！

要去掉派性。小资产阶级派性，说到底就是一个私字，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我们脑子里都有资产阶级思想，你们没有派性？你们今天讲话就有派性。

我们历史上打过交道的人不知有多少，看别人要多看优点，别人的缺点让别人自己讲，毛主席提出的“实事求是”四个字，讲了几十年，这四个字到现在我们还没学好，经常犯主观主义错误。

过去，我们打了七、八个胜仗，就翘尾巴，民主作风少了，打起仗来伤亡大了，别人一句话都不讲，自己也难过得很，老老实实，大翘尾巴做检讨，就好一些，当时在中央党校，主席是我们的校长，主席讲：“一个人一天都不知道犯过多少错误。”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钢新之间的斗争

720 之后我是倾向加入工总的，我已经说服了勤务组的人。我设想捍卫成建制地参加工总，新的勤务组通过选举产生。我当时确实不想搞了，因为自己水平不行，军区三办的徐剑说你不搞不行，交通厅乱了不好办。那个时候工总有点张牙舞爪，在运输局的楼上谈判，工总那边有个司机跳起来说你们是名义上参加，实际上是想要把我们吃掉。因为在交通系统我们组织的人多，工总的人很少，大

概不到 500 人，是新派起主导作用。胡秀娟说不是参加不参加的问题，是收编，人事由他们安排指定，勤务组不能够选。这个老大姐说话也真是的，这样我就冷了，联合没有搞成，那个时候确实有派性。

后来我们就树交通联司的旗帜，我们的组织一亮相，就引起工总的注意。我们的人有些加入工总把他们的袖章搞来，再加入交通联司，青山船厂和民管局都搞了这样的板眼。

有一次在汉口饭店开会，谈大联合的问题，朱鸿霞也在场，他在那里大模大样地坐着，军区三办也有人在那里。他们当时拿了一套大联合方案，我说你们的东西没有理由，我说好戏还在后头。这个时候工总的小家伙们就不耐烦了，我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我们有更有说服力的方案。刚刚好工造总司的刘麻子跑去抓朱鸿霞的领口，朱鸿霞一脚把他踢开了，这样刘麻子就又冲上去打了朱一拳，这样旁边的人就打了刘麻子。当时军区朱鸿霞极力克制，我也极力克制，军区的人还打电话去，要派兵过来弹压，当时大家手上都有枪。因为发生了后来这些事情，我的那句话就被理解是人身威胁性质的，这样工总把矛头对准付廉，说我是黑手。

第三天，我们在运输局四楼开会，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军宣队，一起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时工总的小哥们进来抓住我就打，谢青云拿身体护着我。这一顿打得重，出来之后先是藏在武汉歌舞剧院，后来转移到陆军总医院去治疗。到总医院后我人就清醒了，仆着写条子给余明生和陈静先他们，说这个事情肯定是有人在搞鬼，要冷静不能上阶级敌人的当，怕打起来了要停产。在那里住了四五天。

在钢新两派联合失败之后，社会上都潮得要武斗，当时除了新派和钢派势力之外，还有百万雄师死灰复燃的一股势力。我们在华工和湖大开了几次会，最后决定成立卫三红指挥部，这个名字是彭油嘴起的。

一次我们在航运局礼堂召开新派会议，工总航运局的头席其中把机枪架上四楼，坚决不要我们开，说我们在这里开会是他们示威。我们这边的一个黄金善也带着敢死队过来了，这也是一个左得可爱的人物。我自己倒是不怕，但是群众组织是兄弟伙的，不能互相残杀，我上去找他，工总的一个人说他喝了点酒，他不肯下来见我，说这个会一定不能在这里开，工总知道了也不好交代。这样我就说换个地方开算了，大家都走了，很多说我胆子小，这个礼堂的隔壁就是侯船室，

万一出了事那可是不得了。

后来的抢枪就是与这样的钢新之争背景有关，公安厅的刘有必，说他知道公安厅在丁字桥那里有一个枪械库，我还去看了一下，这个地方三面是水，只有一条独路进去。我还特定去看了一下仓库周围的情况，又有人公安厅仓库里没有完整的枪，一进去就拆散了。结果工总的人把公安厅仓库的枪抢了。

李先念的侄儿李良金是个电工，跟工总航运局的伍斌超抬杠，伍斌超说话象个姑娘，李很匪，伍斌超威胁要向他开枪，李就上去抢吴的枪，结果争夺过程中枪走火了，打断了吴的三根手指头。再后来交枪的命令我举双手赞成，平时我的手枪放在抽屉里是连膛都不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打。他们工总说我们是“老机”，他们说他们是“强权”，我说抢席位的不是敌人，反对毛主席的才是敌人，我们和工总都是拥护毛主席怎么会是敌人呢？公路局和地质学校住在隔壁，曾经围了一次没有打，那时学生比较冲动一些，把李金祥的脑壳打破了。

最大的一次钢新之争，是 1968 年发生在新中原机械厂”的“五三事件”，开始好象是厂子内部两派发生了分歧和争执，结果发生了冲突，外面的人就去声援他们，后来是工总二七分部的何永清指挥人马包围了新中原，当时双方手上都有枪，也开了枪，没有对着人打。在北京学习班的时候，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采访录（付廉）》）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庞然大物”原形现纸船明烛照天烧》

【载《七月风暴》第 4 卷，武汉市机关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印，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第 21—27 页】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今天，把我们公安联司经过调查和审讯了解的《百万雄师》的情况，向大家作个汇报。

（一）《百万雄师》的组织原则

《百万雄师》这个反动组织是从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开始由红武兵、红卫兵、造反大军三个组织筹建的。开始是搞什么“斗刘批邓筹备会”，联系了“体育无产者”等七个组织，后来扩张到十八个组织，在新华路体育场开过筹备会。到四

月底，成立了一个“专批刘邓联络站”，这时，已经发展到三十三个组织。后来经过三次酝酿、讨论，于五月十六日正式定名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直到七二〇反革命暴乱事件，根据他们自己写的报告，共有五十三个组织，一百二十二万九千一百人。其中，工人五十多万，农民三十五万，红卫兵二十三万，江城公社的老太婆十多万，还有一些机关干部，文教卫生工作者一万多。在五十三个组织中，有七个核心组织——《野战军》，主要由四清工作队队员组成；《二一八红星军》，职工联合会的变种；《硬骨头战士》；《红武兵》；《红卫兵》；《革工三司》，工造总司分裂出去的老保；《江城公社》。这七个组织以发起者自居，把持着《百万雄师》的常委席位和各部、室的大权。

（二）《百万雄师》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

组织机构：在“六二六”中央电示之前，它是一个组（勤务组或常务组）、一个室、七个部、十个分站、一个直属队。“六二六”电示之后，改为三个室，增设一个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一个斗批改办公室。

勤务组成员情况如下：

一号头头喻文斌，三十四岁，浙江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出身学生，机电局人武部干部，《红武兵》头头，经 8201 和市人武部挑选到《百万雄师》任司令，是常委核心成员之一。

二号头头杨道安，三十八岁，武汉市人，家庭贫农工人，本人工人，武汉汽车修配厂的职工，是革工三司的头头。《百万雄师》第二号勤务员，常委，核心成员之一。是“专揪王力指挥部”的总指挥。他的两个兄弟分别在香港、台湾，与他有密切的通信往来。在我国经济困难时期，他弃工经商，搞投机倒把，搞地下工厂，搞男女关系。

三号头头纪登清（又名纪登树），三十四岁，汉阳人，家庭出身贫农，硚口区街道办事处干部，《野战军》头头。一九五七年因乱搞男女关系受留党查看两年处分，至今未恢复党籍，是《百万雄师》常委。

孙运东，汉桥区委干部，原来是第三号头头，后由纪登清代替，是常委核心成员。

蔡俊善，武昌建设基地的技术员，《红色造反军》的头头，原来是《职工联合会》的头头，《百万雄师》的常委兼政参部长，水运学院钢二司小将抓的那个

坏蛋就是他。

谢敏华，三十三岁，武昌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工人，皮革联合加工厂的，原来是皮鞋厂的付厂长，因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在四清运动中撤销职务，留党查看，至今未恢复党籍，是个四清下台干部。他是《造反大军》的，《百万雄师》的发起人，是十个元老吧。“专揪王力指挥部”的总指挥之一。

孙德州，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份学生，汉口铁路医院职工，铁路《红铁军》的头头，《百万雄师》的常委，作战部副部长，是“专揪王力指挥部”的指挥。

章迪杰，三十一岁，硚口房地产公司工人，《职工联合会》的头头，《百万雄师》的常委兼联络部部长，一九五九年因乱搞男女关系受降级处分，曾因贪污被拘留过四十七天。

李本富，武汉市仓储公司的保卫干部，《红色尖兵》的头头，转业军人，《百万雄师》的常委兼宣传部长。

夏菊花不是常委。《百万雄师》组织了两个宣传队和一个慰问团，她是慰问团的成员。

辛甫是市委抽了六个人的《百万雄师》顾问小组的负责人。

办公室主任叫朱德明，东风造纸厂的。

七个部大致是组织部、宣传部、政参部、后勤部、联络部等。各部部长大部分是常委兼任，作战部长刘经胜是攻打水院的总指挥，他是江汉帆布厂的工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专门会杀人。

各部情况：

宣传部八十多人，作战部也是八十多人。革司令部勤务人员脱产的共七百四十四人，各分站脱产人员三百八十五人。

宣传部、政参部、组织部大部分成员是原来市委的老保，宣传部八十多人中，市委干部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还有一个队，叫“雄师支队”，直属总部领导，它的任务是密捕绑架，“首长”警卫。有六十多人，是黑打手，长得膘肥力壮的一些混蛋。

最初他们在江岸区委，以后搬到江汉区委，六月四日强占市委大楼，在“六二六”中央电示之后，他们从市委偷偷搬到 3506 工厂。

总站下面设有十个分站，除洪山外，各区均有分站，另有五一六分站，设在

友好商场，东风分站，设在唐家墩。

有人说《百万雄师》很纯，纯洁得很。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我们说他们是很“纯”，是纯纯粹粹的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

《百万雄师》的组织成员大致上有这些人员组成：一种是《职工联合会》的骨干和成员，占的比重很大，《职工联合会》是湖北、武汉有名的保守组织，是王任重、张体学一手培植起来的；第二种是四清下台干部，搞阶级报复，如常委谢敏华就是；第三种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文革的成员或是王任重的积极分子；第四种是历次运动中专整别人的干将，刘氏黑《修养》学得好，驯服工具，奴隶主义；第五种是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斗的走资派；第六种是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造反顾虑重重，企图以死保捞一根救命稻草，不敢造反，怕别人抓尾巴。所以，真正实事求是地说，这个组织是非常的不纯，我们革命造反派论定一个组织或者一个人纯不纯，主要标志就是要看在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中他站在哪一条路线上，《百万雄师》这个组织从它的立场以及一系列的活动来看，是最不纯的。

（三）《百万雄师》的主要罪恶活动

《百万雄师》的筹建、成立之日，也就是它进行反革命活动开始之时。它一成立立即把矛头对准革命造反派，对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的成立公告，完全颠倒是非。他们曾经在东湖召集所有五十多个头头开了一整通宵的会，会上制定了罪恶的计划。原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倒对方；第二步组织集体亮相，进行全省全市的夺权；第三步横扫“牛鬼蛇神”。经过一夜的争争吵吵，最后他们决定把第三阶段的任务提前，与第一阶段同时并举，即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倒对方，横扫“牛鬼蛇神”，交叉进行搞所谓集体亮相，进行夺权。他们的策略是先汉阳，后汉口，再武昌。在汉口先中山大道后解放大道，一条街一条街地对造反派的宣传阵地进行打砸抢，什么三天扫平、一天扫平，计划很多。紧接着在肉联、汽车二站连夜开了几次常委会，进行分工，六月二日开了常委扩大会，决定常委分兵把口，深入各分站集结人力准备行动。这时武汉军区在陈再道之流操纵下，抛出一个臭名远扬的“六四公告”，发出了围剿革命造反派的黑色信号弹，是与《百万雄师》的纪登清、杨道安共同研究后出笼的。六月八日，这些匪徒竟敢置中央六六通令于不顾，明目张胆地制定了“反逆流紧急动员令”，是在辛甫、林立这些走资派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这个反革命的紧急动员

令出来之后，谣言四起，什么“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说什么造反派要搞匈牙利事件，要炸长江大桥等等，更为可耻的是说什么“百万雄师站起来，牛鬼蛇神全垮台”，“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百万雄师一声吼，牛鬼蛇神齐发抖”……。解放十七年以来，我们的一切成绩应该归功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党，没有说是他们（百匪）一起来，这也垮台那也扫光的。这些家伙就是在为屠杀革命造反派制造舆论准备。8201 中的一小撮和他们狼狈为奸。

他们镇压造反派有几种方法：一种是绑架，通过《江城公社》的老太婆登记观点，通风报信，秘密逮捕。据《百万雄师》雄师支队的副队长陈昌文供认，他有一天出去三次就逮捕了六十多人，全部关押在市委地下室，进行严刑拷打，采取国民党、日本法西斯手段，打得遍体鳞伤；《百万雄师》江岸区委的一号头头张文，六天内就逮捕造反派三十五人，同样是严刑拷打。刑法多得很，把三个所谓“案件重大”的转往总部，更恶毒的是把受伤的造反派用小汽车送到偏僻的郊区丢掉，都是在深夜十二点以后干的。再一种是搞特务手段，百匪和公检法的×××和 8201 的“情报科长”（文化科长，搞情报）王××，他们都用化名，组织了大批特务人员，对革命造反派进行跟踪盯梢，秘密监视或者秘密逮捕。尤为可耻的是，他们为了搞情报竟施用美人计，打入造反派。首先他们派武汉话剧院的演员孙义，利用与湖大某干部搞男女关系而打入新湖大，进行情报活动。据孙义供认，这是 8201、公检法直接掌握的，任务就是了解在新湖大的造反派活动，革命领导干部在什么地方等，而且是单线领导。这些家伙对孙义许了很多愿，什么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搞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套，费用是实报实销。以后他们准备转入红水院，不过在这以前已经被造反派发现了，孙义落网了，她自首了，也发表了造反声明。他们向新湖大派遣特务，主要任务是去搞王任重材料的，据说王任重曾经写过一个揭发陈再道的材料。孙义落网后，他们又派了一个男的受骗的小战士化装打进了红水院，任务是抢救孙义，如抢救不成就干掉她。这个小青年没有经验，到那里两三天就落网了。以后又搞了一个曾国华，也是去救孙义的。为什么一定要救出孙义呢？他们知道如果让中央首长知道了这事，那就可以定陈再道的性质，所以千方百计要把孙义搞出来。曾国华是武昌造船厂的，这家伙很笨，打电话直接找师长，就被造反派抓住了。他们在造反派据点的周围，建立了

很多特务点。如湖大对面的特务电台、新华工后面的餐馆等。此外，他们还专门研究了一个绑架计划，新湖大的谢邦柱正在谈恋爱，他们就利用他的对象作工作，先进行软化，如软化不成就绑架。结果，他们是在谢从洪湖返校的路上绑架了他。

再一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地围攻造反派的据点，重大流血案件有十几起，据不完全统计，在七二〇反革命暴乱之前，造反派死伤四千人以上，每一次大的流血惨案，造反派都要死伤数百人。下面重点讲几个事件：

六月十二日至十三日，汽配事件，死伤一百八十余人，一个国家有数的配件厂被踏平了，精密仪器被破坏了，百匪的借口是，我们绑架了三个军代表，这纯属造谣。他们于十二日下午开始围攻，晚十一点开始进攻，打得最激烈的是十三日凌晨一点至三点半，造反派不到二百人，其中还有四十多个女同志（那天工厂发工资，很多职工送工资回家了）。他们首先用大汽车把门冲开，还配有三部消防车，还有一部很高的吊车。火线指挥部设在申新纱厂，由硃口区一号头张彬指挥。成千上万的百匪分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一梯队头戴钢盔，身穿蓝色工作服，第二队头戴柳条帽，穿蓝工作服。消防车内装有含六六粉的有毒液体，向造反派喷射，吊车把百匪吊上楼顶，揭开屋顶进入三楼，凌晨三点多钟全部踏平。打的时候，军代表向他们喊话说：“我们没有被绑架，你们上当了，我们都是阶级兄弟，不要打。”我们的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八级工人工程师杨开涛同志高声喊着：“我是共产党员，不是牛鬼蛇神，都是阶级兄弟。”但被百匪一下打过来，刺穿他的颈部，动脉出血死亡。百匪就是这样向真正的共产党员开刀。当时铁路两边站了好几万观看的革命群众，其中大多数都痛哭流泪，百匪从屋顶进了三楼，在三楼上，有一个军代表，二三个夺权派和四十个女同志，他们不听军代表阻拦，对准女同志全身殴打穿刺，许多女同志肚子被刺穿、眼刺瞎。厂里有三个刚刚从南京来的同学，被打伤逼到平台上，同学们高举红旗，喊着毛主席万岁，被迫挑楼自杀。整个汽配厂到处是喷溅形血迹。当场统计被杀死的工人有九人，重伤员六十五人，轻伤号被他们拉走的一百零七人，拉到申新纱厂，又经过申新的老保们把受伤的女同志打了一顿，说是“过过瘾”。早上八点，他们又把伤员拉往东西湖东山分场进行严刑审讯，饭没有吃的，伤没有治疗，还填了一个表，连爱人、小孩的观点都要填上，到下午四点钟才用两部车子送回一百另一人，还有七人因伤势过重被丢下，直至七月二十八日我们查问时仍无下落。这个

重大的流血惨案是硚口区的武装部长指挥的，还有好几个来历不明的军人参加。早上八点多钟《九一三》前去支援，8201 则去了很多车子，说什么要文斗不要武斗。每次武斗都是这样，当造反派自卫反击时，他们就去进行所谓的“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们早就计划好的。

“六一七”重大流血惨案，是在蔡炳臣、牛怀龙直接操纵下进行的。他们说是战略上的转移，派四五百人去抢占造反派的阵地财贸大楼，更重要的目的是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想有计划、有目的地吸引民众乐园、南洋大楼的革命造反派出来。我们的造反派，没有他们那样的高级指挥官，中计了，前去支援，开去了好几车，刚到六渡桥转弯处，就被 8201 所谓的宣传车（实际上是指挥车）拦腰卡断，放过去《九一三》一个车子，数千百匪冲上去，首先用斧头砍死司机，车上三十七个同志很短时间就光荣牺牲。开车的小谢同志没有死，被扔在江汉区委地下室，过了几天他跑出来，伤口已经发绿长霉。当晚统计，牺牲九十八人，死难烈士尸体多数被百匪抢走。抢回的十一具尸体，个个都有几十处穿透性的伤。看了那些尸体就会触动你内心的阶级感情。据江岸区的百匪作战部长熊兆祥供认：他亲手杀死六个工人，为了灭尸，于深夜将尸体运至八大家——武东之间沉入江中。六一七有很多烈士的下落至今不明，尸体不知弄到哪里去了。这个重大的流血惨案究竟是谁指挥的？他们有两个火线指挥部：一个设在江汉区委办公室，由区监委书记、《百万雄师》作战部长谢敏华指挥；一个设在铜人像前面，由《百万雄师》作战部长，江汉分站一号头头，以及汉阳分站的头头刘勇、硚口分站的张彬，《霸王鞭》的郭眼睛等指挥。在志成布店楼下，有 8201 的电台，经常和牛、蔡、陈、钟取得联系。有困难时，马上打电话请示蔡炳臣，蔡炳臣说“已经派一个团去了，有什么事和他们取得联系。”晚上两点钟，攻打中南旅社时，百匪中很多人有点寒心了，当时要撤退，8201 不同意，一定要打到天明再说。在攻打之前，有些来历不明的军人在一起研究了作战地图，已有三个在押犯供认此事属实。

我念一段 8201 造反派同志揭发六一七的情况：“当晚反革命分子蔡炳臣亲自给《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打过三次电话，在电话中重复他的黑指示：‘你们在政治上要争取主动、斗争上要讲究策略，要提高警惕，不受损失，不失战机。’同时还问他们的指挥位置安不安全？在最后一次电话中还说：‘我对你们安全胜

利撤出来表示祝贺，并向你们的负伤人员表示慰问。’ ”

六二三、六二四是在陈再道之流密谋策划和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两天发生四次大血案，一次是攻打水运工程学院，一次是打工造总司，一次是打汉阳轧钢厂，一次是打铁四院。进攻前，《百万雄师》三号头头纪登清向 8201 汇报了他们的预谋计划，而蔡炳臣纵容地说：“可只准打这一次”，所以《百万雄师》在两天时间内就打了四次。

攻打铁四院时，他们的指挥官蔡俊善，武昌分站的头头刘喜本、潘志祥被钢二司的同志活捉，他们就借口要人围困水运。在六二三晚十至十一点有个谈判过程，造反派同意放人，但是《百万雄师》要撤兵。可是放了这几个坏蛋，他们撕毁协议，仍然攻打。在攻打过程中，《百万雄师》一号、二号头头专门给军区参谋长打电话，由军区派了一车全副武装人员护送这些头头们，从军用码头过江，到 8201 密商。谈完后又照样送回《百万雄师》的司令部。在密商时，蔡炳臣说：“就只准打这一次”。纪登清就这样利用作战室的通讯工具，调兵遣将攻打水运学院。他们共调三万多人，使用汽油硫酸瓶，消防车配合攻打革命小将。最后逼得小将口里喊着：“我们想念毛主席”跳楼，跳下来后，小将们手挽手、肩并肩，而百匪对他们进行毒打，把近两三百小将拉往红卫纱厂，《公检法》派了四十个特务去审讯革命小将。

工造总司这个重大的流血惨案也惨得很。攻打的借口是“造反派破坏了无线电工厂”。二百多同志全部被刺伤，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工人同志抱着一个小孩，他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也被一刀子刺死，小孩掉在地下，一个百匪一矛刺在小孩的肚皮上。女广播员从楼上跳下来，还把她的肚子挑开。有一个女同志怀孕三个多月，百匪杀红了眼，根本不管这些，也把她刺死。

七一五惨案起因是湖北钢厂的造反派开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会，两个头头当场被砍掉头，扔进江中，于是全部停产。为了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造反派举行游行，游行队伍从新华工——水运——中山大道——解放大道，一路上小将们饥饿疲劳，沿途受到革命群众的夹道欢迎。但在百匪的密谋下，挑起武斗，使大量的同志死在百匪的刀下，特别是 3506 工厂的《雷达兵》，大杀特杀，当天新华工死了二十多人，有一个女同学被杀晕，醒过来后，又被杀死。七一五死难烈士的尸体也被抢走了。

七二〇反革命暴乱，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是陈钟之流蓄谋已久的。他们把中央首长的讲话转嫁于王力同志，制造了大量的反革命谣言，张贴了大量的反革命标语，说什么“揪出江青的后台”，“主席受蒙蔽”，“要求派出真正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来解决武汉问题”，“打倒王力”等等，还喊什么“王力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8201 的一小撮坏蛋在七二〇头天发出一个“特急呼吁”，这是反革命的大煽动，反动透顶，为反革命的大暴乱制造反动舆论。我念一段给大家听听（略），《公检法》与之臭味相投，也发了一个特急声明。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派出了一百零七人到北京去进行反革命暴乱，但是一到北京就被北京卫戍区和北京造反派全部包围落网。8201 并派小股部队到《百万雄师》总站、分站去煽动，进行反革命的大发动。另外就是派反革命的急先锋去围攻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住地，进行反革命的罪恶活动。与此同时，他们还派人去军区各招待所搜捕中央派来的同志。这些匪徒一天比一天嚣张，到七月二十一日，制造了大量的反革命谣言，什么“主席七个字指示”（即百万雄师“大好纯，要爱护他”），什么“周总理的两点指示”，又是什么“好消息，中央批准斗王力”，“周总理来武汉，王力靠边站！”，这些王八蛋真是可耻至极！他们拿着《百万雄师》的旗子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最大的造反派，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流了鲜血，我们的血已经流够了，不能再流了，血债要用血来还！”他们败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声誉，闹得中央首长再武汉没有安身之地，这是谁的天下？《百万雄师》还成立了“专揪王力指挥部”，我把他们的计划念给大家听听（大意）：

“专揪王力指挥部计划：一、派代表去军区谈判，其内容：1、王力留在武汉解决问题，未解决问题之前，王力不能上交，谁交谁负责，工总不能翻案；2、王力的安全由武汉军区负责；3、不上北京，在武汉解决问题，要中央首长来武汉。二、各交通要道，如飞机、轮船、火车……严加控制，以免王力开溜。三、组织批斗王力指挥部。四、发出通电：为什么要揪王力告全国人民书。五、通告各革命组织暂不派队伍来军区，关于斗王力的问题，均由专揪王力指挥部负责……。”

一共七点，这是手稿。

总指挥名额分配：《百万雄师》五人，《公检法》一人，《红旗联委》一人，省直联司一人，……。

七二〇反革命暴乱中，百匪是够凶的，常委部长倾巢出动，而且指派了作战部副部长带领五六人去暗杀朱洪霞同志。对东海舰队发表的严正声明置之不理。在七二〇反革命暴乱中，凡是经过造反派的据点，都鸣枪威胁，而且在七月二十一日攻打了新湖大，打死打伤三人，一个卖开水的小孩也被打死了。

（四）《百万雄师》的近况

党中央一声广播，吓得他们丢盔卸甲，七二六他们坐上八辆公共汽车狼狈逃窜，先跑东西湖，东西湖有广播。又跑到肉联，肉联也有广播，最后跑到姑嫂树黄家大小湾一带。在逃跑之前，他们曾经开了紧急会，说中央已经表态，坏头头要打倒，于是就把原来出头露面的人物作为一线，其他的作为二线潜伏下来，伺机活动，主要任务有三条：（1）派人到毛主席、林副主席家乡去发动贫下中农闹事，向北京递告状材料，这个手段很毒辣；（2）派人立即去北京告状；（3）如果上两条不能实现，就继续蒙蔽欺骗郊区的农民，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扑。

他们逃跑的过程很狼狈，跑到黄家大湾一个地方就丢下十九部话机，三匹绸子的袖章、长矛、枪支等，有些匪徒半路溜掉了。第二线的人由 8201 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点。作战部长在汉阳十里铺进行秘密活动，计划成立《江城飞虎队》，准备搞枪。他们的罪恶计划很快被发现，经过武汉警备区同意，我们去到那里抓了他们，在回来的路上，这位作战部长不老实，想抢枪，我们的战士发现开枪，身上中了四弹，送到医院后这个坏蛋自作自受了。还有三、五个人一起偷偷活动，这些人都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他们再一个斗争方法就是写反动标语，向报社电台写匿名信，矛头对准我们伟大领袖和我们的副统帅，这些反动传单在东西湖发现多一些。

这个组织现在是基本上已土崩瓦解分崩离析了，有个别顽固的跑到东西湖、黄陂等地，也有的跑到通县、通城等地。绝大多数已陆续回来，在外面的寥寥无几。二线的头头大部分已经向我们自首。

所以，现在总的情况，和全国一样，武汉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我们革命造反派，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迅速掀起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的高潮，集中目标，集中力量，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爪牙，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向毛主席请罪！向大家请罪！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罪，执行了刘邓路线，以致造成了罪过。我犯这么大的罪，这么大的错误，毛主席还一再宽大，教导，还希望我回头，不要坚持错误，认真的改正，取得广大群众的谅解，还可以站起来。毛主席最近又指示，叫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也是不断教导，也是很宽大，又把我送到学习班来，来接受造反派和干部对我罪过的批判，斗争也好嘛。都是对我很大的帮助，我以前总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也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所以，我应该低头认罪，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在我来说，就是重新做人。我这个人，已经是敌人了，已经坏了，修了，应该是重新做人。脱胎换骨，所以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请罪，向武汉部队的指战员请罪，向今天在座的干部和造反派请罪。我是反革命，但大家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还想我真心的回头。所以，我现在讲三个问题。

一、我犯罪的主要罪恶事实

我已经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是我的总暴露，我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蜕化变质，第二部分我再来讲（犯罪的根源）。

第一，我养病休息一年多，去年九月回来，回武汉，回来就参加省委会议，我就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自己本来以前就是修了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回来也没有很好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针，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不理解，一些政策、方针也没有学习，领会。一回来，因为我是省委常委，就参加常委会，就听张体学的，就跟张体学在一起了。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一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右的方面参加的，一参加就站到省委一边去了，站到这个黑省委的反动路线一边去了。保省委，说省委有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总是在那里帮旧省委定调子，帮助张体学，说你们不要去活动（这也是帮助他）；要做的好看一点，隐蔽一点，都是站在省委这个反动立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方面，坚决去向省委进攻，而是站在省委方面，怎么对付革命派，怎么样

应付革命派。那时，革命派在省委绝食，送饭不吃，还照下相来。省委提出“高姿态，软办法，真狡猾，难对付”，这些反动的东西我都感到提得很好。都是打击对付造反派的，都是站在黑省委方面的。我跟张体学，他叫我就去，通知我开了四次大会，都是保守派召开的大会。一次是武大，名义是纪念毛主席视察的，九千人的大会，我去了，这一次，我还讲了话，当然是讲意义了，也讲省委没有大问题。一去就是保省委、镇压造反派的，因为我们还是以解放军的名义嘛，玷污了解放军的名誉。省委礼堂欢迎南下学生，也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这个会我也参加了，这是一次。再有湖大保守派，开会纪念国庆，又说是发毛主席著作，这是在湖大礼堂开的。我参加了四次大会，很积极，都是站在省委方面，都是保守派方面，都是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压，帮助省委涂脂抹粉，包庇，助张体学的威。多次参加省委的常委会，对付造反派。一次说报社被封，要撤职几个，罢官几个，我说要停职就停几个，先拿下来，以后再拿上去，这都是给省委出谋献策，搞不出革命的东西。帮助省委搞检讨，检讨一下就行了。讨论检讨开了两次会，保张体学，借房子给他住，把滨江饭店借给他们，开了几天会，还准备把洪山房子借给他们办公，干什么？就是把他们藏起来，掩护，保这个黑省委，支持他们的反动路线。站到省委这个反动立场上去了。

保王任重。王任重本来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青同志早已说他是黑枪手，点了，我以前不敢点他的名，只是他错误严重，批判了以后再讲，将来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十二月，造反派从广州把他揪到武汉来，我还叫韩东山到飞机场去接他。就是派人去接他，问好！这是什么立场？资产阶级立场嘛，看这个鬼啊！他是敌人嘛，还是保他，助他的威。三月，王任重写信，当然也给了中央，也写给我、韩东山、姜一，要转给省里干部，那个信就是抱着成绩不放，什么检讨？就是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吹捧自己不是三反分子，自己有错误，但不是三反性质，说湖北要是反革命领导，能够增产，能够搞好？那不是刘少奇的理论，信上都有。我们以后把这个信打印发到省直，我们没有组织批判，这不是保他？

而且我们给他写了个信，也说他这个检讨，抱着成绩不放，很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写这个信，还写了个“同志”，这是明目张胆地保王任重。这个时候应该知道么，为什么还写个“同志”，所以，这是个立场问题，站到他那个立场上去了，没有站在革命的立场。站在革命的立场，他是个敌人，就应该和他坚决

斗争，应该揭发他，应该斗争他。所以，我保省委，保张体学，保王任重，参加了一些活动；起了极坏的作用，完全是站在省委的反动立场上，来对付造反派，帮助省委出谋献策。跟省委一起坚持反动路线。这是我九月份回来后，到一月这个阶段。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镇压革命造反派。一、二月会议以后，这个阶段。这次会议，贯彻的就是自己的，乱用八条来镇压革命。为什么镇压呢？因为我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蜕化了，已经很多问题了。李迎希起来，李迎希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有些联系。司政机关起来了，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陈伯达同志指示的，旧的很多，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我就是这样的人。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暴露在群众的面前。所以就借口稳定部队，抓革命生产促生产，借口李迎希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击造反派。总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怕革命，到反革命。这次回来什么不做，在北京就准备说李迎希、张广才是野心家，要夺军权，要把军队搞乱，活动了许多造反派，卫校啊，高级步校啊，文艺团体，凡是接近他们的，谈过话的，就说是有问题，乱污蔑，就说政治不纯是混进来的。借公安六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认为不好就抓，所以就捉人。思想上就是想把革命搞下去，打下去就是不革命，那时就认为军队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风，过去的保守派没有反对我们的，那是好的，反对我们的，反对我的，那就不行，就是要打击，有“我”字，自己已经成了修正主义，那么坏，还挨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对造反派，李迎希就是又气又恨，就是要报复。借着李迎希这个东西，来打击造反派，借着李迎希，借口稳定内部，部队不能乱，部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要随时保持警惕，借着这个东西来镇压革命，解散组织。在生产方面，借口生产来压革命。生产要抓，现在春耕季节来了，自己就赤膊上阵，有几次我就亲自抓人。高级步校副校长，我就抓起来了么，卫校抓人我到了。司令部文工团我到了。除了我的意图，在这个整个反动路线下面，实行白色恐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在军内捉了两百多，那时候说是一百七，把一些青年抓起来。“十六条”上说什么样的人都不能捉抓，就是右派有问题也要在运动后期处理，所以违反了“十六条”，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刘少奇、邓小平那样子，就是毛主席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打刘少奇的司令部，我们那个司令

部，以我为主也是那样子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而且不是一般的，而是调兵遣将，用部队。那样怕，完全不是那个情况，你现在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你是真正革命的，那问题就好说得很多。你站在反动方面就看着他不好，要革你的命。所以现在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看，我们那时候完全是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完全是采取白色恐怖，镇压，很恶劣，很毒辣，反革命很坚决。因为我们玷污了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有崇高的威信。我那时候就是修了的人，还没有暴露。所以，以后就镇压的更利害，就是在这些借口下面：李迎希要夺权啊！野心家啊！张广才啊！所谓稳定部队啊！促战备对付帝国主义啊！这都是假的，就是为了对付革命，为了自己执行反动路线，镇压革命，打击造反派，报复。抓革命促生产啊！实际上就是乘这个机会搞“抓办”。因为这个“抓办”将来干部好，就是准备搞三结合的。把坏人也搞进来，镇压革命，镇压的学校多了，还有北京管理的九个学校也采取了，这样办法，借口要支援北方，赶快搞整风，整风九天，总想赶快把革命镇压下去，打击下去，不是就没事了嘛！不打倒你了嘛！就是自己不革命，也不准人家革命，更不准人家革自己的命。谁个要革我的命，要打倒，就是有气，就想办法要整。依照我们那样子，国家就不革命，资本主义就复辟了，就是我们复辟了。因为你就是资产阶级分子么。所以抓了九百人，解散了几十个组织，全省一百多，大抓人。再就是处理李、张，什么政治扒手啊！什么野心家啊！处理张竞的问题，把他跟湖大造反派搞下来，他们很好么，就是过去他跟李迎希他们说了一下，现在看，说得对么，说有两条黑线，军区一条，省委一条，这就是两条黑线么，这样就说他们不尊重领导，也是有野心，所以要停职反省，这都是我亲自做的。开会，我亲自参加的。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些人就是反对了我，要打倒你，就是不满，就是报复，就是要整。参加省委大会，抓革命促生产，想搞生产高潮，鬼！那全是假的，就是借口这个东西开上层会议，就是光开那些当权派的会议，在省委开的有百把人的大会，在体育场开了三万人的大会，都是机关、省直、市委各个战线上的，各行业的当权派。这些会议我们的讲话，拿这个生产来压革命，歪曲事实，思想上就是还正在斗和还没有斗的人，给他们打气，向造反派示威。把一些当权派塞进来张旺武、闫钧、姜一、夏世厚都塞进“抓办”，这些名单我在北京还是跟张体学商量提出来的，

这不是有鬼啊！原封不动，还革什么命啊！把旧省委那些人搞出来复辟，把一些当权派，有严重问题，象张旺武是历史上自首了的，我知道，就是说过去由省委解决了问题的，是什么人解决的？是旧省委张体学、王任重解决的，到底是怎样解决的，自己就是认为过去历史问题解决了。都把这些拉出来，塞进办公室，不经过造反派，也不经过群众，这我们的罪多大啊！所谓成立“抓办”，以后，周总理去时，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武汉的抓办，人武部领导的抓办，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办反革命事情，这都是在我的意图，思想指导下面一系列都是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了自己不革命，那里有反对就采取报复。批判“二八”声明，错误的批判“二八”声明，“二八”声明批判的时间那么长，已经是挑起群众斗群众，什么香花派，什么毒草派，已经把保守派势力搞了起来，跟造反派斗争，打击镇压造反派，特别是对于二司，打击二司，打击工总，为解散工总加罪名。还拉三新，说支持你，他们那个时候同意批判“二八”声明么。不是真支持，就是利用，挑起几派斗争，镇压真正造反派，为取消工总作舆论准备。不管批判“二八”声明怎么样，我负责，起了这么样坏作用。“二八”声明有什么错误？我们用解放军的名义，用毛主席缔造是人民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来批判，这对革命派的打击是多大啊！

扶植保守势力，扶植三字兵，这个大专院校三字兵，中等学校的三字兵，都是保旧省委的。已经几个月的斗争了，有的跑出去了，基本上散了。如果我们真正站在造反派方面，彻底地争取瓦解、分化、那武汉的形势就不同了。我们承认它的组织，把它又恢复了起来，所以造反派二司、三新都说三字兵恢复，表示反动路线的猖狂，我们就是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上，又把保守派势力扶植了起来。过去他保省委，以后又扶植起来保我们。在北京打电话说瓦解，说了又后悔，就是要团结、教育、提高，准许人家革命。保守组织应该坚决瓦解，这才是革命的立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他们保军区，保我们，所以就很亲热，就扶植，把它重新组织起来。说他干部子弟多。这是我们执行反动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这个观点，我们从过去那个旧省委把它接过来了，还变本加厉了，比他们镇压革命，镇压造反派还厉害，为什么呢？他们办不到的我们办不到了，我们玷污了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这个荣誉，这个威信。自己是个修正主义分子，自己不革命，利用这个东西来打击。所以，总的来说过去那个旧省委做不到的事情，起不

到反动路线的作用，我们起到了。我们玷污了人民解放军的威信，比过去的省委还厉害。我这个资产阶级路线，造成的恶果损失，比过去那个旧省委还大，还恶毒，更厉害，你带枪嘛，有枪杆子么。发表“三二一”通告，解散工总，这是发展到了高峰，把工人总部这样大的组织解散了，也不调查，也不研究。报告报了，没有批准就做了，解散工总，抓了工总的负责人。那个十六条、八条上说的是个别的，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谁个叫我大批抓了？都反对么！我们采取大批捕人，解散工总，当然材料整了，我点了头么，说材料看不看，谁看那么多。说照公安六条做是对的，对个鬼啊！一个都不对，就是反动的，你站在资产阶级方面，镇压无产阶级，镇压革命，那你说的对罗，你站到革命方面，站到无产阶级方面看，那就是反动透顶，那是实行白色恐怖。点头之后，准备汽车，牛怀龙独立师，还把罗孟刚叫来，叫后勤出汽车，先说抓二百，抓三百，结果一夜抓了四百七。这是什么革命啊！这完全是白色恐怖，是反革命专政。不管情况怎么样，这个罪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是你这个反动路线，是你点了头么。就是你干的，也不要推谁么，就是我的罪么。我们抓的这些人，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加紧批判“二八”声明来压工总，解散工总来压二司，打击造反派，一系列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拉一派，打一派，拨弄是非，就是想把造反派一个一个的打下去。这是二月会议后，在武汉镇压，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坏的时候。

第三，军委四月会议以后，这是我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十条命令、江青同志讲是爱民的，就是要纠正错误。我们参加这次会议，一个是讨论十条，一个是接受教训。要转变么。毛主席讲纠正错误发扬成绩，有错误就赶快改，改的越快越好。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许多教导，都没有听进去。十条革命就是好啊。好啊，内心里这还得了啊，又要来冲啊，又要搞乱啊，自己做的这些罪恶事实，怕人反攻。不执行十条命令，不贯彻，不讨论，不认真执行，不检查方向路线错误。已经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是不承认方向路线错误。在内部也不说，在外部更不说。工总不平反，抓的革命群众也不放，组织也不恢复。说的要平反，要赶快放人，我们就是不坚决，放一点，留一点，说什么严重的不能放。有什么严重问题啊。就是继续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路线。拒不执行十条，不检查错误，工总不平反，

抓人不放，组织不恢复，变本加厉，放一点人，恢复一点。说过去解散是对的，现在恢复是对的，放个鬼啊！过去就是错的，就是继续反动路线，不公开在群众中检讨，承认错误，更没有决心发动群众来批判自己。

钟汉华在北京，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害了下面，欺骗了广大群众、干部，江青同志批评我的“借势压人”。我们只向中央作了一般检查。回来，作为我来说应该提出这个错误，这是造谣，对这个东西应进一步消毒，我没有做，那你为什么不做啊？因为他说的也是我的思想，反动的思想，合乎自己的反动思想，因此，回来也是这样做，工总不翻案，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三字兵大方向是对的。那时，百万雄师还不多，因为自己是这个反动思想，就不可能进一步去处理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自己忘记了，自己没有注意，就是合乎自己的思想，这些反动的东西合乎自己。回来后，言论、行动还是那些东西，这是我们的，但用江青同志的名义，这个就不同了，这是个大罪过，欺骗人哪！盗用江青同志名义，蒙蔽人，下面当真的，还有什么怀疑的。所以，这个恶果是很大的，这个罪责我也逃不了，不管是政治委员，也不应该顾及，要好好把这个东西收回，公开辟谣。没有这样做。

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我作了个总结，继续坚持错误。五月份，我向主席、中央作了报告，也是错误的。错误的分析形势，歪曲事实欺骗上级，打击造反派，这个问题，就是我坚持反动路线发展到了最高峰了，那个时候，把等待他们觉悟，一面斗争，一面团结，那个团结是假的，就是人家一天喊捉“武老谭”，什么陈再道，“打倒陈大麻子”就是有气，心里恼火。对三新、二司就是想办法报复。所以这个总结就是把反动路线更系统化了，形成了反动的借口的纲领。以后的六四公告也是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整个党委也是这个精神。这是我们定了调子的，就是肯定了批判“二八”声明没有错，应该么，解散工总没有错，不能恢复么。造反派大方向错了，我们大方向是对的，他们背离了毛主席思想，我们是按毛主席思想。一种反动的论调。说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是对的，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错误的说成是好的，把好的说成是错的，把革命的说成是坏的，把我们的反革命说成是革命的。所以这样一系列，还加上我们政治部发了一个通知，说陈、钟不是三反分子，谁要喊打倒陈、钟就抓

起来，所以这一切在下面造成的罪过最大。我听到了没有，听到了，那时孔庆德在那里讲，说我不是三反分子，那时也认为自己不是三反分子，听了就很顺耳。因为自己总是坚持反动思想，听了洋洋得意，不会打倒自己，合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自己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其实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了的。在给毛主席、中央的报告和会议总结，提出他们大方向错了，说孟夫唐、刘真站过去了，说是一小撮搞的，是反革命逆流，是复辟，把种种罪名加到造反派头上。这时，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说，我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了，百分之百，一点不假。而且还说他们被孟夫唐操纵了，是一股逆流，搞资本主义复辟，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这个时候主要的矛盾是在我身上，我是镇压革命的罪魁祸首，自己是个资产阶级当权派，自己把过去省委的那一套接过来了，变本加厉了，自己这个反革命分子，还在那里指手画脚地说造反派这不对，把一切罪名斗争的矛头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污蔑革命派。是千方百计地来对抗造反派。这个时候革命派同我们斗争，这是完全对的，你老坚持，你打击他，阻碍他，你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你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么。所以，这样子我们越坚持，想方设法调兵，把革命派当敌人，怕的那样。新公校事件，绝食斗争，到军区来要见我，我没有见，以后钟汉华签了七个协定。一回来我们就研究，把这个推翻，这事我主要负责，我把它推翻的，出了一个五一二文告，打击造反派。说冲击军区，把副司令员打的怎样，把政委绑架走了，许多罪名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我们的罪过，以后又说他们冲军区，就搞铁丝网，水枪、护具，护具少了还到信阳去拉，说是防啊！怕杀啊。我是躲到廿九师去了，那就是怕的要死，恨得要命，陷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不知多深。但是，是不是不可以找来谈、商量，还是可以来，我们就是不见，不谈就怕。就是想办法对付，就是哪里住个连喽！哪里广播是他的喽！以后到五月，百万雄师就起来了，推翻这个七条，还出来个文告打击造反派，这是我的罪责。总理说这个七条也没有什么问题么。写了个给张维荣（按，指湖北大学造反派头头）的信，把七条推翻，不作算。倒打一耙，把罪名还加到造反派身上。

发表六、四公告，不检查错误，不执行十条，不平反。反而把矛头指向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肯定了解散工总是对的，不能翻案。这也对的，那也对的，存在缺点，强调没有经验，初次上阵，强调很多的客观原因。任务多，时间紧，

来掩盖自己的反动路线。继续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的路线，继续打击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进一步迷惑欺骗蒙蔽群众，造舆论。我这个反革命盗用军队的名义，我是军区的司令员，利用解放军这个崇高的荣誉，压造反派，保守势力百万雄师就趁这个机会发展很快。而我们总是说他好，给他地位条件，而在舆论上给他造便利条件，这样百万雄师当然根据我们的六四公告，不执行六六通令，搞动员，搞大规模武斗，就是我们挑起来的，挑起武斗，没有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制止武斗的指示和批示，还说百万雄师好啊，他执行六六通令好啊！执行个鬼哟，打得那么厉害，自己在鼓里头，说单方面打么，自己没有坚决贯彻中央文革的指示，伯达同志打电话叫我制止武斗，我没有坚决的执行贯彻。百万雄师杀人。以后还说他们执行的不错。处处在造反派脸上抹黑，在保守派百万雄师脸上抹粉。以前说我是百万雄师的后台，我不通，我也没见他，我也不知道。其实你的这个方针，你说了话还要你去，这是助长了也么，你在思想行动上帮助它喝了采，给他创造条件，培养它，支持它。所以立场没有站正，一讲起来就抵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我也是反映这个问题。好象我是操纵百万雄师，我挑起武斗，鬼我也没有到过，我两个月住在廿九师，我没见过。说他有许多好的，大方向是对的，又说是这么大个组织，是个革命群众组织，这就是承认，就是支持。你站在革命方面来看，别说口头的，屁股已经坐到保守势力方面，坐到百万雄师方面。所以百万雄师发展那么快，打的那么凶，那时都感到很好，不感觉里面已经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是我这个反革命造成的。对它坏的方向看的少，对它好的方面看的多，还夸大，把造反派的个别缺点夸大，这是什么？这是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坐在保守派方面，早已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早已把毛主席领导的这个革命给断送了，打了下去，但我们还说自己革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孟庆唐站在革命派方面去了，省、市干部我们希望他们很快的亮相，亮么，搞三结合么，组织很大一批干部亮到百万雄师，我们也很欣赏，很同意，还去策划，叫他们亮，赶快亮。以后，省市这些保守组织，都跟百万雄师一块，都亮到我们这方面来了，以为很好嘛。所以现在干部站不出来，还受批判，这都是上了我们反动路线的当了。

做了上面这么多罪行，这是主要的，还多喽。当时就认为这么多干部亮到我们这边好，还是个胜利。我们反动路线搞的这样，害了干部，当然，也有少数的

对我们的反动路线很同意了。

第四，“七二零”反革命事件。这个“七二零”反革命事件，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天大的事情，是明目张胆的反对中央、反革命、反对中央派来的代表，这是反革命的事件。我应该对这个反革命事件的罪负主要的责任。这一次，经过大家对我的帮助、斗争、批判，才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严重，过去我认为有很多客观原因，还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这是极端错误的；不出“七二零”事件，我这个环境好得很嘛，都在保我，都说了话么，为什么出了？我不知道，这就是对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没有很好的认识。再一个，说王力不应该在水院讲话广播出去，怪那些事，没有说我的责任我要负。这是我一系列的…执行这个…造成的。但是还有旁的原因，旁的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最大的是我造成的。你长期站在刘邓路线，执行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反对主席路线，而且顽固的坚持，造了许多舆论准备，定了许多的框框，调过来欺骗下面，欺骗战士，欺骗群众；但是群众认为当真的，因为是上面说的还有什么假的？我们就听嘛！结果做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反动路线。七月九日常委会定调子，七月十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里面还有造反派嘛，是个很大的组织。他们抓防汛，复课闹革命，（本来）都是假的，还加以夸张，说这些都对嘛！方向是对的。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么！“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而且我放毒的这个时间又长，中毒又深，下面受了欺骗。所以这个就是你造成的，所以这就是做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就把保守势力搞起来保自己。

七月十四号，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

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为什么呢？就是自己这个反动的思想，就是不重视，就是抵抗毛主席。以为我开的几次会，都是搞的那。主席的这个指示总理说了，主席又说了，（如）传达下去，这个力量会多大！这个反动透顶了，连主席的东西都不传达。这不是反抗主席啊！还要怎么样反对主席啊！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东西，你就是没有做嘛。所以，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为什么汇报汇报总是在会议上汇报，没有讲不要这样汇报么，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领导）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工总…在我思想上……，我过去没有说心里话，（实际）认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已经解散这么久了，现在工人到处参加了组织，有了这个谬论。继续对抗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总理。就是不愿意贯彻。指示这么明确，这么英明、正确，就是抵触，不愿意办，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在继续顽抗，而且公开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周总理这些指示，拒不执行。所以，“七二零”事件不是偶然的。

“七二零”事件一发生，那就晚了。“七二零”事件，是我们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必然的产物。独立师也是嘛，也是我们蒙蔽欺骗了嘛！“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自己不挺身而出，不很快的站出来；就是说王力的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对的，应该挺身而出。那时候说，以前是让我们说出去，还没有公开，我还在给公检法这样说，你们在外面听到的，那不可靠嘛，有错误是我们的责任，不怪你们，还在那里不承担责任，把责任推在中央，继续造成自己的罪过。打你几下没有妨碍大事，你怕什么嘛！中央首长在那里多重要啊！自己就是那样，这件事情简直搞的糟糕，没有办法，束手无策。也就是抵抗，好象是我们有责任，也有旁的原因；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一点阶级感情。“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中央首长我们没有很好的加强警卫，根本就没有放在心。这么大的事，这么天大的事，这不是我一个头、两个头顶得了的，这个安全工作，首先我（还是）去开会去了，由X X X布置去了。但是“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对安

全没有注意，没有放在心上，这是最大的罪，那里还有比这个还重要的。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可恨啊！中央首长在你那里，你还不采取措施，假使有事怎么得了啊！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

那个时候冲进来，把王力带进我的军区大院，他们也打了我，那就不说了，那是打错了。但是，这个时候，王力绑架到大院里去了，谢副总理叫我、钟汉华去，我就没有去，钟汉华去了。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央代表，我们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很快去搭救（按：陈检讨时，王力已经被所谓“请假检讨”关起来了）。当时认为有人去，军区那里还有人么。自己怕死，这个反动的思想。过去说我是“七二零”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我自己搞起来的，感到冤枉。现在你站在革命方面看，一点也不冤枉。这确实确实就是我们造成的，策划的，做了许多舆论准备，一系列的坚持造成的，还定调子蒙蔽群众

搭救王力也不注意，自己挨了打，还把老婆叫来看，自己很注意自己。所以，这个资产阶级思想反动透顶了。一切为了自己，为了我。为革命的事情，为党的事情，为人民的事情，在身上很淡薄，没有了。自己确实确实是个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无产阶级气味，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多。以上这些罪行，说明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刘邓的反动路线，帮助刘邓搞资本主义复辟，我这样搞不打紧，我欺骗和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指战员，使他们犯错误，使他们受气，就是在我的罪恶下面，我们欺骗了他们，蒙蔽了他们。想方设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说得他们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使他们跟着我们的错误走，扶植保守派，打击造反派，把武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搞得乌烟瘴气，乌云盖天，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以致造成这个“七二零”事件。所以我犯的罪大，对党、对革命、对人民、对我们下面的干部、战士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恶果。

我的罪恶滔天，请求审判我，枪毙我，杀一个头也不行，杀一百个也应该。

二、我犯罪的根源

我犯这么大的错误和罪，顽固执行、坚持反动路线，站在刘邓反动路线，镇压革命，这个不是偶然的，是我早就蜕化变质了，我的思想象林总那个报告指出的，老干部也要用阶级观点来看，有的保持了光荣传统继续革命，有的受了资产

阶级的侵蚀，有的蜕化变质，变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我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我个人的一生，如果活着的话，这是一个人的血的教训。自己就是蜕化了，就是不注意量的变化，量的增加，无产阶级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慢慢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往里灌，毛主席的思想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来了，别的不说，就是进城以后慢慢的变了质，自己不知道，一天就是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胜利了居功骄傲，停止不前，贪图享受，就是由这里起的，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不知道没有毛主席、没有党那里还有中国的胜利，还有我们呢？把党、把人民都丢开了，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一天就是个我字、私字，我的思想慢慢变了，蜕化了，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一天就是看到那里房子好，走到那里看到设备好，回来就搞设备。汽车、钓鱼、猎枪、表、沙发、生活方式极端腐化，至于说劳动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进城以后，总是学资产阶级的东西，看到那里有地毯，自己搞个地毯，买沙发，买餐具，炖什么果子酱，面包。都是学修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是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这都是我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污辱人格，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都有么，却都是犯了。我这么高，这么老，不象个人样，哪个爱你哟？自己不照一照自己，这么大年纪，丑得要命，自己还腐化堕落。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在那里一天吃、乐、玩耍，对于工作，对于人民事业，为人民服务，老三篇看了，都没有做，都违犯了。人民为我，多少人为我服务，自己还不做工作，革命事业心没有了，淡薄了，就是搞那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跳舞啊！前年在上海，还看什么家具厂，想买什么好家具，买桌子，椅子。一天就是看不到人民，忘本了，你现在怎么就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么有兴趣，那么牵心。是对时时为个人打算，为享受。住房子要好一些，坐汽车要好一些，钓鱼杆子要好一些，沙发、地毯……什么都要人家服侍，还不称心，还要训人家。主要指示出来了，官做大了，钱多了，架子大了，当官做老爷了，就是修了，不平等待人。这样子毛主席的书就不想读，读不进，没有读，毛主席的话不听，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你不犯错误，不跌跤子？那是一定的。到那里去，毛主席的书带着，带着不学，做样子，学也没学进去，学了也不会用。就是贪图享受，到那里就玩，斗志衰退。我一个是忘本，一是啃老本。今年一月份，毛主席说，不要啃老本，老本有毒。这些教导都不听，多么

重要的指示，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不栽跟斗？所以，走到反革命道路不是偶然的。你不照毛主席指示办，照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办事。就是蜕化变质，堕落腐化，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原来自己阶级，我是个孤儿，是个穷孩子帮人家牧牛的，过去看人家端碗大米饭就想吃，欠碗饭吃啊。革命不是靠毛主席，靠党，哪里有今天？

毛主席的指示，主席的话不听，主席的指示不照办，不贯彻，不学习，不研究，我犯罪的最根本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今年一、二月军委会议，四月军委会议。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的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了不少指示，就是不听，听不进去。特别是今年一、二月会议，就是说乱了，就看了表面现象，就是听不得了，连林副主席的讲话都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陈伯达同志的报告，还要其他的报告，都说不解决实际问题。什么实际问题，就是怕，就是不好好领会，好好学习。回来也没有很好的传达，研究、贯彻，还是照自己的一套搞，还是搞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错误不改。四月会议，制订的十条，就没有很好地执行，就对抗。蜕化了嘛！秘书把主席亲自批的浙江问题的指示，夜里送去，让在门外念，还发脾气，说打搅了自己的瞌睡。这么重要的东西，也不看，到了什么程度。今年四月，总理当面传达的主席指示，叫把河南、湖北两省的领导班子研究一下，自己不好好的抓，没有好好做，也没有向中央报告，向主席报告。四、五、六月这个时期。主席批示了不少的东西。都没有很好的研究，引起我们的警惕。批广州、济南的就是看了，也没有听进去。这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多顽固，该死啊！（略）

不听林副主席的话，对抗林副主席。六四年底，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这样伟大的指示，多么重要，多么英明，自己都跟罗瑞卿搞到一起，搞大比武，听罗瑞卿的，很积极。对林副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自己就抓的不紧。罗瑞卿搞大比武，自己是很积极的。林副主席纠正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帮罗瑞卿的腔，同罗瑞卿唱一个调子，帮罗瑞卿，说什么叶群、那个时候还有刘志坚，他们蹲点调查的材料。拼凑尖子，弄虚作假。自己认为我们那个部队，没有那么严重。其实很严重，我们不知道，自己官僚主义，还说人家材料不确实，不能代表整个部队的形势。一天在那里搞练武，拼凑尖子，日夜练，不搞政治，单纯军事观点，冲击政治。罗瑞卿就是拿这个大比武来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是帮了罗瑞卿的腔。

还提出林副主席的报告中，某些字句要修改。其实就是说林副主席那么指示要修改。某些词句，就是指的拼凑尖子，对于大比武也要一分为二，好象还有成绩。那么会议上，当然其他人不说了，我个人就是这样的抵抗林副主席，抵抗他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这也是反对林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副主席的指示，自己也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说八条是过瘾的，其他的指示不好好学习研究，如要站在左派一边，阶级斗争，自己要革命呀，自己既是一份革命力量，又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这些指示就不听，没有把自己作为革命对象。你自己资产阶级，不革自己的命，人家就革你的命。这是必然的，不听主席、林副主席的话，非跨台不可。不是一次、两次，一次不改，一次不听，那多么危险。

对中央文革不尊重。老实说，不是不尊重，就是有抵触情绪，某些地方就是有不满意，这是心里话，现在不要再藏着。中央文革是多么好啊！总参谋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卓越的功勋，做了伟大的事情，立了伟大功勋。这个问题，过去有人讲过，自己不看这些事情，对中央文革牢骚不满，就是反对中央革命。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时，我们提意见，要讲阶级，讲成分，不能唯成分论。对那一段讨论时，提意见，请韦国清同志提上去，我们态度不好。血统论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什么理论，就叫到这个血统论也是有意见。批评反动的血统论，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对伯达同志报告时，以很不好的态度提意见。讨论提意见是对的，但是你就是有点抵触情绪。（略）说他们不听我们的，只听革命小将的。这都是暴露了证实了我们不满。对中央文革怎么能一报告就能答复？说不答应。就是自己的反动思想，不合乎自己，自己坚持自己的反动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的参谋部有意见。四月会议又提出中央文革要增加人，把这个省看还没有好的书记，调个把去，文革多搞些人，那个地方学校多，工业多的城市，派一个是到那里去坐镇。我们武汉要派个人到那里去坐镇，我们来做工作，你们掌握。意见就是自己不负责任，根本思想上就是不满意，就是说你没有人在那里，报告你又不批，也不批，也不指示。什么提意见，胆大妄为，反对中央文革。再就是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当官做老爷。这就是伯达同志那个报告里讲的怕，怕这怕那，归根到根就是怕革命，怕群众，辜负了主席一再教导，要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呢？不相信群众，到怕群众，以后要镇压群众，实

行刘邓的那一套，反革命的反动路线，怕群众就不是共产党人么，当然现在成了反革命，所以一斗争激烈，自己就藏起来。硬是不到群众中间去，这也是我犯罪的一个根本的东西。长期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懒惰，没有共产党人的气味，没有革命事业心，一天就是为我，吃、乐、玩耍，不到实际中去，也不到群众中去。不说地方，连我们军队也脱离了，所以以到最后采取镇压群众怕群众，不相信群众到镇压群众。作风非常恶劣，听不进反面的意见，说反对我更不行。受我们训的人不少。为什么呢？没有道理。自己那么懒，不做事情。为什么训呢？就是照顾你生活照顾的不好，并不是为革命，为工作。所以说我主观片面，骄傲自满，目中无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同志们批评我的完全对。到资产阶级这样子就怕死，怕群众，不革命。以后我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喊打倒你，就怕揪走，就不敢见。“七二零”事件也证明，也是怕死。

我们党委工作，我们这个党委已经是修了，都黑了，是我搞坏了的。我这个班子，把大家带坏了，害了大家，也害了下面。党委长期的不突出政治，我这个人就反对突出政治，作风不民主，就是自己说了算，人家说了不算。政治空气很稀薄，政治原则很差，对上面的东西，就是当了个交通，当了个收发，没有很好的认真研究，认真贯彻，认真执行，认真检查。党委内部长期思想斗争不开展，我的错误就怕人揭，自己对思想斗争不提倡，压制，就是表面上表现还不错，一致，实际上意见还是很多。班长坏嘛，错误那么多，怕人家揭，怎么去搞思想斗争，怎么去搞思想斗争，怎么能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来批判。所以，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这样造成的，大家都是一致的错。当然，我们下面还有些同志跟我们的意见不同，他们看的还有一些对的。但是，那不行，要打击，要批评。特别是哪一个同造反派好，同造反派可以说话，说他们还有些道理，那马上就找来批评。二十九师那个副师长赵奋，他跑到三新，到处可以说话，觉得亲近，我听到有人说，就把他找来，说他偏向了，说他没有看到三新的方向错误，就打击。所以，我们这样思想早就蜕化了，变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过是总暴露而已。这是必然的，你是资产阶级，怎么能跟主席搞无产阶级革命呢！资产阶级思想，自己灵魂深处的肮脏东西，就怕革命，就怕革自己的命。总想糊住，包住。这一下搞，都搞出来了，大家帮嘛，彻底把我过去这个陈大麻子，陈再道，连骨头带肉都不要，都算了，都是资产阶级了，都是腐化的东西了，今后要重新

来脱胎换骨，又按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重新做人，脱胎换骨。过去的彻底抛掉，对我只能这样。我以前总是站在老位子，老位子就是资产阶级位子，你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资产阶级的陈再道这个坏家伙。你就看不出来，你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陈再道这个坏家伙，你什么都看出来了。林总讲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观察问题才是正确的，我早已抛弃自己的阶级了，革命的事业心，革命的干劲，完全消失了。

主席、林副主席的话，你不听，你不执行，你革什么命。怎么能不犯罪，怎能不跑到反革命方面去。长期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自己变了质，到了刘邓那里去了，自己还说自己满对的。对主席、对中央文革为什么这样的？只有敌人，只有资产阶级才反对他，只有敌人，只有反动派才不满。他（按指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最高的领袖，世界人民的领袖。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革命最高的司令部。我们反对他，就不听，就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对抗无产阶级，对抗革命，反对伟大的革命，罪真大呀！所以，这次来，斗，那没有什么，主要是我们好多干部苦口婆心的，又恨我这个错误，又想要我重新革命，相信主席，坚决执行主席的，人家还是根据主席的这个精神，还是想我回头来。所以这十天来，每天都有人跑到我屋里去教育我，帮助我。开了几次斗争会，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以前就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没出“七二零”事件，我解决好，“七二零”事件与我无关系，也不是我组织来的。这样想，不是你组织的，你一直在活动，一直在那里搞舆论，搞策动，不是你造成的是谁？所以罪责难逃。特别是我这个人，一个人死了算什么，对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对主席、对中央、对中央革命，对武汉的造反派、武汉的人民、军队的广大指挥员、民兵。造成多大的恶果。都是我这个黑线害了的。把我一个陈再道杀了，把一百个陈再道杀了也应该。有些同志提出了这一错误的性质严重，面大、深广。几方面，这一方面吃了亏，造反派方面，被我们打击。扶植百万雄师起来，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来镇压造反派，杀人、放火、打死了那么多革命小将，这都是我们的罪过。还有什么说的。所以，我现在没有一点好的，就是犯罪，都是错误。所以说我是镇压造反派，镇压武汉革命，“七二零”事件的罪魁祸首，一点也不冤枉。反对毛主席路线，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你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毛主席说的话始终不办，还不罪该万死，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蒙蔽欺

骗了广大革命群众，干部、部队的指挥员，这是罪恶滔天。毒害大家，保陈再道。那个时候政治部还发了通知到下面去，多害人，那个要喊打倒我，还要捉。这种下了多大的恶果。这就是我们搞的么，我搞的。所以，我现在成了反革命，等着中央、人民审判，都是怪自己，自己是这样的蜕化变质，到最后成了罪人，成了反革命。

三、 我的决心

最近主席几次指示，我犯了这么大的罪，当然，主席不仅是为了我一个人，是他伟大的干部政策，再就是为了武汉广大干部、广大的人民。再就是大家苦口来帮助，希望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主席讲的，来一个人就叫看哪，就念给我听。那真是来一个就问我看了没有，你念念，你看看，你把那个群众谅解，重新革命好好学习，造反派同志也是好的，来读文件给我听，帮助我，指出我的前途，指出重新革命，我能不走，是牛也应该教好了。所以，我不能辜负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以反对在座的大家和革命派的小将们对我们的帮助，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希望。我也想啦，你不听毛主席的，重新革命，你还想把错误带到那里去。以前是带到火葬场，现在那还有火葬场。自己到了这么大年纪，做什么不靠毛主席，不靠党，不靠人民，你一事无成。活着吃饭，也得有人给你一碗饭吃。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以丢的。毛主席教导，过去多少先烈倒下去了，我们一想起他们来就很难过，我们战争几十年，跟我们同事的死了多少，比我强的人多哩，我是个没有用的人活着了，没有打死，那牺牲了多少，他们为什么？我现在对人民造成了这么大的罪，还在要你转变，承认错误，把错误交出来，那个野兽，牛都不如。所以我决心不能辜负主席的教导和大家的教育。

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在那里破坏了，搞的乌烟瘴气，搞的个“七二零”反革命事件，公开的向中央进攻，反中央、反毛主席，都是我的错误恶果造成的。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采取果断的及时的英明的措施，把武汉文化大革命挽救过来，把坏事变成好事，使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同全国一样。我一万个拥护。对我个人的处理，罢官、撤职都是非常应该的，我没有半点怨言。而且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还在想各种办法挽救，指出前途，指出出路，还希望我重新革命，这使我感恩，感恩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和大家。所以，对我的处理，我是坚决拥护，我是坚决拥护，一点怨言也没有。只有感恩不尽。今后要

拿实际行动，你光说不行。象恩格斯说的，看一个人，不是光看他的文章，看他的演说，要看他在做什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个人坏了，看你不能抛弃你那个坏的东西，过去你那个人是坏人，现在重新做人，脱胎换骨，应该下这个决心。今后叫我劳动，做什么坚决跟群众在一起，拿到群众中去监督。所以，我是一个是坚决的听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遵照主席的一切指示，继续的不断的来给自己这个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是什么斗争呢？就是按主席、林副主席指示，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斗私批修。自己既修了，又有私，由私到修我都有。所以，只有用主席的思想，不断斗私批修，就是革自己的肮脏的，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灵魂，改造世界观。世界观不转变，不站到无产阶级立场，那是搞不好的，就是林副主席教导的，今后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争取做一个劳动人民。不管做什么，一定要跟着毛主席，听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做。

再一个，不是在这里说了，马上又去翻。又放炮了，一想自己有点道理了，形势好了一点又变了。这个老老实实的在这个基础上，今天的认识还是很差的，初步的，一定要不断的，对错误认识不够的，还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对错误进行揭发。拿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的观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不断的改造。我只要下决心，有主席指示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来改造，就会把自己能够挽救过来。只要自己不顽固，听说，真正的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好好的照毛主席思想做事情就会好。真正地立场站过来，真正把过去的肮脏东西，真正不怕丑，真正不怕割尾巴。丑就是这样丑嘛，已经全国都臭了么，你还包着干什么呢？我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老三篇改造自己的灵魂，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听党的话，以人民为自己的老师，当小学生现在人民也不要你，你不转变，你是个反革命么，如果自己真正想重新革命，要上靠毛主席，下靠广大干部、群众。我现在是个反革命，转变好了是个劳动人民，在人民监督下面，做人民的勤务员，自己有决心有信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今后还要靠大家来监督，来教育我，主要是靠我自己能不能把我自己的脏东西抛掉。你再顽固不顽固，毛主席讲了，顽固是坚固，以后就不固了，就死了。你顽固，顽而不固了。所以，我还是不想死，这样死了连根鸿毛都不值，我遵照主席的教导，我重新革命。能劳动几年，我总是争取做个劳动者吧！许多同志都说了：

“不是你呀，联系到后代”，是啊，那真是苦口婆心的教育。我如果不是个野兽就应该懂得。我感谢主席的教导，我一定照着做，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教育、我下决心不辜负，我今天讲到这里。

（根据录音整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陈再道给毛泽东的信

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

最敬爱的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主席啊，主席！我犯了这样大的罪，您老人家还这样关怀我、教育我，要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您老人家给我指明了出路，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给我第二条生命。我感激不尽，感恩不尽，我永生永世感恩不尽。

毛主席啊！我过去就是不听您老人家的话，胜利后，进城以来，我的思想蜕化变质，腐化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了，忘了本，变坏了，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滔天大罪，破坏了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有罪，我向您老人家低头认罪！向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低头认罪！我遵照您的光辉教导、文革的指示，把我送到学习班，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对我进行了批判、斗争和帮助，进一步触动我的反动思想、反动灵魂，对我教育极深，帮助极大，使我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有了进一步认识严重。我坚决承认和改正错误，重新革命，重新做人。在您老人家的亲切教导下，在同志们热情帮助下，十二月一日我作了一个检讨交代，我这个检讨交代很不深刻，认识还好似很差的，以后进一步作检查，认识检讨错误，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的起点。

现在把我的检查交代记录送您老人家看一看，请您老人家训教。我永远听您老人家的话，永远永远跟着您老人家，重新革命，重新做人，永远读您老人家的书，听您的话，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办事，争取做您老人家的一个好战士。我要好好学习，坚决重新革命，我决心到群众中去接受造反派和广大群众的教育，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重新革命。坚决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犯了罪的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张玉华关于湖北形势问题的报告

〔张玉华：武汉军区付政委〕

形势大好，敌情观念不可麻痹。

存在问题，……我们说是支流，是现象，不是主要方面，是次要方面，不是本质，怎么正确认识？怎么对待？毛主席说三个原因：“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三个原因不是并列的，主要是走资派，走资派是敌我矛盾，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观点来看问题。阶级斗争，林彪同志讲过三个领域：政治、思想、经济。三个原因第三条是思想问题，是内部矛盾。

现在的问题就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与走资派的矛盾。

形势大好，敌情观念不可麻痹，不能上当，要站得稳，看得清，敌人大体上有三种要注意：

(1) 走资派在全国来说，对走资派的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可是他们决不甘心失败，走资派不少的都打倒了，但还有些只是受伤的老虎，没有完全批倒批臭，他们还能起一定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大量是间接作用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司令部彻底摧毁了，但这个司令部的成员，还没有完全、最后解除武装，北京的造反派和武汉的造反派正在作工作，我们每天都收到他们的消息，北京“五·一六”是个反动组织，对武汉肯定有影响，武汉肯定有几个人，但不能夸大大。扩大化不行，要犯错误。运动的重点要抓住，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派。

(2) 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在兴风作浪。劳改犯抓了几个送回去了。有的劳改农场也乱了一下，有的伪保长起来搞反革命组织，秘密的，有纲领的，会议记录，条件。有个“人民党”，主席是刘少奇，地方政府

主席就是那个伪保长。还有反共救国军，还有自封总统的，什么“十六天子”的（多在本省山区）。有个分区抓了九个反革命集团。当然我们要进一步核实，搞准，搞了好人就不行。

（3）特务活动，“7.20”前还不明显，“7.20”后美蒋、苏修、日本特务都有。有的十八年来都没有动，现在又动起来了，这种情况少些。三种敌人，共同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阶级敌人怎么活跃起来了呢？他们与我们是两个世界观看问题，我们认为形势一片大好，他们认为是一团漆黑，是对他们有利。武汉的党、政、军都瘫痪了，处于无政府状态，他们就认为是变天的时候了，好象是他们的天下，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上有毛主席，下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撤下天罗地网，阶级敌人总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这样一乱，十八年一直埋伏下来的，这次暴露了，群众看清了，处理了，锻炼了群众。群众专政，形势越来越好，有损失，有伤亡，但是最小最小最小，“7.20”是坏事，在毛主席的引导下变成了好事。

第二个问题，谈一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

领导干部要多考虑这个问题。遇到问题不通，考虑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就通了。林付主席说：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这个成绩是不可估量的，不但把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解决了，而且解决了世界革命命运的问题。

江青同志说：“三防”即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出资本主义，防止党和国家变颜色。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文化大革命不行，怕乱，怕受损失，怕字当头不行。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如果这个时候怕乱，怕损失，以后象苏联那样复辟了，就不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多少人头落地。中国反复一次就了不得。世界向何处去？三个“防止”没有文化大革命肯定防不了。

“三相信”、“三依靠”，最根本是相信毛主席，依靠毛主席，群众、部队、干部苏联都有，就是缺毛主席。什么时候才能转过来，不知要付多大的代价。只要想想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什么戴高帽子，挂一挂黑牌子，游一游街呀，想不通的问题，就一通百通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只要能胜利，国家不变色，我

个人生命安危有何足挂齿？一想就通了，就敢字当头了。

另外是正确对待群众问题，正确对待群众，首先必须相信群众，不相信就会怀疑，再就是压制打击。相信群众什么，林付主席说群众天然是革命的。相信就是相信他们要干革命的，是热爱毛主席的。你要群众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群众肯定不会答应。在文化大革命中怎么理解，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来看，相信群众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保卫毛主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众起来……（不清）有些甚至武斗，要看他们的目的是保卫毛主席，要看到他们是热爱毛主席，好干部挨斗了不要紧，是个误会。

第三个小问题是：运动的重点，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些同志犯了经验主义，以 57 年整风反右的办法对待群众。57 年是打退党外一小撮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就不同了，是整党内一小撮。这是从苏联的教训中吸取的，群众理解了十六条，就烧当权派，有的人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打击群众，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以后就要高姿态，群众起来要炮轰，大字报，批判，都要欢迎，不是走资派轰一下也好么！文化大革命下一次怎么搞，群众就有经验了。

第四，保持晚节的问题。什么叫后半辈子，不是我们的寿命被二除，作为领导干部，就是从现在开始到最后一滴血，咽最后一口气。就是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跟毛主席跟到老，永远永远坚定不移紧跟毛主席。自杀是叛变罗！不管什么场合死，我们都要呼最后一句话“毛主席万岁！”

第五，讲一讲既是革命动力又是革命对象。”文化大革命前，把自己看成动力的时候多，把自己看成对象的时候少（指在坐的干部）把自己看成革命对象，自觉革命，群众才欢迎。社会主义革命革过去的命，革自己的命，走资派是在干部里面，是在领导干部里面。我们干部要注意这个问题，不是走资派也要防止生锈，不少的走资派是生了锈的，和平演变的，路线斗争中有些人站队站错了，但是他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认为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是捍卫正确路线的，是属于路线觉悟问题，是内部问题，通过学习最高指示，一觉悟就站出来，就清楚了，路线觉悟就高了。什么文件也不看，脑子里毛泽东思想少了，忙忙碌碌吃老本，犯错误还不知道，新形势来了会掉队。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才能跟紧，要改正错误，必须紧跟。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关于武汉红代会问题的电话指示

13 日晨 4: 50，总理秘书周家鼎同志给武汉军区曾思玉司令员打来电话，由曾司令的沈秘书接，并传达此电话：

目前各学校尚未联合起来，还是搞红代会。上面联合起来，促进和推动各校大联合，不要急于开红代会，看来不能超越红代会这一步。至于常委的问题，还是由大家（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中学红联）出，上次都讲了嘛。二司提出的学校出常委的意见是不适当，是不行的。

二、研究资料

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

1967 年 7 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下榻东湖宾馆，试图就地解决湖北武汉文革的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武装冲击武汉军区和中央来人下榻的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形成在文化革命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〇事件”。万雄师”，抵制中共中央处理运动问题的精神中共中央对此事件做出严肃处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提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

毛泽东、周恩来在世之时，尽管文革司令部内部出现系列重大人事变动，1972 年，一度靠边赋闲的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治委员钟汉华也被重新起用，但是中共中央对于“武汉事件”的定性一直没有改变。

毛泽东、周恩来去世以后，文革被全盘否定。1978 年 11 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彻底平反；该报告称：“‘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本文从历史的实际过程，记述 40 年前震惊中外的“武汉事件”。

1967 年 7 月 13 日下午，北京。

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萧华、杨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想，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并对全国各地运动形势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要到长沙、武汉去看看，准备在武汉游泳。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游泳；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周恩来决定派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会后，周恩来又电正在四川重庆的谢富治赶到武汉“负责主席安全”，谢请示要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力金，和随行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同行。周当晚即飞武汉打前站，安排毛泽东住处。王力回忆毛泽东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1、2}

此时，武汉文革运动的问题并没有讨论和定性；13 日中央最高决策碰头会上，没有具体谈武汉的问题，更没做结论，毛泽东只说去武汉做调查研究。会上谈了一些原则问题和人事安排。实际上，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也从来没有对武汉问题进行过正式研究，只是在 6 月发生激烈的武斗时，商议发一个文，制止极不正常的武斗，由杨成武和戚本禹共同草拟了 6 月 26 日给军区的电话指示，周恩来、陈伯达知悉。³

在此之前，毛、周已经商议南巡和解决武汉问题；7 月 7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林彪一起接见出席解放军会议的代表，在 6 日和 9 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周在 10 日立即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周恩来电令谢富治到汉，除了他身为副总理、公安部长外，也由于武汉地区驻军的一部分，原为解放战争期间陈（赓）、谢兵团的老班底。老陈、谢兵团的 9 纵，1949 年改编为第 15 军，也即 1967 年在应对武汉非常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空（降兵）15 军。

中央警卫团当事人今天回忆 4：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之前，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要外出，并就外出的警卫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汪东兴同志在向我们传达布置任务时就指出……这次又是文革以来毛主席第一次外出，他要大家要有足够的认识与准备，……他还特别指出，要我多带些部队……足见这次任务非同往常，有可能遇到艰难和危险。看得出，毛主席是有这种估计的，而且也是做

了准备的。

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在含等一行 6 月底去云南时，并无武汉的任务，中央文革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也没有做解决武汉问题的准备。谢、王一行人 7 月 13 日刚刚到重庆；当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务必 14 日赶到武汉执行任务，也未说明是什么任务。

毛泽东和周恩来亲临武汉

14 日凌晨，周恩来、李作鹏离京，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武汉空军刘丰副司令员、萧前政委前往机场。周抵武空司令部，叫刘丰通知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去空司。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军先行接了总理，心里十分纳闷，很不高兴。周恩来一见到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就向他们告知对于武汉情况的态度；钟政委后来检查说：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一边。陈再道也证实过这一事实。

周恩来指定刘丰负责安全，从而，不是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毛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又把东湖宾馆内梅岭一、二号的 8201（湖北省军区独立师）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这一举措本来属于规范惯例，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不满意，北京来人发现，他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

尽管中央在北京从未正式谈论武汉问题，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武汉形势心中有数，抵汉之前，已经有一个基本倾向和态度。

14 日中午，谢富治、王力、余力金等自重庆、成都抵汉口，海军政委李作鹏接机，一行人到东湖客舍，周恩来立即接见了他们。下午，周召集东湖警卫队队长、招待处处长和两派群众负责人开会，提出：1，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2，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3，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经周批准。同时，也把宾馆的工作人员做了调整，原来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换成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钢工总”的。晚上，周与三军领导，谢、王一行开会时，随毛泽东同行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来到百花一号；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已经到达，立即赶赴毛的住处梅岭。

随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的三军领导，带来了三军作战部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的微行南巡，架设了电台，建立了“前指”。

深夜，王力、谢富治一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接触到造反派学生。见了北京来人，在场群众眼泪哗哗直下，消息迅速传开，湖北中医学院群众组织“红三司”也刷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周总理听说消息业已传出，当机立断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并布置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谢、王也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

从东湖宾馆看，虽然警卫有所调整，但是整个宾馆大院仍由 8201 部队负责保卫，大门由他们看守，并没有调换警卫人员，中央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仅仅密切控制了毛泽东和 8341 驻扎的梅岭 1、2、3 号一片建筑和附近树林、要道。15 日，军区保卫科王振英科长和孔庆德副司令提出建议，即用 8199 部队（陆军第 29 师）来加强宾馆警卫，但钟汉华政委没有同意。

毛泽东对武汉问题的基本态度，周恩来做军区的工作

7 月 15 日上午，毛泽东开始听取关于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并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楼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有军队干部汇报了造反派“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中央首长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15 日后，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等和军区领导曾反复去江边踏勘，策划游泳事宜；周恩来和谢、王等都是上午在毛泽东处汇报，下午，听取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汇报。

16 日，毛泽东明确“工人总部”要平反，先把几个被军区抓捕的头头释放。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次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汇报，研究武汉问题。谈到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

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处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5

王力回忆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不难。湖北有可能要先进些。‘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对于武汉军区，毛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样……”。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下一道命令就行。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6

连日的汇报会议上，陈再道对于周恩来讲的基本意向十分不通，虽然周在17日已建议毛泽东次日接见军区领导，当晚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做工作，可是陈再道并不知周恩来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而且毛泽东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他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他还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陈再道直接冲撞周恩来，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甚至指着周在18日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周恩来气的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7

军区支左办公室后来揭露出当时的实情：“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可是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嘛’！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

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的很”。

8

陈再道自己在 1967 年 12 月的检查，也谈到：“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他后来回忆 9：“汇报会的第二天，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认为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

不过，18 日总结会议后，周恩来带陈、钟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再次讲了解决问题的原则。毛泽东接见有关人员，宣布中央对武汉的态度，对周、谢、王、余，李作鹏、汪东兴、陈再道、钟汉华等谈到：为什么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也谈到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也夸奖了钢工总在水利学院修筑的自卫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

该会明确了关于军区支左、造反派、“百万雄师”问题的三条基本方针。陈、钟在主席亲自指示和安抚下，接受了批评，表示要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工人，做部队的转弯工作。周恩来在毛泽东接见之后，连夜就回北京了。陈、钟亲自去释放了被拘禁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朱鸿霞和胡厚民；并让军区按中央指示精神修改、印刷检查的公告。

武汉群众的反应和社会实况

15 日这天，武汉造反派以“粉碎刘少奇新反扑”名义组织大游行，队伍里也打出了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王、余的标语。各高等院校的喇叭，播

放了《毛主席派人来》高亢激越的歌曲。与此同时，“百万雄师”硚口区三分站等候总站命令，于 12 时，在武胜路电车公司埋伏的“百万雄师”冲击游行队伍，发生武装冲突；区站指挥专业武斗队“雷达兵”、“闪电兵”、“霸王鞭”、“翻江龙”、“铁臂摇”等几十车“百万雄师”发起进攻，致伤工人学生多人，“新华工”工人李长亮等伤重致死。双方冲突到下午终止。此外，郊区农民造反派在水利学院举行控诉残酷镇压群众运动大会，造反派数万人在青山游行，抗议“百万雄师”迫害一冶革代会负责人。是日，“百万雄师”组织约 800 人横渡长江。

当晚，谢富治、王力到喻家山华中工学院看“新华工”大字报，和学生、工人座谈；要求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回本单位，不许武斗，要求收缴武器。说：“王力同志向你们领导人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个建议，我们坐下来学习，学习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一系列政策，首先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十年前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著作……要运用这部光辉著作中提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尤其是自我批评。我们今天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和关心带给你们，同时带来了两点要求……”。王力接着讲话，强调：“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掉主流是什么，不能够抓不住主流，不能让支流牵着我们鼻子走。这就希望武汉地区现在的三派，同志们统统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第一条立即停止武斗。根据中央的六条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武汉地区人民解放军应该保证执行这个六条。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应该达成这个六条的协议，停止武斗，停止煽动人心的宣传，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证四大民主能够正常地进行！使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对于中央来人，“百万雄师”高层，在内部存在两种意见，一是按原来准备的材料汇报，希望扭转中央对于武汉形势的看法，另一个是“鹰派”——包括盲目主张武斗解决问题的人，和认真冷静分析了全国形势的人，他们对于中央是否会倾向于“百万雄师”，已经毫不乐观，失去信心（他们在中央来人之前就有报告分析了前途，警告了高层）。他们倾向于公开的反抗和斗争。7 月 16 日深夜，谢富治、王力前往硚口区 3506 工厂“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态度十分冷淡。谢劝诫他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革是怎

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的名单；王力批评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不耐烦地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百万雄师”头头顶嘴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王力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1. 立即停止武斗；2. 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 撤除所有的工事；4. 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 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 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 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说完不欢而散，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和骨干，对谢、王的态度与话语十分不满，情况次日即传到“百万雄师”基层。

“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回忆 10：“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谢、王到 3506 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后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说我们怎样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不论回顾是否仍带有情绪，会见的结果是谢、王丢失了缓和其情绪的唯一机会；尽管此时群众还不知道周恩来 15、16 日批评军区的讲话精神，但已经十分清楚：由谢、王等中央文革要员代表中央处理问题，决不会倾向保守派的。

按照毛、周意图，中央的代表充分听取各派意见，调查研究，做好“百万雄师”的思想转弯工作；“百万雄师”个别头头也设想改变中央印象。但 16 日深夜的初次会见，问题变化得更僵持，“百万雄师”下决心抵制谢、王，群体性的反抗势在必然，中央来人不得不再次面对“百万雄师”做疏导工作，已是兵临城下之时。

16 日，为纪念毛泽东横渡长江一周年，武汉造反派组织了大型的渡江活动，是日，没有发生两派的冲突，汉口“百万雄师”广播站，甚至还对游行的学生，发出“向革命小将学习”的友好呼声。从 17 日起，各大专院校造反派按谢富治的要求，开始陆续集中和封存自制长矛。

18 日凌晨，谢、王前往位于武汉测绘学院的钢二司司令部，与学生座谈，要求收缴武斗器械，制造和平气氛，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要坐下来学习，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9 日凌晨，谢、王前往工人和学生造反派“逃难”集聚的武汉水利学院，向在场的五千群众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王力强调：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并激情地表示“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武汉空军的刘丰与萧前（政委）也在大会上诚恳表态，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支持革命左派。

欣喜若狂的一些造反派把大会录音拿到武汉三镇播放。省直造反派的头头郑军现在回忆：我们把录音拿到洪山路湖北饭店，对着省委用高音喇叭播放。这一下大概坏了事，当天晚上 8201 部队和“百万雄师”的人，就冲到东湖宾馆抓了王力……

部队对立情绪的酝酿形成

但是，在毛、周来到武汉前，思想上僵持对立的局面早已酝酿、形成。问题主要在部队。

陈再道后来在检讨中承认：“7 月 9 日（军区）常委会定调子，7 月 10 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

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么！‘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

实际上，“工人总部”是否反革命组织，是否应该和必须平反翻案？是一个极其尖锐敏感的问题，造反派极为平白又刺激的政治口号“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是言简意赅的，军区主要领导、“百万雄师”的头头都认为“工总”一旦命运逆转，将是他们政治失败的标志。

省军区独立师深深卷入运动，他们对于公检法军管、逮捕造反派、顾问并支持“百万雄师”武斗，负有具体责任，对于即将到来的所谓“摊牌”——决定自己支左工作的路线是非和“政治命运”，精神十分紧张。其领导和军区的一些中层干部，也分析了全国情况，对于即将到来的情势，并不乐观。独立师领导详细传达了军区会议精神，并讨论了三天，指示各团根据所统一的口径，组织讨论、统一认识。

思想上的冲突其实早在 5、6 月就已经形成与积聚，总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6 日，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署名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不言而喻，“百万雄师”按照传统思维把谢、王看成脱离工农兵大众的“钦差大臣”，而造反派学生则是“臭知识分子”。

17 日，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某散布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又说“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这个典型意见，已天才地预见未来事变的端倪。

19 日上午，军代表张某在汉口对“百万雄师”头头讲话：“中央最近有个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

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做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 8 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¹¹ 这些动向，反映出部队对于全国形势认识，对中央文革十分疏离；担心形势将不利于武汉，担心“犯方向路线错误”。

实际上，通过各种渠道，他们收集研讨了内蒙、成都和河南军区的问题，研究了中央的态度，对解决各地所谓“保守派”的方针政策，表示极不理解和极其不满。当时最担心的是走四川、内蒙、河南的道路，这些忧虑立即以大量对抗性言论、标语——甚至谣言表示出来。

7 月 18 日周恩来的总结讲话

1967 年的“武汉事件”前夕，最为关键的是周恩来在 7 月 18 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是军区连续几天会议的总结讲话，也是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正式、基本态度；讲话稿由周恩来在东湖亲自拟订，且由毛泽东在 17 日看过。

在军区的会议上，周恩来讲：“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¹²，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¹³，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¹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

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指责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像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 15。

“‘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 16。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 17 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 18 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 19。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按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 20。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21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按：这里点的“中间偏保派”)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22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23

最后，周恩来说：“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从史实和本质看，当时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独立师主要领导，以及“百万雄师”极其抵触，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实际上正是周恩来的这一席讲话，他们非得要谢、王确认和澄清的正是流传出的所谓“四点指示”（公正地说，“百万雄师”在宾馆最先是要求谢富治澄清这个指示，而非找王力）。所以周恩来 21 日在东湖边对北航红卫兵井岗山同学讲：“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24 25 日，他对河南省的军队干部也讲：“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

应该说明，独立师的肇事者在 19 日开始抓住王力发难，并非王力自由散漫、

“党性不高”——错误地在周恩来身后向群众透露了周的讲话精神；到军区和街上闹事人极端反感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周恩来 18 日讲话的核心实质。这是发生反弹的一个最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时值 40 年后的今天，“百万雄师”上层的朋友们是心知肚明的。

周恩来讲话精神被泄露，群众情绪被挑动激化

按照军区会议的规定，周恩来对师级干部的讲话内容需保密，先不要向下传达。

但是，讲话精神在 18 日当晚就被泄露了，总理刚走不久，钟汉华政委即同意在独立师传达，后又迅速传到社会上。对于这点，钟汉华后来检查 25 这样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 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

18 日晚独立师常委研究决定，19 日上午向各团级干部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实际上，当夜会议精神就由蔡政委传达到独立师机关团级干部，次日又扩大传达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部队听传达，并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从决定在 8201 部队团级干部传达，到武汉群众听说“四点指示”，不超过 20 小时。事实是：18 日深夜会后，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蔡炳臣家，第二天周叫管理员阎某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了会议，突然扩大了原定传达范围。19 日上午，独立师部分单位已经将精神传达到战士，再由战士、军代表散布给“百万雄师”的群众。

蔡政委说：“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言罢，群情激愤；牛怀龙师长、蔡政委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把愤怒引向王力。

他们又向 8201 机关干部传播谣言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

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

对于周恩来 18 日在军区的讲话，军区擅自同意向下传达，一些部队领导故意挑动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的愤激情绪，是一个长期被忽视或有意掩盖的关键。毛、周辞世以后，主流舆论和众多的“文革研究”总是指责王力在水院泄露了所谓“四点指示”、造反派宣传了所谓“四点指示”，激怒了对立面；几乎没有人真正愿意搞清楚，王力在水利学院说了什么，造反派宣传了什么，对立面为什么被激怒？

实际上 7 月 18 日（已是 19 日凌晨），谢富治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讲话，并没有传达或提到中央处理问题的精神。王力接着谢富治发表激情的讲话，也没有传达所谓“四点指示”；而是具体提出这样的几个方面：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从讲话全部内容看，王力在群众中没有泄露或公开周恩来的讲话内容，精神大意是在中央的原则范围里的。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这些讲话精神显然是支持、安抚与引导群众的；尽管头脑发热、不可一世的王力支持造反派的情绪和话语锋芒毕露，也实际上促使了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抗议与对抗。就在王力还算是“武汉事件”的“英雄”的时候，周恩来就给文革小组人员说：王力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闯了大祸。本来是要先作陈再道的工作，再到群众中去，结果王力不听，去群众中讲话了。

文革以后，中纪委在审查谢富治问题的报告（中发[1980]77 号，1980 年 9 月）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赴武汉，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步骤和方法做了明确指示，交代谢富治、王力等人，对群众组织不要作倾向性的表态，要协助武汉军区做好部队和群众组织的工作，要实行大联合。但是谢富治同王力等人七月十四日到武汉以后，背着军区党委，私下四处活动，支一派压一派。七月十八日深夜，他们到武汉水利学院，公开吹捧‘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宣称‘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而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当成‘保守派’，致使矛盾更加激化。这就酿成了所谓‘七·二〇事件’”。对于此，该报告文件的附件十一“谢富治参与制造武汉‘七·二〇事件’”里有王力自己在对中纪委的交代证言（1979-4-13），在审查中，他退而承认事件的“直接导火线，

是谢富治和王力到水运（按，系‘利’之误）学院大讲支持与‘百万雄师’对立的‘钢工总’‘钢二司’……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都是支持一派，反对代表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另一派，激起了武汉爆发‘七·二〇’波澜壮阔的革命行动。在武汉问题上，我违背毛主席路线，谢富治和我是一个路线”。

19日上午，除了造反派在武汉三镇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院讲话录音，并没有任何人在街上宣扬什么“四点指示”，两派群众都不知道什么具体“指示”。最先提出问题并发难者，就是独立师的人，是他们把中央精神有组织地传达到在汉干部、战士，再迅速散布到全社会：军区秘书科揭发说26：“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按：此时谢富治、王力正在传达中央的精神），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军区机关同志的证言是非常重要的。

此时，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师长继而也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6时左右，8201部队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战士的工作。独立师的副师长、副政委去到军区大院，却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又有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机关人员：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2时，各团宣传车集中到师部，周和蔡在师部食堂对宣传人员进行了动员，又到四楼动员。蔡还未讲完，院里就起哄了，要去冲军区。

今天访问“百万雄师”的领导骨干27，回忆问题究竟如何爆发的，章迪杰如实说：“‘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王少荣说：“上街武装游行是抵制中央文革的错误路线。因为‘百万雄师’当时在党内、党外都是大多数，承担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中央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这么做既是反弹，也是叛逆。当时如果知道（‘四点指示’）是毛主席说的，‘百万雄师’是会绝对服从的”。当年“百万雄师”头头的这些反映和认识是相当客观的。

23时半，8201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说“去就去吧，要守

纪律”；此时，已经有 200 多独立师的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六台独立师的宣传车大喊大叫，指责所谓“四点指示”，半个晚上跑遍了武汉三镇……对此异常行径，独立师的干部当时就提出质疑和意见：19 日 24 时许，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

19 日晚上，（师）370 医院听说军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师部回电承认。于是医院大批工作人员便冲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湖北军区后勤部政委于某在夜 12 点带领 3 个人到医院传达军区的指示，竟遭到一些病员和工作人员围攻和毒打。许多人叫嚷：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

这些都反映出了当时独立师机关和基层一些干部极端暴烈的情绪。

事件平息后，独立师干部分析、揭发说：“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在一天之内将总理和王力同志的指示贯彻下去，在传达时，按其所需断章取义，尽力歪曲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挑起部队、‘百万雄师’‘公检法’对首长的不满……”

另一个非常重要问题是 28：就在 19 日陈、钟军区首长已经按中央调子认错，起草、印刷公告，去释放造反头头时，有人让“省直联司”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接去武昌洪山宾馆，告之：毛主席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他们要找到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亲自反映“百万雄师”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意见。不过后来他们没有直接去找寻毛、周，而是与独立师人员在军区食堂共同商议，具体行动是找王力、谢富治理论；随后，军、民行动人员就闯进了东湖宾馆。这是事后调查和文革以后平反该事件时，外界并不知道的实际情况。“百万雄师”高层，在揪斗王力之前，业已知道毛泽东就在东湖。

到目前为止，人们并不清楚是何处的对弈高手，明知毛、周在指导处理武汉问题，却“项庄舞剑”、顾此言它，引导狂怒的军人和群众：绕开“士相”，拥“兵卒”、挟持“马”别“马脚”，狠狠地将了毛泽东主席一军。29

实质上，东湖弄剑，意在毛公，用意旨在毛泽东的文革路线。

事件发生的经过

策划揪斗王力，冲击东湖宾馆

凌晨，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由 8201 作战科长孙某召集会议，成立“专

揪王力指挥部”，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百万雄师”当事人回忆 30：19 日晚上 10 点左右，“百万雄师”总站二号头头杨道安叫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赶到联络总站：“快上来，去军区”；到达军区大院，在食堂召开会议，杨和另一头头孙德洲主持，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汪次日在批斗现场录下了全过程。

和“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一起回忆事发经过 31，章迪杰（其常委、联络部长）说：“7 月 19 日晚，我们在 3506 工厂吃过晚饭，我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决定派杨道安、孙德洲（常委、作战部长）、余均才（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因为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军区大院。他们三人到达武汉军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 273 辆，1 万 3 千余人。他们是去落实究竟有无‘四点指示’的，不是去揪王力的。当时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军区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是谢敏华（政委、作战部长），副指挥长是‘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当时总站有这个提法，但没有行动，行动主要在军区。‘七·二零’事件的发生，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 8201 部队先搞起来的，‘百万雄师’是跟进的”。

显然，“专揪”行动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一些人组织策划的。

当时一个据说是 8201 部队的连指导员将一字条递交给“百万雄师”头头，字条书有“‘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 是叛军”，公然造中共中央的谣，欺骗、煽动群众。

俞文斌（“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说：“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关于‘七·二零’揪王力，8201 部队的人很坏，不听招呼，跳到桌子上，打人，都是他们干的。有人打了王力，并把他架走，把事情搞复杂了。但‘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武汉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李良应该很清楚这些事情”。32

7 月 20 日零点三十分，武昌公安局 14 人，冲击东湖客舍北门（靠近毛泽东

下榻的梅岭院落)，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赶到北门阻拦。他们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独立师干部）开的介绍信，说“今天晚上来了 14 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在大门内 100 米处，双方对峙下来。

王振英立刻报告中央警卫团，汪东兴通知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赶到北门。王科长又电告钟汉华，钟已入睡，王强烈要求钟立即采取措施，秘书才去传达，但始终未有回音。王又急忙给军区值班的首长报告，要他电告军区领导，立即调 8199 部队来。

张根成向“武汉公安”来人解释，说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你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你们先回去。但来人硬往里面冲。凌晨 3 点左右，8199 的张昭剑政委奉军区之命带了一个排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手挽手拦住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 8201 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 8201 卫兵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百万雄师”属下的“园艺军”按“专揪”统一策划，受命控制南山宾馆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前门）和后门（北门）。在统一调度下，“园艺军”东湖分部雷某带一车人，从北门冲击宾馆，众人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没有找到谢富治，雷就带领宾馆内的的彭、唐、毕、王等十余人，向西越过第二道岗位，率先冲入百花院落。随后，集结在武重一带的“百万雄师”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同武昌公安分局的结合，封锁北门，其余四辆冲进西大门，他们不听哨兵的警告，反而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二号，包围了谢、王的住房，要见谢、王。在谢、王指责下，有人说：“我们不是来揪你的，是请首长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有人叫“不出去”，“谢富治、王力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扬言要揪王力去军区，要与谢、王拼到底。谢出来：“我就是谢富治”，又说“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要绑架吗？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一些群众自觉理亏，悄悄退出，还有 5、6 个仍在纠缠。

到四点多，谢富治叫军区曾秘书叫陈、钟来百花二号。陈进门就说“靠你们做工作罗，我是无能力了”！继而，陈再道提出到外面去谈。谢穿好军装，主动提出接见这些人，独立师张守本带领警卫将冲进的群众组织好坐在草坪上，谢出大厅后门在草坪上谈话，谢出来和群众交谈解答问题后，气氛变得较为融洽。王力也换上军装向草坪走去，坐在谢身边。

大家正在谈话，五点四十分，从西门又冲进一群“百万雄师”，径直向二楼谢、王住房冲去。他们手持长矛、匕首、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有人居然戴个大口罩。接着，又冲进来 8 车 8201、8199 军人和军事院校学员；端着冲锋枪的 8201 军人，枪口直对谢、王。有人直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又窜到草坪，挥拳就殴打陈再道，陈被打倒在地。王力见势不好，跑回房里；钟汉华也忙跑到一个地下室。军人将王力抓了出来，激愤的军人和群众蜂拥谢、王，愤怒殴打王力。张根成、北航学生和他们讲理，遭到毒打。问题发生后，独立师负责警卫的秦堂春、吕宗贵、蒋建隆分别打电话向牛、蔡报告，但却找不到牛、蔡，只好向司令部值勤室报告，并要求他们找牛、蔡到东湖处理问题。

北航学生被打倒在地。王力被架上车。汽车向军区大院开去。张根成紧跟大喊：“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绑架王力同志要犯大错误。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来的代表”！听张回答说“我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人员”，军人把张也拉走；北航女红卫兵尹、胡被 8201 战士和“百万雄师”带走。牛怀龙师长当时就在西门，王科长忙叫来了牛阻止事态发展，牛到绑架王力的车前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自己也随部队驱车赶到军区大院。

谢富治赶去搭救王力，路过消防队门口，消防队是属于公安系统的，其“武汉公安”人员居然说：“谢富治来了，谢富治是个大坏蛋，抓住他，揍死他，赶快拿刀子……”！

军区大院批斗王力、全市游行

上午，武汉三镇陆续集结了上千军车、备战车和民用卡车、消防车，独立师（及部分其他单位干部战士）、“百万雄师”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车上的高音喇叭狂呼“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等口号。“百万雄师”的宣传车在反复播放《人

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时，播放起《造反有理》等语录歌曲。军区大院早已失去控制，军人、群众、车辆随意进进出出。在军区大门，一卫兵对旁人说“……我们的人打电话给‘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派了一千多人到东湖疗养院，包围了，捉到了王力，送到军区，现在在四栋三楼”。有人与军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在口腔医院门口，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

武汉测绘学院竟有署名三司的标语写“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九时，王力被汉阳区的“百万雄师”围在军区二号楼3楼46房，军人和群众围攻王力，“要他回答‘四点指示’有没有”？一个人拿起话筒和纸条，照着纸条问：“王力，你到武汉也没有几天吧！你也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就发出四点指示……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众乱。牛怀龙师长忙喊“静一下，好录音”！

此时，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喊声震天。“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刘敬胜陪同王力，众人反剪着王力双手到四楼楼梯边的阳台示众；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王力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群众问好，说明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就群众要求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王力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并面对愤怒的军民表态：“武汉‘百万雄师’是庞大的群众组织，湖北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武汉军区有错误、有缺点需要改进”等等……。

钟汉华在宾馆销毁军区业已印刷好的检查公告后，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叶明、孔庆德让8199部队将王力从“百万雄师”手中解脱出来。

面对事态，钟汉华、叶明急得哭啼制止，然而无效。钟甚至向群众作揖、磕

头劝阻，叫“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绑我好了”，但乱中无人理睬他，有“百万雄师”指责他磕头作揖，说“你也太不象话了”。

10 点后，除少数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 396，其中消防车 27 辆，空军军车 15 辆，打 8201、8216 旗帜的车 83 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

宣传车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甚至有人说“不管周XX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在这个过程中，钟汉华抱头坐在角落里，捶着自己身子，叫“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心脏病发作，被军人将他背走。在军区其他领导指挥下，8199 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带部队与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赶到，与群众相持，保护王力，并控制了所有楼道、大门侧门通道。警卫营、8199 侦察连、六连、四连战士将“百万雄师”群众、8201 军人与王力隔开。”百万雄师“一次次向四号楼冲击，谩骂解放军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战士用身体阻挡拳头棍棒、长矛和冲锋枪。军区警卫营营长栾庆祥用胸膛顶住独立师战士的冲锋枪，卡住扣扳机的手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

张政委奉军区之命，劝说群众不要纠缠王力，总理让他们派代表去北京谈判；在场一个头头拍桌子大喝一声：“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把这个不知情的师政委吓了一跳，专去问躺在办公室的钟汉华，钟得闻此情，急

的说不出话来，流下了眼泪。

午后，孔庆德副司令指挥，军区警卫营将钟汉华从人群里救出。三点左右，孔与揪斗王力的头头达成临时协议，让王力吃饭，休息了再说；8201 一位军官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 8201 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命令两个战士将王力架进屋去。

孔庆德命 29 师政委，调 87 团四连、六连和师侦察连、军区警卫营相互配合，巧将王力转移出军区大院，进入 8199 驻地。四号楼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战士发现王力脱身，气的大叫：“王力跑了！打倒孔庆德”！呼啸去追。

以 8201 部队名义印制散发的“特急呼吁”宣称：“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呼吁》顶头用的是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百万雄师”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 8201 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有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百万雄师”还抛出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是反革命纲领‘二月汇报提纲’的起草人，是推行苏修教育路线的旧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以前是刘少奇重用的红人，是孟夫唐（按：指已退休的副省长）的学生，是王任重的好朋友……他混入中央文革后，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在哪儿插手，哪儿就出现武斗”。

上午，“园艺军”头头雷荣从军区大院回到东湖的集结地，得意地宣称：“总说‘百万雄师’没有‘造劲’，这次就要在王力身上造反”。

谣言四传和武装扫荡

非常事件的发生往往依赖政治谣言，鼓惑欺骗民众。几天里，一些谣言迅速散布全武汉：

毛主席的四大天才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一月风暴；四、百万雄师。

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今天，章迪杰先生承认 33：“‘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士奇，他是某科室的干部。当时‘6.26’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指责‘百万雄师’对若干院校的围攻，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在独立师里，参谋长郝文德又奉命在部队继续传达这些谣传，甚至翻印一些传单。

在震耳欲聋的消防车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巨大声浪下，连日来部分游行的“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扫荡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等十余单位，抓捕留守的湖大造反派学生、教师 200 余人。在游行的街道和其他地方，马路边和单位里的普通群众，一旦被人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怒气冲冲的“百万雄师”蛮横毒打、抓走，怕事的人纷纷躲避。“百万雄师”从 20 日凌晨 2 时开始对武钢围攻，由百余辆卡车、十多辆消防车，包围了 33 街坊的新一冶、业余大学、一冶一中和工人村，闯进工人宿舍和造反派办公室，见人就捆，抓捕 100 多人。

大批持造反派观点的人，乘车船疏散离开武汉，人们同车同船，竟面面相觑，不敢言谈！

坚持和支持“百万雄师”观点的人，一直把武汉“七二零事件”，看成所谓“抵制林彪、‘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的盛大节日；而被公开扫荡、镇压的革命

造反派群众和武汉市民，则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白色恐怖，是一次政治事变。

中央对于事件的反应

8341 的卫队长今天回忆说：群众在宾馆闹事，把中央警卫团紧张坏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他们与“百万雄师”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状况下，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中队长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 8341 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³⁴

毛泽东得知消息，让汪东兴传达指示叫军区放人，负责把挟持走的王力找回来。

谢富治要“北航红旗”的井岗山同学给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嘱咐大家保持冷静沉着，不要向军区冲击，不要上街和受蒙蔽的“百万雄师”群众发生冲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妥善安排处理事情的。一些院校造反派总部传达此精神，要求坚信党中央，命令不得启动已在 17 号封存的长矛、匕首。在声势浩大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武装示威和扫荡下，武汉造反派没有招架之力，集聚东湖一带学校区的造反派，在总指挥部、夏帮银等领导下，纷纷商议落实指示和最后的防守抵抗，其他地方零散的工人、学生，就走为上策了。

在北京，早晨传来武汉消息，中央文革召开紧急会议；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事态，一致要求毛泽东立即转移。林、江写信给毛，要毛转移；周总理亲自作军事部署，并立即赶回武汉，劝毛转移。会上确定海军在汉舰只水兵上岸行动，空 15 军随即进城维持局势。林彪给毛泽东的信，由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等修改后，江青也签了名，再由邱会作亲自带着飞抵武汉，交毛泽东；邱到达汉口后，过不了江，信件于次日晨才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上，面交毛泽东。

听说总理要来武汉，有百余 8201 战士和“百万雄师”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来人带着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机场空军同志讲“总理不在这里”。8201 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说，三点钟从北京起飞”。空军问“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谁要你们来的”？回答是“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

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居然还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 周恩来于四时前起飞离开北京，40 多分钟后，机长报告王家墩机场跑道停有满载人群的卡车，无法着陆，只好改降条件较差的山坡机场。到达山坡后，周首先要通刘丰电话问讯情况，联系已在汉口机场的邱会作（离北京前，周命令邱带上电台和医生，做了最坏的准备）；刘从王家墩赶来，商量进城办法。周恩来再飞王家墩，天黑后由空司作战科长带路进城。

周恩来抵达东湖后，立即与毛泽东商议转飞上海，并指挥安排转移、飞行等安全事宜。

空 15 军上甘岭特功八连调至武昌护卫毛泽东到汉口。深夜 2 时许，毛泽东和刘丰，杨成武、李作鹏乘坐武空小车转移到汉口机场。21 日上午，毛泽东一行乘飞机飞上海。

周恩来安排毛离开东湖以后，鉴于陈再道严重失职的言论和行径，临时对他采取了措施，指定孔庆德、叶明临时负责军区工作，并要求军区找回王力。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气愤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又对孔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 100 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

21 日，周亲自组织平息事端，由李作鹏、余立金出面分别与海军、空军单位做工作，稳定局势；周与陈再道谈话，要求他配合处理问题，找到王力，陈再道怨气不消，仍然表示无能为力；周又通过武汉军区其他领导（孔、叶），控制局势。

周和三军领导调动部队，空 15 军一支支在武汉周围的部队，开始迅速调派入城。此间，周总理三次要求军区设法找人，到黎明前，仍无王力消息。早上，总理决定要刘丰去找到王力。刘带领空军司令部王惠民、叶锡洪出车去 8199 部队；的确，王力就在 29 师。于是，29 师七连在张绪师长和解参谋长率领下，全副武装掩护，刘丰、王力等坐司机郭景元的小车，穿科学院、武汉大学间，经街道口，转移到武汉空军司令部。

刘丰去东湖向周、谢汇报。周当即决定，东湖宾馆和武汉空司的北京来人，深夜分两个车队，在山坡机场汇合。22 日凌晨 5 点，载有中央来人的专机从山坡飞到王家墩机场；周恩来马上召集军区、空军，和 8199 负责人开会，部署和

调动部队，稳定武汉局势。8 点多，周通知在上海的杨成武“我们都到了”；说他正在同林彪商量部署，商定后再请示毛泽东。并说，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要含蓄点，不点名，还建议，他回北京后把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毛泽东作了许多考虑，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武汉）好”。周恩来在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李作鹏、刘丰开会，明确孔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并嘱转告陈、钟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同时决定派空 15 军进驻造反派群众集聚的红水院、红武测、新华工、新湖大、新武大等学校和武钢。

当晚，支左的空 15 军部队迅速抵达几个预定位置，开始控制市内制高点。

22 日下午两点多，周、谢、王、李（作鹏）等分头登机回京。周恩来临行前，还专门督促军区，落实释放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抓走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高天堂等三人。周恩来先行降落北京，于机场主持欢迎中央代表胜利回到北京的仪式。

深夜，持折叠式冲锋枪的百余空降兵战士进驻红水院，另有部队进驻武汉大学、测绘学院等院校，宣称是接受中央命令前来支持造反派、保护造反派。留守这些学校的学生、工人潸然泪下，热情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21 日，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奉命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二、8201 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三、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王力、余立金同志是中央负责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他们。四、8201 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的军党论……必须彻底识破和揭露并展开斗争。五、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武汉市民眼见舰队海军指战员上街用摄影机拍下市内武装游行与混乱场面。

造反派在街头贴出大标语“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住在东湖，但联系到历史上的“西安事变”，议论“这不是兵变吗”？

周恩来临赴武汉前夕，又亲命中央文革记者站派 5 名记者赶赴武汉调查事件，张春亭等去军区，郭昌琦、张广友于 21 日深入水院和武大调查，并向北京紧急反映了造反派的处境与要求。张春亭等在空军帮助下转移到部队安全处所，到军区和部队展开工作。

“武汉事件”的持续和平息

20 日当晚，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的会议，拟出一个十分具体的行动纲领：1、“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 20 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

21 日上午，“百万雄师”在 3506 工厂召开夺权动员会议，一号头头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的权……”。下午，“百万雄师”开会，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晚上，“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还进入蔡炳臣办公室关了灯轻轻商量夺权问题。独立师干部揭发 35：次日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和蔡政委到六团某连，有的战士问周开枪可不可以？周说，少打几枪可以，不要多打。周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现在急刹车也要起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一我们 8201 为核心。

独立师干部揭发 36：21 日上午，蔡向机关干部探问对事件的看法，当大家就已经指出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的后果时，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

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深夜，独立师党委下发了六个决定，强调“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针对干部的怀疑，22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宣传车约50余人到师部开会，蔡作了新布置，讲：“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

连日来，“百万雄师”继续在全市游行，22日全市“百万雄师”出动车辆约1500辆。

形势的急速转折

23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一行回到北京的消息，武汉三镇顿时爆炸了，几天来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普通民众纷纷奔走相告；部分“百万雄师”汽车的游行还在持续，但不少群众已对他们宣扬的舆论产生怀疑，开始退出街头的“造反”行动。

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针对中央广播王力等回到北京的消息，秘密制订计划，甚至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吹嘘装备60万人抵抗；组织10万人徒步进京告状。“百万雄师”头头还召开会议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

但是迫于形势突变，这些空口的计划没有实现；为扭转被动局面，24日“百万雄师”出动了百余辆卡车全市游行，呼喊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算是对“七二零事件”的一种变相、权宜的表态；同时坚持呼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就24日的变化情势，海外研究者王绍光先生曾经指出：“百万雄师”对陈再道个人的命运并不大关心，但他们不能理解，北京当局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对

待由大多数“纯洁”、“可靠”的人民组成的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和林受到了蒙骗。……但大多数人现在痛苦地相信，新的事态发展是得到毛本人批准的。

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态，我们也有罪，不表态也跑不脱。……另一个人说，如果我们明天参加了明天的会议，我们就是承认了 7 月 19 日是反革命行动。我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就是砍脑袋，我们也不表态。……

22 日夜，周恩来与林彪商议，下半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并代中央起草电报，召武汉部队和市人武部领导到京。

23 凌晨，陈、钟一行飞抵北京，在京西宾馆受到三军“无革派”冲击。三军“无革派”并在大街刷出反对徐向前元帅的大标语。

武汉造反派和“百万雄师”各联络分站，分头组织开会，商讨局势和对策。

8199 部队从“百万雄师”手里解救出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张维荣、谢邦柱、彭勋。

测绘学院、武汉大学“钢二司”与“三司革联”学生，分别造反查抄了位于该校的“三司”总部。由于“三司”总部在事件中公开表态支持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行径，一些学校“三司”单位参加示威游行，该群众组织在中央表态以后顿时自动解散消亡。

全国声讨事件

24 日，还有 18 车“百万雄师”包围体育学院大楼，驻测绘学院和华中工学院的战士前去制止武斗；次日凌晨 5 时，“百万雄师”出动 38 辆卡车、3 辆消防车、一辆装甲车攻打体院，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一名参加围攻的体院学生头头被小口径步枪击毙。同时数十辆车包围测绘学院，直到 25 日上午 11 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连续两日来，一支又一支的空 15 军的队伍开进武汉市，宣布支持革命造反派，谴责 8201 部队的行为，并接管独立师所控制的战略要地，后者则接受换防，离开市区集中整训。驻守东湖宾馆的 8201 战士，痛哭失声；按命令于 8 月 1 日

将防务移交 15 军部队，离开武汉市，留下了枪支。必须指出，所有部队的交接、换防都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25 日全天，武汉部队三军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分别乘坐数百辆军车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战士高举毛主席语录向热情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高呼“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联致敬”！“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打倒陈再道”！游行群众看见蛇山下孔明灯处有 8201 战士横枪低头“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请罪”，也感到这些战士受委屈了。联想起前些日游行的指战员丢解放军脸的举止，都说这些镜头是在电影里演反派才见过的，把解放军糟蹋了。市直造反派“人民勤务员”的头头魏绳武说：“看到 8201 部队的人在那里请罪，低头弯腰，把枪横着拿在腰下，像是打败仗的兵，我们看了心里也不好过，把解放军弄成这样，其实都是当官的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他们没有什么过错”。晚上，武汉“三钢”、“三司革联”和外地来汉造反派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 3 万余人，在武汉测绘学院操场集会，愤怒声讨陈再道和“七二零事件”。

在北京这边，25 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军委成员出席。北航的井岗山同学在会上代表北京学生讲话。林彪对蒯大富、韩爱晶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王力也默示蒯大富，去追在北京的“事件后台”。

25 日，周恩来为次日召开的中常委扩大会召集预备会；并接见河南的军队干部，讲述武汉情况和问题实质。在天安门城楼，周恩来碰见“湖北日报”的一个在京记者刘某（按：周原来认识）问他武汉局势，周说：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从外面调了某某、某某部队，把武汉包围住了，陈再道他们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汉是安全的，是万无一失的。

中共中央处理事件和武汉的变化

也在 25 日，毛泽东就中央关于武汉“七二零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

“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毛代拟

的复电称：“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³⁷

武汉部队草拟《公告》，将“七二零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26 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会上批判了陈再道，周恩来主持会议，说“七二零事件”是“叛逆行为”；听到常委会开始的这一宣判，对自己命运已有思想准备的陈再道和钟汉华，也几乎当场瘫倒在地。谢富治则说“七二零事件”是陈再道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会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一些秘书批斗、殴打了陈再道。

武汉造反派连日游行声讨陈再道，8201 与“百万雄师”。大幅标语与漫画显示：武汉的天亮了，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游行人们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支持你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27 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在武汉传达。称“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

中央继续召开揭批陈再道会议，连日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连续报道全国各地群众和部队上街游行，谴责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行径，表示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武汉群众议论，中央通过对武汉事件的反映报道，集中地点名支持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确认的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

也在 27 日这天，8201 部队的千多名指战员乘坐 40 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和大专院校举行游行，高音喇叭真诚喊出“8201 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口号。

事后，8201 部队被调出武汉市整训，武汉军区调查落实参加“七二零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二千余人，当时 8201 全师共有官兵九千余人，在武汉市驻有师直机关和 4 个团。

晚上，陈伯达和谢富治等接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钢二司”一号负责人杨道远、“新华工”的“红色造反团”负责人聂年生讲话，高等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的毛远耀（测绘学院第一书记）参加接见。

也是 27 日，“百万雄师”在舆论的高压下最后解体。总部告诫各分部头头及活动分子：一旦造反派得势，他们必定会对保守派进行报复，因此，“百万雄师”成员有必要暂时离开武汉。因此，有许多人跑回老家的亲朋好友家避难。月底，7、8 个“百万雄师”主要头头去“新华工”，想与造反派谈判下台阶，“新华工”负责人把公安局造反组织“公安联司”的人通知来，把他们全抓了起来。

“百万雄师”中的骨干人员和武斗分子害怕造反派报复，撤至郊区、东西湖，再逃避到地县。其他一般人员即回单位，向得胜回来的造反派认错“投降”了。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

毛泽东在上海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并决定：

“武汉由 15 军或 2 个师（指 44、45 师）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

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

原梅龄、百花的原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

飞机场到梅龄的通道要 15 军部队或 29 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

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

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38

7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红旗》第 12 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发表。

7 月 30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红旗》第 12 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发表。

毛泽东指示：宣布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丰的任命，对陈、钟的宣布（按指免职）可以晚一点；独立师分编到 44 师、45 师、29 师，不离湖北，集中整训。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军区的公告，可在全国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复电发到县团级。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公告”。清晨，周恩来电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3 日你去武汉军区工作”；上午 9 时，周恩来在钓鱼台 5 号楼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旋即接见刚刚赶到北京的曾思玉（和已在北京的刘丰），代表中央宣布了武汉军区新领导的任命。

连日来，“两报一刊”和新华社通过各种媒介，集中报道全国军民支持武汉问题解决，并对全国的群众组织，作了革命或“保守”的倾向性表态。

武汉造反派的愿望和呼吁

此日，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布重要的《紧急通告》提出：

……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的指示，为了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新高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伟大的新胜利，特发出紧急通告如下：

一、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掀起一个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一小撮坏头头的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斗倒、斗垮、斗臭。

二、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把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勇敢地挑起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作“节约闹革命”的模范。

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爱解放军，我们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作拥军爱民的模范，要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共同担负起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担，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一般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对他们决不能采取讽刺谩骂、打击报复的态度，更不能抓人，要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耐心、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团结他们，热情地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把仇恨和斗争矛头狠狠集中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五、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都是把“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严格区别开来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们热情地欢迎“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迅速猛醒，起来造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造反派工人一起抓革命促生产。

六、对于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只要他们不再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卖力，改邪归正，我们同样给予出路。如果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将给予严厉的打击，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依法惩处。

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抗争的矛头实质指向毛泽东与中央

40年过去了。

“七二零事件”的抵制和抗争行动，单纯是针对王力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吗？是“武汉军民反对林彪、江青”吗？从事实和问题的实质看，当然不是。在街上，有人针对说“百万雄师”受蒙蔽闹事，回答说：“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如果说街头上激愤的群众语言不足为凭，市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交谈总还是理性思考的。市监委一个张姓副处长说：“毛主席受了蒙蔽，现在有人怀疑林彪和周总理有问题”；组织部韩姓处长说：“他（按：指毛泽东）还在稳坐钓鱼台哩”！农委书记冀某说：“中央现在已被几个笔杆子控制了”；李某说：“揪王力当然是大快人心，但问题不要想的那么简单。据辛甫（按：市委书记）说，‘武汉支左大方向错了’，这一套是谢富治讲的，那就不是王力个人的意见，说明中央文革对武汉问题有框框”。

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张根成，在 20 日 15 点左右被抓进 8201 师部，有人问“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显然，在独立师的这个科长看来，周总理与中央文革完全“他妈的”是一回事。蔡炳臣政委进来后，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并有针对性地追问“你们那里还有文件吗（按：指总理讲话稿和其他关于处理问题的文件）”？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还追问“那个人呢！？”“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蔡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张想“这不是造反了吗”？接着独立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又盘问张，指责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他在游街时，车上军人指责批判说：“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 80 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对抗情绪十分激烈。

8201 部分干部的一些认识与心态的矛头所指，显然并不只是王力具体的人，实质是针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有人已经明显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不满。当时，“百万雄师”的头头明明知道他们的斗争矛头业已指向中共中央。批斗王力时，军区叶明副政委要 29 师张政委让揪斗王力的头头

放了王，并传达总理指示——派代表商谈解决武汉问题。现场一个头头居然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说“百万雄师”不知道毛泽东在武汉，他们只是反对王力，是抵制所谓“四人帮”。实际上绝不是如此。事后，周恩来对河南的部队干部讲“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并非一时的气愤之言。“七二零事件”中军民的反弹言行，实际针对的就是周恩来代表中央的讲话精神，这正是毛泽东在武汉亲自制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根本原则。

今天，“百万雄师”的主要负责人也承认当时明知毛泽东就在武汉，还要这样做：“我们实际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³⁹ 为回顾历史真相，重访“百万雄师”主要头头⁴⁰，俞文斌仍然坚持认为：“‘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我认为这件事是不应该发生的，‘七·二零’事件是毛泽东搞的，江青后来又把这件事推给林彪，林彪是听他们指挥的。毛是罪魁祸首，帐要记在毛泽东身上”。

看来，他并非想在当今批判文革的浪潮里赶出风头。这位历史的当事人，对于事实和实质的认识，比我们好些“研究历史”的御用文人，要直白和坦荡得多！

8201 部队在直接触发“武汉事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至今“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还在埋怨他们把事情弄糟了。从层面上看，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原来是地方公安部队，习惯于按照传统思维定式看文化革命，将造党政秩序反的群众看成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牛鬼蛇神”，而他们的认识又始终得到军区主要领导的支持；在支左中，8201 的一些干部参与“百万雄师”的组织领导工作，甚至一些干部参与、组织了 6 月的一系列大型武斗，他们把部队的观点和命运与“百万雄师”结合在一起了。8201 部队深陷武汉和军区的文革政治纠葛。他们在“武汉事件”中的作为，严重违反了当时的党纪和军纪，也违背了现代政治的基本规矩和原则。独立师支持武装镇压群众，伙同“百万雄师”暴力冲击武汉军区、（中共中央领导人下榻）宾馆的行为，违背了现代政治学准则和法制、法理，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

问题是 40 年之后，我们是沉重地全面总结教训，还是掩盖史实，甚至宏扬其精神？

鉴于事件发生在文化革命的非常时期，情况纷繁、复杂，其后又有深沉的历史背景，中共中央当年并没有把问题看得过重，毛泽东并没有把事件定性为“兵变”，对于陈、钟等人宽大处理；独立师的一些团队，后来编入 17 军建制，一些干部，提前转业到地方工作。

政治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没有估计到：就在他总结讲话、在他带领陈、钟去见毛泽东后几个小时，军区领导就擅自同意了在独立师上下传达讲话要点；没有估计到他刚刚离开武汉，王力就在没有做通军区和“百万雄师”工作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热情洋溢地在造反群众中显示了中央对他们一派的支持；更没有估计到他总结讲话后刚刚一天，就会有人专门告诉“百万雄师”——毛泽东就在东湖的秘密，要他们去宣示怀疑文化革命的愿望；甚至有人故意造谣生事，煽动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去火中取栗。由文革的这层“败事有余”的领导干部的思维、行为模式，直接释放、催化了各派群众的行动力量。

诚然，在文革发展的关键时刻爆发这一事件，有更为宏观和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且是我们全党、全民、全军的一个共同的历史教训，事件之后运动的变化和转折，超越了事件的本身意义，科学地全面认识和分析研究，业已超出记录武汉文革史实的篇幅。

注释

1 《杨成武将军自述》，268-269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版。《杨成武将军访谈录》，170—171 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4 年版。

2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68、39 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年）。

3 按：已向原中央文革小组当事人王广宇、何天琦和戚本禹证实，2005 年 6 月、10 月，2007 年 3 月。

4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P50-5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年。

5 《毛泽东传》（1493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

6 《杨成武将军访谈录》，173-174 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年。

7 《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P199（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 年）。陈司令的生活副官陈某也证实他的确拍桌子对总理意见不通，此情当时在

场的人都已私下传开，消息也很快传回北京，得知武汉出现变异的邱会作就听说了陈与周总理拍桌子。顶撞总理是在 16、18 日。后来在中央办的湖北省军队干部学习班批判斗争陈再道，在 11 月 23 日上午的会上，军区机关领导和群众还揭发指责陈顶撞总理、拍桌子。15 军军长方铭后来也与群众回忆起当时的冲突，陈说怕群众不依，军队和群众的工作不好做，周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

8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P202，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 年。

9 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中国老年”1-5 期。

10 俞文斌，“百万雄师”常委，一号头头；1978 年“720 事件”平反后，曾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外经委副主任、武汉市政府驻香港办事处主任。2005 年 11 月 29 日采访。

11 《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宣传部、红水院宣传部编辑印行，1967 年 8 月。

12 按：指 15 日到 18 日四次。

13 按：有反复的是黔、黑、晋、鲁，这里的“邻近”是四川。

14 按：总理一方面认真处理各省问题，一方面也充分估计到按当时处理文革纷争的认识和方法，会有反复；不过讲的反复，还是干部和群众的局部性认识反复，还不是出现剧烈冲突和大规模抵制中央。

15 这里批评任意解散群众组织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应当与中央汇报和知会、请示和批准；不过中央也未太当成事，认为对群众的问题出现随意处置，对文革开展有激进思潮和守旧思潮，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16 认为“百”的产生发展，军区指导思想和倾向有问题。

17 按：军区一直追索一个虚幻的口实，指责“工人总部”死保公认了的走资派王任重，犯了错误。在当时的汇报中，还将其作为主要理由，反对工人总部翻案。

18（下答：抓办搞的）按：根据陈再道的检查内容，周恩来还有一段话未记录下来，周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

19 周这里全面概括了他介入武汉问题以来，社会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他对武汉局势变化和激化心里有数，将问题归咎于军区。但这里也明显地把“百万

雄师”看成犯错误、对激化冲突有主要责任的群众组织。

20 周恩来这里说明了，从军区一开始去组织批判群众的一个声明入手，抓人，几个环节几个问题处理得不好，造反派群众有气，就要打倒陈司令，抓武老谭；而同时中央处理河南问题对武汉有影响，这都是实际情况。

21 按：总理讲了一个原则，也是当时各地很难做到的；这里周还高姿态承担责任。周说的“指名”还不是指武汉，而大概是指湖南“湘江风雷”处理，王力在当晚就当众人的面接毛泽东的话，说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是中央文革。周这里说湖南影响湖北，也是做自我批评，给湖北问题下台阶。

22 按：7月18、19日，军区的当务之急是着手总理要求的这个工作；陈、钟由于思想不通，没能也不可能把握总理的教育转化要求与机会。

23 按：这条是引导群众组织，要自己区分言行的正确与错误，要正确对待解放军，也是批评了造反派对军队的态度。

24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P260，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25 钟汉华的检查（1967年12月1日，中央举办的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河南省军区干部集训班）。

26 武汉军区秘书科揭发，辑于辑于《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年9月。

27 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荣根，2007年。

28 采访“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俞亲自披露，2005年11月，2006年6月。

29 按：王力在整个棋局里，仅仅是一只“马”；文革小组的人，在当年也戏称他是好出风头的“马谏”。

30 汪洋，“‘七二零’揪斗王力录音的回忆”，辑录原“百万雄师”回忆录《波澜岁月》，2002年印刷内传。

31 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荣根，2007年。

32 同前注。

33 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荣根，2007年。

34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P50-5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年。

35 “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的忠实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动言行”，辑于《七月风暴》（增刊之二）钢二司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1967 年 9 月。

36 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联合编印，1967 年 9 月增刊之一。

3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P380-38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

38 杨成武回忆，《微行——杨成武在 1967》，P141。

39 按：2005 年 11 月 29 日俞文斌与笔者讨论事件实质，坦然承认。同时也说：但是毛的文革全错了呀！

40 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荣根，2007 年。

《杨成武自述》摘录

2011 年 8 月 30 日修改

七、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1）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一节 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在这个光辉的节日，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央军委，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的工人们、农民们、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们，向全国的红卫兵们，向全国的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全国各族人民，致最热烈的敬礼！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地欢迎！

今天，我们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的。

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普遍到全中国。几亿人民发动起来了。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车间到工人家庭，从十来岁的娃娃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从来的群众运动也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样广泛和深入，广大的工农群众，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的红卫兵，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来的斗争中，逐步地联合起来，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他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全面崩溃。

被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吓破了胆的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这场大革命会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乱。事实同这些老少爷们的愿望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我们的工业生产胜利的捷报，正在不断传来。我们的农业获得了连续第六年的好收成。我们的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我国氢弹爆炸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教育了群众，教育了青年，大大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锻炼了干部，锻炼了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第一次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的、创造性的划时代的新发展。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不但要从组织上彻底地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要开展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大批判，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

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能翻身。这种大批判，应当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一切阵地。

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斗争大方向，跟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通过学习，帮助我们的老干部，新干部和革命小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头脑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大力促进我们的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迅速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运动，毛泽东思想一旦为亿万群众所掌握，就成为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就可以保证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变色，就可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胜利前进！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打倒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

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

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一定要解放台湾！

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毛

泽东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大道上，乘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荡东风，我们胜利地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在这盛大节日的前夕，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喜讯，传遍全国，给几亿革命群众以极大的新鼓舞。

我们热烈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他们将同我们一起，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欢度我们的国庆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八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十八年，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十八年，是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加强和巩固的十八年。

遵照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十八年来，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共同奋斗，我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

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出现了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全面大跃进。我们的祖国由一个贫困落后、灾难深重的国家，一跃而为繁荣昌盛、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强国。

解放以来，我们打退了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我们取得了“三反”“五反”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取得了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胜利，取得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胜利。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我们对资产阶级展开了多次的批判。

十八年来，我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和朝鲜人民一道，使美帝国主义遭受到惨重的失败。我们在支援越南人民以及其他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自己的国际主义贡献。我们同世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坚决的斗争，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新阶段上的胜利发展。

十八年来的历史充分地证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红旗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我们走过的战斗历程。这就是我们的方向。

在建国以来的光辉历史中，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国广大的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登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创造出了震撼世界的奇迹。

列宁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正是这样的。

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下，动员起来，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革命的群众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粉碎了这个妄图实行反革命复辟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他们推行的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地破产

了。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风暴，激起了亿万群众灵魂深处的大震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普及。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懂得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道理。

千百万革命的青少年，革命的红卫兵，在这场大革命中冲锋陷阵，经过一次又一次阶级斗争反复的磨炼，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在逐步成长起来。无产阶级的新生革命骨干，正在大量地涌现。大批革命的干部，经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觉悟，大大改善了自己同群众的关系，正在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新成绩。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林彪同志的亲自指挥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国防、保卫和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在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建立了新的光辉的历史功勋，同时得到了最大和最好的锻炼。他们不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是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发起来的巨大精神力量，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标志着我们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达到了新的水平。

林彪同志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

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统一，我国各民族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团结，我们的国防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巩固。

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深入发展的必然阶段，是毛主席长期以来研究和总结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规律的伟大成果。

早在十八年前，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毛主席就向全党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在这里，毛主席向我们阐明了一条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绝不意味着革命的结束，而是革命的开始。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还要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斗争和较量。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把社会主义革命向前推进，并且进行到底。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剥削阶级失败了，但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梦想恢复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他们在思想领域中还占有相当大的势力，控制着许多阵地。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和习惯势力，也不会因为实现了集体化就会很快完全消失，并且还会不断地生长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国际资本主义势力，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正如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

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最顽固的维护者和最集中的代表者。他们利用所窃取的权力，拚命鼓吹资本主义，妄想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用公开的或隐蔽的手段，企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要摧毁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就必然要同这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生对抗性的冲突。这样，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生死搏斗。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国际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研究了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这样，就抓住和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最重要的根本问题，极大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极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平地一声惊雷。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一旦和亿万革命群众相结合，就立即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发展成为空前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这个无敌的力量，进一步打垮了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势力，加速了我们的历史进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开辟了新纪元。

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是伟大的。为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

我们今后的战斗任务是：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火力，集中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使他们妄图复辟的一切阴谋诡计永远破产。

充分发动群众，结合革命的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各个领域中进行深刻的改革，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除了对工人阶级作了重要指示外，又教导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加强革命的团结。

巩固和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按照毛主席的原则正确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正确对待干部，大胆使用革命干部，努力帮助新干部成长。

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并且把这个运动持久深入地进行下去。

进一步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坚持业余闹革命，就地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大力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在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的同时，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战备，巩固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随时准备粉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

依靠群众，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日本特务的各种间谍活动。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要完成这一系列伟大任务，就必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是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的影响，几千年来是根深蒂固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都要自觉地拿起自我批评的武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毛泽东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勇敢地和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决裂。这样，才能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犯错误的革命干部，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传统政策，对他们进行耐心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时间，使他们能够改正，跟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了一大批新的年青干部。教育好这样一支新的队伍，不断地向他们灌输毛泽东思想，使他们永远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本色，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紧密的联系，这是关系到我们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我们取得一切胜利最根本的保证。我们必须大树特树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坚决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

必须看到：今后一年阶级斗争还是很剧烈的，很复杂的，我们仍将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前进。对于那一小撮从右的方面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暗中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坏人，对于妄想倒转历史车轮的反革命势力，必须揭露出来，给予坚决的回击。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得到了世界革命人民热情的赞扬和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凭着他们的反革命

嗅觉，一开始就预感到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他们的最大威胁。他们为了掩盖他们内心的极大恐惧，拚命地诬蔑和咒骂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他们的这一切诽谤，却一次又一次地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毛主席早就指出：“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让那些垂死的苍蝇去嗡嗡叫吧！我们将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定不移、信心百倍地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彻底胜利！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这是毛主席给我们概括出来的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纲领。

林彪同志说：“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就是要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改造人的世界观，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以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只有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的伟大纲领，正确地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才能认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才能领会和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充满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阶级的所有制，时间不一定要很长。但是，剥削阶级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消失。我们没收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财产，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他们在思想领域里还占有相当的势力，甚至在一定时期内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

剥削阶级思想体系的核心，要利己主义，是一个“私”字。由于几千年的私有制度，这种利己主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旧的社会制度消灭了，但是，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资产阶级就是利用这些东西来腐蚀群

众，腐蚀青年一代，企图征服人心，同无产阶级作斗争。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用孔孟之道巩固他们的政权。资产阶级也要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巩固他们的政权。在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被推翻以后，他们必然要拚命地利用自己在思想阵地上占有的某种优势，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完全正确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思想因素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能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旧的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反动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新的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先进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加速的作用。

恩格斯在他的晚年曾经谈到，前些时候马克思和他为了主要地反对历史唯心主义，较多地阐述了经济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后来有人把他们的原理加以歪曲，说仿佛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这是荒诞无稽的。他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经济基础。”

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思想家毛泽东同志，用彻底的唯物辩证法，对思想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第一次作出了最深刻、最精辟的阐明。

毛主席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毛主席在历史唯物论问题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括。

毛主席在《矛盾论》这一光辉著作中非常重视精神的東西的作用。他说：“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反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毛主席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这些重大原理，仍然是我们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几年来，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思想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开展了多次的批判和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资产阶级越来越感觉到由他们自己亲自挂帅向无产阶级夺权，已经不那么容易了。他们更加需要在我们党内寻找、培植代理人，来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现在，人们已经十分清楚，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为了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千方百计地抓意识形态，拚命地鼓吹和维护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和文化，拚命地保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从批判《清宫秘史》到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中，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明确地规定，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批判和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并且给我们指出了，要充分发动群众，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性，彻底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揭露和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理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航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崭新的伟大的里程碑。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一年多来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和打倒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样，就消除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最大的隐患，也扫除了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的最大障碍。(1)(4)

当前，我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在这个伟大方针的指引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已经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我们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同时，把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推行的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来一个大破除，肃清他们的反动影响，把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便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统统改掉。这样，就会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对修正主义的识别能力和抵制能力，反修、防修就有了牢固的群众基础。为了更好地批修，为了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们就必须狠斗“私”字。林彪同志指出：“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尖锐，这样激烈，这样深刻地触及到每一个人的灵魂。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破私立公，牢固树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象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那样，“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修正主义产生的条件，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大事，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在十月革命后，列宁说过：“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同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建设，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在思想方面、教育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几十年来工人阶级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习惯、风气和信念，我们要把这一切习惯、风气和思想用作教育全体劳动人民的工具”。

林彪同志指出：“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通过学习，帮助我们的老干部，新干部和革命小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头脑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人民立新功。”

在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中，教育干部，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教育干部的运动。大多数革命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干部。对于犯不同程度上的错误的干部，都要一律加以教育。犯了错误的干部，应该把群众对自己严肃的批判，看作是对自己最好的帮助，要联系阶级斗争的实践，联系自己的经验教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改正错误，提高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认识，在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要加强革命青少年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向他们灌输毛泽东思想，帮助他们在斗争中健康地成长。

革命的青少年和红卫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先锋作用。但是，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一定要正确地对待自己，要特别重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在向工农兵学习的过程中，努力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恩格斯在谈到旧传统的时候曾经说过，“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

封建社会几千年，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这种社会制度已经和正在灭亡。为这种社会制度服务的思想已经腐败透顶。科学共产主义从《共产党宣言》算起，才一百多年。但这是新生的无敌的力量。正如毛主席所说：“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有充分的信心，用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宇宙观，战胜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夺取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伟大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第十五期，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向全国的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伟大的战斗号召：要斗私，批修。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最新指示。林彪同志指出：“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斗私，批修”，很精辟、很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它是保证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方针，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加强和巩

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根本方针。

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推翻剥削阶级的所有制，时间也不需要很长。但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旧的思想体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人们的灵魂，却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认为，思想是从物质来的。社会意识是从社会的存在来的，从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占有制度来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但是，思想，反过来，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巨大的能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的作用。反映剥削阶级要求的旧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反映先进阶级要求的新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加速的作用。先进的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

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在哪里？最本质的，是旧在一个“私”字上，就是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来看世界。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是滋长资本主义的天然土壤，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是瓦解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毒菌。

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旧的思想体系在工人阶级内部最集中的代表者和最顽固的维护者。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一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而实际上企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就说明，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开展政治思想的大革命。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修正主义的命，革一切旧思想的命，就是改造人的灵魂，就是要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因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斗私，批修”。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了把这场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动亿万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更广泛、更深刻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彻底肃清在各个方面的修正主义流毒。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必须用毛泽东思想克服我们队伍中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扫除妨碍政治斗争任务完成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我们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一个革命同志，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动力，又应当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对象；既要批修的先鋒，又要做斗私的闯将。如果不斗私，不革自己的命，那么，批修也是搞不好的，而且可能会被修正主义的东西所蒙蔽，甚至跌入修正主义的泥坑。同样，也只有积极地投入批修的战斗，才能深刻地触及灵魂，狠狠地斗私。

林彪同志指出：“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开办学习班，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头等重要的事，是要带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各种活思想，刻苦地、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根

据毛主席历来的教导，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主要采取自我批评的方法，破私立公，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加以改正。通过学习，使我们的老干部、新干部和革命小将，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斗私，批修”中为人民立新功。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大联合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革命大联合高潮的到来，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走在革命大联合的最前头，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树立了榜样。

毛主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彻底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就可以更有效地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就可以更好地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大力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工人阶级的革命大联合，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骨干力量。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就能够极大地抵制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冲击，把一切革命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践证明，那一个地区的工人阶级联合得好，起了带头作用，那一个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联合得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顺利发展。

工人阶级的革命大联合，是在“斗私，批修”中实现的，也只有在“斗私，批修”中，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身负重任，联合起来以后，要坚决贯彻毛主席“斗私，批修”的伟大方针，要在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中，起模范作用，带头作用。

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将继续更好地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社会主义的公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私的斗争。中国原来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虽然我们的工业早已实现社会主义的国有化，农业早已实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还会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侵蚀工人阶级的肌体。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也必然存在公和私两种思想的斗争。毛主席说：“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后，要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努力改造世界观。同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同社会上的资

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世界。

工人阶级组织上的联合，要有思想上的联合来保证。毛泽东思想是工人阶级大联合的灵魂。如果组织上铲除了小山头，思想上还是“私”字当头，派性作怪，那就还会貌合神离。只有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工人阶级大联合才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统一整个阶级的思想，统一整个阶级的行动。建立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大联合，是最牢固的，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

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是为了一致对敌，共同批修。工人阶级革命最坚决，立场最坚定，旗帜最鲜明，在对敌斗争中站在最前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工人阶级的死对头。如果不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透、批臭，不把他们彻底打倒，那么，资本主义就会有复辟的可能，工人阶级就会被重新打入深渊，受二遍苦。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和他的代理人，就是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挖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毒根，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去掉那些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旧东西。这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以后，就要全力以赴，狠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把革命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积极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带动无产阶级革命派把批修斗争进行到底。

工人阶级只有在批修斗争中，才能消除内部的无原则分歧，更自觉地、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工人阶级的革命大联合，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沉重打击。阶级敌人最害怕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总是妄图用更加隐蔽、更加毒辣的手段，来分裂工人阶级的队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他们的狂妄想法。在革命大联合的凯歌声中，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加强敌情观念，及时地识破和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

由工人阶级大联合所带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正在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飞跃。

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万岁！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第十五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学习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讲话的通知

1967.10.06；中发〔67〕310号

中央决定，将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的几次讲话，转发各地学习。这些讲话是：

（一）林副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已登十月二日人民日报）；

（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张春桥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九月二十六日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录音）；

(三) 江青同志四月二十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九月五日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九月二十六日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录音);

上述这些讲话很重要, 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各军管会, 各军区, 各革命群众组长, 应即认真组织阅读和收听这几次讲话的录音(录音带或片子), 进行学习。大家应遵循毛主席的教导, 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牢牢掌握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斗争大方向, 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在革命的大批判中, 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 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各地更应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用“斗私, 批修”这四个字为纲, 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 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最近,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 要斗私, 批修。林彪同志说: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用‘斗私, 批修’这四个字为纲, 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 中央办, 地方办, 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 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 为了加强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 普遍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取得了许多好经验。我们希望全国各地, 都象上海那样, 充分发动群众, 创造出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更多的好经验、好办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的任务, 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 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 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 对于我们, 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归根到底, 是改造人们世界观的大革命。在这场大革命中,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一直进行着激烈的冲突和斗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都在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 顽强地表现出来。要战胜资产阶级思想, 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 要使我们在防修、反修的斗争中获得最大的战斗力, 就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

经过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 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 每一个革命干部, 每一个红卫兵都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取得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经验。这就为我们大学习、大总结、大提高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以“斗私, 批修”为纲, 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这是帮助老干部、新干部和红卫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的好形式、好方法。这是我们党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光荣传统, 是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的重大战略措施。

我们的老干部, 绝大多数都是好的。他们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 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 立下了功劳。但是, 他们中有的人, 在和平环境中, 放松了自己的学习和改造, 不同程度地脱离群众, 脱离实际。同时, 他们对于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又缺乏经验, 很不理解, 在运动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要从教育着手，扩大对干部的教育面，给他们以时间和机会，认真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扬成绩，改正缺点和错误，更好地理解、掌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鼓励他们放下身上的包袱，大踏步地跟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同时就是要不断地向新涌现的干部灌输毛泽东思想，帮助他们学习和继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使他们具有民主作风，具有自我批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实际，在政治上更快地成熟起来。

对于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队伍来说，也有一个改造世界观的任务。如果不用毛泽东思想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放松了对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斗争，这些革命新兵，这些革命小将，也就有可能犯错误。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要加强对红卫兵的教育。革命干部要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教育和引导他们。对他们作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很好地结合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边学边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通过学习，推动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互教互学。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多做认真的自我批评，把自己头脑中的“私”字狠狠斗掉，把利己主义、实用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狠狠斗掉。

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不但要做到严肃、紧张，而且要做到团结、活泼。要有民主空气，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和交锋。要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结合起来，使我们的队伍成为一支步伐整齐、生气勃勃的革命大军。

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样，七亿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必将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奋勇前进》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并作了关于要斗私，批修，要进一步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大办学习班等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是一年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精辟、最透彻的总结，是指引全党、全国、全军奋勇前进的灯塔，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中央军委发出重要通知，号召全军全体人员，包括所有干部、战士、职工、家属，立即掀起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这一最新重要指示的新高潮。这是当前最中心的政治任务。

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是胜利。

一年多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个重要关头，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

英明、最及时地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作出伟大的战略部署。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是要坚决拥护，认真学习，反复宣传，深刻领会，字字照办，句句照办，不折不扣地照办。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要牢牢掌握“斗私，批修”这个纲，把它贯彻到一切思想、言论、行动中，用它来统帅一切，带动一切，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要根据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方针，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不断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斗私，批修”方针、符合按系统、行业、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我们就坚决支持；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搞小资产阶级派性、搞跨行业组织的，我们就不支持，就要帮助纠正，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并且帮助地方办好各种学习班，把全国、全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要帮助革命群众正确对待干部，帮助革命干部站出来，这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要正确对待群众，加强群众观点，发扬民主作风，反对摆架子、做官当老爷的不良倾向，要平等待人，到群众中去，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全军同志们！让我们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认真总结前一阶段运动和“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订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使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项项落实。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林彪同志“八·九”重要讲话

1967. 10. 19；中发 [67] 320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的讲话很重要。这篇讲话，运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并且对今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

现将这个讲话的记录稿转发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切实执行。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

林彪同志重要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同志的讲话

你们讲了很多情况，我没有你们熟悉。各地区的问题由总理、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方法。武汉的问题已经请示过毛主席，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

毛主席指示我们，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会变好事。武汉事件是很坏的事情，现在变成很好的事情，对全国各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推动，教育意义很大。这一次把一些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暴露了，把反对革命路线的一方暴露出来，革命的一方，也表现出来了。这里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激烈、最紧张的地方。

过去我们对各别军区有些不放心，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事物的规律是坏到了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革命的力量总是前进的，反动的力量总是要失败的。某些人不管怎么样反动，总是顶不过革命洪流。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他穿头。毛主席指示，烂透了的可能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坏人不完全暴露，就没有理由把他打下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样两个条件下，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他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没有这两个条件，特别是没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条件，是不行的。在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才有这个胆略和气魄。现在有毛主席健在，亲自领导，亲自掌舵，在文化大革命中，让各种坏事充分暴露出来好，各种隐患诱发出来好。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乱，经过破，经过革，转化为治，转化为立，转化为胜利，转化为建设。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表面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路线搞乱了，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出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倒了。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不乱，反动东西就不能暴露。我们敢于这样做，正是有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有这样的条件，不让他们暴露什么时候暴露呢？乱，在毛主席领导下是不怕的。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应该。（二）坏人斗坏人。这是“以毒攻毒”，是我们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象北京军区、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有过这样的情形，好人挨整，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好人吃点苦头，但尝到很大的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误伤，有损失，但可以从中得到教训。这四种情况，前三种都有利，只有第四种差些，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容易解决。

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总后当权派中的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海军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同志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了甜头。如果是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王、张、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很有利，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有效的措施。只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惩罚。就是乱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

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了错误，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都不希望他垮下去。有的干部犯错误，只要能挽救的，就尽量使他不要垮。但是自己应该下决心改正错误。如果自己不下决心改正错误，硬要往垮的路上走，就没有办法。

要不垮，办法有三条：

第一, 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 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 就不报告中央, 不要以为是小事, 就自己处理, 不要以为自己聪明, 就不请示报告, 也不要怕麻烦中央。中央是不怕麻烦的, 是有这个精力和能力来解决问题的。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和中央许多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 打电话看到的人少, 又传得慢, 打电报, 大家都可以看到, 还可以自己坐飞机来嘛, 一两个小时就可到, 不要自己想当然, 自作聪明, 自作主张。往往自己以为对了, 实际上不对, 自己以为差不多了, 实际差得满远。这是我反复要讲的, 是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

第二, 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 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调查研究, 了解情况。要听取两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说: 调查研究是基本功。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 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第三, 现在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 左派右派阵线分明, 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 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派右派的根据。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 站在左派一边, 站在革命群众一边。不要单纯从成份纯不纯、党员多不多、干部多不多来分左右派, 来看问题。阶级成份是必须注意的, 不注意会犯错误。但不能唯成份论, 主要要看政治表现, 看站在什么路线上。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 站在哪一边, 这是个立场问题, 是个首要问题, 其他都是附带的问题。对待保守组织的群众要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工作, 要进行分化争取工作, 不要使他们和革命派长期对立, 要争取广大受蒙蔽群众过来, 使他们站到革命派一边。对保守组织的各别坏头头, 要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 发动保守组织的群众自己起来把他抓出来。要坚决支持左派, 把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左派本身有问题应强调联合, 说服他们不要打内战, 不要搞本位主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主义不利于左派, 而有利于右派。对右派组织的群众不能简单粗暴地压制。出了问题, 出了事情, 要报告请示中央, 不要急, 要慢慢地有步骤地解决, 把情况弄清楚了, 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 这是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工作作风。

现在老实讲, 担心我们同志担负这样重的任务犯错误, 对文化大革命不利。现在依靠军队, 军队不犯错误就好, 要不犯错误, 就要依靠左派, 依靠群众, 最重要的是请示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犯了错误就要高姿态, 早认错比迟认错好, 高姿态比低姿态好, 改正的越快越好, 这样群众就会满意、就会谅解。有错误不认错, 遮遮盖盖、拖拖拉拉是不好的, 坚持不改正错误是危险的, 抗拒的办法是不行的。检讨了, 改正了, 就主动。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 都是仓促上阵的, 情况不了解, 难免犯错误, 错了不认错, 就被抓住辫子, 错了改了, 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 受到群众的欢迎。共产党人要有这种不掩盖错误、勇于改正错误的精神。

过去的革命也是仓促上阵的。北伐战争、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各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都是仓促上阵的。经过几十年, 农村情况已经熟悉, 这些问题都清楚了。革命胜利之后, 建立了新制度, 进入一个新阶段, 发生了新情况, 出现了新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全党许多同志过去没有仔细研究过, 理论上、思想上准备不足。过去推倒三座大山, 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一套。胜利后就变了, 不知不觉地踏上了新的阶段, 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这种革命, 许多同志没有准备, 没有认识, 只有我们毛主席

理论水平最高, 在理论上、路线上、思想上、方针政策上高瞻远瞩, 胸有成竹, 早有准备, 或者思想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有准备, 其他一般的同志都没有思想准备。过去我们对农村土地革命熟悉, 对资本主义不熟悉, 在美、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 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侵略可以看的清楚, 一个普通工人都能够懂得, 但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 我们过去又是在农村, 许多同志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理解很少。假如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那一套旧思想、政策、理论来看今天的革命, 就难免要犯错误, 就不能理解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过去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的办法搬到今天, 就不能不犯错误。犯错误有两种, 一是肯改, 一是不肯改。肯改, 党和群众就欢迎, 不肯改, 就将毁了自己。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 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很不理解, 进入了新的社会制度, 作的新的事, 脑子里还是老的一套概念。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 但过去的领导班子, 只有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才是真正马列主义的, 除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之外, 不少人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是资产阶级分子, 所以犯很多错误, 而这种错误, 非纠正不行, 绝不能因为犯错误的人多就不纠正。如果不纠正, 就会不知不觉地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 使我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国家就会变颜色, 有些人就会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政治大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就会变成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 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 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经过这个政治上思想上革命, 就弄不清楚那些是社会主义, 那些是资本主义, 自以为是社会主义, 实际上变了, 变成了资本主义。只有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也就是把毛主席思想搞通, 才能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资本主义, 才能分清左右, 分清正确和错误。否则, 就会分不清敌我, 分不清是非, 把右的当成左的, 把错的当成对的。今后要在毛主席领导下要好好学习, 好好改造世界观, 把毛主席思想学习领会通了, 就是懂了马列主义, 才能不犯错误。

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靠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要避免犯错误, 就要多请示主席、中央。另一方面, 要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 要政治挂帅, 要学毛主席著作, 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要朝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前进, 不要朝着资本主义发展, 后退。

毛主席说, 政治是挂帅, 是灵魂,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用毛主席思想挂帅。部队工作千头万绪, 只要大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抓好两条路线教育, 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搞好学习毛泽东思想, 不突出政治, 就会迷失方向, 甚至有的镇压人民, 象内蒙一样。总政治部反谭政以后一定时期抓了学习毛主席著作, 办了一些事情,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差了, 跟不上形势。现在还要想办法, 把总政机关改造好。

大学毛主席著作, 主要依靠各大军区、军、师、团、营、连。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是个法宝。工作主要是靠各军区, 主要是抓好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抓好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要讲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多介绍左派的好处。教育部队正确对待革命左派、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当前要抓大批判,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有抓好大批判, 抓好政治思想工作, 把干部、战士的头脑搞清楚,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 才能完成“三支”“两军”任务。如果部队本身的革命化不搞好, 一出去就会出

洋相，犯错误。“三支”“两军”，是在地方党、政机关瘫痪了的情况下，要军队去接管，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的军队干部参加三结合，有的军队干部要调到地方工作。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的重要性，对政权的重要性，对领导班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头脑不清醒。过去十七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着一部分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的班子垮了，部分国家机器不灵，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领导班子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就是国家机器，过去旧的当权派领导班子垮了，实际是等于这一部分旧的国家机器不适用了。这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同，又有相同的地方。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一部分垮了，是好事，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就让它垮。垮了，军队去接管。

我们的领导班子，应该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走毛主席革命道路的人组成。军队接管不要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立即改正。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干部，要照毛主席指示分期调来集训，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取革命造反派的意见。要把错误当教材，来接受经验教训。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也可以调来集训。过去的党政人员思想不通的，也要进行教育。不通，通过教育转变过来的就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就欢迎。应该按照主席教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来对待干部。就是暂时被打倒的人，教育过来也是好嘛。大多数干部是可以争取过来的，思想不通的也可以争取过来，使他们改头换面。经过教育之后，大部分还可以用。能不打倒就不打倒，有些暂时打倒的，还可以重新教育过来。领导班子是国家机器，必须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不适当的零件就要撤换，让他们受训，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继续革命。

刚才讲了，我对情况没有同志们熟悉，我参加的会少，知道的事情少，我说的话仅供同志们参考。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主席都有指示，许多问题总理、中央文革都解决了。

一再告诉你们：三个条件，特别是第一条。怕你们犯错误，事情宁可慢些，凡事要多考虑，不要急，拖几天，天塌不下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其他同志日夜干，希望上上下下都要注意请示报告。

毛主席指示，向坏人专政问题，专政机关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右派组织的群众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在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和坏人，我们专政机关不要抓，解放军不要抓，让右派内部群众发动起来去抓。这样能促进内部分化。

部队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问题，应该请地方左派来当教员，要借这个东风。我们过去就是请贫下中农来作报告嘛。内蒙请保守组织作报告，所以把部队都引到邪路上去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十月十七日发出了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指出：

（一）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

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二)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

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今年二月根据贵阳棉纺厂的经验,肯定和提倡的革命大联合的正确方针。接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根据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经验,发出了著名的“三七”指示,要求“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遵循毛主席规定的方针,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通知,切切实实地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面临新的战斗任务。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努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更加要求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革命的原则下,普遍地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

各单位的革命群众,最熟悉本单位的情况。他们最懂得本单位应当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应当怎么斗,怎么批,怎么改。只有实现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能最充分地发动本单位的广大革命群众,集中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把革命的大批判真正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给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更加沉重的打击,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个方面的流毒和影响。

只有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能更好地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扩大教育面,团结大多数,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

只有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做到统一指挥,协调动作,克服各自为政的状态,以便更好地完成本单位的革命、生产、教学和工作任务。

只有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能依靠本单位、本组织的群众,把混杂在革命群众组织中的个别坏人清除出去,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

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过程,是一个破私立公的过程,是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斗争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一切以毛泽东思想为原则,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原则,斗掉“私”字,去掉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在自愿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在这方面,我国工人阶级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走在革命大联合的最前列。工人阶级是最大公无私,最有政治远见,组织纪律性最强的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干部,都应当向工人阶级学习。

在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部门和单位,一切革命同志都要珍惜这种联合,巩固和发展这种联合。要警惕有坏人挑拨离间,破坏革命大联合。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实现以后,在统一的组织内部,仍然会有不同的意见和分歧,会有无产阶级

同非无产阶级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斗争。这是必然的、正常的现象，应该通过“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加以解决。

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的革命大联合，是革命斗争所需要的，是有强大生命力的。

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一个革命群众，每一个革命干部，都要积极推动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落实在我们的思想和实践里面，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搞好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对干部问题做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强调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

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对我们干部队伍来说，是一次严峻考验。许多革命干部，始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摧毁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为人民立下了新功。大多数干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去掉了身上错误的政治灰尘，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懂得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道理，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改造。在打倒了一小撮不可救药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后，我们的干部队伍更加纯洁了，更加坚强了，更加生气勃勃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之一。

最近，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的伟大纲领，迅速地武装了广大群众和大多数干部。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的高潮，正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兴起。这样，就为我们进一步解决好干部问题，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革命干部，参加到革命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来，发挥他们的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是当前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三结合方针的关键。革命干部，一般来说，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较高的政策水平。只有让大批革命干部站出来，挑起担子，才能形成真正的革命三结合，才能建立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权力机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重大任务是，让大批革命干部，包括一些犯了错误、不再坚持而又认真改正的革命干部，参加到各级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来，大胆地使用他们。

正确地对待干部，解决好干部问题，对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只有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共同的斗争目标下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不致因为干部问题上的分歧而无法联合。革命干部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立场上，虚心向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学习，并且用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原则，去帮助和教育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增强我们队伍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和其他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只有解决干部问题，成立革命的三结合的班子，才利于领导本单位的斗、批、改。没有革命干部的参加，本单位的斗、批、改是很难进行好的。即使是犯过错

误的革命干部，他们懂得在哪些地方摔过跤，他们犯错误的经验教训，也可以作为斗、批、改的借鉴。

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我们的态度是要教育、团结他们。这是我党的传统政策，毛主席的一贯方针。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运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教育和团结了广大干部，包括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很好继承和发扬。

毛主席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要深刻揭露和彻底批判的。但是，对待犯有错误的干部，包括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我们都要允许他们将功补过，戴罪立功。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帮助和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使他们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遵照毛主席的政策，对犯错误的人，应当一“看”二“帮”，在斗争中、工作中，在学习中考察他们，帮助他们。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多想一个时候。

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从教育着手、帮助干部的一种好形式。中央、各大区、各省市、各单位都要办学习班，让各级干部分期分批地集中学习。

各级干部要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要认识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起来批判他们的缺点错误，是正确的，必要的，是对他们的帮助、教育和挽救。对于群众的批判，应该采取热情欢迎的态度，应该有鲁迅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抵触、消极以至对立的态度。

老干部，要有强烈的革命的责任感，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要放下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让群众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看作是人民群众中的一个人。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做到老，学到老，改到老，跟到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晚节。

新干部，要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严格地要求自己，不脱离群众，经得起长时期的考验。要坚持参加体力劳动，要有民主作风，勇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断地向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作斗争，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做一个一辈子有益于人民的人。

应该看到，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一小撮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属于这样的人。他们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一定还会兴风作浪，挑拨离间，极尽其捣乱破坏之能事。这些垂死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要挣扎和“悲鸣”的，然而，这只是证明他们的日暮途穷和无比愚蠢。对这些人，对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对美蒋特务、苏修特务、日本特务，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毛主席早在三十年前就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锻炼和造就优秀的革命骨干的大熔炉。在这场烈火的锤炼中，一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保持和发扬我党光荣传统的、革命化的、充满朝气的干部队伍，正在茁壮地成长。他们必将肩负起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任，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伟大的贡献。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复课闹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阶段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革命师生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共同愿望。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所作的纲领性指示，为教育革命指出了根本方向：“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上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出来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受到了群众性的批判，这就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扫清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学校完全可能和需要由停课闹革命转入复课闹革命，广大革命师生应当集中力量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

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完成教学改革，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发挥广大革命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红旗，大家来动脑筋，想办法。

改革教学，必须同教学实践相结合，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离开了教学实践，就不知道怎么改。毛主席教导我们：“……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只有在教学的实践中，经过群众性的讨论、批判、革命和创造，我们才能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认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革命的规律，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

复课闹革命，搞好学校的斗、批、改，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各学校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教育每一个革命师生狠斗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以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责任感，彻底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一切革命同志务必保持警惕。

抓住斗私，批修这个根本问题，就要抓紧对革命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紧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深入批判，这样，复课闹革命就能够搞好，教育革命就会落实。

在复课闹革命的过程中，各个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各个学校革命的红卫兵，

要遵照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学习天津延安中学的经验，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帮助革命的干部和教师站出来，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在复课闹革命中，革命教师和革命干部应该时刻想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大事，应该有勇气有决心对旧的教育制度彻底批判，同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底决裂。应该认识到，自己是教育者，同时也是受教育者，学生有很多比自己高明的地方。要到学生中去，和学生打成一片，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的师生关系。

复课闹革命，也要贯彻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原则，提倡因陋就简，大家动手，解决教材和设备问题。要教育学生爱护国家财产。家长也要配合学校，加强对子女的政治思想教育。

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任务，是一个豪迈伟大的事业。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为武器，做教育革命勇敢的闯将，披荆斩棘，无所畏惧，有勇有谋，坚韧不拔，敢于破除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那种资产阶级的旧框框，敢于提出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新的教学内容、新的教学方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反复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建立起一个红彤彤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

1967. 10. 26；中发 [67] 325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反映，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到处申诉，无理取闹，趁机否定过去的罪行。中央重申过去的规定，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乘机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在押犯人，在劳改工厂、劳改农场的犯人，一律照旧看管，不准乱说乱动。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附：

青海刮起一股平反风省革委会建议中央发个规定

青海省革委会办事组负责来访来信的同志向记者反映：从青海省革委会成立至九月底，他们处理的来信来访问题，绝大部分是要求平反。据初步统计，八百四十七封来信中，有四百四十二封是要求平反的；来访一百六十八人中，就有一百三十人要求平反，目前已形成了一股风。

要求平反的，都是五二年到六五年的问题。他们有的是被劳改、劳教、退职下放、戴反、坏、右帽子的；有的是四清中成份上划和被打下台的干部，等等，其中已退职下放，反、坏、右分子和四清中成份上划、下台干部要求平反的为最多。

负责来访的同志讲：据他们初步了解和调查，除极少数人是属于政治迫害外，绝大多数人过去的处理是正确的。从当前看，主要是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趁新生的红色政权刚刚成立，企图混水摸鱼，无理取闹，趁机否定过去的罪行。如孟玉甫是国民党时期青海伪邮电局局长，曾参加国民党外围特务组织，五

二年已定为历史反革命，他也趁机起来要求平反，还要求解决生活问题。又如，九月从外省来的一个女人，一定要叫刘贤权司令员给她平反，别人不行，经调查后，才知道她是个右派，曾当过伪军官，早已定为历史反革命。

革委会常委、办事组组长张文芳同志说，由于当前要求平反的人特别多，影响了革委会工作正常开展，常委值班室曾一度无法值班。来要求平反的人中，有不少人是中央、国务院、中央各部接待站给的介绍信和批示，他们以此介绍信来压革委会。还大发脾气，说什么“有中央介绍信，你们为什么不给平反，你们叫什么革委会”。要求平反的人中有不少是外省和州、县的。他们来后立即要求平反，不平反就不走，有的一家人都来了。革委会只好将这些人介绍到原单位去，有原单位解决食宿问题。少部分没有工作单位的，只好由革委会解决。

鉴于此种情况，青海省革委会办事组同志建议：中央文革通知一下中央各部接待站，对下边上访要求平反的人一定要按中央规定执行，不要轻易批示；另外建议中央对平反问题作出几项规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周恩来对“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的解释

毛主席早在十六条的第三条中说：“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战略动员，好的战略。这几年没有打仗了，这次把青年人都动员起来了，青年得到了锻炼。看形势，看你站在什么立场，各有各的看法。如果你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立场，就能看到主流，看到本质，否则你就只能看到支流，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也是大好形势，主席思想深入人心。

乱得越透，解决得越快越彻底，为什么呢？因为把矛盾都暴露出来了，才好解决，反过来乱得不彻底，乱得不透，掩掩盖盖，反而解决不彻底。坏的东西暴露出来了，群众也得到锻炼，提高了觉悟。

毛主席这个话是在九月份讲的。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只有七个省市（北京、上海、黑龙江、山东、山西、贵州、青海）。现有八个单位在北京把问题也基本解决了（就是内蒙、浙江、河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甘肃）。以上一共有十五个省市到年底再解决十个单位（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河北、宁夏、天津、陕西、辽宁），这样就共达廿五个省市，全国剩下四个省、自治区（西藏、新疆、云南、吉林了）。整个部署到年底，都能看出来了。目前十个省市的代表也已到了北京。看来明年初春就初步解决问题了。×××首长说：到明年五月就解决问题了，第一年发动群众，第二年基本解决问题，第三年是扫尾工作。

在大联合中对待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不然会使走资派钻空子。我们军队和专政机关不要乱抓人。要专政，要抓人要和群众结合，叫他们自己觉悟起来，专政问题要和群众问题联系起来看，要走群众路线，要发动群众起来专政。

秦化龙（农林政治部付主任）就是小将们抓出来的。他在新疆被捕，叛变了。反动当局叫他签字，承认毛泽民、陈潭秋是苏联派来搞颠覆活动的。所以被新疆的反动派杀了。

毛主席一贯的干部政策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要教育群众，但对干部不能片面理解，要求要严格，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要开办训练班。伯达、康生、杨成武、吴法宪、邱会作五人负责，由林付主席亲自领导。这是战

略部署，不仅中央办，各大军区也要办。文的要办，武的也要办。靠边站久了，成了逍遥派了。干部站不出来，对工作不利。

不仅对干部应该这样，对红卫兵也是这样，要提高他们。小将们总强调大方向是对的，正确的。你们所做的具体事情都符合主席思想吗？南昌八一纪念馆有个八一军徽，那是好多黄金作的，小将们要去砸。历史有前有后，毛主席也讲过八一南昌起义不完全是贺龙、朱德，也有林总、刘伯承么。八一起义大方向是对的，向蒋介石开了第一炮，但没有很好地掌握政策，就地闹革命，有城市观念退出南昌到广州去，忽视农村包围城市，还想去靠外援（就是靠苏联）要跑到海（丰）、陆丰，这种作法，不是当时主席的思想，这样就说服了小将们不砸了，先强调大方向对，但具体作法是错的，就保不住大方向了。

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有了权，又有势，就不民主了。我们要用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对他们讲道理。

大联合是在毛泽东思想上联合，是有条件的，有原则的。

大批判，最后要大团结。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姚文元对人民日报社的讲话

主席指示最近可以发表几篇教育革命方案。主席又对教育革命作了重要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要很好的研究这个指示，每条每项都要认真宣传，认真落实。过去黑帮邓拓、吴冷西之流，最大的罪过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说了也没有用，雷打不动，或者是加以歪曲、扣压。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对待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一定要把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放到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先于一的地位。凡是毛主席、党中央规定要宣传的，一定要全面的，不折不扣的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上去。这是能不能按照毛主席的方向把人民日报办好的根本最重要的一条。

党报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是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领导的，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且应该宣传贯彻毛主席指示方面作模范，出了错误怎么办！那就要按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教导那样，发动群众、坚决改正，不能文过饰非。毛主席对报纸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主席的指示，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些是主席对新闻工作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报纸是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你们编的“新闻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我也学习了一下。过去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是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是同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牛鬼蛇神进攻，充当无产阶级喉舌。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不能忘记，现在要进行大批判、阶级斗争还会继续下去。如果我们忘记了阶级斗争，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那就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

为了使报纸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的喉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有力武器，一定要紧跟毛主席，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思想，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加强革命的组织性、纪律性。毛主席几次提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反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资产阶级新闻是

反映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的小报登了陈伯达和我的谈话，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可是实际上是这样做，登我们的谈话，没让我们看就发表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刘邓陶及他们在新闻界的代理人，他们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一定要彻底批判。

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战略上，在方针上，在纲领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按照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口号进行宣传，不要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口号以外提出标新立异的东西，如揪军内一小撮，今天的报纸没有乌兰夫的名，是中央决定的，是请示了主席的。不要经常提新阶段、新高潮、伟大的转折等等。文化大革命不过几个阶段，那有那么多的新阶段，讲多了把人都搞糊涂了。这方面要紧紧地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有些事情要多研究。

另一方面当主席提出新的战斗任务时，要紧紧跟上。毛主席这次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文化大革命所作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要紧紧跟上。那一些能公开报导、那一些可公开见报，那一些不能公开见报，要有区别。但思想要跟上，形势是在不断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盾是明确的，就是斗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但是各阶段着重宣传什么，要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例如，毛主席最近提出了党的问题，那些是可以宣传的，那些是不可以公开宣传的，要研究如吸收新党员的问题，可公开宣传，处理党员，恢复党的生活，就不好公开宣传，这些完全不研究，我们的思想落后了，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严格按照主席的战略部署进行宣传，不要标新立异，另一方面主席提出新的问题，提出新的战斗口号，要紧紧跟上，不要落后。

无产阶级报纸，一定要走群众路线，这是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的，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新生事物。毛主席最重视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如首都三司夺“私”字权的文章、贵阳棉纺厂的经验、上海“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上海女六中的经验、天津延安中学的经验都是毛主席最早发现的，批给报纸发的。这个方面我们要向毛主席学习，再三向毛主席学习，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定要使群众的首创精神得到发扬。刘少奇压制群众的首创精神，搞白色恐怖。

现在国内新闻报导越来越长，青海西宁的消息写得好的比较短，应该这样的明确突出。（唐平铸插话：是不是根据教育革命写几篇社论？）主席指出，在教学革命中先积累些经验再写社论。第一篇社论起了很大作用（指大、中、小复课闹革命）唐平铸：谈到报社斗私批修问题，希望在斗私批修中认真学习主席的新闻路线，彻底批判刘邓的邓拓、吴冷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提高觉悟，批透。

你们编的“新闻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引的主席话，有的准确，有的不准确。编大事记很好，要很好的重新编一下。毛主席的新闻学说，新闻思想是非常丰富的，非常宝贵的。毛主席不仅在理论上解决了新闻路线，而且在实践中解决了问题，领导了我们的斗争。主席的新闻思想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非常深刻的，是很具体，很尖锐的。主席对办报所作的一系列方针指示，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我们要看到主席新闻思想是宝库，一定要认真地、很好地学习。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十一月九日晚和十二日晚，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召集中直文艺系统部分单位的军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开了两次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吴法宪等同志。在九日晚和十二日晚的座谈会上，江青同

志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稿，就是根据这两次讲话整理的。)

我觉得很对不起，很长的时间没有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同志们对我们有什么意见，我是能够谅解的。因为同志们不了解我们的情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全心全力地跟同志们一块在搞戏剧革命、音乐革命。这是一个很细致的工作，很严肃的工作。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所能办到的，一个样板，要立起来，不仅内容应该是革命的，而且应该在艺术上也是站得住的，否则，人家就要复辟。这需要很大的精力。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我反复地对有的同志讲过。自从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工作情况变了，我的精力就又全副用在别的方面。所以，你们搞的戏、音乐、电影，我就顾不上看，不能象过去那几年那样，和同志们一起专门闹文艺革命。这一点说明了，同志们也可以原谅。

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工作不是做文化工作，在文化界只是打遭遇战。进城初期，我是遵照主席的教导，想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树立两支队伍，一支就是创作队伍，一支就是评论队伍。但是，因为在这条战线上，人家专了我们的政，他们用各种手法不执行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艺路线。而我们呢，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又有一个工作岗位的问题。主席在这方面，那是很注意的！我不过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只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过程中，才能基本上解决文艺界的队伍问题。

在座谈会上听了一些发言，我觉得发言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能够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事实上也是不平衡的，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个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有的地方搞得比较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比较差一些，有的地方看起来是很平静，实质上是一潭死水。针对这样的情况，不能一律说都没搞好，都要重新大乱。象新影，象芭蕾舞剧团，这是属于捂着着的，没有真正地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当然也就不能够很好地搞斗批改，大批判。这样的单位，再乱一下是有好处的。乱敌人！乱敌人！！有些单位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但还没有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就应该在进一步巩固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通过辩论、批判，解决干部问题，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进行斗批改和大批判。对于有些搞得比较好的单位，革命的大联合搞的比较好，也搞了革命的三结合，那就要全力以赴搞斗批改、大批判。

总的说，是要树立革命队伍。树立队伍在文化界有这样一个问题，阶级成份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一个人是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的，还是可以看表现的。主席教导我们，树立阶级队伍，是要看阶级成份的，但也不唯成份论。大多数青年、革命小将是会跟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的；大多数干部、党员，也是会跟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满怀信心。

搞革命的大联合，最重要的是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两个组织都混杂了坏人，最好是不要你这个组织去捉那个组织的人，那个组织来捉这个组织的人，最好是由他自己的那个组织调查研究、自我批评，这样就容易搞联合。否则，每天吵架，这样敌人就容易利用。在这个方面，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同志们也学习了，不多说了。总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事情，最好是多做自我批评，少批评人家；要是敌我矛盾，那就要斗倒、批臭。

文艺界是比较复杂的。从你们的发言里以及从你们送给我们的材料里，都可以看到这点。现在搞深搞透了没有？我看没有。因为敌人是很狡猾的，他们有一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一套，它又弄上一套，所以我觉得对文艺界要作深入的调查

研究。

要稳、准、狠——对敌人；对自己，不要老打内战，对朋友也不要老打内战。打内战，就会被敌人利用；敌人有时候就是在背后操纵你们打内战，他就乘机溜了。这一点你们要识破。

新影厂最近搞了一个现代革命京剧的纪录片（叫现代革命京剧集锦）。当然你们是好意，也是花了功夫的，据说你们不是在舞台上拍的。但是对这几个戏的主题思想、它的艺术性在什么地方，你们都没有摸透，就搞了，每个戏搞了一点。我昨天晚上看了以后，觉得不安。你们是不是还能够补拍一点？现在这样子，到全国去放，工人、农民、士兵如果没有看过这个戏，他就不懂了。因为他们不象我们是摸熟了这些戏的。你们不要急着放映，你们讨论一下，看怎样把它改好。

北京京剧一团谭元寿同志，他就很急，说没有搞出戏来，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象过去那样很粗糙地搞出来，那人家还是要打倒我们的。宁愿我们这八个样板戏暂时占领舞台。这八个样板戏就已经把帝王将相、资产阶级赶下了舞台，赶下了银幕。而且在芭蕾舞、交响乐方面进行了改革，虽然还有很多缺点，有许多需要探讨的地方，但这在世界上也是震动的。象芭蕾舞团这次改《白毛女》——《白毛女》我相信一定能改好——由于急躁，搞得就很粗糙，这样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这我有责任，因为我没有很多时间和同志们在一起搞。但是你们自己，是不是应该组织起来，认真地进行这个工作。

这里有一个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刚才有人说，要组织小分队下去搞一些片断和小节目给工农兵看，这当然是可以的。不过，现在的中心任务还是斗私、批修，组织革命队伍，否则，是不可能搞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符合工农兵需要的东西的。斗私、批修是很艰苦的事情，如果有人企图利用下乡下厂的活动逃避它，那就更不对了。这种思想，同志们不一定有，不过应当警惕。一个民族，总要有它自己的艺术尖端，现在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可不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艺术尖端？大家知道，搞一个样板戏是不容易的，千锤百炼，总要改二、三年才成。因此，不可能每一个戏，每一个文艺团体搞的节目都搞成样板。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当然，也不能孤立地搞尖端，尖端总是在普及的基础上出现的、提高的，而且尖端也是要普及的。例如，我们的革命样板戏，就要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通过拍成电影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因此，我觉得同志们还是要安下心来，搞好斗私、批修。这在当前说来，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

在目前，十一月还有半个多月，十二月有一个整月，春节前还有二、三个月，在各个单位里，是不是把队伍先树立起来，把敌人狠斗狠批，批倒批臭！否则，创作思想很混乱，那就不能搞创作。在这个时期，有的单位要乱一下；有的单位乱够了，就不一定再乱了。有的单位乱一下，乱敌人，不是乱我们，这是完全应该的。把矛盾掩盖起来，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也不正确。我们不怕乱，但是已经搞的比较好的，搞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就不要再去乱了。这就是说，我们要有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革命同志、革命小将，既要有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风格，不怕乱，顶得住，受锻炼；又要有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动脑筋，科学分析，克服和排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真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还有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问题。我觉得有些革命小将的见解是很好的。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哩！有一个小将讲，有的人只搞五十天，不搞十七年，这实质上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这个看法很深刻。同时把五十天同十七年分割开来，也就是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

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分割开来，这也是不对的。当然，对三十年代、对十七年、对五十天，都要一分为二。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五十天，那就更多了，纷纷起来反抗文艺黑线。工作队实质上是保护十七年，保护三十年代，甚至保护二十年代。有一些青年同志和革命小将，水平比较高，看清楚了这个问题。

关于参军的问题，你们不要着急，现在林副主席已经下命令，请杨成武同志他们军委办事组，挑选几个军、师一级的干部来管这个事情。报告你们这么一个好消息。你们如果一天老是参军呀参军，就忘了别的了。

我今天没有准备，也许我讲的不完整，有的错了，同志们批评我。我就讲这样一点，以后我们再座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 11. 13；中发 [67] 354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晚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所作的讲话很重要。这个讲话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分析了当前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并对文艺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和今后的任务作了重要指示。

现将这两次会的讲话记录稿发给你们，请组织文艺界、新闻出版界、军队的文艺单位、大中学校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学习，并结合各单位的具体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发至县，团级）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1967. 11. 15；中发 [67] 347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发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请你们加以讨论，并召开一些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征求贫下中农和干部的意见。我们希望你们能在半个月将意见告诉我们，以便修改定稿。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一）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夺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当前农村形势大好。只有一小部分受灾地区和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地区的情况不好。

（二）今冬明春农村基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继续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原则进行。斗争的矛头要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在各地的代理人。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不要派工作组去指手划脚，学生也不要串联。必要时，可由人民解放军组织少而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三）农村各基层单位，要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大社员、干部和民兵都要参加学习。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

进行下面教育。要深入地学习“老三篇”，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要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所宣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桃园经验”等等反动谬论，他们对干部实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恶阴谋，以及他们进行的其他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揭深，批臭。同时，要把学习班内的学习，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

(四) 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要反对投机倒把，反对分田到户，反对闹单干。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也不要搞捐献。

(五) 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在需要夺权的生产大队，应当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用改选领导班子的方式解决。应当肯定，农村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六) 革命群众要提高阶级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反攻倒算，不准他们在群众中造谣挑拨和破坏。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山头主义、防止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其他坏人挑动武斗，挑动群众斗群众。

(七)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根据这两个文件进行的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必须肯定。四清运动遗留的某些问题，可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解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干部要到群众里面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成果，就是极大地加强了干部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极大地发扬了我党一贯地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群众前进的优良传统。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干部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各级干部，必须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阶级斗争的历史说明了：我们的干部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才能引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的存在，干部如果脱离群众，就有可能被阶级敌人腐蚀侵袭，就可能出修正主义。因此，干部队伍的状况，干部是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加强，关系到我们的政权的命运。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可摆架子。”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但是,也有少数干部,这些年来,自以为“官做大了”,自以为了不起,摆架子,有的还喜欢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犯错误,受到群众的批判,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一切干部,不论是老干部或新干部,犯过错误的干部或没有犯错误的干部,都要深刻地记取这个教训。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根本上说来,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我们制订政策的基础,是领导思想的源泉。党的任何工作人员,他们好的思想、意见、计划和办法,只能是比较正确地集中了广大革命的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智慧。如果有人不是这样,而是主观主义,不同群众商量,不向群众学习,那就一定会碰钉子。

到群众里面去,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这不仅是我们的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根本立场、根本态度问题,是一个世界观问题。

资产阶级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颠倒历史,把人民群众看成是“无知的群氓”,把自己看成是高人一等的“官老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就是这样一批害怕革命群众、镇压革命群众、背叛革命人民的家伙。我们的干部,必须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同他们彻底划清界限,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中的一个人,当作人民忠实的勤务员,当作人民的儿女。

干部到群众里面去,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是一个“斗私,批修”的过程,是一辈子的事。你今天同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你就能获得旺盛的革命斗志;你明天削弱了同群众的联系,思想感情就会起变化,就会停滞起来。老干部,新干部,都要警惕这一点,要终身坚持到群众里面去,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干部犯错误,往往是从脱离群众开始的。要改正错误,根本的途径,是到群众里面去,把群众的批评作为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的巨大推动力。少数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只有向群众作自我批评,并经过群众的批评、教育和经常监督,才能得到改造,才能弃旧图新,将功补过,重新参加革命的行列。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最集中地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抓住了当前革命运动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广大革命干部,必须到群众中去,直接向广大群众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传达毛主席的声音,把毛主席的指示迅速变为广大群众自觉的革命行动。同时,也只有到群众里面去,才可能真正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深刻地理解毛主席伟大的战略思想,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的问题不断地提上议事日程。我们要领导好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就要和群众在一起,经常研究运动中的新动向,新成就,新经验,新问题,善于发现和提倡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大力支持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的干部,对待群众运动,要积极主动,善于引导,不要尾巴主义;对群众运动中发生的问题,要坚持原则,正确处理。

在当前大好形势下,干部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新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社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是毛主席的方针,党中央的方针。全国各学校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积极复课闹革命,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大道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初步的经验。

坚定不移地贯彻复课闹革命的方针,是当前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党中央指出,复课闹革命,就是要“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的实践中,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党中央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正确途径。按照这个指示去做,决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复旧”,什么“改良主义”。

复课闹革命,是在批判中教,批判中学;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就是说,要在教学实践中,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教育战线的代理人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这种教学实践,是革命的实践,是教育战线上一次伟大的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显然,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都一定要发动群众,反复调查研究,反复实践,反复试验,不断总结,不断提高。我们要欢呼这种一边教学、一边改革的做法,欢呼这种在教育革命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正在逐步完善的新生事物。

红卫兵小将们,我们不是常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吗?复课闹革命,这就是当前学校中斗争的大方向。当前在学校中,一切抵制这个大方向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必须澄清。

进行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业,需要做艰苦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也正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我们一定用全副精力来进行这一工作。有耐心,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改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任何脱离实际的空想,消极地等待一切都改得彻底了再复课,而不愿意做深入的批判,做认真的实践和研究,付出艰巨的劳动,那将是一事无成的。

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指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因此,复课闹革命,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一定要让愿意革命的教师和干部站出来,一定要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

党中央指出:“各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外,有些人过去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工作。”广大革命的教师和干部,同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工人一起,以“斗私,批修”为纲,投身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实践中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气象,不能把它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混同起来。我们应当热情地欢迎他们,相信他们,支持他们。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

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旧的习惯势力，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进行抵制和破坏。我们队伍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也会干扰复课闹革命的正确方向。对这点，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立竿见影》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为人民解放军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亿万军民，勉励他们紧跟伟大舵手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指出：“对毛泽东思想同志，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学习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立竿见影。就是说，要用毛泽东思想之“矢”，射当前革命斗争实践之“的”。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是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你要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就必须理论和实际一致；你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就必然理论和实际分离。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学了毛主席著作，学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要用，要立竿见影，要雷厉风行地见之于行动。要联系自己的实际、本单位的实际、社会的实际，坚决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广大工农兵群众，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于毛主席的每句话，每个指示，都应该努力紧跟，深刻领会，联系实际，句句照办。这样，就是充分体现了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学了毛主席著作，用，还是不用；学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执行，还是不执行，这是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阶级感情问题、根本态度问题。当然，用，有一个提高的过程。但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总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学一点就用一点，学用结合，立竿见影，不断地改造自己。这样的同志，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

有的人言行不一致，口头上说同意，行动上却另搞一套；会上讲的漂亮，会后又那样去做；甚至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派性服务。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这种言行不一致的情况，正如毛主席在二十多年前指出的，“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

要用，要解决问题，就是要斗私，要批修。

大家要带着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进行本单位斗批改等方面的活思想，提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去斗私。把资产阶级的“私”斗下去，把小资产阶级派性克服下去，学习毛泽东思想，就能够立竿见影。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社论）

3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

1967. 12. 07；中发 [67] 373 号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军区，各地大、中、小学校：

现将《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这一极其重要的文件发给你们。这是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纲领，这是我们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无比锐利的武器，这是复课闹革命的根本指针。它不仅对于大、中、小学校的教育革命，而且对于各条战线的斗、批、改，都具有十分巨大的指导和启示作用。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对于破除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这个文件中，对于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教育方针、教育制度，直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等的改革，都作了极其深刻和精辟的分析，处处闪耀着毛主席唯物辩证法的天才光辉。望你们接到这一文件后，立即在学校中掀起一个学习和执行这一文件的群众运动，按照毛主席所指出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大大推进一步。各报刊也应以此为指针，组织有关教育革命的理论批判文章及宣传报道。

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当前，全国人民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正在掀起蓬蓬勃勃的高潮。

各地的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街道，都普遍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大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两派或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一起，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我国革命群众创造的具有伟大政治意义的新事物。它是帮助老干部、新干部、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好形式，是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巩固革命的三结合，密切上下级关系的好办法。

如何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国许多先进单位已经创造了不少好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必须建立毛主席亲自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好学风。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革命的好学风，最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办好学习班，就是要以毛主席的“老五篇”和最新指示为思想武器，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指针，解决革命大联合的问题，解决革命三结合的问题，有力地推动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定要认真执行，做到条条落实，句句照办，学用结合，立竿见影。这是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学了不用，说了不做，是完全错误的。

建立革命好学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

毛主席在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中说过：“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象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象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这些话说得多么深刻、多么恳切啊！这岂不是切中我们革命组织中一部分负责人的要害吗？

毛主席最近还指示我们：“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我们有些同志，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往往是难免的。有了缺点、错误，就应该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改正。自觉地改正错误，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志之一。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则是腐朽的资产阶级作风。革命运动中出现反复，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对于一年多来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某些曲折，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不要彼此无休止地追究对方的责任。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有利于共同对敌。

实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自我批评，是很不容易的。斗自己头脑中的私，要自觉，要主动。决不能对自己轻描淡写，文过饰非，而对别人倾盆大雨，无限上纲。

干部、群众一起学习，军队的干部、战士一起学习，互相启发，互相帮助，互教互学，这也是我们要建立的革命好学风。

干部和群众一道斗私，批修，把自己的思想同群众见面，取得群众的帮助，从群众中吸取营养，这是密切上下级关系，促进干部思想革命化的一项重要措施。群众看革命干部要一分为二，要热情帮助干部，也要学习他们的优点、长处。要努力帮助更多的革命干部站出来，参加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用毛主席提倡的革命学风，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于进一步组织和教育我们的阶级队伍，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产生极深远的作用。

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要发扬革命的好学风，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全党、全军、全国继续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这是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社论）

二、研究资料

《政治旋涡中杨成武》（作者：董保存）

第二十八章 要团结大多数

毛泽东此次南巡，第一站是武汉，两个月后，他的专列又悄悄地来到这里。沿途他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回北京的火车上，杨成武整理了他沿途谈话的要点，这就是当时覆盖了所有媒体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1967年9月17日上午9点40分。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停在南昌的飞机场，车厢里坐着江西省的干部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他们几乎都着军装。

程世清首先汇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95命令后十几天的时间，收到了群众交上来的枪达五万多枝，他们用这些枪武装了一个工人团，两个营又一个连。

毛泽东插话，哦，武装工人，这个好。

程世清继续汇报说，有几个军分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赣州、抚州两个地区的个别领导人，支持保守派，发生了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开枪的严重事件，现已按中央8月10日的文件进行了处理。

毛泽东说，抚州发生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中国有没有内战？有没有武斗？这就是内战，这就是武斗嘛！

程世清说，周总理说，抚州事件是军事叛乱。

毛泽东说，对的，是军事叛乱。毛泽东又问，过去他们也是两派对立？是否过去的对立领导上批评了他们？这次要从教育入手，人武部、军分区好人总是多数，有的已经犯错误，还是要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当他们汇报到抚州军分区，政委王玉义一听到毛主席的批示后就说，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受骗了。他在紧急关头坚决不同意向红卫兵和战士开枪。

毛泽东说，对这个政委要保，他听话嘛，看到了中央的决定，他们就听话了嘛！在紧急关头他就坚决不同意开枪，不同意打嘛！

“造反派报复思想不好，造反派的领袖要注意，现在对抚州军分区的司令处理也要注意，不要坏对坏，他对我们坏，我们对他也坏。”

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主席在上面批示：此件看过照办。传达到群众以后，群众很快就变了，拥护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说，各省去凑出一个协议来吧。

他又问起一些他知道的干部，他说，黄志珍、白栋材怎么样？你们要多争取几个人嘛！他们有错误是确实的，能改就让他改……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好事

还是坏事？

毛泽东明确说，现在要批评极左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种人不多但能量很大，与社会上的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

“总之，要团结大多数么！”毛泽东做个手势，再吸燃香烟，然后放缓声音：“过去我们有多少山头，许多互相见面都没有过嘛！红军时期有江西苏区，有湘赣，有闽浙赣，有湘鄂赣，有鄂豫皖，还有陕北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有晋冀鲁豫，有华北和山东，好多个根据地。在座的同志过去我一个也不认识嘛！”

毛泽东用夹了香烟的手指指杨成武：“你们的总长杨成武同志，我在长征中才逐渐认识的嘛，毛儿盖过草地前才熟。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哪一个为核心团结起来。”

毛泽东说，核心不是自封的，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有的学校造反派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泽东说：“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还能挽救的都要挽救，极少数人要顽固下去就顽固下去，也要给饭吃。”

第二十九章 “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

江西的同志汇报说野战军在江西威信高，旗帜鲜明，已有五百多人被右派打了。

毛泽东说，右派打你们，左派不打你们，这个阵线很清楚啦！

说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江西省一级还是要站出一些干部来，要消灭造反派是不可能的。有的人到部队去挑拨战士与干部的关系，说你们战士和干部不一样，干部钱多，生活好等等，这是不能得逞的，很多人想当兵还难呢，军队是个学校，每月还有六块的津贴费。

他又说，军区搞“四大”不能搞得太苦了，要文明些，我是对那些不雅致的做法翻案的。把我们内战时期斗土豪劣绅的一套来用，是不对的，这是干部嘛！过去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十几年来从未曾要人武部军分区的干部到北京集训一次，现在你们先集训一下，中央也应该开集训班。

“内蒙独立营训练后很好，回去后就支左了。有些右派你们也不要看得过死了，有坏人是极少数，训练后可以转变，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包括左派。现在到处揪赵永夫、谭震林式的人物，哪有那么多呀！保守派，右派，他承认错误了，自己又回来了就加以保护。

最后他对江西的同志说，你们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现在的理抓在你手里，为什么你还这么凶？这样你就输了。

1967年9月16日中午11点，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杭州。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南萍、空5军政委陈励耘应召前往汇报。参加接见的还有张春桥、汪东兴和余立金。

“主席！”南萍敬礼，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一边握手，一边打量南萍：“南萍，你就是南萍么。你的祖宗是不是南霁云啊！”毛泽东嘴角流出笑：“你就是南霁云的后代，你处理

这些事情有经验。”

“我是照主席指示办。”南萍以为毛泽东是说他处理温州武斗和全省支左问题。

“主席！”陈励耘敬礼，然后用双手去握毛泽东的手。

“陈励耘，你应该是在以南萍为中心的领导下，你的空 5 军比南萍的力量大就不好了。是不是啊？”

“是。”陈励耘恭敬回答。

“空 5 军和 20 军要互相学习；20 军向空 5 军学习，20 军为主嘛，空 5 军要服从。”

毛泽东朝着刚刚坐下的陈励耘问：“你服从不服从啊？”

“服从。”陈励耘答。

“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就是互相学习进行自我批评，搞好上下级关系；另一种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士兵怕连长，要教育连排长，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一个连长都是了不起呀，如果出了一个营长那就更了不得啦！”毛泽东睁大眼睛表示“了不起”的神情。他又说：“我那个村子里出了个师爷就了不得了。我们的一些元帅，总是训人骂人，如果你真有理就不要训人了。现在我们的干部都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我在上海就反复讲这个上下级关系问题。一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南萍，你挨过整没有？”

“没有。”南萍回答。

“这是一大缺点。”毛泽东指点南萍，尔后问陈励耘：“你挨过整没有？”

陈励耘回答：“三反时挨过整。”

“好！”毛泽东声音很高，“红卫兵、工厂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犯个错误好。南萍你们为什么要派独立一师师部到温州去？”

“温州军分区瘫痪了，”南萍解释，“派他们去主持温州的工作。”

第三十章 毛泽东的一番议论

听南萍说温州军分区瘫痪了，毛泽东说：“越瘫痪越好，烂透了的就好解决。”

听了南萍对温州形势的汇报，毛泽东问：“为什么‘温联总’又分三路向温州城反攻？”

南萍说：“‘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如何对待另一派，在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的态度对待‘温联总’。”

毛泽东点头：“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对龙潜和张秀友不要这样搞，什么喷气式、罚跪。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地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我们对黄伯韬、王耀武、杜聿明都不这样搞嘛！我们不要这样搞。上海斗陈丕显、曹荻秋，说比较文明，但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人家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二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的作风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被搞乱了，被破坏了。”

毛泽东告诫南萍和陈励耘：“你们对两派的意见都要听。红暴的观点在一家就有斗争，有的儿女是红暴观点，有的儿女是革联观点……要一分为二，一家也

分两派，两派意见都要听。我家里就有两个孩子是造反派，两个孩子是保守派，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过去八条命令中就有一条要教育好孩子，教他们不听，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教育他们。”此时毛泽东谈到了干部子弟，他说如果工农子弟不把他們看成朋友，那他将来就没有希望。

毛泽东要南萍、陈励耘转达他对 20 军和空 5 军军长、副军长的问候，他们向毛主席反映空 5 军的黄军长表现不大好。

“不要只看他一时一事，他打过仗的嘛，一个同志犯了错误，能帮你们一定要帮，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红卫兵一风吹不好。对一些干部不放过，也不能搞得太苦了，什么喷气式、挂黑牌罚跪、抄家，这些要禁止。”

毛泽东又是一大番议论：“江西有几个山头，什么中央苏区了，湘赣、闽浙赣了，等等。我就生怕一、三军团有的同志犯错误，生怕四方面军同志犯错误，结果出了陈再道。至于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红卫兵要打倒去打他的，我保是保我的，这是一个大局。矛盾是有的，统一还是要统一。七次大会选中央委员，八次大会选中央委员都选了王明。现在我们要恢复那个传统，人家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现在打倒一个人太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主要还是要搞训练。”

“张闻天当了十年的天子，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他要管军事。我告诉他：你不要管。结果呢？他到下边去煽动，后来他又和高岗搞到一起，他又批准 62 个叛徒自首。他在瑞金时，他们内部分化，他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不站在项英一边的，但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这个传统。他提出什么高帽子、挂牌、罚喷气式、抄家，他们引证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那是对地主、土豪劣绅嘛！现在这是干部嘛！几十年的干部他是做了一些好事。”

毛泽东继续评论干部，这种评论并非全面，只是即兴评点：“陈毅打过仗不怎么突出，比较右。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给照会给陈毅本人。现在又搞北大，并牵扯到蒯大富、韩爱晶，有些学生和工人领袖不稳定。”

第三十一章 第二次讲到极左问题

毛泽东谈着谈着，又谈到了南霁云。

唐朝有个南霁云搬兵。有个叫张勋的被安乐生杀了，南霁云去搬兵报仇，搬不到兵就不走。他说：“我城里老百姓没吃的，不发兵我也不走。”

毛泽东再次望住南萍：“你南萍是不是南霁云的后代呀？”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接着，毛泽东又从他长期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经验，谈出他决策各部队调防的理由：“军队在一个地方久了不好，他舍不得亲戚朋友，姻兄大姑，金银财宝，包袱太重了，可以寄给家里嘛！或者是送给贫下中农嘛！不要爱财如命。”

毛泽东将身体仰到靠背上，吸着香烟，带着结束的口吻讲了最后几句话：“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搞七擒，还要可以搞八擒嘛！一次反围剿杀张辉瓒我就不赞成，主要是彭德怀要杀。张辉瓒不仅是个师长而且是个总指挥。”

9 月 18 日毛泽东的专列来到长沙，这次没有进城，而是停在了大托铺。

9 月 18 日上午 10 时 20 分，在专列上听取了四十七军长黎源，和湖南省的领导干部华国锋、章伯森的汇报。

黎原汇报说：“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五万多，数量比较大，下一步如何搞，还是个问题。”

“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毛泽东说，“他们有这么多的工人，对他们的头头就尤其要政策恰当。”

“沅江的形势还比较紧张，还在打仗。”

毛泽东说道：“打一打也好，很多县去一去也好。现在他们动员农民进城，每天 15 到 30 个工分，有的一天给 100 元，打死了作为安家费，没打死就白拿了……”

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他们是用这个办法动员农民进城。”

黎原说：“常德保守派进攻常德城，经过说服以后撤退了，结果左派又报复，反过来向农民进攻，农民就向城里边进攻，后来我们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农民说服回去了。”

“好，这个好。”毛泽东点头赞许。

当黎原汇报省军区的新造反派压老造反派时，毛泽东插话说：过去他们是保守党的，现在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

这是毛主席南巡以来第二次讲到极左的问题，可惜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在讲到抢枪问题时，毛泽东问：“枪，基本上是抢的还是发的？或者是以借的名义？”

黎原和章伯森实话实说：“是军区发的。”

“枪发给左派了，现在他要送回来，给你们保管好了枪，不然右派又抢走了，这是个好经验。”

毛泽东说，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铁路通了——这是指衡阳以南的铁路通车了。

黎原说：“通是通了，现在有一个红旗军的问题不好解决，他们按行业联合，组织也恢复了，他们说没有翻身，政治上没有地位。”

毛泽东说：“看一看吧，如果做坏事再说，世界上的事不要做得那么多。”

湖南的同志说：“林副主席指示过，不要单独组织荣复、转业军人的组织。”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条指示未加可否。

毛泽东讲着，将目光转向华国锋：“有一个毛华初和高凯，就是毛泽甫，他们怎么样？”

华国锋一直在毛泽东家乡工作，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悉。他说：“都还好。”

“毛新民一批都被杀了。”毛泽东开始谈他家乡，“韶山说都被保守派占了，如果占了，47 军可以分几路打进去。姓毛的过去有 48 乡最能打仗，谁请他们去参加，一打就胜了。”

第三十二章 在湖南听取汇报

毛泽东又谈起他的父母：“我的父亲的哲学是两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不赞成，父亲不得人心，母亲得人心。父亲死的时候没人送葬，母亲死时有二三百人送葬。母亲说别埋在一起了，结果还是在了一起了。有个土坟，没有立碑写传……”

毛泽东问章伯森：“以后你还同张平化，同军区顶？‘工联’没有后台是不

行的。”毛泽东问这些的用意是指章是“工联”的后台，不过没有挑明就是了。

章伯森说：“湘江风雷派掌握实权的是张家政。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军医，有许多会他的父亲都来参加了。现在‘青年自卫军’、‘孙大圣’、‘井冈山’等都退出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一般的组织。叶冬初是湘江派里的另一派，实权不好由张家政掌管。”

毛主席讲，现在群众的消息灵通。

黎原和华国锋同时讲：“中央关于不准抢夺军队枪支的九五命令一发出，大家都很拥护。群众开始想枪，抢枪，抢到枪后又怕枪，怕被抢去枪，枪就变成个负担。”

毛泽东一番感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解放军有四十多天不敢拿枪呢！军队不仅‘四不’，还有‘五不’，不敢拿枪呢！过去军区设巡逻队是示威的，结果没威信了。”

黎原插话说：“独立师过去中毒很深，现在湘派派人去作报告，转得比较好。这里军区搞四大，一个 613 医院就有三十多个组织，你造反呐，我就不做饭，你开处方我就不拿药。都乱套了。”

毛主席说，你们军部已经来了，做群众工作嘛！你们不谈不行，自然，谈呢，又要占很多时间。说到这里毛主席又问：“株州空军部队过去态度不那么明朗，现在怎样？”

“八月份才转过来。”

毛泽东说：“株州的形势好，47 军一开始支左就支对了。”

华国锋说：“桂林、株洲，22 个师支左支对了，另两个师支错了。衡阳以南的铁路已经通了。”

毛泽东依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不通的反面就是不通。”——这当然不是指铁路。

“浏阳现在有一千多带枪的保守派组织，是副省长孙国治带着跑到那里，其中有几十个省级的干部。”黎原和章伯森汇报。

“王治国身体不好，何必斗得那么苦。问题是军区错了，影响他们，他们又影响军区。地委、县委两级都瘫痪了，不过现在照样种田、开工。”毛泽东说。

“农民照样种田。”华国锋回答，“今年可产粮油 250 亿斤至 260 亿斤；今年棉花可产 180 万担，去年是 150 万担。”

毛泽东说，“什么农口，农业部、农垦部，什么宣传部、组织部、文化部、高教部都不起作用。我们是有意识地叫他不起作用。过去是庞大的组织，还有坏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在领导，还有公检法，没有他以为不得了，我一听到公检法垮台，人就高兴！听说富治同志这次才说了几句话。”

黎原说：“湘潭军分区司令赵仁山不好，在北京还欺骗总理。”

毛主席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这么多人武部，不搞运动就搞不动。过去延安整风，是自上而下进行。现在我们队伍大了，干部多了，而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当官做老爷，形式主义，说假话，谎报情况等时有发生。有的干部又老得不得了，老革命，他有兵权，你不发动群众怎么搞得动？只有从下到上发动群众，让群众讲话，让群众在运动中来评定鉴别干部。

第三十三章 毛泽东重返武汉

关于干部问题，毛泽东说：“当然大多数是好的，要教育他们，其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练班，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

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黎原请示：“我们每个军分区需要有一个营的兵力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现在分区都瘫痪了，想把两个工程兵团用来暂时担任湖南各分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好，同意。”毛泽东点头，再次讲他那每到一地都有要讲的话来作为结束语：“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思想不通。一派压一派，越压他越是反抗。”

毛泽东讲到这里思索了一下，讲了一段历史：“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压出了几十万红军。不然，只叶挺一个团。以后自己犯错误，打败仗，长征实际是被蒋介石赶出来的。你越摸不得，人家越要摸你。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枝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枝枪。”

黎原也是从军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他说：“各个群众组织会造枪坦克等武器，这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听了很是赞赏。主席说：“前天我在杭州给浙江的同志说，大学、县、工厂都能造武器，将来打起仗来就好了，都有用。你也是这种看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确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 7 月到武汉，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来是休息的”。后来，由于谢富治、王力不听主席的话，捅了一个马蜂窝，激发了“七·二〇事件”，林彪又将它定性为“一场反革命军事叛乱”，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迫使毛泽东离开武汉，去了上海、浙江、江西、湖南等地，两个月后又重返武汉，来到了东湖宾馆，住在他原来休息的那幢房子——梅岭一号。

20 日晚 6 时至 8 时，毛泽东在他的住地，接见新到任的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政治委员刘丰和武汉市的方铭发及警备区的领导人，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均在座。

毛主席听了两位军区新头头的汇报。对他们的兵力部署，以一个师担任武汉警备，一个师分到各军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一个师担任铁路护路，一个师在机场，并明确分工，武汉市由警备区负责，军分区由省军区负责，等等，均表示同意。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不像以往一边听，一边问，一边插话，做指示，而是待他们讲完，然后就几个主要问题，谈了他的看法。

毛主席首先谈形势，他说：看来湖北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黄冈、黄石、恩施、孝感都比较好，荆州是打内战。他问曾思玉、刘丰，你们可不可以到这些地区走一走？毛主席指示说：就是荆州，恩施、襄樊也可以去看看，同干部谈谈，吹一吹风。

毛主席要武汉军区领导武装工人和红卫兵。主席说：你们按中央 9 月 5 日的命令，要他们先交枪，然后再发给他，他会谢谢你的。

主席对抢枪的事，沿途谈了几次，但都没有把它看得多么严重，怎么地不得了。他对曾、刘两位具体分析说：抢枪、发枪，其实发多于抢。抢和发，两种一比较，发的最多，真正抢的不多，不是老虎借猪，最后，还是送还了。人民群众是好讲话的。

毛泽东向曾思玉、刘丰交代：你们对待犯错误的班干部不要搞得太凶了，独立师不要整得那么苦。军区司政后的班干部要用教育的方法解决，科长，副部长总留了一些吧，不要整得那么苦，犯了点错误没什么要紧。

第三十四章 毛泽东说很不喜欢“四个伟大”

毛泽东对“现在动不动就要拉一大批人”的做法很不赞成，并说：“我看不好。”

他对曾思玉、刘丰说：你们不要从沈阳、空军、北京军区调干部，就在本部找干部，在四大中找人。人总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不相信武汉军区、湖北军分区、人武部就没有好人。

他说：你们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干部，多数干部是好的。

主席还说，干部不要多，要精干，三七开，一百个干部中三十个精干的能办事的就了不得啦。十年没有训练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大军区的干部。人家犯错误他又不通，这怪谁呢？责任在我。并指示：以后一年训练一次。

毛泽东明确指出：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一条出路，包括陈再道。

对待群众组织，毛主席指示，对百万雄师要有点接触才好，叫他们不要搞了。工总头头太多了。二司内部有矛盾但比较好。

毛泽东主张用历史的事实来教育年轻一代。他告诉军区领导人，你们同他们讲一点历史。毛泽东回忆说：我们过去内部也打……但不搞喷气式，以后开了古田会议，有了决议纲领出来了，一个人都没有处罚，连名字都不提。主要是朱（德）陈（毅）造我和林（彪）的反。以后还是团结起来了，合作得比较好。1931 年项英夺权了，现在夺权的方式不好，不给精神准备。

毛主席对曾思玉和刘丰说，这里的还是问题，你们回去解决，也还是容易解决。

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问题和到会的同志商量。

毛主席说：全国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开一次九大，怎么选代表？红卫兵赞成不赞成，工人、农民有何意见？明年春季以后，至迟后年一月，要开九次党代表大会。

党团员多数是好的，有的非党团员比党团员好，团员比党员好。

工、农、兵、学、党，选代表，左派为主，要有中间派，要有右派，但不是反革命，没有他们当代表不行。

主席讲：邓小平没有参加反革命组织，没有黑修养，打过仗，邓要保……公不离婆，夏曦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李维汉他们是接我的手的，接后就反对我了。

主席又问，还有些老干部怎么办？

他开始点名字：如张体学、许家屯、陈光、彭冲、江华等等，湖北干部问题，他们（指原军区领导）还没有来得及做，你们能说服红卫兵老的不当第一书记，只当副书记、当副省长？有的人就是蠢，政治上不行，也许是个好事，不一定。没有张屠夫就要吃活毛猪。我同林（彪）就是张屠夫。现在我很不喜欢“四个伟大”，叫主席就行了嘛。

毛泽东谈了他对刘少奇的看法。

他说：刘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那时还相信他，想他还能独当一面……以后出了许多书。1953 年我退居二线，1959 年他当国家主席，1953 年起一朝权在手，一切大事都不同我商量，以后一切大事他又不管，1964 年他下决心，全国跑，说调查研究过时了，1966 年十一中全会靠边站了，但他不是第一。

毛泽东赞扬林彪的大小事都报告的做法。毛泽东具体谈到：林彪一切大小事都递来看，小事可不送的也递来，强调请示报告。你们要教育大家注意请示报告，不搞独立王国，请示了，批了，不一定正确，但比不请示报告好。

毛泽东问大家：你们想一想，马克思叫我和林（彪）去汇报怎么办？谁来？群龙不能无首，没有陈独秀，要有瞿秋白……

第三十五章 杨成武整理《重要指示》

毛泽东接着说：张闻天、王明是二十八个半里头的理论家，马克思多得很，我土得差不多有人搞到茅厕缸里了，熏了一下臭了。王明和张比，张比较动摇。洛甫十年，党消灭了没有呢？没有。军队也不会灭的，长征到陕北，编三个师只二万五千人，报四万人，打了八年抗战，发展到一百二十万。这时蒋介石进攻，我们有办法了，也不搞过去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至于现在新成立的革委会与党委是分还是不分？不一定。各省先开党代表大会。

毛主席再次告诫大家，你们一辈子没有挨过整，官做得大，薪水多，房子又好，又有汽车，这些都可以，就是不要摆架子，装老爷的样子。谈话要找少数人谈，大会小会不要训人。训人，人家不舒服，尤其不能动手动脚。整一下好，战士有气。

最后，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湖北的问题上来，他说，湖北要注意三结合，找出人来，不要开一次会决定。吹吹风，开神仙会，讨论一下，谁可以当中央委员，没有问题的老家伙都要当代表，邓小平是个当中央委员的标兵，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委，还有张体学。

说完，主席站起来又说，今天讲错了，可以批，我也批，红卫兵权力大，列宁讲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

9月21日上午8时，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满有把握地说：整个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

于是准备回京，部署工作，加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实现“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毛泽东的这次南巡后，各种媒体发表了一份《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份历史性文件，是杨成武一手整理的。若干年后杨成武将军回忆说：最初形成这个文件，应该说是在回来的专列上。对于主席沿途所作的指示，回去如何传达贯彻等一系列问题，总在我脑子里思考着。我把记录本子拿出来，从头至尾看了两遍，边看边摘录，把摘下来的东西一整理，居然有29个问题。虽然有一些重要问题，在视察期间就及时向周总理、“中央文革”和军委常委有关同志传达报告过了，但总不是那么系统。

我将自己的这些想法和秘书及同行的有关同志交换了意见，也希望他们帮着参谋参谋，出些点子。

专列在9月23日上午抵达北京车站。

回到北京，我及时组织人将主席的指示进行整理。由于主席在各地讲的内容有重复，且使用的语言并不一致，我要求他们整理时既不重复，又力求详尽、具体，并且尽可能把主席的原话都整理进去。经过几天工作，将整理的稿子抄好报呈周总理、林彪、毛主席，请他们审定。

主席、林彪、总理的指示，要我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传达。

9月27日，军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除军委委员外，各总部、各军兵种、院校和北京军区以及在京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在京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

我向到会的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外地所作的关于形势与任务、上下级关系、军区支左、干部训练、抢枪以及有关军区的组织机构、装备、换防……等等问题

的指示。总之，凡是我记得的，本子上有的，都向大家传达了，有的地方余立金还作了补充。

随后将可以公开的部分，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题（记录稿，未经本人同意审阅），印发给各单位。

10月7日，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文稿转发全国各地，并在《重要指示》正文前面，写了一大段文字，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情况。要求各单位“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

2008年8月8日初稿

2011年9月27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2）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二节 批判极左思潮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1〕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2〕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五月廿九日（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1〕 外交部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一片大好形势下于 1967. 6. 30—7. 1 在北京外语学院胜利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和目前

形势作了充分的讨论和估计，大会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的高潮和热烈庆祝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一周年的一片欢呼声中硕果满载，胜利地结束了。

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首先进行了“两忆三查”的运动，即忆全国许多地方革命造反派惨遭迫害之苦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的反扑，竭力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夭折的阴谋，代表们检查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决心今后要用无产阶级革命性取而代之，同时，对自己的斗志和工作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代表们一致认为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达白热化，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败退，国内国际资产阶级已勾结起来，正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热情向无产阶级发起攻击，4 万的革命造反派战友倒在血泊中！千万的阶级弟兄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决心“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我们誓与全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彻底把资产阶级司令部摧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代表大会一致认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坚信：我们必胜！因为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我们也坚信，反革命两面派必败！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都是必然要灭亡的一具僵尸。

代表们一致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一方面决不能打乱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及他的参谋部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又要展开为革命造反派

战友和群众所能接受的形势的各种针锋相对的积极的斗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我们决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启发造反派内部觉悟上，应该从国务院各口各部内因入手积极工作。

代表们一致认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目前不会收尾结束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今天这个世界无产阶级的决战时刻，我们尤其应该牢牢记住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教导：“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代表大会认为：斗争是长期、曲折、复杂而艰巨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只要毛主席身边这颗定时炸弹没有消除，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就坚决与之战斗到底！

代表大会决议：《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成立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并推选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部阶段作战方案。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全体战士“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谁要拥护毛主席我们就跟谁亲，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地解决。”我们全体代表决心以中国共产党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力求在火线中在思想上首先加入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终生，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首都 516 红卫兵团散发的传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家都来关心国家大事》

一、当我们回顾一年多的历史时，谁能不深切地感觉到：在大革命运动中，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是多麼激烈，多麼复杂啊！（提纲）败下阵去，五·一六（通知）杀上历史舞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刚刚被伟大领袖批转，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便迅速撕掉罩在外面的遮羞布，（十六条）刚刚将刘邓杀了个体无完肤，刘邓代理人便迫不及待的粉墨登场，表演一番，反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以“抓”生产，压革命，依然想把革命烈火扑下去。听！林副统帅吹响了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进军号！看！百万革命造反派挥戈跃马，英勇上阵，敌人全面崩溃啦！可是，刘邓代理人负隅顽抗，以攻为守，经济主义黑风妄图动摇国计民生！二月黑风企图扑灭伟大的一月革命。四月挑起大规模武斗，六月公然动用武装及公检法镇压革命，使我们千百万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倒在血泪中。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决定性胜利，敌人即将全部、干净、彻底地被埋葬，一切牛鬼蛇神就要完蛋了的关键时刻，狗急跳墙了！正如《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社论指出的一样，“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时刻，一个个地跳出来，大表演，大暴露，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疯狂的反扑。”他们要搞武汉的反革命匈牙利暴乱事件了，他们要搞蒋介石 4·12 大屠杀了，一句话，牛鬼蛇神现原形了，刘邓代理人撕了自己头上的那层薄纱，赤膊上阵了！“让它们表演去吧！表演得越起劲，就暴露得越充分！也就垮台得愈快，愈彻底！”大家知道，谁是那些“一个个跳出来”的总代表？这种人是不是刘邓代理人？一年多来无数血淋淋的事实，是否说明他们时刻企图用武力颠覆毛主席的政权？

二、在七月二十五日百万人天安门集会上，北航红旗战士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武汉事件”是十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反革命事件，是早有预谋的武汉“匈牙利事件”。而继武汉七·二〇事件後广州、福州、新疆、安徽、张家口、宣化，东北等地都相继出现大规模武斗事件，出现严重的白色恐怖。联系以前刘邓一直把武汉作为他们政变的战略交通要点，把东北和中南作为围剿毛主席红色政权的要害地区，这些是否向我们说明：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信号弹？！而正是那些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

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

三、“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是坚信不移的。（十六条）中提到：这次运动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目前出现的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肯定是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策划操纵的。他们利用党中央，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指使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分子，蒙蔽一些群众走上了反动道路。而全国同时出现的相同类型，相同战术，相同策略的反革命暴乱事件难道不是由某些人假借党中央，中央文革，军委文革，中央军委，国务院的名义蒙蔽一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战士造成的吗？联想到有人竟在一般群众的接见时，随便信口开河地说：“就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名义联名写信，不叫‘打砸抢’派演出。”难道不是令人深省的吗？目前，全国的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直接统帅下正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全国的反动势力、保守势力例如四川老产，重大八·一五，湖北百匪，湖南高司，河南公安公社，北京联动等等，等等，也在互相勾结串连，联合行动，难道他们不是在另一个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有组织有纲领有步骤的进行活动吗？难道这没有表明明为暗的敌人妄图实现全国反革命的大联合，为颠覆我们的红色政权作组织准备吗？这难道能不引起全国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百倍千倍的警惕吗？

四、毛主席、林副主席，多次教导我们要注意反革命政变，林副主席特别指出：“有一批王八蛋，他们要冒险，伺机而动，他们是假革命，假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想叛变，他们想杀人。”七月十六日陈伯达同志，戚本禹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这些问题不仅是我们个人掉脑袋的问题，我们要考虑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七月二十二日凌晨江青同志亲切教导我们造反派要“文攻武卫”，“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这些意味深长的教导说明什么问题，联系最近所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岂不是给人以极大的启发吗？

五、戚本禹同志七月二十四日下午给新华社革命同志的电话指示说：“我对新华社的工作有意见，……现在新华社黑线问题是否肃清了？革命是否搞好了？新华社各部门的领导权是否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了？我有怀疑？突出一点是你们那里可以向黑线司令部提供绝密情报，但不向中央文革同志和三军无产阶级司令部反映情况。例如‘内参增刊’，‘每日要闻’等绝密文件，可以

发给华北局、西北局以及中央各部门另外一个司令部的一些人,但是不发给王力、关锋、姚文元甚至江青同志,这是不能容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年多,还有这种现象是很奇怪的……”联想人民日报前个时期为×××及其部下同僚××,×××大吹特吹,不惜贬低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为×××大树威望,说×××的讲话是“最强音”等等,难道不令人深省吗?想想看,戚本禹同志所说的“另一个司令部”是什麼司令部,“司令官”是谁?

六、戚本禹同志最近要造反派大力批判刘邓 7·29 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特别强调“要在这儿下功夫”,请大家回忆一下,去年七月二十九日谁与刘邓站在一起,一唱一和,三篇讲话如出一辙?是谁伙同刘邓攻击毛主席,极力为刘邓反动路线开脱,是谁在大肆贩卖“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反革命破烂货的?这种人该不该揪出来批判?

七、为什麼七月二十四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次广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麼能够存在),联系到目前斗争形势,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有何现实意义?

八、“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後挣扎的。”看!是谁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从左和右的方面不断地在动摇着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副统帅曾经说过:“党内党外,党内为主,上层下层,上层为主,中央地方,中央为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也完全证明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请问,当革命造反派从四处冲杀出来,向阶级敌人决一死战的关键时刻,那个叫喊革命小将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说小将们犯了“方向性错误”,当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叱咤六月革命风云,衡刀策马奋勇向前的关键时刻,那个声嘶力竭地大叫“夺权过火了”,“中央的权不能夺”,“各部党委一律官复原职”,“把权交给你们我不放心,以后打仗,这些老将 99%都要上阵。”等等的人,是不是从“右”边动摇党中央的政策?!请问,当刘邓大打出手,残酷地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时候,站在刘邓一边亲手制定执行这条反动路线,亲手将陈伯达同志打成“反革命总后台”的人,在一月风暴後,继续煽阴风点鬼火,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站出来讲话”“挺起腰杆来干”。随之,二月黑风滚滚而来,全国规模的所谓“镇反”,把多少革命造反派送进了监狱,带上镣铐,把支左变成“吃左”的人,是否正是他们从右的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个见风使舵,突然从右边来了个

180°的大转弯，煽动群众“不管什麼当权派，权都可以夺，夺过来再说！”“科长也是当权派”，“辅导员也可以扫扫嘛”，极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难道不是从“左”的方面来动摇党中央的政策吗？那个一贯主张“要树立对立面！”，“要让几派同时存在”，极力扶植奄奄待毙的保守组织，例如重大8·15、湖南高司、郑大红卫兵战斗师、新疆八一野战军的人，是不是又在从右边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个在刘邓快要完蛋的时刻，大声疾呼：“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亿万革命群众痛批刘邓反动路线时，他说：“这只是五十五天的错误”。在群情激愤，万众一心，准备揪斗刘贼和他的老婆王光美时，他口口声声说：“十一中全会已经解决他们的问题了。”更甚者，在今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给刘邓定论後，在四月一日戚本禹同志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後的四月十五日，他在广州军区仍然胡说：“刘邓在四五年前没有犯过路线错误！”“在七大党章报告中，刘少奇提出学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那时候当然要给予信任了！”请问，这种人不是从右边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是什麼？试问，在军内高级干部会上讲这些话，用意何在？这不是明目张胆反对毛主席又是什麼？这不是明目张胆为刘邓翻案又是什麼？毛主席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请大家想一想，目前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和初露锋芒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不正是刘邓司令部及其代理人反革命政治的继续吗？而这个反革命政治的最高阶段难道不是用暴力来推翻我们的红色政权吗？

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们：

革命大潮卷得正急，斗争的火焰烧得正烈！挺起胸来冲上去吧！与敌人血战之日就在今朝！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用我们青春的热血，捍卫祖国红色江山！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 516 红卫兵团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时间：晚，地点：人民大会堂〕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昨天，大家讲了些意见，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讲出来还是好的。有些问题跟大家商量一下，谈些看法，看对不对。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这个大革命的胜利震动了整个世界。几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了，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最新的革命。这个革命的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对地主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是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这个革命的出发点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毛主席提出的路线，这是过去领导革命的路线，也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毛主席的群众路线。

革命的性质，群众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作一种正确的估计。我们是在胜利地前进着，在前进的道路上，在胜利的道路上，形势大好，全国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波浪式的前进。不仅在全国是这样，在北京也是这样。

北京的工人运动比起上海来落后。北京大中小学一共七十万人，工人是一百万人。工人阶级，他们运动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最大的学生运动数北京发展得最宽广，而现在，学生受到很好的教育，很好的革命锻炼，但是，还没有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总结经验。大吵大闹兴趣高，总结经验兴趣比较少，不总结经验就是不能进步。闯劲大，闯的思想多，学习的思想比较少。学习，当小学生，当毛主席的小学生，当群众的小学生，这种思想比较差。怎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考虑得比较少，这种估计对不对？压倒旁人，压倒别的派别的思想比较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思想比较少，对不对？

你们本身也有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若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究竟怎么结合，你们并没有研究个方案来。前一个时期，一说要与工农结合，一哄都到工厂里去，车间里工人倒没法工作了，大人小孩一大堆，影响工作。说是下厂要向工人学习，其实没有学习到。还有一个毛病，你们

下去是不当学生，而是当先生，把你们派别观点也带去了，这对不对？你们说，北京有两大派、三大派、四大派、谁晓得你们是几大派？总之，你们把派别观点带到工人、农民中去了。你们去了不是向工人学习，而是把派别观点带下去，起分裂的作用，是不是这种情况。当然，你们到工农群众中，很多人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首先要当学生，而不是要当先生，这样就不会带下去派别观点、结果影响人家生产，那是不好的。

从去年以来，你们到各地大串联，有很大的成绩，你们发动了许多革命派，发动了革命小将，并且回到北京来向我们汇报了许多情况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这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联的号召。现在，有许多人坐在车上不下来。在北京，你们要和群众商量，谢富治同志很谦逊，你们没商量就出去了，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作具体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问题。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这是个别的，少数的。这种估计对不对呀？到底是个别人的估计对，还是中央估计对？请你们作一个判断。

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对不对呀？这就把你们自己也否定掉了，把你们一年来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努力否定了。

中央和你们的估计就想反了，中央说你们作了很大的工作嘛！你们的个别派别估计就与中央相反了。有些同学的估计是错误的。因为有这种错误的估计，所以行动就徬徨了，有时想这样，有时想那样，想到处串联，包办代替，以为没有北京学生，其它地方就不得了啦。以前我们说过。你们出去串联，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继续下去，呆在外面包办代替，就会把这种作用走向反面。有这种说法，不知对不对？有些地方一些派别斗争，不是原则的争论，而是无原

则的派别斗争，争论不休，都与北京学生有关系，不知对不对？这是少数人喽，想包办代替全国的革命，这种想法是不对头的，与毛主席说的，要信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思想相违背的。

从历史的发展观点看，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后来想包办代替就不好了。你们学习得不够，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不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比如武汉市问题，中央作了正确的处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中说：“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引的轨道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级。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可是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你们应当信任中央派到武汉作工作的一些同志，曾思玉同志，刘丰同志，武汉的革命派应当和他们合作，应当信任他们。北京的同志不要插手了。这些意见不晓得对不对？我曾和北京的一些同志交谈过，你们各学校都有大量的工作可以作，各单位的斗批改，大批判相结合。但是，你们坐不下来，有些得不错，你们的小报有的搞得不错，但还要更提高一步。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出更灿烂的花，作出更大成绩。你们现在的花开得不旺盛，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内战外打”。你们要搞战备。当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想把内战打出去。还有一种人是想入非非。还有人《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毛主席说，相信大多数群众，大多数干部，相信解放军。这是我们遵循的正确轨道，不要被破坏利用，不要被坏人挑拨，毛主席在延安时给新中华报提过两个字“多思”，多多地思考，不要简单化，不要直线、想当然。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不是毛泽东思想。

关于毕业生的问题：现在正在研究，作出方案。（戚本禹：原来的通知不是正式决定）在没有离开学校之前，要安定下来嘛，在学校里搞大批判，搞斗批改，

不要当逍遥派。

我今天就讲这些，给你们商量，向你们请教，如果不对，希望你们提出。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好久不见面了，原来在武汉事件（20 号）那时候就想和同志们见面，听一听你们的意见。但是，后来就拖下来了，又拖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的缺点是，应当跟你们早一些交换意见。比如，走人的问题，预先有觉察，如果早讲一下，你们可能听我们的，当然，也不一定罗。比如清华，走了五、六千，我们有责任，不能把责任推到你们身上。当然，我们要有观察的时间，如早提醒一下，你们可能清醒一下。

形势逼人，有时工作被动，比如今天晚上的会，原计划八点钟，现在十点了，才开。

伯达同志讲话是准备好了的，我没有准备，谈出来，和你们交换形势，错了可以批评。

谈形势，我觉得须有个比较，如果不比较，老谈形势大好，你们也看不出，不信。

如果拿去年这时候来比，也就是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是大好形势？你们会说，去年没有武斗，今年有武。比如对于武汉问题，伯达同志说了，已经解决头问题了，你们还说，问题还大的很呢！已经解决，就是说基本解决，还要作大量的工作。去年这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虽然是一小撮，但是有权，很强硬，他们还可以调动。而现在，他们是瘫痪了，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现在还有一小撮人背后操纵武斗，搞有组织的、有训练的专门杀害革命派的武斗，他们是强呢？还是弱呢？是弱了。武斗总是少数人。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号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他们挑起武斗是弱的表现。当然，我们有些地方有损失。有的小将被他们杀害了，可是同志想一想，这是一场大革命，难道能没有牺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死伤几个人？当然，我不是说，死人就是好。敌人是要反扑的，他们还要较量的，两个阶级的较量，反复较量。有些同志觉得一年过去了，没完没了的，这是急不得的。总之，一小撮人没办法调动我们的正规军，军队有命令，不准开枪。他们就只好在幕后组织一些人搞武斗。这个武斗很残酷罗。我看了这方面的材料，我想了很久，很难过。

他们操纵的一些人也不是真心要搞武斗的，有个人写了一封信，说他现在已经杀了四个阶级兄弟，现在不愿再干下去了，跑出来了，他要投案。我们相信这是真的。

他们还有一个办法是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农民进城总是要吃喝的，这是有限度的。今年一月，他们有一种手段叫做经济主义。目前，有一些地方还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形势好，就是过去他们是强有力的，掌握政权，现在是瘫痪，过去是群众不知道，受蒙蔽，现在群众有些知道了。比如江西连塘，有些小将突围出来，向南昌中途遇到了全村武装敌人的埋伏，这小将受伤清醒之后，是在一个老乡家里。他被毒打后，要活埋他，农民不舍得活埋，就送到老大娘家里去。老大娘硬是设法把他送到城里去。这样一个事情说明了群众是不明白，受蒙蔽的。就是说要进行宣传工作，要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说贫下中农一定要搞武斗，对小将不爱护，那是不正确的。他们一旦觉醒了，就会帮助他们。所以要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传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对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意义，对世界革命的意义。使那一小撮人变成过街耗子，人人喊打，他的武斗就不行了。

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要使形势更好，就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南方是武斗，难道要北京搞大武斗吗？北京的工作有很大成绩的，有先进的地方，又有落后的地方。应当如伯达同志所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股劲地说北京落后，那就错了。比如，在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两次百万人大会，这两次会对全国有影响，这能说北京落后吗？我很希望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观点强加于人，我也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你们，我的话你们可以不听，可以睡觉。当然，有个好的方面，对全国革命特别关心，这个想法不应排除。

革命的大联合问题，我还是想强调，你们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呢？还是搞分裂好呢？分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为了搞革命，为了战胜敌人，要在大的革命前提下，要一致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共同斗争，有什么小团体主义、个人的私心杂念不能排除呢？在座的革命小将很多都经过了一年多的斗争经历了，难道这个问题不能逐渐解决吗？而是讲起来津津有味，令我惊奇的是，揪刘

火线，开始比较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你们没有小团体主义？没有风头主义？你们的请帖，去年你们给我们的请帖是手写的，是在一张小纸上写的，现在越来越高级，请帖好得很哪！你们在火线上不联合，遇到真正的敌人怎么办？还打内战？

个别单位搞自己的展览。最近我很难过，我看到你们把我吹得太厉害了，就要跌倒了。在这儿（指长安街上）有一幅画，把我也画上了，我看了以后很不安，很难过。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做了一些事是应当的，况且有时还作错了呢。最近好了，把画盖上了，我就舒服了。现在我感到有些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有些造反派单位也搞起来了，照了象挂起来，还拍电影，还演起戏来了，有没有？这是一种腐蚀，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增加一点免疫力，抵抗力。头脑中老想我在那儿出个名，考虑自己，而不是为了革命，团结广大人民，不是考虑大联合，这能不能革命，能不能战胜敌人呢？所以要强调大联合，不要革别人的命很舒服，革自己的命就难了。

不搞大联合就不能形成大批判的新高潮。革命的大联合很必要，革命的三结合，而且组成领导班子，才能领导本单位的斗批改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也许有些同志说，这是老生常谈，我们比你懂得多呢！可是我觉得有必要再说一下。

大批判要在全国范围内搞，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透。要在全国每一方面进行，就要同本单位的结合起来。你们就是要坐下来，不要忙忙碌碌地往外跑。

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的问题，这是百年大计，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不能代替你们斗，不能替你们批，不能替你们改。如果把革命的对象确定下来了，就能去团结更多的人。还有利用敌人的矛盾，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和斗批改，走出一条路来。你们就喜欢往外跑，坐不下来。外边也有造反派么！

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全国各省都有，搞情报，手伸得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北大？

七月二十二日，我讲了几分钟话，只一页纸，可就各取所需了，抽掉了阶级内容就歪曲了我的讲话，爱莫能助，鞭长莫及，有些地方小将受迫害，我想了好久，那时，河南二七公社受压制，他们提出文攻武卫，我讲了，还讲错了一个字，

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强调了文攻，搞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人阴谋。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谁给我柳条帽，我也找不到长矛，你们有没有呀？

南京有几万人武斗，最近的形势有改变。

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么！要带头反对武斗。（谢：不要带头武斗）但是有些地方，有少数坏人在操纵，例如武汉、河南、南昌，当权派组织一伙人，叫做武工队、红武军，多了，专打要害地方，武器高级得很，比抗日战争还高级，矛头是钢的，很厉害。使广大群众识破是一小撮人破坏我们，使他们孤立起来，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在有的地方，一个条件群众受蒙蔽，第二个条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力量，革命派处于劣势，赤手空拳。有的地方，我看见了心里很难受的，小孩也被捅了。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是象河南二七公社呢？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卫呢？

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廿日凌晨，扣押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支持革命派，那里革命派自己又没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还不该革命小将自卫呀！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修工事，我觉得儿戏了，要冷静，头脑冷静很重要，不冷静容易犯错误，要冷静、勇敢、谨慎。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就很怪，藏龙、藏貉、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假工代会搞的？）。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象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

有些地方把我们小组分为多少个派，这是不对的。在一些地方看法不同，这是常事，你们也一样。但是，我们是团结在毛主席周围。有人说我与伯达同志，还有戚本禹同志是一派，关锋同志与康老是一派，根据什么呢？！

对于聂元梓同志，我没有什么私交，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去年写了大字报后，才知道这个同志。对于她的对的，我们全组都支持的，拍掌。她的错误，我们是不支持的，对于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的，对的就支持，错的向你们提出意见，交换意见，你们也可以驳，但是不允许闹分裂。人大三红的分析我觉得有些道理，我也怀疑有一只黑手，不知我讲的有没有道理。这只黑手不仅伸到群众当中，伸到革命小将身边，还想在我们身上打主意：肯定要失败！对于革命小将，他也是要失败的。因为革命小将也在提高嘛！要满怀信心，主席在搞斗争时，想到，充分想到困难的一面，但是，总是满怀信心地领导中国的革命。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如果不对形势作正确的分析，把自己放到恰当的位置上，那就会出问题。我们应当配合主席的思想。你们不仅是闯将，而且应当是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要提起脚就走。现在北航你们还搞斗批改吗？总是要有点试验嘛！失败了再改，这不妨碍我们搞大批判，这个工作很艰苦。

今天话讲长了，你们也听腻了，结束吧。

康生同志的讲话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没有什么多讲了。

讲到分析形势，都具体的作了解释。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我想讲一点。江青同志用比较的方法证明了形势。我有个补充的事例，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月17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二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二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

那篇文章是讲了国内的大好形势，也讲了国际的大好形势。那篇文章讲了三个里程碑，讲到了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第三个光辉的里程碑。文章中还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阶级斗争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不可能解决，毛主席解

决了。

比如列宁，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和“‘左’派幼稚病”里提出这个问题，但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 28 年以前还承认了阶级斗争。到了 36 年就否认了阶级斗争。直到他逝世前两年才讲到有阶级斗争。是谁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最高水平呢？是伟大的毛主席。毛主席不仅提出了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仅对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伟大意义，对世界也有巨大意义。

文章的最后，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不要以为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解决问题，也不要以为三次就能解决。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文献上有记载。难道我们当前还不是大好形势？！

我们的一些同志不仅不认识这个问题，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去推测，根本问题就是没掌握好毛泽东思想。《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五·一六通知》发表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诬蔑“五·一六”。

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在最幸福的时代，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史无前例的创举。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诬蔑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近一个英国共产党做工会工作的代表到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参观。他看了以后回来就说：我拥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没想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觉悟这么高。我回答他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的诬蔑是他们不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那些诬蔑我们的人是缺乏起码知识的。

我们对毛主席要好好学。我们学得实在不够，希望同志们多想一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了多少，领会了多少，应用了多少，活学活用了多少，这是我人经常应该想的。少打点“内战”，不要光想站着两条腿这里跑跑，那里逛逛，我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没有那回事。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检查自己，就会少打“内战”了，我们用“五·一六通知”和 5·17 社论来检查，就发现我们学习得很不够了。

另一点，我想讲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有敌情观念，还有帝国主义，还有修

正主义，还有蒋介石匪帮，难道他们不利用我们的缺点，利用我们的无政府主义干反革命活动吗？来破坏吗？昨天我们收到香港寄来的一本书，书名叫“刘少奇语录”，上面有刘少奇的象，刘少奇题的字，也有 33 条，写这个书的人叫司马义（晋）是美国《展望》杂志的反动编辑。这就告诉我们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这不能说明他们的强大，只能说明他们穷相无聊的，是接近死亡的。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我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的讲话，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我们看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有两种估计方法。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认为形势大好。江青同志说要有比较。首先敌人是什么样，去年这个时期，正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期。后来，开始了大串联，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北京起了很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阶段，是毛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提出了夺权斗争，掀起了一月风暴，搞了夺权斗争，这个问题比前阶段深入了。经过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暴露出来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进行夺权斗争。经验证明，上海，山西，山东，北京还有黑龙江，贵州夺权是对的。这些经验证明，夺权就是夺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要通过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夺了权还会有反复，还会有许多经验需要补充。夺权中出现了一些缺点，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靠我们在斗争中，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可能一帆风顺直线上升，这样的形势是在前进，只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相信群众大多数，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相信解放军的大多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依靠解放军的大多数，敢于自下而上地发动了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不过不是重复，是螺旋式地上升。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军”、“两支”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军。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和他们讲，真是任重而道远的了。事实上证明解放军是胜任的。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没有解放军，光光发动群众，敌人就要乘虚而入。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前进的，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还要有力量来维护，当然首先是群众，而解放军是最有组织的。解放军也会犯错误。只要把问题讲清楚，赵永夫之流就会象豆腐而已。青海也开枪打过革命派，但是说清楚，就亲如一家了广大解放军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的军队、只要毛主席、林付主席命令一下，就好办事。广大军民亲如鱼水。内蒙的军队问题，只打了一枪。他开始采取两面派，最后还是暴露出来了。陈再道也是这样。武汉事件，我亲眼看到。武汉问题的解决是解放军大力支持的，有个士兵，端着枪，对准王力同志，当时，独立师的一个营长马上站出来，说，你开枪，事情就变了，要开朝我开！结果战士手也软了。所以，我们解放军的支持作用看得很清楚，不看这个半年，就看去年接待红卫兵，没有解放军怎么能行呢？四个多月时间接见了一千三百万的红卫兵，那么有纪律这是个伟大的创举，那一个国家能见到？还不是解放军组织得好。后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看到很有组织，就想到军训，号召在红卫兵中的搞军训。北京武斗，解放军受伤不少。就是在毛主席接见时，由于群众要见毛主席，也有许多解放军受伤。我们去看他们没有听到一句埋怨的话，想起来非常感动。解放军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林付主席的话，受打时，受骂时，不动口，不动手，不开枪。坚决照办，几乎占百分之九十九，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万分之九千九百九，现在，全国的武斗解放军去阻止，受伤的以十万计了，而不是几万计了。这么个好的军队，那个国家有能有？这是几十年的我军的培养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军队内挂帅的结果，什么物质力量也不能办到的。犯了错误，只要毛主席一说，林付主席一讲，就马上改，山东军区司令员就好嘛！陈再道是个常败将军，他把枪对准王力同志，他的警卫营营长就挺起胸膛保护了王力同志，说一开枪性质就变化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几十年革命的传统。三相信、三依靠，最重要的是军队，所以毛主席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军队，解决了许多问题。《五·一六通知》证明主席的预见，最后一段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念最后一段），刘邓陶是后来被揪出来了，《五·一六》是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文献，所以苏修感到挖了他们修正主义的墙根，就把赫鲁晓夫从垃圾堆里拉出来，污蔑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

刚才康老讲，从香港寄来了一本刘少奇语录。我也打算讲一个香港的故事。

香港九龙那里是边界，我们工人为了张贴语录，主席象，标语，冲出了边界，到了一个警察局，那个局长准备开枪，但还未来得及，我们工人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把手枪夺了过来，对准了他的脑袋，结果，下面的当兵的，也得交枪投降了，并勒令他，认边界哨所的人也交枪。结果搞了三点协议还在签字，允许工人们贴语录，带主席象出进。工人胜利地回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大的小的都证明这一点，英帝、美日、苏修都是纸老虎。另一种说法说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前夜，说刘邓还有那么大力量，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从武汉中作中，得出的这个结论，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就是要武装夺取政权，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北京不能夺权就到别的地方去锻炼，去夺权去了。怎么把毛主席的影响看得这么轻，把刘邓的影响看得这么重？可能你们看了参考消息，又不注意分析。独立师，百万雄师坏的是一小撮坏头头。总司令说，我们的两个同志对独立师只作了半天工作，他们就听话了，都照我们计划办事，这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把王力同志搞出来了也是解放军嘛！（叶君同志讲话：二十号发生事件，海陆空三军就全力支援，出了舰艇等）不错，解放军思想有些保守，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什么广州要抓广州黄再道。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同志，沈阳军区司令员都是好同志，任重道远，又没有经验，这几年来接触群众又比较少，当然有些领导长期脱离群众，加上传统观念，受《黑修养》的影响，容易犯错误，但也容易纠正，尤其是野战军还不同于军区，他们不同于军区，和群众接触就更少了。我们的军队只要给任务，去了以后，立刻就改变形势。但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对解放军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提出来了，这和去年不同，要区别看，武汉地区问题解决了，提出武装人民，这是对的，首先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是有条件的。例如，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还有江苏、湖南的。北京的工厂，如果联合起来了，可以武装起来，但没有联合的单位就不行，（武装了）就要打“内战”。可以武装联合起来的左派，把保守派的武装要收回来，农民进城，他们是不愿进城的，受了蒙蔽。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小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急先锋，闯将，立了大功，现在要求你们前进！武汉地区的问题，靠武汉地区革命人民解决就行了。陈再道出来了，革命的干部也亮相了，有了三结合的基础了。靠谁解决问题呢？主要靠本单位的同志们。我们北京红卫兵、学生、要和中央一起，有计划地，有领导地派出一些人到需要的地方去抓革命，促生产，进行调查。现在有个倾向，是有组织地搞，还是自由流出？武汉去了两万人，是个大包袱。北京的同学有个优越感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清华派出了 5000 多人，这不好，火车票怎么搞来的，这人我有责任。没有车票的上车就不下去了。我们去动员，谢富治去请，当面答应，我们一走，还是不走，希望大家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清形势安下心来，学习全国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斗、批、改然后在此基础上，要抽调一些人，有组织外出调查。去调查这些问题：冲击军区，夺了枪，是违反“六·六通令”的。还有两派武斗，武装左派，农民进城要调查。这些工作可由那些综合大学去做，专业大学可专业搞调查。最近，我还和戚本禹同志商量过，矿院抽一些人，到全国重要矿上去，进行调查，抓革命，促生产，就好了，这样就要安排了。现在，大部分在校搞大批判，斗批改，另一部分，外出调查，搞抓革命，促生产调查。要求大专红代会协助。北京专业学院几十个，可以作这个工作。要听林付帅的话，加强三性。你们是毛泽东思想时代的大学生，比我们五四时期的中学生要好的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比我们少。

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问题。我们搞了个决议。66 年毕业生，生活问题我们解决，9 月份发工资，国家供给，因为已经一年多了。67 年毕业也差不多。困难由国家来负担。至于分配地方，如果那儿需要，你也原意去，就离开学校。实在不行的一般地暂时还留在学校搞大批判。详细情况，条文上有。细节研究一下，马上发下去。

总之，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三相信，三依靠。还要把林付帅三性记住，今年是这样光辉灿烂，明年就要更加光辉灿烂，开花结果了。

让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建新劳！

谢富治副总理的讲话（记录不全，大意不变）

同学们，今天晚上的会议，是重要的会议，几位同志都讲了话。三军的负责同志都到了。有四位首长讲了话。为什么开这个会，因为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大好，但北京有些同学，对这个形势看不到，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一些不统一的想法，需要中央文革小组讲讲，我们来听听。

今天的大会，除王力同志外，中央文革都来了。杨成武同志有事没有来，其他三军负责同志都来了。

我有个建议，希望把四位首长的讲话，整一份纪录，发给大家学习，学习一个星期，然后，结合社论、中央指示，配合当前形势，当前的《红旗》《人民日报》等社论，讨论一下。整理稿，最好几个学校一起整理，不要每人一样，对我有利，我就要，没有利，就不要。武汉三钢三新最近就联合整理了一份讲话，很好。

文革小组同志批评我，说我北京大批判抓的不好，革命的大联合抓的不好。这是对的，我接受批评。我听不到大中小批判，听不到大联合。只听到吵吵嚷嚷，武斗。我光和稀泥，在大联合上我有缺点，要承认。在制止武斗方面，我也有缺点。但我好几次强调了哇！我还和工人讲，你们上街游行反对武斗。我一定要参加！

同志们要把大批判搞好不要搞武斗。我们还沿着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给的方向去干，我们应当注意。是按毛主席、中央文革提出的路线去做，还是按某一个学校什么动态报的形势分析去做？应当注意。

首都红卫兵给全国革命派很大的支持，北京的同学在外地影响很大，但也有要注意。例如，几个人就可发声明，还挂着什么红代会的牌子，这就不好了。

关于军队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伟大的军队。北京的军队，是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四月份，江青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拥军爱民的口号，这不是一般的口号，是一个重要口号。

还有一个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我去过京西煤矿，那里搞不好，北京的煤就有问题。你搞武斗，不要把一万吨煤给搞掉了。我们还要关心铁路工作，我们要强调。最后还强调一下，不准冲中南海，不准冲人民大会堂，也不准冲钓鱼台。不要光贴大标语，什么谁的讲话好得很，问题在于好好地学习，

对四位同志讲话要忠实记录传达、整理，不要贴一张大字报，什么好得很。大家也不知什么内容，就各取所需，

康老插话：有一个内容可以贴大字报，说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串联这是造谣。不要串联了。出去的，找回来。我有错误，我可以检讨，但你们要协助我一下。

昨天京西煤矿武斗，我批评了他们。还死了一个人。你们武斗要解决，但一万吨煤不要搞掉了。

总理插话：我很关心铁路。

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对外作战部《井冈山通讯》(号外), 1967. 8. 12
图博文物口革筹小组翻印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谈判代表时的讲话

安徽有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五条》、《九条》，这是很好的基础。安徽可能有个别人、个别组织反对《九条》，这是不可否认的。不仅在合肥有、北京街上也有贴这样大字报的，我不说是那个组织贴的喽！也不定是代表贴的，有的是坏人贴的，甚至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破坏。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有的用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人。北京“五·一六”这是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安徽一个月以前确实有人反对《九条》，七月份有人反对，最近也有。这是小丑跳梁，如“几个为什么”呀。当然罗，我不怕。合肥不是有打倒我的吗？如果我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不打我也倒了，如果我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打也打不倒。打我，安徽不是第一个，青海赵永夫要打倒我，内蒙古也要打倒我，结果不是他们打倒我，而是他们倒了。你们要提高警惕，千万注意。同志们要有敌情观点，也就是阶级斗争观点。面临着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蒋介石、地富反坏右、党内走资派，请同志们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同志们也不要这样讲：我这个地方没有“百万雄师”。要调查研究。北京还有，你们那个地方就那么干净吗？北京还有“五·一六”。当然，不管怎样，这是一小撮小丑。我上次同你们讲过，你们来北京不要上当，不要听信一些谣言，不要糊里糊涂。就是武汉事件发生的七月十九日晚上，绑架王力，安徽合肥就也有“打倒王力”、“揪王力”，合肥就有这样的大字报！不能

否认这个事情。武汉事件就是这样。为什么？同志们，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你们要记着主席所说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来源：安徽省炮轰派阜阳《东方红》报编辑部、水电红代会北京水电学院《水电红卫兵》编辑部、水电大专院校红代会华东联络站《水电红卫兵 阜阳东方红》 1967 年 8 月 28 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北京市“工代会”委员的讲话

什么工代会，到革命委员会门前示威，听说有近万人十几天。我们不知道什么另外一个工代会，我们工代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中央文革是支持的，是合法的。我们不去支持另外一个什么工代会，你们谁支持另外一个工代会举手（无人举手）没有一个举手的嘛，不赞成另外一个工代会的举手（全都举手），唉，都举手了嘛。

你们这些人都是没有斗争经验，有坏人挑拨离间，对着你就说你好，不要上当。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听坏人挑拨离间的话，当着人说好话，背着人说坏话，你们刚刚一年的斗争经验是不够的。当然我们不是在摆老资格了，你们一定要有毛泽东思想，二不要有私字，三不要听坏人挑拨离间的话，为什么现在老联合不起来呢？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你们就是光攻击别人，不做自我批评，这是最大的缺点，毛主席怎么说的呢？（念毛主席语录、223 页三段、3 页三段）只准我讲，不准你讲这是不对的嘛，任何时候，没有自我批评要说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看是有问题的。

（来源：1967 年 8 月 30 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 136 期）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讲话

从姚登山的表现看，他还不够成熟，他提出一些说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如提“刘、邓、陈一小撮”就是很错误的，这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你回国不久，还不熟悉，我们还要看你，人家要求你当外交部长，连天安门上都有。你作为一个司长，对出现这样的大标语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吭一声。联络站报的夺权班子

名单（指部党委），我送给林付主席看了，林付主席表示不同意，林付主席说外交部还要三结合。

陈家康象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总理问姚登山在外贸部的讲话，姚说：我对王力讲话理解错误了）总之，你不要推给别人，你自己检查自己。（这里总理强调了几次）

陈毅的问题很清楚，他有缺点和错误，但不是你们提的“刘、邓、陈”，我现在还不能同意打倒，你们打倒，我还是不举手。

（联络站：陈毅不倒，其它部长都打不倒，姬鹏飞、乔冠华也打不倒。）

你们老是逼我把最高指示说出来。主席对外交部付部长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一个地方有陈再道，什么都要打大麻子。不要每个部都要×××大麻子，什么谭××嘛！但是我主张批，姬、乔可以批。

（联络站：姬、乔靠边站。）

这样不行，我是在最高指示原则下灵活机动一下，9月批姬，10月批乔，11月再批姬，12月再批乔，而且轮流管工作。（联络站：一定要打倒姬、乔）我是按最高指示办事。

你陈家康象小丑一样，跳出来了，很坏，你们可以向外交部宣布，陈家康停职反省。

（联络站：王炳南呢？）也可以停职反省。

“五·一六”的出名，是因为《五·一六通知》。去年五·一六通过的，今年发表，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新的赫鲁晓夫没有揪出来，还在主席司令部里。说这才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恰恰相反，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抓小失大，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巩固，这是使敌人快意的，使我们亲者痛恨的。

外面现在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涉到很重要的问题，主席已经肯定了，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你们（指外联）要注意，外交部大一统了，不会一个没有（指“五·一六”分子）。我看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既有“五·一六”组织。哪个地方都能钻进去，秘密活动、抓材料。“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不是我们说的，把刘邓黑司令部打乱。这是红线，打出光明来。他们

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乱，他们把我们许多不利的东西拿出来大宣传，把我们外交文件拿来宣传。

正如江青同志说的，从各个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或者从右的方面，来孤立、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有那些人在后面搞名党，幸灾乐祸。你们不懂得，（他们）把毛主席、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在到处、在国际上孤立起来就高兴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时间：下午。参加会议的首长有：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杨成武、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李天佑等。参加会议的还有：红代会核心组、中学红代会核心组、工代会等代表。〕

谢富治：今天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同志们、革命小将们：我们好久不见了，是不是，有的可能最近见过，有的可能好久不见了，这个会准备得很仓促，我们准备得也很仓促，来的也仓促，我讲的不一定对，对的接受，不对的批评，可以贴大字报，可以轰（笑）。我这一时期看了一些材料，对全国形势，也看过一些材料。有些看法。上次在什么时候谈过形势，和你们不一样，可能部分不一样，可能有分歧。现在看来可能还是有一部分看法同我们不一样。因此闯的乱子不小。昨天我和有些人谈形势很好。可能有人会说江青这个人就是会说形势大好，形势确实很好，昨天和总理一块听了四川情况，就是形势大好。派到四川去的干部精神面貌变了，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难道形势越来越坏吗？你们怎么想的？难道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我不说你们全体，而是说部分。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由于形势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我曾驳过这观点，武斗就是先进吗？我们搞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是落后吗？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认为北京应该带关搞好斗批改，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谢：好得很）如果不搞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那个年头呢？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自己要搞好，北京有一、二个学校不是在试点吗？韩爱晶来了没有？（来了）身体不好？（没什么）北航、师大试点了没有？要坚持，不要怕人家说你们右倾。全北京市都应

该试，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臭，从各条战线上把他们一系列的政治纲领批深批透批臭。要在本单位搞斗批改，大批判，要把本单位搞好，批深、批臭。各单位要搞斗批改。要批得比当年苏联托洛斯基还臭。这任务艰巨呀！非常光荣的任务，我们不能代替你们，既不能代斗，也不能代改。这是文化大革命落在你们身上的光荣任务。还有工厂、农村，还要抓革命促生产，要好好安排。当然工农不能因斗批改而耽误生产。由于一部分人背离了大方向，坏人就利用青年人好动的特点，想到处看看、冲冲，甚至想制造点“先进南方，落后北方”，武斗就先进吗？北京打个稀巴烂好不好？（不好！）要坚决反对反动的无政府主义。

又搞起个大串联不好，现在串联不好这和去年完全不一样，去年串连煽了革命之风，点了革命之火，有好作用，现在去了，不了解情况，去了一头钻进去，要犯错误，错了还不知道。你们还相信不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信！）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解决问题，你们去了解决什么问题呢？这样是做错误的，不认错不行。错误地判断形势，听了一些过左的词句，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到处抓“军内小撮”指向革委会。你们要相信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军队吗？还打还手，骂不还口，自己拿着枪被人夺去也不打。要相信军队，固然有少数坏人，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这是有阴谋的，把军队搞乱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来了怎么办？到处去揪，还说你们不去揪，我去揪。全军几百万，陈再道的确是少有的，赵永夫更少。因为要揪军内一小撮，不管那个军区，说了点错话，就要揪一小撮，这是错误的。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我讲行对不对（对！）你们不明白，即使我们军队老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但一旦打起仗来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你们到处揪一小撮，搞喷气式，这是什么人提倡的？我们是反对的，你们这么搞，什么人高兴？我这不是说军内有少数错误不能做检讨，我是批评这口号到处揪某大麻子、某老谭，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想打乱阵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保卫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提出这口号到处搞，乱轰轰的，我很气愤，我要是战士，要是夺了我的枪，我就开枪，这样说可能过火，现在大炮也夺了，一天打一万多发子弹，就是左派也不对（总理：要是到越南能

打多少敌人！真是败家子。）是左派也该批。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对吗？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这个人就时常说错话，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有一点错就打倒？斗争锋芒错了，不是对准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对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样做错了！但他们不一定是坏人，改了就好。总之先进的北京就是搞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把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我上次讲过的，不知讲清了没有？没有准备，大家考虑对不对？我现在重申几个问题：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中南海，去年在红卫兵成立时，我说过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钓鱼台，另外还有大会堂、外国使馆，不准冲，反使馆可以在外面嘛，怎么钻到里面去了？这是国际惯例，否则，那人家也可以进我们的大使馆，揪我们的人。最近搞了英国代办处，结果我们十几个人在那边就挨了打。黄浦港援越物资也被抢了，这不是左派，是有坏人挑动，要警惕，该不该专政？国防部不能冲，京西宾馆不能冲，要开会嘛！今天我们在人大大会堂开会，外面有人冲进来，你们看行不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新华社、电台等不能冲。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保卫。我看了材料，光明日报昨天被抄了，怎么能随便抄？还抢了资料，不知什么人干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还搞这一套，这不行，光明日报还要坚持办下去，（谢：要查谁抄的）（总理：卫戍区马上去查）这个风要打下去，一个报社一下子就去抄，能这样随便，有了“六·六通令”“还抄？打砸抢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住，西单商场打得那样，不管那一派，坏头头一定要抓起来。这已是刑事犯了。专政要正常进行嘛，要正常手续办。以上可能有遗漏，大家说对不对？还有西山重要地方大家不要去，还有宾馆。有的破坏国家财产，国家荣誉也不要了，当着外国人打砸。这是坏人利用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挑起来的。还有什么革命呢？光去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怎么行。我告诉你们，我永远忘不了在延安的三年整风，作自我批评，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那象你们，自我批评象挤牙膏，不许人家批评，不是冷静考虑问题，情绪一上就干起来了。现在说一下聂元梓同志，我上次开会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好的就支持，错的要批评，对同志们也一样。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大功劳，我们不会忘。她

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不对（对！）有了错误你们也不给个机会。“红旗飘”的牛辉林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红旗飘”里有坏人？群众是好的。（谢：还有一些大字报很庸俗。）牛辉林到处去抢、抄。（康生：杨勋、杨炳章在什么地方？）（聂：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杨勋、杨炳章是特务。（康生点点头说是特务。）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们来记你的功，一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做了许多错事，最后被揪住了，甚至连她的组织都要垮台。组织是好的，她的助手不好，那个助手叫什么名字？（答：孙蓬一）出了许多坏点子。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错误、也要小范围谈，要与人善，惩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不要被一点功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得不对，可以火烧，可以炮轰、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满怀热情对同志们讲话。

伯达：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认真讨论一下，是代表小组的，代表中央说的。我们跟你们开这样的会，说这样的话，不是随便讲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

江青插话：“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伯达：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头，党中央发出这样一个重要号召，大家不要轻视，你们是不是接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答：是）如果是就认真讨论江青同志的讲话。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听，我们讲了话，你们贴大标语说好得很，但你们仍干自己的，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听中央的话，自己干自己的，给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失败等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就一定会垮台，不要以为一时人数很多，那是表面现象暂时多数会变少数，暂时少数是会变成多

数的，是会得到胜利的。现在有一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择手段为自己创造活动方便的谣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允许的。谢富治看到一个福州来的电报，上面写的北京来电，内容是说什么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先派一千人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再来人，其余的随后就来，口号是打倒韩再道，这是瞎闹，这是谁干的？完全有他的政治目的。完全是荒谬的，用这样一个办法捞稻草是办不到的。一个革命者不能这样干。福建是前线，我们正和福建的两派谈，就接到这么一个荒谬的来电，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假借各种名义，搞这一套，这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为吗？革命能这样搞吗？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我请谢富治同志找红代会的同志谈谈。江青同志说，文化革命初期，北京许多学生到外地煽风点火，做了很大成绩，告诉了我们许多不大知道的情况，但你们夸大了，好像没你们就不行，想包办代替，到一个地方，就说我是代表红代会的，什么响当当的左派，我从不欣赏这个词，过去货郎担响当当的，是招摇过市。有人还科学些，说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刚几个月怎么坚定了昵？坚定左派要在长期大风大浪中考验。北京下去的学生，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反动派。说响当当，像卖膏药的，你们大概没见过卖狗皮膏药的，摆个摊子，敲锣打鼓，说膏药多么好。我说的过分些，多数人是勤勤恳恳的，我是说少数人，有些人上了当，人家拍马屁就高兴。你们不要把自己丑化，不要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的讲话是内部的，不要贴大字报说“好得很”，怎么能说好得很呢？现在许多地方受北京少数人的歪风影响，大家要注意，全国都注意北京，要搞出好样子来，有一个人说，你北京就搞出好榜样，当然他讲这话不全面，但这句话值得我们反省，北京要做出好榜样来。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都要在北京做出榜样。所有外出串连的统统都要回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变成“响当当”，出了不适当的错误的主意，在江西的，福建的，谢富治同志派出去几个人？（谢：只派了几十个人。）除中央派出去的调查组一律都回来。

第一机床厂过去搞垮捍卫团是对的，是先进的，但现在打内战从先进变落后了。仪器厂我们去了，石头都扔下来了。学生搞两派，工人也搞两派，搞武斗是错误的，我反对。（谢富治插话：武斗都有两派支持，搞宗派是错误的）清华有个团派，有个“四·一四”。我和戚本禹同志本来去帮老蒯忙的，蒯慌“忙”装

喇叭，装机器，“四·一四”稳坐钓鱼台，站在我旁边，“四·一四”当了主席，还当了我的翻译。还有那天我到北大去，是帮聂元梓的忙的，从大方向帮忙的。当时我提了三条协议：第一、全国一千多人的动态组撤回来；第二、撤销航空版不搞了；第三、还有他们那儿有个保卫组，就是二组，我说不要了。但我走了两个钟头就去抄了，也不商量一下，不要这么匆匆忙忙嘛。这是派性高于一切，不是无产阶级党性高于一切，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抄家算什么革命行动？有少数同学，还有工人，有时是他自己的东西，也去抄，搞鬼，过去抄家还要批准，封建时代是皇帝批准，现在是想抄就抄，头脑乱烘烘，派性高于一切，而不是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而是自己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我再三说过，你们不要上当，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学们，工人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象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遇到问题，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毛主席在延安给新华社题字就是“多思”要多思多想，不要头脑乱烘烘的，以毛主席的章程为章程，以党中央的章程为章程，章程就是轨道。

那天外事口一个会上说，十几年来外交完全脱离了中央，怎么能这样说呢？外交具体是听周总理的，外交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周总理执行的，开国以来都是这样，陈毅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怎么叫我们的外交部是卖国主义外交部。刘邓路线是卖国的路线，破坏了出卖我国利益的是刘邓。

康生：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是刘、邓、王稼祥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我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制定的，不要把这些混杂起来，从对英斗争 120 多年，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在我国建了个代办处，你们去烧英代办处，也不请示周总理，我们打电话去（那时还没有烧）帮你们，你们不听，这里很可疑有反革命，脑子里没有敌人，没有敌情观念。

伯达：康生同志说的完全对，这里有坏人，不听我们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坏人插手，化工部抢档案，中央文革打电话不听，那里有许多国家机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看那干什么！去年就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说这样干好得很，一次二次可以原谅，继续犯错误，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准破坏

国家财产，要有责任感，我们到西单商场里看过，我们感到痛心、落泪的，是毛主席领导的国家。不要搞武斗了，我们看够了。（谢富治：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的武斗戚：西商场武斗挑起者，康老说了不管是那一派的都要抓。）（康：如果抓错，我一块坐牢。）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强大的，不能允许这样干的，不要觉得我们是什么革命行动？（戚：反革命。）（康：强盗。）凡是破坏生产的头都要抓（戚：包括革命委员会委员）今天到会的大多数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我向你们致敬，但在座的就有个别搞武斗的。有一个人做了坏事不认帐，他说陈伯达讲话 70%都是错误的，你不要太狂妄了！有些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称职，可以按巴黎公社原则撤，通过群众讨论。

谢富治：分两大派，都是想撤自己反对派的委员会委员，我们希望他们自己撤自己那一派的。上海不分两大派，北京的学生到上海搞两大派，反对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革命委员会。

伯达：北京这种风到处飞，自己地方还未搞好，就到处跑。

（这时康生同志写了一张条子给张春桥同志，问张春桥同志今年还欢迎北京学生吗？）

春桥：我来回答康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我代表六个省市发了言。在 4.20 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北京学生去年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充分感谢了北京学生那个讲话仍然不变。直到前一段，我在北京，听说北京的同学到上海，我还是给上海的同志说要欢迎，做好接待工作。但最近有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情，北京的一些学生说上海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某人，姚某人要靠边站，北京好多同学对上柴“联司”这个组织支持，说上海镇压了“联司”。上海群众对“联司”的行动我是完全赞同的。其实上海革委会并未表示态度，群众说我们右倾。“联司”这个组织性质变了，在工程武斗一年多了，是一些走资派挑动两派武斗，后来把所有反对市革委会的力量集结起来，反对市革委会和上海最大的革命工人组织工总司，到处打人，打死人不交凶手，解放军由工厂调查被打出来，革委会 20 人到工厂劝他们生产被扣起来，这样群众就开了十万人大会，会完了包围了工厂，要他们交出凶手，他们不但不交反而主动出去，因此群众气急了冲进去打了歼灭战，打了个漂亮仗。群众到那里是要“联司”交凶手，不是砸商场。但北京学生到那里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

阶级专政还要不要？上海的学生也是一到武汉就反对曾思玉同志，我完全赞成北京上海的学生回来，回本地本单位搞大批判。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不要打乱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轨道，江西问题不是上了轨道了吗？再去实在是帮倒忙，我们欢迎帮忙，但不欢迎帮倒忙。对上海革委会打不倒，我是担心他们被人利用上当，我希望把自己本单位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出模范来，不要到处骗人，在上海我还敢顶顶，别的地方不敢顶，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在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也可能成为模范。我们上海要紧跟上你们，向你们学习。

伯达：我完全赞同张春桥同志的讲话，上海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北京落后了，上海张、姚为首的市革委会中央是全力支持的。是上海革命群众支持的。北京的学生都回来。（谢：马上回来）

康生：建议北京市革委会、红代会搞个文件，正面说明，动员在外地同学回来，报上登出来，做个根据。

伯达：大家再看看十六条，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北京学生应该相信各地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你们去包办代替，去包办代替就是违背十六条。

谢：请康生同志讲话。

康生：讲的不一定对，粗鲁一些，不要生气。江青、伯达同志提出的问题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传达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部署大方向的问题，不要当作随随便便的谈话。毛主席，林付主席经常讲，在中国的条件下，出现某些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如武汉出了陈再道是坏事，但当毛主席的路线给群众宣布，给解放军宣布了，局面就变了，坏事变成了好事。但不是所有坏事都会变成好事，这里需要条件，当前，第一，有毛主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动摇了这个条件就很不利。第二，有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付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去年十二月卅一日中央通知上讲述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最主要支柱，任何情况下不动摇，相信解放军。一年来事实证明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解放军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我这里有很多电报，很多国家，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今年“十·一”要来看我们文化大革命成绩，北京应成为模范，世界上马克思列宁主

义者来检验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国庆快到了，他们要来，我们是有成绩的，但是否可以搞得更好些。过去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情况变了，我们要坚决拥护毛主席司令部。坚决拥护解放军，坚决执行中央文革指示，改进前进中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有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包括蒋介石，还在到处钻空子，破坏，他们不来搞破坏吗？琉璃河水泥厂发生了武斗，可发调查以一下，过去那里有国民党支部存在。十一个解放军都打伤了。

谢：革造、红造两派打仗，把军管会主任打了，打死四个人，而参加谈判的不是工人，是学生。炮兵师政委被打了。

杨成武：工人阶级没有利害冲突，为什么分成两大派？这里面是有敌人的，是有阶级仇恨的。

康生：一个工厂都是无产阶级，少数坏人捣乱，两派工人为什么那样刻骨仇恨，想想，应该是没有不可调和的，但甚至打死了人，这是什么样的道理？除了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还有一小撮走资派，有少数坏人，地富反坏右，国民党伸进黑手。无论如何要有敌情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敌人要垂死挣扎，美国过去用月牙形包围圈封锁我们，印尼反动派杀了印尼多少共产党员，杀了我们多少华侨，把我们的使馆人员打得那样子，印尼的外交部长马利克到苏联受到热烈欢迎，缅甸同苏美勾结反华，印度、泰国怎么样？蒋介石也利用这个机会不但在沿海，而且往内地派特务。外地把打砸抢的“成绩”拍了照片登了报纸或印了传单，拿到北京来展览实际上作了美蒋特务的好情报员，实在痛心。我们一些好青年没有敌情观念，国家大事不管，内部吵架，连爱国主义都不管，要警惕起来。“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两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司令部。同志们你们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结果帮了阴谋家、反动分子或者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

谢：逮捕的头头是钢院革造的，他们不交。

康生：钢院延安公社作得对，师大作得对，首先要感谢他们。交到公安部，

还要把问题弄清楚，还要靠大家。毛主席历来主张专政机关同群众相结合。

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动摇我们的解放军，要瓦解我们的解放军，抢我们解放军的枪，占领我们解放军的司令部。

江青同志提出来不要自焚长城，把解放军搞垮，把枪夺了就是自毁长城。这不行，敌人来了怎么办？外交部问题，发现有些组织要犯错误，说外交部三降一灭的路线是讲刘、邓、王稼祥、彭真等人。对东南亚人民实行了和毛主席相反路线，毛主席要武装夺取政权，他们实行和平过渡，因此他们是去扑灭各国人民革命。你们可以研究这些。刘、邓、王做了很多坏事，但不等于说中国的外交路线就是三降一灭。我们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领导外交。陈毅是有错误的，也可以检查。国家的国防权、外交权不能夺，这个权是属于中央的，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权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总理解决了很久，还成立了监督小组，现在发展到发生了什么情况，群众组织不经过中央就向国外使馆发电报，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代替国家发报呢？这是错误的，是越权违法的，有一些使馆不接受，报务员不发报是对的，还有擅自决定出国人员不跟总理打招呼，有人有事不请示总理，我说外事口好好整风，检查一下自己，不是说轻了，几个月了，我说你们死了心吧！外交权不能夺，夺了外交权就一定犯错误。外交权不能夺。不是说外交不依靠群众，不是说外事口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贡献，不是说外交没有问题，但最后决定权在中央，包括出国。开批判刘、邓、王，三降一灭的大会可以。冷静想想，烧英代办处，最高统帅毛主席说：“至少是无知”。中央文革电话广播不听，伯达同志说：到底你们听谁的？外国通讯社可以报导了，什么将近一点钟伯达、康生、江青来电话都不听。出我们的丑，也出国家的丑。

我肯定外事口里面有敌人。我这个话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今天不宣布。我是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我所以要这样讲，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大局的问题，关系到动摇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关系到动摇我们中央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成败的问题，关系到批判刘、邓路线的最后胜利的问题。我相信一说群众就会懂的，他们想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妄想，几个苍蝇碰壁，想动摇我们的解放军，也痴心妄想，白日做梦。青年人不要上当。今天和你们交心，希望你们成为模范，同志们千方百计地把外地的同学找回来。在座的有好几个省的同志，每晚开会提出这个问题来，春桥同志都不欢迎了嘛，自己还觉

实在了不起。中央委托 6408 部队到安徽去支左，刚一到，就有一小撮头头把矛头指向 6408 部队，企图挑起流血事件，向中央施加压力。这是革命的吗？应引起警惕。曾思玉同志刚到武汉，就有人反对。总的方面北京不是很理想的模范，但还是模范，要求你们更好嘛。刚才讲这些激烈的话，希望做得更好，文化大革命初是模范第一年点火是模范，第二年要做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的模范。

总理：同志们，战友们，时间很长了，江青、伯达、康生讲话我同意，稍微归纳集中到几个问题。

(1) 形势任务：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形势的估计，在座的一些人，前些时候的看法是不对，八月五日在天安门上，有一个红卫兵问我：“是否第三次大串联又要开始了？”我听了很奇怪，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目前形势是好的，去年八月份，红卫兵诞生了，革命的大串联煽风点火，要记上这一功。一年了全国的火点起来了，机关、厂矿、企业也都起来了，当然还不平衡。一年来全国布局已经搞好，现在第二年就是争取胜利的一年，依靠谁去争取胜利，依靠北京的红卫兵？要相信全国广大群众，全国广大群众是会争取胜利的。全国革命群众都起来，都去取胜利，当然胜利有早有晚的，但是解放要靠自己，也能靠自己取得胜利，北京的学生应该回本单位，争取本单位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把矛头对准刘、邓、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抓革命促生产。对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就要犯错误。现在是胜利的一年，第三年扫尾。等以后隔几年再搞。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不要主观地估计形势，出了个赵永夫就到处揪赵永夫，出了个陈再道，就到处揪陈再道，当然允许你们犯错误，我们老的还会犯错误的，但要紧跟毛主席，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这样才能保证全国的一致嘛。外事口联络站捉了两个英国记者，要同港英交换，提到国防部就被否定了。香港问题苏修一直搞我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有伟大的战略部署。港九同胞自己起来斗争了，有人建议，派一个营去消灭英国侵略者，我们不要受苏修的挑拨，修正主义骂我们“天天喊反帝，连个澳门也不敢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能让一个小小战场牵制，要打就大打，最后解决帝国主义问题这个部署，现在每一步都作准备。有人拿着枪要冲到香港去干，要去受锻炼，我们说小将要锻炼可以，可以编到军队中去作后备军，

千万不要到边疆去冲。这个问题是毛主席、林付主席经常在脑子里盘旋的，任何人不要去干扰。估计形势要把中国和全世界革命联系起来。

（康老：外事口特别要注意）每个问题都要思考，要请示，否则就要影响全局。

（杨成武：开第一枪，动第一炮，动第一班这是毛主席决策的大事，一旦打起来，动用再多的枪炮，几十万人也是小事。到香港去打要总参签字怎么能签？）

港九同胞也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他们搞得很好。港英封了三个报馆，群众起来了，大字报、小字报、油印传单到处都是，千万人都行动起来，弄得殖民者没办法。不要认为只有我们才行，别人不行。不要想在北京包办，不要想去一些人就去解决XX的修正主义问题。我相信只要伟大领袖毛席一声号召，你们大多数人可以毅然走上战场。消灭帝国主义，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你们总是坐不下来，总是想走，还乘车游行，这样一废油、二废车、三那么多车，易出车祸，应把汽车交出来集中，抓革命，促生产。第二个年头是胜利的一年，主要靠自己，不要去干扰。

（2）拥军爱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解放军这么好的队伍真正举世无双，解放军在制止武斗时，几十万人被打伤了都不埋怨，世界上那有这么好的军队，军队的将领大多数都是好的，象赵永夫、陈再道是极个别的人，“三支”、“两军”任务一担上，因为多年不做群众工作了，没有经验犯了错误，这不同于刘、邓反动路线，只要主席、林副主席一说错了，他们绝大多数都痛痛快地改了。我曾问了广州军区等四个司令员，他们当中是受 46 处伤的，都是身经百战的，即使犯了一点错误，怎能到处去抓大麻子呢？最近广州、徐州、重庆、沈阳、昆明等地都很紧张，有点问题就打倒，怎么谈拥军爱民？一定要写公开信，要支持解放军，我们不要自焚长城，让帝修反哈哈笑，我相信不会焚，最近广州武斗把外国船员都打伤了，我相信具有光荣传统的广州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停止武斗的。你们不要认为在毛主席身边，撒了娇也不批评。

（3）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卫戍区住满了外地群众，你们各红卫兵宣传队动员他们回去。制止武斗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西单商场毁了多少财产啊！（康生：有一些群众团体，中央一支持立即骄傲起来，高兴地过头了。宁夏我们一支持他们就印了很大海报，马上要斗杨麻子，你们就有人支持他们犯错误。）不准抢枪。

（谢：所有外地抢枪的一律收回。）（康：但不要彼此打架。）夺了解放军武器、粮食、被服的要法办，（解放军遵守四不，做出了伟大成绩。）再做下去就要采取措施，要严防坏人钻空子，有的好人被挑动，在北京要组织宣传队去动员住在革委会的人出去。有说反动话的可以批判。但不要打死人，打死人的要做工作，专政机关拘留进行教育。

（4）所有外地串联的马上回本单位，有些组织中央一支持马上到外地，如武汉的上海、东北。如二七公社的都要回本单位。红代会，市革委会要作出决定不要去干涉人家。现在到处告急，福州、南宁、新疆、哈尔滨、济南等等，去串联，号称首都红代会，中央批准的那有这么回事。你们去年串联煽风点火做模范，今年搞斗批改也要做模范。在本单位搞斗批改，搞大联合、三结合、也要做模范。希望北航、师大要坚持下去。搞一个工代会又搞一个，应该联合嘛。大家都有共同基础的，为什么联合不起来，两派都要做自我批评，整风是为了做到老学到老、跟毛主席跟到老。我 1922 年入党，46 年了，就我的水平不可避免有错误，犯了不少错误，写下不少错文章，做了不少错事，但是我还是要革命的嘛，可以改嘛。如果是这样，我欢迎。如果是好意帮助，我感谢，如果拿这个来挟我，我反对，不是总有人想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水搞混。

（5）大联合、三结合，在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年了，不然怎么算成果。由于前段形势估计错了，不是拥军爱民，到处武斗夺权，不联合，不搞大批判，使生产下降了。

（6）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最后结果，现在铁路运输降到最低指标。港口货物卸不了，天天罚款。如果我们搞得好，用不了半年，生产可以恢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收获很大很大，损失很小很小。煤矿要抓，矿院的同学要去做工作，不要搞派，要制止武斗。康生：要有组织，不要总理讲完了，就自己走了。只要按毛主席的部署，革命就会搞得更好。革命搞好了，生产就很快上去了，自由散漫，无政府主义不符合我们伟大的国家的要求。

（7）66 年毕业生从九月一日起开始按毕业生待遇，已经决定了。正式文件已经批下来了。

康生：大部分是革委，希望你们爱护这个组织，不要拆台，不要把矛头对准革委会，有缺点随时指出，要好好巩固，不要拆台，要补台，要爱护，不要糟

踏。

总理：北京市公共汽车不买票，还打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这怎么能容忍，中学红代会要组织排军队，作说服教育工作，不要武斗。

谢副总理：开了好几个钟头，通过了一项决议，刚才几位负责同志讲了，没有多少话讲。

一、把革命的大批判搞深透搞彻底。大批判，工农学都要狠抓，不管什么人都要抓大批判要抓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刘邓陶彭罗陆杨，从政治、思想、理论各个领域里的修正主义批深批透，更重要的还要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对此不感兴趣，实际上，只要把本单位的斗批改大批判搞好了就是对全国最大的支持。清华、北大、师大，搞好本单位就是对外地支持，否则不搞好本单位大批判到外地去，去干什么？说个不好听的，出风头！江青同志点了，北航、师大，每个学校都应该这样做，所有红卫兵小将都要在大批判斗批改中立新功。发动时期有贡献，但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要在斗批改中立新功。

二、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这是大方向，所有北京市革命派要高举大联合旗帜，反对打内战，不要分派，分派我反对，那一派打内战，做事不符合方向，就反对，那个同志做的对我们支持，不对，反对。有什么理由不联合，人家联合，非把人家搞垮。上海市很气愤。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主席提出要联合。要团结共同对付“五·一六”，搞大批判。革命师生要搞好团结。主席话不听，总理话不听，中央文革小组话不听究竟要听谁的话？北京市两大派都是革命的，特别是有个倾向，这一派利用那一派某一个人有什么毛主席病就想把那派搞垮，这是错误的，就是那一个垮了，也不能把那一个组织那一派搞垮了。江青同志说的我同意。北大聂元梓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但要把人家打倒，我反对，有些大字报很不严肃我反对。地质朱成昭是坏人，该打倒，但是要把他同地质学院分开。

还有个条子，写打倒谭厚兰，这是错误的，群众领袖嘛，不要随便打倒，要打倒也要和中央文革打个招呼，革命群众树立起来，怎能随便打倒。还有打倒徐凯，群众领袖有错误不能随便打倒，委员有错误可以批评，委员不要自己拆自己的台。所有人不管谁有错误也不要从中捞稻草，还是要搞大联合。

为什么我对两大派斗争不感兴趣？两派斗争是否一派要灭另一派？不消灭，

那前途是什么？（联合）消灭那一派我看不行。要我支持一派，我不能批评，有人说我在派别斗争中旗帜不鲜明，我不能接受。我要支一派、整一派，我就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不管那一派，对的我就支持，错的我反对。我们要在联合问题做模范，全国都看北京，是否要联合起来！到处都制造两大派，上海没有两大派，没两派的就硬要出去支持一派，当然自然分歧出两派，没什么可怕，但是人为的制造两派，要到全国去制造，严格说，这是犯罪。

我们应强调联合，不能去制造分裂，在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中北京同学要立新功。去年八、九月出了少数派、多数派，我们支持少数人与反动路线决裂是对的。现在不同于去年了。如果只讲小团体主义，不顾大局，不讲联合，搬石头砸自己脚，是错的，为什么坏人可以兴风作浪？现在为什么武斗？就是坏人一条利用小团体主义、派别斗争，另一条利用四大民主，地富反坏右没改造好的都出来了，我们要有敌情观念。一小撮走资派、帝、修、反坏没死亡。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三、搞好市革命委会建设各区夺权、就几个大学有革命委员会，中间一级政权，一个也建立不起来，有几个区在准备成立筹备小组，西城区、东城区、平谷县根本不准成立，一成立就马上要被打倒，根本不让你有政府，干部不站出来还可，一站出来就马上被打倒。要爱护市革委会，尽管有缺点错误。我们北京市的同学最近有些倒退，支持的，不是打走资派，见当权派就反，在贵州支持“四·一一”。不能说“四·一一”都是对的，贵州革委会就全错了。上海支持上柴联司，在山东支持鲁大，我们这个革委会还要不要呢？要爱护市革委会，当然批评也是爱护，学校建立的不能马上把打倒。区、大学、工厂、企业都要建立权力机构。我们许多单位、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还需要大家支持，当然理想的是不可能的，基本上可以。

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北京煤不能解决，要有百分之四十五要停产。在广州港等打架，不要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连普通的爱国主义都没有。不要破坏工厂，破坏生产，要有敌情观念，全局观念，革命，在一段时期损失一点生产是可以的，但不应该损得那么多，工代会你们要注意，工人如不搞生产，那就很成问题。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

五、发动群众制止武斗，武斗上次点了后有点好转，但这几天又有发展，这

是不能

允许的，无论如何在北京发展，要刹着这股风，现在（七机部）916、新 915 动员上万人打。现在相当多的武斗根本原因是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煽动，但表面上有两大派支持，这完全离开毛主席的航线，是非常错误的。听说正在酝酿挑起一场大规模流血武斗，我坚决反对，那样搞就是犯罪。搞了一年多了，常见首长，听毛主席声音，总应高明一点嘛！西单商场事件，要抓人，不管你是谁，是委员也好，挑起武斗，就抓。总有一天群众要觉悟把挑动武斗者抓出来。要在制止武斗中立新功。我们不要去帮助武斗，支持武斗，所有革命委员会委员，去支持武斗，煽动武斗，就辜负了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总理、中央文革、北京市人民的委托。有人用武斗显示力量，武汉百万雄师力量大，他是纸老虎。制止武斗要搞好，一搞武斗坏人都有了市场，有空子可钻了。派别斗争高于国家、人民的利益是非常错误的。

六六年毕业生、学校、工人、教职工搞武斗的工资问题，经单位革委会研究确定，报市革委会批准。

六、专政、群众结合，搞好社会秩序。中学红代会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坏人、盗窃、强奸犯趁机捣乱。派别利益高于一切是错误。派出所解决，坏人就钻空子。

七、“农村包围城市”，农民进城，毛主席讲了，过去是对的，现在就是反动的。把这个路子堵死。

八、更大规模地开展拥军有民运动。北京军区大方向正确，是支持造反派的，没有宣布了那个学校、工厂、组织是反动组织。没有抓那个领袖。“红旗军”、“联动”都是坏的，不能翻案。可是现在有人想把我们的卫戍区搞垮，北京卫戍区保卫着我们首都，搞垮了怎么行？现在听说是否景山的工人在卫戍区，大多数是保守势力搞，这样做谁高兴？有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但采取造反的办法，我们反对，要爱护解放军，特别是首都的军队。

九、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搞大联合也好，大批判也好，要按毛主席教导去做，头脑不要发热，我们北京市造反派总的说还是比较好的，北京要做个好样子，好的也影响全国的，坏人的也影响全国，北京市革命派责任重大，要做个样子。

以上有人说是老一套，搞武斗是新一套呀？只能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只能搞这个老一套。有人认为不对，可以提新的。武斗内，加一条，“不发工资”是新一套。

（来源：旧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翻印）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星星之火战斗队《揪出“五·一六”兵团的后台示众！》
一提起周总理人们会肃然起敬，尤其是“老”红卫兵对周总理更有无限热爱的感情。

“五·一六”兵团一小撮王八蛋反对周总理罪该万死！

在大学生中“五·一六”兵团有相当一部分实力。并有相当大的思潮。在大学为什么会出现反总理的思潮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周总理最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和中央文革有相当大的矛盾，那么一贯做为中央文革的应声虫——“大学生”来讲出现反总理的思潮也就不足为怪了。“五·一六”兵团破案之后，中央文革的走卒大学红代会连个屁也没放，中央文革也只不过轻描淡写地说上两句。若不是因为“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谢富治的公安部也是不会把他们捉起来的。象群众扭送公开反总理分子公安局不要的事情，更是举不胜举，这次“五·一六”兵团的全部释放就更说明了——“五·一六”兵团的黑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对于中央文革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挑动一部分群众炮轰总理的卑劣行径，我“星星之火”全体战士表示极大的愤慨！最后我们提醒中央文革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原转载于北京中学红代会作战部《北京红卫兵》，创刊号，1967年9月20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某日，中央首长谈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周总理：

在这个期间，首先应该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讲话（指九月五日讲话）。现在大好形势中有些问题值得注意。这个问题应该很好的学习。第二个就是姚文元同志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大批判当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党中央出现了一个两面派陶铸，他实际上是刘邓的一伙。第三个，值得大家

学习的，是《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的社论《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各革命派，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值得学习。这三篇东西推荐给大家学习，就是说对时事的认识，怎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进行大批判。要进行这个大批判，就需要很好的学习这三篇。

陈伯达同志：

谈一下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观点，对陶铸系统批判的一篇。当然以后还有二、三篇。主席号召大批判。现在系统批判的文章还比较少。我们要打倒刘邓陶，就要从政治、思想、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批判。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进行系统批判的样板。今后要围绕一些文章进行报道，要学习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章写得很好。写文章就是要抓住中心，要踏踏实实，质量要高，我们要用主席思想来报道批判文章，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榜样。

戚本禹同志：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的发表是中央重要的战斗步骤。重要的会议你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讲话是当前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写出来的，特别是根据江青、康生、伯达、总理、春桥同志的讲话写出来的，特别是江青同志接见安徽的形势讲话很重要。文化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主要是大方向，矛头指的谁，指对了就不断胜利。现在根据中央讲的，对大方向的干扰有两方面，就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两方面干扰的典型。陶铸是从极右到极“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这个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过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人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很好，很扎实，这是大批判中的代表作。（姚文元同志插话：文章写了半年了，是中央文革小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篇文章是从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是陶铸极“左”的发展。文章发表后可能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应。

运动方向要把矛头指正，要集中力量展开大批判，批党内走资派，要发表一些评论。对“五·一六”反革命小集团进行批判。要发表群众的批判和反应。十一号发表一些反映文章，批判陶铸，批判王任重。江青同志说这篇文章是个重型炮弹，发出去以后，要有各种型号的炮弹，报馆电台要组织各种炮弹。文章出来

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在批判走资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批“五·一六”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引导大家端正方向，引导到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姚文元同志：

这篇文章能在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起点作用，应归功于主席和主席思想、主席路线，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们的集体劳动，特别是江青同志的帮助。我是一个小学生，作了些事情完全应该，应宣传主席，不应宣传我，决定广播是中央决定的。

报纸要有革命的战斗的风格，要敢于用主席思想批判错误的东西，即是向主席学习，而且要见于宣传。我们都是主席的小学生。

（来源：1967年9月21日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主编《新闻战线》；1967年9月16日红代会北京经济学院红旗公社红旗报编辑部《红旗》。）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时间：晚8：50至次日晨0：45，地点：人大会堂安徽厅。被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部分组织的负责人。出席的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姚文元、叶群、戚本禹、傅崇碧等。〕

江青同志：我们现在开会。小将们，你们不是老将。先读语录，带了没有？（念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第三页第二段，第224页第二段，第229页第二段）好，现在请总理给我们讲话。

周总理：这次找首都红代会各学校组织来商量一些事情，但是北京现在分为两大派，“天派”，“地派”，今天主要接见“天派”。我最近才知道，听说我是“天派”的后台。我倒是喜欢坐飞机，但是飞机要从地上飞起，以后又要回到地上。“天派”有一个观点，小报中对形势有一个错误估计，任务从形势而来。今年春天清华井冈山小报上对形势估计很坏，说什么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去了。你们不知道党中央情况，到处道听途说，瞎估计。

最近又是，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在八月五日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认为是第三次大串联。我讲哪有这么回事。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估计，形势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否定这种错误估计。

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是同学们不回去，还是这样讲，还是这样估计，还是这样做。八月十日、十一日两次座谈会，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估计，你们还是这样估计。清华派出四、五千人，北大也派不少，北航也去了不少人。我们不断的号召回来，但是不灵。

（江青：清华去了五千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来，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

连武汉三钢三新都说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这样估计是错误的，还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谁的权？就是要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就是企图夺军队的权了。揪军内一小撮，七月我们纠正了一次，但八月到目前这个错误口号就是没有肃清。我们与大学红代会谈了多次但不灵。北京的话传到全国，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党中央的估计与你们相反。七八月份，各地军队承认了错误，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问题，比上半年快得多。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军队，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一号召说，错了，解放军马上就认错了。解决武汉问题就是靠毛主席，靠军队，不是靠别的前进。这就是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这些人有什么多大作用，一下子就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又过三个半月了。文化大革命向深度、广度发展了。全国已有七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了。现在正面临第二个年头，要思想革命化，要夺走资派的权，要巩固胜利，我们有无限胜利信心。首都红代会不听我们这些，主观臆造，错误估计形势，影响全国，与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驰。例如，江青同志九月五日有一个讲话，你们放了录音了吧？（众：都放了。）她讲了三个问题，可是你们的做法与这三个问题都相反。

江青同志讲要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提出要巩固这个领导核心。所以，九月一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讲了“五·一六”兵团是一个阴谋反动组织，它要动摇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质。但这主要是一小撮坏头头，从极“左”方面破坏党的领导，我们要认真对待。他们的矛头不是反对我个人周总理，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我与中央

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这你钻什么空子呢？有人想从极“左”钻空子，我们小将到处传闻，油印，推论，臆造，总归是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就是帮助你们。

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总是少数坏头头，对揪黑手要认真对待，不能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派。“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而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扩大化，不要揪一派打一派。对“湘江风雷”就是这样，他们的头头有坏人。我们过去听军区的多了，现在解决了，“五·一六”别看在名字上有几方面军，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群众会觉悟，他们本来就是造谣生事。这是第一不要扩大化。

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线，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农大东方红查出了秦化龙是叛徒。他们听我的话，在批谭时没让他上主席台，他们农大东方红将秦化龙扭送卫戍区，我通知接受。我今晨接见了他们。虽然他们东方红查出几个“五·一六”分子，但是他们找出了人证物证，自己揪出秦化龙扭送卫戍区，这很好。安徽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中央解决问题以后两派都打电话揪黑手，他们从没有讲过团结，P派和好派也一道揪黑手了，这是从没有的好事。（康生插话：两派争先恐后的交武器，自己把自己的坏头头抓起来，送交军管会了。）

秦化龙是个叛徒，不是一家调查出来的，农大的问题两派都参加了，你们应该欢迎他们。揪叛徒问题“天派”“地派”都合作了，这个行动完全有利于党的纯洁，为什么要分裂呢？对“五·一六”要有这个精神。

第三，“五·一六”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也都不好了，把群众推到对立面，这是群众斗群众。

第四，“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都是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人讲好了。（康老插话：勾心斗角的看待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五·一六”从极“左”方面来干扰。但也要防止二月逆流那样从右的方向来干扰，两者形式不同，实质相同。所以我们要指出“五·一六”问题，但不允许老保翻天，不能借此机会翻案。文汇报今天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从中央领导巩固起。

你们何必来干预党中央领导的内部生活呢？我们是一致的，你们胡说乱猜是胡闹，是干扰我们的领导，是不能得逞的，如果你们是被人操纵就要揭发，若是自己认识问题就改正。地、富、反、坏、右坏人都想拆党中央的台。你们青年人思想常常摇摆，别的地方一听你们的讲话，就以为你们从党中央、中央文革得到什么法宝了，这很不好，当年五四运动青年受封建和军阀思想影响有派别是可以的，当时北大就有胡适之派，陈独秀派，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取得我们党的领导地位之后总是一派红线，虽然有刘、邓黑线在作怪，但仍然取得了伟大胜利。可是你们都扳着手指头算党中央还有几个人了，这完全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五十年前我们对北洋军阀的看法。现在虽然有走资派、特务，但是主要还是毛主席的伟大领导，回想五四运动时，你们比我们高明多了，但是你们不能飘飘然，要好好的从天上回到地下来。

江青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巩固人民解放军。主席讲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其中武装力量是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我们，从去年保卫革命小将就提“四不”。而你们如何看呢？就相信揪军内一小撮，到处分析，说“林副主席只能指挥五分之一军队”了，简直一派胡言，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四十年的历史。林彪同志提倡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五好连队，我们怎么能怀疑呢？不错，军内也有坏人，象陈再道、钟汉华、赵永夫等，但是绝大多数是经得住考验的，怎么能用“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如果有坏人挑动你们就要上当的，拥军爱民是毛主席早就号召了的。我们现在面临着国内外阶级敌人，走资派，要更好地树立敌情观点，这一点在一到打内战时就忘记了。有些领导靠边站了，应该考虑大联合，北京武斗有的比较严重，西单商场，光学仪器厂破坏机器。工农带眼泪进去，带眼泪出来，总归是有坏人伸黑手。在这方面我们要告诉大家，“揪军内一小撮”继续下去是错误的。与军队的对立情绪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军训才能将散乱无组织现象变成有组织行动，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一些机要部门要实行军管（江青同志插话：昨天有人象强盗似的从房子上进入《红旗》，这是强盗，要专政，请谢富治同志破获，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北京还发现有违背中央精神的事，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批评，我们不赞成弯腰驼背。这是桃园四清的经验，“燕飞”是王光美、王任重搞的（江青同志插话：北京爬墙抓人是从叶向真那开始的。刘诗昆、叶向真打解放军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些你

们要批判。年青小将犯了点错误不能就摔在地上，对军队夺权是错误的，保卫国家的武器你们夺过来干什么？你们夺了枪就乱放，这事不允许。特别是有人不是光明正大，而是做特务行动。去年我对红卫兵讲过，叶向真爬墙搞彭真，杨尚昆搞窃听器，身上带录音机，开秘密会，偷记录，偷日记本，这都是资产阶级特务方式。

北航红旗去年搞什么“斗争策略”小册子，绝密的，这是一套特务手段，是国民党特务手段，这种办法早就被毛主席痛斥的。我要不告诉你们就是犯罪，你们必须去掉。

还有就是抓住人家一句话，就推理，这是不好的，我们不要学彭罗陆杨那一套，我们不指出就是犯罪（江青同志插话：宣布，一切秘密会议非法，我们中央文革都没有秘密会议，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北航红旗有人给蒋经国写信（念中央社新闻……，你们听了吃惊不吃惊呀！）。要警惕呀，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敌人就是要破坏。（江青同志插话：队伍不纯是正常现象，但要相对的纯，这一点你们组织内部处理。）这是阶级异己分子在派别斗争后边搞的鬼，暴露出来是好的，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是不完全、粗糙。有缺点错误，是爱护还是一棍子打死？但在北京就是两派斗争，找一个借口就要给人家颠覆掉，外部还有人。你们不少人参加，蒯大富、韩爱晶你们都到了现场。（江青同志插话：聂元梓也去了，躲在一个地方指挥。）（聂元梓：我没有去。）

总理对江青同志讲：这个情况没证实。师大革委会有缺点有错误自己改正嘛！为什么需要外边的人去干涉，不听主席的。我们说这些心里很难过。我们学主席著作不好，我四十六年党的历史，我犯过不少错误，也犯过路线错误，不需要五·一六来整理，我心里清楚。我个人犯过错误要认识错误，我快七十岁了，要做到死，学到死，要改到死，跟到死，就是要至死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统帅。你们来日方长，不要自满，固步自封。只要一天离开毛主席教导就要犯错误。我们的影响较大，你们的影响也不小。我们有错误有缺点，在北京对工人文化革命注意的差，因为北京工人文化革命开展的比学生晚，我们注意知识分子多了。（江青同志插话：你们从小受资产阶级教育，从小受家庭影响。不要忘记你们还没有进行斗批改呢！）我们有些偏爱你们，溺爱你们，比如蒯大富他的思想不稳定，他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也要好好改造。（江青同志插话：是劳动人民家庭吗？）

但这不要紧，要与工人、农民结合去受锻炼，我和韩爱晶同志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就是因为在一次会上我看见他很瘦，就派我的医生给他检查检查，结果这也成了包袱。（江青同志插话：韩爱晶，我们宠坏了你，我难过，你写的自我批评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你们不应该随便去颠覆人家的革委会，全国都应该如此，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

所以，北京两派不是学好毛著，而是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修正主义影响，近一年来运动轰轰烈烈，你们连坐下来学习都不行，有时连《人民日报》、《红旗》社论都来不及学。所以一些坏东西如：“怀疑一切”、“包打天下”思想很厉害。好象北京的学生如何如何好，不错，北京学生先点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是对的，你们有成绩有功劳。但是今年八、九月份不同了，各地都起来了，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了，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北京大学生再包打天下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的就是支持少数反对领导。不管对不对，外地反感，电话全是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这是帮倒忙。（康生同志插话：这是主席说的，你们为什么总是不听呢？！）大家联合开会不能解决人家本身的问题，还有“以我为核心”、“唯我独左”，目前这个论调在某些组织或学校中很盛行。（江青同志插话：北京地派要吃掉天派，或是天派要吃掉地派，老实讲吃不掉，你们老老实实从天上下来，否则跌得粉碎，地派也必须从地下钻出来。）我们必须用毛主席思想为准则，如果私字当头，压一派是压不倒的，这是派性高于党性。（江青同志插话：打内战就是打私战。）

我们希望你们还是按十六条方针，紧跟毛主席的航向，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本单位斗批改，不然，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何时才能完成？有些学生外出不回来，给他一个月的有效期，不回来开除学籍。（江青同志插话：不分配工作，参加斗批改这就是毕业分数，不参加不准毕业，这样可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众：可以！应该！）你们还要放一辈子假吗？现在到时候了。现在考验你们两件事：

一、红代会两大派，各学校的多少派，为了迎接文化大革命后第二个国庆，联合起来好不好？（众：好！）派军训团去军训，接好军训站好队伍，否则你们没有资格参加。

二、三秋到了，又是考验你们的时候，（江青同志插话：昌平有的地、富、

反、坏、右抢秋，要坚决镇压，不许地、富、反、坏、右翻天。)我们要保护搞好秋收，国庆之后到农村参加三秋，考验你们好不好？(陈伯达同志插话：可不要把两大派的观点带下去)这是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锻炼自己，其它分配、选种、秋种都是考验你们。(傅崇碧同志插话：有的学生从外地回来带来了枪，说是胜利品，问题很严重)国家的财产，你们从哪来的胜利品，手榴弹、枪、子弹完全交出来。(江青同志插话：你们都不会瞄准。哎……)

江青同志：下面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同志：说我是天派的后台。(康生同志插话：街上画了系统图，有书为证，不是造谣)说我是天派的唯一理由就是我和他谈过话，但是都可以公开，可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江青同志：造谣的事太多了，各取所需，以后总得设法弄清，总不能造谣有功。)

韩爱晶你讲一讲我和你谈过袁世凯吗？(韩：没有)我知道韩爱晶名字不久，我认为韩爱晶要做象样的自我批评。我问你韩爱晶、蒯大富，你们对二月逆流有鲜明的态度和鲜明的旗帜吗？对五·一六兵团表示过什么气愤吗？(韩：有)在这里我批评韩爱晶、蒯大富，我不是天派，我是不三不四派，我批评的不对请你们批评。(江青：爱护你们才批评你们，不要灰溜溜的。)

我有一次找韩、蒯讲了一次话，蒯大富讲了一些悲观的话，我才说：“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途，无限的光明”，“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样我就变成你的后台了。你们有这样一个悲观的思想，就不能正确的估计形势，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估计是大好形势，这种悲观情绪正确吗？最最正确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们是很悲观的。你们要学毛著。你们对江青同志讲话很好学习过吗？想过吗？你们大批同学到全国去抓军内一小撮，不是自毁长城吗？而是中了敌人奸计！

北航有人写信给蒋经国，难道不能引起警惕吗？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革我们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的阶级敌人用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你们当了大官了。听说韩爱晶要去西安买飞机票(韩：没有，火车票)，财政大权在你们手里，你们拿钱挥金如土，口口声声说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你们的言行又是怎样呢？各行其政。认为天要塌下来了，那天师大问题，你们搞了什么活动？(戚本禹同志：你们清华、北航、人大三红、体院

等几个院校开了一个秘密会。)(江青同志：你们自己就说话不算数，人大三红就言而无信，你们三红里就有很多特务，回去把它搞出来。我怀疑你(指回答问题的三红战士)不是学生。你们保大特务孙泱。)

我建议你们到外边去都坐公共汽车，财经公开。我不晓得你们化了多少钱。不要采取特务手段、警察手段，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派为什么不能谈问题呢？为什么要吃掉他呢？大鱼吃小鱼。聂元梓去了没有？你们总是幸灾乐祸。(江青同志：你们以前在教育部还俘虏过谭厚兰)你们要公开到桌面上，不要采取手段。

(江青同志：你们就只能片字只语，完全是糊涂)你韩爱晶不在学校搞你的复课闹革命，而是到师大亲临前线，你们还是东支持西支持。(江青同志：看来你真是后台了。)

今天就是摊牌了。你们抱了一大块石头，却以为自己得了个宝贝，死抱住不放，走路有包袱。你韩爱晶有没有后台？(韩：没有，保证没有！保证二十年也能证明我校大方向是正确的)你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走？不知不觉被人拉着走，你蒯大富有没有后台？(蒯：不敢保证)聂元梓有没有？(聂：没有)(江青同志：有人说新北大又立第三功了，聂元梓你不害臊，老实讲，我们去年与陶铸作斗争时，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与王任重打得火热，他是一个CC特务。孙泱也是一个特务，可能是一个日本特务，还与苏修有关。)(戚本禹同志：孙泱的秘书就是你们三红战士。)

你们大事不去搞，而去搞师大革命委员会，大鱼吃小鱼，实用主义很严重。不搞自己的斗批改，要提高警惕呀！不能包办代替，手要收回来，你们有没有后台，调查研究一下再说话，不必匆忙声明。我们不会冤枉好人。是什么线把你们拉在一起，乘人之危，这样会得到你们意想不到的老保翻天。(江青同志：北大已经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

江青同志：今天给同志们、小将开这个会。今天由沉痛变成气愤，几次都不能与你们冷静地谈，我觉得我应该做自我批评，听你们意见时较少，不能及时地对你们从思想上到政治上帮助你们提高。另外一方面，我接受外地的批评：说我对北京的学生太宠了，这是事实，批评你们很少，都说好啊！好啊！当然，老保翻天，颠覆小将成果你们不答应。在许多时候，宠、溺爱你们。我的孩子回家造我的反，说韩爱晶如何如何……我对他说：你不跟爸爸、妈妈干革命就走开。韩

爱晶栽了个大跟斗，对接受我的批评不理解。对你溺爱了，见了你就笑咪咪的，圣人呵，小圣人啊！现在我感到你是绝对主义者。我敢保证，我敢保证……。北航你敢保证吗？说得太早了。

有人想从右的，极“左”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对你们太宠了，要求不严格，接班人要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接别的。而在你们脑子里毛泽东思想占得很少，因为主席从来不绝对，不武断。不久前，毛主席告诉我，让我转告给小将：“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回去好好想想，我对你们帮助、教育不够，谈了以后，以为你们能听我们的谈话，但你们根本不听我们的话，这是我们的主观主义。

上次批评了蒯大富，自从蒯大富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你们思想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以后发现几次总是背道而驰。到目前某部分人，对我们言而无信，这是什么问题呢？除了少数坏人混水摸鱼外，你们自大狂妄、个人主义膨胀没地方放，把自己置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人民之上。

你们是救世主，包打天下的英雄。就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在作怪。去年朝气蓬勃，现在变成另外一种人，背离大方向。当然说的是部分人，但他们在起作用，我应告诉你们，不要以为中国没有你们就完了。中国共产党 1,800 万，就是揪出一万也是少数。你们悲观失望，韩爱晶写什么检查，连我名字都不写，变成大老爷，宠坏了你，在座的我是最宠爱你，训了要训你，训无产阶级的子女，你脑子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泛滥，蒯大富我都不愿再训了。

总的说，天派、地派也好，我们做的工作少，你们有缺点有错误，我们应该承担，我并不轻松，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关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共患难。现在你们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了。有的人在小报上骂我：“江青算老几！”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别认为离了你自己不行。你们回去要开门整风，把不纯分子清除出去，提醒你们，你们不跟毛主席走，我们依靠军队、劳动人民。只要主席一声令下，军队就坚决跟主席走，我跟主席几十年了，不象你们摇来晃去。你们不学毛主席著作，靠歪门邪道，靠特务手段……连我的信都有人邮检，对我专政。你们那一套，是刘少奇的。主席关心你们，因此谆谆告诫小将：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说的是真正的革命小将。

我想突出讲一个问题：就是你缺乏敌情观念，刚才韩爱晶的表现就是如此，

什么都是好的，有三千地富反坏右、国民党特务在温州捣乱，这就是敌情。我们军队去夺了权。你们人大有相当多的特务，为什么日修、苏修对你们学校的动态报导那样迅速呢？两派都有，那派（指新人大）是肖前。

另外，有奴隶思想，非常喜欢外国人参加你们的会议，我们自己的事，革自己的命，请他们干什么？当然有的是朋友，但混着不少特务。国民党也留下相当大的一批人没走，难道他们不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北京两大派，我感觉有苏修、美蒋、日本特务在作怪，你们有的自己不知道，利用你们个人主义膨胀，爱为个人吹捧，说你如何如何，听不得不同批评。我们批评你们，就对我们疏远，那边就会拉你们，要提高警惕。

另外讲一个立新功的问题。

你们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立了不少功。要作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的小学生，每天都要想想自己为人民立了新的功劳没有？犯了错误要自我批评，立了功那是本分。

说了几次你们听不进去，你们是老大，大到连毛主席的话，中央的话都不听了，多数是听的，我说的是少数，少数回去想了，也还是听的。

回去搞大联合，三结合，进入本单位斗批改，你们不去改谁改，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灿烂青春你们想过没有？世界上没有（原文如此，似应为：“所有”——编者）资产阶级的东西全部改掉，这样光荣的任务落到你们肩膀上，这样光荣的任务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设想，发一个命令，一个月不回来不分配，不毕业。这下子揪军内一小撮的人回来了，逍遥的也不逍遥了，你们也可以分配给他们些任务，有人反映不干工作就不给工资，教师也如此。教师是操纵你们的。不搞斗批改就不毕业。

从今晚会议，如果还听我们一点的话，脑袋还有一点缝的话，斗批改就摆在你们面前。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要求过急，各校按具体情况，但今年年底一定要进入斗批改。学校里头斗批改，文学艺术斗批改，学校斗批改还容易一些，你们受资产阶级影响，但读了一点毛主席的书，你们是大学生的，不单是语录本，你们有毛选吗？不要教条地背，要理解主席的精神。话说多了，结束了。

康生同志讲话：我接触同学不多，但却得到了地派后台的称号，不胜光荣之至，有点受之有愧。开始我还是支持聂元梓的，后来又支持了谭厚兰反对薄一波、

孙友渔。我想问问蒯大富，你们有一个时期也反对我，和党校红战团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黑帮子女。如苏振华的儿子就在这里，我曾经告诉蒯大富，不要和红战团联系，你们要批刘少奇、刘邓路线，清华要与党校红旗战斗队联系。但是我好心没有用，以为我是害怕了，怕你们揭露打倒我，我好心，没有用，得出这么一个结果，刘少奇以为我是清华后台，在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斗了我三个钟头。我说我是支持蒯大富的。刘少奇专门找我，在人民大会堂谈了三个钟头。我说不清楚，刘少奇说：“你不清楚我清楚”，我是保护蒯大富的。因为个人关系我不愿意讲，我对同志们教育帮助不够。

我们今天谈话的目的是爱护的，帮助同志们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毛主席语录上讲过：“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就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希望同志们很好的去读一读正确的意义，这是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关照我们这样作。要我们以身作则的用自己犯错误的事实帮助同志们。

毛主席讲：“一个工厂内两派那样斗争，到底两派斗争有没有阶级基础，看不到。”当然，少数地富反坏右除外。都是阶级弟兄嘛！为什么这样，开机枪，六〇炮，放高射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释。坏分子是有的。我同聂元梓讲过，反聂的杨旭（飘派）和他的弟弟杨旭章（）是坏分子，可能是特务。这是少数。但在学校里学生这一派那一派斗的这么厉害，到底为什么？有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江青：缺乏自我批评，只有批评人。地派如果不钻出来就闷死。）

不！是被埋葬！有些同志言行不一致，会上一套，下去就不一样了，言不由衷，言行不一致。这就是一个两面派作风。错了不要紧，不要表面上一套背后一套，还要搞秘密活动，怕我们知道。

（江青：我们的记者已经哭了，因为你们拒绝他们，你们就是无视中央，这就是两面派，资产阶级政客作风。）

有些组织或某个人采取特务手段。我与特务、敌人斗争了多少年，我特别敏感。“天派”“地派”有些作法就是特务作法，我想不出你们从什么地方学来的？哪个学校都有动态组。有些人对一篇文章象研究密码似的，不是研究思想，

而是研究这一段，那一段。这里有一小撮走资派在后台操纵。另外还有苏修、美帝、日修和蒋匪特务在后边伸黑手。他们不直接出面，如人大的孙洪。

周总理：农大东方红揪秦化龙，秦化龙就是以极“左”面貌出来，你们学校就没有？有大的有小的，不要把话讲绝对了，你们年轻不怪你们，农大东方红是地派的，我们应该欢迎。我请同志们注意，要注意敌情，外事口有美国间谍直接插手。（江青：请大家注意一个情况。九月十二日在地质学院有一个气象局红旗战斗队的“谁是最大的黑手”要分析一下。）与特务斗争的经验你们太缺乏了。第三种情况，就是社会思潮，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有右的，也有极“左”的。

我今天看清华井冈山小报有一个社论是很错误的。九·七苏修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一次会上做了一次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我们准备回击。勃列日涅夫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的。然而我们有些人说苏修骂我们是极“左”。首先是这个题目就有问题。（江青：你们井冈山小报搞我们，我们就用大报搞你们，必要时一个个点名搞你们。）

如果按标题和内容来看，两条路线斗争只有极右了，而没有极“左”了。列宁为什么写《“左派”幼稚病》一书呢？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个社论和第一句话就是错误的。勃列日涅夫正在骂我们反革命，你们说他们骂我们是极“左”思想。当然作者不一定是有什么企图，因为可能是对4·14等等，但问题是反对批判“揪军内一小撮”，这是自毁长城。而恰在同一天出这么一张报纸。

你们说“揪军内一小撮”是林杰搞的，但是你们清华井冈山出去五千人到河南反新军区，到上海反张春桥，到武汉反对曾思玉。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吗？而用社论大反这些东西，你们清华井冈山就是极力反对江青九·五讲话，而称这些人是什么先生。（江青：你们知道这个文章（指井冈山报社论）是谁写的吗？）

（蒯大富解释了一些）（江青：一定要组织一篇文章，肃清流毒。）（戚本禹点头）（语言学院汇报：我院两派都有外国人参加，怎么办？）你们怎么处理？！你们去斗一斗蒋南翔去，这是蒋南翔搞的特务学校。

还有人说，“极‘左’思想就是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我问一句，什么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东西，北京市最重要的国家机器是什么？就是傅崇碧吗？要打砸北京卫戍司令员吗？你们怎么能把我们这些错误缺点和少数坏人的某一机构

及美帝苏修混为一谈呢？这是一种什么思潮？这是被敌人利用了。（江青：我们还称你们是同志，信任你们，你们就称我们是先生了，我还得保你（批蒯），有人说总理是最大的保皇派，我是一个小保皇派。我生怕你们犯了错误。）

你们对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不对头，你们有些人是资产阶级政客式的、国民党式的、赫鲁晓夫和台湾式的看法，是不对的。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看法。与香港反动报纸一对照，完全一样，是反动的。

我们揪党内走资派，丝毫不妨碍以毛主席为首的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怀疑这一点就要犯绝大错误。你们还有人要整我的材料，如果不够，我可以供给。蒯大富我提醒你注意，党校的红战团开始向清华井冈山 28 团活动。

（江青：当心老保翻天，韩爱晶还那么绝对保证吗？韩爱晶、蒯大富要作自我批评，向谭厚兰作自我批评，这次你们不对，你们颠覆别人，你们自己也可能被别人颠覆。）

要认真学习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四章。新北大应该总结一下为什么在一个时候要打倒谢富治副总理。

（江青：就是想要打倒谢富治，聂元梓当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你们这些头头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散会）

（来源：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翻印）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
九月十六日凌晨两点五十分至五点十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单独接见了农大东方红公社代表，对当前农口和农大的文化大革命作了最及时、最重要的指示。

周总理仔细地听取了我农大东方红代表关于秦化龙问题的汇报。总理指出：“你们秦化龙的工作做得不错，有成绩。你们是有功的，立了新功。”同时，周总理还着重向我们指出：“革命派要注意有黑手伸进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恐怕前几段你们兴趣小，对后面几段最感兴趣，后面几段就是结合当前形势写的。”

我农大东方红的代表还向总理汇报了“农口革联”抓住了四个“五·一六”分子的情况和农口老保把农口造反派头头都划成“五·一六”的谣言，总理笑着说：“那有那么多五·一六呀。不能批判极‘左’，右派就翻案嘛！”

周总理对我校革委会十分关心，并且针对那一小伙“反动派”说：“他们反

对（革委会），就让他们反对去吧！”

在谈到我校“反对派”的头头污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师大问题的“九·七通告”是“滥用职权”，是“红色政权出了问题”时，总理明确指出：“这是中央批的，我签名同意；我们都签了名，送给毛主席、林副主席看了。”总理的这段话是对攻击市革委会“九·七通告”的一小撮人的有力还击。

在谈话中，总理赞扬了中央气象局《红旗》的同志“对形势认识的不错，我看了一份他们写的东西。”

农大问：是不是《三十个为什么》？）

总理：是。《三十个为什么》写得很好，逻辑性很严密，分析得很深，是谁写的？

答：是七兵团。

总理问：是哪一派？

答：是气象局红旗。

周总理对农口斗批改工作还作了具体的指示。总理说：“秦化龙是你们揪出来的，你们揭发；你们还要继续批判谭震林，也要结合批判你们学校的王观澜的领导，重点仍放在谭震林身上。”并同意在国庆节前批斗一次谭震林。

总理后来还向农大东方红的代表说：“你们很主动嘛！四个‘5.16’分子首先是你们抓的，你们又揪出了学校里的八个‘5.16’分子，秦化龙你们又揪出来，说明你们划清界限了。毛主席一贯主张：造反派要自己起来斩断黑手，这样造反派就更造反了，更壮大了。”

最后，总理亲自写了批准农大东方红把大叛徒秦化龙扭送专政机关的批示。

周总理的这次接见是对农口和农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关怀，是对我们的巨大鼓舞。我们要坚决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紧紧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又讯）

根据周总理的亲笔批示，我农大东方红公社战士在十六日凌晨已将大叛徒秦化龙扭送专政机关。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农口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取得的胜利。

（来源：1967年9月19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

153 期)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对外事口领导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九月十八日下午五时，周总理接见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外交部和对外文委有关领导干部、部（委）业务监督小组代表和群众代表，作了重要指示，现将有关姚登山、“五·一六”问题整理如下。〕

周总理在谈话中当面严厉地批评了姚登山，他说：“三降一灭路线对外交工作是有干扰的，但总的说来外交部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毛主席的外交路线的三个部分都执行了嘛。姚登山你在这里，我要再讲一遍：你在对外斗争时是英勇的，我对你的估价是足够的了，是我把你派出国的，你回来我去接你了，我又推荐给毛主席接见了，报上还登了照片。不料你却昏昏然了。结果你干扰了外交部。你不仅到外贸部，第一、第二外语学院作报告，而且到处作报告，个人主义膨胀了。你是司级干部，你尽管对我说你承认错误，要检讨，但你没有认识错误。”

周总理接着说：“国庆节要放映一批电影，戚本禹同志问我，主席接见姚登山的那部新闻纪录片能不能放，我说电影还是照样放嘛。国庆节快到了，今天已经是十八号了，中央文革同我谈到，不抓不行了。今天这个会本来不打算开的，但国庆快到了，外交活动又多起来了，不把政策掌握好怎么行呢？我告诉你，姚登山！你的话比我灵，这点我懂得。中央文革，特别是康生同志提过你。

（外交部联络站同志说：有些事，姚登山是不知道的）

你们是一般干部，你们年轻，他是参加部领导的，指的是旧的部领导，不是三结合，不应该这样发热嘛！那天上午（指八月二十七日上午接见外联等组织代表——编者），我接见外交部联络站等组织的代表时，他们逼我到了这个情况，你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吭。我的病发作，手都打哆嗦。我的医生都看不惯了，要造你的反了。你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了，我对你是有阶级感情的。许多同志看见都非常气愤，你就没有感觉，处之泰然，奇怪！

谈到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时，周总理说：“‘五·一六’问题，‘九·一’讲话谈到了，三号《人民日报》报道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就更清楚了。‘五·一六兵团’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个反动的阴谋小集

团，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多少人。它拉一些本来就不存在的关系，好象自己的组织了不起。只要群众觉悟了，就可以把自己的头头抓起来。说什么八个方面军，神乎其神，吓唬人的。里边有黑线牵着，目的首先是动摇和削弱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拿反对我作幌子，收集我的材料。我在法国入党，在黄埔军校工作……四十多年不知说过多少话，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情况，把不同时期的话罗列起来，也可以形成材料！这怎么行呢？”

周总理接着说：“外语学院的‘六·一六’拿了龚澎的日记，就是不交出来，这不对嘛！如果他们交出来，我还是可以见他们的。他们还抄了乔冠华的家，打了他几拳。‘六·一六’我还是把它摆在善意范围里的嘛。连刘令凯我也打电话给谢副总理，要释放他嘛。其实我早就批了嘛！有文字根据嘛！这是巧合。结果他们说我是听了他们的勒令才放的，没有到四十八小时就放了。”

周总理继续说：“‘五·一六’所谓地方军，即第八方面军，只有长沙一地，没有多少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五·一六’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

‘五·一六’另一方面军揪军内一小撮，影响我国威信，动摇军委领导，妄图搞垮新生的革委会，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许可的！这就是‘五·一六’的阴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几点：

（一）抓‘五·一六’不要扩大化，没有多少人。群众是受蒙蔽的，要孤立少数头头嘛。

（二）各单位各组织让受蒙蔽的群众自己抓，对方不要去抓。农大开大会要让秦化龙上大会主席台，我说秦化龙要去我就不去了。后来秦化龙没去，我去了。但发言的人保秦化龙，我就退席了。现在调查，秦化龙可能是个叛徒，与‘五·一六’有关，已被扭送卫戍区了。要按主席思想办，要他们的群众自己划清界限，别的机关和另一派不要压。

（三）过去二月逆流是要批的，陈毅、谭震林还是要继续批。我还是要支持你们的。现在看来陈毅没有插手。现在批陈毅的小会已经开完了，可以联合搞一次大会，限于批判外交政策方面的错误嘛，别的单位不参加。大的联络站今后要逐渐取消。大联络站增加派性，影响党性。

（四）推动一个学校、一个机关掌握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进行革命的大批判，结合本单位斗批改，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特别是通过批判‘五·一六’的极‘左’思潮，促进大联合，而不是促退联合。

以上这几条对外交部和对外文委都适用。国庆节有繁重的任务，你们要批判极‘左’思潮的影响，也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好好学习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列宁关于‘左’倾幼稚病这篇文章。”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谢富治接见北京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下午 3: 15，谢副总理、卫戍区，各兵种首长接见了首都四代会代表，会上，谢副总理、吴法宪等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谢副总理的重要讲话：

今天的会，卫戍区、各兵种首长，四代会代表参加，会议响应江青同志 15 号、16 号，9 月 5 日的重要讲话，搞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大批判。解放军表态：军队支持革命大联合不支派，凡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支持。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解放军，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要拥军，人民解放军是举世无双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我爱军队，我是老当兵的。解放军总的方面是好的，有缺点错误有个别坏人，江青同志 5 号讲话强调不准冲击军队，有缺点可以提。

毛主席、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再强调革命大联合，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北京大学的学生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如果我们真听毛主席的话，那么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听，何况不让你们上刀山下火海，大联合你们就不干了呢？要听江青同志的话，搞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配合全国大批判。

为什么工人分两大派？就是有坏人挑拨，当然，不见得直接控制。有坏人，地、富、反、坏、右。

钢铁学院只关心打架，不关心国家的钢铁数字。头头有“私”字，想把别人搞垮自己来独占，私字当头会被别人利用，要加强敌情观念。武斗搞分裂，会被敌人利用，北京搞分裂对全国影响极坏，对上海不但不学习，反而要扰乱，说上海“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五月以后，两派组织一般都是革命派，只不过一派对的多一些，一派的少一些，对北京两派，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都支持，不能全力支持一派。北京要取消两派。不准开派会，尤其不能开派性秘密会议。一派

完全想把另一派压倒是错误的。联合是唯一道路。一派吃掉一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两派联合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好好学习江青同志 9 月 5 日，9 月 17 日的重要讲话。要联合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的话听不进，就要走远了，这个造反派就要考虑。军队不能单支持一派，北京基本上没有只支持一派的现象。中学要取消 43 派、44 派，43 派说以我为主，44 派说以我为主，都不行，要组织以军队为核心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学对军队的态度不好要改变。不准赶军队，维护解放军的权威。

江青同志说：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革委会很重要，为什么对师大中央那样果断而又坚决，搞了三结合，就是组织上加以巩固。三结合就是政府，不要无政府主义。

国庆节要到了，还不联合，教人家笑话我们。要用国庆推动革命大联合，革命派的团结。凡联合起来就准参加，不联合的，就把他们放到不重要的位置上去，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是最大利益，是国家的最大利益，是党的最大利益，是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不执行就要走向反面，满脑子私利就要走向反面。要看谁的风格高，看谁的风格高。要在革命大联合中立新功。解放军、革命干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大联合中立新功，北京要做模范，北京实现了革命派大联合，将对全国起到好影响，三军支持联合，不支持分裂。

“五·一六”小集团人数很少，不要到处抓“五·一六”。他们人数虽少，但危害大，“五·一六”有三个罪恶目的，（一）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动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可靠柱石——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动摇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对造谣、挑拨离间要坚决回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中央文革是分不开的，本来就是一回事，17 号江青讲了，不要听流言蜚语，挑拨离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要上坏人的当。对江青、陈伯达、康老还有其他一些同志要保卫。奇怪的是有些人一边反“五·一六”，一边干着“五·一六”的事。凡是没有中央正式表态的，就是谣言，现在谣言太多了，却没有人去辟谣。你们的小报，小道消息太多，生意兴隆，要整顿小报，你们小报再搞小道消息，就抓住几个小报好好整整。不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小道消息要整整。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和人民解放军联合。今天的会议是大联合的会，是响应江青同志，也是毛

主席最高指示、最新指示的会议。你们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响应毛主席司令部的号召，不能光说，耳边风，口头的响应不行，要实际行动，要采取有力措施，革命派不听毛主席的话就不是革命派，我这个人没什么能力，有一条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希望同志们拿出坚决措施，各大学，各代会拿出坚决措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群众组织及“外办”代表的〔接见外交部五个群众组织和外办代表及外交部、外办当权派。参加接见的当权派有：罗贵波、姬鹏飞、韩念龙、徐以新、龚澎、宦乡、董越千、郝德青、姚登山。〕

今天这次接见是偶然的。韩念龙对我说，外交部的档案很乱，这是我意识到的，因此，今天把你们找来谈谈。

八月份外交部档案很乱，各单位都在翻阅，失密现象严重。档案是否有外传要追查，这是关系到国家的核心机密。今晚来一个总动员，号召观点不同的组织在这个问题上要联合起来，要清查坏人。

对乔冠华要一分为二。

王力还没有定案，王力的八七讲话只代表他一个人，王力犯错误只是一个人，对中央文革还要绝对信任。外交部八月份大方向错了，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很不满意。八月份外交部发现一条反动标语。（是群众反映：刘少奇万岁！）要追查，要动员起来抓坏人。

姚登山在国外抗暴还是有功的，还是坚强的，现在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允许他检查，允许他改正错误，允许他革命。姚登山还要保。

十八年来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八月份砸政治部、机要室是错误的。以前泄密我以为是把大字报转抄出去的，现在看来，总根子是档案丢出去的。（接见时总理对北外红旗大队把王力材料要出去，提出了一些批评。）

现在果然出现拆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台。他们不是反我一个人，反我一个人的错误可以。但后来知道“五·一六”有黑后台，反康老、江青、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形“左”和右会走到一起去。

我欢迎给我贴大字报，不要因为给我贴大字报而抓起来，有人要抓，我亲自

干预了这个事情。问题在于我们外交政策上出了一些问题，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抹了黑，可以不发生的事情，我们发生了，可以推迟发生的，提早发生了。

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反对周总理，要明确几件事情，给毛主席抹黑了。

十八年来我们不是卖国部，外交路线不是“三降一灭”。“六·一六”这样写，外交部恐怕也有人同意这样的意见，一定要找“三降一灭”。主席说外交工作都是主席亲自过问，九月一日康老也澄清说“三降一灭”是刘邓王稼祥的。

“五·一六”是个反对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没什么了不起，没多少人。

“五·一六”它的目的是要首先动摇、削弱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拿反对我作幌子。

“五·一六”想动摇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得逞的；挑拨中央文革与我的关系；揪军内一小撮、动摇军队的威信、影响军队的威信；搞掉革命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

揭发“五·一六”反动集团要更促进这个大联合，而不是推迟这个大联合。就是这四个原则：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如有群众组织受“五·一六”的蒙蔽，自己出来揭发，严重的扭送卫戍区。不严重的，可以自己开会批、斗。第三、不能因此老保翻天。第四、因此促进联合，不是推迟联合。

（来源：1967年11月4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33期）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
总理：

中医也有消极的东西，吃了饭不能吃冷的，吃了这不吃那，……我不相信那一套。极少数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主要还是增强体质。如果这样就大众化了。我国卫生工作既不能学资本主义，也不能学修正主义，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让卫生成为人人的常识，成为人民的习惯。肥皂最好不用，肥皂并不好。你们年青人不懂，主席就不用肥皂，我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我就不常用，不是必需品，牙膏也是一样不一定用，农民也不用牙膏，不一定坏牙多，坏

牙的城市的人多，很多是退化。打破卫生的许多迷信，你们好好讨论一下，把老爷部打破。林付主席指示要具体化，提高到原则上、哲学上、思想上。

卫生组织不能简单下放，不能简单转业，你们卫生部在运动中有多少人管业务？（众答：440 多人，现有 60—70 人搞业务。）主席说这次运动证明了一个真理，少数人能办事。国务院有七个单位，我都没管，我只抓了五个秘书、联络员、总理值班办公室。人事上访有 20—30 个人就够了，二、三十人就能办事，但是这么多人不能都推出去，以邻为壑，要自己想法为人民服务。最容易下放的是卫生部，教育部。

卫生系统最好办，可以用卫生知识为人民服务，在基层可以在下面搞卫生、宣传，培训卫生人员，还可防病。最容易下放的是教育、卫生，一半劳动，一半教育，帮助人民学文化，既教政治又教科学。这二个部最容易为人民服务。工业部门就不能这样，不能到处办工厂，农村部门也可以下去，开荒办农场。国务院有些部有问题，教育卫生只要方向对，很快就可以下去，消除文盲，带徒弟。军队搞文化教育，很快就消除文盲。最容易往下推的，是教育卫生，面向农村，为群众，要从卫生教育带头。卫生我抓的，教育部是伯达同志抓的，你们可以竞赛一下。教育部教科书要重编，困难些卫生要好办些，医字教科书，有些繁琐的课程也要重编。

原来我们认为在大批判中促进大联合，现在看来大联合搞不成，大批判也搞不好，干部也站不出来。派性最强的表现在对待干部，这是新发展。“斗私”斗得怎么样？你们要多做自我批评。两个组织不忙于取消，取消早了反而对联合不利。支左不支派。保守的要联合。孙正是路线错误，不是三反分子，我今天表明态度，你们说他是三反分子，材料不足。

双方都是群众路线，两派总是有先进一点的，后进一点的，有激进点，保守一点，任何组织里头有先进的，落后的，都有左中右，不是右派的右，是偏保守。你们不要为孙正同志争来争去了，我宁可让他做其它工作，不让他介入。只有真正联合起来，才能搞好大联合，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支左不支派，联合不倒旗。

干部问题人家对了，你们也不支持，干部站不出来。今天本来是请你们来听听，听说你们总部再搞几个组，要达成协议，学习班为什么不多搞几个，不要单

独搞，要联合搞好，单独搞，派性越搞越强。

（有的同志提出抓 5.16 问题）

总理说：关于抓 5.16 问题，我过去讲过四条意见：

第一，不要扩大化，真正是 5.16 头子才算，受蒙蔽群众不算，5.16 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垮，5.16 今天搞周××，明天还搞江青、伯达、康生同志，是阴谋集团少数人。中央对待 5.16 比对联动还慎重。联动是年轻人，抓起来学习学习就放了，还追联动后台，对 5.16 要区别头子和一般人。

第二条，如果发现哪个组织有坏人、有黑手，就告诉那个组织，由那个组织自己抓。农口如秦化龙问题是我第一个告诉他们的。批判谭振林时结合秦化龙，不仅是 5.16 还是叛徒，就跟他们讲了，经委陈大伦，骆风，经济研究的编辑骆风，民族所洪涛，统战部刘郢，他们都是本组织揪出来的，知道有黑手就告诉他。

第三条，5.16 是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形“左”实右，极左思潮有市场是刘、邓造成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难免，青年有极左没什么不得了。批左时要防右，不要使右倾思想复活，防止二月逆流，老保翻天。

第四条，利用这个推动大联合，坏人黑手揪出来了很快就联合起来了。二、三月份先念同志的讲话也有毛病的，但三个副总理是有区别的。他说错话批评是允许的，这怎么能理解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呢？李先念，这问题不是早解决了吗？联络员没告诉你们吗？“天派”、“地派”都是派性，我既保谭厚兰，王大宾还不错，也保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五大领袖。你们要比他们年纪大，不要受他们影响，对那个领导，有意见批评不等于是 5.16，5.16 是阴谋集团，他们口袋里装了很多黑材料，不要以为他们只反对一个人。

吴传启，他目的是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是国民党，从十一月份搞了我的黑材料，我都不看。我看他怎么暴露。潘梓年是个叛徒。反对派接见时，那一派问我，我没明确说，让他暴露，我要说的话，就切断联系了。他们抱得紧紧的，一个跑到江苏太湖，一个跑到山西河北交界地方。

李先念：这些人都是特务。（有人说：3.10 问题）群众组织贴李先念大字报是可以的，但有的人和吴传启有联系。

总理：在卫生系统，吴传启就是通过叶心清来搞，他是个江湖医生。

（有人说：除了叶心清外还有人。）

总理：他们上了叶心清的当，不了解。我还不是找他看过病？你们不懂的，5.16 是个秘密组织，没有暴露以前他们和红旗杂志、中央文革、人民日报、新华社有联系，难道这些是 5.16？看是什么联系。

二、批判“揪军内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空军司令部 红尖兵（林立果）《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人民日报编者按：

红尖兵的文章，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但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任务，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是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思想革命运动，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拉下马，让他们靠边站。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但是，正如红尖兵的文章所说的，从组织上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就是说，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仅仅从组织上打倒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一场大批判、大揭露、大斗争，对他们这些腐朽的垃圾堆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不打不倒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毒根扎得很深。不彻底批判，他们的流毒就不可能肃清。弄得不好，随时有复辟的可能。因此，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能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绝对“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

进行这场大批判，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在大批判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边学习，边战斗。在大破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大立毛泽东思想，在思想理论阵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吧！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调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运动的斗争大方向。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把他们彻底粉碎。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他们混进无产阶级政权机构内部，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机构，从而造成了两个政权、两个司令部激烈斗争的局面。当然，就我们整个国家来说，是无产阶级政权占统治地位，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领导权而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机构，只是某个局部、某个方面。但是，如果我们让其存在，任其发展，“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粉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极其复杂、极其深刻、极其激烈的大搏斗。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争夺政权的斗争，不能不强烈地表现在政治

思想战线方面。我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无产阶级政权机构内部揭露出来，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这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把组织上的胜利，扩大到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胜利，还需要继续作艰苦的斗争。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林副主席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极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无数事实也告诉我们，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组织上打倒并不等于从政治上思想上打倒，撤职并不等于完全夺权，夺权也不简单地就是撤职。职和权是联系着的，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有职固然有权，无职仍然可能有权。

什么叫有权？有权，不仅是指有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而且意味着有政治上、思想上的指挥权。在政治上有势力，在群众中有影响，就会有人听他的指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转化为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权，主要表现在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是他们利用职权，打着红旗反红旗，在群众中进行欺骗活动的结果，也是由于他们多年来利用宣传机构，利用笔杆子，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思想教育阵地，在群众中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结果。这种政治上、思想上的权，采取自上而下地撤职、罢官等组织手段是剥夺不了的，必须通过自下而上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大揭露、大批判，把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以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流毒和影响，才能剥夺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权，使他们今后再也不能欺骗群众。

从组织上打倒和从政治上、思想上打倒，从组织上夺权和从政治上、思想上夺权，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比较地来说，后者比前者更复杂、更重要。如果只是从组织上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组织上夺他们的权，而不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打倒，夺他们的权，这还不是彻底的打倒，不是彻底的夺权。而且，没有政治

上、思想上的彻底胜利作保证，组织上的胜利也不会巩固，甚至随时可能被他们推翻；因为组织是人建立的，是受人的思想和意志支配的。“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不仅有决心有力量从组织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从组织上夺他们的权，而且有决心有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打倒，从政治上、思想上夺他们的权，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的“政治资本”是骗来的，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彻底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防止我们国家变颜色的关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不能东山再起；并且使我们革命群众警惕今后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果一旦出现了，就很快地认清他们的真面目，坚决把他们打倒。因此，我们一定不仅要狠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他们连人带思想统统打倒，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后台、总代表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埋葬，一定要狠挖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因此，我们在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之前和揪出来之后，必须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他们。有人说这是打“死老虎”，是“浪费弹药”。他们认为只有揪“活老虎”才是运动的重点，才能立汗马功劳，才符合斗争大方向。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一切阶级敌人一样，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决不会甘心灭亡。“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1)(3) 他们当中有些人在组织上“死”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死”，还不是“死老虎”，他们是“受伤的老虎”，有的还是“装死的老虎”、“假死的老虎”；而且有的人在组织上也没有“死”，还正在那里咬人。那些已被揪出来

但还没有真正被打死的“老虎”，他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革命群众更加仇恨，不仅妄图“秋后算账”、“十年报仇”，而且就在目前运动中，也都时刻利用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影响进行反扑，直接或间接地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这种挣扎，比被揪出来之前更加疯狂，更加狠毒。我们如果不把“受伤的老虎”、“装死的老虎”、“假死的老虎”和组织上也没有“死”的“老虎”统统打死，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会被老虎吃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前功尽弃，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为了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必须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开展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采用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寸权必夺”、“寸土必争”的反复搏斗。在战略上敢于藐视他们，在战术上肯于重视他们；在战略上有决心打持久战，在战术上有办法打速决战。

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最根本的是依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依靠毛主席领导我们创建的无产阶级政权。因此，我们要始终强调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权威，在斗争中锻炼革命的阶级队伍，在斗争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来源：（新华社二十一日讯）（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四十年前，以国民党完全叛变革命之后，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

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开始创立了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辟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不仅是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光辉道路。

四十年来，在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率领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极其光荣伟大的路程。依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我们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依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我们在建国后的十八年中，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武装进攻和颠覆破坏阴谋，英勇地保卫了社会主义祖国，支援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坚强的支柱，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最强大的后盾。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年来所取得的震惊世界的丰功伟绩，是毛主席军事理论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必须有一支新型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人民军队。没有一支按照毛泽东思想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一切都是空谈。

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立了最完整、最系统、最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著名论断，关于首先从政治上建军、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光辉思想，关于“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重要原则，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伟大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学说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最强大、最锐利的武器。

在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一条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就是在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中，在批判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以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中国的赫鲁晓夫，一贯地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实行阶级投降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公然主张把人民的军队交给“国民政府”去“领导”，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是什么“革命的旗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一次狂热地鼓吹议会道路，主张向国民党缴枪投降，无耻地叫喊什么“军队让一步，全国大进步”。

毛主席彻底批判和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取消人民军队，取消武装斗争的投降主义路线，从而使我们的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继续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猖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力图搞资本主义复辟。他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他在军内的代理人，就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揭露出来的和文化大革命前不久被揪出来的反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罗瑞卿。他们是埋在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长期以来，他们在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把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变成个人野心家的工具，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罗瑞卿，最害怕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最害怕毛泽东思想和广大干部战士相结合。他们恶毒地攻击的诽谤毛主席，疯狂地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毛主席、党中央对军队工作的重要指示，他们或者竭力封锁，拒不传达；或者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片面强调正规化、现代化，否定革命化，否定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他们竭力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妄图把军队引到邪路上去。他们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反对普遍民兵制，破坏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传统体制。他们推行这套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军的性质，妄图使它变成一支脱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脱离人民群众，站在群众对

立面的资产阶级旧军队。

彭德怀、罗瑞卿这伙反党野心家，推行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是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是这条反动的政治路线在军事上的表现。

彭德怀、罗瑞卿等反党野心家被揭露出来，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大胜利，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重大胜利。

在党内军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林彪同志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军事思想。四十年来，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他总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同错误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英勇地捍卫了毛泽东思想，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林彪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号召全军指战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第一的思想，提出了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这一系列关于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和重大措施，把我军的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对于把全军和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卓越的领导人。他所著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等书，系统地阐明和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

人民解放军担负着巩固国防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荣任务。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最重要的，就是加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加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使全军指战员在任何阶级斗争的风浪面前，都能够赤胆忠心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解放军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投入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洪流，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绩，立下了新功。

当前，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解放军在这场斗争中的伟大作用，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无产阶级革命派

和广大革命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全国军民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紧密团结起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和他的最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而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的人民解放军，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及其一切帮凶的斗争中，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更加伟大的新贡献。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岁！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以自豪的心情来纪念建军节，纪念我们伟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的战斗的胜利的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的举世无双的最强大的革命军队。

四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五次大规模的“围剿”，胜利地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歼灭了由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八百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同朝鲜人民一起，打败了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所拼凑的十四个国家的侵略军，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浇灌

出来的革命鲜花，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骄傲和光荣。它不仅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而且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坚强后盾。

一九二七年八月，在国民党完全叛变革命之后，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九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基础上，亲自领导农民暴动，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创立了井冈山根据地。中国人民开始了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开始有了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红旗卷起农奴戟”。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在中国革命史上和我军的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开辟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

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发展。它不仅为中国人民开辟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且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出了争取真正解放的康庄大道。

毛主席说：“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剥削阶级总是依靠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被剥削阶级稍有反抗，就遭到反动军队的血腥镇压。反动派手里拿着刀，革命人民也必须拿起刀来。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不抓枪杆子，不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人民就不可能翻身。没有人民的军队，人民的一切反抗都没有胜利的希望。即使暂时取得某些成就，只要敌人实行武装镇压，一切都成泡影。

修正主义者的最大罪恶，就是反对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掌握枪杆子。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是这样，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多列士、陶里亚蒂、丹吉、南布迪里巴德之流也是这样。

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一样，一贯反对武装斗争，鼓吹议会道路，大搞投降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无耻地吹捧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主张把人民军队交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去“领导”。抗战胜利以后，他公然主张把人民的军队拱手送给国民党反动派。

毛主席彻底批判了不要人民军队、不搞武装斗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主席创立了最完整、最科学、最伟大的军事学说。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和其他一系列的军事著作中，制定了一条真正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思想的最高峰。这是世界革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和一切阶级敌人的最强大的武器。

毛主席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总结。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个真理正日益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民、被压迫的民族所掌握。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革命人民，正在奋发起来，踢开机会主义的领袖，勇敢地拿起枪杆子，建立人民的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大造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反，大造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同旧世界进行英勇顽强的大搏斗。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集中地表现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搞复辟，一定要抓军队，抓枪杆子。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产阶级复辟阴谋，也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牢牢掌握军队。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有失去政权的危险；同样，建立了军队以后，仍然有失去军队的危险。如果失去了军队，军权被坏人所篡夺，那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争得的一切，就会全部丧失。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军权，实行反革命政变，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彭德怀、罗瑞卿是他在军队里的代理人。彭德怀是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几十年来，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饶漱石一起，结成彭、高、饶反党联盟。一九五九年，他又是党的庐山会议揭露出来的反党集团的头子。罗瑞卿也是一个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同彭德怀、彭真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顽固地执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无耻地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是抗日战争的“最高统帅”。全国胜利以后，

他们进一步勾结起来，拚命抓枪杆子，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使人民的军队变成反革命复辟的工具。

毛泽东思想是我军的灵魂，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指南，是我军永不变质的根本保证。彭德怀、罗瑞卿之流为了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为了篡夺军权，首先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彭德怀恶毒地攻击说“毛主席著作只能作参考，不能作为指导作战、训练部队的指针”。罗瑞卿胡说什么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他还大肆推销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养》，吹捧这本书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要全军干部战士“好好学习”。

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我们党、我们军队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军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要犯错误，受挫折，遭失败。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受无产阶级思想指导，就要受资产阶级思想指导。彭德怀、罗瑞卿之流拚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用修正主义的《修养》来指导我们的军队，就是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资产阶级的军队。

彭德怀、罗瑞卿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为了篡夺军权，拚死命地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贩卖从外国搬来的一套修正主义货色，专搞资产阶级正规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化。他们把军事技术放在第一位，否认政治思想工作决定战斗力的首要因素。彭德怀胡说什么“部队军事训练成绩的优劣，各级干部学习军事科学成绩的优劣，是决定我军今后战斗力高低的基本标准”。罗瑞卿用“大比武”来冲击政治，并且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谬论，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和四个第一的指示。

认为决定军队战斗力的高低的基本标准是军事技术，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我们军队的最大战斗力是什么？是飞机吗？是大炮吗？是原子弹吗？不是，完全不是。我军的最大战斗力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战士。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军事技术放在第一位，这就是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事实上，彭德怀、罗瑞卿之流，是一贯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突出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就大肆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观点。罗瑞卿的《抗日军队中

的政治工作》一书，完全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竟然认贼作父，把“蒋委员长的伟大及其生平”和蒋介石的“智、仁、勇”，“忠孝、仁爱”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他们所宣扬的完全是国民党的反动政治。

彭德怀、罗瑞卿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在军队里培植私人势力，树立个人威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里通外国，阴谋篡党、篡军。彭德怀搜罗一小撮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的旧军官等牛鬼蛇神，结成反党集团、反革命的“军事俱乐部”。罗瑞卿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结成反党阴谋集团。他们私自封官许愿，拉一批，打一批。他们做尽了坏事。他们力图在军队里搞反动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这一小撮人处心积虑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反对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

总之，中国赫鲁晓夫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这些家伙，力图用反革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一套来改造我们的军队、篡夺军队的领导权。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枪杆子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我们就会亡党、亡国、亡头。

在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军队的斗争中，在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彭德怀、罗瑞卿等篡军阴谋的斗争中，林彪同志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同志，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好，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深。几十年来，他一贯最忠实、最坚定、最彻底地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军事思想。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旗帜鲜明地、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林彪同志在《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等著作和一系列讲话中，系统地阐明了和创造性地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林彪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第一”的思想，提出了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一九六〇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根据林彪同志的思想所作出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继承和发扬了古田会议的传统。林彪同志向全体指战员发出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伟大号召；他所提

出的对毛主席的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原则和方法，对全军和全国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实现思想革命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毛主席指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彻底揭露和批判了彭德怀、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同他们的篡党、篡军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林彪同志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无产阶级掌握军队的严重意义。他指出：“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人民解放军要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积极参加大批判，彻底清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军内散布的恶劣影响。这将进一步巩固毛泽东思想在军队中的领导权，进一步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进一步促进全军的思想革命化。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满腔热情地，全心全意地支援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进行军管、军训等工作，为人民作出了新的伟大贡献。

有的地方，当地驻军的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只要认识错误、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好了，改正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而自己也就可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增强免疫力。如果有人坚持不改，那就不是认识问题了，错误的性质也要起变化。

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战斗号召。人民解放军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要善于采取各种适当的方式，听取革命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不断地改进支左工作。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依靠和爱护人民解放军，全力支持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行动。对于当地驻军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在支左工作中，军队和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要严格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而不要无根据地无限上纲，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重要保证。大家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岁！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第十二期，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长江在怒吼，汉水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从东海之滨到天山之麓，从海南岛到长白山，大江两岸，长城内外，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无数的抗议书，指向武汉地区一小撮坏人。大批的致敬电，飞向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制造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陷入了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阶级敌人越接近死亡，就越要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作拚死的挣扎。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而是他们垂死挣扎的一个突出表现。

一切阶级敌人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力量，轻视人民的力量。想当初，他们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不可一世，妄图一口吃掉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举扑灭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但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曾几何时，他们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切阶级敌人，看起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只不过是银样 1 ò@①枪尖一根，纸老虎、泥足人一个，虚弱得很。

在我们的时代，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后台多硬，只要你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一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还正在玩弄新的阴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妄图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新的反扑。我们要千百倍地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揭穿和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坏人只是一小撮。武汉地区的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把一小撮坏人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对制造武汉地区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打倒，严加追查，依法惩办。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善于启发，耐心帮助，支持和鼓励他们站出来，大杀回马枪，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对敌，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

能够这样做，就是好同志。

最近，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公开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已经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欢迎。我们热情地希望他们、并且相信他们能够按照这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勇敢，队伍更加壮大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经受了这一次严峻的考验，觉悟大大提高。武汉地区的这次严重的政治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历史在飞跃，革命在前进。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

武汉三镇的胜利凯歌鼓舞着全国人民，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了。

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风暴吧！

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第十二期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 加邈去掉走底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去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联的号召。现在，有许多人坐在车上不下来。在北京，你们要和群众商量，谢富治同志很谦逊，你们没商量就出去了，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

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作具体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问题。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可是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了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

江青同志的讲话

现在比起去年来是的大好形势，要使形势更好，就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南方是武斗，难道要北京搞大武斗吗？北京的工作有很大成绩的，有先进的地方，又有落后的地方。应当如伯达同志所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股劲地说北京落后，那就错了。比如，在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两次百万人大会，这两次会对全国有影响，这能说北京落后吗？

康生同志的讲话

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的大好形势。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

我们看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去年这个时期，正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期。后来，开始了大串联，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北京起了很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阶段，是毛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提出了夺权斗争，掀起了一月风暴，搞了夺权斗争，这个问题比前阶段深入了。经过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暴露出来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进行夺权斗争。经验证明，上海，山西，山东，北京还有黑龙江，贵州夺权是对的。这些经验证明，夺权就是夺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要通过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夺了权还会有反复，还会有许多经验需要补充。夺权中出现了一些缺点，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靠我们在斗争中，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可能一帆风顺

直线上升，这样的形势是在前进，只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相信群众大多数，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相信解放军的大多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依靠解放军的大多数，敢于自下而上地发动了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不过不是重复，是螺旋式地上升。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军”、“两支”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军。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和他们讲，真是任重而道远的了。事实上证明解放军是胜任的。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没有解放军，光光发动群众，敌人就要乘虚而入。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前进的，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还要有力量来维护，当然首先是群众，而解放军是最有组织的。解放军也会犯错误。只要把问题讲清楚，赵永夫之流就会象豆腐而已。青海也开枪打过革命派，但是说清楚，就亲如一家了广大解放军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的军队、只要毛主席、林付主席命令一下，就好办事。广大军民亲如鱼水。内蒙的军队问题，只打了一枪。他开始采取两面派，最后还是暴露出来了。陈再道也是这样。武汉事件，我亲眼看到。武汉问题的解决是解放军大力支持的，有个士兵，端着枪，对准王力同志，当时，独立师的一个营长马上站出来，说，你开枪，事情就变了，要开朝我开！结果战士手也软了。所以，我们解放军的支持作用看得很清楚，不看这个半年，就看去年接待红卫兵，没有解放军怎么能行呢？四个多月时间接见了一千三百万的红卫兵，那么有纪律这是个伟大的创举，那一个国家能见到？还不是解放军组织得好。后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看到很有组织，就想到军训，号召在红卫兵中的搞军训。北京武斗，解放军受伤不少。就是在毛主席接见时，由于群众要见毛主席，也有许多解放军受伤。我们去看他们没有听到一句埋怨的话，想起来非常感动。解放军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林付主席的话，受打时，受骂时，不动口，不动手，不开枪。坚决照办，几乎占百分之九十九，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万分之九千九百九，现在，全国的武斗解放军去阻止，受伤的以十万计了，而不是几万计了。这么个好的军队，那个国家有能有？这是几十年的我军的培养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军队内挂帅的结果，什么物质力量也不能办到的。犯了错误，

只要毛主席一说，林付主席一讲，就马上改，山东军区司令员就好嘛！陈再道是个常败将军，他把枪对准王力同志，他的警卫营营长就挺起胸膛保护了王力同志，说一开枪性质就变化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几十年革命的传统。三相信、三依靠，最重要的是军队，所以毛主席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军队，解决了许多问题。

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另一种说法说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前夜，说刘邓还有那么大力量，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从武汉中作中，得出的这个结论，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就是要武装夺取政权，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北京不能夺权就到别的地方去锻炼，去夺权去了。怎么把毛主席的影响看得这么轻，把刘邓的影响看得这么重？可能你们看了参考消息，又不注意分析。独立师，百万雄师坏的是——一小撮坏头头。总司令说，我们的两个同志对独立师只作了半天工作，他们就听话了，都照我们计划办事，这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把王力同志搞出来了也是解放军嘛！（叶君同志讲话：二十号发生事件，海陆空三军就全力支援，出了舰艇等）不错，解放军思想有些保守，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什么广州要抓广州黄再道。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同志，沈阳军区司令员都是好同志，任重道远，又没有经验，这几年来接触群众又比较少，当然有些领导长期脱离群众，加上传统观念，受《黑修养》的影响，容易犯错误，但也容易纠正，尤其是野战军还不同于军区，他们不同于军区，和群众接触就更少了。我们的军队只要给任务，去了以后，立刻就改变形势。但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对解放军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提出来了，这和去年不同，要区别看，武汉地区问题解决了，提出武装人民，这是对的，首先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是有条件的。例如，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还有江苏、湖南的。北京的工厂，如果联合起来了，可以武装起来，但没有联合的单位就不行，（武装了）就要打“内战”。可以武装联合起来的左派，把保守派的武装要收回来，农民进城，他们是

不愿进城的，受了蒙蔽。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小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是急先锋，闯将，立了大功，现在要求你们前进！武汉地区的问题，靠武汉地区革命人民解决就行了。陈再道出来了，革命的干部也亮相了，有了三结合的基础了。靠谁解决问题呢？主要靠本单位的同志们。我们北京红卫兵、学生、要和中央一起，有计划地，有领导地派出一些人到需要的地方去抓革命，促生产，进行调查。现在有个倾向，是有组织地搞，还是自由流出？武汉去了两万人，是个大包袱。北京的同学有个优越感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清华派出了 5000 多人，这不好，火车票怎么搞来的，这人我有责任。没有车票的上车就不下去了。我们去动员，谢副总理去请，当面答应，我们一走，还是不走，希望大家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清形势安下心来，学习全国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斗、批、改然后在这基础上，要抽调一些人，有组织外出调查。去调查这些问题：冲击军区，夺了枪，是违反“六·六通令”的。还有两派武斗，武装左派，农民进城要调查。这些工作可由那些综合大学去做，专业大学可专业搞调查。最近，我还和戚本禹同志商量过，矿院抽一些人，到全国重要矿上去，进行调查，抓革命，促生产，就好了，这样就要安排了。现在，大部分在校搞大批判，斗批改，另一部分，外出调查，搞抓革命，促生产调查。要求大专红代会协助。北京专业学院几十个，可以作这个工作。要听林付帅的话，加强三性。你们是毛泽东思想时代的大学生，比我们五四时期的中学生要好的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比我们少。

总之，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三相信，三依靠。还要把林付帅三性记住，今年是这样光辉灿烂，明年就要更加光辉灿烂，开花结果了。

让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建新劳！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

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公开发表了。这对于彻底打倒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

对于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推动当前革命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个文件，是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取得伟大胜利的产物。庐山会议，揭露和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保卫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保卫了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

毛主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在建国以后的短时期内，我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是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而提出的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亿万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实现了国民经济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引起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极端恐慌和拚死反抗。在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华歇斯底里大发作，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就在这个时候，老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伙，慌忙披挂上阵，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反党集团头目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抛出的所谓的《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他野心勃勃，反骨毕露，死命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革命群众运动，反对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党的领导 and 政治挂帅，反对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在庐山会议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彭德怀等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场大搏斗。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它是灭亡中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疯狂的绝望的进攻。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次反革命进攻的黑后台。

就是他，在庐山会议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积极支持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当彭德怀的阴谋被揭穿以后，他仍然在暗地里煽风点火，阴谋把原来准备的会议纪要篡改为一个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左”文件。在庐山会议以后，他又赤膊上阵，污蔑总路线的提出有盲目性，大跃进是“一轰而起”，造成“经济失调”，“人民公社办早了”，“现在发生一种瓦解的危机”。他胡说什么“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反右是不对的”。他还极力鼓吹“海瑞”精神，大刮“翻案风”，为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妄图让彭德怀死灰复燃，重掌军权，实现他篡党、篡军、篡国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较量中的一次大战役。

彭德怀的反党活动，不仅有中国的赫鲁晓夫作后台，而且有苏联的赫鲁晓夫撑腰打气。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跳出来以后，苏联赫鲁晓夫就公然无耻地吹捧彭德怀是“正确的”、“勇敢的”，是他“最好的朋友”。事实十分清楚，彭德怀就是配合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里通外国分子。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指出：“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由来已久的反党活动，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

彭德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带着“入股”的投机心理，混入党内、军内的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大军阀，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几十年来，他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长期以来，他利用自己在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中所窃取的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篡军的阴谋活动，成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军内的代理人。

庐山会议挖掉了这颗埋在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这是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打击，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

“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在当前革命的大批判中，把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揪到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群众性的深入的大批判、大斗争，这是彻底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一定要发扬猛追穷寇、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彻底清算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所散布的修正主义流毒，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来源：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今天，全国正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个时候，公开发表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有着重大的意义。

八年前，在党的庐山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揭露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粉碎了他们篡军篡党，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庐山会议之后，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林彪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彭德怀，这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从来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是“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支持者和追随者。抗日战争中，他积极推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建国以后，他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站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他实际上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头头。他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积极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军事路线。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贬低和削弱政治思想工作。他抗拒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反对全民皆兵。一九五九年，正当我国社会主义革

命日益深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极端恐慌，联合起来对我们进行疯狂攻击的时候，彭德怀在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支持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纠集了一小撮反党分子，在庐山会议上抛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纲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叫嚷要改变党的路线。他的一套修正主义主张同中国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

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一次激烈搏斗，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一次严重较量。彭德怀及其一伙窃踞着军队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很大一笔赌注押在他们身上。因此，党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是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沉重打击。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曾经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充分证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论断的英明正确。

彭德怀这条“落水狗”，绝不会改变它的本性。什么“改正错误”的保证，什么“不会翻案”的诺言，统统都是鬼话。庐山会议以后的八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党活动。一九六二年，正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大刮“翻案风”、“单干风”，大搞“三自一包”、“三降一天”，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彭德怀抛出了长达八万言的翻案书，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彭德怀这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是得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积极支持的，是同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密切配合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开为彭德怀的翻案制造舆论，企图让他重新上台。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串通一气，狼狈为奸，穿的是一条连裆裤，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

产阶级司令部展开了总攻击。亿万革命群众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个揪了出来，叫他们显出了原形。他们的末日到来了。无产阶级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

但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他们是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现在，他们已经成了“落水狗”，但随时还会爬上岸来反口咬人。他们是纸老虎，但不是死老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口诛笔伐，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猛烈开火！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清除他们的一切流毒，一切影响，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来源：原载《解放军报》1967年8月16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的高潮中，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大进军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国内外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它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阴谋，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在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之后，一九五八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在农村中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全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社

会主义正气高度发扬，资本主义邪气受到沉重的打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激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激烈、最卑鄙、最疯狂的反抗。

在这种阶级斗争形势下，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急先锋彭德怀，赤膊上阵了。他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撮反党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他还抛出了一个所谓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纲领。

彭德怀这些家伙，充当了杜勒斯、赫鲁晓夫之流的应声虫。他们恶毒地攻击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他们把毛主席领导的几亿人民的伟大群众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们还叫嚷什么政治挂帅与经济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他们所谓“两者并重”，就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政治挂帅，主张钞票挂帅，搞物质刺激。他们还恶毒地攻击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总而言之，他们就是妄图推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推翻人民公社，对大跃进进行反攻倒算，就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妄图把中国拉上修正主义的轨道。

庐山会议所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彭德怀这一伙，完全是一个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篡党篡军的阴谋集团。

《决议》指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庐山会议揭露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篡党篡军的大阴谋，夺了他们的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学生、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主持了军委工作，使军权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彭德怀一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党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在十年内战时期，他反对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忠实执行李立三、王明的冒险主义、机会主义路线。（(1)(3)）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顽固地推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

战线”，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还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极端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无耻地吹捧蒋介石是“领导抗战的英明领袖”。在中国人民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抗日战争中，他用这一套来欺骗和愚弄群众，这就充分暴露了他是革命人民的敌人。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就更加猖狂了。一九五三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刚开始，他就伙同大野心家高岗、反革命分子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高饶联盟的实际领袖是彭德怀。他们里通外国，搞两面手法，阴谋篡党篡军。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反党活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主席的这段话，极其深刻地说明了我们党同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庐山会议以来的阶级斗争进程，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一天才的科学论断。

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一次大交锋。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和包庇之下进行的。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也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彭德怀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党急先锋。当时，他们认为有机可乘，彭德怀就恶狠狠地冲了出来，而中国的赫鲁晓夫也亲自打起“反左”的旗子，来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经过一番较量，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打败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看到形势不妙，就连忙掩护彭德怀退却，并且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制造混乱，阴谋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背信弃义，对我国进行经济破坏，由于遭受自然灾害，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在国际上，帝国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了“神圣同盟”，又一次掀起了反共、反华、反人民的逆流。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那班老爷们看来，天快要塌下来了，神州快要陆沉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他们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牛鬼蛇神，大造反革命舆论。

美蒋反动派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座上客吴晗，首先披挂上阵，大喊大叫，替彭德怀翻案。在《海瑞罢官》这株大毒草中，吴晗为彭德怀被罢官鸣冤叫屈，说“将我罢职理不公”，吹捧他是“昂然挺立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励他“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叫喊“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就是要为彭德怀进行反攻倒算作舆论准备。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将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人以及臭名远扬的“三家村”狐群狗党，也鼓噪而起，大肆吹捧《海瑞罢官》，在全国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海瑞精神”，为彭德怀翻案，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在这场反革命舆论的锣鼓声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目、中国的赫鲁晓夫亲自出场了。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公然替彭德怀翻案。他为彭德怀辩护说，彭德怀的反党纲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他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在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抛出了一个洋洋八万言的翻案书。在这个翻案书里，他再一次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唱一和。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号召。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伟大理论的指引下，奋起迎战，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挑起的这场进攻予以迎头痛击。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毛主席亲自抓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主席对《海瑞罢官》的这一批判，不仅打中了《海瑞罢官》的要害，而且打中了整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害。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海瑞罢官》打开一个缺口，揪出了“三家村”的后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揪出了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

报，进一步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亿万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挖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各个战线上的流毒，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破产了。这是我们党的最伟大、最辉煌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四月，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过大江的时候，毛主席写了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其中有四句：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在今天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我们重读这首诗，感到倍加亲切。我们要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进一步磨砺革命的锐气，团结最广大群众，彻底清算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彻底清算中国赫鲁晓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全面地、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

（来源：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第十三期，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大批判现场会上的讲话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我是来学习的，向同志们学习的。

这场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教导，就是破字当头，破中有立。所谓破，就是“革”，就是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刘邓陶、彭罗陆杨为代表的他们这一套资本主义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各个领域要把这些资产阶级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合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不合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的，可能导致使我们这个国家变颜色的东西，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倒，彻底批判，彻底破了，彻底革他的命。

我们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了，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一年发动了，这

是第二年了，这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一方面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方面这个革命进入到更为重要的阶段，就是要将资本主义的东西认真地、深入地、真正是从政治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了，把它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彻底打倒，那些修正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彻底批判了，这个事情是个不好做的事情。正如我们的江青同志屡次讲的，比我们冲一冲、闯一闯，打打闹闹的困难多了。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提倡同志们坐下来大批判，因为这件事情是比较用脑筋的事情，比较用脑筋比较用思想的事情，比较是困难的。但是这件事情做得好，也容易提高同志们的水平，而且呢，必须下这番功夫。简单地把这个人揪出来斗两下，那个东西比较容易，比较简单，但是要是真正把它一切东西拿出来批判，把它的毒素彻底肃清，那就比较困难，要狠下功夫，那就必须坐下来研究一些他们修正主义的东西，研究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用革命的武器去批判他们修正主义的东西。这要看很多材料，研究很多问题，收集很多资料，还要加以加工、认识，这是件难事。但是这件事必须做。大学在点革命之火，煽革命之风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不是点火的时候，现在是坐下来批判。总有那么半年计划从各个领域彻底批判。那天江青同志批评过我，北京的大学好象有一点劲头不大。但是在我们的领导来讲，作为某些方面来说，也有些不够的地方。所谓劲头不大呢，就是狠抓大批判，有份量的有质量的批判。大家把脑筋都用到这方面来做得不够。不是汇了两天报吗？我们文革小组，第一天听到就是那些什么两派打架事啊，吵嘴。我说你不对，你说我不对，什么四三派，四三派！叫的人家很不高兴。搞了半年还是那一套。怎么批判黑《修养》，好象就听到师大讲了一下。开起大会来，就是你告我的状，我告你的状，就是这件事情，江青同志很不满意。应该炮火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么，怎么批判？有什么经验？怎么在批判中搞革命大联合嘛。你们下次再会见中央文革小组，你靠那么一套，人家还不听的。因为我们的大方向是要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各个领域把它们搞臭，彻底批判，大家对这大是大非没多少语言，就是啊！你抢了我的广播，你抢了我的汽车，你又怎么样了，津津乐道。人家不听，你下次再这样搞，人家还是不听，不听，完全对的。你互相抢这抢那，谁叫你去这样抢的？谁也没有讲，毛主席没有讲，林副主席没有讲，中央文革也没有讲，要始终抓大方向嘛！特别是你们成立了革委会的这些学校，只抓这些东西，要起模范作用。而且我们搞了一年零三

个月了, 不要把我们的运动停止在初期阶段。这个, 最近几天负责同志讲了, 最近几天又冲, 冲这里面抓人, 什么抢档案, 这些办法我看也不要再搞了, 一般的情况下, 特殊的情况下例外, 我看特殊情况也不那么多了, 有什么特殊情况呀? 要好好地搞大批判, 我这个话有点不适合大家的口味, 觉得有点不对头。那些东西还是初期的, 我们要提高大学的水平, 真正有份量的批判, 大家坐下来, 一个学校, 一个系, 一个班, 一个战斗组, 可以分工, 批判的方面多得很嘛。最近人家送了一套刘少奇反动言论集, 就那么多, 每一篇都可以批判的。要批判它那一套, 要收集好多材料, 要学习好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 才能批判, 至于彭真那些反动家伙多少毒呀! 你这个师范大学, 就教育方面资产阶级的东西最富呀, 苏联的那一套, 大部分都是从美国来的, 我们又是从苏联学来的, 有什么新东西呀, 新东西不多, 那都是可以批判的, 我们要提高。特别是在这方面下点功夫, 订个半年计划嘛, 至今年年底。不要去串联, 也不要到外面去打架。也不要支持人家打架, 订一个半年计划, 在家里坐下来, 主要就是读书, 这样就是复课闹革命, 闹革命就是革那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刘邓陶、彭罗陆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东西。这就是破, 就是革他们的命, 就是把他们打倒, 就是把他们搞臭, 看看谁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就是破了, 还要立。不是毛主席讲破中有立嘛? 不破不立嘛, 我们搞了一年文化大革命, 搞了一年零三个月了, 如果搞两年胜利完成, 那就还有九个月, 第三年收尾, 九个月一晃就过去了, 还要立哪, 把修正主义东西彻底打倒, 革他的命、把它破了, 那么马列主义的呢? 最高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呢? 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有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东西, 但是要把它具体化、具体到学校教育制度搞共产主义, 完全搞我们的, 就是搞毛主席思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完全脱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 这个工程也是相当大了。比那个破可能还艰难。大家都不想干、毕业生都不安心, 都想走, 不想干这些事情, 这个不好, 不完成这个任务不行。为什么现在又要串联呢? 有的学校走了五千人, 就是怕艰难, 这个革命不要怕艰难, 真正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要立, 我们搞一个完全是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是毛泽东思想的这么一个教育办法更艰难, 要走自己的道路可能要走好几次。开始走一趟, 开始走不好, 可能又要回头。犯错误也不要紧嘛。实验嘛。师大是办教育的。江青同志让北航搞斗批改, 师大也搞大批判, 搞斗批改, 你师

大是办教育的，你是办资产阶级教育、修正主义教育，还是办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这个任务也落在你们身上了。我们相信群众、相信你们在座的所有同志，青年人哪、大学生，我这个人又是害怕大学生，有时候也迷信大学生，你学了那么多年、读了那么多书，可以搞的，只要把毛主席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搞透了以后，什么搞新的教育制度，怎么搞哇？搞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完全脱离那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走自己的路。可能开始不那么完整，企图一下就很完整，是幻想，是不可能的。经过修改嘛，你看那些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都是从六三年搞的嘛，六三年我就看了，我是最早在上海看的，我还是个热心家，那时我们还叫好，我说好！我对那个旧戏就是没有一点知识，我看那个新戏呀，就看得惯，那个旧戏哇，我一点也看不惯，没那个文化，新戏听得懂。六三年春季我就在上海看《智取威虎山》，我也不大摸底，看了以后叫好。有的说你这个人随便表态。六三——六七年四年了，现在才象个样吧！

我们要搞教育制度的改革，不要四年也要两三年，而且现在就要开始。光破不立不行，还要立。破比较困难、立比破更困难。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改革，需要同学们在这些方面下些功夫，那就是为全国文化大革命做了点成就。不是到哈尔滨，到上海去支持，把这件事做好了，彻底地批判、彻底地破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就是对全国革命最大的支援。可是这个事情不容易，你们青年人就是爱冲冲跑跑的，我们大家都当过年青人的，坐下来干这些事情都不愿意干的，不过任务落到我们这一代身上，我们相信青年，相信群众，就落在你们肩膀上。主席在批评工作组时讲的，我们也不能批、也不能斗，不能改，这些都要依靠群众、依靠学生、依靠教职员工，还不是依靠你们在座的吗，所以希望同志们在这个方面要下一点苦功夫。师大在这方面做出了一点成绩，还是一点点成绩。这一点点成绩都了不起，都应该加以表扬，我就来开会支持，那些靠武斗的，我们不支持。我说你们在这交流经验很好嘛，批判要有成绩嘛，有份量嘛，要靠革命的大联合嘛，别打内战嘛！

还得附带说一声，对待解放军的事情，我们要谨慎，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这支世界无产阶级的好队伍，在支左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改了就行。陈再道那是叛变性质的，只有一个陈再道，现在北京到处抓陈再道，这个不行，不要违背了大方向。我们现在要三依靠、

三相信，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这是基本的。但是你总得有一个领导力量啊，得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有什么错误，我们可以提，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不许把解放军搞乱了，这是最近毛主席讲的。河北省张家口、石家庄、天津、唐山、保定都派人来了，还有师大、北航学生参加，可以提意见嘛！军队的事情，军队自己解决，不能到那里去抓人。前些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人乱抄，要资料，要参与军内两条路线斗争，你对军队有什么意见写个材料就行了嘛，这是江青同志早就讲过了的。你提意见可以，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不干涉不是说就不要提意见，这是我附带讲一讲的。

《井冈山通讯》据录音整理，未审阅八月二十二日晚

（来源：1967年8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主办《井冈山》；1967年9月1日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北邮东方红》）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1967.08.25；中发〔67〕274号

很好，照发。

毛泽东八月二十五日

全国各地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一切革命群众，一切爱国的人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驻军的全体指战员！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经过一年多了。

这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充分地发动了我国几亿人民群众，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几亿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人民群众觉醒的威力面前，已经破产了，已经垮台了。

无产阶级的新生革命骨干，正在大量地涌现出来。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取得的伟大胜利。

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国国防安全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主席又说，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他的唯一的宗旨，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现在事实也正是这样。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地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个伟大的长城。

为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推向前进。

为着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前进道路上取得更辉煌的新胜利，这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革命群众，更亲密地团结起来；

这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的运动。

人民解放军是我国人民的子弟兵。人民解放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肉相连的关系，是鱼水相依的关系。

因此，人民解放军要尽一切责任，爱护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爱护一切红卫兵小将，爱护一切革命群众。同样，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一切革命群众，要尽一切责任，拥护人民解放军。

因此，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群众组织，必须根据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革命小将，支持革命群众。

拥军爱民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为着保卫祖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在备战中。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容许外部的人进驻的。

拥军爱民的公约，还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双方面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处理自己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对待他方面，在必要时也可以提意见，但必须按照毛主席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采取适当的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双方有问题争执的时候，必须用协商的方法解决。

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不符合这样条件的，除紧急情况，经过中央特许的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现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交。

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坏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专政措施。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军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一切革命群众，一切爱国的人们，团结起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三集）》，北京：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沈阳三派代表团讲话

时间：8月26日凌晨1:00—3:15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

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关锋、吴法宪、邱会作等中央首长接见了沈阳三派（八·三一、辽联、辽革站），同时被接见的有喻平、徐少甫、张正德、王坤×、莫文祥、李国华、凌少农等人。参加接见的有陈锡联、宋任穷。

吴法宪同志讲了八·二二机场事件。当讲到辽联、辽革站把飞机打坏，打伤了空军战士还不让送空军医院时，周总理非常气愤，康生说：可耻！吴法宪同志

继续讲到两名战士牺牲，战士被打还念毛主席语录时，周总理：“这叫什么性质的问题？打解放军！”康生同志气愤地说：“谁打我们的解放军呀？帝修！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总理、康生、吴法宪都严厉的批评了辽革站和辽联，并点名批评了徐少甫。总理、康生又就辽联冲击辽革站及辽革冲京西宾馆揪宋任穷同志的事，再次批评了辽联、辽革。

总理：要求你们支持解放军，三相信、三依靠，集中要讲解放军三相信三依靠，集中要讲解放军，当然首先依靠群众，还要武装，更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而解放军就是在这方面作得好。抓军内一小撮看来不合适，我们以前这样宣传犯了错误，告诉你们，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解放军），不管彭德怀、罗瑞卿怎么样，解放军是支柱，八条十条都有效，要联系起来。

总理：并指示八·三一进驻军区司令部的人全部撤出。

最后总理要求三派达成协议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康老叮嘱大家每天要学毛著，不要张贴什么血洗、殴打之类的照片传单。

接见开始时总理提了三条会议遵守制度：一、不许互相攻击、谩骂，要摆事实讲道理；2. 到北京开会不准带枪；3. 要支持解放军，达成制止武斗协议。

（来源：1967年8月27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34期。）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

我们正在胜利地前进着。在前进的道路上，形势一片大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革命。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允许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

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坚强的柱石，是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防安全、保卫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我国，能够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规模广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能够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就是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有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派，虚心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他们把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教导，作为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行动指南。他们与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对敌斗争中巩固和发展了军民之间的战斗友谊。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不仅在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三支”、“两军”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而且在保卫祖国的边防、海防、空防以及内地治安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新的贡献，建立了新的战功。

为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为着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更辉煌的新胜利，这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革命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的运动。

全国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拥军爱民的旗帜，永远相信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学习人民解放军。

拥军爱民，是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口号，是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和革命群众关系的总原则。对这个口号，我们一定要作全面的深刻的理解。理解了 this 口号，就能正确地分析与认清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就能正确处理军民之间的关系，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在人民解放军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享有绝对的权威。特别是林彪副统帅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连队运动，整个部队更加无产阶级化了，更加战斗化了。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解

放军经受了极大的锻炼，军队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样一支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是无限信赖的。

人民解放军是我国人民的子弟兵。人民解放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肉相连的关系，是鱼水相依的关系。

人民解放军要尽一切责任，爱护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同样，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要尽一切责任，拥护人民解放军。

人民解放军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群众组织，必须根据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革命小将，支持革命群众。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必须协助解放军搞好备战和巩固国防的工作。

拥军爱民的公约，还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双方面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处理自己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对待他方面，在必要时也可以提意见，但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采取适当的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双方有问题争执的时候，必须用协商的方法解决。

绝对不能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的敌人，最害怕人民解放军，最害怕人民解放军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紧密团结。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挑拨离间，进行破坏。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千万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上敌人的当。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专政措施。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军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一切革命群众，一切爱国的人们，团结起来！掀起一个伟大的拥军爱民的新高潮。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学习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通知

1967.08.29； 中发 [67] 278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省军管会、各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

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是一个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文件。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以各种方式最快地传播到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在一些边远地区和交通阻塞的地区，可用飞机散发。使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作到家喻户晓，在全国立即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 [内部参考]》，1968年5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三、批判在外交部夺权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周恩来与外交部各组织代表的谈话

〔时间：晚，地点：国务院会议室。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外事口“红旗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等组织代表出席。〕

外交部联络站代表：今天上午的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他们其他9个组织都支持我们。

周恩来问：是你们发起的？

联络站代表：是的。我们发起游行主要是要求陈毅到群众中来。还有外交部其他两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姬鹏飞、乔冠华。姬鹏飞不能再主持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另外，我们提出，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不能参加对外活动。主要一点是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要他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但是，从他1

月 24 日检查以后，他没有到群众中去，这是逃避群众的批判揭发。所以，我们要搞示威游行。

周恩来：你叫什么名字？

联络站代表：我叫×××。总起来，我们就是这个要求。今天我们来把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告诉你，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

周恩来：我跟他们谈过这个问题，本来准备让陈毅去检查。问题是忙五一节耽搁了一下。本来这礼拜排上了，但刚把财贸口的问题处理完。部里和学校不同，要抓革命，又要抓业务。今天你们外交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要把陈毅同志抓出去，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对你们也不利。批判，我赞成，但我上次对业务监督小组谈过，要大中小结合，要彼此打个招呼。

联络站代表：我们在简报上登过。

周恩来：简报我看了。你简报登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不能这样。

联络站代表：昨天上午我们开大会，给你打过电话，没有打通。

周恩来：我有多少事啊，我那有这么多时间。昨天我在京西宾馆，天亮才回来。一回来就看到钱嘉栋的电话记录，我在床上睡不着，叫钱嘉东给你们打个招呼。陈毅的问题你们不能强加于中央。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动。

一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我不大懂，请你讲清楚些。

周恩来：外交部要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是外交部长，还参加外事活动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

造反派：你不是主张陈毅到群众中来的吗？

周恩来：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起哄，喷气式飞机一坐，这怎么行？！

一同学：我们就是要批判。

周恩来：批判错误可以，但不能揪人。批判错误也还要创造条件。

群众：什么条件？

周恩来：大中小三结合，商量好了，我陪他去。

群众：好几个月，有反复嘛！我怎么知道他二月份又出了事。有反复，你也

知道，何必问我。

一同学：陈毅不到群众中来，心里有鬼。

周恩来：他心里有想法。你们想想，你们几个队伍游行，把他揪去像什么样？

“六·六”代表：5月4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他到现在也没回答。

周恩来：5月4日他已经患肠炎了。

几个造反派齐声地以命令式的口气说：你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你要相信群众。

周恩来说：我说过，还要商量具体的方式，还要创造条件。你们在这里不要给我施加压力。

……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说着，周恩来转向联络站代表）你们证明，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一学生：我们不强加总理。

周恩来：我给你们先排个次序，还是先开大会，分几次。陈毅肠炎好了，我马上陪他去。

造反派：是不是把陈毅交给联络站？

周恩来：那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不是商品，他是政治局委员，给“批陈联络站”也不行。

“批陈联络站”：陈毅应先交给我们批判，然后交给（外交部）联络站。

周恩来：那你们满场的“打倒”口号。

造反派：我们就是要打倒。我们下定了决心。

周恩来：你们下定了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现在是跟你们商量具体方式，你们一个人随便就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造反派：我们是为了维护主席思想开这个大会。

周恩来：正是主席思想不同意这样做，不赞成用你们这个方式。

造反派：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周恩来：你这个样子就没法商量了。我说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批判陈毅

的大会不能开。我本来是与你们来商量，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

众人：我们是对付陈毅，不是对副总理。

周恩来：你们用这样的方式对付我，没法商量事情。

众人：我们同意总理的安排。但是，在这之前，要先开一个外事系统大会。

周恩来：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嘛，中央不能同意。现在才 200 多人，我说两句话，你们就起哄，陈毅怎么来！……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我要一个一个地保，我们还要做工作。我这样的身体，这一年就成了这个样子，你们总希望我为党多做一些工作吧。你们这样压我，吵了一通，达不到目的。

……

造反派：总理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周恩来：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保密，你不能这样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走吗？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谢富治与冲击外交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等组织代表的对话

〔时间：1967 年 5 月 14 日凌晨 1—2 时；地点：外交部三号礼堂。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参加接见。〕

（谢富治听到外交部内的争吵声，散步来到外交部。当时谁都不知道。他直接来到了礼堂。有人发现后要求他讲话。红旗大队的人也要求他讲话，并鼓掌。）

谢富治：我不了解情况怎么发言？我是偷偷跑来看看的。这样压迫人，总理永远不会接见。要我讲，只有一句话：统统回去！统统回去！将来这样当外交官真糟糕！

（在会议室里）谢富治：你要给我录音呀？我又不是讲演…。这么多人，对我的威胁太大。你们是不是派个代表跟我说。隔壁就是我的家，每天喇叭都响。我怕你们武斗。你们大学生来干什么？宋远利、刘令凯来了吗？你们看机密文件了吗？（同学：他们造谣！）我这次来不是解决问题来的。三家（“六一六”、造反派、红旗大队）都有理，都批评我。涉及总理的问题，我就没理，就都来斗我，就是我不对？（同学：我们那次态度不好！我们向您检讨！[指 4 月 18 日]）

就我一个人不对，大家都来斗争我。（大家哈哈大笑。）

同学：你对刘令凯太宽大了吧？宽大的无边。

谢富治：他现在很好。没贴总理的大字报。

同学：刘令凯说过，“党内现在还有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说，除了刘少奇还有一个人。这个人米高扬式的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两面派，是卖国主义者。

（此时谢富治发现一同学衣袖上有血迹。）

谢富治：这是怎么搞的？

同学：外交部的人打的！

谢：不要告人家的状，我不听。

同学：他们告我们的状了。

谢：没有！我没听见！（大队的人继续讲关于刘令凯对抗总理……）不要讲刘令凯了！

同学：那你讲今天的吧。

谢：又是想问“是不是革命行动？！”

同学：我们今天的行动就是革命行动，他们说我们是暴徒，是……。

谢：我想还是找两个头头了解一下情况。

同学：还是让我们大家听听。

谢：在天安门广场我看见过你们，想和你们辩论，可是你们的人太多。总理告诉我，你们抢了材料。……

同学：根本就不对。

谢：总理会说错话吗？他们（刘令凯）到外交部待了多长时间？

同学：一天不到。

谢：那你们今天这样做好不好？是不是革命行动？

同学：第一次，我们听了总理的话回去了。

谢：那为什么今天又来了？

同学：那天我们听了总理的话回去了，可是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又都进来了。

谢：还有个井冈山？

同学：刚刚成立的。

谢：有多少人？

同学：（答人数）刚从红旗大队分出去的。

谢：刘令凯他们还是三十人吗？

同学：有一百多人。

谢：好，他们也有一百多人？有发展了。

同学：从造反团里又出来一个 28 团，他们是反总理的，是原来的老保。

谢：不要这样说。你们都是红代会的嘛！就是刘令凯不是，谭建锋（听不清）……他们来没来？你们可以和宋远利合作嘛！

同学：他们说我们是保陈毅的，是新的保守派组织。

谢：他们是搞激将法。

同学：不是什么激将法，他们是想把造反派搞成保皇派。……（同学议论）

谢：你们现在要讲团结，不要随便讲保皇。

同学：我们很欣赏您的话：“极左派或保皇派与保守势力结合在一起”对付真正的革命造反团，很适用于我们学校的情况。

谢：不要这样讲！我没讲过这个话。

（同学中有一人拿出了“关于当前北京市高等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的声明”，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

谢：我看过，我当时就问过，为什么没有地质东方红？（同学插话：他们只去个代表，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为什么没有宋远利他们？

同学：造反团不同意第二、第三条。

谢：我不同意……（记录不清）。

同学：如果这样，为何红代会四十一个单位都同意我们的观点？

谢：我听总理说了，你们提意见可以到房子里去，为什么非到大街上？你们这样怎么能做外交官当大使？（谢：很气愤，接着激动而又气愤，大声地说）千条万条要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刚从办公室回来，怕你们武斗，出来散步来看看。大门那儿人很多，我从西门进来的，走走，看看，我根本没有接到总理的指示，我不能代表总理。我说，你们赶快回去吧！你们这样压总理行吗？

同学：总理说要接见我们。

谢：那打个电话。

同学：我们也去听一听。

谢：啊呀！是大学生了……。我给总理打个电话，叫他派我接见你们，那你们就可以回去了。如他有空，来见你们，那就是他的事。我现在去打电话，如果不相信我，可以派人来听，来监督。昨天在天安门“九一五”、“九一六”闹起来了，问我：你是哪一派，我说我是“九一七”的。我请你们不要闹了，要把矛头指向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这些大学生啊！总理今天没派我来。如果是总理派我来的，我会这样偷偷摸摸的来？总理如果派我，那我就可以代表总理。行吗？那我现在去打个电话。

同学：今天来的还有二外的。

谢：我以前没有和二外的打过交道。

同学：你今天来散步，到我们这来，我们感到很幸运！你从总理那里得到消息，说我们抢了材料。我们感到总理还没了解清楚，我们想这一定是总站反映的，我们也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向总理汇报。

谢：那你就说吧！

同学：要说起来很长。

谢：你们大学生讲话就是那么长，讲得简短扼要点吗，你们今天来了很多人，你们二外里边也有两派？

二外红卫兵：有一个组织就象你说的是“极左派或改良派与保守势力结合在一起”（介绍二外几个组织情况。）

谢：不要用这个话！

同学：我们想让总理听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听说派代表，我们就派了代表，可是造反团等组织派遣去了三大卡车，还听说搞了游行。姚登山说：“总理很累了。”我们于是就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情况。可是他们这是总理指示，来压我们……。

谢：你们闹那么对立吗？（红旗大队与造反团）他们两家都在一起活动吗（指“六·一六”，“井冈山”。）

同学：他们明里是两个组织，暗地里是一样的。

谢：你们也不能因人家偶尔说了一句，把人家打成反革命。

同学：我提醒谢副总理，应注意这一点。

谢：听说你们有一个组织夺权了？

同学：就是我们，我们有二千一百人了。

谢：明天我们要开会，对武斗要采取坚决的行动。

同学：（红旗大队要继续汇报，企图要说“六·一六”造反团的谣言）外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冲了外交部，把陈毅办公室搜了，什么都干。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总理就接见了，总理对他们这种行为，深有体会。我们希望谢副总理把我们的情况向总理反映。他们还把总理逼的心发跳。

谢：“六·一六”和红旗革命造反团在不在一起？

同学：经常在一起，有时不在一起，他们还贴总理的大字报。

谢：这是反动的。

同学：闹起来了。

谢：小家伙天真烂漫。

同学：不是这样，他们贴总理的大字报，在总理的名字上还打“X”。他们在“欢迎总理到我们学院来”的大字报上的总理二字上画了两只黑手。（红旗造反团递了一个材料）过去是明的，现在是隐蔽的，是一贯反对总理的。

谢：不能把人家说成一贯就是反革命的。现在应该讲一讲外交部。你们讲这一派那一派，当着我面，老说别人的坏话，我反对。你们这么说，那我就走了！（起身欲走）

同学：这都是实话。

谢：我要反对，我不听！在外交部为什么不讲今天的事？宋远利是我的好朋友，你们在我面前说他的话，我不要听。（红旗大队插话：要用发展眼光看人，现在变了。）我有几个月没见他了，上次只跟他说了几句话，你们不能批评我的老朋友，（大队插队：现在他不是你的老朋友了。）（下面不清。）

同学：我们感到很有必要向总理汇报我们的情况。不过我今天不是来压总理的，是揪陈毅的。

谢：可是你们到外交部，揪得出陈毅吗？他又不在这里。我不支持你们，你们先告人家的状，你们发了这么多言，都是告别人的状。

同学：这都是事实，可以调查。

谢：陈毅在国务院，可以调查。

谢：陈毅在国务院，你们都知道的嘛！

同学：（理亏……）他是外交部长，不在外交部揪，行吗？

谢：你们来了一千多人，我是为你们着想，我感到这样不好，你们既然来了，我就打个电话给总理，看他有什么意见。

同学：希望你能把我们和（你）说的事儿讲一下。

二外同学：（稍稍谈首都红卫兵的分歧。）

（谢打电话给总理，总理在大会堂。谢对着电话讲：我今天是散步到这里来的。听说这里要搞武斗，我赶来了，到处都是。看样子他们要台阶下，是不是给他们一个台阶，总理是不是给我一个指示？总理答：要他们撤回，明天找他们几个代表接见。）

谢：我有事马上要走，总理的电话打通了。你们选几个代表，明天总理接见。但你们马上得出去。

同学：选多少个？（吵）

谢：我那未来得及问，反正两三个吧！

同学：（乱吵吵）不成，五、六个，七、八个，十个，全部。

谢：七、八个吧！七亿人都要见总理呢。我要批评你们了，我看到血衣了，没看到人。你们还有人带刀子，带剪子。

同学：（吵）造谣！他们诬蔑我们有人带手枪呢！

谢：你们是打了架了嘛，反正打架是不对的。

同学：没有，根本没有这回事。（有同学说，他们打的。）

谢：你们要响应总理的号召，马上撤！

同学：好！（鼓掌）相信总理。我们没打人。

谢：你们要撤，要排好队，不要搞小动作！要突出政治，你们将来要当外交官……你们是不是打扫一下房子，大标语盖一盖。

同学：我们没写，他们都把写我们的贴到大街上去了。

谢：你们撤，收拾一下，我就管这一点儿，我是公安部的，不管外交部。

遵义兵团战士：我们支持联络站，红旗大队冲入保密室是错误的，保卫保密人人有责。（揭发红旗大队砸广播室事件真相）

谢：你们是哪儿的？

同学：我们是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

谢：你们做的对！就应该管！（谢和我们的留学生遵义兵团战士握手）

（注：因为接见时会场很乱，有的听不清）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周恩来召见冲入外交部的造反派时的讲话

〔时间：凌晨。因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造反派冲入外交部，要揪斗陈毅，周恩来紧急召见冲入外交部的造反派。〕

周恩来：你们这件事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冲到楼上，打伤了人，抢夺机密。不管你们有多少条理由，仅这一条就违反了中央的规定。

造反派：我们去外交部是为了揪陈毅，是为了见总理反映情况。

周恩来：揪陈毅到外交部去揪？那中南海你们也去冲吗？我在整个外事系统都讲过，外交部不能冲嘛！

造反派：“六·六”、“造反团”的人就冲过。他们一冲，总理就接见。

周恩来：不是因为冲就接见，而是因为他们9个单位游行，在街上喊“打倒陈毅！”我反对这种做法才接见的。你们不要拿“六·六”的错误来抵销你们的错误。

造反派：反正我们是下定了决心，要揪出陈毅。

周恩来：下定决心，走向了反面嘛！反正我也把政策都交待了，你们不听，将来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以为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有这么简单？滑稽！如果你们执意要召开外事系统的批陈大会，我就要下命令让部队去外交部加强保卫，不管哪一派，谁冲就扣留谁。你们首先承认错误，不然就被动。从机要室抄走的机密材料、笔记本要追回。

周恩来：对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与外交部联络站核心小组成员的谈话

〔地点：中南海小会议室〕

总理：你们现在批判陈毅同志的材料准备得怎么样了？

联络站同志说：我们现在在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群众性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现在大家先学《通知》，武装思想。大约下星期开始批判。

总理：群众可以学习《通知》喽，我们少数人可以先谈，你们可以先准备材料，批判内容先告诉我。最近一外又贴我的大字报，说我搞两面派，我怎么能这么搞呢？！红旗大队向我承认了错误。不承认这点就是歪曲了我的话了嘛。那天我接见完红旗大队就叫（钱）嘉栋打电话告诉你们。接见他们不是我要见的，我本来就是不管，我没有答应见他们。是谢副总理强加于我的嘛，他散步走到那里去，是他答应的。我历来的办法是一起谈，这样就不容易歪曲了。

（联络站同志谈到 5.13 事件后，红旗大队不但不承认错误还在外面造谣。）

总理：他歪曲，你们怎么能怪我呢！你们不相信我，反倒相信他们。你们怕什么？你们就是相信谣言，街上谣言多的很，你们都相信？他坏，很好嘛，走向自己的反面。

（联络站同志说，总理 5 月 15 日接见红旗大队以后，他们公布的记录说总理这样讲：“你们不要在这件事上纠缠，没意思。如果他们真这样，就会在批判陈毅同志问题上形“左”实右，走得很远，正好暴露自己……。”）

总理：我怎么能会这样说呢？！你们哪里是形“左”实右呢？！我历来主张在一起接见，什么话都在一起讲，不要分开来，那次你们不同意，我是被迫分开接见的。那天见他们主要谈了几点：

1、冲外交部是错误的，要他们承认错误。

2、我原来十二号跟他们讲红旗造反团等组织批判陈毅，要他们参加一起批，我说人家发票，你们去参加。开始他们同意，后来又不同意了。我说，我对“六·一六”、红旗造反团讲，要他们请你们参加。他们说这等于不承认他们这个团体，我说团体可以保留嘛。他们后来不同意，要自己搞。我说那没有办法了，还是按原来的次序，你们排到后面。

3、他们说你们打了他们。我说外交部拿出很多证据，还有血衣。他们说你们把血衣抢走的。他们说大字报没拿走。（联络站同志说二外红卫兵把机密大字报抄上了王府井大街了。）红旗大队还说他们进保密室时门口有人，不告诉他们是保密室，门锁不牢，一推就开了。说这是政治陷害。他们还说进去后两分钟就

切断电源了。我说要他们回去检查，有大字报交回来。

（联络站同志说现在一个字也没交来，还抢走了三个工作证和一个照相机也没交还。）

总理：现在我不去辩论这件事，一看就知道他们这件事错了。过去经常吵，在一个屋里谈话的，回去还各写各的，这是人的观点、立场不同嘛。

（联络站同志又指出，红旗大队公布的记录说，总理会讲“我接见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造反派，而是他们要游行。”）

总理：我怎么会这样说呢？在没成立红代会前，对“六·一六”是什么空气？在那时是我去替“六·一六”辨白的。两次我和江青同志一起去的。我支持你们批判陈毅同志，但是不同意游行。特别是外交部不要参加。可是你们那天学生与你们还是去游行了。如果你们游行了，我就不见你们了。

（联络站同志答应，我们把不去游行的决定通知了学生，他们仍游行，但本来要静坐的后来只是走了一圈；同时也有四、五十外交部的同志自发参加了。）

总理：后来你们还游行，并且呼口号。

（联络站同志说这是反武斗和抗议香港英国当局迫害我同胞的游行。）

总理：还有外交部副部长参加，喊了口号了吧！（联络站同志喊了。）学生们去游行，这是运动中不能避免的。只要联络站不带头就没有关系。学生打闹不要紧。

总理：以后学校方面的问题，我不再管了。我原来是好心，对“六·一六”人家那时反他们反得很凶。我两次去替他们讲话。我这说的是心里话，我对他们没有反感。我为什么要挑拨他们学生（指红旗大队和“六·一六造反团”）的关系？！我不喜欢哼哼哈哈打官腔。我不愿骗你们。向你们讲心里话。我是守信用的。你们反而不相信我了。

总理：我和他们讲了，他们冲外交部是不对的，冲外交部，还要我见。

（联络站同志说，是红旗大队在外面造谣撞骗，影响很坏。）

总理：我不见，我和钱嘉栋讲不要管。我是要托姚登山同志处理这件事，要他们走。

联络站同志说：红旗大队公布的记录还说，总理这样讲：“他们说的不是我说的某某嘛，以为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哪有这么简单呐！他们提，你

们也提？！既然批判本质不同，为什么怕他们哪？”

总理：我没有说过本质不同嘛。我是说，你们既然都是批判，为什么不能参加他们的会呢？批判总部的观点是先批判后定性。红旗大队在我面前说他们也要打倒陈毅，我说既然你们也要打倒，就可以参加他们召开的会，何必搞两次？我没说过什么“批判本质不同”。从去年我管外事口以来，我都是一起接见，没有分开过。上次你们不同意一起见。主席的思想就是分派也可以在一起开会。你们不同意，我只好等待。在一起开会讲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要是分开来，就会各取所需，你们不去管他们，最后要核对起来还得了啦。哪有这么多时间。

（联络站问到总理的十二号讲话是否有改变）

总理强调：批陈的问题没有变嘛，我已经答应的事不会改变。问题是你们不要轻易相信那一方。红旗大队冲外交部是错误的。拿走的大字报要追回来。他们说没有写，但上了王府井。这就证明拿出了××，照相机，三个工作证，让钱嘉栋打个电话去调问一下。至于你们说红旗大队是保守派，你们说你们的，我了解情况不够。还不能同意。他们现在还是红代会的。红代会现在也分两派，中央文革都不能表态。

关于批判陈毅同志的问题。你们批判前要把主要内容告诉我，有些事点个题目我就知道了，心中有个数。你们顺便把姬鹏飞、乔冠华的问题也谈一下。第一次会，一定要开好。如果搞得不好，下不了台，也不能批透。这样我就不好向主席交待了。

（下面谈了查档案等具体问题。）

张闻天这一案还没了，档案还是交给专案组比较妥当。其中有哪些档案你们要看，可以找一下目录，开个单子给我。档案一般不能随便看，都跑去看势必要乱。我是给中央办公厅打过招呼的。你把四川调查情况的同志写个名字给我，我和军管会联系一下，那儿军管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谈话

你们占领导地位，不要自居领导，三结合还没有出现，你们是实际领导，但是不要说出去。譬如政协开会，实际领导是我们，人家叫我们领导党，但是 we 不说，后来别人慢慢承认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说了，现在说了，事先主席不说这话。不敢谦虚，其实是自信心不够。自居为领导，结果一定做出麻烦。你们应该增强信心，但不要强居为领导。学校就是这样。你们要自信一些，自信心不太多，自信心不够，又强居为领导，人家不服，不服一定就压，压了人家没有几个人，也压不下来。

山东解放军出了个自我批评，很痛快，晚自我批评不如早自我批评，吞吞吐吐不如痛痛快快，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承认，知道了为什么不早承认方向路线错误，还带个“性”字。那是初级阶段，主席教育大家循循善诱，说了个“方向性”吧，连“路线”都没有说，那是八月四日说的，还没有说路线错误。那天晚上我们去清华讲了话，李雪峰就没有说方向性错误，其实李雪峰讲话原来是有方向性错误的，是总书记邓小平不同意，那时候说方向性错误是刘少奇，没有说到邓小平。他坐得离主席很远，两种可能，说没有听到，也许是假的，也许是真的。他把方向性错误勾掉了。伯达同志也在场，那时新的选举，还没有提出，16条也没有说，李雪峰就没有说，只说是严重错误，他不说我当然不好说：是根据七·二九那个方面说的，后来人家怪李雪峰为什么当时不承认，他是不好说。现在，我可以替他解释。难怪接见了造反派，一看那天你的演说是错误的。这不怪群众，伯达同志也去清华了，七·二九本来没有邓小平讲话，群众一定要总书记出来说话。平反在清华、北大张承先、江青同志、康生同志都去了，揭得最早，清华压制很强，事情的经过是曲折的，现在到这个时候才好说。

（总理谈到陈毅问题时说）对陈老总，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可以听你们的意见，但是中央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讨论有不同的意见，还是按照主席的意见，先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批判，先批判后定性，你总要先定性，后打倒，你们一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我不好叫你们取消，会上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允许让他讲，我不会去插言，你们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让我回答，你们不回答不好，回答了也不好，不独立思考了。

（二）王力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戚本禹在一次会上和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同志交谈他说：革命小将揪陈毅的行动是革命的，大方向完全是对的，冲外交部是方法问题，次要问题。

又说：陈毅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到群众中去好好检查。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姚登山等同志的谈话

〔地点：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按：陈毅这个庞然大物，其三反罪行累累，早在今年二月，周总理、中央文革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就已命令他必须滚到群众中作检查，接受批斗。但是，他一直负隅顽抗，拒不到群众中来。因此，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等革命组织于七月十七日派出了几百名战士，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掀起揪斗陈毅高潮。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等曾一度冲进外交部。外事口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一小撮保陈小丑却歇斯底里大发作，制造了一连串非议和谩骂，恶毒攻击造反派，恶意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八月四日戚本禹同志在一次会上和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同志交谈时说：革命小将揪陈毅的行动是革命的，大方向完全是对的，冲外交部是方法问题，次要问题。又说：陈毅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到群众中去好好检查。戚本禹同志的这一席话，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保陈派的威风。这一小撮小丑竟恼羞成怒，到处造谣惑众，说什么姚登山同志“捏造”戚本禹同志讲话，说什么“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等等。同时，他们还写信给中央文革搞什么“控告”，掀起了喧嚣一时的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就在这一形势下，王力同志八月七日晚接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同志，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对外事口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的指示。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整理的谈话记录转发于下。〕

八月七日下午七时，中央文革办公室电话找姚登山同志，说王力同志于晚上九点找姚登山和联络站代表一起谈一谈。

姚登山同志和联络站的同志走进王力同志办公室，王力同志的左小腿部分打

着石膏，在躺椅上和大家一一握手。姚登山同志和联络站代表向王力同志表示了极其亲切的问候和敬意，并询问王力同志的伤情。王力同志说不要紧，快好了。

姚登山：武汉问题解决了吧？

王力：解决了。武汉问题证明一个道理。凡是烂透了的，可以很快、彻底、痛快地解决，凡是不痛不痒的要拖些时候。武汉这次事件后，军区立即改组，司令部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八二零一部队调出去改编，“公检法”彻底改组，武装部彻底改组，对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对“百万雄师”本来想慢慢诱导，现在问题一清楚，下面起来造反，问题就解决得快。

王力：今天晚上请你们来谈一谈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看到外交部一份材料，我们小组的同志议论了一下。晚上他们有事都出去了。我有点空，找你们闲聊一下，什么都可以谈。

（王力同志看了代表名单，一个个认识一遍）

王力：好吧，先听你们的，我们学。

（联络站代表向王力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去年六月到十二月外交部运动三起三落，谈到联络站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月十八日夺权，谈到四月份“总部”出现时……）

王力：“总部”是个什么组织？有多少人？在外交部有多大影响？

联络站代表：据他们说有二百三十人，他们在外交部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认为他们是保守组织。

（联络站代表继续谈运动情况，谈到“打倒陈毅”的口号。代表阐明我联络站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根据陈毅的三反言行，我们认为是敌我矛盾，应该把陈毅的三反言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至于将来对陈毅的处理，那是中央决定的事，我们最后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们联络站也有同志提出“要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

王力同志插话：这个道理你们跟总理谈过没有？

联络站代表：谈过。

（又继续谈运动情况，当说到外交部运动阻力大时，分析了一下外交部的具体情况。）

王力同志：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

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王力同志：“攀险峰”是什么组织？有人看到它的政治主张，说它还不错，是不是中间的？

（联络站代表介绍了“攀险峰”的主要观点，联络站代表提到在七月十七日粉碎刘少奇新反扑誓师大会上，“攀险峰”攻击联络站，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是方向路线错误，是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上了刘少奇的当）。

王力同志说：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联络站代表指出“攀险峰”和“总部”、驻外革联等组织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搞统一行动的。就是大字报、标语等都是联名写的。）

王力同志：那外交部基本上还是两大派嘛！

（联络站代表谈到目前外交部运动情况，运动搞了这么长时间，外交部走资派没有真正打倒。领导干部没有敢于站出来亮相的，业务还是原来的班子抓。）

王力同志：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戚本禹那天对姚登山同志讲的话是对的。总理不是讲过“三结合”吗？老、中、少“三结合”，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联络站同志谈到有些司长、部长只划圈，举了个例子：有个案子徐以新看后写上“怎么办”，让其他副部长传阅，最后传一圈回来，部长们都划了圈，案子上仍然是“怎么办”）

王力同志：这是官僚机构，不管事，何必还要个人在那儿？

（监督小组代表在谈到部党委对抗中央文革时）

王力同志问在场的中央文革宣传组负责人之一朱庭光同志，他们现在是不是威风小点了？

朱答：他们不管了。

（联络站代表插话：中央文革批评后他们采取撒手不干，消极抵制。）

王力同志：（对部监督小组的同志讲）他们不干我们要找你们了，你们现在监督。监督不了嘛！？

（监督小组代表：中央许多精神下不到我们这里，如：主席七月一日对缅甸

问题的指示我们不知道。关锋同志对新华社的讲话也是我们自己从新华社那里搞来的，也不知道部党委知道不知道，我们一月份夺权后有些不称职的司、处长、副部长让他们靠边站，那时候业务上我们搞的还可以。）

王力同志：那为什么又退了？原来冲了一下，后来又缩回来，现在停止不动，下阶段怎么办？没有很好考虑吧？

（联络站代表：在整风时，有人批评我们夺权夺过了头，说业务权是中央的。）

王力同志：这话不对。外交业务权指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权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主席。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如果你们夺了权另搞一套路线、方针那就不对。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具体执行和贯彻，谁执行和采用什么方式是另一个问题。干部司掌握人事大权不能动，那么照这样说来中央组织部要恢复罗！？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权嘛！

你们要充分运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干部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选干部，你们监督就要把它监督掉。挑干部出国也好，干什么都好，第一条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这个统统打倒（说到这里时王力同志坐了起来，用手挥了一下，很激动）。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二十几岁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我们小组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三十几岁。没有这首要的一条，不管什么“长”，多少级，出去代表谁？代表毛主席，还是代表刘少奇、邓小平？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出国首先提出要什么“长”，多少级，不管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拥护刘少奇的，这不行，这是原则分歧，要是这样，革命就不要革了，以后出去要革命派来挑选，来审查。我们革命派，首先看你站在那一边？你不革命，什么长，多老的资格都不行，当然我们也要负责全面审查，保证不出乱子。看来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造反派也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不要嘛！路线方针、政策中央主席决定，至于怎么样贯彻、执行，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什么形式大家创造。因为要办外交，要几个“长”，当然这几个“长”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组成的新班子坚决批判“三降一灭”，贯彻毛主席的外交路线。你们要记住一个最根本的分界线，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以此为分界的条条框

框多打倒一些好。

（联络站代表告诉王力同志说，英勇护卫我国国旗的赵小寿同志回国后，分配工作时竟有两个单位都不要，部党委一次会议上还说赵小寿不能作为外交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典型来学习。）

王力同志说：这是专政！

（联络站的代表说：有些干部不称职，但是不能让他们靠边站，说是还没定性，不能撤职，要到运动后期才能处理。）

王力同志：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有人不做工作还让他看文件干什么？造反派为什么不能看文件？只要工作需要就可以看。反毛主席的倒可以看，这是笑话！

今天请你们来要和你们谈一件事。八月五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同志传达了关锋、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竟有人告状告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这件事证明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本来是正常的常识，而外交部竟有人还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地反对！姚登山同志传达后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

（王力同志念这封信的全文，最后署名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王力继续讲：我反对革命造反总部这种做法，这是错误的。关锋、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群众高兴是好事，是革命表现，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为什么竟成了罪状呢？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这是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一致主张，他们不要想在这中间找什么裂痕，挑拨离间。我这样说并不是对你们偏听偏信，我们本来对“总部”不了解，现在它自我介绍了。我们经常是从这些告状的人中看出问题的。不对头，相当不对头。我们不赞成这封信，集中攻戚本禹。这种作法不对，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戚本禹看了，他说那些是他讲的，他负责任。我们从信中看出这不是个别现象，我们从中看出问题是严重的这是一种思潮。

（联络站同志谈到整风，检查了我们对总理问题上的错误。也谈到有些同志现在觉得就受压抑。）

王力同志：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不要磨掉锐气。

（联络站代表：我们联络站成立才半年多，整风就花了三个月，做了三次检查。）

王力同志：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以后有什么材料寄给我们。老早就说要找你们，排不上队，没有办法，有些省的事更紧迫。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排不上，各省的问题排在前面。每天还要抓报纸、广播，我分工管这个。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当然不是叫你们过火，去搞打、砸、抢。打、砸、抢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要你们搞彻底革命，彻底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掉“三降一灭”。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要真实地监督，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提出看法，意见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凡是重大的原则性争论问题，应提到党中央，要坚持原则。

别的方面我们没有调查研究。“总部”给我们来信，我们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可以明确表态：不赞成这个“总部”。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错误的。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

王力同志念“总部”的信，而后他说，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戚本禹对“总部”来信和传达记录都看了，他说姚登山传达的没有出入，是他讲的话，他负责任。

王力继续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可以揪。一月份他检查了，后来他自己又翻了，翻了后他不到群众中来，揪他有什么不对？不是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要改。原则性问题不对，中央文革小组都指出了，六月三日我们小组的同志差不多都去了。都讲了话。支持革命派同时教育革命派，我们向来是这样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联络站的同志说希望中央文革小组今后关心我们外交部的运动。）

王力同志：对外交部必须有鲜明的态度，这样阵线才能分明，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这样干部才敢站出来亮相。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外交部搞成彻底革命的外交部，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战线。

（联络站代表把整风中我们检查对待群众的问题给王力同志谈了一下。）

王力同志：凡是有群众的地方用压是不行的，要做思想工作。希望你们坚决贯彻主席的革命路线。监督不能做点缀品，重大的方针政策上不能让步。当然，看不出问题是另一回事，夺权夺了半天没有多少权，挂了个招牌。以后监督小组不只监督业务，整个负责发动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监督，凡是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要监督。什么机密神秘化，对革命不利，不合理的要监督掉，等级森严，该批的就批，该改的就改掉。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调来搞党内工作的同志二十刚出头。他搞党总支书记工作，管好几个单位，学毛著积极分子，干得挺好吗，他只有两个口袋，没有四个口袋。（大家没听懂，王力同志说两个口袋是普通战士，四个口袋是干部嘛，大家都笑了。）

（部监督小组问：以后业务上的事是否也可以和中央文革联系？）

王力：有原则性争论就打电话给我们。

（又回到“总部”来信的问题上）从这封信我们看出这代表一种错误思潮，我们认为问题严重，找你们来谈谈。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联络站代表把联络站十七个战斗队写的“关于联络站某些负责人再次对抗总理的联合声明”递给王力同志看。）

王力同志仔细阅后说：也是挑拨中央文革和总理的关系，跟“总部”一样。

（联络站代表在离别时表示希望王力同志和中央文革推动一下外交部的运动。）

王力同志说：主要还是靠你们。

联络站代表最后表示：我们下定决心要把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决不能让它半途夭折，我们准备着有大反复，革命造反派要准备重新被打下去，但即使这样也要坚持到底！

王力同志：那不会的，你们干吧。

最后，姚登山同志和联络站代表同王力同志握手告别，并对中央文革对我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批斗陈毅大会上的讲话

〔地点：人民大会堂〕

同志们：

首先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付主席、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同志们问好！

你们这次大会，我在五月十二日就表示支持，现在还表示支持。

今天这个会开得好，当然中间有些波折，这是不可避免的。总的说来是按照我和谢富治同志和你们订的三条协议执行的，开得好！

这次会是很有意义的，对我是个学习，是个动员大会。这样的大会不宜太长、太多，比如今天有很多发言我没有叫进去，大中小套着开，开小会批得深，批得透。当然不开大会大家看不见也不满意罗！我还是提议今后开小会，只要我有时间参加。关系到外事口的政策、方针、路线的问题我都愿意听，小会说得更清楚。这样排列起来就不快了，一个星期二次就不错了。

你们心情很急，这个责任由我负，不是陈毅贪污时间。除了外事口，以后还要排农、林、财贸、工交、更急的是各省的问题。今天晚上还要给北京红代会开会，对全国的任务有个建议。

虽然外事口没有实现整个联合，但成立了批陈联络站，庆贺你们这个联合。
(口号略)

(三) 一些群众火烧英国代办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新华社记者报道：“你有你的法西斯‘法令’，我有我的抗暴行动！”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风起云涌

新华社香港二日电“你有你的法西斯‘法令’，我有我的抗暴行动 1 英雄的

香港爱国同胞连日来不怕港英法西斯当局的暴力镇压，不屈不挠地开展反英抗暴斗争。

据港英电台供认，在七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两天内，港英当局在港九各地非法逮捕了五十七位爱国同胞。

港英法西斯当局妄图用疯狂的镇压来压倒正在风起云涌地进行反英抗暴斗争的爱国同胞，但是，就在港英进行疯狂的大镇压、大搜捕的同时，港九各地反英抗暴标语到处出现，反英抗暴传单漫天飞舞，反英抗暴大字报遍地开花。一队队爱国青年走上街头，演出反英抗暴节目。他们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的英雄气概，无情地讨伐万恶的英帝国主义。他们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爱国同胞，极大地鼓舞了爱国同胞反英抗暴的斗志。有一个学生文艺演出队在石硤尾为苦难深重的小贩演出《小贩的控诉》，激起了爱国小贩们仇视英帝国主义的强烈感情。他们说：英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我们一定要把它斗垮，斗臭！一支以“港九先锋游击队”命名的战斗队，在港英“工务局”的围墙上用油漆书写巨型反英抗暴标语，港英警察慌忙前往涂抹，勇敢的青年们就在他们的头上把大叠传单撒下来，爱国同胞们争相拾阅，大灭港英帝国主义的威风。

在港英当局袭击港九纺织染业职工总会的第二天——七月三十日，纺织染工人纷纷奔回会所开会，愤怒声讨港英袭击工会和所属支会、福利部，以及在二十六日枪杀纺织染工人苏全的滔天罪行。这个工会的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发表声明，对港英当局恣意撕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以及捣毁工会和绑架工人的罪行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声明说：有暴力压迫，就有暴力反抗。我们纺织染工人完全懂得怎样回答英帝国主义者。

港九车床打磨职工会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也发表声明，对港英暴徒扯下工会福利部悬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撕毁《毛主席语录》一书内的毛主席像的严重政治挑衅行为提出了最严重的抗议。

正在胜利进行联合大罢工的六万香港工人，在收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打来的慰问电和随电汇来的港币一千万后，感到无比鼓舞。罢工工人表示：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亲切关怀。祖国工人阶级对我们的有力支援，使我们的信心更强，斗志更加昂扬，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反英抗暴

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新华社记者报道：英帝国主义无视我外交部照会，激起我国人民义愤，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一万多示威群众严正指出，英帝必须承担向中国人民挑衅的严重后果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今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且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声讨大会严正指出：英国政府竟敢无视我国外交部八月二十日照会的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尚未撤销对香港三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拒不释放被捕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和撤销对爱国报纸以及印刷公司的非法诉讼，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政治挑衅。大会指出：中国人民是说话算数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英帝国主义者在香港横行霸道。英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

今晚，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同仇敌忾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反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职工代表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要针锋相对地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发言的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孔的纸老虎，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港英法西斯当局对中国人民和香港爱国同胞犯下的滔天罪行、欠下的累累血债，必须得到彻底的清算！

“香港爱国同胞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神圣权利不容侵犯！”这是声讨大会上最强烈的声音。在大会上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指出，从史无前例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照亮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港英法西斯当局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和爱国新闻工作者，妄图封锁真理的声音，妄图阻

遏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扑灭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的烈火，完全是痴心妄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和七亿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是不好惹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香港爱国同胞，是吓不倒，压不垮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讲话中还向坚持反英抗暴斗争的香港爱国同胞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们热烈赞扬香港爱国同胞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勇气概，香港爱国同胞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英雄儿女。他们指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香港爱国同胞的英勇斗争表明，香港的命运要由中国人民来掌握。有七亿祖国人民作后盾，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原载 1967 年 8 月 23 日《人民日报》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讲话

从姚登山的表现看，他还不够成熟，他提出一些说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如提“刘、邓、陈一小撮”就是很错误的，这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你回国不久，还不熟悉，我们还要看你，人家要求你当外交部长，连天安门上都有。你作为一个司长，对出现这样的大标语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吭一声。联络站报的夺权班子名单（指部党委），我送给林付主席看了，林付主席表示不同意，林付主席说外交部还要三结合。

陈家康象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总理问姚登山在外贸部的讲话，姚说：我对王力讲话理解错误了）总之，你不要推给别人，你自己检查自己。（这里总理强调了几次）

陈毅的问题很清楚，他有缺点和错误，但不是你们提的“刘、邓、陈”，我现在还不能同意打倒，你们打倒，我还是不举手。

（联络站：陈毅不倒，其它部长都打不倒，姬鹏飞、乔冠华也打不倒。）

你们老是逼我把最高指示说出来。主席对外交部副部长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一个地方有陈再道，什么都要打大麻子。不要每个部都要×××大麻子，什么谭××嘛！但是我主张批，姬、乔可以批。

（联络站：姬、乔靠边站。）

这样不行，我是在最高指示原则下灵活机动一下，9月批姬，10月批乔，11月再批姬，12月再批乔，而且轮流管工作。（联络站：一定要打倒姬、乔）我是按最高指示办事。

你陈家康象小丑一样，跳出来了，很坏，你们可以向外交部宣布，陈家康停职反省。

（联络站：王炳南呢？）也可以停职反省。

“五·一六”的出名，是因为《五·一六通知》。去年五·一六通过的，今年发表，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新的赫鲁晓夫没有揪出来，还在主席司令部里。说这才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恰恰相反，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抓小失大，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巩固，这是使敌人快意的，使我们亲者痛恨的。

外面现在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涉到很重要的问题，主席已经肯定了，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你们（指外联）要注意，外交部大一统了，不会一个没有（指“五·一六”分子）。我看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既有“五·一六”组织。哪个地方都能钻进去，秘密活动、抓材料。“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不是我们说的，把刘邓黑司令部打乱。这是红线，打出光明来。他们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乱，他们把我们许多不利的东西拿出来大宣传，把我们外交文件拿来宣传。

正如江青同志说的，从各个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或者从右的方面，来孤立、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有那些人在后面搞名党，幸灾乐祸。你们不懂得，（他们）把毛主席、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在到处、在国际上孤立起来就高兴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王海蓉等人批判王力“8.7”讲话的大字报《王力“8.7”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

外交部联络站王海蓉等

最高指示：

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危险性，在于他可能发展到小组织，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

周总理 8.31 日讲话，中央首长 9.1 日讲话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发出的伟大战斗号令，我们必须立即响应，认真学习，坚决照办，不能含糊。

九·七《解放军报》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中明确指出：“凡是不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的东西，不管来自那方面，都要坚决反对，坚决抵制，坚决顶住。”

王力八·七讲话是什么东西？他利用自己的地位，摆着革命的架式，采取煽动性语言，放出遮人耳目的烟幕，欺骗群众，蛊惑人心，企图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我们必须识破王力八·七讲话冠冕堂皇的外衣，彻底批判他的八·七讲话，批判他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背离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署的实质内容。

八·七讲话的要害是夺权。他力竭声嘶，锋芒毕露，以为时机已到，“有政权才有威风”，向中央夺权！

八·七讲话的矛头是针对周总理，针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他明目张胆地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唱反调，“将”周总理的军，“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军！

八·七讲话是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和分裂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一发“炮弹”！

八·七讲话是“怀疑一切”的活标签，它全部否定八·七以前我部运动的光辉成果，全盘否定不该否定的东西。

八·七讲话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丑恶表白，别人都不行，唯我最革命，要听我指导！

八·七讲话给“抓革命、促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失，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

八·七讲话私字当头，助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展，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

认真回顾，仔细分析，难道八·七讲话所造成的恶果还不明显，还不惊人吗？

王力在八月七日抛出这篇讲话不是偶然的，它是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的！

可是算盘打错了，“风吹月老天不动，浪打船头道难移”，任何风浪也动摇不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

周总理 8.31 日的讲话，中央首长 9.1 日的讲话是何等的好啊！王力讲话是何等的丑啊！一好一丑代表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态度，两套方针！同志，你站在那一边，必须作出果断的抉择！

毛主席说：“毒草只有让它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除几次草吗？草锄过后，还可以做肥料。！”

我们要锄八·七讲话这株毒草，肃清它的影响和流毒，挽回它所造的损失！

同志们，我们坚决不移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吧！

外交部王海蓉 刘华秋 冯联直 陈德和 王永华 方峰 李奉阳 陈贞芳 李钟英红代会北京轻工红鹰兵团《523》战斗队转抄 9.13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对外交部谈陈毅问题

〔9月16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后，对外交部刘祥伦等同志作了谈话。〕

陈毅是有严重错误，亚非会议上有严重错误，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有严重错误，他认为是革命的，我说是政变，他还说是革命的。他随刘少奇出访，刘少奇是典型的三降一灭，他也会有错误。一月份让他过了关，以后他又发那么大脾气，无怪小将抓住他不放，这个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毛主席说：“陈毅同志还是要一批二保。”

外交部和另外的部就是不一样，陈毅这个部长和别的部长就是不一样，这是关系到国家威信和威望的问题，不是保他个人，不是保他的面子。

（当有人谈到联络站二十五个战斗队、组开会批判王力问题时）总理说：王力问题不要开会批判了，联络站有问题可以关门整风，外交部要自己搞运动，不要受外界影响。

又 14 日晚，总理接见柬埔寨外宾之余与翻译班同学谈了几个问题，大意如下：

- 1、陈毅的大字报、大标语等不能上街；
- 2、对陈毅的态度是“一批二保”，这是最高指示；
- 3、王力的问题要相信中央能解决，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大标语，中央不会象有些大字报那样无限上纲。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十二月一日，总理接见了外交部各组织的代表。参加接见的有陈毅及其他部党委成员，刘晓未参加。接见情况如下：

- 1、使馆在十二月份要立即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 2、对外交部东方红兵团（67. 11. 30 成立的，属“外联”34 战斗队一派）没表态，总理说：“东方红兵团声明很弱，政治主张不明确。”
- 3、对“外联”34 战斗队没表态。34 战斗队代表曾发表意见，但被到会代表压了下去。
- 4、总理说：“业务监督小组暂时不要动，同志们要负起责任来，加强自信，把工作搞好。大联筹对他们的态度是正确的（指没有撤换监督人员）要斗私批修，学毛选。正确对待 34 个战斗队的群众。”
- 5、总理说：“对 516 不要认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有线索就认为没事了，还是有坏人的，要注意阶级斗争。”外交部自王焕德揪出后，又搞出了个泄密小集团。
- 6、总理还批评陈毅说：“你在北戴河会议上反王稼祥的“三和一少”是好的，但到广州会议就变了。”

参加接见的还有王海蓉、唐闻生（唐明照的女儿）

（据外交口同志传达，非记录，供参考）

四、处理王关戚问题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戚本禹检讨信上的批语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毛泽东 九月七日

注释：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戚本禹给毛泽东的信

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一）错误地估计全国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还说：我对他们有些问题觉察不出，王力要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二、研究资料

一）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

关于“五一六”的一些资料（王年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曾有一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五·一六兵团”，其成员就是“五·一六分子”，简称“五·一六”。从1967年“清查五·一六”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五·一六”一直是被坚决打击的对象。被打成“五·一六”的人，没有准确的统计，估计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人。有关资料较多，难以分类。现开列如下，供大家研究时参考。

（一）1978年11月21日，原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吴庆彤，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专门谈了“五·一六”问题。吴庆彤说：

首先是有没有“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我认为是有，在北京有。其他地方有没有，我不清楚。证据是：1967年8月初，“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北京散发了恶毒攻击周总理的传单。8月9日还将这些反革命传单张贴在北京动物园门口、甘家口商场和西四丁字街等处。……这些反革命传单的署名是“首都516红卫兵团”。这些传单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进行无耻的诬蔑和攻击，群众看了十分气愤，纷纷揭发“五·一六”的反革命罪行，有的将反革命传单拍照下来，有的从墙上搞下来，送给周总理和国务院。现在国务院的档案里还保存着这些反革命罪证。

毛主席在同外宾谈话中揭露过“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

所以，有些我们也不懂，为什么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李先念，后天打倒叶剑英，陈毅、聂荣臻、朱德、陈云这些老同志都要打倒。后来才晓得主要就是他们搞的。

同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说：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1967年8月，7、8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5月16日。这个组织非常秘密，人不多，可是煽动性很大，在大街上公开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打倒李先念这些人。

同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会见斯诺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这个敌人叫‘五·一六’，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有4个人……王、关、戚，还有一个下次我给你讲。”

国务院各部门在清查中也发现有“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如学部的吴传启、林杰，外交部姚登山，国家经委的陈大伦，国务院财办的何畏等人。这些坏家伙都直接同王、关、戚挂勾，受王、关、戚的指挥。现在看来，后台就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林彪反党集团。

吴庆彤又说：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中斗争非常复杂。中央文革一伙和林彪反党集团惯于施展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大耍贼喊捉贼的伎俩，对清查“五·一六”进行破坏。陈伯达竟然当上了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组长。他们胡说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是“五·一六”后台，他们在全国全军普遍清查“五·一六”。林彪提出“一个不漏”。陈伯达提出追组织，找加入“五·一六”的登记表。吴法宪说“北京的小三军就是‘五·一六’”（引者注：“小三军”就是当时与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立的所谓“冲派”。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多数派的“大三军”比较而言，人数较少的“冲派”就是“小三军”）。他们千方百计地转移斗争方向。这样，在清查“五·一六”中，就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伤害了很多好同志，还整死了不少好人。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和林彪反党集团，故意把清查“五·一六”引向邪路，搞扩大化，把水搅浑，以便掩盖他们的罪行。在毛主席指出王、关、戚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后，中央文革一伙不得不将王、关、戚关起来。但是，在清查“五·一六”中，不少单位要求通过王、关、戚弄清本单位“五·一六”分子的情况，中央文革一伙人又规定要经过姚文元批准，结果是不许向王、关、戚作调查。

（二）1967年8月9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一个小报（增刊）刊出《北京出现一股反周总理的逆流》。报导说：

8月8日深夜，“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分别在北海公园前后门、王府井大街北头一个胡同里、西四、平安里、动物园、商学院等处贴出了6种恶毒攻击周总理的反动大字报。他们同时还在师大等处散发了同样内容的传单。所谓“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7月中旬出现的，跨行业的秘密组织，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

（三）1967年9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小报第4621号刊登《公安部有关人员谈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一些情况》。其中有公安部“五·一六兵团”专案组负责人孙茂祥和北京卫戍区的杨增祥向记者介绍的调查、审讯“五·一六兵团”头头供认的情况：

1、关于“五·一六兵团”活动情况，原文为：

经中央批准，已拘留入狱审讯的有：钢院学生张坚（建）旗、李芳（女）、陈力（女），商院学生程镇华，101中学学生郭海燕（女）、长沙一中学生唐亦

安。还有与该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冶金部矿冶研究院的物资组成室副主任蔡萍迹（女）和她的母亲曾广澜。

“五·一六”兵团是7月1日正式出现的，有一个“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可以证明，会在北外开的，发起者有钢院的张建旗、李连菊、李芳、陈力和101中学的郭海燕。

前身是钢院的“五·一六”。张等均是钢院的“五·一六”分子（属钢院造反公社红一团），在对外作战部工作（原文如此——引者注）。据交代，5月份在反击二月逆流活动中，张建旗最先提出揪二月黑风总后台，矛头指向周总理。并说：“从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天起，就准备坐牢。你们过了三个月再看。”不久，张写了一封攻击周总理的万言书《致总理的公开信》，4月上旬，送林副主席、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张到处向社会上观察哪里有反总理思潮的人，积极串连师大苏东海、商院程镇华以及农大、北外、二外等有反总理思潮的人。

《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后，张建旗一方面提出所谓“要掀起深入揭发高潮”和“抓新的一小撮”，另一方面派李连菊和北外“六·一六”进行反革命串连。

5月下旬，北外“六·一六”派张新民、戴达明等5人到钢院找张建旗等人。5月29日，张建旗、李连菊等人就搬到北外活动。由北外××给他们腾出几间房子住宿，只留曾先锋、李良弼、杨阳等在钢院活动。曾先锋是钢院的负责人，并担任“第一线指挥”，张建旗在北外担任“第二线指挥”。

5月底6月初，张建旗及其同伙成立了所谓“钢院五·一六兵团”，发表了一个反革命的宣言。他们还把《致总理的公开信》抄成了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同时他们自己还写了一些欢呼的大字报，这样又勾引来一个郭海燕（去年到鞍山大串连时认识张建旗的），她写了《为一张反动大字报叫好》的大字报，署名“群众的呼声”。“钢院五·一六兵团”成立以后，还向毛主席、中央文革等写过信，信中希望中央文革在6月4日前给以指示，如不给指示，就按自己的分析行动。

6月3日，中央首长严肃地批评了北外、二外反总理的活动，引起了张建旗等人的混乱。张等7人在紫竹院讨论了一两天，意见不一致，一种认为反总理不符合毛主席战略部署，要搞只在业余时间搞，另一种意见坚持搞下去。之后，李良弼、曾先锋、杨阳回钢院，张建旗、李芳、陈力、李连菊和郭海燕等5人继续到处收集攻击周总理的黑材料。

6月30日—7月1日，在张建旗倡议下开会两天，张提出用整风方法搞了“两忆”（忆“受迫害”、“受压迫”之苦）、“三查”（“查斗志”、“查阶级”即查动摇性、“查工作”）。这样，他们又鼓了劲，起草了一个反革命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因为101中的郭海燕参加了，就由“钢院五·一六兵团”改为“首都五·一六兵团”。

……

这一时期，他们还串连了商学院程镇华、农大郭树忠、师大苏东海、长沙一中唐亦安以及财办何畏等人。

7月份以来，张等频繁活动。方针是：“影射攻击不点名”。这时，程镇华、唐亦安等也参加了活动。

7月3日—5日深夜，张及其同伙在财贸口贴出“枪毙××”、“打倒李先念”等大标语。

7月5日，程镇华透露李先念要在人大大会堂做检查，他们把准备好的传单印了1000份，在人大大会堂散会后散发。

7月11日—12日，经过串连后，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农口和八机部。一是到八机部门口刷大标语，一是与农大东方红“五·一六兵团”配合，到农口各部门口大量散发《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等传单。

7月13日—14日，他们到天安门附近、南池子等地贴出“吴克华是好同志”、“肖华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把三军打成打砸抢派没有好下场”等大标语。

7月份，张等经秘密串连，召开了两次秘密会议。7月15日，由张建旗、刘令凯发起，在北外“六·一六”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主要研究是否要搞总理，以及如何搞法。参加者约20人左右。其中有三中卢平化（化名×东兵），二外张广武、欧阳江，农大周明灯、崔碧君等。

7月29日，他们又开秘密会议。……

由于唐亦安、郭海燕等4人贴了攻击总理的大标语，被革命群众当场抓住，扭送公安部门，张建旗及其同伙在8月3日—8月4日开了两个晚上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一，积极准备写、印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和传单，公开贴出和散发。二，扩大组织，统一行动，成立所谓“八个方面军”。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写了7种

传单，约印了 4 0 0 0 份，并抄写了 1 3 份大字报。

8 月 9 日凌晨，他们把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公开贴在北京街头，并向北京大专院校，以及湘、鄂、粤、新疆等地邮寄传单。他们还到城里挨门挨户塞传单。这是他们活动的高潮，也是最后一次。

8 月 1 1 日，江青等中央首长宣布“五·一六兵团”是阴谋的反革命组织以后，该组织从政治上、组织上迅速土崩瓦解……但是张建旗等 6—7 人，仍在负隅顽抗。……

8 月 1 7 日，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抓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到 8 月 2 5 日，就把“五·一六兵团”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全部抓起来了。

2、“五·一六兵团”成员情况。

孙茂祥对记者说，从目前调查、审讯犯人口供情况来看，判断是否“五·一六”成员，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大致可分三类：一类，头头和骨干，了解内幕，一起参加活动者有张建旗等 2 0 人；二类，有相同观点，和骨干分子一起抄写大字报，刷大标语，散发传单等活动者共 2 4 人；三类，被骨干头头串连过的学生、干部，并表示支持赞同，提供了黑材料的共 2 1 人。~}

3、“五·一六兵团”后台问题。

财办××组组长何畏，7 级干部，6 月 2 0 日，何与张建旗、郭海燕谈过话，表示对总理一不是奴隶，二不畏惧。

“五·一六”的活动还有一些，清查“五·一六”也还有些情况，补充如下：

1 9 6 7 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铁一连”编印的《内部资料》（第一集）刊登《看，黑手操纵下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简介）》，其中说：“6 月 3 0 日和 7 月 1 日两晚，经过充份的反革命舆论准备，‘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主楼 5 楼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1 9 6 7 年 5 月 2 7 日，中央在一个内部文件上说：“炮打周总理的歪风逐日增长，革命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表态。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红旗造反团’和二外‘首都红卫兵’中一部份人为代表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不断高涨，调子不断升高。”

1 9 6 7 年 1 1 月 2 7 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小报第 5 6 3 3 号刊登《中央机关群众组织抓“五·一六”分子中的几个问题》。这份材料说：“一些单位

已有~扩大化。”它又列举了种种表现。

1967年8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关于“首都5·16红卫兵团”问题调查简报》第4号刊出《“5·16”——蔡萍绩——徐向前》。8月25日，戚本禹在简报上批：“即送江青同志阅。‘5·16’与徐向前、康克清以及军队有关。”同日，江青批：“总理、康生、伯达、富治同志参阅。”（1979年12月16日，戚本禹写的交代材料说：“关于徐老总……我现在记得有一个‘5·16’后台的调查就涉及到他。这件事还向江青等送过简报。所谓‘涉及’指的是某一个可疑人物同徐老总认识或有来往。”

（四）“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铁一连’”1967年编印的《内部资料》（第一集）（油印）收有《看，黑手操纵下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简介）》一文，其中说：

1968年1月5日，北外‘×××兵团’在天安门前贴出反革命大字报《×××你要干什么》，公然进行反对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活动”。

“钢院张建旗跳出来攻击×××是‘毛主席的同路人’，‘与李××、李××、余××、谷×是第三司令部的人’，‘运动以来与中央文革讲话不一致’等等。

4月×日，张建旗到学部请示吴传启，讯问他的炮打×××的大字报何时可贴，吴说时候未到，没让他贴。”

6月2日，张建旗等人在外院密令，准备公布炮打×××的材料，会上成立了‘北钢五·一六红卫兵团’，即‘首都五·一六兵团’的前身。”

6月3日，张建旗贴出《给×××的一封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污蔑×××是二月黑风的后台，煽动人们起来‘造反’。同一天，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出现署名‘北钢五·一六兵团’的极端反动的传单《23个为什么》。”

6月30日和7月1日两晚，经过充份的反革命舆论准备，‘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主楼5楼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所谓‘代表大会决议’，提出‘×××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一员主将’，是‘反革命两面派’。”

7月12日，在八机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中央气象台等单位散发

了传单《告农林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个为什么》等，诬蔑×××是二月黑风的后台，反动之极。”

7月30日夜，商院‘决战纵队’在阜成门贴出《首都五·一六兵团政治部、作战部严正声明》，要总理公开检查。真是猖狂！”

8月11日，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严正指出‘五·一六兵团’是秘密组织，阴谋组织。”

“‘五·一六’一些成员名单：……。”

“‘五·一六’后台：农口秦化龙、外交部陈家康、红旗杂志林杰。”

“‘五·一六’组织系统：有政治部、作战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及8个方面军：

一方面军：农林口。

二方面军：财贸口。

三方面军：文教口。

四方面军：工交口。

五方面军：军事口。

六方面军：中学口。

七方面军：外事口。

八方面军：全国通讯联络。”

（五）“首都红代会部份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于1967年9—10月编写成《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2.9——1967.10）》（铅印本，共153页，内部发行），这个大事记中零散地记录了一些有关“五·一六”的材料，或可补以上资料的缺失。摘录如下：

1967年“三月中下旬在反击‘二月逆流’的剧烈的复杂的斗争中，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集团——王力、关锋、林杰之流初露头角。其干将吴传启、洪涛等人开始相互串连。他们散布种种流言蜚语，说什么“现在有三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司令部，一个是周总理司令部”，“现在的斗争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周恩来是旧政府的人，不用听他的”。“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谷牧、余秋里是一条黑线，这条黑线是以生产压革命”，等等。“……在这个阴谋集团的策划下，3月中下旬，北京街头贴出了许多恶毒攻击李富春、

李先念的大字报，轰打周总理的逆流从此时隐时现。”

1967年“五月初，钢院张建旗等一伙，积极策划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活动。农大出现了‘五·一六兵团’”。 “在二外，以张光武为首的一小撮公开发表‘开炮声明’，在商学院跳出了一个‘火线纵队’，迫不及待地把矛头针对周总理，并暗地策划建立反革命‘五·一六兵团’。”

1967年“5月16日，一个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小集团北外‘六·一六’抛出反动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恶毒诬蔑周总理是‘反革命两面派’”。

5月底，反革命“首都5·16兵团”的前身——“钢院5·16兵团”成立。

6月2日，反革命小丑张建旗抛出他两个月前（3月31日）写的大毒草《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并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二十三个为什么？》，攻击周总理。

6月14日，北外“六·一六”头头刘令凯和钢院“五·一六”头目张建旗等~人密谋后，在北外“六·一六”成立了“首都5·16兵团”。……钢院、二外、商院等地不时出现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许多革命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迎头痛击反总理的逆流。

5月24日，首都大专院枝红代会发表声明说：“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5月29日，陈伯达等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核心组严肃指出：……反对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6月3日，陈伯达、江青等同志再次向北外“六·一六”提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

张建旗一小撮见势不妙，于4日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作退却，并倒打一耙。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并作了重要指示。伯达同志指出：……‘周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1967年“6月30日至7月2日，反革命阴谋小集团‘首都五·一六兵团’在外语学院5楼召开了所谓‘第一届代表大会’。……7月上半月“五·一六”黑匪兵团在财贸口、农口开始所谓‘第一个战役’、‘第二个战役’，大肆散发《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反动传单。污蔑周总理‘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在八机部贴出反动标语‘打倒六月黑总后台’，大肆攻击周总理。”

1967年“7月14日‘五·一六兵团’猖狂活动。7月14日在首都大街上及农口各局、各院校发现大量反动传单……”

1967年“8月9日反革命‘五·一六兵团’在夜间贴出许多大标语，恶毒地攻击周总理。……”

1967年“8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开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革命组织座谈会。……首长还说，……被坏人操纵的‘五·一六兵团’是反革命组织”。“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8月11日，商学院斗争了‘五·一六’黑匪干将程镇华。”

1967年“8月17日黑匪兵团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擒获。8月18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钢院延安公社等76个革命组织发表严正声明，决心与黑匪兵团决一死战……8月20日，黑匪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捉拿归案。师大井冈山揪出黑匪干将陈力。8月25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里的黑匪‘五·一六兵团’干将季××等9人，缴获手枪两支、子弹百余发以及大批反革命材料。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奋起反击‘五·一六兵团’的大本营北外‘六·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黑材料。8月26日，首都及全国在京革命派1000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5个黑匪头目被揪出示众。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六)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革命》编辑部编的《教育革命》第20期(1967年9月13日)在头版头条刊登《毛主席、中央首长谈“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全文如下：

革命的学生要联合，要团结，共同打倒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搞大

批判。——毛主席最近指示

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摘自 9 月 3 日《人民日报》

还有个“五·一六”，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陈伯达同志 8 月 1 1 日讲话

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我们说过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学们、工人同志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象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陈伯达同志 9 月 1 日讲话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叫“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污蔑“五·一六”。——康生同志 8 月 1 1 日讲话

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有的以极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情。北京“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同志们要有敌情观念。——康生同志 8 月 2 7 日讲话

“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有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康生同志 9 月 1 日讲话

“五·一六兵团”明天（指 8 月 9 日）要出×××的大字报，我想找你们谈一谈，这件事要大动的。文革小组开会谈到要找几个学校办一办这个事情。“五·一六红卫兵团”第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建旗，是钢院的。——谢（富治）副总理 8 月 8 日讲话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很怪，藏龙、藏貉，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像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江青同志 8 月 1 1 日讲话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从“左”右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江青同志 9 月 1 日讲话

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社会上地富反坏右，还有美蒋特务。有这些黑手藏在背后，以极“左”或极右面貌，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绝不允许，注定要失败的。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个东西，叫“五·一六”，它人不多，表面上多数是青年人，这青年人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利用青年人思想不稳定。

“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出现，我们每个人材料他们都整了，我们也不怕，心里没鬼怕什么？

他们从右的方面来反对毛主席的司令部，二月份有一股风。目前是一股“左”的风，以极“左”面目反总理。

要提高警惕，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他们不会老老实实，千方百计要作垂死挣扎，我们就要提高警惕识别他，向群众宣传，把他们孤立起来。他们是见不得人的一小撮。~

有人要破坏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这要提醒同志们注意。——江青同志 9 月 5 日接见安徽代表讲话

现在有用极“左”的口号，打倒一切，分裂和挑拨中央文革的关系。这一篇文章（指姚文无的文章）的要害，是点破了目前出现的“五·一六”反革命小集

团。有人企图用形“左”实右，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陶铸的那一套，妄图分裂中央，分裂毛主席的司令部，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有些人就上了当。“五·一六”的青年上当了，要反戈一击。

“五·一六”的黑手是一小撮，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戚本禹同志 9 月 6 日讲话

在当时铺天盖地针对“五·一六”的批判中，上述只是摘引了一部份中央首长的谈话，并且所引或背景交待不清，或摘引不全面。根据本人掌握的资料，下面对以上引文作一些解释或补充。

1967年9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1967年9月2日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报导说：“中央负责同志指出，……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1967年9月5日，江青、康生、姚文元等人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江青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又说：“目前这股子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康生说：“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象北京‘5·16’中的一小撮，还有什么‘星星之火’，实际上是阴谋小集团，他企图动摇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破坏已经批准的革命委员会。”

“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刘、邓联络站”1967年9月13日印发的《文化大革命关键时刻中央首长十分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铅印）收有《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代表》，时间：1967年9月5日晚9点10分至次日凌晨零点25分。“中央首长”为：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李天佑、曹轶欧等。江青在讲话中说：“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我说它是‘东西’，就因为他是反动组织，就是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人数不多，这个表面上也是年青人（引者注：语言不通，原文如此）。这些年青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五·一六’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它集中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们都整了……。”“象‘五·一六’，反对中央，或者以极‘左’的面目来反总理，这

是很典型的，是反革命组织。”

1967年9月1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江青“九·五”讲话的通知》。

1967年9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革命委员会、军管会、革命群众组织”“认真组织收听”江青“九·五”讲话的录音，“进行学习”。

196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九·五”指示〉的通知》，文件注明“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张贴”。

1967年9月16日晚，“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部份代表时，周总理说：“9月1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康生、江青同志都指出‘五·一六兵团’是一个反动的阴谋组织。姚文元同志在文章中指出了它的性质。”“对待‘五·一六兵团’，不要扩大化，只是几个坏头头嘛！”“千万不要扩大化”。“听说五·一六有八个方面军，名字很吓人，其实只有几十个人。”“你们哪个组织，哪个学校有‘五·一六’……由学校组织内部自己解决，不要别的组织去捉。”“我们要防止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我们，一定要批判极‘左’思潮。”

1967年10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一个小报第4975号说：“10月18日下午，总理在同外交部……接待组同志谈话中指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中有人与‘五·一六’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活动。”

1968年12月17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专案组全体人员。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五·一六’成员分成三类，这是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幌幌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谢富治说：“张建旗这个人现在是否认罪，可不能放啊！”陈伯达指着“五·一六”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谢富治说：“总的讲有‘五·一六’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陈、谢二人商量后决定：王恩宇、傅崇兰交“五·一

六”专案组管。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谢富治问：“有什么证据没有？”陈伟回答：“没有证据。”陈伯达说：“案子要落实，情况要弄清，要有真凭实据。”“‘五·一六’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反革命特务集团。”

1968年1月24日，周总理、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纪登奎等接见中央直属宣传队和解放军代表、样板团和北影、新影的领导同志时，周恩来、江青讲话，他们讲了三大问题：（一）“五·一六”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二）“五·一六”的部份罪行；（三）深挖“五·一六”的意义。

吴法宪交代：“1967年7—8月，江青一伙诬蔑周总理保护老师、副总理、国务院的部长、各省委书记，是保护了‘走资派’，是‘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同中央文革分庭抗礼’。要周总理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和国务院的碰头会议。以中央文革为中心，代替党中央集中领导文化大革命。”“1968年5月，江青还多次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谢富治等人秘密开会，诽谤周总理‘在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掌握方针、原则性差’。”

（七）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用3个版面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审稿时加了如下一些话（毛泽东在批示中说，他加了一些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份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八) 严家其、高皋二人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最新增订版, 香港潮流出版社出版)中有《清查所谓“五·一六”》一节, 其中对“清查五·一六”扩大化, 有一些论述具有参考价值, 不妨摘引如下:

其实, 在“坚决镇压”了“五·一六兵团”之后, 所谓“五·一六”已不复存在了。谢富治说过, “五·一六兵团”非常渺小, 他们人数不超过五十人, 而且, 其中相当多是受蒙蔽的。江青在讲话中, 姚文元在文章中, 所以对“五·一六”如此大张挞伐, 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所谓“右的和极‘左’的”, 所谓“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所谓“幕后人”、“操纵者”, 都没有具体的指向。因此, 一切对“毛主席司令部”(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和林彪), 对军队中林彪支持的人, 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或持有反对情绪的人都被笼统地称作“五·一六”分子。实际上, 所谓“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属于“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人”、“掌握军队大权的人”, 只要觉得“你反我”, 就可以用“五·一六”这个代名词给人以定罪。

.....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 “文化大革命”中各类受过冲击的人又被重新清理一遍。从“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演化出来的“五·一六问题”, 是一个含义不清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都可以牵扯到“五·一六问题”所包括的内容中, 这就难免有人就“五·一六”问题纠缠不清。一九六八年, 在北京以至全国, “五·一六问题”也被重新提了出来。中央还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 陈伯达任组长, 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各单位先后开始了清查“五·一六”运动。

因为曾经有过“五·一六兵团”, 因此, 认为“五·一六”是一个广大的组织。追查登记表、追查组织网首先提上了清查“五·一六”的日程。然而, 追呀追呀, 越追组织问题越模糊。由于绝对不肯否定“五·一六”的存在, 于是提出, 组织是一个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罪行, 要从清罪行入手。然而, 清呀清呀, 越清越清不出头绪, 于是又重提清组织问题。就这样, 清查“五·一六”, 从清“罪行”到清“组织”, 又从清“组织”到清“罪行”, 反反复复地进行着。由于普遍存在着逼供信, “五·一六”的问题也就越清越大了。一九七〇年1月24日, 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 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

指示”。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一定要彻底清查“五·一六”。黄永胜也在会上跟着林彪、江青，亦步亦趋。很快，抓“五·一六”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很多单位还把林彪 1 月 24 日的讲话摘成语录张贴在最显眼的地方。不少单位的高音喇叭在播音时间里总是不停地重复播放着。……各种形式的“攻心会”、“批斗会”也在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所谓“五·一六”问题严重的人，不仅被单独隔离，不准回家，还必须不断地交待“罪行”，接受批判斗争，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洗刷自己“肮脏的灵魂”。在这样一种森严壁垒的环境中，在不停地叫喊不要逼供信，但事事处处又都存在着逼供信的气氛中，有的人不堪忍受这种极度痛苦的精神折磨而走上了绝路。

清查“五·一六”在漫无边际地行进着。中国大陆大多数地方都抓出了不少“五·一六”。在“文化大革命”中活跃过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被宣布为“五·一六”分子，接下去的便是写不完的交待，认不清的罪。不过一百五、六十人的东方歌舞团，一开始就抓出了“五·一六”分子五、六十人，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清查运动，使各单住的群众心惊肉跳，觉得恶运随时有可能降临。派性冲突也在明中暗中加剧。清查“五·一六”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为此，中共中央于一九七〇年 3 月 27 日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毛泽东批示：“照办。”通知承认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指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搞逼、供、信。然而，这个通知是在肯定存在“五·一六”的基础上发出的。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加上所定“五·一六”的罪行范围广泛，因此，“三·二七通知”虽然有企图制止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倾向，但实施中却适得其反。

清查莫须有的“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极为严重的全大陆的逼、供、信运动。一些人被隔离审查，受尽折磨。由于清查“五·一六”长达数年，捏造出来的“罪行”反复交待，一些细节则在反复交待中编得神乎其神。“五·一六”被描绘成了一个罪大恶极、无孔不入的组织。

在“五·一六”组织和罪行都不明晰的情况下，在认为必定有一个“五·一六”反革命秘密组织的基础上，一九七一年 2 月 8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

决定建立由吴德担任组长的“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从此，全大陆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便按照《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的精神，采取以往“审干决定”中的种种做法，诸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突破”……继续进行着。

在不足两千人的外交部清出“五·一六”六、七百人。北京以外的地方，情况就更严重了。就全大陆而言，在清查“五·一六”中，直接遭受诬陷迫害的有数百万人，受到牵连的人就无法计数了。有一句顺口溜：“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来就是友”，便反映出清查“五·一六”的广泛性。

军队的“五·一六”是指与三军“冲派”有关联的那部份群众。不仅把“五·一六”与“五·一三事件”连在一起，而且把它和“七·二0事件”连在一起，点名说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操纵“五·一六”。实质上是对黄、吴、叶、李、邱的反对派的冲击，火药味本来就浓的军队，与“五·一六”斗争的火药味当然更浓。

一九七一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受到震动，然而，清查的方向一时并没有动摇。……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彻底垮台后，才不了了之。

（九）金春明先生著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是一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可不读的好书。金先生在书中也有一节专论对“五·一六”的清查，现将其下半部份全文抄在下面：

可是，在事情已经基本解决之后，中央为什么又要专门成立专案组，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之后又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清查运动，依据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本人目前缺乏足够的事实作分析判断的根据。因此，这里只能对事情经过作一简述。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当时陈伯达毛遂自荐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一方面大肆鼓吹查组织、追表格，强迫“坦白交代”，以制造扩大化；另一方面，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所谓“五一六分子”并无科学的判定标准，一般的解释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两条：“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

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两条从原则上讲并不错，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以给予完全不同的解释。因此，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乘机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也有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或军队支左人员，把他们认为是攻击周恩来、反对党中央、反对解放军的极左狂热造反派，当作“五一六分子”加以打击，情况颇为复杂。在所谓“红色恐怖”下，有的单位1 / 3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严重摧残。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并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这些本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实际上这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这个通知还错误地把遭到诬陷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帮助林彪、江青一伙干了很多坏事，当时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

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也成了“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而且名列首位。到1973年冬，身任公安部长、“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成员、并兼管专案办公室的李震，也自杀身亡了。在下边的清查运动中，由于大搞逼供，轻信口供，专案组负责人被咬为“五一六”分子的事，也屡有发生。如此混乱不堪的清查，自然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但是，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却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痛苦的灾难，造成了很大的创伤。这样的教训是不应该轻易忘记的。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期

吴德回忆录；《风雨十年记事》，

（朱元石记录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第四部 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

戚本禹也被关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起的时候急，收的时候疾，跟不上挨批，跟上了又错了，又挨批。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也这样。北京市的革委会筹备时，把原来的老市委、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进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王、关、戚”那一派的，主要是学部的人；还有学生，“五大领袖”；还有工人，如刘锡昌、鲁文阁等。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基本控制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戚本禹在抓。有一种说法，不知是不是真实：开始成立革委会时，戚本禹要当革委会的主任，直接抓了很多事，革委会的成员很多都是戚本禹的人。听说毛主席不同意。谢富治任“革筹”小组组长以及任革委会主任后，一方面积极向中央文革小组靠拢，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有矛盾。周景方是市革委的秘书长，曾几次给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告谢富治的状，说谢富治阻碍发动群众。革委会中很多戚本禹的人，想把谢富治架空，所以才出现了保谢的一派和反谢的一派。保谢的这一派叫“地派”，还是戚本禹抓的一派；反谢的一派叫“天派”，是聂元梓抓的。我们当时知道，这两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直接操纵的。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抓起来了，当时说先关王力、关锋，留下戚本禹加以分割。以后，戚本禹的活动更频繁。1968年1月，把戚本禹也关起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先发迹，也是最早倒霉的暴发户。他们得意的日子不长，却罪恶累累，他们的垮台是罪有应得。例如，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就同江青、戚本禹有关系。1966年12月，戚本禹学江青的舌，在矿业学院的大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鼓动学生“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结果，张霖之被造反派残酷批斗和刑讯，不到一个月就被折磨死了。也是在江青的唆使下，戚本禹策动中南海里造反派贴朱老总的大字报，诬蔑朱老总是“黑司令”、“大军阀”。在1966年11月的一个夜里，在中南海、全国妇联、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朱德”、“打倒康克清”的大标语。戚本禹还到人民大学去煽动，透露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孙泱曾给朱老总当过秘书，要造反

派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一夜之间，在人民大学校园内外，贴出了许多“打倒朱德”的大标语。

在 1967 年 2 月初，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开始组成“揪朱联络站”。1967 年 3 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来头很大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刘少奇是什么“假反帝、真投降”，“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戚本禹因此声名大噪、红极一时。与此同时，戚本禹还唆使韩爱晶等人贴“打倒陈毅”的标语，在首都组成“批陈联络站”。1967 年 4 月，戚本禹在陪同陈伯达接见“批陈联络站”等组织时，鼓动说“外事口的盖子还是要揭开”。一时间在外事口、外交部等单位又掀起了揪斗陈毅的风。1967 年 5 月中旬，江青把他们从上海弄来的一份诬陷周总理的材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给林彪、康生和周总理，还居心叵测地写了一封信，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周总理为此不得已写信向毛主席报告，附上有关历史材料说明真相。这个启事是 1932 年国民党在上海伪造的，周恩来当时已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康生知道这件事，陈云、康生他们当时在上海还及时揭穿过敌人的阴谋。在毛主席的阻挡下，江青等人的罪恶阴谋才没有得逞。此事，听说戚本禹也是搞了一手的。1967 年 7 月中旬，彭德怀同志被残酷批斗，也是在戚本禹的怂恿下，韩爱晶等人对彭老总大打出手，把硬铮铮的彭老总的肋骨都打断了。戚本禹的罪行，在这里只能举一些例子。“王、关、戚”倒台以后，周总理专门找了谢富治去谈，后来把我和傅崇碧也一起找去参加谈话。周总理向我和傅崇碧明确交代，要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我们回去，经过研究，首先把杨远抓起来了，让周景方等学部的人统统回了原单位。周景方回到学部后，另一派认为戚本禹已经倒台，也就一下子呼啦起来，声势很大，揪斗了周景方等人。周总理让我们贴出类似布告的东西，要求不要揪斗。后来，周总理让以监护的名义把周景方逮捕了，是傅崇碧去执行的。由戚本禹派到市委的学部和其他单位的人全部回到了原单位，对市革委会以及党委成员，如“五大领袖”和其他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工人造反派，学生毕业的就分配了，工人造反派的人员回到原来所在的工厂，这个活动清理出去了一百四五十个人。市

革委会里这样就几乎没有人了，工作又近乎瘫痪，不能开展。市革委会抓紧陆续从部队“三支两军”人员中调来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同志，从中央各部委调了一些没有什么派性的同志，又加上原市委下放的一些干部，这样就等于重建了市里的领导机构，等于又一次改组。调来的新同志是五湖四海，大部分不是造反派。原来革委会领导机关存在两派的问题一时没有市场，慢慢地在消除。这些步骤都是周总理和我们商量、给予指示和我们想了办法的，很多人不晓得这个情况。这是谢富治期间出现的一波。原来都是造反派，后来“王、关、戚”倒了以后，清除了一下。清除后，重新组织了市革委会的领导机关。周总理当时明确地说：那些人不清理，你们市里稳定不了，你们也工作不了。这以后，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1968年的时候，具体的月份我记不清了，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章含之教毛主席读过英语。毛主席当时对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说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要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毛主席还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以后又有一次，汪东兴同志找我去阅看毛主席对市里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又批评北京市，说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主席的旁批写道：这就好了。这样一来，谢富治很紧张。周总理找谢富治谈过话，内容我不清楚。谢富治回来告诉我们，周总理指示要李作鹏、谢富治和我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到外国语学院“支左”的是海军）。周总理提了三条：一是“支左”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是市革委会作检讨；三是海军的“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领导斗批改，这样可以使海军、北京市革委会解脱出来。市里派谁去检讨呢？谢富治去不合适，因为有人保他，也有人反他。就确定由我、丁国钰、刘绍文同志一起到外国语学院大会上检讨，我们检讨时，上纲到我们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以后，我们就不管外国语学院的事了。这以后，江青、谢富治开了市革委各部门的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分子。到底有没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一时难说。在北京是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

反兵团。 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奇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23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很多地方。紧接着，大概在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当时，社会上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风潮正趋于高峰，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兵团”就对陈毅发起进攻，矛头指向周总理。 1967年七八月间，以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一派反总理为起端，许多污蔑攻击周总理的反动传单，贴到了北京市的一些闹市区，什么“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首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等。反动传单上署了“首都六一六红卫兵团”的名。打击这些反动行为，打击这些造反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是必要的。但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查过程中发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产物。什么是“五一六分子”？好像是以反周总理为标志，实际上包括涉及“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都在内，也就是所谓“三指向”者，把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向了人民解放军的，指向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摊着一项，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论了。“五一六”定性的扩大，使“五一六”问题大无边际，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五一六”问题愈是严重扩大，所谓“五一六”的反革命组织问题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最后，不仅在北京抓“五一六”分子，而且在全国抓“五一六”分子。这里固然打击了一些造反上来的坏人，但也使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和打击，特别是当对立的两派在互揪对方的所谓“五一六”问题时，造成的扩大化就更可怕了。

抓“五一六”问题也时伏时起 抓“五一六”问题也时伏时起，1970年3月27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要求进行清查和重点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指定我任抓“五一六”的办公小组的组长，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组长。这时，各机关开始抓“五一六”分子，提出查他们的登记表、组织情况等等，我们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东西，

只有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总理的比如“六一六”等组织都是“五一六”分子，戚本禹是反对周总理的，搞周总理的什么“伍豪启事”，该是大号的了。我们开了若干次小会，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登记表和组织情况等线索。但谢富治在报告中仍然说“五一六”是有组织的、有后台的等等。北京市也组织了一个抓“五一六”的办公室，由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负责这个工作。就在这时，北京的一些工厂被坏头头夺了权，那时，各级都在夺权，很多工厂因此停产。有一部分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很坏。北京市面临工矿企业的大面积停产危险，怎么制止？这时，周总理在外交系统作了一次反极左的讲话，我们就借这个形势，提出反极左，把一些破坏生产的坏头头、打砸抢很厉害分子作为“五一六”问题来抓。市里开始成立的叫“批清”办公室，临时调了一二十个人，主要是“三支两军”的同志多一些，负责人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和李立功。批极左思潮，市里发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是针对蒯大富搞的极左谬论的，突出抓了“造谣一千次就变成真理”、“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这样的谬论。这次批极左思潮搞了一段时间。借此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提起来了一批老工人负责生产，发动群众，稳定了生产。

1970年春，市里就布置清查“五一六”。一开始，下边就有个问题，有的单位就交代了：有组织，叫做“五一六兵团”，还有什么政委、兵团司令。说得头头是道。有的人还交代填了什么表。这样，就有一阵子追查组织甚至有的单位就追查表。这就搞得触动的人比较多一点。这样搞了几个月，大概搞到最多的时候是群众揭发出来涉及五万多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下边报上来的重点人是七百多人。办留宿学习班，全市最多时有三千人。有一段时间，下边报上来的揭发数字天天往上涨。发现不对头了，哪有这么多的人，如果是反革命组织怎么能弄到那么多的人呢？张铁夫很怀疑，就向市委汇报。市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决定抓住一头，甩开一头。所谓抓住一头，就是抓住几个反革命案件，指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查事件、查人物。所谓甩开一头，就是不要追什么组织、什么表，一般的，没有罪行的，就不要去折腾人家了。这以后就集中力量，查事件、查罪行，逐渐搞了核实、定案。

当时，我们组织查了几个事件，是涉及到全国性的东西。一个是围困中南海，几十万人安营扎寨；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午门大会，就是香港问题。这三个都是对着周总理的。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一

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矛头所向清清楚楚。以后，我们在清查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们清查的这几个事件，都涉及到他们反总理。围困中南海，他们就是想把总理轰出来，戚本禹就逼周总理搬出中南海。然后，他们冲进去，抓刘少奇，再嫁祸周总理，他们是这么个阴谋。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这样，总理负责外事嘛。午门大会也是这样。查了这三件事，基本上查清。比如围困中南海，那时不是有“天派”、“地派”吗，实际上查来查去，“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虽然“天派”、“地派”也有矛盾，但根子是一个。在北京市我们主要查清了几个重大武斗事件，一个是西单商场武斗，破坏性很厉害的，死了人。那是“财贸尖兵”干的，头子是洪振海，后来抓起来了。

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 友谊商店的王景瑞也是头头。百货大楼的武斗、永定门粮库的武斗、琉璃河水泥厂的武斗，都造成很大破坏，也是伤了人、死了人的。另外一些事件，比如西郊的张兆庆，还有一个王洛宾，是造反派的头头，他们准备在西郊搞一个大公社，搞一块根据地，是戚本禹指挥的。二七厂的徐凯，他是准备把铁路系统抓在手里的。还有一个矿冶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名字记不起来了。随着这几个事件查罪行，查到罪行联系到这些头头，解决事件的发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还有周景方从学部带来的一批夺权的人，他们来后把持了市里的几个主要口，比如建筑。这些人都是支持造反的。还有参加工代会的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把“五大领袖”搞下来，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张铁夫他们写了材料、写了报告。我传达了毛主席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的意思：谭厚兰是不行了；韩爱晶是蒯大富的军师；聂元梓的问题牵涉到林彪的问题，没有查清，放一放；王大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安排工作、给出路。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又把这些人的头头抓起来，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我们后来还想给点出路。谭厚兰劳动改造表现比较好，认罪态度比较好，写过几次认罪书。谭小的时候是童养媳，很苦的。后来做了小干部，送到北师大学习的。我们考虑到这些，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想让她回老家当个小学教员，她四十多

岁了，没有结婚，还可以找个对象。但以后没有弄成，她病死了。包括“五大领袖”，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敌我矛盾就是敌我矛盾，你是打砸抢分子就是打砸抢分子，你有人命案就按有人命案处理。我们最后核实定案的结果，这个数字不是十分准确，大概是这样：定了10个；待批的有22人，当时有些人市里批不了，要报上去批；另外还有14个挂着的人，当时，重点人物总共有46人。此外，还有敌我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43人；犯有严重错误的608人，其中有200多人是要给适当处分的。这是1973年时的一个统计材料。这就是结果，清查“五一六”开始不是说扩大化了吗？以后市委就掌握逐步落实政策、逐步定案。当时是根据人证、物证、旁证，核实定案的，没有这三条不行，不能光凭个人口供，最后还要给出路。再补充一下，我们当时还查了两个案子。一个是讨孔，就是谭厚兰组织小分队到曲阜破坏孔庙；再一个是谭厚兰反大庆，她组织了一个班子到大庆去揪王铁人，记得好像把大庆的火车站都砸了。对清查“五一六”，不能一概而论，只讲扩大化的这一面，我们后来查的这些都是反革命案件，讨孔破坏很大，现在公安部还有他们破坏的纪录片，他们是打、砸、抢、烧。我们清查“五一六”中间，还搞了“一打三反”。这中间有人写匿名信给毛主席，告状说我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主席把信转给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红铅笔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账。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北京市有关“五一六”的情况，张铁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示落实，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来负责的。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写个报告，他写了一个。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到，怎么写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评了，就不要再写什么报告了。李震还想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说毛主席指定我们成立联合办公小组，周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就提出过应该有个政策，周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反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则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现在还想搞个政策界限，这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没有查出“五一六”有什么证据，你怎么能够提得出区别政策来呢？后来报告没有报，指示也没有发。这是抓“五一六”的情况。毛主席讲是极少数，“王、关、戚”已经抓起来了。但一开始可不是那样，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

北师大的报告毛主席也批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出面和谢富治召集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极左 40 天。毛主席一批就没有“五一六”了，所有市里抓的“五一六”，主要是工厂的，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都摘了，这样就没有“五一六”分子了。一场声响很大的抓“五一六”的运动就此结束，但留下的后遗症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要轮流地吃它的苦果。

二、关于“揪军内一小撮”

何蜀《“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这场全国性的灾难负有直接责任，因此目前中国的官方历史书籍或准官方述著对其中许多重要事件的表述常常语多遮掩，甚至扭曲事实，以尽量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形象。“文革”中以“揪军内一小撮”为口号而打击军队高级将领的事件，就是一个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案例。官方版本的介绍是，1967 年这一事件发生时，毛泽东被蒙蔽而不知道真相，后来毛发现了就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笔者通过对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分析，发现毛泽东其实就是这一行动的始作俑者，毛后来制止进一步“揪军内一小撮”的行动，是因为担心军队的控制权会落到林彪手中。显然，就象“文革”中的其他行动一样，毛泽东利用“革命”口号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斗争，无非是要打击他不喜欢的高级官员，以保持其个人对党政军最高权力的绝对控制。毛泽东的个人政治欲望把国家拖入了灾难的深渊，给中国的发展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其政治、经济、社会后果至今仍未消散。

“揪军内一小撮”溯源

“文革”时期“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的完整说法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国内关于“文革”的记述往往把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字句省略掉，如此则整个口号的含义就大为不同。口号原文中矛头指向“走资派”的主要含义被模糊掉，听起来似乎这个口号只是把矛头指向军队。不过，为简便和通俗起见，本文仍使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简略说法。

“揪军内一小撮”的背景是，当 1967 年“文革”发展到“全面夺权”和全面

内战的白热化阶段时，在群众造反组织中出现了一种“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潮和行动。后来，这种思潮受到“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厉申斥。凡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活动或有过类似言行的人，大多遭到清算，不少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五·一六分子”。

其实，“揪军内一小撮”说法的源头，出自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并亲笔修订的、1966年5月16日下达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同时批判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该文件还提到：“军队里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笔者注：那时还未使用“一小撮”这个限制词），必须批判和清洗”。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历来强调“党指挥枪”，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军队。既然“文革”的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派”，那么在军队任职的“党内走资派”也就必然面临同一命运。因此，“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就是“揪党内一小撮”这一政治目标的必然结果和组成部份。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方面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即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始终不忘“揪党内一小撮”。但是，当“揪党内一小撮”自然地延伸到“揪军内一小撮”时，1967年8月，毛泽东和听命于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却严厉申斥、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论和行动。当时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个理由是，军队不能乱。粗听起来，似乎有一些道理。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能乱，然而领导军队的共产党却可以大乱特乱——这算什么逻辑？

权威”说法质疑：林彪、江青要“揪军内一小撮”？

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公开提出和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文革”时期，为这一口号付出代价的不止一个人、一个政治“集团”。当“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揪出来后，官方曾说是这几个“小爬虫”提出了“揪

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但当林彪外逃坠机死亡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官方改说是林彪炮制了这个口号。以后，当“四人帮”倒台时，又说是他们伙同林彪炮制了这个口号。不论罪名归于谁，似乎都与毛泽东无关，而且似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永远“英明正确”，而且全靠他“明察秋毫，力挽狂澜”，才刹住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歪风。

“文革”结束以来公开出版的有关“文革”史的著述中，谈到“揪军内一小撮”时，基本上都继续重复沿用了“文革”中一变再变的流行说法。即使是在否定了“两个凡是”之后，有关论著对这个问题依然沿袭旧说，而且含混不清。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辞条是这样说的：“《五·一六通知》中，曾错误地抨击了所谓‘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1967年1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同年7月末，《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鼓噪：‘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彻底乾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于是，一些造反派就到各地‘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闹得乌烟瘴气。毛泽东发现后，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提法，才刹住这股歪风。”〔1〕

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1967年“7·20”事件后，“早在1967年1月就由江青等人拟定并经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但又一直不敢公开的‘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也利用‘7·20’事件的时机，在报刊上公开宣传，以致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2〕

这两例应该算是较为权威的说法。从上述说法中只能推导出以下结论：

第一，林彪支持“揪军内一小撮”，因为1967年1月林彪在提出这一口号的中央文件上批示“完全同意”。但以上两个说法对谁是口号的具体提出者却各执一词，一说是由“关锋、王力等4人提出”，一说是“由江青等人拟定”，而且上述两本书对这个口号具体文字内容的表述也不同。

第二，虽然有人（可能是林彪，也可能是江青或别的人）在1967年1月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但“一直不敢公开”。至于他（她）或他们为何“不

敢公开”，上述的“权威”著述就语焉不详了。

第三，他（她）或他们正式公开宣传这个口号的时间大约是在 1967 年 7 月底，通过《红旗》杂志 12 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提出的。此后，才“于是”、“以致”有了全国的“揪军内一小撮”浪潮……

历史真是这样的吗？

到底是谁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

按照上述说法，“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似乎是“关锋、王力等 4 人”或“江青等人”提出的。其实，这两种表述在事实的认定上出入颇大，前一说法不含江青，后一说法也未必包含关锋、王力。由此可见，在当事人这个基本环节上，上述两本“权威”著述的说法是漏洞百出的。

更有趣的是，被称为当事人的王力后来完全否认了他参与其事的说法：“人们又说，1967 年 1 月王力伙同关锋按照林彪、江青的旨意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彻底揭穿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个宣传要点还拍成照片，铅印的名字有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签名的只有胡痴一个人。这件事王力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上王力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这时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唐平铸、胡痴是成员，关锋是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委托关锋管《解放军报》。王力知道，过去不管谁领导中央宣传部工作从来不管《解放军报》。这个宣传要点王力连看都没有看过。关锋提到过这件事的过程，说这个要点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但没有说要加王力的名字。我认为这个问题即使是胡痴签了名，也不应追究责任。而且这问题还应该进一步研究。因为《五·一六通知》上就有：‘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五·一六通知》的这一段话，是毛主席加的。这不是说得更厉害吗？怎么能责怪后来的这个宣传要点呢？怎么能把责任推到四个人身上呢？”（3）

王力的这个说法值得重视。这一说法首次提到，“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是根据当时《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来的，与时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关锋确实有关，但关锋也不是自行其是，他说这个“宣传要点”是根据一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当时军委常委

包括几位老师在内，军委常委会议一般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而林彪平常一般是出席这样的会议的。如果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确实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那显然就不能说成是“关锋、王力等四人”或“江青等人”的责任。况且，在那个“宣传要点”上签名的胡痴和没有签名的唐平铸，很快就被揪出、打倒了，也属于被揪的“军内一小撮”，他们既非“王、关、戚”同党，又非江青集团中人，能把他们笼统说成是“江青等人”吗？显然不能。其实，只要把上述“宣传要点”和存档的那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录对比一下，就真相大白了。这个简单的对比查证工作至今未被批准，其中自有原因。

根据“文革”时期那一阶段的有关史实来推论，毛泽东确实有“揪军内一小撮”的意图，而且作了切实的部署。最早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是1967年1月14日的《解放军报》社论，社论的标题是“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这篇社论号召：“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前一天，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与江青之女肖力（李讷）为首的造反派在《解放军报》报社宣布造反、夺权，报社负责人胡痴随即被“打倒”。这篇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造反夺权之前就写好的，还是夺权之后才赶写的，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这篇煽动在军队内部夺权造反的《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不可能一无所知。

从下列文件还可以进一步看出，“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是瞒着毛泽东的阴谋活动，而是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安排，并从一开始就处于毛泽东的掌握中。

1967年1月26日，毛泽东对全军“文革”小组1月25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5号刊登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作了如下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

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随后，中央军委于1967年2月16日作出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4〕。中央军委这个文件的第一条列举了军队夺权范围限于哪些单位后说：“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如果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的，要坚决夺回。”〔5〕

中央军委的文件必须经军委主席毛泽东阅后才能签发，这个文件鼓动“坚决夺回”军队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力，可以被视为在毛泽东指示下宣布“揪军内一小撮”的明文规定。

1月30日，毛泽东将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批给林彪、周恩来：“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6〕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毫不含糊地提到“军队内部”与其他各界一样无例外地“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这说明毛泽东确实认为存在着“军内一小撮”，应该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批倒”。

2月7日，毛泽东对西藏军区党委关于请示中央尽快对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

等表明看法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7〕

毛泽东批示中点名的王其梅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要林彪、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判断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人“究竟是好人、坏人”，结论倘为后者，那自然就属于“军内一小撮”了。后来王其梅就是被当做“军内一小撮”迫害致死的。

2月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把“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文稿送林彪审阅。报告称：“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会上的指

示，起草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今天上午召集 32 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特呈上请审查批示。”林彪 10 日将此文件转报毛泽东。毛的批示是：“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军委于 2 月 11 日将此文件下发。（8）

该文件的第 2 条规定：“由军委决定已经展开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9）

可见，“揪军内一小撮”实乃“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

“揪军内一小撮”波及全国各地

从上述中央文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及类似提法是从 1967 年 1 月起就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在一系列文件、社论中反复提出过。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文革”高潮阶段，时刻“紧跟毛主席”的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立即把“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落实到行动上”，从 1967 年初开始，引发了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10）

1967 年 1 月 3 日，军事院校“造反派”在北京召开 10 万人大会，“炮轰”叶剑英、陈毅等人，并计划在 5 日召开“批判叶、陈大会”。同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炮轰”聂荣臻。首都街头大量出现“炮轰”几位老师的标语、传单。周恩来当晚与总参、总政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接见了 40 多所军事院校的学生，说服这些学生放弃了 5 日的“批叶、陈大会”。

1 月 23 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 5 期发表了一组批判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文章。~}

1 月 26 日，福州地区红卫兵“红革会”及“首都三司”赴福州人员等，连续冲击“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冲击福州军区，揪斗军队干部。

1月2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红卫兵“呼三司”几千人包围了内蒙古军区大院的南大门，静坐示威，要求拒绝支持“呼三司”的军区副政委刘昌作检讨，提出“刘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后来发生了军队枪杀示威学生的事件。

1月31日，西安召开批斗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的“西安地区空军院校、文艺工作全体红色造反者斗争三反分子成钧大会”。

2月4日，青海大学红卫兵贴出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2月8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等学生组织，抗议广州军区逮捕军区机关“千钧棒”等军内造反派，于凌晨起到军区静坐示威，冲击军区。

2月11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围攻成都军区，要求军区释放被捕的军内造反派及兵团人员。《八·二六炮声报》发行了“批判成都军区专号”，发表了“成都军区顽固推行刘邓路线大事记之一、之二”，号召“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

2月13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造反组织、珠江电影制片厂“东方红”造反组织、军体院等1,000多人在省中级党校举行“声讨广州军区镇压革命学生誓师大会”。

2月14日，昆明军区军医学校、外语学校、步兵学校、文工团等军队单位造反派与其他群众冲击军区机关。

2月17日，四川大学“八·二六”组织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以“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的名义，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了“砸烂以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

4月4日与4月12日，北航“红旗”两度发表“打倒徐向前，炮轰叶剑英、陈毅的严正声明”。

4月20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14期发表了“炮轰叶剑英，叫他靠边站”的文章。

5月23日，广西大学“革联”、医学院“闯”等造反派组织及一些中学红卫兵连续两晚冲入广西军区院内张贴“打倒韦国清”、“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等标语。

6月5日，广州中南林学院“红色造反者”组织发出“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此后发表于6月14日的《红色暴动报》第9期。

6月7日至13日，“新北大公社福州联络站”参加了当地学生反对福州军区的绝食行动。

6月12日，浙江“省联总”一派在“打倒刘邓大会”上公开喊出打倒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龙潜的口号。6月15日浙江省“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联络站”主办的《反逆流报》发表了“龙潜35大罪状”一文。

6月15日，“首都红代会赴邕（广西南宁）调查组”发表了“就南宁一中六一三事件告全市革命人民书”，号召全广西造反派行动起来，“宣判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绞刑”。

6月26日，43个军队院校和军队文艺团体造反派组成的“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斗争罗瑞卿大会，刘志坚、苏振华等陪斗。

7月1日，“首都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渝人员）”发表了“关于砸烂重庆黑警司的严正声明”。

7月15日至17日，成都军区机关造反派连续召开批斗甘渭汉（成都军区第四政委）、韦杰（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大会。……

在“沸腾”的1967年上半年，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的结果是，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向军队单位发起了冲击。

1967年“7·20”事件之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高潮

军队一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本身也是“专政机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被群众冲击威胁的场面。因此，一些地方的军队领导人对冲击军队单位的当地造反派组织毫不犹豫地采取了镇压措施。然而，这些镇压措施却被毛泽东视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对抗“文革”，毛泽东决定打击这些镇压“造反派”的军队干部，这就导致1967年夏天“揪军内一小撮”的声势被推向了高潮。

1967年2月青海“造反派”冲击省军区后，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开枪镇压，令“造反派”伤亡惨重。血案发生后，3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该中央文件称，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 205 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最后宣布“赵永夫隔离受审”。〔11〕

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点名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和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该中央文件同时将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第二政委郭林祥定性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从而点名打倒。〔12〕

7月20日，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了著名的“7·20”事件。当时，武汉地区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被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认定为“保守组织”，认为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时隐居在武汉的毛泽东以及从北京专程到武汉的周恩来，均要求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改变同情支持“百万雄师”的态度。当代表中央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王力到武汉对武汉军区干部施加压力时，这种态度激怒了“百万雄师”的上百万群众，该组织举行了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甚至与谢富治、王力发生了肢体冲突。〔13〕

这一事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全国报刊上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声讨宣传。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认定为这个事件的“策划者”和“黑后台”，而遭到猛烈批判。据王力回忆，7月22日，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

“7·20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周恩来），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14〕

另据杨成武回忆，7月24日，他飞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还说，他同意北京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他同意他不在北京期间，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在‘7·20’事件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15〕

7月25日，毛泽东就“中央关于武汉7·2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

毛代拟的复电中称：“7月24日20时10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16〕

毛泽东认为“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并批准发表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7·20”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这个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该《公告》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17〕

毛泽东还审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18〕

这封信声称：“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19〕这里明确使用了打击“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有关“7·20”事件的宣传方针，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的社论、文章都使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1967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文提出：“我们一定能够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北京支持你们”中说：“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同日《解放军报》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中说：“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7月27日，《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号召：“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7月2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中称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同日，《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决心掀起一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同日《解放军报》的另一篇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7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中说：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划清界限，坚决把他们打倒。”同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说：“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7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中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远没有冻僵的毒蛇。”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中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

7月31日，《解放军报》社论“新的考验”向“犯了路线错误的干部”发出号召：“从实际行动上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滔天罪行”。

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上述一系列社论之后，7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将于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7月31日全国各大报均在头版刊登。《红旗》第12期有两篇社论。一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文章称“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同期的另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

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乾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停止“揪军内一小撮”？

由以上史实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辞条为了得出既定的结论，扭曲了真相。实际上，“揪军内一小撮”并非只得到了林彪的支持，毛泽东有关鼓励、支持“揪军内一小撮”的批示和他批准发出的有关文件，不是远比林彪那个“完全同意”的4字批示多得多吗？当然，说毛泽东对此事毫不知情也是错误的，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是“揪军内一小撮”的指挥者。至于说林彪对这一口号作了批示后“一直不敢公开”，更是无稽之谈。该辞条为了掩盖1967年上半年“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部署”和“指示”，颠倒了时间顺序，把上半年全国各地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说成是7月末《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发表之后才发生的，这样的描述与历史真相显然相差太远了。显然，如果承认“揪军内一小撮”已经在1967年上半年持续闹腾了半年多，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无法摆脱干系了——沸沸扬扬了半年多而没有被“发现”，岂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于是，就把“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归罪于《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既然“揪军内一小撮”是毛泽东的部署，那为什么在1967年7月底、8月初中央的党报、军报、党刊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推向一个新高潮之后，毛泽东突然又要求停止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呢？据王力回忆，1967年8月12日，毛泽东有了新的指示，说“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策略。从此以后全国各级宣传机器才不再使用“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20）

而毛泽东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据说与《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有关，他在这篇社论的提法中发现了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上述辞条的说法是，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上“发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为此严厉申斥。此说非常可疑。“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首次出现在《红旗》杂志的这篇社论里，此前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亲自修改审批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文件里多次用过此类提法。而且，在《红旗》杂志这篇社论刊出的同时，党中央机关报和军报都多次用社论的形式提出过相同

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而《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前都会将大样送毛泽东审定，显然，毛泽东当时赞成在报纸上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1967年的第12期《红旗》杂志刊登了两篇社论，都提到了“揪军内一小撮”，但毛泽东只对其中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不满。那么，毛泽东在这篇社论的文字当中究竟发现了什么“问题”呢？笔者对比了这两篇社论的内容，有一个发现：虽然两篇都有“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这篇社论中有一个提法是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另一篇社论中没有的，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这篇社论除了回顾解放军40年来“在毛泽东建军思想指引下成长壮大的历程”，和毛泽东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刘少奇）及其“在军队中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的斗争历程之外，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颂扬林彪，大段大段地颂扬林彪对建立人民军队作出的贡献。这篇社论说，林彪“系统地阐明了和创造性地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据军队系统的“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后来在书中披露：“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21〕

毛泽东的不满究竟是什么？他批评的是《红旗》杂志那篇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还是该社论对林彪的颂扬？他的“还我长城”之语，针对的是谁？是奉命“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是被这篇社论称为“直接指挥”军队的林彪？到底毛泽东关于这篇社论的批示有那些具体内容，迄今为止国内的有关论述都讳莫如深。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文革”时期许多无关紧要的批示都公开发表出来了，但却没有1967年8月间毛泽东对这篇社论的批示。在“文革”中批判王力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和传单、小报上倒是有所披露，但其说不一，有的说是批示的内容是“还我长城”，有的说是“打倒王力，还我长城”，还有的说是“打倒王力，打倒，打倒”……真有“打倒王力”的批示吗？1967年9月7日毛泽东在戚本禹写于9月4日的检讨信上批示

说：“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之关、王二同志。”

〔 2 2 〕

此批示仍称王力为“同志”，可见“打倒”之说难以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的一篇回忆录可以为这一段历史作注。杨成武回忆说，在他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即“7·20”事件前后）期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长征，并问我知道不知道有个‘会理会议’。我说知道，但会议内容不太清楚。他就讲了‘遵义会议’后不久，林彪曾写信给中央，要求他和三人军事小组下台，由彭德怀出任军事总指挥。所以才召开了‘会理会议’，批判了林彪，保证了党内、军内的稳定，并进一步肯定了北上的方针。”此外，毛泽东还对当时流行的祝颂语“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表示强烈不满。“在上海虹桥宾馆，有一天，毛泽东非常烦躁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毛泽东还要杨成武回去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要犯错误。“当时这些话，也仅仅是传到周恩来那里。由于林彪当时所处的地位，处理这样的问题，对于周恩来也是很棘手的。”〔 2 3 〕

毛泽东是在“7·20”事件后从武汉转移到上海住进虹桥宾馆的。他“非常烦躁地”说上面那段话的时间，基本上可以断定为《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发表（7月30日广播，31日见报）之时。从杨成武的回忆可知，这时官方媒体和社会上对林彪的颂扬已经使毛泽东十分反感，因此他要求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注意：当然不是说不要宣传毛本人，而是不要宣传林彪，不要再说祝林彪“永远健康”之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对林彪的颂扬，很可能触犯了对军权高度敏感的毛泽东，他才作出了“还我长城”的批示。毛泽东担心的是，自己对军队的领导权被架空了，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会落到林彪手中——几年后毛泽东就明确说过：“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在毛泽东的这一批示的原文及真实背景尚未公布之前，笔者只能认为：“还我长城”的深意是“还我军权”；这里的“我”其实并不象某些“权威”著述解释的那样，是毛代表人民提出要求，而只是指毛个人的要求。毛泽东突然要求停止使用“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大概与他担心林彪借“揪军内一小撮”的机会巩固军权有关。

只要正视历史，直面现实，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还是批判“揪军内一小撮”，都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在1967年7月底之前就已经持续闹腾了半年多的“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未“发现”，而是了解得清清楚楚，并且给予了明确的鼓励和支持。

看看从彭德怀到罗瑞卿等军队领导人的命运，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的而不是经过剪裁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毛泽东借口有人“揪军内一小撮”而批判打击别人，其实他才真正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始作俑者。在整个“文革”时期，他在军内前前后后揪了若干个“一小撮”。凡让他不满意的人，都难逃被揪之劫。

注释：

〔1〕《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375页。

〔2〕《“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171页。

〔3〕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第291—292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201页。

〔5〕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出版，2002年。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09页。

〔7〕出处同上，第218页。

〔8〕出处同上，第226页。

〔9〕出处同上，第227至228页。

〔10〕这一节对当时事件的报道取材于当时的各种媒体，包括各地造反派组织出版发行的报纸（俗称“红卫兵小报”）。这些“红卫兵小报”的大多数可以在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查阅到。

〔11〕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出版，2002年。

〔12〕出处同上。

〔1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第260—266页。

〔14〕《王力反思录》，第1011、1927页。

〔15〕杨成武，《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第291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0页。

〔17〕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8〕毛泽东对该信作了如下批示：“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此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3页。

〔19〕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4、265页。

〔20〕王力，《王力反思录》，第291页。

〔2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7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12页。

〔23〕《杨成武将军自述》，第304、306页。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1期（总第84期）

阎长贵《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

自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被“打倒”后，在近40年的时间里关于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中，在谈到错误和罪行时，几乎无一不说他们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也确实是他们被“打倒”（确切地说是被“抛出”）的根据之一。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回事？其来龙去脉怎样？这是研究“文革”需要探讨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

1967年的“七二〇”事件，本来是武汉地区军队和一部分群众抵抗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做法的一次大斗争，它反映和体现了不满“文化大革命”的体制性力量和群众性力量。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叛逆行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在“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继全面夺权风潮造成各级政府和党

组织瘫痪后，又使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在“七二〇”事件中，被揪斗和殴打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及随行人员，于7月22日被救回北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等党政领导人及数万群众的热列欢迎。当谢富治、王力从飞机上下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拥抱，陈伯达和江青还左右两边，手挽手地扶着王力走出机场，场面十分热烈和壮观！王力俨然一位胜利归来的英雄。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100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统帅林彪也主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更提高了这次大会的地位和声势！

关于“七二〇”事件本身我们不谈，只就“七二〇”事件所引发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作些介绍和说明。

《人民日报》7月25日所载“新华社武汉24日电”称：“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人民日报》7月26日所载“新华社25日讯”，关于百万军民举行集会的报道说：“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亲切、郑重地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从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提法，便在报刊上，在社会上，铺天盖地地传播和流行起来。细检7月27日到31日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其他报纸姑且不说），从社论到通讯，从报道到文章，“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每天都出现十几次。

7月27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据杨成武回忆，“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40 周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40 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地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

《红旗》杂志第 12 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40 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红旗》杂志第 12 期还有一篇就“七二〇”事件写的专论，题目叫做《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

《解放军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40 周年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说：“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彭德怀、罗瑞卿等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党报、党刊、军报，亦即“文革”中红极一时而又极具权威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三个名字在 1967 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8 周年时第一次联合使用，此后就成为写重要文章和重要社论的定例，是“文革”中的最高舆论权威），一齐上阵，大肆宣传和鼓噪“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不是达到顶峰了吗？

写到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

在庆祝建军 40 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却只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讲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为什么？这里是否透露出和反映着某种情况和信息？要知道，杨成武当时随同毛泽东在外地，他是奉毛泽东之命回京参加国防部招待会并讲话的。这个不同，即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杨成武的讲话不同于“两报一刊”的言论，很值得注意。十分明显，这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肆宣传和鼓噪造成了严重恶果，军队及其秩序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的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揪本地的陈再道，在冲击军事机关，在抢夺枪支弹药等等。而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了。当时还说什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说什么“乱”，只是“乱了敌人”，而“锻炼了群众”，这完全不是事实。

由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严重地冲击了军队及其秩序，造成了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泽东虽然口头上说“形势大好”，但对这种“兵荒马乱”，不能不忧心忡忡。他在 1970 年同斯诺谈话时说：“1967 年 7 月和 8 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信条。当毛泽东看到《红旗》杂志第 12 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又针对着报刊上大量和反复出现“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言论，话里有话地指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这就是说，毛泽东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归结为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从《五一六通知》到《军报宣传方针》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流毒全国，并招致毛泽东不满，究竟是谁先提出这一口号的？

1967 年 8 月 22 日，因抢夺军备和援越军用物资问题，周恩来在接见广州两派时，严厉地批评他们“简直没有敌情观念”。又指出：“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 7 月 20 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看看事实。

实际上，应该说“揪军内一小撮”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就有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说：

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谁都知道，这两段话，在《五一六通知》中是极其重要的，可以称之为《五一六通知》的灵魂，其印刷也都是黑体字排印的。

“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派”，其人数是“一小撮”（《五一六通知》中说不是“一小撮”，而是“一批”、“一大批”。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十六条》中说的还是“一些”。“一小撮”是后来确定和流行的），故称之为“党内一小撮”。

无疑，“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军队走资派”，其人数也是“一小撮”，故也可称之为“军内一小撮”。

据此，我们说“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最早出现应在《五一六通知》，不能算是妄言。当然，在《五一六通知》中没有“军内一小撮”这样的话。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说：“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

同已有的军委、总政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相比，这个紧急指示，是“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军事部门“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文件。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概念，但有了军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的说法。可以说，这距独立和单独提出“军内一小撮”只有一步之遥了。

1967年1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要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说部队也有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要搞好搞彻底，要支持“左派”，又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主管军报。顺便说一句，关锋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他实际上一天也没到职，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管了军报的。他会同中央文革小组

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王力，召集军报的两位领导，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于1月10日上送给“全军文革小组并林副主席”，其中第一条就说：

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严格和真正意义上的“军内一小撮”即“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这是第一次出现。王力，关锋这里说的，是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军内一小撮”明确地独立出来。这也可以算作他们的“创造性”吧。

这份《军报宣传方针》，没有送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简称全军文革），却直接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又由她“嘱”，立即报送林彪。军报代理总编辑胡X代写：“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林彪不仅在自己姓上画了圈，还批示：“完全同意。”

这不容置疑地证明，林彪和江青也是认可和同意（并且是“完全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这样，《军报宣传方针》也就确实确实、不折不扣地成为《解放军报》必须执行的命令和指示了。

《解放军报》1967年1月12日的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说：“让我们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热情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

《解放军报》1967年1月14日发表的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说：要把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必须“冲破重重阻力”，而“这阻力主要来自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又说：“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

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196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又加编者按，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即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说：“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由于“七二〇”事件的爆发，再次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推向高潮。

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江青、康生、陈伯达极力推卸责任，王力、关锋成为替罪羊

当毛泽东针对“揪军内一小撮”的狂热宣传，提出“还我长城”，说“党内、军内一小撮”不提不策略的时候，据说江青、康生、陈伯达都慌了手脚，急忙为自己开脱，推卸责任。江青明明看过和同意《军报宣传方针》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嘱“速送林彪同志批示”，她现在不提了，并装模作样、“义正词严”地批“揪军内一小撮”。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得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江青表白她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贯正确的，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自我批评。

1967年7月“新华社25日讯”，即关于北京百万人集会的报道，其中“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关锋加上、康生审定的，康生说他请示了主席，现在他改口称，他没说主席同意了。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为自己开脱。

查阅《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从1967年8月10日开始，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就不见了，可谓戛然而止，这显然是对毛泽东“还我长城”呼吁的贯彻和回应。最显著的证明，要算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摘要公布1959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这件事。按理说，利用这件事恰好大讲特讲“军内一小撮”，并且军报社论已经明确断言彭德怀、罗瑞卿等是“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公布这个决议而写的社论中都不再提“军内一小撮”，当然也不再说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而只是说彭德怀有这样或那样的罪行。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说一说，为“补救”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八一”社论，在8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写了一篇关于军队的社论，题目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靠支柱》，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发，登载在8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则是9月17日出版的第14期了。

当时，陈伯达不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红旗》杂志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而发表这样重要的社论，他不审阅，不签字，那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不仅是惯例，而且是规定，即他作为总编辑的职责所在。这篇社论，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说他没看过，显然是弥天大谎。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

这件事，我也问过关锋，关锋说：“毛主席批评这篇社论后，陈伯达说他没看过，并把有他签字的稿子要回去了，这完全是想推卸责任，是小人的做法——对他这一点，我是很有意见和看不起的。”

《红旗》杂志第12期有两篇社论，一篇是纪念“八一”的社论，一篇是专就“七二〇”事件写的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据负责处理这篇社论的责任编辑说，这篇社论中有句话就是陈伯达改过的。这句话原为：“……实际上只不过银样蜡枪头一根”，陈伯达将其中的“蜡”字改为“J”字。此语出自《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是红娘讥讽张君瑞的，说：“你原来苗而不秀。呸！”

你是个银样锻枪头。”所谓“银样J枪头”，即表面像银质其实是焊锡做的枪头，比喻中看不中用；而“银样蜡枪头”，则不通，也无据。编辑们看到陈伯达这一改，深深赞赏和佩服总编辑知识渊博。

陈伯达撒谎有术，但是骗不了人。只是当时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直接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毛泽东不想追究他的责任就是了。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但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

1967年9月，毛泽东经过两个月的南巡回到北京，据说外交部的王海容去见毛泽东，探听打倒王力的消息，毛泽东只给她念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说别的，便下了逐客令。唐代罗隐这两句凭吊诸葛亮的诗，毛泽东在“文革”中不止一次地吟诵和抄写过。应该说，这两句诗，确实是毛泽东经过“七二〇”事件后的心态写照，也是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心态写照，值得我们认真体味。

《党史博览》 2006年第6期

三、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

二00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英前官员魏思敦爵士（Sir John Weston）回忆：
火烧英国代办处

魏思敦爵士（Sir John Weston）曾经担任过英国内阁的副秘书长、英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的常驻代表等要职。在1967年到1968年期间他曾在英国驻中国的外交代办处任职，亲身经历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39年过去了，魏思敦爵士在谈起这一经历时仍然无法摆脱那种恶梦般的感觉，他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经历的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下面是根据对魏思敦爵士的专访记录整理后的事情经过：

“1967年8月22日的上午，我们发现有很大一群红卫兵和其他人在代办处的外面。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在事发之前我陪代办处主任去中

方外交部时收到了一个外交照会。中方要求英-港政府在限定的时间内释放与几起在公共场所安置炸弹案有关的、被香港法院判决后关押的一些人员，否则后果自负。回到代办处后我们向伦敦做了汇报，告诉伦敦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后果会是什么。

红卫兵在英国代办处召开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后的场景。（魏思敦爵士提供）

当时守卫大楼的军人不让我们出去。我们想出去办事、买东西、回家等要求一概都被拒绝了。他们说，‘如果你们出去的话，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代办处外面的人一整天都在那里，而且越聚越多。（记者：根据 1967 年 8 月 23 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事发时在现场的有一万多人。）

后来我们发现，电话线被切断了，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了。那时其它国家使馆的人看到了红卫兵拿着燃烧瓶和其它的凶器向我们的代办处走去，他们却无法用电话通知我们。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天也慢慢地黑了下來，外面的人群仍然没有散去的意思。

晚上 10 点半左右的时候，突然有一颗信号弹飞上了天空。这时，整个人群一下子骚动了起来，有人推倒了代办处的院墙。人们大声地尖叫着向代办处的大楼冲了过来。他们不断地砸着窗户和门。直到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对代办处的袭击，我们将是这次袭击的受害者。

我们大家很快地转移到了楼中最安全的保险库，打开了所有的灯。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大家都保持着安静。但是，情况很快就变得明朗了：他们这次袭击的目的就是要烧掉代办处的大楼。通过窗上的玻璃，我们看到了燃烧的火焰，浓烟从被打破的窗户和通风口进来了。房间里的烟雾变得越来越浓，外面的喊叫声也越来越大。我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喊着：“杀，杀，杀！”我们几个能听懂这喊叫的人不敢告诉那 5 个妇女这喊叫是什么意思。这时的大楼已经有一部分被他们占领了。有一些人是从房顶上进到大楼中的。还有一些人是把大楼的墙推倒了一部分后进到大楼中的。

被焚烧后的英国代办处的内部。（魏思敦爵士提供）

我们在保险库里停留了大约 45 分钟到一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留在里面的危险性比在外面还要大，因为里面非常热，浓烟也很呛人，大家都难以呼吸。在

这种情况下，代办处主任做出了打开大楼紧急安全门的决定，这样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出去。

安全门打开后，我们看到的像是一幕戏剧似的场景：整个的大楼都在燃烧，夜空被火光映得通红，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群红卫兵暴徒。他们一看到我们，马上就象发了疯的动物似地冲到我们的面前。当时，我一只胳膊挽着我的太太，另一只胳膊挽着另一名妇女。我看到有个男人伸手抓我太太的头发使劲地拉。我做了一件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连想都没想就咬了他！因为我看到他拽着我太太的头发要把她从我身边拉走。咬他的时候我在想，让我的牙齿进到他的胳膊里，让他松手。

代办处所有的妇女们都受到了红卫兵的性骚扰。他们撕破了我太太的衣服，把手伸到她下身的私部，其他的妇女们也有同样的遭遇。还有人用手去抓揉几个男同事私部，搞的他们很难受。我们都被打到地上。那是由一群非常愤怒的人们组成的流动人海，能在其中站稳是很困难的。

在混乱中我一直挽着我的太太，但是另一名女同事却不知在什么时候离开了我。后来我们渐渐的能够移动一些了。我看到一个军人，马上抓住了他。我对他说，‘你有责任帮助我们。’我后来一直跟着他。慢慢地，我们几个代办处的人和人群分开了，聚到了一起。这时候，有人搬来了照明灯，开始给我们这些没能履行外交照会的英国人照相。疯狂的人们向我们喊叫着：你们这些英帝走狗，向毛主席请罪！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是很难熬的。……

最后，来了一些军人，他们站成两排了。有一辆拖拉机慢慢的开了过来。他们开始把能够看到的我们的人都叫到拖拉机上。他们让我们都躺在拖拉机里，两排军人们分别站在我们的两侧。从拖拉机外面看里面，好象里面只有那些军人。就这样，拖拉机慢慢地从还在袭击大楼的人群中开过。拖拉机把我们送到了当时大多数外交官居住的外交大楼。这时已是 23 日清晨 2 点半。

回想起来，当时中方上演了一场文革中经常上演的政治戏剧：在代办处的院墙外面有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在把守，而在院墙和大楼之间充满了红卫兵。在这背后的安排是：由于外交上的原因，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不应该去干涉院墙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这样红卫兵们就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在我看来，那天晚上的安排中最危险的是，那些筹划这件对英国政府“复仇”之事的人没有

办法控制现场的情况。在整个事件中，我们都受到了人身攻击和伤害。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他当时满脸都是血。幸运的是，我们当中没有人当时被打死。

被焚烧后的英国代办处内部全部损毁。（魏思敦爵士提供）

第二天，我们回到代办处后，看到的是整个大楼都被烧毁了，旁边的大使官邸也被烧毁了。我们还发现，那些在 22 日的混乱中进入到大楼的人中有一些是特工人员。他们进了我们的联络室，切断了通向联络室的电缆，偷走了我们用来与伦敦联系的电传机。我们后来得知，事发时伦敦方面得到的最后一句从我们这边电传过去的话是：他们正在向我们走来。从那时起，在整个事件中伦敦方面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我们的消息。”

（文章来源：摘自大纪元记者唐英伦敦报道）

四、关于处理王关戚问题

《政治旋涡中杨成武》（作者：董保存）

第四十一章 “王、关、戚”事件

据杨成武回忆，事情大致是这样的：那天，他回到北京，听周恩来总理讲了北京发生的一些情况——8 月 16 日，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当晚，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代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第二天一早，姬鹏飞、乔冠华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还必须边叫边卖。

外国记者闻风而动，拍了他们卖小报的照片，很快，传真照片飞到纽约、巴黎、莫斯科……

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地说，这是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要公安部长谢富治立即去把他们找回来……

8 月 22 日晚上，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聚集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周围，要冲进这所英国人的外交机构。周恩来接到报告，即令陈伯达、王力赶往现场劝说，不

得制造外事事端。

陈伯达、王力对周恩来的指示推托不办，直至英国代办处付之一炬，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几乎是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也“着了火”，里面和外面的揪“刘邓陶”大军联合起来，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的夫人……

北京的局势越来越乱。要使形势得到控制，就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而周恩来又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动。他决定，把北京的有关情况告诉已在上海的毛泽东，请毛泽东定夺。

周恩来叫工作人员找来了一堆材料，其中包括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杨成武送给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有关情况。

杨成武当晚飞回上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他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看看材料，考虑考虑。”

两天后，杨成武被毛泽东的秘书请了去。毛泽东正在看书，见杨成武进屋来，他放下线装书，说：“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得很平静，甚至没有动气。看来他是真的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做了简单的准备，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毛泽东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像是想起了什么，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又记录了，给毛泽东念了一遍。

毛泽东说：“就这样。”

——结束“王关戚”的政治生命的决定，在上海的宾馆发出了。

这里还有一段小的插曲，有材料说，毛泽东在王力的“八七讲话”上批了“大大大毒草”几个字。至于王力的“八七讲话”，他自己说，他只是对外交学院的人谈了话，而且谈话的观点也是中央文革定下了的。

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讲话，有毛泽东看了这个讲话的态度，这都是事实。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正焦急地等待着南方的消息，当杨成武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并做了一个用手抓的手势之后，周恩来用右手托住下巴，凝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这三个人先后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在中国老百姓那里也许引不起什么大的波澜。但在中央文革的内部，在林彪一伙那里，则如同发生了十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下卷 182-183 页

8月25日 晨一时，找到刚由上海回京的杨成武谈话，讲了各省情况、王力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即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交给杨转送毛泽东。本日，杨成武飞上海见毛泽东。

8月26日，毛泽东二十五日听取杨成武汇报后，今日对杨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并对王力八七讲话批：”大、大、大毒草“稍后又对杨说，将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之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会上，周恩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师东兵著《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陈伯达访谈录

陈伯达说：“老实说吧，真正把关锋、王力和戚本禹送进监狱的，不是总理，更不是杨成武。他们和揪出这三个人压根就没有半点关系。王力和姚登山的谈话就没有什么记录，是他们把王力的谈话发表在红卫兵小报上了。江青看到小报后，搜集了几份并附上她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春桥。张春桥早就对王力和关锋不满

了，他曾经对我说：「关锋骄傲得很，王力和他搞在一起经常把我们搞得被动极了，应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批评批评他们。他们在学生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还挑动一些人到上海来造我们的反。这样下去可是不得了。现在王力又在打陈毅这些人的主意。现在不是搞他们的时候嘛。」张春桥把王力谈话的报纸交给了主席，并反映了关锋和王力的许多问题。反映前张春桥是报告了江青的，江青回答说：「你转告主席，我也是这样的意见。」周总理听到要整关锋和王力的消息后，吃惊地问我：「这样传到红卫兵中去会引起很大的风波呀，这两个人在造反派中是很有影响的嘛。」怎么可能是周总理让杨成武向毛泽东报告的呢。不可能！但是，批判和解决王力、关锋的会议的确是周总理主持和参加的。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任何会议对总理已经不保密了。再说，当时并没有把他们抓起来，而是叫他们请假检查。当然是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而且，当时并没有动戚本禹，一直到了第二年才动的戚本禹。现在有些纪实作品和当事人的回忆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有搞准，有的人几乎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好事都千方百计地往自己身上拉。这不好！我现在给你讲的，完全是事实，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来作保。”

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 访问：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 整理：锺志林 一度担任毛泽东「御笔」、前中央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近年深居简出。他不接见记者，不谈政事，不写往事回忆。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之父，是戚本禹的好友。前不久，陆源因公务去中国大陆，两人会见，谈及往事。谈话中陆源曾就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征询戚本禹的意见。戚本禹坚决驳斥了李志绥，并透露了许多文革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历史秘闻。 陆：前不久，台湾、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回忆录，这本书轰动海外，不知您看过没有？ 戚：看过，是友人从日本带回来的，谈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学孔夫子来个「正名」。毛泽东没有私人医生。毛泽东的医生、护士、秘书都姓「公」。李志绥原是北京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我一九五〇年进中南海时，他负责给中南海的干部、工人看病。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洋医生」，医术要比当时从解放军训练出来的土医生高，加上他看病认真负责，而且能讲出个道理来，所以大家部愿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声，并被选为工作模范。他给当时中南海的警卫局长汪东兴看病看得也不错，汪东兴喜欢他，遂被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

保健工作。开始没有名义，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前才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记得一九五八年五月叁日傍晚我到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开会时，看到他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和卫士长李银桥一起在毛泽东卧室旁的值班室值勤。毛泽东并不是「封建帝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领袖，而是个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他说回忆录「是在毛泽东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对此，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但专职是保健大夫，政治常识比较贫乏，以致在为了某种目的要攻击毛泽东的时候，只能拾人牙慧，东施效颦式地学着时髦去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这并不奇怪。什么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压迫农民、维护地主统治的世袭君主，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李志绥大概没有看过北洋军阀、日本汉奸、国民党政府是怎样用枪炮来镇压农民、工人和学生的。毛泽东正是为了同这些专制的独夫民贼作斗争，才拿起武器闹革命的。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过苏维埃红色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区民主政府，就连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等人都承认这些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管在民主建设上仍有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权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既然是通过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说它是专制独裁！虽然，那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威望，许多决定是按照他意旨通过的，但既然通过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不能说是个人的专制独裁。你可以对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违反规则提出责难，但你不能简单地把它与封建时代的皇帝独断独行等同起来。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是没有可指责之处的，但是他仍然是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探求者和力行者。他可以有一千条缺点、错误，但是终其一生，他是始终热爱着、牵挂着他的人民。毛泽东生前对英、法、美等国所奉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欣赏，他曾

对我们说过，我们宁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贝利亚式的道路。法西斯指希特勒所实行的国家社会党的专政，贝利亚指的是前苏联内务部所实行的乱抓人、乱杀人的特务统治。封建帝王是世袭的君主，但我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主席地位传给自己的夫人或儿女。尽管江青多么热中于权力，毛泽东还是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确定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的子女也没有特权，在他去世之前，他唯一尚存的儿子毛岸青是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作者，他的两个女儿大的是普通的科技干部，小的是党委机关的一个领导成员。毛泽东掌握着全中国的财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点稿费外没有分得任何财产。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封建帝王？

「曹营」的事不易办 我五十年代接触毛泽东，六十年代离开毛泽东。就与他的交往看，我不感到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领导人更缺少民主。就以李志绥讲到的「八司马」案件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即「八司马」）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当时被批判斗争了几个月的「八司马」听了毛泽东这句话，全部嚎啕大哭！就李志绥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尊重他，对他讲平等（尽管他攻击这是表面的、虚伪的），有几次错怪了他，还向他道歉。他说毛泽东向他道歉时的一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吧！」情节上绝对真实。毛泽东向自己的部下道歉时常说这句话，意思是他像曹操一样，出尔反尔，错怪了人。李志绥攻击毛泽东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个问题，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称之为「叁面红旗」的产生、发展及其成绩、错误，对它的历史批判，需要一部专著才能说清楚。愤慨和攻击，无助于历史的认知，也无补于历史的前进。当然，要求李志绥讲清楚这个问题，就他的水平和经历，也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在纠正「叁面红旗」的错误方面，毛泽东所化的力量不比他倡导「叁面红旗」来得少，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的，第一个提出要全党冷静的，第一个要底下讲真话的，第一个反对过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等等，都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对人民的苦难心酸垂泪，用不吃肉来惩处自己的也是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一个小老板，他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一碗红烧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还能怎样处罚自己呢！在毛泽东和他的党的领导下，六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经济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易）曰：「无咎者，善补过

也。」毛泽东至少是一个「善补过」者吧！在李志绥的笔下，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死人无数。这也太夸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缺点、错误，当时的天灾人祸，的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苦难，但也下像李志绥描写的那样一片漆黑，当时我、田家英，一组的林克、叶子龙以及李志绥等人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苦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都清楚，为什么要夸张其辞呢！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每年都有人口统计，这统计基本上是准确的，到文革时中国的人口已近八亿，如果大跃进、人民公社时的中国真是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么当时中国的八亿人口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许他们都是果戈里笔下的死魂灵吧，那中国今日岂不早解决了人口问题，还提倡什么计划生育呢？

文革机密抄错了 陆：李志绥回忆录的第叁篇写文化大革命，外国人认为这是文革的信史，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单纯的权力之争，以这种庸俗的见解，写不出文革的信史，历时十年、牵涉到亿万人民命运的一场运动，不可能根源于一、两个人的权力之争，虽然在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中，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斗争，又往往具体体现为它们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深远的历史根源，关于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李志绥连门槛还没有跨过。我一九六八年一月即被审查，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但我亲自参加了文革初期的历史活动，对这一段历史我比较清楚。据我的了解，李志绥在文革初期，他的工作任务只是给毛泽东、江青和一组的人看看病，他既不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在文革小组办公室担任过任何职务，他离文革风暴中心比较远，不可能了解很多文革的机密，由他来向我们提供文革的第一手史料，这是很滑稽的，依我看，他写的文革回忆录除了他亲身参与过的支左活动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据现有报刊资料和别人写的东西拼凑起来的。在拼凑时，为了哗众取宠，使人相信自己参与了核心机密，便假造现场，因此把个回忆录弄得错误百出。拿他写的文革第一件事《二月提纲》来说，他说他列席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武汉召开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是我们从他写的书中看到，这个讲话却是从关锋、艾思奇整理的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讲话原封不动地抄过来的，你既然参加了二月八日的高级会议，毛泽东在此次会议的讲话，却要从几个月以前的会议纪

录中抄袭，这岂不可笑！接着，李志绥写道：「彭真说，是不是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我马上就知道大难（彭真、陆定一的大难）要临头了，毛泽东设下圈套。」事实上，当时毛泽东、江青、康生都还不清楚彭真的意图，也没有仔细研究过《二月提纲》，毛泽东、江青还想依靠彭真打开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江青在彭真回北京前还向彭真交代她所联系的北京左派力量，要他回北京後找戚本禹、关锋、李希凡，所以彭真回北京开会时，一定要关锋、戚本禹到场。只是在北京发生压制左派的文章的事件以後，毛泽东回过头来研究《二月提纲》，才发现这是一个压制学术批判的文件，李志绥太不自量。李志绥的「推背图」不宁唯此，他还是个「叁年早知道」，就是说他早在叁年前即知道毛泽东在设圈套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其他细节上的随意编造，更是不胜枚举，如所谓中央文革的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又如所谓中央文革在一九六六年底布置打倒汪东兴等等，全是瞎扯！还有武汉事件，连前後过程都弄不清楚，就在那里乱加评论，读者只要把他的回忆同当事人写的回忆一比较，就可以看出破绽。中共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南海机关有严格的工作纪律。保健医生的职责是保护首长的健康，他不能参与党和国家的机密。不仅共产党如此，就是号称民主的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大概也不会允许一位保健医生参与他们的核心机密吧！而且，毛泽东对医生，以及对大部分喝「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总的态度可以说是「敬而远之」。这是毛的一个弱点，世上知之者颇众，这也可以帮助人们推断李志绥在中南海的地位。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却大言不惭地说，他不仅经常参与关系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会议，甚至只有少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他也可以参加，而且与毛泽东、彭真等人同席而坐，真够吓人的！事实上为毛泽东服务过的保健大夫也不只你李志绥一个人，在李志绥以前，起码也有过五、六个人，他们，包括毛泽东最信任的红军老干部、卫生部长傅连璋，没有一个人参与过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要说是医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警卫，包括他最信任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局长汪东兴这样的老党员也不能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他们都是长征干部呢！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叶子龙、汪东兴偶尔过来关照一下，也只能站在边上看一看。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中央要汪东兴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这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汪才能在後边有一个座位。一个医生、一个新党员竟可以列席中央少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与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席，「充壳子」充到这般地步，李志绥也太不谦逊了。李志绥不仅不能参加讨论党和国家机密的中央会议，就是中央的一般会议，他也没有资格参加。李志绥说他曾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调查「八司马」案件会议，还作了记录。其实这次会议参加者都是中央直属机关的领导人，其中职务最低的是我。除了林克、彭达彰（中办领导之一）有个简单会议纪要以外，没有其他纪录。李志绥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李志绥的「纪录」，大部分是根据一些传闻编制的，他说「毛说，唐顺宗时王叔文、柳宗元八个人变法图强」等等，就不对头。毛泽东当时说的二王八司马，二王是王叔文、王丕，八司马是柳宗元、刘禹锡等。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把二王、八司马混在一起，自称读过《二十四史》的李志绥连这些常识都没弄清楚就敢於代「圣人立言」，这等说起来，「小僧」真是可以「伸伸脚了」

毛泽东是有过婚外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一贯以女人为玩物」，「热中于以道家房中术御女」，他徵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几个人共一床大被，雨露均沾。这些都是事实吗？如果您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我要弄清事实，千万不要「为尊者讳」，言不由衷！

戚：毛泽东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十八年的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最後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有责任澄清事实，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其实，早在你问这些问题以前，我已向许多人解释过，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但是看过李志绥回忆录的人，大多相信李志绥的谎言和捏造，而不相信我的解释。只有一位美国医师胡定仪小姐相信我的解释。她说，戚本禹被毛泽东关押了十八年，如果有事实，他不必为毛泽东隐瞒，胡小姐唯一的保留是，也许戚本禹没有风闻过这些事，但又不大可能，因为他在毛泽东身边生活过许多年，假如真有这些事实，他却一点风闻也没有，那是难以想像的。可惜像胡小姐这样保持理性思维的人太少，许多人都是先入为主，偏听偏信李志绥，反而认为我在替毛泽东文过饰非。这真是令人叹息！善良的人是容易上当受骗的，文学家编个故事，就能赚他们的眼泪，骗他们的钱，他们怎么对付得了一个处心积虑地在那里伪造历史的人呢！我在北京解放後不久，即上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开

始任见习秘书，后来任秘书、科长、支部书记等职。顺便说一下，李志绥说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是陈伯达，他弄错了，陈伯达从来没做过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师哲以后，田家英任主任，副主任有彭达彰、何载、陈秉忱等。田家英出问题后，我接任主任，一九六六年四月政治秘书室归并中央秘书局，童小鹏任局长，我任副局长。中央政治秘书室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室，所以我在任期间，同毛泽东一组的人联系甚多。叶子龙、蒋英、徐业夫、林克、汪东兴、王敬先、李银桥、沈同、王宇清、高智、吴旭君等等，我都熟识，而且同他们的关系满不错，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任何人说过毛泽东有玩弄女人的事实。毛泽东生活朴素，根本没有什么「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事实。伟大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欲望，据我所知，许多伟大人物也同小民百姓一样犯过婚外恋的错误，尽管我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私生活限制在合乎社会要求的范围里，但我不认为这类问题是什么「糜烂透顶」的事情。所以，要是我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我就说有，可是我在任期间确实没有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所以我只能说无，我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伪证，因为在历史法庭面前做伪证，受损害的不仅是历史，而且是他本人。历史的伪证者同历史的伪造者一样，下仅丧失了现实的人格，而且有历史的遗臭。事实上，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一个人睡也不宽敞的床五十年代毛泽东住在菊香书屋背北面南叁间大房，东西两屋各叁十多平方米，由毛泽东、江青分住，中间屋二十平方米不到，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毛泽东的屋，中间放个大床，半床多书，后来毛泽东常住游泳池，屋内也是一个床，半床书。这些床一个人睡觉都不宽敞，怎么能几个人大被同眠，雨露均沾！李志绥的造谣也太离谱了！毛泽东是全国人民的领袖，威望极高，他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一点李志绥也是承认的。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吧，他也要为自己的婚外恋保守秘密，很注意维护自己形象的毛泽东却肆无忌惮地向李志绥公开自己的秘密，甚至同他讨论自己非法的性爱问题，这能是事实吗？毛泽东那么

多部、秘书，怎么他不去向别人公开自己的秘密，却偏偏要向你李志绥坦白交代呢！毛泽东的居室没有锁，也从来不上锁。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只要毛泽东没睡觉，每隔一会，就要由警卫、护士、服务员进去送文件、热毛巾、茶水、药品，毛泽东无论做什么，外边的人都知道。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是如何「以房中术御女」？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呢？

毛江之间无密议

文化大革命开始下久，我即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外出时，我是留守中南海的总管（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这个期间我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有时深夜也去，我怎么从来没有在毛泽东那裏看到李志绥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房中秘戏图呢！相反的，我倒是看见毛泽东对女同志格外尊重。包括日夜与他接触的护士吴旭君，毛泽东对之都很尊重。因为我在中南海呆的时间久，同中南海的服务员很熟悉，她们中确实有漂亮非凡的年轻姑娘，她们最愿意为毛泽东送水、送热毛巾，她们经常对我说「主席真伟大，不仅政治上伟大，生活上也很朴素」。毛泽东对她们也很尊重，有时问她们的姓名、家庭，讲几句鼓励的话。有几个姑娘也替我打扫办公厅，同我无话不谈。她们受委屈，找我申诉，有时有人对她们有非礼的言行，她们也找我申诉。她们向我反映过好几个人的非礼行为，最严重的一次是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但她们从来没向我讲过毛泽东有任何非礼行为。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事，李志绥后来也知道了，但他笔头一转竟把它硬按到毛泽东的头上了。党同伐异，尚可理解，歪曲事实，是何道理！李志绥最肮脏的造谣是说毛泽东同江青达成秘密妥协，江青允许毛乱搞女人，毛允许江青参与文革，这真是一石双鸟，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攻击了江青，但毛江妥协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绥从何得知，难道你真是爬虫族。再者，毛泽东和江青都不是简单的个人，他们的一切都在党、群众，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外政敌的监视之下，他们不可能作这样的妥协。在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上，谁也没发现毛泽东有过以党的原则来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江青虽有种种错误，但她泼辣的性格很难改变，它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连死去的杨开慧她都要死命妒嫉，怎么能想像她能在这种问题上与毛泽东达成什么秘密妥协！我以为，指毛泽东为「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认文革为「毛刘之争」，仅表明李志绥在政治观念上的无知与庸俗。作为一个留洋的医生，长期生活在一个大国的政治权力中心，纵然有千万自以为是的「灼见」，

却难启齿，一旦找到宣泄之机，长期被压抑的政治表现欲骤然爆发，便飘飘然以为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了政治评论家。得意之余，容易忘形，夸大扭曲，在所难免。对此，我觉得尚可理解。但不能容忍的，是李志绥利用自己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身分，编造毛泽东的「假隐私」，蒙骗世人。这不再是一种正常人的心理需要，而是一个道德败坏者的宣泄了。李志绥写的那些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其实是从地摊上的黄色小报上改头换面抄袭来的，不同的是除了几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如江青、张玉凤以及电影明星等，黄色小报再造不出多少女人的名字，李志绥毕竟在一组呆过多年，知道不少女机要室人员、女服务员的名字，他造谣的本钱比黄色小报大得多，他还会吹嘘自己，把自己说成是毛泽东身边的重要人物，装腔作势、藉以吓人，企图使人相信他捏造的各种谎言都是事实。曾参杀人，毛泽东玩女人，这古今两大流言，都发人深省。

陆：李志绥回忆录里有七、八处提到您，他说您是一九六六年叁月到上海帮助陈伯达、江青起草「五一六」文件，当时您是中央办公厅新任秘书长？在一九六七年由毛泽东下令被捕。他还为您辩护呢，说您是「替罪羊」。

戚：我不需要李志绥的辩护。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但李志绥关于我的回忆也是根据不负责任的所谓「纪实文学」抄写的。一九六六年叁月我是《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不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任局长是後来的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仍在中央文革工作，没有被逮捕。别人可以现抄现卖，你李志绥在中南海生活过，「八司马」事件中曾支持过我和林克，并经常同我们打交道，可以说也是我的朋友，怎么可以乱抄乱写呢！

早谋刘少奇太离奇

陆：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毛泽东当时对他不错，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回忆录呢？

戚：我听一位从外面探亲回来的友人说，李志绥的回忆录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後来出版社以重金提出了要求，才改成这个样子的。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这本书同其他根据政治需要而编制的反对共产主

义的小册子一样，不过是某种政治目的产物，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叁十块银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太。但是我不满足於简单地把李志绥刻划为一个卑鄙的犹太。他从来就不是耶稣真正的门徒。他是封建帝王御医的後裔，後来是一个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意识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由职业者。共产主义意识对他格格不入的，他的回国决定是他人主道路上的一个迷误。这个决定同他的人生理念、价值取向以及世界观体系完全相反。当然，这些分析是我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而作出的判断，李志绥本人不可能对自己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在哲学思想上，他很浅薄、极其浅薄，正如我的医学知识比起他也很浅薄一样。把这样一个角色装扮成「内幕知情人」，让他故作神秘地凑在人们耳边大声嚷嚷「隐私秘闻」，实在很可笑。不能说李志绥的回忆录没写一点事实，不，他写了些事实，特别是一些他直接经历的又与他的创作意图不冲突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写得满好，满真实。例如毛泽东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在毛泽东身边秘密安置窃听器的事件，毛泽东对击水长江与奋搏海浪的执拗，还有他对江青、汪东兴等人品格、作风的某些描写等等，它们不仅整体就连情节也是真实的。但是只要涉及政治性的报导或分析，他就转向了，历史真实与他的政治取向竟成了互不相容的冤家对头。即使是生活性的事情，只要与政治结了缘，他的笔也会产生扭曲。例如他说毛泽东早在六十年代初即企图取消刘少奇的保健，让刘少奇死於疾病，这个谣言就造得太离奇了！李志绥说他的回忆录是中国「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志绥的回忆录在海外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普通的平民百姓却自发地掀起了空前的「红太阳热」。成千上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昨天上山下乡的年轻人，虔诚地怀念他们逝世多年的领袖，一遍一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

抄袭别人见品格 被李志绥认为遭受毛泽东「涂炭」的干百万「生灵」，在没有任何舆论导向、没有任何组织指令的情况下，掀起了遍及神州大地的「红太阳热」。李志绥对这个现象作何解释呢？李志绥在序言中很得意他创制的种种谎言，但这些谎言对中国人民已无新鲜感！在此以前，各种攻击毛泽东的出版物早已风靡过一阵子了。李志绥的书就同林青山写的《江青的机要秘书》一书非常雷同，不仅雷同，而且有前书抄袭後者的痕迹，不同的是林青山没有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他无法编造自己的「亲身经历」，只好假冒戚本禹、阎长贵的口吻来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戚本禹本人看了此书非常愤怒，郑重地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诉，

但北京市人民法院对我的控诉置之不理。林青山的谎言被戚本禹、阎长贵揭穿後没人相信了，可李志绥不同，他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谁能想像他与谎言制造者林青山竟是一流的人呢！李志绥不仅攻击毛泽东，除了彭德怀等个别人，他是大观园里没好人。就连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周恩来也是毛泽东的「奴隶」「忠犬」，他深感「憎恶」，而且他还亲眼看到周恩来跪在毛泽东面前报告工作，哎呀呀！我几十次地看到毛泽东同周恩来在一起商谈国家大事，怎么一次也没能看到此情此景，为什么好事情全部给李志绥一个人看去了！又，邓颖超是「泥鳅样的人物」「极端自私自利」，他深感「厌恶」，其他人更不必说了，上上下下都腐败透顶……李志绥攻击的仅仅是毛泽东吗？

〔原文注：本记录发表前未经戚本禹看过，文责由整理者自负——钟志林〕
（摘录自《明报月刊》96年六月号）

戚本禹沉浮录（霞 飞）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干了不少坏事，因此，在1967年8月和1968年初中央先后处理他们之后，“王、关、戚事件”便在历史上记下了一笔。但是，对“王、关、戚”这种排列法，关锋却不赞成。关锋说过：“王、关、戚”实际上应该是“戚、王、关”。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有一个事实似乎印证了关锋说的这个话：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重新审理“王、关、戚”一案时，对王力和关锋没有判刑，而对戚本禹却判了18年有期徒刑。

少年得志，受到毛泽东赏识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市，1931年生。父母早年去上海谋生，戚本禹也就出生于上海。解放前，父母供他在上海读了小学、中学，直至高中。读高中时，戚本禹很用功。受党的地下组织的影响，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1949年，戚本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不久，戚本禹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很好。他学习刻苦，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工作认真，受到过多次

表扬。因为他文笔很好，在中央团校学习结束后，他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他当自己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工作。后来，田家英又推荐他去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任科长，行政上是 18 级。

1958 年，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八司马事件”，这件事让毛泽东记住了戚本禹。那年 3 月，就全国来说，反右运动已进入尾声，但中南海的中央机关整风因按计划排在后面，到此时才开始。在中央政治秘书室开始整风时，林克、戚本禹等 8 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因为当时反右运动已经明朗化了，他们就借反右运动批判这 8 个年轻干部，说他们“反党”。中南海的干部中竟然出了“反党分子”，这在中央机关里是件大事。后来，有人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在成都开会的毛泽东，毛泽东为 8 个年轻干部说了话。毛泽东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 8 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毛泽东此言一出，马上解救了戚本禹等 8 个年轻干部，也使这 8 个年轻干部从心里感激毛泽东。1962 年，戚本禹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又一次挨整。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偶然遇上了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直言了自己受到的冤枉。毛泽东一听“戚本禹”3 个字，便记起了他是卷进“八司马事件”的人。戚反映的事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毛责令田家英细查。经查，戚本禹确实是冤枉的。

在中南海工作的戚本禹，知道毛泽东爱读历史书，就向毛泽东学习，留心去读历史方面的书籍。一来二去，他对研究历史产生了兴趣。

在诸多历史课题中，戚本禹对中国近代史更感兴趣。他利用业余时间，下了很大工夫，读近代史方面的书，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对这些观点，他也试着写一些文章，投给一些学术刊物或者报纸。1963 年，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 年第 4 期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

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李秀成扣了不少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在史学界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不同意他的观点，戚本禹就与罗展开了论战。这样，史学界的讨论风气更浓了。一开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来自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在社会上也受到很大压力。正当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16个字否定李秀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历史学界的风向一下子就转了过去，出现了一大批否定李秀成、赞成戚本禹观点的文章。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和有地位的理论骨干担任，戚本禹能成为历史组的组长，在当时已经非同一般了。

1965年底，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愿望，已经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此时，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秘密酝酿，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这篇署名姚文元文章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借评《海瑞罢官》比喻当时的现实政治，直接点出了自60年代初以来中央高层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并没有积极响应，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正当此时，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并且确实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上发表。文章的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同时，文章中也提到了一些现实政治斗争问题，隐晦地指出了中央高层中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起到了相互配合的作用。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

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泽东还点名批判了吴晗和翦伯赞，他说：“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们批判吴晗和翦伯赞，政治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发表讨刘“檄文”

田家英本是毛泽东的秘书，也是最早赏识并提拔戚本禹的人。在中南海，田家英不仅呵护着戚本禹，还经常在毛泽东面前替戚本禹说好话。可以说，戚本禹能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是与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为他说好话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却取代了田家英。

“文革”发动前夕，田家英因在批判彭德怀、包产到户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决定，不让田家英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又隔了几个月，田家英的问题被“升级”。1966年5月22日下午，中央的几位干部与戚本禹一同来到田家英的家里，代表中央向田家英宣布了两条：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党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这样，戚本禹正式取代了田家英的位置，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枢要大权。不久，戚本禹又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在中南海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戚本禹作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各地的党政干部都意识到，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意见，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更加趾高气扬，每日昂首阔步前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大员，他都不放在眼里。连当时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也描写了戚本禹当时的傲慢情形，他写道：“到了钓鱼台16号楼，我找到了戚本禹。我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给了他，并转达

了林彪请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兴。他可能是午休后刚起床，也可能是三伏天天气太热，只穿着背心和裤衩，坐在电风扇前看着林彪的信。他有个绰号叫“戚大帅”，加上他看信过程中接了一次电话，口气十分生硬，这就更给我以此人粗鲁的印象。”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戚本禹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他从此进入了“中央首长”之列。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是要批判刘少奇的，但并没想打倒刘少奇。然而，戚本禹因掌管中央秘书室，曾看到过毛泽东两次批判《清宫秘史》的谈话记录：一次是毛泽东1954年10月说过的《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影片，不是爱国主义影片；另一次是毛泽东在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五人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提到：“《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因此，戚本禹决定，就从批判《清宫秘史》入手，发出讨刘“檄文”，打出一个政治信号，鼓动全党、全国人民打倒刘少奇。

1966年底至1967年初，戚本禹在工作之余开始动手写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3月底，他的这篇文章脱稿。在送去发表之前，他先把文稿的内容捅给了北京的一份红卫兵小报。这份红卫兵小报闻风而动，立即在报纸上提出：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自封为“红色买办”。3月31日，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播出，接着在《红旗》杂志第5期上发表。出自戚本禹之手的这篇讨刘“檄文”，终于发出了。

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首先回顾了1950年陆定一、周扬等人与江青在评价《清宫秘史》时的意见分歧，此举意在点明：两种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着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当前政治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写道：“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重大原则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认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

的代理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帝国主义买办”。戚本禹在文章中给刘少奇罗列了八大罪状，并一连用了八个“为什么”来对刘少奇兴师问罪。戚本禹在文章中还针对刘少奇断言：“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开了一个不点名却不点自明的方法恶毒攻击、陷害老干部的先例。

紧接着，在戚本禹的鼓动下，中南海一个造反派组织冲进刘少奇家里，揪斗了刘少奇夫妇。刘少奇对造反派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抗议，对他们的诬蔑进行了批驳，但却受到拳打脚踢。由戚本禹指挥的这次事件，开了直接侵犯共和国主席人权的先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戚本禹指挥下，造反派也揪斗了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在揪斗中，也有武斗行为。在中南海的外边，戚本禹鼓动大批红卫兵围困中南海。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揪出刘少奇决不收兵。

戚本禹在把眼睛盯上了中南海的同时，竟然忘乎所以地又瞄上了老革命家朱德。他们鼓动中南海造反派闯进朱德的家里，贴大字报，并且要求朱德“滚出中南海”。朱德听说造反派冲到家来了，便从玉泉山赶了回来。他看到造反派贴的大字报、大标语后，气愤地说：除了“朱德”两个字，剩下的全是一派胡言！戚本禹在那一段时间里，鼓动红卫兵大闹中南海，确实搞得太过分了。他犯了众怒。

周恩来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决定动用人民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稳定一下混乱的局势。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鼓动造反派搞乱全国之后，又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各地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事件，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但他们并没有收敛，又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最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的积极鼓动者之一，更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

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1967年8月26日，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经过慎重考虑，下决心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但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一下。因此，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决定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不但没有动戚本禹，而且在钓鱼台开会宣布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时，还让戚本禹发了言。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并称为“小三”。之所以将他们并称为“小三”，不只是因为三个人在一起干了不少坏事，而且因为他们三个人关系很好。王力、关锋都比戚本禹年长，因此，戚本禹常称王力、关锋二人为兄长。现在，两个兄长倒了一双，戚本禹自然也心惊肉跳。虽然他在解决王力、关锋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王力、关锋，但他心中有数：离自己垮台的日子也不远了。

但是，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的。

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他在批判王力、关锋时，把王力、关锋称为野心家，并把他们三个人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指挥下一起干的不少坏事，都往王力、关锋二人身上推。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目的是通过积极揭发批判王力、关锋二人，好好表现自己，以求自保。

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负有更大责任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在毛泽东8月26日的谈话传下来后，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他们给“王、关、戚”扣上了“变色龙”、“小爬虫”的帽子。他们也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戚本禹明白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毛泽东求救。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先批判了王力、关锋一顿，说王力、关锋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接着，戚本禹自我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从这封信中明显可以看出，戚本禹还是想把问题往王力和关锋身上推，对自己则只说没有看出来王、

关是坏人，要负部分责任。

毛泽东看了戚本禹的这封信后，于 9 月 7 日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事实上，在抓了王力、关锋之后，毛泽东此时已对戚本禹的表现极为不满。而对戚本禹更为不利的是：当红卫兵知道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满意时，立即把矛头指向了尚未被揪出的戚本禹。1967年12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大标语：“戚本禹算老儿！”“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此前，红卫兵小报对王力和关锋进行批判时，就已经涉及了戚本禹。现在，红卫兵小报对王、关批够了，开始集中火力批戚本禹了。

1967年12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出，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在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不满5个月的时间里，戚本禹也被“端”了出来。

被“请假检讨”之后的戚本禹

戚本禹被“请假检讨”后，就没有王力、关锋那么幸运了。王力、关锋刚刚被“请假检讨”时，先是在钓鱼台2号楼被分别关押，后又转到西山的别墅分别关押。在这段时间里，王力、关锋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后来，他们被送到秦城监狱，条件就差多了。而戚本禹在“请假检讨”后，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因此，戚本禹并没有得到与王力、关锋刚刚“请假检讨”时一样的待遇。他被送到秦城监狱后，待遇一开始就不算好。关押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监狱方面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只是到了后来，才慢慢地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之后，人们又想起了“王、关、戚”。在重新审理“王、关、戚”时，王力和关锋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于起诉。而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他的党籍，还决定将他起诉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

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 42 号”起诉书中列举了戚本禹的罪行，主要是：1966 年 6 月 16 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信中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 12 月 26 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支持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1967 年 1 月 12 日，在钓鱼台 16 号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煽动下，当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1967 年 7 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7 月 18 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 300 余人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戚本禹的刑期，从 1968 年初算起，到 1986 年初正好是 18 年。1986 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戚本禹被剥夺 4 年政治权利，则要到 1990 年初为止。戚本禹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做一点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楼里。在那里，他每天房门紧闭，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写作。据去过戚本禹办公室采访他的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记述：1988 年他去采访戚本禹时，戚本禹还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访时，神态自若，头发乌黑，很随便地蓬松着。他肥瘦适中，身体不错，谈话时无拘无束。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各种书报他都看，尤

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还说：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这句话，是颇为意味深长的。

《党史博览》2005.7

关锋沉浮录（霞 飞）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个人叫关锋：一个是在西安事变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关锋，此人本名贾拓夫，做党的秘密工作时，化名关锋，是共产党的老资格的革命家，已于1967年去世。另一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关锋，此人在“文革”时期与王力、戚本禹被人并称为“王、关、戚”。本文记述的，是后一个关锋的沉浮人生。

得到康生赏识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庆云县。

关锋出生在贫苦人家。由于是独子，他父母尽管生活艰难，仍然克服困难送他去读书，并且一直供他读到了中学。中学时，关锋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接触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1933年，刚刚14岁的关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关锋，工作积极努力，对上级党组织的精神理解较快、较深，贯彻得力，又肯动脑子，有一定创造性。1938年，19岁的关锋就担任了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1939年，即20岁那一年改名为关锋。

关锋读过书，有文化，喜欢写作，组织能力也很强，又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了历练，成绩也很突出，因此受到党组织的重视。1944年，关锋被调往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任教育科长。1947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

关锋被调到中共山东分局工作后，正好康生也被调到山东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闲暇时间，康生除了读古书，鉴赏古玩，写毛笔字外，就是出门找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与他有同样读书爱好的干部聊一聊。

在寻找这样的谈话对象时，康生发现了时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的关锋。一来二去，康生开始对关锋由好感到赏识，觉得关锋是个有才干的干部。

那时的康生，虽然因土改中的极“左”做法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但他毕竟还有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的职务，他向党组织提出的提拔干部的建议，还是很受重视的，而康生对于他所赏识的干部也是极力向组织上推荐、提拔的，加上那时关锋确实表现得很好，工作努力，有成绩，又有文化。因此，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关锋在党内的职务也就逐渐提升起来了。

1950年，关锋担任了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处处长。1952年，关锋又调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

1955年，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

~{当时，中央高级党校在北京，就是在现在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负责培养党的省部级干部（也有一部分担任关键部门领导职务的司局级干部）。中央党校在各大区则设立中级党校，中级党校负责培养司局级的领导干部（也有一部分担任关键职务的正处级领导干部）。中央党校在山东省设立中级党校，是因为山东省委是在原来山东分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培养干部的任务很重。当时，校长是老革命家夏征农。关锋能担任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的副校长，地位和职务分量都是很重的。更重要的是，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的位置，给关锋进一步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平台。

在中央党校山东第四中级党校，关锋不仅讲课，还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文章写得好，文笔较为活泼，不光是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写得有深度。

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康生分管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工作，也管文教方面的事，有了一定的权力。此时，关锋因小有名气，加上康生和中央的一些“秀才”的推荐，使他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来，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既是中央的智囊班子，又是中央的笔杆子。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都是理论造诣较深，又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大人物，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

在反右派运动中当上了“左派新秀”

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反击右派的政治运动。

反右运动开始时，正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关锋，自然对反右派运动的发动和发展情况十分了解，也更清楚毛泽东当时的思路变化历程。

在日常工作中，关锋很注意右派的言论和动向，搜集、整理出了右派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材料，及时上报给中央领导人参阅。但这仅仅是关锋当时工作的一部分。关锋工作中更重要的一部分，是在研究、分析右派言论的基础上撰写反击右派的文章。那个时候，关锋是很用功的，也很用心。他每天阅读大量的报纸、杂志，从中发现右派的言论，并对这些言论进行分析、整理，探寻其政治意向，然后有针对性地阅读马列的书、毛泽东的书，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材料，拟定写作的题目和提纲，再关起门来下工夫写作。写出文章后，关锋主要投给《中国青年报》，在那上面公开发表。那时，《中国青年报》既是关锋批驳右派言论的主要阵地，也是展现他理论水平和文采的主要平台。在关锋批驳右派的文章中，有一篇分量最重，就是1957年8月2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面的《驳所谓“一切领导阶级都有局限性”》一文。这篇文章，从历史的、理论的高度，分析了无产阶级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政党的必然性，是反击右派的文章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文章。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有几个人是经常发表“重头文章”的。在上海，姚文元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文章。他写的《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等文章，很有影响力。在北方，王力也以《中国青年报》为阵地，经常发表反击右派言论的文章。同时，关锋也在《中国青年报》上经常发表文章反击右派。这样，南有姚文元，北有王力、关锋。关锋与姚文元、王力一起，一时成了“左派新秀”。成为“左派新秀”的关锋，也被正式调入中央工作。

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关锋对他所干的这个工作是十分认真的。他编此刊时，搞的材料、写的文章，分析问题深入浅出，笔法也活，深受毛泽东的重视。主管《红旗》杂志的陈伯达，也对关锋十分赏识，有意提拔他。不久，关锋被任命为《红旗》杂志的编委。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中央一些高级别、理论水平较高的人才能担任此职，编委主任是邓小平兼任的，而陈伯达

也是《红旗》杂志的编委负责人之一。

急忙响应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关锋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他 1958 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在《红旗》杂志期间，不光是编《思想理论动态》，关锋还深入研究了中国哲学史。1958 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毛泽东在阅读《光明日报》时，看到了这篇文章，对关锋的观点十分满意，大加赞赏，还提笔在这篇文章的旁边写了一段批语。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在党内传达下去后，关锋的名字也被党的高层干部们记住了，党的思想理论界对关锋也更加注意了。

接着，关锋趁势而上，批起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杨献珍是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在给党校学员讲课时，讲了“合二而一”也是辩证法的另一种表述的观点。对这一观点，毛泽东不赞成。关锋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后，开始撰写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在文章中，关锋认为，杨献珍的观点，是否定对立统一规律，在政治上则是否定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关锋的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当时思想的，因此，毛泽东更增加了对关锋的好感。

在发表文章时，关锋经常用“庆云”、“何明”的笔名。他用何明的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杂文较多。由于这些杂文笔锋尖锐，引人注目。1962 年，有好事者把关锋的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告关锋（以“何明”的笔名）发表的杂文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看了告状者送来的署名“何明”的杂文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毛泽东的这句话，使关锋身价倍增，从此，包括那些中央重要干部在内，都对关锋刮目相看。

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支持下，由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长时间酝酿、修改而成的。这篇文章不是学术性的，而是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提到了当时中央高层的政见分歧，已经包含了要在当时的中央内部揪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内涵。

姚文元在文章中实际上点明了两点：第一点，当前党内正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第二点，中央里面有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要掌权、执政。

这两点无疑给了人们一个明确的信号：要搞大的政治运动打倒中央的修正主义者。“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围绕着对待这篇文章中所点明的观点的不同看法而爆发的，因此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但是，姚文元这篇文章虽然包含了现实政治的针对性，却又是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名义出现的，因此，当时读过这篇文章的人，有的看出了文章中包含的很强的现实政治性，有的则没有看出来，只把这篇文章当做学术文章来看待。

一向对政治十分敏感的关锋，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初，竟然没有看出文章中所包含的深刻的现实政治性。那时，他是把这篇文章当做学术文章来读的。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文汇报》驻北京的记者为了寻求北京的“左派理论家”的支持，特意找到了关锋，请他谈谈“读后感”。关锋就学术方面的认识谈了一番话，《文汇报》的记者大失所望。关锋为什么没有认识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的现实政治性？这恐怕与关锋在中央工作、一向通过了解“重头文章”产生的内部情况来推断文章的“政治来头”有关。他形成了这样的思维习惯后，一时难以改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毕竟是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搞出来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不久，围绕此文的争论在中央上层和学术界同时展开，关于此文产生的内幕也逐渐清晰，关锋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了这篇文章的“来头”之后，他立即紧紧跟上，不仅在讨论中公开表态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而且对姚文元的观点加以强调和发挥。在整理的有关材料中，对姚文元的文章大加赞扬。关锋的态度和整理的材料，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个中央的理论家、大笔杆子谈话，在参加这次谈话的人员名单中，关锋的名字也列入了其中，与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并列在了一起。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明确肯定了姚文元的文章，也肯定了戚本禹响应姚文元文章而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这次谈话，艾思奇、关锋负责记录。关锋首次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大笔杆子的谈话，自然受宠若惊，记录很努力，几乎一字不落地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记了下来。在参加这次谈话和记录毛泽东讲话内容的过程中，关锋对毛泽东的观点了解得更清楚了。此后，关锋所写的一篇篇响应姚文元的文章、内部材料便陆续产生了。这更使毛泽东重视关锋了。不久，关锋便被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

一六通知》——笔者注)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

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五一六通知》中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可见，当时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的机构，代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同时，它又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关，权力是很大的。那个时候，中央下发文件，常常是这样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是：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都这样称呼他。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关锋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首先是毛泽东对他的关注。过去，毛泽东就很赏识关锋写的文章，在发动“文化大革命”阶段，关锋又成了积极拥护并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左派”。因此，他受到毛泽东的关注是必然的。

关锋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跟得紧。1966年5月8日，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指责《北京日报》4月16日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关锋发表这篇文章，正好是毛泽东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批判北京市委的时候，关锋的文章，对毛泽东起到了配合作用。

关锋能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的赏识。关锋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社工作期间，由于工作关系，同陈伯达接触较多。关锋对陈伯达表示了足够的尊敬，而陈伯达对关锋的理论素养和写作能力也十分欣赏。康生在历史上就与关锋有上下级的关系，更是替关锋说好话，多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到并推荐关锋。而江青在筹划《评新编历史剧〈海

瑞罢官》一文之后，看到关锋积极配合与支持这篇文章的发表，因而对关锋很有好感。有这些人的抬举，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后，一方面出去搞“调研”，与红卫兵接触，发表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讲话、谈话，鼓动红卫兵造反；另一方面，也写一些文章和内部调研报告。由于关锋实在“太忙”了，抽不出时间来写文章了，更谈不上仔细修改文章了，因此，他在这一时期写的文章和调研报告中，真正有分量的不多。

但是，关锋以其多年政治经验和在中央工作养成的习惯，对政治形势十分敏感，经常深入分析。这种习惯，使他在关键时候走了关键的一步棋——给江青写了一封关键的信。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中央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犯了严重错误，甚至说他是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但毛泽东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把他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没有把同刘少奇的矛盾看成是路线斗争。而关锋却对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分歧下了一番工夫进行分析，对这一矛盾性质进行了概括，认定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路线斗争。认定这一点后，他经过一番思索、酝酿，于1966年7月24日提笔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关锋在信中说：“我认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出现了一个逆流”。信中还说：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

江青接到关锋的这封信后，十分重视，马上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十分赞成关锋的观点，并把关锋这封信转给了林彪看。林彪看后，也十分赞赏关锋的“眼力”。毛泽东决定，把关锋的这封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会文件印发。这封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这封信的启示，这次会议把刘少奇、邓小平作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同时，这封信也是促使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因素之一。此后，毛泽东把与刘少奇的斗争，看成了路线斗争。

关锋的这封信，不光对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他本人的一生来说，也有重要影响。自从关锋写了那封信后，毛泽东对他更加重视

了。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举行家宴所请的人中，关锋名列其中。关锋的信被毛泽东重视并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下发后，作为中央二号人物的林彪也开始重视关锋了。林彪派叶群去找关锋，问了关锋家里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从此，关锋与林彪也有了“直线联系”。林彪还点名让关锋管《解放军报》，还提名让关锋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那时，政治上比较机灵的关锋，已经看出了林彪与江青之间有裂痕，因此，他想两边讨好。每当林彪要见他时，他总是拉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一两个人同去，他怕单独去会使江青产生猜疑。这一手果然很灵，那时，林彪和江青虽然勾心斗角，但对关锋都十分信任。

“文化大革命”中的活跃分子

毛泽东的信任、林彪的信任、江青的信任，使关锋觉得自己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放手大干一场、“立新功”了，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关锋是一个十分积极、十分活跃的人物。他经常到红卫兵组织中去，到各造反派组织中去，发表谈话，鼓动红卫兵组织和各造反派组织造反。对于中央的一些干部，关锋的指责往往就是他们被打倒的信号。他和王力、戚本禹一起，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的骨干分子。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成了制造动乱的指挥者。他们三人并称为“王、关、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时，人们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陈伯达、康生、江青并称为“大三”，把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活跃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并称为“小三”。

在揪斗彭德怀问题上，关锋起了作用。早在1966年4月12日，关锋就和戚本禹一起，在给中央写的一个材料中提到：对于让彭德怀去三线当副总指挥，我们“思想上有保留”，“反对这样处理”。6月16日，关锋和戚本禹又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关锋和戚本禹的这封信，很快就在红卫兵组织中传开了。“中央首长”的这封信，成了红卫兵把彭德怀从三线揪回北京进行批斗、乃至武斗的口实。彭德怀从三线被揪回来后，身心受到巨大伤害，最后不幸患病，含冤去世。

在“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是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冲击住在中南海里的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些老干部的鼓动者之一，而对于这些冲击行为，关锋则是积极支持者。

关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之一，还有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主持起草含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红旗》八一社论。这件事，也使他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管《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就在全中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一口号的提出，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各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就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泽东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1967年7月22日，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提出，也是引发武汉“七二〇”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进行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对一些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了。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在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此时，康生于1967年7月25日在审定新华社电讯稿时再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同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发表的声讨陈再道等人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对于这些，关锋是赞同和支持的。7月底，关锋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在起草过程中，关锋强调要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这篇社论提出：“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篇社论经陈伯达签

发，在《红旗》杂志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先是引起了林彪的不满。但林彪在当时的表态是很含蓄的，他没有直接提这篇社论，而是在8月9日接见曾思玉、刘丰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林彪在这次讲话中，不仅没有提“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反而说了上面这样一段话，很明显，林彪对这篇社论是持不同看法的。

接着，这篇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的做法不能容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也推不掉责任。

推不掉怎么办？那就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8月11日至12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及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20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组织下，《红旗》杂志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的社论，重提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中央文革小组实施这些转变时，他是参与者。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此时转变，已经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周恩来让关锋“请假检讨”

毛泽东对“王、关、戚”产生不满后，本想再观察观察，考虑考虑。但是，王力在8月7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人时，发表了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

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即著名的“王八七讲话”）。在他这个讲话的鼓动下，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部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周恩来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还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后，于8月26日上午做出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请周恩来把王力、关锋抓起来，而对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

关锋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那里条件很好，他和王力原来的生活待遇没有变。他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报纸，还被允许听收音机，但不能自由活动。这样，他实际上仍然能够知道外界的政治动向。在2号楼，他在规定的范围内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1967年10月，中央派陈伯达找关锋谈话，除了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关锋和王力都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关锋的生活待遇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此时关锋的生活还算是平静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条件就差多了。不光是住得差，吃得也很差。这让关锋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感觉：自己的问题升格了。不久，他的党籍被开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关锋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他被放了出来。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于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的宿舍里，与

妻子、孩子共同生活。

由于关锋仍有公民权，也就有写作和发表文章、署名的权利，因此，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开讲，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那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都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晚年的关锋，生活和心理都平静了下来。他说过，自己晚年只有三大爱好：看古书、看电视、练气功，其他什么事情都不想了。穿着还是老一套：戴个干部帽，穿着中山装，不抽烟，不喝酒，每天三顿平常的饭菜，接着就是埋头于研究老子、庄子、孔子。他的兴趣很广泛，甲骨文、哲学史、电脑，都懂一些。每天一大早，关锋的身影就会出现在他家附近的公园里，混在一帮练功的人群中，和大家一起一招一式地认真地练着。

《党史博览》2005.

王力就陈伯达问题上书中共中央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

一九八〇年，尚在狱中的王力开始有了纸和笔，便给中共中央写信，这是其中的一封。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判刑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革命”，坏事不会少，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一．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的一天拂晓前，陈伯达找我，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还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呀！”他同我商量怎么办？商定由他约请彭真、陶铸同志一起去告知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向毛主席当面检讨，这样，我国人民这场大灾难

推迟了。

二.《历史决议》(引者注:指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列举《五·一六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初稿中完全没有。而且,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也是后来康生要加上的,那时彭真同志正在钓鱼台八楼。

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林彪讲话后,毛主席要陈伯达讲话。那次讲话,陈伯达就说他不过是刘盆子(王力原注:前汉亡后,一个放羊的,因为是宗室,被抬出来当皇帝的。)意思很清楚,他说他不过是傀儡而已,文革小组是江青当家。

四.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讲话,突然打倒了陶铸同志,应负有严重罪责。但是那次会议确实是江青组织的,临开会前他还不知道,毛主席批评他以后,他先后同关锋,康生,总理谈话,诉述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表示要自杀,他也多次向我表示要自杀,并已查过列宁的文章,以拉法格为例,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五.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张春桥在上海提出夺权口号传到北京,陈伯达在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讲话,提出上海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自下而上只应监督,不应夺权。(王力原注:一九六六年六月陈伯达就提出夺权,那还是根据一九六四年中央在四清中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的指示,实际上只是改组。)当天,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肯定了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的口号和做法,陈伯达才改变了。

六.一九六七年二,三月间,毛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散会时,要所有人都立即去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人人要讲话。陈伯达说今天有事不能去,毛主席大怒,对着陈伯达和大家说:“不愿干的人,给我统统滚!”这是我所经历的毛主席说的一句最无原则性的话,令人痛心,这次会议,现在党的领导人剑英,先念同志在场。

七.(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我同关锋同志关在一起时,他告诉我:(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是针对陈伯达的,因为陈伯达在前一天提出,要收缴各个群众组织的武器。

八. 十大政治报告提到，陈伯达原来起草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主张今后以生产为中心。（林彪决不会参加起草）。毛主席反对以后，才重新起草了后来的政治报告，尽管陈伯达绝不会象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鲜明，但是。如果经过查对确实是那样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陈伯达还有可取之处。

摘自叶永烈：《中共神秘掌权者》，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王平权就“王力事件”致人民、光明、文汇等报函

（王平权为王力之妻）

王力同志在中央文革只待了一年零两个月，那时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都还没有形成，所以王力不属于这两个集团中的任何一个。当时中央文革的工作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也经常参加和主持中央文革的会议，王力参加起草的一些文件和文章，都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起草的，经过毛主席，周总理审阅修改后批准发表的。《五一六通知》中的黑体字，都是毛主席亲自加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党内军内一小撮”，“全面夺权”，“越乱越好”，“所有干部都要放到火里烧一烧”等口号，都不是王力提出和发明的。当时有一个和中央文革平行的“中央专案组”，江青宣布，除王力一个人外，中央文革其他成员全都参加这个专案组，所以这个专案组所作的迫害老干部等坏事，没有王力的份。王力一九六七年八月底就被关起来了，那时大规模武斗还没有开始。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主席提出“武装左派”以后，才由部队发枪，建立所谓“第二武装”，到一九六八年，武斗规模才越来越大，成为真枪实炮的武斗，那时王力已经早就被关起来了。总之，王力不等于中央文革，王力不等于中央专案组，王力所参加的一段，只是文革初期中的初期，不能把中央文革的账，中央专案组的账，文革中后期的账，都算在王力头上。

在王力同志参加中央文革的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王力起了什么作用呢？总的来说，王力同志是相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不论从思想上讲，从组织纪律上讲，他都不能超出这个框框。但是对某些具体事件，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也尽其所能作了些应作的事。如，

对打倒刘邓陶的口号，他是有保留的。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就要打到刘

少奇，王力建议陈伯达约彭真和陶铸一起，去告诉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作检讨，这才把整刘推迟了一年半。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王力在武汉向毛主席提出，不同意提“打倒刘邓陶”的口号。王力兼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的几个内，坚持按常委名单发文件，即也要发给刘、邓，江青为此撤消了王力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江青动员王力在批邓会上发言，王力一言未发。王多次提醒主席：你不是说刘邓要有区别吗？主席也对王力谈了许多对邓小平的好话，主席说打倒刘邓只是打倒一两年，以后邓还要留在常委会，刘还要留在中央委员会，林彪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出来。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毛主席的预料。一九六七年七月毛主席在武汉对王力说他不同意对刘邓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王力把主席的话整理出来，送给江青等传阅，后来中南海揪斗刘邓陶夫妇，王力又把主席那段话抄下来送戚本禹和江青，江青很恼火。

关于所谓“二月逆流”：在怀仁堂会议上王力是同意老前辈的意见的，他在会上没有发言，后来周总理要他整理一个怀仁堂会议的记录，他整理后在会上读了，大家都没有意见，认为合乎事实。王力还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一些谈话写了一篇《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周总理亲自在会上宣读，陈老总拉住王力的手说：“写得好极了，要是这样作，大家都没有意见了。”陈伯达要写一篇《坚决反击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社论，王力拒绝写，后来毛主席肯定王力的看法是对的。林彪、江青、张春桥在怀仁堂事件中进行了一连串不正常的活动，王力在秦城时加以揭发，专案组不让揭发，说“二月逆流”是写进九大报告的，不能揭发，王力还是坚持揭发了。

关于七·二〇武汉事件：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是中央在北京定的，“四项指示”是周总理代表中央向武汉传达的，王力既未参与制定也未传达这个方针。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武汉，亲自处理武汉问题。“百万雄师”揪斗王力，按毛主席的话说，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对武汉问题的方针。”陈再道的回忆录也承认，王力是作了替罪羊。七·二〇以后，王力反对在机场举行盛大欢迎，反对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反对拍电影，反对全国游行。可是江青说：“这不是为了你王力，是为了毛主席。”那王力当然就只好说什么了。王力再三提出要防止连锁反应，防止引起冲击军队的风潮。在京西宾馆斗争陈再道，王力这个当事人一言未发，并且递了条子，反对叫他们弯腰。周总理在会上说，“王力是

处处捍卫军队的。”可是江青等后来却造谣说王力“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其实正是江青，康生等自己把军队搞乱了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康生接见学生时攻击北京卫戍区，从而引起“打倒李钟奇”的风潮，王力当时就递了条子，说不能把北京的军队搞乱。第二天即四月四日周总理让王力再作一次讲话，加以补救。究竟是谁“毁我长城”，于此可见一斑。

关于所谓“八·七讲话”：有的文章说王力跑到外语学院发表了“八·七讲话”，这是谎言。事实上八月七日王力并没有发表一个讲话，只是在钓鱼台病床上听取外交部姚登山等人汇报时，作了一些插话，他们把这些插话串起来成为所谓“八·七讲话”，未经本人审阅。有许多重要的话没有整理进去，如王力说，“不管什么群众组织，只要是反对总理的，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线。”又如姚登山等人说：“我们打倒陈毅，并不是真打倒，只是给他加点压力，什么时候毛主席党中央要保陈毅，我们立即拥护。”王力说：“不是真打倒，这我就放心了，要报告总理，让总理放心。”这些话都没有整理进去。中央文革曾经要王力“照顾一下外交部的运动”，王力坚决拒绝。在八七以前和以后，王力都没有过问外交部的事。外交部夺权，与王力无关。至于说“群众喊打倒陈毅的口号没有什么了不起”，“要红卫兵给陈毅加点压力”，这是毛主席讲过的话。揪斗陈毅，是江青组织的，那时王力不在北京，火烧英国代办处时，王力还上着石膏躺在床上，在斗争王力的会上吴法宪提出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的罪名，周总理立即插话说：“这没有王力的事。”

关于“反对周总理”：真正反对周总理，向周总理夺权的是江青。江青提出：“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中央文革”。他们在几个问题上，如有关军以上干部会议问题，五一节刘邓陶是否上天安门问题，“所有干部都要放到火里烧一烧”的问题……。他们利用这几个问题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围攻周总理，王力都站在周总理方面，为周总理讲话。武汉事件后邓大姐到钓鱼台看望王力，江青大骂邓大姐，王力为此和江青吵了一架。

王力是怎样被打倒的？在宣布杨余傅问题的大会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说，王力问题“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他们还说要“向江青同志学习。”王力和江青的矛盾，上面已经谈到一些，在对京剧改革问题上，对彭真同志的关系问题上，对刘邓的态度问题上，对武汉事件的处理上都有矛盾。王力经常用毛主

席的话来纠正江青的话，还有王力向毛主席反映，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是中央文革，毛主席立即调阅了那个文件，并责令中央文革公开检讨。这更使江青对王力恨之入骨。江青本来就说：“你王力眼里根本就没有我江青。”武汉事件后，王力反对他们的一系列作法，她再也不能容忍了。而且由于他们自己把局势搞得很乱，不可收拾，她正好把王力“端出来”，作为他们的替罪羊。江青用毛主席最忌避的话来进行挑动：“武汉事件后，王力以为天下是他的了，不是毛泽东的了。”毛主席才问：“王力究竟是什么人？”江青借着这句话就到处说：“毛主席问王力是什么人，我一眼就看出王力是坏人。”康生连夜查了档案，证明王力是苏修特务兼国民党特务。他们又诬陷王力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这样才引起毛主席对王力的怀疑，当然打倒王力同打倒其他人一样，最后都是要毛主席点头的。把王力关起来后，周总理还指示：不许贴王力的大字报，贴了的要覆盖；王力问题由中央处理，不要下面群众组织管；对王力问题不要无限上纲。当时还传达了毛主席对王力同志的几句话：“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那时毛主席周总理还没有把王力问题当成敌我问题，关到秦城后，毛主席周总理也不让任何人提审王力，江青就用放噪音，灌药，假枪毙等办法来折磨王力，力图置王力于死地，杀人灭口。

王平权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

摘自叶永烈：《中共神秘掌权者》，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
(王 力)

我从一九六六年六月正式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就被江青等人关起来了。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被关了十三年半。这两个数字，就足够引人深思的了。而且，我在狱中备受江青等人法西斯式的残酷折磨，九死一生，这段曲折坎坷的经历，更令人触目惊心。由于我个人的命运和党的命运、个人的错误和党的错误密切地纠缠在一起，更增加了人们对我的问题的关注。朋友们都希望我写一个回忆录。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该怎么认识？该怎么办才是正确的？我是应该进行反省和探讨的：

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

我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阐述者之一。

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两次讲话中的词句编辑起来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有名的“语录”，这段语录后来被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

我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和第三个里程碑，而以文化大革命作为标志”这一错误观点的主要提出者之一。这也是错误的。

理论上的这些严重错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其危害性是难以估量的。由于理论上的错误，导致党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混淆了敌我界限。在我参加“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指导运动的重要的指示、决定、通知、社论和文章，我都参加了起草工作。（那个专门整老干部的“专案组”办的事情除外，因为“文革小组”成员只有王力一人被排除在“专案组”之外。）我参加起草的这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原则，今天看来大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很少。即使有的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因为是在战略错误的前提之下写成的，因而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虽然这些文章和文件大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但是我作为具体执笔者也有严重的责任。我不能也不应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毛主席。

我一被关进秦城，就开始了反省。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主要不是由于某个人的不良动机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这一点我过去是没有认识清楚的。上面所说的我所犯的理论上的错误和行动上的错误，都是从这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我就误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实，我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改变为社会化经济，并没有把农民等小生产者改变成为同现代生产相联系的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并没有把大量的手工生产改变成为机器生产。也就是说，封建主义的墙脚根本没有铲除。中国人民还是苦于封建主义，即苦于资本主义的不足，而并不是苦于对国民经济有利的而不是对国民经济有害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语）。我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二重性，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用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武器，时常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实质是带着封建色彩的小生产者的观点。如果不从

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性质的错误还可能以另外的形式重犯。

解放以后，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的领导人常常以诗人的浪漫性和军事家的决断性来处理经济问题，多次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而在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以后，并不检查自己，反而责怪“阶级敌人”捣乱。这样，臆造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以至无处不是敌人了，敌人不但跑到党内来了，而且跑到最高的领导核心中来了。于是，就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就要“不断革命”，并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了。这个深刻的、痛苦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

我国没有经过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大课堂，人们的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观点，就难以为完全现代社会的文明的、科学的、民主的观点所代替，更谈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这个历史是绝不能也绝不应重演了。

（摘自《王力反思录》下册）

王 力：《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它的发动》

我从一九六六年六月正式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就被江青等人关起来了。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被关了十三年半。这两个数字，就足够引人深思的了。而且，我在狱中备受江青等人法西斯式的残酷折磨，九死一生，这段曲折坎坷的经历，更令人触目惊心。由于我个人的命运和党的命运、个人的错误和党的错误密切地纠缠在一起，更增加了人们对我的问题的关注。朋友们都希望我写一个回忆录。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该怎么认识？该怎么办才是正确的？我是应该进行反省和探讨的：

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

我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阐述者之一。

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两次讲话中的词句编辑起来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有名的“语录”，这段语录后来被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

我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和第三个里程碑，而以文化大革命作为标志”这一错误观点的主要提出者之一。这也是错误的。

理论上的这些严重错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其危害性是难以估量的。由于理论上的错误，导致党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混淆了敌我界限。在我参加“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指导运动的重要的指示、决定、通知、社论和文章，我都参加了起草工作。（那个专门整老干部的“专案组”办的事情除外，因为“文革小组”成员只有王力一人被排除在“专案组”之外。）我参加起草的这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原则，今天看来大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很少。即使有的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因为是在战略错误的前提之下写成的，因而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虽然这些文章和文件大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但是我作为具体执笔者也有严重的责任。我不能也不应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毛主席。

我一被关进秦城，就开始了反省。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主要不是由于某个人的不良动机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这一点我过去是没有认识清楚的。上面所说的我所犯的理论上的错误和行动上的错误，都是从这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我就误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实，我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改变为社会化经济，并没有把农民等小生产者改变成为同现代生产相联系的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并没有把大量的手工生产改变成为机器生产。也就是说，封建主义的墙脚根本没有铲除。中国人民还是苦于封建主义，即苦于资本主义的不足，而并不是苦于对国民经济有利的而不是对国民经济有害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语）。我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二重性，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用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武器，时常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实质是带着封建色彩的小生产者的观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性质的错误还可能以另外的形式重犯。

解放以后，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的领导人常常以诗人的浪漫性和军事家的决断性来处理经济问题，多次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而在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以后，并不检查自己，反而责怪“阶级敌人”捣乱。这样，臆造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以至无处不是敌人了，敌人不但跑到党内来了，而且跑到最

高的领导核心中来了。于是，就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就要“不断革命”，并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了。这个深刻的、痛苦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

我国没有经过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大课堂，人们的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观点，就难以为完全现代社会的文明的、科学的、民主的观点所代替，更谈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这个历史是绝不能也绝不应重演了。

我回顾过去的目的，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的回忆录要涉及不少人。对所有的人，我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只是如实地反映他们在特定历史情况下的真实的言行，以便探讨真实的经验教训，为后人作为可靠的借鉴。◇ 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文化大革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此有几种说法，有的说从学术批判就算开始了，有的说学术批判只能算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上次是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开始谈的。其实可以从一九六五年开始。现在我就从一九六五年布加勒斯特会议谈起吧。

一九六五年夏，罗马尼亚开党代会，勃烈日涅夫率苏代表团去罗，中国是邓小平率代表团去的。我们的既定方针是在那会上继续同苏方接触，改善同苏关系。代表团出发前，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会，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权、王力。会上毛主席大讲党史（我有记录，整理出来了，但文化大革命中丢了），毛主席反复讲不要怕庞然大物。他说陈独秀、王明、李立三，都曾经是庞然大物，都不行，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说不要怕大风大浪，大风大浪来了一定要顶住。这个会本来是讨论同苏修打交道的，可是毛主席反复讲上述问题。具体问题讲了两点：第一，骂杨尚昆，说杨尚昆为什么还不走？毛主席早就要杨尚昆离开北京，说杨尚昆搞窃听，还说反右派时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这就是所谓八司马事件，就是一九五七年中办把戚本禹和毛主席的英文秘书的爱人等八人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后来英文秘书告了状，毛主席给他们翻了案。他们不知道是毛主席给他们翻的，具体是田家英办的，他们都感激田家英。）毛主席在会上还骂了邓力群，说邓力群当时看了大字报，对打右派的事一句话不讲，随声附和，这样的人怎么能行？那时邓力群是刘少奇的秘书，

所以毛主席这话也是对刘少奇的。第二是谈彭德怀，毛主席说，我看要给彭德怀分配工作。毛主席说彭德怀这人是不会接受挂名的工作的，他要干实事。毛主席提议叫彭德怀到三线当副总指挥（彭德怀是三军团的，杨尚昆也是，刘少奇也是。）小报传说毛主席请彭德怀吃饭，我没参加。请吃饭那件事在后，决定分配工作在前，是在这次会上决定的。毛主席还骂杨尚昆从来不检讨，他打右派打错了，翻过来了，他也不检讨。会上大家说马上叫杨尚昆走。会开后，杨尚昆打电话给吴冷西，问会上谈了些什么问题？吴说“我没参加会，你问王力。”杨尚昆就问我，我不好说毛主席骂他，只说毛主席在会上大讲党史，讲庞然大物。从这次会以及后来的发展看起来，庞然大物是指刘少奇。（这次会上还要给彭德怀分配工作，可见这次会不是继续整彭德怀。）◇ 学术批判和五人小组

一九六四年七月成立五人小组，是为了领导学术批判。那时毛主席对思想文化战线的情况不满意，毛主席召集了几个人谈学术批判，他提议搞个小组，要陆定一当组长。那时江青跟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说中宣部是阎王殿。一九六四年我们去杭州谈外宾事，也谈过学术批判，毛主席也对中宣部不满，可是这时毛主席还要陆定一当组长。陆定一坚决不干，他说“我干不了，我见事迟，不能当组长。”陆定一提议彭真当组长，毛主席同意了。小组成员究竟几个人，也没有定。毛主席当时只提了陆定一、周扬，陆定一提出加彭真，才三个人，陆定一说要加几个人，毛主席说那在座的都是吧！在座的除三人外还有康生、吴冷西，这样就成了五个人。不是毛主席先想出五个人，叫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不是文化革命小组。当时没有文化革命小组这个词。陆定一提议叫彭真当组长，彭真没有推辞。这时江青同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同彭真的冲突还不尖锐。彭真当组长后，还真的抓，开了些座谈会，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列了个很大的名单，包括胡绳、许立群、吴冷西、姚臻、王力、范若愚，四大秀才都抓上了。胡绳当办公室主任。当时我推辞，因为同苏修打交道任务很重，写《九评》我是专职，中联部副部长我是挂名。康生也说，王力不参加学术批判办公室吧！但彭真说不行，非要王力参加。这个五人小组送常委和主席的汇报提纲（即后来的二月提纲）稿子上并没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姚臻后来加上的。那时彭真主持中央工作，康生在钓鱼台，外号叫“楼长”。姚臻加了个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在京常委）把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字也传开了。

姚臻很得意，二月提纲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的，主要是彭真批的。刘少奇不在国内。毛主席看了没反对，压下了，连个圈都没划。后来周总理总结出个经验：凡是毛主席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因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如果只划圈，那还不行，何况这个文件主席连圈也没划。◇ 四清问题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

一九六四年发表《二十三条》。毛主席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就是在一九六四年。桃园经验，先是王光美作报告，然后刘少奇作报告。在北京怀仁堂讲的。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可是刘少奇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刘少奇报告中是说过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这个报告我没听。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报告整理一下。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北戴河，我们也在。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理掉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江青告状，只是觉得报告有些话说得过了，如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等等，我们把它勾掉了。后来突然少奇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桃园报告不发了。（这是说的王光美的报告，刘少奇报告没有送毛主席。）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发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党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是李雪峰。过去都说白区工作正确代表是刘少奇、彭真，这次说是李雪峰。桃园经验不发我同意，我当时认为它很左，撇开原来干部，扎根串联，实际上是搬石头。那时还抄家，查干部的笔记本，说里面有些东西比《金瓶梅》还厉害。喷气式也是桃园发明的。李雪峰反对是对的。毛主席对桃园经验也认为刘少奇的一套过左。江青告状我当时不知道，文革时才知道。文革时江青说文化大革命是她拼着离婚发动的，就是指这件事。毛主席不满意四清由刘少奇领导，说了些不大好听的话，如“什么都叫刘少奇干就得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要搞二十三条，是针对刘少奇在四清中的过左作法的。毛主席半夜找陈伯达，陈伯达服了安眠药没醒，尽力地记下了十三条。他从来不详细记。记下一点，赶紧打电话找我，把记下的先理一下，看怎样理解毛主席的话。他说我写，写了十三条，说要搞个文件。文件是一九六五年一月发的。

陈伯达对我说，主席要整少奇，怎么办？他说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现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对党对国家不利。我说：“主席还是信任彭真、陶铸的，我建议你去找他们两人，你们三人一起去找少奇，要他向主席认个错，就好了。”这是因为在二十三条之前毛主席和刘少奇有争论，政治局扩大会上，刘少奇说当前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说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的说法是李井泉等人提的）。会上有争论。刘少奇坚持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毛主席说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那个会我没有参加，康生也没有参加，陈伯达参加的。我认为毛主席的说法是对的。这时我建议陈伯达等三人去告诉刘少奇，请他赶紧向毛主席认个错，毛主席消消气，就行了。他们三个人找了刘少奇，刘少奇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向毛主席表示检讨，说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概念不清，主席说的两条道路矛盾是对的。刘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因为刘少奇表示了检讨，就没有整刘少奇，光搞了个二十三条。这样一来，整刘少奇推迟了一年多。在这点上陈伯达是有功的。关于这事我在秦城写过材料，说陈伯达有功。那时陈伯达已打倒了，我还是这样提。我写的这个材料彭真也看过。现在陈伯达、陶铸不在了，彭真还在，这件事他大概还记得。

搞二十三条，我从头到尾参加。主要是我写，后来又吸收几个人，有许立群、邓力群、李雪峰、李井泉。刘少奇本来依靠王光美指挥全国四清，二十三条以后刘少奇不指挥了，毛主席指挥。书记处是彭真管四清，抓通县为重点，二十三条印成大布告到处张贴，也是彭真抓的。一九六五年一月最后写成二十三条。这个文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是毛主席的概念，是第一次这样提。这里所说的走资派表面是指农村干部，实际上是指刘少奇。毛主席认为党脱离群众，搞不好党要变质，政权要变质。官僚机构，旧的机器，如不解决，党要被打倒。这问题苏联解决不了，中国采用了很多办法，思想改造不行，反右不行，教育不行，学术批判不行，四清这样比较激烈的办法也不行，最后才找到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一九六五年刘少奇还主持中央工作，但不直接掌握王光美指挥四清了。《历史问题决议》说在四清问题上刘少奇比毛主席更左。

当时刘少奇不直接管四清了，他抓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他对这方面讲得很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刘少奇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两

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还拿出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上面谈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刘少奇要各地加以贯彻。余秋里、谷牧在工业方面加以贯彻。刘少奇强调一要看书，二要调查研究。他在会上还夸了王力，说王力是这方面的模范，又研究理论，又搞调查研究。那时邓小平抓三线，刘少奇准备出国，书记处、常委只剩下彭真。他不是常委，但实际上是副总书记。彭真抓两条，一是四清，一是五人小组。

会开完后，我跟邓小平去三线，同去的还有谷牧、吕正操、余秋里。我对这一年多北京情况不大清楚，北京的事我没有管。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我手里没有文汇报，没有看，姚臻夜里打电话来，说有重要文章，要马上看。我请中联部马冠华同志给我找了文汇报，连夜送来。当时觉得很重要，但也没有加以研究，没考虑会引起什么后果。我跟邓小平上三线，把文汇报带着，向别的部长们推荐。我跟邓小平去了西安、宝鸡、成都、攀枝花、昆明，一路上了解三线建设，也了解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情况。现在看来，毛主席抓阶级斗争为纲，而刘少奇、邓小平，想把重点放到建设上。社会主义建设怎么符合中国特点？邓小平考虑要发展小城镇，解决城乡矛盾、工农矛盾。两种劳动制度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把邓小平同志在三线的历次讲话、插话作了系统整理，成为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心思想是要走中国道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不能过度发展大城市，而要发展中小城市。三线的大工厂必须有小工厂为它服务。部队也搞基建工程兵，很有好处，也很有成绩，又省钱，工程又搞得很好。对这问题，刘和邓没有交换意见。刘从理论上提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邓小平看三线，从实践中解决这问题，解决两种制度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工农关系问题。我觉得两方面要结合。我整理了马克思列宁对这问题的观点，也整理了邓小平在三线的讲话。我整理的材料在工交系统的会上印发了。红旗杂志给铅印了。邓小平的谈话同后来提的发展乡镇企业的方针有关系。前几年我到廊坊参观，回来后写了个报告，也提到这问题。◇ 一个热锅上的蚂蚁

十二月中央打电话要邓小平立即赴上海，因为发生了罗瑞卿事件。当时诬蔑罗瑞卿篡军反党，把他调离，杨成武担任代理总长。邓小平走后我们留在昆明，阎红彦招待我们。他们发现了卢汉埋藏多年的白兰地，用这个招待我们。邓小平

走后，罗瑞卿来了。他自我感觉很紧张，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打听怎么回事？为什么开会不通知他？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又来电报要罗立即赴上海。后来知道已经采取了措施，防止罗逃跑。文革时批判李井泉，说罗瑞卿到成都，李井泉还送给他两筐桔子。其实当时方针是先稳住罗。罗到上海后就没有自由了。◇ 《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个人，说要出版五本马列原著，有《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要他们五个人每人写一篇序言。毛主席对他们谈了很多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等等。他们五个人商量的，由关锋、艾思奇作记录并整理，主要是关锋。记录整理后给胡绳、田家英看，当时他们都没有说什么。后来田家英说，关于彭德怀这一段和主题无关，不要吧，就勾掉了。艾思奇认为这是重大原则问题，我们有责任全部整理出来，这一段要不要由主席自己定。胡绳说就不要吧，关锋没有表态，最后是删掉了。后人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把这事提出来，关锋说了说当时情况，说到田家英当时要删去这一段。这成了田家英的大问题。现在有些文章写的不符合实际情况，说关锋一定要保留这一段，其实也不是这样。这话没说完就回北京了。……

起草二月提纲以前，彭真在人大大会堂开会，研究学术批判情况及存在问题。除五人小组成员外，还吸收一些理论工作者，有王力、胡绳、姚臻、许立群、范若愚、邓拓，对学术批判提些意见。会上没有什么争论，比较一边倒。那时二月提纲还没出来，会上发言说的也就是二月提纲上的那些话，都说学术批判不要轻易提高到政治。

这里插一段：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陆定一就有意见。（不是在这个会上讲的。）他说姚文元的文章写得不错，海瑞罢官可以批评，但姚的文章最后一部分不好。没有必要提高到政治，说要害是罢官，并且和庐山会议相联系。这是陆定一的意见。

当时会上并不是针对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是笼统地说整个学术批判不要轻易提高到政治，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要当学阀，不要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允许改正错误，与人为善，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等等。二月提纲不过是把会上的意见综合了。有些观点一九六四年我和彭真到杭州时我

就向毛主席提过。这次会上“有破有立”的观点是我提的，我说现在说怎么做不对说得多，究竟怎样才对呢？还要下点工夫。包括九评，光是说人家不对，究竟怎样搞社会主义，我们自己研究也不够。这一点大家同意，写到提纲中去了。另外我提出要组织队伍，通过学术批判，组织马列主义学术批判的队伍。会上彭真正式提出建立学术批判办公室，过去也提过，这次是要见诸文字，向毛主席汇报。后来严家其的书说康生力排众议，要把海瑞罢官同庐山问题相联系，这不对。当时大家意见一致，没有争论。康生当时心思也不在这里，他要管国际问题，同苏修斗争，还要编毛选五卷。当时大家也不知道毛主席对北京那么不满。如果会上有人提出毛主席不同意，彭真也不会那样汇报了。

二月四日，姚臻、许立群在钓鱼台整理汇报提纲，这就是所谓二月提纲。整理时康生、吴冷西是没有参加。二月五日开常委会讨论提纲，参加的常委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还有彭真、康生、吴冷西、王力、姚臻。康生参加了，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大家都说提纲可以。所以不能说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吴冷西的。上面说过，事先讨论这问题的时候他们参加了，事后讨论提纲的常委会他们也参加了，只是起草的那一天没有参加起草。常委会上决定谁到武汉去向毛主席汇报，五人小组五个人都去，包括康生。另外有办公室负责人胡绳、许立群，主要起草人姚臻。我没有去。康生提出加一个田家英。康生说他要谈五卷毛选，田家英是康生编五卷毛选的助手，毛主席的资料都是他管的，所以康生要他去。（田家英从来没有说过康生的坏话，这时毛主席对田家英已经不怎么好了，康生还是要田家英去。）

这时在北京发生一件大事：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臻、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二月提纲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情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砝码。什么事情都有个偶然性。彭真至今还记得这事，说王力是很慎重的。当时我建议彭真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

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后来从彭真家查出这信，江青对戚本禹大为不满。这又成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三月份，常委会开会，讨论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事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要在京常委讨论，讨论结果告诉他。常委会是刘少奇同志召开的，参加的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康生、吴冷西、姚臻、王力，加了刘宁一。会上一致同意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大家估计毛主席的意思也是要派代表团参加的。人家邀请，不好拒绝不去。去了以后，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意见。最初刘宁一主张不去，大家说，人家邀请都不去，在全世界面前显得不好。我们可以用他们的讲坛讲我们的话。我们不直接骂人，但可以表明我们的看法。刘宁一也就同意了。一致同意派代表团，并给毛主席发了电报。但毛主席回话说不能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说要写个公开信答复勃列日涅夫，说明为什么不参加。这封信是我起草的，经过毛主席定稿的，正式发表日期是三月二十二日。报上登了。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这是个重大政治决定，要向全世界讲清楚我们为什么不去，责任应由苏共来负。公开信列举苏共不断在党内党外发表很多反华文件，安德罗波夫还发表了反华文章。公开信还说，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我们都去了，但二十大你们反斯大林，在全世界掀起反共浪潮。二十二大你们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赫鲁晓夫倒台后，我们建议各国共产党开个会，希望你们改变赫鲁晓夫的作法，你们又不改，你们坚持赫鲁晓夫的一套，而且越走越远。一九六五年三月，你们不听我们劝告，坚持召开分裂性的兄弟党会议，我们要求你们公开承认错误，承认非法，你们也没有作。分裂的责任是你们的。现在我们不能参加你们的二十三大，这个责任在你们。我们还是相信苏联大多数人民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如果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我们还是要同苏联人民站在一起。这封信是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写的。

苏共二十三大大后，日共代表团和越南代表团来我国。日共是以宫本为首，吴冷西接待；越南是以黎笋为首，我负责接待。黎笋没什么问题，双方同意不发表公报。宫本要发公报，而双方意见不一致。中方主张在公报中点苏共修正主义的名，宫本不同意，只同意一般的提反修，不同意点苏共的名。中央又开常委会讨

论，这次会我参加了。会上一致同意要照顾日共的困难。这也是毛主席一贯的观点，要照顾兄弟党的困难。会上都同意照顾日共的困难，公报上不提苏修，只一般提反修。会上决定派康生和赵毅敏去上海向主席汇报。这时刘少奇要出国，邓小平要去西北三线，彭真主持中央工作。

康生、赵毅敏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魏文伯参加，江青在座。这次毛主席讲了一大篇，发了脾气，说你们（常委）同意我不同意。中日公报问题，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两个决定毛主席都不同意。然后就大骂二月提纲、骂彭真、骂北京市委、骂吴晗、骂中宣部，骂他们整左派材料。这对康生来说也是很突然的。据我分析，如果没有因为二月提纲等问题对在京常委的不满，毛主席对中日联合声明和苏共二十三大问题本来都可以同意的。

在这里插一段：毛主席发脾气以前，陈伯达已经知道一点风声。因为他在杭州、在武汉见过毛主席。那时北京空气已经很紧张，彭真也知道点风声，知道毛主席不满意，但不知道那么严重。陈伯达回来后住在天津，他叫我去天津，谈《红旗》的一篇文章。红旗杂志主持日常编辑工作的杜进跟我去的。陈伯达透露了毛主席、江青对学术批判和二月提纲的不满。那时候许立群也很紧张，我去天津时，许立群说，现在看起来很紧张，有什么动态你赶快告诉我。

康生从杭州回来后，先是在钓鱼台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还准备在政治局传达。我说这不好，这么大的问题，又是针对彭真的，现在彭真主持中央工作，你怎么好去传达？我建议他请小平同志回来主持。康生同意，当着我们的面就拿起红色磁石机给小平同志打电话。刚说了几句，小平同志就说立即回来。因为出了大事了。政治局会议是邓小平同志召集、主持的。康生传达。会议决定马上向全党发个通知，撤销二月提纲。会上要我起草，我说这个不宜多说，说不清楚。所以我只起草了一句话：以前中央某月某日发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现在予以撤销。大家同意，报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不行，没说实质性问题。毛主席实际是对常委不满。毛主席要陈伯达起草。陈伯达还是找了我，起草了个稿子。这时陈伯达在十四楼，又开了一个会。参加人有康生、吴冷西、姚臻。这时不叫起草小组。这次起草的稿子就是后来的五一六通知。起草后在北京就修改了好几次，搞了好几个稿子，还是在八号楼开会修改，彭真也参加。康生在会上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彭真说：好嘛！要提就提够吧！姚臻很紧张，因为二月

提纲是他主要起草的。陈伯达同我起草的稿子还是只批了二月提纲本身的问题，按照毛主席对二月提纲不满的那些话来批，没有离开学术批判及二月提纲本身。

“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是讨论时康生要加的。◇ 《五·一六通知》的起草过程

在北京起草文件（那时还不叫五·一六通知）只有几个人，不叫起草小组。四月份在北京完稿后送到杭州毛主席那里。这时毛主席决定开两个会：一个是常委扩大会，在杭州开，参加者有常委、康生、陈伯达，各大区的书记。常委扩大会的任务是批评彭真。另外成立起草小组，在上海，名义上是给常委扩大会准备文件。名单是江青定的，组长陈伯达，成员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尹达、陈亚丁、关锋、戚本禹、穆欣。因为康生、陈伯达在杭州开会，所以上海的起草小组实际上由江青主持。成立日期是四月十六日，就是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市委批判邓拓的两个版的那天。毛主席指示要让我们吃得好、住得好、好好休息。我们在上海非常舒服，我、吴冷西、陈亚丁、尹达住锦江饭店后楼的套间，其余人住的是锦江饭店前面的客房。吃得很好，每天看电影，是江青组织的，看那些她认为有问题要批判的电影。有时在小礼堂，有时在后楼的会议室。毛主席叫我和吴冷西写些陆定一的材料，我们写不出多少。因为吴冷西的人民日报不归陆定一领导，我更不归陆定一领导，平常来来往往见了面开个玩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严慰冰的事我们不清楚。陆定一说话不慎重，说过些不好的话，叫我们凑凑，也没有凑出多少。我们没别的事，就逛大街，逛淮海路。这时康生、陈伯达在杭州开会，上海起草小组是江青主持，她不住锦江饭店，她有别墅。柯庆施给毛主席搞了个单独的、适合毛主席居住的房子，同时也给江青搞了个相当于毛主席标准的别墅。她住在那里，我没有去过，都是她到锦江饭店来。来了就到客厅见见谈谈，看看电影。张春桥是起草小组的，他好象是秘书长，招待我们三顿饭吃得好，时常来看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江青来了就讲她那一套，骂彭真，骂中宣部阎王殿，骂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讲她自己如何受打击，没人理，说阎王殿的阎王我一个一个都去拜望，一个个副部长我都登门拜访，可是没有人理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我只好依靠上海。那时她还没有骂常委和书记处，只骂彭真和中宣部。她还给我们看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的纪要（那时还没有公开发表）。说她要请尊神，靠部队，靠林总。

我们在上海的任务是什么？主要就是原来在北京起草的稿子（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送主席后，主席每天都有修改，改的稿子每天送到上海交张春桥，再交我们讨论，文字上理一理，顺一顺，有什么意见给毛主席回话。毛主席每天都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后来五一六通知上那些黑体字，都是毛主席亲笔加的。有些虽然不是黑体字，但问题提得很尖锐，也是他加的。

杭州常委扩大会和上海起草小组会同时举行。在毛主席看来，起草小组改稿子比常委会重要。常委会并没有讨论和通过五一六通知。毛主席对五一六通知的修改，并不给常委会看。常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彭真，彭真作检讨，揭开彭真的盖子。实质性的问题都在上海。有人说常委会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交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那回事。常委会开会期间，毛主席每天送修改稿来，开了几天会就修改了几次。杭州的会完了，起草小组的会还没有完。杭州开会完后，康生、陈伯达到上海，参加起草小组的会。康生简单说了说杭州会议的情况，没详细说，因为没有什么精彩的发言。康生说到会的每个人都发了言，都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彭真的问题认识不够，没那么高。都批评了彭真，说彭真检讨不好，过不了关，说彭真作法恶劣，没有经过中央，突然搞了批判邓拓的两个版，以为把邓拓抛出来就没有事了。毛主席说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和刘仁没有检讨，没有考虑整个市委是否改组。总之是不能容忍彭真。彭真回北京是单独回去的，回去时马上就有了“警卫”了，是公安部九局的，汪东兴是局长。这个局是专门保卫中央的。五一的活动彭真没有参加，从此就出面了。康生还说到，刘少奇出国回来，到了杭州，刘少奇对国内情况，对彭真的问题大吃一惊。康生传达时江青插话，对陈伯达说：你这个伯达，主席讲《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唯心主义的，你还给他修改整理，重新发表在红旗上，你怎么搞的？你也真够糊涂的。当众批评刘少奇，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大吃一惊。康生也很紧张，因为他正在编刘选。

◇ 毛主席对《五·一六通知》初稿修改的地方

第一，通知开头第二段：“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

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这一段虽然不是毛主席的亲笔，但是他的思想。目的是要给康生开脱，由彭真一人负责。这叫剥笋政策，这一次只剥到彭真。这一段是上海写的，大概是张春桥写的。

第二，下面一段，即通知的（二）中的一段，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这一段强调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

第三，通知（四）段开头不是黑体字的地方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这些提法本来还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的，可是后面又加了一段黑体字，问题的性质就变了。黑体字说到“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很明确了，问题性质发展到这程度了，这是毛主席的亲笔。

第四，通知（七）段说到学阀、党阀，这也是毛主席的提法，起草文件以前他就说过。这些非黑体字不过是用文字表达毛主席的思想，得到他的认可的。后半段黑体字更明确地说：“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这就更明确了。

第五，杭州会议结束后，康生、陈伯达回到上海参加起草小组会议，会议还是江青主持的，作最后一次定稿。我们正在读稿子时，徐业夫又打电话来找王力，又加了几句，就是通知（一）段内括号里的话：“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这段加上，这才算是最后定稿了。

◇ 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康生带着定稿回北京，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将这文件印发。当时不相信中办印刷厂，怕他们同彭真、杨尚昆关系密切，怕他们泄露给彭真。康生要我去找谢富治，到公安部印刷厂印刷，要绝密。但他们印得不好，不好看，还有错字。

文件定稿时还是有“彭真同志”，第二年公开发表时把“同志”去掉了。

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三个版批判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三人，《前线》加了编者按，这是北京市委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当天广播了。可是当天新华社就奉命通知撤销北京的按语，因为毛主席、江青不同意北京的按语。上海开会回来后，五一六通知发表前，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提出这不是学术问题，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五月八日发表高炬文章，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文章，题为《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何明就是关锋，高炬是解放军报的，解放军报那时正副总编是唐平铸、胡痴，是刘志坚领导的。何明、高炬的文章直接批评北京市委。五一六通知发表前，组织了一系列文章，一面中央开会，一面在社会上揭露。五月十一日发表戚本禹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说：姚文元文章提出吴晗问题以后，你们改变态度没有？在差不多二十天的时间里，你们对姚文元文章不作介绍，反而责问上海同志，有什么背景，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到那里去了？这段话是彭真打电话给曹荻秋时说的。戚本禹把它拿到社会上去了。

政治局开会主要是康生传达。他连毛主席说的“我就是要搞剥笋政策”也说了，说一层一层地剥，这次是彭罗陆杨。我们都很惊讶，这个怎么能传达？康生传达着重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为苏共二十三大和日共公报问题大发脾气时讲的一些话，还有杭州会议期间也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过程中毛主席对陈伯达、康生讲的一些话，康生都有笔记，他写得很工整。这次经过整理，把它连起来，成为有逻辑的、系统的东西。好象是经过我整理的。康生传达后政治局会上进行了讨论。对文件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五月十六日上午就通过了，所以叫做五一六通知。会议的主要任务就完了。张春桥、陈伯达也介绍了情况，张春桥限于文化战线的情况，陈伯达讲的不多，他讲彭真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历史上一贯错误，思想作风不好。

常委都讲了话，都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认识不够，还都说自己受了剥削阶级影响。少奇同志首先讲的，他说过去填表时自己的家庭成分一直是填富农，后来到花明楼看看，应该是地主。总理也说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的影响，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对北京的问题事先没有觉察。邓小平同志也作了检查，说书记处发

生这么大的问题我都不知道。（彭罗陆杨都是书记处书记。）最神气的是林彪，他不检讨，不过最后也讲了几句，说常委同志都检讨了，我没有准备，我的家庭也是地主，问题也看得不那么清楚。这是十七号下午的事。十八日林彪讲话，讲政变经。我们事先知道叶群到科学院等单位搜集中国历史上关于改变的资料。

林彪为什么讲这个呢？是因为毛主席多次讲要防止在我国发生反革命政变。但毛主席不赞成林彪这个报告。大概因为林彪讲得太玄乎了。毛主席从一九六二年就讲有反革命复辟的可能性，并且采取了措施，要害部门都调来一些军队干部。当时林彪经常生病不在北京，是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军队挑的优秀的、可靠的干部到要害部门。一九六五年调丁莱夫到广播电台当政委，交代他的任务就是防止政变者占领电台。他原来是一个军的政委。林彪的政变经别人都说很好，刘少奇、邓小平、周总理都说要印发。林彪要陈伯达、刘志坚找了些秀才把他的讲话整理成文，整理了很长时间，讨论修改过几次，直到十一中全会后九月二十二日才印发。毛主席也同意了，划了圈，但毛主席背后说他不那么赞成，是跟江青说的。

邓小平的检讨是临时作的，不是从九月份起就作的。邓小平的检讨送毛主席是十月二十一日，是急就章。邓的检讨着重讲五十天，没有多讲历史问题，只承认一九六二年错误他也有份。一九六四年错误他没有份，而且当时他就有不同意见。邓说这次错误是他同刘少奇的错误。刘少奇的检讨说由他一个人负责，邓说他和刘两人负责，别人都不负主要责任，特别是工作组不能负责任。毛主席认为，别的一些人也认为，邓的检讨很诚恳，本来不能由他负责，他还说他负责。邓的检讨讲到，他这样高的领导干部，长期独当一面的同志，学习很差，没有跟好毛主席，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得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也接触少，对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向群众作调查研究工作，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说，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主席思想的轨道，必然发展到同毛主席思想相抵触，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允许的。 一

九六六年毛主席批了我是一个独立王国，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原谅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作风没有得到改正。

当时毛主席及其他同志认为邓小平的毛病也不过这些。作为一个负责同志，能这样检讨也就不错了。对他有意见的也无非说有的同志找他他不见，没有象林彪那样把他骂得一塌糊涂。至于说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这是言不由衷。后面还谈到不寒而栗，要补过，要保持晚节。

检讨本来到此为止，毛主席看了后，希望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如说”我要有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相信在相当时间内错误会得到改正，请给我时间，自己努力站起来。干了半辈子，跌了跤，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邓小平照毛主席的话说了。毛主席还把”初步检讨”的”初步”二字也勾了。毛主席的意思是不要以消沉的话来结束，要以积极的话来结束。邓的检讨，在当时条件下不能说是被迫的。但是对林彪的乱骂邓是不会同意的。

5月19日批评彭真、陆定一。彭还是说自己认识不够，至于搞政变、里通外国等，他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同陆定一没有联系，请中央审查。彭真发言五分钟，大家批评他说不深刻，没抓住要害，还是对抗的态度。陆定一早就受审查了，就是因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信上说叶群在延安时跟陆定一好，林豆豆就是陆定一生的。林彪到哪里信就到哪里。这就涉及公安问题，一定是能够掌握林彪行踪的人写的，林彪到哪里她都知道。经过侦破知道是严慰冰写的。告诉陆定一，陆大吃一惊，说他不知道，说严慰冰有精神病，找医生证明。一九六五年中央决定要彭真审查陆定一，看严慰冰是单干，还是有个夫妻店。

陆定一离开北京到外地后，给严慰冰打电话都有人窃听，陆电话里说给严买了个半钢的表，这句话被说成是暗语，因为无锡话“半钢”和“半讲”同音，说是暗示严慰冰只能讲一半，不能全讲。这是叶群在大会上讲的。彭真审查陆定一的结果，说陆确实不知道严写匿名信，林彪很恼火，政治局会上林彪写了一个条子，证明他和叶群结婚时叶群是处女。这个条子印出来发给到会人。陆定一发言没有说几句，林彪就质问：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陆定一说我确实不知道。林彪拍了桌子，说了脏话，说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X X，能知道吗？批判变成了闹剧……。

有人说林彪在会上说“我恨不得枪毙了你”。这话是没有。还有人说，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的不是很多吗？这好象是顶嘴了，这话也没有。别人批评陆定一，也说不出什么，只是说文人无行、纵容老婆胡闹等等，另外就是批评陆定一反毛泽东思想，只反教条主义，思想战线的事都由他负责，中宣部一塌糊涂，成了阎王殿，文化部也一塌糊涂，学术批判他反对上纲，这是给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总之都是笼统的，具体的没什么东西。陆定一不承认有反党集团，不承认搞复辟。严慰冰问题他辩解的多。

会上人人都得发言，不只是康生、陈伯达说。◇ 田家英自杀

二十三日在大会堂继续开会，讨论通过政治局扩大会作出的组织处理决定：彭真、陆定一撤消工作，调陶铸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任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就在这个会上，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很紧张地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了几句，说田家英自杀了。总理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赶到田家，这时田家英已经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如烫衣服、取衣服、买这样、买那样，很长时间才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去时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叹气，说家英怎么这样，有话可以向组织上说嘛！这时安子文也是自身难保，六神无主。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觉得他死得很可惜，审查以后可以继续工作嘛！整理毛主席的东西最合适。戚本禹也吓呆了。戚本禹对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调到要害部门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搞三自一包时戚本禹也在田家英领导下搞试点。这时候陈伯达、江青也在拉戚本禹，但还是刚开始，戚本禹对田家英的旧情还是有的。总之当时对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没有人说“自杀是自绝于党”之类的话。

一九六一年我同田家英一起搞六十条，以后也常常在一起搞文件。一九六二年在北戴河会上批三自一包，主要是批陈云，附带批田家英；批三和一少，主要是批王稼祥，附带批王力。都当成右倾典型。事后我和田家英不约而同去找康生，请他缓和一下。我们说现在各方面都很困难，不要对陈云、王稼祥搞那么紧张。康生拒绝，也就算了。田家英死后我们到他家，看到家里很乱，有些烧东西的灰。

康生给我写的一个画上的题跋，田家英那里还有照的一张相。田家英到死以前没骂过康生，他只骂陈伯达和江青。我对田家英是很欣赏的，私交很好。当时对他的压力当然是不小的，可是一顶也就过去了，何必自杀？在田家英自杀前姚臻也自杀了。他以前和国民党斗争时，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企图秘密逮捕他，姚跳了楼，那是为了公开国民党秘密逮捕的事，让组织知道，是为了保全组织而牺牲自己。那次跳下来没有死，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服了大量安眠药然后上了吊。田家英死后火化了，在八宝山，中办有几个友好还去送葬，陈秉忱嚎啕大哭。陈作过潍县专员，同田家英在文物上有交往。田死后当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边，到中央组织部，谈田家英死的经过。董边说头天夜里田家英说了一句话，说“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董边说她当时没有注意这句话，没有向组织汇报。七月份江青回北京前，我们就听到传达了江青的话，说陈伯达、康生（实际上是说周恩来）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让田家英自杀了？（意思是应该先加以隔离。）江青回来后又骂了好几次，说对田家英处理不果断，早就该隔离。她是把田家英当成敌我矛盾了。田家英之死的经过就是这样。

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刊载胡乔木的文章，说“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迁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这些诬蔑和污辱，不得不含冤去世。”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事实。

对彭真、罗瑞卿的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文件，对陆定一、杨尚昆也有一个说明他们错误的文件，是后来二十四日通过的。杨尚昆搞“窃听”，毛主席不知道。但这也不是杨尚昆能够决定的。有人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这也未免太武断。搞录音是有的，但我判断杨也不是坏意，因为在毛主席那里开会不准记录（政治局、书记处正式会议有记录），只有个人可以记。毛主席有些话很精彩，录下来多好。但安录音机绝不是办公厅主任能够决定的。后来杨尚昆也没有承担这个责任，没有检讨。他也没有说是谁决定的，只把具体办事的人撤了，如康一民，还有直接安录音机的几个人撤了。后来杨尚昆平反时说这不叫窃听器，叫录音器。我认为录音不经过毛主席也是不对的，但确实不是为了监视毛主席。◇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

中央文革小组名单是刘、邓为首的常委、书记处提名的，五月二十八日发出，送毛主席，所以一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是五月二十八日成立的。实际上那天并没有成立。因为毛主席起初不同意王力为组员，所以没正式定下来，到六月份才定下来的。原起草小组的人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吴冷西没有了，老的秀才保留了王力。陈亚丁换成谢镗忠（总政文化部正部长），加了姚文元。这还有个过程，张春桥极力要加姚文元，江青在上海向在京常委提出，要审查一下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张春桥说没有问题，于是就定了姚文元为中央文革成员。名单送主席后，主席不同意王力，说王力是彭真的人。

为什么毛主席不同意王力，其实就是江青搞的鬼。因为一九六四年九月，彭真、乔冠华和我到杭州毛主席处，谈国庆十五周年邀请外宾事。说完这件事后，彭真提了个头，我接着讲了一通对学术批判和京剧改革的意见。我说一是不要动不动提高到政治；二是不要扩大化，要有个界限。京剧改革不要一律排斥传统戏，鬼戏也不必一律禁演。毛主席很不高兴，变了脸，说你这个同志是中宣部的人吗？

（那时已经骂中宣部是“阎王殿”了。）但他还不是完全不接受。最后他讲：第一，江青有点“左”；第二，是要有个界限。他说对郭沫若、茅盾、范文澜不准批。我们告辞时，主席说再加一个翦伯赞。

因为我批评了京剧改革，触怒了江青。另外，一九六四年中央要我列席常委会，是彭真找毛主席谈的，彭真说王力是优秀干部等等，主席同意了。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在钓鱼台，常委要我作点秘书工作。彭真讲的王力的好话，江青在文革中作为攻击王力的把柄。因为江青在毛主席面前说王力的坏话，毛主席才形成“王力是彭真的人”这个印象。毛主席不同意王力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可是当时康生、陈伯达觉得过去的秀才班子一个不留，不好办事，从起草文件一直到印刷整个过程，新来的人都不熟悉，所以要留一个王力。他们请江青向毛主席谈，说“要留一个王力，不然清一色了”（张、姚、关、戚都是响当当的左派），毛主席才同意了。因为有这样一个周折，而且各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人也还没定，所以文革小组成立会是在六月二十日前几天才在上海开的，当时没有通知王力出席。他们从上海回来后才告诉我新的文革小组中有我。

文革小组虽然成立了，但没有开会，也没有机构，反映情况靠光明日报的内部简报。陈伯达调尹达、关锋、穆欣到钓鱼台十四楼，我还在八楼。吴冷西回了

人民日报，姚臻自杀了，范若愚回了党校。有人说谢镗忠、刘志坚进中央文革是叶剑英提的，这不符合事实。刘志坚是林彪的主要秀才，当然是林彪提的。打倒刘志坚，林彪是不同意的。不能因为现在刘志坚是好人，就不说他是林彪提的，而说是叶剑英提的。◇ 关于《大事记》

大事记是康生一定要搞的，他是专门搞大事记的人。他把毛主席历次谈阶级斗争的话都排起来，这次又排了个大事记。主要是康生排的，得到刘邓同意。我是参加整理，还有李鑫、贾一学。

现在中纪委把这说成是我的罪状，说我在大事记中给康生开脱。其实大事记比正件《五一六通知》说得缓和。正件说彭真背着康生、吴冷西炮制了二月提纲。我整理大事记时觉得不好说整个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就只说起草的那一天是姚臻、许立群关起门来起草，这比正件轻得多。写大事记时康生提出要给王力开脱，有些事是王力反对过的，其实主要是为他自己开脱。他要给我开脱，我不赞成。因为文件太长了，不能再加了。后来康生在中联部讲话时说，没提王力是个疏忽，王力是正确的。中纪委把这作为王力的罪状，说王力在大事记中栽赃诬陷彭真，给康生开脱。

其实大事记比正件轻得多。为什么正件无罪，附件（大事记）倒有罪呢？这些我在《申诉书》中已写明了。◇ 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发动：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聂元梓的大字报

那时文革小组没有制度，没有机构，康生也并没有重视他这个顾问的职务。他是中央理论小组组长，还要管国际问题。理论小组派了几个人到北大去。五月份，北大就热闹了。何明、高炬文章发表后，各学校震动很大，大字报小字报都出来了。康生派一个组到北大，组长是曹轶欧，她是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她到北大不是工作组，不是中央文革派的，不是搞文革的，是搞调研的。她本来就常去北大。她这个组没有多少权，也没有多少事，聂元梓大字报出现后，曹轶欧是很重视，因为五一六通知刚发下去，就出现这张大字报，是一个重要动态。曹轶欧向康生作了汇报，康生也向毛主席反映了。陈伯达也通过光明日报向毛主席反映了。六月一日毛主席在上海，给康生、陈伯达都来了指示（不知是经过什么人传来的）。毛主席叫在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而且还讲了很多话，主要是同康生讲的多。毛主席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

重大。陈伯达那时是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五月三十一日进驻的，是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决定的。他还兼顾新华社。康生找了王力、关锋、曹轶欧，让我们写一篇评论员文章。

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因为他想用大字报直接号召，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毛主席一贯的总的思想是，解放后十七年搞的一套机构不行。他认为这一套机构、制度脱离群众，如果发展下去，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必须把这一套搞掉，搞一套新的。怎么搞法？思想教育不行，整风不行，四清也不行，各种办法都试了，都不行。这次要用新的办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揭露党的阴暗面。要实行这种作法，依靠原来的组织、制度、纪律就不行了。他认为只用原来机构，自上而下传达五一六通知是不行的。光靠人民日报也不行。江青向来认为人民日报不在她手里。陈伯达的工作组是刘邓派的，而广播这张大字报是毛主席布置的，评论员文章是康生传达毛主席指示后，根据毛主席指示写的。六月一日传达，当晚写好，六月二日见报。对毛主席的思想，当时评论员文章还没有从理论上说得很明白，后来才说明白的。毛主席的思想就是要把束缚群众手脚的旧的机构、旧的纪律、旧的秩序打乱、摧毁，解放群众的手脚，让群众直接揭露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按照他的指示，评论员文章当时写得不够。所以十一中全会印发时，在括号内加了一段毛主席的话，原稿上还有“毛注”字样。红旗公开发表时就正式加了一段。这一段是：“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这是毛主席加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修改。

对于聂元梓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毛主席为什么那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历史学家等估计不够。其实毛主席是借题发挥，把陆平作为旧组织的代表。问题也不在于江青和聂元梓有什么私交。当时陈伯达对这点就迟钝。评论员文章写好后，康生要我和关锋送给陈伯达，陈伯达没有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放在人民日报第一版的上面。上面是他的社论。我们说主席指示应该放在上面，他说社论重要。他不知道光靠社论是不行的。

后来大字报的作用大了。聂元梓的地位突然高起来了，曹轶欧的地位也高了，她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了。康生同大字报也有关系，他把大字报送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是他传达的，他就把功劳归于自己，康生同外国人谈话时也居功。实际上

他们三个人都没有份。后来曹轶欧和聂元梓的矛盾爆发了。曹轶欧不同意把聂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对聂元梓一贯印象恶劣。毛主席、江青都重视聂元梓，曹轶欧觉得过分，就揭她的底，说大字报她一个字也没有写，主要是杨克明写的。杨写了后，叫哲学系的人签字，聂元梓是哲学系总支书，叫她签她还不签，说服了好几次才签的。因为她是总支书，才把她放在第一名。有人说曹轶欧和聂元梓是老乡，大字报是曹轶欧组织的，这一点影子都没有。曹轶欧强调杨克明，十一中全会吸收北大的人参加时，江青提聂元梓，康生提杨克明。曹轶欧和聂元梓势不两立，聂元梓靠拢江青，江青支持聂元梓反曹轶欧。曹轶欧也列席了十一中全会，参加文革小组，当办公室副主任，后来被撤销。

以上所谈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认为历次运动都没有解决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变修的问题，这次运用大字报，采取新的方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不靠原来的组织，原来的纪律，原来的方法。第二是澄清关于大字报的一些胡说编造。没有那么复杂，有的人没有那么多功劳。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它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和林彪五一八讲话的精神，还有毛主席历次讲话加以综合。它的发明权不属于陈伯达。如果说陈伯达有发明权，那只是在社论中第一次提出“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光这篇社论也没有用，如果没有第一张大字报，还是按过去搞法，旧的机器、旧的组织纪律还束缚着，还是不行的。毛主席利用聂元梓大字报、评论员文章来解决这问题，主要是自下而上，摧毁旧机器、旧组织、旧纪律、旧方法，同过去的运动都不同。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陈伯达。因为当时说人民日报不站在左派一边，不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可靠阵地，所以要派陈伯达去夺取阵地，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派他去还是刘邓统一派的，不过他比别的工作组早一点。工作组是陈伯达自己组织的班子，在政治局书记处的会上说了一下。主要依靠解放军政治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还有上海的一个人。这几个单位都是江青的阵地。具体的人有穆欣（光明日报总编辑）、钱抵千（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唐平铸（解放军报社长）、尚力科（解放军报编委）、红旗编辑杨某某、解放日报鲁瑛（当时未到，后来到了）。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开会，说要清除邓拓的阴魂（资产阶级办报方针），清除吴冷西的阳魂。宣布要一天写一篇社论。这些社论都是他自己主持写的。《横扫

一切牛鬼蛇神》定稿时请我去过。◇ 文革小组成立初期和工作组问题

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是六月二十日，在上海开会，没有通知我。我打电话问陈伯达，问我要不要去，陈说不要去，也没有说什么原因。开会回来后告诉我说文革小组有我。这时陈伯达还在人民日报，康生还是不管文革，曹轶欧正式参与文革，各机关大字报很热闹，很震动。在我观念上，文革小组不过是常委的参谋秘书性机构，由少奇、小平同志领导。这时文革小组没有机构，没有制度，没有刊物，还是由当时的党中央领导运动。怀仁堂每天都有会，各部门各个口在会上汇报，按原来的组织系统搞。各单位自己有简报，原来的机构还在正常运转。如团中央，后来有人说是王力去撤了胡耀邦的职，其实不是。是常委、政治局派工作组到团中央，宣布三胡一王停职，宣布的人是过去就管青年团的李富春，他是政治局委员分管青年团的，是按正常系统搞的。

清华的工作组长叶林，是经委副主任，日常工作是薄一波管。

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是北京市委派的。

这些地方很热闹。最初文革小组没有什么措施，后来上海来电话，江青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文革小组要积极活动，要直接去看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不要让原有机构控制运动。

六月下旬，文革小组虽然还是没有制度、没有机构，但执行上海指示，全部人马浩浩荡荡集体去看大字报。蒯大富这时还没有被隔离，薄一波和蒯大富辩论，薄一波说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要富，还要大富，还要快大富！这样的话简报上就有。毛主席看到了。蒯大富是三好学生，登过人民画报的。这时各单位很热闹，积极执行五一六通知，挖黑帮、牛鬼蛇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没有把矛头对准走资派。陈老总在外事口汇报，说外事口有三个大牛鬼蛇神；一个是李昌，是对外文委主任，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他母亲是四川最大的地主，女恶霸，李昌一直养着她。第二是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宦乡，说他里通外国，家里有美金，抄家抄出来了。第三是浦寿昌，是总理的外事秘书，后来放到外办当工作人员，是美国博士。这三个人后来证明都是优秀干部。外办工作组组长张彦主持搞李昌。

六月下旬，上海来电话给陈伯达，不赞成由原来旧的工作机构派工作组。

陈伯达根据上海意见，在怀仁堂会议上递了个条子，说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

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条子递给邓小平，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陈伯达说不出道理，回到钓鱼台十四楼就坐在地毯上哭，说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么凶！他报告了上海，江青传过话来很厉害，说你们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这时确有群众反对工作组，如对外文委，工作组整了一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的，还有些小的。工作组同造反群众对立，群众要揭发领导，受到工作组打击。文革小组集体到对外文委找人谈话，群众对工作组有很多意见，贴了不少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如张彦当工作组组长，整了李昌，但张彦的夫人杨纯是对外文委副主任，就没有事。所以有人说张彦去对外文委是保杨纯，不准给杨纯贴大字报，不准查对外文委的“黑线”，康生、陈伯达都去看大字报，支持反工作组的人，反对张彦。陈老总非常恼火，他召集群众大会，说张彦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干部，这是领导的看法，你们群众说他这样那样毛病，是群众的看法，这不对，要以领导的看法为准，不能轰走张彦，张彦是我派的。当时形成僵局。

北大六一八简报是刘少奇批的，康生、陈伯达都划了圈，简报说对“反革命事件”要镇压，少奇同志批了要全国仿行。那时上海电话还没来，康生、陈伯达也在简报上划了圈。

六一八事件经过大体是：六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北大工作组正在开会，群众离开工作，揪斗了四十多名校领导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动。工作组制止了他们，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斗的作法，有害于革命，已经被坏人利用。工作组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见北大文革简报第九号。

少奇同志批：现将九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的作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地都可仿照北大办法处理。

据说当时有侮辱妇女的行为。我们没听说，有的书没有说简报认为北大事件是反革命，只说毛主席认为不是反革命，是革命事件，这是春秋笔法。

这一段经过是在上海来电话以前。事件发生在六月十八日，上海电话是六月下旬。毛主席只知道北大工作组把群众说成反革命不对，毛主席认为是革命事件。

为什么群众离开工作组就是反革命？他当时还不知有少奇同志批语。直到七月下旬，毛主席回北京，十一中全会开会以前，康生发现全国都发生工作组与群众的冲突，他认为来源于少奇同志的批语。可是他查了档案，看到简报上也有自己的大名，自己也画了圈。他在文革小组里说：“到处发生这个问题，和中央批语有关，我把批件揣在口袋里，几次想告诉毛主席，到现在没有拿出来。”

张春桥一听，马上把文件要过来。他马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大怒，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才有了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毛主席当时不但骂刘少奇，还骂了康生。因为张春桥告了康生的状，说康生把简报揣在怀里很久没有拿出来。毛主席说，要康生这种人有什么用处？

我想，康生不拿出来，一方面有个人顾虑，因为自己也划了圈；另一方面据我观察，他也顾虑到是否要告少奇同志一状的问题。他当时对刘邓还是尊重的。他常讲，他自己在白区执行的是王明的左倾路线，少奇同志是正确的。

总之，六一八事件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毛主席的大字报和换接班人的决心来源于此，其它学校发生的类似事件并不重要。

七月十八日，毛主席从上海回来，江青是先两天回来的。她回来后第一件事是建立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筹办刊物《快报》，专门开了一个楼（十六楼）作为文革小组的办公楼，建立文革小组办公室，说是同毛主席商量的，要王力当办公室主任。为什么要我当办公室主任呢？我想主要是因为1960年列席书记处会议，1964年列席常委会议，在党内人熟好办事，同各方面打交道都好办，别人在党内没有这个地位，人家都不知道他，办事就不方便。我推辞不干，江青说不行，非要我从八号楼搬到十六楼。八号楼还保留我的房，陈伯达住十四楼，江青自己住十一楼，毛主席要来开会就住十二楼。王力为办公室主任，戚本禹、曹轶欧、穆欣为副主任。要我和肖华、刘志坚商量，调一百个团以上政工干部办《快报》，向常委、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快报暂时放到解放军报印刷。这一百人等于是文革小组的联络员、巡视员，到各地、各部门了解情况，公开名义是用红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不用文革小组联络员的名义。其实人家也都知道是文革小组派的。这一百人是刘志坚、肖华从全国部队挑的，主要是从济南部队和沈阳部队挑的。这一套作法也是毛主席的思想，通过江青说的，说办公室不要大，联络人员要多。办公室除主任副主任外，

只有三、五个助手，他们只作些技术性工作，主要的事情应该我们主任、副主任自己办。毛主席就没有政治秘书，只有个收发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作他的秘书，都是兼职的。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把旧的机构、旧的作法改掉。文革小组人少办的事不少。不准配专车，需要人临时调。后来电话太多，搞了个接电话的组，三个人，是部队的。曹轶欧要搞个调查组，调了几个人，不住在中央文革，还是依靠北大。从文革的机构来看，毛主席的思想是对的，大批人到第一线反映第一手情况，坐办公室的人要少。简报一事一报，要快，不要积成一大叠才印。“快报”只发常委和中央文革成员。很多快报上有毛主席的批语。档案馆可能还存着。一百个记者得力的不多。后来又从人民日报、新华社调来一些人。江青第二件事是抓制度，建立碰头会，每天下午三点碰头，小组全体成员参加，另外需要谁就通知谁，稍微重要的事就通知周总理和陶铸。后来几乎每次都通知他们二位。周总理说，凡是中央文革通知开会，他从来没有不到过。最早的时候，中央文革每天开过碰头会以后，全体人马到一个单位去开群众大会，如各个大学（有的大学去了不止一次）。大会上都是把文革小组成员向大家介绍，每个人讲讲话。去的有王任重（中南第一书记、候补中委）、刘志坚、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王任重向大家介绍江青，说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中央没有这么通知）。有人介绍我时，说我是党的理论家，九评的作者（九评有七评半是我主稿的）。关锋、戚本禹不用介绍，因为他们写的文章很多，人们都知道他。这时期，重点逐渐转移，刘少奇那里黯然失色，怀仁堂只讨论一般性问题，实质性问题都在钓鱼台。钓鱼台直接支持群众，矛头对着工作组。

七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毛主席要我和关锋到清华去见蒯大富。这时蒯大富被隔离在宿舍。我们听取了他的申述，对他说，他的信收到了，不要着急，很快会恢复自由，有什么话可以对我们讲。他对工作组叶林、薄一波有意见。我们根据毛主席指示，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动。我们没说要释放他，可是我们一走，他就恢复自由了。蒯大富在学校是孤立的。开大会辩论时，蒯处于被告、辩解的地位。这次辩论会我去了，总理也去了。

蒯大富这人不怎么行，他的发言不是进攻的，都是被动辩解。批的人理直气壮，他都吓蒙了。

再一件事就是七月下旬，我们正在师范大学开会，突然有人递了个条子，说

团校在展览馆礼堂组织大会，同彭小蒙辩论。根据毛主席指示，派我和吴德去支持彭小蒙。（这次会上有周总理。不知是谁来个条子给江青，据说说的是二月兵变，我没听到）。我和吴德到展览馆，青年团说彭小蒙那个组织是反动组织，要在大会上辩论。

彭小蒙比蒯大富厉害，口才很好，讲话逻辑性强，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十一中全会把她的发言印发了。

当时最重要的是支持不支持红卫兵或类似组织，对此首先鲜明表态的是我和吴德。当然是根据中央指示这样讲的。我们代表中央，表示他们的组织不是反动组织或反革命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对他们的革命行动应该支持，不应该阻挠。会上还有个问题，团校是不是要象其他学校一样搞文革？校方意见是不搞，我同吴德商量后表态说要搞，一般性学习是次要的，文化大革命应放在首要地位。这样就把团校冲垮了。这时团校校长是周杰。这时来不及请示，我和吴德就表了态。

因为文革小组天天到一个单位支持群众反工作组，这时刘少奇那里的指挥就不那么灵了，毛主席直接领导文革小组，取而代之。工作组不行了，到处轰工作组，有的被赶走了，中央不得不发出撤工作组的决定，不撤也被赶走了。

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了大专院校积极分子大会。大会上，刘、邓讲话都是带检讨的。邓的检讨是自己写的，请我去修改过。他又打电话请康生、陈伯达来看，没有意见，他才讲的。这次大会我没去。刘、邓都是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没有后来提得那么高，没有提到毛主席不要旧机器、旧组织、旧纪律、旧方法的思想，没提到那个高度。毛主席认为旧的一套不行，要自下而上揭露脱离群众的阴暗面，少奇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问他他也不知道，文革小组的人也并不清楚。刘、邓不是发牢骚，确实是手足无措。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这句话来源于刘少奇，在这个会以前刘少奇就说过。毛主席认为再不解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问题，党就要成为人民的敌人。群众对党是有不满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干部特权，群众都有意见。当然也不能认为群众意见都是对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

十一中全会以前，中央常委会是刘少奇同志主持。总理、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参加。毛主席那里开会都是他自己定名单。陈云同志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是常委了，毛主席、少奇同志开会时都不通知他。1964年以前

就没有他。

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后，原来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常委会。后来张春桥告了状，说少奇同志对“北大六一八简报”有批语，毛主席大怒。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毛主席下决心换接班人。

那时林彪不在北京，日常工作就由总理主持。从这个时候起，中央批文件就是总理批了，没有少奇同志了。把少奇同志换下来，是全会前夕就定了的，选举只是个形式。全会公报是早就写好的。公报初稿是总理批的。总理主持日常工作时，有些人可以直接向毛主席汇报，不经过总理。如陶铸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也可以。总理参加文革小组的会，但文革小组向毛主席汇报的署名是陈伯达、康生、江青。总理要报告，就单独报告。

毛主席本来已退居二线，这时又回到第一线主持常委会。

毛主席不在时，林彪主持常委会。政治局的会他不参加，就派叶群参加。文革小组的会也是派叶群参加。

7月1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回来，我建议康生赶紧向总理汇报，国内情况很严重，不是一般的运动，刘、邓都陷进去了，陈老总也陷进去了，总理千万不要再陷进去。我当时在陈伯达那里起草十六条，是跑步去找康生的。康生到机场欢迎总理时，同总理坐一个车回来，一路上向总理汇报了。康生说，一是总理不要陷进去，二是中央文革现在与过去大不一样，总理要参加，要过问。刘、邓可能站不住了。陈毅在张彦问题上也陷进去了，总理不要再陷进去。总理第一不要参加工作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管不了。（康生那时对江青有意见，看不起她。老早就知道她历史上不那么干净）总理也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回来差不多天天接触文革小组的事，首先抓清华。当时总理只要不陷入工作组问题，毛主席就会同意由总理主持工作。（以上选自《王力反思录》下册，565—614页）◇ 康生与文物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

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倒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有交往的人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

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

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

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以上选自《王力反思录》下册，1271—1276页）

霞飞：《王力沉浮录》

在中国,有两个王力：一个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原籍广西的王力，一个是曾在“文化大革命”前任中联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原籍江苏的王力。此文所说的王力，是指后一个王力。这个王力，曾经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红极一时的人物。

曾经是党内才俊，受到康生的提拔和推荐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秘密工作。1940年，根据中央决定撤出东北军。不久，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

在当时，王力可以说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中央下发的带有一定理论性的文件，他都能读懂，而且理解较快、较深，常常还能谈出自己的见解。在平时，他经常接受上级指派的任务，给一些基层干部谈一些理论问题。王力口才出众，常能深入浅出地剖析理论问题，分析当前形势，使听众很是信服。干部们有什么不懂的事情，也常去请教王力。

此外，王力还是个笔杆子。早在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他就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写一些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报告，受到上级的好评。后来，王力在党的内部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有材料、有观点，文笔也比较好，读后总能让人眼前一亮。王力到山东分局工作后，在任《大众日报》记者时，写文章更多了。他

写的报道稿、评论稿，以及发表的一些带有理论性的文章，是这份报纸上的重头文章。王力的小说《晴天》发表后，在解放区流传很广。当时，在山东分局中工作的有点文化的干部，都把王力视为楷模。

青年时期的王力能在共产党内崭露头角，固然有他自己文化水平较高、文笔好、聪明能干、工作努力的因素，但还有一个外在因素，就是康生的大力提拔。

康生曾经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王力调到山东根据地工作后，正好在康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康生通过读报纸和在工作中接触，很快就发现了王力。

当时的康生，以理论家自居。在党内发表讲话时，也喜欢一套一套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摆出一副“党内理论家”的架势。康生也读过一些书，爱好舞文弄墨。这样，王力与康生二人似乎有了某种共同点。两人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王力经常是康生的座上客，康生闲下来也愿意到王力住的地方坐一坐。两个人谈诗论文，常常一谈就谈到深夜。这样，康生和王力虽然是上下级，但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康生在他的下属中，是比较垂青于王力的，经常安排王力做一些重要工作，让他执行一些重要任务。当时山东分局的一些重要文章，甚至给中央的报告，康生都安排王力执笔，或者参与起草。久而久之，王力就成了山东分局的“文胆”，成了山东分局离不开的人物。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解放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南方城市和广大地方，急需一批能力强、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南下去建立政权。这时，康生想到了王力。他把王力列入了山东分局向中央推荐的几个干部名单中。中央同意了康生的意见。全国解放不久，中央将王力调往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

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在当时已经是十分重要而且地位很高的职务了。那时，中央对华东局的工作十分重视，配备的干部也很精干。像王力这样资历的干部，能够担任这样的职务，已属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对华东各省市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对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解放日报》的社论，大多出自王力之手。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越南。当时确定选择去越南的干部的

标准：一是要政治上可靠，思想好；二是要有一定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强；三是要有为国际主义献身的精神。同时，中央还有一个考虑，就是：选一些年纪轻、能力强的干部赴越南，一方面抗法援越，一方面接受锻炼和考验，以后回国后要重用这些干部。此时，康生又想到了王力。他亲自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名，建议派王力去越南。由于康生的举荐，王力被列为赴越工作人员之一。1953 年底，王力即赴越南。当时，王力是以正司局级干部赴越南工作的，在赴越人员中，职务是比较高的。在越南，当然也受到重视。他一到越南，就担任了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同时，还做组织和训练民兵的工作。

对王力的一生来说，这至关重要的两步，全赖康生的提拔和举荐，因此可以说，康生是王力的“恩师”。

一炮走红，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1955 年 10 月，王力被调回国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 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杂志社，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赏识。从 1960 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 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 1964 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知道王力，王力也经常给中央写一些重要文稿。有些文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看到过，这就使王力在中央高层领导人心中挂上了号。50 年代后期，中共中央有一个打算，就是要选一些年纪轻，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到中央担任部一级的领导职务，以后作为“苗子”来进一步培养，其中的优秀者，还可以再提拔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在考虑这类人选时，由于此前康生多次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面前替王力说好话，加上王力工作确有成绩，因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同意把王力选拔上来。

王力人生重要的一步，是担任中联部副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负着了解世界政治动向，分析国际问题，帮助中共中央制定国际战略的任务。它实际上是既做重大的外交工作，又研究国际问题的部门。

王力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曾经 10 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中

苏两党辩论时，我党发表的“十评”文章，王力曾参加起草。

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并且让康生当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审稿人。康生在选执笔人时，选择了王力。王力深知写作此文的重要性和作者的分量，于是欣然受命。在康生的指导下，他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量历史文献，研读了一些毛泽东的有关重要著作，然后下笔写作。写作期间，王力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日冥思苦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草稿。康生看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王力按照康生的意见又修改了一遍，然后由康生转呈林彪。林彪看后，基本上认可。林彪还问康生起草人是谁，并让康生约王力到他住的地方来面谈一次。当王力如约来到林彪住的毛家湾一号时，身体不好、一般不见客的林彪亲自接见了，与他谈了很长时间。林彪问了王力的一些基本情况后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努力，好好工作。同时，林彪也对文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此次见面，王力给林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于写作这篇文章，王力与林彪之间便有了一种亲近感。

1965年9月3日，署名“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出自王力之手的文章，在介绍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之后，着重强调该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断：毛泽东思想具有国际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观点赞赏有加，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毛泽东赞赏这篇文章的话，很快就在中央高层中传开了，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们更加赏识年轻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了。可以说，王力通过写这篇文章而“一炮走红”。

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并在党内公布了小组人员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王力在中央文革小组成

员中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排在部队高级领导干部谢镗忠和著名历史学家尹达之后。另外，王力还担任着该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此后不久，谢、尹二人很快就被排除在中央文革小组之外，这样，王力就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地位仅次于组长和副组长的“大员”了。

王力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后，很快就与江青熟悉了。江青早就知道王力，欣赏王力头脑清楚，文笔好。不过，江青最欣赏王力的，是王力与她一样有极“左”的头脑。因此，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江青把王力当做第一号大员使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找王力商议，有什么重要文章，也让王力执笔。而此后不久，江青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实际“当家人”。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1月8日，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宣传组，由江青提名，王力担任了组长。

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因为早已经是王力的恩师，对王力更是关爱有加。他经常把王力叫到自己的住处，向他面授机宜，有时还长谈至深夜。王力则进一步向自己的恩师靠拢，每有重大事情或者有自己考虑不透的事情，总要跑去请教康生。康生的话，他最信服，康生给他作出的指示，他不折不扣地照着去做。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只有江青、康生二人。

想在武汉“露一手”，结果捅了“大漏子”

1967年初上海发生一月夺权事件之后，全国的局势处在更加动荡之中。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为了落实毛泽东依靠人民解放军稳定局势的决定，1月25日，林彪、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等共同商议，拟出了七条规定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十分重视。在对文字进行了修改之后，加上了一条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作为中央军委命令（简称“军委八条”）发出。“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立即行动，全国局势一度稳定了许多。

在“军委八条”发布后，武汉军区立即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

但没有得到军队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不高兴了，他们和军队内部的一些造反派勾结起来，把矛头指向了武汉军区。2月初，这些造反派组织强占了红旗大楼，接管了长江日报社。3月，武汉造反派贴出了“打倒陈再道”、“枪毙钟汉华”的标语。武汉动荡的局势，使王力意识到“露一手”的机会来了。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到武汉去“一试身手”。

1967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了解情况。王力听说后，直接找到负责安排毛泽东行程的周恩来，要求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还说，江青已经同意了。周恩来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之前又到南方走了一趟，去向毛泽东汇报也好，就同意了。但周恩来同时向王力提出：到武汉后，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王力答应了。

然而，7月14日，王力刚到武汉就违背了周恩来不准他公开露面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的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武汉的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称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亲人，欢迎他到武汉来解决问题。随后，王力便以中央“大员”的身份，陪谢富治同陈再道等人谈话，向陈再道和武汉军区其他领导人施压。7月17日，王力还跑到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左派”组织“百万雄师”的总部去，把“百万雄师”头头的名单弄到手，并公开指责“百万雄师”搞武斗，要求“百万雄师”管好自己的人，不要管别人。这一下，把“百万雄师”激怒了。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万余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大卡车和8辆消防车涌进武汉军区大院，高呼口号，并质问王力为什么说“百万雄师”不是革命组织，如不答复，明天全市罢工，“百万雄师”要在军区呆一个月。7月21日、22日、23日，又连续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在后几天还喊出了“毛主席受蒙蔽”、“打倒王力”、“江青靠边站”等口号，贴出了类似标语，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各地群众也举行示威游行，支持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件事，史称“七二〇”事件。这个事件，纯粹是王力捅的“大娄子”。

王力在武汉支持一派压一派，搅乱了毛泽东、周恩来要安定武汉大局的思想。而此时王力在哪里呢？原来，他被群众抓走之后不久，就被军队要了回来。后来，按周恩来的指示，他被武汉空军的刘丰保护起来，于7月22日派飞机送回北京。

王力回到北京时，江青等人为了表示对王力的支持，也为了树中央文革的威

信，特意组织了许多人到机场迎接王力。此时的王力，腿上夸张地打着石膏和绷带。走下飞机时，在武汉被吓得面如土色的王力，摆出了一副英雄的样子，向在机场欢迎他的人挥手致意。接着，王力以“凯旋者”的身份，乘车回到了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地方。7月25日，在江青的安排下，北京搞了一个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集会，“热烈欢迎”王力等人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

王力回北京后并没有安分。他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介绍“七二〇”事件，把责任都推到陈再道的身上，激起了不明真相的北京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对陈再道的义愤。他和关锋、戚本禹还一同去向江青汇报，要在北京找陈再道辩论。江青听后，马上去找周恩来，逼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与陈再道面对面辩论。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在7月26日召开了一个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请陈再道和钟汉华在会上谈一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没有让王、关、戚参加这次会议，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参加这次会议了。经过他们造谣、鼓动，北京的许多造反派组织和一些部队都认为陈再道要搞兵变，陈再道已是有一口难辩，处于挨批的地位了。果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陈再道的质问集中在兵变问题上。有的军队高级领导人还把陈再道指责为钻进革命队伍中的蒋介石，说武汉军区是汉奸窝，“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叛乱。当陈再道进行辩解时，他的领章、帽徽被撕掉，讨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第二天，陈再道、钟汉华被撤销军区司令员和军区政委职务。

王力并不只是搞乱军队就罢手。8月上旬，王力按照江青、康生的旨意，把制造动乱的手伸向了外交部。他们觉得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关、戚的策划下，组成了千人的“揪陈大军”，要揪斗陈毅，并且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8月7日，王力约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权。王力在谈话中说，要打倒陈毅，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他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冲击并砸了外交部，宣布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

权。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毛泽东亲自下令将王力“抓起来”

“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对王力并无恶感。毛泽东赏识王力，江青、康生也在周恩来面前说王力的好话。在他们的推荐下，周恩来也认为王力年轻，头脑灵活，有能力，能写。因此，当时周恩来对王力也曾经抱有很大期望。“七二〇”事件中王力被群众抓住扣押时，周恩来对王力的处境很关心，想方设法打听到了王力的下落，让武汉空军设法保护王力，并派飞机把王力送回了北京。北京举行的欢迎王力的“百万军民集会”，周恩来也参加了。但此时周恩来对王力的行为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在会上没有讲话。

王力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使周恩来看透了王力，认定王力居心不良。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恩来还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

本来，在康生、江青的一再推荐下，毛泽东对王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也是很有好感的。“七二〇”事件之前，毛泽东也没有看透王力，他当时只是认为王力过左，对群众的态度很凶，不听他的话。当时，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王力，但也没有认为他是坏人。后来他说过，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毛泽东那时只是认为王力同他不一致，王力的方法不对，并没有认识到王力是坏人。

“七二〇”事件后，王力等人向毛泽东、党中央汇报时，都说陈再道要搞兵变，要发动反革命暴乱。他们向林彪写了一个材料，说武汉有发生兵变的危险。林彪听后也相信这一说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邱会作飞往武汉，让毛泽东迅速离开武汉。

毛泽东到达上海后，越想越不对头。他经过两天的独立思考，认定陈再道不是搞兵变。7月24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谈话时问：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杨成武回答说：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又问：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回答：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毛泽东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再道、钟汉华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泽东也知道了。此时，毛泽东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恩来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他。8月26日上午，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被关押之后的王力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他

当时的考虑是：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同时，王、关、戚深受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任，他们会保护王、关、戚的，如果只由自己单独行动抓王、关、戚，江青、康生、陈伯达会闹事。只有通过开会的方法，在会上把毛泽东的指示说清楚，才能动手抓王、关二人，并让戚停职检查。周恩来预先在钓鱼台单独和陈伯达谈了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表示拥护毛主席的决策。这样，就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

准备停当后，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王力他们走进会场时，仍然是往常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板一眼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恩来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恩来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恩来的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宣布的是毛泽东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此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请假检讨”后的王力与关锋，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因此，王力和关锋实际上是被限制行动的。

王力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后，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每天的伙食标准还和他在台上一样，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报纸，还允许听收音机，在规定的范围内还可以自由活动。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轻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或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

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仍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这座别墅的四周环境很好。王力在那里，每日的活动也很有规律。他每天起床洗漱后，就在规定的地方锻炼身体。活动一会儿后，去吃早饭，然后是看书、看报、听广播。午饭后再小睡一会儿，下午继续看书、看报、写检讨。晚饭后还可以活动一会儿，散散步，然后就早早睡下了。由于条件好，加上生活有规律，王力的身体反而比被软禁前强健了许多。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住得不好，吃得也很差。但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曾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

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放了出来。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住了一段时间后，他感到不满意，说是门口有人站岗，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供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他和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他喜欢读书，还不时写点儿小文章。

1982年4月《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他关于纠正引用古文时误用两字的信，还为他的信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中称王力为同志。但是，那时乃至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此王力是彼语言学家王力，没有太注意此事。

自1982年1月以后，王力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虽然有保姆照顾，但他还是愿意和老伴一起上街买东西，一起打理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后虽经医生多方治疗，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

师东兵著《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访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

听到王力身患癌症的消息后，十分惋惜，觉得应该看望他一下。研究[文革]历史，他可以称得上是重要的知情人。这倒不是仅仅因为他当过一年零两个月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了文革初期一些重要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从六十年代就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中联部副部长，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所以，他对中央最高层的决策过程，应该是充分的发言权的。目前，能够在文革前文革中两个历史时期列席常委会的活着的人中，大概只剩王力一人了。我很清楚这个[活档案]的价值，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人的虚荣心很强，也不会把有损于他的形象的那些历史事实轻而易举地公布出来，他会利用他独特的身份继续不切实际地拔高自己，但是他不一定会像某些人那样厚颜无耻地打击别人。

毛主席对王力有过评价：“王力这个人不可重用，不可轻信他的话。他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把整个国家的摊子当破烂的来整，要坚决地打倒他。”

早在文革时代，我就接触过这个人。不过那时，他是身居高位的文革要员，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不会坐下来好好地交流一下思想的，更别谈能够研究历史了。今天，他的地位变了，使我们能真正有时间和机会坐下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和他接触几次以后，我觉得他的最大的缺点，或者说他的全部悲剧就在于他总是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他整天是在想象和唯最高领导之命而是听的生活里过日子，这就决定了他的归宿只能是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起伏。他自己的历史和思想已经不能允许他有属于自己的自我，他的行动归结了他自己的一切。而他却想入非非地企图东山再起。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真是一场大梦。”王力对我说，“我参加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却坐了整整十多年的牢房。可是有人还是认为我是什么文革的红人。真正文革的红人应该是华国锋、汪东兴这些人。历史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神情很激动。我对他说：“你还是稍安勿躁，激动对你的身体不利。历史对每个人归宿应该都是公平的，只是我们许多人不理解而已。”连我也觉得奇怪，怎么对他说了这样的话？

据他说，1981年12月26日，邓小平委托邓力群和他谈话，传达了邓小平

对他的评价：“从三中全会以后，王力写的东西我全看了。我认为，他的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是有文字修养的，也是能够为党工作的。”王力听到这些话，激动得泪水纵横，发誓要为党再努力工作十几年。他曾在同年4月19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这个人，属于邓小平曾对我讲过某某时所说的[不可重用]的一类人。我言过其实，有很大的片面性，容易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过去十四年，通读了马恩列全集，积习恐怕还是难改的。毛主席说我‘没有当过家，不知柴米贵’。我只能是在正确路线下做一点文字技术工作，不能做负责工作，个人摔跤子事小，祸国殃民事大。我好提意见，但对我的话不可全听。毛主席信用我时说是[顶多听三分]。超过三分，我就会连累他老人家，也就要犯错误了。我深知党不要我，照样鹏程万里；当我离开党，寸步难行。在新时期，别人从零开始，我是从负开始。时刻准备着，在任何一个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结束自己的生命。”

应该说，王力的自我解剖是诚恳的。小平对他的评价，是准确而又恰如其分的。在我和他未接触之前，我已经听许多的老同志对他作了充分的介绍，他们都没有过多的成见，有的显然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有人说：“这个王力，还是可交的，他没有太多的坏心眼，别人对他不能原谅，是因为他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伤害人往往是最惨重的。”这，也许是事实吧，但是岂但一个王力呢？

1987年2月20日下午，我敲开了王力的家门，他的夫人王平权告诉我他正在午休。我给她打了个手势，示意她不要惊动他。于是，我进了王力的书房，和他的夫人先聊了起来。

王力生于1921年8月11日（阴历七月初八），江苏淮安人。1935年参加青年团，那年他才14岁。四年后他在国民党东北军里秘密参加共产党，介绍人是现在的国务委员谷牧。党组织从东北军撤出后，他到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作，担任《大众日报》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1943年有担任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的主编。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历任华东局宣传部教育科科长、华东局驻渤海区党委土改工作总团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优秀的共产党员焦裕禄曾是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晴天》等几部反映我党土改的革命小说，成为全国作家协会的第一批会员，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建国以后，他又在上海担任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1953年底调到越南

劳动党中央当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两年后奉调回国，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不久，又出任中联部对外宣传处处长，主管新华社的国际部。1958年6月1日党中央创办《红旗》杂志，他当了第一任编委，负责国际评论，他用[于姚力]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还参与并负责编辑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这套书，为培养、教育全党从新民主主义转化到社会主义阶段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中苏关系紧张后，他参与了我党同苏共交往的一系列重大活动，是一至就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重要文章的起草人之一。

王平权在谈到王力这些经历后，深有感触地说：“他不仅对建国以来我党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有较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对1957年至1967年8月这段时期里，党所犯的错误，也有切肤之痛般的总结。党和人民应该发挥他的余热，这对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党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为什么不能谅解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人呢？”

我们正谈着，王力走了进来。

和二十多年前相比，他明显地苍老了。前额上已经谢顶，稀疏的头发灰白，走起路来迟缓而稳重，但精神良好，满面笑容。他使劲地摇晃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说：“我很愿意和你们年轻人谈谈。写历史，一定要真实。只有真实地把过去的经历写出来，才能使后人吸取经验和教训。现在有些回忆录和所谓纪实文学歪曲历史，在提到我的时候把别人的罪行也往我头上扣，这怎么能叫人心服口服呢？”

我说：“历史背景的真相是任何人也封不住的、歪曲不了的。假的只能蒙蔽一时，绝不能得逞永远。现在市场上不是经常有伪劣产品吗？我们党内现在也有不少这样的伪劣产品。”他很欣赏我的这句话，不住地说：“好在我们是处在光明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一再强调实事求是。这不但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也是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不久前，上海一位叫叶永烈的作家采访我，他把录音机往桌上一放，我就说：[我的历史不怕录音，我认为录音比记录可靠。我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敢负责。我只是反对对录音和记录进行歪曲和利用，更反对莫须有、诽谤性的剪辑。]这方面，我是有苦头和教训的呀！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完全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一言难尽呀。”

我知道他是指 1967 年 8 月 7 日晚上那次所谓他的[讲话]。正是根据那次未经他本人审阅的记录，给他扣上了“反总理”、“反陈毅”、“五一六黑后台”等的帽子，几乎置他于死地。直到最近一两年，还有一本“纪实文学”的小册子在写到这段历史时，竟说王力在那一天，“气急败坏地跑到外交学院的大礼堂，发表了“王八·七]讲话。”其实，作者连地点与背景也没搞清楚，怎么能不出笑话呢？王力自 7 月 20 日的“武汉事件”后，腿和脚严重骨折还打着石膏，怎么能跑到外交学院发表什么讲话呢？

王力回忆着那天晚上的情景说：“中央文革接到外交部姚登山和一些群众组织的报告，说他们有事要向首长汇报。正好那天晚上有文艺演出，中央文革的人全部看节目去了，钓鱼台只有我在家养伤，所以他们让我听汇报。我在十六号楼我的床上听取了姚登山等人的汇报，同时我有一些插话。后来他们把这些插话串起来，整理了一个所谓的[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的记录。此件我没有审阅过，后来我发现我的一些重要的话没有收进去，他们的一些话也没有写进去。比如我说[任何群众组织，只要是反对总理的，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限。]还有姚登山、王宗琪等人说：[我们并不是真要打倒陈毅，只是要给他点压力。什么时候毛主席和中央保陈老总，我们立即拥护。]我说：[不是真打倒，这我就放心了，要报告总理，让总理也放心。]后来康生、江青把他们干的事也栽到我的头上来了。”

事后不久，周恩来曾经让他的秘书钱家栋问王力：“你是不是有一个[八月七日的讲话]”，王力回答：“不是我的讲话，而是我在接见外交部一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的时候的插话，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审阅，也不是我的原话。”他把当时的情况汇报了一遍。

毛泽东看到那个“八月七日讲话”和其他的材料后，问江青等人：“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江青说：“我早就一眼看出王力是坏人。”康生连夜查了王力的档案后，向毛泽东汇报：“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王力确实像江青讲的，是坏人。”毛泽东十分生气地说：“他胡说八道什么？他的错误要比陈毅和其他的人的错误大得多。”马上，毛泽东对王力的问题作了一个重要批示，决定对他进行审查。

提到这些，王力至今激动不已：“我是在国民党东北军作地下工作时，有谷牧同志介绍入党的，怎么能成了国民党特务？是的，我在参加莫斯科裁军会议时

同苏共安德罗波夫谈了一次话，那也是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而且有很多人在场，怎么能成了苏修特务？江青这么不择手段地整我，完全是另有原因。她早就说过：[谁犯了我的疑，我就叫他不得了！][就是无辜的，也要这么定。]就在整我的前两天，康生和江青有个密谋。那天，我在轮椅上坐着休息，正好被屋里的门挡着，就见康生和江青边走边谈走过来，因为他俩都是近视眼，没看见我，我也没啃声。他俩进了屋里后又接着谈。康生说：[王力是在苏北参加革命的，苏北的党员是红旗党，全是假的。他还是华北局的干部，华北局没一个好人。]他还说：[王力的老婆家里也是一窝黑货。]其实，我老婆一家都是老党员、老干部。她父亲和大姐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她姐和邓小平在莫斯科是同学，这又怎么能说成是一窝黑货呢？江青和康生他们当时都对我有很大的意见，说我是最不老实的人。”

我问：“你究竟是在哪些问题上得罪了江青，使得她那么恨你呢？”

“说来话长。”王力陷入往事的沉思和回忆之中，他缓慢地向我讲了起来... ..

1964年9月，王力随着彭真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在讲到京剧改革和学术批判的问题时，王力说：“我们不要轻易地把学术性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领域来，学术批判要有界限，不要弄得人人自危。京剧改革我是赞成的，现代戏也很好。但是我不赞成传统戏都不要演了，还是可以演一些的，鬼戏也不一定一律禁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就是鬼戏吗？”

毛泽东听了这些话，脸上马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事后，他还是接受了一些意见，曾说：“看来江青有一点[左]。”江青闻讯后，对彭真、王力等人大为恼火，骂他们是“破坏京剧革命。”她说：“还有一些人也不是好东西，跟着那些坏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无产阶级的革命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这一年下半年，刘少奇决定王力列席常委会，并委托彭真向毛泽东汇报。汇报中，彭真说了王力一写好话，夸他是“优秀干部”。江青对别人说：“这充分证明，王力早就是彭真的人了。我们选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班子的時候，已经知道王力是彭真、陆定一他们一伙的，但是考虑到他已经揭发了彭真的许多问题，总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有这样的一些人可以了解他们的黑幕。就是考虑到这些，把他也吸收进来的。”

1966 年夏天，王力和贾一学、李鑫三人联名写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第十五期《红旗》杂志上。文章从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认为：“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阶段；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斗争；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带修正主义的斗争。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这篇文章最后还有精彩的几句话：

“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声赞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约翰逊、腊斯克之流的帝国主义者，切齿咒骂。他们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用最恶毒的语言，掀起了反华歇斯底里，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动家货为什么这样暴跳如雷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传播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能不冲击和震撼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摇摇欲坠的统治。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响亮地敲响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丧钟。”

这些话现在看来，已经是很可笑的东西了。但是在当时，他的这些高论的确鼓舞了亿万人民的革命斗志和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

1983 年，中央林彪、江青两案办公室于 8 月 20 日写出了《关于王力问题的审查报告》，说他“竭力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其中的一条罪证是他在“1966 年 3 月，根据康生的授意，起草《红旗》社论《彻底批判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罗织十大罪状，诬陷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集团，是一批大恶霸、阎罗王’等等。”所以，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了他的党籍。

由于《审查报告》用词不够准确，对事实没有很好地核准，让王力抓住了把柄。王力在给中央的申述中声称：“第一，《红旗》社论发表与7月1日，而不是3月。3月份彭真同志还在主持书记处的工作。第二，社论的题目是《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审查报告》把原来题目中的[一些负责人]去掉了，又增添了[反革命]三个字，意思就改变了。这种做法是很不正确的。第三，起草这篇社论的背景是：1966年6月18日，毛主席在上海批评了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没有系统地批评彭真的错误。毛主席说：[彭真把北京变成了独立王国，为什么北京的同志至今不总结教训，难道对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黑色王国还有保留吗？]刘少奇听到主席的批评，于6月下旬召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系统批判彭真的错误。会上把彭真的问题议了一下，派康生飞往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康生把彭真的问题归纳为十条，在汇报中毛主席又插了许多的话。康生回京后把这十条和毛主席的指示向常委和书记处分别作了汇报，会上决定把这十条和毛主席的指示写成一篇社论。因此，我起草社论是根据中央的决定而不是根据康生的授意。社论所说的大部分是毛主席的原话，因此，根本不应该追究这篇社论的责任。何况，王力只是参与写作而已，更不能认定是王力的错误。”

我找出当年王力起草的这篇社论作了仔细的研究，社论给彭真和北京市委强加的十大罪状，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功而不是过。就是这十大罪状，在当时也未必就是真实的。请看：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

同样，这十条中的若干条，就是在当时也是在拼凑罪名，根本不严密，也很荒唐。

但是，里面有许多精彩的段落，的确是毛泽东的语言，如：

“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我们，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党内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由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我们党能够及时地识破和摧毁由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垄断的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动堡垒，恰好表明我们党是强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是非常英明伟大的。”

这些决非是王力敢于和能够加以编造的。

《审查报告》中，还有这样给王力定罪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一再宣扬不要怕武斗，不要怕乱。”引用了许多王力在记者站的讲话，说明他的罪行。

王力是这样申诉的：“第一，这些引文，从未同本人核对，没有确实可靠的根据；第二，记者站，即文革小组的快报组，其成员主要是从军队抽调团以上的政工干部组成的。任务是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常委反映文革动态。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常委有什么新的指示和意图，王力都要向他们传达吹风。这是中央给王力的任务。对他们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不准把中央机密外传，更不准参加和干预下面的运动。发现有违纪者，立即调离。因此，说王力的[这些谬论，通过记者站在各地广为散布，煽动了武斗，制造了混乱]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记者站是中央的核心机密部门，所以王力在记者站内部传达的话，都不能成为王力的罪状。第三，《审查报告》把‘不要怕乱’同[不要怕武斗]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

《报告》列举王力的话，并没有一句说过[不要怕武斗]。第四，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基层党组织领导问题，当时领导核心中有两种意见。毛主席坚持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有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组织来领导]。并且发出了中央文件，即 1966 年 12 月 9 日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王力向记者站这样的核心机密部门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是正常的。第五，至于[不要怕乱]的问题，那时毛主席反复坚持的观点。1966 年 7 月 8 日，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 8 月 23 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1967 年 4 月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是一场全面内战。]5月25日，他又说：[北京也在分裂为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7月13日，毛主席又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着很好嘛！]7月28日，毛主席又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并没有什么关系。象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我列举的这些，都是现在还有文字可查的。由此可见，王力所传达的都是毛主席的指示，只有不足，并无过头。”

王力这个申诉里，有不少是强词夺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完全是唯毛泽东之命而是从的，如果是这样，他就不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把他打倒，而很有可能是在抓江青之时就把他捎带了，但是《审查报告》所罗列的那些东西，无疑给王力以推卸之词。因为是王力，这些问题就完全推到他的身上，显然是有失公平的。但是，这并不能给王力减少丝毫的责任。这一点，王力生前始终没有充分地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开过，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示批判刘少奇，江青同时提出也要批判邓小平，并让张春桥动员王力在会上发言，王力觉得自己发言不妥，所以始终保持沉默。江青认为王力是在“观测风向”。当时，王力担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他主张刘少奇、邓小平未撤销职务前，都应该按规定分发文件。这也引起了江青对他的不满和愤恨。江青曾经对张春桥说：“王力这个人其实是个滑头鬼，总想八面玲珑，四面讨好，偏偏我这里就不让他讨上好。”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巡视时，对王力说：“我不赞成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那样势必造成武斗。”王力提醒说：“主席，你不是经常说小平的好话吗？是不是刘、邓还要区别对待？”毛泽东点点头。王力回到北京后，立即把毛泽东的话整理出来，送给戚本禹和江青。这时，江青得出了王力是“刘、邓埋在中央文革的黑钉子”的结论，准备对他下手。

回忆到这里，王力笑着说：“我对江青始终采取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当她给我下指示时，我总爱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主席的意见？]有时江青会沉下脸，不高兴地说：[这是主席的意见。]当我感到她转达的意思和主席过去讲的话不一致时就当面给她提出来，总弄得江青下不了台。这也是江青整我的一个原因吧。”

众所周知，王力是 1967 年 7 月 20 日“武汉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之一。正是这一导火线，使“揪出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响彻全国，天下大乱到最高峰，以至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收缩部署，重新思考若干问题。时隔二十多年后，王力对我说：“7. 20 事件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即使毛主席这样伟大领袖亲自坐镇，只要是违背民意的事，也要碰大钉子的。这里，真正的教训是林彪利用了这个事件，在军队里排除异己，重用亲信。从前逐步在中央内部形成了林彪集团，并逐步掌握了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

王力向我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早在 7 月初，毛泽东就去了武汉，住在东湖宾馆指导全国的文化革命。而当时，王力正在重庆完成中央交待的赴西南的任务。

7 月 13 日晚，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到重庆，要谢富治第二天赶到武汉，去执行紧急任务。周恩来没有也不可能在电话里说是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一类的话。谢富治请示总理，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一起去，周恩来同志同意了。当谢富治把总理的决定告诉王力后，王力一怔，说：“我们西南的任务还没完成呀，为什么改变计划？”谢富治也回答：“不清楚。我们马上赶去执行任务就是了，不要再过问了。”

王力马上给北京的关锋打电话，询问原因。关锋说：“任务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第二天，王力陪同谢富治、余立金到了武汉。陪同人员有北航红旗的井岗山、段聚平、胡慧娟、武介之等红卫兵。

谢富治到武汉后，要王力等人陪他到街上去看大字报，他们在武汉测绘学院门口时被群众认了出来。立刻，该校的群众组织就用高音喇叭广播并贴出了欢迎标语。王力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毛主席。”当即，同在武汉的周恩来亲自布置正式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发出通知。

当时，武汉地区两大派武斗激烈。周恩来从维护毛主席的安全出发，要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各回本单位去，不许武斗。谢富治、王力根据这一精神，在 7 月 15 日、16 日两天内多次重申了这一指示。到了 7 月 18 日，毛泽东提出：“为

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在老人家召集的这次会议上，王力提出：“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汉，而是江西，是中央文革决定的。”毛泽东听了，很恼火地说：“这样大的事为什么不请示。你回去以后把这个文件送来我看，要中央文革作公开检讨。”王力回去把这份文件找出来，上面有陈伯达、康生、江青三人亲笔签名的字样，提出对某类群众组织“要采取专政措施。”

在此前后，王力传达的经中央研究共同制定的四条指示，即“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司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向群众传开了，武汉的一些部队和群众组织极为愤怒，纷纷议论和抗议来自中央文革的这些精神，把斗争的锋芒首先对准了王力、谢富治等人。

在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上，当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提出：“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毛泽东接着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当武汉军区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写检讨时，王力还帮助他们修改，有的地方都改轻了，军区的有关同志看了都表示很满意。

但是，百万雄师及部分军队同志的愤怒反抗终于还是爆发了。7月20日，他们冲进东湖宾馆，包围了王力、谢富治的驻地，并将他们绑架走，进行批斗、游街。同时，也有部分群众包围了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当即带领警卫员、秘书等四、五个人从另一个后门跑了出来，到了火车站后才给汪东兴打电话。武汉事件发生后，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在北京的林彪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立即分头行动，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周恩来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乘飞机亲临武汉，将王力、谢富治先后从群众手里解救出来。这时，康生、江青等人一口咬定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兵谏”。毛泽东起初也很震怒，说：“想不到这次我竟然掉进贼窝里了。”后来冷静下来后，才说：“看来，他们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在北京的中央文革成员开了碰头会，决定组织百万人热烈欢迎王力、谢富治等人回到北京，并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声援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声讨百万雄师和武汉地区军队的领导同志。王力建议：“不要这么多人迎接我，这样影响不好。”

江青说：“这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主席。”

当王力讲到这段历史事实的时候，我就有点耽心，是不是果真如此？后来我听一位熟悉内情的人说，当时决定召这样的大会的并不是江青，而是周恩来。周恩来对在京的中央文革和主持工作的林彪建议：“要用全国的力量来打击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逆流，北京要召开百万人的群众大会，给一小撮走资派迎头痛击。”如果真是这样，王力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虚假的东西了。

于是，当王力、谢富治走下飞机时，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人员全部前往迎接。王力、谢富治乘坐敞篷小卧车，接受了百万群众的欢迎。然后，一起登上天安门，使武汉事件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全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主持会议决定在天安门城楼开大会时，并没有通知林彪。但开会的前一天，关锋接到叶群的电话。叶群问：“听说天安门广场有个会，是不是？”关锋回答：“是有这么个会。”并把会议的内容讲述了一遍。叶群又问：“林彪同志想参加这个会，不知行不行？”关锋说：“那当然好啊！”叶群说：“如果你们同意了，那我就正式请示江青同志了。”

由于林彪亲自出场，大大地提高了天安门广场会议的规格。紧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在支持你们》等社论，把“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变成了反军乱军的行动。

回忆到这些往事，王力痛心地说：“在天安门上开会的时候，我就对江青说：我担心这样下去，全国会出现反军的连锁反应。江青置之不理。果然没多久，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我没想到，我的这些活动还使江青等人引起嫉妒和愤怒。谢富治回京后同我交谈说：[我同你相处一个月，没想到中央文革还有你这么右的人。]他的话，同样引起了我的震动。”但是，我翻了当时的文革材料，从王力的各次讲话里，看不到他这样的情绪，连一点痕迹也没有。

很快，毛泽东以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他以革命家和政治家的伟大气魄，开始纠正极左派们的错误。毛泽东发出了一系列不点名的警告，同样引起了林彪、康生等人的不安。林彪在8月下旬，向毛泽东请了一个月的病假，坐着火车到处跑，他曾经对中央文革的人说：“我只有睡在火车上，听着火车的轮子的声音才能睡得着觉。”实际是躲了起来。王力也觉得空气反常时，曾给康生的秘书说：“我们首长不得了了，三

天没吃东西没睡觉了。”那时，他们包括林彪在内，都猜不透毛泽东的心思，都不知道他每天究竟在想什么，都怕戴一顶跟不上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帽子。王力既要显示他是毛泽东司令部里的人这个形象，又把不准毛泽东的政治脉搏，只好在红卫兵那里打听消息，然后再来一个总批发，名其曰：“听取群众的意见。”这就导致了他 1967 年 8 月 7 日接见红卫兵和外事口群众组织的讲话，实际上是他听取姚登山等人的插话。群众组织把他的片言只语整理出来，登在他们办的小报上，形成了他垮台的导火线。

其实，真正导致他们垮台的原因并不仅仅是那些东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有人密报他们在背地里整理和搜集了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当然也包括陈伯达等人的材料。张春桥对江青等人说：“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越来越象群众组织的领袖了，他们在千方百计地抓队伍，根本不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则放在眼里。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后，毛泽东特意指示江青和张春桥：“你们要注意，和王力、关锋这些人划清界限，要让群众和红卫兵感觉到你们和他们不一样。”

中央关于王力的《审查报告》，把武汉事件再次作为王力的罪状。为此，王力在《申诉》里提出了六点意见：

“第一，1980 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经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再追究王力的责任了。那时中纪委要王力誊清两份笔记，一份是毛主席 1967 年 7 月 18 日在武汉的谈话记录全文；另一份是周恩来同一天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座谈会上总结发言的要点。看了这两份记录之后，就知道王力讲的话，正是毛主席、周总理讲的话。例如：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作团结对象，等等。周恩来传达的方针更厉害，要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这一点王力恰恰没有说。”

“第二，至于要各派群众组织都[撤除据点]，当时不但如此，还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给军区保管。这是周恩来为保卫毛主席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专门对[百万雄师]一派的。这不能成为[使矛盾激化]，爆发 7.20 事件的原因。说王力[竟然宣布事件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王力没有宣布，也无权宣布。《审查报告》把已经否定了的罪状又翻出来加在王力头上，是不应该的。”

“第三，7.20 事件以后，王力在一系列问题上同江青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如：王力反对机场欢迎仪式，认为不正常，不应该开这个先例；王力反对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反对在全国游行示威，认为这太反常，会引起连锁反应，冲击军队；王力反对斗争陈再道、钟汉华，认为他们没有责任。在斗争会上王力一言未发；王力反对拍摄《北京支持你们》的电影，并拒绝审查，等等。事实很快就证明王力的反对都是对的，果然在全国掀起了冲击部队的风潮。这不是王力的责任，而是能由当时反对王力意见的江青等人负责……”

但是，根据我的调查，王力罗列的这些事实，没有一件是客观存在。他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江青的任何意见。相反，他是在许多的问题是背着江青等人单独行动的。这正是江青等人对他恼火的原因。据我掌握的事实可以证明：王力和关锋都喜欢打着毛泽东和江青的旗号行事，为此，江青几次当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质问他：“我什么时候指示你干某某事情了？你为什么总是要打着我的旗号干事？这样下去，我是要讲话的！以后，凡是没有我的亲笔签字的东西你们不能乱说！”这些，王力偏偏只字不提。

王力申诉的第四条是：“7.20 事件后的武装左派问题，是毛主席 8 月 4 日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出的，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贯彻执行，决定武汉地区武装左派的试验由王力负责。因为江青主管这件事，王力向她作报告，是正常的。这构不成罪状。”

“第五，8 月 8 日‘中央首长接见武汉代表’。接见者是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和王力。当时中央就宣布，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自己记录的都无效，以文革办事组统一整理的纪要为准，根本没有介绍是哪一个人讲的话。所以，《审查报告》列举的都是流言而已。[军内一小撮]这个词，王力不但没有使用过，而且一直到自己打倒时还不知道有这种说法。”

这就是王力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当“打倒”和“揪出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震天响的时候，王力明明参与了其中的许多活动，怎么能推得一干二净呢？正是他这种文过饰非的态度，使得本来不是他的问题都弄得人们不敢为他作证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当时，连张春桥都说他：“总是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到别人身上，好象你王力是一贯正确的，其实你王力是一贯的不正确！一贯的装腔作势，一贯的弄虚作假！”当然，这话也有过

头之处。

王力申诉的第六条是：“《审查报告》罗列的，以及社会上还流传的所谓王里[毁我长城]的罪状，绝大部分都是江青等人捏造的，王力一贯反对江青等人对军队的做法。周总理在批评陈再道的会议上，称赞王力是[处处维护军队]。江青等自己搞乱了军队，反过来拿王力作替罪羊，说王力[毁我长城]。现在到了该澄清的时候了！”

其实，王力的这些解释有的起作用，有一些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为什么？无数大量的原始证据都在，王力自己是怎样也赖不掉的。至于是否王力本人的责任，这已经不需要解释了。因为无论王力怎样兴风作浪，毕竟是一个大气候下的卒子，没有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运动，王力就是使出浑身的解数，也翻不起半点水花。但是，在大风浪中王力使点小聪明，搞点个人的小动作而被毛泽东所抛弃，那是另外的一回事了。

王力还把当年的一张小学报给我拿出来，上面记录着当初对武汉事件的过程：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预谋的，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这次暴乱的直接指挥就是武汉军区和 8201 部队中的一小撮坏蛋。他们坐镇军区大院，听汇报，下指示。行动前他们就调查好了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的住处，连离二号楼只有几步远的一号楼，他们都没有去碰一下，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故意把谢副总理推到屋里纠缠不休，这边却绑架王力同志，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抢走了王力同志的文件，可是其他东西都没有动，这难道是一般的抢劫吗？再听听这次反革命叛乱喊的是什么口号吧！什么[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定时炸弹！]、[王力是刘少奇的走狗！]、[绞死王力]、[打倒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滚出武汉！]、[陈再道的政权万岁！]等等。他们的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反革命的政治上目的不是很清楚吗？”

王力对我说：“这个历史怎样才能完整无缺地记录下来呢？看来真正要准确地记录一个事件真是不容易呢，现在就更要有勇气了。”我默契地无语。（后来我写出了真实地记载这个事件的长篇纪实文学《武汉·毛家湾·钓鱼台》，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但是，王力等人知道，他们如果离开了毛泽东和江青，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所以，他们在公开的场合，特别是在北京一部分红卫兵中，总

是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和毛泽东的化身。他们到处讲话，引起了中央许多同志的不安，使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了，于是江青等人下了最后的决心，要把他们抛出来了……

1967年8月30日下午3点，中央文革召开了批判王力、关锋的内部会议。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是康生。他给王力定的主要罪状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反对周总理、反对江青、陈伯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还说王力是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鼓吹”三和一少“的黑干将。

这是一个以生活会的名义召开的绝密会议。事前王力毫无所知。到会议开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考虑文章，陈伯达沉下脸来说：“现在不是你考虑文章的时候了，是考虑你的问题的时候了。你想一想，你们最近在干什么？你们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别提报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简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这是在丢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化身！你已经昏了头脑！”

当吴法宪发言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罪魁”时，周恩来插话说：“火烧英代办处没有王力的事。”他还对其他争先恐后发言的人说：“你们让王力讲讲，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嘛。”那时，人们一听是批判王力，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发言，竭力要和他划清界限。谢富治严肃地说：“王力是个投机客，背着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坏事，他把许多的情报偷偷地给一些有问题的人透露，这里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用心。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呢？”

王力当时已心灰意冷，摇摇头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最后江青作总结说：“根据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完全是黑线上的人。”她当即宣布叫王力“请假检讨”，实际上从此关了起来。

这个会一直开到8月31日凌晨2时半。

会议刚散，有关人员就叫王力搬家，先是搬到钓鱼台一号楼，切断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10月16日，又把他关到西山一座别墅里，交给卫戍区看管。1968年1月26日，正式将他送到秦城监狱，直到1982年1月28日释放，整整14年之久。

王力被关押后，毛泽东明确指示：不准任何人提审王力。所以，他住的房子都用白布遮挡着，也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子。

讲到这里，王力的双手激动得微微颤抖，他声音有些哽咽地说：“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康生一伙就想杀人灭口。五年多把我关得死死的，不让我放风，不给我任何带字的东西看，连《毛主席语录》本也不给。饭不让我吃饱，一天只给三小杯水，24 小时不时地用喇叭宣布要枪毙王力，我就高声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高唱《国际歌》。他们每天搞这么几次，目的就是想把我王力折磨死。”

王力站起来，从书案上找出几页纸，递给我说：“每到党的生日这天，我都要默默地纪念党。这是我在 1981 年 7 月 1 日写的一首《哀情寄给党》。”说着，他又深有感触地朗诵起来：“尺尺天涯青鸟忙，蓬山日夜在心房。黄钟乐奏鸣宵汉，瓦釜刑宣弃大荒。残骥但求征路险，病蠹呕愿吐丝亡。白头未悔相思志，越是多磨情越长。”

早就听说王力善词工诗，文章写得漂亮。今日拜读他的诗词，果然名不虚传。应我之求，他信手将这首诗抄写下送给我。第二天，他又挥毫将他另一旧作用宣纸写出来赠送于我。诗是这样的：“惊雷发出图千根，风雨如磐我自春。出土初生先有节，凌云直上永无心。风霜百折柔坚骨，山石千磨申屈身。夭折飞升回首笑，龙孙择约又成林。”

我对诗词恰好也有一定的研究和爱好，但是诗词并不等于作诗人。这个我已经有了许多的例子。但是对王力这个人，我还是很同情他的。毕竟是一个运动的牺牲品。有些真正罪行比他大千百倍的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这个摇动笔杆子的秀才，却被两个截然相反的时代所不容。这也是王力无法挽回的悲剧，就是说什么也太晚了，只好留下深沉的教训启示后人吧。我们一边读他的诗词，一边谈论那个很难一下子说透的峥嵘岁月，话题又回到了文学的领域……

5. 16 兵团》大事记 (1967.9)

▲1966. 11-12. 北京一些高等学校中出现了一股反对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11 月 30 日林院“红卫兵”李洪山之流贴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的反动标语。扬言“你们看吧，不到一个月中央文革就解散了”；叫嚣“中央文革被右倾路线统治”。北航“八一纵队”等组织也相继贴出攻击中央文革的大字报。

▲12月2日钢院“红卫兵”“红色风暴”贴出了“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的反动大字报。“九一九”(现延安公社核心组织)中“闯道”、狄德岳之流也贴大字报，写信恶狠狠地说：“中央文革为什么批评不得，反不得！”并恶毒攻击毛主席、林付主席。吕长春(现延公头目)也跳出来要和陈伯达辩论有关长征问题。疯狂地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九一九”窝藏狄德岳反中央文革材料，妄图包庇。wengewa ng.org

▲12.5在黑手的策划下，反中央文革的“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粉墨登场。

▲25日，清华井冈山举行声势浩大的揪刘行动，林杰慌忙出来死保刘贼，胡说刘贼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打倒”。

▲十二月底，北外“616红卫兵团”成立。北外“616”在六六年九月份就开始怀疑总理，因为当时气候不合适，不敢公开攻击。到十二月，社会上出现一股反中央文革的逆流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公开成立了以炮打周总理为职业的《616红卫兵团》。

▲一月初，在赵易亚、林杰、穆欣等反党集团的指使下，经委井岗山头目反革命分子陈大伦操纵井岗山整周总理黑材料，因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功，陈被林杰之流提升为反党集团主管工交、财贸系统的黑干将。黑干将洪涛则亲临民院红教工会议放毒，暗示赵、林、穆集团战略布署，叫嚣：“今后运动大方向就是要揪周总理以下的几个副总理”。并说：“中央文革(指林穆之流)很重视这几个人的材料。

▲67年1月，商学院成立“决战纵队”，公开炮打李先念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外贸学院也有混蛋贴《火烧周XX》的反动标语，财政部刘振玉、程圣言等竟狂吠说这是“革命行动。”

▲在精心策划后，吴传启的黑干将XXX和薄一波死党骆风，陈大伦等公然在炮政礼堂召开火烧李富春大会，攻击李富春同志是“经济战线修正主义的租师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士”。7日斗余秋里时，计委XXX等按骆风意图竟派人去医院揪病在床上的李富春同志。疯狂已极！同时期钢院延公《东方红》收集李富春黑材料。

▲6日北外《616》在天安门前贴出《XXX你要干什么?》的反革命大字报，

公开进行攻击毛主席亲密战友周总理的罪恶活动。13日—19日其头目刘令凯大肆攻击道：“周XX与陈X是一个反党集团”。21日《616》胡说“中央文革不是没有错误”，反动已极！并抗拒公安部拘捕，大打出手”，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15日，为了收集周总理及其它中央首长的档案材料，销毁穆欣等反革命罪行，在林、穆集团的一手策划下，统战部反革命分子张经武、刘郢(统战部东方红头头)勾结地院朱成昭之流抢劫盗运了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建国以来的全部机要档案一百四十余柜。事后穆欣得意道：“我的材料已在我手中，我不怕。”

▲17日刘振玉，财经八八敖本立等对抗总理，硬把大扒手杜向光(财政部副部长，阴谋夺李先念副总理的权)拉进中南海，总理下令逮捕。二十四日，北京商学院红反军决战纵队程镇华(现5.16兵团作战部长)公开为抗拒周总理的人含冤叫屈，胡说什么“站在造反派这边的干部已经灾难从天而降……。”攻击总理。wengewang.org

▲师大井冈山一小撮人成立秘密组织——“中央机关调查队”，专门整理中央各部委及周总理的黑材料。师大井冈山作战部长周XX布置任务时说：“现在不能搞XXX，别单位搞，我们可以支持。”

▲3月13日在林、穆集团的策划下，吴传启，洪涛亲自出马，组织北京市包括民院东方红等单位的炮打李富春同志的反动势力。接着又在钢院延安公社等组织的小报上抛出真真假假的材料，把先念同志打成“叛徒”。林杰之流借洪涛之口疯狂吠：“夏揪出一个比李富春还大，不是中央文革的，保人保最多的，使人听了吓了一跳的人来”。矛头直指周总理。

▲67年2至3月，林杰、吴传启之流借打余秋里为名，行炮打周总理、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实。X日有人问起余事说：“中央已表态，为什么师大还起劲地打”，林杰大声吼叫：“群众愿意打，就让他们打！”。

▲3月21日—23日，总理多次肯定余秋里同志，但师大、钢院延安公社等组织在林杰之流操纵下，在周总理讲一次话就升一次级。制造中央文革与周总理分裂的假象。钢院反革命分子张建旗跳出来疯狂攻击钢院《革造》的外战方针是“新保皇”，另一方面咒骂敬爱的周总理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为刘邓复辟的人”。

▲3月24日，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苏东海、杨行素、李桂芳等跳出来

贴周总理的大字报。谭XX心有侧隐地讲：“校外来贴的就是别有用心，校内人贴的，要作具体分析。”同时，有人揭发师大井冈山的王岚反总理，但一再获得某些人的保护。钢院反革命分子张建旗扬言要与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的苏东海串联。

▲林杰叫他的特务老婆王乃英钻入市革委会，办一个“北京动态组”收集情报。并通过地院朱成昭之流，在全国散步反动的“左派分化论”、“左派大动荡大分化”的口号，拉一派打一派，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号召，为极“左”派大开绿灯，为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制造舆论和组织准备。

▲5月16日，《5.16通知》公开发表，掀起大批判的高潮，这批混蛋，秉承主子意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制造混乱，更加疯狂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声称：“5.16意味着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要揪出第二个刘少奇”。《616》抛出了一张“戳穿一个大阴谋”的反动大字报。恶毒攻击周总理“玩弄反革命两面派”，胡说周总理“支持保守”是为了达到“保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的阴险目的”。

▲5月20日，北外《616》抛出了《红旗大队的后台是最大的卖国主义者》。扬言这个后台不是刘少奇，不是陈毅。又一次恶毒攻击周总理。

▲6月21日，北外XXXXXXX红28团一连又抛出名为《致周XXX同志的一封信》的射向总理的一支毒箭。

▲次日归国遵义兵团世界红旗红卫兵贴出《向总理提出问题》的反动大写报。

▲配合整个反革命逆流，北外《616》翻印了二外首都红卫兵《迎春到》的《十问周XX》，《再问几个为什么》，北外XXXXXXX红28团红一连的《打倒奴隶主义，提倡独立思考》等反动大写报。接着，又写出了《是哪一个阶级的代言人——从新编历史剧〈十五贯〉说起》，恶狠狠地质问周总理是哪一个阶级的代言人。二十八日商学院红反军程镇华写出攻击周总理的“开炮声明”，攻击总理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于商院，外贸部、北外刷出大量反总理的大标语。we ngewang.org

▲6月8日，《5.16》一小撮混蛋大量散发了《28个为什么？》的反动传单，再次攻击XXX，胡说什么。毛主席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掀起一个‘炮打

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等等。

▲6月8日晚上，中央首长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对北外《616》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危险的。

▲6月初，谭XX在师大校内与《6.16兵团》成员苏XX和两个外校的谈话，当这两人恶毒地攻击XXX时，谭XX竟说：“你们真敢想敢说。”

▲67年7月1日，反革命集团《5.16兵团》在北外《616》的会议室召开所谓第一届代表大会，进行反动的“两忆三查”（忆受“压迫”，受“迫害”，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作出了反动的决定，定了行动口号、行动计划等，负隅顽抗。

▲7月4日凌晨。《5.16兵团》在财政部门外地上，墙上刷出“绞死李XX”等十几条反动标语，矛头指向周总理。

▲7月6日，《5.16》借XX、XXX同志参加财贸口各革命组织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庆祝党的生日四十六周年之机，散发了《揭穿李XX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反动传单，矛头指向总理。在传单中，大段引用林杰影射攻击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话，并肉麻地吹捧“说的好！”

▲11日，《5.16兵团》在紫竹园集合，交换各口情报，商量计划。次日，《5.16兵团》就抛出《二十个为什么？》和《告农口革命战友书》，恶毒攻击总理，挑拨周总理和农口革命派的关系。

▲7月份，正当全国出现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大批判高潮时，林杰为了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发动亿万群众”，“揪出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对抗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配合这个阴谋，混蛋们在长安街一带贴出大标语支持三军冲派，反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死保肖华、吴克华等三反分子。

▲7月16日，《5.16兵团》政治部、作战部发表所谓“严正声明”，进一步宣扬《二十个为什么？》和《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的反动观点。《616》贴出《为什么陈X、李XX，谭XX等反革命分子未被打倒？》，“包庇上述反革命分子的人，终将受到革命人民的审制和惩罚。”恶毒攻击总理。▲7月21日，农口各单位贴出大字报《评谭震林问题是农口关键的关键》，攻击总理。▲7月23日，《5.16

兵团》就武汉形势发表“严正声明”，恶毒影射XXX是百匪的后台，为百匪真正后台陈再道、徐向前之流开脱。▲7月29日李X、郭XX等四人在文化宫前门散发反动传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农口造反派当场抓住，送公安局。▲7月31日商院黑匪程镇华等在阜成门等地贴出《5.16兵团》政治部、作战部所谓严正声明，继续炮打XXX。在其后台的支持下，林杰瞒着江青、伯达等同志提起秃笔，阴险地提出“揪出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妄图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实现篡军篡政的阴谋。▲67年X月，林杰的黑爪牙郭XX对《5.16兵团》坏头头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对具体情况不能具体表态，我们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坏头头郭XX公开承认说：“我们找林杰谈过三次。”wengewang.org▲8月3日，师大、农大、商院、钢院、3中、101中等院校中的一小撮在紫竹院召开了《5.16兵团》正式成立大会，阴谋八月上旬进行大规模行动。我革造战士查明钢院《延安公社》袁冬平是《5.16兵团》的小头目。《5.16兵团》散发了《还我战友》的传单，公然攻击XXX，为《5.16》黑匪叫屈。同一天，《616》的总头头刘令凯插言：“XXX打不倒，陈毅倒不了……”，并诬蔑XXX与陈再道有联系，一再挑拨XXX与中央文革的关系。在这天，《5.16》贴出《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19个为什么？》等反动大字报，扬言“走向社会穷追猛打军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恶毒攻击被林副主席所肯定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声嘶力竭的为徐向前，吴克华等鸣冤叫屈，杀气腾腾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8月7日，刘令凯对外院孙XX说：“XXX一定能打倒，已经有一个重要人物给我们讲了”，又说“我们通过这个人可以把材料转上去”。▲8月7日—10日，《5.16兵团》还散发、张贴了《质问XXX》、《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XXX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南院）、《XXX之流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张建旗）、《XXX你要在农口干什么？》（农大）等反革命大字报，进行猖狂的反革命活动。10日，李莲菊，唐亦安等三名《5.16》分子被西单公安分局扣留。同日，南院“决战纵队”再次贴出大字报，叫嚣“炮轰周总理的革命行动大方向完全正确。”▲8月11日，中央首长又一次痛斥了《5.16兵团》，指出其反动性。▲接着，12—14日《5.16兵团》在陶然亭开了两次紧急会议，讨论首长讲话，决定在商学院打开局面，建立根据地，继续顽抗。▲8月12日，张建旗找XX杂志社记者郭XX，要求见中央文革或林杰，第二天记者来电话说，林杰工

作忙没有空。(看来想溜)▲8月16日中午,《5.16兵团》想通过师大谭XX见林杰,晚上李莲菊,任铁岑等去师大见到了XX杂志社记者郭从军,当时师大作战部人员在场。以上只是一个极“左”的反党阴谋集团操纵下的马前卒《5.16兵团》的罪恶活动及其后台的一些情况。他们帅后有帅,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共同揪出《5.16兵团》的黑后台,把那些极“左”的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一个个揪出来斗倒斗臭! wengewang.org中南海警卫连整理编写来源: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小册子《砸烂反革命阴谋组织“5.16”黑兵团》,一九六七年九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2008年3月2日初稿

2011年9月29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3）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三节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坚决贯彻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刘贤权在青海省军管小组长和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坚决贯彻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安徽问题的决定以及军委颁布的十条命令，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文件，是我军支左工作的主要依据。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精神，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和军委命令经过迅速传达，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广大指战员和革命群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当前正深入揭发、批判反革命分子、拿枪的刘、邓路线赵永夫，顽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罗瑞卿的死党分子王昭和张晓川等的罪行。许多受蒙蔽的群众认识不断提高，纷纷表示要彻底揭露他们的反革命滔天罪行，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些都说明我军广大指战员和革命群众是听毛主席的话，最能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当然还应该看，赵永夫之流，为实现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搞了两个多月的反革命宣传，特别是直接参与活动的人，中毒较深。从反映看，还有个别人怀疑中央决定，认为“决定是假的”，“没有盖章子”；极少数的坏人，趁机造谣惑众，说什么“中央不完全了解青海的问题”等。还有的群众组织去京告状，实际是告毛主席的状。这是极其错误的。对受了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我们要继续进行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抓好活思想，使其早日觉悟，团结大多数；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反坏分子，则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坚决打击。对中央决定，开始不大相信，可以理解，但是到现在还不回头、不觉悟，就不是认识问题了。这种人应及早悔悟，否则是会要犯大错误的。部队认识的转变，对地方影响很大。

传达教育中，极少数干部、战士对执行中央决定还存在私心杂念，“我”字当头，原则拥护，具体不通。二·二三流血事件是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之流的罪责，广大的干部、战士是受了骗、上了当，是没有责任的。只要我们和八·一八革命群众站在一起，群众是会谅解的。要相信群众对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哺育的人民解放军是无限热爱的，要相信我军在革命斗争中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所建立起的鱼水般的关系。

做好支左工作上，我讲以下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坚决地、不折不扣地、百分之百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青海问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首先发现和亲自批示的。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最新、最高的指示，是对我省二百万人民最大的关怀和支持，也是搞好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强大的思想武器。对中央决定采取什么态度，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拥护还是抵制，是相信还是怀疑，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还是阳奉阴违，这是区别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如果说过去受了欺骗和蒙蔽，现在有了中央决定，我们要改变立场、改变观点，重新认识青海问题。我们对中央决定，首先要从认识上提高，更重要的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对青海问题作了明确和处理办法，并明确指出：斗争矛头要指向以王昭、赵永夫、张晓川等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一八红卫兵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依靠的力量，团结的对象和打击的目标，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因此，我们要发动广大群众，把王昭、赵永夫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斗垮。我们发动群众，首先要发动被打成“反革命”的八·一八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是我省文化大革命的主力 and 先锋，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对准了以王昭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主要是：

（一）六·三社论是文化革命运动中斗争的主要问题，一方以八·一八革命组织和外地学生，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彻底为六·三社论平反；一方以王昭等为首，勾结“保”字号组织，反对平反。这个斗争很激烈、很尖锐，持续时间很长。事实证明：前者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中央指示的，揭开了青海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这场斗争中很多群众被欺骗、蒙蔽，上了王昭等坏蛋的当，有些群众组织起了保护王昭的作用。

(二) 炮轰省委、火烧王昭的口号也是八·一八和外地学生提出的。在那个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并见之于行动，没有高度革命精神是办不到的。而当时一些群众组织，并没有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实质，相反地在王昭等一小撮人的挑动下和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相对抗，提出新的省委是革命的，炮轰省委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等，为王昭等人解围，向省委报喜，特别是把青海省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都归于王昭，流传什么“王青天”！王昭确是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一八革命组织这一革命行动，是完全符合“十六条”精神的。

(三) 王昭挑动群众斗群众。如毛纺厂工人到省委静坐示威，李家庄孤儿问题，迟迟不处理，还调农民进城以及以后几次调贫下中农进城，围斗工人、学生等，都是在王昭的一手策划下进行的。严重的是有些问题发生在主席批转王效禹同志的保证报告以后。

(四) 围斗、排挤外地学生。在“胡天申事件”上，他们大搞“慰问”，夸大病情，假报病危，扩大了事态；组织写传单，到处散发，企图搞臭和镇压外地红卫兵；组织写起诉书，写反击大字报等。搞得西宁满城风雨，一度出现了“捉拿凶手”的白色恐怖，有的学生连袖章也不敢戴。白天不敢出门。而王昭则自以为得计，说什么这一下抓住了他们的问题。严重地造成了本省学生和外地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

(五) 徐国源同志第一张揭露王昭的大字报，刺痛了王昭，他便布置许林风、薛可写反驳的大字报，到处张贴，扩大影响，并在西门外几百人围斗徐国源，进行压服，甚至张贴揭发王昭和省委错误的大字报时，有人就当场提出质问，要把人家轰走。

(六) “民和事件”，查明确有“黑材料”，八·一八作的非常对，而红卫兵总部等，在王昭等一小撮人的挑动下，则千方百计为省委开脱，大肆攻击八·一八盗窃了党的机密，制造了“民和事件”。

(七) 王昭重用坏人，结党营私，谁要给他提意见，就打击报复。生活上拉拉扯扯，极不正派，伪君子，假装正经，乱搞男女关系。

(八) 王昭同三反分子罗瑞卿的关系极为密切，六六年四月即有人揭发，但始终不作交代；同王仲芳互相勾结，攻守同盟，企图达到包庇罗瑞卿、王仲芳，

使自己蒙混过关的目的。

从以上事实说明，青海的群众组织，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究竟谁在革，谁在保，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以八·一八为主体的组织，是青海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一点，我们必须充分的认识。因而，支持不支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是执行不执行中央决定的问题，是执行不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问题。

二、彻底揭发和控诉赵永夫、王昭、张晓川等人的反革命罪行。

赵永夫、王昭、张晓川是扼杀青海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二·二三流血事件的刽子手。对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罪恶采取什么态度，是容忍还是斗争，是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也是立场问题。他们顽固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搞反革命“三结合”，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震惊全国、骇人听闻的二·二三事件是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严重步骤，是拿枪的刘邓路线。据初步统计，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人。大捕、大打、大斗、大抄家。对革命群众和干部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一万零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看管和软禁三千五百零四人。采用各种刑法对革命群众实行逼、供、信，不仅本人遭到逮捕、毒打、捆绑、抄家，而且株连了自己的亲属和小孩。同时，大搞“请罪”，人人过关，人人写检查，有的集体跪倒“请罪”，长达四、五个小时。

继二·二三事件后，二十四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十二人，再一次制造了流血事件。

总之，他们对敌人亲，对阶级兄弟、革命群众恨，大搞法西斯统治，大搞白色恐怖，残酷地镇压杀害革命群众，扼杀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坏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玷污了人民解放军的荣誉。我们一定要发动群众，造成声势，大揭露、大控诉、大批判、大斗争以王昭、赵永夫和张晓川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坏分子的滔天罪行。大小会相结合，把他们罪恶事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地方上主要控诉揭露清算王昭等人，军队主要是控诉揭露清算赵永夫和张晓川等，用他们这些罪恶事实激发起阶级仇恨，教育部队和广大群众，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人绝不能施仁政，

坚决要把他们打倒。林副主席说：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这是阶级斗争。只有把这些罪魁祸首的罪恶事实揭彻底了，揭深刻了，我们才能进一步领会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正确和英明伟大，也才能进一步领会毛主席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中央决定中指出，青海问题同王昭直接有关。从我们最近掌握的材料看，王昭是直接参与了的。他离开青海后，一直和赵永夫、张晓川等人取得秘密联系。通过孙国廷和孙光荣等人派人去北京给王昭汇报。王昭写了十余封黑信。王昭到北京后，改名换姓，迁移住处，继续与赵永夫、张晓川联系，进行反革命活动。王昭对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从来就恨之入骨，早就把八·一八革命组织看作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眼中钉、肉中刺，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次赵永夫等对八·一八进行疯狂镇压不是偶然的，王昭在北京说：我早就认为八·一八是反革命，没有想到你们搞得这样快。

在大揭王昭、赵永夫、张晓川罪行的同时，还要大揭死保王昭的分子和反坏分子。在军队、机关和群众组织中，确有一批死保王昭、死跟赵永夫的人，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搞资本主义复辟。在二·二三流血事件中，这些人跳了出来，充当打手疯狂镇压群众，实行阶级报复。这一点以公安厅一小撮反坏分子最为积极，他们阴险毒辣，专无产阶级的政，长右派的威风，灭左派的志气，从侦察，到逮捕、审讯，用尽了对付阶级敌人的所有手段，比起国民党对革命群众组织，都有过之无不及。

揭露、批判和清算以王昭、赵永夫、张晓川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样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教导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他们绝不能含糊，绝不能留情，绝不能原谅。

坚决支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

对八·一八坚决支持，这是革命问题，是执行中央决定的问题。支持八·一八要旗帜鲜明，态度明朗，不能搞调和、折中，也不能有私心杂念，感情用事。要顾大局，识大体。过去我们对八·一八的错误认识，是赵永夫等反革命宣传造成的。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从立场、观点、态度上转变。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爱

什么、恨什么上必须有棱有角，观点鲜明。过去搞的所谓八·一八的“十大罪状”、“评八·一八的大方向，等毫无根据，纯属造谣，是反动宣传，是彻头彻尾的大毒草。有毒草必须铲除。他们宣传八·一八火烧王昭是“打击一个、保住一窝”，恰恰说明，他们执行的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反动思想必须严肃批判。他们说：八·一八要血染西宁，八·一八要搞暴动，八·一八有三线作战计划，……等。完全是捏造，都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事实上血染西宁的恰恰是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等。

我们支持八·一八革命组织，要大力宣传八·一八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建立了丰功伟绩。我们抓住几个比较大的事情，如六·三社论平反、炮轰省委、火烧王昭、“胡天申事件”和“民和事件”等，使一些受欺骗的群众，提高认识，划清界限，认清谁是革字派，谁是保字派，使广大革命群众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第一，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首先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和军委命令，这是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依据。离开了政策，我们就迷失了方向，作事就没有原则，就一定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前一个时期，有的人无视党的政策，无视党的纪律，极端民主化的倾向非常严重，有的人甚至公开怀疑军委命令和规定，这是极端危险的，当前，要认真学习中央关于青海、安徽问题的决定，军委颁布的八条、十条命令和七项规定以及十六条。用党的政策武装自己，提高政策思想水平，充分发动群众。

第二，要正确对待群众组织革命小将。要发展壮大和依靠左派，争取团结中间力量，孤立极少数的右派。通过斗争，要逐步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

对八·一八要看大方向，要看本质和主流。过去有人反映八·一八组织不纯，这是个别的。当前对八·一八革命组织，主要应掌握以下几点：（1）恢复、发展组织，不宜过早提倡开门整风。可以边战斗、边整风，主要是战斗。组织恢复、发展了，再搞整风。（2）掌握政策，但又不要束缚了手脚。在平反中个别人由于气愤动手打了人，要具体分析，是好人的，要教育。确是坏人趁机搞报复，可以待后处理。防止坏人破坏八·一八的声誉。（3）对过去受反革命宣传，曾一度动

摇过的队员，不要歧视，更不要扣“叛徒”的帽子，允许他们参加组织，继续革命。(4)从“保”字号组织中分化出来的群众，要求参加八·一八，只要他们真正提高了认识，划清了界限，应抱欢迎态度，吸收他们参加，防止关门主义和防止宗派主义。注意纯洁组织，防止坏人混入，并要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对中间派组织，要搞好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前应切实搞好开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端正斗争大方向，提高群众的认识，提高阶级觉悟，把坏人揪出来。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为革命左派大联合创造条件。

对一些保字号组织，要分析研究，这些组织中确有一部分死保王昭的人，但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当前，要发动群众，揭露真相，使广大群众觉悟过来，把一小撮保王昭的分子揪出来，彻底批判。现在有的组织已经解散了，散了不再恢复，没有散的，通过斗争、揭发，还会分化、瓦解，至少也要彻底改组。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坏人以解散组织为名，逃避斗争；有的则转入地下，分散注意力，继续活动；有的则以集体请罪为名，继续欺骗群众，甚至挑拨群众组织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那些挑拨军队和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关系的，要引起足够的警惕。

目前各单位的八·一八组织，大体可分为四种情况：占优势的、占半数的、处于少数的、还根本没有建立组织的。我们在指导思想，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要革命的，即是八·一八处于少数的单位，也要坚决支持，发动群众，扩大队伍。去这些单位工作的同志，可能听到反面的议论多，如不注意就会滑到另一边去。这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头脑清醒，从始至终和八·一八站在一起。

第三，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对他们的优点和缺点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学习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造反精神。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打击革命小将，就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不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首都红代会的革命小将，他们来自毛主席的身边，对我省文化大革命做出了许多贡献，但是，王昭、赵永夫等反革命分子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把他们打成了“反革命”。现在我们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坚决地支持他们，同他们一起支持八·一八，搞好文化大革命。

第四，正确对待干部。“对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

我省干部队伍状况，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参加、支持和同情八·一八的干部，要帮助他们进一步亮相，站出来革命，参加工作，有一般或严重错误的，要帮助他们检查错误。即使有些干部有问题，如：历史问题，出身不好，但他们支持革命派，坚决革命，就要让他们参加工作，边工作、边革命，在实际斗争中考验他们，搞清问题，提高觉悟，改正错误。一种是“靠边站”的干部，要具体分析，有的是定性不准，划的过重的，应根据党的政策，根据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在斗争中进一步加以考查；有的确有严重错误，经过批判斗争，帮助亮相，大多数人是能够站出来工作的。一种是一小撮坚持反动立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三反分子和死保王昭的分子，坚决把他们揪出来，揭深、批透、斗倒、斗垮、斗臭。但对于经过斗争转变好的，也要给以出路。

第五，关于夺权问题。凡是赵永夫搞反革命复辟夺权的，一律宣布无效，概不承认。现在要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夺权作好准备。

五、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认真组织群众学习“老三篇”和新规定的五篇文章以及中央的决定，进一步增强阶级斗争观念，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在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同时，还要夺自己头脑里的私字的权；区别两类不同矛盾，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抓革命，促生产，节约闹革命。

支左，首要的是政治思想上的支援，因此，部队同志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调查研究，紧紧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在工作中，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防止包办代替，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圆满完成支左任务。

在支左工作中，只要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政策办事，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好，就可以避免犯方针路线的错误。至于在具体工作中产生一些缺点甚至错误是难免的，只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迅速改正就行了。不要因为怕犯错误

就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工作。现在的军管和过去不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管的是革命群众，因此，政策性更强，要作许多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军管是一种过渡措施，其目的是要促成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

支左的任务是很光荣的，也是艰巨的，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全体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努力工作，把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把青海建设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关锋戚本禹关于解决青海问题的讲话

关锋同志：

青海的同志们到北京来了好几天了。你们的意见，材料，要求都收到了。今天中央文革小组叫我们来看看大家，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我们相信你们是要革命的，所以才来见你们。我们来见你们主要解释一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有些同志想不通，我们觉得要想通这些问题，要抓住大是大非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不清楚，小是小非问题解决不了。今天不谈小是小非，谈大是大非。青海事件是个什么性质的事件。

，青海军区是个反革命政变，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军区副司令员）夺了党在青海军区的军权，推翻、扣押了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应该重视这一问题，否则就糊涂了，刘贤权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跟林彪同志走的，是跟毛主席走的，政治上是很强的好同志，无论从历史上，到青海来讲，中央军委是了解他的，是一个好同志，赵永夫是一个什么人呢？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南京国民党教导队干了好几年，你们知道什么是教导队吗？（答：不知道）是干特务的，后来回到家乡，在一个地主民团里干事，以后就混到我们队伍来了，一直没有发现，这一回他自己跳出来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很多牛鬼蛇神都跑了出来。赵永夫欺上瞒下，煽动军区司令部的一小部分人，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斗争了刘贤权同志，把刘的军衔，帽徽都扯掉了，并遭受毒打，他想取而代之，把军权夺了过去，根本不向中央报告，甚至在群众中发传单，宣布刘贤权是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是反革命军事政变，是青海的大事情，这就是青海问题。

，他篡夺军权后，又勾结××部队，打死，打伤三百多人，逮捕了一万多人，这在全国是没有的事情，军内也没有的事情。就抓起来的小孩子，我们都看见了，有十四岁的，有十五岁的，有小女孩，他们是反革命吗？实行的是资产阶级镇压，王昭是罗瑞卿的死党，是安在青海的死党，但他在幕后指挥的，赵永夫完全是欺上瞒下的，说八·一八有枪，先开枪，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没调查嘛！他派了一个专门小组在报社里搜，结果一支也没有，什么地道，阴沟都找遍了，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们问赵永夫如何解释，他也无言可答。接管青海日报是错误的，八·一八办的青海日报卅三天，我们全都看，罪状是捏造的，我们都看了。

我们问赵永夫搞三结合，结合谁？他说：“结合王昭”，王昭是什么人，中央文革小组是知道的，看青海问题要抓大方向，搞反革命夺权，伙同王昭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我们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或者放在次要地位，那就永远也解决不了，刘贤权同志处理得很好嘛！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是很满意的。

王昭的党羽是不甘心，还在煽动，最近青海出现了大标语，要欢送刘贤权，打倒刘贤权，（刘贤权同志是中央调至内蒙军区任司令员）内蒙是个大军区，刘贤权现在不能去，由别人去代理，以后去，贴他的标语完完全全是错误的，贴的人是受了欺骗、受了蒙蔽，希望同志们好好考虑，当赵永夫打击刘贤权的时候。你们应当想一想。有错误可以改嘛！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追究，要接受教训嘛！要严防坏人欺骗，同志们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也不要呕气，不要纠缠枝节问题，那样会犯错误的，特别是你们那六位负责同志，不注意的话，会犯错误的。受蒙蔽要从这个问题得到教训，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一个副司令员把司令员打倒，军队不允许自下而上地夺权，有问题由上级撤换，有问题的可以反映。受蒙蔽的人概不追究，刘贤权要注意这一点，可能下面群众不会这样做。但你们应想一想死难的同志，被捕的同志，心里就会好一点，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带着问题好好学习毛著，提高一步，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支持刘贤权，把青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你们离开了中央决定，是要犯错误的，决定（指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是林彪同志批准的，林彪、肖华、杨成武同志很关心青海的问题。不能有怀疑，不能对抗，不能抵制，你们当中有人跑到接待站贴大标语：“打倒刘贤权”，你们六人当中有四人共产党员嘛！应该站到党的立场，这样下去会犯更大错误，

在座的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中央决定由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而有人贴刘贤权的大标语，这算什么问题？这算不执行这一决定，这件事你们负不负责任？原来受蒙蔽被欺骗了，中央原谅你们，为什么现在你们还这样干呢？有些人把大是大非看得轻了，相反，有些人把小是小非看得重了，贴标语很不好，你们不是真正的负责人（答：是。）我劝你们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对人民事业不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会继续犯错误。希望你们从这接受教训。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你说你不知道，怎么不反映（青海的情况，）至少你们没抓大是大非，抓的小是小非，可能有的同志很不满意，我相信多数同志是会理解的，如我说你们很对很好应很好走下去，也许会有好多人会高兴，但过一段时期，有人会反对我，不能那样，那样会继续犯错误的，同志们的欢迎也罢，赞成也罢，反对也罢，将来会明白的。

戚本禹同志：

文革小组要我们来见大家，因为你们经常到中南海，国务院接待站对抗中央的活动。为了避免大家犯错误，才讲一讲中央精神，你们其中一些人还在进行对抗中央的指示，写“打倒刘贤权”的大标语，攻击八·一八大方向错了，你们对。为了使同志们不犯错误，是想劝服大家听党、听毛主席的话，不要上当，擦亮眼睛，不要听赵永夫，王昭的话。中央决定是不能动摇的，内蒙出来了四千人，也就只有十来人在那里跳，广大群众自发起来游行，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定，你们当中就有那两个人，也许你们后面还有人，你们为什么还闹、贴大标语，还动员了一些老太太，有小孩的妇女，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动员他们来？光考虑自己，不考虑人家，你们可以写信给我。赵镇压群众，屠杀群众，你们为什么不告急，给刘贤权平反、给八·一八平反，你们就告急了，你看你们的口号，为什么不喊打倒赵永夫？刘是跟毛主席长征的，赵是混入革命队伍的。他镇压群众你们就支持，对老红军你们就拉倒要打倒，你们错了，方向错了，赵不敢干的事你们敢干。最仇恨刘贤权的是赵永夫，是刻骨的仇恨，（他得了势就会枪毙刘的——关锋）你们这样做了谁高兴？青海有人写了要“欢迎刘贤权”，你们其中有人要搞复辟，要和赵同生死，共患难的，你们是拥护赵的，不拥护刘的，对反革命罪行你们不反对，毛主席给平反了，你们反对决定，你们同反革命坐在一起是大问题，不是开玩笑的问题。还要接管接待站，要把接待站人员拉上街去辩论。

这里是北京，不是赵统治的西宁，就是赵统治的西宁，北京学生都知道青海事件，你辩论可以，人家到时候发生武斗我们可不管了，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了解你们的情况，我们了解的情况很多，不要存在任何幻想，赵打死了那么多人，你们为什么不到北京来告急，我们到处找都找不到，给他们平反了，你们就来了。好人站错队赶紧过来，大多数是好人，是热爱毛主席的，八·一八做得对嘛！当然八·一八不是那么纯，我们是知道的，刘贤权同志也了解。这是不可避免的，慢慢会……解决的。两个组织比较起来，我看你们不纯，赵、王是最大的不纯，要看大方向，是站在刘一边，还是站在赵一边的，一个是毛主席的路线，一个是反动路线，两方面打、砸、抢，我们都反对的。就看你们站在哪边，站错了队就改嘛！同志们要认清队伍，弄不清就往里钻，要作阶级分析，看看对不对，在青海你们吃不开了，才到北京来贴。你们过去听说过象青海这样的事情没有？（答：没有）给你们一个任务，回去做工作，应不应该。刘是一个好同志，他挨过打，他没有报复过谁嘛！我看现在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没有喊打倒刘贤权的口号，我看你们心里头是想喊的，你们青年人不要瞎起哄，不要叫人利用了，不要当枪使，你们要很快的改正错误，不要听煽动，他们要把青海搞成反革命的基地。赶快回去闹革命，反对赵永夫，你们组织不要恢复，错了嘛！干脆解散算了。

二、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青海日报》永远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阵地

《青海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青海日报社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青海的一个伟大胜利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新华社消息：

新华社西宁九日电 为庆祝青海日报社革命委员会诞生，《青海日报》六月二日发表了题为《把〈青海日报〉办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的社论。

社论指出，青海日报社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光焰无际、威力无穷的毛泽东思想的一曲振奋人心的凯歌，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青海的一个伟大胜

利，是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革命造反大旗，团结战斗、坚持斗争所获得的重大成果！

社论说：青海日报社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青海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夺权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社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是中外古今一切阶级斗争的科学的历史总结，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社论接着谈到，长期以来，青海省委和报社内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竭力控制《青海日报》，企图改变它的无产阶级报纸的性质，把它变成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舆论的工具。在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下，《青海日报》一度堕落成牛鬼蛇神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前哨阵地。特别是在毛主席亲自点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以后，争夺《青海日报》的斗争，空前加剧了。省委和报社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挽救他们彻底覆灭的命运，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手段，不遗余力地加紧对《青海日报》的控制，残酷地镇压报社内部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妄图通过对报纸的控制，扑灭席卷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扭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车轮。当“一月革命”的红色风暴席卷全国的时候，《青海日报》的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十分尖锐、十分剧烈地开展起来了。这场斗争，不光是《青海日报》这个阵地的得失问题，而且是全省范围内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中谁胜谁负的关键。在这场斗争中，青海省“八·一八”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打垮了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逆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彻底夺回了《青海日报》，牢牢地掌握了这个重要的宣传阵地。社论说：现在，《青海日报》已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青海日报》已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斗争的宣传阵地。我们——青海日报社的革命职工，将永远坚守阵地，为捍卫和强化这个阵地贡献出我们的一切。我们——青海日报社的革命职工，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青海日报》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办成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有力的武器。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中央文革小组告各省劝阻革命群众组织和文艺体育团体来青”的报告

1967.07.17；中发[67]221号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各军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级军管会：

现将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中央文革小组告各省劝阻革命群众组织和文艺、体育团体来青”的来电转发给你们，并遵照执行。

（次件可口头向革命群众组织传达）

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

附电：建议中央文革小组告各省劝阻革命群众组织和文艺体育团体来青

中央文革小组：

我们正在积极筹备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和准备工作。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方针和中共中央六月二十九日“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精神，在我省革命委会成立和庆祝时，一切从节约出发。但目前已有少数兄弟省的剧团、体工队来青，据了解还将有一批剧团、体工队准备来。据此，建议中央文革小组转告各兄弟省劝阻革命群众组织和文艺、体育团体来青。妥否请批示。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在亿万革命群众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中，宣告成立了。这是“一月革命”风暴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新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青海高原上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青海省以“八·一八”左派组织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从青海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经历了激烈、紧张的阶级搏斗的严峻考验。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青海地区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下，曾经在一些艰苦日子里，顶着阻力行，迎着风浪上，终于从阶级敌人手中，把党、政、财、文大权胜利地夺了过来。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愧为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钢铁战士。

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保卫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大后盾，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柱石。青海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指示，旗帜鲜明地支持和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派。青海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青海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经出现了反复。这看起来仿佛是坏事，实际上是大好事。因为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加暴露了，革命方面也表现出来，阵线分明了。事情的规律往往是这样，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变成了好事。经过反复，问题就看清楚了，就解决了。矛盾越是充分暴露，就解决得越彻底。青海的事情就正是这样。

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证明，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能无往而不胜。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又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了革命的大联合。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夺权斗争，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形成了革命的“三结合”，又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了革命的“三结合”。这就保证了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大批判、大斗争。

这种大批判、大斗争，在推进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的时候不能放松，在夺权斗争中不能放松，在掌权和用权的过程中也不能放松。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充分发挥革命的领导干部的核心骨干作用。在青海省的夺权斗争中，一批革命的领导干部站了出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他们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进一步亮了相。毛主席说：“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青海省的革命干部，正是按照毛主席这个教导做的。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模范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帮助他们转变过来，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这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青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受蒙蔽的群众，不搞人人过关，不搞打击报复。而是以对革命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耐心细致地、一个一个地帮助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使他们在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大斗争中提高觉悟，反戈一击，共同对敌。

青海的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所开辟的航道上，进入了新的伟大的航程。青海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在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同时，狠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实现思想的革命化。这样，才能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创造出—一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彤彤的新青海。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全文如下：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青海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在您的光辉思想照耀下，在革命的大批判的高潮中，我们青海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大军，以“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为主体，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把青海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都夺回来了！

这是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乘风破浪胜利前进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西北高原的一次大捷！

凯歌高奏，红旗漫卷，在这欢庆胜利的盛大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跳跃，我们热血沸腾！千言万语涌心头，心潮逐浪热泪流，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啊，毛主席！今天，当我们回顾一年来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时，我们的眼里饱含着激动的泪水，心头充满了对您的无限热爱。昆仑山高，您光辉的形象更比昆仑山高，青海湖深，您天大的恩情更比青海湖深。以祁连森林作笔，用青海湖水当墨，也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感激，无限敬仰！我们永远永远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那掌握着中国革命航船之舵的巨手，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毛主席啊，毛主席！

是您以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亲手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是您亲手书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光辉的篇章，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和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

是您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是您亲自决定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是您高瞻远瞩，以极大的魄力，果断的措施，亲手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宣告了维护旧世界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

是您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进一步系统地解

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照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前进的道路。

云涌星驰宇宙宽，风吼雷鸣气势豪。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一系列的伟大指示和英明决策，鼓舞着亿万文化革命大军，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全面的胜利的总攻击。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一声令下，我们挥戈杀向战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您伟大的号召，给了我们必胜的坚定信念，鼓舞着我们向青海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连续冲击，清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顽固堡垒。

造反有理，一反到底。您殷切的期望，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勇气和力量，使我们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的《青海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的社论，决心紧紧跟着您老人家，誓当砸烂旧世界的闯将，永作开创新时代的先锋。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一年来，我们迎逆风，战恶浪，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围困。“一二·九”在民和，我们粉碎了旧青海省委妄图私自销毁一汽车黑材料的阴谋，“造反有理”的战旗在湟水两岸高高飘扬；“一·二八”大夺权！我们踏着“一月革命风暴”的狂涛怒澜顶风上，击退了资产阶级经济主义歪风的进袭，我们革命造反的红色铁流浩浩荡荡。是您的革命路线时时为我们胜利领航，使我们在斗争的暴风雨中锻炼成长。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您老人家为人类命运操劳，语重心长，我们为祖国前途出力，志大胆壮。您光辉的思想是我们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精神武装。“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急流险滩无所惧，刀山火海我敢闯。我们彻底粉碎了青海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您的革命路线，保卫了您光焰无际的伟大思想。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毛主席啊，毛主席！在阴云迷雾的白色恐怖中，我们日日夜夜仰望着您光辉的形象；在艰难的日子里，您老人家的教导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坎上！

浩歌正气动天地，生生死死为革命。面对残酷的迫害，我们高声朗读着您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英勇守卫青海日报社的九天九夜里，我们满含热泪无限深情地一遍又一遍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我们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面向着东方，心向着东方，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碧血青史写新篇，蓝天白云寄红心。

旭日东升照长空，锦绣河山展新容。毛主席啊，毛主席！又是您老人家洞察一切，及时发现了青海的问题，拨正了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引导着我们走上了新的历史航程。

天大地大不如您老人家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您老人家亲！我们又怎能不千遍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在您光焰无际的思想照耀下，历史的长河更加汹涌澎湃，波澜壮阔，浩荡东向，气象万千。今天，青海的形势大好！您的革命批判的大旗，插遍了昆仑南北，您播下的革命种子，生根开花在湟河两岸，一个万炮齐轰中国赫鲁晓夫的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正在青海高原全面兴起，蓬勃发展。

革命实践使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了您所教导的真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的现实，使我们深深懂得：政权就是我们的命根子。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誓死斗争。我们决心遵循您老人家的教导，高举您的革命批判的大旗，把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同批判他在青海省党内的代理人结合起来，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坚决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任务，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祖国的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敬爱的毛主席，您给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您争气。我们用鲜血和生命从阶级敌人手里夺得了大权，我们也一定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这个大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有您光辉思想的照耀，有您亲自主持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我们敢于为无产阶级掌权，我们也一定善于为无产阶级用权。我们坚决执行和捍卫您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方

针，加强青海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迅速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秩序而斗争。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深深地懂得，我们的胜利同您的战略部署要求比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一定念念不忘您的告诫，要警惕“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遵照您所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牢记您“既当‘官’，又当老百姓”的教导，响应您“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的号召，警惕阶级敌人“和平演变”的阴谋，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作风，永远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永不变质，永远革命。

敬爱的毛主席，您总是谆谆教导我们：必须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们一定听您的话，照您制定的政策办事，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我们不但要做国内革命派，还要做世界革命派，永远不忘国际上一切受压迫的阶级兄弟，随时准备支援亚非拉地区反帝反修的斗争，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普照全球，闪耀万代！

敬爱的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是您提出来的伟大方针，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要乘文化大革命的东风，猛促工农牧业生产，多快好省地为把青海建设成为祖国社会主义的战略后方而挥汗劳动。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战斗号召。这是您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青海的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和“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肩并肩，心贴心，急革命派之所急，帮革命派之所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我们要永远向解放军学习，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活动。誓让莽莽昆仑变为钢铁般的长城，绵绵祁连变成无敌的防线。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的英明舵手，您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誓死保卫您，誓死保卫您的革命路线，保卫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永远永远牢记您的教导：现在的文化大革命，

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要高度警惕那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千秋万代忠于您的思想。谁敢反对您，我们就打倒谁！谁敢诋毁您的光辉思想，我们就造他的反！谁敢动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根毫毛，我们就砸它个稀巴烂。为了保卫您，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江山代代赤胆在，长河滔滔志不摧。我们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您伟大的思想永远永远与日月同辉！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庄严宣誓：我们最最坚决地执行林彪副统帅的号召，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我们一定要用您光辉的思想，来统帅一切，推动一切，改造一切。我们要把学习您的光辉著作，看得高于一切，先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我们要永远以“老三篇”为座右铭，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彻底斗倒“私”字，在头脑里树立您光辉思想的绝对权威，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誓把青海建设成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伟大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永远照耀着青海高原。

毛主席啊，毛主席！千言万语说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有了您，人类的命运就有希望；有了您，世界的前途就有指望；有了您，我们就有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们要永远紧跟着您，紧跟您的光辉思想，紧跟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以您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时代在前进！祖国在前进！请您老人家放心吧！我们决不辜负您的期待！千年青史，在您的教导下，由我们来谱写——谱写成您光辉思想的颂歌；万里山河，在您的指示下，由我们来安排——安排成您光辉思想的新天下！我们永远永远是忠于您的新一代！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啊，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号公告

青海省党、政、财、文一切权力，全部归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坚定不移地掌握斗争大方向，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运动；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拥护、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扑；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号公告 全文如下：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亲切关怀下，经中共中央批准，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正式宣告成立。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更新的阶段。任重道远，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执行十六条，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深入开展大批判运动，彻底完成斗批改任务，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此，特公告如下：

一、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由刘贤权同志任主任，由张江霖等同志任副主任。自即日起，青海省党、政、财、文一切权力，全部归青海省革命委员会。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是全省最高临时权力机构，全省各族人民必须积极支持和维护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

二、坚定不移地掌握斗争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充分发动群众，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大批判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青海的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彻底批深、批透、批臭，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

在大批判运动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推动和彻底完成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坚决支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在一切需要夺权的单位和部门，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把党、政、财、

文大权统统从他们手里夺回来！

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耐心地教育和帮助受蒙蔽的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促进他们自我革命，发动他们揭露保守组织的幕后操纵者和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在斗争中，争取和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对一般的犯路线错误的干部，必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就是犯了很严重错误的干部，也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

受蒙蔽的群众和犯了错误的干部，要勇于认错改错，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积极向“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靠拢，同他们一起，勇敢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坚决的斗争，在阶级斗争中经受新的考验。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不断增强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团结，加强思想革命化，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我们的团结。

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严防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必须受到国家纪律的制裁。

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革命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必须坚守工作岗位，既要当革命的闯将，又要当生产的模范，誓夺革命、生产双丰收。

坚决执行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和“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反对铺张浪费，厉行勤俭节约，停止外出串连，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永远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各族革命群众要拥护、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解放军要爱护、相信

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学习。坚决支持“八·一八”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积极参加和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扑。凡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凡蓄意破坏军民关系的反坏分子，必须追究、查处；凡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生产者，依法惩办；凡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纠纷者，必须法办；对于杀人凶手，必须依法惩办；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七、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改造一切，批判一切，推动一切。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以“老三篇”为座右铭，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全省革命人民，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真正掌握起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和工作人员、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指挥员，要学在前面，用在前面，作出好样子。

一定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把青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青海上空永远飘扬！

八、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往所发出的一切公告、通令，必须坚决执行。

本公告自即日起生效。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贤权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大立毛泽东思想 把青海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战友

们：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今天正式成立了！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伟大胜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支响彻云霄的凯歌！

在这全省各族人民最盛大的节日里，我们衷心祝愿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军区和驻青海各部队广大指战员，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地大力地支持“八·一八”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对青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新的功勋，我们向他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在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首都和全国各地来青海串连的红卫兵小将，同我们并肩战斗，同呼吸、共命运，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舞，我们向他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夺权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今天，在我们庆祝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时候，让我们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怎样战胜重重困难，克服种种阻力，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党、政、财、文大权，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一年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进一步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确立了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最彻底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彪同志为全党的副统帅，进一步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败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全会的文件，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向全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光辉道路。在具有伟大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毛主席的大字报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

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是又一声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号炮”，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取得决定胜利的一炮，是摧毁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炮，是保证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一炮。从而，使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明白了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

一年来，我们“八·一八”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和阶级敌人的生死搏斗中，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每一个胜利，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伟大成果，是“十六条”的伟大成果，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是毛主席点燃了青海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和显微镜，使我们揪出了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伸向青海的黑手，安在青海的钉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妄图通过这些家伙把青海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基地。长期以来，这些家伙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意旨，恶毒地污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肉麻地吹捧中国的赫鲁晓夫，忠实地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四清运动中搞形“左”实右，在农牧区推行“三自一包”，在民族统战问题上实行投降主义路线，在教育、文艺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干部问题上，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打击大批革命干部，包庇重用坏人，篡夺党政财文大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狂妄叫嚣“党重新建设，政权重新组织，干部重新认识。”全面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一套修正主义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里，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的罪恶活动。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又顽固地充当中国赫鲁晓夫炮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玩弄阴谋诡计，实行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天不怕，地不怕，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向着青海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向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奋勇冲杀。当阶级敌人眼看自己即将完蛋的时候，来了个狗急跳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信念，和阶级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搏斗。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不管阶级敌人如何摧残，我们都是一心向着毛主席，一心向着党。有的同志在遭到摧残的时候，一不叫苦，二不喊痛，只要把身边心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拿出来看一看，就精神振奋，力量无穷。同志们，亲爱的“八·一八”等革命派的战友们，这是什么样的力量？这是什么样的精神？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给予我们的力量，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我们要向那些坚决保卫毛主席，坚决保卫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学习；向那些在敌人镇压下，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同志学习。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要象他们那样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下，在人民解放军驻青海各部队的大力支持下，在“八·一八”等革命派的英勇斗争下，彻底粉碎了反革命复辟逆流，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青海高原，拯救了青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经过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

青海地区的保守组织，在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下，在政治上受了害，中了毒，打击了“八·一八”等革命派，破坏了阶级兄弟的感情。保守组织中的个别坏人，甚至是阶级敌人，对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进行过残酷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争取、教育、团结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是一个非常艰巨复杂的问题。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在解放军支左部队的支持和帮助下，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正确区分了两类不同性

质的矛盾，分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受蒙蔽群众的界限；分清受蒙蔽群众作坏事和坏人做坏事的界限。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对个别反坏分子，坚决镇压。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即便作了这样那样的错事，他们是无罪的，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共同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坏分子开火，防止和克服了要搞“红色恐怖”，“只有触及皮肉，才能触及灵魂”的错误倾向和错误做法。我们紧紧掌握了斗争大方向，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深入的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群众，提高受蒙蔽群众的觉悟，使他们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在毛泽东思想的感召下，在“八·一八”等革命派的耐心帮助教育下，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悟，自动解散保守组织，许多同志加入了“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我们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使保守组织土崩瓦解，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大杀回马枪，揭发旧省委内以王昭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一八”等革命派在斗争中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没有发生打击报复现象，没有发生大的武斗，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这是党的政策的作用。

在对待干部问题上，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坚定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识别干部的时候，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有的单位认为识别干部标准不好掌握，对于同一个干部，有的说是革命的，有的说是不革命的。原因何在？关键在于没有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立场，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看干部，而是从个人的角度、个人的观点去看干部，所以就统一不了，甚至可能把革命的领导干部揪住不放，使应该结合的干部不能结合起来。许多单位的经验证明：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才能正确地识别革命干部，才能帮助犯错误的干部站出来。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敢于坚持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实行“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对待革命的干部，敢于支持，敢于保护，不怕别人说“右”倾、“保守”、“保皇”。对青海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坚决打倒，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决不允许钻进我们革命队伍里。正因为我们“八·一八”善于区别干部是那个司令部的人，是走什么样的道路，能不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从

而使许多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了，组成了革命的“三结合”。我们夺了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仅仅是开始，我们要运用省里用毛泽东思想夺权的经验乘胜前进，将全省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踞的权力，统统夺回来，使全省一切权力都真正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革命同志们，战友们！我们都是在一起战斗的，我们在一起打垮了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反革命复辟逆流，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大好形势。这一切胜利都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胜利的法宝，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是我们克服任何困难的法宝。这是我们党几十年的斗争证明了的，我们亲身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证明了的。我们要永远永远、世世代代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法宝。

掌权必须用毛泽东思想

我们必须认识到，不仅要善于夺权，而且要善于掌权和用权，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夺了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广大革命人民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我们革命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青海的代理人，在大批判、大斗争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革命派掌握大权恨得要命，怕得要死，每时每刻都在挖空心思地要搞垮我们无产阶级所掌握的政权，妄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同我们斗争的手段将会更加隐蔽，更加狡猾，更加毒辣。最阴险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特别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进行腐蚀侵袭，搞“和平演变”。我们要切记毛主席的教导：“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革命派队伍中，有些同志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可能随着地位的变化而滋长和发展，很容易被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打中，因而要百倍警惕阶级敌人的糖衣炮

弹的攻击。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高度警惕，千万不要以为夺了权，就天下太平了，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我们青海省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未停止。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我们的领导权，妄图把无产阶级专政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一严重教训，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和全省各族人民，要永远牢牢记住。

林彪同志指示我们：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永远不要忘记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省革命委员会建立后，确有千头万绪的事，我们必须遵照林彪同志的指示，决不能忘记政权，决不能忘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掌权，用毛泽东思想用权。我们党几十年的斗争，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一切一切，都证明一个真理：用毛泽东思想掌权，就能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资产阶级思想掌权，就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用“公”字夺权，就是忠实地执行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掌权、用权，就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用“私”字夺权，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用资产阶级思想掌权、用权，就会蜕化成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要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夺过来的政权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最最根本的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掌好权、用好权。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个大方向就是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青海的代理人，推动和完成本单位的斗、批、改任务，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透、批臭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只有抓住这个大方向，才能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只有抓住这个大方向，才能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只有抓住这个大方向，才能团结全省各族人民，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总之，说一千句，道一万句，就是要抓住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放。谁要放松这一点，谁就会迷

失方向，就要犯方向错误。有的同志认为，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了，是“死老虎”了，没有什么斗头了，可松一口气了。我们说：“老虎”躺是躺下了，但还没有死。不是没有斗头，不是可以松口气，而是要密锣紧鼓，一鼓作气，遵循毛主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教导，以“八·一八”等革命派为核心，把全省各族人民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团结一心共同对敌的战斗大军，展开一场气势磅礴，锐不可挡的大斗争、大批判运动。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把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批透、批臭。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条战线上，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青海省各个阵地。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对于某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那么多人，什么问题都要求一个看法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的大前提下，允许有不同看法，欢迎提出不同的意见，对运动、对问题提出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是关心运动，关心革命的表现。有些意见一时统一不起来，也是允许保留的。我们可以在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但是，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和不同的看法，都应该看到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把对准敌人的枪口掉过来对准同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革命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夺权斗争是付出了代价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敌人对我们的残酷迫害。我们要把阶级仇、血泪恨，凝成千百倍的力量，狠狠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阶级敌人，我们要发扬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反扑中向青海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永远保持这种精神。如果我们有的同志，忘记了阶级敌人，把革命派内部的某些认识上的分歧和意见看得过重，硬把问题往纲上提，甚至发展成“内战”，那就会使我们一起战斗的同志痛心，使阶级敌人高兴。那就对不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予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的关怀和支持。

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和全省各族人民，一定要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掌好权、用好权，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打退敌人糖衣炮弹的进攻；坚决防止小资产阶级思想，从右的或“左”的方面来干扰我们的政权，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要善于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我们每

一个革命派的同志有权监督和帮助我们的政权，要拥护我们的政权，爱护我们的政权，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特别是我们掌权以后，手里有了财权，更要精打细算。一枝笔，一张纸，一根铁丝，一粒粮食，都要注意节约，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本色。铺张浪费，是资产阶级作风，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我们还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工厂、农村、牧区要积极抓革命、促生产，力争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机关要抓革命、促工作，把本职工作搞得更好；学校要向北京航空学院学习，复课闹革命；军队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伟大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这是对人民解放军最大的关怀，最大的信赖，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当前，青海省军区和青海驻军面临的战斗任务，就是响应林彪副主席的伟大号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地和“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坚决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随时准备打击任何敢于侵犯的敌人。总之，我们既要搞精神文明建设，又要搞物质建设，并且要用精神文明建设来推动物质建设。如同总的火车头带动火车在双轨道上前进，就会一日千里。

革命委员会一定要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关键在于革命委员会成员头脑里，要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处处按毛主席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办事。

我们的政权，必须是掌握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人手上。今天，毛主席信任我们，人民信任我们，把全省的大权交给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无论在思想上、工作能力上，距离毛主席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都是很远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使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得多一点，深一点，跟得紧一点。这样，我们的智慧就会多一些，本事就会大一些，错误就可以少犯一些，犯了错误也可以改正得快一些。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为谁掌权的问题。是为无产阶级掌权，为人民掌权，为“公”掌权，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为小团体掌权，为“私”掌权。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要自觉用毛泽东思想去战斗，彻底扫除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为“公”掌权，为无产阶级掌权，为人民掌权，为社会主义掌权。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如果为“私”掌权，任“私”字在头脑里兴风作浪，就会引起蜕化变质，出修正主义。

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不管是比较老的还是年青的，都必须扎扎实实地改造世界观，既要改造客观世界，又要改造主观世界。我们一定要完成毛主席和全省各族人民给予的重托，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立毛泽东思想，把青海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领导革命，决不允许用非无产阶级思想领导革命。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学了就用，用毛泽东思想克服我们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坚决照办，我们不能凭过去的老经验、老水平，以想当然来代替毛主席的思想。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指引工作，以毛泽东思想衡量工作。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准则，离开了毛泽东思想，那就非犯大错误不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理解的要坚决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我们要执行得好些，就得遵照毛主席教导：“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过分相信自己，陷入盲目性，不符合自己愿望的事就不执行，甚至提出自己的“小山头”来对抗，任其发展下去，由小变大，由量变到质变，就有可能走向反毛泽东思想的危险地步，犯路线方向的错误。这

次文化大革命中揪出来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千条罪、万条罪，最根本的一条罪，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要时刻给自己敲敲警钟，绝不能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二、一定要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决不允许立个人权威。大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这是革命的头等大事，是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我们革命委员会每个成员，在大立毛泽东思想权威上，要以身作则，做好样子。如果打个人小算盘，搞个人的权威，争名、争利、争权、争位、争出风头，忘了整体，忘了七亿人民，忘了三十亿世界人民，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要胸怀祖国，眼望世界，要树立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世界的雄心壮志。打小算盘的人，就不可能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可能忠于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作风，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话，就不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就不做。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同志要自觉地改造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毛泽东思想水平，处处事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大立特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三、一定要站在群众之中，决不允许站在群众之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关心群众，最信任群众，最善于走群众路线，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革命委员会年青的同志是在群众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老同志与群众也都有较深的感情。但是，我们掌权后，地位发生了变化了，如何保持普通老百姓的本色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人民的利益，关心革命的利益，要处处想“八·一八”等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所想，作“八·一八”等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所作，急“八·一八”等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所急，要时时想到革命，事事为革命，终身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永远永远记住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高居人民之上的权利。要牢记毛主席教导：“即当‘官’，又当老百姓”。我们要：（1）正确地认识个人的作用和群众的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民的群众运动，决不是少数人能完成的，更不是那个人包打的天下。毛主席说：“人民，只

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只是为革命尽到自己应尽的一分力量，切不可把自己的作用估计过高，更不能把自己作的事当作资本，显示自己高明。要是那样，就把自己摆到不适当的地位了。

（2）对待同志的态度，要善于取长补短。多看到别人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有长处，都有短处。你在这一方面有长处，在另一方面可能有短处。长处和短处也都不是静止不变的。每个同志应该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就是你的长处多，也不应该骄傲，也不值得骄傲。如果光看自己的长处，不看别人的长处，那里还谈得上向群众学习，作群众的小学生呢？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3）正确对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每个同志都是一分为二的，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如果只看优点，就会骄傲，就会脱离群众，就不能继续前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特别是在革命取得一定胜利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要遵照林彪副主席的指示，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这里首先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自己头脑里私字的命，经常扫除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才能继续前进，不断革命。如果只革别人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

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在我们欢庆成立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立毛泽东思想，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完成一切任务的根本保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我们相信忠于毛主席的“八·一八”等革命派和全省各族革命人民，一定会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上昆仑山顶，插遍全省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商店，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每一条街道，每一寸土地，使青海高原永远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让我们高呼：

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彻底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伸向青海的黑手！

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一九六八年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青海省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文章：《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武器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一最新指示，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内容。它象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进一步照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航程，给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在阶级斗争新形势下，向我们发出的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号令，也是我们当前反击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我们青海省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阶级感情，热烈欢呼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的发表。一年多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战胜一切阶级敌人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伟大纲领，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保证。对于毛主席这一极其重要的最新指示，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把它作为斗争的准则，行动的指南，字字照办，句句照办。

当前，我们青海和全国一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传播、大普及，革命大批判如火如荼，革命大联合日益巩固，革命三结合空前发展，基本上实现了全省一片红，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整个青海高原呈现着一片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革命

景象。

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绝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目前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勾结社会上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余孽，在某些地方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妖风，他们又扯起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旗，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钢铁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秘密串连，幕后策划，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否定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否定我们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大方向，把保守组织说成是“犯错误的老造反派”，以便重新拉起山头。社会上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也伺机反扑，妄图否定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绩，大刮翻案妖风。大量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

毛主席的最新英明指示，大长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鼓舞着亿万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迎头痛击反革命复辟逆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阶级敌人是一些笨得出奇的家伙，“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他们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管他们多么阴险狡猾，不管他们反革命策略多么“高明”，但是，在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新反扑，只不过是几只碰壁的苍蝇在冻死之前发出的嗡嗡悲鸣，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落个可耻的下场。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青海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狠抓阶级斗争，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青海的代理人继续发动持久的进攻，把革命的大批判深入地持久地开展下去。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迎头痛击右倾翻案的妖风，彻底粉碎阶级敌人一切阴谋活动，把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统统揪出来，把一切变色龙、小爬虫统统揪出来，彻底斗倒，批臭。

我们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生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献身。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乘浩荡的东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三、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总政的《处理意见》称：“一九六七年二月，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将青海革命群众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四十七人（亡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的严重事件，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造成‘二·二三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联办’领导小组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和武装夺占报社的错误决定与行动”，“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副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处理意见》称：“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中央、军委在转发总政《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同意总政《处理意见》的请示，并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一九八几年，中央军委作出结论：赵永夫受了冤屈，但有严重错误。当时确实打死了不少红卫兵。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八日逝世。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中共青海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解决一批重大遗留问题

中共青海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实事求是地解决一批影响安定团结的重大遗留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据新华社西宁电 参加青海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围绕着把全省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议题，发扬民主，各抒己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根据青海的实际，实事求是地，集中地解决了一批影响安定团结的重大遗留问题，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会议认为，两年多来，青海省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工业、农业、牧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青海省已经基本具备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条件。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影响安定团结的因素。在去年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许多同志就提出，青海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是非还没有彻底澄清。

在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同志们纷纷就此问题提出了批评。省委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评，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对由这一决定而造成的冤案、假案、错案一律予以平反昭雪。省委还对解决青海文化大革命中涉及全省的十一个遗留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如宣布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青海是占主导地位的，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驻军指战员是好的，是革命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文化大革命前的第四届省委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受到全省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些符合全省各族人民愿望的决定，把功过、是非分清了，大家的心平了，气顺了。

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许多与会同志特别是州委、县委的负责同志反映，省委前一段在落实有关人的政策上，虽然做了大量工作，纠正和平反了不少冤案、假案、错案；但是，对象主要是脱产的国家干部，对于农村、牧区的广大基层干部和各族农牧民群众，还有许多遗留的问题，急待解决。省委根据大家的建议，经过调查研究，发动与会同志充分讨论，解决了几个关系到调动基层干部和各族农牧民积极性的重大问题。其中有：

改正了一部分人的家庭成份。青海农村在土地改革时划分了阶级成份，但后来在“四清”运动中又重划了一次阶级成份，把一些不应划成剥削阶级的人划为剥削阶级。牧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四清”运动中划分阶级成份时，违背国务院关于按当地解放前三年经济状况和实际剥削量为划定阶级成份的标准的规定，而附加了一条，即参照一九五七年以前三年的经济状况划分阶级成份，因此，划定的剥削阶级比例偏大。这次省委明确规定，农村以土地改革时划定的阶级成份为准，“四清”运动中重划的无效。牧区按一九五七年以前三年经济状况划定的剥削阶级一律无效。同时规定凡划为“宗教职业者”成份的，政治上按中牧对待，属于团结对象，过去把宗教职业者当作“专政”对象的，一律改正过来。

落实了对农村、牧区基层干部的政策。省委决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基层干部因说了错话、做了错事而戴了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或者因为工作错误等原因戴了坏分子帽子的，一律摘掉帽子。其中属于冤案、假案、错案而被处分的，给予平反。农村、牧区的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审查，长期查无实据的，除极个别大案、要案外，一律宣布不再审查，以解除他们的顾虑，同心同德，为四化做贡献。

2007年10月4日初稿

2011年9月29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篇五章（4）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四节 内蒙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请示中央批转“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主席、中央：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揭发了乌兰夫的错误。中央先后撤销了乌兰夫的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内蒙古大学校长等职务。内蒙古自治区各族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热烈拥护中央的决定，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们纷纷要求公布乌兰夫的罪恶活动。近来，随着文化大革命更深入广阔的发展，这种要求日益强烈。并且，有些干部和群众，因未公布乌兰夫的罪恶活动，而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发生严重怀疑和不满。因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建议，请中央批准华北局一九六六年七月向中央所作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自治区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经过讨论，华北局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建议，即把乌兰夫的错误问题，在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和军队党的基层组织中，在革命群众的组织中，进行公布，以利于内蒙古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以上请示，是否妥当，请中央批示。

中共中央华北局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节录）

主席、中央：

在五月华北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会议的一百十六位同志（包括旗、县委书记），根据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和批判了乌兰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

对乌兰夫的错误批判和揭露，从六月七日至七月二十日，共进行了四十三天。除小组会外，开了几次区党委常委会议；六次有各盟、市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十六次全体会议，乌兰夫检讨交待了四次（在常委和常委扩大会议上各一次，在全体会议上两次）。

在此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和高等学校，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集中地揭发了乌兰夫及其一伙的错误。

根据揭露的大量事实，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乌兰夫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乌兰夫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

乌兰夫放肆篡改和歪曲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里说：“种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乌兰夫对毛主席这个英明论断是反对的。他叫秘书从马、恩、列、斯著作里查毛主席这句话有无根据。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他在筹备庆祝内蒙古成立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再再说：“民族问题就是人民问题。”“毛泽东思想是民族团结。”“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只要在民族问题上抓住这二条，我看就根本抓住了民族问题的核心。”他甚至竟然宣称“民族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的实质”。“离开了民族问题的具体事实，空谈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句空话。”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听取乌兰夫汇报时，对民族问题作了

重要指示，主席说：“蒙汉两族要密切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说清楚。”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主义。”而乌兰夫不仅没有在党内传达这一指示，反而和主席公开唱对台戏。他强调“逐步实现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任务。”他不仅这样说，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

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阶级斗争。而乌兰夫却以民族问题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突出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六年二月，他在土默特旗四清工作队整训大会等几个会议上反复强调“民族问题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我们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乌兰夫却公开攻击毛泽东同志著作是“教条”。他说：“学毛选要从自治区的实际出发，要有的放矢。……不从实际出发，不解决针对性问题还不是教条。”“学习毛泽东思想要与内蒙古实际相结合。”“学习毛泽东思想，中心是树立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一九六六年四月。根据他的授意写成的区、党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大学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中，就是提出：“只有真正认识到内蒙古的实际，解决了从实际出发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才会有新作为，才能踏出自己的路。”实际上，就是要在内蒙古树立一个“乌兰夫思想”，要干部学习他的民族问题的言论。（他有“言论集”五卷，油印本，在少数人中发过，后又收回了）一九六六年三月三日，自治区党委发出的《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工作要点》，要求“结合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在“学习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要“学习乌兰夫同志有关民族问题的重要讲话及有关文章”。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所谓“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即所谓发展党的组织和贫协会员的多数及蒙人，建立起阶级队伍的政治基础；贯彻农牧结合的方针，蒙人可以放羊，汉人也可以放羊，汉人可以种地，蒙人也可以种地，农牧互相支援的经济基础；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行两种语言文字的文化基础。他说：“有了政治基础，有了经济基础，又有了共同语言，……结果就反映

了共同心理。……有了共同的心理状态，在文化上民族团结就有了可靠的基础”。并且把它看成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民族融合”的三个基础。

乌兰夫的“三个基础”，是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任意曲解、篡改、贬低毛泽东思想；根本不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乌兰夫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点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取消阶级斗争。他提出在牧区实行和平过渡，对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实行和平共处，对蒙修实行和平竞赛，以民族问题代替阶级斗争的“三和一代”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以民族问题代替四清，代替阶级斗争。他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把民族矛盾扩大为主要矛盾，提出内蒙古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大汉族主义。并且，以此为借口在内蒙古自治区大反大汉族主义。他还指出：“在四清运动的自始至终都要狠抓民族问题，”“揭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也是揭民族问题的盖子。”他狂妄地在毛主席提出的搞好四清运动的六条标准之外，还要增加一条：“民族问题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并且说：“如果这一条没有做到，其他六条都做到了，也只能说四清运动搞好了一半。”乌兰夫以他的家乡土默特旗为据点，总结出所谓大汉族主义几种表现形式，突出地反大汉族主义。去年十二月，他在土默特旗四清汇报会上公开说：“我与大汉族主义斗争了几十年，今年六十来岁，还能斗二十年，非把他们斗倒不可。”甚至指责一些蒙族干部说：“就是蒙族干部也是犯了大汉族主义错误，不是地方民族主义错误。”“蒙族干部犯大汉族主义错误，比汉族干部更危险。”以此来煽动民族情绪，企图把土默特旗的四清运动变成反大汉族主义运动。有些蒙族的革命左派，被孤立，受打击，被看成是“汉族的走狗，蒙族的叛逆”。这样，乌兰夫就把四清运动的性质、重点根本改变了。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性质矛盾，而是民族矛盾；不是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而是重点反对他所谓的大汉族主义。他把他这一套所谓“经验”写成纪要，用自治区党委名义批转下去，要全区仿行。

乌兰夫反对在牧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实行“和平过渡”。他在牧区坚持改革步子要稳，处理要宽，时间要长的“稳、宽、长”的政策，说这条“和平

改造的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革命中要自上而下自始至终的贯彻执行。他认为革命要破坏生产，说什么“革命革得把牲畜都死完了，牧民的思想要变的。”在少数民族地区平叛问题上，他也是反对的。一九五五年九月，中央讨论四川XX地区的平叛问题时他说：“对少数民族打仗是下策。”当时中央就不同意他的观点。一九五六年六月，在一次会议上仍然坚持他的观点，说：“我当时在会上说打仗是下策，但会上有的同志不以为然。”又说：“我认为我们如果搞错了，应该承认错误，才能稳定人心。”

乌兰夫反对牧区划阶级，坚持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他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次会上讲，这个政策“调动了牧主生产发展的积极性，牧主也好，牧民也好，富的也好，穷的也好，都发展了牲畜。”“今天看这个问题也还是这样，这是牧业的一条方针。”因此，他认为“生产上去了，不划阶级也心甘情愿。”由于他一再阻拦，内蒙古绝大部分牧业至今没有划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很不巩固。

乌兰夫美化民族上层，牧主和宗教上层，主张同他们实行“和平共处”。一九六二年四月，他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干部，都是过去的亲王、公主，……而且工作得很有成绩。所以，各族人士，各阶层、宗教上层人士和一切爱国的，赞成实行自治的各阶层人民，我们都团结了，并进行了思想改造工作，同时放手使用他们。”又说：“保卫自治区，就是保卫着蒙古人民，也保卫着宗教信仰。”他还到处宣传呼盟有一个牧主富得很，发展了两万头牲畜，从前去哈尔滨坐火车*坐飞机，最后把牲畜原盘交给了公私合营牧场，现在去哈尔滨坐火车不坐飞机了。但是，他从来不讲牧主的钱是剥削来的，在四清运动中，他竟然还主张“要同少数民族领袖商量。”“要倾听少数民族领袖的话，把少数民族领袖团结了，群众就团结起来了。”

乌兰夫对蒙修在政治上不进行斗争，主张实行“和平竞赛”。他所谓的反修，不是在政治上同蒙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在牧畜头数上要大大超过外蒙古，不是在牧区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教育，而是强调物质刺激。因此，在牧区尤其是在边境区，不少群众祖国观念不浓，对蒙修恨不起来。

乌兰夫还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他提出：“千条万条，增加牲畜是第一条。”“搞不搞生产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真革命与假革

命的问题。”所以，他用生产代替阶级斗争，把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去年巴盟中后联合旗遭受风灾，牲畜受到损失。今年一月八日，乌兰夫发电报指责搞四清是造成在风灾袭击下牲畜遭受损失的最主要原因，强令停止四清。在今年三月，内蒙古区党委发出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工作要点》，竟然提出：“以抗旱抗灾为中心的农牧业生产，是当前全党全民的中心工作，是各行各业共同任务，必须全力抓好。”在总任务当中对阶级斗争、反修斗争只字不提。

乌兰夫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社会主义民族”，“机关民族化”，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平叛等重要问题上，同李维汉的修正主义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是互相支持、利用、公开反党、反中央的。

三、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

乌兰夫对内屈服于王公贵族、牧主的压力，对外则屈服于修正主义的压力。

在蒙文文字改革问题上，乌兰夫坚持斯拉夫化，全套搬用外蒙古的，说：“把语言文字同外蒙古一致起来，是为了影响他们。”一九五五年即在全区推行蒙文斯拉夫化，直至一九五七年周总理在青岛提出拉丁化时，才停止下来，但至今不搞拉丁化。

乌兰夫在对外关系上是卑躬屈膝的。一九六一年七月，他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和蒙古党十四次代表大会。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代表在大会上讲话时，他两次带头起立（没有鼓掌），孤立了阿尔巴尼亚的代表。蒙修在播送和刊登我党的贺词和代表团团长讲话时，故意把“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篡改为“世界上有我们的朋友”。代表团人员发现后，两次报告给他，他都不理睬。蒙修对我代表团参观乌兰巴托百货大楼极端无理，故意冷落。在我代表团参观前，蒙方动员全店人员去欢迎波兰客人，店门紧闭。但他甘受凌侮，坚持参观了那个“无人商店”。泽登巴尔因撞车受伤住院，乌兰夫提出去医院慰问。蒙修同意乌兰夫与王维舟同志二人去看望。但泽登巴尔的老婆（苏联人）只准乌兰夫一人进病房，王维舟同志当场愤然离去，而他不但不同王维舟同志采取一致行动，反而喜笑颜开，无动于衷，一个人进去探望了泽登巴尔。事后，王维舟同志归国前，向蒙方负责人对此无理行为表示遗憾，他也在场，毫无表示。

去年以来，正当我们同修正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泽登巴尔疯狂反华，

极力挑拨蒙汉关系时，乌兰夫把反修旗帜降了下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大反大汉族主义，完全适应了国外修正主义的需要。

四、以一九三五年《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

乌兰夫对一九三五年《中共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念念不忘。去年下半年以来，公然打起《宣言》的旗帜，进行民族分裂活动。

一九三五年《宣言》中提出：“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规定：“原来的蒙古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木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城。……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它的一切权利。同时，内蒙古民族的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它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

这个当时党内教条主义者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发表的《宣言》，正适合乌兰夫目前搞民族分裂主义的需要。解放以后，他拿《宣言》规定的区域，向中央“要账”，争地盘，在同毗邻省、区划界时，一步不让，寸土必争。今年一月，他把《宣言》印发到全区，要求下边以此“检查我区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求内蒙古自治区所有干部要大学一番。

乌兰夫印发一九三五年《宣言》的借口是反大汉族主义。实际上是借自治之名，搞独立王国之实。当前内蒙古大汉族主义不是主要危险。主要危险是地方民族主义。建国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一直没有认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因此，地方民族主义相当严重。民族分裂分子的活动相当嚣张，叛国事件一再发生（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六年六月，共发生一百六十起，九百三十八人，其中已遂六十八起，六百二十四人）。对有些重要民族分裂案件迟迟不处理，甚至姑息养奸。更严重的是，在这次华北局工作会议期间，内蒙古赤峰军分区副参谋长云列成（乌兰夫的远房侄儿），从呼和浩特突然来京，进行地下活动，说他是受云世英（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等人之托，转告“土默特旗人，都要顶住，让乌兰夫也要顶住”。还说：“‘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山打游击也要‘革命’。”

事实十分清楚。内蒙古的地方民族分裂主义的总根子就是乌兰夫。他是以一九三五年《宣言》为纲领，以反大汉族主义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民族

分裂主义活动，搞独立王国。

乌兰夫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绝非偶然的。他有强烈的“领袖欲”。他把自己装扮成蒙古族的“领袖”、“权威”自居，他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实行“家长制”领导，心目中根本没有民主集中制根本没有自我批评；他只能听颂扬，听不进半点批评，千方百计树立个人的威信。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喊“乌兰夫主席万岁”，在牧区大量印乌兰夫的象。乌兰夫的象同毛主席的象平挂在一起，甚至现在有的地方还挂着他的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长浩帆（乌兰夫的亲信）在办公厅干部中公开讲：“在中央听毛主席的，在内蒙古听乌兰夫的”，“全国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内蒙古要学习乌兰夫思想”，“党委的文件要体现乌兰夫思想”。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干事何跃（乌兰夫的亲信）当着他的面说：“乌兰夫同志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领袖。”所有这些，乌兰夫十分欣赏，从不加任何制止。

乌兰夫对中央、毛主席、军委以及华北局的指示，他们不同意的就加以抵制，或拖而不行。除上述不传达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指示。不执行周总理关于蒙文拉丁化指示外，对林彪同志指示要把原下放的军马场上交总后勤部，他坚持呼和马场不交，对中央、华北局在内蒙古进行农垦，也一概不支持、不欢迎。他对中央、华北局实行严密封锁。他的许多见不得人的讲话、报告，根本不送中央、华北局，甚至有些文件，华北局要，也不报送。

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

乌兰夫为了积极推行他的民族分裂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治阴谋，在近两年多的时间内，处心积虑地实行了一条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

他任用干部的标准，是能否坚决执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否积极反大汉族主义，搞民族分裂主义。并且无原则地优先照顾家族，实际上是优先照顾蒙族干部中的右派。在蒙族干部中他又分东蒙、西蒙、土旗、非土旗，延安民族学院学生、非延安民族学院学生。他的亲戚、亲信更吃香。因此凡吹捧乌兰夫、反大汉族主义的人，就被重用、提拔；凡是坚持党的原则、不投他所好的人，就被排斥、打击，甚至关押。

这样乌兰夫搜罗了一批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极端个人主义分子和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包括有汉族干部），形成了一股右派势力，并以一

小撮亲信为核心，搞阴谋活动，尤其是一些重要人事的安排，他们都是事先密谋策划。乌兰夫自己交待说：“都是书记处之外的‘小书记处’”。

去年下半年以来，乌兰夫迫不及待地安插亲信，篡夺党政重要部门的领导权。

1. 用建立“代常委”阴谋手段，篡夺区党委常委会的领导权。

今年一月，乌兰夫乘自治区党委许多常委和书记处的成员到基层蹲点或患病之机，不顾书记处王铎、方锦明二同志的反对，成立了以他的亲信为主的十三人“代常委会”，其中蒙族干部就有九人，有六人是土默特旗蒙族干部，作为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具，“代常委”代替了常委会，在他的亲信操纵之下，大力推行乌兰夫的民族分裂主义路线。

2. 大量安插亲信，控制党政要害部门。

乌兰夫借精减机构、建立“五委”、加强领导之名，安插亲信，篡夺了区党委办公厅、组织部、调查研究室，和自治区人委的文委、计委、农委以及公安厅等重要部门的领导权。

3. 在呼和浩特市委发动了修正主义政变。

乌兰夫用修正主义分子、反大汉族主义急先锋李贵（汉族，呼和浩特市委新任第一书记），会同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处书记陈炳宇，把市委第二书记赵汝霖同志的缺点、错误扩大化，加上所谓“反乌兰夫”，“不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等罪名，戴上“反党宗派主义”帽子，把赵汝霖同志整掉。李贵在呼市连续作了八次报告，并到包头市干部会议上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里大肆宣扬修正主义，反大汉族主义；大肆吹捧乌兰夫如何英明正确，反毛泽东思想；一笔抹煞呼和浩特市十几年民族工作的成就，扩大蒙汉族矛盾；把民族政策说成是贯穿一切工作的红线。在全市通过“揭盖子、挖根子、换班子”，实现了修正主义的政变。乌兰夫对李贵搞的呼市政变，倍加赞扬，说是“建立了马列主义的领导班子”。

4. 以呼和浩特市政变为样板，积极在其它盟、市搞修正主义政变。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乌兰夫亲自主持下，以区党委名义批转了呼和浩特市委关于“有关民族工作方面一部分问题的报告”的政变经验。这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政变纲领。文件里首先把他自己捧为一贯正确，“领导全区人民获得解放，……受到全区各族人民爱戴和拥护”，然后指出：“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指大汉族主义——注），目前特别突出地集中攻击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内蒙古

自治区的一部分老的蒙族领导同志”，“内蒙的民族问题，就是内蒙的革命问题。反对党的民族政策，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内蒙领导同志，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民族政策，反对内蒙古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前自治区党内民族问题上的主要倾向”，这是当前自治区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突出表现”。这个文件为许多地方的民族分裂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开了“绿灯”，他们拿上这个文件四处活动，积极地准备进行阴谋反革命政变。他们把手首先伸进地方党政机关，也开始伸向军队。

5. 集中打击自治区党委汉族领导干部，为其推行民族分裂主义扫清障碍。

今年四月一日，乌兰夫以突出政治为名，在“代常委”会上搞“小鸣放”，他带头点名攻击区党委书记王铎、权星垣、高锦明（满族）等同志。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把错误推给别人。说王铎把农业搞得“一毛不拔”。权星垣把工业搞得“手无寸铁”，高锦明不执行民族政策，污蔑自治区商业是“大盛魁”（旧社会剥削蒙人的大商号）。接着，“代常委”就跟着他的意图积极准备整这些同志的材料。在会外，王丽文、浩帆等人**市区党委这些书记和一些领导干部反乌兰夫，积极做舆论上的准备。

今年四月下旬，乌兰夫以贯彻华北局会议、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为名，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亲自出马，调兵遣将，煽风点火，突出反大汉族主义，打击王铎、权星垣等同志，企图实行“宫廷政变”。此时华北局已有所发现，派人去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制止，并且恰好中央叫他去京参加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乌兰夫的这次阴谋才未能实现。接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乌兰夫的错误被揭发，他的阴谋完全破产了。

乌兰夫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受资产阶级教育，参加革命以后，长期做民族上层工作，很少参加群众运动和艰苦的阶级斗争。解放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养尊处优，当官做老爷。所以，他虽然入党四十多年，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一贯表现右倾，并不是象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一贯正确。”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国内外阶级斗争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触动了他的灵魂深处，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就迫不及待地、明目张胆地打出自己的旗帜，公然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进行民族分裂活动。乌兰夫是党内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大阴谋家。他想用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改造内蒙古，来改造内蒙古的党组织。

内蒙古自治区是祖国的边疆，是反修的前哨，是战略要地，中央对乌兰夫是信任的，委他担负了重要职务。但是乌兰夫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任和期望。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出发，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发展到分裂祖国统一，在内蒙古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程度。乌兰夫的错误，对祖国边疆的巩固，对民族的大团结，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遗毒很深。

乌兰夫的错误思想，过去就有所流露。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对他进行过说服和批评。近几年来，华北局对他的错误有所觉察，也不止一次的提醒并批评过他。但他从来没有自我批评，对待批评也是两面派的态度。在这次会议上，他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虽经同志们的严厉批判和斗争，开始有所认识，但他仍不愿与错误彻底决裂，没有根本改变错误立场。与会同志对乌兰夫所犯错误和对错误的态度，十分愤慨，纷纷要求中央严肃处理，彻底肃清乌兰夫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相信，内蒙古自治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革命的，是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能够肃清乌兰夫错误造成的影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内蒙古自治区一定会举得更高，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跃进局面。

以上报告，请中央审查。如中央同意，我们建议中央把这个报告批转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和军队党的基层组织，并在革命群众组织中公布。

中共中央华北局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的电报，和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1967. 01. 27；中发 [67] 31 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

现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的电报，和中共中央华

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转发给你们。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发

（正文原载北京化工学院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 [第二集]》，北京：1967 年 9 月；附件根据中央文件的群众组织的翻印件，出版者不明）

二、开展革命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七月某日，滕海清谈内蒙古目前形势

〔滕海清：内蒙古军区司令员〕

目前内蒙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八条”下达后，方向明确了，四·一三到五·二六，这段时间里，出现了反党集团制造的反革命逆流，使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五·二六以后，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彻底粉碎了反党集团的阴谋。五·二六以后“八条”在内蒙各地得到了认真的普遍地执行这段时间里较好的，呼市比较平静，按正常秩序进行工作，其它各地方也逐渐好转。分区武装部的各级干部基本上都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现在除伊盟阵线不分明以外，其他地区阵线却是分明的。比较好的是哲、锡盟、巴盟比较正常，其他地区由于表态比较晚，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比较紧张，比如海拉尔、牙克石发生了武斗，但形势还好的。从军队到地方受蒙蔽的群众绝大多数已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现在正在以造反派为骨干带动了广大群众，向反党集团的骨干进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扩大了，正在开展声势浩大的大批判运动，内蒙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后，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走的权基本上都夺回来了，基本上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现在内蒙生产情况有好转，农业生产情况较好，小麦增产 20%，工业生产从七月开始有好转。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革命造反派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中出来的成果。当前也存在很多问题，要把内蒙问题搞好任务是很艰巨的。对乌兰夫及其代理人的斗争还没有搞出个很大的名堂。比全国其它地方晚一个到二个月。对王铎的斗争现在也没有系统地开展起来。这项工作在相当长时间

内是中心的中心。军队在没转变之前，大批判运动是无法进行的，造反派本身前一阶段受到镇压，现在需要整顿一下，做一些准备工作，所以使大批判运动晚了些。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总指挥部：《乌兰夫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乌兰夫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内蒙古各族人民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激烈的阶级大搏斗，把他揪出来了，挖出了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中央先后撤销了乌兰夫的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内蒙古大学校长等职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长期以来，乌兰夫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直接支持下，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在统战、民族、宗教工作方面，他是推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长期以来，乌兰夫在内蒙古利用职权，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纠集一批王公、贵族、特务、变节投敌分子及其他反党分子，结成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反革命集团，与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庭抗礼，分裂祖国统一，大搞独立王国，建立“内蒙古王朝”。乌兰夫对全国各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支持内蒙古“呼三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布署，在集中力量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斗倒、斗臭的同时，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揭发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在统战、民族工作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大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共流毒。

下面我们初步整理出乌兰夫十五条大罪状的材料，供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揭发、批判时参考。

一、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1】

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就是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为个人树立威信，无耻地吹捧自己。贪天之功为已有，把自己打扮为“唯一正确的领导者”，“正确路线的代表”。根本无视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甚至狂妄地宣称要在自治区踏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公然要人们紧紧跟上“乌兰夫思想”，要自治区各级宣传机构加紧宣传“乌兰夫思想”。用“乌兰夫言论集”代替《毛泽东选集》，阴谋诋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与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分庭抗礼。妄图另立旗帜，自立制度，实现分裂祖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2】可是三反分子、大叛徒乌兰夫经常肉麻地吹捧自己，以“领袖”自居，妄图把自己打扮成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党的化身，以抵制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乌兰夫在一个文件中无耻地批示：“反对以乌兰夫为首的内蒙古领导同志，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民族政策，反对内蒙古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一次会上甚至叫喊：“反对乌兰夫，就是反对内蒙古党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乌兰夫借反对“反党集团”之名，公开声称：“是什么人反对乌兰夫？是国民党反动派，是地、富、反、坏、右。反对乌兰夫就是反对内蒙古党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乌兰夫在土旗讲话的时候说：“有人要追根子，我的根子就是毛泽东，反对我就是反对毛泽东。”

早在 1945 年至 1949 年，在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乌兰夫要人们呼“乌兰夫主席万岁！”“云（乌）主席万岁！”等口号，一直到 1952 年，有些地方仍然流行着“乌兰夫万岁！”的口号和标语。1960 年乌兰夫去呼盟向牧民说：“禁止开荒，保护草原，是乌兰夫对牧民的关怀。”乌贼竟野心勃勃地树立个人“威信”，并煽动牧民高喊“乌兰夫主席万岁！”的反动口号。

乌兰夫的历史本来就臭不可闻，但他却恬不知耻地要为他树立偶像，在内蒙古地区大量印发乌兰夫“伟人像”，有些地方就只挂乌兰夫像，不挂毛主席像。还下令四处雕塑乌兰夫像，把自己打扮成不可一世的“英雄”，以满足他的“领袖”欲。在乌兰夫授意下，内蒙古博物馆为他雕刻了十几座塑像。有“抗日战争时期的乌兰夫”，“解放战争时期的乌兰夫”，“自治运动联合时期的乌兰夫”，

“今日的乌兰夫”等等。每个都要送請乌兰夫的小老婆兼“总参谋长”云丽文审查批准，每座雕像创作费高达 500 元以上。

乌兰夫为了实现他的“领袖”欲，还大量印发编印《乌兰夫言论集》。现在出了五卷兰皮精装本《乌兰夫言论集》，发给内蒙高级干部阅读，并且制订了计划，准备陆续印刷出版。这些都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他自己吹嘘的大毒草，大量贩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言论。乌兰夫疯狂反对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

乌兰夫还收罗一些人大编歌颂他的歌曲，流毒很广。例如一首反动的“内蒙青年进行曲”歌中唱道：“我们有了革命领袖——云泽（乌兰夫）同志领导，我们向前……为了我们民族的平等自由，向大汉族主义者进军！进军！进军！”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大特务、叛国头子所规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他的全部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罪恶活动，都是直接对抗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乌兰夫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种种罪恶都表现得极为露骨，极为恶毒。

1958 年 3 月在成都会议上，乌兰夫汇报时，毛主席就指出，蒙汉两族要密切合作，要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那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讲清楚【3】。毛主席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指示，就是针对乌兰夫之流讲的。毛主席的指示，刺痛了乌兰夫资产阶级反动民族主义的要害。因此，他对毛主席极端仇视，内心十分恐惧。为了掩盖他的民族分裂活动的罪恶勾当，把毛主席的指示严密封锁起来，不但不向自治区各族人民传达，也不向自治区各级干部传达。竟胆大包天，瞞天过海，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凭空捏造毛主席的“指示”。1966 年春，在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乌兰夫当众撒谎说：“毛主席一年之内问我三次民族关系。毛主席在那时不讲阶级斗争，而问民族关系。”又说：“毛主席问我汉族干部听不听你的话？汉族干部犯了错误你敢不敢处分他们？”好一个大骗子手乌兰夫！竟胆敢如此卑劣地耍弄政治骗术，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反对毛主席！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内蒙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乌兰夫都千方百计地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中央提出内蒙生产应以农为主，为什么乌兰夫不顾中央指示，不顾内蒙古

自治区实际情况，却提出“以牧为主”的方针与中央指示对抗，还不满地说“内蒙的粮食是不是过了关？反正是自给有余！要不是全国粮食紧张，内蒙有什么紧张！”

1965年6月，毛主席指示要大力培养卫生人员【4】，乌兰夫胡说什么“大力培养卫生人员，是承认医生，将来要消灭医生。”毛主席要抽三分之一的卫生人员下乡【5】，乌兰夫则强调“要加强城市街道卫生所、门诊部、减轻城市医院压力。”中央规定地方工业建设的方针是：第一，为农业服务，第二，为人工业服务，第三，为市场服务，第四，为出口服务。而乌兰夫篡改为：第一，为农牧业服务，第二，为自治区重点建设服务，乌兰夫还叫嚷说：“办地方工业，不为自治区服务，为谁服务？” 乌兰夫就是用这些偷天换日的卑劣伎俩，遮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阳光，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封锁内蒙真实情况。把自治区搞成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以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二、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林彪副统帅教导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6】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千方百计地和我们林副统帅大唱反调，恶毒攻击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对各地轰轰烈烈的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我们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乌兰夫凶相毕露地把毛泽东思想诬蔑为“教条”，“不解决内蒙古的实际问题。”他恶狠狠地诬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主席著作放在身上，主席语录写在墙上，突出政治挂在嘴上。”胡说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他还反动透顶地列举了一大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状”，什么“学习毛选不下基层，学习毛选文化不下乡，学习毛选知识分子不下乡，学习毛选干部不下乡，学习毛选不愿参加四清，学习毛选怕苦，怕死……。”看！乌兰夫这个万恶不赦的家伙对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是何等恨之入骨！

乌兰夫为了对抗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挖空心思，从各方面对革命群众施加压力，企图扼杀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正当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轰轰烈烈地展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之际，他却针锋相对地在自治区组织大

学蒙文、蒙语的群众运动，和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争时间，争版面，争纸张、设备等。企图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排斥在一边，把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压下去。同时为他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准备干部条件。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见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势不可挡，便打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旗号，贩卖他的黑货。1966年1月4日，乌兰夫在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上，装作对全区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支持”，做出了“五点指示”，“第一，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第二，抓活思想；第三，面向基层；第四，解决领导核心和培养革命接班人问题；第五，精通业务。”根本不提突出政治，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用偷天换日的手段，塞进“政治落实到业务上”的黑货。并肆意歪曲，把“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说成是在“民族问题”上狠下功夫，“否则学了毛选也是一塌糊涂。”他把“抓活思想”归结为“抓大汉族主义”思想；他借口面向基层，扼制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他叫喊的“解决领导核心和培养革命接班人”，就是为实现民族分裂，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政策的黑帮队伍准备条件。

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毛主席亲自参加制定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中说：“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总是坚定的相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他们充分的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光荣传统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地向困难作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7】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对毛主席亲自制定和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进行恶毒攻击和诽谤。1961年他在内蒙党委第十四次扩大会上，胡说什么“大跃进违反了客观规律，太热了，过了头。”叫嚣要“消灭三面红旗上的黑点”。乌兰夫还恶毒地诬蔑内蒙工农业建设的蓬勃发展，他说：“现在内蒙古还是手无寸铁”，他胡说大跃进的教训是“不同程度上违反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又说：这几年的错误“一个是动摇了所有制；一个是比例失调。”更恶毒的是：在1956年他在内蒙古筹备二十周年庆祝活动报告会上说：“爱祖国包括内蒙古在内，光爱天安门，天安门是不长粮食的。”

乌兰夫对人民公社也是竭力反对和敌视的。他按照其主子刘少奇的“大砍合

作社”的意图，提出在牧区停业发展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在一九六二年民族工作会议上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有些地区，在这几年可以不办人民公社和合作社，将来再办。某些边疆地区需要退的，应当坚决退下来。”乌兰夫极力否定人民公社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他在 1965 年土默特赖农牧林誓师大会上说：“公社化以前他们（指他四清蹲点的前朱堡大队）有大量树林呀，大群牲畜呀，从一九五八年以后，集体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大片的树林被破坏了，集体牲畜被杀光了”，“解放以来，特别是 1958 年以来，人民生活没有很好提高，很多落后队生活很苦”。一句话，在内蒙古公社化搞糟了。

乌兰夫在内蒙古牧区反对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8】。提出在牧区步子要稳，处理要宽，时间要长的“稳、宽、长”的政策，在发展畜牧业生产上，提出“稳定，全面，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方针，同党的总路线相对抗。乌兰夫借口大反特反商业经营管理思想上的“大盛魁的作风”，“大盛魁思想”，（大盛魁是建国前二十年就倒闭了的大旅蒙商，对蒙古族人民通过不等价交换的手段进行超经济剥削）恶毒的攻击党的商业政策，同时暗示中央不在自治区搞建设，挑动蒙古族人民跟着他们一道，对抗党中央，分裂社会主义祖国。

四、积极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蠢动，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9】

乌兰夫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千方百计地妄图在内蒙复辟资本主义，把内蒙变成他的独立王国。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他在商牧业生产上极力主张无限制地发展社员自留畜。他在 1957 年 10 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中说：“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坚持既发展公有的畜牧业，又发展社员个人自留畜的公私兼顾的方针，是农业区发展牧业的重要问题之一。……合作化以来，内蒙农村干部和合作社干部中，有一种让所有社员的牲畜都入社，对社员自养劣质牲畜不放心的思想，因而不是积极帮助社员个人发展牲畜，而是限制个人发展牲畜，这是不利于生产的。”又说“从内蒙牧区的阶

级情况，政治状况看，我们认为，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在合作化中有意识的保留牧民对于牲畜的所有权，对社会主义改造，对发展生产都是有利的，所谓保留所有权就是在合作社内较长时期采用初级的办法，使社员每年能够从畜股分到合理的利益。同时按照社员的自愿，允许社员自留较多的牲畜。”由于乌兰夫极力主张发展自留畜，结果社员自留畜发展速度远比集体快，有的社员自留畜达到三、四头。有些农区生产队社员自留畜的比重也比集体畜高，因而大大削弱了集体经济。

乌兰夫在畜牧业生产上采取包产到畜群生产组的办法，推行刘邓的包产到户的政策，为牧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绿灯。

乌兰夫积极宣扬刘少奇“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剥削有理”等反动理论。他说，“对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和合作社，因牲畜增加，劳动力仍然不足的时候，可允许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雇工，经过相当时期后，再把他变为合作社社员。”1953年一次座谈会上说：“如确实因劳动力不足……小量的雇工可以允许。”公社化以后，规定给牧主付定息，说牧主拿定息不是剥削。

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篡夺领导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10

乌兰夫为了达到他篡党篡军篡政，分裂祖国，搞独立王国的罪恶目的，大肆排斥异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1966年1月，乌兰夫背着中央，借口加强领导，分工负责，解散自治区常委，大量排除异己，任用亲信，组成十三人的代常委。并将毕力格巴图尔，陈炳宇、浩帆等心腹组成“三人小组”，凌驾于书记处之上，操纵区党委大权。同时在自治区的党政要害部门大量安插亲信。在自治区一级政府机关中，乌兰夫以精减机构为名，撤销了六十多个厅局，建立了工交、农牧、财贸、计划、文教〔“五大委”〕，并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完全控制了内蒙的党、政、财、文大权。

乌兰夫及其黑帮掌握了内蒙的所有实权之后，便开始进行大清洗。乌兰夫说：

“打起仗来，甚至还有人调转枪口对准我们”，所以“要清理内部”。计划在一九六六年清洗 80%，同时大量提拔，安插亲信，以备他们进行全面复辟。在呼和浩特市，乌兰夫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贵等人，以“反乌兰夫”，“不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借口，用“揭盖子，挖根子，摸班子”等办法，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在自治区党委则集中力量打击自治区党委内的革命领导干部。乌在“代常委”会上搞“小鸣放”，围攻打击原党委书记处书记，权星垣、高锦明等革命领导干部，并整他们的黑材料。企图进一步在“代常委”中搞清一色，使十三名“代常委”完全由其心腹组成，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宫廷政变”。可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乌兰夫搞“内蒙古王朝”的梦想彻底被粉碎了。

六、搞独立王国，破坏祖国统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1】

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搞独立王国，破坏祖国统一的狼子野心由来已久。早在 1947 年，乌兰夫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就打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公开号召：“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团结起来。”1948 年在一次报告中又公然否认内蒙古是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鼓吹民族分裂，大讲“内蒙古人民与中国人民”，宣扬“民族自决”，“独立自主”，“走外蒙古的道路”等等。

1965 年以来，乌兰夫大量印发 1935 年王明假借毛主席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简称三五宣言）。这个宣言内提出：“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规定“原来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查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它一切权利。同时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成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它民族结成邻帮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乌兰夫以 1935 年《宣言》为纲领，以“反大汉族主义”为步骤，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分裂祖国的活动，大搞独立王国。这是乌兰夫妄图建立“大蒙古王朝”的舆论准备。

乌兰夫还扬言：“我这个人反对大汉族主义，已经几十年了，还可以再反二

十年”。他的小老婆云丽文也狂妄叫嚷：“战争打起来和中央断绝关系！”真是嚣张已极！

乌兰夫为了建立反革命的“内蒙古王朝”，千方百计地利用文艺阵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戏剧、电影、展览等进行大反“大汉族主义”的活动。乌兰夫为了分裂祖国，为自己歌功颂德，还借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之机会，亲自给内蒙文艺界规定宣传方针，即突出民族地区特点，突出反大汉族主义，突出土默特旗，突出乌兰夫个人。

乌兰夫为了巩固和扩大他的“独立王国”，在与邻省解决区划问题时，是“寸土必争，得寸进尺”，“只能划进，不能划出”。他在党委会上一再强调“区内为什么还闹边疆纠纷，叫他们发扬共产主义精神，至于外区嘛，那就是另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关系到自治区的问题。”例如在解决伊盟与甘肃中旗与吉林的边区区划纠纷时。乌兰夫就象封建王侯扩张领土一样地将本区区划一再扩大，并亲自坐阵指挥，与邻省争地盘。

乌兰夫为了搞独立王国，进行里通苏修、蒙修的叛国活动。在蒙文文字改革问题上，乌兰夫坚持主张斯拉夫化，全套搬用外蒙的，要“把语言文字同外蒙一致起来”。“统一使用一种文字”。早在 1956 年，乌兰夫还背着中央，指使语文研究所所长额尔敦陶与蒙修搞了一个内外蒙《四十三人名词术语统一委员会》。同年额尔敦陶从蒙修回来向乌汇报说：“他们（指蒙修）提出了合并问题。”乌兰夫当即追问：“你没问他们向那边合并吗？”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乌兰夫背着中央妄图分裂祖国，进行叛党叛国的罪恶活动。

1963 年乌兰夫亲自下令，不让在锡盟边境地区进行反修试点，并责令烧掉揭露蒙修泽登巴尔反华罪恶的材料。我国人民在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修正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蒙修领导集团的头子泽登巴尔在帝修反进行反华大合唱中，扮演着可耻的角色，地处反修前线的内蒙古，乌兰夫却把反修旗帜降下来，在内蒙大反“大汉族主义”，这不是里应外合的行动又是什么呢？

七、反对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抹煞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12】

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长期以来，在民族问题上，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

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关于“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13】的科学论断，否认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用民族问题代替阶级斗争。1965年12月，乌兰夫在筹备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座谈会上胡说什么，“民族问题就是人民问题”“毛泽东思想就是民族团结”，“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只要在民族问题上抓住这两条，我看就根本抓住了民族问题的核心”。他把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篡改成：“民族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的实质”，“离开了民族问题的具体事实，空谈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句空话。”乌兰夫反对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达到何等猖狂的程度！

1965年11月，乌兰夫抛出了所谓“巩固与发展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的修正主义谬论。他胡说什么：“有了政治基础，又有了共同的语言，……结果就反映了共同的心理。……有了共同的心理状态，在文化上，民族团结就有了可靠的基础。”并且把它看成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民族融合基础。乌兰夫的这“三个基础”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根本不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这完全是为他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大搞独立王国所做的舆论准备。

乌兰夫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刘春在1961年炮制了一个“社会主义民族”的修正主义谬论。乌兰夫在1962年民族工作会议上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改变了，阶级关系改变了，民族关系，民族内容也改变了”，“内蒙古自治区内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起，开始成为社会主义民族”。认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阶级消灭了，各少数民族也都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民族”了。这完全背叛了毛主席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抹煞了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抹煞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

乌兰夫为了掩盖民族问题上的阶级实质，把农、牧业生产上的矛盾，也说成是民族矛盾。他在1965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扩大会上说：“民族关系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牧矛盾的问题”，以农牧上的生产矛盾代替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完全荒谬到了极点！

八、抹煞民族区域自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14】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的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最根本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乌兰夫抹煞民族区域自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问题是少数民族在管理本民族的事务上当家作主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他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说：“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执行中的缺点，关键是当家作主问题，有的地方贯彻不够，有的地方尚未贯彻，自治地方的财政管理权，制定条例和公安部队问题都没搞出一套的东西。”这充分暴露了乌兰夫借区域自治之名，向中央争夺财权、政权、军权的狼子野心。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招待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宴会上乌兰夫公然胡说什么：“处理民族自治地方内部事务的问题上，也不尊重当地民族干部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而由在那里工作的汉族干部包办代替”。一九六二年四月，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又说：“当家作主的权利是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财政等方面的。只有在这些方面实现了民族平等权利，才能真正体现出当家作主。”

乌兰夫所说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不是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为那些王公、贵族、牧主、喇嘛等剥削阶级和社会渣滓争职争权，篡改党的区域自治政策的根本性质，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机关。

一九六四年国庆前，民族文化宫展览修改时，乌兰夫亲自到民族文化宫，要内蒙馆区域自治一版中增加“三五宣言”，并要用显著标记突出宣传如下两点：

(一)原来内蒙大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均应归还内蒙古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

(二)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它的一切权利……如前所说，这个“宣言”是当时党内老机会主义者王明假借毛主席名义发表的。而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空前的国家统一，内蒙古各族人民生活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大家庭的今天，乌兰夫还大量印发和展出“三五宣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向谁要“土地”？谁干涉了蒙族人民的权利？向谁要“权利”？这不是明明白白代表着王公贵族、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各族劳动人民要土地、要政权，妄图利用这个“宣言”制造民族分裂吗？

乌兰夫又别有用心地极力鼓吹建立大自治区，煽动各少数民族“按自主原则

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一九五六年，准备在中央召集的统战、民族工作会议上用的发言稿中写道：“我以为可以建立一个彝族自治区，因为聚居在那里的彝族群众已经有一百二十万以上，地方也牵连二、三十县，这和省比较，当然是人口少，地区小的，但少数民族就是少数，是可以照顾的。我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实行大省制的国家，可以允许成立人口较少，地区较小的民族自治区。这也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有人提议及早在青、甘、川边的地区建立藏族自治区，我以为也是可以考虑的……如果现在还不能建立，我觉得也可以阿坝、甘孜两地区，先在党内建立一个在四川省委领导下的区党委，以加强这些地区工作的领导。”

毛主席指示：不能吃民族主义的饭，要吃共产主义饭【15】。而乌兰夫却反对毛主席的指示，胡说什么：“自治机关民族化问题，这基本上是民族发展问题。创造文字，自治机关民族化都是为了民族发展，否则就没有意义了。”他所说的自治机关民族化，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自治机关以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组成；一是以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行使职权；一是自治机关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适应当地民族特点。他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而强调什么“民族特点”、“地区特点”，阉割自治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一实质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乌兰夫扬言：“仅仅实现自治机关民族化，不去实现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就还没有彻底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实现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任务。”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而乌兰夫提出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的用意是分裂党，把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分成若干个民族党，用心又何其毒也！

九、反对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彻底革命，积极推行“和平改革”、“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6】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顽固地站在封建地主、农奴主、牧主阶级立场上，在少数民族地区坚持“和平改革”和“和平过渡”，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群众起来闹革命，极力保存封建势力和其他反动势力，维护封建主和奴隶主的统治。

乌兰夫竭力主张改革要按上层的“意愿去作决定”。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在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少数民族积极分子座谈会上说：“可以不再采取其他民族地区已经采取过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方法，而采取和平的方法，即经过曲折迂回的步骤和更为温和的办法，逐步地自上而下地进行。”这是地地道道的反对暴力革命。他主张在各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时期，党和政府容许各族人民以及在各民族中同人民群众有联系的公众领袖们从容考虑，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去作决定。这完全是放弃党的领导，放弃革命的投降主义路线。

乌兰夫不提改革口号，不敢触动剥削阶级反动社会基础，是真保护假改革。一九五六年，乌兰夫准备在中央统战、民族工作会议上用的发言稿中说：“和平改造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中要自上到下，自始至终的贯彻执行。和平改造，从表面来看主要是对上层让步，从实质上看，则是为了在较少的震动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这主要是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这是骗人的鬼话！不触动剥削阶级的反动社会基础，那里还谈得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还胡说什么：“和平改造也是一场阶级斗争，但在步骤、方法、方式上不是面对面的斗争，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迂回曲折的斗争。策略上我们是‘网开三面’，不仅使进步分子，而且使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都容易接受，这就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觉得我们办事合乎‘人性’，在道理上我们是站在完全主动地位。”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莫大诬蔑。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对农奴主、牧主、王公、头人恨之入骨。乌兰夫所说的合乎“人性”正是合乎剥削阶级的“人性”，是站在农奴主、牧主的立场上，替剥削阶级说话。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乌兰夫以为对农奴主、牧主“不应四面出击，造成全面紧张，应该一件一件的办。……在步骤、方法上也不宜狂风暴雨的搞运动，而宜于微风细雨的解决问题。有些改革也可以一件一件的办，而不提改革的口号。”毛主席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7】而乌兰夫却背道而驰，对抗毛主席的教导，他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压制群众的革命，连“改革”的口号都不让提，暴露了他的剥削阶级代言人的丑恶嘴脸。

乌兰夫在牧区顽固地推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修正主义

政策。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又一次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后【18】，乌兰夫在一九六二年的民族工作会议上还说：“在牧区继续按稳宽长的方针，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甚至到一九六五年，乌兰夫仍然颠倒黑白地说：“只有修正主义分子才想上在牧区划阶级。”

十、极力美化宗教，主张“和平共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9】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否认宗教问题的反动本质，极力美化，保护宗教和宗教上层。六二年四月，他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说：“保卫自治区，就是保卫着蒙古人民，也是保卫着宗教信仰。”在会上还介绍所谓内蒙古经验时说：“萨木登是个喇嘛，而且参加革命还不是年青的时候，现在当了共产党员，他的生活一方面是共产党员，而每天起来念一下经，但他另一方面党的政策决议他是毫无保留地执行，这又是一方面。他念经还有他的习惯，跟咱们每天起来打太极拳一样。那你为什么不可以让他念经？”他接着又说：“对一切民主人士，……爱国的宗教上层人士，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安置在适当的岗位上，使之各得其所，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现在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各级政权中，在许多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中，都有这些朋友在担负着各种工作，不少人还担负着领导工作，大多数人在工作中作出了很好的成绩。”乌兰夫就这样处处宣扬宗教上层起了积极作用，极力保护和美化宗教。

少数民族中的反动派、宗教上层和牛鬼蛇神疯狂攻击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乱，利用宗教猖狂地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他们造谣惑众，攻击党的宗教政策是“消灭宗教”，“消灭民族”，公开以所谓“宗法”来同国法对抗，极力扩大宗教势力，肆无忌惮地进行反革命封建复辟。而乌兰夫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中，却颠倒黑白，极力吹捧宗教上层说：“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大多数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的政治思想觉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他们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三面红旗的，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并说：“宗教界大多数人是反帝，爱国守法的”。

宗教是反动统治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是毒害劳动人民的鸦片，而乌兰

夫不但不揭露宗教的反动本质，反而竭力吹捧宗教说什么“现在我们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蒙古民族开始成了社会主义民族，喇嘛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民族的发展？还要请在座的宗教界朋友们多加考虑，提些意见。”

乌兰夫不但为反动的民族宗教上层开脱罪责，而且向他们卑躬屈膝，为他们张目，经常指责一些同志说：“对党的政策，对毛泽东思想认识不够，体会不深，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政治上安排不当，工作上帮助不够，生活上照顾不够”等等。

十一、破坏伟大的四清运动。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做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它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新人的伟大的运动。”

【20】乌兰夫这个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在内蒙古的代理人，被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吓破了胆，于是亲自上阵，纠集了他的干将和爪牙，在全区掀起了一股反对四清运动的反革命逆流。

1965年10月，乌贼带领七千多人组成的四清工作队，遍布于土左、土右两旗，亲自坐阵指挥，疯狂地、有组织有步骤地镇压和破坏四清运动。把四清运动歪曲为要“找到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规律”和“解决的办法。”

乌贼还擅自用内蒙古党委的名义批转《土旗四清工作座谈纪要》，要求全区执行，以此来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和《二十三条》相对抗。他多次在工作队员中放毒，散布什么“土旗蒙古人直爽、汉人鬼”，“蒙古人被迫把地给了汉人，蒙古人没办法才转为农业”，等等，竭力煽动民族情绪，破坏民族团结。乌贼又以整训为名，强迫四清工作队员硬上“民族问题的纲”。若谁不按乌贼的指示办事，他就指使其干将“组织力量批判”，打击陷害四清工作队员。

在一次土左、右两旗四清工作团民族座谈会上，乌贼暴露了他在土旗蹲点的罪恶目的。他说：“不要以为把这个点搞好了就算了，要看到全国、全世界！”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他妄想通过破坏土旗四清运动，总结出一套对抗社会主义革命，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经验”，找出镇压群众运动，进行民族分裂的“办法”，以便复辟资本主义，以迎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

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即《二十三条》，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纲领，是伟大的马列主义文件。《二十三条》的制定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破产，为四清运动规定了正确的方针、任务、政策、方法，从而保证了四清运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乌兰夫则疯狂地歪曲篡改、反对《前十条》和《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和前《十条》中说：“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并强调必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教育干部，重新教育人。乌兰夫却说：“牧民脑子里是没有阶级的，硬给人家划阶级，是主观主义。”“没有划阶级完成了民主改革任务，公社化以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非划阶级不可？”《二十三条》要求“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乌贼却极力提倡蒙、汉分队，扩大自留地、自留畜数量，破坏集体经济。他说：“蒙汉分队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么！”《二十三条》说：“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这个纲”。《前十条》中又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乌贼却大谈特谈民族问题，要上“民族问题的纲”，他说：“只有抓住民族问题，才能抓住阶级斗争。离开了民族问题的具体事实，实际上是一句空活。”“土旗四清能不能达到高标准，就看民族问题能不能解决。”还说什么“民族问题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政治。”《二十三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贼却大反特反所谓“大汉族主义者”，并扬言“我与大民族主义斗争了几十年，今年六十多岁，还能斗二十年，非把他们斗倒不可！”乌兰夫故意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转移斗争大方向，不就昭然若揭了吗？《二十三条》指出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乌贼却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大汉族主义”，汉人“整蒙古人”。但事实是：在乌贼的庇护与支援下，在内蒙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民族主义。但他完全混淆是非，转移斗争目标，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民族团结。《二十三条》指出：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而乌贼之流，依靠的全是地、富、反、坏、右以及其他牛鬼蛇神。他还提出“首先依靠蒙族中的贫下中农”的民族分裂主义口号。《前十条》指出：“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而乌贼却要“组织民族贫下中农”的组织，走“蒙族群众

路线”。这是公开煽动蒙汉两族贫下中农的分裂，是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二十三》条指出：在四清中要逐步形成领导核心。乌贼以抓领导核心为名，行反革命复辟之实。趁机大肆把他的亲信、土匪、流氓、蒙奸、特务等社会渣滓安插进各级专政机构内领导核心里。乌兰夫还以生产、抗旱、救灾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1月乌兰夫指令停止“四清”，专搞抗旱救灾。乌兰夫强调牧区畜牧业经济的特点，反对在牧区搞阶级斗争。他说“阶级斗争搞完了，牲畜也搞完了”，“究竟你革命革的怎样，牧民把自己的命也革了。牧主改变了成分，牧民也改变了成分，即成失业游民。”乌兰夫如此顽固地抵制和破坏四清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忠实推行刘、邓黑司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十二、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21】

乌兰夫对内适应资产阶级以及王公、贵族、牧主的需要；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压力。同蒙修勾勾搭搭；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1961年，乌兰夫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代表在大会上讲话时，乌兰夫不仅不进行抵制，反而两次带头起立，使坚决反对南修的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处于孤立；蒙修泽登巴尔，因撞车受伤住院，乌兰夫亲自前往看望。泽登巴尔老婆（苏联人），为了侮辱我伟大的中国人民，竟只准乌兰夫一人进病房，不准一同去的×××同志入内，×××同志当场愤然离去，而乌兰夫却无动于衷，不但不同×××同志一起采取抗议行动，反而厚颜无耻，如获重赏，喜笑颜开地一个人进去看望。事后×××同志在归国前，向蒙方负责人对此无理行为提出抗议，表示遗憾，乌兰夫虽同时在场，竟毫无表示。蒙修在播送和刊登我党的贺词以及我代表团团长讲话时，故意把原文中的“我们的朋友遍于世界”篡改为“世界上有我们的朋友”。而他却不予针锋相对进行斗争。在我代表团参观蒙修百货大楼前，蒙修故意动员全店人员去欢迎波兰客人，店门紧闭。但乌兰夫置英雄的中国人民的国体于不顾，甘受凌侮，坚持参观无人商店。这充分暴露了乌兰夫对修正主义屈膝投降的丑恶面目。

蒙修头子泽登巴尔，配合帝修反疯狂反华，极力挑拨蒙汉关系，乌兰夫为了

适应国外修正主义的需要，在内蒙古反所谓“大汉族主义”。更令人气愤的是，当蒙修、苏修不断在我巴盟、乌盟、呼盟等边境地区大肆进行特务和颠覆活动时，乌兰夫从不坚决回击，任其为所欲为。在乌兰夫的屈膝投降下，近年来，自治区民族分裂集团和叛国集团活动非常嚣张，乌兰夫却让他们逍遥法外。事实证明，乌兰夫是自治区内一切民族分裂分子的总后台，也是国外修正主义的忠实代理人。

十三、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指出：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22】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乌兰夫的丧钟。因此，他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5年10月内蒙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领导下，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鼓舞下，积极行动起来大造特造乌兰夫之流的反。乌兰夫之流吓破了胆，于是慌忙发出一颗战略退却的信号弹。66年5月1日《实践》主编，乌兰夫的黑帮干将厚和奉旨在《实践》上发表了一篇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异乎寻常的社论。乌兰夫之流多年来一直疯狂地反对所谓“大汉族主义”，特别是在最近几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这篇社论突然180度急转弯。接着乌贼又提出“民族问题”在这个时期“主要表现为大民族主义，在那个时期主要表现为地方民族主义，有的地区表现为大民族主义”，等等。企图金蝉脱壳，逃之夭夭。

内蒙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向乌兰夫反党集团发动了猛烈进攻，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情地有力地揭露了乌兰夫之流的罪恶活动，揪出了乌兰夫反党集团的干将和爪牙。乌兰夫之流深知末日临头了，便一面把玛拉心夫等人抛出去当替死鬼，借以转移内蒙人民的视线；一面指使共干将韩明之流到处煽阴风，点鬼火，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猖狂地镇压敢于造反的革命小将和革命干部，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革命小喽喽”、“三反分子”等等，挑起大规模群众斗群众的反革命事件，妄图保护乌兰夫之流过关。乌兰夫还在华北局会议之前，就盗用了大批档案材料，打击陷害

一直与它斗争的高锦明、权星垣等革命干部。

1966 年在华北局五月学习会议期间，乌指使其妖婆云丽文几次让浩帆（乌贼干将）把乌兰夫的多次讲话原始记录转移给她。乌兰夫又让云丽文指使浩帆销毁有关民族工作会议讲话和他的有关黑指示。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三反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这条疯狗虽然被革命群众打落了水，但它人还在心不死。今年二月乌兰夫之流，指使内蒙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和牛鬼蛇神，百倍疯狂地向以呼三司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扑，掀起了自上而下的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实行白色恐怖。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王良太之流杀害了呼三司战士，反而颠倒黑白，驾祸于人，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把呼三司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打成反革命组织，把大批的革命群众逮捕入狱，严刑毒打，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遭受围攻、辱骂、毒打，遭受残酷迫害；广大革命干部被打成“三反分子”，“反革命两面派”等。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铎、王逸伦、王良太之流蒙蔽欺骗广大群众，极力挑拨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血肉关系。四月十三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规定》，号召内蒙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击退乌兰夫及其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王良太之流的反革命复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然而乌兰夫之流仍然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他们继续蒙蔽解放军战士和广大群众，猖狂地对抗党中央和中央文革，他们煽动大批战士、工人、农民、学生上街游行，煽动他们上北京告状，在北京闹事，甚至到中南海静坐。他们直接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康生同志，企图迫使中央收回“八条决定”，继续在内蒙搞资本主义，建立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王朝”。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在内蒙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勇斗争下，他们的阴谋可耻地失败了。

十四、乌兰夫是贪生怕死的大叛徒大特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23】

乌兰夫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特务。他隐瞒自己从狗洞里爬出来投

敌变节的卑鄙可耻的丑史，骗取了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要职。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变节投敌的大叛徒、大特务乌兰夫揪了出来，消除长期隐藏在党内的大隐患，大祸害。这是一件大好事，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大叛徒、大特务乌兰夫是内蒙古默符旗人，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一九二五年赴苏联入莫斯科大学求学。一九二九年回国后，因贪生怕死躲在家里。当时绥远国民党党部大特务陈国英派人去抓他，乌兰夫得讯后逃跑。后来国民党省党部民众运动科长閻秉坤（乌兰夫的妹夫）找国民党大特务陈国英，当时陈国英表示，如果乌兰夫能保证为党国工作，就不逮捕他，以后閻秉坤找乌兰夫商谈，这个贪生怕死的乌兰夫就同意了，乌兰夫就这样变节投敌给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当记者，每月拿薪金三十块大洋。以后乌兰夫就披着记者的外衣，干着特务勾当，成了大特务陈国英的帮凶，杀害革命者的刽子手，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一九三五年，乌兰夫又给大军阀傅作义当俄文秘书，专门研究苏联情况，用傅作义给他的专用电台收听苏联情报，帮助傅作义从事特务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乌兰夫又被派到国民党部队做过政治工作，鼓吹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效尽了犬马之劳。

通过乌兰夫这段自首投敌的丑恶历史，完全可以看出，乌兰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民党大特务，大叛徒。长期以来，乌兰夫这个大叛徒、大特务，不但没有受到人民的审判，反而飞黄腾达，骗取了中央和地方的重要职务。这是由于中国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刘少奇，为了达到篡党、篡政、篡军罪恶目的，千方百计地把他保护下来，充当其反革命班子的一员干将。

十五、乌兰夫是不学无术、养尊处优的大王爷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24】

乌兰夫是一个典型的不学无术、独断专行的大党阀。他平时不但不看报，就是内部文件也很少看。他自己从不动手写东西，就连私人信也要别人代笔。他在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大搞一言堂，独断专行，谁是要提不同意见，触动了“王爷”

的尊严，他就暴跳如雷，破口大骂。

乌兰夫深居“禁宫”，养尊处优，贪图享乐，过着封建王爷的寄生生活。他每天早晨九点多钟才起床，起床后大夫检查身体。他的小老婆云丽文是当代的“慈禧太后”，长期不工作，终日过着腐化堕落，糜烂透顶的生活。“宫内”的工作人员，都是他的奴隶，直接为他服务的就有十二、三人，再加上他的调查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达二十来人。“乌王”出府，前呼后拥，“乌王”乘马卫士保镖，“乌王”玩牌“奴隶”伺候。“乌王”对其工作人员，好象王爷对待奴隶一样，实行残酷的统治。

乌兰夫从不下乡深入群众，有时高兴了下乡游一游，下边干部就遭了殃。一九六一年是自然灾害严重的一年，群众生活暂时遇到困难的时候，乌兰夫乘专车去巴盟，首先命令巴盟军区腾出全部办公室进行粉刷，消毒，到包头拉钢丝床、洗澡盆。把厕所改成坐式的，并叫医院包上纱布，只供一个人专用。吃饭要茅台酒，鲢鱼。为了寻欢作乐，每晚都举办舞会，把市场上的香水几乎全部买光。花天酒地，令人作呕！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25】。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三反分子乌兰夫揪出来了，已成了落水狗。但是他人还在，心不死。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把乌兰夫揪出来，彻底批深、批透、批臭，斗倒、斗臭！肃清其流毒！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打倒刘、邓、陶！

打倒乌兰夫！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附录：

云丽文的主要罪恶

“妖为鬼蜮必成灾”，云丽文这个出身大地主家庭，混入革命队伍，钻进党内的乌兰夫的小老婆，是乌兰夫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她借乌兰夫反革命的阴风，大点反革命的

鬼火，火长风势，风助火威，虽然不少革命同志对她进行过抵制和斗争，但是乌兰夫一手遮天，欺上压下，百般庇护，依为心腹，致使她地主阶级的本性变本加厉地大发作，成了地地道道的女恶霸，成了当代的“慈禧太后”，成了地、富、反、坏、右一切牛鬼蛇神的代理人和各族人民的死敌。她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横行一时，恶贯满盈，死有余辜。这里把她的主要罪恶公诸于世，让人们看看这个女妖精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以便全党全民，口诛笔伐！

一、极端仇视毛泽东思

云丽文象鬼怪害怕太阳一样，害怕毛泽东思想，仇视毛泽东思想，她看见谁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横眉瞪眼，就是冷嘲热讽，乌兰夫身边的工作人员学习《毛泽东选集》，她横加干涉，说：“叫你们来是工作的，不是叫你们来学习的！”“这是用人的地方，不是培养人的地方！”她听说一位秘书在病中坚持学习《毛泽东选集》，便大加斥责说：“你养病还不老老实实，还看什么毛选！”公务员、司机、炊事员等同志学习《毛泽东选集》，她更加看不顺眼，气势汹汹地说：“你们还学习！你们是干什么的？”有时也冷冷的挖苦和嘲笑说：“你们学习的不错呀！”“你们高明呀！”“你们想升官发财吧！”她还强迫秘书、公务员、司机、炊事员等同志占用学习时间和党团员活动时间给她种菜，喂鸡喂兔，陪她打麻将，聊天，听她宣扬黄色书刊里臭气熏人的东西。她的“闲心”只能用在这上面，她自鸣得意地说：“你们有时间学习毛选，我可没闲心学。”

对于各地轰轰烈烈的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她和乌兰夫一起，疯狂地抵制和破坏。他们胡说什么：“毛主席著作装在身上，主席语录写在墙上，突出政治挂在嘴上”，“学习毛选不下基层，学习毛选文化不下乡，学习毛选知识分子不下乡，学习毛选干部不下乡，学习毛选干部不愿意参加四清，学习毛选怕苦、怕死……”等等。在这里她怀着多么深刻的阶级仇恨，使尽了多大的力气来诋毁、谩骂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其目的就是要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顶出内蒙古自治区。妄图用云丽文、乌兰夫的黑手，遮住伟大毛泽东思想最红最红的光辉，而代之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乌兰夫思想”。云丽文是打着乌兰夫的黑旗，反对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开路先锋。所以，当她听到华北局要召开毛主席著作学习会的时候，非常恐惧和憎恶，她说：“闹这个干什么！”

工作这么忙，华北局没事干了！”她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处处都“影响工作”，影响了她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进行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搞反革命政变的“工作”。为了这个“工作”，她们正在拼命宣扬“现在还是汉人压迫蒙古人”，“突出民族问题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千条万条发展牲畜第一条”，“抗旱就是突出政治”，“乌兰夫是内蒙各族人民的领袖”等等黑话，不一而足。如果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他们这些反革命政变的舆论准备就要原形毕露，他们建立“大蒙古共和国”的反革命阴谋，就要更早地彻底地破产。

二、拚命鼓吹“乌兰夫思想”

乌兰夫是一个反革命大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云丽文极力鼓吹他是内蒙古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领导者”，“正确路线的代表”，俨然如人民的“救星”。乌兰夫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大杂烩。云丽文却吹嘘他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最能解决内蒙的实际问题”，让大家“好好领会乌兰夫思想”，“紧紧跟上乌兰夫思想”，“保卫乌兰夫这面红旗”，“加强宣传乌兰夫思想”，“让乌兰夫思想在群众中扎深扎透”。这就是妄想和群众中挖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栽上反革命的“乌兰夫思想”的祸根。

她用五卷蓝皮精装的《乌兰夫文集》这套烂货去和伟大的毛主席雄文四卷相对抗，她还要继续编印《乌兰夫文集》。她还恬不知耻地同文化局反党分子一起，为乌兰夫搞了十多个塑像，准备在自治区二十周年的机会，通过写文章，编书，编剧本，出画册，搞展览，拍大型彩色纪录片和故事片等形式，为乌兰夫这个大野心家、大骗子手歌功颂德，把乌兰夫吹上天，制造对乌兰夫的偶像崇拜，梦想在自治区各族人民中间用乌兰夫这个跳梁小丑去抵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为他们建立“乌兰夫王朝”的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准备。

三、大搞民族分裂活动

云丽文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是彻头彻尾的，根深蒂固的，她早就疯狂地攻击成立华北局是“多了一层”，“找麻烦”，阻止乌兰夫参加华北局会议。一九六四年十月，在华北局负责同志主持召开内蒙三级干部会，揭露了乌兰夫、云丽文的一些民族主义问题和其它一些严重问题。触到了痛处，他们暴跳如雷，恨之入骨，说那次会议是“放毒会”，“在民族问题上欠了一笔帐”。李雪峰到内蒙牧区视察工作，云丽文深恶痛绝，她说：“李雪峰是汉人，他到牧区干

什么！”并派人加以监视，她杀气腾腾地说：“大汉族主义，反革命欺到头上了，不能放过，要抓！”她还扬言：“战争打起来要和中央断绝关系”。

她和乌兰夫借土旗四清的机会，积极配合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大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罪恶活动，她积极主张用张如岗、何耀(乌兰夫的“钦差大臣”)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的急先锋来领导土旗四清，利用汉人大反“大汉族主义”。她向乌兰夫、浩帆等提出这样阴险毒辣的建议：“土旗四清是决定胜败的一仗，这一仗最好让汉人来打，汉人搞比蒙古人搞好”。今春她还亲自跑到土旗，夸奖张如岗、何耀等反“大汉族主义有功”，并给他们打气说：“何耀真坚决，许多人不同意只反大汉族主义，但何耀能硬顶住，不动摇，土旗的问题是严重嘛！现在还是压迫奴役蒙古人”，“突出民族问题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他们公然对抗二十三条，胡说：“四清要以民族问题为纲”，“不解决民族问题，四清就要过场”，“阶级斗争说到底是个民族问题”。

她感到土旗这一家，……制造出来的“大汉族主义”材料，供不应求，于是又派人到昭盟巴林右旗专门搜集“大汉族主义”材料，在听汇报过程中，她就大叫大嚷起来：“看这个大汉族主义光是土旗的问题吗？联盟不也是这样吗？这是谁搞的？”

云丽文看到《四清队报》刊登了一篇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稿件，非常气愤地说：“大汉族主义这么多，为什么要批制地方民族主义，《队报》就是有问题，这是什么人领导的？”接着，乌兰夫就用小老婆云丽文的语言批评了《队报》，并且为了改变这《队报》的方向，云丽文又派出了她的亲信斯来，打入《队报》。从此，《队报》便大肆煽动反《大汉族主义》的黑风了。云丽文也把她的黑手伸进了《牧区工作队报》《实践》《内蒙古日报》《内蒙古党的工作》等报刊杂志，使之变为他们鼓吹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喉舌。

云丽文一贯是打着民族的幌子，掩盖她仇视蒙汉各族人民的罪恶本质，她咒骂汉人都是坏蛋，山西人、河北人“没有好人”。甚至把内蒙古刮黄风也说成“汉人开荒来的”；她也同样咒骂蒙古人是“法西斯”，“土默川大黑河流域的蒙古人象哈巴狗”等等。这个打着民族幌子的女妖精，疯狂仇视蒙古汉族各族劳动人民的狰狞面目，岂不暴露无遗了吗？他们唯独对王公贵族，地主资产阶级，以及

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关怀备至，情意缠绵。如包庇内蒙师院特大而巴根的叛国集团，包庇乌盟大右派和强奸犯李景山，包庇在押的反革命分子王岳五等等。总之，他们是一切牛鬼蛇神的保护人，是蒙汉各族人民的公敌。

四、实行反革命大清洗，篡党篡政

为了贯彻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路线，云丽文最猖狂地协助乌兰夫推行一条反革命的组织路线，他们大肆排斥异己，清洗革命左派，招降纳叛，篡党篡政。

首先请看他们怎样篡夺自治区一级的党权的？

乌兰夫、云丽文把自治区党委左派书记看成他们推行修正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路线的最大障碍。他们认为：“书记处书记都是反对乌兰夫的，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因此，长期以来，云丽文利用自己手下的爪牙搜集左派书记的材料，近一年来，他们开始下毒手了，对这些左派书记，有的公开逼迫辞职；有的用“养病”办法“软禁”起来，待机整倒；有的实行封锁；有的“养起来”夺其实权；有的“干干交流”办法，撵出内蒙古。同时，阴谋计划要把他们的亲信李振华、石光华、陈炳宇、浩帆、云世英、潮洛蒙等提升为书记处书记和政府副主席，在这个计划的过程中，于一九六六年二月非法成立了由他们的干将组成的“三人小组”黑代常委，从而篡夺了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处和常委的领导权。乌兰夫、云丽文认为：自治区党委各部也是不可靠的，说：“打起仗来，甚至有人还会调转枪口对准我们，所以，现在要清理内部”。他们计划，自治区党委机关干部，在一九六六年要清洗百分之八十，他们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视为他们实现反革命政变的眼中钉，决定首先拿办公厅开刀。云丽文认为：办公厅原来是反乌兰夫集团，××，××的马刀，“必须首先彻底改造”，所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从民族学院调来老右派浩帆。云丽文对他说：“调你来就是叫保卫乌兰夫这杆红旗，把好办公厅这个关。”于是让他当上了秘书长、黑代常委和“三人小组”成员，排斥了原来的正副秘书长，云丽文和浩帆拟定了清洗办公厅三十人的黑名单，撤销了书记处办公室，下放和调走了其全班人马。各处里的左派干部也开始通过各种形式撵出办公室、厅。把他们的忠实爪牙大批地越格提了上来，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自治区党委各个革命左派的清洗，安插乌兰夫、云丽文的亲信。

这样，经过一番大清洗、大调配之后，自治区一级党权就开始让他们篡夺了。

其次，他们又是怎样篡夺政权的呢？

云丽文认为：过去厅、局太多了，挤不过来，大权都不在自己手里，成立五个委把大权夺过来，我们就抓五个关，就能集中领导。云丽文是乌兰夫至高无上的代言人，乌兰夫也常夸奖她，“跟多年了，很能领会我们的思想。”所以云丽文的言语最能反映乌兰夫的灵魂。正是在云丽文上述方针下，乌兰夫以“精减”之名，行集权、夺权之实，撤销了自治区六十多厅局，成立了工交、农牧、财贸、文教、计划五大委，这就是所谓“检了五个辫子”，使乌兰夫、云丽文能够直接控制实行独裁，五个委主要领导干部都是经过这位“揭帘听政”的当代“慈禧太后”及其“天子”乌兰夫，伙其同党潮洛蒙、陈炳宇、云世英、浩帆等，在“禁宫”密室里议定的，从而，安上了他们心腹和党羽。这样，自治区一级的行政大权也被乌兰夫、云丽文及反革命集团篡夺了，他们在篡夺自治区党政大权的同时，也开始将他们的黑手伸进了盟市，如呼和浩特市就已经被他们彻底篡夺了，乘反革命大清洗、大调节之机，云丽文搞裙带风，除了早已把她妹妹安插在调查研究室当特务，还准备把她的一个不服从管制的反动地主的弟弟拉来门卫，把另一个弟弟从内蒙医院拉来当机要秘书兼“御医”。

正当乌兰夫“王朝”的文臣武将，牛头马面，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时候，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浪潮把他们冲垮了，“南柯一梦”化为泡影。

五、在农村建立反革命复辟的据点

土默特旗沙尔沁公社小营子生产大队，是云丽文的家乡，是云丽文、乌兰夫在农村大搞反革命复辟据点之一，这大队仅有四十三户，一百五十人，地主及其子女就有十一户，占 26%，这些地主富农全是云丽文的本家，云丽文、乌兰夫在这里搞点，就是要打击压制这里的贫下中农，为地主撑腰，重建地主庄园，光宗耀祖，并为全区农村搞反革命复辟提供样板。他们对小营子的贫下中农，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光骂小营子的贫下中农“没有好人”，把为她家当过长工的，土改时斗过她家的，解放后对她家管得严的干部和群众，都视为仇敌，加以打击和迫害，在小营子实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

一九六四年初，他们调查研究室派人去小营子搞面上四清，发动群众整了那里的地主分子及其代理人，大大触怒了云丽文，她说这次四清把乌兰夫的点“搞翻了”。指使何既等一群打手捏造材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硬把这次面上四

清说成反“复辟”，对参加这次四清的革命同志进行残酷的打击和陷害，并大张旗鼓地利用这个假案打击陷害持有不同意见的内蒙古党委左派负责同志。

一九六五年冬，他们派了以其忠实爪牙为首的工作组，开到小营子搞“四清”，硬要给某些贫下中农戴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帽子，加以迫害，阴谋给云丽文的地主家庭改变成份，以便于他们掌握小营子的各种实权，实行反攻倒算。同时云丽文又利用权势，盗用国家大批现金和物资，抽调机关的技术人员和大批劳动力，为她家重建地主庄园。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小营子无偿动用国家的，除了两万多元现款外，还有水泵五台，拖拉机三台，柴油机两台，推土机一台，种子两千斤，树苗三万株，山药籽七千斤，鱼苗七千七百五十尾，鸭子四百只，木材两大卡车，水泥四吨，炸药四百公斤，雷管一百四十个，钢钎十根，大小锤子五个，雨衣二件，冰靴十双，安全帽五个等等。从自治区直属机关抽调的技术人员有：兽医一名；安装水泵工人三名；筑路技术员一名；打井技术员一名；开山技术员一名；农林技术员一名。一九六六年一月至五月通过浩帆组织机关职工去小营子义务劳动五次，其中百人以上的两次，在小营子义务劳动的职工，每天平均有三十多人(相当于小营子整劳力总数)。此外，仅一九六六年一月至五月区党委机关就被迫出动汽车去小营子达九十七次之多，汽油费达一千七百元左右，连小营子社员及四类分子烧煤也由区党委机关出车运送。

请看，乌兰夫、云丽文在她的家乡小营子搞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试点？

六、演丑剧，争名夺利

云丽文争名夺利，利令智昏，可谓丑态百出，这里请大家看两出丑剧。

第一出戏。一九六三年调级时，原来办公厅提出的提级干部名单中没有云丽文，乌兰夫和云丽文知道后，勃然大怒，于是这赫赫有名的乌兰夫，亲自出马为他的小老婆争级别了，他把人保处长传来，声色俱厉地训斥道：“你们提出的调级名单不合理，你们连云丽文的历史也不了解吗？”“太后”云丽文在一旁仰望天花板，衔着双喜牌香烟神气十足的自我表白：“从四七年我就享受了先团后旅级的供给制待遇，吃小灶……”，“原来定级年限五四年应改为四七年”，“我这个十四级十多年没动了，这回应该提级呀！”乌兰夫立即命令人保处长：“把云丽文的历史写下，报上去。”但是报上去一查对，证明乌兰夫和他的小老婆一齐撒谎了！原来四七年云丽文根本不是什么旅级待遇，内蒙四七年根本没有定过

级。因此办公厅还是不提云丽文。后来自治区党委开会审批提级名单，大部分都通过了，就是十四级提十三级的妇女干部定不下来，因为其中没有云丽文，乌兰夫蛮横地质问：“你们说培养民族干部，妇女干部，你们究竟对少数民族妇女干部提拔了几个，把这方面的材料给我看看！”并立即命令区党委组织部查清全区十四级妇女干部共有多少，提了多少，历次级别变动情况以及各人的详细历史情况。为此组织部从部长到干事一起行动，立即给各盟市委组织部，直属机关各口打紧急电话，惊天动地，全自治区从上到下整整忙了一夜，总算把情况弄清了。但第二天乌兰夫“大人”又不在了，党委会上还是定不下来，又派人专程去北京请示他。与此同时，利令智昏的云丽文也亲自出马了，找秘书室的一位同志，自吹自擂一番，然后软硬兼施，逼着这位同志以秘书室或党小组的名义，写了一个给她提级的意见。但是，乌兰夫、云丽文这一番怒气冲冲的紧张活动，由于一些革命同志坚持原则而失败了，这个十三级还是没争上，只是这场争名夺利的丑剧，轰动一时，传为“佳话”。乌兰夫、云丽文感到不是滋味，暗暗地咬牙切齿：“该死的办公厅负责人”“反党分子”等着瞧吧！

第二出戏，是云丽文乘机篡夺调查研究室的领导权。一九六五年乘调查研究室主任都不在的机会，云丽文跟她的忠实走狗何耀，以调查研究室支部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劝进表”，提出云丽交代主任。在这个意见书上云丽文化费了很大精力反复推敲，细细修改，然后交给乌兰夫。乌兰夫本是独断独行不可一世的大党阀，他根本不和其它几位书记商量，更不经书记处讨论，就要任命这个“代主任”。有的书记提出不同意见，他不理，硬逼着办公厅发通知。就是这样，一个硬爬，一个硬拉，使云丽文登上了“代主任”这个宝座，篡夺了区党委调查研究室的领导权，使调查室变成了专门贩卖反党私货的黑店。不仅如此，云丽文还在觊觎着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大权哩！

七、抖妖风，祸国殃民

云丽文具有反动阶级最野蛮的本性，专横暴虐，唯我独尊，她象慈禧太后一样，施展妖风，祸国殃民。

自治区党委书记根本不在她眼里，她经常干涉乌兰夫参加党委会议，使安排好的会议推迟或开不成。有时书记处会议稍长一点，她就训斥秘书长：“怎么搞的，还不散会！”有些文件经过书记处书记研究通过的，但只要她这个心腹人说的

不行，就得由她重新审查，发给乌兰夫的机要文件，她也硬要机要秘书拆封登记后交给她，她狂妄地规定：“送什么文件都要先给我。”不管什么文件到她手里，都要扣压，如果有人催办，她还大发雷霆。对此乌兰夫也自以为得意，十分欣赏。

云丽文把内蒙古最高级的宾馆当作自己行宫或别墅，想住就住，想走就走，横行霸道，他们一有人住在宾馆，必须专揀一座，指定要十年以上的服务员，看电影，只要他们一出场，不管有几个人就得立即开映，他们不到场，不管其它人等多长时间也不能开演，宾馆的各种高级备品，如被褥、床单、椅套、台布、盆花等，只要她看中了，想拿就拿。

云丽文把乌兰夫身边的工作人员全当奴隶，实行了野蛮的封建统治。秘书、警卫、司机、公务员全夜不得离开，就是他们的爱人、小孩有病也长期不准回家，这些人一到节日更遭殃，除了警卫之外，他们都要彻夜为他们值班，还要没完了的给他们搞卫生。甚至大年三十晚上，公务员和护士为她做衣服和搞卫生到深夜，公务员一边逼着这些人给他们搞卫生，到第二天(大年初一)的四点钟，但是大年初一中午，乘他们午睡的时候出去看看熟人，回来后还遭她一顿斥责。公务员的往来家信或往家中寄东西，都要经过她的严格检查，她蛮横地阻止公务员入团、入党，威胁他们说：“入进去，也不准你们过组织生活”，甚至找对象，她也百般刁难，横加干涉，对于他们这许许多多家法，谁要越轨或稍有疏忽，就要大祸临头。前几年，一位管理员同志就是这样被他们扣上一堆莫须有的罪名，逼得自杀。

他们自己还常打狗架，吵得没来没头，云丽文把乌兰夫撵得满楼乱窜，他们一打架，公务员就得跟上遭殃，他们往往把满腔怒火找这些人发泄，一一打他们，骂她们“臭丫头”“不识抬举的”“混蛋”等等。

当然，“太后”的妖风还不至于此，还有更“高雅”的镜头。

“太后”仰面朝天躺在藤椅上，吸着双喜烟，喷云吐雾，地下蹲着一个保姆给她捏脚、挠脚，背后站着一个护士给她捶背，按摩，还有一个太监李莲英式的人物额尔敦给她端茶送水，点烟，打扇。这是白天的情形。到了晚上，太后还要打麻将消遣，同样也得有捶背的，捏脚的，端茶的侍候到底。睡前，还得把两只脚搭在护士双眉上，让人按摩。有时半夜里醒来，还得叫起劳累了一天的护士、公务员继续给她按摩。有时半夜里她忽然想闻着花香味，姗姗入梦，在梦里，她

大约见到了“玉皇大帝”，领了两句签言：“不忘天恩祖德，千秋荣华富贵。”于是大年三十晚上，院中就上通宵旺火，四处挂满灯笼，祭天报恩，祈祷万福，到清明时节，开上汽车，带上全家和警卫等随员，浩浩荡荡，走到她的大地主家的祖坟，烧纸，上供，举行了一番隆重的祭祖仪式。不仅如此，她还认为她这个女王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在“王宫”里传出圣旨：“把我的生日改为在大年初一，让普天下的人都给我过生日！”

请看，这位“女皇陛下”的妖风，比之当年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还有逊色吗？

八、挥民财，穷奢极欲

封建“王爷”乌兰夫的小老婆云丽文，大肆挥霍人民的血汗，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透顶的生活，在这里面她也是以当年的慈禧太后为榜样。

云丽文居住的地方，俗称“王爷府”，誉称“紫禁城”，院内一座富丽堂皇的“皇宫”，其设施修缮本来是无以复加的了，但“太后”还不满足，还要锦上添花。为此，仅一九六四年换天花板等等，又化掉国家近万元，为了美化“王府”“庭院”，让工作人员放下工作，开上汽车到城外挖草坯等移植院内，还把宾馆医院的盆花也搬来，专供“太后”赏心悦目。“太后”还嫌美中不足，又合农业厅送来了桃、李、杏、梨、核桃、苹果、樱桃、槟果、海棠、沙果、葡萄等十几种树果栽院内，另有松、柏、杨、柳等，样样俱全。有的是用飞机从千里之外送来的。仅有奇花异木，瓜果飘香，天水陪衬，何以称美？于是又在院庭中心造了偌大一个养鱼池和喷泉，这里又有一番鱼游池底，水花喷雾的奇观。这样“太后”满足了吗？不，她还要把内蒙最好宾馆当作“游宫”，她还要在北京改建一座“行宫”，计划用十万元，因故未遂，“太后”尚不甘心。

这位“高雅”非凡的“太后”，为了猎奇，为了榨取秘书和公务员的血汗，她还驱使这些“奴隶”在“王宫”院里为她种上玉米、山药、葵花、柿子、蔬菜等，劳动时她在一旁监工，收获的果实全入她的私库，或送给她的弟弟妹妹等“皇亲国舅”。此外还驱使“奴隶”们给她养鸡养兔。给她专门盖了一座豪华的“鸡兔大院”，有三间青砖瓦房，全是铁纱玻璃窗，内青砖铺地筑有暖炕，冬天怕鸡冷，有人给烧炕，夏天怕鸡瘟，经常撒药消毒，鸡有了病还要吃“四环素”等等，院里边全是甲砖砌成，谓之“露天舞厅”。这正是“太后”当朝，鸡犬升

天。但是，就在乌兰夫、云丽文这个禽兽“天堂里”，竟没有秘书和公务员同志大小便的地方，因为楼里的几个高级厕所，是专供乌兰夫、云丽文这些高级禽兽使用的，秘书和公务员这些“下等人”严禁入内！

当太后的鸡兔有病，也跟太后的“公主”有病一样，急如星火，讨方求药，专人侍候。但是秘书、公务员和护士有了病，她一概不理，有时医生叫住医院，她不准许，怕误了她的工作，病稍重一点就一脚踢出去了，一位公务员为她效劳期间跌断了脚趾骨，还得了别的病，她辱骂这位公务员“毯还病了”；一位保姆因病借了她们外出时的空隙时间，住院十天动手术，她还给扣了工资，但一年到头一天假日也没有，都不补发分文。

我们再看看“太后”云丽文的胃口是怎样与凡人不同吧，她吃的糜米，必须炊事员一粒一粒挑出来，不得有一粒带皮的；她吃的黄豆芽，必须一粒一粒剥皮，绿豆芽必须一根一根掐去两头；她吃的肉必须是刚杀的鲜猪；她好吃鸡肉，但是夏天不吃公鸡专吃母鸡，冬天不吃母鸡，专吃公鸡，她吃的公鸡小的不行，老的不行，必须是一年到三年的；她吃的瓜果必须是刚摘下的新鲜的；她爱吃烧排骨，有一次一顿吃了二斤多，然后抱肚拉稀了，她还追查责任，硬说水有问题，要整炊事员。

“太后”本来盼得膘满肉肥，但她也和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一样荒淫无度，又非常怕死，因而还需要种种特殊的医疗。她专用贵重和奇特的药材，有时一帖药就要一百多元。除经常吃人参鹿茸之外，还从邓拓那里学来秘方——注射白公鸡血，如果鸡血不足，就让护士给公鸡吃大量的维生素，钙片（当然是公费）给鸡补血，供太后注射。有一帖药必须用日晒百天的长流水，于是派专人到包头黄河取来两瓶，又有一帖药需要活牛胆，于是从锡盟杀牛取胆，冰藏上（夏天）飞机专程送来；又一次，听说鲫鱼汤治病，就立即给乌盟打电话，令其派人从数百里之外专程送来；又一次，听说铁雀肉也是灵药，就立即给哲盟打电话令其派人抓铁雀，然后从两千里以外专程送来；又一次，听说冬瓜汤可补贵体，在冬天立即派人在北京坐上专用汽车，在市内市郊到处寻找，然后专程送来。

云丽文有专医、专护经常在身边侍奉，但只要她感不适，不论是深更半夜，风里雨里，也得把内蒙医院的院长、主任大夫、护士、化验员等都一起叫来，围前围后，为她效劳“看病”。常从北京、山西、福建等地请名医，专程来呼市为

她“看病”。“太后”甚至觉得人间的名医不足用了，又异想天开，找来一位赵大仙，用鬼神法术给她“治病”。但是太后最称心的还是一个正在坐牢的犯人，即中医王岳五，从监狱中用轿车接出来，奉为上宾，专门为她“看病”。上述许多奇方怪药就是这个罪犯给开的。

请看，云丽文的穷奢极欲的生活，在历史上除了“大观园”里的“贾母”和“颐和园”里的“西太后”，还有几个能跟她相比呢？

九、仗权势，贪污盗窃

云丽文、乌兰夫长期以来，仗着他们窃取的职权，大肆贪污盗窃，侵吞人民的血汗，使他们能过上“天堂”的生活。他们不仅是罪恶极大的政治犯，也是万恶不赦的大贪污犯。

他们时常派人大量购买上等人参、鹿茸、麝香、犀牛角、藏花、茅台酒、虎骨酒等，每次都上百元，然后违反国家规定硬要国家报销。这些东西过去用的不计其数，至今还有不少存货，其它贵重药品据为已有的也不计其数，一九六六年五月还有不少存货。一九六六年五月去北京开会前，还砸毁了价值二百余元的过期的贵重药物。

云丽文的“太子”“公主”看病，也一贯不给钱。“二公主”出麻疹，云丽文从北京请来了大夫，不仅医疗费全由国家报销，连大夫乘坐的千元以上的专机旅费，也全由国家负担。

云丽文一家常坐汽车游山玩景，打猎，跑医院，拜祖坟，探家属，看电影等，一概违反国家规定，分文不出。仅今年二月一次，“公主”乌兰其其格、“太子”苏尼特坐轿车从北京去天津，往返汽油费就四十多元。

云丽文、乌兰夫一贯用国家财产送礼，接受的国内外的礼物则一律装入私囊。现有的价值两千元以上的照相机四、五架，近千元的电视机一台，高级望远镜三个，都是这样贪污来的。

由别人代写以乌兰夫名义发表的文章全部稿费一律装入云丽文腰包，初步了解，近年来大约有两千元以上。多年来，云丽文一贯烧“王宫”里的国家林木，不买劈柴，并将院中林木和木箱成车地送给她弟弟妹妹等皇戚国舅，公然盗窃。云丽文从宾馆拿来的高级被褥、床毯、台布、毛巾等，占为已有，甚至自己用的暖水瓶、肥皂、手纸等也要国家开支。

她还侵吞工作人员的出差补助费，竟被云丽文一手扣下，理由是炊事员每月吃他们的饭，只拿九元，太“便宜”了，所以国家补助给这位炊事员的出差补助，就被他们抢去了。但炊事员多吃一点不行，胃口好的炊事员就要遭到监视或撵走，因为“太后”怕赔本。

云丽文这个大贪污犯和大富翁，还有其它一些怪人的吝啬小气，也是千古奇闻。公务员给她买回二十多斤苹果，她生怕人家中途吃了，当面称过，不幸少了一两，她立刻追问：“一两是有几个？”“王宫”院里果树上少了一个苹果，她立即追查：“谁偷去了？”以至酿成“苹果事件”。买来一些西瓜，要放在冰箱里藏起来，怕别人偷吃了，她不仅把工作人员视为奴隶，也把他們当贼看。

请大家想想：云丽文这个稀见的怪物，集中了古今中外一切剥削阶级的多少“美德”!!!

十、传谬种，培养毒苗

“太后”云丽文生怕自己的“美德”绝了种，所以，千方百计按着她自己的模子培养“太子”和“公主”，一心叫他(她)们成为王公贵族的接班人。

云丽文、乌兰夫似乎确信，他们的孩子是祖上有德，注定要当官的。云丽文这一个无耻的野心家，有一天在他们华丽的大厅里，向“大公主”乌兰其其格说：“你好好学习，将来就接爸爸的班，做爸爸的工作吧！”请看他们深谋远虑，把“王位继承人”都选好了！又一天，这一位官迷，又给“太子”指示了“远大理想”，“将来做行政工作吧，看你哥哥当了文化局长，也能坐汽车呀！”又有一次，在会议上，云丽文向工作人员发出了“神圣”的号召：“你们对我们的孩子要特别照顾，他们长大了是要担负国家大任的，那时你们也有功呀！”

那么，对那些将来要“担负国家重任”的宝贝，云丽文、乌兰夫是怎样培养的呢？他们的基本方针是从小就培养他们具有贵族和特殊人物的一切特性，成为凌驾在一般人之上的“小贵族”“小老爷”，请看如下的事实：这些“小贵族”下定决心继承当代“慈禧太后”的美德，并极力向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看齐，把黄色书刊当成“珍宝”“座右铭”，他们除了上学外，就用黄色书刊充塞空虚的头脑，有时竟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二公主”的玻璃板下摆满香港“影星”和各种化妆品的画片。

这些“小老爷”极端鄙视劳动，把劳动看成“下贱”“没出息”的事，是永

远应该由别人替他们做的事。他们有公务员给，有的十八、九岁，有的十五、六岁，但他们的衣服都要保姆、护士、公务员给拆洗，甚至他们的裤夹、袜子、月经带等，也要这些人给洗。起床后自己连被子也不迭，有时云丽文不在家，十五、六岁的乌兰托亚就在宾馆里，有特别指定的服务员、炊事员去伺候她，她的早点每天由服务员送到房间里，送饭时间以她的起床为准，她起晚了送早了不行，起早了送晚了也不行，饭菜要是稍不合口，就要发脾气，还装着“绝食”，恫吓刁难，直到炊事员、服务员再给重做一份端上来，赔礼道歉，才算消气。她从不做一点家务活，有人劝她学学，说：“将来出嫁还能不做点家务活吗？”她摆出了小贵族的架势，断然回答：“出嫁时我带着李××(女公务员)！”

“太后”培养出来的这些小贵族，也同样把保姆、护士、公务员等视为奴隶，小贵族乌兰敖德想骑马玩，就骑在护士、公务员身上，叫她们爬在地上走。不让她骑，她就大叫大嚷，“太后”也盛气凌人，大喝一声：“骑着玩玩怕什么！臭丫头，有什么了不起的，乌兰夫还让她骑呢。”她们只好偷偷掉泪。乌兰托亚完全学着“太后”的威风，有时故意把鞋扔到楼下去，强迫公务员再给拿上来，有时故意要公务员把洗脚水端到面前，如公务员感到不满，她也学着“太后”的口气，骂道：“你这不识抬举的！”

这个乌兰托亚，身体稍感不适，就不上学了，还得兴师动众，老师得亲自到宾馆给补课，学校还得派几个女同学搁下功课，来陪她们打扑克、散步、跳皮筋。她们想打猎，云丽文、乌兰夫就命令公安厅派专车，跟上警卫，带上枪支弹药，陪她们玩个够。有时一次出去就打三百多发子弹，在他们看来，这不算什么，因为这个天下是他们家的，有一次乌兰托亚学着“太后”的口吻，对公务员说：“这是我家，书记是我们的……这里什么都是我们的……你懂吗？”

看来，这些她们精心培养的小毒苗，把云丽文、乌兰夫的谬种传下去，似乎是很有希望的，他们的祖德家风似乎绝不了种。但是历史的潮流将使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以乌兰夫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在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揪了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他们的影响还没有肃清，他们的流毒至今还很广，他们还时时刻刻企图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反攻倒算！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必须在伟大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坚定地、彻底地斗倒、斗垮、斗臭！叫他们威风扫地，打他个落花流水，永世不得翻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调查研究室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一九六六年十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某日，高锦明在内蒙古自治区批判乌兰夫大会上的讲话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标志着乌兰夫王朝的彻底破产，标志着内蒙形势一片大好，并向纵深发展。

当前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教导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以斗私批修为纲进一步把革命大批判开展起来，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与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肃清乌兰夫在各条战线上之流毒，这是关系到革命大批判的进一步深入，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与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夺了权，从组织上摧垮了内蒙资产阶级司令部，还要进一步彻底从政治上、思想上摧垮，不管他们用什么伪装我们都要揪出来。我们要进一步努力，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批判、批臭、批透，使分裂祖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永远不能得逞，使内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内蒙这个祖国北方的边疆成为反修、防修的巩固阵地。把乌兰夫分子彻底挖干净。决不能怜惜冻僵的毒蛇，对敌人的怜惜，就是最大的犯罪，但是也不要扩大化，把自己人当成敌人，把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同样把敌我矛盾当成内部矛盾，就要留下隐患，使乌兰夫分子隐藏下来。

以乌兰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大致有三种人：

(1) 老搭档，老班底，多年来与乌兰夫勾结在一起，他们是党内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像金璧、王锋、吉雅泰。

(2) 拉进来的封建上层人物，他们是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一个小股份公司，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恶活动，这一部分人以哈丰阿为代表，包括封建上层，叛徒、卖国贼、间谍、外国特务。

(3) 近年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成了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一小撮骨干，包括蜕变的“老干部”、“走资派”，李贵等。

这三部分结合起来结成一小撮，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们是乌兰夫的死党，是各族人民的死敌。这些人在军内也有，这要由军队内部解决，地方造反派不要干预。

对乌兰夫反革命集团我们基本清楚了，但未完全清楚，要提高警惕，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打击一小撮，不是打击一大批。各革命委员会要严格掌握政策，坚决打击敌人。

警惕别有用心的人，为走资派招魂。

廿年来乌兰夫打着红旗反红旗，伪装成老革命欺骗人民，把自己伪装成“民族领袖”、“民族的保卫者、救星”。他与党内头号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相勾结，他们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有共同点，不同的是乌兰夫有民族外衣。

乌兰夫长期以来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大搞民族分裂，阴谋把内蒙从祖国大家庭里分裂出去，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甚至恶性发作，但最后终于被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揪出来了，剥开了外衣。但目前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大批判工作做得不够，认识不足，还需要进一步剥开乌兰夫外衣的必要，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及民族问题的理论把乌兰夫批倒批臭。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也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顶峰。民族问题服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毛主席也同样发展了马列主义。“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问题”，这个是精辟论点，它防止了两个倾向，一方面来自“左”的，一方面来自右的。“左”的是没有民族问题，只有阶级斗争。用“左”的面貌取消民

族问题，这不是主要的，但有苗头，要注意其危害性。有些人对这个是不明确的，但有的人是别有用心，他们要制造分裂，使革命造反派革命人民犯错误，完成乌兰夫未完成的事业。

我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政策，坚决执行毛主席在民族问题上的指示。“民族区域自治”乌兰夫实际上是反对的，他要搞一个国家，要当历史上的伟人，八百年前有个成吉思汗，八百年后有个乌兰夫，要想成为成吉思汗第二，把内蒙古变成封建王公地主贵族统治的天下。

我们要培养共产主义的民族干部，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要加强民族团结，不是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废除民族问题上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从右的方面来的明的暗的用民族问题挑拨煽动民族情绪，集中为乌兰夫翻案，诬蔑文化大革命是“汉人整蒙人”或“汉人联合东部蒙人整西部蒙人”、“整土旗蒙人”、“乌兰夫是受反动路线迫害的，要平反”。甚至钻进造反派内部，这是乌兰夫的黑手，有的是外国间谍的黑手，借民族问题把水搅混，破坏文化大革命。有的成立“成吉思汗战斗队”，这是反革命的战斗队。有的人到北京到乡下为乌兰夫翻案，有人公开叫喊“爷就是为乌兰夫翻案，能咋的！”这种人要专政！为乌兰夫翻案就是反革命。造谣诬蔑说内蒙革命委员会是乌兰夫黑帮组成的，如果有，可以揪，揪出来也不影响革命委员会这一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不影响三司是造反派。要注意这是阶级敌人以攻为守，采取合法斗争，用民族问题掩盖代替阶级斗争，也可能有人会上当，但要区别。

三、内蒙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滕海清高锦明传达中央关于成立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参加人：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椽、李树德等〕

中央对成立革命委员会有这样的指示：

1、革命委员会组织机构不宜过大，革命委员会应有彻底革命精神，首先是思想革命化，才有组织革命化。初步方案按照黑龙江抄下来的。中央首长指示，领导机构不一定原来有什么，现在要都恢复起来，先根据实践经验摸索。根据需

要，建立一个组织，不适合的就撤消。这是一个摸索过程。比如各地机关摊子，哪些要，哪些要加强，哪些不要。还没有到改的时候，现仍确定哪些适合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摸索中找经验。这组织机构问题，中央的整个精神是机构不宜过大。不一定要把所有摊子都补起来，在实践中，需要的建立，不需要的就不建立，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到大改的时候。最近主席给姚文元一个任务，叫他调查九大问题、精简问题。

2、革命委员会的本身成员，按原汇报方案，自治区 1300 万人按 150 人出，盟市 50 人。中央看了方案后，认为现在看革命委员会，应该质量上强调，不应该从数量强调，革委会成员不一定太多。讲到盟市 50 人太多了，减少一点。革命委员会成员的产生应以呼市地区为中心，因为呼市是内蒙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要照顾下面和盟方的问题。

革委员是过渡性的东西，在摸索中考验干部是否称职，能否担当起来。中央指示，机构不宜过大，少一点，精悍一点。

3、原来军队里面少了一点，原方案军队 20 人，而地方领导干部多了一点，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站出较多这是好事，但不一定都参加革委会，可以参加工作，群众代表多一点。

4、注意培养新生力量。革委会应当做到“三结合”。三结合中有一个新老问题。有工人、学生、地方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优秀的，政治历史清楚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的，有干劲不是派性，而是党性很强的人，选这些人到革委会中来。这里有个新老结合，新的上来帮助老的，老当权派有个接班人问题，把年青人带起来，以老带新，以新斗老。都是老家伙不行，都是新的也不行。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涌现出了好多好多革命领导干部，好的苗子，有个互相帮的问题，一方面要非常注意培养新生力量，也要注意革命老干部，他们有很多经验，当然会有错误，互相结合，互相学习，培养新生力量。

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经主席，中央文革批准。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国影响很大，是对修正主义的严重打击。但哪一天成立还得请中央批准，凡是中央不批准的不做，苏联十月革命节修正主义是否发动攻势，值得研究。革命委员会成立，哪一天开大会请中央批准，准备十一月一日开大会。自治区两位书记，暂时不参加革委会，一个是康修民，同志们知道，石家庄造反派反映了很多情况，但

中央八条是肯定康修民同志的，等情况搞明了再参加。王再天参加军队以前，参加旧军队，一般历史问题调查清楚再参加。总理、康老指示，康、王同志问题调查清楚以前暂不参加革委会。向中央讲了二人情况，不管怎么样，文化大革命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康修民在八条中肯定的。王再天一直表现好，不可能是三反分子，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中央一方面重视群众意见，另一方面中央指示经康、王讲清楚，调查清楚再参加，早一点、晚一点没问题，可以参加工作。

中央谈到内蒙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阶级斗争复杂，康老说内蒙有苏修、蒙修、日本特务，加上乌兰夫，王逸伦、黑爪牙，所以阶级斗争复杂，形势大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

从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传来了特大的喜讯。在我国北部边疆、反修前哨，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内蒙古地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彻底垮台，斩断了他们的后台老板中国赫鲁晓夫伸向内蒙古的黑手，迎头痛击了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蒙古现代修正主义的颠覆阴谋。对于巩固我们边疆，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增强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内蒙古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谨向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战友们，向内蒙古一千三百万各族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和鼓舞下，同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复较量和英勇斗争的结果。内蒙古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派，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中，无限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顶黑风，战恶浪，经受住严重的考验。他们不断地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创造了良好条件。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内蒙古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功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驻内蒙古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关键的时刻，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挺身而出，坚定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地进行了反对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再一次表明：不管斗争多么尖锐复杂，不管有多大的阻力和干扰，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无往而不胜。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主席又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混进党内的封建王公贵族、牧主、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推行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反动路线，掩盖阶级矛盾，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以适应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

内蒙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再次告诉我们：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伟大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指南，是巩固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可靠保证。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论哪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同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一定要以毛主席教导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正确地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任何时候都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革命的力量总是前进的，反动力量总是要失败的。内蒙古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一个曲折和反复，正好彻底暴露了阶级敌人的面目，大大锻炼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现在，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内蒙古革命形势空前大好，今后还会越来越好。

在欢庆我们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国内外阶级敌人是决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还会捣乱再捣乱。处在反修前哨的内蒙古军民，必须高度警惕，加强敌情观念，及时揭穿和粉碎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巩固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巩固祖国的边疆。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内蒙古的代理人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内蒙古草原的每一寸土地，把内蒙古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社论）

八、大搞挖肃运动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滕海清在内蒙革委会上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

今年二、三月、四、五月间和现在比较一下么，可以清楚地看到形势是大好。整个全国的形势也包括了内蒙的形势，一年来天翻地覆变化，当前形势大好，革委会否则成立不起来。

内蒙形势好在下面几个方面：

（1）各族人民发动起来，历次运动都没有像这次运动深入地发动，革命靠群众，关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过去那有这么多？

（2）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和大发展，这是马列主义历史上空前的没有的大发展。

（3）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大批涌现出来，在大风大浪中成长，青年一代受到了锻炼、考验。一年文革涌现特别多的人材，很有能力，这是我国兴旺的标志，这就是后继有人。干部的受到锻炼，有错误的得到警惕，假的就平反清除。

（4）乌兰夫被打倒了，不能再发号施令了，但要进一步肃清他的影响。

（5）革命大联合、三结合进一步巩固，革命大批判更进一步深入。

不能放松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性，过去没有打死什么人，最近打死了一些人，国家的机器、枪又被抢。究竟怎么看待？毛主席说主要是：

（1）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挑动群众；

(2) 群众里有坏人；

(3) 无政府主义。

东三盟这三种情况都存在，内蒙的情况也符合全国的情况。这里告诉我们不能放松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性。另外加强队伍中思想建设。敌人不甘心死亡，主要手法是操纵一部分受蒙蔽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内蒙处于边疆，有苏蒙修、日、蒋特务，在这时要插手进来捣乱。他们可能和走资派联系起来破坏文革，社会上地富反坏右乘机钻进来，也打着造反有理，甚至钻进我们造反派内部来，大造谣言，破坏文革，因为我们空隙很多，造反派中的派性是最大的防空洞，敌人肯定要钻进来，国内外敌人就是找这样场所。造反派内部不能那样纯洁，造反派内部争名、利、权起了很坏作用，这些根本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

尽管这些是非主流东西，但是各级领导也一定要看到，引起注意，在政治上、数量上、质量上我们都是绝对优势，但是这一小撮坏人，总是要挣扎，因此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在北京谈陈伯达讲“内蒙是社会主义还是民主革命”，廿多年来乌兰夫在思想上的流毒还是很深很广，要发动群众对乌兰夫思想大扫除，巩固无产阶级政权。

因势利导建立革委会，各盟市在年底前把革委会或小组建立，在春节前把各旗县建立起来。建立革委会是国家机器。

有的干部躺在那里不检查，让人家解放，说“你们不解放我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说你才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好干部，要叫群众斗斗他，因为他没有触及灵魂，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内蒙革委会要分批有计划地下去。

要立即着手调查研究牧民、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搞法。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滕海清谈内蒙形势

〔滕海清：内蒙革命委员会主任。地点：内蒙人委礼堂〕

我们内蒙形势和全国一样也是大好，并且越来越好，大好形势主要表现在：

(1) 全区一千三百万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城市到乡村到牧区，群众都发动起来了，都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2)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得到空前的大普及，过去乌兰夫在内蒙大反毛主席，阻止广大农牧民学习毛主席著作。

(3) 培养锻炼了一大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中间都有。

(4) 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出现了大批判、斗批改的新高潮，斗私批修的高潮也掀起来了。

(5) 拥军爱民活动深入发展。

(6) 全区各族人民空前的大团结。

(7) 工业、农业、牧业、林业生产形势一片大好。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经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可以变成改造世界巨大物质力量。通过文化大革命，广大革命人民深深懂得只有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救世界，因此更加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从亿万人民的心中共同发出一个声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在分析形势时，必须跳出私字的小圈子，否则就会错误的估计形势，得出错误的结论。新的大好形势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把我国我区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不辜负毛主席、林付主席对我们的希望，不辜负全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我们既要看到当前形势一片大好，这是主流、本质，这样就会鼓足我们的信心，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存在的问题，不然就会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当前内蒙的阶级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尖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及美蒋特务，日本特务、苏、蒙修特务，互相勾结起来，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专政，一些坏家伙有一个暴露的过程，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暴露了，有些正在暴露，这是件大好事，只有让他们充分暴露出来，我们才能消灭他们。

东三盟（呼盟、哲盟、昭盟）武斗正在发展扩大，阶级敌人暴露得还不充分，现在有很多地区，很多单位，有这种情况。乌兰夫黑帮分子放在那里不批不斗，对这些人还恨不起来，还有一部分人，偷偷的保乌兰夫及其一伙。那些民族分裂分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现在还逍遥法外，还有大批判、斗批改搞不起来。

一方面领导不力，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另一方面，里面有阻力。也就是有部分人，保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在内蒙廿多年的修正主义的东西一直没有很好的批判。

为什么呼市的谣言那么多？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一些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还偷偷活动，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说明乌兰夫没有批深、批透、批臭，乌兰夫的黑线没有彻底挖，乌兰夫的流毒没有彻底肃清。我们必须把他们的问题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我们头脑中必须有敌情观念。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必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一定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滕海清吴涛给内蒙古革委会各常委同志的一封信

高、权、李常委诸同志：

一、春节前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否应该放在大抓毛主席著作学习班和解决各盟市促进革命三结合、建立新政权这两个问题上。这两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不办好学习班，大搞斗私批修，就解决不了干部问题，也解决不了群众组织之间分歧，当然也解决不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问题。而如果不大抓各盟市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就无法加强对学习班的领导。也必然影响到深入开展大批判、大联合和斗私批修，我们的革委会也不能挣脱盟市问题，以至旗县问题的压力，盟市问题解决不了，旗县问题自然也难解决。

二、关于解决盟、市、和旗县问题

河北省准备在十二月底前把各地委级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现在已经解决三个（石家庄、承德、天津专区）；12月底有50%的县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河北形势发展很快，内蒙形势不比河北形势坏，而且比河北好。因此要抓紧工作，动作要快，步子要稳。具体的说：

1. 原准备在12月底前解决各盟市问题，仍然要抓一下，不要放松。巴盟问

题不要再犹豫，要当机立断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以推动全区形势。东三盟问题年底也要解决，要建立革命委员会和筹备小组（最好不要这个过渡）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来推进革命形势。反正成立革命委员会是一场斗争，迟斗早斗总要斗，与其失之过晚不如失之过早。要相信建立新政权是符合广大群众心愿的，不要被那些群众组织中头头之间的问题和其他一些表面现象所纠缠。伊盟问题也一样，最近要解决，关键是做好军队同志的工作，要告诉陈继舟、刘维真等同志，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内蒙革命委员会和内蒙军区支持他们。如果不抓大方向，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2. 各旗县问题，我们革委会没有底，打招呼不够，现在要抓紧，有条件要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没有条件的要创造条件去解决。年底前搞 50%，春节前搞 70%—80%，是否可以，请考虑。

三、大办学习班问题，全区如何？我们心中无底，许多经验还没来得及总结。也没有向中央报过一次全面的报告，革委会政治部门要专门有一个象样子的班子管起来，掌握情况，指导学习，推动全区。

自治区办的学习班领导力量较弱，需要立即加强。各盟、市、各旗县都要办，凡结合的学习班，要仿效乌盟的办法，杭后的办法去办。这样可以迅速解放干部，为三结合创造条件。自治区的学习班要与大批判结合起来，要有计划的去搞。要集中力量，加强领导，不要分散力量，各搞一套。

四、文教口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以后，必然要涉及到其他方面，这是又一次从文艺界开始的更加深入的革命，当前面不要搞宽，防止阶级敌人扰乱我们的阵线，把乌兰夫的黑线彻底挖净。

五、要把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机构迅速组织起来，健全起来，摆起门面，搭起架子，做好工作。

六、自治区的领导机关要抽调一部分干部到盟、市、旗、县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深入调查研究，以促进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抓好学习班（不要到公社以下去。）

革命委员会办公室要加强请示报告，向中央反映很好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滕海清在内蒙古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如何紧跟形势问题。滕海清同志说，紧跟形势首先要认清形势。毛主席视察三大区对形势作了最完整，最精辟，最正确的总结。毛主席指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泽东思想的大传播、大普及，大发展，这是当前形势大好的最根本的标志。

内蒙形势也是大好的，概括的说就是内蒙一千三百万各族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城市到农村，以致牧区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不管是老人小孩，人人关心国家大事。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全区大传播，大普及，使全区各族人民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培养了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原来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很出色，涌现出大批符合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标准的接班人。这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不变颜色，永远兴旺再兴旺的重要保证。全区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的高潮。全区“拥军爱民”运动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军民空前团结，各族人民的团结也是空前的。

滕海清同志说，根据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必须运用以下几个观点来分析研究形势。

1. 群众观点。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林付主席说这句语录是很典型的，是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最概括的、最精华的语言。群众的动向决定革命形势的本质。我们有些同志看国际形势。总是看反动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活动比较多，不去看人民群众的动向。这样国际形势一有风吹草动，我们的脑子里就想不开了，就是因为我们同志们没有看群众的力量，革命人民的力量。毛主席教导我们，百分九十五以上的人是要革命的，广大受压迫人民是要革命的，百分九十五以上的人是要革命的，广大受压迫人民是要革命的。真正反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不过是资产阶级那一小撮人物，而广大人民是拥护我们的。不从这方面看，只从上层人物的活动去看形势，就会迷失方向。所以我们看形势的好坏，就是要根据毛泽东思想，看群众是不是真正发动起来了，看群众发动的深度和广度，群众觉悟高和低，这是人心向背嘛，是决定战

争的决定因素嘛！

2.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形势的好坏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看政治上那一个阶级占统治地位。现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垮台了。毛泽东思想大普及，全世界都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大普及。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伙同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扑灭，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很大的阻挠，几乎有夭折的危险。去年八月，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大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扭转了大局。无产阶级革命派从那时起万炮猛轰资产阶级司令部，经过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发动，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和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派由少数变成多数，革命派的队伍迅速扩大了。现在形势和那个时期比就大不相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在政治上、数量上、质量上都占绝对优势，掌了权。受蒙蔽的群众和犯了错误的干部，大多数人都已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就是阶级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变化。如果没有这种阶级力量的根本变化。那么形势就不会象今天这样大好。这就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阶级力量的变化。阶级力量的变化是逐渐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间，林付主席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所有现象总的根源。离开这个根源去观察社会现象，就观察不出来，就会观察错了。”我们观察革命形势，不能离开这个总原则，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地认清形势。

3. 辩证的观点。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本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人们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把形势真正看清楚，就要把主流和支流、本质和非本质的东西分析清楚。如果把这个问题看颠倒了，那就必然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迷失方向。我们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的，就是在受这些支流所迷惑，没有看清主流。有人说现在少数仍然是少数，这是错误的，是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少数派仍然是少数派，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了。经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教育，大多数人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少数就成了多数。主流的东西指引着革命大军奋勇前进。当然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我们的同志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要紧紧跟上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任何时候看形势，都不能把主流和支

流颠倒过来。我们要建立学习形势的制度，每月分析一次形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去分析和认识形势，这样才能想得深一些，看得远一些，特别是在阶级斗争复杂的时候，认真分析形势就更为重要，形势看清了，立场就稳了，就可能不犯或少犯大的错误。

二、当前内蒙地区的阶级斗争。

当前内蒙地区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乌兰夫和他的代理人的矛盾。当然这个矛盾的总祸根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内蒙地区的祸根，就是乌兰夫和他的代理人。忽视了这个问题，就会犯错误。我们要充分地注意到，乌兰夫在内蒙廿年的统治，他的那一套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流毒，还远没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乌兰夫这条黑线还没完全彻底挖掉，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我们同乌兰夫的斗争就算完了。没有完，他们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这一套东西根子是很深的，就是连乌兰夫黑线上的人，也还没有全揪出来，内蒙揪出乌兰夫及其代理人王逸伦、王锋，军区揪出了乌兰夫在军区的代理人××、××、和黄、王反党集团，并不等于全内蒙的黑爪牙和黑线全部挖出来了。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军区机关、部队整顿整训结束了，好像矛盾解决了。当然要承认解决了很大的问题，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把党政财文大权从以乌兰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手里夺回来，军区机关整顿，部队整训，使干部、战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决定的胜利，但是并不等于乌兰夫的影响已经彻底肃清了。必须看到阶级斗争还很激烈，很复杂，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要防止右倾，甚至麻木不仁。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我们把权夺过来了，阶级敌人是决不会甘心的，他们必然会改变斗争方式，更加隐蔽更加狡猾地负隅顽抗。有些地区阶级敌人刮阴风，点鬼火，造谣生事，挑拨离间，还有的人把黑手伸得很长，利用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和其他弱点和社会上的极“左”思潮，插手到造反派内部，利用造反派的派性，瓦解造反派的队伍，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制造造反派之间的思想紊乱。他们的矛头是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军区机关有的人还在背后搞鬼，有的人耍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左派，也披上左派的外衣，混水摸鱼。实际上他们蒙蔽了很多群众，从极

“左”或右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干扰和破坏对乌兰夫的批判。

滕海清说：我们内蒙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敌人惯于利用民族情绪，挑起民族矛盾，制造民族之间的纠纷，用这个东西来掩盖阶级斗争。如果用这种情绪对待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就会犯错误。不能用民族情绪来掩盖阶级斗争。我们和乌兰夫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内蒙要是走乌兰夫的路线，那就是修正主义，那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同志们要注意这个问题，防止阶级敌人利用民族问题来混淆是非，来掩盖阶级斗争。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内蒙地区阶级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激烈的，必须看到这一点，根子还是在乌兰夫。现在有些人削尖了脑袋往我们内部钻，往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关钻，往造反派内部钻。当然，好人就不用钻了，不是好人他就进不来，钻进来也一定会被革命群众把他们拉出去。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内蒙地区形势大好，阶级斗争还是复杂的。我们看形势必须看本质，从阶级斗争中，我们看到形势是大好，但在大好形势下，阶级敌人采取了更隐蔽、更狡猾的斗争方法。我们要提高警惕，要有敌情观念，乌兰夫在内蒙统治廿年，我们不要轻视乌兰夫思想的影响作用，我们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来彻底肃清。阶级敌人是不甘心他们死亡的，最后挣扎也是必然的。林付主席说：“如果我们不自觉，不重视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不注意阶级分析，就会变成客观主义。而客观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体系，这种客观主义的思想，在表面上是否认阶级的。但是，实际上用这种形式来掩盖它的阶级的面貌，阶级的愿望，阶级的政策，阶级的行为，便于欺骗群众。”我们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如果就事论事，孤立地看问题，不上纲上线，不讲阶级斗争，就肯定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们犯错误，敌人就会利用，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不利于迅速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三）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滕海清说：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就是贯彻北京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的精神。现在就要闻风而动，迅速地往下贯彻北京军区学代会的精神。我们部队驻得很分散，“三支”、“两军”任务很重，这次会议是强大的推动力量，要把这次会议的精神迅速贯彻下去。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这是我们完成“三支”“两军”的根本保证，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今后的任务，

千条万条学习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真正把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先于一切的地位。

要认真办好学习班，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斗私，要打进攻战，光打防御战，不是马列主义。批修，就是批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之流。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斗私、批修”为纲，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教育。部队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就是要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的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影响和流毒，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进一步在部队中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林付主席的崇高威信。

四、开展挖肃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滕海清在内蒙古教育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话

一、不抓阶级斗争，教育革命是搞不好的。

教育战线也有这一问题，阶级斗争，各单位、各部门，轻重不同，哪个单位，哪个部门阶级斗争都是存在的。教育革命离不开阶级斗争，离开阶级斗争，搞教育革命搞不好。教育革命从去年开始，有些学校复课闹革命，有些单位搞的早，五中就搞的早，农牧学院是搞的最早的，五中是好的。农大没有联合，没成立革委会，有些班系搞的很好。整个看，当前形势很好，但斗争很尖锐，我们要向敌人进攻。敌人一是防，一是反扑，阶级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愈要灭亡，愈是要挣扎，有些单位斗争很剧烈，这是好现象，这是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的表现。教育革命的主要任务，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揭开教育战线阶级斗争的盖子，建立教育战线上的阶级队伍，把教育革命和肃清黑线流毒的斗争结合起来。你们哪个单位如不把乌兰夫死党清出来，只进行教育革命，学生来一批走一批，这种改革是不好的。首先要从思想上组织上改，思想上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农大师大院坏人最多，很复杂。不把教育革命和挖线消毒联系起来，就不能把教育

革命进行到底，只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是治表不是治本。我们的学校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都有。当然主要的是毛泽东思想，但是封、资、修的残余在一些学校占统治地位，毛泽东思想不占优势，有些学校毛泽东思想占优势。

二、一定要彻底揭开教育界阶级斗争的盖子。

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搞的是什么？内（蒙古）大（学）校长乌兰夫，里边有叛徒、特务、乌兰夫死党。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什么人？是无产阶级接班人吗？我看不是，只能为乌兰夫服务。敌人总是在青年一代身上做文章，培养他们的接班人。一个学校的领导班子是否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班子？如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培养出来的人就是无产阶级接班人，否则就是修正主义的苗子，民族分裂主义的苗子。过去外国人为什么在中国办学，是关心培养中国青年一代吗？实际是培养他们的人。教育界的斗争从历史上看就是复杂的斗争。如蒋介石时代大学校长都是他的嫡系，是他的可靠的人。过去一切统治者都是派忠于他的人办教育。我国建国十八年了，这十八年教育界阵地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实际上掌握在刘、邓手里，掌握在刘、邓、周（扬）、陆（定一）手里，当然他们不会贯彻毛主席教育路线，不可能用毛泽东思想培养教育青年一代，而是把封资修的一套继承下来。现在就是为乌兰夫翻案，保乌兰夫的。最近几天有些人公开讲，保乌兰夫是保定了，一定保住；还有人讲；内蒙二十年成绩是主要的。如果成绩是主要的，功劳是乌兰夫的。……公检法是包庇坏人的合法机关，许多坏人。王再天一手把他包庇起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很多真正革命同志受迫害受打击。其实教育界要把肃清刘少奇、邓小平、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肃清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教育路线结合起来，如离开这个东西搞教育革命那只能搞一些现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教育革命就是把教员队伍很好整理一下，要把教育界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的手里边。凡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一切反革命，地、富、反、坏、右，没有改造好的这些分子，要从教师队伍里边清除出去，他们不能掌握各种教育权，如果掌握在他手上，那么毛泽东思想就不能真正在那里占领阵地，这项工作是比较艰苦的。

当然这里还要靠我们教师队伍自己，教代会主要搞教育革命，清理教师队伍，另一个要靠学校的学生。如果不下这个决心，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坏人就清不出去。我说的是政治问题。一般问题如地主出身、资本家出身能够改造嘛，能接受毛泽东思想改造嘛，改造好就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嘛！

有的学校搞得不好，但有的班系搞得不好，要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育革命除抓阶级斗争外，思想要解放，大破过去不适合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旧框框。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滕海清吴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革委会汇报会的讲话

（当朱志明同志谈到如何理解“三右”主义时）

滕司令员说：“三右”主义，实质上是对敌人，对走资派讲的。那个时候，全国都出现了翻案风，乌盟报事件，不管你们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是帮了敌人的忙，迎合了敌人的需要。战斗口号，你们常委是研究过的，打个电话问我们一下，不是就好了吗！那个时候敌人跃跃欲试，你们帮了忙，做了蠢事，我想今后会聪明一点。我们挖黑线、肃流毒，他们没有理由说不挖。有人便借此说是“压制老造反派”“带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靠群众，我们要支持受蒙蔽站错队的群众起来革命，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让人家起来革命，一辈子不让人家翻身，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当然老保翻天有，但是少数，主席讲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有些人借机翻案，内蒙这样的情况并不算多，其他地方搞得很凶，实际上是走资派操纵的，是走资派在起作用。他们起来翻案，我们坚定一点就顶住了，你们这里摇摆性很大，呼市也有摇摆，呼三司摇摆很厉害。包头学生摇摆，工人坚定。我在北京看了你们的小报很奇怪，搞这个干什么？现在有些同志思想还是不服气，思想问题要等待。

吴涛政委指出，挖肃斗争就是搞阶级斗争，矛头是对准敌人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有些人反映是“整老造反派”“站错队的参加挖肃斗争就是老保翻天”。我们应该全面的看问题，老造反派应当肯定。但造反派队伍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不能这样说，我们党内还有走资派，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革命造反派队伍也是如此，不作阶级分析地讲老造反派是不行的，挖肃斗争清理阶级队伍，并不是对

准造反派，有坏人抓出来，你的队伍就更坚强了，更纯洁了，对革命有利，并没有什么坏处。乌兰夫是刘邓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与其他省市的省委书记不同，那个有象他在一个地区呆这么长时间的，他有民族问题，流毒很深，死党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势力不小。在挖肃斗争中钻到造反派里的人，完全有，特古斯在去年就是个造反派，还是响当当的，进革委会时都叫他进，那个时候抓他，群众有情绪，让群众自己抓出来嘛，我们从党内、军内挖出了一批走资派，是打击谁了？再纯洁也纯洁不过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不是也挖出了揪出了坏人？

站错队的允许不允许他革命？是好人站错队改了就好，敌人就没有站错队的问题了，他一直站“对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站错队的就是好人，是我们的同志，阶级兄弟，多数是认识问题，有些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转。东北的宋任穷保了一年多，不检讨，只有打倒，他就是顽固不化。要允许站错队的群众革命，欢迎他们立新功，不能说是“老保翻天”，中央也有些人犯错误，中央还是一批二保，象余秋里。干部站错了队，站过来就好了。

滕司令员指出，你们所犯的那样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对形势估计错了，看支流多了，这个支流，那个支流，把很多支流汇在一起认为是主流，对主流却没有看到，这是犯错误的根本。

有少数人活动很猖狂，很反动，你们没采取措施，不坚决果断地处理，这与你们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是分不开的，光看现象、支流，对本质和主流看的少了，对多数少数没作分析。

滕、吴首长问了丰镇情况，全盟抓了多少坏人，206 案件进展情况后，盟领导同志请示关于丰镇提出要处理五十四名小学教员，有的已经开除了的问题，如何处理？

滕、吴首长指出：放在运动后期处理，这是中央精神，把他们放在学校，可以不让他们教课，干其它活，否则下去不得了，打乱了中央部署。

当请示农村要不要搞挖肃斗争时，

滕司令员说：农村牧区划阶级，不要搞挖肃，大批判就是肃流毒，农村划阶级斗牧主要搞，有坏人也可以揪出来。要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办学习班，清查坏人，一些守法的地主让他劳动，不守法就斗他，把他们都集中起来干啥，

还是监督劳动嘛，还是掌握稳一点，搞大批判，对地富反坏右的言论可以批判，发现新的地主可以划，把他们圈起来不劳动不行。要抓几个典型，总结经验，有的农村搞的好。

滕、吴首长对改造公检法的老战士问题，自留地问题都作了指示，并了解了各级革委会成立情况及工农牧业生产情况。

当赵军同志谈到摆脱不开事务工作纠缠时，

吴政委指出：事务工作做一百件，不学习也不行，天天读要坚持。

滕司令说，以前被造反派牵着鼻子走是可以的，现在是革委会了，不能再让造反派牵着鼻子走了，有的牵的对，有的就牵错了。

吴涛政委说：对待受蒙蔽群众，始终是个问题。

滕司令员说：老保是有想翻天的，但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他们怎么也翻不了天，有些地方复辟了，我们慢慢地有计划地总要搞他。有人说，公检法百分之八十是坏人。其实大多数还是好的，我们要看大方向，看基本的，大多数是好的，光看支流问题，钻在里面就会出不来。阴暗角落总是有的，文化大革命以后还会有。有人说我们压制造反派，真正受压制的是假造反派，或者根本不是造反派，是资产阶级造反派。对真正的造反派我们怎么会压呢？我们只能支持。

当盟的领导干部汇报到干部问题时，

滕司令员说：站出来的干部要大胆干工作，不要怕犯错误，不干事就是更大的错误。犯点错误怕什么，有错误就改是聪明人，做了坏事但本质是好的干部，还是要扶起来的，至于乌兰夫的死党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要清理出去。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被群众斗一斗，触触灵魂有好处。领导不要搞两面派，杨成武就是搞两面派，搞两面派迟早要垮台。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吵咀都可以。有些领导支一派，压一派，以为自己聪明，其实群众觉悟后，什么都抖露出来了，帐不用你算，群众向你算，两面派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吴插话：小聪明，大愚蠢），搞两面派想保护自己，其实保是保不住的，只能造成自己垮台，是好人怎么也垮不了，是坏人躲也躲不了。要克服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能把小将养的娇生惯养，有了错误不批评，就是害了他。犯错误不怕，把他教育过来就好，最怕的是有偏心。对自己的一派亲，这样必然犯错误，领导要特别注意让小将要大胆的干，推上第一线，犯错误没关系，可以变

成经验。不要把小将捧上天，那就糟糕了。盟革委会机关可以吸收少量的优秀的小将参加。

当汇报到报纸问题时，

滕司令员说：你们的报纸当时是你们掌握，还是人家掌握？革委会当家，还是人家当家？到底是什么人当家？红卫兵的小报无所谓，这是革委会的机关报，不是红卫兵报。报纸、电台是个大问题，出了问题就了不得。

在市委们汇报完情况后，滕、吴首长又讲了几点意见，兹将滕司令员的讲话整理如下：

讲几件事：

1、你们前段走了一段弯路，对问题作了检查，应该说，还是个认识问题，这说明革委会常委之间学习、研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央精神差，没有跟上，起码是跟得不紧。革委会成立这么久了，为什么发生这些问题？革委会要真正成为领导广大群众向阶级敌人战斗的坚强指挥部，你们怎么在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时，发生了动摇？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们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中央精神没有跟上，头脑很不清醒，这是应该接受的一次教训。检讨大家是都检讨了，思想通不通还是个问题。那时，你们本来不应该发生这个问题，如有问题不好解决，应该请示。林副主席说，要不犯错误有三条，其中一条是大小事情多请示。起码你们应该打个电话请示一下，对你们有帮助。看来是小事，实际上不小，开始你们没认识到这个问题。

2、这个问题从常委来说是认识问题，跟不上，从社会上是什么问题？你们没把问题的本质看透。把反击右倾翻案与挖肃对立起来，本身就是为乌兰夫翻案，不看本质，无非是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来抵制挖肃斗争，转移斗争大方向，实际上就是为乌兰夫翻案，这就是本质。有些人跳的那么高，那么厉害，联系的面那么广，说明什么问题，不是为乌兰夫翻案又是什么？我们挖黑线挖什么，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讲了，挖乌兰夫的三股势力，三月四日在包头讲了，三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都讲了，不但我们讲，中央报纸都讲，中央不发文件，就是用报纸来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你们没看出问题的本质，好象还是方法问题，这是什么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两派？不论从什么道理上讲，我们向阶级敌人进攻与反击右倾翻案都是完全一致的，什么人翻案？就是乌兰夫的势力。把他们

统统挖出来，揪出来就翻不了案。用不着更多的道理来解释。你不挖他，他就要翻案、复辟，进行垂死挣扎，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方法问题。文化大革命要取得胜利，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取得全面胜利表现在什么地方，思想上就是要肃清流毒，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每寸土地，组织上就是把阶级敌人挖净，政治上要把走资派搞臭，理论上要批透，只有这样，经济上才能夺取胜利。为什么敌人这样一搞翻案，你们就摇摆，最大的教训是中央的东西学习太少，因而看不出本质，只抓支流。不是有人大肆宣传呼市资本主义复辟了吗？这是什么人说的，只有阶级敌人才这样说，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会这样说，内蒙、乌盟各个旗县都成立了革委会，人民当家作主，他说是复辟，这不是敌人吗？不是替乌兰夫宣传吗？

3、这里面可能有坏人操纵，没有“高明”的人，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想的那么全？很大可能里面有坏人。革委会被牵着鼻子走，你们被什么人牵着走的，为乌兰夫翻案的人牵着你们的鼻子走，你们糊涂就糊涂在这里，没看出问题的本质，应当说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但有坏人，而且很“高明”，报纸口号发表的一些东西，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吗？报纸掌握在你们手里，还是人家手里？我看你们没经验，精力顾不过来，内蒙古日报也出了问题，但没你们的这么大，报纸赶快改组，这是机关报，不是红卫兵小报，不是群众组织的报纸，应当接受教训。阶级斗争就是有反复，只有主动出击不断进攻，敌人才没有喘息的机会，你松一松，他攻一攻，你攻他就防。你们打乱没打乱敌人的阵脚，我们不了解。总怀疑里边有人搞鬼，是内部有人，还是外部有人，总是有人搞鬼。内蒙古日报四·一三点名批评的很严重，你们的影响很大，全区各地都有影响。批评了你们，你们作了检查，但应采取有力措施。林副主席说：光做思想政治工作，没实际行动，就不是毛泽东思想。你们有些问题不采取断然措施还是不行。后面的家伙不搞出来还是要捣乱的，什么人捣乱，就是乌兰夫势力。问题还是在革委会，如果革委会是个坚强的战斗指挥部，这些问题完全可以解决。革委会有权威，完全可以顶住，那个地方搞不好，问题还在革委会，山西就是革委会内部思想不统一。周发言同志是军队的，革委会主要还是赵军，你们大家要支持赵军同志。革命小将也要支持赵军，大家都要支持赵军。许集山同志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要支持赵军，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协力。革委会是新生事物，没有经验，大家研究讨论，

有些问题不要那么急，天塌不下来，要请示上级，不要急急忙忙。革委会要实行集体领导，大家讨论问题就好办。革委会要有权威，紧跟毛主席，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办对了群众才相信，才拥护，否则怎么会拥护呢？前段走了弯路，可以吸取教训。革委会忙于事务不能很好地学习，上面的东西什么都看不了，那是不行的，做了一百件小事，没做一件大事，一百件小事顶不上一件大事，方向路线错了，其它做了很多事也顶不上。要组织一个精干的核心小组办事组应付事务要考虑那些放在第一线，那些放在后面，都在第一线忙于事务不得了。我们革委会也没经验，开始也是忙得很，终日辛辛苦苦，成立了核心小组办事组后，可以想些问题。没几个同志掌握全盘，非犯错误不可，就事论事，吃老本，老本吃光了就犯错误，领导班子要统一思想，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大胆工作，大家挺身干，不怕犯错误，越是困难越是要出来，不要形势好一点就出来，形势不好就躲躲闪闪，这就不好，这就是老滑头，不是革命者。

4、革委会的正副主任、常委，不能是那一派的头头。对造反派的思想政治工作要狠抓，对不良倾向要加强教育，组织他们好好学习。特别不能支一派，压一派，有些单位有这个情况，起码是亲一派，疏一派，这样也要犯错误。对革命小将要帮助、爱护，犯了错误要批评，要求严格才能锻炼他们，考验他们。你们这里与呼市一样，没有大乱过，也没有大型的武斗，和和平平，容易对敌情估计不足，认为没什么敌人，这是右倾情绪。

5、群专问题，不少旗县两派，出了很多毛病，你抓我的，我抓你的，互相抓，这样不行，要很快纠正。群专主要是教育、动员群众，一般案件发动群众搞，重大案件革委会要组织专案，群专可以配合，与群众结合起来搞。有的地方搞抓人，不去教育群众，光去抓人，这个问题搞不好，打击面就过宽了，要很快纠正。要规定，这派不能抓那派的人，有坏人自己揪，不能这一派专那一派的政。群专抓人要经革委会讨论，这是指重大案件，其它的就让群众斗，一般让群众自己揪。两派互相揪，就会把敌人放跑，要注意这个事，不要光求抓多少，要向纵深发展。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比较容易抓，阶级斗争不是看抓人多少就是成绩大，要看抓的要害。抓的人多，司令没抓住，还是不解决问题。要分析敌情研究情况，不调查是不行的，完全可以调查吗？特别是公检法，把情况了解了，才能动员群众，不了解情况就打不中敌人的要害，包头为什么发动的晚，搞的比较好呢？就

是先摸情况一直搞下去，没有停止，一直是主动进攻。呼市进展比较慢一点，成绩还是大的。对敌情不断分析，不打无准备之仗，才能打中要害。

依靠谁的问题。要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受蒙蔽站错队的群众。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些是好人犯错误，有些就是敌人。

工作方法。要调动机关人员的积极性，核心小组办事组搞个七、八个人，研究情况，应付外面的东西。

一元化领导问题要解决，革委会本身要思想统一，本身不统一叫什么一元化，那是二元化，三元化，不能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要经常碰头研究思想情况，重大问题要碰头，核心小组办事组可选一些军队、地方比较可靠的同志，一般会议让他们参加，这样可以解决问题，不了解意图，机关就不好做工作。

6、派性问题，革委会研究的事情，外面就已知道，开完会大字报就出去了，那不行，要强调民主集中制。革委会里边有历史问题的，要调查清楚，不要急急忙忙处理。一般历史问题没搞清，不要搞斗争，搞清后报上级审批，如查清是叛徒、特务，要采取措施，内部处理，一般情况下，可以交群众批斗，一定要落实，不能匆忙。革委会对这些问题要慎重，这是有关革委会的威信问题，匆匆忙忙搞错了，今后别人就不相信你了。下面旗县一、二把手有问题，可采取调动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真是坏家伙，放在那里不行。

上一段批评了你们的错误，也是对全区其它地方的教育，如果都这样无政府主义还行，我们是有政府的，报社、电台不得了，一点不能出乱子。

乌盟报纸是错的，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有的是好人犯错误，有的是坏人插手。还在那里为乌盟报辩护，现在还明目张胆地到外地宣传，为乌兰夫翻案，不得了，什么想不通，群众通了，坏人一辈子也通不了。

(五月二十五日)

(呼和浩特群众专政总指挥部《联合战报》第二十三期 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滕海清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革委会上的讲话
(滕海清在乌盟革委会常委会及联指常委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今天找同志们谈事件。

一、在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革委会怎样掌握斗争大方向，这个问题掌握不好，其他工作再有成绩，也是暂时的。会出很大偏差，如何掌握斗争大方向呢？革委会常委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制度建立起来，坚持下去，做到雷打不动。最重要的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大方向就是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中央指示精神。前段你们走了弯路，恐怕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出了毛病，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革委会才成立。它是个新生事物。大家没经验，出些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要有统一的想法。出了问题大家集体负责是好的。你们常委是领导全盟三百万人民的核心。有些同志以前是造反派，现在参加了革委会。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在组织上把我们安排在重要位置上，我们就要对党和群众负责。我们应当在群众之中，而不是在群众之上。地位变了，如果思想也跟着变，不是在群众之中，而是在群众之上，脱离群众，这样下去，就要犯错误。要知道我们责任的重大。全盟的工作做的好与不好，主要责任在我们身上。我们决不能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绝不能辜负群众的信任和要求。因此，要兢兢业业，团结一致，进行工作。这些道理好懂，做起来就不容易了。

二、要集体领导。大家对待问题，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不要做和事佬。旗帜鲜明，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看行动。对问题不能抱沉默态度。旗帜不鲜明，该讲的不讲，不拿出主见，这样，领导班子的集体领导就形不成，就会少数人说了算，旗帜一定要鲜明，要勇于负责，不要怕犯错误。军队同志要这样，地方老造反派更应该如此。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首先，我们要在内部把大方向抓住，其次分工负责。要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不要遇事你推我，我推你，都推给一、二把手，这样不行。如果旗帜不鲜明，对群众就有影响。不讲话就是默认。群众最会察颜观色。因此，革委会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口径。问题要大家讨论决定，民主集中。工作要有分工，定期检查，向核心小组及常委会汇报工作，这才能了解情况。为什么情况不明？主要是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忙于事务。是不是不能了解情况？很能了解情况，很多人在下面嘛！比方差不多的单位都有解放军支左，你说他们

掌握不掌握情况？他们对情况基本是了解的。革委会是不是找他们定期汇报、收集他们的情况了？当然，他们的情况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正确，但可以供我们参考。还有其它方面，都是可以了解情况的。

三、革委会内部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对有些不健康的东西，不正当的小动作，要批评帮助。要敢于指出缺点和错误，要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这样，领导班子才能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机构。这个问题同志们应当注意。革委会内部不能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派，对于这样的人，在革委会内部要进行教育，指出他的错误。教育后如果不改，就要进行斗争，包括造反派在内。这样，革委会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有战斗力的机构。如果革委会里边思想不集中，不统一，不抓活思想，也就根本谈不上抓群众的活思想了。内蒙革委会从筹备到成立，革委会成员中有很多活思想。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对错误的东西进行批判，把问题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人改过来，不使他垮台。

地方的革命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革命的精神状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实际上，在工作中犯些小错误，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错了就改。上次讲过，革委会要支持赵军同志。自己要是腰杆不硬，自己负责，但其他人要支持他，互相支持。大家要挺起腰杆敢于负责。军队要支持革委会，尊重革命领导干部，并经常帮助他们。告诉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小将，要支持革委会，支持革命领导干部。如出问题，就出在革委会内部。很多地方出问题都不是出在群众身上。山西就是典型的例子。革委会内部各支一派，思想不统一，对革命损失多大！这样，怎么能使革委会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领导班子？群众怎么能相信你？在革委会工作要公道，不管出什么问题，特别是处理造反派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不能亲一派，疏一派，应该一视同仁，否则敌人就会钻空子。敌人想分化革委会是很自然的。内蒙革委会筹备小组成立后，敌人谣言很多，什么这是一派，那是一派，实际上是挑拨我们的关系，希望我们有裂缝可以钻进来。我们一直很警惕。实际上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们是很团结的，包括小将在内都是这样。敌人散布谣言，无非是想分裂革委会，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我们没有上敌人的当，因为我们是互相信信的。如

果互不信任，敌人就会利用这个东西。我们千万不要听片面的东西。毛主席早就讲过，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敌人有两种手法：一种是真枪实弹，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捧场，可以把你捧上天去。有些同志经不起捧场，这边一捧，那边一拆，就裂缝了。因此，我们的同志头脑要清醒，否则就会上当。

四、思想工作要跟上去。跟不上，就可能出现另外情况。当然，今天批评你们严格一点，我想批评严一点有好处。我来了几天，时间不长，和同志们接触谈话中，发现你们对前段走的弯路有顾虑。今天讲的比较严格。如果你们跟上去了，形势可能象包头那样，发展很顺利。如跟不上，就会出现不足了。

现在如何跟？这样群众非采取行动不可，就看革委会领导表什么态，关键就在这里。今天讲话主要是点火，能不能点得起来，不一定。点起来了，你们怎么办？灭火还是支持，要看你们的行动。如果有人冲你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应当坚决支持正确的群众起来革命。如果还是态度暧昧，不敢表态，甚至个别同志做小动作，就不利了。包头开始情况没有你们好，根本没有动，一点火，一下子动起来了，跟的很紧。我们要求他们主动进攻，不停顿地进攻。现在一直还在进攻，比呼市还快，基本上没走弯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上了。杨、余、傅事件后，学生有些波动，工人没有动，一直稳住了阵脚，继续发展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也要态度明朗。前段有错误，没有团结紧。这次应当口径一致，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紧跟内蒙的既定部署。

核心小组，是个战斗指挥部，怎样才能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指的正确，方向明，决心大，很快就能把敌人的阵脚打乱。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大家不要顾虑那样多，要相信群众，不要划那么多条条框框。在文化大革命中，贴几张大字报，斗一斗，有什么了不起的？要打破框框，大胆发动群众。现在要继续发动，不是讲一次话就能发动的。讲话总是有人拥护，有人反对的。要继续发动群众，跟上去。

旗县同志来了也要讲清，有些事要注意。现在中心问题是发动群众，打破条条框框。有些政策界限，群众发动起来后再教育群众。

生产要专门有一个班子领导。生产不能脱离革命，要以革命带动生产。要直接抓阶级斗争。要专门搞一个班子，指挥战斗。阶级斗争，比过去打仗难多了。过去打仗，部署好了，打进去就行。现在对隐藏很深的敌人，主要靠斗智，不能

靠斗勇。不研究敌人的策略，不掌握敌人的情况，就打不稳，打不准，打不狠。所以，要研究情况。知己知彼，才能打胜仗。

五、工作如何抓，如何掌握情况？根据包头情况，很多人是很了解情况的。领导要根据新情况，下新的决心。有些单位触不动，就找造反派来，找群众来，支持他们的行动，领导亲自上第一线点火，这样就能把群众发动起来。你们过去的错误，就是对待受蒙蔽站错队的群众的态度。要支持他们起来革命。就是有人借机起来翻天，也没有什么关系。让他翻几天，跳一跳也好。特别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被支流冲击大方向。除机关本身搞，还要统一部署，专门下去，掌握情况，发动群众。否则机关管什么用？

总之，这次决心大一点，不会犯大错误。犯了错误，我们会来承担。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有些支流问题，只要领导好，没有什么关系。不要光看支流。什么叫群众运动，把群众发动起来才有运动。群众运动总是朝着正确方向走的。虽然有些支流，朝羊肠小道上走，但可以帮助他们克服。我的中心意思是思想要跟上去。部队干部、支左人员思想都要跟上去，与革委会行动一致，那么，这一仗进攻战就可能打歼灭战，坏事就能变成好事，使运动更深入一步。

地方干部要大胆地干，军队支持你们，上级支持你们，腰杆应该很硬，软就不行了。内蒙批评你们，是支持你们，不要认为下不来。不批评你们，就要犯大错误。支持你们，你们腰杆挺起来。对不同意见的造反派要做工作，不能压制。对你们只能批评帮助，把他们压垮就不对。有坏人要揪，是群众的事。

在常委发言时，滕司令员又指出：

文化大革命后，每个人要有新的精神状态。革命领导干部要有新的面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挺起腰杆干，不要灰溜溜的。一般人哪个不犯错误？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没有背包袱的必要。新的领导干部应该是生动活泼，生龙活虎。红卫兵小将就是生龙活虎，敢说敢干。没有经验，干错了，没关系，错了就改。红卫兵想的天真，但精神状态好。老干部最讨厌，有些是老滑头。关键时刻躲躲闪闪，打仗时就是逃兵。

对小将，还是要爱护，坏人只是少数。在挖肃运动中，要打的稳，打的准，打的狠。对认识不到的，要教育他们。小将犯错误，我们老头就好过吗？培养的接班人老犯错误，我们就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对群众还是要提高他们，这个问题

不能动摇，不能把造反派搞垮。坏人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好的，要依靠他们，帮助他们。老不批评，他们就会犯大错误，我们就对不起毛主席。中央文革对小将那么爱护！但对坏人要狠，要抓，对小将要爱护。

绒毛厂造反派是好造反派，但中间不可能没有坏人。绝不能把造反派搞的灰溜溜。我批评是批评没把坏人揪出来。广大群众是好的。坏人是少数。不是要你（指贾成元）回去把造反派搞的灰溜溜的，主要是要把坏人搞出来，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把马蜂窝捅开，无论如何不能对造反派泼冷水。人与人的关系只能是阶级的关系，政治的关系，不能是其它关系。好造反派还是好造反派，功劳是老的，要立新功，要不断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搞阶级斗争。与谁斗？与敌人斗，与刘少奇斗，与乌兰夫斗，与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斗。机关里有，应不应该斗？应该斗。这样，队伍才能更纯洁。群众起来了，问题就好解决了。

把集宁问题解决了，旗县问题就好解决了。呼市问题不解决，盟市问题就不好解决。关于突破问题。群众发动起来就好突破了。解剖一个麻雀，总结经验，指导运动，突不破的地方就能突破。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关键问题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不要划框框。我们半年后才出了个六条。让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领导再拿出框框。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来源：呼和浩特群众专政总指挥部《联合战报》1968年6月7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滕海清在听取内蒙察右中旗汇报后的讲话

中旗文化大革命的主流还是好的。革命委员会做了很多工作。在抓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抓生产等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支流问题，这些是值得重视的。支流多了，就会把主流冲掉。阶级斗争本来很复杂，政策性强，我们没有经验，掌握不好，可能出偏差。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抓得不好，不但不能向纵深发展，反而会后退，各项工作会受损失。我们要以革命带动一切。革命，就靠毛泽东思想。你们那里出现的问题比较严重，实际上是没有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完全落实下去。当然，没有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有了缺点错误怎么办，要很快纠正。根据你们的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各级革委会、支左部队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不但要学习，而且要落

实，落实就是用，落实得怎么样，要检查。中央报纸社论，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声音，往往我们不重视学习，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不好好学习就会落后于形势。你们那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掀起来，是好事，如何长期坚持下去，是比较艰巨的工作。养成群众自觉学习的习惯很不容易。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扎扎实实，要学一条，用一条。不要这个统计，那个统计，不要今天统计挂毛主席像，明天统计唱语录歌，给群众找麻烦。群众对毛主席是无限热爱的，毛主席著作学好了，他就更加热爱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就会更加深厚，贴毛主席象，背语录，就会自动去搞，不要你下命令。群众尝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甜头，生产搞好了，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团结搞好了，坏人坏事搞出来了，就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毛主席的伟大。内心热爱毛主席。当然，有些人没有养成学习习惯也要有一点制度。无组织无纪律不行。现在大家都参加学习，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应该组织力量，大力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扎扎实实。对好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鼓励和表扬，调动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革命委员会、支左部队要狠抓这一条，千条万条，这是第一条。毛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干，而且要快，要闻风而动，长久了，就养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

在农村主要是办学习班。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新旧对比，忆苦思甜，与革命的大批判结合起来。把批判刘邓、批判乌兰夫、批判本地区本单位的坏人坏事结合起来。农村大批判，不能象城市、学校那样，搞大字报、大标语，主要是搞学习班，斗私与批修相结合。搞地头，炕头批判，家家户户都搞。联系实际，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阶级熄灭论”等等，笔伐不行，就搞口诛。

二、各级革委会可能钻进个别坏人，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开始情况不完全了解，钻进了个别坏人，是可能的。坏人总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很能蒙蔽一部分人。对个别钻进革委会的坏人怎么办，这个问题大家考虑比较多。这里要说明一下，坏人不是指犯一般错误的人。坏人是指乌兰夫的死党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革委会有坏人，应当揪出来，赶出去。有些干部群众不敢揪，害怕这样做是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其实道理很简单，新生的红色政权是有很多革命的代表组成的机构，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都应当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坏人就不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

边，他就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为什么不可以赶出去呢？这倒不等于攻击红色政权，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把他们赶出去，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机构就更纯洁。有些人有问题。到革委会后又做了很多坏事，这样的人，群众有意见，可不可以批判？教育以后不改，可不可以赶出去？我看可以。这个问题不要顾虑那么多。革委会几十个人，揪出一、二个坏人，能垮了台？垮不了。只能是更加坚强，并不损害革委会的威信。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方式揪是另一个问题。现在有人就是要破坏革委会，有从外部来的，但更主要是防止内部有坏人在搞鬼。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希望同志们注意。这里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人犯错误，改了就是好人；有人颠覆，破坏革委会，做坏事，也可能不一定是反革命。经过批评斗争，他坚持不敢，可赶出去。新生的红色政权，既要抓思想革命化，又要抓组织革命化，只搞一化是不行的。对革委会内揪出的一些坏人。可以批判、斗争，但不要游街、打人、挂黑牌。

三、有个比较普遍的问题，过去群众对现在已经站出来的领导干部都贴了大字报，反对过他，批斗过他，现在这些干部站出来了，进革委会了，他不但不感谢群众对自己的教育，帮助自己触了灵魂。反而以种种借口用各种手段进行打击报复，甚至利用一派去打击反对过自己的一派。这些干部如继续这样做，就要垮台，这是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反攻倒算。对这些人，领导上要告诉他们，你过去工作中有错误，群众批评你是对的，帮助你应该是，感谢他们。不要埋怨，更不能打击报复。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错误，为什么不能批判？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为什么不能对你贴大字报？你现在为什么要打击报复？你还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吗？！应该严格讲清，不改的话，就要垮台。不要以为站出来了，当了领导，就不能碰了。这样做，实际上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攻倒算，打击报复，镇压群众。镇压群众就是镇压革命，就要垮台。各级干部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军队干部在内。现在发现有些过去站错队的受了群众批判的军队干部，现在要翻案。他们乘挖黑线的机会，整那些斗过自己的人。要知道翻案是翻不了的，那时你不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反对中央八条。为什么不能批你？你错了，改了就行，现在想翻案，我看只能是翻跟斗，越翻越深，制造打倒自己的条件。地方干部，×××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姿态那样不高，这不能说对文化大革

命不理解，而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继续搞下去，就要垮台。这实际上就是政治上的打击报复。这个问题不一定光是×旗有，其他地方也可能有。这不是什么认识问题。这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的大问题。

四、对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态度问题，在内蒙许多地方存在着这个问题。造反派犯错误是难免的，有的犯得多一点，有的犯得少一点。有的在这个问题上犯，有的在那个问题上犯，他们犯错误，自己有责任，但领导也有责任，没很好地教育他们，当然有些时候你说了，他听不进去，犯了错误。我们有些同志老是把造反派犯错误看的那么严重。为什么看得那么严重？有坏人只是少数，群众与坏头头要严格区别开来。对犯错误、过去反对过自己的老造反派，现在采取压的方法，利用一派压一派，总想吃掉一派，这是什么问题？就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为什么不允许别人犯错误呢？你自己不也犯过错误吗？造反派、红卫兵小将没有经验，文化大革命又是史无前例的，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应该教育他们，等待他们，不能报复、压垮、吃掉。如果把他们压垮、吃掉，那就是严重错误，是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的老造反派都是犯过错误的，你教育好一点，他少犯一点，你教育不好，他多犯一点，不管怎么样，总要犯一点错误，一点不犯错误的造反派是没有的。文化大革命中，包括很多老干部不犯错误的很少，有的改得快一点。几十年的老干部都犯了错误，为什么不准造反派、红卫兵小将犯点错误呢？一犯错误就看得这么重，硬是要把他们吃掉、搞垮。为什么不允许人家革命？×旗对×犯错误的老造反派，采取的态度完全是错误的。这个组织里有坏人，让他们自己去揪，你用“群专”去搞他，不就是镇压群众？压垮了，群众还是要起来的，思想认识问题，压是压不服的。将来有反复，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不看后果，光求当时痛快，没想到这就是镇压群众。毛主席说对造反派要做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对犯错误的老造反派要“帮助、批评、联合”。你们没有很好执行毛主席这个教导。当然有些事可能是下面做的，但你们指导思想有问题，否则下面不会这样做。这个问题要很好处理，两派要联合起来，有坏人自己抓。否则，挖黑线、肃流毒的运动是搞不下去的。你多做工作，有坏人他们自然会揪，要相信大多数群众是要革命的。这个问题你们回去后要很好地做工作，两派工作都要做，那一派压人家也是错误的，不该抓的人要放，否则要栽跟斗。文化大革命有各种观点，这些观点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统一起来，两大派要在毛泽东

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

五、群众专政问题。各旗县要很好整理一下队伍，总结一下经验，有些人不行要调整。最好由军队领导，真正没派性的、比较好的人也可以参加，领导权要抓好。前一段没有经验，犯些错误是难免的。“群专”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如果还是“群专”几个人在搞，搞少数人专政，那与旧的公检法有什么区别？“群专”要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有些案件可以交给群众。广大群众是了解情况的，是坏人还是好人群众是能分清的。“群专”只搞少数人专政，不去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光抓人，这样的“群专”，应当取消！这个问题有普遍性，应当总结一下。加强领导。人员要改组，找比较好的干部掌握。“群专”的任务，一是发动群众，二是掌握政策。要坚定地依靠群众，一切通过群众。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群专”就要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看有一些老的叛徒、特务不一定要关起来，交给群众批斗就是喽！牛鬼蛇神也不一定都抓，有一些可以交给群众批斗、监督劳动。真正要抓的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特务、重大政治案件的骨干。还有其他重要的坏人，该抓的也要抓。有些大家知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现在做坏事，交给群众斗他就是了。投机倒把分子是要打击的，但要打击主要的。要发挥“群专”的威力，就要掌握政策，都抓还了得，不该抓的别抓，有些坏人限制他们自由、监督劳动就可以了，这就发挥群众积极性了。“群专”要教育群众，掌握政策，不能打人，一开始抓起来就打，那有这个道理，打人就是不行。“群专”指挥部的人一定要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没有派性的。

那些两派对立情绪严重的地方。盟里考虑可以取消“群专”，有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自然互相抓，那一派掌权，另一派就吃亏。资产阶级派性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公社以下不要搞“群专”小组，把群众发动起来就行了，生产大队里有什么样的坏家伙，群众还不知道？！公社以下还是搞发动群众。

总而言之，“群专”成绩很大，不要泼冷水，应当总结经验。

这几点你们可以传达。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来源：呼和浩特群众专政总指挥部《联合战报》1968年6月7日）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权星垣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话

〔六月六日权星垣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二阶段动员会上的讲话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同志们，我是来学习的，没有准备讲多少话。刚才听了×××(学习班政委)的很好报告，我很受教育。他集中了学习班几百名同志一个月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收获，把这个用毛泽东思想总结概括起来，把下一阶段的做法和方针讲的很清楚，我认为很好，很深刻。问题都讲了，我再没什么可讲的，仅提出几个重复问题供参考。

我在运动初期，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错误。我十七年来也犯了不少错误。同志们有这个进学习班来学习，我还没有这个机会。让我们进学习班来、应用毛泽东思想比较系统地分析我们这些年来究竟在什么问题，犯了什么错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我们好好地清理自己的思想，看看自己世界观改造得怎样，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做到了忠。因为大量事实反复证明，每当我们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对，执行不坚决或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必然要犯很多很大错误，给革命造成很多很大损失。所以我们应以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态度，这样的无产阶级感情，来对待自己，来要求自己。尽管在认识水平上一时还认识不了那么高。但我相信同志们逐步会把自己的错误看清楚，逐步上纲上线，就能做到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痛，改私不怕难。对我们自己所犯错误，是不是严肃认真改正，就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任何企图侥幸、蒙混过关，实际上是自欺欺人，就不能改正错误，只能说明没有决心和自己的错误彻底决裂，没有决心把自己改造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战士。相反，如果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犯了什么错误，就敢于拿出来深刻批判，认识错误，上纲上线，正说明我们

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正因为过去我们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才犯了错误，那是不忠。现在用毛泽东思想批判我们的错误，那不就说明我们在改正自己的错误了吗？

刚才×××列举了九条顾虑，有这样那样的活思想，不奇怪，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但说到底，没用，不必要。我请同志们回忆一下之所以犯错误，不就因为自己怕群众运动，怕群众运动起来打乱自己的坛坛罐罐，所以评头品足，以至起来镇压。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的干脆拒不检查，顽固坚持下去，走到什么下场，同志们知道，有的迫于形势，搞两面派。例如王逸伦，就是典型，他做了检查是迫于形势。上了汽车就骂街，他是个大特务，混进来的，不是共产党，是个大坏蛋。

有的当时检讨了错误，但情况有变化，他又反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击了自己，检讨了错误，二月黑风一来，他又马上出来反攻倒算，镇压群众。

有的人说：“犯错误是情况不了解，犯了错误是没有看清形势。”

做为自己不能这样讲，自己是老干部，革命多少年。红卫兵为什么他们能看清形势，战黑风，顶恶浪？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比他们多吗？你们的老资格哪儿去了？这是原谅自己。有的人怨自己不该亮相。不亮相本身也是个亮相。有那么一位厅长说：“现在的事真难办！亮到三司那边，挨捉、挨打，甚至掉脑袋；亮到红卫军那边，现在安全，将来丢党籍，最后还是亮到红卫军一边。”象这样的人很清楚，难道他不知道那边是革命路线吗？他宁丢党籍也要亮到红卫军一边，就是保住自己的脑袋啦，他能象门合那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到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林副主席说：“你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这是个立场问题。”刚才×××说的，有的人填表加注解一事，回想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志们犯错误，我们有责任。但十六条的发表以及在以前毛主席就明确指出过，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国民党、北洋军伐，满清政府镇压，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毛主席发出指示，后来又发出文件，给大家平了反，这才有几天呢？我们这儿真正平反是在十一月十二月，还没有真正落实，二月黑风就起来了，这就是反扑嘛！

毛主席刚刚给红卫兵小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平了反，又起来更大规模的镇压。这道理很简单，可以想明白嘛！但有的人就不这样想。有的反攻倒算，有的不服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从内蒙来看，“四·一三”以后经毛主席领导的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胜利，这时我们如何团结得更好，对干部来说就应该检查改正自己的错误，和造反派一块把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的不是这样，不是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而是躺在保自己一派身上，不敢见打自己、反自己的一派，有的组织一部分力量来保自己，扶植一派攻击另一派。红卫军就是王逸伦看自己的日子不好过了，发动组织来保他。

胜利后也出现这种情况，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什么问题呀？经群众批评帮助大部分干部得到了挽救。有的干部加入三结合领导班子，在好好工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敢负责任。在《革命委员会好》这篇社论中指出过：革命的领导干部起着骨干的作用。但有的没有发挥骨干作用，说什么“自己好容易结合了，可再不能犯大错误了。”你不工作这本来就是个大错误，还说不犯错误。有的人，人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贴过他的大字报，他叫人家检查，这不是右倾翻案吗？现在清理阶级队伍，开展挖肃运动，革命造反派从自己队伍里，揪出了一些坏人，这说明他们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这说明造反派更加强大了。有的人却说什么“那时我看他们就不正派，看现在真的揪出来了。”这是什么话？这是翻案！你为什么用这些来否定造反派大方向？！谁用这个否定造反派大方向，谁就是右倾翻案。决不答应！刚才×××说，有的人说过“如果保守组织胜利了，也在挖乌兰夫黑线”，可惜你没想到他为什么没胜利呢？你这是唯心主义，它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怎么能胜利呢？他们不可能挖乌兰夫黑线，二月黑风他们把黑帮怎么拉到北京，中途汽车怎么坏的，在什么地方修理的，我们都一清二楚。他们怎么能挖乌兰夫黑线呢？！这说明你的思想还没有改变。广大受蒙蔽群众是没有责任的，应支持他们和革命造反派一块投入挖肃运动，要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但对他们有三条，一、绝不能否认自己过去犯错误，那是历史事实，现在是一九六八年，不论多会儿，也不能否认。二、不能把矛头指向造反派，不

能否认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事实证明，受蒙蔽群众大多数这样干了。我们接触不少，他们第一句话就说，我是站错队的。个别有翻案的，例如公安厅就有。公安厅造反派有右倾思想，曾一时对王再天的面目没看清，于是就有人说(原红革联)“造反派不对了，保了王再天”，但当场就被东方红的同志顶了回去说：“你们吹什么牛？！你们保王逸伦、王铎，王逸伦、王铎是乌兰夫的人，有什么可吹的！”攻击造反派不行。三、不能另立山头，要和造反派一块斗争。有人说：“我们组织不该解散，那时解散坏了，如果不解散，现在还不和咱们联合，还不闹个席位。”有的干部又对这个感兴趣，他不是挖敌人、肃流毒，他趁这个机会否定造反派，说什么：“看，那时不是看准了吗，他们里面就是有坏人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混入造反派里的少数坏人和造反派组织混淆起来。为什么会出来这种观点，这是立场问题在不同时期的表现。

有的干部三结合了、造反派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是难免的，你究竟是满腔热忱地帮助纠正呢？还是就在那捧着呢？多数是前面的，但有的就捧，对他们的错误不提出批评帮助，脑子里想，我好不容易解放出来结合了，再提不就又打我批我。运动初期由于有权可以镇压群众，现在不行了，就从另一方面来捧着，有的想利用这个来搞垮造反派，万变不离其宗。根源就是“私”字。

我们应利用这个机会，按照林副主席所指示的，我们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毛主席接连发出最新指示，我们是不是真正站在毛主席革命立场上，是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了？我们不仅要革别人的命，而且要解决自己的世界观问题，不解决世界观，还会出现走资派。我们是不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就看我们检查如何、认识如何。有的人把自己错误说的轻一点，少一些，这实际上是自己骗自己，这要从过关来说是过不去的。即使过去了，埋下了祸根，分不清是非，今后你还要工作嘛，主观想自己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实际上按资本主义原则处理问题，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久而久之，不就成了走资派了吗？这里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自觉的，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觉得委屈，还有些不服气，满心想干社会主义，满心不行呀！光强调动机，不说效果不行呀！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毛主席说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社论上说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如果不严格要求自己就埋下了祸根，即使在学习班通过了，

思想上解决不了问题，将来还不会犯大错误？这是自己骗自己。也许有的人认为这样把事情联系起来，那不成了走资派了吗？你这样想就会把屁股坐歪了，首先考虑自己，你不能这样考虑，应考虑自己的检查，检查自己对毛主席忠不忠。不做触及灵魂检查，就分不清自己错误为什么产生。

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心干部。最近毛主席又说：“要相信百分之九十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这一指示很英明很深刻，但有一条，可不要说我自己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毛主席说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如果你要认为你自己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那你就不能站在象毛主席所说的大多数可以改的一边了，而是站在少数不可改的一边了。我们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正确对待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看自己对毛主席忠不忠。有些人认识不上去，可以谈心，谈心就是批评，起初你觉得批评刺耳，慢慢你就觉得顺耳了，就不觉得过不久了。因为你把自己的错误批判了，立场转过来了。放下一个包袱，就轻一点，放下两个包袱，就又轻一点，把包袱彻底放下来，就轻装上阵了，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你对自己的错误要有充分准备，提意见的人给你提了九十九条，如果你自己再准备二条，成了一百零一条，那就没有什么难过了，就主动了嘛！否则你就觉得不入耳。

我想同志们回想一下，运动初期，对造反派的话为什么听不入耳，而对保守组织的话就听得入耳了。因为他们是保的，保你，而造反派打你，一拿起语录就是“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你就会说我也没站在反对革命一边，这样你就听不进去，你就听保守组织话舒服，结果闹了个大不舒服，这是个立场问题。现在反过来，你再批判当时的那种错误思想，那你的认识就提高了嘛！

所以希望同志们要按毛主席的斗私批修指示去做。这四个字文章可大了，看我们是不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看行动。在学习班就看你对斗私批修抱什么态度，敢不敢刺刀见红、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疼。一切私字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究竟敢不敢和私字彻底决裂，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我相信大多数同志会做到这一点，尽管一度思想紧张，不好受，但真正通了，会越来越亲切。我想大多数同志会用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对待自己。

第二阶段是有决定意义的阶段，希望同志们努力，敢于刺刀见红。造反派、解放军热情帮助大家改正错误。干部真正把犯错误教训讲清了，斗私斗得好，这对造反派、解放军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教育。

我们今天确实没有准备，刚才×××讲了许多，我所讲的不对的希批判。

（来源：《联合战报》呼和浩特群众专政总指挥部第二十四期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四日）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滕海清对内蒙古文艺界的讲话

编者按：六月二十一日晚，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滕海清同志在呼和浩特新城宾馆俱乐部对内蒙古自治区文艺界的部分革命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出席报告会的有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锦明，常委权星垣、郭以青、王金保等同志。王金保同志也在会上发了言，听取报告的还有自治区教育界和卫生界的部分革命同志。滕海清同志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全文如下。

今天和文艺界的同志们开一个单方面的座谈会。我很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因为最近在开会，没有时间，人又这样多。今天不是开什么会，也不是什么总结。我想就文艺界文化大革命谈些意见。最近情况不太了解，仅供同志们参考。

同志们，文艺界的挖肃斗争从去年十一月份就开始了。江青同志对北京文艺界讲话以后，我记得我们革命委员会是十六号听了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以后革命委员会就决定，文艺界应当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把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一步。文艺界的运动现在是半年多了。半年多来革命委员会对文艺界的工作还是重视的，我们有很多同志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开始高树华同志抓，做了很多工作，还有文艺办公室，以后是王金保同志抓，文艺办公室的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半年多来，文艺界阶级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虽然在运动中有过几个反复，但这些反复没有什么了不起。反复么，就是搞了一段停下来了，停下来后又搞。但不管怎么样，文艺界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挖肃斗争中间，揪出了挖出了各种不少的坏人，这就是很大的成绩。文艺界长期以来在乌兰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的统治下，钻进了一些坏人。但是应当看到文艺界坏人总是少数。现在揪出多少人？（答：二百多人）二百人，总是把各种坏人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成绩。文艺界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基本上揭开了，主要的坏人我

看基本上是挖出来了。也可能还有。当然要想把敌人挖的光光的，一个也不剩，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对一个人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文艺界开始一段不乱，以后乱了一段，这一段乱的不错，乱的好。乱了以后，现在是大部分联合起来了。这种联合可能比过去的联合更巩固一些。因为敌人少了，把坏人揪出来了，没有在里面破坏捣乱的了，联合就可能更巩固。整个说文艺界的形势是好的。但是不是还有些落后的单位呢？发展的不平衡呢？我现在不了解，因为出去两个多月了。也可能有些落后的单位，希望落后的单位自动赶上来。很可能还有些单位发展的慢一些。

江青同志讲话之后，文艺界的造反派应该自动地按照江青同志的讲话精神办事，向阶级敌人进攻。但是在特古斯揪出之后，一段时间有反复，以后又有一段反复。反复的原因，一个是敌人在那里顽抗，我看主要的还是我们一些领导同志思想右倾，同时我们革命委员会也有责任，领导上下的力量不够。三方面凑起来才有这样一个反复。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右倾。敌人不管怎么样，总是少数。真正革命的同志什么时候总是多数。

为什么右倾呢？第一，看不见敌人。好像把布赫这些人揪出来后，文艺界基本上没有敌人了。看不见敌人这是最大的右倾。第二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起来革命。这就适应了敌人的需要。敌人在那里，你看不见，敌人还不高兴吗？另一方面敌人是害怕群众起来的。是不是敌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广大群众是知道的，怎么也隐瞒不过群众的眼睛。敌人就害怕群众。我们造反派同志在前一段犯了错误，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犯了错误，害怕群众，这就恰恰适合了敌人的需要。当然我们主观上不是那样想，实际在客观上，我们右倾就把敌人保护起来了。

我们有些同志，特别是造反派的一些同志，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不高。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造反派站队站对了，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这时我们不仅把中国最大的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和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揪出来了，还把其他的象王铎、王逸伦也揪出来了。好像敌人已经是搞垮了。没有看到乌兰夫的势力，中国赫鲁晓夫的社会基础那些乌兰夫的死党和特务、叛徒、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其它的一些人混进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里面。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披上了造反派的外衣钻进来，当

然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钻到了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钻到文艺界就更多一些。这些人总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总还是用革命的口号来蒙蔽群众，我们造反派在这个时候右倾，就是看不到这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敌人与我们斗争的主要特点就是阶级敌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主要的是反映到我们党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搞了二年多了，我们造反派开始时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了，后来却没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去办事，好象第一次站对了，就永远站对了。第一次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们站对了，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揪出来了，打倒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我们要彻底地清理我们的阶级队伍，要把我们阶级队伍里面的一切坏人和中国赫鲁晓夫及乌兰夫黑线上的叛徒、特务和真正的坏人，也就是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搞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把这些坏人统统挖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右倾了，看不到敌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阶级路线，也就是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这个时候，有些同志不知不觉地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好象觉得自己还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实际上是右倾了。既看不见敌人，又害怕群众起来革命，特别害怕站错队的人起来革命，就连造反派内部有的同志要起来革命，也要压制，也要捂盖子。这实际上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志们，前一段文艺界有些造反派的头头捂盖子捂得很厉害呀，因此，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当然大多数是好同志，是好人犯错误，但有一些人本来就是坏人，他们那么干就是他们阶级本能决定的。我们有些同志并不是坏人，就在这一段离开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离开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步，就是对毛主席不忠，就是对毛泽东思想不忠。我们天天说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能够落实，躺倒吃老本，不知不觉地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就根本谈不上忠于毛主席了。当然，这些问题大多数都是认识问题。好人犯错误，改了就行了。歌舞团赵忠义来了没有？（赵答，来了。赵站起来。）你是好人犯错误，应该站起来革命。你这个同志，——坐下！（赵坐下）在歌舞团你是个头头，当然我知道你是个傀儡，后面有人在搞你的鬼，自己不知不觉上了当，起了捂阶级斗争盖

子的作用。你是好同志犯了错误，现在要起来革命嘛。文艺界还有好多象赵忠义这样的同志。这是因为我们思想落后于形势，革命向前发展了，我们思想还是在原地踏步，因此思想跟不上形势，跟不上群众，跟不上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跟不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自己总认为做得对，坏人在后面搞些鬼把戏，由于我们的同志阶级警惕性很低，看不出来。广大群众的意见听不进去少数坏人的意见倒信以为真，这样就不对了。文艺界因为有些同志捂阶级斗争的盖子，有些群众就拉出来，新组织了其他战斗队，有些同志很担心是不是又乱了？毛主席说要搞大联合，我们搞分裂了，有各种谣言，各种看法。那种乱不是乱我们自己，是乱了敌人。那样一分，有些同志就头疼啦。其实我们老造反派思想保守，促了一下，这样一促就把敌人暴露了，我们老造反派当然有点功臣自居，一促对他有帮助，这样老造反派就转过来了。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同新杀出来的战斗队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真正地把坏人抓出来。我在三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讲了京剧团的例子。京剧团那个办法是好的。开始分裂了，分裂出来的同志对原来思想保守的同志进行了有力的帮助。保守同志转过后来又联合起来了，这就很好嘛。现在看歌舞团是不是也是这样一条道路？（答：是！）当然这一段已经过去了，我今天讲这个问题并没有别的意思，目的是希望同志们吸取教训。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革命向前发展，不要掉队。所谓掉队，掉到那里去了？就是掉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另一边去了，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希望同志们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希望过去思想保守的同志，特别是有些头头，——当然个别头头是坏人，群众已经把他们赶出来了，绝大多数都是认识问题，是好同志，——应当总结这个经验，而且要吸取这个教训。我们造反派里面有些群众有些小同志，思想一时转不过来。歌舞团有一部分人思想转不过来，到底是听革命委员会的还是听赵忠义的，没有把握。到底能讲的对弄不清，思想跟不上。本来这个问题江青同志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我们真正的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应当是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奋勇前进，主动地向阶级敌人进攻。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就是那样不觉悟，那样停止不前，这是什么问题？是敌人拦着不叫我们前进呢，还是我们自己不前进呢？我看敌人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原因还在于我们自己。对于如何真正的一寸一步不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如何按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怎么讲就怎么办，中央文革

怎么讲就怎么办，还是缺乏经验的。事实上我们同志们前一段所犯的错误，归因一点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不管时间多长，一个小时，一分钟，只要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不上这个纲，天天说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忠于，还有四个无限，那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忠不忠，看行动。同志们回头看看，你们到底忠不忠？半年来自己的行动，我看可以比较一下，当然敌人在那里操纵、破坏、捣鬼，那时候你们没办法，现在就有办法了。问题还是我们的思想右倾。总结这一段经验教训，还是必要的。你们不是办了两期学习班吗？学习班是不是总结了前面一段的经验呢？我们犯错误的同志是不是总结了这一段犯错误的原因哪？应当从主观上去找原因，不要从客观上去找原因。主观上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思想不坚定，还摇摆，对毛主席不是一切忠于，坚定不移。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的中间逐步的理解。我们没有按照这样去做。我们前一段文艺界，说起来，搞得并不比别的地方晚，江青同志讲话之后，我们就搞。但由于有以上三个原因，一个是敌人顽抗，一个是造反派内部的右倾，再加上领导不力，我们有责任，所以文艺界文化大革命拖了时期。如果搞的好一些，迅速一些，成绩比现在可能更大些。

我们取得的基本成绩是：阶级斗争盖子基本上揭开了，有可能还有个别的单位有阴暗角落没有揭开，希望同志们继续揭；把主林的敌人揪出来了，但还不是已经揪光了，挖光了，也可能还有些发展不平衡的单位还没有真正把敌人全部挖出来。那么，文艺界下一步怎么搞法？

我认为文艺界的挖肃斗争和内蒙整个地区一样，现在首先就是要继续抓阶级斗争，以抓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为中心内容来办毛泽东学习班，来提高大家的两条线路斗争的觉悟。所谓路线斗争觉悟，就是指在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我们跟上跟不上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我们是不是每时每刻真正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如果说你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动摇有摇摆，那当然就不可能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现在就是要解决我们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林副主席讲，“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这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它都是附带问题。”那就是你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派性一边，还是站在中国赫鲁晓

夫、乌兰夫那个路线一边，这个问题是个立场问题，是个大是大非问题。路线斗争觉悟不提高，就看不见敌人，路线觉悟不提高，就不知道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样的首要问题也是认识不清楚的。为什么文艺界前一阶段那样右倾，面对那样多的敌人看不见？一个问题，就是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没有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是不是完全解决了呢？我看还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学习。我们大家要懂得，路线问题就是要不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要不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一边的问题。所谓路线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立场问题，还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你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你就很容易看清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思想行动，你要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那一边，当然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就闻着很香，对于无产阶级的东西你就闻不进去，中央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就可能听不进去，而阶级敌人的马路消息，他们的谣言，或者风吹草动，在你的脑子里就很敏感。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立场没站对。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所以说路线问题也就是个立场问题，就是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问题。我们文艺界文盲很少，工农分子很少，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当然，有的知识分子是接受了毛泽东思想，改造好了的。但是要看到，内蒙文艺界在乌兰夫一贯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下，有许多同志中了毒，而没有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真正地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改造，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下大功夫。下一步，第一个问题要办学习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就是要狠狠地斗自己的私字，改变自己的立场，把前一阶段的教训作为经验，回头来看一看，那一段为什么你的思想是那样。拿毛主席的指示对照一下，检查一下，当然这并不是让我们坐在那里检查是谁的责任，而是要自觉地改造自己，自觉地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如果办学习班不联系到文艺界和文艺界各个团体自己的东西，那么总结前一段那些问题就没有针对性。当然，前一段我们造反派犯了右倾错误，有些造反派的头头犯了错误，没多大关系，可以取得教训，就是要知道错了就改正。要大办学习班。现在大家没有什么其他任务，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什么演出呀，能演就演，不能演就算，还是把革命抓好，把我们这支队伍真正地建设成为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非常无产阶级化的文化队伍。前一段是组织上的革命化。有些没揪完敌人的单位，可以继续揪。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搞入的思想

革命化。搞了二年人的思想革命化，是不是我们人的思想革命化已经解决了，我看很多同志还是没有解决。办学习班要对照自己的思想很好地检查。

其次，挖出了这些敌人，应该把他们的流毒，他们反动的罪恶肃清。光挖出来还不行，那只是把敌人打乱了，打溃了，溃不成军了，阵脚乱了，但还没有把他们彻底歼灭。我们要把他们彻底歼灭，一定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批透。这个问题我想文艺界现在差得很远。前一段我听几个同志讲，说你们那个大批判很不象样子，实际上明批暗保。把那些黑帮、走资派揪出来，放在那个地方没有很好地斗他，没有把他的罪恶统统揭露出来，实际上把他保的很好，很舒服。象布赫斗臭了吗？我看没有文联的玛拉沁夫那些人斗臭了吗？我看没有。加上你们以后揪出来的。下一步一个办学习班，先斗私，斗了私提高了觉悟，再去批修。批修就是斗那些黑帮、那些坏家伙。集中力量，集中火力，集中目标，首先斗你们文艺界的第一号人物，第二号人物，先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我对你们那个地方，有目标、有对象。目标就是一号人物，二号人物、三号人物嘛，还有什么？你们那里还有毒草，恐怕还有大毒草。毒草批了没有？没有批么？下一步应当先集中全力对文艺界的一号人物、二号人物首先斗。搞大毒草的那些人就很可能是文艺界很重要的目标，这样结合起来，把他们批倒批臭。再下能搞明批暗保了！也就是说，前面第一个战役挖了敌人，挖了以后，整顿自己的队伍，办学习班，提高觉悟和斗争水平。现在必须把我们队伍整顿好，做好战前准备，把材料准备好，选定目标，集中火力，把文艺界一号、二号人物首先搞倒。当时把敌人挖出来的时候，有些造反派由于认识不清，表面上虽然不讲话，但心里一定不服气，那么在搞大批判的时候，对这些造反派是个考验。你敢不敢革命，敢不敢向敌人进攻，敢不敢打歼灭战，这就是一个考验。揪出某个坏人，有的人是同意的，有的人心里不那么同意，他有自己的看法，但大势所趋，他在群众的压力下不敢讲，心里别扭，所以我们要办学习班，首先要提高自己的觉悟。向主要阶级敌人进攻的时候，大家集中力量，集中火力，向敌人进攻，这就是一个考验。你是一个真正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中间的革命同盟人，这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开始思想保守的那些同志，或右倾的那些同志，应该积极行动起来，立新功。前一段保守了，犯了错误，思想跟不上，捂了阶级斗争的盖子，帮了敌人的忙。问题

已经过去了，现在应当立新功，站出来，敢于革命。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揪出二百多人，是否都是打倒对象？我认为这二百人中间，当然有些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等等。但有些人犯了严重错误，但还不是敌人。这一次，向主要敌人进攻的时候，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他们不是犯了错误吗？如果他是布赫线上的人，那么向布赫作斗争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大胆地揭发，把他所知道的事情，一切事情都揭发出来，那么这样做是好的，我们欢迎他。过去你没有和他划清界线，现在和他划清界线，这叫革命的表现。现在要把这部分人动员起来，他们也可以参加到学习班里面去。必要的时候把他们拿去，需要他们讲话的时候，启发、提高他们的觉悟，要他们站起来重新革命嘛！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就看行动，看在文艺界主动向敌人进攻的时候他们表现的是什么姿态，他是不是真正的彻底的揭露他们的主子。揭露他们那些东西，这是对他的考验。我们争取这些人起来革命，只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了，问题就搞得深，搞得透。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知情人，他们知道得多，他们把问题揭出来了，既教育了群众，也把敌人批倒了，批透了，批臭了，而且对他自己说也是一种革命的表现。不然你们把这揪出的二百多人怎么办？这里面无论如何还有一部分人可以争取过来的，能够拉过来的我们还是拉过来，不是真正的敌人还是把他们拉过来好。但是光拉过来还不行，你们批判了他，现在要考验他。什么叫考验？过去打仗我们捉住了俘虏兵，在战场上考验，就看是不是真的对准敌人，是不是拼刺刀。现在我们向主要的敌人，向头号、二号的敌人进攻。他们是一条线上的，可以考验他嘛！只要他能站出来大量的揭发，把事实揭起来，这就是革命行动，革命的表现，如果这些人历史是好的，就是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犯了错误，能够大胆地起来革命，经过考验，大家认为可以解放，就大胆的解放嘛。当然这要经过群众讨论，大家认为这个人真是勇敢的，虽然过去做过很多坏事，但他现在勇敢地站出来了，揭发了敌人，批判了敌人的一切东西，这好嘛，这是给他一条出路。但是我们现在在斗争的时候，不一定要开大会。我特别希望你们不要低级趣味的挂牌子呀，喷气式呀，那不好！要搞政治水平很高的讲道理摆事实的做法，完全用事实驳倒他。开大会，开几千人、几百人的大会，你讲一通，我讲一通，让他低着头，弯着腰，他自己都没听到，怎么能打准他的要害！不要那样，可以开小型的会。先把材料搞好，必要时开会或开大会教

育群众。最主要的就是批判那些毒草，下点功夫用毛泽东思想对照批判。坏人，跟乌兰夫挂线的坏家伙们，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最近还搞活动的那些人们，主要是用事实，没有事实是不行的，光放空炮喊口号不行。喊口号是必要的，但实际上是打不倒敌人的。我希望你们在这件事上做一个准备，回去好好研究一下，选好对象，做好准备，做好他们那些知情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交待政策，争取一部分人让他们起来揭发问题。就是叛徒特务，他们坦白交待了，将来也会从宽处理的。如果有些人就是思想上和他有联系，现在和他划清界限，在战斗中去考验嘛！甚至有些人在组织上有联系，跟他搞了很多坏事情，那么他真正地能够站出来革命，把他所有的问题都揭出来了，这样的人我们还是要给他出路的。这要交待政策，要很好的学习一下党的政策。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什么叫善于斗争？一个是我们自己水平很高，真正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再进一步掌握好党的政策，用党的政策去攻击敌人；第三条是准备好我们知道的材料，材料要核实，要确实，不要放空炮，如果发现知情人，争取这些人起来揭发东西，那么很快就会把敌人的问题全部揭发出来。揭发出来了，就可以教育群众，这样，就把他搞臭了，把他打倒了。现在，实际上敌人并没有倒。你看布赫倒了！布赫并没有倒！为什么没有倒呢？我们过去仅仅触及了他的皮肉，没有触及到他的灵魂，他肮脏的黑东西，我们还没有真正系统地给他端出来。这一个仗起码要打他一个月、二个月。这就是把所有揪出的敌人搞深搞透，彻底搞臭。一部分没打解放的干部，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好，敢于斗争，通过斗争考验，就可以把他解放。一部分犯了错误的而被揪出来的人，在这次斗争考验中表现的好，就可以从轻处理，甚至有些人可以把他解放出来。这样就逐渐地把真正的一小撮敌人孤立了，打倒了，要解放的干部解放了，犯错误的干部如果是可以打倒也可以不打倒的，那我们就是争取不打倒。打倒要先靠他自己，我们要帮助他，交待政策，要他自己站出来革命。这样敌人就越来越少了，孤立起来了，目标集中了，你把主要的一号、二号、三号敌人的问题搞清楚，那么他们下面的问题也容易搞清楚。看这个仗到底怎么个打法？是先打小的，还是先搞大的？你们研究一下。我看“擒贼先擒王”，把主要敌人打倒了，把他的问题性质定下来了，他下面的那些人的问题就容易搞清楚了。有些人也可以把他们教育过来，争取过来。

把这仗打好了，下一步干什么呢？经过这次斗争，大家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阶级斗争觉悟提高了，立场真正转的过来了，毛泽东思想在每个人头脑占领了阵地，坏人揪出来了，我们这个队伍组织上革命了，思想上也革命化了，那么下一步干什么呢？应该是斗、批、改的问题了。文艺战线要演什么戏，搞什么创作，排什么东西，那将来由群众积极创作，到群众中去嘛。现在群众有许多新的创作，东西很多。你们下去搞三个月两个月，向群众学习，把群众好的东西集中起来，那自然我们的所有内容也就丰富了，那就好办了。问题在于思想。思想问题解决了，将来怎么演，怎么唱，怎么导演，那些问题好解决。如果我们思想不解决，还是旧思想，毛泽东思想没有占领阵地，将来想演好戏是不行的。那只能是人家排好了样板戏，你们照样去套就是了。当然，江青同志已经搞好了八个样板戏，八个样板戏就可以给你们演上几年的，自己就可以不创作了。工农兵的东西多得很嘛，群众一天天创造的东西也多得很。将来怎么改，怎么演，是下一步的问题。

过去第一个战役打了胜仗，现在我们打第二个战役，这个战役是比较不好打的，搞了半年，经过很大的反复，才把敌人揪出来了，甚至现在还没有揪完。把敌人揪出来，仅仅打了个预备仗，还没有歼灭敌人。现在第二个战役要歼灭敌人，思想上、政治上要敌人歼灭，那我们首先是组织自己队伍，整顿自己队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象打仗一样，要准备炮弹，选好阵地，选好目标。你们现在是这样做的吗？有炮弹吗？有准备对象吗？首先是武装头脑，要练兵。在军事上，练兵就是炮打的怎么准啦，坦克开的怎么好啦，手榴弹扔的怎么运啦。我们现在当然不是拿枪炮打，但我们现在也要有子弹。没有炮弹，没有子弹，还是不行的。自己没有水平，还是不行的，斗不过敌人。我们现在要好好整顿自己队伍。要特别注意子弹炮弹最多的地方，这个那方就是你们揪出的那一二百人。我们最后不是要找到第一号、第二号敌人吗？我说你们揪的那些敌人、坏人，甚至有的可能不是敌人、坏人。而他们掌握的炮弹子弹最多。你们怎样能把他们的子弹、炮弹自动用他们的嘴已打出来，打向敌人，这股力量靠我们去做工作。这样做，你们是不是说我们右倾了，这不是右倾。我们要执行党的政策，对敌斗争要讲政策的，如果你不是执行正确的政策，就是执行错误的政策，错误的政策就是不讲政策，搞武斗、挂牌子、搞喷气式。搞那些东西，那叫什么政策呀？我们要讲政策，对

敌人也要讲政策，给他们出路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争取他们立功赎罪，将功折罪，争取他们立新功，争取他们重新起来革命，这就叫分化瓦解敌人，最后把一小撮敌人孤立起来，把他歼灭了。那么我们同志中间右倾思想还有没有啊？我看还是有的。你不要以为文艺界现在右倾思想没有了，还是有右倾思想的。中央提出，三右主义是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全面胜利时候的最大的危险，在各地区、各部门都存在这个问题，甚至包括我们好多同志的脑子里面。三右一定要反。但是我们也要反对那些形“左”实右的做法。形“左”实右的做法，实际上是给敌人帮忙，破坏党的政策，我们反对形“左”实右的那些现象。我们说的右倾，就是指看不见敌人的危害性，看不见敌人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搞民族分裂主义，要破坏文化大革命，要夺权，要专政，我们的脑子里边敌情观念很弱，这就是不见敌人的右倾。另一种就是害怕群众，压向群众起来革命，不敢发动群众。还有一种右倾，就是不敢真正地向敌人、向多数犯了错误的人做政治思想工作，不敢去交待政策，而搞一套形“左”实右，什么游街，挂牌子，喷气式，逼、供、信，打人等等。这都是违反党的政策的，这都是形“左”实右。实际上都是右倾，这种右倾同样是帮助敌人。我们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出来的东西是不可靠的，将来人家是要翻案的。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事求是，他是什么错误，什么罪恶，什么事实，都要有时间 有地点，有文字，有旁证。不是凭我们脑子想他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就不好了。要发动群众大量揭发，特别是要那些知情人揭发。另一个，你们对一些过去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在这次犯了右倾错误的造反派头头，只要他们承认了错误，就不要他们禁管起来。要让他们起来跟着革命，在这次革命大批判中考验。真正的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一些乌兰夫死党，那些人也还是可以做工作的，还是可以让他们起义的。把一些犯了错误的造反派的头头经过教育、批评，只要他们愿意承认错误，还要团结他们，同他们一起来革命。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这是好人犯错误。坏人做坏事，那是他的阶级本能所决定的，他必然要干坏事。对他们还是要做工作，交待政策。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希望同志们好好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好，好好把自己队伍整理好，发动总攻击。包头不是搞大会战吗？你们文艺战线也可以搞大会战。你们可以派少数人到包钢、二冶去学习学习，看看人家怎么搞的。搞大会战

就是抓住主要敌人，有充分的根据。我想你们文化战线文化水平高，办法就多了。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敌人打倒。把自己队伍组织好。现在没有联合好的单位，如果够条件，那就联合起来。个别单位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我今天不点名，希望你们自觉一点，要赶上去，后来者居上。我相信，是能够用毛泽东思想把文艺这支队伍整理好的！

今天我讲了这么多，供同志们参考。

（来源：《新文化》（内蒙古宣教口《文化战线》新文化编辑部）第三十六期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八年七月六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当前挖肃斗争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全区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为了进一步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防阶级敌人乘机破坏，更深入地开展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斗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特作如下通知：

一、不准随意抓人。凡属必须依法拘留和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犯罪分子，除由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按规定权限执行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私自抓人。

二、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斗争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意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处理刑事犯罪案件中，要把武斗的指挥者和幕后挑动者同受蒙蔽参与武斗的一般群众区别开来，要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流氓犯罪、赌头赌棍同一般犯有偷摸行为、另星私贩行为、一般生活作风、偶而参与赌博的行为区别开来。

三、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领导。当地支左部队和公安机关军管会对群众专政指挥部要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并派人具体指导。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稳、准、狠的打击敌人，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并积极协助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执行专政任务。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领导班子，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密切联系群众。成为执行、捍

卫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模范。因此，参加群众专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政治可靠，作风正派，大公无私。

群众专政机构，只能在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旗(县)以上的城镇建立。两派对立严重的地方暂缓建立，已建立的要进行整顿，待实现革命大联合后，再组织统一的群众专政指挥机构。各基层单位不再设立“群专”分部或小组。公社以下一律不建立群众专政指挥机构。过去建立的，立即撤销。农村牧区应坚决依靠广大贫农(贫牧)下中农(下中牧)，团结中农和农村其他劳动人民群众，把一切暗藏的阶级敌人统统地挖出来，对地、富、反、坏、右就地进行监督管制，劳动改造。

群众专政指挥部一定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不准利用群众专政支一派，压一派，不准一派对另一派专政，不准利用群众专政报私仇，打击好人，包庇坏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四、对于应该实行群众专政的人，除有现行破坏活动，必须依法惩办外，都应交给群众批斗，就地监督改造，一般不要集中看管。

五、关于“群专”，隔离反省的批准权限要从严掌握。今后凡需实行“群专”的对象，应由本单位革命群众讨论，经当地群专指挥部审查，报请所在地的革命委员会批准执行。必须实行隔离反省的干部，应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后执行。过去未经批准而实行隔离反省的，由群专指挥部审查处理。

六、严格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一小撮阶级敌人既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斗，同时也要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分化瓦解。

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教导，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六六”通令，严禁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严禁私自抓人、私设拘留所、私制刑具；严禁武斗和变相武斗；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坚决反对逼、供、信。在批斗审讯犯人要允许本人申辩。

对于违犯“六六”通令的肇事者和背后操纵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公安机关军管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及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有权追究，查明情况，根据情节轻重，依法惩处。

七、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

动群众去处理。”的教导，严禁两派群众组织互相揪人、抓人及查、抄。如果发现对方组织里有坏人，要将材料交给对方组织，要相信那个组织的广大革命群众会把坏人揪出来。

八、对儿童犯罪的处理，要坚持正面教育。对幕后操纵、唆使儿童犯罪的坏人，要发动群众进行批斗，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办。家长和教师都有责任把儿童教育成无限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红后代。

九、凡需采用抄家手段获取罪证的，应由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或“群专”指挥部批准，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得查抄。查抄时主要是查抄犯罪证据和政治性的反动物品，证件、枪支、弹药、凶器、毒品和赃款赃物。对生活用品，衣、物不准查抄和毁坏。查抄的物品，必须按照中央有关规定，一律上交银行、财政部门和军事单位。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得挪用，违者从严处理。以往抄查扣留的财物，应立即补报公安机关军管会或“群专”指挥部。

十、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应该成为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有关政策规定的模范，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军管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执行任务。随时警惕阶级敌人乘机破坏，如有发现，定予严厉打击。

以上各条，希望向广大群众认真传达，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八年七月六日

(原载呼和浩特《联合战报》1968年7月19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滕海清在内蒙古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滕海清在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初稿)

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以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感情，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同志们！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是在最近连续发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三条最高指示的指引下，在全国一片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在我区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斗争进入到决战胜的新阶段，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召开的。这几天，大家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并以此为纲，分析了形势，交流了经验，检查了前一段工作，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找到了差距，为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开好这次会议打下了基础。

从自治区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以来，已经整整半年了。半年来，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全区各族革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反右倾，鼓干劲，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主动地不停顿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把这场斗争推进到围剿歼灭、决战次胜的崭新阶段。成绩的取得，首先应该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归功于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区各族革命人民群众。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们的工作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发展大好形势，克服不利因素，乘胜前进，夺取全胜！

现在我代表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常委会把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以来的基本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意见，向全委扩大会议做一汇报，请大会审查。打算讲三个问题，一、关于形势问题，二、关于前一阶段工作的体会，三、关于今后的战斗任务）。

第一部分：对形势的基本估计

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半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形势的发展和全国一样，完全证实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

（一）全区形势一片大好

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自治区革委员会建立以后，遵循林副主席的教导，大抓狠

抓了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开展了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全区各族革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无产阶级感情，更加巩固，更加深厚，更加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城市到乡村、牧区和林区，从厂矿、机关、学校到车间、地头、家庭，到处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是斗私批修的战场。从上到下遍及全区各地的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经使七百多万人参加了学习，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效果之好，远远超过了我们愿来的设想。活学活用“老三篇”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改造主观世界，天天读，天天用，早请示，晚汇报，一日生活毛泽东思想化，正在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第一需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活学活用、狠学狠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大量涌现，自治区、盟市、旗县召开的学代会，特别学门合同志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推动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大传播、大落实，正在荡涤着一切污混浊水，横扫着一切阴暗角落。总之，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推动一切，指导一切，改造一切，正在成为全区各族革命人民的自觉行动，成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前进的火车头。全区各族革命人民正在为把我区迅速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努力奋斗！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广大革命人民群众阶级斗争的觉悟，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英明教导，在江青同志对北京文艺界讲话的鼓舞下，开展了以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为中心的伟大群众运动。

最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斗争，就是共产党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从而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开展了向以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为代表的一切反革命势力主动的、不停顿的、猛烈的进攻。“挖肃”斗争，如急风暴雨，席卷全区。广大革命群众高举革命批判大旗，狠批中国

赫鲁晓夫及其在内蒙古代理人乌兰夫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深挖隐藏的乌兰夫死党分子、叛徒、特务等一切反革命分子。人人是战斗员,个个是批判家,他们克服重重阻力,排除各种干扰,以高屋建瓴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展开了大包围、大扫荡、大歼灭。在这场伟大的“挖肃”斗争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又创建了新的功勋,过去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绝大多数已经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积极勇敢地投入这场斗争,在斗争中改正了错误,立了新功。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在共同的斗争中团结在一起,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阶级敌人英勇冲杀,一小撮阶级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伟大战略思想正在实现。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场伟大的“挖肃”斗争,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一仗。半年多的战斗,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果。革命的大批判,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内蒙古的代理人乌兰夫等一小撮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流毒,正在逐步肃清,他们真国民党,假共产党的丑恶面目,正被广大群众所识破。一大批乌兰夫死党分子、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被“挖肃”斗争的洪流冲刷出来。一大批政治案件被发现和破获。乌兰夫集团一明一暗的两套班底和“新内人党”的反革命罪恶活动被揭发。由乌兰夫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反革命翻案集团被砸烂。披着革命领导干部或革命造反派外衣的,伪装革命而实际反革命的两面派有的已被挖出。这就粉碎性地打击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农村牧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年来经历了一段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伟大斗争,掀起了夺取全面胜利的新高潮。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贫下中农和贫下中牧,人人关心国家大事,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生动活泼的新局面。广大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以本地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为活靶子,上联中国赫鲁晓夫和乌兰夫,下扫地、富、反、坏、右,狠剥了他们的画皮,把他们反革命的丑恶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与革命大批判紧密结合的、与本单位斗批改紧密结合的诉苦、忆苦活

动普遍开展，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农牧民的无产阶级觉悟，激发了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出现了学大寨人，走大寨路的热潮，空前加强了各族人民间的大团结。农村牧区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的深入发展，进一步整顿了阶级队伍，巩固地树立了贫下中农和贫下中牧的优势，使政权切实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特别是牧区，今年一月兴起的划阶级、斗牧主的红色风暴，迅速席卷整个牧区，所到之处，砸烂了乌兰夫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狠地打击了牧区残留的封建和宗教势力，横扫了日本帝国主义、苏蒙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等一切残渣余孽。广大牧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贫下中牧，扬眉吐气，真正翻身作了主人，享受着从来没有过的、象在农村土改后一样的翻身喜悦，更加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千言万语凝结成一句话，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建立了新的伟大功勋。他们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用政治建军的光荣传统去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好传统、好思想、好作风。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他们拣重担子挑，和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在生产斗争中，那里有困难就到那里去，发挥了既是战斗队、又是传宣队、又是工作队的巨大作用。他们坚持贯彻“支左不支派”的原则，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坚决支持革命委员会，拥护革命委员会，尊重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许多单位积极抽调大批力量，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充分地发挥了坚强的柱石作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是我区革命形势大好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各族革命人民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积极开展了“拥军爱民”活动，相信解放军，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支持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大大加强了军民团结，出现了许多军民团结的动人事例。“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阶级敌人妄想挑拨军民之间、军队和革命委员会之间鱼水关系的阴谋，是永远也不会得逞的。

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有力地促进了生产，推动了各项工作。全区工农牧业生产出现了一片兴旺景象。在工业战线上，广大职工，坚决响应毛主席“抓

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以冲天的干劲，战胜各种困难，使工业生产一直稳步上升，工业总值不断增长，一大批工矿企业，月月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在农业战线上，广大贫下中农，劳动热情高涨，以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克服了重重困难，与干旱等灾害做了顽强斗争，基本上保证了春播计划的落实，正为夺取一个好收成而努力奋斗。牧业战线了，广大贫下中牧战胜了去冬今春严重的风雪灾害，夺得了畜牧业生产的好收成。交通运输战线的职工，特别是铁路系统的职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扬了冲天干劲，有力地支援了工农牧业生产和国家建设。财贸工作大为改进，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保证了生产资料 and 人民生活物质的供应。在文教战线上，许多学校的教职员和广大学生，响应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团结战斗，改革教育，做出了新的贡献。不少文教单位的革命和工作，做出了成绩。各级革命委员会抽调几万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基层，宣传和捍卫了毛泽东思想，他们自己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半年来，我区以对敌斗争为中心的伟大群众运动，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的威风，深刻地教育了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极大地提高了他们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大联合，促进了革命三结合，盟市、旗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全部建立，实现了全区一片红。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和加强，革命和生产形势空前大好。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地巩固了伟大祖国的北部边疆。这充分说明，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号通告和五月三日自治区革委会常委会议纪要正确的，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的“挖肃”斗争，方向完全正确，成绩最大最大，我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胜利发展，夺取全面胜利已为期不远了！

（二）阶级敌人的新动向

伟大的“挖肃”斗争，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有些地区和单位，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有些隐藏最深的敌人，还没有统统挖出来，那些已经被挖出来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乌兰夫死党分子等，也还没有彻底地批深批透、斗倒斗臭，他们的政治思想影响，还没有肃清。“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面临末日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还在和我们做拚死的斗争。

当前阶级敌人的新动向，集中的表现是：千方百计地妄想从根本上破坏和否

定伟大的“挖肃”斗争，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翻案，为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一切反革命势力翻案。他们的斗争矛头始终对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准新生革命委员会。他们自以为得计的最恶毒、最拙劣的手法是，百般挑拨关系，阴谋分裂革命队伍。因此，右倾翻案风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夺权反夺权，复辟反复辟、翻案反翻案的斗争，还在继续激烈地进行着。斗争的焦点仍然集中在政权问题上，即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势力则阴谋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由于我们的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改变他们反革命的斗争策略，我们必须充分注意研究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及时识破阶级敌人各种阴谋诡计，战而胜之。

在新的斗争形势下，阶级敌人要弄的反革命新花招，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①阶级敌人从右的和形“左”实右的两个方面，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同我们迂回斗争。他们常常接过革命的口号，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有时以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名，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实。他们接过反对“整群众”的口号，死捂阶级斗争盖子，保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装出比革命还要革命的样子，极力扩大打击面，把矛头引向有一般历史问题的或生活作风上有问题的人，以转移视线，乘机溜掉。他们还会采取揪明保暗的办法，把一些次要的人物推出来，牵制我们的主要力量，“舍车马，保将帅”。他们装出一副革命的面孔，残酷打击了一些知情人，甚至杀人灭口，以保住自己。他们还煽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矛盾，挑拨民族关系，妄图把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引向民族之间斗争的歧途，等等。这是阶级敌人狗急跳墙，进行垂死挣扎的突出表现，是和我们作合法斗争的主要手段。

②施展各种反革命手法，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大搞右倾分裂活动，妄图分裂革命委员会和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面临灭顶之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和煽动某些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派性，施展借刀杀人的毒计。他们捏造领导核心之间的“分歧”，制造革命组织之间“磨擦”，挑拨离间，兴风作浪，抓住小事小非，无限上纲，激化矛盾，造成长期对立，无休止的争论，甚至挑起“内战”，煽动

武斗，把革命群众组织搞臭，以转移视线，在混战中求得生存。他们有的披着革命的外衣，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花言巧语，上窜下跳，左右煽风，挑拨军政之间，军民之间，革命委员会和群众之间，部队和部队之间，群众组织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极力地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而我们有一些糊涂人，人妖颠倒，是非不分，正在上当。

③阶级敌人利用我们队伍中的右倾思想，把一些糊涂人推出来替他们说话。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煽阴风，点鬼火，造谣言，放暗箭，散布流言蜚语，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为了破坏“挖肃”斗争，利用我们某些同志对这场斗争的暂时不理解，恶毒的把这场斗争污蔑为“跟中央唱对台戏”，“打击老造反派”，“支持老保翻天”“复辟资本主义”，等等。而我们队伍中的一些糊涂人，由于右倾思想作怪，也跟着敌人瞎说，一小撮阶级敌人，从他们反革命的需要出发，非常注意社会动向，一有风吹草动，立刻狂呼乱叫，蒙蔽和煽动群众，刮起翻案妖风，例如：当揪出反革命两面派杨、余、傅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就乘机造谣，乱叫，“×××是杨成武线上的”，“搞挖肃斗争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看不到内蒙革委会的右倾是最大的右倾”。当自治区革委会提出了六条具体政策界限，引导群众打击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时，他们又狂叫，“挖肃斗争大方向错了”，“要击面宽了”，“纠偏了”，“刹车了”，等等，等等。

④施放糖衣炮弹，腐蚀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革命意志。他们有的利用小恩小惠，金钱美女，腐蚀瓦解我们的队伍。有的利用某些同志喜欢奉承的弱点，歌功颂德，肉麻吹捧，设下圈套，使其中计，诱惑他们走上犯错误的道路。还有些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利用他们暂时窃取的权力，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任意挥霍国家的财产，滥发奖金，补助，拉拢部分落后群众为其服务。这种种手段，其目的就是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进行反革命的翻案活动。

⑤用破坏生产的办法来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有的散布“搞生产就是反动路线”，“全面停产，就是全面胜利”，极力煽动群众离开生产岗位。他们有的赤膊上阵，制造事故，杀人放火，破坏生产设备，造成停工停产。他们有的诱骗落后群众，投机倒把，退社单干，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脚。有的制造紧张空气，破坏市场供应，利用封建迷信，腐蚀群众，蛊惑人心，以瓦解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我们必须看到：我区地处边疆，阶级斗争有更多的复杂性，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无一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颠覆破坏活动相呼应，相配合。从“挖肃”斗争的现实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帝、修、反为了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已经直接插手。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新的斗争形势下，阶级敌人会不断地改变战术，要出各种新花招，他们既能从“左”的方面，又能从右的方面，既能用隐蔽的手法，也会用公开的手法，既可来硬的，又会要软的，“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如果我们丧失了警惕，他们就会“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人民夺得的政权，就会丧失，我们就要变成革命的罪人。

（三）存在的问题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半年来，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好的，这是我区形势的本质方面。但是，我们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差距是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还没有得到全面的落实。我们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这些问题，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由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夺得了政权以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看不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和长期性，滋长了右倾思想。当前，在我们队伍中的“三右”主义和形“左”实右的思潮，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严重地阻碍着“挖肃”运动的发展。右倾思想严重的同志，斗志衰退，厌倦斗争生活，求安怕乱，看不见阶级敌人，不去研究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不去分析敌情，过低地估计阶级敌人的力量，看不利一小撮阶级敌人仍在和我们作拚死斗争的触目惊心的现实。因此，他们对群众起来革命，挖敌人，看不惯，想不通，荒唐地把革命群众揪坏人与自己联系起来，以为“揪××就是把矛头指向革委会”，“揪××就是想搞我”，等等。特别是革命烈火烧到自己身边的时候，他们就手软起来，不敢下手，总想刹车，以致害怕群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敌我不分，死捂阶级斗争盖子，甚至压制群众起来革命。当领导指出和群众批评他们的右倾错误时，他们就乱搞一气，应付搪塞，甚至用形“左”实右的办法，掩

盖自己的右倾。当揪出一些敌人之后，他们又恐慌不安，怀疑一切，草木皆兵。

“三右”主义，是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夺取全面胜利的大敌，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反动思潮，它在客观上适应了阶级敌人的需要，起到阶级敌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如果不彻底反掉右倾，势必使伟大的“挖肃”斗争半途而废，甚至前功尽弃。

(2) 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主要是不能正确对待犯了错误或反对过自己的群众组织。目前，不少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对待群众组织存在着亲一派，疏一派，甚至支一派，压一派的倾向。有的领导干部，对于犯了错误而一时未能改正的老造反派，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愿亲近他们，团结、帮助、教育他们，而是讨厌他们，完全忘记了毛主席对待犯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应采取“帮助，批评，联合”的教导。还有一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没有很好地触及灵魂，不能经常把自己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做人民的勤务员，还没有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与反对过自己的群众组织感情疏远。还有个别同志，对群众的批评念念不忘，甚至拉一派，打一派，这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报复行为，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忠。

(3) 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认识不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大革命的实质理解肤浅，对革命的大批判的伟大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抓得不紧。在许多单位中，存在着重挖轻肃的现象，许多同志对狠抓革命大批判缺乏自觉性，推一推，动一动，冷一阵，热一阵，甚至坐不下来，对革命大批判不感兴趣，错误地认为，那些走资派是“死老虎”，而放手不管，不批不斗，致使中国赫鲁晓夫、乌兰夫以及他们在各地区、各单位的代理人，还没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他们所散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

(4) 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我们有些同志，看不见广大群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丰功伟绩，夸大自己的作用，以解放者自居，好大喜功，傲慢不逊，唯我独尊，总想指挥一切。有的同志，只看见成绩，看不见差距，沾沾自喜，故步自封，坐井观天，不求进取。还有的同志，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总是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常常偏听偏信，轻率地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这些人既经不起表扬，也受不了批评，既不能正确地

对待自己，又不够正确对待群众。总是喜欢听符合自己口味的話，不喜欢听不同意见的话，更听不进反对自己的话，这种骄傲自满的恶性发展，就是争权、争位、争利，拉山头，搞宗派，破坏团结，造成分裂。“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同志们，我区形势一片大好，成绩是巨大的，主要的，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伟大斗争中，产生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阻力，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注意纠正，就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这些阻力也只是暂时的，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坚信全区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将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阶级斗争，“宜将剩勇追穷寇”，一鼓作气，排除万难，乘风破浪，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第二部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无往而不胜

半年来，在以“挖肃”斗争为中心的伟大群众运动中，我们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阶级斗争，就无往而不胜。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地、突出地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由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这一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我们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开展的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斗争，就是要把以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内蒙古的代理人乌兰夫为代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彻底斗倒、批臭；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挖肃”斗争的过程，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挖肃”斗争的胜利，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因此，我们必须用路线斗争去统帅“挖肃”斗争，在“挖肃”斗争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更自觉地去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体会是：

一、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展开进攻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主席最近

深刻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所在，是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继续前进的灯塔、方向。革命委员会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提到文化大革命实质的高度狠抓阶级斗争？还是与此相反？这是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根本立场、根本态度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真革命假革命的试金石。我们有些同志由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毛主席的教导理解不深，因而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他们认为应当“和平建设”了，他们对“挖肃”斗争不积极、不热情、不主动。他们看不到，被打倒的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无时无刻不在妄图翻案，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盲目地以为“天下太平”了，因而不肯去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问题，丧失了革命警惕性，缺乏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雄心壮志。他们求安怕乱，逍遥起来，不抓“挖肃”斗争，以右倾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挖肃”斗争，有的甚至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构成了“挖肃”斗争胜利发展的主要危险。

半年来阶级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深懂得：要胜利进行“挖肃”斗争，就必须狠反右倾；不断胜利推进“挖肃”斗争的过程，就是不断反掉右倾的过程。我们队伍里的右倾反掉一分，“挖肃”斗争就前进一步。去年十一月中旬，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乘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界讲话的东风，冲破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阻挠，否定了应该转入“正常工作”，搞“和平建设”的错误意见，首先在呼市文艺界兴起了“挖肃”斗争，一举揪出了披着革命领导干部外衣、实则反革命的特务分子特古斯，打了一个前哨战。这一仗打得好，冲击了右倾思想，击破了某些同志“天下太平”，“和平建设”的美梦，使自治区的阶级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同时敌人也进一步暴露了。但是右倾思想还在顽固地抵抗，污蔑革命群众揪出特古斯是“形左实右”，是“黑手揪红人”等等。为了率领广大革命群众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把从文艺界兴起的这场“挖肃”斗争推向各行业，各地区，今年一月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

系统地分析。研究了敌情，狠反了右倾保守思想，批判了我们队伍内部的种种错误论调，否定了那种不敢发动群众的错误观点，明确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口号，选择公开包庇坏人的公检法为重点，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为了有力地配合“挖肃”运动，广泛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我们首先在呼市开展了“群众专政”，同时在牧区提出了划阶级、斗牧主的战斗任务。这样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形成一个伟大的人民战争。这场斗争一开始就揪出了黑司令官苏修特务王再天，打乱了敌人的阵脚，从而掌握了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广大群众在斗争中进一步认识了敌情，阶级斗争觉悟空前提高了，革命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壮大，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严厉批判，三右主义的市场越来越小了。

敌人还在拚死挣扎，在三月底四月初，乘揪出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之机，向我们举行反扑，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妖风，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支持“老保翻天”、“压制老造反派”、“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从根本上否定伟大的“挖肃”斗争。我们队伍内部的右倾并未彻底克服，那些右倾思想严重的同志，不自觉地卷入了阶级敌人煽起的右倾翻案黑风，说了敌人不敢说的话，办了敌人不敢干的事。实践证明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战胜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让右倾机会主义自由泛滥，使我们的“挖肃”斗争背离大方向，让敌人的右倾翻案妖风到处吹。这是对我们年轻的革命委员会和每一个革命同志的一次严峻的考验。你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迎上前去，反对右倾，把运动推向前进，你是半截子革命家，你就停顿下来，半途而废，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你就向敌人投降，使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前功尽弃，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每一个同志的面前。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高举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的最高指示的红旗，用一个月的时间，在革命委员会内部办学习班的形式，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狠反“三右”主义，并因势利导，把“挖肃”斗争推进到打歼灭战的新阶段。这就向全区人民表明了我们坚持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使“挖肃”运动在全区范围内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不少单位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在“挖肃”运动中必须始终抓路线斗争，狠反“三右”主义，才能不断提高自觉性，掌握主动权，永不松劲，节节深入，

步步提高，夺取“挖肃”斗争的彻底胜利。

我们看到，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人犯错误。有鉴于此，半年来我们在革命队伍内部开展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三右主义的时候，始终采取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犯了错误必须改正，改了就好，改了就信任。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同志心悦诚服，才能推动“挖肃”斗争不断胜利前进。

半年来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的反对三右主义的斗争，绝不能关起门来进行。一定要到“挖肃”斗争的实践中去反，到“火线”上去反，边打边反，边反边打。经验证明，路线斗争觉悟只有在斗争实践中才能不断提高，右倾只有通过活生生的斗争实践，才能彻底反掉。也只有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彻底反掉右倾，才能有力地领导“挖肃”斗争，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展开进攻。

二、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狠狠地打击敌人，是对人民群众最大的保护。要狠狠地打击敌人，必须树立彻底的群众观点，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在整个“挖肃”斗争中，我们就是始终坚持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方针的。从而充分地调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掀起了一场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取得了“挖肃”斗争的巨大胜利。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不仅狠狠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而且解决了许多看来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原来很长时间对乌兰夫那套“暗班底”民族分裂叛国集团搞不清，群众起来后把他们挖出来了，原来我们担心挖出来的坏人不好处理，而通过“群专”的办法，处理得很好，真正罚不当罪的极少。有的地方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还把男扮女装隐蔽了几十年的特务坏蛋挖出来。但是，也有的单位没有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放手发动群众这一教导。虽然，他们口头上也喊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实际上他们是象“叶公好龙”一样，当群众起来时，他们就害怕起来，甚至压制群众起来革命，结果，把运动搞得冷

冷清清，收效甚微，在客观上起了保护敌人的作用。应当看到，在挖肃斗争中，相信不相信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愿不愿意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不是方法问题，而是对待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只有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认识这个问题，才能迅速提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挖肃斗争的自觉性。

半年来斗争的实践还证明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挖肃斗争的闯将，他们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克服了重重困难，排除了种种干扰，同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建立了新的功勋，这是我们挖肃斗争中坚定不移的依靠力量。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还必须十分注意去发动那些曾经受蒙蔽，站错队的革命群众起来革命。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大多数是要革命的，只有把他们充分地发动起来，才能实现毛主席关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伟大战略思想。才能真正建立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才能真正打一场人民战争。许多单位的经验证明，对受蒙蔽的群众的思想发动是一个十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们的活思想很多，怕担风险，怕再站错队，怕人家说是“老保翻天”等等，但是一旦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可以起到一些造反派所起不到的作用。受蒙蔽群众发动得越充分，敌人越孤立，挖肃的成绩越大。反之，运动就进展迟缓，甚至停止不前。当我们发明这个问题，公开表态支持受蒙蔽群众起来革命时，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阶级敌人拼命地造谣破坏，说我们是“支持老保翻天”，“为二月逆流翻案”等等，制造混乱。而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也跟着起哄，他们不仅不支持，甚至阻止压制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什么原因？据几个单位的调查，有的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认为“老保”不会革命，人家一动就怀疑是“老保翻天”，不相信大多数站错队的人还是要革命的。有的怕人家起来给自己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自己再不能独断专行了，他们说“老保”这顶帽子是“紧箍咒”，摘掉了就不好办事了。有的是有个人恩怨，怕这些人起来将来再夺了权整自己等等。怕的结果，就充当了“假洋鬼子”的角色，不许人家革命。在这种阻力面前，我们没有动摇。第一，我们及时揭穿了阶级敌人企图用五十天掩盖十七年的卑鄙伎俩。第二，对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并且严肃地指出了敢不敢发动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是有没有彻底的群众观点的问题，也就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不忠的表现。同时，我们也指出了受蒙蔽的群

众起来革命是好的，应当大胆地站起来革命，但不能借机否定自己过去站错队的严重错误，也不能否定革命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在这个问题上，经过一场激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敌人的阴谋破产了，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大家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从而，把挖肃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挖肃”斗争中，还必须正确对待犯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对犯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和犯错误的同志，是采取“帮助、批评、联合”的方针，还是揪住错误不放，否定全盘，甚至想用“肃××流毒”的办法，把他们搞臭、压垮？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一派革命群众，是热诚相待，还是感情格格不入，甚至寻机打击报复？这不仅是能否最广泛地发动群众投入“挖肃”斗争的问题，而且也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包钢、二冶的经验告诉我们，对这些组织和同志，既要严肃地批评他们的错误，又要热情、耐心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斗争中信任他们，并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引导他们积极投入对敌斗争，就一定能够消除隔阂，增强团结，同心协力，共同对敌。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往往又多是知情人，把他们发动起来之后，能够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如果亲一派疏一派，甚至支一派压一派，不仅问题解决不了，而且会犯镇压群众的严重错误，甚至挑起内战，为阶级敌人所利用，扭转运动的大方向。当然，犯错误的老造反派，也必须正确对待自己，属于工作中一般的错误是前进中的错误，改了就行了，属于方向性的错误，甚至一犯再犯，必然给文化大革命带来很大损失，必须痛下决心，悬崖勒马，否则矛盾性质就会转化。当然，这主要是头头的问题，广大群众是没有责任的。

群众专政不仅是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的好形式，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对敌斗争中的具体体现。自从今年一月十七日呼和浩特刮起第一次群众专政的红色风暴以后，各盟、市、旗、县也相继成立群众专政指挥机构，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了一场大扫荡战，把敌人打了个落花流水，显示了群众专政的无穷威力，他们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群众专政能够更好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对敌斗争，可以大大地推动“挖肃”斗争的深入发展，为挖尽乌兰夫黑线，肃清乌兰夫流毒，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它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威风，大大加强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群众无不拍手

称快。由此可见，群众专政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而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深入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的必然结果。可是有些糊涂人不去看“群专”的大方向，而对它前进中出现的这样和那样的缺点、错误谈起来津津有味，评头品足，给“群专”泼冷水。实际上这仍然是一种不相信群众，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表现。“群专”是这场伟大挖肃运动中的一个新生事物，不可能没有一点缺点、错误。只要我们领导上充分注意，这些缺点、错误是不难纠正的。事实上许多地方的“群专”正在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向着更巩固、更完善的方面发展，更加有效地发挥它的巨大威力。因此，凡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同志都应当欢呼：“群专好得很！”

三、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必须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稳、准、狠地打击敌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党的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是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是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服务的。它既然是党的生命，就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缺少。可以说，没有党的政策就没有运动，没有党的政策就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不是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同样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的表现。任何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这场“挖肃”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又是政策性很强的群众运动，如果你只满足大方向正确，不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规定的各项政策，就不但不能取得“挖肃”斗争的彻底胜利，而且还要犯严重的错误，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在“挖肃”斗争中，有人把强调政策说成是纠偏，是刹车，是右倾，会束缚群众手脚，是“策略派”，等等，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强调政策和策略，正是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地调动积极因素，鼓起更大干劲，迈出更大的步伐，夺取更大的胜利。敌人是最害怕我们执行正确的政策的。我们要十分警惕，阶级敌人利用革命队伍中的无政府主义，故意制造混乱，歪曲党的政策，以达到破坏党的政策的罪恶目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

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半年来，我们体会“挖肃”斗争的首要问题，就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才能做到狠狠地打击敌人，坚决地保护人民，才能逐步做到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防止右的和“左”的错误。许多先进单位一条共同的经验：就是善于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对敌狠，对己和，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又要善于引导，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又要注意团结；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特别是对知情人，更要注意政策。这些人很多是犯有严重错误，有些与阶级敌人有牵连，干了不少坏事，是属于“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对于他们应作具体分析，向他们交代政策，启发他们主动站出来检举揭发，欢迎他们起来革命，不能把他们与敌人等同看待，以利挽救干部，彻底孤立和打击敌人。在具体事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时，他们把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与叛徒、特务区别开；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与坚持反动立场的区别开；组织联系与思想联系，工作关系区别开；黑帮黑线的头目骨干与一般成员区别开，个别坏头头与群众组织区别开，主动交代与顽固不化区别开，一般的错误言论与“三反”言行区别开，好人办坏事与坏人干坏事区别开。实践证明，只有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学习、掌握毛主席历来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要做到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保证政策落实兑现，还必须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1)必须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阶级观点。我们政策的出发点，就是狠狠地打击敌人，热情地保护人民。对敌人狠狠地打击，是对群众的最大爱护，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因此，“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鲜明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就不能正确地判断是非。(2)必须彻底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无数生动阶级斗争事实告诉我们，有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就会是非不分，敌我不分。在他们自己的小派别内，右的可怕，把明明的敌人看成是“风雨同舟的

战友”，把明明的坏事看做是“革命行动”，对另外一派，则“左”的出奇，把自己的阶级弟兄看成仇敌，千方百计地想吃掉对方。有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还会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出发，不能正确解放干部，容易造成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钻我们的空子，混水摸鱼。(3)必须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坚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是极少数。”要时刻注意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总之，要正确区分相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老老实实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

大力宣传党的政策，把政策交给群众，政策才能真正落实。“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事实证明，群众掌握了党的政策，就能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就能更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去战胜敌人，群众的积极性就更能持久。斗争水平就能提得更高，斗争方向就更明确，积极大胆地宣传党的政策，把政策交给群众，是相信依靠群众，坚信毛泽东思想巨大威力，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表现。如果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宣传党的政策，或者不敢把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离开党的政策轨道盲目行动，势必使运动遭受损失，挫伤群众的积极性，那就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大不忠。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政策和策略水平打了较快的提高，这是取得“挖肃”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只要我们继续运用党的政策武装群众，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群众的政策水平，就一定能够取得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

四、必须有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指挥部，才能更坚强地率领革命大军，夺取这场挖肃斗争的彻底胜利

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中心抓什么？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继续深入的条件下，每一个革命委员会都必须回答的问题。

毛主席英明地提出：“革命委员会好”。我们理解，好的核心就是革命二字。半年来，许多“挖肃”斗争取得显著成绩的先进地区和单位，大量的生动事实证明，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定地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道路。继续发扬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狠抓阶级斗争，

自觉地组织并率领革命大军主动地、不停顿地向以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为代表的一切反动势力发起猛烈进攻。能不能主动亮明旗帜，有没有这种高度自觉，敢不敢狠抓对敌斗争，这是衡量一个革命委员会是否真正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根本标志。挖肃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当广大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群众掌握了政权以后，对敌斗争的群众运动，就有可能也必须是自上而下，上下结合，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作战指挥部，想从总体上打歼灭仗，取得对敌斗争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坚强的作战指挥部呢？

首先，这一个指挥部应是由一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革命干劲的骨干来组成的。这个领导班子具有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对敌斗争中，干劲足，斗志坚，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锐气，它只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那里的指挥部是这样，那里的“挖肃”斗争就搞得热气腾腾，群众斗志昂扬，敌人惶恐万状，取得的战果就大。包钢、二冶等先进单位就是这样的单位。还有一些地区和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在挖肃斗争中表现软弱无力，嗅觉迟钝，眼睛里硬是看不到敌情，甚至当上级领导和革命群众已经把火点起来了，他们还不知道敌人在那里。特别是有些同志，主要是革命领导干部腰杆不硬，精神状态不好，根本不象一个指挥员。这种人“怕”字当头，顾虑重重。怕犯错误，怕得罪人，怕有反复，怕火烧到自己。一句话，怕丢官，怕死。因此，他们只能在这场伟大的“挖肃”斗争中“左”右摇摆，当“和事佬”，“和稀泥”。这种人怕这怕那，就是不怕阶级敌人挖不出来，不倒，不臭，一有机会就要复辟资本主义。这种人如果不立即振作精神，勇敢地投入战斗，将要犯不可饶恕的错误。发展下去，早晚要垮台。在这场“挖肃”斗争中，站在第一线指挥战斗的同志们，他们勤勤恳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干革命就会有风险，就一定会碰到许多困难，也不可避免地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犯错误有什么要紧，错了就改，改了就行了。如果有人抓住他们在“挖肃”斗争中的某些错误不放，无限上纲，那是绝不允许的。

其次，要多谋善断，密切联系群众，一个坚强的战斗指挥部，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善于斗争，就是要加强调查研究，经常分析敌情，做到对敌情“心中有数”。“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

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只有做到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在对敌斗争中，才能做到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指挥员要做到情况明，就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亲自到第一线去指挥。只有和群众战斗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向群众学习，才会丰富领导，才能得到真知灼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经验证明，只有敢于领导，深入群众，才能及时掌握运动的新动向，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才能从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抓住重点，选准突破口，狠狠打击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争取斗争的主动权，

第三、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一个坚强的作战指挥部，首先必须是一个“拳头”，就是说、是一个有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团结一致的领导班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切实实行一元化的领导。

什么叫一元化？从政治上说，一元化就是要化在毛泽东思想上。“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不管来自那个方面，都应当是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代表，都应当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办事，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办事。决不能只代表某个小山头，而不代表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只团结少数人，而置绝大多数群众于不顾。”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大家的思想，统一大家的行动，才能最巩固地团结自己，最有力地打击敌人。最近，毛主席又深刻地教导我们：“如果各人按个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个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象个样子了。”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一切行动的准则，大力加强组织纪律性，这对每一个指挥部的成员，每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在挖肃斗争的决战决胜、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具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组织上说，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强调集体领导。事实证明，那个指挥部集体领导作用发挥得好，那里对挖肃斗争的领导就有力，反之，互相掣肘，口径不一，常常被敌人钻了空子，不是抓不住主要敌人，就是对敌人打得不狠。还有一些革命委员会象一个“股份公司”，象“联络站”。有的同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很大，合我口味就听，不合口味就吵，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则以“解放者”自居，尾巴翘上了天，什么都得听他的，总想牵着别人鼻子走。这种现象必须坚决反对，迅速纠正。否则，这些自以为得意的人，

很快就可能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

总之，在革命委员会内部必须加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经常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在斗争中学、斗争中用，不断总结经验，加深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解，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政策、策略水平，才能有力地率领无产阶级革命大军同阶级敌人英勇斗争才能充分发挥指挥部的职能，适应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第三部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乘胜前进，夺取全面胜利

现在，我区正处在革命高潮中，正在与阶级敌人进行大决战，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全面胜利已经不远了！

我们一定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教导，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指针，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发扬无产阶级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精神，反右倾、鼓干劲，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发展大好形势，进一步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革命大批判，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坚决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切实保证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全面落实，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为了实现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确定的一九六八年的伟大战略目标，我们下半年的主要战斗任务是：

第一，继续大抓狠抓毛泽东思想教育，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把大抓狠抓毛泽东思想教育，放在高于一切，先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抓住不放，一抓到底，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带头学习，认真组织广大群众和干部学习和贯彻最近发表的毛主席“三条”最高指示，要继续大办、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使全区各族革命人民，迅速地、直接地掌握毛主席的光辉思想，使学习、宣传、贯彻、捍卫毛泽东思想，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中的第一要素，把运用毛泽东思想去“斗私，批修”变为自觉的行动。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应当象宁城、杭后那样，紧跟毛主席，每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宣传贯彻，

迅速做到家喻户晓，并不断用以检查思想和工作，经常看到差距，鞭策自己，不断前进。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活动，开展学习门合活动继续推广一日生活毛泽东思想化，强调提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强调带看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坚持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反对那种学用脱节，甚至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学习毛泽东思想。当前应当特别强调狠抓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使全区各族人民，明确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突出地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不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就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就完不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就会迷失方向，甚至会站到革命的反面，成为革命的绊脚石。

第二，继续深入地、持久地狠抓革命大批判，坚决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狠抓阶级斗争，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以中国赫鲁晓夫和乌兰夫为代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要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推荐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对敌斗争经验。要大力推广包钢、二冶和杭锦后旗五四大队大办学习班，狠抓大批判，抓住主要敌人打歼灭战的先进经验。要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彻底革命精神，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把那些隐藏最深的乌兰夫死党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全部、彻底地挖出来，并把挖与肃结合起来，把他们彻底地批倒批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当前，对敌斗争已经进入到决战决胜的新阶段，这是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一仗，只能打胜，一定能够打胜，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绝不动摇，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为了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夺取对敌斗争的全胜，我们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狠反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最狡猾的敌人。

在对敌斗争中，要坚定地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

级革命派。要进一步发动、帮助、支持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要充分注意组织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上战场，通过斗争考验他们，让他们在斗争中改正错误。同时要注意争取那些犯有错误或有一般历史问题，但还不是敌人的人们，使他们在对敌斗争中经受考验，立功补过。

要继续认真地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伟大指示，认真总结前一段群众专政经验，进一步整顿、充实和加强旗县以上城镇群众专政机构，不断提高群众专政的水平，充分发挥群众专政在对敌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各单位各行业都要把以敌斗争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地结合起来。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各学校，必须坚持复课闹革命，砸烂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大搞教育革命，做出显著成绩，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毕业生应积极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文艺界以江青同志为榜样，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及乌兰夫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打倒反党叛国文学，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创作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社会主义新文艺，演出样板戏，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

第三，把农村、牧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农村、牧区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要坚定不移地依靠贫下中农和贫下中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贫下中农和贫下中牧手中，树立贫下中农和贫下中牧的优势。农村、牧区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正面教育，大办、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内蒙古代理人乌兰夫所宣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以及“特殊论”、“三不两利”、“稳、长、宽”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得臭臭的。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要抓好整顿、恢复贫协和民兵组织的工作。公社以下（包括公社）不建立群众专政机构，不开展“挖肃”运动，但必须依靠贫下中农和贫下中牧，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各级革命委员会，特别是旗县一级革命委员会，狠抓基层，巩固集体经济，开展学大寨活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牧区划阶级，要在今年年底以前全部搞完，还没有开展的地区，要迅速地迎头赶上。已经开展的地区，要认真地进行复查。彻底砸烂乌兰夫在牧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路线。

第四，在狠抓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中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伟大的整党运动。我区正在进行的“挖肃”斗争为整建党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一定要把“挖肃”斗争同整建党工作紧密的结合起来。使整建党的工作逐步铺开，力争年底前整顿完毕。整建党工作，要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召开的整建党工作座谈会纪要精神办事。要办好有党员和革命群众参加的整党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和乌兰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旗县以上各级革命委员会，要迅速把党的核心小组建立起来。各基层单位，要建立党的临时总支、支部，逐步恢复正常活动。在整建党的同时，也要积极抓一下共青团、红卫兵等革命群众组织的整顿工作。

第五，热烈持久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反复深入地贯彻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团结。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把这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扎扎实实地抓紧抓好。要大力宣扬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丰功伟绩。要帮助解放军克服在执行战略任务或其它各项任务中所遇到的困难。要高度警惕，及时揭露、严厉打击挑拨军民关系、破坏军民团结的阶级敌人。广大革命群众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解放军，拥护和热爱解放军，支持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拥政爱民”工作上，创建了伟大功勋，今后一定会进一步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向群众学习，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坚决保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一定要认真地学习解放军，把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三个忠于”，“四个无限”，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好传统、好思想、好作风学到手，走解放军政治建军的道路，努力搞好思想革命化。

第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夺取全面胜利的战略任务。各级领导都要政治挂帅，从促进人的思想

革命化入手，抓好生产工作，使下半年我区工农牧业生产出现一个大发展的新局面。工业生产一定要达到并力争超过一九六六年的水平。包钢、一机、二机等大企业，要起带头作用。煤炭生产一定要抓上去。农业生产要挖掘各种潜力，做好抗旱防涝工作，争取一个好收成，并制定可行规划，采取有效措施，力争在几年内，解决东粮西调的问题。牧业生产，要防灾保畜，力争完成今年畜牧业生产计划。交通、财贸等各个部门，都要为今年下半年生产大发展作出贡献。

各级革命委员会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要求出发，从巩固祖国北部边疆出发，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宣传贯彻勤俭节约，爱护国家财产，反对各种错误倾向，加强劳动纪律，批判、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歪风，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把生产及其他各项工作抓紧抓好。

第七，进一步加强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化建设。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根本方向，迅速建设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班子。这个班子，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狠抓阶级斗争的，率领广大群众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革命的战斗指挥部。及时地、准确地、全面地把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任务和方针政策，落实到群众中去，变为群众自觉的革命行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人员，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经常最广泛的血肉联系，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虚心地向群众学习，主动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遇事和群众商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时刻替人民着想，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实行一元化的领导。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工作人员，不管来自那个方面，都应当是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代表，绝不是哪个小山头的代表，“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都必须按照毛泽东思

想办事，为人民负责。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切实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要反对一言堂，又要反对各自为政，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既要有自由，又要有纪律。“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以后，……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反对自由主义，增强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巩固集体领导，同心协力地做好各项工作。

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认真学习灵宝县的经验，切实搞好组织革命化，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从组织上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各级革命委员会还要加强作风建设，不断改进工作方法。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人人有坚强的政治责任心，充满革命干劲，勇于负责、敢于斗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反对那种松松垮垮，稀稀拉拉，遇事推诿，互相掣肘等官僚作风。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地指导。”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把一般号召同具体指导结合起来的领导方法，认真地发现和培养典型，总结典型经验，通过典型去指导全盘。上半年，我们推广了杭后、宁城、呼市机床厂、呼市五中的经验，现在又推广了包钢，二冶等单位的先进经验，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还不够，还应当继续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应当普遍地运用这个方法。

同志们，我们已经走过的战斗路程，是光荣的，艰巨的，我们将要走的路程，是更光荣、更艰巨的。在我们前进的征途中，会遇到重重困难；但是，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前进，我们就一定能斩荆披棘，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阶级敌人。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乘胜前进，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英勇奋斗！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狠抓阶级斗争，坚决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新文化》（内蒙古宣教口《文化战线》新文化编辑部）第四十一期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四日，滕海清在内蒙古革委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滕海清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七月十四日晚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前段会议开得不错，为了把这次会议开好，昨天晚上核心小组同志们研究了一下，有些问题再重复说明一下，使讨论更好点。

这次会议的目的，吴涛同志已讲得很清楚了，上次讲了一条是以毛主席的三条最新指示为纲，找差距，开展自我批评。会议上先进经验的介绍给开好会议增加了很好的内容。

前天我的讲话大部分问题都讲了，下半年的中心任务也讲了。下半年的中心任务是：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指针，主要反右（特别是是右倾分裂主义），同时也防“左”，更充分的发动群众，狠抓革命大批判，集中兵力，对一小撮最主要最危险的阶级敌人打歼灭战，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

围绕下半年的中心任务，再重点讲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全区“挖肃”斗争形势的分析

上次讲话关于形势部分讲得很多了，各方面的成绩都讲了。挖肃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揪出了这么多的特务、叛徒、乌兰夫死党分子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不能否定它的成绩。但还应从政治上看，如果光从揪出这样的人来看，还不能说明问题，从政治上看，我们彻底把刘少奇及其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叛国集团的社会基础摧垮了。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现在看来，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两头小中间大。

一种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单位，就是挖肃斗争、大批判、斗批改搞得比较好。比如包钢、二冶，挖和肃这方面从我们全区来说是先进的单位了，挖的方面，公

安厅搞得比较好，是不是挖得一个没有了，很难讲，挖得比较彻底一点，还有其他很多单位，像机床厂等。类似这样的先进单位从整个内蒙来说还是少数的。以包钢、二冶、内蒙公安厅这些单位为代表的一部分好的单位，挖得好，肃得好的共同特点是：抓得准，挖得深，批得好，群众充分的发动起来了，特别是把受蒙蔽站错队的群众、犯错误的造反派和走资派相联系的知情人，都发动起来了。这就充分的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入这场挖肃斗争，形成了真正的一场人民战争。

第二种，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了，阶级斗争盖子基本揭开了，打了一场扫荡战，多数单位挖出了一些主要的敌人，危险的敌人，但还没有把他们揭深揭透，批倒批臭，有一些单位虽然把表面敌人挖了不少，但对隐蔽得最深、最巧妙的危险敌人还没有挖出来。有些敌人钻到我们革命队伍里面，钻到革命委员会机关里面，这些敌人有的是特务、叛徒、乌兰夫死党分子，有一些也可能不是特务、叛徒、乌兰夫死党分子，但他是杨成武式的反革命两面派。这样的人可能为数不多，有些职位也不高，但能量很大。他们可能过去和乌兰夫在组织上没有什么联系，工作上也看不出什么问题，像杨成武似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张大字报也没有，但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方面蒙蔽群众，另一方面领导对他看不清楚。所以，这样一部分人是最危险的敌人。我们队伍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

这是第二种情况，这些单位群众也基本上发动起来了，你说没有揭开盖子？揭开了，你说没有把敌人揪出来？也揪出一批敌人，但是不像包钢、二冶，或者公安厅、机床厂搞的那样深，就是不深不透。这样的单位占大多数，集中表现是盟市、旗县的党政机关、公检法、文艺界。当然旗县机关也有一些搞得比较好的，整个说来旗县机关大部分搞得还是不深不透。盟市也存在这个问题，有的搞得比较好一些，像包头可能搞得比较好一些，还有个别的盟也可能搞得比较好，但大部分盟市机关，特别是党政机关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完全彻底揭开，处于中间状态，你说没有作出成绩？也有成绩，但是不深不透。现在看，有的公检法搞得比较好一些，如锡盟公检法，但有些地方公检法搞得不好，一直到现在成绩不大。整个内蒙，从旗县开始，我还没有发现有一个公检法是真正革命的，也可能是我官僚主义不知道，根据揭发的情况看，公检法的机关就是一个黑窝。

第三种情况，少数单位挖肃斗争局面没有打开，阶级斗争盖子基本上没有揭

开。有些革命委员会成立晚的单位，两派对立比较厉害的单位，一些偏僻地方盟市领导上抓得不够的单位，那些单位的领导很不得力，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他们有些口号喊得很响亮，但实际作得很差，并没有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也没有真正把盖子揭开。这样的估计是不是符合实际，同志们讨论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

为什么今天要专门说一下这个问题？这是要说明我们的挖肃斗争任务还很重，阶级斗争要狠抓、大抓、特抓。特别是多数处于中间状态和少数处于落后状态的单位，要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指针，狠反“三右”主义，集中兵力对一小撮最主要的敌人打歼灭战。如果仅仅看到我们揪出了这样多的人，政治、思想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满足现状，看不到全内蒙处于什么样一个状况，这样我们脑子就可能不清醒，就可能让成绩把脑子占得满满的，而骄傲自满起来。前天讲了防止骄傲自满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成绩，肯定我们成绩很大，但必须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些问题，既要肯定主流，又不能忽视支流问题。

两头小、中间大，也是符合运动发展规律的，发展不平衡也是合乎规律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和第二次全委会比较起来，这一点完全不一样。两头小中间大具体表现是什么？就是多数盟市、旗县机关、公检法、文艺团体，也还包括学校等，还处于中间状态。现在看，大工厂一般的比学校、比机关是好一些，但也不完全一样，有些厂矿也很糟糕。学校有一部分是好的，但是大部分挖肃斗争不深入，因为他们资产阶级派性太大。党政机关里面也存在这个问题，有的抓得紧一点就好一些，抓的不紧就差一些，整个说来与第二次全委会比较，完全不同了，这是我们找到的差距。有没有好的？包头有一个一中、五中，还有一个地方一个区的学校全部复课了，呼市的五中，呼市的大学，中医学院、工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还是比较稳定的。党政机关也有好的，比如宁城，我看挖肃斗争比较好。当然，像宁城这样的单位，不只一个，牧区的旗县也有的搞得更好一些。但是从整个说，比例还是小的，中间状态的比较多，最差最差的也是少数。只有作了这样的分析，才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先进的单位要更加先进，中间的单位要赶先进，落后的单位要作更大的努力，把群众发动起来，争取赶上去。

二、必须大力推广包钢、二冶的先进经验

前天报告讲到了这个问题，还要反复的强调一下。虽然内蒙革命委员会已经

作了决定，到包钢、二冶参观的人也很多，这次包钢、二冶典型经验介绍，大家都很满意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推广包钢、二冶的先进经验。他们的经验，就是狠抓革命的大批判，集中兵力对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打歼灭战。包钢、二冶的经验集中起来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一次全委会以后在农村推广了杭后、宁城的经验，这对我们农村文化大革命，也包括我们全区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要把一个政治大革命、两个继续的最新指示继续落实下去，包钢、二冶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的经验不仅仅是在工矿企业可以用，机关、学校都可以用，大会战的形式不同，但他们这样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

第一，首先讲一讲推广包钢、二冶经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前一段，从全区来说，打了一个很大的扫荡战，取得很大成绩，挖出一大批特务、叛徒，以及中国赫鲁晓夫在内蒙各个地区的代理人，从组织上摧毁了他的反动社会基础，但是，要想让我们的运动向纵深发展，不仅从组织上把它摧毁，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把他们批倒批臭。这在我们全区说来是很不够的。大家想一想，我们各个盟市，各个旗县揪出的走资派已经两年了，是不是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把那些敌人揭深揭透，批倒批臭了呢？没有，因此，我们要继续打歼灭战，把敌人彻底批倒批臭。中间状态的这些单位，处于停滞、甚至顶牛状态不知怎么搞了，一揪二游三不管，把敌人挖出来以后大概以为运动完了，不是继续向前发展，而是一种停滞的状态。包钢、二冶给我们提供了经验，敌人揪出来以后，要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倒批臭，使我们的政治大革命继续向纵深发展。包钢、二冶是三月份才开始搞挖肃斗争，我们有的单位从去年就开始了，呼市有些单位今年二月就开始了，但是没有像他们搞得那样深，那样透。我们呼市有没有先进经验？有的，就是抓了一下丢掉了，没有下力量一直抓到底，没有找到政治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的门路。

第二，包钢、二冶的主要经验是，充分的发动群众，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他们这样作的结果，进一步解决了如何继续深入革命的问题，解决了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把毛主席关于一个政治大革命，两个继续的指示具体的落实了。

第三，现在各地都在学习包钢、二冶的经验，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没有一定的条件，想打包钢这样的大会战我看有些困难。包钢、二冶大会战是在较好

的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的：

①大办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为中心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和其他地方办学习班有所不同，其他地方是搞大联合三结合，以后也是按毛主席的指示“斗私，批修”，斗私是斗了，批修也批了，但是没有和本单位情况，没有和一个政治大革命，两个继续结合起来，提高大家阶级斗争觉悟、路线斗争觉悟夺取思想阵地。

②他们有详细的调查研究，对敌情搞得比较清楚，心中有数。他们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所以对敌人打得谁，打得狠。三月份我在包头找各大厂军管会同志汇报，那时包头革命委员会没有成立，各大厂革命委员会大多没有成立，那时他们领导上还有点右倾思想，斗争还没有开展，但是他们已作了大量的工作，对什么是敌人，什么是好人摸得比较清，包钢二百多局以上干部，真正有问题的八十多，问题最大的三十多，三十多人里还有区别。这个条件我看中间状态的很多单位是不具备的，把几个走资派搞出来了，和走资派关系密切的坏人搞出来了没有？有的搞出来，有的没有搞出来，大部分没有搞出来。包钢、二冶在这方面就作了调查研究，这样就心中有数，有数，就抓得准，打得狠。为什么公安厅搞得时间不长，也抓得准，打得狠？他们也是作了调查研究。当然调查研究主要还是靠群众。有很多单位，到底敌人在什么地方，谁是敌人，脑子里还糊里糊涂，这样一个状况歼灭战、大会战怎么打下去？没有这个条件，你办学习班，没有把真正敌人抓出来，你那里好人、坏人分不清，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如把坏人的问题揭发出来，有了对立面，就能很快提高大家路线斗争觉悟阶级斗争觉悟，而不是在那里放空炮。对敌人抓得狠，这不是一日之功，是经过长期调查研究的。一机、二机厂军管会同志是吃了苦头的，挨围攻，什么都经受过，这样他们倒心中有数了，分清了什么是好人、坏人，作了调查研究，但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敢发动群众去搞，当然，也不能怪他们，上边没叫他们去搞嘛，为什么一动员后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人抓出来呢？抓得很准，就是事前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不管大小单位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中间状态的单位要注意这一条。落后的单位，盖子没有揭开，什么都没搞，你打歼灭战搞什么？没有挖就没有肃嘛，要注意创造条件。

③对广大群众作了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用解放军的那一套办法，

各方面的工作都作到了，不仅对造反派、受蒙蔽站错队的人，犯错误的干部做了工作，连家属、小孩的工作都作到了。这样充分的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敢把受蒙蔽站错队的同志发动起来，特别是把犯错误造反派发动起来，把他们团结过来。

对犯错误的造反派的处理，二冶对井冈山的处理在全内蒙来说是处理最好的，如对井冈山那一派处理得不好，二冶大批判也搞不下去。他们对那个井冈山就是只抓了二个坏头头，连第二把手‘过去最坏的，也把他争取过来了，完全不是采取压的办法，是采取爱护、帮助的办法。二冶的革命委员会对二冶的井冈山作了大量的工作，大联委这一派很听毛主席的话，一作工作，姿态很高。领导干部姿态也很高，井冈山原本就是打林光的，打得很厉害，但是林光同志姿态很高，井冈山打他，他反而去帮助和保护他们，这样，使犯错误的造反派很受感动。军管的同志对大联委作了很多工作，对犯错误的一派作了很多工作。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从全内蒙说，现在还存在着这个问题，对犯错误的造反派，很多地方还处理得不好。他们敢发动受蒙蔽站错队的人，而且真正按毛主席教导的批评、帮助、联合的办法、去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他们现在不是两派对立，就是一派，没有隔阂，井冈山第二把手过去打林光打得最厉害，林光作了检查以后，自己主动跑到林光家给他剃头，建立了革命的感情，过去打错了，上了当。所以，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领导干部高姿态，对犯错误的人采取爱护的办法，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如果两派对立，大会战搞不起来，你要打，他要保，只有两派真正团结起来才能一致对敌。

④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不是创造了八个区别对待吗？这八个区别对待大家都知道了，这八个区别对待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很不容易，不经过详细研究党的方针政策，真正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这八个区别对待是搞不出来的，没有这八个区别，有些人就可能被推到敌人那边去了，可以拉过来的就推到敌人那边去了，真正的敌人又没有推过去，搞得敌我矛盾混淆不清，他们对这个问题是下了功夫的。

⑤建设一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冲杀、敢干、敢于负责、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指挥部，具体说来，就是敢于革命，善于革命，这样一个坚强的指挥部。你没有这样一个领导班子是不行的，这个阶级斗争、挖肃斗争向纵深发展的

时候，就是从上到下的领导，由下而上的结合，没有这样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来指挥它，就不可能搞得这样好。

我想，学习包钢、二冶的经验时，这几方面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大会战就不会搞得那样彻底。这并不是说包头能办到，其他地方就办不到，因为过去我们没有这个经验，现在人家给我们提出来了这个经验，我们应当办得到，也能够办得到，我们相信有些单位会超过包钢、二冶。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些问题，仓促上阵，打无准备的仗，这个不行。包钢、二冶是打了个有准备的仗，有思想准备，对敌情比较清楚，思想工作做到了家，政策研究得很细，指挥很有力，这样才打了一个有准备的仗，若仓促上马，打了个无准备的仗，不具备这个条件，这个仗很可能打成一个击溃仗，不可能是歼灭战。

第四，包钢、二冶经过这个大会战、歼灭战，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我看主要是：

(1)真正把敌人彻底地批倒、批臭、批透了，最大的走资派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拥护他，保护他，这就彻底地把他搞臭了，这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乌兰夫到现在还不臭？还有人保他呢？有些走资派到现在还起作用，还不臭，就是因为没有经过这个功夫，没有把他的罪恶完全揭露出来。还讲一点，他们作知情人的工作是比较成功的，知情人的工作若做不好，也是放空炮，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能把要打倒的敌人彻底打倒，把敌人搞臭，让它永世不能翻身了。

(2)在斗争中间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3)通过大会战，把要解放的干部解放出来了。全内蒙来说，我们解放干部的工作做得很不好。二冶大概解放了百分之九十几，要解放的干部都解放出来，他们有这个魄力，该解放的，就坚决把他们解放出来。当然，这是在斗争中得到解放的，干部犯了错误，上第一线作战，对敌人作战，既检讨自己，又揭发敌人，和敌人作战就表现勇敢，得到群众的谅解，领导讲话，把他解放出来。

(4)以革命带动了生产。包钢现在要全部上马，原本是燃料供应不上，不是人力的问题，二冶从二、三月后生产不是增加百分之几十的问题，而是加一翻，加几翻的问题，革命带动了生产。这次推广包钢、二冶的经验，大家学习经验很积极、很好。现在有的单位条件不够，没有关系，我们创造条件，包钢、二冶能办到，其他地方也能办到，我们要作很好的准备，不打无准备的仗，一定要在思

想上等各个方面准备得很好，一打就响。

三、全区目前“三右”主义仍然是运动的最主要的危险

比较普遍的是右倾分裂主义。右倾分裂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组织上的分裂、政治上的投降。右倾表现主要是看不见敌人，害怕群众。但目前，突出的是右倾分裂主义。当前阶级敌人采取的手法是什么呢？是千方百计的分裂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有些搞右倾分裂的同志，正适应了阶级敌人的需要，被敌人所利用。当然，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阶级敌人是分裂不了的，不管他有多少王关戚、杨成武等等这些反革命两面派，他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敌人并没有放弃他们企图分裂和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罪恶阴谋的。第二，是分裂人民解放军那是办不到的。因此阶级敌人把主要目标对准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因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它是新生的，年青的经验不多，不完备，存在很多缺点，所以敌人把它当作最主要的突破口。现在我们的挖肃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从组织上说，阶级敌人是越来越少了，不是越来越多了。但是阶级敌人越接近死亡，越要拚死地同我们作斗争。因此这场斗争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更加尖锐了。现在阶级敌人不象过去那样，明火执杖赤膊上阵，搞那一套都失败了，而是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就是杨余傅这样的人，采取这样的手法，矛头主要的还是对准革命委员会。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仍然是当前斗争的焦点。敌人失掉了原来的“天堂”，但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要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破坏、分裂我们的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起码保存他们的反革命的残渣余孽。这就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新动向。

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三右”主义，最突出的倾向就是右倾分裂主义。因为我们有的同志思想右倾，有资产阶级派性，有些单位领导思想不统一，精神状态不好等等原因，在有的革命委员会里面实际上“是两套马车”、“两套班子”。本来就有这个裂缝，敌人用不着制造什么条件。现在看，我们大部分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团结的。如包头比较团结，所以他们的工作搞得好。我们内蒙革命委员会也是团结的，敌人想在我们里面搞什么名堂，那是妄想。但有些革命委员会就不是这样，主任一套班子，副主任一套班子，常委一套班子，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本身就有分裂主义的表现，用不着敌人在那里制造条件就可以钻进来，我们已经有缺口，敞开大门让他进来，那他还不进哪！我们要接受有些地区的经

验教训，要加强团结，在革委会内部开展两条路线斗争，要引起盟、市旗县革命委员会同志和其他革命委员会同志注意这个问题。如果由于我们的意见不统一，有资产阶级派性，或者私心过重等原因，造成革命委员会内部的分裂，让敌人钻了空子，实际上我们有的同志成了右倾分裂主义者。那不是个人犯错误的问题，而且是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成了革命的罪人。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一点不警惕，正在上当。我们说有的人正在上当，这句话恐怕很多同志还不大理解，他们说上什么当呀？！实际上你在那里搞几套班子，适应了敌人的需要，还不是上当！你团结得很紧，敌人就不可能钻进来，你大门开着，人家还不进来！这是很危险的。为什么不能团结对敌，为什么革委会主任对这派亲，副主任对那派亲？为什么常委对这派好，对那派不好？凡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现在搞两派的，实际上就是分裂主义。到底是什么人在那里搞，那是另外的问题。本来革命委员会应该是一元化领导的，为什么两派对立得那样厉害，为什么有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那样狭隘，那样不顾大局，不照顾团结，个人私心那样重？实际上有的人就是搞分裂嘛！不管你有意无意，主观上怎么样，实际上这就是搞分裂。还有的地方群众组织，两派对立。为什么对立？原因很多，归根一条，就是有人搞分裂。既然都是造反派，为什么不能团结对敌？为什么不能开诚布公，把问题摆出来，把问题讲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搞一套？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有人拉山头、搞宗派、搞分裂是什么！这是搞革命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两派都是国民党不可能斗，两派都是共产党不应当斗。是不是一派是国民党，一派是共产党？如果说是，就是有的头头是坏人，或者阶级敌人在幕后指挥，广大群众肯定不是，也不可能是国民党。搞分裂的就是个别坏头头。有的人现在可能不是国民党，可是他做的是国民党的事情，是蒋介石的代言人。不然你搞什么？！为什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不能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就不是无产阶级党性，就应当打倒，国民党要打倒，一切剥削阶级那些东西要打倒。分裂主义要不要打倒？要打倒。不要看他过去是老造反派，随着革命的变化，他不前进，就要被时代淘汰的。我们有些同志对当前存在这些情况，失掉了高度警惕，

发展下去，必然适应敌人的需要，造成革命委员会的分裂，造成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分裂。我们要提高警惕，如果不提高警惕就上了敌人的当。敌人不敢干的，你干了；敌人不敢说的，你说了；敌人办不到的，你办到了。蒋介石要谢天谢地，刘少奇、乌兰夫要谢天谢地，真正给敌人作了好事。要引起高度警惕，狠反“三右”，防止敌人钻空子，不要上当。我说有些同志正在上当，就是指这个问题。

我们反对右倾分裂主义，但我们主张同右倾机会主义分裂。在那些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或揭得很不彻底的单位，有的人在那里捂盖子，这些单位应当乱一下，乱敌人。因此，有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控制下冲杀出来，那是必要的，是革命的，绝不是什么分裂主义。我们必须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来检查三右主义。主要是右倾分裂主义。当然，右倾机会主义要反，右倾投降主义同样要反。右倾机会主义发展到一定时候就是右倾分裂主义。发展到向敌人投降。就是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就是向阶级敌人、走资派、叛徒、特务投降的，危险性是很大的。所以中央再三强调反“三右”，批判“三右”。现在我们批判“三右”，是因为我们的同志中存在这些问题；但不是敌人，是犯了错误认识不到，给敌人以方便条件，适应了敌人新策略的需要。当然，我并不是说犯错误的同志就是敌人，就是国民党，就是右倾分裂主义分子。但是，这个问题不改，发展下去就是右倾分裂主义。那你分裂到哪里去？那只有分裂到刘少奇、乌兰夫那里去，分裂到蒋介石那里去。那是十分危险的！

当前主要是反右，反形“左”实右。要注意有人以反“三右”主义为幌子搞“三右”主义，以反右倾翻案为幌子搞右倾翻案；但也要防“左”。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这一点务必请同志们注意。

四、关于正确对待群众，保护群众问题

(1) 如何对待群众，这是一个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立场问题。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对待群众“三个根本区别”的最新指示，来检查我们的根本态度和立场，看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落实得怎样？这次会议上有些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这很好，但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还是不通的。不用毛主席关于对待群众的“三个根本区别”这个纲来对照检查，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这次会议要很好地解决一下对群众的态度问题，落实“三个根本区别”的最新指示。在做群众工作方面，有些单位做得好，有些单位做得不够好，没有按毛

主席的指示办事。从领导上说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特别是不能正确对待犯错误的造反派和反对过自己的造反派。我在前面讲了二冶的情况，要向林光同志学习，林光同志能做到团结过去打过他的人，他的姿态很高。为什么有些同志不能做到？当了革委会的负责人，或者在革命委员会工作了，有职有权了，采取非常不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过去反对过自己的群众，这个问题在我们地区说带，不是个别的。现在有的人提高了认识转过来了，有的正在转，有的还没有转过来。文化大革命以来，你是当权派，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错过队犯过错误，为什么人家不能反对你。文化大革命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就是群众反错了、打错了，无非是了解情况不全面，即使打错了也不要紧，群众要革命嘛！另一个是敌人在那里挑动，我们的造反派上当、这个帐应该记在敌人身上，不应该记在造反派帐上。如果造反派头头有坏人，是叛徒、特务、牛鬼蛇神，是坏人就按坏人办，但广大群众是好的。

(2)要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全心全意地保护群众。怎样真正做到保护群众？一条就是狠抓阶级斗争。对敌人要狠狠打击，这就是对群众最大的保护。真正压制群众的是什么人？是敌人，是国民党。我们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只有狠狠打击敌人，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广大群众。第二，各级领导同志，必须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严格按照毛主席关于对待群众三个根本区别的教导，大公无私地正确对待群众。对那些犯了错误的造反派和反对过自己的群众组织，必须一视同仁，绝不能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如果是这样做，实际上是自己站在国民党那一方面。不管你主观上是怎样想的，客观上是那样的。有些造反派犯了错误，应当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少领导干部也犯错误嘛！为什么造反派不能犯错误。他们犯错误，我们要做工作。他们一时想不通，也应当耐心教育、等待，不能简单粗暴。哲盟×××犯了错误，我和他谈了三个小时也没有谈通。但他不是敌人，是个年轻娃娃，不通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可以等待嘛！一次不通，两次通嘛！最近就通了一点。那时根本不承认一点错误，现在承认了错误，错了就改，改了就好，当然，如果是敌人就用不着谈话了，把他抓起来就行了。因为他不是敌人嘛，就要做思想工作嘛！年轻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嘛！有些人，本身就不是好家伙，那只有警告他。我记得在这里对李芳德讲过，我说：你不是一个真正革命派，你对共产党没有感情。那时红司

那一派想不通嘛！现在看起来李就是一个坏人，是坏人要警告他。有些同志不是坏人，但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要教育、批评、帮助，既要弄清问题，又要团结同志。毛主席一再教导，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你只相信，依靠尊重你那一派，不去团结反对你的那一派群众，那你算什么领导！有的群众组织犯错误，主要是他们头头，不是广大群众。拥护你的那派，把你捧得高高的，你就感觉很舒服，反对你的那一派就听不进去，偏听偏信这怎么能行？他越是反对你，你越是要听他的意见嘛！对就改，不对就教育、批评嘛！对群众不能摆老爷架子，不管是军队的，地方的，都是群众的代表，代表群众利益的，不是当官做老爷的。造反派中间也有这种情况，也有支一派，压一派，现在就有大派压小派，大方向比较正确的一派，压犯错误的一派，特别是在革委会掌权多的压掌权少的，形成一部分群众压另一部分群众的问题。实际上也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去压人家。你革命人家也革命嘛！人家犯了错误，可以教育嘛。现在有的利用群众专政抓来另一派的人，打另一派的人。有的抓得很多，有打伤的，还有打死的嘛。他也是革命的，你也是革命的，为什么要把人家抓起来？你用毛主席的三个根本区别的指示来检查，你对人家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就因为他犯了些错误，观点不同，你们对人家采取专政，那不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去了吗？压了群众嘛！这样做不合乎毛泽东思想，不合乎毛主席最新指示，应该改正。这样搞就把自己推到国民党的地位上。阶级兄弟有错误，应该耐心帮助。对敌人要狠，对自己的同志要和。领导干部不能支一派压一派，要耐心做政治思想工作，进行帮助。群众组织间不准大鱼吃小鱼，不能大派压小派。不准你用革委会的权力去压人家，也不准你这一派去抓那一派的人，对人家专政。如果有敌人要告诉他那一派自己去抓。他不听，告给革委会，革委会可以去做工作嘛！我看要是真正的革命派，你告诉他是坏人，他就不会保的。如果继续保敌人就不是革命派了。

(3) 群众组织必须支持革委会。任何群众组织，必须积极支持革命委员会，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支持解放军，特别要支持对立面的那一派的群众代表，群众代表参加到革命委员会里来，不是代表你那个宗派、那个山头到革委会里来合股的。作为革委会的成员要顾全大局。如果利用在革命委员会的权力和掌握的材料，去支持自己的山头，利用这些东西去压制对方。这样做不对。革委会是整体，

革委会是由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组成的，不是哥老会，不是联络站，不是资产阶级议会。群众组织一定要支持革委会，不支持革委会是错误的。不要因为革委会有缺点错误就不支持、不承认。支持革命委员会不是空洞的，就要支持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要支持解放军的干部；解放军干部要支持群众代表，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也要支持群众代表，是三结合嘛！要互相支持。群众组织的代表有对立面的，要互相支持。你要人家尊重你，你首先就要尊重人家。革命领导干部对犯错误的群众组织，应当批评帮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革委会必须在群众的监督之下，不能脱离群众。现在有一种说法，凡是向革委会提意见，就说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确有阶级敌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想搞垮革委会，但广大群众是出于帮助革委会，爱护革委会的，甚至提出严肃的尖锐的批评，我认为这是好的。对群众爱护、支持、帮助革委会，与阶级敌人颠覆、攻击、污蔑革委会要区别开来。不能给批评革委会的群众扣上炮打司令部的帽子。如果革委会确有坏人，就应该打嘛。

犯过错误的造反派，承认了错误，改正了错误，得到领导上支持后，又否定过去的错误。这是不对的。领导上不应当算造反派的老账，但造反派也不应当为自己的错误翻案。现在有这样情况，过去受压了，我们讲了话，支持他，他就翘起尾巴，反过来压人家，这能行嘛！现在巴盟《×××》就要防止翘尾巴，现在不知怎么样？希望直联姿态要高一些，过去你们同革委会唱对台戏就是错误嘛！

有错误就改，改了就行，哲盟《×××》、《×××》从去年到今年四月，错误严重得很，你们是造反派，犯了错误改了就行。哲盟革委会和《×××》压了你们不对，我们是批评了他们。你们《×××》也是做得过分了。我们告诉你们，赵玉温不要打，你们不听。肇那斯图、阿古达木是乌兰夫黑线上的人，你们就不打。那时我们不揭你们的底，可能你们是受蒙蔽。革委会成立了，还是那样，一直搞的不像样子。我这并不是说哲盟革委会压你们是对的，革委会压你们是错误的。《×××》、《×××》广大群众是好的，犯错误的是头头，你们带头冲革委会，那怎么是正确的呢？你们犯错误改了就行。不能说你过去正确，现在正确，一贯正确。没有那样的事嘛！不能否定过去的错误。《×××》不能压《×××》、《×××》。《×××》的大方向是比较正确的。这是从大的方面讲的。你们双方都应该吸取教训。还有其他一些单位也是这样。犯错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错了就改，改了就行了。不要认为自己什么都正确，正确不正确广大群众是很清楚的。今天不是批评你们，是要你们吸取经验教训。哲盟有这种问题，巴盟有，乌盟也有，还有一些地方也有。犯错误老是不改，一直犯到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那还叫什么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狠抓阶级斗争，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怎么讲的，就怎么办。造反派要在革委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革命造反派随着革命向纵深发展，如果自己的思想不发展，不前进，将来就要被时代淘汰的。可能造反派就不成为造反派了。中央有个布告，广西出现的反革命事件，过去是造反派，现在搞了反革命事件，不是走到反面去了嘛！中央批准广西筹备小组成立的时候，对广西的造反派是很大的鼓励，他们硬是不听。反革命事件是什么人搞的，革命的还搞反革命事件，性质变化了嘛！对犯了错误的人领导同志要关心、帮助他们，这些同志也要自觉地改正错误。受蒙蔽的群众，过去犯了错误，站错了队，你不能说站错队也是对的。你那时是站在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造反派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因为你受蒙蔽，一时站错了队，认识了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行了。犯了错误，还说自己正确，那就是自欺欺人了。造反派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虽然他们很长一段时间离开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还是承认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成绩，不能割断历史。在批评他们的错误的同时，还要肯定他们的成绩。站错队的同志起来革命，是对的，但是不能反对造反派，不能否定造反派的大方向。造反派要主动团结受蒙蔽的群众，站错队的要依靠造反派，受蒙蔽的群众应同造反派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五、革委会建设问题

革命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七一”社论所指出的：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定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正确地、全面地把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任务和方针，落实到群众中去，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革命委员会的建设，一就是思想革命化。着重讲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我很惊奇的是有的旗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没下过农村牧区，这糟糕。革委会要真正的联系群众，希望这次会议后，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要抓两条，一条要抓宣传毛泽东思想，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有一条就是掌握群众的思

想动态，抓群众的活思想，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这就叫联系群众。如果说下去转一转，那样不行。联系群众，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就是要掌握群众的思想情况。

二是组织革命化。必须以灵宝县为榜样。一个是清理阶级队伍，一个是精兵简政。灵宝县的经验就是大抓机关的精简。他们已精简到三十人，我区察右中旗已减到五十一人。灵宝县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把我们旗县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大大精简一下。人民日报发表灵宝县的消息的按语，是毛主席的思想，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

还有一个领导作风革命化的问题。首先要突出的解决干部的精神状态的问题。领导方法很多，就是要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雷厉风行，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干部的精神状态不改变，怕负责任，不敢上前线，这不行。要向灵宝县学习。盟市机关如何精简，你们要研究一下，大家创造点经验。我们内蒙革委会是一百七十人，还要精简点。灵宝县减下来的人，大部分是下去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灵宝县的经验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灵宝县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希望各级革命委员会通过学习灵宝县的经验，真正把革命委员会整顿一下，真正“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使各级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充满革命干劲，雷厉风行，精悍有力的战斗指挥部。

（来源：《联合战报》（呼和浩特群众专政总指挥部）第三十一期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滕海清在内蒙古日报社全体人员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今天，我是来向同志们学习的。在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报社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报社开展“挖肃”斗争以来，成绩很大，运动的方向是对头的，主流是好的。报社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好的，广大革命群众是好的。现在，

同文化大革命的深度广度进军，这很好。

报社从今年二月间开始分了两个班子：一个办报，一个搞运动。在分两个班子后，从办报的说来，成绩很大，这是主要的。我们这一段报纸的大方向是对的，是紧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如果说报纸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主要的是我们领导上的问题。还有一个班子是搞革命的，经过了这段时间办学习班，进行“挖肃”斗争，广大的群众和干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报社军管会自军管以来，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军管会的人员还不足，领导力量还不够强，一方面要搞好报纸，一方面搞好运动，要搞好这两项工作，要搞好这两个班子。这就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戒骄戒躁，继续前进，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

今天，我想跟同志们研究目前运动中存在的一些活思想。我想提出三个问题，跟同志们研究。

毛主席最近发出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的重要社论，把目前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各项任务都讲得很清楚了。但是，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如何贯彻落实毛主席的这一系列最新指示，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当前斗争先抓什么？后抓什么？内蒙地区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内蒙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是不是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没有？还有，不久前内蒙革委会召开了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论，那时候，毛主席还有一些最新指示没有发表。现在，怎样把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自治区革委会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结合起来？总之，我们的工作怎样安排，一系列的问题都提出来了。我们报社、广播电台必须研究这些问题，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狠抓阶级斗争（我们内蒙形象的说法就是“挖肃”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完成各条战线上的斗、

《人民日报》八月五日社论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在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两周年的时候，各级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革命

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对敌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切实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清除干净，完成各条战线上的斗、批、改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对全国形势作了正确的估计，对今后的任务作了明确的部署，完全适合我们内蒙地区的情况。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我们必须坚决贯彻，彻底执行。

在内蒙革命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曾提出了继续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的任务。我们的“挖肃”斗争形势的两头小，中间大。我看报社是不是属于中间较好的一类。从现在看，我们认为这种估计是合乎我们内蒙地区阶级斗争实际的。这就是说，我们在对敌斗争、清理阶级队伍、革命大批判等各方面还差得很远，我们“挖肃”斗争的任务还很艰巨。现在有些同志这样问：当前内蒙地区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革命处在什么阶段？工作重点是什么？斗、批与改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但是我们各级革委会领导同志要解决，所有的群众组织都要解决。从报纸的宣传上，对实际斗争的指导上，都应当重视这些问题，明确的解答这些问题。

我个人认为，我们“挖肃”斗争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不能把目前“挖肃”斗争形势看得太乐观。我们这个地区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同以乌兰夫为首的反党叛国集团的矛盾，也就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矛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的。斗争的性质，仍然是复辟与反复辟、夺权与反夺权、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仍然是政权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内蒙地区并不是没有出现过，乌盟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从三月二十六日乌盟小报出了问题以后，一直到现在，最近才把这个盖子揭开。实质上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乌盟革命委员会内部，有人在那里搞了一套班子。实际上，乌盟革委会是两个中心、两套班子。他们不是搞两派的派性问题，而是搞了一个黑班子，搞反动的“多中心论”，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有没有普遍性？我没有把握。但是，在少数单位、少数地方，可能有类似乌盟的情况。这个问题说明什么呢？说

明我们的“挖肃”斗争并没有进行到底，不能盲目乐观，不能认为“挖肃”斗争已经取得彻底胜利了。从目前的斗争实际看来，那是不现实的。

我们的“挖肃”斗争，从去年十一月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界讲话起，我们就从文艺界开始了。但那个时候动得还不大，主要是今年一月十七日以后，我们的“挖肃”斗争在全区起来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挖肃”斗争就表面上的扫荡战全区打过了，要向纵深发展了，要把隐藏最深的、伪装得巧妙的那些敌人挖出来，要深挖深批，现在革命大批判进入了全面的人民战争阶段，包钢、二冶的经验已经推广到全区。把革命大批判向纵深推进了一步，把“挖肃”斗争推向了新阶段。

我们必须加强对敌斗争，切实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也就是说，要突出“挖肃”斗争。挖和肃，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问题，也就是抓阶级斗争和革命大批判。到底这位置怎么摆法？关系怎么样？从我们内蒙的经验看，就是只有把敌人挖出来了，才能更好地进行深入的革命大批判；而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又有助于挖出隐蔽更深的敌人。我们革命大批判从去年开始，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内蒙“当代王爺”乌兰夫，但是相当长时间内，没有同本单位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挂起钩来进行革命大批判，那是时还没有这样搞“挖肃”斗争。今年的革命大批判比起去年的革命大批判来更加深入，更加生动，有了活靶子。目标更明确了。当然，挖和肃二者不能截然分开，挖的中间要进行革命大批判，要肃；肃的中间要肃得好，要进一步的深挖。总之，你没有把敌人挖出来，同本单位阶级斗争的实际联系起来，挖和肃就难结合。只有在狠抓阶级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各条战线的改的任务。

现在，同志们问我们的“挖肃”斗争处在什么阶段？我们认为，当前处在深挖，深批的阶段。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恐怕都要这样搞。如果我们不首先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那现在搞教育革命中的学制、内容等改革，精兵简政等其它一些任务就搞不起来。当然，这些任务是要搞的。实际上，在那些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彻底揭开，阶级阵线还不清楚，领导权还没有真正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单位，改是改不成的。你没把隐蔽的敌人挖出来，敌人必然还在那里作垂死的挣扎，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改革是进行

不下去的。我想，这一点同志们是清楚的。是不是我们只要挖，只要批，不要改呢？我们说不是这个问题。斗、批、改都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文化大革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一定要坚决的改，彻底的改，对教育、文艺、工业技术、旧的机构和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必须彻底的改。斗、批和改的关系怎么摆？我想，还是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开展深入持久的革命大批判，在这基础上完成各条战线的伟大的改革任务。

当然，各种改革仍然有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改的过程中，一方面，会遇到来自敌人方面的干扰和破坏。另一方面，也会遇到来自我们自己同志思想中间的旧的习惯势力的阻挠。这里就有革与保的问题。一种思想是要彻底改革，一种思想就是要保持原来中国赫鲁晓夫推行的一套修正主义路线，不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所以在改的中间，也还是一场斗争。

斗和批是当前主要的。我们说，当前改的问题也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各级领导要抓紧。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批大改的革命群众运动，我们要有准备，要突出政治，抓好全面规划和典型试验，把一般号召同具体指导结合起来。有条件的单位，在深挖深批的基础上，应该能改的马上就改。没有条件的单位，应当在“挖肃”斗争中积极为改创造条件。最近，工业战线有些单位在改的方面创造了不少好的典型，我们各级领导要抓住、抓紧，狠抓和推广各个方面的典型经验。

我们报社的记者要到各个地区去。现在看，我们报社的人员还不充足，所以下去的人还很少。前一批同志下去很久了，我同报社的领导同志商量，要前一批下去很久的同志回来学习一下，再挑一批同志下去。根据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我们记者下去的任务，也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思想上、工作方法上有所发展变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去年自治区革委会没成立以前，我们记者到下面去，主要是观察下面的动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向领导上反映。现在，各级革委会都建立起来了，他们可以有组织地向上面反映情况。但那还是不够的。我们报社的同志要掌握一手材料，必须要派人下去，了解情况。现在记者下去，第一条是不是把各旗县，大单位的内蒙古日报通讯网迅速建立起来。我们办报要靠群众办报，光靠报社下去的人是不够的。另一条，报社记者下去，除了要了解这个地区全面的和一般的情况以外，我看一重点还是要抓典型。抓典型，是抓好

的典型，当然坏的也要了解。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以后，着重的抓了典型，以典型带动一般。我们从去年筹备小组成立起就开始抓，那时抓了机床厂、五中等，但没抓好。革委会成立后，抓了杭后、宁城，以后抓了包钢、二冶和五四大队，最近抓了牧区阿巴嘎旗。从这些典型看来，对我们全区的文化大革命、“挖肃”斗争和生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报纸主要还是传达毛主席的声音，同时要介绍本地区的典型经验。我们要找到我们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典型。你们不同的时期能抓到个把典型，真正能抓出来，我看这个成绩就很大。报上虽然介绍了一些典型，从现在看来，同志们是努了很大的力，但还有不足的地方。我们报道的一些东西，没有把群众斗争中的好经验、生动活泼的局面充分反映出来。当然，这些问题不能完全怪办报的同志我们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上也对报纸抓得不够。我们记者要下去抓典型，必须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不和群众一起战斗、工作、学习，想把那里的东西写得很具体、很生动，了解得很全面，是不可能的。这就要解决报社的全体同志和下去的同志的革命的精神状态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革命的精神状态，就不可能抓住很好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深入群众，作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老浮在上面。人的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困难、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报社全体同志、下去的记者，要在这方面带头做出个好的样子。

我们的报纸，我想要反复强调当前主要的还是要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这个无论如何不能松下来。如果这这问题抓不好，那就后患无穷了；如果我们“挖肃”斗争不搞好，我们有些单位可能出现大的反复。有些单位，有些地区真正搞反复、搞翻案的、搞复辟的是些什么人呢？主要是敌人。现在不把他们挖出来，他们总是要在那里兴风作浪的。所以我们在各项工作的安排上，包括我们报纸在任何一个时间，都有一个一重点，有主有次、有先有后、有急有缓。任何时候，工作千头万绪，但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也就是我们要抓重点，要搞重点论。有了重点，就有了方向。挖、肃和改到底那个放在前，那个放在后？从我们看，一般说来是挖、肃、改。但并不排除各个单位有条件的地方能改的就改。破和立，不能把它搞一个阶段论。不破不立，破的中间，就有立。但是，每个时期要有个侧重面，在各单位有他自己的因地制宜的问题。要挖到什么时候才算把敌人挖完呢？我看是这样，广大的群众认为这里的敌人已经挖尽了，就算完了。但是，群

众没发现也并不等于一个敌人也没有了。“挖肃”斗争想把敌人百分之百的都挖出来，这也不可能。你就是这次挖干净，有阶级斗争，敌人他还是要钻进来，或把我们的人拉出去的。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有阶级斗争，就有敌人。所以，我们现在“挖肃”斗争达到什么程度，广大群众认为问题基本上搞清楚了，对某些同志怀疑也都解除了，从领导上说，也没掌握什么新的材料，人家认为再没有什么挖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挖就可告一段落了。告一段落，也不是说阶级斗争就不搞了。“挖肃”斗争，我们现在还要反复强调，一定要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也不准半途而废！

二、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抓不抓路线斗争，特别是我们各级革委会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是决定内蒙地区这场政治大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情。

两条路线斗争这个问题，是中央、《人民日报》反复强调的问题。我们在自治区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前，就一直强调这个问题。现在有些地区、有些单位还是对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重视不够。《人民日报》八月五日重要社论深刻地指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就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同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教训，就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往往是通过隐藏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活动来实现。党内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而且，集中地反映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这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就是敌我性质的、对抗性的。当然，这不是说犯路线错误的人都是敌我矛盾，如果犯路线错误的人不改，坚持不改，那就可能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

《人民日报》八月五日社论，进一步为我们指明了这场政治大革命的斗争实质和革命怎么革法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党内、革委会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不重视、不狠抓路线斗争，实际上是丢了灵魂，失去了方向，那就一定要走到邪路上去。

中央两报一刊“八一”重要社论上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林彪副主席指出：‘部队工作千头万绪，只要大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好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按照部队要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我们革委会内部、革命派内部就不要抓两路线斗争吗？社论上又说：“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是要突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就是要带着路线

斗争的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提高广大指战员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无比仇恨，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阻忠诚，方向对了，勇敢也有了，积极性也有了，创造性也有了，组织纪律性也有了，吃苦的革命精神也有了。我们的部队就有了最大的战斗力，就能够在巩固国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创立新的功勋。”

这样看，我们要重视抓两条路线斗争。我们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对这问题是不那样重视的。有人讲，好象革委会是新成立的，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班子，好象就没有路线斗争了。这样的想法，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阶级、阶级斗争。只要有二个阶级存在，就有二个阶级的斗争，就有两条路线斗争。实践证明，我们革委会成立后，两条路线斗争仍然是存在的，而且是很尖锐的。从中央的“八一”社论来看，突出两条路线斗争是多么的重要！提高我们革命队伍每个同志的路线斗争觉悟是多么重要！抓两条路线斗争，就是要从革委会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抓起。抓两条路线斗争，就是要彻底解决站在那一边的问题。只有两条路线，没有三条路线。你不是站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你就必然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边。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这问题，革委会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是不是每个人都也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了呢？应当说，绝大多数同志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但是，也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动摇的。他们动摇的表现，就是一有风吹草动，他们的思想就跟着摇摆起来。为什么我们造反派内部的资产阶级派性克服不了？为什么我们队伍中间，还有那一些动摇的、被敌人利用的？甚至有些人知道他是敌人，还要靠近他，这是什么道理？归根结底，还是站在那一边问题没有解决，是立场问题。所以，站在那一边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他问题都是附带的问题。我们抓两条路线斗争，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我们天天说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但是有些人口里讲的和实际行动是两回事。实践证明，凡是革命、生产搞得好的单位，首先是路线斗争教育搞得好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那么，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

派和一切阶级敌人无比仇恨，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的忠诚了。

党内、革委会内部、革命派内部，首先要不断地解决路线斗争问题，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这是搞好对敌斗争的大前提。不解决路线斗争，不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解决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就不可能把对敌斗争搞好。因为，犯“三右”主义错误的人，认敌为友，敌我不分，甚至和敌人同流合污，那么，不管主观上他是要革命的，但实际上是站在不革命的那一方面去了。总之，要抓好阶级斗争，深挖、深批、大改，就要狠抓两条路线斗争，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当前，我们主要抓什么呢？还要抓反右。反右这一点看起来，好象我们已经反得很久了，应当讲，现在很多地方的实际情况表明，“三右”主义的很多东西仍然还存在。现在，还是要讲反对右倾。有些单位反映，现在有右倾回潮。据说，你们报社也有类似情况。是否右倾回潮了？毛主席说，右倾是一种顽症。右倾你不反，它就要回来。所以，这回潮并不奇怪。现在右倾的表现，有些单位有一种厌战情绪，认为“挖肃”斗争已把敌人挖得差不多了，应该下马了，有些单位已经挖出了敌人，胜利冲昏了头脑，现在想不干了，想收兵了，有些单位“挖肃”斗争取得点成绩，就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停滞不前，似乎“挖肃”斗争没有多大油水了；有些单位大会战的火刚刚点起来，就熄灭了，那里的右倾势力还是很顽固的，在抵抗；有些单位犯过右倾和极“左”思潮的人，又开始否定他们自己的错误，否定“挖肃”斗争的大方向，有些单位组织上联合了，思想上联合不起来，不是把矛头对准主要敌人，把大方向放在一边，而把矛头对准自己的战友；有些单位逍遥派比过去多了，这明明就是不抓阶级斗争，不抓路线斗争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喽！有些单位资产阶级派性没有彻底克服，敌人就利用这个东西来干扰、破坏对敌斗争，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笼统地讲阶级斗争，就是不讲两条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不是抽象的，有两个阶级，就必然要走两条道路，那么反映到党内来，反映到政权机构里面，反映到我们革命派队伍内部，就是要搞两条路线斗争。那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的人，他们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所以，我们不讲路线斗争，实际上阶级斗争是空洞的。反对“三右”主义，好象只有群众组织中有“三右”主义，革委会领

导成员中就没有“三右”主义了？革委会机关中有没有“三右”主义？同样存在。当然，从机关、从人来说，程度不同就是了。但这种思想，是存在的。这种东西。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思潮，它不可能不反映到我们革委会和群众组织中央。我们还有一种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的现象。我们说，我们要讲团结，不团结那怎么搞革命？七亿人民要有个统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团结不等于和平共处，不等于不要斗争。这个问题我们做得很不够。我们的斗争是什么斗争？就是同资产阶级思想，同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毛主席的指示的东西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对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言行，就要斗争，就要抵制。每当斗争激烈的时候，运动转折的关键时刻，总是有些同志搞折衷、搞调和。折衷主义就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他们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和偷换毛泽东思想的两点论，不讲重点论，以次要矛盾代替主要矛盾，他们大搞调和论，不分敌我，不分是非，不讲斗争，他们在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回避明确、肯定地提出问题，力图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回旋，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种观点。他们对该批评的不敢批评，该支持的不敢支持，该反对的不敢反对，没有一个是非标准。我们说，不管是谁，是革命领导干部，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凡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支持；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反对，应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些同志害怕矛盾激化，他们总是回避矛盾，所以对来自右的方面的东西很容易接受，对正确的东西也容易从右的方面去理解。这些有右倾的人，他们最怕压力，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们就软下来，倒向右边。他们最爱搞折衷，搞调和，搞平衡，自以为很“稳当”，很“客观”，很“全面”，实际上是掩盖他们右的本质。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要反对这种调和主义、折衷主义。事实证明，搞折衷主义最容易为反革命两面派所利用。我们要反对“三右”主义，反对折衷主义，打倒反革命两面派！这种反革命两面派，他现在不仅仅存在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而且也存在于我们某些革委会里面。而有“三右”主义的人，他们看不见敌人，也害怕群众，实际上是害怕革命。因此，他们搞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搞折衷主义恰恰是为反革命两面派所利用的，是他们所找到的最好的对象。如果真正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人，反革命两面派就不敢去找他的。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在这

方面犯错误，吃亏就吃在这个地方。

三、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

批判“多中心论”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我们各级革委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发出的新的战斗号令，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识的：

首先是，“多中心论”的要害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所谓“多中心”，实际上只有两个中心，不会有三个中心。一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多中心”，就是无中心。搞“多中心论”的人，不是不要中心，而是要夺无产阶级的中心，要的是资产阶级那个中心。

“多中心论”，是集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之大成的反动理论，它涣散无产阶级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所以，我们必须坚决地批判。

第二，当前“多中心论”的主要表现，是搞“以我为中心”，搞山头主义，搞宗派主义，搞右倾分裂主义，背离和干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背离和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多中心论”的人，必然要搞“以我为中心”。在他没有掌权的时候，他就“争中心”；在他掌权以后，他就要搞“以我为中心”。也就是对上是“多中心”，对下是“以我为中心”。这样的人，在组织上必然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必然要搞分裂，要搞独立王国；在政治上，必然要耍两面派，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他们判断是非是以我为转移的，从根本上抹煞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抹煞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在政治上走向投降主义的道路。特别是在思想上，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战斗号令，不是认真学习、贯彻，不是象林副主席讲的，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采取机会主义的手法，择其所需，为我所用，对他们有利的就高喊“坚决照办”，对他们不利的，就进行抵制，甚至歪曲最高指示。这种坚持“多中心论”的人，坚持“以我为中心”的人，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是敌人拉过去的，就是敌人打进来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第三，批判“多中心论”，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保证。反动的“多中心论”，是各种反动思潮，如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汇流而成的。它冲击的目标，就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权”的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高瞻远瞩地抓住了这个问题，号召我们进行批判，这有伟大的战略意义。我看到我们报纸上写了些文章，我们应该号召大家来批判这个东西。《人民日报》八月五日重要社论号召我们要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无限忠诚，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整体观念，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迅速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战斗号令。同时指出了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抱什么态度的问题，是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抱什么态度的问题。这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我们批判这个问题，也就是教育广大革命派真正的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主观世界，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站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边。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批判这种反动思潮，解决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个立场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必须要有足够的认识。我们一定要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一定要及时地识破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要警惕混入我们队伍的反革命两面派分裂和破坏革委会的阴谋。我们要加速实现革命队伍的思想革命化，就一定要坚决抵制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一定要进一步批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把右倾分裂主义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抛到垃圾堆里去，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当彻底的革命派。

第四、我们在批判“多中心论”的时候，要针对着我们地区的斗争现实。也就是说，要把批判“多中心论”同批判乌兰夫搞“独立王国”结合起来，把批判“多中心论”的反动思潮同批判右、极“左”的思潮结合起来，同批判反革命两面派结合起来；同批判肃清各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的流毒结合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提高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今天晚上，广播电台的同志也来了，我今天要讲的就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也没有把握，我提出来，请同志们帮助研究，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报社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传达毛主席声音的，是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的，也是代表内蒙古革委会对全区进行工作指导的。所以，我跟同志们研究一下，研究这些活思想。我希望报社、电台的同志对这几个问题再很好学习一下、研究一下。我讲的这些问题不一定都对，错了，希望同志们批评。

我们报社的同志、电台的同志，自去年六月十八日自治区筹备小组成立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各个方面是做出很大的成绩的。但我们现在不要满足于现状，革命进一步的向纵深发展，我们的思想要进一步紧跟上。特别是你们报社、电台同志，你们要把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传出去，传得快，传得准，这样才能更好地教育广大革命群众，所以，同志们的工作任务是十分光荣艰巨的。希望大家更好地进一步解决思想革命化问题，彻底改变我们的旧作风，把工作做得更好。

（来源：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新文化》内蒙古宣教口《文化战线》新文化编辑部）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草案）

“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下简称“新内人党”）是一个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集团。“新内人党”是在 1946 年春由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一小撮民族反动派为首，笼络了一些民族上层分子和蒙族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内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分子乌兰夫，利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机会和他窃取的权力，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极力网罗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把“内人党”的头目哈丰阿等人陆续拉入共产党内。从此，他自己成为“新内人党”的总头目，“新内人党”则成为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工具，成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集团，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它的首要分子都是地、富、王公、贵族、蒙奸、反动军官，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特务、叛徒。1947 年 4 月 20 日，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1960 年后，“新内人党”进入了组织大发展时期。

当时，帝、修、反联合反华，西藏、新疆民族反动派搞叛乱，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反动派武装入侵，加上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他们便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一个严重的危机。”于是大搞反革命活动，并极力扩大组织。经过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一些农村、牧区建立起“新内人党”的组织。

“新内人党”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它的纲领就是“新内人党”党章所规定的“为实现内蒙古的统一和民族统一与独立，第一步统一内蒙古，继而逢相当的时机在合理的条件下实现我们全蒙古民族的独立统一。”其步骤是，先自治后自决，先独立后统一。就是在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的这一天，“新内人党”总头目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上公开宣称：“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内蒙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策略是不公开的，将来我们广播到全世界，争取进步人士，如今天独立，国际上不承认，但是我们将来争取国际上的同意。”这是“新内人党”二十多年来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活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二十多年来，“新内人党”疯狂地进行了民族分裂和背叛祖国的罪恶活动。他们利用已经窃取的权力大肆宣扬反动的地方民族主义，公开叫嚷成吉思汗的子孙团结起来，大量散发“三五宣言”，提倡民族自决，煽动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大反所谓大汉族主义，制造民族分裂。他们打着民族特点的幌子，叫嚷要“踏出自己的路”，拼命推行“三不两利”，“稳、宽、长”等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极力宣扬反动的“三基论”，他们还大搞所谓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实行机关民族化、干部民族化、搞民族军队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为了分裂祖国、实现内外蒙合并、复辟资本主义，做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新内人党”还是一个庞大的苏、蒙修的间谍特务组织，长期以来，他们组织特务机构，采取特务手段，通过各种渠道，盗窃我国、我区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大搞里通外国的活动。

乌兰夫等“新内人党”的首要分子，为了实现分裂祖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利用合法身法，大搞宫廷政变，组织地下黑书记处，代常委、五大委。并在呼市等地区搞反革命夺权。大搞反汉排外。把“新内人党”的骨干安插在要害部门掌权，阴谋实现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目的。

总之，“新内人党”反动透顶，罪恶累累。是我们伟大祖国北部边疆的一大隐患，我们必须更加充分，更加深入地发动群众，把这个反革命集团从组织上彻底摧毁，从政治上彻底批臭，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它的流毒。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新内人党”有首要分子，有骨干分子，同时也蒙蔽了一部分群众，使他们失足加入“新内人党”。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区别对待，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的指示，贯彻执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打击首要，争取胁从，挽救失足。就是对首要分子也要分化瓦解，做政治思想工作，争取起义。不能把他们看做铁板一块。在具体的政策上要执行以下几条：

1、坚决打击证据确凿的首要分子（上层领导机构成员）和支部书记以上有重大罪恶的分子。对这些分子也要区别对待，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对坦白交待好的，有主动表现的应从宽处理，贯彻执行“给出路”的政策。

2、一般党徒要通过办学习班，讲清问题。只要他们彻底交待就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虽系一般党徒，但有重大罪恶，民愤很大的而态度恶劣的分子则应严惩。

3、对工人、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农村、牧区的大、小队干部、青年学生、干部家属和职工家属中受蒙蔽参加了“新内人党”的人，坚持正面教育，开展对“新内人党”反党叛国罪恶的革命大批判，启发教育他们的政治觉悟，只要他们从组织上、思想上与“新内人党”划清界限，就不再追究。

4、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如发现有混进来的“新内人党”分子，应上报材料经领导机关批准，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5、对“新内人党”分子的子女应坚决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1968 年 12 月 26 日的通知的精神执行。对“新内人党”分子的家属也不应歧视。

6、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主要在公社以上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农村牧区也要把“新内人党”挖出来，但主要应采取正面教育，办学习班的方法进行。

7、凡是由“新内人党”骨干分子操纵的，它的纲领与“新内人党”基本一致的组织，如“统一党”、“兴蒙党”等均为“新内人党”的变种组织，一律按

“新内人党”对待。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毛主席最近又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一定要注意政策。”是否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不忠的大问题。在前一段我区运动的大好形势下，也曾出现过一些问题。有些同志缺乏以敌斗争经验，有急躁情绪，掌握政策不够稳，只要讲清道理，帮助他们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就会很快改正。也有过去犯过右倾错误的人，抱着抵触情绪，搞形左实右，只要严肃地批评、教育他们，也是能够克服的。要特别警惕的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挑拨民族关系，混淆阶级阵线，实行阶级报复，甚至杀人灭口，妄图破坏对敌斗争，对他们必须坚决打击，刹住妖风。一切革命同志都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积极维护党的政策，严禁武斗，严禁逼、供、信。向违反政策的各种不良现象做坚决的斗争，把伟大的斗、批、改运动进行到底。

关于对待“新内人党”的问题，过去自治区所做的有关规定凡与本规定有不符之处，按本规定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五、中央决定对内蒙实行全面军管，纠正清队等中的错误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等关于挖“内人党”扩大化向中央的检查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扩大化的错误，对高锦明同志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衷心接受，认为这是对我们的爱护，对内蒙的关怀。

我们核心小组来开会的三个人又进一步学习了上述指示，检查了自从清理阶级队伍以来，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的这一段工作，深感错误严重。我们的错误集中在一点上，就是没有事事听毛主席的话，处处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在内蒙落实得不好，这说明我们对毛主席不忠。

我们的错误突出的是：

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违反了毛主席关于“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教导。相当普遍地产生了逼、供、信，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这个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以后，发展成为全区性的。在革委会四次全会以前，内蒙就挖出了十三万多人，这时已发现个别单位有武斗和逼、供、信的现象；革委会四次全会反右后，在农村、牧区街道等普遍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这时本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起来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但仍继续开展反右斗争，结果造成扩大化和逼、供、信的错误。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十五日又挖出了二十五万多人（包括“内人党”六万四千四百多人），其中有极少数是坏人，但误伤了很多好人，蒙族干部和群众被伤害的面更大，造成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的局面。多数人是在逼、供、信的情况下打成“内人党”的。例如，集宁市一个不足二百人的机关学习班，就挖出“内人党”一百四十四名，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出身很苦的干部和共产党员（已平反）。据对内蒙军区机关、骑兵五师、独立二师等单位了解，蒙族干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打成了“内人党”。当时曾出现了许多极端错误的论调。例如，“共产党的支部就是内人党的支部”，“边防站是内人党的边防站”，“内人党是没有什么证据的”等等。

中央早已多次提醒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注意扩大化的问题，我们本应认真遵循，可是直到今年二月初，在北京开的一次有各盟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上，滕海清同志仍错误地提出，主要的还是反右，右倾仍是主要阻力。以致使“左”倾思想继续泛滥，造成人人怕被说成“右倾”的局面。

二、在解放干部问题上，政策落实很差。

毛主席曾多次指示：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口头上也说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但说的更多的是内蒙被乌兰夫统治二十年，他要叛国，必然培植自己的庞大的反革命势力。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对毛泽东思想在内蒙占绝对统治地位，内蒙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发生了动摇。内蒙解放干部的工作，本来就是很落后的，在去年六月到十二月，总还解放了一些；但从挖“内人党”以来，不但没有解放，就

是原来已经解放的和参加了“三结合”的干部又有一些被揪了回去。比如盟市一级的干部，去年十二月份统计，被打倒的有百分之五十八点四，在今年三月十五日，却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原自治区党委、人委机关的处长和盟市机关的部长一级干部，不完全统计有一千七百二十七人，参加了“三结合”和解放了的只有四百九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全区正副县（旗）长、党委书记共有七百零五人，参加“三结合”和解放了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我们没有很好执行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致使解放干部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造成干部的极端缺乏，使工作和生产受到损失，使犯了错误的干部感到没有出路。

三、对待群众组织，犯有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我们对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做到象八三四一部队那样，坚持三条原则，九个一样。而是对亲自己一派的就亲，疏自己一派的就疏，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就压。因而加深了两派对立。类似这样情况，在乌达煤矿、巴盟、锡盟、呼市的许多单位中都是存在的。

四、在第四次全委会之前，高锦明同志提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要注意防“左”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却错误地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公开批判，并停止了他的工作。高锦明同志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在前门饭店会议上批判乌兰夫和顶住“二月逆流”中都是有贡献的，对他这样做，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五、在宣传工作中，我们有一些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引起了思想混乱。例如，在《内蒙古日报》的一篇社论上，散布了“狠是基础”的错误论调，从而助长了“左”的思想。

我们所犯的错误，基本方面是“左”。这是因为我们对内蒙的情况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进行阶级分析，而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造成的。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关怀下，本来内蒙的形势是很好的，如果我们不犯这种错误，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内蒙的形势会更好。我们感到很痛心，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也没有完全理解，还想慢慢地克服就是了。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批评的那样，我们有私心，有骄傲，总是看成绩多，怕否定大方向，怕否定了成绩，怕影响威信，没有很迅速地痛下决心检查、改正错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鼓舞下，现在内蒙地区对落实政策，已初见成效。

我们的错误对革命损害很大，它混淆了阶级阵线，伤害了一些好人，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程，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造成了严重混乱。我们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爱护。经中央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后，我们已初步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坚决地、忠实地、迅速地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坚决完成“九大”规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更大的胜利。

以上检查还是肤浅的，认识是不够的。我们将在工作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决心把内蒙的工作做好。

不当之处，盼指示。

滕海清 吴涛 李树德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呈报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毛主席批示：照办。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内蒙古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古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迅速纠正前一段时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扩大化的错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定内蒙局势，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 共 中 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

《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和十六日中央找我们来，对内蒙当前形势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中央对内蒙的极大关怀，极大爱护，我们深受教育，深受感动。对于中央的重要指示，我们完全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一)

内蒙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地处反修前线，在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保持内蒙局势的稳定，这是人民利益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我们一定遵循中央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迅速按照“九大”精神，加强团结，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内蒙各族革命人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人、贫下中农（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狠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狠抓阶级斗争，作出了很大成绩，内蒙出现了大好形势，这是运动的主流和本质。

滕海清同志从一九六七年四月到内蒙后，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了大量工作，是立了新功的。但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以来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领导核心中资产阶级“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滋长，违背中央多次对内蒙工作的指示，尤其是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方面要注意防止扩大化的指示，严重的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宁“左”勿右，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错误地把高锦明同志防“左”的正确意见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区进行了批判，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夸大乌兰夫的影响，过重地估计敌情，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工作中，产生了“左”的倾向，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在宣传工作上也犯了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左”倾错误；对待群众，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在领导制度上，犯了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错误，等等。这就造成严重的后果：混淆了两类矛盾和阶级阵线，伤害了不少基本群众，损害了各族人民的团结，一些革委会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一些地方的革命大联合遭到破坏，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的战略部署，阻碍了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落实。我们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们的信任。对不起内蒙古一千三百万各族革命人民对我们的重托。

在“九大”期间，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同志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育下，对前一段工作中的错误，于四月十九日向中央作了检讨、这对于我们团结一致，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内蒙这一段工作中所犯的错

误，滕海清同志应负主要责任，核心小组其他同志也各有不同程度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勇于承担责任，团结一致，积极做好工作，迅速纠正错误。下边的同志是具体执行的问题，只要坚决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吸取教训就行了，不要责怪他们。

（二）

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重要指示，是我们搞好内蒙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发出的“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做好下列工作：

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所做的多次极为重要的讲话，深入贯彻“九大”精神，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坚决纠正我们前一段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团结广大群众，深入开展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搞好团结，首先是我们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的团结、自治区革委会常委的团结，这是解决当前内蒙问题的关键。我们决心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纠正错误，团结一致，决不给敌人以挑拨、利用之隙。否则，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加强解放军内部的团结和保持部队的稳定，这是当前稳定内蒙局势的重要因素。部队各级领导同志应积极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在内蒙地区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艰苦奋斗，取得了很大成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中，由于内蒙革委员领导上犯了严重错误，使参加“三支”、“两军”的有些同志受到了影响，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这个责任应由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承担。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继续加强拥军工作，继续大学人民解放军，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

必须正确对待群众，加强群众工作。对我们前段工作中犯的严重错误，群众中有不同观点，这是正常现象。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批评我们的错误，是对我们的革命监督，是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热诚欢迎。各级革委会在认真落实政策中，应就地解决问题，不要矛盾上交，不要进行大串连，尽量减

少上访。

我们对不同观点的群众都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批评和帮助我们改正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不同观点的群众不要互相指责。由于内蒙地处反修前线和目前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我们要继续说服群众今后在批评我们的错误时，都不要采用大字报、大标语上街、登小字报等方法。

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和干部的绝大多数，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在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中，误伤了一些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应坚决彻底予以平反，信用他们。积极培养、提拔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

必须迅速地、坚决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当前我区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应立即停下来，对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因“内人党”问题被关起来的，除确有证据和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查外，其余都要立即放出来。该解放的干部要迅速解放出来。

各级革委会和领导班子必须迅速充实，健全起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错搞为“新内人党”而停职、撤职者，应迅速平反，恢复工作。各级革委会和领导班子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一元化领导。

（三）

这次中央把我们找来，当天给予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对我们教育极深。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尽管在落实中央指示中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我们坚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有全区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决心和群众在一起，完成中央给我们的任务。

当否，请指示。

滕海清 吴 涛 高锦明 权星垣 李树德 李 质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

日

六、七八年以后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华国锋等同意内蒙党委七

意见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内蒙党委呈送的《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的批示及附件

中共中央批示

华主席、党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尤太忠、池必卿、侯永同志《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并希望认真贯彻执行。

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五省、区也有同类的问题。为了统一思想，统一政策，共同解决好挖“新内人党”的遗留问题，中央委托胡耀邦同志通知这五省、区党委各派一位负责同志来京，向这些同志传达这一文件。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呈送的《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

华主席、党中央：

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于四月十日到京后向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和纪登奎、胡耀邦同志汇报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中，干部群众的一些思想情况和遇到的一些重要问题。在几位领导同志的亲自指导和具体帮助下，我们研究了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的问题。四月十六日前来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的池必卿同志也参加了讨论。现将有关情况和意见报告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在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中，由于当时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大挖“新内人党”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这些严重错误，混淆了阶级阵线，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损害了各族人民的团结，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

积极性，给内蒙古自治区的革命和生产造成了很大损失。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对内蒙工作的指示，停止了挖“新内人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后，特别是自治区新党委成立以来，根据党中央的一系列有关指示，全区各级党委纠正清队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对挖成“新内人党”的干部、群众及其家属分别给以抚恤、治疗和生活上的适当照顾；对查抄的财物，给以清还或一定的补偿。对乘机进行阶级报复的阶级敌人，有的已依法惩处，等等。广大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对这些是满意的。但是，按照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的精神，在解决挖“新内人党”的问题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恰当地处理有关干部和群众提出的某些合理要求，以利于加强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加速自治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究竟有没有一个“新内人党”是全区广大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一直关心，并希望给以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家认为，在揭批“四人帮”斗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是应该而且有条件对这个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了。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根据在落实政策中了解到的大量事实，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林彪、“_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主观臆断，盲目蛮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因此，应该完全予以否定。这一错案的祸根是林彪、“四人帮”，责任在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当时，广大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是极其忿恨的；对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的严重错误也是不满的，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的。参与挖“新内人党”活动的人，绝大多数是不明真相的，有些是被迫的，这些同志是没有责任的。真正乘机进行阶级报复的阶级敌人、严重违法乱纪的刑事犯罪分子是极少数。全面、正确地估计和分析这一情况，是解决好这一问题的基础。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反修前线，保持安定团结发展大好形势，加强对敌斗争，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内蒙建设好，是革命的需要，是全区蒙汉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大局。我们一定要从这一大局出发，坚决遵照华主席、党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大局的方针，积极而又慎重地按照党的政策，把工作做深做

细，把这一个历史错案的遗留问题解决好。

一、对致死的干部和群众从政治上给以平反后，还应由有关党组织对他们的历史和工作做出全面、正确的评价，写出书面材料，通知其家属和生前所在单位的群众。

二、有关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亲切关怀死者家属和伤残人员，尽可能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过去对死者家属的生活补贴，和伤残人员的治疗、困难补助问题的有关规定，要继续认真贯彻执行。

三、有些生产队因死伤人员过多，集体负担过重的，国家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扶持他们发展生产。

四、对于极少数证据确凿、借机搞阶级报复的阶级敌人，和严重违法乱纪、民忿极大的刑事犯罪分子，应经盟市以上党委审查批准，由政法部门依法惩处。

五、对有关干部、群众提出的其它要求，凡合理的，要抓紧研究，及时解决；办不到的，要认真解释，说明情况；不合理的，要耐心说服，做好思想工作。

以上意见，如经中央批准，全区各级党组织都要认真学习讨论统一思想认识，制定执行办法，联系当地实际情况，结合当前中心工作，深入进行传达，做好思想教育和团结工作。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都要从大局出发，要向前看，消除隔阂，加强团结，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把对死者的怀念、对伤残者的关心化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实际行动。人人上阵，投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深入揭批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破坏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反革命罪行。过去被伤害的干部、群众及其家属是顾大局、识大体的，是通情达理的。大家懂得，绝不能用错误的办法去纠正错误，甚至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党组织对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有的已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有的结合其他问题，正在令其接受干部、群众的揭发批判。对少数跟着他们犯了错误的人，要加强教育帮助，只要这些同志自觉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主动做好团结工作，是会得到群众谅解的。

内蒙古的广大党员、干部、驻军指战员和蒙汉各族人民是好的，是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热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忠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过去在建设内蒙、保卫边疆，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方面，作

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家的思想路线觉悟更有了很大提高。我们相信，只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工作，讲清道理，讲明政策，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一定会正确认识，正确对待过去挖“新内人党”的严重错误，共同处理好这方面的遗留问题，一定会提高警惕，排除干扰，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乘机挑拨离间，破坏捣乱。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建设和保卫好祖国北部边疆，奋发努力，做出新的贡献。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阅批示。

尤 太 忠池 必 卿侯 永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

十一、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全盘否定内蒙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上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讨论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会议由胡耀邦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万里、习仲勋、方毅、宋任穷、余秋里、姚依林等同志，列席的有乌兰夫、杨静仁、周惠、冯文彬、邓力群、朱穆之等同志。会议听取了周惠同志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情况的汇报。胡耀邦、万里、乌兰夫、姚依林、习仲勋、方毅等同志发了言。

会议一致同意周惠同志的汇报，并做出如下结论：

一、内蒙古自治区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曾经是全国的先进地区，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模范自治区，在国内外都曾经产生过良好的影响。后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工作走了弯路。重工业的发展过快，畜牧业的发展被削弱，影响了全区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制造了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使许多干部和群众特别是蒙古族的干部和群众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很多人致死、致残、致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了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平反冤、假、错案，认真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干部政策，切实整顿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因而，民族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生产恢复得比较快，群众生活有一定的改善，各民族比较满

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作风也比较实在，不尚空谈。总的来说，中央对内蒙古自治区这几年的工作是满意的，但是也要看到，内蒙古自治区的生产还比较落后，群众的生活上还有许多困难，进一步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一定要振奋精神，加强团结，谦虚谨慎，再接再厉去争取新的胜利。

二、内蒙古自治区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要敢于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比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各方面大大超过它。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内蒙古自治区的情况比蒙古人民共和国要好，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在按人口平均的产值方面，比它落后了，但是，内蒙古自治区经过努力超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受苏联的剥削和掠夺较重，发展生产受到很大限制。中央认为，这种比赛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霸权主义竞争的问题，是考验真假马列主义的问题，是巩固建设国防的问题。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和人民，一定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三、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干部和人民，要有足够的信心把内蒙古建设好。内蒙古的自然条件很好，地广人稀（每平方公里只有十个人，每人平均一百亩地），资源、能源、交通条件都较好。要看到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确定一个实事求是的奋斗目标：第一步，争取在五年之内，按人口平均的工农业总产值要达到内蒙古历史上的最好水平。第二步，争取在十年之内工农业总产值按人口平均计算要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中，进入先进的行列。现在内蒙古工农业总产值是八十亿元，每人平均四百元，再过十年，争取达到每人一千元，即翻一番半。

四、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建设方针，应下决心以二、三十年或半个世纪的时间，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因地制宜，走出一条以林牧为主的多种经营的路子。同时，在农业区要做到粮、油、糖和农副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工业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在发展林牧业的基础上发展皮革、制糖、乳制品、毛纺、民族日用品、木材工业，以及发展国家投资的稀土、钢铁工业等。要放手发展森林数量，多种树、多种草，用几十年的时间，坚持不懈地把林业和草原发展起来。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和扩大草原，保护草原，改良草原。草原发展了，不仅畜牧业可以得到发展，还可以调节气候，增加雨量，保持水土，减少风沙。要科学养畜，力争在十年之后，使牲畜达到一亿头。这是一个战略任务。为此，必须认真解决草地、山

林所有制的问题。要在牧区和农业区建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使各项工作和群众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除此之外，政府要拿出部分资金，种树、种草，在这方面找到一条投资少、效益大的路子。

五、《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情况的汇报提纲》中所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今后不向内蒙古移民的方针是对的，但是，人口从外省区自然流动到内蒙古去，内蒙古也不要采取堵的方针。应该看到，人口的自然流动是堵不住的。今后内蒙古的工作做得越好，人民生活越富裕，外省的人就越会往内蒙古流。要准备十年之后内蒙古的人口超过两千万。对自然流入的人口，要妥善安置，加强管理，让他们从事林牧业生产，不要开荒，并对他们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搞好民族关系。

六、要继续加强民族团结，既要照顾二百万人口的“主体”民族蒙古族，又要照顾一千六百万人口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内蒙古自治区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内蒙古的各项工作搞不好；内蒙古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的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内蒙古的各项工作也搞不好。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要继续加强团结，做到亲如手足，相依为命。在干部配备方面，自治区一级的少数民族干部要有一定比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少数民族干部为主；在汉族聚居区以汉族干部为主。总之，搞好民族团结，是搞好内蒙古建设事业的关键，也是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关键。

七、要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发展教育事业。内蒙古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科研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要把发展科研和教育事业放到重要日程上。

八、此纪要，连同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情况汇报，一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参考。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的通知

1981.08.03；中发〔1981〕28号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

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周惠同志《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情况汇报提纲》。现将《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发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望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同时，将《纪要》和《汇报提纲》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和中央党政军群众部门党委（党组）供参考。

中共中央 1981 年 8 月 3 日

2008 年 8 月 31 日初稿

2011 年 10 月 1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5）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五节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革命群众群众河北省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执行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张春桥接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来京同学时的谈话

〔八月六日下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小组成员穆欣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接见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及河北大学来京参观的全体革命同学代表，举行了座谈会，并作了重要指示。〕

张春桥同志问：是哪几个大学来的？（众答：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什么时候到的？（众答：昨天上午十一点。于是，张春桥同志和穆欣同志向代表们互相作了介绍。）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不大了解大家要求谈些什麼？各校不同，都是带着什麼问题来的？

一个同学说：我们看到北大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回去以后，究竟应当怎麼做？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看到了哪几个学校？（众答：北大，清华，还有师大）那你们跟我差不多。我是在上海工作的，到这里来开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我也是看了这几个学校。你们在天津有些什麼问题？

一个同学说：北大的形势跟天津不一样，北大的道路是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那里和北大怎麼不一样？（众答：我们那里由学校组织开大会批斗，和北大不一样。北大一次会就斗好几个，我们那里是由革委会组织的……）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的革委会是怎麼选的？（南开大学一个同学讲了自己对革委会的看法。以下又有南大，天大，河大不少同学提了很多问题，递了很多条子。然後，由张春桥同志作了解答。）

同学们，我想这样，大家到北京来，是来学习的，我们到北京也是来学习的，是一个任务。北京是党中央所在地，而且文化机关比较多，大专学校比较多。这个地方的同学在毛主席身边，他们受到党的教育很多，有很多好的经验，我们来这里交流经验是应该的。我虽然不是北京的，但今天是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的，所以对同学们表示欢迎。同学们要求总理接见，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今天来不了，打电话给我，委托我们来和同学们见面，所以我还要代表总理对同志们表示欢迎。

先介绍一下我们看到的北京的情况。

文化革命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如果说是从讨论《海瑞罢官》开始的话，从去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发展到批判“三家村”，一直到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广播。这期间，经过了二百天，这二百天里，全国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大家对国内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认识更深刻了。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并不是偶然的，它对全国来说不是偶然的。而大字报由聂元梓写出去，可能是偶然的。她不出，别人也会出的。毛主席看了大字报，立即就批了，让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可见，文化革命的烈火是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从六月一日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北京大学在六月十八日发生了一个事件，即所谓“六·一八”事件。为什麼会发生这个事件呢？因为工作组进来以后，没有领导革命师生进行文化大革命，没有领导群众斗黑帮，而是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运动不是斗陆平，到十日，连个斗争计划也没有，反而订了许多清规戒律，如你们刚才提出的那些情况，这里都有。例如：班级之间不准串联呀，门口也不准随便进呀，校系之间不准往来呀，兄弟院校，工农兵来声援还不让进去等等，同学们耐不住了，自己起来革命，就出了个“六·一八”事件，打了一批黑帮分子。学生里面有没有不太好的呢？有。但那天打人的多数是好的，而张承先却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那天打了人，戴了高帽子，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同学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如撕破女同学的衣服。张承先借口说，这不是流氓行为是什麼？是反革命事

件！六月十八日以前，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但六月十八日以后，却转过去镇压革命学生，把参加“六·一八”事件的革命学生当反革命来镇压。工作组本来应该领导同学起来斗黑帮，但他们却来斗革命的学生，完全把方向弄反了，影响很大。此后，接连在北京出现了“六·二零”事件，“六·二三”事件，“六·三零”事件……经过调查，都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性质很清楚了。为什么有这个事件发生呢？最主要的是工作组不革命，别人起来革命。有的同学打了人，思想负担很重。我们不提倡打人，但已经打了，怎样？只好解放这些学生。当时两派学生斗起来了，其实两派学生都是革命的。被打成“六·一八”反革命的革命同学自己就说嘛，打我们的同学也是为了捍卫党的利益，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原来对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当成了反革命。这是工作组挑唆的，我们要解放两方面的学生。好人打了坏人活该，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我们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后不要再打人了。这是第一句话。至于你们怎么办，你们自己讨论。戴高帽子，我们也不提倡，戴不戴由你们讨论，青年人就是要革命的，他们最富有创造性。他们现在还没有地位，也不是权威；不怕罢官，也不会罢官，因为你们还没有当官，顶多是挨斗，戴高帽子。我看戴戴有好处，挨斗也有好处，这样可以锻炼毅力。平时说是忠于毛泽东思想，轮到自己头上就不行了。你们不想给别人戴高帽子吗？人家也能给你们戴，不怕！

（有些同学递条子问：扩音器可不可以供同学辩论使用？）我看可以。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关。罢官都可以，连校长都可以罢，何况扩音器呢？（天大的同学提倡：既然工作组撤出，有的单位也有派出帮助革命的学生，调回来怎么办？）派了学生帮助教职员革命，文化革命委员会有权决定，派人可以嘛！不是外边派来的，是你们内部的人嘛！

关于怎么斗？斗谁？由学生民主辩论决定。要解放思想，不要有那么多框框。北大一万五千人的大辩论会都可以开嘛！南大可能多一些，（众答：不多，五千余人）也可以开嘛！

学生在文化革命委员会中应该占多数，教员就恐怕难教育，他们不大懂得革命，他们的地位跟你们不一样，他们不理解同学。学生不起来，恐怕革命难以搞彻底。

同学们要求八月十三日主席到你们那里去参加庆祝活动，或者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去，我们可以负责转达。有的同志还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到你们那里去，现在中央同志正忙于北京的事情，先把北京的问题解决了，取得经验，当然愿意到处去一去。请相信我们能转达就行了。

关于文化革命委员会，教师和学生的人选，中央没有规定过比例。河北省委怎样规定的，我们不大清楚，你们看怎么办，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规定是不是可以容许在革命中随时改变，有不同意见可以写大字报，不行就变动嘛！关于代表，绝大多数同学不同意，当然可以撤换。

（有人问：北京各院校的形势所以是这样，是不是因为北京市委烂了？）这个说法恐怕也不大妥当吧！在上海有些人也提倡上海市委在文化革命中是正确的，所以在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校党委也应该是正确的。这种论调是错误的。第一，上海市委虽然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第二，更重要的是，即使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也不能保证你就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中央。主席是正确的，那前北京市委怎么烂了呢？党委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就一定起来革命，如果不革命，就有人来革命。（穆欣同志说：你们还没有闹革命，你们闹嘛！）上面还有很多框框压着你们，现在你们希望我们出来说话，替你们把盖子揭开，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好，我希望还是你们出来。中央指示很清楚，你们是主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革命师生，你们是主人，你们起来革命嘛！我们头脑里也不是那么干净，有错误就改。如果你们学校的领导愿意革命，检查错误，也可以一起革命嘛！如果不革命就可以轰嘛，就闹革命嘛！

（有的同学提出，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不来参加学校的斗争会和文化革命运动。）据我了解，子厚同志正在北京开会。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工作一直很忙。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可以贴他一张大字报。

（有的同学提出：刘子厚同志指示我校斗娄平的时候，让娄平和主席团并排坐着，大家不同意。）我们见到刘子厚我们传达，如果见不到，可以送他一张大字报。

（有人问：批斗怎么结合，辩论怎么结合？）这个问题我不想谈，你们讨论，看看怎么进行。

（一个同学提出：北大发动群众的方法是适合全国的，回去是否可以讲？）当然可以。你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你们还有框框，还没有起来革命，还没有！你们自己组织起来。你们就说，我们大了，我们现在是大学，不是幼儿园，用不着给我们安排座位。

（有些同学提出：学校曾经提出中央和省市委的一些领导人，报上没点名。）贴在哪里都可以。一些框框规定，中央从来不知道，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你们对我的讲话有意见，回去可以提。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常说，如果对我们有意见，都可以写大字报。关于“内外有别”是国务院外办说过，现在没有必要了。总理讲过了嘛，不要用这个约束大家。外国人来，叫他们看好了。无非是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在搞革命。

（有人提出：学校一些党政负责人，不带头写大字报，理由是领导上写了好象是作了结论了。）等你们起来了，他就作不成结论了，谁也作不了结论。别说是党委书记说了不算结论，中央一级同志讲话，不是也有递条子的吗？我们也不强加于人，你还是劝劝他们吧，你说了也不算定了，也不算结论，我们还不一定同意呢！叫他说嘛！你不说话，怎麽站在前头领导我们呢？他说写大字报不是时候，我们说，现在是时候了，叫他贴大字报，我们服从真理，不怕压制，我建议你们在这里辩论一番，交换意见，我告诉你们，提这个问题的领导干部，一定有鬼。

有些人是不是左派，还要看看。有些人是左派，大家已经看到了，象毛主席，大家已经是公认了。但还有些左派，一部分人不承认，要展开辩论。认识一个人要看一个过程。我们党认定毛主席是领袖，是经过多少年的斗争的。过去也有些人自称领袖，象陈独秀，王明之流，但是大家不承认。我们一些自己认为是左派的同志，还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是不是左派，要看我们的（行动）。这样有益于取得群众的信任，绝不能自己称王称霸。

（天大有人问：如果有人骂左派，贴大字报说你是“蠢驴”等等怎麽办？）那你也给他写大字报，你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左派。你们要团结多数。

（天大有人问：调查材料时，受到人事部门，组织部门阻扰怎麽办？）革命委员会真正把权力抓在手里，是可以调查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动脑子，你们还要想一想，怎麽闹革命，权不在你们手里！又有委员会，又有代表，他们不代表

你们，你们可以选一个委员会嘛！（穆欣同志插话：印把子还没有在你们手里）如果你们不知道革命怎麽闹法，你们还是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从十二个人的代表会一直到进北京，新中国成立。革命怎麽闹法，不能叫领导小组出主意。

给你戴了高帽子，你还革命不革命？是共产党，共青团员，开除了你的党籍，团籍，你还干不干革命？有人提出对市委有意见，你们既然可以到北京来，就不可以到天津市委吗？你们对市委就毫无办法？我这可有点煽风点火了。

我今天谈的是一个精神，具体的话我不保险，具体的事情，我还不大了解。总之，从领导上说要放手反动群众，怕这怕那，统统是错误的。从同学来说，你们自己要做主人，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你们不是都会唱《国际歌》？

《国际歌》的基本精神，就是号召群众起来自己解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是明确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站在你们一边。你们有个最大的支持着，就是毛主席！你们提了很多问题，你们只要掌握了这个精神，在革命实践当中，在向困难斗争当中，去想办法。智慧是在革命斗争中出来的，一个人的聪明也是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产生的，有了困难，要想办法解决，没有什麽可怕的。只要有障碍，我们革命前进中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都要彻底揭露批判！统统打倒。没有任何人阻碍了我们。只要有这种革命精神，办法就可以想出来。你们想的办法会比我们讲的办法更好。我给你们想的办法不一定好，一革命，办法就有了。

最後，请代我们向学校的革命师生问候！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1）》。）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挥起革命铁扫帚 横扫一切旧习俗

许多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腐朽气息的商店字号和服务行业的陈规陋习全被扫除，革命群众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

新华社天津二十四日电 天津市红卫兵，在首都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造反精神鼓舞下，抡起千钧棒，举起铁扫帚，斗志昂扬地走上街头，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二十三日，在天津市的许多街道上充满了革命的气氛。红卫兵们敲锣打鼓，到处张贴大字报、标语，集会演说，热情地向职工、居民提出更改旧商店字号和街道里弄名称的革命倡议。他们说，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彻底破“四旧”，坚决地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天津市的面貌，让天津市换上崭新的社会主义新装。

红卫兵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得到了全市革命职工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在天津市商业中心区——滨江道一带，整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许许多多商店拔去了旧字号，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称。中原公司的革命职工热情地贴出决心书，设立接待站，征求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对更改名称的意见，最后在革命群众的建议下，决定改名为“工农兵商场”。天津市最大的商场——劝业场的革命职工，在红卫兵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抡起铁 l á n g @①头，砸碎了嵌在墙上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劝业场”三个字，换上了“人民商场”的新名称。全场革命职工举行庆祝集会，热烈欢呼“人民商场”的诞生。他们说，“劝业场”是恶霸豪绅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扶助下开办的，解放前，它是远近闻名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老虎摊”，今天，我们把它改为“人民商场”，这是天大的喜事，我们一定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把“人民商场”办得好上加好。这时聚集在商场周围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具有四十五年历史的北洋纱厂革命职工二十三日晚集会，一致决议把在北洋军阀时代建立的北洋纱厂，改名为“四新”纱厂，以表达全厂革命职工破旧立新的革命决心。他们还把工厂原来的“金三鼎”棉纱商标，改为“工农”牌商标。

*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 加朗 * * * * *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来源：《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张春桥接见北京天津红卫兵时的谈话

〔八月廿七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组员姚文元、王力同志接见了“八·二六”流血事件的受害者，和北京红卫兵、天津红卫兵一百多名战士作了谈话〕

同志们：

经过战斗，受到了锻炼。当然也挨了打，流了血。但是，正如你们说的，干革命就不怕流血，不怕掉头。这个流血事件是残暴的。关于这个问题，你们整成材料，我们上报给中央。要解决问题，还要靠你们解决，这样的斗争，还要靠当地的群众。关于天津市委和其它省市的问题，中央已经研究了。罢官很容易，中央下个决定就罢了官，但是，你们就没有对立面了。不能算胜利。所以我们要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同学们的气愤我们很理解，但是不能那样做，因为我们以前这样做了，收获不太大……。

他们打你们，你们就可以打他们，重要的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1）》。）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参加人：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同志、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河北省书记处书记李颀伯同志、中共中央华北局文革小组芦志彬同志、中共河北省委文革小组茹洪声同志，天津工学院红卫兵、红战友代表赵建敏、胡忠信、齐熙国等二十人，天津大专院校造反总部代表六人。我们在晚九点卅分走进国务院某会议厅，周总理迎到门口，一一和我们亲切握手，让我们坐下，关心地问我们的名字和家庭情况。总理十分关心我们天工红卫兵组织，提出了很多问题。〕

总理：你们谁是总部的？

答：我们没有总部的。

总理：不！我是说你们天津工学院的。

赵建敏：前三个。（指被接见代表名单中的前三名）

总理又逐个点名，并问：谁是总指挥呀？（赵建敏迟疑了一下）

李颀伯：你们现在可以公开了。

总理：你们对我可不能保密呀！

赵建敏答：我和马桐臣。马桐臣没来。

总理：你们（来京的）有多少人？

答：共来五百多。

总理：你们家里还有多少人呀？

答：家里还有四千人。

总理：啊！这么多人啊！你们学校一共多少人？

答：有六千多。

总理：学生有多少人？

答：四千多人。

总理：你们这边有多少学生啊！

答：我们这边有三千左右。

总理又关心地问：怎么编制啊？

赵建敏答：共分八个连。

总理：这么大的连！

赵建敏：我们以红卫兵为核心，还有红外围，就是红战友。

（总理此时一边说，一边用铅笔将天工红卫兵、红战友写在代表卡片上。）

总理：“红战友”这个名字很好哇！我可以当你们的红战友吗？

大家高兴地回答：可以。

总理：红卫兵有多少人？

赵建敏：有一千四百人。

总理：一千四百人八个连，每个连一百八十人吧？

李颀伯：不到吧！

总理：八八六十四，一百八，对！就是一百八十人一个连，你们这是一个小团、一个大营啊！（又对赵建敏说）你这个官不小啊！（众大笑）你们不都是指挥官吧？比如吴××，你是什么？是连长、班长、还是战士？

吴××：是战士。

总理：在总部吗？

吴××：不，在连里，资料组。

总理：你是来记录的，可得记全点。（对大家说）你们是全权代表吗？

赵建敏：是。

总理：好！一言为定，说好了我们就好谈了。（这时，天津造反总部又来了六个同学，总理又一一问了他们姓名，当点到我院红卫兵天津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总部联络员于登元时）

总理：于登元你也和他们是一派吧？是左派啦！

（于笑了笑，没回答）

总理：噢，谦虚嘛！（总理知道他家在邢台地区时，关切地问地震情况，“你们那里损失多大？”于登元答：不大。）

总理：最近又发生两次。

李颀伯：我们还不知道呢！

总理：让你们安心开会嘛，没告诉你们，河北省委人很少，不仅你们闹革命，还有工农群众嘛，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嘛，你们要眼界开阔，胸怀大志，心胸要放在大世界上。

（此时由总部的一位同学谈话，引起总理的下面一段话）

总理：我给你们一点知识，毛主席在青年时代一直是襟怀坦白，胸怀大志，毛主席二五年第一首《沁园春》有多大的气概！这是主席精神，我还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要从正面观察人。（总理从衣袋里拿出主席语录，放在桌子上）劝告你们一件事，不要搞小动作，有事摆到桌面上。你们年青一代要胸怀大志，你们搞革命斗争，从小要立定大志，向主席学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要学毛主席的好作风。

实际就是毛主席的基本功，进入社会首先要进行社会调查、阶级分析。青年时最好的调查就是把自己的家庭研究一下，最好的办法是自我研究。我不是常说嘛，思想、政治、家庭、社会、生活五个关，我们要破旧立新，对自己的家庭、亲属、朋友进行分析，这样就可以知道对自己的思想有什么影响，对自己的思想也进行阶级分析，这是社会调查的开始。青年人不能一下调查清楚，要逐步深化，到老不休。

好！我现在和天津工学院红卫兵讲，你们是左派啦！谈谈问题，其他六位是见证人，你们不是他们学校的。

李颀伯：他们是一个总部的。

总理：天工有自己的独立性嘛！我今天头一次接见天津的同学，我首先推荐毛主席的基本功，从调查入手。刚才谈了第一件事。第二就是民主。现在你们说，得到的民主多不多？算过没有？有多少？（这个问题首先问两个同学）

噢！你们算得不清，我给你们说说吧。有多少自由，有多少民主，多少权利，你们想一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闹四大嘛，第一、大鸣、大放，你们对什么都要敢批驳，省委如何你们都敢提，谁的大字报你们都敢写，你们到北京还不贴我们的大字报，你们有权利啦！大鸣，即鸣放了，炮轰司令部，这不是大鸣啊！不管你们材料有多少就轰一下，当然有的可能是空炮，一下轰的没东西，那还不是空炮啊，实际上就要有材料。

大放，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你校基本是两派，将来还要分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思想动态也是经常变化的。天津不知道，从北京看来就是这样，原来两派，后来又分，分得很多，这是个规律。这就是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还有六大权利，过去不感觉，现在你们得到了权利，你们什么话都敢说了，这就是言论。对河北省委提了不少，你们还没有说我已知道一些，还有出版，你们至少有油印材料，你们有铅印的吗？（答：有）这不是出版的自由吗？集会，你们大会、小会都有了；结社，你们不是组织红卫兵了吗？游行，你们都游到北京了，还有点示威性质的，闫达开是站在前面吗？（闫：是）你们要走路来，天津到北京是小长征，四天就到了，应该让你们长征，如果你们走来，我就摆队伍到大门口欢迎，还把你们都请进来。秘书追着我告诉我这个消息，可得到了这个好消息，我正开会，我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很高兴。让达开带着游行很好嘛，晚上李颀伯告诉我，才知道你们上汽车了，我怪省委太体贴你们了。

李颀伯：我应该检查，我没领会总理的意图。

闫达开：我当时也没坚持。

总理还对大家说：你们还怕闫达开累着啊！你们说全部来，我说你们来廿个人，原来我叫你们双方都来十至二十个人，自己决定，可是你们不同意，说这是承认双方。当然要承认双方，就算他们是保守派也要承认，就连资产阶级议会也

还承认彼此。英国议会有保守党、工党、共产党，法国皇帝被推翻了，也还有保守党，无产阶级的为什么不可呢？总是有左、中、右的，政治态度上有区别，承认双方，不是轻视哪一方。刚才你们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左派，这是你们还认识不清，政治发展是分派的。中央对学生组织是可以承认几派的，要是一下子就统一起来，那才是迷信呢！不承认也会内部分派，思想动态永远无止境，如果都一致了，人类也就消灭了，因为没有矛盾了。现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到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就是这样矛盾的嘛！对立统一的嘛！

我打电话是通过李颀伯打的，没有什么阴谋，你们不要把什么都叫做阴谋，对敌人才是阴谋，对自己怎么说得上阴谋呢？到这里还是和你们二十个人谈，你们三百人来只能见面，或者我演说，谈话还是你们二十人。你们坐汽车了，他们坐火车来的，你们九点多到，他们两点到的，你们见到了没有。（众：没有）这不好，你们不见他们，这样的生活怎么过呀？这怎么政治斗争啊？不在一起怎么行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怎么能行呢？

孙桂香：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总理：可以告诉你们。（总理回头叫秘书，问他们在哪里？）

秘书：他们在化工学院。

总理：他们住在化工学院，你们去拜访嘛，都是同学嘛！你们是同等兄弟嘛！要不耻下问（总理解释：成语要新鲜，要不叫人误解）。大队人马总不能谈，你们要走来，我就欢迎了，这个精神没有发扬下去。

闫达开有胆病，现在又有些痛，他不叫我说，我得给你们说，他是好同志。你们精神用的得当，我们坚决支持，他们前面来，你们（指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面就来了，你们申述，他们也申诉。宪法有六大权利，毛主席常说：“我们规定的少了。”按毛主席的意思连罢工、罢课、罢税，请愿都写上。现在虽然没写，你们已超过了，事先放了假，你们就不用罢了。前一段错误路线时间并不长，也是在某些问题上，现在不能认为那一段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主席支持登出来的，你们想大字报能登到报纸上吗？我都想不到，只有我们主席才能这样做，才有这样大的决心，这是举世无双的。列宁死后，斯大林保守，许多东西不敢在报纸上登。这张大字报是有世界意义的。大字报登出之后，我们就宣布放假，这是在北京常委请示主席同意的。

不能把一个人做错了事，就把什么都说成错的了，一件事做对了，可又有的做错了。放假是北京同志们提出的，但是又出现了限制大字报，不让在外面贴等框框，束缚了群众，不要说犯了错误的同志一无是处。照毛主席的意思，放手就要放到彻底，只有毛主席伟大，如果你们要知道时间这么长，你们就一定走来了。

（众：对！）

米文智：我们可以走回去。

总理：好！可惜工作离不开，不然我可以跟你们走一趟，我这可不是激将啊，你们革命小将用不着我激将，你们应该激我的将。你们坐车花不花钱啊？

众：不花。

总理：不花，还不是国家的钱啊！你们有六权、四大，吃饭不要钱，这么多的民主权利，这么大的民主，要不要集中啊！你们看看民主集中制，最大限度的民主，要高度集中，你们有最大限度民主，只有毛主席敢下这个决心，你们也承认集中才来到北京请愿，这是上下关系，毛主席给你们最大限度民主。现在我向你们要求，要一点集中，集中到中央来，闫达开同志的问题不管多么大，这是要中央处理，你们说是不是？（众：是）好！好！你们承认毛主席的党中央，就让党中央来处理。（总理指着墙上的语录牌说）国家机关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你们会这样做的，由民主集中制发展到政权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是最大的民主，对敌人是最强烈的专政。

毛主席进北京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人民民主专政》，专政是对反革命，是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专政是为保护人民的！你们也得到了专政的保护。

专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武装方面，武装是专政的工具，就是人民解放军。林彪同志说得清楚，没有军队就夺不了政权，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取政权。

要依靠广大人民，对解放军必须尊重爱护，他们是保护你们的，你们同学们运动发展到“高昂”的时候，就挺身而出，有的就到机关里查材料了。有人介绍北航的经验，北航也要一分为二，坚持斗争的左派经验是可以推广的，但是他们冲进了国防科委有情可原，但不可以推广。热情好，但方法不可仿效，国防科委

怎么可以去呢？敌人还不乘机而入啊？要是推广这个经验，解放军可就忙了，要冲到这个地方，我们只好派解放军去保护了。

有的小将拦火车，十几个小将把火车拦住了，自己是红五类，上车查黑五类，又加上资产阶级黑六类，又加上黑帮黑七类。黑帮是反党阴谋，随便一问他能承认吗？热情可佳，但天真可笑。他们很得意地说是办了一件大事，上车检查一遍，一检查就三、四个小时，这样影响了火车的正常运行，铁道部急了，这个方法不行，只好拉解放军来押车，这样就分散了国防力量。

我们给解放军定了几条纪律，限制解放军要“五不”，讲话不动气，挨骂不还口，交涉不动手，打了不还手，受伤不开枪。不要对革命青年动气，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打伤了要说一句：“同志们，你们做错了一件事，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凡是革命的青年们，听了都会感动的。解放军是徒手保护你们的，人民内部矛盾也是复杂的，你们不知道界限，不知道没关系，知道就不会那样了。对毛主席的解放军要尊重。

另一个专政的法律工具是公安、法院、监狱，这是对无产阶级敌人镇压用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维持人民秩序的。比如警察，人多就要让警察来维持，专政的权力交国家掌握，应该信任我们的国家，党来行使这个权力，你们不要干涉。北京政法学院揪工作组斗，追查工作组的档案，我们没意见。最高法院副院长王××把材料藏到档案室，同学们就追到最高法院王不给，同学们拿大棍子给撬开了门（档案没破坏），我们出头了，给同学们做了工作，中央决定让王××停职反省，同学们送回了卷宗，撤走了设在法院的联络站。法院是专政机关我们要保护，当然监狱更不能进了。

第三、专政的宣传机关，对人民宣传，对敌人打击，这是新中国的声音，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所以，党所领导的报纸、新华社、广播电台，这些由国家机关掌握，不能由一部分同学去占用，消息登不登由新华社决定。你们的大字报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在大街上贴已经是最大限度了，外国记者抄去了，外电传出了，但《人民日报》、新华社不发表，发表就成为正式的了。有些地方还要保护它的尊严，有的在天安门两旁，人大大会堂的柱子上也要贴标语，我们说服了，这两个地方没有了，中南海的红墙上现在也贴上了，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

大字报贴的范围已经超过了，但我们还要等一等，慢慢说服，等同志们觉悟了，再慢慢来。

这三件事要抓紧。

今天只给你们谈一件事，就是给闫达开同志自由，今天既然到我这里来，首先要给他自由，信任中央嘛！专政只能对敌人，你们不用陪他了，你们同意的话，就撤走闫达开身边的同学。

你们同意吗？

众：同意。

总理：达开同志今天不让我提，颀伯同志还说没把握，你看怎么样，一讲大家同意了，同志们很懂得道理嘛！达开是个好同志，他很尊重你们，他有错误，他会检查的，这样你们就主动了，要不，保守派又要说你们限制他的自由了。今天我想谈的主要就是这些，前面说的是为烘托，是画龙，这一点是点睛。前边我说的也不是废话吧？对你们有帮助吗？

众：帮助很大！

总理：青年人一时想错了，想过来就是了，我不责怪你们，你们做错了就改，完全允许的。五十年前我们也有好些笑话，你们比我进步得多，我们很高兴，要不是时间关系，我可以给你们讲几个小笑话，当然你们也不是扣留他。

闫达开：不是扣留，是解决问题。

总理：当然你们的理由是怕别人抢走了，这点不行，回到天津也不能这样抢来抢去，我们电话通知他们，谁也不能再抢。前些日子我替李雪峰同志办了一件事情，雪峰在北大作检查，快完的时候从旁边插进来一支军队。

李颀伯：不是真正的军队，是学生，是红卫兵。

总理：他们说保护李雪峰，让他上了小汽车，后来抢到了政法学院，政法学院的工作组是最高法院派的，与北京新市委关系不大，雪峰同志检查四次的时候，我们认为就可以了，现在已经六次了。雪峰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让他检查得通过中央，北京五十九所高等院校，光北大就七、八个组织，每个组织都检查一遍，那怎么能行呢？

我已经答应他们（指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接见他们，我说你们是左派，就是左派，我不会两面派，当着他们的面我也说他们是保守派，说你

们是左派。但是不能说你们每个人的一切思想都是左的，有的时候就过了，是带引号的“左”，那就是形“左”实右啦！

看起来天津的事，我也沾上手了，要找我，放不下了。

李颀伯：（对总部的人讲）总理很忙，别的学校就别找了，错是我们犯的，这样我们心里就够痛的了。

总理：来也好嘛，来了总会有帮助吧？

众答：有很大帮助。

总理：我只解决天津工学院的问题，别的学校别来了。以后有什么，一概在天津解决。

现在我提三个方案：

第一是：你们全都来北京解决，我想你们是不会同意的。

第二是：只限你们两派争论和省委的关系，在这谈出一个头绪，回天津解决。

第三是：干脆所有的问题都回天津解决。今天是三十一日，你们要谈就耐心等待，等一个星期，我把时间安排安排，我不让你们回答，你们回去考虑考虑，我建议他们（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你们再回答，明天我见他们，以后还见你们一次，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问题。（指我们留闫达开解决问题）

我要预告他们，不许他们抢，要抢的话，说就要说重点，我下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需要去解决，我就谈到这儿，你们也别说了，反正我还再见你们一次。另外闫达开，李颀伯同志去跟同学们见见面，看看同学。

（闫、李表示同意）

（这时胡忠信代表天津工学院红卫兵、红战友赠给总理一个“八·二五”帽徽和一个经历过“八·二五”革命风暴洗礼的天津工学院红卫兵袖章。当把袖章献给总理时，总理伸出左臂戴上了我们的红袖章。总理在接到我们的“八·二五”帽徽时，关心问：“八·二五”是什么日子？

胡忠信：这是我们翻身的日子。

总理：噢！这是你们解放的日子。

最后，总理、闫达开、李颀伯等同志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2）》。）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十五名代表和共产主义红卫兵五名代表，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晚九点十分到夜一点多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接见了我们，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亲切交谈，总理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并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座谈中在座的还有华北局负责同志，河北省的负责同志。

晚九点钟，我们二十名代表来到会议厅门口，总理走出门外来迎接我们，我们看到了总理，满面红光，身体非常健康，走起路来十分强健有力。总理虽然年近七十，但脸上没有丝毫皱纹，我们心中万分高兴，为我们革命老前辈的身体健康感到幸福，总理同我们一一热情握手，我们的代表一一向总理问好，并代表全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和共产主义红卫兵全体战士通过总理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问好！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并祝林副主席、周总理身体健康！

我们向总理汇报了我院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一直到深夜一点多钟毛主席给周总理打来了电话，说有事研究，这时才结束了同我们的谈话。周总理带上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共产主义红卫兵的袖章。并请总理将我们的另两付红袖章转送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我们给总理带好了袖章，总理说好，我跟你们合影，合影后总理不止一次、两次的和我们亲切握手，我们个个心中都下定了决心，要听毛主席的话，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座谈开始，总理点名：“赵红旗！”赵站起来回答：到。

总理高兴地说：“红旗”这个名字很好！你是后来改的吧？

赵答：不是，从小就叫红旗。

总理：你多大了？赵：二十二岁。

总理：噢！这也可能。总理又点名：王淑兰！王：到！

总理：你是北县的？噢！是农村的，你们那地震怎样！（总理非常关心广大人民的生活，就详细的关切的问了地震区的情况）

总理：你回家了吗？现在生活怎么样呀？

王：我回家一次，你放心吧！现在没事了，家里都挺好的，照顾的非常好！社员干劲都很大！

代表插话：我们搞四清都在地震区，那里建设得很快。

总理：噢！你们在哪个地区！

代表：我们在隆尧地区。

总理：我去隆尧时你们在那儿吗？

代表：在！当时您在隆尧县委大楼下指挥战斗，我们有许多同学都看到了您了。

总理继续点名（这是无产阶级红卫兵的同志）“刘学敏！你是宁普的？也是地震区，你们那儿的房子盖了吗？”

刘：我不大清楚。

总理：你没有回去看看吗？也没有去信问问吗？

刘：没回去，家里也没告诉我。

总理：噢！家里人是怕你们惦记，你要关心嘛！往家里去信问问嘛！

（总理继续点名单，互相交谈着。念完了人名单以后，我们就开始谈起我院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同时提出我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袁血卒和中央××领导人的关系问题。）

代表：据天工红卫兵某些人说，天工红卫兵曾三次会见了中央××同志，交换了袁血卒的问题。

总理：噢，这倒是个新闻！怪事！××近年一直休假，更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接见红卫兵呢？

一个工作人员插话：大约一个多月以前接见过一次，在大会堂。

代表：一个天工红卫兵战友××在八月二十五日从京回校后说：“我这个地主狗崽子也到中南海兜了一圈！”

总理：这是吹牛！中南海大得很，在外边转也是转一圈。袁血卒是什么人？

代表：袁血卒是我们学院的党委付书记兼付院长，是广大革命师生揪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经省委批示了。

总理问×××和×××：是吗？

×××：（点头）批示了！省委同意批斗。

代表：可我们批斗袁血卒有人说是大阴谋。

总理：黑帮揪出来，你们就斗嘛！怎么斗黑帮还是大阴谋呢？哪儿那么多大阴谋。

（此时总理马上派人用电话去调查关于袁血卒和××同志关系的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

代表问：袁血卒的大女儿在天津市一女中上学，据说她近来请假回家整理他爸爸的材料，就等××或总理的一句话了，只要有××同志或总理一句话她爸爸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总理：这种人就是吹嘘！我根本连知道也不知道，连认识都不认识，怎么把我当成他的后台？这更证明他是好吹嘘的了。

（电话，此时调查报告送来了）

总理念调查报告：天工红卫兵代表共六个人，通过文革小组介绍，合乎手续，九月二日××接见过他们一次，他们要调查袁血卒的历史问题，××介绍他们去中央组织部，并告诉他们袁血卒过去的历史问题已经作了结论，不然就不会派到天津去工作。他们向××也汇报了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并将他们的材料转给文革小组，以后又来了，没接见他们。另外，中央办公厅付主任×××接见过他们，但从没给他们（天工红卫兵）写过信，×××同志说：“我从来没给任何一个红卫兵写过信，只是接见过他们。”

接着又谈到中央××领导人支持天工红卫兵的问题。

总理：是革命的就要支持，你们要是不革命我就不和你们在这儿谈话了。我支持你们，他们我也支持，这不能说是折衷和稀泥，思想总是在变动，都是有先进与落后，代表提到左派和保守派的问题。

总理：关于保守派问题，好好检查自己的思想，党内也有中间的，偏右的，各个队伍中都有左、中、右，不过左派有的多，有的少，左派和先进派一开始都是少数，经过团结和争取可以变成多数，而多数在新的形势下又可能变成少数，

青年人的思想变化很快，一时一个变化，左，是有限度的，左的超过了限度就下来了。我和第二司令部谈过话，北京××学院马上开始整风，他们过于相信工作组了，我问他们什么叫整风？他们说：就是让过去受过他们打击的同学也参加整风，让他们给予批评，给提意见。这好啊！这很有涵养。他们给我写了信，我给他们发表了。当时还有××学院热烈支持响应，北京各派也还有分化，目前达到高潮。

（我们和总理谈到大方向的问题。）

总理说：我对北京院校讲的话，我现在还认为原则是对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好，八一八红卫兵也好，其他各种名字的红卫兵也好，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都是以十六条为纲领，那个红卫兵也承认这几条，大方向能说不？你们的领导是毛主席，方向是毛主席指示的方向，纲领是毛主席亲手制定的纲领“十六条”，大方向当然是对的。你们应该统一但又不能统一，这是个思想态度问题。左、中、右反映一定的阶级社会存在，先进开始总是少数，争取多数就要排除右倾错误思想，成为多数以后，又出现新的错误思想，不断排除，不断进步。阶级消灭了，思想也有左、中、右，思想没有变化了，人还有什么意思？有了保守的，就得排除吗？在斗争实践，锻炼自己嘛！

代表：可说我们大方向是错的，因为我们和省委进行了辩论，我们的大方向就错误。

总理：你们是绝食的？

代表：不！我们是反对绝食的。

总理，你们是少数受压制的？

代表：是的，这个问题，都知道。（汇报十月二十七日的情况。）

总理说：天津武斗这么严重？抢东西砸门这是不好的。应该讲道理，要材料追查材料，中央要发一下紧急通知，解决这个问题，该交的交，该烧的烧，因工作组接受领导的路线不能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

代表又讲到十·廿七事件×××用大汽车开路的问题。

李颀伯说：确有这事，×××只得这么检查，再详细就不好说了……。 （然后代表提起长征的事）

总理：长征问题，进行徒步长征，陈伯达同志给讲了一些，大学生跑到人民日报社，并且和陈伯达同志吵，说陈伯达同志搞阴谋，大串联这是毛主席提倡的嘛！北京学生南下的多了，走了还回来嘛，并且也不是叫你们都去，在纪念鲁迅大会上接见时还谈了这回事，有人说：北京学生都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搞法？两条路线斗争，不是同学之间彼此斗，不是你那派斗我这派，也不是我这派斗你那派，不希望同学斗同学，保守派不是百分之百都保守，观点有错误，可以改正，不断地变，路线斗争不是一方走了，就不能进行，走了还要来嘛！路线斗争是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路线错误是领导不是学生，学生受影响受蒙蔽，应当解脱出来，你们可以讨论，讨论什么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同志讲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三种提法差别在什么地方？少数人就不能搞路线斗争了？三个人在一起就可以争论，我和我的秘书在办公室里就进行讨论，人的思想斗争反映路线的斗争嘛！比如我吧，脑子里也有保守的东西，经过我想之后，排除了保守的就先进了一步，昨天的稿子，今天改了几个字，这就是斗争，人的脑子要象石头那样僵化，那也无所谓人类了。

不要你打我我打你，这就是斗争，我今天就讲这些了，你们把全部的问题想一想，关于你们同那红卫兵的争执和省委的问题是在北京解决还是在天津解决，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保证不武斗，我保证说服他们不要武斗，他们打你们，你们也不要还手，这不就停止了吗？省委的问题是另外的，他们要检查，争论我不参加，我参加了就不能办别的事了，我只能给你们扫清障碍，打人的事可以解决，以前你说他们打你们，他说你们打他们了，并且也找些借口，刚才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可以和省委解决自己范围内的问题，你们要按十六条办事，听毛主席的话要坚持下去。

不要堵省委的门口，有子弹就炮轰，堵门口省市委不能办公，始终堵住不放，那省市委的工作怎么做？

十月十八日晚上的会议决定发一个紧急通知，召开省市县三级干部紧急会议把中央的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了，以前党委和各中央局有些被动，有些地方连中央精神也来不及传达，社论一发表，红卫兵就起来了，就冲来了，这样也好嘛！使我们的干部受了锻炼。

×××：那个材料我们省委强挤了两天时间念了一遍。

总理：这次我们吸取教训了，所以用 10—20 天时间充分学习领会精神，你们好好整整队伍，不然会分化的，北京这边象××和××大学都化整为另了，××大学分化到一百多个战斗组织了。各种思想都在变化，这就要内部好好整顿，提高思想水平，必须按十六条整顿，把思想水平提高了战斗力就加强了，当然我说的是思想战斗，一旦国家有事情，你们就成了后备队了，以民兵为标准了，目前还是个文化战斗队，这俩书记（指×××、×××）不能留在这儿，我的意见不再对这个争论下去，要高举主席思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就会胜利。

我不赞成留在这里，天津的问题在这里不好解决，我只帮助讲些大道理，不是保守不可变进步，左派也可能变成保守，政治态度是可以变化的，保守可以变进步，左派超过界限就可以变成保守，革命左派不是自封，也不是别人恩赐的。

你们天津工学院的问题我不了解，我们也不想参与你们的问题，你们不要往里拉我，我相信省委挺身站出来检查，省委解决不了会派人去，但决不是我。

现在把打人骂人取消，你们不打他们，我说服他们不打你们，你们大本营在天津，你们可以写材料给我，我可以看看，也可以转给中央文革小组，我一再讲，我不参加你们的争论，我不做总裁判，×××、×××在北京总要和你们谈一次，派代表还是全体？（×××插话：派代表）我认为代表好，派代表可以坐下来谈问题，人多了一起哄怎么谈问题？象现在这样打不起来，人多了就不能保证了，我还相信省委，你们可以再找找看，省委再解决不了，可以再来嘛！进一步解决要靠自己努力。

总理问：你们知道我给他们（天工红卫兵）讲什么了吗？

代表：我们不知道。

总理：没有告诉你们吗？代表：没有。

总理：我和他们讲了些大道理，都是主席的大道理，最后我向他们提出一个要求，要求恢复×××的自由，他们很快答应了，不要那么紧张，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怕别人抢走了（指×××），听说你们今天也抢了，是吗？

×××：没有抢，是我们去看他们的。

总理：听说你们还要扣留他们？

×××：没有扣留，你打电话要我们一起接见，我们马上就来了。

（接着我们又谈到长征问题）

代表：根据我院的情况是否适合长征？

总理：徒步串连到工农中间去嘛！做长征打算，整个大串连要经风雨，见世面，要有准备，有个安排，从现在看，春假文化大革命是结束不了的，可能到暑假才能结束，从长征利益着想，还是把事情处理好，长征不是小事，凭一时激情不行，应该做好准备，应该好好安排，长征到社会上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昨天见你们（天工红卫兵）也谈了这个问题。

我正在开会，听说他们弄着×××步行到北京，不管是他们弄着×××，还是×××带着他们，二百多里地嘛！来个小长征嘛！锻炼、锻炼！当我打电话告诉×××不要派车去接他们时，可是已经晚了，他们已经上车了，看来长征不是容易的事。

代表们谈到搜身、封门的问题。

总理：搜身！我反对这个行为，封门搜身是错误的，广播器材共同使用，只能平等相处解决问题。

总理：我反对这种作法。

最后出来时，家在地震灾区的同学对总理说：总理请您转告毛主席，灾区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生活非常好，灾区人民无限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请他老人家放心，总理的问候是对灾区人民的巨大鼓舞。

（此材料根据座谈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如有错误之处我们负责）

天津天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小组整理 11 月 13 日

（来源：《大字报选 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报选编小组，1966.12）。）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在座的有：天津大学红卫兵代表六人、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二人、东风大学（师院）红卫兵总部代表二人、天津高等院校红卫兵总部代表四人。在座的还有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李颀伯二同志、省市联络站站长杜长天同志、华北局卢志彬同志、省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儒洪升同志。廿二点五十分左右总理来到会场，代表们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然後齐问：周总理好！周总理微笑着和大家握手，问代表都是哪个学校的。各校代表向周总理献袖章，周总理戴上了

东风大学红卫兵联合总部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总理开玩笑地说：他们也让我参加红卫兵，你们也让我参加红卫兵！代表们说：两个都参加！周总理笑着说：那人家该说我是折衷主义了！代表们都笑了。然後，总理点名熟悉人。】

总理问天大：你们住在那儿？答：华北局。

总理问：你们总部在北京有几个人？答：两个人。

总理问：你们来京干什麼？答：学习。

总理说：中央同志讲话你们都看到吧？听说你们互相传说，连陈伯达同志讲话的草稿都传出去了，都传错了。代表说：我们没传。

总理说：你们二十五个大城市的革命师生在京都参加了哪一派？都是一派吗？你们之间是什麼关系？答：只是互相学习，联络传阅一些材料。

总理说：第一步只能是学习，联络第一步只能搞全国的……当然了，全国也可以成立，不过大家得承认。

你们想谈什麼，我对你们毫无所知！（笑着说）上次接见第二司令部时，×××来了。我以为你们（是指某校红卫兵）是和第二司令部志同道合的。保守也不是固定的，是要分化的，主席接见都是说接见革命师生，不能说接见“有革命的，有不革命的。”青年人的思潮是起伏的，分一时期又合，合一时期又分，有左、中、右之分。左的先进一点，坚决一点，看问题远一点。左派要争取多数，把中间偏右的说服过来，多数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新的观点出现了，又要分化。青年学生总不能象我们伟大领袖那样能把人们思想集合起来。主席是经过几十年革命考验才涌现出来的，经过几十年奋斗，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是不可更改的，青年怎麼能够呢？从路线斗争，社会的斗、批、改来看，要想把这个任务完成，半年是不够的，大中学校放假闹革命延期到明年暑假，我们透露过几次了，现在确定下来了，要公布。经过一年的考验，更多的锻炼，对你们有好处。

（接着代表提到总理上次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时所说保守派问题。）总理说：都是革命学生组织嘛！有左的，有中的，保守是中间偏右一点。毛主席接见的革命师生，有革命的，有不革命的。放假革命嘛？有的保守一些，後来改进了，有坚定的，有动摇的，这种状态完全可以理解。有闹的坚定，有闹的动摇，这种状态常发现的。看北京的红卫兵。开始两个，後来几个，几十个。清华也分化，革命师生大家志同道合，朝着一个方向，起伏不定，总是经过一个考验时期，有

左的，有中间的，有偏右的。左的要说服大家，团结大多数向前进。先进的可能又有变化，又出现了新的观点。我们的伟大领袖是经过几十年考验奋斗涌现出来的。在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心中是不落的红太阳。青年人嘛，这个问题，这个人看得准一点。哪个问题，哪个人看得准一点。斗批改，破四旧，立四新，把初期革命完成，半年是不够的。大学中学要延长到明年暑假，时间不能短，短了不能考验一个青年，时间长对一个青年有好处。

你们不同於我们当年闹革命，匆匆忙忙的，时代不同了，你们处在社会主义，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根本变化了。你们太幸福了。现在有毛泽东思想，有利得多，放手让青年闹革命。我说老实话，没想到过，做梦也没梦见过，我也没做过这样的梦。你们梦见过？（把大家问笑了）也许有人幻想过。但是，只是幻想，不是现实，现在成了现实，道路还不是你们走出来的。现在实现了，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主席批了一张大字报，威力就那么大！运动轰起来了。第一张大字报是聂元梓等七位同志写的，不是主席写的，是主席批的，主席抓住了，公布了，其作用多大！这还不是群众的创举？

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登报後，想不到大字报满天飞。原来想大字报有两个内外有别，国内外和校内外，不让贴在街上，外国人不能看，初期这些苗头就是怕。现在看来是保守了。利用工作组打击群众，压制群众，以致发展到围攻群众，形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都登报了，大字报都贴到大街上去了，还有什麼内外有别，外国都知道了嘛！这就是主席的伟大！报纸一登就冲破了界限。要冲，就得有大字报，没有大字报怎麼冲破呢？这就是群众的智慧和领袖的英明决断相结合。

以前四清，工作组需要一点，人不要多，主要依靠群众，放手反动群众。人多了搞人海战术，包办代替，就不好了，冷冷清清也不好，廿三条给纠正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反动群众，特别是学生放了假，又不让他们搞，这是矛盾的。……北大陆平撤了职，党委解散了，六月初在北大开始派工作组是必要的。主席说要少派，最好不派。但是全面开花了，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天津没有派，但党委和工作组差不多，总想包办代替。（李颀伯插话：天津只是师范学院派了。）主席早看出来，要让群众自己去闯，既放手就让大家闯，运动初期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凡是革命运

动都是这样。目的是整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好整有错误的也好，总得自下而上轰一下吧！

不过，群众起来闹革命，出现这么多组织，没想到。原来只有一个文化革命小组，十六条确定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十六条把这些写上了。群众不受这些限制。这方面，中学比大学强。首先红卫兵是中学搞的，中学生比大学生闯劲就大。我参加过你们小弟弟、小妹妹两次座谈会，他们说大学生是“策略派”，照这样说，我们就成了保守派了。（笑！）就是他们革命，当然这么说是片面的，但红卫兵首先是清华附中闯出来的，而不是清华大学闯出来的嘛！更大的创造性是出现红卫兵，红卫兵这个名称我们都没想出。

清华附中成立红卫兵写了三篇大字报。《造反有理》，主席看了很称赞，给以支持。这就是群众创造的智慧，主席的英明果断。八月四日我到清华讲话，代表主席对红卫兵表示称赞，欣赏。那次以后，全国就轰起来了。到“八·一八”，毛主席肯定了，主席带上了红卫兵袖章，这下全国都有了。这是谁创造的呢？还是群众，主席一下子抓住了。新事物总是由群众产生，领袖的英明智慧把它抓住。

天津没有北京组织多。红卫兵……分几派。革委会应该是革命师生的统一战线，一百天了，还没统一，聂元梓领导的革委会也有部分人不拥护。全国还没有一个像样的革委会，原因是青年的思潮起伏大，有的组织校内的、全国的，有的组织到边疆，有的想成立国际红卫兵。国际红卫兵人家不承认不行。日本几个红卫兵镇压下去了。坦桑尼亚有几个朋友带着我们红卫兵赠给的袖章回非洲，在机场上人家检查，学习中国红卫兵精神，不让检查，报纸登了，说中国红卫兵闯进了非洲。坦桑尼亚会不会发展红卫兵，这要看它自己的条件。

红卫兵在国内如雨後春笋，这个发展，还会继续一个时期。红卫兵在学校发展，也向校外发展，还要向全国发展。时间拖长，放假到明年暑假是必要的，给你们个机会。

开始时，北大的班与班、系与系不能串联，后来主席一批判这个错误路线，学生们马上冲倒社会上去了，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我们有些被动。后来主席接见大家，又坐车不花钱，后来派专车，后来吃饭不花钱，这就主动了。我向你们介绍这个经验，要紧跟毛主席走。

你们思想有个时期保守是可以理解的，革命往前进嘛！就象运动员一样，有先进的有後进的。这不等同於法国保皇党，他们公开承认自己是保皇党。资产阶级政党，他们至死不能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潮是起伏的，本来是前进的，不能认为一个问题上保守就不能前进了。对於某个问题陷於保守，没关系，不要气馁，懊丧，我看犯点错误对你们有好处，错了就改，没关系。北医的整风空气很好，极“左”的不相信，我看人家是有诚意的。第二司令部有几个单位说要整风，我问“闭门整风吗？”他们说：“不！是开门整风，先让左派批评我们，然後自我批评。”这一句话就证明他们（指北医）的主席思想学得不错嘛！相当不错！左派就不犯错误？我不信，犯错误就改嘛！阶级兄弟嘛！宽人严己嘛！又不是敌我，还能幸灾乐祸吗？敌我之间才能幸灾乐祸。同志们有缺点，有错误，要帮助他们，自己有缺点，有错误也要欢迎别人批评。

（总理说到这里，问了问各校的情况，天大红卫兵提出两方面红卫兵中五类多不多的问题。）总理说：红五类是北京中学生提的，开始时为了成份纯是可以的，但作为唯一条件，绝对化就不妥当了。红卫兵的条件总不能比党员还高吧！征兵条件是要求严的，要贫下中农、工人等，但表现好的还可以嘛！初期我们支持一下，解释为红五类为主体，还有四肢嘛！我们对新生事物是欢迎支持的。欢迎是第一。以后发展到适当的时候，再指点指点。新生事物开始时总是毛手毛脚的。红卫兵发展到现在还那样能行吗？小孩总是成长一段才教他走路，说话总不是一开始就教。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的讲话，开始总有些偏向，陈伯达同志曾批评过她，因为出现了严重错误。象谭力夫的发言，那就是错误的，六，七月里可以，到九月、十月再偏激就不应该了。太阳刚出地平线时的红不是真红，是地平线的反射，升到东方才是真红，才能发出它真正的光辉。最近不是传着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吗？那是初稿还没定稿，有许多字都传错了。象主席那张大字报也传错了。你们还得跟着改。这样传对国家机密不利。

这半年，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放假到明年开学（九月份）还有十个月，时间很长，自己要很好计划，如何搞学校，社会上的斗批改，如何和群众相结合，各单位领导要掌握运动的规律。一个时期有些同志前进一点，有些落後一点，没多大距离嘛！原来前进的不要骄傲，一骄傲就会落後，和运动员赛跑一样，那是运动赛跑，咱是政治赛跑。

总理看表说：十二点我还有会。接着说：

今後你们的事情还很多，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外地来的见了主席还不走，占着地方，再来的没地方，送不上饭，天又这么冷，在外面坐着，怎麼能行呢？

永定门车站又来了三十万人，我要去为三十万人服务。现在外地学生还有一大批都见过主席也不回去，你们天津的是得天独厚，不应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离北京近，你们回去做做动员工作，让出地方来让外地的住，现在大学都串联去了，把大夫也都带去了。外地同学无法住，这不好。这次来的中学生多，乡村来的多，他们比较老实，不象城市的那样调皮，这也不是不变的，在城市呆些日子也会变，存在决定意识嘛！现在居民区三分之一住上了，（原稿如此）六十所高等院校最大容量三十万，现在只接待二十二万，原因是有见主席後不走的。现在北京已有二百四十万，你们倡议倡议，带带头，让一让，在北京少留人，你们这儿留有多少人？（答：没有多少人了，大家都回去了。）好，那你们更有资格说话了。

天津大学的问题有特殊性，你们和第三司令部联系没有？反映情况没有？

（答：联系了，反映情况了）你们和第三司令部联系，这是一个办法，你们自己还要搞出个样子来，做个榜样嘛！（大家递材料）总理笑着说：××的事我再声明，我不陷进去了，北京我已陷进去了。

（有人把某校红卫兵印发的：“号外”——说总理说他们是左派——递给总理）总理很不满意地说：发“号外”，捧自己，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於你们学校的问题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你们寄份综合材料（一两千字）给我，明天上午十二点交给我能行吗？（答：行！）

你们先别走，留一天，後天再走，我派报社同志到你们那儿了解。派人到××，到社会上调查。调查清楚了才能解决嘛！

现在省委只能做团结工作，现在省委能召集两派到一起开会吗？（答：不能）不，有一派很好嘛？打了不还手，骂了不还口，象解放军一样嘛？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高举十六条。

天津有一个问题，省委可以检查，听说你们做得很好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时南大、天大、东风大学都汇报了一些基本情况）总理说：你们真的受压制，可以写材料交给我看一看。最近一天先别走，可以派中央同志和记者去了

解你们的情况。我只有五个秘书，主席让建一个班子，很忙，让他们了解一些情况。

（提到打人）打人是错误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十六条这个文件规定的嘛！

（这时有的代表问：关于长征问题。）总理说：最近就要发通知，十一月廿日停止来京，因为天气冷了，明年春暖再来，再搞免费乘车到北京，还有充足时间来。停止期间在省范围内搞徒步长征，先搞个试点。各个省可以在短距离内搞试点，中央搞长距离试点。中央搞全国试点，为大家设计路线、粮站等。我们打算在北京搞个徒步串联访问站。今冬作典型试验，明春可组织，我们可以帮助。有人要走长征路，但要做好准备。以前我们过草地、爬雪山是夏季，还披羊皮。现在自然变化不大，必须做好准备。以前长征有两个敌人：一个是阶级敌人，一个是自然敌人。现在只有一个自然敌人。长征时要宣传主席思想，和群众相结合，就是走马观花，你也得到群众中去，参加劳动，群众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向社会作调查，作阶级分析。这是主席的基本功！毛主席的《实践论》我们要学习好。我今日到主席哪儿去了，和主席研究过，长征不能一天走得太多，开始十几天走得多一点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李颉伯同志插话说，有的计划一天走一百里）。总理说：长征时还要搞分工，计划、社会调查、做工作，一天走五十里就不错了。

（当我们提到黑材料问题时）总理讲：关于黑材料等问题，透露一下中央有新的决定精神，把那些档案都烧毁。（当我们讯问后）总理又讲：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中从五月开始整理学生的材料，档案都要销毁（这时×××同志插话：总理还有一个补充，就是无论是对方搜去的或交去的，都要交出公开烧毁。）接着总理说：对，有这样一条，各方派代表一块销毁，过几天后就通知发表。

（总理接着谈着，看表。时已零点三十五分了。）急忙说：好，我得去开会了，解决那三十万人的事情去了。说着走了。接着阎达成，李颉伯等同志又和代表谈了谈。李颉伯同志说：你们和另一方要坐下来，达成协议。我们的总方向是一致的，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要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如果象打人，武斗，砸东西，这让我们说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我们的态度是这样，革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做法我们不同意。有的人贪小便宜，总要吃大亏的，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也就是革命人办革命事。

阎达开同志说：你们给总理写报告时，也要检查自己的错误。

（来源：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第三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徐立清对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讲话

〔徐立清：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者：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直属战斗兵团代表。〕

听了你们的发言，综合为以下五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有些意见是个人建议，有些是传达上面的指示。

一、大家最关心的是要求澄清有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三条批示。告诉同志们，有这三条批示。这三条批示是怎样来的呢？是在十二月二日南京军区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反映上海市有很多荣复转退军人组织，其它城市也很多，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有些地方不那么好，上海组织比较多，上海警备区被冲击得很厉害。因上海是国防前线，南京军区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三条建议。林副主席报告毛主席，同意这三条意见，答复南京军区，并发各大军区，告诉各省、市委，全国照办。这三条批示是：

（1）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单独成立红卫军和其它名义的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

（2）不准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和散发传单。

（3）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且协助人民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想，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什么批示这个文件，是不是不相信我们呢？不是。上星期六京筹备处的红卫军要见总理，是我接见他们的。他们问，是不是不信任？不是的，正是信任，为了发挥更大作用。我们转业军人是参加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有他自己的单位，都要搞文化大革命，所以要求参加本单位的组织，在本单位的群众中起带头作用，单独成立组织就要脱离本单位的组织。另外，本单位的群众参加本单位的组织，再参加其它组织，时间、精力一定有困难。因此，就应主要去和本单位的群众一起去搞。荣复转业军人在社会各方面都要起骨干带

头作用，不仅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也是本单位的主要力量。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组织，这样会不会妨碍我们的革命积极性呢？不会的。可以和群众一起搞，起骨干带头作用更大，精力也来得及。（念十条规定第二，八条）

我想，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示考虑这些是正确的，当然你们单独成立组织也是为革命。（有人递条子，要看文件）这是电报，电报密码是机密，不能张贴。我是亲眼看见了批示，因为他们没正式向你们传达，出了大字报。警备区说他们没贴大字报，是谁以警备区的名义搞的，要查清。如果是警备区贴的，这是严重的错误。周彪同志七日应当看到，他为什么不向你们讲，这是错误的，所以你们怀疑是有道理的。

大家谈了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这是很好的，但这里要提一下，如果思想不通，毛主席说要打通思想，如果不通，怎么办？我建议，可以由你们负责同志代表和群众共同决定，是解散还是不解散，如果思想不通，可以同群众商量，自行解决。北京、中央军委只是宣传，但决不能强迫命令解散，省，市委也不会这样做的，你们要作为解放军也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是说服，决不会压服，要解散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是外部，省市委、省军区都可以帮助你们做好工作，把内外工作做好。如果确实困难很多，不能强迫下命令，你们商量好了，解散不必很着急。（李正君代表全体交袖章）你们这种精神很好，但还要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再肯定一句，第一是主席指示，确确实实。第二，听毛主席的话，要执行，群众不通还要商量，如果说要保留，军队决不干涉，不会说黑组织，要做好工作。

二、如果解散了，我们如何交代，会不会说我们是黑组织，打成反革命，受打击怎么办？把工作做好了，一般是不会的，省、市委也不会这样做，因建立组织时还没有这个批示，现在听毛主席的指示是好事，原来组织也不是错的，是为革命。所以没有理由批评你们，如果批评你们是错的。当然有些厂矿领导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可能打击你们。现在有十条规定，第二条和第八条，领导不执行，你们可以造他们的反嘛！他们想打击迫害你们，十条规定的第八条就有保证了，真正革命同志一定保证政治、经济、人生不受迫害，如果不执行，你们向省市委、军区反映，必要时派代表来北京。

三、警备区的问题，市委的问题，你们按十六条办事，警备区传达方法不适当，应先向民兵讲，如果威胁你们，架机枪，挑动群众斗你们、打你们，如果事实确实是如此，警备区是犯严重错误，要受纪律处分。郑副司令员去了解，事实有出入，大字报他们没写，摩托车问题他们不知道，是某部队不受警备区领导，是偶然误会，应该谅解。群众斗、打，是不是他们挑起来的？若是他们挑起的，是严重错误；如果不是，是群众自发的，看警备区采取什么态度。如果袖手旁观，不理也不对，应该说服群众，如果没有采取这个态度，也是不对的。有什么事实你们还可以讲，北京军区会调查，并严肃处理这个问题。警备区主要做民兵工作，同时也要关心复员转业同志的工作，关心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当然，政治生活、物质生活，要靠本单位解决，解决不好，可以向人民武装部门反映，如果我讲的有出入，你们还可以揭发，由北京军区调查处理。

四、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群众受到打击，受到压制，明天还有同志去你们那里，你们可以谈。如果确实打击、压制，应回本单位去解决，错了就应当平反。过去的事情希望同志们看大问题，过去的问题，不一定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问题，按紧急指示办事。如果过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揭发批判。

五、想见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问题。毛主席七十多岁了，不仅管中国的革命大事，还要管全世界的革命大事。林副主席管全国、党中央，事情很多，不要要求接见，照顾他们的工作和身体健康。但可以向同志们建议：建议周总理接见你们，是集体接见，会后开座谈会，只能接见代表，建议你们派代表，最好象今天这样，不仅接见，还要开座谈会。今天的意见，我保证向周总理报告，接见时不可能都发言，有些重要的问题，周总理会答复你们的。建议你们留一部分代表，大部分同志回去。周总理接见后，讲话回去要传达，不必都住在这里，你们住在这里条件差，病了也不好。你们着急，厂里的同志也很着急，可以留代表在这里。

总之，三条指示是传达，其它意见是我个人的。同志们都在人民军队里做过工作，希望站在战友的立场上，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毛主席语录》第八十九页“人民军队”第二条）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毛主席语录》第二三三页，第三段）

有些同志立过功勋，在当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必须保持光荣传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坚决地执行十六条，模范地抓革命、促生产。

向你们来京的全体同志们问好。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4）》。）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给天津建筑材料公司造反队的指示

1967.01.18；中发 [67] 26 号

各地党委：

天津建筑材料公司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来电报说，他们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把公司批准给他们的三千九百多元钱和附加工资，全部上交银行，进行封存，等运动后期处理。中央认为：天津建筑材料公司交银行的做法好，赞成他们。

中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

（来源：根据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北京：1967年5月）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中共天津市警备区的报告

副司令员并军区其他首长和全军文革：

现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报告如下：

这是一个初级中学，一千三百多人。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仅五六十人，组织多而乱，不少组织斗争方向不明确，有武斗现象，学校冷冷清清。经一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学校面貌，到校人数达一千一百人，广大革命师生更加热爱毛主席，提高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三性”大大增加，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

结合”的临时委员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出现了公物还家，节约闹革命的新风尚。三月一日复课后，掀起了“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实践证明，毛主席“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的论断是非常英明、正确的。我们的体会是：

（一）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针对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针对师生中存在的问题，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深刻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使广大师生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分清敌、我、友。接着以整风的方法，反复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整顿了组织，克服了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为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扶持新生事物，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新形势下，中学广大革命师生应采取什么样组织形式，实现全校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呢？起初想以战斗组织联合，但争论了二十天没有结果，组训五连学生二月十六日写出了“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第一张大字报。但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便立即显示了它的极大感召力，两天内就有十五个教学班联合起来了。可是这里也出现了一些阻力，有的学生说这是“折中”、“调和”、“和稀泥”、“大杂烩”、“破坏文化大革命”、并扬言赴京“告状”，这时组训部队的团党委及时组织广大师生和干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组织任务服从政治任务”的论述和“红旗”三期社论，大家认为方向对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

（三）狠抓大联合的活思想。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组织在运动中作出了贡献，建立了感情。现在回班闹革命，就产生了不少活思想，搞不清大联合和战斗队的关系，怕失掉“地盘”，怕丢“官”，怕回班受冷遇等等。总之“私”字作怪。我们反复宣传了大联合的意义和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的好处后，广大师生一致认为这种形式有利于大联合大团结，有利于“三结合”，有利于整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抓革命、促教学，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整顿、巩固和发展统一红卫兵队伍。一句话，有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彻底完成学校的斗、批、改任务，同时并发动所有干部和师生的骨干做好每个人、每个队的思想工作，使大家愉快地回到教学班，归口闹革命。

（四）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起来后，组织大家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八条）各教学班选举了文革小组，遵照八条精神，由下而上整顿和发展工作过程中，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已发展的五百二十名红卫兵中（占受训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劳动人民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红卫兵整顿后，战斗力大大加强，已成为复课闹革命的一支先锋队。

郑三生 赵瑞伦 杨竹亭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 三月七日 根据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人民日报》刊印。已节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有手稿）

注 释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等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关于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给北京军区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说，天津市延安初级中学在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组织多而乱，有武斗现象。经过一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面貌，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三月一日复课后，掀起了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一起转发给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这

个批语，并拟题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指示》。因这个批语写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因此又简称为“三·七”指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及附件

1967.03.08；中发〔67〕85号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

现将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毛主席所加批语，对于学校的军训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请你们向所有参加军训的工作干部和全体师生传达，组织大家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天津延安中学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天津延安中学红卫兵团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组织——天津延安中学革命大联合的体会》

红卫兵战友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

我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热爱、无比崇拜的心情，万分激动地向你们报喜：

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延安中学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革命大联合。并且整顿、巩固、发展和统一了红卫兵组织。建立了革命学生、革命教师和革命干部“三结合”的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三月一日复课后，掀起了一个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大用“老三篇”、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出现了人人学毛选，人人做好事，公物还家，节约闹革命的新风尚。广大革命师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整个校园内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形势好的很，而且越来越好。

毛主席派解放军同志来我校进行军政训练，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支持！我们由衷地感谢解放军同志，由衷地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们的体会是：

（一）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针对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

我校在军训前，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战斗组与战斗组之间，互相攻击，互相拆台，互不信任，互不服气，不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群众；有的组织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滥发“宣言”，招兵买马，结果成了大杂烩的“杂牌军”；有些组织的“头头”滋长了占山为王，称王称霸的个人主义思想；也有的组织和社会上的落后组织来往密切，并参与了一些打、砸、抢活动。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敌我不分，阶级界限不清；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作怪。针对这些问题，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我们首先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同时深刻揭发、批判和控诉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增强了广大革命师生的阶级斗争观念，分清了敌我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运动中受了血统论的影响，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其它战斗组错误地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视为主要批判对象，先后将“红卫兵”连部抄、砸十余次。在学习中，大家深刻地懂得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道理。“造反兵团”的战士们说：“对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他们现在的缺点，又要看到他们在运动初期横扫四旧的功勋；既要看到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又要看到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因此，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团结——批评——团结’的教导，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认真检查了自己由于受血统论的影响，而不能团结大多数革命师生一同闹革命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宣传队”和“先锋队”为争一张桌子，互相攻击，认为大方向全然不同，三个月不说话。学习中认识到，这样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双方开了团结会，表示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接着，以整风的方法反复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

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整顿了思想，整顿了作风，整顿了组织。克服了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组织纪律性大大加强，一心为集体，一心为革命的思想大大发扬。学生满玉珍在助民生产中，压断了社员一根扁担，他想到毛主席“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陪”的教导，跑了二十多里路，从家里拿来了一根还给了社员，社员感动的说：“你们真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好后代。”原来战斗组所占用的房屋，电话、桌椅、办公用品和“抄”来的东西纷纷上交。广大师生自己动手修理门窗桌椅，还把原来的大袖章改成胸章。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已成为广大革命师生自觉行动。

广大革命师生，积极响应毛主席“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伟大号召，纷纷回到教学班，和同学们在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亮思想，斗私心，破私立公，一起开“讲用会”，一起劳动，放下架子给同学打水，热饭，打扫卫生，修理桌椅。老师们的模范行动，使广大同学深受感动，有的主动找教师检查自己的缺点，互相谈心。从而消除了隔阂，改善了关系，加深感情。

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广大革命师生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消除了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隔阂，增强了革命师生内部的团结，为实现全校大联合及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好的很！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下，中学的广大革命师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实现全校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呢？起初想以战斗组织联合，但有的战斗说：“我们的人马壮，粮草足，力量大，要联合就得以我们为中心。”有的说：“我们的人手虽然少，但论时间我们最长，论资格我们最老，论贡献我们最大，当然应以我们为核心，其它组织向我们靠拢。”还有的组织说：“我们的人数虽然少，成立时间虽然短，但是我们可以发展壮大。”没参加组织的说：“战斗组织不可靠，看看再说吧！”他们还说：“各个组织都是跨班、跨级、跨校，这样联合起来，将来怎样上课呢？”争论很激烈，各有各的打算，都想各霸一方，

自立门户，占山为王，担任“当然领导”。就这样，争吵了二十多天也没有结果。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组训五连（二年九班）学生于二月十六日贴出了“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个倡议立即轰动了全校，绝大多数战斗组织的战士表示，这个倡议好的很，我们坚决支持；原来没有参加组织的学生说：“这下可好了，我们也有着落了”；教师们也高兴地说：“这样做，既利于革命，又利于教学，也符合复课闹革命的需要”。同时，也得到解放军同志的大力支持。

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便立即显示了它的极大的感召力，引起了连锁反应。许多同学纷纷退出原来的组织，回班参加了大联合。建立了以班、以校为基础的班、排、连、营、团的战斗的大集体。两天内即有十五个教学班联合了起来。

可是，这时也出现了些阻力，有人说这是“折衷”、“调和”、“和稀泥”、“大杂烩”、“不适时”、“破坏文化大革命”，甚至扬言要“赴京告状”。这些思想反映了部分同学对运动的新形势和以教学班为单位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意义认识不清，或是私心作怪，没有毛泽东思想挂帅。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学习了毛主席“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须服从于政治任务”的论述和《红旗》第三期社论，广泛地发动群众，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辩论，得出的结论是：革命师生自下而上地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起来，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互相了解，谁革命，谁不革命，群众最清楚，更有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群众，符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需要，这样的革命大联合怎么能说是“大杂烩”呢？那些先有“司令”，后招兵买马，跨年级、跨班次、跨学校凑合在一起的组织，才最容易成为“大杂烩”，最容易被坏人利用。至于“不适时”的论调，大家则认为：“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是当前运动的迫切需要，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这样做，也是中学当前实现大联合的好形式，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的好方法。

（三）以毛泽东思想为灵魂做好大联合中的思想工作。

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战斗组织在破四旧，立四新，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建立了感情。现

在要回班闹革命，就产生了不少活思想，搞不清大联合和战斗队的关系；怕失掉“地盘”怕丢“官”；怕回班受冷遇等等。总之，“私”字作怪。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大家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老三篇”。狠斗私心，破私立公，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反复宣传了大联合的意义和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的好处。大家一致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实现全校大联合，大团结；有利于“三结合”；这样做有利于复课闹革命；有利于整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有利于贯彻民主集中制。一句话，有利于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完成学校的斗、批、改的战斗任务。通过反复讨论、反复宣传，大家统一了思想，认准了大方向，克服了各种阻力，愉快地回到教学班，“归口闹革命”。

起初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唯恐回班闹革命遭受冷遇，经过整风学习，一致认为应该去掉私心杂念，回到广大革命同学当中去，一道闹革命。这是又有同学讲：“我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整风学习后，局势刚刚好转，就要‘分开’，太可惜了”。他们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共产党员好比种子……”的教导，提高了认识，大家说：“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派大联合，是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提高，是‘初级社’到‘高级社’”。并一致表示：要做一颗红色种子，撒遍全校，到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回班闹革命的誓师会上表了决心，写了喜报，敲锣打鼓，高高兴兴地回班参加了全校大联合。

二月二十八日，全校革命师生欢欣鼓舞，召开了全校大联合回班闹革命的誓师大会，热烈庆祝斗争中形成的革命大团结。

（四）以“三结合”的形式，建立临时的领导班子。

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在基本实现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后，急需有一个革命的领导班子，这是巩固大联合，把运动引向深入，把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重要条件。

我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的精神，采取自下而上的选举了由学生、教师、干部“三结合”的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作为正式文化革命委员会产生之前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全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并具体安排上课，管理师生生活。

在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学校文化革命运动更深入了。过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各个战斗组织意见不易统一，甚至如大会主席团人数等细节问题，争论不休，组织一次批斗会，往往协商七八天也定不下来。现在临时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的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掀起了斗、批、改的新高潮。广大革命师生反映，现在运动有人领导了，复课有人安排了，生活有人管了，工作有人抓了，全校出现了抓革命促教学的大好局面。

（五）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

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起来后，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八条），各教学班选举了文革小组，遵照八条精神，负责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工作。三月一日统一了全校红卫兵组织，称为“延安中学红卫兵”。在整顿和发展工作中，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经过整顿、巩固和发展的红卫兵中（占受训学生的百分之五十九），劳动人民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用毛泽东思想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每一个革命小将都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在我校斗、批、改的阶级斗争的政治舞台上，这是一支新的政治力量，这是一支具有无限生命力的队伍。这个队伍在复课闹革命中是团结广大革命师生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核心力量。这个队伍在复课闹革命中，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的模范，是抓革命促教学的先锋。

整顿、巩固和发展后的红卫兵组织，是广大革命学生无限热爱的组织，是渴望参加的组织。广大革命学生在被批准加入红卫兵的时候，他们庄严宣誓：“永远忠于毛主席，誓做毛主席忠实的红小兵”。剥削阶级出身的丁云翔同学更是一致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在日记上写下，“今后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和家庭划清界限，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誓言。没有参加红卫兵的同学也纷纷表示：决心以自己的革命行动，争取参加红卫兵组织，这时，有的红卫兵小将和同学结成了“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共同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思想互助，互相谈心，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整顿、巩固和发展后的红卫兵组织，战斗力大大增强，成为学校抓革命促教学的一支先锋队。

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一面上课，一面闹革命，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战斗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天津延安中学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天津延安中学红卫兵团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延安中学红卫兵 姜 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大联合的灵魂》

我们二年九班，是女生班，共五十一人。军训前参加战斗组织的只有八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提高了认识，逐步实现了教学班的联合。我们班是全校头一个实现全班大联合的。

我们深深体会到，以教学班实现联合的过程，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过程。开始，我们提出班为单位联合的倡议时，遭到一些同学的反对。这时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的指示，又结合全国的革命形势和本校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学认为以班为单位的联合，是当前斗争形式的需要，符合斗争的大方向。但也有的说：“这是‘大杂烩’、‘合稀泥’，是盲动主义，成立的快，解散的也慢不了”等等。有的公开贴大字报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些同意以教学班联合的人，也有些动摇了，甚至报名的也犹豫起来了。怎么办？这时我们又学习了毛主席的“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经过艰难曲折”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教导后，大家信心足了，一致表示，凡是符合大联合

（下缺两页原文，第 12、13 页）

9. 有利于培养集体主义思想。过去，战斗组，各自为政，各占一房、一桌，争地盘，争东西，容易助长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现在，一个班团结一起，在文革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0. 有利于复课闹革命。过去很多战斗组占很多教室设“总部”，无法复课，现在全班、全校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可以既能复课，又能革命。

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过程，两种思想的斗争过程，是破私立公的过程，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过程。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干革命一步也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今后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做毛主席的忠实红小兵，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延安中学红卫兵 姜 颖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天津延安中学三年二班 许玉仁《打倒风头主义实现革命大联合》

我们“毛泽东思想造反兵团”，原来是全校最大的一个战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与全校革命师生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革命大联合。这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风头主义的结果。

二月十六日，二年九班革命同学提出了以教学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倡议后，我们“毛泽东思想造反兵团”有些人，就大叫大嚷，说这是一颗大毒草，是保皇派的鬼把戏，纯粹是“和稀泥”，“大杂烩”，有的还说，我们组织最大，房子最多，努力最大，东西最全，选举时票数最多，夺权时权利也最大。总之，是从“私”字出发，从小团体出发，与己有利即欢迎，与己不“利”则反对。

我们在解放军同志的帮助下，用四天时间，以整风的方法，组织大家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老三篇”，在开门整风中，亮思想，斗私心，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认识到，山头主义，风头主义，个人第一主义，是束缚自己思想不能得到解放的枷锁，是当前革命派大联合的主要敌人。这些错误思想直接起着阻碍运动向前发展，客观上起着瓦解自己，帮助敌人的离心作用和消蚀作用。问题的根子找到了，危害认清了，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克服头脑中“私”字的自觉性，增强了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的革命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让

“私”字扫地出门，让“公”字安家落户。革命不分先后，组织分大小。不彻底打倒“私”字，打倒风头主义，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一句不说，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一件不做。

通过开门整风，整顿了思想，整顿了作风，克服了个人主义和大队沙文主义，树立了集体主义思想，跳出了“坐井观天”的小圈圈，认清了当前运动的大世面。

我们全队认真学习了二年九班的倡议书，认为这个倡议好的很，是二年九班同学的革命首创精神的结果，是实现全校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的战斗号角，是大方向。认识提高了，方向认准了，行动就自觉了，通过大家的充分酝酿讨论之后，我们于二月二十三日召开了由全校各战斗组织派代表参加的回班闹革命的誓师大会，会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肯定了成绩，提出了要求，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回班闹革命、抓革命促教学的新的斗争中，做出新的贡献。当天我们全队人员兴高采烈地回班参加了大联合。

实现全校大联合之后，我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广大革命师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天津延安中学三年二班 许玉仁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

（来源：原载包头市革命委员会宣传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包头：1968年1月）

一九六七年三月，毛泽东关于推迟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批语

（1）以推迟到三月下旬成立，照总理十日意见（2）办理为宜。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中说，天津市革命学生组织多已趋向联合，五日已开了红代会会议。工人革命组织已按口分系统组织，多已组成，达十七万人。中学生革命组织较差。在本周内，他们拟开各方协商会议，商定革委会及其常委会名单。群众大会预定十二日开，在会上宣布成立天津市临时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等。

〔2〕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要他考虑先开大学、中学、工人、农民、机关革命派代表会议，然后再开全市革命组织协商会议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革委会的程序。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叶群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接见的有李雪峰同志、北京军区首长郑维山副司令员。被接见的有肖政委、郑三生，革命的领导干部有解学恭、胡昭衡、赵曙光、江枫五个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四十九人，劳二半八·一八、天工八·二五、河大井岗山等为特约代表。10:05分中央首长进入会场，会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首先周总理向郑维山说：“郑维山同志，是你讲还是肖思明同志讲？”

周总理接着说：十多天，我想弄清情况，有很多事情要办，有四川、内蒙要办，不是故意卡你们。有的比你们来得晚也接见了，他们的问题比较大，天津的问题算什么，我先声明一下。

肖思明同志说：“天津驻军于1月23日按主席的指示正式介入天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作了一些工作，由于我们的同志学习不够，出现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

1. 在促进革命派大联合方面，虽然开了五个代表大会由于时间仓促，还有一些革命组织没吸收进来，由于调查研究不够，少量几个保守组织也进来了。

2. 在几个代表会期间，我们跟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进行了协商，从全局看，表面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不民主，这样，应该选的代表，没吸收进来，如3月23日筹备小组的选举，结果使原来想吸收进来的没有吸收进来，职工代表会和中学代表会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总怕把观点强加于群众，违背十六条，没做细致的工作，想选的没选上。

3. 对张淮三一手泡制的七个野战兵团，处理慢了一些，态度是明朗的，反复讨论了几次，请示了上级。这么庞大的组织处理要慎重，在上级没有批示时，作他们基层工作，分化瓦解。这样作不能解决问题，又请示，发表了公告，态度明朗，采取了措施，发表了声明，没有点名，实际上是提这些组织，最近才点名。虽然作了点工作，希望对军队提出批评。”

郑维山同志说：天津的同志到北京已十几天了，十几天与同志接触很少，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开会接见，我个人来讲应很好接触，表示抱歉。军队在天津作了许多工作，但也出现了一些缺点，我作为北京军区负责人，我应担负更大的责任。

对天津大联合的帮助很少，北京的大联合是总理中央文革直接指导的。按北京大联合经验指导天津大联合，如果天津出现缺点错误，首先是我的责任。2月6日我到天津搞工作，按中央和总理的指示去天津，听郑三生同志、肖思明同志讲了野战兵团的问题，野战兵团是保守组织，我没有及时详细报告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直到野战兵团来京才报到中央军委。1号肖思明同志、郑三生同志亲自来抓，直到同志们这次来，肖思明同志、郑三生同志当面汇报给总理，才把这个问题处理下来，处理慢责任在我。天津驻军态度明朗。周总理接见我们对天津有很多指示，我们要尽快照办。我相信在中央指示后，在今后大联合中，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关怀下，工作会搞得更好。

接着总理又把中央首长一一介绍给代表，以后有代表随便发言，发言时，有工矿企业的李勇，还有劳二半八一八王德明，反修锦纶厂的张成明，还有天工八二五的帅关仁发表了反面意见。（八·二五、劳二半等汇报情况从略）

（反修锦纶厂汇报很长时间，总理打断他的话说：江青同志要讲话。）

江青同志说：战友们，我对天津情况了解的不够，但对天津造反派印象很深刻，在去年，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迫害你的时候，你们二次徒步到北京，半路上，北京派车把你们接来的，值得我学习。我3月28日听了一次汇报，这方面的事情听了一些省分和个别专区的汇报以及群众组织的辩论，事物总是要有比较的，多方面比较一下，我对3月28日66军负责同志肖思明同志的汇报的印象很深刻的。人民解放军作群众工作满腔热忱，爱护革命左派，这个印象也是很深刻的，当时我的印象是66军作了大量工作，对没有团结进来的革命左派组织满腔热忱、爱护就是不知怎么作好，有老好人的心情，这样好的军队，有的地方就不是这样，抓人很多，天津抓人很少，比北京少，有的地方抓几千、几万，甚至有惨案，这就不必细谈了。这么一比较，我觉得天津军队是较好的。我希望也算作建议吧，大联合外的左派组织也要想一想他们的苦衷。另一方面，对张淮三操纵的野战兵团的处理，不是他们故意搞晚的，因为涉及到十多万人的群众组织

采取慎重态度是对的。向中央报告了，他们的报告送来好多，给军委又给总理，又给中央文革。另外本来应该选进委员会的没有选上，他们认为是错误的，他们今晚还说是错误的，我觉得应向没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说明这个情况，我有这个责任。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大多数是好的，支左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我们一下子接近群众也会出现错误的，但是知错必改，犯错误的左派组织要帮助他。把我了解的情况讲出来，是不是没有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心里应该平一些。我不认识他们（肖思明、郑三生）但是，今天我觉得有必要替他们说话，我不是保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我希望在这个座谈会上，通过辩论来解决。天津驻军是好的，军队不多全市下去一万四千人做工作，抓人少，没开枪。天津由一个反革命大乱局面，到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时间并不算太长，这和军队做工作分不开的。有的人可能说，江青同志今天和稀泥了，不是这样，我不是和稀泥，我觉得我应该这样说，我就要退席了，我就讲这些供同志们参考（掌声雷动）

接着反修锦纶厂张村民又讲，总理打断他们的讲话，说：同志是不是可以集中一点谈，你们 25 个单位的材料，我们印发你们的材料，赠给我们一些。

（当反修锦纶厂说到天大八·一三炮打康生时）

康生同志说：我说几句，有几个学校受高级党校个别的少数的人，彭真、林枫影响下，有些时间收集我的材料贴我的大字报，成立全国委员会，调查我，其中有的受了蒙蔽，这里面北京的也有，清华的也有，体院的也有，人大的也有，天大八·一三也有（八·一三也受蒙蔽），以后问题揭穿了，是高级党校红战团个别头头搞的，其他是受蒙蔽。我屡次声明受蒙蔽的，觉悟了，改正了就完了，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我在清华讲过，戚本禹同志在人大也讲过，对其他几个单位不要把这件事作为攻击他们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向我们请罪，我不赞成这样作，一时受蒙蔽的常有，列宁曾说过：上帝允许别人犯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比上帝强得多，为什么不允许别人犯错误呢？（热烈掌声）

有人说：八·一三炮打张春桥，八·一三代表说，我们是坚决支持张春桥同志的，张春桥同志可以做鉴定嘛。张春桥同志当即说：“我做鉴定，我与八·一三的关系很好。”

周总理的几段插话：“天津冲击警备区的抓人了吗？没有抓这不就很好吗？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冲击中南海我们都没有责备他们嘛。”有人提到红代会，

红代会有多少保守组织的时候，周总理说：“北京 80%参加了红代会，也有一部分保守的，你们是 58%（指天津），有一部分保守组织是必要的”后来还说对天工八·二五帅关仁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个姓张）说：“你们赶明天好好地谈一谈吧，卫东和南大八·一八也好好地谈一谈吧，都各有各的长处，应在一起互相谈一谈。”戚本禹同志插话说：“南大八·一八是有功勋的。”其他首长都点了头。咱们的代表要发言驳反李雪峰派造的谣。周总理说：“这样好吗？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接见你们，我们就不一次表示出态度了，你们在一起好好谈谈，好好想想，我们今天有别的紧要事情，后天再接见你们好吗？”（热烈鼓掌）

（来源：1967 年 5 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4）》）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参加接见的还有李雪峰、郑维三等同志。被接见的有：天津驻军首长肖思明、郑三生等同志，天津革命领导干部解学恭、胡昭衡、江枫、赵曙光同志及天津五个代表会代表。劳二半八·一八、天工八·二五、河大井冈山等作为特约代表也参加了接见。〕

周总理的讲话

各位同志：

正如伯达同志所估计的，我们的三次会开得很好，两方面的意见都听了。开始五个代表会议的代表来京，我们想应该有不同意见的代表也来。当时来得少一些。你们来了以后，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同大家接触。我们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有的是直接接触，有的是派记者和联络员同志和大家接触，知道还有些单位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因此又增加了二十五个单位的十八位同志和财贸系统的两位。第三批是今天发现的，人数很多，主要是塘沽的，今天也在会上发了言。给了你们充足的时间，主要内容都讲了。总起来说，有不同意见的代表比五个代表会议推选出来的代表还要多。如果军队和工作的同志不算的话，两方面比较起来，不同意见的代表数量多，发言的人数和时间也占得多。我们充分地听取了你们的意见。以后还要听取你们的意见。今后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同派到天津去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记者谈，或者来北京到国务院和中央文

革接待站去谈，我们还可以听取你们的意见。但你们能在本地解决的就不要来了。你们也晓得，我们这儿很忙。来了以后，也影响工作，影响学习，影响生产。如果十分紧急必须来，要事先打个招呼，同意来再来。要来的话人也不要太多，一两个人就行了，不要来了一大堆。你们晓得，十个多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来一个人和十个人、一百人讲都是一样。现在不是大串联的时候，要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搞大联合，“三结合”和夺权斗争，事情很忙，一个人能讲清楚，何必来那么多人？不要以为来得人多就见，人少了就不见。从来没有这个标准。你们回去传达要注意这个问题。要精简，要节约闹革命。

现在谈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一)

天津十个多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几个大城市比，跟上海不同，跟北京也不同。总的趋势是一个大方向，但过程不完全相同，应该承认，有它本身的特点。不错，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公布以后，北京轰起来了，上海、天津受到影响，全国也受到影响。同样，刘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迫害、受影响，天津也不例外。李雪峰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北京、对天津都有影响。雪峰同志在北京有文字检讨。刚才同雪峰同志说了，印出来给你们看看。我们认为检讨是诚恳的，是愿意改正错误的。

但是，天津发生的问题，远远超过了雪峰同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两个系统领导——省委和市委。后来天津划为直辖市，省委不管了。开始省委管大学，市委管中学、工矿企业、财贸。有这个复杂情况。从市委讲，今天你们清楚了，知道有个万张反党集团。开始很迷惑了一些人。我们发现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万晓塘死了以后，几十万人悼念，搞什么名堂？我们很奇怪。当时仅仅是怀疑。天津的工作，伯达同志是长期关心的，蹲过点，农业在小站，工业在钢厂。我只是有时开会，去天津一下，没有直接蹲过点。万晓塘的死，那么多人悼念，我有怀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问赵武成、李颀伯，越问越觉得离奇。追出了八月底就有个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也是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不是向坏人示威。当时正是中学红卫兵冲击全国的时候，使中学红卫兵在那一次受了很大压制。万晓塘死又是一次。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

人；下午万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万晓塘的检讨根本没有压力，算不上检讨，不象样子，象谈话一样。这样的检讨怎么会逼得万晓塘死呢？这个问题还要再追查。两次受到压制，中学红卫兵受到很大压制，工厂、机关也受压制。这跟上海、北京不同。全国也少有这样的事。对当时天津的红卫兵运动，对天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用群众示威施加压力，直接把刘邓的反动路线扩大，加深了。万晓塘死了，跟着出来个张淮三，不仅继续执行反动路线，而且还继续布置搞阴谋，在工交口安插了他的亲信。刚才江枫同志的揭发就说明了问题。首先揭露万张反党集团的是江枫同志。伯达同志看了他的信，注意了这件事，派解学恭同志去天津，把张淮三调到山西。他心里有鬼，没等他谈话就自杀，没有死又调回来了。接着又搞公安局的反革命夺权，有些小将受了骗，承认了错误。在天津，万张集团控制达七、八个月之久，执行和发展了刘邓路线。这是主要的。（康生同志插话：你们天津来的同志对张淮三的走狗和爪牙还注意得很不够。张淮三同前北京市委刘仁有很密切的联系。这是个很坏很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埋藏了很多坏东西，塘沽也有，财贸、工交系统也不少。你们应该把矛头摆正！）后来经过讨论，告诉了解学恭同志。张淮三在公安局一·二〇“政法公社”夺权以前，实际上早有布置，万晓塘老婆也参加了。江枫同志实际上早就没有权了。张淮三的布置是一通到底的。就象北京彭真、刘仁早被揭出来了，但他们的黑手还伸在北京公安局。（康生同志插话：你们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搞了很多叛徒集团的调查，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建议，你们对万、张、刘仁，也组织个调查团，很好地调查一下。）就在你们鼻子底下嘛！你们要好好地调查。万张同刘仁集团有联系，同彭罗陆杨有联系。

北京公安局军管，才想到了天津公安局军管。北京公安局欺骗了北京政法学院的革命小将。天津市公安局内部夺权，也蒙蔽了一些小将。镇压“政法公社”，是派郑维三同志亲自去的。一·二零以后，很乱，广大人民不满，比北京反映还大。军管以后，才扭转了局势。如果没有解放军，局势扭转不了这么快。你们想一想，如果从五月十六日算起，到二月十四日，九个月了；如果从六月一日算，也继续了八个多月。这么长的时间，天津的领导是瘫痪的。张淮三、赵武成，当然，还不能把赵武成说成是他们一伙的。赵武成的问题，还要他自己检查交代。

省委原来管大学，也插手了。比如天津工学院，两派都到北京来，是十月底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那一天。一派扭着阎达开，一派扭着李颀伯。阎和李的问题，要经过检查才能下结论。从过去的工作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面貌来看，阎达开比李颀伯好一些。当然并不是说阎达开没有错误。他正在检查。一个学校两个造反派，一个方面揪住一个，也有保的，也有反的，天工、南大就是这样。其他天大、河大等接触过一些，但不多。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省委领导瘫痪。有的同学在校内，有的在校外；有的到保定、到省委造反，后来又互相对打。打砸抢彼此都有一点，有多有少。这个情形怎么去领导？摆在中央面前是个问题。一月份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去上海。工人运动发展了，学生运动也发展了，领导了上海以工人为首的各派革命组织的夺权斗争，以首创精神号召了全国，是全国工人阶级之冠。还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两件事有功，归于上海革命群众。是张春桥、姚文元同志领导的，影响了全国。这时，不得不考虑天津、北京怎么夺。在北京，成立了筹备小组，准备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开始有各种设想，设想了几个名称，主席确定叫革命委员会好。同样，李雪峰同志在北京多次检查以后，中央和毛主席认为检查是诚恳的，是好的，派他去天津推动这个工作，同解放军和解学恭同志接洽，帮助革命干部站出来，同胡昭衡同志，江枫同志一道推动工作，进行筹备。当时，就设想成立革命委员会。

从大联合走向“三结合”（革命群众组织、解放军、领导干部亮相站出来），在山西和贵州出现了。天津、北京也向这方面准备。在北京，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筹备小组就是这样做的。天津，也是这样设想的。天津的发展过程，一月份仅仅是接洽而已。那时，形势还不明朗，万张反党集团还起作用。二月接管公安局，形势在扭转。这是公认的。以前是万张反党集团的黑手在活动，所以，接管公安局，群众放鞭炮，热烈欢呼，超过北京。北京自去年六月份就安定了，天津连交警都没有了。二月正在筹备。原来，设想三月份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来，毛主席发现了开代表会议这个创议。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的代表不好产生，北大、清华、师大、北航就是合作不到一起。戚本禹同志很清楚。他们都是革命的，是经过斗争，受压迫的，但联合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要经过很大的推动。北京的好处是离中央近，可以直接帮助。谢富治同志说：“你们不合作，我们就不开会。”果然有效。我知道晚了，否则告诉解学恭同志，天津也可以这么办。八·二五在

外边，不合作起来就不开大学红代会，“逼上梁山”就好了。主席说，大学开了，为什么中学、工人、农民不可以开呢？北京这样做了，天津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我就给解学恭同志打了个电话。本来三月份就要夺权，这才推迟了一个月。到北京来汇报了一次，我们是同意了，天津开了五个代表会，比北京多了一个干代会。但八天开了五个会，时间仓促，筹备得不那么好，有遗漏的，保守的多了一些，主要是协商不够。不能用选举的办法。反修绵纶厂，是想要你们当主席的，结果落选了。这不是雪峰同志的“阴谋”。那时，他们没有来北京取经，我们也没有来得及通知他们。选掉了绝不是阴谋。你们那里把一切问题都说成是雪峰同志有鬼，他也不好争辩，雪峰同志还要回天津工作，你们可以谈谈心嘛！什么都可以说。但是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吵一顿、吼一顿。选举以前，反修绵纶厂对雪峰同志还是欢迎的。这个东西是不能搞选举的。（康生同志插话：不能迷信选举。在一定的情况下，选举不如协商民主。）为什么不能选举呢？因为革命委员会还是临时权力机构，还没有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要以造反派为核心，进行协商。

中学比大学更乱一些，分野更不清楚。都出去串联去了，二月份才回来，三月份军训才开始。过去，中学受万张集团的压制比大学还厉害。北京对中学过问得少了一些，散了一个时期，也是一、二月份才陆续回来。北京中学红代会，也不是很纯的，也有保守组织。正象伯达同志讲的，有曲折嘛！（伯达同志插话：这也是允许的嘛！）春桥同志讲，要想那么纯是不可能的，中学的界限很不清楚。工人里面的野战兵团，是万张反党集团搞的，在工交、财贸系统很有势力。李雪峰、解学恭同志一到天津，就看到了这个问题。野战兵团上面是保守的，下面不见得没有造反的，基层组织不能说一律不好，要同总部区别开来。对野战兵团总部，他们是主张取缔的，手续慢了一些。郑维山同志请示了全军文革，耽搁了。××军是三月五日报上来的，军委三月二十二日批的，并不是说有人支持。农村就不大一样了。农村经过四清，确实有一些下台干部想重新上台。中央有指示，在春耕大忙时，大队以下的不能夺权，下台干部不许反攻倒算。贫下中农的代表情况好一些。中学和工代会急了一些，可能保守组织多了一些。请示主席，主席讲，一下子联合起来，哪能没有保守组织？不可能是清一色的。清一色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连我们党、我们中央政治局也不是清一色的。造反派也不可能那么纯。

天大八·一三，你们占绝大多数，你们就那么纯？我问蒯大富：“清华井冈山占多少？”他答：“占百分之九十五。”我说：“这里左中右都有了，要不右派跑到哪里去了呢？”没有左中右就没有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一切推动力量都是矛盾的斗争。现在是阶级斗争，到共产主义还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当然，我们应该强调以左派为核心、为基础。同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的大方向，保守一点的组织，哪个代表会也会有的。我们基本肯定下来，但要做很大的改进工作。如果天津的工作有些问题，我和伯达、郑维山负很大责任。（伯达同志插话：我负主要责任。郑维山同志插话：我负主要责任。）没有主要次要，我不同你们争。

雪峰同志，是中央和毛主席派去的，我们经常通电话。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缺点，你们要多方面同他接触。他有顾虑，常请示出不出面，怕出去揪住不能工作。华北局就有一派，经常来问我李雪峰何时回来，要造他的反。我说毛主席派他到天津工作去了，因此传到天津。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改嘛：“夹着尾巴作人”。这句话是整风的时候毛主席教育我们的。我们从延安来的人都知道。你们一解释就变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了。不要理解为藏起狐狸尾巴。（张春桥同志插话：“夹着尾巴作人”，是指不要翘尾巴。）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的警惕性很高。

解放军，江青同志说了。解放军做群众工作，是一番苦心，满腔热情；但对情况不够了解，警备区过去也不归他们管。支农、支工容易些，支左就不那么容易。南大卫东是造反的，八·一八也做了好事，参加了北京二司的整风，吸收卫东不吸收八·一八也不好。天工，我们认为两方面都应该吸收，不进来就等。你进来要别人退出去那也不行。革命的团结是需要的，江青同志讲了，你们都很拥护。解放军的确是一片好心，支左工作不知怎么做好，有时上了当，有时疏忽了。肖思明同志检讨了，很诚恳。一解释清楚你们就懂了。你们应该同肖思明同志、郑三生同志、解学恭同志、胡昭衡同志、江枫同志好好合作。我想他们是愿意同你们合作的。

（二）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解释，全国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刘邓，他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津主要是万张反党集团。一个死了，一个还在嘛！十

七年的统治影响很深。康老的话很重要，你们应该很快地做调查工作。当然，要实事求是，不要扩大打击面。只有把这个集团挖深了，天津的主要矛盾才能解决。解放军同志和几位同志几个月的工作主流抓对了，特别是二、三月的工作，基本上应该肯定，但也有一些缺点错误。凡是有益的批评都应该接受。

(三)

讲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反对五个代表会，反对李雪峰，不要说是反革命逆流，叫反革命逆流不好；反过来，说五个代表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互相对骂也不好。这样不能达到大联合、大团结。应该上纲的上纲，不应该上纲的不要上纲。要紧紧地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刘邓和万张反党集团。对李雪峰同志批评过分了一些，也不要紧。有些大字报、传单，说过头话，我看了很不安心，如谁反对周某某就打倒谁。干涉也不好，只好有机会讲一讲，我也不能贴大字报把它盖起来。过去在天安门贴某某的大字报，我也劝过，现在不劝了，反正外国记者也知道，你们的标准不是那么准的。使他们摸不透也好，这是一种思潮的反映，也不要过分责备。不是李雪峰同志本人喜欢什么标语。北京贴雪峰同志的标语也很多（其中，也可能有你们加了几张），雪峰同志从来也没有向我说过。只要是好意的批评，就应该接受，就应该欢迎。人民内部矛盾嘛，应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两种极端化的态度，都是不好的。错误应该批评，不一定一批就得倒，那得倒多少？那不成了“打倒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了吗？反过来，也不是说不倒就不能批。要养成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批评过一点，只要是好意的而不是恶意的，也应该欢迎。

第二、不要随便宣布是反革命组织。互相宣布也无效。军委十条命令说过了，反革命组织要经过中央批准。我们要进行严肃的政治斗争。

第三、我们欢迎你们开门整风，但也不要过头，形成请罪风。请罪，天津确有此事。当时，也不光是天津，北京和其他地方也有，是一股风。包围军事机关，不外两种出发点：一，是有意见要求回答；二，是他们知道解放军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能怎么样，闹一阵子再说。一月二十八日军委命令以后，就不要包围了。解放军的任务很重，要同他们商量，不要有芥蒂。不要请罪。当时请罪成风。应该认真触及灵魂，改正错误，请什么罪。请罪差不多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专用词了。解放军要劝大家不要请罪，也不要揪住一个问题不放。毛主席说了，解放军支左错了，改了就行了；冲了军事机关，不冲就行了。如果是好的，还交了朋友，少数坏人抓住处理。一般地说，群众绝大多数是好意的。我们光荣、伟大的解放军，负担这么重的任务，支左、支农、支工、支交，军管、军训，哪能一点不犯错误？解放军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兵，犯错误改了就不要计较了。解放军也可能认为，听话的、成分好的是左派，一下没有看准也是允许的，改了就行。

第四、谭力夫思想、联动的思想和行动、反动的血统论，要追究。但一定要把头头和受蒙蔽的一般群众分清楚。北京有个八一学校有，天津也有。你们中学生要查清。对反动头子，要扭送公安机关和警备机关，扣留起来，惩办和教育相结合。都是同学嘛，要好好教育。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教育，对头子要给予惩罚。

第五、野战兵团，上层和基层要区别对待。已经有了公告，要按这个办事。以野战兵团的名义游行是不许可的。塘沽没有重视，支持错了改过来，不要揪住不放。

第六、革命组织不要勒令什么解散。如五个代表会议，已经开了，就是结合得不够，除了很保守的，一般的要教育，不要勒令解散，结果无效，反而不好。除非特别事件，如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勒令做什么事还可以，一般不要轻易用。

第七、人民武装、保卫系统，由警备区和公安局很好地摸一下，负责清理。清理是必要的，要更深刻地揭发。当然，应当依靠群众，领导同群众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调查万张集团的影响。

第八、有些传单，有许多措词很不恰当，也有的有错误，要改正过来，象这样的传单以后最好不发。一般地都是教育，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主席还填上了“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嘛！要给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把话说绝了并不好，结果也不起作用，失掉信用。有些提法北京都不用了，天津还有。北京去的同学要帮助一下。天津要向上海、北京看齐。

第九、现有的组织，如工厂、机关、学校，常常有两种或多种组织。有造反，有保守，也有双方都造反，也都有些保守性的，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开门整风。对保守的，要按伯达同志讲的办，促使他们把方向改正过来，两个都变成

造反派不好吗？但要在斗争中考验，发展，不能强求、速成。有时需要等待，不能强制。除革命性以外，还要讲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

这些具体问题，在这里讲一讲。还有很多具体问题不能一一地讲了，你们回去自己解决。革命靠自己，解放靠自己。如果还是这些问题，以后就不需要再见了。

（四）

今后的处理方针：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扩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临时权力机构，还需要做一段工作。原来急躁了，有很多缺点毛病，要共同努力，把它改过来。只要是造反派，就要坚决批判刘邓和万张反党集团，要立即行动。这是斗争的主要方向，在斗争中考验各个组织。要各自搞整风，作自我批评，讲联合，在斗争中大联合。要改变办法，多协商，现阶段选举不十分适用。认识问题，要服从大的方针政策。协商能一致的，主流对了，具体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代表有缺点错误，要允许改；搞错了，也可以撤换。前天中学代表发言说，错了可以换，这种态度是好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希望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掌握大方向，认清主流，胜利前进！

可以散会了吗？（众答：可以！）散会！

（总理指挥大家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几句话。

我们认为会开得很好，发扬了民主，不同的意见都讲了。任何一方面，对不同意见都要遵循毛主席“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指示，加以认真思考。对群众一律不许打击报复。

一、大联合的主流，革命“三结合”的大方向，基本上应该是肯定的。

二、人民解放军××军，在天津做了很好的、大量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促进了天津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秩序的建立，促进了各革命派的大联合，促进了城乡社会主义生产的稳定和发展。应该感谢人民解放军。

三、大方向是正确的，并不等于没有曲折，没有缺点和错误。譬如船在大海上向哪里去，方向是正确的，但总不会是笔直前进的，必然经过许多曲折和波折，才能达到目的地。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联合、“三结合”，革命派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不能设想会没有缺点，甚至没有某些错误。有缺点或者错误，改了就行。有某些情况，局限于少数人谈判，放手发动群众不够，或者对革命群众的态度有错误，这些都要改。

五、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是我们斗争的中心问题、根本问题。大家必须集中目标，拥护、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反对刘邓的反动路线。揭露刘邓这条反动路线在革命运动中所犯的各种罪恶。

六、刘邓路线在天津的忠实执行者，代表人是万、张反党集团。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反党集团在天津的各种罪恶。要配合北京现在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革命高潮，同北京这个批判高潮相呼应，把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同批判万张反党集团的问题结合起来。

七、刚才李雪峰同志在会上作了一些自我批评。看来，李雪峰同志在工作中有缺点或者错误。群众的批评有很多合理的东西。我认为李雪峰同志应该欢迎这些有益的意见。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天津的主要矛盾是革命群众同万张反党集团的矛盾，斗争的锋芒应该针对万、张反党集团，而不是针对李雪峰同志。

八、同志们回到天津去，要按照毛主席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搞好大联合。

九、要学习毛主席对待山头主义的方法。各个山头主要地是实行自我批评，避免批评对方。只要是认真地、诚恳地实行自我批评，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就都可以得到对方的原谅。我们的党就是用这种方法，在四二年、四三年、四四年的三年整风中，才达到了党的团结。敢于作自我批评，这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风格，是毛主席学生的朴素风格。

十、有错必改，肯自我批评，就是正确的大方向的一种表现。

以下几点建议请考虑：

第一、革命的造反组织，被强迫解散的，自愿要恢复都可以恢复。同时，按自愿的原则应该实行大联合，扩大大联合，不要闹分散主义。

第二、保守组织解散后，不要用换名义的办法重新恢复。已经恢复了的，也不用打、砸、抢的方法，而是用说服的方法，教育的方法，争取分化瓦解他们。

第三、对顽固地坚持错误观点的、不肯改的保守组织的头头，要加以揭露，加以批判，进行政治斗争，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打击的是一小撮，避免扩大打击面。

第四、革命派对原来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他们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应该表示衷心的感谢，不要歧视他们。（热烈鼓掌）

张春桥同志的讲话

我没有准备讲话。我们刚从上海回来，因为讨论天津的问题，我们参加了。上海、天津都是大城市，希望从天津的大联合、“三结合”中学到有用的东西。三天的会，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当然。两个城市不同，但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回忆上海的情况，根据伯达同志讲的第一条，大方向、主流基本是应该肯定的，说一些意见。

天津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在准备过程中。上海已经成立了。回过头来看，我们上海的大联合、“三结合”还没有你们做得好。（总理插话：情况不同，你们是首创嘛）正如语录里所说的，革命不是绣花，不可能按我们的设想，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一切都按计划，不发生一点曲折。也不能象写文章，写一段不如意，撕了重写。革命就不允许这样。

我们上海的大联合，是在同上海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同保守组织的斗争中形成的，在发表《告上海市人民书》的时候，大联合已经形成了，并且不断扩大。开始，我们没想到夺权，没想成立革命委员会。看到当时铁路不通、码头堵塞，铁路局长跑了，也没有售票员、司机，怎么办？码头停船，平时二十四艘，最严重的时候达到一百二十艘，货卸不下来。外国人污辱我们祖国，把我国国旗倒挂着，工人气愤极了。可是赤卫队跑了，造反派怎么也顶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从别处调人了，大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自动到码头、车站、工厂做工人。实际情况逼着我们不能不顶上去，把大权夺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这个大方向，把无产阶级专政的

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我们的大联合也不是那么纯洁的，我们的联合是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彼此信任，我和姚文元同志一句话也没说，全是革命造反派自己定的。就是这样，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组织进来了。农民造反总部的一个负责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审查，原来是个四不请干部，就在大联合中还贪污了几千块钱，整天同我们在一起开会，直到二月底才发现这个人。他到处招摇撞骗，说毛主席同他一起照相。他还吹牛，说和我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当时很迷惑了一些人。后来才知道，他把自己的像片和毛主席的像相片剪在一起。发现以后，我们通知生产队把他揪回去了。还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是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他经常同我接触，开会就坐在我的旁边。后来发现是个“联动”分子，每次开会都带着匕首，总想找机会下手。他同我一起开会至少八、九次，好在没有下手。后来红卫兵发现了，把他也抓起来了。我们总想革命组织比较纯洁，但再想纯洁也不会怎么纯洁。我只给同志们举这两个例子。（伯达同志插话：听说“联动”跑到天津去了。应当充分揭露这个反动组织。发现“联动”要抓起来。）这说明我们队伍还不是十分纯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革命造反派的警惕性还是高的。

我们的大联合是革命的大联合，但毕竟有一个过程，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对大联合，既要有严格的标准，又不能象绣花那样细，总会有缺点错误，发现了问题，改就行了。我们也有没联合进来的革命组织。是革命组织，但多数人不赞成，只好说服这些组织，暂时放一放。为这样的事纠纷也很多。有的组织，这一段有这样的表现，那一段有那样的表现，只好等一等。我们向他们说明，革命组织要接受群众的鉴定，真是革命的，总有一天会进来。现在还有这样的组织在外边。最近，这样的组织也有的同别的组织合并了。

大联合、“三结合”应该看作是一个过程，完成时间会很长。有缺点错误改正了，就不会妨碍革命的前进。不要使支流的问题妨碍我们前进。再好的领导，也会出现缺点或错误。要从大局出发，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还有其它问题，我只说这一点。革命不是绣花，总会有缺点错误。这也算是一点学习心得吧！（热烈鼓掌）

天津市赴京代表集体整理

(来源：1967 年 5 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4）》)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陈伯达谈“天津工学院八·二五”的问题

〔1967 年 5 月 8 日下午与天津市长胡昭衡的谈话摘要〕

你们开始走的路是对的，现在你们走错了路。有的人开始走对了，现在走错了；有的原来走错了，现在改过来了。原来走对的，不能半途而废。“行百里者半九十”。明明是走了一里，就说走了百里，就什么意见也都听不进去了，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自己走向反面。你们不但在天津，而且到了唐山，过错就更大了。

你们过去虽然做得对，一系列的错误可以把过去正确的东西一笔勾销，掉到泥坑中去。你们过去正确过，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随便干了。商量都不能商量了，过错也不让弥补了，非打倒不可。但打倒的不是我们。走错了路不回头，要变成被打倒的对象。想想嘛，把天津闹乱了，有什么好处。

天津的部署是中央决定的。

没进红代会，这是缺点，可以弥补嘛。无非有缺点，解放军再三说要弥补。你们这样搞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就你们少数人正确？你们的行动是得不到社会的同情的。你们这样跟解放军对抗是严重错误，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错误。

解放军不能说一点缺点都没有，有缺点可以提意见。为什么非要这样闹翻不可呢？这样闹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难道天津三、四百万人，就由你们这很少的一部分人垄断？解放军并没有得罪你们嘛，工作有缺点可以弥补嘛。工作有缺点就不能弥补，毛泽东思想哪里去了？！没有吸收你们进红代会是个很大的缺点，中央说要补嘛。你们是不是正确，还要经过实际考验。实际考验证明，你们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证明你们是不正确的。

这些意见请你们好好想一想。

你们绝大多数人是好的。一时弄不清楚问题是可以原谅的。这么长的时间，到了回头的时候了。一个人一辈子中有几天功夫方向是对的，就吃老本吃一辈子。把别的造反派否定了，也就否定了自己。

毛主席再三说过要读读《阿 Q 正传》。你们是不是赵太爷？别不许人家革命。要防止你们上别人的当，上少数几个人的当。回过头来还是好同志，有意见可以提。这样闹，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脱离了群众的想法，你们的行动是与群众的利益相反的。

你们的干劲要保护，看是什么干劲。干对的我们赞成，干错了的我们不赞成。

你们要革命，不许别人革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是正确的吗？合乎毛泽东思想吗？没有你这一家，世界照常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照样进行。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希望你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鼓掌欢迎你们。有意见，你们可以提。现在连党中央的决定、耐心的谈话、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完全不理，都抛到脑后。你们究竟到何处去？你们要不要无产阶级权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就是无产阶级权威。你们要不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权威？你们这行为不是无产阶级的行为，不代表无产阶级，是有很大破坏性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占领了你们的脑子。无政府主义不管变成什么形式，最后都是要失败的。

我们不是怕你们，是爱护你们。无产阶级怕什么！你们以为这么乱闹一通，我们就害怕了？

我们可以等待，但不能把大量时间只用在你们身上。你们按中央指示做，欢迎你们一块革命。我们等待这么久了，你们看不清我们的耐心，你们越走越远。这样下去后果怎样？为什么不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不反省一下？走错路是经常有的。走错了倒回来再走，这是合乎食物规律的。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走前进的路。走错了路，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再走。

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万岁！

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

打倒无政府主义！

（来源：根据 1967. 5. 11 天津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主办的《中学红卫兵》第八期翻印）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解学恭传达陈伯达对天津工作的指示

〔根据解学恭同志传达记录整理〕

我和肖思明同志六月二十八日到北京听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同志传达陈伯达同志的指示。六月三十日下午，陈伯达同志叫我们去，谈了几点指示，记得不那么完备，主要把要点和精神传达一下，如有错误我们负责，因为记忆和理解能力有限。

一、关于解放大量的干部问题。

天津驻军做了大量的工作，立下了功勋。军代表在工厂里要帮助革命派，要解放大量的干部，包括厂长书记这些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极少数一小撮，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只是有错误，认识了就算了。这是中央的方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城十几年了，领导干部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官僚主义，不到工厂，不到车间，不到班组，脱离了群众，群众意见很大，这些都要改，改了就算了。局长这些干部能站出来的，都要站出来，都要站出来工作，他们有经验管生产熟悉，懂得生产中间的协作关系。厂长书记要解放，这是一个大问题。信任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是主席的路线，党中央的总方针。对干部要有一个谱，不要把工作关系也搞成黑帮关系。万晓塘、张淮三是两个坏人，但是在他们下边工作的不见得都是坏人。要区分，工作关系就是工作关系，万张集团只是一小撮，几个人嘛，不要把不是万张集团的人，说成是万张集团的人。抓爪牙，抓爪牙的爪牙，这个口号过“左”不好。对干部，主要看他的现在和将来，过去犯了错误，改了就算了。我建议你们革命造反派，干部，都要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团结——批评——团结》，这篇社论讲的是毛泽东思想，第一、有缺点要做自我批评，不要学阿 Q；第二、要允许人家革命，不要学赵太爷。

二、关于南郊区的问题

小站有反复，刘晋峰不能支持，小站的四清不能翻，事实完全正确，而且中央知道。总之刘晋峰不能复辟，要支持王凤春。有人说西佑营不是陈伯达的点，是周扬的点，不对。周扬根本不起作用，在那里吃饭就是了。就是一万人工作有问题，四清运动是群众运动，也不能否定。四清下台干部不能翻案，果断地说不能翻案。

三、关于今后的工作问题

天津的形势很好。天津的情况究竟还是比较稳定的。

军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很辛苦，很谨慎，要支持军队，支持军队是大方向。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军队。

几个代表会议，团结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还少了些，要积极加强工作，要充实、加强、巩固几个代表会。要通过批判刘、邓、万、张扩大大联合，加强大团结，只有扩大了，才能加强。要巩固五个代表会的团结，进去了就不要再打内战了。

比较纯洁的、朴素的、诚恳的，这样的人能站得住。埋头苦干的，没有声色的，比较能经得起考验。凡是好出风头的都站不住。

北京的各派都在搞大联合，进行大批判，搞联合发言，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刘邓，天津就是要批判万张反党集团。

在工作的部署上，要解放大量干部，厂长、党委书记重视起来，分别的，逐步的解决这个问题。

对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要争取教育，还要做争取中间群众的工作。

四、其他几个问题。

1、群众组织抓人的问题。不管好人、坏人私自抓人总不对，不许群众组织私自抓人。抓的人要马上放出来。需要抓的也要经过国家法律。

2、武斗问题。群众对吵架是厌烦的，武斗是脱离群众的。我六月五号的讲话是代表了群众情绪的。那些头头们回去以后，都比较老实了。

把武斗打伤的人都照了象，印成传单，到处张贴，那是给外国人提供情报。喷气式不能再搞了，那是反对中央文革的人搞的。有一次北京开大会，我只讲了一句话，我说：“喷气式是中央文革提倡的吗？”大家回答说：“不是”。第二天就贴满了一城标语，“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群众是很敏感的。

凡是不合理的东西，一定站不住。喇叭车也是这样，也是脱离群众的。吵的人睡不着觉，不能休息，影响生产，影响工作。

3. 保护文物问题。有些书进了造纸厂，要控制一下，不能毁掉，刻板书不能毁掉，那是劳动人民刻的，不能毁掉，你们要去检查一下。还有炼铜厂，也要控制一下，检查一下，有些有价值的东西不要毁掉。有些东西可以出口，换外汇，换得很多铜。

4、关于胡昭衡同志的问题，按照总理的指示办，总理指示：不要揪，让他继续工作。他现在仍然是七人小组成员，他的材料可以送中央，由中央做结论。

5、关于天（津）工（学院）八·二五的问题。我对天工八·二五的讲话是诚恳的，满腔热情的，希望他们好，希望他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方针。我对他们的批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批评也是为了团结。天工八·二五×××给我写了一封信，引了我三句话：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正确，信任群众的将来。那是我在 1942 年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候写的。大方向正确，才有力量，才有将来。三句话不能分开。没有大方向，就没有力量，就没有将来。

6. 天津市夺权领导小组，改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你们领导小组七个人没有动嘛，实质没变，改改名义同全国一致起来好。

（来源：天津《革命职工报》1967 年 7 月 10 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陈伯达对天津武斗问题的指示

工厂是国家的财产，社会主义的财产，人民创造的财产，你们忍心破坏吗？请你们好好的想一想。

工人是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翁，你们可以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劳动人民吗？

要把我的话贴到街上，贴到每一个工厂。

我上面的话是提醒受蒙蔽的群众的。

现场不要动，要由五个代表会议组织人去参观，借机教育人民。

（来源：天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天津卫生系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主编《革命造反报》1967 年 8 月 5 日第八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二十一时五十分至十六日一时，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在座的有：郑维山、罗元发、张秀川、肖文玖、黄振棠同志；天津驻军负责人杨银声同志、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江枫同志。〕

接见开始，伯达同志问：上次开会，哪些人到了？（有七名代表举手）介绍一下。（接着伯达同志逐一介绍了参加接见的各首长）中央指定我们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两方面，对天津的问题看看究竟怎么解决好？听得懂吗？（郑维山同志翻译）你们大部分是学生吗？（答：大部分是工人。）关于天津问题，已经闹得很久啦，乱够了吧？有人说不是要大乱特乱吗？天津有个劝业场，听说自行车都不能走。中央开过会，要解决天津的问题。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你们又大闹了一通，大乱特乱一阵，你们觉着乱够了没有？（众答：乱够啦！）已经乱过两次啦。今年春天大乱一次，现在又乱了一次，在全国也算乱得相当可以的啦。（谢副总理：天津算第三个大城市，乱数第一。）我看够啦。你们觉得不够，还可以再乱。天工八·二五你们觉得乱得够了吧？（答：我们是不希望乱的。乱不乱不取决于我们，而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天津支左的问题，请首长注意六十六军的问题。）（谢副总理：可以发言了吧？）现在就发言吧。

天工八·二五代表起立发言。

伯达同志问：你叫什么名字？（答：赵健敏。）是你写的给陈伯达的公开信？（答：是。）是你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答：自己写的。）

接着赵汇报了政治师范学校和六零九厂武斗的情况。当赵谈到六零九厂军代表支持该厂武斗时，谢副总理说：天津的问题，同志们到北京来过多少次，伯达同志也接见过多少次。现在发展越来越严重，发展到武斗，破坏工厂，破坏很大，不管愿不愿这样做，武斗仍然继续发生。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关心天津的事。这次伯达同志叫你们来，我希望同学们和工人同志们谈主要问题，具体事情就不要讲了。关键所在和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希望多讲一些。如何按着主席思想，按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按天津情况，处理天津问题。当然，这一派对那一对有什么意见，都可以阐述，但意见要集中一点。如说打架，十天八天也说不完，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打架天天有，都说不行，也不能一点不说。这是笔老帐。是继续下去，还是解决？

伯达同志说，要解决一些问题，如解决武斗问题。还是要订一个停止武斗的方案。你说六十六军有错误，关键是支左的问题，也可以提。但乱了几个月啦，还是怎么治的问题。最后你们有什么好意见，对天津驻军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讲。你是个头头，我的话可能不对。

接着赵念了一张传单，并问伯达同志，是否有一个关于保卫六零九厂的指示？

伯达同志说：我说过不要去攻六零九厂，这是国家财产。（此时，郑维山同志念了陈伯达同志和郑维山同志对围攻六零九厂的指示）

赵说，标题是他们加的。

伯达同志说：不要讲究题目，要看内容，是从爱护你们出发的。我说了那么个意见，郑维山同志整理后，电话传给了你们。还是有效果的，你们接受了这个意见，我们欢迎你们撤退，我们就不再责备你们啦。

接着，白金生发言，继续说明这个问题时。伯达同志问：你是那个组织的？（答：工农学革命造反野战兵团。）工农学太杂，又是工又是农又是学。你是哪个职业？（答：三轮六社，蹬三轮。）

当提到李雪峰问题时，伯达同志说：李雪峰已不在天津，还攻什么？还搞一个“反李派”？

当天工八·二五代表提到天津存在走资派复辟时，伯达同志问：阎达开是不是住在你们那里？（答：来过几次，是从保定借来批斗的。）住了多久？（答：四、五天。）是四十五天还是四、五天？（答：四、五天。）李颀伯住过没有？（答：没有。）天津问题，上次在北京开会，不是所有问题全部解决的。没有吸收到五代会的造反派，要继续吸收，是你们提出来他们不吸收，还是你们不参加？（一代表答：天工代会要表两个态：支持天津驻军，支持李雪峰。我们不支持，没叫我们参加工代会。）

接着，大联筹的代表谈到有的被打倒的走资派又公开出来活动了，不仅不检查错误，还说要算帐。

伯达同志说：没有作自我批评，还要算旧帐？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大家说一下。天津工厂系统站出来的干部很少，如不是大问题，有些错误，可以作自我批评，让他站出来帮助工作。几个月来，天津工业系统指挥不灵，只靠军代表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代表和这些干部。犯些错误，欢迎作自我批评，得到群众谅解，可以出来做工作。没有作自我批评，当然群众就怀疑了。一般错误，应该作自我批评，就会得到群众谅解。

当有的代表谈到支持武汉的游行，是向大联筹示威，他们大喊“六十六军就是好”“天津驻军就是好”时，伯达同志说：不错嘛！（五代会代表鼓掌）不要鼓了，鼓掌他们就不高兴了。你们这个会秩序很好，不管什么意见，都能心平气和地讲，不中断对方讲话，证明天津问题是可以搞好的。你们这一派讲得不少了，现在让五代会的同志讲讲吧？

大联筹代表未理采伯达同志意见，继续发言。说到天津武斗背后有黑手时，伯达同志问：哪里来的黑手？（答：六十六军领导。）

谢副总理说：不见得吧！

伯达同志：个人猜想。

谢副总理：插一句话，天津是伯达同志管的，我是来学习的。

伯达同志：我也是来学习的。

谢副总理：武汉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只有一个陈再道，一个赵永夫。他们不是一般错误，是一种叛乱行为，是针对毛主席、针对中央文革的。至于我们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不能套，不能天津也搞个陈再道，张家口也搞个陈再道，到处搞武老谭，陈再道。不要上纲上得太高了。上了没关系，上了要降下来。青年人上了纲，可以原谅你们。要相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解放军。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说过天津部队是个好部队。（五代会代表鼓掌）不要鼓掌，鼓掌容易帮倒忙。

伯达同志：我讲两句，也可能帮倒忙。天津第一次大乱的时候，六十六军起了很大的作用，起了稳定天津局势的作用。当时天津公安局瘫痪了，整个天津瘫痪了。去年冬天我和王力同志去过天津一次，很乱，吃了一顿饭就走了，后来听说更乱了。六十六军接管了公安局，就平静了嘛！群众放炮竹，表明了群众的态度。你们放了吗？（答：放了，现在不放了。）你们以后还要放的。

当大联筹代表谈到三五二七工厂扣河大井冈山同学及解释在武斗中破坏机器问题时，伯达同志说：你们发生两件大事，破坏了两个工厂（郑维山同志：还有一个铁路调度所。）我和谢富治同志、郑维山同志商量派人去公平地调查一下。我们不赞成破坏工厂，不赞成破坏！国家财产嘛！你们发言不少了，现在请五代会的代表发言。

五代会代表林启予发言。谈到天津“走资派”没全打倒，李立三、阎达开等人还在活动。

伯达同志说：大联筹，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和谢富治同志还有别的事，你们发言暂时到这里。为什么找你们两派来，人数一样多，目的是要你们互相谅解，首先达成一个停止武斗的协议。不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并付诸实施，就只好谈了，就要僵持下去，乱下去了。根据你们今天的情况，可以搞一个停止武斗的协议。每一方派三至五个人，你们自己谈，自己达成协议。不仅仅是“停止武斗”四个字的问题，还要有具体措施。听说你们都装备起来了，刀、矛、火药都有了，这些在协议中自己去解决。你们自己谈，自己达成协议，不是我们强加于你们。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有争论，自己商量解决，不然就无从谈起了。同意的话，军队派人参加，必要时公安局也参加一个人，拟一个稿，交两方群众讨论、修改、补充。你们有很多有文化的人，讲话比我漂亮，你们一定能搞好。你们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主席很关心天津问题。天津与北京密切相连。你们知道天津的名怎么起的？天津就是上天的道路，到北京要通过天津，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你们要把天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达成协议，就要执行，要有具体部署。你们还有想干的样子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还要大搞武斗？搞过了嘛！是不是不要搞了。按着你们今天的这个态度，我看是可以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的。

谢副总理：我同意伯达同志的这个意见。三方达成一个协议，一方是大联筹，一方是五代会，一方是夺权筹备小组。我们参加你们的签字仪式，总理也可能要参加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一年来，狠狠打击了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打了个落花流水。你们一定要把刘邓、把万张集团批深、批透、批臭，他们还未死，要进行大批判。一小撮“走资派”始终是不甘心的。他们千方百计破坏文化大革命，方法之一是制造矛盾，挑起武斗。武斗，这是一股歪风，北京正在煞这股歪风。这个东西，干扰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歪曲了江青同志“文攻武卫”的精神。江青同志是针对河南二·七公社的情况讲的。他们造反派力量小，保守派力量大，不武卫要吃亏。你们不是这种情况，是革命派之间搞武斗。天津的保守组织，过去同他们还未发展到今天这样。革命派之间，武

斗比过去发展了，这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离开了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要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处理军队和两派之间的关系，用毛泽东思想看看两派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怎样解决。首先把武斗停下来。武斗搞下去，破坏生产。（伯达同志：老百姓是不满意的）你们领导人不注意，发展下去，领导人就控制不了了。北京在煞武斗风。要使武斗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北京西单商场打坏了，正在搞展览，你们可以派代表参观一下。明天你们两方各派代表，搞协议，军队参加。你们要达成一个“停战”协定，并且不要破坏协定。破坏协定群众是不欢迎的，不要做群众不欢迎的事。

伯达同志：大家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央文革小组是很慎重地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你们也要很好地慎重地执行。中央文革小组一不小心、不慎重，就不能很好地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说过要到天津去，还没去，就是怕到天津不能很好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讲话，你们不听，你们达成了协议，我就能去了。

谢富治同志搞工代会、红代会，经验是比较好的。以前我比较心急，他比较耐心。急了不行。他搞的大联合、“三结合”还是比较好的。好象我给北京市卖膏药。用不着替他卖。北京市的膏药是很有名的，不是瞎说的，有很多好经验是可以学习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不能学的。北京学生乱七八糟都上纲是不能学的。北京学生到天津，不知有否好作用，如果有，去过了，也不要再呆了。北京派到天津去的学生都要回来。发现北京学生有两大派，他们就把各自的观点带下去了，搞成了两大派。北京有些学校形成两大派，他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嘛，不一定形成组织分裂。在一个组织内不同意见是可以讨论和商量的，为什么一定要形成两派呢？北航、北师大都未搞成两大派，但有不同意见。没有不同意见才怪呢！制造派别，搞组织分裂，就不一定对了。大家帮忙，不要上街打架。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放下。我今天讲的，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是你们可以打电话回去，说：中央不同意武斗，两派正在搞协议。你们赞成吗？（众答：赞成。）（有的代表提出对方扣着人。）双方扣的人，今天晚上要全部放掉，无保留地全部放掉。能做到吗？（众答：能！）现在是一点钟。你们打电话回去，三点以前全部放掉。好，散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央首长对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一时三十分至四时三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在座的有：李天佑、郑维山、罗元发、黄振棠同志，天津驻军负责人杨银声同志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江枫同志。〕

开始，伯达同志问：昨天回天津去的人回来没有？（答：回来了。）怎么样？（大联筹代表要求汇报）只准说实话，不准说假话，事实是最雄辩的。今天弄不明天弄清，今年弄不明年弄清，总会弄清楚的。我们这一场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不是今天能解决的。我们是有耐心的。我们准备持久战。你们愿搞多少年就搞多少年。大家不肯说实话，想想看对谁有利？对无产阶级有利没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没有利？对革命师生有利没有利？对全市革命群众有利没有利？你们是要拖，你一定讲不真实，那么就一定拖。总之，是要靠自己水落石出的，不要靠人家。希望你们说实话，按无产阶级的作风办事，不要按资产阶级的作风办事。无产阶级的作风就是实事求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是造假情况、假材料，故意制造假象。无产阶级不这样干，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这样干。所以希望大家要说实话。你们说实话我欢迎，我听的。要说实话，首先说自己的缺点、毛病、错误，一句话，要敢于自我批评。这样做就欢迎，天津人民群众欢迎，中央欢迎。这一段话算个开幕词，现在你们讲吧。

大联筹代表汇报。当汇报到外地赴津师生与天津驻军郑三生同志辩论时，陈伯达同志提议：现在一方面在这里发言，同时双方各派五名代表去搞制止武斗的协议。协议是为了平息纠纷，不是重新挑起纠纷。用这样的态度工作可以吗？要诚心诚意搞协议，要用革命精神、自我批评的精神，与对方合作的精神搞协议。你们现在就可以各派出五名代表协商一下。（群众组织代表提出是否请军管会的同志也参加）军管会可以派个把人去听听，但主要是靠你们自己。（郑维山同志：可以去参加，光带耳朵。）八·一三、卫东的两个同学来了没有？（答：来了。）为什么不让你们来？（答：因为观点不一致。）观点不同就不让人家参加？这不对。正因为观点不同才开这个会嘛。

大联筹代表汇报到塘沽港口武斗影响生产时，伯达同志说：塘沽问题也要搞个专门协定。这个地方要保证运输畅通，保证安全。（大联筹提出要求把受伤代表送北京治疗）谢富治同志说：和国民党打仗受了伤送北京治疗我们欢迎，打内战受了伤送北京来我们不欢迎！这时，搞制止武斗协议的双方代表对协议题目、签字方法等问题发生分歧，并进入会场请示中央首长。伯达、戚本禹同志对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作了调解和回答。戚本禹同志并强调指出：制止武斗是中央的指示，你们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了。采用任何一方提出的题目或签字方法，都不意味着中央承认谁反对谁，这里只是解决制止武斗的问题。

接着五代会代表汇报对大联筹反映情况提出异意。相继双方交替发言，对有关事实发生争论。当谈到“反复辟联络站”这个组织名称时，伯达同志说：我随便讲个小意见。“反复辟”这个意义究竟怎么样”你们搞反复辟要考虑考虑。有反复辟，有大联筹。反复辟就是说天津有资本主义复辟，是不是这样？这值得很好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子，反复辟就不要用了。大联筹还是可以用的。“反复辟”你们好象讲不出多少道理来，值得三思，多想想，是不是有复辟。天津是搞过一次复辟的，那是二、三月间在小站镇……也不过几十天，四清下台干部要登台或准备登台。听说小站有一段搞得很乱，后来北京政法学院同学到那里，向农民请罪，承认错误。我赞成他们这种态度。所以你们可以总结这一段经验。什么叫复辟，什么叫反复辟？要晓得这个事情嘛！当五代会代表谈到“反复辟”联络站与李立三派有联系时，伯达同志说：李立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众呼口号：打倒李立三！）

当两派争执抓人、抢东西、死人、放火等问题时，戚本禹同志与双方代表一个一个地问清事实真相，澄清事实，最后非常气愤地说：今天达成制止武斗协议以后，如果再发生杀人、放火、打人，就把这个组织宣布为法西斯组织。对于这种事的人，内部要造反，把这种人揭露出来，认真处理！你们可以学北京的办法，回去以后要搞游行示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杀了人就没有事了？那不行！要处理的！达成协议以后，马上打电话停止武斗，制止武斗的协议要在全市张贴。一个工厂、一个单位的问题只能靠内部解决，禁止任何人带人到外单位参加武斗或冲击。今后规定一个简单的标准：谁去冲击谁负责，谁抓人、扣人谁负责。武斗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质变。质变了，不管你这个组织过去怎么样，都不行。以后

就用实际行动证明是什么组织，是革命组织还是法西斯组织。同意不同意？（众：同意）同意就鼓掌。（众：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今后，谁都不准购买杀人凶器，谁买扣谁的工资，弥补国家损失。（众：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戚本禹同志说：我再讲两点意见：一是塘沽的问题很重要，你们用武斗的精神去支援一下，两派考虑一下，要派人去参加劳动。这要与驻军研究商量，安排好再去，安排不好不要去，去了绝不能发生武斗。那是个特殊地方。如果在那里发生武斗，军管会有权按“六·六通令”处理。如果有人包庇，我们就要过问。这一点你们要向上海造反派学习。上海港运发生困难时，上海造反派去支援，参加劳动，做出很大贡献。（谢富治同志插话：关心国家财产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搞武斗停止生产是不对的。）武斗停止生产就是犯罪。今后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项规定，坚持八小时工作，白天搞生产，晚上搞革命，任何人不得随意离开生产岗位。（大联筹一代表表示马上打电话回去坚决贯彻中央首长指示。两派代表鼓掌支持这个行动。）另一点意见是，建议你们不管哪一派，今后不要随意说“军内一小撮”。你们没有根据不能随便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三依靠”：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干部大多数。解放军有缺点错误是可能的，但与地方不同，如与天津的万张反党集团就根本不同。他们是有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的，他们长时间来形成了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军队不是这样的。军队中也有坏人，但是极少数，如彭德怀就是坏人。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好的，是经过考验的。要不，为什么毛主席号召我们向解放军学习呢？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可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性质是不同的。不是坏人，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说是“一小撮”，不要哪里都抓陈再道，哪有那么多陈再道？就那么一个嘛！犯了错误可以炮轰，可以检讨。有坏人你可以提出材料，我们研究，不能随便提“一小撮”。

戚本禹同志讲完后，群众代表宣读了双方制止武斗的协议。全体一致鼓掌通过。伯达同志说：达成协议是个很大的成绩。要执行，谁破坏协议就有责任。定下来就要执行，谁破坏谁就犯罪。

有的代表提出，过去武斗中，有些人抢了不少公物和私人财物，应当处理。戚本禹同志说：要号召他们自动交回。现在不交没有关系，将来一定会一一查清，

进行处理。不要看他们现在高兴，将来要哭的。群众一定会揭露他们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不报，时辰不到，不要耽心！（众：笑、鼓掌。）

最后伯达同志鼓励说：祝贺你们达成协议！但是要看行动，看实际，口头上的不算。（众：鼓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三时三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在座的有：郑维山、罗元发、肖文玖、黄振棠同志及天津驻军负责人杨银声同志，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江枫同志。〕

陈伯达、谢富治同志进入会场时，群众组织代表起立鼓掌。陈伯达同志说：不要鼓掌了，不欢迎，鼓掌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们鼓掌的。认为鼓掌我们就高兴，不会高兴的！（谢富治同志：不武斗，我们就高兴了。）给你们谈了那么多的话，几天的话，不知是否觉得我们是与你们开玩笑？还是觉得我们好玩弄？大联筹在那里呀？你们在干什么？天津发生了什么事情？（大联筹代表：首长生气可能是昨天五代会开会时，有冲击会的情况，但决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你们把人全部放出来，昨天捉的。我们整天不睡觉闹来闹去，你们认为我们很舒服，我们可以受玩弄，其实，你们可能在受一批坏人玩弄，你们被坏人操纵了，提醒你们呀！我们想挽救你们。我前天就批评过，什么叫“反复辟”？你们答不出来，你们讲不出多少道理来。算了吧，什么“反复辟联络站”，我根本不相信。现在我问你们：难道中央对天津问题的决定，成了你们“反复辟”的根据吗？你们对准谁呢？反的是什么呢？我替你们耽心呀！你们要当心哪！（天工八·二五代表赵建敏：伯达同志我要求发言。）你已经发的不少了。你是大理论家，我倒要看你是哪一类的理论家。（赵健敏陈述昨天五代会的队伍游行时受干扰的原因。）我是搞过游行的，小时候就参加游行了，我从五四运动开始就参加游行、演讲，在家乡、在上海、在其他许多地方。

谢富治同志问五代会：你们游行队伍有没有说刺激话刺激对方的？（答：没有。在北京是有的。）我替你们耽心。可能你们控制不住你们的队伍。你们这个队伍那么庞大、复杂，你们认为都是好人就可能上当了。上当的可能不能排除呀！

你们在这里谈判，有人就直接破坏谈判。我想：就是你们签字是诚心诚意的，是否就排除这个可能性呢？我们是在阶级中，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你们说那些剥削阶级、反动阶级能轻易退出政治舞台吗？他们不退，就要利用一部分人。我现在提醒你们注意。可能你们都是好人，但你们如果不当心，可能要上大当的。我看你这个三轮车工人就不大象。（大联筹白金生：我确实是蹬三轮的，我的历史可以调查。）你多大岁数了？（答：三十三岁半。）哪一年蹬的三轮？（答：一九六二年。）家中几口人？（六口人。我简单谈一下我的历史……）你由集体工厂的工人到去蹬三轮这是一个倒退，你必须承认这一条。伯达同志：我们不以貌取人。（白金生：首长昨天就说我不象三轮车工人，而有人就利用此大造谣言。）谢富治同志：那样是不好的。不要捞稻草。

伯达同志：我现在在想这个问题，我们的会还开不开下去。休息几天，以后再开，诚心诚意地和你们的群众组织商量商量。同时你们也看了，不管哪一派，有没有人在让你们做坏事。我想可以停几天，我还有很多别的事，有点吃不消了。本来我对这个协议（指停止武斗协议）是很高兴的，其他地方的协议没有这么详细。从今天情况看来，可能还不能实现。恐怕大家脑子要冷静一下，我的脑子也冷静一下。这几天我受刺激不少，我觉得我还要看一看。你们回去一两天再来。还是希望你们诚心诚意，不要捞稻草。你们两方都想捞稻草。除了你们，还有没有坏人？我没有查清不好说，但两方面的组织都有想捞稻草的味道。稻草有什么可捞的，一捞就断了嘛！你们觉得稻草那么牢固吗？你们到小站去看看，那边稻草很多，捞一根试试看牢固不？不要靠这个吃饭，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把我回答的问题扩大，不要这样搞，这搞不好。昨天我提出搞一个塘沽港的协议，一个油田的协议，一个全市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大家都没心搞了吧？搞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以后就又去搞武斗了。

谢富治同志：刚才伯达同志讲了很多。先不要回去。回去几个人去传达制止武斗的协议，这里继续谈。家里那么多人，你们可能完全控制不了。也不要搞游行做样子。同志们要向前看。只要你们抓大方向才好。什么是大方向？就是大批判。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大批判、大揭露。搞大联合是大方向，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划时代的伟大著作、抓革命促生产是大方向，要文斗反对武斗是大方向，搞

革命的三结合也是大方向。这都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告诉我们要这样做的。革命造反派不应该让这样那样的问题干扰我们。你们要按毛主席的航线前进。大海航行靠舵手。要按我们伟大舵手的航线走，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要把天津改造成毛泽东思想统治一切的城市。搞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制定的航线，要按此前进。你们是革命造反派，要不受任何干扰，不受“左”的干扰，也不受右的干扰，离开了革命的航道就要犯错误，过去的旧帐不要算了。除了过去杀人放火的、破坏工厂的，要追查一下，一般的就不要追查了。大联合的同志们也有好多好的意见。解放军如在支左方面（如对天工八·二五的问题）有什么缺点错误，应该公开承认检讨。当然错误还是认识问题，不是陈再道的性质。这以后慢慢讨论。但八·二五的同志也要注意，不要去想什么办法去压军队，迫使驻军犯错误，在天津大干一场。你们要好好把你们那个队伍搞好，不如此，坏人就可能钻进去。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认真听取、采纳，但你们那个队伍要好好整顿。协议还是要广泛宣传、张贴。昨天打了一下，不要对此做文章，要看他们明天还打不打，后天还打不打。如果接连三天打就有问题了。协议可能还没到家。我们要看十九号、廿号、廿一号。仅昨天打了一次要原谅。看十九、廿、廿一号哪方破坏协议。我们往天津派人去了，你们还是留在这里继续讨论。还有个塘沽港、油田和抓革命促生产三个协议，然后再搞五代会和市革命委员会。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解放军反映意见要公正。把材料都给我们送上来，要听两方面的意见。（大联筹：支左一次都不到我们那里去。）不去不对。你们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十条已通过了八条，另两条有不合适的地方再协商哪！我看这个要求是好的。大联筹这封公开信不错。那条语录不要用了。不能乱用，改一下可以印一下。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凌晨零时五十分至五时三十分，地点：人大大会堂安徽厅。出席首长：陈伯达、谢富治、江青、戚本禹。陪同接见的有：郑维山、罗元发、肖文玖。被接见的成员：五代会、大联筹双方代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

筹备小组解学恭、肖思明、杨银声、江枫和北京军区、天津驻军工作人员。零时五十分，陈伯达等首长进入会场，大家热烈鼓掌。】

陈伯达：鼓掌有什么用啊，我们听得不少了，年纪大了，耳朵吃不消了。你们是刚从天津来的是不是？（众：是。伯达同志看到赵健敏后说）啊，老朋友又来啦。叫赵什么？（郑维山：赵健敏。）好厉害呀！向我进攻的理论家。告陈伯达的信谁写的呀？今天谈什么？停止武斗的协议执行的怎么样？只管鼓掌不管执行怎么行呢！赵健敏，你贴大字报说陈伯达怎么歌颂你了？（赵：我没贴。）我是含蓄地批评你，不是歌颂你，是批评你。

谈谈吧，停止武斗协议执行的怎么样？（白金生：我说点儿。）又是你，光听你的了，算了吧！换一个吧。（工矿总部赵凡：我谈谈。）你是哪个组织的？（赵凡：我是工矿企业的，赵凡和工代会林启予简单说了执行协议情况。）

戚本禹：同志们，最近天津发生的一些事情，中央文革小组很关心。天津协议达成后，情况并未扭转，有些地方比过去还严重。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现在处于这种混乱状态，我们很着急，中央文革小组很担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要问题是什么呢？是斗争大方向问题，就是斗争矛头指向谁。这也是天津市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关于斗争大方向，最近中央首长有很多重要指示。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讲了很多话，同志们听到了吧？他们做了很多分析。江青同志接见安徽代表还有个重要讲话，一会还可以放录音。解决天津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全国的形势。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局在胸。了解了全局，才能解决好局部问题，如果对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理解不正确，就无法解决天津问题。最近，中央同志的讲话，批判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左”倾盲动主义，从极“左”的方面来干扰文化大革命；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从右的方面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要批评这两种倾向。中央对形势的正确分析是正确解决天津问题的指导方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特别着重批评了目前干扰大方向的一些错误倾向：

一、不是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解放军。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抓什么“广老谭”、“湖老谭”，到处抓陈再道。中央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样估计我们的军队，完全是错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光荣伟大的军队，是举世无双的。毛主席教导我们：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部队从秋收起义到现在，四十年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建立了伟大功勋。即使是几次“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时期，广大干部战士也不是跟他们走，而是跟毛主席走的。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确定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的军队始终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

四九年解放后，军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其中有一段，彭德怀篡夺了军队的领导权，企图推翻党对军队的领导。但一直受到抵制，并很快被中央识破了，庐山会议罢了他的官，由林副主席领导我们的军队，部队面貌很快改变了。三年困难时期，军队始终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定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特别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搞思想革命化，做出了伟大成绩。因此，毛主席发出号召向解放军学习，如果象有些人所说的，到处是一小撮，那毛主席不是号召错了吗？同志们认真考虑一下，究竟是毛主席估计的正确，还是你们少数人估计的正确？为什么毛主席不号召我们学习西北局、中南局，而是号召我们向解放军学习呢？就因为我们解放军确实伟大。有的同志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把矛头指向解放，煽动群众，企图打倒人民解放军，对军队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敌对的态度。这里有坏人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进行捣乱，我们看得很清楚。军队在“三支”“两军”中也建立了伟大的功勋，有很大成绩。当然，由于介入仓卒，没有经验，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的地方，军队支左犯了些缺点错误。但这是认识问题，只要中央一指出，就马上改正，高姿态的改正，这就是军队伟大的地方。如山东、湖南就是这样。象赵永夫、陈再道那样的，是极个别的。我们的整个军队是伟大的。他们有缺点错误，就高姿态检查，勇于负责，很快改正，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他们不愧为伟大的军队，不愧为毛主席领导的军队，不愧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而某些人想利用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企图把军队冲垮、打倒，这是极其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中央负责同志都严厉地批评了这个问题，希望引起天津同志的严重注意，否则就要犯错误。

二、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北京、湖南，就出现了反革命阴谋集团。象“五一六”，直接把矛

头指向周总理、指向中央文革，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一小撮阴谋集团。还有的象上海的革命委员会，刚建立，他们就企图把它搞垮。新建立的革委会并不是说没有缺点，是有缺点的，有的缺点甚至很大。但这是新生事物嘛，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缺点要帮助改，扶植他成长。有些人不是帮助改，而是非打垮不可，唯恐天下不乱。乱是有阶级性的，不是什么乱都好，要看乱谁。一种是无产阶级乱资产阶级；一种是资产阶级乱无产阶级。现有人想乱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刚建立一点新权威、新秩序，他们就想搞乱，这是我们所反对的。新的革命委员会有缺点，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不包庇。但有些人企图搞乱新建立的权威，搞乱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秩序，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三、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也是值得天津市的同志严重注意的。你们好好想一想，工厂那么多，每个工厂，都分两派，工厂和工厂，也是两派，互相打得头破血流，这是正常的吗？工人阶级是一个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没有根本对立的矛盾。轻工业工人和重工业工人没有根本对立的矛盾，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是一家人。钳工、车工，不管什么工，利益都是一致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不是为资本家，那为什么这样呢？就是那些“走资派”、坏人在背后挑动的，就和过去地主挑动农民打农民一样。伯达同志经常给我讲他们那里封建剥削阶级挑动农民斗农民的故事。家族两姓互相打，都是地主挑动的。凡有严重武斗的地方，背后一定有坏人，有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特务、野心家。不要看他讲得漂亮，很好听，什么高举伟大红旗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呀，那都是骗人。实际上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在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反复辟呀？这就是最大的复辟！工人阶级没有什么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就是坏人挑动的。

在天津开始有个野战兵团，是张淮三操纵的。万晓塘死了以后，我去天津，看到几十万人游行，我问一个小学教师：这是干什么？他说是追悼什么书记的。我说，马克思讲，凡纪念死人，都是为了活人，那是利用万晓塘整人的，他们以追悼万晓塘为名，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万晓塘的阴魂不散。有的本来是一起造反的，现在也分成了两家，互相打。你们不要以为工人愿意打架，没那么回事，

我们问过许多工人，他们都不愿意打。工人说是有些头头搞的，是坏人挑动的，或者是野心家干的。好工人是愿意靠四大搞革命的，武斗是坏人挑起的。

中央对挑动群众斗群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文汇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的党性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现在有些人就是要制造派性，搞宗派，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斗群众，坏人混水摸鱼。这样，就背离了斗争的大方向。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大方向。这样下去，就要背离毛主席指引的航道，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中央负责同志从九月一日开始的重要讲话，就是要端正大方向，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现在有的人想让船儿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向右转，这是搞破坏。这一点同志们一定要认破。这是首要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无从谈起。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希望同志们一齐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同志的讲话，真正弄明白什么是大方向，怎样掌握斗争大方向，怎样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样，才能正确解决天津市的问题。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

（一）少数头头认识有问题。他们对全国形势，对大方向，对解放军认识有错误。当然，这不一定是坏人，但他们不是用毛泽东思想看问题，而是用小资产阶级甚至是资产阶级观点看问题。

（二）阶级敌人破坏。美、蒋、苏修和日本特务，地富反坏右、社会渣滓、个人野心家，混进来在背后煽风点火，进行破坏。同志们要提高警惕，眼睛里要敌人。这么大的运动，难道敌人能不捣乱破坏？如果看不到敌人，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不要认为自己很高明，要吸取教训，如果不警惕，摔倒就会爬不起来，掉进去就会越陷越深。有的人看起来很左，其实是假的，是装的，是特务，是敌人。同志们要很好想想这个问题。“五·一六”的口号不是喊得很好吗？也喊保卫毛主席。那是阴谋，是敌人。有些人很善于伪装，例如胡风集团，就是窥测方向，投其所好，进行阴谋活动。我们要善于识别，要警惕，别上当。

（三）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使一些人对问题认识不清，这也帮了敌人的忙。如军队支左中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又迟迟未检查，或改正得慢，被敌人利用了，使群众发生了错误的认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没有政府，没有无产阶级的权威，各地普遍有这种现象，特别是天津更突出。是不是这样？（五代会：是！）你们（大联筹）这边呢？（大联筹：是！）这是不能容忍的。无政府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列宁曾经很严厉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是革命的腐蚀剂。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无政府主义就很猖獗。天津现在就是这样，强盗、土匪、流氓……横行霸道。在这方面，天津驻军有缺点错误，不敢镇压，看到流氓坏人不敢抓，手软得很。我们收到很多材料，天津一些女同志写给伯达同志的信，这里不好念。还有一封信，真是触目惊心！七月三十日，杨柳青代销店粮食被抢，抢走四十九袋面；八月十日，一伙人到河北区抢粮、抢棉；八月一日，一伙匪徒到河北区商店，将商店老头看住，抢烟，然后又到大光明抢汽水、抢西瓜！八月二日，有些匪徒拿着匕首，到保定道商店抢东西，有的凶手拿着刀，抢粮库；八月十九日，在河北区抢走大批东西；八月十七日，在河北区抢走起士林一个车间的糕点、饼干；八月十三日，河东区被抢走了糕点、手表、自行车；许多化工厂药品被抢；南开区大型砍刀两千把被抢；××厂七千把大刀被抢；八月九日，大联筹围攻政师后，把女学生绑走强奸；七月二十五日，工矿企业、天工八·二五围攻地毯公司，放火烧楼，把地司一女同志绑走轮奸……。谁是工矿总部的？（工矿程国富、赵凡起立答应。）这些事你们知道不知道？（赵凡：不知道。）什么？不知道？马上撤职！你说瞎话！你们自己把一个不重要的人游街还说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答：工人。）我建议你明天回去，不要在总部干什么工作，回到生产岗位上去，跟群众在一起，你就知道了。（工矿程国富：那是少数人干的。）当然是少数，大多数是反对你们的。你们工矿有个孙志民、林造反吗？（程国富：这两个同志……）什么！还称同志？（程赶快改口说：不，不是同志，是坏人。）林造反在哪里？抓起来没有？（程：在我们那里，我们打算回去就抓。但他们二百多名坏蛋很凶，还有匕首。）你们害怕他们的匕首吗？我看你们有很多流氓。这些人都是你们的吗？（程：一个。）就一个？不对！林造反是你们的吗？（程：是。）孙志民是你们的吗？（程：是。）……这不就好几个了吗？怎么说只有一个？所有强奸轮奸的都要抓起来，军管会要依法处理，要枪毙他几个人！（众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样的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允许的。江青、伯达看

了这些材料都很生气，批给郑维山同志按刑事犯处理。你们军管会再不抓人，再不杀人，要你们干什么？再这样手软会被人赶走的。

（这时江青同志在谢富治同志的陪同下进入会场，会场起立，鼓掌欢迎，高呼毛主席万岁！）

江青：同志们好！谢富治同志要我来看看同志们，我还有别的事。天津市夜里有人出去抢东西，奸淫妇女，对这种东西要专政！（热烈鼓掌）我为什么说是“东西”呢，因为他们是反动的。人民是愤怒极啦！我们有责任。我们的军队宽大无边，对不对？（众：对！）但你们要支持军队，要发动群众，把坏人孤立起来。强奸妇女的这些人十分可恶，我都不好说出口，这些人要抓起来枪毙！（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好！我看同志们是赞成的，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要协助军队、军管会办好这件事。不要把军管会搞垮，把无产阶级的权威搞得威信扫地。军队的同志们腰杆要挺起来，不要怕他们。好，我还有事，现在退席了。（大家鼓掌，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江青同志喊：“向同志们学习！”）

戚本禹：中央文革对这些是严厉谴责的，是非常不满的，你们回去后，马上办这件事。各个组织都要把坏人抓起来，送军管会。军管会要成立个专门班子办这件事。先把社会秩序稳定了。

无政府主义还有一种表现，就是不上班。不生产不上班，伸手拿工资，长期旷工，遛遛哒哒。天津有这种现象没有？（众：有。）特别是塘沽港，外国轮船货卸不下来，看着国家被罚款，就是不管，这算什么革命造反派？上海市就不是这样。他们在港口发生堵塞时，不分是那一派，都去干，很快扭转了局势，而天津港至今没扭转过来。中央不只一次发出号召：一切工人都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工人要业余时间闹革命。而现在有些人以闹革命为名，以旷工为实。

伯达：实际上不是闹革命，把工厂停了产，关了门，在社会上遛遛哒哒，搞什么革命？

戚本禹：天津工人阶级的传统不是这样，我和伯达同志到天津工厂作过调查。

伯达：我去过钢厂、三条石。三条石的阶级教育展览馆搞起来了没有？三条石是天津工人阶级革命最早的，那里有一大堆卖身契，悲惨得很。

戚本禹：天津工人阶级是有光荣传统的，你们不要给天津工人阶级脸上抹黑。我在那里搞过厂史，那里有优良的传统。

伯达：天津是老工业城市，在旧中国，除了上海就是天津了。

戚本禹：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号召，现在居然抛在一边，光拿工资，不上班。什么是造反派？我看很重要一条，就是看你这个总部脱产的有多少。脱产的多，肯定不是革命造反派。不生产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败类。我和伯达同志到天津做过调查。那还是困难时期，工人在那里认真劳动。那时也有坏人不上班。你们查查，看那个组织不上班的多。不上班的多，肯定不是革命造反派。不上班，不生产，成了“油子”。真正造反派的工人，是好好劳动的，优秀的工人是不旷工的，我没有听说过到处流浪不上班、不生产的革命造反派。到处遛遛逛逛，当流浪汉，不生产，拿工资，是可耻的剥削行为。不给国家生产，每天吃国家的粮食，拿国家的钱，是剥削工人农民积累的资金。有的人拿工资不上班，成了新的剥削阶级，丧失了工人阶级的光荣称号。好的工人，好的造反派，一定要上班，要恢复生产，增加生产。军代表识别造反派，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是否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听他说得很漂亮，讲得漂亮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听其言，观其行。违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号召的人，就不是革命造反派。不生产，打砸抢的造反派我没有见过。

天津驻军支左、军管会是有缺点的，他们是会检讨的，已经检讨过一些了。但必须维护驻军的威信。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在天津抓军内一小撮，我们是不赞成的。五代会有缺点也要检讨，要把没有参加五代会的造反派吸收进来。要补台，不要拆台。你们八·二五也要去补台，不要去拆台。你们说五代会不稳固，可以去当支柱嘛！这个方针，上次伯达、江青同志就讲了，你们就是不听，再不听就要走到反面去了。我们不包庇五代会的缺点错误。五代会有缺点错误要检查。你们（大联筹）的错误要比他们多一些，你们要检查。（大联筹红革会代表：保守组织野战兵团改头换面，就参加了五代会。）你怎么知道是改头换面？犯过错误要允许人家改嘛。广大群众是革命的，不要把大多数工人看成是坏的。现在还有多少拥护刘邓、万张的？如果把大多数工人看成是坏的，那他自己就是坏人；不要把受蒙蔽的人看得太重，都说成是坏人。伯达、谢富治同志他们是高明的，我是不高明的，我就受过蒙蔽。改了，你还不让人家革命？鲁迅讲过假洋鬼子，凡

是不准别人革命的人，自己就是假革命，就是假洋鬼子。群众的大多数永远是革命的。有些人说人家是“老保”。怎么老保？也有的说，因为反对过我。反对过你就是老保？我到工厂去，有个人说我联系的都是坏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我说那你也是坏人了？后来他说他说错了。不管是谁，不要把别人说得全是错误，把自己说得没有错误。你这个同志是工人吗？（红革会：学生。）学生？我就怀疑你这个学生。你就那么了解工人？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改？野战兵团有多少人？（答：十几万。）十几万人你都了解吗？都是保守的？都没有改？我不信。反对过你们的不一定都是保守的，可能你们有缺点错误。（答：头头没有改）你怎么知道没改？（答：我一直和工人在一起。）你们赶快退出工厂，回校复课闹革命，搞斗批改。不管怎么说，要补台，不能拆台。要拥护军管会，维护他们的权威。我们建议你们两派开门整风，特别是大联筹要认真整风。你们（大联筹）有无专门打人的组织？（五代会：有！）要一律解散。什么“敢死队”、“飞虎队”都要解散。“飞虎队”的名称是国民党的名字，名字就不正。我不是形式主义，但一听“飞虎队”这个名称，我就反感。解放前，蒋经国在上海就搞过飞虎队。坏头头要自己抓，自己抓自己的。强奸犯、盗窃犯，你们要抓起来，抓了送公安局军管会。你们要整风，把坏头头清理出来，端正斗争大方向。五代会也要整风，要检查，你们对群众的态度有毛病。（五代会：接受首长的批评。我们团结群众有缺点，要作自我批评。欢迎大联筹中的造反派和我们联合起来。）他们（大联筹）对军管会、对部队、对群众的态度上有问题，要检查。要抓革命促生产。

郑维山：下面请伯达同志作指示。

伯达：刚才戚本禹同志讲的，请大家注意，要好好学习、研究，反省反省自己，检查一下自己。五代会、大联筹都要根据戚本禹同志讲的检查自己。是不是你们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我以前说，响当当是货郎担子。现在又有人说是什么“名牌”，由货郎担，又变成了“名牌”。“名牌”就是商标。无产阶级革命派变成商标了？原来是货郎担子，现在成了商标，很值得想一想。大家都自称是响当当、名牌。我们又不做买卖，我们中央文革跟你们谈话，不是做买卖，更不会拿原则跟你们做买卖。所以说，谁向中央施加压力的话，我们一律退回去。你们现在有些组织，有些派，自己背上了大石头，可能还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不只一

块，甚至是两块，包袱很沉重。这块大石头可能是一百斤、二百斤，可是自己还不嫌重，还把它作宝贝，作依靠。在大联筹这方面，希望你们想一想。上次接见保定的时候我说过，我说你们如有人认识天津“反复辟”的，就请转告他们，他们不是在反复辟，而是在搞复辟。反复辟的一些人听了这些话可能很不高兴，说什么陈伯达受蒙蔽太深了，中毒太深了。可能有些人背了大石头，自己中了毒。因为自己中了毒，就不以为大石头是个大负担，而当成宝贝。现在我劝你们把大石头丢掉，这样子就可以轻装上阵，就有可能成为革命派。不然，自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中包括赵健敏。赵健敏，现在大联筹不买你的帐，说你们签定了协议出卖了他们。天津是不是有人这样说？值得想一想啊！停止武斗的协议是你们自己搞的，我无非是改了几个字嘛，怎么能说是出卖呢？

（赵健敏：我们不承认是出卖自己。）有的想搞武斗，不满意你们搞停止武斗协议。就有那些背后背大石头的人。赵健敏，你是衡水人吗？解放前很苦吧？（赵：是，解放前很苦，现在好多了。）现在你在北京签了字，签定了制止武斗的协议，大联筹有人要造你的反。不是革命群众、工人、革命造反派造你的反，群众不是这样看法。你们的协议是在群众的压力下，群众要求你们搞的，包括你们两派的群众要求停止武斗。你们的武斗、停产，是残暴的行为，包括杀人、放火、抢劫、轮奸，许多罪恶群众是痛恨的。

谢富治：我们不愿意说出来，讲出来是不好听的。

伯达：大联筹的特别要想一想。五代会有缺点，没有做好团结工作，也可能打了人。既然是五代会的，就应该遵守革命纪律。大联筹有个工矿企业造反总部，组织了十几个所谓“扫氓队”，说什么要扫除流氓。“扫氓”是联动的口号，你们比联动走得更远。所谓“扫盲队”，实际上就是流氓队！要宣布为不合法的组。我建议十几个扫盲队，全部解散！他们打砸抢，胡作非为，军管会、公安局有权处理他们，谁也不能干涉！（工矿代表：原来是三十五个复员军人组织的。后来自动解散了，现在出来的是假的，是五代会冒充的。）假的你们也有责任，你们和劳改犯合在一起就是可悲的了。你是干什么的？（工矿代表：开汽车的。）现在为什么不开汽车了？是不是因为当官了？（答：我是勤务员。）勤务员也是很大的官嘛！勤务员就不开车了？现在我建议一条，所有的大卡车、公产汽车，可能还有一些小汽车，要全部交出来！（众：鼓掌。大联筹一代表：我有重要事

情向中央汇报。)我还没有讲完。(大联筹代表,我说的事很重要。)我讲的比你的更重要。我讲的是天津四百万人民关心的事情。我建议你们把抢来的大卡车、公共汽车、小轿车,要全部交出来!由天津驻军、公安局军管会负责接收。军管会组织个专门班子,负责这件事。你们两派,派代表和军管会共同商量处理这件事,并作好检查。

塘沽港那些妨碍生产、妨碍交通的关卡一律撤掉,不撤掉就是犯罪。还有天津市的全部交通,和平路那些地方,不准堵塞。赞成不赞成?(众:赞成!)赞成就搞一个协议。如果有诚意,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不管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这是国家的利益,整个天津人民的利益,一定要这样做。

谢富治:我完全同意陈伯达、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最近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作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今晚讲完了话,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可以放一下。

当前非常重大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非常重要的时刻。一年三个月了,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主流,必须肯定。全国是这样,天津也不例外。主流是好的,但出现一些不好的苗头和支流,很值得严重注意。支流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组织,有一些现场,有一些事情,背离开了大方向,背离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没有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走上了邪路。文化大革命当前的大方向是什么呢?首要任务是大批判,这是重要标志之一。天津除批判刘邓、彭罗陆杨外,就是批判万张集团。现在批判的怎么样?第二,是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的航线。不能离开这个航线。但是当前有些组织,有些革命派就离开了这个航线。首先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对准群众。在去年开始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矛头指向群众。现在我们有些组织把锋芒不是对准走资派,而是对准群众,这是背离开了大方向。我们的大方向是搞大联合,而你们在那里搞分裂,分成两大派,每派内部也再分裂。分裂固然是客观规律,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大联合。联合有利于对敌,分裂有利于敌人。谁联合就是革命的,谁分裂就不是革命的。当然,与走资派、与走资派操纵的保守派要分裂。革命派内部是提倡联合的,无原则的分裂是背离大方向的。第三,搞武斗是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教导,完全违背了大方向。第四,

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现在有很多人只相信半个，去掉了两个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解放军是三相信三依靠的骨干，反对这个，就是反对三依靠。还有的不相信干部大多数，革命干部根本站不出来，站到这一派，那一派打倒，站到那一派，这一派打倒，采取了实用主义。相信群众这一条，还是只相信你那一派，五代会不相信大联筹，大联筹不相信五代会。是否你那一派都依靠了，也要打个小问号。同志们，你们在北京，中央同志讲了很多话，不是马马虎虎说的。你们这样乱搞，就有利于敌人，有利于美、蒋、苏、日特、地富反坏右。群众是很反感的，脱离了群众。天津治安不好，北京也受到了影响。北京最近准备杀人。把那些杀人犯、强奸犯杀他几个！（伯达同志带头鼓掌，大家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敌人捣乱，暴露出来好。伯达、戚本禹同志分析的很好。我们要警惕，不要做那样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天津的生产情况很不好，八月份比七月份下降了百分之十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九，近三分之一了。

伯达：所有的工人都要在业余时间搞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

谢富治：刚才伯达同志说到塘沽港的问题。我看了很多材料，一个是广州港，一个是塘沽港，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很生气。不是说是革命派，连一点爱国主义也没有。

伯达：大联筹要注意，听说你们把塘沽港支左联络站的王克同志抓走了。抓多久了？今天早上就放出来，不放就是犯罪！

谢富治：不管什么理由，塘沽港要疏通。外国轮船上上下下，来来往往，设关卡，阻拦、搜查，干那些丢人败兴的事，丢了我们国家的丑。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过，我们要去一下，我们什么也不怕。你们随便抓人不行啊！

伯达：现在就马上打电话，把人放出来。你们把王克抓起来是很大的错误。（大联筹：我们没有扣他，是要他解决问题。）没有价钱可讲，就是要放，马上打电话放人。

谢富治：我希望天津的同志们对戚本禹、陈伯达同志讲的话，要严肃对待，迅速扭转天津局势，不能采取两面态度，这里谈，那里打，军队也不负责任，这不行。不要以为中央是好欺负的。

伯达：在天津日报，大联筹要撤出来。以后可以吸收你们的代表参加工作嘛，强占是不行的。（大联筹吉新民要汇报报社情况）不要汇报了，天津日报不能强占，要马上撤出来。

戚本禹：不管怎么样，先撤出来再说嘛，老强占着还行？（大联筹：我们和郑三生会谈，他们答应改，但是他们不改，他们把谢副总理回北京的消息登在副刊上，以地方压中央。）

谢富治：你们大联筹有没有报？送给我十份，我挑挑毛病，管保能挑出来。敢不敢给我签字？我准能找出错来。（大联筹代表：我们的错和他们的错不一样！）什么一样不一样，我谢富治回北京的消息登不登都可以，什么一样不一样！

郑维山：现在三点了，下边还要听江青同志的录音报告，是否就讲到这里？（这时大联筹代表纷纷要求发言，提出很多具体问题，晚上没被子盖；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河大八一八有刑讯室、水牢，杀死他们三十多人。）

陈伯达：河大八一八来人了吗？（答：来了。）你们那里有水牢吗？（河大八一八代表：我们那里根本没水牢，也没有刑讯室，更谈不上杀死他们三十多人，这完全是造谣。对这件事中央可以派人去调查，如果有的话，我们情愿公开检查，该受什么处分就受什么处分。大联筹：情节严重的要枪毙！河大八一八代表：我们如果犯了枪毙的罪，就枪毙。）

戚本禹：水牢、刑讯室我没见，我倒是看见你们放火烧房了。你们为什么不检查？（大联筹代表：这个问题请中央派人去调查。）放火的事你调查了没有？（答：没有。五代会汇报了大联筹挑起武斗的事实后，大联筹代表说：对这些事件我们没有调查。）你们放火烧政治师范学校，我可调查了。（大联筹：五代会干了许多错事，为什么不向中央汇报？）我们没听到你们作自我检查，你们的大方向没错？（答：没错。）你这是什么态度？

陈伯达：你们（指大联筹）先做点儿好事，得到群众谅解。如果五代会做了坏事，也会暴露出来的。在塘沽港，你们就要先做点儿好事给群众看看。你们开着好几百辆卡车到北京来，要砸二零一医院。你们对疏通塘沽港就不能办点儿好事吗？五代会做了什么坏事也要做自我批评嘛！（大联筹：我们开车到北京来是为了制止武斗。）

谢富治：（笑）天津武斗那么厉害，你们都管不了，怎么还到北京来制止武斗？

大联筹：伯达同志，我提个口号，“将反复辟进行到底”，可不可以提？

陈伯达：我看这个口号不对头。

大联筹代表：我认为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方向有问题，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

戚本禹：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你这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对天津市文化大革命做了错误的估计。（大联筹：我是说天津市委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天津市文化大革命搞了这么长时间，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万张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揭出来的，还是以后揭出来的？（大联筹：我承认错误。但天津市委九个书记，只揪出了万、张，其他七个书记都未动。解学恭、阎达开到天津后干了些什么？他们怎么站出来的？解学恭站在李雪峰资产阶级立场上，和驻军的某些决策人支持保守组织，在天津搞资本主义复辟。）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不认为李雪峰是资本主义复辟，某一个单位可能。

陈伯达：我同意戚本禹同志的讲话，大联筹应该做点儿好事，让群众看看。你们在群众中有很坏的印象，听懂了吗？（大联筹代表抢着讲）不要多说了，只要求你们多做点儿好事。

（大联筹一人站起来念语录：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又有一人站出来向陈伯达同志检查。陈伯达同志不听，退席。后天工八·二五赵健敏检查。）

戚本禹：（当赵健敏检查完后，问：赵）你们说过李颀伯是好书记没有？（赵：没有。）你们贴过大字标语没有？（赵：那是个别人干的，不代表总部。八·一三杨长俊：你们有一次开大会，指挥部一个人讲话，代表总部说李颀伯是好书记，应该给李颀伯平反。赵：八·一三就抓住我们这一点，攻击了我们三个月。但他们在学校要树李曙森。）你们保过李颀伯吧？（赵：保过。）对李颀伯我了解，你们保他有问题。就这一点说你们是保守组织行不行？（赵：我想中央不会这样说。）那么你们讲这个是保守组织，那个是保守组织，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你有个报告，文字是流利的，也很会讲，但很多观点是错误的。你这个人很偏激。拿你的观点和中央精神对照一下，检查一下。（赵：我的报告可能有错误的地方。）不是可能，是错误的。（赵：我讲的那些话是从工农那里学来的，是别人向我介

绍的。)你不要把错误推给群众。到底是你的错误，还是工农群众的错误？你过去讲话脑子很清楚，现在怎么逻辑乱了？你说的话相互矛盾。你这不等于说从群众中学来的错误吗？你现在不是在改正错误。你给伯达同志写信，利用伯达同志的话攻击伯达同志，很狂妄！很错误！用他的话批评他，不客气地说是攻击他。你太狂妄了！我还不知道天津有这样一个“狂人”！今天你有了点儿自我批评，但很不够。我怀疑你们是否想借自我批评转个弯子，继续干自己的。(大联筹红革会：敬爱的谢富治、戚本禹同志，……)不要说“敬爱”什么敬爱的！(大联筹红革会：我代表一百三十万人汇报我们的工作。)不要煽动，你们有一百多万人吗？我做过调查，派了两个人到京津铁路，见人就问，大部分群众是不支持你们的，对大联筹的印象非常不好。你们的名声很不好。你们说一百多万人，你们统计过吗？希望你们听听群众的意见。(大联筹：这是五代会造的谣，你可看看我们的材料。)你们的材料我看过了，看得很多，的确不象话，有很多火是你们放的。(大联筹吉新民：我回去后，准备让五代会把我杀死。)谁杀死你我负责把他枪毙。希望你们不要杀别人。杀人都要处理，都要查清。我希望你们回去听听群众意见。我派人在车站听意见，群众对你们印象很坏。(大联筹：这都是五代会给造的。)你们那一百三十万人呢？为什么不宣传？(大联筹：我们这个组织有缺点，但它是在资产阶级反动逆流中杀出来的。)什么逆流？从什么时候杀出来的？(大联筹：是今年四月从反动逆流中杀出来的。)谁搞的逆流？(大联筹：李雪峰搞的。)到现在我并不认为李雪峰在天津搞的是逆流。(赵健敏：五代会杀人放火，失道寡助。)我知道，你就是一个放火的！(赵：不错，但是五代会的也要追查。)(大联筹三配件厂董广发：我看这是大阴谋，没有突出两条路线斗争。我还要提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这是毛主席说的。念语录。)

谢富治：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戚本禹：毛主席说了，提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不许提揪军内一小撮。(董：毛主席没有那样说，我按毛主席说的没错。)刚才伯达、江青同志的指示，你同意不同意？(董：我是同意的。)同意你为什么还那么说？(董继续辩解)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是反革命的提法，现在反革命分子就利用这个口号，到处抓一小撮。(董：不要拿大帽子压人。如果认为我是坏人，那把我逮捕起来吧！)我说你还不行呢，怎么能逮捕呢？你不要逼着我们犯错误。(大联筹一代表：天

津所以混乱，都是天津某些决策人挑起的，……) 什么“决策人”？这不象共产党的提法，不是共产党的语言。你是否经常看《参考消息》，从外国学来的？再说一遍，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错误的。

谢富治：你们这是跟中央唱对台戏！

戚本禹：我看你思想很混乱，一会同意，一会又不同意，你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你坐下好好休息。(董：思想混乱的不是我，有人混乱了。) 这里是解决大是大非问题，不要在这里耍流氓！你坐下。(董：我可以坐下，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见。) 你可以保留一万年。(大联筹：我们要建一个主席塑像，快建成了，没有原料，支左不支持我们。) 不要搞塑像了，毛主席很反对，对这个问题批评得很厉害。我们要按最高指示办事，如果没有建成就不要搞了。(大联筹：戚本禹同志，你同意不同意？) 不要问我，要听主席的。问我，到处见到主席象我才愿意呢，但主席不同意，要按主席说的办。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们都要按最高指示办事。你们大联筹现在到底听谁的话？你们究竟听你们“决策者”的话，还是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我希望你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你们大联筹方面很好地改正错误，很可能搞得更好。如果象那个工厂的同志(指董广发)的态度，还是提揪军内一小撮，那是错误的。再三讲，不要提军内一小撮，因为军内和地方不一样，军队支左的错误，是认识上的错误，即使军内有走资派，也与地方的走资派有所不同。地方走资派有一整套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走资派抓一人与解放军抓三个人，性质也不一样。野战军过去是作保卫工作的。天津支左绝大部分支持是对的，局部的可能有错误，但这也是难免的。叫你们支持支持看看。你们什么时候介入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是也支持过林造反吗？他是个流氓，为什么支持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我也支持错过，过去我也受过蒙蔽，我向中央文革作过检查，改正了错误。可是你们至今还坚持揪军内一小撮，说天津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你们把自己都否定了。想搞得很彻底不可能，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妄想。想一次搞完，纯又纯，那有这样的事情。中央讲了这么多了，现在你们还说天津市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究竟是认识问题还是故意对抗？我怀疑你们。我们对你们做了很耐心的工作，就是希望你们把方向扭过来。说服你们，你们就是不听。主席把船摆正了，你们非要扭过去，这不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这样下去，你们会走向反面。我们不说五代会没有毛病。五代会的

态度比你们好些。你们这里头就有一个人态度还比较好点，是不是真的我还要看行动。你们不是要看我们的行动吗？我们也要看你们的行动。看行动，首先看你们是否能把坏人抓起来，把枪交了出来，中央很满意。希望你们考虑中央的意见，不要觉得自己比中央还高明，比毛主席还高明。整个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主席部署的。

谢富治：这话很重要，看你们究竟听谁的话？

郑维山：伯达同志临走的时候说，大卡车、公共汽车、小轿车，三天之内交出来。你们要达成一个协议。下边听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中央首长对天津石家庄等地区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同志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凌晨二时十分至五时四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了天津市、石家庄、唐山、张家口等地区群众组织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接见时在场的还有罗元发、肖文玖、黄振棠同志，以及天津市和河北省驻军部分领导同志。〕

当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同志走入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陈伯达同志在群众的热烈掌声中说：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大联合万岁！群众跟着呼喊：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大联合万岁！接着陈伯达同志又说：今天就是一个大联合的会议，祝同志们大联合成功！

陈伯达同志讲话：今天算是个大联合会议吧？怎么样，天津已经联合了没有？（众答：没有）还没有联合？很可惜呀！你们心安吗？就是我们着急，你们就不着急吗？！天津工人阶级三条石展览你们应该去看一看，你们看一看就晓得你们工人阶级利害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冲突的理由。你们天津工人阶级现在分成了两大派，打来打去，实在是给敌人高兴，我们不高兴。毛主席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嘛，是一个阶级，工人阶级内部没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没有什么理由要分成两大派。听懂吗？（众答：听懂了）今天人民日报要发表一篇社论，希望同志们读一读，里面引了毛主席很重要的一段话，对你们什么两大派、三大派都有很大教育意义。好好读一读，想一想，好不好？（众：好）今天算是

大联合，不要再吵架好不好？（众：好）你们石家庄已经达成了协议，（指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可不可以再达成大联合的协议？（答：可以。）

我们工人阶级就是一个派，毛泽东思想派；就是一个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是一个阶级，不是什么派别。我们总是讲工人阶级嘛，没有讲工人派别嘛！你们现在搞了两大派，势不两立，我同一个地方的两大派讲过，你们都抱住一块大石头，把这块石头当作宝贝不放。抱着这块大石头就走不动路，怕丢掉了这块大石头，就低着头走，就迷失方向，这怎么走呢？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可是有些人还得意得很，把这块大石头当宝贝，被人牵着鼻子走觉得很高兴，可以不要看路，可以闭着眼睛。我看，你们同样有这样的存在问题。我对天津“大联筹”是大批特批，大批评，特批评。你们生我的气也罢，不生我的气也罢（众：不生），你们生我的气没有关系。我的话是真理，你们生我的气没有关系；我的话不是真理，你们不生我的气就不对了。你们总有一天会明白。有一个地方写了一个标语，说陈伯达不得好死。我说这个标语写得很对，他们的代表说，这是反动标语，我说对，是反动标语，不过他说的对。那一个人是好死的，一个是病死，一个是被枪打死、炮弹炸死，或者自杀，都不是好死。凡是死都不是好死。经过我的分析，他们哈哈大笑。所以我说这个标语是对的。我不怕别人轰我，你们天津“大联筹”说我受蒙蔽太深了，中毒太深了。不要紧，我把你们看成小孩子，或者被蒙蔽，或者不被蒙蔽，总归有一天会清楚，水落石出，纸包不住火。听不懂吧？我第一次到天津，有人说，你这个中国人为什么不说中国话。我到现在还是不会说中国话，不过知道一点中国的事情就是了。我加入了你们天津籍，加入了你们河北籍。福建人总是说我是福建人，我说我不是福建人，他们说不对，是福建人。我说我是天津人，河北人，北京人。他们要跟我争这个东西。我实际上大量的时间在北方工作的。不过我没有做什么工作，不象你们这样英雄好汉，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今天砸这个，明天砸那个，又要抄这个家，又要抄那个家。老实说，我还没有干过这个事情。打砸抢，谢富治同志没有干过，郑维山同志没有干过，我看我们这几个人都没有干过。（谢富治同志说：我们打蒋介石打的多了）那是打仗，我讲的是打架，不是打仗。谢富治同志、郑维山同志和在坐的几位同志都是身经百战的，我倒是没有打过仗，连你们这个打砸抢都没有搞过，很惭愧。所以我不配做工作，你们不服气，连打砸抢都没有搞过，还做什么工作。

现在我们可以讲一点和吧！就是搞协议嘛！天津的协议现在怎么样？你看，我首先关心天津，我主要是天津人，就是不会说天津话就是了。可是我在天津抓的人最多，不是我自己抓的，是江枫同志帮我抓的。一天晚上，我说抓，江枫同志就抓。一天晚上抓了好几个。是不是江枫同志？（江枫同志答：对）抓得很顺利，我称赞了他，我也害得他一晚上没有睡觉。你们搞打砸抢，江枫同志他倒是有抓人的本事，你们要注意。我现在怕到天津去，就是怕他抓我。虽然他再三希望我到天津走一走，我怕他抓我，我就没有去。

我说这些话，是有点意思的，就是你们打砸抢搞的太没味道了。太没有意思了。你们干得津津有味，也害了你们，害得你们不能好好学习毛主席思想，害得你们不能很好的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害得你们不能很好的掌握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听懂听不懂？（众：听的懂）我的废话说得太多，我希望“大联筹”批判我。前几天我不是告诉保定的代表，要他们转告“大联筹”，“大联筹”说陈伯达中毒太深，受蒙蔽太深，现在你可以启发我，我准备和你们辩，大辩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在大辩论一番，我输了就认输，采取这种方法。这是文化大革命必须采取的。当然，你们要打我，我也不反对，但文化大革命不提倡这个。你们不要以为我怕死，没有什么，不得好死没有关系。请谢富治同志讲一讲，他是我们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谢富治同志在看文件）他要看东西，“大联筹”的同志，出来辩论。（这时“大联筹”的一个代表站起来说：中央首长接见了我们七次）太少了。（我们不是说陈伯达同志中毒太深，而是说中央首长对我们的批评指示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不是，是一般的关系，不是对你们特别关怀，对别人就不关怀。拿着大石头当成宝贝。（“大联筹”代表说：大石头已经丢掉了。）不要说的太快了，还没有完全丢掉。你们要不放下那一块大石头，或者两块、三块大石头，你们就不能够领会毛主席思想。（“大联筹”代表说：我们一定按照中央首长指示，尽快把石头卸掉。）要你们丢掉石头，这倒是真正保护你们，爱护你们的，使你们身子可以直起来，眼睛可以向前看。听懂吗？（答：听懂了，“大联筹”一代表说：首长……）不是首长，是老百姓，是不得好死的老百姓。（“大联筹”代表说：我们没有这样说过。）不要紧，不是说你们说的，是别人说的。（“大联筹”代表说：我们按照您上次的指示，做了一些好事。）你们做一点好事给群众看一看，这是我们上次说过的。（“大联筹”代表说：我

们汇报一下，我们已经抓了我们自己的十一个坏头头，共抓了二十八个，公安局军管会只收了十一个。谢富总理说：这个决心大。并带头鼓掌。“大联筹”又汇报了他们现在搞大批判，在大街小巷搞批判专栏的问题。）你们抓了十一个，这可能是小石头，还不是大石头，大石头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大联筹代表说：我们按照首长指示去做，还要抓。）不要到处乱抓一通，这不好。要调查研究。（“大联筹”代表说：行行行，我们一定照办。）和平路现在疏通了没有？（“大联筹”代表说：现在畅通无阻。）高兴！高兴！（伯达同志鼓掌，全场热烈鼓掌）塘沽港怎么样？塘沽港抓了一个支左联络站的王克同志，放了没有？（“大联筹”答：放了）好！这是革命行动。（伯达同志再次鼓掌，全场鼓掌。）

这时“大联筹”代表要求解放军进驻塘沽港。陈伯达同志说：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郑维山同志说：军队已经下了命令，今天就到。我要问“职联总”，抢的枪是否都收了？（答：已全部收了）

陈伯达同志说：要全部收回。天津市的各派，不管哪一个学校，或者不是学校的，如果到农村去制造派别，挑起武斗，在那里抢收庄稼，那是一个罪过、罪恶。绝对不能允许的。郊区农村的生产，还是要按照往年一样，那个生产队生产的由那个生产队收割。一定要割好，收好，存好，分好。不能抢，不能抢割庄稼。如果你们哪一派有人搞抢割庄稼，动员农民互相抢割，那是很大的罪过，那是历史不能宽恕的。注意啊！“大联筹”要特别注意。还有八·一三那些学校，要特别注意。你们这个野心太大了，不但在天津乱搞，农村还要去捣乱。你们这个想法是什么想法？不是正常人的想法。要把腿停下来，把手停下来，把口停下来，就是不能允许你们出去鼓动。这个问题，昨天我专门给郑维山打了一个电话（郑维山同志说：昨天接见完了，四点多钟，伯达同志给我一个指示，他看到一个材料，我也看到了这个材料，有的学校学生，分到郊区，去挑起武斗。现在三秋到了，迎接三秋，伯达同志告诉我，要用武装保卫秋收。这时全场热烈鼓掌）一颗庄稼都不能丢，一颗庄稼都不能抢，谁敢犯这个罪过，谁就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你们现在这么快活，能够吃饱饭、开会，甚至吵架、打架，还不是因为农民种了粮食。要是你们吃不饱饭，你们就没有力气了。不吃饭说话也没有气力，何况打架。想一想嘛！（“职联总”提出要解放军进港）。部队现在已经进去了。我给你们说，今年农业生产是空前没有的好（大家热烈鼓掌）农民是希望丰产又丰收。

丰产又不丰收，这个错误可能就是由于你们进去的人挑动起来的。现在大家不要去干这个，把腿停下来，把手停下来，把口停下来，农民还是按照那个生产队的庄稼由那个生产队去收割，收割好、保存好、分配好。你们不要去干涉，这对你们是一个劝告，也是一个警告。我看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会懂得这个意思。赞成不赞成？（众：赞成。郑维山同志说：我希望张家口、天津、唐山、石家庄，你们马上打个电话，把伯达同志对你们的要求传达回去。同意不同意？群众齐声答：同意。）这里一方面不要动员农民进城，另一方面，你们也不要下乡。听懂吗？（众：听懂了）这两方面都要把住。（“大联筹”代表说：要把车辆交还）那件事马上就可以办到，明天下午六点以前全部交完。（“大联筹”代表说：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我们有件事情很难过，你们调了几百辆汽车到北京来想砸一个医院，名义上说要制止武斗，北京的事情要你们管？！（大联筹一人说：是参加制止武斗大会）我作为北京的公民，不感谢你们的活动。谢谢你们，不要再来了。

（“大联筹”代表继续汇报，说他们最近开展拥军爱民周，准备收缴武斗凶器。国庆节快到了，准备做工作采取措施，不让群众随便到北京来。）好！欢迎！（伯达同志带头鼓掌，全场热烈鼓掌。）今天，你讲的话很诚恳。（“大联筹”代表说：感谢首长，请首长再给我们批评、指示。）按照你们的协定，按照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去做就行了。

谢副总理说：你们协议上都写的很清楚。昨天塘沽新港“巴黎公社”和“职联总”签定的协议八条念给大家听听。（谢富总理念塘沽新港的八条协议）陈伯达同志说：这是我们谢富治同志亲自起草的。（当念到谁破坏协议搞武斗，军队有权抓人时，陈伯达同志鼓掌，全场鼓掌。）

陈伯达同志说：我作为一个公民，在抓人这个问题上，完全拥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同志的意见（谢副总理说：这是群众的意见），不过我过去和他有一点小小不同的意见，就是他抓人太少了。所以你们不要看我，我这个人喜欢抓人的。你们不要看我同你们这样好地说话，我抓人也是不客气的，但我抓人也是谨慎的，不是乱抓。江枫同志可以证明嘛！我在你们天津抓人也是抓的不少，但很谨慎，是不是？江枫同志。（江枫同志答：是，抓得很准。）我是要抓就抓，毫不客气。但我不赞成乱抓。我还杀过人，我自己没有杀，是旁人

替我杀的。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在晋西北，跑到一个乡村，看到一个恶霸，他还假冒我们的许多名义，长的个子很高，房子里边放着一个盆子，泡着八个鸡蛋（郑维山同志问泡八个鸡蛋是什么意思），每天吃八个鸡蛋。这个鸡蛋是我亲自看到的。所有这个乡村的人没有不害怕他的，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怕他。我说抓就把他抓了。抓他可不容易，他个子大，力气大，要很多人去抓，还要带枪。抓了以后，有人说明天就杀，我说为什么那么快，老百姓不晓得，他那个村子老百姓晓得，别的村子老百姓不晓得。后来一直关着，两手用铁链锁着，两脚也用铁链锁着。搞了两三个月的土改，这个地方的土改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就想到这个人要杀了。但是怎么杀？工作组杀人不好，群众自己乱杀也不好。所以开杀戒我是很谨慎的。后来让那个乡村老百姓把他的罪状列一个单子，看够不够杀的条件，叫老百姓讨论，他那个乡村讨论以后，再交给周围乡村讨论。四周乡村一听，老百姓说，这样的人还不杀？这样，我就有杀的根据了，但我们工作组里就有不同意见，说是不要杀了（后来证明这个人是不好的人），他和我争论的很厉害，我说一定要杀，问题是怎样杀的问题。最后有一天准备要杀了，他这个家伙又跑来和我谈，他说不要杀吧，或者送到别处去杀，不要在我们这个村子杀。可是老百姓的心情就怕这个人跑掉，这个人力气很大，大力士，个子很大，棒得很。这个乡村最怕抓了他又不杀，或者在半路跑掉了。他们说，要是他跑了，全村老百姓都活不了，他一个人跑到村子乱杀一阵，受不了。所以我说非杀不可，罪状够杀的条件。但既然工作组有人反对我的意见，我就跟一个解放军同志在后边山坡上散步谈这个问题，怎么杀好？这个解放军同志给了我很大启发，他说我们这里有行政公署的人，又有县长，又有区长，为什么不可以杀？我才恍然大悟。真糊涂，就是忘了这点。我就这样搞个三堂会审，就是行政公署代表、县长、区县结合群众代表组织审判大会，全体群众参加。这样就决定了，大家没有话说了，反对我的人也就没有话说了。所以开始反对，说你们杀不好，可是我慎重，用三堂会审和群众相结合的方式，他就没有话说了。这样就决定第二天杀了。杀的时候，大家去看，我也看了，他那个手上的铁链快磨断了，差两天不杀就跑掉了，那才是罪过呀！

给你们说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杀人也要让群众知道，要群众作主，让群众懂得为什么要杀，我是主张你们天津杀几个的。（热烈鼓掌）在这一点上，我

是强硬派，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就算了。听说你们天津秩序很乱，水上公园糟蹋的一塌糊涂，流氓坏蛋，其中有反革命，有特务，为什么不杀几个，要杀！罪状公开到全市群众，让群众讨论该杀不该杀。群众要说杀就杀，群众说不要杀，就慢一点杀，看一看。你们赞成不赞成杀几个？（众：赞成）我看到你们天津一大批材料，很难过，看到那些坏蛋作坏事，睡不着觉。给你们说实在的，我主张专政，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有多种多样，有的是抓，有的监督劳动，有的要杀掉。多种多样，不仅是杀了就算了。我们的谢富治同志杀人、抓人兴趣少些，他是监督劳动的多（笑）（谢副总理说：不要说笑话了），也可能不对，啊！（笑）我们可以大辩论，我们经常辩论。公安机关的人，要慎重是对的。谢富治同志慎重的态度是对的，我是拥护他的，赞成他的慎重态度。但需要杀他还是主张杀的。前天北京杀了四个，北京做了个好样子。（谢富治同志说：杀的质量相当高）你们天津要杀的质量也不低，你（指郑维山）杀的太慢，在群众中广泛讨论没有？要在群众中广泛讨论，把罪状公开，要家家户户讨论，目的是让后来的人不敢这样做了。不是为杀人而杀人，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教育大家，教育群众。同意不同意这个意见？（众：同意）我不是公安机关的人，讲了一套公安机关的事情（笑）。这时“大联筹”代表说他们捉了二十八个坏人，陈伯达同志带头鼓掌，并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谢副总理说：自己抓自己一派的坏人，合乎毛主席思想。你“五代会”抓了没有？“五代会”的同志汇报了通过整风，交换了意见。

陈伯达同志说：有人告你们“五代会”，“五代会”也要注意，有坏人也要扭送。参加“五代会”的单位要注意，如果有违犯国家法律、胡作非为的，同样都要受到制裁的。（天津双方代表因为抓人问题发生争论），在这里不要辩论了，你们回去由天津军队的同志、公安局的同志，还有筹备小组的同志进行调查。不管你哪一派，犯了罪，一样要制裁的，“大联筹”有坏人要制裁，“五代会”混进坏人也要按照法律制裁（热烈鼓掌）。

（“五代会”汇报了一下整风情况，并检查了一些缺点错误。“大联筹”一代表说：“五代会”言行不一，他们不抓内部的坏人）

（石家庄“鲁迅公园”汇报九·六事件情况，双方发生激烈争执。会场气氛紧张。谢副总理一一向“鲁迅公社”、“联指”和军管会的同志查问了情况。在

军管会同志发言后，谢副总理很生气地说：你这个军管会偏，难怪人家反对你，人家不相信你，你不公平，我也不信任。事情很清楚吗，你“联指”夺了枪，开了枪，打死了三个人。狂人是有毛病的，但这个事情你们是没有理的。你们（指“鲁迅公社”）过去可能作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这个事情，他们恐怕是错的。军管会，没有讲公道话，要检查，抢枪以后，开枪的人要受处分，要军队执行（“鲁迅公社”和在场其他地区群众组织代表热烈鼓掌，“鲁迅公社”高呼毛主席万岁！）你二十六日签定协议，九月六日架起机关枪，（“鲁迅公社”说还抓了二十六个人没有放）要坚决放。（热烈鼓掌）

郑维山同志说：枪，不管哪一派，抢的枪要全部收回；六十三军今天下午六点钟以前全部收回。（“鲁迅公社”代表说：要严惩凶手。）谢副总理说：你们狂人过去作了许多错事，但你们这件事情是有理的。

郑维山同志说：马上打电话放人。我建议，今天这个会不开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一下。第一，今天收枪，武斗问题按双方协议解决，双方捉的人，今天全部释放。

陈伯达同志说：还有车辆要全部上交。

郑维山同志说：现在请谢副总理讲话。

谢副总理说：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全赞成，我就没有什么话可讲了。最近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讲了很多话。特别是江青同志在九月五日接见安徽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大家听了没有？

（众：听了）那是代表我们毛主席司令部讲的话，对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大家要好好学习这个讲话。

你们来了将近二十天，达成了很多协议。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毛泽东思想、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努力，情况是向好的方面发展。不管天津也好，张家口也好，石家庄也好，唐山也好，都有进步，我们要向前看。这是代表们的努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天津签订了抓革命、促生产协定，我看天津进步最大。天津两派都有进步，你们这些小地方有进步，还没有天津进步快。天津一派自己抓自己的坏人，这是最伟大的，是合乎毛主席思想的。（陈伯达同志说：这是值得学习的，是做得对的，刚才的态度是诚恳的）“大联筹”过去有毛病缺点，现在坚决纠正错误，很值得各地学习。有些

地方遵守协议不够。石家庄，不管你们两派怎么样，你们是做得不够，签字以后，开机关枪，把人打死这件事要追查，起码石家庄军队制止武斗不力。打死三个人很可惜，是阶级弟兄。我听了这件事情很不高兴，都是阶级弟兄，在和平时期，把人打死了。这件事情要检查，不追个水落石出是不行的。如果别的地方还有这样事情，要追查。各地都有解放军，你们不听话，都要抓，解放军制止武斗要坚决。天津有一个人写了一个条子，说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有点骄傲，有点唯我独左，希望下次听到这两个革命派有点自我批评。总之，我们要向前看，有些进步，有些进步很大，有些进步不大。刚才伯达同志讲了很多话，我完全同意。

下一步，签订的协议要坚决执行，谁违背协定，解放军有权处理，重则抓人、轻则警告。我们还要向前看，下一步要搞政治协定，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和江青同志的讲话，要抓大方向，抓大批判，抓大批判这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搞革命大联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关心革命派大联合。各派都是一个厂的工人，都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联合？分几派！一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不能联合？就不能一块革命？联合对革命有利，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利，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利，对大批判有利，对停止武斗有利，对我们各个方面都有利，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只有对什么人没有利呢？只有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利，对地富反坏不利，对美帝、苏修特务、印度反动派不利。对革命人民都有利。而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心的事情。我们有联合的基础，都是工人阶级，都是革命的，所以我们应该联合，可以联合。而且所有的造反派，所有革命人民，都欢迎我们联合。如果谁不这样，而要打内战，那些头头就会被广大群众抛弃，群众要造反。所以下一步最大的关键是联合，革命的大联合，工人组织联合，学生组织联合，其他组织联合，一直到一个市、一个省的联合。这件事情，天津要走在前头，天津已经落在北京的后头了。今年二月份，总理说，天津可能走在北京的前头，但北京四月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至今已五个月了，而天津筹备小组还不巩固，“五代会”也不太巩固，这次希望你们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们代表就作了新贡献。希望下一步由你们自己解决大联合问题，由驻军负责。石家庄由石家庄的军队负责，张家口由张家口的军队负责，唐山由唐山的军队负责，天津由筹备小组负责，不要把这件事情都推到中央同志身上来，你们搞的差不多，就拿到这里来签字。你

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搞，我们不行，特别伯达同志最忙，你们先搞好，然后拿到这里来，好不好？（众：好）（“鲁迅公社”要求中央派人到石家庄去调查九·六武斗情况）你们“狂人”是有毛病的，甚至有很多毛病。但这件事情，他们毛病比你们多，军队也没有讲公道话，但要改正错误，我是信任军队的，但这件事情你没有很好调查，希望你们要追查，不要再这样干了。今天到会的有天津市、石家庄、张家口、有唐山，希望你们比赛，尽快达成协议，过国庆节。（伯达同志插话：谁走在前头谁就受群众欢迎）我看天津最有希望，但不要骄傲，要继续进步，继续做好事。别的地区的两派都要向天津学习。希望你们在下一个问题上要立功。（伯达同志插话：今天的社论请大家好好学习）还有江青同志的讲话，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汇报的社论，其中反映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你们都说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要我们大联合。你们联合不联合？（众：联合）

郑维山：今天就休会。

伯达、谢富治等同志走出会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送。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八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零时二十七分—二时二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会议厅。接见首长：周总理、陈伯达、谢富治，陪同接见的有郑维山、罗元发。被接见单位：天津赴京代表团，同时被接见的还有保定赴京代表团。〕

郑维山：没想到周总理来参加我们的会，这是很难得的机会（鼓掌）。先请谢副总理作指示。

谢富治：谈不上指示，几天没见面了。这几天，天津市是好形势，天津市工人阶级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联合起来了。（众呼口号：向天津工人阶级学习！）下一步是搞大批判，斗批改，巩固大联合。天津这几天的好形势是毛主席伟大号召的巨大威力。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嘛。按照林副主席说的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有些单位起了带头作用，如反修锦纶厂，南开大学卫东和八·一八联合起来了，很好。

天津市是走在前面的。天津的事，是伯达同志亲自管的。武斗问题解决了，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解决了，下一步达成“政治协议”。在座的同志们再努一把力，

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组织问题。以五代会为基础，先把组织从点、面上联合起来，这种形式比较好。以“五代会”为基础，加强扩大。“五代会”是中央承认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先把“大联筹”和从未参加“大联筹”和“五代会”的组织，吸收进“五代会”。第二步，是筹备小组问题。不能把筹备小组放在一边，天津成立革命委员会条件是成熟的。

周总理：天津大大落后了，希望你们赶上北京，现在就赶上了。

谢富治：大家要再努一把力，要服从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按系统联合起来。

现在国庆节到了，欢迎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一边谈判，一边过节。欢迎你们到观礼台上去观礼。（众：鼓掌欢呼）过节是好的嘛，但是过节要献礼，把你们组织联合起来，是最大的献礼。

“大联筹”的赵……来了吗？（赵健敏：来了）老先生，你怎么不能联合呀？

周总理：你是按主席的指示办事，还是以我为核心？（赵健敏：我们主张“五代会”内外造反派联合起来，我们不主张以“大联筹”为核心，以“大联筹”为核心，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大家都听到啦！（赵健敏：五代会加强扩大了，我们“大联筹”就解散。）你是天工的吧？天工一派是革命派，但你们不能否定“五代会”的革命派。“大联筹”是跨行业的，应该归口嘛，应该加强扩大五代会嘛。加强扩大也好，充实也好，你“大联筹”和“五代会”不能成立两个政权对立。凡是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吸收到“五代会”里来，共同团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前进，才有方向。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动的，要打倒。不能自己创一个方向，以“我”这一派为核心，不管你造反多早，这样作都是错误的。《文汇报》已经批判了这个问题。

天津工人这次体现了先锋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联合起来了。（众鼓掌，呼口号）特别高兴的是塘沽海港已联合起来了。（众：鼓掌欢呼）广大劳动人民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油田联合起来了。毛主席的最近指示是在外地视察时讲的，我们传达的晚了一点。天津联合起来了，这一点不落后，要庆贺你们。（众：鼓掌欢呼）天津是工业城市，北京不是工业城市，上海发展的快，最先进的是上海，

其次是天津。青岛、济南也是很好的。最近唐山怎么样？没有联合起来的，都是少数派在当中影响。一是走资派捣乱，二是坏人操纵，三是社会思潮影响。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学生应该把学校的斗批改搞好嘛。（众：呼口号）

象我这样的人，快七十了，我还是要紧跟毛主席，学到死，改造到死，跟到死。你们年青，是早晨的太阳，是有希望的。你们多老了？一年多，有多少经验？我们不能看你们犯错误。青年人犯错误是允许的，但是我们看到你们犯错误，要提出批评，否则就是我们的罪过。天津这一派我不很高兴。有一个好消息，南开大学两派联合起来了，不管怎么样，你们是大学生，我是中学生，比你们低一级嘛。卫东、八·一八两派应该联合起来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才会巩固。

工厂本身就是来抓革命，促生产，好联合，也好巩固。学校就差一些。各学校要规定一个时间，都要回学校来，如果不回来，就开除学籍，不让毕业。你们有没有诚意接受这个协议？（众：有）去外地串连的，中央已决定不招待，不开支。这一点，要靠你们自觉的执行，回到本校搞斗批改。客观条件已成熟，就是考验革命小将的时候，看你们听不听毛主席的话。

我对天津学校的问题，刚才看了一点材料，还有一点逆流。哪有那么多走资派？要结合他们，让他们工作。不能打击一大片，要解放大量干部。首先是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掀起大批判，结合本单位斗批改，这是完全有条件的。毛主席视察、高瞻远瞩。你们谈多长时间了？（众：一个多月了。）工人同志们懂得，生产已过三个季度，第四个季度生产要抓了，要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对国庆献礼。

你们如果有勇气接受北京红代会的经验，用这样的方法，采取措施，限定时间，北京六十二所学校全部通过，一个月内回来，不回来开除学籍，不给分配。四大民主嘛，但你违犯毛泽东思想就要强制。天津要经过多数人讨论，要真正多数人主张这样做才能发表。

去年这个时候，大中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队，今年这个时候，是大批判，大联合，结合本单位斗批改。如果你们不赶上来，就要落后了。工农队伍已经起来了，你们不能再来左右群众，左右全局。不听主席的，不听群众的，也不听解放军的。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尽管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有这样或

那样的错误，但他们最听党的话，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光荣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现在正纠正。解放军坚决执行四不，在群众夺枪的时候，不动手，还念语录。你们天津夺枪了没有？（众：没有）解放军是爱民的，你们应该拥军。江青同志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的主要一条是要拥军。解放军经八、九个月的考验，是最听主席的话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一句话，有错误就改了。我们现在是三相信、三依靠，这是中心的环节。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两次地震，六三年在石家庄，我是亲眼看见的，一声令下，立即行动。所以，你们学生如果不快赶上来，就要落后了。

谢富治：石家庄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周总理：我们学生到处抓“军内一小撮”，错了。当然现在不抓了。学生要想一想拥军做的怎么样？军队要想一想爱民做的怎么样？

武汉“百万雄师”的问题，把情况和群众一说清楚，就不成其为百万雄师了。

天津的学校联合，还有些困难，他们不讲用毛泽东思想去指挥全国。学校就去包办一切，总想支配天下。包打天下的思想是错误的。

老保翻天有两种：一是走资派在后面操纵，坏人可以搞起来。二是社会思潮，思想里有“私”字，个人主义影响，组织小团体，派性高于党性。联合的关键在那里？主席说了四个字，“斗私批修”。这是主席指给我们的斗争方向。大联合要建立在“斗私批修”的思想基础上，一定要多作自我批评，把“私”字去掉，才能联合。学生现在要赶上来，不要还是学生领导一切，跨行业不行。现在学生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向解放军学习。不要以“我”为主，唯我独左。（众：鼓掌呼口号。）

“大联筹”代表：天津已经联合，现在是如何巩固的问题，加强扩大“五代会”的问题，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现提出以下几点意见：①补充筹备小组成员，参加天津支左部队三名，“五代会”代表十五名，“大联筹”代表十五名；②产生系统基层的新的代表会，组成临时工作小组……

郑维山：不要讲了，双方协商。让总理多讲一些好不好？（众：好。）

谢富治：你们“大联筹”提的条件高了一点，你们要解散筹备小组另搞一个不行。要按总理说的，加强扩大“五代会”，代表不要争。说句公道话，“五代会”要多一点，“大联筹”要少一点。不要争名额，你五个我十个，“五代会”

也不要争。天津的事情要协商，要把三结合搞好。天津四百万人口，你一个学校三、四千人，当然管不好。赵健敏你就是管你们的天工，也不容易，不信你管几天试试看，管不好的。一下子把担子加给你们肯定是要把你们压垮的，北京不就是个例子吗？你们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照周总理刚才的指示去办，不要争名额，想压倒别人。你们还是按照主席的思想去协商。不能够表面上尊重“五代会”、筹备小组，实际上否定“五代会”、筹备小组，这是不对的。

“大联筹”代表：“五代会”外的造反派数量还是很大的。成立起组织来，我们就回去工作，我们不是想当官。是把各代表会搞好，加强扩大“五代会”。

谢富治：你这个意见好。

郑维山：今天很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让总理多讲一些。（天大、五代会、保定代表向中央表态）学生不要到工厂去，叫工人自己搞自己的。（“大联筹”代表：工矿企业百分之九十八的组织已经联合起来了，向首长报喜！我工矿总部宣布撤销。）既没参加“五代会”，又没参加“大联筹”的组织，也派代表参加搞“政治协商”好不好？（众：好。鼓掌）

周总理：我提议，你们联合起来很好，南大、天大，你们大专院校红代会，去天工找赵健敏去和他联合，带着倡议书去联合。（赵健敏：我们向大专院校提出了联合，我们再一次提出向他们联合。）你们大专院校几个常委？（众：七各常委。）天工分两派，给他们两个常委。你们要有这种气魄，你们要作这样的联合。大专院校只要联合起来，常委名额多少，无所谓。（赵健敏：我们天工有三派，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要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当然还叫红代会，这是主席亲自起的名。

郑维山：总理、谢副总理作了很多指示，天津和保定回去以后要搞好大联合。工业生产第三季度大幅度下降。学生不要带着观点下农村，各校把已下农村的都叫回来。要保证生产指挥部的正常工作。现在天津已发现抢秋的问题。（“大联筹”代表汇报郊区联合情况）

周总理：贫下中农座谈，搞基层联合，由下而上，把外面的吸收进来。（师范学院代表汇报少数派被排挤在外，没吃没穿的情况）如果少数派被排挤在外面的，多数派不能拒绝别人，功劳大不能成为包袱。你们排除少数，就要抵消你们

的功劳，扣你们的分。排斥别人的事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些单位的支左部队也没尽到责任。

（陈伯达同志进场，群众起立鼓掌。总理退席）

陈伯达：祝贺大联合！（众鼓掌）不算“三结合”吧？！是有抵制大联合吧？争论的很厉害吧？（保定两派争执，郑维山同志制止。）两派代表过国庆，不要在国庆节打架，国庆应该欢庆。

郑维山：达不成协议不给观礼票。

陈伯达：大家可以协商嘛。还有什么不同意的，协商谈清楚。你们（指保定）会议的气氛不如天津。我们要向天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众呼：“毛主席万岁！”保定代表向首长报喜。）我是小小的老百姓，我没有什么官名。你看我有什么官史？你们都是各个组织勤务员，我连个勤务员都没当上。

郑维山：只要大家按中央首长指示办事，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路线办事，按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掌握大方向，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保定迟了一些，但能够赶上。

陈伯达：对天津的同志我很抱歉，以前我发了几次脾气，请原谅。天津的大联合是巩固的吧？已有好几次反复了。已经过去一年了，不会再反复了吧？所有的知识分子，要向工人阶级和农民学习。（众：高呼口号）听说天津有一些人到郊区去抢粮食，这是错误的。农村的收割，还是按原来的生产队办事。自己种的，自己收，别人不能收，城市更不能去收。前天看到这个消息很不安，其他地方也要注意这一点，不要扰乱三秋，注意巩固工农联盟。工人要特别注意。如果有人挑动破坏秋收，要坚决顶回去。抢秋是错误的。

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保定是否也有知识分子给工人出主意呀？你们知识分子要先当工农的学生，然后才可能当先生。不要下去就当先生。我们北京的学生就糟在这里。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庆祝你们胜利。（众：热烈鼓掌）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大联筹”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郑维山同志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晚十一时至十一日凌晨四时二十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了天津市“大联筹”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参加接见的还有罗元发、肖文玖、黄振棠同志，以及天津市筹备小组成员和河北省驻军部队领导同志。当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郑维山等同志走入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陈伯达同志讲话

好，今天专门是“大联筹”的，可见你们相当伟大，“大联筹”，只有你们是大联合的，旁人不是大联合的。这是笑话罗！

你们在坐的好多人很好，听说你们天津搞了很好的协议，我们听了很高兴。不仅我们听了很高兴，全天津市老百姓听了都很高兴，全河北省的老百姓听了都很高兴。是不是高兴？（众答：高兴。）你们大联合不是很好吗？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一年多了，谢富治同志上次就将了你们的军，说原来估计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可能比北京快一点，结果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早已成立了，已经成立五个多月了，天津还没有搞起来，落后了。本来军队接管公安局时，那是很好的形势，天津的市民，老百姓都欢迎嘛！欢迎解放军接管公安局嘛。放了多少爆竹啊！那个爆竹是代表天津市人民的希望。听懂吗？（众答：听懂。）所以，我对你们不了解，为什么闹了这么久，还不能合作起来。天津市的老百姓一定是希望你们联合起来，搞革命的大联合，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革命大联合。天津人民很盼望这个大联合的实现。所以你们上次那个协议是代表天津人民希望的。

不过听说最近好像又要垮了的样子，我们就觉得很耽心，究竟垮了好还是不垮好？（众答：不垮好。）你们赞成不垮？（众答：赞成。）你们当中有没有赞成垮了的？（众答：没有。）可能有个别的。如果有个别的人想破坏协议，你们不要上当。对不对？（众答：对。）不管他用什么名义，讲多漂亮的话，不要上他的当。或者讲很不漂亮的话，那就更不要上他的当。用漂亮的话来破坏协议不要上当，用那些很不漂亮的话来破坏协议，那能上当吗？

在座的是“大联筹”的，要加强、充实“五代会”。你们联合起来，就都是“五代会”了，再不叫“大联筹”了。不要搞成两个组织，互相打来打去，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这是一件好事，天津人民很高兴的一件事，党中央高兴的一件事，怎么能够让人家破坏呢？不能！但我们今天准备听不同的意见。你

们对协议还有什么不满意，可以讲，如果想推翻，可以站出来当面讲，不要在幕后讲，有问题公开谈出来。我的话不知对不对？（众答：对。）可以公开的讲。刚才我的话也是公开跟你们谈的。党中央很关心你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希望你们走正确的路。今天接见是第几次了？是第九次了，恐怕全国也是最多的了。

（戚本禹同志插话：不是全国最多的，广西从去年到现在了。）不过天津是很突出的罗！（郑维山同志插话：对天津，中央下的力量不小了。）恐怕加上以前的接见，就不止九次了，是十次了。是不是请谢富治同志讲话？（谢副总理：我不讲了，我同意你的话。）戚本禹同志讲话？（戚本禹同志：我不讲了，我同意你的话。）（郑维山同志：是不是请大家讲一讲。）

你们这里有没有赵健敏，赵健敏来了没有，你到前边来讲嘛！听说你有一套意见，今天就是要听你的意见，看你的意见站得住站不住嘛！

（赵健敏谈了对九月三十日政治协议的三点意见中的两点，就说到过去的问题。）

我的意见，你要单刀直入，不要讲的这么长，究竟有些什么问题嘛！过去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嘛！你不赞成筹备小组，怎么样搞的“大联筹”，这些经过我们都知道。你把问题提出来嘛！现在的协议，你到底赞成不赞成嘛！（赵健敏说：我认为九月三十日协议有很大问题，其中大部分我是赞成的，但对拥军爱民、五代会、革命委员会三部分有意见，我们提了三点主张。）你提的三点主张是什么？

（赵健敏把三点主张说了一遍，“大联筹”几个代表都起来说通过协议不民主，协议中有些地方写得不对。）我看现在的问题不在协议的文字问题上，这个问题是可以商量的。实际上是有人企图垄断天津问题，有一种野心家想垄断天津，想随便玩弄天津的老百姓。是这么一个问题。解决天津问题的原则，中央早已明确了，就是加强、充实、扩大“五代会”。本来这是没有问题的，早就讲清楚了。现在协议的文字上写的怎么好，怎么漂亮也不行，就是有个别的野心家想垄断天津，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要揭穿这个盖子。我老实说，我是好意的，“大联筹”的同志不要怪我，我是这样说，我是不赞成你们“大联筹”这个组织的。你们是跨行业的组织，混杂了不少不好的人，被坏人利用。你们赞成不赞成我的意见？

（一部分人答：赞成）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所有的工人，都按照工厂、行业，所有学生，按照学校班级联合起来，不要搞跨行业的组织。这个问题解决

了，对你们天津的大联合就起实际的作用。现在搞这个“大联筹”，是跨行业的组织，要归口，回到本单位去。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大联筹”的同志？（“大联筹”工矿企业造反总部程国富同志表示同意协议，但他们的这种行为被诬工贼、学贼。）说赞成这个协议的“大联筹”的同志是工贼、学贼，是完全错误的。赵健敏这话是完全错误的。（赵健敏和程国富吵了起来。谢副总理说：你学生不能和人家工人对立。）劝你们工人不要被那些学生拉着鼻子走，工人应该左右天津的局势。（谢副总理说：赵健敏，你们有不同意见，应首先在代表团里面斗争，不应当回到天津串连群众，开会向群众讲这就把事情搞坏了。以后有意见可以发表，但只能在代表团里吵，今后这样的事情要注意。大专院校一代表说主要是五代会不执行协议，人家联合去备案，他不给备案。谢副总理说：那就不对了。关键是两代会，一个是工代会，一个是大学红代会，你们先把工代会、红代会怎么加强、扩大，达成个协议不好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都是抽象的，你们争权还不是争工代会、红代会，然后是革命委员会。关键是工代会，大学红代会，对不对？众答：对。特邀代表和大联筹的代表发言，有的说协议的通过是民主的，有的叙述协议通过时的情况。）

陈伯达同志接着说：讨论这个协议我也没有参加，我说一点意见，不知道对不对。为什么赵健敏、还有“大联筹”其他的一些人，反对这个协议，我看是不是有这样一些问题。

一个是关于五代会的扩大和加强问题。协议中有一句话，就是按系统实现大联合。这句话，“大联筹”有些人不能接受。像赵健敏，因为按系统实现大联合，“大联筹”就分散了，“大联筹”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我赞成刚才有一位同志（指胡忠信）写的一封信，我看他的意见是对的。他说，革命师生通通按照学校，按照班级联合起来，工人按照班组归口联合起来，就是按系统联合。工厂，就那么一个工厂的工人实现联合，外边的工厂就不要干预它，学校也不要干预它。工代会必须是名符其实的工代会，他是工人自己选出的代表，各人工厂，各个系统派出来的代表。“大联筹”是一个跨行业的组织，是不是？（众答：是。）如果按协议，跨行业就不能跨了。而且我们研究了很多材料，很多地方的情况，群众组织如果是跨行业的，就不恰当了，它就鱼龙混杂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混在里边。有没有这个问题？（众答：有。）你们这个“大联筹”就是掺杂了许多这样

那样的人，有许多坏人也混进去了。赵健敏你说你们代表多少人？原来讲代表四十万，现在说代表一百万，越大越杂了，这样就更糟糕，混进去的人就越多。如果按系统、按行业组织起来，这样坏人就不容易混进去，就不好混，我们就可以分别清楚，就比较容易分清楚。听懂这个意思吗？（众答：听懂。）所以学生还是要按他的学校，按他的班级联合起来。听懂我这话吗？（众答：听懂。）工人应当按照工厂联合起来，对不对？（众答：对。）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早就有这个指示。延安中学这是主席批的嘛。按系统联合，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如果按“大联筹”这样的大联合，就联合不成，那真正是大杂烩。你们想一想，看一看，我跟你们“大联筹”没有冤仇嘛！不是故意说你们的坏话嘛！你们不是按系统搞，什么人来都随便吸收，跨行业，不可避免地，不以你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定要变成大杂烩的组织。这是我的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了。你们考虑考虑。你们批评五代会是个大杂烩，你们自己恰恰是个大杂烩。中央要我们帮助你们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发表意见。你们同意不同意学生必须按学校、按班级实现大联合？（众答：同意。）工人就按工厂，按系统实现大联合，同意不同意？（众答：同意。）这样，你们“大联筹”本身就有改组的必要。对这个组织怎么看法，就可以怀疑，这个组织是跨行业的，是个大杂烩。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说是大杂烩，并不等于说你们这些同志不好，但你们“大联筹”组织里边混进了一些不好的人，并且被人操纵。有人操纵你们，我们是了解的，你们不要上当。上次我不是说过嘛，你们抱着大石头，两三块、三四块大石头，抱着这些石头就迷路了，看不清前途了，看不清前面的路了，也不好走路，抱着那么一些石头干什么？你们抱着几块石头，连你们的代表同志都不知道。给你们说穿了，你们背后有人操纵。你们的代表可能很多同志不知道。（有人提出要伯达同志指出是谁）不要。总之是有野心家在那里操纵就是了。我是得到一些群众来信的，不是军队同志告诉我的，也不是公安机关告诉我的，我是看到一些群众来信。我告诉天津筹备小组的同志，他们还莫名其妙，他们还不知道，是我先知道的。现在我知道最少有三个人。当然那三个人我们希望他们不要那样搞了，我们希望这三个人觉悟，不要在背后去搞这些玩艺。听懂吗？！（众答：听懂。）实际问题就是归口大联合，还是不归口大联合？就是按系统大联合，还是不按系统大联合？就是执行毛主席指示还是不执行毛主席指示？刚才我和谢富治同志同

北京中学一些同学谈话，他们说按班级联合就可以联合起来了，几派就可以变成一派，毛泽东思想派。我看这是一个实质的问题，不晓得对不对就是了。你们考虑考虑，我是跟你们商量的。（一代表说：如“大联筹”是大杂烩，五代会更是大杂烩。）他们那里可能混进一些不好的人。我对五代会也不了解，你们比较突出，我就比较了解你们的问题。五代会，我是不大去研究他们的问题，我特别研究了你们的问题。我声明不替五代会打保票，我并不否认五代会可能有坏人，有没有还要调查清楚。

刚才讲的按系统大联合，操之过急也是不行的。归口大联合，还要很好协商，很好商量，不能过急，也不能高压。（有人提出对协议搞一些补充）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可以的，可以搞一些补充。但协议已经公布了，在天津群众面前翻来复去不好，可以再搞个补充协议。

还有一个问题想和你们说一下。你们对拥军爱民有意见也是真的，拥军爱民是我们党的方针，是毛主席的方针。江青同志讲了几次嘛。天津的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是不是对这个问题你们有不同的看法？你赵健敏发表的声明“大吼几声”，说天津驻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了大量成绩，在某些单位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只要检讨错误，还是欢迎的。说的轻一点嘛，不要说的这么重。天津驻军的工作是作得很好的，不要象你们那样上纲上的那么高，天津驻军同志他们也是很辛苦的，他们是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你们也是承认的。但天津驻军有些缺点我并不是不知道。对有些事情他们并不熟悉，比如军管工作，原来不大熟悉，因此，作风就生硬一点，我是很早就知道的，并不是替他们辩护，但我觉得这是很好改正的。只要“大联筹”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军队是好做工作的，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容易改正的，整个天津的工作都可以改进。如果你“大联筹”还是硬棒棒的，采取不能商量的态度，天津问题还要僵持下去，这是天津人民很反感的，天津人民很不喜欢你们这样做。

我们开会开得太多了，我看你们再搞一个补充协议（鼓掌）。你们搞这个协议我没有参加，签字急了一些，可以慢一两天。但同志们还是好意，为了好好庆祝国庆，但太匆忙了，这是可以原谅的。有些东西可以补充一下，还可以商量搞个补充协议，搞几条就行了，不要太多了。

谢富治同志讲话

刚才伯达同志说的话我完全赞成。我说不要去搞那些枝节问题好不好？天津市从二月成立筹备小组到现在时间比较长了，现在所有革命派同志，包括“大联筹”的革命同志，应该到了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了。最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了最新指示，你们要学习几天。你们大家要有一个不搞枝节问题的态度，大家一致努力，把天津市的工代会、学代会搞起来。主要是这两个。然后把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搞起来，要为这件事情做出贡献。这是方向，是我们伟大领袖提出的方向，也是我们当前的大局。不管你千条万条，要服从这个大局，就是按系统把工代会、农代会、学代会，主要是工代会、学代会充实加强起来，应该吸收进来的都吸收进来，不适合的人应加以调整。然后成立革命委员会。

我们伟大领袖讲了，今年年底，最迟到明年春节前，全国二十九个省市都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你们天津早就提出来了，不要等到二十八个省市都成立了，最后再搞？那样光荣？不光荣。伯达同志批评你们“大联筹”的负责人，就是你们对大联合不积极。赵健敏同志要积极一点，对搞大联合、革命委员会，要采取积极态度。最近不是许多报纸报道争名额问题吗？不要争名额。其实争一点也可以嘛。不要“以我核心”。不管什么革命派，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应该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刚才伯达同志讲的，所谓补充协议，就是在这里把工代会如何加强、充实，搞一个工代会协议，学代会也搞一个，然后把革命委员会名单排出来，就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批准。主要的是先搞工代会、学代会，你“大联筹”无非要争几个名额。你们这个协议上面的拥军爱民没有错误，解放干部报纸社论上都写出来了。工代会那是个实质东西，革命委员会那是个实质东西。我希望“大联筹”的同志们，你们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执行伯达同志的指示，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抱积极的态度。其实你们已经作了很多好事，你们有很多的进步，捉了一些坏人，签订了一些协议，但你们要搞到底嘛！最后要搞个结果，结果就是把工代会、学代会搞起来，关键问题是工代会、农代会的充实加强，还有革命委员会，名单你们排一排，但最好不要争。

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可以作自我批评，但都写到公告上也不好嘛！你们（指群众）也不要要求太高，天津解放军做的还是好的嘛！你们要求低一点，他们要求严一点，这就好了。你们不要争论枝节问题。伯达同志刚才的指示，所谓补充协议，就是工代会的调整，学代会的调整，然后革命委员会的名单。你赵健敏同志无非就是学代会，你还要管人家工人？到革命委员会当个委员，你还要当什么主任吗？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就给你当。既要看过去，看现在，还要看将来是不是紧跟毛主席，是不是紧跟林副主席和毛主席的司令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现在和将来很重要，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我们这些人吃老本就吃亏了。你“大联筹”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为革命的大联合，为革命的“三结合”，为大批判和斗批改作出新的贡献。我还吹过牛皮，说现在已有七个革命委员会，天津可能是第八个，现在内蒙报了名单，他可能是第八个，你天津现在的苗头不是第八个、第九个，弄不好就是二十八、二十九个。天津是个工业城市，大联合应该带头。

你们大学学生，过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带头点火，作出了丰功伟绩，当了闯将，这个功劳不能抹煞。但不要吃这个老本，不要指挥旁人，要“斗私，批修”。不狠抓“斗私，批修”，还要去办，那就要把老本吃光，吃光了还要犯错误。现在你们应该在大联合中立新功，在革命“三结合”中立新功，在大批判中立新功，特别是在斗批改中立新功。你们过去有功劳，现在不要吃老本。我这个话可能有错误，有错误你们可以批评。你们在北京好好和五代会商量。

今天是你们来开会，对五代会我也要说几句，不能因为有了这个协议，就认为我五代会是正统，你来就进来，不然不要你。筹备小组，军管会要注意，各方面都要照顾嘛！就是刚才讲的，我这里联合，向你那里报到备案，还摆那个架子。我这个人就是专门搞联合的，不联合是不行的，应该搞联合。（有人说，五代会要以我为核心）以他们为核心也不对，以你们为核心也不对。（有人提出去五代会报喜，五代会不接受）那个不对。现在既要从下到上，也要从上到下，如果把五代会充实了，那下边也好搞了。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然后搞革命委员会，可不可以？（众答：可以）你们不要争，也可以争一点，但不要那么争。（许多同志说向他们报喜不要）看军队代表是什么态度，你军队代表不搞大联合，就要打屁股。

你们“大联筹”就是要按照刚才伯达同志讲的几点，积极地搞联合，这就好办了。军管会就是专门搞大联合的，厂里军管会，市里军管会都要专门搞这个事情。你们也不要说人家五代会太杂了，他们也不要说你们太杂了。天津四百万人，要是那么纯，也不可能，只要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不要十全十美。

（河北大学代表说联合对方不干）那不对，不能用正统卡人家。同时，也不要以你们成为正统。有些人怎么也不想联合，想把自己力量搞大了再搞联合，想等到能压倒人家才搞大联合。两派都有点名堂。你们“大联筹”有少数人，就是认为你们现在人数少，成立革命委员会对你们不利。总之，搞了一年，多数人对付少数人有一套办法，少数人对付多数人也有一套办法，都学了一些歪办法。（有人汇报干代会情况）干代会，我这个北京就没有这个干代会。（有人提出取消干代会）建立了为什么要撤销，不能因为北京没有干代会就撤销。这是你们天津的事情，我们不能干涉。你们都要有一个山头，我就什么会也不加入，我加入了革命委员会。

（郊区农民汇报）陈伯达同志说：你们不要把矛盾带到农村去。我对你们天津那个反复辟就有怀疑，是反复辟还是搞复辟？你造谁的反吗？不要破坏农业生产。

（小站的代表汇报，说那里有复辟，原来的四不清干部上台，整原来的四清积极分子）陈伯达同志对解学恭同志说：小站这个事情你们抓一下嘛，你现在的五代会有缺点，没人管。那个不对，四清积极分子嘛，怎么都能打成反革命？又让四不清干部上台？你们帮助解决一下。这个事情你们要仔细一点，不能这样搞，把不同意见的人都打成牛鬼蛇神。（转向大家说）好了，我们委托解学恭同志解决这个问题。

谢富治同志说：你们“大联筹”，这个女同志（指小站代表）今天还给你们讲了一点道理。

陈伯达同志说：委托解学恭同志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不能反过来。对王洪忠同志（四清上台干部，这次与下台干部勾在一起了）要敲警钟。（有人谈到政法公社）政法公社是政法公社，你支持什么组织是什么组织，不要联系在一起。

谢富治同志：现在都要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多作自我批评。这个造反派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那个造反派在另外一个问题上犯错误，这个造反

派在这个时间，那个造反派在别的时间犯错误，都要作自我批评，实现大联合。当然，你们在这里讲一讲，也没有什么错误，见了面的时候，还要作自我批评。回去以后不能这样，要作自我批评。毛主席讲：“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有了这一本（指主席视察指示）最高指示，我看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陈伯达同志第二次讲话

你们今天讲话是一边倒，你们的意思我们都清楚了，不用再多说了。请你们单方面来，这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民主作风来做的，向你们做工作。你们不要弄误会了，认为你们就是正确的，绝对正确的，这样想就错了。我们是来给你们做工作，作政治思想工作。当然，当然，我们讲的话怎么说，也不如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现在就你们的一些具体问题谈一谈。

你们刚才最大的理由是申报备案他们不给备案。五代会、筹备小组是要考虑你们的意见。但从你们九个印（陈伯达同志指着纺织系统九个系统联合向五代会备案的材料）看出，在你们纺织系统就有九个组织：“天津纺织工业造反大联合总部”，“天津工农学革命造反野战兵团纺织系统指挥部”，“天津工业系统无产阶级革命联合委员会”，“天津纺织系统战斗兵团红卫军联合革命委员会”，“天津纺织系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天津纺织系统革命联合造反总部”，“天津纺织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天津纺织系统红色联合革命委员会”，现在又搞了一个叫“天津市纺织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究竟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天津纺织系统是很大的罗，但现在有九个系统，你们“大联筹”就有九个系统，假如我是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我可以跟你们商量，但我要了解你们的真相。九个系统都是纺织系统造反总部，都是革命委员会，究竟怎么回事，闹不清楚。你那个系统怎么解决的？怎么联合的？只看那上面弄不清楚。所以，我说你们还是个大杂烩。你们告状没有告赢，可是抓住了你们的狐狸尾巴。只是那个小学教员（指小站的代表）告状还有点道理。你们告状没有什么理由。我们说，革命委员会要考虑你们的问题，和你们协商。纺织系统怎么办，你们今天才去备案，人家还要跟你们商量一下。

我们都是好心好意，希望五代会和你们搞大联合，真正革命的大联合。不是你们说的大杂烩，三凑会。（八大局一人要谈情况）不要说了，你这个八大局我是有怀疑的，是有保留的。（谢副总理插话：你们不要讲具体问题了，把工代会搞起来，把红代会搞起来，把革命委员会搞起来。这时有人说驻军的问题，谢副总理说：驻军有问题可以检讨，你们也不要要求太高嘛！这时特邀代表杨茂友揭发“大联筹”的问题，谢副总理插话说：不搞大联合，而想把大联合搞垮，这都是不对的，都是张伯伦政策。革命大联合是人心所向，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谁要违背这个潮流是不行的。当然，革命大联合不是目的，还要搞大批判，斗批改，但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搞好斗批改，反过来，斗批改，大批判，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联合。毛主席讲大联合的四种障碍，一种是走资派，一种是少数坏人，第三种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然后就是保守势力，那个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前三种。年青人不要上了人家的当。真正的走资派最反对大联合，一大联合他就完了。这时，杨茂友继续讲完“大联筹”的问题）“大联筹”对刚才讲话的杨茂友同志要负有保护的责任，你们不能伤害他。要有伤害，我要找你们的。现在，反对赵健敏的意见可以讲，单方面讲不行。不同意赵健敏的意见可以讲。（何光临站起来，揭发赵健敏的问题，当谈到因他积极搞九·三〇协议，现在有些人要揪他时，谢副总理说：可不能随便揪谈判代表。）所有参加“大联筹”的人都应当想一想。（何继续发言谈到开秘密会议时，谢副总理说：我们北京，不准开秘密会，这是中央文革的命令，开秘密会是非法的。）

这时陈伯达同志拿着“大联筹”的一个传单说：我也不了解，为什么签定这个协议就是对天津工人阶级的出卖，出卖了什么？为什么签订这个协议就是工贼？就是学贼？这不是很荒唐的一种招摇撞骗吗？为了私利，不择手段，什么帽子都可以给人家戴，这种人一定要垮台的，注定要垮台的。签订这个协议失掉什么原则？什么坚持原则，反对投降，投什么降呀？！投降谁呀？对这个协议，我说可以补充，但不能这样上纲。所以小站这位女同志（指刚才发言的小站代表）你要小心，要想一想，不要盲目跟着跑。虽然你在小站可能是对的，可是对天津整个问题你弄不清楚。你觉得他是反复辟，你就参加了。但他可能是以反复辟之名，行复辟之实。反复辟联络站，就可能是复辟联络站。他这个反复辟是假的，我以前就说过，今天又反复地想了，还是假的。实际上是在那里搞复辟的，搞资

本主义复辟，搞反革命复辟。但大量的群众是被蒙蔽的，不清楚的，包括在座的大量的代表是不清楚的，可以原谅的。为什么我要说这样一些话呢？因为我看了一些东西，为什么对签定协议上纲上得这样高呢？说这是对造反派的贩卖，是投降，这完全是一种恶毒的挑拨，是使用了他所能够使用的一切词句，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赵健敏，你要反，反就是了，我就不怕你反，你已经反过一次了。我今天不是报复，是说我想说的一些话。我在想，你这个人究竟是什么玩艺？我感到你所采取的词句，就不是革命者。你对待同志间所采取的手法，就不是一个革命者。我说的非常之猛烈。赵健敏，你如果还要革命的话，就要猛醒过来，不能再走这样的迷路了。赵健敏所用的语言不是同志的语言（“大联筹”一人站起来要辩解，说不要听何光临的话）我不是根据他的话来说的。我看到一些东西，赵健敏的活动不是简单的，不是采取对待同志的态度，而是把不同的意见打成反革命。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革命，我看是相反。不能用这么一些语言对待同志，不能用这些语言对待协议，说什么叛卖、投降，怎么能这样说呢？对待同志就不能这样嘛！对待普通群众更不能这样。所以，赵健敏的活动不是简单的。他玩了一个很阴毒的手段，大家如果不看清楚啊，只看他的表面，只看他大叫一声，就以为他革命得很，其实是相反啊！要注意呀！同志们。（会场上发生斗吵。谢副总理插话说：我认为赵健敏从开始谈判到现在，总是对达成协议不感兴趣。革命大联合是大方向，为什么这样！？）不要被赵健敏虚假的革命词句所迷惑。

当然，我也不赞成五代会的一些小动作，如果五代会有这些小动作也不好，这样不能团结嘛！（有人说，因为我们签订协议，家里有人说我们修了，要来揪）签订这个协议一点都没有修，完全正确。（郑维山同志插话：刚才伯达同志是批评赵健敏，不是批评“大联筹”。会场上发生争吵，有人说赵健敏有一定的缺点错误。）我说赵健敏不是有一定的缺点错误，是很大严重错误，是很可怀疑的错误，不是什么一定的缺点错误，不要把他缩小了。（有人表示对赵的问题理解不了）理解不了慢慢来嘛！

（有人说要和赵健敏一起战斗，陈伯达同志问：你向谁战斗？答：向走资派。陈伯达同志问：那个走资派？答：万张反党集团。陈伯达同志说：你晓得有代表万张集团的人在你们背后操纵吗？）

（这时有人提出何光临两面三刀，过去也有很多错误。）陈伯达同志说：好，实事求是，如果何光临同志过去真是那样，今天转变过来，有什么不好？何光临也要有自我批评才能服人。（有人说何把错误推给别人）不能那样，何光临不作自我批评不能过关罗！何光临如果两面手法，在群众面前要作自我批评，不作自我批评过不了关。你们应当把“大联筹”背后有些什么人挑动说一说。（何说出了×××。“大联筹”另一人说今天会议气氛不好。）

陈伯达同志说：很好嘛。你们要保护何光临同志的安全，他要作自我批评。（一人发言说到驻军要主动听取意见，郑维山同志说：这个意见很好，天津驻军应该这样办。接着十八中一人发言）要克服派性，你们中学生不要被大学生拉着鼻子走。

我现在没有多少话好讲，刚才已经讲了一些话。有些话你们可以思考思考，看对不对。我有点建议，请大家看妥当不妥当。

第一、就是现在这个协议，九·三〇协议，大家已经签了名，定了下来，应当是有效的。大家同意不同意？（众答：同意。鼓掌）

第二、对九·三〇协议中没有写到的地方，有些原则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可以搞个补充协议。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鼓掌）

如果赞成的话，你们跟五代会代表在北京积极搞一个补充协议，其目的就是加强、充实五代会，最后建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但也不要勉强，不要为争名额打架，能够成立就成立，应当成立了。谢富治同志经常说，天津的革命委员会应该早于北京成立嘛，现在北京已经成立这么久了，天津还遥遥无影嘛。我替天津同志有点不好过，因为谢富治同志将了天津的军嘛！你们还不适当地作一点努力吗？可以作一点努力的。好不好？

总而言之，要加强、扩大五代会。你们和五代会，大家互相交心，不要一见面就拍桌子打架，要商量、谈问题。五代会也不能以老子自居，要按照中央原来的决定去做，加强、扩大、充实。不要提以谁为核心嘛！有诚意就可以搞好，没有诚意怎么也不行。（谢副总理插话：你们就不要吵了，比如讲工代会，假如原来有二十个委员，或者十五个委员，有两三个不适当，那还有十来个人，那么再吸收十个八个的。你们协商去嘛。其实按我的意见，就是搞五代会，搞革命委员会，多少名额，有几个人不行，再补充多少人。）现在不管是谁，不能去抓，不

能去揪，特别是对起来批评“大联筹”的同志，你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大联筹”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然的话，将来你们就听不到批评的声音，你们不知道你们内部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有人讲出来还是好的嘛！不要去打倒。是不是就准备揪何光临？（众答：不揪，我们回去和何光临提出批评意见。谢副总理说：你们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郑维山同志问：你们传达了那个指示没有？答：传达了。）要好好讨论一下。（有人说到造反派之间联合不起来）要多作自我批评，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最近的指示。

你们天津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干部站出来的很少。因为两大派的斗争，干部没有法子站出来。现在就不要搞两大派斗争了，派性不要这么强。你们要帮助革命的干部站出来，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不能站出来就打。现在天津工业生产跟这个很有关系。厂长、党委书记都不能站出来，影响工业生产。（郑维山同志插话：干部问题我和同志们讲一下，天津和河北干部站出来的很少，所以我们最近准备和天津和河北的造反派研究这个问题。谢副总理插话：站到五代会这边的干部，“大联筹”不要去抓，站到“大联筹”这方面的干部，五代会也不要抓。）

（有人汇报工厂停产问题）谢副总理说：按照北京的办法，从停产日起，停发工资，到那一天恢复生产，再发工资。

陈伯达同志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按劳取酬，不劳动不得食。

谢副总理：我刚才把最新最高指示给了你“大联筹”，你们要按照最高指示去办，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

陈伯达同志：明天就谈，你们现在就是不听最高指示，那不行。一定要听最高指示。

（有人提出成立大联合的备案小组）谢副总理说：这个可以考虑。

接见结束，群众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接见天津赴京汇报代表团时的讲话摘要都是老话、好话，可以重复地讲。我准备说的都是好话。

1. 我们还是主张贯彻执行毛主席按系统搞大联合的指示，不赞成跨行业的组织，包括大联筹反复辟，这就可能得罪你们了，你们要打就打。

2. 要把参加“大联筹”的群众同头头区别开来，“大联筹”有些头头搞了很多坏事，亲者痛，仇者快。他们做的坏事是不能容忍的。对一些头头做的坏事，参加大联筹的群众不能替他负责任。这就没有压力了嘛！

3. 遵照毛主席关于多作自我批评，少批评别人的指示，继续协商，能快一点成功是好的，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利。

陈伯达同志批评了《政法公社》。他指出：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这个学校里一小批学生组织《政法公社》要在全国夺权，他们到天津帮助万、张反党集团夺公安局的权，在小站帮助张凤琴夺王凤春的权。群众是最后的裁判者。

三、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1967. 12. 01；中发 [67] 361 号

很好，照办。

毛泽东十二月一日

（一）中央认为天津驻军在无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在天津某些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经改正。肖思明、郑三生、杨银声三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九个月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推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作了很多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

某些缺点错误，四月以后已经有了纠正。中央同意郑维山、解学恭、肖思明三同志的报告。

（二）天津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中国赫鲁晓夫最大走资派和他的代理人，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影响。他们结合美、蒋、日、苏修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对此，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警惕性。

要坚决同上述敌人作斗争，加强革命群众之间团结，加强军民团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希望天津市的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三）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当地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

（四）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天津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胜利的喜讯：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诞生了！

这是您的战无不胜的光辉思想的一曲新凯歌！

这是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是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创造的又一丰功伟绩！

阳光普照，红旗招展，渤海之滨，锣鼓喧天。在这盛大的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您的伟大的思想哺育我们成长，您开辟的革命航道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前方！您的恩情高过山岳，深过海洋。我们心头充满着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滔滔海河流不尽，曲曲颂歌唱不完。千声欢呼万声唱，最最衷心地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那掌握中国革命之舵的巨手，亲自制定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在您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直接指挥下，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天津，使这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城市获得了新生，使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从黑暗走向了光明。在这永生难忘的日子里，天津的革命群众第一次放声高歌《东方红》！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年代，亲临天津，视察工厂、学校、农村，对我们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您的教导，您的关怀，您的高大庄严的形象，您的慈祥的笑容，深深地铭刻在天津革命人民的心里，鼓舞着我们沿着您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飞跃前进！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一九六〇年，又莅临天津，和天津四百万人民一起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您给我们的最大鼓舞，最大光荣！激励着我们鼓足干劲，奋发图强。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永远忠于您！海枯石烂心不变，风吹浪打志益坚。我们永远跟着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勇往直前！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一九六三年，在天津受到罕见的洪水威胁的时候，亲自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动员令。您的伟大的战斗号召，表达了海河两岸千百万人民的心愿，百倍地增长了我们驯服海河、根绝水患的信念，调动了千军万马，怀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英勇地向大自然开战！

回顾这些激动人心的情景，这些无比幸福的时刻，我们心潮汹涌，热血沸腾，千万颗红心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您统帅亿

万人民，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展开了猛攻。就是这个中国赫鲁晓夫，在天津解放不久，便一头扎到天津，拚命地宣扬“剥削有功”，为资本家涂脂抹粉，充当资本主义复辟的吹鼓手。此后，他又屡屡到天津放毒。臭名远扬的假四清、真复辟的“桃园经验”，就是首先在天津抛出来的。中国赫鲁晓夫还培植了万晓塘、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做为他在天津的代理人。他们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妄图把天津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

敬爱的毛主席，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您的战斗号令，怀着誓死保卫您，保卫您的革命路线的决心，凝集起对一小撮走资派的深仇大恨，高举革命造反有理的大旗，向他们发起了冲锋，敲响了他们的丧钟。

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感到末日的来临，他们惊慌失措，暴跳如雷，妄图扑灭您所点燃的革命熊熊烈火。他们围剿革命群众，武装镇压革命小将；他们耍阴谋，放暗箭，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操纵反动组织，实行反革命夺权，制造白色恐怖；他们伸出黑手，挑动事端，转移斗争大方向，抗拒您的伟大战略部署。在那乌云翻滚的日子里，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的雄文四惠 悄 奈按笏枷牒个裕 颐侵该?方向，给我们无穷的力量。是您，带领我们闯过一个个急流险滩，战胜一道道惊涛骇浪，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暴中越战越强，把海河两岸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是以您为首的党中央，一直关怀着我们。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总是您的英明的决策，伟大的号召，为我们拨开了迷雾，鼓舞着我们披荆斩棘，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冲锋陷阵！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最最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我们面对着残酷的迫害，手捧您的革命宝书，日夜仰望北京城。您及时地派来了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我们并肩作战，向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发起总攻，经过剧烈的搏斗，终于摧垮了他们所盘踞的顽固堡垒，把天津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上了您所指引的航程！敬爱的毛主席啊！

没有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便没有今天的胜利，没有我们的一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敬爱的毛主席，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出的最新指示，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纲领。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工人阶级一马当先，条条战线万马奔腾，以“斗私，批修”为纲，迅速掀起了革命大联合的高潮，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高潮，革命大批判的高潮。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形势空前大好。在以您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日夜盼望的红色政权诞生了！

敬爱的毛主席啊！十八个月来，您领导我们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取得了最大最大最大的胜利！千胜利，万胜利，一切胜利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我们认识到：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只是新的战斗的起点，展望未来，前途似锦，光明灿烂。我们任重道远，永不骄傲自满。我们决心更高举起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涤荡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把天津市建设成您的光辉思想的新天地！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在灵魂深处开展破私立公的大革命，彻底铲除修正主义的温床，保证我们的江山千秋万代红！我们一定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天津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让您的伟大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伟大号召，把“拥军爱民”运动持久地深入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向守卫在首都门户，为人民屡建功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虚心学习，争当拥军的模范，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要响应您的伟大号召，依靠群众，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革命新秩序，把新生的天津建设成磐石一样巩固，钢铁一样坚强！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您的光辉的思想，是力量的源泉，是智慧的海洋。大树特

树您的光辉思想的绝对权威，是我们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永远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把天津市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天津市的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把世界引向了以您的光辉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一个学习您的伟大著作的运动正在国际上蓬勃展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正在席卷全球。我们以生活在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感到荣耀，为战斗在您的旗帜下而无比自豪。我们不但要做国内的革命派，还要做世界革命派。我们永远不忘国际上一切受压迫的阶级弟兄，全力支援他们的革命斗争，让您的光焰无际的伟大思想，照遍全世界！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热烈欢呼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光辉照耀下，继上海、北京之后，我国的又一大城市——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渤海湾边红烂漫，海河两岸尽朝晖。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变天津为复辟资本主义基地的黄粱美梦，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在天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恶统治的彻底垮台。我们热烈欢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利！热烈欢呼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我们谨向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民解放军天津驻军和天津市四百万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天津市解放十八年来，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严厉批判了在城市斗争中主张依靠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会议刚刚开过，中国赫鲁晓夫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天津，一头钻进资本家的怀抱。他抛出臭名昭著的“天津讲话”，大肆宣扬“剥削有功”论，把资产阶级捧上了天，鼓励资本家“多剥削”，“赚大钱”，极力煽动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斗争”。他千方百计把王光英之类极端反动的资本家乔装打扮，作为他精心培植的所谓“红色资本家”的标本，安插到重要岗位上。他在天津抛出了假四清、真复辟的“桃园经验”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和他在天津的代理人，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培植亲信爪牙，网罗牛鬼蛇神，妄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把天津变成在全国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桥头堡。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天津的代理人反复较量和英勇搏斗的结果。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英勇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在这场夺权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驻天津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扎扎实实地进行深入、细致、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满腔热情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革命群众，做了大量的、很好的工作，为人民立下了新功。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新的长征的开始。巩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进行一系列的艰巨工作，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要斗私，批修，就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从灵魂深处来一场破私立公的大革命，加强思想革命化。当前，处在穷途末路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正在利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挑拨离间，制造混乱，妄图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正在用糖衣炮弹来征服我们革命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妄图从思想上腐蚀瓦解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队伍。一切无产阶级革

命派，应该在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革命大批判的同时，狠斗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不断扩大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天津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港口，是交通的重要枢纽。我们相信，天津市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必将以更大的革命热情，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为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作出新的贡献。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社论）

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天津市革委关于小学放寒假的请示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在十月十四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中指出，“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之后，人民日报又陆续两次发表了“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的社论。最近，中央在批转吉林省军区“关于教育革命中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大、中学校不放寒假，未提及小学。目前小学取暖比较困难，我市大多数小学要求放假，也有部分小学表示，开课不久，刚刚走上轨道，以不放假为好。我们意见小学学生年龄小，天气严寒，应该放假。在放假期间，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整顿小学教师队伍，促使小学教师的思想革命化，迎接教育革命的新高潮。当否，请批示。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小学放寒假的请示报告

1968.01.15；中发〔68〕6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中央同意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小学可以在一月中旬开始放寒假四个星期。小学教职员则仍坚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四、中央文革判定天津市出现了一个黑会一个黑戏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时的讲话

当总理、伯达、康老、江青、文元等同志步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江青同志：问同志们好！（热烈鼓掌，呼口号）向同志们学习！今天请同志们来，我们是有这么一些问题和同志们谈一谈。天津是中央的直辖市，两个小时就可以到，本来我们到那里去也可以，你们来也可以，由于我们还有别的工作，所以，麻烦同志们走一遭。

我们想有这几个问题和同志们谈一谈，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文艺战士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吧？（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个什么原因，讲一讲道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给我们讲话。（热烈鼓掌）

陈伯达同志讲话

同志们！今天走了一天很辛苦了，刚才江青同志说，请你们到这里是有原因的，因为最近天津一年多来，出现了一些怪事，拿江青同志举的两个例子，一个黑会，一个黑戏，那就值得大家考虑了，值得大家想一想这些问题了。在去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过，说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要有三个条件：一个是要拥护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要拥护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三、是要拥护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现在，比如说文艺黑会，准备在天津召开，已经破产。这个黑会，就是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些叛徒，一批坏人，他们想借召开这样黑会的机会，来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反对我们无产阶级

专政的柱石，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举世无双的、举世无敌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还有，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想千方百计地破坏她。

现在，我们说一下文艺黑线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全国，在我们国家内部，有周扬为代表的一条文艺黑线，它在全国有一个相当的黑网。比如在天津，他就有一伙，象方纪、孙振、白桦、李超、董阳等等，比如他们所表演的黑戏《新时代的狂人》，就是由方纪编排的，参加导演的。在天津出现这样的黑会、黑戏，都不是孤立的现象，他是反映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社会上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潮，而且反映了这个思潮形成的组织，比如在天津有“大联筹”、“政法公社”，在河北，在保定有“省委兵团”、“八五风暴”、“农大红色造反团”。石家庄，比如“狂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吧？（众答：知道。）在唐山、邯郸等地都有代表他们反动思潮的这些流派。所以天津这个黑戏、黑会，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个是一个侧面。在天津、在河北，还有组织上的联系。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我在天津工作的情况，我大概是五七年冬天，同康老一块到天津，康老调查教育问题，我是调查工业问题，后来做了一些四清的工作，当然，在这里面接触了一些人。比如在天津，在一些工厂里，就受到许多老工人的教育，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知道了很多我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我现在举个例子，我问他们天津工人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他们给我说，在三条石。这样，我就到了三条石去看了，看了原来那个最原始的展览馆，有一些很原始的材料，我很受感动。有一个时期，周扬在天津，我跟他说，你可以去看看三条石，受些教育嘛！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周扬和在天津的一伙人，把三条石展览变了样子，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发家史。这是我原来不知道的，这回我看到了《天津日报》，看到天津一些小报揭发这件事，这就给我很大教育，他们就是这样颠倒历史，资产阶级的剥削史，他们就可以把它变成资产阶级的发家史。还有，有些人，象方纪之流去年不知道什么道理，到北京来，因为过去在四清工作中认识他们，因此我也跟他们谈过话，我那时跟他们说了三条，要他们不要登台，不要伸手啊，不要上当啊，是跟他们这样说的吧，你们小报上反映的，我都看了，是我说的这个意思，但方纪他们还是要表演呀，要登台呀，所以我跟他们说是一回事，

他们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这又是一回事。这里就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很多我们原来所不能想象的事情。比如听说他们在天津还隐藏着什么叛徒集团，他们和一些坏人、叛徒，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想登台，想插手，拚命要钻到里面去。这个要和大家说明白一点，我想是有好处的。

天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就因此被他们破坏呢？我看天津有强大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进行到底的，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一定会逐步巩固起来的。我最近和一些同志谈过、说过，天津虽然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个别的也不能排除有反复的可能，也有一些变色龙，变颜色，有些小的爬虫，为了适应它的需要，时而变这样的颜色，时而变那样的颜色。我想，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我们充满信心，我们是能够战胜一切的。完了。

姚文元同志讲话

会议开始的时候，江青同志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怎么彻底揭开天津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的讲话，他剥掉方纪、孙振一伙人的画皮。

同志们，江青同志刚才说的，被中央文革去年十一月份就揭露的所谓“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是一个什么会呢？只要看一看这个会的后面有黑手，是什么人，就可以弄清楚，据说有两员大将，一员叫方纪，一员叫孙振。方纪，何许人也？是胡风分子，周扬的死党，刘邓在文艺战线上的代理人，周扬安排在天津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振，何许人也？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就是雪克，就是大毒草《战斗的青春》的炮制者，疯狂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象这样一些人召开的一些会，同志们，是不是黑的，（众答：是）该不该揭露？（众答：该。）

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他们召开这个会，准备成立“工农兵文艺革命委员会”，要夺权，取而代之，这些胡风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他们要夺谁的权？他们就是要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所以我说，这次黑会带有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夺权的性质，把全国那么多人找来，是这样两个人，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夺权的会。象这样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夺权，

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江青同志去年十一月的讲话，彻底揭露，彻底批判。把我们阶级阵线分清。把一小撮坏人彻底揭露出来，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使广大群众得到教育，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更加巩固、更加健康。

所以，我想顺便说一下方纪、孙振这两个人。方纪、孙振和我都有一点关系。

方纪，我到现在还没有跟这个人见过面。但一九五八年，他写了一篇《来访者》，我是批评过的。《来访者》是控诉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篇彻头彻尾的大毒草。（呼口号）这篇作品，不是方纪一个人的，而是周扬、陆定一以及他们的主子刘邓陶的一个代表作。方纪这篇作品是在上海发表的，发表以后就受到读者的批判，广大工农兵起来批判。批判以后，当时他同上海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勾结起来，跟周扬这条黑线勾结起来，展开了疯狂的反扑。当年，六月十八日他给周而复——大毒草《上海的早晨》作者的一封信，这封信经过林默涵发出的，他把他的《来访者》说是构思不成熟的问题。六月十九日他又写了一封信，他是和刘白羽商量写的，在这以后，他又说《来访者》思想上是积极的，只是艺术上没有达到，而且说，只要帮他的忙掩盖过去，下次到上海面谢。从这里看来，陆定一、周扬他们的一条黑线，在全国有一个网，一个方纪受批判的问题，四面八方都动起来，在北京、上海等等一大群人，都在为他奔走。《来访者》这篇作品发表以后，马上被香港反动报纸转载，并且加了按语，说是大陆的揭露，揭露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而且把方纪封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功臣”。同志们，这样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毒草，该不该揭露？该不该批判？（众答：该。呼口号）当时，香港反革命报纸说方纪这篇小说是“良心的发现”，就是这样“赞扬”的，可见他的反动本质。到今天，他的反革命本质一分一厘一丝一毫没有转变。后来我又看到英国有一个特务机关出的一个刊物叫《苦果》（译音），内部发行的，专门搜集社会主义国家内最修、最修的作品，收集中国两篇半，其中就有方纪的《来访者》，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居然他们也要夺权。他究竟夺谁的权？还不是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夺毛泽东思想的权。（呼口号）还有一员孙振，一九五九年的《战斗的青春》，是在上海出版的，上海一些坏书是在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天津有些大毒草好多是在上海出版的。这是有联系的，他们是一丘之貉，组织这本书的人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叫刘金，这个人跟雪克

转了很久，他也写了很多，后来被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包庇。这本书一出版，广大工农兵纷纷反对，在一篇文章中点了，说它是坏作品，是美化、歌颂叛徒，诬蔑我们军队，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大毒草，刚刚开了一次座谈会，要进行批判，这个时候，上海的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得到了刘邓的黑指示，慌张已极，马上下令禁止批判这本书，而且说：谁批判这本书，就要检讨。陈丕显这个家伙，是根本不看书不看报的家伙，但他三天就看完了这本书，看完就下令不准对这本书进行批判，他们究竟是什么黑关系！这还看不出问题吗？（江青同志插话：陈丕显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还居然看了这本小说。）就是这些东西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你们天津还有一个人，叫吴雁，又名王昌定，是周扬很欣赏的，为他翻案，写了一本《创作需要才能》，周扬看了以后，为他捧场。这篇东西是经过方纪修改后，才在《新港》登出的。

我在这里就是说明这一点，所谓文艺黑会，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夺权。他们开黑会能代表工农兵吗？方纪、孙振如果能代表工农兵，那才是见鬼哪，他们只能代表叛徒、特务、坏人、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所以江青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尖锐的，引起我们的警惕。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从这里揭开这个盖子。揭开天津的盖子。

天津文艺界有右派，就有左派，有反革命派，就有革命派。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指引下，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希望同志们再看一看去年十一月九日、十二日江青同志的讲话，真正把清理阶级队伍解决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我的讲话完了。（热烈鼓掌）

江青同志讲话

同志们，革命小将们，（呼口号）打倒周扬！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热烈鼓掌，呼口号）我同意伯达、文元两位同志的讲话。我补充一点，你们这个天津呀，可出奇哩！雪克我找了好几年，不知道叫什么家伙，原来叫孙振，钻出来了。就在天津，他这本书我看了三个版本。文元同志批判了，我不讲了，你们也批判了，深不深，够不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有一个电影，叫《探亲记》你们看过吗？（众答：看过。）这个作者叫杨润身，这个人也在你们天津，也是黑会的积极分子，他这个《探亲记》，算是修到

家了，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我看了以后，心情非常沉重。歪曲伟大的解放战争、卫国战争。在他的电影里，写整个战争，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子，无亲可探，但非要探亲。他的第一稿说，儿子当了高官，不承认贫农的父亲，恶毒透顶，歪曲工农兵。但象这样一些家伙，一个月拿着国家的高薪还不说，还要拿着非常非常高的稿费，不义之财，是剥削，我有证据。拿着这些稿费，作为他们黑会活动的经费。这里（江青同志念单据），方纪一百五十六元，杨润身三千元，孙振一千元，多啦！王昌八百元，袁静八千元。举一点例子，同志们听一听，拿着劳动人民的血汗，来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他们，赤裸裸地说明他们要夺权。孙振给一个董阳，不知道是什么人物，大概是伙伴吧，还有邵文宝、滑富强、王静、张贺明写信，指使他们夺权，务请注意，这是他的亲笔信：“为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夺权的观点制造舆论。”说：“为了扩大影响，是否考虑与全国各省市已经占优势的或者还在坚持斗争的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联合发表呼吁和宣言。互相支持，造成优势。这一切搞好，夺权才能得到广泛支持。”请问，他们夺谁的权？

（众答：夺无产阶级的权，呼口号）这是他的亲笔信啊！（江青同志拿起了信）嚣张极了！狂妄极了！今天请同志们来值得不值得？（众答：值得。）为什么他们会在天津、北京、上海许多地方这样嚣张？他们人数很少的，但他们的活动能量很强，就是因为他们有黑后台，他们有活动经费，现在我们下令冻结，你们说应该不应该？（众答：应该。热烈鼓掌）

出现这样一些怪事情，不简单、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的。在历史上看，天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城市，也是产业工人很多的城市，各国租界比较多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一个万张集团，你们扫干净没有？能不能说把万张集团搞清楚？（众答：没有。）在你们那里有这么一个组织，整总理的黑材料，整伯达同志的黑材料，整康老的黑材料，整我的黑材料。请整！这个组织不坏，是混进了坏人，这个组织是立过功勋的。（呼口号）这个万张集团，你不搞清楚，反而整我们，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我去年九月五日讲的第一条，他们就是要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呼口号）对万张集团兴趣不大，搞我们，好，搞吧！请！不过我给同志们提供一点线索，在河北省这么两个县，有大叛徒集团。一个叫献县，孙振的家乡，他都回去安置了的，布置了的，不让搞调查，不让你查出东西来，现在要广大群众动员起来，

认识他这个叛徒的面貌。（呼口号）还有一个县叫深泽县，也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革命的同志们，小将们要把这个搞清楚，要不搞清楚它，他们就支持方纪这些人，搞我们。（呼口号）把矛头对着什么人，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我重复说，谁要是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谁要是对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谁要是对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谁就错了。当然，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逐步地使她健全起来，我不是说她没有缺点错误，但不允许坏人钻空子，来搞我们的军队，搞我们的革命委员会。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也向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建议，方纪他们到北京来坐的汽车就是公安局的，我有证据，上次我和总理就点过，天津文化界，公检法，现在我再一次郑重提出，公检法的问题，一定要彻底地揭开。（鼓掌，呼口号）当然娄，不是公检法一个没有好的，主席教导我们总要一分为二相信大多数，是有许多好同志，坏人只是一小撮。但是万张集团经营很久。建议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学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改造公检法的办法，就是用复员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一千多人？（谢富治同志插话：两千人）三千人也可以，只要需要。（热烈鼓掌，呼口号）这个公检法不把盖子尽快揭开，害苦人了，他不是专了资产阶级的政，而是专了我们的政。主席、林副主席和我走到那里，他们都盯梢，安装窃听器。这个允许不允许？（众答：不允许。呼口号）要不要打倒他们？（众答：要。）打倒他们！

同志们，回去要新深入广泛的宣传，要使广大群众擦亮眼睛，那么这一小撮坏人，他们就掉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过街耗子，人人喊打。祝同志们成功。（热烈鼓掌，呼口号）

我想问一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有没有这个决心？（有人回答：有。）说的不太响亮啊，这两个盖子一定要揭开。不过你们现在可能还蒙在鼓里，这点可以原谅你们。要有决心揭啊！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天津市的革命工人，革命干部，人民解放军，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成立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这个革命委员会，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我们今天第一次接见了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以及革命群众的同志们，首先祝贺你们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伟大成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革

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呼口号）刚才江青同志讲，天津在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下，出现了几种怪事。一个黑会，一个黑戏。这就看出，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决定胜利，全面胜利的时候，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所以今天找同志们谈话的时候，在天津的大好形势下，出现了反革命复辟活动，这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特务、叛徒，他们是垂死挣扎，他们企图动摇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是妄想。他们想动摇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想企图瓦解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是白费心机的，白日做梦。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看到这个黑会出现在天津，出现了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黑戏，我想就黑戏和同志们交换意见，这个黑戏过去我完全不晓得，天津市革命群众告诉我们，揭露了这个黑戏的前因后果。这个黑戏，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大加吹捧，大加赞扬，而且得到社会上、国际上的叛徒、特务大大赞扬。这个黑戏在天津，演了几十场，在北京演了几十场，《天津日报》大加赞扬，我们应该不应该注意。（众答：应该。）（江青同志插话：还造谣说：江青同志看了，报告了毛主席，说很好。造谣！）（总理插话：诬蔑！）这个问题该不该反映？（江青同志插话：还说要做我的样板田的第九个样板戏，见他的鬼去吧！）这件事不是偶然的，通过黑戏，可以从中得到深刻教训。列宁同志讲过，历史的辩证法总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逼得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换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同样毛泽东思想在全国全世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光芒万丈，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逼得敌人伪装起来，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来反对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从天津的事实可以看出来，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反革命用“革命”的方法反对革命，把陈里宁这个对革命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分子伪装成“革命英雄”，编了剧本，演了戏，大加赞扬，这点我们应该得到深刻的教训。毛主席在六二年十中全会上说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他们要采取这个方法为夺权作舆论工作。毛主席还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黑戏就证明反革命分子利用戏剧文艺、理论作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舆论准备。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我们利用大字报这种形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革命运动，但大字报没有阶级性，正象语言

没有阶级性一样。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用话剧，资产阶级、汉奸也用话剧。同志们，他们这个黑戏是什么人演的？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呼口号）同志们，在阶级斗争中装疯卖傻是一种手段，鲁迅写《狂人日记》是革命者反对国民党，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同样反革命也会利用的，反革命分子陈里宁和他们一伙人伪造《狂人日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编造了《狂人日记》到处散发，到处翻印。陈里宁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恶毒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反对毛主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同志们，不要上当，不要光看到他怎么样反对刘少奇，反对叛徒哲学的黑修养，就以为他是革命的，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全删掉了。（呼口号）同志们，不要上当，不要受蒙蔽，不要看到他反对黑修养，这就是革命，他反对的是整个共产党，他把毛主席著作批驳得一塌糊涂。如果不相信，同志们可以到监牢去看一看。（呼口号）陈里宁不是疯子，是反革命！但是，不但有《狂人日记》，还有你们天津人民话剧院编的一个戏，叫《新时代的狂人》，这名字是王力起的，（文元同志带领大家呼口号）看一看人民话剧院革命委员会六七年八月一日剧本前言说了些什么？（当念到国际上反修战士支持时）这就是特务分子李敦白。（江青同志插话：李敦白是个外国特务，还照了像，这有照片，好几个外国特务支持这个戏，同志们说，简单不简单？）这个戏从剧本上看恶毒地攻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恶毒地攻击了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个戏，在天津上演了几十次。而且得到了《××日报》的大肆宣传，登广告登了一个多月，这个剧本，作者是个叫尹淑坤的，在场吗？（众答：已经揪出）（江青同志：好。）还有一个演出负责人叫李启厚的，来了没有？（众答：没有。）揪出来没有？（众答：没有。有人说，回去就揪。）这个黑戏跟你们讲清楚，在天津文艺界里，有周扬黑戏，以及他们的走卒方纪、孙振等等，通过这个黑线，混进了很多国民党特务、叛徒以及外国敌人。这一点，同志们要特别警惕，要擦亮眼睛，当然，也要一分为二，天津人艺的群众还是好的，方才有的同志讲，“八·一四”把尹淑坤已经揪了出来。这很好。同样，外国朋友也是这样，在北京的外国朋友绝大多数是好的，支持我们。当然也有一小撮，象李敦白。同志们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把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象保护我们的眼睛

一样，保护你们新生的权力机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把黑戏、黑会的黑后台，方纪、孙振之流揪出来，取得彻底胜利。祝同志们成功！（热烈鼓掌，呼口号）

补充一下，这个戏很明显，把反革命打扮成“革命英雄”，不仅在天津而且和北京×学校有关系，希望同志们注意。

杨成武同志讲话

我完全拥护伯达同志、文元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的重要指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示。它揭开了周扬黑线方纪、孙振、白桦、李超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盖子。他们有的是叛徒，有的是特务。刚才江青同志讲，有一个冀中的县，叫献县。这个地方我是比较熟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解放军，那时是八路军，进都进不去的。孙振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又是一个特务。还有一个深泽县，谁都知道的，那个地方有的是坏人、有特务，也有叛徒、地主，有的是。所以这两个据点一定要把它拔掉，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他们出面搞一个黑会，一个黑戏，他们依靠那些，来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这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复辟活动，他们企图夺取文艺界的领导权，是有阴谋的，有计划的。他们在这同时拚命地攻击人民解放军。我们听说，凡是人民解放军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就进行镇压、迫害，有没有这个事情？（众答：有。）我们一定彻底剥掉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画皮，斩断坏人伸出的黑手，把他们揪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亲自领导的，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谁拥护毛主席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坚决执行江青同志去年九月五日指示的，谁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谁反对人民解放军，谁反对革命委员会，我们就和他作坚决的斗争。（热烈鼓掌，呼口号）我们解放军一定和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热烈鼓掌，呼口号）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热烈鼓掌）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热烈鼓掌）最后，祝同志们在新的战斗中取得新的胜利。（热烈鼓掌，呼口号）

周总理讲话

同志们，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问你们好！
（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口号）问同志们好！

我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文元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成武同志的讲话。我没有更多的话说了，我综合讲几点，我们去年在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今年要取得全面胜利。毛主席说：“越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越是尖锐，越是激烈”。那些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苏修美蒋日特间谍，还有一些社会渣滓，他们不甘心失败，他们要在死亡的时候挣扎。当然，只不过小丑跳梁，我们还是沿着胜利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不要放松警惕。所以中央、中央文革邀请天津一千二百多位同志来北京开会，讲一讲刚才的事情。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每个地方都有，为什么讲天津？因为天津有一个黑会、黑戏，它代表了全国的阶级斗争的，有它的典型性。去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就讲了三条：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个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讲话以后，在同一个时期，天津刘邓陶死党和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江青同志号召大家要提倡三红，要巩固我们的红色司令部，要巩固红色的军队，要巩固红色的政权，但阶级敌人同时出来捣乱，这就证明敌人不甘心死亡。过去江青同志在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抓坏人，开展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天津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就要搞他的，作垂死的挣扎，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工农兵文艺座谈会”进行反扑，证明伯达同志刚才说的，北京也有，石家庄也有，还有其他地方也有。找的都是渣滓，听说天津开不成，他们要到长沙去开，有个省文联支持，也是一批渣滓，正受批判。为了把盖子揭开，就是抓天津这个典型。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但周扬以及叛徒、特务掌握的文艺界盖子没有彻底揭开，我们现在抓住天津典型，不仅要在天津，象方纪、孙振、白桦、李超、杨润身等，其他地方也有周扬的死党，必须号召广大文艺界革命派，擦亮眼睛，分清敌我，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夺权，他们要夺谁的权？他们要夺以毛主席为首和林副主席为副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我们必须认识这个问题。揭穿他这个阴谋。这就是我们今天开会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高举毛泽东思想

伟大红旗，批判党内最大的刘邓陶，联系到文艺界的黑线周扬、夏衍，进行批判。不仅是天津，上海、北京也有，他们勾结在一起，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批臭批倒，好不好？（众答：好。）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正是因为这样，康老讲得很对，他们要进行反夺权，编成剧本，在天津演，在北京演，欺骗了一些人。他们就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中国共产党。我们就要揭穿。当然，有一部分是受骗的，但写这个剧本的人、导演的人，是别有用心的，观众可能不知道，这种事情，我们在舞台上同政治舞台一样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要用批判的眼光看，这个戏诬蔑我们党，诬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诬蔑人民解放军，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诬蔑红卫兵的形象，搞打砸抢嘛。把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毛主席倡导的这场亿万群众的革命运动，史无前例的伟大的运动，歪曲成打砸抢，用歪曲、丑化，把一个革命的形象丑化了，听说这个剧本还要搬到国际舞台上，诬蔑文化大革命。你们想一想，我们能忍受吗？（众答：不能。）所以我们要把编剧的人、导演的人，中国的外国的叛徒、特务、坏人揪出来批判，批倒批臭。广大人民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只要伟大的毛主席司令部一说，中央文革一说，就会响应。所以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告诉大家，他们开黑会，反夺权，都必须彻底批判。我们说清楚了，大家批判。广大群众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就会响应。这个戏是黑戏，是毒草（江青同志插话：是反动的，反革命。）必须彻底批判，包括事实经过，包括《××日报》鼓吹它，迷惑了我们广大群众，同志们一听，现在还不愤慨吗？

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准，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要巩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当然，不是说没有缺点，要看主流，缺点错误是要改的。天津万张反革命集团，不仅是两个人，是个集团，当然是个小集团，有叛徒，有特务，特别是在文艺战线，公检法专政的机关更要做好工作，要改造，要改造公检法，改造文艺界的领导，把坏人揪出来，有错误的检讨错误。公检法是实施专政的，以后必须依靠解放军改造。北京照这样办了，刚才江青同志提出天津也要照这样办，我们欢迎解放军和解放军干部，参加进来改造公检法，好不好？（众答：好。热烈鼓掌）这个会不仅对你们、对我们也是上了一课，我们也知道不久。从“两黑”当中，知道阶级敌人不甘心死亡，进行最后挣扎。在这儿开会的还有各大区的同志，他们也可以受到教育。你们讨论讨论。我们相信天津市革命委员

会，你们根据我们大家的意见，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公检法，在广大群众中作好宣传动员，相信你们会获得新的成功。我们也从中受到教育，学习一课，谢谢你们。（热烈鼓掌，呼口号）好，讲到这里。（最后，姚文元同志带领大家喊口号。）

《陈里宁案材料》

说明：在以思想言论定罪的制度下，精神病患者，因为其异于常人的思想言行，常有被定为犯罪的危险。上文中的陆洪恩就是一个惨痛的例子。但是，这样的悲剧并不始于文革。陈里宁在文革前因持有怀疑、反对刘少奇等人的思想言论，转辗于精神病医院和专政机关之间。文革的风云变幻使得他原来的“反动言论”成了先知先觉的“革命言论”，他本人也从“反革命分子”一夜间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一时间被誉为“新时代的狂人”，他的日记被冠以《狂人日记》的标题在群众组织的小报上广为刊载，他的事迹被编成剧本在京、津等地演出。后来，由于有人揭发陈里宁也有涂改毛泽东及马列著作的行为，他被再次打成“反革命”。这里收集到的材料摘自1967年2月陈里宁被“平反”时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编印的部份材料。——编者

清华大学红教工宣传组发表“陈里宁日记”的说明

这里，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由于怀疑和批判刘少奇，因而遭到刘邓反动路线和反革命分子罗瑞卿之流的残酷的政治迫害的情况。

共产党员陈里宁同志，现年32岁。他初中毕业后参加革命工作，原职湘潭市人委资料员。1960年在参加××公路工程中，获“劳动模范”奖状；1962年获市委机关“优秀党员”奖状。

自1957年起，他从刘少奇的著作及其言行中，逐步看出了刘少奇的问题。他感到问题很大，自称这个问题“把我急疯了”、“使我的神经到了错乱了的境地”。

步”、“害怕刘主席反对毛主席”。他把自己对刘少奇的批判在同志间议论，但遭到了“批判”，精神受到极大的压抑、刺激和摧残，并被当作精神病人，在 1962 年 4 月至 1964 年 12 月间，三次关入湖南精神病院。可是他对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一直进行着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每次出院之后，他仍继续“琢磨”着刘少奇的问题。1964 年 10 月间，他“忍不住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不怕死，利用时间，写了三十多封信扩大影响，并把一切行李拿回家，准备不怕死大斗一场。”但是，他给毛主席、林彪同志、康生同志等首长的信，却落入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成了他“反革命”的“罪证”。

1965 年 1 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刘少奇和他是什么关系？！）派人将陈里宁从精神病院“秘密逮捕”入狱。当时，迫害他的“凶手”丧心病狂地威胁陈里宁说：“毛主席年岁大了，只挂个名了，真有权的是刘主席，你反对他是自取灭亡……。”入狱后，他被连续审讯了七个月之久。在狱中，他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不准看书、看报和写信。为了与外界取得联系，他想出了唯一的办法——装疯。1966 年 10 月底，他第四次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即现在的红卫医院），这是他第七次被关入精神病院。

这个“精神病人”，无论是在狱中或是在病院中，对刘少奇的问题，一直做着十分正确的批判，对党对毛主席无比热爱。他经过了绝食斗争，才获得了看书、看报的权利。但他从病院中送出的信件，却一直被扣压在“病历”中，成了他新的“罪证”和“病证”。直到去年十二月底和今年一月三日，主管陈案的人还两次对他扬言说他病好了就送他去劳改，并不准他与红卫兵接触。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波涛，早就震撼了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派统治着的害人医院，他第四次进入安定医院的主管大夫从陈里宁的言行及“病历”中看出了“问题”，文化大革命启发了这位共青团员的政治责任感。她看清了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迫害，她否定了以前好些反动权威对“病人”的诊断，冒着风险，帮陈里宁把信件发出去了！

1966 年 12 月 19 日，红卫医院的革命造反派，联合了清华大学井冈山、清华大学红教工和其他院校的革命师生，造了医院的反；接着于今年一月六日，又造了与陈里宁有关的某上级单位的反，把有关材料直接汇报给中央文革小组。

革命造反派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陈里宁等“病人”被解放了，造反行动的第一个回合胜利了！

下面，我们把已搜集到的有关陈里宁的部份材料，分类按日期先后编纂起来。（材料原文有作删节的，均用“……”表示，原文中的用词用字，均按原来面貌，未加修改，阅读时请加注意。）这些材料，是对刘邓路线的重要揭露和迎头痛击。它把刘少奇剥得体无完肤，把王光美打得狗血喷头，也是对那些精神病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有力审判和“诊断”！

编入的材料极不完全。希望同志们读后多给我们提出意见！

清华大学红教工宣传组 1967年1月11日

第一部份：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向刘少奇这个“庞然大物”开炮！——陈里宁日记和别人对他的“揭发”

日记：

1963年4月23日

在人们把我推上吉普车（送去精神病院）时，我向××同志说了一遍，我是故意说的：我要给×××（机关领导）一粒象征性的子弹，表明我将以毛泽东思想来打击敌人，作为一颗子弹一样。

1963年6月21日（这一天，陈里宁第一次出院）

我没什么病。我可以清楚地合逻辑地想起当初的情况……。

1964年9月14日夜

韶山，花明楼，两者真有天地之别。毛主席爱的是山，气势磅礴；这个爱搞什么楼，真是与毛主席唱对台戏！

1964年11月2日夜

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把好得很说成糟得很。他也大谈其政治、阶级斗争，等等。实质内容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那末这种只不过象红薯一样，红皮白心。可怕的是：这种人党内混入很多，发号施令，不可一世。我看就糟了。还是要彻底清理一番，照毛主席说的那样做。

大干部想特殊，以为他就是救世主，他没有想到：他作一个报告，中间的数字句子，都是集体的创作，没有群众的劳动，他不可能作报告。我劝他谦虚一点……{。

有些人喜欢把问题复杂化，迷惑人的注意，接触到原则问题，就息事宁人，实质就是为反动派效劳。他们被阶级的有色眼镜迷住了眼睛，把真理当毒草，似乎只有某人说的就对，毛主席说的就不对。他们口头拥护毛主席，实质反对毛主席。

林彪作风很可取。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见有益无害的事情就干，战备观念强，随时准备打仗，这就是无声的命令。

1964年11月5日

不要把那些资产阶级人物当宝贝，他们有些人顽固得很，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是死要面子，名利都要……。

有的人专干坏事，但是他到处吹嘘他就是党，代表毛主席，真是怪事。

别人对陈里宁的“揭发”材料：

第一篇：《陈里宁的反动言论之一二》

一、说刘主席是大流氓、政治骗子：“自己本来有爱人，离了婚，又找一个年轻的学生王光美做爱人，带着游马路，还要游到外国去。”“……照他（指刘少奇）的说法，好像毛主席、周总理、林彪同志的被人民群众崇敬，都是他搞个人崇拜搞起来的。”“安源煤矿的大罢工，写成是他个人的劳动，实际上，工人死伤很大。”

二、说刘主席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八大《政治报告》是错误百出，并将该~}

~{书乱加批语：“我看了一下，这两本书至少有五十个错误：《论共产党员修养》第一句话……显然是荒谬的。……他教育党员修养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政治报告》（1956年）中，他宣布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消灭了，……等等，这是否认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是与毛主席的学说唱对台戏。其实哪里消灭了。”还在该书批着：“既不可能，又不需要”、“此处猫屁不通”等等。

三、说苦日子都是刘主席带来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哪里是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都是他搞的不好带来的。”

四、说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是假的：“她作的报告都是假的，我听了几句，觉得冒（湖南话，没有）一点味道，讲了一天，结果是自己在农村里没有吃到饭。是她没有找中地方，象妖精一样，我在河东河西都走过，农民是很欢迎的，没有吃不到一餐饭，就要搞社会主义教育。”

五、说×书记是婊子养的：10月4日上午在办公室他对我说：“……×书记这个婊子养的，到×××厂去工作，看见一个女学徒长得漂亮，就说她看问题水平高，将她调来市工作……”

××× 10。4

第二篇：《陈里宁的言论非常反动》

陈里宁在群众中对刘少奇主席、×书记（机关领导）进行了恶毒的谩骂和攻击，他在10月2日说：“我就不拥护刘少奇，就是要反对他……他写了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有50余个问题，我要和他进行辩论。”又说：“我不怕，要杀就杀……宪法上有规定，党章上也有规定，党员对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直至中央有意见，有权利提，就要提。要杀，你们就杀，我只有一只笔。”“……他要杀我，我倒不怕……，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陈里宁经常说：“我姓陈，是东边挂锄头，他锄禾苗，我要锄毒草。”“你要不相信，我说的是有根据的，将来历史也会作结论的。”

××× 1964年10月4日

第三篇：《检举陈里宁的反动言行》

……十月一日晚上十一点钟，交际处前坪的电影结束了，这时陈在桌旁看书，见我进了房，忙说：“……刘少奇过去自己有妻室儿女，丢了不要，而不知从哪个学校里找了个30多岁的女学生，转山游马路，带了出国，唤做夫人，还拍成电影，真是当了婊子还要起牌坊。他是大骗子，大流氓，到处招摇撞骗。有的人还选他当人民代表，我是坚决反对他。我姓陈，我东边挂锄头，到处去挖。……”

陈说到这里开始上床睡觉，我插嘴问道：“你刚说的这些向组织谈过吗？”他说：“我谈一点，他们就讽刺我，我懒得说。……今晚我又写信给中央，我不信鬼，说不得硬要说。”此刻，陈从床上爬起来，急忙翻阅《宪法》和《党章》，并说“……我是个共产党员，还怕什么！我拿了这本宪法和党章可以走遍全国。”我提出要他把《论共产党员修养》那本书给我看看，他不但答应供书，还将写好的信递给我看。我估计，他是先看书，后写信的，书上批语和信上写的全部系谩骂刘主席的一大堆话。我说：“你这情况应找组织上的同志谈谈。”他冒作声。第二天清晨，我便把陈的反动透顶的言行向党支书×××作了口头汇报。

十月三日晚上，陈很生气地说：“我就是恨透那些人，造了我一些谣，说我想爱人，疯了，隐瞒家庭情况。×××假名送我去长沙治疗，结果他在宾馆住了十几天，他和市委书记×××把手枪扳起来要杀我……近来也好，有人跟随我，监视我，我写了信，别人告了密，被拿去了。我向党小组长谈谈个人思想，又说我是会后议论，这真叫我只有死路，冒得路走。”

上述两晚陈的反动言行，我认为不能作为是疯子的表现，陈并不怎么疯，从他恶毒的谩骂刘少奇主席，要以笔去杀革命同志，看来是有极其反动的政治思想作指导的，是有意的在我国庆节的夜晚放肆发泄阶级仇恨。

材料检举人 教育局干部×× 1964.10.4

第二部份：用生命来保卫党！——陈里宁信件

下面的信，有的是陈里宁在湖南时所写，从时间上看，多是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写的。但他在1964年10月冒死所写的给首长的30多封信，大部份未搜集到。信的另一部份是他在红卫医院中写的，它们（除了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外）都被扣压在“病历”中，没有寄出。

1964年10月2日给《新湖南报》的两封信

第一封：

中国有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代言人，一再修改他的唱本，向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说教：“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共产党员深深知道：有志不在年高。新中国青少年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应当做党的孩子，入党入团那更不用说了。伟大的毛主席在青年时代就写出了“天不怕，地不怕，鬼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等豪言壮语。抗日战争时期、朝鲜战争时期就有英雄小八路，少年游击队。既然如此，为什么此人念念不忘孔子的说教呢，文章并不是没有修改的机会呀！

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封建说教：“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很苦的锻练过程……”

这段话证明：此人连历史都不懂。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斗争史，孟子所指的那些担任‘大任’的人物，可惜都不是什么锻炼。他们锻炼的是如何杀人民，剥削压迫人民的本事，那些锻练方法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

{……如此等等。这种既不加批判、不加分析、盲目说教的人，正是“伟大的”刘少奇主席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告诉我们的。“既然如此，我们还要去……学习那些所谓圣贤之道干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升官发财……”这一段话用在这里，岂不是十分恰当的帽子吗！……

第二封：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是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应当象雷锋同志那样做。

但是奇怪的是：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人，写了一本著名的书，流行国内外，甚嚣尘上。书上说的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呢？人们为了要生活，就必须……。”

按照这种奇谈怪论，岂不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以及陈立夫之流的“唯生论”等论调，同出一辙吗！……

我们再看此书的结尾吧。

“……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进行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精练的模范党员和干部。”

由此可见，他说半天是劝共产党党员当模范。我们知道：模范的称号，不是共产党员修养的目的。共产党员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毛主席也一再教导。退一万步说：模范党员和干部，并不是某人去封的，也不是自封的，共产党员不应当在思想改造中抱着这样一个目的……。

为什么此人如此放肆呢？还不是廿多年前刘少奇主席英明的预见吗：“……人，都是有人的思想意识来作指导的。而人的思想意识又常常和他的世界观分不开的。”

这真是一个极端严重的原则问题……。

1964年10月6日给江麓机械厂党委信，揭发刘少奇霸占国家物资为其地主家庭修“花明楼”

江麓机械厂党委：

我记得1960年时，贵厂支持农业成绩很大。但是其中有一部份是值得研究的。比如说，有人唆使一些坏东西，另搞什么花明楼，架子大，气势汹汹，硬拿强要马达、水泵、钢材之类，……供地主阶级祖宗搞什么“光宗耀祖”之类的低级趣味。这是很值得追查的。……

1964年10月7日给湘潭市公安局的信

湘潭市公安局王局长等同志们：

毛主席是我们最热爱的领袖，也是世界人民最爱戴的无产阶级导师之一。我记得解放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五位无产阶级导师的像片并排挂的，后来不知为什么只剩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四位导师的象并排挂了。我很奇怪一九六二年正当赫鲁晓夫与帝国主义等反华大合唱的时候，有人在一本很“著名”的书内，又用笔砍掉了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此人胆子真不小呀！为此事，我急疯了！

中国共产党员 陈剑鸣 一九六四·十·七夜

1964年10月9日给湘潭县委信，再次揭发刘少奇为其地主家庭修“猪楼”事（信封上有“特急”二字）

中共湘潭县委：

我们知道，有人以皇帝的派头，大建什么猪楼，到湘潭全民所有制工厂横行无忌，侵占工人阶级创造的财产，实际上就是对劳动人民犯下了罪行。……

俗语说：擒贼要擒王，打蛇要打七寸。这些看法如无不当，请你们准备一下材料，掌握敌人的罪证、证明人、找出真正的为首分子，不管他的官有多大，都不要怕。我相信六亿神州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群众的天下，什

么鬼都是不可怕的。不管它如何诡计多端，我们也采用“三打白骨精”的精神，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无声的命令，统一思想，将旧世界杀个落花流水，必获全胜！

1964年10月13日夜给林彪同志信

林彪元帅同志：

我有一个事情向您反映一下，近期《解放战争回忆录》见《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这一文章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期间，有人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挟天子以令诸侯”，主持把南方的一些部队调驻北方，这样即可巩固北京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内战一旦发生后，不致孤悬敌后，被人吃掉；同时对谈判也有好处。云云。我仔细想过此问题，认为与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实质是与蒋介石遥相呼应，摧残有生力量，布置一次围剿，使伟大的工农红军集结一处，便于在半路拦击，暴露我游击队目标。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我认为：全国都是工农革命人民的天下，游击队应当在这些地方扎下根子，与群众有如鱼水关系，不断壮大，迎接主力红军的到来，长期隐蔽，待机破敌。

我觉得琼崖纵队孤悬敌后23年，红旗不倒，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安徽、江苏游击队也坚持得很好。但是有些却复没了，如洪湖赤卫队，……有些被敌人破坏，如新四军等。这些事情决不是偶然的。现在东风绝对地压倒西风，我建议中央军委和您是否能听取这个意见，派人专题调查研究一下这些事件的真相，则无产阶级事业幸甚。

我认真看过您的书，知道您对于党和毛主席的事业是忠诚的。我祝您身体健康。顺致布尔什维克式的敬礼！

同志 陈剑鸣 1964.10.13夜 湘潭市人委

1964年10月19日给他的女朋友的信

……现在，领导正在追查我，说我是混进革命阵营里的反革命分子，所以我害怕得很，病又复发了。

1964年10月26日给他的女朋友的信

~{小×同志：

……我神经病又发作了，最近以来，我写了很多信件发到中央和各地。追查起来，我是犯错误的。我一定承认错误，但以后还会处处犯类似这样的错误，除

非我的生命停止了跳动。我知道这样作的后果是什么，但是我决定坚决地做下去，直至有人打击我为止，再和他说道理。……

1964年12月2日给妹妹的信

××妹：

看到你的来信，我认为你在革命的熔炉里锻炼得更纯了。党和毛主席太阳一般的光辉，赋与每个革命青年新的生命……

但是，我又被当作一个疯子，早几天送到湖南医学院和省精神病院看病，估计又要住两个月，……我厌倦医院那种生活，希望作一个健康的自由人，生活在太阳照耀下的大地上。……

1965年10月31日给母亲的信

母亲：

一月十五日我被逮捕了，关在北京×××看守所，审讯记录写了半尺高。这件事我感到惊奇和可怕。但我相信党和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对我的问题的处理是不会错的，希望母亲不要大惊小怪。……如果母亲找到组织连系，也不要过于激动，客观地说明情况就可以了。 祝

安好

儿里宁上 65. 10. 31

1966年9月19日给妹妹的信

××妹妹：

……我相信在党和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一小撮牛鬼蛇神的捣乱，只不过是“蚍蜉撼树谈何容易”罢了，它们的灭亡是必然的。党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哥哥 里宁绝笔 66. 9. 19

1966年11月23日给母亲的信

母亲：

……此外，请母亲写信给中共湘潭市委政治部或湘潭市人委组织上，请求他们营救我出狱。万一我有不幸，也请母亲弟妹放宽心怀，因为人总是要死的，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死，也是义不容辞的，希望母亲不要忧伤，好好保养身体。

希望母亲和弟妹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老三篇，把心怀放开一些。我于十月二十九日到红卫医院，现在感到好多了。

儿里宁 上 一九六六、十一、二三于北京红卫医院

1966年12月1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现在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我这个失去自由的人，情不自禁地高兴得跳起来，我虽然没有参加运动，但我对文化革命有关消息感到十分亲切！内心里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在北京时间内，有关当局（不明身份）曾经对我审讯了七个月，我尽可能把一切想法和问题，向政府有关当局作了彻底交待。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说我是反革命、阶级异己份子等等，扣了一些帽子，使我感到惊奇。在看守所，我看不到报纸，直至今年五月才如愿以偿。我一直坚持“党是不会冤枉人的。……”（下略对刘少奇的揭露和批判）

……我对以上问题一直找不到答案。如果我错了，又错在什么地方？我承认我水平很低没有社会经验，我怀疑了一个庞然大物——刘少奇。但是矛盾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既有明显的矛盾，我有权利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名义，理解这些矛盾。头可断，血可流，都在所不辞。问题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死不瞑目。

敬爱的首长，由于我失去了自由，我一无所有，我连信纸都是千方百计借来的，有信封了，又没有钱买邮票……。

最后，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内心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陈里宁 于红卫医院四病区1966年12月1日

1966年12月14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我回忆我所作所为，主要是对刘少奇有了怀疑，发现他的《八大政治报告》、《论共产党员修养》、《在1959年军委扩大会的讲话》，有许多问题自己

解决不了，一共有五十多个问题，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可能没有收到。我对刘少奇有怀疑的地方，例如：八大报告中一开头说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富农、变为自实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与毛主席思想相违背的。在 1959 年军委扩大会上，他说他过去搞毛主席个人崇拜，现在搞邓小平个人崇拜，这是谩骂毛主席。他还说掌握党的政策要象开飞机到莫斯科一样左一下右一下，才能到目的地……。

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我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怀疑刘少奇，并不等于就是反党。最近从红卫兵传抄的材料中，我看到聂元梓等十一人写的大字报以及其他材料，说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二号人物，而刘少奇则是一号人物。他们并没有犯法，而我却犯了法，使我十分惊奇……。致以

最崇高的敬礼！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里宁于红卫医院 1966.12.14

第三部份：赤胆红心永远忠于毛主席——陈里宁狱中言行（狱中看守人员所记

1965年2月9日

犯人（指陈里宁，以下同）用小棍在草纸上刺下了动人的词句。他刺道：“妈党：儿1月17日到北京，2月9日 永别了。您万岁！里宁”

1965年2月11日

犯人自言自语说：“毛主席，救救我！”

下午，犯人提出受审讯之后，搜出犯人用手指甲在上面刻着字的肥皂，上刻着：“毛主席万岁！妈，永别了！共产党万岁！共产党员 陈里宁 1965.2.11”

1965年2月21日

“不知你们怎么搞的，把我当成了反革命，当成了叛徒。我没犯错误，我是一个红色革命干部……。”

1965年2月22日

犯人用草根在手纸上刺小洞，让小洞排成字名：“毛主席：永别了，我无罪，

祝您万岁！”

1965年2月23日

犯人向看守人员要毛选，要雷锋日记，要报纸，说要进一步学习政治。还说：“他们就是不给。”犯人被提出去审讯后，在床上搜出了他用草在脏手纸上刺的五张字：“妈，儿已被杀！勿悲伤，祝安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陈里宁！还有后来人！”

下午五时，犯人大哭：“妈，我没罪，人家犯法我倒霉。”“看守，什么时候枪毙我？死时我写个字条送妈妈。”

1965年2月27日

犯人在观察孔的玻璃上哈气，不让看守人员看见。并且高唱：《学习雷锋》、《洪湖水》、《红色娘子军》……等歌曲。

1965年3月4日

“同志，你太辛苦了。我给你唱《白毛女》的歌。”说后就歌唱。

1965年3月17日

中午，用小草根在手纸上刺大字：“天涯何处觅真理？”

下午被审讯回来，又大唱《娘子军歌》。

1965年3月18日

“我都快死了，给我一本书看看吧！”

并举起了拳头，呼“我要为真理作斗争！”

1965年3月25日

犯人提审完回到住室后自言自语说：我要去看天安门！我要跟着共产党走，走毛主席的路。你们把我关在这里，我跑也跑不了，你们把我放了吧，我死也死个光荣呀！我要看看毛主席，看看天安门。说后就对着看守人员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1965年3月29日

“我只骂了皇帝一句，你们就要把我杀掉了。”

1965年4月5日

犯人说：把我烧成灰也找不出反革命的影子来！

1965年4月×日

“我光吃饭不干活，这不是成了二流子吗？叫我劳动改造吧。”

他还对看守人员说：我要交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检举一个大反革命，就是我死了也要检举清楚。

1965年4月15日

今天仍然对看守人员说：我不是国民党反革命。国民党时我还是一个小毛孩子。共产党要杀国民党和反革命的脑袋，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害怕。

1965年4月20日

犯人问：“你把我关在这里干什么呀，把我养肥了杀肉吃吗？……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把我抓错了。”

1965年4月×日

犯人自言自语：可惜呀我没有长上翅膀呀，如果我有翅膀，早就飞跑了。接着又问看守人员：这里离北京市有多远呢？不知道有没有公共汽车？

1965年5月1日

犯人坐在床上说：今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算了一算，是国际劳动节。

犯人被审讯回来后，对看守人员说：那位穿呢子制服的审讯首长说我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贩卖私货。我没有披过马克思的外衣，我披的是破棉衣。……法官还说我是贩卖私货，我检查了一天也没检查出来，我连一分钱都没有怎么贩卖私货呀。

我没有披马克思的外衣，县里的一个书记披过马克思的外衣。他报告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三面红旗。反而把我给抓来，没有抓他，叫我当替死鬼。

~{赫鲁晓夫披过马克思的外衣……。

1965年5月10日

上午犯人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呀，我要去给农业社干活，在这里没有什么意思。……你们干吗不给我书看呢？”

1965年5月19日

“他反对毛主席为什么不杀他的脑袋呀？我不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杀我的脑袋呀？不行，我得找个地方去讲理。”

“难道我相信马克思、列宁的话我就反动吗？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教，我不信天主教和蒋介石的鸡巴教，我就反动吗？我思想搞不通。”

1965年5月22日

犯人在地下走着说个不停：“审讯我的首长说我的脑袋中毒太深，要我消毒……那个老头子可厉害了，我斗不过他，咱一个跟头打十万八千里还是出不了他的手心。”

1965年6月9日

犯人自言自语：那个鸡巴毛把我关在这里，我犯了什么错误，要杀我的脑袋。我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你就把我抓起来不放。抓我的人坏家伙，我出去以后非要枪毙他不可！为什么随便把一个共产党党员抓起来？真他妈的不讲理。

1965年6月22日

犯人用手纸叠了一只鸽子，并和它说话：“我骂了皇帝，骂皇帝是要杀头的呀。……反革命分子真厉害，想作皇帝。”

附：看守所人员对“密捕”陈里宁以后的情况的报告二则：

（一）×××同志：

逮捕陈的保密工作，想继续下去很困难，×××意见是否可通知××，公开向其家属宣布陈已依法逮捕。

××× 1965.4.16

（二）……陈母找陈犯，她怀疑，着急，据她自己说，她急的有些疯疯癫癫。……四月二日，陈母借了五块钱，到了××落脚，并去了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的—妇女同志×××拿了陈里宁调动工作通知的存根给她看，说是已被省人事局调走。~}

四月五日，陈母去省人事局寻找，人事局的两个女同志答复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现在，陈母的态度是：认为不该瞒着她，她说：“……就是犯了什么事情，只要告诉我一下，也没问题。有什么问题，就办到那里，我也不会有有什么顾虑。即或犯了错误，他也不是当权派，我想也没有蛮大的错误犯啊！……我的崽女都是政府养大的。……我若不是想得宽，看着几个细伢子遭孽（湖南话：可怜），就死了……”

1965年4月×日

第四部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们，你们才有精神病——陈里宁“病历”及他自己在病院中所写的“病情小结”

一、湖南省精神病院大夫所写的陈里宁“病历”二则：

1963年12月×日

病人对刘主席有十多点怀疑：

(一) 刘主席所写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和《论党内斗争》违背了《矛盾论》和《实践论》。

(二) 与普列汉诺夫亲密一家、拥抱。

(三) 带爱人出国游马路游山玩水。

(四) 刘主席当权以来，不是过左，就是过右，刘主席的主张象开汽车一样，一左一右。

(五) 疑刘主席的爱人是特务。

(六) 刘主席发表的反修文章观点不对，很勉强。

(七) 刘主席工作不深入基层。

(八) 刘主席访问越南后多了一个万岁“刘主席万岁”。……

病人还说要到省委去证明他不是疯子。

……因此又送来住院，胸部透视无异常发现，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态清晰……。

1964年11月7日

……九月下旬，忽然又大写文章，谩骂刘主席，说刘主席《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中有五十多处不正确的地方。说刘主席的观点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受鉴定人陈里宁生活上一直表现尚正常，仪态整洁，表情自然，意识清楚，定向力、理解判断力、记忆力，相当好。

受鉴定人自己感到几年来变得特别喜欢思考问题，看了毛主席著作，就用毛主席思想来看别人的问题，所以发现刘主席的书有50多处错误……。

谈到自己别名叫陈剑鸣时，说要使他变成毛主席手中的宝剑……。

结论：

(1)此员精神病复发，其所以出现反动言论，乃是原来反动思想在精神病症状上的反映。

(2)~{诊断：仍为精神分裂症。

医生×××（签字） 1964. 11. 7

二、北京红卫医院大夫及护士所写的陈里宁“病历”

1965年8月16日~

……伴诊×同志述：目前病人正在京×××受审讯，因病，影响审讯。已和我

院联系，先住院治疗，病情好转后，继续审讯。

查体：一般情况佳。~

精神状态：意识清醒，接触良好，对答切题……。但无自知力，不知道自己为何在×××被审。

印象：精神分裂症（妄想型）。

×××（签字）

1965年8月18日~

说话滔滔不绝，语流快，未听有破裂性思维。被动接触良好，能回答护士提出的一切问题，能将自己家庭历史详细叙述。

大量地看报，而且是过期的报纸。

问你有什么病，说有时给毛主席写信，想见毛主席。

中班×××

1965年8月19日

病人自述“我最恨尼赫鲁、肯尼迪、赫鲁晓夫，我恨死他们，要揍他们。”

观察病人情态仍是活跃，说话时表情丰富，形像，动作神神彩彩，内容丰富，语流快，常常引来许多人围着病人。常常把自己经历和家庭历史毫无保留地滔滔不绝告诉给病友和护士，常常向病友讲解天文、地理等知识，被动接触良好，对护理合作，大部份时间，专心地看报，甚至一口气能看三、四小时。

早班×××

病人夜里睡眠好，早起料理生活好，在床上阅读毛选《为人民服务》，自述昨晚吃了药夜里睡得好，脑子什么问题都不想了，表现愉快。

夜班×××

1965年8月25日

病人上午很兴奋，自己滔滔不绝地向别人述说自己的看法：“刘少奇是地主出身，在家盖自己的房子是光宗耀祖，没有阶级观点，曾经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出二十个问题，他们不解答，说我是右派，没关系，我坚持原则，向毛主席写信告他们。”说时感情很激动，比手划脚。

早班×××

1965年10月15日~

患者夜间睡得好，晨起主动地帮助工作人员进行劳动，能积极地参加集体活动。生活饮食均好，未见异常情况。

夜班×××

1965年10月29日

病人仍无自知力，不知道自己得了精神病。

1965年12月24日~

患者积极参加病区娱乐活动，协助工作人员劳动打扫卫生等，有时独自看书看报，今日问护士：“我什么时候能出院？病基本上完全好了，我在医院一定安心养病，出去好工作。”病人主动接触好。

早班×××

三、陈里宁在红卫医院亲手所写的“病历”二篇

（另一篇未知何时何地所写，好像是“口供”记录）

1965年11月11日

“我在湘潭和北京发病的原因都差不多，……我害怕刘主席反对毛主席。我疑心刘主席的原因有如下一些：

1. 1950年刘主席作土地改革报告，说地主三年可以改变成份。这个说法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很明显是一种阶级斗争息灭论。

2. 1956年他说：地主阶级消灭了，富农快消灭，资产阶级正消灭。这很明显是种修正主义。1962年中央农村工作双十条说明地主阶级存在，并没有消灭。经济上改变了，政治思想上没改变，不能算阶级消灭。列宁说：要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消灭阶级社会带来的一切痕迹，才能算消灭阶级。

3. 刘主席在 1959 年军委扩大会上说：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搞林彪、××× 人的个人崇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党和毛主席从来就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提高领袖的威信与个人崇拜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拥护毛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正确，并不要别人去搞个人崇拜。~}

4. 毛主席一贯主张掌握党的政策要反右防“左”，坚持正确的路线政策。可是刘主席 1959 年说：掌握党的政策要左一下，右一下，象开汽车、飞机一样。我认为这是对党的政策开玩笑。

5. 刘主席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上修掉了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1962……正当赫鲁晓夫反华之时，这是不是相呼应？如此等等还有许许多多，我在×××看守所交代过了。这些矛盾我提出来，总是遇到批判，我不相信我的眼睛了。我害怕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就会与蒋介石呼应，人头滚滚。

6. 1960 年湘潭市都说刘主席故居要修花明楼。党委书记不通过手续，跑到湘潭市×××厂要马达、电线、木材、水泥。刘主席家是地主，房子本来就比农民好，再修好让别人参观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算不算背叛地主阶级？

陈里宁 1965 年 11 月 10—11

日写

1965 年 11 月 19 日

“现在我感到自己的病情好转，……

对刘主席的看法问题：

……我把刘主席的文章《论共产党员修养》、《八大报告》、《在军委扩大会~}

~{议上的报告》等与毛泽东选集对照，这时我看问题不同了，把《论共产党员修养》烧掉了。1964 年后，我更发展到写信给毛主席，说刘主席与毛主席唱对台戏……我认识到：我们党有毛主席领导，党的团结有如钢铁一般，……

54 床 陈里宁”

196×年×月×日

一、1963 年 11 月，市人委把我抓到长沙湖南精神病院，正在等床位，我向湖南省委张平化书记交了一大包信，信是我找到省委交给传达室，其中包括毛主席和张鼎丞检察长、谢觉哉院长的信。

二、1964年9月向政治局、毛主席写信一包，寄去的。里面攻击刘主席及××书记、××书记等（地方的）领导。攻击刘主席已花甲，怎么又结婚，访问四国没有宣传马列主义。

三、1964年10月向湘潭市公安局王局长写信，建议查清为什么马恩列斯毛主席的象解放初放在一起，后来又分开挂。此信由市人委传达室转去。~

四、1964年10月向湘潭县委写信，又提起五风为什么这么严重，要查清原因。

五、1964年10月向宁乡县委写信，攻击刘主席是地主，为什么要修花明楼。是什么人到湘潭大厂子搞材料去用？

六、1964年10月向康生等同志写信，攻击刘主席不好。

七、1964年10月向湖南省委社教团写信，诬蔑刘主席和××书记，××书记（地方的领导，与本项第二条同）搞私人关系。

第五部份：砸烂刘邓反革命专政，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陈里宁和金大夫在“红卫医院控拆刘邓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

1967年1月10日

陈里宁发言：

敬爱的同志们——敬爱的红卫兵战士们！

您们好！

我能够参加这样一个会议，我真是高兴极了，我的心好像是要跳出来！一月七日下午，中央首长王力、戚本禹同志接见红卫兵并向我宣布“你自由啦！”我真是高兴得要跳起来！我禁不住要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毛主席和党救了我！是革命群众救了我！是亲爱的红卫兵战士们救了我！我内心里说不尽的感激！没有这些，我早就完了。

下面我把我近几年的遭遇，向大家作一个汇报！

事情是这样的，我叫陈里宁，在湘潭市人委办公室工作，一九五四年入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对刘少奇产生了怀疑。刘少奇一九五六年在八大会议上——一手遮天地作了一个政治报告，说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富农……。我把这个论点与列宁、毛主席著作对照，认识到刘少奇的论点是反对毛主席的。毛

主席从来教导我们，改变了所有制，我国政治思想体制谁胜谁负的问题，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列宁同志教导我们：什么叫消灭阶级呢？就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消旧社会带来的一切痕迹（列宁文选两卷本第二卷）。为什么刘少奇反对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呢？这条阶级斗争的红线促使我对刘少奇产生了更多的怀疑，并成天推敲不已。到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上说：“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不搞了，我要搞邓小平个人崇拜……”又说：“掌握党的政策，就是要左一下右一下，象开飞机到莫斯科一样，才能达到目的。……这使我更怀疑了，我与其他同志陈中虎、陈泽声等作过争论并老是琢磨这个问题。到一九六二年，我又重新对照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发现修改本把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勾掉了，并很少很少提毛主席的教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沿着这个线索，带着刘少奇的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我对刘少奇的幻想消灭了，于是在一九六二年独自钻研推敲刘少奇著作，共发现五十多个论点值得怀疑，于是我在个人的笔记上记下了这样一些问题，可是我因公外出，有人爬窗进来，偷看了我床枕头上的这本笔记本。一九六三年四月份，我写了一份材料交给李力秘书长，他诬我精神病，把我送入湖南省精神病院。回机关后，我又琢磨那些问题。在一九六三年十月，我忍不住了就写了信给毛主席谈到了我的怀疑。不久我又被送入精神病院，出院后我继续琢磨那些问题，但湘潭人委办公党支部开大会批判我。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伟大精神鼓舞下，从恐惧到无畏产生了一个飞跃，我忍不住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不怕死，利用时间，写了三十多封信扩大影响，并把我的行李拿回家，准备不怕死大斗一场，我认为修正主义也只不过是纸老虎。接着住入精神病院。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有三个人把我从医院秘密逮捕到北京，非法审讯七个月之久，扣上了“现行反革命”、“民族败类”、“叛徒”、“阶级异己分子”、“黑帮”，不准写信，不准说话，挨打受骂，威胁，用墩布棒子打我，把臭袜子放入我口内，夏天光脚走水泥地，并准备把我用绳子吊到窗户栏杆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害人呀！我也针锋相对地作了斗争，如想办法找住院红卫兵，与外界联系等。

我听到外界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后，心中高兴极了，毛主席真是英明呀！我总是想法找红卫兵。幸亏第七次住院金大夫冒着极大的风险，帮我与红卫兵联系上了，把给中央文革的信寄去了。我还想通过同乡周齐明弟弟探亲，把给中央文革的另一封信发出去，后来信被扣。有曲折有反复，但我想到毛主席教导，相信党，相信群众，我就什么也不怕了。毛主席说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从毛著中找到鼓舞，支持，力量，克服私心杂念。认识到光有敢字还不够，还要有一个善字，从毛著中找到聪明和智慧。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是力量，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掌握了万能武器。我虽然能力有限，但体会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经过这场斗争，我接受了党对我的初步考验。我准备同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去迎接新的考验。对我本人来说，今后更要加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我的缺点和错误还是相当多的，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我充满信心，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什么也不怕。现在看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不过是纸老虎！我完全相信自己可以克服缺点和错误，背叛我的家庭。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但是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前途。我要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永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上刀山入火海也甘心情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怕任何艰险，就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坚决同刘邓反动路线斗争到底！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金弘敏大夫的发言：

同志们：

今天在这里开这样的大会，由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直接受害者来控诉，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过去精神病人一旦被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就是永世不得翻身，说话没人信，办事不可靠，政治上低人一等。而今天，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方向，过去被认为“疯子”受政治迫害的人也和我们一块起来造反

了。我们坚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把资产阶级的精神病院砸个稀巴烂！

同志们，陈里宁同志第四次住我院由我来主管，在和陈里宁同志接触时，我认为他是一个革命同志，是一个革命意志坚强的同志，他经受了考验和锻炼。陈里宁同志才只三十一岁，曾先后七次住湖南精神病院和我们医院。本次入院是十月二十九日。病历记录着现在职务是政治犯，由看守所送来，主诉是吃屎、喝尿。面对这样的“病人”，我仔细翻阅了既往病历，发现陈里宁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出于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决心，而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对刘少奇之流产生怀疑，对刘少奇的一系列问题做了系统分析研究，并做了严肃的、非常正确的批判，并于一九六二年开始就有关问题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但是，以刘邓为首的反动路线的黑线，对陈里宁进行了政治迫害，从精神病院中秘密逮捕到京，长期住看守所，进行多次审讯、逼供，遭到了生活上的虐待和政治上的迫害，不许看报纸，不许读毛选，过着与人世完全隔绝的监狱生活。后经陈里宁同志的绝食斗争，才给一本《论人民民主专政》看。了解了以上情况后，感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精神病院的大夫不应无视政治，首先必须对每一个精神病人政治上负责任。毛主席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想，精神病本身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一门科学，一个临床工作者头脑缺乏政治，就会犯错误，就会使革命同志受迫害，使坏人受保护，因此我决心接受主席教导：“周密仔细地思考”，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应盲从”。尽管陈里宁同志每次住院都受到限制，不能写信，不能自由活动，而且病人多次提醒我：“金大夫对我这样，不怕受连累吗？因为我是政治犯人。”但我还是主动给病人寄出去几封信，使病人两年多来第一次和家中亲人取得了联系，和其他病人享有同样待遇，可看电影等等。以后，我又感到，应进一步仔细周密思考，我发现病人最后两次住我院时间只隔一个月，为什么这么快又犯病了？而且为什么病人入院后马上一切在看守所的精神症状全部消失了呢？更值得怀疑的是，为什么每次入院的原因都是吃屎喝尿？一系列问题使我决定不能再做前几次诊断的奴隶了，中国的精神病工作者要做中国精神病学的主人，而不能做苏修、英美精神病学的奴隶。在苏联，反对赫鲁晓夫的人被送到精神病院，而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把怀疑刘少奇的同志打成“反革命”关在监狱、

精神病院里，能容忍这一切吗？绝不能！精神病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后由于革命师生的革命造反精神，及中央文革首长的支持和关怀，终于给陈里宁同志彻底平反，陈里宁同志获得了自由。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给的。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

类似这种事例还很多，应使我们每一个临床工作者深思了，要从自己的工作中看到政治，不能再埋头于业务和大病历的书写中了。陈里宁同志曾对我说过：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们大夫只能管治病，但管不了政治。同志们，陈里宁同志对我们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一针见血地击中了我们的要害，这不仅仅是陈里宁一位同志的批评，也是多少阶级兄弟对我们的严肃批评！过去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一部份充当了刘、邓反动黑线的工具，陷害了革命同志，保护了坏人，但是毛主席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确应猛醒了，我们也要起来造反，清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在以前工作中大夫也诊断错、治错了病人；但是这一切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责，责任应由他们来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冲垮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安定医院并不安定，里边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最近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同来我院，建议我院成立一个调查小组，要求我们用清醒的政治头脑去审查与政治有关的病历，对被反动路线摧残、折磨的精神病的同志不单治好病，也要从政治上帮助他，从政治上关心他。

同志们，这是首长对我们的期望和信任，但是要真正搞好，必须依靠广大革命群众，依靠革命医生、护士、工人等同志，一块大揭发，彻底批判，将资产阶级反动东西彻底砸烂，肃清刘、邓路线恶劣影响。我们还要到全国精神病院点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同志们，让我们一块造资产阶级的反吧！~}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卫医院两派组织的讲话

〔时间：3：25 至 3：55，地点：人大大会堂。红卫医院即安定医院。清华井冈山、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医大红旗、公安部×局、学部等同志出席。〕

戚本禹同志讲：今天找大家谈谈陈里宁问题，我们作了很多调查，请谢富治同志谈谈。

谢副总理：陈里宁的事我没有好好管，戚本禹管了（戚本禹同志说：开始管了一段）公安部李震管。听说为了陈里宁的事你们医院涉及到你们学校（戚本禹同志：医务界）医务界有很大争论，有的说是响当当的左派，有的说是反革命，攻击伟大领袖，我们过去没好好研究，最近作了些调查，群众组织也作了调查，今天与同志们商量一下，不要因为这么一个人的事情妨碍大联合，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争起来没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这样肯定，这个人当时写了相当多的材料反对刘少奇，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反对刘少奇这件事是对的，不能因反刘少奇把这个人就怎么样，不要把反对刘少奇这点作为这个人犯罪的罪名，因为全党全国都在批判刘少奇。但是这个人同时也有很大错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著作，作了大量的修改错误的批判、攻击（戚本禹同志说：是歪曲）甚至是攻击、歪曲，这是很大的错误（戚本禹同志说：反动的）反动的，这部分分量是少，研究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混乱（李震：逻辑混乱）不管怎么样是错误的。但是从全部过程看，这个人神经不健康，我们没有学过医。你们在坐的有好多学过医，这个人起码在某些时候神经不清，所以他的东西，就不能作正确的判断，因此不能说他是响当当的左派，因为他反刘少奇的同时也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不能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至于这个人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观察，可以了解。有一点可结论，反对刘少奇是没罪的，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不准许的，这种人不能成为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来有别的问题审查。如果是精神病要治，有什么问题今后审查，所以争论就没意义，肯定精神不太健康。金大夫，我见你几次（金大夫：两次）揭露这个问题，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后来有了派性，是不是？金大夫（金大夫：是，是有派性）有了派性就不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经验。

今天宣布一下，这个事不要再搞了，这个人交有关单位处理。报告不作了，书不出了，剧不演了（戚本禹：报告五月就停止了）两派不要抓住互相搞。他是精神病，今天是不是达成这个协议，搞提乌烟瘴气，这个人的处理交给我们办，停止争论，停止演剧，停止报告，不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来讲这件事情是好心，后来有点派性，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把这人交国家机关处理。我讲的清楚吗？

戚本禹同志讲：很清楚！很清楚！

医大红旗高××：我们坚决同意谢副总理指示，现在他们“狂人日记”全国卖的很广，小学他们作教材学，连内蒙古、拉萨也有，在科技东方红翻印的“狂人日记”第一页上写着：江青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好。

戚本禹同志：你们把谢副总理的话讲出去，就行了，说江青同志给毛主席看了没有这回事。这是谣言，谁给造出去的。

孙××：红旗战斗队负责人在大会上公布的还有传单。

戚本禹同志：没有这回事，谁造出去的。

孙××：是科大东方红。

戚本禹同志：根本不会有这回事，我问了江青同志没这回事。科大东方红是什么组织？

孙××：科大东方红就是科学技术大学的东方红。

戚本禹同志：现在作正式声明，你们两派不要争论了，好不好。你们把谢副总理讲话公布出去，就行了。

医大：双方立即停止对这问题的争论，可以停战，坚决照办。

谢副总理：可以不可以停止争论了？

众答：可以。

戚本禹同志：因为有派性就坚持，你们不要为难他们，主要是你们，他们也不一定是坏心，这个问题你们胜利不等于你们别的都正确，开始陈里宁批判刘少奇是对的。因为十三局光整理了批判刘少奇的材料，这个谢副总理严厉批评过，听说有人当面不说有病，背后说有精神病。

谢副总理：金大夫你们，有什么意见？

金××：坚决照办。

王××：我坚决拥护谢副总理的指示，我们当时有许多工作作的不够仔细，有缺点，但大方向正确，目前形势大好。

戚本禹同志：他这样检讨，态度是好的。

王××：（读一段井冈山小报上刊登的最高指示，汇报了清华大联合情况）

谢副总理：要大联合。

戚本禹同志：“四一四思潮必胜”应彻底批判，你们团派也有缺点，要认清是非，要大联合。

王××：目前阶级斗争很复杂。

谢副总理：昨天还打架。

（王××汇报了清华××问题）

戚本禹同志：李××要搞清楚，你们要建立一个专案组，协助公安机关搞。

王××：两派冲击利害，容易被坏人利用。

医大：××还作报告。

戚本禹同志：以前大串联可以嘛！既往不咎，分清是非。

谢副总理：以前大串联是对的（医大：是对的）现在最高指示你们登的很多，有真的也有假的。

众：笑。

戚本禹同志：（把小报接过去）意思对，但我没有听过。

曹××：我们坚决执行谢副总理指示，回去传达！中央作出的正确结论我们坚决拥护！有关材料应上报，全市斗争形势复杂，应提高警惕。十六号全北京市贴出很多大字报……。

戚本禹同志：听说有的大字报陈里宁名字打×刘少奇却没打……。

金××：学部的大字报有。

戚本禹同志：问付××来了没有？有没有？

付××：我不了解。

谢副总理：千万不要再为这件事搞分歧，争论了。

医大：“狂人日记”各地都翻印，印的很多，要求让他们都收回来。

戚本禹同志：让他们自己发表声明，给他们主动权。

甄××：我们坚决按首长指示办事，发表声明。

戚本禹同志：我们不是首长，谢副总理是首长。

孙××：戚本禹同志您在为陈里宁平反的时候，提到王福显，这人有病，现在住院……。

戚本禹：这事我们不了解。

医大：提到××专案组问题。

戚本禹同志：不要搞了，以后单独找你们谈。今天的会就这样结束吧！

（全体起立，以热烈掌声欢送首长）

红卫医院红旗战斗队记录整理一九六七年十月廿一日凌晨

（记录稿未经首长审阅，有错误由整理者负责） 请张贴，请转抄。

叁、研究资料

《精神病？政治犯？》（陶德坚·）

（陶德坚：原清华大学教员，文革中任群众组织领袖，后移居加拿大。本文摘自她的遗作《风雨人生》，原载“五柳村”网站。）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外语教研组的红教工成员简秀文、刘韵琪向我介绍他们教研组的一位名叫方天心的党员教师，文革前曾因反对清华党委及陆定一而被送进安定医院（精神病医院），出院后又回到教研组担任教学工作。文革开始，据说刘冰曾经下令必需把学校中的危险人物都安置出去，于是他又被送进了安定医院。当时中苏交恶，中国报刊时有介绍苏联将一些政治上的反对派送进精神病院加以迫害的报道。她们怀疑这是否与苏联的“疯人院”有些类似，认为红教工作为教工的组织，应该过问此事。于是，我约了朱起鸣在第二天早上同往安定医院，朱是共产党员、工程化学系的青年教师。我在病人接待室里见到了方天心，只见他呆若木鸡，脸上毫无表情；我和他握手时，有意将一枚毛泽东像章放在他的手中，并告诉他现在全校都开展文化大革命了，他仍然毫无反应，无从谈起，我只好告别。出来见到朱起鸣正和安定医院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王某、梁某还有金弘敏大夫谈得很投机，说他们正谈到金大夫的一个名叫陈里宁的病人，本是公安部

关押的犯人，过去曾送来住院多次，文化大革命开始，又给送来了。金大夫介绍说，陈是湘潭市委机关的一般干部，前几年因不断向中共中央写信，批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用封建主义的一套道德标准来毒害共产党员，他还反对大肆修建刘少奇在家乡的故居花明楼；认为王光美随刘出访印尼时的打扮有失国体……，后来就被秘密逮捕了，在湘潭的老母从此不知儿子的下落。金还说从她和陈的接触看，陈的精神平时是很正常的，只是在作精神病的治疗，施用大量药物后，才出现暂时的精神错乱。我想，仅仅是用信件向中央反应对某一领导人的意见，这完全是一个党员也是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竟然就被秘密逮捕，家人至今不知其下落；如果定为犯罪，为何又送到精神病院？如果真是精神病人，就不能定罪，为何又由公安部作为犯人对待？总之，这里面横竖有问题。我问金大夫，医院里还有没有类似陈里宁的病人？她说院方管理很严格，每个医生只能管自己的病人，不许了解别的医生的病人的情况，所以她无法回答。

和朱起鸣回到清华，召开了红教工核心组会，我介绍情况后说，我们首先要拿到陈里宁的病历，查清他是否真是受迫害，如果是，就从此打开缺口，查清安定医院是否真是苏联式的迫害政治犯的“疯人院”，我们应当把受迫害的人都救出来。这时大家都很激动，一些不是核心组的红教工成员也闻讯跑来，纷纷表示应该把这个问题查下去。朱起鸣提出，精神病人的病历，院方是作为机密材料保存的，一般不给外人看，看来得给院方施加压力才行。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去安定医院“造反”，即靠人多势众，强迫院方，交出陈里宁的病历。但当时在场的红教工成员谁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大家说看来还得有学生一起干。这时清华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已垮台，由蒯大富领头组织的井冈山红卫兵已从少数发展成多数，并与校内其他群众组织联合，扩建为不问出身，教职工也可参加的井冈山兵团，为在清华大学成立革命委员会作准备，红教工早就与井冈山红卫兵相互支持，许多红教工成员也参加了井冈山兵团，所以我们首先就想到找井冈山兵团的学生参加，便由林贤光把我带去和学生见面。林这时在兵团总部动态组工作，那是专门收集文化大革命各种消息的地方，他和许多学生都很熟悉，所以很快找到了他们的负责人，在我们介绍情况后，他们马上就集合起四、五十人，加上红教工有二、三十人，大家都骑上自行车，立即出发，到达安定医院后，大家齐呼口号，要求医院负责人把陈里宁的病历交出来，但院方拒不交出，大家就聚在医院里，学生

们特别有精神，不断的喊口号，还将大标语贴在医院的墙上。如此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突然，金弘敏医生出来说话了，她说，陈里宁的病历就在我手里，我交出来。金医生明知交出这病历得担负多大的政治责任，但是，她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既然已拿到了病历，大队人马就撤离了，朱起鸣表示他有兴趣干这件事，于是就委派他留守安定医院。我立即写了一份向中央文革的紧急汇报材料，报告在安定医院发现陈里宁的情况，由安定医院王某开摩托车和我一起即将破晓时将这份材料递交中央文革接待站。

第二天我再去安定医院时，朱起鸣向我介绍了他看陈里宁病历所作的归纳，因为这病历很厚，要看一遍的确是很费时间的。原来陈里宁被秘密逮捕到北京之前，就曾多次在湖南被捕过，被捕后老母都不知其下落。在对他进行一种是否精神病的鉴定时，要施以大量的药物，造成精神亢奋，错乱等等，最后才经公安部谢富治部长的亲笔签批（朱起鸣将批件给我看了），将陈里宁秘密逮捕到北京公安部十三局，陈在关押期间，时而表现得很清醒，时而又吃草根，甚至粪便，于是才多次送到安定医院来治疗。

又一天，朱起鸣告诉我他已见过陈里宁了，陈很清醒，他说自己吃草根粪便都是装出来的，他争取到安定医院来了解到许多文革的情况，他相信总会有一天有人会把他的解救出去的。

大约过了三、四天，中央文革派联络员王广宇到安定医院来，他对我们说：关锋、王力都知道这事了，他们原来不知道精神病院这种角落还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你们是立了大功了。我们向他汇报说：现在的关键是要拿到陈里宁的档案，下一步工作才好开展。他叫我们要耐心，要等待。

这样又等了好多天，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了，我和朱起鸣忍不住又去问王广宇，他说：他已经去十三局看过陈的档案了，但未能调出来，你们要看只好由你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了。

当时进驻安定医院的，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地质学院“东方红”及北京医学院“八一八”，当即我们三单位和安定医院的群众组织一起开了联席会议，会上介绍了王广宇的意见，大家都赞成到十三局办公的地方去，迫使他们交出陈里宁的档案，并为陈里宁平反。但十三局到底在什么地方，办公区和监狱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更是首先要弄清，弄不好跑到监狱里去就糟了。北医“八一八”的学生

和陈里宁已混得很熟，他们立刻去找陈里宁，不一会儿，他们就拿了陈里宁画的图来了。原来，十三局办公区和监狱是前后院，中间有围墙隔开，围墙开了一个门。陈里宁说他每次到安定医院来坐在汽车上，眼睛都是蒙着的，所以不知道十三局在什么地方。安定医院的人说他们只知道十三局是在秦城，但没去过。有了陈里宁提供的情况，虽然还不清楚十三局具体在什么地方，但是，对于去十三局的事我们心中都踏实了，我们只要不进后院的门就行了。于是，会议作出决议：这次行动由我任总指挥；各单位负责组织自己的队伍，于今晚 12 时整到十三局外集合，出发前对本单位的战士进行教育，绝不允许进后院监狱的院门；十三局的具体地点由红教工负责打探清楚在晚十点以前通知有关单位。

我和朱起鸣等赶回红教工总部，已经是傍晚时分，不少红教工闻讯赶来，当时正在召开紧急核心会，研究去十三局的行动，大家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核心组成员了，群情激奋，七嘴八舌地纷纷发表意见，对于这次行动均无异议无需讨论，关键是怎样能快速得到十三局的准确地址。张昌龄教授说，他时常到秦城那边山上打野鸭子，看到山脚下有一组建筑类似陈里宁画的图，当地老百姓说是圈人的地方，大家都认为那恐怕就是十三局了。于是当即派张先生和来晋炎骑摩托车前去打探

在核心组会上，对这次去十三局作了周密的部署：由我和侯虞铿带领红教工第一梯队 40 人；张家廉和林贤光作为留守，必要时张作为第二梯队负责人支援第一梯队；林贤光负责组织第一、第二梯队的井冈山兵团的学生队伍；朱起鸣留守安定医院与王广宇保持联系，并在我们出发后及时向王广宇报告我们的行踪，必要时争取中央文革具体的支持（我们去十三局的行动计划王广宇已认可）。

我抽空回家与世龙告别，我对世龙说这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我万一回不来，两个孩子就全靠你了。他不赞成我们去十三局，他认为这些事由学生做比较恰当。我觉得，从总体来看，我们也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但我们也不能退，这样太不仗义，而且这事从头到尾只有我们是最清楚的，我们对这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也不再说什么了。

大约晚八、九点钟，张先生和来晋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们按照张先生的记忆，在山脚下找到了十三局，十三局外有一大开阔地作为停车场，他们怕暴露

只在远远的路口上，看清十三局有卫兵守门，院后靠山的岗亭有荷枪卫兵把守。朱起鸣问清了去十三局的具体走法，就立即赶回安定医院去通知各单位了

林贤光陪我去井冈山兵团发动了约六十位同学参加第一梯队。晚十一时，红教工约四十人和这六十位同学一起分乘两辆轿车出发了。这次出发前赶印了大批造反守则及造反宣言，分发给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造反宣言为要求交出陈里宁档案及为陈里宁平反。造反守则为不许进监狱院门；不许私自动档案；不许动武器；不许向外泄露十三局的具体地址；这次行动不许向外宣传。

晚十二时正，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清华“红教工”及安定医院等五单位分乘五辆车均到达了十三局门外的停车场上，我们又把造反宣言及造反守则分发给其他单位。本来，我想把队伍集合在离十三局大门外一百米处，各单位派一负责人进十三局交涉，但是学生们笑我太胆小，根本不听指挥，一下子都涌到了十三局的门口，近三百人在大门前很有声势，我赶忙挤上前去让

各单位负责人先进去交涉，十三局的干部也表示愿意与我们的代表谈判，铁门刚打开一条缝，代表们还没有全进去，学生们已一涌而入。这时，探照灯把院内照得通明，半山上的机枪正俯视着我们。我怕学生们冲过界限，赶忙请安定医院的工人师傅组成十人的人墙，紧紧把住通向监狱的门院以防止我们的人误入监狱。我们在院内寻找档案室，准备贴上封条，以免陈里宁的档案被转移。但所有的办公室都已黑灯锁门，在外面也看不清那间是档案室。这时，侯虞铿告诉我已分别与张家廉、朱起鸣通了电话，朱起鸣说王光宇他们正关注着我们的行动。又过了一会，总机房通知我周恩来总理要我接电话，我赶紧对周总理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守纪律的，我们已派人守住通向监狱的门，我们的战士绝对不会到监狱里去的，请您放心。我们来十三局的目的是要求十三局交出陈里宁的档案，为陈里宁平反。”周总理说：“我知道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革命的，你们守纪律，很好，我支持你们，你们先撤出来，明天上午，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说：“这里的运动冷冷清清，我们准备向工作人员及家属作宣传，我们可以先撤到家属区，做完宣传后再撤出吗？”周总理说：“好的，我答应你们，你们明天早上撤出，然后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他又对十三局的负责人交代要好好接待我们。我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向各单位负责人

传达后，地院“东方红”贾继承说，既然周总理叫撤，我们就撤了吧，别做宣传了。因为十三局的负责人已去组织参加座谈的人了，于是决定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安定医院三个组织的人先撤，其余的人留下作完宣传再撤。大约在凌晨三点，我们全部撤离了十三局。

第二天上午，去十三局的各单位负责人及朱起鸣到了公安部，当时，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在入门时，警卫要参加接见的人进行登记，包括姓名、出身、本人成份、工作单位、及住址。红教工的几个负责人出身都不是所谓红五类，这时，我确曾闪过一个念头，谢富治会抓住我们出身当辫子的，但是，事已至此，只有勇往直前了。不久，谢富治就出来了，他说：总理让我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介绍了陈里宁被秘密逮捕的原因及经过，我说：“在陈里宁的病历中我看到，秘密逮捕陈里宁的命令是您签署的。”谢说：“是吗？我不记得了，如果当时你处在我的位置上，我想你也会这样做的。”我只是摇了摇头，表示并不会如他所说，但并不想在此时与他争论，我说：“现在，我们希望您让十三局将陈里宁的档案交给我们；为陈里宁平反；释放陈里宁。”会上还有人提出要在十三局成立联络站，继续清查类似陈里宁的人，谢说：“联络站就不要搞了，陈里宁的档案可以交给你们，其他的事等你们看了档案后再说吧。”谢在这次接见中，还一再表示，他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就这样结束了。

一月十日凌晨，朱起鸣到我家叫醒我。告诉我陈里宁的档案已拿来了，是十三局的李子明处长陪着他一起送来的，李等在外面的车上。我要他先把它留下，等天一亮就去找红教工的人来摘抄，争取中午前抄完，然后送井冈山总部保管，并通知参加这一行动的各单位一起来审查。

朱起鸣告诉我，李子明很支持我们的行动；十三局的负责人还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就是在这次会上被开除的），他们就想到给陈里宁平反了。而在陈里宁这件事上，李子明告诉他，当初上面怀疑陈有后台，查后台比对陈里宁本身还更着力，有关的查对材料用了两个房间才装下。

这天一大早，我就把陈里宁的档案带到红教工总部，找了近二十人来分头摘录，过了一会儿，马春浦发现档案袋中有一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每一本封面上毛的名字都被涂改了，在当时，这是可以定为反革命行为的。马急忙来找我去看，只见这毛泽东三个字都被用墨笔涂掉，并在旁边写上陈剑鸣三个字，还注有

日期；翻开封面，里面的文字也有不少被涂改过，多是改为与原文相反的意思，但零乱无序，看不出他的用意。从所注明的日期来看，集中在两三天内，正是他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鉴定的那几天。看来是这时由于他被施用药物，出现了短暂的精神错乱，所以作出这些不可理解的涂改。但此事关系重大，我们不能自作主张，只能如实上报中央文革由他们处理。为了摘录能继续进行，我告诉马春浦，这应是陈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发生的事，你先将这些书捆起来，由我来处理，现在不必告诉大家，摘录工作照常进行，到中午就结束了。同时，我立即打电话给朱起鸣，告诉他发现了这捆书的事，朱立即向王广宇作了汇报。当天王就派人来把陈里宁的全部档案取走了。我们摘录的材料也暂时封存起来，准备等待上面审查有了结论，再拿出去。

后来朱起鸣告诉我，这捆书的事，在十三局的第一第二次和第三次审问记录中都有记载，逮捕他的人原不知此事，是陈里宁自己讲出来的，他不承认给中央写信反映自己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有罪，但说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检查时，服用药物后，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把毛主席的书涂改了，要说有罪，这倒可以算上。审讯员问他这些书在那里？陈答，我把它捆成一捆，放在家里。十三局立即派人去陈的家中搜出了这捆书；他们看后也认为这是精神病发作时所为，所以没有当作什么罪证，以后审问也没再谈到这件事。

中央文革把陈的档案取走后不到一个月，朱起鸣就告诉我上面已下来通知，和十三局原来的看法相同，即这是陈在精神错乱时所为，不是他的问题，这个人可以宣传。朱还说这是戚本禹看了陈的档案后讲的。这下我们和其他几个群众组织都向社会公开这件事了。由于陈里宁的档案交给中央文革后别人再也见不到了，而我们手头有一份摘录，红教工的成员曾昭奋据此编了一本《狂人日记》，有陈的日记摘抄，也有这一案件的发生与揭露的经过。我们自己找印刷厂一次印了五千份，没有几天就卖光了，但我们也未再重印，因为全国各地翻印的版本到处都在卖了，而且还在许多城市被摘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显著的位置。大概不仅因为陈里宁受迫害的遭遇使人同情，他的日记中有许多发自肺腑的语言更增强了对人们的感染力，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中央文革下通知后没几天，就把陈里宁接走了，是谢富治亲笔签发的无罪释放证明。我们设在安定医院的联络站也随即撤消，在当时以为这件事就此圆满结

束了。陈里宁出去后，我们除请他来清华作了一次报告外，和他也没有其他来往，这时他在社会上成了知名的人物，许多地方请他去作报告，都为他的经历大为感动和激动，一些人还掉下了眼泪；来清华讲演时也是如此，大礼堂坐不下，把广播扬声器拉到室外，外面草地上也坐满了人，这是红教工成立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天津市还上演了根据陈里宁事件编写的现代剧，剧名叫做“新时代的狂人”，新成立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天津日报为这轴戏的演出发了社论，备加赞扬。在社会上，有些群众组织自命为“狂派”。

是不是还有类似陈里宁的案件存在呢？我们无力再去查访了，但在安定医院，后来确又放出来一个王景瑞，是北京市的职工，以后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他还当上了委员。

《“陈里宁事件”始末》（王广宇）

（王广宇：1966年6月由马列主义研究院调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曾任办事组负责人。1967年9月回原单位。1968年3月遭逮捕关押，蒙受七年牢狱之灾。1979年得以平反。）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陈里宁反革命案”已经过去了三十七年。为了澄清这件已被忘却了的事件，我作为当事人愿把这个案件的原委说出来，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资料。

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我的叙述不得不涉及许多当事人的名字，这样会再刺激许多被卷入这个案件的同志早已愈合了的心灵伤疤，这决不是我的本意，希望得到这些同志的谅解。当时多少荒唐事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意志使然，许多同志也因之而罹祸殃的。

一、“反革命要犯”到“反刘少奇英雄”

陈里宁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他就给中央写信、撰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后来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并作为反革命要案从湖南移送公安部继续审查，再后来被关进北

京秦城监狱。大约在 1965 年，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把他从监狱转到北京安定门外的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文革初改名为红卫医院）治疗。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高等学校的红卫兵，不满足于在本校造反，杀向社会。

他们了解到当时苏联克格勃迫害政治犯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把“不同政见者”打成“精神病人”，关在精神病院加以迫害。受到这个启发，这群红卫兵就到精神病院查找这类病历，并以此为理由去造政法部门的反。

大约在 1966 年底，驻扎在红卫医院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和红卫医院的造反派清查出六十年代以后，几个政治犯被当作精神病人受迫害的病历，加以渲染，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1967 年初，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到红卫医院找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医院的造反派开座谈会，了解精神病院把政治犯当成精神病人强迫治疗的情况。

第二天，戚本禹向我介绍了座谈会的简要情况。戚本禹说他们在精神病院发现了一个因为写信、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而被公安部门抓起来关在精神病院的人，这个人叫陈里宁。据陈里宁的主治医生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因为反对刘少奇而遭到关押迫害。他们见到的陈里宁神志很清楚，谈话也很有条理，根本不像精神病人。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据清华大学红卫兵说，陈里宁的文笔不错，能写文章。我想把他接出来，找个安静的地方，叫他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这种人可以现身说法，批判一定很有力度。不过，陈里宁被关在监狱好几年，又在精神病院受折磨，身体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出院？出来后能不能写文章？这些由你同造反派和主治医生商量。

1967 年 1 月初（我记不得具体时间，是我被囚禁后中央专案组的人告诉我的），我第一次去红卫医院，向金弘敏（陈的主治医生，是她最早发现陈里宁“没有精神病”的）、王志（护士）传达了戚本禹的意图。金弘敏等人表示，陈里宁没有精神病，但由于长期大量用药，对这些药物有了依赖性，不过出院没有问题。

我把商量的结果向戚本禹作了汇报。戚本禹让我考虑找一个适合的单位接收陈里宁。我最先考虑的是我的原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戚本禹同意了，后来又变

了卦，要改到人民日报社，他说已经同唐平铸（文革开始后接管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说好了。

人民日报那边安排停当，我同金弘敏、王志联系好，便去红卫医院接陈里宁。那天在红卫医院一个小会议室召集了有一、二十人的会，除陈里宁外，以金弘敏、王志为首的部分医院造反派和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也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把接陈里宁出院写文章的意思说了说，然后又把戚本禹送的棉衣、我送的旧绒裤交给陈里宁，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陈里宁还没反应过来，金弘敏对陈里宁说，还不快说感谢毛主席，谢谢戚本禹和王力同志，陈里宁跟着说“毛主席万岁”、“谢谢戚本禹同志”。我又把戚本禹给金弘敏和王志的红卫兵袖章当场交给了他俩，与会者都流露出羡慕的眼光。全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问了陈里宁几个问题，陈里宁都一一作答。就我当时观察陈里宁的印象，他的眼光呆滞，反应迟钝，有点恐惧，但回答问题时神志还清醒。会后金弘敏把朱起鸣介绍给我，说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清华大学红卫兵驻红卫医院的负责人，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商量。

我把陈里宁送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即向戚本禹汇报。戚本禹问我，你看陈里宁像精神病吗？我回答说：我看不出有精神病，不过他有些迟钝，眼神呆滞，可能是长期受迫害留下的后遗症。

二、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几天以后，戚本禹告诉我，有人反映，陈里宁除了批刘少奇以外，还有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你去把他档案调来看看，若有批判毛主席的问题就不能用他了。我向公安部调陈里宁的档案，公安部告诉我，陈里宁的档案早就被清华大学学生抢走。于是，我就给朱起鸣打电话，他说档案在他手里。我问他档案中是不是有批判毛主席著作的材料，朱起鸣告诉我，只是在毛主席著作中有些批改，看不出有反毛泽东思想问题。我派人把陈里宁的档案取来，给戚本禹送去，他说没时间看，让我看后向他汇报。

我的工作很忙，没时间看这些东西，拖了十来天，朱起鸣催要陈里宁的档案，我才大致翻了翻。总的印象是，他批判刘少奇的著作观点明显，特别是他的日记，反对刘少奇是很明确的。然而他批改的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则很混乱，他把作者的名字如“恩格斯”或“毛泽东”改成“陈里宁”，把“辩证唯物主

义”改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或改动一些连接词，大多是用同义语替代原著中的词汇，就变成他的著作了。他还在著作的扉页空白处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等口号。

我看完后向戚本禹汇报，说陈里宁批改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很混乱，不正常，但看不出有反动的观点。公安部并没有把涂改毛主席著作等当成他的罪证（不过在文革中，即使是对毛的著作涂改一个字也是一种罪过）。戚本禹说，陈里宁是不是真的有点精神病？不然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你再去找金弘敏他们问问，研究一下他为什么在批判刘少奇的同时也批改毛主席著作。

我去问金弘敏、王志，他们看了档案之后，认为从陈里宁涂改的毛主席著作情况看，没有明显的反毛泽东思想，但也不像正常人干的事。他们说在医学上有一种叫“间歇性精神病”，即患者清醒时像好人一样，而发病时就处于颠狂、无意识状态，涂改毛主席著作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我认为这种解释有道理，金弘敏提议去问陈里宁，陈紧张地说，我都记不得了，好像有一次给我吃一种药，脑子产生幻想，稀里糊涂地就把毛主席的书乱画了，真的不是反对毛主席。我向戚本禹转述了金弘敏等人的解释。戚本禹也感觉到陈里宁是“有点精神病”，但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多么严重。

就在陈里宁出院的几天内，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做了两件事：

一是出版了一本署名“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的宣传陈里宁的小册子，名曰《新时代的狂人日记》，从陈里宁档案中摘编了他在六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日记和文章，吹捧他是反对刘少奇的先知先觉的英雄。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散发，陈里宁由此成为新闻人物。朱起鸣一次就送给我一、二十本。我认为，为陈里宁翻案绝不会是王力、戚本禹两人的个人行为，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所以发给了小组成员每人一本。但他们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什么议论和反应。

第二件事是，清华大学驻红卫医院的红卫兵在朱起鸣的带领下，冲进公安部，要求为陈里宁作“平反决定”，并开“释放证”。

应当说明，这两件事中央文革是支持的，至少是不反对。朱起鸣从公安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公安部推卸罪责，耍花招，认为必须把平反和释放作为一个问题由公安部来解决。他说不达目的绝不撤出公安部。

朱起鸣的电话刚打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也给中央文革打来电话，一再解释公安部给陈里宁开释放证没问题，但作平反决定还需要研究。接朱起鸣电话时，王力正好到值班室，我顺便汇报了一下朱起鸣的电话内容。王力说，当然应该由公安部作出平反决定，我们中央文革不能作这种决定。我把王力的意思转达给李震。后来到底怎么开的释放证我记不太清了。

陈里宁住进人民日报招待所后开始写批刘的文章。他的文章写得比较长，文笔还算可以，但内容不符合戚本禹的要求。戚本禹先后让闫长贵、陶文鹏、程里嘉等人修改，最后也没修改成。戚本禹利用陈里宁写批判刘少奇文章的计划未能实现。

三、恢复党籍，安排工作

陈里宁的文章交稿后，住在人民日报招待所也不是长久之计。既然放出来了，总得给找个落脚的地方。戚本禹经过了一番思考，决定把陈里宁放到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交给历史所造反派负责人傅崇兰，算正式调入历史所，恢复他的工资级别和党籍。

四、陈里宁到社会上讲演，引发了争论

戚本禹对我讲过，先把陈里宁放在历史所，等他适应了外界环境后，愿意回湖南原单位就让他回去。戚本禹对陈里宁的要求是，参加所内的文化革命运动，可以继续写批判文章，但尽量不要到社会上活动，少同外界的造反派接触，更不要支援一派，打击一派。这些意思我当着傅崇兰的面对陈里宁都讲过，并嘱咐傅崇兰掌握好陈里宁的活动。话虽这么说，但陈里宁已经成了社会上的“名人”，北京的高校和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请陈里宁去作报告，社会上还散发了一些陈里宁讲话的传单。哪派请到陈里宁就表明他是站在哪派一边，这样就引发了对立派的反感。关于为陈里宁平反问题，红卫医院的内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反对派认为陈里宁确有精神病，金弘敏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是政治需要。这个情况我并不了解，是戚本禹后来告诉我的。在京医务界的各派组织中围绕着同不同意为陈里宁平反，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尽管陈里宁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支持，但反对陈里宁的一派也在加紧活动，他们抓住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这个要害做文章，说陈里宁也反对毛主席。因为都知道是王力、戚本禹给陈里宁平的反，不少人以给戚本禹写信等方式表达对陈里宁的看法。对于有关反映，戚本禹是了解

一些的，而我作为做具体工作的人，了解的情况不多，认为给陈里宁平反是中央文革首肯的。

陈里宁到历史所后，我去看过他几次，戚本禹还叫我找傅崇兰、陈里宁，专门谈不要陈里宁到社会上活动和作报告。我劝陈里宁尽量少出去作报告，陈里宁表示同意。但傅崇兰解释说，几乎每天都有来请的，我们一般都谢绝，但有的知名的高校造反派，如北大的聂元梓来请，我们就很难回绝。傅崇兰表示尽量严格控制陈里宁外出作报告。

1967年的5、6月，清华大学井冈山支持的天津市话剧团来北京演出颂扬陈里宁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朱起鸣和天津市话剧团造反派负责人不断给我打电话，请我去看演出。我告诉了戚本禹，他说，他不去看。我当然也不能去看，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没有小组成员的指令是不能擅自参加社会活动的，这是江青亲自规定的纪律。这时我已经影影绰绰地感觉到陈里宁问题有麻烦。

在此以前，傅崇兰、陈里宁和我见面时，曾提到有人想以陈里宁的事迹为背景编写一部话剧，想叫陈里宁给编者讲讲，以便塑造他这位反刘少奇的“英雄”形象。我表示可以向编者提供些素材。后来中央专案组审查我的问题时，把这件事也当成我的罪行之一。

戚本禹大概掌握一些反陈里宁的材料。有一次他有点不耐烦地对我说，陈里宁还是到处活动作报告，他住在北京安静不了，别人找他，他就出场，也是一个好表现自己的人。想办法让他离开北京躲一躲。当时正赶上中央文革要了解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筹划记者站，借这个机会把陈里宁派到农村搞调查，可以防止他在北京继续被利用，找麻烦。

五、派陈里宁下乡去调查

我和傅崇兰一起向陈里宁传达戚本禹的“指示”。陈里宁听后稍微犹豫了一下，表示愿意接受。按照戚本禹的交待，我嘱咐陈下乡后，不能用陈里宁的名字，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各种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以调查组记者的身份出现，可以写调查报告，直接寄给我。陈里宁对我的谈话作了笔记，表示遵守这些规定。我还一再强调千万不能暴露真实身份。

陈里宁下乡出发的时间大约是1967年6、7月。

本来，让陈里宁下乡的初衷是让他出去躲一躲。可是陈里宁却非常认真地把下乡调查看作中央文革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下乡没有几天就急于写报告，而且每次寄来的报告最少一两万字，大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给我寄来十几次调查报告。

1967年7月末或8月初，傅崇兰打电话告诉我：陈里宁在保定乡下暴露了身份，各派组织纷纷请他去作报告，碍于东道主的情面，他出去作了几次。傅崇兰请示该怎么办。

这次戚本禹真的恼火了，他气愤地说：这个陈里宁，我们把他弄出来，现在却成了一个包袱了，看来他真是有精神病，又好出风头，乡下呆不下去了只好叫他回北京吧！

傅崇兰告诉我，陈里宁回北京后，心情沉重，觉得犯了大错误。我去历史所和傅崇兰一起同陈里宁谈了话。我批评他暴露了身份，他解释说，他一直用着在监狱里用的写有“陈里宁”名字的毛巾，不知怎么被人发现，就在保定地区传开了。我告诉他回来后一定闭门谢客，谁都不要见。陈里宁当面提出想回湖南老家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我同陈里宁谈话前，戚本禹曾对我说，陈里宁回湖南的想法不现实，那里现在乱得很，他回去又得卷进派仗里去。我把戚本禹的这个意思告诉了陈里宁。陈里宁表示犯了错误，对不起戚本禹同志对他的爱护。

陈里宁回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反陈派看准这个时机，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大肆宣传陈里宁有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以此来抨击为陈里宁翻案的这一派。陈里宁已经成为两派斗争的筹码。一派猛打，一派死保。这种形势，戚本禹是知道的。

六、策划陈里宁疗养

戚本禹同我商量，陈里宁呆在历史研究所，北京两派都知道，最好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躲躲，他在北京会激化两派的矛盾。戚本禹想了想说，陈里宁最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给他找一个郊区的疗养院去疗养一段。随后他又说，陈里宁给我找了多少麻烦，真没办法！王力也不管，你去找王力把陈里宁的情况跟他讲讲，问他怎么办。我向王力汇报后，王力说，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陈里宁去疗养。

经过比较，最后选定了离昌平不远的亚洲学生疗养院，时间大约是1967年的8月初。然而没想到陈里宁坚决不去疗养，并要求马上回湖南。戚本禹也没

辙了。他叫我给傅崇兰打招呼，注意看好陈里宁，不让他出去，并注意防范某些造反派去揪他。就这样，陈里宁不去疗养，也不让他回湖南。

七、散发关于陈里宁问题的传单

又拖了几天，戚本禹可能得到了什么信息，他感觉招架不住了，不得不设法平息两派为陈里宁问题发生的争吵。有一天晚上，戚本禹找我说：你用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给傅崇兰打电话，叫他向社会上散发一个电话记录的传单。我起草的电话记录遵循了戚本禹指示的基本调子，考虑到为陈里宁翻案这一派的不利处境，把基调弄得更平和些，大致是这样的内容：“现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因为陈里宁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陈里宁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一派则认为陈里宁不是坚定的左派，他有篡改毛主席著作的错误。两派组织因陈里宁问题进行争论，很不利于毛主席号召的革命大联合。希望各派组织不要为陈里宁问题再争论了，陈里宁的问题由我们来处理”，署名中央文革办事组。这个电话稿经戚本禹同意后寄给了傅崇兰。傅崇兰收到以后，又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修改了几处，基本倾向是不要因传单而对保陈这一派产生不利影响。最后散发到社会上的传单是什么样我就再没见过，散发传单的时间是1967年8月下旬。不久王力、关锋被打倒，反陈派加紧了对保陈派的攻击。而我也在这时离开了中央文革办事组，回到原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很快就失去了人身自由。陈里宁的问题，戚本禹后来怎么处理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出狱后听说，散发传单后，对保陈派很不利，反陈派猛烈进攻，要揪斗陈里宁。戚本禹只好派王道明（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去历史所，宣布对陈里宁重新收监。

2001年，陈里宁的妹妹陈里如来北京找我了解情况，我大致把过程给她介绍了一下。原来，“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给我定案的第一大罪状就是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翻案活动。专案组说，陈里宁是“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其实，在1967年，刘少奇问题已在社会上公开，并定为“修正主义”、“走资派”，为陈里宁翻案，在当时并不是什么错误和罪行。因此中央专案组就把陈里宁定为真反毛主席，假反刘少奇。陈里如同志告诉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安部对陈里宁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最后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改正原来的错误结

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和原工资待遇。陈里如还告诉我，陈里宁现在病得很重，正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疗和休养。

陈里宁案件，反复折腾了十多年，的确有很多教训值得反思。

（原载《往事》）

2008 年 5 月 25 日初稿

2011 年 10 月 4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6）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六节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批判江西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江西和新疆革命师生代表时的讲话……（对新疆的同学说）等不及了，先解决江西的。你们放假闹革命，还早嘛，你们的问题，自己回去解决。只要你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只要你们做得对，就一定会解决。因为你们的矛头已指向江西省委，你们是十三个院校参加，问题要解决，要检查错误。各省、市委在北京开中央全会，江西省委是要很好地进行检查，革命是长期的，江西省委回去是要检查的，当面对你们回答。对江西我没有多过问，有些是新的，有的我知道了，你们不要担心，留一、两个人就可以。全国大学有七、八十万人，中学有一千四百万人，设联络站有困难，你们留一、两个人通通消息，不够，大学留一个，中学留一个，工人留一个。中央工作会议要宣布、传达。八月十八号接见，二十号就冲出去了。中学比你们早，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大学还没有红卫兵，一下子就传到全国各地。你们南昌少，你们的事情出在九月三日，比较迟，南下的同学去了，起了一个推动作用。当然主要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江西省市委确实没有精神准备，我看确实可能是符合实际的。开个大会，单传达就要不少天，一定要给地、县级干部传达，只要他们是革命的，就欢迎。你们还继续串联，斗批改。允许他们开会，向当地工农传达。当然开会允许他们把会开好，认识不一致就不好，帮助他们革命，要与人为善嘛！总不能一棍子打死嘛！你们要求他们承认错误，你们回去要有能耐，允许他们把会开好……。

你们红卫兵是清华附中先搞起来的，三张大字报说明造反有理。十八日主席接见，十九日就闯，中学生比大学生更会闯。他们说大学生是策略派，中学生是敢闯派。红卫兵一成立，就搞社会上的斗批改。

红卫兵，毛主席抓住了，革命串联，毛主席也抓住了。炮打司令部也是中学生搞出来的。打有好几种，看你怎样打。总有点怀疑，允许不允许？当然允许，是黑帮，总是要暴露。打错了没关系，只是打了两门空炮。就是放两门空炮也不要紧，但非要打成黑帮，就未免主观了。在问题没有了解以前，保了上级，保了工作组，错了要允许人家改。怀疑是对的，一般来说，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可以批判，可以怀疑，炮打是正确的，而扣帽子（指给革命同学）是错误的，但是要辩论。放两门空炮也不要紧，老革命可以冲冲他们的暮气，但一冲他们就怕，就乱了阵脚。

有些南下归来的红卫兵说：以前那些老革命，不怕枪林弹雨，却怕学生，真是不可理解。因此你们江西同学回去，第一建议你们要调查研究，可以进行调查，如果错了就承认。老革命、共产党员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青年人可以加点语言上的夸张是允许的。但你们要好好进行调查研究，核实材料，这样能发现一些更多的事情，也许能发现更多事实，这对你们是一个提高，将来你们面对面的辩论好，我们希望你们比我们更好。你们在这里学了很多，十月一日已经提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自己可以提高，而且可以提高省委。

串联会不会妨碍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会。但如果还坐火车，这样会停止生产。比如，你们江西出粮食，也要车运。一天要来十八万，十天一个国家就搬到北京来了。中央美术学院，长征式出去串联很好，火车到一定的时候要停止。你们和省委的一场辩论，总不会老搞，他们错了就要作检查。如果你们是真正革命，那么还要到社会上去，如到上饶。景德镇市委压制、打击学生，你们就去帮助，推动一下，就好象北京南下串联同学一样。你们会碰到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军队。性质不同，你们要参加他们的斗争，要和他们联系。你们都是放假革命。至于工厂、城镇居民各种企业单位，他们要抓革命、促生产，我们闹革命不能不搞科学试验。核试验，现在是导弹加弹头，两弹结合，有火箭。抓革命，促生产。因此他们不能停止生产，要一边革命，一边生产。他们串联的性质、范围、内容和学生不同，与学校不一样，我们还要研究一套办法，以后去搞。当然有的同学

已去搞了，我们不去干涉，有分工，不可能全国都去搞串联。我们设想，放假至少放到明年暑假，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你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得还不够，还要宣传，把毛泽东思想扎下根子。“老三篇”、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两论、十六条都要学习。解放军又在选编主席著作，打基本功。所以理论要和实践结合，徒步串联，能接触社会，主席的基本功就是社会调查研究、阶级分析。所以搞大串联不会妨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放假就是为了闹革命，为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如此害怕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害怕我们七亿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不怕他们，有了这精神原子弹，把你们的眼界提高了。不要老想着受到的压制，在北京停留一个月，你们是革命左派，不受压制怎么能成为革命左派呢？不然就是中间派或保守派了。你们要经得住锻炼，革命要千锤百炼，你们才锤了几下子。当然要允许老革命犯错误，就向你们学习，在这一点上，你们眼界要放宽些，要继续闹革命，不断前进。

红卫兵从八月初发起，已三个月了。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红卫兵有些组织要起分化，受到打击还怕，这就是左派。就青年来说，思想是分左、中、右的，在先进思想中，开始总是少数，中间状态是多数，坚持错误的也是少数。思想是分左、中、右，争取中间多数之后，孤立右派，革命还要继续深入，又要有一个少数。先进思想要争取中间，不断前进。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辩证法，发展了列宁的一元论，不是斯大林的多元论。阶级消灭了，到了共产主义还有先进与落后，新与旧之分。如果一致。铁板一块，那人就消亡了。

青年人的思想经常不定，有时与行动不一致，思想起伏变化很大。比如红卫兵，北航要求工作组回来批判的是坚定的左派，支持工作组的是保守派，还不能说是右派，否则，必然又是学生斗学生，“保”字号应不说，说保皇派就闹得更凶。哈尔滨的“八·八”团犯了保守思想，保工作组和省委，保错了。现在闹得更凶，搞国防科委，这就是过“左”，再过“左”，就是形“左”实右。现在不能把同学们的思想统得过死。所以说保守派更容易接受些。多数派同意我的意见，他们开门整风，北医有的红卫兵原来不承认错误，现在承认了，开门整风主动了，红卫兵开始是少数派，变成多数派，在同学中是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大

好形势。我们那时候只有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还谈不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由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左派，要团结中间派，分化保守派，打击右派。这里应指出，你们要前进，要不要变成中间派，就落后了。你们实行大民主是对的，是主席提倡的。但要有集中，专政的一面。你们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右派还会捣乱。因此这个问题应该谈谈。你们所得到的民主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作梦都没想到过，只有毛主席做到。也许你们青年人敏感，想到了。作梦想到了。但是这是现实，幻想变成现实。你们有四大自由，你们贴大字报的范围，连我也贴了几张，有错误就可以贴。“炮打司令部”不是大鸣吗？不管是不是修正主义，先打几炮，“飞鸣镝”。大放，放手发动群众，六大权利，出版、集会（万人大会）、结社（红卫兵）、游行示威、言论，宪法的六大权利，外加两条吃饭，坐车不要钱。不仅如此，还放假闹革命。我们那时改良主义被关，你们还放假闹革命，坐火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个不是在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哪里有如此幸福！

毛主席为了锻炼你们，在这个最大限度民主的基础上，要有集中和专政。三个界限，专政的工具武装部队要保护，送大字报要贴在里面，不要贴在大街上，影响不好。专政依靠武装，没有武装就没有一切。总参不革命，不是搞了罗瑞卿？不需要你们搞。解放军要保护你们，女十五中的红卫兵，八月廿五日被资本家老婆砍了几刀，解放军就赶来保护你们。我们提出解放军不准动气，不吵嘴，被打不还手，打伤不开枪。专政的第二个工具是法院、监狱。送大字报可以，但不能闹。第三、宣传工具应掌握在党的机关里。因为这是党和毛主席的喉舌，你们的意见，可以在你们的广播上搞。这三条是不能侵犯的。有人打到广播电台，那不行，我们要有统一的声音，要把革命的声音发出来。解放军打武仗，后面打文仗。在最大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最高集中下的民主，放手发动群众。政法学院打进法院，上了当。因为付院长是坏的，所以停职反省。

要档案材料，可以谈判商量，有个通知嘛，问题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是形“左”实右。你们犯了错误，我不责备你们。我告诉你们，景德镇可以串联，而且还可以大串联。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坚强后备军，设立机关应给一些经费，也应当给中间，保守派一点。真理不怕辩。要经过锻炼，才能做将来的红色接班人。

扣工资当然是错误，要解决这一问题。真正的半工半读应该放假。新党委，红卫兵根本不听他的。要看具体问题。

工人和学生相结合，本来学生闹革命，不要到工农中去，但是如果是志同道合，也不是绝对的。一般说，不合。（指工人和革命学生联合行动——整理者注）。南昌的情况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还是胆小，他不执行，叫他执行！（指叫领导执行军委指示——整理者注。）

（来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央负责同志讲话选集》（中央教育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编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大字报选 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报选编小组，1966.12）。）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汪东兴陶铸接见江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出席会议的有陶铸、汪东兴、王遂印等，刘瑞森，白栋材两人陪同。〕

陶铸：我们初次认识了，现在我们讲一讲这个会议怎么开法，让同志们先讲。看了一些材料，大的情况知道了，但具体情况还不如汪东兴同志知道得多。汪东兴同志是江西的，情况很熟悉。汪东兴同志开会去了。我和刘瑞森、白栋材谈过四、五次了，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四点钟总理召开一个会，要讲要点，一个钟头可以吗？

（代表们答：可以先汇报情况，后提要求，然后请陶铸作指示。汇报完了，代表们提出八点要求。略）

陶铸同志：请由刘瑞森、白栋材讲讲，中央决定了，还要他们去执行，开了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问题没有解决，你执行无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可以炮打，还是先让他们（指刘、白）回答你们的八条（代表提出的八条要求）。

白栋材：南昌的情况确实是严重的，这情况是发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比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发生的更严重，群众斗群众，大规模的打人是江西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这种（现象）形势不能让他继续发展下去，到中央以后，我和陶铸同志谈了几次，得到了些启示，怎么扭转这个形势，我们两个人（刘、白）商量了一下。头一条认真地、彻底地向群众公开作检讨。省委的第一次检讨，几个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方式也不好，没有和群众见面，在无线电广播中检讨的。为什么不能在八一广场开一个十五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检讨呢？

几个主要问题没有谈到，张永红的大字报只承认了印发的错误，张永红的大字报（问题没有提到张永红的大字报）本身对不对还是应表示态度；还有赵志坚的传单“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口号江西还没有得到解决。第二条：省委要明确表示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一起革命，首先革我们的命，坚决支持革命左派。

陶铸：以前表示过吗？（代表们答：没有，一直站在镇压学生的立场上）

陶铸：到现在还没有表示！？

白栋材：第三条，认真给在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进行平反，彻底改组各厂矿企业。平反小组，应以革命造反派受害者为主体，吸收少量的有关人员参加，如果靠原来的党委负责人和筹委会是不能彻底平反的。立即制止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学生，不能殴打工人、学生。第四条：不准多数压少数要保护少数。第五条：立即恢复生产……

陶铸：我现在先讲个人的意见作参考，你们没有带来录音吧？（代表答：没有！）…对江西省委的错误看法，这是个大问题。很多问题是从小省产生的，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条万条是江西省委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就不能解决，他们背道而驰。江西省委的情况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讲是一个最严重的省，错误也是最严重的一个省，各项没有排，反正是最严重的一个。（重复多次这句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全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由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以中央的名义公布出来，有刘、邓思想当然就执行了。全国执行的程度有不同，江西省当然张永红自己可以贴，适合他们（省委）的口号，就决然支持，宣传他（张）的大字报，原来还打算印300万份，由于他们两个（刘、白）反对，结果印了40万份用于镇压革命。赵志坚的“坚决和坏蛋作斗争”也印了48万份，（汪东兴插话：就是这封公开信）这个问题是由刘瑞森，白栋材反映的，他们的思想看来是比较通了。赵志坚人我不认识，他们不能怪赵志坚，底稿是省委起草，是要他来签名，强加名义，这种行为很恶劣，这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刘俊秀是要求“大辩论”的，结果组织了三次“大辩论”，而白栋材还是反对的，“九·七”调动工人保卫省委，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全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贯彻）刘邓思想中，江西是严重的，特别是不能容忍的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委”……

的口号，江西省委是一直反对的。白栋材开始是同意的，由于省委没有通过，白栋材一直没有喊；刘瑞森觉悟比较早，所以喊了。但是省委批评了他，你们不知内幕，我今天不是保白栋材。（接着陶铸站起来生气地说）既然是革命的口号，你为什么不喊呢？（并指着白说）说明你不坚决，这次我批评了，他喊了。杨尚奎同志回去了，主持两天的三级干部会，“炮打司令部”的口号都没通过，省委还拒绝这一革命口号。你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不可以轰？为什么不可以烧？烧了就是烧出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不革命的就要轰，就是革命的也有缺点，错误，把缺点错误轰了，烧了有什么不好呢？我看很好，没有什么不好。三级干部会议你们冲进宾馆，你们当然可以进去，他们（省委）可以向你们讲清楚，中央有指示，学生不要参加三级干部会，省委应该采取解释的方法，对你们说明：我们在讨论中如何作检讨的问题。但省委没有这样做，而是出“紧急通知”挑动群众斗学生。

关于“八一战斗兵团”，肯定是省委有组织，有领导搞出来的，究竟是谁，可能是谢象，（陶铸拍了下桌子）要追查！为什么早不组织晚不组织，一组织起来就打学生，打到现在，省委要负责任。他们（八一战斗兵团）打革命学生，这当然不是革命组织，他们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反革命组织，你们考虑，我们需要讲究策略，里面多数是好的，要革命的，里面有坏人，是否不是革命的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省委有很大的关系，是省委调工人保省委之后成立，工会主席是政委，赵志坚是司令员（总指挥）。这样一层一层的压制革命，省委要负主要责任。

从以上事实看来省委是有责任的，有些完全是省委挑动的。如张永红的大字报、通告完全是省委挑动的。省委的错误是严重的，江西的问题是严重的。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你们提出的改组江西省委，把官罢掉，这是一个办法，不能一下子解决的，工人赤卫队有十九万，干部抵触情绪还很大，现在是不是他们干，你们自己来选或者中央派人去。组织新的省委是不是能解决问题，江西省委是否到了改组的时候，不管他过去如何，还是看他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根据过去的情况是否还有点希望，是不是给他一个机会，可以再看一看。你们提出的改组，罢官是有理的，合理的，可以这样提，我可以反映给中央，这还要中央决定，你们提是有道理，省委改组罢官还要毛主席决定，林彪同志决定这是一个方法。还

有另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彻底革命，马上改。马上站起来和你们闹革命，痛改前非，革命不容易，我个人趋向于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自我革命，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如果他们还不革命，那就没办法，就改组，这次我向中央汇报，我对省委的批评很严肃，我认为江西省委的错误是严重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不能说不是自觉的，江西省委要负责任，我希望江西省委站起来，彻底革命。

第二个问题：

1. 他们两个回去，你们要帮助，一看二帮，一斗二批，彻底批判江西省委，到现在为止，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要求他们改正错误，回过来，还是欢迎的，回去省委马上开会检讨，脱裤子割尾巴。前一阶段杨尚奎不在，由刘俊秀代理书记作检讨，张永红的大字报，大辩论是他（刘俊秀）支持的。（白栋材插话：不能说杨尚奎没有责任）后一阶段由杨尚奎作检讨，他参加工作会议以后，他回去后应该支持革命派么，可是他不这样做。他要向全市作检讨，不是半导体，而是面对面，赶快把责任承担起来，支持革命派，彻底改正错误能扭转过来。方志纯，黄知真，白栋材各有各的账，要登门，面对面作检讨，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

2. 必须马上解开群众斗群众的局面，“八一战斗兵团”这个组织没有必要！坐在省委干什么？还给肉吃，你是工人就参加工人的组织，你是学生就参加学生的组织，为什么还要组织这样一个东西呢？省委不承担责任还行！省委应该站出来，我看不要搞，你们搞你们自己负责任。凶手要查，如果是民政厅长搞的，我看要罢官，不是下面而是上面，你们要抓头头，抓幕后指挥，严肃处理，向全市人民宣布，撤职，才能平民愤。工人马上要恢复生产，一方面闹革命，一方面促生产。学生可以到工厂去，省委如果支持你们，江西形势就可以改变，有利于发展革命队伍，有利于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利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派，有利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3. 平反要彻底搞，省委要负责。

4. （对十二大队）你们要在南昌搞革命，我个人赞成，当然革命要依靠本地，你们留多少要商量，全国各地都要留第三司令部的。

华东局到江西来检讨，华东局没有什么人，就是魏文伯和他的秘书，我今天是了解情况来谈话，不是不了解情况。

总理接见我可以反映，是否赞成，来还是都来（指两派观点）以你们为主，但我们不能象你们所提的那样河水不犯井水，总理是七亿人民的总理，你们可要做好工人赤卫队的工作，十万人啦，要研究策略，我们不是从个人意见出发，而是从策略出发，团结他们，也使他们受教育，讲话都是对你们有利，主要是支持你们的，让他们听一听有什么不好？让他们受教育，我放的都是大道理。

汪东兴同志的讲话：

差不多了，你们要求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接见，我们一定向总理反映。你们要毛主席接见，不可能，明年四月来！公安厅和文工团的同志到北京来，你们一起来（接见），你们赞成不赞成？（大家回答：赞成）（大声地说）我赞成！…

（代表提：现在打死人，公安厅不管，省委也不管。）打人应该管，如果真正发现他们打死人还不管，没人过问，这还了得？！公安厅，应该过问，省委也应该过问。打人要拘留，要改造。拿打人杀人的主犯开刀，对他们实行专政。不管什么人，什么出身，多大的干部高干子弟也好，都应该管。要不，革命派的人身安全无法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搞不彻底。现在北京开始实行了，今天北京召开了十万人的声讨大会…

关于你们提出的在南昌设立联络站的问题，不但你们江西提出了，上海、新疆、广东、沈阳等地都提出了，一个不留（首都红卫兵）可能不行，这个涉及全国，要由中央统一安排。

你们要吃透两头，一头是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头是吃透下面具体情况，才能搞好革命。不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誓不罢休，中央决心很大，毛主席决心很大，中央文革小组决心很大，同志们的决心也很大。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搞彻底让修正主义的根子留在工厂，继续留在机关，继续留在学校是不行的。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支持你们造反的。

你们担心（指白栋材、刘瑞森二人说）他们耍花招逃掉，这次逃不掉，中央责成他们作检讨，还是在房子里怕得要死，来一个学生，也不敢出来。现在看来有些单位确实不认真检讨错误。学生、工人、文艺工作者，有什么可怕呢？凡是违背主席指示和十六条的都是错误的就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江西来的电报，信件不少，到现在还没有停止打人。打人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同志们回去要多看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书，要到工厂去了解情况，工厂工人应该欢迎学生来登门拜访。

你们造反派还要团结那些反对过你们的人，那些人要教育、帮助，到运动后期达到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真正的坏人，修正主义分子，是少数，对这些人要把他打倒。中间派，保守派还是要革命的，要允许他们犯错误，也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是不是真革命，要看他们是不是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能讲少数是革命的，多数是不革命的。你们江西革命派学生就是多数，工厂就是少数嘛！多数和少数应该按照江青同志在 11 月 28 号在全国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去理解。就是要用阶级分析看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在谁的手里，应该是掌握十六条和党的政策。凡是违背十六条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就是不革命的。十六条说了，有些意见是两种思潮的反映，林总提出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前天有×××两派来找我，互相争论起来，多数派说少数派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少数派说多数派都是“保皇派”，我说双方这些说法都不对，经过我说服，后来他们双方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双方越谈越近，会后大家都说这个会开得好。

毛主席说，遇到问题首先一听听，看一看，想一想，这就是思索，我们不允许看了不思索，听了不去想。说错了就改，哪个人不会说错话呢？说错了就改嘛！要允许人家改，不要说人家都不革命，这就不对了。林彪同志说朝错夕改。你们南昌“八一”兵团的大多数是要革命的，中央要求你们团结他们。孤立一小撮坏蛋，把那些中间派、动摇派争取过来。

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是从江西老区根据地来的同志们、同学们，我们离开你们三十二年了。一九三四年离开你们的，现在又见到你们。我们想念着江西，想念着富有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的人民！（鼓掌，呼口号）

正是我们离开你们这么久，虽然我们到过江西南昌、庐山，但是很少有这个机会和南昌的、景德镇的、乐平的，以及其它地方的，以及杭州的，和这些同志见面。另外，借这个机会我想回忆一下，我们都应该回忆这个三十二年。如果讲到一九二七年南昌“八·一”起义和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算起的话，就快四十年了，仅仅差一年。

这四十年革命道路是难忘的，是曲折的，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正如毛主席说的，中国革命是一条曲折的道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从胜利，经过一些挫折，经过一些失败，又走向胜利；然后经过一些挫折，取得经验，又取得新的胜利！这样子经过武装斗争二十二年，取得全国的胜利，进入北京。如果没有毛主席和毛主席武装斗争的火炬，在井冈山高高举起第一根火炬，就没有今天。所以，我们感谢毛主席，也感谢江西人民！

（鼓掌，呼口号，众喊：总理请坐下。总理说：我喜欢站着讲，谢谢你们。）从我们四十年艰苦的日子，先经过了二十二年，后又十七年，共三十九个年头，差一年就四十年。我们回忆这个光荣的历史，在座的有的是四十年前出生的，也可能大多数是在这四十年当中出生的。不管是在四十年前或四十年当中出生的，我们都是江西劳动人民的血汗抚育大的。我们现在享受革命果实，我们应该饮水不忘本！我们想想，正好我们面对着毛主席这两句话，毛主席亲笔写的刻在江西厅上的，就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正好用这句话来勉励江西的同志、江西的同学、江西的工友。你们想想，你们要无愧于我们跟着毛主席，无愧于江西的劳动人民，无愧于江西的革命学生，无愧于江西的革命干部。你们都应该想想应该怎样无愧于这些。“八·一”南昌起义，人数开始很少，但是由于领导，其中我就是个，没有负到责任，在领导战争中犯了错误，没有能在江西站住脚，到广东去，到海口就失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下来，会师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井冈山，由毛主席高举这个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这四十年经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这段斗争中，毛主席总结了三个法宝：一个法宝，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领导我们革命，就是主席语录的第一段的第一句话；第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三，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有这三个法宝，

就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引向了胜利！所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总结了三条经验。我们相信，你们懂得领导革命，信任群众，信任党的道理。要有党的领导，当然，咱们是相信，尤其是毛主席领导的。

今天，你们把江西问题摆在党中央的面前，就是江西省委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究竟是谁引起的？这条错误路线是深还是浅，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多还是少，这当然要由你们决定。你们在江西，在南昌，了解情况，你们要检查他们的错误。他们自己要自我批评，然后由你们决定，得出恰当的结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激进的分子提出“炮轰江西省委，火烧江西省委！”（欢呼口号）我想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炮轰江西省委，火烧江西省委！”这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由于省委同志有思想问题，想不通，公开进行挑动。这样，我们的革命学生、革命的工友，觉得党委犯了错误，执行了错误路线，炮轰一轰，火烧一烧，这是形象化的语言。难道真拿大炮轰吗？难道真用火来烧吗？没有这回事嘛！我没有看见哪个拿大炮轰的。同志们，那是个形象化的词。炮轰也可以允许炮轰，省委长期拒绝这两个口号，这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省委不接受是错误的，接受这两个口号，不等于是黑帮。材料不够就是空炮，材料够就是实炮，不管是什么实炮还是空炮，放了以后，考验他，看他受得了还是受不了。（鼓掌欢呼）省委同志应该挺身而出，要敢于承担错误。勇于承担错误的省委，彻底检查错误的省委，如果站在正确方面，不是黑帮也不会乱讲成黑帮嘛！所以，这个问题主要在于领导敢不敢于挺身而出，赞成革命，欢迎批评，站在群众当中交代政策、检查错误，这是毛主席一贯教导的，我们要用这样方法来严于律己。所以，这次我们江西省委（指向白栋材、刘瑞森）来到北京……。

第一点是各级党的领导要在群众面前经受考验。犯过错误要检查错误，犯了错误，能不能改正，要真改，允许你改，要革命，允许你革命，这就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和组织路线。（大意）上面讲了，我们南昌起义就是犯了错误嘛！我没有把战争领导好嘛！不配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嘛！但是长期革命也学到了一点，觉悟过来了，主席还让我革命嘛！还团结我，教育我嘛！……

所以，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我们任何负责同志应该挺身而出，承担错误，为革命修正错误。既不能少说，也不能乱说，我看应该是实事求是，要

作出实事求是的检讨。我想，不管哪一派，都是不应该指责的，这是第一点我要说的。

第二点，确实在南昌和其它地方，我完全清楚了，我大致清楚了，确实有些省委引起群众斗群众。责任在谁呢？不在于群众互相之间，主要的根本的在于省委。所以，这一点江西省委应该勇于负责，负起责任主要的根本在于省委。所以，这一点江西省委应该勇于负责，负起责任，不应当把这个责任推到群众身上去！

（鼓掌，高呼口号）我想呀！省委应当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不仅革命左派同意这样做，就是当时受省委蒙蔽的，受省委欺骗影响的，暂时跟省委走的那些同志，他们也会赶上来，应该教育他们嘛！因为当时他们受蒙蔽了，受欺骗了，以为这样是保护党嘛！所以保卫党，保卫省委，这是可以理解的。受省委欺骗的这部分群众，也是革命的群众，你们还应该相信他们是革命的呀！你们不能责怪他们嘛！所以大字报（攻击学生的），省委决定的《紧急通告》（省委三级干部会时发的），这是引起群众斗群众，这是错误的！第二点，希望转告杨尚奎同志、刘俊秀同志、方志纯同志、黄知真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好好开一个省委的会议，检查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才能团结江西省的劳动人民、革命学生和革命工友。

第三点，希望在座的同志们，你们都是江西省劳动人民、江西省人民的子弟，经过解放后党领导下的教育，十多年或者十年左右，都是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哺育下的青年嘛！党对你们希望很大。正如毛主席说的，搞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把这样的希望，把主要的希望，放在革命青年的身上，因为你们是可靠的骨干。四十年后，三十年后是你们做事了！你们如何来保证祖国不变颜色呢？你们的立场、观点，你们的世界观，是真正符合无产阶级的，那么，我们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就减少了嘛！就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保证党不变颜色了嘛！所以你们要想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工人是领导阶级，不管你是大厂、小厂，还是景德镇来的，你们都是负有生产重任的。拿我们南昌，还有军事工厂，这是我晓得的嘛！是负有这样大的责任的。我想同志们、工友们，你们应该想想，不管是哪一方面，都不能反对，你们能不接受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吗？不能！你们能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现在的十条，工厂十条，农村十条办事吗？一定要按照这些办事。所以，你们领导方向、纲领都是一致的，不管是哪一派，你们都不能脱离这些打交道，你们不能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

毛泽东思想。既然大方向、大前提想通了，相同了，就承认是革命的组织嘛！就不应该分革命的，不革命的，不应该把对方说成不是革命的。当然应该承认有激进的、有后进的、有左派的、有保守的。在某一个问题上、某一个事情上，认识是有差别的。因为我们的运动是向前发展的，开始他站在革命立场上，是少数，通过斗争，会转变为多数，又碰到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少数，经过斗争，又转变为多数。所以要不断革命，不断前进。

在革命的大前提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并肩作战，共同革命。有共同领导，共同领导就是党的领导，领导、方向、纲领都相同，就不应有两种行为。在联合行动中，只要大方向同了，那么观点差异是允许的。不仅你们，就是我们党中央，我们中央政治局和我们中央常委也有观点不同的，也必定有……作为人的思想，永远不会是铁板一块，一个人的头脑里也有几种思想，有斗争。有进步思想，也有落后思想。不断进步的思想把落后的思想挤出去，这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占领资产阶级思想的阵地，无产阶级思想不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钻进去。一个人如此，何况一个团体？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嘛！不要认为有不同的思想就不能够共同生活、共同工作。这就是我们从井冈山以来，毛主席不断地把这个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联合在大方向相同下的各方面的人，统一在一个战斗单位里面。军队里也有不同的思想嘛！党内也有不同的思想嘛！又比如，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才能领导革命，才能走向革命的胜利。这是我跟随毛主席四十年，逐步认识到的，有时跟上了，有时跟不上，就得赶快赶上。不能说这个完全对，那个完全错，有了共同点，为什么不能联合？江西产生打人的事情，甚至打死人，这个责任要由省委负。如果不能完全解决，我们可派几个人，到那里把问题解决清楚。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真理要搞清楚，是非要搞清楚，不能违反大前提。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你们要无愧于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省委要团结大多数，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省委若是革命的，真金不怕火来烧，敢到火里烧一烧。希望你们帮助省委。刚才你们写的标语很紧张（指景德镇同志写的），你们在政协礼堂谈了。希望你们推动江西省委和你们站在一起，和你们真正亲切地谈话，真正撇开思想谈。不然前进不得，后退不得，生产也停了，就不能为人民服务了。

在江西厅看到毛主席亲笔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希望你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4）》。）

二、批评江西省军区支持保守派打击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周恩来关于《江西日报》问题的第一次电报指示江西省军区党委转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

五月二日十七时二十分中央文革小组给你们的指示是确实的，希望你们立即执行。

根据中央三月十六日关于报纸问题的几项规定，《江西日报》已实行军管，它不是哪一派革命群众的报纸，不能只反映哪一派的意见和观点。暂时可只刊登新华社电讯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文章等，以便使江西全省人民能够保证听到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你们进了《江西日报》的同志，望能立即退出，以利报纸立即出版。至于《江西日报》的报头问题，因这四个字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以不改为宜。

周恩来 1967 年 5 月 7 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关于《江西日报》问题的第二次电报指示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并告江西省军区党委：

关于《江西日报》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日的电话和我五月七日的电报，军区党委均已向你们传达。据悉，进驻报社的红卫兵同志尚未完全撤出，报纸至今还没有启封出版，对此中央十分关心。为了使江西全省人民能够及时听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务望还留在报社的红卫兵同志立即撤出，以便《江西日报》启封出版。在目前，报纸可以出版新华社电讯和中央报刊上的文章。关于对《江西日报》前一时期的报道有不同意见，可以协商解决。

周恩来 1967 年 5 月 12 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有关江西省军区报告的批示及他自己的指示

〔时间：1967 年 5 月 30 凌晨 2：10〕

五月三十日凌晨二时十分周总理来电话，转告了毛主席在一个文件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小组同志：

江西军区与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什么愈演愈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三个省军区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对，也值得研究。

刘培善（签字）6.1

同时总理指示：

1. 江西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犯了一些缺点错误，革命群众认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你们应该很好解决。
2. 江西日报问题不要争论下去了，“江西日报”四个字可以暂时去掉，改出一个时期的新华电讯。
3. 不要把刘瑞森的问题看得太严重了。
4. 刘培善先作检查，军区那个检查，你们（指军区）自己研究。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江西大联筹的电报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革命同志们：

据报，你们二十九日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这是违反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违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六·六”通令和中央六月二十四日通知的。不管你们有任何理由，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你们珍惜和保持你们的革命称号，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返回原驻地，听候中央派人员处理。我们命令江西军区不

许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如果双方任何一方不这样做，不听中央的话，就要犯极严重错误，我们等待筹委会同志的回答。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毛泽东关于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

毛泽东 七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第五十五号上。这期摘抄登载了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分团七月四日的电话汇报，反映赣州武斗情况严重，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2）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周恩来接见江西军区和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北京来电

时间：七月十一日凌晨

来电人：南昌三中井冈山兵团赴京控告团陈××

接电人：南昌三中井冈山兵团谢××

内容：总理、伯达、张春桥等中央首长昨晚十一时四十五分至今天二点零八分接见了我方代表和联络总站代表共五十人，军区、军分区负责同志，刘瑞森、黄先、郭光洲、黄霖、李杰庸等同志也参加了接见。

（一）总理、伯达亲自修改协议说：“停止武斗是大方向”。

（二）总理传达主席指示：江西问题终于炸开了，江西造反派不是弱，而是强……是要流血的，为有牺牲多壮志……七月份把局势稳定下来，迎接“八·一”，要把斗，批，改搞好……（电话中断）

（三）总理传达主席指示：从广州、福州调一部分部队来江西，稳定局势，维护社会治安，树立无产阶级权威。

（四）总理、伯达亲自修改协议说：“除军事机关以外的武器弹药，在十天之内全部集中，在本单位封存好，不准转移，不准埋藏，不准调换。”

（五）总理激动地拍桌子说：“农民进城不只是他们的责任（指联络总站），挑动农民进城是军分区、武装部，我在这里直说了，不是军分区、武装部哪能挑动武斗？！”总理又说：“农民大批进城，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不好，这是错误形势，军事领导机关责任要大些，他们的确是下了命令的，我们了解。”又说：“军区、军分区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坏人，也有犯错误的，有些地方要派小股部队去处理，如波阳、景德镇，要不，就不好办了，要有权威的人去处理。”还说：“江西军区要作一个好的检查，要比六月七日检查要深刻要坚决。”

（南昌三中井冈山兵团 1967 年 7 月 11 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江西省双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赴京控告团和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赴京汇报团，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期间，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双方派出了同等数量的代表，就关于在全省范围内立即停止武斗问题进行协商。双方代表一致认为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保证“四大”，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六·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

现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结合我省具体情况，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必须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在达成协议后，立即停止武斗。

二、不得动员农民进城。已经进城的农民，必须立即撤回，回到原乡村；同时，撤销沿公路、铁路的岗哨，以利工农团结和农业生产。

三、双方必须在签字后尽可能快地不超过十天内将所有夺取的武器弹药全部集中封存在各自单位，准备交回原所有单位，由驻军及武装部门散发的所有武器弹药及自制的杀人凶器（包括土枪、土炮、土手榴弹、炸药等），必须立即就地封存，听候中央派员协同军区，分别情况处理。并积极协助当地驻军和公安部门把流散在社会上的武器弹药缴回，立即停止自制各种凶器。不许转移、埋藏和破坏所有武器和各种凶器。撤除一切用于武斗的组织机构和进攻与防御设施以及哨卡，恢复正常交通运输和邮电的畅通。不许抢夺交通运输工具。

四、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参加武斗的人员必须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包围其他单位的人员应首先撤走，立刻返回原单位。并动员离开生产、工作、学习岗位的人员在十五天内返回原地区、原单位（不包括正常上访人员），对于被迫外走人员在外期间，不许克扣工资，不许彼此歧视，切实保证返回人员的人身安全。

五、双方在协议达成后，必须立即登记释放全部扣留的对方人员，并在三天内负责安全送回原单位，在释放前和释放期间不得加以任何迫害和污辱。立即撤销双方设立的集中营、劳改所和刑讯室。双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

六、双方保证：对双方负伤人员要认真予以治疗，不得因观点不同而进行任何刁难和歧视。对死亡人员要通知其家属或原单位妥善安葬，对死者家属予以适当抚恤。

七、各组织的宣传广播车，十日内全部拆除，用于生产。

八、要求中央迅速派出代表团并由双方派同等数量的代表参加，对江西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监督上述各项实施，并严惩流血事件的幕前幕后的策划者和指挥者。

以上八条双方必须保证在全省范围内坚决贯彻执行，并积极宣传动员所有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南昌地区工交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复辟联络站 李永仁国营洪都机械厂井岗山兵团 周锦红南昌铁路保卫毛泽东思想战士“二·七”总指挥部 郭人定南昌钢铁厂“五·一六”兵团

赵玉梁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大专院校革命师生总指挥部 蔡方根南昌五中“一小撮”战斗团井岗山兵团 胡敬辉南昌三中井岗山兵团 张兰发中共江西省委机关革命造反团 魏厚庆江西省直机关保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战斗团 曾凡珩南昌地区政法战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 赵予尧宜春专区萍乡矿务局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彭锡顺赣州专区江西冶金学院《东方红》战斗团 罗仁彤抚州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革命师生总指挥部 张达连上饶江西上饶波阳“三七”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 韩烽九江星子温泉工人疗养院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 陈公明吉安井岗山报社《捍卫毛泽东思想》司令部 刘清友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江西省红卫兵东方红司令部 李佑民《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组》红卫兵江西总部（红江总） 钟舜生南昌柴油机厂铁扫帚红色造反团 汪明远国营洪都机械厂《红旗兵团》 陈耀辉南昌市公安红旗公社 张憬九江车站“二七”革命造反指挥部 田根才中共江西省委机关《红旗》联合战斗团《长缨》《燎原》革命造反队 甘炳元宜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 郑卫庐山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曾智宏吉安专、市、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 曾宪行铁路向圻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 龚水波江西赣南专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 吴继元抚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高仰文上饶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思想宣传联络站 陈品贤江西波阳红五月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 余浩章景德镇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 秦和清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通知稿（1）的批语 一 照办。 二 不宜称为坏人。（2）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戚本禹起草的，主要内容是：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武器一律收回。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律由挑动者负责。五、

从本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 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指示。 (2) 中共中央指示稿的开头有一段话，说到最近一个时期，江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坏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毛泽东审阅时，将文中的“坏人”一词改为“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并写了这个批语。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戚本禹给新华社江西分社的一封信

王广宇、王道明、徐学增、杨松友并记者站同志：

南昌记者站（新华社）的同志（刘光辉、赵永安、李醒民、詹文良、孙璞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在六月二十九日晨，非常及时而准确地报导了江西保守派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严重事件。这个报导对中央了解和处理江西的问题起了作用。建议党委和记者站通报表扬。我们全体同志都要学习南昌记者这种坚决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对人民革命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

革命敬礼！

戚本禹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总支委员会通报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新华社江西分社和记者站南昌记者组的记者以及通讯员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及时地向中央提供了南昌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六月二十九日晨，记者刘光辉、赵永安、李醒民、詹文良、孙璞方（总社注：《红旗》驻江西记者，下同）等同志，有的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武斗现场采访，有的废寝忘食，认真研究、整理材料，及时、准确地报导了南昌军分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由于他们想革命派之所想，急革命派所急，做革命派之所需，同革命派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报导对中央了解和处理江西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

根据戚本禹同志的建议，总支委员会研究，决定给予刘光辉、赵永安、李醒民、詹文良、孙璞方等五名同志通报表扬，以资鼓励。

希望刘光辉等五同志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党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要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学习他们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坚定不移地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学习他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艰苦奋斗，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把革命派的需要当成无声的命令，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勇敢地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线。

学习他们的对人民革命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总支委员会希望全体同志通过这一学习，更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搞好思想革命化，人人争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色勤务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

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总支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

（来源：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主编《新闻战报》第 11 期 1967 年 8 月 12 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姚文元接见江西省四方代表讲话记录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一时六分至四时七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代表：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赴京控告团五十人，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赴京汇报团五十人，刘培善、吴瑞山、倪南山、徐鹏、李胜、陈昌奉、刘瑞森、黄先、郭光洲、黄霖、李杰庸，首都红代会四人，济南部队首长杨栋梁同志。〕

内容：江西大联筹代表汇报联络总站片面撕毁八条协议，继续制造流血事件，并与武汉“百万雄师”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企图掀起新的更大反扑的事实。

总理：包围火车（指十五日机枪扫射五十八次快车一事）是我亲自处理的，知道这件事，这是预谋的，上海铁路局不知道，军区也承认是联络总站搞的，派了温州的张勇布置的，动员农民，用机枪，火车本来往东走，上饶通知他后退，车轨上有枕木，停下来就被打，死伤——（大联筹代表：死五人，伤七人。）

总理：煤校的事十三号，打列车十五号，这两事都是协议以后的事，（生气地对联络总站代表）你们联络站在地方力量大，你们既达成了协议，就应该遵守这个协议，就不能动员农民进城，县武装部和你们配合烧房子，攻打，有没有这回事？！听说你们还走三人，五个核心走了三个，不想谈了？（联络总站汇报团核心人物汪明远，甘炳文、钟舜生预感到失败之日已到，偷偷溜回南昌——笔者）

总理：是不是有新的负责人推选了？

联络总站代表师院东方红李有民答：我们宣布退出联络总站，在京听候总理指示。

陈耀辉（联络总站代表）：我们也宣布退出联络总站。

（大联筹代表发言，揭露联络总站借此解散之机撕毁协议）

总理：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军区，军区必须通知军分区、武装部，把民兵的枪收起来，武斗才能停止。

总理：（对联络总站）你们这边偏保，保守一些，还是群众组织，只要你们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存在，还可以发展。就是被个别坏头头掌握了，也可以离开他。

你们偏保，造反精神不旺，对我的话就不满意，其实过去你们就是受军区的影响嘛！就是偏保嘛！你们要改过来，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欢迎，支持你们，但可不要起来打砸抢，如果搞打砸抢就更错。过去军区错误，就是对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农民，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我的看法（大声地）刘培善同志，就是策划，放纵！军区要负这个责任。你们说对不对？

大联筹代表：对！

总理：军区要下决心，把发的枪收回，但是否有效我怀疑，刘培善同志说四十二个县收回了。

刘培善：三十二个县。

倪南山插话：收了六十五个县。

总理：你是谁？

倪：倪南山。

刘：军区副司令员。

总理：你就那么相信你的军分区、武装部呀？我就不相信。我就是怀疑你派的独立营到抚州去，能不能把那里的武斗制止？刚才说的都是抚州的事情，军分区，武装部确是不象话，放纵了几个月，已经成了习惯。（对造反派）你们要站在革命路线一边，就要有伟大气魄，与另一派联合。已往革命的要更革命，彻底革命，保守的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走错了路的也要革命。他们能改变还是要欢迎。你们既然是造反派，希望人家跟着你们造反，这好嘛！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不是绝对对立的敌我矛盾，何况我们本来就是人民内部的事，认识上错了，站过来，改过来就行，联络总站回去三个人，不知为什么？协议是你们达成的，我们是对你们组织的客观表现加以评论，对中央评论不满，那是不对的，如果回去气不过，越搞越凶，那就要走到人民内部矛盾的边缘了，走向绝路的是少数。对解决江西问题我们正设想一个方案，最好能促成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不要再搞军管。（对造反派）以你们造反派为核心，有群众组织代表参加，跟亮相的领导干部商量，现在军区威信不够，你们信不过，所以夺枪，这是在南昌等地。另一些地方联络总站力量大，联络总站相信军区，那样搞联络总站又要反对，我们希望联络总站能够觉悟，马上转过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现在革命好嘛！（对造反派）革命不分先后，你们要欢迎他们革命。通过大批判，批判刘、邓、陶，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们那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谁？可以不点名。要点只能点一个方志纯，你们首先把矛头指向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名字暂时不点，方志纯总是一个，单独点一个太少，保留将来再点更好，点了再换不好。江西形势，几乎每个军分区都闹了，应该打出一条路来，把无政府状态变成有政府状态。你们赞成不赞成？

大联筹：赞成！

总理：我对联络总站还要讲几句，无论如何，你们要保证再不动员农民进城，萍乡烧房子，打火车，就是你们搞出来的。

（安源老工人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向总理愤怒控诉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一小撮人策划火烧萍乡煤校的滔天罪行。）

总理：（气愤地）萍乡有没有人在这里？

（联络总站萍乡一老保站起：有！）

总理：（翻名册）萍乡市武装部张锦才在不在？

（张答：在！）

总理：（严厉地）你到前面来听！

（老工人继续控诉。说到红卫兵小将被活活烧死时，泪涕俱下，全场无声。总理难过地低下了头，一连问：多少人包围？老保有多少人？学生有多少人？）

总理：（愤怒地对张锦才）你们武装部干这样的事情，你听一听！

总理：（大声地）吴瑞山，吴瑞山，你们军分区武装部就干这些事情，你听嘛！

吴站起：我们查清楚要严肃处理。

总理：处理？就是你们策划，放松这些问题，你们的检讨到现在扭扭捏捏，还说客观的，思想影响的，军分区、武装部都一样，抚州、宜春、莲塘、萍乡、赣州、吉安，没有一个不这样的。

肖华：要把策划的祸首抓出来，严肃处理！

总理：（对张锦才）你知道吗？王世清，他亲自策划的。（对吴瑞山）吴瑞山，要不是你们亲自策划指挥，他们怎么敢这样做呀？

总理：两面的情况晓得了，东面火车上的事也已经查清了，这件案子破了以后，一定要捉拿凶手，抚州来人了吗？七十六师派去侦察，肖华同志，你把电报给他们。这两个案子查一查，军分区、武装部怎么动员农民进城破坏八条协议，根子就找到了。

（南钢 6·29 事件牺牲的烈士家属向总理汇报其爱人牺牲经过，控诉刘培善、林忠照、吴瑞山之流屠杀革命造反派的罪行。总理十分关心地倾听。）

总理：徐春青同志（首都红代会），你们和江西造反派不是很有感情吗？你们在北京组织一个联络站，设在西苑吧，把这些材料调查一下，由国家来抚恤，主谋和凶手群众会揭发的，主谋要严办，调查完后，可交给联络员。

总理：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你们有组织么，你们没有发展到全省，在政治处于优势，因为你们造反是对的，但要谦虚谨慎，要防止骄傲。一大发展有两条，一许多原来偏保觉得势孤的钻进来了，另一是坏人也可能钻进来了，要注意，要有政治上的高姿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发挥毛泽东思想的威力，要逐步地稳步地发展，因为你们在政治上占优势，发展慢一点，不要紧。你们要成为江西省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核心，否则人家就会跑到你们前面去。刚才三个老同志和那位女

同志讲的，应该激动，不激动没有阶级感情，但处理问题要冷静一点，这点要向年长的人们学习，要有政治上的高姿态。才能促进中央把江西的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你们说对不对？

大联筹：对！

总理：（对老保）你们犯了错误，你们受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的错误影响，也有自己的错误思想。你们一部分是从造反派中来的，一部分是受蒙蔽的。你们到处笼统喊：打倒刘瑞森！也不分析具体情况，还拿这个口号作为发工资的标准，这象什么话？

联络总站马上散掉不好，当然有杀出来的也不能阻止，但你们来会谈，代表一部分群众，将来成立筹备小组，要宣传中央的主张，那就表现你们革命了。

姚文元：以前干了坏事，现在做点好事，也好嘛！

（本文系根据江西大联筹赴京控告团记录稿整理）《火线战报》
驻京记者组 1967. 7. 29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西四方面代表谈话摘要

周总理说：

今天我把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同志请来了，济南部队是从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去的，是毛主席亲自派出的部队。我再给你们介绍这个部队的军政委程世清同志、副军长杨栋梁同志。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派出的队伍，谁要说是刘少奇派出的，是污蔑，谁说的，我们要把他揪出来。

为了使江西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们从首先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调了支左有成绩的部队去，要听最高统帅的话，要相信解放军。不仅北方调了，南方广州也调了，也是调了支左有成绩的部队。这说明重视你们江西问题。江西是前线的近后方。我说过你们是三个后方嘛。福建是对台湾，广东是既对港九，又对美帝，所以调部队做你们的支柱，是为了使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有几件事，大家要注意：第一，不能再随便发枪，凡是会议期间发的枪，一律收回，要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方向路线在上边，不要过分责任下面。

现在军区自己承认在支左工作中某些问题上犯了路线错误。指出来了，军区就应该严格执行，

不能乱发枪。

双方群众组织打电话回去，停止武斗，停止夺枪，停止动员农民进城。

〔补充〕

周总理说：我给你们供给一个材料，刘少奇近二年一直在主席跟前吹嘘他在安源的历史，主席不吭声，叫他暴露，主席就是容量大。其实，主席一直在领导安源斗争的。萍乡的煤、大冶的铁、汉冶萍公司，当时安源运动是湖南省委去领导的，主席全部历史都清楚。主席说，刘少奇是第三代，李立三是第二代，第一代是什么人？跑了。刘少奇总是吹嘘，跟我说过几次，（对姚文元）跟你也谈过几次吧。所以我觉得有问题。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从二十年代入手批判是有道理的。刘少奇跑到苏联去不到一年，回来就到安源搞了一下。二十年代还不仅是安源，还有上海，还有广东，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广东省港大罢工他也插了手，其他的我就不讲了。（姚文元同志插话：这就是他捞的政治资本，这点要揭露。）

我听到不下五次，很奇怪，以为有什么名堂，总是程咬金那么三斧头，当时还不会想到八月以后的情况。批判刘的根子要从二十年代搞起。真正批判刘的话，二十年代很多可批。

（姚文元同志插话：反动历史要彻底搞清楚。）

（摘自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总理、姚文元接见江西四方代表谈话记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周恩来第六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座谈记录

〔时间：八月五日二十二时五十分至六日四时十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大联筹代表汇报济南 6013 部队一股长到萍乡武装部接洽事情，被“萍总”老保毒打，当时武装部长在场不管，现在伤很重。）

总理：萍乡武装部长是哪一位？人武部政委张锦才同志在吗？济南 6013 部队一个股长郑洪斌同志到人武部接洽事情，被“萍总”毒打了一顿，你在这儿听

清楚一下：你们那位部长在场，视而不见。这样的事情都出在你们萍乡，而且在武装部！我说了，你们就是策划放纵的嘛！

（大联筹代表继续汇报：“萍总”造谣说济南部队写反动标语，并以此为借口冲 6013 部队驻地，抓走济南部队四人。）

总理：抓了四个吧？（向杨副军长）根本济南部队不会写这样的反动标语。若有也是栽赃！武装部长视而不见，这样的武装部长！（非常气愤地）还把部队的四个同志一个副营长，一个副指导员，一个副连长和一个战士都抓走了，还打伤了一个妇女……这也叫拥护解放军吗？！

（杨副军长去接电话。）

总理：（对杨副军长）去了解一下萍乡问题，顺便问问南昌的事。

（南昌橡胶厂保守派汇报 6·25 南橡事件，诬蔑造反派搞武斗，老保乘机呼“打倒刘瑞森”。）

总理：（对老保）你们不要这样叫！这样叫，我就不好谈了。“联络总站”把人家打死了一大批人，你们知道吗？怎么是刘瑞森呢？你们不知道大联筹被打死了很多人？（联总又抢着讲，总理很生气）我还有没有权力主持这个会场！既然谈南橡的，那就一边一个讲嘛！

（南橡造反派汇报，被老保打断。）

总理：（对老保）你们讲话他们不打断，为什么他们讲话你们要这样？上次也是如此，让你们讲了两，三个小时，你们在中央开会也这个态度，那在地方更不用说了。

（大联筹代表汇报总理第四次接见后江西全省动态，讲了进驻吉安广州 6182 部队战士到军分区参加会议，军分区头头指使二十多名战士毒打野战军战士等情况。接着大联筹赣州代表，烈士家属控诉李胜之流操纵保守派“反复辟大军”残杀造反派的滔天罪行。）

总理：李胜来了吗？（李胜：来了。总理站了起来）你几时来的？（李胜：七月十四号来的。赣州造反派继续汇报。总理很激动，站起来踱来踱去。当谈到赣州军分区开了许多会，证明李胜之流是赣州 6·29 大屠杀的策划者时，总理，姚文元走到李胜前面，严肃地详细地查问了李胜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李支支吾吾，吞吞吐吐，十分狼狈。当李谈到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时，总理问得特别

仔细，要李交代证明人，并追问以后如何回部队，恢复组织关系以及工作情况。李回答得很含糊。总理查问了 30 多分钟。此时，李胜的上司刘培善站起来，呆呆地望着李胜，神色慌乱。）

（大联筹赣州代表继续汇报，说到赣州老保在军分区策划操纵下残杀造反派的惨案时，老保哄动。）

总理：“联络总站”的同志要好好听一听，赣州的事件是最典型的，有阶级感情的话，应该听一听。

（大联筹代表继续汇报赣州问题。谈到老保准备上翠微峰打游击。）

总理：这是吓人的，不会的，现在毛主席领导下，还要上山打游击？李胜，你发给城里的枪有多少枝？

（李胜：我不清楚。）

姚文元：怎么不清楚？

（李胜：是市武装部发的。）

（大联筹代表：七月十三日还在发枪）

总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知道赣州事件后，亲自派广州部队去的，要不然，你们（指大联筹）的生命还保得住吗？（大联筹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老保无动于衷）

总理：现在活了，就要坚强地战斗下去！（大联筹代表汇报到伤亡数字时）

总理：我们查过了，确实有 223 具尸体，两方面（指广州部队和大联筹）数字一样。

（联络总站许多人站起来：报告总理，要把南昌问题作个麻雀来解剖。）

总理：（生气地）开了这么多会难道不是在解剖麻雀吗？！你们还相不相信中央？你们就是无视中央！

姚文元：（大声）毛主席对江西问题这样关心，你们想了没有？！你们要相信中央文革的决心！

总理：上次你们双方都鼓了掌，欢迎济南，广州去的部队，呼了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我们中央把你们（指“联总”）看成群众组织的代表，既然是群众的代表，应该听最高统帅的话。全国人民都依靠人民解

放军，解放军是全国人民的支柱，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这两军队（指济南部队和广州部队）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派去的。

江西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所以要有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我有一个要求，军区、军分区、独立师、独立营、人武部，其他地方部队，应当采取这个态度，对野战军应该抱欢迎的态度，搞好工作。对新去的解放军的态度是个考验，给你们一次最好的机会，也是最大的考验。关键在于实际。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到底是欢迎还是不欢迎新去的部队，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最高统帅派的部队，另外，群众组织，到底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是支持他们还是包围他们，甚至夺枪，抓人。要真正地学习解放军。你们晓得军队是支左的，对造反精神旺的，敢于对党、政、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当然要支持。军队一不还口，二不动手，也不开枪，大家知道的。不要认为这是可欺，就欺负他们，包围他们，打人，捉人，夺他们的枪，那就犯严重错误。造反派夺军区的枪是受了迫害，我们已指示，交掉的算了，没有交的暂时封存不交。如果夺新去的解放军的枪，打人，捉人，那就犯严重错误，大错特错。（此时杨副军长向总理汇报，刚才接到萍乡来的电话，济南部队被打伤五十七名指战员，重伤七人。）

总理：（对联总）你们听听！……人武部长看新去的解放军挨打不管，视而不见，反过来，“萍总”的人冲到部队捉了四个人，又打伤了几十个，这样的情况怎么许可呐？如果夺新去的解放军的枪，打新去解放军的人，那么可以判断你们（指联总）是反对解放军的。现在赣州、萍乡、宜春、南昌、波阳、抚州、九江、上饶、景德镇都派了部队去，（大联筹代表：抚州还没有去。）也要去的，有军区的独立营在，以后还是要去解放军的，每一个地方都要去人，都要受考验，首先是对解放军的态度。如果把矛头指向新去的解放军，就是直接指向最高统帅，林副统帅，如果妨碍新去的解放军执行任务，就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姚文元：（意味深长地，高声地）这一点总理讲得很清楚了，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去的嘛！

总理：（对联总）你们还是早些打电话回去，萍乡、南昌、赣州、吉安、抚州等都打电话回去说一说，如果再这样，你们就会把自己摆到最不利的地位，那界限分明了，谁拥护解放军，谁反对解放军。解放军又没有动手还口动枪，人被打伤了。以前，方向不定，要看新的，这一步走得更远了。当然，不是怪你们群

众（指“联总”），特别是吉安、萍乡、丰城这些地方，这是一个很好的表态嘛，这是一个新的考验。这是第一点。

第二，无论如何，既然达成协议了，首先在北京要执行，不要互相谩骂，互相打人，捉人，抢东西。

第三，江西问题快到临近解决了，做代表的不能随便走，要告诉一下，要走要经过了我们同意才行，临近解决，随便走不好。至于这几个事情，赣州的查得很清楚了，查到了二百二十三个尸首，当然还要调查。莲塘事件也是要调查嘛，要派调查团去，但不影响解决江西问题。军区党委要改组。现在有条件成立筹备小组了，现在不说，下次再说。

（本文系根据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赴京控告团记录稿整理）

江西《火线战报》驻京记者 1967. 8. 6

三、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及江西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四方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姚文元等接见了江西四方代表及全体来京人员。周总理讲话于下：

我念决定，然后解释一下：

江西省军区有几位同志，首先，刘培善同志对江西省军区所犯的错误要负责任，要检讨，他作书面检讨，我们印出来交给你们。明天可以在你们住的地方开会，但必须指出，在人民大会堂，全中国最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也就是在这个全国开各种会议的地方，不要进行武斗，出去以后不要搞这些动作。明天和以后也不要在北京开什么大会，把某些同志揪去进行斗争，因为中央已经作出决定，这是最高指示，希望你们按十六条办事，按照最高指示办事。

我们已经改组军区，已经采取了措施，回去可以把整个江西，南昌的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你们开群众大会，这些同志去检讨，不要在这个时候大家开大会，搞这些名堂，这样不利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大联合筹委会的同志应该了解这些情况，另一方面“联络总站”的同志你们受了蒙蔽，广大群众受了害，将来

检查检讨嘛！所以，既要有革命性，又要有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这一点必须说清楚，因为刚才我们刚从湖南会议出来，会议的同志出门口就把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抓走了还搞武斗，这样不好，这不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应该树立高姿态，高风格，当然，你们受害，很激动，我们理解，所以今天让你们都到会来，这也是开了一个例，一千多人全体参加，还是第一次，四川都没有这样。（姚文元：希望你们作模范）听毛主席的话，要摆事实，讲道理，完全按十六条办事。

（2）（从略，当宣读到要揭露、制止保守组织中有攻击绑架支左部队时总理解释：）这几天，你们一些人清楚，除了南昌和赣州以外，在吉安出现的事情，在萍乡也出现包围支左部队，最近部队进驻抚州又有这种事情，刚才得到消息，向塘也有这种事情，又出了一点事。所以，我们要号召所有的群众组织，应该坚决支持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林副统帅亲自决定调动南北两方的支持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部队，应当拥护，不能抢他们的枪，抢他们的服装，抢他们的仓库，抢他们的车辆。（总理继续宣读，读到：军区、军分区指战员要与驻江西的部队紧密合作时解释）这段我们是号召，江西省军区，军分区，独立师，独立营，人武部在场的也有，不是各个军分区都有同志在？独立师也有人在，我们号召你们在这次野战部队进驻江西支持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要有好表现，看你们是不是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因为今天就发生这样一件事，我们派了一个野战营进驻抚州，因为要去的时候，抚州有独立部队，本来两个营，一个福州派的，一个是本地公安部门改编的，原来中央决定把这个独立营调上饶整训，然后调去一个独立营，但是这个独立营拒绝调动，这是已经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不仅如此，今天野战营进驻抚州，派联络员到前面联络，由副团长去联络；但是进驻人被绑架 28 个人（姚文元：28 人）我们新任副司令员直接打电话打到抚州军区，参谋长，姓什么？（有人回答：姓刘。）是参谋长。在这时候，正当联系说，把联络同志都绑架了，他不承认，要他释放，他也不承认，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抚州军分区有同志在这里吗？（下面一人答有，薛利职）回去负责下命令，28 个同志今天立即一定要放出（姚文元，把汽车打烂了）你们拿出汽车送到温家训去。第二，传达中央、最高统帅、副统帅的命令，要把独立营全部离开抚州。（营：好）你不管，如果他们违抗命令，那是他们违抗命令，

军分区政委都在家，要他们负绝对责任，如果他们对抗中央、中央军委，那他们就要走陈再道的路。抚州部队我相信绝大多数是拥护中央的。我们相信，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包括人武部，还是一分为二的，多数还是好的，个别人，比如说，刚才说的参谋长，完全对抗我军进驻，不负责任，这是少数，但是，这件事情要考验各个军分区，今天江西七个军分区都到了，你们要表明坚定的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愿意和野战军关系搞好，愿意改正错误，必须在这次有所表现，我刚才和福州军区政委说了，等一下你们回去要处理，抚州军区、人武部，独立师负责人会传达的。一定要搞好关系，是最高统帅、副统帅的命令，经过改组军区，跟他们程世清、杨栋梁二位传达，要能够负责，落实每个命令。（接着宣读）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检查和改正了就好。（总理解释，这是把主席的话写在上边，因为给你们改正机会，如果再犯错误，你们就错上加错）（接着宣读）要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总理解释：他们可能煽阴风，点鬼火，这是不好的，但是，只要军队还是相互紧密联系，遵照以前的政治工作规定，整好关系，我们相信，阴谋也会暴露出来。）

（3）（从略）这是筹备小组的同志，已经中央提议，回去你们协商，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还有干部出来亮相，这一些同志都参加筹备小组也是考验同志的机会，工作好，原来的可以再用他，工作不好，将来会考验出来。

（4）总理：江西的革命同志，你们的任务重，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你们取得这样的结果，你们就应该负起责任。

（5）“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双方，应坚决执行制止武斗的协议（鼓掌）（周总理：这件事，从声明反映到，八条协议造反派遵守。7月12日当时的情况你们互相达成协议是很好的，许多你们付之实施了。但是，的确有些地方还在那里武斗，特别是保守组织，有些幕后指挥打击你们造反派，在萍乡，上饶，南昌，赣州，刚才说了吉安，在丰城，在沈阳，现在抚州，还有向塘，都有这样。因此，广大群众都不太理解，好象是你们达成的协议，说这些头头都右倾，都错了，这不对，大家达成的协议，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按：指造反派）过去支持，现在支持，将来还是支持。这是两派达成的协议，“联络总站”也负责，很好嘛。在这一点上，如果“联络总站”真正付诸实施，就不会在地方搞武斗。你们“联络总站”的很多同志回到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上，我们应该欢迎。应该说，你们到北京来了的代表也是代表这些群众来参加这次会议，你们大家的心是好的，把江西的文化大革命推进了一步，暴露了一些错误事情，一直到现在，抚州还在暴露，向塘还在暴露。还在暴露不要紧，暴露到将来，把这些坏人揪出来，受蒙蔽的改了就好，最近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你们的三句话，（指造反派）既呼的三句口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胜利归于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话，各革命组织及群众组织应当进行内部整风，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批判和克服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总理解释：这是所有群众组织，包括保守派组织，都应该这样做。造反派不能因为过去受压抑，胜利了，因此就不做，还是应该强调，严于律己，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些错误思想应该批判参加保守组织受蒙蔽的群众……（到末尾，略）总理解释，特别是革命造反派要做表率，做模范，这样就更主动。将来受蒙蔽的，看错了的反戈一击，最后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欢迎。（姚文元：要欢迎他们！）要热情欢迎他们，欢迎受蒙蔽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保守组织的群众不要去压他们，压不垮的，摆事实讲道理才能起变化的。

（6）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群众武装起来。目前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总理解释：因为我们现在证明了，在过去犯错误的军区，特别是军分区、人武部，在某些地方曾因为发枪给保守派，挑动农民进城搞武斗，这个事实例子很多，现在当然在改正错误。另外，革命造反派在被压的不得已的情况下夺了武器，夺来以后，很快达成“7·12”协议，武器可以封存起来，但不忙于交回，因为这一点造反派有了经验，南昌军分区、人武部，还有某一些保守派头头，在南昌城没有敢再来破坏革命事业，南昌城的秩序比较好，南昌城以外还在发生，今天向塘还有发生，这就是说，需要武装一部分革命群众组织，这当然要有计划、有步骤进行，首先应该在工厂进行，当然不排除在学生中进行，当然武装要掌握在人民解放军手中，一定要在统一的领导下进行。革命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鼓掌）总理：另外，湖南有这种情形，枪很多，不是落在造反派组织手里，而在社会上没有组织的人手中，南昌革命造反

派是遵守三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我现要问一句话，昨天请你们打电话回去，把在军区内设的拥军联络站撤出，撤了没有？（大联筹代表答：报告总理，我们已经打了电话，今天上午四点已经撤出，还有清华的几个同志，我们正在做工作。）

今后，军分区、人武部（总理：这是指地方的，就是江西七个军分区，还有南昌市人武部，连塘、景德镇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总理：已经发的，如果不是这方面（指造反派）各个军分区、人武部要进行检查，如果发现已经作了犯法的事，不是发到造反派，应该把它收回，由军区收回。我刚才讲的包括人武部，先人武部，各派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总理：包括汽车在内。）（鼓掌）

总理：这个决定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确定了，并且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批准的。（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好，这样子，除了这个问题以外，还有江西省军区党委检查报告，刘培善同志的检讨，还有江西省军区司令的，这个决定和你们“7·12”决议，一共是五个文件，明天发给你们，你们自己好好认真讨论一下。但是，你们个别代表可能有意见，首先对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你们深学吧！

（大联筹代表：报告总理，我们大联筹宣读一个保证。）

总理：你叫什么？（翻名册）

大联筹代表：刘美贵。

总理点头答应。大联筹代表宣读保证。（略）大联筹代表读完后，总理说：很好嘛！抄一份给我。（大联筹：好。）

总理：你们回去找个地方把今天发给你们的文件和中央决定，不管那一派，首先大联合筹委会，刚才有了表示，你们应该很好地去讨论。表示决心，刚才表示很好。希望你们做模范，你们这个文件（指大联筹的保证）给我一份，现在我已经说了，解释了多次，两个“刘”都不要打倒，让他们改正错误嘛！刘瑞森同志支持你们早，另一派提出打倒我们劝说了；刘培善同志你们应该允许他改正嘛！他们也表示坚决改正，你们如果要提打倒，你们这样对立起来就不利，其他我都支持你们。你们晚上回去睡好觉，明天好好讨论，希望对决定好好贯彻。今天大

会开了，希望你们很快回去，没有事情的早点回去，因为家里很多同志看着你们，有的差不多有两个多月了，有的一个多月了。祝你们胜利！

会后姚文元同志单独找大联筹负责同志刘美贵到大礼堂中厅作了如下指示：

1. 你们保证很好，回去要高姿态，正确对待保守组织，要注意政策策略，要注意团结他们。
2. 你们胜利了。不要象湖北、四川、湖南那样，当中央支持他们了，打内战打得很厉害，这样对革命有阻力，你们要防止这一点，做好工作，团结一致。希望你们江西要做出一个好榜样。
3. 你们以后的任务还很重。八月十四日我们单独接见你们，研究参加筹备小组的问题。

江西省大联筹赴京控告团赣州分团整理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三、筹备、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江西省南昌市各革命群众组织认真贯彻中央“九·五”命令，纷纷上交武器弹药》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江西省南昌市各革命群众组织认真贯彻中央“九·五”命令，纷纷上交武器弹药》的材料转给你们。南昌市各革命群众组织贯彻执行“九·五”命令的作法很好，可供你们参照执行。

南昌等地的经验证明，要能很好地贯彻执行“九·五”命令，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一）突出政治，首先做好思想工作。军队和地方都要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和中央的“九·五”命令，同时，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群众和全体指战员，深刻地全面地领会中央命令的伟大意义。

(二) 在群众思想提高的基础上，通过各派协商，落实执行命令的个体措施，做好武器、军事物资的清点、封存、上交等工作。在收交武器的过程中，要注意树立和宣扬好的典型，使各派群众自觉地把遗漏的枪支、弹药交出来，严防个人私自藏匿。四类分子隐匿武器、弹药不交者，要采取专政措施。

(三) 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全体指战员要增强组织性纪律性，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遇到问题，要调查研究，多请示报告。

(四) 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拥军爱民”活动，把贯彻执行“九·五”命令列入“拥军爱民”公约，军民团结一致，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坚决制止武斗，保证“四大”恢复生产。

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

(这一通知可在内部传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视察江西的指示

毛主席在江西视察时，一天上午，毛主席接见了江西革筹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光、刘瑞森、郭光州、陈昌奉等同志，作了重要的指示。

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同志、张春桥同志、汪东兴同志和余立金同志。程世清等同志向主席汇报了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亲切和蔼，谈笑风生，边听汇报，边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江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汇报到收缴武器的情况，到九月十六日止，全省收了×万支枪。

主席问：“这些枪是谁发的？我看两方面都发了，谁发的多？”

(答：军分区、人武部发给保守派的多。)

主席：“啊。”

接着汇报抚州问题。

主席教导说：“抚州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也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

当汇报到他们有一批人控制了九个县时，

主席亲自点了这九个县的名字：“临川、金溪、资溪、南丰、南城、黎川、宜黄、崇仁、乐安。”并说：“从这一点上看，他们是想扩大势力，进攻南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是军事叛乱。）

主席问：“你们定了没有？”

（答：定了。）

主席问：“批了吗？”

（答：总理批了。）

主席教导：“啊。实际是叛乱，是典型之一，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凡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角钱，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汇报到主席思想、政策已在江西广大人民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作用时，

主席教导：“五月底我们几句话给林彪同志，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河南、湖北。”

当汇报到吴瑞山他们封锁主席的指示，不告诉我们时，主席点了点头，笑了笑。

接着汇报了王景义在中共中央处理江西若干问题决定之后，他知道主席说话了，知道自己错了，在八月二十四日夏绍林开会决定打不打的时候，王景义不同意打，我们请示要保王景义。

主席教导：“要保，在关键的时候他起了作用，我看还应该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是受蒙蔽的，有些人犯了错误，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主席问：“六·二九事件时，支左部队来了没有？”（答：没有来。）

主席说：“他们估计中央会支持他们吗？他们先拿下南昌，全国不赞成也行。”

（答：他们想造成事实，逼迫中央承认。）

主席：啊。

主席又说：“王景义，造反派骂他，火线战报登了。火线战报总是讲刘培善、吴瑞山罪责难逃，没有周子韬，为什么不提周子韬呢？”

（答：周子韬是个副参谋长。）

当汇报到 31111 基本瓦解时，

主席问：“听说有些散兵逃到广昌、宁都，结果如何？”

（答：已经解散了。）

主席：“啊，已经解散了。”

当汇报到造反派对受蒙蔽群众有些报复情况时，

主席教导：“这就不好，你们要注意。你们这些（指刘、郭、黄）造反派的领袖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你们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恐怕你们讲话也不会完全听，杀人总是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他也不好，要说服教育。打击报复，下跪，戴帽子，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罗，这不好。”

主席说：“你们这里有个钢铁厂吗？”

（答：有个南昌钢铁厂。）

主席说：“火线战报登的南钢失守、庐山失守，已经收复了吗？”

（答：已经收复了。）

主席问：“庐山有个姓楼的吗？”

（答：有，叫楼绍明，原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

主席问：“这个人是哪一派的？”

（答：保守派的。）

当汇报前一个时候各地造反派都受到压制、打击，被迫跑到南昌来，群众说南昌是解放区时，

主席说：“啊，还出现这样一件事，恐怕不止是江西。”

汇报到夏绍林的问题时，

主席说：“对夏绍林的处理也要注意，坏是坏，和王景义有区别。”

汇报李胜的问题时，

主席说：“李胜变成了李败。”

接着主席问：“工厂、学校现在还有辩论吗？”

（答：保守派都瓦解了，造反派里面还有辩论。）

主席问：“到九江的火车通了吗？”

（答：通了。）

问：“公路、铁路都通了？”

（答：通了。）

主席问：“江西还有没有区？”

（答：大县有，小县没有了。）

主席说：“有人说，公社、区、县、专区已经瘫痪，什么叫瘫痪？总有人在那里吧，不是这一派就是那一派。九江军分区好象好一些。”

（答：×××比较好。）

主席说：“还有一个钟××吧？”

（答：现在改名叫钟光）

主席说：“他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

主席问刘、郭、黄：“你们回来多久？”

（答：一个月了。）

主席教导：“现在北京还有十来个省在那里，一个一个的解决，现在中央不提什么方案，让他们自己去吵，看吵出一个什么样子来。你们江西也是自己吵出来的嘛。现在那一派有在省里参加工作的吗？”

（答：联络总站已经瓦解了。）

这时汇报到汪明远，他自己回来了，写了检讨，现在被造反派拉走了。

主席：“把汪明远又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主席又问：“白栋材、黄知真怎么样？他们有无希望？”

我们汇报了白、黄情况。

主席说：“如果能改，能够争取几个人也好嘛。”

（张春桥插话：原来省委把知真安在第一线。）

主席就：“我看他做了许多工作，他在那里顶着。”

主席问：“过去省委是不是成立了一个什么组织来保护自己？”

（答：组织了工人赤卫队。）

主席说：“干部垮了这么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没有？总要给他们时间来认识和改正错误，要批评打倒一切的思想。”

（张春桥同志插话：现在还有许多人在南昌串联。）

当汇报到这些人又在搞反右倾、反复辟时。

主席教导：“那有这么多反复辟呀，他们已经垮了，不能再反复辟了，有一种说法索性垮了就垮了，其实天下不会乱了，天也不会塌下来。是教育左派的问题，不是右倾的问题。比如过去多少山头，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粤赣苏区、闽赣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通南区、陕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们用一个纲领团结起来，管他那一派，不能只要一个山头，不要别的山头，只有一派怎么行呢？过去我只认识陈昌奉同志，杨得志在井冈山当兵，后来带了一个旅在陕北才认识的，杨成武同志在长征时当团长，他说长征时在那里见过我，我忘记了，杨成武同志也是后来认识的，在座的过去都不认识，你们当师长的也不一定认识好多人，你们当军长恐怕也认识不多，有的知道姓不知道名，战士只知道××团长，××师长，××军长，也叫不出名字。我还是倾向于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极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吗，我们给他饭吃算了。”

当汇报支左部队被保守派打了四五百人时，

主席问：“有没有伤亡？”

（答：部队进驻抚州时，在路上遇到了夏绍林他们三道伏击，我们的战士都在汽车上，打到的都是头部、胸部、牺牲五人，五十七人受伤。）

当汇报夏绍林叛乱时，他首先把电台和密码搞走了。

主席听了很惊讶，“啊”了一声。

主席说：“过去江西省委说江西没有军队，要我向中央说一说，批一个师。”

接着问陈昌奉：“你们那个师多少人？”

（答：×××多个）

主席说：“是个小师。”

当汇报到七十六师李文忠排支左爱民事迹时，

主席说：“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三个人的照片，他们三个人都很年轻吗，现在这个排还有多少人？”

（答：还有十七个人。）

主席说：“江西还站出来一批干部吗？你们是省一级的，省一级要多站出一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干部？”

这时主席问刘、黄、郭是那里人时，郭回答是吉水人。

主席说：“有人说文天祥是吉安人，其实是吉水人。”

主席教导说：“我看过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吉安造反派跑出三千人，怎么能够消灭他们呢？总还有人留下吧？”

（答：有些留在地下活动。）

主席教导说：“现在有人挑拨战士反对官长，说你们每月六块钱，当官的钱多，还坐汽车。农民是愿意当解放军的，解放军很光荣，他们每月还有六块钱，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是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拨不起来的。”

主席教导说：“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了。战士一起来，火气就很大，龙潜（浙江）每天都斗，一斗就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吗。据说戴高帽子是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来的，现在不好了。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就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没有调军区和军分区的干部到北京教育，你们先把武装干部训练一下。”

（杨成武：“我们在北京开训练班，集中了几个省的干部集训。”）

主席接着说：“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过去开三级干部会，公社大队没有人来，都来也不行。江西有多少个县？”

（答：八十二个县。）

主席说，“可以分三批，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两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九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习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当汇报到十月间省召开全省造反派政工会议时，

主席教导：“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一批不行，可以训练二批、三批，造反派人很多，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还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具，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一下就转过来了。我对现在右派不那样看死，一训就转过来了，有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包括左、中、右（指教育面）。左派不教育变极左，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那有这么多赵永夫、谭震林，江西抓什么人？”

（答：红卫兵抓×××，×××，×××，还有人到福建去抓×××，总理要我们打电话叫回来。）

主席说：“你们的电话不一定要打。”

主席教导：“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了台，要使人有机会改正错误，你现在有理，但做得过火不好。”

这时汪东兴说：“现在十一点多钟了，谈了一个半小时。”

主席说：“就这样吧。”

（来源：原转载于江苏《一月风暴》1967年10月29日，第35期，第二，三版）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接见了江西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光洲、陈昌奉等同志，作了极其重要极为英明的最高指示。

陪同主席一起参加接见的，有杨成武同志，张春桥同志，汪东兴同志，和余立金等同志。

当程世清等同志走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面前时，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满面笑容站了起来，他老人家伸出伟大、温暖的手亲切地和程世清等同志一一握手，并问了每个同志的情况。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穿一身普通的布的便服，穿一双我们解放军战士穿的布鞋。这里我们报告同志们一个最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这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是全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记忆力非常好，洞悉一切，高瞻远瞩，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对我们教育最大，感受最深。主席对江西省文化大革命情况非常熟悉，非常关心，在谈话中，当谈到抚州问题时，毛主席亲自指出了抚州九个县的名字，“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在谈话中，主席曾三次谈到大联筹、大中红司办的《火线战报》。对江西过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比如“六·二九”事件，赣州事件、抚州叛乱事件，以及当前的情况，都很清楚。主席对当前江西文化大革命是满意的。我们向主席汇报当中，主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主席向我们问了很多问题，都是江西省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给我们作了许多最高最新的指示。

（一）毛主席对形势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主席的思想、政策已经在江西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的作用时，毛主席教导我们：“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同志、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毛主席还说，“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

当我们汇报到抚州问题时，主席听了汇报后教导我们：“抚州的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

“抚州问题实际是叛乱，是典型之一。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

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毛钱。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我们汇报《文汇报》写了一些好文章，影响很大时，张春桥同志插话说：“人家还反我们右倾，说我们变右了。”

接着，主席教导我们：“那有那么多复辟呀，他们已经垮了，不能再复辟了。有一种说法，索性垮就垮了。其实，天下是不会乱的，天也不会塌下来。”

（二）毛主席对干部问题的指示

汇报中间，毛主席指示：“干部垮掉这样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没有。总要给他们时间，来认识和改正错误，到批评打倒一切的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些人犯了错误，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当我们汇报到造反派里有的同志有报复思想时，主席教导我们：“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而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

“我看还应该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

“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样看死，有坏人是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了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要包括左、中、右。”

主席询问了过去省委的一些人的情况，然后指示我们：“我还是倾向于多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极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嘛，我们给他饭吃算了。”

当主席问了过去省委几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时说：“如果能改，能多争取几个人也好嘛！”

当我们汇报到正在集训军队一些干部时，主席教导我们：“开训练班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二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同志还要到外边抓什么人时，主席教导我们：“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了台，要使人有机会改正错误。”

主席还教导我们：“江西还站出来一批干部嘛。你们是省一级的，省级要多站出一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干部？”

（三）毛主席对造反派教育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大联筹准备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时，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练。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造反派人很多，一批不行可以训练二批三批。”

主席教导我们：“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人反右倾时，主席教导我们：“是教育左派的问题，不是右倾的问题。比如，过去有多少山头呀，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赣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通南巴、陕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们用一个纲领团结起来。”

（四）毛主席对参加保守组织群众政策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因为前一阶段造反派受迫害，压抑，现在有些同志有报复思想时，主席教导说：“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下跪子、高帽子、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啰，这不好。”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杀人总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人家也不好。”

当我们汇报到联络总站一个负责人自己回来，写了检讨，现在还在造反派那里检讨时，主席指示：把他“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五）毛主席对军队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人武部、军分区的情况时，主席很关心地听了汇报后，教导我们说：“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是受蒙蔽的。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那有那么多赵永夫、谭震林？”

主席还教导我们说：“你们先把武装部干部训练一下。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古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问题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俱，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还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一下就转过来了。”

主席还特别指出：“现在有人挑拨战士反对官长，说你们每月只有六块钱，当官的钱多，还坐汽车。农民是愿意当解放军的，解放军很光荣，他们每月还有六块钱，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是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拨不起来的。”

对江西军区搞四大，主席教导我们：“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啦！战士一起来火就很大。浙江现在每天都斗，一斗就是戴高帽、挂黑牌、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

当我们汇报到 6011 部队四排的事迹时，主席听了很满意，主席说：“李文忠排的事迹，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三个人的照片，他们三个人都很年轻。”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省二千二百万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最高最新指示。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来源：原转载于扬州《东方红战报》1967 年 10 月 5 日，第 93 号第一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注意工作方法”

1967. 11. 17；中发 [67] 349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条工作经验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作参考。其中第三条说到必须解决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的问题，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望各地认真检查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 5-1968. 5 [内部参考]》，1968 年 5 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江西省革筹小组正确对待极“左”派的经验

1967. 12. 25；中发 [67] 406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现将江西省革筹小组如何正确对待极“左”派的材料一件发给你们。这个材料中总结的经验，在全国一部分存在这类矛盾的地区和单位，是有参考意义的。希望你们自己也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需要我们经常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结经验教训。目前，当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于许多重大问题已作出指示和规定时，尤其需要具体的经验总结。如有比较好的典型材料，望核实后及时报告中央。

附：

江西省革筹小组正确对待极“左”派的经验

江西省革筹小组用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极“左”派，获得了显著的成效。江西的极“左”思潮，以南昌地区较为严重。六、七月份在南昌形成了一股近五千人的势力，称为“第三势力”。原来，省大联筹有的同志认为与“第三势力”的内战不可避免。但是，事实上现在却是一派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大好形势。新的权力机构省革命委员会即将成立。江西能够排除来自极“左”方面的干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省革筹小组能正确对待极“左”派是重要原因之一。他们主要掌握了这样五个原则。

一、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英明教导。革筹小组成员深入群众，调查了极“左”派的情况。认为，极“左”派中绝大部分群众是老造反派，有的单位（如医学院）在“火烧省市委”时期有较大贡献。他们的主要错误是以“反右倾”为名，一度把矛头指向省大联筹和省革筹小组。他们的幕后操纵者是大叛徒黄霖（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和少数坏头头马成新等，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可以教育的。省革筹小组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操纵极“左”派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与极“左”派的组织和群众严格区分开来，对极“左”派群众采取帮助、批评、联合的政策。例如九月二十八日，南昌航空工业学校发生武斗以后，省大联筹和极“左”派互相攻击，形势比较紧张。

革筹小组及时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这次武斗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挑动起来的，责任不在广大群众，并组织两派群众短期集训，要求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仇恨集中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阶级敌人的身上，揪出幕后策划者和杀人凶手。通过省革筹小组的工作，革命派提高了觉悟，从而稳定了局势。

二、紧紧依靠工人革命组织，教育他们始终不移地坚持斗争大方向。九月份，正当极“左”派借口为“三大户”平反，对省革筹小组施加压力时，革筹小组依靠省大联筹大张旗鼓地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视察江西时所作的最新指示，掀起大联合高潮。以后，当部分极“左”派在坏人的策划下不断挑起武斗、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时，革筹小组又教育广大革命群众，狠抓大方向，不受极“左”思潮的干扰。

省革筹小组领导同志，还经常深入工厂向工人宣传正确对待犯有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政策。九月下旬和十月上旬，正当极“左”派的活动达到高潮时，程世清同志到洪都机械厂，江西拖拉机厂等单位听取工人对形势的看法，教育工人阶级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抵制小资产阶级思潮，坚持斗争大方向。在省革筹的教育帮助下，广大革命工人不参加外单位的武斗，排除了极“左”派的干扰。

三、以活典型对省大联筹进行政策教育。省革筹小组认为，省大联筹与极“左”派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大联筹。于是，便狠抓对省大联筹所属组织的政策教育。省大联筹所属的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曾经准备摧垮极“左”派，提出了“引蛇出洞，穷追猛打，踩住狼尾，搞臭搞垮”的斗争策略。并且一度用打砸抓对付极“左”派。如九月底“南航”事件中，南航井冈山因该校东方红首先挑起武斗，他们便使用武装进攻东方红，要东方红缴械投降。省革筹小组及时抓住这些典型事件，旗帜鲜明地批评了省大联筹所属组织，对他们进行活的政策教育。十二月一日轻化工业学校发生武斗纵火事件后，省革筹小组领导同志亲临现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拘留了武斗纵火事件的策划者。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最新指示下达以后，省革筹小组同志便到师范学院、工学院和江西大学等单位和红卫兵小将们一起学习、讨论。小将表示：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按毛主席提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对待极“左”派的广大群众。

四、从教育入手，积极地把极“左”派引导到正确的方面来。革筹小组对极“左”派平等对待，热情帮助。早在九月间，革筹小组就多次邀集极“左”派负责人座谈，并多次深入南航、一中、医学院等单位对极“左”派的群众耐心讲道理。长江航空工业学校，是极“左”派的主力之一，革筹小组成员杨栋梁同志到这个学校大讲特讲毛主席关于“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的最新指示，使小将们走上了革命的正轨。他们感动地说：“起初我们认为程世清，杨栋梁等同志是带派性来的，感情对立。现在觉得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我们和杨司令员更亲近了。”这个学校克服极“左”思潮以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他们不参加武斗，主动交出武器，百分之九十的师生和工人，实行了革命大联合，掀起了复课闹革命的高潮。附属工厂制造摩托车的任务，十月和十一月就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创造了建厂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学校的转变，在社会上发生了良好的作用。由于革筹小组深入细致的做思想工作，许多有极“左”思潮的组织转变过来。如一中红八团，就敲锣打鼓向革筹小组送检讨书。南航东方红也自觉地作了“肃清我组织中的极‘左’思潮”的检查。

五、广泛发动群众，大搞“三查”。查走资派的幕后策划，查叛徒、特务的阴谋诡计，查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打击在幕后策划的一小撮阶级敌人。革筹小组遵循毛主席关于“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的最新指示，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这三种人。十一月初，正当省大联筹与极“左”派矛盾激化的时候，为了教育广大革命群众，打击极“左”派的幕后策划者，革筹小组请示中央同意后，把极“左”派的后台黄霖从北京押回南昌，交给群众批判斗争。经过群众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极“左”派组织的大部分群众看清了叛徒黄霖的反革命真面目，纷纷表示，要和黄霖划清界限，彻底肃清极“左”思潮。革筹小组因势利导，十一月初，发动群众，大搞“三查”。一个多月来，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如商业厅系统的商业厅战斗团（属省大联筹）和商系总指挥部（极“左”派所属组织）之间长期对立，不断发生武斗，致使文化大革命处于停顿状态。省革筹小组把两大组织的全部常委集合在一起学习。商业厅战斗团揭发了坏

人幕后操纵商系总指挥部的罪恶活动。会后，两派逐步消除了对立，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林彪对程世清等人的讲话

政治工作是管思想的、灵魂的，管革命化的。是各部门各单位的总管。政治统帅一切。我军历来是靠思想革命化，靠毛泽东思想领导的。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思想革命化，解放军就不成为解放军，就成为压迫军，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军队，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就不能战胜敌人。

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打仗，当然还有生产、施工等任务，但是主要的是打仗。对打仗历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识是艺高人胆大，一种是胆大人艺高。打仗主要是靠勇敢，靠不怕死。当然，技术、武器的好坏也有关系，但是，最主要的是不怕死。不然，其他工作虽好，但到了战场上就打不下来。

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搞好思想革命化，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党的存亡，政权的存亡的大事情，是人民得到一切还是丧失一切的大事情，这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没有政权就没有一切。军队靠政治挂帅，靠思想革命化，靠先进思想来领导。是要突出政治。我们要坚定走突出政治的路，但军事并不是不要了，军事是在政治统帅下的。事实证明，政治工作作好了，训练也就搞好了，生产、施工，内部团结，纪律，军民关系也就搞好了，仗也打得好。事情是千头万绪，但必须抓住主要的，抓住主要的，一切就迎刃而解，如果只抓住千头万绪，忘记了主要的，就糟了。带人就是要抓住人，人是活的武器，政治工作作的好，其他一切工作都好了。政治工作要摆在第一位，不能摆在第二位，第三位，更不能摆在其他位置上。

人不能多，三个和尚没水吃。

向上请示，向下抓活思想。下边的活思想不断地变化，上边的任务也不断地提出，所以要不断地抓两头，否则工作是作不好的。

一个是要抓毛著学习，一个是要抓群众的活思想。一个是要抓思想问题，一个是要抓组织问题。学毛著一个是在背字上狠下功夫，一个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看主要的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一个出主意，一个用人，一个是抓群众思想革命化，一个是抓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那里的政治工作好，那里就会出干部，就出欧阳海、黄继光、雷锋、李文忠这样的人。

江西当前形势很好，过去乱的很透，群众是好的，讲道理的。我们的任务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所有的人，第一是作好政治思想工作，这是最基本的。现在有坏人在混水摸鱼，要揭露，揭露就好了。

对干部要边走边看，有些干部要在很长时间才能看出。先进思想不是工农自发产生的，先进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吸取了外国的先进思想，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也吸取了中国古代的先进思想，但是是批判地吸取的。所以毛泽东思想，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我们的军队、国家、党，之所以有今天，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毛泽东思想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世界的面貌，并将继续地改变着中国和世界的面貌。

我军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什么？一个是要突出政治，一个是什么样。选拔的干部要有工农本质，要过好突出政治关，工作作风要迅速，准确，泼辣，还是在工人农民中找骨干，他们懂得阶级斗争，懂得生产，懂得生活，上海就是走工农路线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7. 12. 30； 中发 [68] 1 号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的报告。中央同意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其中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鲁鸣、罗元昕、陈昌奉、黄先、刘瑞森、郭光州、丁士来、于厚德、许洪云、李鹏、于德馨、万里浪、蔡松龄、涂烈、汪桂荣、吴才榜、陈全生、周开炬、蔡方根、张行阳、龙标桂、刘剑秋、王萱春二十六人为常务委员，并由程世清同志任主任，杨栋梁、黄先、于厚德、万里浪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将与江西省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井冈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响彻云霄的凯歌声中，在光辉灿烂的一九六八年来到的时候，从毛主席亲手创建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

我们谨向英雄的江西革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江西部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四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在井冈山树起了革命的红旗，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革命道路。从那时起，英雄的井冈山儿女，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在百战百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赤胆忠心干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江西的代理人方志纯之流，长期以来，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使江西这块红色老根据地改变颜色。忠于毛主席的江西革命人民，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英勇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冲破重重阻力，战胜狂风恶浪，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千条万条，贯彻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见面，为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掌握，变成千百万群众自觉的革命行动，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

江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驻江西部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模范地体现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他们始终把学习、执行、宣传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们组织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他们用多种多样的形式，把毛主席的伟大声音，最迅速、最广泛、最深入地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受蒙蔽的群众，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这样，他们就以迅速的步伐，实现了全省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了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

“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西省部队广大指战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全力支持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在他们之中涌现出了象英雄四排和李文忠同志那样的支左爱民模范，为全国军民树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榜样。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千条任务，万条任务，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继续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学用结合，立竿见影，把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狠抓“斗私，批修”，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我们坚信，英雄的井冈山儿女一定会遵循毛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伟大教导，戒骄戒躁，乘胜前进，让毛主席亲手树起的井冈山红旗高高飘扬，万代飘扬！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社论）

四、批林批陈 批判程世清的错误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韩先楚同志和我们十一个同志，从三月二十七日起，先后到达北京。二十多天来，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重要指示，联系江西的实际，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开了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大家都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毛主席四月十五日的重要指示更进一步给我们指出了解决江西问题的方向，大家表示坚决拥护，并就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进行了研究。现将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全省范围内，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展了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全省军民进一步看清了林贼一伙的反革命真面目，进一步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了党、政、军、民的革命团结。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江西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许多成绩。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

但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江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程世清同志。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林贼叛国投敌、自取灭亡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事实上，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反映得很尖锐、

很突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交代，早在“九大”以前，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谎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反动言论。一九六九年九月，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窜到井冈山，阴谋策划在江西建立反革命“根据地”，林贼还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同程世清同志进行了广泛深谈。林贼同苏修一唱一和，胡说什么“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程世清同志积极执行了林贼的黑“指示”，为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效劳。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期间，程世清同志与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等多次密谋，向党进攻。庐山会议以后，程世清同志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制造水陆两用汽车，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六、七、八、九月间，林贼的死党周宇驰、刘锦平、查全伦、程洪珍、王佐、顾同舟、解耀宗等人，纷纷窜到江西，紧锣密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程世清同志先后同周宇驰、查全伦、顾同舟、解耀宗见面谈话，相互送礼，行动很不正常。

几年来，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受到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的交代，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程世清同志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例如：在农村中，不区别具体情况，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全面实行扩社并队；不根据当前农村经济的实际可能，不考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便，拆掉一批民房盖新村。在城市中，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全部解散；不区别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界限，均按地、富、反、坏对待；要南昌市拆掉大批房屋，另建新城镇。在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工作中，存在有乱出主意，乱提口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错误。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作风上，骄横跋扈，家长制，一言堂。尤其严重的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有的严加封锁，有的肆意歪曲，有的弄虚作假，欺骗干部和群众。

程世清同志的严重错误，阻碍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给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二十多天来，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下，在韩先楚同志主持和帮助下，通过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而耐心的教育帮助，程世清同志对自

己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逐步有所认识，作了初步检查，并且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回去接受群众揭发批判，继续向党作彻底的检查，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大家表示欢迎。杨栋梁、文道宏、李登云三同志，也初步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于德馨同志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全体与会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路线觉悟，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这对于推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促进江西各项工作的胜利前进，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

为了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们研究了如下几项措施。

一、继续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抓细、抓好。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一系列指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联系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深入揭发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要认真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将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二、进一步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纠正损害党的领导的各种错误倾向。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委成员都应当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正确处理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相互关系。要建立和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及时请示中央。

三、人民解放军驻省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保卫国防和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立下了不朽功勋。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进一步做好拥军爱民工作，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要按照中央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切实改进三支两军工作。省军区、军分区和各级武装部，都是同级党委的军事部门，应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省军区要尊重福州军区的领导。

四、有计划、有步骤地传达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的斗争情况。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

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揭发、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要从有利于增强革命团结、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原则出发，工作要细，步子要稳。

在传达过程中，必须着重说明：（一）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全省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的所谓“借用力量”、“固守江西”，正如中央所指出的：“只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江西，犯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只是个别人。（二）党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包括犯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内，只要他们彻底交代，认真检查，坚决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我们就应当欢迎，准许人家革命。

五、在发动群众，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同时，在省委常委领导下，组织一个清查小组，彻底清查林陈反党集团的死党分子在江西的阴谋活动的罪行。

六、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对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坚决纠正，以利于深入开展斗、批、改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要向干部和群众讲明，产生这些错误的责任在省委，主要在程世清同志，不能责备下面。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目前，春耕大忙已经到来，各级党委切记不违农时，把农村工作安排好。

七、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和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时，一小撮阶级敌人必然要乘机捣乱和破坏；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也可能借机制造混乱，甚至为阶级敌人所利用。各级党委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八、全省各级干部，全体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各级党委，必须牢记“九大”团结胜利路线，以大局为重，时刻注意党的团结。对于犯过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就应当团结他们，信任他们，帮助他们做好工作。犯了错误的同志，也要放下包袱，积极工作，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一定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把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以路线斗争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

我们打算，第一步，召开省委常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会议，第二步，召开省委全体(扩大)会议，吸收地、师、军分区负责同志参加，第三步，再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彻底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批判程世清同志的错误，检查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段的工作。会议以后的安排，另行报告中央。可否，请指示。

程世清 杨栋梁 文道宏白栋材 李登云 于德馨黄知真 陈昌奉 熊振武张志勇 邹文泗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1972.04.27；中发 [1972]17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语

中共江西省委：

中央同意江西省委和驻赣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一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江西的实际，认真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和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斗

争中，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利于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纠正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认真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文件原题为：中共中央批语）

四、十月政变后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审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江西的八名重要案犯侧记
（《江西日报》记者 宋天星）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江西的重要案犯涂烈、万里浪、蔡方根、陈全生、蔡松林、张羽、魏厚庆、曾凡珩终于被押上了被告席，受到了江西人民的正义审判！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执行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从 1982 年 12 月 13 日开庭分别对这八个案犯连续进行公开审理。

法庭按照人民的意愿，对八个案犯一一进行审问，出示大量证词、供词和其他书证、物证，无情地揭开了这帮历史的丑类一次次策划篡夺江西党、政大权的内幕：

1967 年 1 月中旬，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夺权后，魏厚庆、曾凡珩等人在 1 月 19 日、20 日两次秘密集会，密谋夺取江西省党、政领导权。魏厚庆在会上迫不及待地叫嚣“上海夺权有几天了，我们不能再等了”，并由他充当反革命夺权班底的负责人。1 月 26 日，魏厚庆、曾凡珩等人按照密谋，同时在省人委和省委两处举行夺权大会，公然宣布“接管省委、省政府领导权”，强行将几位省委书记抓到台阶上戴高帽子。2 月 8 日，他们利用窃取的权

力，召开批斗省委、省政府领导人的大会。这股夺权妖风很快刮遍全省各地，数以万计的干部遭到揪斗，各级领导机构陷于瘫痪。

众所周知，当时省委、省政府被这伙反革命分子搅乱之后，省军区遵照中央指示主持着江西的日常工作。涂烈、万里浪一伙就把省军区视为夺权障碍，猖狂策动反军乱军。法庭调查表明，万里浪、张羽是大闹军区的主犯。1967年5月，万里浪伙同张羽秉承江青反革命集团“揪军内一小撮”的旨意，打着“反逆流”的旗号，炮制了反军乱军的“五项要求”，直接策动在省军区门前“静坐”闹事。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大肆进行反革命的宣传煽动。在万里浪、张羽的一手控制之下，“静坐”闹事持续两个多月，肆意冲砸军区机关，劫走绝密文件，抢夺枪支弹药，殴打值勤战士，绑架、劫持福州部队和省军区领导人。在他们的煽动下，全省有四十二处军事机关受到冲击，打伤部队干部、战士四百多人，抢走轻、重武器一千四百多件，各种子弹一万二千余发。

“千条万条，归根到底自己掌权”，这是八名案犯的一致自供状。1973年底，他们又兴风作浪，再次大乱江西，疯狂叫嚷要把重新出来工作的省委领导干部“再一次打倒”。法庭对起诉书指控涂烈等人1973年12月25日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写信诬陷省委领导，以及涂烈与王洪文密谋篡夺省委领导权的罪行进行庭审调查。被告涂烈坐在被告席上，当年不可一世的气概没有了，但他强作镇静以掩盖着内心的恐慌。当法庭工作人员根据审判长的要求，把涂烈写的亲笔信稿拿给他辨认时，他不知所措，一会儿说“是”，一会儿又说“不是”，最后装模作样再看一下才供认“是我亲笔”。他在信中咒骂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抵制“四人帮”的正当行为是“反攻倒算”，点名批判省委领导同志。1974年2月20日，王洪文在北京单独召见涂烈，密谈三个多小时，具体授意他夺取江西省委领导权的步骤，声称“斗争从你的信开始”。涂烈受宠若惊，十分卖力，一回到南昌就纠集同伙开始夺权活动。3月10日，涂烈在省“三全会”大组召集人会上，煽动对省委书记余积德、白栋材、黄知真“要一面揭、一面批”。在“四人帮”的支持下，涂烈、万里浪一伙篡夺了对“三全会”的领导权，肆意诬陷、迫害三位省委书记。他们还搞“会内会外结合”，指使同伙到各个地、市去“层层揪孔老二”，致使全省局势相当混乱。案犯万里浪在法庭上供认，1974年2月初，他伙同张羽等人窜到抚州、吉安、赣州、九江等地，大肆进行反革命煽动，

诬陷省委领导人“搞右倾复辟”。2月中旬，他又纠集蔡松林等人拼凑“省、地、市上访团”，三次围攻省委领导人，逼迫释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的杀人犯、打砸抢分子二百二十四名。

法庭调查还进一步证实，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涂烈、万里浪等人也在江西遥相呼应，篡权活动步步升级。1976年3月，涂烈纠集蔡方根等人在南昌市西湖路二十一号秘密集会，传达王洪文的加快夺权步伐的旨意，结成以涂烈为头子的“七人”反革命核心。他又通过蔡方根控制“二十一人”帮派骨干组织和“江卫文”材料班子，一方面建立“武斗小分队”，进行武斗，一方面搜集印发诬陷省委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大造反革命夺权舆论。反革命分子万里浪也步步紧跟江青反革命集团，竭力诬陷、诽谤省委领导人和邓小平同志，把他们一伙煽动停工停产、停水停电造成的恶果嫁祸于省委领导人，妄图一举全面篡夺江西省的党、政领导权。

1983年元月26日上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开庭一审宣判：依法判处涂烈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判处万里浪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蔡方根、陈全生、蔡松林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张羽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魏厚庆、曾凡珩有期徒刑各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四、李九莲案件始末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李九莲给曾昭银的信

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明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

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

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

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祝好！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一九六九年 李九莲日记

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是偶像和倾向的名词，都有具体的内容和实质。他们之所以伟大美好，就是给了人民以幸福，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我们歌颂和拥护他们，不是从名词和形式出发，而是从得到了解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在我国，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实践体验是符合的。但是，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情况下，这些名词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感受，有时是相反的。

火热的“三忠于”配合着极左政策，将给人民的思想带来什么？

- 一、将割裂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 二、将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 三、将真正损害领袖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

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忠于”……（注：此处被公布此日记的资本主义者故意省略，本书编者无从查考）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血淋淋的教训摆在毛主席的面前。我痛惜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

“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政治迫害就是这样产生的，因而它不是无根无据，而是有根有据。问题在于，它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路线和思想来指导，对问题作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结论，而在本质上，它是用腐朽的来扼杀新生的，用错误的来反对正确的。

红梅报春早。不做百花苦争春。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是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在无光的黑夜里边，发出自己的光，照亮一片小小的角落。而当太阳出来了，它心甘情愿地消失……（注：此后被公布此日记的资本主义者故意省略，本书编者无从查考）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赣州地委书记吴清明在地市直属单位干部会上关于处理调委会问题的讲话

编者按：从此历史资料可以看到，革命志士、造反派李九莲同志在当时的人民群众眼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者，不仅有“共产主义人生观”，还有“摆脱私有影响”的“恋爱观”，是“最好的革命接班人”、“反林彪的英雄”、“反潮流的坚强战士”，是“当代的法家”。李九莲同志不死！共产主义不死！

同志们：

（报告无关的开头部分省略）

下面着重讲一讲关于处理“调委会”的问题：

- 一、前段进展情况

省委关于处理李九莲案件问题的四点指示和地委的八条决定传达贯彻已经一个月了。一个月来进展情况很好。广大干部群众对省委的指示、地委的决定热烈拥护，坚决支持。他们说，这些措施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普遍要求。并且批评地委过去对这个问题态度不硬，处理不力。认为“早就应该这样做了！”现在这样做了，大家感到大快人心。绝大多数领导同志、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革命职工在这场斗争中立场坚定，态度是积极的。他们坚定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贯彻执行省委、地委对这个问题的指示、决定，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表现在：

1、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它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阶级敌人利用李九莲案件大做文章，兴风作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他们不甘失败、垂死挣扎的表现。他们的许多反动言论和林彪在“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中的恶毒语言同出一，这正好说明了必须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这件事情的出现也从反面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要干反革命勾当，总是要欺骗一些人，蒙蔽一些人；而我们队伍中某些路线觉悟不高的人，革命意志薄弱的人，个人主义严重的人，有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过去受过党和群众批评审查而有怨气的人，最容易上敌人的当。许多同志从这里认真总结了教训，提高了觉悟。不明白真相的群众，经过教育绝大多数都已经觉悟过来，早已停止活动，表示和李九莲彻底划清界限，起来揭发、检举坏人。

2、暴露了一些重要敌情。省委指示中指出：“李九莲案件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从现在揭发和暴露的问题看，证实了省委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李九莲案件问题上，在“调委会”问题上，确实是阶级敌人插了手的。这些敌人，有的是在幕后进行操纵，有的是在幕前公开活动。他们利用李九莲案件猖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干扰批林批孔，破坏大好形势。现在广大干部群众正在检举揭发这些幕前幕后的阶级敌人，查清之后，我们将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进行处理。通过揭露和打击这些阶级的敌人，必将进一步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稳定局势，发展大好形势。

3、挽救了犯错误的干部和调委会的骨干。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和地委的决定，我们对调委会少数骨干成员分散到本单位办了学习班，由本单位党组织、革命干部、群众对他们进行教育，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团结、教育、挽救。经过一个月来的工作，说明这样的做是完全正确的，效果是好的。已经办学习班的“调委会”骨干，大多数已经开始认识错误，并且揭发了不少问题。有一部分由于转变较快，表现较好，已经结束了学习班，回到生产和工作岗位。现在参加学习班的调委会骨干，大多数认识到，省地委这样做，对他们确实是政治上的关心和挽救，是给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的一个机会；否则就要继续滑下去，走向反面。因此，他们对党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很感激，结束学习班的调委会骨干回到生产和工作岗位后，广大群众热情欢迎他们，团结他们一道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过去支持过调委会的领导干部，多数认识有提高，态度有转变，能坚决按省委、地委指示办事，大胆开展工作，并且主动向群众检查自己的错误。通过处理调委会问题，通过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批评教育，团结了更多的干部和群众。

4、进一步稳定了局势，推动了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通过调委会问题的处理，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增强了革命团结，促进了革命和生产。大家记得在调委会未解散前，由于阶级敌人利用调委会兴风作浪，干扰了批林批孔和工作、生产的正常开展，也搅乱（了）社会秩序。现在，通过贯彻落实毛主席“安定、团结”的指示，通过（对）调委会的处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狠抓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样革命的正气就上升，歪风邪气就下降，机关工作更正常，社会秩序更安定，工厂劳动纪律有了加强，广大职工积极性更高了。有些单位生产成倍增长。有些原来生产不正常、有时停工停产的单位，最近都能正常生产。

赣州市的街道秩序也大有好转，不少人反映，现在晚上上街都更放心了。事实证明：省、地委对调委会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是保证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进行下去的需要，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需要，是增强革命团结、稳定局势、发展大好形势的需要。阶级斗争越抓，局势越稳定；越抓，革命和生产形势越好。

处理调委会问题目前还在继续进行。现在，各单位进展不平衡。有个别单位对省委的指示决定没有很好贯彻，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对处理调委会的问题没有认真抓，这主要是这些单位的领导对这场阶级斗争认识不足，不敢大胆抓。有的领导干部过去支持过调委会的活动，他们不是主动讲清问题，认识和改正错误，而是消极对抗，或者吹冷风，或者捂盖子，有的还在背后搞名堂。最近我们收到一些群众来信，反映某些领导干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些领导干部应该迅速觉悟、转变立场；否则，就要继续犯错误。还有的单位，把这场斗争看得很简单，认为上级指示传达了，讨论了，就行了，或把处理调委会问题，看成只是办几个骨干的学习班；不是发动广大干部职工起来开展革命大批判，检举揭发坏人，使群众普遍受到教育。个别单位对调委会骨干学习班抓得不认真，对不明真相的群众也教育不够。还要看到，有的人还在秘密进行串连活动。有那么几个人（钟海源为首，后判 12 年终被处死一编者）还写小字报，印传单，甚至到剧场去散发，而且明知有外宾在，还要这样做。这是要严肃处理。我们要警惕有的人无中生有，造谣煽动，企图制造混乱，挑起事端，干扰和破坏我们的的大好形势。调委会早就不得人心，越搞越臭，越搞越孤立；现在有的人还想搞名堂，只能越走越远，决没有什么好下场。

二、关于“调委会”的真相

“调委会”闹了半年之久，长期不得解决，过去本地和外地同志们都议论：“为什么在赣州出现这样的怪事：有些人不批林不批孔，却搞什么调委会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翻案？这里面究竟有什么问题？”现在，就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讲讲这个问题。

首先，关于调委会的性质。这个问题省委四点指示已经讲得很明确：“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现在揭发的情况说明，省委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调委会”决不是一般群众由于对批林批孔运动的特点认识不清而成立的“战斗队一类的组织”，它是由于阶级敌人煽动、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利用李九莲案件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非法组织。过去朱毅、方道球（原赣南日报总编辑、九二盐矿党委书记，后判二十年一编者）等人，为李九莲和调委会大肆鼓吹，百般辩护，竭力掩盖李

九莲的反动性和调委会的非法性。他们不仅说李九莲无罪，并且还说李九莲有功。把她说成是“反林彪的英雄”（市建严金禄语，后判八年——编者），“反潮流的坚强战士”，“当代的法家”（地区外贸吴文浦语，后判七年——编者），“发展中的马列主义”（林峰语——编者），“最好的革命接班人”（赣州一中工宣队队长孙成章语，后监禁三年——编者），胡说李九莲不仅有“共产主义人生观”，还有“摆脱私有影响”的“恋爱观”（人防办卜小松语——编者），而且她的爱情生活还使他们感到“灼热深情”，真是荒唐得很，肉麻透顶！

他们为什么要狂热地把一个反革命分子吹捧成为“英雄”呢？无非是要说明李九莲翻案有理，调委会名正言顺；无非是说我们党和政府，我们广大革命群众反对李九莲翻案、反对调委会的非法活动是什么“执行反动路线”，“破坏四大”，“镇压群众”，“压制反潮流”等。好家伙，帽子真大呀！

尽管朱毅（教师，后判二十年——编者）、方道球等人散布了种种谣言和诡辩，但他们改变不了也掩盖不了李九莲的反动性和调委会的非法性，因为这是铁的事实，事实胜于雄辩。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李九莲案件和调委会的活动。

李九莲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案情公布之后，大家都看到，她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而且有言有行，通过写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等手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是严重的，罪证是确凿的，定性是准确的，处理是宽大的。但她不思悔改，反而趁批林批孔之机，窜回赣州市，接过“反潮流”的口号，以“反林彪的英雄”出现，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大肆进行翻案，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批林批孔，我公安机关将她重新拘留，这是及时的、必要的、完全正确的。现已查明其翻案罪证确凿，决定逮捕法办。对这样一个反革命分子，调委会某些人为她鸣冤叫屈，百般辩护，那是别有用心，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们说李九莲出身工人家庭，本人是红卫兵、造反派，不可能反革命，即使有错也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一时失足（气压机厂谢明语——编者）”。这是机械唯物论，看不到事物是发展的，人是会变的，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说明，她完全接受了刘少奇、林彪、孔老二的一套反动思想，她的许多话都与“571”一样，这是偶然的吗？她把反革命的思

想变成反革命的行动，写反革命匿名信，妄图搞反革命串连，成立反革命组织，这是一般的错误吗？这一切都说明她完全背叛了工人家庭，背叛了红卫兵。

李九莲和为李九莲翻案的调委会的某些人，特别提到她所谓“反林彪”的问题。其实她是把文化大革命污蔑为“毛林派”与刘少奇的所谓“宗派斗争”，并认为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完全是攻击毛主席，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怎么能说“反林彪”呢？当然有一两句怀疑林彪的话，其实她是把林彪与毛主席联在一起反的，从根本上看她是攻击毛主席的。她的全部反动言行，正是按林彪的反动观点、反动路线行事的。

他们还说李九莲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就是“同志”，就有“四大权力”。这些人恰恰忘了她是个现行反革命这个本质，党和政府对她的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并不改变她的性质。对这种人，党和政府宽大她是为了改造她，但决不允许她捣乱破坏；如果捣乱破坏就要从严处理：这是我们党的政策，是人所共知的。李九莲跳出来翻案，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这就是破坏批林批孔！我们决不能给她什么“四大权力”，只能对她专政！

还有些人说什么“运动期间不能抓人”（教师赵诗镜语，后判十年——编者）这是什么理论？这是哪里的规定？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至于方道球同志说什么“抓了李九莲是杀鸡给猴子看，压制群众反潮流”，这是认敌为友！把李九莲的反革命活动与革命群众反潮流混为一谈。这种论调只能为敌人所欢迎，对反潮流的广大群众是个重大的侮辱。我们倒要问：为什么抓了反革命李九莲广大群众都叫好，而方道球同志却会感到受压呢？这是一种什么立场，什么感情？

在广大群众对李九莲案情越来越明确，调委会为李九莲翻案的理论被人们看穿了之后，方道球又玩弄一个手法，妄图迷惑人，他说“李九莲问题…和一般案件不同，有她的特殊性”，“决不是领导机关一个简单决定或者几个武断的通知所能解决的问题”，还说什么李九莲问题涉及到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各个领域，要大家从各个领域去研究。真是说得玄妙得很！一个已经根据确凿的罪证和按照党的政策定性准确的李九莲反革命案件，竟然要从各个领域甚至包括文学、艺术方面研究之后，再作结论，这是什么用意呢？这是别有用心！说穿了就是叫人不要听省地委的决定，要再研究下去，直到研究出李九莲

不是反革命而是“反林彪的英雄”，才是他所谓的“正确的结论”！方道球同志真是煞费苦心，但是这一套能骗得了谁呢！

再看调委会的活动。他们不是给调委会挂了许多金字招牌，说它是“群众性的组织”、“具有反潮流精神”、“观点是正确的”、“大方向是对的”吗？其实这些统统是胡说！什么“群众性”，是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欺骗一些人不明真相的群众；什么“反潮流”，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逆革命潮流而动；什么“观点正确”，帝修反和林彪咒骂我们的那套反动语言都用上了；什么“方向对”，按他们的意志搞下去，只能是地、富、反、坏、右上台，资本主义复辟！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调委会究竟搞的是什麼名堂！

（一）先看调委会的纲领。现在查出，调委会从非法成立那天起，到我们宣布解散为止，前后共发表过十五份像“声明”、“公告”一类的东西（其中由朱毅一手泡制的就有十三份）。朱毅四月份写的《众手掀翻独霸天》是调委会纲领性的宣告，他们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说成是“独霸天”，这和林彪“571”工程纪要中污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为“独裁”是一个腔调。他们叫喊“让我们扭转乾坤的双手，众手掀翻独霸天吧！”调委会叫喊要掀翻“独霸天”，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他们的要害！

他们在六月二日《联合声明》中又写道：“李九莲的再次被捕是右倾复辟势力新反扑的信号弹”；李九莲问题的争论，“是复辟势力压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捂盖子、保林彪死党的烟幕弹”；他们说：“不调查就无以争论，不放人就无以调查。”这是什么逻辑？反对李九莲翻案，抓了李九莲，就是右倾复辟，转移斗争大方向；岂不是让李九莲翻案，让牛鬼蛇神一齐出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反复辟正确的方向？这完全是反动逻辑！值得注意，如果说《众手掀翻独霸天》是在赤裸裸的打着白旗反红旗，那末这个声明是在所谓“反潮流”、“反复辟”的口号下为反革命翻案，这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后来朱毅又露骨地说：“现在要讲就讲翻案，过去讲重新审查是运动的策略，李案现在不翻，更待何时？”他们还说：“翻李九莲的案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而是突破口”，“要把千千万万个李九莲的案翻过来，这才是根本的目的”（林业局邓清华语，后判七年——编者）；并扬言什么“凡是过去被你们搞臭了的，我们今天就要把他们搞香来”，“要翻个底朝天”等等。这就不难看出，调

委会的某些人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为一小撮阶级敌人鸣冤叫屈，为地、富、反、坏、右翻案，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他们的活动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

（二）从调委会的组织活动看。调委会的幕前幕后是有阶级敌人的。其中有地富反坏右分子，有劳改释放犯，有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四处出动，网络社会渣滓，设立接待站，与一小撮牛鬼蛇神串通。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有那么一个人，调委会的骨干都知道他问题严重，他劳过改，释放出来后又为非作歹，这次他积极参加调委会活动，惟恐天下不乱，到处插手，甚至鼓动一些人要把地委领导干掉。许多事实说明，混在调委会的坏人，是什么事可以干得出来的。他们用反革命两手对付我们，不仅有文一套，还有武一套，有的就公开叫喊：“赣州发生武斗，就对我们有利！”事实上他们已经搞了武斗。他们有公开一套，还有秘密一套，组织里面，核心里还有核心，有一线、二线、三线。总而言之，这场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当然，参与支持调委会活动的，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是受骗上当的。还必须指出，参加和支持调委会活动的还有我们某些领导干部，有的领导干部在这方面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有的给钱给物，甚至在背后出谋划策，支持李九莲翻案，这些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了，连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都分不清，竟然支持反革命李九莲翻案，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这样对得起党和群众吗？这些同志应该猛醒了！

（三）调委会散布的反动观点。调委会某些人利用大字报、广播、演讲、刊物等形式，为反革命分子李九莲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有许多言论是极其反动、极其恶毒的。下面仅用部分材料来说一说：

1、攻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调委会有一个骨干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救世主”（粮油机械厂罗斌语，后判十五年——编者），“公安六条第二条是形而上学的，是机械唯物论，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气压机厂管佑龙语，后判十五年——编者），“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第一把手要负责”（冶金十三队刘挺荣语，后判十五年——编者）。还狂叫不能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胡说这些口号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

（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编者注）还有的“调委会”骨干多次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这个是“右倾复辟势力的总代表，”“5.16”的黑后台，那个“对造反派没有感情”，是“马林科夫”，“要下台的”。他们直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许多中央领导同志，思想十分反动。

2、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咒骂公安机关是“法西斯”，叫喊要“踏平人间地狱”，还叫嚣“制度要变，法律要改”（管佑龙语——编者）。他们全部否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肃反成果，多次叫喊“江西的三查、一打三反大方向错定了”（运输局邱彩云语，后判十年——编者），“凡是过去被你们搞臭了的，今天就要把他搞香来”（接插件厂肖国涵语，拘捕——编者），这是赤裸裸地叫喊要把被我国人民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党内机会主义分子重新扶上台，它和林彪“571”工程纪要中说的要给所谓受迫害的“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自来水厂廖根生语，后判五年——编者），同唱一个腔调！还有的别有用心的歪曲中央 25 号文件，说“贺龙能平反，李九莲也一样能平反！”（矿机厂朱修仁语，后判五年——编者）

3、污蔑我国的大好形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调委会的一个重要成员（赣南纸厂工人林锋，后判五年——编者）用毛笔写着：“大局不宁，宁戡乱；人心所向，向九天：以放为好，以放为妥。”这是什么话？林彪污蔑我们“政局不稳”，他们说我们大局不宁；国民党反共叫戡乱，他们也叫戡乱：这不是明显的跟林彪、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吗？方道球在他的演讲报告里，把省委关于陈万兆同志停止工作进行检查的决定说成是“转嫁”政治危机，这同林彪“571”工程纪要中的话不是也一模一样吗？朱毅在他的《野草》中更是篇篇充满对我们的大好形势、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和诬蔑。他在《野草：发刊词》中第一句就说“今天，我们的野草在投枪的啸响和匕首的寒光里萌出了第一片嫩叶。”社会主义社会被他看成是一片“投枪”和“匕首”的“寒光”，这和他们骂我“法西斯”、“白色恐怖”是一个意思！在《野草》第十二期里他胡说：“今天，‘无权即无钱’的公式和‘反潮流即反革命’的公式一样流行时髦，这已经是政治常识了。”在《野草》第十三期里，几次引用爱伦堡的话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荒淫和无耻！”朱毅等人就是用这样的一些恶毒的语言

来污蔑我国无产阶级政下的新中国，可见他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何等仇视啊！

4、攻击党的领导，辱骂党的干部。朱毅把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污蔑成“争乌纱帽戴”的官僚了：把党培养新生力量，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说成是“争乌纱帽戴的好时机”；胡说“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提出以后，戴乌纱帽的天地就更加广阔起来”；污蔑我们的干部状况是“胆大的造反，胆小的生产，胆子不大不小的偷懒”，“表面信仰共产主义，内心的信仰是十五号万岁（15号领工资）”。有的甚至骂我们的干部是一群“狗”：什么“天狗”、“小狗”、“看门狗”、“哈叭狗”（邱彩云语——编者）等等，真是恶毒至极！

5、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破坏批林批孔活动。朱毅在他的《野草》中说“运动运动就是要乱要动”，“要大着胆子骚动下去”，污蔑党中央强调批林批孔运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是“给大大小小老老少的官们祭起了一块‘一元化’的禁牌”，“插在群众面前曰：‘不许动！’”还胡说：“李案之辩具有儒法斗争的鲜明特色”，“李九莲的人生态度鼓午年青的当代法家抛弃私利，冒顶风险，献身革命”。

6、反对稳定，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中央26号文件下达后朱毅说：“地委不解决李案问题，休想安定！”“你们不要高兴太早了，赣州的局势稳定不了！”另一个调委会成员说：“现在以安定为好……我吃饭都有点包袱。”方道球在他的所谓演讲报告中歪曲我们经过八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好形势，叫喊“批林批孔运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还说：“运动越深入，阻力越大”，现在只能“放”。他大讲所谓“收与放”的问题，歪曲毛主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讲“放”；根本不提“放”的内容，是“香花”还是“毒草”，根本不提毛主席提出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这和当年右派向党进攻鼓吹的那一套又有什么区别？方道球鼓吹的“放”，就是要我们让牛鬼蛇神出笼，允许地、富、反、坏、右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要让李九莲这样的反革命分子继续放毒。

7、污蔑、歪曲和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疯狂叫喊“李九莲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李九莲辩护士康为民语，后判七年——编者），他们对（把）李九莲的反动观点说成是“真理”，把她的反革命活动叫做“追求真

理”，把她的反动的人生观，恋爱观，都说成是“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卜小松语——编者），这是对马列主义的歪曲和污蔑。他们还说：“李案之争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争”（知青丁承华语——编者）。还胡说：“中央不同意李九莲翻案就不是马列主义！”（教师龚伟农语，后判二十年——编者）有的公开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还说：“中央批林批孔文件都应批判”（精选厂李昧照语——编者）。真是丧心病狂！

从上讲的仅是几个主要方面，当然还不止这些。仅就这些言论也足以看出调委会某些人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其中有的人根本就不是什么认识上的问题：他们从思想理论到行动，都是受自己的反动立场，反动世界观所支配的。比如有的骨干分子，他交代他之所以要在调委会积极活动，是因为他们的资产阶级家庭在共产党领导下遭遇“不幸”，特别对“三查”中父母亲、哥哥被揪斗，更加不满。他说：“因此使我对毛泽东思想发生反感，产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还说：“我的思想和李九莲一样”，“批林批孔开始后，自己认为时机已到，要大干一场：为李九莲翻案，为千千万万的李九莲翻案。”（赣州二中副校长梁义贵语，后判十年——编者）还认为：“中央内部有问题，不稳定，以后还要大乱。”（教师丰修椿语，拘捕——编者）他就想在“乱世”中当“英雄”。可见这些人的反动思想、反动立场是非常顽固的，他们的反动目的也是很明显的。

（四）调委会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法活动。他们顽固对抗党中央、对抗省委，严重干扰了我区批林批孔运动，激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这里列举他们的几件主要活动：

- 1、他们在赣州市街头，一次再次公开张贴和广播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进行反革命宣传，并且到处插手，扬言要“为千千万万个李九莲翻案”，“要翻个底朝天”。
- 2、一再对抗中央和省委指示，拉队伍，搞串连，分裂革命队伍，破坏革命团结，成立非法组织并拒不解散。
- 3、冲击兴国监狱，冲击地区公安机关，殴打公安干警。
- 4、干扰党委正常工作，揪斗和绑架地委领导干部，还抓人打人。

5、搞打砸抢，破坏社会治安和国家财产。他们冲印刷厂，围攻不同观点的群众；抢劫和毁坏地区革命会交通车、吉普车、自行车，还抢走广播器材和其它物资。

6、擅自离开工作和生产岗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更严重的是直到十月多次派人到南昌等地张贴为李九莲翻案的标语和大学报，十月中旬调委会几个骨干还去北京街头写大标语为李九莲翻案，破坏首都秩序。朱毅还用电话指使他们去冲京西宾馆，妄图给中央施加压力，这是公然反对稳定，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用朱毅自己的话说，调委会是“一赴兴国，两种小报，三请领导，四处南昌，五次大会，六上北京”。这些活动都是为李九莲翻案，都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妄图干扰和破坏大好形势！

调委会的这些活动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十分不得人心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说明：“调委会”完全是非法的！

当我们了解了调委会的性质和他一系列非法活动之后，我们还必须弄清调委会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认为，李九莲问题和调委会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阶级敌人趁批林批孔之机跳出来捣乱破坏的表现。可是，朱毅、方道球等人认为，这不是敌人跳出来搞的，而是地委领导执行反动路线逼出来的。方道球同志的逻辑是李九莲翻案有理，地委批李九莲是“捂盖子、压群众、执行反动路线”，调委会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是地委某些领导高压手段压出来的。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前面说过，方道球同志根本忘了敌我界限，认敌为友，把反革命李九莲的翻案活动与革命群众的反潮流混为一谈，这样只能歪曲事情的真相，充当李九莲和调委会的辩护士。我们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如实地反映和具体地分析实际情况。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半年来的斗争过程，这个问题也就清楚了。

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我们广大群众干部都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林彪、程世清和他们鼓吹的孔孟之道，同时也揭发批判省委余、白、黄同志所犯的“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和成果”的严重错误；对地委所犯的的错误，当时广大群众也通过大字报和一定的会议进行揭发批判。我们认为，群众对我们的错误揭发批判是完全必要的，

过去我们表示欢迎，今后还欢迎同志们批评监督。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革命群众反对错误潮流的时候，阶级敌人也会接过反潮流的革命口号，乘机捣乱。因此，对反潮流必须作阶级分析：革命群众的反潮流，完全是为了批林批孔，反修防修，帮助领导端正思想和政治路线，以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敌人跳出来，不管他打的什么旗号，其目的是要破坏批林批孔，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分子李九莲就是当时跳出来，打着反潮流的旗号，进行捣乱和破坏的一个十分嚣张的人。李九莲窜回赣州市先是秘密活动，暗地串连；后来公开活动，大肆翻案，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这无疑是对运动的干扰。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敌我界限是分明的，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对省地委领导人所犯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的同时，对李九莲这个反革命分子跳出来进行翻案活动，立即警惕起来，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加以公开揭露。但李九莲进行反扑，气焰嚣张，在这种情况下，地委为保卫批林批孔运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就决定由公安机关将反革命分子李九莲重新拘留。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及时的，也是得到广大干部群众支持的。

朱毅、方道球同志说什么地委抓李九莲，反对调委会为李九莲翻案是害怕群众，压制群众，转移斗争目标，这是有意把水搅乱！事实是，无论在拘留李九莲之前，还是拘留李九莲之后，我们地委都认真听取群众对我们所犯错误的揭发批判，尽管我们对自己所犯错误还认识不足，改得不够，但根本不存在借李九莲问题去压制群众对我们的批判。至于对李九莲，那不仅仅是压，而且是抓，因为她是进行捣乱的敌人，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就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只有把李九莲看成群众、同志、战友的人才会把这看作“压制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我们各级党组织，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都应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都应该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我们在批林批孔中检查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就是为了端正思想，搞正路线，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团结群众，去攻击真正的敌人，夺取革命的新胜利。身为共产党员的方道球，而且据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革命领导干部”，不仅不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还竟然竭力为反革命分子李九莲

和调委会的非法活动大喊大叫，这不是咄咄怪事吗？！按照方道球同志的观点，就是我们各级党组织不能领导批林批孔，不要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要让李九莲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大鸣大放，让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兴风作浪，这是痴心妄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方道球同志还说什么我们不准李九莲翻案，不同意成立调委会是“怕打开缺口，对许多冤案、假案、错案不纠，保林彪路线”。这是故意歪曲！过去由于程世清路线的干扰，在“三查”、“一打三反”中发生过某些扩大化的错误，这些问题必须根据毛主席“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加以解决；但是，三查、一打三反的大方向是对的，成绩是基本的，许多案件包括李九莲这个反革命案就完全没有搞错，这是必须肯定的。我们发现了一些错案，这几年在落实政策上也做了大量工作，这也是必须肯定的；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今后还要继续落实政策，彻底纠正扩大化的错误。这个工作只能在党委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决不能像朱、方等提出的成立这个那个“调查委员会”来搞，这是原则问题。

必须指出，调委会是在中央 12 号文件下达后搞起来的，这是公然对抗中央指示的。以后他们又一再对抗省地委关于解散调委会的指示，而且妄想扩大事态，激化矛盾，但没有得逞。在形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也曾想变换策略，以退为进。比如在七、八月间，他们看到多次派人上访都碰壁而回，跟他们跑的人越来越少，他们惊慌地说：“公安部的一个电话吓跑了一大批”，“省委的几条指示惊走了一大群”（朱毅语——编者），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真是寥寥无几呀！怎么办呢？他们感到原来公开讲为李九莲翻案太露骨了，想换掉调委会这块招牌。他们召开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议研究招牌问题，但争议不休。为这还开了少数人参加的核心会议，方道球亲临指导。方道球现在还说没有参加调委会的活动，这是欺骗。已经查明，方不仅参与了，而且是参与到调委会的核心进里面去了，是参与决策的人物。就在那次核心会上朱、方等人主张换换“招牌”，主张把“调委会”改为“反潮流战士之家”。这个意见通不过，又说改为“反潮流战士俱乐部”，当即就有人说：“这个名字怪里怪气，人家会叫‘裴多菲俱乐部’。”朱、方一再讲改了“调委会”这个招牌，目的并不变，不叫“调委会”，却有利于斗争形势的发展，换上“反潮流”之类的招牌，可以联络更多的人。可是，另一些人坚决不同意，说改名是“换汤不换药”，反而弄得旗帜不鲜明，要干就还打“调

委会”的旗号干，翻案要翻到底！这是一策之争，并无根本分歧，虽然表面上闹了几天别扭，到后来，他们还是一直扛着“调委会”这面破旗照样地干，直到被我们解散。

回顾这段过程，说明调委会的产生，决不是什么地委压出来的；它恰恰是一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树欲静风不止”，阶级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时刻都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我们宽大处理了李九莲，李九莲还是要跳；对调委会，我们一再做工作，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觉悟了，但幕前幕后的阶级敌人拼命挣扎，耍了种种手段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跟他们干下去；现在解散了调委会，阶级敌人也决不会甘心，还会继续捣乱。这一切都说明：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正确认识调委会的问题，也只有狠抓阶级斗争才能真正解决好调委会的问题。

现在，在解散调委会这个问题上，阶级敌人造谣破坏，散布种种流言蜚语，这是不奇怪的，我们要提高警惕，要发动群众和加以揭露和批判。同时，在我们干部群众中，包括某些领导干部，由于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认识不清，也对处理调委会的问题还有怀疑和顾虑，这里有必要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有些人怀疑强制解散调委会，办调委会骨干学习班这种做法，说这样会不会是执行资产阶级路线？大方向对不对？是不是压制或镇压群众？这是一种糊涂观观念！首先要问调委会合法不合法？要不要解散？调委会幕前幕后的坏人要不要检举揭发、给予打击？一些调委会的骨干是不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不要教育、挽救？这应该是肯定的吧？！省委有指示，群众有要求，解散调委会，办骨干学习班，检举揭发坏人，这是贯彻安定、团结方针的需要。但你要解散，他不散；你要他认识错误，他还要活动；你要揭发坏人，他要掩护敌人：怎么办？是放任不管，还是大胆地发动群众来管？应该说管是对的，不管是错的。我们现在发动各单位的同志分别把本单位在调委会的骨干找回去，给他办学习班，在一段时间内不让他外出乱跑，而让他集中精力学习文件，交代问题，检举坏人，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这有什么不好？不这（样）不足以挽救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上海民兵工作的经验之一，是对于那些有这样那样严重错误的人采取办劳动学习班的办法，效果很好。我们学习上海民兵工作（的）经验，对调委会的一些骨干办学习班，效果也是好的。有些调委会有骨干开始可能对我们有意见，但当他认识到

错误的时候，他会感到我们是挽救他。有些骨干，开始对办学习班反感，还想外出活动，但厂里把他留住，让他集中学习和考虑问题，经过反复教育，现在态度转变，感谢组织和同志们的教育。

有人说，我们搞“扩大化”了，这是不对的。首先我们不是乱批乱斗，明知问题很大的人也作内部问题教育，根本不存在所谓“扩大化”的问题。如果是说学习班的人多了，其实我们只对二十几个调委会的骨干和主要成员办学习班（后共判刑六十人，处死二人——编者），都是经过地委反复研究决定的，这些人办学习班是必要的，而且问题弄清了就结束。多少问题，（多长时间）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要从实际出发。需要办学习班的人一定要办。还有的人把领导找不明真相的群众谈谈话，也说是“扩大化”，其实省委指示就说了要教育不明真相的群众，使他们觉悟过来，检举坏人。领导给不明真相的人进行教育，使其了解李九莲案件和调委会的真相，动员他检举揭发坏人，这有什么不对？相反不教育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动员他们揭发坏人，那才（是）不对的，当然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也有些人认为：调委会解散了就行了，就这么回事，不要小题大做，不要再搞了。这是“小题”吗？这是阶级斗争！说“小题大做”的同志是对这场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固然，调委会解散了；但它闹了半年之久，影响不小，流毒很广，现在有的人还在背后搞名堂。问题是：我们不仅（要）在组织上解散调委会，把坏人挖出来，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解散它，肃清它的影响。一句话，要把问题搞清，要使群众受到教育，要使坏事变成好事。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抓下去，一定要抓到底。

三、关于下一步的要求：

1、要继续抓好学习和大批判，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在学习中和大批判中，要联系处理调委会问题，对李九莲反动观点，对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还有朱毅、方道球等人放的毒，必须进行批判、消毒。这个问题，不能认为只是朱毅、方道球等人所在单位的事，也不能认为是负责办调委会骨干学习班几个人的事，要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大批判，普遍受到教育。

2、要继续办好调委会骨干学习班：调委会问题是严重的，但对参加和支持调委会的人要作具体分析。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调委会的主要成员和骨干，要区别是坏人干坏事还是好人犯错误，还要看他的错误程度和态度好坏区别对待。经查明确实是阶级敌人（的），要坚决打击。对敌人也要分化瓦解，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凡是好人犯错误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应该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学习班是为了教育挽救他们。只要他们认真检查错误，彻底交待问题，起来检举坏人，就应当欢迎和团结他们。有骨干成员的单位，领导要下决心把这个学习班办好。要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学习省地委有关指示、决定，向他们讲形势、讲路线、讲李九莲案情。要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要针对性的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广大干部群众、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协助党组织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大家伸出手来把犯错误的拉过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阶级敌人。

3、对在李九莲案件和调委会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干部，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干部要严于群众，领导干部更要严格要求。要严肃指出他们的错误，要教育他们主动作出检查，以实际行动挽回影响，积极协助党组织做好群众工作。过去错了，改了就好；仍坚持不改，要严肃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大多数干部立场是坚定的，是反对为李九莲翻案的。犯错误的是极少数。这极少数同志中，有的是属于认识模糊，过去支持过李九莲和调委会活动；但在省委几次指示下达后，早已不支持了。这些同志改了就好，要努力学习，自己总结经验教训。有的虽然支持调委会的时间较长，但属于一般性问题，现在已经认识（到）错误。这些同志可以在党组织内作必要的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有的在这个问题上陷得比较深，错误严重，但现在表示要认识和改正错误。这些同志有必要在适当场合，在群众中检查自己的错误，应当欢迎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帮助，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挽回影响。广大群众应当热情帮助和欢迎他们改正错误，支持他们工作。个别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现在又坚持错误，拒不检查。对这样的人，我们还要尽力教育、挽救，如果屡教不改，那就要给予必要的处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同志，能够迅速觉悟，转变立场，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4、要继续做好不明真相群众的工作。对已经觉悟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要热情欢迎他们，团结他们；少数还没有完全觉悟的要耐心教育使其了解真相，提高觉悟，分清敌我，自觉起来检举坏人。各级党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要从关心爱护这些同志出发，启发他们的觉悟，教育群众对他们不要另眼看待，更不要讽刺挖苦，要团结他们一道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要发动群众对幕前幕后的阶级敌人，对于本单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有参与支持调委会活动和对处理调委会问题进行造谣破坏的，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证据确凿的要进行批斗。广大干部群众要提高警惕，不要给阶级敌人可乘之机。

5、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处理调委会问题要和整个批林批孔和抓革命促生产结合起来，要通过处理调委会问题，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教育，进一步提高觉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

一九七五年五月，李九莲：“投降书”

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出“投降书”。是的，我有“罪”。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效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真理是个美丽的字眼，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我为她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做到了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凡真理，都有三种遭遇：用得着时，便奉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非但用不着而且“害”时，就象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的遭遇。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注：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李九莲第二次被判刑前），李九莲开始绝食，从兴国、赣州直到波阳珠湖，断断续续绝食 73 天。绝食之后，在一次例行的大检查中，干部在李九莲布鞋的面壳里发现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这样的文字。

叁、本节研究资料

李九莲年谱

李九莲，女，1946年生，江西赣州人。文革时为赣州第三中学学生，校团委宣传股长，学生会学生部长。文革中任第三中学革命造反派”卫东彪“造反兵团负责人。1968年分配到工厂当学徒工。1969年4月3日，年轻的李九莲因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太理解（当时对刘少奇的政治面目有些误判），主要是因为怀疑野心家林彪的若干观点被友人告发而被捕。1972年7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获释。1974年春写出大字报《反林彪无罪》，要求平反。赣州地区数万人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给予声援。4月再次被捕。1975年5月兴国县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李九莲断断续续绝食73天进行抗议。1976年底，李九莲在狱中宣读“我的政治态度”一文，反对华叶等走资派发动反革命右派军事政变、逮捕江青，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寄希望于江青”……，同文中对铁杆走资派邓小平亦颇有不敬，由此触怒了军事政变集团，1977年12月14日被判处死刑。直到1980年1月新华社《内参》上报后才得以重新审查此案，1980年9月江西省委研究认为李九莲“属轻罪重判，错杀”，但此后为革命造反派李九莲案奔走的“李调会”成员仍持续受到政治迫害。直到今日，革命造反派李九莲案仍未完全平反。

1946年9月9日

李九莲出生于江西赣州市。祖籍江西丰城。父李忠华，老共产党员，赣州通用机械厂工人（大革命时期赣州总工会秘书长陈赞贤麾下的工人赤卫队员）。母卢菊英，家庭妇女，略识字。她共生育过十一个孩子，九莲是第九个。这些孩子们死的死了，送人的找不回来，只剩下一男四女。上有兄姐下有两妹，李九莲排行居中。

1947年 李九莲因病休克被父母装入提篮扔出去，听见哭声又提了回来。

1948年 因家境贫困李九莲被送人做童养媳。

1949年 赣州解放，父亲把李九莲背回家。

1953年9月 李九莲入学赣州市文清路小学。

1955年 因体弱多病李九莲休学一年。

1956 年 9 月 李九莲回到文清路小学继续读书。

1960 年 9 月 李九莲进入赣州市第六中学读初中，初二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团干。

1963 年 9 月 李九莲入赣州市第三中学 63（一）班就读高中，任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

1966 年 8 月

李九莲参加原空军司令刘亚楼侄女邹军领头组织的赣州市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八一战斗队”，为三头之一，任组织委员。（赣州一中学生舒北斗任宣传委员。）

1966 年 10 月 1 日 李九莲作为红卫兵小将在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

1966 年 10 月底 李九莲参与组织赣三中“卫东彪战斗兵团”，任副团长。（曾昭银任团长。）

1967 年 4 月 22 日

李九莲率团参加朱毅任总指挥的为营救因“反军”陷狱的舒北斗的红卫兵五千五百三十五人绝食。李九莲堂兄李全瑞代表江西冶金学院参与指挥。绝食“斗争”持续了七天七夜。

1967 年 4 月 27 日 周恩来联络员与绝食指挥部通电话，询问赣州红卫兵绝食情况，商谈解决方案。

1967 年 6 月 6 日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六·六”通令。同日中央文革严令当即释放舒北斗，李九莲为此而欢欣鼓舞。

1967 年 6 月 29 日 至 7 月 14 日

李九莲姐妹三人分两派，经历了赣州发生的全国最早、规模最大的武斗。武斗丧生者达 168 人。李九莲震惊不已，陷入深深的忧患。

1967 年 8 至 9 月 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在接见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时说“江西有个舒北斗，李胜（原赣州军分区政委）变成了李败”。举城欢呼之际，李九莲却陷入协查赣南医专陈耀庭“现行反革命”案的犹疑和痛思之中。

1967 年秋 李九莲作为代表出席“江西省第一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提名为省革委会委员候选人。

1967年12月18日 赣州军分区发布《关于为舒北斗革命小将平反的声明》，军分区政委李胜停职检查。

1967年12月， 赣州市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八大成员之一的学生代表舒北斗、曾昭银同时参军入伍。当时舒北斗任市治安保卫办主任（佩发手枪）兼赣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副政委。曾昭银是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副司令。李九莲一一为他们送行、留念。

1968年2月 李九莲被分配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工，为厂民兵团武装基干连民兵，建党对象。

1968年夏 李九莲姐李兰香赴军垦，妹李青莲插队崇义，小妹李玉莲远赴深山“共大”，哥哥李东林则在西宁基地有“科”难“研”。

1968年秋 看到纯洁的青年熊辉被以现反判刑的布告，李九莲同情不已。

1968年秋 “清队”（“三查”）开始，李九莲的父亲、老赤卫队员、共产党员李忠华因黄埔军校同姓同名者被“揪出”，常跪地求李九莲代写认罪书，屡遭李九莲拒绝。

1969年3月21日

李九莲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家庭只是整个社会的缩影。由幸福走向痛苦，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巴金的《家》、《春》、《秋》作于旧时代，反映了时代的去向。今天的《家》、《春》、《秋》也似乎如此吧！我决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只不过想试图开辟一条新的路罢了。”

1969年2月28日 李九莲给已经参军入伍的曾昭银写未署名的恋爱信。

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

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祝好！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1969年3月5日 曾昭银在不知信的作者的情况下，接信后上交团政治处。信很快被转往赣州地区保卫部。

1969年4月 曾昭银被当作“有嫌疑的人”提前退伍。部队和赣州军管小组保卫部让他协查“反革命匿名信”。

1969年4月30日 曾昭银与李九莲见面时，李九莲说破实情。当夜曾昭银向军管小组保卫部报告。

1969年5月1日凌晨三点

由冶机厂保卫科长宋德恒带领一个班武装民兵，以五一“民兵检阅”为由敲开李九莲家的门。李九莲被赣州市军管小组保卫部以反林彪现行反革命罪拘捕，信的底稿和九大前后的日记被抄。

1969年5月1日傍晚，曾昭银约见朱毅骗造“恶攻”林副统帅信是左手写，他说他原来并不知道信是李九莲写的。

1970年1月29日 冶金机械厂向地区军管小组保卫部提出李九莲交厂群众处理的意见。保卫部同意。支左部队赵副师长一人认为处理太轻，怒而携卷往省革委会要求重判。

1970年2月 林彪死党、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说“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付主席的，全国罕有”。批示：“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

1970年6月21日 李九莲父亲李忠华在对女儿的极度思念中含冤饮恨郁郁而死。

1971年1月5日 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作出（71）赣刑字第3号判决书，以恶攻林付主席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五年。

1972年6月20日

鉴于林彪折戟沉沙，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遮掩对李九莲作过的判决，批复赣州冶金修造厂革委会，对李九莲免于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2年6月20日上午八时 李九莲被释放出狱。

1972年7月 李九莲被安排去远离赣州城的兴国县画眉坳钨矿陈也矿区当电焊工，但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

1973年5月 李九莲向市、地、省投诉无效，进京上访最高法院、公安部。上访的困窘中节食资助一位带着孩子的新四军干部的妻子——也是冤屈上访申诉者。

1974年3月初 赣州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李九莲听从朱毅意见给曾昭银写信，要求曾昭银帮其辩冤。李九莲同学丁承华为其送信给曾昭银。

1974年3月18日 李九莲往见曾昭银。曾昭银拒绝帮她翻案。

1974年4月4日

李九莲在赣州公园女墙贴出第一张公开申辩大字报——《反林彪无罪》，引发社会极大关注。随后陆续贴出《一评反林彪有罪——斥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二评反林彪有罪——谁是反林彪的英雄》、《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乱讲一通》……

1974 年 4 月 13 日

赣州地区中级法院、公安局、工代会张贴《联合声明》称“李九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当前批林批孔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1974 年 4 月 14 日 冶金十三队工人刘庭荣张贴《评三家“联合声明”的反动性》大字报，代表义愤的赣州人民，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1974 年 4 月 14 日 地区公安局、地区工代会印发《李九莲有关罪行材料》，公布了影印的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供批判用。

1974 年 4 月 16 日下乡知青康为民张贴署名“李九莲辩护士”大字报《掀翻现行反革命李九莲一案》。气压机厂工人管佑龙张贴声援李九莲大字报《路遇不平，拔笔相助》；……群众不平之鸣越趋强烈。

1974 年 4 月 17 日 应地区工代会强烈要求，赣州地委常委会议决议重新逮捕李九莲。

1974 年 4 月 18 日 李九莲去舒北斗家恳请他鼎力相助。

1974 年 4 月 19 日 在最后一篇公开申辩《我的人生态度》中李九莲写道：“为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入铁窗！”“人民起来了，一切妖魔鬼怪统统都会被消灭！”“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74 年 4 月 20 日傍晚 朱毅由全南回到赣州，直趋地区公安局见领导询李案。

1974 年 4 月 20 日晚十点 在地区工代会人员参与下，九莲再次被赣州市公安局拘捕，当晚押往兴国。

1974 年 4 月 22 日

朱毅、舒北斗、曾传华等三十余众署名张贴《众手掀翻独霸天》大字报，称“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抗议地委和公安局重新逮捕李九莲。

1974 年 4 月 25 日晚 朱毅在市委党校礼堂演讲李九莲问题真相，赣州地市二百五十九个单位签署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合声明》。

1974 年的 4 月 25 日 赣州三百民众乘车前往兴国县营救李九莲。最初曾得到兴国县革委会和公安局的支持和理解。

1974 年的 4 月 25 日下午 赣州地区公安局、工代会、红代会紧急汇报赣州、兴国情况，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下达“五点指示”：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李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

三、冲击兴国监狱是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四、某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五、对于在李案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

1974 年 4 月 26 日 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陈昌奉派秘书召见舒北斗，同日赣州地委工交办主任杜昭约见舒北斗，“苦口婆心”深入反复地动员他和“现行反革命”李九莲划清界限。

1974 年 4 月 26 日

顶着巨大压力，“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立”。庄严宣告：“还李九莲以本来面目之日，就是调委会自行解散之时。或者走向真理的光明，或者走向牢狱的黑暗。”

1974 年 4 月 27 日 李调会建立广播站、宣传组、材料组、动态组。

1974 年 4 月 28 日 李调会创刊《战旗》、印行《动态》。

1974 年 4 月 29 日 在地区工交办主任杜昭和家庭的压力下，舒北斗退出李调会。

1974 年 4 月 30 日 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在省委三届八次全委会上斥责赣州有人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

1974 年 4 月 30 日 李调会在市体育馆召开第一次万人大会宣讲李九莲案真相。李玉莲交出姐姐未被搜走的思想提纲和文字草稿。

1974 年 4 月 30 日 景凤山小学教师钟海源参加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为李调会广播站主播人员。

1974 年 5 月 2 日

李调会在赣州公园门外设立讲坛，让民众自由发表对李九莲问题的看法。这一自由民主讲坛持续数月之久。严金禄、刘挺荣、管佑龙、林锋、吴文甫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发表入情入理、动人心魄的讲演。

1974 年 5 月 9 日 江西省委下达有关李九莲问题的“三点指示”：

一、赣州地委常委陈万兆同志支持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省委责成其停止工作，反省交待问题。

二、兴国县委、兴国县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支持不明真相的群众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责成作出深刻检查。

三、赣州市公安局批林办 4 月 24 日的声明是向阶级敌人投降，责令立即收回，挽回影响，并作出深刻检查。

1974 年 5 月 10 日 李调会发表《关于不准利用李九莲问题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的严正声明》。

1974 年 5 月 11 日 李调会林锋写《西安还是延安》。

1974 年 5 月 11 日 管佑龙在大字报中提出“我们的法律，甚至宪法中对当前不适应的问题也要修改”。

1974 年 5 月 12 日

省委电话指示省领导决定召见赣州李调会负责人。指名朱毅、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五人前往南昌解决问题。朱毅拒绝前往。省委书记陈昌奉接见了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调委会代表始终坚持李九莲的革命本质。

1974 年 5 月 18 日 李调会大字报提出：“取消公安六条，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阶级斗争扩大化，百扩不灵！”

1974 年 6 月 1 日 省委秘书组给赣州地委打电话，传达省委“关于李九莲问题”四点意见。

1974 年 6 月 2 日

李调会由一百八十四各单位签名的《联合声明》：省委的五点指示和两次三点指示，不仅是地委某些人片面汇报所骗取的，而且是省委分工负责李九莲问题的涂烈一手泡制的……

1974 年 6 月 1 日 生物农药厂李冰姜写大字报《赞李调会》。

1974 年 6 月 7 日 李调会刘庭荣、李冰姜一行五人驱车前往福建省寻找新华社记者戚休反映赣州李九莲案件情况。未能如愿。

1974 年 6 月 10 日夜

原赣南日报总编辑、九二盐矿党委书记方道球在公园门前发表演讲，支持公开争辩李案。接着，1969 年带领武装民兵第一次拘捕李九莲的冶机厂宋德恒公开演讲，揭露事实真相，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1974 年 6 月 11 日 国家公安部对李九莲案件作出批示：“按省委意见办理。”

1974 年 6 月 13 日 李调会廖树才写《登龙术浅谈》，对趋炎附势的小人进行解剖。

1974 年 6 月 14 日 机床厂谢明写大字报《官官相护》。

1974 年 6 月 17 日夜 万人空巷：朱毅、方道球、孙成璋邀请地委书记田启松激辩李九莲案性质。

1974 年 6 月 29 日 大雨滂沱中，李调会主持纪念“六·二九”死难者七周年大会。钟海源主播《祭文》。

1974 年 6 月 30 日 李调会李抹照、黄志荣、郭宗秀、路扬、陈富等十二人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1974 年 7 月 4 日 李调会孙成璋、徐声扬等四人再次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1974 年 7 月 10 日 李九莲辩护士（康为民）写《坚持革新办李案》、《斩断按着李案的黑手》。

1974 年 7 月 12 日 刘庭荣写《法治者专政也》。

1974 年 7 月 23 日

赣州地区工代会、红代会为批判李九莲攻击李调会开办了刊物《投枪和匕首》，于是李调会小报《野草》创刊。以鲁迅杂文《野草》命名的刊物，寓意野火烧不尽。此时更名亦有在“投枪和匕首”的寒光中萌发新叶之意。

1974 年 8 月 李调委连续三次就李九莲案继续派员赴京上访。上访人员赣南纸厂林锋、地区外贸公司吴文甫和地区土产公司刘文锋。

1974 年 8 月 8 日 《野草》七期刊登曾小舟讽刺性杂文《调委会者该杀乎》，为李调会鸣不平。

1974 年 8 月 20 日 汇众思写《李案争论的根本和归宿》、《李案争论的实质和要害》等理论探讨文章。

1974 年 8 月 21 日 继《静夜扪心录》九篇之后，朱毅开始写《九吐心丝》，全面为李九莲的真理执著、革命理想、人生态度，爱情观及在禁区中勇敢探索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勇气等辩护。

1974 年 9 月 15 日 朱毅发表《九吐心丝之九. 并非最后的话》动员解散调委会，以避免招致大规模镇压，但遭到李调会大多数人反对。

1974 年 9 月 30 日 朱毅、廖树才、康为民、罗汉进行李调会人员就李九莲案的第六次赴京上访。

1974 年 10 月中旬 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徐承中，对李调会调查其在瑞金“三查”中滥杀数百无辜事件中的责任不满，利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已经七年，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最新指示，借口李调会人员“无理”强求其解决停发工资事，赖在李调会交际处北院办公区不走。据此，地委以李调会“绑架”地委领导为由密电中央。

1974 年 10 月 22 日 江西省委陈昌奉等在京常委终于通过对李九莲问题的“四点决议”：

- 一、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
- 二、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
- 三、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四、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希望地委做好工作，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1974 年 10 月 23 日 赣州地委提出取缔李调会的“八点意见”。

1974 年 10 月 25 日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镇压，避免一网打尽，朱毅写《告全省人民书》，并将管佑龙、林锋、廖树才、卜谷、谢明、康宏垠等李调会骨干派往南昌。

1974 年 10 月 28 日 朱毅将《九吐心丝》底稿和《野草》等李调会文件交钟海源保存，以备不测。

1974 年 10 月 29 日

上午，朱毅贴出的《仍然并非最后的话》，说：“我们和赣州人民及其思想的女儿共同创造和度过了一段这样难忘的岁月……既然需要经过牢狱的黑暗，才能到达真理的光明，人民会相信面对铁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坦然的……”。深夜，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主任朱毅被拘捕。一个小时之后，曾传华、孙成璋、李抹照、刘挺荣……纷纷被保卫干部和武装民兵从家押出。

1974 年 10 月 30 日凌晨 数百干警和五个武装民兵连查抄捣毁李调会广播站及有关场所。调委会负责人员和骨干被强制办班审查。

1974 年 11 月 1 日 赣州李调会的《告全省人民书》和为李九莲辩护的大字报在南昌八一大道旁贴了一里路长。赴昌人员在樟树被捕押回赣州。

1974 年 11 月 江西省委针对赣州李调会问题下发（74）四十六号文件。

1974 年 11 月

李九莲在狱中遭遇审判高潮。面对越愈恐怖的高压，李九莲在狱中无数次的反复吟诵共产主义者臧克家的《弔屈原》宇宙这样宽大/却容不下一条身子/天地如此广阔/思想却无处安放/只好抱着贞节去追踪彭咸/D 带一颗眷恋的心跳下了泪罗江/（生命就是这样/不能去碰死僵冷的社会/就只有碰死在它身上！——这三句显然是李九莲自己加上去的）泪罗江的水/为诗人流了二千多年的清泪/到如今/上官令尹/依然在人间充沛……（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李九莲的罪证列入起诉。）

1974 年 11 月 29 日

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刘华英、肖国涵等四人在赣南采茶剧团散发《强烈抗议》和《紧急告全市人民书》传单，传单如雪花从剧场空中飘落。因遭“线人”邹根保出卖，4 人被当场拘捕。

1974 年 12 月 3 日

赣州地委副书记吴清明在地市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处理李调会问题的报告》，称调委会“一赴兴国、两张小报、三请领导、四处南昌、五次大会、六上北京”，“这些活动都是为李九莲翻案，都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妄图干扰和破坏大好形势。”

1975 年 1 月

江西省委下发关于赣州李调会问题处理的（75）六号文件，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重申了在京学习班 10 月 22 日讨论通过的四项决议，在全省范围内宣布李九莲的反革命性质和李调会的非法性质，并且强调进一步坚决取缔李调会转入地下的活动。

1975 年 5 月 以华国锋为部长的公安部党组讨论批准了赣州地区公安局关于李九莲问题的报告。

1975 年 5 月 22 日 李九莲开始长达七十天的绝食，靠强行鼻饲得以存活。

1975 年 5 月 30 日 兴国县人民法院对绝食中李九莲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5 年 5 月 30 日 全南县公安局对朱毅正式逮捕。

1975 年 7 月 3 日，仍在绝食中的李九莲被从赣州的江西二监狱押送到位于赣北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例行检查时发现李九莲写于绝食前的绝命书——《投降书》：“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出‘投降书’。是的，我有‘罪’。

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效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真理是个美丽的字眼，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我为她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做到了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凡真理，都有三种遭遇：用得着时，便奉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非但用不着而且有。‘害’时，就象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的遭遇。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1975 年 9 月 27 日，赣州地委决定对李调会人员第二次大抓捕，刘庭荣（后被判刑 15 年）、管佑龙（后被判刑 15 年）、钟海源、康为民（后被判刑 7 年）、林锋（后被判刑 5 年）、罗斌（后被判刑 15 年）、邱彩云（后被判刑 10 年）等 16 人被拘捕。

1975 年 12 月 20 日 朱毅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6 年 5 月 钟海源坚持为李九莲鸣不平，被加刑五年至十二年，押往南昌新建服刑。其他被捕调委会人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判五至二十年不等。

1976 年 12 月 28 日

在年终评审鉴定会上宣读“我的政治态度”一文，反对华叶等走资派发动反革命右派军事政变、逮捕江青，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寄希望于江青”……，同文中亦对铁杆走资派邓小平亦颇有不敬，由此触怒了军事政变集团，

1977 年初至 1977 年 8 月

李调会被打成“帮派体系”，赣州地委在“揭批查”中对李调会人员进行第三次大拘捕，被拘捕李调会人员 41 人、同情支持者 18 人。行政处理 600 余人。

1977 年 2 月 曾昭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重从快被判刑十五年。

1977 年 12 月 8 日 李九莲被从珠湖乘船押往赣州。

1977 年 12 月 11 日

李九莲因反对华叶等发动右派军事政变逮捕四人帮、并为江青等鸣冤而被政变集团判处死刑。在赣县看守所，地区公安局向李九莲宣读死刑判决书。李九莲拒绝上诉。李九莲满腔悲愤地在手纸上写道：“我就是像一只杜鹃一样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墙壁喊一声，还会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 年 12 月 14 日

李九莲在赣州市老体育场万人大会公判后，被拉到西郊青光岭枪杀并暴尸荒野。当晚，李九莲尸体遭变态者的凌割。残害李九莲的变态者当即被捕，被判七年徒刑。

陪同李九莲公判的有曾传华、宋德恒、马军、管佑龙、吴文甫、严金禄、朱江涛、刘西贞、徐亨其、方向佑、吴景伯、朱修仁、赵诗镜、龚伟农、郭宗琇等李调会人员二十四名。分别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刑期相加达二百一十六年。曾传华、方道球、孙成章（在九江）皆被重判。

1977 年 12 月 17 日 处决李九莲的布告贴在朱港十大队一中队墙上。

1978 年 1 月 1 日 朱毅在狱中写了《卜算子——咏梅》，祭悼李九莲喋血双周。

笑看三尺雪，矗立九寒中，百壑千山香一缕，醉了竹和松。

玉殒魂何在，一梦人天同，应是春山丽日下，天地女儿红！

1978 年 7 月 2 日 舒北斗与二十名“帮派”一道，在赣州市老体育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1978 年 4 月 30 日，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因坚持批评数度涉入李案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被认定重新犯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宣判时钟海源慨然签上自己的名字。法官问她道：还有什么话要交待的吗？钟海源站立说：“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说罢，一甩头发，昂首大步流星走去。钟海源从容赴死之态令所有目击者震惊不已。当日，钟海源在新建县被枪杀。

1979 年 4 月 10 日 赣州地区中级法院拿出对李九莲案件的复查意见：该案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被告死不认罪，凡（翻）案。

1979 年 4 月 14 日 赣州地委同意中级法院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1980 年 5 月 8 日 江西省高级法院认定李九莲确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1980 年 9 月 17 日 江西省委研究作出批复：“同意法院意见，属轻罪重判，错杀，撤消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1980 年 11 月 全国人大法治委员会主任彭真肯定李九莲，指出李九莲问题是林彪四人帮在江西造成的最大冤狱。

1980 年 11 月，举世闻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国家副主席宋庆龄收到寄来的申诉李九莲冤案的信件、材料、即刻转给新华通讯社。新华社和最高法院同时收到其它中央部门和领导转来的内容相同的信件、材料。

1980 年 12 月 新华社戴煌前往江西调查李九莲案件。

1981 年 1 月 23 日 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在赣州地委扩大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反革命李九莲和非法的李调会案是不能翻、也是翻不了的。”

1981 年 1 月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坚持李九莲案不能翻。

1981 年 1 月 25 日 戴煌关于李九莲案文章在《国内动态清样》第 214 期上发表。

1981 年 1 月 25 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读到戴煌文章，当即在文章旁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作出如下批示：“彭冲、江华、（赵）苍壁：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1981 年 1 月 25 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彭冲接到胡耀邦指示，当即给江西省委负责人作批示“（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1981 年 3 月 24 日 赣州地委决定为李九莲平反，对因李案被冤狱株连者进行复查重处

1981 年 3 月 26 日 赣州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刘玉瑞代表地委就李九莲案复查处理问题作报告

1981 年 4 月 13 日，赣州地区中级法院派员去李九莲家宣读对李九莲的复查改判书（并未作无罪宣判，留有严重政治错误尾巴），李九莲母亲向他们提出六项要求，他们回答：完全给她平反这个她达不到。

1981 年 4 月 17 日 江西纪检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就对李九莲案复查改正一事，向中纪委写报告并附省高院《复查报告》。《报告》反省错误，用词恳切。

1981 年 5 月 9 日 江西省高院审定作出对钟海源（81）刑二监字第 13 号刑事判决书。宣告被告人钟海源无罪。

1981 年 7 月 朱毅、方道球、曾传华、宋德恒、康为民等近六十人出狱，但无一被宣告无罪，均结论为犯有严重（帮派）政治错误，尚未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刘挺荣、马军、罗斌竟被改判成刑事罪犯，（待）“刑满”释放。

1981 年 8 月 8 日 李九莲母亲卢菊英要求原调委会人员帮助他们向上面反映自己的愿望，为李九莲平反昭雪。

1981 年 8 月底 朱毅赴京上访李九莲案平反中的严重遗留问题，得到戴煌鼎力支持。

1981 年 9 月 5 日 中纪委办公厅三一四室正式受理朱毅上访，有关负责人朱立同志盛赞李九莲是“党的优秀女儿”，对钟海源被杀无比震惊。

1981年9月11日下午两点，朱毅在北京中南海侧中纪委办公厅会议室向中纪委、中法委、人大法制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中宣部、全国妇联代表汇报李九莲冤案。

1981年9月12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刘复之为彻底处理好就李九莲一案受牵连的众多人员的善后事宜，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室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冤案……骨子里并不同意中央和省委对李九莲本质的看法，仍然坚持认为李九莲是什么“现行”或“铁杆”的人；还有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保持“永远正确”的面子，不得不强拉硬拽、胡拼乱凑一些理由，继续打肿脸充胖子以伺机报复的人，都还有一些。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1981年9月16日，胡耀邦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五次“两案”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谈李九莲案时一一点出了受株连者的数目：死两人、被判六十人、遭党政纪处分六百余人、株连逾千……强调说“出了这么大的事，现在还没有解决好，应该解决好”。

1981年11月16日，中央政法委员会给胡耀邦总书记并中央书记处呈送《关于江西李九莲案件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说：李九莲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如此的认识和思想觉悟，是难能可贵的。主流、本质是好的，应进行再复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2年7月 鉴于李九莲案及受株连人员近一年来未得到中央有关方面庄重承诺“再复查”，朱毅再度赴京上访，仍无果。

1983年8月17日下午 坚拒“再复查”的赣州地委书记杜昭，指使地委保密委员会借口朱毅涉入第五次“两案”工作座谈会中央下发的（调整和落实政策）文件起诉，以“泄密罪”逮捕朱毅。

1983年8月18日 杜昭借口打击刑事犯罪，一举刑拘了李调会骨干和有牵连人员数十人。

1983年9月2日， 为了为赣州“打击刑事犯罪”造势助威，为了羞辱坚持为李九莲鸣不平者，曾传华、宋德恒、梁义贵等原李调会骨干十余人被权势五花大绑，和真正的刑事犯一道徒步游行示众。

1984年9月 李调会朱毅、曾传华、宋德恒等七人被“泄密罪”再次判刑。

1986 年春 《血色黄昏》的作者老鬼由于母亲杨沫曾收到朱毅狱中写的《还在流血的爱情》，以《中国法治报》记者身份前往江西赣州进一步采写李九莲案情，赣州公安拒绝了他查阅李九莲案卷的要求。寻找朱毅未果，由卜谷陪同数日后离开。

1987 年 2 月 国家级刊物《中国作家》发表资深右派胡平（现叛逃美国）、张胜友的《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联二十周年祭》，李九莲被化名“黎莲”，时间被推到 1970 年，并称“黎莲”被枪杀前被“活体取肾”（而中国第一例肾移植手术成功是在 1973 年）。

1987 年 4 月 由于杜昭退休，省委和高院干预，朱毅、曾传华、宋德恒等被宣告无罪出狱。

1988 年秋 唯明在《收获》1988 年第 4 期上发表《寻觅回来的哀痛》，李九莲第一次以真名步入文坛。

1989 年 6 月 20 日，《当代》1989 年第 3 期发表胡平根据采访朱毅而著的《中国的眸子》，并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书。文革中两位伟大女性李九莲和钟海源由此震惊海内外。（《中国的眸子》在赣州发行受到有关部门干涉。）

1997 年 10 月 17 日 老鬼报告李九莲、钟海源的文学作品《愿你的死能唤醒中华民族》整理成稿。

1998 年 5 月，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由新华出版社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第二部分首篇（第八章）即《为“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李九莲）昭雪》。这是历史的推动者书写的李九莲血史，为还李九莲以本来面目起了巨大的作用。

2002 年 5 月 30 日 李九莲母亲卢菊英逝世。

2003 年中 曾昭银死。

2003 年，赣州官方编撰《赣州地区大事记》中记“1974 年 4 月 26 日，一些人乘‘批林批孔’运动之机在赣州市组织‘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揪斗、批判、拉山头、打派仗等活动，历时数月被解散（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错误处理，文化大革命后遭错杀，1981 年平反）”。

2005 年 5 月 叛逃美国的民运分子胡平的《中国的眸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2006 年 1 月 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由工人出版社再版。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者：戴煌

第二部分首篇（第八章）即《为“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李九莲）昭雪》。

从监狱悄悄传出的挂号信

1980 年秋天，拨乱反正的急鼓仍在冬冬响，江西鄱阳湖畔的监狱中有人托可靠人士，向新华社邮来一封挂号信。信中透露：1977 年 12 月 14 日，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又两个月零八天，江西的一位反林彪、同情刘少奇的青年女工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尖锐的竹签穿连在一起，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奸尸、刈去双乳。十二名曾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时被判以重刑……

看到了这封信，不禁令人愕然。如果所言属实，这是又一桩张志新式的骇人听闻的大冤案！1980 年 11 月下旬，在飞往南昌的途中，我仍在自我发问：这可能吗？张志新死于粉碎“四人帮”前一年，长春的青年工人史云峰死于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另一位英雄王西申死于粉碎“四人帮”半年后，而李九莲不但死于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又两个多月之后，而且还在党的新时期召开了“十一大”的五个月之后，中国还会有如此草菅人命的狂徒吗？

到达南昌后，得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上海休养治病，主持省委日常事务的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对我说，这不仅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当时在讨论是否批准判处李九莲死刑的省委常委会上，他本人就是坚决反对处死这位女青年的常委之一。但他和持同样观点的常委是少数，未能力挽狂澜。为此他一直心存憾痛。他全力支持我详细查访以期纠正这个大冤案。

查访开始，先去江西省高级法院，翻阅李九莲案卷。这案卷足有几大包一尺多厚。每天上班时间去，下班回新华社江西分社，夜晚就空过了，实在可惜。我向法院办公室主任邹济生和副主任老崔建议，是否可以让我把这些案卷借到分社去，这样可以加快速度。他们倒也爽快，而且都是同情这起冤案受害者的好心人，

说了声“绝对信任”，让我打了张借条，就如愿以偿。这样早早晚晚地只花了半个月，就看完了大约二百多万字的案卷，摘抄了十余万字。然后王泽民派出省委汽车队最得力的司机黄荣水，开辆最新的北京吉普，由省高院郑科长陪同，去了赣南又转到赣北，察看了李九莲求学、工作、拘禁、劳改以及被处死的场所，访问了有关人士，历时共一个多月。所获材料证明，那封狱中来信，所言基本属实。

勤于独立思考的女青年

这位被“冤杀”的女青年，1946年出生于赣州一工人家庭。其父是位老共产党员，其母为家庭妇女，哥哥姐姐都是大学毕业的国家科技人员，两个妹妹是中等文化程度的一般工作人员或工人。加上她自己，兄妹五人都是共青团员。

解放前，由于全家生活难以维持，三岁的李九莲就被送人做童养媳。解放后，其父又把她背了回来。读书时，她十分刻苦，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在赣州市第三中学，被选为校团委宣传部长和学生会学习部长。由于善于钻研问题和独立思考，生活也十分简朴，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

1966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团的惟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热的地步。

1968年，她与同时高中毕业的少数出身较好的同学，被分进赣州市当地的一些工厂当徒工。真正地接触到社会实际，她很快就发现有很多问题和现象，与自己“造反”时想像的不一样。生产衰退，人民困苦，文化艺术凋零，青年一代的痛苦彷徨与颓废等等事例，像潮水般向她涌来，正是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江西的死党程世清，又刮起了一场“三查”风。

这场“三查”风，就是所谓的“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在“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的口号下，捉拿“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战斗队来去匆匆，私设的公堂和牢门比比皆是。刑讯逼供成了“最最革命”的主要手段。全省各地成千累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被铸成了“反革命”。多少人被打成残废，多少人惨然死去，又多少人妻离子散。这一

切，更刺痛着李九莲的心，从而使她与当年举国上下许多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们一样，不时扪心自问：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1969年春天，她为此写了独自珍藏的七千多字的三十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她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和家庭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师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晖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她时而悲愤厌世，时而又亢奋探索，“绝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

1969年2月28日，她给高中同学时的恋爱对象曾昭银写了一封信。其时曾昭银已在福州部队当兵。李九莲在这封信中说：“经过多年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时好想（像）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

接着，李九莲还写了这样一些话：“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

在谈到自己的“人生态度”时，李九莲向其恋人写道：“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和完善的理想。’我决心接受马克思所说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

最后她告诫对方：“此信万勿给予他人”；下款“你明白的人”。

然而这个应该“明白”的人却装着“不明白”。他陡生“主动”之念，让飞黄腾达的私欲把爱情压得粉碎。他说此信“很反动”，“把矛头直指林副主席”。

他立即把这封信交给了上级。这“上级”当然更是如获至宝。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紧急调查，在 1969 年 4 月 30 日深夜，将李九莲抓进了赣州市公安局。

林彪叛逃了，反林彪的人仍然有罪

李九莲无所畏惧。在为她举办的“单人学习班”上，她坦然地复述了自己的许多“活思想”，并交出了信件底稿和日记，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支左”部队的赵副师长（笔者去赣州查访时，这位副师长已调任福建三明军分区副司令员）认定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在刘少奇的罪状公布以后为刘少奇进行辩护的……按毛主席的《公安六条》，她全都够格了”！于是，李九莲被捉进了插翅难飞的监狱。

1971 年 9 月 13 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出逃并摔死于温都尔罕了。按说，这不但应该立即开释李九莲，而且应该大大地赞扬李九莲，赞扬她目光深远、高瞻远瞩；当人们扯高嗓门狂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之后，也同样狂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时候，她就看出这个叛逃者不是什么“永远健康”的“亲密战友”和“副统帅”，而是一个十足的好臣。就凭这，也应该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地把她送出监狱，并向她正式赔礼道歉才是。

但是，历来干了错事坏事从不认错的当权者们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一旦这样做，他们就觉得这会丢了他们的面子，降低了他们的威信，有失“为人民当家作主”者的身份；而失去了这种身份，就不利于作威作福、发号施令。他们向李九莲严密封锁林彪出逃的消息，继续把她关押了将近一年，直到 1972 年 7 月，才把她开释出狱。中共赣州地委给她做的结论是：“性质是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待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他们并派人告知李九莲：“这样处理，你还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还可以革命。”

瘦小孱弱的李九莲信以为真，欣然走出了牢门。然后回家辞别了父母；离开了赣州；到了毛泽东当年搞过农村调查的兴国县，又到了这个县的崇山峻岭中的画眉坳钨矿，山上山下地挑矿砂，每月“工资”十六元。

很快，严酷的现实又一次使她大失所望：敌伪时代的矿警等人可以参加工会，她这个“年轻、出身好”的却没有资格；三年零八个月的拘禁、拷打、虐待，摧

残了她的健康，使她有心而无力从事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附近一所中学因为没有英语教员，孩子们都上不了英语课，她要求去补这个缺，可有关人员回答说：宁可荒废孩子们的外文课，也不能答应她的请求；后经别人介绍，她同意嫁给一个因出身于地主家庭而三十五六还没找到对象的光棍汉，这个光棍汉却在众人之前嘲笑她：宁可讨一个“破鞋”，也不要她这个“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黄花女……

诸如此类的刺激与屈辱，使这位姑娘痛感赣州地委和公检法部门欺骗了她、损害了她。她接连向赣州地区、江西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并到北京上访，要求改变这个“是非颠倒”的结论。

1973年11月，公安部和江西省公安厅，把李九莲的申诉状转到了赣州地区公安局，要求对她的问题必须进行复查。地区公安局拖延了三个多月，它的一位负责人对这份申诉状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批示看也不看，就在上面批了四个字：

“此信暂存”，然后束之高阁。

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多次通过正当途径申诉均如雪落沧海的李九莲，不得不请一些较好的同学，帮她写出一张《反林彪无罪》的大字报，张贴在赣州公园的围墙外，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修改“现行反革命”、“敌对矛盾”的结论，为她的三年冤狱彻底平反。

这一举动，立即涌起广泛的同情与声援的热浪。赣州市和赣州地区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学生、市民、知识分子，纷纷集会和张贴大字报支持李九莲。他们还自发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下或称“李调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并在群众集会上，与地委书记杜昭等人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地委不但断然拒绝了这一情理兼备的要求，反而以“反革命翻案”、“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等新加的罪名，于1974年4月，再次拘捕了李九莲，将其押往兴国县。原由是她既在兴国县画眉坳钨矿劳动，应由兴国县县委及县法院审理处置。

兴国县，明代“海青天”海瑞在这儿当过知县。四百多年来，海瑞为官清廉、办事公正、屡屡平断冤狱的故事，一直在这一带广泛传颂着。因而这里很多人都明白：李九莲是个大冤案。兴国县委领导拒绝受理。他们推辞说，李九莲在赣州市张贴大字报，她的家又在赣州市，这件事理该由赣州市研究处理。两地互相推诿，“李调会”的众多群众又涌向拘禁李九莲的所在，强烈呼吁释放李九莲。程

世清随着林彪倒台之后，有人又一次打电话，请示在江西临时掌权的省军区负责人陈昌奉。毛泽东的这位老资格警卫员再次以省委名义下令：不准释放李九莲！

有了陈昌奉的坚决撑腰，赣州地委的腰板更加强硬了起来。他们指责兴国县委没有党性，犯了原则性错误，随之派人去兴国县，把李九莲押回赣州。但在 1975 年 5 月，赣州地区“公检法”仍以兴国县法院名义，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矛盾进一步激化，她成了“恶攻”分子

李九莲与赣州地委及地区“公检法”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她认为他们已不是共产党，而成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法西斯专政，因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绝不迫害自己人。她拒绝在所谓的《判决书》上签字，也不上诉，并立即绝食以求一死。从赣州市的第二监狱，到江西北部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她断断续续地绝食七十三天。

1977 年 1 月底，劳改农场的犯人们按照一年一度的惯例，进行对上一年度的“年终评审鉴定”。在开评审小组会时，李九莲鉴定中的第一项“我的政治态度”尚未写完，到会“监督指导”的管教人员却对她说：“没有完全写好也不要紧，可以先说说已经写了的。”李九莲拗不过，只好照本宣科。她首先对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在一年中相继辞世表示悲痛，继而对“现在的当政者华国锋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导和政策”进行了批评，接着说“在毛主席逝世时我就说过，‘寄希望于江青’……”在场“监督指导”的管教女干部即刻厉声喝道，“不许放毒”，一把夺走了李九莲手中的鉴定草稿。

这位管教女干部和女犯小组中的积极分子，都指责李九莲在进行“反革命煽动”。而李九莲却泰然自若，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她的未及读完的鉴定草稿上这样写道：

“毛主席历来提倡党的集体领导……华国锋却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华国锋借口反对‘四人帮’，取缔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华国锋在毛主席逝世后，身为党中央主席，没有召开过一次党的会议……无视党的领导作用，妄图用暴力和血腥政策来强迫党员和人民的意义，借口批判‘四人帮’把党搞乱了，把军队搞乱了……”

“……如华国锋按自己的政策路线走下去，能把党事、国事办好，我是拥护的……”

很显然，李九莲的这份尚未写完的鉴定草稿中所持的观点，与她第一次被捕前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与否定的清醒认识是截然对立的。她为什么会这样，本是不难明辨的。

1977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7]六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铁道部于当月中旬下达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纪要》主张：“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对这样的“会议纪要”，当时就有人在私下悄悄议论说，这是“非君者诛”、“因言废人”的继续，并是老的个人迷信的继续和树立新的个人迷信。这只能给那些不明真理而只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的人，继续滥杀无辜以根据；同时也给那些乐于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的人增添了廉价阶梯。但是，当时的党中央立即转发，要全党全国遵照贯彻执行，无异于给“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公安六条》又添了一条。

1977年4月，李九莲被劳改的珠湖农场党委，就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给上级领导单位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历数了李九莲的一切“罪行”，特别强调了李九莲“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誓死保卫华主席，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那些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的精神，我们认为劳改犯李九莲已构成犯罪，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对李九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报告，依次得到了鄱阳县法院和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在这各级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决定或批示中，也都一律强调李九莲犯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一罪，一律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立即执行。

省委常委中的明智之士奋起抗争，但他们屈居少数，未能挽回狂澜

要求立即判处死刑的报告，被送到了江西省委。省委常委会讨论是否作同样批复时，发生了一场争论。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等同志认为，对李九莲的本质及其思想言论，应作唯物主义的分析。应该说，这位女青年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忧国忧民、勤于思考、要求上进的。这样的青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然，她很不成熟，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难免有失偏颇，或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有所反复。这是很自然的，应该予以谅解宽容。我们这些革命几十年的人，在这方面还有过摇摇摆摆，何况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在思想认识上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怎能过于苛求呢！再说，1969年她给恋爱对象写的那封信，以及她写的那些日记，根本不算犯罪，可是她受到了拘禁，定性又错了。人家事后要求平反，本不为过，又把人家抓了起来判以重刑，谁能咽下这口气？因此可以说，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个错案。既然在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之后，“四个指向”的定罪法已不存在了，又是在“年终评审鉴定”小组会上念了尚未写完的材料，怎能叫做“反革命煽动”？至于她对江青和整个“四人帮”的错误认识，只能归罪于我们民主生活中的弊端。如果过去没有人把他们捧得那么高，把江青树为“战友”与“旗手”，把他们的劣迹和野心包得紧紧的，不让世人共知，李九莲和类似的年轻人就不会对他们产生那种错误认识和幻想。再进一步说，如果李九莲没有被一捕再捕，长期与世隔绝，促其产生严重自暴自弃的对立情绪，而让她一直生活在人民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吸取新的空气，她必会像迅速识破林彪真面目那样认清“四人帮”本质的，同样也会正确理解邓小平代替周总理主持工作时“九大整顿”内涵的。

因此，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不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

但是，讨论到最后，到会的常委中的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王泽民、张力雄们只有三票，无力挽狂澜之既倒。

消息传出，赣州地委为彻底肃清李九莲在赣州地区的影响，并进一步打击“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要求省委将李九莲的死刑改到赣州执行。省委立即批复同意。

李九莲被押解到赣州得到如此判决，却漠然待之。她既不上诉，也拒不签字。和几度绝食求死时一样，她认为在这个天地里，很难做一个清白正直的人，“活不如死”。她只在一小片粗劣的灰黄色手纸上，草草留下了一首题为“真理的花

环”的小诗：“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武装自己，同时也是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她又在另一小片同样的手纸上写道：“我只是像一只杜鹃似地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得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年12月14日，浮云蔽日。上午九时，赣州市宽大的体育场举行三万余人的公审宣判大会。主席台下先站了一排都被戴着手铐的“李调会”主要成员。他们此来是“陪绑”，最后押进会场的，是五花大绑的死囚犯李九莲。为避免她在广众之前进行分辩或呼喊口号，她的下颚和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与沈阳张志新之被割破喉管和长春史云峰之被缝起嘴唇两角，“异曲”同工。对她的“判决书”一念完，就在她的胸前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的大牌子，背后插上打着红××的亡命牌，咽喉紧勒，口塞毛巾，架上死囚车游街示众，使她完全彻底地失去了任何呼喊的能力，游街一周后，她被枪杀于赣州市西郊土红色丘陵地带的一座小松林中。她的亲属不敢前往收尸。

一个月后，即1978年1月，曾是“李调会”的广播车广播员，已有三岁女孩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在南昌郊区被处以极刑。

1978年6月及10月，又有一批“李调会”人员被当做揭批查“四人帮”余党的重点人物，而先后被抓进牢房。据不完全统计，连同宣判李九莲死罪的公审大会上陪绑的十余人在内，前后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六十人。

在监狱之外，许多机关、学校、厂矿、科研部门声援过李九莲的干部群众，包括原地委常委赣州市市长、原《赣南日报》总编辑、地区或赣州市的一些局长、赣州四周的一些县委负责干部多人在内，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开除公职或留用察看、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降职降薪或免职停职靠边站的，多达六百多人；挨批挨斗、写检讨、坐“学习班”的，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学、亲友、熟人等等，则数以千计，其中有的人被迫自杀，终于形成了一个殃及广大民众的大冤案。

拨乱反正的鼓声，很难影响到这个角落

1978年1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结束。全会决定全面复查和平反一切冤假错案。12月29日，党中央就以中央文件形式，全文批复了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

中央在这份发至县团级、要求传达到全国基层法院干部的文件中说：在复查工作中，对原被认定的反革命案件，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才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真正做到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要严格法纪，有错必纠。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这份“请示报告”说，粉碎“四人帮”后，陆续复查纠正了一批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遭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也复查纠正了一批因受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其他冤假错案件。但是工作进展不平衡。较好或基本完成的法院是少数；多数虽已复查纠正了一些，但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复查纠正，少数法院还没有动。

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估计，从 1966 年到 1976 年这十一年间，全国各级法院（包括军管期）判处的反革命案犯，约占全部被判处案犯的百分之二十八，其中百分之四十需要改判纠正。在这些需要改判纠正的案犯中，有因为反对林彪、“四人帮”或为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的；有因为不了解党内斗争情况，在议论林彪、“四人帮”时，发过某种怨言，说过某些错话而被判为“恶毒攻击”判刑的。据 1978 年 10 月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统计，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已查出这类案件有一万一千九百多件，已复查平反改判的仅二千二百二十五件。另外，把群众对某些干部不满、对党的某项政策不理解，或由于个人利益未得到满足，向上级写信，或在自己书写的日记、文章、诗词中，写了一些对党、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甚至谩骂言辞的，当做反革命“恶攻”而被判刑的。……还有，由于逼供信，不调查，又不听申辩就草率定案，完全搞错或基本搞错的，也有相当数量。

《请示报告》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的法院对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识不足，心有余悸、顾虑重重，怕被戴上“思想右倾”、“包庇坏人”、“否定军管”、“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帽子，怕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挨整。因而措施不力，行动迟缓。有的办错或批错了案件，怕承担责任而不予纠正，甚至从中阻挠，妨碍落实党的政策……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认为：对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刑的，要坚决彻底平反。对那些既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鸣不平，同时也说了一些错话，甚至说了些带有谩

骂的话，都要历史地全面地进行具体分析，要看主流，看本质，不要揪住说了或写了几句错误言词不放，借口“非纯属”就不予平反纠正。如果这样做，就是不对的。应该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要注意把某些群众由于思想落后或因一时一事不满，而说了或写了一些对党、对领袖和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甚至谩骂的言辞，与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宣传、煽动、破坏加以区别，不要轻易给人戴上“恶毒攻击”帽子。至于那些喊错口号、乱写乱画、无意损坏领袖像、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更不应定为反革命。要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无限上纲而定为“恶毒攻击”、“反革命宣传”、“反革命煽动”、“反革命破坏”的案件，着重进行复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纠正。

中央批转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这份《请示报告》，与李九莲的冤案完全对得上号。可是这份报告提到了复查纠正“反革命”冤错案已取得成绩的许多省市自治区中，没有“江西”二字；然而从《请示报告》列举的阻挠和妨碍落实党的政策的种种表现中，却可以看到“江西”的影子。

1979年4月，面对这份已经传达到基层法院的中央文件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再催促，赣州中级法院才不得不复查了一下李九莲大案。案件复查人王光法，就是当年判处李九莲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九人审判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在1979年4月10日写下的复查意见是：“该案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被告死不认罪，凡(翻)案。”4月16日，地区中级法院检查组的意见是“维持原判”。

1980年1月29日，在与李九莲案有关而被判处有期徒刑者的不断申诉下，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指示赣州地区中级法院进行复查。法院于当年3月15日，写出了《关于李九莲现行反革命一案的复查报告》，坚持认为李九莲犯有一系列反革命罪行，不论是1969年的拘禁、1974年的逮捕和1975年判刑，以及1977年的枪杀，都“符合当时的政策”，“应予维持原判”。隔了一个月，即4月14日，赣州地委常委会“讨论”了地区法院的这个《复查报告》并作了决定：“同意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这一系列动作说明，1978年年底中央批转的全国最高法院党组的那份《请示报告》和中央的那几句关于如何判断“反革命”案的指示，1979年7月最高法院下达通知说，“文革”十年被判为“反革命”的案件已复查了百分之八十三，已平反的冤假错案已达十三万一千三百余件，还有广东省委、山西省委、承

德市委分别在 1979 年 2 月和 9 月在平反“反革命”冤假错案群众大会上公开进行检讨的报道，对赣州地委及地区法院的主要负责人都毫无推动的作用。

面对赣州方面的这种态度，江西省高级法院调去李九莲案的全部案卷，从 1980 年 5 月 8 日开始直接进行全面复查，于当年 9 月作出了复查结论，并上报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复查结论认为，1969 年和 1974 年、1975 年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拘、错捕、错判，1977 年的处死是“轻罪重判，错杀，但李确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9 月 17 日，江西省委研究决定：“同意法院意见，属轻罪重判，错杀，撤销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就在江西省高级法院将这个复查报告送最高法院的时候，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在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的人中，“有十八万四千人遭到错误判决”。

然而，这对赣州的某些人来说，仍如耳边风。

地委书记杜昭说：“记者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

鉴于这种现实，当我即将离南昌去赣州的时候，在 1977 年的省委常委会上反对判处李九莲死刑的江西省军区政委张力雄——解放战争中期，我任新华社江淮前线记者时，他是江淮军区政治部主任，是我的老领导——为顾及我的采访顺利和人身安全，叮嘱我一定要住在赣州军分区招待所，并给军分区政委——也是当年江淮新四军的一位老同志打了电话。到了赣州，我才切实地体验到，我的老领导的叮嘱并不是过分的。

在赣州，李九莲当年学习过的学校、当学徒工和第一次出狱后劳动过的厂矿，以及她被关押过的看守所、监狱的人员，都积极协助我参观并提供我所需要的材料。他们对李九莲不幸均表同情；他们对李九莲问题的分析，与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惟独赣州地委和赣州法院的有关同志，对我的查访采取了抵制或不合作的态度。

11 月 21 日晚饭后，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副书记李侦续等人，驱车来到赣州军分区招待所与我谈话。虽然有时他们谈得也相当委婉，但都坚持认为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即使不是反革命，也是硬骨头造反派”，因为“谁当领导她就反对谁”。对于李九莲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张贴《反林彪无罪》大字报的要求平反活动，以及由此引发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给地委造成的种种不

快，他们仍然耿耿于怀。他们甚至说，“如果她想一死了之，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骂毛主席呢？”

我在采访提纲中，列出了李九莲案卷中出现的几个实情不明的人名，其中有的也死于狱中，我想弄明白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杜昭和李侦续认为这些人都很坏。由此，转达地区法院对来访提纲有意见的口气说，“法院同志认为记者屁股坐在什么地方，是来干什么的？”

最后，他们的结语是，李九莲是反革命，只是不该杀而已。说得很轻巧，绝无杀错了人的那种负疚愧痛之情。

我说我的屁股坐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凳子上，是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而来的。我说在赣州，在江西，很多人都认为李九莲第一次被拘捕时，她自身并没有错。她那时才二十三岁，就能够猛然觉悟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谬误，《语录》不离手的林彪是奸臣；而我们一些革命了几十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她父辈的人却还执迷不悟，把她当做“反革命”，往死里整，最后终于酿成了她身首异处的悲剧，至今仍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失误辩解，这不论是对党、对人民，还是对自己的良知，都是说不过去的。

这次谈话，延续了数小时。夜间十一点，我下楼送他们登车而返时，同志式地拍拍杜昭的肩，请他们第二天晚上继续交换意见。杜昭也满口应允，结果第二天让我白候了一个夜晚，后来我要求地委派人带我去走访李九莲的家庭和有关场所，也遭到不明不白的拒绝。

看来，这个大冤案的彻底平复，非尚方宝剑不行。

胡耀邦的批示，才掀开了这里的大铁盖儿

1980年除夕夜晚，我飞返北京。对所得素材经数日整理，写出一篇《内参》，题目是：《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当时，华国锋仍是党中央主席。这样的《内参》能否发得出，也还是个大问题。但是经当时的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杜导正拍板，被送往印厂发排。

正在这个关口上，1981年1月23日，杜昭在赣州的一个会议上照旧强调，“李九莲反革命案是翻不了的，反革命的‘李调会’案是翻不了的”。他的这个

讲话，立即刊登在《赣南通讯》，向赣州地区各县、各单位迅速而广泛地传达。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也作了基本相似的表态。

1月25日，那篇《内参》稿一送到党中央，立刻受到了胡耀邦的重视，他当即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做了这样的批示：

彭冲、江华、(赵)苍壁同志：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彭冲当天就给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写了两行字：“(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沉重的铁盖终于被掀开了。

2月17日开始，江西省法院按照省委的指示，并请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和赣州地区公检法机关派人参加，彻底复查李九莲案，3月9日就做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3月18日，省委常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作出了对李九莲案进行平反纠正的决定。

3月26日，赣州地委召开了所属各县市和地区直属机关、厂矿企业与学校的党委负责人会议。此时地委书记杜昭已去中央党校学习，所以会议比较顺利地作出了贯彻耀邦批示和省委决定的决定。

接着，由省法院、地区法院和有关单位出面，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正决定。

4月17日，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省委的指示，就李九莲的复查改正事，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报告，并附上江西省高级法院《关于李九莲案件的复查报告》等材料。省高级法院的《复查报告》态度相当诚恳，用词也很恳切。它在历数了多年中接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流毒所造成的危害之后，用检讨的口吻说：“在处理李九莲案件时，不能分清违法与犯罪的界限，甚至模糊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对李九莲给她恋爱对象曾昭银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当时虽然看出她怀疑林彪是对的，但她对文化大革命提出非议，为刘少奇同志鸣不平，我们(就)没有看出她这一言行是正确的。对她1974年的申诉，也没有看出是合理的，相反仍认为她这些言行是犯罪行为。”

在谈到复核李九莲死刑案件时，省法院检查说，他们没有分析此前兴国县法院对李九莲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以及赣州地区保卫部认定李九莲有反革命罪

等等是否正确，只是孤立地研究了李九莲在劳改期间的表现，和她在《我的政治态度》中一些攻击粉碎“四人帮”、攻击领袖、吹捧江青的言论，“没有对李九莲这个具体人进行认真地具体地分析研究”，片面地认为她犯有“‘反革命’罪”，“判处了她死刑”。

在检查没能及时纠正这一错误的危害时，省法院的《复查报告》继续写道：“从1979年开始(就)有人为李九莲申诉，中央有关部门也陆续转来为李九莲申诉的信件，省法院和地区中级法院……(也)进行过复查。但由于在我们头脑里‘左’的影响没有肃清，思想不够解放，认为她没有了这条罪还有那条罪，总想抓她一点尾巴；案内没有证明(她)犯罪的材料，还想再调查找些材料来定点罪。在定性上，认为她构不上反革命罪，还想定她诽谤罪，以致使这个案件不能尽快地、实事求是地、正确地得到纠正。”

这时令人高兴地看到，江西省法院的这份《复查报告》在分析李九莲问题时所运用的逻辑，与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观点是这样的和谐一致，真正按照耀邦的批示，着重总结了经验教训。

然而人们：还得警惕啊

1981年初夏，在江西省和赣州地区为这偌大的冤案平反昭雪处理善后的时候，笔者与中纪委的一位老同志朱立，驱车到中央党校，见到了正在那里学习马列的杜昭，我们向他说了耀邦的批示，说了南昌和赣州正为这起冤案落实政策的动态，希望他能够扭转原来的态度促进这项政策的圆满落实。他涨红着脸，说他现在只能集中精力完成党所交给的学习任务；关于这件事，在家的同志会按照耀邦同志的批示办的。但从他的神态上看，他似乎仍有点悻悻然。

1981年秋天，为彻底处理好李九莲一案受牵连的众多人员的善后事宜，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刘复之，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室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冤案。李九莲在那样早的时候就开始反对林彪，不简单！后来她批评华国锋，是因为绝对相信毛主席的缘故。她身陷囹圄多年，不了解外面的实际情况。这当中有些错误，完全应该谅解她，……她对小平同志的认识有错误，说了一句不恭的话，这也不算犯法。这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反动思想。她长期接受的是“左”倾思想的熏陶，后来又长期被管制关押，这种思想没有来得及改变，是可以理解的。她没罪。

刘复之接着说：这个案子大，株连多，牵涉面广，拖得又太久，影响之深广是必然的。当年受到“李调会”人员冲击的一些领导干部仍在台上。这样，同情李九莲等人的人很多，反对他们的人也不少。所以处理善后必须稳妥：既要坚决不留尾巴，又要安定团结。对当年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中犯了错误而今天仍在台上的人，要多做工作，促使他们自己去彻底改正。对受害的同志，也要多做工作。另外，骨子里并不同意中央和省委对李九莲本质的看法，仍然坚持认为李九莲是什么“现行”或“铁杆”的人；还有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保持“永远正确”的面子，不得不强拉硬拽、胡拼乱凑一些理由，继续打肿脸充胖子以伺机报复的人，都还有一些。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笔者也参加了这个小型座谈会。我认为刘复之的这种分析是相当正确的。要私心重、缺乏正义感的人，能够真诚爽快地承认和纠正错误，是很难很难的。1983年，在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在早结束中央党校的学业、回到了赣州的杜昭的领导下，赣州地区果然把已经恢复工作的原“李调会”的一些成员重新抓了起来，与那些真正的刑事犯混杂在一起，五花大绑地游街示众。这些人被新加的罪名是：不服从妥善处理，上访闹事，谩骂领导，传阅有关“李案”处理和调整工资的“机密”文件，等等。这就像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古今中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风风雨雨，总会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的。一些新旧时代都能左右逢源、很吃得开的人，往往都很擅长于执新鼓槌，敲打他们烂熟的旧鼓点。而我们有许多人，在胜利的欣喜中却往往掉以轻心，麻木不仁。

不过不管怎么样，最后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李九莲、钟海源的冤魂均得以告慰，“李调会”的案子被翻了过来，受牵连的千百人也总算喘了一大口气。同时据说，全国因“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被处死的五十多人的冤案，也由此一一得到了平反纠正。

一封江西造反派的求助信

作者:suozhan99 2008-3-11

这是一封江西造反派求助信，看了让人心酸流泪。信中原本都是真名实姓，为了不因敏感字而删除，真名实姓都打了‘*’号。他们的信多次寄出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

据说他们的信根本就到不了书记的手中，都让‘信访办’给截了，当投诉者追问信访办时，他们答复说‘没有上传的责任’。

今年的两会特别关注依法治国、民主、民生等问题。听说现在总书记和总理及地方首长都经常上网，听基层民众的呼声，我将这封信贴到网上，有望能通达天庭，也许能被我们的首长看到，并引起重视，从而能使问题得以解决。（江西像* * * * *这样的情况少说也得有数百人。）

造反派，不管他们有多大的罪孽，再大也大不过溥义和沈醉。而溥义和沈醉在建国十周年时就特赦了，那些下层的地、富、反、坏份子也于 80 年代前相续赦免、摘帽，即使还‘代帽’的也是给生活出路的。而文革已过去 32 年了，而这些文革中造反派至今还背着那个沉重政治包袱，特别是江西坐过牢判了刑的造反派至今连个生活出路都不给，这在全国也少有。

党中央 82 年就为解决他们的问题下达过九号文件，同年江西也下达了十号文件，可是有关部门就是给顶着不办。最近终于有所松动，原省革委付主任和常委都领到了生活费，可是有关部门说‘这是特例，不具普遍性。’这就是说其它人要想解决问题还得‘拉关系走门路’，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还要按文革中的职务‘论资排辈’。这一切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现在官场的腐败和当权者的冷漠无情，也说明有关部门执法和执行政策的随意性，将民生和法制当儿戏。

这些人员都到了耄耋之年，人也即将就木，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诉求应该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我以为这也是一项依法治国关注民生的重要内容。是否有必要在两会上议一议，能不能在新一届国家主席上任之际发布一个大赦令，将他们的头上的反革命帽子给摘了，并给予生活出路。这对促进社会和谐，对促进人民安定团结，对重树党和政府的形象都是件大好事！

附：给**书记的一封信

* * * 书记：

我叫* * *。原系南昌* * * * *职工。因参与‘文革’，被南昌中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附加三年剥夺公民权。于 90 年刑满释放。原公

职、工龄等一撸到底。现年 70 岁整，已年过古稀，身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肺结核、风湿病等多种疾病，已于九十年代中期因年迈多病而失去从业能力，十几年来，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坐吃山空。就我现在的处境，说不定那一天躺在床上起不来，那就只有等着往火葬场拖的份了。

然而近日社会上盛传：文革后的两案人员（如涂烈、万里浪等）原省革委主任、常委生活出路问题都已经解决……。这又燃起了我的希望。看来党和政府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人。我在文革中也是省革委委员之一，我有理由相信：主任、常委能解决生存问题，那么与其同案的委员和一般群众也应该能解决，党和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传言：上述两案人员生活出路的解决是走了‘门路’的。不知是真是假？也有人为此走访了有关部门，答复说那是‘特例’，不具普遍性。

我以为解决两案人员的生活出路是比较严肃的党的政策问题，早在 1982 年中央有九号文件，江西有十号文件，根据这两个文件的精神，我们这类型人员是不该判刑的，生活出路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可是由于江西的派性严重，使党政策得不到落实，一直拖到现在。据说当时省委书记白栋材同志也认为对我们这些人员的处理过重了，为我们的生活出路问题的解决，他曾有个批示，并得到两任前书记毛致用和***的认同。此后就不知被什么部门给卡住了。现在白栋材同志还健在，你不妨问问他。

现在党和政府十分关注民生问题，‘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已写进十七大报告，希望党的政策在我的身上能得到落实。

此致

敬礼！

原南昌****员工 *** 2008/3/4

2008 年 3 月 13 日初稿

2011 年 10 月 7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7）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七节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听取了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关于甘肃省军区支援甘肃地方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

现对甘肃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甘肃省军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光荣任务，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同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甘肃省红色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主要是在《红联》处理《七一战斗队》问题上，没有掌握大方向，不做团结工作，轻率地开除了《七一战斗队》，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甘肃省革命左派大联合受到挫折。在处理这样重大问题上，詹大南同志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时，还竟然错误地进行抵制。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詹大南同志已经检讨了错误并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甘肃省军区广大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很多工作，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军队的支左工作，在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左工作要服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要严格组织纪律，不得自行其是。

（四）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以冼恒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国珍（兰州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同志为副主任。甘肃省军区要全力参加军管工作。甘肃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兰州军区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露和批判以汪峰为代表的甘肃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在斗争中壮大左派力量，分化瓦解保守组织，争取教育广大群众，做好革命干部的“亮相”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取得甘肃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月，

毛泽东关于甘肃实行军管和成立省革委会问题的批语〔1〕 一 照办。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二 林彪、恩来

〔2〕同志： 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冼、詹大南〔3〕诸同志商处。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退林彪同志：

此件已阅，很好，照办。 毛泽东 七月三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

刊印。 注释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批语。 意

见中说，“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本篇二是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语。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党委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十二时给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并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个电报说，兰州地区当前的文化革命形势仍然是大好的，一些左派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这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领导干部已表态支持“红三司”，因此“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我们认为，应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委会。军区党委经过讨论，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红三司”，请

速指示。本篇三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七月二十九日转发《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的通知和纪要的批语。这个纪要是根据毛泽东五月十四日批示，将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冼恒汉、詹大南等二十多名负责人和胡继宗召到北京，就甘肃问题进行座谈后产生的。纪要指出，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2〕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3〕张，指张达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指冼恒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詹大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甘肃省军区司令员。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兰州军区关于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报告

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并中央文革：

（转张达志、冼恒汉同志）

一、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五月八日、九日，“红色长征团”、“工联”等真正的革命左派相继杀出“红联”后，当前已形成以“革联”保守派为一方，以“火车头”、“中南海”等革命群众组织为一方，以“工联”、“长征团”、“七·一”等革命左派组织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形势。我们认为，当前的形势仍是大好的形势。兰州文化大革命，由于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破坏及“红联（指）”在二·五夺权后，没有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然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终因是属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难以成效。因而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兰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反复。在这种情况下，“工联”、“长征团”等革命左派组织杀出“红联”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是革命的行动，是符合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规律的。

二、以“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

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甘肃省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认为，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三、原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革命领导干部已公开表态支持“红三司”，“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

四、“红三司”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我们认为，应该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火车头”、“中南海”、“红鹰”等革命群众组织及“革联”的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

五、“红三司”定于五月十四日召开大会，发表宣言，革命领导干部讲话，举行盛大规模的游行。他们要求兰州军区表态支持。经军区党委讨论，一致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速示。

兰州军区党委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十二时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康生、关锋、杨成武接见了两级军区的负责人，把中央批示的两个文件发给了大家，给大家讲明主席的批示，并一段一段地讲解文件，严格地批评了詹大南。

康老讲，“二·五”夺权是革命行动，即使“三结合”的差，也应当支持。但是“二·五”夺权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不对的也支持，你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左派组织夺权以后，一个平常的现象就是把“走资派”不斗了、放松了。你们那里不是也以为汪峰是死老虎了！红联夺权以后，没有进行斗争，相反的矛头对内，打“内战”，这就是方向问题了。把矛头对准同自己一起战斗的兄弟了。红联开始是好的，“长征团”到北京来过，原来叫“打倒汪峰委员会”，他们先举起打倒汪峰的旗帜嘛！肖泽民也是比较早的打起反汪峰旗帜的，他也是“红联”，也举起反汪峰的旗帜的，夺权以后，矛头对准先提出打倒汪峰为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是导致了红联的分裂，这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另外，夺权以后，不执行接班人的第三条，就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你们不是在不同意见中做工作，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而且实

践证明了是犯了错误的人，甚至是有对保守倾向和保守的，不做工作，而是用打、砸、抢、压的办法。革联的发展，是红联压的结果，不做工作，去年八月，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一方面支持他们，一方面对他们说：“马克思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以后的有些红卫兵恰恰在这个方面犯了错误，甚至走到反面，象联动就是这样。毛主席三月七日指示，天津延安中学这个批语是怎么说的呢？给解放军一个任务，要劝说的讲，使小将们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任务相当困难。有的地方，欢送军训团，毛主席叫解放军劝说小将，你们在支左工作中，“二·五”夺权到二月底，尤其是詹大南同志开除了肖泽民一些人，开除了“七·一”战斗队，又结合了谁呢？找到了王世泰。你们用电报说王世泰是革命领导干部，要斗争胡继宗，中央没有批，等你们觉悟，你们上了《甘肃日报》了。中央对你们教育实在是耐心哪！那样与中央精神相违反。

关锋讲，打倒个汪锋，叫王世泰上台，我们等你们觉悟，硬是这样做。

康生讲：吕正操是压铁路局这一方面，为什么呢？因为吕正操本身的问题，吕正操是彭真的桃园三结义，是反林总的，是实现王明路线的。你们看去年五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林总的报告没有？那次林总就讲桃园三结义，桃园三结义是彭真、吕正操、林枫，他们在东北就反林总，所以吕正操抵制文化大革命，是无奈铁路的文化大革命与他自己有关。刘澜涛和薄一波是保汪锋的，吕正操与刘澜涛、薄一波彼此之间互相结合，当时的口号是“不要得理不让人”。这就是告诉铁路局揪了裴、马就不要继续斗争了。保汪锋，保汪锋也是保吕正操、刘澜涛、薄一波，吕正操安排铁道部的副部长，贯彻他的路线，以后又派了一个政治部主任贯彻这个东西，所以铁路受吕正操的影响。那个时候，还不叫“火车头”，叫“文革筹委会”。上层干部受影响，去年一段听不到铁路局的活动，兰州的问题，不仅涉及到汪锋，还涉及到吕正操、薄一波、刘澜涛。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甘肃省领导同志

康老讲，西北这个地方，阶级斗争是比较复杂的，从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刘澜涛、一直到汪锋，另外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献珍，把西北、西南当作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据点，贺龙、李井泉进入西南，彭真、刘澜

涛，进入西北，西北的确就是重点。解放以后，三次大的斗争，反高、饶的斗争，反彭、黄的斗争，反彭、罗、陆、杨的斗争，都扯到西北地区。因此，西北比较复杂。加之在过去干部中的地方主义相当严重的。这个地方比较复杂，彭、高、习的影响不能说在西北没有。所以，地区比较复杂。甘肃文化大革命以来，又插入了一个吕正操、薄一波，铁路局的问题。吕正操问题是严重的，他们的桃园三结义，这两个结义彭真，林枫检查起来了，吕正操还没检查，和吕正操的斗争很复杂，斗吕正操又牵涉到薄一波，薄一波的问题没有彻底揭开，汪锋也没有彻底揭开。我们孤立一个反革命分子汪锋也不能轻视，你们的任务很大，阶级斗争比较复杂。

康生还说，汪锋从一九六二年中央就不信任他了，中央没有处理，当时考虑到西北的工作方面震动的很大，那个时间，也考虑了汪锋的书记还当不当？还是想争取他多揭发习中勋的问题。

关锋讲：批判汪锋一小撮，肃清吕正操的恶劣影响。

康生说：批判刘、邓、陶，实际上有吕正操、薄一波、刘澜涛、汪锋。对汪锋的问题，革命的群众组织要调查材料，从历史上调查，不知三司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没有。汪锋有没有被捕过？我当时说，有两年的时间下落不明，这段历史没有查清。

康生讲：没有看到他的档案，估计前面问题不少。

关锋讲：汪锋不是死老虎，这些人再翻案，那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问题。左派必须有这个觉悟，汪锋是很危险的，都不是死老虎。他们有阶级本能，不把他整倒整臭，他们是不会甘心的，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干扰，就会捣乱，再搞就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了，是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教育各组织、各派，要有这个觉悟。彭德怀吃饱了肚子还锻炼身体哪！他还不是准备再干！？不要认为一罢官，一点名，就没有搞头了。应该懂得，这个壁虎打死了，他还会装死，不注意就跑了，苍蝇也会装死，不注意就飞了，要把脑筋用在这个方面。

康生讲：军队的问题解决了，群众工作要做。群众是三方面的啰！三司、红联、革联。要促进三方面大联合，还有很大的问题。你们提出坚决支持三司，团结红联，争取革联，实现这个要求还不容易。汪锋一小撮不是没有作用，群众之间的隔阂不能一下子消除。三司这方面有“长征团”、“七·一”战斗队、“工

联”，应该去说服他们，能够去争取多数群众，要进行团结工作。要充分的估计三司会不会翘尾巴，翘尾巴就要犯错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个规律。有时候，头头也同意做团结工作，但群众一下子转不过来。内蒙是这样子，西安的问题最清楚了，开始西大、西工大压交大。西工大、西大曾经喊过：“打、砸、抢万岁！”压交大比较严重。以后我们支持了一下交大，结果交大就翘尾巴了，走向了反对胡伟、黄经耀（这是军区的人）。所以翘尾巴几乎是普遍规律，两个军区要很好注意这个问题。支持他们正确的方面，不支持他们错误的方面。对三司要进行工作，主要是端正政策，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詹大南同志检查以后，对红联可能有压力。两级军区也好，三司也好，都不要歧视他们，应该是做工作，促进他们自己检讨。对革联你们是争取他们了，也是很艰苦的工作呀！革联、红联都必然要分化，但你们注意不要去瓦解他们，他们实际上是要分化的。三司翘尾巴他们会感到受压制的，或者是受坏人煽动闹起来，也可能是革联、红联联合起来对付三司。革联的事例就更多了，胡继宗出来，革联那时候就不那么舒服，高健君在里边煽风点火嘛！

康生讲：对兰大，兰大江隆基到底批判的怎么样？

康生讲：翻什么案？叫兰大的同学研究研究，江隆基到底是个什么人？我没有看他的档案，知道他到德国去过。到德国去是杨虎城送去的。当时，陕西的杨虎城和山西的阎锡山都有这一手，是招降纳叛。军阀都有这一套，从各方面吊线。陕西前一个时期有这样舆论，陕西的共产党员都拥护这个于有仁。不但江隆基，还有一批人啰，他们是共产党员，又是杨虎城的人。这个汪锋算不算哪？不清楚。如王炳南也是杨虎城送出去的。送到德国的，不只是这两个人，还记得有个秦凤团。那个时间阎锡山，把动摇的、叛变的送到日本，杨虎城也送到德国，江隆基到底怎么样？过去加入了团，还是加入的党？记不清了。只要是杨虎城送出去的，就不那么妙了。这是各方面都吊上了线了。军阀的军队、杂牌的军队，都是这个样子。江隆基不是到法国，是到德国。德国有一个反帝大同盟都是中国的留学生，开始是王炳南负责，以后是江隆基负责，他们两个好象是有什么矛盾，我去法国见到过江隆基，他是代表德国的反帝大同盟到法国参加一个什么会。他不是在英国是在德国，他从德国回来以后，去延安大学了，延安撤退以后，不知道他到哪了？解放以后，他去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那一套完全是投降，向资产阶级投

降。他好象历史上还有什么问题，他到兰州，是北大的工作把他撤销了。陆平刚到北大，反江隆基的右倾还是不能否定的。江隆基在五七年反右派当中完全是投降主义，整风、反右，北大的工作最差了。北大对资产阶级教授完全保护下来了，马寅初是在我们的压力下撤掉的。陆平原来是铁道部的副部长，这是彭真当时认为调的最好的一个副部长到北大去当校长去。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

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洗恒汉、詹大南、龙炳初、张忠等二十名负责同志和胡继宗同志，在北京期间，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同志的多次接见，并直接领导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毛主席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使我们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大家提高了思想，统一了认识，端正了方向。两级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的分歧已基本解决，对于今后如何把甘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进行了充分讨论。纪要如下：

（一）《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二·五”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也是正确的。但是，夺权以后詹大南同志以军方代表的身份，在《红联指挥部》工作期间，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没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左派组织，开除了《七一战斗队》，排斥《工联》，《红色长征团》，《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压制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又开除了《红战》；错误地结合了王世泰，打击了胡继宗同志，并在甘肃日报上大肆宣传；轻率地开除了已结合的领导干部。这就造成了《红联》的分裂，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詹大南同志处理上述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批评、纠正其错误时，还错误地进行抵制。五月，中央、军委听取了张达志、洗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的汇报，提出《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四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照办。詹大南同志对“四条”竟然进行抵制，并给中央施加压力，企图改变“四条”。这次来京，经过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同志谆谆教导，认真学习文件，詹大南同志认识了错误，进行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詹大南

同志应向机关、部队和革命群众，做公开检讨，挽回影响。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广大干部、战士是没有责任的。

（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必须认真传达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建议党中央批准把这两个文件印发给营以上的党员干部，并把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在广大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中口头传达，使广大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牢记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对解决甘肃问题的重要指示，并落实在行动上。在传达学习中，甘肃省军区要检查前一段的支左工作，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整顿纪律，保持机关的正常工作和部队的绝对稳定。兰州军区要教育机关、部队要更好地同甘肃省军区干部、战士加强团结；要主动检查在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我们相信，两级军区的分歧，一定能够消除，在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中，会更好的团结起来。对于个别屡教不改坚持错误的人，要按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理。

（三）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由冼恒汉同志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同志任副组长。小组成员，预计二十名左右，其中包括军方代表、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部。小组成员的具体人选，拟回去以后，经同群众协商，再确定上报。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组织以左派为核心的广泛的革命大联合，筹建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甘肃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管起来。

（四）正确对待三大派群众组织。坚决支持《红三司》；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红联》；积极地、艰苦地说服教育《革联》端正大方向。对三大派，都要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开展自我批评，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力量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大联合。对于原则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应进行正常的讨论、辩论。引导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甘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坚决贯彻“六·六”通令和中央六月二十四日指示，不搞打、砸、抢、抄、抓，不搞武斗。

（五）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汪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汪锋一小撮，没有彻底挖深，更没有彻底打倒。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拼命进行反扑，妄图重新上台。从历史看，西北是彭真、刘澜涛苦心经营的反革命政变据点，彭、高、习的恶劣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在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吕正操的黑手又伸向了甘肃，企图保汪锋，实际也是保自己。因此，甘肃的阶级斗争很复杂，任务很艰巨。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汪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深批透，斗倒斗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以及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是甘肃革命群众当前的斗争大方向。号召各革命群众组织，为完成这个共同任务，停止“内战”，团结对敌，狠斗“私”字，勇敢上阵。在大批判中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逐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建议党中央批准在《甘肃日报》上点名批判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薄一波、吕正操、刘澜涛、汪锋。

（六）大家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以张达志、洗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在支左工作中大方向是正确的。军队的“三支”、“两军”工作必须在兰州军区的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左工作，必须坚决服从以张达志、洗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不得自行其是。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革命干部的积极性，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团结一致，为完成党中央、毛主席给予我们的“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而坚决奋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康生等人接见甘肃到会人员

关锋把纪要的中央批语念给大家听。

康老说：

刚才关锋同志把纪要的中央批语念给大家听了，

批语的关一段是批准了纪要，因为纪要是正确的，可行的，同意六条意见，就是批准了。这就说明这次会议作出了成绩。会议最后两级军区达成了六条意见，这是正确的，中央同意了。六条说明会议开的是有成绩的，有结果的。

这个批语的第二段，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这就是说过去在支左工作上，两级军区不够团结。因为省军区向中央发过电报，在下边也散布过反对兰州军区的意见，下边喊“打倒张达志，洗恒汉！”的口号是错误的。甚至错误地喊：“打倒张、洗、杨，解放大西北！”在军队里下级提出这样的口号是错误地，也是严重的。

（关锋插话说，主席几次讲，兰州大区在支左上大方向是正确的。）

康生继续说：对这种恶劣的现象，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很关心，把两方面找到中央来，本来中央早就知道，四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可惜四条被军区一部分同志没贯彻执行，遭到了公开的、不公开的抵抗。这次没有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有的来了也没有见，因为在群众面前解决两级军区的问题不合适。看来，首先是两级军区的团结，这次在北京基本上达到了团结的目的，说明会议是积极的、有成绩的。因此，批语中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团结。其目的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把“三支”、“两军”工作进一步做好。但是，在兰州军区的统一领导下，具体说，就是在张、洗领导的兰州军区的领导下面，这一点过去省军区的同志存在着问题，具体地证明是四条就有规定，结果没有真正贯彻。这一次一定要以张、洗为首的兰州军区统一领导下，因为主席几次讲过兰州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青海问题上证明了的，甘肃问题也证明了的，所以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第一个文件就规定了以张、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军管会。这次批语还是批这个问题。第一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第二是在兰州军区的统一领导下，这并不是说，过去的一切都不好，是在支左上，省军区特别是詹大南同志犯了错误。现在詹大南同志检讨了，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还是在兰州军区统一领导下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好。

第三段讲，坚决执行三个文件。一个是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一个是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一个是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三个文件都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了的，经过林副主席亲自批准了的。兰州军区，甘肃军区，要坚决贯彻这三个文件，还要积极引导群众贯彻执行，下边还有一句，就是坚决反对省市机关和甘肃省军区内个别人抵制中央指示的一切

行为，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兰州的形势是大好嘍，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可不可以有个别人在省市机关和甘肃省军区内部抵制中央的指示，指出这一点，同志们应该看到，还是可能的。因为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上次的文件有人抵触了。这次无论省军区领导，无论是干部、战士，应该深深的以此为戒。当然，这里面是有很多原因的，不能怪下面。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应该注意，你们个别领导要是抵制中央指示，詹大南在检查中不是讲到这个问题吗？我们应该向大家说清楚，詹大南同志在中央承认错误，回去以后有抵触情绪，对下面有影响了，借以为戒。特别讲一下，付加庚同志，你初次来中央参加会议，你检查一下，我们认为这段时间你表现是不好的。现在可能有些改变了，也许改变不太大，因为我们没有见到你的检讨。这样严肃的问题，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当然，允许你们保留不同意见，但是不要在口头上检讨了一下应付过关了，实际上并不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错了不要紧，认真地改正错误，这才是共产党、解放军的态度。改正错误要严肃对待。不然，对毛主席的抗拒不是小问题。同时，胡正平，胡正平同志不在了，不知他的态度怎么样。总之，中央希望把上一次引以为戒。同志们知道“武汉事件”了，也知道河南了，武汉从五月十二号是抗拒中央，毛主席指示，很不好，陈再道同志走上了叛乱，性质就变了。甘肃也发生了问题，应引以为戒，希望不要发生抵制中央的一切行为。如果有，要坚决反对。当然，我们有经验，没有公开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常常是对中央，主席的东西加以曲解，甚至是随便造谣言，说什么中央文革蒙蔽了主席了。当然，也有反革命分子公开反对中央了，希望同志们警惕这一点。这是说的领导了，下边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呢？不能绝对地说没有，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特别是詹大南同志自己要好好做工作，往往有人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玩火可以烧掉自己，所以要去做工作。部队也是群众嘛！也要做说服教育工作。这是一方面嘍！是来自部队，他不是支持欢迎改正错误，而是抗拒改正错误，一定要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问题还可能来自群众一方面，更多的是来自红联方面。詹大南同志的错误或多或少和他们有关系，詹大南不检讨，不改正错误，会使红联更主动一些。河南军区支持了八大总部检讨了错误，他们就去冲军区，冲省军区，不叫省军区承认错误，一承认错误，他们就不好混。山西，张日清也是在夺权以后犯错误，支持红联战，中央支持红联总，红联总就冲击省军区了，张日清的办公室。兰州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对这

一点要做工作。这就是说，要估计要有个别人、个别的组织，抵制中央的指示。有这种情况，你们领导机关要坚决反对。这是讲批示第三段，这是主要的，其他问题纪要上都讲了。

纪要和批示可以发到连队和人武干事，纪要林副主席批准了，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办。

关锋讲：中央批准了在《甘肃日报》上，点名批判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薄一波、吕正操、刘澜涛，汪锋。中央所以批准点这些人的名，因为他们都向甘肃伸了黑手。由彭、高、习这条黑线，吕正操、薄一波也插了手，特别是在甘肃要批判吕正操。吕正操是桃园三结义之一，反林副主席，反毛主席，是三反分子毫无问题。吕正操的问题不仅如此，还是个大坏蛋。要从政治上，批判他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他是三反份子。点薄一波的名，因为他在甘肃插了手，作了一笔政治交易。本来铁路反汪锋是好的，但是两次政治交易压了下去，蒙蔽了不少人。铁路局有些人受了蒙蔽，方向就转了。铁路局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罪责应该归于吕正操、薄一波。所以特别提到点他们的名，甘肃不批判他们，甘肃的问题不好解决。你们回去后，可见和铁路局、铁道学院接触一下，搞大批判，这有助于大联合。

关锋讲：吕正操不仅是反党分子，还是反革命分子。对两次政治交易也作些说明，去年八月，兰大一派，铁路局一派，汪锋操纵着兰大李贵子一派，与铁路闹的挺紧张。先撤的是赵涛、苏华，以后撤裴，马。薄一波插手甘肃的问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薄一波找吕正操、找汪锋谈判。以后，吕正操也提出来“不要得理不饶人”。这就给铁路局定调子，反了裴、马就不要反汪锋了。因此，给铁路局施加压力，要求炮口只对内，不对外。在去年八月，铁道部副部长苏杰还到兰州调解铁路局和省委的矛盾。去年八月刘昌汉也曾奉刘澜涛之命到兰州铁路局施加压力。到了九月二十九日，吕正操把赵涛叫到铁道部施加压力，吕正操给赵涛讲：“你们不要搞过分了，省委书记已经搞下去两个了，不要再搞了”。意思是适可而止，再搞的话就不知足了，不能搞汪锋。吕正操还说：你们搞文化大革命，只能搞你们自己的问题，不能反上。你们反省委、反铁道部，省委、铁道部反谁呀？第二次政治交易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时候，吕正操、刘澜涛，谈判好了，叫胡继宗，高健君布置任务，有这样一个电话稿嘛！（下面念稿：九

日上午，吕正操同志，刘澜涛同志，商谈了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两人也参加了。吕正操同志说：“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部里已经给赵涛同志谈了话，对他们有批评，赵涛同志能够接受。部里已向他们交待，今后铁路工人不要上街，如果贴了，由铁路局自己盖起来。不要出动宣传车，不要散发传单，有什么意见，通过组织传达。同时，不对红卫兵出借宣传车，也不再接待外地红卫兵。即使铁路工人反对，也必须加以说服教育。吕正操同志说：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部里昨晚已经派出政治部副主任任克加同志，带领工作组即赴甘肃，沿着铁路线向铁路职工进行工作。吕正操还提出，省委应对兰州铁路局进行领导，有错误应当对他们指出来。刘澜涛同志接着指示说，省委要与铁道部工作结合起来，教育机关、工厂也不要贴铁路局的大字报，散发传单，出宣传车。任克加同志来了，省委应该热情地，诚恳地接待。胡继宗，高健君，六六年十月十日三时九分）。

关锋讲：最近有这样的情况，确实不确实再查，兰州军区部队游行，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红联冲击游行部队。现在红联的大方向越来越不对头。解放军游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打倒陈再道，你们也冲？！红联你们也知道有四条。他们想在北京会议没有结束之前，把三司打垮。这样做，危险的是他们自己。

康生讲：“武汉事件”发生之后，听说部队游行，红联的人冲游行部队，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武汉事件发生后，全国纷纷声讨陈再道，不同观点的，不同派别的，可以一起开会、游行，从来没有听说冲击游行部队的，唯独是兰州发生了这样问题。《人民日报》登载声讨陈再道的情况唯独没有兰州，请同志们很严肃的注意这一问题。对待这样一个反革命事件，怎么能够这样子呢？难道广大群众他们拥护刘邓？！拥护陈再道的？！这个不是群众罪过，这是一小撮人别有用心。这件事要引起同志们严肃注意。

康生讲：尤其最近武斗恶化，我们得到的消息，红联联合革联，他们说中央对甘肃问题还没有解决，趁机把三司打垮。这是不能不注意的。河南也是这样的，想把“二·七”公社打垮。兰州为什么武斗严重呢？他们知道，批评了詹大南，詹大南检讨了，对他们不利。他们也知道三司，还是个造反派组织。因此，把三司彻底打垮。各地的规律是一样的，一个作法。

康生讲：必须给红联说，两次冲击部队游行必须承认错误，给他们说，难道你们不反对反革命分子吗？为什么兰州不能联合大游行，问他们政治上负不不负责任？詹大南犯错误，他们也要犯错误，甚至于越来越远了，冲击声讨陈再道的游行部队。

康生讲：武汉事件应取得经验教训。

康生说：要搞好宣传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他们操纵计划的叛乱行为要好好地向干部向地方干部宣传，取得经验教训。第一，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人民解放军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通过宣传大大提高觉悟。第二，有的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造谣中央文革小组只要学生、知识分子，不要工人，不要解放军。甚至有人恶毒地讲，不要解放军，我就当农民去。从陈再道可以看出，谁要解放军，谁不要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是解放军的败类，真正相信解放军、拥护解放军的正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不要解放军的正是解放军的败类。第三，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毛主席的人说，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说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了。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极大的诬蔑。有的人甚至说中央文革小组不能代表中央，说这个算老几，那个算老几，都是些臭知识分子。我们要什么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怎么没有党的领导呢？文化大革命正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他们那样说是反对毛主席领导，他们要的是刘邓党的领导，陈再道是武汉军区的书记嘛！钟汉华是第二书记，能不能要他们那样党的领导？我们说要党的领导。他们说要党的领导，是不要毛主席这个党的领导，是要刘少奇那样党的领导。第四，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还说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老干部，不要老干部了。要什么样的老干部？不要阶级了吗？离开了阶级要什么样的老干部？刘邓是老干部，陈再道说他自己四十多年了，也是老干部。钟汉华不到四十年，也三十多年了，他们能不能代表老干部？他们诬蔑老干部。他们说不要老干部，恰恰是要刘邓、陈再道那样的败类。陈再道还说，自己是老粗、不识字。言下之意，自己是工人，不是知识分子。他不能代表工人，他是败类，他已经离开了工人阶级。要教育干部、战士不能受欺骗，他们认为能够欺骗“百万雄师”，我们叫他们“白完行尸”（我们说他白色恐怖完了，是行走的尸体）。另外，通过武汉事件取得教训。甘肃要特

别注意，他们煽动的第一是独立师，第二是利用人武部，第三是公检法，第四利用省市机关的保守组织。一句话，就是怎样能够识别这些问题，就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主席批示的文件，这是保证我们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武器。

关锋讲：对红三司要多做些工作，叫他们不要认为有了中央文件便有了上方宝剑了，就认为自己胜利了，骄傲了。一骄傲就犯错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义务做受蒙蔽群众的工作，不要认为自己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了，有功劳。要反复给他们讲接班人第三条，就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要三司主动地去团结他们，叫三司要有责任感。要三司认识这一点，就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

康生讲：兰州军区坚决支持和保护红三司，但要防止一条，防止文件下去以后，三司报复，那就要犯错误。左派和保守派往往对立很厉害的，他们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都不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把头头和广大群众分开，你们要做三司的工作，一方面保护他们，一方面支持他们，不要走极端，这是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对红联，第一，应说“二·五”夺权前是革命造反派，第二，夺权以后犯了严重错误。过去是左派，不能吃老本，这样是不能保持荣誉。对他们头头要进行这些教育，对广大群众要做艰苦的工作。红联这方面的工作比三司还艰苦。要说服三司去帮助他们，不能刺激他们。对“火车头”的群众要做工作，不能去压服他们。同样，对革联也要做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批转毛主席批准关于兰州军区党委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一事的通知及附件

1967.08.03；中发 [67] 231 号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

1967.08.04; 中发 [67] 230 号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兰州军区党委办公室关于传达中央关于甘肃问题三个文件的有关事项的通知

兹将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关于甘肃问题三个文件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传达范围：甘肃地区驻军及甘肃军区所属军分区、武装部传达到全体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务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其他省军区和驻军，传达到军队全体人员。

二、要原原本本传达，不作解释。只在第一、二个文件（即中央《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毛主席、党中央对兰州军区党委《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事》报告的批示）传达完后，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1）第一、二个文件为什么五月份没有发？关锋同志说，“需要说明一下，前两个文件为什么没有正式发下去需要解释，责任不在大军区，是中央办公厅办事机构压下来的。为什么压？第一个文件是说的军事管制，第二个文件是说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办公厅认为两个文件精神不一致，没有发。大家这次来了后，查到了文件，‘七一’印发给大家，这次纪要也写上了两个文件。”

（2）什么是中央碰头会？中央碰头会是代替中央政治局会议，因为中央政治局有的人没有清理，所以开碰头会议。实际上是政治局常委会议。

兰州军区党委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胡继宗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甘肃问题的有关指示

八月十七日，在兰州军区礼堂

根据录音记录，未经本人审查

注：文中“汪”即原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

同志们：

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和斗汪联络站, 召集我们广大干部, 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 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 这是一件大事, 有伟大的意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最关心群众, 最相信群众, 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广大群众最热爱毛主席, 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三个文件下达以后, 无产阶级革命派, 有许多人感动的流下热泪, 一遍又一遍地喊: “毛主席万岁!” 双手捧着毛主席的指示读了一遍又一遍, 感到非常亲切。受蒙蔽的群众和站错了队的干部, 大多数人提高了认识, 明确了方向, 纷纷表示下决心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毛主席的话, 威信最高, 威力最大, 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三个文件, 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 是最有力的武器。目前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好形势。但是,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 阶级敌人, 汪锋一小撮, 人还在, 心不死, 他们是纸老虎, 但不是死老虎, 他们还要作最后地挣扎, 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受蒙蔽的群众有的人受毒很深, 一时转不过来。阶级敌人也还在伺机而动。摆在红三司和一切革命派面前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三个文件, 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 是最有力的武器, 必须认真地学, 坚决地贯彻执行。为了要更好地学习三个文件, 更深刻地领会文件的精神, 我先把在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时候的有关指示, 向同志们作一汇报:

六月中旬, 甘肃军区的少数人和《红联》的一部份人和詹大南同志到北京, 中央并没有通知詹大南同志去北京, 他们到北京的目的, 就是压中央, 企图让中央改变这个四条意见, 这个文件。中央为了帮助甘肃军区的一些负责同志觉悟过来, 彻底改正错误, 又通知兰州军区的负责人和甘肃军区的负责人到北京去, 同时也通知我参加这个会。毛主席及党中央, 中央文革, 对甘肃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 是了如指掌的。毛主席掌握情况是有很多渠道的。许多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我们的时候, 也清楚的告诉大家, 说你们来是受教育的。但是, 甘肃军区的不少同志, 还是错误的认为中央不了解情况, 要向中央, 中央文革, 中央军委汇报情况。康生同志, 关锋同志, 杨代总长, 在几次听汇报当中, 都曾多次指出詹大南同志的错误, 但是不少同志仍然不觉悟。到了七月一日, 康老、关锋同志、杨代总长接见了两级军区的负责同志, 把中央批示的两个文件发给了大家, 给大家讲明主席的批示, 并一段一段地讲解文件, 严格地批评了詹大南同志, 对大家进行了耐

心的帮助，大家受到了深刻地、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以后同志们开小会，帮助詹大南同志进行检查，座谈回去以后怎么办，写出了纪要。这个纪要的稿子，报告康老和关锋同志，由他们提出了个修改的意见，作了指示。我们进行了修改，讨论。最后报到中央，经林副主席在七月二十九号呈主席批示，七月三十日毛主席批示说：“此件已阅，很好，照办。”到了八月一日，康老、关锋同志、杨代总长，又把我们找去，讲解主席的批示，一段一段地讲解中央的批示。现在我把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接见，对甘肃问题的重要指示，向同志们汇报，要讲五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央三个文件批语的说明

八月一日接见的时候，康老对于第三个文件中，中央的批语作了说明。康老说，刚才关锋同志把纪要的中央批语念给大家听了，批语的关一段是批准了纪要，因为纪要是正确的，可行的，同意六条意见，就是批准了。这就说明这次会议作出了成绩。会议最后两级军区达成了六条意见，这是正确的，中央同意了。六条说明会议开的是有成绩的，有结果的。这个批语的第二段，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这就是说过去在支左工作上，两级军区不够团结。因为省军区向中央发过电报，在下边也散布过反对兰州军区的意见，下边喊“打倒张达志，洗恒汉！”的口号是错误的。甚至错误地喊：“打倒张、洗、杨，解放大西北！”在军队里下级提出这样的口号是错误地，也是严重的。这时关锋同志插话说，主席几次讲，兰州大区在支左上大方向是正确的。康老继续说，对这种恶劣的现象，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很关心，把两方面找到中央来，本来中央早就知道，四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可惜四条被军区一部分同志没贯彻执行，遭到了公开的、不公开的抵抗。这次没有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有的来了也没有见，因为在群众面前解决两级军区的问题不合适。看来，首先是两级军区的团结，这次在北京基本上达到了团结的目的，说明会议是积极的、有成绩的。因此，批语中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团结。其目的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把“三支”、“两军”工作进一步做好。但是，在兰州军区的统一领导下，具体说，就是在张、洗领导的兰州军区的领导下面，这一点过去省军区的同志存在着问题，具体地证明是四条就有规定，结果没有真正贯彻。这一次一定要以张、洗为首的兰州军区统一领导下，因为主席几次讲过

兰州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青海问题上证明了的，甘肃问题也证明了的，所以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第一个文件就规定了以张、冼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军管会。这次批语还是批这个问题。第一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第二是在兰州军区的统一领导下，这并不是说，过去的一切都不好，是在支左上，省军区特别是詹大南同志犯了错误。现在詹大南同志检讨了，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还是在兰州军区统一领导下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好。第三段讲，坚决执行三个文件。一个是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一个是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一个是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三个文件都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了的，经过林副主席亲自批准了的。兰州军区，甘肃军区，要坚决贯彻这三个文件，还要积极引导群众贯彻执行，下边还有一句，就是坚决反对省市机关和甘肃省军区内个别人抵制中央指示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兰州的形势是大好，还要看到另一方面，不可以有个别人在省市机关和甘肃省军区内部抵制中央的指示，指出这一点，同志们应该看到，还是可能的。因为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上次的文件有人抵触了。这次无论省军区领导，无论是干部、战士，应该深深的以此为戒。当然，这里面是有很多原因的，不能怪下面。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应该注意，你们个别领导要是抵制中央指示，詹大南在检查中不是讲到这个问题吗？我们应该向大家说清楚，詹大南同志在中央承认错误，回去以后有抵触情绪，对下面有影响了，借以为戒。特别讲一下，付加庚同志，你初次来中央参加会议，你检查一下，我们认为这一段时间你表现是不好的。现在可能有些改变了，也许改变不太大，因为我们没有见到你的检讨。这样严肃的问题，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当然，允许你们保留不同意见，但是不要在口头上检讨了一下应付过关了，实际上并不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错了不要紧，认真地改正错误，这才是共产党、解放军的态度。改正错误要严肃对待。不然，对毛主席的抗拒不是小问题。同时，胡正平，胡正平同志不在了，不知他的态度怎么样。总之，中央希望把上一次引以为戒。同志们知道“武汉事件”了，也知道河南了，武汉从五月十二号是抗拒中央，毛主席指示，很不好，陈再道同志走上了叛乱，性质就变了。甘肃也发生了问题，应引以为戒，希望不要发生抵制中央的一切行为。如果有，要坚决反对。当然，我们有经验，没有公开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常常是对中央，主席的东西加以曲解，

甚至是随便造谣言，说什么中央文革蒙蔽了主席了。当然，也有反革命分子公开反对中央了，希望同志们警惕这一点。这是说的领导了，下边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呢？不能绝对地说没有，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特别是詹大南同志自己要好好做工作，往往有人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玩火可以烧掉自己，所以要去做工作。部队也是群众嘛！也要做说服教育工作。这是一方面啰！是来自部队，他不是支持欢迎改正错误，而是抗拒改正错误，一定要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问题还可能来自群众一方面，更多的是来自红联方面。詹大南同志的错误或多或少和他们有关系，詹大南不检讨，不改正错误，会使红联更主动一些。河南军区支持了八大总部检讨了错误，他们就去冲军区，冲省军区，不叫省军区承认错误，一承认错误，他们就不好混。山西，张日清也是在夺权以后犯错误，支持红联战，中央支持红联总，红联总就冲击省军区了，张日清的办公室。兰州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对这一点要做工作。这就是说，要估计要有个别人、个别的组织，抵制中央的指示。有这种情况，你们领导机关要坚决反对。这是讲批示第三段，这是主要的，其他问题纪要上都讲了。纪要和批示可以发到连队和人武干事，纪要林副主席批准了，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办。

第二个问题，讲一讲“二·五”夺权和经验教训

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在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一日的接见中，又进行了说明。在六月二十八日谈青海问题的时候，讲“二·五”夺权的经验，甘肃“二·五”夺权的经验，引起青海的注意。康老是这样讲的，根据好多地方的经验，大联合以后还会出现分裂。青海联合起来了，还会不会分裂呢？甘肃犯了错误，道理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分裂，是在一百天之后，（“二·五”夺权到五月十四日红三司成立），他们从“二·五”夺权到五月十四日分裂，出现了红三司，这是突然的吗？不是。是掌权以后发生了变化。很多地方掌权以后不一样了，变化相当大。甘肃二月五日到十日，五天的形势是很好的。为什么会分裂呢？一个是夺权以后把原来的“走资派”当作死老虎不斗争，不批判汪锋了。总理插话说，对！这是大方向问题。康老讲，这一点必须注意。总理讲，山西是这样，没有斗争当权派，必然打“内战”。广东也是这样，开个大会也开不起来，矛头不是对准陶铸、赵紫阳。康老讲，你们可要注意啊！不要丢了大方向，在斗争中巩固大联合。张春桥同志讲，干部“亮相”也是批判斗争中“亮”。康老讲，另一个唯我独尊，不

尊重别的组织，对别的组织排挤。二月十日，开除了肖泽民，十八日开除了“七·一”战斗队。关锋同志讲，在三月又开除了一个“红战”。康生同志讲：有些原来反对红联观点的组织，向毛主席请罪，要求参加红联，也不要，这是脱离群众嘛！红联的核心组织还是很好，比如“长征团”，“长征团”的前身是“打倒汪锋委员会”嘛！主要中学生。汪锋压制的那么厉害，他们还是敢游行，还是到省委控诉。后来几百人长征，到北京以后，中央文革支持了他们。回兰州后发展很快，同工人串连，搞工人运动。十月的时候，成立了“工联”，肖泽民在共青团市委中一部分人组织“七·一”战斗队，八月的时间就反汪锋，这在全国、省、市的青年团里还是少见的。“火车头”开始还是革命的嘛！据了解十一中全会，薄一波插手甘肃，刘澜涛、吕正操作交易，吕正操把赵涛叫到北京来，说是不不要得罪了人，说是裴、马已经撤职了，不叫他们再反汪锋了，这样的揭露将近有两个月，就不上街了。十二月就成立了“火车头”，“火车头”一成立，不斗汪锋，也不斗铁路局里边的当权派。红联夺权开始还好，以后领导核心转到了“火车头”，红联里边起了变化。军队支持红联，是对的。问题是詹大南同志支持了“火车头”那一派一系列的错误的政策，不斗汪锋，开除“七·一”战斗队，开除“红战”，压制不同意见，把矛头对准军队，又结合了王世泰，犯了错误嘛！一不承认，二不改，结果这里边分裂了。到七月一号接见的时候，康老讲，“二·五”夺权是革命行动，即使“三结合”的差，也应当支持。但是“二·五”夺权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不对的也支持，你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左派组织夺权以后，一个平常的现象就是把“走资派”不斗了、放松了。你们那里不是也以为汪锋是死老虎了！红联夺权以后，没有进行斗，相反的矛头对内，打“内战”，这就是方向问题了。把矛头对准同自己一起战斗的兄弟了。红联开始是好的，“长征团”到北京来过，原来叫“打倒汪锋委员会”，他们先举起打倒汪锋的旗帜嘛！肖泽民也是比较早的打起反汪锋旗帜的，他也是“红联”，也举起反汪锋的旗帜的，夺权以后，矛头对准先提出打倒汪锋为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是导致了红联的分裂，这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另外，夺权以后，不执行接班人的第三条，就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

的人。”你们不是在不同意见中做工作，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而且实践证明了是犯了错误的人，甚至是有对保守倾向和保守的，不做工作，而是用打、砸、抢、压的办法。革联的发展，是红联压的结果，不做工作，去年八月，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一方面支持他们，一方面对他们说：“马克思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以后的有些红卫兵恰恰在这个方面犯了错误，甚至走到反面，象联动就是这样。毛主席三月七日指示，天津延安中学这个批语是怎么说的呢？给解放军一个任务，要劝说的讲，使小将们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任务相当困难。有的地方，欢送军训团，毛主席叫解放军劝说小将，你们在支左工作中，“二·五”夺权到二月底，尤其是詹大南同志开除了肖泽民一些人，开除了“七·一”战斗队，又结合了谁呢？找到了王世泰。你们用电报说王世泰是革命领导干部，要斗争胡继宗，中央没有批，等你们觉悟，你们上了《甘肃日报》了。中央对你们教育实在是耐心哪！那样与中央精神相违反。关锋同志讲，打倒个汪锋，叫王世泰上台，我们等你们觉悟，硬是这样做。

第三个问题，甘肃的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任务是很重的

七月十七日，在接见的时候，康老讲，西北这个地方，阶级斗争是比较复杂的，从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刘澜涛、一直到汪锋，另外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献珍，把西北、西南当作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据点，贺龙、李井泉进入西南，彭真、刘澜涛，进入西北，西北的确就是重点。解放以后，三次大的斗争，反高、饶的斗争，反彭、黄的斗争，反彭、罗、陆、杨的斗争，都扯到西北地区。因此，西北比较复杂。加之在过去干部中的地方主义相当严重的。这个地方比较复杂，彭、高、习的影响不能说在西北没有。所以，地区比较复杂。甘肃文化大革命以来，又插入了一个吕正操、薄一波，铁路局的问题。吕正操问题是严重的，他们的桃园三结义，这两个结义彭真，林枫检查起来了，吕正操还没检查，和吕正操的斗争很复杂，斗吕正操又牵涉到薄一波，薄一波的问题没有彻底揭开，汪锋也没有彻底揭开。我们孤立一个反革命分子汪锋也不能轻视，你们的任务很大，阶级斗争比较复杂。康老还说，汪锋从一九六二年中央就不信任他了，中央没有处理，当时考虑到西北的工作方面震动的很大，那个时间，也考虑了汪锋的书记还当不当？还是想争取他多揭发习中勋的问题。关于桃园三结义，吕正操和铁路局的问题，康老在七月一日接见中，还讲道，吕正操是压铁

路局这一方面，为什么呢？因为吕正操本身的问题，吕正操是彭真的桃园三结义，是反林总的，是实现王明路线的。你们看去年五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林总的报告没有？那次林总就讲桃园三结义，桃园三结义是彭真、吕正操、林枫，他们在东北就反林总，所以吕正操抵制文化大革命，是无奈铁路的文化大革命与他自己有关。刘澜涛和薄一波是保汪锋的，吕正操与刘澜涛、薄一波彼此之间互相结合，当时的口号是“不要得理不让人”。这就是告诉铁路局揪了裴、马就不要继续斗争了。保汪锋，保汪锋也是保吕正操、刘澜涛、薄一波，吕正操安排铁道部的副部长，贯彻他的路线，以后又派了一个政治部主任贯彻这个东西，所以铁路受吕正操的影响。那个时候，还不叫“火车头”，叫“文革筹委会”。上层干部受影响，去年一段听不到铁路局的活动，兰州的问题，不仅涉及到汪锋，还涉及到吕正操、薄一波、刘澜涛。七月十七号关锋同志讲，批判汪锋一小撮，肃清吕正操的恶劣影响。康老还说，批判刘、邓、陶，实际上有吕正操、薄一波、刘澜涛、汪锋。对汪锋的问题，革命的群众组织要调查材料，从历史上调查，不知三司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没有。汪锋有没有被捕过？我当时说，有两年的时间下落不明，这段历史没有查清。康老讲，没有看到他的档案，估计前面问题不少。关锋同志讲，汪锋不是死老虎，这些人再翻案，那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问题。左派必须有这个觉悟，汪锋是很危险的，都不是死老虎。他们有阶级本能，不把他整倒整臭，他们是不会甘心的，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干扰，就会捣乱，再搞就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了，是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教育各组织、各派，要有这个觉悟。彭德怀吃饱了肚子还锻炼身体哪！他还不是准备再干！？不要认为一罢官，一点名，就没有搞头了。应该懂得，这个壁虎打死了，他还会装死，不注意就跑了，苍蝇也会装死，不注意就飞了，要把脑筋用在这个方面。八月一日接见的時候，关锋同志还讲，中央批准了在《甘肃日报》上，点名批判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薄一波、吕正操、刘澜涛，汪锋。中央所以批准点这些人的名，因为他们都向甘肃伸了黑手。由彭、高、习这条黑线，吕正操、薄一波也插了手，特别是在甘肃要批判吕正操。吕正操是桃园三结义之一，反林副主席，反毛主席，是三反分子毫无问题。吕正操的问题不仅如此，还是个大坏蛋。要从政治上，批判他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他是三反份子。点薄一波的名，因为他在甘肃插了手，作了一笔政治交易。本来铁路反汪锋是好的，但是两次政治交易压了下

去，蒙蔽了不少人。铁路局有些人受了蒙蔽，方向就转了。缺路局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罪责应该归于吕正操、薄一波。所以特别提到点他们的名，甘肃不批判他们，甘肃的问题不好解决。你们回去后，可见和铁路局、铁道学院接触一下，搞大批判，这有助于大联合。关锋同志还讲，吕正操不仅是反党分子，还是反革命分子。对两次政治交易也作些说明，去年八月，兰大一派，铁路局一派，汪锋操纵着兰大李贵子一派，与铁路闹的挺紧张。先撤的是赵涛、苏华，以后撤裴，马。薄一波插手甘肃的问题，在八届十一全会上，薄一波找吕正操、找汪锋谈判。以后，吕正操也提出来“不要得理不饶人”。这就给铁路局定调子，反了裴、马就不要反汪锋了。因此，给铁路局施加压力，要求炮口只对内，不对外。在去年八月，铁道部副部长苏杰还到兰州调解铁路局和省委的矛盾。去年八月刘昌汉也曾奉刘澜涛之命到兰州铁路局施加压力。到了九月二十九日，吕正操把赵涛叫到铁道部施加压力，吕正操给赵涛讲：“你们不要搞过分了，省委书记已经搞下去两个了，不要再搞了”。意思是适可而止，再搞的话就不知足了，不能搞汪锋。吕正操还说：你们搞文化大革命，只能搞你们自己的问题，不能反上。你们反省委、反铁道部，省委、铁道部反谁呀？第二次政治交易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时候，吕正操、刘澜涛，谈判好了，叫胡继宗，高健君布置任务，有这样一个电话稿嘛！（下面念稿：九日上午，吕正操同志，刘澜涛同志，商谈了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两人也参加了。吕正操同志说：“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部里已经给赵涛同志谈了话，对他们有批评，赵涛同志能够接受。部里已向他们交待，今后铁路工人不要上街，如果贴了，由铁路局自己盖起来。不要出动宣传车，不要散发传单，有什么意见，通过组织传达。同时，不对红卫兵出借宣传车，也不再接待外地红卫兵。即使铁路工人反对，也必须加以说服教育。吕正操同志说：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部里昨晚已经派出政治部副主任任克加同志，带领工作组即赴甘肃，沿着铁路线向铁路职工进行工作。吕正操还提出，省委应对兰州铁路局进行领导，有错误应当对他们指出来。刘澜涛同志接着指示说，省委要与铁道部工作结合起来，教育机关、工厂也不要贴铁路局的大字报，散发传单，出宣传车。任克加同志来了，省委应该热情地，诚恳地接待。胡继宗，高健君，六六年十月十日三时九分）。

第四个问题，要接受“武汉事件”教训

八月一日接见的时候，关锋同志讲，最近有这样的情况，确实不确实再查，兰州军区部队游行，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红联冲击游行部队。现在红联的大方向越来越不对头。解放军游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打倒陈再道，你们也冲？！红联你们也知道有这四条。他们想在北京会议没有结束之前，把三司打垮。这样做，危险的是他们自己。康老讲，“武汉事件”发生之后，听说部队游行，红联的人冲游行部队，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武汉事件发生后，全国纷纷声讨陈再道，不同观点的，不同派别的，可以一起开会、游行，从来没有听说冲击游行部队的，唯独是兰州发生了这样问题。《人民日报》登载声讨陈再道的情况唯独没有兰州，请同志们很严肃的注意这一问题。对待这样一个反革命事件，怎么能够这样子呢？难道广大群众他们拥护刘邓？！拥护陈再道的？！这个不是群众罪过，这是一小撮人别有用心。这件事要引起同志们严肃注意。康老还讲，尤其最近武斗恶化，我们得到的消息，红联联合革联，他们说中央对甘肃问题还没有解决，趁机把三司打垮。这是不能不注意的。河南也是这样的，想把“二·七”公社打垮。兰州为什么武斗严重呢？他们知道，批评了詹大南，詹大南检讨了，对他们不利。他们也知道三司，还是个造反派组织。因此，把三司彻底打垮。各地的规律是一样的，一个作法。康老还讲，必须给红联说，两次冲击部队游行必须承认错误，给他们说，难道你们不反对反革命分子吗？为什么兰州不能联合大游行，问他们政治上负不负责任？詹大南犯错误，他们也要犯错误，甚至于越来越远了，冲击声讨陈再道的游行部队。康老还讲，武汉事件应取得经验教训。康老说，要搞好宣传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他们操纵计划的叛乱行为要好好地向干部向地方干部宣传，取得经验教训。第一，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人民解放军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通过宣传大大提高觉悟。第二，有的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造谣中央文革小组只要学生、知识分子，不要工人，不要解放军。甚至有人恶毒地讲，不要解放军，我就当农民去。从陈再道可以看出，谁要解放军，谁不要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是解放军的败类，真正相信解放军、拥护解放军的正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不要解放军的正是解放军的败类。第三，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毛主席的人说，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说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了。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极大的诬蔑。有

的人甚至说中央文革小组不能代表中央，说这个算老几，那个算老几，都是些臭知识分子。我们要什么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怎么没有党的领导呢？文化大革命正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他们那样说是反对毛主席领导，他们要的是刘邓党的领导，陈再道是武汉军区的书记嘛！钟汉华是第二书记，能不能要他们那样党的领导？我们说要党的领导。他们说党的领导，是不要毛主席这个党的领导，是要刘少奇那样党的领导。第四，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还说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老干部，不要老干部了。要什么样的老干部？不要阶级了吗？离开了阶级要什么样的老干部？刘邓是老干部，陈再道说他自己四十多年了，也是老干部。钟汉华不到四十年，也三十多年了，他们能不能代表老干部？他们诬蔑老干部。他们说不要老干部，恰恰是要刘邓、陈再道那样的败类。陈再道还说，自己是老粗、不识字。言下之意，自己是工人，不是知识分子。他不能代表工人，他是败类，他已经离开了工人阶级。要教育干部、战士不能受欺骗，他们认为能够欺骗“百万雄师”，我们叫他们“白完行尸”（我们说他白色恐怖完了，是行走的尸体）。另外，通过武汉事件取得教训。甘肃要特别注意，他们煽动的第一是独立师，第二是利用人武部，第三是公检法，第四利用省市机关的保守组织。一句话，就是怎样能够识别这些问题，就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主席批示的文件，这是保证我们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武器。

第五，群众工作问题

七月十七日接见时，康老讲，说军队的问题解决了，群众工作要做。群众是三方面的啰！三司、红联、革联。要促进三方面大联合，还有很大的问题。你们提出坚决支持三司，团结红联，争取革联，实现这个要求还不容易。汪锋一小撮不是没有作用，群众之间的隔阂不能一下子消除。三司这方面有“长征团”、“七·一”战斗队、“工联”，应该去说服他们，能够去争取多数群众，要进行团结工作。要充分的估计三司会不会翘尾巴，翘尾巴就要犯错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个规律。有时候，头头也同意做团结工作，但群众一下子转不过来。内蒙是这样子，西安的问题最清楚了，开始西大、西工大压交大。西工大、西大曾经喊过：“打、砸、抢万岁！”压交大比较严重。以后我们支持了一下交大，结果交大就翘尾巴了，走向了反对胡伟、黄经耀（这是军区的人）。所

以翘尾巴几乎是普遍规律，两个军区要很好注意这个问题。支持他们正确的方面，不支持他们错误的方面。对三司要进行工作，主要是端正政策，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詹大南同志检查以后，对红联可能有压力。两级军区也好，三司也好，都不要歧视他们，应该是做工作，促进他们自己检讨。对革联你们是争取他们了，也是很艰苦的工作呀！革联、红联都必然要分化，但你们注意不要去瓦解他们，他们实际上是要分化的。三司翘尾巴他们会感到受压制的，或者是受坏人煽动闹起来，也可能是革联、红联联合起来对付三司。革联的事例就更多了，胡继宗出来，革联那时候就不那么舒服，高健君在里边煽风点火嘛！

八月一日关锋同志接见时讲，对红三司要多做些工作，叫他们不要认为有了中央文件便有了上方宝剑了，就认为自己胜利了，骄傲了。一骄傲就犯错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义务做受蒙蔽群众的工作，不要认为自己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了，有功劳。要反复给他们讲接班人第三条，就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要三司主动地去团结他们，叫三司要有责任感。要三司认识这一点，就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康老还讲，兰州军区坚决支持和保护红三司，但要防止一条，防止文件下去以后，三司报复，那就要犯错误。左派和保守派往往对立很厉害的，他们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都不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把头头和广大群众分开，你们要做三司的工作，一方面保护他们，一方面支持他们，不要走极端，这是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对红联，第一，应说“二·五”夺权前是革命造反派，第二，夺权以后犯了严重错误。过去是左派，不能吃老本，这样是不能保持荣誉。对他们头头要进行这些教育，对广大群众要做艰苦的工作。红联这方面的工作比三司还艰苦。要说服三司去帮助他们，不能刺激他们。对“火车头”的群众要做工作，不能去压服他们。同样，对革联也要做工作。

七月十七日接见中，康老曾经讲，对兰大，兰大江隆基到底批判的怎么样？康老讲，翻什么案？叫兰大的同学研究研究，江隆基到底是个什么人？我没有看他的档案，知道他到德国去过。到德国去是杨虎城送去的。当时，陕西的杨虎城

和山西的阎锡山都有这一手，是招降纳叛。军阀都有这一套，从各方面吊线。陕西前一个时期有这样舆论，陕西的共产党员都拥护这个于有仁。不但江隆基，还有一批人啰，他们是共产党员，又是杨虎城的人。这个汪锋算不算哪？不清楚。如王炳南也是杨虎城送出去的。送到德国的，不只是这两个人，还记得有个秦凤团。那个时间阎锡山，把动摇的、叛变的送到日本，杨虎城也送到德国，江隆基到底怎么样？过去加入了团，还是加入的党？记不清了。只要是杨虎城送出去的，就不那么妙了。这是各方面都吊上了线了。军阀的军队、杂牌的军队，都是这个样子。江隆基不是到法国，是到德国。德国有一个反帝大同盟都是中国的留学生，开始是王炳南负责，以后是江隆基负责，他们两个好象是有什么矛盾，我去法国见到过江隆基，他是代表德国的反帝大同盟到法国参加一个什么会。他不是在英国是在德国，他从德国回来以后，去延安大学了，延安撤退以后，不知道他到哪了？解放以后，他去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那一套完全是投降，向资产阶级投降。他好象历史上还有什么问题，他到兰州，是北大的工作把他撤销了。陆平刚到北大，反江隆基的右倾还是不能否定的。江隆基在五七年反右派当中完全是投降主义，整风、反右，北大的工作最差了。北大对资产阶级教授完全保护下来了，马寅初是在我们的压力下撤掉的。陆平原来是铁道部的副部长，这是彭真当时认为调的最好的一个副部长到北大去当校长去。

对于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甘肃问题的有关指示，就是方才讲的这些。

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三个文件讲一讲个人意见。（略）

红三司白银区宣传部记录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来源：红三司白银区宣传部记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四、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甘肃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1.23；中发[68]11号

兰州军区党委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你们一九六八年元月九日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零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冼恒汉、张达志、徐国珍、李书茂、龙炳初、张忠、铁峰、姚树阴、胡继宗、王国瑞、白学光、朱培屏、赵滔、白明、邱裕民、肖泽民、李宗虎、谢金胜、李荣山、白富贵、于宝亭、赵连壁、李毓及留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空额一名等二十四人为常务委员，并由冼恒汉同志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肖泽民五同志任付主任。

中央祝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认为，甘肃省的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干部，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召开了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推选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开展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汪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革命大批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兰州地区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希望，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与甘肃省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做好各项工作，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坚强指挥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中央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
《春风已到玉门关——热烈欢呼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我国西北高原要地、反修斗争前哨之一——甘肃省的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胜利诞生了。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汪锋之流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的彻底破产，标志着巩固

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斗争在甘肃地区的决定性胜利。这是西北高原上又一曲振奋人心的毛泽东思想的凯歌！

我们谨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甘肃省各族人民和驻甘肃的人民解放军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致以崇高的敬礼！

毛主席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同一小撮阶级敌人反复较量和顽强搏斗的结果。尽管敌人是狡猾的，斗争是艰苦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派凭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胆忠心，靠着威力无比的毛泽东思想，在解放军的坚强支持下，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打败了阶级敌人的种种反扑，粉碎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破坏革命队伍团结的阴谋，在工人阶级的带头下，不断在斗争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终于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决定性的胜利。

战斗在甘肃省“三支”“两军”第一线的人民解放军，把对毛主席深厚的阶级感情，倾注在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决贯彻上，倾注在对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反复落实上。他们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他们踏遍甘肃高原万重山，深入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传播毛主席的声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帮助广大革命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斗私、批修，破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新的功勋。

甘肃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甘肃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对毛主席的每一个战斗号令，都紧紧跟上，坚决执行。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经常地如实地反映情况，多请示，多报告，绝不自以为是，自作主张。要以最大的热情，最强的决心，最快的速度，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扎扎实实地落到基层，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春风已到玉门关，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正以破竹之势胜利向前发展。我们希望新生的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成为带动广大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坚强指挥部。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都要力争成为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要更加广泛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进一步发扬毛主席倡导的革命好学风，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真正做到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要斗私批修，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把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妨碍毛主席最新指示执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的一九六八年的各项战斗任务，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社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新华社报道：甘肃广大军民热烈欢呼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进一步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 把甘肃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据新华社兰州二十六日电 甘肃一千三百万人民热烈欢庆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新的伟大胜利。全省人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表示，一定要进一步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斗。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诞生的喜讯迅速传遍全省，城乡到处锣鼓喧天，一片欢腾。在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岷山、腊子口、哈达铺，在红军胜利会师的会宁，以及全省各地，广大人民纷纷集会，热烈庆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深厚感情，一次又一次地纵情高唱《东方红》，千遍万遍地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当天晚上，兰州市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聚集在省革命委员会门前的广场上，和省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一起狂欢，直到深夜。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和全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在欢庆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刻，深深地体会到：“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冼恒汉，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事情千头万绪，但是，最根本的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总结经验，检查工作，制订措施，特别要搞好领导机关和成员的思想革命化，带动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引导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全省迅速掀起一个认真学习、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高潮。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以及许多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在庆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都决心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最新指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把本部门、本单位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甘肃各地许多工厂、学校、机关等单位的广大革命群众，在欢庆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指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最大障碍，是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最大障碍。他们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动一场“人民战争”，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长期对立的兰州大学三派组织，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全校有六个系和两个附属工厂立即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为校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全省各条战线都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热潮，迎接和庆贺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兰州新华印刷厂革命职工以最大的热情、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提前完成了一月份印制《毛主席语录》的光荣任务。临夏回族自治州广大贫下中农在热烈庆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表示，要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甘肃省代理人汪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在抓好革命的同时，积极作好春耕生产准备工作，力争今年农业生产有更大的发展。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复课闹革命。

据新华社兰州二十六日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广大指战员，最热烈地欢呼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在“三支”“两军”和各项工作中，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创建新的功勋。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的喜讯传到兰州地区各部队，从营区到“三支”“两军”第一线，从机关到连队，处处锣鼓喧天，凯歌阵阵。指战员们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纷纷举行庆祝大会和游行，纵情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喜讯传到战斗在“三支”“两军”第一线的部队，这些部队的指战员们同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一起举行座谈，认真地回顾和总结一年来“三支”“两军”工作。他们决心以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标准，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在热烈庆祝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许多部队掀起了更广泛、更深入、更扎实地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为了把毛主席最新指示化为广大革命群众的灵魂，八〇八三部队派出了四十多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冒着寒风，踏着冰雪，深入到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向革命群众热情地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传播、普及毛泽东思想。在“支左”“支农”中作出了出色成绩的八一一〇部队指战员，总结了支左、支农经验。他们积极热情地帮助广大贫下中农开办学习班，搞好革命大批判，使毛主席最新指示在农村中全面落实，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一切阵地。

兰州部队广大指战员在欢呼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的时候，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伟大教导，深刻地认识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今后要走的路子还更长、更曲折、更艰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指战员们坚决表示，一定要千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坚决保卫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在祖国的西北飘扬！

五、甘肃省狠抓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洗恒汉谈清理阶级队伍

〔洗恒汉：甘肃省革委会主任。摘要〕

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既要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要注意严格区别以下几种情况：

(1) 把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同有一般政治历史的人区别开来，有政治历史问题也要把过去已经交待的同隐瞒反动历史区别开来。

(2) 把历史反革命同现行反革命要区别开来，主要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中又要区别交待过的同隐瞒隐藏的，主要是挖隐瞒的，已经交待的又要区分安份守己的同不安份守己的。

(3) 对跟着坏头头干过一些坏事的这些人同坏头头要区别开来。

(4) 把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同犯了严重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干部区别开来。

(5) 在旧人员中，旧的人员在我们这个队伍里头在旧社会干过事的旧职员、旧官员这是不少的，把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同接受改造没有作过坏事的要区别开来。

(6) 把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阴谋分化瓦解解放军、破坏军民团结同由于派性作怪，冲击过军事机关，骂过解放军，向解放军提过一些错误意见的要区别开来。

(7) 把政治上反动的坏分子同有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人要区别开来。

(8) 对揪二套班子这个问题不要扩大化，现在有些乱套，省上有二套班子。你那个单位就一定会有二套班子？这样套是不行的。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新华社记者报道：

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兰州大批中学毕业生去农村

许多家长坚决支持子女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

新华社兰州二十一日电兰州市一万八千多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怀着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心，最近陆续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批知识青年离校前，在驻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在学习班里，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斗私批修为纲，狠批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读书做官”、“升学第一”和“下乡镀金”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措施，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他们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时代青年的最大光荣。他们纷纷聚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前表示决心：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一辈子革命，走一辈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以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许多学校担任革委会和红卫兵组织负责工作的毕业生，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带头到农村安家落户。在这批毕业生下乡的过程中，兰州市各中等学校还组织了许多有工人宣传队队员和革命师生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广泛进行家庭访问，同毕业生的家长一起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且向学生家长进行了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通过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学生家长的阶级觉悟。许多家长表示坚决支持子女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

甘肃省许多县和农村人民公社的革委会都成立了专门机构，把这项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许多公社、大队、生产队，还举办了以安置知识青年为专题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政治、思想、生活等方面做好迎接和安置知识青年的准备工作。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二版）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通讯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编者按：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这话说得很对！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

* * *

本报讯 会宁县部分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从七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全县六百八十八户城镇居民中已有一百九十一户、九百九十五人分别到十三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住在城市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认识到，不参加生产劳动，不仅给国家增加负担，不利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缩小城乡差别，而且不利于自己和子女的思想改造。今年四月底，县革委会和城关镇革委会成立后，一些城镇居民（包括一部分干部家属）纷纷向革委会提出，要求上山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知识青年王庆一向镇革委会提出下乡落户申请时说：我是个青年，蹲在城市里没事干，农村很需要劳动力，我决心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革委会坚决支持群众的革命要求，积极协助居民委员会先后举办了一百一十五期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二千七百多人参加了学习。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和关于“勤俭建国”、“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伟大教导，狠批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阴谋使城乡长期分离的罪恶行径。认识到，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坚决表示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

到农村去，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王秀兰老大娘，已经五十多岁了，儿子在外当工人，家里只有她和儿媳妇。她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学习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后，坚决表示要到农村去。她说：“贫下中农在乡里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我们也生有两只手，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城里吃闲饭，靠别人养活？”一个原住在农村的干部家属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在农村和社员一块劳动，一块学习，感到很畅快，和贫下中农的感情也很深。自从跟随爱人进了城，过起了清闲日子。开始心里很急，不习惯。后来慢慢变了，身子变懒了，思想变落后了，和贫下中农的感情淡薄了，开会学习都不愿参加。过去自己还不觉悟，现在才认识到这是走下坡路，是变修的开始。”她表示坚决要回农村去，重新拿起劳动工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为了尽快满足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革命要求，县革委会对居民上山下乡及时作了细致的安排，他们根据城镇居民报名上山下乡的数量，和各公社作了具体研究，确定了去每个公社的户数，再由各公社和生产队联系，作好住房等生活安排。搬家时，县革委会派出车辆，并由专人引送到落户的地点，直到安置妥当为止。由于安置工作做得扎实细致，居民下乡后都很满意，下去不久就向革委会写信、捎话，表示感谢。

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许多社、队的贫下中农在城镇居民未到以前，就给腾好了住房，盘好了炕，安排了口粮和烧柴，有的公社、生产队听到城镇居民要来落户，还派车派人到十几里远的地方去迎接。贫下中农说，干部下放劳动，城镇居民下乡落户，这是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办事，我们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最欢迎干部、城镇居民到农村来。下乡城镇居民一进村，贫下中农社员就热情地帮助他们打扫、布置房子，担水送菜，问长问短，给他们介绍本村的阶级斗争史和解放后的巨大变化。有的贫农社员还介绍了自己解放前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悲惨家史，使新来的城镇居民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王秀兰老大娘下乡后，看到贫下中农对他们如此热情接待，深受感动，很快就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劳动。儿媳妇不懂生产技术活，社员们就手把手地给她教。在贫下中农的热情帮助下，下乡城镇居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农业生产知识不断提高。他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办学习班，一起搞革命大批判，一起斗私批修，一起下地劳动，思想感情起了很大变化。有一位下乡城镇居民深有体

会地说：“过去住在城里，长期脱离劳动，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坏习惯，走路怕脚上沾泥，做活怕手上沾灰。现在和贫下中农干活在一块地里，住在一个村里，体会到贫下中农对毛主席感情最深，对阶级敌人最恨，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下乡落户的城镇居民在贫下中农的教育、帮助下，学习、劳动、搞革命都表现得很积极，深受社员的好评。到土高公社陈原大队陈川生产队安家落户的高玉兰，虽然下乡才几个月时间，但由于各方面表现好，已被社员评为标兵。知识青年王永淑，和家里人一起落户到土高公社红湾大队上芮生产队后，积极帮助贫下中农学习毛主席著作，社员们很满意。现在已被队里聘请为学习辅导员。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社通讯员：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五·七”道路育新人

甘肃省兰州市“五·七”干校从一九六八年创办以来，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已经先后轮训了几千名在职干部。这些干部在“五·七”干校经过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兰州市给排水公司党委副书记傅月华来干校以前，思想上有不少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想不通象他这样一个从小参加革命，受过党多年教育的干部，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会犯错误。他把犯错误的原因归咎于自己过去说多了，做多了，因而下决心今后再不“多事”。在这种错误思想支配下，他虽然发现本单位在落实党的政策上存在一些问题，但却采取了回避态度。

来到“五·七”干校以后，傅月华和其他学员到兰州市红古区平安公社河湾大队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老贫农鲁志新以革命为怀，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迹，深深地触动了他的灵魂。

一九六二年，河湾大队一小撮阶级敌人闹“分田到户”，拉走大队的牲畜，抢种集体耕地，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老贫农鲁志新挺身而出，气壮山河地宣布：“走公社化的路是毛主席定的，我们贫下中农说啥也不能再往回走！”他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针对阶级敌

人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下，终于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捍卫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对照老贫农的英雄行动，傅月华很惭愧。他认识到，自己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正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干革命，就是要象贫农鲁志新那样，不怕担风险，对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就是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回干校后，他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干校学习期满，傅月华回到给排水公司。他带领群众狠抓阶级斗争，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坚决落实党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给排水公司的斗、批、改。现在群众都称赞他是“为革命拉车不怕爬大坡”的好带头人。

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翁

吉林柴油机厂广大职工在斗、批、改运动中，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工厂面貌日新月异，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这里向大家介绍这个厂齿轮车间的一件事。齿轮车间广大职工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建立了一个“首件送检制”。实行这项制度后，检验人员严格检查产品的“首件”（即每批产品的第一件），发现问题，就与工人一起，调整机床，校对量具，把废品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可是，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新工人加工一批产品时，看错了千分尺，又没有及时找检验人员检查首件，结果出了一批废品。事情发生后，这个新工人和大多数检验人员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心情很沉重。但是，也有个别检验人员认为这件事与自己关系不大，他们说，制度规定“首件送检”，他没有送首件来检查，我们怎么知道产品废不废？这种思想，引起了检验科长刘殿福的深思。他感到眼前发生的这件事，说明“首件送检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问题就出在这个“送”字上。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在检验科的一次会议上提了出来。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得很热烈。有的同志认为，“首件送检制”群众欢迎，领导同意，没啥好改的。另外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说，现在检验人员大都深入车间进行工作，因此保留这个“送”字，不符合检验科的实际情况；同时，要等工人送产品上门检验，这就保留了旧检验制度的残痕。我们要改掉这个“送”字，彻底转变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生产服务。刘殿福支持后一种意见。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首件送检制”改为“首件检查制”。

这以后，检验科人员主动到生产第一线去，配合工人，加强质量检查，堵塞质量事故，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工人群众称赞说：“这个‘送’字改得好！”

北京来的好“摩雅”

在澜沧江畔的密林深处，活跃着一支从北京来的医疗队。他们怀着满腔热忱，进竹楼，登山寨，全心全意地为各族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并为许多社队培训了一大批卫生员，深受各族群众的欢迎，亲切地称他们是“北京来的好‘摩雅’”。

一天清晨，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屋里，三名医疗队员正在聚精会神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了，他们得知有的地方发生了疫情，于是背起医疗箱就出发了。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的雨雾之中。虽然山高路滑，他们一口气赶了二十几里路，来到路南山区拉祜族社员聚居的曼迈寨子。

这里正在流行着疟疾病。贫下中农听说来了医疗队，纷纷跑到村口迎接。医疗队员们一进寨子，就投入了紧张的诊治工作。他们挨家挨户地问寒问暖，送医送药，一直忙到天黑，直到把寨子里得病的社员诊治完毕。

就这样，分布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各地的医疗队的同志们，在半年的时间里，共治疗了二万五千多人次，做了各种手术两百多例，使二十七例双目失明的患者重见光明。

教育革命开新路

去年“五一”节前夕，一批来自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的工农兵学员，来到厦门大学数学系新创办的“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专业学习。

过去的数学专业，上不着天，下不落地，与生产实践很少沾边。人们形容它是“一张纸，一枝笔加一个脑袋”。新学员入学后，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数学系的三脱离现象。在学校党委和革委会的领导下，他们学习清华、北大等学校的先进经验，先后派出十几支教育革命实践队，到全省几十个厂矿企业，作广泛的社会调查，决心彻底改变旧数学系的面貌。

系党总支委员、青年教师黄国柱、何宗炯带领的一支实践队，来到了厦门卷烟厂，一边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一边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劳动过程中，他们见烟丝加料工序的劳动强度比较大，决心改变这样笨重的劳动条件。在工厂党组织的支持下，经过同工人们一起反复研究，最后，确定采用射流技术配合光电转换来实现烟丝加料自动化。

射流技术是六十年代出现的一种先进技术，它具有效率高、节省劳动力、实现自动控制等优点。当时，他们既缺乏材料、元件，又对射流技术懂得很少。黄国柱他们在工人阶级大闹技术革新的革命精神鼓舞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自力更生，土法上马，说干就干，边干边学。其中有一种紊流元件，要求在仅有一张邮票大小的有机玻璃上雕刻出好几条细小的槽道，又要保持槽道垂直。尽管困难不少，他们硬是用锉刀锯片一刀一刀地锉、锯成功。整个射流技术所需的其他元件，也都用土办法一件件地制作出来了。他们和工人们团结一心，终于用土材料、土设备攻下了现代化的自动控制与射流技术，实现了烟丝加料自动化。

在社会调查和参加实践的基础上，数学系的青年教师们进一步体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并逐步摸索出了一条使数学理论应用于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领域的道路，编写出了新的教材。在党的关怀和广大工农兵的支持下，厦门大学数学系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专业也就从此正式诞生了。（本栏均据新华社）

（原载《解放军报》1973年1月24日）

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陈永贵同志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大寨走过的路子》（摘要）

同志们：

这次我到甘肃省，是学习的好机会。正是在甘肃省委贯彻党的十大精神的时候来的，正在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有来自各方面的代表，更便于我学习。虽然我来的时间不长，跑的地方不多，但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把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带回去，在山西开花结果。

同志们，今天下午先向各位代表谈谈大寨走过的路子。

还是从根儿来吧，从互助组时期说起吧。大寨一九四五年秋季解放，一九四六年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那时候具体情况是这样：一个是土地赖，土地都在山坡上挂着；再一个，就是没有耕畜，耕畜被日本帝国主义吃了肉；再一个是劳力少，我们六十多户人家，共一百九十口人，日本帝国主义一次杀死我们四十二个青壮年；再一个就是农具也少，农具都被日本帝国主义烧光了。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三光”政策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刚开始组织互助组，分成了两派：有劳力跟有劳力的户组织在一起，

人们叫好汉组；老的和小的组织的一个，叫老幼组。这个组有五个年老人，最年轻的六十岁，其余都是六十以上到七十多岁的。娃娃有七个，最大的只有一个，十四岁，其余都是十二岁、十岁，还有八九岁的。这个老幼组一组织起来，好汉组就攻击说：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扯不开弓，有好戏看啦！可是，老的给地主扛了一辈子长工，他有经验，对农业这一行熟悉。小的都是被日本鬼子杀死了父、兄，他们有民族恨、阶级仇，不要看人小，志气可不小。这些老汉娃娃们，还有个不服气，说：不要看你劳力好、土地好、耕畜好、工具好，你不要看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土地又赖，耕畜又没有，工具又没有，就看听谁的话，跟谁走。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只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路子走不差。老的把这些娃娃当成自己的孩儿看待，娃娃把老的当成自己的大人对待，互相尊重爱护，团结得很好。这样，老幼互助组战胜了好汉互助组。这个好汉互助组，名互助实单干，春来夏散秋不见。结果，老幼组看了好汉组的戏了！这个老幼组就是大寨成长的基础。到底是路线决定一切，还是条件决定一切？不是很清楚了吗。我们不能用自然条件掩盖路线。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回忆。每一次革命大批判，我们都要回忆这些问题的。你不回忆这些事情，怎么能比出来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有比较才有分析，才能认识清楚。这样回忆对比，看我们走过的道路，那些对了，那些错了，有利于开展革命大批判，有利于提高路线觉悟，有利于教育群众，也教育我们自己。

这个互助组，到一九四九年就发展到了四十九户。一九五三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就以这个老幼互助组为基础，娃娃们成了骨干力量。县里批准我们办三十户的农业社，户多了怕办不好。那么，多下的十九户该怎么办呀？谁也不愿意出去搞单干！那只好说“假”话，明里是三十户，暗里是四十九户。人心齐，确实办得不错，到秋天农业社亩产二百四，互助组亩产一百八，单干户亩产一百六。农业社丰收了。我们准备扩大社，开大会总结农业社的优越性，表彰先进，使大家早日加入农业社。可是，有个反革命分子在会上跳起来说：“你们农业社亩产二百四就大惊小怪，我这个单干户，一亩地产了三百多斤，我还觉得没有什么。”这一下在大会上泼了凉水。有的人也说：“是不是单干比农业社好呀？”不能让反革命这样嚣张，要想办法。我们就开支委会商量。恰好这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任务刚下来，还没有宣布。商量好了，就到大会上说：农业社丰收

了，互助组丰收了，单干户也丰收了。今年国家给了我们四万二千斤的粮食征购任务，还不能超额完成吗？这一提，那个反革命分子，就跟《智取威虎山》里的栾平一样，打开自己的嘴巴了，他说了实话：“我是有意破坏农业社。我不仅不想加入农业社，连互助组也不想搞。我的产量是假的，连我那秸秆过了秤，也没有三百斤。”这一下，我们贫下中农又掌握了主动权：亩产三百斤，是你自己报的。就按你报的数字给你派征购，这个会上不能给你下产；要下产，大寨这六十多户人家，你挨门挨户去恳求吧。逼得这个坏家伙没有办法，第二天，确实登门上户，户户不漏，到处恳求救救他。他破坏农业社了，走到那一户也挨斗争、挨批判。反革命搞破坏，让反革命自己请罪，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通过整反革命，也教育了贫下中农。在当时，有一种议论说：“地主没地了，富农不富了，阶级斗争没有什么了。”事实摆在眼前，不是没有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并没有睡大觉啊！每发生一次阶级敌人捣乱破坏，我们都不放过去。工作再忙，不能忽视搞阶级斗争。这样，正气就逐渐上升了，邪气逐渐下降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比较顺利地向前发展了。

农业社没有被地富反坏破坏了，反而旗帜更加鲜明，成绩更加突出了，广大社员的决心更大了，巩固、壮大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办法更多了。这时候，“暗会计”也起了作用。“暗会计”是一个没有入社的富裕中农，我们社里的场在他的房前边，他藏在一边，每天晚上给我们记账，社员分了多少，入库多少。他出来起作用了，给咱们公布数字了，他登门上户对那些没有入社的户说：社员的粮食比单干户多得多。他当了宣传员，动员大家都入社。我们还没有进行很好的发动，工作还没做到，报名入社的户就这么多，在一九五三年冬天，全大寨合作化了。

这时，我们党支部就因地制宜来彻底改变大寨的贫困面貌和不好的条件。条件不好就改造条件嘛！你不改造，那好条件什么时候来，天上会掉下来吗？它自己会跑出来吗？你要改造它嘛！现在已经有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有了改造自然条件的力量，你还不能改造它！于是，我们制订了一个十年造地规划，要彻底改变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大家都熟悉，这不是小面积，是一千多亩的面积。七沟是干河沟，河沟里一分地也没有；八道梁都分布在一面坡上，土地都在这坡上挂着；梁上也有点地，都是跑肥、跑土、跑水的“三跑田”。这里解放以前产

量很低，一亩地都是几十斤，碰着好年景，一亩地产个百十来斤。我小时候记得大寨最多产过八万斤粮食，那就是大丰收年。

十年造地规划，贫下中农非常拥护；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坚决反对，他们叫嚷说这是“胡来”，说条件还能改变？要能改变，旧社会早就把它改变了。他有他的理由，说人要走路，水也要走路，人有人路，水有水路。过去人常说：人不和水斗，鸡不和狗斗。人有多大本事，你们敢跟龙王爷搏斗！贫下中农起来说话了：什么龙王爷、马王爷，龙王爷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过是个纸老虎，斗一斗怕什么呢？我们就是要斗！这时候，我们就提出来，要下最大决心，非治好不可！因为这些地富反坏害怕治理坡地、沟地、梁地，我们就非治理不可。这也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已经订了的规划，就必须实现。要是实现不了，那不仅是经济损失，也是政治损失。从党内到党外要坚决执行这个规划。大干了十年，规划实现了，成绩显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落实了，愚公移山在那看得明显了。阶级敌人再钻空子、再破坏，没有它的市场了，没有它活动的余地了。阶级敌人何时破坏何时斗，丝毫不能放松。

开始治沟的时候，没有经验，也失败过。三战狼窝掌，就是失败了两次。就举这一条沟吧，这是最长的一条，三里长，来水面很大，沟又窄，治理费力气。把大家发动起来，干部带头，治理了。可是第二年一场洪水，冲得光光的。这时候，地富反坏跳出来反对；就连我们贫下中农中有些思想不健康的同志也不满意了：这是干啥？一冬劳动一水漂，千日打柴一火烧，作为教训，可再不要干了！再不要干了，还是要再干？我们再干就要找到第一次失败的原因。有的说，根基浅，石块小，冬季施工，工程质量不高。这倒也是个道理。第二次又开工，根基深了，石块大了，质量高了，治了以后，第二年又一场洪水，冲得光光的。这一下，地富反坏当然反对，贫下中农也有动摇了的，党支部里也提出问题来了：群众意见提的对，这不是失败了两次啦！还要再搞？“群众？”你把界限划清一点，群众里头包括了谁？下去开了不同类的会，看究竟谁反对，那方面占的比重大。党员会呀，青年团会呀，贫下中农会呀。从各种会上的情况来看，贫下中农中个别思想不健康的有点意见；反对的还是地富反坏。这样，弄清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必须听群众的反映，接受意见。看问题、做事情，都要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不要一概而论，都说成群众。那样，会掩护了敌人的造谣破

坏活动，辨不清是非，混淆阶级阵线。这是又一次教训，这就又学会了怎样分析问题，用什么观点、什么思想来认识问题和讨论问题。这样子，第三次又上马了。找出了第一、二次失败的原因，第三次治理就有了经验。过去治理都是直坝，第三次完全变成弓形坝了，能承受洪水压力。嗨，第三次成功了。如果你第一次不想干，第二次失败就更不敢搞了，那还有什么狼窝掌地呢？狼窝掌又经过去冬今春的建设，就是大搞搬山填沟造平原，增加了五十亩耕地，现在就这一条沟的粮食，足够大寨大队全年吃。如果我们还种着大寨原来那山坡地，不用说高产稳产，就低产也不保险，遇到天旱，你不吃国家的供应粮吃什么呀？正由于这样大抓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整整二十来年稳产高产啦。

每年从收了秋到第二年播种，至少有五个月时间，能开展农田基本建设。这五个月劳力非常集中，没有其他事，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来打歼灭战，年年搞，年年有成绩。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里“土”是首位，冬天正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大好季节。大部分地方至今过冬闲，在大寨早已不过冬闲了，从一九五三年办农业社，至今根本没有冬闲，把冬闲变成冬忙了。“只有冬天忙，秋天才能多收粮。”这是大寨贫下中农的口号。过去给地主扛长工，冬天冰冻三尺不能给他多于活，他饭也不想给你吃，不用说你挣钱了。他就不要你了。过一个冬闲，冻饿死多少人呀！回忆了过去过冬闲的苦，提高认识了，把过冬闲变成现在的过冬忙，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全力以赴搞五个月，你想那要干多少成绩！这样说着容易，做起来相当不容易。谁来带头干？大寨贫下中农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们党支部成了火车头啦，又要工作，又要劳动，到底以哪个为主？还是参加劳动为主。不能借口工作，放松了体力劳动，但也不能因体力劳动放弃了工作，缺了那一个也不行。要想把工作做得扎扎实实，要想取得群众信任，得到群众拥护，只有跟群众在一起参加劳动，同甘共苦，群众也爱护干部了，干部也看到了群众的疾苦，互相关心，互相促进，团结战斗，就无话不说了，有什么工作还做不好呢？

就说我们大队长贾承让，在旧社会上过三个月的学，一九五三年办社时，选他当了会计。开头，算也算不了，账也写不清，可是群众拥护他，说我们这个会计手脚清，不往口袋里装，不往家里拿，没有跑邪道。他不是借他这个干部的名东游西逛，他是实实在在参加劳动。他的业务，利用休息时间，晚上、中午呀，

就作完了。他跟社员一样出勤，样样会。我们给他补贴四十个工，他自己参加劳动所挣的劳动日分下的粮食、钱和各种物资，除家中五六口人吃穿用以外，还有剩余的。所以，他就不靠这四十个补贴工。这样群众就拥护他了，都非常满意，就选他当了大队长。这就是要想巩固壮大集体经济，必须要干部参加劳动，这一条在大寨来说是比较过硬的，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和群众一起干活，在实践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指挥生产头脑清醒不转向，很少犯瞎指挥。这样，干部的威信也就有了，群众也信任了。另一个体会，就是干部不怕犯错误，但怕有了错误没人给提意见。大寨这个问题处理的比较好，我今天对你有意见，及时给提出来，你改的快，工作顺利，成绩大，威信还能低了？有的人怕提意见降低了威信，或者你要给他提嘛，还得讲究什么场合呀，条件呀，提的过分了就麻烦。大寨不存在这个问题，只要群众给提，不管何时提出来都接受，是错误马上改，改了效果就好，成绩就大，群众就满意，自己的威信就高。不是群众给干部提意见丧失了干部的威信，只怕干部不接受群众的意见，丧失自己的威信。你要去大寨看，就分不出那是干部那是社员，社员也是干部，干部就是社员。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走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正由于这样，大寨干部比较稳定，相对的稳定。土改时的老同志，除个别因公牺牲外，都还在一起工作，没有一个掉了队，没有一个垮下去，又层层培养了一大批新干部、青年干部、妇女干部。所以大寨能有一个长期的打算，五年、十年的规划，在完成任务的时候，群众上不来，干部就带头，既抓住眼前，更考虑到长远，就是因为干部稳定。干部如不能相对稳定，这些长远规划和长远打算就没有信心去完成。干部相对稳定，好处很多，他们对当地情况熟悉，经验教训丰富，对实现长远计划的决心大。他想的尽是怎样搞好工作的办法，就没有什么个人考虑的问题啦。大寨贫下中农说：这个集体经济所有制好，使人们能够真正树立集体主义、思想革命化。思想不革命化，就尽想个人事情，那就复杂化了。大寨如果没有个思想革命化，现在到大寨参观访问的外宾很多，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的同志参观，对外、对内、对上、对下，那么多的事，都靠干部来抓，那可糟啦，你不知抓啥，你啥也抓，啥也抓不成。老实说，大寨那一系列工作，基本上都让群众掌握起来了，你干部在不在一个样。在大寨除了地富反坏以外，没有一个社员吵工分高低，嫌苦嫌累。因为有了思想革命化，他考虑革命事业多了，考虑集体事业多了，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少。

改造农业基本条件是很重要的。那么，大寨改造了这么多年，是不是潜力没有了呢？潜力有，再搞它几百年也不能没有。这是在近三年我们所看到的。过去治理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现在又重新治理了。为什么要重新治理呢？已经治理成了高产稳产田，再治不是把肥沃的土壤破坏了，不是这里有些地方说：要搞水平梯田，两三年不增产了？不是两年三年不增产，而是当年就要增产。这一点我们已经做过了。近三年来，大寨搬山造平原。什么叫搬山造平原？就是过去那个沟已经治了，中间一个一个土山，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两边的沟地，坡度很大。近三年来，就把土山挖成洞，放进炸药（大一点的能放它一两千公斤，小一点的弄几百公斤）。一下爆炸后，用推土机推平。然后再从远处运来石块，打起石坝。后底沟是一九五三年开始治理的第一条沟，它包括三条小沟，治了以后，扩大到二十亩耕地。可是到了一九七一年，又重新治理，把三条沟连成一条沟，中间的土山都搬掉，耕地扩大到八十亩，增加了六十亩，当年就种了高粱，每亩平均收了一千斤。这不就六万斤！当年都能产一千斤，你还能说三年不增产？问题不在平田整地破坏土壤，而是在于你没有考虑要当年增产，你从开始就考虑三年不增产，这事不干也不行，上头赶，底下追，闹点形式算了，当然是不会增产的。如果把肥土层破坏了，你就必须增施农家肥料，或调整作物品种。

大寨经过一个冬春的时间增加了六十亩好地，这是为集体经济创造财富，也是永久性的利益，这是一九七一年搞的。一九七二、七三年就更大胆了，大头山也敢爆破它，狼窝掌、老坟沟也搞了。这三条沟，由三、二分一块，变成二十亩到三十亩一块了。那就是因地制宜进行了重新治理！说因地制宜，就是需要大块就大块，需要小块就小块，不是死搬硬套，硬拿人工搞大块。大寨三年增加了一百亩耕地，光这一项今年最少也拿它十二万至十三万斤粮食。怎么能说平田整地三年不增产呢？当然，用镢头刨下来土不象炸药爆破的。但是你刨下来以后，多上肥料，把它熟化不行吗。你不熟化，刨下啥就是啥，当然不可能多长庄稼了。

这是三年增加一百亩地，这一项措施就增加了十多万斤粮食，再加其它措施，一九七三年大寨大队每一口人平均两千多斤粮食。如果没有这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改土工作，这一口人两千斤粮食是上不去的。连续抓了二十多年农田基本建设，二十多年来高产稳产，没有因灾吃过国家返销粮，也没有因灾少卖过

一斤余粮。比如说一九六三年，这是灾害最严重的一年，不仅冲了土地，而且人们的住房百分之九十七都冲掉了，路也没有了，整个大寨都变了，阶级敌人高兴极了，地富反坏说什么：这下大寨今后再不会有人参观了，大寨红旗从此就倒了。这一回国家什么都得给吧！如果国家不给大量的支援，大寨还得逃荒。这“逃荒”二字引起了大寨贫下中农的反感，这就回想到旧社会了。旧社会遭灾，不仅逃荒，还要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你想让我再逃荒，这就说明阶级敌人在明目张胆地进行破坏。就用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对待灾害带来的损失，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靠自力更生的方针，战胜灾害，给阶级敌人迎头打击。你说国家对大寨受了那么严重的灾害能不关心？粮也给，钱也给，物资也给，并且已经派人派车把粮、钱、物资送到大寨大队。在这种情况下，大寨的贫下中农让开车的、赶马车的同志吃了饭，让他们把国家给我们拨来的东西仍旧拉回去，支援比我们受灾更大、经济薄弱的大队。拉走了，地富反坏是怎么讲哩？“这大寨干部要不得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家送上门来了，他不要，就是为了当模范。”他也对症下药哩！给你点火，这火是容易点起来的，要是贫下中农没有较高的路线觉悟，这下可麻烦了。可是，大寨的贫下中农说：我们战胜灾害，不是靠物资支援，是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要这些物资是对的。群众力量是打击敌人最有效的办法。很快来了一个扶苗、加肥、加工，夺得了粮食丰收，带来了“三不少”：口粮不少，卖粮不少，储备不少。有了毛主席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就什么也不少了。这样不仅锻炼了群众，更重要的是考验了干部，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看你能不能想出办法来战胜困难。在当时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先治坡呀，还是先治窝呀？

“窝”就是房子，“坡”就是地。如果要先修房，不恢复土地，不抓田间管理，住上好房没有粮，问题就更大了；抓住粮食，修房问题、恢复土地问题就有了力量了。最后，按群众意见办事，先治“坡”，后治“窝”，五年恢复土地，十年修好房屋，白天恢复土地，夜间修房。结果呢，两年恢复了土地，四、五年恢复了房屋，不是因陋就简，窑洞是石头修的，房屋是砖瓦盖的。有人怀疑，大寨遭了那么严重的灾害，没有大量的钱财物资，怎么恢复这样快？就包括我们公社里的一些大队党支部书记，也这样想。后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就直接向我说：“别人怀疑你们的自力更生，我也怀疑。我们后庄多年想修一个办公室还没有修起来，

你们修了那么多的房，那么多的窑，没有国家给你钱，你吹牛啊！”到了一九六八年，后庄的人口增加了，他也不得不干了，结果，房屋也盖成了，他对自力更生也认识了，找我来赔情道歉，说从前错估了大寨了。他要没有那个实践，一辈子也认识不了。坚持自力更生，使大寨的干部更积累了经验，一般的困难，吓不住他，对青年人接好革命事业的班，树立了一个榜样：遭了毁灭性的灾害，经过艰苦努力，到秋天又给国家卖了二十四万斤余粮，每一户平均三千斤。一九七二年，全县降雨平均一百零四毫米，整整旱了一年，一九七三年又旱了几个月，两年合起来旱了十八个月。一九七二年大寨亩产还在九百多斤，一个人平均粮食接近一千七百斤，一九七三年两千斤了。条件并不好啊，为什么能够那样？简单一点说，大寨的活土层厚，大寨是海绵田。活土层厚、海绵田怎么来的？还是艰苦奋斗改造下的。毛主席对深翻土地有好多指示，落实了没有？回头看一下，想一想。口头上到处都讲加厚土层，要深翻，到底深翻了没有？有些地方把拖拉机变成运输机，这还有什么深耕哩！这说明没有认识深翻的作用，没有尝到深翻的甜头。如果我们那里土层加不厚，去年旱两个月也不行。一九年只旱了四十天，我们那里许多人卖儿卖女，饿死了人。我亲身有体会，我的母亲、姐姐、弟弟都是那一年卖到了外地，留下我和我父亲，父亲扛了老长工，我扛了小长工，两个人养不活自己，最后我父亲被迫自杀了，就留了我一个人。那么，为什么去年旱了一年，一亩地产到九百多斤粮食，一口人平均还能拿到一千六七百斤？这有多种因素，活土层厚就是其中的一条。要说土层啊，我看定西地区有几百米厚，那不是肥土、活土，水不好渗透。活土层厚，蓄水量就多，就能适应我们当地的十年九旱。二是肥料多，秸秆肥料多，农家有机肥料多。如果土地不平整，土层本身就厚不了，你要说土层厚，那是骗人的。工具还是笨犁、木犁，牛耕，你就深不下去了。你要再想深耕，就得套耕，再不就是刨，再不就是机耕。要下决心，加强领导，没有改变不了的落后面貌，没有改变不了的生产条件。大寨加强了抗旱能力，大旱之年，四百来口人卖了四十万斤余粮。你说没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没有那样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的群众和干部，那不就说了空话？

再给大家谈一下昔阳学大寨的情况。昔阳学大寨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县，可是跟大寨相比，还差七年才能赶上大寨现在的水平。我为什么这样

讲呢？大寨今年平均一口人产粮两千斤，全县今年平均大约能产一千二百斤，一口人跟大寨相比，还差八百斤。接近几年每年亩产增加九十多斤来说，它还得七、八年才能赶上大寨。那么大寨这七、八年也不能等啊，还往前跑。全县在学大寨群众运动中是有奔头的，不是生产到了头。学大寨是一九六七年开始的，特别是在《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社论以后，变化更大。先说粮食问题，这不是就生产论生产，不讲这个，问题说不明。一九六六年以前，每年都是六、七千万斤，七、八千万斤粮食。一九六六年还不错，全县总产量是八千万斤。四十万亩土地，恰恰一亩地二百斤。阶级敌人嚣张，到处造谣惑众来破坏。当时的领导是怎么想的？就是“要想粮食多增产，必须扩大播种面”，就是把经济作物所占的面积挤掉，一亩也不种了。我们那里有两个公社还能种点棉花，还有两个公社大量种线麻。这些棉花、线麻都去掉，全部种粮食。结果呢，不仅粮食没有上去，反而造成减产。这就是错误路线给我们所带来的结果。一九六七年以来，粮食是个什么情况呢？一九七一年粮食总产达到两亿四，比一九六六年的八千万翻了两番，亩产也是两番，按人口平均也是两番。一九七一年卖给国家的余粮数有多少？八千万斤。一九七一年秋收以后，县委就讲丰收不忘国家，丰收不忘支援工业，要多卖余粮，支援国家建设。这个八千万一提出来，社会上就有了舆论了，说是吹牛，说是不要看卖的多，要看到“一多带来三少”。什么少？就是口粮少，种子少，饲料少。这是什么舆论呢？你不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马马虎虎过去，那就忽视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大寨贫下中农当时就下了一个结论，说造这种舆论是和当前的批林整风背道而驰的。一九六六年以前，这是真的少。种子少，饲料少，口粮少，卖粮少，储备那就更少了。有那么多“少”，为什么没有人造舆论呢？偏偏在这个时候，粮食本来多了，一口人给国家卖了四百斤，还有八百斤粮食，怎么能说“三少”呢？我们就在批林整风中批驳了这种谬论。你不批它怎么办？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能放松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这是一件事。另一件就是昔阳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劈山改河，河滩变良田，也同样有舆论。这是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九年。一九六七年搞试点，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接着大干。在全县四百一十二个大队里同时开始，普遍开花。这一开花，舆论就来了，说昔阳县又刮起了新的“共产风”、平调风。在这种舆论下，你是挺身干还是算了，是上马还是下马？这是考验我们的一个试金石。这些造舆论的人是不懂得什

么叫“共产风”的。我们调了劳力把河滩变成良田，三年来造了那么多良田，是给社会主义增加了永久性的财富，这是什么平调？大家说不怕，要顶得住，还要大干。全县又调了百分之四的劳动力，合起来是百分之十的劳动力，到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后来中央领导同志去了，在全县看了一下，说这不是“共产风”，这是一支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专业队。要搞农田基本建设，不搞专业队是不行的，这是经验。我们的干劲更足了，大搞农田基建的信心更坚定了。同志们，没有党中央、没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你尽管办法想得多，干劲足，也还是很难办到的。刚才说的粮食翻了两番，这是一个小的成绩，可以说不值得讲。要说学大寨的成绩，是在全县范围内劈了那么多山，改了那么多河沟，增加了耕地五万亩。这就为一九八零年打下了基础。那时候粮食就不是两亿多，三亿多，恐怕能上四亿或者比四亿还要多，全县每人能有两千斤粮食。这就是大寨精神在全县范围内开花结果了。这里再举个例子。皋落大队是一个有两千多人口的大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叫他学大寨，他说“村大人多心不齐，学习大寨不容易”。从一九六七年到现在呢，他的口号成了“村大人多力量大，学习大寨有办法”。一九六六年以前，每年的粮食产量没有超过一百三十万，一九七一年这个大队的总产量上升到四百八十万。他要卖二百六十万斤余粮，等于一九六六年两年的总产量。他运输困难，上县里要汽车：“你要不给我汽车，就得生产一年停止一年，往出运一年。”他又跟一九六六年前相比，那时吃供应粮有压力，县里给他的供应粮来回运七十八里地，劳力和畜力相当困难；现在是卖余粮的压力。给了他一辆汽车，我们当时想他要贷款。可是汽车一到，第二天交款，还说再给十辆我也不贷款，银行存着二十六万元现金。这是一个大队，整个全县就不讲了，队队如此。毛主席革命路线一旦被革命人民掌握，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遭到干扰和破坏，就是一九六六年前那个结果。这样，就使全县认识到大寨走的是什么道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走的是什么道路，学大寨不是光学大寨产量，不是就生产论生产，首先是要抓路线问题。去年是一个考验，全年下了一百零四毫米雨，有几个公社连种子也收不回来，饲草也没有。悲观情绪相当厉害，全县办的水利工程下马了，把整个专业队撤销了，说要出去抓现钱。阶级敌人出来破坏了。这样，大寨贫下中农又说话了：“全县学大寨，遇到这样的灾害，就跟大寨贫下中农想不到一起。”这就引起全县各级领导考虑问题：

大寨遇到灾害是想办法战胜；我们遇到灾害被吓住了。这就需要检查学大寨中的问题了，就来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经过大反右倾，大鼓了革命干劲，水利上马了，专业队恢复了，粮食产量上去了，结果产了一亿五千万斤，每人平均七百多斤，我们宣布：那几个一颗粮食没收的公社，社员口粮要有保证。这样，我们抢先来占领阵地，既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又打击了敌人。全县共卖给国家三千多万斤余粮，比征购任务二千五百万斤还超了百分之二十。

在农田基本建设上，不是所有人都认识清楚了。洪水公社一个党委书记，一九六七年起，等了一年，算了一年，看了一年，三年没动成。等什么呢？等人家工程都开工了，看它能不能存在住，洪水能不能冲掉？呢？请了一些专“算”就是算账，家，给他算了时间、投工、开支，不敢干。后来看到人家越干越劲大，就想干脆干吧。他带领全公社的干部、群众干了两年，后来者居上，在河滩打起了一万一千米长的坝，造了三千亩地，大部分当年就有了收益。这样呢，物质变精神，教育了全社广大社员，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劲头大了，办法多了，经验也丰富了。所以说干也并不是那么困难的。

我来甘肃在定西跑了三天，典型还是相当多的，就是怎么能够由点到面的问题了。昔阳是已经由点发展到面了。我们把全省典型的作用都发挥出来，上下拧成一股劲，来改变甘肃的面貌，肯定用不了几年时间。昔阳才几年？就是那么三、四年，四、五年吧！搞农田水利，要统一制订规划，不能只靠专家，还要靠贫下中农和有经验的干部。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我看这里条件相当好。我前两天到过靖远县一个叫旱坪川的地方，土质好，又找到了地下水源，同时又能把黄河水引过去，而且又平，不用打那么几千米几万米的河坝，用推土机来回一平整，打起埂，就是园田化。那个党支部书记说，没有水利化以前，一年种一季也不保险，有雨了六七十斤，没有雨了连种子也回不来。可是他今年，小麦收了五百斤，种上糜谷，他说能收二百斤，我看可能收三百斤，这样就是八百斤，你能说这不叫过“长江”？这样好的条件在我们甘肃省到处都有啊！

定西过去那个县（会宁县），百分之八十的山地，几百米底下还是土。但就是土地不平，活土层浅，肥料少，不能高产。沙石峪是“千里万担一亩田”，就是跑一千里路，担一万担土，搞一亩田，在石头上创高产。这里，你不费那么多工，到处是土。燃料问题可以解决，不仅是山上，就是那些沟沟岔岔，如果栽上树，

很快都要长起来，这树枝做燃料总比那个麦秸秆硬吧！解决了燃料问题，完全可以挤出秸秆做肥料。大寨一口人只两亩地，两千斤粮食，又有钱花。你一口人六七亩、七八亩地，广种薄收，卖粮不多，其它也没有发展起来，花钱很少。你一口人种四亩粮食，一亩牧草，一亩林，一亩药材，这还没有钱花？现在你种那么多，反而产量少。也可能你种的亩数少了，肥集中了，精力集中了，就会来一个产量多。我们那里都是石头山，为了在山上栽树，打上眼，装上炸药，炸一个窟窿，远处运来土，然后再植树。你这里到处都是土，还不能植树造林？还不能解决燃料？还不能腾出秸秆增加有机肥料？我感到，条件好就好在这里。省委多次在这方面想办法，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但主要依靠基层去具体执行，要真正把省委的计划和设想变为现实，首先必须认真地贯彻党的十大精神，要继续深入地开展批林整风，很好地讨论和认识省委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和意义，省、地、县、社、队团结一致，上下拧成一股劲，加强领导，大干大变，彻底改变我们甘肃省的一些地区的落后面貌，用实际行动来报答毛主席、党中央在政治上、物质上对甘肃人民的巨大关怀。

（原载《甘肃日报》，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胡继宗同志追悼会在兰州举行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华国锋同志等送了花圈 洗恒汉同志主持追悼会 宋平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兰州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胡继宗同志，因病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在兰州逝世，终年五十四岁。

胡继宗同志的追悼会七月八日下午在兰州举行。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中共中央委员皮定钧、年继荣、李瑞山、张达志、张恒云、洗恒汉、韩先楚、粟裕，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康健民、黄成连，以及湖南、陕西、青海、宁夏等省、自治区和河北省肃宁县党、政领导机关；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兰州部队、兰州空军、甘肃省军区、甘肃省政协、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革命委员会以及甘肃省各地区、州（市）党、政、军领导机关，省属各部门和胡继宗同志生前友好。

参加追悼会的有：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兰州部队、兰州空军、甘肃省军区以及甘肃省政协、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革命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洗恒汉、张忠、宋平、年继荣、徐国珍、王国瑞、朱培屏、龙炳初、蔺进生、胡定发、白明、茅林、邱裕民、谢金胜、李宗虎、陈建兰、高明芳、单秀、李书茂、伍生荣、王德润、杜绍山、孔俊彪、李樾、李虎、谭开云、杨焕民、刘镇、吕世英、马友里、孙殿甲、梁仁芥、李彬、冯有财、李永和、陈钧、廖政武、刘璧夫、王加印、刘雪、李天冲、肖秉公、周昌举、马宜生；

中共青海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胡继宗同志的生前友好薛宏福、徐启文、石峰；

正在兰州参加中共甘肃省委五届五次、省革委会十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和工农兵群众、各界代表，以及为胡继宗同志治疗的医务人员等一千二百多人。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洗恒汉同志主持，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宋平同志致悼词。悼词中说：“胡继宗同志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青救会主任、县武装部长、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省委秘书长、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代理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省委书记、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党的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胡继宗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忠于党，忠于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紧紧依靠群众，克服种种困难，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工作，继续革命，做出了新的贡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胡继宗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光明正大，顾全大局，团结同志，联系群众，朝气蓬勃，忘我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胡继宗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个好党员、好干部，是我党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地悼念胡继宗同志，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

1981.09.09；中办发[1981] 34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决定：为所谓“红旗党”一案正式平反。现通知如下：

在一九四三年的延安审干运动中，康生曾把原甘肃地下党的一个同志打成所谓“红旗党”，诬陷这个同志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并据此推断“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策略”。还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所谓“红旗党”一案。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区的地下党都被诬陷为“红旗党”，不少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

延安审干后期，中央发现康生制造的所谓“红旗党”一案纯属假案，及时进行了纠正，给受到冤屈的同志平了反。但对整个所谓“红旗党”的问题，限于当

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作出全面的结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以及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和多次审干的审查，证明上述各地的地下党组织都是我们党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都曾英勇地领导了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和从事各种对敌斗争的活动，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在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很多同志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同志壮烈牺牲。把这一部分同志诬陷为“红旗党”是根本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历史问题又被翻腾出来，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斗争，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

为了彻底解决所谓“红旗党”的历史遗留问题，消除康生制造这一假案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中央决定给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以及其它地区被诬陷为“红旗党”的地下党组织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这些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因此案受到迫害的同志要彻底平反，致死的同志予以昭雪（不开追悼会）；有的同志因此失掉了党籍，要根据具体情况，妥善解决；人事、干部档案中如有这类不实之词的材料，要取出销毁。希望曾在这些地下党组织中工作过的同志坚持为党为人民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可登党刊）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二、研究资料

《甘肃文革大事记》

1966年甘肃大事记

1月8日，中国气象学会甘肃分会在张掖县召开河西干热风学术座谈会，提出了新的防治措施。

24日，《甘肃日报》发表工人出身的科学技术专家蔡祖泉的文章《工人阶级完全能做科学文化的主人》。蔡祖泉是一个只上过三年小学的普通工人，经过10余年的努力成长为一个高真空、电光源方面的专家。

是月，截止1966年1月底，全省有30个县(市)恢复或组建了科协机构，除甘南州外的11个地(州、市)，都设立了专办或兼办科协工作的机构或干部。

2月18日，省水利厅机械制造厂研制成功的“AT20—6水轮泵”。通过技术鉴定。[中国文革研究网编辑]

2月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测绘室人员参加由国家组织的珠峰登山科学考察队，进行地面立体摄影测量、绘制珠峰地区五万分士一地形图。中国第一次测得珠穆朗玛峰高度为8848.98米。

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等先后到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酒泉钢铁公司和刘家峡水电站等处视察。 wengewang.org

3月2日，甘肃师范大学、定西专区科委等单位完成“会宁、皋兰两县苦水改良调查”科研课题，为我省苦水改良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5日，省科委召开河西干热风研究工作会议，修订了1966年河西干热风研究计划，并决定成立河西地区干热风研究领导小组，陆为公为组长。

4月2日，全国先进刀具技术推广队到达兰州，为我省送宝传经。

3日，省人民委员会常委会议决定，在永靖县刘家峡建化肥厂。1967年2月，刘家峡化肥厂动工。自1970年6月30日建成投产至1971年5月期间，刘家峡化肥厂生产出氧气、氮气、合成氨、尿素等产品。其中尿素填补了我省化肥生产的空白。

9日，兰州铁道学院黄秉淦教授设计研制的砂田犁，通过技术鉴定。

22日，据报道，兰州部队总医院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十分复杂的断臂再植手术，把一个10岁儿童已完全扭断、碎裂、污染的右臂重新接上，其功能基本恢复。

4 月 23 日中共甘肃省委抽调万名干部，蹲点创办“大寨”、“大庆”式单位。

25 日，为加快我省工农业生产发展，积极推广科研成果的利用，省科委、计委，经委联合召开科研生产接力赛会议。

5 月

15 日，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所开办我省第一期电子计算机训练班。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制定与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与迅猛开展。在甘肃境内，以大中学校和铁路系统职工为先导；已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随处可见。从中旬开始，兰州大学、兰州铁道学院等大专院校，已开始停课闹革命。

20 日中共甘肃省委先后召开各种座谈会，号召各界积极行动起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22 日，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制造成功中国第一台整体搬迁石油钻机。

6 月

4 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甘肃省委向兰州市各高等院校派马文化革命工作组。7 月 29 日，又依照毛泽东的指示，全部撤出。

6 月 6 日，能够整体搬迁的石油钻机在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诞生问世。

22 日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制造出全国第一台整体搬迁石油钻机。

23 日兰州市 20 万人游行，声援越南胡志明主席《告全国同胞书》。

25 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日下午，江隆基含冤去世。1978 年 1 月 26 日甘肃省委为江隆基平反昭雪。

28 日，玉门市农具生产公社研制成功半机械化蚕豆点播机。

7 月

12 日，兰州第一毛纺厂试制出的 GA01002 纯毛麦尔登，GA03001、GA03002 纯毛海条呢，GA41912 毛粘粗纺哗叽和 GA13601 毛粘粗纺制服呢等 5 个产品通过技术质量鉴定。

28 日，省兰州客车装配厂研制成功的 jT660A 型长途客车通过技术鉴定。

是月，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试制成功年产工万吨维尼纶的关键设备——第六精馏塔材料为脱氧铜，规格为 2800×8×170,000 毫米，重 48 吨。

8 月

18 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到 11 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了 1300 万师生和红卫兵。甘肃省大中学校师生红卫兵约有 15 万人次奔向全国各地串联。

22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甘肃省委撤销了省委常委书记裴孟飞、书记处书记马继孔的一切职务。此后裴孟飞、马继孔被作为“黑帮”受批斗，戴高帽，挂大牌，搞“喷气式”等，裴孟飞死。文革后平反。[中国文革研究网编辑]

23 日《甘肃日报》刊登新华社关于首都红卫兵向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猛烈开火的消息。甘肃各地亦开始了横扫“四旧”，许多文物古迹遭破坏，许多商店、街道、公社被改换名称，个别地方还出现“剪子队”，拦路剪去妇女的烫发和辫子。

9 月

3 日兰州“造反”群众组织及外地红卫兵在七里河体育场集会，揪斗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

5 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制止动乱扩大的五项规定：（一）不要上街游行；（二）不要到外单位贴大字报；（三）不要出宣传车；（四）讲要派代表提抗议；（五）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围斗，更要严禁打人。

10 日针对红卫兵横扫“四旧”造成的破坏，省人委批转省文化局《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注意保护文物的报告》，提出，凡属于中央、省级、县级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要妥善保护，不要使其遭受破坏和损失，省博物馆、县（市）文化馆等事业单位所保存的历史文物或文物展览，目前一律停止开放。

12 日兰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及赴兰红卫兵宣布成立“打倒汪锋委员会”。

是月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在今、明两年内，印刷《毛泽东选集》60 万部。并决定向全省大、中、小学学生赠送毛泽东著作。

在红卫兵冲击下，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参事室、省文史馆等停止活动。

9 月 21 日至 28 日，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召开全省农业生产会议，产生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会议纪要。

《纪要》中说，我省旱象从去年秋季开始露头，到今年夏季持续 200 多天，波及 47 个县(市)，受旱 2600 多万亩。在大旱的 5、6、7 三个月，先后组织 430 多万劳动大军，抢种、补苗、扭水点浇、点种，兴修农田水利。到 9 月初，扩大有效灌溉面积 56.7 万亩，铺压砂田 25 万亩，修水平梯田 78.8 万亩，种高产作物 910 万亩，坑种 15 万亩，担水点种、点浇 100 万亩，复种、扩种 459 万亩，秋田面积比去年增加 256.7 万亩，达到 2221 万亩。基本达到了以秋补夏的目的。

《纪要》提出，今年秋冬和明春的农业生产建设工作，以“三秋”生产、农田基本建设、积肥造肥运肥、备耕春耕四个歼灭战为中心，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要实现良种化，高产作物要求达到 1000 万亩以上。凡能够复种的社队，要变一年一熟为两熟，有些一年一熟的社队，只要条件许可还可以设法改为两年三熟。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大力培养大寨式的 400、500、800、1000 斤的万亩川和 400、500 斤的县、社、队。农田基本建设，以群众自办为主，国家帮助为辅，努力完成平整土地 200 万亩，水平梯田和洪水漫地 160 万亩，铺压砂田 20 万亩，扩大有效灌溉面积 120 万亩。

9 月 27 日，省科委主持召开全省地震科学研究工作和地震仪器试制工作会议。

10 月

5 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 4 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甘肃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

19 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书记李友九被兰州铁道学院“造反派”揪到该院批斗。此后省委和省政府一些领导人被兰州各高等院校进行了轮番批斗。

28 日西北地区第一座现代化平板玻璃厂——兰州平板玻璃厂建成，并投入生产。

31 日兰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进占中共甘肃省委机关办公大楼，建立据点。

是月，配合丁苯橡胶 3 号配方的需要，兰化公司有机厂试产阻聚剂福美钠和络合剂 ED TA 二钠获得成功。

11 月

5 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10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讲话中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这次会后，甘肃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0 日中共中央通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书记处书记陈曾固停职反省，由胡继宗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增补詹大南、刘昌汉为省委书记处书记。

11 日甘肃省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部分师生 3000 余人，组成 200 多个“长征队”，徒步前往北京、延安、井冈山、遵义、韶山等地进行“串连”。

[中国文革研究网编辑]

21 日全国第一个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完全利用冶炼废气制造优质硫酸的废气制酸厂在甘肃省建成。

11 月 25 日，甘肃冶金公司冶炼厂修炉工陈永林等在高温条件下，用“热挖补”的方法修复大型冶金炉炉底成功。

12 月

27 日中共甘肃省委转发省委天水工作队《关于对芦坪大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调查报告》。指出，这个调查说明“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

斗争是十分严重的，尖锐的，斗争的反复性很大”。要求各地党委必须“大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

全省棉花生产出现了 2 个亩产 80 斤以上的县：安西 87 斤、敦煌 82 斤，6 个亩产百斤的公社、28 个亩产百斤的大队，191 个亩产百斤的生产队，出现了粮棉双丰收的单位：敦煌县棉花亩产 83 斤（实为 82 斤），粮食亩产 402 斤（实为 368 斤）。安西县东方红公社棉花亩产 120 斤、粮食亩产 397 斤。敦煌县红旗公社东方红大队，棉花亩产 131 斤，粮食亩产 573 斤，先锋公社胜利大队第二生产队，棉花亩产 187 斤，粮食亩产 642 斤。

是年，兰州长风机器厂 SL—1 型末制导雷达试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成为全国第一代投入批量生产的产品。

1967 年甘肃大事记

1 月

1967 年 1 月 5 月，天水电池厂试制成功的 9 种军用锌锰干电池，通过技术鉴定。[中国文革研究网编辑]

6 日《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被两报社“革命造反委员会”查封。《甘肃农民报》停刊。《甘肃日报》改为只发表新华社电讯稿的《红电讯》。17 日，在一派群众组织主持下，《甘肃日报》重新出刊。

8 日中共甘肃省委发出通知，决定今后“文化大革命”实行分口分级管理。（一）撤销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省委常委主管，文化大革命，生产工作由生产领导小组负责 2（二）撤销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省委文化革命接待室及外地师生接待站；（三）撤销农村社教办公室、城市社教办公室及城乡社教委员会；（四）按照工业、农业、文教、大学、财贸、党群政法及综合 7 个口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分别管理所属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 3 月 18 日开始，驻甘部队派出大批干部战士，陆续进入全省厂矿、农村、学校，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及军管、军训顺称“三支两军”任务。派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

2 月

5 日兰州 34 个“造反”群众组织夺取了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省委、省人委领导机关和办事机构瘫痪，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状况。此后，全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所属机构相继被夺权。

6 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高歌猛进》，鼓吹“全面夺权”。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 61 人的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 1936 年 8 月至 1937 年 3 月薄一波等写反共声明出狱定为“自首叛变”。从此甘肃同全国一样，到处掀起“揪叛徒”的风潮。[中国文革研究网编辑]

22 日根据中共中央 3 月 11 日的指示，由甘肃省军区第二政委龙炳初、副司令员张介民、原副省长李培福、王国瑞、冯直等组成“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组织全省生产和日常工作。

是月全国第一台用于开采石油的混沙车在兰州通用机器厂试制成功。

4 月

4 日兰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驻兰州部队指战员 15 万人集会游行，声讨“党内头号走资派”。

18 日兰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甘肃日报社发生武斗。

22 日兰州铁道学院一群众组织提出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的“打倒张（达志）、洗（恒汉）、杨（嘉瑞），解放大西北”的口号（张达志、洗恒汉、杨嘉瑞均为兰州军区主要负责人）。

4 月 26 日，定西县八一建材厂开展的轮窑烧青砖试验成功，通过技术鉴定。

5 月

6 日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转发《甘肃省农业厅关于 1967 年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意见》。意见中提出，要积极推行山西大寨劳动管理上“标兵工分泪报公议”的经验，大批“工分挂帅”。

兰州地区一部分群众组织冲击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并围攻斗争了办公室负责人。

8 日 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转发《甘肃省农业厅关于 1967 年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意见》。《意见》中说，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必须突出政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求各地做好：

(一)积极推行山西大寨劳动管理上“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经验，进一步改善劳动管理。(二)处理好去年收益分配中的遗留问题，认真做好今年的收益分配工作。对去年分配中出现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必须严肃处理，并严防今后再次发生。

(三)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搞好财务管理。(四)加强生产队的计划管理。

12 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确定甘肃的支左工作要在兰州军区党委的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

15 日兰州地区一群众组织又冲击并占据了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办公楼，并静坐至 23 日。

5 月 16 日，泾川县农具厂研制成功的 216 米高扬程小型水锤泵，通过技术鉴定。

17 日兰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七里河桥发生大规模武斗，约有 4 万多人参加。

17 日兰州一群众组织从是日至 30 日冲击甘肃省军区办公大楼，并静坐“绝食”。

17 日，兰州军区 8709 部队采用淡化器处理咸水成功。

20 日，兰州通用机器厂试制成功用于采石油的主要配套设备混沙车，经试车表明，质量达到设计要求。

25 日中央文革同意将原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市委的书记处书记和省、市政府副省长、市长以上领导人，统一由兰州军区管理，各“群众组织”若要批斗时，同支左办公室联系“协商安排”。

28 日兰州军区发出第 5 号通告，要求各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

是月根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关于广线建设归军区领导的指示，兰州军区成立三线建设办公室，由司令员张达志负责，在兰州开展工作。

29 日全省绿肥现场会议在天水召开，会议认为，我省有发展绿肥的广阔条件，种植绿肥对肥地增产、提供饲料、解决燃料、保水固土等方面开辟了重要途径。号召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大种绿肥作物，为解决肥料不足，实现农业丰产做出贡献。

全省 1962 年绿肥作物面积(不包括紫花苜蓿)只有 20 多万亩，1967 年达到 126 万亩。天水专区 1966 年绿肥作物面积达 50.2 万亩，占粮田面积的 13.1 %。

6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坚决制止打、砸、抢、抄、抓等歪风邪气的《六·六通令》。

12 日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有关负责人和胡继宗在北京举行“甘肃文革问题座谈会”，座谈会 7 月 22 日结束。

7 月

8 日，由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甘肃省科委、农建十一师组成的河西盐碱土改良利用调查研究选点工作小组前往玉门、高台等县开展工作。

22 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组成了由军方代表、“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地方干部参加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

甘肃省各地各派纷纷建立武斗班子，流血事件不断发生。本月下旬，兰州地区“群众组织”之间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召集各派组织商谈制止武斗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8 月

3 日由毛泽东批示的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事》、《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关于甘肃问题

座谈会纪要》相继下发。这些文件肯定兰州军区的“支左”方向和“红三司”的“造反”行动和斗争方向，同意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24 日兰州至成都直达航空线正式开航。 wengewang.org

9 月

1 日兰州军区给甘肃“群众造反组织”赠送毛泽东著作 18 万册。

7 日甘肃省军区发布《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命令》：（一）禁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已进城参加武斗的，由军分区和县、公社人民武装部立即动员他们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二）凡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专、县、军分区、人武部要立即查明原因，对策划的主谋者，严加追究；（三）军分区、人武部与当地驻军紧密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16 日 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各地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搞好秋收、秋播、秋耕的通知》，掀起“三秋”生产新高潮。

21 日 《甘肃日报》发表《以革命大批判为动力集中力量搞好三秋》的社论。

25 日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革命大联合紧急动员大会，号召全省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9 月 28 日，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在金塔县召开现场会议，推广该县节煤省柴新技术经验。

是月甘肃省第一座公路隧道——定(西)天(水)公路鸡嘴山隧道竣工。

10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18 日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和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600 余人参加。

14 日甘肃省学校系统第一个“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兰州一中革命委员会成立。此后，各学校陆续建立起革命委员会，许多学校废除了教导处、

教研室，取消了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度，将师生接班、排、连、营建制编队，推行“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做法。

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要求“各厂矿、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

20日兰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使用了枪支等武器，致死致伤多人。

11月

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批准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冼恒汉、徐国珍、李书茂、张忠、龙炳初、胡继宗、王国瑞、白学光及“群众组织”代表9人，共17人组成，冼恒汉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任副组长。

10日兰州军区、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负责人会见兰州地区第一批成立的50个基层革委会成员，要求革委会成立后，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20日甘肃工业大学1966届全体毕业生向全省大专院校毕业生发出倡议：知识青年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本月底兰州市全日制中学和小学已经全部开学，绝大多数学生到校上课，各类中等专业学校也相继开学。

12月

3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5日甘肃省第一个县级革委会——临洮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12日兰州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

15日兰州军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决定由驻甘肃地区各部队抽调干部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农村去，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农村“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20日兰州地区贫下中农、革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

22 日甘肃省完成首次承担的印制 50 万部《毛泽东选集》任务。

24 日甘肃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在兰州召开甘肃省基层革命委员会工作经验交流会议，总结交流革委会建设的经验。

25 日兰州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成立。

29 日兰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

30 日兰州军区决定对甘肃省各级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全省 27 个劳改单位也同时实行军管。

是年

根据毛泽东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 指示”，中央派北京医疗队到甘肃河西地区开展卫生工作。截至 1977 年 10 月，共派来 10 批，4000 多人次。

是年，兰化公司研究院用 50 天时间建起了“783”低分子液体橡胶中试装置，很快生产出产品，应用于火箭推进剂。

1968 年甘肃大事记

1 月

2 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兰州地区 10 万人誓师大会，“迎接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12 日临夏回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成立。至 9 月 23 日，全省 11 个专区（州、市）和 82 个县（市）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21 日 甘肃农业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吴金功任主任，王立有（解放军代表），王莘夫、杨平定（学生代表）任副主任。

24 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由 105 名委员组成，常务委员 24 人。洗恒汉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肖泽民任副主任。革命委员会包揽党、政、财、文大权，实行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是日，兰州 25 万军民集会，庆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 月 24 日，我国自行设计的大型回转式水泥窑在兰州建成。

25 日，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制成大型水泥回转窑，产品在窑身筒体椭圆度和传动结构方面，都达到了先进水平。

25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春风已到玉门关》的社论，庆祝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我国自行设计的大型回转式水泥窑在兰州建成。

2 月

1 日，兰州军区 8120 部队研制成功的乘除器，通过技术鉴定。

15 日 河西盐碱地改良利用科学研究座谈会在兰州召开。会议由甘肃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农建十一师主持。参加单位有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兰州地质研究所，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究所、南京土壤研究所、西北水科所、中国农科院河西试验站、甘肃省水利厅、张掖地区农科所、甘肃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共 33 人。会议确定 1968 年在人民公社设高台信号大队和玉门市黄闸湾大队两个研究基点，在农建十一师设一、三、七团三个研究基点， 并提出了研究任务。

20 日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立即动员起来，抓革命、促生产，迅速掀起春耕生产高潮的紧急指示》。

2 月

决定在全省范围掀起一个“大办特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新高潮。要抓好“天天读”和自学活动。“天天读要做到雷打不动，早晨向毛主席请示，晚上向毛主席汇报”。“开各种会议，会前学语录，会中用语录，要成为全省革命人民的制度，养成良好习惯”。这次会议还对抓好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各单位的斗批改和整顿党组织等问题作出了安排。

3 月

12 日兰州市公安局破获了英国间谍乔治·瓦特（英国人）以工程师的身份，用特务手段窃取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等重要情报，并大量偷拍禁区照片的间谍案，同时，还发现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工程师彼德·迪卡特（西德人）也在我国从事间谍情报活动。15 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乔治·瓦特有期徒刑三年。同时宣布把彼德·迪卡特立即驱逐出境。

13 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大会，欢送首批医疗卫生工作队队员去农村进行医疗工作。

29 日甘肃省革委会上报下发常委会议《纪要》，说“以裴孟飞为总头目的刘、邓第二套班子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又出来同我们斗争了。这个斗争由来已久。斗争的实质是谁掌权的问题”。随后，在兰州地区发起了揭批“反革命政变二套班子”的运动。4 月 8 日，省革委会召开揭批“反革命政变二套班子”誓师大会，要求各单位“要集中目标，集中火力，狠揭狠批，穷追猛打”。[中国文革研究网编辑]

同月，省科委在酒泉主持召开河西盐碱地改良科学研究工作会议，确定了河西盐碱地改良工作任务、方法和规模。

4 月

11 日甘肃省革委会召开兰州地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誓师大会。兰州地区第一批 1200 余人参加的“6.26”医疗队分赴农村、牧区。

13 日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白彦博任主任。冯国政(解放军代表)、陈启荣任副主任。

是月省级各民主党派参加学习班，民主人士被逐一审查。

5 月

10 日，兰州农业机械厂试制成功“东方红—12 型”四轮拖拉机。

14 日甘肃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发文，要求农村推广大寨“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劳动管理经验。

25 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甘肃全省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接着追查所谓“5.6 反革命阴谋集团”，举办实为审查干部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省被关押审查的干部群众达 30 多万人，原中共甘肃省委 19 名常委中有 8 人被定为敌我矛盾。

31 日，徽县农机公司试制成功的“FFC—37 型”粉碎机通过技术鉴定。

是月刘家峡水利水电枢纽大坝主体完成，开始下闸蓄水。

6 月

6 日，兰州阀门厂研制成功的“H44T—Dg150 旋启式止回阀”通过技术鉴定并投入量批生产。

7 月

10 日，据报道，甘肃冶金公司实现重大技术革新 22 项。

同日，据报道，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研制成功自动切管机，比手工切割提高工效 80 倍。

11 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学习讨论河南省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经验。决定从原省级机关中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抓革命，促生产，走“精兵简政”的道路。

18 日，省革委会批示同意省科委、省科协成立革命领导小组，孔传道任组长，侯保田、王根土任副组长。

20 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生产出第一套合格的铀部件，为 12 月 27 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20 日，酒泉新生机械厂研制成功的“CDMD 型”0.5 吨、1 吨系列电动葫芦，通过技术鉴定。

8 月

7 日省革委会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召开全省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要求毕业生家长要鼓励子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各地农村、工矿企业要做好接收和安置工作。

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第一次生产出品位 90% 的金属铀。至此，金川矿中所含 8 个贵金属元素—铂、钨、金、银、钼、铀、钽、铯均已提取成功。

29 日兰州地区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兰州铁道学院、兰州医学院、甘肃教育学院、甘肃工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 8 所高等院校及一些科研单位，领导“斗、批、改”运动。

9 月

2 日经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同意，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由 105 名增加到 125 名；常委由 24 名增加到 35 名；增加王国瑞、朱培屏、谢金胜、李宗虎、李荣山、年继荣、陈建兰、高明芳、单秀为副主任。

18 日兰州市首批 600 余名高、初中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

10 月

5 日毛泽东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甘肃各地普遍建立“五·七干校”，全省先后有 1.1 万多名干部下放到干校或农村劳动。

19 日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关于复课闹革命并做好教材改革工作的通知》，决定中学学制改为“二·二制”（初中、高中各二年），知识课主要学数学和物理合并的工业基础知识课，化学和农学合并的农业基础知识课，也可适当开设文艺课和军体课。

是月甘肃省河西走廊第一代第一期万分之一地形图测绘工作完成。计 2251 幅，5.6 万余平方公里。河西农业区万分之一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测绘工程，是国家测绘总局根据国家第二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为建设河西商品粮基地而安排的。采用现代航空摄影测量技术成图。

11 月

7 日甘肃省革委会决定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民勤、甘谷、庄浪三县。

30 日《甘肃日报》报道，由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和全国有关协作厂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全国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深井石油钻机，在某油田试钻成功。

12 月

20 日甘肃省革委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新高潮的决定》，强调学大寨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向一切阶级敌人展开猛烈进攻。

22 日新华社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甘肃省会宁县从 7 月中旬到 12 月中旬，全县 688 户城镇居民中有 191 户，995 人分别到 13 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的消息。“编者按”中还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甘肃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了知识青年奔赴农业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热潮。甘肃还“动员”大批职工家属下到农村。

是年

著名教育家、甘肃师范大学体育教授袁敦礼去世。

是年，兰化公司设计院对引进的砂子炉裂解装置进行改造，并设计出我国第一台用于橡胶后处理的挤压机，这两项设备均在 1978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69 年甘肃大事记

1 月

1 日 甘肃省革委会创办不定期内部刊物《甘肃通讯》。

甘肃省革委会决定，把省属的兰州机床厂等工交、财贸、农林、卫生系统的 203 个直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各地、州、市或县领导。

10 日，兰州轴承厂试制成功两台生产轴承毛坯的专用铸造设备——250 扩孔机。

11 日甘肃省革委会在会宁县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会宁县动员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经验。要求在全省立即掀起一个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12 日，阿干镇煤矿试制成功专供矿井电机车电源用的自动控制直流发电机组。

31 日，化工部决定将化工部天津化工研究院的涂料专业迁往兰州。1969 年 11 月 20 日，化工部西北涂料工业研究所在兰州成立。1971 年 3 月 19 日，甘肃省燃化局决定，将西北涂料工业研究所与甘肃油漆厂合并，改称甘肃油漆厂涂料工业研究所，1978 年 10 月 19 日，经国务院批准，化工部发文将该所重新独立，改名为化工部涂料工业研究所。

2 月

1 日甘肃省革委会决定，从今年起，中、小学校一律实行春季招生。今春招收的新生，小学试行五年制，中学试行二·二分段制和四年一贯制。也试行中、小学七年一贯制和九年一贯制。

甘肃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城乡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会议决定，废除班主任制，按年级组成班、排、连，每连设政治指导员。城市中小学采用“厂办校，两挂钩”，由工、军宣传队领导，农村中小学由社、队办。各校都要建立学工学农基地，逐步做到自给或半自给，中学生每周劳动 2—3 天，小学生 1—1.5 天。

4 日，省革委会甘革发(1969)13 号文通知，省科委改为“甘肃省科技管理站”并批准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

10 日，西电一公司(在兰)试制成细粉分离机。

同日，兰州农业机械厂试制成功对轴双面铣床，为成批生产拖拉机创造了条件。

24 日，兰州第一毛纺厂制成自动化裁毛毯机，使裁毛毯由手工操作变为自动化操作。同日，3512 工厂试验成功羊皮低盐基度铬柔的新工艺。

同日，兰州铁路局兰西机务段试制成功阴阳离子交挽软水装置，解决了机车冷却问题。

同日，长通电线厂试制出绕麻线用的自动化机械。用于生产提高工效 20 倍。

。29 日，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 11 万吨 / 年的不锈钢衬里尿素合成塔。

是月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农建第 1. 2. 4. 5. 6 师及林建师。兵团部驻武威黄羊镇。彭思忠任司令员，林山任政治委员。1973 年 10 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撤销。

3 月

8 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高健君去世。

10 日，兰州农具制配厂试制成功加工粮食的 65 型磨粉机。

同日，兰州市给排水公司自制成功大型双面进水叶轮。

19 日，甘肃冶金公司选冶厂设计、安装成功利用冶炼炉的余热代替动力废热锅炉，节约了大量煤炭。

同日，天水市电器安装合作社制造成新型的高压配电柜，技术性能符合标准。wengewang.org

24 日甘肃省革委会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交关于电影《红河激浪》的调查报告。称《红河激浪》是“反党分子习仲勋和张仲良主谋炮制的一株大毒草”，是一部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翻案的反党影片。1979 年 9 月 30 日，中共甘肃省委宣布撤销这个报告，为《红河激浪》平反。

4 月

1 日 刘家峡水电站第一台 22. 5 万千瓦发电机组安装完毕，开始发电。1975 年全部建成，总装机 122. 5 万千瓦，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水电站。

2 日全省第一条 220 千伏刘家峡至兰州龚家湾的输变电工程正式投入运行。线路长 45 公里，变电站容量 24 万千伏安。

12 日，天水汽车修理厂制成 200 吨压力器柱万能液压机。

同日，兰州第二通用机器厂试制成功煨弯机。使工效提高 10 倍多。

同日，兰州制桶厂制成油桶丝圈台模具。

15 日，酒泉农机厂试制成轻便灵活、工效较高的红旗一 700 型脱谷机。

26 日兰州铁路枢纽编组站改建工程完工。

27 日，甘肃光学仪器厂，甘肃电影机械厂试制成轻便式电影放影机和脚踏式发电机。

5 月

13 日甘肃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在文县召开河东地区小型水利现场会议，总结交流各地特别是文县小型水利建设为经验。要求各地农村坚决贯彻“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针，兴修多种小水利，与河争地，改变落后面貌。

18 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召开河东地区小型水利现场会议，要求水利建设以小型、配套为主，兴修多种多样小型水利工程，并结合水土保持，治理山洪。

6 月

21 日，西固机械厂试制成功四开印刷机。

24 日，兰州铁路局兰西机务段职工自制成功小型减温器。

同日，兰州制药厂攻破难关，首次生产出注射剂。

同日，兰州造纸厂把旧式锅炉改造成耗煤量低、热效率高的煤粉悬浮燃烧炉，耗煤量降低 1 / 3。

同日，兰州制胶厂利用兰化橡胶厂的废油烧炉成功，每年可节煤 6000 多吨。

28 日，兰化公司化肥厂试验废煤渣回烧成功，每年可节约煤炭 1 万多吨。

7 月

3 日 中共中央《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规定》，将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省，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决定，额济纳旗划归酒泉专区，阿拉善右旗划归武威专区。

8 日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省革命委员会各部、室、局机构设置和干部编制的通知》。其中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农业局现编制 95 人，比原编制 619 人(包括原来的机构：省农业厅、畜牧厅、农垦局、林业局、农科院)，减少 84. 7%。

9 月

4 日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试制成功全国第一台 40 吨电动轮自卸载重汽车。

17 日，据报道，省高中压阀门厂实现 60 多项革新项目，使该厂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19 日，兰州电器设备修理厂试制成功 30 千伏安变压器，各项性能均达到国家标准。

20 日，天水农机厂试制成 290 型筒式柴油机。具有马力大，震动小、结构紧凑等特点。

22 日，兰州助剂溶剂厂完成引发剂“A”，“C”装置安装工作，9 月 24 日试产，9 月 30 日出成品，达到当时英国同类产品的标准。1970 年 5 月 20 日生产出第一批工业产品。

28 日，兰化公司化纤厂腈纶生产装置建成投产，凌晨纺出第一批丝。

是月，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所研制的卫星短波天线机构防冷焊镀层和温控滑动轴承，用于东方红 1 号人造卫星。后均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0 月

11 日全国第一台用国产最新的高强度低合金钢制造的发展化肥工业的重要设备——大型尿素合成塔在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试制成功。

11 日，我国第一台用国产最新的高强度低合金钢制造的、发展化肥工业的重要设备——大型尿素合成塔在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试制成功。

15 日景泰川电力提灌一期工程动工兴建。

17 日，兰州通用机器厂制成石油工业生产急需的超高压酸化压裂车，经过运转，性能良好。

同日，兰州电气设备修理厂试制成 180 千伏安变压器，经验收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同日，西北电力建设局兰州修造厂试制成功跨度 195 米、起重 20 吨的桥式天车。

同日，兰州综合电机厂设计制成 30 双闸流管电火花加工机床。

22 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宣判大会，判处美国间谍特鲁茨·封·汗林德（西德籍）有期徒刑 10 年。特鲁茨·封·汗林德于 1965 年 10 月来中国后，以“开箱检验员”、“现场秘书”身分为掩护，窃取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情报，严重地危害了我国安全。

26 日，兰州黄河通用机器厂试制成新型螺杆式压缩机。

31 日，据报道，省农业科学院会川基点和会川良种繁殖场，用有性杂交的方法，培育出一批抗病高产的洋芋新品种。

是月，省革委会决定，撤销省农科院，成立省农牧局农业科技工作队革委会筹备小组。

是月，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根据五机部下发的科研计划，开始研制塑-4 炸药，于同年 12 月研制成功。[中国文革研究网编辑]

是月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县雷台清理一座东汉晚期砖室墓，发现一套罕见的铜车马俑和一匹昂首扬尾、三足腾空，右后足踏展翅飞鸟的铜奔马。

11 月

9 日全省卫生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强调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要求到 1970 年上半年，原有县以上城市卫生人员（除老弱病残者外）的 50% 以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要积极推广合作医疗，到 1970 年底全省农村达到普及，要大力培训“赤脚医生”，到 1970 年底每个大队要有 2—3 名“赤脚医生”。

16 日，兰州炼油厂科研所研制成功轮船主机用润滑油，达到国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同日，西北煤田地质局兰州机修厂试制成功油压镗管机。

12 月

5 日，据报道，兰州炼油厂近 3 个多月来，取得科研技术革新 20 多项。

7 日，我国新型的机车自动信号机在兰州试制成功。

22 日甘肃省革委会批转《关于文件档案清查、整理、保管的意见》，提出清理档案要贯彻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教导，要“少而精”，“对打倒对象的讲话文稿，要抽出单独立卷，单独保管”。据兰州、平凉、天水、庆阳、定西、临夏等地州市的不完全统计，已销和判销的档案达 70%。

是月全省战备疏散开始，动用了大批人力、财力。城镇居民和在校学生大批送往农村。

1970 年甘肃大事记

1 月

8 日，兰州市金属加工厂试制成功卧式装水暖锅炉。

12 日省金属材料公司干部袁自立、胡森成、刘显昭向中央文革写信，反映干部分配中存在的任人唯亲和派性问题，被省革委会以“攻击红色政权，攻击四个面向”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告状团”。袁自立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刘显昭自杀，死后又定为“叛党行为，清除出党”。1977 年 11 月 2 日，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给予彻底平反。

16 日甘肃省革委会召开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了“打农业翻身仗”的口号，要求地、县两级一定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农业上。

2 月

8 日，据报道，中国科学院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进行的 16 项重要科学研究项目均获得重要成果。

11 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都要作出支援农业的全面规划，组织好厂县、厂社挂钩，并确定兰州炼油厂等一批大厂矿和 28 个县（市）挂钩。

是月，兰化公司合成橡胶厂新建的年产 2000 吨 ABS 塑料装置投产。

3 月

28 日，兰州市东风皮革挽具厂制成刮皮机、切皮机、洗皮机等，分别提高工效 1~6 倍。

同日，兰州市农具制配厂试制成功东风 12 型手扶拖拉机。

同日，西峰农具厂试制成功 14 匹马力柴油机。

同日，兰州长通电线厂试制成功新产品电磁线。

是月，涂料工业研究所研制的食品罐头环氧酚醛内壁涂料，质量指标与日本进口的同类产品相同，超过了法国产品质量，在上海投产。1973 年 4 月，轻工部在镇江市召开的全国罐头内壁涂料座谈会上，肯定为国内食品罐头内壁的标准涂料。

国务院批示，将武威地区所辖永登县，定西地区所辖榆中县、皋兰县划归兰州市领导。

4 月

4 日甘肃省革委会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和大学生，组成“甘肃省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一批 2000 多人，分别到酒泉、金塔等 22 个县开展工作。8 月 15 日，又决定派第二批 5000 余人，分别进驻敦煌、民乐等 22 县。

15 日，兰化公司石油化工厂年产 3.6 万吨乙烯的砂子炉投产，生产出乙烯、丙烯，在我国首次实现了重质油裂解制烯烃的工业化生产。

24 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酒泉航天基地发射成功。此后，我国第一枚洲际运载火箭、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和多次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均在这里进行。

26 日，兰州通用机器厂试验成功抽油杆电正火新工艺。

28 日，国内第一套万吨级丙烯腈生产线在兰化石油化工厂建成投产。

5 月

1 日，兰州汽车修配厂在完成改装车生产任务的同时，试制成功“兰州”牌 5 吨载重汽车，并已进入小批量生产。

5 日，兰州灯泡厂试制成功耐用灯泡，已大批量生产。

同日，兰州农机厂制成东方红 12 型拖拉机。

5 日，国营华丰机械厂自制电解机床试车成功，从此枪管加工采用了电解新工艺，生产效率提高 2 倍。

8 日国务院批准，将嘉峪关市划归酒泉地区革委会领导。

26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冼恒汉、皮定均、胡继宗、徐国珍、张忠、王国瑞、朱培屏、李书茂、龙炳初、胡定发、姚树荫、白明、商进生等 13 人组成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冼恒汉任组长，皮定均、胡继宗任副组长。

是月皮定均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

6 月

12 日甘肃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在农村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大辩论的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开展一场关于人民公社的经营方针、产品销售、收益分配问题的群众性大辩论。

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在西峰镇召开全省农村广播网工作会议，提出 1970 年全省所有生产大队和 80% 的生产队要通广播，并建设放大站 360 处，发展人户喇叭 20 万只；1971 年达到所有生产队通广播。

27 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且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28 日，省革委会(1970)58 号文通知，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

29 日，甘肃氮肥厂革新煤气发火炉，试验成功用小颗粒煤生产合成氨和氨酸氢氨。

30 日，化工机械研究所研制成功第一台国产塑料挤压机。

7 月

5 日，兰州炼油厂研制成功润滑油炼制新工艺，每年可增产 2 万吨润滑油。

15 日，张掖农机厂试制成功 50 吨盐浴炉、100 吨盐浴炉和 100 吨井式回火炉。

同日，广河县农机厂试制成功 507 型玉米脱粒机。

同日，兰州针织厂试制成功高温高压尼龙染色机，使生产效率提高 3 倍。

26 日，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设计试制成功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钻机。

29 日，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化肥厂制成 4000 吨高压电机线圈。

是月，兰州农药厂 1967 年起建厂，本月投产，氨基甲酸酯类除草(燕麦)剂生产能力为 400 吨 / 年。

8 月

4 日，武威县建成一座容水量为 1400 万方的西营水库。

5 日，酒泉地区试制出 920 农药及杀螟杆菌；

20 日，兰州市东风综合制配厂制成高强度聚酯漆包线。

25 日甘肃省革委会决定停办西北民族学院(1973 年 3 月 17 日经国务院批准重新恢复)，将甘肃教育学院合并于甘肃师范大学。

26 日，甘谷县农业机械厂试制成功 12 瓩水轮发电机组。

同日，会宁县农机修造厂试制成功丰收 150 型打井机。

同日，永登县工业局试制成功磨粉机

是月，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试制成功年产 8 万吨的氨合成塔。设计压力为 32 兆帕，设计温度为 220℃，材料为 18MnMoNbR，规格为 $\phi 100 \times 100 \times 14670$ 毫米。

9 月

6 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后，甘肃同全国一样，开始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6 日，甘肃省高中压阀门厂炼出优质耐酸不锈钢，经检验符合国家标准。

同日，兰州铁路局兰西车轮厂自制成客车滚珠轴承用的四轴钻孔攻丝机床，提高工效近 10 倍。

同日，兰州农业机械厂试制成功成工频感应炼钢电炉，已投入使用。

同日，兰州第二毛纺织厂制成电动下料机，比人工操作提高工效 10 多倍。

同日，兰州电镀厂试制成功 80 瓦晶体管收扩两用机。

同日，兰州棉纺织厂试制成功喷气式无梭织布机，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降低了原材料消耗。

同日，天水南河川渭河大桥建成，这座钢筋混凝土大桥全长 236 米。

7 日兰州地震大队成立。

28 日，文县农业机械厂制成 4.2 马力的水轮机和 68 式打米机。

同日，西北电力建设局第一工程公司兰州电器厂试制出 560 千伏安电力变压器。

10 月

1 日西北地区第一座大型高炉——酒泉钢铁公司第一号高炉出铁。

3 日甘肃省广播事业管理局筹建的“兰州电视台”开始公开试播。1978 年 10 月 1 日改名为“甘肃电视台”。

11 日，兰州第一汽车修理厂试制成功兰州牌 210 轻型越野汽车。

同日，天水农业机械厂试制成功 495 型 54 匹马力柴油机。

同日，甘肃省建设公司一大队加工厂试制出滑动钢模，代替了作油罐钢筋混凝土罐壁的木板壳子，节约了大量木材，提高了工效。

27 日，兰州炼油厂研制成功我国第一种新型添加剂——无灰添加剂。

29 日，据报道，今年来全省有 250 多个公社实现了良种化，1.2 万多个生产队建立了种子田，推广良种面积 2700 多万亩。

30 日甘肃省革委会发出《关于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来一个大动员，把大寨经验由点到面迅速推开，要立即把一切能够动员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迅速投入到兴修水利、水平梯田、平整条田、铺压砂田、改造盐碱地等项农田基本建设中来。各行各业都要为支援农业生产作出自己的贡献。此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虽然由于广大干部和社员的努力，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11 月

1 日甘肃省革委会作出关于认真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决定，要求全省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著作。地区以上领导干部还应当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

9 日，省革委会(1970)136 号文通知，张波任省革委会科技管理局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13 日，定西农机厂制成 500 吨摩擦压力机。

15 日全国劳动模范王进喜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 47 岁。王进喜，1923 年生于甘肃玉门。1960 年春，率 1205 钻井队从玉门油矿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被誉为“铁人”。

是日国务院各部委将酒泉钢铁公司等 54 个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甘肃省管理。

20 日，临夏市东风社制成全封闭式三项异步电动机。

同日，永昌机修厂制成 4.5 瓩电动机。

12 月

6 日，西和县农机修造厂试制成功 190 型 10 匹马力柴油机。

17 日，兰州铁路局兰西电务段试制成功我国新型的接近区段频率脉冲式机车自动信号。

19 日，据报道，兰州市电子工业初步发展，现已建成两个初具规模的电子骨干工厂，并拥有 50 多个点的电子工业生产网。全市已能成批生产出半导体收音机，半导体收扩两用机、扩大机、电视接收机等 4 种整机和数字频率计、变频器，半导体低频日参数测试仪、扫频信号发生器、电视专用视波器、扩散炉等 6 种电子仪器。

31 日，据报道，在粮食产量连续 8 年跨《纲要》的规定指标后。嘉峪关市农村坚持科学种田，战胜自然灾害又获新丰收，全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 450 斤，比上年增长 6%。

是年，兰州炼油厂研制的 T-108 硫磷化聚异丁烯钡盐清净添加剂。

wengewang.org

是年，国家选派玉门炼油厂检验科检验员沙占荣赴朝鲜帮助从事技术工作。

是年，核工业部西北地勘局 219 大队北秦岭研究组完成“北秦岭西段铀成矿规律及远景预测”项目，同时提交温泉岩体地质调研报告，后均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1 年甘肃大事记

1 月

5 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第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宣布，1970 年全省粮食产量突破 40 亿公斤，创造了甘肃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13 日，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上水工程第一次工程竣工。该工程为六级泵房，扬程 714 米，管线明渠 15 公里，全部工程完工后，可溉地 3.5 万多亩。

19 日，甘南农业机械厂设计，制造出万能组合机床，并投入生产。

是月，西北涂料工业研究所与沈阳油漆厂、东北输油管线指挥部合作，研制成功环氧煤沥青防腐涂料与玻璃布组成的保护涂层，成功地解决了大庆石油长输管道外壁的腐蚀问题。

2 月

11 日中共甘肃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兰州开幕，17 日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 1098 人，代表着全省 43 万多名党员。会议通过了洗恒汉代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作的题为《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由 68 名委员和 24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甘肃省第五届委员会。在五届一次全会上，选举洗恒汉为第一书记，皮定均、胡继宗为书记，作出了《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整风的决定》。大会闭幕后，陆续增补宋平、张忠、年继荣、秦彦章、禹贵民、茅林为书记。

27 日，平凉县东方红印刷机械厂研制成功年产 3000 吨化肥的氮氢压缩机。

28 日全省计划会议认为，农业问题仍是甘肃经济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必须继续打好农业翻身仗，并提出 1970 年要完成新修水平梯田 100 万亩，条田 100 万亩，新增有效灌溉面积 100 万亩。保灌面积 100 万亩。

3 月

8 日刘家峡水电工程局在吊装变压器时摔坏了全国第一台高电压、大容量的变压器，并砸坏了正在运行的发电机的部分盖板和机器，直接影响了陕西、甘肃、青海三省的供电。

22 日，碌曲县应用新技术建成甘南州第一座煤矿。

29 日，兰州市东风第一被服厂制造出第一批硅平面型高频晶体三极管。是月，西北涂料工业研究所开发的偏硼酸钡酚醛防锈底漆，经国家计委、燃化部、商业部鉴定，列为国家油漆的正式品种。

4 月

5 日敦煌、安西、玉门镇、酒泉、金塔等地遭受 7--12 级大风的袭击，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

17 日，省水电局“五、七”修造厂制成 7500 千伏安铝线圈、油浸、风冷、热轧矽钢片大型变压器。

20 日，酒泉地区额济纳旗制药厂就地取材，生产出第一批治疗地方病的中成药。

21 日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召开的“五七”干校座谈会确定，省“五七”干校轮训省级机关干部，各地的干部由所在地区干校轮训，争取三五年内使所有在职干部普遍轮训一次。

23 日，兰州市窑街水泥厂利用煤矸石作附加材料生产出高质水泥。

是月，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换热、分离、氨组合“四合一”设备。

5 月

8 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从省农宣队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选调 1000 人分配到全省农业公社工作。

甘肃省革委会下达《关于选拔工农兵教师改造文教队伍的指示》，要求聘请工农兵专职教师 644 人，充任大学教师。

8 日，兰州水泵厂试制成功大型电灌用泵—32Sh—9 型双吸离心泵，其扬程高达 180 米，每秒提水 1.86 立米。

14 日，兰化公司将生产能力扩大 10 倍的气喷嘴，用于阿尔巴尼亚费里氮肥厂，一次投料成功，使用周期可达两个多月，超过意大利油喷嘴一倍。

28 日，省革委会主持召开全省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总结和交流了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经验。

6 月

16 日刘家峡水电站经建设坪至青海红湾变电站的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送电。线路长 206 公里，输电能力 25 万千瓦，实现了甘青两省联网。

21 日，甘肃省电信器材三厂试制成功无毒电镀新工艺，改变了原来用剧毒品山奈电镀的工艺。

7 月

8 日，盐锅峡化工厂（原称永靖化工厂）水银电介制烧碱投产。填补了甘肃省一项空白。产品除氯碱外，还有液氯、盐酸、敌百虫、敌敌畏、聚氯乙烯等。

10 日，北方七省（区）胡麻科技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临泽县召开。

是月全国第二次人民防空会议确定，兰州、天水市为国家人防重点城市。1978 年 10 月，全国第三次人民防空会议又增补嘉峪关市为国家人防重点城市。

8 月

11 日漳县手工业综合厂试制成功 30—6 型水轮泵。

15 日，甘肃省高中压阀门厂试制成功超高压阀门。

同日，兰州市东风皮革厂研制出塑料工业急需的辅助原料增塑剂。

27 日，文县横丹公社农具厂研制成功小型水电或水轮泵作动力的多用脱离机。

9 月

9 日，灵台县农机厂制成窝壳转装式 50 型水轮机。

12 日，省电信局研制出四芯音频塑料埋式通信电缆。

同日，兰州长途通讯站试制成功我省第一套 7771 型晶体管八路载波机。

同日，兰州长通电线厂制成铝芯漆包线。。同日，兰州市第一机器合作工厂制成龙门刨床。

同日，兰州东风铁器制配厂制成封伏压力机，使锅炉生产效率提高一倍多。

13 日林彪反党集团策划、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林彪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10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兰州军区、省革委会嘉峪关地区联合总指挥部与原嘉峪关市（县级）、三九公司合并，成立政企合一的嘉峪关市（地级）。

24 日，据报道，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山丹军马场，科学改良草原，提高了草原的载畜量，促进了军马发展。

30 日，兰州综合电机厂研制出大型电力提灌工程所需的 2000 瓩同步电动机。

10 月

10 日全省农业机械化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精神，讨论制定了全省农业机械化规划。

是月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陆续开学，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

22 日，甘谷毛纺厂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研究生产出羊毛脂。

同日，甘肃绒线厂研究成功用国产碱性染料染晴纶的工艺。

23 日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转发《生产指挥部关于 1971 年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中提出，公积金一般社、队提取可分配总收入的 3—5%，社员的收益分配，实行按劳动工分分配，对五保户实行供给，对生活有困难的军属、烈属和残废军人给以适当优待。要注意解决“超支户”的问题。粮食分配，储备粮一般可提取可分配粮食总量的 3—5%，不战不动，无荒不用。社员的口粮分配，一般采用基本口粮为主和按工分分配的办法；

(一)《六十条》规定的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相结合的分配办法，按人 7 劳 3 或人 8 劳 2 分配为宜；

(二)实行突出政治，人劳比例，以人分等的办法。按劳动工分分配部分要占 2—3 成。人的等级不要超过 3 级；

(三)在社员思想觉悟高、集体生产搞得好、口粮标准高的极少数生产队，大多数社员要求并经过评试和试算，可以实行政治挂帅、自报公议按实际需要进行分配的办法。粮食征购做到同一基本核算单位只购不销。《意见》中还对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和“赤脚医生”等人员的工分补贴问题作出了规定。

25 日 中共甘肃省委批复天祝县，同意实行农牧并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生产方针。

30 日，据报道，我省黄河流域地区重视水土保持，到目前为止，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11800 多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0%。

11 月

17 日，兰州农业机械厂研制出首批手扶拖拉机。

同日，兰州市白银区农机厂研制出大型水泵，经鉴定性能合格。

同日，灵台县农机修造厂制成扬程为 85 米的深井泵。

同日，长津电机厂试制成功重油化铁炉，其炼铁质量合格。

30 日甘肃省革委会发出《甘肃省财政包干试行方案》，规定从 1971 年起，省对各地、州、市试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超收归己（或分成），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财政收支包干办法。

是月甘肃省水电局兰州电器厂制成一台 11 万伏级 3.15 千伏安的大型电力变压器，用于景泰川一期电灌工程，填补了甘肃该项生产的空白。

《红小兵》杂志创刊，这是解放以来甘肃创办的第一份儿童期刊。后改名《甘肃儿童》、《小白杨》及《故事作文月刊》。

是月，甘肃省水电局兰州电器厂制成一台 11 万伏级 3.15 千伏安的电力变压器，用于景泰川一期电灌工程。口 12 月

是月，甘肃省第一台 6000 千瓦汽轮机在兰州电力修造厂制成。

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全国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

12 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抓好酒泉、敦煌、张掖、武威、民勤、永昌、临洮、靖远、会宁、康乐、临潭、成县、榆中、永登、皋兰、泾川、平凉、灵台、庆阳、镇原、宁县、正宁、天水、礼县、徽县等 25 个重点县，作为商品粮基地。

甘肃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靖远黄河大桥通车。

是年，兰化公司有机厂建成年产 500 吨防老剂 SP 生产装置。

是年，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制成 1000MPa 超高压试压泵。

是年，玉门油矿炼油厂建成处理能力为 12 万吨的催化裂化装置。

1972 年甘肃大事记

1 月

2 日，据报道，全省农村建成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医疗站、生产队有草药房的三级医疗卫生网。

6 日，灵台县在告王河上建成了一座 160 瓩的双机组水力发电站。

2 月

19 日，我省第一台 6000 瓩汽轮机在兰州电力修造厂制成。

3 月

3 日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在全省各公社设立科技站，配备 2~3 名农业科学技术干部，加强农业科学技术工作。

30 日，据报道，武威县引种成功黄连，三七、浙贝、元胡、木香、川芎、川牛膝等 16 种南方药材。

同日，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胆道蛔虫症，取得成效。

同日，解放军第 25 医院治疗眼科“不治之症”——视神经萎缩眼病，取得良好效果。

4 月

4 日，金塔县东方红农具社试制成功扬程 14.5 米的离心式水泵。

6 日，我国数学家华罗庚应省革委会的邀请来我省传授推广“优选法”。

27 日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转发生产指挥部《关于科学种田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全省、县、社、队三级建立起农业科学实验站(组)5.5 万多个，参加的社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15.3 万多人。”

《报告》提出：

(一)关于推广良种问题。去年全省粮食作物的良种面积近 3000 万亩。占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67%，是年要求扩大到 3500 万亩。小麦要大力普及已肯定了的 35 个良种。加速“三杂”的推广，在去年 90 万亩的基础上，今年发展到 250 万亩(其中：杂交玉米 90 万亩，杂交高粱 10 万亩，杂交马铃薯 150 万亩)，力争 1973 年发展到 700 万亩，1974 年达到 1000 万亩。在敦煌、靖远、徽县建立棉花良种基地，在华亭、清水建立大麻良种基地，在武威、天水、临夏建立甜菜良种基地，在岷县、宕昌建立当归良种基地。wengewang.org

(二)关于生产和推广“五四 0 六”菌肥问题。去年全省施用“五四 0 六”菌肥面积达 42 万亩。一般百斤“五四 0 六”菌肥相当于 15 斤化学肥料。今年计划全省施用面积达 1000 多万亩。要求每个农业县建立一个菌种厂。

(三)关于加强农业科技队伍问题。全省原有农技站 90 个，现在只有 52 个，现在全省地、县共有农业技术人员 1045 名，比 1965 年减少 40%。全省 1000 多个农业公社都应设立科技站，配备 2 至 5 名农业技术干部，一、二年内配齐。干部来源：动员一部分改了行的归队，从地、县农技人员中抽调一批加强基层，选拔一批有社会主义觉悟、劳动好、有事业心的知识青年，进行短期培训。农业技术力量薄弱的县(市)农技站、种子站，也要适当加强。撤销了的应该恢复起来。

5 月

16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从农村中选拔3000名脱产干部(行政干部1800人、公社农业科学技术干部1200人)充实基层干部队伍。1800名行政干部,多数应放在公社或基层单位。1200名农业科学技术干部,集中分配在省上确定的重点县的400个人民公社,每社配备3人。

6月

4日,兰州市何家庄蔬菜商店人工培育蘑菇成功。

16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施工的第一条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刘家峡水电站至陕西关中汤浴变电站)建成送电。

10日至18日,全省农林科技座谈会在庆阳西峰镇召开,传达全国农村科技座谈会议精神。研究建立健全全省农林科技网、大力培养贫下中农技术骨干和加强科技队伍思想作风建设等问题。

会议统计,全省杂交玉米、杂交高粱、杂交马铃薯面积已达200多万亩,县、社、队已办起菌肥厂2.1万多个,生产“五四〇六”等苗肥6亿多斤。

会议要求,从现在起,在一年半左右时间内,全省每个生产大队至少要培养5名左右农民技术员。

16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施工的第一条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送电,这条线路西起刘家峡水电站,经天水到达陕西关中汤浴变电站,全长534公里,输电能力42万千瓦。该线路于1968年开始勘察设计,1970年春正式施工。这条线路把水电比重大的甘肃电网和火电比重大的陕西电网连起来,成为陕、甘、青三省电力系统电网的骨干,发挥了水、火电并网调峰节能效益。

19日甘肃省革委会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

中共甘肃省委向全省转发《关于兰州市一轻局、一毛厂、二毛厂私分国家产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7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通报了这一事件。

26日甘肃省革委会、省军区在张掖召开“三化”(广播载波化、警报信号快速化、天线小型化)建设现场会议。

7月

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宋平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

陕西宜川至甘肃兰州公路修建工程开工。1981年7月21日宜兰公路甘肃段全部竣工,全长457.88公里。

26 日，省革委会(1970)82 号文通知，邢成武、贺进民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8 月

16 日，省委组字(1972)16 号批准成立省科委党的核心小组，张波任组长、邢成武、贺进民任副组长。。31 日，由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组织和筹备，在兰州召开第一次全国换热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科研、设计、制造、使用等 91 个单位的 180 多名代表。

2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并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人员。

25 日中共甘肃省委 25 日至 30 日在兰州召开全省民族工作座谈会。根据会议精神，甘南、临夏等地对平叛和反封建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有步骤地作了处理。对绝大多数因被骗上当或裹胁参叛而被错判、铝管、错戴、错划的劳动群众，一律宣布平反纠正；对错没收财物的，酌情退赔或救济。1983 年，根据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再次进行了复查。

是月，兰州炼油厂仪表厂试制成功三型气动单元组合仪表样机。

是月，天水红山试验机械厂改制成功轴向柱塞泵。

9 月

7 日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召开兰州大学、甘肃工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兰州医学院、兰州铁道学院等 6 所高等院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11 月 14 日，中共甘肃省委批发了这次座谈会的报告，要求各地认真做好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分批撤出驻校工宣队、军宣队；高校各系一级不再成立革委会。

7 日，据报道，中国农科院兰州中兽医研究所，近年来取得较大的科研成果 11 项，大多数已在生产中推广应用。

10 日，由国家建委、中国科学院、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联合主办的“工业三废综合利用展览”在兰州展出。16 日，据报道，我省地质科技工作者帮助会宁、定西、阿拉善右旗一些干旱地区找到人畜饮用水源。

10 日，燃化部决定，将兰化公司化机所设计、锦西化工机械厂试制的我国第一台乙烯冷冻透平压缩机安装在兰化石油化工厂进行物料试车，连续安全运转 267 小时。

10 月

10 日临夏市北源地区社员群众在崔家坡建成的落差 100 米、长 300 米的高缆车运输站正式通车。

11 月

2 日甘肃省革委会作出《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暂行规定》。

5 日，据报道，兰州钢厂近年来完成较大的技术革新项目 19 项。

28 日甘肃省革委会批转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请示报告》，要求力争在“四五”期间，使甘肃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城市下降到 10%。左右，农村下降到 15%。以下。

是月甘肃省博物馆与武威县文化馆合作，在武威城郊旱滩坡东汉墓中，发现医药简续 92 枚，内容包括临床医学、药理学、针灸学等，是迄今所发现的全国最早的一部较完整的医学著作。

12 月

5 日，据报道，兰州炼油厂近年来自动化研究所开展的 55 个科研项目，有 10 多项已实现了工业化生产。

12 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机构恢复工作。刘兰亭任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18 日中共甘肃省委对甘南州委《划定资本家成份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对可划可不划资本家成份的坚决不划；对划定为资本家成份的（不含反动资本家），在政治上坚决执行党的“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尚未划定资本家成份的城镇，暂不划定。

是月，省革委会决定，省农业科技工作队改为省农科院(县级)。

是年，白银磷肥厂普钙车间副产品氟硅酸钠车间建成投产，同年质量达一级品。

1973 年甘肃大事记

1 月

5 日，兰州军区在国营岷山机械厂召开新型自动步枪科研会议。

会上成立了以 977 厂为主、岷山机械厂和丰收机械厂参加的新型自动步枪联合研制组。

12 日，兰州长新电表厂试制成功体积小、重量轻、性能好的三相电度表。

3 月

2 日，中国农科院兰州中兽医研究所编写的《兽医手册》、《怎样养猪》、《马骡结症和胃扩张的防治》、《针灸治疗马骡四肢病》4 本科普书籍出版。

24 日，据报道，甘肃师范大学植物分类室对我省植物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发现了 80 多种可作猪饲料的野生植物，并编写出版了《野生植物猪饲料》一书。

4 月

27 日，据报道，我省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取得显著成绩。截止目前，共兴修水平梯田 308 万亩，条田 261 万亩，治河争地工 8 万亩，造林种草 429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23 万平方公里。

5 月

10 日，省革委(1973)35 文通知，任命吴坚、刘思华为省科技管理局领导小组副组长。

6 月

7 日，由省农业局主办的“甘肃省农业展览”在兰州开展，展出了一批种子，农药等方面的科研新成果。

同日，兰州鱼场首次人工繁殖红鲤鱼成功，现已出塘放养。

11 日，据报道，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承担的 40 多项科研项目，已有 15 项取得成果。

17 日，据报道，天水地区开展小麦品种普查选种工作，为提高小麦单产创造了条件。

26 日，北京医疗队深入我省张掖、酒泉地区农村，帮助开展医疗卫生工作。

27 日，据报道，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化工机械研究所取得了 3 项科研成果，完成了 17 项阶段试验任务。18 项设计和 10 项设备试制任务。

7 月

10 日甘肃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粮油统一管理的规定》，规定省以下各级部门在国家收购的粮油以外，不得自行收购；粮油收购，要认真贯彻按质论价的政策，不得提级提价和压级压价；不论在征购期间或征购任务完成后，都要严禁粮棉油进入市场。

15 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实行军事管制的公安机关（公、检、法），甘肃日报社、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国营 404 厂、504 厂、兰州铁路局等单位撤销军事管制。军管人员除担任地方党委和革委会主要职务的暂缓撤离外，其余调回原部队。

8 月

2 日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生产指挥部确定从国家干部、工人中选调 4000 名适合担任教师工作的人员，充实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

14 日至 10 月 25 日，兰化公司对国内自制的裂解气透平压缩机，丙烯制冷透平压缩机，乙烯制冷透平压缩机进行实物试车成功。

21 日，兰州电器厂制成大型变压器，经检验达到国家规定的性能标准。是月，化工部召集 70 多家油漆厂在兰州举行节代食用油会议。

9 月

4 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兰州结束。会议通过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9 年到 1980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初步规划》、《关于 1973 年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计划安排》、《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使用管理的暂行规定》。

21 日，青藏高原气象科研交流会在兰州召开，有 30 个科研单位的 100 多名科研人员参加学术交流。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到榆中、定西、会宁、靖远等地检查农业学大寨情况。

10 月

21 日，据报道，今年来。中国民用航空兰州管理局支农飞行 2800 多架次，为农作物、草原和森林的病虫害进行了大量的防治工作，防治效果达到 90% 以上。

26 日，据报道，陇西冶金设备制造厂一年多来，实现技术革新项目 315 项，其中较重大的有 59 项。

27 日，全国石油、化工分离及传质技术交流会在兰州召开，兰化公司设计院向会议作了《萃取蒸馏和恒沸蒸馏的计算》、《复杂塔的逐板计算》、《深冷法分离烯烃的几个流程分析》3 个专题的汇报。

是月，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所气相色谱法预测变压器潜伏故障的研究成果向刘家峡水电站等全国电力系统推广应用。1978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1 月

1 日，西部 6 个省(区)治抄造林技术协作会议在民勤县召开。

30 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庆阳地区及合水县文化馆共同组成的发掘队，在合水县板桥公社境内的马莲河畔发掘出一具剑齿象化石，身高约 4 米，门齿长 3.03 米，门齿直径 32 厘米，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完整、个体最大的剑齿象之一。

是月，玉门炼油厂将电力化学脱盐改建为可控硅控制管道电脱盐。

是年

甘肃省自然灾害严重，全省受灾面积达 2630 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63.60%，其中旱灾 1650 万亩，洪灾 126 万亩，雹灾 391 万亩，冻灾 192 万亩，虫灾 59 万亩，其它 212 万亩。减产三至五成的 558 万亩。六至七成的 803 万亩，八成以上的 599 万亩，绝收的 323 万亩，共减产 5 亿公斤。

甘肃省地质局自 1971 年初开始，经历 3 年，编制完成 1:500000 甘肃省地质图和矿产图。共编入各类矿产地 1659 处，其中矿床一级产地 277 处。是为本省首次系统、正规的地质、矿产图件。

在临洮县发现“三粒小麦”。1980 年至 1983 年甘肃农业大学系统选育，加代提纯，育成性状稳定的“三粒小麦”。鉴定认为“三粒小麦”属六倍体，三粒性状为显性，可以遗传，受一对基因控制，其分离符合孟德尔定律。

1974 年甘肃大事记

1 月

7 日，盐锅峡化工厂自制成功硅整流有载调压变压器，使产量提高 30 %。wengewang.org

11 日，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兰州供电局联合试验成功能检测变压器内部故障的新方法——气相色谱法。

同日，兰州综合电机厂试制成功 1600 瓩拖动水泵用电动机，经检验，性能良好，质量合格。

13 日，省委组字(1974)1 号文决定，吴坚为省科技管理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同日，省委组字(1974)1 号文决定，吴坚为省科技管理局局长，贺进民、刘思华邢纯洁为副局长。

14 日甘肃省革委会第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在兰州举行，26 日结束。会议着重讨论研究了甘肃省农业三年（1973 年～1975 年）大改变的问题，通过了全省（（19 年～1975 农业发展要点（草案））、《甘肃省两三年改变农业面貌奋斗指标（草案）》。

18 日中共中央转发江青以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名义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此后，甘肃和全国一样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运动中，“评法批儒”。

23 日，兰州无线电厂试制成功可控硅自动掉制高压硅整流器。

2 月

2 日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军区召开深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8 万多人参加。

是月，《真空技术》编辑室编辑的《英汉真空技术辞典》出版。

5 月

2 日省文教局长座谈会宣布兰州二中一学生自杀等 23 起事件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严重事件”。在此之前，全省教育系统按照上级部署，大抓“马振扶事件”（即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所谓“走回头路”的问题），批“代表人物”。

26 日 1974 年甘肃省田径运动会在兰州举行。这次比赛第一次设立了儿童项目，有 83 名 12 岁以下的小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是月，兰州炼油厂研制的我国第一代分子筛裂化催化剂——13—X 型分子筛催化剂，在玉门炼油厂试运成功。

6 月

18 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向中央统战部汇报有关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和要求的材料上作了批示。指出：“根本问题在于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是没有出路的。”

26 日中共甘肃省委举办第一期工农理论学习班。学员是从全省工矿企业和农村挑选出来的理论骨干。

是月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兰州医学院、甘肃农业大学首届“工农兵学员”1800 多人毕业。

7 月

12 日，据报道，今年来天水长城控制电器厂研制出专用设备 13 台，实现技术革新 50 多项，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25 日，兰州沙井驿砖瓦厂建成用大型双筒隧道窑焙烧的机械化制砖生产线。

30 日，据报道。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和玉门铁路分局工务段的工人一起在戈壁滩成功地试验和培植了防护林带，基本控制了风沙对铁路的危害。

是月，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和燃料化学工业部，开始联合设计单系列常减压装置为 500 万吨 / 年的炼油厂单元装置设备。

8 月

16 日为加强河西商品粮基地的建设，尽快改变中部干旱地区农业落后面貌，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成立“河西地区农业工作小组和”中部地区农业工作小组”。河西小组由李培福任组长，中部小组由窦述任组长。

19 日，天水红山试验机械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 50 吨低频高温拉压自控试验机。

24 日，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试制成功可识别冰雹云并预报冰雹的仪器——防雷用晶体管闪电计数器。

8 月甘肃省辐射育种协作组组成。全省开展农作物辐射育种工作的有 24 个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48 个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农作物良种繁殖场，110 多个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科研组。

是月，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奥克托金中型试验生产线基本建成投料试制成功。

9 月

5 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宋平代表省委向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人汇报甘肃农业问题时，提出了甘肃农业发展的基本方针，即以建设河西走廊商品粮基地为重点，来加快甘肃农业的步伐，同时改变中部干旱地区的面貌，并注意东部地区的发展。

10 日，由 510 所发起“全国真空技术经验交流会”在兰州召开。

24 日黄河上第一个发电的大型水电站——盐锅峡水电站发电

25 日，国营 279 厂全线联动试车，经 157 小时带料运转，拿出了第一批合格的三碳酸铀铯铵产品。这是我国第一个碱法水冶厂一次试车圆满成功。

14 日全省高等院校政治工作会议结束。会议提出“要发挥工农兵上、管、改的作用”，“要充分估计高等院校封资修的流毒年深日久的严重性”。

是月，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开始研究梯恩梯自动包装技术获得成功。

10 月

5 日，据报道，我省县以下农村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1690 个，病床 11900 多张，医务人员 18500 余人。

是月，双金属催化重整新工艺首次在兰州炼油厂工业化试验成功。

12 月

7 日，据报道，武威铁路局自制 120 多台养路机械，使维修线路的扒渣、捣固、回填、夯拍 4 道主要工序实现机械化。

24 日 新华社报道，甘肃省今年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增长 30%，是历史最高水平。全省粮食平均亩产上《纲要》的县，由去年的 13 个增加到 20 个。去年

就上了《纲要》的酒泉地区，今年又跨过“黄河”。去年受灾减产的庆阳、平凉、定西、天水地区，今年也夺得了丰收。

27 日 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分析了农业战线形势，总结了 1974 年农村工作，讨论了 1975 年农村工作的任务。洗恒汉在会上讲话，要求明年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力争粮食总产达到 120 亿斤”。

30 日兰州至西安长途地下电缆设备正式开通使用。全长 762 公里，是 1969 年由军队和邮电部门共同设计和施工的全国第一条长途对称电缆。

30 日，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开始黑索今连续真空过滤机的研制工作，于 1981 年 9 月研制成功，投入试生产，由兵器工业部组织鉴定。

是 年

是年，玉门炼油厂用 8 个月时间，将催化裂化装置改造成我国第一套年处理能力为 18 万吨提升管催化裂化装置，具有 70 年代世界先进水平。

是年，燃料化学工业在自动化研究所召开会次仪表鉴定会，FGL—2 型 y 射线料位计、WS—工型气体微量水份仪，气相工业色谱仪、实验室色谱仪 4 种仪表通过鉴定。

是年，我省第一项扬程最高、流量最大的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第一期工程竣工。它把 10 秒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 12 级泵站，提到 472 米的高处，灌溉景泰川的 30 万亩荒滩旱地。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农业办公室、省农林局调查报告：张掖地区黑河沿岸板桥、鸭暖、蓼泉、六坝、平川 5 个公社建立的十万亩耕作制度改革样板田，社社增产，亩亩增产，平均每亩净增粮食百斤以上，其中有两个大队，31 个生产队，亩产超千斤。

始建于 1969 年 10 月的景泰川电力提灌一期工程竣工。这是甘肃省第一项把 10 秒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 12 级泵站，提到 460 米的高处，灌溉 30 万亩荒滩旱地的电力灌溉工程。

继 1973 年中共甘肃省委恢复统战部以后，本年各地（州、市）统战部先后恢复。原来遣送外地的省管统战对象陆续调回兰州，并举办学习班，为恢复政协甘肃省委员会进行准备工作。

甘肃省博物馆在兰州市西北王保城发掘了马家窑类型与马厂类型墓葬，其中马家窑类型墓葬为兰州首次发现。

1975 年甘肃大事记

1 月

1 日，据报道，甘肃油漆厂涂料工业研究所在全国各地建立 60 多个科研基点，使科研、生产和销售紧密结合起来。2 日，甘肃钢铁公司机修厂试制成功 BBC120F 凿岩机，经试验鉴定接近同类设备先进水平。

8 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免除他担任的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中共甘肃省委在兰州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学习湖南株州实行厂县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的经验，制定了 1975—1980 年的六年规划。

13 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作出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新宪法，决定再不设国家主席。会议选举朱德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会后，周恩来因病住院，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国务院和军委日常工作。

16 日，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成功的 sP 高温防潮绝缘漆，由兰州化物所、长风机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联合召开科研、试生产和应用工作交流会。1976 年一机部列为定型产品，1978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是月王世泰、李芳远、茅林、秦彦章、禹贵民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8 日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在景泰召开腐植酸类肥料现场会议，要求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土法上马，做出规划，抓好典型，总结经验，及时推广，使这一新生事物在全省范围内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

会议统计，全省农村社队投入这类肥料生产的劳动力达 13.5 万人，办起矿点 168 处，已开采原料(风化煤和泥炭)19.52 万吨，生产腐植酸肥料 2.3 万吨。据景泰县、临泽县试验，复种糜子施腐植酸铵的比不施的亩增产 30% 以上。

是月 彭梦臣、王桂南任甘肃农业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2 月

1 日 全省掀起以大搞积肥造肥为中心的备耕工作高潮, 投入劳动力达 260 万人, 占农村劳力总数的 50%, 积、造的各种肥料比去年同期增长 32.6。

2 日, 据报道, 兰州炼油厂发扬自力更生精神, 坚持技术革新 10 年来完成技术革新 300 多项, 产量增长 5 倍。

5 日, 我国目前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这是一座以发电为主, 兼有防洪、灌溉、养殖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7 日, 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施工的第一条超高压输电线——刘天关输电线建成, 其电压为 33 万伏, 输电能力为 42 万千瓦。wengewang.org

21 日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发省科技局《关于 1974 年开展科技情况的报告》。(按语) 要求科技战线要把自己的工作切实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把农业科学研究和实验活动在全省普遍开展起来。科技工作要做到贫下中农、干部、科技人员三结合, 研究、生产、使用三结合。全省农村现有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科研队伍 25 万多人。

《报告》说: 张掖地区农科所选育的冬小麦良种张冬 17 号, 19 号, 经大田示范, 亩产均在千斤以上。庆阳地区农科所选育的玉米良种庆单工号, 经大田试验, 平均亩产 1800 斤。临泽县平川公社黄二大队推广带状种植 450 亩, 平均亩产 1048 斤。其中六行小麦两行玉米的带田平均亩产达 1636 斤。张掖地区农科所种的 30 亩小带田, 平均亩产 1288 斤, 其中有两亩平均 1813 斤。

全省农业科技工作会议在张掖召开, 传达全国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经验交流会精神, 16 个单位介绍了科学种田经验, 落实改革耕作制度任务, 要求农业县争取在二、三年内基本建成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科网体系。

25 日 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委员会会议决定: 为实现我省农业大变, 抽调省直机关干部组成农村工作队到基层工作。每期一年, 逐年轮换。还决定将全省分为河西、中部、陇东。陇南四个片, 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各有关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分工负责抓好片上工作。

25 日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会议决定, 抽调省直机关干部组成农村工作队到基层工作。每期一年, 逐年轮换, 形成制度。会议还决定将全省分为河西、中

部、陇东、陇南四个片，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各有关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分工负责抓好片上的工作。

3 月

2 日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转发商业部、农林部《关于广泛种植向日葵、蓖麻的通知》，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充分利用盐碱、风沙、干旱地和闲散土地种植，增加油料，增加集体收入。

3 日 白庆祥任甘肃省农林局副局长。

18 日 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成立平凉、天水、定西三所农学院。本年开
始招生。1978 年 1 月 5 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撤销三所农学院改办中等专业学校。平凉农学院改为平凉林校，天水农学院改为清水农校，定西农学院改为定西农业机械化学校。

18 日，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兰化公司设计院共同研制成功年产 15 万吨合成氨装置中的双层热套氟合成塔，设计压力 32 兆帕，设计温度 200C，规格为 $\phi 1600 \times 145 \times 19, 530$ 毫米。3 月 18-23 日，由甘肃省机械局主持通过鉴定。

20 日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制定年度、五年和十年农业规划。

26 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批转省轻工业局媒关于酿酒工业利用酒糟生产 5406 菌种支援农业现场会议的情况报告》。《报告》提出 1975 年生产菌种 500 吨到 550 吨，1976 年达到 1000 吨。要求在抓菌种生产的同时，积极向农民传授堆制苗肥的技术，使这一新生事物在我省迅速推开，为农业大上快变做出贡献。

是月，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8321”混合炸药热风干燥新工艺试验成功异用于生产，继而在钝化泰安、钝化黑索今干燥工序中推广使用，并通过鉴定。

5 月

5 日《甘肃日报》报道，自学习推广株州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的经验以来，甘肃已有 3 万名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

7 日，兰州炼油厂自行设计、研制成功新型喷雾蜡脱油工艺装置，为我国石蜡生产闯出了新路。

14 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解决甘肃省武都和定西地区群众生活困难问题的报告》。《报告》要求农林部、商业部会同甘肃省委检查武都和定西地区上年度粮食征购和销售情况，认真执行粮食征购政策，使社员留够口粮；对灾区缺粮的群众，要发放救济粮、钱，以安定生活。

14 日甘肃农业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兰州医学院；兰州大学等高等院校 1975 年毕业的刘双兰等 24 名毕业生报名下乡当农民，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予以鼓励。

15 日，庆阳地区马头坡水泥制品厂试制成功 10 米圃型水泥电杆。

15 日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发省科技局《兰州市使用塑料棚生产蔬菜成效显著》的材料说：实践证明用塑料棚生产蔬菜是消除气候影响，克服早春蔬菜淡季，新鲜蔬菜提早上市，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保证市场供应的有效途径。兰州市今年塑料棚内播种蔬菜 1052 亩，西瓜、白兰瓜 4,54 亩，共计 1506 亩，比上年增加 13 倍。

23 日 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洗恒汉在中共甘肃省委理论学习班结束时的讲话中提出，“不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去办农业，农业就办不好，就上不去”。

是月，西北油漆厂用电感加热方式生产醇酸树脂装置投入使用，在国内处于技术领先地位。

6 月

4 日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发省革命委员会中部地区农业工作小组《中部地区直 8 个县的农业情况汇报》、《按语》说，只要抓住农业生产的主攻方向，以土为主，大搞梯田、条田，大抓深耕（一尺以上），再把肥料、良种赶上去，干旱地区稳产高产也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14 日 甘肃农业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兰州医学院、兰州大学等院校 1975 年应届毕业生刘双兰等 24 人报名下乡当农民。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予以鼓励。

17 日，清水县砖瓦厂试制成功陶瓷和沙器两项新产品。

7 月

1 日 全省科学种田经验交流会，在景泰开始，12 日在酒泉结束。与会 180 人，参观了建立四级农科网、落实实验基地、各种带状种植、“吨田”试验等 24 个科学种田典型，研究提出了因地制宜推广带状种植、一季高产、马铃薯种植和冬麦、高粱、玉米移栽，尽量做到一季交两季以及加快土地平整、良种选育、肥料建设、渠系配套的任务。

14 日，据报道，临夏回族自治州建起公社农科站 74 个、大队农科队 692 个，参加科学种田的农民技术骨干达 3.5 万多人。

15 日，据报道，我省工交战线今年前 6 个月实现技术革新项目 4230 多项，其中重大革新 792 项。

28 日，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研制成功管式反渗透苦咸水淡化装置。

26 日，驻甘第八冶金建设公司和长沙矿山研究院共同研制成功 0.35、0.4 立方米靠壁式液压抓岩机。

同日，全省气象长期预报讨论会议在成县召开。

是月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编写的《农药与药械使用手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8 月

25 日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发定西县青岚公社大坪生产队、皋兰县武川公社火烧沟生产队、通渭县常河公社杏树湾生产队、会宁县四方公社葡湾生产队、临洮县改河公社上于家生产队、永登县清水公社孙家井大队、永靖县平沟公社、华池县桥川公社 8 个农业学大寨典型材料。按语说，大坪是中部地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大坪的道路就是中部地区农业发展的道路。要象大坪那样，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各种右倾保守思想，从现在开始就大干大闹，迅速掀起学大寨，赶大坪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并把冬闲变成冬忙，下定决心，很快把中部地区的农业搞上去。

9 月

2 日《人民日报》公布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意见，并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指出评《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随后，甘肃同全国一样，兴起了评《水浒》的斗争，批投降派”。

7 日兰州--拉萨航空线正式通航。这是由内地通往西藏的第二条航线, 全程 1636 公里。

15 日《甘肃日报》报道, 全省所有县(市、旗、区)都建起了广播站, 70%以上的公社建立了广播放大站, 90%以上的大队、生产队通上了小广播, 农村广播喇叭入户率达 72%

28 日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结束。甘肃省 214 人参加 12 个项目的比赛、获 10 公里公路自行车女子团体总分第一名; 公路自行车 70 公里团体赛第一名, 有 41 人次打破了 39 项省记录。

10 月

6 日甘肃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

12 日, 甘肃省第二建筑工程局研制成大型塔式吊车。

16 日, 甘肃八盘峡水电站基本建成。这是我国在黄河流域自行设计, 建造的又一座河床式电站, 坝高 33 米, 库容 4900 多万立方米。

11 月

5 日中共甘肃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结束。会议决定动员全省人民为“在 5 年内把全省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和在“1980 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

是月《甘肃省地图集》出版。

国营天水峨山机械厂部分建成投产, 成为甘肃生产军用枪支的大型企业。此前, 生产四 0 火箭弹的跃进、胜利、前进机械厂, 分别在平凉、华亭建成投产。

1 日, 甘肃第一冶炼厂试制成功高效化肥硝酸稀土。

同日, 兰州机床修配厂试制成喷吸钻, 工效比普通麻花钻提高 10 多倍。

wengewang.org

29 日, 兰化公司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套裂解气透平压缩机, 乙稀透平压缩机和丙稀透平压缩机。

30 日, 兰化公司有机化工厂开发新产品抗氧剂 702、甲叉 4426 - S, 络合剂 EDTA 四钠。

是月, 兰州炼油厂催化重整装置实现催化剂氯化再生新工艺。

是年

马岭油田投入开发。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在完成 54 口井的钻、试采和裂压的基础上，集中 2000 人的施工队伍，进行了地面八大系统工程的建设。年底，共建成产能 101.3 万吨，使陇东油区初具规模。

是年，甘谷油墨厂工程师葛长茂负责研制成功的酞箐蓝 BGS，打入美国市场，在《美国油墨制造家》1976 年 11 月号月刊上报道。

1976 年甘肃大事记

1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

5 日兰州铁路局张恒云等组织 200 多人将中央帮助兰州铁路局工作的工作组长黎光围斗后，拉到铁路局招待所软禁。

8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 78 岁，甘肃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8 日，据报道，西和县长道公社试验种植烤烟获得丰收，平均亩产达 330 斤以上。

17 日，甘肃国防工办批准，在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建成研制炸药科研所属工艺试验厂。

21 日，兰州中心血站试制出首批冻干人血浆，开始供应医院使用。

21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的提议，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兰州中心血站试制出首批冻干人血浆，开始供应医院使用。

25 日甘肃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千比回原籍（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探亲途中，在 53 次列车上自杀身亡，终年 32 岁。

2 月

9 日洗恒汉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说黎光“在整顿兰州铁路局期间，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借批派性为名，实际上批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了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表现好的

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15日凌晨一时，王洪文等人在北京接见了河南、甘肃省委、郑州、兰州铁路局党委和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肯定了洗恒汉的意见。

15日中共甘肃省委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说，全省3.9952万所各类学校，正在掀起“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热潮。“右倾翻案风，不仅在教育界、科学界，而且在其他战线都已造成严重的影响；“铁道部以万里为首的党的核心小组在兰州铁路局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推行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此后，《甘肃日报》连续数月，发表刊载了大量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文章。 wengewang.org

3月

3日，据《甘肃日报》报道，张掖地区建筑公司科技人员与工人相结合，两年多先后研制出各种施工机械93台(件)，从而提了工效和施工质量。

4日，据报道，兰州市安宁区已建起区、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业科学试验推广站98个，在耕作制度改革，推广间作套种、培育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5日，据报道，正宁县已有76个大队建立起了农科站，在大力推广良种化的进程中促进了粮食增产。

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社论指邓小平是“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从此开始在内部点名批判邓小平。

17日，据《甘肃日报》报道，张掖地区农业科技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坚持与群众结合，几年内完成104项科研项目，培育出各种优良品种50余个，促进了增产增收。

18日，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试制成功新型深井钻机130—3型钻机。

21日，甘肃农业大学的286名农学、草原、林果系毕业生分赴生产第一线，有26名自愿报名去当农民，进行科学种田。

同日，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在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和抚顺石油三厂的配合下，研制成功大型套箍式加氢精制反应器，内径2.1米，工作压力21兆帕，重220吨，处理量40万吨/年，由甘肃省机械局主持通过鉴定。

22 日，一机部复函兰石所，国家计委同意兰石所在“五五”期间被列为大中型项目进行扩建。同意扩建钻采设备实验室和炼油乙烯设备实验室等。工程投资 500 万元。

26 日文县碧口水电站主体工程完工，第一台 10 万千瓦机组投产发电。翌年 6 月第三台机组安装完毕，总容量为 30 万千瓦。该电站主要给川北和陕南送电。

是月国务院文化部遵从江青指示，派人来到兰州铁路局，在省上配合下，创作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同走资派作斗争”的话剧《战长年》和电影剧本《主要战场》。

是月，由五机部在湘潭召开的专题科研论证会上，甘肃国营岷山机械厂的厉树忠创造性地将金相硫印和磷印方法运用于枪管内壁，揭开了直纹之谜，此项成果被评为“创造性试验方式对课题的重大贡献”和“最佳成果”。

4 月

1 日，兰州炼油厂机械厂制造成功 vL30001 型烟气轮机，于 1982 年 3 月获石油化学工业部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

5 日，在邓小平、胡耀邦等操纵下，以高干子弟为暴动核心的北京“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发生。兰州地区许多群众则前往华林山革命公墓等地敬献花圈、花篮，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

21 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改组兰州铁路局党委。改组以后的局党委大力推行文革路线。

5 月

16 日在兰州市七里河体育场举行“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庆祝大会。

6 月

5 日，兰州通用机器厂设计制造的我国第一台 1600 大气压压裂车诞生，经过试验，各项主要参数均达到或超过设计要求。

11 日，据报道，平凉地区农科所近几年来，科技人员下乡蹲点，建立科研基点 11 个，示范联系点 47 个，在开展科学实验中，培养出 9 个小麦优良品种，“平凉 21 号”亩产量达 700 斤。

18 日，兰州炼油厂研制成功稀释冷冻脱腊炼油新装置。

23 日，玉门油矿白杨河油田管理自动化装置建成投产。

同日，全省农业机械化技术经验交流会在平凉召开。

24 日，据报道，渭源县农民育种家年得成，又培育出“渭薯工号”“渭薯 2 号”两个洋芋新品种，亩产达到 6500 斤。

25 日 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把学习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会后组织与会人员到定西县大坪生产队进行了参观学习。

是月，由省农科院主持的全省杂交高粱育种研讨会在镇原县召开。

是月，兰州助剂厂 300 吨 / 年蒽醌法过氧化装置投产。1977 年 10 月在青海黎明化工研究院指导下，用重芳烃代替苯成功，在全国推广。1983 年 4 月扩建成 1000 吨 / 年装置，采用黎明空气氧化工艺，均属国内首创。1983 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wengewang.org

7 月

1 日 北京—西安—兰州微波通信干线工程竣工，开办微波电话、电报、电视和报纸传真业务。

兰州红古建设坪至金昌市宁远堡的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送电。线路全长 254 公里、构成了连城及永昌地区电网。

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 90 岁。全省人民处于巨大悲痛之中。

8 日，天水地区邮电局试制成功 30 门准电子交换机。。同月，据报道，会宁县鸡儿嘴大队因地制宜办沼气获得成功，为解决农村能源开创了新路。

21 日全省“七·二一”工人大学座谈会披露：截至 6 月底，全省“七·二一”工人大学已经发 460 余所，在校学员达 2. 27 万人，已毕业 1. 3 万多人。

8 月

15 日，据报道，我省开展小麦花粉单倍体育种研究获得成功，培育出“甘花 1 号’优良品种。

16 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河西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议。研究解决知识青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6日和22日，甘川交界的松潘、平武发生两次7.2级地震。兰州地震大队文县强震台记录到主震强震记录。这是我国强震记录中震级最大震中距最近的强震记录。

9月

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全省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从农村到城市，群众举行各种隆重的悼念活动。18日下午3时，兰州市东方红广场隆重举行30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28日至10月6日，甘肃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号召全省人民掀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伟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20日至29日，全省科学种田经验交流会在敦煌县召开。

29日，省委作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的决定》，指出成立甘肃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省级各有关部门，大专院校和大中型厂矿企业都要成立相称的科学研究机构和科技管理机构，农村建本健全四级农科网，恢复甘肃省科协和各种专业学会。

10月

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发动政变，逮捕革命派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18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事件通知全党各级组织。

11月

9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兰州地区揭批江青集团万人大会。会议特意安排兰州铁路局的赵滔、张恒云发言，大会名为揭批“四人帮”，实际上是捂盖子。

12月

2日兰州市“引大入秦”工程开工。该工程是把大通河的水引到永登秦王川的大型跨流域自流引水灌溉工程，预计完工后可灌溉农田100万亩。

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

15 日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5 亩面积的大型玻璃温室动工，1978 年 7 月建成，投资 45 万元。

1976 年全省总耕地面积 5350. 25 万亩，其中：有效灌溉面积 1235. 36 万亩，保证灌溉面积 929. 49 万亩，条田 855. 48 万亩，梯田 667. 96 万亩，砂田 125. 32 万亩。

全省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 5304. 38 万亩，其中：粮食作物 4448. 2 万亩，平均亩产 216 斤，总产量 960991. 15 万斤，经济作物 381. 49 万亩。其中，棉花 22. 71 万亩，总产量 678. 44 万斤，油料 263. 06 万亩，总产量 16799. 37 万斤。

全省农业总产值中的纯农业产值，按 1970 年不变价格计算为 154315 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71. 55%。

[中国文革研究网编辑。资料来源：《甘肃省农业大事记 1949-1987》（甘肃省农业厅农业志编辑办公室，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甘肃科技志：大事记》（甘肃科技出版社 1989 年版）；甘肃经济信息网等。]

《甘肃省历任主要领导名录》

省委书记

张德生(49.07-54.06)

张仲良(54.06-61.01)(一)

汪 锋(61.01-66.11)(一)

胡继宗(66.11-67.01)(代一)

洗恒汉(70.05-71.02)(革委核心小组长)

洗恒汉(71.02-77.06)(一)

宋 平(77.06-81.01)(一)

冯纪新(81.01-82.03)(代一)

冯纪新(82.03-83.03)(一)

李子奇(83.03-90.11)

顾金池(90.11-93.10)

阎海旺(93.10-98.04)

孙 英(98.04-01.01)
宋照肃(01.01-03.08)
苏 荣(03.08-06.07)
陆 浩(06.07-
省 长
王世泰(49.07-50.01)(省府主席)
邓宝珊(50.01-54.12)(省府主席)
邓宝珊(54.12-67.05)
冼恒汉(67.05-68.01)(军管会主任)
冼恒汉(68.01-77.01)(革委主任)
宋 平(77.01-79.12)(革委主任)
冯纪新(79.12-81.01)
李登瀛(81.01-83.04)
陈光毅(83.04-86.05)
贾志杰(86.05-93.01)
阎海旺(93.01-93.09)
张吾乐(93.09-94.04)(代)
张吾乐(94.04-96.07)
孙 英(96.07-97.01)(代)
孙 英(97.01-98.04)
宋照肃(98.04-99.01)(代)
宋照肃(99.01-01.01)
陆 浩(01.01-01.01)(代)
陆 浩(01.01-06.10.30)
徐守盛(06.10.30)(代)
人大主任
王世泰(1979.12~1983.4)
李登瀛(1983.5~1986.5)
刘 冰(1986.5~1988.1)

许飞青（1988.1~1993.1）
卢克俭（1993.1~1998.1）
卢克俭（1998.1~ ）
宋照肃（2003.1~2003.8）
苏荣（2004.1~2006.07.29）
政协主席
邓宝珊（1950.10-1954.12）
张仲良（1955.2-1961.8）
王世泰（1961.8-1964.9）
高健君（1964.9-文革）
王世泰（1977.12-1979.12）
杨植霖（1979.12-1983.4）
黄罗斌（1983.4-1984.3）
王秉祥（1984.4-1988.1）
葛士英（1988.1-1993.1）
申效曾（1993.1-1998.1）
杨振杰（1998.1-2003.1）
仲兆隆（2003.1-

《风雨八十载——洗恒汉自述》（节选）

、
洗恒汉（1911—1992） 广西田阳县人。壮族。一九二九参加中国
工
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
二
〇师教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一军副政治委员，七军政治委
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西北
军

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文革”中，主政甘肃，一九七七年被免职，隔离审查，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九二年在兰州病逝。

十年文革（第一次整理稿）

第一章 官罢西山

◇ 这总是一段历史吧

从 1936 年长征到达陕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西北工作，从没有离开过这片贫瘠、荒凉而又质朴、纯真的土地。对自己亲手参加解放的这块土地，我心里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有一种扯不开的眷恋。解放以后虽然也有几次调动工作的机会，但我还是选择了留在兰州军区工作。当然，这一方面是服从组织上最后的权衡考虑，另一方面彭总在解放大西北的征途中对我们发出的肺腑之言无时不在我的耳边回响。

那还是兰州战役刚刚结束，枪炮声都还没有停息，彭总浑身征尘，布满血丝的疲惫的双眼放射出兴奋的光彩。他说：

“我们就要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北了。西北有多大的一块地方啊，但人烟稀少，荒凉贫困……，同志们，大姑娘连遮羞布也没有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解放大

西北，建设大西北，这是我们所有在座同志义不容辞的任务！”

这些话跟了我一辈子。尤其是 5 8 年我响应军委号召下连队当兵体验生活时
驻
地群众生活的艰辛、6 2 年浮夸风甘肃死了那么多人，6 6 年上半年我在天水农村
村
搞社教时当地老百姓的贫困，这些事实总叫我觉得我们作为党和军队的干部愧对
解
放这么多年的西北人民。所以几十年来我总想着为西北做些什么事，这实实在在
是
我在西北工作的由衷。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十年“支左”，我想我的后半生也许是
顺
理成章地盖棺定论了。但是“文革”使我们这些奉命“支左”并被历史推向“文
革
”大混乱中第一批站出来主持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有争议的人。十几
年
来，尽管我为顾全大局保持沉默，尽管我为了协助组织上搞清问题而尽了自己最
大
的努力写材料，向上级申诉反映情况，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经过多次考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作为一个
受
党培养教育考验六十多年的老党员、老红军战士，为了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任
何
委屈我个人都可以承受。但是，当我看到听到由于我的问题而使得在兰州军区和
甘
肃省工作了多年的一批老西北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受到株连，至今还抬不起
头，
不被信任，蒙受冤屈，甚至仍然背着所谓“洗家帮”等政治包袱，我实在于心不
安

，总觉得这是个事情，而且又是因为我的问题造成的，所以更觉得有必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请求中央能对我的问题重新审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处理，以使其他同志的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

我已经是将近八十岁的人了，有着很严重的心脏病，风烛残年，日薄西山了。我从六十多岁等到现在，不可能再等一个十几年了。考虑再三，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应该写出来，一吐为快。当然，我只是讲事实，况且这是我的私人回忆录，并不打算公开发表。这是一段历史，等我们这些人都去见马克思了，也就无从考证了。写在纸上，记录下来，或许将来有一天，在不影响党和国家大局的前提下，如果有人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话，那么可以供他们去判断、去分析，总是个依据吧。至于孰是孰非，还是让历史去裁决吧！

◇ 乌纱帽扔在了西山

1977年6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去“谈一谈”，我认为又是去接受什么任务，回来传达照办就是了，因此毫无思想准备。

后来知道，这实际上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解决省级领导班子问题的序幕，甘肃和安徽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两个省。

6月7日、8日和9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我的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加上我、韩先楚、肖华与宋平。

6月7日的会议一开始，就宣布我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

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

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

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摘自1977年6月

16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

6月9日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一是听取我的检查，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发

言讲话。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都讲了话，根据我的记录，大致要点为：

（华国锋：）刚才，听了洗恒汉同志的自我批评。一个同志有错误，愿作自我批评

就好。但洗恒汉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还很不够，看来需要一个过程，来加深认识。

中央发现甘肃问题，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暴露得突出的是在铁路问题上

。那时，铁路运输瘫痪，一了解，发现省委在处理兰州铁路局问题上有问题。过去

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又有错误作法。省委派去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同

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调走以后又调回来的同志，洗恒汉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顾柏年回到铁路局，实际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个讲话的精神办事。

说

铁道部黎光同志刮右倾翻案风，换了几百人，可是又一翻，调换下去的人更多。

但

洗恒汉同志说，前一个是路线错误，后一个是那“三点”（即转弯的面大了一点，

时间长了一点，调换的人多了一点）（我注：铁路问题省委是按华国锋、纪登奎的指示办的。）后来中央派去了帮助工作领导小组，一深入了解，实际不是那么回事。新华社记者也说，那里照“四人帮”那一套搞得很厉害，连赵滔都想搞掉。赵滔说他办的那些事情都是来自省委，是有根有据的。（我注：赵滔是工作组搞掉的。工作组向我汇报，说赵滔不免职，群众发动不起来，我说你们看吧。）黎光同志来汇报铁路问题，铁路局的问题都联到省委。当时我说，先解决铁路问题，要同省委的问题分开解决。（我注：铁路局的问题我后面有详述。）

……我对洗恒汉同志有个基本认识，有错误，但还不能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总想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后来感到洗恒汉同志认识得很慢，改得很慢。（我注：中央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

……我看洗恒汉同志的检讨，说这场运动“来势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没有准备。……因此肖华同志发言批评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我注：是从华国锋同志你的渠道来的。是你自己制造的，而加罪于人。我入党六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你在前天发言中说，你同王、张、江、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没给“四人帮”写过任何信，没送过任何东西，没有请他们客，就连看望、照相等也没有搞过。……那么，庄则栋是“四人帮”安排他（到甘肃）串联的……，王洪文同你谈话、喝酒……，这难道不是来往，不是接触吗？（我注：这些我以后面都要详述。）

……你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你只靠一派，怎么行？（我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乱，中央在甘肃的重点工程怎么能完成的呢？如：刘家峡、八盘峡、碧水电站、景泰川灌区等。）

……政治局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政治局的意见是：鉴于上述这种情况，洗恒汉同志在甘肃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说：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油了。运动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下边犯错误的同志要离职审查，你还在那里，也不服气。中央政治局反复考虑，按毛主席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的指示精神，洗恒汉同志还是调动一下好，但洗不是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这也不合乎事实。想按正常调动办理，这样对洗恒汉同志有利，对于甘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有利。洗恒汉同志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

当然，对洗恒汉同志要一分为二。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给党作了很多工作，红七军的老同志，后到中央苏区，留到湘赣，到了二、六军团，参加了长征。这次有错误，希望改了就好。我们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是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甘肃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
兰
州军区政委。大军区也一样，冼恒汉同志调动后，肖华同志为第一政委。

……冼恒汉同志调离甘肃，对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众有意见可以提，
大
字报不要上街。毛主席说过：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已经走了，还贴他的大字报干什么

。有意见集中起来转就是了，……对冼恒汉同志还是要热情帮助他改正错误。……

（汪东兴：）……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是很不应该的。（我注：有什么
根

据说我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我是反对“四人帮”到中央来的，特别是王洪
文。

但老师们和周总理反复说服我们。）……庄则栋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
同

庄则栋谈了话。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会讲话后，你中毒更深，这些都应该交代
清

楚。……冼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绩的。但八个月来的错误也是很大的。
我

们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

……（陈锡联：）我对甘肃省的情况不了解，……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出现兰州
铁路局

这样大的问题，由于翻烧饼，被压制、处理了一千多个干部，你应该作自我批评。

甘肃农村问题不少。陈永贵同志反映，在甘肃有讨饭、有逃荒的，有的群众
没

有衣服穿。陈永贵同志建议国务院拨些粮食、衣服，可你们给国务院回电话拒绝，
说是搞恩赐，你们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我注：农村问题后面详述。）

……中央分工我管体委，庄则栋去西北，我都不知道。关于庄则栋去西北活
动

的问题，冼应该说清楚。

……（叶剑英：）……洗恒汉同志是红七军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党对你很重视，正因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严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水的。……洗恒汉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亲近的人，有的不帮你办好事，帮了你的倒忙，你还相信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庆认识，有水平，昨天发表的意见也很持平，你就不能团结。“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话很值得你想想。

你说，自己同“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通讯联系，一个机要通讯员就揭发你给张春桥写了信。（我注：张春桥当总政主任时，关于青海省军区政委宋长庚同志身体弱，不适应青海工作，而给张春桥、梁必业和总政党委反映这个问题。信封上只写了一个张春桥主任。）

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你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一个人跑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我注：我并不认识庄则栋，庄来甘肃时是宋平接待的。当时我不在家，而在外视察。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让我接见他一下。庄同我见面时说是陈锡联副总理批准来的。）

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

，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

。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

，“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我注：叶帅可能不了解具体情况。“四人帮”怎样说的，我不知道，可国务院各部每次有人来兰州都很满意

，当时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武斗、打架，而甘肃是工厂复工、学校复课。我每次到北京，刘伟见我时都感谢我们，说“504厂”、“404厂”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错误。我对常委同志们经常说，我几十年都是干军队工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们各口的书记。）

……（纪登奎：）……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

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并且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华主席的那个讲话讲了什么呢？那个讲话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能层层揪，要按中央1976年

4号、5号文件精神办。（我注：“四人帮”是反革命的问题，怎能把小平同志同

“四人帮”平列起来反呢？这是个原则问题，我顶了。并且我二月一日一个讲话还

揭发“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诬陷。免我的职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站不住脚，以后还乱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乱扣帽子。）

……处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冼恒汉同志的姿态低，对问题不认识。……中央工作组作了很多工作，……为了使铁路畅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铁路局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华主席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讲话中也提到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劝工作组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最好请冼恒汉同志也签个名，但又遇到了困难。这说明中央一直在等待冼恒汉同志，对冼恒汉同志是爱护的。（我注：中央工作组是宋平为组长，宋是管工交工作的书记，电报宋平送来给我看时，他自己不签名。我同送电报的同志说，要宋先签字，他了解情况。后来常委会议不是签字了吗？）

说句老实话，从打我参加革命以来，几十年我还从未受到过这样严厉的批评。对于批评的事实，平心而论，大部分我是不能接受的，这在以后的章节中我还要详述。这其中有些是有很大的出入，有些是无中生有，而有些则纯属执行问题。我作为党的一个地区工作干部，尤其又是一个长期做军队工作的军人，执行中央的命令是我的职责，尤其又处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代，我无论是从党性、党纪以及个人感情还是从军人的思维考虑，都只有坚决执行。当然，中央犯了错误，我也必定犯了执行的错误，但我只是执行问题，不能把问题的全部都归结到我的头上，我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唯物主义者，看问题要尊重历史。特别是我们这些在下面工

作的人，不执行中央的指示，执行谁的指示？所以看问题要历史地看、唯物地看，不要脱离开总的前提，不然说不清问题，解决不了矛盾。

对我作出的调动工作的处理，我是当时就表态拥护的，参加会议的各位都可以证明。这是因为：一，自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来，我和韩先楚同志工作上合作的并不愉快，这在以往的工作中是从未有过的（和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都合作的很好）。由于工作上存在着分歧，致使兰州军区领导班子对一些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影响到内部的工作和团结。因此，当叶剑英同志问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时，我表态“我调走”。二，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中央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是一棒子打死，严于批评，宽于处理，我当时是十分感动的。

由于我当时患病，瘦的很厉害（后查是甲亢），华国锋同志问我是留下还是回去时，我说想留下检查一下病，这样，我就住进了 3 0 1 医院，一方面看病，一方面也是等待中央重新分配工作。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中央的一次全会，华国锋还对我讲：“你十一大还要参加（当时我是代表已选出），中央委员还要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随着运动的发展，中央和地区对我的态度和处理竟与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意见大相径庭，以至于很快，就在我毫不知情、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并且还在 3 0 1 医院治病并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情况下，《甘肃日报》就已经把我作

为“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放在头版头条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了！
以
后的运动更是越搞越离谱，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
子也见不到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材料、申诉也都写了不少，都是为了一件事：协助
中央、兰州军区、甘肃省把问题搞清楚，一是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二也是解
决一大批因我而被迫停止工作的同志们的政治生命问题。这些同志都比我年轻，有
的从四十几岁已经拖到了六十几岁，到现在还生活在另册中，尝遍不被信任、不能
工作、看不到政治前途的痛苦。我们党内的人为斗争何时終了？所谓的不能更改的
历史遗留结论何时甄改？下面，根据我的记忆和材料，我将一些事件的发生以及过
程详细记录下来。

◇ 一年翻了两次烧饼

在兰州铁路局这个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但是我是个替罪羊。因为铁路局问题
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同志决策处理的，我们则是完全按他的指示执行
。现在我觉得需要把这个历史事实讲清楚。

兰州铁路局与省委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在我没有出来支左前，1966年
“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两家的矛盾就很突出、很尖锐。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

为了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把裴孟飞和马继孔两个省委书记都撤职了。问题分歧的实质是：在兰州铁路局内部，省委支持一派，铁道部支持一派。我出来支左以后，省委又重蹈覆辙，支持所谓红三司一派，铁道部支持红联一派。这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在解决甘肃问题时发了三个文件，表态支持红三司，我也就支持这一派，争取和团结另一派。但是，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从1968年1月省革委会成立到75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前，表面上铁路局的形势还是稳定的，铁路运输基本上是正常的。中央九号文件决定把铁路局收归铁道部统管，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常委会上说过，同袁宝华同志也说过，“九号”文件好，我举双手拥护。宋平同志也知道嘛。我说，铁路就是要统一管理，不能一个省管一段，这样不行。“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央一类部就要管下面各个企业单位，铁道部就是一类部嘛。就是后来黎光同志工作组在那里出问题之后，我还说不是因为“九号”文件，而是工作问题。我的这些意见，宋平是知道的，我去看袁宝华同志，也说过我这个看法，宋平当时也在场。

铁路归铁道部统管后，当时铁道部派黎光同志来整顿兰州铁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红三司这一派撤换了近千名干部，把铁道部支持的那一派扶上来了，翻了烧饼。这样，原来表面上缓和的矛盾又重新激化了。当时，我对黎光同志的作法是有看法

的、有意见的。但是，铁路局已交铁道部，我只好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当然，在某些场合，我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错话。

整顿不到半年，却又碰上中央开打招呼会议，在全党搞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被黎光同志工作组整顿下去的那一派乘机又闹起来了，黎光同志又来兰州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当时认为，铁路局的问题是铁道部管的，问题又是你整顿中搞出来的，我们不宜插手，所以当群众围斗他时，省委没有管这件事，而且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对发生的事情也不很清楚。

后来王震副总理打电话给我，叫我出面解决一下，我没有执行，顾虑有二，一、当时正处在“反右”的风头上，并且铁路已不归甘肃省委管，我已无能为力，非中央出来说话才能解决问题；二、铁路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引起兰州出现王副总理的大字报，这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状况。

兰州铁路局虽然归铁道部管，但该局又在兰州地区，对甘肃的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很大。这样，1976年2月，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叫我上北京，和铁道部一道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会上既没有让汇报，也没有让我们谈意见，就明确指示兰州铁路局以整顿为名是搞了右侧翻案风，黎光同志犯了方向

、路线错误，兰州铁路局仍然交给省委管等。并且把当时铁道部党的核心小组的
检
查送来，让我看，并指示让我修改。我看后一字未改，原封不动地又送回去，也
没
有提任何意见。第二天，华国锋又派人给我送来，说他们是搞了右侧翻案风，是
“
三个总是”（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案、总是要算账）的问题，是犯了方向、路
线
性错误，叫我大胆修改。同时又让国务院联络员要我当晚写一个解决兰州铁路局
问
题的意见，并且说了要写的具体内容（包括点铁道部和黎光同志的名）。关于铁
路
局领导班子的问题，不是我提的，而是纪登奎同志和万里同志定的。开始他们两
位
说：“干部由甘肃解决。”我说：“甘肃没有懂这行的干部，我们解决不了，还
是
由铁道部派人。”他们说：“铁道部派不出来，还是由赵滔搞。”我说：“赵滔
对
铁道部一肚子意见，他已经被免了几次职了，柳州一次，兰州两次，恐怕不会干
的
。”最后，把赵滔（还有张恒云、章良、陈平等同志）叫到北京，他们两位亲自
同
赵滔同志谈话，赵才表示继续干。但又提出一个要求，要在省上挂一个职务，铁
路
干不成就到省上工作。我向纪登奎同志汇报后，纪说：“可以同意这个要求。”
这
样，赵滔就在省上挂了个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铁路局的班子就是这样定
下

来了，最后写到我的意见中，并报毛主席批准的。我向中央提的书面意见还特别强

调说除了个别干部不称职可以调换外，不准再“翻烧饼”。兰州军区党委和甘肃省

委 1982 年 11 月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中说，这是我

“重新夺了兰州铁路局的领导权”，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2 月中旬，我带着中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回来贯彻执行。在贯彻中

，路局新成立的党委把原来整顿中不该撤换的干部又复了职，这就是“结论”上

说的揪“走资派”、“层层揪”、“动大手术”、“搞垮了铁路局各级组织，搞乱了

干部队伍，破坏了西北铁路运输。”半年以后，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铁

路局两派又闹了起来，所以兰州铁路局又处于瘫痪状态。

就在 1976 年 9 月毛主席逝世，我到北京参加吊唁活动，遇到华国锋时，我

还请示他说：“兰州铁路局可能要出点麻烦”。华国锋当时说：“兰州铁路局问

题是今年 2 月定的，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主席同意的，还要继续执行。有

人找麻烦，还是照此办。”纪登奎还插话说：“中央作过结论的问题，绝不能翻，如

果要翻，就是右倾翻案风，坚决给以回击。”

10 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我再次请示华国锋、纪登奎，铁

路局的案能不能翻，怎么办？纪登奎同志当着我的面问华国锋：“老冼问，这次铁

路

局的案能不能翻？”华国锋明确表示：“不能翻！”并再次强调，铁路局的案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不能翻（见注）。我回来后，省委又多次研究铁路局的问题，要兰州铁路局党委以大局为重，积极引导大家消除派性，把思想集中到揭批“四人帮”，查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方面来。但结果不行，两派都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但实际上是打内战。

铁路的问题，我们省委很伤脑筋，曾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请示，并上报了几个方案，中央既没有批也不作答复。1976年12月15日，华国锋又把我叫到北京，第二次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说个老实话，在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一年两个政策，上半年这样搞，下半年又那样搞；今年翻过来，明年翻过去，叫谁搞谁都没有办法搞。我承认，在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省委、省革委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但我们不是决策人，而是执行人，把这个责任都归到我一人身上，我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也是不公道的。

另外，铁路局在生产方面一直都是铁道部管的，如，机车车辆的大修、车皮调动、机车用煤的分配等都归铁道部直接管理。我也常听到省计委讲，铁路局反映，机车年久失修、机车用煤分配不足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铁路运输，而宋平同志应该是最清楚的，他是管工交的书记。所以，把铁路的问题全部推给省上，而省上

又全部推给我，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就在这次，河南的刘建勋同志也被同时叫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两人同住京西宾馆。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差不多，由于心里郁闷，闲暇我俩也坐在一起发发牢骚。

刘建勋这个同志很开朗，思维敏捷、健谈，说话也很幽默。当时他讲：“铁道部一贯支派，谁不跟他，他就整谁。他们整人有一套办法呢，先把你的屁股眼堵上，然后硬往你嘴里塞东西，最后逼得你运输堵塞、铁路瘫痪，让你犯错误，再反映到中央去解决。中央两次叫我来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前些天，铁道部把武汉搞畅通，硬往郑州塞，堵上了就把我叫到北京来了。你们兰州也是这么回事吧？”我讲：“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兰州铁路局也是这么回事。铁道部就是一贯搞派性，谁反对省委，他就支持谁，谁跟省委，他就整谁。甘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铁路局的造反派反对汪锋，铁道部积极支持。省革委会成立后，铁路局同省委一致，他们也不向省委通知，就直接派人下来整顿，结果搞乱了，铁路不通了，就让省委来解决。”刘建勋同志说：“对、对、对，郑州也是这么回事，只要你听他的运输就通畅，啥事也没有，否则就堵塞，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做法。”

虽然是些牢骚话，但确实道出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和真实思想。当然，你位在省

委第一书记，有些事情由不得你，上面叫你这么做，你明知是个火坑，也得去跳。跳了，出了问题，只有把你舍去，说你另搞一套。当时我对这种“权术”实在不懂

，想都没有想过，后来有人说我：“搞了一辈子政治工作，其实并不懂政治是怎么

回事，难怪被人整了！”我不赞同，如果政治就是阴谋诡计，那还叫什么共产党。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当时甘肃省委内部分工是由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分管工交工

作，因此，铁路局的工作是由宋平同志具体负责的。但由于铁路局的问题内外矛盾

比较多，牵扯到上下关系也比较复杂，面对这种复杂难办的局面，宋平很不愿意过

问铁路局的事情，甚至有时有意推躲，更谈不上主动去管了。有时下面向他反映铁

路局的问题，他听了既不表态，也不向省委反映提出处理意见。有时需要他签字处

理的文件，他不签，要秘书送到我这里，让我先签了后他再签。甚至中央领导向他

问及兰州铁路局的情况，他也推说“不了解”。硬是把矛盾集中到我这里，把我推

到第一线。

由于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棘手，使我左右为难，思想上曾有过一些情绪。在中央

开会时我曾向华国锋提出不想在地方搞了，想回军队。当时华国锋对我说，你在甘

肃这几年搞得不错嘛，整个西北地区的“支左”工作都比较稳，你身体还可以，再

干个十年没问题。当时我很感动，觉得这是中央对我的信任。

可是没过几个月，华国锋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将他原先的指示和表态全盘矢口否认，硬将兰州铁路局问题一股脑全部砸到了我一人头上。明明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事情，说成是按“四人帮”的那一套搞的“另搞一套”，给我戴上了一项“跟‘四人帮’很紧”的政治大帽子。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华国锋、纪登奎等多次指责我在铁路问题上“压群众，捂盖子”，我当场回答：“捂盖子是你们指示的呀！”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证明。

我注：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解决甘肃领导班子问题时，华国锋同志说，洗恒汉同志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捂盖子、压群众，特别在铁路局问题上。我插了一句：“我是请示你们的，你们说铁路局的案不能翻嘛，我当时执行你的指示。”纪登奎发言时说：“关于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议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的，并且经过毛主席同意的，不能翻。事实上你违背了华主席的讲话，没有掌握斗争大方向，违反了四号、五号文件精神。”（摘自省委印发的记录）。

◇ 我戴上了“代理人”的帽子

1977年6月9日，中央在解决甘肃问题的会上明确指出：“洗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

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

，洗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摘自印发的记

录）当时我就表态完全拥护，肖华、韩先楚、宋平都在座。

同时，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在传达中央指示的要点时也说：“遵照毛主席关于

干部交流的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免除洗恒汉同志在甘肃省委和兰州军区的职务，由

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中央决定后，我因病向华、叶告假，经批准在 3 0 1 医院住院，一面治病一面

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这个期间，我还参加过中央召开的会议。当时跟我

一起来京的我的秘书陈文生和保卫干事华德孝也没有回去，住在招待所里为我整理

检查材料，逢探视日也去医院看望我。宋平同志临离开北京前还专门带书信到医院

给我，劝我放心好好养病，省里会按照中央“正常调动”的精神，不搞揭批，不

搞运动。嘱我如有什么事情要办一定找他，云云。

但是，韩先楚、肖华、宋平三同志回兰州后，却没有按照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

题的精神办事，而是以更加极“左”的作法，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

批所谓“洗家帮”、“西北帮”等活动，整掉了一大批在西北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了

几十年的干部，仅省、军、兵团、大军区级的干部被非法拘留或停职专案审查的就

有

四十余人，师、地和县、团级干部有好几百人，一般干部更是一大批。

我也在事先毫不知情并且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被扣上了“‘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从此，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

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声讨我这个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所谓“

代理人”。报纸上的文章看不到象样的、能说明问题的材料，而只是扣帽子，使人

的感觉是，似乎洗恒汉比“四人帮”还要“四人帮”。

报纸上所批判的事情除了夸大其辞外，很多都是无中生有的。例如，有一出话

剧叫“红河激浪”，是文革以前省委和西北局搞的，也挂到了我的头上；白银公司

1964年的一起“三人反革命”冤案，也跟我联系起来；甘肃那年气候反常，也说成是我做的怪；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军区“四大”，我和张达志被夺权挨整

，可现在却倒打一耙，说我在“四大”中“乱军反党”！我想，如果这样的帽子扣

到我头上能成立的话，那天下就没有真理而言了。总之，我对他们这种既不按中央

政策精神办，又不符合事实，而硬把我往敌人那里推的搞法实在想不通。

再往后，我的秘书陈文生被押回兰州隔离审查，听说对他大搞逼、供、信，强

迫他揭发我的“罪行”。这个同志后来被复员处理，分配到火葬场干活。我的保卫

干事华德孝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文化，也被揪回去参加运动，后来被处理到砖瓦厂

.....

运动是越搞越离谱了，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子也见不到了。

“由军委另行分配工作”象是一纸空头支票，一直没有兑现，而“

‘四人帮’在甘肃代理人”的帽子我却一直戴到现在，不知是不是还要戴到马克思那里去？

那里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拥护。这是党在历史转变关头

的一次伟大的会议，不仅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而且实事求是地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几十年来，我无论在兰州军区工作和在甘肃地方工作期间，都是按

毛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办事的，重大问题都经常委讨论。我这个

人是直来直去的，不搞阴谋，我从没有给林彪、“四人帮”单独干过任何坏事。出

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总根子在文革是一场大洗劫嘛，方针、路线、方法都错了嘛。全国性的灾难，甘肃能避免？洗恒汉能没有错误？中央1981年曾发了一个

（8

1）22号文件，还专门讲了“过去历史上的错误，责任主要在中央，不要层层去

追究责任”。所以看问题要从历史条件、总前提来看。

我从1977年6月开始，一直住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里等待中央军委另

行分配工作，一等五年多，这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过问过有关我的工作分配或调

整的问题。

1982年11月，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决定下达五年多后，也就是肖华知道了他要从兰州军区调到全国政协去的消息后，为把这个冤假错案搞成既成事实，经过一番不正常的活动，突然决定让我回兰州最后解决我的问题。

回兰州之前，我去看望余秋里同志，秋里同志曾是我的老同事，对我是十分了解的，更何况他是当时的总政主任，由于我没有看到让我回兰州的军委、总政批件，因此想找他问个究竟。

见面后，我问肖华让我回兰州的事情中央、军委是否知道？让我回去干什么？

余秋里说：“他们打了个报告让你回兰州去，最后把问题了结一下，中央、军委也同意了。……放心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错误检查一下就是了，不会对你搞什么批斗，事情都过去六年了嘛……”

其他一些老领导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带话，都觉得对我这样一个老同志几年来如此揪住不放是太过分了，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为我说话。他们还希望我回去后尽快解决问题，抓紧时间再为党工作几年，为四个现代化再贡献一份力量。我非常感激。

当时，兰州军区还派了一名干部接我回兰州，讲得很好，说是肖华同志请我回去最后解决问题，等问题解决了，还可以抓紧时间为党工作几年。我在北京已等了

六年了，从六十几岁等到了七十几岁。说个心里话，我非常想尽快解决问题，早日
洗刷掉强加于我的各种污蔑不实之词，摘掉硬扣在我头上的“代理人”帽子，因此
，表示愿意回去，配合组织尽早把问题搞清楚。

然而等待着我的，一下火车，兰州军区便立即将我软禁隔离起来，宣布不许
回家，不许和外界联系。他们把我带到宁卧庄的一座小楼里，光看守我的战士就
住了一个排，完全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就连我的孩子们来看我都要严格盘问、规定
时间。

第二天，肖华派人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严重，有的是触及刑律的问题，要
起诉，要立案，要判刑等等。看起来，他是一定要按照他的政治需要，不顾历史事实
，硬要给我定个什么罪才肯罢休，否则他就下不了这个台。

对此，我提出了强烈抗议并给予义正词严地斥责。我当即表示要见肖华、韩
先楚、宋平等军区和省委领导，当面问问清楚：1977年6月在解决甘肃问题时，
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对我的问题的性质和处理原则是怎样的？为什么军区、省
委领导回来后不按中央指示办，而是另搞一套，并株连了一大批无辜的干部？是否
“
中央”另有“精神”？可是肖华、韩先楚、宋平等入却回避不见，只派了一个军
区副政委张如三出面回答说：“首长没有时间，所以不见！”以后我又几次提出要
见

他们当面谈，但他们根本置之不理、躲避不见，一直到他们先后调离兰州，始终没
有见过一面！

由于我根本想不到他们会这么干，把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执行工作的问题无限
上纲上线并欲加治罪，又加上以后十几天里私设公堂，一大群专案人员对我进行严
厉审讯、逼供，而根本不给我一丝解释和辩白的机会，这使我愤怒之中深感痛心。
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完全是把我当作罪犯来对待，七十多岁的人了，这种身心
折磨终于使我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抢救，差点要了命。

经过一年的治疗，到 1983 年 11 月，就在我将要出院的前一天，突然，
军区纪委给我送来一份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所谓《免于起诉书》和兰州军区党委、甘
肃省委 1982 年 11 月 15 日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和处理
意见的报告，让我看后提意见。我出院后的第三天，又给我送来总政治部 1982
年
12 月 5 日关于让我退出现役及降至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的通知。
由于这接二连三的刺激，我心脏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

这一系列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事先我并不知道，这等于说，不容我提任何
意见，就定性处理了。按党章第四条（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
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并将申辩意见连同报告一并
上

报中央。”既然他们如此践踏党纪国法，我当时只在那个“结论”报告上写了：

“

这个审查结论很多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我不同意。”

随之而来是对我生活上相应的制裁：200元生活费、限期搬家，否则便停水

、停电、停暖气。由于无处可搬，只得听凭制裁。水停了，孩子们爬下水管道又接

上；电停了，再自己拉一根线过来。只有暖气无法解决，冬天到了，西北风呼呼刮

着，偌大的房子只有生几个大炉子取暖。由于室内充满了一氧化碳，搞得我经常煤

气中毒，实在没办法，只好每年冬天到医院里去过冬。

上述这些极不正常的作法，都是完全违背党的《准则》的。

根据后来郑维山、谭友林时期的兰州军区党委整党总结说：“上届党委（指肖

华时期的党委）常委集体领导发挥得不好，个人说了算和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比较

突出。有些经过常委讨论过的问题，未经复议，就被个人否定了。这样，有不同意

见的同志不愿意说，有的不敢说。”（上届党委）“个别领导干部，封官许愿，任

人唯亲。”对我的所谓“结论”和处理意见以及一系列人身迫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下的产物。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央、军委对我先后几次的“组织处理”，也使我

感到不同寻常并深感困惑。

第一次是1982年12月，也就是骗我回兰州所谓解决问题的时候，当时是

总政办公厅打电话通知的，大意是：中央决定，洗恒汉按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移交地方安置。除此以外，“通知”里一字未提我到底犯了那些错误，也未提及什么“代理人”之说。由于我当时重病住院抢救，故这个“通知”并未通知我本人，也算是体现“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吧。一直到1983年10月我出院回到家，军区才派几个工作人员将这个打印的总政电话“通知”拿给了我。从此取消了一切原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

1984年6月，总政又电话通知，说中央指示，改变以前对洗恒汉同志的处理决定，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不久，又电话通知，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这两次“通知”也都没提一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以及为什么改变原先的决定，又依据什么给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组织对一个党员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必须严格按干部管理权限的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并将“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党章还特别规定：“对党的中央委员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予撤消党的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本人所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追认”。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是党的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军委委员，又是兰州军区党委的委员、常委、第一书记，但对我的处理却如此草率，只是由总政的三次电话“通知”。一直到现在，我的问题已经拖了十几年了，始终也没有见到中央的一个正式的“结论”，更没有由中央或军区党委正式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我百思不得其解，写了无数的申诉，但都如石沉大海，难道我的疑问和费解还要带到棺材里面去吗？

第二章 军内“四大”

◇ 不理解也得理解：这就是“文革”？

1966年初，我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到天水县农村刘家庄大队参加社教。我搞社教的那个地方很苦，干旱、缺水，老百姓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养牲口没有草，烧锅烧炕没有柴，我们和土改时一样，住在农民家里，吃轮流“派饭”。群众多数情况下只能吃玉米面糊糊（当地叫散饭）和窝头，我们也吃这些。老乡们没有水喝，哪里还谈得上洗碗，我每天吃完饭都是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用舌头把碗舔干净。

老百姓生活苦，又加上文化低，全村几百口人和牲畜饮用水只靠一个“泉眼”，既不卫生也不方便，我到天水驻军要了些钢管，叫人把泉水引到便于群众接水的地方，又将人、畜用水分开，老乡们也觉这样很好。

由于陇海线穿越我住的村头，因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火车经过。

1966年8月间，过往的火车车厢上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幅标语，记得有“打倒裴孟飞！”“打倒马继孔！”，还有什么“火烧”“油炸”等。由于裴孟飞同志和马继孔同志当时都是省委书记，而过去又从未见到过这种斗争方式，因此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我们的消息并不灵通，报纸是一个星期由通信员送来一次，又不能及时看到中央的文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兰州铁路局职工到省委门前静坐，北京来了红卫兵，省委瘫痪了……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红卫兵。那天，火车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在离村不远处缓缓停下。也许是想下车活动活动身体，从车上下来了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娃娃。他们围坐在一起，象是开个临时会议。当时正值8月下旬，甘肃已经见凉了，可这些孩子们却还都穿着短裤短衣，很有纪律的样子。我已经从文件和报纸上知道了北京红卫兵，这趟车恰巧又是从北京过来的，因此心想，这大概就是红卫兵了？

有些老乡围了上去看稀罕，我也快步走了过去。看见他们果真在开会，是在讨论去新疆揪斗王恩茂的事情，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些娃娃是不是受了谁的指示？

看见一个年龄稍大些的，象是他们的头，我把他叫了出来。我对他说：“你们

可不能乱来呀，王恩茂可不能打倒，他是好人。”他看我穿着便衣，以为是个农村

干部，觉得解释多了我也理解不了，便说：“大伯，您不懂，这是文化革命！”

这就是文化革命？我心里充满疑惑。

由于要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10月初我结束了社教，回到兰州。

回来以后我才了解到，早在6、7月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由于

省委汪锋、裴孟飞、马继孔支持兰大学生李贵子，一派群众组织先是逼死该校校长

、党委书记江隆基（这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尔后，在1966年8月1日冲击

铁路局和一些中学，搞打、砸、抢，引起铁路职工不满，到省委静坐、绝食。为了

平息铁路局事件，当时汪锋同志就把责任推到裴、马身上，撤了裴孟飞和马继孔的

职。但愤怒的铁路职工和学生们仍然不肯罢休，加上北京红卫兵的串联鼓动，各大

、中学校的学生们把矛头指向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

那时全国已经开始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各地政府机关几乎都是焦头烂额，工作

陷于瘫痪。当时汪锋同志被红卫兵揪住不放，追得无处藏身，还在兰州军区大院东

头的六栋房躲过一段。

我回来以后，对地方上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工厂停工

、学校停课、领导干部人人自危的情况感到十分忧虑并很不理解，但毛主席“炮打

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八次接见红卫兵的事实，又说明了毛主席是有意识地支持红卫

兵，运用红卫兵的力量去冲开“阻力”并全面展开“文革”的。作为军人，服从
是
天职。虽然弄不懂中央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好在军队当时并没有乱，对于地
方
上发生的一切我们只是时刻在关注，而并没有参与和干涉的任务。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统一全党的思想，要把“文化大革命”坚决推向高潮。

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和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找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同志到西山去，向我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等等，叫我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左向郭鹏同志传达，要我们搞好思想转弯。我听后吃了一惊，当即说：“他是土匪军阀是过去的事嘛，红军二、六军团会合时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枪毙了，现在怎么又成问题了？前一段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到底咋回事嘛？”叶帅和肖华没有理睬我，只是叫我们转好思想弯子。我回来后如实向张达志同志作了传达。

当时，西北的部队虽已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架子基本还是贺龙部的老底子，军队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贺龙的老部下，对贺老总的感情是很深的，对于要打倒贺龙这件事，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是不通的。和张达志同志统一思想后，我们决定不转弯子、不传达、不理睬。

会后，大约是11月上旬，军委又把军队干部留下参加座谈会。会上，当时的

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肖华指示，要在全军的机关、院校、文艺、体育单位开展

“四大”，大闹三个月，把军队的问题好好揭一揭。

对于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当时我们思想是不通的，弄不懂为什么要把军队搞乱？但“文化大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理解也得理解

。当时林彪为此还有句名言：“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执行”。因此回来后

，仍然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肖华的指示，并在军区

机关作了动员。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 拉起大喇叭广播的“常委会”

由于地方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已经几个月了，因此对于将要开始的军区机关

“四大”也是有些思想准备的。虽然自我感觉比较自信：一、历史清楚；二、历次

运动无问题；三、工作几十年从未犯过错误。但共产党人批评与自我批评总还是不

能丢掉的，世界观的改造是不能放松的，群众运动嘛，一定要正确对待。尽管做了

这些思想准备，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

机关“四大”一开始，政治部副主任张XX就带头贴出大字报，给军区部分常

委画了像，定了性。说张达志是“三反分子”；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张

达志、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我和高维嵩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他还声称他有“重磅炸弹”，还要陆续不断地出大字报。这实际上是要把军区“四大”纳入他的这个框框进行。

他的大字报出来后，就得到了机关一部分人的拥护，说张 X X 同志站出来了。在我们召开常委会时，一部分“群众”和张 X X 同志就一起冲进了会议室，要求改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运动的领导权。在此压力下，我们作了无原则让步，由张 X X 接替李虎同志担任文办主任，接着王 X X 又接替高维嵩同志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从此，王、张就掌握了兰州军区“文革”的领导权，军区党委领导实际陷于半瘫痪状态。

在王、张的一再威逼下，11月25日、26日召开了所谓的军区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但会议实际上无法正常召开，因为会议一开始，群众就闯进了会议室。会议室地方小装不下多少人，大部分群众就挤在会议室外，由于听不清，有人就拉起了喇叭，外面的人就在喇叭底下听，群众称之为“喇叭会”。

会议名义上由我主持，实际上是王 X X、张 X X 把持了会议。整个会议开成了由他们发问，我们被迫交代问题的斗争会。就连散会出场都按他们划分的左、中、右的顺序作了安排。第一个出场的是王 X X，接着是张 X X、杨嘉瑞、康健民、徐国珍、李书茂、高维嵩，最后是我和张达志。这个拉起大喇叭的“常委扩大会议”

，我看也算是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一大发明创作了！

这个会散了以后，王 X X、张 X X 便多次在常委会上根据所谓“革命群众”的
意见，要求将张达志和我的印章收交文办管理，并公开宣布要窃听张达志和我的电
话，又宣布要限制我们的兵权，凡是要调动一个班的兵力，都要经过常委一致同
意、一致签名才能生效。同时，又对张达志和我搞单线警卫（即由文办派人监视），
就连徐国珍到北京参加军委碰头会议，文办也派权洪（原任军区老干部办公室主任
）跟随到北京监视，从去到回一直跟着。

对我和张达志则到处是勒令、通知、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战，逼着
要我交待同贺龙同志的关系问题；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们给我们挂
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我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
上
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等。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
成
觉，有一次我实在是支持不住了，不知不觉中竟一头栽下台子来，当时就晕了过
去
.....

以后，有的群众组织又到山西学习夺权经验，在军区机关起草了所谓“联合
夺
权通告”。到了 1 月份，一派拥护王、张的要夺权，一派反对王、张的不同意夺
权
，两派就闹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听说一派就成了“三军造反派”的组成部分，
参加搞“斗罗筹备组（处）”，揪斗罗瑞卿同志游街，绑架刘志坚同志，还搞什
么

“百丑图”。这样，从军区机关“四大”又发展到北京参加全军“四大”去了。后
来，还发生了大军区的造反派去甘肃省军区静坐，“四大”停了以后，又企图冲击
军区办公大楼等。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党委就完全瘫痪了。

1977年6月被免职后，当时的兰州军区党委在1978年发了一个“四号”文件，说我“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这完全颠倒了是非。我和张达志同志当时毫无自由，我身为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一直被残酷斗争，我怎样去夺权？我要夺谁的权呢？我总不能自己夺自己的权吧！所以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就在机关“四大”正进行期间，全军文革小组还给各大军区发来电报，征求连队可否也一样搞“四大”（大意），要我们提意见。常委们专门讨论了这个电报，除王XX外，其余人都不同意，党委给全军文革小组回了一个“不同意连队搞‘四大’”的电报。这些都有案可查，所以究竟是谁要“乱军”嘛。

1968年7、8月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五〇四厂对空防御的兰州军区空军高炮一师一名副参谋长叫潘继祖的，一天夜里，背着该师师长、政委，假借奉中央、中央文革的命令，调动三个团的兵力，八十二辆大卡车，要攻打兰州军区，扬言抓到张达志、洗恒汉可以不请示报告，就地枪决。当潘给部队动员讲话时，有两个团的政委质问潘：“这样大的事，师长、政委怎么不来？”潘不回答。他们立

即跑步前去告诉师长阎福增，这样才把潘当场逮捕，事件才没有发生。这个事件的

主谋者潘继祖，第二天就被林彪反党集团的吴法宪用专机押回北京，包庇下来了，审讯结果怎样，从不告诉兰州军区。“9.13”以后，1972年中央召开批林

整风汇报会，我在小组发言时又一次严肃地提出此事，并登了简报，要求中央派人

审查，并将情况告诉兰州军区，以解开压在我们心中的疙瘩，可后来也没有任何下

文。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江青窜到西北组接见西北各省的负责

同志，她突然说：“杨勇同志，把抓你和廖汉生的某某人放了吧。”（我没有记清

那个人的名字）她又转过来对我说：“你们那里的潘继祖也放了吧。”杨勇和我都

未吭声。（事实上潘继祖早已押到北京，并不在兰州）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到

底是谁在“乱军”？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

”。但实际上停不下来，张达志和我说话没有人听。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派群众组

织拿出了红卫兵转来的王X X 1933年在山西反省院写的反共宣言和反共文章，

要求军区党委处理。

当时，我召集部分常委开了个会，要高维嵩同志去北京汇报，请求中央军委派

人解决兰州军区的问题，并报送王X X自首变节的材料。高维嵩同志到北京后，当

时肖华接见了他和原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长刘凯（已病故）。肖华没有让他们汇报军

区的情况，就说：“你们军区党委的报告我看了，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也了解。

王

X X这个材料是个高质量的叛徒（他连说了三声叛徒）。现在你们简单谈一下，还

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最后他答应军委派人到兰州军区解决问题。在这次接见中，

肖华还指示兰州军区查一查王X X与黄克诚、薄一波的关系，（据肖华讲王当兰州

军区政治部主任是黄克诚提名的，又因王曾是山西牺盟会出来的干部，因此肖华要

把王X X与黄克诚与薄一波挂上勾。幸亏我们没有查，否则又是一大罪状。）

过了两天，肖华又找高维嵩同志谈，大意是，军委不派人去了，你们自己解决

，办法是整顿机关，有问题的部就停止工作整顿，有问题的人就停职检查，把张、洗、王、张都调到北京来，让群众在整顿机关中背靠背的揭发。揭发一段后，如果

需要他们回去就让他们再回去。并说，张、洗来了住京西宾馆，王、张来了住海运

仓。对你们的问题，军委还要开会研究，然后再正式批示。对王、张的问题，同意

你们的意见，应该有所区别。王X X有历史问题，隔离审查；张X X没有历史问题

，停职审查。高维嵩同志电话传达这些指示后，他们于3月15日由北京返兰，我

们四人于次日从兰州一起乘专机去北京。一下飞机，军委派来接机的两辆车已经在

等待，其中一辆车将我和张达志同志直接送到京西宾馆，另一辆车将王X X和张X

X拉到海运仓。

1967年4月4日，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问题，专门发了个电报指示说：要整顿军区机关，在整顿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左派，打击右派……

由于在兰州军区机关“四大”期间，我是一直处于被批斗状态，“四大”停止以后，我又被暂时调到北京，让群众背靠背地揭发。所以军区机关搞“四大”、王XX的定性为叛徒、搞整顿机关，都是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一手定的。特别是整顿机关，怎么定的、怎么搞的，具体问题我没有过问，也不便插手。

可是在1977年6月以后，肖华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期间，领导大抓所谓“洗家帮”时，却把王XX定叛徒和军区“四大”以后进行机关整顿统统推到我的头上，说成是洗恒汉和高维嵩一手制造的大冤案。高维嵩同志想不通，在1979年，有一次碰上肖华，就当面问他当时代表军委接见时是怎样指示的，又是怎样亲口交代的，而且有军委的正式批复等，现在怎能说是我和洗恒汉一手制造的呢？请你再回想一下，说句公道话。肖华则矢口否认说：“我没有听过你的什么汇报，也没有看到你们的什么报告，更没有说过定王XX叛徒和要你们机关进行整顿的话！”说完拂袖而去。

1967年5月，军委让我回到兰州，紧接着我便奉命调出参加地方“支左”

，并立即去北京领受“支左”任务，一直到8月5日我才又回到兰州，从此以后我
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支左”工作上了。

由于当时的分工，我主管西北四省（区）地方的“支左”工作，因此军队的事
情，包括整顿机关以及王、张案子的具体审查，我都没有具体过问。

1967年军区常委在讨论所谓王、张的案子时，我参加过两次会议。作为兰
州军区党委书记，对将此案定性为“篡党反军集团”，我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定案会上，我讲了一些错话，对因此案受到打击迫害的同
志，我再次向他们赔情道歉。

这个案子的平反我是同意的，但兰州军区党委1978年第4号文件中，给王
XX摘掉了帽子，又把“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帽子扣到了我的头上，这样的帽
子我能接受吗？要实事求是嘛！我是军区政委，反谁的军、乱谁的军呀？我是军区
党委书记，篡谁的党、夺谁的权呀？合乎逻辑吗？

机关“四大”停止以后，由于要落实“支左”任务，我们成立了军区“支
左”
办公室，当时军区派出了杨嘉瑞同志担任“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跟随我一起
参
加对甘肃地区的“支左”工作，这也就是兰州大街上出现“打倒张、洗、杨，解
放
大西北！”大标语的那个时候。

“支左”办公室成立不久，大约是 5 月间，我和张达志同志在参加军委召开的
的
一次会议上，肖华、杨成武同志在会上又点了杨嘉瑞的名，说：“你们军区有一个
个
叫杨嘉瑞的副司令，这个人是在贺龙线上的，是‘贺龙分子’，不能参加支左。”
还
要我们回来后给军委写报告，免掉杨嘉瑞的副司令员职务。接着总政通知军区政
治
部派人（据说是军区干部部科长李志明去的）去北京领受审查杨嘉瑞同志的具体
指
示，杨嘉瑞同志的审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与此同时，地方上又转来一个材料，陕西关中地区有人揭发他在彬县当国民党
党
保安中队长期间，杀害三名要投奔红军的人。经过反复调查，据说有人证明有这
件
事情，而杨本人却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曾请示
我
怎么办？我当时说：“算了，再不要调查了，就是有个事情也是个历史问题。
杨
已年过七十了，你们给他谈清楚就行了。”审查人员把我这些话如实地向杨讲了，
杨还专门给我写了信，表示感谢。

70 年底，林彪搞了一个一号战备命令，各大城市都搞人口疏散，当时把他
也
疏散到他的原籍陕西省兴平县，没有房子住，我知道后，叫军区政治部把他安排
到
西安兴庆公园军区干休所。

在审查杨嘉瑞同志这个问题上，我执行了上面的指示，是有错误的。我愿意
再
次向杨嘉瑞同志赔情道歉。

说个老实话，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有许多事情是由不得你的。不做，当时犯错误；做了，过后犯错误。军区“四大”，我挨整遭批斗，是受害者；“四大”过后，我也审查过别人，同样，别人也挨了整。这个现象在“文革”过程中和“文革”后期，应该说是很普遍的，它是我党在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既违心而又不可抗拒的产物，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感到十分痛心。真诚地希望我党历史上悲剧不再重演。

◇ 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城市烧到乡村，从军外烧进军内。

奉军委命令开始的军区机关“四大”，最先闹起来的是文工团和体工队。之后不久，军内军外的“造反派”开始相互串联，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军区大院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张、洗！”的大幅标语象一幅幅巨型挽联从办公大楼上垂悬而下，我们住的宿舍干脆被大字报和大标语糊了起来，只留下一个门洞进出，门上还贴着白纸黑字的大对联，怪渗人的。记得运动开始后不久，我广西老家来亲戚看我，这些少数民族边远山区的纯朴农民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当时就吓得浑身哆嗦，第二天一早吴杰便买车票打发他们走了。

“四大”开始初期，我和张达志及其他常委同志都还是抱着欢迎群众监督的态度，认真接受群众批评的。但事态的发展却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造反派对我们

搞起了人身攻击和逼迫审讯。

这些耻辱对于我们这些跟毛主席干了一辈子、尤其年龄已五、六十岁的人来讲，实在是不可理解和难以接受。但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电报却一封接一封不断，要我们满腔热忱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运动开始以后，我的公务员以及保姆、大师傅都被造反派赶走了，家里的大孩子们也都出去串联了，老伴吴杰是省委档案馆馆长，为保护档案，经常在馆里顾不得回家。

我和张达志同志的宿舍紧挨着，我的小儿子当时十二岁，我们挨斗的时候，他便和张达志同志六岁的小女儿圆圆一同去送饭。饭是他们自己做的，常常是煮一锅糊米饭，下面还埋着鸡蛋和未熟的绿豆。两个孩子一路走还沿途捡些散落的传单，准备留给我们回家看。可常常是饭没送进去反还让骂一顿“保皇派”被赶出来……

那时候造反派经常去家里胡闹，有时候刚参加完批斗会回家睡下没几分钟，另一派的又来揪斗。为多睡会儿觉，我和张达志常常各自站在自家后窗树底下等造反派走了后再进屋。有一次，站着站着就在树底下睡着了……

当时，全国军队（机关）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造反派无法无天，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很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因不堪凌辱，纷纷跑到北京

回避，住在京西宾馆“避难”，还有些住进了医院，南京军区的许世友更是带枪上了山。

后来，军区“四大”结束后，我们在北京开会碰到一起，许司令还对我嚷嚷：“谁象你们一样，还老老实实等着人家斗？”吃饭时大家聚在一桌，七嘴八舌都说我和张达志是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由于各大军区“四大”期间都是文艺团体闹得最凶，因此，“四大”结束后，由南京军区带头先解散了这些造反派的发源地。我们也步南京军区后尘，解散了军区战斗文工团和军乐队、体工队。这些人后来听说有的转了业到地方工作，有的回了家乡另谋出路。当年他们造反的时候还都很年轻，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们，他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 毛主席说：“张、洗是老实人。”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些会议。有时候是中央叫去听汇报，有时候又是全国会议的西北组召集人，因此，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触机会也就相对多一些。

那个时候经常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打来，紧接着随后专机也就到了。中央和军委召集的会议一般都在京西宾馆，会议都很保密，尤其是党的全会，基本都是会议开完后才见报见广播，在整个会议期间媒体是决不做报道的，只有“美国之音”才在夜深人静时作一些猜测。

住在京西宾馆开会，尤其是全国性的会议，低头抬头吃饭走路遇到的都是“各路诸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有子女和亲戚在北京，由于会议一般都保密，因此有的时候子女和亲戚来访，就安排在专门的房间里，个别时候安排不下就两家进一个房间，我就遇到过一次，和皮定均同志同在一个房间里接见女儿。过后，大家都发牢骚，对此种故作神秘和不信任人的做法很反感。

住在京西宾馆，过的是集体生活，吃饭十个人一桌，各自掏各自的饭票。那个时候我们是吃一块三一天的伙食，工作人员是八毛钱一天。经常看见陈永贵、吴桂贤、尉凤英等人和工作人员一道去吃八毛钱一天的伙食。这些从基层上来的同志工资并没有增加，国家给一些补贴也是有限的，因此他们都很节俭。在我们省上开会时也一样，有些基层的干部还自带干粮呢。

军队“四大”结束以后，毛主席决定让解放军出来“支左”。5月，毛主席接见了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我和张达志也参加了接见。刚刚经历过“四大”的批斗，被毛主席接见就是得到党中央的信任和首肯，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和兴奋。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与我们一起照相留念，当周总理把我和张达志同志引向毛主席身边并介绍我和张达志经历“四大”的情况时，毛主席指着我和张达志同

志说：“张、洗是老实人！”主席的一句话，说得我心头一热，顿时百感交集，
觉
得自己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理解，什么委屈都烟消云散了！在后来的一些接
触
中，主席又几次讲过“洗恒汉是个老实人”的话，使我终生难忘。

1971年“9.13”时，总理半夜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已吃了安眠药，
脑子昏昏的，一听是总理的电话，便立即强迫自己清醒过来。总理说：“那个经
常
生病的人跑了，……你立即和张达志同志商量部署一下西北方面的紧急战备。”
第
二天，总理又亲自打来电话落实战备情况，在询问完毕后，听得出总理心情很沉
重
，他说：“洗恒汉同志，西北地区你要做牵头人呀。”我当即表态：“总理，我
不
行，还有李瑞山同志他们呢……”总理说：“你要当仁不让嘛！洗恒汉，你不要
太
世故呢！”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当时的西北局已名、实俱亡，各地省自为战，
总
理为了便于管理，便指定我作为西北组的召集人。说句实在话，由于我在军队工
作
几十年，对地方的情况并不是太了解，更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了，因此我一再向总
理
推荐李瑞山、胡继宗这些做了多年地方工作的同志，但总理和主席主意已定，我
不
好多说什么，一方面觉得不能辜负主席和总理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想为西北人
民
做些事情，便硬是咬咬牙挑起了这付担子。

第三章 十年“支左”

◇ 奉命“支左”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毛主席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走资派夺权”的阶段。

进入夺权阶段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普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地方上乱揪斗、乱冲闯有看法，比较反感，军队也时常受到地方造反派的冲击。当时，八届十一中全会规定军队是不受中央文革小组的管辖的，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当时地方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一派群众夺了“走资派”的权，另一派群众又来夺这一派的权，各派都说自己是“左派”，指责别人是“保守派”。到处都是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机关、抢夺“走资派”，随之而起各地出现了武斗、流血事件……这种局势眼看着愈演愈烈。

为收拾天下大乱的局面，1967年1月23日，在毛主席指示下，中央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的决定。

《决定》指出：“在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而不应该充当保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顽固分子的防空洞。”以后，“支左”又发展成包括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在内的“三支两军”。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立即停止“四大”，准备参加“

支左”。但实际上军区的“四大”停不下来，我们说话没有人听，“四大”的余震

一直持续到4、5月份。当时，兰州军区“四大”还未完全平息，我和张达志还都

来不及洗澡换衣，便被专机接到北京领受任务。

关于兰州军区“支左”的安排，具体人员分工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文件也是毛

主席圈阅批示的，但布置任务是周总理亲自谈的。

总理先对刚从批斗会场上下来不久的我和张达志表示慰问，问我们身体情况怎

么样？然后，总理对我们表示坚决的信任。总理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老实人，过去都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次军队机关‘四大’，受到冲击，受了些委屈

，希望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党是信任你们的，毛主席是信任你们的，希望在

‘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

总理又说：“经毛主席批准，由兰州军区负责组织陕、甘、宁、青的‘支左’工作。张达志同志分管军队的工作，洗恒汉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

。现在国家有困难，各地武斗那么严重，工厂都不生产了，造反派不搞联合，需要

人民解放军出来做工作。你们要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西北是工业重镇，国家

有许多大项目在那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全靠你们了……”

总理的话语重心长，我和张达志本来还憋着一肚子委屈想向总理倾诉，这一下

全化为乌有了。我们看到总理一脸疲惫，眼睛里布满血丝，心情很沉重。当时国家

那么乱，中央文革小组又不断找茬子，看到总理心力交瘁的样子，我们都很心疼，

当即向总理表态一定努力搞好“支左”工作，争取早日稳定大西北的形势和恢复生产。

回来后，我们立即召开军区常委会传达中央的精神，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并派出了精兵良将。甘肃省的“支左”工作由当时的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同志负责；宁夏自治区由军区副司令员康建民同志负责；陕西省由当时的 21 军军长胡炜同志负责；青海省由刘贤权同志负责。干部决定以后，再由他们分头负责组织各地的

“支左”班子，一级一级动员、开会，把中央的精神传达到每一个“支左”人员。

当时，很多同志都是刚从批斗会上下来，大标语上还在继续“油炸”和“火烧”。但是，毛主席、党中央一道命令下来，这些受命于国家危难之中的干部，顾不得洗刷自己的委屈，连发牢骚的时间都没有，便立刻收拾行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从此，我们这些军队“支左”人员便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

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在“支左”解放军的帮助下，各大、中、小学校很快都进驻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当时，为了表示支持，毛主席把巴基斯坦访问团赠送给他的一些芒果送给清华大学的宣传队，对大家鼓励很大。军宣队、工宣队总算使各地区、各单位有了领导，较快地结束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局面。

兰州军区的“三支两军”工作，主要的负责人是我。我可以肯定地认为，工作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的办公室和宿舍里安有专线电话，经

常可以和总理办公室通话，直接请示和汇报工作，也可以及时得到总理本人的具体指示。许多直接指导西北地区工作的中央文件，也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示圈阅的。在我“支左”期间，我从未和“四人帮”有过直接联系，也不记得得到过他们的什么指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跟随党和毛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几十年斗争中风风雨雨走过来的人，我不至于糊涂到去听一些根本没有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过的人的瞎指挥。何况，我对这些人是有抵触的，是反感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那么复杂，我就是认准了只跟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一点，我的头脑始终没有动摇过。当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这似乎有些教条和僵化，但我们不可能摆脱当时历史的局限性来谈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才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一决定，我是从心底拥护的，“文化大革命”我本身也是受害者。但是，在当时那个天下大乱的局势下，让解放军来收场，由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及后来的工宣队、军宣队的派驻，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了重要作用。很难设想，如果当时没有解放军的介入，局势将会怎样发展。尽管执行的是中央当时“左”的方针政策，但这是当时唯一能够有效使用的结束这场已经动用了真枪实弹的“八百诸侯，全面内战”的

手段。当然，“支左”工作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整个大的前提错了嘛，当然具体措施

施的对否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些问题我想还是留给专门的研究人员去讨论吧。

◇ 初识“造反派”

对于“支左”，我们的头脑里始终存在着一个实际的问题：谁是“左派”？这个问题无论是毛泽东本人或是中央当时的各种文件中都没有讲明，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不清楚。毛主席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清楚。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后来的具体执行中才容易产生偏差，以至给有的地区带来了严重后果。

兰州军区机关地处兰州，我们虽然对甘肃的运动情况了解得多一点，但对于甘肃各派群众组织我们到底支持哪一派，当时我们的“支左”干部虽经过一番考察和接触，但还是犹豫得很，实在很难下这个决心。

当时甘肃省造反派组织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一派组织由出身比较好、党团员比较多的群众组成，他们比较遵守纪律，造反精神不是很强，被激进的造反派称之为“保守派”，这就是“革联”。这派群众以一般干部为多；

还有一派组织是由造反最早、斗争最坚决、运动一开始便首先受到省委压制和打击的铁路工人们为中心组成的“红联”。由于一开始受到不公正对待，因此造反目的明确、态度坚决。但由于参加者人数众多，各种成分都有，难免鱼龙混珠，各

种违犯纪律和乱搞的事情时有发生；

由于“红联”存在的问题，于是从中分化出另一派组织“红三司”，这个组织大部分由学生和工人组成，他们的政治目标和“红联”一样，但组织成分较为单纯，比较守纪律并拥护军队。

三派都是群众组织，到底支谁舍谁？实在不好下这个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犹豫后，我们想摸一下中央的态度。

由于甘肃省委在运动的一开始便是得罪了群众的，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汪锋同志是被点了名的。因此，几派群众组织目标对准省委是比较一致的。当时，红卫兵们闹到北京去，中央以周总理为首的领导同志还接见了他们，并讲话支持了他们。后来，在北京形成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曾明确表态支持所谓红三司，这样一来，我们当然也就支持了这一派，争取和团结另外的群众组织。

◇ “三个文件”

1967年6月，奉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调我到北京去领受解决甘肃问题的具体任务，几天后，中央又把当时甘肃的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和原甘肃省委书记胡继宗同志也调去。在中央的会议上，拿出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结合胡继宗同志的指示和由中央指定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在此基础上经过讨论并形成了解

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因为是 8 月 5 日从北京带回来的，因此甘肃群众称之为“八五”文件）。文件中，中央明文确定了要结合谁、怎么搞大联合、成立省革委会等一系列问题。我在甘肃“支左”，完全是遵照这三个文件办事的。

由于对三个文件各派群众意见不统一，尤其是“革联”的群众，抵触情绪相当大。当时，街上出现了不少大幅标语，有拥护三个文件的，有反对三个文件的，持反对意见的大标语直接点名说三个文件是张达志、冼恒汉欺骗中央搞的，要：“打倒张、冼，解放大西北”等。因此，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非常艰巨，要把全省的群众联合在三个文件的精神下，要复工、复课，成立革委会，恢复秩序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那一段时间，我们全体“支左”人员几乎是连轴转，哪里出现问题就到哪里去，哪里需要解决问题随叫随到。有好多次我都已经吃了安眠药，脑子已开始犯困了，电话一来，说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放下电话，马上就得走。到外面冷风一吹，睡意也就没有了。当时就是感觉责任重大，一点都马虎不得。

但是，在筹备成立省革委会的过程中，各派群众组织的意见不一致，甚至“红三司”自己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争论的很厉害，影响了大联合的进度，这样就有一个统一认识，即促进联合的问题。

分歧的实质是成立甘肃省革委会时结合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甚至一直到

省革委会已经成立以后，有些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都很大，具体地说就是反对结合

胡继宗同志，提出结合裴孟飞同志。

当然作为裴孟飞同志本人，在原省委工作期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由于运动一开始便得罪了群众，有些群众组织还心存芥蒂，另外当时中央对他的问题也没有一个说法。

胡继宗同志是当时在北京解决甘肃问题时毛主席亲自点名要结合的干部。这个同志很朴实，工作也很踏实，过去和华国锋在湖南一起工作过，在湖南的口碑很好。

我当时在讨论结合谁这个问题的时候，支持中央提名结合的胡继宗等领导干部，没有同意一部分群众提出的结合裴孟飞的意见，我认为这对稳定当时已经初步恢复的政治局面是有好处的，对巩固当前大联合的雏形也是非常有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胡继宗同志在省里工作的很好。他认真踏实、任劳任怨，在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个新秩序的工作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后来，这个同志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繁重的工作，不幸心脏病发作去世。

由于各派群众组织在干部问题上以及各派在革委会中占有席位名额上的意见不一致，造成各派争论不休，互不相让，街上的大字报一茬接着一茬的换，不是你的盖了我的，便是我的盖了你的，常为这些事引起一些事端。

在省革委会成立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问题几派都有分歧，工作是异常的艰辛

，要做每一派的工作，因为“大联合”是基础。那一段时间，我们的“支左”干部

真可谓是“苦口婆心”了。

尽管我们给各派组织的头目都做了很多工作，根据毛主席关于“要支持革命群

众组织中的左派”的指示，对他们尝试团结和教育，但个别造反派头头，还是从各

自的派性地位出发，争权夺利，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致使我们对某些造反组织头

头深感失望。这也造成了后来革委会中军人成分为多，而群众代表则以劳模为多的

普遍现象，理论上应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组成的革委会，最后实际上

主要由军队干部组成，而红卫兵和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占的比例很小。

由于文革初期的无政府主义，许多干部都被本单位或社会群众组织分别关押批

斗，致使这些干部身陷囹圄并成为各派群众相互争斗的原由。针对这一混乱状况，我们以统一监管的名义，将各派组织抓去关押审查的省厅级地方干部，全部收归

“

支左办公室”统一管理，取消各派成立的专案组，对这些地方干部起到了一定的保

护作用。

除了大张旗鼓宣传三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把重点放在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联合

工作上，我还亲自抓造反派的整风，抓兰州地区三派组织的大联合。我要求支左人

员一律下到基层，狠抓三个文件的落实，促进解放干部和大联合，并以省筹备小组

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发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稳定，发展生产等三个八条规定，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按党的干部政策对待，反对“挂黑牌子”、“戴高帽子”，随意罚跪捆绑，不准乱揪斗、抄家搜身；规定凡离开工厂、学校到社会上参与活动的工人、学生一律回工厂、学校就地“斗、批、改”，不准搞大规模的上街游行和批斗大会；要求各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禁止相互武斗，并下令收缴散落在群众中的枪支、匕首等，这些规定对稳定当时甘肃的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

1968年1月24日甘肃省革委会成立，成立以后连革委会的牌子都没有地方挂，结果挂到兰州饭店。因为当时原省委、省政府的机关及重要公共建筑物都是群众组织占据着，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叫喊。那一段时间大的武斗虽然没有发生，但小的诸如你搞我我搞你一类的冲突还是经常发生。解放军“支左”人员虽然在努力做工作，但有的地方做通了，解决了，有的地方解放军根本进不去。社会秩序还是很乱，警察不敢维持和干涉。

那一段时间社会上针对解放军、针对我本人以及新成立的省革委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都很多，有反对的，有拥护的，今天你的盖了我的，明天我的盖了你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又不是地方干部，对地方上的干部、群众又不认

识，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他反我什么呢？我又反他什么呢？无非就是一个要政府，一个不要政府；一个要治，一个要乱嘛。我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搞大联合，搞“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为此而努力去工作的。当然，在那样混乱和复杂的情况下工作，要不犯错误是很难的，这是实际情况。

◇ 复工复课“闹革命”

1967年1月23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当时我们军区的“四大”都还没有停止，我和张达志同志还在接受造反派的批斗。所以，这个“支左”一直拖到了四月初，由周总理提议，经毛泽东主席批示，明确由我负责组织兰州部队参加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张达志同志负责军区工作，我和张达志到北京领受了任务。当时正是天下大乱，而收拾这个混乱局面的任务只有靠解放军了。但是，一堆乱麻，工作从何下手呢？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思路。现在分析起来，历史上“大乱大治”都是发生在政权更换、改朝换代的时候。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掌握着政权，根本不需要通过“大乱”来

达到“大治”，否则只能乱了自己。但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已经乱到了极点，毛泽东打出了最后的王牌：让解放军出来收场，居然在不长的时间内控制住了局面，显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崇高的个人威信，没有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后来的局面是很难设想的。

为了稳定混乱的局势，我们首先调集部队进驻刘家峡水电站、白银公司、兰化、兰炼、兰州铁路局以及中央在甘肃的几个重要国防军工企业等重点单位和地区，并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大专院校、省市机关做群众工作，制止武斗，消除派性。对公检法机关、金融系统、电台、档案机要等部门实行军管。为稳定农村局势，保证农业生产，我们的“支左”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劝说“造反派”不准到农村串联，农民也不准进城游行等。我们还以省革筹小组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颁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发展生产的多项条款规定，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并督促落实。

由于甘肃的战略地位（当时是反修前线），中央对建在这里的几个国家大型工矿企业以及几个重点国防军工企业非常重视，有些重点项目的建设，周总理更是经常亲自过问，我也向中央、国务院立下“军令状”，保证按期完成。

比如刘家峡水电站的复建。刘家峡水电站是国家 1964 年投资兴建的，工程

进展到关键时刻，文革开始了，由于派性严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无法正常指挥生产，当时我们派出了军队得力干部进驻工地，和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做群众工作，解决派性问题，使工程指挥、技术人员以及施工工人能够不受社会上混乱局面的干扰，专心致志加快建设进度，使电站于1969年提前发电投入生产。

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后，甘肃的电用不完。国务院指示我们要支援陕西关中、汉中地区的国防厂矿生产用电。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专门拿出资金，派军区“支左”干部负责指挥架设了从刘家峡到陕西关中的三十三万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保证了陕西地区国防工业生产用电。为此，水电部还发文向全国进行通报表彰，并组织人员参观学习。

再如酒泉钢铁公司，这个工程国家投资十二个亿，十年没有建成投产，“文革”期间更是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烂摊子，周总理很关心这个项目，经常过问。我向国务院汇报了情况，也提出了我们的具体想法和建议，国务院很支持，并批示全国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援，重新上马建设。1971年1月，在中央组织召开的会议上，我和皮定均司令员向周总理立下誓言：本年10月1日不出铁，我俩从高炉上跳下去。我和皮定均点将第十九军副军长郭时胜任建设总指挥，负责该工程的重建工

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0月1日酒钢练出了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产。以后，经过军、地干部和技术人员、广大工人群众的进一步努力，终于把酒钢这个烂摊子初步建成甘肃的钢铁生产基地。

此外，我们对兰州钢厂、兰州机械厂的兴建，对长庆油田的勘探和建设，对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金川公司，以及窑街煤矿、靖远煤矿的扩建改建等工程，也尽了很大的努力，都派出军队和地方得力干部去参加领导，具体组织落实。同时我要求我们省委、省革委会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抽时间亲临现场检查工作，就地解决困难，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这些项目都很快建成投产，为国家提供了大批急需的重要物资。1970年以后，甘肃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税达十八个亿多，改变了历史上工业产值排名落后的状况。

我们省的几个中央直属大型国防军工企业生产形势也很好，比如404、504、805以及长风、万里、新兰等厂，那几年一直在战备，这些厂子的生产任务都压得很紧，在别的省区还在武斗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企业年年超额完成任务。我每次去北京开会，周总理以及国务院几个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碰到后都表示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说中央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和几个国防军工企业都很出色，保

证了国家急需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为战略需要作出了贡献，为原子弹按时试爆成功

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做出了贡献，这在文革动乱时期是很不容易的。

甘肃省历史上是一个工业落后省份，解放初期全省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私营企业

业，产值非常低，轻工产品也几乎全靠外省区调拨。解放后，国家拨款建厂大力开

发甘肃拥有的丰富矿产资源，使甘肃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但由于基础太差，底子太薄，工业产值在全国排名总是倒数几名。

由于军队、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1970年以后，我们的工业排名前进

了不少。除了钢铁、发电、冶金、矿产、机械、军工等外，我们的轻工产品也上了

一个台阶，当时我们的毛线、毛料和毛毯，包括利用化工废料制作的氢纶产品在全

国来讲也是质量上乘的。我们还建成了甘肃电视机厂，拥有了黄土高原自己设计生

产的电视机，虽然是电子管的，体积很大，样子看起来显得很笨重，但这意味着甘

肃电子工业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的汽车修造厂也很不错，柬埔寨的宾努亲王访问兰

州时乘坐的敞篷汽车就是他们改造的，既漂亮又舒适、安全，宾努亲王很感慨，说

原以为甘肃是个人迹罕见的荒凉落后地区，没想到还能自己改造汽车。

不能不提到一点，当时的“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以及“备战

荒为人民”这些口号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些口号，使工人返

回了工厂复工，学生返回了学校复课，社会秩序安定了，人们都立足本职工作了，

混乱的局面结束了，生产和经济工作才能谈得上进行和发展。

◇ 脱贫之水黄河来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历年来干旱少雨，自然灾害不断，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历史上就是一个长期贫困和缺粮的省份，老百姓靠天吃饭，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不少地方群众一年几乎有半年以上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讨饭度日。

解放以后，每年需要国家支援，从外省区调拨大批粮食接济才能勉强度过贫困生活。所以，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是摆在刚刚成立不久的省委、省革委会面前的第一个大难题。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农业是基础，粮食是根本”的方针，我们把抓好农业生产，争取多打粮食摆在省委、省革委会工作的第一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省革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农业发展问题。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沙漠戈壁在全省占很大面积，常年雨量稀少，蒸发量大，有的地方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老百姓吃水都是靠修水窖积聚雨水和雪水，条件十分艰苦。加之多年来缺少治理资金，农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历届省委都下了大力，但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因此，想把粮食一下子搞上去困难比较多。但是甘肃的干部很好，能吃苦、老实、厚道，这是有利条件。

我们部队参加“支左”的大多不是本地人，有些同志对改变甘肃的贫困面貌信

心不足。我对他们讲，我们这些人虽然不是甘肃人，但解放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这里工作、生活，吃的是甘肃人民种的粮，喝的是黄河的水，也算是甘肃的半个儿子了吧？解放这么多年了，这里的条件还这么差，老百姓还这么苦，我们作为共产党，如何向人民交代？现在党要我们来做这里的工作，我们一起为甘肃人民做些事情吧。

甘肃发展农业，关键是水。有水就有粮，有粮老百姓就有饭吃。因此，我们提出要改变干旱面貌，必须以“水”为大，下大力气解决水的问题和控制水土流失问题。省委、省革委会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点抓好“两西”（河西、定西）建设的设想规划。要利用祁连山的水力资源把河西走廊建成商品粮生产基地；要下大力改变定西地区干旱缺水的面貌，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修造梯田，打坝填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为此，我们专门组建了“两西”建设指挥部，选配了懂业务、有干劲的干部具体负责。

这个设想计划上报国务院后，国务院领导认为很好，又把甘肃的“两西”扩大为包括宁夏“西海固”地区，合称为“三西”治理干旱的建设工程，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加大投资，统一实施。几年后确实见了效，也取得了治理干旱的实际经验。

在那几年中，我和省委、省革委会的其他有关领导同志们每年至少有四个月的

时间深入基层视察和调查研究，我们分别深入各地农村蹲点（我在最穷的通渭蹲点），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体察民情，了解情况，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治山、治水、如何解决人畜饮水、农田灌溉渗漏、压砂保墒、如何解决种树成活率等许多实际问题，为我们决策打下了基础。

为了增加治水经费，我多次找国家计委做工作，使计委批准每年投入三千多万元，用于打机井和建设水利设施。几年中我们全省共打机井六万多眼，使八十多万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达到旱涝保收。

为了充分利用黄河流经甘肃境内的地理优势，在续建好刘家峡大型水力发电站的基础上，我们又先后兴建了兰州郊区的八盘峡水电站和地处陇南的白龙江上的文县碧口水力发电站。

为了解决严重干旱问题，我们请专家研讨论证指挥设计并率领群众修建了景泰一条山、靖远、会宁、榆中桑园峡、三角城等黄河提灌工程，使几十万亩旱地变为稳产高产的绿洲。当时，兰州几个大的中央厂矿企业都把农场建在景泰一条山一带，有了水，那里变成了江南，这些企业也都纷纷解决了一部分农业户口的家属的安置问题，这些家属都有种田的经验，把个一条山农场经营的有声有色，坐在火车上经过这一带时可以观赏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

为了彻底改变兰州以北地区的干旱状况，我几次向周总理请示、向国务院报告，建议拨款修建“引大入秦”水力工程，即提引青海大通河水入永登秦王川，浇灌秦王川百万亩旱地的浩大工程。为了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我几次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徒步到实地勘察，遗憾的是，当时因为经费、技术条件所限，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更好地利用小型水力资源，我建议兰州发电机厂和水力涡轮厂生产中小型为主的发电机产品。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多生产中小型机，以满足陇南、陇东和河西地区的中小型发电提灌的需要，你们自己也解决了销路。后来，河西民乐县的两个中型水库，安装了几台中小型发电机组，解决了全县工农业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用电，群众很满意。

经过全省干部群众几年的艰苦努力，甘肃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粮食产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69年前，全省粮食生产一直徘徊在五十亿斤左右，到1970年达七十三亿斤，1975年又超过了百亿大关，大部分地区吃粮达到了基本自给，多数老百姓基本能吃饱肚子，离家外出讨饭的人少了。

我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十年期间，我认为，我们甘肃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以及我们绝大多数的“支左”干部，工作是认真踏实的，态度是积极努力的，并且能吃苦、廉洁自律，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文革的情景我想大

家还都没有忘记，在那样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中，我们甘肃能做到油井出油，煤矿

出煤，钢厂出钢，电站发电，黄河水上山，戈壁旱地产粮，农业增长，粮食翻番，使绝大多数人有饭吃，社会秩序安定，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干部们是在努力

地为人民工作吗？就连后来的省委书记宋平在 1978 年省党代会上也不得不承认

：“十年来甘肃全省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按照肖、韩时期兰州军区党委对我的“结论”的说法，十年来我们是在搞破坏

，这就全盘否定和抹煞了我们甘肃的广大干部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的辛勤工作

，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那几年报纸广播大会小会狂轰滥炸，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甘肃省委也好，兰州军区也好，不工作的人没错，泡病号的人正确（说是抵制错误

路线），而大多数辛勤工作、日夜忙碌的人却错了。我想，我们党的事业、社会的

发展，任何时候都需要勤奋敬业、努力工作的同志去实现。因此，我们还是要讲实

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我们在任何时候，看任何事物，都要

坚持这一原则。

甘肃中西部地区生活艰苦，风沙大，沙暴一起来人和车就被裹在沙涡中，稍一

站不稳就会被刮倒，满脸满头满脖子都灌的是沙土，一张嘴就是一口沙，能见度往

往只有五、六米。一个生产队与另一个生产队之间是大片的荒山秃岭，中午太阳烤

得土地都有一股焦味，有的地方连草都没有一颗，人走过时只有被惊动的蜥蜴在戈壁上飞快地爬行。当时英国有个华裔女作家叫韩素音的，到我们中西部地区去搜集素材，来过好几次。她对我讲过，她第一次来时一下飞机就发出惊呼：“这里还能生存吗？！”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省里和县里的干部要顶风冒沙，不顾酷暑严寒坚持深入基层，每年不少于四个月。那时没有任何补贴，也没有奖金，更不可能提高工资待遇，甚至有的基层干部为了省钱都自带干粮（有些带点土豆找锅煮煮当饭吃），没有人说过什么，也没有人提出要调动。

我们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同志是南方人，或者老家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的人，他们是解放大西北时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一干就是几十年了，找了甘肃的老婆成了家，生了娃娃，算扎下了根，就象电影上说的，成了昆仑山上一颗草，风吹不倒，日晒不枯。这些资格很老的同志有些至今还坚持在基层，很令人感动。

文革时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都有一个体会，你在前面干事，可能就有人在后面搞你的阶级斗争，不知什么时候你可能就要倒霉。当干部的不但捞不到半点油水，有些需要应酬的时候还要自己掏腰包。还有些县里的基层干部进城开会，为了节省开支自己背干粮吃。那时候当干部不长工资，但事情要办好，受了委屈自己找毛主席语录解决问题，想通了第二天接着干，许多基层干部就是这样在工作（当然有些

少数败类除外)。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文革时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我们的基层干部工作放不开手脚，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党长期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基层干部身上起到了作用，廉洁奉公，尽职尽责，吃苦耐劳，发扬了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我们军区派出的“三支两军”干部也大都象地方干部一样，他们无论是来自什么岗位（有些还是从原子弹发射基地来的，还有各个岗位上来的），对自己将要执行的任务都尽职尽责。“支左”人员刚一进点时，工作难度很大，但他们坚决按照中央文件办事，想方设法制止武斗，苦口婆心将几派群众联合到一起，又以身作则搞“抓革命、促生产”，无论是在工厂、学校，还是在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油田、矿井等地，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绿军装的解放军。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那么乱，到处是武斗，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生闹事。甘肃自中央“三个文件”后便逐渐走上整治，并迅速开始恢复生产。这一切，如果没有广大的地方干部和大批“三支两军”解放军官兵们的努力工作是无法作到的。

我常常在想，这些干部好哇，真的是很朴实，很能吃苦。

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甘肃是最平静的一年，农村干劲十足，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不向中央要回销粮、第一次摘掉要回销粮帽子的一年，如果象“结论”上讲的，我们是在搞破坏，是在残酷迫害广大

干部和群众，哪里来的这个成绩呢？“结论”显然是把问题扩大化了。

当然，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也搞了农业学大寨，也抓了农村阶级斗争，提过一些错误的口号，伤害过一些干部和群众。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我在这个时期，无论搞什么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毛主席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执行了那条极左的路线，是有错误的。但是，把这个全党性的历史错误都看成是甘肃一个省的，并且要我来负责，我也确实负不起这个责。另外，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时代，无论从党性、党纪还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我们都只有执行，这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脱离这个历史背景谈问题。

不能不承认，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我也犯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比如在礼县蹲了几天，走马观花地看了几个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又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实际上只有几个公社不错，就当成是全县不错，结果讲了许多大话，过头话，树了一个假典型，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影响很不好。

在农村，农民搞一点小自由，就说是资本主义尾巴，是搞修正主义。实际上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谁也不知道！

另外，在治理甘肃农业的过程中，我们过分强调了自力更生，没有向中央、国

务院要过多少救济粮。当时我们的出发点是“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想方设法

自己省内调济解决，现在反思起来，当时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甘肃的农业问题

是个历史难题，我们苦干了十年，问题解决了一些，粮食产量上去了一些，但这还

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广大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也需要休养生机，因此适当向中央

要求一些救济是必要的。

◇ 放不下的牵挂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度过的，乍一免职时，什么事都没有了，后来连文件都看不上了，一下子成了个局外人，猛然间谁都不需要你了，说个心里

话，真还有点不适应。

人不工作了，心还是放不下，毕竟是操了十年的心啊，一下子还真割舍不下。天下雨了，我就高兴，心想今年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了。天旱的厉害，我就着

急，唉，又要有老百姓出来讨饭了。天天关心天气预报，天天记在台历上，这已经

成了我几十年的习惯，连我的儿女都说我，你又不工作了，还关心天气预报干什么

？我说，习惯了。甘肃的老百姓太苦了，很大程度上讲，还得靠天吃饭，你不关

心天气预报怎么能行呢？

从兰州到中川机场的几十里公路上，沿途都是盐碱地，我们沿公路两旁种上

了树，但成活率很低，树死了，我们就组织人再种，一连种了三年。前两次我都亲

自去看过，不知这第三次树活了多少？

景泰川一条山黄河提灌工程我们搞了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戈壁上有了水，有
了树，有了草，有了庄稼，坐火车从北线走可以看见这一片沙漠绿洲。我免职前，
省里已搞了个二期工程方案，已报请国务院批准了，提水泵要修到十二级，可以
说
是一个奇迹了，如果工程实现预期效果，那么腾格里沙漠就又多了几十万亩的旱
涝
保收稳产田了。可惜我没能亲自参加这一为甘肃人民造福的工程建设，所幸的是，
下一届省委圆满地将这个蓝图实现了，这也足以让我感到欣慰了。

“引大入秦”工程，原来我们曾组织人勘察过，我本人也多次去看过，我们
还
搞过一个方案报国务院，甚至一些前期工作都开始抓了，但因为没有资金无法搞。
现在从报纸上看，这个工程已经开始抓了，这说明我们国家经济有了实力，有能
力
为老百姓办些事实了。这个工程将来完工后，肯定会为老百姓造福，是个子孙后
代
受益的大好事。

最近还有一个问题老是在我脑海里转，就是我们修了不少水库，但水的利用
率
还有问题。你比如说修渠，甘肃的土地沙化的厉害，渠道的衬里就要有讲究，砌
得
不好，水流经渠道，有相当一部分漏掉了，在沙地里蒸发了，那就很可惜。

还有，最近我看电视，那个以色列的自然条件就和甘肃差不多，人家就搞得
很
好。他们浇地搞喷灌，我看这个很适合我们甘肃的情况，我们甘肃一个是缺水，
一
一个是土地质量不好，水浇多了还容易盐碱化，因此，应该借鉴国外的喷灌方法，
搞
些长臂式的大型喷灌机，既节约了用水，又解决了土地盐碱化问题。

甘肃的自然条件恶劣，农业技术底子薄，技术人员缺乏。我们有一所农业大学，还有一些培养农业技术员的中专，但没有经济实力解决技术人员的待遇、房子等具体困难，致使一部分技术人材转业、流失。要想以科技治农，就要留住农业技术专家，改善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甘肃农业的工作中去。科技治农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技术人员就是实现这个途径的宝，所以要设法培养并能留住。

通渭县是甘肃有名的贫困县，荒山秃岭，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建国以后，七任县委书记都认为“通渭没治”。1976年，我曾去那里蹲点几个月，亲眼看到通渭的老百姓生活在极度的困境中。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基层干部与群众一起商量改变贫穷的具体措施。针对通渭荒山荒坡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无雨无收成，有雨冲成沟的特点，当时我们提出了植树种草、兴修水利，发展养殖业等十项措施，发动老百姓在坡地上修整梯田。为了调动广大农民治理荒山的积极性，我们还提出谁栽树谁受益的政策。为帮助通渭县尽快脱贫，我们还组织省委、省政府各部门派出工作组，结合自身业务进行具体帮助，对口支援。

说句心里话，解放那么多年了，看到通渭老百姓还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上，心中

实在不忍，但更多的是自责：作为党的干部怎么向当地老百姓交代？所以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使他们尽快脱离贫困，和全省广大农民一起逐步过上好日子。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离开了领导岗位，事情来的很突然，对通渭的许诺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一些具体帮助也没有来得及落实，更无法亲自继续带领大家实现“治理通渭”的心愿，对不起通渭的广大父老乡亲。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会从电视上、广播上、报纸上看到通渭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到那时，我会把酒遥祝那一方质朴、敦厚的农民兄弟们的！

甘肃的优势是重工业，能源充足，资源丰富，但交通困难，能源优势发挥不了。另外原料与加工能力不协调，国家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经常发生原料供应不足的情况，1974年我们搞过企业挖潜改造，兰化的产量翻了一番，当时康世恩同志还在兰化、兰炼开过现场会，推广过“两兰”挖潜改造经验。但是要彻底解决问题，除了搞企业挖潜外，兰化和兰炼以及西固热电厂应该尝试搞联合，可是这几个厂子上级主管单位不同，归几个部管，具体问题很多，一时半时联合不起来，寄希望于以后体制改革。

最近从电视上、报纸上看到一些工程相继完成了，有的是我们当年没有来得及

完成的工作，有的是后来的同志们新搞的项目，总之，都是造福甘肃人民的好事情

。这些工程完成后，对甘肃的工业、农业以及人民生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大西

北蕴藏着巨大的潜质，但她的开发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是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

地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从解放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西北的开

发还只是开了个头，路还要靠后来人一步一步地接着走，寄希望于后人。

近十来年都没有出门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但总想到甘肃各地再走走，看看工厂又搞了些什么改造项目，看看庄稼长得好不好，看看水渠还漏不漏水，看

看树木成活了多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牵肠挂肚的，比自己的孩子还操

心。老伴儿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讲，远的去不了，就到近处看看吧。她找车陪我上

皋兰山看了看即将完工的兰山提灌工程，我的心情非常感慨，确实还是小平同志那

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支左”十年，心系甘肃十年，我对甘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深厚

的感情，有着一份割舍不掉的牵挂，因为这里毕竟融入了我的心血，留下了我的足

迹。还记得 1974 年去酒钢解决问题，路上突遇暴雨，山洪引起泥石流，沿途社

、队干部群众拦车劝阻不让再行，使我非常感动。因为酒钢的问题很急，所以当时

我们也顾不上什么危险，在当地老百姓的带领下和护送下，和随行的几个同志硬是趟

过洪水，赶往酒钢。1975年我去天水视察，在翻越华家岭时，因公路积雪结冰，汽车打滑，随时有翻下深沟的危险。在险要地段，我和随行人员都下来推车，路过的老百姓都主动过来帮忙。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谁，但看到我们穿军装，推得是军车，知道是军队的干部。他们说，他们那里也有支左的干部，解放军是帮助他们的，所以他们见解放军遇到困难也过来帮忙，这使我很受感动，好象又回到了战争年代的军民鱼水情中。我当时想，解放那么多年了，甘肃的老百姓还生活的那么苦，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还有没有把他们从贫困中彻底解救出来，可他们见到我们这些干部摸样的遇到困难却能不顾严寒和危险主动前来帮忙，这说明了人民对党的干部是信任的，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能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为人民工作呢？

十年“支左”聊以自慰的是，我对这一片土地尽了责任，作了努力。尽管现在这里还很贫穷，人民生活还不富裕，但我会是在有生之年时刻关心着她，祝福着她，愿这片土地上人民安康、省富县强。

第四章 须要说清的一些问题

◇ “油沙豆”及其他

导致我被免职的导火索是铁路问题，但1977年6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时，并没有把我和“四人帮”拉到一起，可后来事情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是肖华、韩先楚、宋平回到兰州后，便立即掀起了一场围剿洗恒汉的所

谓“人民战争”。为了把我搞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他们完全不顾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而是采取了先扣帽子定性，后根据需要补充搜集材料，编织罪名。

当时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都曾提出了“知道什么揭发什么，哪怕是道听途说”，动员人们“翻箱倒柜”。在这样一种人为煽动、一哄而起的氛围下，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联合专案组给我罗列了一大堆所谓“洗恒汉投靠林彪、‘四人帮’，积极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证据”，并且在没有和我本人见面核对及签字的情况下报中央，据此定罪。而正是凭着这些不实之词，给我拷上了“四人帮”代理人的枷锁。对此，除了让人深感痛心之外，还感到迷惑：三中全会以后，这种草菅人政治生命做法居然还能畅通无阻？！

为了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同时也对我自己几十年革命历史负责，对这些将我置于死地的所谓“罪证”，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实。

一、关于江青给的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抄件的问题。

1972年5、6月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江青参加了西北组的讨论。有一天她发言时，念了毛主席原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好几段。她发言后，大家建议，把毛主席这篇文章印发到会的同志，以便学习。她说：“我这份是

政治局发的，将来还要收回去，印发恐怕不可能，你们要我可以让护士抄一份，你
们传看。”第二天她来开会时，将抄件交给我（我是会议召集人），我就将这份抄
件先给新疆的胡良才（因他先提出），而后一省一省的传阅，最后交我。会议结
束
后，江青也没有收回。因为不是大会秘书处发的文件，收文件的单子上没有提到这
个手抄件，所以也没有交，秘书带回来了。回兰州后我告诉秘书交党办保存。这
是
作为公文处理的，并非是私人活动。

二、关于“四届人大时，江青送油沙豆”的问题。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快结束时，会议秘书处通知各省到秘书处领取油
沙
豆种，说此豆适合干旱地区生长，经济价值也很高。我的秘书陈文生也去领了，
根
本不是江青直接送给我的。我们带回去后，交给农办要农科院试种。我还交代说，
甘肃的传统油料胡麻油不能废弃。

三、同米士奇接触的问题。

1976年1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时，王洪
文
的秘书米士奇来看我的秘书陈文生。我事先并不知道他来，他也未去我的房间。
我
只是有事到陈文生房间看见了他，寒暄了几句就走了。事后我问陈文生米士奇来
干
什么，陈说：“他要我给他代买一些中草药。”

四、“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会上乱点乱问”的情况。

1976年3月，中央“反右”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

负责同志会议，甘肃省也在其内。江青在会议上乱点乱问，其中也问到我。她先是问大家：“‘反右’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哇。”因为我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嘴巴没动，后来她补问：“洗恒汉，‘反右’好不好？”我说：“好嘛。”第二句问：“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我答：“有。有一个公务员，还有一个大师傅。”第三句问：“甘肃形势怎样？”答：“还可以。”十二省（区）的同志都在场，都知道，可以查问。至于江青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我在省常委会也好，在其他会议也好，根本就没有传达过。

五、同胡炜的关系。

胡炜原是 21 军军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73 年由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指名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室主任。我同胡炜的关系完全是工作和礼节性的关系。文革期间我们每年都有几次来北京开会的机会，每次胡炜都来看望陕西的同志，同时也来看看我。我们在一起谈话主要是谈地方的事情，偶尔也说“四人帮”的一些怪话。比如江青搞“江青传”、搞“四人帮”，主席批评后，王洪文、江青想去见主席，被主席拒绝；王洪文参加军委会议，说话说不到点子上；西沙群岛战役，上午那些人整叶副主席，下午还要叫叶副主席处理作战的事，叶副主席很苦呀，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听后都很气愤，都表示愤慨。

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但他从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几次电话的内容是：
一次讲皮定均同志飞机失事遇难；
一次问军委工作组向仲华、徐立清何日动身来兰州；

一次毛主席逝世，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问韩先楚怎么还不回来；

还有一次是“四人帮”粉碎后，中央打招呼会议后，韩先楚回兰州才半个月，就又回北京了。韩说“301”让他回去，我说，我们都很忙，实在分不开身，他

身体也不算太坏嘛，怎么又走了呢？是“301”真的追他回去？

我回忆就是这几次电话。

以上接触我认为完全是工作中的正常接触和礼节性的问题，如果把同志之间正

常工作接触和纯属礼节性的来往也看成是政治问题，党内就没有正常生活了嘛。

至于胡炜是不是“四人帮”死党，从未见过中央的正式结论，但韩、肖在给我

的“结论”中却定性说：“冼恒汉同‘四人帮’死党胡炜关系密切”。

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1977年6月9日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华国

锋曾经问我：“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

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

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

。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这个“另有渠道”的问题，象一块千斤巨石压在我的身上，使我苦恼了好几年，我觉得有必要讲一下。

我在1976年10月6日甘肃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了二十几个“按

既定方针办。”但那时我认为这个指示是真的，因此，就进行了宣传。根据是：

1976年8月中旬，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毛主席的两条指示

，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还有一条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茅林同志（省委

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讲话精神时,还特意印发了一个书面汇报提纲,提纲中也写了“按照既定的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这两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国内问题要注意”一条后面加:(现在只传达到这个范围,暂不向下传达。在这之前中央也发过电报,规定只传达到军)。这个汇报提纲当时常委每人发一份,原始稿、省委常委会会议纪要,可能还在,可以查,也可以向茅林调查。

此外,主席逝世后,《人民日报》9月16日的社论,以及9月18日至27日共六期《国内内参》上大量报道这方面内容,要讲渠道就是从这里来的,这就是我讲话的依据。

恰好我住在北京海运仓等待解决问题时,偶然看到中央办公厅1981年31号文件,内容是批华国锋的,其中有这么一段:赵紫阳同志说:“我问我的秘书,‘按既定方针办’怎样来的?”秘书说抄来的。华接着说:“是为了同‘四人帮’斗争的需要。”当我看到这一段话时,我的心情骤然轻松下来,所谓“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交代”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

从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这个历来以忠厚、老实著称的人,其实也会说假话,并以假话陷害人。我不禁想问一声,不顾党性原则,以权压人,这是你作为一个

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应该具备的品质吗？另外，托辞用这句话同“

四人帮”作斗争，你不觉得是自己底气不足吗？

七、1976年10月8日晚，孙殿甲同志告诉我，接北京给解放军报记者打

来电话说“四人帮”已抓起来了。我第二天（9日）上午派陈文生到总院找高副政

委来（因韩先楚不在，高是党委管党委常务工作的），说有个事要告诉他。高来后

，我照孙殿甲同我谈的内容告诉高，我又说，如果是真的，中央总要开个会吧，不

然总要发个文件吧。我们又扯了一下可能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分析，除上海、清华

、北大可能要出一点事外，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军队总的来说没有他们的市场。后

来有人揭发说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是什么宫廷政变，纯属造谣。

八、关于所谓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起哄”的问题。这个帽子韩先楚强

加到我的头上，还不如再拿回去戴到他自己头上更合适。

要说在庐山小组会议上起哄，在毛主席指出陈伯达错误之前，确实是有不少的

同志。但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下面工作，又不善钻营的人来讲，上层斗争的内幕，我们是不清楚的。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任国家主席，哪个不表个态拥护毛主席？

韩

先楚在华东组跳得更高，“哄”起得更凶。当时毛主席还不无惋惜地指出：多数中

央委员都不懂一点唯物主义，而轻易就相信一些骗子的天才论。并指出要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委员中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人所共知的。

至于说我在西北组“起哄”，邓颖超同志和董必武同志都在西北组，这件事情

他们最清楚，是当时最好的见证人。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上午是邱会作、曹里怀等人发言，下午我刚到会场，毛主席就叫我到他的住处开会。会上毛主席严肃批评了陈伯达、李雪峰等人，而后规定

三条：1、会议暂停；2、不提揪斗；3、不要再提他当国家主席（大意）。我回

来后立即宣布小组会散会，各组长留下。邓大姐、董老要走，我请他们留下，传达

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根本不存在什么洗恒汉带头起哄的问题。“9.13”之后发

的材料，林彪反党集团说“西北组温度不高”，这又如何解释呢？邓大姐还健在，可以请她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嘛。

九、1976年1月17日至2月17日，我在北京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

2月18日回兰州，当天下午在省委常委（还有铁路局党委常委参加）的会上传达中

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问题精神时，是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这是事实，但是这

是经过解决郑州、兰州铁路问题的中央领导华国锋同意的。因为郑州和兰州参加会议

的同志都问，回去传达时，如果有人问，右倾翻案是谁搞的，我们怎样回答？华国

锋说，你们可以点名，这个事不久就要公开点名了。

十、给我罗列的所谓“罪名”里有一条是：据郭玉峰交代，王洪文向郭玉峰指

名要洗恒汉到中央工作。还有马天水、王玉珍、徐景贤和刘湘屏等交代，说王洪文给他们讲洗恒汉如何好，工作如何踏实肯干等。这些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呢？怎么能作为证据给人定罪呢？王洪文要调我到中央工作，中央谁也没有给我说过这个事，这是中央的事。就算是有这个事，也只是议论了一下，又没有真正调去，也算一条罪？那么已经去中央工作的人呢？该怎样说呢？另外中央还有不少老同志也说我的好话，这又怎样解释呢？

把这些我并不知道的事写到我的材料中，这是不公正的，完全是形而上学的看问题嘛。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只承认事实，不相信那些无稽之谈，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教训太多了。

另外，什么王秀珍、马天水、徐景贤、刘湘屏之流，我同这些人并不熟悉，有的还不认识，至于王洪文给他们散布洗恒汉的什么，那是他们的事情，由他们自己负责，同我毫无关系，更不应该写到我的材料上，作为给我定罪的依据。

讲到与“四人帮”勾结，什么叫勾结？勾结应该是指拉拉扯扯，搞非组织活动，你来我往，信来信往，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嘛。这些方面我都没有，怎么叫勾结呢？至于勾结起来进行反党活动，有什么事实呢？什么叫反党活动呢？拿《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衡量，能够上哪一条呢？“结论”上没有举出一个象样的

事实来。

十几年来我反反复复地讲，我同“四人帮”并没有你来我往，信来信往，拉拉扯扯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他们并不熟悉，仅有的两次接触，一次是和王洪文吃饭，一次是庄则栋去甘肃，这也都是偶然发生的，这些我都不厌其烦地多次向中央讲清楚了，何以叫“关系密切”呢？得到“四人帮”的“赏识和信任”，有什么事实呢？他们给了我什么呢？所以说，赏识和信任我的是党，有党的信任和支持，我才当兰州军区当了二十多年的政委。我当兰州军区政委时“四人帮”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至于当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也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的指示批准的。当时到北京研究班子时，我曾提议叫胡继宗搞，总理坚持要我搞，他说，大军区所在省，要一名同志挂帅。所以，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那个时候还在上海呢。

十一、“结论”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紧跟林彪、康生制造多起冤、假、错案”的问题。我首先要问，所谓“初期”是从何时算起？又到何时为止呢？如果“初期”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16”通知算起的话，那时候我在干什么呢？我还在甘肃农村蹲点搞社教呢！社教搞到10月，然后去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会议。北京回来后，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开

始，一直到次年 4 月，这期间我失去人身自由，进入了挨批斗的角色。受迫害的应

该是我，我又如何能去制造什么冤、假、错案呢？！

倒是 1966 年 9 月 3 日，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汪锋被群众揪到七里河体育场

批斗（当时我在天水农村社教），后到军区总医院治疗。肖华知道后，专门给军区

司令员张达志同志打电话说：“赶快要汪锋出来，他不能住在军队医院。”张达志

同志打电话与我商量，我们都觉得不好给汪锋直接说，便拐了一个弯，通过地方的

同志给汪锋说，后汪锋搬到七局医院。

十二、“结论”不但给我扣上“四人帮”亲信的帽子，而且还把我和“林彪反

党集团”扯到一起，那就更不实事求是了。林彪反党集团以及黄、吴、李、邱等从

来就不信任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曾从林彪同其死党

的谈话记录中查出，林彪说：“兰州军区连一个通风报信的人都没有，要派一个人

去。”结果派了 X X 任副司令员。这件事是纪登奎当面同高维嵩同志讲的，后中央

召开的西北四省（区）和兰州军区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纪登奎也同我说起此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凡属比较重大的问题，都是直接向毛主席

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请示的，周总理曾当面同我们说过，各大军区向中央反

映情况的兰州军区算是比较多的。我们从来就认为，除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委报告情况外，不能也不应该向任何个人“通风报信”。

另外，前面讲过的潘继祖事件也足以说明问题。这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因为在文革中，江青在许多场合都讲过吴法宪是她保的，江青和吴法宪勾结是很密切的。“四人帮”粉碎后，吴法宪交代，江青和叶群都是在相互利用，说什么你消灭我的“敌人”，我消灭你的“敌人”。对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毛主席、周总理是有态度的，是肯定的。因此，他们想公开的撤掉张、冼不可能，所以就通过潘继祖这样的人来制造突然事件，干掉张、冼，安插自己的亲信。当然，牺牲一个潘继祖，他（她）们是干得出来的。

高炮一师是属空军建制，归兰空领导和指挥，同大军区没有关系，更没有矛盾。潘继祖这个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但他要下这样的毒手，干掉张、冼。吴法宪对潘继祖的所谓数年审讯，从来不给兰州军区透一点气。江青对潘继祖这个凶手一点也不恨，反而利用职权释放他。从这些情况看，不能不使人怀疑潘继祖的后台就是林彪、江青、吴法宪。而“结论”却不顾这些事实，一味将我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人，这不符合事实，也难以让人信服！

十三、“结论”说甘肃省委在悼念毛主席的唁电中有“向江青同志表示慰问”的词句，从而“证明冼恒汉坚决效忠江青”。

唁电是省委发的，并不是冼恒汉发的，是宣传部起草，常委讨论同意的，怎能

把这样的事挂到一个人身上呢？同时不少省（区）和大军区的唁电中也有这样的词
句，这又如何解释呢？上海倒没有，能不能说上海同江青划清界限了呢？唁电中是
把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家属来慰问的，怎么能把这样的事情说成是“向江青表示效
忠
”呢？这不是很可笑吗？

十四、所谓“在党的‘九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冼恒汉在西北组说：‘上面有
个精神，对那些老右倾，既要选上又不能得票过多。’”的问题。

根据我的回忆，兰州军区和甘肃省的代表不是编在西北组，而是同武汉军区和
湖北省以及海军的代表编为一个代表团，曾思玉同志是代表团的召集人。有一天晚
上，吴法宪、郭玉峰等人确实召集了由各代表团派出的代表开了一个会，甘肃省是
胡继宗同志，兰州军区是高维嵩同志参加的。他们回来后，传达了“‘老右’既要
选上，但又不能得票过多”的话，我听后说：“我要投全票，其他代表自己决定。”

◇ 庄则栋河西行

庄则栋这个人我并不熟悉，只是在北京开会时见过面，也没有说过话。晓得他
打乒乓球，是个世界冠军，名气很大。他来甘肃是宋平接待的。庄则栋当时是国家
体委主任，因为甘肃的临泽县是个体育先进县，据说受陈锡联副总理指示，来甘
肃
调查研究体育工作并视察临泽这个体育先进县的。

庄则栋到兰州时，我并不在家，而是在河西走廊视察工作，是宋平当时接待的

他。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视察体育工作

，我在张掖，不见不好，让我接见他一下。

由于临泽是张掖地区的一个县，庄则栋看完临泽后就到张掖，我们安排在 19 军军部见了一面。当时庄则栋见了我就对我讲，是受陈锡联副总理的指示来视察体育工作的。我们在一起谈了我省体育工作方面的情况，我提出要他帮助我们在兰州修建一个体育馆，他没有答应，说现在体育要下放，不是在城市搞，而是要到农村去。寒暄了一番后，庄说他到宁夏时听到些反映，说康健民同志派性大，班子不团结，要我出面帮助解决。我说：“我不能解决，因为他是宁夏第一书记，我是甘肃第一书记，他怎么能听我的呢？”庄说：“你是军区政委，康是副司令，怎么他不听呢？”我说：“那是两码事。”由于谈不拢，就不谈了，我们都出来看他打球。因为大家都慕其打乒乓球的盛名，所以安排打了一场球，吃了个中午饭，他就回临泽了。当时陪同和在场的有关同志很多。

我认为这完全是一次纯礼节性的交往，并且这次见面又是宋平交待办公厅给我的秘书打电话安排的，他不打电话，我是不会接见庄则栋的。现在宋平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却对我无限上纲上线，说什么“密谈”，什么给“四人帮”的心腹提供“炮弹”等等，可见这个人的品质。

我和庄则栋的这次会见，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另外庄则栋并不只是到了甘肃，他内蒙、宁夏、青海都去了，这件事在其他省（区）都不成为问题，惟独对洗恒汉就是问题，这是不公正的。

◇ 王洪文到房间来看我

和王洪文吃过一次饭的问题，是当年做为把我定成“四人帮”亲信的“重磅炸弹”。尽管这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而且运动中我也向中央做了说明，但我还是要把当时的情况讲一下。

1974年中央开会时，当时作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在看望了几个省的代表后路过我的房间，就顺便也进来看了看我。我和王洪文并不熟，可以说连工作关系都很少发生过，当年硬是总理做了工作我们才投了他的票，因此对这个人我一直持保留态度，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和信任。

王洪文来的时候，事先并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正要去食堂吃饭了。他进来后，说了几句客套话，就说：“我吃饭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当时开会都是凭餐券吃饭，因为当时年继荣也在我房间，因此王洪文叫服务员将三份饭送到我的房间，我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说了几句话。饭是普通的会议份饭，很简单，吃完后我们各自向服务员交了自己的餐券。王洪文吃过饭后就走了，继续看望其他省（区）的代表。

至于我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我记忆不深，无非是些客套话，内容也没有出格

，决不是象“结论”上硬强加的那样是“密谋”。当时有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服务人员自始至终都在旁边，这些都是可以调查清楚的。

王洪文当时担任中央副主席，是中央领导，不能说谁与他一有接触就是参与了什么阴谋。再说我与王洪文平时工作中并没有什么来往，互相之间并不了解，他就有什么“企图”也不敢贸然跟我这个不摸底细的人“密谋”呀！况且我当时并不看他这个“年轻人”，觉得他是没有能力担负起党的中央工作的重担的。选他作中央副主席，当时我们很多人思想都不通，除了周总理亲自做我们的工作外，叶剑英还有个公开的讲话，说什么王洪文当过兵、做过工、“过过江”、打过仗，是最“理想”的接班人，这个讲话是以中央正式文件转发的。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脱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看问题。

另外，对“四人帮”这几个人，我还是有戒备心的。我向中央反映我和韩先楚的关系不好的问题时，我是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当时我是有意把王洪文排斥在外的。

以上的这几件事情，都是在工作中发生的很平常的正常接触，但韩先楚、肖华却硬把它作为我和“四人帮”关系的重要依据写进所谓“结论”中并据此定罪，我认为这是手段低劣的政治陷害。如果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我的炮弹将会多的多。

例如，1973年毛主席召开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期间，江青曾把韩先楚请到钓鱼台的住处一起喝酒、吃饭，并一同照了像。粉碎“四人帮”之后，韩先楚并没有向中央讲清楚。后来，中央查抄了江青的住所，韩先楚得知后怕他同江青的合影被抄出来对他不利，很着急，便在回兰州的飞机上，向我讲了这件事。我当时对韩讲：“你在北京开会时，这样的事为什么不给中央直接说？现在你给我说了，让我怎么办？”韩先楚说：“你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我向你说了，不也就是向党说了吗？”

还有韩先楚长期称病住在北京期间，曾有几回陪王洪文去西山打猎，有时天黑了还出去打猎。为了方便王洪文晚上出猎，韩特意找人给王洪文打猎的汽车安装上探照灯。这件事韩先楚在党的会议上也从未讲过。还是当时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在看到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的罪行材料的照片上，有王洪文打猎的汽车探照灯，便当作“笑料”对我讲：“那个探照灯是你们的司令员送给王洪文打兔子的礼品”，并诙谐地说：“有功劳啊！”

1976年冬，中央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时，李先念同志对我讲，韩先楚在武汉给他打电话，要求通过他给福建说一说，把已被福建抓起来的“四人帮”骨干分子放了，被他顶了回去。韩先楚已经离开福建多

年，还插手福建清理“四人帮”骨干分子的事情，那么韩先楚同志同“四人帮”的

关系又作如何解释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果把这些问题都算作是工作和生活中的正常交往

，而把我那几件带偶然性和礼节性的接触都算作是“参与阴谋活动”的话，那么我

们党内生活还有什么实事求是？还有什么公正而言？我们判断是非的依据又是什么

？难道原则可以随便因人而异吗？法在哪里？理又在哪里？

“结论”还说我：“洗恒汉免职受审查以来，对立情绪很大。”那么我反问一

句，十几年来把我当成敌人来整，申诉无人管，辩白无人理，还要我不带一点情绪

？如果这样搞的话，岂不是又回到王明路线统治全党时期的“肃反”了吗？

◇ 赵永夫事件

1967年1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的左派

群众”的号召。1月22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省军

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

“捍卫队”的围攻批斗。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常

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令

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

的待遇。

刘贤权迫于无奈，于 2 4 日凌晨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扭转混乱局面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无论表态支持哪一派都难以稳定局面，于是决定，把原来支持“八一八”的提法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考虑这样提法笼统些，比明确支持某一派更好解释。

这个新的决定，并没有使各派群众组织满意，相反，事态越发严重。同时，省军区机关造反派也借势上街闹事，并在机关内部擅自将刘贤权软禁起来，不许他与外界接触，这实质上也就是篡夺了省军区的领导权。

刘贤权深感问题的严重，心急如焚，担心如此闹出大事来无法向中央军委交代。于是，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要向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报告情况。但机要员将电报稿退回，称：“赵副司令不同意发”。1 月 2 5 日，兰州军区指示，不同意由军队接管“青海日报”社。省军区机关造反派认为是刘贤权报告的，于是以此为借口，抄了他的家，撤了他的电话，并派武装战士看守，实际是将他关押起来。

1 9 6 7 年 2 月 5 日，赵永夫召集机关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出舆论说，“八一八”手中有七、八百支枪，并以自己划线，将省军区领导都划成了“敌人”。

此时的赵永夫利令智昏，将自己封为青海省军区第一把手。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会上由他宣布撤消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正式关押。他的这

一切活动，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严重。

这里还要说一下，文革初期在西宁地区，围绕着倒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保第二书记王昭和保杨倒王的斗争，西宁的群众组织分成了“捍卫队”和“八一八”两大派，对立情绪非常大。现在，省军区的机关造反派也加入了进去，致使局面更加复杂混乱。杨植霖、王昭看到形势严重，省委难以控制局面，便先后借故离开了西宁，使省委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由于赵永夫在省军区机关造反派的支持下，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又改变了支持“八一八”的决定，因此引起“八一八”群众组织的不满，每天都开着宣传车到省军区大院门口叫骂，赵永夫对此十分恼火，便借口由“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报”社有林彪漫画的所谓“反革命”事件，要军事接管报社。

由于赵永夫请示兰州军区遭拒绝，便擅自派出部队强行进入报社进行接管，激化了“八一八”群众的对立情绪，相互形成对峙。赵永夫再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赵永夫十分不满，派出副司令刘XX率领十几名机关造反派，连夜到兰州军区办公楼绝食静坐，胁迫还困身在“四大”余波中的我和张达志撤消不同意他们军事接管报社的批示。

尽管当时我和张达志同志自身处境还很困难，但我们还是坚决表态：批示不能

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更不能强行进入报社，并且对他们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刘 X X 等人看到我们态度坚决，只好返回青海，向赵永夫汇报。赵永夫根本不予置理，仍一意孤行，于 2 月 23 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

23 日下午 1 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于发生。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现场惨不忍睹。报社内惊恐的群众四处躲藏，没有死伤的抓到就投入监狱。这就是曾经震惊全国的 1967 年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西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便立即给青海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的电话才接通了青海省军区的电话。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况，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

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

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

24日上午，我和张达志电告青海，要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将赵永夫、王文英及55师师长陈如意接来兰州。在汇报中，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事后我和张达志为了证实军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向军委发电报请示确认，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在西宁，赵永夫为了掩人耳目、欺骗群众，将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让群众参观，说这是“走资派刘贤权支持的‘八一八’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是斑斑血迹，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薰人的恶臭。被丢弃的帽子、鞋子一大堆，但不见一支枪。

赵永夫把“八一八”搞成反革命组织，在西宁市进行大清查、大搜捕，全市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一些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西宁，到兰州和北京反映真实情况。

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付武装押送的。

月 8 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

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

3 月 29 日晚九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兰州军区

是我和康健民同志参加，同时青海的刘贤权和张江霖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总理就亲自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大意如下：

- 1、青海问题是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推翻了司令员刘贤权，篡夺了军权；
- 2、赵永夫对西宁“八一八”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多人，逮捕群众近万人；
- 3、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经查，报社“八一八”群众并无一枪一弹；
- 4、此事件与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接着，总理宣布中央的处理办法：由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除独立师、独立团外，在处理青海问题上，再划归

几个野战部队归刘贤权指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

”流血事件由赵永夫负责；筹备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赵永

夫隔离审查，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周总理宣读完中央决定后，当即命令北京卫戍部队武装战士把赵永夫等三人

拷

走，会场立刻欢声雷动，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周总理同我、康健

民、刘贤权和张江霖同志一一握手。散会后，又把我们留下具体研究安排了青海省

如何贯彻中央决定的问题。我向总理报告说，兰州军区准备派康健民副司令员去青

海协助刘贤权同志处理青海问题，总理同意。中央对青海“赵永夫事件”的处理，当时还以红头文件告示全党，人人皆知。

十年后，周总理逝世，军委叶剑英元帅曾经两次指示我，让我给青海的同志们
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很为难。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我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但青海的同志们却有他们的道理：“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此事不了了之。

1976年夏季，叶剑英又亲自派遣总政的两个干部来兰州，向我传达他的指示，要我出面把张江霖、宋长庚找来兰州谈为赵永夫平反的事，总政的来人也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张江霖和宋长庚两位青海的领导同志来兰州，并请总政的来

人向他们当面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尽快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
张
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仅凭叶帅个人一句话，我们不好办。我也觉得张江霖
的话有道理，便提议总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叶帅报告，最好请中央能下达个文件
，便于下面执行，也好给群众解释。

这些意见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却直接触犯了叶元帅
的尊严。在 1977 年 6 月处理甘肃问题时，叶帅几次提到我“不听”他的
“话”，“不执行”他的“指示”。而肖华、韩先楚等也以此大做文章，不但将我打成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张江霖也成了“四人帮”在青海的“挂帅人物”。可叹
张江霖一个四方面军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在艰苦的青海地区辛苦工作几十年，落下
一身病痛，最后被作“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对此，连总政、解放军纪委、兰州
军区后来的几届党委都一致认为处理不当，但由于这是由“大人物”下的口喻，所
以一直无法甄改。但愿我们党内这种“以言代法”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不再出现。

◇ 青铜峡事件

关于青铜峡事件的问题，因为事情牵涉到敬爱的周总理，我一直不愿意在其他

场合讲。既然“结论”一再把我和康生挂在一起，我也不得不把事情真相讲清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这是我回忆他们报告的大意，在此之前，徐洪学同志曾电话讲过上述内容，我让他正式报告军区）因为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军区的工作由张达志同志主管，支左工作由我主管。

后来查清楚，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而且这些群众手中也确实掌握了一部分武器，有的是抢夺地方武装部存放的民兵武器，有的是他们自己收集制造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杀伤能力。由于形势严重，另一派群众组织就直接向北京反映情况，强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但因为当时还没有接到六十二师的详细报告，我们对此情况还并不是十分清楚。

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这样，我又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由于是夜里，就通知大家到我家里集中。会上大家分析了情况，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大意）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承上启下是军区的责任，至于以后部队是怎样执行的，因为有别的领导同志专门负责，我主要精力放在甘肃地方上，没有再具体过问。

后来听汇报说，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

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结论”上说，我还通过秘书和值班参谋指示六十二师前指具体怎么打，这
完

全是无中生有。我历来不管这些具体事情，如果有什么意见，也是通过司令员、
参

谋长和作战部长去办，或他们找我商量去办，我怎么可能会让秘书、参谋去指挥
部

队呢？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汇报甘肃问题时，周总理主持“碰头会
议

”正在接见宁夏代表团。总理让秘书打电话叫我去参加，我去的时候，接见快结
束

了，总理正在讲话，我向总理报告说我来了，总理指了个座位叫我坐下。

总理讲话后，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最后总理指示让我讲话，我推托说，总
理

已经作了重要指示，我没有啥讲的。总理第二次又让我讲，我看不好再推托，即
按

总理指示的精神说了几句，具体讲的啥我也记不清了。好在这次会上所有人讲的
话

都录了音，凡是我讲的，我都认帐。在那个情况下，我肯定会讲错话的。“结论”
上说我是陪同康生接见宁夏代表团，这完全不是事实。

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早已作了调查并平了反，平反文
件

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不要层层追究下面的责
任

。”（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编号 0 0 1 5 6 5》）

上述情况，我是在总理指示下，按正常工作程序办的，“结论”说我同康生
勾

结制造了这个冤案，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康生当时只是代表中央给我打电话，
通
知我们中央同意兰州军区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如果这就叫勾结，那也太简单化了吧。

◇ 钱信莎事件

钱信莎，女，原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文革期间，她曾是二医大造反派的
的一个小头头。1968年毕业分配来兰州军区驻青海西宁市第四医院工作。

分配来不久，总后勤部有一个叫陈昌洪的干部率领两个人，持有当时军委办
事
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亲笔批示的介绍信来兰州军区，说有重
要问题要向军区主要领导当面直接汇报。因我当时地方上“支左”工作很忙，没
有
时间，就由张达志司令员和政治部副主任李樾接待，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陈昌洪在汇报中说，第四医院的钱信莎有重大问题，要求兰州军区派人派车
协
助他们把钱信莎从青海抓来兰州关押。并说，案情的审查完全由他们负责，兰州
军
区只负责派人看管，不能让死了、跑了，也不准问及案情。

按照他们的要求，军区在招待所安排了他们的住宿，并立即派人派车协助他
们
连夜到西宁四医院把钱信莎押解来兰州，关押在军区看守所，并抽派女同志专事
看

管，由陈昌洪他们开始对钱的审讯。

由于陈昌洪一行人在审讯过程中搞了不少逼供行为，并明显有打骂、虐待等发生，致使钱信莎对立和抵触情绪很大。对此，看管人员向军区有关领导作了反映，有关领导对陈昌洪等人的做法也提出过意见，请他们注意政策。但因为他们自恃是上面派来的，对军区领导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还认为是“同情反革命”。经过半年多审讯，陈昌洪一行回北京向军委办事组汇报。

1970年初，专案人员又带着黄永胜等人的亲笔批示从北京来到兰州，要把钱信莎案交给兰州军区负责审理，理由是“钱信莎是兰州军区的人”，但又说“钱案”中有涉及中央领导材料，为了保密，案情和档案材料全部带回北京，不移交兰州军区。我们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对他们这种作法感到困惑不解，表示不愿接受这个案件，理由是，事情发生在二医大，前段由总后专案组审查，兰州军区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请他们向军委办事组反映这个意见。于是，他们返回北京汇报。

再次来兰州时，他们带来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的批示件，坚决将此案移交兰州军区，除一般性材料留下外，“核心”材料仍不移交，并且不准留下军委办事组的所有批件。对此，军区有关负责同志产生了怀疑，觉得军委办事组可能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事，怕将来一旦出事说不清楚，便坚决要求他们将详细案情移交清楚，并将军委办事组的批件留下，否则，军区坚决不接收。

陈昌洪等专案人员见军区态度如此坚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将案件作了一般性介绍，并将所介绍内容的有关档案材料留下，至于军委办事组批示件只同意给留下复印件，原件仍要带回北京。

经过反复争论和协商，军区只接受对他们所移交案情材料有关内容进行核查，其它问题军区一概不加过问，最后的定案处理由军委办事组审查决定。就这样，在以军委办事组名义的高压下，兰州军区不得不将“钱信莎案件”接收下来，组成了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成克仁为组长的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后，对移交的材料所涉及的几个问题作了调查核实，但没有发现什么重大问题，更没有涉及到什么有关“军委领导”的问题。在讯问中军区专案组没有发生逼供现象，这一点钱信莎本人也承认。

几个月后，军委办事组多次催要军区上报材料，并几次电话说明军委办事组领导同志的意见，要我们以军区党委名义，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定性报军委办事组。军区党委经过认真的研究讨论，认为根据现有材料根本不能定为“现行反革命分

子”，她虽有些错误，也只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极左”的过火行为，构不成

“反革命”罪，更不能以兰州军区党委名义向上写这样的定性报告。

军区专案组电话向军委办事组专案人员讲明兰州军区党委的意见后，军委办事组专案人员答复：军委办事组领导不同意，坚持要按“现行反革命”定罪，并以军区党委名义书面正式上报。在此压力下，我们无奈，只得写报告，但在报告开头确写上了：“按照军委办事组首长指示，将钱信莎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报军委办事组，是否适当，请审定批示”。这个报告送上去后，一直没有批复。

1971年“9.13”前几天，陈昌洪等人又突然来兰州，对军区的报告只字未提，只说要将“钱案”收回，由他们自己负责审查，并要组成“联合审查组”，由总政、总后、二医大、兰州军区派人参加，由总后负责。军区对他们收回“钱案”表示欢迎，觉得松了一口气。并提出不派人参加“联合审查组”，因为不了解情况，参加了也不起什么作用，总之是想尽快摆脱此事。

正在同总后来人协商之际，还未正式办理“钱案”移交手续，“9.13”事件发生，黄永胜等人也被抓起来了，北京来人匆忙返回，从此，“钱案”再无人过问。

“9.13”后，我们军区几个常委在一起讨论，都觉得“钱信莎案件”从始至终都是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以军委办事组名义一手操纵审查的，这里面可能有什么阴谋，但背景到底是什么不清楚。现在黄永胜既然倒台了，就立即向军委写报告，建议解除对钱信莎的关押。

报告送上去后还未等批复，军区就先将钱信莎释放，改为办“学习班”，并向她传达了林彪事件和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的情况，让她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军委的批示。但不知什么原因，军委一直没有批复。这样，一直等到11月初，军区见上边迟迟没有动静，便自行决定完全恢复了钱信莎的自由，送回第四医院工作。

“钱信莎事件”是“结论”硬强加给我的所谓“阴谋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恶毒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的依据。那么，一个二医大学生的事件和以上罪名又有什么联系呢？免职以后我才搞清楚此事的背景，原来钱信莎据说是叶剑英元帅的一个亲戚！

利用“钱信莎事件”硬强加于我一个“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既叶剑英同志的罪名，这未免有些太牵强并太不实事求是了吧。第一，前面已经说过，“钱案”是兰

州军区被迫接受的，并且只负责审查其中的“一般案情”部分。至于黄永胜等人到底要搞什么名堂？要通过钱信莎整谁？他们始终未向兰州军区透过底。对于“钱案”，我和张达志同志以及军区其他有关领导，从一开始就有怀疑，并千方百计进行抵制，但无济于事，因为，作为下级的兰州军区来讲，毕竟顶不住上级用军委名义强压下来的指示，我想，兰州军区党办和军委有关机要部门应该还保留有当时的多次往来电话记录以及有关的上报材料和备忘录，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第二，我们确实谁都不知道钱信莎是叶帅亲戚这一背景，那么，被迫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把矛头指向叶剑英元帅，这个结论未免下的太武断了吧！

曾作过总政主任的肖华应该很清楚，我们党内斗争多，各种不同时期都有中央的犯人被押解到基层看管，兰州军区条件艰苦，地处边疆，更是如此。这些上面来的犯人，我们只有配合派人看管的义务，根本没有过问的权力，有很多人从来到走，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肖华作总政主任时期我们这里也来过总政的犯人，难道这也要由我们负责？都要记到我们帐上？

“钱信莎事件”是“文革”浩劫中无数个冤、假、错案之一，但这并不是我造

成的，也没有兰州军区的责任。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韩先楚和肖华，说话办事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既然“三中”全会以后党内的思想已经得到统一，我们党也结束了“文革”所造成的各种混乱，那么，利用混乱年代所造成的混乱事端又来制造新的冤、假、错案，那岂不更是错上加错吗？

“钱信莎事件”，不把罪责挂到林彪反党集团头上，反而挂到兰州军区和我的头上，这岂不是本末倒置、是非颠倒了了吗？这岂不是告诉大家，林彪反党集团抓人无罪，而我们释放了人倒有罪了？这不是等于站在林彪反党集团的立场上，帮助黄、吴、李、邱开脱罪责吗？

“钱信莎案”，实际上是邱会作搞的打击报复，但是肖华、韩先楚却将“钱案”作为所谓“洗家帮”要“阴谋陷害敬爱的叶副主席”的主要罪证写在“结论”里，以此来挑唆激怒叶剑英元帅对我的不满。

◇ 是否有一个“洗家帮”？

所谓“以洗恒汉为首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即“洗家帮”纯属是肖华、韩先楚凭空捏造出来的，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还曾被冠以一个副词：“壳壳很

硬”。由于这个杜撰的“洗家帮”，使得兰州军区和西北地区有成千上万的干部被结束了政治生命，长期不分配工作，普遍得不到信任，在年富力强的年华被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机会。对于这个问题我多年来曾给中央及有关领导写了无数封信和申诉材料，但都没有回音，因此，在这里我要谈谈这个问题。

兰州军区的干部大都是解放大西北时第一野战军的指战员，这些同志中有参加长征从祖国的南方到祖国的大西北的老红军；有来自陕甘宁的刘志丹部陕北红军；有晋察冀的抗日战士；还有大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和各路知识青年。

这些同志随一野的各个兵团在解放大西北的炮火声中撒遍了浩瀚大西北的各个城市、乡村、草原、荒漠、戈壁。战争结束以后，他们或继续留在部队镇守边疆，或转业地方参加建设大西北的工作，无论是南方的、北方的、喜欢吃大米的、喜欢吃馒头的，统统都毫无怨言“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不仅能征善战，在建设时期也同样能吃苦耐劳，衷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在这片黄土高原上。他们都找了西北的婆姨，在西北生孩子、过日子，几十年了，把自己的青年、老年以及子孙都无私奉献给了大西北。这些同志，构成了我们兰州军区机关和部队以及西北地区各地方早期干部的基本队伍。

还有比例不小的干部是解放后几十年来从全国各个地区陆续调来的同志，他们为了党的事业，服从组织调动，来到祖国大西北这个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作出了巨大成绩。

无论是什么时期、什么地区来的干部，大家都团结一致努力为党工作着。我们对这些干部也从不分彼此厚薄，在推荐选拔使用任命上一视同仁，搞五湖四海。

在我们军区领导中就有不少从其他各军区调来的干部，例如孔 X X、张 X X、张 X、卜 X X 等，我们按照总政的意见对他们均委以重任，都交给了很重要的工作，并没有薄待他们。

不仅是军区机关、部队，地方也如此。例如宋平同志原来在陕西长期靠边站，不被任用，我专程到西安将他要到甘肃并重用他全面负责省生产指挥部的工作，以后又是省计划委员会主任、省委书记等。

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我们的干部是做什么工作，都是经组织部门严格考察报审和党委集体讨论研究的，很多干部过去并不认识我，我也不熟悉他们，是革命需要走到一起来了。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干部队伍没有什么“山头、宗派、圈圈、摊摊”等，我们是秉公办事，五湖四海。

根据工作的分工，无论是我的同事，还是我的下级，和有的同志接触可能多一

些，但我们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这个人办事较原则，平时很少私人交往，不熟
悉我的人都说我生性孤僻，有些“怕”我。我在工作范围内没有“山头”，生活
圈
子里不搞“裙带”，因此，更没有什么“帮派活动”和“私下交易”，这是我做人
的原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党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我每次到北京开会，都是会议
一
完当天就走，从不逗留，更不到任何上级和朋友家串门、应酬。我解放以后几十年
一直在西北地区工作，对中央上层斗争内幕以及党内各种矛盾消息闭塞，信息知
之
甚少，加之我是一个军人，从不思钻营，工作中信奉的是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
以
及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袖们的无限信任和敬仰。我作官为人，对上不给自己
找靠山，对下不给自己拉山头。在我任职期间，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封过官许过
愿
，也不记得有什么干部找我要过官和权。我一生鄙视不正之风，一生对党问心无
愧
。既然不谋私利，何来“帮派”而言？对于这个问题，我就是到马克思那里去，
也
是可以拍胸脯的。

当然，无论是哪一个单位，总是有一些干部到的早一些，有一些干部到的晚
一

些，有的呆得时间长一些，有的呆得时间短一些，这是客观存在，也是历史形成的
的
嘛。哪个单位都是这种情况，今后也还是这样的。所以不能主观的没有根据的认为
为
，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长的，就一定是要搞山头，搞宗派，搞帮派体系。我们一贯
贯
认为，不管那里来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应该有彼此之分。我在兰州军区任
任
政
委二十二年，我认为军区党委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搞五湖四海的，军区干部队伍
队
伍
总的来说是团结统一的，没有什么山头，没有什么宗派，没有亲疏之分，也不存在
在
什么排外问题。

在“结论”中给我强行划定的所谓“洗家帮”体系里，有军以上干部，有机
机
关
和师团干部，几个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以及各军分区、武装部，甚至所有参加 “
支左” 的人员。据“清查”后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军区被划入“洗家帮”而受到
受
批
斗或株连的多达二千余人。这些同志和我都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其中的绝大部分
分
我根本就不认识，更没有直接的工作交往。他们被定为“洗家帮”亲信、骨干后，
统统被关押审查，有的被批斗几十天或几个月，有的长达一年多。无论有无问题
或
问题大小，一律“停止工作检查交代问题”，其中多数人从此被“免职”、“罢
罢
官
”，再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

例如，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军委尚未下达免职命令，就调来兰州
住招待所交代问题，虽无查出任何问题，但也一直未分配工作，最后作离休处理。

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也是军委未免职就调来兰州审查，“靠
边站”三年多，才被军委重新分配。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同志是老红军，却被作“退休”处理；政委宋长庚
“靠边”三年，后因上面有人说了话，才调其它省军区工作。

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副司令员王晓一、张怀礼，副政委张光勃等，批斗几
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被命令离休。

对于藺进生同志和曾给我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
则更是不放过，一直审查十年，最后硬是编造了几条所谓“错误”，给了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降级离休处理。

在撤换改组军以上领导班子的同时，对大部分师团主要领导也进行了更换，
特别是甘肃、青海、宁夏的军分区甚至县市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进行了大
换班。

对于划入所谓“洗家帮”的军区领导，也进行了数月甚至几年的打击迫害，使
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残。例如军区副政委高维嵩同志，长期带病工作在青海高原，
在肺气肿和哮喘病频繁发作的情况下，经常靠氧气和药物坚持工作，却从未提出
过
调到内地气候好一些的地区去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好干部，在打击“洗家帮”的
运
动中，被非法关押批斗一年之久，有病不让住院，即使住进医院还不放过，派人在
在
病床前围斗，不许家属子女送饭，致使高维嵩同志身心焦瘁，于1985年含冤
过
早离开人世。

李书茂同志，军区副司令员，贺龙同志的老部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洪
湖
籍老红军，被非法关押一年两个月之久，大会批小会斗，甚至体罚侮辱人格。在
残
酷打击迫害下，致使体弱心衰，疾病缠身。

这些同志都是经过长期考验的我们党的优秀儿子，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军队的
宝
贵财富，就因为肖华、韩先楚人为制造的“洗家帮”冤狱，使他们被打入另册，
背
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

这些同志都是我工作中的同事、战友、部下，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私利的交易，
更没有不正常的非组织结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光明正大的、是经得起组织任何
考
查的。如果一定要说“帮派”的话，那我们都属于共产党、毛泽东这个“帮派”，

除此而外，别无他属！

对于“结论”中几个强加于我的所谓搞“冼家帮”的“罪证”，我有必要说清楚，还事物以本来面貌。

一、所谓 1974 年 9 月背着党委诬告韩先楚的问题。1974 年 8 月中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会议主要听取那些上林彪贼船的人的检讨，韩先楚是其中之一。会议完后，我们遵照中央规定，召集军区常委及各省（区）第一书记（或组织工作的书记）传达。讨论时张 X 首先发言，说韩检讨不好，到会同志也都有这个感觉。会议完后，党办将会议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个电报，我签发了这个报告。因为我主要是主持地方工作，报告送来我也没有问其他常委们是否都看了，只是看报告是反映会议情况，而且是符合会议精神的，我就签发了，怎么叫诬告呢？我第一书记不能签发报告？可以把电报同会议记录对照对照嘛。

二、所谓背着党委在西安召集 21、47 军领导传达中央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精神的问题。

一个政委不能在下面找一些同志谈话，一找谈话就扣上“背着党委”的大帽子，我军从来也没有这样搞过。

我在西安找 2 1、4 7 军的同志来谈一谈，并不是开会。找他们来谈是出于这样的愿望的，即在十次路线斗争中，2 1 军刘江亭、4 7 军刘凌等是有错误的，据反映两军都对他们老是揪住不放，同时 4 7 军对广州军区有很大意见，批林批孔时，据说他们准备给广州送大字报。为此，我给他们谈这次中央召开的会议，对犯错误的同志如何宽大，以及毛主席指示中对广州有一段话，这样纠正他们对犯错误同志的做法，不要总揪住不放，另外，缓和 4 7 军和广州军区的紧张关系。我的动机就是这样一个目的，而没有别的什么。

三、1 9 7 5 年 8 月，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韩先楚和张 X 在各组大讲特讲兰州军区有宗派、山头、排外，等等。他们都是党委书记和常委，但他们又不在常委会上提出来，而是到下面大肆地讲，并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会内会外（军区机关）反映强烈，对团结不利。在这样的情况下，逼着我在作总结之后，不能不讲一点个人意见。我个人的发言，我认为正确的，从头至尾都是讲一个团结问题。

四、“批林批孔”，说我把矛头指向老干部，指向韩先楚同志。韩先楚就是老

干部，老干部就是韩先楚，我们就不算老干部？有人贴了几张大字报，就叫矛头指

向韩？我的大字报比他多得多，怎样解释呢？在福建省、福州军区，他的大字报铺

天盖地，还上福州军区小报，那又怎样说呢？很多大字报、小字报转到兰州，我都

指示扣下，不予理睬，兰州不管福州的事情，我是保他呢还是将矛头指向他呢？

由于甘肃的战略地位（当时是反修前线），中央对建在这里的几个国家大型工
矿企业以及几个重点国防军工企业非常重视，有些重点项目的建设，周总理更是经
常亲自过问，我也向中央、国务院立下“军令状”，保证按期完成。

比如刘家峡水电站的复建。刘家峡水电站是国家 1 9 6 4 年投资兴建的，工程
进展到关键时刻，文革开始了，由于派性严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无法正常
指挥生产，当时我们派出了军队得力干部进驻工地，和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同
劳动，做群众工作，解决派性问题，使工程指挥、技术人员以及施工工人能够不受社
会上混乱局面的干扰，专心致志加快建设进度，使电站于 1 9 6 9 年提前发电投入
生产。

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后，甘肃的电用不完。国务院指示我们要支援陕西关中、汉
中地区的国防厂矿生产用电。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专门拿出资金，派军区“支

左”干部负责指挥架设了从刘家峡到陕西关中的三十三万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保证了陕西地区国防工业生产用电。为此，水电部还发文向全国进行通报表彰，并组织人员参观学习。

再如酒泉钢铁公司，这个工程国家投资十二个亿，十年没有建成投产，“文革”期间更是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烂摊子，周总理很关心这个项目，经常过问。我向国务院汇报了情况，也提出了我们的具体想法和建议，国务院很支持，并批示全国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援，重新上马建设。1971年1月，在中央组织召开的会议上，我和皮定均司令员向周总理立下誓言：本年10月1日不出铁，我俩从高炉上跳下去。我和皮定均点将第十九军副军长郭时胜任建设总指挥，负责该工程的重建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0月1日酒钢练出了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产。以后，经过军、地干部和技术人员、广大工人群众的进一步努力，终于把酒钢这个烂摊子初步建成甘肃的钢铁生产基地。

此外，我们对兰州钢厂、兰州机械厂的兴建，对长庆油田的勘探和建设，对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金川公司，以及窑街煤矿、靖远煤矿的扩建

改建等工程，也尽了很大的努力，都派出军队和地方得力干部去参加领导，具体组
织落实。同时我要求我们省委、省革委会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抽时间亲临现场检查
工作，就地解决困难，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这些项目都很快建成投产，为国家提
供
了大批急需的重要物资。1970年以后，甘肃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税达十八个亿
多
，改变了历史上工业产值排名落后的状况。

我们省的几个中央直属大型国防军工企业生产形势也很好，比如404、5
0
4、805以及长风、万里、新兰等厂，那几年一直在战备，这些厂子的生产任
务
都压得很紧，在别的省区还在武斗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企业年年超额完成任务。
我
每次去北京开会，周总理以及国务院几个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碰到后都表示对我
们
的工作非常满意，说中央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和几个国防军工企业都很出色，
保
证了国家急需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为战略需要作出了贡献，为原子弹按时试爆成
功
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做出了贡献，这在文革动乱时期是很不容易的。

甘肃省历史上是一个工业落后省份，解放初期全省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私营
企
业，产值非常低，轻工产品也几乎全靠外省区调拨。解放后，国家拨款建厂大力开
发甘肃拥有的丰富矿产资源，使甘肃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但由于基础太差，

底子太薄，工业产值在全国排名总是倒数几名。

由于军队、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1970年以后，我们的工业排名前进
了不少。除了钢铁、发电、冶金、矿产、机械、军工等外，我们的轻工产品也上了
一个台阶，当时我们的毛线、毛料和毛毯，包括利用化工废料制作的氢纶产品在全
国来讲也是质量上乘的。我们还建成了甘肃电视机厂，拥有了黄土高原自己设计生
产的电视机，虽然是电子管的，体积很大，样子看起来显得很笨重，但这意味着甘
肃电子工业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的汽车修造厂也很不错，柬埔寨的宾努亲王访问兰
州时乘坐的敞篷汽车就是他们改造的，既漂亮又舒适、安全，宾努亲王很感慨，说
原以为甘肃是个人迹罕见的荒凉落后地区，没想到还能自己改造汽车。

不能不提到一点，当时的“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以及“备战
备荒为人民”这些口号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些口号，使工人返
回了工厂复工，学生返回了学校复课，社会秩序安定了，人们都立足本职工作了，
混乱的局面结束了，生产和经济工作才能谈得上进行和发展。

◇ 脱贫之水黄河来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历年来干旱少雨，自然灾害不断，农业生产条件落后，
历

史上就是一个长期贫困和缺粮的省份，老百姓靠天吃饭，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不少地方群众一年几乎有半年以上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讨饭度日。解放以后，每年需要国家支援，从外省区调拨大批粮食接济才能勉强度过贫困生活。所以，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是摆在刚刚成立不久的省委、省革委会面前的第一个大难题。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农业是基础，粮食是根本”的方针，我们把抓好农业生产，争取多打粮食摆在省委、省革委会工作的第一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省革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农业发展问题。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沙漠戈壁在全省占很大面积，常年雨量稀少，蒸发量大，有的地方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老百姓吃水都是靠修水窖积聚雨水和雪水，条件十分艰苦。加之多年来缺少治理资金，农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历届省委都下了大力，但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因此，想把粮食一下子搞上去困难比较多。但是甘肃的干部很好，能吃苦、老实、厚道，这是有利条件。

我们部队参加“支左”的大多不是本地人，有些同志对改变甘肃的贫困面貌信

心不足。我对他们讲，我们这些人虽然不是甘肃人，但解放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这里工作、生活，吃的是甘肃人民种的粮，喝的是黄河的水，也算是甘肃的半个儿子了吧？解放这么多年了，这里的条件还这么差，老百姓还这么苦，我们作为共产党，如何向人民交代？现在党要我们来做这里的工作，我们一起为甘肃人民做些事情吧。

甘肃发展农业，关键是水。有水就有粮，有粮老百姓就有饭吃。因此，我们提出要改变干旱面貌，必须以“水”为大，下大力气解决水的问题和控制水土流失问题。省委、省革委会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点抓好“两西”（河西、定西）建设的设想规划。要利用祁连山的水力资源把河西走廊建成商品粮生产基地；要下大力改变定西地区干旱缺水的面貌，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修造梯田，打坝填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为此，我们专门组建了“两西”建设指挥部，选配了懂业务、有干劲的干部具体负责。

这个设想计划上报国务院后，国务院领导认为很好，又把甘肃的“两西”扩大为包括宁夏“西海固”地区，合称为“三西”治理干旱的建设工程，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加大投资，统一实施。几年后确实见了效，也取得了治理干旱的实际经验。

在那几年中，我和省委、省革委会的其他有关领导同志们每年至少有四个月的
的
时间深入基层视察和调查研究，我们分别深入各地农村蹲点（我在最穷的通渭蹲
点
），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体察民情，了解情况，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群众
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治山、治水、如何解决人畜饮水、农田灌溉
防
渗漏、压砂保墒、如何解决种树成活率等许多实际问题，为我们决策打下了基础。

为了增加治水经费，我多次找国家计委做工作，使计委批准每年投入三千多
万
元，用于打机井和建设水利设施。几年中我们全省共打机井六万多眼，使八十多
万
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达到旱涝保收。

为了充分利用黄河流经甘肃境内的地理优势，在续建好刘家峡大型水力发电
站
的基础上，我们又先后兴建了兰州郊区的八盘峡水电站和地处陇南的白龙江上的
文
县碧口水力发电站。

为了解决严重干旱问题，我们请专家研讨论证指挥设计并率领群众修建了景
泰
一条山、靖远、会宁、榆中桑园峡、三角城等黄河提灌工程，使几十万亩旱地变
为
稳产高产的绿洲。当时，兰州几个大的中央厂矿企业都把农场建在景泰一条山一
带

，有了水，那里变成了江南，这些企业也都纷纷解决了一部分农业户口的家属的安置问题，这些家属都有种田的经验，把个一条山农场经营的有声有色，坐在火车上经过这一带时可以观赏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

为了彻底改变兰州以北地区的干旱状况，我几次向周总理请示、向国务院报告，建议拨款修建“引大入秦”水力工程，即提引青海大通河水入永登秦王川，浇灌秦王川百万亩旱地的浩大工程。为了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我几次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徒步到实地勘察，遗憾的是，当时因为经费、技术条件所限，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更好地利用小型水力资源，我建议兰州发电机厂和水力涡轮厂生产中小型为主的发电机产品。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多生产中小型机，以满足陇南、陇东和河西地区的中小型发电提灌的需要，你们自己也解决了销路。后来，河西民乐县的两个中型水库，安装了几台中小型发电机组，解决了全县工农业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用电，群众很满意。

经过全省干部群众几年的艰苦努力，甘肃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粮食产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69年前，全省粮食生产一直徘徊在五十亿斤左右，到1970年达七十三亿斤，1975年又超过了百亿大关，大部分地区吃粮达到

了基本自给，多数老百姓基本能吃饱肚子，离家外出讨饭的人少了。

我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十年期间，我认为，我们甘肃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以及我们绝大多数的“支左”干部，工作是认真踏实的，态度是积极努力的，并且能吃苦、廉洁自律，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文革的情景我想大家还都没有忘记，在那样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中，我们甘肃能做到油井出油，煤矿出煤，钢厂出钢，电站发电，黄河水上山，戈壁旱地产粮，农业增长，粮食翻番，使绝大多数人有饭吃，社会秩序安定，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干部们是在努力地为人民工作吗？就连后来的省委书记宋平在 1978 年省党代会上也不得不承认：“十年来甘肃全省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按照肖、韩时期兰州军区党委对我的“结论”的说法，十年来我们是在搞破坏，这就全盘否定和抹煞了我们甘肃的广大干部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的辛勤工作，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那几年报纸广播大会小会狂轰滥炸，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甘肃省委也好，兰州军区也好，不工作的人没错，泡病号的人正确（说是抵制错误路线），而大多数辛勤工作、日夜忙碌的人却错了。我想，我们党的事业、社会的发展，任何时候都需要勤奋敬业、努力工作的同志去实现。因此，我们还是要讲实

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我们在任何时候，看任何事物，都要坚持这一原则。

甘肃中西部地区生活艰苦，风沙大，沙暴一起来人和车就被裹在沙涡中，稍一站不稳就会被刮倒，满脸满头满脖子都灌的是沙土，一张嘴就是一口沙，能见度往只有五、六米。一个生产队与另一个生产队之间是大片的荒山秃岭，中午太阳烤得土地都有一股焦味，有的地方连草都没有一颗，人走过时只有被惊动的蜥蜴在戈壁上飞快地爬行。当时英国有个华裔女作家叫韩素音的，到我们中西部地区去搜集素材，来过好几次。她对我讲过，她第一次来时一下飞机就发出惊呼：“这里还能生存吗？！”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省里和县里的干部要顶风冒沙，不顾酷暑严寒坚持深入基层，每年不少于四个月。那时没有任何补贴，也没有奖金，更不可能提高工资待遇，甚至有的基层干部为了省钱都自带干粮（有些带点土豆找锅煮煮当饭吃），没有人说过什么，也没有人提出要调动。

我们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同志是南方人，或者老家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的人，他们是解放大西北时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一干就是几十年了，找了甘肃的老婆

成了家，生了娃娃，算扎下了根，就象电影上说的，成了昆仑山上一颗草，风吹不倒，日晒不枯。这些资格很老的同志有些至今还坚持在基层，很令人感动。

文革时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都有一个体会，你在前面干事，可能就有人在后面搞你的阶级斗争，不知什么时候你可能就要倒霉。当干部的不但捞不到半点油水，有些需要应酬的时候还要自己掏腰包。还有些县里的基层干部进城开会，为了节省开支自己背干粮吃。那时候当干部不长工资，但事情要办好，受了委屈自己找毛主席语录解决问题，想通了第二天接着干，许多基层干部就是这样在工作（当然有些少数败类除外）。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文革时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我们的基层干部工作放不开手脚，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党长期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基层干部身上起到了作用，廉洁奉公，尽职尽责，吃苦耐劳，发扬了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我们军区派出的“三支两军”干部也大都象地方干部一样，他们无论是来自什么岗位（有些还是从原子弹发射基地来的，还有各个岗位上来的），对自己将要执行的任务都尽职尽责。“支左”人员刚一进点时，工作难度很大，但他们坚决按照中央文件办事，想方设法制止武斗，苦口婆心将几派群众联合到一起，又以身作则

搞“抓革命、促生产”，无论是在工厂、学校，还是在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油田、矿井等地，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绿军装的解放军。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那么乱，到处是武斗，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生闹事。甘肃自中央“三个文件”后便逐渐走上整治，并迅速开始恢复生产。这一切，如果没有广大的地方干部和大批“三支两军”解放军官兵们的努力工作是无法作到的。

我常常在想，这些干部好哇，真的是很朴实，很能吃苦。

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甘肃是最平静的一年，农村干劲十足，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不向中央要回销粮、第一次摘掉要回销粮帽子的一年，如果象“结论”上讲的，我们是在搞破坏，是在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哪里来的这个成绩呢？“结论”显然是把问题扩大化了。

当然，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也搞了农业学大寨，也抓了农村阶级斗争，提过一些错误的口号，伤害过一些干部和群众。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我在这个时期，无论搞什么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毛主席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执行了那条极左的路线，是有错误的。但是，把这个全党性的历史错误都看成是甘肃一个省的，并且要我来负责，我也确实

负不起这个责。另外，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时代，无论从党性、党纪还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我们都只有执行，这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脱离这个历史背景谈问题。

不能不承认，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我也犯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比如在礼县蹲了几天，走马观花地看了几个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又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实际上只有几个公社不错，就当成是全县不错，结果讲了许多大话，过头话，树立了一个假典型，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影响很不好。

在农村，农民搞一点小自由，就说是资本主义尾巴，是搞修正主义。实际上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谁也不知道！

另外，在治理甘肃农业的过程中，我们过分强调了自力更生，没有向中央、国务院要过多少救济粮。当时我们的出发点是“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想方设法自己省内调济解决，现在反思起来，当时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甘肃的农业问题是个历史难题，我们苦干了十年，问题解决了一些，粮食产量上去了一些，但这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广大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也需要休养生机，因此适当向中央要求一些救济是必要的。

◇ 放不下的牵挂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度过的，乍一免职时，什么事都没有了，后来连文件都看不上了，一下子成了个局外人，猛然间谁都不需要你了，说个心里话，真还有点不适应。

人不工作了，心还是放不下，毕竟是操了十年的心啊，一下子还真割舍不下。天下雨了，我就高兴，心想今年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了。天旱的厉害，我就着急，唉，又要有老百姓出来讨饭了。天天关心天气预报，天天记在台历上，这已经成了我几十年的习惯，连我的儿女都说我，你又不工作了，还关心天气预报干什么？我说，习惯了。甘肃的老百姓太苦了，很大程度上讲，还得靠天吃饭，你不关心天气预报怎么能行呢？

从兰州到中川机场的几十里公路上，沿途都是盐碱地，我们沿公路两旁种上了树，但成活率很低，树死了，我们就组织人再种，一连种了三年。前两次我都亲自去看过，不知这第三次树活了多少？

景泰川一条山黄河提灌工程我们搞了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戈壁上有了水，有了树，有了草，有了庄稼，坐火车从北线走可以看见这一片沙漠绿洲。我免职前，

省里已搞了个二期工程方案，已报请国务院批准了，提水泵要修到十二级，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如果工程实现预期效果，那么腾格里沙漠就又多了几十万亩的旱涝保收稳产田了。可惜我没能亲自参加这一为甘肃人民造福的工程建设，所幸的是，下一届省委圆满地将这个蓝图实现了，这也足以让我感到欣慰了。

“引大入秦”工程，原来我们曾组织人勘察过，我本人也多次去看过，我们还搞过一个方案报国务院，甚至一些前期工作都开始抓了，但因为没有资金无法搞。现在从报纸上看，这个工程已经开始抓了，这说明我们国家经济有了实力，有能力为老百姓办些事实了。这个工程将来完工后，肯定会为老百姓造福，是个子孙后代受益的大好事。

最近还有一个问题老是在我脑海里转，就是我们修了不少水库，但水的利用率还有问题。你比如说修渠，甘肃的土地沙化的厉害，渠道的衬里就要有讲究，砌得不好，水流经渠道，有相当一部分漏掉了，在沙地里蒸发了，那就很可惜。

还有，最近我看电视，那个以色列的自然条件就和甘肃差不多，人家就搞得很好。他们浇地搞喷灌，我看这个很适合我们甘肃的情况，我们甘肃一个是缺水，一个是土地质量不好，水浇多了还容易盐碱化，因此，应该借鉴国外的喷灌方法，搞些长臂式的大型喷灌机，既节约了用水，又解决了土地盐碱化问题。

甘肃的自然条件恶劣，农业技术底子薄，技术人员缺乏。我们有一所农业大学，还有一些培养农业技术员的中专，但没有经济实力解决技术人员的待遇、房子等具体困难，致使一部分技术人材转业、流失。要想以科技治农，就要留住农业技术专家，改善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甘肃农业的工作中去。科技治农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技术人员就是实现这个途径的宝，所以要设法培养并能留住。

通渭县是甘肃有名的贫困县，荒山秃岭，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建国以后，七任县委书记都认为“通渭没治”。1976年，我曾去那里蹲点几个月，亲眼看到通渭的老百姓生活在极度的困境中。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基层干部与群众一起商量改变贫穷的具体措施。针对通渭荒山荒坡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无雨无收成，有雨冲成沟的特点，当时我们提出了植树种草、兴修水利，发展养殖业等十项措施，发动老百姓在坡地上修整梯田。为了调动广大农民治理荒山的积极性，我们还提出谁栽树谁受益的政策。为帮助通渭县尽快脱贫，我们还组织省委、省政府各部门派出工作组，结合自身业务进行具体帮助，对口支援。

说句心里话，解放那么多年了，看到通渭老百姓还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上，心中实在不忍，但更多的是自责：作为党的干部怎么向当地老百姓交代？所以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使他们尽快脱离贫困，和全省广大农民一起逐步过上好日子。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离开了领导岗位，事情来的很突然，对通渭的许诺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一些具体帮助也没有来得及落实，更无法亲自继续带领大家实现“治理通渭”的心愿，对不起通渭的广大父老乡亲。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会从电视上、广播上、报纸上看到通渭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到那时，我会把酒遥祝那一方质朴、敦厚的农民兄弟们的！

甘肃的优势是重工业，能源充足，资源丰富，但交通困难，能源优势发挥不了。另外原料与加工能力不协调，国家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经常发生原料供应不足的情况，1974年我们搞过企业挖潜改造，兰化的产量翻了一番，当时康世恩同志还在兰化、兰炼开过现场会，推广过“两兰”挖潜改造经验。但是要彻底解决问题，除了搞企业挖潜外，兰化和兰炼以及西固热电厂应该尝试搞联合，可是这几个

厂子上级主管单位不同，归几个部管，具体问题很多，一时半时联合不起来，寄希望于以后体制改革。

最近从电视上、报纸上看到一些工程相继完成了，有的是我们当年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工作，有的是后来的同志们新搞的项目，总之，都是造福甘肃人民的好事情。这些工程完成后，对甘肃的工业、农业以及人民生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大西北蕴藏着巨大的潜质，但她的开发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是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从解放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西北的开发还只是开了个头，路还要靠后来人一步一步地接着走，寄希望于后人。

近十来年都没有出门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但总想到甘肃各地再走走，看看工厂又搞了些什么改造项目，看看庄稼长得好不好，看看水渠还漏不漏水，看看树木成活了多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牵肠挂肚的，比自己的孩子还操心。老伴儿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讲，远的去不了，就到近处看看吧。她找车陪我上皋兰山看了看即将完工的兰山提灌工程，我的心情非常感慨，确实还是小平同志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支左”十年，心系甘肃十年，我对甘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深厚

的感情，有着一份割舍不掉的牵挂，因为这里毕竟溶入了我的心血，留下了我的足迹。还记得 1974 年去酒钢解决问题，路上突遇暴雨，山洪引起泥石流，沿途社队干部群众拦车劝阻不让再行，使我非常感动。因为酒钢的问题很急，所以当时我们也顾不上什么危险，在当地老百姓的带领下，和随行的几个同志硬是趟过洪水，赶往酒钢。1975 年我去天水视察，在翻越华家岭时，因公路积雪结冰，汽车打滑，随时有翻下深沟的危险。在险要地段，我和随行人员都下来推车，路过的老百姓都主动过来帮忙。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谁，但看到我们穿军装，推得是军车，知道是军队的干部。他们说，他们那里也有支左的干部，解放军是帮助他们的，所以他们见解放军遇到困难也过来帮忙，这使我很受感动，好象又回到了战争年代的军民鱼水情中。我当时想，解放那么多年了，甘肃的老百姓还生活的那么苦，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还有没有把他们从贫困中彻底解救出来，可他们见到我们这些干部摸样的遇到困难却能不顾严寒和危险主动前来帮忙，这说明了人民对党的干部是信任的，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能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为人民工作呢？

十年“支左”聊以自慰的是，我对这一片土地尽了责任，作了努力。尽管现在这里还很贫穷，人民生活还不富裕，但我会 在有生之年时刻关心着她，祝福着她，

愿这片土地上人民安康、省富县强。

第四章 须要说清的一些问题

◇ “油沙豆”及其他

导致我被免职的导火索是铁路问题，但 1977 年 6 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时，并没有把我和“四人帮”拉到一起，可后来事情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是肖华、韩先楚、宋平回到兰州后，便立即掀起了一场围剿洗恒汉的所谓“人民战争”。为了把我搞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他们完全不顾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而是采取了先扣帽子定性，后根据需要补充搜集材料，编织罪名。

当时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都曾提出了“知道什么揭发什么，哪怕是道听途说”，动员人们“翻箱倒柜”。在这样一种人为煽动、一哄而起的氛围下，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联合专案组给我罗列了一大堆所谓“洗恒汉投靠林彪、‘四人帮’，积极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证据”，并且在没有和我本人见面核对及签字的情况下报中央，据此定罪。而正是凭着这些不实之词，给我拷上了“四人帮”代理人的枷

锁。对此，除了让人深感痛心之外，还感到迷惑：三中全会以后，这种草菅人政治生命的做法居然还能畅通无阻？！

为了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同时也对我自己几十年革命历史负责，对这些将我置于死地的所谓“罪证”，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实。

一、关于江青给的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抄件的问题。

1972年5、6月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江青参加了西北组的讨论。有一天她发言时，念了毛主席原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好几段。她发言后，大家建议，把毛主席这篇文章印发到会的同志，以便学习。她说：“我这份是政治局发的，将来还要收回去，印发恐怕不可能，你们要我可以让护士抄一份，你们传看。”第二天她来开会时，将抄件交给我（我是会议召集人），我就将这份抄件先给新疆的胡良才（因他先提出），而后一省一省的传阅，最后交我。会议结束后，江青也没有收回。因为不是大会秘书处发的文件，收文件的单子上没有提到这个手抄件，所以也没有交，秘书带回来了。回兰州后我告诉秘书交党办保存。这是作为公文处理的，并非是私人活动。

二、关于“四届人大时，江青送油沙豆”的问题。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快结束时，会议秘书处通知各省到秘书处领取油沙豆种，说此豆适合干旱地区生长，经济价值也很高。我的秘书陈文生也去领了，根本不是江青直接送给我的。我们带回去后，交给农办要农科院试种。我还交代说，甘肃的传统油料胡麻油不能废弃。

三、同米士奇接触的问题。

1976年1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时，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来看我的秘书陈文生。我事先并不知道他来，他也未去我的房间。我只是有事到陈文生房间看见了他，寒暄了几句就走了。事后我问陈文生米士奇来干什么，陈说：“他要我给他代买一些中草药。”

四、“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会上乱点乱问”的情况。

1976年3月，中央“反右”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甘肃省也在其内。江青在会议上乱点乱问，其中也问到我。她先问大家：“‘反右’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哇。”因为我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嘴巴没动，后来她补问：“洗恒汉，‘反右’好不好？”我说：“好嘛。”第二句问：“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我答：“有。有一个公务员，还有一个大师傅。”第三句问：“甘肃形势怎样？”答：“还可以。”十二省（区）的同志都在场，

都知道，可以查问。至于江青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我在省委常委会也好，在其他会议也好，根本就没有传达过。

五、同胡炜的关系。

胡炜原是 21 军军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73 年由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指名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室主任。我同胡炜的关系完全是工作和礼节性的关系。文革期间我们每年都有几次来北京开会的机会，每次胡炜都来看望陕西的同志，同时也来看看我。我们在一起谈话主要是谈地方的事情，偶尔也说“四人帮”的一些怪话。比如江青搞“江青传”、搞“四人帮”，主席批评后，王洪文、江青想去见主席，被主席拒绝；王洪文参加军委会议，说话说不到点子上；西沙群岛战役，上午那些人整叶副主席，下午还要叫叶副主席处理作战的事，叶副主席很苦呀，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听后都很气愤，都表示愤慨。

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但他从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几次电话的内容是：

一次讲皮定均同志飞机失事遇难；

一次问军委工作组向仲华、徐立清何日动身来兰州；

一次毛主席逝世，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问韩先楚怎么还不回来；

还有一次是“四人帮”粉碎后，中央打招呼会议后，韩先楚回兰州才半个月，就又回北京了。韩说“301”让他回去，我说，我们都很忙，实在分不开身，他

身体也不算太坏嘛，怎么又走了呢？是“301”真的追他回去？

我回忆就是这几次电话。

以上接触我认为完全是工作中的正常接触和礼节性的问题，如果把同志之间正常工作接触和纯属礼节性的来往也看成是政治问题，党内就没有正常生活了嘛。

至于胡炜是不是“四人帮”死党，从未见过中央的正式结论，但韩、肖在给我的“结论”中却定性说：“洗恒汉同‘四人帮’死党胡炜关系密切”。

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1977年6月9日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华国锋曾经问我：“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 “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这个“另有渠道”的问题，象一块千斤巨石压在我的身上，使我苦恼了好几年，我觉得有必要讲一下。

我在1976年10月6日甘肃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了二十几个“按既定方针办。”但那时我认为这个指示是真的，因此，就进行了宣传。根据是：

1976年8月中旬，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毛主席的两条指示

，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还有一条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茅林同志（省委
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讲话精神时，还特意印发了
一个书面汇报提纲，提纲中也写了“按照既定的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
这两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国内问题要注意”一条后面加：（现在只传达到这
个
范围，暂不向下传达。在这之前中央也发过电报，规定只传达到军）。这个汇报提
纲当时常委每人发一份，原始稿、省委常委会议纪要，可能还在，可以查，也可
以
向茅林调查。

此外，主席逝世后，《人民日报》9月16日的社论，以及9月18日至2
7
日共六期《国内内参》上大量报道这方面内容，要讲渠道就是从这里来的，这就
是
我讲话的依据。

恰好我住在北京海运仓等待解决问题时，偶然看到中央办公厅1981年3
1
号文件，内容是批华国锋的，其中有这么一段：赵紫阳同志说：“我问我的秘书，
‘按既定方针办’怎样来的？”秘书说抄来的。华接着说：“是为了同‘四人
帮’
斗争的需要。”当我看到这一段话时，我的心情骤然轻松下来，所谓“要以严肃
的
态度向党交代”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

从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这个历来以忠厚、老实著称的人，其实也会说假话，并以假话陷害人。我不禁想问一声，不顾党性原则，以权压人，这是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应该具备的品质吗？另外，托辞用这句话同“四人帮”作斗争，你不觉得是自己底气不足吗？

七、1976年10月8日晚，孙殿甲同志告诉我，接北京给解放军报记者打电话说“四人帮”已抓起来了。我第二天（9日）上午派陈文生到总院找高政委来（因韩先楚不在，高是党委管党委常务工作的），说有个事要告诉他。高来后，我照孙殿甲同我谈的内容告诉高，我又说，如果是真的，中央总要开个会吧，不然总要发个文件吧。我们又扯了一下可能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分析，除上海、清华、北大可能要出一点事外，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军队总的来说没有他们的市场。后来有人揭发说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是什么宫廷政变，纯属造谣。

八、关于所谓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起哄”的问题。这个帽子韩先楚强加到我的头上，还不如再拿回去戴到他自己头上更合适。

要说在庐山小组会议上起哄，在毛主席指出陈伯达错误之前，确实是有不少的同志。但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下面工作，又不善钻营的人来讲，上层斗争的内幕，

我们是不清楚的。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任国家主席，哪个不表个态拥护毛主席？

韩

先楚在华东组跳得更高，“哄”起得更凶。当时毛主席还不无惋惜地指出：多数

中

央委员都不懂一点唯物主义，而轻易就相信一些骗子的天才论。并指出要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委员中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人所共知的。

至于说我在西北组“起哄”，邓颖超同志和董必武同志都在西北组，这件事情

他们最清楚，是当时最好的见证人。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上午是邱会作、曹里怀等人发言，下午我刚到会场，毛主

席就叫我到他的住处开会。会上毛主席严肃批评了陈伯达、李雪峰等人，而后规定

三条：1、会议暂停；2、不提揪斗；3、不要再提他当国家主席（大意）。我回

来后立即宣布小组会散会，各组长留下。邓大姐、董老要走，我请他们留下，传达

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根本不存在什么冼恒汉带头起哄的问题。“9.13”之后发

的材料，林彪反党集团说“西北组温度不高”，这又如何解释呢？邓大姐还健在，可以请她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嘛。

九、1976年1月17日至2月17日，我在北京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

2

月18日回兰州，当天下午在省委常委（还有铁路局党委常委参加）的会上传达中

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问题精神时，是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这是事实，但是这
是
经过解决郑州、兰州铁路问题的中央领导华国锋同意的。因为郑州和兰州参加会议
的同志都问，回去传达时，如果有人问，右倾翻案是谁搞的，我们怎样回答？华
国
锋说，你们可以点名，这个事不久就要公开点名了。

十、给我罗列的所谓“罪名”里有一条是：据郭玉峰交代，王洪文向郭玉峰
指
名要洗恒汉到中央工作。还有马天水、王玉珍、徐景贤和刘湘屏等交代，说王洪
文
给他们讲洗恒汉如何好，工作如何踏实肯干等。这些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呢？这
怎
么能作为证据给人定罪呢？王洪文要调我到中央工作，中央谁也没有给我说过这
个
事，这是中央的事。就算是有这个事，也只是议论了一下，又没有真正调去，也
算
一条罪？那么已经去中央工作的人呢？该怎样说呢？另外中央还有不少老同志
也
说
我的好话，这又怎样解释呢？

把这些我并不知道的事写到我的材料中，这是不公正的，完全是形而上学的
看
问题嘛。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只承认事实，不相信那些无
稽
之谈，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教训太多了。

另外，什么王秀珍、马天水、徐景贤、刘湘屏之流，我同这些人并不熟悉，有的还不认识，至于王洪文给他们散布洗恒汉的什么，那是他们的事情，由他们自己负责，同我毫无关系，更不应该写到我的材料上，作为给我定罪的依据。

讲到与“四人帮”勾结，什么叫勾结？勾结应该是指拉拉扯扯，搞非组织活动，你来我往，信来信往，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嘛。这些方面我都没有，怎么叫勾结呢？至于勾结起来进行反党活动，有什么事实呢？什么叫反党活动呢？拿《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衡量，能够上哪一条呢？“结论”上没有举出一个象样的事实来。

十几年来我反反复复地讲，我同“四人帮”并没有你来我往，信来信往，拉拉扯扯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他们并不熟悉，仅有的两次接触，一次是和王洪文吃饭，一次是庄则栋去甘肃，这也都是偶然发生的，这些我都不厌其烦地多次向中央讲清楚了，何以叫“关系密切”呢？得到“四人帮”的“赏识和信任”，有什么事实呢？他们给了我什么呢？所以说，赏识和信任我的是党，有党的信任和支持，我在兰州军区当了二十多年的政委。我当兰州军区政委时“四人帮”们还不知道在哪

里呢？至于当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也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的指示批准的。当时到北京研究班子时，我曾提议叫胡继宗搞，总理坚持要我搞，他说，大军区所在省，要一名同志挂帅。所以，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那个时候还在上海呢。

十一、“结论”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紧跟林彪、康生制造多起冤、假、错案”的问题。我首先要问，所谓“初期”是从何时算起？又到何时为止呢？如果“初期”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16”通知算起的话，那时候我在干什么呢？我还在甘肃农村蹲点搞社教呢！社教搞到10月，然后去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会议。北京回来后，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开始，一直到次年4月，这期间我失去人身自由，进入了挨批斗的角色。受迫害的应该是我，我又如何能去制造什么冤、假、错案呢？！

倒是1966年9月3日，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汪锋被群众揪到七里河体育场批斗（当时我在天水农村社教），后到军区总医院治疗。肖华知道后，专门给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同志打电话说：“赶快要汪锋出来，他不能住在军队医院。”张达志同志打电话与我商量，我们都觉得不好给汪锋直接说，便拐了一个弯，通过地方的同志给汪锋说，后汪锋搬到七局医院。

十二、“结论”不但给我扣上“四人帮”亲信的帽子，而且还把我和“林彪反党集团”扯到一起，那就更不实事求是了。林彪反党集团以及黄、吴、李、邱等从

来就不信任兰州军区的张达志、洗恒汉。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曾从林彪同其死党的谈话记录中查出，林彪说：“兰州军区连一个通风报信的人都没有，要派一个人去。”结果派了X X任副司令员。这件事是纪登奎当面同高维嵩同志讲的，后中央召开的西北四省（区）和兰州军区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纪登奎也同我说起此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凡属比较重大的问题，都是直接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请示的，周总理曾当面同我们说过，各大军区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兰州军区算是比较多的。我们从来就认为，除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情况外，不能也不应该向任何个人“通风报信”。

另外，前面讲过的潘继祖事件也足以说明问题。这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因为，在文革中，江青在许多场合都讲过吴法宪是她保的，江青和吴法宪勾结是很密切的。“四人帮”粉碎后，吴法宪交代，江青和叶群都是在相互利用，说什么你消灭我的“敌人”，我消灭你的“敌人”。对兰州军区的张达志、洗恒汉，毛主席

、周总理是有态度的，是肯定的。因此，他们想公开的撤掉张、洗不可能，所以就
通过潘继祖这样的人来制造突然事件，干掉张、洗，安插自己的亲信。当然，牺牲
一个潘继祖，他（她）们是干得出来的。

高炮一师是属空军建制，归兰空领导和指挥，同大军区没有关系，更没有矛盾
。潘继祖这个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但他要下这样的毒手，干掉张、洗。吴法宪对
潘
继祖的所谓数年审讯，从来不给兰州军区透一点气。江青对潘继祖这个凶手一点
不
恨，反而利用职权释放他。从这些情况看，不能不使人怀疑潘继祖的后台就是林
彪
、江青、吴法宪。而“结论”却不顾这些事实，一味将我说成是“林彪”、“四
人
帮”的人，这不符合事实，也难以让人信服！

十三、“结论”说甘肃省委在悼念毛主席的唁电中有“向江青同志表示慰问”
的
词句，从而“证明冼恒汉坚决效忠江青”。

唁电是省委发的，并不是冼恒汉发的，是宣传部起草，常委讨论同意的，怎能
把这样的事挂到一个人身上呢？同时不少省（区）和大军区的唁电中也有这样的
词
句，这又如何解释呢？上海倒没有，能不能说上海同江青划清界限了呢？唁电中
是

把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家属来慰问的，怎么能把这样的事情说成是“向江青表示效忠”呢？这不是很可笑吗？

十四、所谓“在党的‘九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洗恒汉在西北组说：‘上面有个精神，对那些老右倾，既要选上又不能得票过多。’”的问题。

根据我的回忆，兰州军区和甘肃省的代表不是编在西北组，而是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以及海军的代表编为一个代表团，曾思玉同志是代表团的召集人。有一天晚上，吴法宪、郭玉峰等人确实召集了由各代表团派出的代表开了一个会，甘肃省是胡继宗同志，兰州军区是高维嵩同志参加的。他们回来后，传达了“‘老右’既要选上，但又不能得票过多”的话，我听后说：“我要投全票，其他代表自己决定。”

◇ 庄则栋河西行

庄则栋这个人我并不熟悉，只是在北京开会时见过面，也没有说过话。晓得他打乒乓球，是个世界冠军，名气很大。他来甘肃是宋平接待的。庄则栋当时是国家体委主任，因为甘肃的临泽县是个体育先进县，据说受陈锡联副总理指示，来甘肃调查研究体育工作并视察临泽这个体育先进县的。

庄则栋到兰州时，我并不在家，而是在河西走廊视察工作，是宋平当时接待的。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视察体育工作，我在张掖，不见不好，让我接见他一下。

由于临泽是张掖地区的一个县，庄则栋看完临泽后就到张掖，我们安排在 19 军军部见了一面。当时庄则栋见了我后就对我讲，是受陈锡联副总理的指示来视察体育工作的。我们在一起谈了我省体育工作方面的情况，我提出要他帮助我们在兰州修建一个体育馆，他没有答应，说现在体育要下放，不是在城市搞，而是要到农村去。寒暄了一番后，庄说他到宁夏时听到些反映，说康健民同志派性大，班子不团结，要我出面帮助解决。我说：“我不能解决，因为他是宁夏第一书记，我是甘肃第一书记，他怎么能听我的呢？”庄说：“你是军区政委，康是副司令，怎么他不听呢？”我说：“那是两码事。”由于谈不拢，就不谈了，我们都出来看他打球。因为大家都慕其打乒乓球的盛名，所以安排打了一场球，吃了个中午饭，他就回临泽了。当时陪同和在场的有关同志很多。

我认为这完全是一次纯礼节性的交往，并且这次见面又是宋平交待办公厅给我

的秘书打电话安排的，他不打电话，我是不会接见庄则栋的。现在宋平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却对我无限上纲上线，说什么“密谈”，什么给“四人帮”的心腹提供“炮弹”等等，可见这个人的品质。

我和庄则栋的这次会见，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另外庄则栋并不只是到了甘肃，他内蒙、宁夏、青海都去了，这件事在其他省（区）都不成为问题，惟独对冼恒汉就是问题，这是不公正的。

◇ 王洪文到房间来看我

和王洪文吃过一次饭的问题，是当年做为把我定成“四人帮”亲信的“重磅炸弹”。尽管这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而且运动中我也向中央做了说明，但我还是要把当时的情况讲一下。

1974年中央开会时，当时作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在看望了几个省的代表后路过我的房间，就顺便也进来看了看我。我和王洪文并不熟，可以说连工作关系都很少发生过，当年硬是总理做了工作我们才投了他的票，因此对这个人我一直保留态度，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和信任。

王洪文来的时候，事先并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正要去食堂吃饭了。他进来后，说了几句客套话，就说：“我吃饭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当时开会都是凭餐券吃饭，因为当时年继荣也在我房间，因此王洪文叫服务员将三份饭送到我的房间，我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说了几句话。饭是普通的会议份饭，很简单，吃完后我们各自向服务员交了自己的餐券。王洪文吃过饭后就走了，继续看望其他省（区）的代表。

至于我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我记忆不深，无非是些客套话，内容也没有出格，决不是象“结论”上硬强加的那样是“密谋”。当时有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服务员自始至终都在旁边，这些都是可以调查清楚的。

王洪文当时担任中央副主席，是中央领导，不能说谁与他一有接触就是参与了什么阴谋。再说我与王洪文平时工作中并没有什么来往，互相之间并不了解，他就有什么“企图”也不敢贸然跟我这个不摸底细的人“密谋”呀！况且我当时并不看上他这个“年轻人”，觉得他是没有能力担负起党的中央工作的重担的。选他作中央副主席，当时我们很多人思想都不通，除了周总理亲自做我们的工作外，叶剑英还有个公开的讲话，说什么王洪文当过兵、做过工、“过过江”、打过仗，是最

“理想”的接班人，这个讲话是以中央正式文件转发的。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看问题。

另外，对“四人帮”这几个人，我还是有戒备心的。我向中央反映我和韩先楚的关系不好的问题时，我是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当时我是有意把王洪文排斥在外的。

以上的这几件事情，都是在工作中发生的很平常的正常接触，但韩先楚、肖华却硬把它作为我和“四人帮”关系的重要依据写进所谓“结论”中并据此定罪，我认为这是手段低劣的政治陷害。如果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我的炮弹将会多的多。

例如，1973年毛主席召开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期间，江青曾把韩先楚请到钓鱼台的住处一起喝酒、吃饭，并一同照了像。粉碎“四人帮”之后，韩先楚并没有向中央讲清楚。后来，中央查抄了江青的住所，韩先楚得知后怕他同江青的合影被抄出来对他不利，很着急，便在回兰州的飞机上，向我讲了这件事。我当时对韩讲：“你在北京开会时，这样的事为什么不给中央直接说？现在你给我说了，让我怎么办？”韩先楚说：“你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我向你说了，不也就是向党说了吗？”

还有韩先楚长期称病住在北京期间，曾几次陪王洪文去西山打猎，有时天黑
了还出去打猎。为了方便王洪文晚上出猎，韩特意找人给王洪文打猎的汽车安装
上
了探照灯。这件事韩先楚在党的会议上也从未讲过。还是当时的昆明军区司令员
王
必成，在看到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的罪行材料的照片上，有王洪文打猎的汽车探
照灯，便当作“笑料”对我讲：“那个探照灯是你们的司令员送给王洪文打兔子的
礼品”，并诙谐地说：“有功劳啊！”

1976年冬，中央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
时
，李先念同志对我讲，韩先楚在武汉给他打电话，要求通过他给福建说一说，把
已
被福建抓起来的“四人帮”骨干分子放了，被他顶了回去。韩先楚已经离开福建
多
年，还插手福建清理“四人帮”骨干分子的事情，那么韩先楚同志同“四人帮”
的
关系又作如何解释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果把这些问题都算作是工作和生活中的正常交
往
，而把我那几件带偶然性和礼节性的接触都算作是“参与阴谋活动”的话，那么
我
们党内生活还有什么实事求是？还有什么公正而言？我们判断是非的依据又是
什么

？难道原则可以随便因人而易吗？法在哪里？理又在哪里？

“结论”还说我：“冼恒汉免职受审查以来，对立情绪很大。”那么我反问一句，十几年来把我当成敌人来整，申诉无人管，辩白无人理，还要我不带一点情绪？如果这样搞的话，岂不是又回到王明路线统治全党时期的“肃反”了吗？

◇ 赵永夫事件

1967年1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的左派群众”的号召。1月22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军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捍卫队”的围攻批斗。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常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令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的待遇。

刘贤权迫于无奈，于24日凌晨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扭转混乱局面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无论表态支持哪一派都难以稳定局面，于是决

定，把原来支持“八一八”的提法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考虑这样提法笼统些，比明确支持某一派更好解释。

这个新的决定，并没有使各派群众组织满意，相反，事态越发严重。同时，省军区机关造反派也借势上街闹事，并在机关内部擅自将刘贤权软禁起来，不许他与外界接触，这实质上也就是篡夺了省军区的领导权。

刘贤权深感问题的严重，心急如焚，担心如此闹出大事来无法向中央军委交代。于是，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要向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报告情况。但机要员将电报稿退回，称：“赵副司令不同意发”。1月25日，兰州军区指示，不同意由军队接管“青海日报”社。省军区机关造反派认为是刘贤权报告的，于是以此为借口，抄了他的家，撤了他的电话，并派武装战士看守，实际是将他关押起来。

1967年2月5日，赵永夫召集机关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出舆论说，“八一八”手中有七、八百支枪，并以自己划线，将省军区领导都划成了“敌人”。

此时的赵永夫利令智昏，将自己封为青海省军区第一把手。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会上由他宣布撤消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正式关押。他的这

一切活动，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严重。

这里还要说一下，文革初期在西宁地区，围绕着倒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保第二书记王昭和保杨倒王的斗争，西宁的群众组织分成了“捍卫队”和“八一八”两大派，对立情绪非常大。现在，省军区的机关造反派也加入了进去，致使局面更加复杂混乱。杨植霖、王昭看到形势严重，省委难以控制局面，便先后借故离开了西宁，使省委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由于赵永夫在省军区机关造反派的支持下，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又改变了支持“八一八”的决定，因此引起“八一八”群众组织的不满，每天都开着宣传车到省军区大院门口叫骂，赵永夫对此十分恼火，便借口由“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报”社有林彪漫画的所谓“反革命”事件，要军事接管报社。

由于赵永夫请示兰州军区遭拒绝，便擅自派出部队强行进入报社进行接管，激化了“八一八”群众的对立情绪，相互形成对峙。赵永夫再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赵永夫十分不满，派出副司令刘 X X 率领十几名机关造反派，连夜到兰州军区办公楼绝食静坐，胁迫还困

身在“四大”余波中的我和张达志撤消不同意他们军事接管报社的批示。

尽管当时我和张达志同志自身处境还很困难，但我们还是坚决表态：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更不能强行进入报社，并且对他们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刘X X等人看到我们态度坚决，只好返回青海，向赵永夫汇报。赵永夫根本不予置理，仍一意孤行，于2月23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

23日下午1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于发生。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现场惨不忍睹。报社内惊恐的群众四处躲藏，没有死伤的抓到就投入监狱。这就是曾经震惊全国的1967年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西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便立即给青海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

的电话才接通了青海省军区的电话。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况，
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
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

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
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
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
话
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

24日上午，我和张达志电告青海，要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
将赵永夫、王文英及55师师长陈如意接来兰州。在汇报中，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
，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事后我和张达志为了证实军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
向
军委发电报请示确认，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在西宁，赵永夫为了掩人耳目、欺骗群众，将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
“
尸体展览”，让群众参观，说这是“走资派刘贤权支持的‘八一八’犯下的滔天
罪
行”，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
工

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是斑斑血迹，有
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薰人的恶臭。被丢弃的帽子、鞋子一大堆，但不见一支枪。

赵永夫把“八一八”搞成反革命组织，在西宁市进行大清查、大搜捕，全市
人
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一些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西
宁
，到兰州和北京反映真实情况。

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付武装押送的。
3
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
蒙
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

3月29日晚九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兰州军
区
是我和康健民同志参加，同时青海的刘贤权和张江霖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总理就亲自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大意如
下
：

- 1、青海问题是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推翻了司令员刘贤权，篡夺了军权；
- 2、赵永夫对西宁“八一八”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群众三百
多人，逮捕群众近万人；
- 3、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经查，报社“八一八”群众并无一枪一弹；

4、此事件与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接着，总理宣布中央的处理办法：由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除独立师、独立团外，在处理青海问题上，再划归几个野战部队归刘贤权指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赵永夫负责；筹备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赵永夫隔离审查，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周总理宣读完中央决定后，当即命令北京卫戍部队武装战士把赵永夫等三人拷走，会场立刻欢声雷动，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周总理同我、康健民、刘贤权和张江霖同志一一握手。散会后，又把我们留下具体研究安排了青海省如何贯彻中央决定的问题。我向总理报告说，兰州军区准备派康健民副司令员去青海协助刘贤权同志处理青海问题，总理同意。中央对青海“赵永夫事件”的处理，当时还以红头文件告示全党，人人皆知。

十年后，周总理逝世，军委叶剑英元帅曾经两次指示我，让我给青海的同志们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

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很为难。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我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但青海的同志们却有他们的道理：“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此事不了了之。

1976年夏季，叶剑英又亲自派遣总政的两个干部来兰州，向我传达他的指示，要我出面把张江霖、宋长庚找来兰州谈为赵永夫平反的事，总政的来人也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张江霖和宋长庚两位青海的领导同志来兰州，并请总政的来人向他们当面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尽快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张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仅凭叶帅个人一句话，我们不好办。我也觉得张江霖的话有道理，便提议总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叶帅报告，最好请中央能下达个文件，便于下面执行，也好给群众解释。

这些意见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却直接触犯了叶元帅的尊严。在 1977 年 6 月处理甘肃问题时，叶帅几次提到我“不听”他的“话”，“不执行”他的“指示”。而肖华、韩先楚等也以此大做文章，不但将我打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张江霖也成了“四人帮”在青海的“挂帅人物”。可叹张江霖一个四方面军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在艰苦的青海地区辛苦工作几十年，落下一身病痛，最后被作“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对此，连总政、解放军纪委、兰州军区后来的几届党委都一致认为处理不当，但由于这是由“大人物”下的口喻，所以一直无法甄改。但愿我们党内这种“以言代法”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不再出现。

◇ 青铜峡事件

关于青铜峡事件的问题，因为事情牵涉到敬爱的周总理，我一直不愿意在其他场合讲。既然“结论”一再把我和康生挂在一起，我也不得不把事情真相讲清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

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这是我回忆他们报告的大意，在此之前，徐洪学同志曾电话讲过上述内容，我让他正式报告军区）因为当时毛主席、周总理

指示，军区的工作由张达志同志主管，支左工作由我主管。

后来查清楚，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

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而且这些群众手中也确实掌握了一部分武器，有的是抢夺地方武装部存放的民兵武器，有的是他们自己收集制造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杀伤能力。由于形势严重，另一派群众组织就直接向北京反映情况，强

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但因为当时还没有接到六十二师的详细报告，我们对此情况还并不是十分清楚。

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这样，我又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由于是夜里，就通知大家到我家里集中。会上大家分析了情况，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

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为了

三、为了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

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大意）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

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

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承上启下是军区的责任，至于以后部队是怎样执行的，因为有别的领导同志专

门负责，我主要精力放在甘肃地方上，没有再具体过问。

后来听汇报说，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

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

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结论”上说，我还通过秘书和值班参谋指示六十二师前指具体怎么打，这完

全是无中生有。我历来不管这些具体事情，如果有什么意见，也是通过司令员、参

谋长和作战部长去办，或他们找我商量去办，我怎么可能会让秘书、参谋去指挥部

队呢？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汇报甘肃问题时，周总理主持“碰头会议

”正在接见宁夏代表团。总理让秘书打电话叫我去参加，我去的时候，接见快结束

了，总理正在讲话，我向总理报告说我来了，总理指了个座位叫我坐下。

总理讲话后，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最后总理指示让我讲话，我推托说，总理

已经作了重要指示，我没有啥讲的。总理第二次又让我讲，我看不好再推托，即按

总理指示的精神说了几句，具体讲的啥我也记不清了。好在这次会上所有人讲的话

都录了音，凡是我讲的，我都认帐。在那个情况下，我肯定会讲错话的。“结论”上说我是陪同康生接见宁夏代表团，这完全不是事实。

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早已作了调查并平了反，平反文件

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不要层层追究下面的责任

。”（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编号 0 0 1 5 6 5》）

上述情况，我是在总理指示下，按正常工作程序办的，“结论”说我同康生勾

结制造了这个冤案，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康生当时只是代表中央给我打电话，通

知我们中央同意兰州军区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如果这就叫勾结，那也太简单化了吧。

◇ 钱信莎事件

钱信莎，女，原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文革期间，她曾是二医大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

1968年毕业分配来兰州军区驻青海西宁市第四医院工作。

分配来不久，总后勤部有一个叫陈昌洪的干部率领两个人，持有当时军委办事

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亲笔批示的介绍信来兰州军区，说有重
要问题要向军区主要领导当面直接汇报。因我当时地方上“支左”工作很忙，没
有时间，就由张达志司令员和政治部副主任李樾接待，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陈昌洪在汇报中说，第四医院的钱信莎有重大问题，要求兰州军区派人派车协
助他们把钱信莎从青海抓来兰州关押。并说，案情的审查完全由他们负责，兰州军
区只负责派人看管，不能让死了、跑了，也不准问及案情。

按照他们的要求，军区在招待所安排了他们的住宿，并立即派人派车协助他们
连夜到西宁四医院把钱信莎押解来兰州，关押在军区看守所，并抽派女同志专事看
管，由陈昌洪他们开始对钱的审讯。

由于陈昌洪一行人在审讯过程中搞了不少逼供行为，并明显有打骂、虐待等发
生，致使钱信莎对立和抵触情绪很大。对此，看管人员向军区有关领导作了反映，
有关领导对陈昌洪等人的做法也提出过意见，请他们注意政策。但因为他们自恃是
上面派来的，对军区领导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还认为是“同情反革命”。
经过半年多审讯，陈昌洪一行回北京向军委办事组汇报。

1970年初，专案人员又带着黄永胜等人的亲笔批示从北京来到兰州，要把
钱信莎案交给兰州军区负责审理，理由是“钱信莎是兰州军区的人”，但又说
“钱
案”中有涉及中央领导材料，为了保密，案情和档案材料全部带回北京，不移交

兰州军区。我们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对他们这种作法感到困惑不解，表示不愿接受这个案件，理由是，事情发生在二医大，前段由总后专案组审查，兰州军区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请他们向军委办事组反映这个意见。于是，他们返回北京汇报。

再次来兰州时，他们带来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的批示件，坚决将此案移交兰州军区，除一般性材料留下外，“核心”材料仍不移交，并且不准留下军委办事组的所有批件。对此，军区有关负责同志产生了怀疑，觉得军委办事组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怕将来一旦出事说不清楚，便坚决要求他们将详细案情移交清楚，并将军委办事组的批件留下，否则，军区坚决不接收。

陈昌洪等专案人员见军区态度如此坚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将案件作了一般性介绍，并将所介绍内容的有关档案材料留下，至于军委办事组批示件只同意给留下复印件，原件仍要带回北京。

经过反复争论和协商，军区只接受对他们所移交案情材料有关内容进行核查，其它问题军区一概不加过问，最后的定案处理由军委办事组审查决定。就这样，在军委办事组名义的高压下，兰州军区不得不将“钱信莎案件”接收下来，组成了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成克仁为组长的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后，对移交的材料所涉及的几个问题作了调查核实，但没有发现什么重大问题，更没有涉及到什么有关“军委领导”的问题。在讯问中军区专案组没

有发生逼供现象，这一点钱信莎本人也承认。

几个月后，军委办事组多次催要军区上报材料，并几次电话说明军委办事组领导同志的意见，要我们以军区党委名义，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定性报军委办事组。军区党委经过认真的研究讨论，认为根据现有材料根本不能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她虽有些错误，也只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极左”的过火行为，构不成“反革命”罪，更不能以兰州军区党委名义向上写这样的定性报告。

军区专案组电话向军委办事组专案人员讲明兰州军区党委的意见后，军委办事组专案人员答复：军委办事组领导不同意，坚持要按“现行反革命”定罪，并以军区党委名义书面正式上报。在此压力下，我们无奈，只得写报告，但在报告开头明确写上了：“按照军委办事组首长指示，将钱信莎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报军委办事组，是否适当，请审定批示”。这个报告送上去后，一直没有批复。

1971年“9.13”前几天，陈昌洪等人又突然来兰州，对军区的报告只字未提，只说要将“钱案”收回，由他们自己负责审查，并要组成“联合审查组”，由总政、总后、二医大、兰州军区派人参加，由总后负责。军区对他们收回“钱案”表示欢迎，觉得松了一口气。并提出不派人参加“联合审查组”，因为不了解情况，参加了也不起什么作用，总之是想尽快摆脱此事。

正在同总后来人协商之际，还未正式办理“钱案”移交手续，“9.13”事

件发生，黄永胜等人也被抓起来了，北京来人匆忙返回，从此，“钱案”再无人过问。

“9.13”后，我们军区几个常委在一起讨论，都觉得“钱信莎案件”从始至终都是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以军委办事组名义一手操纵审查的，这里面可能有什么阴谋，但背景到底是什么不清楚。现在黄永胜既然倒台了，就立即向军委写报告，建议解除对钱信莎的关押。

报告送上去后还未等批复，军区就先将钱信莎释放，改为办“学习班”，并向她传达了林彪事件和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的情况，让她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军委的批示。但不知什么原因，军委一直没有批复。这样，一直等到11月初，军区见上边迟迟没有动静，便自行决定完全恢复了钱信莎的自由，送回第四医院工作。

“钱信莎事件”是“结论”硬强加给我的所谓“阴谋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恶毒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的依据。那么，一个二医大学生的事件和以上罪名又有什么联系呢？免职以后我才搞清楚此事的背景，原来钱信莎据说是叶剑英元帅的一个亲戚！

利用“钱信莎事件”硬强加于我一个“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既叶剑英同志的罪名，这未免有些太牵强并太不实事求是了吧。第一，前面已经说过，“钱案”是兰

州军区被迫接受的，并且只负责审查其中的“一般案情”部分。至于黄永胜等人到底要搞什么名堂？要通过钱信莎整谁？他们始终未向兰州军区透底。对于“钱案”，我和张达志同志以及军区其他有关领导，从一开始就有怀疑，并千方百计进行抵制，但无济于事，因为，作为下级的兰州军区来讲，毕竟顶不住上级用军委名义强压下来的指示，我想，兰州军区党办和军委有关机要部门应该还保留有当时的多次往来电话记录以及有关的上报材料和备忘录，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第二，我们确实谁都不知道钱信莎是叶帅亲戚这一背景，那么，被迫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把矛头指向叶剑英元帅，这个结论未免下的太武断了吧！

曾作过总政主任的肖华应该很清楚，我们党内斗争多，各种不同时期都有中央的犯人押解到基层看管，兰州军区条件艰苦，地处边疆，更是如此。这些上面来的犯人，我们只有配合派人看管的义务，根本没有过问的权力，有很多人从来到走，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肖华作总政主任时期我们这里也来过总政的犯人，难道这也要由我们负责？都要记到我们帐上？

“钱信莎事件”是“文革”浩劫中无数个冤、假、错案之一，但这并不是我造成的，也没有兰州军区的责任。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韩先楚和肖华，说话办事

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既然“三中”全会以后党内的思想已经得到统一，我们党也结束了“文革”所造成的各种混乱，那么，利用混乱年代所造成的混乱事端又来制造新的冤、假、错案，那岂不更是错上加错吗？

“钱信莎事件”，不把罪责挂到林彪反党集团头上，反而挂到兰州军区和我的头上，这岂不是本末倒置、是非颠倒了了吗？这岂不是告诉大家，林彪反党集团抓人无罪，而我们释放了人倒有罪了？这不是等于站在林彪反党集团的立场上，帮助黄、吴、李、邱开脱罪责吗？

“钱信莎案”，实际上是邱会作搞的打击报复，但是肖华、韩先楚却将“钱案”作为所谓“洗家帮”要“阴谋陷害敬爱的叶副主席”的主要罪证写在“结论”里，以此来挑唆激怒叶剑英元帅对我的不满。

◇ 是否有一个“洗家帮”？

所谓“以洗恒汉为首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即“洗家帮”纯属是肖华、韩先楚凭空捏造出来的，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还曾被冠以一个副词：“壳壳很硬”。由于这个杜撰的“洗家帮”，使得兰州军区和西北地区有成千上万的干部被结束了政治生命，长期不分配工作，普遍得不到信任，在年富力强的年华被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机会。对于这个问题我多年来曾给中央及有关领导写了无数封信和申诉材料，但都没有回音，因此，在这里我要谈谈这个问题。

兰州军区的干部大都是解放大西北时第一野战军的指战员，这些同志中有参加

长征从祖国的南方到祖国的大西北的老红军；有来自陕甘宁的刘志丹部陕北红军；

有晋察冀的抗日战士；还有大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和各路知识青年。

这些同志随一野的各个兵团在解放大西北的炮火声中撒遍了浩瀚大西北的各个

城市、乡村、草原、荒漠、戈壁。战争结束以后，他们或继续留在部队镇守边疆，或转业地方参加建设大西北的工作，无论是南方的、北方的、喜欢吃大米的、喜欢

吃馒头的，统统都毫无怨言“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不仅

能征善战，在建设时期也同样能吃苦耐劳，衷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在这片黄土高原上

。他们都找了西北的婆姨，在西北生孩子、过日子，几十年了，把自己的青年、壮

年、老年以及子孙都无私奉献给了大西北。这些同志，构成了我们兰州军区机关和

部队以及西北地区各地方早期干部的基本队伍。

还有比例不小的干部是解放后几十年来从全国各个地区陆续调来的同志，他们

为了党的事业，服从组织调动，来到祖国大西北这个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作出了

巨大成绩。

无论是什么时期、什么地区来的干部，大家都团结一致努力为党工作着。我们

对这些干部也从不分彼此厚薄，在推荐选拔使用任命上一视同仁，搞五湖四海。

在我们军区领导中就有不少从其他各军区调来的干部，例如孔 X X、张 X X、

张 X、卜 X X 等，我们按照总政的意见对他们均委以重任，都交给了很重要的工作，并没有薄待他们。

不仅是军区机关、部队，地方也如此。例如宋平同志原来在陕西长期靠边站，不被任用，我专程到西安将他要到甘肃并重用他全面负责省生产指挥部的工作，以后又是省计划委员会主任、省委书记等。

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我们的干部是做什么工作，都是经组织部门严格考察报审和党委集体讨论研究的，很多干部过去并不认识我，我也不熟悉他们，是革命需要走到一起来了。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干部队伍没有什么“山头、宗派、圈圈、摊摊”等，我们是秉公办事，五湖四海。

根据工作的分工，无论是我的同事，还是我的下级，和有的同志接触可能多一些，但我们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这个人办事较原则，平时很少私人交往，不熟悉我的人都说我生性孤僻，有些“怕”我。我在工作范围内没有“山头”，生活圈子里不搞“裙带”，因此，更没有什么“帮派活动”和“私下交易”，这是我做人的原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党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我每次到北京开会，都是会议一完当天就走，从不逗留，更不到任何上级和朋友家串门、应酬。我解放以后几十年一直在西北地区工作，对中央上层斗争内幕以及党内各种矛盾消息闭塞，信息知之

甚少，加之我是一个军人，从不思钻营，工作中信奉的是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以
及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袖们的无限信任和敬仰。我作官为人，对上不给自己
找靠山，对下不给自己拉山头。在我任职期间，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封过官许过愿
，也不记得有什么干部找我要过官和权。我一生鄙视不正之风，一生对党问心无愧
。既然不谋私利，何来“帮派”而言？对于这个问题，我就是到马克思那里去，也
是可以拍胸脯的。

当然，无论是哪一个单位，总是有一些干部到的早一些，有一些干部到的晚一
些，有的呆得时间长一些，有的呆得时间短一些，这是客观存在，也是历史形成的
嘛。哪个单位都是这种情况，今后也还是这样的。所以不能主观的没有根据的认为
，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长的，就一定是要搞山头，搞宗派，搞帮派体系。我们一贯
认为，不管那里来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应该有彼此之分。我在兰州军区任政
委二十二年，我认为军区党委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搞五湖四海的，军区干部队伍
总的来说是团结统一的，没有什么山头，没有什么宗派，没有亲疏之分，也不存在
什么排外问题。

在“结论”中给我强行划定的所谓“洗家帮”体系里，有军以上干部，有机
关和师团干部，几个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以及各军分区、武装部，甚至所有参加 “

支左”的人员。据“清查”后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军区被划入“洗家帮”而受到批

斗或株连的多达二千余人。这些同志和我都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其中的绝大部分

我根本就不认识，更没有直接的工作交往。他们被定为“洗家帮”亲信、骨干后，统统被关押审查，有的被批斗几十天或几个月，有的长达一年多。无论有无问题或

问题大小，一律“停止工作检查交代问题”，其中多数人从此被“免职”、“罢官

”，再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

例如，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军委尚未下达免职命令，就调来兰州

住招待所交代问题，虽无查出任何问题，但也一直未分配工作，最后作离休处理。

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也是军委未免职就调来兰州审查，“靠边站”三年多，才被军委重新分配。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同志是老红军，却被作“退休”处理；政委宋长庚“

靠边”三年，后因上面有人说了话，才调其它省军区工作。

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副司令员王晓一、张怀礼，副政委张光勃等，批斗几年

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被命令离休。

对于藺进生同志和曾给我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则

更是不放过，一直审查十年，最后硬是编造了几条所谓“错误”，给了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降级离休处理。

在撤换改组军以上领导班子的同时，对大部分师团主要领导也进行了更换，特

别是甘肃、青海、宁夏的军分区甚至县市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进行了大换班。

对于划入所谓“洗家帮”的军区领导，也进行了数月甚至几年的打击迫害，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残。例如军区副政委高维嵩同志，长期带病工作在青海高原，在肺气肿和哮喘病频繁发作的情况下，经常靠氧气和药物坚持工作，却从未提出过调到内地气候好一些的地区去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好干部，在打击“洗家帮”的运动中，被非法关押批斗一年之久，有病不让住院，即使住进医院还不放过，派人在病床前围斗，不许家属子女送饭，致使高维嵩同志身心焦瘁，于1985年含冤过早离开人世。

李书茂同志，军区副司令员，贺龙同志的老部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洪湖籍老红军，被非法关押一年两个月之久，大会批小会斗，甚至体罚侮辱人格。在残酷打击迫害下，致使体弱心衰，疾病缠身。

这些同志都是经过长期考验的我们党的优秀儿子，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就因为肖华、韩先楚人为制造的“洗家帮”冤狱，使他们被打入另册，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

这些同志都是我工作中的同事、战友、部下，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私利的交易，更没有不正常的非组织结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光明正大的、是经得起组织任何考查的。如果一定要说“帮派”的话，那我们都属于共产党、毛泽东这个“帮派”，

除此而外，别无他属！

对于“结论”中几个强加于我的所谓搞“冼家帮”的“罪证”，我有必要说清楚，还事物以本来面貌。

一、所谓 1974 年 9 月背着党委诬告韩先楚的问题。1974 年 8 月中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会议主要听取那些上林彪贼船的人的检讨，韩先楚是其中之一。会议完后，我们遵照中央规定，召集军区常委及各省（区）第一书记（或组织工作的书记）传达。讨论时张 X 首先发言，说韩检讨不好，到会同志也都有这个感觉。会议完后，党办将会议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个电报，我签发了这个报告。因为我主要是主持地方工作，报告送来我也没有问其他常委们是否都看了，只是看报告是反映会议情况，而且是符合会议精神的，我就签发了，怎么叫诬告呢？我第一书记不能签发报告？可以把电报同会议记录对照对照嘛。

二、所谓背着党委在西安召集 21、47 军领导传达中央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精神的问题。

一个政委不能在下面找一些同志谈话，一找谈话就扣上“背着党委”的大帽子，我军从来也没有这样搞过。

我在西安找 21、47 军的同志来谈一谈，并不是开会。找他们来谈是出于这样的愿望的，即在十次路线斗争中，21 军刘江亭、47 军刘凌等是有错误的，据

反映两军都对他们老是揪住不放，同时 4 7 军对广州军区有很大意见，批林批孔时，据说他们准备给广州送大字报。为此，我给他们谈这次中央召开的会议，对犯错误的同志如何宽大，以及毛主席指示中对广州有一段话，这样纠正他们对犯错误同志的做法，不要总揪住不放，另外，缓和 4 7 军和广州军区的紧张关系。我的动机就是这样一个目的，而没有别的什么。

三、1975 年 8 月，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韩先楚和张 X 在各组大讲特讲兰州军区有宗派、山头、排外，等等。他们都是党委书记和常委，但他们又不在常委会上提出来，而是到下面大肆地讲，并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会内会外（军区机关）反映强烈，对团结不利。在这样的情况下，逼着我在作总结之后，不能不讲一点个人意见。我个人的发言，我认为是正确的，从头至尾都是讲一个团结问题。

四、“批林批孔”，说我把矛头指向老干部，指向韩先楚同志。韩先楚就是老干部，老干部就是韩先楚，我们就不算老干部？有人贴了几张大字报，就叫矛头指向韩？我的大字报比他多得多，怎样解释呢？在福建省、福州军区，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还上福州军区小报，那又怎样说呢？很多大字报、小字报转到兰州，我都指示扣下，不予理睬，兰州不管福州的事情，我是保他呢还是将矛头指向他呢？

第五章 矛盾由来

◇ 来了新搭档

1973年12月，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对全军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与
我工作上合作很好，同时也很受广大干部拥护、深孚众望的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同
志
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当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同志则调任兰州军区司令
员。

中央的会议上，毛主席亲自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和我们这些新搭档一
起分别照了像，并语重心长嘱咐大家要团结一致，努力把工作搞好。与我和韩先
楚
照像时，毛主席特别指着我对韩先楚说：“洗恒汉是个老实人，你到了兰州后，
可
不要欺负他呀！”我们听了都哈哈一笑，认为是主席开玩笑。

12月，我奉命去福州亲自接韩先楚来兰州上任，当时的福州军区政委李志
民
同志曾私下对我说：“我把一个瘟神给你送去了，你可要当心啊！”我心想没这
么
严重吧？听过后也就没有放在心上。韩先楚这个同志我不太熟悉，因为从来没有
在
一起工作过。这个同志在战争年代是很有名气的，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195
5
年授衔时被授于上将军衔。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一直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和
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根据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的
指示，执行了对福建省的“支左”任务。因此，他实际上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以及党委第一书记。党、政、军大权在握，集四个
第一于一身的“福建王”。

兰州军区是一个条件艰苦的军区，地处西北，自然环境恶劣。干部基本上都是
解放大西北时一野的同志，还有后来调入的一些干部。这些同志长期工作、生活
在西北，世面见得少，还是延安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显得“土”一些。我们过
去的司令员张达志同志也很“抠”，尽量削减不必要的开支，生怕多花国家一分钱。
后来皮定均同志来了，皮司令也是这个作风。因此，到我免职的时候，我们兰州
军区已给国家节约军费将近一个亿。后来的领导盖新的司令部办公大楼用的就是这
笔钱。

韩先楚同志调来兰州军区后，只保留了一个军区司令员的头衔，其余的三个第
一都没有了。再加上西北地区比福建沿海环境要艰苦得多，战略地位也没有福州
军区重要，气候恶劣，部队又少，因此，他是带着一肚子牢骚来上任的。

初到伊始，韩先楚便嫌兰州军区“土包子”，房子不好，门前的树象烈士陵园
，喝的水不卫生，宿舍里没有配备电冰箱、彩电等，弄得我们管理局的同志好一
通忙乎：把树移走；专门派几个战士每天到五泉山给司令员背泉水喝；赶紧配备电
冰箱。管理局的同志觉得光给司令员配冰箱不合适，于是，给我家也搬来了一台，
我家里从此也第一次用上了电冰箱，我记得是沈阳出的单开门的，不知是什么牌子。

管理局的同志私下说：“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伺候的首长。”生活上的问题好

解决，工作上的分歧也随即而来了。

这里还要讲一个历史的问题。一是韩先楚在福州“支左”时，曾支持打砸抢分

子陈佳忠，这个人搞武斗很凶，打倒了一大批领导干部，1974年中央还专门为

此发了解决福建问题的第九号文件，特别指出和批评了韩先楚在福建工作时的错误

，为此，他很不满意，曾去问过李先念同志，九号文件是不是“四人帮”搞的？

李

先念对他讲：“是不是‘四人帮’搞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参加了中央的讨论，也举

手赞成了的。你怀疑是‘四人帮’搞的，恐怕没有多少根据，这是个对中央的态度

问题。”把韩顶了回去。

二是韩先楚与林彪关系密切，在福建他曾支持周赤萍出版了为林彪大造反革命

舆论的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9.13”以后，毛主席召开中央

会议，在会上亲自点过他的名，在林彪事件上犯错误的几个大军区领导进行检查，韩先楚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这些，他总觉得把他这样一位历史上有战功的上将调来这个“鬼地方”当

司令员，实在是大材小用，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他不信任、不重用。因此，韩先楚

同志调来兰州后，就以身体不适应西北地区为名，长期住在北京或外地看病休养，从来没有象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那样扎扎实实抓过工作。实际上从1973年底到

1977年6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之前的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兰州呆的时间还不到两年。

当然，韩先楚同志在兰州时，也曾下过几次部队检查工作，也亲自勘察过部队的战场设置和边防建设。军区广大的指战员也慕其过去战功显赫的名声，殷切希望他能象前两任司令员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那样，对工作提出指导性宝贵意见。但韩先楚同志却不是这样，他走到哪里，指责到哪里，这也不对，那也错误，全盘否定兰州军区二十多年的工作成就。大到战备训练、战场设置、边防建设，小到军区大院的绿化，全部都不对头了，全都要改过来，甚至是中央军委定下的问题，都要变过来，要按他的意见办才对。

说个老实话，兰州军区自1955年成立以来，我和张达志、皮定均两任司令员以及军区其他领导同志都一贯非常重视战备工作，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各总部在各个时期的作战部署和有关作战命令、指示。军委和总参每次作战会议，我们都召开专门会议认真传达贯彻，会上将毛主席、周总理和各位元帅的有关作战理论、方针、原则和指示不走样的印发，组织与会同志认真学习、讨论、领会，并结合本军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落实的措施，这是我们一

贯的做法。在兰州军区成立的二十几年中，我们无论是在五十年代平息青海、甘南藏民暴乱，还是在 59 年平息西藏达赖喇嘛叛乱，以及 1962 年解决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我们军区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表彰和嘉奖。60 年代中苏论战激烈，兰州军区的战略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的“大后方”一变成为“反修前线”。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的防务十分重视，赋予军区的作战和战备任务十分繁重。1966 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毛主席很不放心西北地区防御战备情况，特派周总理率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政委廖汉生以及我和张达志同志一同视察了新疆、甘肃、宁夏以及内蒙古的战备情况，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三大军区共同商定了作战部署方案，报经毛主席批准实施。在以后的设防重点、部队部署、战场设置以及国防工程施工等方面，兰州军区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在人烟稀少的戈壁滩上，经过五、六年极其艰苦的工作，有的同志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花费了国家大量的资材，基本上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改变了过去“有边无防”的状态。

而韩先楚同志到兰州后，只是坐飞机在空中盘旋观看了一下，便武断地指责，这样的设防是“胡闹”，要改变原有的所有设防，并向总参、军委报告。总参、军

委明确指示：“不能改变原方案，如需作个别调整，可报意见。”韩先楚对别人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对总参谋部的指示置之不理，未经总参同意，擅自调换设防部队。总参得知后，对军区提出批评，韩却借“治病”外出不归，把他一手制造的矛盾甩给别人。

有些同志对我讲，韩先楚是上将，在福州是“四个第一”，来兰州后，三个“第一”没有了，又在中将的领导之下，心里可能有些不平衡、不服气。对于这些同志的提醒，我都告诉他们，不要随便揣测别人，韩司令员资格很老、水平很高、功劳很大，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很多。至于我在兰州军区任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以及省革委会主任等，那是中央定的，我个人并不想要这“四个第一”。

◇ 上书毛主席

韩先楚在福建长期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到兰州军区来很不习惯。对于他的一些作法，军区的部分干部有看法，我个人也觉得他有些“霸气”。但作为党委第一书记，我的原则是大局为重，团结为上，首先要维护韩司令员的威信，工作中要尊重他的意见，尽量求大同、存小异，减少分歧。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做了不少工作。

比如，韩先楚任福建省党政一把手七年多，他也积极贯彻了“文革”的那一套

，给福建省造成的危害和破坏也不小。他支持全国有名的打砸抢头子陈佳忠，打击迫害了福建省和福州军区一大批干部，逼死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以及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积极批邓等，比起甘肃省和兰州军区来，他在福建的所作所为要严重得多。福建省和福州军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反映强烈，在他调走后，给兰州军区寄了不少小字报和揭发材料，还有人专程到兰州来反映和去北京上访。党办告诉我，问怎么办？我说：“一律扣住，不要散发出去。福州的事情我们不管。”有意识保护了他。

韩先楚同志还利用各种场合无中生有地到处散布兰州军区有“山头”、“宗派”、有“圈圈”、有“摊摊”、“排挤外来干部”、“对外来干部不信任、不重用”等。他这些话又不在常委会上讲，而是在各种场合乱讲，结果造成干部之间的不团结以至相互猜疑。由于兰州军区二十多年来领导班子一直比较安定团结，这种破坏组织原则的事情军区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令人感到吃惊并且反感。还例如在有的大会上，韩先楚事先不打任何招呼便突然大谈军区存在“山头”“宗派”等，搞得许多基层的同志不知所措，纷纷问回去如何传达？我只好给大家解释，要正确理解韩司令的讲话精神，给他打圆场。

韩先楚的霸道作风还反映在日常工作中，比如，有些事情很急，军委和总政催

着要报，由于他长期在外地养病不归，军区党委集体讨论通过后电话或电报征求他的意见，他又不讲，可事后却大发脾气说：“我又没有死！”等等。在韩先楚等的干扰和发难的情况下，军区机关、部队很多正常工作难以开展和进行。军区几个原领导也将精力放在时时、事事提防韩抓辫子、找岔子和穿小鞋上，不敢全力抓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和机关的几个领导同志多次向我反映，我对此情形也十分为难和焦虑。韩先楚是司令员，对他的做法我实在不好说什么，更不便出面处理。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于 1975 年 9 月向党中央、毛主席、叶、邓副主席写信报告了韩先楚同志来兰州后的一些问题，请求中央军委帮助解决。

当时毛主席看了报告后，委托叶剑英副主席解决。叶帅给我打了电话：“你的报告毛主席已看了，要由军委派人去帮助处理。”1975 年 12 月，经毛主席批准，由军委派出以副总参谋长向仲华、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为组长的庞大的工作组，以检查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名义来到兰州军区进行调查，协助解决。

工作组来了后，找当时的军区领导和各大部主要领导逐个进行谈话，并找了一大批二级部长和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觉得双方认识和分歧太大，一下子很难消除和解决。所以，直到工作组返京，都没有同军区领导坐

在一起，面对面谈问题，进行调解，更没有明确表态，指明谁是谁非。只是说回北
京后向军委报告，听候军委指示。直到 1977 年我免职，长达近两年时间，也未
见中央军委对此有任何一点指示和说法。这样兴师动众一番，最后弄了个不了了之
。韩先楚自此后更加我行我素，不把军区任何领导放在眼里。

◇ “谈心会”始末

关于谈心会的问题，我认为军区党委常委开个谈心会，完全是党内正常生活，
并且是韩先楚同志提议召开的这个会，也是他和我共同主持召开的。

1976 年 7 月 30 日，我从农村视察工作回来，晚上我去看郭鹏同志，郭说
韩司令身体不好，我说明天我去看他。第二天我去看韩时，韩先楚提出要召开常委
谈心会，我当时表示，现在谈恐怕时机不成熟，谈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谈不好还
会引起新的矛盾。但韩先楚态度很坚决，坚持要立即开，我也不便坚持，只好同意。

8 月 4 日起至 11 日，我们兰州军区党委召开了常委和军区顾问参加的谈心会
。会上，我是本着交心通气、消除误会、寻求团结的精神，讲了自己的意见，也对
韩先楚同志的一些作法提出了一些批评。别的常委同志和顾问也都发了言，也有给
我提意见的，也有对韩先楚同志提出意见的。但韩先楚在听了大家的批评后却很不
高兴，他在会上既不交心，也不做一点自我批评，只是表示要保留意见，但会后却

到处讲说我是借谈心会故意整他。结果根本谈不拢，谈心会开了个不欢而散，反而更加深了矛盾。

众所周知，谈心会并不是我要召开的，当时我还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开会时机并不成熟，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而正是韩先楚自己的极力坚持才召开的，怎么能说是我召开谈心会有意整韩先楚呢？参加谈心会的很多同志都还在，会议的记录应该还保存在党办，这些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地讲话呢？

会上，有的同志还批我是在跟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甚至是四项、五项指示为纲（都有记录在案）。我在会上对韩先楚提出的意见，主要是工作上的矛盾，特别是他曾经说兰州军区有山头、有宗派、排外等。他的这些话又不在常委会上讲，而是在下面到处讲，我对他的这些说法和搞法是不满意的（对此，我还以个人名义向毛主席、叶、邓副主席写信反映，请求中央调查解决）。

按照中央规定，会上大家一致通过决定，把每个人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由个人审阅后上报中央军委。可会后，韩先楚同志又迟迟不愿意上报，但同时却又违背党的纪律，私自把党委会记录拿到北京、武汉去，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不断向军委某些领导吹风、打“小报告”。在这种情况下，高维嵩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反映谈心会情况。他的秘书拿给我念时，我是表示同意的。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党中央发出了一级紧急战备命令，明确要求各

级指挥员必须昼夜坚守工作岗位，以防不测。当时韩先楚正在北京。军区接到中央电令后，我当即指示参谋长马友里同志打电话向韩报告，请他尽快返回兰州坐镇指挥，部署军区部队的战备工作。可是韩先楚却在电话中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天不会塌下来。家里不是有那么多领导吗！为什么非要让我回去不可？我不回去，请别人代理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只好由当时分管作战的李书茂副司令员组织机关作了传达部署。

可是，1977年7月兰州军区党委四届六次全委会上韩先楚在总结发言中却反咬一口说：“……尤其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时，中央发出一级战备命令，他们（指洗恒汉、高维嵩、李书茂）竟延误了几个小时不传达、不部署。”并将此事作为我“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干扰战备工作”的罪状。关于我和韩先楚之间工作上的矛盾，到北京开会时，也曾向当时主管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作过汇报。当时叶帅并没有表态，只是说：“你们两个是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两只公鸡，你们说怎么办？”我当即表示我愿意调走，叶剑英还给我做工作说：“你在兰州时间长，情况熟悉，身体也不错，还是不考虑调走吧。”

◇ 中央派来了肖华

1977年4月，中央军委突然任命肖华来兰州军区任政治委员。在下达任命命令之前，军委、总政没有象通常那样给我们打招呼、通气，也没有征求过意见、说明意图。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非常敏感的时期，这是很能引起人们猜测的。

我本人也弄不懂上面是什么意图？我还曾经为此打电话请示过当时主持军委工

作的叶剑英元帅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问中央军委调肖华来兰州军区任政委，

上面有何考虑？由于他曾当过总政主任，来后位置如何摆法？得到的共同答案是：

“因为你的主要精力是抓甘肃地方工作，调肖华去是为了加强军区领导力量，没有

什么别的考虑。至于到兰州后的位置摆法，按先来后到，你为第一，他为第二，协

助你抓好军区部队工作。”肖华来兰州后，也多次对我讲，他是调来协助我抓好军

区部队工作的，他来第一没有带什么人的指示，第二没有什么框框，是“协助洗政

委工作的，”并说对此感到很高兴等。

但是肖华来了以后，却并不是象他所宣称的那样，而是象一位钦差大臣。他把

架子端得很高，在并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对军区的工作多方指责，并明确表

示兰州军区领导对清查“四人帮”工作很不重视，抓得很不得力。还煞有介事地说

，有人在“捂盖子、保自己”。由于他曾任过总政主任，我对他还是比较尊重的，但

是他下车伊始，就武断地下结论，说兰州军区主要领导怕联系实际，怕揭深揭透等

，这也不是那也不对，给我们的清查工作定了“框框”，“要密切结合军区实际

情况”，集中揭发军区主要领导与“四人帮”的关系。

1977年4月下旬，军区召开了师及军分区主要领导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中央关于清查“四人帮”阴谋活动罪行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以及部署对部队进行正面教育的工作。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刚刚调来还不满半个月的肖华和韩先楚联合起来，首先转移会议方向，既不揭批“四人帮”罪行，也不研究对团以下部队如何进行正面教育问题，而是带头对我搞突然袭击，煽动大家集中揭发我与“四人帮”的关系。由于没有揭发出什么问题来，他们又要求与会的每个人亮相，表明态度。当时会议上对他们的作法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如军区副政委高维嵩，副司令员李书茂、杜绍三，军区顾问组长郭鹏，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孙殿甲，副主任李世祥，后勤部政委齐振兴，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青海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政委宋长庚，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等同志，在后来的清查运动中，无一例外受到打击迫害，统统被定为所谓“洗家帮”的主要核心或骨干、亲信，先免职后审查，有的则被关押。

肖华这个同志原来作过总政主任，在工作上他是我的上级，我对他一直都是很尊重的，我和他的关系完全是工作上的接触，没有私人交往，更没有掺杂任何个人恩怨在里面。对于他搞“莫须有”，一定要把我整成所谓“洗家帮”并以此为借口

整掉了一大批干部的行径，我考虑了十几年，都没有想明白其中的原因。回想起我和肖华以往的工作交往，感到这个人是有不光明磊落。关于在兰州军区“四大”中他所扮演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以及先定调支持后拒不认帐并嫁祸于人的角色，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众所周知他在罗瑞卿同志问题上的表现，就已经够淋漓尽致了：在罗瑞卿同志落难时，他提供炮弹，落井下石，并主持发动全军揭发批判；在罗瑞卿同志平反逝世后，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义写诗悼念，对此很多同志都有看法。政治上投机多了，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风派”本质，因此，这也就不难解释热衷于宣传“认识英明领袖、了解英明领袖、熟悉英明领袖、忠于英明领袖”的肖华，在华国锋下台后便又立刻抢先批判华国锋了。

肖华的政治品质在我党几次党内斗争中都有所表现，例如，1957年反教条主义，他就积极追随林彪，整了刘伯承元帅。又如，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他又跳出来揭发彭德怀元帅“里通外国”，在访苏期间和赫鲁晓夫私下谈话反对三面红旗。彭老总解释说，他不懂俄文，赫鲁晓夫不懂中文，又没有翻译在场，两人如何密谈？彭老总的这顶帽子一直戴到平反昭雪。1961年肖华又紧跟林彪，利用“端正政治工作方向”之名，整了总政主任谭政和副主任刘志坚、甘泗淇、傅钟

等老同志。升任总政主任后，随之又整了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同志。后因文革期间在写检讨时犯生活作风错误，听说江青骂他是“花花公子”，因此，“四人帮”垮台后肖华便又成了受江青迫害的英雄。

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和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将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等找到西山叶帅的住所，专门谈了贺龙同志的问题，说我们三人都是贺龙的老部下，给我们先打个招呼，让我们心里有个数。在谈完出去后，肖华又赶上来对我讲：“邓小平已被中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了，你是红七军出来的，要认真回忆一下，要揭发，态度要明朗。”我当时就说：“我在红七军是当兵嘛，知道什么？”后来回去后，无论是关于贺龙同志的问题还是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我们几个都达成默契，即不理睬、不揭发。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时间早已还历史于其本来面貌了，当时的混乱思想也经过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得以彻底澄清。由于历史的原因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并没有谁去翻箱倒柜搬出来刻意追究，到是许多往事都已经淡忘了。然而肖华本人是否还因心虚而耿耿于怀，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对于一个挂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桂冠的人来讲，作这样的猜测是否有些不合适？

肖华到了兰州军区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韩先楚一起，搜集我的材料，给我罗列罪名，然后到中央、军委找关系吹风、打小报告，走政治后门，以达到置

我于死地的目的。打倒我，这是肖华到兰州军区来干的第一件也是他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情，事后他曾多次对人炫耀过，并且在 1985 年调离兰州军区的告别欢送会上作为发言总结道，他来兰州军区工作七、八年，取得的最大政绩就是“彻底摧毁了洗恒汉苦心经营了二十几年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同时，他还信誓旦旦：“将来若是有人出来翻这个案，你们就直接写信给我，我为你们做主。”在甘肃省委，宋平、冯纪新看肖华的眼色行事，提心吊胆惟恐闪失；在军区，这么大的案子只听他一个人的，连中央具体参与此案的人都整天围着他的指挥棒转。

想想参加革命也半个多世纪了，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也都过来了，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是，免职这么多年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找我谈一次话！所谓的“结论”在没有同我本人见面核对的情况下就批了！到底是可悲？还是可叹？不是说“对人的处理要慎重吗”？对干部“要全面的看，历史的看”吗？党的这些干部政策经过肖华们的转手处理后已经在下面变味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共产党内的悲剧。（完成于 1987 年 6 月）

第六章 后记

写完这部自述后，不觉又过了几年了。该说的话说了，心里觉得轻松不少。今年是 1990 年，我也是 80 岁的人了。常言道，人活七十古来稀，如今九十岁也是常见的事，看起来这句俗语要改改了。

这几年一些政治待遇稍稍开始解冻，恢复了党籍，可以学习一些文件，参加一些会议，也经常被邀写一些战史、军史方面的回忆录，一些中央同志来访，年节日来探望等。但又是几年等下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迹象。曾经有过一次，军委和总政某首长检查工作，还专程看了我，听了我的申诉，并信誓旦旦，许愿回京后一定立即着手复查我的问题。但一个月、二个月、半年……在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等来了因为党内又一次内部斗争，而我的问题也随之搁浅的消息。

有时心里愤然，思忖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当初十年汗水，十年操劳，十年忧国忧民，一腔热血尽抛，到头来却被当做筹码成了某些政客间权欲斗争的牺牲品。有时心里又坦然，扪心自问：于党于国自己是尽心尽力的了。时间过的真快，转眼即是八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有资格闭目静思总结人生了。

纵观一生，自我评价还算是功大于过吧。期盼中的组织上重新审查我的所谓“结论”，看起来有生之年是等不到了，是非功过，褒贬由人吧。八十年的风风雨雨，自认为还算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家庭、对得起后代。

平生无甚嗜好，只是：

最大的心愿：老天下雨，缓解旱情。

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新闻联播。

最想听的是：时事民情。

最怀念的人：贺龙元帅。

最想说的话：该说的都说了。

留给老伴的话：我一生两袖清风，什么也没有留下。

留给儿女的话：守法。

这几年又经历了许多：“6.4”事件、苏联解体、苏共解散、改革开放——

总的来说，有的理解有的不太理解。但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这个规律是不以任

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虽然近十年不太出门了，但从电视、收音机里看到、听到

，从家人、朋友口中听说，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家和老百姓富裕了，这一切使

由

衷欣喜，我们革命那么多年，牺牲了那么多人，为的就是国富民强的这一天。国

家

强大了，人民富裕了，我们无数共产党人的努力就值得。至于在前进过程中出现

的

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党内腐败、违纪等现象，相信滚滚向前的历史一定会涤荡

这

些污泥浊水，我坚信，明天更灿烂！（写在1990年11月）

《大寨精神在武威》

甘武著

目录

- 1 毛主席语录
- 2 新的一页
- 3 县委是关键
- 4 大抓基层班子的建设
- 5 坚持社会主义教育
- 6 以大寨精神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 7 向生产深度进军
- 8 还要努力作战

（《大寨精神在武威》，甘武著，85 页，农业出版社出版，1976 年。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农业学大寨

新的一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长期处于后进状态的武威县，近几年来，迈开了学大寨、赶昔阳的新步子，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武威县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部，祁连山北麓，海拔一千五百多米，属大陆性气候，平均无霜期一百五十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一百五十毫米，年蒸发量达两千多毫米。农作物以小麦为主，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谷子、玉米、高粱和其他杂粮占近百分之三十。

武威县（古称凉州）有五十四个人民公社四百三十八个生产大队，七十一万人口，可耕面积一百五十一万亩，每年播种面积一百三十多万亩，是甘肃省人口最多的一个县。这里土地平坦，水利资源比较丰富，素有“银武威”之称，民间流传着“凉州不凉米粮川”的佳话。但是，在万恶的旧社会，这里阴霾四布，鬼蜮横行，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剥削，逼得广大劳动人民走投无路，“米粮川”里尸骨遍地，哀鸿遍野。

解放后，武威县和全国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贫下中农走上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道路，农业生产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农业生产的前进步伐，一直很缓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九七零年秋，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了。《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学大寨》的重要社论，社论说：“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这个尖锐的问题，象春天的惊雷，震动了武威县的各级干部，象战斗的号角，鼓起了武威县人民跃进的斗志，使武威县在“农业学大寨”的征途上迈出了新步伐，开创了新局面。

五年来，中共武威县委和县革委会，带领全县人民以大寨和昔阳为榜样，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强劲东风，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斗出了人变、地变、产量变的崭新景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滚滚洪流，摧毁了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荡涤着孔孟之道的污泥浊水，毛泽东思想大普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农业学大寨的战鼓响彻全县。人民群众想得宽了，看得远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境界高了。这是五年来武威县最大的变化，也是最可喜的收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武威是全省有名的“老大难”县，阶级斗争尖锐复杂，革命和生产都上不去，有的领导干部不愿到武威县来工作。群众形容说：“领导干部难久留，怕犯错误栽跟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广大干部狠批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县委和县革委会领导班子下定决心把武威建成大寨式的县。他们一反常规，走出办公室，扎根到基层，把毛泽东思想送到千家万户，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农民，发动群众。他们和群众一起攻读马列的书，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固步自封的错误思想和懦夫懒汉世界观，他们和群众一起打井抗旱，抡起铁镐平整大寨田，书写“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的历史新篇章。

今天，在武威县，到处可以看到人民群众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喜人情景。各级党委层层举办的理论学习班，一期接一期，公社、大队、生产队学习理论的三级辅导网，已初步形成。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理论骨干队伍，发展到一万六千多人。毛主席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大大发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过去，有的干部嘴里喊的是大干，而实际上夹着铁锹乱转。如今，广大基层干部自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五更棉衣一身霜，中午单衣一身汗”的模范行动，实打实地带头大干社会主义。新老干部都能以大寨干部为榜样，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作反修防修的大事来抓。一年

四季，心贴心地和群众一起劳动，在泥土中滚打，风雨中奔忙，换来了土地大变样，粮食大增产。

全县人民从五年大干，五年大变的斗争实践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轻轻松松改变不了面貌”，这是千真万确的。艰苦奋斗学大寨，加快步伐赶昔阳，成了全县人民的自觉行动。从干部到群众，都能舍得出大力，流大汗，以革命前辈在过去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不畏艰苦，忘我劳动，大干苦干。永昌公社马珣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张龙，为了抢时间，争速度，背着八十多斤重的钢丝绳，连夜跑了三十多里路，赶回打井工地，棉袄磨开了花，脊背上往外浸血，仍然坚持战斗。社员们感动得淌眼泪，他却笑着说：“打井抗旱为革命，越苦越累心越甜。”和寨公社山高大队有两个女社员，她们说：“为了社会主义开凿幸福泉，再苦再累我们也要上战场！”

她们积极克服小孩拖累等困难，参加了抗旱打井的战斗，饿了啃一块饼子，渴了喝几口开水，坚持不下火线。

今天的武威，燃遍了革命大批判的烈火，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社社队队设有大批判专栏。人们思想大解放，精神大振奋。和平公社韩寨大队有个女社员叫任翠兰，从前见了人还没说话脸就红了，对集体的事情不多管，对坏人坏事不敢斗，批林批孔运动的普及、深入，使她从“男尊女卑”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她心里渐渐装上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变成了全队出名的“管得宽”，对有损集体利益的事敢管，对错误思想敢批评，对坏人坏事敢斗争。一次她下地去干活，看见本队的一个反革命分子提着篮子一面走路，一面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心里就犯了疑，立即追上去盘问，那个坏家伙支支吾吾答不上话来，想溜走，被任翠兰一把抓住，从他的篮子里搜出了骗钱害人的罪证。不久，群众就把处处做到“三敢”的任翠兰选为妇女队长。过去心想一家一户的农民意识开始冲出了私有制观念的精神牢笼。解放前，武威县农村有句俗语：“浇水不认亲爹娘”，为了使自家地浇上水，那怕是自己的亲属也不能让水。那时候，因为争水，村与村、户与户常常打架斗殴。解放后，社会制度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变了，为浇水打架闹事的现象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几年前遇到天旱缺水情况，仍然有争水抢水的矛盾发生。近几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九七三、一九七四两年，正当全县缺水干旱的关键时刻，已

经有了机井的社队，主动把自己用汗水换来的井水送到兄弟社队，浇灌受旱的禾苗，为保证全县的丰收做出了贡献。

武威县的广大干部和社员说：“大寨的道路，就是几亿农民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学了大寨，我们懂得了自己治山治水的战斗是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紧密联系的，我们的一锄一锹都是为了完成铲除旧制度的痕迹，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这就是武威县的干部和人民经过一场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得到的新认识。有了这种高度觉悟，有了这种精神境界，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呢

五年来，武威的干部和人民正是用这种新的思想，去改造自然的面貌，创造社会主义农业的宏伟业绩，绘制最新最美的画图。

先说水吧，过去，虽然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因为人们的思想被“靠天吃饭”的绳索捆得紧紧的，地下水没有开发，干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春天愁地干下不了种，夏天急没雨浇不了苗，秋天怕没水泡不了地，终年盼雨水，等山水。

后来，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着手开发利用地下水，但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的修正主义黑货，又象一块无形的磨盘石，压抑着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专家治水”的毒害下，修一条干渠，得国家投资几百万元，得三、四年时间。因而渠道失修，河水乱流，不仅地下水请不出来，连地面水也管不好。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象熊熊烈火，燃遍了武威大地；党的群众路线和自力更生的方针发扬光大，什么“靠天吃饭”“专家治水”“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等修正主义黑货，被革命的铁扫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人们学习大寨人改造山河的革命气魄，同干旱开展了斗争，靠自己的双手向地下要水。没有资金自己筹，不懂技术干中学，立足于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四年内打成机井一千九百九十七眼，相当于前二十年打井总数的八倍。农用输电线路也由一九七零年前的一百五十公里，发展到七百八十多公里，近百分之五十的大队架起了电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有些社队的土地是“牛肋巴，猪耳挂”，一提平田整地，个别懦夫懒汉思想作怪的人，就摇着脑袋说：“土地一年大翻腾，庄稼十年不如人。”搞农田基本建设时，“老埂子上戴帽子，应付上级报数字”。

近五年来，武威县委带领全县人民，意气风发地投入了改天换地的战斗。截至一九七四年底的四年中，新建标准条田五十四万多亩，超过了前二十年条田总数的三倍。

喜看今日的武威面貌，日新月异，有些地方已经条田连片，“铁牛”奔驰，一眼眼机井星罗棋布，机声隆隆，一条条水渠清水长流，纵横似网，一条条大道绿树成荫，平坦宽畅。做到了田、渠、林、路，纵横相间，又平又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

五年来，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指引下，武威县的农、林、牧、副各业兴旺。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零年相比，造林面积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生猪存栏数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八，农副业总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社队公共积累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四，社员个人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也大大加快，全县拖拉机由一九七零年的一百九十台，增加到二百八十九台，排灌机械由二百八十台，增加到一千九百八十八台。扩建和兴建了一批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五小”工业，架子车、磷肥、水泥等支农产品，由过去的十五种增加到二十六种，为高速度地发展农业做出了有力地支援。

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变，促进了粮食产量的逐年增长。一九七二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四百零三斤，比上一年猛增一百零四斤，一举上《纲要》。一九七三年遇到严重的干旱侵袭，亩产仍然达到四百二十二斤。一九七四年，又战胜旱、风、霜、雹等自然灾害，粮食亩产达到四百五十七斤，总产五亿二千万斤，创历史最高记录。

五年来，全县人民学习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向国家交售的粮食一年更比一年多。每到秋季，武威县农村的条条大道上，车水马龙，一辆接一辆的马车，架子车、拖拉机、汽车，满载着金灿灿、红艳艳的“爱国粮”，满载着广大社员群众的心意，争先恐后地奔向粮站。许多老贫农捋着胡子，无限喜悦，无比自豪地说：“我们毛泽东时代的新农民，要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一九七二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七千八百五十六万斤。一九七三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九千三百万斤。一九七四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一亿五千万斤，比国家规定的五千二百万斤包购任务超额近两倍。四年内向国家交售的粮食，相当于一九七零年全县总产量。

五年的实践说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五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武威结出丰硕成果，批林批孔运动在武威县不断赢得胜利的五年，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历史任务在武威县逐步落实，逐步取得成效的五年。

大寨春风吹遍武威，武威县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武威人民将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引下，挥笔描绘更新更美的社会主义画图。

县委是关键

一九七零年秋天，武威县作为后进县，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直接听了昔阳县学大寨的经验介绍，亲眼看了昔阳县人民发扬大寨精神，治山治水，大干社会主义农业的动人情景，震动很大：昔阳县能在短期内建成大寨式的县，武威县为什么长期处于后进状态？是武威县的自然条件不如昔阳吗？不是，武威县的条件不比昔阳差，是武威的人民群众不愿意干吗？也不是，那是为什么呢？武威县何时才能象昔阳那样建成大寨式的县？这些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武威县领导班子面前。

长城公社的启示

武威县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迈开新步子，是从认识了根本在路线，领导是关键这一点开始的。“农业学大寨，县委是关键”，这句言简意明的话，人们早就熟知了，但是，武威县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这话说起来简单，可是真正理解了，做到了并不容易。他们在斗争实践中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才加深了理解，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

一九六八年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诞生的县革命委员会，刚一成立就着手领导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那年冬天到一九六九年春季的两个多月时间内，县革委会先后组织了县、区、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四千多人，去大寨参观学习，受到了很大教育。不少社队干部回来后，学习大寨大队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带领群众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并且涌现出了长城公社、四坝公社四坝大队第二生产队等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但是，由于县革委会在领导学大寨运动中的指导思想不明确，运动的发展很不平衡。仍有部分社队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冷冷清清，没有上路，还有相当多的社队学大寨没抓住根本，光学表面，图形式。

在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回答《人民日报》社论提出的问题时，武威县的领导班子，首先对照昔阳、大寨找差距，发动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用整风的方法揭露矛盾。在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大家向县委提出了一百多条意见：有的说，武威县委在领导学大寨中是：雷声大，雨点小，嘴上说得凶，实际干得松。有的说：县的领导学大寨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还有的一针见血地指出：县的领导是学大寨学在嘴上，行动不对号，面貌咋变了？基层干部和群众提出的这些意见说明：县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中，尽管学大寨的会没少开，赶大寨的口号没少喊，但是，由于方向不明，决心不大，学大寨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当时，大多数领导成员认为，群众的批评敲到了锣心上，揭到了要害处，也有个别领导成员，对群众的尖锐批评接受不了。

为了端正领导成员的思想路线，统一认识，一九七一年春天，县委在地处腾格里大沙漠前沿的长城公社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长城公社不仅是全县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也是出席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先进单位代表。解放前，这里是个“黄沙滚滚不见天，到处沙窝不见田”的穷地方，全公社一万六千多亩土地全部被沙海包围，亩产只有百十斤。解放后，依靠集体的力量，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长城公社党委带领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积极响应，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公社党委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狠抓阶级斗争，严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投机倒把等瓦解集体经济的资本主义势力。对于弃农经商、副业单干等资本主义倾向，及时批，反复批，不断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向沙漠开战，同风沙搏斗，在风沙豁口上植树造林，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在前十年植树造林的基础上，把分散的林片连接成了林带，营造了两条总长六十六里的防风固沙的绿色长城，造林面积达到了三万九千多亩，锁住了“黄龙”，保护了庄田。同时每年组织大批劳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面貌大改变，使昔日沙丘横卧的碱滩，变成了肥沃的良田。从一九六六年以来，粮食亩产连年上《纲要》，对国家作出了贡献。县委全体同志和长城公社的贫下中农一起吃忆苦饭，参加植树造林劳动，听取他们学大寨的经验介绍。

全体县委成员看“长城”，想全县，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全县自然条件较差的长城公社，所以能在学大寨运动中取得显著成效，主要原因是公社的领导班子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满腔热情地学习大寨经验，学大寨学到了根本上。长城公社能办到的，全县为什么没有办到？长城公社学大寨的经验，为什么没有及时地在全县推开？不怪基层，不怨群众，责任完全在县委。

长城公社的启示，使武威县委的领导成员，对昔阳县学大寨的一个重要经验“根本在路线，领导是关键”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了，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在一个县的范围内，要把大寨经验迅速地、全面地推开，尽快地建成大寨式的县，关键在县委。只要解决好县委领导班子本身的思想路线问题，解决好县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象大寨和昔阳那样，建设一个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社会主义雄心壮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团结战斗的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就能带领全县人民加快学大寨的步伐，在短期内改变全县落后面貌。

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

人们说：“学大寨运动中的斗争，是随时可见，每步必有。”这话一点不假，武威县学大寨赶昔阳刚一起步，就遇到了激烈的斗争。武威县在贯彻落实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时，提出了“狠抓路线促大干，重新安排山河川，奋战三年上《纲要》，五年建成大寨县”的战斗口号。广大贫下中农欢欣鼓舞。

这时，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兴风作浪，攻击短期内改变面貌是‘左倾’盲干。”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领导班子内部来，县革委会领导班子内部，也出现了一场斗争，影响了班子内部的团结，使刚刚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受到了阻碍。面对这场斗争，县革委会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地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回顾历史，分析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现实，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学大寨运动的全部过程，充满了这些斗争。要抓好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须首先抓好领导班子内部的路线斗争，不解决好领导班子内部的路线斗争，就无所谓团结胜利，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一句空话，正在全县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可能夭折。于是，在省、地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县革委会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放手发动群众，以“四大”为武器，揭开了领

导班子内部路线斗争的盖子，分清了路线是非，在这场斗争中，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挽救了一些犯错误的好人，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赢得了县革委会领导班子的革命团结，赢得了学大寨、赶昔阳的第一个战斗的胜利。

黄河后浪推前浪，斗争一场接一场，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新的斗争又会出现。一九七一年，全县粮食减了产，在挫折和困难面前，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又激烈了起来，这种斗争又反映到了县委领导班子内部。减产的原因是什么？困难面前怎么办？县委内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又尖锐起来。

有的同志对粮食减产怨天尤人，认为粮食减产是干旱造成的。对武威县在几年内能不能大上快变，又产生了怀疑，说什么：有史以来，武威县的粮食产量，总是随着雨雪的多少而增减，这个“水涨船高，水低船落”的现象，一时难以改变。

还有的同志面对困难唉声叹气，张口闭口“难啊，难”，说什么，昔阳县只有二十多万人口，而武威县是六、七十万人口的大县，人多事杂，工作难搞，长期落后，面貌难变。

大部分同志不同意上述两种看法。粮食减产的原因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吗？同样的干旱，同样的灾害，为什么法放等公社增了产，而有些水利条件较好的社队却减了产？是“人多事杂，面貌难变”吗？为什么长期落后、情况复杂的金沙公社能在一年内面貌大变，粮食上《纲要》，而一些基础较好的社队却减产倒退呢？大量的事实说明，只要自觉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就一定会蓬勃兴起，取得成效。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党的基本路线来观察，武威县大劳力多，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人民群众热气高，干劲大，只要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带领全县人民学大寨、昔阳那样努力奋斗，艰苦作战，短期内完全有可能大变，昔阳县能够办得到的，武威县也一定能够办到！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实质就是县委领导班子内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他们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开门整风，进行思想交锋，使大家的认识取

得了统一：没有一个真正理解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县委，就迈不开学大寨的步伐。用党的基本路线来衡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然条件的好坏和灾害，也不在于落后难变，关键在于一些同志头脑里的唯心史观作怪，只看到部分地区自然条件差的一面，看不到条件差是可以改变的；只看到长期落后，看不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中焕发出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注意埋头抓生产，而放松了抓阶级斗争，放松了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批判。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县委常委深入基层，向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检讨工作，虚心听取贫下中农的批评，主动承担责任。这样做了之后，不仅没有使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折，反而使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坚定了学大寨赶昔阳的信心。

从这时起，武威县委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学大寨绝不是那样和和平平的，要挺起腰杆斗，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几年来，武威县委采取各种措施，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断地打击阶级敌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县委和区、社党委每季度召开一次阶级斗争动向分析会，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每年的春种、夏收等一些重要生产活动开始之前，全县各社、队普遍评审地、富、反、坏，并且把一些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交给广大群众进行批斗，开展对敌斗争，打击破坏活动；抓住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和思潮，及时引导群众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开展革命大批判，

明辨是非，提高认识，扫除思想障碍；每年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总结交流经验，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教育干部提高执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武威县委在这一场又一场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了，认识风向辨明是非的本领也增长了。但是武威县委的同志们深深感到，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还会在不同的形势下，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几年来，武威县委在工作顺利、学大寨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注意克服和批判了盲目乐观、停滞不前的骄傲自满情绪；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又及时地同畏难松劲、悲观失望的思想作斗争。这样，使县委领导成员经常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头脑，坚持不断斗争，不断前进。

一九七四年，是武威县连续获得丰收的第三个年头，正在夺粮的关键时刻，又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特别是受旱严重的黄羊区，河水比往年减少百分之九十二，人畜饮水的涝池全部干涸，全区九万亩夏禾作物受到干旱的严重威胁。县委及时作出了抓黄羊区，促全县，抗旱夺粮保丰收的决定，提出在黄羊区开展担水点种小秋作物。这时候，社会上引起了种种议论，有人说：“天命如此，种在人，收在天么”“旱情这么严重，靠担水点种，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一小撮阶级敌人也攻击说，担水点种是，“极左思潮”“劳民伤财”。还有个别同志，也对战胜干旱信心不足，认为“旱情重，没法抗，担水点种顶啥用？”“是象大寨和昔阳那样，迎着困难前进，还是被困难吓倒，是前进，还是倒退呢？在这新的考验面前，县委领导清楚地意识到：不仅在顺利的时候学大寨，在困难和灾害严重的时候，在斗争激烈的时候，更要毫不动摇地学大寨，才算真学大寨。只能象昔阳人民那样，“天大旱，人大干”，战胜灾害夺丰收，决不能屈服于大自然的压力的。县委带领全县人民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大破林彪、孔老二散布的“天命论”，大立“人定胜天”的思想，以“千里百担一亩苗”的革命精神，向灾害展开了斗争。县委领导，以及正在县上开会的各区、社领导一百多人，同城市机关干部、工人、学生一起，拉着架子车，连夜到六十里外的黄羊地区送水抗旱。当时，武威城内热闹非凡，倒不是人们去看什么动人情景，而是都在议论武威县农业学大寨史上的一件新事物。人们说：“过去，我们听说过昔阳县担水抗旱的事，当时不过觉得是一种精神，今天武威也出现了这种事，觉得这不仅是一种精神，而是精神产生的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一夜，在“兰新”公路上，一支抗旱队伍在一路小跑，汗洒在路上，脚上打起了血泡，但这汗水却冲刷了“天命观”，这血泡回击了靠自然恩赐过日子的懦夫思想。在县委带领下，县级机关和厂矿企事业单位出动了三千七百多人，汽车、拖拉机、架子车、自行车等运输工具一千八百多辆，拉水送水，掀起了抗旱热潮。

在黄羊区的谢河公社，有个只有九十多人的东沟大队第四生产队，干旱夺走了他们的好庄稼，炎日晒得土地直冒青烟，有些老年人说：“要是在旧社会遇到这样的灾情，就只有逃荒要饭了。”一九二九年，旱情并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死的人不计其数，死尸无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如今，时代不同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武威人民，视“天命”如粪土，不低头，不弯腰。这个

生产队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孩子，都出动了，担着桶，端着脸盆，拿着碗，一桶桶，一盆盆，一碗碗地把水送到地里，点种了八亩玉米。县委用这个队的事实来教育大家，他们把各级领导干部带到这个生产队，指着正在用珍惜的水与老天夺粮的老人和孩子们对大家说：“大家看一看他们的行动吧，他们这种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不是正好可以用来医治我们头脑中的右倾顽症吗？”

的确，人民群众的英雄行动，难道不是已经宣告了林彪、孔老二的“天命观”破产了吗？难道不是决定了历史的命运真正掌握在人民群众的手里吗？

这场斗争赢得了思想上的胜利，也获得了物质上的丰收。在黄羊区抗旱斗争的推动下，全县有十八万人投入了抗旱斗争，使一九七四年的粮食总产比大丰收的一九七二年，增产五千七百多万斤，大灾之年夺得大丰收。

五年来，武威县委就是这样，斗争一次，增添一层智慧和力量，终于斗出了学大寨、赶昔阳的新成绩。

执行正确路线的保证

革命化的作风，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保证，为了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武威县委把认真改进领导作风，坚持在干中指挥，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抓。

过去有人认为：武威县的大队多，一个大队住一天，也得四百多天。有的领导以此为借口，蹲在机关忙于日常事务，靠文件指导工作，靠电话了解情况，下去之后也是转一转，看一看，象水上的葫芦沉不下去。贫下中农批评说：“只说干干干，不见领导面，武威农业要上去，县的领导得下来。”

群众的尖锐批评，给新的县委敲起了警钟，大干大变就要舍得花力气，舍得流大汗，领导要当学大寨的火车头，同群众一起战斗，一起前进，不能站在一边指手划脚，空喊口号，一定要把脚根深深扎在人民群众中，从群众中汲取政治营养，和全县人民一起改天换地。为了迅速改变武威面貌，县委经常只留一两个常委在家主持工作，其他领导同志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吃住在社队，劳动在田间，和贫下中农同学习、同商量，抓路线教育，搞调查研究，取得指导三大革命斗争的主动权。谁都知道干旱是武威发展农业的主要威胁，而解决干旱的办法是什么？就得靠调查。新县委一成立，这个调查工作就开始了。平原

地区现在状况是啥？过去状况是啥？山区又是靠什么来解决水利化？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古老的河床谷道，深山的冰川雪堆，甚至连无人烟的老林灌丛之中，县委的一些同志都分别走到了，才得出了解决武威水利问题的正确答案。当全县掀起打井、修渠等水利建设高潮以后，县委又对哪个地区可以打井，哪个地区应该修渠，以及打什么样的井，装什么样的抽水机械等问题，都作了深入地调查了解。在那些进行水利化建设的日日夜夜，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县委的同志，头顶烈日，或披着风雨，在渠道上、在井台上调查和访问。他们通过察看武威的山山水水，按土壤、水源等自然条件，把全县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地区，制定了一个全面治理武威面貌的初步规划：山区和沿山地区，大搞梯田和台田建设，蓄水保墒，防止水土流失，一季夺高产；山水地区大搞条田建设和渠系配套，提高河水利用率，扩大灌溉面积，实行间作套种；泉水地区主要是开发利用地下水，打机井，搞深翻，大力推广带状种植，变一茬为两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武威县委在指导工作中，对涉及全县性的大问题上是这样做的，就是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时，也是这样做的。举个例子说吧：一九七三年六月间的一段时间里，黄羊河上游来水量达到六个秒立米，县委算了一个帐，如果按这个水量，不仅可以浇完全灌区的第一轮苗水，还可以泡两万亩干地，扩大秋禾作物。当时县委考虑到黄羊区因为干旱少种了几万亩地，现在泡些干地抢种部分秋粮，还可以弥补夏禾的不足。但是又想到，事物是不断变化的，现在上游来水六立方，以后能不能持续下去呢？心里觉得没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教导，没有立刻作出决定，而是派了工作组，先到山里去勘察来水区域内的积雪。勘察结果表明：来水区域内没有积雪。于是县委就放弃了泡干地扩种的计划，指示黄羊区集中精力灌好二轮苗水。以后水量果然逐渐减少，连灌苗水都显得十分紧张了。中共武威县委就是这样，不经过自己的亲自实践和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掌握切实可靠的依据，绝不轻易决定重大问题。

要把改变武威面貌的蓝图变为现实，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近几年来，县委领导成员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和贫下中农同甘共苦，大干苦干。一九七四年秋天，在全县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中，县委常委带领机关干部，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办公，同群众一起批林批孔，参加劳动，指挥生产。一次，县委书

记到韩佐公社去参加劳动，看到工地上白天红旗招展，夜里灯火一片，社员们一天三出勤，你追我赶，大干苦干，心情无比激动。他亲自提笔写了一块“武威县大河区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的牌子，挂在改土治水的现场，和群众一起大干，他不是拉架子车飞奔，就是挥动着铁锹上土。有一次，天还没有大亮，他拉着架子车同社员一块运土，帮助拉车的小张说：“你是这辆车子的司机，我就是你的助手，咱们一块儿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跑。”听了小张的话，他更加信心百倍，浑身是劲。他俩一个拉，一个推，一直干到太阳红，在吃早饭的时候，小张才知道和自己一块干活的是县委书记。他看着满脸是汗，浑身是土的县委书记，激动地说：“真没想到，我能和你在一起战斗。”县委书记高兴地说：“不，你应该想到，过去我们没有在一起劳动是受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今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要逐步消灭三大差别，我们将永远战斗在一起，向共产主义迈步。”

“永远和贫下中农战斗在一起”这句话，代表了武威县委全体成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勇往直前的心愿，他们从书记到委员，都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旧传统观念决裂，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反修防修的大事。一九七四年秋，县委提出每个干部深翻一亩地，县委常委首先做到了这一点，为广大干部树立了榜样。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革命，在炮火纷飞的年代里，他和人民群众鱼水相依，革命胜利后，进了城，坐了机关，由于脱离了劳动，和人民群众的感情逐渐淡薄了。文化大革命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后来进了“五七”干校，在学习和劳动中提高了路线觉悟，焕发了革命青春，使他深深认识到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危险。当他担任县委领导以后，经常告诫自己，要干着指挥，绝不能转着指挥。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严重的心脏病、血管硬化和胃溃疡等疾病，医生曾警告他，病情又有新的发展，不能参加劳动。但是，他全然没有把自己的病放在心上，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只要一有空就参加劳动。有一天，他步行了五十多里路去检查工作，当来到他蹲点的大队时，天已经黑了。他问队长：“明天干啥活？”队长看他已经很疲劳了，就说：“明天我们放假，你就好好休息吧。”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起了床，到地里去平地，

社员们上工时，他已平出了好大的一块。见到此情景，社员们说：“县委领导这么干，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呢？”

县委利用开会、学习的机会，还经常组织一些集体劳动，他们在劳动中发现问题，就地解决，受到了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热烈赞扬。有一次，他们在南营公社穿城大队集体劳动，发现这个大队的改土造田进展不快，他们就和贫下中农社员一起劳动，一起谈心，了解到这个大队农田基本建设搞得差，主要是干部缺乏大干快变的思想。他们就和干部座谈，提高他们的认识，使这个大队的干部振奋了革命精神，很快就在全公社掀起了一个与河争地的高潮。

武威县委领导成员，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指示，批判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自己的头脑里构筑反修防修的长城，同时也用自己带头大干的实际行动，教育了广大基层干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

大抓基层班子的建设

从全县情况来说，农业学大寨县委是关键。在基层，一个领导班子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那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能不能深入开展。双城公社中山大队，是一个地势平坦，水源充沛，土壤肥沃的好地方，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非常优越。在农业合作化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当时党支部的几个干部都能一心搞社会主义，他们狠抓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认真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时，粮食亩产就达到了四百零八斤，实现了《纲要》规定的指标，成为全县的先进单位之一。后来，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领导班子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资本主义泛滥了起来，大搞自由种植，与种粮食争肥、争水、争劳力；社员大量外出“抓钱”，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了下来。一九七一年春季，县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带领县、区、社工作组，到这个大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顿领导班子后，新的党支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批判资本主义，坚持学大寨。当年粮食亩产就由上年的二百多斤上升到四百多斤。近几年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七二年过了“黄河”，一九七四年亩产达到了七百三十多斤。中山大队两上一下的经验教训，使武威县委认识到：革命化的领导班子，是执行正确路线的决定因素，一个党的基层组织权利，只有掌握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手里，才会使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反之，如果党的基

层组织的领导成员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就不可能落实，农业学大寨也就是一句空话。因此，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要把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不断引向深入，就必须要把每个基层党组织建设成象大寨大队党支部那样斗天、斗地、斗敌人的坚强战斗堡垒。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武威县委对全县基层党组织的现状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县的基层领导班子，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能联系群众，有比较强烈的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但还有一些处于后进状况的班子，很不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这类班子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有极少数班子中的一些领导成员被阶级敌人拉拢腐蚀，阶级阵线不清，在他们那里好人受气，坏人得志。他们不搞社会主义，专搞邪门歪道。有的领导成员，本身就热衷于搞资本主义活动，在农业生产中搞自由种植，什么利大种什么，不管国家计划；搞重副轻农，不搞农田基本建设；在生活上搞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损公肥私。在这些人掌权的地方，根本不学大寨，农业生产长期落后，年年完不成国家任务，少数人富裕，多数群众生活困难。二是主要领导成员不敢抓阶级斗争，他们的思想受孔老二“中庸之道”的毒害很深，说什么，“石头大了绕着走”“腿长廓露水，话多惹是非”。在这些人当权的单位，正气上升不起来，坏人坏事没人过问，学大寨冷冷清清。三是少数农业生产搞得较好的社队干部，产生了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的思想，觉得产量不高年年有增加，贡献不大比兄弟社队高，社员的肚子吃饱了，该歇口气了，不愿继续前进。认为学大寨，无非是把生产搞好，现在地里有看的，社员有吃的，给国家有交的，学大寨算学到了头。

从上述分析中武威县委认为：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必须耍狠抓基层，在社队领导班子的思想、组织建设上下功夫。遵照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五年来，中共武威县委在搞好自身革命化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对基层干部进行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提高执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武威县委从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中，从分析基层干部的思想状况和发展变化中深深感到：过去一些基层党组织的干部在路线斗争中左右摇摆，分不清路线是非，不能自觉抵制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能

带领群众扎扎实实地学大寨，主要原因是头脑里缺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大寨的道路，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认识不清。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象大寨党支部那样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坚强战斗堡垒，就必须认真抓好基层干部的看书学习，加强他们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搞对头。武威县委根据基层干部文化水平低，看书学习有一定困难的特点，通过举办基层干部理论学习班，分期分批上党校等办法，把基层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集中起来，组织他们认真看书学习，进行短期培训。四年来，参加学习的仅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和革委会正副主任已达三千多人次，全县四百三十八个大队的主要负责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集中学习一次。在党校和学习班里，他们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结合农村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结合学大寨运动中遇到的斗争，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使大家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学习，大多数的基层领导干部能够自觉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事物，处理问题。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觉悟不断提高，加强了学大寨的领导，推动了学大寨运动的步步深入。

五年来，武威县委通过不断地抓基层干部的看书学习，大大加强了基层干部的思想建设，使广大基层干部的思想觉悟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主要表现是：

第一，过去有些基层干部其所以不能很好的带领群众学大寨，是因为对大寨的根本经验和学大寨运动的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把学大寨停留在口头上，年年喊学大寨，大寨经验学不来。通过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学习和总结自己在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大寨是我国农业集体化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典型。学不学大寨，学大寨学什么？这不单纯是个生产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有了这个认识后，许多基层干部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领导学大寨中就能认真地抓住方向路线问题，舍得出大力，流大汗，一步一个脚印地改变面貌，能够因地制宜地改变农业

生产的基本条件，促进农业生产的大上快上。南安公社羊儿大队是个干旱出了名的地方，有首民谣说：

“石头羊儿沟，鹰、雀、老鸦磕石头，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以往，这个大队的干部，胸无大志，认为羊儿大队的自然条件太差无法学大寨，常常以那首民谣作为挡箭牌，得过且过，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粮食亩产只有二百来斤，吃了十几年供应粮。后来，大队干部分别参加了几期理论学习班，对照大寨经验，联系自己的实际，加深了对基本路线的理解，思想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们再也坐不住了，在一起认真地讨论，“自然条件差，能不能改变？羊儿大队还能继续落后下去吗？”

讨论的结果，统一了思想，一致认识到：越是条件差，越要学大寨，只要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发扬大寨精神，什么样的条件都能改变。他们下定决心学大寨，革命加拚命，誓叫羊儿换新天。一九七三年夏天，他们带领群众狠批唯条件论，狠批懦夫懒汉思想，大干五十天，打成了机井八眼，改变了干旱面貌，当年粮食亩产上《纲要》。一九七四年又跨过了“黄河”。民谣也换上了新的内容：“今日羊儿沟，清水潺潺日夜流，没说三年两头旱，年年都要大丰收。”

第二，在学大寨初期，有的基层干部只把大寨作为一个生产典型来学，只学表面，不抓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倾向不敢揭、不敢批，就生产抓生产，生产老是上不去。高坝公社高坝大队党支部书记冯海元，过去怕惹是非，不敢抓阶级斗争。第七生产队干部之间不团结，互不服气，生产处于后进状态。冯海元曾多次到这个队，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在学习班上，他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论述，使他进一步认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大寨是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路线斗，同资本主义斗，同旧的传统观念斗，七斗八斗，斗出来的。因此，学大寨就要坚持斗争哲学，不坚持斗争哲学，学大寨就学不好。他回到队里以后，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再次到七队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很快找到了问题的根子，原来是阶级敌人在暗中破坏捣乱。于是，他发动群众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揭露和打击了阶级敌人，教育了干部和群众，增强了革命团结，使这个队的革命和生产出现了新气象。

第三，从一九七零年以来，随着粮食产量的不断增长，

一些基层干部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倾向，只看到斗争后取得的胜利，看不到胜利后还有斗争，只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认识不到现有的成绩，只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因而在领导农业学大寨中，只守旧摊摊，不想新套套。长城公社前营大队是武威县学大寨学得比较好的一个大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大队党支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地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一九六九年，粮食亩产就达到了七百多斤，大大改变了历史上那种“风沙撵人走，亩产二三斗”的穷白面貌。在这种形势下，大队领导班子中的个别成员，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认为在风沙线上搞农业，亩产能够达到七百多斤，已经是骑着骆驼上沙尖——够高的了。因此，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了一九七零年亩产过“长江”的口号。但由于思想上的自满松劲，行动上的因循守旧，结果是连续过了三个年头，还在“长江”边上徘徊。一九七二年，大队党支部的几个主要领导成员，参加了县的理论学习班后，回到队里组织开门整风，对照党的基本路线，认真总结三年过不了“长江”的教训，批判了半截子革命的思想，大家决心要象大寨的干部那样，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大队党支部进一步提高了抓大事，抓路线的自觉性，开办政治夜校，建立图书室。阶级斗争日日抓，基本路线天天讲，资本主义倾向不断批，反复批，大大振奋了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良土壤，科学种田，一九七三年粮食亩产过“长江”，一九七四年又突破了千斤大关，成为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坚持继续革命，不断夺取高产的先进大队。

加强基层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几年来，武威县委在对基层领导班子普遍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同时，还派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帮助社、队干部学习、工作，加强社、队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柏树公社中畦大队，在旧社会是个穷得出了名的地方。这里的二千五百多亩耕地，绝大部分被地主富农霸占，大部分贫下中农流离失所，出外扛长工，打短工，逃荒要饭。一些老幼拖累较大，不能背井离乡的穷苦人在路旁用土块泥巴垒个窝铺居住下来，挖野菜吃草根糊口度日，因此，人们把这里叫周家窝铺。解放后，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农业生产逐年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

面貌有了很大变化，但从全柏树公社看，仍然处于中间状态，对国家贡献不大。到这里蹲点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在深入调查研究后，发现大队领导班子的手脚被满足于现状的思想绳索捆住了，总认为当日的周家窝铺，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不错了。粮食上了《纲要》，社员吃饱了肚子，对国家也有了点贡献，再要大发展多贡献就不那么容易了。针对这些思想，这位县委副书记和大队干部在同一盏灯下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同一个炕上彻夜谈心，帮助他们理解《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光辉论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大队党支部书记周延文说：过去我们总觉着，只要把本大队搞好，社员生活过得去就可以了，心中没有大目标。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小生产者的自私狭隘观念。一个基层党组织，只有首先把自己从旧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带领广大群众冲破旧的思想牢笼，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这个大队原有的干部焕发了继续革命的朝气，决心带领社员群众彻底改变中哇面貌，加快学大寨的步伐，为国家多作贡献；同时培养锻炼了一批朝气蓬勃、敢打敢冲的年轻干部，充实加强了大队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各生产队也都选拔配备了年轻队长，全队的革命和生产出现了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他们自筹资金四万两千多元，经过两年的英勇奋战，打成机井八眼，平出条田一千二百多亩，初步改变了生产条件。一九七四年的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五百七十二斤，给国家贡献比上一年增长了一倍多。

大批干部深入社队，帮助领导班子进行革命化建设，使许多基层班子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能够朝气蓬勃地带领群众学大寨，而且增长了学大寨，学什么，怎么学的才干。

清水公社王锐大队，是全县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大队，但是，长期落后，靠吃国家供应粮过日子。这条穷根到底在哪里？清源区委的负责同志带着两个干部到这个大队帮助工作，他们协助党支部带领全体党员，到阶级斗争激烈，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第一生产队去，搞了四十天的开门整风。同时，在社员群众中举办了四十天的路线教育学习班，具体剖析了第一生产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原来这个队的生产队长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在阶级敌人的糖弹面前吃了败仗。一个投机倒把分子请他吃吃喝喝，还给他送了一顶帽子，他就让这个投机倒把分

子领着二十五名强壮劳力出外搞副业单干，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绿灯。群众批评说：“敌人送给你的不是一顶普通帽子，那是一顶印着‘新的走资派’字样的帽子，你戴上它就会把我们领上刘少奇走的路上去，这可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啊！资本主义的苦处我们尝够了；社会主义的阳光大道我们走定了！”群众的批评，在大队党支部领导成员的思想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不专阶级敌人的政，阶级敌人就要挖社会主义墙根，不批臭资本主义，就变不了穷白面貌。从此，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和干部，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深入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大干一年，面貌大变，粮食亩产比上一年猛增百分之七十六，摘掉了吃供应粮的帽子。一九七四年，亩产达到六百八十五斤，为国家做出了新的贡献。

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

通过普遍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派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对社、队领导班子进行帮助培养，使大部分基层领导班子发生了变化，在领导农业学大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还有少数社、队情况复杂，问题较多，领导班子仍然处于后进状态，还需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重点整顿。否则就会拉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后腿，影响农业发展的步伐。于是，县委下决心抓后进班子的整顿和建设，促进后进队的转化。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武威县委先后从县级机关抽调二千多名干部，由县委常委和各部门领导干部带领，用了四个冬春的时间，对十一个后进公社、一百八十二个后进大队和一部分处于中间状态的大队领导班子，分期分批进行了整顿和建设，每期三至六个月。大体分为学习文件、开门整风和组织建设三个阶段。在整顿前，首先进行调查研究，摸清社队领导班子的状况，做到情况明，底子清。然后认真培训干部，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任务熟悉政策。同时，组织一定力量先行试点，总结经验，指导面上工作。

在整顿过程中，武威县委注意贯彻了坚持正面教育，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原则，从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着手，突出进行思想整顿。他们认为：这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不强，不能充分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主要是中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造成的。因此，要把坚持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作为整顿和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个根本任务来抓。在教育过程中，采取一学、二揭、三查、四批、五总结的方法，组织干部群众反

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论述，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从理论上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接着大揭大摆本队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使干部从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受到教育；启发干部自觉检查阶级立场，查不抓阶级斗争给革命和生产带来的危害；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干部群众共同对敌，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最后，帮助基层干部，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端正学大寨的方向。和寨公社山高大队党支部书记徐兆熙，过去对党的基本路线学习不够，理解不深，好人好事不支持，坏人坏事不斗争，大寨经验推不开。一九七一年全大队粮食亩产只有一百八十五斤，不但对国家没有贡献，还吃了十万零九千斤回销粮。这年冬天整顿领导班子时，群众对他意见很大，公社有的干部也主张撤换。在这里蹲点的县委书记深入调查研究，同干部群众一起，对他进行历史的全面分析。大家认为徐兆熙同志出身好，根子正，对党和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工作没做好，主要是路线觉悟不高。在县委领导和群众的热情帮助下，徐兆熙从思想上深刻地进行了检查，得到了群众的谅解，仍任党支部书记。县委领导同志为了帮助他，先后六次同他促膝谈心，同他一起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讲路线、教办法，热情支持他工作，使他很受感动。他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带领群众大干苦干，一年之内，自筹资金九万八千多元，打成机井九眼。一年大干，一年大变，一九七二年粮食亩产猛增到三百七十四斤，亩产、总产都比一九七一年翻了一番。一九七三年上了《纲要》，一九七四年跨过了“黄河”。

在组织整顿中，对于那些不能继续担任主要领导的干部，着重从思想上进行耐心细致的帮助，组织上进行调整充实，使其提高战斗力。谢河公社新路大队的原任支部书记何东先，是土改时期的老干部，在二十多年的工作和历次运动中，受过群众批判，因为路线觉悟不高，没有吸取正面经验，而是错误吸收了反面教训，工作中胆小怕事。在他的影响下，其他几个副书记、副主任也是“老好人”思想严重，他们斗阶级敌人、批资本主义不狠，干社会主义小打小闹，小手小脚。一九七三年冬，县、区、社三级党委派工作组，对这个大队班子进行了重点整顿。整顿中，一些群众主张把他们全部换下来。工作组对这个班子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何东先出身好，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作中有一定经验，只要提

高路线觉悟，还可以继续当干部。副书记李伯奎在当生产队长时，敢斗敢闯，到了大队受了何东先的影响，才有些缩手缩脚了，通过教育，还是可以焕发出原有的那么一股干劲。因而不主张全部撤换。一方面组织他们批判“中庸之道”，进行开门整风；另一方面让何东先、李伯奎深入到各生产队检讨错误，处理以往积压的问题，他们在生产第一线受锻炼，受考验，同时取得群众的谅解。同意他们继续当干部。何东先本人提出自己年纪大了，要让年轻人早挑担子，早接班，他自己当个助手和参谋。工作组根据群众意见、本人建议和实际情况，调整充实了大队班子，让李伯奎担任了支部书记，又新选了一名副书记，何东先被选为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副主任。整顿和改选后的新班子，团结战斗，面貌一新，使全大队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一九七四年秋冬，大干八十天，平整标准条田六百五十亩，相当于以往平整条田总和的百分之六十五。何东先在负责大队水利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九七五年春，这个公社缺水干旱，无法下种，他和大队其他干部，带领社员们担水点种玉米一百多亩，抢种粮食二百五十多亩，超额完成了播种计划，成为全公社完成播种任务最好的一个大队。

在组织整顿的过程中，除犯有严重错误，必须给予处分者外，对犯有一般错误，又不能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了必要的撤换和调整。在撤换和调整时，认真贯彻了党的干部政策，教育他们不当干部，还要做一个好党员、好社员。红星公社华亭大队原任党支部书记梁守元，担任干部多年，工作中犯有一定的错误，工作长期落后。一九七三年冬到一九七四年春，县、区、社工作组到这个大队进行组织整顿，群众意见较多，不撤换对改变这个队的落后面貌影响较大，工作组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广泛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最后在做通本人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大队支部进行了重新改选，梁守元回队去当社员。此后，有个别社员对他进行讽刺打击，大队支部发现这个问题后，专门召开社员大会，对全体社员进行了党的干部政策教育，同时鼓励梁守元好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做个好党员、好社员。经过一番工作后，广大社员提高了认识，梁守元也焕发了革命精神，积极帮助本生产队的干部做好工作，在集体生产劳动中，处处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受到了社员们的好评。一九七四年冬，又被本队社员选为生产队的副队长，去年在农业学大寨中，他和队里的其他干部团结战斗，使全队的各项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经过整顿的社队，多数变化很大。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整顿的一百四十二个后进大队，到一九七三年有七十多个大队上了《纲要》，十七个大队过了“黄河”，十一个公社中，一九七四年有六个上了《纲要》，两个过了“黄河”。

坚持社会主义教育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一九七零年，武威县的农业生产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大部分社队增了产，总结丰收经验的报告，雪片似的飞到县革委会，但是也有少数社队减了产。到第二年春天，一份份要回销粮的报告送到了县委。这些减产要粮的社队里边，有相当一部分单位，处在“田心地胆”的好地方，他们为什么“端着金饭碗，伸手要饭吃”呢？武威县的负责同志迈开双脚，到基层去调查研究，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个严重的问题

清源公社的刘广大队，土地肥如油，清泉地边流，是全县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但是，也是全县出了名的后进大队。一九七零年，清源公社的粮食亩产四百三十六斤，刘广大队的亩产却只有三百七十多斤。别的大队打井抗旱，锄草积肥，是一派热气腾腾的繁忙景象，刘广大队的农田里，干活的人稀稀拉拉，而且大部分是妇女和老汉，生产冷冷清清。这些现象，使县、区、社派到刘广大队解剖“麻雀”的工作组同志产生了许多想法，也提出了很多疑问。当他们广泛地接触了群众，深入进行了调查研究，用党的基本路线一衡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一分析，刘广大队长期落后的“毒根”才算挖到了。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不甘心死亡，但又惧怕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不敢公开跳出来捣乱，就拚命煽动资本主义妖风：“集体生产靠不住，要想富，还得走老路”，“吃粮靠国家，挣钱自己花。”这股妖风，刮得一些富裕农民迷失了方向，放下集体生产，想方设法捞一把。第四生产队有个富裕中农一年四季为个人发家致富奔忙。春天，他从社员手里收购点菜籽儿，拿到山里去倒卖；夏天，在生产队果园里买下成百上千的果子，拉到别处换糜子，糜子拉回家碾成米再转手倒卖；秋天，进山买来活羊，杀了卖肉。社员们说他被金钱迷了心窍，是专想个人发财的“脱产”社员。而他自己却说什么：“不跑黑市，我的钱不够花。”他为了个人花好吃好，成天价盘算着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对于集体生产的好坏，全不在意。有一次，队里接到第二天要刮大风的气象预报，为了使已经成熟的粮食不受损失，决定夜里突击割麦子，

他不但不支持反而说怪话。在这种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全队有三分之一的劳力出外搞单干副业。劳力外流这股风，把人心吹散了，在外的人变了心，在家的人不安心。第五生产队队长的妻子，看到出外搞副业的人买了自行车、红绒毯、条绒褂、绸子衫，也有些眼红了，成天价向男人叨叨：“看人家几个月挣成个啥样子了，你当个队长有啥出息。你就不会出去挣点钱。”日久天长，说得这位队长动了心，他甩掉了生产队长的担子，也出外搞起副业单干，在他的影响下，为个人捞一把的妖风，在全大队越刮越厉害。贫下中农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人不干，不是地不长，资本主义倾向大泛滥，农业生产咋发展？”

这一场活生生的两个阶级在思想上的争夺战，不仅使解剖“麻雀”的县、区、社工作组同志受到了启发，也使大队领导班子经受了一场极为深刻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他们在社员会上沉痛地检讨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走集体化的道路，就是要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去战胜资本主义，引导群众依靠集体的力量奔社会主义阳光道，而我们却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对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熟视无睹，这样发展下去，不但助长资本主义倾向，还将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是多么危险啊！”

刘广这只“麻雀”的病症端在了县委会上，下乡调查的其他常委也都有同样的感受，摆出了许多资本主义小车拥挤，堵塞社会主义大道畅通的现象：有的地方弃农经商，投机倒把的歪风邪气上升；有的地方不按国家计划办事，而搞作物自由种植，产品自由出售；有的地方不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把大批人力、物力放出去“抓钱”。还有一些盘算着个人发家致富的富裕农民公开散布：“男人出外挣钱，女人在家种田”，“集体干活养精神，自留地里下功夫”。有些干部打着“为集体”的旗号，名为集体打算，实为自己捞油水。这一系列的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县委领导坐在一起，认真看书学习，从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受到了启示，提高了认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农村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国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建立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但是，代表私有制的思想残余并没有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并没有彻底铲除，农村中的一部分富裕农民，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正如列宁指出：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的。”这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对我们革命事业危害极大，如果让它自由泛滥，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此，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除了坚决打击一小撮反对社会主义，煽动资本主义妖风的阶级敌人外，更重要的问题是，不断地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经常“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建立一支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队伍，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这是县委的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措施。

怎么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呢？刘广大队为全县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为了刹住资本主义妖风，开始时，刘广大队把外出搞副业的人每月向队里提交的副业款，由四十五元提高到五十元，又由五十元提高到六十元、七十元，以为这样就可以制止社员外流的问题。可是，事与愿违，出外搞副业单干的劳力不仅没有减下来，反而从一百二十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人。他们感到这个办法不行，又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让所有出外搞副业的人在规定时间内一律回大队，可是，人虽回到了队里，思想并没有从资本主义的道上回来。五队撂挑子不当队长出外抓钱的那个社员，回到队里没过三天，就买了一口猪，杀了卖肉。群众说，以往出外搞副业单干，还靠劳力挣钱，现在是用钱挣钱，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了。

刘广大队党支部对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认真进行了分析，同时回顾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教训，使大队党支部认识到，要制止资本主义倾向，要把千百年来形成的富裕农民的私有观念和固有习惯改造过来，不是靠开一两次会，或者单纯采取行政措施所能解决的，还要坚决依靠贫下中农，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们采取的主要方法是：

一、算帐对比，教育农民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教育那个一年四季为个人发家致富而奔忙的富裕中农的过程中，大队党支部首先引导他回忆他所走过的路子。贫下中农帮助他算帐对比，解放后单干那几年，每年打的粮食每人平均才三百来斤，而近几年，每人每年要分的口粮就是四百多斤，并使他认识弃农经商，投机倒把的危害，发展下去，就会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农村就会出现新的两极分化，旧社会人剥削人的状况就会重新

出现。终于使他提高了认识，表示要坚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绝不走少数人发家致富，多数人贫困破产的回头路。在教育五队撂挑子不干的那个队长时，引导大家摆事论理，分清是非。就拿第五生产队来说，春种后，男劳力纷纷出外，地里草没人锄、苗没人管。秋收分配时就回来了，有的人只要口粮，不交副业款，装着票票当欠款户，严重地影响了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一九七四年，全大队的其他八个生产队都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唯有五队比计划产量减产三万八千多斤，拉了全大队学大寨的后腿。这样，使那个撂挑子的队长很快认识了错误，在社员会上作了沉痛地检讨。在以后的生产中他带头苦干，又被群众选为副队长。

二、忆苦思甜，教育农民加深对“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伟大真理的认识。第一生产队有个贫农社员在劳力大批外流时，也积极地跑到外头搞副业单干。党支部为了教育他，在党员路线教育学习班上启发他忆苦思甜。老贫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旧社会，你家四口人，无房无地，挤在人家的一间磨房里。为了糊口度日，你四岁的妹妹卖了十五块钱，后来，仍然没法生活，你的母亲也给人家顶了债，是我们全村子贫苦弟兄挡住了‘人贩子’，你母亲才没有被买走。毛主席教我们走社会主义的光明道，你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心想着出外抓钱是走的什么路？你可不能忘了本，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啊！资本主义的回头路万万走不得啊！”这些话，句句似重锤，敲中了他的心头，他思前想后，深深感到自己走错了路，决心和资本主义一刀两断。以后，又有人叫他出外搞副业单干，他说：“为个人打算的副业单干，是资本主义的害人坑，就是个金洞子我也不去挖了。”他积极参加集体生产，一心为公，不久就被群众选为一队的副队长。

三、干部以身作则，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打铁先得本身硬，当干部的要以身作则，按党的原则办事，自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不然还怎样去教育社员。一些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总想在干部身上打开缺口，让干部为他们搞资本主义开放“绿灯”，发放“通行证”。农村中一些资本主义歪风刹不住，往往是干部不过硬，或者是带了不好的头。刘广大队党支部的同志们在教育社员群众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批判资本主义歪门邪道的同时，十分注意防微杜渐，努力克服干部身上小生产的思想影响，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一次，一个领着社员出外搞副业的负责人，回到队里，拿着

五十二元钱，硬往党支部副书记手里塞。这位副书记问：“哪来的钱？”那个人说：“你先花吧。”副书记说：“来路不正当的钱，我连一分也不能花。”那个人说：“出外的社员都挣了几个，你们干部在家也很辛苦，这是工程上节余的钱，放心花吧。”说着，把钱放下就走了。副书记在资产阶级思想的糖弹面前，心明眼亮，立场坚定，立即把钱交给大队文书收了帐，并把这个问题摆在干部会上，让大家分析讨论。通过讨论，教育了干部，另一个在糖弹面前动摇不定的干部，也坚定了立场，表示要和这种打着为集体的旗号，而牟取个人私利的行为作斗争。

四、在坚持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的同时，努力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逐步创造克服小生产者私有观念的物质条件，使广大社员群众真正认识到，集体经济是靠山。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刘广大队以大寨自力更生、苦干大干的精神，打成并配套大口机井十二眼，修建小水塘一个，保证了灌溉。同时建成标准条田一千二百亩，购置提灌和加工机械二十台（件），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粮食亩产一九七二年上《纲要》，一九七三年过“黄河”，一九七四年上升到六百八十斤，总产达到二百一十六万斤，单产、总产和对国家的贡献，都比一九六九年提高了两倍多，由一个“三靠”出了名的老穷队，变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刘广大队的巨大变化，使武威县委领导成员进一步认识到：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要想带领全县干部和群众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间断地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要把大寨和昔阳的经验在全县迅速推开，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让农民懂得小生产者和旧的传统观念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危害，而起来自觉地与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二、广大贫下中农是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只要县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就会逐步克服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固有特点，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引导农民沿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继续前进。这几年来，武威县委坚持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使一代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迅速成长起来，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艰巨的历史任务

武威县委从工作实践中深刻体会到：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总是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搞好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除了抓好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外，还必须象大寨那样，坚持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引导农民同小生产的私有观念和一切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北安大队共有耕地三千一百多亩，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春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就是不打粮”的盐碱地。多少年来，“盐碱地不打粮”的结论，象一副沉重的枷锁，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批判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再相信这个“结论”，提出要走铺沙压碱夺高产的路子。阶级敌人又散布说：“凡事由天定，半点不由人。”妄图涣散社员群众的革命斗志。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批斗阶级敌人，同时开展了是“听天由命，做大自然的奴隶，还是人定胜天，做大自然的主人”的专题辩论。广大社员通过批判林彪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进一步树立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明确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决心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把盐碱滩改造成高产稳产田。盐碱最严重的第六生产队一马当先，打响了改造盐碱地的第一炮。他们铺沙压碱，移土垫地，深翻改土，把亩产二百来斤的盐碱地建成了亩产过“黄河”的好条田。第六生产队的实践，使人们坚定了改造全大队三千一百多亩地的信心，他们一年接一年地向盐碱地开战，终于将百分之九十的盐碱地改成了春天绿汪汪，夏天金灿灿，冬天平展展的高产稳产田。

有一个时期，北安大队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个别社员的私有心理，拚命鼓吹“空怀出门、满怀进门”等反动谬论，煽动青年人出外搞单干。这个苗头一出现，驻北安大队工作组和党支部，立即开展正面教育，在全队干部和社员中开展路线教育。社员们奋起批判“金钱万能”的剥削阶级生意经，批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腐朽没落的世界观。并且进行忆苦思甜和新旧社会的对比教育，进行关于执行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对比教育。有个青年跑到外面不但没捞上一分钱，还把家里的一百多块存款花完了，他的父亲为了教育儿子，特意开了个家庭忆苦会，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旧社会，咱家穷得房无半间，地无一寸，我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吃的猪狗食，穿的破烂衣，受尽了折磨，如今，住的

新房子，铺的大白毡，出门骑车子，仓里有余粮，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的路，可不能忘本走资本主义的道啊一席话说得儿子口服心服。以后，这个青年人积极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还帮助别的社员安心在队里劳动。

以往，在孔孟之道的毒害下，北安大队有的人认为“再能干的妇女也顶不上半个男子汉”。因而，处处轻视妇女，大队组织平田整地专业队时，总是不让妇女参加。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社员们以毛主席关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教导为武器，向“男尊女卑”的陈规陋习猛烈开炮。他们以本大队妇女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种田中发挥显著作用的大量事实，说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伟大真理。进一步落实了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提高了广大妇女的路线斗争觉悟，调动了她们参加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妇女们纷纷跳出家务圈子，顶烈日，冒严寒，争挑重担，抢干重活，成为改天换地，加快学大寨步伐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九七四年，组织平田整地专业队时，有五十多个女青年要报名参加，仍有个别守旧派信不过，在人背后嘀咕道：“平地是个大力气活，干不上半个月，终得退下阵来结果怎样呢？专业队的男社员干了八十天，她们也干了八十天，一个人也没更换，由于女社员的参加，平田整地专业队的总人数，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了一倍，深翻的土地也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

北安大队的贫下中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编写和宣讲《历代劳动人民反孔斗争史话》，戳穿了“英雄创造历史”的骗人鬼话，懂得了奴隶们创造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伟大真理，同时，结合总结北安大队文化大革命前后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使干部认识了群众的力量，也使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在生产斗争中，在频繁的自然灾害面前，冲破了几千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思想的束缚，不怕鬼，不信邪，困难面前不弯腰，灾害来了顶得住。一九七四年，在严重的旱、虫、涝灾一齐扑来的时候，群众并没有向老天低头，也没有被自然灾害所吓倒，而是开展了战天斗地战胜洪涝的斗争。

在干旱最严重的时刻，他们大搞打井抗旱，工地上红旗飘飘，热气腾腾，拉绳的，抬砂的，下井的，制圈的，不分白天黑夜，顽强奋斗，新打机井五眼，保证了灌溉。盛夏，又发生了罕见的虫灾，灰叶蛾遍布田间，茁壮嫩绿的庄稼枝叶，有的被一条条虫子吃得只剩下光秆秆。全大队男女老少一齐上阵，人捉药杀，

大打消灭虫害的人民战争，连续奋战了一个星期，终于歼灭了害虫，保住了田禾的正常生长。初秋，全大队五百多亩已割倒的麦田，被洪水突然淹没了，麦捆子埋在泥水里，眼看着粮食受到损失怎么办？广大干部和群众挖沟排洪，抢捞麦捆，苦战了三天三夜，战胜了洪水，保住了村庄，捞出了全部麦捆，保证了粮食增产。这一年，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比大丰收的一九七三年净增一百一十四斤，达到七百三十八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

县委及时总结推广了北安大队的经验。北安大队狠抓学习理论和革命大批判，狠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很快传遍全县各地，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政治夜校、图书室、业余文艺宣传队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同雨后春笋，遍地涌现，茁壮成长。

新型的农民队伍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断深入，一代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在斗争中成长，武威县的农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和平公社韩寨大队就是一个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好典型。这个大队的自然条件较差。全队二千一百多亩土地，被三条满眼石头的烂河滩分隔成三千二百多块窝窝田。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这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推不开，自然条件得不到改造，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粮食亩产一直在二百斤上下打转转，每年都是“吃粮靠国家，资金靠贷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新的党支部总结了以往的沉痛教训，认真学习大寨大队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经验，坚持不懈地举办政治夜校，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调动了广大社员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广大社员群众，以高昂地战斗姿态修渠平地，努力改变生产基本条件，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

一九七零年，亩产上《纲要》，首次为国家作出了贡献，结束了吃回销粮的历史。一九七二年跨“黄河”，一九七四年亩产达到七百零六斤，亩产和总产都比一九六九年翻了一番，对国家的贡献比一九六九年增长了二点七倍。短短

几年功夫，一个贫穷落后的旧韩寨，变成了到处闪耀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的新韩寨，变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韩寨大队近几年的发展变化虽快，但是，大队党支部保持清醒头脑，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干部和社员，坚持破旧立新，不断前进。

韩寨大队党支部在教育农民继续革命，不断前进中，认真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教导，帮助大家破除小生产者的旧习惯，旧观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教育党员克服“半截子革命”思想，时刻记住自己是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要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第四生产队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产量一直居全大队第一名，是韩寨大队的先进队，曾多次出席过公社、区、县的先进单位代表会。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和个人生活的改善，这个生产队的队长觉着“革命到头”了，该歇一口气了。在他的影响下，一些社员们也产生了“安营扎寨”的思想，认为集体富了，个人家底也厚了，应当经营经营个人的“小家庭”了。一时间有的出外抓现钱，有的盘算着打新庄子盖新房，而把集体生产丢在一边。思想上一松劲，生产就栽跟头。一九七三年的产量，由原先的排头掉到了排尾。党支部抓住这件事，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全大队社员开展辩论：“多年的排头为啥变成了排尾？”“是革命到头了，还是刚刚开始？”在学习和辩论中，使社员们逐步超出小生产的狭隘眼界，继续革命的觉悟迅速提高，大家说：我们的心目中不能只有自己一家一户的米箱面柜，而要时刻想着社会主义革命。那个生产队长也在社员会上说：“我在组织上入党已经好几年了，但在思想上没有完全入党，还没有跳出小生产者的小圈子，在胜利面前不想再继续革命，这同共产党员的彻底革命精神毫无共同之处，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是不相容的。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在半路上停下来。”从此，大家一心奔社会主义，搞集体生产，一九七四年，粮食亩产由上一年的五百四十斤猛增到七百二十五斤，又由全大队的排尾一跃而成为排头。

韩寨大队党支部，由于十分重视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农民的头脑，狠抓人的思想建设，使“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天地土崩瓦解了。”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

习惯，被扫除一新，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天天发扬光大，干部和社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革命种田，为国家多作贡献的崇高思想大大发扬。这里有一个关于下中农社员韩福自觉克服私有观念，争做共产主义新人的故事。

韩福是队里的积肥专业队员，前几年，他为了多挣工分，把河泥掺到大粪里边，一年下来，一个人挣了八百多个劳动日，社员们有些信不过，就注意观察他拾粪特多的“诀窍”。不久，“人造大粪”的“诀窍”就被发现了，几个俏皮的青年就给他送了个外号，叫“老资产”。这个外号一流传，韩福见了人脸红脖子粗，怪不好意思，到家里，儿子老伴埋怨他私心太重，不该欺骗集体。到了队里，社员们劝他来一次自我革命，把资产阶级的“私”字扫地出门，让无产阶级的“公”字安家落户。大队党支部也帮助他忆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苦，想解放后走社会主义道路，过好日子的甜，忆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资本主义泛滥的苦，思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集体生产大发展的甜，使他从心坎里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的憎恨，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他说：“在万恶的旧社会，我家经常吃苦苦菜，喝的清米汤，有时，三四天揭不开锅，解放了，有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有了咱贫下中农的幸福，我家才有吃有穿，有余有剩，还有了崭新的自行车，我却忘了本，干了损公肥私的事，实在不应该，今后，大伙看我的行动吧。”

从此，他不仅脚踏实地的为多打粮食积肥，还主动参加了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登台说快板，批判资本主义，歌颂社会主义。一次，他在拾粪中拾到了一个钱包，里面装着二十七元钱，还有一些票证，立即送到派出所，很快转到了失主手里。

韩寨大队贫下中农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给国家多作贡献，舒舒服服不行，慢慢腾腾也办不到，只有“只争朝夕”干革命，只有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拚命精神大干苦干。几年来，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忘我劳动，拚命大干的一代新人茁壮成长。提起这种新人的杰出代表，韩寨大队的社员和干部，永远忘不了共青团员、第三生产队青年突击队长赵寿山同志。在大队党支部的帮助教育下，赵寿山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政治夜校和大队业余文艺宣传

队，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一九七四年五月，他向大队党支部交了入党申请书。党支部书记问他：“

“你入党为了什么？赵寿山一字一句地说：“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递上入党申请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行动实践自己的誓言。他曾两次拾到别人的钱包，都及时送交失主。一次，失主看看已经丢失的钱包里的一百多元钱和几十斤粮票，原封未动地回到自己手中，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事后，他买了好酒好烟，要酬谢拾金不昧的赵寿山。赵寿山却说：“这是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应该做的，谢什么。”硬是婉言谢绝了。夜里突击干活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为了农业的大上快上，在打井战斗中，他领着青年突击队员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拚上命的大干。一次他正在井下挖砂子，半个身子突然瘫痪不能动了，据检查是风湿性心脏病，可是他毫不在乎，能动了就又回到井上参加战斗。他带病坚持劳动，一天也没耽误打井。一天，他正在井下汗流满面地往筐里铲砂子，鼻子里猛然淌起血来，嘴里也大口大口往外吐血。社员们把他吊出井口，用架子车送回家中。家里的人用车子拉着他看了一个时期的病，当病情稍稍好了一点，刚刚能走路时，说啥也不要家里人拉他看病了，他说：就感到难过，

“我不能为抗旱夺粮出力，你们拉我不是更少一个劳力吗？”不久，就在他一个人挣扎着去看病的路上去世了。他去世的前三天，还挣扎着到饲养院，为队里剥麻，为运肥的大车铲粪。

赵寿山同志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的英雄事迹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里。学习赵寿山的好人好事处处出现，比如，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队长头天晚上计划好第二天干的活，可是等到第二天早上一看，土拉完了，粪送光了，活都干完了。队长不用打听就知道是铁姑娘队、青年突击队干的。一次浇冬水时，三十多个男女青年都要求去浇林场的地，因为林场的地是在卵石滩上担的客土新造的，渠道、土埂也是新打的，容易漏水跑水，很不好浇，大队党支部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浇水的那天正刮着西北风，天气很冷，水面上漂着一层冰渣子，青年们唱着“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心里热乎乎的，浇了一块又一块，突然，有一段渠沿被水淹塌了，青年们二话不说，纷纷跳进水中堵口子，等收拾好渠沿，大家的身上冻起了鸡皮疙瘩，有的人身上还被冰渣子划破了。

心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永远冲锋向前，这是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韩寨大队贫下中农逐步培养起来的战斗风格。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是第二生产队的“四大娘”。四大娘的领头人叫邓秀英，是这个队的妇女队长。她的年纪已经五十三岁，头发也花白了，可是她人老心红，斗志高昂，干起活来不示弱。平日里，男社员挑担她挑担，男社员翻地她翻地。一九七四年秋天，大队组织平田整地突击队时，邓秀英又串连了三个平均年龄四十八岁的老大娘，报名参加突击队。在场的几个青年人感到有些意外，说：“快算了吧，平了四五年地，没见过老大娘参加突击队，我们的手里稍微快一点，就把你们干的那一点代替了。”邓秀英说：“你们多干是你们的觉悟，我们参加是我们的志气，你们干劲再大，也代替不了我们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心意。再说，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挖一锹少一锹，拉一车少一车又有人说：

“平田整地不比平常干活，起高垫低，挖土拉车，是一场硬仗，你们这把老骨头能顶得住吗？”邓秀英她们齐声说：“顶住顶不住咱试试看，豁出中午不歇，也要赶上你们青年。”邓秀英特意叫儿子买了一把大茶壶，每天早五更提上一壶茶，背上几个馒头，拉着车子下地，干到中午，别人回家吃饭，她们四个拾些柴禾，把茶热一下，吃些馒头接着干。小伙子一天拉运土二十方，她们一点也不差。得到了全队社员的热烈赞扬。工地宣传组特意为她们写了一首诗：“雄鸡叫，星满天，四个大娘走出庄，歌声笑语洒一路，‘咱要顶起半边天’；人老心红干劲大，继续革命的好榜样，人人夸奖‘活愚公’，四大娘越干越欢畅。”这首诗说出了全体突击队员的心里话，表达了社员们对四大娘的衷心赞扬。但是，也有个别思想守旧的人在背后风风雨雨地说：“邓秀英是个挣死鬼，儿子姑娘一大堆，何必拚死拚活不失闲”。风声传到儿子的耳朵里，儿子也怕把母亲的身体累坏，劝母亲歇几天。邓秀英对儿子说：“孩子，毛主席领导咱贫下中农翻了身，吃得饱，穿得暖，日子越过越香甜，咱可不能忘了台湾还没解放，不能忘了世界上还有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更不能只顾个人图清闲，享老福。要活到老，干到老，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贡献。”说得儿子连连点头。邓秀英她们四个老大娘，和突击队的全体队员一起，整整大干了两个月，平出了高标准条田六百一十亩。

在韩寨大队，象邓秀英她们一样老当益壮的社员，还有许多。第三生产队的贫农社员吴百申，已经六十多岁了，因为老伴没生过孩子，以前总觉得是块心病，后来，他在党支部帮助下，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渐渐懂得了人生的目的不是生个一男半女传宗接代，而是为革命做点有益的事情。他主动要求当了队里的饲养员，腾出壮劳力干别的，他的老伴也成了队里的养猪饲养员，老两口日夜为队里的牲畜操心。有人问他们：“你们这么老了，不当五保户，图个啥里？”他们响亮地回答：“不图名，不图利，图的是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图的是早一天进入共产主义。”

以大寨精神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翻开武威县农业学大寨的历史，前几年慢慢腾腾，近几年快步向前，这是什么原因？中共武威县委的同志们这样说：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靠天靠地靠国家，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看不到群众的力量。现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以大寨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农业的步伐，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越走路子越宽，越走步子越大。五年来，武威县委体会到：

抓主攻方向

要以大寨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农业的步伐，就要象大寨那样，用社会主义革命，去推动改造自然的革命。大寨的山变了，地变了，产量变了，这一切变化是怎么来的，就是抓了社会主义革命，用革命推动了生产，改造了山岭河川。五年来，中共武威县委在领导农业生产斗争中，学习了大寨精神，抓革命，推动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变，并按照实际情况，抓住主攻方向，制定了改土治水的规划。

干旱，是阻碍武威县农业发展步伐的一个大敌，多年来，人们吃尽了干旱苦头，盼着早日解决水的问题，因此，县委把抓水做为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主攻方向，发出了打井抗旱的号令。这个号令靠什么去实现，当然要靠大寨精神去大干。但是又是靠什么才能促进人们大干呢？武威县委从实践中认识到，纲举才能目张，大干要靠党的基本路线，学大寨决不仅是一场改造自然的生产仗，更重要的是要打一场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政治仗。

一九七二年，县委打井的号令一提出，有人就说：“前八年总共才打了四百三十眼井，今年一年要打一百五十眼，这不是蛮干吗？”

阶级敌人也造谣说：“一眼井得几个月时间，花万把块钱，劳民伤财，得不偿失！”那些资本主义迷了心窍的人，也劝队干部“少找麻烦，把劲用到搞现成饭上”，有的生产队甚至退回了国家支援的打井材料。

在这个节骨眼上，县委为了用事实教育干部和群众，打击阶级敌人，及时总结了金沙公社的经验。

金沙公社地处西营河下游，大旱不断头，小旱年年有，连续吃了十几年回销粮。一九七零年，公社新党委成立后，提出打井抗旱，改变穷白面貌的设想。可是，有的人被懒汉懦夫世界观束缚，认为金沙公社的干旱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说啥也难变，眼望祁连山，盼等河水来的旧思想仍然很严重。公社党委书记党延生同志说：“坐等自然恩赐，与上游争水，永远也改变不了面貌，文化大革命前，我当水利干部近十年，只知道领着社员向上游争水，结果丢失了自力更生的精神，丢掉了大上快变的时间，想起来叫人痛心。主动向大自然进攻，向地下要水，才是我们金沙人民唯一的出路他亲自深入中沟大队抓典型。这个大队的三个生产队联合起来打井。动工不久，阶级敌人从阴沟里吹出了冷风：“要能在戈壁滩上打出水浇地，除非是驴的头上长出角来。”

这股冷风吹得第一生产队的队长失去了主心骨，刚刚打了十米，不见水，他就丧失了信心，领着社员退出，不打了。党延生和大队党支部的同志们，领着社员们在井台上学习《愚公移山开展辩论：“是继续打下去，还是散摊子？是用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战胜困难，还是在困难面前当逃兵？是当愚公，还是当智叟。大家越学心里越亮堂，越辩心里越明确，他们说：“只要有了愚公移山的精神，别说十米、二十米，就是凿穿地球也要把水打出来！我们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气，决不能半途而废。”党支部带领社员们从腊月干到正月，连大年初一，也吃在井台，干在井台。打到二十五米深时就见了水，一队队长又主动跑到井台检查错误，批判见困难就退缩的思想，领着社员重新投入战斗，一眼三十四米深的机井终于打成了。党延生领着公社全体干部到这个机井上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下井，学习贫下中农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尔后又在全公社推广了中沟的经验，迅速掀起了打井高潮，一年内打成机井十眼，土井六十多眼。不仅战胜了干旱威胁，也战胜了“金沙干旱难变”的错误论调。这一年全县受旱减产，他们却第一次跨上了《纲要》。

到金沙公社取经的干部和社员，从金沙打井抗旱的斗争中，认清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改造自然中的无比威力，决心抓路线、抓革命、改造山河。从这以后，全县上下，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推广金沙公社学习大寨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的经验，狠抓阶级斗争，使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使各种错误思想，资本主义歪门邪道受到了猛烈地冲击，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有了很大改变。

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县委打井抗旱的号令，变成了全县人民的大干行动。烈日炎炎的盛夏，全县各地红旗招展，井架林立，工地上人声鼎沸，气壮山河；北风呼啸的严冬，人们燃起堆堆篝火，烤消三尺冻土，日夜轮番突击；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十来岁的“红领巾”，人人都为打井抗旱贡献自己的力量。许多贫下中农为了早日打成机井，为了在冬季预制高质量的钢筋混凝土井圈，主动腾出自己家里的花被子、大白毡，搭在打井工棚上遮风挡雪。许多社队的群众，为了早日改变穷白面貌，春节不休息，坚持战斗在井场。永昌公社张义大队第五生产队的社员们，在打井工地过革命化的春节，井架上贴了这么一幅大红对联：“路线正确方向明，打井抗旱夺丰收”，横披是“为革命打井”。这幅对联，说出了全县人民的心里话，表达了决心改变干旱面貌的坚强信念。南安公社前进大队第一生产队，也是一个干旱缺水的地方，全队只有一百来口人，原认为队小人少家底薄，没有办法打机井，他们学习大寨人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硬骨头精神，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队小志气高，人少创大业，在绝大部分劳力出外修建水库的情况下，全队仅有六个男劳力向干旱宣战了。他们两人在井下面挖，两人在井口推绞盘，其余两人抬砂石，六颗红心志坚如钢，六双铁手苦干硬干，战胜重重困难，挖开了井，抽出了水，战胜了干旱。

武威县人民就是靠大寨的革命精神，在短短的四年内，打成机井一千九百九十多眼，相当于一九七零年前打井总数的八倍，井灌面积由五万多亩发展到三十五万亩。

武威县委在大抓水利建设，改变干旱面貌的同时，也把农田基本建设当成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去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也在年年喊平田整地，其实是只在那里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小田并大田，直田改横田，甚至有的还搞“应付田”。这就是群众批评为“老埂子上戴帽子，应付上级报数字，凑凑合合

过日子。”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武威县学习大寨的经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啥大寨年年都在大干，年年都在大变，而武威多少年过去了，还是“唐朝的渠道宋朝的田，磨磨蹭蹭不向前？”

为什么大寨人越干越想干，越干越会干，而武威县干了多少年，还是“一碗豆腐，豆腐一碗”，没有进展？查来查去，就是因为大寨人有雄心壮志，站的高，看的远，把农田基本建设当成了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而武威县只瞅见了鼻子底下一点点，没有把农田基本建设当成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抓，缺乏雄心壮志，缺乏远大目标。这样一比一学，武威县委领导成员顿开茅塞，大搞开了农田基本建设，象大寨那样，农田基本建设的规模一年比一年大，速度一年比一年快。一九七三年，跳出了小打小闹的圈子，一年建成条田十九万亩，特别是一九七四年以来，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广泛展开，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使武威县又出现了一个比前三年规模更大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入秋以后，丰收的粮食刚刚到手，武威县的山野河川就沸腾起来了，到处摆开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战场，到处是改土修田的大军。全县五十四个公社，四百四十个大队，社社有规划，队队有工程。那些先进的社队继续在大干，落后的奋起直追也在大干；条件好的地方继续在大干，条件不好的创造条件也在大干。有的地方前几个月还是乱石遍地，后几个月就变得条田整齐，渠道纵横，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有些社队一年搞的农田基本建设，超过了过去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总数。不过一百多天时间，全县就修出条田二十四万多亩，等于解放二十四年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这样大干大闹农田基本建设的阵势，是以往任何一年也没有见过的。

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使人们开始摆脱了小生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崭新的精神状态，以人定胜天的革命英雄气概，投入到农田基本建设中来。一些过去不敢想，不敢干的工程，现在很快拿下来了；过去只有少数人在家门口修修补补，现在声势浩大的改土治水队伍向上千亩、上万亩的土地宣战。

古城公社中河大队，有条两千八百多米长，二十多米宽，四米多深的路槽，把土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大的一亩多，小的转不过牛身子。据老年人说，早几辈子，这里就是这个样子，没变过。前几年，群众就批评说：“咱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大农业，可种的还是小农经济的地，该向前跨几步啦。”

但是，每年规划农田基本建设的时候，中河大队的干部都要到沟边站站，荒滩上看看，可是点点人数，算算土方，心就凉了，这么大的工程那年那月才能搞成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干部、群众大批“天命论”等孔孟之道，又重新学习了大寨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到：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坚决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还是只在旧有的土地上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这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搞不搞社会主义农业的大问题。如果沿着千百年来老路走下去，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大发展。他们深有感触地说：“要革这两条大沟的命，首先要革自己头脑里右倾保守思想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命，要不然，手脚给捆得死死的，怎么大干得起来？一九七四年秋天，这个大队组织了一支三百多人的治沟大军，集中力量打歼灭仗。思想端正了，群众的干劲估不透，每人每天完成的土方量，由四方增加到十方，又由十方增加到十四方。正是由于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只用了两个多月，就把二百四十多米长的一段路槽两边的悬崖陡坡削平，把土垫到路槽里，平出了九十五亩好条田，山洪按照人的意志改道了，面貌变了。广场公社横沟大队七十多岁的老奶奶齐桂香，身体有病几天没出门，等病好了到村头一瞧，原来的深沟乱崖不见了，跟前是一大片平展展的条田。她激动地说：“这样的大干，没听过也没见过，这一回呀，大变样的日子算是盼来了。”正如一个普通社员齐桂香盼望的那样，武威县的农田基本建设在一年一个样地大变着。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新建条田五十六万多亩，比一九七零年前条田总数增加了三倍多。

群众运动威力无穷

要以大寨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农业步伐，就要象大寨那样，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去改天换地。过去武威县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状况，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一些领导，只看到了改造山河的困难，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巨大，没有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投入到生产建设上来。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束缚群众手脚的“群众落后论”，

“天才论”批了个人仰马翻，臭不可闻，焕发出了空前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以往认为短时间内无法办到的事情，很快办成了。充分显示出了群众中

蕴藏的巨大威力，教育各级干部看到了群众的力量；也使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增长了才干，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路线对了头，群众力量估不透。杂木二干渠的修建过程，就是武威县委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多快好省地大办社会主义农业的一个例证。这个渠是杂木河灌区新改建的一条卵石浆砌的高标准干渠，全长十三公里，灌溉着三个公社的六万多亩土地。开始，县水利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多年的老经验，搞了一个三年建成的施工计划，可是群众听了坚决不答应，纷纷质问：“学大寨，赶昔阳，就要加快步伐大干快上，一条渠道就化三年时间，啥时候才能发挥效益？武威县的面貌那年那月才能改变？他们打破技术人员的设想，大胆而又响亮地提出：“秋开工，春完工，夏灌水。”

在这里负责修建工程的一位县委领导同志，被群众的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所感动，他满怀信心地把群众的要求带到了县委，得到了县委的大力支持。县委指示工程处的全体工作人员，要一头扎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高质量，高速度的去完成这项工程。县委的指示给广大群众鼓了气，添了劲。一九七三年八月，修建杂木二干的战斗打响了。

但也有人摇着头说：“一年之内完工，完全不可能。”还有一些人嘴里不说，心里嘀咕，过去象这样的工程，哪一次不是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放线领工，雇请许多的技工施工，现在，不仅技术人员缺，就连有技术的工人也没几个，时间这么紧，要求这样高，能行吗？

三个公社的三千多名修渠民工，冲破一切阻力，背着铺盖口粮，浩浩荡荡奔赴工地，以实际行动回答了摇头派和怀疑派提出的问题。他们夜以继日地大干苦干，工程进度不断加快。但是，任何工程的修建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工程只完成了四公里半的时候，大地就封冻了，严寒的冬季就来临了。在这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冬季怎么灌浆呢？在这新的困难面前，各个社队的民工分头开“诸葛亮会”，提出了打破常规，冬季完成开挖支渠，砌石面和渠系建筑物的任务，开春灌浆，保证在夏灌前全线完工的施工计划，破除了冬季不能施工的老黄历。工地上红旗飘飘，热火朝天，民工们在没有完成的八公里长的干渠上，在十条支渠的工地上，摆开了战场，挥钢钎、舞镢头，战三九，斗严寒。有的风餐露宿在分水闸旁，有的在乱石河滩支起帐篷，垒起锅灶，就地吃住，就地施工。在大地冻

得钢钎撬不动，镢头刨不动的情况下，他们点燃一堆堆柴火，烤消一层挖一层，就这样，硬是凭着火热的红心，在零下二十多度严寒中大干了一冬，完成了全部土石方的开挖任务。

一九七四年的春天，工程全面铺开，一个新的矛盾又产生了，需要大量的浆砌技术工，而当时工地上每个公社只有两三个老技工，大多数民工都是第一次参加修渠的青年小伙子，和年轻的姑娘、媳妇。这些人虽然热情高，干劲大，但还缺少实践经验。

修建卵石浆砌渠道这活看来很简单，其实要求很严格，石头大小要均匀，砌上的石头要纵横成行，渠底的石头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渠壁要保持一定角度的斜面，这样才能减少水的冲刷，如果，砌的石头高低不平，在急流的冲刷下，只要有一个石头当了“逃兵”，就会把周围的石头全带走，把整段的渠道破坏，弄不好就会前功尽弃。

面对这个直接影响工程进度和质量的问题，民工们信心百倍地说：“什么技术都不是天生就会的，我们要在干中学，学中干。“可也有人说：“一级算，二级看，三级技工灰盘上站，学一名技工少说也得二、三年，就是培养出来，也是远水不解近渴。”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整个工地变成了大批判的战场，民工们把林彪、孔老二散布的“天才论”、“上智下愚”等谬论抓住狠狠地批，把“技术人员放个线，施工干部转着看，民工出力干”的修正主义办水利路线抓住狠狠地斗。七斗八斗，斗出了一个新局面。

大河公社西寨大队的女民兵王惠琴、李香兰等三个姑娘，跑到工程指挥部自动报名要求学习浆砌石技术，担任技工，抢时间完成干渠衬砌任务。他们请了一名技工师傅，三个年轻人从配灰、放线、砌石等活，一样一样地从头学起，不到半天的功夫，三个人就掌握了这几样活路的基本要领。她们回去后又发动了十六名女青年到工地上来，一边干，一边练，两三天的时间都学会了这门技术。开头的几天虽说慢一点，但她们干的活和男技工不差上下，并且一天一个样，日日在提高。工地上出现女技术工的消息，随着春风吹遍了整个工地，吹散了人们头脑中的唯心史观。县委负责同志深深感到：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如果不紧紧地依靠群众，就会使自己变成离开大海的一

滴水，很快地干枯。他们积极地支持几个新涌现出来的女闯将，并在这段工地上及时召开了现场会，表扬这几个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号召大家学习她们勇挑革命重担敢闯敢干的精神。

这次现场会后，许多民工都积极报名学技工，几天时间，工地上的技工由十多名发展到了四百多名。这一下，技工缺乏的难题，靠群众自己起来革命的精神解决了。昔日粗手大脚的庄稼汉，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掌握了施工技术，变成了熟练的浆砌工。过去靠少数几个技工浆砌，一尺一寸往前挪，现在四百多土生土长的技工，全线铺开，分段作业，同时并进，工程进度发展很快，只用了十六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八公里长的干渠浆砌任务。原计划五月一日通水，在民工的英勇奋战下，四月二十五日就胜利地通水了。整个工程，从开工到建成通水只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当欢腾奔流的渠水流进盼水的麦田时，中共武威县委的领导们又一次来到了工地，这一场水利工程的战斗，又使他们更进一步加深了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伟大真理的认识。

群众运动，威力无穷。依靠群众，斗天天低头，斗水水按人们的意志流；不相信群众，不搞群众运动，就会一事无成。这些年来，武威县委在领导农业生产建设中，由于坚持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就使生产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先后建成山谷水库两座，库容两千六百多万立方米，新修和改建干支斗渠五百五十多条，长达一千三百三十多公里。新建农用输电线路六百三十公里，使近百分之五十的大队通了电，改善有效灌溉面积达五十多万亩。这些都是大搞群众运动结出的硕果。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要以大寨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农业步伐，就必须要以大寨为榜样，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路。提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事来，要首先讲一讲广泛被人们传颂的老庄大队五迁办公室的故事，因为它代表了武威县以大寨为榜样，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道路的坚强意志。

老庄大队现在办公室的房子，还是一九五七年成立高级社时盖的。窗子上至今仍然糊着几块旧报纸，唯一的变化是侧面墙上增加了一块泥抹成的黑板，

黑板上端端正正写着“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八个大字。办公室里为啥泥块黑板呢？

以往，老庄大队没有小学，孩子们都到外队去上学。一九六九年五月，在普及小学教育时，大队党支部决定在本大队办所学校，就借了社员的两间房子作为大队的临时办公室，把大队办公室用的房子里的隔墙推倒，里面的侧墙上泥抹了黑板，办起了学校。

一年后，大队准备打机井，购来的水泥等材料没处放，干部们瞅来瞅去，又看上了大队临时办公室，因为这里地势干燥，房子也比较坚固，保管材料最合适。大队办公室又往那里搬呢？有的干部说：“干脆盖几间办公室，也是我们当干部的一点成绩”。“办公室党支部书记冯观有听了耐心解释说：盖的再阔气，也算不了什么成绩，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革命和生产搞上去，才算真正的成绩。”建议把大队办公室搬进二队曾经做过油坊的两间空房子里去。有人说：“那个地方一没窗子，二没门，黑咕隆咚能办个啥公？”冯观有说：“怎么不行？我们有个地方学习、开会就行了，实际上最亮堂的办公室是在田地里。”大队干部亲自动手，给那两间房子按了个门，做起了牛肋巴窗子，又在里面盘了个土炕，大队办公室又算建起来了。

一九七一年二月，大队党支部考虑到二队要办村学和政治夜校，又主动提出再次移办公室。当时，又有的人说：“一千多口人的一个大队，三间房子也盖不起吗？各队凑些材料，抽几个劳力，修上几间怕啥冯观有没有同意，他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眼前最要紧的是打井抗旱夺丰收。”于是，大队革委会的牌子又挂在了大口井旁的一间用树枝柴草搭成的，存放着打井用具的草棚子门口了。这一年是个大旱年，可是由于老庄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一起，吃在井场，睡在井边，坚持打井抗旱，粮食平均亩产比一九七一年还增长了百分之六，第一次跨上了《纲要》。

后来，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他们自己动手，在机井旁盖了六间简易的草棚房子，按说大队占用两间当办公室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可是大队干部从生产需要出发，作出了第四次搬迁的决定。当时，又有人议论说：“困死了的兔子也有个窝，咱们一个大队连个固定的办公室也没有，县上来个领导，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象个啥？”

冯观有还是没有同意，他仍然耐心地解释说：“领导来了要看的是我们学大寨的劲头，我们农业大上快变的面貌，绝不是看我们的办公室漂亮不漂亮。”井口新盖的六间草棚房子，两间存放着油料，两间做了面粉加工坊，两间做了醋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冯思功和老婆孩子商量后，一家人搬到了羊圈旁的一间小房子里住下，腾出了两间正房当了大队的办公室。直到一九七二年夏收后，大队修了一所学校，学生们搬进了新的教室，大队办公室才又在旧房里泥起了隔墙，搬回了原来的地方。几年来，老庄大队的办公室先后搬了五次，而把全大队的人力物力全集中在大办农业上，艰苦奋斗，大干苦干，把两千三百多亩土地全部深翻了两次，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耕地平整成了高标准条田，打了八眼大口机井。生产条件的改变，促进了粮食生产直线上升，一九七四年亩产比一九六八年增长两倍多，向国家交售粮食五十万斤，相当于一九六八年全大队的粮食总产。

老庄大队艰苦奋斗的事迹，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洗礼的武威县人民，艰苦奋斗学大寨，加速社会主义农业建设这一崭新精神面貌的写照。

老庄大队五迁办公室的创业精神，在全县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在全县人民的心目中生根开花。双城公社徐信大队第八生产队，认真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集体经济大发展，是个粮多钱多的富队，但是仍然不忘“勤俭办社”的传家宝，富日子当穷日子过。队里用的一个算盘，还是五十年代刚办初级社时买的，框子坏了，用铁丝箍着用，杆杆磨断了，珠子坏了，自己削几个木头的代替，舍不得买新的。队里用的草筐、车篮子，社员自己动手编，就连给队里的牲口钉掌，也怕花钱多，派几个小伙子学来技术，泥起烘炉自己钉，真是一分钱掰成两瓣花。他们就是这么一分一厘的节约，一分一厘的积累，为队里的机械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几年来，他们没有向国家贷款，全靠自己的资金，购置了手扶拖拉机、柴油机、磨面粉碎机等提灌和加工机械十多台，做到了“三不欠”。清水公社王胜大队，原来等、靠、要思想严重，不愿打井，国家给了三千斤补助粮，五千元投资款，结果粮吃了，钱花了，一眼井也没打成。一遇干旱，就派出“代表”，背上干粮，蹲在县水利局要河水，亩产只有二百来斤。近几年来，没要国家一分钱的投資，一斤粮的补助，凭着集体的力量，凭着群众的双手，打成机井十二眼，粮食产量步步高，一九七四年，亩产达到了六百六十多斤。

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鼓舞下，武威县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大干快变的先进单位，同时，造就了许许多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带头人。古城公社二坝大队上唐生产队的副队长唐子文，就是这许多先进人物中的一个。

上唐生产队地处祁连山下，一个个陡坝乱崖把全队的三百多亩耕地分割成斜七扭八的四百多块牛蹄窝窝。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一连吃了国家十几年回销粮。过去，有人曾断言：上唐是木板上砸钉子，没法变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大寨人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吹进了上唐贫下中农的心坎里，他们横下一条心，三两年内要让上唐变样，正值隆冬季节，他们向一块叫中段子的地块开战了。地冻得足足有三尺深，刨一镐头只留个白印印，挖一铁锹只掉点土渣渣，工程进度太慢，大伙围在一起开了个“诸葛亮会”，想出了象开小煤窑那样，先掏上几个洞子，把里面没冻的土挖出来，来年开春地解冻了再平高处的好主意。他们抱来麦草，在一人多深的高埂子下，燃起大火，烤消了冻土，挖开了两米多高、三米多宽的三个洞口，兵分三路，向里掘进。洞子越深，里面越黑，他们就在洞壁上铲下一个个土台子，点上墨水瓶做的小油灯，红灯苗闪闪发亮，大家越干越欢，副队长唐子文一直战斗在洞子最深处，他那手上的老茧磨了一层又一层，指头伸不展了，虎口震裂了，鲜血染红了铁把，贫下中农心痛地说：“老唐，歇一会儿吧。”

他直起腰，果断地说：“咱上唐的穷面貌十几年没变，就是不知为啥种田，没有出大力干，想起来叫人痛心难过，现在，别说是出大力，流大汗，就是献出这把骨头，也要叫上唐大变快变！”一次，鹅毛大雪整整下了一天一夜，积雪把大地盖的严严实实。第二天早上雪刚停，唐子文拿起扫帚，从村口通往中段子扫开了一条路，扛起铁锹上了地。在他的带动下，社员们呼啦一声拥到了中段子。大家说：“这才象个艰苦奋斗的样子。”

唐子文本来就有严重的胃病，不时发作，疼痛难忍，他咬着牙，挺着腰板子。一天，就在他猛力地往下挖的时候，“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接连又是几口，他只觉得天旋地转，差点栽倒，身旁的社员们连忙把他扶住背回了家。第二日，天刚亮，唐子文挣扎着翻身起来，吃了点药，把一片膏药剪成二、三十个小块，贴住手上还在渗血的裂口，又扛着铁锹来到工地上，看到这种情景，不少社员感动地流下了泪。

上唐贫下中农、社员群众为了刨掉穷根，为了社会主义的千秋大业，都象唐子文一样，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拚上命地打了一场又一场攻坚仗，三年时间，把四百八十多块陡坡地翻了几个过，移动了多少土方，投入了多少劳动力，已经算不清了。平出的五十一块平展展的条田，配上那笔直的水渠，蔽日的林带，织绵一般地放射着“艰苦奋斗”的耀眼光彩；那一年比一年高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多的贡献，显示着大干快变的光辉成果。

几年来，武威县就是这样，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大寨精神，迅速地改变着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全县各社队仅用于打井和配套的自筹资金就占全部费用的百分之七十；用大寨精神，战胜了一次又一次自然灾害的侵袭，夺得了粮食三年上《纲要》的成果。

向生产深度进军

“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时刻注意的大课题。”武威县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经常注意研究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解决农业生产斗争中的新矛盾。

攻破秋禾低产关

一九七二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了四百零三斤，第一次跨上了《纲要》。粮食上《纲要》以后，还能不能再前进呢？历史上农业生产好一年坏一年的情景，会不会再现呢？在这些新的矛盾面前，武威县委对全县的农业生产状况，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这一年，全县小麦平均亩产为四百六十三斤，而秋禾作物亩产才只有二百九十九斤，成为农业生产上的“拉腿田”。能不能改变秋禾作物低产的状况，成了粮食亩产能不能大幅度增产的重要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武威县委从总结生产经验入手，在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中找答案。

高坝公社红崖大队第十生产队，一九七一年种了一百二十五亩秋禾。这一年因为天气大旱，给作物生长带来了不利因素。在困难面前，他们不低头，不后退，天大旱，人大干，既重视夏粮作物，又重视秋田管理，精耕细作，增施肥料，为夺取粮食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年，全队秋禾平均亩产达到五百零五斤，比夏禾亩产量还高出一百四十八斤。清源区六个公社，从领导到社员，层层重视秋禾作物的播种、管理，积极推广良种，狠抓秋禾作物的施肥、锄草等薄弱

环节。一九七二年，全区二万多亩秋禾作物平均亩产四百二十九斤，一跃跨过了《纲要》。

许多事实充分说明，秋禾并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天生的低产作物。”它的低产，是因为人们只重视夏禾作物，对秋禾轻视而造成的。因此，一九七三年春天，在秋禾作物播种前，武威县委向全县发出了“狠抓薄弱环节，努力攻破秋禾低产关”的口号。问题一提出，各种思潮又出来表演了。

有人说：“秋禾作物产量低，这是武威县农业生产上多年的老问题，个别的高产典型说明不了全局。秋禾要高产，只有慢慢来。”持这种说法的人，他们的论点是：从历史上看“三秋不如一夏”。还有的人说：“过去，全县亩产才二百来斤，现在上了《纲要》，就很不错了，再能高到哪里去？”他们认为，粮食亩产每年增加三、四十斤是个规律，再多了不可能，持这种论调的人，总认为别人是在“冒进”。

生产斗争的实践证明，粮食亩产可以大幅度增产，秋禾作物也可以高产，而那些习惯于按常规走路的人，却口口声声在非难。为什么生产每向前跨进一步，每新提出一项增产措施时，就会遇到重重思想阻碍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武威县委的同志们，通过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认识论的斗争，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千百年来，从孔老二到林彪，一切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派，他们总是极力散布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天命观”等毒素，这是思想领域里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论斗争的总根子。如果不从这个高度去观察、了解、分析生产斗争中的两种思想，就抓不住问题的实质，也就无法解决前进中的矛盾。随着县委认识的加深，在全县范围内，结合生产斗争实际，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了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在批判中向广大群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育，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种田的活动，进一步挖掉了秋禾低产的思想根子。南安公社北安大队，过去在反动的“天命观”的毒害下，办什么事情阻力都很大。一些人只认为“谷子天生就是低产的”，所以，白水（不施肥）下种，另眼看待，谷子亩产只有二百来斤。提出攻破秋禾低产关时，有人竟然说什么“凡事由天定，半点不由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重新认识谷子低产的问题，并进行了“是听天由命做

大自然的奴隶，还是人定胜天，做大自然的主人”的专题辩论，发动群众，对主观唯心主义展开了批判。在学习和批判中，群众说：“林彪和孔老二散布的‘天命论，是他们妄图搞复辟资本主义的精神支柱，是套在我们劳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我们要让批林批孔的烈火，烧毁林彪一伙复辟、倒退的迷梦，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第七生产队在狠批“天命观”的同时，联系实际，批判了“谷子生来就低产”的形而上学观点。不信天，不信神，不信鬼，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大搞平田整地，铺沙压碱，改良土壤，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狠抓谷子增产的关键措施，夺得了谷子大丰收。一九七四年，全队谷子平均亩产达到八百三十五斤，一举跨过了“长江”。

为了迅速改变全县秋禾作物的低产面貌，武威县委在重视解决思想认识的同时，也注意解决了促使秋禾作物增产的一些关键性措施。从一九七三年以来，先后召开了几次秋禾高产社、队座谈会，交流了情况，认真总结了各种类型地区的典型经验，专门研究了如何种好管好大秋作物，加速秋禾增产的具体办法。并根据秋禾高产社、队的成功经验，要求全县各社、队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实现秋禾作物良种化，广开肥源，消灭白籽下种，改进过去对秋禾作物不施肥的落后习惯，从深翻改土倒茬、整地、种子、肥料、管理等方面实行了全面改革，迎来了秋禾作物大面积的丰收。一九七三年，全县三十万亩秋禾作物，亩产平均达到了三百七十九斤，比一九七二年每亩增长八十斤，一九七四年又提高到四百零三斤。秋禾亩产也一季上了《纲要》，并涌现出了一批秋禾作物一季过“黄河”跨“长江”的先进社队。

种植方法上的革命

在突破秋禾低产关的过程中，经过了一场创新与守旧的思想斗争；在实现耕作制度改革方面，也同样经历了一场维持现状还是继续前进的严重思想斗争，这场斗争至今还在进行。

一九七三年十月，武威县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认真总结了农业学大寨以来，特别是一九七二、一九七三两年，实现粮食上《纲要》的经验，在研究制订一九七四年农业生产计划时，武威县委根据外地和本县一些高产社、队的典型经验，针对武威县无霜期短，复种作物不易成熟的特点，他们提出改革耕作方法，大搞间作套种，带状种植，变一熟为两熟三熟为内容的耕作制度改革，用新的耕

作方法，促进粮食生产的大上快上，争取为国家做出新贡献的要求。这个方案一提出，就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一阵争论。

有的人对一茬变两茬持反对意见，说什么“一地不能出二宝，出了二宝就不好。”

有的人对带状种植持怀疑态度，他们说：“这样的种法，前人没有搞过，过去没有见过，现在这样搞，能行吗？”

大多数同志认为，上述思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些思想的出现，也是不足为怪的，这是旧习惯势力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小生产者的一种守旧思想的表现。是搞社会主义大农业，还是按常规走路，守旧摊摊？这是农业生产中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生产上的守旧，是政治上右倾的表现，要前进，就要同守旧的右倾保守思想作斗争，不革掉生产上因循守旧思想的命，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思想就不可能树立，带状种植，变一熟为两熟，这一新生事物就不能成长。

事实胜于雄辩。武威县委在解决耕作制度改革中的思想阻力时，也和解决其他方面的思想问题一样，不是简单的说一阵，批一次就了事，总是要拿出大量的事实，用事实说话，用典型引路。

金羊公社海上大队，从一九七一年起，认真学习外地先进经验，积极改革耕作制度，推广间作套种，带状种植，变一茬为两茬，探索夺取粮食高产的途径。第一年，他们推广间作套种和带状种植一百二十七亩，当时主要是玉米、洋芋“秋带状”，因为没有经验，遭到了晚霜的侵袭，大部分苗子被杀死了，在遭灾后经过发动群众补救，亩产只达到六百八十多斤，虽然高于秋禾亩产，但仍然低于一季小麦的产量。这种情况下，部分群众的思想有了动摇，阶级敌人也乘机出来造谣破坏，一些干部产生了“怕”字。面临着挫折，这个大队党支部并没有退缩。他们一方面认真总结带状种植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及时地在群众中展开了政治思想工作，针对那种认为“人活百岁少，地产千斤难”和“带状种植没条件，间作套种太麻烦，复种作物不保险”等懦夫懒汉思想，分期分批举办干部、党团员、社员群众学习班。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毛主席关于“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

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教导，使干部、社员认识到：只有通过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人们才能正确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第一年没经验，产量不够高，但在认识高产规律方面却增加了知识，只要继续搞下去，就会创造出新成果。认识提高后，又接着试验。一九七二年，他们针对上年带状种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真改进了耕作方法，加强了作物生长期的田间管理。秋收后，间作套种的作物，在一九七一年的基础上，亩产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三点六，单产达到八百五十斤。第三生产队播种的十亩带状田，平均亩产达到了一千一百七十九斤，比单种的小麦高出二百七十多斤。带状田大幅度增产的事实，进一步开阔了社员的眼界，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此后，间作、复种、带状种植在这个大队逐年扩大，产量大幅度增长。一九七四年，这个大队播种带状田四百五十亩，占了全大队粮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二，平均亩产一千二百九十五斤，随着带状面积的扩大，全大队所有粮食亩产都闯过了千斤大关，达到一千一百六十三斤。在播种的带状田中，有十五亩单产达到了一千六百零三斤，为更进一步夺高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海上大队大搞耕作制度改革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武威县委的重视。武威县委认为：海上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大搞农业科学实验，不断探索夺取农业高产的途径，说明了这个党支部的路线觉悟高，他们的行动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具体体现。为了取得科学种田的第一手材料，他们经常派人去这个大队，帮助党支部开展工作，组织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指导科学实验，共同总结科研经验，及时向全县传播，对推动全县耕作制度的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抓好耕作制度改革这场革命，一九七三年粮食收打结束后，武威县委还召开了海上等三十二个粮食亩产跨“长江”超千斤的大队和生产队代表参加的座谈会，总结了他们改革耕作制度中的斗争和经验。会后，县委又把其中十二个单位的代表组成两个组，分别到各公社去传经送宝。武威县委还用抓三分之一的工作方法，根据全县不同类型的地区，选出一百五十个大队，作为全县改革耕作制度的试点，及时召开了这些大队的负责人和驻队干部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了改革耕作制度的问题，落实了任务，制定了措施。

抓与不抓大不一样。经过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又采取了扎扎实实地步骤，带来了耕作制度改革上的新飞跃。一九七三年，在全县大部分地方，人

们还不理解带状种植是什么，只有少数社、队种了几百亩地的带状种植试验田，大部分人持着一种观望态度。但是，一九七四年，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干部到社员，社社队队，思想大解放，眼界大开阔，积极支持新生事物，大搞耕作制度的革命，带状种植一下子就猛增到四万二千多亩。一九七三年，全县小麦田里套种黄豆还只有六千亩，一九七四年就上升到了十万多亩。

耕作制度的大改革，带来了粮食生产的大增产。中坝公社头沟大队，一九七四年粮食亩产一举跨“长江”的事实，就是大力推广耕作制度改革而结出的一个硕果。这个大队每人平均只有一亩粮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通过学大寨，农业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但步子总是迈的不大。为了迅速改变不能大上快上的局面，这个大队党支部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干部、社员去海上大队参观学习，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大家议论说：“一亩带状田收一千多斤粮，听了感动，看了更激动，海上大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并为我们闯出了科学种田夺高产的一条新路。海上大队就在我们的邻近，人家带状田夺高产，我们为什么推不开，说来说去，不是我们大队条件差，而是我们的路线觉悟没有人家高，学大寨的劲头没有人家大，科学种田的措施没有人家扎实。”认识提高了，头沟大队的干部、社员一方面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一方面认真大搞耕作制度的改革，积极推广带状种植和间作套种，在一年之内，就使农业生产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大队二千零七十七亩粮食作物，平均亩产达到了八百三十六斤，比一九七三年净增一百三十五斤。

近两年来，武威县的带状田发展很快，效果也越来越显著，一个大搞带状种植，促进粮食大幅度增产的群众运动，已在武威全县蓬勃兴起。一九七五年，全县各种形式的带状田发展到十九万七千多亩。种植方法也由往年的大带田为主，发展为增产潜力更大，效果更为显著的小带田。有二尺五的小麦玉米等距带；有小麦二尺五，玉米一尺五的宽窄带。种植作物除小麦玉米带外，还有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带等等，一般长势很好。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为改革耕作制度，夺取高产再高产广开了门路，创造了宝贵的经验。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几年来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使武威县委的领导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深深意识到：改革耕作制度，

大搞带状种植，间作套种，是农业生产上的一场革命。现在认识到的东西和正在作的工作，还只是一个开始，这场革命是无止境的，在实践的过程中又会发现新的更高产的因素，因此，要在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指引下，抓革命，促生产，经常不断地学习唯物辩证法，向广大群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育，不断扫除唯心主义的毒素，同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决裂，把改革耕作制度的斗争逐步引向深入，促使新生事物的不断成长，昂首挺胸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为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做出新的贡献。

还要努力作战

四年来，武威县委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领导全县人民坚持学大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武威县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武威县委的同志们并不满足于已得的成绩。他们认为：变化还只是初步的，成绩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这几年对国家的贡献虽然逐年有所增加，离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步伐相比，还很不适应。因此，在今后的岁月里，还要努力作战，大步前进。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方针、任务，武威县委正在制定一个长远的规划：这个规划拟定，武威县委要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引下，带领全县人民学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狠抓阶级斗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加强对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里，不断深入社会主义革命。努力造成一个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引向更深入的发展。

在抓好政治思想建设的同时，要把广大农民群众中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及时地引导到农业生产建设中来，进一步抓好农田基本建设，充分挖掘地力，利用水利资源，改变生产条件，掌握生产的主动权。总结经验，深入发动群众，把农业生产上耕作技术的革命进行到底，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早日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努力，争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大寨精神在武威》，甘武著，85页，农业出版社出版，1976年。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2008 年 6 月 3 日初稿

2011 年 10 月 7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8）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八节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河南省军区某些负责人镇压河南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闹天宫》独立纵队：《二十八个为什么——当前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为什么正当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决战时刻，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混蛋千方百计破坏左派大联合？破坏这场极其重要的夺权斗争？这究竟为什么？！ 二、为什么郑州、开封、新乡、信阳等地有名的、斗争最坚决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都被打成“新保皇派”和“反革命组织”？为什么一些不折不扣的保皇派却以极“左”的面孔出现，从“左”面杀过来，到处招摇撞骗、大放其毒？这究竟为什么？！ 三、为什么正当我省革命造反派迫切需要联合起来，向河南省委展开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一小撮别有用心的的人极力排斥和恶意中伤被保守势力恨之入骨的郑大“革联”、河医“东方红”等最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为什么他们和保皇派一个腔调？为什么亲者痛、仇者快？这究竟为什么？！ 四、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来郑后，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保皇势力大抬头，空前活跃，跳得格外高？为什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则感到倍受压抑、处境困难？这究竟为什么？！ 五、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来郑后，一屁股坐在保皇窝里，站在保守势力的立场上？为什么他们到处给郑州地区的保皇派撑腰打气？这究竟为什么？！ 六、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写的《二十七个为什么》，含沙射影，恶毒攻击郑大“革联”、河医“东方红”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为什么这株大毒草抛出后郑州地区刮起一股翻案风？它到底说出了谁的心里话？这究竟为什么？！ 七、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

络站”写的《二十七个为什么》受到真正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抵制？为什么一小撮保皇派则急忙为之大加转抄、翻印、广播、拍手称快？这究竟为什么？！

八、为什么把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安排在国家金融重地河南省人民银行？为什么革命造反派找他们辩论时被诬蔑为“破坏”国家银行？是谁设下这样“巧妙”的陷阱？是谁有意保护他们？这究竟为什么？！

九、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于元月十五日来郑，而复制的介绍信上的日期却是元月二十五日？为什么他们元月十五日来郑时不持证明信，就能住金融重地省人民银行？为什么他们持着“首都三司”的介绍信（只见到复制品），带着“建立三司驻郑联络站的任务”，但不敢打“三司驻郑联络站的旗号，而打着“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的招牌？为什么北京接连来电否认他们是“清华井冈山总部”派的“驻郑联络站”？这一小撮人不是冒牌货是什么？这究竟为什么？！

十、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来到郑州，俨然摆出一副：救世主的面孔，诬蔑郑州没有发现一个明显的左派组织？为什么臭名远扬的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和国棉六厂赤卫队等组织却格外对他们亲近和支持？这伙人为什么臭味相投？这究竟为什么？！

十一、为什么一些人口口声声喊着“炮轰省市委，火烧刘建勋”，而他们却在大街飞小巷、马路、墙上到处写着“打倒郑大革联”，“打倒党言川”之类的大字标语？为什么这样的反动口号甚嚣尘上，充斥整个郑州城？郑大“革联”是反动组织吗？党言川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这一小撮混蛋为什么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郑大革联和党言川同学？这究竟为什么？！

十二、为什么最近几日每天都有上万人到郑大校门口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革联”示威？为什么省委直属机关几千人，二月一日上午也明目张胆地来到郑大门口向“革联”学生挑衅？这不是空前规模的群众斗学生，干部斗学生又是什么？试问这些老爷们，你们对省委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示威过几次？这不充分暴露了你们，保其主子、镇压革命学生的罪恶本质吗？这究竟为什么？！

十三、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抛出攻击郑州地区革命造反派的《二十七个为什么》以后，河南省委的第二号人物纪登奎亲自“登门拜访”？为什么这群冒牌货在纪的“拜访”后又抛出了一个《十个为什么》（即“几天来的形势发展说明了什么？”）这株大毒草？为什么《十个为什么》比《二十七个为什么》更凶狠、更毒辣、更赤裸裸地攻击和咒骂郑州地区

的革命造反派？纪登奎到底给了这群冒牌货什么黑指示？这究竟为什么？！

十四、为什么一些人把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张耀东等隐藏起来，不交给全省革命造反派批、斗？到底是谁在保省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底是谁在当前夺权的关键时刻扭转了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学生？这究竟为什么？！

十五、为什么当前河南省，尤其是郑州和开封地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了一次比过去更加全面、更加疯狂的大反扑？为什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遭到空前严重的政治迫害和压制？为什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而得不到河南省军区的支持和保护？这究竟为什么？！

十六、为什么河南省当前掀起了一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疯狂反扑的黑风恶浪？为什么这股逆流相当强大？它的幕后策划者是谁？它的急先锋是谁？它的帮凶是谁？这究竟为什么？！

十七、为什么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兼省长文敏生，长期住在河南省军区医院里？为什么当河南省革命造反派炮打省委司令部时，省军区却把文敏生保护起来？为什么省军区能成为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防空洞？这究竟为什么？！

十八、为什么在毛主席发出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伟大号召后，河南省军区的某些负责人偏要支持代表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冒牌“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偏要支持河南地区的保守势力？是哪个胆大包天的混蛋公开违背毛主席的命令？这究竟为什么？！

十九、为什么郑州、开封、信阳等地的驻军和公安部队都直接参与了支持保皇派，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为什么河南省军区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和保皇派穿一条连裆

裤？为什么他们有着鱼水之情？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为什么河南省军区在元月三十日上午调动大批军队，打着欢呼中央军委八条指示和支持真正革命造反派的旗号，联合郑州地区的保皇派进行声势浩大的空前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全副武装，擦着大炮究竟向谁示威？为什么在这次游行示威后，郑州地区笼罩着空前严重的白色恐怖？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一、为什么部队游行队伍走到郑大门口时，格外起劲地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他们究竟把矛头指向谁？要专谁的政？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二、为什么部队游行后，保皇派那样兴高采烈？为什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却对此无限愤慨？为什么到省军区“报喜”的几乎都是保皇派？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三、为什么在省军区部队游行示威的前一天，公安部门的两个参谋突然于深夜到郑大“革

联”等革命造反组织检查枪支？他们心里到底怀着什么鬼胎？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四、为什么省军区起劲地为冒牌“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辟谣”？为什么他们拿不出“辟谣”的根据来？为什么省军区极力保护清华的托派唐伟？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五、为什么保皇派围攻郑大“革联”等造反派同学时，省军区的宣传车和军官赶到现场为保皇派摇旗呐喊，帮腔助威？为什么最近几天省军区故意找岔无理扣留和大批逮捕郑大的学生？河南省军区在两条路线的大厮杀大搏斗中站在了哪一边？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六、为什么河南省军区那样敌视郑大“革联”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为什么反对一个军区的负责人就被诬蔑为“反对解放军”？这和“反对河南省委就是反对党中央”、这一反动口号有多大区别？为什么河南省军区负责人的老虎屁股摸不得？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七、为什么不能说河南省军区半个“不”字呢？这究竟为什么？！难道河南省军区就没有“三反”分子吗？难道河南省军区就没有一小撮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吗？

二十八、为什么二月二日郑州市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举行示威游行时省军区不予支持？为什么指使人暗地记录参加游行的造反派组织名称？他们不是准备“秋后算账”是什么？这究竟为什么？！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河南省委和河南省军区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都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他们必然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残酷的镇压和猖狂的反扑。但是，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有同阶级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有“砍头只当风吹帽”的革命英雄气概。为了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捍卫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坐牢不怕，杀头不怕！我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凡是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誓死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

（《河南日报》1967年2月10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等《就谈判问题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的电报》

就党言川之流对抗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破坏赴京谈判问题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的电报：二月十七日总理对“河南日报事件”及时作了四点指示後，我们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热烈拥护，并坚决执行了小央命令和总理指示。为全面地实现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尽快派遣代表赴京谈判，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一方，于当夜和十八日上午，根据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精神，认真地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派遣谈判代表的具体意见，并于十八日下午报告给召集人何政委。此後，我们一直在积极准备谈判。但挑起武斗的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对谈判毫无诚意，一再拖延。在军区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多次催促下，直至二十二日中午才提出有关谈判的六条意见。其中提出参加谈判的负责人是党言川、申茂功。召集人於二十二日晚通知各方：由所报谈判负责人在二十三日举行会议，商讨拟定选派代表名单。二十三日上午，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竟不按通知规定，另派了两名所谓“全权代表”，代替党言川、申茂功参加会议，并在会上无理取闹，使上午的会议遭到破坏。下午後，联委等组织一方的负责人党言川等，拒绝出席会议。致使商谈又无法进行。对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连续破坏会议的罪行，我们都当即提出了强烈抗议。更令人气愤的是：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极为卑鄙的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在郑州竭力拖延，破坏谈判，一面竟早在十九日就非法单方组成所谓“代表团”偷偷离郑，公然抗拒中央命令，无视总理指示，欺骗省军区和革命造反派。二月二十四日，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从北京给何政委来电，说什么“二七公社”的代表已相继到京，并诈称“代表名单已报小央审批”。我们对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肆无忌惮地对抗中央命令，公然无视周总理的指示，丝毫不尊重召集人的意见，千方百计地蓄意破坏谈判的严重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决心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必须在郑同我们协商拟定谈判代表名单，由召集人上报中央，待中央批准后，再赴京谈判。我们强烈要求，以党言川为首的非法代表团必须立即解散，党言川等人必须立即回郑，不得再继续对抗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必须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罪，向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河南省革命

造反派总指挥部 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载于《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丁望编，香港中报月刊出版，1969年。该书有编者按：“此件刊于河南红卫兵的传单（一九六七年，缺日期）。”）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豫战斗队：《毛主席 河南人民想念您——侧记河南的白色恐怖》

目前，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正在河南泛滥！ 河南告急！ 毛主席啊！毛主席！处在白色恐怖中的河南人民想念你！顽强奋斗的二·七公社的战友想念你！河南五千万人民眼望着北京，盼望着听到您老人家的声音！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八个月的战斗中，郑大革联的战友，河南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农民同志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敢打、敢拼、敢革命、敢造反！他们向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为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怎能忘记啊！二月七日这一天，就在二·七罢工的圣地——郑州，红旗漫卷，锣鼓喧天，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了大联合，二·七公社诞生了！然而，革命正在蓬勃发展，革命派的大联合正在进一步形成的时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凭着他们反革命的嗅觉，感觉到朝不保夕，马上就要彻底完蛋了，于是，便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拼死同革命派进行斗争，一时，黑云滚滚，妖雾弥漫，白色恐怖再一次笼罩着河南，一场大厮杀又要开始了！ 风云突变！ 几天的时间内，郑州市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均被保皇派砸了一遍！ 三月五日晚，郑大革联门口，一辆吉普车嘎然而止，从中跳出四个人，对郑大革联下达通牒：明天我们要开大会，不许你们捣乱，如果破坏会场，由你们负完全责任！ 三月六日上午，我们在郑大革联与党言川交谈。党言川，他中等个子，蓬松的头发，戴着眼镜，摸着长头发对我们说：“过去有些作法不对，今后应尽力与军区搞好关系，然后搞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 正在这时，门外人声嘈杂，郑大红卫兵战斗师把郑大革联包围了！保皇师的广播车疯狂地叫骂：郑大革联是非法组织！要坚决取缔郑大革联！…… 保皇师的

干将在外大叫大嚷，并强行冲入搜查，情况万分紧急。在匆忙之间，党言川写了封筒信，并把郑大革联的印信交给我们，托我们带出。说时迟，那时快，保皇师一窝蜂地破门而入，就要绑架党言川。“把我们的情况带给中央！”党言川仅来得及说出这么一句心里话，就被架走了！别了！同志！别了，亲爱的战友！暂时的分别并没有什么！地质东方红的战士坚决地支持你们！坚决与郑大革联并肩战斗！我们充满了必死的信心，背起了书包，带着郑大革联战友们的委托，大步地向门口走去。要出门时，保皇小丑们瞪大了眼睛，疯狂地吼道：一律不许走！好一幅看门狗似的耀武扬威！“告诉你们，你们没有权利戒严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保皇派毕竟是保皇派，在我们的凛然正气面前，他们不得已而退后一步，让我们登记一下。向老保登记是对地质东方红的污蔑！要写，你自己写去！于是，我们昂然地跨出了革联的大门。我们刚走出不久，保皇师们由于没有搜到革联的印信，便望眼欲穿地死命盯着我们的书包，他们派出大批的侦探，盯梢、跟踪，甚至要强行搜查！一场激烈的斗争开始了！在一大群保皇卫士们的“保护”之下，我们来到郑大门口，门口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仅留一个门洞供钻来钻去，两侧还立着几十位打手。大门不让走，我们走旁门！这下可忙坏了保皇师，几十个人往返护送。可怜的保皇师，动手抢吧，又不敢，放我们走吧，心不甘！只得甘当我们的随从，在郑大周游了五个小时！

为了不辜负战友们的委托，为了带出郑大革联的印信，我们决定：打开书包让校门栅栏外边的广大群众看一看。我们打开了书包，在众目睽睽之下，保皇小丑们不敢细看，只得允许我们出去。我们胜利了！我们雄赳赳地跨出了郑大的大门！这是一件小事，它比起河南革命造反派的斗争业绩，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本不值得一提。但是，我们写出来，是给那些保皇小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你们跳吧！骂吧！跟踪吧！盯梢吧！就在你们几百人的重围之中，我们四名地质东方红战士通过你们的层层搜查，终于带出了革联的印信，这不是对你们绝大的讽刺吗？我们写出来，是让郑大革联的战友们看到，这是我们对自已战友的支持！顽强战斗，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们写出来，是让二·七公社的工人、农民同志们看到，地质东方红的战士永远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革命的战友们，同志们，在那白色恐怖笼罩的郑州，河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并没有屈服，他们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誓死捍卫伟

大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没有被吓倒，没有被征服，他们在浴血战斗！三月六日，郑大附中红旗等二·七公社的小将们，冲破了郑大的圈墙，冲入郑大，冲入党川被囚的楼房，向党言川告别！他们把心爱的语录牌和毛主席像送给党言川！是他们，在楼下给党言川扔馒头，让党言川“不吃保皇派的馍！”是他们，在房上写下了巨大的标语：二·七公社必胜！然而，战斗师却对这些红小将恨之入骨，对他们连推带打，使他们的鲜血洒在郑大的土地上！三月六日，郑州，黑沉沉的夜！消息传来，党言川被打，凌晨四点，失踪！粮院革命造反派被砸！河医东方红被砸！……多少人彻夜未眠！多少人对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像片，热泪夺眶而出！

三月七日，各厂革命造反派的广播均被管制，并强迫命令他们解散，加入保皇组织！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有的在睡梦中被抓去；有的，在车床边被抓走；……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种种借口……“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河南五千万人民是怎样地盼望啊，盼望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我们忘不了，在郑大被围的那天，一个衣服被撕烂的同学，不顾战斗师的监视，拉着我们说：你们回到北京，千万别忘了把我们的情况向中央汇报！我们忘不了，我们临走前，国棉一厂的革命工人保护着我们，送我们到车站，帮我们甩开盯梢的小丑，直到深夜四点。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使他们凌晨六点半钟还要赶回车间，为国家创造新的财富！我们忘不了，国棉一厂的一位老工人颤巍巍地捧起毛主席像，含着眼泪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日夜想念你啊！我们忘不了，一位工人同志含着眼泪说：“让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指保守组织），杀头我也不干！革命才知主席亲！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河南五千万人民是怎样地向往啊，向往北京城！是怎样地渴望啊，渴望听见毛主席您老人家的声音！当我们提笔写到这里，心头压不住满腔的愤恨，现在，河南革命派的战友，我们共同浴血奋战的同志，第二次被打成反革命，被逮捕，遭毒打，受迫害！而那些保来保去，一保到底的保皇干将却死灰复燃，成为当然的“左派”，甚嚣尘上，耀武扬威，毒打郑大革联的战友，是可忍，孰不可忍！何X X，这个在河南十余年的老混蛋，当初和吴芝圃一起打击迫害潘复生同志，今天又妄图搞垮刘建勋同志。正是这个败类，开动造谣机器，蒙蔽广大人民，残酷镇压革命派，实行反革命复辟。其用心何其毒也！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时的猖狂，丝毫不表明他们的强大，却充分说明，他们的末日就要到来了！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五千万河南人民！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在中原大地高高飘扬！ 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豫战斗队 豫磊（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1967年4月12日）

二、中央解决河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等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是看了中共河南省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四千余名代表进京反映问题的报告后写的。（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3） 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汉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建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4） 赵文甫，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5） 文敏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 纪登奎、戴苏理，当时均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时间：1967.5.29，21时—0时30分，地点：人民大会堂西会议厅。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关锋、王力、戚本禹等。出席代表：二七公社22人，河造总10人，省委干部纪登奎等三人，（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等三人。列席：首都红代会4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1人。哈军工红色造反团1人。〕

（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进入会场。

总理：何运洪同志来了没有？

何：来了。

总理：你给郑州打电话了没有？

何：打了。

总理：那三位书记来了没有？

何：还没有到。

总理：文敏生、杨蔚屏、戴苏理中央请他们来了，怎么把他们弄回去了？

何：（未答出。）

二七：这是何运洪捣的鬼！（高呼口号：打倒何运洪！砸烂河南独立王国！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总理：同志们，不要激动，到了中央摆事实讲道理么。

康老：摆事实讲道理最有力么，一个一个讲，不要吵么。

总理：党言川同志来了吗？

言川：（站起来）来了。

总理：纪登奎同志，来了吗？

纪：（站起来）来了。

总理：三个书记明天也来，何运洪你负责。

何：好。

总理：“造总”来了吗？

造总：来了。

总理：来了几个人？

造总：十个。

总理：北京这么大，你们怎么不告而走啦？

造总：我们有意见，他们把我们逼走的。

二七：造谣，是个大阴谋！（双方争吵起来）

总理：别吵，别吵么！今天我们开三个钟头的会，9点至12点，二七公社翻过来，一边一个讲。还有纪登奎么，军区么，党言川，你们谁先讲？（对造总）你们的代表什么时间来？

造总：明天来。

康老：不要激动，不要吵架，这是在中央开会，摆事实讲道理，问题好解决么。

总理：不要吵架，不要骂街，摆事实讲道理，二七公社先讲？

郑大联委：我控诉何运洪镇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总理：你的名字？

郑大联委：寇学济。

总理：噢！噢！二七的，先讲吧！（寇讲了一段，很激动）

总理：多摆些事实。

王力：这是中央开会，向你们作调查的。

康老：心情平静些。

寇：（点名控诉何运洪，当寇检查把二七公社与军区的矛盾公开化时，总理满意地点了点头；当讲到河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二月黑风中跳出来要抓“右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时，康老注视着寇点了点头；当讲到何运洪对纪登奎迫害时，谢副总理站起来用目光寻视纪登奎同志，纪登奎起身向谢副总理点了点头；当讲到在河南竟有人说：“何运洪他老人家说……”时，总理、康生、王力等首长大笑。这时‘造总’起哄为何运洪辩护。）

总理：（生气地）别吵！让别人讲完！

康老：（对造总）何运洪在场么，叫他们讲，你们干什么？

（寇继续讲。当讲到不同观点调查表时，总理伸手接过这种调查表；讲到何运洪利用河南日报制造反革命舆论时，二七代表把几期河南日报递给总理。刘生揭露何运洪在河南日报搞假夺权的阴谋和在报纸上犯下的罪行时，总理、伯达、康老看河南日报；讲到何运洪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时，二七代表

把赵文甫二月黑风中给何运洪的三封黑信递给总理。接着河医东方红黄天亮控诉了（何）操纵公安公社制造五·二六惨案的罪行。）

总理：我们从二月份起就着手一直解决河南问题，你们要摆些事实，“造总”哪位同学讲？节约点时间。（郑工造总孙孝先就 5.22 事件攻击二七公社，诬蔑二七抢了他们的人。）

总理：你们走了干啥？我们派武装警卫嘛。（郑大战斗师李志江就 5.22 事件继续攻击二七公社和首都红代会，陈伯达、谢富治、王力、关锋等首长陆续走出会场。当他谩骂“二七一小撮混蛋”时）

总理：（生气地）你们不要骂人！

李志江：我心情太激动了，骂人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是不对的。

总理：这个地方不要骂人嘛！

孙孝先：二七公社没有谈判的诚意。

康老：你们的人是不是回去了？是回去了，还是藏起来了？

造总：真回去了。

总理：（对造总）你们说完了？（造总又站起来一个要说话）

总理：你讲两次了。（造总一个人还要说话）

总理：（对造总）算啦！（对二七公社）二七公社，你们谁讲？

（二七公社十三所红色造反军的张保怀同志痛斥造总发言中对二七公社的诬蔑，申明五·二二事件与二七公社无关。向中央首长汇报说，二七代表都是陆续坐煤车来的。）

总理：何运洪，叫你安排双方代表，你没安排吗？

何：他们不要安排。

二七：我们上了火车，他们还拿棍子打我们，把我们从火车上往下拉呢！（张保怀继续控诉对首都红代会战士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所欠下的血债，并向总理要求让红代会和军事院校战友参加汇报。）

总理：红代会的同志没有进来吗？我以为进来了。（派人到门外请红代会及外地战友参加会议）（造总一女代表又借 5.22 事件嚷起来。）

总理：你还吵，有什么意思？

康老：（严厉地）你们抓这一件事，就说在北京没有人身安全，借口北京没有人身安全把代表弄走或者藏起来，这不对。

（造总那个女的还要吵）

总理：不要吵！

康老：还是把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谈谈吧，把河南的关键问题提出来，不要抓住这件事不放。（二七代表纷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首长指示，谈大方向。）

康老：何运洪，你负责他们来！中央老早就叫你们来，你们是不执行的，为什么河南问题一直拖到现在？二月份就在解决河南问题了，有很多问题你们是不执行，（何运洪站起来想说话）你不要站起来，中央有材料，以后给你说！（何运洪呆板地坐下去）（郑大联委党言川同志控诉何运洪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当讲到何运洪在河南搞大逮捕时）

总理：最多逮捕多少人？宣布非法组织多少？

（二七公社代表回答以后，总理暂时离开会场）

王力：郑州市宣布非法组织多少？！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后是不是撤消了？

言川：四月十六日军区付政委余嗣贵还在大会上重申“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还说军区说话是算数的。

王力：这些重要材料，刚才你们都没有讲清楚。

总理：（向党言川）你什么时候被捕的？

言川：三月九日在商丘被捕的。

（二七公社新华社河南分社“铜墙铁壁兵团”战士刘建生同志发言控诉何运洪对新华社记者的迫害，当讲到河南目前“非法”盛行，新华社记者进行采访，没有通过河南军区也是非法的时，总理、康老都笑了。首长们很注意地听刘建生发言。）

总理：工学院还有谁？算了，不要讲了，让纪登奎同志讲一讲。

纪：（站起来）抄造总的材料是不对的，我的确不知道，后来在北航韩爱晶同志告诉我的。他们说我是后台。（总理、康老都笑了）我把这事说一下。我被关了四个月。

康老：什么时候被关的？

纪：一月中旬到五月。（康老没听清，总理对康老说了一遍，康老点了点头。）

十六条以前，我执行了反动路线，压了郑大联委，十六条以后，我也有些错误，我愿意检讨，今天时间少了，我暂不讲这个。河南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支左问题上搞错了，去年八月份杀出来的造反派组织除了一小部分，摧垮的面相当大，开封师院八·二四被摧垮了，信阳、商丘全部被摧垮了。现在当权的“三月左派”整天喊着与公安公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公安公社是什么人呢？是死保王一鸣（公安厅厅长）的人，军区搞“三结合”结合他们，各县公安局都是这样。他们把四大民主变成了“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省直机关、十大总部是怎样起来的呢？就是原系统、原机构、原部门把真正造反派压下去以后，其余都成了“造反派”。省直机关负责人李伟是省监委付书记（原公安厅付厅长）丁石的秘书。省直机关不许有一张反面的大字报。丁石一贯支持多数派，在工学院也是支持多数派的。现在的郑工造总原来确是造反派，郑工造总也是清楚的。他们看到自己的阶级兄弟都压下去了，原组织一百多人造了何运洪的反，质问何运洪为什么把造反派压下去。我曾问何运洪这矛盾是什么性质？他不听，很顽固，把所有大学的造反派都说成是我的御用工具，本来这些造反派都是从对本单位的当权派的斗争中冲杀出来的，何运洪抓住了所谓“冲军区”、“打、砸、抢”，把造反派都说成是“御用工具”。他们利用专政机关镇压革命造反派，谁冲公安机关就把谁打成“反革命”，平顶山公安局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在一起，搞便衣活动，镇压学生运动。安阳、商丘，开封都是这样，反把罪名加在学生头上，说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我认为是错误的，我写过一份检查中说：“如果把冲军区作为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那么我承认我错了。”我说：“你们不要逮捕学生，逮捕我好了。”（农学院李天祥插话：“军区又向学校派了工作组，军区宣布说，工作组是经过军区挑选的。）造反派被压得很惨，也有个别很好的人，据说洛阳 344 部队一部分人、硬骨头六连、林县武装部支持造反派。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非法后，下面乱宣布非法组织，中央十条命令下达以后，他不仅不改，还开大会重申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说军区说话是算数的，就这样群众组织翻了个个儿。把好同志打成了“反革命”。革命造反派成了“反革命”，保守派成了“造反派”。

王力：（拿着所谓“中央关于河南问题的十二条”的传单说）这个十二条是谁搞的？

总理：何运洪，你说！

何：有，我们没有看到。

××：是郑工一同志搞的！

造总：我们是从红代会那里搞来的。

陈新民（红代会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战士）：是我们从公安厅机要室得到的，何运洪是篡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王力：（高兴地笑着）行了，这个情况清楚了，我们知道就行了。第一是从公安厅机要室得到的，第二下面有传达。（纪插话：安阳传到十七级干部。）军区至今没有否认，没有辟谣，是不是哩？

何：（狼狈不堪，吱吱唔唔）我们不知道。……

康老：不要说了，已经印成了传单，大家都知道，你不知道？

纪：（接上边话）赵文甫、杨蔚屏跑出来：“形势很好。”杨蔚屏在前一段运动中被革命群众揭发批判了，这时他便说：“我死到棺材里也要记住这件事。”省委机关干部大部分过去了，戴苏理也过去了，还骂造反派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大杂烩”，还要出来“三结合”。何运洪这样搞下去结果是什么样子？公安厅的权交给了保守派，造反派炮打公安厅是对的。“河南日报”社也是这样，还有电台。准备“三结合”的付省长李庆伟是支持保守派的。叛徒齐文俭过去带着日本人到处抓人，也被结合起来了。“三结合”净搞“中间人物”，搞到底全部来个倒退。法院结合了一个伪县长，公安厅把权交给了保守派，报社也是这样，生产指挥部结合的李庆伟支持保守派，齐文俭是个叛徒。谈判前应该悔改了。军区宣布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做了错误的决定。现在来中央，要把问题解决一下，带枪的不好办。

张保怀：敬爱的周总理、康生、伯达同志及参加会议的各位首长同志：根据今天会议的情况，我代表二七公社特提出以下几条建议，报请总理考虑。

总理：可以。

张保怀：第一，何运洪幕后操纵破坏谈判，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何运洪负责。第二，何运洪在河南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大搞资本主义复辟，郑州市仅是一个

小部分，河南除郑州以外的广大地区同样处在何运洪一手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下，有些地方比郑州更严重，为了全面地反映河南的情况，请敬爱的周总理批准以下几个地区各派一名正式代表参加谈判：开封八二四、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偃师八二五，焦作矿院八一八，平顶山选煤 224 战团、鹤壁、兰考造反派。

康老：派不派由中央考虑决定，我问一个问题，反对派可不可以派呢？

二七：可以。

戚本禹：八·二四可以多派几名代表，八·二四派是很有名的。

总理：可以来 2—4 人。

戚本禹：（点头）来四个吧。

张保怀：第三，首都红代会与二七战友一直浴血奋战，应该派代表参加谈判。

萧华：（对何运洪）你们怎么对待军事院校的同学？

总理：是不是军区打了军事院校的同学？

何：没有打他们，没有围攻他们。（二七：（众）胡扯！造谣！002 部队战士讲了开封 5.12、5.14、5.25 事件。）

总理：首先命令军区对待军事院校的同学不要有什么歧视，一定要让二百五十个人回来（指开封被扣学员），红代会同学站在二七公社一边，在河南受压制，作了很多工作，了解了很多情况，我们了解了，明天派有关同志单独和你们谈谈，另外不要再派人去了，已经有一千多人，在北京汇报解决行了。派人去了，已经有一千多人，在北京汇报解决行了。

张保怀：（接着提）我们要求中央责成何运洪立即制止郑州的武斗，停止对二七公社的继续镇压，并要求派医疗队到河南。

总理：何运洪，对武斗事件军区要负责，不要再发生武斗，压得很厉害么！要出去劝阻，要打电话，每天要向军委汇报。

康老：何运洪、一军（野战军，驻开封）有医院，（省）军区也有医院，不能只给一方治，不给另一方治，都是阶级兄弟么，对伤员要一视同仁，如果真的歧视的话，杨代总长在这里，军队是有军纪的，明天派医疗队去。

张保怀：五，为了更好地揭发批判何运洪在河南犯下的滔天罪行，让受蒙蔽的代表回去，等觉悟过来再来参加谈判。

（总理、康老都笑了。）

康生：这一条不是和刚才说的同意他们来矛盾吗？

张保怀：这一条不要了。坚决收回，宣布作废。

康老：就是么，收回就好。

张保怀：六，我们要求敬爱的周总理批准革命干部耿其昌、王庭栋等同志参加会议。他们支持造反派，二月份以来受压制的。

总理：何运洪，由你保证这两个同志来京。

康老：张树芝（河南省军区司令员）为什么没有来？

何：他有病正在休养。

总理：叫他来，为什么不来？在北京也可以休养嘛！还有余嗣贵付司令员。

何：付政委。

总理：叫他也来。

张保怀：何运洪在粮院讲话，表示要和老保八八团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还说八八团可以宣布我们粮院联委为非法组织。

总理：他是挑拨的。

张保怀：七、请敬爱的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代二七战士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林付主席、敬爱的江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全体同志转达我们的决心，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决不丢，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我们这样说的，也是这样作的，我们二七公社战士的共同口号是：只要打不死，还要干革命，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彻底砸烂河南独立王国；不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誓不罢休！（二七代表高呼口号：“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只要打不死，还要干革命！”“砸烂河南独立王国！”）

康生：你们拥护不拥护解放军？

二七：拥护！（二七共同呼口号：“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坚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康老：（大笑）

张保怀：何运洪派到粮食学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付×××说：“要想为郑大联委翻案，就必须打倒解放军！不打倒解放军，不用想为郑大联委翻案！”

总理：（很生气的）这不是挑拨军民关系吗？今天的会就到这儿结束，有些事可以马上解决，答复几个问题：1、造总代表明天赶到，你们负责让他们回来，材料北航归还，问题很清楚，不在材料多少，道理摆清楚，问题一清二楚。在毛主席身边，在北京安全没有保证，那么在河南有保障？靠谁？

二七：（众）靠何运洪保护他们。

总理：2、增加代表，由我们的记者同两方面商量一下，对方也要来，对方没人，不来也可以，时间定了，以后通知军区。（戚本禹插话：八·二四可以多来人。）八·二四比较有名，可以来二个至四个，谈判不等，继续进行。

3、革命干部王庭栋、耿其昌要他们来，何运洪负责打电话，把他们送来。文敏生、杨蔚屏、戴苏理你们说他们也在郑州，他们一块来。军区来人少，司令员张树芝身体不好，来么！来北京可以治病，好不好？付政委余嗣贵也来，政治部主任也来，一共四个人；八·二四来了，一军支左负责人也来一个，可以一块谈。

4、郑州武斗很盛，军区可以制止，劝解一下就打不起来了，何运洪负责，你要打电话。军事院校赴豫调查团的人牺牲了两个，二百五十人在开封被扣，一军要马上放，北京尚有学生与军区对立，可以劝说。马上放，给自由，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文化大革命么！

王力：上你们军区楼上的也要把他们放出来。

造总：前天发了公报，让他们回去。

何：他们不下来。

（空军 002 部队代表籍保军很激动，一下子站起来，指着何运洪）：何运洪，你当面欺骗中央首长……把 796 部队的战士往死里打。

总理：对军事院校的同志不能有任何歧视，让他们安全离开，也告诉开封军分区、一军，保证二百五十人的安全，武斗你负责。郑州、开封大武斗要劝嘛！能劝下来？你今天打电话，明天汇报。

5、红代会去做了许多工作，支持二七公社有材料，记者站（红旗杂志）去找你们谈，弄清楚再处理，北京不要再派人去了，在北京汇报好了，事情总要转过来，不要扩大。

6、明天派医疗队去。何运洪也要负责，军区一军有医院，要好好的治，不能只给一方治，不给另一方治，那些都是阶级兄弟，拥军爱民嘛！

何：我们是这样做的。

二七代表：何运洪你胡扯！

总理：我们要调查，明天派一个医疗队去，一面医疗，一面调查，你们二七公社不愿和他们住在一起，可以住在两个地方，你们受压抑了，你们在北京完全可以公开出来，不要让我们不好找。今天的事谈了马上就做，但不要回去打电话，出大字报，大标语。

造总：二七公社靠北京来电吃饭。

总理：（对造总）这是什么话！嗯？怎么这么说，这不对。

康老：有的说不打电话，回去还是打，各取所需，增加我们的麻烦。

二七：保证执行中央指示。

康老：刚才王力念的“十二条”，军区马上查明，要辟谣。

王力：也可能是军区说，下面记的。

关锋、戚本禹：中央文革没有搞什么“十二条”。

伯达：我们知道“九条”、“十二条”肯定不是中央的。

王力：（微笑）不是中央文革的。

杨成武：也不是中央军委的……

总理：好！散会，同志们再见。

（0：30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支持我们，我们要给毛主席争气！”的口号声中，挥手向代表告别，离开会场。第一次汇报到此结束。）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康生陈伯达谈河南问题

〔六月三日晚十点三十分至四日晨二时，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负责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叶群、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摘要。〕

康生谈河南问题有关部分摘抄如下：对河南二七公社的同情和支持是完全对的，大方向是对的，河南的问题很多，当前分为三派：有二七公社、造总、

公安公社。军区有错误。毛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主席指示我们解决。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是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康生同志在讲到阶级敌人是如何猖狂的时候，还非常气愤地拿出河南平顶山特务分子恶毒攻击周总理的照片让大家看，并随时念了几个在平顶山出现的恶毒攻击周总理、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在场的人都非常气愤。）（1）你们（指首都红代会）派到全国各地的联络站及其工作人员，作了不少工作，但也犯了不少错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你们必须立即撤回北京，搞本单位斗、批、改。在外地用中央文革的名义，这是不对的。（2）六月三日，你们开大会，声援河南（二七公社），不应该开。你们这样做是给中央文革施加压力。（3）中央叫河南双方来谈判，你们把河南造总的材料、粮票、钱抢走是极端错误的，是无政府主义。给中央解决河南问题带来很大困难。（4）现在出现了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逆流，大家应注意。周总理是坚定的左派、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陈伯达：河南三分派，河南造总一派，二七公社一派，公安公社一派。你们不能把河南造总说成保皇派。要那样说，这是极其错误的。河南造总来京汇报你们把人家材料抢了，这是不对的。人家第二次送材料来，你们又抢了，这是错上加错。红代会到四川和河南包办了两省的运动。在河南和四川的红代会同志要全部撤回，一个不留。要相信河南五千万人民和中央会正确处理河南问题的。主席是很关心河南问题的。主席授权周总理、康生和我负责解决河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记录

〔时间：下午四时，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肖华、杨成武、王力、关锋等接见河南省军区和驻开封的一军的首长。〕陈伯达同志问何运洪同志：上次接见时总理指示，让你们同各派代表都谈谈，谈了没有？何运洪同志答：当时没有听见。陈伯达同志又问王力同志：总理不是让他们同各派谈谈？王力同志说：是要他们同各派谈谈，河南来的同志要找各派都谈谈，问题还是要通过你们去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要有成见，要找他们谈，反对你们的去谈谈也好嘛！总理说：河南武斗是你们压二七公社的结果，主席说过福建、河南的问题就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我们开门见山地谈，主席二月有个批件，就是批河南问题的。当时冲军区，主席说这是对你的信任的表示。省委瘫痪了，群众找你们是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不会开枪，他真要

冲，让他冲进去，住够了就好了。郑州围报馆，主席说让他暴露几天，不要接管。以后我们叫你们来谈判，你们说只有一派了。我们讲只有一派了还有啥谈的，就没有谈的了嘛！但是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左、中、右总是存在的。以后你们抓人，宣布非法组织，把他们压下去，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强，物极必反嘛！你压了他，他就要闹。何运洪同志上次接见，你们来了，二七控诉你们，我们说不能叫控诉，他们提了些意见，你给你们刚来的同志讲了没有？何运洪同志答：给他们说过了。康生同志说：去年南大、交大、郑大运动起来得快，南京、西安是派工作组进去镇压，河南开始就支持学生造反，主席称赞过。（总理插讲：现在翻过来了。）赵文甫给你们的信收到没有？（何运洪同志答：收到过一封。）这封信很坏，是挑战性的，搞不好，你们和内蒙一样。总理说：你们谁谈谈。接着何运洪同志代表军区向总理和中央首长作检查，当检查到二月十七日中央指示要派代表来京谈判，我们没有坚决执行，把郑大联委当作右派时，（总理插话说：毛主席当时说即使是右派也来，右派也不能压。）总理说：你们是不是谈谈省委问题。何运洪同志说：由李善亭同志谈。总理说：李善亭同志你谈。接着由李善亭同志汇报省委的问题，当汇报文敏生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问题时，（余嗣贵同志插话说：刘建勋也说过读毛主席著作也要一分为二。）关锋同志插话说：看刘建勋同志说一分为二是咋说的，如果说毛主席著作里有辩证法，讲对立统一，讲一分为二，这就不错，如果他是说主席著作有正确有错误，那就错了。康生同志插话说：这是个复杂问题，看刘是怎么说的，是什么意思？李善亭同志继续汇报，当谈到文、纪叫郑大联委假冲省三级干部会议时，

关锋同志插话说：你们咋知道这样详细？

李善亭同志说：是张耀东等揭发的。关锋同志插话说：这个人怎么样？要把事情弄清楚。杨成武同志插话说：河南问题很清楚，现在是怎么检讨的问题了，你们要和二七公社讲清楚，要检讨。关锋同志插话说：刘建勋在北京三结合，郑州就出现了坚决打倒刘建勋，打倒刘建勋的后台谢富总理的标语，还有打倒江青同志和总理的标语，你们为什么不表态？杨成武同志插话说：还有那个十二条，你们为什么不辟谣？康生同志插话说：是不是符合你们的

口味？！对你们有利，你们不吭气。 杨成武同志插话说：起码你们很欣赏。
康生同志说：你们还有要和赵文甫结合的电报。

李、余、何诸同志说：我们没有这样的电报，我们可以再查一查。 康生同志说：二月叫你们谈判，你们不来，不管有意无意，是和主席思想对立的。 关锋同志说：你们想把人家拖垮，造成既成事实，再来谈判，这是很不对的。 总理说：当时你们拖，你们压了人家，所以人家反对最强。 下面接着李善亭同志继续汇报，刚谈到纪登奎问题时，

总理插话说：对纪登奎的问题，主席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 关锋、王力同志插话说：你们还继续谈，可以谈你们的看法。 李善亭同志汇报完省委的问题后，余嗣贵同志汇报二七公社的问题。 总理说：郑州八大总部是怎么一回事？ 余嗣贵等同志作了回答。 总理说：对八大总部，你们要想法让他们和二七公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当然现在距离很大了。河南不是军管，实际上军区说了他们还听，你们这次立场要站稳，谈判才能谈好，八大总部要求要派代表来，可以和他们双方协商，（王力同志插话说：二七公社不同意）可以和二七公社商量，一个总部来一个。 王力同志说：军区的问题就是几个字，方向、路线错了，打击了革命造反派。

总理说：要把立场变过来。 王力同志说：要听造反派（二七公社）的意见，要到群众里面去，听听他们的意见，不要靠什么百分比，搞繁琐哲学。 康生同志说：你们这一段是什么路线，什么方向，要好好检查。 王力同志说：你们说人家（二七公社）大方向不对，人家抵制你们，说明人家的路线对了，人家如果跟着你们，相反的路线错了，你们把革命的当成保守的，把保守的当成革命的，就是搞错了，对干部也是这样（省委领导干部）。 康生同志说：你们说人家（省委领导干部）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这一段就是和毛泽东思想对立的。 总理说：你们这一段没有按林副主席说的活学活用的办，你们把这个弯子转过来。（康生同志插话说：你们有个电报，体现了你们的思想，说给郑大联委平反是冒险主义。）只要你们承认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是会提高威信，不会降低威信。 王力同志说：你们要到二七公社主动做工作，不然的话就不好办。 陈伯达同志说：你们回去先议论一下，再听就听进去了，要议一议。 总理说：钟生益不是支左办公室主任吗？你们也可以让钟来，和一军同志一起讨论，

还可以找肖华、杨成武、关锋同志给你们帮一帮。康生同志说：你们糊涂，你们没看主席是怎么批的，你们说人家（郑大联委）是右派，主席批的即使是右派也来。王力同志说：关键是你们路线错了，要到二七公社那里去谈谈，他们说的不好听，这不要紧。杨成武同志说：你们干干净净承认路线错误就算了嘛！山东省军区有个报告，中央批了，批语有三条：一条是公开检讨比不公开检讨好，二条是承认路线错误比不承认路线错误好，三条是早检查比晚检查好，你们要好好学习这个批示。陈伯达同志说：不要怕丢面子，怕丢面子，反而面子丢得更多。杨成武同志说：二月叫你们来谈判，你们不来，别的地方都巴不得要来，你们不来，你们犯了路线错误，但不是刘邓路线，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犯了路线错误。王力同志插话说：犯了路线错误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总理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一军同志没有谈，可以找全军文革，可以找肖华、杨成武、关锋同志谈谈。何运洪同志说：向总理请示一个问题，家里没有什么人了，又很紧张，看钟生溢还来不来？总理说：既然这样就不来了。（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肖华杨成武关锋戚本禹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
 【时间：下午六时半，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戚本禹参加接见。河南省军区和驻开封的一军的首长出席】杨代总长说：总理指示，叫肖华、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听听你们上次谈了以后，还有些什么意见，一军还没有汇报，也谈一谈，总理就不参加了。你们不是讨论了几天？把你们讨论的情况谈一谈。何运洪向接见首长汇报讨论的情况。当谈到刘建勋在北京三结合后，河造总和八大总部喊打倒刘，我们有个错觉，以为群众喊不好制止，没有坚决提出不让他们喊。关锋同志插话说：听说八大总部过去名声不好。余嗣贵插话说，还不是那样。当何运洪汇报结束时，何运洪说：我们想，请能明确一下，如果我们支持错了，是八大总部支持错了，还是造总？我们好给家里说一说，通一通气，先作工作，这几天下面就造我们的反。关锋同志接着说：这个问题不是关键，关键问题是看我们领导同志怎么认识，能认识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就好了，山东就是这样。另外，我昨天看了份材料，不知确实不确实。据说，造总在这里谈判，想在郑州把二七公社搞垮，八大总部以为自己

名声不好，把希望寄托在造总，如果造总胜利了，他们也有希望。还说军区给他们发了枪。如果确实，这就是个问题。张树芝、余嗣贵说：民兵武器是按枪弹分开、分别保管的，我们没有给他们发过枪。接着，张树芝、余嗣贵发了言。关锋同志说：今天就谈到这里，我谈点意见，不一定对，我们说的不算数，这个问题是中央决定的，我讲的供同志们参考。军区的同志检查认识错误，把自己想不通的问题提出来，这是好的。现在是不是有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不是把二七公社的问题看重了，把河造总的问题看轻了，是不是一边听你们的话，一边不听话，甚至对你们很激烈，影响了你们对问题的考虑。二、是不是你们支持那个、不支持那个，是以他们对刘建勋的态度去区分的。如对郑大联委，你们的认识就是这样。刘建勋六二年以前搞借地是有错误，去年调北京，表现还不错。（戚本禹同志插话：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错，主席称赞过他。）你们对支持的或不支持的，是不是以对刘建勋的态度为转移，如果是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这样想下去就错了。（戚本禹插话：刘建勋在北京参加三结合了，你们还报要打倒刘，和中央对抗。）造总提出打倒刘，还要打倒刘的后台谢富治同志，这是不对的。要不要从这方面去想一想。提出这样两个问题来，供同志们考虑。

杨代总长：二七公社不能从纯不纯去考虑。主席说，天下没有清一色的东西。主席说坚定的左派只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至多百分之三十。你们从纯不纯这个框框去看问题就错了。他们打砸抢可能有些过头，但他们是年青人，他们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二个问题说，要看主流，不能看支流。对二七公社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要很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说二七公社有好处，但又说他不好。是不是感情上搞不过来。戚本禹同志说：错误肯定你们是有错误，但是怎么认识，你们可以找二七公社去谈一谈，多听他们几次。这次，我们想让军区自己认识错误，同各派协商解决，作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好典型。我接触过二七公社，他们还是讲道理的。何运洪说：我们是不是回去一趟，给家里通通气，给家里作作工作。肖、杨首长：你们这里还没有搞通，中央还没有定，就回去，回去怎么说？还是先在这里搞通。

杨代总长：你们要学山东。山东省军区、六十七军都转过来了。开始，大军区还转不过来。你们要学习山东的经验。那天，总理、康老讲了，你们犯了路线错误，和刘邓的不一样，你们要正确认识问题。当张树芝谈到我们的工作不

好作时，戚本禹同志插话：关键在你们两位（指张、何）。（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天津市防疫医疗队造反总部赴豫医疗队《从夏邑县看河南的“独立王国”》

我们天津赴豫医疗队，到河南省夏邑县支援流行病防治工作，一个多月的农村生活，我们亲身看到了何运洪等河南省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欺上瞒下，搞独立王国，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农村文化大革命，企图以农村包围城市，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在这里，我们愤怒控诉河运洪之流扼杀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和对我医疗队的迫害！三月三十日、三十一日，我们分别到达商邱市和夏邑县，只见满街贴着“打倒郑大联委”、“打倒八·二四”、“打倒刘建勋”、“打倒党言川”，从专区到县，从公社到生产队，都是这样的标语。另外，贴得最多的还有公安局逮人“通告”。不但是当地的，而且鹤壁、焦作、新乡、杨山、天津的都有。他们用这样大的精力翻印公安局逮人“通告”，而不去翻印中央文件和重要社论，就是企图用“坐牢”来恫吓群众、利用公安部门作为何运洪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对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这些革命造反派组织，何运洪发动全省围剿。我们在夏邑县李集公社，向老乡询问当地文化大革命情况，老乡只知道何运洪宣布这些革命组织是“反动的”，并不知道他们的所谓“反革命”活动，因为这是由何运洪自上而下灌输的，是愚民政策的结果。县里印发了大量的唐伟之流的传单和何运洪的讲话，散发到生产队，作为文化大革命学习材料。县里的御用工具“大联合”，编印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五项标准》要农村学生、卫生员学习，却闭口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桑[土固]公社，我们要求卫生员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大队书记不答应，却要学习他们的所谓“标准”。在欢迎医疗队座谈会上，夏邑县 X X 部长李 X X 说：“支持‘八二四’的大部分是学生、教师，他们百分之九十是不革命的”。四月六日，在医疗队工作会议上，他又说：“‘八二四’的九个头头逮了七个，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李集公社 X X 部长苗 X X 一提开封师院“八二四”，他就咬牙切齿地说：“他们就是知道造反！造反！”他们不谈中央指示，张口闭口都是何运洪怎样讲

的。夏邑县自去年十二月开展文化大革命。开始,群众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后来,自上而下地出现了一种谬论:“文化革命就是搞有文化的”!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教师、机关干部。一月份,开封师院“八二四”到该地煽革命风,点革命火后,以夏邑高中、初中学生、小学教师、水力局工人为主,成立了“1.17”的革命组织,以后吸收了贫下中农,发展到一万多人。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在夏邑县公安公社支持下,以公社、大队领导为主,成立了所谓“大联合”的御用工具。发展办法是生产队集体加入,而贫下中农有的还不知道,这难道不是欺骗群众吗?御用工具成立两天后,那些被群众罢了官的“四不清”干部又上台了!县里借“解放一大片”之名,行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实。五月八日,“大联合”召开广播会讲:“对待公社,小队干部的态度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给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真是反动透顶!他们在夜间用五十分钟从县到公社就夺了权,演出了“让权”的丑剧。二月底,开封师院“八二四”被打成“反革命”后,夏邑县公安公社便逮捕“1.17”骨干,开始了白色恐怖。他们的逻辑是:“八二四”是反革命组织,支持“八二四”的组织就是反革命组织!周围的几个县,凡支持“八二四”的组织也都被打成“反革命”,无数革命造反派战士受到迫害。“八二四”被逮捕入狱的,公布了十四个人,还有被秘密逮捕的,大约五十多人。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革命小将在狱中学习毛主席语录,看押的人说:“你们学了没用,学完也是‘反革命’!”这个县里,不让学生搞串联。农中三十多名学生,因为到首都参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回去后竟被打成“反革命”,进行了十八天批斗。这个县整群众,有所谓“消毒”:就是强迫“八二四”、“11.7”的人戴着孝帽扛着幡,站在高台上自己喊:“我是反革命”,有的人被捆着“消毒”,手都捆得发紫了。这种“消毒”甚至连十二岁的小学生也不放过,老乡们见了“消毒”的就哭,可是公安公社一小撮混蛋。却以“消毒”为乐,带着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小将,到各村巡回,有的“消毒”达二十五次之多。一个姓李的开封师院“八二四”的学生,因为“消毒”,得了精神分裂症;当地防疫站一干部的爱人因为“消毒”也得了精神病,至今未愈。李县公社李县大队民兵排长,因为支持“八二四”,参加了“11.7”,被斗多次。但公社干部李X X还带着人去斗他父亲,斗他爱人,并喊:“不老实就往嘴里抹屎!”夏

邑县是重灾区，毛主席党中央对当地贫下中农非常关心，发了救济粮款。但是，凡“八二四”“1. 17”的，他们都不发给，反对的可以多给；凡是“八二四”“1. 17”，的，还被扣发工资。一个民兵排长(贫农出身)，因是“1. 17”观点，就被扣了三百五十个工分，撤销了一切职务。全县去年开除了支持“8. 24”、“1. 17”的二百多人，在我们撤出时，又有陆续被开除的。由于这里的文化革命搞得不好，生产也就上不去，特别是“1. 17”成员因为在政治上受迫害，又不给救灾物资，所以被迫外流。李集公社后司集大队菜园小队一百八十人中，一夜就跑了八十人。这笔严重破坏生产的帐，要记在县社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要算在河南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算在土皇帝何运洪身上！更为严重的是，农民从一月份以来，就没见过报纸，听不到广播。县社那群混蛋，利用他们的权，扣压中央文件，迷惑群众、欺骗群众。由于他们封锁消息，这里有些农民对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半信半疑，有的还称之为“刘主席”[原文“刘”字倒着印]。四月十六日公社召开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誓师会。会前，他们演出“十哭‘八二四’”之类很庸俗、很反动的文艺节目。会上是公社XX部部长、公社秘书起来发言，他们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都不喊。四月中旬，公社斗争开封师院“8. 24”学生XXX，有一公社干部公开喊道：“中央还没有公开批判反动路线，还没打倒刘少奇，喊打倒刘少奇，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真是混帐透顶！充分暴露了他们死保刘邓路线的丑恶面目。对于这种反动统治，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怎么能等闲视之！我们一边搞卫生工作，一边向贫下中农揭露刘少奇的罪恶，搞调查研究，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四月十九日，我们公布了中央四月一日的五条指示(即中发117文件)触怒了专区、县、社的老爷们，公社组织人贴标语大骂：“谁替郑大联委、二七公社、‘8. 24’翻案，就砸烂谁的狗头！”并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公社团委书记崔XX在会上恶毒地骂医疗队是“冒牌驴”，是“反革命”。他们还布置特务活动：我们下村看病，有个叮哨：我们给卫生员讲课，受到监视，他们还威胁群众：“医疗队来了，就要报告我们，报告有赏！要是不报告，他们也不能把你们带到天津去！我还是掌权！”公社干部李XX又亲自召开群众会，在会上讲：“中央五条是伪造的，这是替郑大联委、二七公社、1. 17翻案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大联合”的骨干还到群众中去散布：

“中央五条是大毒草，是反革命传单！”这些情况我们向县、社 X X 部反映，他们对这样恶毒攻击中央文件的严重事件却置之不理。四月廿九日，商邱专区书记冉 X、县 X X 部长李 X X 和姓陈的副部长，亲自坐车到我队采施加压力。他们威胁说：“你们贴的传单很不好，要是闹到 X X 部门就不好办啦！你们还年青嘛！目前有一股反革命逆流，你们要站稳立场。”他们又给我们大讲“郑大联委”、“8. 24”所谓反革命活动，告诉我们以后宣传什么要和社 X X 部门联系，和他们一块贴。公社苗 X X 三次找我们谈话，说：“如果和我们观点一致，经费给个百八十元没问题！如果不改，今后一切都困难”。但是我们决不怕这些，我们对他们讲了，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于是，公社对我们监视更严了，偷听电话，扣信件、拆信，生活上也刁难我们，使出不给灯油、不给留饭，不给水等可笑可卑的小动作。他们还煽动小学生骂我们，连五岁的小孩都喊：“打倒冒牌驴！”但是，广大贫下中农是支持我们的。在白色恐怖之下，贫下中农冒着危险帮助我们甩掉叮哨，掩护我们了解情况，他们说反对医疗队的是公社个别人，贫下中农是支持你们的，有个贫农老大娘说：“你们要是工作队就好了，我要和你们好好说说。”贫下中农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河南省的资产阶级专政总有一天要垮台的。我们到河南工作原订三个月的时间，但只工作了一个半月。五月十七日，河南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河南卫生厅突然通知外地医疗队全部撤出。医疗队撤出后，不几天他们就大打出手，许多阶级弟兄身受重伤，无医无药。我们认为把医疗队突然全部撤出是有阴谋的。医疗队撤出前夜，公社团委书记崔 X X 与“大联合”策划一夜，第二天上午煽动群众贴大字报诬蔑我们替反革命翻案，强迫我们交出印发的传单。下午，他们又煽动六百多人，把我们宿舍围得水泄不通，踢门砸窗，高喊“打倒医疗队！”“打倒冒牌驴！”我们全体队员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被围攻整整十一小时。这次围攻是公社蓄谋已久的，是 X X 部支持的，他们企图用围攻医疗队来威胁群众，达到他们压制革命的目的。在被围攻时，我们向 X X 部反映情况，一个自称李副部长的说：“X X 部不负责，当地群众负责。”这次围攻又一次暴露了何运洪黑手伸进农村，扼杀农村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而围攻对我们革命造反派只不过是一次锻炼，一次考验，没有什么了不起！五月二十一日我们离郑州返津，恰遇 X 区给郑大联委“平反”，老保们阻扰二七公社战士进入会场，大打

出手。我们还亲眼见到西安交大几个同学被打昏，惨不忍睹。我们的许多阶级弟兄被暴徒们迫害，有的英勇牺牲。在这里，我们向死难的二七战士表示沉痛地哀悼。同时，我们以一个革命卫生工作者的身份，向何运洪提出强烈抗议，必须立即制止武斗，并必须保证河南省造反派受伤战士的合理医疗！何运洪你要记住，革命战友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我们要求中央同意我们医疗队打回河南去，为河南真正的造反派服务。毛主席说：“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英勇的二七战士们，奋勇战斗吧，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胜利必将属于英勇的二七公社！ 打倒何运洪！解放全河南！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河南二七公社《二七战报》（地址：北航五楼 309）1967 年 6 月 10 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时间：六月十三日晚十点三十分至十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出席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出席代表：“河南二七”、“河造总”双方代表共 37 人和“开封八·二四”等。省委：纪登奎、王庭栋、耿其昌、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军区：张树芝、何运洪、余嗣贵、李善亭等。8172 部队（一军）：徐文礼、李××二人。列席：首都红代会六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六人，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赴豫战斗队 1 人。〕

六月十三日晚十点二十分，首长进入会场，代表们欢呼，学习主席语录，二七公社代表尚未进完，就被唐伟和河造总一伙拦在大会堂门外，另外还有纪登奎和红代会代表均被拦在门外。

总理：今天还是来听听你们的，各地方代表都来了吗？上次郑州的讲了。

康老：还有一件事，先给大家说一下，下面还有一个节目呢，今天的会准备开两个小时。

总理：听听开封的。

造总：报告总理，我们上次没有讲，这次我们要求首先发言。

二七：讲了，讲了……

总理：噢……噢……（对造总）你们都来了吗？上次他们（指上次造总参加会议的非正式代表）都替你们讲了……那你们就谈吧，谈短些。

（造总王宝生站起来，欲发言）

总理：你叫什么名字？那儿的？

王：郑工造总，叫王宝生。

（总理、康老查对名单）

王：我今天汇报三个问题。（王宝生讲了所谓“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为首的河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事实”和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唆使其御用工具镇压文化革命等三个问题。他讲了十分钟左右时，张保怀（二七）：报告周总理，我们的代表还没有到齐，在外边，他们不让进来。）

总理：谁不叫进来？

二七：河造总不叫进来，

造总：他们的代表够了。

二七：还有纪登奎几个代表，他们不让进。

总理：纪登奎上次就是代表嘛，怎么不让进来！

康老：（对造总很生气地）你们为什么不守纪律？来中央要守纪律。在中央面前还能这样吗？上一次你们就没有守纪律。要有科学性，组织性，还有纪律性。你们这样做，越搞越没有道理！这种现象是不允许的。在这儿说一下，（对双方代表）到了北京，你们都不守纪律，二七抢人家的东西——这个我不知道。

二七插话：不是我们抢的！

王力同志笑着对总理说：不是二七是北航。

（总理摆手示意让到外边叫纪登奎和二七公社的代表，一位警卫员俯首向王力汇报。）

王力：一个叫唐伟的，不叫二七代表进来。

总理：唐伟有什么权利！这是中央开会，唐伟是清华的嘛，他们有什么权利不让进来！（纪登奎和二七代表入场已 11 点左右。）

二七：我们等了两个小时，他们不让进来。

（总理、康老等首长很生气。王宝生继续发言，讲了几分钟后……）

二七：报告总理，受到阻拦，直到现在，红代会的代表还没能进来。

总理：谁不让进来？

二七：河造总把着大门，不让进来。

王力：（对总理）他们强调对等。

总理：什么对等，红代会么，北京的红代会么！（河造总起哄）这个事回去再调查，不会是这样的。

二七：就是河造总把着大门不让进来。

警卫员：我讲了许多道理，还是不让进。

总理：（生气）胡闹！把中央的大门！

康老：（摘掉眼镜，生气）胡闹！你们还没有中央？把中央的门，这叫闹革命吗？

（伯达同志气愤地站起来到门口去叫红代会同学。河造总的代表慌慌张张说：“赶快出去个人看看，坚决按中央首长指示办事。”立即派人去。）

王力：本来就没有道理，你们这个要求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代表么，谁多少，按中央决定办。

总理：警卫员出去看看！

（门口，伯达同志出来，唐伟和河造总等在门口闹事的人静下来，伯达同志让点了红代会的名字，红代会代表进会场。唐伟等人失望地坐在门口。）

（会场上，王宝生继续发言，首长们有的在看材料，有的在批阅文件，均未对发言做记录。当王讲到二七公社的宣言时，说他们如何揭开河南省委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时）

总理：抽象的太多啦，你讲具体的好不好！

（王攻击解放军赴豫调查团时）

军事院校代表：这是造谣！

（王继续讲）

总理：你讲快点吧，你一个人已经讲了一个小时啦。

（王攻击郑大联委。当讲到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时，省委总部周洪运要站起来发言）

总理：哎，哎，你们还讲？

周：很短，主要是刘建勋的，最近揭发的。

总理：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

周：周洪运，干事。

康老：什么干事？

周：宣传部干事。

康老：宣传部，部长是谁呀？

周：宋玉玺。（他继续讲。首长们又在看材料，批文件。中途造总一个代表又想插话）

总理：（摇头示意不让讲）你们这样讲还有没有个完，两小时都被你们占了，你们不说话了，二七还要讲，还有开封吗！（周洪运只管讲，当讲到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时）你们说来说去，还是那几件事，你们交的材料我们都看过了，你们说别的。

周：对，对。（继续讲。讲到刘建勋在河南五年零三个月的三反言行时。）

康老：你们不要在那儿念文章，有具体事可以讲点，材料我们这儿都有。

周：都是新的。（总理笑了）

康老：你们不是印一本一本给我们了嘛！

总理：你们讲的那些，我们都知道，不要再大做文章。你们有自由，你们可以写成书嘛！那些东西我早晓得了！

周：这是新的。

（郑大红卫兵战斗师要求发言）

总理：不行，听我们安排，你们已经占了一个小时零一刻了。

战斗师：我们不是造总的呀！我们是战斗师的呀！我们要求发言！

总理：（指周洪运）时间都叫他给占去了，两面都是攻击郑大联委的，他们还要回答嘛！

（周洪运继续讲。当提到赵文甫、文敏生时）

总理：现实的你不说，文敏生、赵文甫都在这里嘛！你这些事情材料交出来嘛！

（河造总方面的代表抢着发言）

康老：听中央安排好啦！

（周说：快了，快了。周继续讲……）

（总理、康生等首长看河造总转抄的郑大战斗师编造的“北京谈判消息”的传单，均笑了。）

总理：我提一件事，（对河造总）你们搞了个北京谈判消息报导，你们知道不知道？郑大的谈判消息，这是哪个搞的？（非常生气地说）简直是造谣！莫名其妙！你们把我和康老分开，说康老见你们，我见他们，这简直是造谣！大家都在这儿嘛！

康老：（非常生气）请你们考虑，中央叫你们来汇报河南情况！是不是谈判，你们以为你们一个党，我们一个党，你们一个国家，我们一个党，你们那个党，那个国家和我们谈判了。

（河造总抢着发言：“这不是我们的”……）如果你们河造总说不是你们的，我们要彻底批判，追查什么人搞的。反革命。（康老双手篡着拳头，激动地）我们是和你们谈判，两党两国，你们赞成不赞成？（河造总代表惊慌万状，不知所措。少数人说，不赞成！）反对不反对？（造总答：反对。）反对就要有表示，必须彻底批判。（河造总代表楞了一会站起来要赖掉：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

总理：（拿着那张传单）你们说不是你们的，那你们给我们写的东西可以作证明，你们是跟我们谈判的。你们中医学院给我们写的东西，下边就是谈判代表团（指落款）。

康老：你们是什么意思？你们把住门，把我们包围住，跟我们谈判。

王力：你们说谈判，我们派到河南的记者，你们有什么资格和他们谈判？还要唐伟来。

总理：你们的意思就不是来汇报解决问题的，是来讨价还价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反毛泽东思想，你们思想就是不纯！你们大概谈判不好就要回去，象内蒙那样给我们造成一种形势，强迫中央承认。你们要想一想，你们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你做对了，我们支持；错了，中央什么时候也不会支持的，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六月十四日零点十分，谢副总理和戚本禹来到会场，谢副总理下车后，坐在大会堂门口的唐伟一伙又一哄而起，围上谢副总理，无理取闹，硬要进入会场。谢副总理说：“我不了解情况，我不管！”就和戚本禹同志进入大

会堂，唐伟一伙象泄了气的皮球，一个个地坐了下来。在以后时间内唐伟一伙不断有人硬往门口冲，均被警卫坚决阻止。）

（二七代表吕以尧站起来要求发言）

总理：你叫什么名字？

吕：吕以尧。

（吕以尧以五月廿九日第一次汇报后发生的国棉六厂“五卅”惨案等控诉何运洪等拒不执行周总理指示，继续制造流血事件，迫害革命造反派的罪行。当讲到六厂事件时，总理、伯达、康生、王力等十分注意听，并长时间作记录。）

总理：你们工人赤卫队有多少人？

工人赤卫队代表：原来 3000 多人，后来被镇压到 1000 多人，现在在厂的有 400 余人。

总理：全厂多少人？

六厂工人赤卫队代表：5000 多人。

（吕以尧继续讲六厂事件。当讲到六厂工人赤卫队大楼被烧，工人被打的惨况时，首长们显得心情十分沉重。总理看二七公社交上的有关照片时，气得皱着眉头，手直发抖。当吕以尧讲到 12 岁的小孩眼睛被铁军用弹子打坏时，二七代表把那颗钢珠交给总理）

总理：谁参加的？

吕：有郑州铁军、河造总，最多的时候达十万人。围攻大楼时，他们用推土机、吊车、消防车等机械，最后他们把楼烧了！

总理：谁打的？是工人多还是农民多？

吕：工人多。

总理：工人阶级都是阶级兄弟嘛，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打得这样惨呢？

（吕又讲了一个事实经过）

总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打？你别光讲现象不讲实质嘛！

吕：这是何运洪一手策划，是何运洪一手搞的。

总理：噢，是这样……

吕：总理指示何运洪他们徒手隔离，制止武斗，（总理点头）可是不执行总理指示，何运洪对抗总理指示。（吕又继续揭发了何运洪策划与挑起武斗的事实）

六厂赤卫队代表：造谣！没有解放军，解放军根本没有指挥，是军区的××来制止武斗的，被他们抓起来了。

康老：（摆手示意，让赤卫队代表坐下）叫他（指吕）说完嘛！

红代会代表：（拿出传单、汽车牌照、照片）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你们的车牌照，这就是你们的照片！

六厂工人赤卫队代表：我是现场受害者，我要控诉，我把六厂工人赤卫队受害的情况讲一下。

（略）

（六厂赤卫队代表抢着发言，诬蔑说他们之所以围攻工人赤卫队是因为工人赤卫队打伤了他们 400 多人。……）

总理：你们有多少人？

六厂赤卫队代表：有 3000 多人。

总理：你们人多，3000 多对 1000 多，怎么能打伤你们 400 多个男的？

（六厂赤卫队又诬蔑说二七公社廿六号游行时都是拿着铁棍，戴着安全帽打他们）

二七：造谣！我们根本没有拿铁棍，我们只拿语录本！

总理：（对六厂赤卫队代表）叫你们谈六厂的，你怎么又回到 26 日去谈过去的事情，叫你们谈谈你们为什么包围他们嘛！都是阶级兄弟，怎么打起来了！

赤卫队代表：（张口结舌地）是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起的。8202 部队师长彭辉是到现场制止武斗的，可是在离现场二里多远的地方就被他们逮住了，并且审问……

刘生：报告总理，我有个新问题，我是郑州支左办公室，六厂情况我最清楚。（刘是河南支左办公室唯一支持造反派的人，后被调走。现在北京。——抄者注）

王力：（丢开手里拿的材料）叫他说嘛！叫支左办公室的说！

（刘生站起来）

总理：你姓啥，叫什么名字？

刘生：我姓刘，叫生，生产的生。

总理：（用铅笔在代表名字的下面写下了刘生的名字）你什么时候来的？

刘生：今天下午。

总理：你们和他们住在一块吗（指二七）？

刘生：对！（刘生以其亲身体会揭发了何运洪支保不支左的事实及他自己思想认识转变的过程，他说他原来是绝对相信、坚持和宣传何运洪的意见和决定的，但通过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命令、《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等报纸杂志的有关社论，以及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青海、四川等地的问题的决定，对照河南的情况，越来越觉得何运洪的作法是错误的，他又通过周密而深入地调查，认为二七公社是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他逐渐倾向支持二七公社了，但正因为这样，他于五月被调开了支左办公室。他曾给中央文革写过两封信，反映河南军区在支左中的几个实际问题，但是，均被扣。他在发言中还强调指出，如果说何运洪在前段的错误还可以说是认识问题的话，那么，在中央军委十条下达以后，依然坚决不改，便是严重的立场问题了。首长都很认真地听取了刘生的汇报，总理、康老都频频点头，王力同志不时发笑。当刘生同志谈到何运洪与八大老保总部是如何难分难舍时，王力、戚本禹都笑了。特别最后，讲到何运洪的性质分析认识时，康老点了点头。）

总理：你把这些事情整理一下材料给我们。

刘生：是。

（河造总的一个代表又站起来抢着发言。）（二七发言）

吕：我还没有讲完！

总理：好，你说吧，简短些。多长时间？

吕：时间很短。

总理：十分钟行不行？（吕：行。）好，你说吧。

吕以尧：最近在郑州、开封、洛阳等地，出现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中央文革、炮打谢副总理的反革命逆流，这类传单很多，仅郑工造总廿八、九两日就出了 26 种。

（河造总起哄，说造谣，二七公社代表陆续将有关传单、照片递给王力。首长们在传阅。）

郑工造总代表：我们一直认为谢副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官。

（总理、康老看着谢副总理笑。谢副总理摇着头、摆着手，笑着说：“还是谢富治，还是谢富治。”）

吕：正当中央着手解决河南问题的时候，他们这样做其目的要给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对河南问题的态度。（念洛阳红师 6 月 4 日贴的大标语“打倒刘建勋，揪出谢富治，炮轰中央文革，江青靠边站！”总理和首长听了以后很惊讶！吕又念了郑大战斗师和郑工造总的两张炮打谢富治副总理的传单。）

总理：这些内容你们都不要说了，你们有材料报给我们嘛！

吕：（再次强调）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给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对河南问题的态度，为进一步制造反革命暴乱造舆论，他们已经把枪发给老保了，他们的家属已经转移了，他们准备中央一旦表态，支持二七公社以后，和我们干，干不过我们，就拉到山里去。

总理：一军的谁来了？

（一军的两个代表站起来）陈红兵的问题，他们提出来要让放。

（八·二四代表插话：我们还有许多工人没有放。）

先解决陈红兵问题，你们（一军）说他写有反动标语……

（一军的代表：材料已经报上去了。）

我们要叫记者联络站跟你们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写了反动标语。

八·二四代表：开封赵静生是支左的主要负责人，但也没有来，而叫徐文礼来了，这里面有文章，我们要求让赵静生来。

（总理把赵静生的名字记了下来。）

总理：休会。

造总代表：总理，我们说两句……

（总理没理，首长站起来准备离开会场，河造总纠缠不休。）

（二七公社代表喊口号：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

打倒何运洪！

打倒河运洪是最大的拥军！

砸烂河南独立王国！

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第二次汇报结束。）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时间：1967年6月14日晚9点40分至凌晨2点40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戚本禹。出席代表：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造总、以及新乡、洛阳、焦作、鹤壁双方代表。省委干部：纪登奎、耿其昌、王庭栋、纪的秘书、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军区：何运洪、张树芝、余嗣贵、李善亭。〕

开始“二七公社”高呼口号（略），对方也呼。

总理：你们的口号喊清楚点，不要把自己的口号也加在里边，不然我们不举手。这是我们戚本禹这个青年人提的。……（大笑）

康老：我讲一点，在中央开会时，用不着读语录，用不着呼口号。我再讲一遍（又重复一遍），另外，不管你们那一边，千万要遵守纪律，要摆事实，讲道理，要讲慢点，讲清楚。

总理：你们年纪和我差一大截，你们说那么快，我怎么跟不上。（哄然大笑）我们把各地都请来了，有开封的、有新乡的、有焦作的、鹤壁的，信阳的、洛阳的、偃师的，兰考的也来了。郑州的听得多了，这次听听外地的。

郑大战斗师：我们郑大战斗师还没发言。

总理：等一下（造总代表不由分说起来发言）

康老：（发火）等一下嘛，我再三地讲你们要守纪律，听总理讲嘛！

总理：开封八·二四讲。

八·二四：我，李福来。

总理：查名单（戚本禹插话说是李福来）

总理：好！李福来讲，不要太长，最多20多分钟。

八·二四：何运洪和赵静生都是一个腔调，要不把八月的造反派打成御用工具就糟了（对方跳起来说造谣）

（总理、康老阻止对方发言。）

康老：你们这成习惯了，一触即发这是要犯错误的，我给你们介绍经验，一触即跳必定要犯错误。

（李福来继续讲）

总理：什么时候定你们反动组织？谁定的？

（李回答了时间，李谈到军队宣传车喊“贺龙万岁”。）

戚本禹：谁喊的？

八·二四：8172 的宣传车。

戚：有这事吗？

八·二四：不仅一次，16、17、18 连续多次（李举出时间地点并举出一车号是午 4—16—94）

总理：你们把主席象砸烂了吗？

八·二四：纯粹造谣。

戚：你们搞了个四条吗？

（李作了详细的说明，并拿出笔记本上的原始材料说明是断章取义，政治陷害。）

戚：（满意地点了头，并接过笔记本仔细阅后面带微笑地转交给陈伯达同志。）

（李谈二·八事件、二·一一事件、二·一八流血事件打死二人时，戚和总理在一块研究记录）

康老：打死叫什么名字？

八·二四（黄泽生）：杜聚明，化建公司木工，35 岁。

康生：哪里人？

八·二四：开封市人。

康老：女的？

八·二四：孙爱英、开封青年农场女工，被赤卫队掐死的。

总理：那女的当时送家里了？

八·二四：是不是送家里的不清楚。

总理：等了几天？

八·二四：八天。

总理：怎么死的？

八·二四（黄泽生）：掐死的。

总理、戚本禹：谁运走的？

八·二四（黄）：八·二四同学。

戚：谁开的枪？

八·二四（李）：一驻军战士。

戚：弹头？

八·二四（李）：出来了。

戚：没找到？

八·二四：没有。当时队伍打乱了，有医生诊断，有伤口分寸。

戚：材料带来了？

八·二四：带来了，下边可交首长。

总理：（仔细听李讲。）

八·二四：八·二四被捕 615 人，占八·二四的 34%。

康老：打死在二月十九号？

八·二四：二月十八日晚上。

戚：八·二四多少人？

八·二四：1600 多人。被捕 600 多人。

（作记录）

戚：被捕 600 多人。

总理：劳动改造多少？

八·二四：57 人。

总理：放了没有？

八·二四：放了。

戚：宣传车是你们砸的吗？有这事吗？

八·二四：没有。

戚：抢了枪了吗？

八·二四：没有。

总理：六号门有枪吗？

八·二四（黄泽生）：公安公社逮捕六号门负责人秦俭时，群众气愤地把公安公社枪下了，当时交给电厂武装部。

八·二四（李）：从 2 月 8 日至 3 月中旬开封捕 4 千人。2 月 18 日抓一千多人。

总理：师院抓 2000 人？

八·二四：600 多人。

总理：你讲快点，你讲的差不多了。你别把今晚的时间都讲了，要集中点，有材料把材料交上来。我们记者站的同志明天还以座谈的形式找各地谈，把材料交上来，不然每个地方都要听，时间不允许。四川就是这样。

八·二四：好，快点。摧垮的保守组织复活，以开封师院为例。

康老：他们现在成造反派了（李讲到井冈山时），噢，你对井冈山有什么看法？

八·二四：地地道道的保皇派。（这时开封师院井冈山跳起来大叫：造谣。）

总理：你是开封师院的？（井冈山：是）

总理：井冈山的？（井冈山：是）

总理：哈哈，对头啊！（井冈山起来发言）

康老：你讲快些，人家还要讲嘛！（……）

总理：兰考有人来吗？（有，总理，我要求发言）。

总理：你等一等，还让他讲。（井冈山又讲，当他否认自己是保皇派时）

总理：你们杀出来是今年了吧？（井冈山：不是！）（八·二四欲反驳）

总理：（对八·二四）你不要接人家的话，你把东西拿出来嘛！

（八·二四交给总理一份井冈山成立声明）

总理：（对井冈山）你们今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声明，（把声明举起来一股劲地摇）承认井冈山兵团前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井冈山：当时他们压我们很厉害，把我们压垮了。

总理：压是一回事，你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一回事，你讲一下。

井冈山：那……那时……（吞吞吐吐地）

总理：你们自己的事嘛。

井冈山：那是几个人起草的，没通过……

总理：起草没关系，怎么能油印呢？这下边落款还是你们兵团的名字嘛！

（井冈山吞吞吐吐，狼狈不堪，又讲八·二四的“罪状”，拿出许多照片……）

康老：你要扼要点，这里材料比你还多。（井冈山又讲了一会）

总理：你等一下，我问一件事，北航×××来了吗？

红代会：没有。

总理：你们来几个？

红代会：六个。

总理：都是哪个学校的？

红代会：地质二人，农机二人，石油一人，北大一人。

总理：通知另一方面，清华、北航、北工有人支持造总的，也让他们进来。

（红代会答：支持是少数。）不管多数少数，有支持的让他们进来。

红代会：是这样的，他们每个总部，比如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总部都是支持二七的。

支持造总的只是个别人，不能代表总部的观点，没有经过红代会的批准。

总理：你们是红代会批准的。

红代会：我们是红代会特派河南战斗队，是红代会批准的。

总理：噢，你们是正式批准的，（造总递了条子要求让他们进来）这个事交给谢副总理。（总理将条子递给谢副总理，谢看后没吭声。）

（井冈山又讲，总理和康老等首长在看材料）

（井冈山讲到纪登奎、开封第一书记徐学龙收买八·二四，给了 70 万元）

总理：（不满地问）谁给的钱？什么钱？有什么证据？你要快一点，离题太远了！（走出去了。）

康老：听我讲，我们现在要听一下洛阳的情况，因为现在洛阳情况很严重。请洛阳拖拉机学校的常春波同志讲。

（洛阳的常春波讲了，讲得很慢、很生，没有感情，主要讲洛阳的武斗的情况）（二七群众很生气；老保得逞，跳起来说什么不会造谣，我们讲。）

康老：（仍然非常耐心地听他讲，仔细地询问）你讲的是军区还是军分区？

常：是何运洪搞的……（对方嘲笑）

（康老点了点头）（当常谈到洛阳武斗影响了生产）

康老：（惊讶地问）拖拉机厂停工了？！

（老保门不承认是他们挑起武斗，乱吵吵）你们八一六是什么组织？包括不包括工人？工厂是什么组织？（常作了回答。）

红代会：（尤红）：拖拉机厂筹委会去围攻的。

康老：现在还围着吗。（常答：攻破了！）

（公安厅红色公安几次要求发言，想在首长面前无情地揭露公安公社黑幕）

康老：等一下，围攻哪里？（常答：机务段。）我没听清，噢，机务段……

公安厅的张××：发生在六六通令后。

康老：（点头）张捷是什么人：（常答：洛阳市武装部长，参加围攻）

（老保：造谣！）

康老：（对老保）我说了，你认为他是造谣，那不是对你有利吗？逮捕了二百多人放了没有？有没有再捕人？

张××：洛阳捕人了（老保：造谣。）

（张××同志要求揭发公安厅内幕，老保急得跳了起来，攻击张××是投机倒把分子。这时红代会同志要求发言，场面较乱。）

康老：慢慢地让他（指常）讲吗。你是红代会的，等一等，你有材料送上来好了。

常：有 1000 多人跑出来到八机部住着，还有的跑到其他地方。

康老：有没有捕人？（常：没有。）

常：八一六大楼被围，上面有 300 多人。

尤红：我要发言。（老保跳起来指着尤红：你尤红是专门挑起挑斗的！）

康老：你哪一位？（老保：我洛阳的。）洛阳的正在讲吗！（老保：我们有材料补充。）你有材料交上来好了！（常继续讲）

康老：火车停了？

常：6月9日全部停运，工人不敢上班，被毒打被抓走！

康老：扼要点！（常：在洛阳出现了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妖风，写出了许多反动标语。）（老保：我们没有，是你搞的，欺骗中央。）

尤红：有！是你们干的！（老保反驳，要压制尤红发言，攻击首都红代会战友挑起武斗。）

康老：他们（尤红等）是中央请来的，发言不发言中央有权力，不能由你们决定（对老保）（后又对尤红）你是红代会农机学院的吗？人家点了名啦！你有权利反驳，你把材料整一下交上来，交给戚本禹同志，这关系到你们红代会的声誉。（说着和戚本禹、周总理同时大笑……）

康老：（对老保）你讲！不要激动，造反有理，一激动就没有理啦！

戚：那是观点不同？（老保讲……）

康老：我想现在请洛阳的同志说明一点，现在还有没有武斗？有武斗如何制止？这是我们当前的迫切任务。洛阳是重工业城市，（在洛阳武斗）对国家不利。（老保还要继续讲）

谢：停下来！

戚：停下来！

（常又讲。老保：造谣！）

康老：你们让人家讲嘛，何必左一个造谣右一个造谣。

刘生：制止武斗我有办法，只要解放军站在公正的立场就能制止。

康老：对！军队应该徒手解围制止武斗。双方都要制止武斗。破坏了国家财产，损坏了身体，不好！（老保又讲）我谈一句，有个叫刘峰的是哪一位？（河造总的捣乱分子站了起来（康老发火了）你递了两个条子，说有要事告诉我们，你有什么事怎么不写出来呢？这事并没有什么好保密的！请新乡的讲吧！新乡已发出呼吁了，你（老保）到过新乡吗？（没有，）你没有到过新乡，你讲啥！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有材料你写出来吧。

（新乡八一八李德森讲，最近八一八被围困、断粮断炊的情况，康老很关切地询问了情况。接着新乡李玉坤讲，当讲到他是参加了老红卫兵时）

康老：你是老红卫兵，什么时候成立的？（李回答）噢，你老红卫兵是八月二十四日成立的，八一八红卫兵是9月1日成立的，相差一个星期就老了。在北京老红卫兵人家就从另外地方想……（说着笑了）

伯达：（对李玉坤）时间很宝贵。

康老：新乡最近逮人没有？刚才那个同学讲八号捕人了……粮食站封锁了没有？老保李玉坤讲他们也被断粮的情况欺骗中央首长，李玉坤油头滑面地讲个不停）。

康老：你把材料交过来！

伯达：你说的多了把主要问题都冲淡了。（新乡师院八一八要求辟谣。）

康、陈：你们可以辟谣。（新乡八一八发言，李玉坤立即起来吵吵。）

总理：焦作的谈吧！（焦作矿院八一八刘文学讲，焦作老保不讲道理的抢着发言，刘文学一看是个四不清干部，气愤地说：你没有资格发言）

康老：这儿谁都可以谈。（老保讲了下去，当他骂耿其昌老混蛋时）

康老：在这儿不要骂人，摆事实讲道理，在中央开会不要骂人！（面带怒色）你是不是抢了章子（指假夺权）的？你要讲扼要点，你从开始讲，讲一天也讲不完！焦作矿院八一八讲，讲了大方向，很有声色，时间到了……

戚：今天就停下来。

总理：今天谈到这儿，以后谈，以后来谈。郑大战斗师不属于两派，可以写材料。下一次十大总部各总部来两个人。

康老：尤红把材料送上来。

总理：洛阳打群架很厉害，不符合六条通令。要百分之百地执行六六通令，军分区无论如何要劝阻，派不带武装的。军区除一军负责的地方要多负责任，把武斗劝阻。生产下降的尤其是洛阳，还有煤矿，平顶山，焦作，还有铁路全部军管。有权制止武斗，我刚才……去广西那边，一国际列车 94 个小时停在柳州，复杂了。把农民调到车站打司机，司机受伤，把车开到柳州停下来。要交打人凶手，不交出打人凶手不开车，这多不好！运往越南前线的，国际影响也不好。徐州也搞得不好。郑州是关键地方，不管怎样打架，不要打到铁路上来，一切为运输服务……你们双方打电话，不要讲下去，算了。

康老：总是讲过去，这怎么行呢？

总理：军管会，大军区管，武汉军区管，不得支持一方打击一方。军管会是站在中央的立场上……散会。（双方吵，总理很生气。）（大家呼口号！）

（二七战士高呼，毛主席万岁！第三次汇报结束。）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郑大联委反刘邓兵团《撕开河南“独立王国”的黑幕》

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摘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伸向河南的黑爪牙文敏生、何运洪、赵文甫、杨蔚屏等，多年来，大肆贩卖修正主义货色，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文、何、赵、杨又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血腥镇压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血腥镇压全国赴豫无产阶级革命派，妄图把河南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河南“独立王国”的班底

文敏生：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陶铸的忠实爪牙。四年内，被陶连提三级。河南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地政策，就是他以“党性保证”提出，陶铸同意后由他贯彻下去的。毛主席提出批评后，他仍然负隅顽抗，并对急于改正错误的刘建勋同志说：“何必那样紧张。”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对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并指使召开高干子弟会，控制群众组织。他还追随陶铸、王任重发下十七、八道黑指示，背着党中央，强令县以下中学停止运动；他还领取叛徒金明（中南局书记）的黑命令，强制全省地直机关停止炮轰以他为首的黑司令部。

何运洪：河南省委常委，原中南保卫部长，三反分子罗瑞卿的亲信。长期以来，和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互相勾结，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今年二月份以来，与省委内文、赵、杨一小撮再次勾结起来，刮起了二月复辟黑风，造成了三月的白色恐怖，挑起了四月的频繁武斗，制造了五月的血腥屠杀，并且一再对抗中央指示，竭力煽起反革命暴乱，妄图篡党、篡军、篡政，把河南搞成“独立王国”。

赵文甫：河南省委书记，副省长，是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三反分子。多年来，他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搞假材料，欺骗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结党营私，招降纳叛，为牛鬼蛇神大开绿灯；残酷实行阶级报复，阴谋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元月份以来，又与何运洪勾结起来，上揪革命领导干部，下扫革命小将，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

杨蔚屏：河南省委书记。一九五九年因陷害潘复生同志被陶铸、吴芝圃之流提升一级。一九六〇年，他听到信阳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后，置之不理，却坐上轿车、带上剧团到鸡公山享乐。在文化

大革命中，他镇压学生运动，是刘、邓、陶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包庇他的实行阶级报复的儿子、杀人凶手杨继凯，并将其母(地主婆)接到省委，逃避监督改造。

大搞“独立王国” 刘、邓、陶的黑爪牙文敏生、何运洪、赵文甫、杨蔚屏，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对抗中央，在河南大搞“独立王国”，罪恶累累，必须彻底清算！现将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恶初步揭露如下： 一、破坏赴京汇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周总理指示何运洪召集双方代表(以二七公社为一方，“河造总”为另一方)赴京汇报。命令下达后，文、何、赵、杨立即疯狂镇压革命派，把我二七公社一方代表抓起来，并大肆造谣，颠倒黑白，把破坏汇报的罪责强加在我二七公社头上。现已查明，周总理指示下达后四天，文、何、赵、杨集团的杨X X就说：“我们根本就不跟他们谈，谈判个屁！河南的问题我们自己就能解决。看吧，到不了一个礼拜他们就完了！”话音刚落，他们的御用工具公安公社立即行动，开封市仅一天就逮捕了三千多人；郑州仅印染厂八一红卫兵在一天内就被抓走二百多人。 四月廿六日，周总理第二次电令双方赴京汇报。文、何、赵、杨又制造重重障碍，妄图再次践踏周总理指示。其一，继续监禁我方代表。经过两千余名二七战士和全国革命派战友英勇斗争，他们才被迫把我方代表释放出狱。其二，于四月二十八日一天之内，在郑州砸了河医东方红等十四个革命组织，血洗了新乡师院八·一八，紧跟着制造了“五四”“五五”“五六”“五·二六”等一系列的大屠杀，妄图在赴京汇报前把革命派一口吞掉。其三，他们用飞机把自己的代表文、何、杨等送到北京；相反，千方百计阻挠我方代表赴京，封锁经济，封锁交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方代表乘煤车来京，有的被他们发现后拉下车进行毒打。对于我方革命干部代表纪登奎、耿其昌等同志则严密看管起来。后来，纪、耿等由二七公社和外地战友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层层岗哨才抢救出来；耿还被迫绕道太原、由山西革命委员会帮助来京。王庭栋是周总理点名才要来的。 这时，他们又要花招，一半以上的代表返郑，拒不出席周总理于五月廿九日召开的会议，要挟中央把汇报地点改到郑州。总理召集一次汇报，他们竟抗拒了三四个月，而要总理三令五申。文、何、赵、杨究竟是哪个司令部的人，服从谁的命令，又对抗谁的命令，难道不是很清楚了吗？！ 二、对抗、封锁中央指示 文、何、赵、杨只公布了中央军委八条

命令，对军委十条命令，中央关于处理青海、内蒙、安徽、四川问题的决定等都拒不公布，拒不执行，甚至有人诬蔑为大毒草。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否！在文、何、赵、杨看来，中央这些命令和决定太不合他们的口味了，所以不能接受。文、何、赵、杨还对抗中央关于不得把矛头指向群众的指示。在他们操纵的《河南日报》、《郑州晚报》头版上大登“打退郑大革联的翻案风”，特别是删掉人民日报四月二十日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关于彭真旧北京市委是水泼不进，针捅不进的“独立王国”的那段重要报道。这难道又是偶然的吗？否！单从文、何、赵、杨集团的通讯处长亲赴电讯局，指示公安公社成立六人监信小组，扣压二七战士重要电报、电话和信件，封锁向中央的汇报材料之事，就不难看出文、何、赵、杨搞的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独立王国”。

三、伪造中央文件三月六日，何运洪背着中央，擅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之后，拼命宣传他们的决定是“上呈下达”的，何运洪还亲自说过：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他的行动“不是冒然的”“是有根据的”等等，力图制造“中央批准”的假象。当四月六日军委十条命令下来后，他一面封锁，一面又重申郑大联委非法，不仅如此，文、何、赵、杨竟假借中央之名，伪造了一个所谓中央关于河南问题的“十二条”。中央发现后，他们拒不辟谣，还层层向下传达，蒙蔽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狗胆包天，到如此程度，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一切的一切，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政治背景的。早在一九五九年，吴芝圃、赵文甫、杨蔚屏在陷害潘(复生)、杨(珏)王(庭栋)事件以后，吴便将赵、杨各提了一级；吴、赵、杨一起提出和实行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所谓“三高”政策，以对抗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九日亲自起草的《给生产队的一封信》；吴、赵、杨又拒不执行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和一九五九年三月两次郑州会议的指示，毛主席曾批评吴是左倾盲动；吴、赵、杨实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以后，毛主席曾亲自给河南省委写信，指示要以小队为核算单位，他们仍然拒不执行，何等狂妄！在今天河南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回顾这段历史不是发人深省吗？！

二月黑风——反革命复辟 正值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河南的“独立王国”面临崩溃时，以何运洪为中心，结成了一条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阵线。文、何、

赵、杨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三步曲开场了： 一、大造反革命复辟舆论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廿四日，文、何、赵、杨利用唐伟，抛出了臭名远扬的《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并一手扶植了“省直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特别是其中的“红刺刀”等战斗队，以“知情人”的权威身份出面，充当反革命舆论工具。在全面否定刘建勋同志的同时，把“御用工具”的帽子扣到郑大联委头上。经过半个多月全付宣传工具的煽动，河南反动的和保守的势力就都在“打倒刘建勋，气死党言川”的统一口号下聚集到了文、何、赵、杨的周围。 二、上打革命干部，下打革命群众；

上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替保守组织翻案 何运洪集团首先利用造反派之间的一些矛盾，抓一点，打一片，利用他的同党刘X X的女儿在郑工造总作内线，想把整个河南革命派一口吞掉。 现已查明，仅仅郑州、新乡、焦作、

洛阳、开封等八个县、市，直接由公安公社和何运洪亲自批准宣布为“反革命”的组织就有十五个，宣布为“非法”的有七十多个。而在他们的影响和纵容之下，一个党支部书记、商店经理和办公室主任，也可以擅自决定解散革命组织。象这样，仅洛阳地区上报给省公安厅的“非法”组织、就有一百多个(实际数目远不止此)。郑州市郊十个公社就被解散了三百四十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桐树洼大队二十八个组织就被解散了二十四四个。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中的成员，大批被捕、被斗、被劳改和勒令到公安局登记，搞人人请罪。如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共三千多人，被迫到公安局登记的就有近一千人；郑大革联共一千人左右，登记就有近二百人。大逮捕中，全省上报了四千三百多人。实际上，仅据七个县十个市的调查，有名单可查的就有一万七千多人；连十三岁的小学生也逃不脱毒手。与此同时，文、何、赵、杨又残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非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狂喊“打倒刘建勋”，特别是四月廿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他们更加声嘶力竭地要“坚决打倒刘建勋”，诬蔑毛主席表扬刘建勋是“不了解情况”，

“受刘建勋的骗”，恶毒散布对伟大领袖的怀疑情绪。近来，又把“打倒刘建勋的黑后台谢富治”的反革命标语贴上了街。他们对坚定地支持革命派的省委候补书记纪登奎恨之入骨，把他软禁了四个月，拳打脚踢。把周总理点名要到北京担任我方代表的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斗了一百多次，强令他披麻带孝。还害

死了辉县县委书记胡占春等人。与以上相反，文、何、赵、杨拼命扶植保守组织。首先，他们支持了三反分子罗瑞卿在河南安置下的爪牙所组织的公安公社，作为镇压革命的工具。然后，为周总理点过名的保守组织“郑大红卫兵斗师”翻案，使这个只剩十七人的典型保守组织又死灰复燃……已被揪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时又是一番景象，一个个从阴沟里伸出头来，拼命企图钻进“三结合”机构，实行反攻倒算。赵文甫和何运洪紧密配合，何说“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赵应道“你们做得对”；何对专程赴京揪刘建勋代表团的杨蔚屏秘书胡X说：“你们揪不回刘建勋，我在谈判桌上也要绞死他！”赵立刻呼应：“我就是回家种地也要打倒刘建勋！”他接连给何运洪等写了三封信，狂呼：“你们干得好”，“要干到底！”激动地大叫：“我的头脑豁然开朗了，我不能再沉默。”并跑到何运洪门口高嚷：“现在形势大好，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他不但应邀参加斗争纪登奎大会，还动手打人，进行报复。郑大附中红旗等革命小将一再要求揪斗他时，何运洪却把他保护起来。就这样，他一直逍遥法外。杨蔚屏也先后给何运洪三封信，打气献策。自然也被邀请参加斗纪登奎大会，他咬牙切齿地说：“你斗了我二十多次，我就是死到棺材里了也都记得这笔账！”早在去年七月就已被揪出在报上点名批判的三反分子、大叛徒郭晓棠居然也无耻地说：“我是黑帮打成的黑帮。”企图翻案。就是这样，河南革命的历史被文、何、赵、杨颠倒了！洛阳竟出现了为刘少奇翻案的大字报，开封竟有人喊：“贺龙万岁！”到处是“摧毁郑大革联反动思想体系”的巨幅标语，河南出现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三、反革命的“三凑合”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当文、何、赵、杨自恃时机成熟，就迫不及待地于三月六日搞出一个干部“亮相”会，还跟大叛徒齐文俭(付省长)等结合起来，搞了个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在文、何、赵、杨之流的亲自指挥下“分系统按部门”建立了十个“总部”，他们想篡夺革命成果，要摘挑子了。这还不是典型的反革命“三凑合”吗！？这一切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二月以来，河南的确出现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文、何、赵、杨的确是一批打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批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招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最阴险的敌人。反革命

大屠杀 在无产阶级的红色中国，这种白色据点能长期存在下去吗？当然不能！河南革命人民不容许，全国人民也不容许，毛主席和党中央更不容许。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军委十条命令、中央关于青海、安徽、内蒙的决定、《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和《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等中央指示陆续发表了，鼓舞和激励着二七战士。二七战士满眶热泪日夜想念毛主席！ 三月份以来，首都红代会、工代会、各地军事院校革命派，中央各部及上海、哈尔滨、西安、武汉……等全国的革命派都相继发出了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和声讨文、何、赵、杨之流的檄文；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友，牢记着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教导，奔赴河南斗争的第一线。暂时被打下去的河南革命派又站起来了，二七战士又成千上万的走上街头，革命派的大字报重新占领了阵地，没有广播器材用口喊，没有印刷工具用手写，黄河两岸又沸腾起来了。与此同时，周总理四月二十六日第二次召集向中央汇报的命令已下达了。文、何、赵、杨外惧全国革命派的声讨，内忧河南革命派的壮大，陷入了天罗地网。同时机校“八·二六”、郑工指点江山兵团等举起了义旗，何运洪的后院起火了！他们预感到末日的来临，就使出了最后一着——没有枪声的反革命大屠杀。 五·四、五·五、五·六、五·一七、五·二一、五·二六、五·二七、五·卅、五·卅一等一系列的反革命大屠杀，都是有组织有指挥的杀人放火！五·二六事件中当场捉住的何运洪的忠实爪牙彭 X 就是铁证。何、文、赵、杨集一切反革命策略之大成，他们调动大批人马，团团围困革命造反派，断水，断电、断粮，动用汽车、起重机、消防车、推土机、炸药、雷管、六六六粉和化学药剂以及烟幕弹、燃烧弹……仅五月二十七日一天，就打死打伤我二七战士千余名，有名单可查的重伤号就有五六百名，比青海“二·二三”事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反革命屠杀环境下，全省大批工厂停工，郑州铁路机务北段工人被打走，京广、陇海两线货运受到严重破坏，直接影响了援越抗美和全国的生产运输。

现在，何运洪等已把枪发给保守组织。同时，由于上下压力而一度被踢开的公安公社，再次被捧了起来，并急剧强化；他们还向四川产匪“取经”，并已到山区和农村去大肆活动……种种迹象表明，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迫在眉睫，河南革命派的战友们，全国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一切受文、何、赵、杨蒙蔽强制的群众，我们热情欢迎你们掉转矛头，造一小撮幕后操纵者的反，迅

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打倒刘、邓、陶!打倒文、何、赵、杨!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郑大联委反刘邓兵团 (河南二七公社《二七战报》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

〔时间: 夜, 地点: 京西宾馆。河南省军区和驻开封的一军的领导同志出席。记录稿, 未经本人审阅。〕 康老说: 你们这两天考虑得怎样? 八大总部的人来了没有? 何运洪、余嗣贵答: 八大总部的代表来了。 康老说: 这两天河南武斗情况怎么样? 你们谈谈。 何运洪: 武斗还有, 没有完全停下来。现在由洛阳转到焦作了。焦作武装部长、政委都被抓走了, 有的被打的很厉害。 康老说: 焦作不是军管了吗? 余嗣贵答: 是电厂军管了。 康老说: 想听听你们对解决河南问题的意见。最近作了点群众工作没有? 两派的工作做了没有? 何运洪答: 前一段做过一次。 何运洪、余嗣贵、张树芝先后向中央首长汇报了军区领导同志所犯错误的认识, 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 提出了我们准备分两步走, 先向军区党委传达中央首长的指示, 接着开党委扩大会, 请分区、各师的领导同志和军区机关副处长以上干部参加, 传送中央首长指示, 组织学习讨论, 然后, 再向群众公开检讨。 汇报后, 提出了几个问题, 请中央首长予以明确: 一、河造总的性质我们还不清楚, 我们不好同他们讲。 二、对省委领导人还摸不到底, 怕再搞错了, 省委还有没有一小撮? 三、八大总部是什么性质的, 将来怎么样作工作? 它们现在攻我们攻得厉害。

四、河造总、二七公社都是跨行业的组织, 不符合中央按系统大联合的精神, 以后怎么解决? 五、我们怎么检查, 是等中央决定了讲, 还是我们先检讨? 在部队内部, 我们只是在党委常委里讲了, 没有敢往下讲, 怕讲错了。我们也想早检查、快检查, 变被动为主动。 杨代总长说: 你们准备怎么办, 谈具体些, 两步怎么走? 何运洪说: 准备先向军队内部讲, 已让赵复兴来过, 对他讲了中央首长指示精神, 让他回去传达。 杨代总长说: 这个办法好, 要来可靠的, 不要来反对的。 康老讲: 可以来人, 也可以打电话。 杨代总长讲: 济南

军区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内蒙也给我们提供了经验。济南军区党委统一，杨司令、袁政委一站出来检查错误，表明态度，原来抵触较大的炮兵、工程兵也都转过来了，内蒙则是内部出了问题，只要你们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主任通了，你们真正转过来了，事情就好办了。对各师、分区要请他们来开会，不能让他们帮倒忙。

康老讲：我看你们的意思是不是等中央表了态，你们才表态？如果你们等中央作了结论，你们再表态，那你们就又被动了。二月叫你们来，你们不来，被动了一次。这次再不先表态，不就又被动一次？等中央作了结论，你们再表态，群众会说中央已经表了态，你们不表态也不行了，这不就是被动？我提出这个问题，请你们考虑。

开了几次大会，河造总保你们，你们连一句话也不起来说，你们应该起来说，你们说：“同志们，我们有错误”，不就好了吗！？

你们有错误，应该告诉河造总，人家忠心耿耿地保你们，你们有错误为什么不告人家呢？要告人家。这些也请你们考虑。

我们等你们觉悟，把主动给你们，我们才好讲话，我们才好保你们。我看何运洪，你的思想这个弯子还没有转过来。

我告诉你一个经验，四川杨超我们几次让他讲，还给他写了信让他讲，他不讲，中央想保他，但保不起来了。

戚本禹说：你们还是姿态不高。

康老讲：你们应该主动检查，要不河造总会怨你们有错误不告诉他，二七公社认为是中央给他平反的，不是你们主动认错的。你们回去后，可召开群众大会检讨。

河造总讲郑大联委是省委的御用工具，值得注意。主要讲刘、文、纪，这三个人要分析，文的问题大，刘、纪当然有错误。

河造总，你能说他不是革命群众组织？但他们的错误，你们是有责任的。河造总，二七公社也没说他是反动组织、非法组织，相反，河造总说二七公社是御用工具。

现在是公开向二七公社和郑大联委平反的问题，不是想河造总的问题。你们应对二七说：我们错了，把你们搞错了。给河造总说：你们支持解放军，支持我们是好的，但我们有错误，我们准备检讨。

二七不能说是没有错误，但总比你们抓人好得多（戚本禹说，你们抓了几千人。）

戚本禹说：康老讲的很清楚，这是方针。你们要争取主动，你们抓了人，把杀出来最早的造反派党言川抓了，还开斗争会，还让人家游街，中学生这些小孩带着牌子上街请罪，这你们都是知道的。

我们觉得很惊讶，就是你们说省委还有没有一小撮，运动搞了一年多，你们支左，把左派都抓起来了，却找不到一小撮啦，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你们要

主动，要高姿态地检查错误。这些小将，你们不要把你们当作小孩子，他们很敏感，他们不简单。 杨代总长说：小将们比我们强。 戚本禹说：赵文甫的材料我看了，问题很严重。 何运洪：我们是把他当作已揪出来的。 康老说：赵文甫给你们写信，很恶毒，你们没有反击，只是说被揪出。何运洪同志，你们的话不能说服人。 戚本禹说：康老说的话，就是让你们主动检讨，康老保你们的。这是个方针。但能不能作到，就要看你们的了。主席说三依靠，其中之一就是依靠解放军，你们要自觉，这就要看你们的了。要不主动检查，就象四川、内蒙了。 康老讲：一军对“八·二四”发展组织的四条还坚持，这就不好了。 戚本禹说：康老已经提醒你们不要追了，你们还把四条当成宝贝，这就不对了。 杨代总长说：一军还有个打死人的问题，错了就错了，不要掩盖，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是保你们的。你们对反动组织也缺乏分析。 康老说：开了几次大会，二七觉得他胜利了，河造总觉得他胜利了，都是往自己身上想得更多。 八大总部压军区，压造总，对军区、造总不满，但主要矛头是对二七公社。据联络员讲，来这里的方针，是对二七公社。受压制的平反后要压别人。 戚本禹说：对二七公社要做工作，不要压造总，将来要以二七公社为核心搞大联合。 康老说：省军区的同志，一军的同志，你们先想一想自己错在那里了，不要老是看人家不对，这就好考虑问题了。 杨代总长说：总理、康老一直向你们讲的都是要你们很快转过来，把总理、康老讲的记下来检查就行了。军区、一军都有点怕字当头，错了就错了嘛！改了就好了嘛！检查一定要深刻地、高姿态地、诚恳地去检查。深刻地、高姿态地、诚恳地去检讨认识错误，要本着以自己在这次运动中接受教育的态度去检查认识错误。 康老说：你们不要觉得犯了错误灰溜溜的，相反，只要你们能主动检讨，就会提高威信。 戚本禹说：济南军区检讨后，十万人给他报喜。 杨代总长说：你们没有转过来，就是只看人家的错误，不看自己的。主席讲，要对己严，对人宽，你们应当这样做。 康老说：你们要转过来，要做好下面的工作。 戚本禹说：关键在领导，在首长。 杨代总长说：就是你们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副政委、参谋长、主任，你们要搞通，你们要转过来，要很好地学习山东的经验。你们检讨，不要说成绩，检讨错误就行。你们的成绩让康老去说。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康生接见纪登奎耿其昌谈话纪要

〔时间：晚 6 时至 11 时 30 分〕 康老：主席让抓河南问题，有些情况我们还不太熟悉，再了解一下，你们汇报一下，河南的情况，河南的领导班子，军队问题。 纪、耿向康老汇报，康老笑着细心听，并不时插问。 康老对文敏生、杨蔚屏（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七公社打倒对象）很注意，特别是杨蔚屏。说他进过高级党校，当过党校党支部书记，和杨献珍关系很密切，杨献珍经常找他看戏。又谈到山东大学，西安交大彭康，南京大学匡亚明，郑州大学王培育等，康老说，彭康早就该打倒，王培育挑动群众斗群众。 运动初期，全国有三个大学有问题（南大、兰大、郑大）。中央对河南的处理很满意（即刘建勋在河南时对郑大的处理），对六六年河南的情况也较满意。

康老非常关心开封“八·二四”，问开封“八·二四”的情况较多：

1. 康老谈到 2.18 事件占开枪的问题时说，作为野战军开枪打死群众，开封是全国第一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不是开了八枪吗？军队（驻开封的部队野战军一军）只承认开枪了，不承认打死人。
2. 康老说：对方反映八·二四提了反动口号，我看提“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是错误的，不是反动的，更不能从这抓人，打倒谢富治这口号是反动的，要以此抓人，以此抓人得抓多少？
3. 八·二四“四个入队条件”是否这样，反革命是不肯把自己说成是反革命的。

康老说，一军说井冈山（原开封师院战斗师，反八·二四的）是最早反院党委的，是造反派。

纪说根本不是这样。

康老又谈：“曲乃生是八·二四的后台”，这是一军军长来讲的，

纪又回答：八·二四从来没有和曲乃生有什么联系。他们是反曲乃生的。

康老又问到徐学龙，

纪回答了八·二四对徐学龙的认识过程：八·二四初起时，徐学龙受省委批评，写了支持八·二四的大字报，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比较缓和了，后来八·二四就把他当作第三类打，又当第四类打、打倒了。

康老说，别人支持自己的革命行动就必然欢迎嘛！ 康老又问：八·二四为什么揪住赵静生不放？ 纪答：因为他是镇压八·二四的幕前指挥。 康老说：二七公社组织纯不纯？ 纪答：现在发展全省了，我不敢保证。 康

老又谈工人总部时，问工人总部和公安公社能否一样看待？ 纪答：不能一样看待。 康老又问：公安公社是谁主持的，操纵的？ 纪答：是河南军区。康老的秘书说：都是何运洪搞的。 康老：保守组织里有没有高干子弟？ 纪答：有。如郑工造总有一个。新乡红卫兵总部就有何运洪的女儿何泰廷在里边，与李玉坤（总部负责人，曾炮打中央文革）乱搞。 康老：李善亭作的坏事很多。 纪说：他是何运洪的参谋（李为军区政治部主任）。 康老又问：余嗣贵怎么样？ 纪说：是镇压二七的总指挥，出头露面的都是他。

康老又问张树芝好象不太管事了吧？又点了几个名，纪都不熟悉。（张树芝、余嗣贵为省军区司令、副司令） 康老还问：军队内部有没有不同意见？ 纪答：我知道的消息不可靠，据说有军区几个军管和一个参谋。 汇报共同用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康老讲：我们接到一些人民来信，反映你们二七的事，你们还打、砸、抢，河南报馆是你们搞了吧？ 纪答：是我们，他们在报纸上天天写我们是非法组织，是反革命，小将们急了，把他们砸了，我们保证今后不再搞了。康老：二七过去是受压制的，现在又活跃起来了，现在有一个规律，当他受压制时，他的大方向是对的，当他解放了，他自己又重复别人犯的错误，给他们平了反，他们就用别人压自己的办法压别人。二七对这个问题不觉悟，犯的错误就会更大些。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毛泽东思想，这是最重要的，有的革命组织，不当权的时候还好，一当权地位就不同了，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他就变了，各地的规律都是这样，发展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最近中央对两派发了六条，双方都要执行，望二七做工作，请他们办到。 1. 不要上街游行，上街容易引起冲突，写标语要有所克制。 2. 双方保证不搞打、砸、抢、抄、冲。 3. 双方不要抓人，不要违犯十六条。 4. 保证铁路、公路交通运输，军事工业，尖端科学部门正常生产。 5. 不要动员农民进城。 6. 不要抢夺武器，军队要坚守岗位。

（来源：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河南联络站 67.7.1）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并武汉军区党委：

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有了错误，定要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绝不能扭扭捏捏、吞吞吐吐，更不能坚持错误，越走越远。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给河南省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我们对这一严重错误，在中央首长指出以前，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越陷越深，以致不能自拔。经过中央首长指出我们的错误，循循善诱，谆谆教导，才使我们逐步的醒悟过来，这是对我们政治上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实际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决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期望，坚决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方向就错了。我们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他们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我们在二月份先后错误地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而没有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月十七日河南日报社事件，主席、中央指示我们组织双方代表赴京汇报，这对解决河南问题、纠正我们的错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指示，而对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采取了压垮和拖垮的政策，限制他们的代表名额，不想赴京汇报，这实际上是无视主席、中央的指示与主席思想是对立的。

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許多人，打击了革命小将，压制了群众运动，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阶级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

四月初，传达贯彻了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精神，中央发出了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指示，中央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这又给了我们一

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我们对中央、军委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这些重要决定，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盲目自满，自恃正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把当时河南二七公社向我们的反抗，看作是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所掀起的一股“翻案妖风”。所以军区领导同志在四月十六日群众大会讲话中，又重申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并且还把这个讲话登了报，这就进一步打击了郑大联委，压制了河南二七公社，致使我们错上加错，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直至赴京汇报前夕，才作出宣布撤销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决定，但只承认是作法上的错误，没有认识到是根本上搞错了。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不仅压制和打击了一些革命造反派，而且还支持了一些保守派。特别是三月份我们在急于夺权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原则，组织了几个总部，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被动。

赵文甫给军区写信，挑拨离间，用意极其恶毒，但我们政治上麻木不仁，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给以及时揭露和反击。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立场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党委书记何运洪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并应作深刻检查。我们所以犯如此严重错误，而且在长时间内不觉悟，不认识，不改正，根本原因是：

一、路线觉悟不高。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始终体现着斗争的大方向认识不清，把本质和非本质，主流和支流的关系搞颠倒了，对他们非本质的和属于支流的缺点错误看得太重了，错误地把他们当作右派势力，进行压制和打击，自觉不自觉地站错了队，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保守思想严重。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墨守陈规，习惯于按常规办事，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很不敏感，很不理解。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看不惯，甚至反感，对他们缺乏深厚的阶级感情。对保守势力在思想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态度暧昧。支左工作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

三、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委领导成员很少深入实际，到群众里面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即使对我们所支持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

挥部提出的善意批评和宝贵建议，也听不进去。患得患失，不敢挺身而出，冒风险，担担子，缺乏勇于负责的精神。怕群众，怕革命，怕丢面子，怕丢官，一句话就是怕革命。

四、党委领导不力。未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闻不问，很不关心，参加省委文革小组有名无实，没有积极主动了解情况，因此介入后，心中无底，仓促上阵。在支左工作中，常委没有形成核心领导力量，工作忙乱，处处应付。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明确的方针和有效的措施。作风不民主，工作不深入，情况不明，决心不大，犹犹豫豫，朝令夕改；包办代替，听不进不同意见，未能充分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作用。

五、归根结蒂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树立得不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一份力量多，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少，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很好的触及灵魂，破私立公，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

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辜负了最高统帅毛主席、副帅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信赖和期望。我们深感万分痛心，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河南五千万人民。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地检查错误，坚决地改正错误。我们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一步提高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坚定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决心以山东省军区为榜样，公开向群众作检查，给郑大联委彻底平反，对二七公社坚决支持。努力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坚决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对部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路线觉悟，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努力完成伟大领袖

毛主席交给我们“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以上仅是我们的初步检查，还很不深刻，恳切盼望给予批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戚本禹与河南“二七公社”代表的谈话

〔时间：1967.6.28 晚 9：30 分—10：30 分，地点：西苑旅社，二号楼二楼会议室。〕

戚：都来了吧！

戚的秘书：都是二七公社的吧！

戚：党言川来了吗？

党：来了！

戚：你给他们写了个什么东西？在监狱里面？（当党言川说到不要给军区干事）不要给军区干，不要公开干，这还是对的。河造总人数比你们多吗？

二七：多！

戚：十大总部和河造总一样不一样？

二七：一样！

戚：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十大总部和河造总是有区别的。我今天来是来得罪你们的，不准备给你们讲什么好听的。准备让你们把我赶走（众笑）。我在清华的讲话你们抄出来了吗？

二七：抄了，抄了几句……

戚：我不想给你们说一句好话，好话你们自己已经都说了，你们研究一下，怎么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大联合，你们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和“河造总”搞大联合，否则，河南的问题不好解决，我今天讲的不做纪录，不要外传，对河造总这个组织，我们了解一下，大部分还是杀出来的，他们的错误是打刘建勋、保军区的错误路线，你们怎么看？

二七：他们还镇压造反派，炮打谢富治……。

戚：大部分还是好的，河造总整个不能说成是保守组织，十大总部可以说是“保守派”，你们那个看法我是不同意的，公、检、法我从来就是反对的。

二七：他们同样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

戚：我今天说出来是个人意见，但也不是个人意见。怎么办？距离这么大？没有调和的余地吧？

二七：我说一个情况，十三所造总，粮院（郑州粮食学院）八·八团，豫农造司等……

戚：我不要具体的，我说大部分是造反杀出来的。有 60%，总超过 50%，你们要承认这一点，才好搞大联合。

二七：（解释……）

戚：你们要承认，你们是有错误的，汇报了几次，没有一点姿态，我是不赞成的，我们都是不太赞成的，你们有没有错误呵？

二七：有！对待军区，报纸问题……（陈新民讲）

戚：你这个人好心帮倒忙，说话太尖锐了，我几次都不让你讲么！（对二七）你们至少有三个缺点，第一，你们那个组织有不纯成份，也有不好的，个别组织有坏人，这不能全怪你们，抓的人放出来，全进了二七，有坏人是**不好的。你们要研究。第二，有小团体主义，不大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群众，甚至统一战线也不讲。我们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还搞统一战线，你们老子天下第一，唯我革命，什么都正确，说你们这，你们一定不承认，或者口头上承认，心里不承认，还是私字作怪，所谓小团体主义那就多了，什么风头主义呀，山头呀……，第三，方法不对，所谓方法不对，无非是打、砸、抢，你们说有没有？（二七：有）对，你们要说没有，我是不相信的，概括起来三个缺点，你们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这是我的认识，（又重复一遍）不是说你们方法都不对，也有对的，不过今天我不讲，只讲不好听的，三个缺点，其它还有缺点，这里千万要注意，如果不注意，会向反面方向发展，会向对立面转化，你们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说中央支持你们，你们有些组织就非常骄傲。将来要站不住脚的。我看现在就有点站不住脚，我今天来是不讲你们一句好话的，这是我的领导交待我的，要是讲了是我自己的，都不算的，要你们和河造总联合，看起来，你们抵触情绪很大。何运洪有错误，你们反他我们支持你们，保刘建勋我们也支持你们，但是你们不注意，就要走向反面，要犯错误，最后被人家打倒，这是个预言吧！可能实现，也可能不实现。第一：你们的组织有些不纯，又不注意情况，大发展，当然是要浩浩荡荡的了，但你们不注意让坏人钻进来了，还有小团体主义，老子天下第一，再搞点打砸抢，

你们会不垮台！？不垮台才怪呢！以我看，你们面临着垮台危险，你们有没有办法不垮台呀！（二七：有！）你们胜利了，中央会很高兴的。

二七：我们学习毛著。

戚：你们要很好学习毛著，到中央来会谈事情不多，不过你们学习抓的不紧，听说你们不好好学习，我派了联络员给你们指导，今天造总一个人，领我到这里来，你们也不欢迎，来了客人嘛！（二七：不认识）河造总也有缺点，我去他们那里，他们正在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今天也没有通知嘛！你们在干什么？

二七：我们刚刚开了一个会，（另一人）我们去欢迎你。

戚：我到他们那里去，在学毛选，到你们这里来，在乘凉。

红旗杂志记者：二七也不错。

戚：你也站在二七立场上了，成了二七公社的通讯员了。你们还有别的缺点没有？方向恐怕还有点问题，你们对文敏生怎样？我又揭你们短了。

二七：我们元月份就起来提出打倒文敏生！

戚：你们对文敏生就那么正确？！恐怕是认识不够吧！你们认识的那么清楚吗？那么说你们就没有错误了。

二七：认识不够，十二月份以前我们搞刘建勋，没有注意文敏生，他要两面派，没有彻底搞，元月份我们提出要打倒！

戚：对的，是认识不够！

纪登奎：这个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把盖子揭开，表现出来的，我们还认识不够！

戚：你这个说法也不对，完全是二七立场，怪不得二七保你哩！你所说的那个所谓表现出来的认识不够，这可说不通，就是认识不够，相当时期的认识不够！

耿其昌：我到北京才认识到{笑}

戚：对！这才是个老实人！

纪：我有个心理，想他刚当了三个月的第一书记，就拆他的台。

戚：不！以前就是第一书记，刘建勋算什么，他听刘建勋的吗？他的后台硬，陶铸的人嘛！你们为什么不造反呢？你也认识不清吗？下不了决心，就没有揭开。

纪：就是认识不清。

戚：你这才是老实话，河造总对这个问题认识怎样？比你们早，比你们晚？

二七：他们喊打倒文敏生是假的，打倒刘、纪是真的。

戚：打倒刘建勋不对，打倒文敏生对了。

二七：假的！

戚：我不管真的假的，那怕是乱搞也搞对了，你们不要认为你们对了，他们不对，你们不对的，他们也不对，河造总他们是把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刘邓司令部的人合到一起打倒了。

二七：他们的口号喊对了，实际不是真心打，没打倒。

戚：口号上只对三分之一，刘、纪是打不倒的，文是要打倒的，口号只对三分之一，你们要承认他们对的一面，他们自己检查他们打倒没有打倒，你们怎么样他们心里有数，你们学毛著开始整风好不好？

二七：好！好！我们不能集中，一集中他们就围攻。

戚：问题不在于集中不集中，你们现在不就集中了吗？你们发表一个整风公告，不好好整风一定要失败的，造反到底就是胜利，这个“底”在那里？“底”就在自己，（用手指指自己）不革自己的命，失败无疑，上海不是有个“反到底”吗？反自己才能反到底，不反自己必定失败，我们去了郑州好多记者，他们回来都非常同情你们，他们生怕你们搞不好，但是，也不得不向我们汇报，有些事情也的确作得不好，小团体主义，组织不纯，打砸抢，对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也不对，你们说是不是？

二七：我们已经给家里写了意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纪律、整顿作风，学习五篇文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保守组织》等，康老六点指示，总结前段斗争经验，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

戚：你们这样作，好！这才有希望，首先要制止打砸抢，河造总他们有错误，你们说怎么办呢？你们也消灭不了他，他也消灭不了你们，怎么办呢？能不能联合呢？有没有联合基础呢？如果一个保守组织，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能不能团结？

二七：能！只要他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

戚：你们能不能用自己的行动促进这种联合呢？

二七：能！

戚：河南问题恐怕要两派群众之间怎样解决的问题，何运洪好办，关键在群众，对军队你们有些组织，一部分组织，就是没有头脑，一见了军队就反，这是错误的，河南军队很多，你们都反，都搞成对立面了，军队里的战士也是群众嘛！军队的大多数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有一部分是受何影响的，这个你们要负责，战士对你们看不惯，关键在群众嘛！表态以后要敲锣打鼓的欢迎他们，青海八·一八风格很高，他们作出了榜样，他们作的很好，主动和军队联欢，战士们都很感动，青海八·一八的特点是以工人为主，你们二七公社以谁为主？有多少工人？

二七：现在站起来能干的至少有一两万人，……

戚：真正有希望的是工人同志们起来，学生有小资产阶级风味，工人是不同的，在这里，我不隐晦，我是学生出身，我到工人中生活了一段，很有体会，学到了许多东西，在青海，在赵永夫开枪的时候，工人挺着胸膛抢上前去掩护学生，表现了英雄气概，高尚风格，我们要向工人学习，学生不要指挥工人，……你这个人（指红代会大庆公社陈××）我就喜欢刺激你，你在这里起了一些作用我是知道的。

二七：我们跟河造总的大方向不一致，他们仍然死保何运洪，坚决打倒刘建勋。

戚：刚才我跟他们说了一下么！他们也不想保何运洪了，刘建勋也不打倒了，今天晚上就挂电话回来，你们对何运洪也不要提打倒，可提炮轰，改成重炮猛轰，万炮齐轰好不好呢？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出去不要讲。

二七：他们现在的《中州烈火》上还喊打倒刘建勋。……

戚：事情在变化，地球在转，变化这么快，你怎能知道呢？刘建勋问题他们接受了，他们有他们的错误，你们也有错误，你们要不承认，我就不承认你们是造反。

二七：我们承认。

戚：河南问题主要是反对文敏生，文敏生的问题你们要自觉点，不要那么傻，你们还不快点承认错误，重新提出口号，发出传单，把材料全部公布不就行了吗？

二七：河造总是省委总部操纵的。

戚：河造总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联合，就是对于保守组织的群众，只要他们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我们就要团结么！

二七：让他们内部造反，必须改变他们的大方向。

戚：你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们说话还算数不算数。

二七：算数！

戚：你们越是这样，人家越不内部造反，对个别头头你们可以提出撤换，但这要由人家内部来办，十大总部和河造总是有原则区别的。

二七：他们一起镇压了我们。

戚：你听我们的好不好！

二七：好！

戚：铁路看一段是直的，但从郑州到北京整个看是曲曲弯弯的，你们这里有没有铁路上的？

二七：有，他就是，还是个司机！

戚：（笑着说）对不对？

二七：对！

戚：你们说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一致不一致？

二七：完全一致。

戚：完全一致？世界上没有那么完全一致的东西。

陈（红代会石油大庆公社）：基本上一致！

戚：基本上一致吗？那么不一致的有没有？

二七：有！

戚：你们现在应该坐下来仔细研究研究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不一致的地方，从而制造一种使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条件。你们怎么来研究这个东西，我今天来讲个人东西的，你们跟那么多工人对立，你们能站得住脚吗？

二七：河造总和十大总部是一回事……

戚：那些东西我都知道，你们交出来那么多材料我都看过，这不是我个人意见，一般来讲，我是不愿表态的。

二七：河造总中大部分是老保：比如说，粮院八八和联委怎么合呢……

戚：具体问题具体处理，我在这里就不说了，你们应该研究研究，怎么能使二七公社站得住，这里干部来了几位呀？

二七：纪登奎，那是王庭栋，耿其昌……

戚：你们这五位同志不要作群众的尾巴，你们的造反精神比小将差远了，要向小将们学习，但理解党的政策还强些，要帮助小将，（对二七）你们赞成不赞成？（二七：赞成）今天就到这里，下面你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我十一点还有个会，下面也要见见十大总部，让他们到这里来，我不到他们那里去，十大总部我不见，只见九大总部（对秘书说）公检法抓人的我不见，对开封一军的态度要比何运洪好，对一军的态度要更好些，特别要注意区别对待。

八·二四：他们现在还不老实，还欺骗中央！

戚：你们要看到他们是有进步的，你们八·二四的问题，错误厉害些，回来我再说。

二七：各厂确实有老保加入河造总怎么办？

戚：不要紧，一个一个都能解决，我没有叫你们现在就联合，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慢慢地联合嘛！

二七：我们只有一个担心的问题，怕何运洪耍两面派，表面上改正了错误，我们欢迎了他，他又掌了权，暗地里害我们。

戚：我不叫欢迎何运洪，叫你欢迎军区。

二七：军区里有没有何运洪派？

戚：这叫我怎么回答呢？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公安总部的不要叫他，公、检、法抓人的我不见。（对秘书）二七的你们走吧！十大总部的你们欢迎吗？来了你们还要吵！

刚开始上楼时，问：十大总部来了多少人？（二七：一两万人）来了那么多！

二七公社赴京汇报代表团整理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戚本禹与河南“河造总”代表的谈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六月廿八日晚 8：20 分—9：15 分，地点：北京西苑旅社。〕

戚问：你们都是“河造总”的吗？

答：是！

陈××问：二七公社在外面写的你在清华讲话是你说的吗？

戚：是我说的，你们看了有点不舒服吗？

众答：没有。

戚：你们递了很多材料，关键问题只有一个，抓着一个关键问题，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在内蒙问题上，主席说抓一个主要矛盾，其他就解决了，我们照办就解决得很好。河造总大多数是革命造反派组织，都是杀出来的，我的看法，你们都是造反派组织，但你们有错误，后来你们在军区问题上盲目支持军区错误的东西，军区在支左是错误的。二七公社是个造反派组织，有他的缺点和错误，成份不纯，方法不对，他们大多数组织是杀出来的，他们方法上不对，但他们对军区问题上，敢于斗争，何运洪有啥反不得。

主席二月份叫来京谈判，他就不来，谁敢对抗中央呢？内蒙那样独立王国，还不敢咧！他敢！军区抓那么多人，你们看得过去吗？军区的大方向是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你们总指挥部是三大部分：工人、学生、干部，干部在你们这边多吧！干部在你们这边很吃香。

（河造总服务员做自我介绍，略）。

戚：河南问题中央是很清楚的，中央在河南、湖北有一条线是专跑河南的。远的不说，潘复生、吴芝圃以来，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潘、刘、纪是一条线，吴、赵、杨是一条黑线。赵文甫很坏，杨蔚屏也很坏。刘、纪是一条线。陶铸调刘建勋是为了使文敏生掌实权，这中央是比同志们清楚的。

北京叫刘建勋亮相，光谢富治他敢吗？这是中央决定的，可是你们刚见报，你们就来电报，以后又反谢富治，二七公社大方向我支持，你们不是反二七公社吗？可是，很多干部调查后站到二七一边了。中央大方向是支持二七公社，他不反刘建勋，他反对军区错误路线。

众：他们挑起武斗打死人等等。

戚：他们打死人，有缺点错误，这是革命群众搞的吗？主要责任在军区，他们有一个错误路线。二月份军区就不来谈判。我建议你们和二七公社搞联合。

众：他们有些组织很坏。

戚：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要整风，你们也要整风，你们说他们，他们也是一方群众嘛！你们对军区错误不要支持，军区介入地方后，大方向是错误的。在三月份还坚持。你们也看看二七公社的材料，听听他们的意见，就是毒草也要看看，你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你们希望这样局面下去吗？河南朝那里去？

王××答：跟毛主席走！

戚：刘建勋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他到处检查错误，就很好嘛！他在关键时刻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纪登奎也要支持的。

朱××汇报了纪的情况。

戚：这个我们回去考虑。你们盲目保军区。

众：我们没有保军区，我们准备下次就汇报军区支左工作。

戚：不保他？我有很多记录，保的没法再保了，还说不保。有一篇文章是空司红尖兵写的，人家敢革敢保。

众：我们要批判当权派。

戚：批省委的谁？

答：刘、文、赵、纪。

戚：刘建勋是主要的吗？

朱道晏：（汇报文敏生情况和二七公社保文敏生的情况。）

戚：我告诉你们个实际情况，困难时文敏生是掌权的，对刘建勋问题中央早表过态了，你们还揪。

中央十中全会以后，刘建勋就是个好同志，当时中央和河南最大的分歧就是刘建勋问题。

你们是否研究一下方针路线，今后怎么办，要分清是非搞大联合，你们研究一下咋办！你们吃不了二七，二七也吃不了你们。

对省委要一分为二，不能一概都打倒，杨蔚屏怎么样呢？为啥河南当权派一个没有打倒呢？

日报社：都是二七公社保来保去，组织与组织干仗。

戚：你的观点我不赞成，一切都是二七公社，这样说法是不对的。

众：我们说是他们的头头。

戚：你们的服务员和二七公社的大部分服务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众：他们所做的一切超过了人民内部矛盾了。

戚：我支持二七公社的大方向，陈伯达也支持二七公社的大方向，我支持错了，陈伯达同志也支持错了？你们过去造反我支持，今天保军区错误路线我不支持。

陈金海：我就是要揭发军区支左工作中的问题。

戚：你们是一保二揭发嘛！你们有个大缺点，光听人家说你们好的话，就你们是天下唯一的造反派。总理、康老都说你们保嘛！还有接待人员都在场，都对你们不满意。

众：二七公社一直把矛头指向军区挑起武斗。

戚：武斗主要负责人是何运洪。喊打倒何运洪就打嘛！二七公社挑起武斗，打人都是二七公社？二七公社是被抓的，他敢打人吗？

众：确实都是他们挑起的。

戚：我有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记者，都在河南，天天都给我们来电话，我们知道情况。

粮院八·八团一女哭诉……

戚：你的这样哭诉，在二七公社听了很多！支持刘建勋，反对军区我说是对的。

李惠芳说：二七公社在社会上笼络的都是牛鬼蛇神。

戚：你说这话我不赞成，他们组织领导有错误是不好的，但不是主流。你们也考虑一下我的不全面的意见。你们的立场要根本改变，不改变就要复辟，抓人只能抓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不能抓群众。

粮院一同学说：可能抓错一点。

戚：一点？！百分之九十八都不对，你们和十大总部搞统一战线吗？

三厂一同志说：我们根本不和他们搞统一战线，他们在下面镇压我们，他们和公安公社是一个总部。

（……遗漏 96、97 两页）

老保反问：就有一万多人？

戚：军区都承认了你们还不承认？

财贸总部：（女）请首长派人调查。

戚：（非常生气地说）我不是首长，我说的话都没有调查吗？中央已经派了好多人调查了。我不是首长，我不是首长，我不是首长！

财贸总部：首长！你不知道我们在河南的情况，根本抬不起头来！

戚：你们不是抬不起头来，是压倒一切！

十大总部：我要向首长汇报。

戚：（生气地讲）：我不听！你要讲，给我们联络员去讲。联络员领导你们学习，希望你们认真检查错误，起来造反。

十大总部（插嘴说）：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根本没有错误。

戚：我给二七公社提的缺点，他们还听进去了，你们根本听不进去。

铁军代表：我是铁军的。

戚：（生气地说）铁军不要讲了，你们的成绩我都知道。

铁军（插嘴说）：首长，听我给你汇报！……

戚：（打断他的话说）我不是首长，我是个小组成员。不听你的汇报，（生气地站起来说）我说的不对，你们可以贴我一百张大字报，可以炮轰我，我还是要坚持。你们贴“十大总部必胜！”我说“不胜！”

十大总部：首长！那不是我们贴的。

戚：怎么不是你们贴的！

铁路老保站来说：我是铁路工人……

戚（打断他的话说）：你不是铁路工人，你是代表！

铁路代表：二七公社是内保、外保！

戚：看保的是什么人！看谁保的对！

工交公社石油公司的人说：我们是起来造反最早的一个单位，给李先念写过报告。李先念亲自批了我们的报告！

戚（发脾气了）：李先念批准你们的报告，我不知道。你们先起来造反，可能；但是后来还可以变坏！（最后并用手指着说）你们就是老保，就是老保！

工交代表：（发脾气，质问戚本禹同志）你有什么根据说我们是保守组织？

戚：（一拍沙发站起来，非常生气地说）我看，你们就是保守组织。你的这个态度就是保守组织。不讲了！我今天来，就是宣布联络员领导你们学习，认真检查错误。下一次听你们汇报。

十大总部：（女）我们欢迎，我们就是要向中央汇报的。

十大总部：（又站起来说）我们要汇报。

戚：（很生气地说）我不听！我要回去了，有什么事向我们联络员汇报，群众大部分是好的，总部的头头，比如公安公社到底是什么人，我怀疑！

市委代表：（站起来说）我们是最早起来造市委反的。

戚：我看不见得。

（戚本禹同志起来，离开了会场）

（十大总部代表们个个垂头丧气）

1967年6月28日晚首都动态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时间：1967.7.2晚9：40-7.3早1：40，地方：人大会堂安徽厅。中央首长：周总理、康老、肖华、戚本禹、叶群、刘建勋同志出席，总理等人坐在前排。汇报单位：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造总、十大总部、河南军区并驻军师级以上部分干部，首都红代会及军事院校部分代表。省委干部、纪登奎、耿其昌、王庭栋。另有：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

在开会前，由8250等部队首长到纪登奎位前，与纪热情握手。河南军区陈桂昌付司令员与纪亲切交谈。纪：我们早就盼望你来。两人都笑了。刘建勋同志去后，军区司令员张树芝等都去到刘建勋那里交谈。

总理：我们刚才商量一下，先听八大总部讲讲。后来的么！（铁军要求发言）

总理：有个铁军。那一个讲话？你们准备了没有？

铁军：……

总理：你们是哪一个单位的？

铁军：十一中的。

总理：你们铁军什么时候成立的？

铁：67年2月11日。

总理：你们有多少人？

铁：7000 人。

总理：这么多，都是郑州的吗？

铁：都是中等学校的。

总理：好，你讲吧，时间不要太长。一个同志发言，别的同志不要插话。不要喊口号，对吵，什么“造谣”、“阴谋”。便于弄清是非么！

（全场笑）座谈么！

（铁军讲到王黎之时）

康老：王黎之是什么人？

铁：是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我们认为他是三反分子，要打倒他。（铁军讲到中学情况时）

康老：你是几年级的学生？

铁：高三的。……（当讲到铁军历史时）

总理：简单一些。

铁：……我们听了戚本禹的讲话，给家里的群众作了传达。家里一致有这样的要求，有一些联络员扣压了我们的消息。听汇报的漫不经心。我们说，他们也不记。对我们封锁消息。蒙蔽中央。我们相信中央。但是那些蒙蔽中央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总理：（大笑）他们没有记录，就不要要求他们记录。什么下场不下场！

铁：（继续攻击二七）

总理：你们对二七公社这样对立啊！

铁：我们是两条路线斗争。

总理：什么路线斗争？

铁：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还不是路线斗争？（气愤的）他们保王黎之（市委书记）

总理：省里的呢？

铁：开始我们主张打倒刘建勋……

康老：（对铁军）对军区怎样啊？

铁：支左大方向基本上是好的，但有严重错误。……我们铁军是革命组织，军区不支持。

康老：你们既然是革命组织，军区不支持，军区大方向又是正确的，这不是矛盾吗？你们讲一下这是什么道理？

铁：（……吞吞吐吐，回答不上来，然后继续讲）

总理：你们认为造总是什么组织？

铁：我们基本上认为造总是个造反派组织。

总理：你们中学有造总组织没有？

铁：有。

总理：公安公社来人了没有？（无人吭声）。

总理：公安公社的王子现是不是公安公社？

王：我是公安公社的成员，我不代表公安公社。

（大笑，并用手指着王子现说）他是公安公社的人，但不代表公安公社。

戚本禹：（对总理小声说）那天我批评了公安公社。

总理：张治安是哪里的？

张：我是公安公社的，但代表省直总部。

戚：（大笑）他是公安公社的人，但不代表公安公社！

总理：（指王，张二人）那个代表公安公社？

（没人吭气）

戚本禹：（对总理）他不就是公安公社的人吗？

张：……

总理：你担任什么工作？

张：省人事局工作，担任一处秘书。

总理：你们总部多少人？

张：一万九千多人。公安公社是二百九十六人。省直总部包括党群、政法、农村水利、宣传、财贸、工交六个战线。

总理：你们八大总部呢？

张：我们和八大总部不是一回事，我们占省直机关总人数的 65%。

康老：：你们总部主要负责人是谁？

张：杨全志。

康老：他是什么人？

张：他是工会主席。

康老：勤务组有多少人？

张：十五个人。

康老：你是个吗？

张：我是个。

康老：丁石（省监委副书记）参加不参加？

张：他是当权派，没有参加。

康老：杨全志这个人怎么样？

张：杨是省直总部的发起人。

戚：丁石是河造总的吧？

张：河造总的（主要讲省直总部的历史）

总理：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二月二十四日成立，……二七公社根本没有提过炮轰省市委……对刘建勋四月二十四日前提出口号“打倒刘建勋”是应该的，四月二十三日省委机关发出通知“坚决打倒刘建勋”，我们讨论了半个月……我相信中央会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联络员今天给我们扣了打倒刘建勋就是方向错误，刘建勋的问题我们应该揭。

康老：刘建勋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省直机关内有什么表现？

张：没有什么表现……我们没有见到他一次检查。

康老：也没有支持造反派？写过什么东西没有？

张：八月十九日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支持郑大联委。

康老：这算不算表现？

张：算（康老大笑）。

张：（关于“坚决打倒刘建勋”问题）升级的不是我们，是河造总。河造总之所以这样干，是军区何运洪支持的，我们的录音（攻击刘建勋的）稿是经过军区修改的，录音是省委机关造总发下来的，我们放了十天。

总理：他们不在你们组织？

张：他们是河造总的。来两个代表都在他们那边。

总理：你们省直机关不大办事了。

张：我们还办公，抓革命促生产，今年的公粮征购很好。（当他谈到当权派来京时）

总理：来了多少人？

答：四十多人？有名字的三十八个，还有几个没写上。

总理：占你们机关人数多少？

答：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戚：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张：例如张柏园……

康老：张柏园来北京了？（张柏园是副省长）

张：来了。

康老：住在什么地方？

张：不知道。

康老：张柏园参加了什么组织？

答：什么也没有。

康老：是他自己来的还是象你说那样，纪登奎、二七公社把他弄来的？

张：是纪打电话，二七公社叫他来的。

康老：在座的有没有知道张柏园住在什么地方？（无人回答）

康老：我们找他调查材料找不到，是不是在京？

造总：我们在西苑旅社门口见到他和二七公社的说话。

康老：二七的谁？叫什么名子？

造总：不知道？

省直：军区镇压运动不支持工人总部，压一派打一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军区支左大方向基本是正确的。

康老：你刚才讲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又说大方向是正确的？

省总：我们对反动路线是有抵触的，文、纪公开攻击军区，纪在 5.29 日向总理汇报 12 条，在中央首长面前欺骗中央。

康老：军区一点不晓得 12 条？

省总：我不知道。

康老：同情军区的人搞的？还是反对军区的人搞的？关键在这里。

省总：查明是一个有反动言论的人，劳教后到工厂，对军区不满支持二七公社的人搞的。

康老：怎么对军区不满，12条是支持军区的么？那么河南二七公社支持军区吗？

（省直造总继续讲：开始说二七公社是群众组织，后来又说二七公社是御用工具时）

康老：你不是刚才讲是群众组织吗？怎么又是御用工具呢？

答：它是一个群众组织，但它的作用是御用工具。

康老：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是御用工具还是群众组织？

（答：无理狡辩。……）

康老：那我就明白了。

郑大战斗师：我们战斗师要求发言。

总理：你是新来的吗？

战斗师：从5月1号接到总理指示后就来了，一直没有发言（欲发言）。

康老：你等一等，听总理讲一讲。

总理：你们等等，十大总部再找一个发言，让工人组织讲，三厂停工了吗？

省工总代表：没有停，停了一个星期天。

省工总：（电缆厂复员军人）……

总理：七月一日游行是哪个方面的，是你们方面的还是二七、造总方面的？

答：我们十大总部的。

总理：停产一天吗？

答：停了一天。

总理：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产闹革命，不要把群众集中起来开大会，过节更应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停工，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和学生不一样，学生放假，你们工人不能这样，他们学生么！在学校读书都读呆了，让他们到工人农民中、到社会上去锻炼。你们是工人么，你又是军人么，不应该这样么！不管哪方面，都不应该停产闹革命，这些是违犯毛泽东思想的。挤出时

间学毛著，不是集中过多开会，一开会就要打架，不要动不动就把工人拉出来停产打架，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了。

省工总：（插话）我们没有停产，我们是倒班。

总理：你这话是说服不了我的，纱厂三班倒么！

省工总：我们停产后又补上了。

总理：噢……

省工总：对革命小将看得多了一些，对军区的错误斗争不坚决。

总理：军区宣布郑大联委非法，他们（二七）是你们压的！

（省工总想解释）

总理：你们接近官方。

（省工总拿出许多照片，污蔑二七公社写反动标语）

总理：那是不是他们写的？

省总：有照片为证。

总理：照片现在有各种照片。我说可能是坏人这样写的，假如别人写的，造他们的谣，给他们脸上抹黑，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省工总：（继续讲）……二七公社的骨干组织都是右派势力，的确也有些造反组织。河南军区对工人阶级重视不够，一直不公开支持、不表态，对二七广大革命群众区别对待不够……

总理：我想问一下铁路。河南铁路几处都中断了，你们三方面说好不好？

二七：不好（河造总、十大总部也说不好）

总理：既然你们三方面都说不好，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使我们的铁路交通能够畅通。

十大总部：我们不知道，与我们无关。

河造总：这个事我们管不了，不是我们搞的。

总理：豫北纱厂归哪派管？你们这里有没有豫北的？

十大总部：我们除了郑州以外，也不管其他地方，他们二七是全省的。

总理：那不对，听我们念一下我们铁道部军管会的消息……（总理念……）
豫北纱厂归哪一派管？

河造总：不知道。

十大总部：不知道。

（此时二七沉默，全场暂静）

二七：（鹤壁）豫北纱厂不是二七观点，是反二七的，他们听说要宣布他们是保守组织，他要到北京告状、要卧轨、扒车，解放军再三劝说，他们不听。

（老保着急了，跳起来说：“总理，我要控诉二七公社一小撮混蛋制造反革命停车事件。……”总理摆手制止）

总理：我要知道的是当前的情况。（老保张口结舌）铁总不停车，工总扒车。

十大总部：我们只管郑州。

总理：你们八大总部不管全省，河造总呢？

河造总：我们只在郑州。

总理：你们两方都是郑州地区，其他地方都不管了。那末为什么河南那么多地方告急？

二七：河造总派人到豫北去，对我们二七派的说：“只要你们不打二七旗号，我们就承认你们是造反派，就支持你们。”

总理：一点不往外发展，我不相信，二七是全省的，那是观点相同么，你们观点不同，那你们为什么派人煽动啊？观点不同就要吵架不行就要打架，打架以后先到郑州，郑州解决不了，就要到北京告状。

（老保起哄，抵赖）

原因说不完，你们调查一下就知道这么一回事了，你说你们反对停车，那位也反对停车，你是造总的，你说你更加反对，你们三方面都派人立即出发，铁道军管会帮助你们一起去调查。

康老：不光是调查，现在的情况是停车了呀！不要光说抓革命促生产，情况是车停了呀。运输不通，总理已讲了，五列，最快车一列，客车一列、货车三列，主要是往北京方面来的，为什么停了，什么原因？是豫北纱厂三百人，要到北京来告状，从今天下午起多次劝说无效，石家庄也是往北京的列车停下了。为什么堵塞？是河南一千二百多工人扒车不讲道理，进行工作无效。第三种情况，洛阳和郑州车站军管会被扒车的人包围了，现在同志们面临着这种情况，车运关系到国计民生，整个国家的问题，面临着这种问题，这不仅是郑州的问题，河南的问题，更不是关系到哪一派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国的国家问题……总理说包括

你们也在内到那里去，说服那里的工人，不能堵塞铁路，有的地方正在卧轨，这是很不好的，保证通车，这是第一个任务，然后再调查情况，发现情况，看是哪一方面的，这是第二个任务，如果光调查，车仍然停着，不如不去，你们要承担这个任务。

总理：要三方面一道去，康老把任务交待清了，我还说第三个情况，过去二七公社在北京多了一些，因为过去受压迫么，二七现在不要来了，因为中央对二七有一定估价了，要动员在京的二七的人回去，有这些代表就可以了，过去你们不知来了多少次，还有刘建勋在这里，一有问题就来了（二七说还有一二百人），那就好啊！（老保攻击）人家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你们还要重复一句。你们作领导还得学习几年么！河南是人多，但人多压力往中央，中央是要讲道理的。

康老：你们想人多，跑到中央来几千人，压中央，一压就压垮了，那还象个样子吗？毛泽东思想是不怕压的。

总理：我们承认二七公社不会把你们压垮的，不会的。你们犯了错误。他们帮助你们，你们不要想着过去，过去你们压人家了，现在还要压你们。群众组织么！我们都会报告你们走对的，大联合么，都站到毛泽东革命路线上来么！

你们先去打电话，电话不通，你们还是要去的，到石家庄那一千二百多人，那后天就来了，河南太近了，不象四川。你们提出学四川，四川大乱，你们也大乱，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河南是中原要地，以后变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们希望各省都有份，同意不同意（答：同意）。第一要打电话，不要扒车，查查是哪个观点的，还是劝他们回去，吃的住的都很不方便，交通也停顿了，铁路关系到工厂，铁路不畅通工厂就窝工了，因为郑州四通八达，郑州这个关键不通，安阳不通，很不利了。

现在请郑大后来的讲……

战斗师：……

总理：你们战斗师多少人？（回答 400 人），（二七说：原来有 1000 多）变化了，郑大总数多少人？革联多少人？我问你们和郑大革联在什么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在什么地方？（战斗师说：革联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整总理材料）总理笑着摆手，说具体点，讲你们学校嘛！你们保了些人吗？党委的问题我晓得，工作组来了以后？（战斗师：我们最先反党委），你们两派我都知道，我想听现

在。二七公社、郑大联委受压迫，还是你们受压迫？（战斗师扯以前的）不说那些了，军区管制以后，你们那时算非法还是合法？

战斗师：不合法。（革联同学拿出平反传单）

总理：三月六号以后你们还不算合法？那么你们两方面都不合法，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恐怕过去太对立了，那时你们两个组织都存在。

康老：以后郑州大学没有捕人？郑大学生中被捕的人有没有？（战斗师答只捕三人）党言川不是也被捕了？郑大革联 39 人（革联：被捕 39 人）。

总理（问战斗师）：你们被捕了多少人？

战斗师：没有。

总理：你们两方有没有联合的基础？

二七：有！只要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总理：去年在北京也是这个数，后来他们发展了，（指革联），你们减少了。

战斗师（象哭）：我们几乎被压垮了。

总理：不要那么激动，第一，你们没有被压垮，第二没有被捕。现在你们选择共同基础联合（战斗师继续攻击革联），你们这样互相攻击就没有联合的基础，不是让你们来了吗，你们今后应当怎样做？来两个月要好好学习 5.16 通知，毛主席的伟大著作，红旗、人民日报社论要好好学习。不是也让你们来了吗？你们今后应该怎么做，你说说前途好了，旧帐少说一点。

康老：你们三派有一个共同点，一讲就算旧账昨天如何如何，前天如何如何，大前天如何如何，就没有听你讲明天如何如何。你们这些年青人，不象我们这些老头子，我还向前看呢！

（战斗师又摆旧帐）那你不要算旧帐了，还是得向前看，拿这个指导思想，在前进中间看经验教训，不断总结再前进。你们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把你们的思想摆正，毛主席说过：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革命的大联合嘛！应千方百计地搞好大联合嘛！原则问题当然要弄清楚，看是否有共同点。刚才有四个铁路上的同志都反对停车，这就是共同点嘛，如果你们光算旧帐，等你们把帐算完了，车越停越多！

战斗师：我们保证和革联同学……但是……

总理：说了半天，还是算旧帐？

（战斗师一面讲，一面把所谓二七打人凶器交给总理），我们就从打人说起吧（战斗师又讲过去）还是过去的事情，你写材料交给联络员（战斗师要求单独汇报）什么单独汇报？！

康老：你们有个抓叛徒组织？有多少人？

总理：只限于河南？没有贴大字报公布吧？

康老：你先给我一个材料，你们要把抓叛徒的指示好好看一看，好好把那个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关系几个组织，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关系到每个人的政治生命。一确定是叛徒就是政治生命的枪毙。千万不要在大街上公布。一个是人家不是叛徒，你一公布，把人家的政治生命枪毙了，不管是什么观点，二七观点的也好，造总观点的也好，不同于御用工具，牛鬼蛇神，要负法律责任。另一个真正叛徒，你先告诉了他这一条，怎么对付，那一条怎么作，你先告诉了他。好人你们冤枉了，坏人把你们的秘密公布了，要好好分析一下，我找人和你们联系，先把那几条学一下。

（战斗师：革联、粮院联委、革委会东方红都与大叛徒有关系）

总理：你说你不宣布，又宣布了，当面答应不印，回去为了派别的需要又印了，你连这个都不懂了，不要捕风追影，掉以轻心，信口开河。

康老：在这个问题上，有的造反派由于不了解情况，吸收了一个历史不清的人，作结合对象，这是常有的，你们河造总不至于没有吧？问题是，不能因一个人就说这个组织是叛徒组织，那些人，不能因为一个人牵连整个组织，革命小将不晓得么！我们反复讲，那是他的个人问题么！不是你们的责任，不要抓对立面的辫子。彭罗陆杨过去我们不是也不知道么，也还在中央工作过，我们的党内也有混入的叛徒，投机分子，特务。不然的话，你提出一个来说你的组织如何如何，我提出来一个说我的组织如何如何。揪出是好事，不要以此攻击，混入我党的也有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革命组织中混入坏人也不要灰溜溜的，要挺起腰杆子，革命是革命的，反革命是反革命的。

总理：革委会我们有材料，你们再给我们一些材料，这个不要讲了，哪个组织也不敢保证（战斗师继续讲）。你讲了半天，前途还是没有讲么！（战斗师不听）你还是谈这，你不是讲前途吗？（战斗师提出要让纪登奎、文敏生站起来时），不要采取这个办法，不要采取斗的办法（生气地）你还是说过去的，我要中止你

的发言了！不是要讲前途吗？你听我讲，你们闯了中南海的门，我们见了你们，搞了一天多，头一次嘛，进来还是守纪律的，坐在草地上学习毛主席语录，我让他们进到屋子里来，他们不进来，我看外面太冷了，给他们水喝，劝到小礼堂去的么！我是没有说的，后来传出去了，两方都知道了，他们就抓住这个小辫子，你们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主席批评了安徽问题，说冲了没有什么，中南海、国防部都冲了，不要看得太严重了，不要请罪了。要说不是错误也不行，不是错误，大家都去冲了。四月六日发了十条以后，冲的事情多了，第一要见要负责人，第二我们下了命令，卫戍司令部不得开枪，最近两个月冲得多了，不但是见负责人了，只是要见负责人，军队也不会打的，四川打架是不对的，青海是反革命政变了，内蒙犯了严重错误。前几天，江西冲军区夺枪了，我们劝他们，后来还了，是好的。中央通令是有时间性的。犯了错误，不要抓住不放，不应该冲的就不要冲，随便冲不对，路口也堵了，领导机关不要看得太严重了，群众也不要来找事，每一件事都要一分为二，河南乱出一个好的局面，只要大家努力军区已经认识了，调来了几个野战军的同志，都来了，都有认识了。你们把六条学习了，三方面达成一个协议，不要写得太长，一、不要示威游行，二、不要互打互冲，再加一点，不要停工停产。现在许多厂在停产。还有一条，不要阻拦铁路公路运输，不要扒车卧轨，你们达成协议的文字打电报回去（老保喊让我们撤除工事）

康老：不要急，你怀疑我，我怀疑你，彼此不相信，就是撤除了，也是会筑起来的。因为农民进城带枪要打他们，他们不敢放下。

总理：给军区下命令，不准动员农民带武器进城，民兵的枪支弹药，统统都封存起来，要建立互相信任，不要压倒一方，你们那样要求多了，就写这三条，军区，军分区要象江西一样，下命令责成军区人武装部、县城下命令，不准动员农民进城，河南军区行吗？（何运洪：好）只要不武斗，那些东西都要撤除的。问题还不在这，仅仅在于凶手，这个东西都会打人的（手指着烟灰缸），石头砖块都会打人的。这个要达成协议的（问康老），是不是还开下去？（各方都要求发言，战斗师还要求发言）你们发言一个钟头了，各讲十分钟吧，从十分钟就可以看出各派的倾向性了，各派的水平了。

二七：（发言……）

康老：时间超过了一分钟，遵守总理的指示嘛，河造总也只能超过一分钟，
（将二七发言稿要去）

（十大总部发言时）

总理：你们共同达成协议，搞一个联合发言。战斗师你们回去想一想！

（十大总部互相争着发言）

康老：刚才你们有个条子，不能把八大总部看成一个总部，你们回去商量一下，今天时间到了，军区还要讲，省委干部还要讲，明天还要再搞一次，战斗师明天发言。

总理：我有两个比较紧的事，今天，有一部分冲开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对立起来了，我们希望八·二四打电话回去，八·二四说：电话不通），我们给你们叫。

康老：一定要按照周总理指示去讲，不要添枝加叶的（对八·二四）。

总理：十大总部，实际是八大总部，听说军区支持二七公社，八大总部就冲军区了，他们的办法是轮换班搞。

（十大总部否认）

戚本禹：不管那个总部都要退出来。

康老：你们不能主观，说没有冲，我还听说不光冲了，还将一个刘副司令员搞走了。

（老保不承认）（余嗣贵站起来说：有！一个是撤出来，第二要把刘副司令员放回来。（老保造谣说：二七公社抢赤卫队衣服）

昨天有一点外事，缅甸刺伤我们的人，还要去接，有些兄弟党明天下午还来，明天时间怎么分配，以后再通知你们。

总理：记者站，联络员回去把协议搞好，浙江的搞了一个很好嘛！拿给他们去看看。

（老保攻击我们说：二七公社煽动农民不交公粮）

康老：你们刚才这个同志不是说公粮收的很好么？！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周恩来对河南各派及铁道部军管会代表的指示

七月三日凌晨二点三十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王二杰）、河造总（王庆明）、八大总部（郑州铁路造反总指挥部胡年运、蒋克敏）以及铁道部军管会杨杰、副主任王世范、业务协助小组娄铁成。

对各代表作如下指示：

河南几派都是群众组织，中央都是承认你们的，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你们各派都派有代表在北京会谈协商，不需要再来了。来那么多人，成千上万来北京，妨碍抓革命、促生产，又影响三线建设，又妨碍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符合最高指示。再具体的说，这么多人怎么能向中央反映情况呢？你们应相信三方面的代表，应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中央一定会商谈出很好的解决河南问题的办法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既能抓革命、促生产，又能把河南的革命群众组织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河南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革命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最光荣的任务。现在我派三方代表去，希望你们回到本单位闹革命。

王二杰、胡年运、蒋克敏、王庆明杨杰、王世范、娄铁成共同整理并签字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于人民大会堂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晚 9.50—七月五日凌晨 2.00，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出席中央领导同志：周总理、康生、戚本禹、叶群、曹轶欧、刘建勋。出席代表：二七公社、河造总、八大总部、省委领导干部、河南军区、开封驻军负责同志。〕

（9 时 50 分康老、戚本禹等领导同志进入会场）

康老：开会吧？总理事情很多，晚来一会儿，为使会议进行好，提一些意见，由戚本禹同志谈一下。

戚：据反映最近由各方代表纷纷往回打电报电话，传达首长讲话，内容互相矛盾，并以此互相攻击。对首长讲话精神有歪曲，这是不恰当的，中央决定公布以前不要传达。

二七：二七公社坚决执行。

康老：最近有的用电报、电话，写信往家里传，家里的同志也很想知道这些。代表也觉得很有责任，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这里边就有个矛盾，有个缺陷，有些会不是一次就完的，要经过反复讨论，是听各方面意见，听取各方面意见，核实情况，因此开一次会，不是这个问题的全面，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全面。有时这个组织讲讲，那个组织讲，中央首长有时对这个问题问一下，对那个问题问一下，是调查情况，有时还没有弄清楚，拿到家里去，家里同志不了解这个会议，对某一个问题的结论，可以发生不同的理解，即使真实传达，也有不同理解，因为一个会议有个过程的，另方面打电话、写信、打电报不那么准确，所以有时这一派打对这一派有利的，另方面打电话、写信、打电报、不那么准确，所以有时这一派打对这一派有利的，各取所需。或者有的加以夸大，有的误解，家里得不到确实消息。这样，文革小组向同志们提一下，这个传达在中央有个结论性意见，定了再准确传达，能使代表真正完成任务，给家里消息。在会议过程中，希望不要打电报、电话，当然中央要求你往家里打电话的要打，如停车啦！武斗啦！放人啦等等，应该打。一般的反映情况的不要乱打电话，不要把会议中的讲话歪曲，这个建议你们各方面看行不行？

（河造总攻击李天资同志往郑州打电话歪曲戚本禹同志讲话，开封左司周树凡提出八·二四来回打电话，歪曲中央精神）

康老：恐怕这个问题检查起来各方面都有，大家以后注意。这些天工作进行有成绩，你们各方面赴京汇报代表团共同讨论一个协议书，是不是有这个事？（众答：有！）很好！中央文革小组听到很高兴，我们的会议前进了一步，很好，得到了一个文字的东西，我念念是不是这样的？（念协议）河南省各方面赴京汇报代表团，这个名字我也很高兴。以前叫谈判，这又不是两个国家两个党派嘛，是向中央汇报情况，又是各方面赴京代表团。（康老继续念，当念到关于贯彻执行“六二四”通知以及周总理的指示协议书，河南省各方面赴京汇报代表团向中央首长汇报期间，遵照中央首长指示时，说）：协议中有个地方叫中央首长，提议不用首长两字。此两字在军队方面用，在中央党的方面不常用这个字，是不是用这个，可用中央领导同志或同志，不是你是头，我是脚，你是手，苏联他们是用这个称呼，苏联有的还叫首长同志。你们是很尊敬我们的，但有个缺点，我们还是同志关系嘛，谢谢你们的尊敬，我们还是不愿作首长。

（康老继续念协议书，当念到协议上提到不超过半个月串连的串连学生回到本单位，说：）不超过半个月，是对外地还是对本地？如果在郑州，本单位也在郑州，那就不用不了半个月，一个是到外地的串连，如果到北京，应该分开，说清楚。

（当念到若某一方面偶然违犯了协议应协商解决时，康老高兴地说：）若某一方偶然犯了错误，违犯了这个东西，应当协商解决，不应你违犯了我也违犯，为什么你能违犯我不能违犯。（念完）

康老：现在大家没有签字？大家同意吧？（众答：坚决执行）这不是两个记者商量的吧？（众答：双方协议的）过去我们的记者，就犯过错误，协议定好后，双方都不执行，就是记者搞的，你们不要说是记者写的，我有这个经验啦，现在你们说不是，这就好啦。你们签字是怎么个签法？（众答：现在就签）。

康老：铁路问题怎么样？（指郑州、洛阳保守派爬车，造成铁路停车）。

河造总：十大总部作了回答。

康老：这都很好啦？我现在关心一个事，郑州、洛阳是不是已经通车？

河造总：还没有得到消息。

康老：应该问一下。这方面希望同志们努力搞一下。我不管外交，但我了解一些兄弟党来参观我国文化大革命情况，阿尔巴尼亚等一来，总想到各地看看，特别是武汉长江大桥，韶山毛主席旧居，广州革命遗迹，但车不通。满腔热情来看文化大革命，留下个印象是不愉快。这在国际共运中宣传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的英勇斗争，受到些损失。北京有一个语言学院，外国留学生有越南的、非洲的，他们没有调查清楚，要到井冈山，结果不通，他们向本国说了。

（铁道部一同志发言，谈了目前铁路中断的严重情况）

康老：从这个情况看，我们很欣赏你们达成的协议。这样我们看出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另外我们的铁道部工作同志要搞秩序，须要进一步做工作，从政治思想上去做，据我们所知，尤其八大总部的同志要注意，其他当然也要注意，在河南流行一种谣传错误法，意思是那一派不顾大局，不顾生产，动员许多人到北京、中央、到毛主席领导的中央施加压力，以为中央就向那些人屈服了。这种想法完全错误。这里边据我们知道，有幕后指挥人，也可能有

军区的人，公检法里边甚至有反革命，工人总部想不通还要走，这要栽筋斗，栽大筋斗，已经走到边缘。（10 点 40 分，总理到会场）

总理：铁路已经完全中断了。十大总部要特别注意，说二七公社是革命组织，十大总部也没有说解散，自己退的。本来是群众组织，这样一搞会走到反面，对抗中央、压中央是不行的。

康老：这是很痛苦的教训，如果幕后有指挥人，更要犯严重的错误。我们是再次爱护同志们，有的以为向中央施加压力中央就会改变态度。军区党委也有问题。

总理：四川后边有人。

康老：群众组织千万要注意，我们是诚心爱护。……这是幼稚的想法，毛主席领导的中央，你们这样搞就解决问题了？（对河造总）你们受骗了，因此各面达成协议很好啦。总的方面看，我还有信心，总会向前发展，还要做工作。这里有洛阳拖拉机厂的没有？

（众答：没有）

总理：农机学院的同志？

（八大总部发言攻击二七公社，表白此次停车事件与八大总部无关）

总理：郑义爽你替哪个来的，对换了你是哪个名字。

（答话发言，后又一个要求发言）

总理：你叫王景安？

（王答后。谈了停车原因，胡说什么军区支持二七公社，广大指战员和人民不满，哭着要把亲人要回去）

康老：军区自己报告的，跟你说的相反（笑）。

总理：从洛阳开的车到郑州，十大总部支持要改变 238 次列车方向，当时“铁军”，都到军管会，叫往北开，说：如果 238 次不北开，别打算从郑州开出一列车。

（十大总部狡辩）

总理：铁道部有人吗？给郑州打个电话。

（十大总部又谈，二七印发戚本禹讲话与停车有关，并交传单。）

戚本禹：（笑）我给你们讲的，二七怎么能听见？我看看。（接过传单）。

总理：黄河水涨，铁路堵塞，如果黄河决口，全民动员，你们各派还闹不闹？

河造总：不闹。

总理：这是对每个组织的最大的考验！

（十大总部念了呼吁书）

康老：要马上尽一切办法，保证铁路通行，抓革命，促生产！可以写么！我帮助你的！你上当的！你不要怕。

总理：十大总部不听么！郑义爽同志，你说的根本不可能吗？（郑辩解说三方代表只到石家庄！）

十大总部财贸代表：二七公社组织不纯，（并威胁说：）要头有一个，说二七公社是造反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康老：二七公社也讲过，你们的组织有些不纯，你不能看一个，不看全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也不能因为那一个组织有问题，不看全体，要看全体。

总理：（拿传单）你看，郑大战斗师，六三赤卫队，说周总理已说：以省工人总部为首的十大总部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说过没有？（郑大战斗师辩解）各个造各个的，你们革命小将不过 30 岁，要老实点，谦虚点，将来到我们这么大年纪，会作更大的成绩。大家都“造”，这最不好，这是彭、罗、陆、杨、刘、邓、安子文叛徒，他们的作风。（指传单）我什么时间说的？

戚：关于我的讲话，你们也可以传达。财贸工人要求读。总理：你就叫常春年？康老：你有材料送上来，签字签到那里去了，去把（财贸代表发言，当他讲到二七公社不要贫下中农，不要红卫兵，不要党员时康生边笑边摆手）（当他讲到一个坏分子是二七的时）字签完。

康老：是那个单位的？

戚：查一查，你看。

总理：粮院王海潮你去查查那个不纯情况，你是粮院的。（对河造总）人家自己开门整风，欢迎你们提意见。

（造总一人要讲，康老摆手不要讲，坐下）

康老：你们刚刚订了协议，你们又违犯，你们相信不相信中央，我讲，你们又把会场搞乱了。

总理：（一工作人员向总理汇报后）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238 车通车了，好事是能做出来的。

康老：都是往后看，不往前看，国计民生，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么，你有材料给我们，可以解决嘛！

（黄造司一女代表讲防汛问题）

总理：你们一共多少人？（答）黄委会呢？（答）二七观点多少人？（答）黄委会真有意思，每一次换代表，黄河水利就你们两派观点（答）没有十大总部，你们可以在防汛问题上达成协议？

二七代表：可以。

（黄造司又讲防汛器材被抢）

总理：谁再抢就抓起来，以前抢的送回来，以后再抢抓起来，你们关于黄河水利达成协议，联合通告，为劳动人民广大利益，你这个女同志，（指财贸总部代表）也是这样，人家愿意达成协议，你就不承认人家是革命，就你一个革命派？

康老：不要你一个人革命，人家都不革命。

河造总：他们是好话说尽，坏事作绝。

总理：你这话不对，态度不好，是骂人的话。蒋介石才是这样，人家骂你蒋介石，你愿意吗？本来我不是批评你十大总部的，你们这样的态度就要批评了，以后要好好说你一顿！

康老：人家达成协议，你在中间破坏。这是什么态度？这是革命的态度吗？

总理：代表就你们两个。达成协议，明天一早钱正瑛去，军管问题我正在考虑，你们群众达成协议军管也好办。这牵涉到河北、山东、江苏、你们东方红有多少人？

二七黄委东方红代表：一千四百五十人。

河造总：五百人，他们当面欺骗总理。

康老：他报多是他们的错误，你报少是你们的错误。

总理：人家（指二七）要达成协议就达么，就是要保证做到，考验考验你们么！

康老：你们签字我很高兴，这正象总理讲的，是个考验，在中央面前报告，签字，这是严肃的事，不是开玩笑，将要考验每一个同志品质的问题，每个组织

的态度问题，这个事情不是儿戏。我相信同志们能执行自己的诺言，因为是革命群众，但又使我担心，从开会情况看，我有些担心，同志们需要注意的。作的时候，我们要坚决执行协议，要么不签字，签字就不能朝令夕改，这不是一个革命者作的。现在军区的同志们几次要求讲话，要听听他们的意见，检讨，何运洪来了没有？（联络员下去找何运洪）

总理：如果三方面代表，把石家庄、安阳、郑州铁路搞通了，这是一个好事情，防汛达成协议，你们三方面都要打电话，任何东西，人力不能挪动，挪用、抢走一个石头一个人、一个麻袋都不行，都要用在防汛上。这是最大考验之一，谁也不能在这个上面讲价钱，今天讲的如果打防汛的人，非抓起来，非严肃处理不行，这是千百万人民的生命问题。

何运洪：（十一点四十五分何站起来检讨。）

总理：坐下。

何运洪：这次来京，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我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二七公社等革命造反派，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而且长期不承认，不觉悟，不改正，给河南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经过中央首长的帮助，吸取了革命造的派的意见，才使我清醒过来，军区犯错误的责任在我，是错误领导的结果。我是有罪的。现在我向中央首长，向革命造反派检查错误，军区支左一开始，大方向错了，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了敌我关系，错误地把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了打倒对象。把郑大联委看成“御用工具”错误地把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二月份连续把斗争矛头指向领导干部，革命群众，没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月中央指示各派赴京汇报。……

康老：二月十七日，主席第一个给河南军区下命令，几次命令他不来，他拒绝来。

总理：主席叫我们打电报，不管左的，右的都来，这件事河南军区犯了大错误。他们要把几派变成一派才来，结果也没变成一派，还是三派。

何运洪：对二七采取了压垮、拖垮的办法，这是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公开与毛主席思想对抗。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非法组织，起了恶劣影响，引起了链

锁反应，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流毒”。让他们上街请罪，军区接待站不仅不制止，还压制，严重地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二、三月抓一批人，是从郑州开始的，被抓的大部分是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党言川也被关押，压制群众运动，破坏了“四大”的正常进行，此影响在全省造成恶果。造反派被打下去，保守势力抬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兴风作浪，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四月底传达了林总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安徽省问题的决定，军委十条命令，给我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但并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我们主观盲目自满，自以为正确坚持错误，把当时二七公社向我反抗当成是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操纵下的翻案妖风，所以四月十六日又重新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并且说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还登了报。打击了郑大联委，我们越来越被动，直到五月二十日才撤消决定，但只承认是作法上的错误，没有认识到根本搞错了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对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尖锐、复杂性认识不足，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保守思想严重，缺乏群众观点，怕字当头，骄傲自满，不爱听不同意见，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我辜负了革命造反派对我的信赖和期望。现在我代表河南军区党委宣布给郑大联委彻底平反，向革命造反派公开检讨，向受害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给他们恢复名誉。责任要由我负，我向毛主席、向党中央请罪，诚恳听取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批评，我诚恳地请求毛主席、党中央给我处分，今后我决心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坚决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公开检讨，彻底改正。坚决不移地和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上只是初步检查请中央首长，总理、康老批评。

总理：（对何运洪）你身体不太好，早一点休息。他作了书面检讨说明了对错误的认识，现在由一军徐文礼讲一讲。

徐文礼：（先念主席语录）总理、中央文革、全军文革、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付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中央汇报期间，中央首长对我们的亲切关怀，耐心教育，开封双方代表对我们的帮助教育使我们受到了最生动，最深刻地教育，对中央对河南问题的正确处理坚决拥护。我沉痛地检讨，对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所犯的

错误的性质是路线性的，错误地提出了口号：“打倒八·二四幕前幕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二·八事件看得太严重了，军队开了五枪，还有三枪没查出来，打死一人尚未查清。总之开枪的性质是严重的。一共抓了 294 人到现在还有 15 人未放。三月十四日赵静生同志在师院宣布“八·二四”为反动组织是非常错误的，在这里我向毛主席承认错误，向“八·二四”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对首都红代会，军事院校汴同学，四、五月份发生了很多错误作法，我们负有很大的责任。这加深了军内外群众的对立，影响了革命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主要原因就是对两条路线的斗争学习不够，认识不清，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在军委十条命令和安徽问题的决定下来后，还没认识到错误。这次汇报，经领导同志耐心教育，热情帮助，才认识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认识的慢，改正的不快，归根结底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我们的错误，如向群众开枪、错抓人，宣布“八·二四”为反动组织，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脱离群众的。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而且没有调查清楚打死了，这是对人民不负责任，不郑重，缺乏阶级感情。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做群众的学生，和群众在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我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既把自己看成革命的力量，又把自己看成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则革命革不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头脑中私字破得不够，公字立得不好，老爷架子，骄傲自满，主观片面，在看待“八·二四”问题上有框框，形成错误。为坚决彻底改正好：

(1)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的伟大指示，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开封问题的决定，一定向山东军区学习，向广大群众检讨，给“八·二四”平反，向他们承认错误，向他们道歉。对开枪打死人的问题，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坚决支持开封市的一切革命造反派。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斗、批、改。

(2) 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3) 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4) 部队和支左，要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景联同志要求发言，揭发徐文礼错误。）

总理：你不是递材料吗？

戚：你下次发言。

总理：你们三方面有了一个协议签了字，我们印刷出来，昨天说八大总部和其他地区发言，让他们发言。

（河造总洛阳地区代表发言：认为军区支左大方向正确，坚决支持戴苏理革命干部站出来，纪登奎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老实检查，开封八·二四，洛阳八一六，新乡八一八是顽固的保守派，他们的大方向是错误的，但只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愿意同他们组织中的群众结合）

总理：你是代表几大地区的？八大总部是不是还有一个人要讲吗？（四个工人总部代表发言：认为文敏生、赵文甫、纪登奎必须打倒，戴苏理是比较好的干部，关于刘建勋问题，中央已经表态，不再喊打倒。认为二七公社没有区别对待，对群众没有做思想工作，在革命派内部拉一派打一派，最近中央解决河南问题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康老：是不是你要求军区继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象过去那样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我听你这个话里似乎有这么一点意思。过去因为你们不了解军区，干了一些事情，这不是解放军的问题，也不是战士问题，也不是军区党委问题，也不是其他干部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抬高声音）是何运洪，当时他那种作法很多同志是满意的。

总理：你们又提到二七公社，下次答复你。

康老：你们十大总部注意这个问题，河造总，你们过去是受蒙蔽的，从二月十七号起啊，你们受蒙蔽。你代表的工人总部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不明白，这不是整个军区，更不是整个党委，更不是军区的所有干部，不是严重错误，而是他讲的，是方向路线错误。他现在要改正错误。

省工总：我们一定要与何运洪做坚决斗争，反对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学红总李广连发言，发呼吁，言二七公社砸其锅，抢其粮）

总理：你们家里来电话了？这几件事，请你们（指二七）查一查。

李广连：他们去年就冲砸了总理办公室。

总理：（笑）我有什么办公室，我的办公室从来没有被冲过。……你讲你现在的，你们过去的材料交上来。

总理：省直机关谁代表？叫什么名字？

丰长录：丰长录。

总理：你代表不代表公安公社？

丰长录：代表。

总理：哪听听你的意见。

（丰正讲时，总理打断话问）

总理：我问你，你们公、检、法在军区的影响下逮多少人？

丰答：不知道。

总理：那你怎么代表？

康老：我肯定你们公安系统里有坏人，同志，我做过公安工作，我懂得。你们逮了多少人，要老实告诉我，掩盖不着的，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与丁石有关系的，丁石来了吗？

戚本禹：我看公安公社可算是保守组织。

康老：这个问题和丁石有关系的。

总理：（对丁石）你不知道你干的什么事情？

丁石：（从角落里站起来，故作镇静地）哪个事情与我有关系？

戚：（气愤地站起来，扇子摔在桌子上）干的坏事与你有关关系的！你干的坏事么！你怎么不知道！

康老：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我问你，过去你做过公安工作吗？

丁石：做过十年，做付处长。

康老：你以后做什么？

丁石：付厅长。

康老：是么，我没有错。

总理：（对省总丰）你这个发言怎么不弄清楚哇？连一点自我批评都没有。

康老：你们有一点阶级感情吗？成千上万革命小将坐牢，你们无动于衷，你们一点也不检讨，摸摸胡子就算了，一点也不检讨。

总理：你对公安系统揭发些什么东西呀？

康老：一点也没揭发，我们不满意。都是空话，你不要讲了，我知道你的。你是代表么！怎么搞的，一点不揭发。

总理：郑州打群架，你们八大总部都没有参加？你这个人不老实！对丁石问题，你们今天晚上可以揭发。我们专意把他找来，他是怎么在幕后指挥的，他是公安厅付厅长，你们是受蒙蔽的，战斗师还讲吗？你昨天讲了很多，简单些！

郑大战斗师：（当讲到因他们冲中南海，总理三次单独接见他们时，他们说这是总理对战斗师的最大关怀时，总理对戚本禹笑了），（战斗师继续发言）（总理和康老、戚本禹在交谈，刘建勋一直在写东西，看文件，不知写了什么东西递给戚本禹，修改后交给总理看，总理看了点点头，又把文件交给康老）

郑大战斗师：……刘建勋同志是在我们广大造反派的炮轰下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的。

（戚本禹、刘建勋都笑了）我们希望刘建勋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刘建勋点头笑了）

郑大战斗师：（发言完。呼口号。）

总理：继续埋头苦干，与造反派联合。快点！快点！完了嘛！你们算八大总部？还是河造总的？

郑大战斗师：都不是。

戚本禹：（对总理说）独立师！

总理：独立师！（大笑）我问你，你说埋头苦干、要联合，现在有一个埋头苦干的事情，就是铁路的问题，安阳、邯郸、石家庄这一线上，很多人都在步行北上。

康老：有些人听到这个消息，他还很高兴！

总理：我要求你们再派三个组，（对战斗师说）我指定郑大战斗师派一个人（对郑大联委说）你们派二个人，十大总部派三个人，不要派公检法，我不信任公检法。

康老：我们不相信公检法。

总理：郑大联委二个，他们一个（指战斗师），好好地大联合。他们犯了错误（指战斗师）你们也有错误（对革联）。我希望你们郑大，好好在大联合上作出成绩，郑大作出成绩。北京有刘、邓，中南有陶、王，可以批判陶、王么！郑

大是全国开始闹起来的四个闻名大学之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大、郑大。北京大学联合也不好么！南京大学两派分裂，交大内部还不错，和社会上闹，你们郑大要做出榜样。

（当谈到王培育翻案时）

总理：你们打内战，被他们利用。搞大联合，郑州、洛阳工人很多，要好好向他们学习，铁道上再派一个小组，河造总三个，十大总部三个，郑大（联委）二个，战斗师一个。铁路已经全线军管了，都分了区，郑州是武汉大军区管，石家庄是北京大军区管。要硬扒车就把头头抓起来，这样子向中央施加压力，不能再等待了。

康老：我们不能再等待了。

总理：去年大串连，造反派和红卫兵上北京是好意，是见毛主席和付帅，一辈子忘不掉。货物积压，受点积压，我们原谅嘛，那是关系到第三代、第四代的问题嘛！大学生都见过了，中学生原来不让来，又说三分之一，最后都来了，有十多岁的、小的八九岁。现在就是解决那个省的问题，那个省的坏人，保字号头头，少数人带领群众起来都到这里来，内蒙搞过。四川搞过，河南也在搞，江西也想搞，全线都断了。东北那边向你们学习，马上成立三个小组，显示你们的力量，说服吗！不回去，向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交待。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要管不了，我就要告诉军委了，抓几个头头。总有人在后面挑动，压中央、内蒙开始地方上动员，八九千人到京说服回去了。又煽动军队来。最后几个军队的坏头头，已暴露出来了。王逸伦这个特务也暴露出来了。

康老：王逸伦这个特务也暴露出来了。

总理：今天就谈这些。你们先回去，关于何运洪、徐文礼检讨，你们讨论一下，何运洪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欢迎，但不要乱传，犯了错误允许改正嘛！你们学好人民日报社论，好好读一读，那里有好些是主席常说的。（二七代表答：团结——批评——团结）

戚本禹：不要传达，起反作用。

康老：刚才何运洪、徐文礼作了检讨，检讨错误是欢迎的，这一点同志们有何看法，可以讨论。他们犯错误，但同志们，绝不能动摇对解放军的信赖和信任，毛主席讲过“三相信、三依靠”嘛！“三相信”……三依靠……绝不能动摇对解

解放军的信赖，更不能在群众中对解放军的信赖有所动摇，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文化大革命最坚强的支柱。毛主席说过：解放军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没有解放军你们怎能进行文化大革命呢？怎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得到一个消息，好的消息，河南出现了好的现象，拥军爱民，革命群众爱护军队、军队爱护革命群众，这是好的现象，这证明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两位同志检讨自己的错误，也是一个好的现象。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在你们还没有把这些问题了解清楚，没有好好把何运洪、徐文礼检讨研究好不要往下面乱传。（戚插话：传不好起副作用）有人乱传说解放军犯了错误，一军犯了错误。要象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解放军。第二，我讲了，何运洪自己也讲了，不是军区所有干部犯都犯了错误，有许多干部有正确观点，愿意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能笼统讲整个军区犯了错误，更不能讲解放军犯了错误。这个问题主要由何运洪负责，不能说都犯了错误，这一点要弄清楚。要爱护我们的解放军。至于一军，他们比何运洪的错误还要轻，赵静生宣布八·二四是反动组织是错误的，徐文礼能初步检查是很好了。一军是全国第一军，野战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错误就改，一军有很多作法有缺点，但八·二四有个口号是错误的（“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不要乱传，要爱护解放军的荣誉，要相信解放军。

总理：那一个组织将军区的话断章取义，或全文贴大字报，都不对。

康老：说河南军区来了个 180° 的大转弯，也不对。

戚：过去冲军区，军区有错误，可以谅解，现在军区改正错误。你们冲军区，你们犯了过去二七公社，八·二四犯过的错误。

总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我们还要再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现在铁路问题，就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不要听到批评就垂头丧气，不要认为你们一受称赞就翘尾巴，这很不好。

戚：二七公社、八·二四要特别注意。

总理：你们的协议，我们印发给其它省份，刚才我来的晚，就是去解决广西问题。一个司机的脖子上打破了皮，一条腿打破了，裤子被撕烂，非要叫交出凶手不可，不然不开车，我接见了他们，我说，受伤了，衣服撕烂过去了吗？车停了凶手又找不到。在铁路上你受了伤，这我们政府有责任，我代表国务院给你们道歉，脖子上伤也好了，我说裤子破了从铁路工人补助金里给你搞新的！他听了

说：我不要了。我要他们团结起来，保证了铁路的运输。我分别送给他们两册政策汇编，铁道上可以有两个组织吗？我们得出个经验，你们工作时间不要辩论，业余时间辩论不要打架，不要和外面联系，铁道本身不要与地方上串联，不然会出问题，要广西做出个样子，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戚本禹关于河南问题的谈话
讲三个问题：

- 一、是对河南军区的错误；
- 二、是省市委群众组织的看法；
- 三、是对军区的希望。

第一、军区的错误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打击了造反派，但不是刘邓路线错误，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说，成都问题是对群众态度问题。四月份，毛主席有个指示，就是对河南说的，毛主席说，冲军区是对军区的信任，因省委瘫痪了，他们就要依靠军区，冲击军区他们住够了就走了。郑州冲军区毛主席说，叫他们暴露一下，以后叫他们谈判嘛！二月叫你们来谈判，你们说只有一派了，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左中右是存在的，以后你们抓人，宣布非法组织，对革命群众施加压力，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强，物极必反，你压他，他就要闹事，把党言川压下去，对群众开斗争会，搞游街，中学生带牌上街请罪，这你们都是知道的。你们二月不来谈判，不管你们有意无意都是与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想把人家压垮拖垮，造成已成事实再来谈判，这是不对的。你们把革命的当成保守的，把保守的当成革命的，这就错了，对领导干部也是这样。你们说人家不学毛著，这样就是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你们是否有这样两个问题：

（1）是把二七公社错误看重了，把河造总错误看轻了。一边听话，一边不听话，斗争很激烈影响了你们对问题的考虑。

（2）是支持哪个是否与刘建勋态度区分，对郑大联委态度是否这样，这样一系列的想下去，就错了。

刘建勋在北京三结合了，郑州就坚决打倒，还要揪出后台谢富治。郑州还出现了反对周总理、江青的标语，你们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表态？十二条你们为什

么不辟谣？看来对你们有利的，你们就不吭气，起码这些很对你们的口味。刘建勋在京三结合了，你们还要打倒，这就与中央对抗，赵文甫写的信很恶毒，你们不报告也不反击，我们看到很惊讶，这样的省委还有没有一小撮，你们支左把左派都揪出了也不到一小撮，这就是很严重的错误。

第二、省委负责人和各派组织，对刘、文、纪三人要作具体分析，文敏生问题最大，刘、纪当然也有错误，刘建勋搞借地是错误的，调北京后表现不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表现不错，这是毛主席称赞过的。（如写大字报，欢迎南下的学生，炮打司令部，到群众中十七个小时不休息等）。对纪的问题，毛主席与你们看法不一致。赵文甫问题很严重，写的信很坏是挑拨性的，搞不好你们会与内蒙古一样。你们说二七公社一成立大方向都是不对的，他们抵制你们，这说明他们对了，跟着你们的相反错了，对二七公社不能从纯不纯来考虑。毛主席说天下没有清一色的东西，坚定的左派只占 15—20%，最多也不过是 30%，从纯不纯看问题就错了，他们打砸抢可能有些过头，但是他们是些年青人，这些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林副主席讲话中指出，要看主流不能看支流。对二七公社问题，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要很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就比较能看清楚了。你们对二七看是否从感情上转不过来，河南武斗是你们压二七公社的结果，二七公社不能说没有错误，但总比你们抓人好得多，这些小将跟小孩不一样，他们很敏感，比我们强，将来要以二七公社为核心搞大联合。

河造总不能说不是革命组织，他们的错误与你们有关，二七没说他们不是革命的，相反河造总说他们是右派。

八大总部对你们不满，但主要是对二七公社，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

第三、对河南军区的要求和希望，要把立场和观点转过来，主要的在于领导立场要坚定，旗帜要鲜明，干脆承认方向路线错误就算了。学习山东三条经验，只要承认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不会降低威信，相反会提高威信。怕丢面子就会更丢面子，这次叫军区自己去承认错误与三派协商搞个典型，你们与各派去谈问题，还是你们自己去解决。要听造反派（二七）意见。不要搞百分比，到群众中要听群众意见，到二七公社方面要主动地做工作，不做就不好办。要去谈，他们说的话不好听也不要紧，错误肯定是有的。你们到二七公社去谈，要多去几次，

你们是否想等中央表态后再谈，那就被动了，二月份你们被动了一次，这一次再被动人家会说中央已表态，你们不表态不行了，这次把主动权交给你们，要吸取四川经验，听康老的话，毛主席说要三依靠，你们不主动就是四川、内蒙的问题，河南军区、一军就是怕字当头，检查承认错误就行了，你们转不过来就是只看人家错误，看不到自己的错误，主席说：“要对己严，对人宽。”现在要公开给二七平反，不是河造总的问题，你们回去以后要开大会承认错误，济南、内蒙都有经验教训，济南杨副司令员、政委公开检查，问题就转过来了，只要你们公开检查，问题就好解决，要召开军分区会，按照总理和康老的讲话去开会就行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

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代表团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期间，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各方代表一致认为：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保证“四大”；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坚决做到：一、不上街游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

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坚决贯彻执行总理七月三日关于“不停产、不停业、不爬车”的指示，以促进河南问题的顺利解决，保证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为了保证上述指示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各方代表经过充分讨论协商，特提出以下六条具体措施，共同遵照执行：

一、立即将“六·四”《通知》和总理的上述指示，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所属组织的全体人员，严格遵守，坚决执行。

二、保证不停产、不停业、不爬车。动员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群众，在本地的应立即返回原单位。在外地的最迟不得超过半个月，迅速返回生产、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

三、保证互不围攻，各方主动拆除武斗工事。

四、凡群众组织之间如有互抓、互扣而未放的人员，三日内一律放回。

五、各方所占用的生产车辆、机具、设备、器材，一律送还原生产单位，用于生产；其它公私财物主动送回。

六、各群众组织的宣传广播车，三日内全部拆除，用于生产。

各方应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遵守上述协议。当发生某些争议时，应互相协商解决。

上述协议由省军区、驻军、军分区和各方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执行。

此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代表（签字）：河南“二七公社”张保怀 党言川 龙一兵 规奇克开封师院“八·二四”李福来洛阳“八·一六”常春波 焦作矿院“八·一八”刘文学平顶山“二七”联络指挥部 赵冠雄河南“二七公社”新乡“八·一八”黄宗万河南“二七公社”信阳分社 郎显庭河南“二七公社”鹤壁分社 王元青河南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 李玉祥河南偃师高中“八·二五”史宏西郑州大学红卫兵战斗师 职承平 傅宗耀河南“造总”刘建亭 王计礼 贺长有 陈金海开封师院“井冈山”张本乐开封市工代会 周树凡洛阳市十一战团 童水盛新乡师院革命造反指挥部 李玉坤鹤壁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委员会 杨得恭平顶山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 王乃斌河南偃师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 侯道宏河南兰考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 杨恒德焦作矿院文化革命联合委员会 曾恒初郑州铁军 郭玉琨省革命工人造反总部 李通郑州市革命工人造反总部 王林 刘开太郑州铁路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 郑义双施松岭河南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 张治安郑州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 芦钦荣 冯昌武郑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 刘广善郑州市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何立本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戚本禹在河南部队领导人汇报工作时的讲话

〔七月九日晚，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政委何运洪和 8172 部队（野战军一军）徐文礼、赵静生向戚本禹同志汇报请示问题时，戚本禹同志做了如下讲话。〕

当何运洪汇报河南日报问题时，

戚本禹同志说：这要和两派商量，和河造总谈一谈，出红色电讯比较合理。

在张、何汇报完后戚本禹同志说：

你们回去几个人先做部队的思想工作，这很好，给中央首长汇报是会同意的，你们可以回去。

检讨很快同群众见面，中央一批时间就不会长了。你们要做好部队工作，不需要层层作检查，主要是你们作检查。部队和二七公社对立情绪这样大，主要是你们过去宣传灌输的结果。如果这个工作作不好，就会出现内蒙的情况，就会有象张杰这样的人鼓动群众来北京。内蒙有人鼓动，四川也有人鼓动嘛！对你们河南，中央是有准备的，准备你们来十万人，别的省也可能来一些人。昨天告诉傅崇碧同志，准备一百万人的接待工作。希望你们学山东，做好这个工作。能不能做好靠你们，你们要承担责任，对部队对群众都要承担。要说服部队、说服八大总部的群众，转好这个弯子，如果搞不好，必然出现内蒙的情况。如果你们中的那个人在后边出点坏主意，煽风点火那就更坏。内蒙王良太就是这样，原来做了多少工作都不行。他把部队弄来，总理、江青、叶群都做了工作，经过教育转过来才认识到他们受了蒙蔽，受蒙蔽只是暂时的，河南会不会有这个步骤，我们是有准备的。总理康老也讲过希望不要出现这个情况，河南地处中原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希望你们作好工作。中央对河南问题很重视，主席对河南很关心，希望你们立新功、赎旧过。你们要做好部队的工作，做好群众的工作。如十大总部他这样搞说明他不顾大局，这就暴露了他，一边谈判，一边这样搞，与中央对抗。你们要教育部队，用部队去带动群众。河南来这么多人，完全是群众自发的是不可能的，不会是没有组织的。我估计中央批了以后，就告一段落，如果部队工作做得不好，就赶不上，所以你们赶快做好部队工作。

河造总与二七公社，以谁为核心，文字上不一定写，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驻马店二七公社力量比较大，要以二七公社为核心。郑州怎么样提，你们考虑，你们在工作上，要依靠二七公社。河造总说他们（指二七）只有 40% 多的造反

派，那就很了不起了，他们是首先造反的，你们那么大的压力，抓那么多人，连党言川这样的革命小将也被你们抓了，就这样他们也没有垮，你们说二七公社不纯，河造总纯么？他们正是在你们支持以后才犯了严重错误，你们抓人他们就不管，你们把你们的电报从头到尾都翻一翻〔注：口头传达时是讲：军区把电报给河造总从头到尾都翻了〕，你们工作的落脚点应该是二七公社，那怕是 40% 的造反派，他们敢于抵制你们的错误，“疾风知劲草”嘛！河造总我说过大部分是造反派，这两个组织不能并提，这你们要考虑，要有一个中心。有一个中心就可避免混乱。你们要敢于依靠反对你们的人，不要有情绪。

关于刘建勋回河南的问题，给中央首长反映后再说。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戚本禹与河南省三派代表的谈话

〔戚本禹接见河南“二七公社”、“八大总部”、“河造总”三派的部分代表。出发前，铁军代表蛮不讲理，因为让他们去两人，就与中央文革办事组及总理联络员吵闹，阻止开车，当即受到中央文革办事组人员义正词严的责备和广大群众的斥责，可铁军代表耍无赖硬爬上车两人。十二时戚本禹同志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代表起立……〕

戚本禹：（手拿八大总部总名单，指二七代表）这那里是八大总部的？这不是二七的吗？二七的我都认识…

工作人员：刚才换了一下会议室，八大总部的到那个会议室去了，到那儿去吧。

戚本禹：你们怎么搞的，那就在这儿吧！让他们先等一会。

工作人员：好……。

戚本禹：你们一派来了五个人（拿起二七名单念）来了吧？

二七：都来了。

戚本禹：十大总部……铁军也来了？

铁军：来一个。

戚本禹：今天我来和你们三派商量一下，上次不是说总理指示你们三方达成协议吗？这很好，有个好的开端，今后对河南问题怎样解决，对河南各派怎样解决，你们三派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拟定一个方案？你们对二七公社怎样分析？

是个什么组织，而对河造总，十大总部又该怎么办？能不能三派在一起商量，你们考虑一下怎么办？而不要象其他几个省份那样，由中央作出决定，如果这样能做好的话，你们写好，中央批准，这样给各省创造一条经验，四川、青海、内蒙……等省中央是下决定了，这里当然有斗争了，甚至是很尖锐的，你们能不能达成统一的那么几条，我们有那么个设想。二七公社那天作了个检查，这很好，总理和我们都很满意，检查了自己的缺点，这很好。第一个是方法有些不对，有的组织搞打、砸、抢。第二个是二七公社个别组织有不纯现象。第三个是什么？

二七：小团体主义。

戚本禹：对，小团体主义，当然，二七公社是个造反组织罗！河造总那天也作了点检查，下来我们听首长议论，在打倒纪登奎问题上，我们还有些看法，我们不同意喊打倒，但是还有些进步了，河造总部分组织是杀出来的，二月以来在军区问题上犯了错误，执行了军区的一套反动路线，矛头不对。对于十大总部，我们是有分析的，公安公社是坏的，不好的，抓了好多人，工人总部，财贸总部和省委机关总部具有区别的。是不是你们共同商量一下，对刘建勋同志可以达成协议了吧！那些能够达成协议就先达成，不能达成的就放一下，要报给联络员同志，公安公社也能达成了吧！二七公社、河造总不都是反对的啦吗？当然这里说公安公社是坏的，不是说公检法都不好了。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达不成的你们向联络员反映，我们再商量，能不能在中央首长同志关心下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实在不行，中央将来再定。上次你们三方达成的六条协议，中央对这个事件是肯定的，上次给毛主席汇报了这个事情，这是良好的开端，当然有个别人也作了不少坏事，个别的要处理，打死人了嘛！

也有的是两方对打误伤，但大多数群众是要革命的，是好的，要向前看了，不久军区何运洪要向全省作检查了。军区有成绩，有错误，主要错误是支左方面的错误，只要你们三方能否在军区检查以后把你们商量的意见拿出来，今天和你们研究一下，一些问题怎样对待，经过你们共同研究，是否对河南的问题达成一个协议，我看你们二七和河造总也说不服，你看怎么办，是打破脑袋呢？还是怎么办？还是商量个办法。不然，坏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钻空子，想尽办法，挑拨煽动看你们打，你们不要上当啊！洛阳有个武装部长，这个人就很不好，这个人在后边挑动搞些事情，就象洛阳拖拉机厂停工总是不对的吧！你

们说是停工好还是共同讨论一个意见好，你们各派一定要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然是作坚决不疲倦的斗争，而对待我们自己的同志的错误什么这一段保了，什么搞过打砸抢了，这些错误要解决，要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如果是敌人，那当然不能那样做，你们这次到这里来的，我们看大部分是要革命的，你们是把二七消灭，还要能把那个消灭，总理不是讲了么？河南各派都有份么？你们能不能开创一个先例，各省问题自己讨论解决，实验一下，不行失败了再想办法，比如：军区抓人问题，你们说对不对，经过讨论，不就认识了吗？哪是对的，哪是错的，你们三派代表或全部坐在一起讨论嘛！会开不起来，不要紧嘛！轮流坐庄，你今天主持，明天他主持，主席对河南很关心，亲自写几个指示，河南地处中南是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交通，军事……都很重要，你们在那里搞三国演义呢！还是怎么办，还是在毛泽东思想思想基础上，很好地解决，当然这不是不讲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毛泽东思想，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改正么。

你们自己在这儿讨论一下，我先给工人总部讲几个问题。现在军区转过来了，这是一个很好地条件，有些东西也就认识了，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有个结果的，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么，铁路中断，这就是个大道理，这关系到国际名声问题，很重要，谁搞谁倒霉。时间短了还好说，长了性质就要变，还有个造反派，中断铁路十八天，一点没有道理，结果越不想承认问题越大，越弄越被动，骑虎难下，一天天压力很大，结果性质就会变，破坏了国家利益，破坏革命，就非走向反面不可，造反是有理的，但你这是没理，一点道理也没有，有些地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骗工厂不行了，现又到农村，去煽动不明真相的农民，这个我们也有准备，四川李井泉搞的产业军，不是讲农村包围城市吗？那是毛主席讲的，我们伟大领袖讲的农村包围城市包围蒋介石，国民党，而军分区，李井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坏人提出这个口号，这是反革命口号，他们包围谁呀，是反动的。对农民一天两天可以欺骗，时间长了，他们必然觉悟，那就不行了，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事情我们那一派都不能搞，不管二七，河造总，还是十大总部。

铁路：（河）上次总理讲铁路军管，不介入地方，怎么理解呢？

戚本禹：就是铁路的两派斗争时，不要再请外面的人，要自己解决，当然要参加河南的两条路线斗争，既不要别人，别人也不包办你们，铁路是个很严格的问题，是不能随随便便的，你们看怎么办。

铁军：我是铁军……

戚本禹：啊，你们这个铁军，是不是作些检查，起码在打砸抢上是很严重的。

铁军：我们是有错误的，在军区……对二七……在四月二十七日前后有打砸抢……。

戚本禹：就这一点吗？我看不是实事求是。

铁：反正前后都有吧（众笑）。但二七是革命造反派，我们想不通。

戚本禹：你们有多少人？

铁：一万多人。

戚本禹：这一万多人你都保证没搞打砸抢，那么有，就由你一个负责。

铁：（不语）

戚本禹：你不是代表么？

铁：是！

戚本禹：对军区的错误是他们二七抵制的，还是你们铁军抵制的？

铁：是二七。

戚本禹：既然是抵制的，为什么不是造反派呢？有些东西认识不理想，你们打回去的电话、电报我都看了，还没有一个是完全正确的。先说二七，你们搞的那个我的讲话，当然有些是确实的，有些是不正确的，结果人家给我们提了好些意见。再说河造总，你们说我们说的大联合以你们为核心，我什么时间说的？

河造总：造谣！从来我们没有说过我们为核心，而流传的是二七公社为核心。

戚本禹：别说了，你们的传单我都有一大堆了，我看你们各派都有小团体主义，以派为重，不是以两条路线斗争为重。文化大革命，这是十七年来两条路线的一个大斗争、大战役，这个战役不胜利，刘少奇上台，不管你们那一派都得抓起来，不然是投降，剩下统统抓起来，什么四大，象青海一样，象赵永夫一样一扫光，什么二七，什么……统统一样，要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省市内党内一小撮坏人，否则让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上台，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了，千百万人头落地，我们都要坐牢，彭罗陆杨上台，还搞什么四大，

他就是抓、捕、杀。你们如果不能把河南搞好，客观上帮了刘邓的忙，如果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团体，那就会迷失方向，别看现在方向对。不要打内战，要联合起来，不要支持错误路线，错了就改嘛！不就完了嘛！当然除了个别在两方打架中误伤外，打死了都是反革命、坏蛋，往死处打人，把人的眼睛挖出来，你们想这样的是什么感情啊！这些都是坏人，这些人难保你们的组织中没有，对在你们组织中的也不能包庇。十大总部和河造总，对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给你们出的坏点子，一定要揭发出来，他们在灭亡以前要失去一切，就丧心病狂地挣扎，采取多种手段，他们喜欢你们群众互相斗，搞打砸抢，坐山观虎斗，破坏生产，真是不择手段，这是决战啊！他们要灭亡，你们觉悟以后要揭发，有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子弟，为维护父母失去的天堂，但有些也是好的，比如向三东，就是和他父亲划清界限，要跟毛主席走。有的黑帮子女，对革命造反派有刻骨仇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要他们回头，我们就要欢迎，全国要都象你们这样子打内战，就要上当。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鬼点子很多，别看现在他挺可怜的，一遇时机他们就又出来的，比如虎子、长蛹苍蝇它们都会装死，等一会突然跑了，这是动物的本能。装死，自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帮家伙能死吗？他利用群众之间的矛盾，你们联合起来共同整他，他们肯定要失败的，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不要以为他们死亡了，到时候他们就又突然跳出来了，那就没有什么四大民主了，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死亡了，可以打内战了，那就上当了，那就要犯历史的错误。二七、河造总、十大总部，你们想想看，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刻骨仇恨，为什么不能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呢？二七工人总部那么多学生，那么多工人都是不好的？我看大部分是革命的，老工人、党团员犯了点错误不奇怪，不要以为人家犯了点错误，改正了就可以联合。我走过一个工厂，树立一部分老工人、产业工人、党团员，文化大革命中站在党团员一边，但我知道这些人并不是坏人，站在保守派一边，这里有好多原因，过去受了黑修养的影响，比如过去北京市委贯彻的一套就是黑修养，再者长期以来，对党有感情，长期以来，把党委书记和毛主席，和党并列联在一起，因此他们不能接受，打倒党委书记就是反党了等等。而革命造反派中又有一部分人是吊儿浪当，有的长期对领导不满，还有的有个人主义，造反派一起来，因此老工人，党团员都看到这种情况

就更保了。他们还说，你们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家伙！加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挑动，就更厉害了。这里说一句，你们决不能用这一点来攻击造反派，我去一个工厂，一个工人说我，你认识的那些人，没一个是好人。我说那么你不是好人，事实证明大部分是好人嘛！你们说他保我可以理解，但坏，我不相信，有的老工人作用很大，他可以说服好多人，两派对立时就有这种观点，更严重的是打起架来，保守组织中的工人、党团员他们在困难时期很坚定，还能教育别人，表现很好，以自己过去阶级苦的亲身经历教育青年。而造反派中，我说我不揭你们的底了，但这里再说一次，绝对不能拿这一点攻击造反派。这些问题从历史上看，你们比我们体验得多，打了架你们冷静的坐下来想一想，过去有的青年表现不好，但在这次活动中，造了反，有了很大进步这就很好，你们不要光看人家过去的缺点嘛！有个工厂，一个调度有历史问题，有一个工人非常清楚，这个工人吊儿浪当，这个调度对这个工人非常打击，因而这工人小病大养，他一次也没有得到奖金，对调度很不满，因此这次运动一开始，他就造反，揭发出很多修正主义的东西，记得非常清楚，一年一年的揭发，那个调度给特务情报，保密厂这样的人当调度当然不合适，就要调动嘛！第一个他写了大字报，我看了大字报的质量还很高，揭发很具体，文化大革命人家造了反了，大家不服气，但是从此以后，人家表现很好，大改样子，小病不休息，一个新的面貌，他成立新的组织，刚成立都不参加，后来这个同志进步很快，也取得了同志们的信任。所以说对造反派要分析，过去不好，还要看现在，不能因过去不太好，而不看现在，造反派也不要看人家错了一段，不看全面，要全面评价考查每一个同志，不能武断片面。就拿斯大林的问题要三七开，有很大的原则错误，我们的主席还三七开，对同志是不是还采取这个办法？但对敌人没有什么开不开，就是一棍子打死，没有一个敌人还是好的，对敌人没有什么谅解，对变节分子没有什么评功摆好，敌人没有什么好坏之分。都是坏的，都要打倒，对同志过去犯了错误，只要改就联合，改正就欢迎，不要去煽动对立，要开展自我批评做好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我们的愿望，希望你们讨论，大的问题解决了，具体问题你们再研究，人最容易感情激动，激动就什么也干不好。

老保：二七公社抢公粮了！

二七：我们的汽车送公粮，你们抢了，还反咬一口，真可耻！

戚：这些具体问题不说了吧，据我们的了解，河南小报很多，但差别很大，你说这些要调查。

河造总：我们有证据。

戚：河造总吗？！你们要注意，如果大联合搞不起来，要拿你们河造总是问。我越（来越）发现你们的问题很多。

铁总：戚本禹同志今天的讲话我很佩服，我以为你从不理解工人运动，今天的讲话还是很理解的，上次你说我们八大总部都是保守组织……

戚：我说你？！我看你就象保守的。

铁军：上次你就说我们是保守组织。

铁路：说了。

戚：大家都谦虚点吧，我不想在这里争论你们这事情，你们说我说了，没关系。你们也可以按这个传达吧！军区的错误路线你们就是保了嘛！改正了就不保了，再造反嘛！（铁路支吾不语）只要我那样说，你们就那样传达，的确有一段保嘛！你们当时气焰很高，请你们开会都不愿来，我们认为你们当时那个思想是不好的。军区抓人，本来就不对，你们还指向毛主席，我是不能容忍的！我的脾气本来不是那样的。当时我很气愤，我还压了呢！就拿联动来说，主席说：小孩子，放了他们，对李洪山也没抓，让我们接见了他们，……（铁军：……）你们不是土联动？（铁军：我们不是）毛主席对群众不是用抓的办法，你们把抓人强加于主席，世界上从古到今那有那样的领袖，河南军区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向八·二四开枪，他们的检查，中央是不满意的，开了五枪，打死了人，还说不知道，（对二七）你们不要对军区施加压力，让他们自己检查，军队是伟大的，主席让他们介入，开始认为只要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就是好的，既然错了，大部分是认识问题。

（铁路辩解刚才说的上次接见的情况。）

戚：你这个意见是拿主席来压我，同时把河南的问题加到主席身上。什么抓人是根据八条命令，八条命令是主席批的，难道是主席让你们抓人了？（指省委总部）你们怎么不说一句话？到现在为止我对你们有意见，军区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你们让工人出来讲，你们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话，党性那里去了？坐山观虎斗，错了也不圆圆场，坐在那里听到不符合党的原则，听之任之，这是自由主

义第十一种，对你们省委总部印象不好，有三种或是缺乏敏感，一种是兴灾乐祸，他们还可以原谅，但你们不行！你们可不能这样认识，你们干部是整天研究学习党的政策，难道党错了吗？千万要相信党中央，抓人问题先不说，但打死人要处理，不管那一方不能包庇，铁军，打死人了没有？

铁军：没有，刚才你说“你们是土联动”，上次你说“你们铁军成绩我早知道了”，这次又问我们打死人没有。我们铁军是一贯不主张动手的，不打砸抢的，我们大部分都是造反派。

戚：我对你们的印象不太好，起码军区问题你们就保了嘛！打砸抢没有吗！？要老实，你现在不要和我争了，你们自己总结缺点错误，我想你们对你们铁军自己的错误缺点认识还是很不够的。你们说造反，既然造反你们对军区错误路线就没造反，上次会还说，大方向是正确的！（指军区）保了几个月。今天就到这里，以后再说。

铁军：我们要求单独接见。

戚：只要你们达成满足五千万河南人民的协议，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觉，我也接见你们。

6

中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周恩来戚本禹与赴京汇报的河南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

〔河南省军区、一军和河南驻军赴京汇报的领导同志出席〕

周总理：

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还不错，中央转发了！各方群众组织达成的协议，中央也转发了。这对军分区、县市人武部认识错误，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有好处。

中央批示上写了，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和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文、赵这两个人挑拨关系，你们过去没有看清，经过揭发，现在你们就看清楚了。

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工作中虽然犯了某些严重错误，在十一中全会以前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错误，当时在全国来说，都程度不同地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要看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建勋同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调到北京工作，对自己错误作了认真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是个革命的领导干部。

陶铸提议把刘建勋同志调到北京加强北京的工作，中央同意了。陶铸就利用刘调到北京的机会，把文敏生搞成代理第一书记了。

文敏生是新四军五师的。文在五师的时候，李先念同志就发现他是喜欢搞小名堂的，后来文调到中南，李先念同志也提醒过陶铸的。后来纠正河南吴芝圃的错误，把刘建勋同志和文敏生调到河南，两人的关系就搞不好。文在代理第一书记期间搞了很多花样。

赵文甫给你们信，康生同志看了，是挑拨离间的。赵文甫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建勋同志表现是不错的，结论是肯定的。过去有一些省委书记站不出来，就是当官做老爷，离群众太远。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省委书记站不出来。刘建勋同志在第一书记中是好的，他在河南是敢字当头。到北京后，被揪来揪去，表现也是好的。刘建勋同志，还有吴德同志，把这个彭真、刘仁搞的旧摊子搞起是不容易的。彭、刘虽然不在幕前指挥了，但他们是后台，下边出来搞，李雪峰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被揪住不放。后来刘建勋同志调进来，也是揪来揪去，常常都是几天都回不来。

河南省要成立以刘建勋为代表的有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的筹备小组，领导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看了你们的检查报告，这是很好的，我们欢迎你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本来主席和林副主席已经看了，批了还是叫你们先学习一下，把思想搞通。

现在洛阳问题很严重，要来五千人闹，不回去。洛阳闹得很紧张，他不同意二七公社是造反派组织，他把交通中断。这个问题，军分区是否认识得很清楚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是否都认识清了。

开封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八·二四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一军、军分区、市人武部是否都认识清了？如果认为错了，要给群众做工作。

你们的检查报告虽然已经批了，先发给你们，你们讨论一下，看还有什么意见。张树芝、何运洪同志你们先看一下。你们要前进，你们要给群众做工作，要和群众见面，可以给一点时间。

张树芝插话：我们现在正在召集分区、驻军领导同志开会，我们已经给同志们讲了。我们还搞了个向群众公开检讨的声明，已报请中央审批了。

戚本禹插话：中央已经批了你们的检查报告，不再批你们的声明了。

张树芝插话：我们和驻军同志研究了纠正错误的十条措施，很快就报请中央审批。

总理：你们搞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余嗣贵插话：我们建议刘建勋同志回河南工作。

戚本禹：中央已经决定刘回河南搞筹备小组。

余嗣贵：我们就在公开声明中写上一条支持刘建勋同志。

总理：可以增加上这一条。

你们在讨论过程中，你们和家里打电话、通信，对错误是个逐步认识过程，这是许可的。你们来了一个多月了，有个认识过程，这是允许的。既然认识到错误，就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改。但是人的认识过程总是参差不齐的，这就要把工作做好。你们在这里我们做工作，有的思想不大通，在电话上受到家里的一些影响，在情绪上有所流露，就影响很大。内蒙就是这个问题，前面谈的很好，背后又搞一套，来压中央。地方的群众劝说回去了，军队的又来了，结果又搞了第二次。四川也有类似情况。

河南一定要注意反复，你们认识多少就谈多少，没有想通的就讲出来。我们告诉你们内蒙、四川的经验教训，就是免得反复。你们认识多少，就向地方讲多少，地方想不通的，就反映给我们，帮助你们解决。

元月份，主席给你们五大任务，就是“三支”“两军”任务。你们离群众太远，没有思想准备。你们在支农上有点经验，因为部队也搞了农业，军训上也有点经验，不过是属于灌注的。河南在支左上的错误较多。这是一、二、三月份的情况。四月份，发了十条命令，主要是讲爱民的。江青同志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了，八条是拥军的，十条是爱民的，这样就完整了。十条发表以后，群众有了根据，就又起来闹了。八条对你们有利，你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来发表了十条，对群众有利，冲你们（有的地方还有夺枪的），你们没有思想准备，又闹起来了，所以以后又发表了“六六”通令。这次来把思想搞通，好好做工作。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又是领导干部，犯了错误，就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好好改正错误，改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你们要好好讨论，不要有反复。

你们看还有什么？

张树芝：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贯彻执行。

徐文礼同志汇报了释放八·二四领导人陈红兵的情况，并提出对现在支持的这一派怎么办？

总理：群众组织嘛，是不会叫他们解散的。过去受你们压制的那一派，现在是造反派了，你们支持的那一派，因为军队支持他，必然要发展到跟军队一块压制对方，这样是左派的就比较少了。他们没有独立思考，你们把责任担起来就行了，他们比较接受教育，他们受了蒙蔽，转过来靠拢左派，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和左派联合起来。这要有个过程。这种反复今年就搞了几次了，去年还更多一些。经过这些反复，教育和锻炼了群众。在和平的日子里，经过这些阶级斗争，就教育了青年一代。

现在几派群众在一块签了字，大家都是平等相待。你们在部队中进行教育，不要说他们坏，主要是你们领导，错了就痛痛快快地认错，就改正。你们可不要动摇了，电话上给你们说几句就软了，这就麻烦了。

何运洪：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贯彻执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

总理：你们明天讨论一天，可以回去几个人，真正认真地做工作，要召开一系列会议，要有一个工作过程，要把真实情况反映上来。主席说，把时间估计得长一点比估计得短了好，把困难估计得多一点比估计得少了好，把情况估计得坏一点比估计得好一点好。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但还要实事求是。

你们也要估计到部分地区出问题，你们要把错误引向自己。内蒙就有这个问题，不仅两派在斗，一派出来打吴涛，而另一派很高兴，没人出来制止，正好暴露了他们自己，结果只好那样处理。

就谈到这里，你们明天讨论一天，晚上把情况反映上来。

、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戚本禹刘建勋接见河南各方代表谈话纪要

〔时间：1967年7月14日晚10点10分，地点：人大会堂南会议室。出席：二七公社，河造总，十大总部各五名代表，郑大战斗师一名代表，中央文革办事组同志，军区动员处参谋。〕

从西苑旅社上车时，河造总一代表强行上车，无理取闹，被文革办事组的同志赶下车来……，戚本禹同志未来之前，只有刘建勋同志在会议室，我二七代表与刘建勋同志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我代表向刘建勋同志汇报河造总放火烧了二七公社8·16大楼。三厂、五厂省工总赶我工人出厂，工人被打，被抓；陈副司令员从北京回去被铁军扣住等严重情况时，建勋同志甚为关切。问：“是否报给了中央，戚本禹同志知道吗？”……几十分钟后，戚本禹同志派人把刘建勋同志叫去。

戚本禹（以下简称戚）：你们三方协议达成了吗？谈得怎么样？（看名单）张宝怀你谈一下吧。

二七：两天来我们谈了两次。第一次会谈，铁军有意转移主题，谈郑州武斗；第二次河造总又是如此，而且，某些组织一再拖延时间，因此，正式协议没达成一条。

河造总（辩解）：不是那样，有几个方面达成了。二七冲我们批判文敏生的大会，今晚还调动几千人，围我省一技校红造联。

二七：刚才河造总提的问题，在今天协议会上已经提过了。会后我们挂长途电话进行了核实，两个事都纯属造谣，并无此事。挑起武斗，放火杀人并非别人，是河造总，省工总。我七中 8·16 大楼被河造总省一技校的红造联放火烧了，几十名红卫兵被迫跳楼，三厂、五厂的二七工人被打伤几十人。

戚：跳楼的红卫兵死了没有，伤了没有？

二七：伤了几十人，死的还正在调查，现在还不清楚。

戚：烧的七中“8·16”？

二七：是。

戚：是谁放的火？

二七：是围楼的人，是河造总的。

河造总：是他们自己放火烧的。

戚：楼上的人是谁？

二七：二七公社七中“8·16”的。

戚（对河造总）：他们自己烧自己？我就不相信！

河造总：是他们放的火。

戚：二七公社自己烧自己的人，这个事情（转对秘书）你快去查查，打长途电话，问我们的记者。

戚：你谈，是谁烧的楼。

二七：今天上午 11 点火才熄灭，他们浇了汽油，还加上木材，当时卫戍司令部、军区都去了人，开去了两部救火车，他们不让救，把车推跑了。

戚：谁推的？

二七：围楼的人。

戚：谁围的？

二七：河造总省一技校红造联。

河造总：是他们自己烧的。

戚：他们的楼，他们自己烧，我们的人民大会堂，自己烧。哪有这样的事！你这样说谎话不行啊！你们自己达成的协议，自己撕毁。

铁军：我们五天之内两个战士被杀，一少年铁军黄××被二七骗去，……另一个也是二七（铁军说二七杀了他们两个人）

二七：这个事情我们也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一个是铁军互相打架时打死的，一个是河造总打死的，与我二七无关。

戚：（问铁军）你说都是二七打的？

铁军：（吞吞吐吐）嗯，就是。

戚：你要调查清楚，你不要说这个问题，我问你，你听没听说你们把陈副司令员绑架了？

铁军：没听说。

戚：怎么没听说，光听说那一方面的（指他们造谣说二七打了他们的人），就没听说这方面的。这么大的事，你就不知道？

河造总：（又站起来说二七公社的坏话）

戚：（对河造总）你说的是陈副司令员的事情吗？你知道陈副司令员被关了吗？

河造总：不是，我们不知道。

戚：这么大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

造总：……（无言）

戚：军区来人没有？

杨松峰（军区的）：来了。

戚：你听说没有？

杨：这个人确实是死了。

戚：你说什么？！怎么死了？！

杨：（目瞪口呆的摇头）嗯……

戚：我问你陈副司令员的事情，你说的是什么？

杨：（恍然大悟）啊，我说是刚才铁军说的那个事情。

戚：我问你陈副司令员的事，你听说没有？

杨：我来的时候还没听说，到这里才听说。

戚：这么大的事情，你们的司令员你就不关心，你自己的司令员被绑架了你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谁的秘书？

杨：我是参谋。

戚：谁的参谋。

杨：动员处的参谋。

戚：你是跟谁来的？跟何运洪吗？

杨：嗯，是工作人员。

戚：工作人员来几个？

杨：来六个。

戚：你回去跟何运洪讲一下，他要求让陈桂昌回郑州，我们同意，但他又不给他（指陈桂昌司令员）任何安全保证。

二七：不但陈副司令员，所有支持二七的军区首长，都没有安全保障。公安厅高大同也被绑架走了。

戚：陈桂昌是好同志，是军区中支左的好同志，陈桂昌你们说让回去，我们同意，回去了又不加保证，你们搞什么名堂？我很怀疑。

戚：（问铁军）你能代表铁军吗？

铁军：能，但这个事我不知道。

戚：你怎么只关心一方面的，怎么不关心另一方面的？

铁军：如果是我们干的，保证马上放出，并作检查。

戚：你们要保证陈副司令员的安全，要打电话回去。

二七：（送焦作电报）

戚：这是陈桂昌的吗？

二七：不是，是焦作来的电报。

造总：（造谣说二七围了他们省一技校红造联）

戚：（看二七代表送去的河造总的造谣传单）你们这里来的都是协商文件的吗？

十大总部：我们有的不是，来时是点名。

戚：点名，谁点名？

二七：我们全是。

戚：你们中间有参加达协议的吗？

十大总部、河造总回答：有。

（二七代表把军区副司令员刘大坤 7 月 10 日的讲话，河造总铅印的传单送给戚）

二七：军区动员河造总，7月10日在郑州市体育场，开了一个几万农民大会，还大搞经济主义，刘大坤代表河南军区发言，坚决支持河造总。

戚：军区的同志，有这个事呀？

军区：有。

戚：这是那个人的讲话？

二七：刘大坤。

戚：刘大坤是什么人？

二七：河南军区副司令员，跳得可高。

戚：（从头到尾很快地看了一遍刘大坤讲话的传单）这个讲话是错误的。嗯，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你回去和何运洪讲一下。（对军区）这个是对抗中央指示的，这和你们军区的检讨精神完全相反。你们一方面在北京检讨，一方面副司令员在家作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倾向性是很清楚的，我要求你们对这个东西要做出说明，你们认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另外，对怎么开的那个会，你们要写个说明。

二七：我上次接总理指示，7月4日到郑州解决铁路停车问题，接触到钟政委，董参谋长，他们都说：我们现在、过去、将来都是坚决支持河造总的，从来没说过支持二七。

戚：（抬手，手中拿刘大坤讲话传单）这个文件和讲话（指政委）有关，你（指秘书）念一下中央文件，（这个文件和郑州农民开会有关，提到河南了。）

秘书：（念）中共中央文件，中发……

戚：你念一遍，我给各个组织一份，下去抄一下。

秘书：（念完文件）

二七：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坚决捍卫中央决定。

河造总：（发牢骚，仍想攻击二七公社）

戚：（对河造总）你看，二七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了嘛！你们呢？

河造总：（慌忙地改为）我……我们也坚决…… /

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嘛。文件上点了河南的名，河南的这个事情。

（他们纷纷表态）

戚：大家都要执行，农民还有生产任务嘛，让他们进城，还给他们工分，谁给呢？（给军区文件一份）文件要带回去。现在是不是集中起来协商问题？

铁总：（十总之一）我讲一点，铁路停车……

戚：这应当由谁来负责，谁搞的？

铁总：我们认为……

戚：这个事情和我们的看法差不多，不光是洛阳的，这里面有问题，我正在调查。

铁总：这是安阳的报告，和我们调查基本相符。

戚：这执行中央决定，不要拦车嘛。

河造总：二七在信阳、南阳地区搞了个九条，六条，说是中央文件。

戚：谁搞的？

河造总：二七公社。

戚：（那张传单）是不是根据传达搞的，是不是军区在中央的检讨搞的，河南“军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也符合中央意思，不过不能公开地乱写传单。

省工总：（立即起来要说）二七……

戚：你坐下，你是工人总部的，你说人家，看看你们的。那天我和你们谈了一次，你们就发传单，你们说我承认你们是造反派。那天我批评你嘛，批评你们保军区的错误路线，没有谈及到你们组织问题。

省工总：我们没有搞。

戚：不是你们的？反正是那天来的嘛。你们这样做，正是硬逼着我们说你们是什么性质的嘛！叫我们对你们的组织表态嘛！你们想想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我对你们工人总部是有希望的，你要说我们承认了你们是造反派，硬要逼着我们表态，你叫我们怎么办？对工人我还是不愿意说那样的话的。不太愿意说你们是老保希望你们改正错误的，对你们有希望但我们是原则性的。

你们二七也不要把工人总部说成老保。工人嘛，只要起来造反，不分早晚，都可以嘛！我们要欢迎。十大总部是不一样的，公安总部是保守的，省直总部有问题很复杂。有坏人操纵的，对待工人嘛不要说人家保了军区的错误路线，就说人家老保。中央没有这样说嘛！你们这样很不利于团结。工人同志嘛大多数是好

的，受些黑修养的影响，有的也是一时弄不清楚，有的有私心杂念，犯些错误，但不要看太严重了。不要叫人家老保。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么可以斗争；但要讲究方式。只要人家不再支持军区的错误路线愿意起来革命，我们应该欢迎，不应该叫人家老保。

省工总：我们有个初步检查想表一下态。

戚：好嘛。

省工总：（对刘建勋、何运洪、公安总部、二七公社等问题作了一些检查）

戚：你和家里商量了没有？

省工总：我们和家里说了，家里还作了修改。

戚：建勋同志，你听了没有，有些问题当然是他们认识问题。但总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你们对二七公社还要再提高一些。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嘛，有个别组织不纯，总是难免的，恐怕你们那个组织也不纯吧，你们就那么纯？我就不相信。康老说了嘛，二七公社造反派。总理也说了嘛，二七公社造反派。当时军区的错误路线谁在抵制？二七公社，还有八·二四嘛。但是现在肯定他们了，他们又骄傲了，内部又闹分裂闹风头。（这时服务员进来对戚说：叶群同志给你来电话）你们等一下，我们出去一下。

（刘建勋和我代表谈话，一会戚本禹回来）

戚：你们谈好了吗？

省工总：最近我们有个希望，希望刘建勋同志去主持三结合。

戚：（对建勋）过去他们反你，现在要求你回去，这很好嘛！（对省工总）建勋有些缺点和错误，但能主动地迅速检查和改正这很好嘛！中央是信任的，你们呢？

省工总：坚决支持，坚决拥护。

战斗师：坚决支持。

戚：你们二七不要讲了，你们是很支持刘建勋的。

财贸：（谈协议）

戚：省工总还表个态，你们呢？

财贸：我们上次写了个东西，已经交给你了。

戚：联络员同志，把省工总和他们的那个东西印出来发给大家，二七公社都发表声明了嘛。

财贸：我们最近总部服务组提了几条意见。

戚：你们“二七”，我们刚才讲过了，你们过去是受压制的。但是现在肯定了你们，你们对待其他组织会不会象“赵太爷”那样，不许人家起来革命？你们的那三个缺点还是存在的。（秘书将长途电话调查七中“8.16”情况交给戚，戚看后）你（秘书）把这个给大家念一下。

秘书念：我们的记者来电，事情是这样的，铁军×××在图书馆里看书。七中另一学生×××去偷书。×××不让×××偷，×××就拿起火钳照×××背心刺去，×××受重伤，医疗无效死去。铁军造谣编说“二七”公社给打死的，但这两个人都不是“二七”公社的。这样就以“二七”公社七中“8.16”打死人为借口，河造总省一技校红造联等包围了七中“二七”公社“8.16”战士，并放火烧楼。楼上主要是“二七”公社的战士。另外粮食干校也发生了武斗，放火烧大楼了，也说是“二七”公社烧的。

戚：这回清楚了吗？放火的人你不要认为找不着他，等两个月后以后，我们腾出手来，总可以找到他。那要处理的，那一派也不行。

二七：我们回去马上调查清楚。

造总：（无奈，只好承认）我们回去立即查清。

戚：你们是不是尽快地搞个协议，不要搞的太繁琐了。你们“二七”不是搞了个声明，你们都可以搞一个嘛！十大总部今后不要叫十大总部八大总部，因为这里边有区别的嘛。公安公社很坏，省委总部有问题，我看有坏人操纵。是不是就几个大的问题，各摆一下观点，就其目的达成一个协议。个别问题回来再说。不要复杂，订上几条，比如军区是不是方向路线错误？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达成协议，你们怎么看？另一条对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究竟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文敏生，赵文甫，还是刘建勋？第三，对刘建勋支持还是反对？

二七：关于省委当权派问题，经过两次协商，第一次协商时，除河造总刘介廷对杨蔚屏态度暧昧外，所有其他代表的发言都坚决打倒赵、文、杨，本来可以达成协议，但是有的人保……

戚：（摆手）可以了，可以了，杨蔚屏达不成，可以写个文敏生，赵文甫等一小撮嘛！这一“等”就进去了。另外，是二七公社，（对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过去你们抓人家的人，中央认为他是革命造反派，你们不同意，达成协议，是革命造反派（对其他代表）你们怎么看？同意就达成，不同意就算。

河造总：我们同意，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

新乡李玉坤：我们同意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

戚：二七公社有几个缺点，我们已经和他们讲了，为什么要肯定，如果不肯定，抵制军区的错误路线怎么体现，怎么叫方向路线错误呢？“二七”抵制了军区的错误路线，军区镇压了群众，他们抓了“二七”那么多人。

新乡李××：耿其昌也抓了人。

戚：耿的事慢慢来，能达成就达成，有几条写几条，不行回来再说，搞个补充协定，第三次补充协定都可以么。

铁总：我们希望铁路总三派坐在一起，搞个协议。

戚：那好嘛！你们“二七”的也有人吗？

二七：有。

戚：你们铁路三方面有多少人？

铁总：我们一万一千人，河造总三千人，“二七”一千人。

河造总：不对，我们九千多人。

二七：我们成立了铁路工人公社，可能有一万人。（吵）

戚：（对“二七”）人家一说你们人少，你们就沉不住气了，说你们人多。你说你们的人多？我才不相信呢！人少才是实际，因为都反对你们嘛！谁敢参加！真理不在于人多。马、恩他们开始只有两个人，后来发展了，就我们中国有六、七亿。除地、富、反、坏、右外。不在乎人多，看你们方向对不对。你方向不对，就不能代表真理，人多也是庞然大物。

铁总：我们三派分歧不大，从未武斗过。首长给我们提供大联合方便。

戚：你们三派协商吧！我支持好不好？军区准备作了检讨，写个声明，这个声明支持造反派了，但也没说哪个人是保守的。出来之后我看见了。二七公社你们过去是受压制的。他们发出之后，你们要欢迎。军区有两面派，我现在当着军区的面这样说，你们革命派要进行斗争。但方法要注意。两面派是暂时的，广大

的干部是要跟毛主席走的。如果有人，不管是军区的，还是省委的，还要搞些花样，你们要斗争。另外，不要以为结合你们，你们就认为当上官了，不要官官相护。如果有两面派就要不含糊地进行斗争，不能没有原则。两面派不怕刘建勋，也不怕中央文革，就怕群众造他的反，他一出来群众就揪他。也许没有，有待考查。相当复杂，斗争远远没有结束，现大才刚刚开始，要有个准备。不要太紧，一急事就不好办了。是不是今天就到这里，下面我还有事。

八·二四：是不是一军（野战军。开封驻军）的我们也搞一下。

戚：“八·二四”与井冈山，你们是不是关于一军的问题，也协议一下。你们是否除几个协议外，也能关于一军的问题达成个协议。洛阳的来了没有？

洛阳：我是“十一”战团的，观点和河造总差不多。洛阳也有三派。

戚：现在搞罢工、拦车的就是你们吗？

洛阳：不是。

戚：那是哪一派？

洛阳十大总部：也不是我们。

戚：洛阳“八·一六”来了没有？（没有）

戚：怎么没有让他们来？（指办事组）

办事组：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只让通知那一派，没让通知“八·一六”。

戚：我写了个条总理批示，让三方面都来。总理不是在那上面批示了吗？要“八·一六”来同样的代表。你没看总理的批示吗？

办事组：看见了。总理值班室打电话说没通知“八·一六”。

戚：你按文字的东西，不要按电话嘛！要通知他们来。你看什么时候能来？

办事组：明天通知他们来。

戚：这里的代表，加上新来的，组成洛阳代表团。怎么组好，你们看。我们要见他们一面。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建勋同志还有什么问题？你再和他们扯一扯。

二七：（指中央文件）让我们带一份回去。

戚：可以。以后交给联络员。

开封“八·二四”：我们开封也搞个协议。

戚：好吧！试试看，搞不出来再说。

戚：（对工人，我们要求你，再给我们读一次）你们，我不谈过了吗？刘建勋同志，你也可以和他们接触接触。你们要尽快地达成协议，中央好批。你们来的时间不短了，你们要回去了。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前进了一步。现在中央就等着你们的协议。

二七：我们要求戚本禹同志单独接见“二七”代表。

戚：好！好！

铁总、财贸：我们也要求……

戚：让建勋同志接见你们嘛！

刘：好么？今后见面还很多。叫我回河南，我同意。我参加了两次会议。我看双方过分对立了。观点可以不同，连人数都对不到一块。大家要冷静下来，要坚持真理，错了就改嘛！就到这里散会好不好？

工总、财贸：再说几句吧！我们很愿意听。

刘：以后我还要分别和你们谈话嘛！好不好？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河南造总看得远战斗队：《与清华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同志座谈纪要——供河造总战友参考》

……为此，该文只供河造总内部传阅。

一、刘建勋问题

我们问：同志，你认识唐伟吗？

414 同志答：认识！认识！唐伟是我们的战友，他对我校文化大革命贡献很大。他是一个好同志。

（按：唐伟对河南文化大革命“贡献”更大）……

问：蒯大富在河南问题上的作法对吗？

答：蒯大富支持二七公社的目的是实用主义的，他在刘建勋问题上押了一个宝，为的是把唐伟打下去。同时把他的一批战友也打下去，以实现蒯大富个人和其小集团的集权。因此对蒯大富来说，河南问题无所谓正确不。搞赌博嘛！胜利了是一个“赌”字，输了也是一个“赌”字。没有甚麽无产阶级原则可言。但是在客观上来说，唐、蒯在河南的作法折衷一下可能对河南文化革命更有利。

（按：两条路线斗争怎麽能折衷？）

（按：恶毒攻击蒯大富，不知道唐伟在河南又押的甚麽宝？）

问：你说唐伟和我们河造总搞刘建勋对吗？

答：……後来我们理解了，因此我们不喊“打倒蒯大富”的口号……要有主要矛盾的概念，一个时期主要矛盾只有一个，搞多重心，主要敌人是会跑掉的，革命就要失败。在目前历史条件下，我认为你们和刘的矛盾是人们内部矛盾，……文化大革命不祇是一次。

（按：无非说，目前不能打倒，以后再……）

二、河南革命大联合问题

问：听说中央肯定了河造总是做为联合核心的造反派，同时也肯定了二七是犯严重错误的、组织很不纯的造反派。此外传说战斗师铁军等也被肯定了，而对八大总部未有绝对否定。你认为此消息可靠吗？

答：从“文汇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杂志近来社论及中央处理各省、各市、各院校问题的方法分析，我认为这个消息完全可能是可靠的。

问：为什麼不绝对地否定八大总部呢？

答：八大总部大部份不是甚麽保守派……二七公社用敌对的办法对待八大总部其後果是不堪设想的。

第一（略）。第二造反派和他们的矛盾，特别是二七和八大总部的矛盾还会向敌我矛盾转化。武斗风会更猛。第三，……相反，河造总这个较好的造反派有可能被二七极左思潮冲垮。文化大革命就会走弯路。……

问：那为甚麽不让二七当核心呢？

答：……再说二七公社，它们是一种极左思潮，它的组织很不纯，在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冲击时，它能起一定作用，但是这种思潮的组织不能成为核心来主导运动。第一，极左的特点，排斥一切，搞集权，也就是以他为核心的政权不可能真正代表工农。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团派思潮就是最明显的一例，章了权，用坏人去镇压逆流“托派”，排斥一切。结果统一的清华井冈山祇好分成两半，，当然最後清华是要联合的。但再联合起来，“核心”就要转移了。党内历史证明极左思潮可以改造利用，而不能掌权，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得到证实了。第二，在河南二七极左思潮已经产生了很坏的效果。……严格地说由于二七组成很杂，思潮极左，它和其他组织的矛盾特别是和八大总部的矛盾有一定成分是地富

反坏和工农兵的矛盾。目前以二七为核心，实现大联合是很困难的，在河南人们心中也是很难通过的。於是核心的作用就历史地落到造总头上了。……

三、对河造总策略的建议

问：你是否谈谈河造总下一段应采用甚麽策略

答：具体的说，争当核心的主要是二七和河造总，这决不是一般的山头、风头问题，

而是两种思潮的争权。也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极左思潮和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团结大多数思潮的争权。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在造反派内部的反映。

问：你的意思是否先团结八大总部後 再联合二七呢？

答：形势确实如此，实质上是河造总和二七展开路线斗争来解决争夺“核心”问题。河造总的成分和思潮是能代表八大总部工农兵群众利益的。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是路线斗争问题。庸俗地理解为山头之争是不对的。

问：再具体谈谈如何对待八大总部好不好？

答：……同时要向他们说明二七思潮的危害性。

问：我们和铁军战斗师摩擦相当大，再加上他们组织中也有保守的，联合不起来怎麽办？

答：……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权而战，而不是为了追求队伍的纯粹而战。有一些组织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路线觉悟低，可以帮助嘛！我觉得战斗师铁军好像是造反派组织，人家去八大总部，是你们关门的结果。……

问：联合时权分散了甚麽办？

答：……铁军很多是革命小将。要注意引导，联动起先也是革命小将。……战斗师、铁军等愿意搞拢我们就要共同掌权，对过去问题要多做自我检查。要相信他们的觉悟。……

问：你的思想方法很有意思，我们理解了，你再谈谈对二七怎麽办？

答：从二七的历史来看二七要改正错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河造总要帮助二七改正错误，清洗组织，否则以后大联合就困难了。但是我们河造总同二七联合起来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河造总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或基本解决八大总部问题，真正使核心巩固，（原文不清……）这一点河造总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当然根据二七的特点和它的地位与八大总部的差别，策略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四、军区问题

问：你认为军区如何？

答：河南军区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军区支左大方向是对的，但有错误，原因是军区党委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理解不深之故，此外阶级斗争的策略性差……

五、内部问题

问：请你对河造总提提意见吧！

答：河南问题很复杂，河造总能处于这样的地位表明河造总是一个先进的造反派，他的政治敏感力很强，他的政策观念也很强。很多地方很值得北京造反派学习的。……

毛主席的战略布署帮助工农兵掌握大方向，没有理论班子，没有笔杆子队伍是不行的。……

目前河南谣言很多，对中央不忠诚，转达中央指示为我所用，作风不正，坏象百出，二七特别严重，其他组织也有。我们要学习二七的阶级斗争观念，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要注意斗争艺术，但不要学习他们的资产阶级手腕……

由于时间关系这份座谈纪要就介绍到这里。（下略）

转载于郑大革联 1967. 7. 17 出的《革命造反座谈纪要》增刊第二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凌晨一时至四时二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接见的中央负责同志：康生、戚本禹、刘建勋。速记稿，未经本人审阅。〕

康生同志：同志们，现在开会了。今天由河南省军区党委向大家宣读检查。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送给了中央。中央看了河南省军区党委的检查报告，批准了这个报告。中央对这个报告拟了一个批语，这个批语是经过中央同志，经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看过的，都同意。为了很快的使同志们晓得省军区党委的这个检查报告，已经中央批示，告诉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主要是谈这个问题。现在先请河南省军区党委的同志把他们的检查报告原文向同志们宣读一下。然后，我把中央的批示逐字逐

句告诉同志们，看同志们有什么意见，那个讲？张树芝同志讲。现在请张树芝同志把这个报告读一下。

（张树芝同志宣读河南省军区党委的检查报告，略）

康生同志：同志们都听清楚了，这个检查报告是由在北京汇报的军区党委的同志和在郑州的军区党委的同志共同研究，交换意见，然后由河南省军区党委用电报发给中央的。这个检查报告是六月二十七日报来的，今天七月十七日，二十天了。为什么二十多天向同志们宣布呢？因为这个检查报告中央需要研究讨论，讨论以后还需要批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和军区在这里的同志、野战军的同志议论，请他们研究讨论，同时，也在我们这个代表大会上听取各方面代表对这个报告的意见，当中也听取何运洪同志、徐文礼同志他们的个人检讨。我们研究这个文件本身，通过军区以及野战军的同志讨论，以及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一些同志的检讨。然后作出这个批示，经过主席、林副主席同志，也就是根据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批示。这样，经过我们二十天的研究工作，听取各方面同志的意见以后，作了批示，今天由河南军区的同志向同志们宣读。河南军区党委检查报告的全文准备发给同志们讨论研究。

这个报告的第一段，有一句话说：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第二段说：自从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方向就没有搞对。为什么？就是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既没有作全面系统的了解，也没有作阶级分析，就错误的把矛头对准刘建勋、纪登奎同志，把他们看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没有犯过错误。但是，军区把矛头指向他们，没有在上边真正对准刘、邓、陶，在中南真正对准王任重，在河南真正对准省委内坚决执行陶铸、王任重指示的文敏生、赵文甫。没有分析到。所以，他们把大的矛头对准刘建勋、纪登奎同志。把次要的看成主要的，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看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这一点在同志们讲话中也有人讲过。同志们不管有什么意见都不能把群众组织说成是御用工具。这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这是不好的。群众组织里边这个或那个战斗队可能不大好，保守、不纯，但是，把整个群众组织说成御用工具，是对广大群众的污蔑，不符合毛主席讲的信任依靠广大群众的指示。因此，军区不但打击了二七公社、郑大联委，而且利用军区党委发表严正声明，甚至发表告全省人民书。这种做法是极恶劣的。如果这

个人那个人认为这个组织不好，在几千人的群众大会上讲一些错误的话，影响不好，而他们用解放军，军区的名义发表一个告全省人民书，这是对群众组织，尤其是革命群众组织，采取的一个极错误的态度。现在河南五千一百多万人，向五千多万人宣布一个群众组织为非法，这种现象在全国可以说没有。这是这个检查报告的第二段。

第三段讲二、三、四月间的问题。他们讲有许多机会改正错误，可是他们坚持错误，对抗中央指示。同志们应该看到这是大方向。同志们不是说要掌握大方向吗？这个大方向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只有依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河南军区的大方向是什么？就是对抗毛主席、党中央。这比什么都严重。这一点我希望河造总的同志、十大总部的同志掌握这个问题。如果不掌握这个问题，就不容易看清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军区所以犯错误，不是在这个那个问题上，而是在总的问题上。二、三、四月间继续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指示。这是最最严重的问题。这一点有的同志并不了解。我常听到有的同志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什么“军区犯了许多错误，犯了许多严重错误，但是他们的大方向还是对的。”这种话没有分析，没有了解军区的大方向是什么东西。这种话不符合实际，符合实际的是，从二月十七日一直到这一次开会，这样顽固地、系统地、长期地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这是他们最大最大的错误。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掌握住，这是最大的方向。因为无论从历史上看也好，无论从文化大革命看也好，都有个共同的规律：凡是坚决执行毛主席路线，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会取得成绩。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对抗毛泽东思想一定犯错误，甚至犯最严重的错误。这个从党的历史上看是如此。从这次文化大革命看也是如此。这是经过千百次考验证明了的。这是一个大方向问题。从这一点你们可以看到中央对省军区是耐心教育、耐心等待的。这是对他们的极大爱护和极大的帮助。所以，军区党委的同志在检查报告的第三段首先讲到二月十七日的问题。就是说，二月十七日河南日报事件发生以后，毛主席就立刻指示中央，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要河南省军区找双方代表到北京来汇报，来解决河南问题。同志们，主席的这个指示不仅是对河南问题，而且是对全国各省的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教育了河南省军区，而且也教育了我们中央的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主席再三指示，要双方代表一定来京汇报，就是说不是来一方，不是这一方那一方，而是双方，

甚至保守组织也要来，也要听他们的意见。就是从这一次开始，我们遵照主席的这个指示，把它作为解决各省、各省军区广大群众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针。主席二月十七日指导解决河南问题的指示，给了我们启示，给了我们方针，我们按照主席的指示方针去解决各省、各军区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在文件上写了。我希望军区的同志也好，一军的同志也好，各个野战军的同志也好，都要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也希望各群众组织的同志认识这个问题。这是毛主席最正确的路线，要遵照这个指示去解决问题。

毛主席的二月十七日的指示，本来是纠正河南军区错误的一个最高指示，这不仅给了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而且启示他们怎样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怎样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可以说是方向性路线性的指示。但是很可惜，这样重要的指示被省军区坚决拒绝了。我们对河南省军区和何运洪同志最大的不满首先就是这个问题。他们不仅不执行这个指示，而且做得相反，同主席思想相对抗，用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席本来要双方代表来京，可是省军区不来，要来只是要一个方面来，中央当然不愿意，为什么不来呢？他们说是有意识的把二七公社压垮、拖垮，然后造成既成事实，向中央说明他们这种办法是对的。这不仅是“实际上”，而且事实上就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毛主席对河南问题很关心，问我们为什么河南的人还不来？我们怎样回答？我们只有回答说他们不来，要来是同主席思想相反，一个方面来，那当然不能同意这个办法。这一点他们自己检查是严重错误。问题的严重性就是从二月十七日到现在长达五个月之久没有纠正错误。今天我们很高兴，省军区党委对这些问题作了检讨。对这个检查我们很高兴，很欢迎。但是，向同志们谈清楚，这个教训是深刻的。这是检查报告的第三段，我们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写的还不够尖锐。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他们犯错误的首先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要严肃看待。这对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教育意义。无数事实证明，上抗中央的时候，必然下压群众。因为毛主席是代表群众的，毛主席是同群众心连心的，上抗中央，必然下压群众。同志们可以看到刘、邓路线，他们上边反对主席思想，下边对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这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个检讨的第三段是讲的不够尖锐的。

第四段，他们讲所谓“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有改正，而且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造成连锁反应，有些单位实际上把有些革命群众组织解散

了。这里还讲了错抓、多抓一些人的问题。这句话是不对的。在河南抓人是个大问题，严重问题。直到现在在省军区的错误政策指导下到底抓了革命群众组织多少人，抓了多少革命小将，军区自己还不很清楚。他们讲抓了五千多，实际上，这五千只是按手续抓的。有的讲抓了一万多，有的讲靠近二万人。总之是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各个群众组织都要体谅被压制打击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小将的心情，他们处在那样的环境下，人被抓了多少，心情激动一些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问题何运洪应该负完全责任。再一方面，河南通过公、检、法作了许多罪恶，公安公社那个组织是错误的，他们应该好好检查，应该向群众检查自己的错误。同志们要注意，公安系统在运动中是保守的，当然也要一分为二，但是很多地方，很多组织，很大程度上保守，甚至于被执行错误路线的人所利用，本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结果变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组织的工具。何运洪同志过去是个作保卫工作的，文敏生也作过保卫工作，丁石也是作保卫工作的，应该是守法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却利用公安系统这样的组织去镇压群众。在河南我们看到了这个公安组织，它自上而下有个系统，不管他们怎样说瞒不了我。它有个系统，抓了許多人，是错抓了。多抓这个说法不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根本不存在多抓少抓的问题，反革命是另外问题，不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群众不存在多抓少抓的问题。把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把革命小将、青年学生捕起来，甚至挂黑牌游街、请罪、登记，这一套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同志们，你们应正视这样的问题，应该打破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的界限，严肃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他必然打击革命群众组织，把成千成万的逮捕起来，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奇奇怪怪的现象，有的叫逮捕，有的叫拘留，有的叫扭送，甚至在陕西发现，不叫逮捕，也不叫拘留而叫“军管你”，这是对军管的诬蔑。昨天晚上，陕西有一个中学生、一个大学生讲，他们被关了几个月，最后问为什么逮捕，他们竟然说不是逮捕而是“军管你”。如果这样“军管”，不但你们危险，我也危险，把我也“军管”“军管”，那不危险了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第五段讲四月份的问题。就是说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贯彻以后，又给了省军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实际上林副主席这个讲话不仅在

四月份，第一次大军区会议是二月份开的，那时候就讲了，这是第二次。这一次是青海赵永夫开枪。在这以前还开了一个大军区会议。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副主席多次指示，中央、中央军委多次指示，后来又发了安徽的五点指示。安徽军区开始保李葆华，背后支持一派打击一派，并且夺了权，中央没有承认，造成解放军同一部分群众尖锐的对立，甚至把老红军逮捕、关监狱，后来以致造成死人。中央鉴于这个问题作了五点指示。紧接着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这是又一次教育河南军区的同志。这不仅是对河南军区的教育，而且是对全军的教育。这本来应该引起河南军区的警惕，但是，军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不但不认真，不贯彻执行，从根本上认识自己错误，而且在四月份又在群众大会上重申一次，说过去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有根据的，是郑重的。并且把这个讲话登在报纸上，很明显这是对抗中央军委指示的。这个对抗不但是在下边，在会议上，而且登在报纸上。同志们想一想，怎么这样对待林副主席、对待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五点指示？这五点指示不仅仅是对安徽的，不是一般的讲，省军区应该坚决贯彻执行。但是他搞的相反。中央在那个指示中讲逮捕的人要释放，宣布解散的组织、宣布反动的组织要平反。可是河南省军区对过去宣布的非法组织又重申了一次，说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有根据的，郑重的，并且登了报，这是执行主席、中央、林副主席的指示，还是对抗主席、中央、林副主席的指示？而且长期不认识错误，错上加错，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群众思想更加混乱，群众组织更加分裂，群众组织之间分歧更加多了，这个问题省军区特别是何运洪要负主要责任，这不是群众方面的问题，在军区这样的方针指导下，群众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都可以理解。不能把错误完全归到群众头上。这是一种错误路线、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兴高采烈，很快伸出手来。赵文甫给军区写的黑信是挑拨离间，很恶毒。他鼓励对抗中央的路线。可是军区何运洪讲没有理他，实际上自己看了很舒服。赵文甫说是有病了，什么事都不管，可是这样的事情他没有病了，立即破门而出，伸出手来，说有病只不过是一句托词。

军区的检查还有一段，军区犯方向路线错误主要由军区党委书记何运洪同志负责。这一点就是这样。我们并不认为军区所有同志，所有干部都对抗主席、中央、林副主席的指示，军区很多同志不满意何运洪的做法，就是因为他是党书

记、又是政委，敢怒而不敢言。他自己则独断专行，不经过集体商量讨论，自行其事，并且长期不觉悟，不改正。

军区的检查最后说到根源在什么地方？他们写了五点：

(1) 路线觉悟不高，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 保守思想严重，对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造反精神看不惯，有反感。对革命造反派没有阶级感情，对保守势力在思想感情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河南有很多野战军，为什么他们包括×师、××师等立场是对的，当然一军也犯有错误。但是那主要是河南军区指挥的。军区和地方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何运洪就是河南省委的常委，如果检查起来，吴芝圃犯错误你们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主席曾经特别告诫过省军区、军分区的同志，他说：你们同地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常有联系，有些家属就在地方工作，千万不要听他们保守思想的话。不晓得你们对主席这个批示讨论没有讨论？对你们我没有调查。但是你们有些家属就在省委、省人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表现到底怎么样？我知道内蒙司令员、政委、参谋长的儿子、女儿绝大多数是联动的。同志们清楚了吗？浙江司令员张秀荣的儿子是有人命案子的。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很多。比如北京军区杨勇的儿子就是联动的头子。据我了解，何运洪同志的女儿在豫北医专，站在保守派那边。这些事情要引起军区同志警惕。所以你们讲对保守势力思想感情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确实是这样。下边军分区、人武部就更严重了。同志们要警惕这一点。

(3) 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怕群众，怕革命，怕丢面子，怕丢官，一句话，怕革命。实际上这是最主要的，由于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就不会有正确路线，不会走群众路线，必然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怕群众，怕革命，就必然走到保守一方面，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4) 党委领导不力没有介入前很不关心，参加了省委文革是有名无实，没有主动了解情况。军区党委同志一般可以这样讲，何运洪同志不是这样。我看到军区有个政治部主任参加过文革小组，而且是副组长，他了解情况很多，并不少，那个组织怎么样他都是知道的，只是他的思想观点立场错了。

(5) 归根结底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这样说也可以，实际上不是举得不高的问题，举得不高那还是举了嘛，我看根本没有举，问题就在这方面。

检查报告最后表示，下决心改正错误，这是好的。这是我们解放军的特点，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这就是毛主席说的犯了错误就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学习山东经验，做到三条。一是犯了错误改正彻底好还是不彻底好？彻底好。二是早改好还是晚改好？早改好。三是检讨是高姿态好还是低姿态好？高姿态好。河南省军区的同志以山东军区为榜样，给“郑大联委”平反，给二七公社平反，支持革命群众组织这个态度是好的。张树芝同志宣读了军区的检查报告，我又对同志们就军区党委的检查报告讲了这些话，这有助于说明中央对这个报告的批示。

中央批示讲了这样几条：

中共中央对河南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
中发〔67〕216号

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左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这次，河南省军区党委所作的关于支左错误的检查比较好。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查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会欢迎并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

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河南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斗等问题达成了六项协议，中央认为这六条协议是好的，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这些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

有的同志会这样问，为什么中央批示这样短？为什么这样原则？这里有一个问题，这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路线搞的。河南问题，根据毛主席的路线，主要还是相信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组织，相信和依靠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绝大多数干部，中央不能包办代替，要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具体执行中央

的路线、原则。因为事情主要是你们作的。当然这是在主席思想、路线指导下做的。

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达成协议是好的。但是，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现在有两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是省军区的检查报告宣布了，他们决心认真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来。我们一方面要看，一方面要帮，特别是军区的同志，自己需要做很多工作。一个是群众组织达成的协议要认真贯彻执行。现在是不是已经执行了呢？有的执行了，有的没有执行。最近河南武斗还是相当发展的。这里面有个矛盾，我们代表达成的协议，在实际方面，还有些没有执行。在河南武斗还相当严重，我们听说郑州纺织机械厂几方面武斗，伤了许多人，而且还可能有死的。实行协议并不那么容易。纸上写的变成实际需有各方面作工作，需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真正首先检查自己的错误，自我批评，进行教育群众，把矛头对准刘、邓、陶，对准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对准群众。有了这次会议精神，我们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会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当然不会一下都好起来。不要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应该向前看。特别是代表们，你们的群众要看你们的行动，他们向那里去和你们向那里领有关系。要真正注意掌握大方向，打破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保证决议的贯彻执行。

康生同志：我们不完全否定军区在支农、支工方面取得的成绩。对军区要分析。但是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同意这个报告，批准这个报告。

由于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成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主席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军区的错误主要由何运洪同志负责。这个意思是说，决不是军区所有同志都不执行主席的路线。而主要由何运洪同志搞的，应该由他负主要责任。

这一次河南军区党委所作的检查比较好，所以我们基本上批准它。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讨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的，会欢迎并且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过去群众不满意，不是对整个解放军不满意，而是对执行错误路线的几个同志不满意，当他们改正错误以后，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的，是会欢迎和支持他们改正错误的。

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赵文甫（二七战士高呼打倒刘、邓、陶！打倒王任重！打倒文敏生！打倒赵文甫！打倒杨蔚屏！）

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是革命领导干部。他过去犯有错误，但很快向中央作了检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中央决定以刘建勋同志为首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个小组不是革命委员会，是作筹备工作的。所谓筹备，就是各方面的群众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实行大联合，组织“三结合”，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同革命群众相结合。先成立这样的筹备小组，一边筹备革命委员会，一边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戚本禹同志：军区的检查，现在先不要往回打电话，因为没有文件，不知道怎样传达，同时军区检查还要发表，是不是由刘建勋同志给各方面协商以后再说。

过去二七公社受压制，现在军区作了检讨，要欢迎和支持他们改正错误。要执行中央的指示。

明天让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同志作检讨。他们有错误，但是犯的错误不一样，犯错误的时间不一样，性质也不一样。（康老讲要给群众作检讨。他们的检查已写好，这个时间安排一下。）

康生同志：明天晚上。

张树芝：我代表河南军区坚决拥护中央对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检查报告的批示。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坚决照办。坚决拥护刘建勋同志回河南领导我们河南五千万人民进行文化大革命。

二七公社：我们二七公社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河南军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检查报告的批示，坚决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康老、戚本禹同志的指示，坚决拥护和支持犯错误的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大力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坚决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把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保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和七·五协议，和武斗歪风作坚决的斗争。

坚决拥护刘建勋同志回河南主持筹备小组工作。

坚决打倒刘、邓、陶！打倒王任重！打倒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

八大总部：坚决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贯彻执行。坚决拥护和欢迎、支持刘建勋同志回河南主持三结合。

河造总：坚决拥护中央的批文……。

郑大战斗师：坚决拥护中央批示……。

各地代表：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批示……。

八·二四（陈红兵）：我们八·二四派坚决拥护中央对河南军区检查报告的批示。另外，我说一下开封白色恐怖的情况。七月十四日：前哨广播站被砸，18人中三人被从楼上扔下。七月十五日：老保调动大批农民、工人血洗八·二四，死一百多人。十大总部、铁军、四川产业军都参加了。（老保们起哄，大喊大叫：造谣）。

康生同志：那一天？

八·二四（陈红兵）：七月十五日。

康生同志：好，叫一军调查一下。你坐下，我讲一讲。

我赞成同志们拥护中央指示。同志们这个态度是好的。我希望你们一条，希望你们成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真正成为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成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成为真正的毛主席的革命战士，必须实行言行一致。说话，做事，一定要言行一致。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革命者的一条重要标志。我欢迎同志们支持中央的批示，支持军区检讨。赞成你们欢迎和支持军区同志改正错误。同志们今天表示的这个态度，我是很赞成的，很满意，要求同志们言行一致，因为向中央作了保证，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我们是相信你们的，相信你们的真诚，同志们必须实行向中央保证的诺言。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

希望同志们客观的冷静的去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虽然同志们在这里就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达成了几条协议，但是，武斗现象现在没有停止，你们要客观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总觉得同志们应该按照毛泽东思想很客观的注意掌握大方向，对河南五千万人民负责，对毛主席负责，不管谁有错误都应该承认。河南武斗现在没有停止，还是严重的，还有发展。承认这个东西，就必须想到如何实行中央的指示，如何消灭这种现象。这是主要的，不是两下吵嘴、骂架所能解决问题的。我骂你，你骂我，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更促进武斗，促进分歧，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所以，要承认这个东西的严重性，正确对待，深思熟虑地想

办法消灭这种现象。听到人家说一个消息，不等人家说完，就马上说人家造谣，你又没有调查，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当然说消息的人也要经过调查，要实事求是。

一听到消息就说是造谣，不是毛主席的办法。没有调查研究就上来一个造谣，那怎么能够解决问题？要听一听对方的意见，不对，不符合事实，你也可以讲嘛！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要调查研究！向团结方面走嘛！

我总觉得同志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志们脑子里毛泽东思想不多，很少，勇于内战，勇于骂架，对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指示，口头上、表面上拥护，实际上不那么执行，不要象刚才那样子。

请河南各方面的同志注意，的确四川李井泉的产业军到了河南，要挑起武斗。有些联动分子也到了河南。不要否认这个事实。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的。产业军不仅到了你们河南，而且到了北京，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李井泉等反动分子，他们千方百计的破坏文化大革命。同志们脑子里要有敌人，要有敌人！要有敌人！不要让我们的同志当作敌人，脑子里不要只有内战，而让真正的敌人在背后笑我们，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在背后笑我们。我们脑子里要有敌人，要有敌情观念，要提高警惕性。四川产业军是到你们河南去了，你们应该警惕。我觉得应该紧迫地共同联合起来，反对反动路线，不要被他们利用，要提高自己的警惕性。至于制止武斗各方面都有责任，不要单纯讲那一方面。同志们，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年了，同志们的毛泽东思想总是要多一点，资产阶级的东西，私字，小团体主义总是要少一点，要彻底革命，在头脑里彻底造它们的反。在这次汇报会议中，代表同志们的表现基本上是好的。为什么达成了六条协议？现在又达成了三条协议？这是好的。你们认识了文敏生、赵文甫是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坚决斗争。你们支持刘建勋同志去领导，你们认识了河南军区所犯的路线错误，还二次回去做工作，使铁路通了车，这些都是好的，并且是很宝贵的。因为这对国计民生都有好处。但是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把已经达成的协议保证执行。现在要搞共同的东西，搞大联合。武斗现象要制止，一军，野战军已经派人回去传达中央指示，现在的武斗一军的同志要打电话回去。但是，同志们要知道，这里的干部通了，下边的干部不一定通，要有个做工作的过程。一军的同志打电话回去，调查情况，重申中

央的指示，也不要完全听军队自己的干部的话。另外，各方面打电话回去，重申六条协议，重申六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在各方面采取坚决制止的办法。这一点工人总部的同志要特别注意。据我们的消息讲，这方面的工作你们还没有完全做好。要特别注意。据说四川产业军首先找到了你们，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铁军也要特别注意，联动的人也找到了你们。只有各方面去检查自己，不是各方面去责备对方，各方面检查各方面的，各方面教育各方面的，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这样一个危险：武斗越来越发展。你们通过的六条，有的相反，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东西。总是向好的方面走，但是还有很多问题。你们大家赞成刘建勋同志回去，可是如果你们还是继续挑起意见，挑起分歧，不向团结方面努力，工作谁去做？所谓勇于内战就是大方向没有掌握住，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松，把敌人观念淡薄了。河南有许多军事生产，你们看看当前的国际形势，确实需要备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备战，但是如果生产不上去怎样备战？所以要注意大家动手。

关于军区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今天晚上同志们才刚刚系统的听到，对错误的严重性还要继续认识。在军区的问题上，今天晚上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是好现象。现在看，在许多问题上同志们的认识是一致的。今天晚上大家对军区的检讨，对中央的批示坚决拥护，是一致的。六条协议虽然没有完全实行，也是好的，铁路通车也是好的。大家要多看到一致的方面，把这当作主流，当作主导思想，有分歧的时候，要把它具体解决，逐渐消除分歧，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这是一个大变化嘛！比如军区的检查，他们认为他们过去是对的，人家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果是何运洪自己。你们过去认为大方向是对的，现在认为大方向错了，这就很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看到这些，要看到积极因素，不要看消极因素。不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在旁边幸灾乐祸。刚才张树芝同志谈到的赵文甫的两封信很值得同志们注意。如果你们不注意，今后还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他高兴，然后就伸手了，“破门而出”。同志们脑子里要想些问题，所以我建议：

(1) 对宣布的这个东西同志们先不要打电话，等他们安排一下，发了文件再传达，不然容易搞错。

(2) 你们已经达成了三条协议，希望继续找到共同一致的东西，积极找到大联合的因素，完成你们的协议。

(3) 希望同志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继续作工作，继续调查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制止武斗。

(4) 希望同志们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再好好反复学习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三种人、三种态度，还有安徽决定中的五条都好好反复学习学习。作为毛主席的革命小将，如果不掌握毛泽东思想，还能成为毛主席的革命小将？大家在这方面要多想一想，这是真正的大方向。

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继续发扬我们的积极因素，巩固积极因素，促进大联合方向走，也就是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革命的大联合。把方向搞正确，把矛头对准。我们相信，经过研究，经过辩论，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通过实际斗争，是能够完成中央对军区检查报告的批示所希望的任务，希望同志们向这个方向努力。现在快四点了，回去大家好好把中央批示研究一下，这个批示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河造总工人代表：我是工人代表，我们工人完全按照中央批示和康老讲的办事，但是有些组织挑起武斗，把我们去制止武斗的工人打伤了 35 个。

康生同志：我基本赞成。我有一点建议，就是有些同志的思想方法不好，第一坚决拥护你，第二来个“但是”，一个“但是”转过去了。刚才这个同志前段讲的很好，我老是担心他说那个“但是”，可是最后他还是说出来了。好了，不说那个“但是”了，散会。

最后二七公社高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打倒刘、邓、陶！打倒王任重！

打倒文敏生！打倒赵文甫！打倒杨蔚屏！

河造总、八大总部、各地区代表也都高呼口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晚八点四十五分——二十二日凌晨四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刘建勋等。〕

康生同志：咱们好几天没有见面了，同志们看，现在北京热闹不热闹？全国都很热闹，上海、四川各地都很热闹。你们看，百万雄师这一套，对不对？（众答：不对！）你们这个态度很好，有点路线的觉悟。全国革命人民、全国革命组织、革命造反派，应该有所表示，当然，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我请你们估计一下，在河南有没有同情百万雄师的？（二七方面：有！已经到河南了。）百万雄师已经到河南了，产业军也到河南了，请同志们注意。特别是铁军、十大总部，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应该仔细考虑，你们组织里，有没有同情百万雄师的，这一点要注意。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百万雄师是反对二七公社的，是反对中央给二七公社平反的，这在武汉有标语。不但百万雄师，武汉军区也有人这样反对。因为河南军区何运洪与武汉军区有关系。何运洪为什么敢这样大胆呢？同志们，河造总的同志们，十大总部的同志们，你们应该很清醒的考虑。因为河南军区是受武汉军区直接领导的，一军也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我不说武汉军区整个不好。但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准备自己检查。他们里面有些组织，特别是独立师的一些干部，煽动“百万雄师”反对中央，因此，全国革命人民坚决反对他们，北京的革命群众，还有部队，反对他们不是偶然的。这是件好事，把他们的面貌一下暴露出来，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我请河南革命组织、群众组织考虑一下，河南有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的危险，有没有按照这样的方法再来第二个武汉，每一个革命群众，每个组织，每一个真正要革命的人，都应该在他的头脑里考虑考虑。当然，他们一意孤行，有他们的自由，他们可以走上反动道路。但是，我希望革命群众要禁止这种现象，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假借革命运动走上反动道路。现在，王任重的百万雄师，李井泉的产业军，都向你们河南走，可见河南有点油水。不然，为什么到那里去？因为那里有同情他们的，有支持他们的，和他们结合和他们有点共同的东西，所以，他们才去。是同他们搞在一起，还是反对他们？这个问题摆在群众组织面前，这两条路要自己选择选择，这不能和稀泥，这不能宗派主义、有小团体主义，这是国家大事，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希望革命的组织，千万千万不要上这个当。我觉得，群众总是好的，我们

坚决相信群众是要革命的，但是，他们一个时候不明真相，会受蒙蔽。现在武汉街上贴满了标语，有些军区的宣传车，也大肆宣传说：“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对的。”这完全是造谣。还造谣说，中央说，百万雄师是革命左派。军区的宣传车假造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林副主席的谣言，欺骗群众。他们总是想采取内蒙古反革命分子的手段，造成既成事实压中央，他们完全想错了。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是不会被这些坏分子压倒的，他们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让他们表演表演，谁愿表演就再表演一番。这样的阶级斗争，才能把文化革命搞到底。这看起来是坏事，实际上是好事。这样，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彻底的。同志们，今天从北京会上一大课，他代表全国的革命组织。这一点，我为什么讲呢？因为河南武斗不是停止了，而是一天天的在发展，有军区的某些人在我们面前玩弄两面派手腕，还在煽动群众。同志们从这个地方，可以懂得什么叫陶铸，什么叫王任重，那些坚持执行，坚决拥护陶、王的人，象文敏生、赵文甫等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你们拥护的是什么样的首长，他是什么结果。从这个问题，也可以叫何运洪、李善亭等人看一看，他们实行这种路线，如果不改变，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们能代表解放军吗？（众答：不能）现在全军陆海空都在游行反对他们。同志们从今天可以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得到一个经验，我看对解决河南问题很有好处。当然，也可能有人错误地估计形势，比如你们的公安公社吧，他们看看形势满好，又蹦了出来，我们准备他们蹦，刘大坤，还有一个钟什么东西，他们已经蹦了出来，谁跳出来都行！他们认为是一个大好时机嘛！我看大暴露一下，他们高兴一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现在河南的武斗，不是停止，是发展了，是在酝酿一个武汉百万雄师这样的反动行为，有这样一个危险。因此，我希望你们看到街上革命群众游行的声势，得到一个教训。军区某些人也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支持对抗中央指示的反革命的百万雄师不会有好结果。当然有些同志，比如何运洪同志，检讨承认错误，我们是欢迎的，但是，我上次讲了，是真革命假革命，有一条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真正的革命者，是全心全意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会两面三刀耍两面派手段同志们犯错误不要紧，哪个组织有错误也不要紧，犯错误坚决改正自觉检查就好了。现在有些群众组织，一面打人，一面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说这种话实在可耻。“从这件事是可以得到教训的。当然百万雄师内，积极参加的还有“三字兵”，这一点你们铁军

要很好注意。“三字兵”就是“黑字兵”，还有公检法，你们十大总部要注意，要警惕，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彼此有同情的基础。我们同意同志们刚才讲的，我一接触河南问题就看出武汉了，不解决武汉的问题，河南的问题很难解决。因为河南军区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政策都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大暴露，对解决河南问题有好处，同志们从这里可得到积极的教训，也可以得到另外的教训，无非是再表演一次，因为事情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今天我希望同志们，希望每个组织，都平心静气地向团结方面走。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团结方面走。求同存异嘛，不要向分裂方面走。有些组织说起来是统统拥护中央的决定，一个“但是”就转过去了。从总的方面讲，我们代表团的工作是逐渐逐渐向较好的方面发展，我希望军区的同志改正错误，军区的检讨已经印好了，可以发给你们，希望军区把这个检讨发到军分区，如果你们军区真正拥护中央的革命路线，要准备有人冲军区，有人压你们，考虑制造困难，说明他们有办法不让你们改正错误。我们希望大家向团结方面走，向前看，不去算旧帐。

武汉军区的问题，希望你们作为一面镜子，引以为鉴，不要向这方面走，这是我们的希望。但是现在看，事情的发展不完全是这样。当然，河南也还是逐渐向好方面走的，同志们要注意国家大事，脑子里有敌人，有阶级，有敌人。陶铸、王任重不是死老虎，陶铸、王任重把手还伸向河南。他们的黑爪牙是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敏生、赵文甫等。我们今天也可以讲，对于何运洪的问题也可以讲到底，是改正错误还是坚持错误，我们相信你改正错误，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底是不是确实如此，因为在军区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还受压制，代表何运洪路线还在兴风作浪。如果他们这样干，可以继续干下去，但是我们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甚至犯了错误的干部，都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希望他们真正改正错误，不是玩两面派，真正按照毛主席、按照中央的路线干。河南的问题会完了吗？不会，还会有一场严重斗争，这一场严重斗争对于你们革命群众组织是个严峻的考验。究竟站在那一边，摆在你们面前，由你们去选择，愿意站在那一方面就站在那一方面。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了就好啦，对中央同志，对文革小组，对毛主席，采取那样的态度，是什么行为？是叛变行为。是愿意跟叛变的人在一起，还是愿意跟革命的人在一起，要选择，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跟着叛变的人阴谋诡计总会暴露出来，两面手法会暴露出来，两面三刀总会被揭发出

来，希望代表了解这回事，也希望你们对不明真象的群众进行工作，你们不是说要革命吗？离开毛主席的路线、反对毛主席路线，还叫什么革命？你们每次都喊毛主席万岁，每一个人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但是你们实际行动并不象喊口号那样容易，互相读语录那样容易。我告诉你们，北京和全国革命派都在游行，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群众是真正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

对你们，也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对于河南特别重要，因为河南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过去是中南局陶铸、王任重领导的。过去军区是反对二七公社的，现在“百万雄师”、“三字兵”、公检法同样反对给二七平反，这里面你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难道我们的同志愿意同他们那样的反动行为搞在一道吗？难道还同他们划不清界限吗？我相信大家不会这样的，现在形势大好，但是斗争是曲折的，复杂的、艰苦的。我希望两方面、几方面达成协议，有些意见可以彼此协商，但是，是有共同点的，共同点，就是反对百万雄师，你们能不能就反对百万雄师达成协议？（众答：能）十大总部同铁军你们能不能？（他们答：能）这就有共同基础了，有这个共同基础，达成协议就不难，你们一方面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各组织在这件事情上，对“百万雄师”、“三字兵”、公检法和一部分独立师，应该发表文件表示态度，象北京的革命群众一样，一起上街反对他们，北京也有两派，但是他们遇到这个东西，大家就一起上街反对他们。大敌当前，就应该团结一致，这一点对于河南的革命群众特别重要，因为百万雄师到你们那里去了，就是给你们搞联合，联合十大总部、铁军、河造总（十大总部、铁军、河造总皆表示坚决同百万雄师、三字兵划清界限）你们不但打电话，还要发表文件。

张保怀：我们二七公社发表声明……

戚本禹同志：你们没有问题。

二七：（读声明的全文，当读到武汉局势极其严重时）

康生同志：你们把形势看得太严重了，事实上，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部分小丑。

（当二七公社读到百万雄师迫害王力、谢富治同志，感到万分沉痛时）

康生同志：这句话不好，为什么要悲痛呢？受坏人的打，就光荣，受了好人的打，就打成朋友嘛！

（当二七公社念到百万雄师迫害王力同志时）

康生同志：不但迫害文革小组的同志，而且迫害他们带去的北京红代会北航红旗井冈山等四个人）

（当二七念到杀退这股反革命逆流时）

康生同志：向中央施加压力不一定是反革命。是非常错误的。

（最后二七公社把“河南二七公社关于武汉目前局势的最紧急声明”全文念完。）

河南造总：（表示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坚决和百万雄师进行斗争）

八大总部（反二七那一派的）（表示和百万雄师开展斗争）

康生同志：同志们这种表示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何运洪今天还是要改正错误的问题，还要看，一看，二帮嘛！最好不定他的反革命性质，这一点是我们的建议，当然，你们群众组织自己有你们自己的看法，出于义愤，也可以。但是何运洪今天还是检讨错误的问题，一看二帮嘛，不一定完全是那么一个性质，他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的确我们还要一看二帮。

（郑大战斗师表态）

康生同志：（打着手势制止他）你们可以印发文件，一方面发给我们，一方面向家里讲，在家里散发，这个办法好。

（战斗师继续抢着说：我们讲了以后，我们散发）

康生同志：（又打手势制止）大家的意思我知道，大家要反对百万雄师，把他印出来好。今天晚上，大家一方面赞成刘建勋同志回河南领导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有的同志说：刘建勋有错误。刘建勋同志的错误，已经检查了。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检讨过多次。今天晚上又在我们的代表会上作一次检查，现在请他来讲一讲，同时，他自己也知道省委一些问题要揭露一下，除此以外，纪登奎同志、戴苏理同志，他们也要求作检查，有时间也请他们检查一下，现在请刘建勋同志讲。

刘建勋：（开始讲，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没有提林付主席）

康生同志：他没有提林副主席，可能有人要抓小辫子，我同你们说清楚，这是林付主席提议的，他有最大的谦虚，他首先禁止我们的干部祝林付主席身体健康，特别禁止我们中央讲这个话。

（当刘建勋同志谈到文敏生五年连升三级时）

康生同志：这一点我查了一下，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发现有一股单干风，这时候刘建勋同志对河南的灾情估计得过于严重，犯有一些错误，主要是借地问题。这个问题是陶铸提出的，真正坚决执行的是文敏生，但是在北戴河会议上，听到主席批评以后，这两个同志有两种态度，那时候，我们知道很清楚，刘建勋同志很沉痛的检讨自己的错误，而应该受到批评的文敏生，根本没有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样，他仍然依靠陶铸，其实这个问题，应该由他负主要责任，但是，他并没有沉痛的进行检讨，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同志的本质了。

（当刘建勋同志谈到，提拔文当省长，陶铸要调文到黑龙江当第一书记时）

康生同志：陶铸想叫文到黑龙江代替欧阳钦。

（当刘建勋谈到，文敏生决定对郑大联委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方针时）

康生同志：明支持、暗瓦解给中央反映以后，有人提出怎样评价文敏生，给他归纳了两句话，说文敏生这个人貌似忠厚，内藏奸诈，李先念最了解文敏生，先念同志说：这个评价最恰当不过了。

康生同志：现在请纪登奎同志讲话。

（纪登奎同志发言，当谈到何运洪的罪恶时）

康生同志：何运洪同志来了没有？

张树芝：没有来。

康生同志：怎么没有来？

张树芝：有病了，是心绞痛。

康生同志：有病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说？

张答：给联络员讲了。

（当纪登奎同志讲到文敏生等人布置收集南下北京同学的材料时）

康生同志：希望同志们注意一下，中南地区在陶铸、王任重的指领下，有一个特点，坚决反对北京南下的学生。无论是广西、广东、湖北，无论是湖南、河南，他们都要搜集所谓南下一小撮学生的材料，这是王任重的口号，这一点，当时河南刘建勋同志没有这样做。他欢迎南下的学生，赞成他们，这在中南地区可以说是很少有的现象。有一件事我没有查清楚，河南军区的同志们和一些群众组织，对北京红代会支持青海八一八同志进行迫害，当时青海赵永夫镇压八一八，

北京的学生有牺牲有流血的。赵永夫被揭露后，北京的学生要求支持青海八一八，中央同意他们去，当他们坐车路过郑州时，遭到迫害，有没有这回事？

二七：有！是铁路公安处搞的，属于公安公社。

（当纪登奎同志揭发杨蔚屏吹捧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时）

康生同志：杨蔚屏在不在？

杨蔚屏：在（站起来，又低下头）。

康生同志：你是杨献珍的学生，对杨献珍有没有揭露？写没有写揭发杨献珍的文章？

杨蔚屏：没有，没有写。

康生同志：你看对不对？我知道杨献珍对你比较重视，这一点在党校的时候我知道，杨蔚屏是支部书记。

杨蔚屏：学习的东西多一点，别的东西不知道。

康生同志：不是知道不多，观点一致就看不到。省委书记对这样的事情不关心，不同他划清界限，对反党叛徒不揭发一点东西，并且表示不知道，这就不对了。杨献珍反对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时候你正在党校嘛。

戚本禹同志：河南大批印杨献珍的著作，是谁搞的？要查一查。

康生同志：杨献珍 1957 年还在党校，那时候杨献珍就反对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过去不认识杨蔚屏，我认识杨蔚屏是杨献珍给我介绍的。杨蔚屏知道杨献珍的问题不揭发，是不对的。路线上不要和稀泥，怎样能够这样对待杨献珍的问题呢？这说明你的思想有问题。1954，55，56，这在党内批判杨献珍，你一句话不讲是错误的。

杨蔚屏：我回去揭发。

（戴苏理检讨略）

（当戴讲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动摇不定时）。

康生同志：你这个同志就是政治上软弱，你不能坚定地支持谁反对谁，就是摇来摇去。

（当戴检讨他政治上很动摇时）

康生同志：你这个同志就是政治上软弱，说这一点我赞成你这句话，你是年轻力壮的同志，工作是有能力的，是了解你的同志对我讲的，不是河南的同志给

我讲的，你这个人不那么坚定，看风势，那里势大向那里歪，这一点自己应该注意，作为共产党员，要引以为鉴，如果坚持正确路线，就不怕孤立，不怕受打击，这一点嘛你自己讲得对了。因为我过去不认识你，是小组的同志给我讲的，你工作很有能力，但有这样一个毛病，这一点我们革命的同志要帮助他，不仅看到他好的方面，而且应当看到他的缺点方面。

（当戴讲到他对河造总的评价时）

康生同志：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法，是不是还想依靠河造总？

戴：那不能单依。

康生同志：这一点你说不那么明确，必须要联合起来，和支持自己的团结起来，但也要帮助他们，改变缺点，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戴讲下去）

康生同志：例如说河造总冲了军区，大家不是反对打、砸、抢吗？反对打、砸、抢为什么还冲击军区？军区何运洪犯了错误，整个军区不是这样嘛，要改正错误，表示态度，不要采取这样的办法。

（当戴谈到文敏生、赵文甫的问题，他说过去做过揭发，今天不在这里讲了的时候）。

康生同志：你可以讲讲嘛，我们没有听到你揭发。

（当戴讲到文敏生看到一个县委书记没有刮胡子就发脾气时。戴狡辩，我谈过）。

康生同志：我还记得 1950 年我有病来到北京，听到刘少奇大讲国际关系，说和苏联的关系要搞好，搞不好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说见了苏联人一定要刮胡子，大讲一套他的刮胡子的理论，现在又听到一个刮胡子的故事。

二七发言：刚才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同志对错误的向群众组织作了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从今天的检查来看，刘建勋、纪登奎的检查是认真的，诚恳的，深刻的，我们坚信刘建勋、纪登奎同志一定能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河南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戴苏理的检讨，尽管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但我们表示欢迎，欢迎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略）

中学红卫兵总部：刚才我们听了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同志的检查和文敏生、赵文甫问题的揭发，表示热烈欢迎……（略）

（11 点 50 分陈伯达、江青、姚文元同志走进会场，我二七战士激动地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万岁！”）

江青同志：革命的同志们万岁！向革命的同志们致敬！

姚文元同志：（带领大家高呼）打倒刘、邓、陶！打倒王任重！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康生同志：你（中学红卫兵总部代表）表示反对百万雄师，这是好的，我们欢迎，现在你不是赞成我的话吗？我有个建议，你那个红卫兵为什么用黑字？

中学红卫兵：因为开始是黑字。

康生同志：现在全国有个说法，叫黑字兵，这个说法代表一个观点，你们不一定同那些人一样，你们属于不了解情况，黑字兵是山东的，实际上是武汉的三字兵也是黑字兵，你们换一下可以不可以？

中学红卫兵总部：马上换。（并当场摘掉了黑字袖章）

康生同志：你们可以讨论，我不是说你们和那些黑字兵完全一致，你们赞成就换，不赞成就不换。

中学红卫兵总部：河南的武斗不但没有停止，而是大规模的爆发，很严重，很多老工人都哭了。全国第二砂轮厂也停产了。

康生同志：在郑州吗？

中学红卫兵总部：二砂造联很坏，把铁皮搞成盔甲。

康生同志：你们关心制止武斗，不搞武器，这一点是好的。我希望你们两方面调查，如果二七有，不对，十大总部有，也不对，河造总有，也不对。你们关心这个东西，要几方面调查，我们得到的材料，不仅是一个方面的东西，甚至工人拿起武器，拿起了枪，所以，希望全面注意这个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中学红卫兵：我们呼吁抓革命促生产，“百万雄师”为什么到河南去，有一定原因。

康生同志：对。

中学红卫兵：工厂停工，扒铁路，把贵重法码当弹弓子打，这都是二七公社黄委会东方红干的。

康生同志：你们学校是不是在铁路西边？

中学红卫兵：在铁路西边。

康生同志：听说新乡斗的很厉害。

中学红卫兵：大家要按照《“六·六”通令》、《七五协议》书办事。

康生同志：你们都签字了吗？

中学红卫兵：康老说不签字不行，我们签字，不执行，辜负了中央首长的期望。

康生同志：在北京达成协议，在家里搞武斗，你们代表中，有没有想打倒戚本禹同志的？

河造总、十大总部：没有。

康生同志：有的说打，打打试试嘛！

中学红卫兵：河南出过打倒谢富治的标语。

康生同志：你们打倒谢富治，有一个谣传，是从打倒刘建勋同志发生的，他们说刘建勋为什么没有打倒呢？就是他有后台，这个后台就是谢富治。所以谢富治要打倒。

中学红卫兵：主要是何运洪有问题。因为打倒谢富治是 155 部队提出的。

康生同志：对！军区个别人，首先是何运洪，要打倒刘建勋是错误的，影响到群众，主要是何运洪的错误。

铁军：我是铁军的，我要发言。

康生同志：我问你一个问题，铁军到底和联动有没有关系？

铁军：没有关系，是他们造谣的。

康生同志：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代表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

应该是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刚才有一位同志讲，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这个意见很好，要大力宣传。挑动武斗的人总是一小撮，如果广大的群众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揭出了他们，他们就会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发动群众，要向群众做深入的宣传工作，这样我们才能胜利。

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热烈鼓掌）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做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第一条，同志们要向群众深入地宣传这一条，做比较艰苦的群众工作，要广大的群众识破一小撮人的阴谋，是要做一些工作的。但是，还要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枝、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现在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当然，武汉的革命小将也在采取自卫手段。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以及他们的幕后一小撮操纵者拿着那样的武器对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我们能允许吗！（群众高呼口号）

河南的情况现在已经达成了协议，我希望各方面都不要撕毁协议，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号跟我们订了停战协议，他马上就撕毁了。

我今天看看同志们，就把这个道理讲一下，我们有理，真理在我们这边。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小将、革命干部、革命工人、革命农民这边，不在他们一小撮那边。我们必胜，他们必败。如果他们挑起武斗，不肯放下武器，你们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我支持这一点。

我就讲这么一点。（热烈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康生同志：军区张树芝同志报告一个情况，就是说这几天还有人冲击军区。同志们不是反对打、砸、抢吗？不是达成的有协议嘛！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情况？刚才工人总部写了个条子给我，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为什么不讲讲这几天的事情，冲军区是一个大事，问题是过去也有人冲过，那时候没有协议嘛？我们达成了协议，大家签了字，就应该注意。

张树芝：（略）

（当张树芝讲到有的地方开着吊车搞武斗时）

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工人总部要特别注意，你们要负主要的责任，别人没有吊车嘛，把生产工具变成了破坏工具。

张树芝：吊车一开是件不得了的事情。

康生同志：新乡就开了吊车。

二七：他们提出三天内全部消灭二七派，用吊车围攻二七派，在家内的人，家都被抄了。……

康生同志：用吊车毁坏大楼是反革命行动，要查一查。

二七：现在新乡的二七派逃荒的很多，新乡军分区搞全市停工、停产、停电。

康生同志：新乡军分区要负很大的责任，立即打电话（对张树芝）告诉他们再这样搞要受到严厉惩处。

戚本禹同志：军法处置。

二七：听说李国秀把炸药交给老保，新乡地委的老保已经散了，李国秀又给他们打气，让他们跳出来。

康生同志：他们看到百万雄师去了嘛。

二七：李国秀对地委老保说：就是剩我一个人，我也支持到底。四川产业军血洗开封以后，又流窜到新乡，行动口号是把腿打断。……

康生同志：当前新乡、开封市的工人同志要特别注意。

二七：十大总部、铁军运到新乡几百人，挑运农民进城……

康生同志：同志们要注意，这几天恰恰都同“百万雄师”的行动一致是不是统一布置的？

二七：他们和十大总部有联系，还翻印他们的传单，说中央文革说“百万雄师是革命造反派。”

戚本禹同志：康老刚才说了，那些全部是造谣。

康生同志：军区是谁讲的？全部是造谣，而且是相反的。

二七：河造总说中央派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到武汉（这时伯达、康生、本禹、姚文元等同志都笑了），8201 和武汉陆海空军游行支持“百万雄师”。

康生同志：8201 就是独立师。

二七：“百万雄师”在郑州有一千多人和十大总部，河造总联系在一起。

河造总、十大总部：二七公社善于造谣，完全是造谣。

康生同志：你们等人家把话讲完嘛！这是讲“百万雄师”问题，你们为什么这样？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注意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百万雄师！

二七：河造总和十大总部成立了河南省革命派联合总部，明天开大会，规定农民四点钟进城。……

戚本禹同志：（对河造总）有没有这个事情？

河造总：没有！是造谣，我下午三点钟才挂过电话，是造谣！

戚本禹同志：现在就马上往家打电话。

河造总：有没有中央派人调查？

康生同志：我们可以派联络员给你们一块打电话。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你们不要讲，他们讲完，你们再讲嘛！

二七：统一行动指挥部在省工会，我们认为这一系列武斗行动不是偶然的，最近所以发生大规模武斗是河南军区和河南省委内一小撮搞反革命两面派的结果。

康生同志：这一点你们刘大坤，还有钟什么东西（指钟生溢）实在作了反革命两面派。你们在这里搞的决议，他们在家里反对，说决议是假的，现在你们两方面都不要讲了（二七和河造总都要求发言）我提议由河造总起草达成一个协议，共同反对百万雄师，反对四川产业军，反对产业军你们赞成不赞成？你不是今天起草吗？你就起草嘛！

（河造总站起来解释并攻击二七公社。）

财贸总部：河造总不起草，我们起草。

康生同志：好！

新乡李玉坤（老保）（当李玉坤谈到用吊车参加武斗时）

康生同志：不管怎样，用吊车吊房子，任何人也不能解释这样行动。（当李玉坤讲到和二七公社联合有些保守派的工作不好作时）这是困难的。（当李玉坤攻击二七公社夺枪时）不要说这个事了，你还是谈谈如何制止武斗吧！

李玉坤：我一定下决心。

康生同志：下什么决心。

李玉坤：我可以马上回去，作大联合的工作。

康生同志：你坚决支持军分区，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军分区同我们的观点不一样。

李玉坤：请你相信，我保证完成。（李给康老念语录：相信群众相信党……）

康生同志：我相信群众，我相信解放军，也相信干部，但我不相信对抗毛主席路线的人。

李玉坤：完不成任务不是革命派。

康生同志：你的话很多，实际表现是最少，你解释的多，理由也很多，但实际却相反。

张树芝：今天，新乡八一八的大楼和河医的大楼，新乡八一八楼里面还有放射性元素，河医的大楼实验室里还有细菌，非常危险，我们责成新乡军分区负责让围新乡八一八的人撤退，郑州由军区负责让他们撤退，现在撤退没撤退还不知道。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意见你们可以提，但是冲到我们办公楼我们不能办公，我们不能同意，昨天有三股人冲过军区，并且上去就喊。

康生同志：还要揪出刘建勋？！

张树芝：刘建勋同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我们信得过的，他回河南我们坚决支持，坚决拥护。我们军区全体指战员是表过态的。为什么昨天晚上还出现过这个情况。

康生同志：你们的目的是给军区施加压力，使军区不承认错误。

张树芝：我们由于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家可以批评，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康生同志：（对张树芝）你在精神上要有准备，你们承认错误，你们部队中间一部分人，群众组织中的一部分人，一定要大大向你们施加压力，你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二七：河造总、十大总部昨天晚上十二点钟冲进军区，围攻陈桂昌副司令，使他无法工作，完全没有保证。

康生同志：我们认为陈桂昌是对的，李善亭、钟生溢是错的。

戚本禹同志：这个是真的，他亲自给我打电话，陈桂昌是好同志。

康生同志：我们坚决支持他。现在陈桂昌同志受压迫，受围攻，我们就看出动向了，张树芝同志要时刻注意，这个文件发出来，大问题还在后头。

康生同志：张树芝同志的讲话，希望同志们注意。中央关于河南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发下去以后，有的同志问我们相信不相信群众？我们相信群众的，我们相信军区认真检查以后，广大群众会拥护解放军的，会欢迎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我们坚决相信，不管那一派，绝大多数都是要革命的，但是我们不相信欢迎何运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如果有的同志还要军区继续执行何运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人，我们坚决不支持。

现在请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同志：

同志们，你们的会我们参加很少，这是第三次，所以知道的情况很少。我今天来主要是看一下。

现在有一点很值得在座的代表注意，河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各省的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利用何运洪在支左工作中所造成的罪恶和留下的空隙，进行活动。我看到一个材料，武汉“百万雄师”，一百条纸老虎（康生同志：就是行尸走肉，我看“百万雄师”就是行尸走肉），都走到河南来了。（康生同志：我还叫他是“白完行尸”，就是白色恐怖完蛋的行尸走肉）。“百万雄师”是个狗屁！他起这个名字是吓人的，没有三天功夫，到现在还不到三天，政治上全部破产，臭名远扬，组织上土崩瓦解。你听到这个名字好象很凶，其实很松，纸老虎。四川“产业军”，武汉“百万雄师”（康生同志：实际上就是李井泉、王任重到了河南。“产业军”是李井泉的，“百万雄师”是王任重的，两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往河南去了）。北京的“联动”，东北的“荣复军”到了你们河南去了，到你们中州去了，利用过去河南军区何运洪所造成许多错误和所作的罪恶，开辟战场，他们为什么窜到河南去了？为什么不到北京来？这些保字派组织或反动组织都窜到河南这个目标，就是想把河南作为战场，我的话大家听懂听不懂？

（众：懂）懂，那我的中国话说得差不多，其实，我的祖先也是河南人，不晓得是那一代。这一点很值得大家警惕，不但看到河南的消息，并且有行动。所谓行尸走肉的“百万雄师”，就是在河南造谣，有的同志把四川“产业军”叫残匪，残是残无人道的残，匪是罪恶深重的匪。他到你们河南杀人去了，有这么一个材料说，一个残匪杀了七个人，群众逮他时，他说：“你打死我还赚六个”，要不要河南成为保字派的河南？（众：不要）说了不要行动上呢？我要看行动，要看

你们这边（指十大总部，河造总）十大总部，河造总你们行动要特别注意，听其言观其行，你们在这里信心很大，说得怪漂亮的不行，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你们在这里订协议，刚才张树芝同志说了，没有实行，把协议斯毁了。江青同志刚才讲，什么人破坏协定？中国的蒋介石。这是值得深思的，走错了路，可以走回来，“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对河造总、十大总部）我讲话有点进步，你们也要有进步，不要口是心非，我们相信张树芝同志的话，坚决不作两面派。你们年纪青青的，在这里达成协议，回去另搞一套，和各省反动派勾结起来，你们成为窝藏的地方，为什么这些“产业军”、“百万雄师”、“荣复军”、“联动”都窜到河南呢？就是有人搞反革命两面派。给他们抬轿子，利用河南的保守派给他帮忙。现在他们在河南都有活动，刚才康生同志说，军区要有这种准备，就是准备有人向军区施加压力。军区公开承认错误后，有人向张树芝施加压力（戚本禹同志：那是一定的；康生同志：在座的人尽管否认，但一定会有，实际也是这样，百万雄师、三字兵、公检法和一部分独立师的干部也是乘武汉军区改正错误的机会，向军区施加压力，要它不要承认错误，这个问题武汉有，河南也发生了。）这是一种罪恶活动。这种活动一定要失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是毛主席缔造的。这个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的支柱，是不可动摇的，它犯有错误完全可以改正，有人有一种反动企图，有这种反动企图的人必定又会重新犯错误，必定会失败，这一点军区要提高警惕。

河南问题，在声明发表以后，它就树立了权威，有了威信，得到群众拥护，河南的局面是可以稳定下来的。谁要破坏这种可能稳定局势，必定要碰到头破血流，失败的不是革命战士，而是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康生同志：不管他有多少人，“百万雄师”不是号称一百万人吗？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他们的头头是武汉市委组织部长、原大叛徒王明的勤务员。）有一个问题，十大总部、河造总在座的代表都要想一想，你们究竟是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走这一条唯一正确的路线，还是跟那行尸走肉在一起？（康生同志：可以叫做“白完行尸”）你改得好。你们十大总部、河造总首先制造杀人武器，有没有这个事？（答：没有）“百万雄师”、“产业军”总是有人帮忙。（二七：在郑州、洛阳、许昌、开封、新乡都有“百万雄师”、“产业军”，并且制造武器，郑工实习工厂因制造武器，车刀飞了打死一工人，纺织机械厂制造弹簧枪等）（河

造总：二七公社造谣，他们最近开了政工会议……）你们哪，我讲一讲，你们不要忙于辟谣，先检查一下。（戚本禹同志：可以看一看谁在搞武斗？）你们听他讲完嘛！用国家的财产、物资制造小团体杀人武器，这是什么？该当何罪？国家财产、物资都不能用来制造小团体杀人武器。叫做破坏国家财产。现在十大总部、河造总有些工厂把国家财产、物资用来制造小团体杀人武器。是有这个事情。（河造总：是二七公社制造武器、挑起武斗）（戚本禹同志：他们是少数，不会这样做。）康生同志：（今天晚上正在军区围攻陈副司令员的是不是河造总、十大总部？）（戚本禹同志：陈桂昌给我打电话，确实是这样，安全没有保证，张树芝同志你们要保障陈桂昌同志的安全。）（康生同志：我有一个材料念一下，根据军区反映，昨天晚上，河造总的一些成员，军区士兵和干部造了陈副司令员的反，昨天河造总的一百多人，夜十二点围攻陈桂昌、赵复兴。刘大坤、钟生溢溜走，后来又把赵复兴放出，一致围攻陈副司令员。他们说：为什么把军区声明支持河造总一句话拉掉，要是刘建勋搞鬼，就坚决打倒他。这个问题何运洪、张树芝他们回答，这是他们觉得为了促进各派大联合，提出二七公社、河造总都不写，开始还向中央作了报告，然后到总理开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河南军区那个稿子的事，这个问题和刘建勋没有关系，这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如果河造总继续围攻陈副司令员，那我可不愿意你们。今天晚上十点钟已经有五百人冲进了军区，现在正在调人。他们造军区反的原因是军区内一部分人说：刘建勋同志到了军区，刘建勋不承认河造总是造反派，十大总部也说刘建勋歪曲中央精神，只支持二七公社。明天开大会要揪刘建勋。今天造军区的反，是内外配合。他们准备明天开大会。据省委机关造总东风兵团翻印了武汉“白完行尸”十八号公布的一个材料。为什么“白完行尸”要到那里去？就是有人欢迎他们和翻印他们的材料嘛！这个传单捏造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产业军”的批示，说毛主席、林副主席支持“产业军”，这完全是造谣。这样的东西竟有人翻印！省委机关造总丁石、张治安你们听着，我预先请你们注意。）

关于破坏国家财产，制造杀人武器问题，我特别讲一下。不能用国家财产、物资制造小集团杀人武器。特别是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一方面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活动，另一方面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他们占有工厂，搞这些东西很方便。所以我觉得工人同志特别要注意，不要被人利用，不要被保守

派利用，特别是工人同志要注意，在座的有没有工人同志？（众：有）工人同志要特别注意，不要被人利用。在工厂，工人被利用是很危险的。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文化革命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文化革命，所以过去有些走错路的工人，应该赶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不应当再被人利用。不然，将来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还有挑动农民进城的问题。谁挑动农民进城？（康生同志：关于这个问题，不仅仅看看人家，首先要看到自己，看自己利用农民没有。）（河造总：我们保证没有。）（康生同志：不是保证不保证的问题，你执行何运洪的路线，一定动员农民给军区施加压力。）你们有些保守派按照自己的目的。让农民犯错误（戚本禹同志：制造谣言）。在农村制造谣言，用农村包围城市，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过去没有解放以前，毛主席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按照毛主席指出的道路，我们取得了全国的政权。现在情况改变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这时候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是反动的。（河造总、十大总部：这个口号是二七公社提的）你们不要嫁祸于人。（康生同志：你们不能这样歪曲，发明这个口号的是李井泉、产业军，讲事实嘛！）（戚本禹同志：产业军最早喊出这个口号）（康生同志：你们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宗派主义？你们是反对李井泉，还是保护李井泉？）用诽谤、造谣、中伤，总是要失败的，你们以为得计吗？李井泉就是在城市混不住了，违背毛主席的路线，背叛了毛主席。（康生同志：如果把这个事情嫁祸于二七公社，那就是客观上帮助了李井泉、产业军。）李井泉想要农民进城，保卫他们政权。他还不是失败了。

康生同志：我告诉同志们一个秘密，农民不会无缘无故的进城，各地的规律就是军分区、人武部的动员。凡是动员农民进城，大体都是军分区、人武部搞的，大家对这一点不要怀疑。

伯达同志：给农民记工分，记多少钱，给多少粮食，不然农民怎么会进城来呢！有些农民就是糊里糊涂进来的。不给粮食，不给工分，不给钱，农民就是不给他干，还有戚本禹同志说的，在农民中间造谣，总是说造反派怎么破坏国家财产，要求农民进城支援，宜宾农民进城破坏生产才厉害哩！（戚本禹同志：这是过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办法，调动群众斗群众。）

康生同志：浙江保守派动员农民进城，就是军分区人武部搞的。

伯达同志：农民进城主要搞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结果农民把对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也喊打倒。他们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康生同志：动员农民进城，不是当权派不行，因为要给农民工分、钱、粮食，谁有这个力量？

伯达同志：你们要特别注意人武部。

康生同志：新乡、开封如果没有军分区共指挥，农民不会进新乡、开封。

伯达同志：张树芝同志，你们的工作要认真。

张树芝：我们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在郑州不成，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我们准备把中央首长指示、中央批示传达一下，经过教育，那些不赞成中央指示，我们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最有纪律的，对他们是要执行纪律的。

康生同志：张树芝同志，你们现在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开不成不错，我支持三级干部会议不开。开这样的会议，看什么人领导、什么路线领导，有的省军区也是这样。用第一个办法开三级干部会议，名义上是传达中央指示，实际上是动员他们反对中央批示，动员他们让农民进城。很多这样的经验，你们要注意，有的军分区，人武部常常以各种借口召开会议，什么好听起什么名字。比如有的用学习毛主席著作模范人物介绍经验会的名义开会，实际上是动员农民进城。有的以整顿过去支左工作为名，实际上动员部队反中央，动员他们同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相结合。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经验，你们也要注意。现在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到底开好还是不开好，你们考虑。有没有人在三级干部会公开的或秘密搞何运洪以前那一套。

伯达同志：何运洪同志要做人武部的工作，不要让他们动员农民进城。

康生同志：他们有很多理由总是借口下边不通来对抗中央，说什么“都能够拥护军区”，“很多人向我们讲思想不通”等等。过去你们河南军区何运洪就作过嘛！说“给二七公社平反，召集干部会议通不过，还要看看。”

戚本禹同志：有电报。

伯达同志：一个是刘建勋同志回河南帮助做人武部工作，能够一分为二就一分为二。

康生同志：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拥护，一个是打倒。

伯达同志：都是利用人武部。

康生同志：现在就有人揪刘建勋，陈桂昌就揪走了嘛！

伯达同志：人武部有好的，能够改正错误还应该欢迎；不想改正错误的要有适当措施。我把这个秘密全给你们说了，你们要采取这个办法对付我，会不会？

（造总，十大总部：不会）你们在这里保证，回去也应当保证。动员农民进城就是犯罪。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了罪，对人民犯了罪，对农民说来也是犯了罪。

康生同志：农民明白了之后会找他们算帐的。

伯达同志：在座的代表同志们，如果你们对农民犯了罪，农民会找你们算帐的，农民受蒙蔽是一时的，我们相信群众，信任群众。毛主席的路线就是信任群众的力量，希望他们能过来。群众可以犯错误，但是他们会改正，你们不要以为可以随便利用农民。那样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今天我主要是讲两点。一个是现在全国各地的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大量流进河南，并且进行了活动。你们要注意，特别不要供给他们武器，不要拿国家的财产制造杀人武器。一个是不能动员农民进城。你们纵容各地保守派组织，动员农民进城，这是犯罪。你们要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前进。要总结正面经验和反面的经验。我相信作大总部中大部分群众，特别是工人同志会提高觉悟的。要想利用他们的一小撮人最后一定会被戳穿的。所以，对“白完行尸”、对“产业军”、“荣复军”、“联动”的态度是考验你们的试金石；动员不动员农民进城来反对造反派，也是一个试金石。

康生同志：

我有个建议，请同志们注意。河南总的形势是大好。为什么呢？因为军区表示了它的态度，向中央表示，坚决改正错误，而且中央对他们的检查也有了批示。所以，比过去的形势更好了。只要军区坚决改正错误，只要同志们和各个群众组织坚决实行《中央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坚决执行中央对军区检讨的批示，执行你们自己达成的协议，那么河南的形势一定会更好，这一点我们有信心，但是，当前河南是存在危险的，这也要估计到。

一、刚才大家讲“白完行尸”、“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到了你们那里，而且产业军在那里杀人，据开封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杀了八·二四的同志。这些反动组织都到河南去，他们去干什么？破坏文化大革命。

二、河南现在武斗向前发展了，张树芝同志都承认，不管什么理由，什么解释，事实是存在的，而且这个武斗还有大发展的危险，也许就在这几天。

三、请同志们注意，正当我们这一种好形势，军区同志改正错误，你们有一部分组织向军区施加压力，要他们不改正错误，要他们继续坚持过去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这种压力已经开始，我们估计，不但是想压军区不改正错误，而且还会有大量的人跑到北京，向中央施加压力。不管怎样保证，事实总会有的。（伯达同志：现在就有向中央施加压力的。）

据说洛阳已经到了。希望施加压力者明白，我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痴心妄想。来两千也好，二十万也好，我们再三同同志们讲话，毛主席领导下的党中央，它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拥护何运洪路线的人，想向中央施加压力，不能动我们一根毫毛，这种人一定碰得头破血流。

四、防止天灾。从天气预报看，黄河水汛有大大增长的危险，黄河水可不管那一派，不管二七、河造总、十大总部，都不能分离。我们不是说一切为人民服务吗？我们就是要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同时，抓革命、促生产。

因此，我有五条建议，都要从积极方面向前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教导，要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联合方面走。

一、希望双方面达成协议，坚决向刚才表示的那样，坚决反对百万雄师，我想同志们可以达成协议（伯达同志：还有产业军、联动），坚决谴责百万雄师在武汉绑架谢富治、王力同志和对他们的迫害。你们必须充分准备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谴责这种叛逆行为。

二、双方达成协议，坚决反对百万雄师、产业军、联动，到你们河南去破坏文化大革命。你们应当坚决抵制这一点，同北京的革命群众一起与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作坚决的斗争。今天，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坐火车到北京来，北京所有革命群众都上街游行抗议，并且不准火车进站，不准他们下车，而有些比较激烈的人准备武斗，我们想办法说服了。因为北京不同于武汉，北京是毛主席的所在地，应当让他们下车，因为另外还有老百姓嘛！下车还要安置他们吃饭、住宿。可以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嘛！不要搞武斗。这一点，二七公社要注意。就是说不要用他们的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他们现在已经把反动面貌暴露了，还不容易斗争，而且这里许多人是被蒙蔽的，

对他们还是要更好地做工作，你到那里乒乒乓乓武斗一顿。当然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带着枪到北京来的，带着枪到北京是来干什么的？但是，我们是革命的，可以给他们辩论，不一定动手，应当采取这样的办法。现在，百万雄师、荣复军、产业军、联动都去了，“三字兵”也去了，很可能在你们那里会师。

（伯达同志：他们在河南会一败涂地）所以要坚决反对这些反动组织到河南破坏文化大革命，坚决反对一个任何组织同他们结合在一起，坚决反对任何组织利用他们的力量反对另外一派，不管那一派都坚持这一个协议。

三、要把已经达成的六条协议重申一下。目前河南武斗发展，重申一下这个东西有好处，坚决实行已经达成的协议，坚决制止武斗，这一条是当前最重要的一条。无论新乡，无论开封，无论洛阳、郑州都要注意。

四、保证黄河防汛安全，任何组织，都不得捣乱和破坏防汛工作。不准任何组织砸、抢防汛器材、物资。不是说关心五千万人民吗？这就是关心五千万人民的问题，坚持这个协议，有没有困难呢？是有困难的。但是，可以在各方努力下解决。因为这是关系到河南五千万人民的问题。

五、坚决拥护解放军，欢迎、支持军区改正错误。反对向军区施加压力，要他不承认错误。这是最后的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最关键的一条。有了这一条，就可以防止农民进城，制止武斗才可能有真正的保证。这不是你们一个人在这里就可以保证的，刚才有个人说：他（李玉坤）可以保证制止新乡的武斗，这不可能。事实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你没有抓住关键，关键在军分区，而军分区的关键在政委李国秀，据我们知道不止他一个人，所以，不要那样天真了。因为有何运洪的路线问题，要从路线问题上考虑才能解决问题。拥护中央批示，拥护解放军，支持、欢迎军区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变错误路线而不是向军区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改正错误路线，这一条可以达成协议。因为中央有批示。

我建议明天一天，核心组要搞出协议来，这个问题本来今天就明显了，刚才有个同志写了嘛，主要是达成协议和贯彻执行协议的问题。

我再重复一下：

(一) 双方达成协议，反对百万雄师在武汉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行动。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写出文件、传单在社会上散发。

(二) 双方达成协议，坚决反对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到你们河南去破坏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分裂、挑动武斗。

(三) 双方重申，保证实行已经达成协议的“七·五”协议书，特别制止日益发展的武斗。

(四) 双方达成协议，黄河防汛协议要坚决贯彻执行，材料、物资、计划不允许破坏。

(五) 坚决拥护军区的检查报告，拥护中央的批示，欢迎、支持军区的同志改正错误，反对向军区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改正错误。

这样五条建议，请你们商量，看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赞成，你们就回去平心静气搞协议，不要算剥皮帐，达成文字的东西，这样你们回去就好做工作了。赞成就散会。达成协议，再开一次会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二七公社的代表高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打倒刘、邓、陶！

打倒王任重！

打倒陈再道！

打倒文！赵！杨！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

其它各方代表也高呼口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声明

目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深入，阶级阵线更加分明。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英勇斗争，冲破重重困难，得到不断发展壮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丑恶面貌更加暴露。不少革命领导干部，已经或正在

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这是毛主席对我军的最大信任、最大鼓舞、最大鞭策。省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热烈响应伟大统帅的号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工、支农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省军区主要领导人的错误领导下，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于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郑大联委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先后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没有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错误地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在全省造成了恶劣影响，引起了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打击了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压制了群众运动；社会上一度出现了摧垮二七公社组织、肃清二七公社“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等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进行阶级报复，打击革命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特别是我们对毛主席、党中央在关键时刻所作的重要指示，贯彻执行的很不认真，很不坚决，很不得力。毛主席、党中央二月要我们组织各方代表赴京汇报的指示，中央四月关于安徽问题的五条指示，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都是我们改正错误的大好机会，但是我们没有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自以为正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把二七公社对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抗，看作是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所掀起的一股“翻案妖风”，所以又重申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这就进一步打击了郑大联委，压制了二七公社，并且还压制打击了支持二七公社的首都红代会和外地赴豫串连的革命小将，以及军事院校的革命同志，这就错上加错，越陷越深，给我省的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这些错误应由省军区党委常委、主要是何运洪同志承担责任。

我们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树立的不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保守思想严重，缺乏群众观点，怕字当头，墨守成规，既不深入群众，又听不进不同意见，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所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我们感到万分痛心。我们辜负了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信任，辜负了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信赖和期望。我们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对不起河南五千万人民。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检查错误，坚决改正错误，端正方向，坚定立场，坚决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更加努力地完成“三支”“两军”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此，特发表如下声明：

一、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最忠实地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拥护并坚决执行中央对河南问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对河南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坚决支持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二、坚决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郑大联委和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他们勇敢地坚持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抗了省军区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过去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压制和打击河南二七公社，拘捕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的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现在郑重宣布给郑大联委彻底平反，给河南二七公社恢复

名誉，向被抓的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赔礼道歉。坚决支持河南二七公社。努力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坚决支持革命领导干部，促进革命的“三结合”。

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旗帜，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坚决和革命造反派一起，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省委内文敏生、赵文甫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坚决的斗争，彻底把他们批深、批透、斗臭、斗倒。

四、坚决贯彻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积极帮助各方群众组织实现《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省军区、军分区、驻军应分别按驻地和各方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监督小组，监督协议的执行。特别是要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执行“六·六”通令和“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坚决制止武斗。对武斗的肇事者，背后挑动者，对打死人或打伤人的凶手，坚决依法处理。对遭受围攻的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坚决加以保护。

五、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坚决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充分发挥广大革命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努力搞好工农业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领导干部的讲话

〔七月二十五日一点三十分到二点四十分，周总理、康老、谢副总理、戚本禹、吴法宪、刘建勋在京西宾馆接见了河南省军区、军分区和驻军师以上领导干部，作了重要指示，整理如下。〕

总理：

同志们，我们叫大家来商量问题，听说你们在郑州开三级干部会，我们想让你领导同志到这里开，更好地了解中央的精神。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军区都来人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武汉，震动全国。林副主席说，武汉的问题，值得全国各个军区学习。大家来了，听到了呼声，不仅是北京、上海，而且是全国。实际情况你们看到了，明天报纸就出来了。只有毛主席的威信，林副主席的威信，才能动员广大群众。有些地方出现另一种情况，相反的情况，听说在河南某一个分区（我不点名）支持保守派，开上吊车把楼都砸了，简直不象解放军。毛主席相信解放军，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有崇高的威信，咱们能支持保守派下这样的毒手吗？保守派群众是受蒙蔽的，坏人只是一小撮，用吊车把房子都弄坏，打伤很多人，这样的事情比武汉更厉害。当然武汉是另一种形式，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康老：

我一接触河南的问题，就知道武汉的问题不解决，河南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因为河南是听武汉的，不听我们的。

总理：

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我提议武汉的问题正面的反面的都要学习，河南是直接受武汉军区领导的，河南的部队又这么多，有陆军、有空军、有工程兵、有炮兵，还有几所军事院校，系统很多，省军区又有自己的系统，有两个独立师，军分区、县、市人武部，还有仓库，这次都把你们找来一道开会，支左半年了，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武汉的问题值得学一学。

河南省军区党委有个检查报告，在北京起草，在郑州修改的，意见是否一致，也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听陈桂昌同志讲，郑州连印的地方都找不到，河造总、

八大总部不让印，当然不是广大群众，只是群众组织中的几个头头，也不是所有的头头。在武汉有些传单、海报纯粹是造谣，说要王力同志留武汉是让斗争的，有些保守组织的头头就是靠造谣吃饭的，这能吃几天？靠造谣是不会长的！我们解放军怎么能造谣呢？希特勒是靠造谣吃饭的，国民党是靠造谣吃饭的，要把歪风邪气造谣生事肃清，共产党员、劳动人民绝不能这样做。我们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作风，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国家树立榜样，传给后代。你们把武汉的问题学一下，把中央批示河南的问题学一下，有不同观点可以说，我们不强求一致。军队也允许争论，军队四大民主也给群众，过去打仗一年还讨论嘛，要摆事实讲道理，要独立思考，这样真理才能越讲越明。武汉的问题主要靠你们讨论，我们有联络员、记者参加，讨论三天，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可以保留，但要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二十一号武汉的问题就揭露了，下午就游行了，晚上就向河南的代表讲了，第二天达成了五条协议，但是有的就不签字，河造总、十大总部有的就不签字。

文化大革命就是考验人，首先考验党的领导，现在考验军队了，也考验群众组织。部队过去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胜利十几年了，打仗不多了，朝鲜战争有××万人打仗，加上福建、西藏也有××万人打过仗。部队最大的任务就是政治思想革命，××万人民解放军都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接受考验。

我就说这些，开个场，下面请康老讲一讲。

康老：

河南的问题解决得比较久了，有的同志回去现在又来了，有的同志刚来。总理讲了，你们在郑州开三级干部会，与其这样，不如把领导叫来北京开，了解中央的方针更好，所以把大家请来。

开这个会天数不少了，有两个多月了，所以开这么长，就是让同志们认识河南的问题，了解中央的方针，领会主席的思想，犯错误的同志也等待他们的觉悟，等待他们的认识。

情况是这样，在北京开会逐渐向好的方面发展，在河南总的形势是好的，因为矛盾揭露出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的发展与北京的会议是相反的，这就是说在会议上和河南运动的实践是不相符合的，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

好的方面，六月十七日我们看到省军区党委给中央报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对错误有所认识，基本上是好的，因此我们很高兴啦，中央对这个决议有个批示，

这是好的一方面。但事实的结果怎样呢？虽然这个决议报给中央了，但在军区内部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解释，刚才总理讲了，这个决议在郑州就找不到一个印刷厂印，这不是群众的问题，这反映了军区内部有的人不同意印，你们不同意印可以另外搞个决议嘛。

从群众方面讲，军区党委对二七公社一次再次宣布它是非法组织。河南省军区发告全省五千万人民书，搞一个群众组织是不好的，没有一个省这样搞过，即使在武汉军区也没有搞，但是河南军区为了摧垮二七公社，竟发表了告全省人民书，迟迟不平反，最近虽然平反了，但二七公社在各方还受到严重摧残。河造总过去是不赞成十大总部的，现在联合起来搞二七公社。总理插话：对二七公社、郑大联委、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开封八·二四这些左派，你们每一个部队首长同志有权利支持它，保护它，要派部队去，我们一定支持你，这是正义的革命的行动，即使省军区不赞成，你们也要坚决干，这是革命的行动。

现在的武斗比开始时还严重，一直发展到象新乡那样情况。新乡军分区请你们注意一下，李国秀同志到底怎么样？李国秀同志说他们支左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考虑究竟怎么样？

河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过去军区支持它，现在如果不注意，就会走到它的反面。

应当看到河南目前的情况，武汉王任重的百万雄师，四川李井泉的产业军，都到你们那里去了，并且在开封已经杀人，东北的荣复军，北京的联动（黑帮子弟），也到你们河南去了。为什么这些反动组织都到你们那里去，在中州会师？大概你们那里有油水，有人同情它，它们在河南找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二十一号我们向几个组织提出这个问题，武汉的问题有没有在河南重演的危险？

谢富治插话：百万雄师到河南是个阴谋。

康生：你们要制止类似武汉这样事件在你们河南的重演。可能重演，也可能不重演，我们要尽力消灭这个危险，制止这个危险。我希望同志注意，所以在二十一号的会议上，我们向军区的同志、河造总、十大总部、二七公社的同志提出这个问题，问他们能不能达成协议。大家表示赞成，后来达成了五条协议。这五条协议我记得是这样：

(1) 反对百万雄师的叛乱罪行；

(2) 反对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到河南破坏文化大革命；

(3) 制止河南武斗。有的是一种罪行，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工具，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和财产，这是反革命的行动；

(4) 黄河水汛上涨，大家要齐心协力防汛，凡防汛材料物资，那一派都不准抢；

(5) 按中央批示要拥护解放军，支持和欢迎军区改正错误。

不要给军区施加压力，要他们不改正错误，要他们继续执行过去的方向路线错误。不要干扰他们去改正错误。同时，军区的同志不要以为人家讲几句好话就不承认错误，不要因为有些群众支持你，就兴高采烈，实际上这种支持是帮倒忙，我们看到十大总部、河造总有这种倾向。那天晚上武汉事件发生，毛主席、林副主席讲，这件事对全国、特别是对解放军有很大教育意义。我们本来很希望省军区表示态度，你们赞成还是反对，但没有得到省军区的反映。那一天晚上何运洪同志装病没有去。那么紧急的事情，何运洪不到会，我很不满意。我事后检查，何运洪没有病。对武汉的问题，到现在我们没有见到你们的正式决定和声明。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四天了，没有见到你们表态，到底为什么？不表态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应该表一表。你们军区直属武汉军区，你们过去的支左工作，支左方针，实际上是执行武汉军区那一套。

过去省军区有些什么错误，省军区的报告大致都讲了，当然还有些不够，那天晚上我作了解释，我想把主要的讲一下。河南军区的错误最严重的是对中央指示长期地、顽固地对抗，二月十七日主席对河南有个批示，对我们中央文革教育很深。主席对各省的批示很多了，但对河南问题的批示是第一个，就是要你们组织各派代表来中央汇报，而河南军区拒绝主席、中央的指示，到今天已经五个多月，将近半年。你们为什么不来？就是想把二七公社拖垮，造成既成事实。事情并不是这样，实际上没有压垮拖垮。当然河南问题的性质和武汉的问题不一样，百万雄师是搞叛乱的。同志们要从武汉问题得到什么教训？

武汉问题的关键：

一个是部队的少数人拿他们的错误路线去煽动欺骗干部战士，八二零一部队的少数人表现很不好。这能怪战士吗？战士是好的。这一点河南军区要检查一下

你们作得怎么样。最近十大总部、河造总开会有军队参加。四、五十人穿便衣，郑州市人武部的干部穿便衣指挥，这是玩火，玩火要烧到自己的。

第二个是利用公检法。从全国各省看，有的利用公检法干了许多坏事。武汉利用公检法镇压造反派，河南这一条从省里一直贯彻到下边，我们不能不研究这个教训。这次会议上，我们批评了公检法，他的代表就回去了。武汉问题发生后，公检法又翻了，可能要打倒我和戚本禹同志。何运洪同志恰恰在这个时候不参加会议，公检法恰恰在这个时候翻这个案。何运洪利用公检法，丁石、赵文甫是搞公检法的。你们捉多少人，你们没有实际数字，连党言川也捉了。

第三个教训是利用人武部。省军区支持军分区犯错误，分区有没有支持县人武部？人武部有没有动员农民进城的？武汉少数犯错误的同志利用百万雄师把三新、三司、二司、三钢、工总等造反派压垮，河南利用十大总部、河造总把二七公社全部压垮。

第四个教训是利用地方机关的保守派。河南非常突出。河南省委省直总部实际上是保守组织。刘建勋、纪登奎有错误，但还是好同志，你们去搞。最坏的是赵文甫，你们支持他，他支持军区。利用这个组织去打垮那个组织，河南和武汉是一样的。

因此，河南有武汉事件重演的可能。同志们要认识清楚，从武汉事件吸取教训。这个会议上，大家要好好把观点摆一下，把思想统一起来，不要讲的一套实际行动相反，言行不一致。有了错误改了就好，如果坚持错误，长期不改，这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你们要好好讨论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提高思想认识。在这里两个月，河南问题实际没有解决，所以经过这次会议望能得到很好解决。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央首长第八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十时二十一分至三十一日凌晨三时二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康生、杨成武、戚本禹、曹轶欧、吴法宪、刘建勋。〕

康老：

现在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空降军政委王新同志，中央决定调他到河南帮助刘建勋同志作军区的工作。王新同志在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发动叛乱的时候，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了谢富治和王力同志，很有功劳。

张树芝、陈桂昌同志来了没有？来了，请到这里来坐。

同志们，解决问题的会议已经开了多次，今天是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完了以后，你们回到河南去，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个时候中，由于各方面同志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会议开得很好。首先是由于自己主观的努力，其次也有客观上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发展，对我们的会议有帮助。在主观上，你们各个群众组织还是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方向走的，如果包括今天提出签字的协议书在内，就达成了三个协议，这些协议都是你们自己写的。一个是七·五协议，制止武斗；一个七·二三协议，反对武汉百万雄师，反对陶铸、陈再道、王任重、钟汉华；一个是现在签字的关于解决河南问题的协议书。这个协议表示，大家赞成和拥护中央关于河南军区检查报告的批示。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同志们作了很大努力。当然，也经过一些反复，经过摆事实，讲道理，但是，总的是向前看的。所以我们讲今天你们在这个协议书上签了字就可以回去了。这个协议书我们看了，很好，现在交给你们签字去。（康老将协议书递给二七代表，首先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最近召开的河南军队干部会议，还要开几天。

同志们，你们的主观努力刚才已经讲了，还有客观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特别是武汉军区发生反革命叛乱事件的形势，促使了我们河南造反派、群众组织和军区、部队干部战士的觉悟，这一点也帮助我们解决河南问题。因为在河南问题上，我们开始一着手就感觉到当中有陈再道、钟汉华反革命分子的黑手伸在河南，如果武汉问题不解决，河南问题是比较难于解决的。当然，从另一方面说，河南问题解决了，也可以促使武汉问题的解决。这一点我们是做到了。谢副总理那天在这里讲，在座的同志们都听到了，中央批评河南（省）军区特别是何运洪同志犯有方向路线错误，主张给二七公社平反，认为二七公社是革命的造反派。中央的这个态度明确表示以后，反过来震动了武汉，也就是武汉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感觉他们的问题严重，特别是“百万雄师”，他们感到严重了。因为他们过去是反对二七公社的。谢副总理亲自去调查，感觉中央解决河南问题触动了武

汉军区的问题，触动了武汉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样一来，武汉军区的盖子就揭开了。百万雄师一小撮头头的反革命面貌暴露以后，也就促进了同志们的了解和觉悟。在搞七·二三协议的时候，我问过同志们：你们河南方面有没有群众组织受蒙蔽？有没有一些群众组织支持百万雄师？因为我们知道确实是有的，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纷纷到河南去不是偶然的，他觉得到那里可以捞到稻草。这个问题现在看的很清楚了，独立师背叛的人也有所觉悟，这可以帮助同志们认识这个问题。据武汉反映也好，我们知道的也好，你们河南十大总部有几个总部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这一点我们指出来了，希望你们做工作。你们在这里同大家一起反对百万雄师。但是，你们在家里有的还是支持百万雄师。河造总也要注意这个问题，确实你们有的组织支持百万雄师，你们河造总还派了专案调查团到武汉，六月十七日公开发表声明，这个声明被百万雄师到处翻印。（河造总：我们经过多次调查，根本没有派什么专案调查团）你们没有调查清楚。这个问题你们千万要严肃对待，自己千万不要光听自己人的解释，你们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不然你们还会犯这个错误。当然，犯了这个错误也不要紧，还会改正嘛！（总理：是你们的专案调查团嘛！）没有，百万雄师不会到处翻印的，这个很清楚。（河造总：我们发表了声明。）这个对的，是六月十七日发表的。（总理：是六月十七日。）百万雄师到处翻印，你们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你们能保证百分之百不犯错误吗？能保证百分之百同百万雄师没有关系？这一点不要去掩盖，而应当相反，有了缺点错误要揭开它，因为这个东西到处张贴，六月十七日到现在一个多月了，这一点你们要注意。为什么呢？道理也很简单，你们河造总支持何运洪，而何运洪就是陈再道、钟汉华在河南执行反动路线的代表，你们在思想上不可能不接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清楚，希望同志们很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很严肃的对待武汉反革命叛乱事件。正是这样，不管你们那一派都应当从武汉问题上得到教训。毛主席告诉我们：武汉一小撮人的叛乱行为可以使全国的解放军、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从中得到教育。现在武汉军区常委的一部分同志发表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在武汉都知道了，河南也传了去，我现在把这个公告和中央的批示告诉大家，（二七公社拿出河造总支持百万雄师的传单，说这是他们支持百万雄师传单）这个很多，支持百万雄师的传单到处张贴。

武汉军区党委的这个公告是前几天搞的，对问题说的还不是那样全面，但是基本方面说了，这个公告一共写了四条：（已发传单，略）中共中央对他们这个公告有一个批语，这个批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批语说：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十二时十分的来电并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第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第二，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组织要打倒的陈再道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并且是要认真的改正错误，还要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康：这一段的意思是说，一方面给他们一条出路，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改正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同志们要看到，说他们做到三条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这就是说他们现在不是在革命行列，而是在反革命行列。对主席这个批示的精神要认真领会。只有不坚持错误，为广大群众所谅解，那个时候才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现在不是革命行列的人。）第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的人员，思想还不通的人，这些部队的人员干部、战士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第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因为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应该帮助他觉悟，不应该报复，不然为什么算革命左派？第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这是中央的批语，这个批语以及公告已经发到部队群众里边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的欢迎，现在独立师很多战士检讨了错误，同百万雄师划清了界限，广大群众纷纷退出百万雄师。当然，还有一小撮头头在那里挣扎，这是没有好结果的。恐怕这里边也会有人觉悟起来的。这种情况促使了我们河南问题的解决。同志们从报上可以看出，全国广大革命群众、解放军干部、战士一致声讨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叛乱行为。这一点，在七月二十三日，我向你们介绍情况以后，得到你们各派同志的赞成，一致反对这种叛乱行为，反对百万雄师，反对陈再道、钟汉华，并且达成了一个协议，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晓得，现在河南的问题还要同志们去努力解决。上次我讲过了，有些百万雄师从武汉派人到河南去，甚至退到河南去，四川产业军也到你们那里去了，荣复军、联动也到河南去。更重要的是河南的武斗还没有制止。象上次我讲过的新乡、开封、郑州、洛阳、平顶山，这方面你们还要努力，你们今天又签字达成了一个协议，这很好。

我讲这一点你们应当想一想，七月二十三日为什么达成了协议，而河南军区没有表示态度？本来，那天晚上一方面你们群众方面对武汉事件政治上表示态度，另一方面，我想省军区也应该立刻表示态度。因为河南军区属于武汉大军区直接管。可是那天晚上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那天晚上何运洪不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当然，他说他有病，也许有病，但是最近我们在军队干部会议上对他作了严厉的批评。在那样的关键时刻，在会上讨论那样的问题，他不参加我们的会议完全是错误的，打了陈再道他心里有点痛。（二七：他同陈再道勾结特别密切，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介绍百万雄师的人到河南活动，河南军区支左办公室给他们积极介绍很多地方，很多单位，一个介绍信上盖了十几个章子，这次我们在烟厂抓住百万雄师三百多人）郑州烟厂吗？（答：郑州烟厂，还搜出五十三枝枪，一百发子弹，还有省工人总部印发支持百万雄师的传单）（中学红卫兵总部：河南军区的的确和武汉军区有联系）（河造总：我们要求作检讨）你们交上来好了。（河造总：我们五分钟就说完了，检讨全文略）我们欢迎你们这种自我批评精神，同意你们的检查，我相信二七公社的同志也会欢迎他们的，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好的，要求团结也是好的。二七公社的同志自己也检讨了自己的缺点错误，大家要彼此互相努力，都作些自我批评。

总理：你们的检讨交联络员印一下。

河造总：向二七公社学习，向二七公社致敬！（二七公社鼓掌）。

省工总：我们要求作第二次检查。

康老：靠你们做工作。

河造总：我们揭发河南军区的问题：镇压二七公社、郑大联委，然后压河造总，支持十大总部，还造谣说刘建勋把军区声明支持河造总的话抹掉了。

康老：根本不是刘建勋同志的事，是何运洪开会时告诉我们要去掉的。

张树芝：你们不要相信这些造谣的话。

陈桂昌：不是军区说支持二七公社，而是中央支持二七公社。

河造总：我们五十多人是刚从家里新来的，我们揭发何运洪的问题。河造总代表团是何运洪精心挑选的，条件是反对二七公社铁杆，打倒刘建勋铁杆，刚才念那分检讨很早就送来了，他们代表团不上来。

康老：你是那个学校来的？

河造总：我是省直联合总部的。

康老：叫什么名字？

河造总：叫于文华。代表团一直欺骗我们，给我们传达说，中央说河造总和二七公社是造反派，没问题，他们对上对抗中央，对下欺骗群众。

省工总：（李通）我们现在再次作检查，略……。

康老：李通同志，你们工人总部责任很大，你们代表的责任是回去作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我们希望你们坚决贯彻执行在这里达成的协议，履行在会上表态时所说的诺言。我们对你们这个态度是支持的，但是要知道，你们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知道有这样一回事，刘建勋同志亲自看到陈再道手里有一个名单，这个名单上列了二七公社、河造总、十大总部，下面还列了一些组织，他们总是这样讲的，第一，十大总部是最坚决的革命造反派；第二，河造总是中间状态的组织；第三，二七公社是反动组织。这是陈再道、也是何运洪反映的，是他们定的，你们想想好了，这个事情刘建勋同志说一说。

刘建勋：四月二十三日主席批示请河南两派来北京汇报，并叫陈再道、钟汉华和我商量谈判问题。批示下来以后，总理办公室通知我找陈再道、钟汉华。我到京西以后，陈再道说河南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河南军区直接向中央反映的，他当时提出让文敏生代表我。我说我自己代表我自己。他当时戴着眼镜看一个很长的东西，就是刚才康老讲的那个左中右组织名单。他不想叫我看，我这么一拿就从他手里拿过来了。他那个名单上写的左派是十大总部，中间派是郑工，因为那时我不知道有河造总，右派是二七公社。二七公社下边列了一百二十多个组织，包括郑大革联、开封八·二四，后来我问过军区许多同志，他们都说不知道，张树芝同志、陈桂昌同志也不知道，完全是何运洪少数人报告的。

康老：这一件事情要引起十大总部特别是工人总部的警惕，陈再道、钟汉华，在河南是军区里边何运洪、李善亭等人，他们主要是依靠十大总部。这一点，十大总部的人，特别是省工人总部的人，要告诉他们提高警惕，这是第一。

第二，你们十大总部、工人总部同百万雄师有关系，不是所有人，但是也不要否认有些人有联系，这一点也要使下边的人引起警惕。现在有些人已经警惕了，政治上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因为百万雄师坚决反对二七公社，你们过去也坚决反对二七公社，在思想上有共同基础，在某些问题上有联系。这一点我希望你们

同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划清界线，坚决反对他们，在这方面你们要注意做工作。

第三，我知道在郑州有些工人总部的人向农村撤退，这个方向不大妙，现在已经有些厂子停产了，这一点应该向他们解释，他们没有责任，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要给他们开脱，不是他们的责任，希望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一散布到农村，就可能走错了路，同时，长期在外边，对生产不利，对自己的家庭也不利，很多家庭也劝他们回来。这一点二七公社要保证不报复。他们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李通同志代表省工人总部，你们的责任很重大。我们相信你完成这个工作。在你检讨以后，我特别提醒你注意。产业军、百万雄师在向你们方面伸手。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李通：我们一定要遵循你的教导，认真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你上次指示以后，我给总部打了电话，可是在省直机关造总普通一兵二十二日的造谣传单的影响下贴了支持百万雄师的大字标语，上了他们的当。晚行动一天。二十三日我们发了反对百万雄师的声明。）在这方面二七公社的同志不要歧视他们，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团结他们。（二七：坚决按照康老的指示办事。我们有些基层组织可能出现一些偏差，我们一天给家里打三次电话，要他们注意。）一些过激是有的。中央会议完了以后，二七公社可能犯错误，骄傲了，翘尾巴了，觉得自己完全对，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二七：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现在有些坏人假借我们的名义办坏事，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定要把他查出来。）嗯，对。有的人说你们抢了公共汽车。（二七：有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被围，没有交通工具支援，搞了几辆公共汽车，现在已经全部退回去了。）不仅二七公社，也有其他坏人假借十大总部工人的名义，河造总的名义办坏事，加在他们的身上。

河造总：我们没有派专案调查团去武汉。

康老：这一点你回去调查调查，不要下结论这样早。市工人总部那一位是代表？（市工总：是王林，他回去了）他的思想通了没有？我有点担心。他的思想没有通，对百万雄师他不表态，我注意到了，你们工总要注意，要做工作。

李通：我们有个请求，我们的代表沙发来回去做工作，被二七公社抓了。

二七：他参加武斗，在粮院被抓。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应当抓他，我们发现以后就把他放了。

康老：再复查一下，看放了没有？所有代表都不能随便抓。陈桂昌同志回去后，十大总部、河造总围攻他，他是军区副司令员，是左派，你们的人围攻他，搞了几天。

陈桂昌：围了二个晚上。

康老：今天还来了一个同焦裕禄同志一起工作的同志，叫张钦礼。哪个是焦裕禄同志的战友张钦礼同志！（张钦礼同志站起来）

康生（亲切地）问：张钦礼同志，你是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张钦礼：七月二十八日。

康老：又在什么地方？谁抓的？

总理：是人武部还是军分区？

张钦礼：兰考，开封军分区政委陈久安，副司令员李地山带部队抓我的。

康生（气愤地）：陈久安、李地山来了没有？站起来叫大家看看你们是什么样子。

（陈久安狼狈地站起来。李地山未来京。）

张钦礼（责问陈久安）：你不是说逮捕我是中央批准的吗？

陈久安（吞吞吐吐的）：是，是，是省军区批的。

康生（严厉地）：何运洪站起来！

（何运洪惊恐万状地站起来）

康生（严厉地）：是你们批过的吗？

何运洪（吞吞吐吐地）：是，是武汉军区陈再道批的。

（二七公社代表愤怒高呼：打倒刘、邓、陶！打倒陈再道！打倒王任重！打倒钟汉华！打倒何运洪！打倒李善亭！打倒陈久安！打倒李地山！

张钦礼（控诉）：你们上欺中央，下压群众……陈久安：张赖兴、张孔照等同志死因不明，你必须交待清楚。

（陈久安吞吞吐吐，哼哼唧唧，张口结舌，无言对答。二七公社代表愤怒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张钦礼：现在兰考监狱还有凤鸣同志没有放，陈久安，你说怎么办？

陈久安：今晚我打电话就放她。

康生：根据张钦礼同志说的情况，陈久安在兰考搞的白色恐怖，这不是孤立的，各军分区要很好检查，文化革命中逮捕的人应该统统放出来！

（总理站起来重复了康生同志的话。）

康老：你们开封要特别注意，抓了很多八·二四的学生。

二七：直到现在还关有三十多个二七战士。

总理：在什么监狱？（二七：郑州法院街监狱）

康老：魏家桢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卫戍区司令部的负责人。

魏家桢：不知道。

康老：你们要好好检查一下，马上打电话回去，确实有要放出来。

刘建勋：属谁管？（魏家桢：属军区，人武部只十几个人）

总理：康老已经说了，今天晚上请张树芝、陈桂昌同志负责召集会议，今天一定查清楚，抓人没有放的，一定在明天十二点前放了，并且把名字报来！

康老：徐文礼你要把开封检查一下，打电话回去问一下，看八·二四还有没有人被押，有，要放了。

总理：军区、军分区都要查一下。你们传达了几次协议，你们响应康老、伯达、江青同志的号召，这是好的，但是必须监督执行。你们还要监督军区、军分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首先要求河南军区经过加强以后，要负起责来，在今天晚上开始表现出来改正错误。改正错误有的真正改，有的表面改，实际不改。他们要表现的。军区同志多次开会，光说不行，要行动，经过群众揭发，改正错误。监狱有人的，不管公开还是秘密，二七也好，其他也好，群众也好，都要放了，因为文化革命而被逮捕的应该放出来，有错误可以教育，有的是被冤枉了。这是一件事，要表现，通过群众组织，看是不是这样作了，包括野战军、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包括在内，都要表现，都要查一查。

其次，过去曾经发了一些枪，军区、军分区、野战军给保守组织，支持军区的保守组织发了枪，名字叫发给基干民兵，他们拿了枪进行武斗，或者挑动农民进城进行武斗。我们反对这样做，应该由军区、军分区、野战军负责收回来，封存起来，这也是一个考验。过去放纵群众斗群众，是有人策划的。

第三，刚才十大总部的部分组织省、市工人总部、河造总的代表团作了检查，承认了过去的错误，这是好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表现在行动上，不仅犯严重错误，

就是一般群众犯错误,也要在行动上改正,我们要教育他,帮助他,比如不离开工作岗位,不停产,不停业,不停交通,现在要回到生产、业务和交通运输岗位上去。从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上表现。二七公社、八·二四造反组织要欢迎他们回来。他们愿回来生产,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欢迎。停产、停业、停交通不行,要有实际表现。你们的宣言是口头的,毛主席说我们要作实际革命家,要从行动上表现。现在凡是回到工厂,不进行武斗,埋头生产,表示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造反派应该欢迎,允许他们从行动上改正错误,不要对立,弄得大家不敢回来。现在有些坏组织中极少数人甚至一些军事方面的人,煽动工人离开生产、业务和交通运输岗位,到农村中去到处流浪,制造事件,这是错上加错。我们发现在百万雄师中就有这种情形,把工人搞散,十大总部也有这种现象。这需要双方作工作,犯有错误的回到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方面来表现,造反派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把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一个商店搞好,才能共同的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考验,左派更坚强,犯了错误的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于武汉百万雄师,不要叫他们“百匪”。他还是一个组织,作为一个群众组织,还要争取教育这个组织中的群众,启发他们觉悟,揭露他们的坏头头。他们的坏头头还是依靠他们来揭。比如河造总、十大总部也有这样的坏头头,也要他们组织中的群众起来揭发,不是由二七公社、八·二四揭出来,那样也揪不准。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犯了严重错误,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坏头头要到群众中去考验,一要承认错误,二要坚决改正,认真改正,三要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的眼睛亮得很,你是不是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是不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通过群众来证明。四要给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要帮助受蒙蔽的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五不允许坏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社会秩序。如果坏人操纵工人散了,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威胁革命领导,不怕,那有广大群众支持。在武汉证明了这一点,陈再道那样掌握一个大军区的兵权,现在他一叛变,最后暴露了,那个地方的问题可以解决的最彻底。百万雄师好象了不起,实际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曾经犯了错误,不要去辩护,你们河造总不但有声明,而且还有报纸,要坚决承认,认真改正,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的错误是这样,头头的错误就要看,从实践中看。看他是不是真正改正错误。

你们达成的协议，要认真贯彻执行，不管谁，群众都看得很清楚。

军区要有集体领导。对他们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交给他们，不要满地贴大字报。

中学红卫兵总部：现在郑州打伤人很多，没有医生医疗。

总理：军区有几个医院？

二七：现在医生参加保守组织的比较多，都不工作了，二七受伤的人很多，他们反映的情况有，但问题究竟在那里？

总理：就是我刚才讲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散掉。军队检查一下，如果医生散了，我给军队同志商量一下。

郑大战斗师：省直机关造总和军区、郑州卫戍区司令部策划建立一个河南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

康老：对，有这回事。

战斗师：联合起来反对二七公社。

康老：是这样，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目的是在中央会议没有开完以前，把二七公社打垮。另外压迫军区，不让他改正错误，这个联合司令部有十大总部参加，也有河造总一部分组织参加。

河造总：我们没有组织参加。

康老：丁石在不在？有人告诉我与你有关系。

丁石：与我没有关系。

战斗师：省直机关造总在北京表现不好，公开对抗中央。戚本禹同志六月二十八日接见三方代表以后，表现更坏。

康老：有没有那个张治安？

战斗师：有。

康老：那个人我一看就象个地主。

战斗师：张治安把几个总部召集在一起，研究对策，他说中央分别接见是设下的圈套。

康老：这个人我注意到了，他在会上还出主意。

战斗师：三月太康、密县公安部门拿着逮捕证到郑大逮捕郑大革联的学生，公安厅登记站、军区都不表示态度，推给我们郑大战斗师。问我们同意不同意？说我们同意就抓。

康老：信阳炮校讲，红色造反团战士朱振华、李志军，还有红色造反团观点的张义民、陈金辉、袁延年等五个人直到现在还在信阳市监狱里押着，这都是解放军，信阳军分区张波：有没有这个事情？

张波：我们给武汉军区打了电话，他们没有答复。

总理：人在什么地方押着？

张波：在信阳。

总理：归你管嘛！要马上放，不要再问武汉军区了。

（张钦礼几次发言被郑大战斗师、中学红卫兵总部打断，总理离座单独同张钦礼到外边会客室谈话。谈完话张回到会议室。）

铁军：省直机关造总策划搞河南百万雄师不是一天了，他们的头头是总工会的杨全智。

康老：李通同志你认识不认识？

李通：认识，我对他有抵制。

张钦礼：我二月二十六日被捕，七月二十八日释放，在监狱过了五个多月。在监狱中，陈久安、李地山对我进行了残无人道的迫害。

康老：陈久安来了没有？站起来让大家看看。

（二七：打倒刘邓陶，打倒陈再道，打倒王任重，打倒钟汉华，打倒何运洪，打倒李善亭，打倒陈久安，打倒李地山。）

张钦礼：陈久安、李地山说逮捕林场一百人是经过谢副总理批准的。

刘建勋：陈久安，到底是什么人批准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搞的，为什么不说实话？

陈久安：他们说是经过批准的。

康老：是不是造谣说经过中央批准的。

陈久安：我不在那里。是公安局搞的。

刘建勋：什么公安局搞的，公安局是受你操纵的。

康老：同志们，各军分区的问题很多，开封八·二四、新乡八·一八，以及洛阳八·一六等，有很多同志，有很多意见，对那里军分区的支左有很多意见，认为他们有很多错误。这些问题我已经在军队干部会议上都讲过了。比如象新乡军分区的李国秀，在支左工作中有许多错误，开封、洛阳军分区也存在很多问题，同志们有很多意见。我讲两点建议，第一，各分区、各县的问题，中央批准刘建勋同志回去，由刘建勋同志一个分区一个分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第二，军队干部正在开会，军分区的负责人都在，我建议各个分区由各地造反派留下一、二个同志，作为代表，参加军队干部会议，开封、新乡、洛阳、兰考的问题，在会议上可以尽量的实事求是讲出来，尽量揭发，帮助各个分区的同志们检讨错误。其他代表同志没有意见就可以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了。有意见可以留下，这样可以使问题解决得更好一点。大家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因此，开封、新乡、洛阳的问题今天就不讲了。

现在我讲几个问题。

一、有这样一个问题要戴苏理回答。有个报告说，戴苏理打电话到河南，告诉河造总，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慌，要表面上承认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组织，但是在基层要否定它是造反派，说他们是保守组织。目前要稳住阵脚，要表面上贴出大字报和二七公社联合。你不是这样向河造总指示过？（戴苏理：我根本没有打过电话）你打过什么电话吧！？（戴苏理：我打过二、三次电话，但没有讲过这个话。）你声明没有可以调查。不过戴苏理你要注意，在中央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不代表河造总，你怎么打电话？你以为河造总就是你的？（戴苏理：不是，我是帮助。）你就是两面摇，我在上次批评过你，我也提醒过你，你这个毛病要经常改正，不要玩两面手段。当然，我们是这样看，戴苏理同文敏生、赵文甫的问题已经讲过了，在这里就不讲了，我说你可以讲讲嘛！你要采取老实态度。请注意这个问题。对待群众组织要积极帮助他们，如果你支持他们，就更要注意他的缺点，帮助他改正错误，带他向好的方向走，必须是这样。

二、本来张树芝、徐文礼也要检查，因为时间关系，他们都写了检讨不讲了，将来把检查印出来，交给大家看。八·二四讲到一军有许多错误，特别是赵静生，有很多错误，这个问题要在军队干部会议上好好加以检讨。

三、中央对河南问题已经有个批示，同志们已经看到了，新来没有看到的同志，可以发给他们看一看，今天就不再重复了。中央在批示中讲，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河南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因此，中央除了派刘建勋同志回去以外，军区干部要加以改组，这一点同志们放心好了（二七战士高呼口号），中央已经决定调王新同志去帮助刘建勋同志作军区工作。有的同志问何运洪怎么样？同志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何运洪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因此，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你们通过后报告中央。对刘建勋同志，中央批示中也讲到了，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这个批示，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现在河南军区党委发了检查报告，一军也有一个检讨报告，这方面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的确象总理讲的，群众还要监督，看他犯的错误是不是真正改正了。

要帮助军区以及一军改正错误。上次我讲过了，他们认真改正错误，我们要相信他能够改正错误。只要改正了错误，广大群众一定会热烈拥护解放军的。何运洪等人不能真正代表解放军，我们相信群众能够支持和欢迎军区改正错误。这一点我再三讲，同志们不要给军区施加压力，使他不改正错误。有这种苗头。有些人还要硬说他过去支左的大方向是对的，这样对河南的文化大革命是不利的，尤其是在武汉地区，陈再道问题被揭出来以后，同志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过去何运洪等人长期的顽固的拒绝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现在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希望军区坚决改正错误，群众要帮助他改正错误，坚决反对口头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坚持错误，坚决反对不支持他改正错误，给他施加压力使他不改正错误。

在我们这次会议上，几个组织达成了三个协议，这很好了，但是这还要在实践中实践，从文字上达成协议，到实践贯彻执行，这要做很多工作。所以，同志们要言行一致。二七公社平反了，中央承认他们是革命造反派了。他们反对何运洪、反对军区的错误路线是对的，这是好的。但是，正象在会议期间二七公社同志讲的，不要在中央会议以后就骄傲了，翘起尾巴了，刚才二七公社的同志也讲了，的确有些组织有些不纯，特别是要注意掌握政策，决不搞报复，还要做工作，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这一点你们代表要紧紧掌握。有的组织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同他们团结在一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不要讽刺歧视，要好好实行团结。当然中间也要经过一些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这就是毛主席讲的“团结——批评——团结”。这一点二七公社的同志要戒骄戒躁，兢兢业业，不要在这方面犯错误，不要背包袱。要帮助“百万雄师”，帮助何运洪，帮助支持何运洪的人，这方面千万警惕，而党言川同志尤其需要注意。你这个人躁得很厉害。你有革命热情，但是不注意政策，要学习林副主席讲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你科学性很不够，要反复考虑问题，不要冲动。我今天还和刘建勋同志讲，要他好好同你谈一谈。要善于掌握政策。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很担心下一次再犯错误。二七公社可能要犯错误，因为各个地方常常是这样，中央支持一下，自己骄傲起来了，不讲政策，打击报复，结果自己犯了错误。我看了你们各个组织，虽然观点不同，但是你们的思想方法有共同点，二七也好，河造总也好，十大总部也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辩证法太少，不会反复考虑问题，我向你们介绍过浙江红暴会翁仙鹤同志。省联总把红暴会打了，翁仙鹤同志也挨了打，但他坚持大方向，坚持团结，批评红暴会的缺点。他是红暴会的赴京代表，因为这样一个观点，红暴会认为他右倾，把他从代表团开除了。开除后他还是坚持大方向。我同红暴会的同志讲，不应该开除他。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遭到打击还坚持大方向，得到平反更要掌握政策。在这方面，二七公社要兢兢业业，才能把革命的大联合搞起来，才能团结好。

还有一条要注意，就是当着他受压迫的时候，自己团结在一起，当着平反，不受压迫的时候，就打“内战”。你们一定要注意。我现在告诉你们，武汉三新、三钢也发生了这个问题，因为百万雄师打下去了。我们找他们双方谈了，双方都作了自我批评，作了检讨。这方面你们也要注意。

河造总犯了一些错误不要紧，犯了错误，得到了教训，并不因为犯错误就把整个工作都否定了，我们也不是这样。不过的确你们需要有自我批评，有自我批评才能真正团结。我讲这个问题请你们注意。你们是青年，是革命小将，决不能玩这样的手段，表面上承认二七公社，是为了巩固阵脚，巩固组织，把阵脚、组织巩固起来，又会发生变化，那就不好了。（河造总：我们决不能这样想，支持二七公社也等于支持我们。）你们今天晚上的检讨是好的，但我还要说一下，你们不但在这里检讨，在家里有什么毛病，有什么缺点，也要检讨。今天河造总作自我批评，我很高兴，在整个会议中，我感觉你们自我批评不够，你们常常解释问题多，自我批评不够。上次新乡有个李玉坤，他的自我批评太少，解释太多，说的太多，做的太少，这是你严重的缺点，你自己要好好检讨。你不敢对自己的错误势如破竹，这是你的很大的错误，我希望你不要再解释了，你要用行动来证明。总而言之，我觉得自我批评这是最重要的，这对你们有很大好处，是很大教训。

十大总部李通同志的讲话我是赞成的，但是你们自我批评不够，你们是工人总部，在这方面应该作的更好一些。这一点请你们注意，我已经听到你讲的那个话里面还有话，你们对二七公社还有一些小嘀咕，这一点更要注意。革命群众组织有错误改正了就好了，尤其是革命组织。我入党以后长期在上海做工人工运工作，我懂得工人的品质，他们无产阶级本质是好的。从武汉事件可以得到一个教训，你们千万不要轻信许多谣言，首先从陈再道反革命叛乱中得到教训。他们有一个口号说是中央文革只是要知识分子、要学生，不要工人、不要农民，这次在京西宾馆批判他的时候，他自己还讲：“我是个老粗，我也不大认识字。”这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说，他是劳动人民出身。“百万雄师”也是这样，说中央文革只要学生、知识分子，不要工人。四川产业军也是这样讲。他们想利用这个来离间工人阶级同我们党的关系，工人阶级同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阴谋。实际上真正不要工人，不要农民的不是党中央，不是毛主席，不是中央文革，而恰恰是这些反革命分子。他们欺骗工人、农民，引导他们犯错误，煽动他们参加反革命暴乱。因此，我前天晚上问陈再道，陈再道假装他是不认识字的老粗，想说明他是劳动人民。我问大家陈再道能不能代表劳动人民？（众答：不能。）不能。他是劳动人民的叛徒，工人、农民的叛徒，不能代表劳动人

民，这一点希望河南省，市工人总部的同志，千万要注意，不要上这个当。不然，工人、农民就会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当，这是一个教训。

反对文化革命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诬蔑文化大革命，诬蔑党中央，诬蔑毛主席，诬蔑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解放军，他们甚至于很狂妄地问我们，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如果不要就回家种地去。同志们，千万不要受这样的挑拨，这样的欺骗。谁不要解放军呢？真正爱护、信任、依靠解放军的恰恰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象陈再道、钟汉华、独立师牛怀龙、蔡炳臣才是真正不要解放军，他们把独立师的有些干部煽动起来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他们是要破坏解放军的声誉，瓦解解放军的组织。同志们想一想，象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他们能不能代表解放军？（众答：不能）不能。他们是解放军的败类。这一点同志们要注意，要警惕。凡是煽动部队对抗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才是真正破坏我们的解放军。这一点是一个很大教训。刚才讲的何运洪、开封军区的陈久安实行的白色恐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是真正支持解放军，还是破坏解放军？是破坏解放军。新乡李国秀，镇压革命群众运动，还枪毙一个工人，他能代表解放军吗？不能。按照他们的路线，是破坏解放军的威信。

有些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说，文化革命不要党了。同志们，要想一想，千万不要轻信这样的污蔑，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亲自领导的，怎么会不要党的领导呢？我们不要刘、邓黑党的领导，说这种话的人就是想象以前那样要刘、邓黑党的领导。那个党不能领导。（二七：高呼口号）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人污蔑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恰恰是要复辟刘、邓路线，想让刘、邓的党来领导。同志们想一想，武汉军区的政委是王任重，被打倒了，以后陈再道是第二书记，实际是第一书记，钟汉华是第三书记，实际是第二书记。我们要不要陈再道、钟汉华的党领导？（众答：不要！）我们应当得到一个教训。

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说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小组专门整老干部，不要老干部了。实际上恰恰是主席、林副

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最关心老干部。老干部是宝贵的财富，要保护他们，但是，离开马列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阶级路线，笼统地讲要不要老干部，那不行。刘少奇算不算老干部？邓小平算不算老干部？陈再道算不算老干部？钟汉华算不算老干部？（众答：是老反革命）他们不能代表我们的老干部，是老反革命。说那样话的人，就是要那些人在我们党内当权，这样恰恰是他们不要老干部，是对老干部的污蔑。老干部应该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如果象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是相反的。这一点同志们应该注意，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所以我们说武汉问题使我们取得了教训。从这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教训，就对我们解决河南的问题有好处，因为，河南还没有发生象武汉那样绑架王力同志、毒打谢富治同志，还没有发生那样的反革命叛乱，但是有些问题是相同的，陈再道、钟汉华他靠什么呢？第一，煽动独立师；第二，利用公检法；第三，利用分区武装部；第四，利用省直机关保守组织。这样去煽动蒙蔽一些群众、工人、干部的。同志们，仅仅是百万雄师搞不起来那样的叛乱的。河南何运洪一直在军区煽动镇压革命造反派组织，利用公、检、法大量逮捕人，到底逮捕多少，何运洪说一千多人，实际上在一万人以上，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忠实的交待，何运洪就是利用这些东西。何运洪自己就是搞公安工作的，在彭德怀保卫部作特派员，文敏生也是作公安工作的，赵文甫是领导公安工作的，省委机关的丁石也是作公安工作的，他们利用公安总部在郑州大量捕人，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使用法西斯手段，刚才张钦礼讲的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而是很多，他们利用这个东西，同样在河南支持某些犯错误的军分区、人武部，这一点应当说河南比湖北还厉害。湖北只是在武汉三镇搞的比较厉害，其他军分区才开始搞，河南的军分区存在严重问题，开封、新乡、洛阳、信阳都有问题，刚才张钦礼讲的是一个例子，在这方面有些人犯的罪恶是很大的，上次我不是讲过吗？百万雄师用吊车推房子，河南新乡、洛阳、郑州、平顶山也都有嘛，这就是白色恐怖。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军分区都不好，犯错误的军分区也不是所有的同志都不好，但是，必须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就是利用军分区、人武部作坏事，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直到现在有些军分区的同志还不愿意真正检讨，不愿意把他们的错误彻底揭露出来，我希望他们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有了错误，坚决改正，这是我们解放军

最好的一种品质。犯错误有时候是难免的，但是要认真改正，我相信多数同志能够作到这些。他们今天应该脱裤子，彻底检查自己的错误，解决河南的问题。

武汉军区利用省、市委机关保守组织，河南怎么样呢？很清楚，何运洪就是和省直机关有些人勾结，供给他消息，供给他观点。所以赵文甫、杨蔚屏写信给何运洪，何很高兴。煽动军区，利用公、检、法，支持军分区、人武部，利用省直很多保守组织等，武汉军区的一套，何运洪都拿到河南来了，所不同的，是没有绑架谢富治、王力同志，但是，如果前几天我和戚本禹同志到郑州去，到底会怎么样呢？我看也逃不脱。所以要从这些地方得一些有益的教训。

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好。有的同志提议，是不是给每个代表发一个毛主席像章，这个意见是很好的，但是，你们明天走来不及了，我想了一个办法按人数配备，交给刘建勋同志，由他发给大家。（刘建勋：好，由我发。）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如果代表在这里讲的很好，回去不执行，那就不发。

河造总：戚本禹同志说，我们河造总是犯了错误的造反派，现在还可不可以这样讲？

二七：戚本禹同志根本没有这样讲过。

康老：你不要听人家说，你自己表现嘛。单独接见的问题，请同志原谅一下，我们没有时间。事实上你们的问题我在会上都讲了，如果你们有特殊问题，可以把材料交给我们。

十大总部：二七公社要保证我们代表的安全，不要抓我们的人。

康老：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比较清楚了，我再三交待不能打击报复嘛，中央关于武汉问题的批示中也讲了，当然，个别地方发生这样的问题，要彼此做工作，不要发生一件事情，就互相攻击起来了。你们要彼此相信，做工作，有些要作相当艰苦的工作。有些问题不是开一个会议就能完全解决的，你们已经签了二次协议了，今天晚上又签一个，你们签好以后交给我们的联络员。二七公社和你们共同签字，如果是反动组织怎么会共同签订协议呢？白纸黑字都在嘛，如果是反动组织，叫我签字我是不签的。今天晚上，把抓的人统统放掉，彼此都放，当然，也可能明天你那个组织被抓一个，他那个组织被抓一个，但是不要因为一件事情破坏协议。现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更重要的事情还是你们根据中央

的路线去执行。中央已经有了指示嘛，如果你们相信中央的指示，就坚决执行，违背就不对嘛。

铁军：我们保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造军区的反，打倒陈再道，永远忠于毛主席。

二七公社、八·二四：中央批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对河南革命造反派的最大关怀，将把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坚决按照中央批示办事，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决不搞打击报复。

康老：再见吧！同志们，将来我到河南去，不要把我抓起来。

二七公社代表高呼口号，河造总、十大总部也高呼口号。（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河南“二七公社”的文章：《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司令部》

八月五日是个光辉的日子，是个具有伟大纪念意义的日子，是铭刻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心上的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去年的今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写了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一把利剑，刺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心脏；是一把铁锤，砸烂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身上的枷锁。这张大字报，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宣判书，是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进攻的总动员令。毛主席的这张划时代的大字报，给我们指明了斗争大方向，给了我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勇猛冲锋的无穷力量。“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一年来，我们“二七”战士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揭发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在河南的代理人的滔天罪行，戳穿了他们对革命派明支持、暗瓦解的阴谋诡计，打退了他们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一月革命”风暴后，我们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勾结起来，对我们“二七公社”进行了疯狂镇压。但是，我们没有被压垮，我们越战越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和关怀下，在全国革命派的支持和

帮助下，经过英勇斗争，终于赢得了胜利。回顾一年来的战斗历程，更加体会到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何等英明，何等伟大！毛主席他老人家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得是何等深刻，而对广大革命群众又是何等信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苦。我们“二七”战士一定要永远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彻底批倒批臭。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破私立公，促进思想革命化，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克服小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组成千百万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河南省军区机关《秋收起义战团》全体战士：《坚决打倒何运洪、李善亭！》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运洪老混蛋和他的狗头军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善亭，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系杭地、长期地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坚持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拼命地扶植省直造总等保守势力，操纵其御用工具公安公社，打击革命的领导干部，压制革命小将，双手沾满了我二七战友的鲜血，其滔天罪恶，真是罄竹难书。我们先揭以下几个问题：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破坏二月谈判 二月十七号下午五点三十分，周总理依据毛主席的指示，发出了解决河南日报社问题的四点指示，命令何运洪“出面召集有关各方，拟定谈判名单，上报中央，在中央批准后，赴京谈判。”这是毛主席为解决河南问题发出的最高指示，是对河南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最高指示是要无条件执行的，可是何运洪这个老混蛋是怎样对待最高指示的呢？十八日上午，也就是周总理下达指示的第二天，他就当着同志们的面说：“谈判我还不准备去哩。去不去由我哩！过去没犯过错误，这次霍上犯个错误。”看，何运洪这个家伙一开始就不打算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狡猾的何运洪，怕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怕群众看出他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于二月二十三日，还假惺惺地召集各方协商赴京汇报名单。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赴京汇报诚意，而是有意

把二七公社压垮、拖垮，然后造成既成事实，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请看他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报告。报告中说：“关于召集各方到北京谈判问题，我们拟采取限制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代表名额的办法，把谈判的时间拖下去。……目前郑州形势正在急剧地向好的方面发展，右派力量正在土崩瓦解。……所以谈判时间越向后拖，对郑大联委越不利。他们必将越拖越垮，以至完全解体。”看，在何运洪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眼里，那有党中央，那有毛主席，那有一点群众观点。由于郑大联委的代表在郑州没有安全保证，党言川同志提前到了北京，派史文华、王月亭两同学，作为郑大联委的全权代表，参加协商名单的谈判。这本来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可是何运洪、李善亭借口郑大联委主要负责人没到会，两次终断会议，使名单协商无法进行。事后还向中央报告说：“郑大联委毫无赴京谈判诚意，党言川无视中央、总理指示，拒不参加谈判，甚至提出要单方面赴京汇报，并已非法派代表赴京，致使会议再次终断，建议中央文革敦促党言川立即返郑。”把罪名加在郑大联委身上。郑大联委为了消除何、李的借口，早日达成赴京汇报协议，让党言川同学从北京返郑。可是当党言川同学亲自到军区参加协商时，何、李老混蛋又耍了一个花招，说党言川延误与破坏谈判，毫无道理地向党言川提出两个条件，一条，要党言川承认错误，写出检查，印十万份，在郑州、北京散发；一条，要党言川开上广播车上街请罪三天。党言川同学当然不会答应这些毫无道理的条件，于是三月三号第四次谈判时，何老混蛋便无理宣布：“党言川不承认错误，无谈判诚意，谈判无法进行，待承认错误接受条件后，再继续谈判。”就这样，使赴京汇报长期终断了下去。难道何运洪、李善亭之流真的想继续同郑大联委商谈吗？根本不是。一个更大的政治阴谋早已在两个大坏蛋肚子里孕育成熟了，这就是在三月四号的一次大会上，（后来因故这次大会推至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既然是“非法组织”了，还有什么可谈呢？所以何运洪以后再不提赴京汇报的事了，彻底破坏了这次谈判。三月六号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后，又亲自打电话给北京，说什么“关于河南日报社的谈判问题，报社已经军事接管了，河南的两派只剩了一派，我们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了。”同志们，康老讲：毛主席指示要河南省军区组织对立的双方组织到中央汇报，在解决全国各省问题上第一个指示，也是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解决省军区问题的第一个指示，

毛主席和党中央是想通过解决河南问题找出一些经验，指导全国。可是毛主席这个最高指示被何运洪、李善亭抗拒了，真是罪该万死！他们抗拒了中央指示，还把罪名加在郑大联委头上，真是混蛋透顶！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历史事实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我们说，抗拒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破坏赴京汇报的，不是郑大联委、二七公社，而正是何运洪、李善亭两个大混蛋！

坚持错误，变本加厉。中央关于青海和安徽问题的决定公布以后，特别是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布以后，一再强调，不准随便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再三指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对业已违犯了中央指示的做法的，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这本来是何运洪、李善亭等人改正错误的好机会。可是何、李两个混蛋不但不执行中央这些指示，反而变本加厉地抗拒中央的指示，不但不给郑大联委平反，反而再次重申：“我们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郑重的，是有充分根据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郑大联委的案是翻不了的。”在军区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根本不认真学习中央的指示，不去讨论军委十条命令，反而大讲特学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他们根本不打算执行中央的指示。李善亭说：“河南不是安徽，河南不是青海，青海有个赵永夫，我河南就没有赵永夫。”看，他们嚣张到何种程度，在他们眼里那有中央。他们就是把河南搞成了独立王国。

在北京汇报期间，封锁中央首长的指示六月三日，中央领导同志就单独接见了何运洪、李善亭等，就对河南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指出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何、李两个混蛋，根本不向家里传达。到六月十日，才趁派人回来继续收集二七公社的材料之机，口头传达到军区在家的常委，对其它领导干部继续封锁。直到六月二十七号，中央首长已经三次单独接见了何运洪、李善亭和军区在京的其它领导同志，反复讲明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之后，才不得已传达到排以上干部。但向部队传达时，何运洪又电话通知，不让传达原文，叫归纳几条，传达精神，生怕部队了解了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中央首长几次接见，都明确指出责任主要由何运洪负责，要他认真作检查。何运洪一直封锁中央首长这个指示，只向下传达让军区常委检查。直到六月底陈桂昌同志去北京，杨代总长要陈好好做何的工作，动员何好好检查时，才知道了这个情况。这时陈桂昌问他个人检查考虑的怎样？他还推托说不知道。真是无赖之极。在京的领导干部气愤不过，造了他

的反，追不得已，他才把工作人员叫了去，商讨检查之事。商讨时，他一点不谈思想，一味地问大家：你们看怎么办哪？你们看怎么检查呀？后来才勉强叫一个处长代他写了一份检查，在中央首长接见时照本作了宣读，根本没有触及灵魂，可以说没有他自己一句话。

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 部队传达中央首长指示后，在家一部分常委决定，七月一日公开表态，支持二七公社。何运洪知道后，二十八日晚打来电话，说：“中央没有正式表态之前，不能公开支持二七公社，以免造成部队思想混乱。”七月三日保守派冲击军区，向中央施加压力时，钟生溢又辟谣说：“我们没有研究过支持二七公社，我们也没有说支持二七公社。”结果一直拖至七月二十五号部队才游行，公开支持二七公社，造成了郑州地区的一段混乱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何运洪、李善亭在北京汇报期间一直和陈再道、钟汉华保持密切的联系，按照其主子意旨办事。

何运洪、陈再道狼狈为奸 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何运洪、李善亭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而对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却视若经典，奉若神明，百依百顺，仰承鼻息。对省委内部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当权派，极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之能事，千方百计地庇护文、赵、杨，疯狂地打击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今年二月，河南省军区发表的“严正声明”、“告全省人民书”，是两株大毒草，是破坏和镇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宣言书和动员令。这两株大毒草，恰恰就是陈再道、钟汉华亲自批准后才出笼的，并扬言要在武汉部队出版的“战斗报”上刊登(后未登)。奴才们看主子这样欣赏，加之这两篇毒草出笼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泛滥全省，使二七公社受到残酷的镇压，常常得意忘形地对人吹嘘：“别看二七那么嚣张，我两篇文章就把它搞垮了！”

四月下旬，省军区召开四级干部会，钟汉华亲自出马来河南，对其奴才何运洪、李善亭作了一系列黑指示。在谈到省委干部问题时，钟说：“纪登奎这个人不能挂帅，杨蔚屏这个人很有能力”等等。这些黑话正中奴才们的心怀，以后何、李更加千方百计地庇护杨蔚屏，也更加坚决地要打倒纪登奎同志。毛主席过去曾说，杨蔚屏是个坏参谋。而何运洪却对“河造总”的负责人说：“现在能替我们说话的就只有杨蔚屏了”。李善亭也多次向军区干部、战士作报告说：“杨蔚屏问题不大，省委多数干部不同意打倒，将来可以站出来搞三结合”等等。对纪登奎同志百般丑化，一度曾送往卢氏县深山密林之中，用警犬看守，并多次交给保守组织进行斗争。他在一次接见

新华社记者时，还颠倒黑白、别有用心地说：“纪登奎过去反过潘复生，杨蔚屏反对过刘建勋搞借地和‘三自一包’政策”。进一步打击纪登奎同志，抬高杨蔚屏的身价。河南代表赴京汇报一开始，中央首长就指出河南军区在支左工作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何老混蛋却迟迟不让向下传达。现在查明，他是接受了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他们要何老混蛋“在中央没有正式作出决定之前，不要往下传”。后来，在北京，何、李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面目已经大暴露，省军区要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要坚决向何、李作斗争。这时候，陈再道、钟汉华这两个反革命家伙，为了保何老混蛋，指示省军区党委：“在困难的时候，党委成员要特别加强团结”。这些黑话的其实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党委的其他成员，死跟死保何运洪，不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不要和何运洪、李善亭作斗争。用心何其毒也！何运洪和文、赵、杨是一丘之貉

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三反分子赵文甫，杨蔚屏曾多次给何运洪写信，并多次进行密谈，他们肉麻地吹捧何在三月六日大会上的恶毒攻击革命造反派的讲话为“伟大的文献”。在此以后，赵、扬行动自由，长期未被群众斗争过一次，甚至在省委部以上干部所谓揭发问题的会上，他们气焰嚣张，充当了围攻、斗争纪登奎同志的急先锋。有一次钟生溢受何老混蛋的指使，召集“省委造总”的头头研究干部问题的会议。当时大家在会上研究那个干部能站出来时，没有提到赵文甫。钟就迫不及待地问：“赵文甫怎么样？”大家回答：“赵已经罢官。”钟又露骨地说：“罢官也不一定对，你们还要研究研究，看能不能站出来。”从此，“省委造总”更加死心塌地地保赵文甫。何运洪、李善亭疯狂地反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刘建勋同志，这是大家很清楚的。部队一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引诱群众组织把斗争锋芒指向刘建勋同志，即是刘建勋同志参加了北京的“三结合”以后，也仍然是这样，甚至变本加厉。刘建勋同志参加北京的“三结合”，以及谢副总理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中对刘建勋同志的评价，何、李都明明知道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同意的了，但何老混蛋还让军区接待站对外答复问题时说：“刘建勋虽然参加了北京的‘三结合’，今后还喊不喊打倒仍由群众组织自己确定。”李善亭不亏为何运洪的狗头军师，他讲到这个问题时还作了“新的发挥”，他说：“刘建勋在北京只是个常委，这说明中央对他是有保留的。”弦外之音就是说只要群众坚持“揭发”刘建勋同志的所谓问题，就

能把他打倒。四月份以后，在郑州地区所出现的要打倒刘建勋同志的更大妖风，就是由何、李一手挑动起来的。何运洪、李善亭是血腥屠杀二七战士的刽子手。大造反革命舆论。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何、李之流在河南镇压革命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也是先造舆论的。今年二月河南省军区发表的“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宣言书，镇压革命群众的动员令。“严正声明”排好大样以后，何运洪就洋洋得意地说：“这个声明要印几十万份，要派飞机散发。”还说：“要再搞几个团来，搞一次更大规模的游行。”“下一步就是镞压反革命了”。可见这个“严正声明”是镇压革命的舆论准备。果然不错，这株大毒草抛出的当天晚上，河南日报就实行了大逮捕。为了大造舆论，何、李一手策划了报社、电台的假夺权。当把报社、电台拿到手后，李善亭亲自控制，凡属重要文章、社论都由他审阅(后来换成陈盛林)。这样一来，报纸、电台便成了何、李之流打击革命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工具。赤膊上阵，动用专政工具，利用公安公社，血腥镇压革命派。河南日报社的两次大逮捕，都是何运洪、李善亭亲自报挥的，连十五岁的小孩也未幸免。二月二十号在印染厂的一次大逮捕，何运洪、李善亭亲临现场指挥，一次就捕二百多人。在何、李的指使下，全省都展开了大逮捕，有多少革命小将含冤坐狱呀！革命无罪，在何混蛋统治下，变成了革命有罪。据我们所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豫农红总、黄委会东方红、印染厂八一、六厂工人赤卫队等革命组织，何、李都指使人整理了这些组织的黑材料，并在批语上冠以“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罪名，准备借机进行大逮捕。操纵保守势力，连续挑起武斗，企图借保守势力之刀，把革命造反派压下去。别的不讲，就说五四事件吧！十大总部要冲击我二七战友绝食现场，何、李之流早就知道。五月三日钟生溢去武汉开会坐在火车上给一些同志说：“明天郑州有好看的。”这可以清楚地看出，十大总部冲击绝食现场是他们早已预谋好的。陈再道、钟汉华对制止武斗曾给何、李有指示，大意是，武斗开始不要去部队，只去一些人或宣传车看看就行了，等打得差不多了再去部队。何、李是这样作的。看看这些人的狼子野心是何等的恶毒。在军内，何、李也拼命地镇压革命派，把一五三医院的真正造反派“红总”打成反动组织，把许多敢于起来造反的人打成反革命，并准

备逮捕监禁。就是十条命令下达后，还不死心，还要抓，说：“还要抓他三四个”。在军队内部，凡是有同情二七观点的，都视为政治动摇分子，停止其工作，限制其活动。从以上事实看，充分证明何运洪、李善亭是不折不扣的、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一定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千钧棒，把他打翻在地，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支豫战团、河南二七公社联合创办《直捣中原》1967年8月12日，第二十七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康生接见河南省军区及驻军负责人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十五时四十分，地点：京西宾馆礼堂第一会议室。接见首长：康生、曹轶欧、吴法宪。被接见者：省军区、一军、军分区、驻军各师、学校负责人。另外，还有省军区机关干部代表。一五三医院“红总”、“职工队”代表。〕

吴法宪同志：康老在百忙中，今天来给我们指示。康老很关心河南问题，今天听了汇报后来给我们指示。

康生同志：同志们，河南问题结束后，军队同志又留下开会。会议开了半个月了，会议开得很好。很多同志根据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彻底检查了河南省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军分区、人武部也检查了关于支左方面的问题，我们相信经过中央、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同志的讨论，将会使河南的“三支”、“两军”的工作得到很大成绩。同时，另一方面，在会议中间，犯错误的同志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错误，总的讲，应该欢迎那怕是微小的进步，虽然检查有深有浅，但这个开端是好的，我希望在实际中去改正错误。会议告一段落，应该总结一下会议的工作和经验，将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主席、林副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开辟下一阶段河南的文化大革命，使同志继续学习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精神实质，对贯彻中央指示将会有更大好处。

会议期间揭发了何运洪、李善亭和其他同志的错误，这些揭发无论对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和今后“三支”、“两军”，无论对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有很大益处。会议开得好，会议中也可以看到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解放军的干部的革命本质，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各种原因，犯了这样、

那样的错误，但大多数同志了解了错误后，能够改正错误，这是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解放军的革命的实质。不管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象何运洪、李善亭的错误，一军某些同志的错误，甚至由于何运洪的错误给河南文化大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整个运动中会议中可以看到我们解放军绝大多数干部、战士是可以依靠和信赖的。通过河南问题的讨论、解决，可以看出主席讲的三相信、三依靠。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们通过这次会议更加看清了这一点。我相信当我们省军区和一军坚决改正错误后，必然受到广大群众对解放军更加爱戴和支持，广大群众必然欢迎解放军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这一点我们应当坚信，不能动摇毛主席讲的相信依靠解放军这个真理。毛主席说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支柱。没有解放军的支持，就不能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也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最终彻底胜利。所以，相信、依靠解放军，是“三相信、三依靠”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河南的问题，是长期地受到毛主席、中央的关怀。大家清楚地知道，二月十七日主席对河南就发了重要指示，也可以说在各军区，主席指示要召集解放军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到京开会，这是各地解决军队支左问题、文化大革命问题、解决解放军与造反派、保守派的问题，端正解放军某些同志的错误，这是首先的一次。问题是何运洪不但没有执行主席的这一指示，相反是抗拒主席指示，这是对河南全体指战员最大最大的教训。因为历史证明，凡是执行主席指示的，不论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凡是抗拒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的指示，不管什么干部，不管历史上多大贡献，必然会使事情搞坏，使革命遭到损失，必然会使自己陷到错误的、和主席路线相反的道路。

林副主席曾总结过解放军四十年来的经验，就是必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所以，这一点我们河南部队指战员，要你们亲身参加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教训，就是必须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办事。但是河南省军区，以何运洪为首的一小撮人走到了相反的方面，不是坚决执行主席路线，而是抗拒主席路线，不是按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进行“三支”“两军”，而是执行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指示，反对主席革命路线，抗拒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如果说一时不了解中央指示精神犯了错误还是允许

改正的，但从二月十七、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五、六个月，长期不改正错误。这里同志们又可以得到一个教训，主席说，有的同志犯了错误改正错误那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长期不改正错误，就变了性质，就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们在工作中犯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不坚持错误，是改正错误。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略，未记上）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介绍山东济南经验，因为他们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即有了错误是早改好还是晚改好？早改好；是高姿态好还是低姿态好？高姿态好；彻底改好不彻底改好？彻底改正好。人们把它总结为“早、高、底。”这就说犯了错误必须按主席教导办事，从这里边经过河南问题的斗争、批判、改正，这就教导我们怎样观察问题。林副主席讲过，我们观察一切问题都应从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离开阶级斗争就常常看不到问题实质、主流、对与错、是与非。从河南问题，从何运洪、李善亭等人错误，也可以认识到，离开阶级斗争基本立场，那一定会把是非颠倒了，离开了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必然对事物本质看不清。

从河南也可以看到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在河南也好，在其他地区也好，有各种看法，主要的有两方面：究竟是大好呢还是不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河南是一个，开封是一个，其他地区也有。到底是收获大还是损失大？林副主席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一年来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讲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大革命，思想的大革命，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对解放军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林副主席说：“我们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毛主席对林副主席这样的估价完全赞成。林副主席这个估价也完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估价。

从我接触到各省的问题，开始是内蒙，以后是青海、南京、安徽、山西、甘肃、河南，国外一些马列主义左派也接触不少，人们常常问，文化大革命收获是什么？问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我回答：通过文化大革命，使千百万工农兵劳动人民直接经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这就是林副主席所讲最大最大最大收获。我们翻一翻世界革命史，中国革命史，什么时候有过亿万人民直接掌握毛主席语录这本小红书！用毛泽东思想直接教育群众，毛泽东思想为群众所掌握所实行，这才能真正保证我们党、政府、军队不被修正主义所篡夺，保证我国不出

现资本主义复辟, 保证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 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 胜利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所说的百年大计, 万年大计。这和我们损失比较的确是损失最小最小最小, 收获最大最大最大。这个真理广大群众懂得了。我们解决山西问题时, 太原五中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学生, 叫郭××, 受军区犯错误的干部所迫害, 被关了一个多月, 但他懂得两点, 一是坚决拥护解放军, 少数犯错误的人不能代表解放军; 二是解放军介入大有好处, 把解放军内部的问题也暴露出来, 使解放军得到教育, 问题得到解决, 使解放军更加提高, 更加前进, 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支柱。同志们你们想想, 每家都有子女, 十七岁的孩子, 懂得这个道理, 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结果吗? 不是文化大革命, 能有如此收获吗? 他没有听我们的报告, 这是从受迫害中得到了教育。这就说明广大劳动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 在毛主席教导下, 人民的政治觉悟水平大大提高了, 因为他们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教育, 受到了毛泽东思想教育, 使亿万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 这就保证了我国党、政、军领导不被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篡夺,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同志们, 可以想一想, 就拿省军区干部、战士、独立一师、二师、驻军中空军、炮兵、工程兵等广大指战员来说, 你们自己对文化大革命, 对毛泽东思想, 不管程度如何, 是大大提高了, 况且广大指战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都立过新的功劳。有的同志犯过这样那样错误, 也从中得到了社会主义教育, 毛泽东思想教育, 这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即使死几个人, 出一些乱子, 比起收获, 还是微不足道的。林副主席所讲的真理, 通过河南文化大革命, 过去现在将来都会证实这是马列主义真理, 就会更进一步了解林副主席这一指示, 即: 损失最小最小最小, 收获最大最大最大。但这要有一个条件, 决不能拿刘邓路线观点来看, 而一定要用毛主席革命路线来看, 用无产阶级立场去看, 这样是非才能看清楚。同志们, 从你们亲身体会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 还是糟得很。历来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个阶级看“好得很”, 另外一个阶级看“糟得很”, 这是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早就说过的。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也是如此,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当前是大好形势。反对中央文革的, 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认为形势很糟。武斗很严重, 甚至开了枪, 有的地方很乱, 河南也算乱的一个省, 而且是和武汉反革命暴乱联系着的, 甚至于在武汉“七·二零”事件以后,

还发生了开封“七·三一”事件。我们怎样去看这种形势。毛主席、林副主席经常教导我们，那个地方出现了这种乱的时候，就是矛盾彻底暴露的时候，矛盾的彻底暴露有助于矛盾的彻底解决。那个地方经过乱，那个地方形势就会更好。事实证明，从这两天人民日报报导看，青海形势不是很好吗？青海过去不是大乱一阵吗？青海出了解放军里最少最少见的败类赵永夫，很多人丢了性命，刘贤权被斗争并免了职，这不是很乱吗？从资产阶级观点看，青海形势很坏，但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从这两天报导看，青海形势就好得很嘛，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都受到很大鼓舞，报上报导武汉受到很大鼓舞，青海这样，其它各地必然会跟着出现更好的形势，内蒙古据说形势也很好，滕海清来了，我也还没有见他。对武汉事件，林副主席有重要的分析，林副主席在分析形势中，对解放军有最重要的指示。这指示是从形势分析出发的。武汉事件本身是坏事，但坏事也可以变为好事。这对全国全军教育是很大的。我扼要传达一下林副主席的指示。八月九日林副主席接见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政委曾思玉、刘丰同志，在北京的几个大军区同志也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也参加了，吴法宪同志也参加了。林副主席首先从文化革命形势讲起。他说：武汉事件本身是一件坏事，但它可以变为好事，对全国工农兵革命群众，对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教育意义是很大的。武汉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有一个指示，大意是那个地方乱得越彻底，就会出现大好形势，中国现在看武斗严重，问题暴露得越发清楚，全国文化革命形势是很好的。林副主席是根据毛主席这一指示讲的。林副主席说：不是一切坏事都可以变为好事，坏事变好事，是毛主席经常教导的，但是是在一定条件下坏事才变为好事，首先，一个决定的条件，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指路明灯。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坏事才能变为好事。二是有毛主席缔造的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通过四十几年阶级斗争，在毛主席思想长期培育下（康老：我插一句，也是在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有四十几年的斗争历史，和全国人民一道解放了全中国，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它是有着伟大功绩，受到广大人民拥护和爱戴的军队。有毛主席、有党的领导，有解放军也就是武装了的工农，长期和人民血肉相联。有了这些条件，文化革命中一切看来是坏事的，都可以转变

为好事。林副主席说，有几件不好的事情，不要使它掩盖起来，而应当使它暴露出来，矛盾的暴露必然接近矛盾的解决。矛盾暴露看来有些乱，但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乱可以变为治，这是辩证的关系，有很多实际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河南问题也看得清楚。坏事不能隐藏。乱是矛盾的暴露，矛盾的暴露接近于矛盾的解决，在文化革命中，通过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林副主席再三地讲，要掌握辩证法，不要悲观失望、惊惶失措，乱肯定会治。河南问题已经出现好形势。（康老：河南问题还会有曲折，如开封形势还很复杂，一军×××团从郑州调往化肥厂，保守势力阻止进厂，一些农民被骗进城，还有很多问题。这些可以理解，不管如何，改变不了将要和已经出现的大好形势。）不要怕乱，不要看到一时现象就束手无策。林副主席接着对所谓乱做了具体分析，林副主席说，乱有四种：第一种，好人斗坏人。这是好事，是必然的；第二种，坏人斗坏人。这是在斗争中彼此暴露自己的面貌，可以削弱他们的力量，这种乱对我们的斗争有利；第三种，坏人斗好人。这种情况也有，河南的“保守组织镇压真正革命造反派二七公社，打击革命同志”、“百万雄师斗争三新、三钢”，这种形势出现，当然不是说“百万雄师”中所有人都是坏人，主要是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坏人斗争好人谢富总理和王力，王力同志脚被打坏，现在还挂有拐杖。这很好，暴露了陈、钟的反革命面貌。广大群众立刻觉醒起来了，你们在北京看得很清楚，×××万人开会示威游行，这就是陈、钟斗谢、王出现了大好形势；第四种，好人斗好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是容易解决的，如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这比较好解决。最近武汉一些学生和清华井冈山学生，听说还有河南二七公社的人，到武汉，由于思想不对头，贴了武汉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的大字报，这是不对的，但把道理讲清楚问题就解决了。你们那样去反曾、刘不是帮了陈、钟的忙吗？林副主席讲：这四种乱的形式，前三种，对我们有利，后一种也容易解决。文化大革命整个形势大好，这是百年大计，万年大计，看到一个时期的乱，同志们要沉着冷静地分析，经过乱才能达到治。这是毛主席的辩证法。

林副主席还讲，部队支左工作中有些地方有些同志犯了一些错误，毛主席、林副主席对犯有错误中绝大多数人希望他们能迅速改正错误，不是希望一下垮掉，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政策是挽救犯错误的同志，不让他垮，这是我们一贯

的政策，要帮助他，教育他、挽救他，这一点要理解。（康老插话，这个政策河南来得早的同志从解决过程中可以看到，对何运洪的错误是采取这种方针，这一点张树芝同志了解，我们苦口婆心地教育他，有时半夜想起来还要去给你们谈一谈。）这个政策今天是这样今后也是这样。从毛主席对武汉问题指示中可看得很清楚，毛主席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挽救是仁至义尽的。这是最后给他们的出路，从这个批示，可以深深体会到毛主席对犯错误干部的爱护和挽救，当然陈、钟能不能得到谅解看他们的了。同样，何运洪不要失掉时机，不要坚持不改，不要改而不彻底，不要同群众对抗，改得好还是同志，中央帮助你，还要看内因。河南得到什么教训？前一时期是坚决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后一个时期有的同志如何运洪、李善亭和一军个别同志，言行不一致，玩弄两面手法，这个教训很深刻。一个革命同志，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光荣的军队干部，决不能用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法来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决不能这样。从开始到现在，总感到有这个问题，这一点省军区要注意，一军同志也要注意，“7·31”事件发生与这个问题有关，就是一方面承认错误，但另一方面有时因为姿态不高，态度不明朗，改正得不彻底，在客观上有这个因素，开封这个因素更多一些。抗拒、坚持必垮、玩弄两面手法同样要垮，改错不彻底会越陷越深，最终也要垮台，这不是中央的希望，中央的精神是不想让犯错误的同志垮下去的，要教育帮助他们，挽救他们，使他们不要垮台。林副主席特别讲到这个问题，除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中央指示，紧紧掌握大方向：掌握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外，要不垮台还要做到三点：

（1）紧紧地掌握着底下的情况，左派的情况，右派的情况。要及时地请示报告，多请示，多报告，不要自以为是。河南的问题有很大的教训。何运洪犯错误，恰恰不是掌握运动的真实情况，他掌握的是反面情况，把左派当成右派，把保守派看成依靠力量，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完全站错了队，这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阶级立场，对左派抵触，厌恶，甚至仇恨。有两个问题：一是思想立场问题。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二是掌握情况问题，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现在有些

情况往往不是很真实，要真正掌握情况，这是重要的一条，不是简单地反映一下。

（何运洪偏听偏信，听李善亭的，另外，听军区机关一些同志的，听丁石的，听丁石秘书李伟的，听省委机关总部的，听赵文甫、杨蔚屏的，赵文甫、杨蔚屏都写信赞扬你。）林副主席说：“多请示，多报告”。河南军区不请示，不报告，甚至有指示不执行，抗拒。比如刘建勋问题，有错误，改正了嘛。在北京参加了三结合，报纸上登了。头脑清醒的人，看了以后，可以改过来，相反的是更加要坚决打倒，这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何运洪还说河南问题要由河南五千万人民来解决，不是由中央决定。由五千万人民解决，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你代表不代表五千万，你把自己封为五千万人民的代表就不妙了。五千万也离不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林副主席说要紧紧掌握下边情况，要多请示报告，不要自以为是，有电话，电话不行有电报，电报不行有飞机。

（2）现在，左派、右派、保守派，阵线比较分明。林副主席说：解放军的同志不要以冲军区不冲军区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标准，应该以路线为标准。要看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合乎不合乎毛主席革命路线。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有事与群众商量，依靠群众办事。坚决支左，对保守派不是简单地镇压、打倒、取缔。应该是争取、教育、分化。如对十大总部要做争取工作，教育工作，对开封的化肥厂工人也要做耐心教育工作。我开始很注意省工人总部，他们的代表李通，是解放军转业下来的，是从青岛海军转业下来的，家庭背景不很好，有海外关系，我一看不象工人，是一个工会干事，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市工人总部的服务员也不是工人。他们的思想不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开封化肥厂许多是转业军人、退伍军人，这些人走错了路，搞起武斗来更厉害些。对待保守组织要进行教育，争取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孤立他们的坏头头。中央7月13日关于不准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的指示，很多地方没有向农民传达。林副主席说：对保守组织要进行政治工作，不是解散、取缔就能解决问题的，而要说服教育，分化，做争取工作。比如陈永贵同志和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解决山西晋中平遥县的问题的例子。很值得参考。平遥县（属晋中专区）人武部站在保守派一边，他们支持农民进城，四个县民兵六千人一下子拥进平遥县镇压造反派。陈永贵同志、六十九军军长、军分区副司令员一道去解决。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支持人武部。平遥县有六个城门。保守组织占了五个门，造反派只占一个门，人武部给民兵发了枪，还有机

枪。陈永贵等同志到平遥后，教育他们，叫两方面派代表谈判，不要武斗。陈永贵同志一进去以后立即被保守组织包围了。保守派开了枪，打死造反派十一人。一个徒手连进去保护陈永贵也被包围了。我们耽心陈永贵等同志生命有危险，研究办法，有的同志主张开枪镇压，中央不同意，叫一个团全副武装开到城的附近，在外面声援，做群众工作政治工作，把中央“抓革命，促生产”、“农民不要进城武斗”等指示，散发传单，陈永贵也内部作工作。农民纷纷觉悟了，把人武部的头头抓起来了，把枪缴了。这方面既要作保守派的工作，还要作造反派的工作。听说：二七公社的基层组织有报复情绪。借抓“百万雄师”、“产业军”为名抓了不少的人，只要有四川口音、湖北口音的，带湖北粮票的就抓起来。这样不好，要教育他们（这是听说的，没有调查证实）。要依靠左派，争取团结中间派，争取教育保守组织。

（3）不要太急躁。这是毛主席一贯的作风，问题来了不要急，要调查研究。急了容易犯错误，慢了也有可能犯错误，但急比慢犯的错误多些，所以要冷静，这是毛主席一贯的作风。要学习主席这个作风，可以避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早改比晚改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彻底检查比不彻底检查好。

林副主席讲，解放军过去没有介入，一介入仓促上阵犯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问题是犯了错误就改。林付主席讲，为什么有些解放军犯错误？这有很多原因，过去解放军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打倒三座大山。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我们的干部在理解新民主主义理论、思想政策上，有准备有经验。所以能解放全中国，但是解放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面临新的情况，新的任务，新的阶段，面临一系列问题，社会主义仍然有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上有，那末解放军内部有没有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呢？广大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对社会主义革命各种政策不熟悉，新的阶段在理论上思想上没有或很少准备。过去搞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工作，现在是革资产阶级的命，革资本主义的命。过去旧的理论，旧的思想，旧的政策，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私字当头，没有肃清。在此情况下，难免不犯错误，有些同志犯错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犯错误的有两种人，一个愿意改；一个坚持错误不愿意改。过去我党有些干部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有些干部遇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思想的大革命，这场革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

场革命，资产阶级思想会侵蚀我们，使我们左右分不清，是非分不清。犯了错误，要改，不想改正错误是很危险的，使自己回到资产阶级思想上去，因此，林副主席说，当前要抓紧部队政治思想工作，要努力把毛主席思想搞好，搞不好会出现内蒙问题。过去各级政治部，在反对谭政方面有进步，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很多政治机关思想落后于形势。你们河南省军区、军分区、一军看看你们的政治工作很多政治干部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站在保守组织方面。因此，要大大加强政治工作，做好政治工作，才能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如果解放军不搞好政治工作，就不可能完成三支两军任务。抓政治工作，必须认识清楚，一切问题都是政权问题。十八年来，我们政府机关有很多班子是旧的。因此，有些人拿民主革命的思想去搞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影响到政权，要使政权不变颜色，就要搞好领导班子。旧班子犯错误的自己要下决心。希望垮得少，但自己坚持错误那就要垮下去。林副主席说：自己要垮那没有办法。地方垮了，军队要接。军队搞不好也会垮，所以我们要教育干部使他们认识这个问题。有的人旧思想很严重。中央还要帮助他转过来。总是使他不垮，不打倒总是好嘛，这样对大多数干部信任依靠，通过训练教育，少数犯错误的转过来，使国家政权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政权。我们的会议就是体现了主席、林副主席这个思想。明天有的同志要回去，有的同志还要留在这里斗、批、改。会议到第二个阶段，有些同志回去进行工作，有的同志继续教育训练。第三阶段，不但省军区、军分区，还有人武部要来的，不断地进行毛泽东思想教育。一方面把干部更加提高，把犯错误的干部逐渐地转过来，少犯错误，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四、中央决定后河南的新形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刘建勋对河南“二七公社”省直革联服务员的讲话
8月20日刘建勋同志接见了“二七公社”省直革联基层组织服务员，作了重要讲话，讲了五个问题，今摘要如下：

- (一) 如何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对待保守组织中一小撮坏头头问题。
- (二) 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问题的。

（三）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问题，对于“文攻武卫”问题，这个口号是“二七公社”提出来的，江青同志把它肯定了。当时，何运洪勾结文敏生、赵文甫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操纵保守组织，挑起武斗，围剿、镇压赤手空拳的革命造反派。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造反派提出“文攻武卫”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情况变了，“二七公社”占优势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应该强调开展政治攻势，耐心细致的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革命派就是要搞文斗。当然，阶级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的，我们要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利用“武卫”这个口号，妄图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罪恶阴谋。当敌人挑起武斗时，我们就要反击，要自卫。但我们决不首先打出去。决不把武斗扩大化。现在，我们要建立新的革命秩序。

（四）防止“二七公社”基层组织的领导权被坏人篡夺的问题。省直革联的队伍正在日益扩大，这是大好的事情。这里，我也提醒同志们注意，一定要把领导权切实掌握在坚决的革命左派手中。反对离开阶级路线，片面强调“民主”、“多数”。现在，有的人就是想打着“民主”、“多数”的旗帜，要求“少数服从多数”；要求实行巴黎公社的选举，妄图篡夺“二七公社”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吃掉革命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夺了权之后，由于缺乏经验，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错误，这是难免的。只要我们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是不能纠正的。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混水摸鱼，防止一小撮走资派钻进我们队伍。

（五）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河南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胜利了，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防止骄傲情绪，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不要搞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现在，有的单位出现“打内战”的苗头，一定要认真开展整风，领导骨干要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作自我批评，狠斗“私”字，不要使“内战”扩大化。革命造反派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分歧，这是正常的现象。应该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因为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只能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只有

这样才能把“内战”的火苗扑灭下去。经过革命的大批判，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刘建勋王辉时的指示

〔时间：五日夜到六日晨三时。周恩来、康生、吴法宪、戚本禹等参加接见。九月七日下午，王辉同志在河南省体育馆“二七公社”基层服务员会议上传达。〕

一、周总理及其他首长要求二七公社及河南驻军很好地学习八·二五号召，九月一日中央首长讲话，九月四日主席亲自批发的命令，很好地执行，很好地贯彻，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在偏僻的地方，可以派飞机散发传单，使《8.25号召》、《九·五》命令家喻户晓。

二、集中力量搞大方向，狠斗文敏生、赵文甫，把他们斗倒、斗臭。

三、总理讲：你们的仓库是一级战备仓库，听说仓库被抢，问题是严重的。抢了枪的要交出来，二七公社的情况我们很清楚，军队要按中央指示办事，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五日晨总理来电话，让开封老保放下武器，生命有保证，（因开封发生反革命暴乱，老保给一军及“八·二四”发了最后通牒，让退出东郊）同时希望郑州驻军及二七公社给予八·二四政治上的支持。

四、总理讲：听说你们那儿每天都有打死人的情况，这很不好，要立即制止，对打死人、打伤人的要处理。（首长问死伤情况时，回答有八人。总理说，不止吧，有30多人。）

五、二七公社、驻郑解放军对不同观点及保守组织的群众，要讲政策，现在在北京告二七公社的人很多，希望你们能按政策办事。

六、希望你们能很好地把“抓革命，抓生产”的任务搞起来，秋收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秋收搞得不好，你们的日子就不好过，就有罪，工业要很好地抓上去。

七、军分区、县人武部不搞四大，要进行正面教育。

八、现在有些人对全国形势的看法与党中央看法不同，请你们很好地看看九月一日的讲话，请你们与二七公社共同注意教育无政府主义的人，防止坏人混水摸鱼，现在有些行动破坏了社会治安，希望提高警惕。

九、枪和物资，告诉二七公社自动送回国库，协助他们坚决执行命令，你们的权力要认真执行。

十、军委吴法宪等首长指示：河南军区改组了，何运洪垮台了，二七公社胜利了，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二七公社要做送枪的模范。

康生同志、戚本禹等同志指示：你们那里有乱打枪的现象，治安不好，人心惶惶，同志们要共同加以制止。

（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内部参考）

河南二七公社省直革联宣传部 1967. 9. 7 开封八·二四宣传级翻印
1967. 9. 23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康生吴法宪在武装干部会议河南组汇报会上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十六时三十分到十八时三十分。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康老问：你们编几个大组？

答：十一个组。还来了几个造反派。

康老：听说河南二七公社分两派？

郑大×××答：郑州没有，下边有的专区乱一些。

康老：听说夺枪的？

郑大×××答：主要是中学生夺的。他们看到大学发枪了，他们就抢起来了。

河医×××说：抢枪的主要是从河造总过来的中学生。

康老问：铁军现在怎么样？

郑大×××、河医×××答：他们一部分跑了。

康老：听说你们二七公社也出去啦？

×××答：主要是受北京影响。

康老：你们可以发表个声明，说我们现在不要保姆，也不要保男了，这一条要马上告诉家里。革命造反派受压抑的时候，组织比较纯洁，比较注意政策，所以在受压抑的情况下也能坚持。特别是中央支持以后，组织解除了压迫，能公开

活动，地位变了，思想就容易骄傲了，政策就容易出偏向。组织庞大了就容易不纯，对政策也不注意了，认为我什么都对，唯我独尊，唯我革命，就容易犯错误。二七公社在开会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但事物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往往情况变化了，就产生报复情绪，政策就不那么讲究了，态度就不谦虚了。对保守组织、受蒙蔽的群众不是耐心教育、争取分化、团结，而是利用优越的地位想把其它群众组织搞掉，这样自己本身就容易脱离群众，千万注意这一点。

（这时进来了几个造反派的同志参加了会议）

康老说：刚才我讲的是在情况变了，环境变了、地位变了，就骄傲起来了，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了，对过去反对过自己受蒙蔽的群众想用优势压倒，不把头头和群众区别开，实际上是重复过去河造总、十大总部和何运洪的错误。最近我对河南情况不大了解，听说二七公社内部不是那么很一致，不很团结，特别是前一段抢枪，甚至攻击警备区司令部、筹备小组，这样就容易走向反面。要特别警惕这个问题。二七公社是跨行业的组织，过去是二七观点的人都参加了，组织很不严密。组织扩大了容易不纯，原来听你们（指二七公社）说要整风嘛！内部不纯。要好好争取、团结群众在大批判中搞大联合。河南搞了一年啦，到现在连个革委会还没成立，说明比北京、上海落后了，这是一方面要注意。

还有一方面，听外省讲二七公社跑到外省去的不少，主观上是支持外省革命，实际起相反的作用。你们说北京的学生帮你们的倒忙，你们去不也是帮人家的倒忙吗？这个你们给家里说一下，叫赶快回来搞自己的斗批改。

康老问：现在你们（指二七公社）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答：北京很少。

康老问：哪个地方多？

×答：黑龙江、长沙、广州。

康老说：是啊！南到广州，北到黑龙江。现在和过去不同啦，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学生是出去煽风点火，推动了各地文化大革命。现在群众都起来了，你们对情况不了解，不需要包办代替嘛！对那个地方不会起积极作用，会使那里复杂化，去可能会给人家搞分裂，有的还不自觉地将矛头指向中央承认的革委会，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有错误，他们可以通过整风自己解决嘛！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

会是错误的。打乱了中央的布署。听说三钢、三新还有河南的跑到了上海帮了倒忙，我希望二七公社把去的人叫回来，要向北京学。

康老问：八·二四出去了没有？

开封八·二四×××答：有到黑龙江去的；上海去了三个人，主要是了解一下情况。

康老说：上海所以比较稳定，是工人领导学生，不象北京学生领导工人，上海有这个传统，上海运动一开始工人就起来了。

康老接着说：你们河南也有客观条件，有很多产业工人，但主观做的怎么样？过去二七公社在工厂做了一些工作，但做的很不够，十大总部在工厂蒙蔽了很多群众，你们想想，一个工厂除了极少数坏人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人不都是阶级兄弟？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仇恨呢？他们都是自己的阶级兄弟。而自己的阶级兄弟打内战动武器，这里关键问题是几个头头和幕后人。学校也是这样，广大群众是革命的，是拥护毛主席的，少数是宗派主义，有的是受坏人利用，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康老说：二七公社现在不是出去跑的问题，而是要把自己的组织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进行整顿。另外要大量地作工人、工厂的工作，促进工人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河南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很大的弱点。

康老问：洛阳工厂的情况怎么样？如拖拉机、重型机械厂。

洛阳八一六×××答：现在是一半对一半，生产不好恢复，正在作恢复工作。

康老说：这个要做工作，无论如何不能压，要有正确的政策，河南工厂的问题，是一个大的问题，我相信河南新的领导一定能领导大家做好这个工作。

康老问：开封化肥厂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八·二四”×××答：我们来八、九天了，来时还没有解决。刘建勋同志说要做政治工作，我们“八·二四”造反派和解放军组织了宣传队，要开展工作。

康老说：“八·二四”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毛病是不少的，眼睛要看到这些。

康老接着问：郑州铁路、砂轮厂、纱厂的情况怎么样？

郑大×××答：铁路没问题，几个国棉纱厂跑得多，没回来。

康老说：别怨人家不回来，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叫人家知道回来安全、不挨打才会回来。要教育，不要报复，那有工人不关心生产的？

郑大×××说：我们学校没有报复，对战斗师的学生是热情的，工人可能有些报复情绪。

河医东方红×××说：我们连头头都没有抓。

康老说：让他们自己去揭发嘛！教育他们不要报复，天气冷了，叫他们都回来。

康老接着说：有个例子，合肥的情况比你们还厉害，用机枪打，两派势不两立。“九·五”命令下达后，解决得很好，炮轰派自己把头头抓了，炮轰派开了五万人的大会，好派放鞭炮欢迎，今天开二十万人大会，两队并排游行，解放军在前面。现在两派竞赛，交枪看准交得快，中央要向全国通报，要学这个样子。

康老说：今天主要不是谈这些，主要是谈武装干部训练班的问题。

吴法宪司令员说：康老的讲话很重要，你们（指二七公社）马上告诉给家里。

康老说：我是关心这个事，想叫二七公社做个好样子，做出模范来。我给二七公社谈过，不要象旧社会那样婆婆压媳妇，媳妇当了婆婆，又压媳妇。

康老说：我看了你们的材料，开始思想上有这样那样的认识不要紧，这是正常的。主要是让大家对这次会有个正确认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决定的重要措施，这是巩固提高人民解放军的重大措施，这不光是河南，各省市都要轮流来，我们计划一年之内把各省军区、分区、县市人武部领导干部都学习一次，以便使我们人民解放军思想觉悟更加提高，更重要的是提高我们干部的政治水平，提高路线觉悟，加强团结，更好地工作，这不光是河南的问题，但不能一下都来，要分期分批。

康老说：武装干部训练，我们不能只从消极方面看，大家总觉着这个训练班有些倒霉，见不得人。将来填表要写某年某月某日……。应看成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训练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训练班，是林付主席讲的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训练班。

康老说：今天不多讲。各大组，小组要注意掌握这一点。另外还有一点，训练班不是来整这些同志的，相反的这是爱护我们解放军，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关心我们的干部。当然罗！它的结果是有错误改正错误，是了解、学习、运用主席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训练班。我们部队不是有讲用会吗？我们这是大讲用会就是了，用毛主席思想，讲用会就是要亮思想，用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照检查

错误，克服缺点，增强党性，提高路线觉悟。二七公社也好，“八·二四”也好，一定要了解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河南要求把何运洪、李善亭揪回去斗，要求是合理的，但还不是时候，要给他时机检查，很快回去不行，看起来，听听你们的，实际是慢的。

康老接着说：准备开个全体会，今天先叫你们来，听听你们的。有些同志支左中没有犯错误也来了，革命小将也来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你们自己也是个学习嘛！这里没家里热闹，不要觉得冷冷清清，现在就是这样，要坐下来，叫屁股和凳子结合一下。现在不是用脚和腿跑，是要用脑子。我准备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一块和大家见面，使同志们很好了解一下毛主席的战略布署。

康老问：那位先讲？

赵复兴同志汇报。（略）

康老说，毛主席说：每省都要开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的会，小则二百左右，中则五百左右，大则千人左右，河南可能再来一些。

赵复兴同志汇报到参加会议人员时，康老问：一军谁来了？（答：来了五个……。）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参加人员有埋怨情绪时，康老问：埋怨什么？

聂济峰、赵复兴同志答：埋怨何运洪、李善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造反派，大家很气愤，来到当天下午就造了他们的反。

康老说：造反要摆事实讲道理。并问：武斗了没有？（答：没有。）不要武斗，不管是对谁都不要武斗，对俘虏也还是优待嘛。革命小将参加要注意，武斗就要犯错误。你们看报没有？（指《假四清真复辟》）王光美六三年在桃园搞吴臣，低头、弯腰、燕子式。原来武斗“坐飞机”是王光美发明的！革命小将怎么能向王光美学呢？何运洪的身体也不是那么好，他给我写了个信说河南造反派要揪他回河南，我说不要慌，他表示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对他的关怀，一定好好检查。如果你们在这里搞武斗，还不如叫他们回河南哩！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有的同志认为来学习的都是错误严重的时，康老说：我刚才没有讲吗？我们这个训练班是文化大革命的训练班。

吴法宪司令员说：是啊！是文化大革命的训练班。

康老问：江青那个录音放了没有？（指九月五日讲话）（答：放了。）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到有些干部认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算完蛋了，康老说：完不了！完不了蛋！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到有的同志来时路过家乡感到格外亲切时，康老说：伤感了。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到有些干部有换班思想时，康老说：调动一下地方是个正常现象。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到有些人说这回把人得罪完啦，回去无法工作时，康老说：见不得人啦！你只要把错误改了，群众是讲道理的。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到有些人没有他的名，也到这里来了的时候，康老说：那好嘛！说实话，我不敢叫何运洪回去，就是怕把他打死了，（众答：活不成。）康老说：那不一定，掌握好政策嘛！不过总有那个危险。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要满腔热情地一看二帮嘛！批评也是帮助，帮不上是另外一回事，还是希望他好嘛！不能忘了还有个办法，你们领导小组、组长和他们个别谈话，要劝导，要以身作则，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中有一段，那个意思是，不犯错误不是能干人，能干人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能很快改正，才是有才干的人。

当汇报到同志们都不愿和何、李在一块住宿、吃饭，怕说在一块开黑会、划不清界限时，康老说：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吃饭也可以做工作嘛！部队干部怎么能和中学生一样，在一块做思想工作嘛！

当汇报到军区领导干部情况时，康老问：吴永光从湖北调回来了吗？（答：回来啦。）当说到吴对错误认识不够时，康老说：他到武汉后起到了作用没有？当汇报到周志坚不愿来学习时，康老问：有个消息说周志坚穿便衣参加武斗？（答：是周志坚穿便衣去了。）

当汇报到一军的情况时，康老说：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再来一两个干部，觉悟比较高的，从司、政，后来，帮一帮他们，工作忙不一定全在这里，空军四十三师也可以来人帮一帮。

开封“八·二四”×××说：刚才一军谈了，他们压力大，他们在开封镇压“八·二四”，罪恶也大，他们虽写了检查，一个深刻的也没有。

康老说：还要有个时间，一军认识比较迟缓。

吴法宪说：他们党委决定，还有师的干部，不能把党委都搬到这里解决。

康老说：今天下午安排得太紧了，下午安排三场会，明天上午十一点继续开？

康老最后说：这是文化大革命训练班，保护教育干部训练班，维护解放军声誉的训练班，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训练班，总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训练班。

最后吴法宪司令员说：回去各组织把康老的指示传达一下，不要开大会，要开展思想互助。

开封师院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宣传组翻印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政教系分会宣传组再印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康生第二次接见武装干部训练班河南组代表时的指示

〔时间：九时五十五分到十二时四十分，接见首长：康生、吴法宪。被接见者：武装干部训练班河南组领导小组大组长及造反派代表。未经本人审阅，供参考。〕

当康老看到各大组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送的决心书时说：送决心书很好，欢迎你们这个态度，要立新功很重要，大家入党很多年了，光吃老本不行，包括我在内。

咱们是学习嘛！学习文件，讨论问题，要允许讲不同意见，也允许人家讲错一、两句话，讲错一、两句话是常事，尤其是学习嘛！每次讨论讲错一、两句话是很自然的。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允许讲得不对，可以允许他们改正，上午讲错了，下午改正就好嘛！也是可以的，学习时也要象解放军那样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也要活泼一些，不要弄得那么紧张，大家可以随便讲，讲错了也不要紧，随便讲吧！

你们的学习计划，可以发给大家看一下，我看，基本上还好，方向还好，当然学习的文件还可以研究嘛！

当新乡××同志谈到江青同志谈话中关于对解放军的态度时，康老讲：这一条江青同志讲了，讲得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大多数还是忠于毛主席的。党中央、

中央文革都这样认为，国家一旦有事，一旦有敌人来了，就会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同敌人奋斗，还是很勇敢的，要相信解放军大多数。我们要教育青年们，青年们对老干部要一分为二，要热情帮助；当然，革命小将要揭发批判斗争是应该的，应该理解，但是革命小将要全面地看他们，他们的本质绝大多数是好的。为什么毛主席叫你们来学习？就是相信大家能够改正错误，能够立新功，所以在解决安徽问题会议上也讲了这件事。

当开封×××同志代表全体同志热烈希望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时，康老点点头说：好！

当驻马店×××同志汇报到大家要求要来见康老时，康老说：上次讲了，先了解情况，将来开大会，先调查了解情况，向中央文革汇报后，总理、江青、伯达、我都去和大家见见面，这个要求是应该满足的。（同志们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当郑大“联委”革命小将×××同志汇报时，康老向吴法宪同志说：“军委文件汇编”，给一个人发一本，如果少了，一个组发几本，轮着看看！（吴法宪同志答道：可以！一个人发一本吧！）

革命小将讲到有的干部接近我们很拘束时，康老说：要多听造反派的意见，即是不对的，夸大的也要听，要向他们学习；当然，他们也要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同志高呼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造反派的同志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你们有错误，让他们揭发一下更好，检验一下我们对错误的态度，要主动地去见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改正错误不仅靠我们自己，也要靠群众帮助，把门关得紧紧的，新鲜空气就进不来，应当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

革命小将谈到我们对何运洪很气愤，来到这里看到了他，就想狠狠斗他。康老说：“这个也需要的，实际上是促进他的觉悟。”

革命小将谈到要为毛主席多争取一个干部，就多增加一分革命力量时，康老说：“对！这个对！”

革命小将谈到河南军区几个当权派编到一个学习组有问题时，康老说：这个要研究，要分开，必要的时候他们再集合。

革命小将讲到个别干部态度不好时，康老说：可见人呀！阶级斗争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的立场观点思想是反映社会上的一个阶级的思想。

革命小将谈到一军的问题时，康老说：一军的同志，首先把你们自己的东西先清理先检查，不要都推给别人，现在首先检查自己，好一些，徐文礼有徐文礼的责任，希望一军的同志先责己，不要向军长、向别人身上推。毛主席教导我们：责人要宽一点，责己要严一点。这是一般情况，当然敌我矛盾是不一样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干部之间的问题。不是说，他不来就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意见可以考虑嘛！目前先检查自己，先责己。

革命小将谈到一军应来几个转得比较好的同志帮助他们时，康老说：这个需要，这个需要。

最后康老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今天就谈到这里，现在回答同志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一个问题：要求中央、中央文革的同志接见大家，我回去后把这个要求转达给他们，这一要求是可以实现的。（同志们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第二个问题，提出的时间问题，增加学员问题，我们要通盘来研究，同时也要考虑河南的情况，要和刘建勋、纪登奎、张树芝同志商量，既照顾这里又照顾家里。

第三个问题，同志们初步起草的计划，我们可以研究，我看，大的方向是对的，但具体问题、学习文件可以增加，补充一下，可以参考。

第四个问题，学习的同志犯过错误，错误性质不同，不管大的、中等的、小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多读毛主席的著作，多读林副主席的著作，多研究中央的政策，改正错误也好，立新功也好，都要掌握毛泽东思想武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运用这个武器，工作才能得到效果，要多学习。另一方面，多检查自己，同志们有这个经验吗？开始认识错误都是从不大关键的问题开始，触及灵魂的问题，关键的东西，总是认识慢些，痛苦些，越发怕痛，越发关键，所以，越是关键的东西越要向它进攻。深检查，多学习，同时，多听取群众意见，尤其是造反派的意见，其它同志的意见，无论是造反派的，本机关的，“八·二四”的，“二七公社”的，“八·一八”的，这些方面的意见都要听，多接近群众，多学习，深检查，多听意见，多接近群众，毛主席说，有事与群众商量。过一个时间，就

会提高，绝大多数同志能够检查过去错误，能够立新功。但是不排除个别人，思想顽固，我想是极少数。

今天很好，各分区同志送了决心书，反映了情况，我们去研究一下，看一下，中央文革、中央的同志再接见全体同志。今天就讲这一些。

最后当造反派同志检讨自己错误时，吴司令员对造反派说：你们讲得很好，我们很感动，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的态度很好，主要是我们解放军干部犯了错误。

（河南组整理）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开封师院八·二四宣传组
翻印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刘建勋在接见河南省郑州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时的讲话

同志们：我没有准备，随便讲几句话。我回河南来两个多月了，忙忙碌碌，没有看望同志们，今天来看看同志们。我代表筹备小组和军区党委向同志们问好！

刚才同志们学习了一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想就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干部问题的指示，谈一点个人体会。

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毛主席这个最新指示，代表毛主席一贯的干部路线，字字闪金光，句

句是真理。这里边包括对干部的估计，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如何提高，又如何改正错误。这些都是毛主席对于干部的政策。刘、邓在干部路线上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就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从这个最新指示中，也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如何关心我们的干部队伍，如何关心广大干部，包括犯错误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毛主席对干部是非常关心的，因此，我们要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斗私、批修”。象过去整风一样，在自己的脑子里展开“斗私、批修”。无论如何不要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爱护，不要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

其次，我一年多没有和同志们见面了，我说一点我犯错误的体会。我认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是我们的干部中完全不犯错误的人是很少的，做工作总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所谓错误，无非是两种：一是在过去工作中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二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也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从我个人说，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都有，而且在若干问题上还是犯了严重错误。虽然我改正得并不那么好，但是怎么改正错误我是有体会的。

我们做工作，犯错误是难免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运动采取什么形式，不是打笔墨官司的形式，而是放手发动群众起来，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运动开始我也不理解。认为只是在政治上、理论上打打笔墨官司而已。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文化大革命是发动广大工农兵起来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一场大革命，经过这场大革命，在各级领导机关、各个领域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通过对党内最大走资派的揭发和批判，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肃清他在各个方面的流毒。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样一定牵涉到各级领导干部，自己的缺点、错误也应该在群众运动中改正，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提高自己的路线觉悟，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除去走资派以外，自己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有的错误大，有的错误小，这次在广大革命小将、革命干部、革命造反派的帮助下，自己改了，就没有了，自己的路线觉悟提高了，

把过去脑子里的毒，把走资派的流毒肃清了，毛泽东思想在脑子里生根了，这是很好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年多了，多数同志是很好的，和革命群众、革命小将站在一起进行这场大革命，这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由于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犯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直到现在还有些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理解的不很好，这就要经过“斗私、批修”，乘整风的机会，重新受教育。

根据我的体会是这样的。广大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广大干部也是热爱毛主席的。革命小将起来闹革命，炮轰司令部，那是毛主席批准的。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省体育场开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提出号召炮打司令部，首先炮打以我为首的省委司令部。同志们听说炮打有点害怕，不大习惯听，真打起来火力比较猛，这没有什么坏处，炮打就是批评，说炮打是形象的话，并不是真的开大炮来打你，不然一开炮不就打死了？批评司令部有什么不可以呀，如果你有错误，一批评把错误改掉，岂不就更好了吗！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红卫兵小将讲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我们炮轰你们司令部，炮轰你们，为了使你们变成左派，你们还有点错误，脑子里毛泽东思想还不占绝对权威，还有些流毒，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一炮轰把错误轰掉，你就成了好干部。”这话很好，革命小将炮轰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无非是轰你的错误，这有什么可怕呢！刚才同志们念一段毛主席语录，要把怕字换成敢字，把私字换成公字，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离开这两条根本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我们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很快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边，还有个别同志一度 and 革命小将的关系闹得比较紧张。我看这是不必要的。如果现在还存在有这种现象，改了就好吗。据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我也是怕字当头，对文化大革命极不理解，革命小将一起来造反，我认为就乱了，赶紧派工作组进去，工作组进去干什么？就是为了束缚群众的手脚，说穿了就是为了使群众得按照我脑子里的框框来进行。如果离开了我的框框，就认为是乱了。就是这样很不理解，这就叫路线错误。不能说我没有把那个人打成“反革命”没有整群众的黑材料，就是不相信群众，压制群众运动，这本身就是路线错误，就是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重新教育下，脑子稍微开了点窍，才懂得乱并不可怕，为什么怕乱呢？乱的是资产阶级，

乱的是资本主义，乱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乱，有什么了不得，就是要乱，乱了才有治，乱中有治，不破不立，破中就有立，不乱怎么破！当时也不是那么高明，稍微开了点窍就好一点，我就不大怕了，无非是炮轰嘛！炮轰司令部，我是司令官，人家一炮轰，就得分析，炮轰对的，就得接受，作自我批评，不仅不反对，还支持你炮轰。同志们要有这个勇气。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就是怕炮轰，谁炮轰你，你就反对谁，思想抵触，这就不对，也就糟糕了。同志们有没有这个感觉？我想这两种经验、两种情况都有，炮轰对了就欢迎，而且支持你炮轰，这种同志不少，这算是懂了点毛主席革命路线了。炮轰我的错误，我就支持，我就检讨，而且向革命小将学习。炮轰的内容有若干不对，但是炮轰本身还是正确的，是革命的新秩序。炮轰以后建立一个新秩序有什么不好？炮轰就是批评，过去没有文化革命以前，平时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谁敢批评你。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文化革命，就是叫群众起来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干部掌握国家大事，群众起来批评好嘛。将来革命委员会建立了，还要和革命群众取得经常联系，不对的允许炮轰。……轰，就不敢继续犯错误了，就更好了。炮轰没什么可怕的，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同志，不怕炮轰，欢迎炮轰，炮轰的不对，行动上不反对，思想上不抵触，还支持革命派，这样的干部，就算革命造反派的干部，去掉了私字。就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了，这是很好的。在座的这样的同志不少，据我知道河南各级干部有这么一批是不错的，是敢字当头，而不是怕字当头，可是也确有一些同志敢字不大，怕字当头。曾一度和革命红卫兵小将、本机关的一般干部的关系闹的比较紧张。为什么闹得紧张呢？人家一炮轰，你就害怕，思想抵触，说话顶牛，就是怕字当头。就是说害怕人家批评。自己有私心杂念，人家炮轰你不满意，一轰就顶牛，这样就和广大革命群众抵触，关系紧张，自己的错误也得不到改正。我看这样的同志有一些，直到现在和群众的关系还不融洽，就是对炮轰不大理解。凡是不大理解的同志，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要把私字换公字，就是“要斗私、批修”，经过斗争，改造世界观，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破除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站在一个方向，和革命群众的紧张关系就解除了，这有什么不好啊？这不是说的走资派，走资派是怕群众的，不敢见太阳，他躲起来，耍阴谋，压制群众。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

开始就教导我们说：从满清政府到北洋军阀、国民党，凡压制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结果。从文化革命运动中也可以看出来，谁镇压群众运动，谁没有好结果。何运洪不是镇压群众运动吗？我看不但革命群众不能压制，就是落后群众也不能压制，只能教育。压制群众的人，耍阴谋的人都要倒霉，都要垮台，绝没有好结果。最近我听说有一个人怕群众怕得要死，没有地方跑了，就跑到监狱里去住。自动住监这有什么好处，住监狱里跟犯人在一起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躲避红卫兵小将，躲避炮轰，这样自然就和群众紧张了。不管你的错误大小，这样做就不对，要到群众中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不会把你的错误扩大，也不会把你的错误缩小。只要我们破私立公，一定可以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很好地理解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的脑子里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在革命红卫兵、革命小将的帮助下，清理我们的思想，肃清党内最大走资派的流毒。如果说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路线觉悟不高，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应当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清理，现在是时候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那样关心我们，爱护我们，给我们指出前进的道路，我们就应该同广大革命造反派在一起，实行“三结合”整风的方法，坐下来进行学习。如果过去是怕字当头，现在就不要怕了，要到群众中去。何运洪是个例子，他把群众说成是牛鬼蛇神，说“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在北京我问他，我说：“老何啊！你到群众中去过没有，你发现有几个牛鬼蛇神？”他说：“没有去过。”我说，你没有去过，怎么知道学生中有那么多牛鬼蛇神，岂不是自己搞错了吗？何运洪开始没有介入文化大革命，后来介入以后，光到省委机关和赵文甫鼓鼓捣捣，没有到工人当中去，没有到学生中去，没有到机关一般干部中去。他听不到群众的声音，听到别人说牛鬼蛇神，他就当牛鬼蛇神来干。哪有那么多牛鬼蛇神？当时我在北京，听说二七公社开会就可以到十万人，十万人都是牛鬼蛇神，那还能待得住？何运洪害怕群众，没到群众里边去，没有深入群众，对群众不了解，走到了群众的反面，到镇压群众，没有什么好的结果。由于他这样发号施令，使我们许多干部跟着他犯了错误，这是很不好的。

对文化大革命，有的同志理解，有的同志不理解，直到现在还有不理解的。同志们不要怕群众，要到群众当中去，只有到群众当中，才能懂得群众的感情，才能懂得革命小将的感情，他们是一片热心，忠实于毛主席的。他们所谓炮轰，无非是炮轰你的错误，我们应该欢迎，不要怕，怕字当头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过

去有揪这个，揪那个，现在我们不允许揪了，我们不提倡揪，乱揪不好。过去郑州有人到北京去揪我，揪了好几次，也没有什么可怕，就是保守派也没什么可怕。揪住我，他讲的道理不对，我就给他讲，最后我还是回去了。同志们把这点搞清楚，对清理自己的思想也好，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解也好，都有好处，这是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对我们广大干部的希望。

广大群众起来，因为群众运动有急风暴雨的劲头，行动上有些粗糙，这是难免的。我们都是搞群众运动的，多少有点也不要那么害怕，对待革命小将无论如何要有正确的态度，今后各级革命权力机构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同革命群众的关系和过去要有很大不同，有事情不要积累起来，在工作中和革命群众随时都要有接触，多接触群众，多听炮轰。当然，我不赞成一件小事就满城贴大字报、标语炮轰。经常接触群众，群众随时可以批评，这没有什么坏处，造反也没什么坏处，只要有理，就好得很吗。群众敢于监督各级领导机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炮轰等于洗脸，脸要天天洗，不然积累一年洗一次多费事呵！我们的干部如果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联系，经常接受批评，经常在群众帮助下洗洗脸，自己也洗脸，就好了，隔很长时间就不得了。我也有很多错误，希望同志们对我炮轰。同志们要很好学习，对文化大革命理解了，就没有什么可怕。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毛主席的这段话，我们要很好地体会。在一年多的斗争中，有很多同志始终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也有的干部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同革命小将的关系搞的比较紧张。这些同志也不要小看自己，革命小将是不小看你们的。他们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的。我同革命小将交换意见的时候也讲过，我说，你们要重视干部的作用，如果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革命大批判，没有干部参加，没有革命的三结合，那是搞不好的。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尽管号召炮打司令部，你们来炮轰我，我知道你们的作用，把习惯势力轰垮了，把机关干部发动起来了，你们切实起了巨大的革命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如果没有干部的参与，让你们自己分清省委哪个是走资派，哪个是革命干部，是闹不清的。你们学生从来没有参加省委

的事务，你怎么知道？光你们轰，是轰不出来的。没有干部参加本单位的斗、批、改是搞不好的。我也讲，一个大学如何进行斗、批、改，如何根据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建立一套完全适合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制度，这有待去创造，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现成的、比较完美的、完善的教育制度，有待在斗、批、改中创造。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有一些好的教育制度，象抗大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的，这个教育制度很好，抗战期间建立的一些战争学校也是比较好的。进城以后，有些人就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大学的制度套在我们的头上了，我们创造的一些新东西搞掉了。现在我们还没有一种完善的制度，需要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进行学校的斗、批、改，把我们的学校建成新型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学校，完全摆脱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要搞好这样一个斗、批、改，我看只有学生是不行的。学生是一支力量，但离开广大干部参与斗、批、改不可能圆满地完成任务。干部是不可缺少的力量。我同革命小将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赞成我的意见。所以，在座的同志们，不管犯过错误，还是没有犯过错误，都要认识这个问题。犯过错误，改正吗。毛主席说，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革命小将也是这个态度，只要改了就可以。同志们不要由于犯了点错误，过去是过多地相信自己，而不相信群众，现在又对自己不相信了，这也不对。应该改正错误，站起来，和革命小将一起斗、批、改，同志们过去有贡献，有的十几年，几十年都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不要躺在功劳上睡大觉，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斗、批、改，革命大批判中立新功，建新劳。今后还会有很多贡献。就是革命红卫兵小将，也不能满足于过去一年造反的功劳，也要立新功，建新劳。同志们万不可妄自菲薄，妄自菲薄的思想也是错误的。同志们要同革命小将迅速站在一起，也就是说要很快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参加本单位的斗、批、改，参加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本省走资派的大批判。希望同志们在这方面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

另外，讲一讲“斗私、批修”。毛主席说，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我们现在办学习班，实际上是整风学习班“三结合”整风学习班。这样的“三结合”学习班有很大好处，可以互相学习。过去整风是干部在一起，现在是“三结合”，革命小将也参加，解放军参加，广大干部参加，这样就更完善。

这就是一个整风运动，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首先是斗私，破私立公，把私字换成公字，这是最根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归根结底是一个私字。凡有私字，就容易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同志们时刻要警惕这一点，要把私字换成公字。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一个公字，就是“老三篇”所讲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就叫做无产阶级世界观。旧社会有一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典型格言。同志们尽管过去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大理解，有些同志不是敢字当头。现在起来把自己头脑里的私字去掉，也就是把头脑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去掉，换上公字，纳入无产阶级思想轨道，这就好了。同时你们要进行批修。没有斗私，不改造自己的人生观，是批不好修的，因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个东西，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搞资本主义，就叫做修正主义。批修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才可以更好地、彻底地批判修正主义的东西。如果脑子里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私字作怪，就妨碍批修，你的眼睛是不明亮的，有的东西就障碍着你，不能把问题看得那么清楚。这也就象正确评价自己一样。同志们十几年、几十年给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当然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怎么正确评价自己，只有斗掉私字，才能正确评价自己，使毛泽东思想在脑子里生根，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清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流毒，特别是肃清中国最大走资派的流毒。抗日战争期间，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团结了广大人民，力量就大了，就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广大干部、广大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彻底胜利，我们就无往而不胜。办学习班，今后争取每一年搞一次，使广大干部进步得更快，犯错误可能更少一些。不知道同志们赞成不赞成，如果赞成，我们就开办，不仅办干部学习班，还要办群众学习班，革命小将学习班。这次要大规模地办下去，这样才能比较细致地弄清是非，大家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

希望同志们经过学习，在头脑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更加顺利，再大大前进一步，以至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递了一大把条子，归纳起来有两个问题。

一、有一些保守组织，或者犯了错误的组织、支持过何运洪的组织，最近又起来活动了怎么办？这没有什么不得了。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如果这些组织真正改正了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的线上来，端正了大方向，他们出来活动是值得欢迎的。二七造反派应该欢迎他们。如果不是这样，方向并没端正，还是错误的，也没有什么不得了。人都有自由，有言论自由吗，可以用四大的办法来解决。这些组织发表言论，是香花就欢迎，是毒草就批判，如果是一部分香花，就欢迎一部分，一部分是毒草，就批判一部分。不能压，即便过去是保守组织，或者支持过何运洪，犯过严重错误的组织，只能用争论的方法去解决，不能压。何运洪压了造反派是错误的。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从满清到北洋军阀，直到蒋介石压制学生运动，没有好结果。对落后的群众，受蒙蔽的群众，保守的群众，都不能压制，不要激动。要按照毛主席教导，按照十六条，做政治思想工作，这样使那些真正愿意改正错误的群众，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就更孤立了。革命派和保守派是认识问题，少数人是立场不同，就是立场不同也可以变。现在“二七”占优势了，要恢复四大，保证四大。要触及灵魂，不要触皮肉。要允许人家讲话，正确的话可以讲，错误的话也可以讲。好话、坏话都要听。正确的就欢迎，错误的就批判。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压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真理不在人多少，人多不讲真理也不行。二七公社基层组织开始是少数，就在三个月以前你们还是少数。只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个别单位有两个造反派组织，但是联合不起来。这是违反毛主席教导的。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一个学校，绝大部分学生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或其他劳动人民子弟，剥削阶级子弟是很少的，就是剥削阶级子弟，也还是要看表现。我们不能唯成分论，不见得老子不革命，儿子也不革命。为什么联合不起来，无非就是毛主席讲那三个原因，有这种情况的各组织自己查，查出原因自己想办法解决。有些走资派，他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常常拉一派打一派。要研究破坏大联合的因素是什么，查出来自己处理。不要搞血统论。毛主席教导，要把非无产阶级思想纳入无产阶级革命轨道。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斗私，批修”，搞好革命大联合。

（来源：河南二七公社中共河南省委机关井冈山兵团总部主办《井冈山》1967年11月1日第11期，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省军区党委接见郑州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时刘建勋讲话的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纪登奎在河南省军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记录稿）

同志们：

我按大家提出的问题，讲一些个人的看法，不对的地方，以建勋、王新同志的结论为准。

一、河南的形势

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我们河南的形势也是这样，证明毛主席的分析是英明、正确的。现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大家都关心文化大革命，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到农村公社、生产队，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出门就可以看到大字报，到处都在谈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使得你不能不想问题。这就锻炼了群众，毛泽东思想得到空前未有的普及。我们河南部队的同志，现在团结一致支左，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再加上军队团结一致支左，到年底我们河南的形势一定会比现在更好。

河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毛主席视察河南以后，运动更高涨了，大批判搞起来了。郑州地区的工人联合起来了，中学联合起来了，大学联合起来了，农民联合起来了，机关也联合起来了。现在正在办毛主席著作学习班，解放干部。用办训练班的办法，帮助干部改正错误，解决问题，促进三结合。比较先进的单位已经转向本单位的斗批改。运动前进很快，形势发展越来越好。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形势也是这样。这是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的结果，这是主流，是全局。当然运动也有点不平衡，

有的地方可能出现一些反复，大联合没有搞起来，革命造反派分裂了。对运动中出现的問題，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去做工作，不要急，不要怕，不要压，不要把支流看作主流，不要因为一些次要問題影响整个的部署。

中央决定河南問題以后，造反派取得了胜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乘胜前进的时候，有极“左”或右的思潮干扰了我们。有些人对形势估计很悲观，说什么“现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等等。把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到处“反复辟”，揪“军内一小撮”，抢枪。在他们看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胜利了，而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这就错了。有的说：“现在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还要大乱”。笼统的这样讲是缺乏阶级分析的。大部分地区经过两条路线的决战，两个阶级的阵线清楚了，两个司令部清楚了，谁是走资派，谁是无产阶级当权派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吗？还需要大乱吗？事实完全不是那样一回事。这种估计是不对的。如果说有的地方大是大非还没分清，两个司令部的人不清楚，保守派与造反派的阵线不清楚，那样乱一下是好事。对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清楚就是清楚，不清楚就是不清楚。

极“左”思潮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群众。他们在造反派内部拉一派、打一派，发展山头，打砸抢，搞无政府主义。在干部问题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种极“左”思潮的风，在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宣传以后，刹了一下，但是思想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地方对这种思潮教育不够，对江青同志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讲话宣传不够，这股风还在刮。要组织他们学习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讲话，把这股风刹住。还要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让群众知道无政府主义、打、砸、抢是不对的。极右的思潮也有，比如说毛主席号召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后，有人主张要无条件地联合起来。还有些人搞翻案风，不管过去处理的正确不正确，把多少年前处理的老案子翻出来，把四清运动中处理的案子翻出来，把民主革命补课来个“彻底翻案”，这样做是不对的。比如四清，中央已有指示，我们要贯彻执行，要保护四清运动的成果。为四不清干部翻案肯定是不对的。因此，对极“左”极右思潮都要抵制，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阶级斗争是复杂

的，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不要笼统地看待问题，不然就要受极“左”或极右思潮的干扰，影响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现在极“左”思潮是主要的，要组织大家反复听江青同志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讲话录音和文件，反复学习。

二、革命大联合问题

现在形势很好，我们要大踏步乘胜前进，不要被一些次要问题所干扰，迷失大方向。现在要注意抓住主要的，抓主流的方面，抵制极“左”或极右的干扰，乘胜前进。

在大好形势下，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搞好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要实现这个要求，关键问题是搞好革命大联合。因为联合不起来，搞分裂，就阻碍斗批改，阻碍“三结合”；天天打内战，搞武斗，也阻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联合起来了，就有利于大批判，有利于革命“三结合”，有利于斗批改，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总的要求是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但在一定的时候要有所侧重。当然这三个方面不能截然分开。郑州革命大联合搞起来以后，现在一方面批斗走资派，一方面抓“三结合”，解放干部。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县打内战，总有二十多个县吧！并且还有一种“内战不可避免论”，说什么“内战是一个必经的阶段”，这是不对的。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革命造反派已经分裂的要做联合工作，说服他们联合起来；没有分裂的，要防止他们分裂；刚刚开始闹，还没有分裂的，要加紧工作，把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

关于大联合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行了。主席在湖南视察的时候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们。这么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这里毛主席讲的多么清楚啊，保守组织主要是头头不好，群众是受了蒙蔽，只要他们自己起来造他们头头的反，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就要和他们讲联合。两派闹分裂，联合不起来，原因是毛主席指出的三条：一个是走资派操纵，

一个是坏人捣乱，一个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作怪，什么“以我为核心”等等。这个问题大家要讨论一下，把它搞清楚。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搞革命的大联合。工作要一步一步做，这里有这样几个问题：

1. 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大联合问题。革命造反派内部发生分裂，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不准打一派，拉一派，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支持。要教育他们做自我批评，不要相互攻击。如果有坏人插手，我们就帮助分析原因，使他们认识从来都是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教育大家擦亮眼睛，不要上当。

军队的同志除了给左派做工作以外，对已经站出来的革命干部也要做工作。在革命派内部分两派的情况下，还按处理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的方法，来个“一边倒”，支持一派，打击一派，就要犯错误。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有的是认识问题，按处理革与保关系处理造反派内部的分歧，有的是本身有错误，一派死保他，他就站在这一派一边，利用这一派为他的错误辩护。一种是盲目的，是认识问题；一种是思想不纯，想利用一派保自己的错误。应该是谁作的对就支持谁，谁作错就要教育。但是，万万不能压。前一段有一股极“左”的思潮，有一个学校发表严正声明，炮轰建勋同志和我，炮轰警备司令部。我到他们那里，我说，你批我们支持庆祝风，这个意见是对的，今后那里开庆祝会都不再去参加了。说我们没有抓大批判，这个意见是对的，我们今后要抓大批判。同志们批评对的我们都接受，都改正。至于对形势的分析，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呀等等，我们就不能同意了，你们可以保留意见，允许你们慢慢转。过几天江青同志讲话的录音就来了，一听就感觉他们的认识不对了。那个思潮也就慢慢下去了。人家批评对的就认错，批评得不对的就给人家解释清楚。有一个地方造反派分成了两派，一派先开枪打死了人，是没有道理的。解放军给另一派做工作，说他们不对，不要去报复，我们负责解决。但是另一派不服气，他就上去把人家围起来，又打，又抓，还说人家是“反革命”。这样搞就麻烦了，他比人家搞得还凶，本来有理的事情，你去压人家就没有理了。总之，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做政治工作，支左不支派。

2. 关于如何对待保守派群众的问题。主要一条是作好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压。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讲的很多了，但是尽管你讲，还是有人在那里搞“小动作”。有些造反派的同志对受蒙蔽参加保守派的群众采取“修理”的政策是不对的，我们的责任是对他们要进行耐心的教育，让他们执行毛主席规定的路线，方针、政策。

坏头头是很少的，那有那么多坏头头呢，每个单位都有坏头头吗，不会的。即便有个别坏头头，也要按照主席的指示，靠下面群众自己起来造坏头头的反，把它揪出来。

对受蒙蔽参加保守派组织的群众，要教育他们起来造他们头头的反，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只要他们造了他们头头的反，就可以吸收他们参加造反派队伍。

河造总的问题我讲不清楚。河造总是二月黑风的产物，它的基层组织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原来是保守派，还有一部分原来是造反派。比如郑工造总和中医八三一，但是二月以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北京向中央汇报河南问题的初期，中央认为河造总中间还有造反派，是挽救河造总的，但他们不听。当时二七公社不通，中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派了一个小组帮助二七公社整风。整风完了以后，思想通了，就派代表和河造总谈判联合。二七公社是党言川去的，还写了一封信，请河造总提意见，搞联合。我告诉党言川他们，对河造总要高姿态，要虚心接受他们的批评。但是，二七公社的代表去了以后，他们说没有时间，就挡回来了。第二次又派代表去，河造总提出以他为核心，说戴苏理是一贯正确的革命领导干部，何运洪打不倒，刘建勋回河南检讨，纪登奎靠边站。我没有什么关系，保何运洪的反动路线就不对了。河造总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武汉“百万雄师”，反对戚本禹、谢富治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抓住戚本禹同志批评二七公社的三条缺点，攻击二七公社，说二七公社是犯了错误的造反派，他们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二七公社代表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在中央面前，也在保守派面前，公开检讨组织不纯、打、砸、抢和小团体主义等缺点错误，并且发了整风公告。这个时候，河造总应该作些自我批评。可是他们不但不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继续攻击二七公社，继续搞反动的东西，并且越来越多，河造总和八大总部的代表完全站在一起，联合起来攻击二七公社，这就继续错下去了，一直错到汇报结束。中央首长最后一

次接见，即第八次接见的时候，河造总的首席代表刘建亭看看实在不行了，感觉有问题了，就在会上当面提出：戚本禹同志说，我们河造总是犯了错误的造反派，现在还可不可以这样讲？康老说，你不要听人家说，你自己表现嘛！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管是何运洪，还是河造总，坚持错误都没有好结果。向中央的汇报结束以后，河造总的组织散了，在一个时期也不活动了，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表现，中央也看不到他们的表现。在这个期间，我们给二七公社做过很多工作，告诉二七公社要高姿态，要帮助河造总改正错误。我们一直给二七公社讲不要压他们。压了不利于他们改正错误。现在河造总起来了，起来是好事。起来我们就本着中央讲的精神，看一看他们的表现。他们现在贴出来了很多大标语：“支持戴苏理”，“纪登奎靠边站”，“打倒王庭栋”，“批判陈桂昌”，等等。还有“河造总越战越强”，“河造总是顶天立地的造反派”，“河造总好得很”，“河造总要起来抗暴”。他们在前一段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无条件的联合，不联合，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联合是有原则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下的的大联合，是革命派的大联合。说无条件的联合是不对的，参加保守组织的受蒙蔽的群众要造他们头头的反，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才能联合。他们就说我是派性。王庭栋同志讲：你们去年还是个造反派，但是今年二月以后你们分裂出去，跟着何运洪搞反动路线，方向路线错了，分裂的责任在你们。现在你们提出联合我们很高兴，我们坚持联合的方针，反对分裂。现在你们愿意回来，我们欢迎。但是，联合有个原则，要承认错误，端正方向，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

对河造总要实事求是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表现，帮助他们，如果他们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并且把他们不象样子的头头揪出来，造头头的反，那么我们就应该联合他，团结他。如果他们不承认错误，认为自己好得很，不讲原则就不行。但是，不准压他们。他们贴大字报，是允许的，要支持他们贴，支持他们把话说完，正确的欢迎，错误的就批评。至于“无条件地联合”，“各派一律联合”，那就不行了。建勋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一段话，讲到这个问题，我现在念一下。他说：“如果他们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是不是应该欢迎呢？（二七公社的同志答：应该欢迎）应该欢迎，应该联合他，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为什么不联合呢？联合的方法，一个是解散组织，分别参加二七公社，这是你们赞成

的，也是我赞成的。还有一种方法是不解散组织，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联合不联合，（有一个人答：联合）好，虽然只有你一个人答复，但答复的很好，很对，应该联合。他们把自己内部的反动路线肃清，把坏头头揪出来，和二七公社方向一致，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毛主席思想基础上搞联合，我们不能拒绝，拒绝是错误的。”不准人家革命不对，但是必须承认错误，端正方向。比如说支持戴苏理，是支持他改正错误，还是支持他继续坚持错误，如果支持戴苏理改正错误，我们是欢迎的，支持戴苏理坚持错误我们就不欢迎。

3. 跨行业组织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好解决了，中央有个文件，我们要贯彻执行。中央规定：“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我们要根据中央的指示，做工作让他们回到本单位去。有很多跨行业组织，成分比较复杂，有些人脱离生产，搞无政府主义。这个问题要在大联合中加以解决。

4. 确立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问题。现在有的地方是学生领导一切，中学生领导一切，他们说了算数。这种情况要改变。大联合中要做工人工作，按系统把工人组织联合起来。在郑州，我们整整奋斗了两个月，现在联合起来了。总之，加强工人的工作，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发挥工人的主力军作用。有一个地方连第一线指挥部的指挥长也不要解放军当，要中学生当，那怎么会行呢，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学生要向工农兵学习。不然大联合搞起来也不巩固。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要根据这个精神搞大联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搞一个革命大联合的高潮，大搞群众运动，使那些不愿意搞大联合的人坐卧不安。这样一搞，闹分裂的人就没有市场了。

三、专政问题

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对罪恶很大的人让群众自己起来抓，这叫做群众专政。除了这个以外，现在社会上地富反坏右、国民党的特务也起来了，他们钻到革命派内部来做了许多坏事，这个情况怎么办，对拥有群众多的组织，要发动群众自己起来搞，不要急，否则我们一抓，群众还没有同坏人划清界限，容易同群众形成对立。还有一种，是反革命分子做了坏事，应该镇压，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地富反坏右也不敢抓，那也要犯错误

的。对群众组织中的坏人，要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去揪。一个不抓不行，但是不可抓人过多。要把公安局的造反派搞起来，发挥点作用，协助解放军专政。

四、郑州地区的工作安排

郑州地区革命大联合已经初步形成，总的任务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现在要大量地办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种是集中训练二七公社基层组织的一号服务员，“斗私，批修”，整风。一种是干部训练班，让干部学习文件，改造思想，接受审查，然后站出来。现在训练班已经普遍地办起来了，我们下决心加强领导，不断总结经验，把它办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郑州地区上一段主要是集中力量搞大联合。现在工人、农民、学生、干部都联合起来了。大联合以后，正在组织广大群众，搞革命的大批判，批斗文何赵杨。在搞好革命大批判的同时，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解放干部，搞革命的“三结合”。为了促进解放干部，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我们批准了几个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人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你们还不大联合，群众就不满意了。这是一种推动，促进大联合，促进解放干部，争取受蒙蔽的群众。

省里准备成立筹备小组，条件成熟的地、市、县也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现在我们的解放军都支左，有几个革命领导干部，群众不打内战，联合起来就行了，有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就有了权力机关，推动工作会更快一点。所以，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成立。

要继续搞好拥军爱民，军队和群众要团结好。

枪，要继续收。收了以后再发。武装左派，要创造条件，经过批准再发。

公安局要依靠造反派搞起来。公安局的造反派组织起来，作为解放军的助手，搞社会治安，对敌人专政。

农村，原来准备安排一下。现在不要让学生去农村，他们一下去就搞派别，把派性搞起来就按派分牛、分地破坏集体经济。中央已有通知，学生一律复课闹革命。这个精神要向农民宣传，农民知道这个精神就不听他的了。在农村要依靠贫下中农，要讲阶级路线。

四清地区要注意四不清干部翻案。有些走资派在那里策划四不清干部“造反”，有的学生就盲目支持他们，不是保护四清成果。这个问题要严重警惕。一定要坚决按照中央的规定办事，不准翻案，保护四清成果，决不能形成翻案风。

下乡知识青年，应该完全按照中央指示办事，劝他们回到农村闹革命。回去就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回去就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真正无理取闹，打、砸、抢严重，拒不回乡，群众起来反对的，我们要处理。

另外，据说现在下边有些人假借我和建勋同志的名义造谣，给你们为难，甚至冒充我的秘书要东西，等等。今天我在这里发表一个声明，通通没有那回事，都不算数。我们有什么事情都和支左办公室联系，都和解放军打招呼的。今后有什么事情你们和支左办公室联系一下就行了。

我的话讲完了，请同志们讨论。

（来源：《井冈山》河南二七公社、中共河南省委机关井冈山兵团总部主办 1967 年 11 月 1 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谈河南两派问题

〔时间：1967. 11. 25, 23: 30—26 日 2: 40,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首长有：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及付主任扬兴陪同。〕

几张大字报有什么了不起，北京不也有 5. 16 呀！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我们伟大领袖，不也把他破获了吗？河南就那么怕“河造总”？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就那么害怕，当然对 5. 16 我们主张不要扩大，一个人要与整个组织分开，把坏人揪出来就算了。

（机务段二七代表汇报：机务段原来还没有河造总时）

总理说：原来并不是没有人了，只不过是说话，是吗？是不说话的“河造总”，你们就是想把人家吞掉，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也吞不掉。过去他们说话不好，说了话才好啊，说了我们才懂了。当然我不象刚才那个同志那样乐观，可也不象你那样悲观，你不是说他们只有五六十个人吗？五六十个人就把你们冲乱了？“河造总”有什么理由不同你们联合呢？他要想什么呢？你们有个恐惧，怕河造总同你们联合后，他们有些群众又回去了。

（“二七”插话：是这样，不但“河造总”，还是四大总部，他们成立的快，垮的也快，现在又要恢复，我们想不通。）

总理说：你们这是派性，看来派性问题在铁路上没有解决呀！

总理休息一下，转对“河造总”代表讲，现在我对“河造总”同志讲一下，听听你们的意见。

第一，你们承认跟何运洪走过一段路，你们承认错误吗？（答：承认）

第二，郑州铁路“河造总”本身组织缩小，这是事实吧！（此时二七代表想插话，总理生气地阻止说，你们派性就是相当强了，我在跟他们说话，你还要提何运洪是罪魁祸首，铁路上还有跟何运洪走的吗？有这种人的话，你们要与他们划清界线。（河造总答：对）我这不是搞群众，是搞与何运洪没有划清界线的干部。

第三，你们组织缩小了，原来 9 千退到现在 2、3 千，缩小就让他缩小，那就维持现在这个组织状态、地位吧。把脚跟站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斗私批修，开门整风，参加毛主席著作学习班行不行？（答：行）不要再发展组织，这样你们就对了，否则人家就要讲你是老保翻天了，把社会搞得动来动去，他们也就不相信你们了。你们要把立场站稳，才能取得人家的信任，要和跟何运洪的干部划清界线，队伍缩小一点，不要去争人的多少，而要看你们的立场稳不稳，这样人家就不会说你拉队伍啦。机务段有几十个人就几十个人吧（河造总插：二七做法人家不服）要向前看，不要往后看。他们有的做法不对，你们过去也有不对的，不要提那些了。矛头对准刘建勋的口号，就是错误的，你们就反对吗？这就表明铁路的河造总不同嘛！你们要在抓革命促业务上做出成绩来，你们总部不要再扩大了，要取得人家信任，你们这二、三千人要确实承认错误与不悔改的领导干部划清界线，斗私批修。

（二七代表、河造代表表态）态度是好的，大家都表态了，你们要交换一下意见，我明天下半夜有空再同你们商量，关于干部问题，你们再想一想，有问题的干部，可以先调开来学习，干部问题要等到联合后再解决，我看河造总还是可以讲通的嘛！要用教育的态度，帮助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也还是可以听的啊，东北各省、沈阳、吉林、锦州局也要同地方分开，否则中央的精神就贯彻不下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郑州铁路造反派及各地在京铁路系统代表的讲话

群众组织一定要区别头头与群众，不能头头犯一点错误就加到群众身上。头头是选出来的，确实是辛苦，他犯了错误，自我批评，群众是会谅解他的。但确实也有一些坏头头，把错误推向群众。现在一办训练班，非常快地实现了大联合。主席的思想，主席的声音，老三篇也好，六篇也好，最新指示与群众一见面，很快地群众就接受了。

毛泽东思想被群众掌握了，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林付主席说：要吃透两头，上头吃透毛泽东思想，下面吃透群众。当然坏人是极个别的，如赵永夫、陈再道、何运洪这些人还允许他们改，在学习嘛！有错误一定要区别头头和群众。

“河造总”过去犯过一段错误，群众就全部都犯错误。“二七”现在有些骄傲，那也是头头。就是过去“十大总部”和“百万雄师”，那也是头头，要与群众区别开来。有些坏人插手混水摸鱼，把坏人揪出来，但组织还是存在的。如北京就有“5.16兵团”，国民党特务，学生不知道，所以揪出几个头头就可以了，不责备学生。而且他自己组织揪出来更好，他立了新功，不管什么群众组织，尤其是当权的时候，总会有坏人来利用你们的，要你们自己注意揪出来，就会不断前进，不断发展。

不是你借我的东风，我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我是借你们的东风，去推动东北、西北、西南的联合。柳州局好一些，有了协议，但执行有问题，也推动华东的，济南、徐州、蚌埠、南京、上海局也还没有完全联合好。十八个局，把你们的东风四面八方去散。屠杀工人运动是从吴佩孚开始的。现在是革命的风雨，从你们郑州开始毛主席的东风，在你们身上实现。所以把你们多留一天，十一月的最后一天把各个协议都达成，十一条协议是不难的，名额可以照顾的，刚才有张条子，两个组织为名额是三七比还是四比六争论了七天，我说多数是伟大的，就应是四比六。真理不在人数，毛主席在初期是少数，但没有失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现在更加伟大。

今天你们做了一件好事，我相信“二七”工人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今天就读了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道命令嘛，是解放两广时给林彪同志的电报，时间是1949年10月31日，也就是十八年前的上一个月，其中一段毛主席说：

“在目前三至五个月内，除完成剿匪任务外，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缅汉向桂阳路，这是极重要的，……完美无缺。”

主席把铁路放在极重要的地位，郑州带头了，其他 17 个局也应如此，跟上来，大家齐头赶上。有一个好消息，西安铁路局搞起来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第四次接见郑州铁路局代表时的讲话

(十二月二日五点五十五分至八点三十分，根据记录整理)

参加接见的还有：刘建勋、王新、铁道部军管会苏主任、杨副主任。

总理：生气地说：(没有按原通知人数去参加会)二·七来的多吧，谁打电话叫来这么多人？(没有人答)你们自己可以开免票嘛！你们就是特殊嘛！我等了你们几个钟头了，我们没有你们那么自由，包括建勋、王新同志也没有你们那么自由，想到这里就到这里，想到那里就到那里。

本来我是来庆贺你们达成协议的，为什么来这么多人？(军管会：大家都想见见总理)见我有什么意思？我的照片不是经常见到吗？要为人民服务嘛！我见你们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对我采取这种示威的方法，我对你们今天这样做是不满意的。你们的协议我看了，我不放心，我担心你们回去执行不了协议。

总理说：二·七公社高姿态，今天称赞你们。服务员不在多少，在于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于能不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协议要通过实践，不要回去又闹起来了。我担心回去会不会出问题，在主席像前，不能说假话。

双方代表：回去保证贯彻执行。

总理：(总理对协议落款很不满意)叫郑州铁路二·七公社就够了嘛！为什么后边又加个郑铁分会？造总又加个分部？这是什么意思，究竟包括多大范围？

(二·七代表：我们原来叫河南二·七公社铁路分社，我们没有同新乡、洛阳、开封、驻马店等地商量，他们也没有派代表来，我们不敢改名字，准备回去以后和他们商量也联合起来。河造总代表：我们原来就想搞全省的，因为二·七不同意，所以没有搞)。

总理问二·七公社代表：你们能包括哪些地区？又问河造总到底有多少人？(河造总代表：加上其他地区还有一万人)听说河造总开了一个大会，把地方都吸

收进去了，学生、农民也来了！叫你们不介入地方，你们又这样搞这是不是想助长声势？！我要批评你们。河造总是犯错误的造反派，你们自己要认识错误。对犯了错误的造反派，要帮助、批评、联合，你们不要小集团主义，要有全局的观点，要服从全局利益。我让你们联合召开庆祝大会，为什么你们(指河造总)提前召开了？

总理：二·七有光荣的传统，用二·七这个名称是好的，四十五年前，一九二三年二·七罢工，当时除了海员大罢工，就是铁路工人大罢工，也是青年学生起来，而后工人起来。工人起来了，党就诞生了，党领导工人运动是有光荣事迹的。过去对付北洋政府是联合的，现在与走资派斗争，进行反修、防修也要联合。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更要大联合。这次你们带了头。郑州是铁路大罢工的中心，铁路总工会开会那个地方你们还记得吧？(二·七代表：开会那个地方现在盖了二·七纪念堂)郑州有这样光荣的传统。

铁路系统不要同地方混在一起，铁路是交通的命脉，现在一切的生产建设关键是铁路运输问题。这几天郑州的运输情况好转了，你们要巩固发展下去。

二·七过去受压，中央支持你们，给你们平了反，你们是造反派嘛！何运洪受了批评，你们得到了发展。

河造总你们是老造反派，二月你们上了何运洪的当，执行了何运洪的反动路线，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你们是阶级兄弟，不管人多人少要联合起来，站在一起，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要执行协议，推动全河南的大联合和推动全国铁路系统的大联合。你们和西安是兄弟，你们大联合领先了嘛！十八个铁路局向你们学习，最后要把二·七的旗帜，在铁路系统打起来。你们不要独霸，要共享这个光荣的传统，不能发展你们的派性。两个组织存在暂时不倒旗。

(双方就联合的范围问题发了言，意见不一致。)

总理：(生气地)你们两边都有私心杂念，你在这里吵架，你们讲话都是骗我，什么斗私批修？今天我本来可以不来，但是我不想失信，你们不讲老实话，我就不听了。搞了四天今天我感到很痛心，工人同志嘛，应该忠诚老实，为什么从旧社会学来这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双方互相勾心斗角，不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上，你们总想多占一个名额，多发展一部分力量，好象多一万人就能打天下。

(总理指名叫唐启山同志起来讲讲老实话)，从你们北站达成协议，发展到五个基层组织已达成协议，在你们的推动下，西安局六个组织也联合起来了，我才有这个念头叫你们搞全省铁路职工大联合。今天你们又变成郑州地区的大联合，河造总想搞全省铁路职工大联合，也是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工人阶级吗！你们为谁打天下，为谁拉队伍？不为铁路的整体利益着想，为北站生产着想，这叫斗私？你们有本事，现在就请你们六位来领导一百六十万铁路职工，现在就叫你们来当铁道部长，你们能当得了吗？现在不行，将来也许行。

我看了你们的协议就是不放心。你们对我都是这样，回去了叫刘建勋、王新同志怎么办，难怪刘建勋、王新要找我和康老谈谈。今天证实了你们就是有问题，在协议中你们按了钉子，你们不说老实话，我怎么给主席汇报呢？！你们这样搞，协议签了字也没有用。例如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是军管会组织，二是大联委组织，三是自己办。军管会办可以，大联委办也可以。自己办还不是关起门来骂别人，只能发展派性，我们不提倡。

总理：你们愿不愿讲老实话，愿不愿意搞大联合？

(这时双方先后共有十几人发言，造了双方头头的反，强烈要求大联合，对他们在总理面前说假话，欺骗总理极为不满，要求头头靠边站，踢开服务组自己闹革命，高呼“要斗私，批修，实现革命大联合”等口号，后来头头们作了检讨，表示愿意修改协议，改变落款，搞全省大联合。当群众强烈要求当场立即签字时)，

我不同意你们这种轰的办法，你们如果愿意多留一天，经过协商讨论把协议修改好也可以，如果这里搞不成回去搞也可以，现在这个协议先带回去实行。我看了这个协议，不是用很高的热情写出来的，是动了脑子按了钉子的，我把我的真心话告诉你们吧！我对这个协议是不满意的。现在天已经亮了，我不能再给你们谈了。我觉得对不起毛主席我很痛心，我接见了你们四次，给了许多说服工作。见个基层的大联合协议是好的，后来两个总部搞联合的时候，派性就发展了

(有人提河造总在天安门贴大字报说总理讲河造总是左派)

总理：谁贴的？(河造总不承认)你们不贴谁贴？难道是二·七公社贴的吗？！那个大字报歪曲了我的讲话，我是说河造总是犯错误的造反派，现在你们(指河造总)又发展人，既然大联合了吗？还有什么发展头。你们再发展还不是吸收十大总部的人。你们争取了联合的地位，但我是帮助你们，批评你们。你们不

要再发展了。再发展有什么好处，已经几千人了，要为全国人民服务。你们在家里开大会还是为了壮大声势，这不对。

二·七对河造总发展组织提心吊胆，你们是河南最大的组织。现在骄傲了，你们想包办一切，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没有河造总的地方还有其它群众组织吗？也要帮助他们和他们搞联合。现在达成的协议，你们先带回去实行，是不是真正贯彻实行，群众是会严格要求你们的。

本来中央的批示已经写好了，准备用，用四个名义(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发全国，现在看到你们这个协议，批示要修改了，如果你们回去要打仗搞分裂就不批了。如果回去确实搞的好，中央再批发，通报全国表扬你们。如果你们不执行协议我还要通报全国批评你们。今天我在中央文革开会还称赞了你们，但在会上听了你们的发言，看出了你们的问题，你们只管郑州，不管别的地方，郑州通车了，别的地方车不通了你怎么办？回去不要再发展组织，再发展组织就要闹磨擦。回去开会要双方共同开会来庆祝。军管会、省革筹小组可以去人参加，现在我不是对你们各打五十大板，还是看你们回去后的实际行动，已经达成的七个协议都算数，回去要努力实行。今天我讲的话也许过分尖锐，不这样讲，刘建勋、王新同志回去为难。当然我对毛主席大联合的方针是无限乐观的，对群众也是相信的，但具体到一些基层单位和某些问题上就不一定。

总理：(当要散会时，大家要求，用郑州铁路二·七公社、郑州铁路河造总的名义，在协议书上重新签字时)名称问题不要勉强，只要你们真正执行协议，不再发展组织和地方割断联系，共同办好毛著学习班，认真进行斗私批修，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联合暂时不倒旗，按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办事，我还是要庆贺你们的。我答应和你们照相，还是要照相的，但是只保留一点，中央的批示要晚一点，看看再批。

会场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井冈山》 1967年12月10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刘建勋对河南两派谈周总理的指示

下面谈谈大联合的问题,我省在实现革命大联合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不容否认的。当然,也要看到,我们在大联合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对“河造总”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这是必须经过协商很好加以解决的。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次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解决了铁路“二七公社”和铁路“河造总”的大联合问题。总理在百忙中四次接见了双方代表,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总理讲,“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你们过去受压,中央是支持的,中央给你们平了反,但是有些骄傲。如果不克服骄傲情绪,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总理讲:“河造总”是犯错误的造反派。你们要作自我批评,承认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你们过去受何运洪的蒙蔽,要划清界线,不然别人不相信你们。“二七公社”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是坚决支持的。你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对待“河造总”的问题,是一个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造反派的问题。

怎样对待犯过错误的造反派呢?总理讲,要采取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我们应当坚决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办,应该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力帮助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批评他们的错误,并促使他们改正错误,同时推动他们同其他革命派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其他任何歧视、压制的政策都是错误的。

怎样联合?总理指示,大联合,要上联下也联,不要光联上不联下,也不要光联下不联上。总理又讲,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大联合是个原则,我们能马上实现是理想的。一个原则、方向,要逐步实现,要灵活掌握这个原则。总理又讲,一联合就倒旗帜,不一定符合群众的愿望。有个实践的过程,通过实践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打旗了,水到渠成了,就可以只树一面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总理再三讲,双方在大联合期间不要再发展组织了。那些左右摇摆的人是不好的,一个革命者起码要有坚定性,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谁还相信你。总理又讲,工人阶级嘛,你们为谁打天下,为谁拉队伍,要为整体利益着想,根据总理的指示,为了稳定局势,在联合时,“河造总”不要再发展了,“二七公社”也不要再发展了。我相信,只要大家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办,以斗私批修为纲,活

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增强无产阶级的党性，经过充分协商，“二七公社”同“河造总”一定能够很快联合起来。

大联合必须是革命的，联合的目的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果讲大联合，去掉了革命两个字，抽掉了阶级性，是不对的。中央对河南问题的批示公布以后，毛主席的指示一经同群众见面，我省“公安公社”、“省委造总”等保守组织很快分化瓦解。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他表明了这些组织中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已经回到和正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这些保守组织和河造总不同，这些已经垮了台的保守组织，现在有人又想把它拉起来，广大革命群众是不会欢迎的，我们也认为是不必要的，是不应当支持的。如果极少数人要重新打出这些保守组织的旗帜来，只能说明他们没有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要再去压制和歧视他们，要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他们，使他们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再去联合他们。

三、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王新向河南省大联委传达中央首长七点指示精神（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传达时间：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半

一、中央首长听了我们汇报后，总的对河南工作、对军队“三支”、“两军”工作是满意的，实际上省革筹工作也是如此。特别提到军队工作，这是中央对部队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中央首长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军队工作是好的。省军区县市人武部对何运洪犯方向路线错误，通过办学习班调整干部，加强领导，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省军区机关根据中央指示，开展了四大，几个月来，思想觉悟、两条路线觉悟有很大提高，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关于停止四大指示下达后，你们坚决贯彻了，机关四大很快停了下来。军队通过两条路线教育，就总体来说，是团结一致的，中央首长批评我们没有很好总结。总的说，中央首长对河南收枪、制止武斗、解决化肥厂问题比较满意，特别提到王洪智同志到开封化肥厂，亲临现场，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给予了表扬，康生专门叫王洪智同志汇报了化肥厂情况，江青同志插话说：王洪智同志是杨子荣，可以写本戏。

二、中央指出河南有两个好条件，河南军队总的是团结一致的，一致支左，二是河南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多，在全国是属一的，中央首长指出这与刘建勋站出来早有关系，毛主席多次提到文化大革命中，纪登奎同志坐过多少次飞机，表现是好的，江青说纪登奎是有名的人。河南革命干部站出来的多，省、地、专、县都有一些站出来的干部。

三、中央特别强调大联合问题。实现大联合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按照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二七、八·二四、河造总都是跨行业的(纪登奎：中央首长还说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也是跨行业组织)，要适应政治任务的需要，取消这些组织，不消失山头，就不能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很好地建立生产秩序，不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伯达同志几次提到这是大杂烩。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了，它就会成为阻力。革委会成立后，要强调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召开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伯达同志还提到：跨行业组织不消失，就不适应政治任务的要求，就保持不了革命性，跨行业组织在抵抗反动路线时有革命性，在新的形势任务下，要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跨行业组织不消失就保持不了革命性。中央首长多次提到，要大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条大毒蛇，不摆脱派性就会毒蛇缠身。另外中央首长还强调反对两面派，玩弄两面派是自杀，自己毁灭自己。革命者什么时候都要老老实实，不能对党对人民阴阴阳阳。社会上出现极“左”和右的思潮是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干扰。极“左”就是极右，极“左”形式上是左的，实质上是右的，极“左”发展下去必然和十大总部结合。有些学校造反派头头，表面上讲的很好，背后捣鬼，上边握手，下边踢脚。口头讲反对武斗，背后又煽动武斗。这是很危险的，这是要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的。玩两面派就是无产阶级政客。打倒的走资派都是老两面派，青年人是下决心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自己服务，这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解决。在讲到这问题时，中央首长读了两条语录，一条是《毛主席语录》246 页的一条，即“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另一条是《毛主席语录》252 页，

即“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有的人今天革命，明天不革命甚至反革命，这是可能的。老的两面派打倒了，还会产生新的两面派，对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你们要严格要求，热情帮助，决不要迁就姑息他们的错误，中央首长特别强调二七公社，八·二四，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按照毛主席教导办事，不能把自己看得高于一切，要正确对待河造总，河造总同志也没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二七、八·二四。群众组织长期联合不起来，武斗停止不下来，有的是有坏人操纵。对坏人要揪，可以在报上点名。当我们汇报到北京有的学生还在河南时，中央首长要我们动员他们回去，确实坏的要送回北京处理。二七公社在外地的也要回来，（纪登奎同志：二七公社已经发了报，态度很强硬。）

总的，中央首长强调要全国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抓的更紧，办的更广泛，把群众发动得更深入。特别提到革委会成立后，委员们要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只要通过大办学习班，斗私批修，就能解决。毛主席的话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千条万条这是第一条，抓住这个根本，就可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国胜利。

五、很好地教育群众。革委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不是各组织的联合会，也不是个联络站。不是对某个组织负责，而是对几千万人民负责，参加革委会不是代表某一派，而是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如果成了你那个派的代表，那就成了联合会。每个委员都要懂得这一点，革委会成立后，要狠学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同时提到革委会是新生事物，要扶植她。有缺点，要帮助她克服，使她不断地完善，决不能今天成立，明天就打倒。

六、革委会成立后，首先要抓工人运动。现在河南那里还是学生指挥工人。平顶山就是这样。平顶山武斗就是几个学生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一定要突出工

人运动，一定要摆脱学生的派性。学生当家就稳定不了，不能让学生当家。只有把工人运动很好地搞起来，才能稳定局势。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冲锋陷阵，但是现在发展了派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要依靠无产阶级。现在就整体说，学生落后了，当然不是指那几个人，对学生的缺点、错误，不能姑息迁就，不然他们会犯更大错误，实际上也是如此。（传达到此，王新同志严肃地说：刘建亭思想不对头，过去河造总不是紧跟党中央、毛主席，背离了大方向，现在仍然在搞分裂，搞山头，不是搞大方向，现在河造总跟着他走，就要犯大错误，是刘建亭那一套正确还是丁素琴正确，我看是丁素琴正确，对刘建亭不能支持，对丁素琴就是要支持。）（纪登奎插话：还有人布置搞停产，这是革命化？！还要升官？！）

七、要体现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是抓煤炭，一是抓铁路，这是中央批评我们的两条。有的人企图用破坏生产的方法来达到做官的目的，这是办不到的。大联委建议革命群众组织对危害人民事业的事情要抵制制止，对坏人要发动群众揪他，河南煤炭供应南方，供应国外，煤上不去，运输上不去，影响全国。中央首长要我们下很大决心，抓好煤炭，抓好铁路，关键是揪坏人，反派性。同时中央首长交待我们，一定要同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作坚决的斗争，勇敢地捍卫党中央、中央文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管什么人，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我们就坚决和他拼。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保卫毛主席，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提高警惕。

（来源：《造反有理报》 1968 年 2 月 11 日 第四版）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河南革命委员会常委中群众代表名录

郜国荣，原国家黄河水利委员会干部，省大联委委员，“二七公社”负责人
 轩东森，原河南省建工局干部，省大联委副主任，“河造总”负责人 申茂功，
 28 岁，郑州国棉六厂工人，“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主任。中共党员 杨
 锡淼，国防科委十三所技术员，“二七公社”负责人。 唐歧山，39 岁，郑
 州铁路机务北段工程师、司机长，郑州铁路局大联委主任，“二七公社”负责人，
 中共党员 申红玉，开封电厂工人，开封“八二四”（八二四造反委员会）负

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郭守仁，开封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人，“八二四”负责人 龙一兵，郑州第二砂轮厂工人，省大联委委员，“二七公社”负责人 李福山，郑州印染厂工人，“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委员 唐振方，洛阳拖拉机厂工人，豫西造反派负责人 张过老，洛阳拖拉机厂工人，豫西造反派负责人 张宗海，省建工局二处工人，省大联委委员，“河造总”负责人 吕书墨，新乡七里营党支部书记，省劳动模范 文香兰，女，鲁山老庄公社副社长，省劳动模范 党言川，24岁，郑州大学学生，“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陈红兵，开封师范学院学生，“八二四”负责人 杨国雄，河南医学院学生，“河医东方红”及“二七公社”负责人。 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派“粮院联委”负责人，省大联委委员。 范念民，河南农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派“豫农红总”（河南省农学院红卫兵总部）负责人， 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新乡师院“八一八”负责人 丁素琴，女，河南中医学院学生，中医学院“八三一”及“河造总”（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王传玉，郑大附中学生，“二七公社”郑大附中红旗公社负责人，郑州中学联委负责人。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工人、贫下中农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同志们：

河南五千万人民盼望已久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号声中，今天庄严宣告成立了！

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欢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让我们最最衷心地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广大指战员，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团结一致，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为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首都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我们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和支持。我们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英勇顽强斗争的结果。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的彻底垮台，宣告了他们在河南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的彻底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彻底破产。它标志着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敏生、赵文甫之流，长期以来，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结成死党，忠实地执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他们大肆吹捧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极力贬低和攻击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时而从极“左”的方面，时而从右的方面，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他们一贯耍阴谋，放暗箭，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他们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的要命，恨得要死，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忠实地执行陶铸、王任重的黑指示，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去年二月，正当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夺权的关键时刻，他们不甘灭亡，垂死挣扎，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相勾结，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说明，文敏生、赵文甫之流，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河南就要走回头路，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把他们揪出来，打翻在地，清除了河南党内的大隐患，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的大批判，肃清陶铸、王任重的修正主义流毒；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团结了广大群众，团结了大批革命干部，大规模地开展了“拥军爱民”运动，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当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经过一年多来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大普及、大传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深入人心。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工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全省呈现一派蓬蓬勃勃的革命景象。“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一切光荣归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切光荣归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我们最伟大的导师，最杰出的领袖，最天才的统帅，最英明的舵手。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革命，是一场关系到世界革命命运和前途的大革命。回顾一年多来的战斗历程，我们每前进一步，都是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步步指引；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

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去年七月，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问题作出了英明决定，从此，河南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去年国庆前夕，毛主席亲临河南视察，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这是对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以后，立即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革命形势的发展如江河奔泻，大大加快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完全成熟了。一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

同志们，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的伟大斗争开始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任务千条万条，头等重要、最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透彻、最精辟的总结，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纲领。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条条落实，全面落实，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好形式。各级革命委员会、各个革命群众组织，要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学了就用，立竿见影。

我们要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持续地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王任重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赵之流，批深批透，斗倒斗臭。结合批判本地区、本部门的走资派，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要迅速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

班级联合起来。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帮助更多的干部站出来革命。

我们要结合革命大批判和斗批改，大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和壮大党的队伍，把河南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的伟大号召，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革命群众要更加拥护和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严防阶级敌人挑拨离间。

我们要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打击投机倒把。发动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维护革命的新秩序，保证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

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掀起生产建设的新高潮，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一定要保证迅速改善铁路运输状况，提高煤炭生产进度。要坚持节约闹革命，业余闹革命，就地闹革命。要坚守生产岗位，自觉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国家财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同志们！战友们：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夺权斗争胜利以后，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它们还会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务必提高革命警惕，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夺权靠毛泽东思想，掌权、用权也要靠毛泽东思想。省革命委员会必须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必须以身作则，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接受

群众监督，参加劳动，调查研究，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建新劳。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们要以最高的热情，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措施，把河南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祖国中原的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辽阔中原唱凯歌——热烈欢呼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辽阔的中原大地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凯歌。在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热潮中，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是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丰硕成果。

我们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向河南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河南省五千万人民，向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河南省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地区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曾经顽固地推行一条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面对着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河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坚信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一定会照彻中原大地。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始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迅速传播毛主席的声音，紧跟毛主席的伟

大战略部署。正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航向，鼓舞着他们顶黑风，战恶浪，和阶级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全省范围内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在河南地区得到了光辉的体现。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地区的代理人，在干部问题上，长期以来，就实行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为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更是变本加厉地打击和迫害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的领导干部。河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自己的斗争实践中深深地懂得：革命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保护革命领导干部，也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始终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批判他们，夺他们的权，革他们的命；对真正好的革命领导干部，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坚决支持他们站出来革命。河南省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所以能够站出来，是和全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分不开的。因此，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敢不敢革命，对真正的革命领导干部敢不敢支持，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有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感情和风格的重要标志之一。

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广大指战员，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毛主席指到哪里，他们就打到哪里。他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大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他们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们为推动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建立了很大的功绩。

目前，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整个河南省，各条战线都呈现了令人鼓舞的新气象。我们希望河南省的革命委员会，河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切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特别要大力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

战备，为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斗。

我们相信，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必将搞得更好、更好！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举得更高、更高！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社论）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好形势下胜利诞生

毛主席的伟大关怀激励中原人民奋勇前进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好形势下胜利诞生 二十五万军民在郑州集会，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全省军民决心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以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中心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新华社郑州二十九日电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在全国亿万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号声中，祖国中原传来了激动人心的喜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东方红，太阳升。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战斗历程中，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多次来到河南，视察黄河和农村人民公社；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两次郑州会议，指引革命的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河南五千万人民的革命斗争，亲临河南视察。毛主席的伟大关怀，是对河南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最大鼓舞，最大支持，最大教育，最大鞭策。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艰苦奋斗，排除万难，夺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一月二十七日，具有“二·七”光荣革命传统的河南省省会郑州市，红旗如海，锣鼓震天，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二十五万人，满怀革命豪情和胜利喜悦，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体育场，隆重庆祝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庆祝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歌声中开始。当大会庄严宣告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光荣

诞生的时候, 全场欢声雷动, 群情沸腾, 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万岁!” “敬祝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在河南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彻底破产。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河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继承“二·七”光荣传统, 发扬大无畏革命精神, 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压制, 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 揪出了中国赫鲁晓夫以及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省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把他们窃据的权力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 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广大指战员, 坚决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号召, 在河南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 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他们以最大的热情, 最快的速度, 把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 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 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 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 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 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毛主席的英明预见, 在河南已成为现实。喜看今日中州, 风展红旗如画。当前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 越来越好。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泽东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普及,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入人心, 人们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意气风发, 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滚滚向前, 势不可挡。全省人民夺得了一九六七年农业空前大丰收, 正乘胜前进。工业战线捷报频传, 一派热气腾腾。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建勋同志在庆祝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胜利, 都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 是我们前进的指路明灯, 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根本保证。回顾一年多来的战斗历程, 我们的经

验有千条万条，最深刻、最根本的一条是：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就是胜利！刘建勋同志强调指出，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以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中心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反复学习，深刻领会，坚决照办，做到条条落实、全面落实。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无政府主义，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各级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认真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刘建勋同志说，夺权斗争胜利以后，依然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务必提高革命警惕，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夺权靠毛泽东思想，掌权、用权也要靠毛泽东思想。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要抓紧自己的思想革命化，破私立公，努力改造世界观。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永远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同全省广大革命群众一起，为把河南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新同志代表河南省军区和驻军全体指战员在大会上讲话，表示热烈祝贺和支持新诞生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坚决维护它的革命权威。他说，一年多来，我们在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光荣任务中，经受了严峻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受到了最实际、最生动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大大提高了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更加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更加坚定地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小学生，积极、热情地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深入、细致、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军民团结，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中立新功。河南省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和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的代表，满怀革命豪情，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热烈祝贺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他们一致表

示：要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进一步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大力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誓作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誓作破私立公的模范，誓作革命大批判的模范，誓作拥军的模范，誓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贡献出一切力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同志和革委会的全体委员，参加了庆祝大会。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大会通过了给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大会结束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一直到一九七八年，除了军队干部变动较大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在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省的党政领导权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达十年之久。实事求是地说，以刘建勋为首的这批老干部基本上能坚持党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资料，文革期间，全国 23 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一九七〇年七月，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其中河南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产七十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一九七八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特种轧钢的历史；闻名世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间竣工的。）

四、河南省的反右、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

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我们第一次常委会议，今天继续开会。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我们的会议自始至终就是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

好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问题。我们要把这次会当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

刚才王新同志讲的很全面、很重要，我没有多少话要讲了，再补充几句。

一、关于形势问题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我省的形势完全是沿着毛主席的伟大预见向前发展的。

正确地分析形势非常重要，如果把形势估计错了，就会迷失方向，走向邪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往往在对形势问题的认识上发生根本分歧。我们说：“好得很”，他们说：“糟得很”。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我们分析形势，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的本质，看运动的主流，而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非常关心，每个关键时刻都给了我们英明的指示，对我们的工作做了明确的结论。去年七月份，中央对河南问题有个批示，对河南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结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今年一月，中央在对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请示报告的批示中，肯定了我们前一段的工作，指出了我们努力的方向。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很大的鞭策。河南形势大好，这是无可非议的。我们要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

在空前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当然不是没有问题了，阶级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斗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关于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问题

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问题，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的问题，是忠不忠的问题。

林副统帅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忠不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区别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革命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忠于毛主席，就要紧跟。对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就要做到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毛主席指到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要坚决反对口头上讲的是一套，行动上做的又是一套，当面是一套，背后又是一套的两面派。这种人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没有阶级感情的，所以不能叫真正的革命派，只能叫个口头革命派。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不改正，必定要垮台。

背离毛主席，背离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终究要被历史所淘汰，被人民所抛弃。刘、邓、陶不是被打倒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后台，是反革命两面派，几十年来，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阴一套，阳一套。我们就是要把他们彻底打倒，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必须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管阶级斗争多么复杂，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胜利，就是幸福。

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形势发展了，我们的思想和认识一定要跟上去，一些老的概念要很好地清理一下。比如说，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前一阶段，表现在“革”与“保”上。广大革命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的，是要革命的，但由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使一部分群众受了蒙蔽，因此，就有站错队的问题，先革命后革命的问题，“革”与“保”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被揪出来了，群众觉悟了。现在“革”与“保”的概念过时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主要表现是公与私的斗争，党性与派性的斗争。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要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上来，否则，就要落后，就会犯错误。

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目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是迅速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极大障碍。这是两条大毒蛇，被它缠住身就不得了。它腐蚀人

们的斗志，瓦解革命队伍，破坏文化大革命。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灭亡，正在利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向无产阶级进攻。在这样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有那么一些人还很不自觉，对派性很有兴趣，很有感情，说派话，办派事，拉山头，争席位，对干部不做阶级分析，从派性出发，你保我打，我保你打。郑州有个人叫金城，坏透了，是彭真的死党，可是有人还死保他。派性严重的人就是这样，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感情，对走资派、叛徒、特务却很有感情。他们对人不讲阶级关系，不讲政治关系，讲什么老同乡、老同事、老上级、老部下，拉拉拢拢，吃吃喝喝，噉噉喳喳，开秘密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庸俗腐朽的作风。这是不能允许的。我们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政权机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允许有派性，不能拉一派，打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对人对事都要讲阶级关系、政治关系，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去对待，要支左不支派。

派性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放大的个人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这是一根藤上的两个黑瓜，它破坏无产阶级权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劳动纪律。他们甚至肆意歪曲“造反有理”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口号，来为自己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辩护。对这两股反动思潮，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大反特反，大惩大罚，群起而攻之，搞臭它，打倒它。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不打倒，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能落实，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不能巩固和发展。

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一个真正的革命派，是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闹派性的人，是毫无自我批评精神的，用放大镜看对方的缺点，用缩小镜看自己的缺点，对自己不分为二，把自己看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这是违犯辩证法的，是形而上学、合二为一。这样下去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广大群众对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是深恶痛绝的，是迫切要求搞好革命大联合的。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党，就是要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相信群众就是要相信广大群众是听毛主席话的，是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

三、关于学风问题

学风问题，也是一个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活学活用，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广大革命人民响应林副主席的伟大号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了就用，学用一致，精神面貌起了极大的变化。但是有些人的学风不正，学而不用，说而不做，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这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不忠。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革命越向前发展，就越是深刻的触及人们的灵魂，公字与私字的冲突就越突出。不斗私，就是对毛主席不忠。我们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认真学习，联系实际，对照自己，斗私批修，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勇于自我革命，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现在有的学生不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在那里看什么《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这些在破“四旧”中早就破掉了的封建主义的糟粕，竟然有人又把它拣了起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严重的是对这种现象没有很好地遭到抵制。复课闹革命究竟怎么搞法很值得研究，我看学校的教育革命，首先要搞思想革命。复课，首先是复毛泽东思想之课，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整党、建党，首先是政治上、思想上建党，大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四、关于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问题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实现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归根到底是一个忠字。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三忠于”的人的手里。

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指导一切，改造一切，推动一切，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我们一定要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感情搞得深深的，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革命委员会的每个成员要成为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最高指示的模范，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我们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任务千条万条，工作千头万绪，最最根本的，就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突出政治的道路。只要抓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这个根本，其他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亿万革命群众直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要以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像解放军那样，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把各级革命委员会、各个工厂、学校、机关、商店和农村人民公社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来源：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这次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研究当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最深刻地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最精辟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内容，是向阶级敌人发起主动的持久的进攻的伟大战斗号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照办。

目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不能说没有问题了，阶级斗争仍然是非常尖锐、非常复杂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越是在大好的形势下，越是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

线的斗争，越是尖锐、复杂。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来自阶级敌人右的方面的反扑。最近一个时期，自上而下地刮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各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坚决杀退这股右倾翻案风。

这股右倾翻案风，是从“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变色龙杨、余、傅的阴沟里刮起来的，是通过他们在河南的代理人刮起来的，是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以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刮起来的。这股右倾翻案风，在我省刮的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主要表现在职下几个方面：

一、集中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要批示，也就是说，要推翻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历史阶段所作的英明的结论。去年二月到七月，河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冲杀出来了。对这一段历史，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已经作了明确的批示。但是，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执行的反动路线说成是“正确的”，说什么“二月黑风不黑”，“去年的二月是革命的二月，红色的二月”。从去年八月到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对这一段历史，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也已经作了明确的批示。但是，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什么“八月是逆流”。甚至扬言“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这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明目张胆地要推翻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批示，要翻两个历史阶段的案！

二、对抗中央和总理的指示，到处拉山头，大搞分裂主义。中央对河南问题的第一个批示公布以后，毛主席的声音一传到广大群众之中，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保守组织很快分化瓦解了。本来那个地区没有那么多派别，一些没有革命历史的保守组织早已垮台了。但是，在这股翻案风中，又改头换面重新拉起山头。他们借反派性为名，攻击解放军，攻击革命委员会，攻击革命造反派，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一句最普遍的口号是：“砸烂派性委员会”，说什么革命委员会对他“无效”。

三、在干部问题上故意制造混乱，抹杀两条路线斗争。他们拉起队伍后，死保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和坏干部。毛主席说，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可是，有些干部到现在还站在革命造反派的对立面，执行了反动路线不但不检讨，还继续蒙蔽一部分群众死保他，把他封为“革命领导干部”，硬要把他拉进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而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干部，却扭住不放，抓住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非要把他们搞臭搞垮不可。

四、借反极“左”思潮为名，行右倾翻案之实。刮翻案风的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口口声声要反极“左”思潮，认为这是河南当前的主要危险。其实，他们所反的恰恰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阶级敌人总是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或同时从“左”右两个方面来干扰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的，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我们经常保持警惕就是了。去年八、九月间，我省一些地区一度出现过极“左”思潮，但是，我们进行了坚决抵制，很快就把它克服了。从去年十月开始，右的思潮就逐步抬头了，在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反击了一下，杀了一下这股风，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这股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厉害了，最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洛阳地区已成立了第二个“革命委员会”，公然对抗我们的红色新政权。南阳、驻马店、商丘等地区翻案活动也很严重，出现了许多非常反动的传单和谣言。如果不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及时发出了英明果断的决定，把刮翻案风的黑后台、变色龙揪出来，地下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多。驻马店不是已经准备成立了吗？！还有一些县和大工厂不是也有了么？！对于阶级敌人从右的方面的这种进攻，我们必须坚决杀退，坚决打击。各级革命委员会应成为阶级斗争的指挥部，放手发动群众，大胆领导这个运动。我们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

义，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当然，在反右的时候，要防止“左”的东西抬头，防止敌人从“左”的方面来破坏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现在，有些地方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些极“左”思潮的派别，在新的形势下，和原来的一些保守组织结合起来了，和右倾翻案的妖风结合起来了，叫做“左”右合流，这是这股翻案风的一个特点。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打着反极“左”思潮的旗号，其实，极“左”思潮正是他们鼓吹的，他们支持的，是为他们的翻案活动服务的。形“左”实右，他们是一致的。这里，我举个例子，驻马店有个从二七分裂出去的组织，叫什么“红旗”，打着二七的招牌，搞分裂主义，不管他是右倾分裂主义，还是“左”倾分裂主义，反正现在和当地的保守组织结合在一起了。他们共同支持的是一个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他们共同要打倒的是一个革命领导干部，他们的矛头都是对着解放军，对着革命委员会，对着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纪登奎同志：已查明背后有反革命分子操纵。）又比如省广播电台，有一个打着二七招牌的所谓“狂派”，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也和去年二月逆流中搞反革命夺权的人物合流了，一起攻击革命委员会，攻击支左部队。报社也是这样。“左”右合流，都是搞翻案。（纪登奎同志：极“左”就是极右。）河造总在上蔡的一个基层组织，叫“上造总”，印发反动传单，被革命造反派发现以后，还把传单寄到省革命委员会来告状，说是“内部传阅”，“二七压了我们”。我说，压得对，就是要压。这种反动传单，在外面散发是反革命，在“内部传阅”也是反革命。省革命委员会通知他们来郑州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竟然在车站把县革筹小组长打了一顿。象这样的坏组织，河造总还不应该把它清理出去。

五、在这股翻案妖风中，相当普遍地出现了打倒谢富治同志的反革命标语口号，所谓“北京消息”满天飞。在这股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洛阳街头贴满了打倒谢富治的反革命大字报。郑州有些人好象“聪明”一点，有些单位写好了打倒谢副总理的大字报没有贴，还要看一看风声。河南医学院红卫公社就写了打倒谢副总理的大字报，只是没有贴出去。洛阳“十一”自称，打倒谢副总理是杨成武支持的，就把大字报贴出来了。现在，他们失败了。一反击右倾翻案风，洛阳“十一”的一些坏头头，带着机关枪逃跑了。操纵这个组织的后台前台都是当权派。（纪登奎同志：是洛阳地委的一个副秘书长，叫陈渊。他参加了好几次秘密

会议，第一次在电厂召开了策划炮打谢副总理的黑会。第二次开会成立了地下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都确定了，他是第三位。第三次会议没有开成，就带着机关枪跑了。洛阳造反派怎么搞的，怎么没有把他抓住。）他跑不了的。反革命传单很多，各地都有发现。南阳就有什么“宛城诗人”、“小灵通”，反动得很。甚至诬蔑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周总理，攻击中央文革，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南阳这个地方很值得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注意，值得当地的人民解放军注意。要抓这个东西。谁反对周总理，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是现行反革命。（王新同志：河造总开了很多次会议，炮打谢副总理。）省直机关有个坏家伙叫高绍堂，策划炮打谢副总理，河造总的同志自己把他揪出来了，这很好！（纪登奎同志：河造总在北京有个联络站，专门搞小道消息，搞反革命活动，搞炮打谢副总理的传单。其中有个人是十三所姓于的。十三所的造反派为什么不把这个姓于的揪出来。）他们搞谢副总理，相当普遍。这股风是从阴沟里刮出来的。他们散布的所谓“北京消息”，都是从阴沟里出来的消息。（王辉同志：二十几个为什么，五十几个为什么，恶毒得很。）中央文革揪出王、关、戚几个小爬虫，本来是大好事，但是，他们却借此大作文章，抛出二十几个为什么，五十几个为什么，说谁谁谁是王、关、戚的黑后台，流毒很广。现在清楚了，王、关、戚的黑后台是杨成武嘛！并不是你们要打的人。抛出很多反动的传单，散布很多反革命的谣言，是这股翻案风的一个特点，这是制造反革命舆论。商丘一个剧团到夏邑演戏，这曲戏非常反动，名字就叫“王、关、戚批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时向中央汇报，是我和王新、纪登奎、王洪智同志四个人去的，这件事我们最清楚。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批准的，这和王、关、戚有什么关系！（王辉同志：这个问题查清楚了，是一个叛徒搞的。）我早就说过，这个剧团有坏人，肯定是这些人搞的。奇怪的是夏邑没有人抵制这种反革命的东西。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现在这些叛徒、特务、走资派不好混了，他们的手段非常阴险毒辣，到处挑拨离间，削尖脑袋往群众组织内部钻，煽阴风，点邪火。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统统揪出来。驻马店那个叫什么“红旗”的组织里边，就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他们的黑高参。（王辉同志：已经抓了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同志们，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林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联系我省的实际情况，展开大揭发、大批判，坚决把阶级敌人刮起的这股反革命的翻案妖风杀下去，彻底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江青同志。

这里，我要特别向同志们讲的一件事，就是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这股反革命翻案妖风是和戴苏理有关系的。（杜河堤同志：他是总后台。）总根子在戴苏理。许多地区揭发，他都插手了。在这个问题上，戴苏理犯了严重错误，大家应当揭发批判。我们已经开过两次小会，现在召开扩大会议，再一次耐心地帮助他、挽救他。（耿其昌同志：这股反革命翻案妖风一定有总后台，不然为什么这样统一？这样一致？）

戴苏理在历史上所犯的 error，我不想讲了，只说一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 error。戴苏理散布过这样一种论调，好象在过去的十七年中，他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潘复生同志和我执行的是错误路线。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查，我不讲了，我的 error 我作检讨。戴苏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 error，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去年二月逆流中，他是破门而出的，跳得很高，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镇压革命造反派。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来讲，是和群众组织不一样的，群众组织造过反，犯了 error，是犯 error 的造反派。一个领导干部，在很长时间内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难道还不是路线 error。当然，在二月逆流以前，他支持过某些造反派，特别是郑工造总。但是，这个问题我也要说清楚，那是我们统一研究的，是我派他去的。毛主席说，犯了 error 改了就好，站错队站过来就是了。戴苏理究竟改了没有呢？是不是站过来了呢？（众答：没有。）（杜河堤同志：他是长期的、顽固的坚持反动立场、反动路线。）在北京的时候，我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给他谈过三次话，是耐心地争取他，希望他从反动路线的泥坑里爬出来的。但是，他说：“站队站对了，不能再站了。”（李忠顺同志：他到现在还说，立场错了，队没有站错。）这是什么逻辑！当时，他说这个话，使我非常愕然。（王辉同志：他插手了八个地区，好多事情他都知道，全省来郑州大游行是从他那里来的。）在北京汇报期间，驻马店保守组织找他谈了几个钟头，他不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教育群众，

出了许多坏主意，包括保坏干部在内。这个材料造反派的同志得到以后，我转给康老了。康老有三点指示，让我告给戴苏理。第一点是，戴苏理不老实；第二点是，问你要把群众带到那里去？第三点是，问你为什么老说何运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戴苏理尽管犯有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回到河南以后，还是耐心地帮助他的。我一回来，就请纪登奎同志给他谈话，我也找他谈过话。在河造总有些人为了毕业分配问题到省革筹静坐的时候，我要他出来做点河造总的工作，希望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群众。可是他误解了我们对耐心帮助的心情，相反地认为我们犯了错误，得罪了某个群众组织，非要请他出马，不然我们解决不了。正因为他有这种错误想法，所以他的工作做得是不好的，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群众，而是以此作“本钱”，向我们讨价还价。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尽管这样，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二七公社的同志，对他是很不谅解的，非要开十万人大会批判斗争他不可。但是，我们还是从耐心地帮助他出发，说服二七公社的同志没有这样作，给他改正错误的时间。今天，二七公社的负责同志都在场嘛，我们对他做到了仁至义尽的地步。我们向中央汇报的时候，一方面说明了上述情况，一方面还讲我们对戴苏理仍然寄予希望，说服广大革命群众，让他参加了革命委员会。我们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想挽救他，要他立新功。但是，从现在初步揭发出来的材料看，戴苏理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希望。他利用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合法身份，利用在某些群众中的影响，继续蒙蔽一些群众，死保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干部，大刮反革命翻案妖风。他想借这个东西把我们的阶级阵营搞混，以达到翻案的目的。我们说，这是做不到的。戴苏理对他参加三结合，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他有一派势力，非让他出来收拾局面不行。这样想就大大的错了。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什么问题他都会看翻的。立场错了，一切都错了。

最近，我看到戴苏理的女儿写的一封信。信是写给他儿子的。这封信里说：“你搞垮革委会困难很大”，“你们独立是一件很蠢的事”，“我一直在学习‘左派幼稚病’”，“你们原可以在革委会内部造反，布尔什维克连最反动的议会都参加过，你们为什么不能留在革委会内部呢？”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要他儿子颠覆革命委员会。她这个观点是从那里来的？还有你的儿子，竟然在登载空军活

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经验的报纸上逐段的“批判”，辱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李文忠同志，你的儿子思想为什么这么反动？你的老婆又是一个叛徒。如果你是个坚强的革命者，你的家庭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这是不能理解的。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此仇视，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如此仇视，这是什么道理？你女儿的信中还劝你回家种地。种地并不坏，问题是你的消极情绪。我看你有时候消极，有时候并不消极。前些时候你的宿舍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你不是积极得很，为什么现在又消极了呢，要回家种地了呢？你的女儿还说“就怕刘建勋不让你走，离开你，工作是搞不好的。”这个话如果是出于孩子们的年幼无知，那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是你的指导思想，认为河南离开你就不行了，非让你出来收拾局面不可，那是非常错误的。在座的同志没有谁都可以，不要把自己估计得那么高。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要正确地对待自己，犯了错误，除非改正，别无出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弄清楚，两条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这样作，对你进行揭发批判，还是为了帮助你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再站错队，再站过来就是了。当然，我们是外因，戴苏理自己认真进行思想斗争才是内因。我们一定做到仁至义尽，在座的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都要以诚恳热情的态度，耐心地帮助戴苏理同志。希望戴苏理同志改弦更张，不要自绝于人民。

（王新同志：批判戴苏理的斗争，在河南来说，就是保卫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是彻底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戴苏理确实利用他参加革命委员会常委的身份，到处欺骗群众，拉势力，仍然要把一部分群众引导到错误路线上去。上次我们常委同志开了一次会，在那次会议上都讲了，希望在我们河南不要出现大反复，在革命委员会内部不要搞两面派。那时候我们是有所指的。建勋同志在讲话中也讲，不要反中央的两个批示。都是有所指的。但是，那次会议以后，戴苏理完全是背道而驰，利用他的合法地位搞翻案活动。开始我们不很清楚，根据这一段揭发的大量事实看，他继续蒙蔽干部，蒙蔽群众，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刮翻案妖风。在思想上，大造舆论；在组织上，大拉势力。很多地方革委会成立以后，他又拉出势力来。他确实是在搞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

右倾翻案风。不彻底揭发批判他的错误，不利于挽救他，不利于教育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场激烈尖锐的斗争中，有些人又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俘虏。通过对戴苏理的揭发批判，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受到锻炼，使受蒙蔽的同志进一步受到教育。所以决定开这样一个会议。这是关系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们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纪登奎同志：革命委员会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指挥部，要领导广大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我们这次会议，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前夕召开的，意义确实重大。这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次会议。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有革命群众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大家要团结一致，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带领广大革命群众主动地、持久地向阶级敌人展开猛烈进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最后，让我们来呼几句口号，结束我的讲话。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

打倒彭、罗、陆、杨！

打倒谭震林！

打倒杨、余、傅！

打倒王、关、戚！

打倒王任重！

打倒文敏生！打倒赵文甫！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反对右倾分裂主义！

反对右倾投降主义！

反对右倾保守主义！

坚决杀退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来源：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纪登奎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

这次全体会议，开得很及时、很好。学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听了同志们的发言，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讲一点对过去一段工作的看法。

这次会议，把全省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戴苏理揭出来了，这是一个大胜利。我们同戴苏理的这场斗争，是大是大非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

这场斗争，由来已久了。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认为有必要把去年从北京向中央汇报回来后这一段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简要地回顾一下。

戴苏理不是攻击我们这一段工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大好形势是“空空洞洞，没有内容”吗？不是攻击我们是极“左”思潮的代表，只反右不反“左”，怕反“左”反到自己头上来吗？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去年八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我们作了大量的工作。革命造反派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由政治上的优势发展到组织上的优势，很快控制了全省的局面。特别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我省视察的鼓舞下，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举办了大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当时，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曾出现一股极“左”的思潮。主要是有的人把形势估计错了，说什么河南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要“揪军内一小撮”，曾一度发生了抢枪的问题，出现了造反派的某些分裂现象。

对于这股来自极“左”方面的干扰，我们是坚决抵制了的，是坚决批判了的，是顶住了这股歪风的。当时，建勋、王新同志还亲自到中央作过汇报，并且当面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报告。

毛主席指示我们，一要反对，二要不怕，不要急，群众起来议论，反对他们，他们就收场了。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耐心地作了政治思想工作，经过造反派内部整风，很快就扭转过来了，枪大部分收回来了。（王辉同志插话：当时我和刘政委、纪登奎同志一起去参加二七公社服务员会议，一晚上就收回七千多支枪。）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而是草率从事，急急忙忙往前闯，那反而会犯错误，出点乱子。

戴苏理借反极“左”思潮为名，攻击我们不抓“五·一六”，什么‘一男一女’的事，攻击建勋同志。其实，这件事是建勋同志亲自处理的，协助中央把坏人抓起来送到北京的。你在这个问题上捞不到半根稻草。至于谣传我同王、关、戚几个小爬虫有什么关系，什么在王力家里办过公等等，我没有必要来批驳这些谣言。

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戴苏理是大做了文章的。去年十一月，正当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出现高潮的时候，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强调了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这个方向是完全对的。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大联合的具体政策、具体方法上，也就是在对待河造总这样一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下联上也联，联合不倒旗的问题上，我们认识上是有缺点的。但是我们没有对中

央隐瞒我们的观点，我们把意见如实地向中央报告了，那时主要耽心引起老保翻天。总理、康老看了我们的报告，总理在接见铁路代表时指出，这个方向是对的，但不懂得群众心理，倒旗应水到渠成。当时，毛主席对浙江红暴派作了关于“帮助、批评、联合”的指示，建勋、王新同志从北京把中央这个指示带回来了。我们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是坚决照办，句句落实的。我们立即改正了缺点。对这个问题，我们在成立省革委的前夕，向中央汇报时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指示，这个方向是对的，承认山头，消灭山头，不要强调跨行业的组织了。这说明，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我们坚持的方向是对的。即便对基层单位的一些保守组织，我们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只要他们改正错误，调转方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戴苏理硬要我们同意搞无条件的联合，我们把这种错误的主张坚决顶回去了。在这里，戴苏理只记住了党的具体的个别的政策，忘记了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忘记了毛主席指示的方向。他抓住我们在大联合问题上个别的、具体的政策上、方法上的缺点，抓住某一句不确切的话，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如我说过河造总是“二月黑风”的产物。这句话是不大确切的。我有缺点，说错了话，我愿意作自我批评。但是，戴苏理大肆散布什么“你们派性大发作”、“你们压了我们”、要什么“政治平等”、要“无条件联合”什么“不分左、中、右”等等论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戴苏理的这些观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反‘左’必出右”。去年十一月，社会上就出现右倾翻案风的苗头，在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前夕，这股风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把矛头指向省革筹小组，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造反派。叫嚷什么“八月逆流比何运洪还厉害”，“罕见的资产阶级专政”，要起来“抗暴”，要“砸烂派性委员会”。

戴苏理说他“憋了一肚子气”。其实，革命造反派才真是憋了一肚子气呢！连两条路线斗争都不准提，谁要是一说路线斗争，就反咬谁一口：“派性最大”。前天戴苏理检讨时，还对我和杜河堤同志去年十二月在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大为不满，说那个讲话“派性大”。我和老杜同志又专门找出那篇讲话看了一下，我们认为没有什么错误，你攻击的派性，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

你攻你的，我们还是讲我们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在全省农村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又讲过一次，在八二零二部队也讲过一次。建勋、王新同志在学习班把右倾翻案风狠狠地批了一通，报社还发了一篇社论。有人对这篇社论是大为不满的，大骂“派性发作”，还要揪黑手。这篇社论是张耀东他们几个人写的，有个别地方讲的不确切，提法不太科学，但总的精神是好的，给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当头一棒。尽管我们讲了很多，可是，戴苏理一概听不进去，一直骂我们“‘左’了”，“派性大”。由于立场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就截然相反。我们认为是对的，戴苏理认为是错的。所以，戴苏理攻击我们，正说明我们作对了。

在这一段工作中，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我们的教训，主要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得不深不透，对右倾翻案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认识不足，对右倾翻案风打击不力，对戴苏理的两面派面目看的还不清，一度反派性讲多了，两条路线斗争讲少了。老实说，我们是有保守思想，戴苏理却攻击我们极“左”，我们明明反右反得还很不够，戴苏理还攻击我们只反右不反“左”。如果听了他的话，依照他的意见去办，我们岂不是要滑到右倾投降主义的地步了吗？

我们曾设想过，在三月底实现全省一片红。可是，三月初我们从煤矿一回来，在家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就向我们反映，下面大联合、三结合搞不动了。这时，我们觉察到有问题了，一定有人在背后捣鬼，不然，为什么郑州、南阳、驻马店、周口等地区都搞不起来呢？这时，我们警惕了。当然，没有提到象中央指出的这样原则高度来认识。当我们看到江青同志的讲话，指出右倾翻案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并且不是苗头，已有行动了。而戴苏理看了江青同志的讲话感到“大吃一惊”，表示要“回家种地”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了。我们就紧跟中央，立即行动起来，发动了对这股右倾翻案风的猛烈的反击。

总起来看，从去年八月到现在，我们是紧跟毛主席的，大方向始终是对的，中央对我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正因为我们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同来自极“左”的和右的或者同时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我们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我们取得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可是，

在戴苏理的眼里，却把大好形势看成一团漆黑，说什么“空空洞洞，没有内容”，这不正好说明，他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毛主席、党中央大唱反调吗？！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关于批判戴苏理问题。

关于戴苏理问题，建勋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头一天就讲得很清楚了，我完全同意。

从揭发出来的许多材料来看，戴苏理确实是我省大刮右倾翻案风和大闹右倾分裂主义的总后台。这一点，戴苏理自己也承认了。这里，我不准备再讲更多的具体材料了，只讲一下我对戴苏理这个人的认识过程。

我这个人，不仅有保守思想，而且有时还比较严重。我应当向大家作自我批评。我的保守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戴苏理问题的认识上。

最近听人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戴苏理就在背后造我的谣言，说我在地委书记中搞“特务活动”。尽管如此，在当时我主观上觉得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是正常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支持他，他也支持我。我批评过他有点怕群众。后来文敏生装病了，躺倒不干了，戴苏理、王维群、王庭栋、张耀东还支持我领着干。

“二月黑风”一来，戴苏理突然变了。他同文、赵、杨合流了，支持何运洪的反动路线。从此，我们就决裂了，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同文、赵、杨还是有区别的，还是可以争取的。

到北京一见面，我就同他谈：“老戴，二七一定胜利，你们错了，到我们这边来吧！”戴不但不过来，跟着他的一些人还写传单大骂我“跳得高”。（刘建勋同志插话：在北京我同他谈话，他说纪登奎态度很不好，一见面就说二七必胜。）康老同我和耿其昌谈话后，我把康老的话转告给他，二七要胜利了，要他站过来。戴说什么呢？他说：“站在那一边，也能执行毛主席路线。”直到现在，他还坚持“立场错了，但没有站错队”的谬论。（王新同志插话：你是站在刘邓陶一边的，怎么是没有站错队！）

向中央汇报结束了，建勋同志把康老对戴苏理的三点意见转告给他，他还是不以为然。我碰了几次钉子，该死了心吧，但仍不死心，还想争取他，再拉他一下。回到郑州，建勋同志又要我同他谈。我说：“老戴，你组织了一把‘内阁’，搞四百多人签名亮相，十大总部和河造总都支持你，连公安公社都支持你，你要

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呢？这样能挽救你的命运吗？你为什么同文赵杨死抱在一起呢？你攻击刘建勋同志排斥你的事，那是赵文甫、杨蔚屏挑拨的，你不可相信”。戴苏理当时表示自己错了，但没有决心站过来。（刘建勋同志插话：老戴，我什么时候排斥过你，你能举出一件事实吗？众呼：戴苏理交待！戴答：刘建勋同志没有排斥过我，就是去年三月听了赵文甫、杨蔚屏他们讲了以后，我才有这个想法。）他讲这个话是对的，就是在省委机关造总召开的那个会议上，赵文甫、杨蔚屏煽动他起来反刘建勋。

（刘建勋同志插话：那是陶铸提出要把你调到湖北，把湖北的一个同志调来河南，我当时不同意调换，后来我给他们说了，二月黑风中，你们把一切问题都集中起来，说成我的“罪状”，说我排斥你，要把你调到湖北。是不是我排斥你？文敏生、赵文甫都没有死，可以问吗！文敏生天天背后骂你，我说你的好话，二月黑风中你反过来造谣中伤，胡说八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党的生活你过多少年了，毫不知耻！）

尽管如此，我们为了进一步帮助他，挽救他，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我们支持他参加三结合。当时，革命造反派是坚决不同意的。（王新同志插话：八·二四也不同意。刘建勋同志插话：你造谣，好象八·二四对你感兴趣。申洪玉同志说：纯是造谣，根本没有这回事。）并且要开十万人大会批判戴苏理，我和王辉同志去做了工作，劝阻了。（王辉同志插话：二七公社已经发了开会的通知，我们说服以后不开了。）后来，二七公社的同志要派代表团向中央汇报，也被我们劝阻了。

有一次，二七公社的常委同志质问我：“为什么要结合戴苏理？”我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第一要团结同志，第二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第三还要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那时，我确没有想到他会这样顽固。在去北京向中央汇报前，我还向他表示过，我相信我们能够合作。在向中央汇报时我表示，我能同戴苏理合作。

我觉得我是以诚待人，好心对待戴苏理同志的。我没有在背后说过戴一句坏话。这点，王新同志可以作证。（王新同志插话：对戴苏理的认识，还受你的影响，你说他不再至于犯大错误，他胆小。）当社会上右倾翻案风刮得厉害的时候，

王新同志曾问我：“戴怎么样？会不会出坏主意？”我说：“可能还不至于吧！只是胆小怕事而已。”

戴苏理参加三结合后，我们是放手让他工作的，可是他呢？辜负了党中央对他的期望，辜负了造反派同志对他的信任。

我们是一直希望戴苏理同志站过来，希望他改正错误的。这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愿望。但是，客观事物总是矛盾着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戴苏理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我们的好心当作坏意，把我们对他的信任当成乞求，好象没有他地球就不转了。戴苏理不是说：“河南犯了慢性病，迟早要爆发吗？”意思是说，总有一天，非靠他来收拾局面不可。

戴苏理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他把黑手伸向全省各地，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两面手法，一手扶植保守势力，一手支持分裂派。来了个“左”右合流，对革命派实行“左”右夹攻。

戴苏理继续蒙蔽一部分群众，硬要把那些顽固坚持反动路线和造反派站在对立面的干部抬出来，塞进革命委员会。本来，有些干部不一定是三反分子、走资派，犯了路线错误，只要不顽固坚持，不一定会被打倒的。可是，当他们还没有转过来的时候，被戴苏理一支持，被保守派一保，就给保垮台了。戴苏理第一次组织了四百八十多名干部集体亮相，（刘建勋同志插话：四百八十多名干部集体亮相，害人不浅。我在北京看到传单，有三条，其中一条说何运洪支左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要组织什么“内阁”，被他害了一批干部。这一次，他又要另立一个司令部，又坑害了一批干部。戴苏理这样做，到头来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戴苏理豁出“常委不当，也要大干”，他是横了一条心，充当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的，一心要为文、赵、杨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

对戴苏理这个人的认识上，革命小将教育了我，戴苏理也教育了我，使我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的教导：“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使我进一步理解了林副主席的指示：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政治关系。

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对党、对人民的事业负责，也为了挽救戴苏理本人，我们必须同戴苏理作坚决的斗争。纸里面是包不住火的。我们面对现实，只有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

在这次会前，省革委会的负责同志曾开了两夜小会，对戴苏理诚恳地、耐心地进行批评帮助。听了前天他的检讨，态度仍很不老实，大家非常气愤，要打倒戴苏理，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看，对待戴苏理同志的问题，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第三个问题，讲一下关于当前工作方面的意见。建勋同志、王新同志叫我对当前工作讲几点意见，我讲一些老话，讲五点：

一、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向他们发起主动的、不停顿的猛烈的进攻。对这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小爬虫，要统统揪出来；要进一步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取得很大的胜利。但是，群众发动的还不够充分，运动发展也不够平衡。文赵之流，还很不老实，赵文甫最近就抛出一个假检讨，至今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翻案吗！

文化大革命搞了快两年了，有的地方，有的部门，明明是受坏人挑动，两派群众组织长期打内战，让敌人睡大觉。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

二、当前运动的主要危险是右倾翻案风，我们必须把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反特反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对戴苏理必须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把他批倒批臭。

社会上的右倾翻案风，不可能不反映到革命委员会中来。在彻底批判戴苏理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好好学习林副主席三月二十四日讲话，根据林副主席指示精神，对同戴一起工作的人，认识戴的人，支持戴的人，以及戴支持过的人，应当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是叛徒、特务、走资派，那就一定要揪出来；如果只是受了戴苏理的影响，参加了三结合，工作还不错，跟着他说了错话，做了

错事，只要承认错误，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应当欢迎他，信任他。如果打了招呼，还跟他走，坚持错误，就不能信任他，就要彻底批判他。昨天，李跃、魏世昌同志给我们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我见过一次戴苏理，找他谈过事，这是一个很大错误。”这个话不对，没有阶级分析。问题不在于你同戴苏理有没有来往，而在于你谈的什么事。如果你谈的是反对翻案风的事，那是对的；如果你谈的是刮翻案风的事，那才是很大的错误，要实事求是。

对革命委员会中群众组织的代表，有的人如果受了右倾思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除个别坏人以外，都应当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他们的路线觉悟，切不可任意拉到街上乱斗，更不可以随便清除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对革委会成员的处理，必须向批准机关请示报告。

三、通过这场反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动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正确对待群众。对站错队的群众，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有的人，对叛徒、特务、走资派恨不起来，而把矛头指向站错了队的阶级兄弟，这是错误的，这是什么感情？！经过这次运动，一定要逐步团结两个 95%，不然，就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决不能因为反右倾翻案风，就动摇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既定方针、政策。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去整群众。

对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仍然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并在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中保留有一定席位。

对现在工厂、学校还存在的一些十大总部的基层组织，也仍然要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只要承认错误，扭转方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革命原则下，在基层同他们联合起来。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对受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毛主席教导的，不能压，要作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对他们实行摧垮的政策，是错误的。

通过这场斗争，要把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得更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和加强“三代会”，尽快实现中央指示的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

四、提高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水平，帮助造反派总结经验。目前，应当注意的，是揪斗坏头头的面，万万不可扩大化。坏头头应当同群众分开。不要互相抓人。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由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要文斗，不要武斗。严禁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目前主要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要注意防止极“左”思潮抬头。

五、警惕坏人挑拨军民关系，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现在已发现有个别地方提出揪“小杨成武”，揪斗人武部干部的苗头。这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坚决纠正。对军队个别人有意见，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通过适当方式，提出善意的批评。要相信军区、军分区、当地驻军党委是会正确处理的。要向一切挑拨军民关系，破坏人民解放军声誉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

最后，再讲一点农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必须坚定的依靠贫下中农，集中目标，打击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决不允许下台的四不清干部翻案。对破坏文化大革命和破坏集体经济的现行反革命，必须坚决镇压。

我讲这些是请同志们注意掌握政策。有的同志可能要说我是“右倾”了。不能一讲政策，就说是右倾。“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说的太多了，如果有不对的，请大家批评，也请戴苏理同志提出批评。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记录稿】

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今天胜利结束了。

上午，王新、纪登奎同志都讲了，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我再简单讲几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了林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大大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这次会议进一步揭开了我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全省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戴苏理展开了揭发、批判和斗争。

这是一次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誓师大会，是一次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誓师大会。

从会议期间大家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来看，戴苏理确实是全省大刮右倾翻案风、大搞右倾分裂主义的总后台。

这次会议把戴苏理的问题一揭开，前一段我们不能顺利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很快实现全省一片红的症结所在也找到了。三月初，我们常委的同志从煤矿回来以后，各个地区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都搞不动了，几乎停顿下来了。这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但是警惕性不高，没有想到戴苏理会搞这一手。我们对戴苏理也是逐渐认识的。

关于戴苏理的问题，会议开始的时候，我把大概的情况讲了。他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利用在革命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疯狂地进行翻案活动。戴苏理大刮右倾翻案风，主要有这么几条。首先是，集中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批示。其次是，拉山头，搞分裂，一手扶植保守组织，一手支持形“左”实右的分裂派，也就是戴苏理称赞的那个所谓“猴派”。第三是，故意混淆阶级阵线，抹杀两条路线斗争。继续蒙蔽群众，死保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他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进行翻案活动。第一步，想和革命造反派分庭抗礼；第二步，取而代之，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戴苏理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刘、邓、陶翻案，为文、赵之流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戴苏理在进行右倾翻案活动的时候，自鸣得意的是两张“王牌”，一是借口所谓“反对极‘左’思潮”，一是借口所谓“反派性”。他的这个阴谋，我们必须戳穿。

戴苏理口口声声说，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党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贯反右不反“左”。他到处唆使受他蒙蔽的一部分人和他的同党，借口反极“左”思潮为名，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攻击省革命委员会，诬蔑纪登奎同志是

极“左”思潮的代表。其实，他所反对的极“左”思潮，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午纪登奎同志讲了，去年八、九月份，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来河南视察时的重要指示，遵照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曾经坚决抵制了一度出现的极“左”思潮。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右倾的苗头就出来了，到十二月份就闹的很凶了，很严重了。当时，为了抵制这股右的思潮，王新、纪登奎、王辉、杜河堤等同志分别在军队的、地方的几个会议上讲了话，我也在有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造总主要服务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了话，重点都是同右倾思潮作斗争的。我的讲话最后也顺便批评了某些地区还存在的极“左”思潮。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对于阶级敌人来自极“左”的方面和右的方面，或者同时从“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我们都是坚决抵制、坚决斗争的。但是，戴苏理却在背后嘀嘀咕咕，到处散布我们只反右不反“左”，这完全是诬蔑和攻击。实际上，他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戴苏理大喊大叫“反派性”，他反的是什么派性呢？他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叫“派性夺权”；把革命委员会，叫“派性委员会”；谁要是一讲路线斗争，就反咬谁一口，叫“派性大发作”；把省革委会的机关报，叫“派性报纸”。在他的眼里什么都成了“派性”，把革命造反派说得一无是处。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在阶级社会中，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派性，派性是有阶级性的。戴苏理攻击我们的派性，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也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戴苏理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用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来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来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的。

为了更好地增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提高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防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侵蚀，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本着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教导，采取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展开了“斗私，批修”的斗争。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敢于在自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敢于“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

脑，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这是对的，无可非议的。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反。我们什么时候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但是，阶级敌人是无空不入的，我们这种革命的口号，也被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戴苏理接过去了，把它用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反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而后快，以反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性而后快。好象只有他们刮为“二月逆流”翻案妖风的自由，没有我们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妖风的权力。就是只许他们放毒，不许我们消毒。如果我们去消毒，就说我们是“派性”。这是一切阶级敌人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惯用的手法。他们扬言要“四大”，要“民主”，要“自由”。其实，他们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自由。

以上，就是戴苏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两把板斧。戳穿了，无非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目前，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的斗争，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起来了，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经过这次全会扩大会议，必然会使这场斗争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主动地、不停顿地进攻，大反特反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坚决杀退这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阶级敌人是非常狡猾、非常阴险的，我们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识破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把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小爬虫统统揪出来。我们要继续广泛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这里，我想特别着重说一下革命大批判的问题。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大批判运动。我们就是要彻底批判旧世界，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只有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才能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从这次右倾翻案风中可以看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并没有斗倒斗臭，他们一有气候和温度，就跳出来进行反扑。最近，文敏生、赵文甫之流交出了一个所谓“检讨”。一看便知，是假检讨，真反扑。这说明，前一阶段他们是躺下装死。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戴苏理同志在这次全会上的检讨，同志们都听了，是极不深刻的，态度是很不老实的。现在我们还是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彻底交代，承认错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是，我们决不能把矛盾掩盖起来。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我们必须把戴苏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罪恶活动，为刘、邓、陶翻案的罪恶活动，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翻案的罪恶活动，彻底揭开，加以批判，批判得越深刻越好。要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对戴苏理有所帮助，才能把受戴苏理蒙蔽的一部分群众和干部解放出来。有这样一些干部，过去他们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来只要他们深刻检讨，承认错误，取得群众的谅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是可以挽救，可以不打倒的。但是，这些人受了戴苏理的影响，在戴苏理的指使下，不但不承认错误，还继续蒙蔽一部分人死保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革命造反派的对立面，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当了那个地区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后台。这就可能要打倒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是走资派？还不该打倒？！这次戴苏理大刮右倾翻案风，蒙蔽了一部分群众，也害了一批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把戴苏理的错误揭发出来，把他批倒批臭，就不能把受戴苏理蒙蔽的一部分群众和干部解放出来。所以，我们要发动群众，对戴苏理所犯的错误，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坚决把这股右倾翻案妖风打下去。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阶级敌人要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对这次又站错队的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悔改，我们仍然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除了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外，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深刻检讨，反戈一击，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还是欢迎他们、信任他们的。我在一次省革委会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过争取边缘人物的问题。希望那些

到了边缘的边缘人物迅速猛醒，不要再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滑下去。我所指的就是受戴苏理影响的一些干部，包括戴苏理在内。现在，我对这些干部，再一次提出忠告。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了，可是有一些干部一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这是不能允许的。如果现在能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深刻检讨，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还愿意帮助他们。如果死不悔改，象戴苏理那样搞实力政策，拉山头，搞分裂，以为“人多力量大”，就可以保自己，就可以当核心，继续蒙蔽群众，搅乱阶级阵线，那就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对于在这次右倾翻案风中受了蒙蔽的群众，我们仍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去整群众。当然，其中极个别的坏头头是要揪的。但是，为了更好地向阶级敌人进攻，狠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不搅乱阶级阵营，那个组织的坏头头，要由那个组织自己去揪。对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坚持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

总之，在这场斗争，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杀退右倾翻案妖风。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逐步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这里，我再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不要因为有的群众贴过炮轰刘建勋、纪登奎的大字报而整他们。这个，问题我讲过多少次了，我们工作中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的，我们欢迎革命群众提出批评意见，炮轰也可以。不要因为炮轰我们而去整群众，更不能把贴这种大字报的群众打成反革命。至于有些人贴大字报，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中央文革，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要坚决地和他们作斗争。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关于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这个前提下要注意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纪登奎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就讲这么多。

最后让我们高呼：

坚决打退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记录稿）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通讯员《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

编者按：灵宝县革命委员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朝着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前进了一大步，树立了崭新的革命作风。

领导班子革命化，办事人员少，走上第一线，这是革命委员会紧密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展对敌斗争，粉碎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克服官僚主义旧习气，促进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革命大联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意义。

实行精兵简政，是一场尖锐的、深刻的阶级斗争。新的革命机构，同剥削阶级的旧观念，旧作风，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旧的习惯势力，必然要从多方面干扰和冲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勇敢地跳出原来旧机构的圈子。必须采取坚决态度，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在政权建设方面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保守主义，击破剥削阶级旧势力的抵抗。

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央各工作部门，都要象灵宝县那样，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如果大多数的革命委员会把清理阶级队伍、实行精兵简政这两件工作抓好了，就是从组织上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 * *

本报讯 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委员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最新指示，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精兵简政，改造工作作风，努力“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进一步发挥了革命政权的威力。

灵宝县革委会在今年一月三日成立以后，对革委会的组织建设和机构设置，曾进行了多次研究。由于受旧思想、旧框框的束缚，改来改去，机构搞得还是很大，设立了“八组两室”：政宣组、组织组、农村组、内务组、财贸组、工交组、文卫组、统计组和革委会办公室、文革办公室。办事人员近百人。有些事情本来过一次手就可以解决，但是这个组推那个组，这个干部推那个干部，问题不能及时解决，革命、生产受影响，群众有意见。贫下中农说：你们办事，过场太多，找了三番五次，问题还没有解决，革委会工作应该改进改进。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灵宝县革委会成员认真学习了这一光辉指示，联系以往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大查了机构庞杂的危害性，大议了“精兵简政”的好处，总结出“五害五好”：（一）机构庞杂的害处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精兵简政的好处是便于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二）机构庞杂的害处是人浮于事，工作推推拖拖；精兵简政的好处是组织机构精悍有力，有利于培养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三）机构庞杂的害处是助长官气，增长私心；精兵简政的好处是能“官”能民，破私立公。（四）机构庞杂的害处是容易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实际；精兵简政的好处是干部能够经常到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五）机构庞杂的害处是容易变成官僚机构，成为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不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精兵简政的好处是有利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通过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革委会的组织建设，必须走毛主席指出的“精兵简政”的道路。

新的组织机构把原来的“八组两室”改为四个组：政治工作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办事组。办公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三十人（包括解放

军代表十二人)。原县委、县人委的工作人员除参加革委会办公的以外，一部分留机关搞斗批改，一部分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深入基层。

组织机构精简以后，人少事多怎么办？他们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和有关群众路线的教导，突出地抓两点：一是千头万绪抓根本。工作再忙，任务再大，总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抓好革委会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一组顶几组用，一人顶几人干。领导相信群众，工作大胆放手，一般问题，分别由各组有关办事人员研究处理，改变了过去事事请示领导，头头说了才算数的状况。二是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大量问题在基层单位解决，改变了以往那种“下边问题多，上边积压多，矛盾光上交，迟迟不解决”的旧作风。县革委会主要成员遵照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和“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的教导，经常深入农村，和群众同学习、同吃、同住、同劳动。哪里困难大，就到哪里去；哪里情况复杂，就到哪里去；哪里工作艰苦，就到哪里去。有一个公社距县城较远，情况比较复杂，革委会建立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大刮翻案妖风，煽动群众不服从革委会领导，阻碍革命和工作的开展。县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带着毛主席著作，到这个公社，协助公社革命委员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阶级斗争。他们把群众很好地发动起来，揭开了右倾翻案妖风的内幕，揪出了反革命两面派，有力地教育了群众。受蒙蔽群众纷纷反戈一击，打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进一步巩固了革命委员会。有一个公社两派斗争很激烈，革命委员会长时间建立不起来。县革委会一个常委就带着毛主席最新指示，到那里和大家共同学习，斗私批修。双方本着“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原则，分别检查了本组织的错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了起来，迅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组织机构精简以后，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有了改进。他们深入各组，深入基层，随时随地解决问题。走到那里，就在哪里办公。有时在树下，有时在渠边，有时在机关，有时在街头，到处可以同来访的群众和请示问题的同志商谈，及时答复和解决他们的问题。领导干部处理问题，经常和办事人员共同研究。领导的意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办事人员可以批评。一次，外单位有个同志要开外出调查的介绍信，县革委会一位领导同志满口答应，叫办事组人员给写。可是经过询

问，不符合上级关于出差外调的指示，办事人员就拒绝给开，并当面向领导提出批评。这位领导同志认为批评得正确，便虚心接受。他高兴地说：“只要有同志们的监督，我们就会少犯错误。”

最近，灵宝县革委会成员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他们决心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带领全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搞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坚决把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反革命分子统统揭露出来，彻底斗倒斗臭。

（原载《河南日报》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有删改）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省工代会主任申茂功：《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伟大事件》

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我们党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胜利地闭幕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会的召开，是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伟大事件。全会发表的公报，是又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会议公报精辟地总结了在两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亿万革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经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所取得的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宣布把长期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宣告了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的彻底破产；并且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令。这次会议大长了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的威风。回顾我们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

伟大最正确，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唯一的指导思想，掌握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无往而不胜。两年来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等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揪出了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先后击溃了“二月逆流”和今春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邪风，加速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实现辽阔中原一片红的基础上迅速掀起了斗、批、改的高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工人阶级，我们工人阶级最忠于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指到那里，我们就战斗到那里。我们一千个一万个拥护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和各项决议，决心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认真完成斗批改各阶段的任务，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王新讲话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同志们！

我们这次会议，从十一月八日开始，到今天十九天了。这两天，在学习重新发表的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两报一刊”重要社论的基础上，研究了会议纪要，讨论了我省当前的形势。讨论中，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原则性的分歧。昨晚建勋同志主持，开了一个碰头会，进行了讨论，感到问题很重要，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用毛主席的思想、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统一我们的步伐，统一我们的行动。建勋、老纪、老耿等同志让我先发个言。我把这两天讨论中涉及到的问题谈些不成熟的意见，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建勋同志还要作总结。

一、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什么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林副主席在国庆讲话中也指示我们：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认真搞好斗、批、改。这就是要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搞好大批判，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整党建党，搞好教育革命，搞好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庄严地号召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极其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全会公报，都给我们明确地指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前进的灯塔。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胜利！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落实全会公报的战斗号召，就是胜利！林副主席在讲话中再三地教育我们，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革命实践中使我们党的干部更加了解了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就是胜利，违背毛泽东思想就吃亏，就失败。

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十二中全会，都是号召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怎样来搞好斗、批、改，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呢？

搞好斗、批、改，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对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实行彻底的普遍的改革；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堵塞产生修正主义的渠道，巩固发展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搞好斗、批、改，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搞好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我们一定要把搞好斗、批、改，提高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一定要搞

好，一定要搞彻底，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这就是摆在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革命群众组织面前的最中心的任务，这就是斗争的大方向。谁违背这个大方向，谁干扰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向歧途，就会犯大错误，就会掉队，就会摔跤子，就会被历史所淘汰。

有的人说：你们光讲斗、批、改，不讲路线斗争。

他们这样提出问题，把完成斗、批、改这样一个伟大历史任务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割裂开来，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完成某一个时期的革命历史任务，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能谈得上完成革命任务呢？我们说，讲斗、批、改，正是要讲两条路线斗争，只有抓路线斗争，才能有斗、批、改的胜利。（刘建勋同志：“两报一刊”社论讲的很明确，现在搞斗、批、改，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耿起昌同志：社论指出：我们必须把斗、批、改提高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务必把它搞好，搞彻底。）（刘建勋同志：斗、批、改是大方向问题，是路线斗争问题。有人说我们光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表现出来。离开了这个，你讲的路线斗争是什么呢？简直莫明其妙！）肯定地讲，搞斗、批、改，就是要讲路线斗争，斗、批、改的胜利，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不仅要讲，而且要大讲特讲，就是要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武装群众，彻底批臭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彻底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们怎么不讲两条路线斗争呢？我们就是要大搞两条路线斗争。（刘建勋同志：这种谬论流毒很广。指责人民解放军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指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指责革命委员会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他们忘记了路线斗争一定时期表现在一定问题上。斗、批、改就是当前的路线斗争，脱离斗、批、改，就是脱离路线斗争，就一定要滑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不搞路线斗争，怎么能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修正主义路线？怎么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堵死产生修正主义的渠道？怎么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呢？只要存在阶级斗争，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阶级斗争就有两条路线斗争。公报指出：两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两

报一刊”重要社论指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将长期继续下去。”革命的实践也告诉我们，在全省范围进入斗、批、改阶段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很激烈吗？现在正在进行的斗、批、改，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派出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直接领导上层建筑的斗、批、改，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又说，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政治舞台，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伟大创举。你对工人宣传队是赞成、拥护，还是反对、抵触？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很重要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建勋同志：省直机关集中了一万多人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下一步还要搞整党。工人宣传队一开进去，就出现了一种谬论，说工人阶级与造反派的矛盾是普遍的矛盾。为什么当工人阶级团结广大革命干部，向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发动进攻的时候，会发生这个问题呢？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种反映。说那个话的人，支持过一段造反派，他比那些已经臭了的“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的发言权要高一些，他是利用“造反派”的名义说的。他这个话是反动的。实际上，不是工人宣传队与革命造反派的矛盾，而工人宣传队、革命造反派与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矛盾，才是普遍的矛盾。）（耿起昌同志：说这个话的人，据说有严重历史问题，可能是个叛徒，工人宣传队开进去，就是要压他们。）他挑拨工人宣传队和广大革命造反派的关系，企图达到掩护坏人、包庇敌人、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目的。

这个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个政权问题。他们就是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一切，就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为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人材。阶级敌人并没有死，也没有睡大觉，他们在造谣言，放暗箭。（刘建勋同志：不但没有睡大觉，而且还组织了不小的大大小的裴多菲俱乐部，制造反革命舆论，制造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舆论。）他们就是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把工人宣传队赶出学校。（刘建勋同志：有人造谣说压了“红色公安”，压了造反派，解放军把“公安公社”的头头启用了。我这里负责声明：这完全是造谣，全部是造谣！）

有的人搞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头脑膨胀，利用种种借口，对抗工人宣传队对教育革命的领导。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采取什么态度，这就是路线斗争。

讲路线斗争，首先要讲领导权问题。这是起码的知识嘛。我们党的历史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不要无产阶级的领导，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使中国的革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抗日战争开始，刘少奇、王明一起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要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反对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对工人宣传队持什么态度，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持什么态度，这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怎么能说只讲斗、批、改，不讲路线斗争呢？（刘建勋同志：搞不搞斗、批、改，对斗、批、改持什么态度，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公报首先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完整的路线。没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可能搞好斗、批、改。怎么不讲路线斗争呢？那种说不讲路线斗争的人，实际上天天讲路线，就是只讲资产阶级路线，要用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刘建勋同志：争论的根本分歧点就在这里。一个要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改造党，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夭折。一个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一切，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把他们一网打尽。这个争论非常激烈，非常尖锐，搞了许多裴多菲俱乐部，开了许多黑会，在那里制造反革命舆论，妄图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一举把革命委员会摧垮，这就是他们的真实目的，罪恶目的！）

还有人说，现在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

这些人老是抓住路线斗争，好象只有他在执行正确路线。你执行的是什么路线？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能分得开吗？党内路线斗争就是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还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路线斗争吗？没有的！林副主席说，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引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代表了两个阶级的要求，两个阶级的愿望，两个阶级的作法。你是反映什么阶级的要求，什么阶级的愿望，什么阶级的作法？路线斗争，就要讲阶级，不讲阶级就成了唯心主义。（纪登奎同志：不

懂阶级，不懂剥削，就不懂革命，连起码的革命常识也不懂。)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无产阶级，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有些人就是企图混淆是非。

讲路线，就要讲那个阶级领导，革命的对象是谁，革命的依靠力量和团结对象是谁，就是说，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刘建勋同志：你屁股坐在那里，矛头指向谁，这就是路线。)这是一条完整的路线嘛！敌我不分，连革命对象都不知道，是什么路线？(耿起昌同志：有个单位揪出个牛鬼蛇神，有人竟说，他在“二月黑风”中路线站对了，为什么你们光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很清楚，他们讲的路线，是把坏人当成朋友。(刘建勋同志：派性必然掩护敌人。这些人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变成资产阶级的行帮团体，好象只要和自己是一派，在一块战斗过，坏人都可以统统包庇起来。这算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是行帮，是山头主义，是独立王国。凡是那个王国里的公民，统统看成是好的。)

(纪登奎同志：按他们的讲法，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右站队站对了就不是坏人了。)讲路线，不讲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专谁的政，这是什么路线？这完全是有意制造混乱，混淆阶级阵线，干扰清理阶级队伍。(刘建勋同志：是认敌为友的路线。)(纪登奎同志：工人宣传队进到一个学校，发动群众，开展忆苦思甜活动，他那里就写社论，说是否定了路线斗争。他最怕诉苦，怕触及他的灵魂，就是要包庇地、富、反、坏、右。不叫讲阶级，不叫讲剥削，还有什么革命。接着清理队伍，清出了坏人，又说这个人站队站对了，就不是坏人了。)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清理阶级队伍，把暗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这就是革命路线。把钻到造反派中的一些坏人清除出去，是我们的胜利。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坏家伙。把他们清除出去，难道还不是我们的胜利吗？讲路线，要分清敌我，不能混淆两类矛盾，不能认敌为友，认友为敌。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根本问题。)

讲路线，要根据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革命的对象是不同的。民主革命有民主革命的对象，社会主义革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讲路线，要分清革命的对象是什么，依靠谁革命。(刘建勋同志：上次开会，有的同志讲，有七个县少数中学生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按自己的意志左右革命委员会，一切都得服从他们，叫他们牵着鼻子走。我们当时说，这些世界观没

有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不能掌权。如果让他们掌权，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句话触怒了那些搞独立王国的人们。他们一定要到北京去澄清这句话，说刘建勋讲错了，问为什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掌权？同志们，世界上的政权只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式的、蒋介石式的、尼赫鲁式的或者苏修式的，统统都是大资产阶级专政。一种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式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从古到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小资产阶级专政的。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你去告状当然有你的自由，但你是错误的！你要专政是什么问题呢？是两条路线斗争尖锐的表现，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反对我们那句话的，是头脑发胀，浑身浮肿的人。说他不能掌权，他就去告我和王政委的状了。）

讲路线，就是讲领导权，讲革命的对象，分清敌我。不分清敌我，就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成了招降纳叛的路线。清理阶级队伍本身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群众，把一小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这样作。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坏人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的路线。

毛主席关于斗、批、改的一系列指示，反映于阶级斗争的规律，反映了工人阶级、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要打好这一仗。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当前，在完成斗、批、改任务中，突出的是搞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刘少奇这个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批倒批臭，把他在各个领域散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肃清，包括在建党、建政、文教、文艺、新闻等方面的流毒，一定要彻底肃清。（刘建勋同志：少数人在那里搞独立王国，搞裴多菲俱乐部，制造反革命舆论，干扰斗争大方向，妄图蒙蔽不明真象的群众，一哄而起，把革命委员会搞垮，这就是他们的罪恶目的。）认真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把这一仗打好，就在政治上、思想上打了大胜仗。把敌人揪出来，彻底批臭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在各个领域的流毒，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群众武装起来，这就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取得全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这是当前突出的任务，中心的任务。

衡量一个人路线觉悟是不是高,是不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表现来看,要以对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的革命任务、要求,来衡量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真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还是假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要把毛主席提出的路线、方针、任务、要求,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行动的准则。新党章给我们提出了总的奋斗目标。林副主席在讲话中说,这两个路线,反映了两个阶级的要求,两个阶级的愿望,两个阶级的作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愿望和作法。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斗、批、改任务,就是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愿望和作法,明确提出了实现这个要求的根本途径。民主革命时期,是不是真正革命的,就是看你在现实斗争中赞成不赞成搞土改?赞成不赞成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看你敢不敢搞武装斗争?搞土改你包庇地主,打仗你怕死,往后跑,这叫什么革命性?(刘建勋同志:怕死,搞议会斗争,是刘少奇的一套,企图投降蒋介石,搞个一官半职。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来主张武装斗争,亲自实践,亲自缔造了人民解放军。这是鲜明的对照。)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是看你赞成不赞成合作化、人民公社。(刘建勋同志:赞成不赞成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所以,革命性,路线斗争觉悟,不能离开毛主席在现实条件下提出的各项革命任务和要求。文化革命也是一样,在现阶段,对毛主席提出的斗、批、改抱什么态度,搞不搞大批判?是不是狠批刘少奇,把他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是不是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执行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拥护不拥护工人阶级对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搞不搞清理阶级队伍,有劲没有?对砸烂公检法赞成不赞成?对工人、贫下中农掌握教育大权,打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赞成不赞成?这就看你路线觉悟怎么样?(刘建勋同志: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天天叫喊砸烂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现在要真正砸烂,他又反对,就是姚文元同志那篇文章中讲的,他们只不过是现代的叶公而已,叶公好龙,好的是假龙,是真龙,他又怕了,他总是动摇的,是口头革命派。)(李忠顺同志: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这种舆论,对公安军管会指责特别多,特别是对省公安军管会。刚才刘政委指出那些人,他们造谣的目的,就是反对军管,反对砸烂刘、邓、彭、罗推行的那一条修正主义政法路线。为什么要军管?就是为的要砸烂这条反革命修正

主义路线。现在有人说我们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说什么公安公社又用起来了。造这些谣言来攻击我们公安军管会。到底谁不讲路线斗争？军管就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彻底砸烂旧公检法，就不能在公检法夺取全面胜利。现在有人出来反对军管，反对砸烂旧公检法，实际上是他不讲路线斗争。有些人是认识问题，有些人是上了敌人的当，有些人则是有他自己的目的。）（刘建勋同志：有的人是自觉的代表资产阶级，有的人是不自觉的代表资产阶级，有些善心的人是被独立王国迷住了心窍，凡是他那个独立王国的人都不让动，就是彭、罗、陆、杨的人，他也不让动。）讲路线斗争，就是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认清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任务和要求。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要紧紧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不能脱离当时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要求。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可能是革命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可能是反动的。“二月逆流”的那些黑干将，在民主革命时期算是跟着走过来了，现在不跟，不就由革命的成为反对革命前进的了。你那个时期紧跟毛主席，在另一个时期不紧跟就要掉队。（刘建勋同志：有的人已经掉队，有的人正在掉队，正在充当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传声筒。有两种人：一种人自觉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种人不大自觉地跟着资产阶级摇旗呐喊，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叫裴多菲俱乐部。现在就是有许多裴多菲俱乐部。）

讲斗、批、改，就是要讲路线斗争，斗、批、改的伟大胜利，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讲阶级斗争，就是要讲路线斗争，就是要搞斗、批、改，这就是大方向。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排除一切干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面胜利。

二、认清当前形势，狠抓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目前我省形势和全国一样，空前大好。这是主流，这是本质。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工作发展不平衡中出现的问题。工作的不平衡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我们不这样看待我省形势，就要犯大错误，就会迷失方向。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好形势，是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

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取得的，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越是在胜利的太好形势下，我们越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公报中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在斗、批、改阶段也是这样。决不能认为实现了一片红，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就没有阶级斗争了，或者阶级斗争不那么尖锐了。斗、批、改阶段就是严肃的阶级斗争。革命更加深入了，一小撮阶级敌人越是接近死亡，越是要进行垂死挣扎，只要情况对他们有利，他们就进行反扑。同志们都听到和看到近来阶级敌人到处在刮阴风，造谣言，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妄图把水搅混，破坏大好形势。大量事实告诉我们，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必然会从右的或形“左”实右的方面，破坏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扑，进行反夺权。所以，万万不可麻痹大意。当前阶级斗争的这个动向很值得我们注意。

昨天同志们学习了“两报一刊”社论，根据社论精神，讨论了会议纪要。现在值得我们非常注意的问题，就是阶级敌人善于把我们革命的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为其所用，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我们要识破敌人的这个阴谋。（刘建勋同志：老一套的东西不行了，被群众识破了，接过革命的口号来攻击我们。）（纪登奎同志：你反右他利用反右，你反“左”他利用反“左”。）（刘建勋同志：说什么“八月黑风比二月黑风还黑”，“罕见的资产阶级专政”，现在光用这些口号不行了。就变一个口号。我们提什么口号，他就利用什么口号，企图转移斗争目标，准备一哄而起，把红色政权轰掉。）有的接过“反复旧”的革命口号加以歪曲，把斗争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实现反夺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他们大喊大叫，“要普遍开展反复旧”。戳穿了，就是准备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场反对革命委员会的逆流。（刘建勋同志：反对工人宣传队，反对人民解放军。现在对人民解放军的谣言多起来了，省直机关是空军四十三师搞的，有些人感到不舒服了，说这个部队是“支保”的，是压制我们造反派的。我告诉你们，这样搞没有好下场。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部队，谁反对人民解放军，用红卫兵的语言，要砸烂你的狗头！）我们要提高警惕，揭穿敌人的阴谋，千万不要上敌人的这个当。不要因为阶级敌人把革命的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我们就迷失了方向。

同志们想一想，我们经过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全省实现了一片红，这是主流。你对形势是怎样估计的？难道会一下子忽然黑了吗？你那样看问题，实际上是否定大好形势。（刘建勋同意：事物的主流决定事物的质，支流无论多少条还是支流，不决定事物的质。主流是大好形势，就是工人宣传队、解放军、革命委员会、广大革命群众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把工人宣传队开进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改革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改造机关，砸烂修正主义的建党、建政路线，彻底砸烂公检法，彻底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彻底搞好斗、批、改。难道我们这个大方向不是正确的吗？有些单位搞不起来是另外的问题。有些是坏人掌权，整好人，不整坏人。还有的是联合的不很好。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事物的质，是主流。其他都是支流。支流可以用调节的方法解决。有些人，把革命的口号接过去，说革命委员会复旧了，说复旧是当前的主要障碍，开着喇叭车上街，一夜之间大字报贴满全城，组织好多人围攻革命委员会，把工人宣传队赶走，企图一哄而起，把革命委员会轰掉，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众：反革命行为！）（纪登奎同志：这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不见得”派在背后操纵捣鬼。）（刘建勋同志：这是“不见得”派在后面操纵的，前台的人主观上不一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客观上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还自以为是，摇旗呐喊，作资产阶级的马前卒。有些地方开黑会，搞裴多菲俱乐部，是很有准备、很有计划、很有组织地搞起来的。我们刚刚发表一篇社论，他们就大喊大叫，说我们突然袭击。你准备了好多天，开了那么多黑会，你的反动行为那么有准备，不是突然袭击？我们稍稍表示了一下态度，就是突然袭击？这就是只许资产阶级造反，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一切反动派所惯用的伎俩。）（李忠顺同志：反复旧实际是复旧，根本不是真反复旧，就是要在公检法恢复刘、邓、彭、罗那一套。有没有复旧？临颖有一点复旧，但他们不去反对，就是反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同志们看了那张大字报，提到“复旧与反复旧，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继续，以整党建党为中心的斗、批、改高潮，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刘建勋同志：是大、大、大毒草，是经过黑会讨论了的。有人认为是香花。你的鼻子不灵了，感冒了，伤风了，不辨香臭，把毒草当成香花，屁股坐在那里去了？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象苏联的“克里空”那样，以为自己作了三个月的工，就不得了，无产

阶级的意识就管一辈子，一辈子用不完。没有那回事！要永远紧跟毛主席。不这样，你就会落后，就会掉队，就会倒退，就会把毒草当成香花。）肯定会干扰斗争大方向，严重破坏整个斗、批、改任务的完成。所以对这些反动的谬论要批判。

（纪登奎同志：这个传单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公民，跑到安阳发表了一篇讲演，然后到一个煤矿去串连所产生出来的一支大毒草。）（刘建勋同志：大、大、大毒草。）是个黑纲领。（耿起昌同志：可见他们还有市场。）（纪登奎同志：新与旧的斗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复旧，我们第一承认，第二反对。我们天天反的，是要搞革命化的。但决不能接过革命的口号去反对“三红”，这是一个阴谋。）（刘建勋同志：有人指着鼻子问有没有复旧？我说有，经过斗、批、改，就是要反掉它。工人宣传队，就是破这个东西。资产阶级统治的地方，就是最大的复旧，就是要破它，就是要破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不存在了，新和旧的斗争还是存在的，一万年还存在。不存在，辩证法就不灵了嘛！问题是看你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上。敌人借反复旧为名，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妄图一个早上把政权夺在他的手里。他们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他们说，你压制造反派。我们说，不是，我们压的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对于上了当的人，经过教育，使他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我们就是要大破资产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反复旧。

在我们前进中有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呢？有的。在革命委员会内部也难免混进坏人，在革委会领导班子中，也有一些不大好的。（刘建勋同志：在革命委员会内部也有人借着这个口号反对革命委员会，因此，放出的风特别有效。）个别地方班子调整不太好。（刘建勋同志：有些地方围攻革委会，就是因为革委会内部有人参加这个黑会，你那个裴多菲俱乐部，必须砸烂。在座的同志就有参加黑会的。）（耿起昌同志：我们搞清理阶级队伍，搞敌人，他搞革命委员会。）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不是不敢承认。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绝大多数革命委员会是好的，有的领导班子不那么好，有的混进了坏人，有的镇压了群众，有的成员觉悟很低，私心很重，办了很多蠢事，我们这个会议其实也是承认这个问题的，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对那些搞打击报复镇压群众的，我们坚决反对，坚决批判，并严肃地处理。（纪登奎同志：个别地方原班人马是有的，

这个问题正在解决。) 提出要大搞反复旧的，并举不出像样的理由和事实。让他尽量地讲，说来说去还是那几个县，没有查出更多的县。(刘建勋同志：好象我们从北京毛主席身边一回来，大方向就错了，又是反动路线。哪有那回事。实际上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家里就有人在那里开黑会，有些人好象发疟疾一样，一阵高烧就上来了。)

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要在今后斗争中不断地巩固、发展、完善她。阶级敌人歪曲这个口号，我们有些同志就跟着跑，不是补台而是拆台。(刘建勋同志：经过补台不断地巩固、发展、完善，不能一哄而起把她轰掉。)(纪登奎同志：经过吐故纳新，逐步去完善，不是象运动初期红卫兵小将砸烂几个四旧牌子，一个早上就可以用物质力量去摧毁。对于思想问题，旧思想旧作风，要发动群众，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解决。) 混进来的敌人要清出去，对于革命委员会中品质不好、路线觉悟很低没有革命精神的，也要清，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促其改正，或适当调整，广大革命群众还要对他们进行监督。但重要的是，对革命委员会要采取补台的方针。对新鲜事物，必须热情支持。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我们必须正确理解领导班子中更新和复旧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 笼统提反复旧的口号，是不恰当的。新与旧的斗争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红旗》四期社论是在一定的前提下提出的“反对复旧”的，是完全正确的。(刘建勋同志：有些人作文章说我们是保守主义，责问我们为什么不赶快整党，不赶快吐故纳新。他们说：你们的党龄比我们的年龄还大，还不该吐故？这些人别有用心，混淆是非。新，当然要纳。但他们反对我们的保守主义，是别有用心，就是对清理阶级队伍没有清出眉目的单位，他们要大开门，大吸收。就是要把地富反坏右拉进来，要把他那个独立王国的公民都拉进来，这是破坏整党。吐故，年龄大的可能多一点，但不能年龄大，就作为故来吐掉，应该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是否有革命精神。) 新与旧的斗争，一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包括组织上复旧反复旧，思想、作风、习惯上的复旧反复旧。有敌我矛盾，大量的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笼统的提反复旧，必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引向打内战。从意识形态上讲，如果没有一点四旧才奇怪哩，除非是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只要阶级存在，旧的思想总是存在的，就要不断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全面反复

旧的问题，必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三红”。这会起什么后果？（刘建勋同志：有个地方利用反“二月逆流”，一夜之间动员三千人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大造舆论，好象革命委员会是什么“二月逆流”的继续。这是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根本不是反“二月逆流”。就是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一哄而起，推翻革命委员会。他的目的昭然若揭，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那些“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利用一些有野心的人搞的。他们在背后操纵，开黑会，言不及义，不知开了多少次，气焰十分嚣张。）

《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社论中指出：“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有复旧倾向的地方，就是在那里搞独立王国。（刘建勋同志：独立王国的地方不能整党，要先把独立王国搞掉，不然你发展的党员。也是“王国党员”，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员。是你那个王国的都是党员，你那个王国以外的都不是党员，这样能行吗？你反保守主义是一种阴谋。）（纪登奎同志：先反多中心，先反独立王国。）新与旧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相对的，必须辩证的来认识。我们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更新的，有的只是更新的程度不同，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是极个别的。在发展中来巩固、完善，只能补台，决不能拆台，决不能一哄而起，把广大群众引导到攻击革命委员会。这种作法我们要坚决反对。

如何更新，要以是否忠于毛主席，是否忠于毛泽东思想，是否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标准，看他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不能从形式上，年龄上看。（刘建勋同志：有的地方把革命干部都说成是“老油子”，“老狐狸”。他们说，老油子还不该进“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是革命干部才能进去的，你那样说就把“五·七”干校的名义败坏了。你的斗

争方向，不是斗争走资派，而是反对革命干部。他们中间某些人有缺点错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可以解决的。但不能把革命干部一律说成是老油子，进行斗争。难道年龄大一点都是老油子吗？（这是什么口号？）有人说所有老干部都要彻底清查。把这些人赶出去，他们进来，做官的瘾这么大。你的世界观，是为自己做官，不是为人民服务，不讲无产阶级路线，不讲无产阶级政治，你就不能掌握好权。（刘建勋同志：这些人厉害得很，他们到北京，造谣中央也镇压了造反派。这就不仅是反对我们了，还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警惕这个问题。警惕阶级敌人接过革命的口号，加以歪曲，企图达到破坏斗、批、改的目的。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我们革命委员会要在斗争中发展、巩固、完善。整个斗、批、改就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大破资产阶级的旧。怎么说我们不反复旧？！但是，我们反复旧，跟你们的方针不同，摆法不同，作法不同。不能把广大群众引导到反对革命委员会，干扰斗争的大方向。

另一方面，必须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多中心论”是严重干扰毛主席斗、批、改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严重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会议上揭发了大量的事实，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看待问题。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有的人认为，我们这次会议上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批判那些搞分裂的人，大方向错了（刘建勋同志：有人扬言会议大方向错了，我们可以摆事实讲道理嘛！）不管来自那个方面的干扰，右的也好，形“左”实右的也好，我们都要排除。我们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指针，在两条路线的实际斗争中，排除“左”右干扰，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为什么我们揭出了这样的事实，有人不敢承认这些事实、否认这些事实呢？这是什么用意呢？这不是唯物主义者。明明是“多中心”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敢承认这种干扰，还说我们批判“多中心论”是方向错误，这就说明你是赞成这种干扰的。（刘建勋同志：有些人非常同情毛主席所批评的那些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是在那里搞武斗的人，这些人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战士，脱离了居民，也脱离了他那一派的多数群众。我们有些同志还在同情这些人，认为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同志，你落后了！那些人是干扰大方向的。是搞独立王国的，毛主席给他们谈了五个小时，指出了他们的错误倾向。奇怪，毛主席批评的，反

对的，你拥护，你赞成，你为他们喝彩。这样，你把自己置于何地位呢？你们是否有共同之点呢？你的大方向是什么呢？你是不是也要象他们一样干扰大方向，搞独立王国？）这就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统一我们的步伐，统一我们的行动，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来衡量一切。不管是来自哪一方面的干扰，都要排除。为什么一排除这一方面的干扰，就说是错误的呢？为什么赞成这一方面的干扰呢，你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底忠不忠？到底拥护不拥护？到底亲不亲？我们批判“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以我为核心”。批判“多中心论”，批判形“左”实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让学生下放劳动，同工农兵相结合。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有人就扬言“造反派受压了”，“造反派受排挤了”，“这是对造反派没有感情”，“造反派没有掌权”。种种理由，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权”字，斗争的焦点还是一个权字，他们要夺权。这种人是极少数，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有极少数人，打着造反派的幌子，他们不是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的人可能是利令智昏，或被坏人利用。最近有人到处串连，大造舆论，大搞右倾分裂，拉势力，保自己当官。（刘建勋同志：有些人出去访问、串连，大造舆论，扬言“受压了”。你早不受压，晚不受压，我们深入搞斗、批、改你就受压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反对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镇压群众，你不感到受压。现在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已应进入了斗、批、改的新阶段，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深挖一切阶级敌人。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你感到受压，去搞访问、串连，这是什么问题。）对于“受压”要进行阶级分析。在阶级社会中的一切人的思想、言论、行动，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都是代表一个阶级的要求，代表一个阶级的愿望，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为一个阶级服务，为一个阶级的舆论所唆使。（刘建勋同志：你听了话，不调查，不研究，就跟着摇旗呐喊，在全省范围内大造舆论，干扰斗争大方向，这是什么问题？你是造反派，你的一根毫毛也不能动。这就是只许你到处散毒，不许人家说你放毒不对。这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就是只许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不许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那里有这样的阶级斗争？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都是只许我斗你，不许你斗我，哪有这样的道理？你刮西风，我们要刮强劲的东风。有些

同志听了这话又不舒服，这不是又压制我吗？你如果是西风，非压你不可。）到处串连是有的，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受压”。对于“造反派受压制”这个口号，要进行阶级分析。有的是只准自己放毒，不许别人消毒。（刘建勋同志：他们举的例子，是属于两派打架。对于支一派压一派的，我们是反对的，态度很明朗，怎么能说我们压制造反派呢？）有的是大派掌权，压制小派。（刘建勋同志：我们是反对的。）（纪登奎同志：镇压革命群众最典型的是×××、×××。）（刘建勋同志：×××是搞“多中心论”的，你就是要搞垮革命委员会。对你的错误要进行严肃地批判。反过来，大派绝不能压制×××影响的一派群众。）（纪登奎同志：×××有一句最典型的语言，他说过去你炮轰我，把我置于死地。今天我要把你置于死地。这叫打击报复，镇压群众。）（刘建勋同志：我们不赞成，我们批判了他们。）（纪登奎同志：×××在临汝支持一派制造了灵头事件，把那一派贫下中农俘虏，打死、枪毙了贫下中农×××个人，还说要消灭的还没有消灭完。这和北洋军阀没有区别，和吴佩孚没有区别，和蒋介石没有区别。）革命委员会中混入极少数坏人，打着革委会的招牌，在那里搞阶级报复，要把他们清理出去。（刘建勋同志：反复旧，为什么不反这个，而专反革命委员会？）这些人在革委会中滥用职权，对群众实行打击报复，有的人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群众。我们坚决反对。对于“压了造反派”的种种说法，我们要作阶级分析，有的就是坏人混进了造反派里面。把坏人清理出去，不能说是造反派受压。同时，革命深入发展了，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要彻底搞好教育革命，广大干部下放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彻底砸烂旧公、检、法等等。修正主义的路线，都必须彻底摧毁。修正主义路线和“私”字紧密联系着。私字当头的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亲，接受毛主席革命路线困难得多，接受修正主义路线就气味相投得多。他是要“读书作官”嘛！要当主任嘛！你不叫他作官，叫他去劳动，你要搞精简机构，你要彻底砸烂公、检、法，他就不高兴了。所以，私字当头的人，不可能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抵触的。（刘建勋同志：工厂里也有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接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是“公”字当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因此，斗、批、改的过程，不仅是阶级斗争的过程，也是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过程。路

线斗争。在思想领域就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也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对资产阶级世界观，要狠狠地进行批判。

林副主席讲话中指出，在进入斗、批、改阶段，又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思潮和作法。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中心是无政府主义，多中心实际是以我为中心，是搞独立王国，是搞山头主义，是搞分裂主义。他们搞“多中心论”，是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有人问当前反多中心，究竟是反右，还是反“左”？“左”也反，右也反，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们这个会议，就是体现了这个精神。搞多中心的人，不是把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作为行动的准则，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统一我们的行动。搞多中心的人，表现有“左”的即形“左”实右的，也有右的。（刘建勋同志：更多的表现是形“左”实右。）从当前形势来看，大家揭发的大量事实表明，还是形“左”实右的问题。（刘建勋同志：他们口头上喊反复旧，这是“左”，实际上为资产阶级服务，这不是右吗？所以是形“左”实右。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革命后的根本问题。你把政权都搞掉了，还谈得上有什么革命路线呢？）集中到一点，还是一个权字。当前要警惕形“左”实右，警惕阶级敌人，接过革命口号加以歪曲，干扰斗争大方向，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

此外，要批判右的思潮的干扰。要批判“二月逆流”，批判“不见得”派。这次会议上，反映出在个别地区、个别单位仍然存在着右倾翻案的思潮。有些人存在着“三气”，怨气，泄气，不服气。在一定的条件下，“三气”就变成一股风，就是翻案风。林副主席讲话中指出，要排除“左”的干扰，右的干扰，右的干扰是主要的。这是从两年来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我们在这方面要有足够的认识。有右的思潮的人，不少都变成了“不见得”派。（刘建勋同志：“不见得”派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就不会罢我的“官”呢。）可见，“不见得”派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是大大存在的。我们批判“二月逆流”，批判“不见得”派，必须把矛头对准刘、邓、陶，对准文敏生、赵文甫等一小撮阶级敌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他们却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人就是乱军，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所以，要批判他们。我们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批

判他们的反动路线，坚持革命大联合的原则。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广大群众共同对敌，我们千万要警惕阶级敌人接过革命的口号，借批判“二月逆流”，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大翻老帐，制造群众的分裂。千万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刘建勋同志：一个单位在一个晚上，分裂出九个战斗组织。）（纪登奎同志：他们在那里重新划分造反派和保守派。）这是阶级敌人的大阴谋。我们要团结群众，共同对敌。（刘建勋同志：包括站错队的群众，也要团结他们，不要歧视他们，打击他们。不对准阶级敌人，这是什么革命派呀？）通过批判“二月逆流”，增强军民关系，警惕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林副主席，指向中央文革，为刘、邓、陶翻案，为王明翻案。这和部队在支左中发生的某些错误是根本不同的。谁借此来挑拨军民关系，谁就是黑手，决没有好下场。什么时候都不能将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这是对当前形势看法中提出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阶级敌人歪曲反复旧的口号，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一个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一个是批判右的思潮，批判“不见得”派，要坚持革命大联合的原则，增强军民关系，目标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在当前大好形势下，全国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形势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我们要紧跟全国形势，狠抓阶级斗争。克服右的思想，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排除“左”的右的一切干扰，不管来自那一方面的干扰，都要坚决抵制。林副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不能以调和的办法解决，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条定律，如同数学上、物理学上、化学上的定律一样，是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不能掩盖的。革命委员会要名符其实地搞革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高举红旗，就要斗争，不斗争就高举不起来。要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的本身就是斗争。要狠抓阶级斗争，排除“左”的或右的干扰。不排除“左”右干扰，就坚持不住，就会动摇。我们革委会一定要干革命，干革命就要斗争。马列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干革命就不要怕斗争。斗争是不可怕的，在当前形势下，可怕的是看不见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放松了革命警惕性，对形“左”实右的干扰不敢抵制，甚至跟着跑，那就要犯大的错误。（刘建勋同志：有些人光讲人缘，人缘好。谁也不得罪，这不是马列主义。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你想用形而上学

的办法搞调和，这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反复旧的人并不反这个复旧，而是不作阶级分析地反什么“老油子”。)我们要跟上全国的形势。十二中全会以后，全国斗、批、改的革命大风暴肯定会出现新的高潮，革委会一定要干革命，敢于革命。

(刘建勋同志：解放军、工人宣传队都要敢于革命。)

进入斗、批、改阶段以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谁敢于抓阶级斗争，敢于革命，形势发展的就快。项城县就比较好。(纪登奎同志：有六十多个县属于这个类型，在那里毛主席的指示基本上能够畅行无阻；有三、四十个县属于一般；还有一、二十个县毛主席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多中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些地方搞的差。说来说去就是没有抓阶级斗争，不敢斗争，不敢革命。(刘建勋同志：那里有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不要迷信自己，总认为真理都在你手里，广大群众都在你手里。这些人的想法和一切反动派的想法一样，总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把广大群众的力量估计过低。这不符合唯物辩证法，不符合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规律。哪有违反了历史潮流，群众还会在你手里的事？暂时也可能蒙蔽一部分群众，群众一觉悟，你就是光棍一条。新乡市革委会有些人是不敢斗争的，有个一般干部去宣布革委会对那个厂做的事件的态度，他敢于斗争。到了那个地方，又推、又揉、又揍，结果还是宣布了，无非是这样几条：一条是复旧是有的，但当成中心来反，一哄而起来反革命委员会是错误的；二是你们搞武卫队，不靠真理，靠武力统治，横行霸道，要立即解散武卫队；三是你这里是独立王国，不能整党，否则搞起来也是“派党”。有少数人不让他讲话，把麦克风夺了，可是他还是讲，广大革命群众鼓掌欢迎，少数人在角落里吹口哨、搓地板、跺脚，这是什么行为！有些同志说压制了造反派，就是压制了这些吹口哨、搓地板、跺脚、打人的人。其实，吹口哨、搓地板的人，不过是前台的人物，背后有坏人在挑动。这个干部开始进厂时，遇到了刁难，不让他进去，说我们是保密工厂，又说是四机部的厂子，进去得经过四机部批准，后来又说得经过省革委、省国防工办的批准。这些理由被驳回以后，又说得经过工厂革委会讨论才能进厂。后来只许进去五个人，被围攻达四小时之久。这是压制造反派吗？我说，是你这个所谓造反派压制革命派！你是什么造反派，有人说，你对“造反派”没有感情。对，我对想一哄而起把革委会搞垮的人就是没有感情，对刚才说的那个同志，对广大群众，为什么没感情？感情深厚得很。有些人可能在“二月逆流”中和我们

并肩战斗过，但也要一分为二嘛！如果说，过去立过功，现在一成不变，一根毫毛也不能动，那就不可理解了，不符合辩证法了。停止的观点，不是发展的观点。我们党内过去那么多有功绩的人，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就反对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了。如果说过去正确，现在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不许动，一动就是压了造反派、这是只许你放火，不许我点灯。这是一切反动派的逻辑。）

三、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

毛主席教导我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成绩，受到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特别是从省革委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以后，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同志也好，野战军的同志也好，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三支”“两军”的力量更加加强了，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希望同志们伟大的斗、批、改阶段，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排除来自右的或形“左”实右的干扰，不断提高自己的路线觉悟。

从这次会议简报来看，最近一个时期军队有少数同志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够好，受形“左”实右思潮的干扰，搞“多中心论”。（刘建勋同志：是极少数同志。）这次会议受到了批评。多数是在前一个时期顶右倾翻案最坚决的同志，是受表扬的。但是，在新的形势下，跟不上。（刘建勋同志：有些人说我们光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其实，是他们光吃老本，不立新功。）我们肯定你前一段的功绩，如果有人以右的观点否定这些功绩，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一段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够紧的同志，要认真改正错误。（刘建勋同志：同志们不要背包袱，改了就好，我们共产党人是光明磊落的。）上次会议，我们批评的几个同志，这几个月绝大多数表现的很好。（刘建勋同志：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嘛。）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学习林副主席的指示，办好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在三支两军的实践中，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更好的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排除右的或形“左”实右的干扰。同时，相信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虚心向他们学习，特别是向工人阶级学习，他们是领导阶级，和他们在一起，这是学习的好机会。同时要做工人宣传队坚强的后盾，对任何歪风邪气和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都要坚决抵制。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缺点是难免的，希望革命派的同志本着关心、爱护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精神，提出批评，给予帮助。前一段好多分区、人武部开各种座谈会，征求意见。这很好，以后还要这样做。（刘建勋同志：而不能相反，制造流言蜚语，把解放军说成是要不得的，你那个话我不能讲，讲了是散毒，这样的人我们坚决反对。）（纪登奎同志：有的工厂不欢迎解放军进去，我看他那里就是有鬼。）（刘建勋同志：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好象一个人不可避免要犯错误一样，改了就是了。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是一支非常革命化、战斗化的军队。对散布解放军的流言蜚语的人，我们坚决反对，不管你是什么响当当、硬棒棒，我们坚决不支持，而且坚决和你作斗争。）我们要正确地对待群众，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爱护红卫兵小将，虚心地向广大革命群众学习；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前进中的缺点、错误，我们应当热情地帮助、教育，决不能支持一派群众压制另一派群众，否则，就上了阶级敌人的当。（杜河堤同志。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和大军区的指示，最近要派一批解放军到县以上工矿单位，和广大职工一起搞斗、批、改，参加三结合，希望大力协助。）（刘建勋同志：要热烈欢迎。）（众：热烈鼓掌。）我们要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最近，我们将派一千八百多名军队干部进入工厂，参加三结合，和广大职工一起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这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努力工作，圆满完成。

四、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搞好革命化

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搞好本身的革命化。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对骄傲自满情绪。要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武装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只有公字当头，只有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两条路线斗争，在思想领域里就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私字当头，个人主义严重的，在政治上就不可能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能倾向和接受修正主义的路线。在组织上必然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所以说，要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斗私。斗私，才能批修。斗私，才能更好地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斗私，才能搞好本身的革命化。这就是大破资产阶级的旧，大立无产阶级的新。（刘建勋同志：“反复旧”的同志，希望也反一下自己的旧，

你满脑子做官，满脑子资产阶级派性，满脑子独立王国，满脑子山头主义，你那个私字不反一点？你那个旧不反一点？你不是要革命吗？首先在自己头脑里暴发革命。你“反复旧”，实质是反对革命委员会，想取而代之。告诉你，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广大群众是不依你那一套的。不要认为自己就是命运的主宰者，好象自己就是“上帝”，那是唯心主义。）

资产阶级时刻来腐蚀我们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用各种糖衣炮弹进行袭击。最近，重新发表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毛主席教导我们：“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我们要警惕糖衣炮弹。（刘建勋同志：郑州铁路局的郑建国，有过一段造反历史，后来被齐林、王国佐这两个走资派拉拢腐蚀，给钱花，给酒喝，拍肩膀。说他是响当当，他就头脑膨胀，多次制造停车事件，周总理讲话点名批评后，我们进行了处理。直到现在，还有人替他说好话，说他是老造反派。什么老造反派？制造停车事件，这是造反派？是中了糖衣炮弹。当然，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还是欢迎的。有人说，这是打击了造反派，打击了自己的战友。这是什么战友？有的人就是用感情代替政策。林副主席教导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阶级关系，政治关系。和谁亲，和谁疏，要用阶级观点去看，不要把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隐藏的坏人，也认为是自己最好的战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教导，在大好形势下，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我们解放军的同志们，更要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在完成伟大的斗、批、改历史任务中立新功！

我今天讲的，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批评。总之，要按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发扬彻底革命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刘建勋讲话

王新同志的讲话，我认为很好。建议把纪录稿印发给大家讨论，必要的时候可以登报。

我们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要根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造革命的舆论，抵制资产阶级的舆论。只许你刮西风，不许我刮东风，那是蒋介石的逻辑，

是一切反动派的逻辑。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实际上是熄灭无产阶级的斗争，搞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凡属想调和阶级斗争的，都是庸人，都是形而上学，也就是修正主义。

王新同志的讲话，明确了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同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矛盾。只要我们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我们的大方向就是正确的。我们的缺点错误，尽管有多少条，无非是思想上、作风上以及组织上的一些问题。有的革命委员会中混进了不好的人，这些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如果离开了大方向，抓不住主要矛盾，屁股坐歪了，那就是错误的，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我们不回避缺点。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问，你说是不是有复旧？我说：有，我们革命，就是要破资产阶级的旧，立无产阶级的新。新与旧的斗争，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一万年以后也还存在。如果不存在，辩证法就不灵了，社会也就不存在了。但是，谁要想转移大方向，掩盖这个矛盾，突出另外一个矛盾，说什么“反复旧是中心”，“造反派受压”，“革命派不香，保守派不臭”，这统统是阴谋。我们的方向，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是十二中全会规定的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我们只有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才能排除各种干扰，革命才能大踏步地前进。

现在，有的地方刮起一股不大不小的风，就是要转移这个斗争大方向，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那里策划指挥搞起来的。他们接过“反复旧”的革命口号，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指向工人宣传队，指向解放军，也指向广大群众，在那里重新算老帐，制造分裂。这是阴谋。革命队伍一分裂，牛鬼蛇神就可以滑过去了。

我们说，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是整党建党的基础。在整党建党中要吐故纳新。有人说，你们都是老油子，你的党龄比我的年龄还大，还不该吐故？这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说法，这是想为牛鬼蛇神制造滑过去的机会，是办不到的。

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有的人，好象真理在他手里一样，起来代表他们的阶级大声疾呼。嗷嗷叫，哇哇叫，疯狂至极！我看象

人身上长疮一样，不让脓出来，问题就解决不了。同志们不要怕，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地球能不转吗？二十四小时转一圈，一点也不差。不因为你出来嗷嗷叫，甚至抡起胳膊叫，地球就不转了。广大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不因为出几个反派人物，就阻碍历史的前进，历史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没有矛盾，社会就不能发展。敌人挑起这场斗争非常好。你不跳出来，我们找谁斗争？你跳出来，我们一斗争，就推动了社会的发展。那种希望没有斗争的想法，是形而上学的。林副主席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仅仅以为可以用行政手段，经济的方法可推动社会发展，这是唯心主义的方法，是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作法。在座的同志都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解放军，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我们要承担起这样伟大的任务，就是要斗。外国人老是攻击我们中国共产党好斗，其实，不是我们好斗，是你先斗我。林副主席说，事实上你不斗他，他就斗你。所以，我们为了防御要斗争，为了进攻也要斗争。我们现在防御够了，可以进攻了吧！

我们怎样进攻呢？就是要搞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直到斗倒、斗臭。现在，一小撮阶级敌人贼心不死，阴魂不散，接过革命的口号，疯狂进行反扑。有人问，为什么现在重新发表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就是毛主席最近指示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要斗，要批判刘少奇和他在各地的代理人。这样，就有学问了。这样，才能提高路线觉悟。要斗，就要清理阶级队伍，把牛鬼蛇神和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家伙一网打尽。但是，总会有个别漏掉的，而且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还会产生新的。再产生新的，再揪嘛！再斗嘛！

有人说我们光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两报一刊”的社论中讲，现在正在进行的斗、批、改，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路线斗争的继续。怎么能说我们不讲路线斗争呢？是你们不讲路线斗争，你们把钻到造反派当中的坏人，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都说成是好人。这是什么路线？究竟是谁不讲路线斗争？是你不讲还是我们不讲？

我再说一遍，把王新同志的讲话很快地印发给大家，满足大家的要求，供大家讨论，很好地把这些问题弄清楚，认清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刘建勋王新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记录稿，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秘书组】

刘建勋讲话

王政委给会议作了总结，讲得很好。我再简单讲几句。

我们这次会议，根据元旦社论精神，就是要坚决落实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以战备为动力检查斗、批、改，推动斗、批、改。我们一定要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把斗、批、改和战备联系起来，把本职工作和全局联系起来。共产党员不能光看到自己鼻子底下的事情，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中国是世界革命的红色堡垒，我们不要辜负世界人民的希望，我们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彻底埋葬帝、修、反。加强战备，不是临时的措施，而是长期的任务，这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一定要革这个命。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树立世界革命的观点。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我们要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武装头脑，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

王政委讲话中，总结了我省一年多来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总结过去，是为了提高认识，今后不重复那些错误。有的同志运动初期支持了造反派，这是正确的，但革命发展了，到现在还支持一派，甚至笼统地说：“支持造反派就能站住脚”，这是错误的。林副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对于两派革命群众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一碗水端平。一些同志为什么老支一派，不从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而是按“老皇历”办事，把某一历史阶段的经验固定起来。我劝同志们都要学一点理论，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头脑，提高继续革命的觉悟。这样，才能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再一个问题，就是要注意政策，要有政策观念。农村整党搞得比较早，成绩是很大的。但是按照毛主席的“五十字”大纲来衡量，还需要进一步整顿。过去

没有看到的问题，蹲点以后看到了，但头脑不要太热，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需要划走资派的人，只是极少数，多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把犯有资本主义倾向错误的人和走资派区别开来。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讲清道理，提高觉悟，改了就好。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多作教育工作。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用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的办法。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要过细地做工作，不要大轰大嗡，光开大会，喊口号，哄一哄不解决问题。可以先支部揭发，再吸收贫下中农参加揭发，有步骤地进行。总之，既不要放过真正的敌人，也不要犯错误的好人扩大为敌人。

机关革命化是个大问题，也提请同志们注意，要逐步加以整顿和改造。首先把现在没有工作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去，经过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将是一批积极的力量。现在在机关工作的同志，要实行“三三制”。群众代表不要脱离生产。有些工作人员原来是各派推荐的，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人物，现在看来，这些人中有的派性很大，要加强教育。

这个会开的很好，对推动全省的工作，大有好处。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新的一年里，夺取更大的胜利。

王新讲话

这次工作会议，开得很好。同志们通过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政治报告和元旦社论，进一步提高了对总形势和总任务的认识，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明确了斗争的大方向。同时，发扬了自我批评的精神，增强了党性。同志们发言很好，给我很大启发和教育。

今天会议要结束了，我讲几点意见，不正确的地方，请刘政委纠正。

一、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继续革命的大方向

林副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就讲过：“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这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作的精辟的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老老实实地照毛主席指示办事，这是夺取一切胜利的根本

保证。这一点，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体会是很深刻的。不管那个地区，那个部门，或是个人，凡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方向肯定是正确的，成绩肯定是主流，错误只是支流；谁稍微跟得不紧，工作就受损失；谁违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就要犯方向性的错误，甚至造成犯罪。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对林副主席的指示也应当是这样。

我们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有一个反复学习、反复实践的过程。我们经过这段实践，重新学习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和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感到更为亲切。

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是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根据整个革命历史发展的进程提出来的。他不但给我们提出了总的战略任务，同时还提出了每一个革命发展阶段的战略部署，指明了继续革命的方向。整个革命历史的过程是如此，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也是如此。从十二中全会到“九大”，从“九大”到现在，多数同志跟毛主席战略部署是比较紧的，工作成绩就大，形势就好；有的同志在一个阶段跟得紧，在另一个阶段跟得不紧，甚至背离了毛主席指示的方向，结果就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说，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继续革命的大方向。

怎样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是考验我们忠不忠于毛主席的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根本态度问题，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刘建勋同志：对待毛主席的指示，一种人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立场上，对最高指示，各取所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另一种人脱离实际，不用毛主席指示指导自己的实践，整天忙忙碌碌，抓不住本质，这也不可能正确理解毛主席的指示。）

紧跟，就是要雷厉风行。毛主席的战斗号令发出以后，要拚命落实。这一点，县里多数同志是做的好的，有的却不怎么好。有些地方直到现在干部下放还是原封不动，你紧跟什么！（刘建勋同志：有些人是“入党做官”。抵制下放，你不敢动他一根毫毛。毛主席最高指示，为什么不执行，你在那里干什么，这就是不敢革命嘛！）斗争肯定是有的，问题是你究竟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呢，还是屈

服于某种压力？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对毛主席、对毛主席战略部署的态度问题。

我们对人、对事，都要用毛主席思想，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衡量什么是革命的，什么是不革命的，什么是反革命的。这是唯一的标准。有的人光听小道消息，就是不听毛主席的。有些入学习，不去学真正的经验，而是学些歪经。（刘建勋同志：要看真理，不要只。看势力；要看方向，不要只看风向。）

元旦社论指出：“新的—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用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推动斗、批、改，检查斗、批、改，戒骄戒躁，更好更快地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在新的—年中，我们要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明确斗争的大方向，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

要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要下苦功夫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副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下苦功学习研究才能获得，不是凭聪明才智或者单凭经验可以获得的。”“要勤学多练。多练，就是反复地学，学深学透，联系实际运用，不要学—下就过去。”就是说，毛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要反复学习，反复实践。我们一定要抓住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法宝，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二、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和雨条路线斗争，排除“左”右干扰

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过程，是排除右的和极“左”的错误思潮干扰的过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解决阶级矛盾、进行阶级斗争的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就是解决阶级矛盾、体现党的路线的政策。在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和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阶级敌人的破坏，也必然会遇到革命队伍内部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所以每当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革命每深入—步。总是出现—些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阶级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就遇到了错误思潮的干扰；后来贯彻十二中全会精神，也有错误思潮的干扰；党的“九大”以后，也有错误思潮的干扰；进入整党后，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又遇到了右的和极“左”的思潮的干扰。（刘建勋同志：整党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有右的干扰，也有极“左”的干扰。不开门整党，不相信群众，想马马虎虎地整党，是右的表现，对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也是一种右的表现。也有极“左”的干扰，这就是把党和群众团体等同起来，甚至把群众组织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他们把自己说成是百分之百的革命派，必须吸收入党，否则就说“压造反派”了，这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实质也是右的。）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可看到，每当重要关头，都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在这些重要关头，我们有些同志又往往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足。（刘建勋同志：毛主席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以后，工宣队、军宣队刚刚进驻上层建筑领域，触动了一下资产阶级派性，有人就说是“压了造反派”。什么压了造反派？只是把他那个小山头碰了一下，就叫起来了。十二中全会指出，文化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又出现了“多中心”的干扰。可是，有些同志对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搞斗批改，不那么理解，抓住某些缺点，无限上纲，说“压造反派了”，“复旧”了。你的资产阶级派性那么大，把你的派性搞掉就算复旧？所谓“反复旧”这个口号，很适合一些有资产阶级派性的人的口味。贯彻“九大”精神时，我们遇到的问题，实际还是那时所谓“反复旧”的继续。省直机关有些造反派头头，资产阶级派性发作，还要我们支持。我们怎么能够支持？我们不仅不支持，还进行批评教育。现在整党中间有些同志不敢抵制错误思潮，不看够不够入党条件，就吸收入党，这是很错误的。这种不坚持党性原则，拿“党票”送人的情况，是不能允许，不能容忍的。当然，积极要求入党是好事情，但是不能用威胁的办法入党，认为造反派是当然的党员。这种倾向，我们要坚决抵制。）

我们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认识不足，不是新动向一露出来就能抓住的，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我也是这样。我们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传达贯彻十二中全会精神时，当时到底思潮有什么变化，开始也闹不太清楚，现在看来，还是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认识不够。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来。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革命队伍内部的各个阶层、各个集团，他们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情绪，必然有不同的反映。不能光看前一段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紧，但是有些人到了另一个阶段，他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情绪就可能有很大变化，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刘建勋同志：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人，有的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掉队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的搞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能够跟得上，可是搞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就不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不很理解。问题的关键是，只要紧跟毛主席，没有私心，一心一意为革命，不为个人，不为保自己，总是比较容易接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闹私字，就容易走到邪路上去了。有个工厂，一些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最近写了一些文章，表面上引用了好多毛主席语录，还讲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他们玩的是两面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企图以一台机器不生产来压军队，叫中央点军队的名。这能算是革命派吗？这是两面派手法。当然，多数是好的，少数人确实变坏了，或在向坏处发展。）

从实践斗争中看，右的和级“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歪曲革命口号，歪曲毛主席的指示。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你说搞政治建厂，他们也抓政治建厂，但却是在这个幌子下干些不可告人的坏事。（刘建勋同志：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厂，有的人提出“打一场政治建厂的硬仗”，“重振造反派的军威”，实际上，他打硬仗，就是打所谓“反复旧”的硬仗，重振军威，就是重新打旗。）另一方面，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所谓形势，就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对形势作出错误估计，把本来是大好的革命形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形势，他们歪曲为形势不好，“复旧”了。因为对形势估计错了，所以提出的一系列方针、任务、政策都是错误的。（刘建勋同志：他们提出一些错误的口号，什么“‘反复旧’是革命口号，要年年提，月月提，天天提。”真正的复旧我们要反，但是他反的是什么复旧？他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怎么能够支持，不仅不能支持，而且要坚决反对！）本来大方向是正确的，工作中的缺点是支流，但是，他们却抓住百分之二的问题，反对百分之九十九的

成绩。抓住支流，否定主流，抓住个别问题，全盘否定。这样，自己就走向错误的道路。

排除错误思潮的干扰，就要坚持革命，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回避矛盾。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你不斗它，它就斗你。如果不坚决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资本主义就必然复辟。整党中也有这个问题。如果回避矛盾，资产阶级派性就泛滥，他们就混淆是非，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所以不能回避。政治上的坚定就是要对不正确的东西进行斗争，对不正确的东西不起来斗争，就等于发现了敌人自己则临阵脱逃，放弃阵地。这是考验一个人对革命是否负责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我们在整党中一定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坚持革命原则，敢于揭露矛盾，用毛泽东思想战胜各种错误思想。

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首先要解决各级领导班子问题。同志们讨论中讲的很多，在领导班子本身，如果有“左”右错误思潮的干扰，首先要敢于革命，解决领导班子中的问题。这次有几个县的同志检查的很好，有的同志表示回去把盖子揭开，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态度是对的，不然就不能率领广大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我们党的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应当是忠于毛主席，相信和依靠群众，自己能够进行革命化的领导班子。不要有问题掩盖起来，而应当自己能革自己的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才是朝气蓬勃的表现。特别是军队支左的同志、人武部的同志更要带头搞好思想革命化，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团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其所以朝气蓬勃，就是因为我们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否则，我们的党就有可能成为腐朽的萎靡不振的机会主义的党。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县以上领导班子，首先要在自己内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深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自觉地搞好思想革命化。

我们有些单位落后了，落后在那里？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在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中，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排除“左”右干扰做的差。所以就落后了，拖拉机厂就是这样。（刘建勋同志：我们办了五百人的学习班，问题一揭开，就是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干扰，你一批评他，他就说你“压造反派了”，“老保翻案了”。这样，站错队的群众不敢动了，干部也不敢动了，结果生产上不去。现在把问题一揭开，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

人的积极性起来了，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看来，只要方针政策对头，敢于揭露矛盾，敢于同“左”右错误思潮作斗争，问题不难解决。)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上就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敢于和善于向“左”右错误思潮干扰斗争，这个工作做得好，形势就好；不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不敢于和不善于向“左”右错误思潮斗争，你那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潮就要泛滥，阶级敌人就会破坏，形势肯定不会好。

三、要正确对待群众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要巩固我们的政权，必须遵照毛主席这一伟大的教导，依靠工人阶级，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采取四大的方式，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起来揭露坏人，挖出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起来革命，当时有的同志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革命行动，犯了错误。至于一部分群众一度站错了队，大都是受了蒙蔽，是认识问题。毛主席视察三大区，发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最新指示发出以后，有的干部不是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而是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因而破坏了革命大联合，干扰斗、批、改。有的同志只当革命的动力，不当革命的对象，群众起来造他的反，他很反感，死拉一派群众保自己，压制对方，这是很错误的。对于来自群众的批评，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的意见就检查改正，不对的也不能同群众闹对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群众分了派，必然有拥护你的，有反对你的。对反对你的群众不要有反感，而要找出原因，适当的解决，对支持你的群众，你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要不分是非，一概支持。对待群众的态度，就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关就过不去。有的同志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

的根本区别。”我们共产党要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不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你不进行阶级分析，而是以我划线，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对另一部分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就必然犯错误。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是非，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片面的、静止的去看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支持造反派，因为他们代表着革命的大方向，他们是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造反派也是不断变化的，大多数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有少数头头就是一直在犯错误。如果不加分析地仍然什么都支持，实际是支持错误。有些人这样做的时候还美其名曰“关心群众”。实际上他是害了群众，把群众引向错误的道路上去。

有的干部不坚持党的原则，带头搞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只要拥护自己，好坏人不分，好坏事不分，什么都支持，不是用毛泽东思想衡量是非，这就是结党营私。有一个单位，提出叫一个开除党籍的坏人当整党领导小组组长，明明白白知道是坏人，也要支持，我看这样的人就要打倒，这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刘建勋同志：不要团结拥护自己的坏人，也不要排斥反对过自己的好人。要团结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对反对过自己的人不能耿耿于怀，象我们这样的人，反对一下有什么了不得！）在干部队伍的建设和，一定要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林副主席提出的“三条标准”办事。在领导班子中安插坏人，招降纳叛，这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条件。这决不能允许。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有少数人确实是这样。有些人还认为这是群众观点，这是什么群众观点？实际是资产阶级的观点。群众观点，是有阶级性的。有些同志不敢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领导，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对资产阶级思想和错误的倾向，不敢争，就是不敢革命的表现。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是“三条原则”、“九个一样”。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批评教育，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揪出来，斗倒、斗臭。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体现了我们党和群众关系的基本原则。我们要好好地学习、运用。

要加强党的领导，就要提高政策观念，要教育群众，照毛主席的政策办事。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我们搞两条路线斗争，总是要通过具体政策来体现的。

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党的各项政策，总的题目就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我们党各项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管整党也好，反资本主义倾向也好，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也好，都要按照无产阶级的政策办事。在整党中要突出党的教育，在我们党内斗争中，要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这里面有很多具体政策界限，要分清整党和清队的政策界限，分清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一般群众的界限。（刘建勋同志：要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区别开来。）在农村中，不要把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小自由统统看成两条路线斗争，不能把有一般资本主义倾向错误的人统统都当成走资派。走资派是有的，这是极少数。

总而言之，要有区别，有区别才有政策，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同时，要和风细雨，不要简单粗暴。（刘建勋同志：不能打人，不要“坐飞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在整党中更应该注意这个问题，要使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条条落实。

四、进一步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组织，思想和作风革命化

组织革命化，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精兵简政”。从全省来说，这项工作做得是好的，但有的地方并没有真正把干部放下去。我们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把干部放下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下放的干部，要加强管理教育，尤其对下放到农村的干部，各县革委会要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去抓，这是党的一大批财富。对已经下放的干部，不要轻易调他们出去工作。（刘建勋同志：不要轻易启用，锻炼二、三年，表现好，群众欢迎的，我们可以调上来工作，把在职干部放下去锻炼，进行轮换。在精简下放工作中，发现有的地方“开后门”，通过熟人安插工作。广大干部下放锻炼，是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极好机会，你却随随便便把人家调上来，这正好符合一部分同志“入党做官论”的思想，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各级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加强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前一个时期，不少办事机构中，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很大。

如果革命委员会内部有资产阶级派性的反映，就要直接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的落实。那里存在这个问题不坚决纠正，将来就可能犯大错误。这样的政权就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就不是无产阶级政权机构，而是资产阶级派性机构。（刘建勋同志：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官僚主义，不亲自动手，重大事情也托别人办，实际把自己架空了！有的单位叫那些派性严重的办事组指挥运动。指挥什么运动？无非是压一派。有的单位叫那些派性严重的政工组掌握人事大权，把自己一派的人安插得到处都是。除了他们有派性，自己负责以外，你作为领导干部在那里干什么呢？无非你是死官僚主义，或者你就是资产阶级派性的头。）

在各级领导干部中，要反对干劲不足，反对骄傲自满情绪。林副主席提出的选拔干部的三个条件中，就有一条是革命干劲。没有革命干劲的人，就不可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该斗争的不敢斗争，该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不去做，该革命的不敢革命，还谈什么继续革命。所以，有没有革命干劲，是衡量一个人继续革命觉悟高不高的重要标志。你没有革命干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在那里？毛主席的“五十字”建党大纲，规定了我们党的生活应该是朝气蓬勃的。朝气蓬勃就是要有革命的精神，战斗的精神，为党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我们有些同志，革命干劲不足，无所作为，认为“中游保险”，这不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拖拖拉拉，困难重重，什么事情也办不了，这是懦夫、懒汉的思想。还有一些同志，工作上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骄傲自满，对自己不是一分为二，而是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爱听奉承话。我们要很好的警惕这一点。每个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应该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向党伸手。有的人有私心，向党伸手要官做，争当书记、副书记，还鼓动一部分群众给自己争官。（刘建勋同志：这种人没有好下场。）新老干部都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正确地对待自己。不要把自己估计过高，夸大个人作用，以为你那个单位离开你就不行，头脑发胀，有这个错误不改，就会走向反面，我们千万要警惕。要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解放军要虚心向革命的老干部和革命群众学习，坚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谦虚谨慎，主动搞好革委会的团结，主动团结好新老干部。个别团结状况不好的县，要迅速加以改变。我们发现郑州有的工厂在建立新党委过程中斗争很激烈。（刘建勋同志：国棉六厂建立新党委的过程中，斗争非常激烈，“左”的右的都

联合起来，反对新党委，企图搞垮新党委。六厂党委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这是很好的。我们就是要迎着矛盾走。要敢于斗争。不能退却，不能绕着矛盾走。整党结束了，阶级斗争还存在，不能有松口气的思想。）我们要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尤其是老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要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加强请示报告，有的单位，对重大问题，不向上级请示报告，这就是大错误。

在新的一年里，解放军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同志要作出新的贡献，现在工作很多，任务很重，要安下心来，抓战备，搞好斗批改，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战场准备，就是要建立好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以战备为动力，搞好斗批改，民兵工作也就搞好了。（刘建勋同志：不能孤立地去抓民兵工作，一个地方的领导班子被坏人篡了权，民兵工作就不会搞好，民兵工作一定要抓根本，不能离开当地的斗批改。）不要作表面文章，不要搞花架子，要扎扎实实、深入细致地去做工作。

（潢川县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翻印）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七日，王新在河南省通许县的指示

〔王新：河南省军区政委、河南省委负责人〕

听了县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否可采取集中办学习班的办法解决。又听了先进队东赵亭大队的汇报，那里的革命、生产形势不错。又听了后进单位关于四清翻案问题的汇报，这个问题确实突出。

一、对通许形势的看法问题。

广大群众和干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在斗批改的运动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些单位的工作是出色的，昨天参观的东赵亭大队就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大队，孙营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发展是不平衡的，要一分为二，有好的、中间的、差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许县与全国全省比，看来速度是慢了一些。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以后，你们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得不紧，从前进的方向看，是落后了。落后到什么程度？不承认落后本身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对一些问题认识的分歧，说明了你们对问题的看法不一致。

障碍毛主席指示落实的还是对通许形势的看法问题。今天上午揭露出来的矛盾，说明对形势看法的不一致。通许县确实有严重问题：（一）“反复旧”问题。十二中全会后，我们省有些人搞“反复旧”。你们县革委作出决议搞“反复旧”。作为县革命委员会作出决议搞“反复旧”，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你们在全省独一无二的一家。（二）争党权。整党中违犯毛主席建党路线，放弃党对整党工作的领导，让一些头脑发胀的非党群众领导整党，批支部，批党员，采取突击的办法搞整党。争党权，“吐疏纳亲”，干扰毛主席“五十字”建党纲领的落实。实际上是反复旧的继续，只是变了一个形式。有些县，有这些现象，是抵制不力，你们县是有某些领导支持，所以搞起来了。（三）四不清翻案，你们比较普遍，没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以四清划线，反四清的是好的，不反四清的就是不好的，这是什么党的原则？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有规定，保卫四清伟大成果，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你们县搞的乌烟瘴气。四不清干部反攻倒算，四清积极分子受打击报复。四清运动中处理个别有出入的，可以在整党后期来处理。但是，你们支持翻四清的案，这是不允许的。（四）对青年干部不是关心培养，帮助他们克服错误思潮，执行毛主席“三不脱离”的指示，而是搞糖衣炮弹，毁坏了他们。你们还搞私招乱雇。这些现象反映你们有些领导成员不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不能代表革命群众利益，你们是心血来潮，胆大妄为。你们违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还说你们胆小怕事，求稳怕乱。你们怕的是资产阶级利益受损失，怕毛主席指示落实，怕丢官。你们“勇敢”的很！你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冲锋陷阵。中央不说招收工人，我们省革委一个也不敢招收，而你们敢。你们叫群众领导整党，我们不敢，你们胆大的很。我就想不通你们胆小在那里，你们是拿胆小作借口，掩盖胆大，你们胆很大怎么说胆小。再胆大大到什么程度！你们的胆不小，你们革委会胆不小了。你们这里违法乱纪的、腐化的、搞女人的可以入党做官。还好象压得你们喘不过气。太不公平啦。所以说落后了，最根本，最关键的是有些老干部、军代表不能很好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抵制错误的思潮。你们给下层干部和党委制造了很多困难。真是象你们反复旧“文件”中说的“形势大好，问题不小，发展下去，危险很大”。不过各有所指。我们一个老干部、军代表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对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抱什么态度？

为什么毛主席指示不能执行！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可以执行？你们要在适当的时候彻底清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很好的提高。希望同志们很好的学习，对自己要一分为二，要从实践中看自己那些作对了，那些作错了。空话是没用的，实践是最无情的。希望同志们很好的学习，敢于革自己的命，领导班子达到“五统一”。

二、关于“一打三反”运动问题。

贯彻中央三个文件，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宣传、大揭发、大批判，特别是县直机关，一定要搞彻底，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搞透。人员要适当集中，彻底揭。揭出的案件，属于敌我矛盾的要认真批斗，老的分子有新的罪恶要批斗，新的反革命分子批斗更有教育意义。不管你是那一派，有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有什么罪就算什么罪。要完全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把敌人批倒批臭。证据要确凿、要准、要稳、要狠。经济问题一样。“一打三反”运动，要搞彻底，你们县的运动和整党，地革委要把关。这里派性严重，阶级敌人插手，混水摸鱼。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落实。这个仗一定要打好，要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出现四个情况。

（一）涌现出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是好的。（二）由于世界观改造的不好，犯了这样那样做错误，要教育。（三）有的中了糖衣炮弹，腐化了，严重的违法乱纪，但够不上敌人，不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这些人要在适当的场合进行揭露和批判。犯有一般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要教育，不要脱离当前阶级斗争的现实，单独处理，但他们包庇了阶级敌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四）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揪出来就是了。他们根本不是群众的代表，要把他的造反的假面具摘掉。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要把混进的坏人和严重违法乱纪的区别开来，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要很好的揭发批判。你们县革委给一个群众代表的父亲、关押释放犯送棺材，把县革委的名誉丢光了。还有什么威信？社直力量来不及，可以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分期分批搞，一次搞他三分之一也可以嘛。

三、关于整党建党问题。

抓整党建党，抓领导班子，抓战斗堡垒。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基层，这是根本任务。这个基层就是基层党组织。抓领导班子，不要与抓整党脱离开，不要与抓阶级斗争脱离开。通过抓整党，抓阶级斗争，深入完成斗批改，

要很好地搞，先作调查研究。你们的整党单位，不够整党条件，必须很好复查才行。有的支部不能算，要把整党和一切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抓领导班子革命化，抓整党建党，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带起来。

组织上的吐故纳新，要进行复查。当前主要是学习好党章，不要孤立的抓生产，要通过革命化来促生产，不要“言不及意”。

四、领导同志要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不调查研究下边情况不了解，上边精神吃不透，吊在空中是不会长的。要脚踏实地认真作好调查研究，大体上作到心中有数。特别是军队同志更重要。不调查，中央的方针政策就落实不了。你们通许条件很好，只要矛盾揭开，很快得到解决，立即就上去了，广大群众是好的，希望同志们很好地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就站住脚了，对人对事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干扰往往集中在对人的看法上。人与人是阶级关系，没有个人恩怨。你老康咱并不认识，没有什么恩怨，搞个人势力，宗派势力的，没有一个不垮台的。

今天批评了你老康（康允周），如果你能改正，把通许搞好，我们是欢迎的。

（×××讲到我们虽然认识有分歧，但大家的心愿还是想把工作做好的）。

我们的工作都是革命事业，阶级事业，不能说不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心愿是好的，还是想把工作做好的。表态是空话，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那有群众。讲话办事都不能抽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王新在河南通许县核心组会上的插话

（当汇报县革委会曾作出“决议”反复旧时）插话：我是很注意反复旧的。当时见到一个文件，或者是一张小报，你们县一位姓康的搞反复旧，当时我叫他靠边站。不知是不是你？（指康允周）

（当汇报到粮食局非党员抓整党时）插话：你们的整党得重新审查。

（汇报到马百顺入党时）插话：你们批准坏人入党，你们建立的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为什么这样的坏人不敢斗他？要揭露他，批臭他，支持坏人也搞什么革命。

（当汇报到县革委五十四人中，群众代表有十三人时）插话：谁在这里不执行中央的指示？省革委讲了多少遍了，在你们这里就行不通，你们这里是独立王

国，谁在这搞独立王国？要狠狠批判他。你在这搞糖衣炮弹，毁坏青年。你搞反复旧代表谁？谁在党内拉势力保自己的官，首先要打倒谁。

（当康允周同志解释县革委反复旧问题时）插话：你讲那么多过程干什么？具体问题可能有出入，搞女人也会有很多情况。总的是你搞了反复旧，你不要搞那么多诡辩，对我们还搞这一套干啥？枝节上可能有这样那样出入，但是有个基本的思想，基本的立场。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很多，但一看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的东西里边可能有拥护的，这里边有个倾向性的立场。一篇文章一万字，七千是反对的，三千是赞成的，反对可能是前提，实际是赞成，你跟我们搞这一套干什么？很简单，实践证明你这一段方向不对。那里还听你那么多具体的东西，你和王甲军一样，他也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批评反复旧的，他的批评是为了更好的反复旧，屁股蹲在他那一边了，一切都错了。不从立场上转变就转变不过来，你灵魂深处私心太重了，有私心总想拉一派势力保你作官，搞私心的总是没有好下场。革命是靠毛泽东思想。张国焘比你势力大得多，最后还是垮了台，你掌了权，再加上你那一伙子，通许县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你建立的党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有些老干部开始并不是支持造反派的，中央表态后，好象他最革命，每个重大问题他都要支持错误思潮，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些人比站错队的品德还坏。叫你掌权就是最大的复辟。历史是无情的。你想改造党，改变政权。反复旧全省你是拔尖的。

（当汇报到通许县不乱时）插话：乱，比你这不乱好。印度不乱就好？我们中国搞革命乱了几十年，就不好？主要看你是无产阶级乱了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乱了无产阶级？你们光兴资产阶级乱无产阶级，和平演变得更厉害。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一日，王新在河南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

刘政委要我来讲一下，遗憾的是没有亲自听到同志们的发言，只是看了一些材料，就没有直接听讲用感受深刻。

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鼓舞下，经过全体代表同志们的努力，今天就要胜利结束了。让我们热烈地祝贺大会胜利成功！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两天，大家认真学习了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全面总结了党的“九大”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指出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伟大战斗号召，我们坚决拥护，坚决照办。我们要立即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大宣传、大学习、大落实的热潮。全会号召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是全会给我们指出的总的奋斗方向、总的奋斗目标。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响应全会的号召，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在这次大会上，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五千多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先进集体的代表，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总结交流了党的“九大”以来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经验，热烈赞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热烈赞颂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热烈赞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通过典型讲用和全体代表的热烈讨论，充分反映了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水平、新成就；集中表达了全省军民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努力攀登思想革命化高峰的强烈愿望。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的一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传经送宝，互相学习，为大会增加了新的光彩。这次大会，使每个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境界有了新的提高。这次大会的先进经验传播出去，推广开来，必将把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必将对我省各项工作发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清算了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亿万革命人民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正如林副

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

党的“九大”以来，在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活学活用的自觉性越来越高。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狠抓根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带头用。工厂班组、家庭院落学习班普遍兴起，这种组织形式很好，便于更好地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便于抓活思想。今后要继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工厂班组学习班的经验。城乡大多数单位，天天读、讲用会、批判会开始形成制度。广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毛主席语录》随身带，随时随地学起来。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学习，立即行动。紧密结合现实阶级斗争，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以“老三篇”为座右铭，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紧跟毛主席、坚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自觉性。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斗、批、改。一年多来，全省军民以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为武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同一小撮阶级敌人斗，同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斗，排除来自右的和形“左”实右的干扰，在斗争中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紧密结合现实阶级斗争，认真开展整党建党工作，加强了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特别是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狠狠打击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激发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大革命群众，自觉地把做好本职工作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同支援世界革命、消灭帝、修、反联系起来，为革命做工。为革命种田，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加强了战备。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一批又一批社队粮棉上了“纲要”。今年小麦产量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大多数地区秋季收成也比去年要好。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很快，技术革新层出不穷，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的地方工业取得很大成就。我省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取得一切工作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的根本保证。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狠抓根本，必须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现在，根据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我们的情况，就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讲几点意见。

（一）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方向，就是胜利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林副主席在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指示我们：“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我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坚决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毛主席的指示，拥护不拥护，紧跟不紧跟，照办不照办，这是区分革命和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水岭、试金石。紧跟、照办，对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最根本的立场，最根本的态度，是革命的大节。在现实斗争中，每个人都经受着紧跟不紧跟的考验，都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答。不跟毛主席，必然是跟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然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那一边的

问题。（刘建勋同志插话：这一段话非常重要。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准则来对照、检查。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必然要犯右的和形“左”实右的错误。有些单位的领导人，至今还不是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而是同少数搞派性的人站在一起，支持一部分人压制另一部分人。他们搞整党建党，也是搞派党，搞宗派主义的党，搞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完全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这种人是肯定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应当向人民解放军学习，一切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每个同志都要好好地想一想：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紧跟了没有，照办了没有。是自觉地紧跟、照办，还是迷迷糊糊、懵懵懂懂。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感情不一样，态度不一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就不一样，紧跟、照办的劲头就不一样，革命和生产的形势也不一样。不论哪个地区，哪个单位，哪个部门，凡是对毛主席的感情深，跟得紧，对毛泽东思想肯学肯用，对毛主席的指示坚决照办，那里的形势就好，胜利就大。水泉大队、岳师大队、井李大队、“五四”采煤队、郾城机械厂等单位为什么先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坚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率领广大群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凡是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得不紧，或者一个时期跟了，另一个时期跟得不紧，那里的工作就没有起色，面貌总是改变不大。有些人，口头喊紧跟、照办，实际上却不落实，不兑现。还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小团体、小山头的利益，搞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使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工作要比别的地方落后一年，人家那里一年生产就翻了一番，他还在那里压制群众，搞派性。（刘建勋同志插话：大家都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有些人却在那里搞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有些小单位是如此，有的大单位也是如此，不紧跟、照办，总是要落后就是了。所有先进单位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好，紧跟、照办的好。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广大群众，就能创造奇迹，推动历史前进。）这些人如果不改，肯定要垮台。历史的结论是无情的。我们每个革命同志，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立场上，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学一

点用一点，用，就是要革命，要落实，做到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不断加深理解。

（二）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头脑，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不仅要有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愿望，还要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为什么要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和怎样革命。这样，才能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认清方向，分清敌我，不断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有些人为什么在文化革命初期自觉不自觉地犯了错误呢？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四个存在”不理解，对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不理解，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怎么个革法。有些人还是用民主革命的观点看问题，因此就看不到当前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跟不上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形势。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新党章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我们要深刻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国际上帝、修、反的存在，它们总是妄图对我国进行武装侵略和颠覆，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教导我们：“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国内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在政治上伺机反扑，在经济上向社会主义进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特别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采取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篡夺领导权，在党内寻找代理人。这是我们应当特别警惕的。在农村和工厂，都有这样大量的事实，正如同志们所说的：“阶级敌人用形形色色的糖衣炮弹打我们的核心力量。”结果，有的单位人没有变，政权的性质变了。（刘建勋同志插话：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明火执仗地拿武器和我们干不行了，地主直接掌握政权不可能了，他们新的反革命策略，就是搞“和平演变”，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他们施放糖衣炮弹的办法多得很，今天给你送点菜，明天给你拉车煤，吃

喝拉拢，你哪里痒他就往那里挠。还有的干部认干亲，拜把子，包庇坏人坏事。这样，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渐渐的被演变过去了。虽然人没有变，政权的性质变了，代表资产阶级了。）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流毒，狠抓战备落实，狠抓对敌斗争。要根据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严格掌握对敌斗争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刘建勋同志插话：区分两类矛盾很重要。反革命分子同我们是敌我矛盾，要批判，要斗争；贫下中农之间、工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动武。领导机关和广大群众的矛盾也有两类，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广大群众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这种走资派要批判，要斗争；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同群众也有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对革命委员会有意见要提出批评，但不能采取对待走资派的办法。）

我们要深刻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大量的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条重要规律，就是在政治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长期的坚持不懈的阶级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动能量，腐蚀人们的灵魂，向无产阶级进攻。我们必须牢牢掌握革命大批判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各种表现，批判“四旧”，以革命的精神力量彻底摧毁反革命的精神力量。我们一定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三）用毛泽东思想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领导班子就是政权。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是个决定一切的大问题，是劳动人民得到一切或丧失一切的大问题。有了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革命干劲的领导班子，就能够保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就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能够朝气蓬勃地率领群众向阶级敌人战斗，不断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教导权掌握在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人手里，掌握

在害怕矛盾、不敢斗争的老好人手里，或者掌握在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人手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得不到很好地贯彻执行。领导权如果被那些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人掌握，就会把我们党的政权、阶级的政权，变成个人的、宗派的、资产阶级的政权，变为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

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带头人首先要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搞好思想革命化的带头人。当前，有的领导班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很差，不肯学，不肯用。带头人不带这个头，就没有资格当带头人。我们要善于辨别什么是党的领导，什么不是党的领导。有些人把自己个人主义的领导，资产阶级思想的领导，错误路线的领导，说成是党的领导，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在那里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对于这样的人，我就赞成群众起来抵制他的错误领导，大鸣、大放、大字报。不然的话，那里的政权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必须在斗争中化。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领导班子中来。社会上的坏人坏事，资本主义倾向解决不了，总是同领导班子内有人同情有人支持或有人参与分不开的。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党内矛盾的理论，在领导班子内开展积极的斗争。领导班子对自己的工作要一分为二，对存在的各种矛盾，必须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能混淆是非。有矛盾就要揭露，就要斗争，不能掩盖，不能回避。掩盖矛盾，回避矛盾，就是害怕斗争，不敢革命。矛盾是客观事物固有的东西。有矛盾，有斗争，才有事物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就是要观察、分析事物的矛盾，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要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党的路线、政策都是为了回答和解决各种矛盾的。不敢揭露矛盾，不敢搞阶级斗争，党的路线和政策又有什么用处呢？各级领导班子，要经常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开门整风，揭露矛盾，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这样，才能在革命化道路上不断前进。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必须在群众中化。各级领导成员要做到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不脱离

实际，必须从思想上真正解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问题。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这一条教导，树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勤务员，不能做官当老爷。各级领导成员要经常深入三大革命第一线，同广大群众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一同参加劳动，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遇事同群众商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接受群众监督；关心群众利益，执行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辉县革命委员会、沈丘莲池公社张文祥同志深入群众、联系实际的作风，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确实有少数单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横行霸道。有个公社革委会的领导同志，那里本来收成不好，他却规定三条：留够自己的口粮；完成上交任务；不许逃荒。这不是要把群众置于死地吗？

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是权中之权。整党建党，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领导权的问题。要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并且把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放在第一位。经过整党，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项标准，本着军、干、群，老、中、青两个三结合的原则，把那些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选拔到领导班子中来，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三忠于”的人手里。

（四）以“老三篇”化灵魂，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毛主席又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彻底改造世界观的任务越来越突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一个“公”字。改造世界观，就要不断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做到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

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许多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事迹，无不闪耀着“公”字光辉，都是用毛泽东思想化灵魂、自觉改造世界观的结果。

我们这次大会上讲用的周牛套、王英洲、刘克让、朱德才、纠桂云等同志都是这样的英雄人物。他们为抢救阶级弟兄，抢救国家财产，出生入死，不怕牺牲。有些同志病、伤致残以后，还能够刻苦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朝气蓬勃地进行战斗，为革命做出新贡献。他们无限忠于毛主席，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牢记阶级苦、民族恨，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命根子。他们胸怀全世界，时刻想着地球上还有三分之二的阶级兄弟没解放。他们为革命不畏艰难，为人民乐于吃苦，把个人的生死病痛置之度外。“宁为公字战分秒，不为私字混到老”。他们把“老三篇”看作“公”字篇，作为座右铭，经常学，反复学，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刻苦磨练，铸造灵魂。他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待自己，成绩面前找差距，赞扬声中更谦虚，不断革命，不断前进。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每个革命同志，都要一分为二，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批评，正确对待表扬和不同意见。要密切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用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要活到老，学到老，干一辈子革命，改造一辈子世界观，永远紧跟毛主席。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做一辈子好事，青年同志要把个人一生的历史写得很红，年老的同志要保持革命晚节。

（五）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夺取工农业生产的新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我们要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理论，全面地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支援世界革命创造强大的物质财富。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一系列教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道路，经常注意摆正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 系，坚持用革命统帅生产，带动生产，促进生产。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和群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自觉性大大增强了。大家从斗争实践中体会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办事，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军队打仗，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大炮、坦克，而是毛泽东思想。

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搞生产也是一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是最大的生产力。（刘建勋同志插话：同样的自然条件，人的精神面貌不同，积极性不同，生产面貌也就大不相同。）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同志说起来清楚，做起来又糊涂了。特别是在生产忙、任务紧、困难大的情况下，往往容易转向。他们不懂得，两个阶级的斗争，人们头脑中公与私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为生产忙、任务紧就消失了。相反，越是生产忙、任务紧的时候，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越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人的革命精神，不怕苦，不怕死，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我们要针对干部和群众中的活思想，经常批判那种不问政治的危险倾向，做到在任何情况下突出政治不转向，狠抓革命不动摇。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深入开展经济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方针，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要发动群众大揭经济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深入批判刘少奇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专家治厂、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余毒。“农业学大寨”，工业要执行“鞍钢宪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群众运动。

这次大会的许多先进集体，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贡献，都是由于他们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目前，我省开始出现了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各级领导要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积极领导群众前进，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要把革命精神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要执行党在现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要深入基层，抓好典型，一切经过试验，使工农业生产新高潮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向前发展。

同志们，目前国际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在毛主席五月二十日庄严声明的鼓舞下，全世界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革命斗争空前高涨。美帝、苏修这两个“超级大国”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毛主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同志们，我们要坚决响应九届二中全会号召，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首要的是深入学习贯彻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继续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认真学习两个“决议”，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希望到会同志把这次会议上交流的先进经验带回去，在全省开花结果。省革委希望到会的代表一律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带领群众老老实实学、扎扎实实地用，不搞形式主义的东西。

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搞好斗、批、改，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严格按照新党章的要求，继续搞好整党建党工作，坚决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

我们要狠抓经济领域里的两条路线斗争，推动工农业生产新跃进，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农业主产要以革命的精神，因地制宜的采取有效措施，打好小麦播种这一仗，为明年夏季丰收打下基础，实现省革委五次全会提出的工农业生产发展规划，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同志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新同志讲话

我先讲些意见，同志们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商量，最后由刘政委总结。

第一季度总的形势是好的。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批修整风，“一打三反”，搞政策落实等工作，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的自觉性，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确实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随着各级党委的建立，党的领导的加强，广大干部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进一步加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这对我们全年工作，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精神力量肯定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我省革命和生产，一定同全国一样，出现一个新的形势。刘政委下去看的情况，昨天部分县的同志向我们介绍的情况，还有生产指挥部检查的情况，都说明我们今年第一季度形势是大好的。

第二季度，对全年工作关系很大。同志们刚才一致谈到，要进一步抓落实，认真摸摸下面的情况，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同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集中力量抓一抓基层，这些想法都很好。总的指导思想，还是按照毛主席关于批修整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落实“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精神和省一月工作会议纪要。下面我讲一些具体意见：

一、关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毛主席最近多次教导我们要认真读书，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这在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两报一刊”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文章中，总结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我们全党，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认真读马、列的著作，读毛主席的著作，这确实是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为什么非常强调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呢？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武装的敌人比较容易识破，如果是美帝、苏修来了，蒋介石来了，地富反坏右起来了，我们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肯定会起来战斗，把他们打败，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不会让他们夺去。而最危险的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打着“革命”的旗帜，搞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党的教训就是如此。苏联党的领导权所以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让苏联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上面一变，下面没有精神准备，没有抗毒能力。所以，毛主席指示我们认真读书，让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去年，我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认真读书。目前全国掀起了学习的新高潮，我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性很高，我们领导同志如果不去刻苦读书、认真学习，就不可能在学习运动中起领导作用，这也是前进或者落后的根本环节，如果学习落后了，一切都要落后。我们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高度的自觉性。

要坚持经常学习的制度。中央要求每周不少于两次的学习日，是可以做到的。具体安排，可以从实际出发。比如县里的同志，分散在下面的时候多，除了个人坚持天天读，同下面一起学习以外，每月回来一起学习三天、五天也可以。再就是要办好学习班。有的县办得效果很好，希望同志们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分清那是对的，那是错的，才能提高辨别能力。要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用毛主席思想指导我们的革命实践。联系实际，才能学懂、学活。毛主席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搞阶级斗争，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联系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才能理解得深。当前在学习中，要注意联系解决如何抓好阶级斗争，抓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问题，还必须注意解决干部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注意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中央强调中高级干部要学些马、恩、列的著作，我们县以下的同志，有条件的，也可以读一点马、恩、列的书，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来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比如，当前我们有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着绝对化的毛病，就应当通过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加以解决。这种绝对化反映在政策问题上，就是

他们总想搞个死的条条，做什么都想一刀切，这是脱离实际的，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省里不能搞一刀切，县里也不能搞一刀切。再比如分配和积累问题，生产条件、基础有很大差别，就不能强求一律，只能是大体有个原则。其实，目前提出的关于农村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北方农业会议文件中，原则精神都有了，只要结合实际，很好的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去商量，那些问题都可以解决。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脱开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如果搞成了死的东西，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只要干部把中央文件中那些原则精神搞通了，根据总的原则去和群众商量出具体处理办法，就不会出大的偏差。

根据县里同志反映，办学习班学路线，学政策，效果很好。还应当学党的传统作风，这很有必要。能够使我们的干部，不要打人，不说假话。

至于省积代会，可以从实际出发，把召开的时间适当推迟。

我们常委学习时曾酝酿，打算在六、七月份，请你们和省委常委一起学习七天到十天，一起讨论中央规定当前学习的马、恩、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座谈学习的心得体会。刘政委说，请你们自己先学，到时候再通知。我们大家都要加把劲。我们全省形势如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执行得如何，同在座同志是否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二、关于狠抓阶级斗争

我们要以批修为纲，狠抓阶级斗争，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当前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在各个领域进一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判刘少奇一伙的反动思想，反动理论，在各条战线上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要把批修为纲理解为只是批修整风会议。刘少奇一类的骗子，都是一个思想体系，要在批判修正主义思潮中，把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反动论点，拿出来批判，肃清他们的流毒，这是活的路线教育。有了这个反面的教员和教材，可以鉴别和比较，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能在我们思想上更好地扎根。公开批判时，要严格按照中央的口径。

“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当前进展情况不同。“一打三反”，城市工厂多数搞了，有些单位过去领导核心不好，盖子揭得不够；农村是结合整党进行的，有些大队的盖子揭了，有些大队盖子没揭。要进一步抓紧这项工作。当

前，在几个城市。结合“一打三反”，进行了深挖隐藏的反革命，深挖特务、间谍和清查“五·一六”的工作。要进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要发动群众搞。群众揭发要背靠背，小字报。郑州市有些单位揭得比较深，现在要注意核实材料。要把群众性的揭发和专案调查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把反党乱军、阴谋搞反革命的分子和有“五·一六”罪行的分子，同极“左”思潮相区别，同一般的打砸抢，同被“五·一六”利用的相区别。不要把后者都当成“五·一六”去清，不然就会造成扩大化。但也要防止“一风吹”，对一些较大的问题，都要进一步查清。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过细，要搞准，要实事求是。比如我们省里，有的地方一下子抢那么多的枪，要搞清是什么人在背后支持，这个阴谋怎么搞起来的。这里面真正的坏人是极少数，他不一定要公开出面，多数人是受骗的。所以不能把抢过枪的群众，都按“五·一六”对待。总而言之，要按照中央指示去办，要打得稳、准、狠，要执行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方针。凡公开批判的，材料要落实，先批判罪行，领导上暂不要给定性质。千万不要把一般的材料和没有核对的材料当成定性质的依据，领导上要严格把关。

对已经查清的重大案件，目前可以搞革命大批判，关于杀、关、管的处理，省公安会议以后再实施。

三、关于整党建党的工作

总的来说，就是要落实毛主席建党思想、建党路线。建成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不能马虎，不能走过场，要保证质量。建立党委，仍然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条件成熟一个建立一个。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快一点也是可以的，但是质量第一。党的领导，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一定要按照新党章的要求，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思想上组织上来建设我们的党。过去，有的单位搞派性整党，随便把不够先锋队条件的塞进领导班子，这类单位，都要重新整顿。那种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不能进领导班子。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是关系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能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

关于地、县建立党委问题。县里条件成熟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已经作好了的，可以按原计划建立，一般的是否四月份暂缓一缓。我倾向同志们的意见，四月份多下去，调查了解情况，帮助下边解决问题，不要再把县、社干部往上集中了。

县里班子问题严重的。要首先解决领导班子里的问题，地区、分区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地区一级，四月份做些建立党委的准备工作。有的地区已整过好几次风了，条件基本是成熟的，要认真改正缺点、错误，五月份可以开党代会；有些地、市，还没有很好的开展整风，这一次群众都提了些意见，需要搞些斗私批修。搞过整风的地方，开党代会前，把有关的人召集起来，核心组作个检讨。把代表名额这一套酝酿完之后，向省里写个报告，说明准备情况，具体的事向省政工组联系。党代会可以开短些，主要是检查工作和选举新党委。

机关“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不能忽视，同志们都要把机关搞好。省、地、县有的机关部门，至今还有派性干扰，有的还可能是坏人当道，请你们认真加以解决。机关建设，是个很大的问题，同志们要警惕，从前一段揭发的情况看，凡是机关里是派性头头掌权。一般说县的工作是搞不好的，需要彻底清理，要根据“三不脱离”的原则，该下去的，都要叫他们到自己的生产岗位。有的县反映，他们机关里有的人，在三种场合讲三种不同的语言，分“官话”、“私话”、“密话”。说穿了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客的一套。他们对党组织不讲心里话，只是同自己一伙子才讲；他们把照党的原则办事，叫做“官话”，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是只说不办的。如此严重，不整顿不行。县、地、省到年终总结，机关都要搞大鸣大放，搞思想作风革命化。你不整顿好，有的人就搞资产阶级派性，搞干扰。当然，我们也不要怕，超出原则的事不要办，你只要按原则办事，就鸣放不倒。属于工作上的一般错误就检讨，就改正。

要注意抓好基层。县里主要领导同志亲自下去抓点，以点带面，用典型去指导一般。你多跑几个大队，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加一比较就清楚了。发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工作好的支书现身说法，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千万不要依靠机关写文件、表报那一套来指导工作，要实行面对面的领导，这是活的领导。去春那一批整建党质量所以好，就是因为那个阶段地、县领导同志都下去了。同志们这一段下去，抓一抓基层，这对发展全省的大好形势，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都知道“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我们学习了，就要实行，就要搞实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交给工人、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去贯彻执行，变成广大革命群众的实际行动，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整党建党中，要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干部路线，一定按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去衡量是非。这是一场斗争，而且这个斗争很激烈，不能低估，建立党的组织以后，斗争并没有结束。依然有各种干扰。我们对“左”右干扰都要抵制，一定要坚持中央规定的原则，实行老、中、青结合。有的人，就是我们批判的那种诡辩论，抹杀问题原则性，不坚持毛主席的干部路线，而是拉势力。搞宗派，不惜歪曲事实。各单位建立党的领导班，要注意这个问题，把好这个关。

四、关于抓革命促生产

总的就是要按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讲的，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当前，存在着抓生产“危险”论，有的同志吓得不敢讨论生产问题。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革命同生产的关系，同志们都会讲了，可是有些同志做起来就糊涂了，或者时而清楚，时而糊涂，说明没有真懂。希望同志们注意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经验，对这一方面错误认识要进行教育，不要乱扣帽子。开讲用会时，让干部突出的讲如何抓政治思想工作，如何以政治统帅生产。相信广大群众的实践，好的典型肯定是有的，同志们要注意抓住典型，突破这个问题。

生产中有些关键性的环节，如基本建设、水利上一些大的工程，工业和农业的安排等，这些县以上要主动考虑计划。到大队一级，农业生产上主要搞好种植安排。农业季节性很强，毛主席教导“要不误农时”，这是个重要问题。大队安排得当，一年就有很大增产。今年春耕到了，避免象去年有的地方那样，到处拔庄稼。要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种植方针。在粮食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可以种些经济作物，这同“重副轻农”或“弃农经商”有原则的区别。要因地制宜，要走群众路线，要让群众有点种植权利。生产上千万不要搞强迫命令，不要搞瞎指挥。

县、社办工业问题，计划会议上再具体研究解决。

五、关于克服不正之风

毛主席指示我们，使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如何转为正规呢？就是要发扬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毛主席强调从实际出发。就是要我们主观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的规律性，就是要我们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毛主席强调的要我们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我们走群众路线，就是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所以，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人们的正确思想，就是正确的反映了客观实际，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科学的方法，这是完全建筑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所以，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都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当前，在我们省有些地方突出的有两股歪风，一个是说假话，一个是打人骂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而是剥削阶级的恶劣品质，一定要严肃对待，坚决刹住。讲假话，虚报成绩，隐瞒错误，这完全是造谣言，搞欺骗！打人骂人，是国民党的作风，是军阀主义残余，对待我们阶级兄弟，为什么那么恨？自己到底站在何种立场上？！我们有些干部，因为官僚主义，对情况不清楚，或者因为认识水平低，对某一件事物没有能够反映它的客观实际，反映不那么正确，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个认识问题。反映客观实际只能是近似的，事物有个发展过程，人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故意把假说成真，把无说成有，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就是骗子。这种歪风要搞臭，对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要严肃处理。

下面说假话，有的是同领导作风不民主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领导同志，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一听不符合自己的口味，就训人家。他就得出了经验，你不让他讲真话，于是就投你所好，看你眼色行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民主作风。有不同的意见允许讲，讲得不对再帮助纠正。别人给你提意见提错了，可以解释，但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打人骂人。今后对打人骂人的，打击报复的，要坚决反对，坚决制止，严加处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有缺点，有错误，只能说服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打骂，打人是犯法行为。

要深入抓点，搞调查研究，抓些典型经验。如果老泡在会议室里，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失掉领导能力，还是先下去调查，有了情况、经验再回来开会，才会有好的效果。有了实际情况，批修整风也才能搞好。四月份计划会、公安会占了一批干部，主要领导同志再不下去，就有危险了。千万不要忽视这一点。

在我们干部作风上，要贯彻林副主席指示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性、科学性就是科学分析客观形势，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同时充分认识人

民群众的创造能力。也就是要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革命的朝气，要充分相信人民的作用。最根本的就是要按照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去办，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被群众所掌握，同实际情况相结合。组织纪律性，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按党的原则办事，遵守党的纪律，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不能乱提口号，不能搞无政府主义。

六、几个具体政策性问题

经济方面的政策问题，大家提的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以粮为纲多种经营问题、商业问题，这次计划会议上，根据中央指示的原则，进一步研究解决。一时搞不清的问题，生产指挥组认真组织力量，调查研究，领导同志要亲自抓。

干部队伍的“吐故纳新”问题，以及清队、“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的组织处理问题，省政工组搞些典型调查，各县的同志也注意摸一下。文教、财贸战线队伍的整顿，有关部门也要抓紧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意见，常委讨论，属于我们权限范围内的，尽快定下来。有些要报告中央。

组织处理中，属于敌我矛盾的，公安军管会研究处理意见。属于内部矛盾性质，组织处理要把好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两个关，材料要核实，要严格批准手续。

最后说一点，我们要根据中央三号文件精神，正确对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对我们自己，要一分为二，要为党、为人民立新功。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这样的精神状态，不要怕这、怕那。不要当半截子革命派。当前，有种种的“危险”论，这是革命精神不振的表现。不论在那个岗位上，都要振作精神，积极主动为人民立新功，特别是我们军队的同志，更要注意这一点，不能有临时观点，不然就会给革命工作带来损失。我们每个同志，要有高度的革命事业责任心，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要尽力干好，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是不是有立新功的思想，这是对我们党性强弱的考验。全省、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全世界，正处在革命的高潮，我们的任务很重，一定要把革命干劲鼓足。我们共产党员应当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退却，只能是不断革命，勇挑重担，再立新功。

刘建勋同志讲话

王政委刚才的讲话，我都赞成，请同志们认真研究执行。

原来我们商量，准备最后开个大会，也就是准备明天开，根据同志们提的意见，原则上表个态度，有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回头常委再研究。我看了同志们提的意见，感到主要问题还是上次整风会提的那几条，只是具体事例增加了一些。上次整风会你们都参加了，耿起昌同志已经代表省革委核心组作了检讨，这次我再讲还是那些。正如同志们说的：“上次整风以后，老错误没来得及改，新错误没来得及犯。”请你们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如果需要再作检讨，明天就开大会，（大家表示：不需再检讨了。）如果不需要再作检讨，就不开大会了。明天把王政委的讲话传达一下，安排一下你们的工作。这样，回去以后就不要开会了，四、五月份都下去。你们安排工作以后，如果没有什么新的问题就散会。

请大家务必向同志们讲清楚，同志们会上提的意见，我们还要整理研究。

整党建党工作，“九大”前的确抓得不好。从指导思想来说，那时候新党章还没有下来。我们的思想没跟上中央的要求。在获嘉开的整党建党现场会，主要是没有强调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没有强调揭现实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从发展党员来看，我们是十三万，可能占全国第一位，主要问题是有的不够条件，也被发展入党了。所以，“九大”以后，我们基本上又重新整顿。这是一个教训。其他还有一些问题，以后有机会再作检讨。同志们提的，只要我们该解决的，能够解决的，就尽力解决。

我重申几点：

关于作风问题。中央三号文件中所举的不正之风的表现，在我们许多同志身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我们也有骄傲自满，要认真克服。当前，我们特别要把打人骂人、打击报复和讲假话、搞浮夸的歪风刹住。我们有些人头脑膨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忘记了这个教训，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要讲。讲假话不是革命干劲的表现，而是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的反映。再就一定要有民主的作风，要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精辟论述，请同志们认真学习。我们的干部，如果丢掉了民主作风，就丢掉了群众；而离开了群众，将一事无成。党章规定，我们共产党员有事要同群众商量。可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却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人家给他提了意见，就要同人

家记一辈子成见，还要“斗争到底”’，甚至搞打击报复，打骂群众，这是不能允许的。今后，对上述两种恶劣行为，都要严肃处理。

关于整顿机关问题。要把机关整顿好，机关要精干。我们成立革委会的时候，对机关没有注意抓。后来，发现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在那里搞资产阶级派性。我们就及时告诉同志们，要查一查，对派性严重的人，要处理，不能让他们在那里任意胡搞。看来有的地方没有落实。如果领导上依靠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非要上当不可，非把事情搞坏不可。前一段有的地方出问题，同机关里搞派性的人在那里起作用，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同志们不要轻看这件事。群众开始起来造反，这是对的，但是有的人陷入派性，想达到个人目的，捞点油水，拉小圈子，把派性带到政权机构里来，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有这个问题的单位，一定要认真解决，不要再拖延，不然就要吃大亏。

关于“一打三反”运动中经济退赔问题。省里已经转发了安阳地区的一个文件，目前还不够完善，你们试行中遇到的新问题和解决意见，报来我们研究，经过几次试行修改，逐步就完善了。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政策问题要求太死了不行，不能搞一刀切，有个大体的原则界限，你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研究处理办法。对人的处理，要取慎重态度。定敌我矛盾的，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一定要掌握好，把好关。落实好材料。

关于经济政策问题。北方农业会议纪要，对许多政策问题都明确了，要认真学习、研究、贯彻。我前天到一个公社问干部，他们说只念了一遍，没有很好讨论。象这样，当然就落实不了。

分配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去定。现在多数队的粮食分配是四、六分，人六、劳四。有的地方是三、七分，就是人七、劳三，这是较富的队。穷队假如也这样搞，就可能影响一些人的积极性。要根据各队的具体条件而定，不要千篇一律，不要一刀切。总之要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关于农业种植计划，要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只要合乎这个方针，不必管得太细。

关于抓好学习问题。这是大事，我们一定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还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问题，以及整党建党中搞好思想、组织建设等等，这些都是大事，是根本性的工作，一定要认真地抓。这些问题，王政委刚才已经系统的讲了，我不再重复，把王政委的讲话印发给你们回去贯彻执行。

来源：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印发（共印 2500 份）。

五、河南省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关于河南问题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于十月十八日来到北京开会，向中央汇报和解决王新同志的问题。江青、先念、登奎、德生、洪文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武汉军区曾思玉、王六生、张体学同志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在汇报会议上，刘建勋同志汇报了王新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到会的同志都发了言，进行揭发批判，严肃认真地帮助王新认识错误，希望他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是，王新的态度很坏，至今有些重大问题仍然没有老实交代。

现将我们经过集体讨论和一致同意的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送上，请批示。

刘建勋 耿起昌 张树芝东传钧 杜河堤 李中顺张耀东 王 辉 戴
苏理申茂功 唐岐山 文香兰孙冠生 朱启祥 刘玉年王文德 赵玉轩 韩怀智支万
鉴 杨 贵 张钦礼王秉章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从十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一日，我们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王新同志的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讨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现报告如下：

（一）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十五日，我们召开了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召开的。中央针对我省上

次批林整风会议，批评我们省委领导上没有联系河南实际，捂了王新的盖子。这个批评非常及时，完全正确，省委衷心拥护，并作了认真检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指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振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会议以毛主席教导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为武器，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联系河南实际，会议集中揭了王新问题的盖子，对王新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揭发批判。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到会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同志们一致认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三支两军人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党、政、军、民沿着“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奋勇前进，斗、批、改深入发展，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以路线斗争为纲，逐步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全省军民进一步看清了林贼一伙叛党叛国、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党更加热爱，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增强了革命团结，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战备。总的形势大好。

但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河南反映得很尖锐、很突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河南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王新。王新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对抗中央指示，不批陈，不批林，保自己，捂盖子，矛头向下，批干部，批群众，竭力扭转批林斗争的大方向，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反党阴谋活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终于粉碎了王新的阴谋，揭开了他的盖子。经过对王新的揭发批判，省委、省军区党委和驻豫部队，进一步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我们决心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二)

大量事实证明，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配合林贼一伙向党猖狂进攻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庐山上第一个跳出来，煽风点火，突然袭击，发出了策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南组会议上，王新积极追随叶群、李作鹏，把矛头直接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向党猖狂进攻的恶毒发言。他说：“有的人利用修改宪法，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想刮这股风，我们很气愤。这是一股子反革命妖风”，“要把这些人、危险分子的丑恶面目揭出来，把他斗倒”，“这些人是阴谋家、野心家。要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林彪点火，叶、李煽风，王新呼应，配合得可好了。就在当天，二十四日晚，吴法宪把王新找到他的住处，策划于密室，进行了反革命串连。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之后，王新还和林贼死党宋城等人同游庐山，照相留念。

二、积极投靠林贼及其死党，竭力为林贼一伙效忠卖力

王新在庐山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王新就竭力投靠林贼一伙，被他们封为“头号的大好”的人，得到了他们的赏识。一个拉，一个靠，相互勾结，由来已久。

从党的“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贼摔死，王新同北京来往电话一百四十五次，其中同党中央联系只有三次，大都是同林贼死党来往。“林办”、“吴办”到河南活动的人，都与王新单线联系，行动诡秘。林贼指派亲信，三下河南，王新亲自迎送，设宴招待。多次密谈。死党胡萍等人到河南看工事，进行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来往，当时就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背着正在郑州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至今还不作彻底交代。于新野、何汝珍等人到郑州，以挑选“女护士”、“男内勤”为名，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勾结，使尽了种种卑劣的手段。王新奉“吴办”之命，为林贼挑选了两名历史教员，编写“文艺复兴”等历史资料，制造向党进攻的“炮弹”。王新为林贼、叶贼窃取古字画，派人专程送给“林办”，而他竟然栽赃诬陷，造

谣诬蔑中央负责同志。王新为调动工作问题，不顾中央已与省委商量决定了的指示，直接打电话给“林办”，要叶群为他说话。更不能容忍的是，王新两次派专人到武汉，通过刘丰看林贼住房，了解林贼是怎样生活的，回来后便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按照林贼在阴暗角落里过惯了的那种生活需要，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郑州住过的房子，改为林贼的住处。

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出笼后，林贼死党刘锦平、王维国、周宇驰、王飞、解长林、王洪智等纷纷窜到郑州，王新和他们究竟搞了些什么阴谋活动，至今未做彻底交代。

王新还和林贼死党相勾结，擅自扣压了向中央报告的重要专案材料。

三、同刘丰秘密勾结，阴谋篡权

王新同刘丰的勾结也是由来已久的。他们经常单线联系，秘密串连，互通情报。从“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王新与刘丰来往电话达二百九十四次之多。他同刘丰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坏事。他们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王新曾同刘丰私下议论，说什么二中全会上“把叶群也牵进去了，很被动。”他们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林贼、叶贼鸣冤叫屈。在刘丰的盖子被揭开之后，王新还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对刘丰的揭发和批判，竭力为刘丰给林贼送情报的反革命罪行开脱罪责。

王新伙同刘丰，攻击和陷害省委几位负责同志，阴谋篡权。他背着党中央和河南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两次向刘丰等人送了陷害刘建勋同志的黑材料。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正在筹备召开“九大”的时候，王新把一份写有同名刘建勋名字的敌伪档案材料交给了刘丰和黄永胜、吴法宪。第二次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新将刘建勋同志的所谓“五·一六”问题的两份材料，带上庐山，送给了刘丰。

四、忠实推行林贼的反革命路线，在河南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

党的“九大”以后，林贼配合苏修，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王新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不断传播：“林副主席有指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被小资产阶级抢走的危险”。他甚至到了林贼叛党叛国的“九·一三”前夕，还猖狂叫

器：“现在是小资产阶级的干扰，争夺领导权”，“这个命不革不行”，如此等等，为林彪反党集团大造反革命舆论。

王新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肆意挑拨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他曾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和省军区党委，通过省军区个别人，指令军分区党委考核、建立地、县委，胡说什么要把地方党委“‘军’起来”，“要占领阵地”。广大指战员遵照“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坚决抵制和揭露了王新的反党罪行，而王新则对抵制他错误的同志，制造种种借口，进行打击报复。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王新紧密配合林贼一伙所谓“军队受压”的反革命叫器，一面攻击广大干部和群众“刮起了一股‘反军’风”，同时又攻击军政关系搞得好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合穿一条裤子”，恶毒诬蔑人民解放军，在河南妄图反党乱军的正是王新。

河南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多一些，毛主席曾多次鼓励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王新却极力反对，诬蔑“地方干部十几年来受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影响很深，形成了习惯，不左就右，不右就左。”还胡说什么“和地方干部打交道要小心，今天在一块共事是朋友，说不定明天一翻脸就把你当敌人了。”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竭力扭转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的大方向，硬说“河南的主要矛盾是派性”，大批所谓“派党论”。他乘“整风”、“整顿机关”和清查“五·一六”之机，把“派性”与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混为一谈，把造反派与极“左”思潮、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同起来，蓄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许多地方新老干部和军队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五、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大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

林县、兰考是毛主席、党中央表彰过的两面红旗。林县、兰考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王新怀着刻骨的仇恨，以“派性”、“反军”、“资产阶级专政”、“独立王国”这四条罪名，打击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硬是要砍掉这两面红旗。他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林县人民战天斗地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是歌颂，而是恶毒咒骂，把林县的红旗渠、储备粮、粮食上纲要三大成就，诬蔑为闹派性的，“三大件”，“是说假话，欺骗中国人民，欺骗世界人民，是一种犯罪行为”。这完全是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言论。

六、对抗中央，压制群众，继续施展阴谋诡计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党中央耐心等待王新同志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央、武汉区党委甚至把揭发他的材料转给他，希望他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他却对抗中央指示，长期不向党说真话。在去年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和武汉地区座谈会上，他隐瞒罪行，不作检查交代。今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耐心教育，他继续顽抗，不向党交心。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以后，他变本加厉，搞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制造混乱，妄图蒙混过关。他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他自立专案，找人为他对口径，写假证明材料。他搞假检讨，在省委和军区党委批林整风会议期间，一手炮制了一个所谓《王新同志七月三十日、八月五日在大会和商丘地区小组会上的发言》的简报，其实他根本没有在大会和小会上作过检讨。他背着省委、省军区党委，召开分裂会，大肆挑拨军政、军民关系。他恶毒攻击“省委常委是联络站”，挑拨省委常委的关系，破坏党的团结。

“九·一三”事件后，王新竟然背着省委，将他的办公室改为省委办公室，并擅自通知各地、市，要把所有关于批林整风的材料上报他所控制的这个由“王办”改成的所谓“党办”，妄图控制对林彪及其死党的揭发斗争。“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王新不但对林彪及其死党不作揭发，对自己的罪行不作彻底交代，而且用流氓手段对付党，狡猾抵赖，栽赃诬陷，威胁起来揭他盖子的同志。直到最近召开的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以及这次中央召开的河南省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批判，王新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已检查交代了一些问题，但在重大的关键问题上，仍然不作彻底交代，继续顽抗，态度很坏，引起了同志们的莫大愤慨。

我们建议，中央责令王新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我们仍然希望，王新同志能够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三）

为了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肃清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流毒，巩固和发展河南的大好形势，我们提出以下意见：

一、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搞好批林整风，继续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是当前全党的头等大事。要遵照毛主席关于“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教导，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在省委领导下，加强专案清查小组的工作，依靠群众，彻底查清林贼死党在河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要联系河南实际，继续深入揭发批判王新从党的“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反党阴谋活动。

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紧密结合起来。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攻读毛主席著作，继续深入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觉悟。

河南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河南阴谋反党，忠实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是王新，三支两军人员和革命干部是没有责任的。由于路线觉悟不高，没有识破王新的阴谋，上当受骗，跟着王新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要同王新划清界限，揭发、批判，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集中批林，集中揭发批判王新，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查。各级党委要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扭转斗争大方向的错误倾向。

我们打算，下一步把王新的问题先传达到县、团级，然后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传达到基层，发动广大群众，深入揭发批判，肃清其流毒。

二、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在批林整风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由于王新的错误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果，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坚决纠正。要正确对待群众。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凡是合理的，要弄清情况，逐步加以解决。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忙于处理某些具体问题，干扰批林整风的大方向。对由于王新推行林贼反革命路线而遭受打击的同志，要按照党的政策，妥善加以处理，本人要正确地对待自己，服从党的分配。

河南各级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下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大方向是正确的。要继续办好“五·七”干校，坚持走“五·七”指

示的道路。各级干部要服从党的组织分配。城市知识青年，要有领导地继续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

有关肃清反革命的各项专案审查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认真搞好清查“五·一六”的落实定案工作，按照党的政策进行处理。毛主席指出：“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对确属搞错了的，要坚决纠正。被审查的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三、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

对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的人，要严肃批评，耐心教育，过细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坚守工作岗位，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秘密串连，重拉山头，煽动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派性头头，经过教育坚持不改的，要严肃处理。

四、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批林整风中，要提高革命警惕，密切注意阶级敌人的动向，严防他们破坏捣乱。对于造谣惑众，乘机翻案，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彻底揭露，坚决打击。

五、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团结

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广大指战员，遵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在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中，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为人民立了新功。决不能因为批判王新罪行，否定三支两军工作的伟大成绩。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有关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做好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工作，进一步密切党、政、军、民的关系，增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

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委成员，都要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要正确处理好集中领导和分

工负责的关系。要建立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请示中央。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门，在接受上级军事系统领导的同时，应接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

七、以路线斗争为纲，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

要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同深入搞好斗、批、改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搞好工农业生产，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以上报告，请指示。

中共河南省委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

附：王新的三次检查交代（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给河南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请浩亮同志亲送

河南省郑县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知识青年同志们亲启

江青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

我看了人民日报今天对于你们批林批孔的报导，十分高兴！为了使你们早日得到阅读材料，更为了使你们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关怀，我特请浩亮同志和一名新华社记者同志前去探望你们，祝你们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也会得到更大的胜利！

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二百份；《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各二百份；《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二百份；《五四运动以来反

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百份。其他材料中央将来会发给你们。

要重新学习毛主席的以下著作：一，《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四，十大和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这些文件你们可能还有，如果没有请河南省委帮你们解决。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来源：来源：中共开封地委办公室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翻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

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语考试，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12日，学校负责人罗天奇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她，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由于老师批评方式失当，加上其他原因，张玉勤当日称病请假离校后即投河自杀，14日才在水库中找到她的尸体。事情发生后，公社、县有关部门和学校都已做了调查处理。

1974年1月，江青在一份内部刊物上看到此事后，派迟群和谢静宜带人到马振扶公社中学重新进行调查。

他们召开了两个半天的座谈会，于1月26日写出《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指出：

马振扶公社中学实行“法西斯专政”、是“复辟”、“回潮”的典型，“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中学负责人和班主任老师是杀人“凶手”。

1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并提出：

“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

1974年2月，江青的一次会议上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逼死了天真的女孩子，“要向全国控诉”。

王洪文指示要给该校老师和负责人“判重刑”。

迟群把江青、王洪文这些话用电话通知了中共南阳地委。当地政府对这一事件重新作了处理。马振扶公社中学被夺权，罗天奇、杨天成被批斗并被判刑2年。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揪“罗、杨式人物”，共批斗了280余人。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按文件精神检查、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和复辟。

（1977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对于南阳地委和省教育局重新处理“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的报告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个大冤案，决定撤销对罗长奇、杨天成的刑事处分，恢复他们的职务，为受迫害的干部和教师平反。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1974年1月31日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指出，“这一事件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炮制的。”这个文件把‘马振扶事件’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的典型通报全国”，不少地方也抓了大大小小的‘马振扶’，制造了许多冤案，不少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和干部遭到残酷打击迫害，蒙受不白之冤，给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灾难”。此后，各地类似冤案便陆续平反昭雪。）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通知

1974.02.01；豫发（1974）7号

全省各级党委、党支部：

江青同志一月二十八日给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写了一封信，并请浩亮同志专程亲送给知识青年同志们，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下乡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

江青同志的信，不仅是写给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也是写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的，是写给全省人民和各级党委的。

江青同志的信，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我们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强大动力。江青同志的信，是对坚持乡村的知识青年的莫大鼓舞和激励，是对我们各级党委的有力鞭策和教育。

省委决定，立即把《江青同志给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印发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并发到全省城乡党支部，向广大群众宣读。我们要认真学习讨论，坚决贯彻执行，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那样，当批林批孔的尖兵，做革命的促进派，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河南省委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

六、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郑州市的“清明节事件”

1976年4月初，临近清明节。郑州市中心二七纪念塔下摆放了一些花圈。表面上看是纪念周总理的，但仔细看其中的一些挽词和贴在旁边的匿名大字报，直接攻击的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攻击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张春桥同志、江青同志，甚至有的已将矛头指向毛主席。

清明节这天，我当时所在单位郑州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的一些同志，到二七塔周围看了看，回厂就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大家气愤之余，结合当时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听说北京、南京等地也有类似的情况，一致认为这决不是小事，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当时就决定要公开表达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立场。

4月5日清晨，签着我们肉联厂几十人真实姓名的大字报《严正声明》，贴在二七纪念塔北边约200米的郑州市电信局营业大厅门前。这里是市中心，来往的人比较多，而我们的立场和二七塔下那些大字报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一直有人在现场观察群众的反映。当时看我们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显得十分拥挤，相比之下，二七塔下倒显得冷清起来。同时，我们的《严正声明》旁边又陆续张贴了一些同意我们观点的大字报，客观上声援了我们，并没有出现反驳我们的大字报。

当天傍晚，厂传达室通知我们：新华社河南分社来电话，让我们签名写大字报的人派代表到分社去，我就是代表之一。到了河南分社，一位记者接待了我们。他表情十分严肃，但详细地听取我们的看法。最后，他告诉我们，他已将我们的大字报连同所有签名（约 40 多人），一字不漏地报告中央政治局。他还告诉我们，据他了解，这是全国第一张这样内容的政治声明。

谈话结束后，我们这些代表就在新华分社门口议论，大家说从这位记者的态度来看，我们没有作错。有的同志就建议，去把那些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了，这个建议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说干就干。

我们将一辆货车开到二七广场，把一些我们认为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到车上。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群众在围观，也有人问咋回事，我们向他们宣传了我们的看法。当时没有发生辩论，也没有阻拦。为保持花圈的原状，一车只装了十几个。本准备拉到厂里，有人说“送到省委去，让省委表态”。我们就直接拉着去了省委南院，值班员把一位姓张的办公室副主任找来接待我们，怎么谈，就是不接受这些花圈。我们也就不和他废话了，自管把车上的花圈卸下，一一摆放在省委南院正对大门的办公楼前，目的是让省委负责人都能看见。然后，我们就回到二七广场继续搬。这时候，突然开来几辆卡车，上面全是穿着军装的军人，我们肉联厂的人下意识地背靠背聚在了一起，心中十分紧张。没想到这些当兵的，下车就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然后就和我们一起收花圈，打扫现场。事后听说，省委书记耿其昌打电话到北京去告我们的状，纪登奎在电话里要耿派部队支援我们。

我们回到工厂后，立即用电话或直接派人与我们共同战斗的兄弟单位联系，和一些战友们联系，向他们通报了当晚的整个情况。最后签署了郑州肉联、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交通运输公司、503 厂等 72 个单位革命群众的《联合声明》，表达我们收花圈和对这一政治事件的立场，随即贴出，直至后夜，包括我们厂在内的几个单位的群众走上街头，刷写表达这一立场的大标语/大字报，到 4 月 6 日晨，才陆续回去休息。少数人还在继续刷写。

最后走的郑州市电信局职工焦春亮同志被十几个人围攻追打，直至被活活打死在二七广场。听到这一消息后，各单位的群众又重新走上街头，声讨这一反革命的血腥暴行。这是 1976 年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其它一些城市的“清明节事

件”一后被称为“四/五运动”中唯一被打死的人，他表达的却是反对一些人以纪念周总理的名义掀起的反革命逆流。

4月7日晚，接上级通知，我厂党委/革委会集体收听中央台新闻，即中央决定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付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消邓小平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及天安门事件的报道，中央台的记者到场采访了我们。在随后几天中央台报道各地拥护中央决议，声讨“清明节”事件的大规模游行中，其中有郑州肉联群众游行的电视镜头。在河南，郑州市革委决定将焦春亮同志追认为烈士。

这一年的夏天，郑州市专政机关按当时一贯的做法，将一批需要逮捕或交付审判的人员材料印成小本，发给群众讨论，征求意见。这本小册子中有郑州清明节事件中写匿名大字报的人员，同时，将当局侦讯后认定打死焦春亮的凶手刘敬列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一位，加上“民愤极大”的语气，按当时的惯例，是要判死刑的（事后知道，省委已将他们要判刘敬死刑的意见告知司法机关）。我们肉联加工厂的一些同志也为此也进行了讨论。当时，大家已知道写匿名大字报的那些人和北京“清明节事件”的主要组织者/参与者一样，大多数是高干子女，也一样有很深厚的政治背景，在没有查清之前，就一判了之，这其中肯定有走资派的阴谋。于是，我们肉联这些人又署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刀下留人”，并揭露省走资派企图“杀人灭口”的阴谋，大字报贴在市百货大楼门口。贴出去的第二天，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副院长到肉联和写大字报的人员座谈，充分听取了我们的意见。此后，刘敬等人的判决就被搁置下来。

（直至后来的中央为“清明节事件”平反，他们出狱，打死人的刘敬们成了“四/五”英雄。也是在“清明节事件”平反后，郑州市委取消了焦春亮的烈士称号。据说，连给焦春亮的年幼的孩子每月20元的抚恤金也取消了。当时参与反击这一事件的一些人在以后的“揭批查”运动中，也因此而获“反周”的罪状，在监狱和学习班里遭到了清算。）

（何远《封的记忆》2005年10月7日）

七、兰考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兰考抓的黑鬼却是张钦礼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北京一些人到兰考炮制出紧急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北京《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筹备委员会红卫兵在周化民、刘呈明的欺骗下，发出了一个最最紧急的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矛头指向张钦礼同志及焦裕了同志生前好友。

最最紧急的呼吁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结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就是遵循毛主席的这一最高指示，最最坚决地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老爷们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 我们是来自北京的：北京大学，北京红卫兵战校，首都师大附中，北京第二师范学校，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兰考县总工会，裕禄一中的红卫兵和革命战士的代表组成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的筹备委员会，来到了焦裕禄同志生前战斗的地方——光荣的兰考。我们是来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焦裕禄同志学习的，是来向英雄的兰考工农兵、红卫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学习的。我们来兰考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来和兰考的广大工农兵、红卫兵一起重新举办《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的。 从我们短短半个多月的调查中，我们深深感受到，焦裕禄同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他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举旗抓纲”：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狠抓阶级斗争这条纲。他一到兰考就积极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渗入到老韩陵大队进行调查研究，向县里提出了《巩固集体经济的报告》；组织了几十人的阶级调查队，渗入到老韩陵、新韩陵、高场大队进行为是一个多月的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并在他的领导下，举办了大型的阶级教育展览；召开了几次三级干部会议，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大揭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所有这一切，打击了一切牛鬼蛇神，教育了广大干部，涨了贫下中农的威风，树立了贫下中农的绝对优势，巩固了集体经济，依靠贫下中农，抓典型，树样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创出了一条改变兰考面貌

的道路。焦裕禄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忠实的儿子，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但是，今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穆青、冯健、周原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大通讯一文，和当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的社论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贩卖修正主义的黑货，歪曲了焦裕禄同志的英雄形象，阉割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阶级斗争的理论，恶毒的攻击了党的三面红旗。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任他们自由泛滥。”既然他们放了毒，我们就要消毒，就要批判。我们要质问那些混蛋王八蛋们：

一、这篇通讯为什么不提阶级斗争，为什么通篇连阶级斗争四个字的影子都找不到？这是谁提供的材料，你们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好样的站出来，有种的站出来辩论！我们料到，你们这些胆小鬼是没有那个胆量的！

二、你们这些混蛋们，为什么把一个人人皆知的，地地道道的叛徒马福重，吹捧为“革命烈士”，挂上了“英雄”的招牌？这又是哪个混蛋介绍的情况？

三、你们为什么不写出兰考解放十几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把兰考描绘的荒凉凄惨，这是对英雄的兰考人民的最大口口，恶毒地攻击了三面红旗，攻击了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写这篇通讯的混蛋和介绍情况的那些王八蛋，你们居心何在？

四、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可是，我们从大通讯，只看到了被歪曲了的“焦裕禄”，在忙忙碌碌的进行个人奋斗，我们要问那些混蛋们：你们为什么不表现县委的集体领导？

五、大通讯为什么不征求兰考广大贫下中农的意见，不征求广大革命干部的意见，而且在有些问题和情节上，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进行造谣撞骗，企图捞取政治资本。这些家伙是资产阶级的头号大扒手！

我们向工农兵、红卫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介绍一点情况：写大通讯的人根本没有下去深入了解，而是在个别人中兜圈子，他们在县委办公室吃着鸡蛋，在开封啃着烧鸡，闭门造车，写出了这株大毒草。这些混蛋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穆青已经是被新华社总社革命同志揪出来的、被斗争了的黑帮分子，周原是摘了帽子的大右派。这些家伙有什么资格来写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英雄事迹呢？这些家伙怎么能写出歌颂

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的文章呢？最后，我们向英雄的兰考工农兵、红卫兵、革命师生和干部发出最紧急的呼吁：

一、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穆青、周原揪到兰考来，交代他们的罪恶。我们要奋起千钧棒，把他们斗倒，斗垮，斗口。

二、同志们，我们要做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做资产阶级保皇党！真正革命的左派站出来，那些胆小如鼠的家伙滚开！革命者要勇敢地起来，澄清事实，揭露黑帮们的罪恶勾当，向反党黑帮猛烈开火。

兰考的工农兵、红卫兵、革命的师生和革命的干部，我们要全党全民一起动手，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重新树立焦裕禄同志的英雄形象，办好《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使这个展览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红色阵地。最后，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北京《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筹备委员会全体红卫兵和革命战士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于兰考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县委机关连夜炮制了《热烈响应》的传单

《最热烈地响应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 坚决把污蔑、诽谤、攻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一伙黑帮揪到光天化日之下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 我们看了北京大学，北京红卫兵战校，首都红大附中，北京第二师范学校，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八个单位和学校，红卫兵革命战士组织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展览馆筹备委员会，发出的最最紧急的呼吁：我们所有的红卫兵战士，万分地高兴，它正符合兰考三十八万人民的心愿，任何力量难以压抑我们的兴奋心情。但对那些扛着红旗反红旗的黑帮分子，我们极为愤慨。北京展览会的同志们，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挥起了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经过半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正确地了解和掌握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英雄事迹，焦裕禄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他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人民的好儿子，县委书记的榜样，我们的好书记。焦裕禄同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高大革命

英姿更高更高地矗立在我们面前，他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阶级斗争这条纲，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思想上。但是那些混蛋的修正主义王八羔子，在采访当中，对人所共知的举旗抓纲，却不理不睬，根本不到工农兵群众当中去采访，只听信那些企图想骗取政治资本的扒手乱说一通。把兰考解放以来，以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取得辉煌伟大的成就，污蔑是：“枯草在寒风中抖动”等。把马福重这个大叛徒，见敌人就举枪投降的怕死鬼，反而被他们这一伙黑帮恭恭敬敬地称之为革命先烈，这是多么令人气愤！！这些混蛋们企图搞资产阶级复辟，不要毛泽东主义挂帅。我们坚决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万万万个不答应。我们最热烈地响应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学校的呼吁，要向那些黑帮开火。我们誓死保卫党中央，捍卫毛泽东主义，保卫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为此，我们红卫兵表示：向全国革命的红卫兵战士们和广大工农兵，革命的同志们呼吁！呼吁！！紧急呼吁！！协助和支援我们把那些贬低、污蔑、反对、诽谤、攻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黑帮分子，全部、彻底、干净地揪出来，砸碎那些妄想资本主义复辟的脑袋。

一、现在我们高声疾呼，要把穆青、周源、宋玉口、秦一飞等这些坏蛋，统统交给兰考三十八万人民，彻底清算他们的滔天罪行。

二、我们向全体革命同志们呼吁：清查那些别有用心坏家伙，为什么在写长篇通讯中不抓阶级斗争，连阶级斗争四个字也不敢提。坚决揪出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黑帮分子

三、让我们革命的左派一起动手，澄清事实，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统统揪出来，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起千钧棒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

四、根据全国各地红卫兵的要求，勒令县委对焦裕禄革命烈士的陵墓，重新进行修建，把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英雄形象，树的更高、更大，让我们永远学习焦裕禄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共产主义精神。

最后让我们高呼：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共产党兰考县委机关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

已经排好了版。周化民感到不妙，又打电话通知不让印发了。

（二）造反派一月夺权，因此被军区逮捕入狱

（三）张钦礼出狱并当上了县革委会的主任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兰考县十个领导干部：《张钦礼是人民的好干部》

（县委常委、副县长蔺永沛、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卓兴隆、县委委员、县委工交政治部主任赵翔、县委候补委员县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樊哲民、县委委员、裕禄中学党支部书记和新民、县委候补委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先志等十人）

兰考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保卫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和砍倒这面红旗，是这场斗争的焦点。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贫下中农，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支持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秦一飞、周化民、刘呈明等一小撮走资派，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怕得要死，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恨得要命。运动一开始，他们就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四清工作队变为文化革命工作组，派往各机关、学校镇压群众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组织围剿革命干部、革命职工、学生，在县委机关集中攻击张钦礼同志。他们在县委机关全体干部会上说：“不贴地主分子的大字报，贴黑帮分子的大字报，县委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啦，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是老上级不敢提，实际上县委目标是很明确的，至多是个县委副书记。”会后，张钦礼的大字报陡然增加，谁不写张钦礼的大字报就是“保皇派”。

但是张钦礼同志并没有被他们所压倒，他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七月二十日，张钦礼同志贴出了《秦一飞反对焦裕禄同志十大问题》的大字报。这一下打中了秦一飞的要害，他恼羞成怒，立即指示把县直下乡搞抗旱的科局长统统调回县里，

周化民亲自动员，并带领他们参观了围攻张钦礼的大字报，然后，放三天时间叫大家写张钦礼的大字报。三天过后，没有写出多少东西，宣布延长三天，又延长三天，置抗旱于不顾，造成了秋季红薯严重减产。

以后，秦一飞、周化民召开各种会议，大整张钦礼同志的材料，疯狂地对张钦礼同志进行围攻。

兰考二中“八·一八”裕禄战斗队，在学校受围攻时，到县委文革反映情况，文革办公室不承认他们。而张钦礼同志却坚决支持他们建立组织，造学校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反。

九月十六日，北京《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筹备委员会红卫兵在周化民、刘呈明的欺骗下，发出了一个最最紧急的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矛头指向张钦礼同志及焦裕禄同志生前好友。县委机关连夜炮制了《热烈响应》的传单，已经排好了版。周化民感到不妙，又打电话通知不让印发了。“北焦展”最最紧急的呼吁发出以后，革命群众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纷纷要求进行辩论。九月二十五日，兰考六中全体红卫兵“焦裕禄战斗队”革命师生和土固阳公社干部，在张钦礼同志的支持下，发出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反对、诬蔑、贬低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传单，严厉批驳了北京《焦展》“最最紧急呼吁”中的错误观点。

张钦礼同志下乡工作，周化民就派人在后边专门搜集张钦礼的材料。去年十月间，张钦礼同志到湖北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徐俊雅（焦裕禄同志的爱人）也去了。周化民就派人监视张钦礼，监视徐俊雅，做徐俊雅的“工作”。

我县于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宣布恢复开展文化革命，他们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就印好了所谓揭发张钦礼的传单。广大贫下中农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他们热情支持革命干部，纷纷到县找他们辩论。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红旗——四个生产队，联合倡议成立了“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革命造反司令部”。

十二月上旬，周化民操纵保守组织到省委要求罢张钦礼的官，省委没有批准。周化民又急急忙忙勾结兵痞、下台干部组织了所谓贫下中农“卫东林焦”、贫下中农“卫东焦”司令部。对于保他们的组织，要啥给啥，他们做好袖章往社员家里送，里边还裹着一角钱，是让买别针用的。土山砦大队五个贫农社员到县，碰

见了X X X，X给了五位社员一百五十元钱，说是到省里罢周化民的官哩。但到了省委后他们又说不要罢周化民的官了，叫罢张钦礼的官。五个贫下中农一听不对头，他们说：“金钱买不住俺贫下中农的心”，于是就回去了。

他们还在兰考实行大逮捕，大镇压。凡是支持张钦礼反对周化民的革命组织的负责人被抓起来。谁说张钦礼好，就抓谁。捕的人，兰考监狱盛不下，又把税务所一个院腾出来押人。兰考放不下，还往杞县监狱里送了八汽车。在开封、民权东明的监狱都押着兰考的人。送人，怕贫下中农拦截，就用绳子捆住，嘴里塞上棉套，用麻袋装着向外运。先后逮捕拘留了1200余人。

二月二十七日他们把张钦礼同志逮捕入狱，二十八名县委委员就有十三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他们说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政治大扒手”，是反对焦裕禄的急先锋。对他进行了无数次残酷斗争，押在监狱里一直不放出来。

元？月份，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成了高潮。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冲破重重阻力，杀了出来，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了以周化民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兰考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了，他们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向刘邓黑司令部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将在兰考大地取得彻底胜利。

（《河南二七报 新北大》1967年7月28日合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焦守凤：《控诉河南走资派对我一家的迫害》

我是坚决支持二七公社的，我同他们一起绝食，一同战斗，他们是从两个阶级大搏斗的风浪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左派组织。最近，在河南和全同各地，贴满了署有我的名字反对二七公社的传单。这全是河南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开封、兰考的爪牙，为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所进行的造谣污蔑和垂死挣扎。在这里，我郑重声明，我根本没有写过任何反对、攻击二七公社的文章。自从河南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阶级敌人就利用我们对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的无限热爱，和我爸爸在人民中的威信，欺骗、拉拢我们全家。他们对我妈妈和妹妹以“保护”为名，长期软禁。使她们听不到毛主席和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还利

用我妈妈和妹妹的名字，大写造谣传单，为他们在河南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这些传单大部分都是出自兰考县委办公室主任刘 X X 之手。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参加了保守组织。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识到站错了立场，就起来造了开封地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站到了以二七公社、八二四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一边。河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爪牙对此恨得要命，他们想尽办法，想把我重新拉到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上去。五月十三日，我回兰考参加爸爸逝世三周年追悼会。刚到家，他们就派了很多人，以找我辩论为名，围攻谩骂我长达数小时之久。十四日，开封地委东方红兵团一小撮头头找我谈话，他们借口“保护”我，说外边很乱，剥夺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去参加追悼会，不让我外出，把我软禁达二十几天之久。在我一再要求回去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下，他们才被迫专门派两个人送我回开封。回去后仍然要我住集体宿舍，派人暗中监视我。更卑鄙的是他们竟然对我进行逼供，让我“揭发”二七公社的“罪行”。开封公安公社的一个人对我说：“你现在应该为你的前途想想，跟着二七公社一伙人跑，你将来入党是有很困难的，现在应该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好好创造条件，争取入党。”X X 军分区李 X X 也说：“现在我们没错，就是真错了，你跟着我们错了，也没有什么。”一中联总一些人，还在兰考县委大街上到处张贴大字报，说我站错了立场，支持和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违背了我爸爸的教导，必须迅速回头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违反国法，私自扣留、拆阅我的私人信件和外寄信件，封锁毛主席的革命造反派的声音和消息，还常常拿大本大本的诬蔑八二四、二七公社和刘建勋同志的所谓“罪行录”叫我看，逼我写检查，说八二四、二七公社是河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御用工具，让我承认五四惨案是二七公社挑起的，打死了十大总部多少人，绝食是错的，叫我污蔑绝食战友轮流吃饭，还说亲眼看到偷吃鸡蛋饼干等。总之，对我施行了高压政策，让我写“控诉材料”，我坚决不写。为了回击，我写了“我是怎样由不支持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到支持他们”的文章。写好后他们竟让一个什么秘书加以“修改”、“补充”。“修改”后，用大字报、传单等形式大量张贴、印发。其实这些都歪曲了我的原意。六月二十四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离开了白色恐怖的河南和兰考，来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心里感到无比兴奋、激动。我下决心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向首都革命造反派和二七公社、八二

四等革命战友学习，我坚信胜利一定属于以二七公社、八二四为代表的真正革命造反派！未来的河南必将是毛泽东思想光辉普照的红彤彤的新河南！（《河南二七报 新北大》1967年7月28日合刊）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张钦礼在首都革命派欢送河南造反派大会上的讲话
《何运洪是残酷迫害兰考革命派的罪魁祸首》

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在野兽的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怯懦！”我代表焦裕禄同志的一家，代表兰考县三十八万人民和革命造反派，向首都革命造反派表示感谢！兰考县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兰考县人民最大的关怀和鼓励。我们兰考县人民要保卫焦裕禄同志这面旗帜。开封地委、兰考县委、河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联合起来，却压迫革命造反派。自去年七月开始，八、九、十月这一段时间，他们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大量工作队到兰考县，把造反派压下去，围攻革命的领导干部。兰考的革命造反派经过艰苦斗争，于十一、十二月又把保守派压下去，由少数变成了多数，到元月，形势很好，我们就研究夺权。一月二十三日夺权，进行得很顺利，把大印夺过来了，但是党、政、财权没拿到，只拿到一个木疙瘩，并没有实权。那时我们经济很困难，我们一年多只花了七毛二分钱。写标语没有墨就到煤场去找煤面来刷标语。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就这样干了一段。武装部反说我们是“反革命暴动”，是“修正主义”，是“打、砸、抢”等。一月二十五日宣布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武装部与军区是一个态度。我们造反派开了会，商议了，都认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天不怕，地不怕。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我们分为三线，一线在县城里，跟他们干，他们可能抓我们，拷我们，第二线在城外，第三线在农村。这样就可以坚持一段时间，不然被他们一网打尽就不好办了。我们统一了思想，宜早不宜迟，马上行动，按计划办。二十七日夜散开的，二十八日晚陈再道、何运洪从开封派部队把县城包围了，来了三连人，老保带头逮捕革命派。二十九日把第

一线全部逮捕了。我们又开会商议，派代表去向他们讲明情况，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们还没有停住脚就这样抓人是不对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依法逮捕，其余不逮捕。毛主席说部队要支左，要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我们派代表去交涉：一、放人；二、打伤的给予治疗；三、赔礼道歉。他们派人来，说“你们是反革命暴动，我们是镇压反革命”。不理，怎么办？就干吧！我们一万多人把他们三连人包围了两天，没吃没睡，还把他们的司令抓起来，游街示众，他们开卡车向外冲，我们人多，把车推得向后退，吉普车被抬起来，走不了。我们问司令员：“你来干什么？”他说：“支左的”。问：“谁是左派？”他说“不知道”。又问他“为什么要抓人？”他说是“执行任务”。再问他为什么要抓人，他说：“我们是军人，来执行任务的”。我想，如果战士不知道，还没什么，司令部不知道，问题就严重了，一直干了两天两夜。我们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给他们送饭来，向他们说：“你们也是贫下中农子弟，你们当了兵，枪口不应对着阶级兄弟，对着贫下中农！”有的士兵都落了泪，把武器放下了，就这样对峙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增了兵，就又捕人，我们又斗争，他们又失败了。有些人害怕了，不干了，说这是解放军，不同于保守派呀！人慢慢不如以前多了。我同革命派同志商量，我问他们“前途怎么样？”他们说：“我们前途很光明，但要走一段曲折的道路，坚持就是胜利！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这是一条坚持的道路，有的人说投降吧！还有人说，上北京告状，就这么三条办法，我决定坚持。保守派和部队对全县大包围，我们就反包围，搞游击战术，他们缩小包围圈我们就跳到外面去，这样周旋了二十六天。他们说，张钦礼过去打过游击，主意多，他们造谣言，说我是现行反革命，要通辑，说见了张钦礼，开枪打死，要死的不要活的。

二月二十日来了一次大逮捕，这次没有抗住，前后捕了一千二百人，把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大小服务员都逮捕了，就剩我们几个没捕着。我们想跳出包围圈，跑到北京去告状，但车站上就有通辑令，还有象片，有几百里的封锁线，我在兰考二十年，好多人认识我，不敢去车站。后来留了少数人坚持斗争，其它几个骑自行车到杞县，才到不久就被包围了。当地的同志说，包围了，不象你们的人，我们研究后，有几个人假装向东北方向的大沟冲，大喊大叫，把他们吸引过去，

这几个人都被捕了，我们往西南冲，冲击了第一圈。冲出后，麻痹了，走不动了，喘气了，我说话了，第二包围圈没能出去，被公、检、法的头头，一个副县长听到了，他说好象是张钦礼在说话，又把我们包围了。我说不要开枪，于是被捕了，捆起来，出来还看到第三道包围圈，有三卡车全付武装的解放军，一辆吉普车、两辆摩托车。为了我们几个人，出动这样大的队伍，如临大敌。他们胆小如鼠，不敢走兰考县境，怕群众抢。绕道转了一夜，直到天明才进了县城，把我们关进监狱，和抓反革命一样，把手指扭断了，手臂扭坏，嘴被磕破、牙也磕掉一块，监狱里挤得不得了，只看到都是人的脸。我们二月二十六日被捕，二十七日进监狱，二十八日上午开始审讯。政委象旧县官审案一样，摆了一张桌子，而后放了个椅子坐在那里，两侧是手持冲锋枪的战士，还上了刺刀，他大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钦礼跪下！”我说：“不能跪，文化大革命扫四旧，跪是四旧，我不能跪下！”他又要我低头，我说：“不能低头，低头说话不方便。毛主席说共产党员不能低下高贵的头。”他就拳打脚踢了一阵，要我交待，我说没有什么交待的，就是要造反。他要我交出后台老板，还说“你的后台老板是刘建勋。”我说刘建勋过去我见过，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根本没见过他。他问我还有没有比刘建勋更大的后台，我说：“有！我的后台是毛主席”，他打了我一巴掌，打得我满口出血。他说：“不许你侮辱毛主席，不许你胡说。”我还是不交待，他就给我带刑具，给我砸上八斤半重的脚镣。他说：“你交待！”我说：“你还有没有别的刑具，你都拿来吧！”他又给带上手铐，别人的手铐在前面，我铐在后面，还说是“优待”，手朝后，这样不能吃饭。我说：“饭是要吃的，不吃要饿死。”我还不交待，他们又用绳子把我身上缠紧，我说：“越看你们越不象毛主席的军队，不象左派，你们不讲理。”一天没问出口供，又下了狱，这是二月二十八日，三月一日又开始审讯了。是公安局长亲自到监狱去的。他说：“今天叫你游街示众。你答应了，和和善善解决问题，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讲话。我说：“我也有要求，三条：1. 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任何人不准动，要衣冠整齐见群众；2. 去掉刑具；3. 自由演讲。”他说：“第一、二条可以，第三条不能答应。”我说：“既然不行，协议不成，那就各行其事吧！”他们还是有办法，有八个彪形大汉，两个人一班，把我拉出去，一路上把头按下去，拉上来，再按下去，再拉上来，弄得我昏过去了，没有说话的能力了。监狱里人很多，就象这个礼堂一

样，一个挨一个。 3月2日监狱放风了，房顶上架着机关枪，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在监狱门口，我见到了对面8号牢房的一个老同志，他是一个志愿军的炮兵师长，52岁了，他们说他是“张钦礼的铁杆保皇派。”刘师长带了手铐，说他们是报复，大喊大叫大骂：“你们是法西斯！狗官站出来！老子要抽烟，老子要喝水！”我喊着向刘师长敬礼。他用铐着的双手给我鼓掌欢迎。看监房的人不愿意了，从七号牢房出来了几个人，他们就拧我胳膊，按我的头，屁股都坐到脸上了，全身骨头发响。我的腿被打伤了，不能走，就爬在栏杆上向下看。狱中人有三种表现：老革命都大骂，工人不吭气、学生和青年叫喊。我就读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在野兽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怯懦。”最后这一句，把他们弄恼了，上来两个拿刺刀的战士向我逼来。我往前凑了一下，他们往旁边让开了，我问：“你们为什么要刺我？”他们说：“不让你读语录。”我说：“你们是不是毛主席的兵？”他们说：“是。”我说：“那为什么不让读毛主席语录？”他们说：“叫你小声点你就小声点。”我说：“声带是我的，我愿意念多高就多高。”刘师长说：“你们是法西斯！白色恐怖！狗官站出来！”他们走过去问刘师长：“你凭什么不怕死？”刘师长说：“我凭的是毛泽东思想！凭我这条老命！”他们没有办法了，只好唉！唉！地叹气。 4月25日用汽车拉着我们三个人去游乡，头上戴着纸帽，插着白旗，开4000余人的斗争会。他们喊口号，群众不举手，我对旁边的同志说““你看，我们还有群众呢！”有一个人包了六个纸包递给我说：“要肃清你的‘流毒’，这是你的‘流毒’，给你！”打开一看，里面包着六个熟鸡蛋。都被他们打掉了，以后就再也不敢让我们游街了。在狱中审了我53次，上刑27次。有的年轻人反抗得厉害，上刑更重，手铐、脚镣吊起来一夜不放下来。最厉害的是把人装在麻袋里，封上口，骨头都挤碎了，九个人装了麻袋，8个人昏死过去了，到第二天才醒过来。这不是什么新发明，这是蒋介石4.12大屠杀时用的刑法。 我住的牢房里是两个人，其他房子里都是上百人。同住的人姓白，作了工作以后，他说是派他来监视我的，他们给他两个条件：1，不要同我讲话；2，不要让我死了。做了可以减轻或不判罪。 十六个解放军，分两个班看守我们，有的解放军端着枪，上了刺刀，脸色很难看，我们就不理他。有的问我们吃不吃得饱，受不受不了。我

们就向他作工作，说这是小小的代价，我们国家要摸反修、防修的经验。全世界都看着中国，我们要扛起反修反帝大旗。你们都是贫人出身，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能忘本。这样就慢慢的熟起来了。经过 50 多天的工作，在 16 个解放军里，5 个人同意我们的观点，其中三个人可以让我们坐下，躺一躺，在牢房里走一走。两个班长白天收集造反派及军内的情况，讲给我们听。

七月一日送来一张报纸，上面有一张毛主席象。我站在牢房的里侧，为的是不被他们发现。一个班长说：“有希望了，听说二七公社与保守派在京谈判，中央表态了，中央支持你们。说军区支左支了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这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人背着我们说的，被我们听见了。”我们七一在监狱里对着毛主席象宣誓：“前半辈子跟毛主席闹革命，后半辈子一定听毛主席的话。”7月2日狱中的炊事员老王送的馍里夹了一张条子，写道：据说中央决定放人。下面写着“新华”两字。这是我们新华书店一个组织的代号。我们关在牢里，造反派他们晚上在牢房外面敲鼓，是信号，怕有人害了我们。他们本来打算把我从狱中抢出来，因怕造成伤亡，没有干。7月26日又送来一个条子说，保守派打算把你搞出去，在三天内暗害。我与那几个解放军商议。他们说：如果发生事情时，让我从牢房小窗子爬上去，翻墙逃走，他们两个人掩护我，

7月28日夜三时，那两个解放军已经下岗了，忽然门锁响了，我马上拿了一个铁盒，好作武器。我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原来是指导员进来了。我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来看一看你。为了你的安全要你出去。”我看他今天的脸稍好看一些，我说：“你们不是要害我吗？等我穿好衣服穿好鞋。”我拿鞋为的用鞋作武器同他们干。我出了牢房，一个小车飞快开来，车门一开，两个人把我一架，塞进汽车就跑，把我架得紧紧的。车开得很快，到了县里我说：“车子别开了。我知道你们要杀我，我死，要死在兰考，再开我就骂。”他们说：“我们是有任务的，老同志，我们一怕老保害你，我们交不了差，二怕革命派不放你走，才这样做的。中央限令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护送你到北京。”他们又说：“你可别跳车，你跳了车，我们就没有脑袋了。”29日我到了北京。三十日下午七时，总理联络员通知我：“下午十时二十分，周总理、康生、江青、杨成武、戚本禹、叶群等同志在人大会议堂接见你。”我思想激动了，

晚上没吃饭。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康生同志亲自解决河南问题，解决的很彻底，河南造反派翻身了，归结起来，就是这几句话：“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救了我们河南五千万人民，救了我们革命造反派。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得我们家破人亡，筋断骨开，河南造反派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全国，特别是首都造反派对我们支持的结果，也是我们河南造反派的同志坚真不屈，坚持斗争的结果，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红旗造反团、安阳地区五月风暴司令部《二七风暴》1967年8月3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向英雄的兰考贫农下中农致敬》

目前，全国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广大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起来，在轰轰烈烈的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规定的进行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针、正确路线。能不能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这是能不能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将农村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河南省兰考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程，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在旧社会，贫农、下中农受剥削压迫最深，家家有血泪史，人人有苦难账。他们对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感受最深，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分得最清。他们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共产党，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赫鲁晓夫所鼓吹和推行的那一套“剥削有功”、“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等深恶痛绝。谁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们都有极明白的计算。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在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了一支坚强可靠的力量。贫农、下中农在对阶级敌人的战斗中，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不管风浪多么险恶，他们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颗颗红心永远

不变。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证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的革命坚定性的时候，曾经教导我们：“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兰考的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贫农、下中农是何等的坚定、明朗，何等英勇无畏！正是他们，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用自己对毛主席、对党的赤胆忠心，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了社会主义的铁打江山！

坚定不移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就能够在广大农村保证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贫农、下中农不仅最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最关心生产。他们是真正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革命就会轰轰烈烈，生产就会热气腾腾，农村就会一片兴旺。兰考县的形势大好，根本之点就在这里。

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依靠那些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农村，就要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只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向英雄的兰考贫农、下中农致敬！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记兰考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

振奋人心的革命景象 在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河南省兰考县，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呈现一派大好形势。一年多来，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经历了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惊心动魄的大搏斗。全县广大贫下中农坚决地要保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焦裕禄这面旗子；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所操纵的一部分顽固保守势力，则千方百计地要砍掉这面旗子。阶级阵线从来没有这样分明；阶级斗争从来没有这样激烈。如今，兰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全县最大的贫下中农革命组织

“兰考卫焦”，已经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这样深入人心，光芒四射。中国赫鲁晓夫伸进兰考的黑线，早已象瘟神一样被千万人所唾弃。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以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为首的兰考县革命委员会，已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光荣地诞生。踏上英雄的兰考大地，一幅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会立刻把你紧紧地吸引住。走进每一个大小村镇，许多男女社员，甚至白发苍苍的老人，都佩戴着鲜红的“兰考卫焦”的胸章。他们一见面就亲切地向你打招呼，一开口就以无限崇敬的心情赞颂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在这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象雨后春笋般地遍及每一个公社和生产队。在这里，不论是大街小巷，是生产队的办公室，还是挖河工地上，揭露中国赫鲁晓夫推行“三自一包”罪行的革命大批判专栏，到处可见。

目前，正是严冬季节。大地冰冻，北风怒吼。然而，广大贫下中农正在以从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投入热火朝天的冬季生产运动。一队队男女社员，手捧着毛主席像，携带着毛主席语录牌，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象一队队英武的战士，步伐整齐地走向田野。在那平坦的土地上，人们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摇动“铁臂”，挥舞“银锄”，开河挖渠……，以使用黄河的水，把多年的盐碱地，改造为肥沃的稻田。在那一堆堆沙丘上，人们正在大种广种泡桐树，以便让兰考全县换上新装。辽阔的兰考大地，红旗招展，人群踊跃，歌声嘹亮。英雄的兰考人民，正在以百倍的信心和勇气，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正在以英雄式的劳动，续写着焦裕禄同志没有写完的瑰丽的文章。

阶级斗争走着曲折的道路 兰考的大好形势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阵什么大风吹来的，而是兰考县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凭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胆忠心，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得来的。兰考县的阶级斗争，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县委第一书记王××，正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兰考县的一个忠实门徒。他一来到兰考，就对这块连年受灾的地方看不惯。他不是领导全县人民向自然灾害作斗争，而是带着棕床、藤椅到土质最好的丰产区去“蹲点”。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赫鲁晓夫乘机抛出了“三自一包”的黑纲领。王××如获至宝，得意忘形地称赞“三自一包”是什么“救命政策”，“活命政策”，“拴人政策”（防止灾民外流）。他不顾广大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的反，在城关公社大搞“三自一包”的试点，

大吹大擂地推销他的“土地包产到户,牲口分槽喂养”的黑货。当时,全县以“借地”、“开荒”为名被变相侵占的土地占全部集体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二。城关公社胡集大队,除了种公粮的土地以外,百分之九十七的集体耕地被分配到户。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复活,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他们到处煽动社员搞单干,猖狂地破坏集体经济。树木被砍伐了,水利系统遭到了破坏。整个兰考灾区盐碱上升,内涝加剧,土地荒芜,风沙重起。严重的自然灾害,又降临到全县三十八万人民的头上。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受了党的委托,带着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来到了兰考县。焦裕禄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他到兰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举旗抓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抓狠抓阶级斗争这条纲。他在灾难深重的兰考县广泛开展了忆苦思甜教育,调动和激发了全县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威风。他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走进生产队的牛棚和贫下中农的家屋,大力表彰贫下中农中涌现出来的自力更生和奋发图强的新事物,热情地支持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他在全县亲自树立了四个红旗大队,这就是: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进一步激发了全县贫下中农冲天的革命干劲和革命硬骨头精神,向自然灾害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经过三年的奋战,基本上锁住了风沙,制服了洪水,改造了盐碱。连年受灾的兰考第一次获得了好收成。兰考人民饮水思源,有口皆碑。他们对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永远感念不忘。他们说:“毛主席咋说,焦书记咋做,句句话说在俺心窝里,件件事办得俺心满意足,真是俺贫下中农的贴心人。”焦裕禄同志逝世以后,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同志,遵照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继续踏着焦裕禄的脚印前进。他进的是贫下中农的门,吃的是贫下中农的饭,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战天斗地,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的新兰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兰考县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焦裕禄同志逝世以后,又来了一个县委书记,名叫周××。这个人 and 贫下中农根本不是一个心眼。他一来到兰考,就要把林彪副主席亲笔题词表彰的毛主席

的好学生焦裕禄这面红旗砍倒。在他看来：“兰考县的灾害还没有减轻，沙荒还没有盖好，精神还没有变成物质。”他竟然说：“宣传出去，叫全国来看什么？看沙荒和盐碱吗？”

焦裕禄同志的模范事迹广泛宣传以后，全国亿万人民被深深地感动了。每天到兰考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人们要求周××介绍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周××却冷冷地说：“我刚来，不了解情况，叫张钦礼介绍吧！”张钦礼同志介绍了，周××又怀恨在心，到处污蔑张钦礼同志“宣传焦裕禄事迹，是想捞政治资本”。一个要宣传焦裕禄，一个要否定焦裕禄。兰考县两条路线的斗争又一天天激化起来。

贫农、下中农英勇地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洪流

一九六六年六月，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在兰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旧县委内以周××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他们蒙蔽了一部分群众，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

“张钦礼是政治扒手！”

“张钦礼是三反分子！”

一时间阴风四起，妖雾迷漫。千百张莫须有的大字报劈头盖脸地朝张钦礼同志打来。

“这是怎么回事？”

“张书记宣传焦裕禄同志的事迹难道错了吗？”

“县委内一些人为啥要砍焦书记这面旗子？为啥要把焦书记生前的亲密战友打成三反分子？”

一连串的问题，使兰考的广大贫下中农再也不能沉默了。

兰考的贫下中农是苦大仇深的，是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在旧社会不知有多少人逃荒，要饭，卖儿卖女……。他们永远不能忘记：是毛主席把他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过上了今天的甜日子。他们永远不能忘记，焦裕禄同志正是打着毛主席的红旗进兰考的。他为兰考三十八万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焦裕禄同志和张钦礼同志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们和贫下中农是一根藤上的瓜。只有王××、周××等人才和贫下中农不一个心眼。本来周××是接焦裕禄同志的班的，可是他来兰考两年，没有交一个贫下中农的朋友。他们反对张钦礼，是企图借反对张钦礼来反对焦裕禄，反对贫下中农，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想从贫下中农的心窝里砍掉焦裕禄这面鲜艳的红旗是万万办不到的。

正因为这样，兰考的贫下中农十分关心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白天坚持生产，夜晚就积极闹革命，谁反对张钦礼，谁贴张钦礼的大字报，他们就为谁辩论。

就在这时候，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毛主席的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象一声春雷传到了兰考。兰考县的广大贫下中农，听到了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召唤，立刻沸腾起来了！他们说：毛主席说的要放手发动群众，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毛主席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尽管起来干！焦裕禄同志亲自树立起来的四个红旗大队的贫下中农首先起来串连，成立了一个“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全县贫下中农一呼百应，呼啦啦都起来了。紧接着，县城的工人组织了一个“工人卫焦造反司令部”，县直机关成立了“卫焦战斗兵团”，二中的学生组成了“八一八裕禄战斗队”。全县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和机关干部一个观点，一个心眼：坚决地保焦裕禄，保张钦礼。按照他们的话说，三十八万兰考人民，绝大多数都是卫焦战士。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敢革敢保。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兰考的贫下中农，从切身体会中懂得：焦裕禄和张钦礼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一心一意要带领兰考三十八万人民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的。王××、周××却安的不是好心。依了他们，就等于向资本主义死路上走，向火坑里跳。因此，保张钦礼，就是为了保焦裕禄，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他们毫不含糊地提出：“周××是县委内头号走资派”，“张钦礼是革命领导干部”，“坚决打倒周××”，“坚决支持张钦礼”。这就是他们的行动口号。一九六七年一月，兰考贫下中农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和鼓舞下，六十六个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一举夺了旧县委、县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在这大好的革命形势下，阶级敌人丧魂落魄，革命人民扬眉吐气。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逃到开封的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一月夺权不久，他们就急急忙忙勾结地委、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配合社会上的一股反动逆流，在一天的夜里，重新“杀”回了兰考，对手无寸铁的卫焦战士，来了个大逮捕，大镇压。他们把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的老贫农、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坚强的革命领导干部，成批地逮捕入狱。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把县广播站夺在自己手里，一天到晚播送张钦礼的“八大罪状”。韩村、秦寨、赵垛楼和双杨树四个红旗大队，被打成“修

正主义大队”和“顽固大队”。离城不远的三义寨公社，被旧县委内的走资派依观点的不同划“解放区”、“游击区”和“敌占区”。他们还在全县大搞所谓请罪运动。不仅如此，他们还采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卑劣手法，强迫社员改变观点为。凡是信了他们的观点的，凡是赞成打倒张钦礼的，他们就发给救济粮、救济款，发给萝卜。他们还把社会上的一些牛鬼蛇神，以及投机倒把、好吃懒做的人，统统搜罗起来，为他们摇旗呐喊，以壮声威。兰考上空笼罩着乌云。兰考大地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决战时刻到来了！一场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加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开始了！赤胆忠心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这场斗争中，兰考的贫下中农不愧为英雄好汉。不管风浪多么险恶，他们永远记着毛主席的话：“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坚信：毛主席是一定会替兰考的贫下中农撑腰的。谁要是把矛头指向贫下中农，他就肯定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他就是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黑线上的人。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在反动路线的层层封锁下，听不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他们就在深更半夜，围坐在小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走资派的亲信们要他们改变观点，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俺们贫下中农只有一个心，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焦书记这面红旗！坚决支持张钦礼！你说张钦礼是个“黑帮分子”，俺们情愿作“黑帮社员”。走资派的亲信说：“改变观点，我给你萝卜！”贫下中农说：“萝卜可以不吃，想叫俺改变观点比登天还难。”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兰考的贫下中农，在和反动路线的殊死斗争中，创造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啊！三义寨公社南马庄大队有一个第五生产队，是焦裕禄同志生前亲自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硬骨头生产队”。队长张应堂，是一个热爱集体、一心为公的好干部。由于这个队没有一户不是“卫焦”观点，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自然把它看成眼中钉，并把这个地方划成了“敌占区”。走资派的亲信，掂着棍子，拿着绳子，整天吆二喝三要来抓人。社员们都劝队长张应堂出去躲一躲。可是，生产队就是他的家业，他的命根子。他怎么能够离开呢？！在旧社会，张应堂一家是一个赤贫户。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一家人住了几十年的破庙，要了几十年的饭。……在多少次忆苦会上，他都热泪横流，泣不成声。可是今天，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却象一座金刚一样坐在生产队的

办公室里，坚强不屈地说：“不！我不能离开大家。我走了，咱队的生产谁管呀！”这个贫农出身的生产队长的形象，不正是兰考县千百个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吗？双杨树大队有个大娘叫周玉花。在黑暗的旧社会，她父亲被地主逼死了，母亲饿死了，哥哥被日本人枪杀了。一家人就剩了她一口子。解放后她才翻了身，过上了甜美的日子，有了八个孩子。她逢人就说：“我永世不忘毛主席。”这次文化大革命，她听说县里出了走资派，跟毛主席不是一个心，要复辟资本主义。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她说：“资本主义那条路我是吃过苦头的，不能再走了，我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谁不跟毛主席一个心，俺就坚决造他的反！”就这样，她参加了“兰考卫焦”，成了一名坚强的卫焦战士。她万万没有想到，眼看县里的文化大革命就要胜利的时候，县委的走资派又回来兴风作浪。广播匣子里天天播送张钦礼的“八大罪状”，胡说什么开封“八·二四是混蛋组织”，“兰考卫焦是反革命”。她一听就把线卡了，心里象刀绞一样难受。有几天听说开封“八·二四”被保守派包围了。她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一心想到开封去看看。有人问她：“八·二四有你的啥人？”她说：“没有我的儿，也没有我的女。是毛主席叫我关心国家大事。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我能不惦记他们吗？”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周玉花大娘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她一有空就坐在毛主席像前，对毛主席说：“毛主席呀，毛主席！俺兰考的事，您老人家知道不知道？”她闺女劝她说：“妈！那是毛主席像，你说了他老人家也听不见。快吃点饭吧！”周玉花说：“不！毛主席就在咱家里。心里有啥话，就得给他老人家说。有毛主席作主，俺啥也不怕。”周玉花大娘已经五十岁了，身边还有个四五岁的孩子。可是，她每天夜里都跑二三十里地出去串连。一见到自己的人，她就先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她就是用毛主席的话去鼓舞贫下中农的后生们起来战斗。走资派的亲信们对周大娘恨得要死，也怕得要死。一见面就讽刺她，挖苦她，骂她是“老顽固”，是“张钦礼的铁杆保皇派”，说她“受蒙蔽太深啦！”周玉花大娘也分毫不让地说：“俺受‘蒙蔽’有两丈深，你看着办吧！毛主席武装我的头脑，是铜墙铁壁，谁也打不开！”走资派的亲信们看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他们把周大娘的眼睛都打肿了。可是周大娘一家那里肯服？她的老伴站在大门口高喊：“打吧！俺全家都是‘八·二四’观点！”周大娘也说：“俺革命不怕死！怕死

不革命！俺还要把毛主席的红旗举得高高的，叫它永远飘扬！” 小宋公社唐寨大队有一个阎协崇大爷。他是县贫协的副主任，出席省贫下中农代表会的代表，也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他有一张饱经风霜的慈祥的脸。头上的一顶棉帽，补了又补，缀了又缀，已经戴了多年了，还不舍得换一换。在兰考县，人们都亲切地称他“阎代表”，说“阎代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毛主席思想学到心里去了。”平日，听说美帝国主义轰炸越南，他就教育儿女们，用瓜菜掺着粮食吃，省出了二百斤小麦，留着支援越南兄弟。还节省了百多斤粗粮，是专门补助五保户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阎协崇带头起来造反，和韩村年青的女共产党员杨素兰等人一起组织了“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坚决保焦裕禄这面红旗，坚决保张钦礼。他认定：周××是走资派，张钦礼是好干部。坏人就是要揪，好人就是要保。 就是这样一个可敬爱的老人，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却被地、县委的走资派和他们的亲信打成了张钦礼的“孝子贤孙”。村子的东西街和南北街，全是围攻他的大字报。连他的一个刚满八个月的孩子，也被贴了大字报，骂成是“小反革命羔”。他家本来是“满家红”，当时却成了“满家黑”。孩子们不敢去上学，不敢去放羊。羊都饿死了。阎大爷本人，也被走资派的亲信们在公社和大队“辩论”（斗争）了几十次。 就是这样千斤的压力，阎协崇大爷保卫毛主席的一颗红心永远不变。他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俺的命根子，还是保卫毛主席要紧！”夜里，他带领全家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幸福是毛主席给的。俺要保卫毛主席江山万万年。” 每一次“辩论”会，阎协崇大爷都当成了忆苦会。他讲自己在旧社会是怎样的吃苦受罪。腊月天，下着大雪，他怎样在冻得红肿的双脚上绑点破布片就去要饭。他讲毛主席怎样把他从火坑里救出来，又怎样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他说：“我永生永世也不能忘了毛主席。你们想想，贫下中农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闹革命有什么罪？你们为啥听信坏人的话，把矛头对准咱贫下中农？！”他的话把那些一时受蒙蔽的群众感动得痛哭流涕！ 阎协崇大爷越斗争，精神越旺盛。一天“辩论”他三次，他照样唱着《东方红》的歌子，背诵着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下地去打井。他说：“毛主席要我抓革命促生产。我要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在那些困难的日子，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兰考的孩子们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是那样热情、勇敢、机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

一个个都是小英雄。他们不愧为毛泽东时代的儿童，不愧为贫下中农的好后代。在兰考到处流传着孩子们赶走中国赫鲁晓夫“工作组”的故事。如今，在韩村的墙壁上，仍然可以看到孩子们写的反对中国赫鲁晓夫工作组的大标语。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村大队韩村生产队除了一户以外，全都是一个观点——卫焦观点。地、县委内的走资派为了胁迫这个生产队改变观点，二十九户人家就派来了三十二人的“工作组”。他们一进门，开口就是：“你们受蒙蔽了！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韩村的大人小孩谁不知道焦书记是好人，张书记也是好人！听了“工作组”的宣传，他们心里火透了。尤其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们，他们尖着嗓子质问“工作组”：“你们是啥工作组？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工作组。快走开！”后来，他们就干脆不给“工作组”开饭。一到“工作组”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围上去说：“俺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是中国赫鲁晓夫的路线，咱们不是一个观点，不能吃俺们的饭。”有的说：“你说张钦礼是‘黑帮’，俺就是‘黑帮社员’，俺的饭也是‘黑’的，你不能吃！”桌上放上馍，孩子们把馍拿走，桌上摆上饭，孩子们把饭倒回锅里。“工作组”在韩村实在不得人心，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县城，再也不来了。在和反动路线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很多孩子都自动组织起来，帮助大人站岗，放哨。他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没有笔和纸，他们就用镰刀在场边和大路上到处刻写大字标语：“打倒周××！”“坚决支持张钦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场光明和黑暗的决斗，整整持续了五个多月。地、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的亲信们，已经深深地陷落在英雄的兰考人民的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骄阳似火。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整个河南开始呈现了一派大好形势。河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二七公社”和开封

“八·二四”已在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央首长在北京接见了兰考的革命领导干部张钦礼同志和“兰考卫焦”的代表。喜讯传来，全县沸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革命人民胜利了！各个公社的贫下中农们自动涌进了县城。从兰考车站到座落在黄河古堤上的焦裕禄同志的墓前，人山人海。人们高举着“兰考卫焦”的战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发自肺腑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为了欢庆胜利，大街两旁的茶水摊也不要钱了。只有亲身参加斗争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英

英雄的兰考人民！战斗的兰考人民！他们并没有因胜利而陶醉，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们正在新生的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决心在新的一九六八年，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英雄的英雄的兰考人民！战斗的兰考人民！正在踏着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脚印，为建设一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社会主义的新兰考而奋勇前进！（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河南省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张钦礼：《永远听毛主席的话 做群众的小学生》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是光芒四射的指路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航程。我们兰考县革命委员会，把伟大领袖这一最新指示，当做革命的法宝，战斗的武器，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落实措施。大家一致认为，革命委员会应该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非常群众化，事事、处处、时时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要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一辈子俯首甘做群众的老黄牛。

县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议，就如何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焦裕禄同志不图名，不图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实现领导核心思想革命化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实现思想革命化，是一场严峻的斗私批修的伟大斗争。应该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心往“公”字上想，劲往“公”字上使，命往“公”字上献。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把形形色色的“私”字彻底消灭干净。要全心全意地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常委会议订出了七条行动措施：一，建立学习毛主席著作制度。每星期一、三、五革委会领导成员要参加所在地方的群众集体学

习；每天早晨定为“天天读”的自学时间。二，实行常委值班制度。每天有三名常委值班处理日常事务，其他常委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工厂，深入学校，参加劳动，接触群众，同革命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进行调查研究。三，认真听取革委会内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接受他们的监督，使革命委员会同革命群众建立骨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四，会议、文件、讲演，要力求精简，不搞烦琐哲学。五，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革命干部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按毛主席“五·七”指示的精神，从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生活上真正实现革命化，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踏踏实实地、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坚决反对特殊化，坚决反对一切脱离群众的现象。六，革委会内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着重自我批评。委员之间，要彼此互通情报，互相交流经验。七，常委会每十天开一次，全体委员会一月开一次，特殊情况随时召开。

会议上订出的制度，并不等于实际行动。我们根据毛主席“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的伟大教导，分别到基层，到群众中去学习。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对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就体会得更深刻，更加深刻体会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最英明、最伟大、最正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具有无穷的威力。到群众中以后，也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我到爪营公社张庄大队去，一位七十多岁的贫农老大娘说：“俺就是一头扑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生就生在这条线上，死就死在这条线上。”简单朴实的几句话，道出了亿万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胆红心。

只要“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感到革命群众的伟大，自己的渺小，会加强和促进你甘当群众小学生的自觉性。到群众中去，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课堂，革命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县革命委员会常委、韩村大队贫协主任杨素兰深有体会地说：“和群众在一起，就眼明心亮，浑身是胆。一脱离群众，就感到无依无靠。”

毛主席教导我们：“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

应该检查。”前不久，兰考连续下了几天雪雨，六、七级的寒冷北风昼夜不息。这时，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在我们脑海中发光，焦裕禄同志顶风冒雪访贫问苦的光辉形象在激励着我们。当时，在家的常委立即研究了六项措施，一面通知各公社大队采取行动，一面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去探望亲人。这一天，常委的同志访问了二十一个村子，访问了九十多户烈属、军属、五保户和贫下中农。每到一处，就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具体困难。群众激动地说：“毛主席可真关心俺贫下中农，请你对毛主席说吧，俺贫下中农永远跟着他老人家走，他老人家说的话，俺贫下中农一千个照办，一万个照办。”

在革命实践中，我们深深感到：实现思想革命化，是革命的需要，是群众的需要，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指引的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航道，是反修、防修，保证人民的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要实现思想革命化，就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牢固地树立勤勤恳恳甘当群众的小学生的态度。要实现思想革命化，就必须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把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的斗争提高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要实现思想革命化，必须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了就用，立竿见影，雷厉风行地见之于行动。要联系自己的实际、本单位的实际、社会的实际，坚决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我们革命委员会把学习、宣传、贯彻、捍卫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作为头等大事。我们听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立即运用一切宣传工具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革命群众，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根本。

（新华社郑州二十一日电）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河南日报报道：《永葆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记兰考县革委会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事迹》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这个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中诞生的革命政权，以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一切行动的准则，以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为榜样，大力突出

无产阶级政治，狠抓思想革命化，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精神，在兰考县三十八万人民的心目中，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和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破私立公 狠抓思想革命化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一成立，就狠抓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他们以“老三篇”为座右铭，破私立公，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革委会成立的当天，他们就讨论通过了《关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若干制度的规定》。第二天，全体委员又一起到焦裕禄同志的墓前宣誓。他们决心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首先狠抓了领导班子本身的阶级斗争教育。他们认为，朝气蓬勃的革命委员会，只有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斗争中，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因此，无论开常委会，还是全体委员会，他们都认真地学习毛主席教导的：“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们经常敲起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的警钟，经常分析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回顾有些干部蜕化变质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提高了反修防变的革命自觉性。他们深有体会地说：“监狱镣铐不可怕，筷子头能打倒人。是彻底革命，还是半截革命，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

“攒着劲变修的人很少，不知不觉变修的大有人在。”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非常注意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思想领域里筑起一道反修防变的钢铁长城。他们抓思想革命化，首先抓大节，但也从来不放过被人们忽视的所谓“小事”，用毛泽东思想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指导一切，改造一切。一次开常委会，有个革命群众代表，穿着还没晒干的湿布衫来开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位同志前一天劳动，布衫上粘了些泥土，怕穿个“脏”布衫来开会别人笑话，就把洗过还没晒干的湿布衫穿来了。事情虽小，常委同志却对照毛主席关于“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教导，把这件事提高

到是不是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高度来认识。在大家帮助下，这位同志认识到，不是自己的布衫脏了，而是自己的思想粘上了脏东西。如果不警惕，这就可能成为变颜色的开始。这件事也使常委同志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为了保持优良作风，兰考县革委会的同志们，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了缺点和错误，就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的教导去做。去年十一月，兰考二中要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个学校的“八·一八”革命小将，冒着风雨，步行七十多里来到县革委会，要求批拨一点开会用的经费。县革委会主任张钦礼同志，当时感到这是全县第一个中等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应当给予热情支持，就给他们批了些钱。但是，当其他常委认为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教导后，他发现自己做错了，就马上在常委会上作了检讨，又向二中“八·一八”小将们检讨，还在其他会议上检讨。张钦礼同志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不折不扣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常说：“忠于毛主席，有了成绩不翘尾巴；有了错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改，彻底改，迅速改。”他这样说了，也这样作了。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中的革命群众代表把自己的艰苦朴素作风，带到县革命委员会里来。县革命委员会委员阎协崇，是一位无限忠于毛主席，一贯艰苦奋斗的老贫农。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他教育儿女们，吃粗粮省细粮，多吃菜少吃粮，省出了二百斤小麦，留着支援越南人民。即使在县革委会成立前，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下，他的老生儿子被折磨得皮包骨头，他也没有动那二百斤小麦。他说：“跟锄地一样，不能光锄自己脸前那一片，周围的草不锄掉，你那片也干净不了。不解放全世界人民，不能算胜利，看不到全世界人民，权就掌不好。”这位老贫农，把掌好无产阶级政权同世界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因而能够高度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他头上戴的那顶“火车头”棉帽，又小又破，已经二十五年了。可是今年一月，当老伴给他几元钱，叫他买顶新帽子时，他却坚持不买。他说：“这顶帽子虽说不好，可意义大。看见它就想起了旧社会的苦，就想起了今天的甜日子。”后来他又添了几元钱，买了五套《毛泽东选集》，留下一套自己学习，那四套分别送给了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阎协崇这种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革命委员会的全体同志们，他们都把阎协崇当成了学习的好榜样。

艰苦奋斗成风 革命朝气蓬勃

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认为：革命委员会能不能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能不能掌好权、用好权的大问题。因此，县革委会一成立，他们就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去年二月份，这个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为了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任意挥霍国家财产，预计年底将出现大量赤字。

面对这一严重问题，兰考县革委会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经济领域里的阶级大搏斗。他们一方面发动广大群众，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兰考的代理人所推行的“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黑货，彻底肃清反革命经济主义流毒；另一方面，想各种办法开源节流，扩大财政收入。他们坚决按照毛主席“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的指示办事，坚持可以不用钱，坚决不用，应该花的钱尽量少花，一切从生产出发，一切从节约出发。兰考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二月逆流”中，曾经用大麻籽叶卷起来作笔，用锅底灰掺水当墨，写大字报，刷大标语。县革委会号召全县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学习和发扬这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尽力为国家节约一滴油，一粒米，一度电，一张纸。革委会本身也处处以身作则，带头节约闹革命。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到年底，不仅弥补了财政赤字，还结余资金达六十一万三千元。

兰考县革委会的同志们，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们自己。去冬，兰考县革委会各办公室、住室都没有生火取暖。不冷吗？隆冬天气，怎能不冷？常委值班室茶缸里的水都结了冰。照以往的习惯，早就该生火了。但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冷不冷，而首先考虑的是群众生活得如何。有一天革委会办事组一位同志，给常委值班室生了个火，革委会一位负责同志发现后说：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再生个火取暖，烤热了皮肉，可就烤冷了心！常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同意不生火取暖。身教胜于言教。革委会的同志不生火取暖，带动了县直机关、公社也都不生火取暖了。这样，他们把原来批准给职工取暖用的五十吨煤，全部节省下来。

有一天，县革委会一位负责同志要去郑州开会，当时离开车时间只有十几分钟了，办事组的同志要用小汽车送他，他坚决拒绝，背起背包，跑着赶车去了。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小事，但是在贫下中农心目中，却关系到你是当官做老爷还是做人民的勤务员的大问题。正象兰考县的贫下中农说的那样：“过去县里的走资派出门下乡都坐小汽车，象个官老爷，和俺们不是一个心眼；现在革委会的人，下乡自带行李，都是地下跑，和俺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真和俺们的心贴得紧啊！”

兰考县革委会的成员“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和群众滚在一起，踏踏实实做人民的“老黄牛”。县革委会委员赵新贞，是下放到秦寨大队的一个国家干部，群众称他是“拣不出来”的干部。意思是说，他皮肤黝黑，满手茧子，一身粗布衣着，站在农民群众中，谁也不能不把他当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贫下中农夸奖他说：“你看咱那老赵，说起来是县上的委员，可他没一点架子，和咱一块干活比原先还下劲，还吃苦！”赵新贞同志虽然患有慢性病，但是不管工作再劳累，睡的时间再晚，经常是天麻麻亮就起床，抓起扫帚，从街西头扫到街东头。革委会的同志们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就出现在群众面前。每当大雪大风天气，下乡访贫问苦已成了他们的新习惯。

密切联系群众 不断改造自己

只有密切地联系群众，深刻地了解群众，才能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正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群众。这样，我们就可能知道群众，了解群众，同群众一道，也就可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兰考县革委会的同志深刻地体会到：脱离了群众，就是离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跟群众贴得越紧，对毛主席就越亲，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自觉性就越高。他们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千方百计地保持和加强同兰考县三十八万人民鱼水相依的密切联系。革命委员会内实行分工负责，轮流值班，亲自接待群众来访，处理群众来信，经常下乡、下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革委会中的革命群众代表，除常委有时轮流值班外，都不脱离原来的学习、生产和工作岗位。

县革委会所在地，原是一座“文庙”，日本鬼子侵占期间，是日伪县政府；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年代，是伪专员公署。人们叫那里是“老衙门”。如今，这里

成了县革委会的所在地。但是有些人对这个大院存在的老看法却还没有改变过来。一天，有两位农民，牵着几只羊，在革委会门前走来走去，问这是啥地方，叫不叫进去看看。这事正好被革委会一位负责同志碰到了。他马上热情地说：“这是咱县革命委员会呀，叫看，来，我领你们进来看吧！”说着，就把这两位农民领进了革命委员会的大院。革委会的同志们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了新的启示，又进一步采取措施：让农代会搬进革委会院内；在革委会院内设立了群众来访接待室。这样，革委会更成了贫下中农常来常往的地方，革委会也开了一条及时听取群众意见的渠道。

把自己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善于接受群众批评，是兰考县革委会同志们破私立公、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袭、实现思想革命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有一位革命群众代表，被选为县革命委员会常委后，一时产生了怕苦、怕脏的思想，参加集体劳动生产不如以前扎实了。村里的贫下中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就主动找着她，语重心长地说：“旧社会地主老财不把咱穷人当人看待，现在你当上了县里的委员，能代表咱贫下中农当家说话，这都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啊！你可得好好领着咱贫下中农抓革命促生产啊！”贫下中农的中肯帮助，句句打动了她的心。她对照毛主席的教导，回忆了当上委员后的思想变化，不禁大吃一惊。她十分感慨地说：“地位再变，劳动人民的思想可万万不能变啊！”从此，她除参加必要的会议外，经常在队里参加集体劳动。还有一个革命群众的代表，当上委员后，一度沾染了讲阔气、闹排场的资产阶级思想。工人同志们为了帮助他去掉这种坏思想苗头，不少人主动地同他促膝谈心，向他进行阶级教育。有位姓黄的老工人和他一起忆苦思甜，当他回想到小时候同母亲逃荒要饭的悲惨情景时，热泪横流，他激动地对那位老工人说：“请你们放心啦，我永远不会忘本。”他自觉地脱下了毛呢衣服和皮鞋，换上了普通的劳动服装，同群众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毛主席教导我们：“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兰考县革委会遵照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把干部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一个不容侵犯的制度，作为反修防变，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革命作风、实现思想革命化的一个大问题。革委会成立后，常委同志们第一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在毛主席十五年前视察过的许贡庄。那里

的贫下中农回忆起当时见到毛主席的动人情景，总是热泪盈眶，感激万分。毛主席亲自访问过的七十四岁的老贫农董宪德，对毛主席和他谈话时的激动人心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当常委同志们告诉他，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的时候，董宪德老大爷无比兴奋地说：“毛主席身体健康，是咱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最大福气，祝愿他老人家万寿无疆！”贫下中农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深厚的阶级感情，深深地激励着在场的常委们，使他们受了一次生动深刻的忠于毛主席的阶级教育。

革委会有不少委员主动带领所在地的干部、群众，以旺盛的革命热情，经常积极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县革委会委员、仪封公社吕拐大队革委会主任陶云彬提出“放下洋车子，扛起粪箩头”的口号，带头背起粪筐，扛起铁锹，经常同社员一道战斗在田间。三月上旬的一天，公社组织春耕生产大检查，他在人未到齐的一点空隙时间内，还要坚持在队里干活，分秒必争，一时一刻也不肯脱离集体生产劳动，经常同劳动人民滚在一起，在社会主义集体生产劳动的大熔炉里百炼成钢！

（原载四月十三日《河南日报》，本报有删改）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张钦礼：《革命的群众运动威力无穷》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已经发表两年了。毛主席在《通知》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武装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全国革命人民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把那些极端狡猾，极端阴险毒辣，隐藏得很久，钻得很深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挖了出来，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战斗过的兰考县，在两年中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回顾两年来的战斗历程，完全证明毛主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伟大教导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充分证明林副主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一论断的完

全正确。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的两年，我们千百遍地纵情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万岁！

在兰考，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长期进行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全县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干部，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向兰考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发动了猛烈进攻。广大革命群众遵照毛主席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教导，分清敌我，明辨是非。谁是党内走资派，谁是革命领导干部，他们都分得清清楚楚。他们和革命领导干部结合在一起，始终把矛头对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兰考的代理人，把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一九六七年一月，兰考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举夺了兰考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这一革命行动，使阶级敌人丧魂落魄，革命人民扬眉吐气。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兰考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疯狂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扑。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掀起了一股反革命复辟逆流，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对兰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实行残酷的镇压。坚决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兰考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贫下中农，并没有被阶级敌人所压倒，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团结一致，同阶级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揪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兰考农村十五周年的光辉的日子。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兰考县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兰考县革命的群众运动的伟大胜利！

通过两年来同兰考县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贫下中农的并肩战斗，我进一步深刻地体会到革命群众运动的无穷威力。革命群众是我最好的老师。和群众在一起就心明眼亮，浑身是胆，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我一定要一辈子做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永远同广大群众在一起，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向奋勇前进！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记者《革命先锋——记兰考县小宋公社唐寨大队老贫农阎协崇》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四十多年前就强调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是“革命先锋”。河南省兰考县小宋公社唐寨大队的老贫农阎协崇，就是我国农村中千千万万“革命先锋”的一个代表。

二十年来，阎协崇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斗争中，充分发挥了革命先锋的作用。土改时，他挺身而出，担任农会组长，积极带动贫下中农斗地主、分田地，把千年的封建制度狠狠踏翻在地。农业合作化时期，他一马当先，担任互助组长，和贫下中农一起，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百折不挠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英勇奋斗在阶级斗争的最前列，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带领和团结广大贫下中农，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坚决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

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地降临到兰考大地。三十八万兰考革命人民，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投入了这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大革命。旧县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惊恐万状，急急忙忙操纵一些社会渣滓，蒙蔽一部分群众，转移目标，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领导干部张钦礼同志。

当时，阎协崇正在县里学习。看到这种情况，他立刻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他反复思忖：张钦礼同志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沿着焦裕禄同志的脚印，进的是贫下中农的门，吃的是贫下中农的饭，办的是贫下中农的事，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好干部。为什么有人要把他打成“政治大扒手”呢？阎协崇想着想着，毛主席的教导又在耳边响起：“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对！一定是阶级敌人在捣鬼。阶级敌人是谁呢？阎协崇分析对比了旧县委内的几个当权派之后，便把注意力集中到第一书记周 x x 身上。这个家伙死跟着中国赫鲁晓夫的指挥棒打转转，疯狂反对贫下中农活学活用

毛主席著作，恶毒污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千方百计在兰考农村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阎协崇看穿了兰考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阴谋诡计，心里立刻明白过来：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大搏斗，这是国家大事，一定要管！决不能让走资派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决定赶回公社发动贫下中农起来造走资派的反。

一回到村里，阎协崇马上召开了大队贫下中农大会，大讲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大揭县里走资派的恶毒阴谋。唐寨大队的贫下中农迅速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在阎协崇带领下，投入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战斗，其他公社的贫下中农队伍也不约而同地组织起来，结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农民革命造反大军——“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阎协崇当选为副主任。他们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同走资派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贫下中农爱憎分明的立场和所向无敌的气概，吓破了兰考一小撮走资派的胆。他们麇集在阴暗的角落里，研究新的反革命策略，妄图用“糖衣炮弹”瓦解革命队伍，首先想把老贫农阎协崇拉下水去。

一天，走资派的一个亲信假惺惺地来看阎协崇。他一边从兜里掏出十五元钱，一边说：“老阎啊，回家去吧！你们懂个啥？啥叫革命！”阎协崇瞪圆了大眼，一把推开了他，粗重无情地斥责说：“滚你的蛋！想用钱收买俺哪？！不要说十五元，你就是开来一火车，俺也看不见，俺就看得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阎协崇铿锵有力的话，表达了千千万万贫下中农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对一切阶级敌人的无比仇恨。

走资派的糖衣炮弹，在贫下中农面前失灵了；走资派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被兰考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举夺回来了。可是，这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又勾结旧地委和旧省委内的走资派，掀起一股反革命复辟逆流，猖狂地反扑过来。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实行白色恐怖，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大逮捕、大镇压。阎协崇也被绳捆索绑，关了监狱。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阎协崇根本不把走资派的迫害放在眼里，他以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身的决心，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走资派的亲信们恶狠狠地审问他：“你为啥要当‘老保’？”阎协崇斩钉截铁地答道：“俺保的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社会主义的江山。过去保，今后保，一保到底，保一辈子！”

“你为啥开‘黑会’？”阎协崇连讽带刺地说：“俺贫下中农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白天干活没空，总是天黑了才开会。”

问了半天，一无所获。走资派灰溜溜地失败而去。

阎协崇把被关的地方作为坚持斗争的阵地，时时鼓励一起被抓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他们逮捕咱们，没啥了不起。咱们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头可断，血可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丢！”他总是满怀信心地说：“毛主席在北京，心里是想着咱兰考贫下中农的，他老人家是坚决支持咱们的。毛主席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咱们听毛主席的话，造走资派的反，最后胜利一定是咱们的！”

在阎协崇的鼓励和带动下，和他患难与共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接连挫败了走资派的阴谋诡计。

一小撮走资派看阎协崇的“破坏性”很大，就想用软办法劝他“投降”。他们装着关心的样子，派亲信给阎协崇送来了一条被子。“你上岁数了，给你条被子。唉，人一老，头脑就昏了……”阎协崇没等他说完，立刻打断了来人的话。他说：“毛泽东思想是红太阳，照得俺心里亮堂堂。你们不跟毛主席走，才是昏了！”那人没有死心，又说：“看在你是贫协代表的面上，写个检讨，请请罪，就放你回去。”阎协崇坚定地回答：“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罪！”走资派的亲信见来软的无效，突然变脸威胁说：“阎协崇！你想死想活？你再硬，就上刑！”阎协崇鄙视地笑了笑，毫不在乎地说：“你就是把刀架到俺脖子上，俺还是要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一辈子不变心！”

硬的，施尽了；软的，用绝了。走资派实在没法，只得把阎协崇“送回公社反省。”

“忠于毛主席，永远不变心”

阎协崇从县城被押回到公社。保守组织的坏头头以为受尽折磨的阎协崇屈服了，得意洋洋地问道：“你在县里反省得咋样？学习得咋样？现在可想通了吧！”阎协崇看着他发笑，意味深长地说：“在县里‘学习’得怪好，对两条路线斗争可看清了！”坏头头一听，以为他的观点“变”了，连说：“那好！那好！开个会，你给大家请个罪吧！”

在所谓“请罪”的大会上，经过许多天折磨的阎协崇尽管浑身无力，但是一想起毛主席关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立即感到有无穷的力量。他坚信贫下中农会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信受蒙蔽的群众会觉悟过来。他首先领着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然后大声地说：“我这次学习得可好了！看得更清楚了！他们逮捕的尽是咱贫下中农……”坏头头一听，气急败坏地质问阎协崇：“你反省这些天啦，反省个啥！怎么还是死不甘心？”阎协崇坚定地说：“不假，俺就是死不甘心！俺一家三代逃荒要饭，给地主种地扛活，旧社会害死了俺五口亲人。是毛主席领导俺闹革命，打下了社会主义江山。现在中国赫鲁晓夫要让贫下中农走回头路，吃二遍苦，俺就是死不甘心！”字字辛酸泪，句句血泪仇，一席话，说得到会的贫下中农和受蒙蔽的群众痛哭流涕。坏头头一见不妙，慌得连忙止住他的发言，要他“表表态，今后咋办？”阎协崇坚定地回答：“忠于毛主席，永远不变心！”他昂头高唱《东方红》，大步走出会场，把一小撮阶级敌人摆弄得狼狈不堪，从而把广大贫下中农和受蒙蔽的群众团结到自己的周围。

在那十分艰苦的环境下，阎协崇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斗争。他经常和大女儿（大队“卫焦兵团”负责人）避开走资派和坏头头的监视，利用劳动、串亲、访邻的机会，和积极分子一起到处发动群众，揭露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贫下中农的革命队伍越来越壮大。一九六七年七月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终于在兰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在五个月之后建立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兰考县革命委员会。

“国家大事，俺一定要管到底”

从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走进红太阳照耀的新社会的阎协崇，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他牢记毛主席把穷人从火坑里救出来的伟大恩情，紧跟毛主席走社会主义大

道，时时刻刻把国家大事放在自己的心上。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他就带头去干；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他就挺身来管，任凭遇到天大的困难，毫不退缩。一九六二年，中国赫鲁晓夫煽起的单干风刮到了兰考。生产队的阶级敌人趁着阎协崇外出之机，怂恿一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社员，按照所谓“上级指示”，把四十多亩集体耕地分了。阎协崇回来后，立刻坚决制止。他对同意分地的社员说：“毛主席让走合作化道路，这分田到户是啥道路？这是回头路！咱贫下中农绝对不能走！”有人反对说：“分地是‘上级指示’，谁敢不执行？”阎协崇气愤地说：“啥‘上级指示’？！反正毛主席没让咱这么干，咱们就是不执行！他们硬要叫分地，俺就上北京去找毛主席！这是国家大事，俺一定要管到底！”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资本主义的邪气压下去。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在唐寨一带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在阎协崇和广大贫下中农坚决抵制下，可耻地破产了。

革命斗争的实践，使这位老贫农信仰毛主席越来越深，跟随毛主席越来越紧。他虽然一字不识，但是非常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说：“我一天不吃饭，中；一步离了毛主席的书，就不中。”他废寝忘食，刻苦学习，身上经常带着《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见了识字的人就问。有时候一句话记不住，半夜里还坐起来默念，直到完全背会为止。他经常对贫下中农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咱贫下中农；有了毛主席，咱们才有今天。读不读毛主席的书，听不听毛主席的话，对毛主席忠不忠，这是天大的事，半点也含糊不得。”

“为了天下受压迫的人民都解放”

阎协崇为革命苦战奋斗，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常说：“俺不是为个人吃喝，也不是为自己家里能过好日子，俺是为了国家不变颜色，为了天下受压迫的人民都解放。”他正是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解放全人类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虽然他自己也不宽裕，但一听到邻近生产队有困难，就立即慷慨相助。朱梁庄大队的牲口没有饲料，他就送去自家的上千斤干草；为了支援五队买红薯秧，他卖掉自己的羊把钱送上前去；下雨天军属、五保户担水困难，他就挨门逐户把水挑好；哪家贫下中农生活困难，他就省吃俭用地接济他们。因此，群众都称他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焦裕禄式的好同志。

就在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迫害的情况下，他仍然没有忘记反美斗争前线的越南阶级兄弟。当时，他的全家都被打成了“反革命”，连不满一周岁的小儿子阎保国，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羔”。由于走资派的控制、迫害，阎协崇家里少米无柴，小儿子病得十分厉害。有人劝他：“老阎呀，你五十多岁了，就那么一个根儿，把家里存的那些麦子吃了吧！”

提起这麦子，有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一九六五年春，阎协崇到郑州参加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参观了“美帝侵越罪行展览”。他看了越南南方阶级兄弟惨遭杀戮的照片，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回到家里，他立刻召开家庭会议，决定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食，支援越南。从此，他们多吃粗，少吃细，多吃菜，少吃粮，一个麦季就省下二百多斤小麦，准备找机会寄到越南去。他在粮缸上贴了张红纸条，上写“支援越南储备粮”，并给全家约法三章，任何人不准动用这个缸里的粮。

现在小儿子病得厉害，怎么办？阎协崇怕老伴动摇，就试探着说：“小孩不行了，磨点麦养养吧。”那知道老伴一听，立刻火了，气冲冲地说：“你咋又变卦啦？要关心国家大事，不能只顾小孩。”他听后满意地笑了。他和全家人都认为：孩子有病是小事，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是大事，再困难，这些粮食不能动用。动一个麦粒就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正在英勇奋战的越南兄弟。

就这样，无论多么困难，他全家从未动过缸里的一粒麦籽。那二百多斤“支援越南储备粮”，直到现在还好好地存放在缸里。

现在，阎协崇是河南省贫下中农协会的代表、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唐寨大队领导班子的负责人。兰考广大贫下中农亲切地称呼他为“俺们的阎代表”。阎协崇作为群众的代表被选入革命委员会后，时时牢记毛主席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教导，勤勤恳恳地工作。他遇事和群众商量，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到县里开会或给外地参观学习的同志作报告，只要情况不急，就步行来往。他丝毫不改老贫农的本色，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即使在县里开会时，他心里也挂念着公社和大队的生产。会一开完，他就立刻走向公社，领导生产，参加劳动。

最近，阎协崇又在向门合同志学习，决心象门合同志那样“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当一辈子革命先锋。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兰考盐碱地稻菽千重浪——三义寨公社盐碱地水稻大面积丰收记实》

兰考县广大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指引下，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了盐碱，引黄河的水改种稻田，在不少地区水稻获得了大面积丰收。其中黄河岸边的三义寨公社就是最突出的一例。

一

从来没有种过水稻的三义寨公社，今年一下子种了一万一千多亩，大部分亩产都在四、五百斤以上，最高亩产达到一千多斤。整个公社的秋粮总产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最高水平。多少年来吃统销粮，花救济款的老灾区，今年一季翻了身，秋季就卖给国家一百万斤余粮。

面对一片丰收景象，社员们个个喜笑颜开，心情激动。许多人一看见大片金黄色的稻谷，就禁不住跳起来，唱起来。许多人喜得夜里睡不着觉，跑到田里摸稻穗，闻稻香。康寨大队第七生产队有一位八十一岁的贫农老大爷蔡文海，一年多来一直躺在病床上。今年他听说稻子大丰收，激动地下了床，拄着拐棍，一步一步地走向稻田。一里多路，休息了十多次。来到稻田里，他双手捋着稻穗，激动地流着泪水说：“我扛一辈子长工，吃一辈子草籽，喝一辈子苦水，现在，毛主席领导咱，盐碱窝里长出了稻子，好！好！这都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今后俺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

面对这片丰收景象，谁能想到这些种稻子的地方，原来是白茫茫的盐碱地！过去，三义寨公社是兰考县最穷的地方之一。解放前，这里流传着一首民歌：

春天白茫茫，

夏天水汪汪，

秋天不见收，

冬天去逃荒。

解放后，三义寨有了很大改变。但自然灾害还没有彻底根除，每年都要吃国家统销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三义寨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

把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用到生产上。他们战天斗地，挖河修渠，把肥沃的黄河水引进地里，然后让河泥沉淀，积下一层一尺来深的淤泥，把盐碱地深深地压在底下。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被改造成为肥沃的良田。

二

三义寨公社在夺取大面积水稻丰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一九六六年，当三义寨公社广大社员开始引黄灌溉，试种水稻时，中国赫鲁晓夫在兰考的代理人，大骂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是“空想盲干”，胡说“引黄灌溉会使土地更加碱化，人会更穷。”他们千方百计地打击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积极性，妄图把群众引向邪路，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三义寨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大学毛主席有关农业生产的光辉指示，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了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大搞群众性的回忆对比。许多深受旧社会痛苦的老贫农，满怀阶级仇恨，以解放前缺粮求乞、卖儿卖女、无家可归、过着悲惨生活的事实，痛斥了中国赫鲁晓夫的种种谬论和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越批，对中国赫鲁晓夫越恨；越批，对毛主席越亲；越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越坚定。他们说：“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要给毛主席争气，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

改种水稻的过程，也是同旧习惯势力作斗争的过程。引黄工程一开始，来自各方面的舆论都出来了。有人说：“盐碱地上种稻子呀！别说吃稻子，连稻草也捞不住，喝稻秧汤差不多。”一些老年人思想更是不通。针对这种情况，公社革命委员会组织广大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反复学习“老三篇”和毛主席“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教导，学习焦裕禄同志决心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深入开展斗私批修活动，解决各种思想认识问题和稻改当中的一系列实际问题。通过群众性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空前提高，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说：“毛主席给咱指出光明幸福的道路，现在不干，啥时干！”

思想通了，决心下了，干劲也来了。为了取得指挥稻改的领导力，他们很快抽出公社革命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和水利技术员，组成了一个稻改指挥部，在田间吃住，在田间办公。大家发誓说：稻子什么时候归仓，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开河修渠的工程全面动工了。每天，一队队的社员，抬着毛主席像，举着毛主席语录牌，高举红旗，高唱战歌，开赴田间，队与队，人与人，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竞赛，并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斗私批修活动，整个工地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南马庄大队，原来是一个穷得出名的地方。解放后，是历年来的照顾重点。如今，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严冬，气温下降到零下十度，地冻一尺多厚。公社为了照顾社员身体健康，决定暂停挖河。但南马庄的社员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精神，每天照样高举红旗，迎着寒风，继续苦干。

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了。一天晚上，河渠大队朱庄生产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后，几个青年妇女自动到地里劳动，队干部喊：“别干啦！回来休息吧！”队干部的话，不但没有把她们喊回来，在家的社员听到了，也扛着工具跟着去了。

实践最能教育人。今年水稻大丰收，使个别原来不相信盐碱地能够改造，准备弃农经商的干部和社员也都信服了。三义寨大队个别生产队干部，过去工作不努力，现在也积极带领社员开河挖渠，引黄灌溉。有个老年人，过去不相信水稻会丰收，这次，他看到水稻真的丰收了，就把生产队的老年人叫到地头说：“咱们的脑筋太老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事物啦！今年水稻丰收，这都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托了毛主席的福！”老人们都笑着说：“对！对！不靠天，不靠地，丰收全靠毛主席！”

三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义寨公社人民的思想境界更高了，革命胸怀更宽广了。贫下中农说：“丰收可不能忘了毛主席，要不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谁能引黄水灌碱地？那能有今天的大丰收？”南马庄大队第五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收割水稻时把长得最好、籽粒最饱的稻子，一穗一穗地选打下来，又一粒一粒地拣出来，碾成大米，装在木箱里，写上“毛主席万岁”，寄给敬爱的毛主席，请毛主席他老人家亲口尝一尝他们在盐碱窝里收获的大米。这是南马庄贫下中农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片忠心，也是兰考县三十八万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片忠心。

（兰考县革委会通讯组）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下放干部的好榜样——赵新贞》

社员们经过一阵紧张的劳动后，围坐在地头，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一个农民装扮的中年人，一手拿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一手拿着劳动工具，坐在社员中间。大家要他讲一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和体会，他谦虚地说：“我是一个小学生，贫下中农是我的好老师，我要永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个和贫下中农有着血肉联系的中年人，就是下放干部、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在河南省兰考县树立的四面红旗队之一秦寨大队的革委会主任、兰考县革委会委员赵新贞。群众都称他是下放干部的好榜样。

思想上的大革命

一九六二年，赵新贞是孟角公社的副社长。当时，兰考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正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抛出了“三自一包”的黑货，刘少奇在兰考的代理人，就积极鼓吹，竭力推行。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在这个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关头，想起了土改和合作化时期曾在这里领导他们斗地主，分土地，组织初级社，高级社，带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赵新贞。他们想，如果老赵能回来和咱们一块战斗就好了，他最了解咱这里的阶级斗争情况，和咱贫下中农最有感情。他们经过商量，就指名要赵新贞回来，领导他们抓阶级斗争，战胜自然灾害。

赵新贞听到这个消息后，却产生了一个思想问题：秦寨大队阶级斗争那样复杂，灾情那样严重，自己能够胜任吗？这时，他又回想起土改和合作化时同阶级敌人战斗的情景。当时阶级斗争是多么激烈啊！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一交给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又是多么英勇啊！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把阶级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于是，他坚定了信心，对自己说：“只要有毛主席领导，有贫下中农撑腰，再凶恶的阶级敌人也能战胜，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成长

革命的道路总不是风平浪静的。几年来，赵新贞在秦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他没有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期望，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前进。

他到秦寨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大队里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想尽各种阴谋来陷害、打击他，妄图把赵新贞赶出秦寨大队。一个坏家伙造谣说：“赵新贞下放到秦寨大队是因为犯了错误。”广大贫下中农一眼就看穿了阶级敌人的阴谋，他们理直气壮地说：“赵新贞是我们要回来的好干部。”

赵新贞面临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考验。正在这时，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调到了兰考，来到了秦寨大队。一次，焦裕禄同志问他：“老赵！改变秦寨面貌，你抓什么？”

赵新贞说：“抓深翻压碱！”

“还抓什么？”

“抓挖河排涝！”

“还抓什么？”

“抓积肥、治虫……”

焦裕禄同志告诉他：“这几项都不是根本。最根本的是抓阶级斗争，抓学习毛主席著作。”赵新贞根据焦裕禄同志的意见，在全大队立即开展了阶级教育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由于赵新贞抓住了这个根本，大大提高了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狠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使广大贫下中农认清了毛主席指引的集体化道路，是一条光明、幸福的道路；刘少奇鼓吹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道路”，是贫下中农受苦、受难的道路。大家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向自然灾害展开了一场气势磅礴的斗争。他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蚕食桑叶”的办法，决心把白茫茫的盐碱地翻个个儿。

当焦裕禄同志授予秦寨大队“秦寨的决心”这面红旗和宣布赵新贞为“五好”党支部书记时，阶级敌人又使出了更恶毒的一计。他们写无名控告信，陷害打击赵新贞同志。面对阶级敌人的进攻，赵新贞说：“我不怕敌人的陷害打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真象总会弄清楚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阶级敌人越是疯狂地反对我们，越是说明我们和敌人划清了界线，分开了家。”他没有被阶级敌人的陷害打击所吓倒，反而劲头越来越大了。

“拣不出来的干部”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都说赵新贞是一个“拣不出来的干部”。意思是说，他皮肤黝黑，满手茧子，穿的衣服和农民一个样，站在农民群众中间，谁也认不出他是个国家干部，都把他当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赵新贞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参加集体劳动作为自己改造思想，反修防变的一项根本措施。不管是炎热的夏季，还是寒冷的冬天，他都是和社员一样肩并肩地劳动，把自己的汗水和贫下中农的汗水流在一起。贫下中农说：“赵新贞虽然当了干部，他可没有忘掉过去的苦，没有改变劳动人民的本色。馊饭好饭都吃得下，脏活累活都干得了。他不讲吃，不讲穿，只讲跟毛主席干革命。”赵新贞就是这样和贫下中农心连心，把贫下中农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一遇到雨季或雪天，他就从这家到那家，从这村到那村，挨门挨户去看望贫下中农。贫农社员秦敬五得了重病，家里人急得不得了，赵新贞知道后，饭都没有顾得吃，急忙赶去看望，并亲自安排病人住院。在他的帮助下，秦敬五经过医治，终于恢复了健康。秦敬五感动地说：“老赵为俺贫下中农把心都操碎了，他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干部！”

赵新贞平时生活艰苦朴素。他的一件棉大衣，穿了十多年还舍不得丢掉。烂了就补，补了再穿。他爱人说：“人家当干部都是穿得整整齐齐，看你穿这身破大衣象个啥！”赵新贞笑着说：“象个农民。冬季有了它，白天当衣，夜里当被，雨天还能当个蓑衣，一当几用，走到那里滚到那里，行动方便，心里舒服。如果爱讲究，就会脱离群众，慢慢变修。”

他下放以后，不摆架子，和社员一样泥里水里滚。前年冬季挖河时，天气很冷，河底里的浅水结了薄冰。社员感动地说：“老赵呀，你歇歇吧！我们替你劳动。”赵新贞说：“不！你们能代替我劳动，可不能代替我改造思想啊！”多年来，他养成了一种习惯：不管每天工作再累，睡得再晚，早晨鸡一叫就醒了。每天起床后，他都拿着扫帚，从办公室扫到院里，从院里扫到街上，然后再背着粪筐下地去。一次在郑州开了十多天会，会议一结束，他连夜赶回秦寨，还没等天明，拿着工具就下地劳动了。

暴风雨里炼忠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赵新贞就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高举毛主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大造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刘少奇在兰考县的代理人对赵新贞的这种革命行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便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贫农出身的赵新贞理直气壮地说：“我捍卫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没有罪！不是反革命！”

赵新贞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以后，一个反革命分子得意洋洋地说：“整天说我是反革命分子，不一定谁是咧！看看赵新贞不也当成反革命了吗！这次，反革命‘帽子’非给他戴上不可！叫他永远不能抬头！到死都不能抬头！”刘少奇在县、社的代理人一到秦寨大队来，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心眼里高兴，跟在后边说：“把赵新贞交给我们吧！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一天，刘少奇在县、社的代理人按照这些坏家伙的要求，把赵新贞送回秦寨大队斗争。广大贫下中农听说赵新贞回来了，一齐涌向会场，准备同阶级敌人斗争。斗争会开始了，一个坏家伙上前斗争赵新贞。赵新贞一看，就说：“秦寨的贫下中农谁斗争我都可以，三岁的孩子提我的意见我都接受，就你斗争我不行！咱俩比比：你爷干啥，俺爷干啥；你爹干啥，俺爹干啥；你干啥，我干啥！我捂住半边嘴也说得过你！”那个家伙一听赵新贞揭他的老底了，出了一身汗，吞吞吐吐地说：“我……是……坏人？”赵新贞说：“你是坏人，好人，你知道！我也知道！群众都知道！”那个家伙伙同另一个坏家伙，一下蹦到赵新贞面前，掐住脖子要捆他。这时，在场的贫下中农高喊：“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抓住打人凶手！抓住打人凶手！”结果，斗争赵新贞的人，成了被斗者，斗争会只得一哄而散。

深夜，赵新贞趁着一小撮阶级敌人不在身边，就把大队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找来开会。干部和贫下中农看到他，人人热泪盈眶。赵新贞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再给你们开一次会，布置几项工作：

第一，咱大队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树立的一面红旗，你们一定要好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第二，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管压力多么大，都要顶得住；

第三，你们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第四，干部要团结好，遇事要多和贫下中农商量；……”

大家含着热泪说：“老赵！你放心，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把革命和生产搞好！”

一小撮阶级敌人听说赵新贞在秦寨又召开会议布置工作，就把他送回县里，对他进行新的迫害。赵新贞毫不屈服，他说：“什么迫害也压不倒我，我就是死了，也得给毛主席留下一颗忠心！”

一九六七年七月，兰考卫焦造反派彻底胜利了，兰考的案子翻过来了，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赵新贞同志，心情是多么激动！他手捧宝书，站在毛主席像前，热血沸腾，心情激荡，泪水直流，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觉得天底下，没有比毛主席更亲的人！他见入就说，逢人就讲：“生我的是娘，养我的是党，教我怎样做人的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兰考县革委会通讯组）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兰考县支左部队坚决按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教导办事 深入细致地做好已解放干部的教育工作》

帮助干部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打消顾虑，勇挑重担；引导他们象焦裕禄同志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为广大贫下中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本报讯 在河南省兰考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解放军某部，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必须善于使用干部”和“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的伟大教导，认真细致地做好已经解放出来的干部的教育工作，引导他们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在不断斗私批修的过程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干部。

干部解放后，教育工作不能放松

解放军同志在兰考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帮助县革委会解放了大批犯错误的干部。如何对待这些干部，大多数同志认为，要继续做好解放出来的干部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大胆地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但也有有的同志存在着“干部解放了，任务完成了”的思想。这种活思想一出现，党支部就组织干部、战士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

大革命群众都知道。”使大家认识到，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经常讲，反复讲。不然，只讲一阵子，就会形成在形式上解放了干部，而在思想上没有彻底解放的现象。一定要把解放犯错误干部的工作做到底，这个“底”就是不把解放干部的工作停留在“解放”这一点上，而是要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继续教育、锻炼和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解放军同志在提高认识以后，便积极热情地做干部工作。首先，解放军同志处处做出样子，和解放出来的干部共同研究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使他们感到解放军信任自己、关怀自己，从而打消顾虑，主动挑起重担子。解放军还引导干部象焦裕禄同志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象焦裕禄同志那样为广大贫下中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与此同时，解放军同志帮助群众学习、掌握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使群众象焦裕禄同志那样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支持他们革命

能不能正确对待已经解放出来的干部，仍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千方百计不让解放出来的干部投入阶级斗争。解放军同志坚决和阶级敌人斗争到底，坚决支持干部站出来工作，这是巩固发展革命政权，推动斗、批、改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解放军同志在新的形势下，识破了阶级敌人的阴谋后，遵照毛主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伟大教导，不让阶级敌人破坏毛主席干部政策的阴谋得逞。于是，他们发动群众，展开对敌斗争，深入批判大叛徒刘少奇在干部问题上推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穿阶级敌人破坏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罪恶阴谋。这样，就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捍卫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向焦裕禄学习，克服思想上的反复

在兰考县革委会领导下，已解放出来的干部，绝大多数在群众的信任、支持、帮助下，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学习焦裕禄同志“举旗抓纲”，思想上和工作上都有很大的进步。但也有个别解放出来的干部思想上出现反复。这时，解放军同志就热情帮助他们从世界观上找问题，从两条路线斗争上找原因，并发动群众教育和帮助他们挖头脑中的脏东西，提高他们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使他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解放军同志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我们的同志一

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大家深刻地认识到，干部解放了，但不等于从他们思想上完全肃清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因此帮助他们不断地在实际斗争中改造思想，接受考验，这是把已经解放出来的干部培养成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好干部的重要途径。因此，解放军同志认真组织已经解放出来的干部不断地用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对照检查自己，用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对照检查自己。解放军同志还注意把群众的反映和组织上对他们的意见经常讲给他们听，帮助他们斗私批修，使他们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断地提高。

原县人委有个干部解放出来后，曾一度出现脱离群众的苗头，群众给他贴了一些大字报。在这里支左的班长周玉成发现后，就立即找他谈心，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学习焦裕禄同志一时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动人事迹，批判刘少奇“当官做老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引导他回顾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 error 和毛主席对广大干部的关怀。这个干部很受感动。从那以后，他经常深入到贫下中农家里访贫问苦，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兰考人民胸怀朝阳征战黄河》喜看稻菽千重浪，兰考大地换新装。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战斗过的河南省兰考县，如今又谱写了改天换地的新篇章。人们登上黄河大堤了望，在那辽阔的原野上，到处是配套的引黄工程。一方方稻田，展现着丰收的喜人景象。千百年来的涝洼地、盐碱窝，现在已经改观了。英雄的兰考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续写着焦裕禄同志生前没有写完的壮丽诗篇。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解放前，在反动派统治下，黄河根本得不到治理。据历史记载，黄河在兰考先后改道两次，大规模决口二十余处，使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的兰考大地，形成了高岗处飞沙走石，低洼地易涝盐碱。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都困难重重。

一九四九年全国得到解放。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兰考视察黄河，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毛主席给兰考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增添了战胜灾害的巨大力量。

正当英雄的兰考人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千年为害的黄河展开大搏斗的时候，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却板着面孔，横加指责，到这个地方给群众泼冷水：“你们这个穷地方，一千年也实现不了水利化！”

在这时候，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来到了兰考。他带着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怀着改变兰考面貌的坚定信念，一踏上兰考大地，就高举红旗狠抓纲，带领兰考人民与“三害”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经过三年奋战，基本上锁住了风沙，治理了内涝，改造了盐碱，兰考人民在同自然灾害斗争中取得了初步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革命政权——兰考县革委会，继续带领兰考三十八万人民，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他们狠批刘少奇及其在兰考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六八年的七月下旬，县革委会组织了一支由革命干部、解放军、贫下中农参加的三结合“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怀揣革命宝书，踏遍了兰考大地，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兰考县斗争的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和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的宏伟前程，鼓舞人们战天斗地的信心。

在宣传调查的过程中，宣传队总结和传播了三义寨公社利用黄河淤灌，改种水稻的经验。这个公社位于黄河岸畔，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改造大自然，把坑洼地、盐碱板和沙荒窝的不毛之地，都进行淤灌，改为良田，种植水稻。他们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日夜战斗在工地、田间，终于淤灌了八百多亩坑洼、盐碱地，经过平整改种了水稻，头一年有的就创造了亩产稻谷一千零八十斤的奇迹。接着，他们又把多年前被黄水冲袭的东坑、西坑，都利用黄河水淤平了，在三米深的胶泥地上，播下了一千六百亩水稻。去年三义寨栽种的一万多亩水稻，获得了大丰收，而且一次就交售给国家粮食八十八万多斤。

宣传队历时两个多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总结和传播了象三义寨那样的一个又一个先进典型，把改天换地的计划，放在了更科学、更可靠、更扎实的基础上，县革委会更加信心百倍地领导全县革命人民胜利前进！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向黄河宣战

一场向黄河开战的斗争开始了。在引黄灌溉的工地上，在改碱种稻的田野里，人们满怀豪情地说道：“胸怀朝阳战黄河，改天换地展新貌；人民自有回天力，誓让碱地稻花香。”

焦裕禄同志生前表彰过的四面红旗队之一——韩村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继续发扬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不怕天寒地冻，不畏重重困难，去冬今春开挖了四条引黄灌溉渠；在茅草不生的盐碱窝，改种了一百五十多亩水稻。

南马庄大队的贫下中农，在冰天雪地的数九寒天，开渠挖河。大家豪迈地说：“天冷，我们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是热的；地冻，用我们的热汗把它化开。”他们在冰天雪地里举办学习班，召开斗私批修会，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教导，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英勇顽强地投入了激烈的战斗。有的抱来柴禾，生火化冰；有的扛来木棒，撬冰抬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过的东坝头黄河大堤上，如今修建了一座电灌站。这是爪营公社东坝头、张庄、雷集、高寨四个大队的贫下中农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结下的丰硕成果。

这四个大队都在黄河大堤两岸，过去号称“沙丘之国”，是一个“风来黄沙起，白天也点灯”的穷地方。为了改变这种落后局面，这四个大队的社员群众决定在黄河东坝头上修建一座电灌站，向沙荒要粮，向黄河讨债。但是，这个规划一提出，有的人却说：“搞电灌是科学，靠那些大老粗、泥腿子，鸡毛上不了天。”鸡毛能不能上天？公社革委会针对这个问题发动和组织社员群众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教导：“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同时，联系思想实际和斗争实际，展开了一场大辩论，狠批了“技术第一”、“专家治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树立了敢想、敢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就是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创前人不曾想的奇迹。没有仪器，我们贫下中农心最红、眼最亮，看得最准；没有图纸，我们的蓝图就绘在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上；没有技术，我们自己学。”

电灌站开工了，他们依靠“泥腿子技术员”，边学边干，群策群力，经过五十多天的艰苦奋战，终于在黄河岸上建成了第一座电灌站，排灌效能达四万余亩。

英雄的兰考人民，就是这样怀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在去冬今春没向国家要一分钱、一粒粮，修建了三处电灌站，三百多座涵闸，开挖较大河渠八条，长达二百六十多华里，做了五百二十多万立方米的土方工程，淤灌土地五万多亩，改种水稻三万多亩，为兰考大地绘下了最美最新的画图。在五万多亩涝洼地、盐碱板和沙荒窝的面积上，种植的一方方水稻，一块块秋庄稼，长得格外好。涝碱地一去不复返了，黄河横行霸道的时代过去了！如今黄河水沿着兰考人民给它指定的道路，流向社会主义的广阔田野，老老实实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服务。

革命没有完，革命要继续。

英雄的兰考人民并没有因为眼前取得的成绩而感到满足，他们经常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武装自己，决心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上，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光辉旗帜，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以实际行动迎接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国二十周年。

（原载《河南日报》，本报有删改）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阎协崇文章：《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兰考县小宋公社唐寨大队老贫农 阎协崇）

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和钢琴伴唱《红灯记》，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它成功地塑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李玉和的崇高形象，为我们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榜样。

李玉和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有一颗红亮的心”，对革命忠心耿耿，为人民鞠躬尽瘁；他决心“要使那几万万同胞脱苦难，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革命的烈火炼得他“浑身是胆雄赳赳”，毛泽东思想使得他“雄心壮志冲云天”。在敌人的“宴会”上，不管敌人怎样软硬兼施，他“宁可筋骨碎，决不把头回”，表现了他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李玉和的宁死不屈是对刘少奇叛徒哲学的无情鞭笞。在日寇的监牢刑场上，他威武不屈，“不怕这浑身的筋骨断”，“不怕把牢底来坐穿”，表现了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的壮烈牺牲是对刘少奇“活命哲学”的有力批判。

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涌现了千千万万个李玉和这样的英雄，我们才打垮了日寇，赶走了美帝，消灭了蒋匪，迎来了“全中国红旗插遍”。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革命没有完，革命还要继续！我们深深懂得，打江山不易，保江山更难。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大革命。过去，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红灯引路；今天，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靠毛泽东思想的红灯领航。“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要把李玉和的品德、智慧和胆量接过来，把革命红灯一代一代传下去，使千千万万个李铁梅迅速成长，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成为“脚跟站稳”、“心明眼亮”、“敢与豺狼虎豹来周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打的金刚”，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阎协崇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破坏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抓紧革命大批判》

老贫农阎协崇同志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要揭露和打击阶级敌人对干部参加劳动的破坏。

广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阶级敌人又怕又恨。有的赤膊上阵，捣乱破坏。有的利用人们头脑里的旧思想，或施放糖衣炮弹，腐蚀干部；或散布流言蜚语，蛊惑群众；或抬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劳动惩罚论”、“入党做官论”，妄图动摇广大干部走“五七”道路的决心。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要及时识破，迎头痛击。同时，我们要抓紧革命大批判，批判刘少奇的“劳动惩罚论”、“入党做官论”，批判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旧思想，为广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扫清道路。

如何抓好阶级斗争，抓好革命大批判，是我们当前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编者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号召以后，成千成万的干部打起背包，扛上锄头，意气风发地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贫下中农称赞说：“干部参加劳动，路子越走越正。热汗洒在田野，红心紧贴群众。”

我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自从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委员、地区贫代会主任以后，许多地方要我作报告，讲经验，我指着肩上的粪筐说：“这东西里边有经验。”不少记者找我谈体会，写文章，我掂着锄把子说：“这玩意儿底下出文章。”粪筐里边有什么经验呢？有我们革命干部永不忘本、永不变质的经验；锄头底下出啥文章呢？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

不要说那些“坐在高楼里，脚板不挨地，看着表册子，咬着笔杆子”的干部了，就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脱离劳动也会变。我就有这样的体会：一天不劳动手不灵，两天不劳动眼不明。如果长期不参加劳动，就会变得耳聋眼花——听不到群众呼声，看不见新鲜事物，对国家大事、世界革命懵里懵懂。这样就会人变质，权丢失，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确实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啊！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那些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能不出来捣乱吗？不！他们在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我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不是从背后刮阴风，就是在面前吹“香”风，总想把我搞得晕头转向，迷三倒四，使我从群众中飘出来。我到县里开会，一不坐汽车，二不骑自行车，六十里路走半天，可以拾上一筐粪。阶级敌人在背后议论说：“阎协崇当了大官，可没有坐上大轿，不还是和咱们一样，走路靠脚板！”今年国庆节，我上北京观礼，临走的头一天，还在地里干活。一个坏家伙见了我，点头哈腰地说：“老阎啊！你劳苦功高，年岁又大，别再象老黄牛一样干了。明天就上北京，锄把子该放一放了。”

我想，阶级敌人这么害怕我们干部参加劳动，到底是为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

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噢！明白了，原来阶级敌人害怕我们参加劳动，就是害怕我们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筑起防修反修的铜墙铁壁；害怕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不改变颜色，他们失去的“天堂”不得恢复。想到这里，我便把阶级敌人训了一顿：“你们不叫我给人民当老黄牛，是想重新让我给你们当牛做马；你们叫我放下锄把子，就是叫我扔掉印把子。这个，你们一万年也办不到！”

阶级敌人还扯破喉咙，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阻拦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听说下放干部要进村了，一些阶级敌人就在群众中散布：“好铁不打钉，好人不下放。”看到下放干部在农村扎下根来，他们又在下放干部中吹风：“劳动过了关，还要去当官。”我们贫下中农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教导，心明眼亮，一眼就看穿了阶级敌人的鬼花招，他们是在贩卖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劳动惩罚论”、“劳动镀金论”的黑货。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必须迎头痛击。我们要大造革命舆论，大讲劳动光荣，大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之风。贫下中农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阶级敌人越反对干部下放劳动，我们就越支持干部下放劳动。‘泥腿子’干部，我们最欢迎！”下放干部也表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贫下中农支持我扎根。下放劳动的革命道路，我们走定了！”

我们希望一切革命干部，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用我们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钢铁脚板，把阶级敌人的复辟迷梦踏成烂泥！把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野心踩得粉碎！

河南省兰考县小宋公社唐砦大队老贫农 阎协崇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小马越走心越亮》

一次，知识青年马海根和阎协崇大爷到县城开会。在回家的路上，遇上了七级大风，黄沙四起，刮得睁不开眼。小马戴着手套，捂上口罩，头上还有一顶大皮帽，浑身上下弄得严严实实，还觉得冻得够呛，真想拦住过往的卡车，一下子坐到家里。阎协崇大爷呢？他一没戴手套，二没捂口罩，头上还是光光的，连块毛巾也没蒙，可他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好象一点也不冷似的。

阎协崇大爷早就看透了小马的心事。走了一段路，他见小马有点赶不上，就拍了拍小马的肩膀说：“小马呀，风大天冷能锻炼咱的革命意志。象你这样，有点小风就弄得这么严实，在大风大浪前又怎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呢？”阎

协崇大爷意味深长地继续说：“小马呀，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是‘在屋里能说会道，一出门办事全部忘掉’呀！我们要学一条用一条，落实一条，这才是对毛主席忠诚呀！”

一席话，使小马脸上火辣辣的，心里热呼呼的。他从贫下中农对毛主席著作学用一致的精神中，看出了自己的差距。他脱下手套，取下口罩，跟着阎大爷大步流星地赶路。一路上，小马想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教导，看着眼前这位贫下中农的高大形象，他觉得越走劲越足，越走心越亮，越走道路越宽广。

（河南兰考县革委会、人武部通讯组）

（四）张钦礼又被王新撤职、关押，出狱后升任地委副书记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的春天》

阳春三月，我们访问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战斗过的河南省兰考县。登临城北黄河故堤，极目眺望，大地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那一排排矫健挺拔的大官杨，一处处满枝花蕾的大果园，一片片紫花盛开的泡桐林，还有那一方方苗青花黄的小麦和油菜间作田，给今日兰考增添了无限春色。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兰考人民，继承和发扬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十年，基本上征服了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之后，又乘批林批孔的强劲东风，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打响了搞好今年春耕生产，夺取更大丰收，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的战斗。

今年春节一过，兰考县的干部和社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决心以新的建设成绩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兰考县委的领导成员站在批林批孔斗争的最前列。县委书记王向明联系兰考的巨大变化，狠批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他说：过去的兰考是野兔不拉屎的盐碱滩，飞沙不毛的荒岗岭。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以来，在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教育了群众，锻炼了干部，全县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继承和发扬焦裕禄的革命精神，坚持挖河除涝，翻淤压碱，植树防沙，不断地改变着兰考灾区的面貌。如今的兰考大地，碱滩变良田，荒岗树成荫。一千多条排灌沟河，渠堤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排灌系统。过去的风口和沙丘，已经被林带堵封起来。五十多万亩青沙地，实行了农业和泡桐间作。二十多万亩盐碱地，经过深翻淤灌，植棉改碱，增强了抗灾能力，大面积涝、碱、沙灾害已经基本上解除。去年，全县八十一万亩秋粮作物夺得高产，总产量比一九七二年增长二成多，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为国家提供商品粮三千万斤。当年焦裕禄同志带领全县人民栽植的泡桐树已经成林，木材蓄积量达二十万立方米，全县胜利地实现了民用木材自给有余。林彪反党集团闭着眼睛说瞎话，胡说什么“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缺吃少穿”，这完全是恶毒诬蔑，必须坚决回击！

在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之一的秦寨大队，社员们用本队深翻压碱逐步把全队四千多亩盐碱地建成稳产高产农田，夺得粮棉双上《纲要》的生动事实，批判林彪和孔老二宣扬的“上智下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等反动谬论。曾被焦裕禄誉为“五老将”之一的贫农社员秦友礼说：解放前，俺秦寨五百一十户人家，逃荒要饭的就有二百五十三户，卖儿卖女的一百七十二户，饿死一百八十多人，死绝三十五户。是我们命穷吗？不，那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解放后，特别是一九六二年，焦裕禄同志带领着俺队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路，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翻淤压碱，经过十年奋战，俺队的盐碱地上长出了喜人的好庄稼。去年，粮食平均亩产五百七十九斤，皮棉亩产八十五斤，队队有储备，户户有余粮，还为国家提供商品粮二十多万斤。是俺的命好了吗？不，那是俺跟毛主席干革命的结果。通过批判，俺算把林彪的黑心肠看透了。他要开倒车，俺要干革命；他要复辟资本主义，俺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

批林批孔运动，成为兰考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巨大动力。它激励着人们决心打好备耕、春耕这一仗，夺取今年农业更大的丰收。

我们来到兰考，正逢春播，社员们正在忙着把营养钵里培育的棉苗往棉田移栽。播得较早的玉米和高粱，已经出苗，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喜人景象。

兰考县今年要进一步发展农田灌溉，需要电。今年二月下旬，在批林批孔推动下，县委及时组织力量，展开了柴油发电机组联合发电并入大电网的试验。参加试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革新，终于成功地把电流源源输送到电网上。到四月十日，全县已用五十多部柴油发电机组联合组成了九个小电厂，每小时提供电力两千五百度，大大加快了农田水利化的前进步伐。

抓肥料是保证农业大上快上的一项重要措施。兰考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广开肥源，狠抓农家肥。在赵垛楼大队，社员们回顾本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自力更生解除内涝，锁住风沙，实现一人一亩水浇地的战斗历程，狠批林彪、孔老二鼓吹的“上智下愚”的反动谬论，进一步激发了革命干劲。干部和社员团结战斗，大积农家肥，为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创造了好条件。

在兰考，最引人注目的是，过去想都不敢想，或想了办不到的事，今天变成了现实。打机井，过去要十几个人干七八个昼夜，花一千多元才能打成一眼；现在花二三百元，几个人大干一天一夜就可打成一眼。河道岁修，过去每年都要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在整治四明河、宋营沟、五干渠等三十六条河道工地上，七万九千名治河大军，你追我赶，以每人每天完成八立方米土方工程的惊人速度，十几天就完成了。在引黄人民跃进渠渠首闸工地上，四百多名治理黄河大军，正在抢时间，赶进度，日夜奋战，对大闸进行高标准整修。在紧靠黄河南岸的三义寨公社，五千多名社员振奋革命精神，打井修渠，为实现井河双灌而奋斗。黄河东坝头的爪营公社，五千名社员在完成东方红提灌站二十里干渠修筑任务的同时，出动马车、架子车，往返五十里，把工程所用的一千吨物料及时运到工地，加速了桥、闸、涵工程的配套，四万亩小麦和春地提前得到浇灌。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深入，兰考县干部们的革命斗志也越来越昂扬。他们以焦裕禄为榜样，带领全县人民大干苦干，在建设新兰考的战斗中积极发挥带头作用。

现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的张钦礼，是当年同焦裕禄并肩除三害的战友。今年春节，他带着县委的五、六名干部，拉着架子车，把一千四百多斤春小麦良种送到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然后，他们同大队干部和社员一道学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狠批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研究如何消除农业

生产薄弱环节，更好地打井修渠，平整深翻，植树造林，加快实现农田水利化、园田化、园林化。

县委八位书记、副书记和十八名常委，也分别深入到全县十个公社蹲点。他们住在老贫农家里，蹲在生产队饲养室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县委常委赵新贞参加十大回来后，担任了堽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他尽管对农业生产有着丰富的经验，但仍然坚持调查研究，跑遍全社十七个大队，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解农业生产的新问题，走到那里，干在那里。为了使春红薯和春播大麦间作在全公社推广开，今年三月上旬他就到春红薯栽种面积较大的范场大队去搞试验，做出样板，然后在各队推广。

县委副书记杨捍东，原是一九六七年毕业的大学生。几年来，他在老干部的带领下，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迅速成长。一九七二年冬，他担任县委副书记后，坚持深入基层，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自然条件较差的王茂店大队蹲点。他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对干部、社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他的帮助下，大队党支部建成了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去年，大队粮棉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为了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杨捍东又帮助王茂店大队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掀起打机井，深翻土地，积肥和植树造林的新热潮，为全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树立了好榜样。

在县委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很多县、社干部，走出办公室，身背行李，到最困难的地方蹲点。他们同群众一道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用更大的革命干劲战天斗地，续写焦裕禄没有写完的战斗诗篇。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 兰考县委大胆选拔和积极培养新干部》

新华社郑州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电 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遵照毛主席关于“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的教导，引导新干部认真看书学习，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帮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路线觉悟，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兰考县委根据

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从工人、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和回乡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二千二百八十多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充实到县、社、队和所属单位的领导班子中。为了使他们更快地胜任新的工作，兰考县委坚持引导新干部在斗争中刻苦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认真改造世界观，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增强识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能力，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回乡知识青年孟宪芝在去年担任仪封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党委立即派她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的代庄大队蹲点。她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进行社会调查研究，了解了这个大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具体情况，然后协助大队党支部组织社员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教导，联系本队实际，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很快把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们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人力、物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促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今年全大队三千多亩小麦获得空前丰收，平均亩产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多年的缺粮队变成了一季完成全年征购任务的先进队。孟宪芝通过斗争实践更深刻地认识到，路线是决定一切的。

兰考县委很注意引导新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县委副书记兼生产指挥部部长杨捍东，是一九六七年的大学毕业生。一九七二年冬天，他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经常向他讲述当年焦裕禄身患重病，坚持带领干部群众跋涉千里，探索积水流向，察看飞沙起落，寻找治碱门路，组织全县三十六万人民向内涝、风沙、盐碱三害进行顽强斗争的英雄事迹。杨捍东以焦裕禄为榜样，坚持徒步下乡搞调查，为建设兰考积极贡献力量。他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各项工作搞得很出色。

在培养新干部的过程中，兰考县委还注意引导新干部联系除三害的伟大成就，批判“上智下愚”的反动谬论，使他们进一步看清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工作中更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大学毕业生吕何生去年冬天担任红庙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就到地处黄河故道的管场大队蹲点。为了改变这个队的面貌，他甘当小学生，走村串队，问干部，访群众，察看地形，寻找办法。他根据社员

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紧紧抓住水利和肥料两项关键措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兰考县的新干部都来自基层，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红卫兵的李军芝，去年担任了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之一的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工作忙、时间紧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拉垫糠搞积肥，她和男社员一样，拉起装满黄土的架子车飞跑；到附近的林场去扫树叶，她总是头顶晨星去，脚踏月光回；麦收季节，她坚持在田间劳动，收割、拉运从不落后。社员们劝她休息一下，她总是劲头十足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等来的。今年春节以来，她平均每月劳动二十五天，自己分担的工作也搞得很好。社员们称赞说，她是贫下中农的好闺女，革命事业的好接班人。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在前进》

秋收季节，我们访问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河南省兰考县。

兰考县位于豫东平原，黄河故道的中心，是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地方。从明朝以来的四百年间，黄河在这里决口二十九次，大堤漫水八次，淹没了无数村庄和田园。现在横贯全县的三条黄河故道，就是当年黄河泛滥成灾的历史见证。黄河多次改道和泛滥，造成了这里地势高低起伏，沙丘密布，河系紊乱，给兰考人民带来了内涝、风沙、盐碱三大自然灾害。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当兰考遭受严重灾害的时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来到兰考。他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带领兰考人民同“三害”展开了顽强的搏斗，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六四年焦裕禄同志逝世后，兰考人民发出了“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的钢铁誓言，踏着焦裕禄的足迹，认真开展学大寨运动，继续写着烈士生前没有写完的文章，描绘着更新更美的画图。喜看今日兰考大地，昔日盐碱窝稻谷金黄，多年的荒沙滩苹果飘香，滚滚黄水淤新地，滔滔洪水归河道。登上城北黄河故堤，极目远望，更是一派动人景象。那一排排矫健挺拔的大官杨，一片片随风摇曳的泡桐林，一方方银花盛开的棉田，一垛垛刚刚收割的玉米棒子、高粱穗，堆得象小山头。兰考的秋色真是绚丽迷人。

但是，我们在兰考访问，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自然面貌的变化，而是兰考人民沸腾的战斗生活。

红旗越举越高

一九六七年十月，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胜利地涤荡着修正主义污泥浊水的时刻，兰考县革委会成立了。新生的革委会作出决定，“继承和发扬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县革委会主任张钦礼象当年焦裕禄同志那样，带领有干部、解放军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三结合调查队，怀揣着毛主席著作，肩背行李和铁锹，跋涉两千多里，踏遍兰考大地，继承焦裕禄同志的遗志，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总结群众中除“三害”的经验。他们一条河一条河地调查，一个沙丘一个沙丘地勘查，寻找积水的流向，察看飞沙的起落，研究治碱的门路，进一步作出根除“三害”的规划，制订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的蓝图。焦裕禄同志彻底革命的精神，鼓舞着四十五万兰考人民的斗志，新兰考的宏伟蓝图，使人民开阔了眼界，振奋了革命精神，一场气壮山河的除治“三害”的群众运动在兰考大地展开了。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兰考人民继承焦裕禄同志的遗志，自力更生学大寨，艰苦奋斗战“三害”，在短短的三年间，全县开挖大、中型排涝河道一百二十多条，大型灌溉渠道八条，打机井四千多眼，不仅基本上解除了“三害”威胁，而且建成了近三十万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一九七〇年，全县粮食创造历史最高水平，比一九六七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三，第一次向国家提供两千六百多万斤商品粮。

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正当兰考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时候，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他们诬蔑兰考县建设成就，恶毒攻击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打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压制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兰考人民，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击退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全县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同错误路线斗争，一马当先；同“三害”斗争，更是走在全县的最前面。

“把林彪反党集团耽搁的时间抢过来！”城关公社韩村大队年轻的女支部书记杨素兰带领全大队二百多名水利大军，奋战一冬春，兴建五米宽、七里长的河，

在盐碱地上新淤地三百多亩，使今年小麦总产量达到十一万多斤，平均每人给国家交售一百多斤，大队还储备了三万多斤。

“定叫盐碱地变成米粮仓！”埕阳公社秦寨大队去年在基本上完成深翻压碱的基础上，打机井，挖渠道，又开始了新的战斗。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新贞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但他一直朝气蓬勃地带领社员扫积雪，开挖冻土，新开了一条二米深，十米宽，十八里长的排灌渠，新打机井四十多眼。这一年，秦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五百七十多斤，棉花亩产八十五斤，做到了粮棉双上《纲要》，双贡献。

在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年轻的党支部副书记李军芝带领全大队的男女青年，利用业余时间，早晨顶星星，晚上趁月亮，割青草，沤绿肥，今年秋季，每个青年都为生产队积肥一万多斤。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的干部、社员，深入批判林彪一伙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今年，这个大队小麦获得大丰收，全大队向国家交售五万多斤小麦，超过以往任何一年。

在两个阶段、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兰考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越举越高。

先进单位不断涌现

在四个红旗大队的带动下，兰考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局面，先进单位不断涌现。

被誉为“兰考的大寨”的埕阳公社大付堂大队，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这个大队座落在黄河故道的劈心滩里，是全县自然条件最差的大队之一。村北有一千八百多亩火沙岗地，上有八十多道岗，九十多条沟，无雨苗枯黄，有雨苗冲光，粮食产量很低。文化大革命中，大付堂大队的贫下中农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大寨大队和本县四个红旗大队为榜样，打响了向火沙岗进军的战斗。干部、社员发扬焦裕禄同志彻底革命的精神，小雨小雪不停工，天寒地冻照样干。年近六十的老支书陈玉忠，早晨总是第一个到工地，晚上最后一个离开，人们称他是“平地迷”。在老支书的带领下，他们用一双手和一副铁肩膀削平了八十多道岗，填平了九十多条沟，开挖了八十多条排水渠，总长五十多里。在这个“十天不雨苗发黄，一场大雨苗冲光”的火沙岗上，建成了二千多亩地成方，树成行，渠成网的高产稳产田。一九七二年，大付堂大队粮食、棉花平均亩产都

上了《纲要》。全大队实现了队队有储备，户户有余粮，结束了“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花钱靠救济”的历史。

兰考县委及时总结大付堂等不同类型的经验，在全县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推广。同时，狠抓了后进队的革命转化工作，使全县出现了“四面红旗带十面，十面红旗促全县”，你追我赶，生动活泼的局面。到去年，全县三十多个后进大队中，已有二十个大队跃入了先进行列。这一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三千多万斤，比一九六六年增长了将近一倍；棉花总产量达到二百九十三万斤，比一九七二年增长了一点五倍。今年，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夏季小麦获得了大丰收，秋作物长势大大超过去年。

一代新人茁壮成长

在兰考访问期间，我们看到全县到处都呈现着鼓舞人心的景象。然而，最令人高兴的是，在改造兰考、建设兰考的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批新人。他们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起带头作用，群众称赞他们是“建设兰考的革命先锋”。

南彰公社张庄大队过去是全县有名的“老大难”单位。难就难在这里阶级斗争复杂，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学大寨运动搞不起来，生产上不去，年年吃国家统销粮。今年一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小将张建军担任了大队党总支书记。他带领干部、社员反复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张建军带领群众联系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林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进一步提高大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

去年秋季，一连下了十多天大雨，五天时间内，黄河连续出现了三次洪峰，滩区一万多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一九六七年大学毕业的兰考县委副书记杨捍东，担任了县黄河防汛抢险总指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杨捍东，在建设兰考的斗争中，同社员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带领青年抢险突击队，向被洪水包围的村子冲去，把小孩子和老弱病残者一个个背出来了。被淹的村庄没有一人伤亡。

象张建军、杨捍东这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在兰考比比皆是。全县一百一十二名公社正、副书记中，新提拔的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干

部就占三分之一；七百八十名大队正、副支书中，三十岁左右的新干部就占百分之四十。喜看这样一大批朝气蓬勃的新干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茁壮成长，被焦裕禄同志生前誉为五老将之一的王志兴乐呵呵地称赞说：“这成绩，那成绩，培养出这么多大有希望的新一代是最大的成绩！”

（本报有删节）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报道：《身不离劳动 心不离群众》

兰考县委领导成员以焦裕禄为榜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领群众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不断发展大好形势

据新华社郑州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电 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领导成员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带领广大干部、社员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使全县的大好形势不断蓬勃发展。

兰考县委领导成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坚持下来的。县委领导成员继承和发扬焦裕禄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的革命精神，走到那里，劳动到那里。但是，这种优良传统却一度遭到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家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轻视劳动、诬蔑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更自觉地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们采取了轮流下乡蹲点、制订劳动定额、检查评比、出榜公布等多种措施，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巩固下来，坚持下去。县委领导成员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保证这些措施的落实，把全县的革命和生产不断地推向前进。

去冬今春，兰考大旱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天。县委六名正、副书记和十八名常委，除了两名在机关主持工作以外，都到生产队带领群众抗旱。在使用机械抽水浇庄稼时，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发现，电力不足成了抗旱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他看见有不少大队的柴油机却在那里停放着。于是他来到县农业机械修造厂，一边劳动，一边和工人研究用柴油机做动力发电。他们把全县的柴油发电机集中起来，建立了二十三个小型发电站，每小时可发电三千多千瓦，比国家电厂供应兰考的电量还多。这样，就解决了全县机井用电力抽水抗旱的问题。张钦礼深有体会地说：干部参加劳动，就能较快较好地解决生产上的关键问题。

县委副书记齐兰英说：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她原以为经过去冬的宣传、贯彻，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已经得到落实。但今年春天她到城关镇北大街大队和社员一起积肥、一起打埂时，却发现男劳动力干一天大多数记十分，女劳动力最高的仍然记七分。针对这种情况，晚上，齐兰英就联系工分问题，发动干部、社员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男尊女卑”的孔孟思想，经过批林批孔，干部、社员提高了觉悟，迅速地落实了男女同工同酬政策。从此，这个大队的妇女争着下地劳动，妇女出勤率比去年提高了一倍多。

兰考县委领导成员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洗刷自己头脑中的唯心精神，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

今年小麦收割前，县委根据去年堽阳公社秦寨大队的经验，提出全县的小麦不用镰割，一律用铲耨。县委副书记王启德觉得：用铲耨虽然不掉粒，还能多收草，晚秋作物也好管理，但是全县四十多万亩小麦，都用铲耨，恐怕不能及时收割完。他带着怀疑的态度到大傅堂大队去耨麦，结果群众起早贪黑，平均每人每天铲麦一亩多，他受到很大鼓舞，就把大傅堂大队的先进经验加以推广，全县各大队的小麦都及时收打完毕。王启德说：“坐在机关，总是估不透群众的力量。经常下去同群众一道干，才能够更牢固地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

（五）十月政变后张钦礼又被戴苏理逮捕入狱

二、研究资料

张钦礼同志刑满出狱

张钦礼同志刑满出狱后，在耄耋之年，以对党和人民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严肃态度，忍受着心脏病、胃病的折磨，把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坎坷多难的革命历程，如实地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记载，为共和国史特别是河南省国史研究和编纂提供了真实珍贵的资料。张钦礼同志在法庭上、监狱中，都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对妄加之罪一一据实据理驳斥，维护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他对昔日

同志挚友中在压力下说假话、违心话，不敢坚持真理的失节行为，不论职务多高名声多大，一个都不宽恕地当面给以辛辣讽刺和严肃批评，充分表现出刚直不阿的共产党人的革命风骨。

全国记协为张钦礼同志鸣不平，于上世纪 90 年代在北京、长沙、杭州三次召开全国会议，均特邀张钦礼同志与会，坐主席台并讲话。张钦礼同志的发言，多次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上世纪 90 年代中叶，全国记协秘书长一行数人，前往开封采访张钦礼同志。为表达对张钦礼同志的敬意，赠送龙泉宝剑一把，举行了赠剑仪式。采访报道张钦礼同志的事迹见报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的许多新闻媒体纷纷转载。又有许多媒体派人多次采访报道张钦礼同志的事迹。

已年近八旬的张钦礼同志，至今仍未得到平反。没有工资，全靠儿女供给生活费。近日患肺癌，兰考人民获知张钦礼同志病情者，家家牵挂，户户泪啼，成群结队，不远数百里到郑州医院探病者已近两千人。纷纷捐助医疗费，张钦礼家属一一拒收。近年来新闻出版界登门采访者络绎不绝。已先后写出两本十五万字以上的《张钦礼传记》初稿。尽管都为张钦礼同志鸣冤喊屈，歌功颂德，但由于在触及一些历史的关键问题上，怕担风险，回避事实，均被张钦礼同志婉言谢绝付梓。这更显示出张钦礼同志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不顾个人恩怨的高贵品质。我们相信被歪曲的历史终有一天要还其本来面目，对张钦礼同志做出公正评价。人民期待着反映历史真实的《张钦礼传记》早日问世。

初稿于 2003、10、8 日 定稿于 2004、5、5 日

张钦礼魂归故里——送行散记

（作者 邵井延 于 2004 年 5 月 17 日）

第一个送花圈的人

（2004 年 5 月 17 日）清晨 5 点多钟，我就已经找到了省人民医院太平间的地方。想找个地方存自行车时，两位熟悉的工人指着太平间对面的一家鲜花、食杂店的门口空地：“就放这，他们就是兰考的。”老板——一位看上去十分忠厚的中年汉子——对我说：“我是第一个给张书记送花圈的人”。“哦？”我想

起了。我听钦礼同志的儿子说过。我忙用双手握住了他的双手。钦礼的亲属曾告诉我，他们的父亲刚“走”，第一个送花圈的竟是他们相互之间不认识的太平间对面鲜花店的老板，是兰考人。还说他们子女还不知道农村如何烧纸的风俗时，是他们不认识的，在郑州打工的许多兰考年青人天天守在太平间外，给他们的父亲烧纸，摆香炉，也送来花圈，上面写着：“兰考人民永远怀念您”。成群结队的兰考人民早就来这里向老书记告别了。钦礼同志在病重住院期间更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如果也用量化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至少是张钦礼同志在这所河南省最大的医院里突破了来看望病人的最高记录，有成千人来看望了他，而且很多是相互并不认识的，慕名而来。打破我思绪的是早坐在店门口的一位老人，他对旁边人说：“我得回家换鞋，早上四点钟我起来，有只鞋穿错了，不得劲。”大家都鼓励他快去。而他胸前那一枚很大的毛主席像章却吸引了我，这是一枚主席穿军装、有鲜艳红领章的头像像章。这是在郑州到处可以看到的人们所戴的毛主席像章的又一种现象，不是去年新制作发售的那几类，而更可能是“文革”的遗物。

长子就是养子 当钦礼的子女们到门口下车时，早等候在那里的人们随他们拥进太平间的院子，至少可以看到有五、六部摄像机，照相机高举在人群的头上。当一位新华社的老记者给端着钦礼遗像的钦礼长子张战行和两边的二儿子、女儿合影时，我突然想起并问旁边一个熟人，哪一位是钦礼的长子？（即他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战友留下的孩子）。他们告诉我，“大儿子就是”，加上我没有看到的“摔老盆”等风俗，我感受到了我和钦礼的又一个距离。

共鸣 到火葬场，将要进行的告别仪式在大门正对面的最大一间厅。据说，火葬场的工人知道是张钦礼同志时，提供了一切打破常规的方便，其他人的丧事活动也毫无怨言。厅外的大广场上，今天是几十年来少有的一次“大会师”，许许多多几十年未见的“文革”老战友，狱中难友，互相知道都几十年未见过面的朋友们今天都在这里重逢、相逢了，又相互给自己熟悉的人介绍，进入大厅内，许多人仍忙于此。有一位朋友说，来这里的有一半都坐过牢。省直一位朋友准确道：“除了兰考来的，除了女的，恐怕会有一半。”

当浩浩荡荡的兰考迎“灵”队伍进厅时，前面哭泣声立即连成一大片，使所有在后面说话的人，不得限制住自己。随着主持人在广播里宣布：“张钦礼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现在开始”，顿时全厅内鸦雀无声，而随即进行的“三鞠躬”就打开了“闸门”，那哭泣声推起

的悲痛浪潮涌向大厅的各个角落，在大厅后部看不到遗体的人群中，也有人跪下去了，哭伏在地……。

为了缩短时间，除了钦礼长子的“答谢辞”外，没有生平介绍，没有悼词和其他的发言，但这个“答谢辞”一开始几句就掀起了我们胸中的万丈波澜，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几十年来始终平静不了的那心中的一切，刹那间在大厅内多少人的心中汹涌翻滚！我看到多少淳朴的农民非得用磕头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哀思，多少人在遗体前哭得站不起来。从告别遗体出来的老同志中，我又看到那些已经八、九十岁的“老红军”、“老八路”、“老市委书记”、“老市长”、文革中曾经风雨同舟的“老干部”。我们紧紧地握住了手，现在应该说是近“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了。包括主持人按惯例介绍的送花圈名单中的人物，按传统的地位观说，这些来送行的人中，仅担任过省、部级、市（地）级领导职务的，就有近百人之多，他们在更多的另一些送行者中的多数人还有一顶通用的帽子，就是“造反派”，“三种人”。

一位新闻界的朋友向我介绍了新华社老记者××，1986年我在狱中读《中国作家》创刊，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时，就知道这位××，通过《内参》曾揭露过原河南省委的弥天大谎和河南实际存在的极其严重的阴暗面，而今天才知道，他后来遭报复，在狱中关了六年，至今没有解决问题。

后来到张钦礼老家后又听说，当年随穆青、周原来采访的一个小通讯员也来了。也就是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新闻人”都来了，今天是确有新闻可做了。

格格不入的两种气氛

我们乘坐的车到兰考下了高速公路后，和前面已经先来到几十部车都被安排在路边等候灵车等主要车队，我看了已到的这几十部车，大都是“红旗”车，听钦礼的子女们说过，他爸爸不喜欢进口车。

路旁，沟外的树荫下，有一群群的农民，大都年纪不大。据他们说，是一早就来这等老书记的。有位妇女说：“听说‘老书记’五月七号在郑州‘走’后，他们就天天来这里等着‘老书记’回来，后来我们进城后听说，还有许多人今天早上三、四点钟就来城里等啦！”

一位农村妇女对我们说，今天没来这么多当兵的了，前两天开大会（指官方纪念焦裕禄去世40周年大会）把附近5个县的武警都调过来了，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路上根本不准有人……进城后，我们还听说，开会那一天全城的商店都不让开门，连机关干部也不让上班，在家里呆着，“不就是来了个政治局委员嘛！硬是把焦裕禄和人民拉远了！”几个月前，

甚至几年前，在各地遇到的兰考人就直言告诉我：“张钦礼是比焦裕禄更好的干部。”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焦裕禄同志毕竟只在兰考工作了一年多。近年来，一些小报刊都报道过穆青、周原等人的回忆中就有当年张钦礼把“焦裕禄”树立起来的故事，焦的女儿也亲口对我讲过，“没有张钦礼，就没有我爸爸，她对张钦礼同志说过：‘张叔，我爸不在了，你就是我的亲生父亲，没有你，就没有我们家……’”

而焦裕禄的那些事迹也是他们两位战友一起干的，焦裕禄身后更多的工作，更大的改变兰考面貌的，是张钦礼领着兰考人干的。今天，听说焦裕禄的女儿也穿一身孝服在张钦礼的孝车上。

“是非功过，自有公论”

约 12 点 40 分，“灵车”到兰考后，整个“送灵”“接灵”的车队开始进城，前面随即传来锣鼓声，但是很快车队就走不动了，等一会儿我看到前边几十部车都下来人，跑步去前边看去了，我也下车跟过去，看到的是一个黑色、白字的横幅拦在“灵车”前面，上面醒目的大字写着：“忠诚于党，情系人民，是非功过，自有公论”。其他还没有看到，车队已经启动了。我回到车上，打开车窗，路两旁不少人含着泪和车队的人们相互致意，哭的较痛的多是年纪大的人，也有许多年青人，他们显然是被这气氛感染了，也感染了我们。在进地道口时，一个中年汉子先“嘿嘿”二声，然后大喊起来：“张钦礼的冤魂回来了，张钦礼冤死了。”车上的人都含泪向他表示敬意。

车队又停住了，我立即下车，向前跑去，一直跑到队头，看到的是张钦礼的“孝子、孝孙”们乘坐的车，被大批群众包围了，哭声，喊声，淹没了其他所有的声音，我好不容易挤到“孝车”的后面，看到钦礼的小女儿爱英已经哭得泪流满面，喉咙已经完全嘶哑了，只听清半句：“我们做子女的，一定不会忘记……”多少双手伸向她，拉住的都不想丢，也有许多人是伸向孝车上的其他人的，几位年青的姑娘也在往这边挤着，喊着：“爱英在哪？爱英在哪？”。一位看上去身体很不好的老人，拉住孝车的车后帮一直不松手，然后让车拉住他走，一位老太太干脆在车上人帮助下爬上了车。

车队不时停下，是不少群众硬要按风俗，在车前路上烧纸，磕头，车的每一次启动，每一次停，都会引起车周围直至路旁形成的人海一次次的“涌动”。我问旁边两个女孩：“你们也熟悉张钦礼吗？”“熟悉，从小大人都给我们讲。”她们快言快语回答。现在，即使作为一个旁观者，你满眼看到的从八、九十岁的老人到妇女怀里抱着的孩子的目光，以及大批的青、壮年，在这个天地里，你不能不感慨

“谁人不识君”呢？我还看到两个坐轮椅的老人，同行中也看到有的是在亲属举着“吊瓶”打点滴来的，人们似乎都不愿错过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在这人山人海，哭声、呼声、喊声，甚至口号声此起彼伏，很多是要求去县委门口开大会，要为张书记申冤一类。当一位妇女又主动给我宣传：“张书记是冤死了……”的时候我忍不住说了一句：“他不冤，因为人民从来没有冤枉过他！”她立即接上了：“对，对，兰考人民一直认为他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学习张钦礼精神，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是在孝车前出现的又一条 20 多米长的白色横幅，特别醒目，一路上两边都有很多人在念着，我问举横幅的其中二个农民：“这是张庄支部搞的，还是你们自己搞的？”他们回答得很干脆：“我们自己搞的”。自此，这条横幅就成了这支车队，已经看不到尽头加上跟随的群众队伍前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快到县委门口时，在这条“进行到底”的横幅后面，一些愤怒的群众高呼口号，只听见几句：“打倒贪官”，“打倒腐败”，“打倒走资派”，“打倒帝国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成千上万的群众围着孝车，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着这支队伍，从马路中的人群到两边路旁的群众，欢迎的掌声此起彼伏，路边的表达多种多样，比如，一块不大的黑板写着“钦礼同志，一路好走！”，落款是：“张子田全家”，一群孩子各拿一个汽球，一个汽球上一个字，只看见有“怀念……等，在马路中间一部分群众举着简单的纸，上面写的是“兰考人民怀念您”，他们迎着孝车，久久不愿意离去。一位中年人又对我说：“全是自发的啊，没有任何人通知。”我问：“怎么来这么多的人？”我问了一下，“早超出了你们县城的人口，有很多是乡下来的吗？”他说：“是的，消息传得可快了，一传十，十传百……。”一位中年人说：“自毛主席去世后，还没见过这阵式！”一个女孩接着说：“他们都说，这叫十里长街接书记啊！”另一个女孩说：“毛主席也不如他。”我对他们说：“钦礼同志病危时，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学生去看他，对他说：‘张伯伯，您为兰考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话没说完，就被钦礼同志打断，他支撑坐起，用手指着病床对面的毛主席画像，意思是说，是毛主席领导的。他在病重，病危期间，胸前一直戴着毛主席像章。路过郑州慕名来看望张钦礼的北京一位姓韩的大学老师紧握着张钦礼同志的手说：‘我一定当好毛主席的学生，把你们奋斗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此时不能说话的钦礼目不转睛地长久

地注视着这位已经哭得泪流满面的青年教师……。” 然后，我对低着头的那个女孩说：“你们话也有道理，毛主席要教育出来的就是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周围的人也七嘴八舌的附和着，“张书记就是毛主席带出来的好干部，”，“现在都啥干部，都是贪污犯……。” 一位老汉说：“他们家亲属都不收礼。”我说：“在郑州从医院到灵堂，多少人去看他，但他们家从来不收一分钱的礼，钦礼对他们子女交待过：‘我也没有任何遗产，我走的时候是干干净净的，以后你们怎么做人，毛主席著作已经讲得很全面了，你们就照那样做人。’” 县委大门内外 路过县委门口时，我有意走近几步，两个像是机关工作的年青人在议论什么事，从大楼里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中年人打着官腔问：“这是弄啥呢？”这大概是我今天所遇到的成千成万的人中第一个“不知道”这是啥事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外面咋不走啦？”另一个答道：“专门搁（停）这的”。大门外一些老百姓扭过头来劝他们：“你们也出来看看老书记吧！”在场的这几个人没任何表情。 县委外的大道上则是另一个世界。从兰考车站到县委门口，到县政府门口，到焦裕禄陵园前，形成一个又一个高潮。一声声“冲天雷”炸破白空，而置在路两旁的一条条“万头”鞭炮迎着车队到来震耳欲聋的响起，在一直不知疲倦的两辆锣鼓手和锁呐车后，又进来一支新的盘鼓队和另一支军乐队，后者奏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一辆专门采访车上站着的记者向人们展示的是香港出版的《中国焦点》杂志内的一幅幅张钦礼的画页，也成为群众包围、欢呼的中心。在车队的最前方，又出现一条引路的黑色横幅：“欢迎张钦礼魂归故里。” 一路上还看到许多小商贩把一箱箱饮料免费送到人群中，从箱中取走饮料的人们又立即挤进孝车前送给车上已太累太累的钦礼的亲人们，尤其是站在车前面的三个儿子，一直高举着钦礼的遗像，不停地向周围群众鞠躬作揖，嘴里还不停地表达着他们真挚的谢意。 在小北关十字路口处停着一大片出租车，几个司机在大喊：“去张书记家不收费啊！”我还注意到，就是在车队还没有到来之前的路两边所有人，所有的商店里，目光注视的远处还没有到来的车队，所有的言谈都是今天这件大事和老书记这个人，一些年青人对老人记述评论的细节都很注意，如此全社会的政治化，是几十年来所有反映这个社会的文字中难见的现象，今天的这些现实——除了“文革”和“八·九”——也是仅见的。 阵线分明 在又一

个十字路口处，又一支盘鼓队迎上去还没来得及“截住”。孝车突然向右边路口拐过并急驶而去，整个车队也紧跟上。我上车后，他们告诉我，顺着原来的大路走，前面还有好几个大乡镇，甚至好多个著名的村口，都早摆好了祭品，各处都有成千成万的群众早就等在那里，那么到半夜也回不到钦礼的老家，若按风俗，天黑以前是要求回家的。再说，那些孝子孝孙们累得再也支持不下去了。“那么，那些等待的老百姓怎么办呢？”我问。他们说：“已经安排好了。”

车上后排座上是两位新上来的本地的妇女，其中一位对路边的桐木加工业务很熟悉，她说，她十几岁就干这一行，十几年前看厂不行就干起“收破烂”。旁边那位老×介绍说，她是收人家收上来的破烂，是“破烂王”，并说了一句笑话：“当了三年‘破烂王’，给个县长都不干。”她笑了，对自己现在的业务是很满意的。但是，话题随着张钦礼转到毛泽东时代，她们则十分深情地怀念。“那时人多好啊，争着当模范，早上一起来，麦子割了一大片，谁都不知道是谁割的！”当时也是其父领导的。同样的表情，在今天去火葬场路上的汽车里，我在一个机关干部模样的兰考女同志那里也看到过。那是她在谈到她的中学教育，每学期只交两毛钱时。老×说：“三年困难时期，张钦礼这个县长家也饿得很，我们家还给他们送粮票。”我接上说：“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个人说老毛那时穷的啥样时，两位纺织女工站起来回击道：‘那时候刚建国，底子薄，都穷，毛主席也穷，他老人家七个月不吃肉，自己腿也浮肿。’其实，换一个时代，再穷，饿死人再多，各级贪官还照样挥霍，四十年代大灾荒时，美国《时代》记者就揭露过宋美龄和蒋家王朝的贪污腐败。前几年公布的毛家驹日记，不也记载着他们这些文人在三年困难时期去内蒙等地时，地方干部不也用山珍海味招待过他们……。”

车上这些兰考人还向我们介绍了就是在那些艰苦的条件下张钦礼这些干部又是如何工作的许多事迹。他们说，跟着张钦礼的那些干部，文革中被资反路线镇压，坐在监狱中还在研究着改造兰考的规划，一出监狱还没有平反就跑到治沙、治碱第一线去了。但是多少好干部都被整死了。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在清查“四人帮”中除韩村的女支书逃出来外，其他三面红旗都被抓到监狱，其中一个死在监狱，钦礼的弟弟也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死在狱中。1980年时我们就听说他的事迹，说他在全县判他的有线广播大会上奋力挣脱出来，冲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对全县人民演讲，好一条汉子啊！在文革中及文革后的多次

镇压中，仅其中一次就正式逮捕了 1207 人……。

几天前在纪念焦裕禄的官方活动中，官方媒体作为继承焦裕禄事业而专门采访的人正是当年清查“四人帮”镇压张钦礼这一大批好干部的刽子手，他本人还是 1958 年搞“浮夸风”的有名干将，造成成千上万人饿死，是民愤极大的。在河南，这个阵线更是十分清楚，当年没打成“右派”“左派”的，例如省委的“潘、杨、王”（其中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就是邓小平支持吴芝圃整的），地市一级耿其昌等，县委一级的张钦礼等，“文革”中都是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的造反派，河南文革中起来造反的学生写的第一个《紧急呼吁书》，就是揭露了“信阳事件”，造反派代表全省人民的意愿几下广州要揪斗吴芝圃——这位全国最著名的“浮夸风”干将，和另一位著名干将曾其全一起，1979 年在全面镇压造反派后得到了最高级别（华、叶、邓及全部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的隆重平反。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车队去往钦礼老家所选择的这条偏僻的路，路旁也不时有肃立的人群，完全被截住的只有一次，落款为双楼村委的黑色横幅上印着：“沉痛悼念老书记”。另一条落款是南彰大队的横幅写的是“人民的好书记”。待我们后面的车也走过，几个被扶住的老人仍在大哭。

前面鞭炮，锣鼓声响起，终于到家了。几百名少年儿童每人手持一朵白花，肃立在村外路边，进村前路上的某一个路口或拐弯处都聚集着大批老百姓。大路上空的横幅除了“怀念”内容的还有：“防风沙，治盐碱，造福人民；一生清正，廉洁为党，鞠躬尽瘁。”“寿越大旬，睦邻精神今犹在；含笑九泉，勤俭作风永世传。”

我们几个人先进了村，找到了张钦礼的家，也确实是很旧的老屋，这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县委书记（还兼地委书记和省里其他职务）的家。灵堂已摆好，两边对联是：树焦君丰碑竟焦君遗愿四十年不曾止步，无愧亲密战友，莫凭恩怨作论。惦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六十载未肯息肩，堪称人民功臣，勿以穷达相观。横批：一代风范，虽死犹荣

当夜回去的路上又经过焦裕禄塑像时，我想起进城的路大家曾讨论群众集资买块地也建个张钦礼塑像（堪称双壁）的问题时，有的同志说这不是花钱就能办成的事，这是政治。也有人说：对，是政治，可是用孙中山的话讲，政治就是众人的事情。那么只要人民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又有什么事办不成呢？今天一天在兰考的感受，更使我们增强了这个信念。应该说，今天使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几十万兰考人民从逮捕、判刑至今，张钦礼同志离开他们 20 多年了，而兰考人

民不仅老一代，中年一代那么刻骨铭心地记着这样一个毛主席的好干部，而且还把他们的认识情感传给了一代又一代兰考人。这就是兰考人，也是生活在中原腹地的一部分中国人的良心，这就是中国人的素质，这就是中国人的希望。

（来源：《河南文革资料汇编》）

二〇〇四年九月九日，《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 作者韩德强

2004年5月17日，兰考发生了一件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大事。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他们的老书记张钦礼魂归兰考。毛主席、周总理去世时，兰考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们功高盖世、泽被人民，普天同哀，理所当然。焦裕禄去世时，兰考也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带领兰考人民，奋不顾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职，成为县委书记的学习榜样，兰考人民深情缅怀，合情合理。但是，张钦礼在1978年被捕入狱，被判13年徒刑。出狱后既无党籍，又无公职，三无基本生活保障，靠儿女赡养。这样一位劳改释放犯，这样一位已经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书记，在这样一个有奶便是娘的时代，在既无政府号召、又无媒体公告的情况下，在丧礼的组织者一再低调处理，一改丧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尽量回避群众参与的情况下，单靠自发地口口相传，怎么能够聚集起十余万兰考群众，让他们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此情此景，举世无双，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

最近，怀着对张钦礼的景仰和好奇，我踏上了兰考大地，参观了焦裕禄纪念馆，并有幸当面向两位张钦礼的生前好友了解他的事迹。震惊，痛心，哀恸，催人奋进，令人深思！从张钦礼一生的坎坷曲折的经历上，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中各种复杂力量的斗争，仿佛亲临其境、亲历其事，又如此清晰地穿透历史，看到了被光怪陆离的现象所掩盖的社会骨骼、腑脏、血脉、经络，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回京后，结合其他人的访问记录，以对话体写成此文。

问：参观了焦裕禄的事迹后，我有一个疑问。焦裕禄到兰考工作1年5个月，2个月又值肝癌晚期，弥留在医院，却战天斗地，卓有成效地治理了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那么焦裕禄之前的兰考县委干什么去了？

答：问得好！焦裕禄之前的县委书记姓王，叫王金壁。这个人有些堕落腐化，一是生活作风上有问题，与其保姆有不正当关系。第二是下去劳动的时候也是到

条件最好的地方，到农村还带着藤椅。第三，王金壁还被称为“三排排长”。王某喜欢看戏。剧院里第三排 17 号座位是最清晰的。每次看戏王某全家都要坐在第三排中间，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如果王金壁没到，戏就迟迟不能开场。群众就讽刺地说：“不急，三排排长还没到哩！”焦裕禄来后，制止干部看白戏，干部的孩子看戏也要掏钱。第四，王某还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

问：这样的书记会不会带出一批又贪又懒还好争名夺利的干部？

答：是啊！王金壁就用那些不会干事，光会拍马屁的干部。张钦礼当时是县长，人称兰考的“活地图”，他对治理兰考的“三害”有一套办法。从 1954 年起，张钦礼就担任兰考县长。从 54 年到 57 年，兰考的“三害”得到了初步治理，造林固沙成效显著。但 1958 年“浮夸风”一来，林子被砍光了，张钦礼还因为反对把大批干部打成右派，而受到“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的处分。

问：这是怎么回事？57 年反右的矛头不是针对那些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分子吗？怎么会把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划成右派？

答：这只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实际上，在地方上，真正要推翻共产党的人很少。但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做着共产党的官，却贪图享乐腐化名利的人却不少。这些人在党内很活跃，臭味相投，拉帮结伙，视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为异类。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人，群众意见最大的也是这些人。57 年一开始是整顿党的作风，其对象就是这些人。

在兰考，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就这种人。他利用职权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并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是个陈世美。更加严重的是，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后，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这位复员军人关进了监狱。所以，整风运动开始后，县委门口就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孙跃堂，200 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北京、上海等地出了一批要求“轮流坐庄”的知识分子，他们借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党内问题，否认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分子，代表被推翻的三座大山势力，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但是，为了教育团结他们，把他们当作右派分子，而不当作敌对分子。毛泽东要求各地在继续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打击右派分子。

这个部署不能不说是正确的。但是，正确的部署谁来执行？具体地说，在河南，谁来执行保护群众、打击右派的政策？很不幸，恰好是与孙跃堂臭味相投的人，省委书记吴芝圃、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和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等人。赵文甫坐镇兰考，将 200 多名揭发孙跃堂的干部全部划成右派。张钦礼激烈反对赵文甫的作法，被赵文甫“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相反，孙跃堂却官升一级，调到邻近的东明县任县委副书记。由于吴芝圃等人的滥施淫威、排斥异己，河南的右派是全国最多的。

问：啊，竟有这种事！我听说河南的浮夸风全国最厉害，饿死的人也最多。这和吴芝圃的用人特点有关系吗？

答：怎么没有？张钦礼吃尽了吴芝圃搞浮夸的苦头！大跃进要求的是多快好省，四个字。到河南，丢了好省，只求多快。1958 年秋收时节，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由全省各地区专员、县长参加的粮食征购工作会议，逼着各县县长说假话，报高产，会议开了三天三夜不让过关。第三天上午，吴芝圃亲自到开封组督阵，发表《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长篇讲话。县长们好歹加码到 500 斤一亩，800 斤一亩。但张钦礼发言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 20 万斤，小麦亩产 5000 千斤，芝麻杆能打出油。兰考报不出高亩产，其他县报的也是假的。他甚至直接批评吴芝圃：“征购透底，再搞返销，粮食搬家，劳民伤财。爱说假话的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这个教训要记取。浮夸风刮过了头，最终是要害人的。风刮在下边，风源在上边。说白了一点，风源是在省委。”吴芝圃坐不住了，面带怒色，扬长而去。接着，大会秘书处通知取消张钦礼的会议资格，遣送回县，接受批判。一批就是 8 个月，张钦礼不检讨，不认错。河南省委又给张钦礼又加了一顶帽子——“死硬派”，给张钦礼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三级，到农村劳动改造。你想想，说实话的人遭了殃，浮夸风还能挡得住吗？

河南的浮夸风一刮就是三年，最终闹得人人浮肿，大批饿死。在饿死人最多的信阳地区，地区书记路宪文是吴芝圃的死党。路宪文不但最积极搞浮夸，大批饿死人后，路宪文又严密封锁各条反映真实情况的通道，仅邮局就截住一万二千封反映饿死人的信件。吴芝圃和秘书长戴苏理千方百计包庇路宪文。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绕过重重障碍，向省委报告固始县征购透底饿死人的情况。一个村支部

23 名党员，饿死了 20 人，剩下 3 名写血书送到省委。但是，这些信件都被戴苏理扣下了。戴苏理还扬言要查处严办。

后来信阳事件败露，李先念、陶铸、王任重到河南考察，吴芝圃、戴苏理陪同。然而，吴芝圃倒打一耙，把路宪文的责任推给地区专员张树藩，而事实上，张树藩恰恰因说实话而倍受吴芝圃、戴苏理和路宪文的迫害。杨守绩终于盼来了大领导，却不料，在李先念等人到固始县的前一天，吴芝圃和戴苏理来到固始，宣布杨守绩是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判刑。

在这种情况下，劳改中的张钦礼一身浮肿，突破重重封锁，进京上访，见到总理，反映河南浮夸和饿死人的情况，你想，吴芝圃和戴苏理等人对张钦礼该有多么仇恨！

问：难道共产党的天下竟能容忍吴芝圃一手遮天，把新中国晴朗的天变成吴芝圃黑暗的天吗？

答：1960 年 12 月上旬，张钦礼冒着生命危险进京上访，周总理对河南的情况有所了解。到 1961 年 6 月，吴芝圃被免去省委书记一职，中央派刘建勋接任。刘建勋到任后，首先将一批受吴芝圃迫害的干部平了反，其中有潘复生（省长）、杨珏、王庭栋、邢照堂、陈冰之、张钦礼等。河南的人民总算是拨云见日了。但是，刘建勋虽然将一批好干部平了反，却没有将吴芝圃带出来的一群坏干部撤下去。事实上，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虽无实权，但威势尚在。河南的天空仍然飘着大团大团的黑压压的乌云，只在乌云的缝隙处漏出一点阳光。

张钦礼得到过总理的肯定和鼓励，刘建勋亲自替张钦礼平了反，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县长之职，但张钦礼从郑州回到兰考，却仍然只能在家呆着。主持兰考县委工作的仍然是紧跟吴芝圃的人，就是那个王金壁，他不但没有通知张钦礼到任，甚至没有给张钦礼落实省委的平反政策。最后，省监委书记刘铭榜不得不亲自出面，给张钦礼办平反手续，并补发了 1264 元工资。张钦礼长期受迫害，贫病交加，本来特别需要这笔钱，但他却把钱全部捐给了兰考的生产救灾。

从落实平反政策到 1962 年底焦裕禄同志上任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在兰考县委仍然受到排挤。虽然身为县长，却空有一腔改造兰考的热血，只能分管一些不重要的工作。

问：吴芝圃搞浮夸风，有没有中央的责任，有没有毛泽东的责任？

答：中央当然有责任。中央也有类似吴芝圃的人。吴在中央也有一个关系网。但是，毛泽东却不在其中。1958年10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时，就明确批评浮夸风和共产风。他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进一步纠正共产风。他说：“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1958年10月）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取消商业。”会上，吴芝圃提出要研究“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还一再批评高指标：“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11月下旬，又召开武昌会议，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1959年3月，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肯定抵制共产风的瞒产私分现象，鲜明地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以上讲话均可见《毛泽东传 1949-1976》，二十二、纠‘左’的努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

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时，吴芝圃都在场，他不可能不了解毛泽东反对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风的坚决态度。但是，吴芝圃却在河南一意孤行。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参加中南局的小组讨论会，向会议主持人金明发问：“金明同志，你说是猪聪明一点呢？还是人聪明一点呢？”金明自然回答：“还是人聪明一点吧！”毛泽东摇摇手说：“不尽然，猪一头碰到南墙上，过不去，他知道退回来，有的人就不知道退回来！”“吴芝圃同志，你离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十万八千里哟”

问：吴芝圃停职了，张钦礼平反了，被赵文甫划成右派的干部怎么样了呢？

答：仍然没有平反。那片黑压压的乌云继续笼罩着兰考。具体代表就是那位王金壁。信阳事件暴露后，毛主席认识到，干部队伍的问题很严重，局部地区甚至已经是反革命力量在统治，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民主补课”。但是，谁来负责组织“民主补课”呢？在兰考，恰恰是需要“民主补课”的王金壁在组织“民主补课”。他借此机会排斥异己，让 2000 多名基层干部参加的“民主补课”学习班，迫使他们交代如何向农民征购透底，将本应由王金壁之流的吴芝圃追随者所负的责任推向基层干部，推向不迎合自己的好干部。

吴芝圃停职反省后，张钦礼劝王金壁放人，王某这才勉强放人，但既无平反之说，也不承认错关错审。

问：这样的草菅人命、贪污腐败的书记怎么能长期为所欲为呢？

答：是啊。吴芝圃调离后，那些善于钻营的上级领导们感到了群众压力，把王某调走了。但是，他们并不启用张钦礼，而是调来一个因贪污粮票在群众中影响十分恶劣的刘某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兰考工作。兰考是个穷县，干部都不愿意来。开封地委选了几位书记，有的都发了调令，都不愿意来。最后把洛阳矿山机械厂的焦裕禄调来了。

对于开封政治生态圈来说，焦裕禄是个外人。钻营者们以为焦裕禄对他们没有威胁。然而，他们想错了。焦裕禄是个好干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一到兰考，就发现了张钦礼的冤屈、干劲和才华，和张钦礼结合在一起了。在张钦礼的建议下，焦裕禄大胆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 2000 多名干部平反，使兰考各级领导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张钦礼又受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规划。焦裕禄和张钦礼齐心协力，带领干部和群众查风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内涝，深翻土壤，治理盐碱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使兰考的自然面貌和农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令人痛心的是，焦裕禄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张钦礼失去了他的好领导、好战友，兰考人民失去了他们的主心骨。

问：焦裕禄给 2000 多名干部平反，开封地委怎么看？

答：当时正值中央开完七千人大会，全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吴芝圃失势，钻营者们不便兴师动众、问罪焦裕禄。可巧，焦裕禄病逝，去了他们的一块心病。

开封地委中上与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声气相通，下与孙跃堂、王书记沆瀣一气，旁通河南各地的投机者，善于指鹿为马、见风使舵的，当数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此人早就视张钦礼为异类，对焦裕禄在兰考的业绩耿耿于怀。

焦裕禄死后，开封地委不是将深得民心的张钦礼提成县委书记，而是派一个叫周化民的当书记。周化民是秦一飞的死党。焦裕禄逝世两个月后，兰考的“四清”工作开始了。秦一飞任兰考“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民任副团长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有工作团成员 2000 多人，其中 260 人专门负责县委和直属机关。秦一飞和周化民领导的“四清”工作，专以焦裕禄和张钦礼带领的苦战兰考的干部为对象。张钦礼首当其冲，被当成“四不清”干部，靠边站，接受审查。秦一飞指示负责县直属机关的工作队长崔礼书，对张钦礼要进行认认真真地清查。崔礼书不敢怠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派人外调，清查了大半年，没有查出丝毫“四不清”的问题。秦一飞批评崔礼书：“我就不相信在一个县工作多年，会没有四不清问题！”显然，秦一飞是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把四清运动当作了剪除异己的大好机会。秦一飞撤了崔的职务，换上了自己的亲信赵为新，指示赵为新从心直口快的潘子春身上打开缺口。赵为新对潘子春使用车轮战术，还是没有成功。最后，秦一飞没有任何理由将潘子春挂了起来，不分配工作。张钦礼名声大，又查不出问题，只好恢复其工作。但是，在周化民的处处制肘下，治理“三害”的工作进展缓慢。

问：整个开封地委就没有好人吗？一个宣传部长怎么能如此胡作非为？

答：好人斗不过坏人啊。坏人对上拍马奉迎，对下小恩小惠，善于笼络人。好人直来直去，不会趋炎附势，投其所好，更不会笑里藏刀，借刀杀人。秦一飞在开封地委绝不是孤立的。

问：我记得，《人民日报》宣传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发表在 1966 年初，通讯上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显然，这篇报道对张钦礼十分有利。周化民怎么能允许这种报道面世呢？

答：1965 年底，穆青、冯健、周原来采访焦裕禄的事迹，我（刘俊生，时任兰考县通讯干事）是全程陪同的。高级记者来了，我找到县委第一书记周化民，他说：“我不太了解情况，张钦礼是兰考土生土长的，又与他共事，对他比较了解。今后来记者别找我了，就让张书记介绍吧！”这样，张钦礼就花了大量时间

对焦裕禄的事迹做了生动详细的介绍，一介绍就感动了穆青。穆青听后，感动地说：“我参加工作 28 年了也没有哭，这次被焦书记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咱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重新报道焦裕禄。”他们本来是想报道整个豫东灾区的面貌，经过张钦礼介绍后，决定着重报道焦裕禄的事迹。那天晚上 7 点开座谈会，张钦礼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绍，穆青就开始流下眼泪，晚上谈到后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才作出报道的决定。

报道一出来，周化民就说：“焦裕禄的事是谁说的？张钦礼自己说的，他不是想宣传焦裕禄，他是想宣传他自己，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呢。”那天，我被请到新华社，一位同志对我说，焦裕禄的事迹已向中央汇报，中央同意将他的事迹树立为典型向全国宣传，并且要求向宣传雷锋一样，不惜时间，不惜版面，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宣传焦裕禄。他让我回去向县委、地委的书记汇报。我回来后给周化民汇报。他听了半天没说话，后来蹦出来一句话：“典型？兰考出了典型？来兰考参观个啥？看咱沙荒啊？盐碱啊？焦裕禄怎么算典型啊？你去找地委宣传部长吧。”周化民不敢得罪新华社，把球踢给了秦一飞，他相信秦一飞能挡住。秦一飞一听要报道焦裕禄，气不打一处来：“别说了，别说了，新华社报道焦裕禄我作为宣传部长怎么不知道？焦裕禄到兰考才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其中还有两月住医院，干出了啥成绩？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看沙荒、看盐碱、看兰考人穷得两人合穿一条裤子？也不知道张钦礼是咋给人家胡汇报的，我不听，我不同意报道。”最后，秦一飞想到毕竟要面对新华社，又留了一句：“小刘，你找地委书记汇报去吧？”我便去找主管宣传的延新文副书记。延新文听后很高兴，把我领到了当天下午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上，叫我来汇报。下午汇报时，看到那么多大领导，我很紧张，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用慷慨激昂的声音来讲焦裕禄的事迹。听完汇报后，秦一飞首先发言，表示强烈不同意。由于他对兰考比较了解，其他人因此不敢发言。幸而地委第一书记张申说了话：“新生事物嘛。有些人对新生事物是看不惯的。焦裕禄是不错嘛，当时派人去兰考，许多人都推辞，焦裕禄接到命令后带病前去，并且在兰考一年多时间，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我看这个同志不错。有时候先进事物和落后事物是要作斗争的，我们应该支持先进事物。”秦一飞反驳道：“看啥哩？有啥可看的？看沙荒呢？”张书记说：“怎么没有典型？你比如去年风地沙丘，把风地给封住了，再起风就没有风沙了。这不是典型

吗？”秦说：“那像这样的有几个典型呢？”张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由少可以到多。”由于地委一把手的赞成，其他人也都倾向于赞同，于是最后通过在全地区开展向焦裕禄学习的决定。

县委一看地委决定了，也不得不同意。但是，新华社的稿子还要交给县委书记审查。周化民再次从中作梗。他认为新华社的通讯需要改，把兰考写得可怜了，阴暗面太多。他将文章归纳了三句话、六个字：第一句话，焦裕禄用一年时间改变了兰考面貌，共产党领导十六年都没改变好？第二句话，改变兰考面貌是焦一个人干得？为什么只报道他一人？都归到焦裕禄一人身上行吗？六个字：灾、难、病、苦、死、逃。他说：“文章要发我也同意，不过得改，得做大修改。”

为此，在兰考四清工作团驻地，当着 30 多名四清工作团的骨干，秦一飞、周化民和张钦礼展开了一场激辩。秦一飞气势汹汹：“试问张钦礼同志，焦裕禄是条龙他又能吸多少水？他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能改变兰考面貌，谁能相信？张钦礼同志是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最多的，我看你的话掺假不少。你把兰考县委的成绩，都记在焦裕禄一个人身上，把几年的工作成绩，也记在焦裕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上，这是夸大其辞。你内心世界里是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看无非是想捞点什么。”

周化民紧跟着说：“新华社的稿子一发表，穆表他们可以得到一大笔稿酬，个人也出了名，名利双得；焦裕禄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光前裕后；张钦礼同志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也跟着风光；背黑锅的是我周某人，给焦裕禄填穷坑的也是我周某人。我周某人就是三头六臂，也填不满兰考这个穷坑！”

张钦礼说，“莫以时间长短论政绩”。他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是一年零五个月时间。这一点秦部长说得很对。但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焦裕禄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比我们任何人都多，都好。他为了尽到一个县委书记的职责，除掉兰考的‘三害’，造福兰考人民，他带着病体，严冬不避寒，盛夏不避暑。在荒沙滩里，在盐碱窝里，在沼泽地里，拄着根棍子，背着干粮，带领除‘三害’调查队，把兰考县的地形地貌、角角落落，查了一遍又一遍，咱兰考一百多个生产大队他几乎都跑到了，往返步行五千余里，焦裕禄的身影是尽人皆知。渴了他趴在河边喝河水，饿了啃的是自己带的干馍，群众给他烧开水喝，他说下雨缺烧的，不让烧了。累了蹲在地上打个盹，整天没白没黑舍生忘死地工

作，发誓完不成除‘三害’的任务死不瞑目，这些秦部长、周书记你们做得到吗？你们只会浮在上面听汇报，懒得下去走一走。你们到兰考与焦书记在兰考工作的时间差不多，你们下基层多少次，为百姓又解决过哪些急需？

在开挖贺李河的时候，他跟群众一起劳动，他背沙袋压趴在地上，起几起没起来，是潘子春跑过去将焦书记扶了起来，搀到工棚里躺下。卓兴隆劝他住院治病，休息几天，他却说，在除‘三害’大决战的时刻，我怎么能休息呢？休息的时候是有，等到同志们站在我的灵前说，焦书记，你安息吧，你没完成的除‘三害’事业，由我们来完成，到那个时候，我就休息个够。这虽是风趣幽默话，却体现了焦裕禄同志宁愿把生命献给兰考人民的忘我精神，这样的好书记难道不是榜样吗？当他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后，他没有掉泪，平静地说‘咱兰考是灾县，我死后不要多花钱，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不离开那里，要看着你们带领群众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说得动容，泪水模糊了眼睛，在场的一些四清队员也被感染而开始流泪。

张钦礼继续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走完了他生命的路程，他和兰考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在群众中有口皆碑。虽然他在兰考只短短一年零五个月，准确说，只一年零三个月，但是，不能以时间长短论英雄！焦裕禄活着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县委的工作成绩该归于他；焦裕禄逝世以后，我们又在焦裕禄精神鼓舞下干工作，县委工作成绩也有焦书记的份，这不叫夸大其辞。焦裕禄来兰考时，自然条件情况比现在恶劣得多，焦裕禄同志从来也没说过背黑锅、填穷坑的话。新华社是中央的喉舌，新华社记者到兰考采访了上千人次，老百姓都热情接待，积极提供焦书记的事迹素材，这反映了民心，民心不可违啊！有的人却冷落记者，老是借口工作忙，不愿见记者，让别人接待记者。别人照着他的指示办了，又骂人家有野心，想捞稻草，我张钦礼难做人啊！”

就这样，张钦礼的意见终于在四清工作团占了上风。焦裕禄的长篇通讯才得以发表。

问：长篇通讯发表后，全国各地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张钦礼在兰考的处境是否有所改善呢？

答：远非如此。全国学习焦裕禄掀热潮，唯独在兰考县委冷冷清清。张钦礼注意到，尽管大批记者、作家、参观学习者云集兰考，但周化民很少露面。有一次，张钦礼递给周原一张纸条，大意是：有一股冷风在阴暗处流动，但它暂时还抵挡不住来自北京的东风。

1966年“5·16”通知发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5·16”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对照河南的情况，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路宪文、秦一飞、周化民、王书记这样的人，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事实上已经将河南的共产党政权变成了他们的黑帮政权、资产阶级政权。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就是针对这些人的。

文革初期，当大学里开始有人响应通知号召，自下而上地揭发党内阴暗面时，工作组自上而下地进驻大学，将学生们打成反革命，而保护各级党委。这样，毛泽东感到工作组在保护走资派，在打击群众积极性，阻碍揭露阴暗面，指示撤销工作组。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认为在工作组领导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从此，揭发阴暗面、批斗走资派的群众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

但是，受压制的群众可以团结起来斗走资派，走资派也可以动员群众斗革命派。无论是哪派，都可以自称是造反派。在兰考，秦一飞摇身一变，成了兰考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周化民任副组长，四清工作团就地转化为文革领导小组，他们组织“造反派”，将张钦礼定为黑帮，批斗游街。周化民控制下的兰考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批判《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派出“纠穆青战斗队”到北京抓穆青。1967年2月，张钦礼、潘子春、卓兴隆等跟着焦裕禄除“三害”的县、公社、大队三级骨干分子1207人全部被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起来，游街示众。城关镇一个姓管的老百姓说了一句：“这绑住游街的不都是好人吗？”仅此一句话，“造反派”竟用乱棍将管某打死在街上。中央轻化部设在兰考的开封造纸林场场长刘永松也说了这样一句话：“游街示众的人

不都是跟着焦裕禄书记干的好干部吗？”这话传到秦一飞、周化民的耳朵里，刘永松就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张钦礼的保皇派。

杨捍东插话：我给你们补充一些材料。“树焦”与“不树焦”是一场斗争。兰考文革开始后，周化民把“树焦”当作张钦礼的“政治扒手”的证据，大字报向全国散发。这事惊动了中央，国务院办公厅看到这张大字报后，让河南省委限期调查解决。

省委把这个任务交给开封师范学院（现为河南大学），学校又交给我，由我带队调查。这里关乎三个人，第一个人是焦裕禄，他的事迹究竟真伪如何？二是张钦礼是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三是周化民到底如何？副省长王维群召见我时说得非常严厉，叫我调查时不要带框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详实再详实。如果出了问题，严惩不贷。当时我只 23 岁啊，很年轻。我说首长放心，我从没去过兰考，在那里无亲无故，不可能带框框，一定会客观详实。

我带领一个共青团小组，领着三个学生调查一个多月。调查过程中我唯独没有见过张钦礼，因为张钦礼带焦裕禄的夫人到广东省介绍焦裕禄的事迹去了。由我执笔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向中央回答了三条：一、焦裕禄的事迹详实无误，完全是真的，且由于新华社通讯篇幅所限，好多事迹还没报道出来。二、张钦礼与焦裕禄肝胆相照，共同协作，焦裕禄去世后，由他完成焦裕禄的遗愿，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之一。三、周化民同志身为家乡干部，却始终对报道焦裕禄的事迹有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前，他不同意，这是个人认识有别，我认为这不是错误。但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他仍取消极态度，仍不认真学习，那就是对党的态度问题，应该予以批评，我只是说“批评”。

报告写成后，我先给王维群汇报，再进京汇报，在中南海将报告交给国务院办公厅。我回来以后，周化民已经要逮捕以张钦礼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了。这时是 67 年的 1 月 29 号。（刘俊生：我也被打成该集团成员了，说我是吹鼓手）凡是当年跟随焦裕禄一块工作过的人，焦裕禄死后积极宣传他事迹的人，都被抓进监狱，全县有 1200 多人，涉及面很广，包括兰考“四面红旗”的支书，农民也抓了很多。

我有一个同学，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我的调查报告印出来发到社会上了。由于报告中我肯定了张钦礼，所以我也被抓起来了。开封军分区的人听信周化民

的造谣（周说我是国民党中校），逮捕我时调用军队，派了三辆汽车，还用机枪封锁路口，将我用脚镣手镣抓起来。当时我是 23 岁的大学毕业生，什么时候去当国民党中校啊？

问：下手竟如此狠毒！后来怎么样呢？

答：毕竟民心不可违。为焦裕禄、张钦礼申诉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向总理，秦寨大队的贫农李占荣还跑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为张钦礼鸣冤叫屈。周总理派记者到兰考暗访，了解到实情，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河南的兰考、林县这两个先进典型，要保护，不准打倒！”这样，总理将张钦礼接到北京，当着河南省军区各级领导的面，宣布撤销下令逮捕张钦礼的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的命令，任命张钦礼担任 7249 师空降师政委。在总理联络员的安排下，张钦礼还在北京向 30 万工人做了 18 场报告，推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回到河南后，张钦礼还被任命为开封地委常委兼地委书记，兼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回到兰考，首先给被关进监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安排他们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对跟着周化民的干部，不开除党籍，也不关进监狱，而是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从这时起到 1970 年 8 月近 3 年时间里，张钦礼带领兰考干部和群众“引来黄河水，重新安排兰考大地”，引黄灌淤工程共挖 3000 万土方，基本完成了赵王河、黄河清故道、陇海路两侧、黑龙潭、四名潭、东大淖、杨桥大淖、老牛圈 26 万亩沙碱荒地的改造，使老灾区变成了粮食囤。

问：犯下严重罪行的周化民到哪里去了？

答：周化民进学习班学了三个月，然后就调到安阳钢铁厂作党委书记去了。实际上，官职原封不动，物质利益还更多了。

这正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吴芝圃、周化民这种投机分子即使在失势时，也只是推推磨、转转圈，跟着他们的人也相安无事，得势时便不可一世。焦裕禄、张钦礼这种革命干部在得势时，拼命工作，失势时进班房、蹲监狱，还会连累跟着拼命的干部群众。毛主席说党内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看，至少就河南来说，千真万确。只不过，这个走资派不但力量强大，还特别善于伪装。

问：1970 年 8 月以后怎么样了？

答：张钦礼又遭难了。当时，林彪的党羽王新在河南权势熏天，原来吴芝圃的网络又攀上了王新，借助王新的力量来整张钦礼。他们说张钦礼是刘少奇的生产党，搞物质刺激，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这其中就有秦一飞，他又回到开封地委了。由于张钦礼影响大，他们名义上调张钦礼为鄂豫皖三省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兼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将张钦礼软禁在大别山下的灵峰寺。张钦礼一走，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 1200 多人，就是 1967 年跟着张钦礼蹲监狱的干部，引黄灌淤大干苦干的干部，又被关押起来了。

问：1971 年 9·13 事件后，林彪死后，张钦礼和他的干部们是不是该解放了呢？

答：林彪虽然死了，王新也失势了，但是吴芝圃的网络仍然稳如泰山，盘踞在河南，盘踞在开封，盘踞在信阳。1972 年，周总理派康克清到兰考调查，解放了被关押的干部，取消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也了解到张钦礼落难的消息。1972 年 11 月，周总理派河南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找到张钦礼。张钦礼再一次受到总理的接见，王新时期被捕。张钦礼深感河南斗争的复杂，他请求总理帮助他调离河南。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会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凑水和泥，说你是贺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周总理答应一定帮助他，让他安心在兰考工作。

张钦礼回兰考以后，恢复了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给遭批判和关押的干部们平了反，补发了工资。一度停工的引黄灌淤的几十处工程又恢复起来。张钦礼遭软禁期间，兰考群众把工地上的物质都藏起来了，等待着张钦礼复出。

从 1973 年到 1977 年，是兰考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四年。仅 1973 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 125 条，配套支渠 154 条，拆除阻水工程 164 处，共完成 1171 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 19 万亩，占沙荒面积的 80%治

理盐碱地 22.7 万亩，占盐碱地的 86.3%。至此，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大灾害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1973 年秋，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商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人花了 5 天时间考察了兰考的路、河、桥、闸、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饭的重灾区的确成了鱼米之乡、锦绣江南，感慨万千，直夸张钦礼，赞佩焦裕禄。

刘建勋他们不知道，张钦礼带领的干部们，为了治沙治水，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和病痛。这批跟着焦裕禄、张钦礼一再受批斗的干部都是与普通农民一起劳动的。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们身上就有多少泥。久而久之，这些干部的腿上就成了“一无二有”：腿上无汗毛，膝盖骨以下有数不清的血口子。腿上的汗毛是被黄河泥粘掉的。俗话说，跳进黄河洗不清，是说黄河的水质粘稠。年轻人到了冬天，还能长出汗毛来，上了年纪的人就长不出来了。血口子是被黄河水浸过来泡过去，泡掉了表皮保护膜，形成干裂的口子。血口子裂开了长住，长住了又裂开，到冬天就脱一层皮，他们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利用黄河水灌淤，把沙荒盐碱地改造成良田的。

问：1977 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你知道，1976 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接着“四人帮”被捕。全国各地开展“揭批查”运动，即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在河南，刘建勋被停职。吴芝圃时期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升任了河南省委书记，那时的组织部长赵文甫则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而且很奇怪地，一向属于开封地区的兰考被划归了商丘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揭批查”的目标，被免去全部职务。1978 年 10 月 16 日，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逮捕时的罪名居然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1979 年 12 月 24 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 1200 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杨捍东插话：我也被捕了。从被捕到判刑，所有审讯的内容都是 1966 年底的那份调查报告，问我为什么要搞这份报告，为什么要迫害县委书记周化民。最后，正如张钦礼被判那样，完全是靠颠倒黑白，判了我 5 年徒刑。我们和张钦礼

在一起的县委委员，任何人没有一分钱的经济问题，没有一个人有生活作风问题，每个县委委员都是很廉洁的。一提到张钦礼有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他们自己都觉得可笑，他们也不往那方面想。既然张钦礼在几十年工作期间，一无经济问题，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二无作风问题，而且拼死拼活地干，为什么还有人如此仇视他呢？为什么仇视他的人力量还那么强大呢？难道不是党内存在严重问题吗？

问：把引黄灌淤、改良土壤说成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把受林彪迫害、与四人帮毫无联系、受周总理三次解救、把兰考变成鱼米之乡的人，说成是“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把受周化民迫害说成是“迫害周化民”！为什么如此荒唐的审判居然能一直维持至今？

答：张钦礼一案出面的是周化民，直接定案的是赵文甫，背后是戴苏理。戴苏理因为在“揭批查”运动中有功，从河南省委书记升任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涉及的人数，开除党籍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没用），完全是罗织罪名、颠倒黑白。

在文革时期，上有毛主席、周总理，戴苏理之流还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文革结束后，他们的春天来到了，他们无所顾忌了。而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却再也没有出头日子了。这样强烈的反差，怎么能让人相信党内没有走资派呢？27年过去了，干部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与27年前发生的政局变动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问：张钦礼去世时，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这是丧礼主办者有意组织的吗？

答（杨捍东）：完全不是有意组织的，相反，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场面，我们还作了种种努力。事先我提出来，丧事规格要比普通老百姓还要低，要平常心，平平常常，不张扬，不显威，不给政府和党委找任何麻烦，不给人家找任何难堪。要不影响交通，不给政府找麻烦，不影响群众的生活、生产秩序。但是，张钦礼在兰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就出现了十万人哭场的场面。

这次张钦礼的后事，我是这样形容的。从场景上看，十里长街，十万百姓。二十四史我基本学了，有些情景我还相当熟悉。在二十四史当中，也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记载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书上说：海瑞病故

在县令任上，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张钦礼呢，700年以后，地方官里又出了个张钦礼，也是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仍然是这样。这个场面比海瑞的恐怕还大。海瑞是病故在现任上，张钦礼是离开任上27年后，并且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他的身份又是劳改释放人员，竟出现和海瑞一样的场景。我说这就超过了海瑞。这样一个人，得到群众拥戴的人，群众祭拜他时，灵车都走不动了，“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灵车走到跟前，一个人喊：跪吧！”扑踏”几百人就跪下了。兰考这个街走了四个多小时，我作为张钦礼的丧事主办人，原来估计只有30分钟就走完了。走完县城，本来可以直着走去张钦礼家，但是有许多群众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国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堵塞道路，我们抄小路走了。路边等待的几千农民又连夜赶到他老家。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又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张钦礼家乡是一个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挤入十几万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伤，或者踩坏庄稼。五月二十几号，小麦快成熟了，不能给群众造成损失。张钦礼是5月7号去世，5月13号火化，结果放到5月17号下葬，为什么？因为5月14号是焦裕禄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怕影响焦裕禄的纪念活动。兰考人都知道啊，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的典型。焦裕禄上天了，张钦礼下地狱了。如果在同一天，至少是冲淡焦裕禄的纪念活动。所以我们就在焦裕禄的纪念之后，启动张钦礼的丧事。

所以，张钦礼的丧事是一丧三改，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结果，张钦礼埋的时候连一般农村的农民的葬礼都不如。现在的丧事是大操大办，大收礼，但张钦礼的是一分钱不收。这二十多年来，葬礼的规格越来越高，场面越来越排场。但是，参加张钦礼丧礼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锅熬菜，不够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词中给他戴了四顶帽子，前三顶是老百姓给戴的，“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再加上《人民日报》的通讯中称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算第四顶帽子。我给他总结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开国以来对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的功劳无人可比，勤政廉洁一尘不染的作风还无人可比。他是一个暂时被埋没的英雄。但是，老百姓给他平反了。那天迎接张钦礼灵车的人群中，有的大标语写着：“张钦礼，我们给你平反了”。

在兰考发生的这场反反复复的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这场斗争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人民的事业自会有人民去实现！

（本文根据现场采访两位事件的当事人，阅读新华社记者国兰写的《我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中国焦点》杂志 2004 年第一期，以及赵伟浩写的《周恩来三救张钦礼》（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 年 11 月）一书，并采访其他几位在河南工作过的老同志而成。文中凡注出姓名的，均为对话实录。其他问答是根据上述材料而来。错谬之处，文责自负。并欢迎读者指正。）

二〇〇六年七月，《杨捍东访谈录》作者老 田

本次口述史访谈，最初是在二〇〇五年五月完成的，二〇〇六年七月再到兰考期间进行了部分修订补充，感谢老黄和老张等同志对文章所涉及的部分事实提供了补充材料。征得杨捍东同志本人的同意，访谈录以初稿形式发布在网络上，希望各个方面的相关知情人士对文章涉及的事实，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修订完善。

一、 出身和教育

我一九四三年出生于河南确山县，家里是雇农成分，父辈是佃农，扛长工过活。共产党到达我的家乡之后，家里就是“堡垒户”，共产党的县区干部都经常到我家里来吃饭，有的时候一整天厨房不熄火，我当时年纪还很小，分不清他们到底是不是我家的亲戚朋友。

解放前父亲就是民兵队长，小乡的乡长，解放后又担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大队长，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我坐监狱的时候，父亲还是大队长。我从小就受父亲的影响和共产党的熏陶，一上学就是靠共产党和政府帮助的。

我一九五二年开始上小学，五六年小学毕业，是少先队大队长，保送上中学。在中学当班长，班主任彭老师被划成右派，暑假回校之后就叫喊“彭右派”，我还是每天去彭老师那里，这样就说我划不清界限，品行就只给三分，我很想不通，彭老师给我们输灌的都是好思想，怎么成了右派呢？这样就把我的班长给下了。

五九年我考上信阳师院，又当了班长，六二年毕业后，和班上另外三个同学一起，考上开封师院。进开封师院以后，我一直也是学生干部，开始当班长，后来是年级的级长，还同时主编《红旗报》和《青春报》。

二、 文革开始的思想 and 行动

我应该是一九六六年毕业，文革开始了停止分配工作。校党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我作为学生干部是当然成员。党委领导的保守派红卫兵开始搞破四旧，砸那些文物，我跟陈红兵不参加这些活动，我们都认为传统的文物不是四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破四旧是指思想问题，要批判解放后文艺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落后思想，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怎么能够去砸文物烧线装书呢？

当时我们一起有五十多个人，要给校党委提意见，这些人多数是学生干部，但是不叫提。在八二四这一天，大礼堂开会，我们集体上台要求发言，结果被校党委打成“反革命”了，批斗我们。有个学生叫白万选，他在地上写大字标语说我是反革命，还不让我们走路，我对他说：你就只这个水平，让我教你三年，你都出不了师的。我又去找系里的关老师谈心，说三次都是系里抽调我去参加四清，我是落后学生吗？我们咋是反革命呢？因为我们不服批斗，就到省委告状，省委承认了我们，这样我们就公开成立八二四战斗队。

我在群众组织内的时间不长，十月份的时候院党委还没有垮，他们让系里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去兰考调查。因为人民日报二月七号的长篇通讯，使得焦裕禄一举成名，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榜样。九月份十六日这一天，兰考出现两张大字报，一是北京八大单位联合发出的《最最紧急的呼吁》，说人民日报的报道是大毒草，要推翻这个报道；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兰考县机关红卫兵”发出的《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在文革期间的一些人看来，声势比什么都重要，响应和呼吁书同时发出也在所不惜，一点点掩饰和技巧都不需要了。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这个长篇通讯“通篇不提阶级斗争”，说执笔写报道的穆青和周原是大右派，不是好人，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也是混帐王八蛋。这个呼吁书装得左的不得了，还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

这个传单向全国散发了，可能还到了北京。上面说报道失实，这对省委来说是个严重的失误，而且对毛主席也是个否定，因为用假人物和事迹跟他老人家的名义进行捆绑宣传。因此国务院出了通知，省委就把任务布置下来了。十月五号，

院里面就找我谈话，要我七号去河南饭店，王维群副省长要照我谈话，在他那里领指示，院里要我带队过去，接受这个调查任务。七号我们到河南饭店二楼的一个房间，王维群的秘书王德英在那里等我们，说中央给了一个调查任务，要省里面限期提交调查报告。然后，他把那两张大字报给我们，要我们先熟悉材料，列出了六条调查提纲，其中牵涉到三个人：焦裕禄、张钦礼和周化民。开始他说下午三点钟王副省长可能要和你面谈，又说没有时间，转达了调查要求：要求马上就下去，争取两个月内写出调查报告，而且约法三章，不许带主观意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调查要细致，资料要翔实，如果出了问题就严惩不贷，说这是王副省长的话。我保证说，王秘书你放心，我从来没有去过兰考，跟任何人都无亲无故，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更不会先入为主，请省委放心，我们写一句话就是一句实话，我们保证拿出个客观的东西出来，至于写得好坏那是水平问题。

我们当天就从郑州赶回开封，给学校汇报以后，院里要系里定人，这样就增加了化学系毕业班的王东舟，中文系的单红秀，艺术系的常文英。他们推举我担任调查小组的小组长和团小组长，九日召集开会，说王副省长传达了省委指示，要他们先看材料。十号，我们从系里借了钱，带队去兰考住在西大楼。当晚就开小组会，分工，先调查焦裕禄的事迹到底是真是假，两张大字报说报道不实，我们首先就落实这个，同时调查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一个人一个大队，我去最远的秦寨。凡是长篇通讯写到的地方，我们都要访问到，每人发三个笔记本。采取主席总结的方法，找农民和党支部开调查会。调查回到县城之后，就找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焦裕禄的秘书，张思义、李反修，副书记刘成名。

我们找周化民，因为不认识，他拒绝见我们，文革一来，干部都害怕红卫兵，最后带了学校的介绍信给他，他才肯稍微谈一下。他说你们到底想要干啥？焦裕禄在兰考成名，但是县委的干部都反对这个长篇通讯。我们就问，周书记你认为通讯中间哪个地方不对，让他谈看法，他说自己不理解，对焦裕禄和长篇通讯的写作过程都不了解，也不能说。既然你不理解，我们就没办法问题，然后他就说，我也忙，你们走吧。

刘成名开始不见，后来到底还是找到了，说是接受省里的指派，两张大字报引起了上头的重视，刘说不跟你们谈，问什么也是一概不知。我们找张钦礼，他去广东宣传焦裕禄事迹去了，始终没有见到他。

我们在底下跟着长篇通讯提到的，走了二十多个村子，个别访问和开调查会调查的人有三百多个，原始笔录有十三个笔记本，他们每个人三本都写满了，我写了四个笔记本。

两张大字报中间实质材料，焦裕禄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共产党人为这片土地付出了重大牺牲，没有轻易丢给敌人，并提到一个月牺牲了九个区长，其中有一个名叫马福重，大字报说他是标准的叛徒。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借了一个自行车，跑去山东曹县小杨口，访问马福重的老家，路过张庄大队向党支部问了张钦礼家里的情况。我找到八路军政委马振清家里，他告诉我，马福重是九区区长，四四年被日本人杀害，肠子拉出来挂在树上，他说马福重就是我的部下，解放后人民政府认定为烈士，咋是叛徒呢？马的坟墓在界牌的南门外，坟前还有烈士碑，我连夜跑到界牌村，在老百姓家里住了一夜，天明找到烈士碑，非要双手亲自摸摸碑文不可。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一天一夜往返二百多里地。

调查一共进行了三十三天，原始记录总共十三个笔记本，集中以后由我十四号去省委第一招待所，讨论如何写这个报告，最后决定按照六条调查提纲的顺序来写，由我来执笔，费了三天三夜，一口气写完了，底稿一份由王东舟保存，同学们分头抄写了两份，一份交给省委，一份给中央。给省委的那一份，由我拿到河南饭店交给王德英，另外一份在十一月底，我去北京的时候交给国务院办公厅的刘主任了。

这个调查报告最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一个是焦裕禄事迹的真伪，调查的结果是翔实无误，没有什么水份，第二个是马福重的叛徒问题，现场找到原来马福重的上级，他确实是为民族和国家牺牲的烈士，两张大字报的相关内容都是诬蔑之词，同时也驳斥了宣传焦裕禄事迹的人是王八蛋宣传假典型的说法，我们调查报告还指出，由于长篇通讯的篇幅限制，很多感人的事迹没有写上，肯定了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好榜样。

周化民是接任焦裕禄的后任县委书记，他应该率先学习焦裕禄的精神，他借口自己不了解情况，还下手整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不组织学习。在中央表态之

后，他还继续抗拒，这就是组织原则的错误了。在调查期间，我们就发现，周化民、秦一飞反对宣传焦裕禄，在看长篇通讯的小样的时候，在县委上周就说焦裕禄到兰考，只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共产党成立政权十几年都没有改变兰考的面貌，你一年多就改变了，那不是比共产党还能？还说长篇通讯不写县委的领导，而是突出个人。刘俊生保管了焦裕禄的遗物，是县委办的通讯干事，宣传部长领他去秦一飞的办公室，说汇报焦裕禄长篇通讯的事情，秦说：啥鸡吧典型，你就知道听张钦礼的胡鸡吧咯咯，说你们的沙荒和盐碱地不是还在吗？大闺女都没有裤子穿的穷地方，走走，我不听你的，结果给撵出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情况了，我说不要写进去，老干部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他们在党内和个人场合说的，中央肯定之前，个人有不同认识，应该允许，也不能算是错误，所以没有写上去。

我把调查报告交上去之后，住在北大，参加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是在西苑。

三、 兰考的文革

我回到开封师院已经是十二月底了，这个时候农村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我到兰考去看，那里已经分成两派了，一派称为“卫焦派”，以焦裕禄树立的四大红旗为代表，他们成立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认为否定长篇通讯就是要砍红旗，卫焦派批判周化民，支持张钦礼。另一派是“卫东林焦”，以机关干部为主体，有少数农民，当时开封地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的干部，也出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周化民打倒张钦礼，好家伙，这就相当于地委四大班子表态了，县里面原来支持张钦礼的干部马上倒戈了，脱离“卫焦”加入“卫东林焦”。卫焦就主要剩下工人和农民了，在人数上还是多数，干部中间是少数。卫东林焦就开始揪斗张钦礼，文革初期的两张大字报一出，实际上张钦礼就被罢官了，说他是政治扒手，介绍焦裕禄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焦裕禄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于郑州去世，地委也没有发现什么事迹，有个地委组织部长王在焦死前去看他，当作正常死亡，掩埋在郑州的公墓里。本来是人死灯灭，一了百了，就无声无息地走了。张钦礼焦裕禄在兰考这一年，张钦礼作为副手配合他工作，很受他感动。张钦礼本人是兰考合并之后的第一任县长，长期抓生产，在老百姓中间的声望已经相当好了，老百姓叫他张青天，干部

称他是活地图。张对焦裕禄就这么无声无息走了感到难过，认为焦裕禄的精神境界不得了，不能埋没，五月二十日张钦礼在豫东的造林会议上就讲焦，省里面是王维群主持会议，每个代表发言限制半小时，张钦礼讲焦裕禄如何造林防风固沙，最后活活累死了，王说张讲话不受时间限制。

六四年张钦礼又给河南日报投稿，怀念焦裕禄。十月，张又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一年来兰考“除三害”斗争情况，重点还是焦裕禄，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在全省四清工作会议上口头表扬了焦，登了四清工作简报，在焦裕禄去世当年，张钦礼就有三次宣传焦裕禄的行动。六五年一二月份，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副社长张李勇先，逯祖毅、鲁保国，在刘俊生的陪同下，下去收集焦裕禄的事迹，河南日报做了报道，并没有引起重视。

六五年十二月，新华社河南分社周原，接受穆青指派到豫东了解抗灾经验，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渡过经济难关，找抗灾典型的线索，本来已经去杞县了，第二天坐错了车偶然来到兰考的。刘俊生接待他，周原说明来意之后，刘就说县委书记累死了，周的职业敏感性很强，追问详细情况，这样刘俊生就让他去找张县长，因为他了解最详细。周因此结识了张钦礼，一提到焦，张声泪俱下，讲了他的很多感人事例，周也是哭着记录的，最后感动地说发现了一个金矿。然后，他就向穆青汇报，在电话里讲了焦裕禄的事迹。十二月十七日，穆青就带了总社的记者团直奔兰考，当天下午，十多个记者就找到张钦礼，在县委办公室座谈，张钦礼再一次声泪俱下地讲了一下午，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补充，晚饭记者们都吃不下去，夜里一直谈到十一点多。穆青说他一辈子的记者生涯中间没有哭过，我在延安时期就是记者，首次被焦裕禄感动得哭了。他说不用任何艺术加工，简单地把焦裕禄的事迹罗列起来，就是极为感人的材料。记者们根据张钦礼提供的线索，下到农村去调查核实，周原执笔写了初稿，最后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出来的。周原的夫人陈健说，如果没有张钦礼，焦裕禄将永远被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四、 陷入兰考文革到进监狱

一九六六年外地学生到兰考串联，也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卫焦，支持长篇通讯，另一派否定长篇通讯。我是二十三日去兰考看大字报的，哪一派都没有介入，

当时支持卫东林焦的一派人，都在县委吃饭，支持卫焦的人，都在西大楼自己搭伙吃饭。

兰考文革群众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人拿走了我们的调查报告草稿，写成大传单散发，跟初期两张大字报是对立的。这个稿子出去了，我还不知道，就算是我的一张文革大字报了。我一到兰考，许多外地学生就一下子包围了我，说我造谣欺骗中央，逼着我声明作废。我说，马福重烈士的家乡，我亲自去调查过，你们说他是叛徒，有什么依据？到底是谁说假话，造谣？你们提出的，我不能答应。

一月份，开封开始大批逮捕造反派。一月二十九日，支左部队介入兰考文化大革命，他们宣布张钦礼是反革命份子，卫焦是反革命组织，是张记反革命集团。二十九日这一天，我也在西大楼，他们捆走了二十几个人，包括管财贸的副县长蔺永沛、县农工部副部长樊哲民，这都是以前跟焦裕禄工作配合很好的人，其他被捆的还有农民和工人。

我问那个支左连长马啸仙，你们带队的军官是谁？他说是开封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李地山，我到县人武部找到他，说：你轻易宣布谁是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捆了这么多的干部和群众，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要成为千古罪人。我跟他吵了一架，就走了，以为自己没事。第一次军队抓的人，被群众组织营救出来了。

军队第二次抓人的时间，大约是二月二十号前后，我也被他们抓了。当时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张贻泉回忆，说是三义寨公社武装部长王金海告诉他：接县上的通知，要到候寨去逮捕八二四的杨捍东，这人是蒋介石的中校军官，让他也参加。我就在三义寨公社背后的候寨被捕了，执行逮捕的有支左军人，也有县公安局的人，来了两辆车。见到我之后，这个张副书记看到我不过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别说是当国民党的中校，就是当国民党的兵都不够年龄，觉得是冤枉了我。

被抓进去之后，昏迷了几次，咋进的监狱不知道，醒来之后被架出牢房，李某还说咋不把杨捍东架出来？下边的人说他就是。他愣了一两分钟，说，你凭什么给兰考的文革划框框定调子？我说自己是开封师院的学生，没有权力为文革定调子。他反问，你为啥写那个鸡吧报告批评周书记，攻击兰考县委？我说是受上级指派来的，不是什么划框框。两个公安人员说修理他，当即就架到现在的县政府，那里有

百十个人，李某、周化民和军分区的政委都在场，几十个人轮流上阵，有出拳的，

也有出脚的，血留下来被地上的席子都染红了。李某问我认不认错，我不认错，他就要我跪下，我说如果我犯了错误也只能给老百姓下跪，决不跪他们。一说完，他们那一伙人又是乱拳乱脚打来，当天还被捆了五绳子。我当时想，我大概活不成了。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个开头，还只是第一场。

进监狱之后，把我的上衣都抹了，又用绳索捆绑起来，我被他们打昏了才进去的，到半夜才冻醒，才发现自己光着上身。嗓子渴得冒烟，看到洗脸盆是空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说，伤重后喝水，很可能当夜就死了。到第二天中午再醒过来的时候，胳膊动不了，眼镜也睁不开，想着自己肯定是不中了，活不出去了，不理解他们到底是为啥？连大脚镣都给我上上了。从此一直没有人审问，到四月二号，才又把我提出来，破了镣之后再用绳子捆上。接着就提出张钦礼，又提出一个张凤鸣，他是复员军人代表，也捆上。这个人十四岁入朝作战，五八年最后一批回国，在玻璃厂当工人，六二年带头下放回家当农民，因为他带领荣复军人支持张钦礼，所以也把他抓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张钦礼，街上很多大标语“打倒走资派张钦礼”，“打倒铁杆保皇派杨捍东”，我看到之后，感到可笑又可悲，想来都是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惹了当权派，给自己带来大祸。他们两个没有戴脚镣，下车时被一脚蹬下去之后，垫几步还能站稳。我自己戴镣之后，整个腿都是软的，被蹬下去就栽倒在地，牙齿磕断了，我也至今没有补，这些都是那些人留给我的纪念。批斗的时候，张钦礼站在外面，我站在中间，血流下来就顺着张钦礼的裤子下去，张钦礼说哎呀，血流到一块了。

从此之后，就开始全县游斗，每天一场批斗会，整整四十天，直到五月十一号。我那个三号号子大概二十平方米，装了二十八个人，有农民、工人、干部，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坐监，根本睡不下去，人挨着人，各个牢房都是人满为患，连隔壁的杞县监狱里，都关满了兰考的文革犯人，兰考大约抓了一千二百多人。拉到外面批斗，拳打脚踢是平常事，进监狱之后要过三关：撞墙、冲地等等，每个人都是这样，真是鬼哭狼嚎，只是没有了老虎凳，不然还得让我们上去坐坐。刘永松是抗美援朝的高炮师长，十三级干部，也被抓来了，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最小的是十四岁的小学生，是法院张院长的小孩。

我是六月十二号出狱的，已经无法走路了，身上都出是血，全身虱子乱爬，同学把陈红兵的裤子给我送过来。出监狱之后，我就回学校去了。六七年七月份我就进京，总理接见两派代表，说二七公社和八二四不是反革命，一句话就给平反了，回去之后就是大联合。

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周化民他们成立了革委会，执政了，开着干部会议。我一下火车，满站的人又把我弄上汽车，几十个干部把我按在那里，弄到杞县去斗。我就说，乡亲们，我是开封师院的学生，你们认识我吧。结果他们又把弄到县城，我又是这些话，他们最后把我关在城关公社里，我就在那里绝食。我坐了几个月的冤枉牢，现在回来拿被子，你们还这么搞，太没有道理了，比法西斯都不如，我就死在你们手上，将来是你们的一笔血债。到了第四天，他们来了两个人，把我架到车站，其中一个金百福。我下了火车之后，走不动路，吃了一斤多卤面，还好没有出事。吃完就没有钱搭车了，就走走歇歇，走了大半天，才走到学校。

五、到兰考工作

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兰考在河南第一个成立革委会，典礼给我发了个请帖。那个时候，我已经留校工作了，张钦礼去师院三次，要调我去兰考工作，六八年二月作为干部调到兰考。

过去之后，县革委会向省里报我副主任。我去找张钦礼，对他说：张书记，我当副主任不够格，你给我一官半职人家还要说闲话，我也不喜欢当官。张很动感情，掉了眼泪，要我参加革委会的工作，名义上是革委会常委，分工上协助管农业。我搬去跟搬运工人住在一起，经常下乡跟着拉架子车。

不久，就开始重新调查兰考的山山水水，要重新安排。我跟随张钦礼带队的“学大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一共二十多个人，步行六十多天，沿着河，带着馍馍作干粮。每天都是边走边看，什么地方可以建闸，沿着引黄河道，跑了三个来回，行程四千多公里。初步考察之后，又请省水文队的技术人员，我又领着他们下去测量了一遍，取了320个水准点，为后来的整体规划提供依据，整个兰考县的规划架子，就是那个时候搭起来的。在六八年我跑了加倍的路程，饿了，就吃个馍馍，渴了，就喝河水，中午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树下面躺一会。

一直到十一月份，那个日子真是不好过呀。第一年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县革委会里面也没有我的床，我就在搬运工人那里搭铺。

六九年元月八号，我结婚了，婚后我们两口子一起下去农村，到最远的地方，南章公社老寨大队住在杨堂那儿。我爱人在小学里当校长，她原是第一任焦裕禄纪念馆馆长，跟焦裕禄的夫人关系特好，为了陪我才下去的。

我们是结婚后第三天下去的，农民给我们腾了间小磨屋，也没有床，就用土搭了地铺，新婚蜜月就是住的土胚床，一床铺盖，带了一个五毛钱的包装箱过去，啥好东西也没得吃。

春季，我就领着九个生产队，搞高产玉米，从农业局引进新单一号，做了很多说服工作，说作为农民长期吃返销粮，对国家没有贡献是耻辱。每个村子都种一二百亩，争取一季翻身。下种的时候，老农思想不通，说我是吃皇粮的，却拿着他们的地做试验。到秋收的时候，平均亩产 8 0 0 斤，最高 1 1 5 0 斤，当年就扭转了缺粮。那些开始反对的老农，主动去看场，我们买了脱粒机，不叫开，非要先照相。

这个事情全县就打响了，张钦礼把这个作为典型事例，汇报给省里。七〇年叫回去当水利局长。我回来的时候，大队党支部领着三百多群众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十八里地，在公社的照相馆合影留念，才回去。农民是真正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发现自己错了，从来都不护短，跟那些死不悔改的干部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回来干水利局长的时候，准备修复三义寨引黄渠首工程，亲自担任总闸修复指挥长，进行底板加固，换闸门，扩大到 5 0 0 流量。还组织打井队，到通许学习打小井，原来的井直径一米，需要花几周时间投资好几千元，耗费大。新的技术是用水冲钻打井，当天下午就能喝到井水。我不搞虚的东西，就干这么两点实际的事情。

我回来之后，爱人孩子还留在杨堂。七〇年，刘建勋说大学生必须锻炼三年，我就又回到杨堂去，担任大队党支部委员，一边搞农村工作，一边组织识字班，中午在识字班教识字，晚上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一段就结合实际讨论当前的工作，白天都舍不得开会，开会都是晚上。那个时候，要布置生产任务，有人晚上就偷着干了，也找不到是什么人，很多活儿不让派，形成这个风气

了，今天要是没有报酬，还有人干活吗？我总是在想，农民真的落后吗？集体真的搞不好吗？可是我亲眼看到，很多农活大家都偷偷干了，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工作。几千年来都说农民落后，是小农，可是在那里的时候，农民常常来找我，说汉东，咱该加加油了，是不是领着学习毛主席著作。

原来杨堂这个地方好地很少，大部分是盐场，春天的时候地表就是一层盐，冻了人走上去嘎嘎响。那个时候，硝盐也不让出，农民偷偷晒。因为大面积盐碱地在那儿，我就跟公社说，应该晒盐，而且把盐场分给各家各户，地少，大家都闲着干啥。公社党委也同意。每个盐场都能扫二三百斤硝盐，比今天的这个精制盐好吃，一吨盐可以换到一吨玉米，老百姓很感谢我，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农民还对我说，你啥时候叫黄河水过来，我们给你立个碑。

六、 反复

六七年二月，他们抓了一千二百多人，张钦礼当了革委会主任之后，很多原来打过张钦礼的干部，都心虚害怕，跑了，有的人不敢去政府领工资。张钦礼说，凡是不敢领的，把工资送到他们家里去，文革运动嘛，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

六八年，在六七年抓人周年那一个月，很多人都在偷偷摸摸地打人，很多人保守派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反戈一击的真诚，打人格外狠。有的保守派原来为了表示自己革命，扭我的腿，一定要拉到一尺多长。我们掌权后，代表县革委会讲话出去反复拉架，拦了一次又一次。六八年我们在革委会工作后，也有打人现象，我骂过几次：说你们是孬种，你们不是简单的打人，而是打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挨整

有我厉害吗？我都没有打人，你们有什么资格打人。虽然如此，还是没有完全制止住，当时发生了两个人命案子，一个是李仁德，是原来的县委组织部干部，六七年他是打手，下手打我的时候可狠了，六八年四月份开会批判他，揭发出来他曾经贪污了二百多元党费，他心里害怕就上吊死了。另外一个申秀春，教师，他的一帮子学生为了表示反戈一击，下狠手打他，打完之后他喝了很多生水，就死了。在我们挨整的时候，他们整死了张邦兴，县委副书记，还有杨孔昭，银行副行长，文革期间，一边有两条命案。

一九七一年初，林彪死党王新撤了张钦礼的县革委会主任职务，把他调到信阳地区挂一个地革委副主任。然后派军宣队到兰考批判张钦礼的“生产党”，说

我们改变灾区面貌的努力是“以生产压革命”。在一月份先搞了 28 天的“爬坡会”，把县委和各级革委会成员集中起来办“路线教育学习班”，搞“思想爬坡”“批修整风”；从四月开始又搞了 52 天的“批修学习班”；从九月到七二年一月，拉到尉氏县搞了 120 多天的“整建党学习班”。在此期间也把我弄到县里来开始批判。尉氏县学习班，又批六八年这个事儿，原来在六七年整张钦礼的人又成了“动力”，张钦礼这一次又被他们作为批斗对象。我说，确实有打人现象，我们一直是批评阻拦的，最后我很快以优秀党员过关了。直到七二年一月，我才从学习班解脱，回到杨堂，参加党支部工作。很快，那伙人又派出一个庞大的整党工作组，专门又去找我的岔子。我很奇怪，把我弄去尉氏县四个月，他们大张旗鼓地批判张钦礼，我在底下，没有回兰考去，也没有碍着他们的眼，怎么又来找我事儿呢？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查我的经济问题，作风问题，一无所获，最后说我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我教识字和组织学毛著是反过来教育贫下中农，我说毛主席说了，见了群众不宣传不鼓动，是自由主义。他们要因此开除我的党籍，最后大队党支部和全体党员，要把他们捉住捆起来，他们害怕才连夜逃跑了。

这个时期，县委书记是武装部长庞传文，他把我弄回兰考，软禁在招待所里，不让出门。我们二十多个人一起，就组织上访团，上省委告状去了。我们是六月份出去的，在郑州呆了一个多月，由我执笔写材料。那个时候，张钦礼还是信阳地革委会副主任，他们这伙子人就在兰考这边批判他，用大喇叭对准他的父母家住房喊叫，结果张的母亲受不了刺激，死了，张钦礼回来奔丧，这些人还把这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登上敌情简报。

林彪事件公布之后，学习班的事情才有所松动，后来才知道是王新派出工作组去兰考整我的。我们开始听说林彪甩死了，都是头脑发懵，后来才松快了。

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接见兰考上访团，由我主谈并汇报情况，刘建勋说听说你一年改变了一个大队的面貌，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后来，刘建勋就提拔我当兰考县副书记。

一九七二年底，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张钦礼、杨贵，为张钦礼平反，年底我参加了批王新的会议，在省革委会五次全会上，我说不能说没有失误，但是打人的事情，先革委会是拦了一次又一次的。省委和武汉军区要听庞传文的检讨，庞来

找我说省委领导要听我的检讨，要我给他写检讨，我说：你过不了关，困死你这个畜生，

我在杨堂劳动，小车一推五百多斤，粮食定量二十九斤半不够，上集上买红薯片，没有掺和县里面的事情，你为什么揪住我不放？我在尉氏县差点被你整死，你还有一点人味吗？你还有脸来叫我帮你写检讨！

在七二年底这个会上，最后一项议程是平反补台，我保留革委会常委。庞传文签了一句：强烈要求省委调张钦礼回兰考主持工作。十二月省委下文，安排我当县委副书记，张让我管组织和宣传工作，我自己要求管公检法，看谁还敢乱整人搞冤假错案。我管公检法之后，凡是捕人都要经过我一支笔批。

七三年一月我开始管公检法，年底又让我兼生产指挥长，主持政府工作。说是不兼政法书记，除了宣传卫生不管之外，工农业、财政、公检法都管。那个时候，张钦礼要求县委干部每年劳动不少于 1 2 0 天，叫生产队记工分，那个时候开会和批案子都是在地头，公安和法院都是找到地里去，晚上才有时间看卷宗，到底是该拘留还是逮捕，我签字之后，公安局再去拿人。往往晚上要看到一两点钟，第二天继续生产，没有过年过节，根本就没有礼拜天的印象。

有些干部，宁肯牺牲别人的生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一根汗毛。我主管公检法的时候，有一起反标案，经过排队抓了个民办教师，经过省里面字迹鉴定，批准拘留他。我看了卷宗，认为这个人没有作案理由和动机，就又要他们排查，结果抓到了真正的犯罪份子。原来的公安局副局长就不肯放这个民办教师，说他手脚不干净，拔了生产队的红薯什么的。我说，当时抓他不是拔红薯，而是反标，现在查明他没有问题就应该放人。那个副局长还是老革命出身，没有多少文化，解放前战争年代的红小鬼出身，解放后自己当官了就是这个态度对老百姓。所以执法人员不能有私心，有私心就很难做到有法必依，执行上法律就变形了。我是一律要求从轻，他们往往要求从重，说这个人态度不好，态度不好是犯罪吗？

因为班子里我最年青，每年都是铁定的防汛指挥长，晚上回来问工业交通的事情。要是什么时候回去一趟，屋里公检法的人都坐满了。我总是告诉他们，我不听口头汇报，就是要看卷宗，常常忙到三四点，饿了就是白开水加上馍馍。老婆说你是个夜游神，每天都是超负荷工作，睡觉没有超过五小时的。

七、 黄河防汛

我这一生，如果要在回忆中间找闪光点，七三年和七五年黄河防汛是两个闪光点。前年黄河才 2 3 3 0 个流量，这也算是个水呀，就出动了 1 5 0 0 官兵，至少花了五千万。七五年汛期时，最大流量 1 2 5 0 0，最少 7 5 0 0 流量，比前年的汛期流量大了五倍不止，我们防汛只花了国家不到十万块钱，这么大的洪水，我们连地区都没有惊动，省里更不用说了。

最为可笑的是，张钦礼被捕竟然是因为这个防洪的事儿，他领着几十个人，为了保住黄河大堤，他在尉氏县破了生产堤，趴开了五十米的一个缺口。他也是舍不得，想要保庄稼。那时周总理每年都强调，只要是花园口流量超过了多少，生产堤就必须破堤行洪，为了保大堤，牺牲生产堤是必须的。他们抓了张钦礼之后，省检察院来了两人，问张钦礼为什么趴大堤？我反问他们，张钦礼趴的是什么堤？如果他有罪的话，就是他不应该只破 5 0 米，而是应该破 5 0 0 米，破 5 0 0 0 米，5 0 0 0 0 米，如果你们现在要找证人的话，我可以找到几万人，要找物证，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1 9 7 8 年 1 1 月 2 1 日河南日报头版消息，说张钦礼“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因为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最后在审判的时候给取消了。

那个时候，为了顾黄河大堤，滩区三次过水。我们当时的工作重心，一是大堤安全，二是滩区救护，我们把兰考空降团调了两个营上去。开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黄河出险，往往间不容发，这个事情我要一个人说了算，希望大家谅解。那个时候一防汛，多少天没有睡过，一天刚刚回家，就来信说洪水湾着大堤了，大堤一直往下垮，多粗的柳树挡水，当场就冲走了，挂柳都不行了，老河工说只有抛石护堤。马上就通知航运站调五艘船过来，装石头，站长不同意，因为一艘船就是几十万，我说如果十二点不到，我就一枪毙了你。船载石头过来之后，很快就捂住了崩岸。下着大雨，我也不打伞，枪提在手里，谁怠慢了都不行，其实枪里头一颗子弹没有。曾经有一处管涌险情，我先下去摸到眼，一挥枪，要都给我下去，很快就堵住了，没有酿成大事故。群众参加防汛，实在困了，就搂着树打个盹，为了让滩区群众安心，我亲自去把群众的小猪小羊装上船。

防汛结束之后，我给大家作检讨，说那一次实在太紧急，没有办法，如果不能迅速处理，溃口了，黄河就要又一次改道，那我们在现场的这些人，都要成为千古罪人了。

这个防汛指挥长，一直由我担任到一九七七年。

八、从停职反省到判刑五年

张钦礼被他们构陷之后，我跟新来的书记刁文，又合作了一年，他对我说，造反派里不是没有好人，你只管安心工作。

这个人跟风很厉害，凡是张钦礼工作期间在职的干部，全部要免掉。七八年四月份一次县委常委会议，一次性要免掉十八个公社书记，由组织部长宣布名单，同时说两句免职的理由，免去孔令洪的时候，理由是恶毒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依据是一九七七年一次帮派会议上，孔令洪说出以华为首的四人帮这个话，我就很奇怪，这个话应该是有下文的，组织部副部长吴令传说他随即改口说是党中央，我就问这到底是口误还是攻击？免掉粮食局副局长杨东英，理由是他用公家的木材做了十八件家俱，我说这个应该有什么家俱名称，用掉了多少木材，合计值多少钱？几方木材都没有，就这样免掉一个局长啊。刁文当即就说，去球去球，这个会不开了，回头假装责怪组织部：你们咋搞的材料？

我说，从免职的程序看，我们太草率了，孔令洪是公社书记，说他是四人帮的帮员，四人帮的手再长，也伸不到公社来呀！我们这些人哪个人跟四人帮搭得上关系呀，我们县委常委应该是干部的娘家，我建议材料跟本人见见面，行不行？当时参加会议的四个军队干部，他们异口同声地支持我，说杨书记说的对呀。以后他们就再也不通知我参加常委会了，刁文说只要叫杨捍东参加，啥人也免不成，我也就一直住队，直到免我的职。

我的专案组，大概有十几个人，始终没有对面批判过我。从七八年初开始，不叫我管生产和公检法了，让我管教育和卫生，要我率教育代表团上商丘开会，后来开科技代表大会，又要我当团长。会上，我要求见地委李锦堂书记，他召集地委常委听我汇报兰考的情况。我说，张钦礼工作的时候，淤灌了二十多万亩盐碱地，是有成绩的，又打通了最后一条河，兰考县内的三害基本上消灭了。张钦礼走了，他手下的干部不一定是坏人，现在来一个全面扫荡，原来整张钦礼的人都作为动力，作为提拔对象，我认为这是刁文搞的还是派性，以派性整派性永远是没有党性，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产量目标是四五八，黄高昌两年把产量提高到八百斤以上，兰考这样的干部都不要，还要啥干部？至于我个人，我希望地委要么把我免职，要么调出兰考，我的这个汇报当场做了记录。

我回兰考之后，马上找刁文作了会议内容汇报，包括我跟地委书记谈话的内容。他下去说杨捍东在地委告我的黑状，我回头去找刁文，他矢口否认。

八月份就开始批判我了，在一招小礼堂开会，科局长和公社党委以上成员参加，我还坐主席台上，刁文说今天要杨捍东说清楚四人帮横行时期的事情。财政局的张玉合说：刁书记，我想给杨捍东提几个问题行不行？一、你抗过日吗？二、你参加过三年自卫战争没有？三、你一没有打过日本人二没有打过老蒋，咋当的县委书记？刁文说回答嘛。

我说，建国那年我七岁，一无战功二无苦劳，为啥当书记？我说不出来，自己做梦没有想过，也没有申请过，当书记不是自己的事情，恐怕要去问刘建勋，我跟老同志比是不够格，还是赶快免我的职吧，早免掉一天早一天好受。我含泪说完这几句话，就没有人再发言了，批判我一场就是有人提了三个问题，他们说没有打过仗就没有资格当书记。

十月份被免职，宣布的那天刁文还告诉我说免职不是处分，该咋工作还是咋工作。第一天县城里到处贴的是标语“打倒杨捍东”“要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杨捍东免职大快人心”，杨捍东三个字还是倒着写的。我找到刁文问他，你不是说免职不算处分吗？怎么我成了恶，还要不留后患？六七年打过我的人、捆过我的人，我个人是连一句话都没有回过头去说他们的，你们就这样对待同志，这样当官、执行政策的呀。

接下来我还是回去住队，在新韩林大队第四队，参加他们的支部研究工作，支部和群众都说老长工又回来了，我听了很感到欣慰，当人民的长工是值得的。反正，我不当官也一样为人民工作，这一年队里成为先进单位，大队每人都受奖。

九、 进入大牢

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我参加会议到六点，回县城有十五六里地，回家天都黑了，刚到了半碗水喝，还没有吃饭。就被叫出去，张传忠副局长宣布，杨捍东因违法乱纪罪被逮捕了，公安局去了四十多人，接着就抄我的家，抽屉、衣篋等等全部抄遍，连工作日记也抄走，练书法的旧报纸也不放过，想要在其中发现思想犯罪的证据。我被逮捕之前，焦裕禄的老婆找我的爱人，说叫汉东去跟刁文说句话就啥事没有了。我没有去，我想我是啥人我不知道呀，刁文自己说他在文革中间参加过抢枪，我当时就说你抢枪你检讨，你用自己的派性来说人哪。

被捕的第二天，张副院长提审我，检察院的丁股长办我的案子。当兵的都很同情我，此前我就是管公检法的，每月五号要检查一次监狱，看看他们缺啥，办过紧俏东西也找我批，他们家里有啥事情都愿意跟我说，官兵对我都很尊重。有个姓周的所长不识数，问杨捍东你怎么进来的？我说老子怎么进来的你不知道，你看老子落马了不是。

到了刑讯室，他们给弄了个烧饼、油条，叫先吃早点。他们说，都熟人了，吃完了吸烟罢。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办我的案，是你们问我还是我问你们？他们说，很多老同志都同情你，可惜呀，文革你要是不来兰考就好了。说来说去，你那个调查报告对周书记的打击太大了。我说，我都被他们抓去坐过一回监牢了，五花大绑批斗了四十多场，还没有完帐？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意把兰考划到商丘地区，周化民是地委书记，过了二三年，打击完了，又划回开封。他们拿出我练书法写的一首诗，是杜甫的春望，中间有两句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问我是啥意思，是不是四人帮被粉碎了你的国就破了吧，我问他们，我还写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你们没有看见吗，哪一首影射现实的？说了两天，我就问他们还有啥问题没有？他们说，你管公检法办过什么错案没有？提到牛万成这个人，我说这个人解放前出卖过八路军，解放后又鱼肉百姓，本身是个坏分子，他罪证确凿。他们回答说，已经放了。又说防汛期间，有个韩美兰，洪水上来的时候他去挖人家的高粱，我拘留了他十五天，何错之有？最后我说，你们谈了这两天，那一条够犯罪，他们说确实不够，我就说你们不能再错。

第三天，起诉书就给我了，三条罪证。一条是六七年批斗李副司令员让他下跪了，我说你们两个当时都在场，他抓了 1 2 0 0 多人制造了多少冤案，放任打人，以国民党中校的捏造事实来抓我，批斗四十多天，罪恶多大。批斗李是武汉军区批准的，开封军分区和兰考武装部联合主持的，他们找到我要我上台发言的，因为我受害最深，让他给兰考 3 2 万人民请罪，开封军分区司令拉着我的手说姿态太高，李批斗我多少场，你们问过没有，怎么还要用这个来起诉我？第二条是有一个偷水泥的，说是我让大队捆他了，我说你们没有调查吧，偷水泥是人家现场扭送公安局的，这是大队党支部讨论的，我说够判劳教，但是可抓可不抓的人就不抓，叫放人的。如果你们连维护公益的人都要作为刑事犯追究，那不是公然

把屁股坐在小偷一边去了，谁还敢维护集体利益？第三条，说我在六八年说过对走资派叛徒特务要坚决斗争，我说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错了吗？我当年对于打人是坚决制止的。他们公然说，现在不是评你当模范，是要找你的事儿，他们已经公然不要脸了，什么事实，什么法律，在他们眼里完全是狗屁。

结果，还没有等我的答辩写好，判决书就下来了。法院院长董惠省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了，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要上诉了，上诉要加判到十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当时，我想到我祖母，是她把我从小拉扯大的，要是十年回去肯定见不着她了，五年出去，她还不到九十，还可能在，因此就不上诉了。

到底后来我还是写了上诉状，写了几天几夜，要我连夜交给他们，第二天九点多商丘中院就驳回了，维持原判，他们是啥时候上诉，啥时候驳回，效率真是够高的，这就成了终审判决。兰考一共六个人送到省第三监狱，狱政科长问是啥罪，我说无罪，他问没罪来这干啥，我回答说，你看看我的判决书，这些事儿作党内处分都不够，叫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吗？因为我一直拒绝写认罪书，就不放过我，要留监就业。科长找到我说，老杨你认个错算了，我说监狱是教人认错的地方吗？我犯的是啥错误？如果你们能够依法办事为我申冤平反，就是认几天几夜的错也可以。

我在监狱了停了五年半，父亲杵着拐棍去看我，说他得了食道癌，怕咱爷儿俩见不着了。我见了他，很难过，说：大，我不孝，我在这给你磕四个响头，就这样送你了。最后批准我半个月假，回家给父亲治病，一五九医院和地区医院都确诊是食道癌。等到我六月三日如期返回监狱，卫兵却不让我进去了，最后是狱政科干部领着我进去，要我捆行李走人，我说我没有认错，原以为五年变无期的。

我离开监狱之后，离开孩子老婆五年半了，朋友们凑了四千多块钱给我，我回家床都没有下，就会老家去了。年底父亲就去世了，人财两空。我年底回家的时候，大儿子已经参军走了，才十五岁多，我到武装部找到部长和政委，说你们胆子太大了吧，乌纱帽不想要了。他说，我们认为你是我们的好书记，我们专门安排他走的，不能因为你影响小孩子的前程。我去信教他当个爱国军人，要他不要再入党了，这个党已经变了，我在被捕之前的几十分钟，还召集党支部会议，当过多年的县委书记，最后那些以党的干部宣布说不承认我的党籍，可笑不可笑。

你开除我的党籍，总要手续完备，我入党时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他当了七年半兵，复员回来之后在医药公司工作。

我爱人是六三年大专毕业生，当过小学教师，焦裕禄纪念馆第一任馆长，财政局人事股长，后来因为我的影响要她医药公司切药，仓库主任，门市部主任，就是不给她调工资，退休了只有 4 0 0 多块钱。

我回来之后，纪检书记杨找过我几趟，他原来是办事员，是反张钦礼的。他到我家里，叫我上班，我说劳改五年了，还有班可上，他说你没有开除公职，还是国家正式干部。中央有个文件精神，清查中间的人，要给出路，让看河南省委的一〇〇号文件，上面说对罪该判刑的人如何如何，我说我不属于这个范围。他说从上班之日起发生活费，不等，最高 5 0 元。我说我一个本科生，最少教个初中吧，小学老师都一二百，我拿五十，像话吗？要我吃狗的食干人的活，何况本来就不该判我的刑，我是宁可多蹲监狱也不认罪的。如果你们真同情我，就在西关农场给几亩地吧，这样从八五年开始，我就种了二十年的地，场长给了四亩地，我自己开荒五亩。靠种地供了两个大学生，本来大儿子学习成绩最好，因为我坐监狱给耽误了。我坐监狱的时候，爱人的工资是 3 4 块钱，三个孩子是十岁、七岁、四岁，现在想起来都寒心，不知道咋过来的。

在农场期间，农场工人多少次要选我当场长，教领着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说我啥没当过，这个年头不是我干事的时候。谁要来征求意见，我都是正面说，不能贪，不能占。我自己一生从没有背叛人民，工作的时候是毫无保留地奉献青春，兰考在我们手上领着建了两个工业区，十个大型厂矿，几十个集体工厂，农业上除三害的愿望彻底实现，最后我倒成了罪人，他们成了功臣。

十、 回顾毛泽东和文革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以历史发展来验证，是非常正确的。苏东剧变，中国今天的现实，都说明了。毛想让人民起来监督党的干部，这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毛是真要人民当家作主，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什么时候心里都是想着老百姓。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从不停留，他看到很多干部脱离人民，薪水高了有了汽车大房子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对于文革的方式问题，值得探讨，天下大乱的方法是否妥当，确实有坏人趁机报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规模这么大的群众运动如何掌握，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从中国政治走向看，继续革命是老人家一生中间最辉煌处，并非失误。现在官员腐败成风不可救药，党在人民心目中早就跨了，就失色了，很可怕呀。两会上，温家宝讲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说到底是路线方向问题，他没有说到点子上。靠免税免粮能免多少，这些措施切断农民与国家的联系，可能也就是能缓和一下人民群众和政府的矛盾。农资大幅度涨价，比免税来的多，交点爱国粮，增加爱国意识，生资别这么涨，农民倒能多得点好处。农民自己始终认为种地完粮，天经地义。

今天兰考连教师、正式干部，要发工资的人不少于一万，按照每人每月八百，光吃饭这一块就得一个亿。兰考的国有工业商业企业都没有了，有几个好的私人企业？税源在哪里？哪有财政收入？吃饭这一块都成了问题。地方财政完全失去了造血能力，靠上级财政转移，战乱、饥荒怎么办？国家如何维持，中央财政也变成吃饭的了。靠富人爱国拿钱，那是笑话，明王朝眼看要垮台了，崇祯亲自动员皇亲国戚拿军饷，还都不拿。

中国今天政治理论混乱，经济理论更混乱，换一个书记打一个旗帜，城头变幻大王旗。毛泽东思想不说千秋万代，起码要管相当一个时期。猫论摸论能指挥一个党？没有方向路线和目标，能成吗？有人说邓小平是故意复辟，我不相信。他是没有能力解决中国问题，他所说的两极分化和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了，已经是走上他说的邪路上去了，他撑不起这个大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江泽民就是搞个维持会，在他自己的任上，没有人找事就行了。老百姓中间说，看这几个领导人的手势就很清楚了，毛主席是登高望远，邓小平光顾眼前，江泽民是求稳怕乱，农民总结的真好啊。

毛主席周总理在老百姓心目中，威望多高，主席去世之后，中央基本上就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他们搞什么粉碎四人帮，我曾经多次给中央写过报告，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四人帮的事情，省级干部都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一切都是那伙子人事后炮制出来的。他们说主席错了，中央错了，底下的人，不管有罪没有

罪都判刑，有罪没有罪都免职，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这样的官员对上是奴隶，对下是奴隶主，靠这样的人支撑共和国搞建设，可能吗？

主席当年是怎么搞重工业的？没有三线建设的老底子，战争早就降临了，援外也是为了周边安全环境，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农业发展，我更有亲身体会，我执政八年，淤灌二十多万亩好地，我去坐监后二十七年了，兰考连碗口大的一块好地，都没有造出来，当年打的井，开出的河道，基本上都破坏完了，都没有人管，对于今天这些当官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可多了。

如果不能客观总结历史，都不是唯物主义，我出了校门就坐监，老了还坐监，咋知道自己一腔热血变成这个结局？党内的对与错、贪与廉，何时和谐过？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阶段，就得提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就得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进行批评和斗争，没有这一点是不可能真正的团结的。

我管公检法的时候，整个公检法队伍总共就六十七个人，现在法院就有二百多，公安局都上千了，还配备了那么多的警车警械，队伍膨胀了上百倍，连治安基本好转都不敢吹。我们那个时候，兰考根本没有积案，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人犯罪，人们会感到很吃惊的，当时的精力都放在预防犯罪方面了，一个公社就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一个大队一个治安主任。过去是坏人怕好人，现在可不是这样。当官的贪污，只要是上万，就非杀不可，谁讲情都无效，现在是什么样子，老百姓说公安局抓人是：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没钱花；过去谁敢这样？！

跟今天这些官员对比，我可以很自豪地宣布，经过他们三十多年的审查，我们那个时候兰考的班子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经济问题、出桃色事件，随便他们怎么查，都没有找到我的问题。时间老人最能给人作结论，文件上的结论判决书上写的都是假的，经不起时间考验，他们算不上什么英雄。张钦礼被他们判刑关押十三年，离任三十年了，老百姓越来越怀念他。他头上带着老百姓送的三顶帽子：张青天、新包公、兰考的活地图，他的政绩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建立以来对兰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共产党人形象的功劳无人可比；廉洁清正一尘不染的作风无人可比。就是张钦礼的政敌也承认这三条，有一个胡某人，是当年整张钦礼的铁杆保守派，前几年来看我，我问他，你们当年反张，他有啥问题没有？胡某人说，没有，就是张不能团结人、骄傲、抗上，都是上级要整他。

张钦礼不媚上是一贯的，老黄有一次亲身经历，他曾经陪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到兰考来视察，张钦礼带他们参观了苹果园和贮藏苹果的地窖，硬是没有请他和随行人员吃一个苹果，视察结束时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张钦礼也没有主动留吃饭。在返回的路上，杨的通讯员和司机就开骂了，受到杨的阻止。老张说到，张钦礼下乡的时候，如果给炒盘鸡蛋或者是猪肉，他一定不吃，还要骂人的，他在乡下通常吃的就是玉米粥里面煮几块红薯，吃完之后碗比“狗舔的还干净”。如果是今天，张钦礼这样耿介的干部，肯定在官场中间一天都混不下去。那个时代出现焦裕禄和张钦礼这样的干部是正常的，今天可不是这样，兰考有一个村子在三几年的时候就建立了党支部，其中一个老党员九十多了，常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入党的，见识过的什么人最坏，他笑笑说：我入党的时候你还没有呢；算种支书算第一。

因为张钦礼威信极高，不搞和稀泥，谁不对就要挨批评，受他批评的人往往几年抬不起头来，他在兰考工作时间又长，挨他批评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很多干部恨他，甚至在公众场合，上级说的不对的，他也起来反驳，周化民就曾经被他当场指出错误，闹得灰头灰脸，下不了台，因此恨他，文革一来就借机整他。

张钦礼死后，我写了挽联，横批是：一代风范 虽死犹荣

树焦君丰碑、竟焦君遗愿、四十年不曾止步、无愧亲密战友、莫凭恩怨作论；
惦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六十载未肯息肩、堪称人民功臣、勿以穷达相观。

二〇〇〇年七月十日，开封中院要我过去，说你多年申诉，我们给你合议了一下，叫你来看给你的裁决；然后念道：“对于运动案，中央没精神无法解决”，是写在他笔记本上的一句话。我要求给我一个副本，他们不同意，我退一步说，抄下来盖上法院的公章，也不中，堂堂的中级法院连正规的法律程序都不敢履行，心虚到何等地步。几个法官跟我谈话，说：老杨，你说张钦礼冤，四人帮哪个不冤，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还不冤死个球。中级法院都承认四人帮冤，公开撕破脸，不要脸了。他们给我的判决书，就是最好的申诉书，是他们枉法断案的铁证。他们说，当年都是省委定调子，我们只是办手续。

邓小平依靠的河南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已经清楚了。那些人从来不干正经事，个个都是整人的好手。从五七年反右开始，吴芝圃、赵文甫、杨尉屏、代苏理，他们一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在反右之后他们搞“反潘杨王”，是老河

南帮把平原省那一批人整下去了。后来的反右扩大化，又是他们搞的；五八年竭力鼓吹五风的，也是这几个人。五九年反右倾，张钦礼被他们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清的时候他们搞四不清干部也是积极得很，文革初期他们抛出这个抛出那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又是来了一个大扫荡。到下面，他们就是依靠那些吹牛拍马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焦裕禄死了他们都不知道，张钦礼如果不吭声，也就一了百了。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连张钦礼都恨上了，因为焦裕禄的工作方式被宣传出来，是对他们工作方式的否定。为这个，张钦礼后半生就被他们一伙压得抬不起头来。从改变兰考的面貌需要看，张钦礼需要焦裕禄这一份精神资源来激励兰考的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但是周化民和秦一飞之流的“当官做老爷”理念与此格格不入。

从我和张钦礼的冤案看，这一伙人就是不想叫焦裕禄当这个典型，我的真正问题还是那个调查报告，触犯了他们的根本立场。焦裕禄和前几任书记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团结人一道工作，在前几任书记那里，张钦礼都发挥不了作用，在兰考县委班子中间，没有人比张钦礼更了解兰考的人，他的工作汇报既具体又详细，好多老农和积极分子他能够叫出名字来。那些人构陷张钦礼，是力图从兰考人民心目中抹掉张的光辉形象，就跟非毛化一样很难实现。有传言说周化民私下问刁文，杨捍东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在群众中间威信怎么样？刁文说在审查中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杨的群众威信也很高，周化民回答说：不怕杨捍东有问题，就怕他没有问题，他还有很高的群众威信，这种人最危险。所以他们就因此不肯放过我。

文革期间，开封师院我班上的同学，在六七年被抓了五个，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判刑的三个，都是最优秀的人。我们的对立面，只要跟我们当面辩论，根本不堪一击，文革初期的打砸抢都是这些人干的，当时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这些人除了追随干部，想趁机捞点什么资本，没有一分一毫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从来不考虑自己眼前利益之外的国家和人民利益，邓小平后来就是依靠这么一批人来治国，如果反而把中国搞好了，那倒真是奇怪了。有一个文革期间参加公安公社的人名叫赵福寿，后来是三监狱的政委，他对犯人说：对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揭发批判，发动利用犯人治他们从前的对立面，说是谁立功谁受奖。照理说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翻身的大好机会，是所谓的“拨乱反

正”，这样的事情他们本不该假手旁人的。就是这个人，从文革期间的派性出发，在我刑满之后又额外多留难了我五个多月。

二〇〇六年八月一日

二〇〇七年八月七日，杨捍东等三十六人《关于因焦裕禄这一典型兰考发生的大型冤案的再申诉暨公开信》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吴官正书记、罗干书记、曾庆红副主席： 我们是河南省兰考县在 1978 年——1980 年期间的清查运动中，无辜受到开除（不承认）党籍、开除公职、枉法判刑等不同程度的错误处罚，蒙冤已 30 年的部分工人、农民、干部，今再次泣血上书，痛陈奇冤。 一、文革十年中我们因焦裕禄这一典型受到两次迫害 公元 1966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以雷霆万钧之力，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树起了焦裕禄这一共产党人的又一光辉典型，给中华民族提供了又一笔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长篇通讯所报道的事实，主要是由与焦裕禄一道工作，时任兰考县委副书记的张钦礼提供和介绍的，通讯的作者穆青、冯健、周原等人多次表示，如果没有张钦礼的发现和宣扬，焦裕禄这一光辉典型就会永远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殊难预料，张钦礼竟因此成为十年文革中两次挨整，文革后清查运动中被判刑坐牢含冤而死的悲剧人物。又由于张钦礼的株连，兰考县演绎了上千人被捕坐牢，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至今未能解决的政治悲剧和奇冤。 十年文革中的简要情况是： 1966 年 7、8 月间，兰考尚未被批准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时任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的秦一飞，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周化民，就利用所把持的县文革领导小组，组织机关干部，揪斗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把张钦礼作为兰考的头号牛鬼蛇神进行连续批斗。 1966 年 9 月 16 日，又唆使北京的少数串联学生和县委干部同时贴出声讨长篇通讯的两张大字报，并于当天印成特大号传单，向兰考城乡和全国散发。（原文缩印附后） 这一对孪生姊妹篇，完全按照秦一飞、周化民在长篇通讯发表前后，责难通讯作者和张钦礼，耻笑焦裕禄算不上典型的调子，以左得离谱的面目，把长篇通讯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大毒草”，并捏造谎言，声称对焦裕禄事迹报道

不实。他们的广泛散发，在全国引起震动和迷茫，是不少人对焦裕禄这一典型产生了质疑。随着声讨长篇通讯的恶浪，县委机关干部成立了“揪穆青战斗队”和“抓扒手战斗队”，到北京揪斗穆青，在兰考揪斗张钦礼和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干部。他们把张钦礼介绍和宣扬焦裕禄事迹说成捞政治资本，给张钦礼挂上“政治骗子”、“扒手”的牌子长期游街、批斗。1966年12月初，河南省委批准兰考开展农村文化革命，“抓扒手”、“揪穆青”战斗队的兰考干部组成“卫东林焦造反司令部”，与此同时，开封地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炮口向下。以组织名义就长篇通讯问题支持9月16日的两张传单，批判张钦礼在长篇通讯中作假。占兰考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和工作在焦裕禄身边的一部分干部认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通讯，对焦裕禄事迹的报道是真实的，说报道不实，实质是抹煞焦裕禄事迹，推倒焦裕禄这面旗帜。他们以焦裕禄生前所树四面红旗大队的干群为核心，成立了“兰考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用切身经历的事实与“卫东林焦”的干部展开了口头的、文字的大辩论。周化民及其支持的“卫东林焦”不容许他们观点以外的杂音，“卫焦”农民群众组织刚成立一个多月，就被他们欺骗和借助支左部队进行武力镇压。1967年1月29日，开封军分区支左部队进入兰考当天，就通过传单和有线广播宣布，张钦礼是兰考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是张钦礼的反革命集团，坚决予以镇压。当即由“卫东林焦”的成员带领和指认，抓捕张钦礼及“卫焦”组织负责人和被认为支持“卫焦”的各级党政干部。抓捕行动持续到同年的3月上旬，总计将张钦礼等各级领导干部，“卫焦”组织的农民、工人、学生1260多人抓进监狱，兰考关不下，分押到杞县、东明监狱。凡焦裕禄生前在兰考树立的模范人物，除三害办公室人员，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写回忆文章纪念焦裕禄的各级干部，直至在兰考为焦裕禄这一典型说过公道话的外地学生都被一网打尽，极少幸免。张钦礼入狱后即被砸上死刑犯的铁镣，先后捆绑批斗了一百多场。每次批斗，每人能提出其历史、经济、作风等问题，主题是逼他承认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是说假话，不承认就紧绳、紧铐、拳打脚踢，直至昏死在地。狱中5个月，他被打聋了一只耳朵，折断了三根手指。被关押的其他干部和工人、农民、学生所遭受的肉体摧残、人格侮辱，更是惨不忍睹，难以尽述。（当时部分照片附后）1967年7底，周恩来总理命河南省军区

把张钦礼送至北京，亲自接见，被同时关押的一千多人也得以陆续获释。至此，表面上是两派组织，实质上是党内对焦裕禄这一典型的认识所进行的第一次惨烈斗争暂告结束。1967年10月至1970年底，张钦礼任了三年兰考县革委会主任。在此期间，他没因受害坐牢，追究过任何人的责任，并坚持要求所有在67年受害坐牢的干部、群众，不计个人恩怨，高姿态对待加害过自己的人。对于1968年4、5月间贯彻中央反三右一风精神时，个别心胸狭窄，乘机报复曾经直接捆打过自己的人的行为，给予了及时而严肃的批评处理，又于事后专门举办“拆墙、平沟、解疙瘩学习班”让两派群众组织中计较个人恩怨、有违法乱纪行为的人各自作自我批评。健康的执政心态，促成了全县团结、安定大干经济的局面。三年中，针对危害兰考农业发展的风沙、盐碱、内涝三害进行了殊死决战，全县干群冬春苦干，整修和新开了40多条引黄渠道，对所有的排涝渠道全部加大了排放标准，彻底改造沙碱地5万多亩，发展农桐间作17万亩。同时，1968年春起，自力更生兴办投产了5座国营大厂，结束了兰考工业空白的历史。1971年初，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王新把持了河南大权，把张钦礼调往信阳地区，随即派军宣队进入兰考，批判张钦礼的“生产党”，文革初期大反焦裕禄的“卫东林焦”的派头头们，又乘机掀起派性恶浪，对1966年、1967年他们曾经关押捆打过的“卫焦”组织的干部和群众实施了第二次全面迫害。他们首先免去了上至革委会，下至农村生产队，工厂车间班组中所有持过“卫焦”观点的人的职务。再次形成一派掌权的政治结构后，进而对免职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又把数百名抵制他们派性报复的职工，干部拉到外县以办学习班为名，长期剥夺人身自由。在非法逮捕十多人，意欲继续更大规模逮捕时，赶上林彪叛逃之事公开，才暂时停手。1972年11月，周恩来总理再次亲自过问兰考冤情，接见张钦礼，当面平反，文革中对维护焦裕禄这一典型的仁人志士的第二次大型迫害才在无奈中结束。

二、颠倒历史事实的派性清查，造成了更大政治冤案

1973年2月，张钦礼受省委派遣，回兰考担任了将近5年的县委第一书记。这五年的人事安排，张钦礼始终坚持八个字：以德报怨，五湖四海。张钦礼没有凭借再次受到周总理接见、抚慰，倒过两次受害的苦水；没有按照上级组织追查过秦一飞、周化民及他们所支持的派头头再一再二反对焦裕禄事迹发表的内幕和责任，在政治上留足了人情。在干部使用上，根据毛主席团结反对过

自己的人一道工作的教诲，只凭工作表现、工作能力、不考虑文革中的观点和表现，一视同仁，一样信用，一样发展入党，一样供职于关键要害岗位，并提拔了 20 多名捆打过自己和其他干部的“卫东林焦”负责人到科局级领导职务上。在思想上，坚持教育文革中的对立面同志放下包袱，心情舒畅。例如 1974 年 4 月，中央号召批林批孔时，有 5 个科局和公社的领导成员联名向张钦礼写信，检讨文革中加害张钦礼的错误。张钦礼把心拿到常委会上传阅，指出这些同志有包袱，有错误认识。当场责成县委副书记杨捍东以县委名义回信，作为县委文件下发。杨捍东在信中批评了五位同志把党的运动当成个人之间的你是我非，把文革中的不同认识看成“站对站错”的错误认识，热情洋溢地表扬了他们的工作成绩，鼓励他们放下包袱，大胆工作。立党为公的人事政策，使兰考出现了文革中第二次长达五年的团结大干局面。在农业上，县委带领干部和农民群众又用引黄灌淤，稻改，再改造 22 万亩沙荒、盐碱为时代可耕的良田，开通了历史上没有开通的排涝河道，排涝能力达到 50 年一遇的标准，根本上消除了“三害”，实现了焦裕禄同志的遗愿。在此基础上，以每年 500 眼的进度大搞井泉建设，结合打井，平整土地 35 万亩，至 76 年底，共建成 45 万亩井河双保险，机电双配套的稳产高产田，全县 230 多个大队，每队都拥有 2 台大型拖拉机，实现了耕作机械化。兰考这个吃粮靠返销的老缺粮县已能向国家提供 3000 万斤余粮，100 万斤油料，80 万斤皮棉的余粮县了。在工业建设上，张钦礼在第一次主持工作时兴建 5 座大厂的基础上，再建 5 座国营大厂，50 多座社、队集体工厂，所生产的砖瓦机、变压器、电动机、潜水泵、深井泵、四轮拖拉机均为省内外的领先产品，红葡萄酒、白葡萄酒是香港的枪手货，供不应求。企业的发展促使财政好转，至 76 年，兰考已达到收支平衡，略有盈余。我们是文革中随同张钦礼的受害者，也是与张钦礼一起白手起家，发展兰考经济的实干者，期间所流的汗、操的心、作的难，至今想起还禁不住浑身打颤，老泪不止。十年文革中，张钦礼是否有可能，有本事在兰考组织一个反党的帮派体系，他本人是否够得上“四人帮”的成员，甚至在粉碎“四人帮”的前一分钟他是否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至今没有人能做出理性的回答。但是，在 1977——1978 年的清查运动中，张钦礼却作为“四人帮”在兰考的骨干而锒铛入狱，判处重刑；张钦礼主持工作是的各级领导成员作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而一道被“粉碎”。

1977年11月13日，张钦礼突然被免职审查，兰考同时暂划商丘地区管辖，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在周化民的直接操控下，兰考的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文革以来的第三次大换班。凡是文革初期发表过批判周化民否定焦裕禄事迹言行，参加过或支持过“卫焦”群众组织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论错误大小，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免职，一律作为清查对象，纵横扫荡，不留出路。凡是加入过“卫东林焦”组织，整过张钦礼及其支持者的人，不论有无劣迹，不论能力如何，统统破格提拔，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进入县委和科局等重要领导岗位的少数“卫东林焦”的大将们，天良丧尽，恩将仇报，利用手中的清查大权，对张钦礼和文革中被他们两次迫害过的同事和下级实施了置于死地的第三次迫害。他们高叫免职不是处分，却在“免职理由”的表格中都填有让人不寒而栗的大小罪名，不给本人见面，不让别人知道，偷偷装入档案，让被免干部万劫不复。同在文革十年之中，张钦礼被第二次迫害，由他们执政时的71年、72年发展的党员，提拔的干部不算是“双突”，张钦礼主持工作的八年中发展的党员，提拔的干部都算“双突”，同是“张钦礼的双突”，文革初期曾是“卫东林焦”成员，党籍保留，职务不动，其余全部取消党员资格，重新审查干部资格。开除党籍和取消党员资格，公然践踏党章。不开支部大会讨论不让本人知道，某个清查组成员一说就算。少数被处理的党员有个文字通知，多数被处理的党员连个口头通知也没有，按兰考的土话说，叫“面子”。干部籍，工人籍的开除也很随便。似乎各级清查组的成员，人人手中都有对清查对象生杀予夺，便宜行事的尚方宝剑，说开除谁就开除谁。科局长开除科局长，开除职工，干部，一说就算，过后让县委补办手续，无不照准。被开除公职的干部，工人随处可见，难以统计出精确数字。1978年11月，河南省委决定以反革命罪逮捕张钦礼后，省政法机关到兰考具体事实时，才发现兰考所整材料中所指控的犯罪是由是张钦礼办的好事，把性质搞颠倒了。但还是抢在刑法生效的前夕，把案子压给商丘地区中级法院，于1979年12月24日强行判处张钦礼13年徒刑。紧随张钦礼被捕，被判，兰考的“清查对象”中有50多人被捕，搭乘河南省突击判刑的快车于79年12月以形形色色的刑事罪名通通判刑。伴随着派性清查，经济上也实行了派性绞杀。凡被清查对象的干部、职工、农民，本人及亲属、子女，在调整工资、评定职称，当兵、招工、升学各方面无不受到限制和刁难，物质生活与“动

力”们相比，势若霄壤，情逾冰炭，再现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悬殊世态。如果说，一派升天，一派坐监，是河南省清查后果的写照，以坏人升天好人坐监来概括兰考的清查，则更为确切。当“清查”的尘埃落定，再没第二个周恩来为张钦礼主持公道，取得最后胜利的周化民及其支持的派头头们还干什么呢？他们首先重操 1966 年“揪穆青”、“揪扒手”战斗队的旧业，冠冕堂皇地以兰考县委的名义，赴省、进京，多方活动，并下达县委红头文件，指责报道焦裕禄的长篇通讯报道不实，企图让中央权威部门和人物表态把长篇通讯作废；还数次当面逼迫穆青承认采写中听了反革命分子张钦礼的谎言，声明重写。直至 2005 年，他们还借无耻文人任彦芳之笔，在北京的“百年潮”杂志上声称，1966 年就发现长篇通讯的失真之处有 20 多条。试问，一篇通讯竟至少有 20 多处失真，还是个文章吗？通讯所报道的任务还有多少可信之处？他们 40 年不改地推翻一个活活为人民累死的英雄人物，能称得上好人吗？

在他们把持和间接操控兰考大权的 30 年来，兰考的 60 多座大小工厂吃干卖净，荡然无存，引黄河道淤塞，设施破坏，再没有改造过巴掌大的一片土地，排涝河道堵塞，机井多已废弃，已改造过的土地三害重起，有旱涝保收成为“望天收田”，现在兰考已跨入向中央要饭吃的白贫县行列。

三、中央所划“两案”禁区，是无根据的政治误区

我们从受到不同程度的错误处分之日起，就基于对党的信任，没间断地向各级党和政府机关申诉，仅向党中央写的申诉信，个人的和联名的，加起来不止上千封。从千百人次的上访经历中，我们深感从北京到河南的各级党政机关中，不乏公正人士，他们在接访中，对我们这些显系违法、违纪处理的案件表示了很大同情，甚至抖着处理文件气愤地说：这些处理决定简直是笑语！但最后却又无奈地告知：中央不开口，谁也不敢动。

难道对于“清查”中的大量冤假错案，是中央划了禁区，不让解决？由于身处底层，无缘找到文字根据，只能怀疑，不能认定。但是，为什么地方各级政府机关有权力解决，也表示应该解决，却又拖了一年又一年不付诸行动，又很令人费解。尤其是 2006 年 5 月河南三级法院大接访活动中，河南高法的接待官员曾对二百多名前往的“两案”人员批示，在 1—3 个月内立案重审，给予实事求是的解决。但是同年 8 月，3 个月过去了，却又推翻承诺，宣布对“两案”实行不受理，不解决，不解释的三不原则。不受理、不解决总应该有个原因，为什么不能给予解释？堂堂的高级法院在访民面前为什么竟

论起堆来了？ 2007年3月20日，开封市政法委的领导同志，在听取了兰考、杞县的“两案”访民代表汇报后，也表示深切同情，并答复可以适当地解决一下生活问题。但到4月突然一反常态，见都不见了。拖至7月，我们第八次找他们讨说法，一个政法委副书记只好在电话中解释：上边没有明确态度，我们不好办，见了你们无言以对，只好躲避。并在无奈之下，让办公人员向我们出示了2001年7月19日出台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审慎处理“两案”人员申诉的通知》。仔细琢磨中纪委2001年12号文件，才真正弄清，到21世纪初，中央还在给涉及基层广大干部群众的所谓“两案”划着禁区。 纸是包不住火的。对照兰考和河南的实际情况，中纪委2001年的“通知”，首先颠倒了“清查”中的基本历史状况。 其一、河南的清查，是不折不扣的派性清查，凡是文革初期属于“十大总部”、“河南造总”一派的群众组织头头和支持这一派的干部，不论文革中有多大恶形恶状，都是清查“动力”；凡事“二七”、“八二四”一派的头头和成员，以及支持这一派或被认为支持这一派的干部，不论错误大小，都在清查之列，全部给予程度不同的随心所欲的处分，哪里是“通知”所说“对被清查的人员82%都未给予处分”？ 其二、对所有被审查人员，不是依法依规，核准事实、准确定性，更不去严格区分两案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完全是派性报复，残酷迫害。开除和取消党籍，不开党员会，不让本人知道，偷偷除名；开除公职，不指出错误，不让本人申辩，同级可以开除同级，口头一说就算；逮捕判刑，肆意捏造罪名，故意指鹿为马，混淆罪与非罪，强扭人以罪。他们于1979年12月搞的公然践踏法律的“突击判刑”，曾遭到最高人民法院江华院长的严厉批评。就连“突击判刑”的决策人赵文甫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的许多判刑案件“材料有水分，定性没高准”。不知中纪委“通知”中所说“对涉案人员的处理，反复进行了讨论平衡，要求从宽、从缓，留有余地”，根据何在？ 其三、“通知”又说：【中发】（1982）9号文件下发后，全国对判刑和开除党籍的案件，又进行了必要的复查（复议），适时纠正了一些处理偏重的案件。事实是，河南根本就没有传达过中央（82）年9号文件，更别提贯彻。兰考有几个干部传阅了中央这个文件，就酿成80多人被隔离审查50多天，4人被判三年以上徒刑的悲剧。所谓“复查”、“纠偏”又从何说起？ 其四、“通知”说，“两案”审理结束以来，多数被处理的“两案”人员，能服法认错，改过自新，但也有少数

人，拒不认识错误，不断鸣冤叫屈，企图翻案。这是官僚们的猜测，又是不负责任的指责。物不平则倾，人不平则鸣。绝大多数被处理的“两案”人员，并没等到“两案”审理结束，就基于对党的信任，向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申诉、上访了。只到 2007 年 1 月，河南高法的官员还坦诚：“你们这些案件是依法判决的吗？都是他们做决定，让我们法院办手续。”审判不公，处理错误，依法上诉维权，怎么能叫拒不认错、企图翻案呢？“通知”基于上述的错误判断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进而做出了继续对“两案”不搞复查的错误禁令，再次封杀了被称为“两案”人员的广大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依法上访维权之路。回顾文革的历史真貌，中央领导人能把清查中处理的河南数以百万计的干部、群众也称为“两案人员”，当成不共戴天的敌对示例，则更是令人痛惜和缺乏常识的政治误区。当年，文革是毛主席发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开展的，亿万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都怀着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继续革命，反修防修，使社会主义祖国永不变色的愿望参加这场运动的，可谓不忠不跟、不跟不忠，其心可嘉，其情可悯。任何属于中央峰层的领导人应该为我党有这样伟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不应当把人民群众的热情视为愚氓而切齿痛恨。后来，中央先后宣布，出了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连省部级的高官都事前难以知晓的事情，遑论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所以，尽管因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分歧而形成了不同观点和派别的群众组织，但不存在一派在造反起家、紧跟林彪、四人帮的帮派分子和“两案人员”，另一派则是抵制文革的先知先觉，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政治精英。鉴于这种客观实际，在总结评价文革，论及人物得失时，理应站到党性和党的原则的高度，站到促进党的队伍、干部队伍和人民群众坚强团结的高度。应当看到拥护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热心为人民服务并为之做出积极贡献的人，毕竟是绝大多数，对这些人，不管文革初期参加或支持过哪一个派别，都应当加以爱护和不分亲疏的量才使用。除敌对分子外，因觉悟不高，品行不端，而在文革中犯下不同错误的人毕竟是少数，主要地还应以教育为主，即使应当处罚，也应考虑当时背景，从宽议处。可惜，清查期间，不知是何原因，中央没能遏制长达四五年的一派整另一派的势头，造成一派升天，一派坐监的格局，酿成了我党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冤假错案，党的队伍、干部队伍、人民群众之间最为严重的分裂局面，中华民族肌体的最为严重的内伤。更为

可惜的是，大错既已酿成，理应尽快纠正，我们党也历来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规矩。但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一直坚持二十多年不纠，直至 2001 年的中央还让这种内伤继续下去。我们真不知道，中纪委对“两案”重划禁区，是为领导人的错误遮丑，还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负责。直到 2007 年 1 月，河南高法官员，2007 年 5 月开封政法委的官员，在解释为何对“两案”实行三不原则时，还有你们造反派站错队了的说法，负面效应多么触目惊心。再说，“两案”人员也是中国的公民，还有为数甚多的中共党员，偏偏对他们这一层人的申诉划上禁区，列入另类，不让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去处理，岂不是公然践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条款，党员在党章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党的纪律？

四、切盼中央诚实面对历史，取消“两案”禁区 痛定思痛，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把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而不是为了埋怨哪些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苛求人们不犯错误，没有失误。为此，我们谨向中央就解决我们 30 年的不公正陈述下列诉求和想法：（一）希望中央常委同志诚实面对历史，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气概，不承认任何冤案为合法，对于确是搞错了的，应当勇敢地说，勇敢地为受屈者主持公道取消对所谓“两案”的禁区，一视同仁地依法、依纪对待清查中遭受错误处理人员的申诉和上访。（二）我们不停地直接向中央申诉，是因为我们明白解决冤枉的症结在中央，更是相信中央仍然是广大忠诚的中共党员的最高领导机关。如果中央有谁宣布不叫中共中央了或声明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没有共同之处了，我们自认挨整活该，连儿孙都不会向你们喊一句冤枉。（三）我们只要求依法依纪重新审查对我们的错误处理，给个公道的结论，绝不计较和追究制造不公的相关人员的责任，引起大小“动力”们的不舒服，不安心。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一些参与多次制造冤假错案的人，为了自己的面子而不惜继续牺牲国家法律，党的纪律和他人的政治生命、生存权利，出口“给他们平反了，不就等于我们错了”的浑话，向中央施压，就毕露无疑地说明他们是蛇蝎不如的小人。如果迁就这些人的病态的情绪，继续划“两案”禁区，将是何等残忍的现实！以不公求安定、和谐，岂非南辕北辙？（四）纵观我们兰考这一底层人群，当年不论能力大小，奉献厚薄，基本上是尽心尽力，不谋私利的人，“清查”中尽管被吹毛求疵，过筛过罗，却没能指出那个人涉嫌一分钱的手脚不干净的问题。现在老了，几十年的困苦都

过来了，对个人钱财多少看得更加淡薄。即使得到公正，还活着的人能领取一点养老金，也领不几年了，不过是别人盛宴后的一杯残羹，多少都不会计较，更不会攀比那些次次都长级，一次调几级的“清查功臣”。现在的兰考，每年至少伸手向中央财政要上亿元的吃饭钱，国家也不宽裕，不给也罢，能自给的还自给，不能自给靠儿女，没儿女靠亲戚朋友，没人会感到不平衡。如此，中央就不会因主持公道而带来经济上的困扰。披肝沥胆，笔楮难穷，深望中央明察。

兰考县 1978—1980 年的清查中部分受害人员 杨捍东 朱广启 和
新民 周付建 程道敬 刘崇汉 王世忠 陶云彬 陶建国 胡安民 赵新侦 黄中
光 张景迁 孙玉珍 孙聚群 王传友 郑子顺 曲雅习 王道臣 曾照泉 李志新
张慕凡 许清刚 肖光绪 曹少林 王善庆 许建全 张世堂 张泽山 王学思 郭
志荣 杨立志 郑家坤 蔡尚书 张自修 任福信 敬上 2007 年 8 月 20 日

注：1、签名中已故去者(已标注下划线)，由其家属或子女代签； 2、联
系人杨捍东，住兰考县西关农场 电话：0378-3300772

《坎坷十年》 作者：陈红兵

我在七十年代一书作者群中算是一个另类。没有我这个另类，七十年代一书就无法组成真实的完整的篇章，就只能永远是一部分人的边缘的记忆，充其量不过是被拆掉的旧窗玻璃碎片的骄傲的闪光。那旧窗连同破碎的玻璃虽然又被装起来使用了，但那旧窗的旧，和玻璃的破碎，却只能永远的“旧”和“破碎”下去。无法让后人了解七十年代的全貌。七十年代是六十年代的延续，是在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结束、中共九大胜利召开的大背景下开始的。看着九大主席台上赫然坐着陈永贵、王进喜、孙玉国等代表人物，工人农民心里想的估计和精英们会有很大差距；李凌先生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这话很经典，但他只是说出了一种趋向。如果我说七十年代是两种思想的激烈搏斗，大概也很少有人反对。毛泽东 1970 年 12 月 18 日同斯诺谈话中就说：“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毛泽东文集》8 卷第 396-413 页）所有人都在思考，所有人都是在围绕着这个大背景思考。不管你当时是否认识到，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也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

我是河南大学（原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六六届大学毕业生，文化革命中是学校造反派头头，1967 年先后被选为开封师院革委会主任、河南省革委会常委。六七年底分配留校，六八年底再分配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七十年代开始的时候，我又被分配到河南原阳县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在农村教学一年；批林整风后当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三年；毛泽东逝世后，七十年代最后四年在隔离审查、被大规模批斗、被登报逮捕、被判 20 年重刑投入监狱中度过。

我出身城市贫民家庭，父亲是清洁工人，洛阳市劳动模范；文革前我是河南大学中文系团总支委员，学习也在前列。说造反派出身不好、不好好学习工作，对党不满、有野心，在我身上找不到根据。文革前我由于长期担任学生干部，才对当时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了解较深，感到好多不正常，所以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那一点点肤浅的觉悟，后来斗争发展到那么深刻的程度，却也是我初始没有想到的。虽然我在文化革命中遭遇的苦难比任何人都多，但从来没有对自己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感到后悔、怀疑和动摇。因为有一个基本认识支撑着我：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解放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文化大革命是符合这个历史潮流的；我认同毛泽东的人民之心！我的这个认识对不对，让别人评价。我只是说出我自己的真实想法。农村插队和当

“官” 1970 年初我在太康县解放军农场锻炼一年后，又被分配到新乡地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不愉快，还主动放弃原分配方案，要求到最艰苦的、河南有名的贫困县——原阳县农村插队。插队的村子名唤下马头，早先大概是黄河岸边的一个码头，因为黄河不断滚道，逐渐南移，这里就成了村落，日久天长，“码头”也叫成了“马头”，当时归福宁集公社管辖。我住在十一生产队两间泥坯草房的落分（记工分）屋里，生产队会计把一半的空间打扫干净，摆一张床，摆一张旧桌，就算是安下了家，每天和社员一起出工收工，在庄稼地里忙活，在群众家里吃饭、拉家常，给五保户困难户担水，学犁地等农活，对农民生活加深了了解。

下马头大队属中等偏上的大队。大队有一台履带式拖拉机，一台天津铁牛 55 轮胎式拖拉机，一个小砖窑。各生产队有自己的菜园，农民生活虽不富裕，但没有一个人生活过不去，军烈属、五保户都得到照顾。农村基层造反派很少，

当时中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八二四造反派之后，原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一句话：“贫下中农都是造反派”，稳定了农村局势（但可惜这位优秀的地委书记八十年代被打成反革命抱恨去世）。但农民心有不平敢于说话、敢于向干部提意见，大队干部谨谨慎慎，关乎大家利益的事情常开会向群众说清楚。这些还是同文化革命前有了很大不同。农村干部学大寨积极性很高，平整土地、打机井抓得很紧。农村买拖拉机和城市比便宜很多，打机井国家出资为主，农民出力为主，群众对党的农村政策很满意。打机井时我和年轻农民四人抬一个六百多斤的水泥机井筒，一手拄杖或者抓住旁边人的肩膀，喊着号子，把机井筒送到井边。夏天麦收打场是农民最高兴的日子，我也向农民学会单胳膊把五斗麦子布袋放上肩膀的本领。一般农民勤劳朴实，很善良，对待下放锻炼的干部学生，对待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过而下放到农村的人，从不歧视。不管上面说这个人如何坏，他们从来都有自己心里的评判标准。这一点给我的感触很深，使我从内心里认他们为朋友。

后来我女朋友毕业了，她放弃直接分配工作的机会要求和我一起插队。我们到福宁集公社登记结婚，生产队把落分屋用砖墙隔开，经我爱人一整理，半间草屋的新房竟然光彩四射，令人惊讶。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女人的伟大、爱情的温馨！我们一起住进新房的那天晚上，各生产队插队的大学生和乡亲们挤满一院子，笑着嚷着。我们两个向大家三鞠躬，唱一首革命歌曲，撒了喜糖，就算举行了婚礼。村里的大婶大嫂过来教我爱人学做饭，我们婚后一起参加劳动，日子很香甜，没有八十年代精英那种天下苦痛集于一身的、仿佛耶稣受难的感觉，也从来不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那样的话。不到劳动者中间，怎样了解他们的需要，不了解他们的需要，怎样为他们服务？共产党不为大多数人服务，难道还叫共产党吗？

我爱人怀孕后反应很厉害，经常呕吐，串村卖豆腐的来到门口，她要多买一些，我只让买了二斤。不是没钱，也不是不心疼她，只是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与农民有太大的差距。谁知当天晚上被猫拱开了案板上扣盖豆腐的瓷盆，豆腐糟蹋得一塌糊涂，也没有吃成。妻子眼泪流得哗哗的。后来遇到同学们，她常常用这件事诉我的苦。他的女伴也笑着指着我指责说：“极左！极左！快赔礼道歉！”但是七六年以后我被抓进监狱，她因我吃了许多苦而无怨无悔，又对朋友说：“我实在想不出他的坏处。”一直等我十多年，一手把两个孩子养大。 1970

年一打三反和抓五一六运动，不知怎么，又变成了整造反派的运动。学校里军代表掌握了领导权，我的几个战友成了五一六嫌疑，看管他们的是过去对立群众组织的骨干；省委军代表王新把第一书记刘建勋的秘书王书庆也打成“五一六”关进了学习班。我有一次回郑州，看到街上贴的法院布告，开封地区我熟悉的三个人名被打大红勾枪毙了，其中马九春，虽不是令人喜欢的人物，但绝没有该杀的理由，肯定是冤案。这种恐怖气氛当时确实让我一阵心寒。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用来镇压人民！这是毛泽东 1956 年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强调的社会主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可惜，很多领导人没有记取。

把学习班变成限制人身自由、搞逼供信的专政手段，是从林彪开始的，一直流毒至今，造成大量冤案，很值得人们思考。后来知道，我的同学被办学习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揭发我这个造反派头头。如果不是林彪事件暴露，在解放军农场已经被“清理阶级队伍”审查过的我，恐怕也难逃又一次厄运。

关于林彪事件，我是在县里听到中央文件传达的，之后五一六学习班便渐渐撤销。物理系的一个头头在街上与我偶遇，对我没进学习班表示大惑不解。他紧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路边，反复地问：“你真的没进学习班？你真的没进学习班？你这个大鱼真的没进学习班！”看得出，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处于被压制状态中，以致毛泽东亲自出面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

1972 年初我和插队的学生们一起被分配工作，教育局局长和我谈了两句话：“红兵，就是这样了，也别有其他想法了，去农村教学吧！”我被分配到原阳县最边缘的祝楼公社高中教学。临行那天，祝楼派一辆马车前来县城接我们一家。大雪初晴，温暖的阳光笼在厚厚的雪原上，让人体味到，真正的美丽有时是非常简单的。清脆的鞭响，嘚嘚的马蹄声，喜鹊蹬落的雪粉和欢快的叫声，冲破原野的宁静。我和妻子以及执意要送我的长春地质学院学生李旭，摇晃着坐在装着铺盖行李的车上，未满周岁的儿子倚在妻子的怀里，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一只不知名的白色大鸟，忽然在路边沟渠未结冰的水面上掠了一下便腾空而去，是不是叼到小鱼我没有看到，水面上散开的涟漪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赶车的老乡五十多岁，从旧社会过来，对生活很满足，一路上给我们讲一些风土人情、笑话、掌故，大家爽朗地笑着，蜿蜒五十里乡路也不觉得遥远。

祝楼高中是个文革中新建的学校，班级不多，没有设美术课，我爱人改教地理，我则干老本行，教语文。我教《曹刿论战》等古典课文，不看教案和课本，边背诵边讲，甚至还讲与课文注释不同的见解，蒙得学生睁大眼睛听；我重视改作文、帮学生办壁报，循着学生思路和思想，把他们不成文章的作文改成完整文章，思路不清的理顺，让学生从实践中体会写作方法，对学生帮助也很大；我和学生一起参加建校劳动，一起打扫厕所，不摆老师架子，直到现在学生都愿和我保持联系。校长是个没有学历的农村基层干部，踏实为教师服务，任劳任怨，对造反派没有好感。他后来对我说：“听说分来个造反派头头，我心里不安了好多天。来了一接触，不是想象的那回事，人还不错，教学也有本事。你这个造反派我赞成！”

1973年3月，我在农村入了党，选拔到中共原阳县委担任县委副书记、兼靳堂公社书记。靳堂公社不大，仅两万人，十多个生产队，社小队小，土地肥瘠不同，有黄河滩地，有背河涝洼盐碱地，有沙地，也有较好的两合土地。因在盐碱地推广种稻，吃饭住房问题不是很大，但公社、大队、小队普遍缺钱，科学种田投资跟不上，制约了发展，集体经济不富裕。用有的生产队长的话来说：“买根鞭稍的钱也发愁！”。我一方面和农民一起学大寨，兴修水利，平整土地，一方面号召大家发展社队工业和集体副业，自力更生办起个公社机制砖瓦厂。砖窑是动员干部群众打土坯建起来的，50米高的烟囱是请来获嘉县的一个行家带领农民自己建起来的。获嘉这个行家出身不好，又懂建筑又懂翻砂，别人不敢用他，我把他请了来。只有钢筋和砖机是花钱买的，20多门的机制砖瓦窑厂，总共花两万元钱就开始生产。工人宿舍都是利用烂砖自己动手陆续盖起来，不经意间培养出一批建筑工匠，在公社氨水厂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氨水厂高高的烟囱上书写着红色的大字：“走自力更生道路，建社会主义大业！”很振奋人心。我又帮助夹滩大队办起了大型面粉厂，看到好处，其它大队也在酝酿。为了节约资金，氨水厂建设用的石头，是我和干部群众一起从百里之外的新乡潞王坟山上拉回来的。“县委书记拉石头”，在当时并不罕见，但群众却记在心里，一直传说到今天；冬天搞农田基本建设，寒风凛冽的十一月份，县里组织引黄渠清淤会战，我也和群众一起挖泥修渠，晚上和群众一样，在黄河滩上铺一层厚厚的麦草豆秸和褥子，盖两个被子，夜里凉凉的霜纷纷落在脸上，这让我认识到，什么困难都是

可以解决的；夏天里和社员一起深锄地，渴了喝机井水，肚子咣咣作响……。那时的新干部，大都不脱离劳动；无论职位多高，和群众拿一样的工资；后来河南数千名新干部被判刑，贪污犯罪几乎没有。七六年之后我挨批判，批判的人在大会上说：“我是只批信（指我给刘建勋写的一封表达批评意见的信），不批人。说实话陈红兵来原阳办了很多好事，没办坏事。”

伟人逝

世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人民由衷地感到悲痛。我当时从外地赶回。在公社附近的路上，一位农民正走着忽然蹲在路边抱头痛哭，我赶快停住自行车把他搀起来，他指着哀乐传来的方向说：“不说别的，毛主席这些年把国家治理得多平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对毛主席怀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不容易轻易撼动。工人农民士兵和劳动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被选拔到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任何一个普通群众可以写大字报或者公开批评他的上级，没有哪一个农民或者工人有了重病，因为没钱得不到医治。这是有史以来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新鲜事，但毛主席领导的国家做到了，人民怎能不热爱他！

毛泽东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主体思想，和群众结合，就是中华民族历史进步的伟大动力，毛泽东指出我国“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清醒而意义深远；他实施的用人民权力监督、限制和逐步消灭官僚特权、资本特权，最后消灭一切特权的方案，已在实践中起到遏制腐败的明显效果，要比现代社会用一部分官僚监督另一部分官僚腐败，用所谓“两只手”来遏制资本垄断和社会不公，都先进而有用得多。毛泽东在文化上站在历史的前列，本应该中国的知识界认真研究。邓小平说永远不去掉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胡锦涛说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我想是会得到历史的肯定的。

我被推进地狱

1976年11月，

在停职检查一段时间后，我被押回开封隔离审查。那天开封来了四五个人，开一辆面包车，从柳园渡口坐船过河到开封。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大木船过黄河，黄河水混不易辨别深浅，船头一位瘦筋筋但结实果断的老艄公，眼睛盯着水面，抖动着胡子的嘴里发出坚定的声音：“进一！”“进三！”……，船尾的摇橹人倒是神色沉稳，两边船帮上，几个年轻人手执长篙，高声吆喝着，前后走动，不断同时把长篙插进水里，用力给船行输入动力。这场景，简直就是一个国家进步的譬喻：方向、动力、团结！我记得当时曾哼了几首古诗，记录下心中的感慨，后

来偷偷写成文字，只是辗转中遗失了。然而祖国这只大船今后如何前行，那时我已经不知道了，我已经失去了自由，并没有说话的地方！船抵开封上岸，押送我的人掏出手枪朝天放了两枪，大概是庆祝他们的胜利，我也很快从这一情节中读出其中隐藏的险恶：还没有审查，他们就已把我看成了敌人！

就在那天晚上，我被送到开封高压阀门厂一个弃用的仓库的小屋里，被厂保卫科的人看管了起来。此后又转移到空分厂氮气车间、空分厂澡堂楼上、空分厂技校操场小屋。十个工人轮流值班看管我一个人，房间里换上低压灯泡，烧开水电炉也是低压的，那大概是在防范我自杀；气氛搞得很紧张。其实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要自杀，因为我一点也没有精神崩溃的感觉。隔离审查中我确实认真读当时的批判文章，希望能使我看到自身思想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是很遗憾，我并没有看到一篇有说服力的、不自相矛盾的文章。隔离初期是

查我和四人帮的牵连，但查来查去，除了我写给刘建勋的批评信之外，也没有查到其它实质性问题，拉我到全市各系统参加了十八场批判大会，也没有突破性进展。1978年上半年，市委审查组很少来问，对我的看管也松了一些，每天早上我到操场跑步，看守的工人继续呼呼大睡。有一天，我忽然看到妻子在操场铁门外向我张望。我快步跑过去，铁门也并没有关，但妻子摆手不让我出去，说：“你继续跑步吧，我就是想看一看你！”……。1978年7月邓小平批评郑州

大学揭批查有阻力，刘建勋应声下台，全省又掀高潮，我也被转移到开封烟厂严加看管。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深夜，我被宣布逮捕，戴上手铐，塞进一辆北京吉普，左右两人押送，沿着郑汴大道从开封向郑州驶去。起初我并不知道后边还有一辆吉普车尾随着，中途偶尔向后边一望，才发现那雪亮的车灯、颠簸的车身和车前侧飘飘的红绸带。我在心里笑了一笑，猜着里面可能坐着我们的战友、兰考著名县委书记张钦礼。到了省看守所正给我办手续的时候，又听见有人进来问，党言川到了没有？给我办手续的看守小声回答，已经关进号（监房）里了。这我才知道，当夜河南革命造反派的三大著名头头同时被逮捕。党言川是河南二七公社的学生头头，我是开封八二四的学生头头，张钦礼是兰考卫焦的头头。河南支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派——河南十大总部、河南造总、开封左司、兰考卫东林焦的头头一个没抓，并且这时大都成了整我们的掌权者。文化

革命前，我对于监狱的了解是从小说里得到的，写的也都是国民党的监狱。特别

是小说《红岩》里描写的监狱，白公馆、渣滓洞，水牢、地下室，给我的印象格外深刻。所以一九六七年文革二月逆流中，我第一次被抓进开封市看守所的时候，一看不是地下室就觉得比小说里写的要好多了，只是卫生条件太差，使我生了满身虱子，戴着手铐的手一抓就是一两个；这次被抓来省看守所，感觉清洁程度比开封市看守所好了许多。虽然我知道斗争又升了一级，但愤怒在我在逮捕证上签字之后就已经转归于平静了——在逮捕之前，我认为是党在审查自己，审查一个党员；看到逮捕证时，我知道眼前的这些人根本不讲理了，已经不实事求是了，不再抱任何幻想，知道这是一次严酷的斗争，比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那次更为严酷；既来之则安之，问题反而变得简单。心里竟然漾着一种并不十分明白的乐观情绪，心情并不沉重，甚至没有什么失落感。看守把我的裤带和鞋带抽去，给我编了一个号码——010，告诉我以后提审叫 010 就是叫我，然后把我送进一个监房，随着一阵咚-噉里夸啦-咔嗒的熟练的关门声，我就成了河南省看守所的一个在押人犯，代号 010。

省看守所原名省直监狱，座落在郑州市纬四路十号。省直监狱可能是在国民党监狱的基础上整修而成的，保留着那时的八卦布局，犯人在筒子里分不清东西南北。解放后这里主要关押国民党战犯和全省重大案犯，五九年以后国民党战犯分批放完，这里就逐渐冷清起来，只有延安时期中共保卫局长、解放后中共开封市委第一书记戴季英还关在这里。他吃小灶，可以自由活动，并没判刑，是吴芝圃五十年代把他抓起来的。我们进来不久，他就被释放。从此，省看守所关押的人犯，共一百零五人，除少数过路号（临时羁押的外地犯人）和几个刑期很短的犯人外，九十多人都是造反派干部。当时郑州八科（郑州市看守所）和各地市县看守所，人满为患，也以我们这班运动犯为多。

我所在的监号，大约不到十平米，进门是一条横的、宽约一米的通道，通道一端放着茅桶。通道里面便是半米高的一条通铺，连我一共六个人就挤在这三米多长的通铺上，白天坐，晚上睡。享受每人一平米多的、被严格限制的“自由”。

几天之后，看守给我送来一份河南日报，证实了我的猜测，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日报头版右下以重要新闻的规格赫然登载一篇消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 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全文如下：

本报消息 为了深入开展“一批双打”斗争，坚决打击“四人帮的

社会基础，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清除出党，依法惩办；将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开除党籍，依法惩办。公安机关已将三犯依法逮捕。

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残酷迫害老干部，疯狂镇压群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罪恶昭著，不加惩办不足以平民愤。

原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包庇纵容坏人，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

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当地党委正放手发动群众对三犯的反革命罪行深入进行批判斗争。

决定中“罪恶昭著，不加惩办不足以平民愤”和“罪恶累累，民愤极大”这些话都是过去死刑判决书里才会出现的套话，其意已经十分明显。但罪状不实就没有震慑力。比如张钦礼“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遭受严重损失”，我一看就知道是颠倒黑白。张钦礼继承焦裕禄遗志，带领群众引黄灌淤，使二十多万亩盐碱沙荒地变成良田，彻底改变兰考面貌。这怎么变成了罪过呢？后来他出狱后去世，十万兰考人民自发为他送葬，民心苍天可鉴。

我们后来都没有按反革命罪判刑，也说明河南省委这个决定给我们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是错误的。后来我了解到，正是从这时开始，凡是曾经支持过造反派的干部，包括刘建勋纪登奎，无一幸免成了被清查的对象；工厂里直到班组长，农村里直到生产队长，全省达一百万人。

在看守所里就三件事：提审、放茅（放风）、打发时光。提审包含两个内容，一是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二是让揭别人的问题。我最想不通的就是让“揭”别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光明磊落，不是阴谋活动，至今仍是全世界政治最公开透明的时期，一切都在明处；我们只是按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指示领会精神，揭发什么？不揭发就说你态度不好。有一天半夜里把我提出去，说是省委常委会议在等我的揭发材料，一个问题是刘建勋支持攻打开封化肥厂的武斗，另一个问题是纪登奎派专列送我和八二四的群众回开封武斗。攻打化肥厂的武斗就没有发生过，开封化肥厂“左司”武斗据点是空十三师师长王洪智派人打入内部做工作和平解放的。

为此江青还称赞王洪智是“杨子荣式的人物”。刘建勋从来都不支持攻打化肥厂，我们也较早批判“向凡尔赛进军”、“武装保卫开封”的极左口号，制止了

攻打化肥厂的思潮，这些在开封人所共知。纪登奎派专列，他当时就没有那样的权利。解释后他们让我马上写成材料。当夜又提审一次，声色俱厉的对我说：“省委常委对你的材料很不满意！”让我再回忆揭发。不满意就不满意吧，那是事实！后来我也没再写，他们也没再问。

有一天，我们监房里关进一个过路号，十七八岁，一坐到床上就唱起了《狱中之歌》：“铁门呀铁锁呀铁锁链……”。唱着唱着，他忽然侧过脸问我们：“你们都是因为啥事儿进来的？偷了？抢了？X了？”我们回答都不是，他仰头一笑，连连摇头说：“不值，不值，不值！”然后继续哼他的歌。

1979年10月，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希正等四名工人首先被判刑。他们的问题68年已经由军管会判过刑，刑满已释放，这次以帮派体系包庇为名，同样问题再抓加判两年。他们不服，上诉到最高法，结果裁定再判无效，立即释放。最高法依法办事被河南从反面理解为“教训”。他们为了规避最高法的二审权力，同时避开1980年1月1日新《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约束，赵文甫通知全省将我们的一审权限层递下降，比如我们本应省高法一审的，下放到市中法一审；本应市中法一审的，下放到区法院一审，把终审权牢牢掌握在当地和本省，为他们违法突击判决扫清道路。

河南原省委书记吴芝圃五八年搞浮夸风共产风命令主义歪风，给河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当时赵文甫是吴芝圃的黑高参。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理所当然地批判了他们，赵文甫一上台就大搞报复，根本就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就在1980年1月1日新刑法正式实施前的一个月时间里，把数千人的案件突击判完。不公开审判，不出示证据，不允许辩护，在新刑法正式生效前运用新刑法的罪名入人于罪，判决书只说依法却不说依据什么法哪个条款。据当时省委领导人公布，全省开除党籍十万零六千人，判刑2700人，实际比这更多，开创了建国以来的冤案之最。

看守所里后来让送书，不知是不是《收获》杂志上，登载的两篇小说，给我思想影响很大。一篇是《罗曼亲王》，一篇是记不起名字的南斯拉夫的小说。《罗曼亲王》说的是一位王室贵族支持农民起义失败后受审的故事。他的妹妹买通法官，约定：只要在下次开庭审判时，罗曼亲王承认自己支持农民起义是受了坏人的蛊惑，就可以宣布无罪释放。妹妹将这一切转告给罗曼亲王。开庭这天，法官问道：你身为亲王，支持农民暴动，是不是受了坏人的蛊惑？罗曼亲王高声回答：“不，这完全出于我的自愿！”结果罗曼亲王被判流放。期满后靠妹妹接济生活，他还

是经常把妹妹接济的钱散给周围的穷苦农民。南斯拉夫那篇小说写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兵在树林里捉住一名南斯拉夫一腿受伤的战士，他们让战士面向大树要枪毙他，但战士勇敢转过身来面对着德国人。几次把他转过去，他又一条腿跳着转过来，表现出不惧死亡的英雄气概。这两篇小说极大鼓舞着我的信念和勇气。当我的《起诉书》发下来的时候，全号看过的难友都屏紧了呼吸，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因为起诉书把开封所有的武斗死伤的责任都堆到我一人身上，不了解实情的人看了自然会为我的生命担忧。但我清楚自己是无辜的，也做好了各种准备。当晚照旧倒头便呼呼大睡，给狱友留下深刻印象。 12月26日，

我接到对我的判决书（1979汴法刑字第365号）——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决书写了长长的四页，而且指控我“拒不认罪”。我怎么认罪呢？比如指控我1967年7月指挥人民会场武斗，武斗引起与八二四无关，我们一些人去解救二七被围人员，也不是我派的，唯一“根据”是说我“派周兵向黄泽生传达命令，向人民会场发动总攻”。但同是开封中法下达的、黄泽生的判决书中却根本未提我向他传达命令的事。这说明开封市中法本来就知道我是冤枉的，但照样判决。我当时签了反对意见，并写了上诉状。后来省高法裁定维持原判。1980年初省高法院长丁石到河南省第三监狱接见我，他说：“我们并不是非要判你们这些学生，关键是你态度不好，你要向***学习。”仅仅态度不好，不该判刑也要判吗？但那时向谁讲理呀。 判决书下达后，看守所安排一次与家属见面。看到多年未见的妻子，想着她这些年因为我所承担的压力和苦痛，忍不住热泪滂沱。我说：“这一次年数长，不是一年两年，不要再等我了，该走了……”妻子反倒很镇定，她说：“快别说这些！原来传说你要杀头，或者判无期，现在判二十年，总算有盼头，我等你！你不要流泪，我都不流泪你流啥泪！”

七十年代结束后，我被送到禹县河南省第三监狱——中国夏朝第一个监狱“钧台”遗址所在地，在四围大墙中度过了整整十年，那是我的八十年代！

文章发于《今天》杂志第93期“七十年代专辑”

2008年1月11日初稿

2011年10月13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9）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九节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与河北大学马曙光等的谈话

张庆奎：我们是河北大学的（陶铸同志一一和我们握手）

陶铸：你们来多少人？

马曙光：四百多人（把材料交给陶铸同志）

陶铸：你们住在哪里？

马曙光等：外交学院。

陶铸：你们回去，回去继续搞革命。

马曙光：这不光是我们学校的问题，是河北省委和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人提出“炮轰省委司令部”，省委的同志讲炮轰省委司令员就是反省委、反党！

陶铸：省委问题也要轰，你们可以和他们辩论。

马曙光：我们要和他辩论，他们不辩，他们发动天津市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向我们围攻，声讨我们。

陶铸：你们革他们的命就要有阻力，他们这种作法就是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你们要顶住，不要怕。

马曙光等：我们不怕。

陶铸：我们把你们的材料交给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华北局机关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地点：中南海办公厅。被接见单位：华北局机关“卫东”战斗队、华展革命造反小组和南开大学卫东、天津大学八一三、山西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

一、你们向书记处和李雪峰要什么材料，可以提出来，我们帮助你们商量。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你们采取行动以前应给我打个招呼。李雪峰的文件你们既然封了，就暂时封着。解学恭的文件你们已经拿去了，应该送回去，我派黄政委（北京卫戍司令部的）去，由他解学恭和你们的代表三方签字，先封起来，你们需要什么材料再商量。关于华北局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文件。这本来没有什么秘密的，如果你们已经拿走了，可以分分类，可以公开的就公开，公开不好的就封起来。你们青年人要看大方向，可以参加社会上的斗争，不要搞文牍主义。李雪峰这个人的毛病就是爱搞烦琐哲学，讲起话来没有完，你们不要钻进去。

二、李雪峰和彭真不一样，但他有他的问题。以前彭真根本没有把李雪峰放在眼里，他指挥不动他，李雪峰的检查，主席、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都看了，提了几点意见，他加上了，日期没改，李雪峰也有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李立三的问题，中央停止他出席会议，因为他没有参加文化革命，以前犯机会主义错误，还有其他问题，这个人不适合在中央工作，他最近还给中央写信，对停止他出席会议表示不满。

八千人大会（指北京市农村四清工作干部会议）是彭真留下的烂摊子，这个会是老实人办的事，本来就不应该开。现在有些人认为揪出来的就是死老虎，不感兴趣，这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主席思想。

三、接待不能解决问题，接待就是为他们服务，让他们回去，打回老家去，在本单位闹革命。华北局接待工作，你们要提意见，在接待工作中要反对经济主义，要什么，给什么，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这次接待和过去接待红卫兵不同，接待红卫兵是有组织的，一次可以接待一、二百万，后来来了些小同学，我们采取军训的方法也解决了，一次接待三百万。现在不同，来的大都是工人，徒步来的也没有想到有那么多，另外，一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彻底改，他们把矛盾上交，搞经济主义，要什么给什么，破坏生产。来的绝大多数人是受蒙蔽的。所以接待工作还要搞，一开始就要下定决心搞好，要有秩序，要和他们搞好关系，然后劝他们回去，自己解放自己。如果和他们采取对立态度，这就会便于坏人利用。我做工作还有自由，他们一出来就被揪走，被一个单位揪走，其他单位就找不到，不象我这样，每天可以做十七、八小时的工作。天津的

压力大，来人多，现在天津还有打架的现象吗？你们（指南大卫东和天大八一三）要写呼吁书，弄个宣言号召：一个矛盾不要上交，一个不要武斗。你们是造反派，你们要主动做工作。你们要制止武斗，要搞文斗。

四、你们是华北局的造反派，一定要负起责任来，住在机关的人一定要搞清楚，他们（指八一三和卫东）来源，很清楚，来源闹不清要出大乱子。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说不定什么时候搞你一下，当然也没什么。最近化工部出了问题，（有人）冒充三司的名义撞进去，把所有门都打开了，抢走了许多军事秘密，后来一查这个组织，他们连他们人员的姓名、籍贯也搞不清楚，看来可能是个黑组织。你们（指华北局卫东战斗队）要想法保卫好华北局机关。

五、（在登记每个人的政治面貌时）党员和群众，应该是党员和非党员，团员和非团员，不应该是党员和群众，如果那样就把党员和群众对立起来了，好象是把党员凌驾在群众之上。这个意见过去给安子文说过要改，就是改不过来，你们（指华北局机关卫东战斗队）是组织部的，你们以后应改过来。

（看到南大卫东同学时）我在南开也挂了名，但只能说我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因为我只上了半年大学，闹学潮，但和你们现在闹学潮不一样，你们现在是幸福的，对“八·一八”要分化、教育、争取，但不要分化得太激烈了，不然他们接受不了。八一八也做了点好事，调查集体自首是他们首先搞的，在北京第二司令部谈话时，他们很坦率，有马骏的孙子，他们承认他们是保守的，他们说他们要开门整风。

（南大“卫东”同学：“八·一八”说周荣鑫是卫东的后台。）因为他女儿是造反的，她还上过天安门，我当时不知道，不认得她，所以说周荣鑫是你们的后台，这根本不是。你们应提高战斗水平，不要搞小动作，要堂堂正正，最近清华把王光美骗出去了，后来蒯大富给我打电话，说他不知道。

卫东说：我们的广播社被八·一八砸了。

总理：现在天津还有打架的现象。

天津大学“八·一三”说：比以前好了点，但还有。

总理：你们是造反派，你们要制止，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要主动做工作，挑动武斗，你们写呼吁，弄个宣言。

机关“卫东”问：关于接待问题……

总理：你们是机关的造反派，一定要负起责任，查清驻在机关里各派的来源，他们（指八·一三和卫东）来源很清楚，是两个大学的造反的，他（指太原中学生）也来源清楚，来源闹不清要出大乱子，化工就出了乱子，名义上是三司，实际上是黑组织，前天他们冒充三司，撞进去，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了，抢走了许多军事机密，有坏人钻空子，你们（指机关卫东）要想法保卫好华北局机关。

机关卫东：华北局来人很多，大部分是天津来的。

八·一三：最近天津来了近两万，听说要有人来，说也不听。

总理：非说服不行，接待就是让他们回去，到本单位闹革命，一个是为他们服务，另一个是劝他们回去，打回老家去。

机关卫东：华北局书记处接待任务不明确。

总理说：接待就是让他们回去，到本单位闹革命，一个是为他们服务，另一个是打回老家去。

机关卫东：机关的干部不敢出来见群众。

总理说：我做工作还有自由，他们一出来，就被揪走，被一个单位斗了，其它单位找不到，不象我这样，每天可以做十七、八个小时工作。

八·一三：现在华北局人很多，吃饭很不方便。

总理说：华北局接待你们要提意见，不要搞经济主义。

机关卫东：同志们认为，李雪峰和陶铸是刘、邓司令部的哼哈二将。

总理：（笑了笑）那不见得。

卫东、八·一三：李雪峰的检查很不彻底。

总理说：李雪峰的检查到中央来，主席、中央常委、中央文革看了，提了几点意见，他加上，又缴上了，主席看了，日子没改。李立三的问题，中央停止他出席会议，因为他没有参加文化革命，以前犯机会主义错误，还有其它问题，这个人不适在中央做工作，他最近还给中央写了封信，对停止他出席会议表示不满。李雪峰也有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彭真半年来不紧张，养肥了，最近红卫兵把他揪出来，才紧张了一点，以前彭真根本没有把雪峰同志放在眼里，他指挥不动他，八千人大会（四清工作会议）是彭真留下的烂摊子，本来不应该开，这是老实人开的，同志们有意见，没有对旧市委，而对新市委，我同

意雪峰同志给他们文件，但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查他要经过中央同意，关于你们拿了解学恭的材料，要送还，你们，我们派代表军区政委黄同志。

总理说：（记下）并对他的秘书说，告诉北京军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你们不是就三个问题吗？一个文件，一个夺权，还有揪李雪峰。我不给你们出主意，夺华北局机关的权可以，不能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华北局是中央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这个问题，我请示了主席。如果华北局书记处有问题，可以改组嘛！夺权不成。夺了权，你们谁准备当书记呀！你们有没有准备？把你们的意见谈一下。你们造反，中央是支持的，但你们要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大概是你们感到没有事做了吧。现在雪峰在搞天津问题。天津很乱，很紧张。天津市委的六个书记都被揪走了。叫雪峰把天津问题搞出一个头绪来，再回机关作检讨。不是不叫他回来参加你们的会。主要是时间问题。

代表：从已揭发出的问题，我们认为李雪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开批判斗争大会，可是书记处却传达了所谓“中央的三点意见”……

代表：我们要继续贴揭发李雪峰的大字报，并要开揭发斗争李雪峰大会。

总理：可以贴大字报。你们把“打倒李雪峰”的大字报都贴到街上去了，李雪峰三个子都倒过来了。我每天都看到，也没有制止过。这两天，雪峰不能回来，是主席派他出去的。伯达同志和我都很关心天津的问题，北京正在搞夺权，很紧张，首先抓北京。其次华东，包括上海，第三就是天津，华北，东北，然后再抓西北和西南。现在正在紧张时期。雪峰检讨不是不可以，最好时间晚一点。他也没说不给你们检讨。主席也说过，检讨检讨就够了，总是检讨干什么……

64年主席提出过批判吴晗的问题。65年3月31日我到石家庄，4月2日到邯郸碰到刘子厚、雪峰。雪峰对我说，主席批评了彭真，说彭真认为批判吴晗是个人问题。六号回来，我对彭真说，雪峰对你有意见，说你对主席指示听不进去。彭真表示：“批评得对。我的认识同主席的话有本质的区别。”我当时还认为彭真还有点觉悟。雪峰当时就认为彭真是有问题啦……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石家庄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代表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石家庄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就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问题于八月二十六日在京达成协议。双方代表及军事代表在协议上签字。八月二十六日零点三十分至四点二十五分首长在人大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双方代表，二点十分周总理手举毛主席语录、精神焕发的与大家亲切会见，会见后陈伯达、谢富治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摘要如下。〕

谢副总理：

石家庄、张、宣、唐、秦地区经过双方协商和解放军努力，在陈伯达同志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央文革的指示，顺利达成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三个协议都很好，我们热烈地祝贺。（全场热烈鼓掌）。希望造反派，解放军同志严格地遵守这个协议。武斗不符合革命的利益，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武斗只能使敌人钻空子，只能使走资派地富反坏高兴。你们都是领导人，不要把群众引到邪路上去，武斗发展下去，就无法控制，就要走向反面。我们在重庆说过这句话，证明是对的。我们在毛主席所在地、在党中央所在地，达成这个协议要严肃地执行。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说过，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我们那里有观察员，看哪方执行得好。如果武斗发展到严重地步，那就不可救药。不要把这个协议当成儿戏，真正的造反派要遵守诺言，在毛主席身边，首都签订的协议是庄严的。人民解放军要特别负起责任来。抓革命、促生产。张、石、唐地区都有煤，煤是工业的粮食，我们造反派最关心革命，也要对生产有最高的责任心。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谁破坏工厂，煤矿、医院就坚决和他们斗争。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破坏生产、只有走资派、地、富、反、坏、蒋介石、美国才高兴。咱们下一步搞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搞完这个，两派有什么看法，会不会达成一个政治协议，搞一个革命的筹备小组。两派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要提出来，两派之间互相有什么看法，能不能搞一个大联合，三结合？对解放军可以批评。解放军错了就检讨。两派哪一派正确、哪一派有错误、都要互相检查，自我批评，100%的正确，100%的错误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三结合，大联合离不开解放军，但又离不开群众，张家口把××军调走，光剩 793 行吗？两派汇报时，我

能说的讲两小时就不少了，我们每天都很忙么，河北省现在一个专区、一个专区解决、在会上不要告对方的状。

陈伯达同志讲话：

这个协议是大家努力，两派协作，能达成协议，这是很大成功，是我们走向胜利的一步。有了协定，不等于实行，不等于就是实施了。要看大家的行动，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把字面上写的东西，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样，不要计较个人东西……。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谢富治第四次接见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张家口等地两派代表

〔时间：凌晨。郑维山在座。〕

同志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家搞联合，搞团结，三个依靠，不管解放军有多少缺点错误，都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是骨干。最近中央发了拥军爱民的指示和社论，这是大事不是小事。近来有些人，个别人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付主席亲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有些动摇。对人民解放军有意见可以提，个别人不怀好意，大家不要失掉警惕性。

谁是真正的革命派，谁不是，主要靠毛泽东思想，要看言论行动，不是靠造谣，用人家的讲话，夸大、歪曲，这些都靠不住，只会起麻痹的作用，最后不会起好作用，谁讲的话多，谁的材料多，谁反映多，就听谁的？中央看事实，不可靠材料靠不住。这种作风不是毛主席的作风，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谦虚、谨慎。希望各地武斗要制止，不管是哪一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张家口石家庄唐山等地代表讲话
伯达：

革命靠自己。毛主席制定的 16 条，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所有外单位，不要干涉其他单位。外地互相干扰，就扰乱了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矿上不能分成两派，只能有一派，就是毛泽东思想派。搞两派毫无道理，毫无理由。我们对你们怀着最大的好意，对你们双方无成见，我们担心你背后有人捣鬼。一个工人阶级不可能设想非要停产武斗才舒服，一定是有人告诉你们怎么干，在你们幕后指挥，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指双方）可能隔着好几层，我说你们这几个地区都要注意，这是肺腑之言。

谢副总理：

应该抓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狠批判。抓革命促生产，在革命、生产上做出成绩，你打我，我不打你，应该是这样的造反派，对你们现在的造反派还要考验。现在有少数造反组织不纯的问题，有地、富、反、坏、右，甚至有杀父之仇的人。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起作用，特务、地、富、反、坏、右对我们有仇恨，唯恐天下不乱。煤矿停产，帝国主义、苏修、蒋介石才高兴，你们没有敌情观念。

在生产中坚持生产一直表现好的，不管他是哪一派，都要表扬和奖励。你们大学生包办一切，大学生不懂生产的重要性，吃的是农民的饭，住的是工人盖的房，他什么都不满，处处包办人家的事。现在有相当的造反派，不关心生产，不关心生产的造反派不是好的造反派。不参加生产，把毛主席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抛到一边，只为一小撮的利益。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河北省保定邯郸地区代表的讲话

江青同志讲话是代表中央的重要讲话，我们要学习，讲话很重要，很适合，不是普普通通的讲话，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以江青同志讲话的精神，总结一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我们伟大的领袖以及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教导我们，搞革命的大批判，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彻底批判，彻底搞臭，这是当前头等任务。第二是革命的大联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工人在一个工厂做工，是阶级兄弟，在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下，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

为什么不能联合呢？联合就有力量大，贯彻就是有力量，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可以集中力量批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联合就不利。联合起来对走资派、地富反坏右不利。他们就怕我们联合。

工厂、学校都应该联合，特别是中学，在一个学校读书，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可能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犯一些错误，可以改的，改了，就什么事也没有嘛！所以希望你们下一步，关键的问题是革命的大联合。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农民组织与人民解放军大联合，以人民解放军为骨干的大联合。

保定成立革命筹备小组、工代会、红代会，联合起来，这件事联合起来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和革命路线，不联合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大批判，关键是大联合，这是毛主席、中央文革最关心的，你们要立新功。到北京后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文件，最近特别要学习江青、戚本禹同志的讲话和文汇报的社论《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想一想是派性高于一切，还是党性高于一切。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石家庄天津张家口唐山代表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三点十七分至五点四十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

陈伯达同志：今天是一个革命的大联合的会议，天津联合了没有？（答：没有。）可惜！你们心能安吗？就是我们着急，你们不着急？！天津上次那三条你们看到了没有？你们看一看就知道工人阶级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理由，你们天津工人阶级分两大派打来打去敌人高兴，我们不高兴。

毛主席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是一个阶级，工人阶级内部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什么理由分成两大派。”听懂吗？（答：听懂了）明天《人民日报》有篇社论，希望同志们好好读一读，里边引用了毛主席一段很重要的话，对你们两大派、三大派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你们好好读一读好不好呀！（答：好！）你们石家庄已经签订了协议，我们工人阶级就是一个派，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

一个阶级不是什么派别，我们讲的都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么！没有讲什么派别么！

天津附近天津的各派不管那派，也不管那个学校，如果到农村里边制造派别，制造武斗，抢收庄家，那是罪过，绝对不允许的。（严肃）郊区的农业生产，按照往年一样，那个生产队生产的，那个生产队收购，一定要割好、收好、捆好、分得好，不能抢公家庄稼，如果那一派有动员农民抢割，那是很大的罪过，历史是不能宽恕你们的，大联筹要特别注意。

告诉你们，今年收成是空前的好，农民希望丰产、丰收，丰产要不丰收可能由你们下去的人挑动起来的。现在大家不去干了，要把脚停下来，要把手停下来，要把口停下来，农民要按生产队去收割，收割好，保存好，分配好，你们不要去干涉，这对你们是一个劝告，也是一个警告，我看无产阶级革命派都会懂这个意思的，赞成不赞成？（答：赞成）

郑维山：我建议天津、石家庄、张家口、唐（山）、秦（皇岛），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指示传达下去，同意不同意？（答：同意）

谢富治：下一步搞政治协议，根据江青讲话抓大方向，抓大批判，要搞大联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关心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派都是工厂的工人，都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一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不能联合呢？联合起来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利，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只有对一小撮走资派没有利，对英国、美国、苏修、印度反动派都不利，对革命都有利。我们有联合的基础，你们都是工人阶级，应该联合，而且所有的造反派及全体人员都要联合，不能打内战。下一步最关键的关键是革命的大联合，搞筹备小组，到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河北五个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的讲话

〔时间：凌晨。摘要〕

谢副总理：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伯达同志是中央文革的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司令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为首的，是毛主席司令部主要成员。

你们鲁迅公社有几个问题，应提起高度注意，你们不改变态度，没有好结果，根本大方向得好好扭扭。一个组织纯洁性；二是对解放军的态度；三是斗争政策，方法是适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三个问题要好好考虑，今天我只讲了你们，不是说解放军和另一派没问题。

陈伯达同志：

要按行政系统实行班系大联合。河北的问题，是个很头痛的问题，我不想管，让你们吵去，闹去，总会闹出个头绪，总有一天不想闹了吧，不过我想表示一下态度，刚才谢富治同志的意见我完全拥护，拥护他对你们的批评，特别是对鲁迅公社的批评，你们要知道，你们鲁迅公社的名字，还是我给你们改的。（呼口号）

不要光喊口号，要真正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只有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这样喊就是真的，如果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光喊毛主席万岁，就是心口不一致，是言行不一致。现在我再给鲁迅公社提一个建议，我不赞成你们再存在，这是我的意见，这个对不对让你们考虑嘛！你们（指鲁迅公社的对方和红楼派）不要这样吗，对不对让他们自己考虑吗！毛主席告诉我们，要按系统、按班级、按行业搞大联合，你们鲁迅公社是跨行业的，是个大杂烩，甚至谁也不认识负责人，跨行业的。我建议你们组织解散（谢：别的地方也要解散）。什么马路兵团、八五风暴等全要不得。要按毛主席指示，按系统、按班级、按行业大联合。我要批评你们这一边的人，那边鼓掌，这边不鼓掌，这边鼓掌，那边不鼓掌，这完全是派性在作怪嘛！你们（对红旗）现在不是有个共同的目标吗？（搞红旗及××），这个目标是错误的。（谢副总理：你们反对××军是错误的。）反对××军是错误的，反对其它军也是错误的，你们都不要在这里钻空子，两派都有这个企图，有的人就是钻空子，有的钻得厉害，有的差点，反正都不是顾全大局，都不是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听懂了吗？

走资派就是乘机利用矛盾，挑拨离间，挑动群众斗群众，我希望你们大联合，不希望挑动群众斗群众，走资派就是利用你们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就是专门在背后活动。你们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好好学习，特别是《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

对自由主义》和平时要读的《老三篇》，大家多作自我批评，以后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不要搞大杂烩了。大杂烩是最危险的，要毒害你们的，要断送你们的前途的。

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有一天不知怎么发了精神病；要揪出窃取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阴谋家——陈伯达。文章写得很长，写得很无聊，我不想看，最后谢富治同志告诉清华大学，你们怎么不处理呀！他们就把他抓到公安部。我告诉谢富治同志不要抓，还把他放回清华，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要采取专政措施。事实上，他出大字报那天，他那一派 414 就把他藏起来了，怕把他打死。如果把他打死群众就犯错误。不应该打，更不应该打死。讲这个故事，说明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学习再学习。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报告

1968. 01. 29；中发 [68] 21 号

中央同意郑维山、李雪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二十一名委员组成，并由李雪峰同志任主任，刘子厚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马辉、曾美、张英辉、刘殿臣、耿长锁五同志为副主席。同意河北省省会迁至石家庄。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毛主席亲临河北视察时，对河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英明指示。河北省的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干部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彻底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在河北的代理人林铁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河北省革命同志最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全省十个专区，有九个专区和大多数县、市都成立了革命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军区认真地执行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河北省的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河北省的形势大好，革命和生产取得了双丰收。农业获得了全面丰收，工业、交通战线上也取得很大的胜利。

中央希望河北省革命委员会、驻河北省的人民解放军、河北各地、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全国亿万军民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河北省革命委员会隆重地宣告成立了！

至此，整个华北地区都已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对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谨向河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民解放军驻河北省全体指战员和河北省四千三百万革命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河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非常关怀，对每一个关键问题，都作了伟大的指示，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作了英明的决策。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河北省地处我们的首都北京的周围。长期以来，中国赫鲁晓夫千方百计地向这里插手，伙同其在河北省的代理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臭名昭著的“桃园经验”，就是在中国赫鲁晓夫导演下，炮制出来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河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反复的较量，英勇的斗争，把他们打得落

花流水，一败涂地。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河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充分证明：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关键。只要抓住这个关键，让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掌握，变成群众自觉的革命行动，形势就会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就会越来越好。

人民解放军驻河北省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把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以最大的热情，下最大的决心，用最大的力量，采取切实的措施，帮助革命群众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机关、学校、直到街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红花开遍河北全省。

他们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突出一个“公”字，狠抓一个“用”字。突出无产阶级的“公”字，就是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地斗私批修，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狠抓“用”字，就是发扬毛主席历来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了就用，立竿见影。这样做的结果，就大大加快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各级革命委员会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河北省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无限热爱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决心做学习、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千百万工农群众，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起来，充分发挥革命主力军的作用，这是河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更大胜利的重要保证。

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事情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抓什么？抓思想，抓根本。根本就是要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就是要以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中心，斗私批修，言行一致。这是最大的无产阶级政治，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抓住这个根本，工作就有标准，战斗就有力量，前进就有方向，就能一通百通、百战百胜。

我们相信，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一定能够成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革命化、战斗化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一定能够成为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率领全省人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社论）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设置工作机构的情况报告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设立了办事组、秘书组、保卫组、政治部、生产指挥部等五个组（部）。工作人员共为八十人，其中军队支左干部四十一人，地方革命干部，包括生产指挥部原有干部，共三十九人。各组（部）的人数为：办事组十人，秘书组十五人，保卫组四人，政治部二十三人，生产指挥部将原有的一百二十人，减为二十八人。此外，另有附属、服务人员三十多人，包括炊事员、电话员、机要交通员和汽车司机等。

从革委会成立近一个月的情况看，坚持上述编制人数，很不容易。新的革命机构，同旧的观念、旧的不良作风，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官僚主义习气、旧的习惯势力一直在从多方面压迫、干扰和冲击这个革命新机构。有的刚开始工作，还没有调查，没有到群众中去，什么情况不摸，就急于发号施令；有的想用自己一个部门的名义，向全省发号施令。没有准备，不调查研究，就要开这样那样的会，发这样那样的文件。个别人轻率处理重大问题的事也有露头。按老框框分工，机械、过细地分工，按自己头脑里主观想象地分工，因循老一套的办事章程，很容易陷到事务主义、文牍主义的包围圈里。因而总觉得人手不够，想增加编制，或者是增加临时机构和临时工作人员。如不采取坚决态度，就有复辟官僚机构的危险。事实上革委会刚成立，工作才开始，人员还没有完全摆布开，提出增人增机构的要求，完全不是客观实际的需要。这只能说明是一些人头脑里习惯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旧观念、旧作风在作怪。根本原因，是我们革委会的领导班子、工作人员突出政治、思想革命化很不落实。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我们一定遵照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困难，按现在的编制毫不动摇地坚持实行、实验下去。

我们正在大抓领导班子、工作人员的思想革命化。向大家传达了主席和中央同志对我们这个新机构的亲切关怀和谆谆告诫，对大家的教育很大。我们决心以“斗私，批修”为纲，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有关指示，依靠群众，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同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旧的习惯势力作坚决的斗争，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不断克服来自我们内部和外部的这些阴暗面。

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集中力量狠抓根本，狠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每一个领导同志起，都要到群众中去，注意时时刻刻联系群众，决定在最近一个月内，让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作人员到基层去，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作调查研究，进行“练兵”，然后总结经验，定出制度来，决不让少数人空忙、乱忙事务，或者不切实际，乱出点子。

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别人，个别部门决定重大问题。充份发挥毛主席关于“三结合”思想的伟大作用，发挥革委会内人民解放军同志、原造反派战士和革命小将的作用，发挥革委会全会、常委会的集体作用。无论是从军队来的或者从地方上来的革命领导干部，都要注意和造反派、革命小将的联系，学习他们的长处，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至于全省工代会、农代会（拟仍叫贫下中农代表会）、红代会何时召开，打算分别研究定出办法后再开。严格控制会议、文件，不经革委会、常委会、核心小组的讨论决定，不能开会，不能下发指示性的文件。

坚决堵死增加编制的路。拟规定今后增加一个人的编制，也必须经过革委会全会讨论通过。

鉴于原省委和省人委机关有的单位，假借革委会的名义发号施令，我们重申：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并规定革委会机构同旧政权机构，必须严格区分开，旧政权机构不能发号施令。它们集中搞斗批改，各种“业务班子”，拟分别审查，划定范围及职责。拟彻底整顿《河北日报》，坚持只能在从思想到组织都要求革命化的基础上出报的原则，如办不到，宁可暂时不出，或者先出三日刊，绝不能让拿出大报的“业务”要求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以上报告当否，请审查指示。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

一九六八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设置工作机构的情况报告

1968.03.09；中发〔68〕39号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

中央同意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三月二日关于设置工作机构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很好，特转发各地，希望你们在各级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设置工作机构时，都能参照执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三月九日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讯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七月二十八日三时四十二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七点五级，震中在北纬三十九点四度，东经一百一十八点一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灾区人民群众十分关怀。地震发生后，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北京市委和震区各级党组织，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领导群众迅即投入防震抗灾斗争。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已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赶到灾区指挥防震救灾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有关省、市卫生系统，已组织大批医疗队赶赴现场。大量医药、食品、衣物、建筑材料等救灾物资源源运往灾区。国家地震局和河北省地震局已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监视震情。受灾地区人民群众已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展开抗灾斗争。他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

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来源：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

中央号召灾区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讯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了慰问电。电报全文如下：

河北省、天津、北京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市警备区并转唐山及其附近遭受地震灾害地区的各级党委、革命委员会、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向受到地震灾害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致以亲切的慰问。

中央相信，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定会在省、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和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中央号召灾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1976.08.18；中发[1976]13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

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灾区人民极为关怀。中央发了慰问电，派出了慰问团，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十几万解放军指战员，两万多名医务工作者，数万名各方面的支援人员，迅速赶赴灾区，抢险救灾。全国各地和人民解放军，及时支援了大批抗震救灾物资。

灾区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临危不惧，英勇战斗，深入批邓，抗震救灾。各级领导站在斗争前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解放军奋不顾身，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先人后己，互相帮助。团结一致，同自然灾害斗，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斗。在短短的时间内，创造了许多奇迹，取得了重大胜利。大批受难的阶级兄弟及时得到了抢救。伤员得到了妥善治疗。受灾群众的吃、穿、住得到了安排。铁路、公路全部修复通车。供电、通信线路迅速联通。灾区农村恢复了生产，正在学大寨，夺丰收。唐山地区的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开滦煤矿开始出煤，唐山电厂开始发电。天津、北京人民坚守岗位，抗震救灾，以更大的干劲抓革命促生产。各条战线涌现出大批英雄人物。整个灾区到处是团结战斗的革命景象。

这一切充分证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的各级党组织是坚强的战斗堡垒，我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我们的广大干部是好的，我们的人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经得

起严峻考验，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充分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一方受灾，八方支援，组织起来，人定胜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对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

要彻底战胜这次地震的严重灾害，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城镇、农村，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还要作很大努力。

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联系实际，集中火力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促进革命团结，推动各项工作，发展大好形势。

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学习灾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用更大的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夺取全国农业的大丰收，生产更多的煤炭、钢铁、电力、机械、化肥、医药和轻工业产品，一定要搞好铁路运输，完成和超额完成铁路运输任务，用实际行动支援灾区人民的抗震救灾斗争，努力争取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努力做好支援灾区的各项工作。支援唐山、天津恢复生产的单位和承担生产、运输抗震救灾物资的工厂企业，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担负治疗伤员任务的单位，要继续努力，使伤员早日恢复健康。

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于反革命，对于打、砸、抢者，要实行镇压。对于阶级敌人造谣惑众，扰乱社会治安，煽动哄抢物资、破坏交通运输，要发动群众坚决斗争，对其中情节严重者，要依法惩办。

各级党委要检查一下今年以来的工作，按此通报精神，与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对今后四个月的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加强领导，促其实现。

中央相信，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英雄的中国人民，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新胜利，夺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九日发出
共印四九、九九七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2008 年 9 月 21 日初稿

2011 年 10 月 14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10）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十节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远同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心连心。一年多来，湖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人王任重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反复较量和英勇斗争，给了阶级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都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去年七月，正当湖北地区处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生死决战的关头，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派中央领导同志来处理武汉问题。阶级敌人走投无路，疯狂地制造了“七·二〇”严重政治事件，毛主席及时作了一系列极其英明的决策，使阶级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伯达、康生、富春、江青等同志出席首都百万革命群众大会，全国亿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给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巨大支持。八月九日，林副主席召见军区负责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中央负

负责同志多次接见武汉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给予了亲切教育和鼓励。特别是去年九月，毛主席亲临湖北视察，为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作了极其英明伟大的指示，又两次亲切接见在京学习的湖北武装干部，这是对湖北全省军民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给了广大军民无穷无尽的力量。十月，毛主席专门邀请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武汉，又为我们送来强劲的东风。“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事事为我们操心，处处为我们撑腰，步步为我们领路，红太阳照亮了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的心。紧跟毛主席，无往而不胜，全省军民满怀革命激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最衷心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英明决策，迅速调整了部队部署，成立了武汉警备区，调配了湖北省军区各级领导干部，稳定了机关，加强了“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狠抓了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支持左派，进行艰苦、细致、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了“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教育争取了“百万雄师”受蒙蔽的群众，发展壮大左派队伍；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广泛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大大增加了军民团结。毛主席最新指示发布后，军民一起，立即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大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出现了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读毛主席著作，大抓斗私批修，大破派性、大搞联合，大胆解放干部的大好局面。毛主席这一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纲领，把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在一年多来剧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经受了严峻考验和锻炼，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当前，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基本成熟。

一、毛泽东思想大普及，人民群众觉悟大提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遍及城乡各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规模空前，气势磅礴。据去年十二月份粗略统计，全省已办学习班一万多个，学习人数百万以上。到处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到处是“斗私，批修”的广阔战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受到严肃批判，无产阶级党性大大增强，有力地促进了思想革命化。在全省范围内展现了一个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极其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大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涨，军民关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密切。广大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被揪出，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一年多的英勇奋战，彻底摧垮了中国赫鲁晓夫盘据在湖北的反动堡垒——以王任重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百万雄师”彻底瓦解，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悟，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断壮大，在组织上、政治上都占了绝对优势。

三、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发展迅速，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比较扎实、牢固。在毛主席最新指示指引下，从工厂到学校，从武汉到专县，掀起了一个抓基层、打基础，扎根群众，上筹下联，下促上带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高潮。武汉市八百零四个大、中型国营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部份建立了革委会；二十三所大专院校，十九所建立了革委会，三百零九所中等学校，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实现了大联合，多数建立了革委会，在此基础上，一月中旬召开了工代会、红代会，一月二十日成立了武汉市革委会。八个专区已有宜昌、襄阳、恩施、郧阳、东风、黄冈六个专区建立了革委会；七十五个县（市）已有四十七个建立了革委会，三个建立了革筹小组。荆州、咸宁两个专区、黄石市和其余二十五个县（市）正在积极筹备建立革委会。

四、领导干部大批解放，上下关系大大改善。由于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经反复，大多数领导干部站错了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群关系一直紧张。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校班，各级领导干部在革命小将的诚恳帮助下，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在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纷纷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

线上来，得到群众谅解。目前省、地、县机关中层干部大多数已站出来工作，省直的三百四十四名部、委、厅、局以上领导干部，也有一百三十四人站了出来。还有一批干部，正在军区学习班学习。

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抓革命，促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广大革命群众在狠抓革命的同时，猛促生产，猛促工作，猛促战备，取得了很大成绩。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情况良好，农业生产全面丰收，市场供应正常，社会秩序稳定。

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决定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在大好形势鼓舞下，广大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正以战斗的姿态决心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全省人民迫切要求早日建立省革委会，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份协商，已经基本筹备就绪。

革委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革命群众一百名，占百分之五十七（工人三十五名，贫下中农三十名，学生二十五名，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组织十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三十名，占百分之十七；解放军二十五，占百分之十四；留作动机二十名，占百分之十一。

常委会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群众十七名（工人九名，贫下中农二名，学生五名，其他一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十一名，解放军九名。常委名单：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姜一（原省委候补书记）、赵文华（原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原粮食厅副厅长）、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李周仕（原省气象局局长）、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舜（女，原地质局处长）、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赵兰田（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王步青（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吴永光（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方铭（武汉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警备区政委）、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朱洪霞（钢工总负责人）、胡厚民（钢工总负责人）、夏邦银（钢工总负责人）、邓锦福（钢九·一三负责人）、钟锡钢（钢九·一三负责人）、潘洪斌（工造负责人）、顾建堂（长办联司负责人）、王屏（女，工人，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杨玉珍（女，武钢工人）、饶兴礼（劳模，原省贫协副主席）、杨

道远（钢二司负责人）、方保林（钢二司负责人）、张立国（新华工负责人）、龙铭鑫（新湖大负责人）、谢华之（三司革联负责人）、郑军（省直红司负责人）、暂空一名贫下中农。

建议由曾思玉同志担任革委会主任，由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等八同志担任副主任。

遵照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革委会的机构力求精简，初步意见，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工作人员二百人左右，从原直机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中抽调，并从工人、学生和解放军中选配一部份。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中央批示。

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01；中发〔68〕22号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洪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堂、王屏（女）、杨玉珍（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下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湖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极大关怀和及时指导，在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明了方向，都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前进的道路，特别是去

年毛主席亲临湖北视察，对湖北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胜利起到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湖北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湖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一年多来的剧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战胜了以王任重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各方面的干扰，经受了严峻考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中央希望，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大同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湖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长江万里起宏图——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的锻炼，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武汉，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

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个胜利！这是无产阶级走向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途径中又一个喜讯！我们向湖北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驻湖北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无产阶级的战斗敬礼！

英雄的武汉和湖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一直是在毛主席亲切哺育、亲自统率下，沿着毛主席亲手开辟的革命航道破浪前进的。“大风大浪并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多次畅游长江，驾驭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伟大气魄，极大地鼓舞着湖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他们在全国亿万军民的强大支持下，迎着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彻底揭露了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人王任重一伙，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得落花流水。斗争是剧烈的，以王任重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曾经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然而，蚍蜉撼树谈何易，一小撮走资派的任何绝望的挣扎，都挽救不了他们覆灭的命运。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紧要关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以英明的决策，果敢的措施，领导着湖北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终于夺得了湖北省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巨大功绩的人民解放军驻武汉及湖北各地部队的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坚决支持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满腔热情地帮助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贯彻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作了深入的艰苦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革命群众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的亲密无间的生动局面。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首要的任务是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要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树立毛主席亲自倡导的革命好学风，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搞好思想革命化。在这里，关键在于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我们希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认真实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保持和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心全意为广大革命人民服务，同种种脱离群众的旧的习惯势力彻底决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事业，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从思想上、政治上不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推动各单位的革命三结合和斗批改，把湖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全湖北、全中国东风浩荡，红旗如画。我们深信，在湖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鼓舞下，长江两岸、中南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必将继续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奔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社论）

八、中央解决湖北军队内部问题

(二) 制止武斗，反对三个分裂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黄永胜接见曾思玉刘丰时的讲话

参加接见的中央首长：总理、伯达、康生、春桥、文元、富治、永胜、法宪、东兴

武汉军区被接见的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方铭、肖前、闵学胜，还有毕占云、张广才、孔庆德、姚喆、叶明、韩东山

会议开始。总理要康老主持开会，康老对曾、刘说：你们先谈谈吧。

曾思玉、刘丰同志汇报了武汉地区军内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当曾、刘首长汇报时，中央首长不时插话

当汇报到李迎希问题时，总理问：“李迎希是什么时候到武汉来的？”永胜回答：“是从工程兵调去的。”

总理问：“李迎希到北京来学习过没有？那几个人来学习过没有？（指跟李迎希跑腿的家伙——编者）你们应该把他调来学习，比摆在那里好。

当汇报到李的错误。汪东兴同志说：“他表演得还不够吗？”

当汇报到王盛荣的问题时，黄永胜同志说：“他是二十八个半当中的吗？”

总理答：“是二十八个半当中的！”

黄永胜：这个人从苏联回国以后，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

总理：对！

谈到武汉黑手问题时。康老说：杨光华这个人现在是干什么的？（杨系湖北省政协常委，已被钢工总逮捕。）

总理说：“王任重的党羽还没有死心。”谈到群众组织跨行业问题时，总理说：“跨行业的组织，中南五省都没有解决。”永胜同志说：“跨行业问题不仅武汉，广州也没解决。”

谈到大批判搞不起来时，永胜又说：“与广州一样！”

当谈到揪出杨、余、付后。有人说杨、余、付在武汉安了钉子，要抓武老杨时，

总理生气地说：“抓武老杨，抓谁啊！”曾司令员笑着指指刘政委，

总理说：“我在那里嘛，谢副总理在那里嘛，汪东兴在那里嘛，毛主席在那里嘛！都在那里，我们是大多数嘛！”

当谈到李迎希问题。康老说：“注意一点啰，警惕秘书帮倒忙啊！”永胜说：“××军区也有秘书帮倒忙的。”

当张广才讲话时，康老问他：“李迎希问题你看怎样解决呢？”

张广才吱吱唔唔。

永胜质问他：“你说这个录音是真的还是假的？（录音指去年二月六日在李迎希家一次密谋夺权的黑会录音——编者）录音上有这句话吧？‘我敢拿下来，拿得下来。我过去指挥过七个军，不过这话要出在你们的口，不能出在我的口’。”（黄永胜同志非常气愤。）

下面是首长发言：

黄永胜：我和吴副总长主持开了两个半天大会，后来曾思玉、刘丰同志又主持开了七次会。对武汉情况清楚了。武汉问题我看首先要解决军队本身问题，要稳定军队。要更好地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大家一起进行工作，才能把工作搞好。我参加了两个半天会，我清楚。两个半天会李迎希不承认错误。不能因为出了七·二〇事件，李迎希就没有错误了，各有各的账。不要因为陈再道。钟汉华犯了错误，李迎希的账就没有了，不能这样说，各有各的账。去年二月份，还没有发生七·二〇事件嘛！两次会议李迎希态度很不老实，狡辩。许多事实摆在那里，就是不承认。他以胜利者自居，正确者自居，造反派自居。因为思想上有这个自大，所以他不认为自己有错误。军队的权怎么能夺呢？怎么能夺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权呢？夺权本身就是错误。上次会议主要是批判李迎希，没有批判你张广才，你也是有严重错误的，你自己年令已这样大了，自己要很好地接受教训，要很好地保持晚节，不要以胜利者自居，你们夺权难道是正确的吗？他们回去以后（指孔、韩、姚、叶等），你们不是照顾大局，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你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采取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还要搞平反？！与社会上搞在一起，影响军队稳定，军队不稳定，反映到社会上。我认为李迎希有什

么反可平呢？夺权还有什么平头呢？夺权是错的，还有什么反可平呢？陈再道有错误，但不能夺权。我们参加了两个半天的会，我与吴法宪同志作了一些工作，要他们团结。批评了李迎希以后，他搞了四十几个问题。他写了一个东西，要我转，我不给他转，李不但不检查错误，还想捞一点东西，他是猪八戒倒打一耙。他没有老干部样子，没有共产党员的风度，他不能回武汉去，要留在北京学习。如果回去他还要搞平反，要到社会上去，要捣你们的蛋。我看，李迎希这个人，过去我不认识他，他去军委工程兵工作时，我才认识他。我看这个人典型的兵痞子。张广才，你六十九岁了，要保持晚节，你今天晚上，对李迎希的一段话，说得是不好的，你自己没有一点自我批评，你这样搞法，没有党性，不照顾大局。我开了两个半天会，就有这么一点印象，这几个同志（指孔庆德、韩东山、叶明、姚喆等人，以下同一编者）态度是好的。他们会上都检讨了。我看叶明同志就检讨得很好吗！都上了纲吗！思想提高了嘛！不是降低了嘛！（总理插话：叶明、孔庆德在七·二〇做了些事，还有功嘛，我们可以作证。）除没有说自己是现行反革命以外，都说了。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老是说人家压你，压你什么，反对你夺军权是对的，否则什么人都可以夺权啦！要平反，你要陈再道、钟汉华去平吧，有什么反可平，让人家出来工作嘛！这样搞不行嘛！其它几个同志要挺起腰杆来，大胆工作，不能让曾、刘唱独角戏。休息的同志要老老实实休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斗私批修，要保持晚节。要照周总理讲的学到老，做到老，跟到老、改到老。你是老干部，老革命嘛！李迎希留下，不能回去。如果回去，不会老实，还要搞活动。

吴法宪：情况我了解一些，去年二月份就知道李迎希、张广才的夺权，徐向前那时是全军文革小组长，把李迎希、张广才叫来，李迎希他们是坐飞机来的。下飞机后，李说这架飞机是我的，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动，简直是笑话！那有你的飞机呢？只能给你派飞机，调动飞机是空军的职责，那时谈话时，徐向前、王新亭、徐立清开会，李迎希态度很坏，徐向前当时态度很粗暴，是不对的，但处理李不能夺权是对的，尽管那个时候是对陈再道、钟汉华，这个问题要搞清楚，那时陈、钟还没有犯七·二〇这样大的错误嘛。这时姚喆、叶明、孔庆德、韩东山、等与陈再道、钟汉华有区别的，不能看成与陈、钟一样。要他们出来平反，是错误的，当时没有做结论嘛。没有什么反可平嘛，你好好休息嘛。你的错误，

一要夺权，二是揪住几个同志不放，是错误的，夺权确有此事嘛。另外，机关里有坏人，抓住了李、张，互相利用。冲击军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你们本来可以向他们做些工作，你们不去做工作，反而支持他们，破坏军队稳定，破坏文化大革命。军内外挂上勾是错误的，起了很坏的作用。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好好学习，不要搞私心杂念。武汉军区曾、刘都是新去的吧，那些副司令不出来工作是不行的。他们的错误与陈、钟是有区别的。他们在北京学习过。几个人的检讨是高姿态的，挨了许多的斗，没有怨言。七·二〇以后很快转变过来了，支持曾、刘是好的，你们看不到。李迎希是主要的，其次是你张广才，毕占云也沾了边，毕也要注意，不要搞私心杂念。文化大革命搞私心杂念就要犯错误。主要是李迎希，对你们两个同志我就不多讲了。今天是中央碰头会，我就不多讲了。

总理：现在还在活动的有哪一些人？还有跑腿的吧？（曾思玉同志回答：机关里有部分跑腿的）

康生：杨光华是贺龙的人，在满洲当省委书记时，叛变了，跑到苏联。我参加第三国际审查过他。斯大林肃反时把他关了起来，赫鲁晓夫上台又把他释放了。他老婆是××人的女儿。回国后他找到贺龙，后来贺龙又通过安子文把他安到湖北。宋侃夫、刘惠农把他弄到武汉。

（当曾、刘提出王、宋、刘要揪回武汉批斗时）

总理：宋侃夫、刘惠农可以搞到武汉斗，要先解决军内问题。

东兴：谢滋群这个人是不好的，是五大干将之一。吃喝玩乐都是这些家伙搞起来的。

总理：李迎希不能回去，其它几个同志什么时候回去啊？军区问题解决后再解决地方问题，王任重、宋侃夫、刘惠农都在这里，还有那些黑手，都搞来，进行批判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大批判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大联合，才能解决跨行业问题，黑手才能抓出来。如果不解决跨行业问题的话，坏人就会互相包庇起来，就揪不出来。军队的问题，李迎希要批判，张广才还要作自我批评，其它几个同志已经作了检讨。叶明、孔庆德在七·二〇作了些事嘛，有功嘛。黑手要抓出来，李迎希就是黑手嘛！干部有问题的，可以来，解放的干

部也可以来，在这里做工作嘛！坏家伙也可以到这里来批判。跨行业的问题也可以到这里来解决。解决得好对广东、广西、湖南、河南都有影响，可以解决一些。

康老：跨行业不解决呀，就不能真正联合起来。

(谈到揪武老杨和抢枪时)

康老：不能因为军队出了杨、余、傅，就到处揪小杨成武，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对我们军队这样搞是错误的，对我们军队这样看，把我们军队看成什么样的军队呢？

总理：把北方的套到南方了，把南方的套到北方。(即南方出了个陈再道，北方到处揪陈再道，北方揪出杨成武，南方揪武老杨、广老杨——编者)

伯达：把这批坏家伙拿来斗，还是摆事实，讲道理，分批来斗，要深刻批判。先在这里批判，以后再到处批判。孟夫唐是怎么搞来的？是王任重弄到湖北去的，是典型的两面派。跨行业的问题要解决好，先开会，稳定内部。军队内部的观点和方法取得一致，才好办，不然要反映到社会上去。社会上搞分裂活动，往往是军队观点不一致反映到社会上。

富治：要向中央文革学习，接见群众组织时都要到，都讲一样的话。江青同志很称赞这个嘛。

文元：清理阶级队伍从报告上来看，你们那里没有搞吧！（曾司令员：我们正在开会研究）

总理：清理阶级队伍可以揪出坏人。比如孟夫唐，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嘛。军队内部，意见要取得一致，问题就好办了。

(曾、刘说：武汉有人在“临时党委”的“临”字上做文章)

伯达：要写个报告，成立个正式党委。

总理：对于李迎希问题，还有意见没有？(众答：没有)军队问题同意军委办事组的意见。(总理对永胜讲)党委不要搞临时的，要搞正式的，你们在这里研究一下，向中央写个报告，批示一下。

康老：革委会成立以前，大家对阶级斗争还重视。革委会成立后，就不够重视。我们想开一个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会议。有些同志思想没有准备，革委会成立以后，认为没有事了，太平无事了。成立前有阶级斗争，成立后还有阶级斗争。李迎希就是代表嘛！也不要认为李迎希的问题解决了就没事了，还会有张迎希、

王迎希，要充分认识，思想要有充分准备。因此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要巩固、加强也是一个斗争。当前问题是处理部队问题，部队思想上不统一，会影响到社会，首先是部队思想统一的问题。据我看，李迎希这个问题，不仅是这一个人的问题，还有机关什么坏人的问题。武汉还不是那样尖锐，军队的问题是关键问题。部队来人是有好处的，（指上京谈判一编者），革委会成立后看来还是要来人的。

总理：来了后要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群众组织头头也来学习，来了就可以学习，就可以批判大杂烩。

康生：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重要支柱。有些人口头讲革命……（未记下来——编者）跨行业是思想问题，实际上是小山头、小团体的。对军队，对革命委员会，对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教育。现在的革委会与以前的领导不能一样看待，不能把刘少奇的专政同毛主席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群众专政一样看待。

春桥：去年一月湖南提彻底改造专政机构，毛主席说不能提彻底改造，提这是错误的，只能部分改造。

文元：对古田会议决议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几十年前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法宪：部队只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但是要讲清楚，还是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总理：军队还是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康老：思想上有个问题，对待群众的问题。两派群众斗争，把对方说成是国民党，这是歪曲毛泽东思想，歪曲三个根本区别。军队不能亲一派，疏一派，要特别注意。另一个问题，军队出了笑话，王、关、戚抓军内一小撮，后来揪出了杨、余、傅。有一些群众受蒙蔽，有人就利用这一点把矛盾指向军队。武汉揪武老杨，广州揪广老杨，把军队看成什么，军队不能夺权。

总理：革命委员会也不能夺权。

康生：你夺权是造谁的反，这不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军队问题，思想问题，跨行业问题、小团体、宗派主义，中心问题是稳定军队，稳定巩固革命委员会。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能口头上拥护而实际上反对，这是错误的，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说“军政府”，这是国民党的话，要学习、执行江青同志九月三日讲话。李迎希的错误，不仅是过去夺权错误，而且现在有问题，他分裂军

队，分裂群众组织，分裂革命委员会。三个分裂主义，李迎希就是一个代表。张广才，毕占云，你们要与他划清界线，他是反党夺权，要着重批判这一点。他们错误有现在的问题，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反对的。

总理：要强调调查研究。

伯达：经过讨论决定才能表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强调，抢枪，放枪都是不允许的。

总理：你们在这里研究一下，再回去布置，以后再来这里办学习班解决问题。军队、地方、群众组织都要来人。但军队、革委会、群众组织都要留人坚持工作。

富治：当前军队统一是很重要的，要帮助、巩固革命委员会，但是不能反过来压群众。有坏人，要他们自己抓，作自我批评。

康老：部队千万要注意，不能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

总理：军队要团结一致，集中统一，不能搞分裂。你们在这里研究一下，把党委组织建立起来，统一军队内部思想问题。军队纪律一刻也不能涣散，不能夺权，不能一说就是黑指示，不能瘫痪。军队要服从命令。军队是久经考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深入人心的。要广泛宣传。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听毛主席的话的。有人想搞坏事，想把军队带走，这是带不走的。张国焘不是要把部队带走，也没走成，他的老婆、孩子还是我们以后送出去的。青海发现了赵永夫是个坏家伙，叫他到北京，他就来了。陈再道、钟汉华这样坏，要他们来，他还是来了。武汉独立师要调，还不是调出武汉了。部队是经过考验的，是有传统的。

春桥：对独立师当时很担心，怕调不动，后来还是调出去了。

总理：李迎希搞夺权是反党、反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是反党行为，他是黑司令，要把这个问题看得严重一点。这对军队有现实教育意义，要把军队威信树立起来，军队威信树立了，革委会威信也就树立了。

（曾思玉：是不是把李迎希问题搞个批示，我们回去好传达）

总理：不要什么批示，就按今天讲的，你们回去传达好了。

康生：你们要理直气壮地讲。要把军队威信建立起来。

伯达：说话要把话说得响亮一点。

法宪：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原则，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原则，怎么行呢。

文元：根据古田会议决定，军队不能搞小团体，你们要搞革命的团结。学习毛主席思想，反复学习古田会议决议。

总理：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在学校、家庭都有四旧思想。毛主席在命令中，第八条就讲了教育子女问题。现在有些干部对子女教育不严。对这些也一定要进行阶级分析。

康老：要注意大专学校的教员队伍，武汉的教员队伍是很复杂的。

总理：好，今天就开到这里。

(根据首长传达，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湖北钢工保卫组《江城前哨》编辑部主编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 9 期)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曾思玉在湖北省革委会委员三代会常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最高指示：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刚才刘丰政委传达了林副主席，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极为重要指示，这不仅是对军队，而且是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

利的强大武器。这又一次说明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首长对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希望。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坚决执行，勇敢捍卫，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口号），巩固和发展按单位、按系统、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持续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始终指向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它们统统挖出来，把他们批倒，批臭，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根据中央首长指示要我们理直气壮地讲，要响亮的讲，我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形势问题

国际、国内都是大好。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不好过，修正主义日子不好过。美国不断发生经济危机，内外交困，战线拉得太长。人民的革命运动席卷了美洲，欧洲，美国黑人在美国心脏里搞起了武装斗争。约翰逊在电视中宣布了停止自由买卖武器的办法。乞求上帝保佑不搞武装斗争。六月五日，民主党的罗伯特·肯尼迪被刺，六日身死。美帝在越南进退两难，在法国谈判也没有什么结果，美国在越南战场有十七万四千九百死亡，这是历史上比较高的数字。美国也开始出现利用大字报来打击美国统治集团。青年开展用暴力进行斗争。美帝到处伸手，到处搞侵略。到处碰壁。美国国内货价上涨，比六五年物价上涨了一倍。一个鸭蛋价格折合币一元多。美帝兵力不足，拆东墙补西墙，想从欧洲调兵到亚洲，又怕丢了欧洲，内部征兵困难，青年不想当炮灰。他们的日子不好过，现在的国际形势仍然如毛主席所讲东风继续压倒西风。法国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戴高乐用两面派手段欺骗群众但办不到，群众是要革命的。苏修内部四分五裂，指挥棒失灵，帝修垮台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国内，二十四个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等着中央批的还有几个省。

我省除黄石市之外，十五个县之外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黄石市的同志来了，看，能不能达成协议，时候不早了吧。

武汉市还在打内战，我这个主任有责任，在座的同志也有点责任。

农业生产很好。比起去年好。

形势的本质、主流是好的，认不清形势，就要采取错误的作法，就要走到斜路上去。当然，也有些支流。特别是武汉地区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地方，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成立省革委会时，总理讲过，不要以为成立了革委会就太平无事了，出现反复，曲折这是很自然的，敌人一定要作垂死的挣扎，这一点也不奇怪，问题是我们要认清这种形势。

有些单位还没有联合起来，落后于辽宁省，辽宁省只有两个县没有成立革委会。我们为什么老是搞不起来呢？人家后来居上，那里乱透了，乱透了就治，不能长期搞无政府主义嘛！乱更加暴露了敌人，过去没有找到原因，找不出来，只看到些现象，不敢作结论。这次黑司令李迎希出来了，就知道了。他的手很长啊，刘政委讲了我们早就发觉了他，但没有精力搞，这次中央把他端出来了。他分裂军队，是黑司令吧！到会的同志就不警惕这一点嘛，老是搞对方，打内战，老是这样搞下去，就上了坏人的当。反复一次有好处，更暴露了坏人，对我们是一次教育。

毛主席不是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吗？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了，进入第三个年头啰，一定要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要有阶级分析，要看本质，看主流，不要老是只看表面现象。不能越搞越对立，发展下去是危险的。

第二、讲李迎希的问题

中央负责同志讲了这个问题，刘政委传达了。现在标语口号已经出来了，说中央首长来了（中央首长没有来），曾、刘回来了。写拥护曾、刘，不要写，我们很渺小，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把武汉搞好就可以了，写口号起什么作用啊！行不行啊？要提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拥护周总理，拥护中央文革，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我们要向中央负责同志学习，他们很谦虚。做事情不要自己讲，不要怕人家不知道。总理就很谦虚，电报中他不让提总理，他说“你提国务院就够了，国务院就包括了我嘛”。看到“拥护曾、刘、方、张”的标语啊，我就头痛。

湖北、武汉的工作我们没做好，很惭愧，大家齐力搞好。这次中央开会解决军内问题，揪出了李迎希这个反党夺权的野心家，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口号）李

迎希是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典型的两面派，分裂主义、机会主义的代表。李迎希旧账未还，新账又来了，旧账是去年一、二月份的夺军权，陈、钟去年一、二月份未犯“7·20”的错误嘛！新账又来了。我们主持军区工作以来，他就搞阴谋活动，在那里搞分裂。军队要稳定，他要搞分裂。

革委会是个新生事物，要巩固嘛！他就要搞垮，挑拨群众组织的关系。这里要解决他的问题。这个人拒绝教育和挽救，这是他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来找他谈，他谈曾、刘三支两军如何如何，很好听，象唱歌一样，但背后搞鬼。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他两句话就搞垮了，原来觉得有鬼，后来知道是李迎希。打个比方吧，这次要他到北京去，八个人有姚喆、韩东山、孔庆德、李迎希、叶明、张广才等，在飞机上他写了个条子，上面写有“三反一粉碎”几个字给了叶明。到北京我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他的意思是说：不要翻案。警告别人，揪住不放。他到我房子里洋洋得意啊，象《白毛女》里的穆仁智一样。我给一个同志讲，老兄要注意啊，有人死也要找个垫背的。下而讲李迎希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反党夺权。解放军的权是不能夺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权在毛主席手里，要夺军权就是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口号）这个人早就该打倒了，我们没时间处理他的问题，这个家伙利令智昏。去年他借军区机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搞了大量阴谋活动。

去年在北京开了五十多天会，陈、钟也去了，我原来不认识他，听说武汉在夺权，把他叫去，这时才认识了他，在大会上开会夺权，有些跑腿的人跟着出谋划策，没成功，群众反对。我昨天听了录音（指夺权大会的录音），吵得一场糊涂，群众反对嘛。他怎么说？他说：同志们的意见（指让他下台）我赞成，我同意，我欢迎嘛。当晚几个人跑到他家里，密谋策划，订了夺权计划。李说：这个兵权我敢拿，但要有个合法手续，我也拿得下来，能力不够，夺了再说，我指挥过七个军，夺这个兵权要出自你们的口，不能出自我口。这次去北京，我问许司令（指许世友同志），许说他可以指挥七个兵。这个人不会打仗，别吹牛皮，过去当师长没当好就撤了职。后来把他搞到机关。他指挥七个军，那是开玩笑啊！开了这个黑会，就按这个计划搞开了，但群众反对没有实现。他夺权也是象抽鸦片一样，上了瘾。

第二明知故犯，违抗中央。同志们知道，军队要稳定，主席要我们搞三支两军，组织宣传队，这个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嘛。中央三令五申要稳定军队，稳定机关。李迎希当面给我们说得多好啊，要如何如何，背后又在搞鬼，要把军队搞乱。他公然对抗毛主席批发的八条命令，搞了个三条指示责令正面教育的单位搞四大。

军队和地方不要挂钩。中央三令五申。有个六所，逮捕了一个闹事派（×××），我听到闹事就生气，闹无产阶级的事嘛。地方不要干涉，我几次打过招呼了，我们有些同志不听话，最后可能推到你们的头上去哟，你们有责任，不得不负，我过去打过招呼，还有人要干涉。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冲了，幕后指挥就是李迎希，有人还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这是反革命行动。我知道要出问题，看到了苗头。我是7月23日到军区大院的，说了搞错了的，搞了黑材料的一根火柴化为灰烬，不负责任，该平反的坚决平反。他得意洋洋，说路线斗争，就是要给他平反，我走了后，底下提了五百多个条子，这个家伙唯恐天下不乱，很毒辣。不准搞四大，他硬要搞四大。

你们是不是气愤啊？

第三、搞翻案活动。“7·20”以后把陈、钟打倒了，李以胜利者自居，以一贯正确自居，以造反派自居，以革命干部自居，洋洋得意，那个小丑样子，就象穆仁智。总以为他正确，人家都错了，总是搞翻案。特别对回来这些人。旧账没有清，又欠新账。在北京看他那个神气不是作检查，而是想整别人的，那个神气不对头。第二天召集这八个同志谈话，要作自我批评，说各有各的账，他紧张了。军区几个常委同志叶明、孔庆德、姚喆，我们作了大量工作，群众组织也作了工作，他们作了高姿态检查，我们到机场欢迎他们嘛。我找李迎希谈，你们是老同志嘛，你们能不能谈谈心啊，作工作嘛，取得群众谅解嘛，他笑笑，说好，好，好。可是就是揪住不放，他一进门就对他们提了三点：①要叶明等请罪；②要别人承认他自己一贯正确；③要给他这个革命领导干部平反。孔庆德一听就火了：要我承认你一贯正确，我当老百姓也不干。这就是原则性。牛皮不要自己吹，吹牛皮干什么呢？他就是这样吹，说自己一贯正确。我来了十个月也不能保证都正确，我今天讲的话就可能有走火的地方，那能一贯正确？对人家怎么能揪住不放，当时我们很着急呀。你们那个口号要叶明低头认罪。

（来源：《新华工》 武汉 新华工革命委员会 红代会红司（新华工） 《新华工》编辑部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 第九十八期）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军区党委组成问题的通知

《68》政字第 119 号

中国共产党武汉军区委员会通知

最高指示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

关于军区党委的组成问题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批准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由曾思玉、刘丰、刘建勋、张体学、张玉华、姚喆、孔庆德、徐国夫、李化民、韩东山、叶明、闵学胜、肖前、傅传作、徐文礼、杨力勇、方铭、张纯青、王新、张树芝、张竞、唐皎、钟文法、胡尚礼、金振中、吴忠泰等二十六名同志组成，并由曾思玉、刘丰、刘建勋、张体学、张玉华、姚喆、孔庆德、徐国夫、李化民、韩东山、叶明、闵学胜、肖前等十三名同志组成常委会，曾思玉第一书记，刘丰同志为第二书记、张玉华同志为副书记。

特此通知

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

1968 年 6 月 30 日

一九六八年七月某日，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张体学的三点意见

1. 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武汉军区新党委是对武汉、河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也是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措施，也是对武汉部队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支持左派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有力措施。

2.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武汉军区党委要积极的维护他们的领导，要积极地支持他的领导，要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拥军爱民活动，希望革命的三代会，能发布一个号召，掀起一个拥军爱民的热潮。

希望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大力维护军队的稳定。毛主席、林副主席是非常关心部队的稳定，要积极贯彻，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稳定军队的指示。

3. 要相信曾、刘首长的领导，相信武汉军区的领导。

曾、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选的将，我们信得过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是经过部队广大指战员的考验的。

有的人揪武老杨是不恰当的。

我们要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武汉军区党委，曾、刘和省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把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来源：《学习资料》（第七期） [内部参考，注意保存]河南省工代会政宣组编 1968 年 7 月 15）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曾思玉刘丰说要按照行业、系统和班级实现大联合，要彻底地铲除山头，于是钢二司就要进行倒旗。

集中在武测的大操场聚会，用环行照相机照了合影留念。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三）武汉“北、决、扬”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武汉新华工敢死队：《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摘要）》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

政治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是流血的政治。战争解决问题，枪杆子夺取政权。这就是结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极其严重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不抓枪杆子，不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永远不能翻身。

全国性保守组织的顽固分子已经集结，八二〇一中的混蛋们到处流窜，意味着一场较武汉事件更为严重的全国性反革命政变的到来。在强大政治攻势的配合下，对于被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军权，必须用武装夺过来。

反对“文攻武卫”，反对“枪杆子里出政权”，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就是和老牌修正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穿一条裤子，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多列士、陶里亚蒂、丹吉和尚布迪、巴德之流唱一个腔调。

“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些已被人讽为“极左”的理论，必将被未来的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已经在开始被证实了，而且继续证实下去！

1967年8月10日原载《扬子江评论》创刊号，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武汉地区 决派联络站《北斗星学会宣言》

我们试看矿岩的分布，铁矿、煤矿和云母各自云集在一起，这是千百年自然界运动的结果，是大自然的威力。但是我们的队伍，也时时有人退隐，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更有人结集在一起，奋勇地前进，这是一年多来运动的结果，是大革命的威力，这种威力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

学者们写史，十有八九无血无肉，不是历史创造者的呼声，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是名家，是黄鹤楼的秀才，不象长江水里的弄潮儿，懂得波涛是如何汹涌，浪潮是怎样澎湃，回流是何等险恶。一个普通的工人，巴黎公社社员笔下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就远远胜过了好多历史学家关于公社的论述，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总结它，如何承受它，难道还需要等着那些黄鹤楼上看帆船的大人先生去进行，而不是由我们这些多少在运动的泥巴里滚了半天的毛小子和工人同志一道来完成吗？

要当官的就让它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法罢，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历史证明了，未来不是属于陈独秀、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曾经大喊大叫一时的风云人物，历史还将证明下去。只有那些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方是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

至于北斗，乃宇宙间七颗排列似的星星，在奴隶的歌中的象征，只有全人类最伟大最天才的舵手毛主席诞生在世上，人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北斗才被赋予最新最美的时代内容。我们的学会取名于此，就是要求永远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把紧航向，北斗北斗，未来的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是谁主沉浮！

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将严格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脏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伟大的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力量。巴黎公社社员喊得多么好啊：“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炉火，你燃烧吧，铁锤，举起来吧，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唱起国际歌，决然地抛掉派性、私心的束缚，到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集合，向旧世界发动狂飙般的进攻。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 年）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摘要）》

毛主席最近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它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决派，这是革命派通过“斗私批修”，从造反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产物，

决派，这是一个牢记着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它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的教导的勇敢的大军。在这个的最后分界线上，一切犹豫的，徘徊的，被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拖累得精疲力竭了的人决不能与决派同伍而分道扬镳。

决派，这是要同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一代新人。

决派，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

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运动，中国最大的运动，无不是农民的运动。

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将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地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赃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伟大的中国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活力。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1967年2月10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鲁礼安《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概要）

过去时期的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都是对农民运动的一个发动。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是农民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正以无限的生命力磅礴于全中国。不仅在浠水，而且在麻城、广济、当阳，更远一点，湖南、江西、福建、延边、广西等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据我们所知农民运动都在蓬蓬勃勃地开展。《人民日报》社论说：群众运动的动向，决定事物的本质，各地农民运动的兴起，决定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狂风暴雨不可避免地到来。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最后走向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我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的这一般规律，毕竟全部地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巴河一司进城占驻红旗大楼，封了《湖北日报》，因为革联会《湖北日报》九·六社论压巴河一司，革联进攻巴河死亡六人，抬尸游行]

是仍然依照第三个五年计划那样按“调整政策”在慢慢推动农业的发展，还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造成一个五八年似的大的革命热潮向二级甚至一级所有制进军。贫下中农迫切地希望着后者……在巴河五州地区，伎匠集中，办合作社，搞综合厂，是群众早有的愿望。历来因为公社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阻挠而不能成功。五州总部成立后，立即拨款八百多元，加上匠人自动筹款共一千多元，建成了一栋房子，匠人集中管理，深受当地贫下中农欢迎。

巴河组织了“文攻武卫团”。巴河一司五州总部的一张布告说：“当此决战紧张阶段，凡是在巴河五州境内从事阴谋破坏，肆意捣乱，勾引煽动，武斗暗杀等破坏中共中央六六通令的行为，经当地人民告发，就地查处，一经证实，严惩不贷。”

随着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步一步的深入，“文攻武卫”应该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提出来。历史将证明离开了“文攻武卫”，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离开了“文攻武卫”农村运动决无彻底胜利的可能。

“新农村”拆除了原有的房屋，集中地盖起了平房便于管理，便于生产，而且首先照顾了最困难的贫下中农，深受贫下中农欢迎。那么富农呢？我见到这一个富农，他无可奈何地说：“我原先的房子又大又宽，如今搬到这里，好，好个

屁。”公社的一个干部的家属则向我们诉苦，“我们去年才建的新砖瓦房子，就保不住了，他们折合再多钱我也不走”，我们看了这家既得利益者的瓦房，实在阔气得与众不同，如今坛坛罐罐就要打破了，他们怎么会不痛心呢？当地的贫下中农则高兴地对我们说：“社会主义道路人人都要走的，不过我们先走了一步。”

“先走了一步”。五州总部成立之后搞起耕牛集中，牲猪集中，匠人集中等强化集体经济的工作便是一个明证。牲猪集中时，社员利用农闲时间，捡石头，买少量水泥，大修猪栏。贫下中农交猪生产队集中喂养，立即付钱，而对地富则分批付给。少数比较宽裕的落后群众和干部害怕家庭负担受影响而反对。后来的保守组织“雄鹰”总部和五州总部的分裂，最后就是在三集中这个问题上开始的。

“新农村”，小队并大队实行三集中等，农民们的反映是不一样的。他们说：“贫下中农拥护，中农跟着跑，富裕农民反对，干部都跑光了”。何等分明的阶级阵线。

[武汉十七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巴河一司。12月24日又围攻进驻红旗大楼的巴河一司。]

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 67年12月30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第二稿草稿摘要）》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消灭两大派的对立，它只不过是用新的两大派别压完全不同于过去钢新斗争的崭新的矛盾，用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取(革命群众组织)而代之的是革命委员会。

但是，与其说是这种革命委员会，不如说取而代之的是以革命委员会中某些人为代表的强势力，与另一支崛起的新军的斗争。

革命委员会又不过是一个各派派性大力被压的一个暂时同一体，更何况是这样一个暂时同一体也是极不巩固的，……这样的各派政治势力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决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而必须由一派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

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

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被放到了“决派”肩上。

直至今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将在这场斗争中被决派所摧毁。

现在的关键在于：从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过渡到正式的国家机器，将采取什么样的道路。

一种人的主张是“和平过渡”，这就是说，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巩固和完善之时，便是革命委员会过渡成为正式权力机构之日，在这时期至多只会发生革命委员会中个别领导人的成员的变动或撤换。

我们的看法完全和上述相反，而认为崭新的国家机器诞生之日，是临时权力机构被群众运动推翻之时。我们公开地宣布，真正的权力机器只有通过对于临时权力机构的严重斗争才能堕到地上。

“决派”则将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得到锻炼，上升为统治集团。

无论是哈尔滨的“炮轰派”，还是贵州的“四一一”，他们对临时权力机构的斗争，不管是否意识到了，都是在为完成“决派”的历史使命在进行英勇的尝试。

我们分析工人中造反最早的也多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现在他们多半掌了权。在他们面前也有一个改造自己，使自己真正取得工人阶级的代表的资格的过程。否则一定会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而那些曾经一时受过蒙蔽的工农群众，一经改正，可以很快地成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们说我们在宣扬“左派转化论”，我们承认这条罪状。

以“赤总工二司”、“民办工人”等为代表的临时工，合同工，他们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英勇斗争，很大程度是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出发，为维护并且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而奋斗，这一大阶层被空前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卷进了运动。他们最希望革命越彻底越好，因此留念他们在运动中结成的团体……这中间有相当一批人会参加决派的队伍。

1968年1月25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武汉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为捍卫 516 通知的原则性与纯洁性而作（摘要）》

我们把那些在文革初期，以中派的面目出现，而终于在革命进入了第五个回合时沦为右派的先生们，称为考茨基派……如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余秋里。

他们无视从中央到地方所存在的右倾分裂的严重实质，而荒唐地提出什么观点不同，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他们还将右倾投降主义笼统地解释为“只保不批”，而首先给人一个对走资派立足于保的概念，他们当中有一员大将，4月4日跳出来说“批判极‘左’思潮不力，也是右倾保守主义”

[考茨基派的]大棒之一曰：论派性的反动性。……上海有家“权威报纸”则在这场反派性的比赛中成为了伟哉一世的英雄。……根本否认各个派别，各种派性，其实都是代表着不同结集，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它们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相反，它们都极力鼓吹派性均是超越阶级性，无原则性的。

大棒之二曰：无条件实现大联合。毛主席指出“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应该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可是上海有家报纸却公然删去了“在革命的原则下”这个极其根本的前提，而代之以“无条件”三字……什么无条件联合，就是向资产阶级保皇派投降，就是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条件倒旗散伙。

大棒之三曰：“现在的斗争只有公与私的斗争，没有什么革与保的斗争了”……最近这么一个要为刘邓翻案，要为二月逆流申辩的不大不小的反党集团跳了出来，不是给“革和保不存在了”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了吗？

毛主席说“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考茨基]的几种奇谈怪论：

“批右可以，批极左也可以。”

“批右时，如果‘左’的又跑出来了，‘左’的也一齐除。”

“批右时，不要忘记了反左。”

“批右要大胆谨慎，要对症，要系统批判，允许核实，领导批判。”

有人说（张春桥）为了避免在某地引起误会，《北京日报》一篇“打倒右倾保守主义”的社论万万不能在当地报纸上转载，有人转载了，便是典型的“右倾分裂主义”……原来社论中指出了“有些人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跳出

来为二月反革命逆流翻案。”而此地正是批判极“左”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仅仅在一所大学里就抓出了具有极“左”思潮的“右派学生”两千余名。

我们从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继续引申：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路上的障碍。……”这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的战争观。

毛主席最近又告诉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国内战争的继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的事实已经，而且正在继续证明着“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这一铁的法则。

革命人民是从太惨痛的教训中才认识到这个真理的。

庸夫俗子们不懂得这一点，或者是不愿意懂得这一点。它们只知道喊叫：文斗，文斗，而不知道“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是指我们大权在手时批判和斗争党内走资派时应取的方法，一旦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时候就是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革命的战争来对付反革命的战争。

这时候宣扬“放下武器”就是对革命人民犯罪。否定国内战争并不能欺骗资产阶级，只能麻痹无产阶级，使它们遭受突如其来的牺牲。

彭勋 5 月 9 日在新华工作了一个内部报告，提出：一曰武汉批极左不力，留下了后遗症，现在应该补补火了。二曰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斗争王任重、陈再道、钟汉华的高潮。

王任重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那些和王任重勾勾搭搭的“左派”例如赵文成先生（新华工）；陈再道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那些在革命低潮时和“陈司令员”拉拉扯扯的“左派”精华；刘少奇我们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工人运动内部的维护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家。无论他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也无论他的职位多高，权力多大。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潮流，冲破了小资产阶级热心散布的一种革命收场了的幻想。去年九月至十月的联合高潮，在我们看来，不是革命运动的终点，而是这个运动的起点……运动中的一些政治派别也会急剧而尖锐地分化开来“直至它们跟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而无产阶级会在一系列搏斗中相继博得各个阵地为止。”（马克思语）在这中间保守派们将迅速地倒向机会主义派别或者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的政治派别里面，来向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作战，我们几乎用不着担心它们会愚蠢地独自树旗。

原载《扬子江评论》总第八期 1968 年 5 月 16 日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

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战斗的，朝气蓬勃的革命的党。

要革命么，必须要有革命党。

从共产党宣言至今的一百多年斗争中，有过许多革命党。

随着革命的推移，党也必然要发生变化。第二国际在大战中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列宁同第二国际决裂了。列宁缔造了新的党——布尔什维克。

苏联出现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又使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共产党变成了社会民主党。

中国的这一场空前的阶级斗争中，同样也暴露了许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没有一个单位不分裂。有的站过来了，有的变成社会民主党，有的则更成为法西斯党。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面临着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

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随着这样一支队伍的形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才有可能获得最后胜利。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样的一批“中派”。经过批判，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可以站过来，另一部人，必定会最后走上向党闹分裂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革命阵营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中央内部“宗派”的社会基础。

在向党内中派先生作斗争的同时，总要批判革命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只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取得绝对胜利，只有最后撕下那些顽固至死的中派先生的画皮，第五个回合斗争才可能获得胜利。

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

毛主席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写到：“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

要生存，就反抗。当革命者也拿起武器的时候，战争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谁敢否认 67 年出现了国内战争的事实呢？谁敢断言一旦中派里的顽固分子与党最后分裂时，他们不会挑起战争呢？

希望和和平取得全面胜利的思想，实在是有点靠不住的。不应当否认一切战争。要从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上把权夺过来并巩固下去，没有武力和武力作后盾是不可能的。

政治革命必然伴随以社会革命，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通过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过渡，会有这一天到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向世界和历史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产物——北京人民公社。

原载《扬子江评论》第十期 1968 年 6 月 12 日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

极右势力：

北京的“联动”，武汉的“特动”，广州的“主义兵”等，他们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社会上的反映。是他们父母的畸形的病态的再现。

保守派：

人们曾简单的用“受蒙蔽”来解释保守派的出现，其实……保守派的存在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许多（当然不是一切）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积极分子都一次再次地落进保守行动。他们不可能都是党内走资派招降纳叛拉进革命阵营的异己分子，不可能都是走资派盗名窃誉树起来的假标兵。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对我们党的组织建设的影响是他们站错队的根本原因。一旦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模范劳动的奖励变成了不同于普通劳动者的特殊政治待遇，一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增加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的义务，而是取得了从入学，提级，升任领导到安排小家庭的机会，则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和几千年的私有观念必然会腐蚀这批同志，使他们与劳动群众日渐疏远，日渐脱离。难怪毛主席在 1959 年就语重心长地指出“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党内走资派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他们不闻不问；两者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立，他们毫无切肤之感，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生出对党内走资派的憎恨和反抗呢？他们政治上的保守情绪正迎合走资派的需要，他们不那么正当的入党，进步等要求，非常容易被走资派利用来镇压革命群众。

保守派中的工人以年龄论，老工人居多；以行业论，铁道、金融、重工业、军事工业工人居多；以企业论，大型厂矿工人居多，……他们安于现在的地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满现状，继续造反的举动非常不满，总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乱现有秩序的目的是想复辟以前那种劳动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旧秩序，而不是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新秩序。

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

保守组织的表征是保党内走资派。实质上，它保的不单是个别人物，更重要的是保旧秩序，更确切些说，是保旧秩序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保一条可以由不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的反动路线。保守派是历史发展的阻力，是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它进行反革命政变时可以调动的力量，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的统治的武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取得全面胜利，必须

彻底瓦解，压垮，吃掉保守组织。保守组织维持原来形态也能扭转大方向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这种事例。……保守组织成员大部分仍然是工人，是劳动人民，这一点，并不影响保守组织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实质。列宁写过“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哪一种阶级斗争是先进阶级的一部分不站在反动派方面的……部分落后工人必然会在比较不长的时间内帮助资产阶级。”

革命造反派：

相当一段时期，革命造反派的斗争还停留在自发阶段，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逼上梁山的。党内走资派的镇压，不啻是为渊驱鱼。

……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等待每一个战士全认清了革命的终极目的和全部进程后再爆发，更何况文革所要完成的任务，自马克思诞生以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未曾提供过成功的经验，毛主席近几年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又被走资派严加封锁。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革命造反派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无异于要求无产阶级在无所作为中束手待毙。

有两个现象使革命造反派成员复杂化：一批民主革命时期仅仅是团结对象的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解放后政治经济地位，思想意识和政治态度逐渐与工人阶级一致，他们投入了革命造反派的行列在自发阶段上聚集，组织和发展起来的革命造反派，虽然按其实质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一翼，但它的组织与其说是单纯的阶级组织，毋宁说是以工人阶级左派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阶层、个人的联盟。另一方面任何一个造反派都很难杜绝狡猾的阶级敌人、变色龙及小爬虫混进来。

革命造反派没有自觉地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标准建立、发展自己的队伍，这给后来的整党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同时，旧的党组织瘫痪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导，政策，方针只能具体地由在组织的严密、步伐的整齐等方面都较革命政党相形见绌的群众组织来贯彻实施，这就大大延缓了革命群众提高觉悟的过程，而且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出现的革命队伍的分化，落伍者的被抛弃，与机会主义派别的决裂等现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得更加频繁和明显。

[湘江风雷、首都三司、武汉三钢是造反派代表]

中派——考茨基派：

武汉的新派，北京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右翼，湖南“学司”，河南“河造总”，四川“红成”“八一五”。

中派——考茨基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个不大不小的集团。它惯用的手法是，借口在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有过火行动，就来取消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并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替之。……目前他们成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危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和他们的斗争成了革命的中心任务。

形左实右派：

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三个司令部”的 516。

受极“左”思潮影响和俘虏过的造反派，多是劣根性远未涤尽，要革命而不会革命的青年。他们不能象工人阶级那样忍受住“二月逆流”带来的暂时挫折，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激起了他们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急躁情绪和报复心理。事实上，他们发烧的头脑已经失去了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对人民群众的信任，将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一场丧失理智的赌博。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字报把革命隐藏着各种矛盾清晰地暴露出来了：从走资派的腐化淫逸到旧公检法的黑材料，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到扼杀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奴隶主义……所有这些，不可辩驳地证明了这场巨大的革命震动是有强烈的社会要求为其背景的。矛盾没有解决之前，革命绝不可能人为地煞车。

如果说他们开始还不完全理解毛主席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誉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的重大意义，那么在付出巨大代价积累了无数经验后，他们开始懂得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林彪）的真理。因此如同《红旗》杂志 1967 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些系统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这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

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必然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它必然经过一级级的阶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来了政权，迎来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意味着革命的真正开始。这个“必须的，非常重要的”临时权力机构，还必须“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造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红旗 67 年第三期社论）这是时代的任务。

最近毛主席精辟地总结了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这就为由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过渡到公社指明了具体途径。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展现了革命人民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的宏伟蓝图，公社必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的最最惊人而又合乎规律的奇迹。

原载《扬子江评论》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1968 年 6 月 20 日

（四）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以革命的方法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开门整党运动。这次整党运动，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在思想批判的深刻性和组织整顿的彻底性上，都大大超过了解放以来任何一次整党。这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伟大斗争。这是全国最广

大的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行动起来，揭露和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等钻进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伟大斗争。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妄图资本主义复辟的两条路线的一场决战。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加强了党的领导，并正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成为全党唯一的领导中心。现在，我们的党，是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团结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整顿和发展，是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分不开的。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可能有党的建设问题上的正确路线。苏修叛徒集团正是从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所谓“全民国家”的谬论出发，抹杀阶级斗争，镇压劳动群众，改变党的性质，使列宁缔造的党变质成为所谓“全民党”即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的党。中国赫鲁晓夫黑《修养》的核心，也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科学社会主义。他所鼓吹的一套什么“自我修养”，其目的是保护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扼杀共产党员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准备“驯服工具”。

毛泽东同志坚持了、捍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主席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毛主席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长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了必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实现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首先是工农兵的绝大多数为出发点，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让共产党员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在极其剧烈、极其复杂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伟大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反革命分子，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正确对待群众，并且经历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学习正确地识别和处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就大大促进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明

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打掉了腐蚀革命意志的官气，密切了党和劳动群众的联系。这样，就发现和锻炼了左派即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教育了动摇的中间派，孤立了和揭露了右派即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服务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有执行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群众性的而不是关门的整党运动，才能保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共产党员手里，党才能始终保持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特性，领导广大群众前进，完成无产阶级专政所赋予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消灭阶级差别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光荣历史任务。

当前整党工作中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吸收无产阶级新鲜血液的问题。

毛主席在谈到整党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主席这个生动的比喻，包含着极深刻的辩证法。毛主席教育我们：要把无产阶级革命党看成在革命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发展着的组织，不要看成凝固的、一成不变的组织。

“清除废料”，就是必须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死气沉沉、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则应劝其退党。

“吸收新鲜血液”，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任务：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首先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广大革命群众中，首先在工农兵劳动群众中，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造反派战士。他们有这样特点：两条路线斗争觉悟高，阶级斗争观念强，站在斗争第一线，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挺身而出，特别反对修正主义很坚决。这是很可宝贵的革命品质。他们也有缺点，这是可以教育和克服的。

上海阀门一厂一位要求入党的工人同志说：“党组织应当吸收那些无限忠于毛主席，坚决贯彻无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号令，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造反派战士入党。要求入党的造反派的同志，要有正确的入党动机和目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为了达到任何个人目的）；夺权之后，要为无产阶级掌好权（不是为“私”掌权）；要始终如一地认真学习、坚决执行、积极宣传、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斗私，批修，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不能以“老造反”居功自傲，不能革命革到一半就中途而废）；要紧密联系群众，甘当群众小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

这段话说得多么好啊！它反映了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对自己先锋队的要求。应当积极地吸收符合这样要求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朝气的新鲜血液入党。要求入党的同志应当这样要求自己，已经入党的同志也应当这样要求自己，经得起今后任何大风大浪的考验。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重视工人队伍中党的建设，重视发扬革命朝气，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主席就提出城市工作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一九五〇年六月，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一九五七年七月，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又指出：“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畏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一九六七年，在文化大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又提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中国赫鲁晓夫等钻进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完全同毛主席这条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相对抗。他们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是注意吸收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入党，而是包庇无产阶级的叛徒、工贼、特务、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帮助这些人混入党内攫取领导职位。他们不是提高工人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的

无产阶级觉悟，而是向他们灌输最腐朽最黑暗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中国赫鲁晓夫推行所谓“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用修正主义去腐蚀工人群众，腐蚀党。“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前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妄想扼杀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革命党蜕化变质。后者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继续革命，妄想扼杀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党员蜕化变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党员所以一度站错了队，就是受了中国赫鲁晓夫“六论”的毒害。我们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党的性质和任务的理论，彻底清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把上述这些反动观点批透，并且在包括工厂、商店、人民公社、机关、学校、街道等各个方面的群众中认真清理好阶级队伍，把混在群众中的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使吸收新党员有一个可靠思想和组织基础。

为了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吸收新党员的工作，还必须有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经过更新的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选拔那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较好的、真正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朝气的同志到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来，逐步形成统一的一元化的领导。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有一些犯过错误而又认真改正了错误、积极工作的同志，他们与那些坚持错误或躺倒不干的人不同。他们去掉了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灵魂中增加了来自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应当支持和团结这样的干部共同工作。应当把他们犯过的错误成为人们共同记取的教训。

反对保守主义。有这样一种人，对于从革命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新事物，总是百般挑剔，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们总要用某种成规旧习来阻碍革命新秩序的建立。

有的地方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存在保守思想。有这样的情况：成份、思想都不错的好同志，等了五、六年，打了多次报告，仍然不得入党。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主席这个极端重要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的群众基础，深刻地批判了迷信选举的形式主义，指出了党的建设和革命委员会建设的根本方向。

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中，有四千名左右的委员，其中大约半数左右是革命群众的代表，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工农兵的代表。这四千左右的同志，是经过了革命风暴的考验和锤炼，再经历了反复的争论、酝酿、协商、审查，才推选出来的。干部要经过革命群众的讨论、审查和领导的批准，而且经常进行着局部的撤换和调整。一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要开十几万人以至几十万人隆重的群众大会，万众欢腾，家喻户晓。请问各地历届的党、政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哪一届有这样广泛的群众性呢？有哪一届这样广泛地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了解，又这样广泛地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呢？决定领导机构本质的是执行什么路线，反映什么阶级的利益，

而不是采取什么形式。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这种在革命运动中经过彻底的群众路线产生的革命权力机构，包括在其中工作的各方面的新、老革命干部，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党的生活中，也应当吸取这个经验。

恩格斯说过：“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的过程就是吐故纳新的过程。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就是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所窃取的一切权力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就是宣告了他们失去了党、政、财、文的一切职位，这是不言而喻的早已客观存在的事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已把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叛徒、内奸、工贼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了。他早已被革命剥夺了党内外的一切权力和职位了。

革命干部队伍的吐故纳新，是一种随着革命不断发展经常发生的过程。一个干部是否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要经过长期阶级斗争的考验。现在参加工作的广大的干部也是这样。新干部参加工作，千万注意不要脱离劳动群众。但我们不要因为怕干部犯错误而不敢大胆使用。劳动群众把他们提上领导岗位，同样地会不断地教育和帮助他们，以至在必要时撤换他们。

清除反革命分子和剥削阶级分子出党，吸收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把忠实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员挑选到各级党的领导机构中去工作，紧紧依靠革命群众，干部定期下放参加劳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并且形成经常制度，这样，我们就能全面地执行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就能有力地粉碎修正主义任何形式的反扑和挣扎。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将更加生龙活虎地领导无产阶级和全国革命人民战胜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逐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使命。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遵照中央指示，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份常委和“九大”代表在京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在“九大”所作的多次极其重要的讲话和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五月十九日又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负责同志多次接见并提了很多重要意见。这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我们的最大教育，最大鞭策。在中央负责同志亲切教育下，开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英明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斗、批、改运动不断出现新的高潮，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胜利。运动的发展和主流是好的，但是省、市革委会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很好抓典型，总结经验，因而落实得不够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够，个别单位甚至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现象。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不够深入、细致和谨慎。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

在“九大”开幕以后，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最新指示鼓舞下，进一步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向“九大”献礼的高潮。正当这时，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错误已经波及到一些专、县，对革命和生产有了一些不良后果。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认真接受教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按照中央负责同志的提议，反复进行了研究，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在全省迅速掀起一个持久的学习、落实“九大”精神的群众运动。各级革委会要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在全省掀起活学活用

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刘少奇和他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宋侃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进一步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实现“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二）搞好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加强革委会一元化领导。各级革委会成员，都要用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既要把自己做为一份革命的力量，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公，一切为革命的共产主义精神。

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各级革委会成员，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自己置身于革委会之中，不能置身于革委会之上，也不能置身于革委会之外，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加强集体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革委会内部有不同意见，应摆在桌面上来当面讲，允许保留，也可以向上级报告，但不要搞“小动作”；要提倡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坚决反对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作风。

（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对大联合和三结合不够巩固的单位，上级革委会和支左部队、工人宣传队，要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彻底解决跨行业的组织，不许重拉队伍，另立山头；本单位的人员不要到外边去串连、插手、干涉其他单位。广大群众要尊重、信任、帮助、支持、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自觉地维护革委会的革命权威，不要以任何借口冲击、进驻和夺革委会的权，已经非法夺权的，一律无效。“三代会”是群众组织，必须在革委会领导之下，不得凌驾于革委会之上，与下边的“三代会”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不要插手外单位、外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四）切实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

么几个阶段”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要抓典型，推广试点，不断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当前要继续抓紧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谨慎细心，不要粗枝大叶。“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严格防止和克服扩大化的倾向。对于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依法处理外，都应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要充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五）要正确对待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要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对参加三结合的干部要信任、支持，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

（六）要正确对待群众。要坚信广大革命群众是忠于毛主席的。参加这次“反复旧”的群众是属于认识问题，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要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成绩和贡献。要说服，不要压服，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要歧视他们、排斥他们。对参加“反复旧”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也不要歧视他们，认识了错误，接受教训，改了就好。要加强广大群众的革命团结，严防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不团结不得了，团结了就了不得。要革命就得要团结，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夺取更大的胜利。

（七）要拥军爱民，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解放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认真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认真学习八三四一部队的“三条原则”和“九个一样”的先进经验，不要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

广大革命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等光荣传统，积极支持、热情帮助解放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百倍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破坏军民团结。

（八）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以革命带生产，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新飞跃。遵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从各方面做好打仗的准备。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继续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返回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必须说服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返回农村。

在贯彻“九大”精神的过程中，我们一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建议，以“九大”精神为红线，按照团结的方针和政策，正确处理“反复旧”这一问题。引导广大群众顾大局，向前看。坚决做到在纠正极“左”思潮的同时，防止出现右的倾向。努力做好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夺取更大胜利。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1969.05.27；中发〔69〕28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地区三代会和广大革命群众：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望你们根据“九大”精神，认真讨论，坚决执行。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从批评刘少奇和他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宋侃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来，特别从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的努力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

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广泛宣传和学习“九大”文献，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特别是省、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做加强革命团结的模范。你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争取各条路线上的更大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五）湖北省的“两批一清”运动

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1969.09.27；中发 [69] 67 号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一）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五）必须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

（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分子，都必须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成为加强、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

（七）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的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报请中央批准。

（八）希望湖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四日，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给毛泽东、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报告

报告说，遵照毛主席“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我们从去年六月开始抓了武重、武锅、武船、武钢机总厂、国棉一厂、二汽、武大等六厂一校。除二汽外，这几个单位都是武汉地区有名的“老大难”单位。抓点前，其中五个工厂斗、批、改搞不下去，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军宣队进驻各点后，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

持政治建厂、建校的道路，宣传、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中央各项号召，团结、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孤立、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群众觉悟空前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改变了这些单位过去“老大难”的面貌。

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常委亲自抓；二、学习、落实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三、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四、建设军宣队。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送审的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经验指示稿的批语。

指示稿要求各省、市、区党的核心小组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在阅读武汉军区党委的报告后，把各自的试点经验也写一份总结报告给中央。如未试点，可以参照北京六厂二校和湖北六厂一校的经验，进行试点和点面结合，以利推广。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抓点情况的报告

毛泽东批示：照发

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一些人为杨道远翻案

我们还在学习班被迫交代问题的时候，就组织材料，给敬爱的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等写过信，希望他们过问杨道远的冤案。杨道远最开始是在北京学习班里被陈伯达点名，说他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刘丰等人又给他加上北决扬反革命组织总后台的罪名，这些都是莫须有的。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二年，又一次办付廉的学习班

1972年，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召集我们去开会，在会上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人，说这是武汉市公安局长王杰，我说介绍这个人干什么，曹承义对我说这个蛮明显，我们是在公安局挂上号的。我心里想我们这些人将来不好下地，当时我们每人跟一个动力，我的动力名字还是侯善生。这个人是个上海人，是海军上校转业的，因为家住上海的关系，觉得武汉这样整造反派不对，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还

曾经反戈一击，把笔记本交出来了，因此这个人后来也没有得到当权派的提拔和重用。

这个学习班在省委第二招待所进行，到后来会议伙食也没有了，就散伙了。我回去之后，胆结石就发了，当时以为是胃病，住在医院里准备做钡餐。这个时候侯善生找来了，说省委找你去谈话，我说那就叫省委来。果然韩宁夫的秘书带着省委的车子来接，说韩省长和信司令员请你去谈点事情。我到达会议室的时候，看见交通厅的秦钟和军区三办的徐剑都在那里，室内烟气呛人，我对他们说我要动手术的人，有什么话就快说。他们有人就问你这些时跟聂年生接触没有。韩宁夫火了说：上级党委很看重你，要挽救你。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要挽救的，你们还是挽救自己吧。信俊杰一看说僵，就转弯说：以后在个别找你谈，做工作。张德蛟站起来说：这样的人还跟他谈什么，干脆抓起来算了。我说除非共产党垮台了，才有人抓我。我们是一个斗争，有什么活动，有活动也不会告诉你们，向你们投降。

反潮流酝酿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彭勋在开会的时候问我，付主任有没有权，我说不谈这个。彭勋说权是毛主席给的，不能不要。我说从结合那一天起，哪个是掌了权的？确实没有政治权力，经济地位乃至人身安全都失去了保障。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七二年，张体学说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幾萬，確實搞錯了

省革委會副主任的張體學在洪山賓館对劉漢武说：“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幾萬。確實搞錯了，要給省委一點時間來糾正錯誤。

一九七四年初，曾思玉说這個事情搞錯了，向被整的人賠禮道歉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曾思玉臨走前在洪山賓館召開軍隊師級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會常委以上干部會議，說：“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幾十萬，不該斗的斗了，不該批的批了，不該抓的抓了。我心裡也很難受。很對不起，這個事情搞錯了，向被整的人賠禮道歉。”

八、政变后镇压造反派

一九七六年十月，谢保安挨整的经过

回来之后，武汉铁路分局百万雄师的头头陈文彩带了铁路的人来捉我，因为赵修曾经带领我到处吹，说要给我补台当武铁分局革委会副主任，他把我当了一条大鱼。当时听说流传一个造反派的联络图，在这个图上我的级别蛮高。这次被抓实际上不是组织行为，而是百万雄师的人看到势头有利冲出来行动的，

很久之后，武铁分局的党委经湖北省委批准，才作出对我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这个时候我已经被关在地下室很长时间了。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我成天被他们许多前呼后拥，

曾经被他们押到武汉体育馆参加铁路系统主持的夏朱胡批判大会，这是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见到他们。因为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刘国栋枪走火打死人的事情，就被他们说得很复杂无比。

到了春节的时候，他们看实在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说谢先生也没有蛮大的问题，放叁天假回家去。回家之后也是凄凄惨惨。

等到叁四月份的时候，个性的东西找不到，共性的东西也没有多少。他们就日夜播，要我承认说过华主席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这个东西可以定性成现行反革命，我就拒不承认。后来四面八方的证据都汇集来了，以前在家里谈天的那些朋友，现在都落在项目组手上，在车轮战和逼供信之下许多人承认了，而且说是在我家里说的。我没有办法就说，我无所谓了，也记不清楚了，文革中间王张江姚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没有深入认识到他们竟然是“形左实右”，可能当时是有这个认识，到底说了这个话没有，记不清楚。有了我这样一个口气，他们就说我是破坏清查，就把我押到铁路上到处批斗，东起黄石，西迄十堰，北至广水，南到蒲蘩，到处批斗。

最后在一个批斗大会上，宣布我的十大罪状，要对我实施拘留，用手铐把我反铐起来押走。到了看守所，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先要自己念一遍监规，把我丢进京汉街的一个土号子里。隔了些时，项目组就把我的行李送过来，铁山那边也把我的工资送来登记寄存，以后买肥皂什么的，就在这个钱里面开支。先是把

我关在一个 12 人的大号子里，那个时候已经是夏天了，非常炎热，身上的汗就没有干过，用毛巾擦完汗，又没有水透，毛巾就总是滑腻腻的。进号子之后，预审科来核实过一次，再也没有提审。这个时候精神上轻松了，逼供信和车轮战没有了，希望早点判。

比较多的事情就是轮番外调，经常有许多人的项目组来找我，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共有 287 次外调记录，后来监狱管理人员不耐烦了，就说谢先生级别蛮高，一点小事情就不要来找他。这个时候的待遇是一天 9 两米，早上九点半和下午四点半各吃一顿，就是觉得饿得慌，饭出来就闻到特别香。那个时候在墙上刻了一道印子，下午太阳到达那个地方就是开饭时间，天天就熬着等那个时候。此外就是感到精神食粮非常匮乏，有时候有过期的长江日报可以看，我就从第一版的第一个字读到第四版的最后一个字，一字不漏，当时国务院下设什么部门，各部门的头是谁记得清清楚楚。还有就是有外调的人跟我谈话，我就跟他们讲条件，要他们下次来带些书报杂志给我，或者拿些香烟和火柴给我的难友们。因为抽烟有气味，一次被监狱管理人员发现了，就铐住难友们进行逼供，问是谁把烟弄进来，我看他们把难友们整治得不象样，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为难他们，烟是我带进来的。他们对我说，我们也不想惹你，不过你下次最好遵守监规。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六年十月，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付廉被关了三年整，编号是 224。

毛主席逝世之后，局里面就闹起来了，姚中义在灵堂大哭一场，说周恩来的灵堂办得那样好，怎么毛主席的灵堂办的这样草率，张蓉吓的筛。当权派拿了几串红辣椒在那里做花，被我踢开了。周恩来死的时候，灵堂是办得很象样的，干部带孝什么的都是很虔诚的，庄严肃穆，因为时间才隔了 9 个月，很容易有个比较。对毛主席和周恩来，干部和群众的态度比较，有很明显的差别。

一粉碎四人帮，就有感觉，邓小平肯定要上台，我说华国锋是个华大荳，说他将来的下场还抵不上我们。这是开始宣布逮捕我的一大罪状，说这是反革命言论。

10月27日党委找我谈话，说要办我的学习班，还不能回家去拿东西要家里人送，张德咬说相当于逮捕。先把我弄到地质厅招待所，宋忠庭是组长，方善利是副组长，后来转到马厂湖，没过几天，就正式在体育馆开全省交通系统的大会，由秦钟主持，在会上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接管我的是公安局七处的胡大海，在上汽车的时候，他问要不要戴手铐，我说随便，他说还是戴着好吧，我问是戴在前面还是后面，他说前面。我们对话的时候，司机在一边笑。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我被关了三年整，编号是224。

在看守所里，我们都是单独监禁，我们就发明了对着窗户外面的高墙回声，进行打电话，后来他们就把窗户钉死，我们就没有办法撬开了。我们那个时候连裤带都收走了，什么工具也没有，放风的时候就用手提着裤子。那些监狱的管教过几个月就换，因为总是受我们的影响被我们盘服了。后来公安局的人对田学群说，你们造反派有什么板眼，我们的管教干部都总是服了你们，田学群回答说你们不是造反派理解不了。

我在学习班里关了一年五不准，后来又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因此判刑就判四年。法院来与我对了两次案，就开庭审理，我把法官驳的哑口无言，我说我们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省市清办的材料都是整群众的黑材料，怎么是省委机要档案呢？要是有问题，那赵修、王克文不是都有问题？他们宣布判决之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要求还我清白，不能判刑，审判长名字叫王健，说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的要求？他们的意思是要我要求回原单位，在宣判那一天单位的组织处长和保卫处长都在那里，他们以前都是铁杆老保，我宁愿出来之后在社会上流浪，也决不在老保面前低头，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在判决下来之后，王健对我说很对不起，我们无权判你，这都是执行上面的精神。

我坚决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我的罪名就是批斗赖振华再有就是抢材料的事情，当初抓我的时候议论华国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在取消了，这些情况都够不上什么罪责。在判决的当天，就把我转移到汉阳扁担山的新看守所，这里的陈所长和几个管教都蛮好，还问我想要吃什么东西。我要他们通知我老伴和孩子过去见一面，按照刑期我要在那里住一个多月。结果过了几天陈所长就要我出来，我出来之后去派出所，说要上户口，户籍警说你的户口从来就没有下。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知

要求各级党委认真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联系湖北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清查其帮派体系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全省批斗“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武昌洪山礼堂召开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武汉市召开大会，批斗“四人帮”在武汉的骨干分子董明会、李想玉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撤销朱鸿霞的一切职务。司法机关依法将夏、朱、胡、张 4 人逮捕。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

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湖北省和武汉部队的广大干部群众、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澄清一九六七年在武汉发生的“七·二〇事件”的性质，要求对由此而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予以平反、昭雪。我们认为，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分清路线是非，正本清源，必将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有极大的作用。经过长期调查，证明“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

叶群亲自打电话给其死党刘丰说：“武汉形势在变”，“有事找王力，听王力的话”。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对武汉军区不放心，“拿他们没有办法”，要打倒陈再道同志。江青还说，“要冲一冲武汉军区”。这就说明林彪、“四人帮”制造“七·二〇事件”，完全是预谋的。

一九六七年春，在林彪、“四人帮”的直接支持和指使下，武汉地区的一些坏头头朱鸿霞、夏邦银、胡厚民、吴炎金、杨道远、李湘玉等人（现已查明他们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帮派骨干分子），反动气焰嚣张，打倒一切，大搞武斗，大搞打砸抢。武汉军区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支持了革命群众，保护了大批干部，抓革命，促生产，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和拥护。这些正确的做法，却触犯了林彪、“四人帮”，引起了他们的仇视。四五月间，林彪、“四人帮”悍然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提出什么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于是在武汉掀起了一股“揪出军内武老潭”、“打倒陈再道”的黑风恶浪。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坚决反对。他们拥护解放军，团结大多数，反对打砸抢，抓革命，促生产，同混进有些群众组织里的少数坏头头，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少数坏人的挑动下，发生了大型武斗。七月十四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人来武汉，他们秉承林彪、“四人帮”的旨意，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煽动反军乱军，破坏军民关系，支一派，压一派，支持武斗，支持打砸抢，加剧武斗升级，造成机关瘫痪，工厂停产，交通中断，干部、群众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广大群众、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对王力等人的这些罪恶活动十分愤慨，七月二十日纷纷上街游行，反对王力，有些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把王力拉到军区大院进行说理斗争。这就是所谓“揪斗、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

事件发生后，林彪、“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七·二〇事件”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利用所控制的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实行反革命围剿。他们栽诬王任重、陈再道同志是“七·二〇事件”的“后台”，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八二〇一部队诬蔑为“叛军”，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同志被打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许多部队同志的家属也被诬蔑为“叛军家属”；把“百万雄师”

诬蔑为“百匪”，“反革命组织”，这个群众的领导人被打成“一小撮坏头头”，不少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家属被诬蔑为“百匪家属”；甚至连同情八二〇一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惨遭迫害。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还有的被打伤、打死。广大军民一提到“七·二〇事件”，莫不义愤填膺，情绪激昂。

长期以来，广大群众纷纷向省、市委反映，要求澄清“七·二〇事件”的性质。省、市委和军区，都作了大量的善后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工农群众、解放军指战员和干部，要求为“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〇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凡因“七·二〇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被打伤、打死的人员，应按照党的政策，继续处理好抚恤等遗留问题。我们在落实有关“七·二〇事件”政策时，一定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据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教导，引导大家顾大局，向前看，加强革命团结，不要纠缠历史旧帐，不能再搞资产阶级派性，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黑干将身上，进一步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把湖北省和武汉部队的各项工作搞上去，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而努力奋斗。

以上报告当否，请中央批示。

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现转发给你们。“七·二〇事件”应予平反、昭雪，但平反昭雪的决定和“七·二〇事件”经过，不要登报和广播。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广大解放军指战员，顾大局，向前看，加强革命团结，不要纠缠历史旧帐，把广大干部群众更紧密的团结起来，同心同德，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九七九年初，连老父病重竟然也不让谢某回去看最后一眼

1979年初的时候，我妹妹来探监，送给一条白手绢给我，我的感觉就有些不妥。果然我的父亲是3月8日去世的，市里面主持追悼会，我哥哥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弟弟出来跟父亲做遗体告别，铁路上不同意，因为时间很短，就拖过去了。隔了一个星期，监狱的王干部递了一张长江日报给我，说要安得一点。我在报上看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顿时五内俱焚，一拳打到铁窗上，把外面的栓子也震断了，手上鲜血淋漓至今留有疤痕。破口大骂这些当权派连国民党都不如，封建王朝的官儿也比他们好，连老父病重竟然也不让我回去看最后一眼，更不通知。他们说疯了。我大闹了一场之后，案子又报到检察院，他们又来提审了一次，我什么都不怕，就对他们说：如果说谢先生该判刑，毛泽东、周恩来应该枪毙，我们的后台和黑手就是他们，我们就是按照两报一刊的口径来搞运动的。他们说你不要乱说话，你的案子蛮简单，你不要自己把它搞复杂了。

我在1979年7月4日被放出来，以前日复一日地总是希望听到开铁门的声响，总是没有等到，已经到了接近绝望的地步。从1978年底的时候起，他们就把我从大号子里，转移到一个小号子里单独监禁，这个小号子不到5平方米，散

步走两步就到头了，这么小的空间却有一盏 100 瓦的电灯泡，日夜照着，睡觉的时候要用被单包住头。号子的高墙外面是京汉街，街边有一棵白杨树，在号子里只看得见一个枝桠，春天来的时候，我看到含苞欲放的小芽，看到它到长出嫩叶，叶子由浅绿到深绿，秋风起叶子枯黄，冬天又变成光秃秃的枝桠。想起当初说为革命不怕把牢底坐穿的豪言壮语，那是多么的幼稚。

后来邓小平和胡耀帮给五类分子摘掉帽子，我非常赞成，认为平反和脱帽都是应该的，他们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不应该成为打击的对象，这在文革初期就是我们跟叁字兵进行血统论大辩论时候的基本立场，也是毛泽东的文革主张与刘邓不同的地方。不过这一次的大平反有明确的政治意味，邓小平非常聪明，让牛鬼蛇神都出来，收买人心以扫除毛泽东的残渣余孽。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愿意去回顾，曾经到底是谁要打击他们并推行极左做法的，历史事实好象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实利益。好象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当权派说毛泽东和造反派是极左，一些昧心的知识分子就跟着宣传这个观点。看起来历史已经没有了是非黑白，只剩下利害关系和以利害关系划分的阵线，历史是不是就因为这样而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九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

中共湖北省委：

关于“北、决、扬”一案，1974年3月省委决定交我院审理后，我们曾多次向省委汇报，一直未最后定案。去年5月省委常委再次讨论决定分别判处首犯鲁礼安、冯天艾无期徒刑，骨干分子蔡万宝、甘勇等有期徒刑。定于同年9月20日在武汉市召开公判大会，并向中央报送了备案报告。后来省委领导同志又指示，公判大会停开，此案暂不处理。最近，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中对反革命罪的规定，我们对此案又进行了复查，现报告如下：

一、立案与审查过程

此案发生于1967年11月，当时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表了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指示。以华中工学院学生鲁礼安、

冯天艾等为首，对抗毛主席指示，在社会上纠合成立“北斗星学会”，分裂群众，破坏联合，妄图搞乱武汉。在这种情况下，点名批判了他们。但是，他们改头换面，以鲁礼安为首成立了“武汉地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即决派），并出版《扬子江评论》，发表有反动内容的文章，故1968年由省革委会政法组立案审查，经调查后作出审查报告。1969年8月以武汉军区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中共中央于1969年9月27日发了《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的文件，指出：“‘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作的大杂烩”，《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并指出：“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对“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对“《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省革委会根据中央指示，逮捕了王盛荣、鲁礼安等13人，组织专案审查。经过审查，于1973年释放了周岳森。1974年3月此案交我院后，经批准又释放了田国汉、干毅、张志扬、王盛荣。周凝淳因患精神分裂症已保外就医，现尚有7人未处理。

二、审理情况

我院受理此案后，经过反复审理和核实，并多次研究，我们认为此案在事实上有重大的变化。

1、幕后操纵问题不存在

原认定“北、决、扬”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现查明：周岳森是华中工学院附属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根本不是特务，只与鲁礼安有过一般接触，不是幕后操纵者。干毅系华中工学院教师，原系国民党将领，与鲁礼安等人没有接触过，仅因其子干小雄曾参加鲁礼安在华工组织的敢死队而怀疑干毅通过其子操纵“北、决、扬”。经查，所列线索纯属分析，不是事实。王盛荣仅与鲁礼安见过一次面，没有谈及“北、决、扬”的问题，不是幕后操纵者。上列三人均早已释放，故幕后操纵问题已不存在。

2、反动纲领认定的根据不足

经再次审查认为，从他们公开发表的“北斗星学会”宣言，还看不出有反动的内容。“决派”宣言，属于煽动极左思潮，鼓吹所谓“农运”，还不能认定为反革命纲领。原认定其有明显反动内容的（也就是有“三反对三重建”内容的）“决派”的宣言（草案），是鲁礼安起草的（现仅收集到打印件，没有原稿），未经“决派”开会通过，也未公开发表，故不能认定为该组织的反动纲领。

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

但是，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极力推行他们的极左路线，纠合一伙人，成立“北斗星学会”，“决派”，出版《扬子江评论》，分裂群众，属于煽动极左思潮，做了一些危害党、国家和人民的坏事，主要是：

(1)支持、煽动农民进城，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城乡社会秩序。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下来后，鲁礼安等人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后要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已经成为当前湖北地区的主要矛盾。北京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上海是工人运动的中心，武汉将要成为农民运动的中心，因此，大肆进行活动，写什么《农民运动与知识分子道路》的文章，到农村去搞所谓农民运动的调查，炮制《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决派成立大会上宣读，宣扬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仁舟搞的所谓“巴河一司新农村”的经验，支持王仁舟带领受蒙蔽的农民来武汉寻衅闹事，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农村的大好形势，在湖北、武汉地区影响很坏。

(2)煽动所谓“反考”斗争，影射诽谤攻击周总理。

他们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想的影响下，采用不指名的形式把周总理说成是什么“机会主义的中派”、“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

、“二月逆流的总后台”。鲁礼安在《扬评》上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的反动文章，影射诽谤周总理，……妄图打倒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3)鼓吹极左思潮，破坏团结，制造分裂。

鲁礼安、冯天艾等人从 1967 年至 1968 年 7 月，编印《扬子江》及《扬子江评论》12 期，大部分文章是打派仗，也发表了一些有反动内容的文章，大肆鼓吹极左思潮，煽动派性，制造分裂，对搞乱武汉起到了破坏作用。

三、处理意见

我们认为：鲁礼安、冯天艾等人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打着造反的旗号，干了一些坏事，犯有罪行，尽管他们的活动，偶尔也有过公开反对和批判张春桥的问题，但不能因此改变他们犯罪的主要事实，而在当时对他们进行拘留审查是正确的，必要的，对于安定湖北形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现审查结果，“北、决、扬”不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因此，此案不作反革命组织处理，按各人的具体罪行分别处理。鉴于这些被捕前大都是青年学生或工人（临时工），入狱十多年来，经过教育，大部分对自己的问题尚能认识，故予以从宽处理。对鲁礼安、冯天艾、蔡万宝、严琳免于刑事处分，对甘勇、童丹、马业成不以反革命论处，予以释放。有所在地法院和公安部门分别办理法律和释放手续。并本着“给出路”的政策精神，由其所在地劳动部门安排，在集体企事业工作。

以上报告妥否，请审批。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

1979年10月19日

（有删节）

一九七九年十月，中共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黨組經省委批復同意的《關於處理“北、決、揚”一案的請示報告》

報告指出：作為認定“北、決、揚”反革命組織的主要依據即幕後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的事實已不存在，而且公開發表的“決派宣言”不能認定為反動綱領，因此，“北、決、揚”不能定為反革命組織。魯禮安、馮天艾等人免于起訴，先後釋放。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武汉市检察院对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向被告夏、朱、胡、张送达起诉书副本。除被告人胡厚民拒不接受外，其余三名被告人均已接受，并办理了法律手续。朱、张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夏不要律师；胡厚民表示不请律师，他说：要请，我请联合国的律师。

七月一日律师去见胡厚民时，他说“我不能让他们演双簧，对不起，谢谢律师先生！”

五日上午，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将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送给胡厚民。胡当即用卫生纸做了一个封面，将两件法律文书包好丢出监号。他在封面上写着：“尊敬的法官先生，人家不愿意接受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却硬要塞进人家的‘铁屋’，且声称这是依法办事。试问，这是依据什么法律办事？怪哉！先将原物奉还，谢谢！”落款“铁屋居士”

七月九日至二十一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共进行法庭调查十九次，其中有关夏的四次，有关朱胡张的各五次。

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人朱夏态度比较好，基本上承认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

朱在第一次开庭审理结束后，在回监所途中看到新华路北湖一带建了很多新房子。他说，这两年发展真快，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不知道还要不要我参加建设。朱对管教干部说：不错，法庭很文明，我原以为要拷上去、拷下来的。生活也不错，吃了两个面包。

夏第一次受审后说：“开庭的方法很文明，起诉书上写的都是事实，我应该认罪。”“刚接到起诉书的时候有抵触情绪，看守所干部跟我谈话以后，感到主要事实是对的，枝节也没有什么必要辩了。人总是在变的，经过这段时间一想，就想通了。”夏还对管教干部提出：“我在法庭上有哪些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指出来，我好注意。”

被告张立国在第一次受审前，律师同他谈话，要他遵守法庭秩序，张当即作了保证。但在出庭受审时，态度却反复无常，对被指控的十九条罪行中的十条进行辩解，对法庭的审问，时而回答“这不是事实”，时而称证人是“有意作伪”

证”。回监后，张竟说：“法庭出示的证据不公正，只出示公诉人的证据，这个证据都是由公诉人任意取舍的”，“把我和夏朱胡一起审判，于法于理都不合”。

七月十二日凌晨三时，张先后两次用毛巾勒自己的脖子企图自杀，被值勤民警及时发现制止。法庭调查后期，张的态度有所转变，能承认部分犯罪事实。

被告胡厚民对法庭调查的问题拒不回答。他回到监所后说：“嗨！还不是那么回事，都是些老掉牙的问题，我听了心里好笑。一月夺权是毛主席肯定的，这算反革命夺权，那全国有多少反革命？”胡还说：“我对法庭没有信任感，我们的案子法院作不了主，他们也没有那个板眼作主。有人会为我们说话的。这不是我看不起他们，今天开庭有那么多小车，还不是头头们在看电视。对我们的处理，态度好坏无关紧要。王洪文的态度还不好？结果判了无期，比姚文元还重。态度越好越有鬼。”胡回到监所之后怒气冲冲地说：“人生能有几回搏，再不说，以后没有听众了。”“不管朱、夏、张判几年，我不管那些，我反正跟他们拼了。”因此，他藐视法庭，破坏法庭规则，故意称公诉人为“原告先生”，称审判员为“法官先生”，称书记员为“书记员小姐”。当法庭调查他策划一九六七年“一·二六”反革命夺权的犯罪事实时，胡只说了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审判长宣布休庭时，胡又说了一句：“法官先生不让我发言，法庭要讲道理嘛！”胡还在法庭上叫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进行法庭辩论，对被告胡厚民连续开庭两次进行辩论，被告人夏、朱、张均一庭辩论完毕。

被告张立国、朱鸿霞既自己辩护，也委托了律师辩护。

张立国在替自己辩护时，只承认自己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而不承认犯有颠覆政府罪，并对被指控的八条犯罪事实进行了辩解。律师在为张立国辩护时提出，第一，张立国阴谋颠覆政府案件发生在十年内乱期间，这一历史背景法庭应予以考虑。第二，起诉书指控张立国的犯罪事实中，有三条不能由张负主要责任：一是一九六七年五月指使编造武汉军区陈再道的材料问题；二是一九七四年三月抢走武汉市委机要档案材料问题；三是一九六九年三至五月的“反复旧”问题。第三，被告张立国归案后，认罪态度有反复，但在法庭调查后期基本上能老实认罪。

以上三条，提请合议庭评议时予以考虑。被告张立国在最后陈述时说：十年内乱中我犯了罪，但我也也是受害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应把我和夏朱胡区别开，恳求法庭在量刑时考虑我的一贯表现，考虑我还年青，考虑我上有老下有小，给予我从轻判处。

胡厚民在辩护时全盘否定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罪行。他说自古以来，打官司两方面都可以说。但在整个法庭调查中，法庭只听原告的，不听被告的，很显然，是法官先生偏袒原告，压制被告，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严格地说是违法的。第一，把一·二六夺权说成是反革命夺权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要搞“四大”，既然要“四大”，我们搞的那些何罪之有？第三，还有什么诬陷迫害干部，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把赵辛初、韩宁夫等搞到武胜路街头，不是阴谋。喻文斌等把省里几个领导人藏了几天，为什么不起诉喻文斌，不外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公诉人有理有据有力地批驳了胡厚民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并提请法庭对胡厚民从重判处。

七月二十四日，胡厚民的法庭陈述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包括他（它）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

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尽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一九六九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516，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516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516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516？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516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一九七〇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516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

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一九七六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只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

身首异处分，魂尤信马列。

第二首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象游子返故居

入党当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

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

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

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官先生

胡厚民

一九八二年八月（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于武汉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

七月二十八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阴谋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案件公开审判

判处张立国、夏邦银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各三年；判处朱鸿霞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四被告回到看守所后，对法院的判决反应各不相同。

夏邦银说，我原来以为会判我十五年以上，但没有，这是政府对我的宽大，我很感谢。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是指挥者，组织者、决策者，但判的比他们轻，这是干部教育的结果。犯罪要认罪，否则人民群众就不会谅解。说良心话，我一九七六年拍板太多了，主要是私心，想当官，想当大官。判我的刑是罪有应得，我不上诉。今后重新改造，好好做人。

朱鸿霞说：没有想到对张立国判这么重。夏是中央委员，做的坏事不多。胡厚民主要是思想问题没有解决。我应该判最重，但不是最重的。我到劳改单位之后好好干，争取减刑，希望干部发挥我的长处。判我多少年我不在乎，但说我是反革命，我不能接受。我要上诉。刑是要判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我想会有政策的，党不会嫌弃我们的，说不定将来还会有具体政策。

胡厚民回到监所之后只说了三句话：判我二十年，我六年前（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隔离之时）就知道；把我和姚文元判一样重，从何说起呢？判我二十年是上面定的，有何上诉的必要？胡在看守所还写了两首诗“示女”、“示子”。

张立国说：法院对我的判决是宽大的，体现了党的政策。我已被关了六年，还有七年，我要好好学习专业，刑满后四十三岁，还可以为人民做二十年事。我感激政府的宽大。这是从内心讲的。张还说，从今天的判决看，态度是重要的，夏邦银态度好，胡厚民态度坏，判的轻重就不一样。但我觉得对夏判轻了，他是湖北武汉地区的拍板人物，我们当时是“跟着夏委员干革命”的，对胡判重了。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对夏、朱、胡、张宣判后，枣阳、黄冈、荆州、孝感、长阳、沙市市、十堰市、阳新、恩施、襄阳、黄梅、宜昌、应城、巴东的代表集聚一堂，表示坚决拥护人民法院对夏、朱、胡、张的严正判决。他们称这次审判，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四人帮骨干分子的威风，大快人心，大得人心。

对夏、朱、胡、张宣判后，省委常委李俊主持召开大会，省委第二书记、省长韩宁夫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人民法院对在湖北武汉地区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进行宣判，是这伙反革命分子应得的下场，也是全省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次审判是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审判，整个审判活动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目的，收到了较好效果，省委对此是肯定的，满意的。

韩宁夫同志说：我们在胜利目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不能放松警惕。各级党委要继续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一系列有关审理“两案”的方针、政策，打击少数，团结多数，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同那些在政治上捣乱，在经济上犯罪的帮派残余势力作斗争，要警惕那些跟随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钻进各级领导班子。一经察觉这“三种人”，就应迅速查明情况，坚决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

韩宁夫同志说：省委相信，通过这次对夏、朱、胡、张的审判，必将达到揭露、打击敌人，团结、教育人民，促进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的目的。全省人民要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去争取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更大胜利，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本报记者 良夏 原载 1982 年 8 月 24 日湖北日报社编《内部参考》第 31 期，总第 81 期）

二、研究资料

寻找胡厚民——兼谈“文革”中造反派的悲剧命运

钟逸专稿

（1）

胡厚民是“文革”中武汉工人造反派领袖中最有智谋、也最有影响的一位，曾被“三结合”进了湖北省革委会中担任常委，省总工会副主任，但“文革”中他多次被关押，1982 年被当局以谓“四人帮余党”罪名起诉，被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据传在刑满之前死在劳改农场。然而，2006 年，有人却说：他还活着，以修电视机为生。

近几年来，在武汉部分市民中频频出现关于“文革”中群众组织领导人的传言：谁在修电视机，谁在摆地摊卖皮鞋……听到传言的半信半疑，有人千方百计地去寻找，想判定真伪；也有人得知其身份后，请他们吃饭，给钱给物。

2006 年元月中旬，我偶遇“文革”中武汉最大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成员李某，他与该组织勤务组（当年群众组织领导层通用“勤务组”的名称，领导人的职务为“勤务员”，这得名于毛泽东有关语录）成员胡厚民有过交往。李某告诉我：“你知道吗？胡厚民还活着哩。有人说他在修电视机，告诉我电话号码，我是以修电视机为名将他请来的。不久前我不仅和他见了面，还在一起吃过饭。”

我大为惊疑。人死复生修电视机？

“文革”爆发迄今已经 40 个春秋，中国社会改观惊人，使任何个人的命运发生极大变化，而造反派领袖既然从事了政治这一在中国属于高风险的行当，比别人多经历若干风云沧桑，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不让人意外。不过，那个年代的过来人，目睹过他们在“文革”舞台上短暂数年叱咤风云，再耳闻他们修电视机、摆地摊的凄凉老境，总难免对他们人生中段数十个春秋的遭际浮想联翩，不胜唏嘘。

算年龄，“文革”风云人物都过了花甲、古稀，不少已相继去世，幸存的当事人、知情人也来日无多。他们除了当年受审查时写的“请罪”交代材料，并没有留下多少能供后人公开研究的回忆史料，并没有能加入到反思这场规模、影响均“史无前例”的运动的行列中去，殊为可惜。当前，执政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那么，寻找“文革”幸存的当事人、知情人，发掘他们所知晓的史实，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采取多种手段纾解民怨以防止大规模社会动荡再次爆发，应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吧。

胡厚民是当年武汉工人造反派领袖中最有智谋、也最有影响的一位，在“文革”中被“三结合”进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担任常委，省总工会副主任。他在 1982 年被当局以所谓“四人帮余党”的罪名起诉，在所有受审者中态度最强硬，一时名噪江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刑期也是最重的。

武汉工人造反派几个最出名的领袖，像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本文中“文革”人物简介，由三部分组成：“文革”初身份、群众组织中职务、“三结合”被安排的职务）、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武汉钢铁公司工人，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

委会常委)等均已去世，我们早先得知胡厚民也在刑满之前死在劳改农场，其姐胡秀娟为他办了丧事，许多人去吊唁。此事早在武汉流传多年，如今人死复生，怎不令人惊疑？

李某将“胡厚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当知青的插队伙伴晏大姐，当年曾和胡秀娟交往颇深，后来断了音讯；还有一位朋友鲁先生当年见过胡，我们不由得都很想“验明正身”。

2006年元月25日下午，晏大姐如法炮制，打电话以“修电视机”的名义将“胡厚民”请到家中。我和晏的女儿均到场，事前我们反复看了胡厚民30年前的照片，对他壮年时的相貌特征烂熟于心。“胡厚民”到晏大姐家后，我们又立即打电话给鲁先生，请他尽快赶来辨认。

“胡厚民”来后检查电视机说是好的。晏大姐看到他装工具的塑料文件盒上插着名片，赫然印着“胡厚民”三个字，便说：您家（武汉方言，即“您”）这个名字我蛮熟悉，您家认不认识胡秀娟？“胡厚民”说：“她是我姐姐，原在汉正街做生意。”

晏大姐说：“我们原来在一起做生意，打交道很多，她现在住在哪里？”“胡厚民”说：“她住在居仁门，有个抱养的姑娘。”

我在旁边观察，觉得此人与三十年前照片中胡厚民的身材、相貌差距太大，就拿出一张胡的照片，问他认不认识。“胡厚民”反问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我说他就是胡秀娟的弟弟。“胡厚民”愣了一下说，这是胡厚雄，已经死了。他神色惊恐不安，说自己“学习”了十几年，不愿意说过去的往事，很心酸。还说他改过名，现在才改回来。

我问他多大年龄？“胡厚民”答：68岁。我又问原来在哪里工作？他说在武船搞翻砂。“胡厚民”还说，我姐姐知道我的情况。晏大姐忙问胡秀娟的地址，“胡厚民”说：“你到居仁门一问就找得到她。”

鲁先生还未赶来，“胡厚民”起身欲走，我将朱鸿霞的照片递给他看，朱、胡在“文革”中生死相依，两人再熟悉不过。但他看了一眼未作反应，就走出房门。晏大姐赶快抓了20元钱追上去要付他的上门费，他坚决不收。

他走后，我认为此“胡”不像照片中的胡，也没有领袖气质，多半不是真胡厚民。晏大姐说，这个年头他冒充胡厚民对他有什么好处？我觉得像。他说的

年龄、原工作单位都对，家里的事情像胡秀娟抱养女儿也说得那么真切。是否受打击太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对他的“突然袭击”，他接受不了？晏的女儿是位教师，也说有点像照片上的人。

鲁先生十分钟后才赶来。听了讲述，他说他百分之百不信，一个人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很容易了解到，不能据此判断为真。

当天晚上，执着的晏大姐冒着严寒去了居仁门。当地人说，居仁门是个老地名，原为城墙，早已拆毁，这一带现只有崇仁路这个地名。晏大姐当即打电话问“胡厚民”，回答说是崇仁路 146 号，晏大姐找去，没有此人。再打电话，“胡厚民”又说在集贤村 3 号。晏大姐再找去，仍找不到。她找当地居委会主任、书记及不少老人调查，均说无此人。此时已是晚上 9 点 35 分，再拨打“胡厚民”的电话已无人接。第二天，晏大姐用不同座机和手机多次打“胡厚民”的电话，均未答话即被挂断。

柳暗花明，找到胡的姐姐

2 月上旬一天，晏大姐来电话说她费尽周折联系上了胡秀娟，约我到她家去见。我和鲁先生走进晏家，未经介绍，我一眼即认出了酷似照片中胡厚民的胡秀娟，虽然已七十多岁，她仍显得很精神。

我向胡秀娟问起那位修电视机的“胡厚民”，胡秀娟说，几年前就有人向她说起过，此人原来在汉阳一带活动，有一次替人修表未修好，被汉阳一些退休老工人识破，认为此人“败坏胡厚民的英名”，将其痛打了一顿。

我问胡厚雄是谁，胡秀娟回应：“他是二弟。”我说：“上次那个假‘胡厚民’说照片上的人是胡厚雄，看来他对你们家的情况非常了解。”我又问：“胡厚民如在世该有多大年纪？”她答：“69 岁。”考虑到中国人报年龄往往虚报一两岁的习惯，假“胡厚民”报的年龄倒也相仿。

我纳闷此人冒充胡厚民动机何在？胡秀娟说，可能是想得到人们同情，多给点修理费吧。胡秀娟大度地说，此人也许在文革运动中被当作“胡厚民”审查过，当时全省到处抓男“胡厚民”、女“胡厚民”，抓了不少人，他现在这样做也是为了生计……此时，我分明看见胡秀娟的眼睛已经潮湿发红。

“文革”结束已经 30 年，揭批“四人帮”、清查“三种人”的运动进行了多少年，人们始料不及：当年“十恶不赦”的造反派领袖的名字，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居然有“市场价值”？

胡厚民之死

我问她胡厚民的死期和死因，胡秀娟说：“开亚运会那年（1990 年）10 月 31 日。监狱通知我说是这一天，死于脑溢血。我就怀疑：他整天在牢里吃萝卜白菜，以前从未听说有高血压，怎么会得脑溢血？就请了湖北印刷厂的医生杜丽娟和胡厚民的四个弟弟，买了一台照像机，买了新衣服，一起到他劳改的襄樊去。我们拍了不少死者照片，请杜医生写了一个死亡鉴定报告。杜丽娟说，从尸斑看，是脑溢血死亡的典型症状。”胡秀娟还说，管教干部介绍，胡厚民发病之前，省劳改局去了一个人到监狱找胡厚明谈话，胡厚民突然说脑壳疼，眼睛突然发黑，送往医院抢救时，还开了颅。“死者头上有个洞，医生说在抢救时揭了‘盖子’。”

1990 年 9 月，胡厚民时年 76 岁的母亲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武汉中级人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实应该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 4 年零 9 个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 1976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1992 年 3 月 9 日止”。也就是说，他被囚禁 14 年，还有 16 个月就可恢复自由时去世了。顾建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书记、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的回忆更为准确：2001 年 1 月，我拿到省劳动厅一份文件，文件里讲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出狱都要回原单位安排工作，工资按逮捕前的级别套现在的标准。我问曾负责湖北“两案”工作的省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为什么没有胡厚民呢？谢杰民回答说胡厚民死了。根据中共中央 82 年 9 号文件精神，判重了的可以减刑或提前释放。胡厚民属于提前释放人员，省里下通知到劳改农场，劳改农场领导找胡厚民谈话，把省里的精神告诉他，准备第二天就释放他。农场办了一桌酒席，农场领导、监狱工作人员和胡厚民一起吃饭，胡厚民在喝酒时倒下，抢救无效死亡。

胡秀娟告诉我们，胡厚民的骨灰盒一直存放在归元寺里，没有安葬。

2006年6月27日，我和胡秀娟、她的两位弟媳及胡厚民生前好友十余人来到汉阳归元禅寺对过不远的僻静小巷。这是一幢两层砖混结构的典型江南民居，门楣上挂着“平田南村54号”蓝底白字标牌，大门右边挂着“汉阳净业火葬骨灰坛寄放处”的木牌，厅堂正对大门依墙摆放着香案、神龛、方桌，东墙贴着两张署名归元禅寺、盖有公章的通告。胡厚民的骨灰盒存放在二楼拥挤的骨灰存放架上，骨灰盒上嵌着死者的5寸遗照，一张红纸上用毛笔写着“胡厚民”三字，上面搭盖一小块红绸，显得寂寞而冷落。

我们这群凭吊者在厅堂里摆上胡厚民的遗像和鲜花，点燃香烛，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

(2)

武汉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陈述上说：既然“文革”全错了，那就不是你非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公正合理的评价，得到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仍然背着各种罪名。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

胡厚民法庭陈述的追记

1976年12月，经中央批准，湖北省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实行专案审查，1977年11月28日宣布对其逮捕，一直关押到1982年7月才进行审判。

胡厚民在法庭上的陈述记录稿在当局手中。下面是胡厚民在狱中的追记，1983年由家属探监时带出。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她）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非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长期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

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文革”中湖北最大的保守组织——钟注）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注）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可查）。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196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武汉军区政委——钟注）在湖北大抓“北、决、扬”、“五一六”，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

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五一六”？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五一六”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1976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们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

第二首：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入党曾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回顾。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寰宇。

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官先生。

胡厚民

1982年7月24日上午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

湖北日报记者在《内参》中这样描述胡厚民：“他利用合法机会，在被告席上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这两首诗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胡厚民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还可以看出他拒不认罪的反革命骨气。”

(3)

胡厚民的刑期和“四人帮”中的姚文元相同，超过林彪反党集团中被判刑的所有人。他被重判是因为拒不认罪。“文革”十年，武汉造反派除 1967 年“七二〇”事件后风光过一年多时间，其它时间几乎都在挨整。胡厚民的遭遇是湖北、武汉所有造反派遭遇的缩影，他三次坐牢，“文革”期间竟有将近一半时间被监禁，“四人帮”垮台后胡厚民又被关了 5 年零 8 个月，才被法庭宣判。

胡厚民，湖北汉阳人，1954 年由技校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当工人。1961 年入党，延至 1964 年转正。1968 年 1 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66 年底，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成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的帮派头目。12 月，胡厚民到北京，在戚本禹的操纵下冲击中南海。1967 年 1 月 26 日，胡厚民与夏邦银、朱鸿霞等人策划联合夺取湖北省、武汉市党政大权。2 月 22 日，胡厚民同杨道远、朱鸿霞等人在《长江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夺权与资产阶级夺权的生死决战》的长篇文章，加剧了武汉各群众组织的分裂和派性斗争，使武汉内乱加深。“七二〇”事件后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掀起了武汉地区反军乱军恶浪，并在北京组建成立了“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返汉后，组织策划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和大量军事机密文件，召开万人大会，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胡厚民等策划成立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指挥部”，欲以此充当省革委会的过渡权力机构，继而夺取省、市大权。当王力在“七二〇”事件中被中央揪出之后，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竟要求王力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随后，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活动。

1968 年 1 月，胡厚民参与策划了武汉地区的“三反一粉碎”运动，致使武汉地区的生产遭到损失，群众遭受不幸。为了篡夺各厅、局大权，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指使姜诗存组织成立“28 个厅局夺权指挥部”，企图架空省革委会，夺取厅局领导权。在此期间，胡厚民还参与指挥中原机械厂武斗，造成打死 2 人、

打伤 57 人、工厂停产 3 个月、经济损失数百万元的结果。胡厚民还插手浠水县的武斗，造成死 15 人、伤 8 人的惨剧。1969 年，胡厚民在武汉参与、组织、策划“反复旧运动”，召开“反复旧、反逆流、反复辟动员大会”，在中央下达了《关于处理武汉地区“反复旧”问题的指示》后，胡厚民一伙仍提出在武汉要进行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同中央指示对着干。1970 年 6 月胡厚民被监护审查，1974 年 3 月解除监禁后，其反党反军活动更加猖狂，多次召开黑会，制造内乱舆论，并多次有组织地围攻军区、省市革委会，为了加强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系，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组织专门写作班子，给江青、王洪文送黑材料，以示效忠，提出“批林批孔就是批周总理”。1976 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胡厚民一伙更极力鼓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攻击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

为篡党夺权，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成立了核心领导班子，于 3 月 21 日强占省招待所 13 号楼作为指挥部，并设立了所谓材料组、宣传组等七大组，并按战线分工，公开向省革委会要官要权。

1976 年 10 月 6 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经中央批准，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977 年 11 月被依法逮捕。1982 年 7 月 28 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上面全文照录的，是 1996 年至 2000 年参加编辑《武汉大典》的人员根据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武汉市档案馆提供材料写成的“胡厚民”条目（注 1）。该条目虽未最后入选《武汉大典》，但它是笔者得到的官方关于胡厚民的最完整叙述，弥足珍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继北京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的审判之后，各省也审判“文革”结束后即被拘押的所谓“‘四人帮’爪牙”。湖北省造反派的一批头头被判刑，其中判得最重的是胡厚民：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一同受审的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和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各判 13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本文中人物简介由三

部分组成：“文革”初身份、群众组织职务、“三结合”被安排职务）被判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胡厚民的刑期和“四人帮”中的姚文元相同，超过林彪反党集团中被判刑的所有人。他被重判是因为拒不认罪。

“文革”十年，武汉造反派除 1967 年“七二〇”事件后风光过一年多时间，其它时间几乎都在挨整。胡厚民的遭遇是湖北、武汉所有造反派遭遇的缩影，他三次坐牢，“文革”期间竟有将近一半时间被监禁，“四人帮”垮台后胡厚民又被关了 5 年零 8 个月，才被法庭宣判，此前未经法律程序他被关押了十年半。

官方上述“胡厚民”条目，颇具“盖棺论定”的权威性口吻。然而，所述果真是事实么？果真是历史结论么？“文革”后话语权被官方垄断，“文革”真相长期被封锁，官方媒体妖魔化造反派，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向造反派。值此“文革”爆发四十周年，笔者探访胡厚民的亲友和知情人，包括当时与他属于对立派别的人士，深深感到：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坚定勇敢、诚信、有爱心的人格，承受艰难而勇于负责，心系国家命运和弱势群体疾苦，拒绝功利、利己和机会主义……这是人类精神天宇中永不磨灭的星光。在这星光普照之下我来说胡厚民，不由想起人们提起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一条汉子。船工出身的工人造反派领袖 1937 年 6 月 15 日（注 2）胡厚民出生在武汉市一个船工世家。父亲胡仁德是一位老船工，在长江、汉江靠撑船摆渡运输养家糊口，育有五男二女，胡厚民是大儿子。10 岁开始，胡厚民就跟父亲学撑船，后来又跟父亲在大船上学司舵。

1949 年，胡厚民告别三年船童生活，插班进入汉口第六小学四年级。1954 年初中毕业后考进武昌造船厂技校，1955 年元月加入共青团，毕业后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1958 年大办钢铁时，胡厚民是转炉工，工作环境很恶劣，胡厚民索性搬到武船铸钢分厂去住，晚上就睡在余温燎人的炉子里。由于表现积极，他当上电炉长。

胡厚民 1960 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班，1961 年 7 月 1 日加入中共（注 3）。1965 年武昌造船厂组织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让胡厚民负责。宣传队不仅在本厂演出，还走出厂门，到肉联厂、国棉一厂、六厂、市技术工人学校

等单位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胡厚民搞过一些业余创作，还写过一些报道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他还曾任车间党支部组织委员。按当时说法，胡厚民可谓“根正苗红”的培养、依靠对象。

1966年夏天，胡厚民被派到北京钢丝绳厂学技术，亲身感受到北京如火如荼的“文革”热浪。回到厂里，他和李承弘、喻尊启三人成立“红尖刀战斗小组”。李承弘与胡同寝室，当时年仅23岁，后为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先后担任过工总组织部长、联络部长；喻尊启是工人工程师、厂劳模，当时厂里提出过“外学马学礼（湖北著名劳模），内学喻尊启”的口号。这个小组写过几篇大字报，有一篇质问是谁“扼杀了我厂第一个工人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另一篇是揭批铸钢厂当时的上级武汉市冶金局党委（武船铸钢分厂1965—1969年一度划归武汉市冶金局管辖，改名“武昌铸钢厂”）对运动领导不力，不支持工人“革命行动”，未同意工人要求派车送工人到武汉大学去看大字报。“红尖刀战斗小组”的大字报也遭到大字报的回击，有大字报说厂长吴方贤、喻尊启和胡厚民三人关系密切，是“三家村”，拉帮结派，不搞政治挂帅，搞“唯生产力论”。

真正让胡厚民加入造反派的，是8月下旬北京南下来武汉串联的部分大学生，提出“炮轰湖北省委”口号，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文革”初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张体学等，操纵多数派红卫兵及工农群众“保卫省委”，大抓“南下一小撮”。王任重公开威胁“枪打出头鸟”、“秋后算帐”，张体学仿效毛泽东，穿军装、坐敞篷吉普车在武昌体育场检阅红卫兵，省、市委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到各大中学校和工厂、农村演出《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舞。张说：“南下学生傅军胜是一个右派，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还声泪俱下控诉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宣称：“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

当局始料未及的是，发动“湖北省委就是好”的大辩论，却发动了群众。

李承弘在湖北大学贴出大字报，支持“炮轰湖北省委”的首都学生，胡厚民也支持李。当时中央尚未批准工矿企业开展“文革”，10月初《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后，在聂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武汉市革委

会常委)等人支持下，胡和李加入新湖大“红八月”战斗队，两人还找到武汉市委工交政治部主任刘振邦、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张天林谈判，要求成立工人群众组织。

1966年11月10日，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几乎与上海“安亭事件”同时，武汉的造反派工人成立了工人总部。胡厚民是发起者之一。【注释】 1，笔者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朋友提供。 2，此系武汉市公安局《安葬许可证》上出生日期。其姐胡秀娟的记忆是1936年农历六月初二，查万年历为公历1936年7月19日 (4)

胡厚民在“文革”中干了什么？因胡厚民在受审时拒收起诉书和判决书，其家属无法向作者提供决定他命运的这两份文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档案馆又不开放让公众查询有关“文革”的档案，只能通过大量采访当事人，结合不同时期当权者给胡厚民罗列的主要“罪状”，挑选其中武汉地区有影响的事件，将胡厚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叙述如下：

胡厚民的“文革”角色与“罪名”

胡厚民在“文革”中干了什么？

因胡厚民在受审时拒收起诉书和判决书，其家属无法向作者提供决定他命运的这两份文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档案馆又不开放让公众查询有关“文革”的档案，省、市图书馆竟规定：查阅“文革”期间报刊者须出示省、市委办公厅的介绍信。作者只找到本文开头的“胡厚民”条目，并对照夏邦银、朱鸿霞、吴焱金（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人的判决书，和1977年4月湖北省“夏朱胡专案组”公布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相信当局对胡厚民的指控，应该与《夏邦银刑事判决书》（市法〔82〕刑初字第29号）所述大致相同，一曰“颠覆政府罪”，二曰“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三曰“诬告陷害罪”，“即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当然，在“文革”中不同时期和“文革”后1982年审判中，罪状说法各有不同。

通过大量采访当事人，结合不同时期当权者给胡厚民罗列的主要“罪状”，挑选其中武汉地区有影响的事件，将胡厚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叙述如下。

一，关于“冲击中南海”

据亲历者李承弘、王光照（武汉锅炉厂工人，工人总部成员，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委员）等人回忆：在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和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学生的牵线串联下，工人总部在湖北大学31号楼形成雏形，大约在10月底成立的工人总部勤务组有李承宏、李洪荣、余福生、彭国华、胡国基、朱鸿霞、丁?秣C人。1966年11月10日，工人总部在省委洪山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张体学和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祝贺工人总部成立；他提前离开，说细节由赵修继续讲。张走后，赵修就一问三不知，连成立总部都不同意，只同意设联络站，结果谈崩了。不能“树旗”，组织又得不到省委承认，工人们于是决定拦火车到北京，希望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几百人到北京后住在国务院白石桥接待站，向中央反映情况，也到北京各高校与机关串联，了解形势。

几乎同时，上海发生“安亭事件”，大批工人在安亭拦火车要求进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给上海工人的电报中，要求他们返回原单位，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上海工总司则批判陈的电报是“大毒草”。全国各地在京“造反”的工人，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大会得到首都红卫兵三司帮助，武汉工总到京人员负责整个会务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王光照回忆：会后，我们打着“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旗帜，步行来到中南海西门，在墙壁上贴了两条标语，说我们要找陈伯达同志辩论：到底革命是“大道理”还是生产是“大道理”？我们认为陈伯达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共去了三百多人，为了避免给人以口实，我们把身上凡是金属制品哪怕是指甲剪也都集中交给其他人带回去。朱鸿霞、胡厚民、王光照和李承弘等人排队走到中南海西门，与一个穿四个口袋

军装的干部交涉要见陈伯达。大家都安静地坐在警戒线外，只有一两个人站起来，要求转达“一定要把陈伯达同志请出来”。晚上绝大多数人撤走后，胡厚民和李承弘等人一直坚持到深夜 12 点。

这就是次年 3 月武汉军区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的主要罪状之一——“冲击中南海”。

造反工人的崛起给中南海出了难题。周恩来、陶铸等希望运动按照原来中央文件的部署进行，不要延及工交战线，但激进的造反工人强烈抵制。张春桥表态支持上海工总司，得到毛泽东支持。武汉造反派工人一部分参加了 11 月 26 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返汉，还有一部分参加了周恩来及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人两次分别接见后返汉。省、市委态度大变，给钱给物给汽车，还安排工人总部到阅马场红楼（原省政协办公楼，今辛亥革命纪念馆）办公。胡厚民则留在北京，主持驻京联络站。

二，参加“一二六反革命夺权”

工总领袖非常重视在大型企业的产业工人队伍里发展组织。工总初期，七人勤务组中来自大型企业的只有朱鸿霞和武汉锅炉厂李洪荣，1967 年元月，朱鸿霞主导调整工总勤务组，换掉几名来自中小企业的头头，新的九名常委几乎全部来自大型企业，工总“四大金刚”（成员最多的四个单位）分别是武重、武锅、武船和电信局，以及有十几万产业工人的长江航运管理局和纺织系统。造反派普遍也受“出身论”影响，怕被外界抓辫子说“政治不纯”、“组织不纯”，推选领袖时很注意其家庭成份和政治表现，胡厚民是党员，是产业工人，有较强的组织号召能力，很快被推选为“工总”勤务组二号勤务员，从此，工总实际上是他掌握实权。

武汉钢铁公司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成立于 1966 年 12 月 12 日，张体学亲自授旗。“九一三”名称来自毛泽东 1958 年 9 月 13 日视察武钢。九一三原是工总武钢分部，其头头李想玉、杨玉珍（女，武钢工人，九一三勤务组成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等全是工总上京告状的人，后来从工总脱离，双方达成划分地盘协议：九一三只在青山区发展，工总不到青山区发展。青山区当时除武

钢外最大的企业是拥有三万多职工的第一冶金建设公司，该公司技术干部曹承义（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委员）本要参加工总，因工总、九一三两家有上述协议，未能如愿，索性另创造反组织“新一冶”。胡厚民后多次责怪工总组织部长李承弘，说他犯有两大错误：一是不该让九一三独立出去，二是组织上实行“血统论”（必须是红五类出身）和关门主义。

(5)

1967年7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东湖亲自交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要他释放朱鸿霞和胡厚民。第二天，阶下囚一下变成了座上客，陈再道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送了每人一套《毛泽选集》。

1967年元月初，工总、九一三和学生组织二司属下数十万成员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斗王任重、张体学等人，酝酿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据时任工造总司负责人吴焱金讲：“一二六”夺权时，武汉造反派各组织在湖北大学开会，我就与胡厚民发生了争执。胡厚民说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仅仅是三个（大学）学生造反组织，与二司这个全市性的学生组织没法比，“三新”不是坚定的造反派，红三司是“康老三”（“康”指康有为，讥红三司是“改良派”），大联合要以工总、九一三、二司为核心。工造总司是全市性组织，夺权还不会排斥我们，我为小组织出面讲话，我说：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只要是革命造反组织，都应该参加夺权，都应该考虑它的代表。你们工总是最大的组织，不要一搞就是打、砸、抢。我的发言遭到工总、九一三代表的围攻，发言中说我是“托派”、“投机分子”，并表示只有他们几个组织才是最革命的。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但没有联合夺权。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武汉市低压锅炉厂工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很幼稚，跑到市政府抢了武汉市人民委员会的铜章子，我知道后认为他是瞎搞，我说章子有屁的用，叫他立即还回去。工总、九一三、二司知道了这件事，把这件事估计得太严重了，于是1967年2月8日

在已经被内部造反派夺了权的《长江日报》上，以多个造反组织联名的方式发表声明（俗称“二八声明”），把造反派的矛盾公开化了。

杨道远（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一号勤务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对两派分裂经过的说法不同。他说当时成立了联合指挥部，预备夺权，打算成立七个人的常委班子，但工造总司的人说，二司参加我们就不参加了。外面传出工总、二司不可靠，二司的头头“修了”（即修正主义）这些舆论。工造在汉口还联合一些组织成立了一个夺权办公室。他声称：“这一次分裂，真正是他们挑起来的。”

杨道远还回忆：于是二司总部决定坚决不让他们夺权。“布置了几个学校，在他们夺权之前，提前下手把印章都拿走。要他们知道，你们人没人，枪没枪，夺权，夺个什么权？”二司连夜去人到省委、省人委把印章都取走。但造反派中的另一派还是搞了夺权大会，起草了声明、公告和致敬电，要在第二天《湖北日报》上刊登。“张体学给各专、县打电话，要他们承认夺权，我们坚决不承认，坚决不让《湖北日报》发布公告。”

双方矛盾催生的那篇“二八声明”，是由二司笔杆子雷志茂根据2月4日工总、二司、九一三等七个组织开会的精神执笔的。二司宣传部长吴恒春后来回忆：“这篇声明，矛头所向很明显是对新派组织（即上述“三新”学生组织和工造总司等）的。是说他们在侵占文化革命的胜利成果”，充当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策划了形“左”实右的假夺权。

“声明”颇有“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文风，以舍我其谁的口气痛骂：“王任重、张体学利用爪牙走狗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伙同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一切牛鬼蛇神，相互呼应打入革命造反派内部，配合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利用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及一些忘记阶级斗争、忘记为党夺权的糊涂虫、马大哈，还骗取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纠集了一个围剿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大杂烩”。

“二八声明”激化了造反派内部矛盾，赞成的一方称为“香花派”，反对的一方称为“毒草派”——这也就是后来造反派分裂成为“钢派”与“新派”的滥觞。使局面更加对立的，是武汉军区十天后介入辩论，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认定“二八声明”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

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声称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该声明用宣传车、直升机在全市和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

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造反派并不示弱，杨道远回忆：我们又组织了一个“二二二文章”《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与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针锋相对，署名为杨道远、朱鸿霞、胡厚民。

但 3 月 17 日晚，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军区在全武汉市实行大逮捕，拘捕工总分部以上头头共 485 人。3 月 21 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宣布工总是“反革命组织”，“立即予以解散”。二司头头不得不列队去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罪”。

胡秀娟回忆：3 月 17 日晚，建乐街派出所户籍警三、四个人到家里来抓胡厚民，胡的妹妹胡茜（24 女中 68 届高中生、班团支部书记，钢二司红卫兵）反应激烈，说你们没有逮捕证，不许带人走；说深更半夜抓人，又没有带铐子，用绳子五花大绑地捆着，抓人是非法的；你们镇压革命造反派，我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们。她追着警察一直骂到派出所。

王光照回忆：从 3 月 17 日到 6 月中旬，我被关在宝丰路监狱的二楼，二楼是个长方形的环形楼房，斜对面就关着胡厚民。对面送饭牢门打开时，我从监视孔中可以看到胡厚民，和胡关在一起的是一位 60 多岁的国民党将军。我和胡厚民是每天上午 10 点、下午 4 点半共两餐，是用桶装的菜。遇到蔬菜的淡季，上午的菜是一块臭腐乳，下午的菜是一块辣萝卜条，吃不饱饭……我看到胡厚民在牢房里锻炼身体，我也学着锻炼身体。后来他和我分别被转走。

1968 年夏，政治上一度翻身的工总负责人在船上开江心会议，胡厚民让开会的人去参观他坐过的湖北“天字第一号牢房”。李承弘说，估计是在长江边的军山砖瓦厂，当时胡已当上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旧地重游，监狱的军代表还让部队一个班出来列队欢迎。这个监狱很特别，是个长方形的建筑，有 3 个单间，每个牢房 4-5 个平方米，房间的四周没有窗子，外形像机场里的油库，门有 1 尺厚，外面是铁门，内面是橡皮的，防止犯人自杀。房间顶上有个台球那么大的小孔，里面没有床，只有一堆草。这次胡厚民被拘押，罪名是“阴谋颠覆政府”，“非法组织工人总部，成为帮派头目；冲击中南海；参与了一月夺权”。此罪

名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推翻。1967年7月17日毛泽东说：“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注4）毛泽东还说：“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注5）1967年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提出：“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胡秀娟告诉笔者，1967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在东湖梅岭（疑为梅园——作者）亲自交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要他释放朱鸿霞和胡厚民。第二天，阶下囚一下变成了座上客，陈再道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送了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用吉普车将两人送到造反派的大本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释放。胡厚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出来，身上穿的是父亲旧社会穿的蓝布衫，上面到处是洞。

4，《毛泽东传》14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5，《杨成武将军访谈录》，173—174页。（6）

三，“反军乱军”和“抢枪武斗”

反军乱军是造反派的一条主要罪名，其实，“揪军内一小撮”和“武装左派”最先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早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加上“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提法。1967年7月18日晚上，毛泽东讲：“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信中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注6）经毛泽东审定的196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也用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周恩来步步紧跟毛泽东，在1967年8月11日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说：“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

但是，仅仅只过了一天，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注7）

“七二〇”事件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以后，武汉造反派确有头脑发热、派出人员到全国去支左、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但中央制止后很快就停止了。

1968年3月24日，中央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称他们是“变色龙”，武汉造反派两大派中的“新派”提出“揪武老杨”的口号，矛头主要是对着林彪在湖北的死党刘丰（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活党”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死党”“活党”的说法，是批林批孔时毛泽东对刘、曾定性）。但胡厚民并不同意这一口号。据柳英发（湖北省实验中学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回忆：作为钢派智囊人物，胡厚民认为历来反军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出于“钢、新之争”，胡厚民想出一个“拥军”口号与“新派”对着干，即“拥护曾、刘、方、张！

（“方”是方铭，武汉警备司令区司令员、15军军长、武汉市革委会主任；“张”是张昭剑，15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1968年7月任17军政委，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揪出薛、李、孙、姜！”（薛朴若、李长庚、孙德枢、姜一，均为“新派”同意结合的老干部）谁知曾、刘等人并不领情，曾思玉在1968年6月传达中央精神的大会上说：“我一听到‘拥护曾、刘、方、张’的口号就头疼。”胡厚民心灰意冷，再也不提这个口号。关于武装左派和抢枪，根据目前看到的材料，与胡厚民并无牵连。杨道远回忆：1967年《红旗》杂志八一社论出来后，还发来文件，有“武装左派”的精神。我和方保林（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等几个人去找时任15军政治部主任康星火，要求发枪。第二天他们就答复，说武装你们肯定是应该的，但是群众组织很多，单给你们发枪其他组织找上门来不好办；最好是你们自己去仓库里搞，我们支持你们。杨道远马上召集会议，决定由武大、武测和武工三校学生去，“守卫排看到钢二司的人来了，就派了几个人开门热烈欢迎，后面的车子就开进去了，我也亲自进了仓库。先是拿枪和子弹，后来连擦枪布都搬回来了，还有几尊迫击炮也运回来了。”他还说，武汉警备区“部队派了很多校枪的、修配的技术军官过来”，“训练也是部队的干部搞的”，还打过靶，此事还在《解放军报》上登过。后来中央下达“九五命令”，要求群众组织缴

枪或封存，“我们坚决执行了，仓库的枪先行封存了，造册都是部队的人搞的，都交给了军政训练办公室”。

造反派抢枪与某些人别有用心地怂恿有关。王光照回忆：1968年5月中旬一个深夜，张昭剑（时任武汉警备区副政委）突然轻车简从来访，对我说：“老王，现在形势有变，左派不武装不行。”还说新华工如何如何，搞了多少枪，要我们尽快行动起来。他还吐露省公安厅里有这么一批“货物”。后来，武锅去3303工厂（兵工厂）和省公安厅抢了枪。

至于胡厚民“参与指挥中原机械厂武斗”的罪名，实际上是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等人有责任，她被控“组织指挥打砸抢”，1977年10月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4月被判刑5年。从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对胡秀娟的起诉事实看，此事与胡厚民毫无关系，但是在批判胡厚民时这笔帐还是算在他头上。

四，不得不说的“钢新之争”

武汉军区取缔工总，被工总、二司等组织“二八声明”说成是“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造反奸贼”、“托派”的新派并没有幸灾乐祸，而是认为：这是否定整个“文革”，并不是仅仅对着哪一派造反组织。唇亡齿寒，新派早在3月4日就伸出援手，在他们控制的《湖北日报》上发表社论《粉碎秋后算帐的反攻倒算》；随后新华工借庆祝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游行到二司组织为主的院校串联，高呼毛40年前的语录“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支持受压的二司。4月5日，武汉市一中造反派大联合组织新一中革司成立，立即公开驱赶军区支左办公室派来的工作组，并发动了两次声势浩大的、矛头针对武汉军区和市人武部的绝食行动。

6月17日、6月24日、7月15日，武汉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几次对造反派大围攻的“白色恐怖”中，钢、新两派工人、学生的血流在一起。

但大敌当前，造反派内部并未消弭矛盾。杨道远回忆：“我们组织班子写上北京的汇报材料，新派和钢派都参加，主要分歧就是为工总翻案上，意见不一样。”钢派要求彻底翻案，释放被抓的头头；新派则只要求给工总广大成员平反。【注释】

6，《王力反思录》1010-1002 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

7，据《王力反思录》1014 页。

(7)

“七二〇”事件后，8月8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主要负责人，竭力协调钢、新之争。但胡厚民对武汉的大联合，有自己一套想法

“七二〇”事件后，8月8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主要负责人，竭力协调钢、新之争，指出：“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二六夺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一个夺权的革命演习，大方向是对的，要支持。”“三新同志的错误”是“客观支持了”武汉军区二一八严正声明，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事实上，三新的同志很快就发觉不对头了，在大风大浪中站在了革命方面”，“三钢的同志应当谅解”。“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大家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过去并肩战斗，共过患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讲话纪要最后说：“革命派一定要实行大联合，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武汉有自己的特点嘛”。

对武汉的大联合，胡厚民有自己一套想法。据柳英发说，胡认为武汉大联合应该像上海那样，实现“三个一”：一个领导；一张报纸（当时武汉地区《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分别被新派和钢派控制）；一个组织。为此，胡厚民动员吴焱金的工造总司加入工总，但胡又瞧不起工造总司，认为他们都是“卖烧饼油条的”，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只在总部常委中给他们几个席位，这下把吴焱金搞毛了。

林子忠（武昌造船厂工人，新武船联司一号头头、武船厂革委会副主任）回忆，1967年9、10月份，胡厚民找我说，把武船的权交给你，你们新武船联司参加钢工总，不要再搞什么“新派”。我当时笑了一下，说此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要跟兄弟们商量一下，实际上婉拒了胡的要求。……胡厚民还动员谢华

之（武汉大学学生、三司革联一号勤务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的三司革联参加钢二司。

1967年10月8日周恩来陪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到武汉访问，问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柳英发，武汉的大联合怎么搞比较好，柳英发说，学生都加入钢二司，工人都加入钢工总。周批评柳英发年纪小派性大。他说，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要走武汉的路，尊重山头，承认山头，最后消灭山头，成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实现大联合。中央在10月17日发出通知，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按行业、按系统、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这个通知是毛主席同意的。胡厚民当时私下认为周总理的指示与中央10月17日通知是不大一致的。因钢派人数多，按行业、按系统实行大联合钢派就占优势，而按山头实现大联合则要让出不少席位。因此他大力鼓动要按中央10月17日通知精神实行大联合。

“钢新之争”的焦点是以谁为核心来掌权？钢派头头特别是胡厚民认为新派不是坚定的造反派，有投机性。他们唯我独“左”的思想也与当权派蓄意挑拨离间有关。柳英发说，刘丰曾经对钢派头头煽动说，你们钢派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新派是小资产阶级、投机商、统战对象；你们钢、新两派还在打内战，百万雄师还在闹翻案。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朱鸿霞、胡厚民在批判林彪死党刘丰时都揭发过此事。1972年张体学患癌症临终前，则把新派头头召集起来开会，挑拨说一定不能给钢派头头掌权。

五，领导武汉的“反复旧”运动。

“反复旧”不是武汉造反派的发明，全国最先搞“反复旧”的是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是《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最早提出“反复旧”口号（见1968年10月出版的《红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1969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的对北京化工三厂的整党调查）。“两报一刊”字里行间传达的信息决不会逃过受压的造反派敏锐的眼睛。造反派认为武汉就是《红旗》社论所指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柳英发回忆：1968年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在革委会里，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

代表只是个花瓶和陪衬。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群众代表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

1968 年底，大、中学生大批毕业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上山下乡，随着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当局认可其隔离审查期可折算刑期，相当于牢房），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军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队”来整造反派。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中的政治地位。“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1969 年初，胡厚民看到了报刊上有关“反复旧”提法和王效禹在《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此时单位的保守派来家里抓他，胡厚民及时跑掉，到了青岛，见到了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几件事促成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此时造反的大、中学生都已离开城市，工人造反派自“文革”以来首次独立面对强大的当权者，胡厚民意识到，必须团结新派同志一起“反复旧”，才能造成强大声势。

“七二〇”后，钢派搞“钢化江城”，新派搞“新武汉”，1968 年春钢、新两派还发生过一些武斗，两派积怨很深，胡厚民与新派工造总司的头头从无私下来往。吴焱金回忆：此时胡厚民在协和医院住院，他请朱鸿霞、夏邦银、郭洪斌（Z 口区房地局工人、工总组织部长）、田国汉（湖北印刷厂工人、工总宣传部长）等巨头先后上门找我承认钢、新之争中的错误。“胡厚民出院后，邀我到他家去了一次。讲了抓他的经过和青岛之行，还反省说，当年你们揪‘武老杨’时，我们共同对敌就好了。他还说‘反复旧’不搞不行，最好是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个人出面挂帅牵头。其情感十分真挚。”

“反复旧”打头炮的是武锅的王光照。王特地选了对工总大逮捕的两周年纪念日——1969 年 3 月 17 日，在厂门口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列宁选集》中的一句话“我们决不半途而废”，这与朱、李、吴署名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大字报，拉开了武汉“反复旧”大幕。胡厚民又叫朱鸿霞、吴焱金、王光照等人上街演讲，讲保守派怎么回潮，造反派为什么受压，为什么要“反复旧”。王光照说：我在“反复旧”中，在全市各单位一共讲了 60 场大型报告会，与我同台演讲的有丁家显（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

革委会常委)、吴焱金、朱鸿霞和李想玉等人。我概括的是军宣队拿“三条扁担”、“三根绳子”压造反派，“三条扁担”是指“派性、打砸抢、抢枪乱军”三条罪名；“三根绳子”是指造反派“想当官、想入党、造反动机不纯”三条罪名。

吴焱金说：4月27日，我们在汉口工艺大楼街头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大会由胡厚民主持，朱鸿霞和我分别讲话，有数万人参加大会，把中山大道堵塞得水泄不通，“造反派感到扬眉吐气”。

4月底，中央通知将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群众组织代表接到北京京西宾馆。胡厚民敏感到中央某些人打算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要压制造反派捍卫“文革”成果的努力，临走前指派郭洪斌、方斌(工总武汉客车制配厂头头)当“反复旧”负责人，交代说：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8)

1969年春天，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叶群、黄永胜等中央领导与湖北、武汉造反派会谈，共有四个通宵。第一次接见，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胡厚民站起来回答了。周恩来说：“你坐过来，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

5月份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接见湖北、武汉造反派，共有四个通宵。

吴焱金回忆，第一次接见，进场后每个人发了一份铅印的有关“反复旧”的资料。其中第一篇就是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

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胡厚民坐在较远的地方，站起来回答了。“你坐过来，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周恩来问，“‘反复旧’是你发动的吗？”胡厚民说：是我们大家一起搞的。周恩来又问：“你是根据谁的指示？你‘反复旧’的依据是什么？”胡厚民回答：“我是领会中央的意图。”周恩来问：“中央什么时候说要‘反复旧’？”胡厚民说：“中央两报一刊中提到的：反对复旧。”胡厚民举了很多例子。周恩来问康生：“康老，你有什么看法？”

康生把“‘反复旧’的资料翻了一下，问了署名的三个人是谁，康生说：“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嘛，‘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你们的雄心壮志还不小。你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从文章中看不出来。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康生谈到周恩来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出生入死，那才是洒尽热血为人民。听说武汉市还在搞“反复旧”，根子就在你们，你们要做工作。

陈伯达也讲了话，大概意思也是你们不能再搞了。

叶群讲话说：“我也算你们半个老乡。你们年轻气盛，看问题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许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渠道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普通群众，你们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情况，派我们来就是做你们的工作的。你们今天谈的情况，我回去以后会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你们可以写信回去说服他们不要搞了。”

接见后，胡厚民对吴焱金说：机会来了，你把接见的情况写下来。胡厚民要他写信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说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吴焱金回忆：“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我。”

吴焱金回忆说：

第二次中央首长接见，

周恩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他说，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么越烧越旺了呢？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

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么不能做工作？康生对胡厚民说：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

陈伯达、叶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意思大同小异：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么不好，工作这么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

5月19日上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各界人士的接见。

第二天晚上，又把我们召到了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出一个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方案。周恩来拿出“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发给我们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吃完夜宵后，放映《南京长江大桥》纪录片，周恩来坐在我和朱鸿霞中间，周恩来对我们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来握着我的手说：我相信你们。

5月27日晚上，我们第四次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

周恩来等正式向我们传达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即“五二七指示”。

“五二七指示”转发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说，“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运动性质被定性为“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武汉的“文革”研究者老田在《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一文中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从‘五二七指示’所隐含的处置方式看，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于追究，实现‘团结’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词。非常奇怪的是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领导人中，除周恩来、

康生外，其他参与者构成整个儿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调整过程，没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参加。”

(9)

中共后来承认：“五一六”和“北、决、扬”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竟然全是子虚乌有！诬陷胡厚民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和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完全是别有用心地打击造反派的伎俩。但祸及全国一千多万人、许多人被整死、致残的特大冤假错案，到“四人帮”被粉碎时不了了之，没有任何人得到平反、道歉。

六，被打成湖北“北、决、扬”和“五一六”的总头子。

对胡厚民及湖北造反派给以致命打击的，是1969年下半年开始的清查“北、决、扬”、“五一六”和批判极“左”思潮，简称为“两清一批”，时间长达5年。胡厚民被诬陷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是湖北地区“北、决、扬”的总头目，他为此在“文革”中第二次被关押达4年5个月之久。

“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异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据冯天艾（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回忆说：“北、决、扬”人员极盛时不过25人，由于认识上的差异，造反派钢、新两派中绝大多数人对其都是反对的，在其被中央定性之前，多次强烈批驳其观点。鲁礼安（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就是被黄石铁山的新派抓获押送新华工，再送武汉警备区关押的。由于鲁在“七二〇”事件前冒着白色恐怖为工总翻案，被抓后，钢工总许多基层单位自发组织了营救活动，但并非出自对其观点的赞同。柳英发说，钢工总领导人和胡厚民本人都不支持“营鲁”。

军区三办（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徐键等人成天穿梭于钢、新两派之间搜集“北、决、扬”的罪证，对造反派普遍反对“北、决、扬”一清二楚。可是曾思

玉、刘丰等人却指使军区三办以湖北省革委会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捏造罪名，认定“北、决、扬”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利用中共中央1969年9月27日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简称“九二七”指示)，借批“北、决、扬”为名，把全省造反派统统打成“北、决、扬”和“五一六”分子。

柳英发说，从10月3日到10月28日，曾思玉、刘丰在洪山礼堂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九二七”指示。我是从10月16日开始参加会议的。这次会议，批“北、决、扬”只是名义，实际是批武汉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批胡厚民、朱鸿霞、任爱生、杨道远等，特别是集中批判胡厚民。大会发言中，凡是造反派的发言，无论钢新，多是先把自己批评一番后，再集中批胡。朱鸿霞就揭发过胡厚民的“三个长期斗争论”，即所谓“革与保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委会中新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新两派的斗争是长期的”论点。

1969年10月3日，刘丰在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上关于“北、决、扬”问题的讲话，表明了曾、刘等炮制惊天冤案的来龙去脉及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讲到“决派”及《扬评》的反革命罪行共10条，从第5条开始就全是张冠李戴，把部分造反派做的事说成是“决派”罪行。例如：“五、煽动抢枪，挑动群众组织打内战”，“八、鼓吹‘反复旧’运动，狂热地煽动向无产阶级反夺权”，“九、鼓吹反动的‘工团主义’，破坏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等等。

被曾、刘钦定为“北、决、扬”一号头头的鲁礼安听了十大罪状，莫名其妙，他在几十年后写道：“这后面几条以前我都没听说过，大概是社会上一些群众组织鼓吹的，也一股脑栽到我们头上”（注8）。实际上，此时曾、刘首长“醉翁之意”早已不在几个“空议论”的书生了，而是想用“北、决、扬”这个箩筐，将所有造反派都装进去。

1969年11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和头头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

平毅（武汉液压件厂技术员，工造总司宣传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回忆：学习班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名誉校长是林彪，陈伯达亲自主持，学习班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昭剑，说学习班的目的是要斗私批修，解决湖北派性问题，弄清湖北文革中几次大的事件，如抢枪、武斗、派性会议和大的争论，实际上是

专揪“北、决、扬”、“五一六”。张昭剑在学习班里把主要矛头指向三钢三新。因为工总组织大，在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的影响都很大，而胡厚民的点子比较多，张昭剑就把朱鸿霞、胡厚民并列为重要对象。在学习班里，反复地调动感情，把是否认识自己有问题、是否揭发别人，提高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高度，逼迫承认参加了“北、决、扬”、“五一六”。要求大家画出各种反动组织表格的式样，一直画到上面满意为止。

王光照也说，当权派对胡厚民特别“重视”。电信局的汤玉莲作为武汉造反派的女代表，参加过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因为当权派要整胡厚民，没找到过硬罪证，就想要汤玉莲承认她与胡厚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学习班搞“车轮战”，日夜不让休息，点着大灯泡照她的眼睛，最后她被逼跳楼自杀。

因为新派从“北、决、扬”诞生之日起就与之针锋相对，把新派说成是“北、决、扬”确实让天下人不服。陈伯达不愧是大秀才，他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揪“五一六”分子，找到了致所有造反派于死地的共性问题。

刘汉武（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司令部工作人员）回忆，1970年元月，陈伯达到学习班讲话，说造反派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派性膨胀，打倒了一批走资派就忘乎所以了，又跟走资派搞到一起。北京出了“五一六”，中央抓了他们，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发展组织。陈伯达问武汉有没有“五一六”，朱鸿霞回答说，武汉造反派在观点上与“五一六”针锋相对，在内部进行过清查，没有发现“五一六”。陈伯达出门后，又转身回来说，不是你说的那样，“五一六”在武汉大大地发展了组织。陈伯达越说越气，说你们不争气，我们中央文革很伤心。

学习班后期，他们抓了工总的刘万泰、九一三的张鹏程、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0年5月30日，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等人从学习班被逮捕单独押解回汉。胡厚民、杨道远被定性为湖北省“五一六”的总头目。1970年6月11日至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批斗胡厚民、李想玉等。

顾建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书记、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回忆，刘丰 1970 年 10 月 1 日在汉阳的大桥工程局平台上看焰火时对人讲：“‘北、决、扬’就是土‘五一六’”。

胡厚民拒不认账，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曾思玉 1971 年 1 月 17 日在湖北省“两代会”上，公然诬陷胡厚民是“五一六”和“北、决、扬”。曾思玉说：“要把‘北、决、扬’的总头目胡厚民的‘三个反对’、‘三个重建’、‘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黑纲领批倒批臭”。“胡厚民就是(工总)驻北京联络站的站长，干了许多反革命勾当。他与‘五一六’合伙”。

杨道远回忆，一直整到 1972 年，最后只剩下我和胡厚民、任爱生三个人关在省公安厅。那是个单独的院子，有伙房，但是吃饭不在一起，偶然开锁可以听见，说话也可以听见，生活上还不算虐待。1973 年 3 月转移出武汉，到了招待所看床上的被子印着“咸宁地区招待所”的字样，才知道到了咸宁。

1967 年 9 月起至 1972 年底，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联手，多次作出指示，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分子。打击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整人手段之卑劣，在“文革”中都属少见。

被当局说成是全国“五一六”总头目的王力，1981 年 7 月 17 日在秦城监狱给党中央写信时说：“中纪委告诉我全国整了一千万‘五一六’分子。”（注 9）被点名的“五一六”头头除王力、关锋、戚本禹外，还点过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些人后来都被证实不是“五一六”。建了账，就应该销帐。“五一六”这个祸及全国一千多万人、许多人被整死、致残的特大冤假错案，到“四人帮”被粉碎时不了了之，没有任何人得到平反、道歉。

1972 年，已经复出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告诉刘汉武：“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几万。确实搞错了，要给省委一点时间来纠正错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经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于起诉，先后释放。此案才大白于天下。

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竟然全是子虚乌有！诬陷胡厚民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和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完全是别有用心地打击造反派的伎俩。【注释】

8，鲁礼安《仰天长啸》432、43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

9，《王力反思录》380页。

(10)

造反派偶然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过了一点，要刹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林彪死党、军区政委刘丰竟对之封锁，批示“暂不传达”。曾思玉亲笔签字批示，说是“在必要的时候，对造反派一些人要处以极刑”。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接见造反派代表，杨拍案追问副政委张玉华，张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七，批林批孔时提出“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

从1968年下半年清理阶级队伍至1973年中共十大这五年中，在湖北武汉掌权整造反派的，主要是军队干部。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等人把许多地方干部也作为打击对象。刘丰常常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湖北地方干部以新四军五师干部为班底）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真正“架空革委会”的，实际上是这批人。

批林批孔运动初期，1974年3月2日，胡厚民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身体被折磨得非常不好，经常得去协和医院看病。

此时，武锅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过了一点，要刹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林彪死党刘丰竟对之封锁，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此时刘丰早已垮台被监禁，曾思玉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去了济南军区，钢工总的四大柱头武重、武船、武锅、电信局，马上召集一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王光照说：“我们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司令员作了汇报。杨得志就转头去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张玉华当时内心极为惊恐不安，他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据顾建棠说：军队整了许多造反派和地方干部的黑材料，有一份列有 18 人的名单，上面有曾思玉的亲笔签字批示，说是在必要的时候，对造反派的一些人要处以极刑，当中就有我的名字。

林子忠回忆，1974 年 3 月 30 日，钢派的人已经把军区围着要“两清一批”的黑材料。新派头头张立国发话要我牵头去找市委查封军区搞的黑材料。当时钢新两派关系并不融洽，但都意识到不联合不行。胡厚民赶到市委，对我们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市委党校一号楼小会议室接见我们说：“曾思玉不是解放军，是军阀”。据柳英发讲，王克文还专门对胡厚民的所谓罪状进行了驳斥，说是“栽赃”。林子忠说，根据一定的组织程序，我们留了借条，将 3 万多份“两清”材料运回，是经王克文书记同意的。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我们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凡是 1974 年到军区去抢了“两清”档案材料的人后来都判了 4 年徒刑，我当时办了手续，留了借条，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胡厚民放出来后，主持制定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

5 月底，随着中央口径的变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偃旗息鼓了。

1975年初至1975年底邓小平搞整顿时，胡厚民、张立国、朱鸿霞、夏邦银被省委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任县委副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朱不是党员，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公社革委会主任）。

顾建棠说，当时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绝大部分都派了下去，对外讲是根据邓小平指示，新干部要下去锻炼，将来好工作，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实际是和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群众组织的代表赶走。这几个人在基层工作是很积极的，与基层干部关系处理得较好。1976年2月，省委通知我们回汉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八，反击右倾翻案风 据吴焱金、林子忠、曹承义等众多造反派头头讲，1976年湖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胡厚民领导的，没有胡带头搞不起来。

吴焱金说：胡厚民先来找我，通过我影响原新派的潘红斌（武汉市三轮摩托车厂工人，工造总司二号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谢望春（国棉三厂工人，“文革”中参加工造总司，中共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武汉市纺织局党委副书记）等人，当时钢新两派很团结。胡厚民确有号召能力和组织能力。

据林子忠、顾建棠等人回忆，1976年胡厚民甚至两次找了“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局武装部副部长，1967年“七二〇”事件后被关押4年，1977年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湖北省暨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我们和胡厚民都主张和“百万雄师”的人合作对付当权派，但是造反派中多数人反对，说我们是“投降派”。

在胡厚民召集下，1976年3月成立了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等七人核心领导小组，要到省委去，促进省委转弯子。参谋班子有胡厚民、顾建棠、彭勋（湖北大学教师、新湖大造反派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委员）、沈复礼、聂年生、曹承义。胡厚民开玩笑说：“彭勋是摇鹅毛扇的。”彭勋谦虚地说：“我是鹅毛，胡厚民是鹅头。”“鹅头”之称从此不脛而走。胡厚民对到省委的行动进行了具体分工：曹承义为前线总指挥，林子忠为现场总指挥，还对材料、宣传、后勤、安全，宣传车、简报组、刻写组、标语队、水塔版写作组进行了具体分工落实。因为干事的人多是新派的，林子忠戏称这个班子是“钢头新兵”。在胡主导下，湖北造反派1976年做了几件大事：

1、召集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部分省市革委会常委集体签名在水塔下贴出给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和一系列大批判文章、口号报。号召全省人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紧密联系湖北武汉的实际，做好领导干部“转弯子”工作，其中的口号大多数为胡厚民等参谋班子所拟订，用以统一思想，明确主攻方向。1976年5月2日郑军亲笔记录的参谋班子提出的口号、斗争策略：“内紧外松，上促下攻，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四不变，一变：目标不变，湖北路线搞正，组织上要体现出来；决心不变；基调不变，也可以说是原则不变，去年七、八、九（月），是林（彪）、刘（丰）路线的继续；突破口不变，（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赵辛初1975年）“六四”报告。活动上灵活机动，重点在基层以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为我们的活动手段。五月份争取有1/3的单位搞起来。抓点：武重、武钢、一冶、交通局、体委。“滚”下去（的），要请回来：（1）去年，从党内滚到党外，从上面滚到下面，从要害部门到其他部门，坚持要省委下文件。（2）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为代表的要请回来。十年来，斗争坚决的。克服速胜论和悲观论的思想。（注10）类似的口号、策略，几乎每周都出现新的。【注释】10，《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67页。

（11）

华国锋向全党传达中共中央4号文件，即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胡厚民据此提出要在省委和各委、办、局实行真正的老中青三结合，这就是后来被指控的“篡党夺权”罪行

2、所谓“里应外合，几次冲击省委常委扩大会和省广播大会”。夏邦银的起诉书指控，1976年3月9日、11日，由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夏邦银、谢望春提供信息，胡厚民、朱鸿霞组织人员和车辆，先后两次冲击省委常委扩大会，围攻省委领导。3月19日冲进省委、省革委会机构，围攻、控诉省委负责人。

顾建棠说，实际情况是，省委扩大会议期间，在汉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董明会（武钢工人、九一三成员，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武汉市委书记兼市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谢望春可以列席会议，省委书记赵辛初、副书记姜一、赵修、韩宁夫对夏邦银等人讲，你们要把会议的精神向造反派吹吹风，让造反派和我们步调一致。比如关于各级党委补台、关于各级革委会要恢复，省委要介绍朱鸿霞、张立国入党等问题，都是省委要夏邦银等人向外吹风的。不存在什么“里应外合”。关于冲击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根据朱鸿霞 1977 年元月 6 日写的交代材料记述，主要是夏邦银、谢望春在东湖召开的省委常委研究转弯子的会议上，打电话出来“要发动群众去促一促”，胡厚民等人按其要求，部署调度群众和省市革委会部分成员前往，省委负责人出面接见，谈妥三五天后再回答。

1976 年 4 月 8 日的武胜路街头批邓大会，算是当年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后来起诉多名造反派时也作为一条主要罪状。“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4 月 8 日，造反派群众在汉口武胜路街头召开盛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群众大会，人山人海，群情激昂，顾建棠回忆：“胡厚民说，群众开会，为什么不能请省委书记们来参加？当时省委书记们正在开全省广播会议，被胡厚民知道了，派武重的工人去省委中断了电话会议，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人请到大交通车上，要他们去参加会场设在武胜路街头的群众大会，要他们明确表态批判邓小平、实际上也是要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明确的表态，促进他们转弯子。”据谢保安（武汉三中学生，钢二司常委，武汉三中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回忆，赵辛初他们几位省委书记一个个沿着长长的梯子爬上新华书店的屋顶，都明确表示了态。会议由吴焱金主持，朱鸿霞、胡厚民都讲了话。会议结束后，省委的车队就来了，为了保护省委书记的安全，夏邦银亲自将他们一一护送到家。此事主要策划者是胡厚民，他是从武汉电信局的监听系统得到省委开广播大会消息的。

3，要求纠正错误的组织路线，实行真正的老中青结合。

1976 年 2 月，华国锋向全党传达了中共中央 4 号文件——毛主席 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元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其中提到：“对造反派要

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胡厚民发展了他 1974 年提出的“放、平、补、提、纳”的观点，提出要在省委和各委、办、局实行真正的老中青三结合，造反派要真正进入核心，掌握实权。这就是被当权者指控的“篡党夺权”罪行。

据王志良揭发，在 1976 年 10 月省革委会全会前夕，胡厚民说：“省革委会两年都没有开过会了，这次开会机会难得，不能轻易放过。”又说：“赵辛初是省革委会主任，韩宁夫是主管省革委会的，乘这个机会抓住他们两人来一个攻韩促赵，大家都在会议上放炮。”张立国揭发：“朱鸿霞召集了部分安排工作的省革委会常委开会，狂妄地说‘你们要提出来，是党员要进党委班子，不是党员的要求解决党籍，还要兼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夏邦银讲：‘我现在不光考虑省委核心问题，我还考虑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厅、公安局要进造反派。’夏、朱、胡也大叫：‘组织部就是专搞修正主义，不改组不得了。’”夏邦银交代：“省委对朱鸿霞、张立国等人脱产分工后，胡厚民也要求开一个会议，胡厚民对我和谢望春说，现在省委着手解决组织上的问题了，我们要有一个意见，向省委提出来，具体意见：一、省委班子中，四个中委（中共中央委员）要进核心。二、部、办，朱鸿霞说胡厚民到组织部当副部长，顾建棠到办公厅当副主任，彭勋到宣传部当副部长。”

据顾建棠介绍，其实在当时形势下，省委也在主动转弯子。1976 年 9 月 25 日，水利部长钱正英到湖北，跟省委商量，调他到水利部去当副部长。省革委会副主任饶兴礼把他找到东湖客舍，赵辛初、姜一当面告诉他，省委不同意，因为准备安排他当省委副秘书长。后来才对钱松口。

顾建棠还说，省委按照毛的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已经准备安排夏邦银当省委书记，革委会成员中造反派是党员的都进同级党委领导班子，不是党员的都发展入党。胡厚民对林子忠说，赵修态度较好，书记们（指两赵一王，不包括韩宁夫）对我们不错了。

随后发生 10 月 6 日的巨变。顾建棠说，会议开到 10 月 7 号晚上，中央通知赵辛初、赵修、杨得志 8 号到北京开会。他们次日回武汉后，省革委会会议仓促结束。

1976 年 10 月 7 日晚，胡厚民对张立国、朱鸿霞等人讲：“实践证明，我的‘三个长期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现在还不是新老、革保的斗争吗？这类斗争还得长期斗下去。”

10 月 12 日，省委向省直机关除造反派以外干部传达“四人帮”被抓，胡厚民私下说：“我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断定这是一次右派政变。”“同志们准备迎接最艰苦的风浪，已经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了。”“你们以后不要乱跑了，特别是不要到上面头头这里来，把毛主席给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忆一下，自己领会就行了。”

“四人帮”被粉碎仅一个月，胡厚民等人就被由“百万雄师”极少数骨干分子组成、受到省、市委支持的群众组织“工农兵”非法关押一个多月。

这是一次不为世人所知的秘密审讯。据汪扬（长江仪表厂工人，百万雄师 Z 口区宣传部副部长，1977 年提拔为武汉复印机总厂副厂长，后调市经委并提为正处级）披露：约 1976 年 11 月上旬，“我们‘工农兵’头头研究决定，对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要抓起来办学习班”，“交代问题”。“武昌（汉阳）以武重、武锅、武船、汉轧的同志为主”，将“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勋等人抓起来”。“其目的有三点：1. 掌握‘四人帮’插手湖北、武汉的情况和（有）牵联（连）的人和事；2. 三钢头头打、砸、抢、抓、抄的罪恶行为；3. 湖北、武汉个别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的牵联（连）和支造的事实真相”。（《波澜岁月》179 页至 183 页，自费印刷，2003 年）

汪扬写道：我们办的一个多月的学习班结束前，对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董明会、李湘（想）玉等在全市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斗，每人一辆车，大长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造反派的威风，他们如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游斗后（我们）把他们移交专政机关。

1976 年 12 月直至 1982 年 7 月被法庭宣判，胡厚民被关押在位于武昌民主路 45 号看守所。一同关押的杨道远说，这里以前是监狱，里头有一栋楼上关人，夏邦银、朱鸿霞和胡厚民都关在这里，原来因“北决扬”案件被抓的人都还

关在这里……看守所订有一份《人民日报》，一份《红旗》杂志，先送到我那里，然后轮流转，到了最后上面的字迹就看不清了，有人拿着它打蚊子。

(12)

胡厚民在法庭陈述中不为个人申诉，而是为千千万万在“文革”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受害者及其亲友“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撤职、开除党籍、坐牢三件事，都落到了胡厚民头上，他做到了三不怕，判刑后胡厚民考虑实践第四件事：离婚

“五不怕”的实践者

在 1973 年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传达了一段毛泽东“五不怕”名言：“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1976 年 12 月，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2 月 12 日，湖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胡厚民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两天后，12 月 14 日，全省批斗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洪山礼堂召开。1977 年 11 月 28 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司法机关“依法”将其逮捕，近五年后的 1982 年 7 月 28 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胡厚民 1982 年 7 月 24 日在法庭上的陈述记录稿在当局手中。胡厚民在狱中的追记，1983 年由家属探监时带出（全文请见连载 2）。他在法庭陈述中说：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她）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长期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

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他还“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可查）。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196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五一六”，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

“五一六”？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五一六”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1976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撤职、开除党籍、坐牢三件事，都落到了胡厚民头上，他做到了三不怕，判刑后胡厚民考虑实践第四件事：离婚。

胡厚民1964年结婚，妻子是华中农学院园艺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在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任技术员，育有一子一女。胡厚民对妻子感情非常深厚，1980年，胡厚民写下了《狱赠妻》诗二首，其中写道：“但疚堂上孝久失，亦憾膝下养中断，恋窝虽损鸿鹄志，无情亦非男子汉。”

但他从判刑之日起就要求与妻子离婚，准备独自将牢底坐穿。胡妻开始不同意，在胡坚持下只得从命。1983年元月20日，胡厚民在被囚禁六年多后，第一次接到四弟胡世明试投给襄北劳改农场的来信，他在复信中说：“下午接到洪山区法院复函，内容尽抄如下：我院已收到你诉讼离婚的来信。案件正在着手审理。如需找你，到时通知。洪山区法院。1983年1月17日。”当年胡厚民与妻子解除了婚约。

1984年，胡厚民在狱中获悉他最疼爱的妹妹，到武昌县插队的胡茜在劳动时被雷击身亡，而自己即将参加高考的爱女胡颖又竟患白血病去世，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他饱蘸泪水写下了长长的《挽爱女胡颖》悼文。闻知前妻的单位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为女儿治病承担了大额医疗费，胡厚民将家人送到狱中的菲薄生活费寄去20元，在汇款单附言栏中写道：“巨款还清十二载，唯因只此绵

薄力。倘若他日能活归，再趋尊处谢救妮。”（胡当时认为还要坐牢 12 年。——钟逸注）

胡厚民不服判决。他的姐姐胡秀娟和朱鸿霞的妻子朱爱华 1983 年去关押胡的襄北机械厂探监，遇到他正在绝食，将牢饭让给其他囚犯吃，差点饿死，被狱医注射葡萄糖救活。回汉后，胡秀娟给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武汉市长吴官正写信，要求让胡厚民保外就医，被拒。襄北农场在梁坡砖瓦厂为胡盖了一排平房，周围是高墙，哨兵在屋顶上站岗，安排几名刑事犯与胡厚民关押在一起，以便监视。胡厚民戏称关押处为“胡家大院”。

1986 年夏天，胡秀娟和母亲陈爱娣去襄樊看望胡厚民，正巧又遇上胡厚民不肯穿囚服、不肯在胸前挂囚犯牌子，上级来监狱检查，狱方就将胡厚民关押到禁闭室，胡厚民绝食抗议。绝食第五天，已是奄奄一息，监狱领导接见家属说：“他跟我们唱反调，不遵守狱规。想死还不容易？我们打个报告就可以要他死。”他们将胡厚民抬出来，胡的老母亲将其抱在怀里喂糖水，4 个多小时后他才苏醒，埋怨母亲和姐姐，“你们不该将我救活过来”。

1990 年 9 月，76 岁的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实应该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 4 年零 9 个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 1976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1992 年 3 月 9 日止”。

据说当局正考虑提前释放他，1990 年 10 月 31 日，胡厚民病故于襄北劳改农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享年 53 岁。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胡厚民事前不怕，事后不悔，言行一致地实践了一个追求真理者的誓言。

（13）

胡厚民极少以诗示人，第一次公开发表诗歌竟是在法庭上。在狱中，他将平生诗词整理抄录在自己用练习本内页装订的厚本上，竟然有几大本。这些诗作不同程度地打下时代烙印，也表现了胡厚民本人的思想局限和认识偏差；远非完美的艺术品。然而，这些诗词，从折射一个造反派领袖内心深处真实思想感情的意义上，反而更珍贵

折射造反派领袖内心的诗词

胡厚民一生写了上千首诗词。然而，本文作者在采访中却惊异地发现几乎没有人了解他有这一爱好。杨道远大概是例外，他回忆，自己因“文革”造反被当权派死整很多年，小孩出世都是姐姐抛家不顾来照料，姐姐一家也因此长期不得安宁。“姐姐去世时胡厚民在狱中写了一首《哭杨姐》，写在纸条上传给我，这个纸条我从监狱里带出来保存至今”。杨还说，两个女儿出世，我都为她们写一首诗，胡厚民都有和诗，现在都找不到了。

他诗歌的题材广泛，思想内涵丰富，渗透着洞察力和思辨力。冷嘲热讽，切中时弊，发别人未发之言，见别人未见之处。这些诗作当然不同程度地打下时代烙印，也表现了胡厚民本人的思想局限和认识偏差；由于其绝大部分都是对现实遭遇的即时反应、心情变化的当下记录，它们都带上某种急就章、半成品的痕迹，远非完美的艺术品。然而，这些诗词，具备了诗歌最基本、最首要的特征：真诚。从折射一个造反派领袖内心深处真实思想感情的意义上，反而更珍贵。

他的诗词，有游记，有赠答亲友，有对自然和社会万物的感叹，有讴歌精神情操和赞美劳动者，很多是记录人生大事，如进厂，入团，入党，恋爱，新婚，下乡务农，中央学习班，悼念领袖等；更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如自戒、自督、自勉、自恼、自讥、自策、自省等。

他在扉页上写下序歌：“血写的诗，泪谱的歌。献给亲爱的党，狱子丹心一颗。”武汉方言将“狱”读作“游”，“狱子”是作者一语双关以对“慈母”赋诗明志的“游子”自寓。

鲁迅自称笔下文字为匕首与投枪，胡厚民的诗歌正是这样。他在“文革”中“怒向刀丛觅小诗”，鼓舞自己的斗志。

1969年底，在中央学习班集中火力揪“北、决、扬”、“五一六”，猛批胡厚民等人时，胡写下《自叹——中央学习班感叹》多首记录心境，认为当权派逼迫自己承认反毛是“生平”“最心痛”的事：“虽经九曲十八弯，一知偏离速返中。”“人非圣贤谁无过，焉能一错推下河。……死马竟当活人医，病株岂当朽木割。如此违教背民意，怎不叫人疑心恶。”

1970年6月，湖北省革委会召开广播大会批斗胡厚民。胡厚民写下了两首《告世诗——全省广播大会感赋》，嬉笑怒骂驳斥当权派的栽赃陷害：“堂堂工

总名中外，何苦又去组‘决派’？谁知‘北会’起东湖？更斥‘扬评’充长街！今世不识鲁礼安，前生未见冯天艾。斯般主操兼总头，栽赃问罪意何在？”

1982年7月开庭后，胡厚民一口气写下《法庭杂咏》等30多首诗词，有的描绘法庭情景：“手无寸纸慷慨辩，泪流满面照本宣。真理谬误谁当是，法庭内外有明鉴。”

有的鼓舞自己斗志：“遗臭不由今日定，留芳更待未来评。”“人生能有几回搏，是非功罪任评说。”

有的驳斥官方起诉的荒唐蛮横：“听罢辩词驳原告，通篇谎言加大帽。若将语录摘几句，活像当年批判稿。”

有的辛辣讽刺法官虚伪：“原告发言从无阻，被告请讲举酸手。法官不坐天平中，竟与原告站一头。”“千对何怕人开口，万错尽出官洋相。”

1982年4月1日囚车路过家门，胡厚民作诗一首：“车过家门情激荡，恨不插翅飞出窗。泪眼怅望锁身铁，寄语街柳问老娘。”判刑之后的胡厚民七年未见过家人，他在《答慈母》一诗中写道：“阳光虽好择晴昼，无宵母爱暗更浓。”

胡在看守所还写了两首诗抒发对儿女的期望：“犹记尺婴怀中笑，一恍身齐父眉梢。惊叹风雨肥效奇，盛赞懔愁能量高。安乐抑思晚发蒙，危难催人早开窍。莫怨生平无佳遇，逆境好将人材造。”（《示女》）

在铁窗中，胡厚民吟诗、读书、看报、写信，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他在给四弟的信中写道：“请给我邮些精神与物质粮食来。由于您们想象得到的原因，我颇为需要，我以后开些书名来。物质者猪油为急，每月最好二斤，因这里除一顿或二顿荤菜外，余皆萝卜白菜，而且水煮盐拌，不吃又饿，吃又难吃进，唯望有点油炒而食之，聊以度日。”但他的《铁窗戏占》将坐牢生活写得乐观、浪漫：“隐居一洞天，快活象神仙。踱步代耕地，遐思当纺棉。三餐来伸手，九桩不掏钱（自注：“九桩”指柴、米、油、盐、酱、醋、茶、房、电）。诸君急何往，此处胜桃源。”

他在1985年——第三次锒铛入狱的第九个年头——春节所写的《闲吟诗》中，对他的诗歌进行了总结：乐岂烟生，懔非酒亡。苦海乐天，唯因信仰。

胡厚民虔信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反派领袖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三结合”政权体制，实际上是为党内官僚阶层设置反对派，实行互相监督。造反派的主观意志不是颠覆体制，他们的造反行为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也没有任何人从中发财。他们也没有触犯当时的刑律，定他们为“反革命罪”，即使是按照当时的法律，也是没有根据的

“文革”已经远逝到可供人们仔细观察的恰当距离。胡厚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恶不赦的罪人，还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追随者、武汉工人造反派领袖的代表？

众说纷纭胡厚民

林子忠和李承弘与胡厚民同为武船技校毕业生、后来又同为武昌造船厂工人、多年同寝室并一起造反，林子忠后来成了新武船联司一号头头、武船厂革委会副主任，李承弘则为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先后担任过工总组织部长、联络部长，他俩说：胡厚民的特点是爱动脑筋，善于学习。胡秀娟说，在1983年当局允许家属探监后，到1990年胡厚民死亡，不到八年里，他读过的书刊报纸有几大箱子。

林子忠回忆，胡厚民在“文革”期间被安排当官后作风清廉，家徒四壁。1976年，他在省总工会任副主任，单位派车他不坐，每天搭电车上下班。在厂里工人中口碑很好，生活上没有什么缺点。

笔者征询当年对胡厚民知情者：他在掌权前后的思想有没有变化？柳英发（湖北省实验中学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说，胡厚民对工总某些头头结婚讲排场是很厌恶的。王光照（武汉锅炉厂工人，工人总部成员，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委员）介绍，胡厚民认为要防止“走资派”利用小恩小惠收买革命造反派。工总武汉客车制配厂头头方斌当时找当权派要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胡厚民知道后，狠狠批评了方，说他是“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王光照说，我结婚后，仍然和父母兄弟八人住在35平方米的日子里。我工作的单位武汉锅炉厂两次给我分房，我都让给了1956年进厂、祖孙三代住14平方米住房的老工人。1975年，邓小平搞企业整顿，武汉市委书记文祥和市科委副主任吴官正担任正副队长的工作队进厂，上门看到了我家拥挤的住房，答

应解决，但迟迟没有动静。我的夫人找了辆汽车，将简单的家具放进厂办公室用文件柜隔开的空间住下。胡厚民批评我：“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不值得！”

胡厚民另一个特点是观点比较激进。在“文革”中，武汉的造反派逐步分裂成“钢派”与“新派”两大派，“钢派”（主要是工人组织“钢工总”“钢九一三”和学生组织“钢二司”）比较激进，对当权派的冲击比“新派”（主要是工人组织“工造总司”和学生组织“新华工”“新湖大”等）剧烈。由于胡厚民的能量和在“钢派”中的地位，在挑起武汉造反派内部“钢、新之争”上，他要负很大责任。他很重视大企业中产业工人队伍，对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小厂职工较多的“新派”工人组织工造总司印象不好。1967年“钢派”发表“二八声明”，引起造反派内部大分裂，以及“七二〇事件”后的钢、新内讧，显示了胡厚民的偏颇和不成熟。不过从1969年“反复旧”到1974年“批林批孔”，再到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胡厚民逐步成熟起来，反省“钢、新之争”，主动抛开成见，团结新派。

林子忠认为胡厚民有能力，但不会用人，也不能容人，心胸不够豁达。钢工总中凡是反对自己的人他都不用。钢工总的组织体系都是他搞的，各个基层的头头他都能抓得住，凡事都听他的。

柳英发也说，胡厚民政治上很敏感，但看问题爱走极端，知人用人有问题。对于他非常相信的人，看不到其问题。他爱用钢二司的学生，与其中方保林、庞道铭、雷志茂等人关系非常密切，1969年“反复旧”文章都是雷志茂帮助写的；1976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运动的计划、安排等，都是请庞道铭写的。而对“钢工总”常委中有些人则不信任。

李承弘回忆，胡厚民原对沈复礼（清华大学研究生、武汉锅炉厂技术干部、钢工总常委，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大代表）印象不好，认为他是“小资产阶级”。九大召开时，沈复礼串联了许多九大代表向中央反映，力推造反派夏邦银当选了中央委员。胡对沈复礼印象便好多了。

尽管胡厚民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武汉造反派从“文革”一开始就不断受压，不断反抗，胡厚民是公认的代表人物。胡厚民去世时，一位本来与他对立的新派工人领袖写诗悼念他：尔才可封将相侯，屡遭打压不回头。果真修得来世在，甘为吾友马前卒。

曹承义（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技术干部，新一冶头头，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委员）说，胡厚民认为，在运动初期，要挑起一个事件来，让大家议论这件事，才能发动群众，没有一个爆发点是难以形成影响的。吴焱金（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工造总司勤务员，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说，“七二〇事件”以后的历次群众运动，主要是胡厚民影响和推动的。造反派群众觉得跟毛主席干了一场革命之后，反而受到压制，不理解、不接受这样一种政治待遇。这是历次起来抗争的群众基础。当局之所以死死抓住胡厚民，主要是认为他有政治野心，有号召力。

这些“文革”知情人在谈到胡厚民时，举出当时另一个造反派代表人物张立国作为对比。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汉中共中央委员、省、市革委会成员中的造反派联合起草了声明，曹承义、林子忠找张立国不下五次，要求他签名，以显示钢、新两派团结一致。他勉强同意了，但大字报在汉口最热闹地带的水塔下贴出后，张叫人晚上搬个梯子，偷偷将自己名字涂掉。张立国在1976年12月被隔离审查前，将日记本等辗转托人藏在一位并无来往的造反派中学生家中。后来为证明自己某些行为是受周恩来等人指使、同意的，张写亲笔信要省专案组找当时也被关押审查的这位中学生要。这位中学生被迫交出张和自己的日记本，牵连了不少人，中学生被判劳教三年。在1982年的审判中，张立国辩解说：“把我和夏、朱、胡一起审判，于法于理都不合。”最后陈述时又说：“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应把我和夏、朱、胡区别开。”法庭判决后，张立国说：我觉得对夏判轻了，他是湖北武汉地区的拍板人物，我们当时是“跟着夏委员干革命的”，但胡厚民判重了（见湖北日报社编《内部参考》总第81期，1982年8月24日）。

许多造反派头头和群众被迫揭发胡厚民，有的人被迫出庭作证。对普通群众出庭作证，胡厚民对家属说：“我原谅他们。”在判决后赋诗：“诸公轻判我高兴，我虽独重友莫惊。若能一死换全归，我愿乐将一弹吞。”柳英发说，但是，对朱鸿霞、李想玉、彭勋（湖北大学教师、“新湖大”负责人、武汉市革委会委员）等头头出庭揭发，胡厚民则毫不留情，以牙还牙。

胡厚民对“文革”的认识是一贯的。柳英发说，“文革”中，胡厚民多次对人讲，造反派是“文革”生的伢（武汉方言，孩子的意思），“文革”完了，我

们也完了。否定造反派就是否定“文革”；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造反派。毛泽东去世以后，胡厚民对朱鸿霞、柳英发等人讲，目前形势很危险，“文革”很可能会夭折，“文革”是不能否定的，我们就象“文革”的孩子，和“文革”血肉相连。

但是武汉造反派与“四人帮”并没有组织联系。柳英发说，胡厚民常说：“武汉造反派是没娘的伢(意思是没有后台和黑手)。”顾建棠回忆：“四人帮”垮台以后，(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有一次也承认，“武汉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在思想上受‘四人帮’的影响比我们深一些”。把武汉造反派都作为“四人帮的黑干将”逮捕法办，没有任何证据可言。吴焱金说，武汉造反派中只有董明会(武钢工人、“九一三”成员，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总工会主席)1974年参加中央学习班，与王洪文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回武汉后传达过王洪文的讲话精神。然而董明会恰恰是反对夏、朱、胡的做法，被造反派称为“投降派”的。“文革”后当局为了将武汉造反派与“四人帮”硬扯到一起，把董明会也抓去坐了几年牢。

湖北省“夏朱胡专案组”所罗列的造反派与“四人帮”联系的罪证之一，是朱鸿霞、夏邦银与河南的唐岐山(铁路工人，河南二七公社头头，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有过几次接触，但这恰恰反证湖北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直接瓜葛。所谓给“四人帮”寄黑材料，正如夏邦银在法庭答辩和最后陈述中说：“党章、宪法都规定，可以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1969年‘反复旧’运动中，周总理向朱鸿霞等人说：‘以后，你们有什么意见和情况要向我们打招呼，你们都是革委会的新生力量，你们反映的情况，谈谈你们的意见，难道我们不看吗？’我认为我是中央委员，向毛主席、党中央书面汇报，反映省委领导人的情况，是合法的，说不上是‘诬陷’。材料也并非仅送‘四人帮’，而且‘呈送毛主席、华国锋、陈锡联’等”。

打击造反派经不起历史检验

胡厚民虔信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49年以后，当局一直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文革”中，工人阶级的地位提得更高，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些造反派领袖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三结合”政权体制，实际上是为党内官僚阶层设置反对派，实行互相监督。20

世纪中期，社会主义仍然在全世界高歌猛进，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毛泽东看到了执政党正在无可挽回地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如此，毛泽东的“三结合”，实在是天才的思想与实践。

胡厚民的“文革”经历，是民众反官僚、反党内资产阶级、反政治迫害、维护应有权益的奋斗历程。造反派尽管有过缺点、错误，但是，他们并无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理念和行动，他们的主观意志不是颠覆体制，他们的造反行为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也没有任何人从中发财——造当权派的反毕竟要有献身精神，要冒风险付出代价。他们也没有触犯当时的刑律，“文革”问题再严重也只是路线斗争的性质，定他们为“反革命罪”，即使是按照当时的法律，也是没有根据的。

胡厚民的法庭陈述还论及司法公正。既然全盘否定“文革”，那么，不仅仅造反派“文革”中触犯刑律应该受到追究，“文革”中湖北省委抛出李达（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朱劭天（武汉大学原党委书记）何定华（武汉大学副校长）“三家村”，将李达等人迫害致死；武汉市委抛出程云（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武克仁（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等黑帮；“破四旧”中老红卫兵打伤、打死人；“百万雄师”在武斗中打伤、打死人（据顾建棠不完全统计，“七二〇”前“百万雄师”在军队和人武部操纵下挑起大规模武斗 17 次，杀死工人、学生 137 人、重伤 1000 多人）；当权派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制造的冤案、逼死的人命，数量远远超过造反派群众对“百万雄师”的反击和报复，他们的罪行令人发指，为什么不予追究？在提倡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当局对 1976 年 10 月以后华国锋等“凡是派”为掩饰自己“文革”表现以撇清与“四人帮”牵连，对造反派大开杀戒所制造的无数冤假错案却很少平反纠正。把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动“文革”的错误统统算在造反派群众身上，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提倡的“四大”说成是“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用“文革”后通过的刑法处罚以前特定时期发生的事情，这种审判，怎么经得起历史检验，又怎么能正确总结“文革”的教训？

中央高级领导人，包括以为人正派著称的陈云，包括被认为平反冤假错案立有大功的胡耀邦，都强调当年老红卫兵头面人物及保守派头头不属于“三种

人”，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文革”后的待遇就和胡厚民是两重天，他们的暴行从来未得到哪怕是象征性的清算。两相比较，清查“三种人”有什么公正可言？

胡厚民不为自己辩护，而敢于在法庭上为千千万万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广大群众代言，表现了他的领袖气质。

胡厚民在牢里对看望他的亲人说，“希望历史的摄影师还历史的真面目。”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的遗言。

与曾思玉将军书（节选）

· 鲁礼安 ·

……就像你现在嗜好书法绘画一样，信口开河，说假话、不负责的话、没有根据的话，也曾经是你的一大嗜好——我绝不是随便这样说的，因为近40年前，我，还有一大批人，正是因了你的假话、不负责任的话、没有根据的话，而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你既然“思维敏捷”，连70年前的长征往事都“记忆犹新”，那么对于40年前你主政湖北时的往事，就更应该“记忆犹新”，无所遗漏了。你还记得当年那个华中工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吗？你还记得你是怎样亲自下令将他投入单人牢房，将他推进那长达11年另7个月的绝境之中的吗？你在沉湎于丹青之余，还有兴趣和我一起回顾一遍你当年是怎样制造那桩惊天冤案的吗？好吧，“芝麻，开门！”，让我们一道来唤开那扇沉重的历史之门吧！

事情是从“北斗星学会”开始的。1967年的秋天，我和我的几位同学，打算脱离派性斗争，坐下来研读马列，对文革进行一番理论的梳理和思考。我在《北斗星学会宣言》中，阐述了我们的上述意图。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你在看到这篇宣言时，勃然大怒，竟指责说《宣言》及其反动，反动透顶，“每一个字都是反动的！”由于你当时身任武汉地区的党政军一把手，可谓“一言九鼎”，你的这番无厘头的话，给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带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们的宣言哪一点反动了？而且是“反动透顶”、“每一个字都反动”。在汉语语系中，怎

么可能出现“一个字”的反动呢？我至今仍然莫名其妙！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字”也可以“反动”

的话，我大概只能引清朝雍正年间的一个著名的“文字狱”为例了。当时一位江西乡试的主考官名叫查嗣庭的，因为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被人诬告为影射“雍正去头”，。竟至丢了脑袋。这个“维”和“止”，就正是“一个字”而够称“反动”的典范。可是我起草的《北斗星学会宣言》中找不到这样的字眼呀！宣言中既没有出现“日”字来影射“曾”去了头，也没有出现“王”字来影射“玉”净过身。我来找去，就是在“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句话里出现了个“心”字，有影射将“思”去头之嫌。可那是一句到处都在传唱的”红军歌曲“，我怎么会想到当中有一个字会犯了将军阁下的忌呢？如果你说并非如此，那么虽然过去40年了，我还是要请求你给我一个说法——我那篇不到千字的《宣言》，究竟哪个字，或哪句话，或哪段文字称得上“反动”或“反动透顶”呢？

1979年我出狱之前中共湖北省委下发的“鄂文（1979）70号文件”说：“经再次审查认为，从他们公开发表的‘北斗星学会’宣言，还看不出有反动的内容。”那么究竟是该相信你说的，还是相信湖北省委的“复查”结论呢？所以我请你一定要对你当年的说法有一个解释，否则我只能认为，你当年对那篇宣言的定性，是极其轻率、极其不负责任的，是拿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政治生命当儿戏。

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了，虽然背上“反动透顶”的罪名厄运难逃，但也许还不至于有牢狱之灾，更严重的罪名还在后头呢。1968年3月，你听信当时“新华工”头头张立国、郭保安的一面之词，说我在被学校“隔离反省”时，画了一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动漫画”（一说是“反动标语”）。这个“反图”或“反标”据说涉及到一个字，那罪名就非常可怕了，放在那个年头一旦坐实的话是可以“立即执行，杀无赦”的。可问题是我本人都不知道我究竟画了一张什么，闹得从上到下的“老权贵”“新权贵”们全都欢喜若狂，如获至宝。我只相信一点，尽

管我早已经不信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话了，但对毛主席仍然是热爱和崇拜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画什么“反图”写什么“反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所以尽管风生水起，我一直泰然处之。

后来，也就是1968年5月，我在铁山遭到绑架。针对这个非法绑架，武汉方面的造反派群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行动”。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形势十分险恶。当时中央早已三令五申，严禁群众组织私设公堂。你作为武汉地区的最高军政领导，理应按照中央精神下令铁山放人。但是你却只是阻拦群众对我进行营救，而任凭铁山将我非法关押了整整两个月。你究竟为什么竟然无视中央的申令，纵容群众组织的绑架行动呢？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你是要假“铁山联防”这个武斗团体之手，用私刑拷打的手段敲开我的嘴，坐实那张所谓的“反图”“反标”，以将我定为犯有“恶攻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但是我在铁山的矿井下识破了你们的用心，无论怎样严刑拷打，坚持证据见面（而铁山和“新华工”生怕我会回忆出事情的真相，只是严刑逼供，就是不让“证据”与我见面），使得你们的意图终于未能得逞。

然而，在“反图”“反标”未能坐实的情况下，我还是被秘密解送进了监狱。在随后的审讯中，“证据”总算与我见了面。通过仔细的辨认和艰苦的回忆，我终于澄清了所谓“反图”、“反标”的真相，以无可辩驳的理由，推翻了这个能将我置于死地的可怕罪名。这一切，“专案人员”不会不向你汇报吧？

但是，由于我已经身陷牢狱，被剥夺了一切的话语权，你居然不顾问题已经得到澄清这一事实，向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在中央首长面前，继续散布作为逮捕我的“根据”的这一严重罪名。如果说在“证据”未有澄清之前，你指我犯有“恶毒攻击罪”还情有可原的话，在“证据”已经澄清之后，你仍然坚持我画了“反画”、写了“反标”，我就无法理解了。你这不是在蓄意陷害我吗？1969年10月3日，当你和你的同伙“刘丰同志”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煞有介事地宣布，“一号头头鲁礼安”是一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时，你真的一点都不觉得心虚理亏吗？你一个堂堂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怎么能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对付我一个20岁刚刚出头的学生？！

正如今年第一期《中国焦点》杂志评论部的一篇文章“有错就改与知错不更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中的一句话所说：“错误虽人人难免，但区分良莠、忠奸、贤恶的重要标志却在于其对待错误的态度。”

你当年明明知道在定我“恶攻”的问题上是搞错了，却一意孤行，死死地抓住那个并不存在的“反图”、“反标”不放，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虽然快40年了，我的宝贵的青春年华，也早已经被毁灭在那间黑暗的单人牢房里，永远也索不回了，我还是要问你一声：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然，也许你认为像我这样蝼蚁一样卑贱的学生娃娃，可以任你这样位高权重者随意拿捏践踏。那下面几位并不卑微，甚至可以说德高望重的老人呢？——我指的是王盛荣、周岳森和干毅，他们都是被你指为“暗中操纵控制我的”北决扬的“黑后台”。干毅且不说了，这位被你指为“国民党反动将领”的国民党起义将军，在你这位“共和国开国将军”面前自然是毫无地位，可以任你肆意糟塌；就是周岳森，不也就是个微不足道的中学校长吗，随便加他个“老国民党特务”又有何难？反正都是由你说了算。那么王盛荣呢？若论起革命资格，他可是比你还老。你参加红军时，王老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军委委员。长征路上，他和你一起爬雪山、过草地，一颗树下遮雨、一口锅里吃饭，是你的生死战友啊。你怎么竟然在

那次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公然骂他“是个小丑”，挖苦他“一条腿，到处乱窜”。这倒也罢了，你还伙同刘丰，诬指他“暗中操纵、控制北决扬”，并以此罪名将你长征中同生共死的战友投进监狱。你这样做真的有什么根据吗？你心里非常明白，其实什么根据也没有。之所以做这种昧良心的事，无非是因为要将“北决扬”定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又苦于找不到这些学生的“后台”，于是只好指鹿为马，拿资格虽老，但无权无势的老同志开刀。这就是你虔诚信奉并身体力行的“党内斗争”吗？真的太可怕了！

如果说在“党内斗争”的祭台上，必须拿这些失势的老干部开刀的话，那么将“北决扬”定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后，你怎么还不满足，还要在清查“北决扬”“五一六”的幌子下，将数十万无辜群众打成“北决扬分子”而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呢？你是不是觉得“一家哭”、“几家哭”还不够，非得“一路哭”、“满地哭”才能让你心满意足呢？由你一手制造的“北决扬”大冤案，

制造了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这就是你这样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对国家、对人民所做的贡献吗？

你从江西一个贫穷的小山村走出来，参加了革命队伍，戎马倥偬几十年，成长为共和国的高级将领。难道党和军队培养你，就是要你大权在握时，肆无忌惮地大兴冤狱，将生你养你的父老乡亲打进痛苦的深渊吗？

仅仅拿你和刘丰当年点名批捕的 13 名“北决扬骨干”和“后台”来说，就有 4 人在狱中被关疯（其中 2 人至今未能治愈），有 3 人（不包括王老）因身心受到摧残出狱后英年早逝。还有几位获释后一直贫病缠身，穷愁潦倒。至于这 13 人之外，成千上万遭受迫害的无辜群众所受的苦难，真个是“新鬼烦冤旧鬼哭”，更是让上天也要为之动颜。

1979 年 12 月，中共湖北省委在《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批复》中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并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

历史终于还了我们一个清白。面对历史的终审裁判，你作为冤案的始作俑者，是否感到过羞愧？

今年九月，就在你舒适地坐在疗养院里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神采飞扬地大谈自己长征中的“传奇经历”“英雄事迹”时，王盛荣老人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对于这位因你的诬告而有 10 年牢狱之灾的长征时期的老战友，你曾经有过丝毫的内疚吗？对于那几十万惨遭过你的迫害，有的至今还在痛苦冤屈中挣扎的无辜老百姓，你心生过哪怕稍微一点点的不安和惶愧吗？如果还有，证明你良心未泯，我仍然敬重你；如果没有，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只想将《新约》上的一句话送给你：天国近了，你悔改吧！

我知道将军你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不会相信上帝的“天国”。

但是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是相信马克思的。你们不是有一句口头禅：“死了去见马克思”，以能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为无上的荣耀吗？

只是，一个有负于人民、有负于战友而又从未对自己的罪孽有所忏悔的人，即使头上罩了一圈“无产阶级忠诚战士”的光环，马克思会接受他的报到吗？他能够进入马克思的“天国”吗？

如果既不能进入上帝的天国，又不能进入马克思的天国，这样一个未经救赎的罪恶灵魂，将在何处孤独地游荡？

致以崇高的敬意！

四十年后看“十年”——鲁礼安的文革史

· 高伐林 ·

面前穿着一身黑白粗格子外套的鲁礼安，不仅一头乌发，红光满面，而且走路大步流星，开言慷慨激昂，在街上若碰见，要说他三十出头也有人信，然而实际上他却年近花甲，而且，他还蹲了 11 年半大狱，绝大多数日子被单独监禁。

他的一位老友告诉我，前几个月女作家方方见到鲁礼安第一句话，竟也是一模一样的大出意外：“你这么年轻！”

方方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人的文革史》，就是眼前鲁礼安的“文革”回忆专着的序。他将这本 50 万字的沉甸甸的书递给我——《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 “请给我以火”

书名“仰天长啸”，出自岳飞的《满江红》。鲁礼安回忆说，母亲教的歌中自己最爱引吭高歌的就是这首《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那份壮士情怀，让少年鲁礼安热血沸腾，憧憬着长大后也要为国赴汤蹈火，建功立业。

春去秋来，多少次他重新咀嚼这四个字、这一首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在哪里？“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哪里？难道真只能落得“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鲁礼安在入狱第八年的除夕深夜，跪在铁窗内发下誓言：今生今世，只要能活着走出这口活棺材，就要说出这桩大冤案的真相。虽然漫长的狱中岁月毁灭了把自己造就为国家栋梁之材的梦想，“但活埋在地底多年，经受了巨大苦难的煎熬与磨练，我可以成为一块煤、一块能燃烧的煤。用煤的火焰去洞照那一段暗无天日的历史，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遭受过怎样惨烈的苦难”！

“成为一块煤”——这让我们记起艾青、郭沫若、叶文福那些自比为煤，渴望燃烧的诗。鲁礼安在第一章中，引用的正是艾青的问答名句：“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请给我以火。”

发誓要说，是一回事，怎么说，则又是一回事。他在“文革”中有“武汉第一笔杆子”之誉，铺开了纸，却无法落笔。鲁礼安告诉多维记者，过去的岁月一闭上眼睛就万象纷呈，但从哪里说起却茫无头绪，“最后我想到捷克作家《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开头，这就一下子抽出了线头，千言万语如同开了闸般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写得畅快极了！”

“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捷克作家伏契克描写庞格拉茨盖世太保监狱牢房的这句话，我十岁时就从姐姐学的初中《文学》课本中读到过。

后来，命运安排我自己来阅读监狱这部“大书”，在这本书里我又读到了这句话——我所在的囚室，从门到窗子，不多不少也恰好是七步。

七步，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实在是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伏契克在他写的那本名叫《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书中间道：“在人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

这间铺着木头地板七步来回的斗室，足够我思考各种问题。何况思想是不受空间限制的，思想可以冲破牢笼……（摘自《仰天长啸》）

◇ 两种“文革”，三个阶段

鲁礼安在“文革”中是一个“造反派”。《仰天长啸》的上卷1-2章，主要回忆两年“造反”的经历；下卷1-2章，主要记叙1-1年为“造反”所受的惩罚和对“造反”的反省。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在《造反派与三种人》一文中说过：对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恐怕‘造反派’已经成了文革罪孽的两个最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一：上层是‘四人帮’，下层则是‘造反派’。在某种程度上，造反派成了诬陷、阴谋和暴力的抽象代名词，承担着文革中所有罪恶的大半责任”。

人们习惯了说“十年浩劫”，其实，“十年”并非一以贯之，也不是“浩劫”两字就能一言以蔽之，而有多条线索复杂交织、回转起伏。不少学者、作家不断深化扩展“两个文革”的看法，即将毛泽东的“文革”和民众的“文革”分开来

判断是非功罪，毛泽东鼓动民众造反夺权的目的，与民众自身诉求，语言虽相同或相似，内涵并不一致——在高层，是夺领导权，在底层，是夺生存权。

有学者（例如姜弘）这么划分“文革”的阶段：

一开始近半年时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有特权的“红五类”制造“红色恐怖”时期；中间不到两年，是多年来受压的弱势群体起来为不受迫害，争取权利的时期——这就是“造反派”时期，他们崭露头角是在1966年9月底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主要“业绩”不是“破四旧”“抄家”，而是“炮打司令部”，造省市的反；1968年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是上层继续进行权力斗争并联手镇压“造反派”的时期。到1969年初中共“九大”前后，“造反派”群体退出社会舞台。

“文革”中最骇人听闻的暴行血案，恰恰主要发生在前后两段，而并非中间“造反派”红火的这一段。当然，“造反派”也并非清白无瑕，某些组织、某些个人参与迫害，对打人甚至打死人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 不安分的基因被毛泽东激活

鲁礼安的故事正是“造反派”命运的缩影。这支“笔杆子”名不虚传，在七千字的第一章中，就信手拈来古希腊犬儒学派、布利丹笔下驴子、“能思想的苇草”、但丁、雪莱、曹植、泰戈尔的诗等十多个典故，与自己的记事抒情浑然一体，充分展现他厚实的修养和敏捷的才思。但他就像一颗一纵即逝的彗星，光华炫目仅仅一年半。

鲁礼安出生于1946年初冬。内战烽烟乍起，中国希望的曙光忽然暗淡，还在襁褓里的他，却听熟了母亲自弹自唱对主耶稣的赞美：“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父母给他姐姐取名，用了“平安夜”的“平”，给他则用了个“安”字，寄托了这一对虔诚基督徒在天翻地覆的年代，祈求上帝保佑小姐弟一生平安的心愿。

1965年，鲁礼安从中学毕业，受影片《甲午风云》影响，考进华中工学院水下舰艇专业。进大学还不到一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既然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关系到党和国家

的前途”、“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他和千百万青少年一起义无反顾、全心投入。

1966年从夏天到秋天，伴随着一句句“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的最高指示，这些年轻学生宛如坐上了过山车，忽一下直冲云霄，忽一下又飞跌深渊。工作组来了；工作组撤走了；“红卫兵”造反了；华工党委书记朱九思与各系领导都被“揪”出来监督劳动、挨斗请罪；又一批学生成立“造反派”组织，造红卫兵要保的“走资派”的反……

鲁礼安身上不安分的基因激活了，第一次是跳上辩论台向取代校党委的工作组放了一炮：运动大方向没把准，在普通群众中大抓坏人；工作组长还要学生用三天学习毛主席“老三篇”，改造好世界观再投入运动——三天改造好世界观，“那不是活见鬼吗？”这最后一句话，引起全场好一阵喧嚣。

真正让他一夜成名的，是一张批判代理省委书记兼省长张体学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了，对工作组功罪的辩论方兴未艾。张体学来到各校巡回演讲：省委派工作组犯了压制群众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的两派师生之间的冲突嘛，则是场误会。这种说法让誓不两立的对立群众皆大欢喜，但被工作组划为“中间偏右”的鲁礼安，却从中嗅出违反中央关于“文革”决定《十六条》的气味：《十六条》说，“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这是关系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原则分歧”，怎么能说成友军“误会战”呢？他连夜写出大字报《省委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暴露》，同窗好友谁也没胆量共同署名，鲁礼安只好只署自己的名字，拂晓前贴到学院最显眼位置。天亮时，这张大字报前观众里三层外三层，都在谈论这个署名船舶系一年级6556班学生鲁礼安的“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互相在打听谁是鲁礼安？“老实说我那会儿得意极了，飘飘然不知道自己的骨头的份量”。

随后他声援陷于孤立的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造省委反的一张大字报，更使他的名气越出校园，扩展到社会上。

王任重当年有句对付不安分学生的话：“枪打出头鸟。”鲁礼安尝到了当“出头鸟”的滋味：领到的“红卫兵”袖章被收回；被查三代档案，大字报和传单无中生有地诽谤其父在抗日战争时期“跟随汪精卫，投降日寇，当了汉奸，于1942年加入汪记国民党”，其母“成了基督教徒，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帝国主

义反华的应声虫”，与他父亲是“同样的货色，同时加入汪记国民党”。鲁礼安本人自然也就是“汪伪汉奸的孝子贤孙”，“妄图在武汉一哄而起，推翻湖北省委，追至中南局，直指党中央，达到复辟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目的”。

鲁礼安的造反害得父母家被抄了三次。第一次是他所在的华中“红卫兵”干的，他回家见满地都是书籍、纸片和横七竖八的衣物、踩碎的镜框、打破的玻璃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次日他母亲学校的老师也戴着红袖章来抄家，这些半老女同胞只对首饰感兴趣，抄走金项链一条、父母结婚戒指一枚；第三天他家所在的街道的“积极分子”也来清“四旧”，将凡值钱一点的衣物搜刮一空……

红卫兵组织被“红五类”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后，武汉地区学校的“少数派”红卫兵组织逐渐形成共同名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区别于被其蔑称为“三字兵”的“保皇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兴起，伴随着一系列“造反事件”：在各院校抢夺“黑材料”（工作组为对学生“秋后算帐”而整理的秘密材料、将学生划为左右的“黑名单”）、抢占学校广播站……而充满造反精神的鲁礼安，因出身不硬，竟不得其门而入；连他要参加步行串联“长征队”，都是在他破指写下血书之后，才被开恩批准。

◇ “敢死队”先锋到太岁头上动土

鲁礼安在“文革”初期的“造反”行动都是小试牛刀。他成为“造反派”一翼的领军人物，或说一种思潮的代表，还是在1967年所谓“一月革命”风暴之后。

当时“造反派”群众组织如雨后蘑菇一样冒了出来，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中“兄弟阋于墙”，争功争名，不可开交。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等十来个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声明，攻击其它造反组织是“托派”和“湖北黑省委第五纵队”，引发了“造反派”内部一场空前大混战。对“造反派”早已忍无可忍的武汉军区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抓了分部以上头目近500人。

塞满犯人的军车在江城夜空呼啸奔驰，震惊了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加入“造反派”组织、在《新华工报》当编辑的鲁礼安。他奋笔疾书一篇篇文章，借巴黎公社的启示，要求“正确看待造反派的功过”。不仅如此，“我素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再次发作。太岁头上也敢动土”，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敢怀疑。当时

中共中央转发了毛“三七指示”，肯定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做法。鲁礼安质疑说：延安中学上报的材料称学生“仅用一天就实现了全校大联合”，可能吗？短短一天能消弭由于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思想分歧、精神隔膜和相互仇视的情绪？他断定这是假的，是有人炮制了“抽掉两条路线斗争实质的大毒草”欺骗伟大领袖。大字报贴了出去，立即遭到攻击——矛头指向红太阳！他辩解说自己是指有人编造假材料“欺骗”毛主席——那也不行，伟大领袖从来都明察秋毫！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又捅了一个更大的乱子。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派出几十个小分队，到各地从档案中挖出成千上万“叛徒”，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批转的《薄一波、刘澜涛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材料》，称他们接受刘少奇、张闻天的“中央指示”自首出狱，窃据要职，是“党内一大隐患”。而鲁礼安研究了这份材料后，断定实属一大冤案，写了篇文章，称“抓叛徒”背后有大阴谋——这又犯了大忌！他被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开除。

到底是时代不同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自己拉队伍。他与冯天艾一块拉起了大、中学生二十多人的“新华工敢死队”。鲁礼安解释：“敢死队”不是鼓吹武斗不怕死，是取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之意，是用文字向“反动路线”宣战，打砸抢与我们无缘。鲁礼安本人在“文革”中更自始至终“君子动口不动手”，一直沉浸在逻辑和激情的乐趣之中。他们以一篇《敢死队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一小撮混蛋挑战》的大字报亮相，历数武汉部队如何“支保不支左”，“镇压革命造反派”，情绪激昂，语言尖锐：“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今日雄文四卷在手，何日缚住武汉谭震林游街示众？！”鲁礼安对多维记者自嘲：“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癞蛤蟆打哈欠的文风”。

大字报激怒了武汉军区首长，“敢死队”还参与支援黄石市造反派逼迫武汉部队韩东山副司令员检讨的行动，军区签发了对他的“逮捕令”，不知为何却没有动手。

“敢死队”更重大的行动，是为被军区镇压的“工总”翻案。鲁礼安认为：造反派头头中或许有不良分子，但个人品质对整个组织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这个组织在革命中所处地位如何。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工总，在武汉地区“文革”中举足轻重。他写下《从阿基米德的一句话谈起》等三篇翻案文章。

鲁礼安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真正以为我们投身的，是一场反修防修，保证中国永不变色的史无前例的“圣战”。“苍天在上，在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者说话这一点上，我敢说我问心无愧。”

◇ 从狂热呐喊转向冷静思考

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营垒，终于从“批判的武器”转向了“武器的批判”，互相诉诸武力。保守派组织联盟“百万雄师”在部队支持下，控制了多数工厂，将这些工厂的造反派驱赶到市中心几个据点，不断对这些据点进行武力攻击，所幸当时的武斗还只是用冷兵器——长矛、棍棒。鲁礼安也鼓吹“文攻武卫有理”。他在大会上演说：“当反革命对革命人民无情杀戮的时候，难道我们竟愚蠢到递过脖子去任人砍杀，而不是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去武装自卫，坚决抗暴吗？”但当台下响起暴风雨般掌声，有人喊“文攻武卫万岁”时，他话锋一转：“我并不赞成文攻武卫万岁。这个口号，也只能说是在当前这样一种特定形势下，一个不得已的应变口号。”他鼓吹应当“发扬优势”，优势就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去唤起群众……“几乎我的每一句话都被狂热的掌声和欢呼声打断……使我产生出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正站在硝烟弥漫的街垒中，对浴血奋战的武装群众进行动员演说”。

在保守派“百万雄师”酝酿向所有造反派据点发起总攻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谢富治及王力等人相继来到武汉处理危机。谢、王在公开场合露面，认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被捕的骨干陆续放了出来。“百万雄师”并不知道毛、周就在武汉，眼看政治风向要变，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以批谢、王“下车伊始偏听偏信”为名，发起超大规模示威，逼迫中央改口。1967年7月20日，骇人的政治风暴拔地而起：几百、上千辆卡车满载“百万雄师”、“公检法”和解放军8201部队战士，在三镇武装游行，其声势之浩大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他们不仅在多处暴打“造反派”，还冲击、包围军区抓王力，形同一场“叛乱”。

鲁礼安在这场事件中差点丧命。他带上一部照像机，上街抓拍“百万雄师”成百上千武斗队员头戴柳藤帽、手持长矛冲击湖北大学等血腥场景。但他被对方发现了，鲁礼安拔腿就跑，身后几名“柳藤帽”挥舞长矛紧追不舍，他慌不择路，

跑到长江大桥引桥旁陡崖上，一咬牙闭上眼睛抱紧相机，滚下几丈高的陡崖，相机摔得四分五裂，他也摔成重伤，幸亏逃过了武斗队员的毒手！

毛泽东、谢富治及王力都脱险了，中央公开表态，武汉形势急转直下，“百万雄师”垮台，“造反派”群众上街载歌载舞狂欢。鲁礼安为工总翻案有功，被“工人运动领袖”奉为座上客。但他有一种预感，“造反派”同室操戈将再现。一个事实也使他特别不安：重新掌权的“造反派”对前“保守派”群众残酷报复，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他在回忆录中说“据不完全统计，单武汉一地保守派方面被打伤打残的，就多达六万多人，被打死的有六百多”。

北京有人点名他去人民日报社“任立新写作小组”。据说这个写作班子由北京一些红卫兵笔杆子组成，直接听命于“中央文革小组”，但商调函被卡在华工造反组织一号头头张立国的口袋里，他没去成。幸亏没去成——听说“任立新写作小组”和不久就因发表乱军讲话而垮台的王力很有关系。

“‘文革’将把中国、世界引至何处”的这类大课题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他和同伴感到实在太欠缺知识，便空前勤奋地读书：马列著作，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还有《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和约翰·里德关于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后来又增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戴高乐《战争回忆录》、托洛茨基《第四国际》……鲁礼安说：说来脸红，书都是我们从我们借住的省委干校图书馆、长江日报社图书室偷的。

鲁礼安在这段时间也写了大量后来为之惭愧不已的文章。他写了《论武汉工运道路》，文中关于“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武汉地区的革命大联合”的提法，带有明显派性。后来他反省说：不少“大权在握的造反派头头，其实并不具备担当‘核心’的素质”。

他支持一支农民队伍——浠水“巴河一司”进城造反。这支队伍的负责人王仁舟，是北京外语学院因政治言论“文革”前被开除、“文革”中又被平反的学生。王宣称贫下中农“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因为他们“经济地位最低、生活最苦”“所以最迫切要求改变现状”。鲁礼安并不相信他这一套怪论，他懂得判断一个阶级进步与否，主要是看是否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但他去考察他们比人民公社更“一大二公”的“新农村”，撰写《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加称赞这些所谓创举乃“共产主义的萌芽”，认为“巴河一司”的崛起是中国

农民运动高潮将要来临的预兆。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我不懂得王仁舟这些“革命创举”其实早在“大跃进”时期，就被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过，曾经将中国农村推向深渊。

◇ “我一生的根本任务是制造真理的旗舰”

鲁礼安从运动一开始就对山呼万岁、万寿无疆之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或许是出于天性的缘故吧”。他不仅对“忠字歌”难以适应，也从来不戴毛泽东像章。特立独行的鲁礼安通读《毛泽东选集》，将毛在一些问题上的论述与后来的实际情况相对照，认为即便是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常有认识超出了实践或落后于实践的问题，用毛自己的话说，就是也会犯“左”或“右”的错误。他在毛着上一些地方作眉批说，现在看来这里“左”了，现在看来这里“右”了。这在旁人眼里实属大逆不道，但他自己却浑然不觉。

“文革”激烈动荡了一年多，武斗不断，内乱不止。有个朋友建议鲁解散“敢死队”，另行组织一个学习马列主义团体，聚集起真正有头脑、有思想、能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要学习已经公开出版发行的，而且要研究未公开出版的，包括毛的早期著作，独立思考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鲁礼安万分感谢北京一些学生组织编印上下两册《毛泽东思想万岁》，收入一大批毛的早期文稿，给他展示了大量以前从未知晓过的思想和信息。毛泽东这位从韶山冲走出来，曾想当警察、当法官、当肥皂制造商的青年学子，原来并非生来就一贯正确的“完人”啊！

他们决定成立“北斗星学会”。名称由当时一句著名歌词“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而来，推选冯天艾为会长，冯提出学会须有一份自己的刊物，不是有过《湘江评论》吗？我们的就叫《扬子江评论》好了。

鲁几乎未作任何修改，一气呵成了《北斗星学会创立宣言》的草稿。劈头就说：“我们试看矿岩的分布，铁矿煤矿和云母，各自云集在一起。这是自然界千百万年变化的结果，是大自然的威力；且看我们的队伍，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废、有人叛变，但更有人集结在一起，奋勇地前行。这是一年多来运动的结果，是大革命的威力，这种威力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最后一句是：“北斗，北斗，未来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谁主沉浮！”

或许有人会感到这些文字狂气十足？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都时兴这种带狂气的文风。鲁礼安在一本“文革”日记的“序言”中还声称“真理的军舰是我的旗舰，我一生的根本任务是制造这艘旗舰。人们都在匆匆忙忙地制造自己的划子……我和我的同伴们则要制造真理的军舰去征服思想的海洋”呢！

◇ “北斗星学会”运交华盖

“北斗星学会”特意选在十月革命六十周年——1967年11月7日成立。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作家、十多年后写出《苦恋》的白桦和剧作家所云平，中学代课教师、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张志扬与童丹等都来了。诞生之日却似乎运交华盖，当场有位工人代表尖锐批判鲁的宣言草稿，更有一个武汉警备区的人不请自来，默不作声，一个劲地记录每个人发言，弄得人心里发毛。不少与会者打退堂鼓，只剩下六七个人算是成员。“那天散会后与我们一道合影留念的人倒不少，而这张照片从照相馆洗印出来后，不知怎的竟也有张落到了警备区的手里，成了长官们按图索骥、追查‘危险份子’的好证据。”

后来工总一个基层头头告诉鲁：武汉军区首长接到警备区的密报后，立即命令对参加学会成立仪式的所有人进行秘密调查，这位头头就被要求调查其中一名工人。鲁礼安纳闷：“文革”各种群众组织何止成千上万，各个群众组织之间打破了头，都不觉有什么稀罕，为什么偏偏我们几个阅历不深的学生想组织起来学习理论研究“文革”，就犯了大忌？

近一个月后，在省革委会12月4日常委会上，武汉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一把手曾思玉点了“北斗星学会”的名，称之为“稀奇古怪的组织”，“老右派分子”白桦也出席他们成立仪式。曾思玉一边抖动手中的一张纸一边说：就是这个北斗星学会的宣言。这个宣言非常反动，每一个字都是反动的！

首长的表态如此横蛮、如此不负责任，是鲁礼安始料不及的。学会几个成员也都惴惴不安。不久有消息说，北京、上海的类似学会的日子都很不好过。看来无论用什么名义，只要企图在思想理论上作自主研究，你就是心怀不轨。他感到憋气：为什么偏偏生活在这个把人当做“神”来供奉的环境里？我们从造旧世界、旧观念的反起家，为什么又沦为新的精神奴隶？

怎么办？一位叫周凝淳的朋友向不甘寂寞的鲁礼安说，毛泽东不久前发出“最高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

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何不就此“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命名？名称太长，就简称“决派”——搞个“决派联络站”，联络一批志同道合者完成学会未竟之事，出版《扬子江评论》。

周凝淳转述张志扬、童丹的看法说：这是一个不容许有自由思想存在的时代，但是“大民主”又确实给了某种言论自由的契机，而言论是思想的外壳，就看你怎么表达。

已经十分娴熟于起草宣言的鲁礼安，便又起草《决派宣言》。第一稿所谓“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因“巴河一司”这时彻底失败而成了废话，年轻学生希望他重写，对夺权后“文革”运动的走向作出分析、预测：既然“革命委员会”仅仅是“临时权力机构”，那么由什么样的正式权力机构取而代之呢？

鲁礼安在《决派宣言》新稿中指出：“革委会”最终会被“革命群众”淘汰出历史舞台，但还没有明确提出将被一种什么样的新国家形式来取代。

就在鲁礼安苦思苦想“文革”前景的同时，天南海北都有一批人正在探索同样的问题。有一天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登门造访，鲁礼安与他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六年之后，李与另两位广州青年化名“李一哲”合写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思考》，闻名全国。而在浩浩洞庭湖的那一边，湖南“省无联”中的一些独立思考者，在一篇《我们的纲领》文章中，也提出湖南“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之必须实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一位名叫杨曦光的中学生（后来他改名杨小凯），则在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中认定，“现在90%以上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

当年知识青年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拥有的精神资源是十分可怜的。1957年那一批“右派”多半经受过“五四”的洗礼，拥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思想等人类精神资源，而鲁礼安这个年龄的青年是在中共的思想专制环境下成长，“文革”前夕他们手中只有“毛主席语录”和《雷锋日记》。鲁礼安与“省

“无联”以及其它地方独立思考的青年，拥有高度相似的思想演进轨迹：从官方的毛泽东思想，到非官方版的毛泽东思想，到列宁、马克思，到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理论，然后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去探索新的道路。他们不约而同地高度关注 1871 年的巴黎公社。鲁礼安就反复鼓吹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公社国家，他的观点的支柱，就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所主张的：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选举，把他们的薪金降到普通工人收入的水平。公职人员都要对选民负责，不享有任何的特权，选民随时监督、随时撤换。

鲁礼安和战友尽管造反夺权有功，但是由于他们勤于学习、思考，思想逐渐超前，与“造反派”的主流日益分道扬镳，成为边缘化的偏师。鲁礼安回忆那时他的处境说，华工“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日益激烈化和表面化，但在坚决不让原院党委书记朱九思重新上台这一点上又结成同盟。而他不单主张解放朱九思，而且认为中央邓小平、省里张体学，也都应当重新启用，这使造反派头头们对他甚为疑忌。

风声越来越紧：康生等人指湖南“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组织被取缔、思潮被批判、成员被逮捕。当局杀鸡吓猴，让鲁礼安他们感到险象环生。在有经验的朋友劝告下，鲁礼安决定不以鸡蛋碰石头，紧急召集骨干分子开会，提出解散“决派联络站”。没想到他那些观点比他更激进的部下坚决不肯。鲁礼安只好以“七二〇事件”中自己跳桥受伤复发须治疗为由，退出决派活动。

对他的围猎在逐渐收网了。省革委会和军区无端怀疑是鲁礼安在幕后操纵各地武斗，指示华工革委会要从他这里挖罪证。有天半夜，他突然被拘押、隔离反省，给他纸笔，要他交待。他根本不理睬他们，只在纸上信笔写写画画。但他的笔记和日记都被抄查，他在毛选上的眉批令他们如获至宝——白纸黑字啊！他们整出了一份分门别类列举他反对毛主席等罪行的材料。

这次被鲁礼安侥幸逃脱，还一口气写下三篇总题为《我回答你们》的文章，逐一驳斥对他的指控。他鄙视那些喋喋不休地指责他离经叛道的人，他讥笑他们困在围墙之内坐井观天，只知道头上有个“红太阳”，忘记了无边无际的天空中还有数不清的恒星。鲁礼安却没有料到，这“围墙”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

1968年5月16日，《扬子江评论》的创刊号印出来了。刊出了鲁礼安起草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他模仿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抓住毛泽东“对派性要作分析”一语，抨击上海对革命造反派学生的反攻倒算——他对镇压过上海“红革委”的张春桥特别不满，也非议周恩来“一贯采取调和路线”，但是他尊敬周鞠躬尽瘁，坚持不点周的名。鲁礼安后来承认这篇文章本身就是站在“极左路线”立场，“流毒甚广”。

鲁礼安在文中还宣称“一旦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必须用暴力对付暴力，用革命的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在这个问题上，鲁礼安的感性与理性是分裂的。当他目睹“七二〇”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七二〇”后造反派内部所谓“钢派”与“新派”之间一场场血腥武斗，曾经和正在夺去多少无辜群众的生命，不由得心情沉重，想到那些“为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横尸街头的同学，那些被流弹或走火误杀的同胞，他们死得“比泰山还重”么？九泉之下真的能安详合眼么？“我写的那些鼓吹武斗的文章，究竟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摇旗呐喊，还是在为一种骨肉相残的罪恶推波助澜？”

他在监狱中无数次扪心自问，对自己的文字认真反省。他对多维记者说：我长期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最终战争不可避免，“七二〇”后甚至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流毒之剧，影响之坏，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分。我写这种文章，等于是唯恐天下不乱！还有鼓吹派性，宣传“农民领袖”王仁舟的极左蓝图……我那些尖锐刻薄极富煽动性的文字，也不可能不对某些人造成相当的伤害。

这篇文章是鲁礼安“文革”中的“绝笔”。两天之后，他在赴黄石途中于铁山被劫，从此从人间消失。

鲁礼安说：如果我不是在1968年的夏天失去人身自由，以我狂热激进的思想方式，在以后的年代里是会沦为“四人帮”的爪牙，还是像杨小凯、李正天那样，从狂热走向冷静、从幼稚走向成熟、从狭隘的派性走向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斗争？我想我一定会走向后者。无它，只是因为我从来嫉恶如仇，崇尚正义，我不但有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头脑，且不乏探索真理，为真理献身的勇气。但是历史没有给予我走向真正觉醒的时间。

1968年5月17日深夜，武汉地区“文革”造反派的“一枝笔”鲁礼安，在前往黄石的途中在铁山被劫，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1年多的单监生涯。被劫是偶然的——误闯了对立派系的哨卡；被囚却是必然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放妖容易收妖难，桀骜难驯的鲁礼安这时赶上了毛泽东从“大乱”达到“大治”的转捩点，正好用来杀一儆百。

鲁礼安被抓在武汉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数百个群众组织参加“营救鲁礼安”行动，数万人乘坐三百多辆卡车示威游行，甚至还有人企图“劫法场”。但最后都被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强行镇压下去。

◇ 入狱

鲁礼安对多维记者没有多谈自己在监禁中的遭遇，但是他的《仰天长啸》中却记录了他亲身遭遇的暴行。仅举几段：

四五个大汉凶神恶煞地围紧了我。我身手全被绑着，躲无可躲、防不胜防，只能给打手们充练习拳头的“沙包”……那家伙霍地从屁股后摸出把雪亮的匕首，“老子今天非把你这小子一块一块零刮了，”他边说边揪住我的左耳，朝耳根上就是一下。我只感到耳根剧痛，鲜血汨汨地顺着脖子朝下流——这是他被劫时给他的下马威。

我被押到地下约200米深处的矿井工棚，两个中学生一人抓起一根用钢丝绞成的鞭子，朝我狠狠地抽下来。一道鞭子一道血印，我痛得蜷缩在地下，一边用戴着铐子的手护头，一边大声惨叫……每天都免不了这样一顿毒打。我被打翻在地上，他们就用脚上的靴子踢我——这是在受审讯的日子。

他被当兵的铐成“苏秦背剑”——将一条胳膊从肩上扭到背后，另一条胳膊从腰下扭到背后，然后用带铜扣的皮带朝头上猛抽，逼他承认“组织越狱”；他被看守班长用半自动步枪上的三棱刺刀朝胸口猛捅，痛得在地下打滚……

当局开始想给他定“恶攻罪”，但这条罪名实在莫须有；后又捏造出“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案”，196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69）67号文件”“对武汉问题的指示”说：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

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歪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的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审讯人员说，因为他经人介绍曾去拜访过一次老红军王盛荣，所以王就算成他的幕后黑手；王盛荣又是中共党史上王明那一伙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王明跑到苏联，还炮制文章恶毒攻击毛泽东和“文革”，所以当局就把鲁礼安与王明挂上了钩——令鲁礼安叹服：“真不愧是惊天动地的大手笔”！

据三十年后官方《武汉大典》记载，当时“全市被定性为五一六、北决扬的多达数万人”，为此受到清查的更是不计其数，据估计达数十万之众。

被关在单人囚室中，他曾经狂暴抗争，激烈申辩，用头撞囚室的围墙，想拉断囚笼的铁槛，想用铁片切开血管，还用一根旧裤带上吊，裤带却崩断……他的同案犯中先后关疯了四个。

支撑他好好活下去的力量之一，是他渐渐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我无罪，他们才有罪。鲁礼安争取到读书的权利，通读《辞源》，苦念英语，钻研《史记》……还背着看守断断续续用极小字体，写下五六万字的纪实小说《狂飙曲——红卫兵之歌》。“本来想写成正剧，写着写着就不像了，写成了搞笑的荒诞剧”。

就在“文革”结束之后两三年了，他还差点被判死刑，后来又改为无期徒刑。原定是要开公判大会，主会场就设在武汉剧院。省里把判决情况上报中央备案，以为铁板钉钉，遂印刷判决通告。岂料中央管政法的一位负责人调阅案卷，认为当年对“北决扬”一案的处理有问题，遂报中央政治局讨论，终于否定了1969年中央“九二七”指示，传达到湖北省委。而当时公判大会已一切就绪，正准备到监狱提鲁礼安一行人犯押往主会场……

◇ 出狱

大墙之外，天地翻覆，真理标准讨论的劲风终于吹开了思想专制的堡垒。1979年10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向湖北省委呈送《关于处理“北、决、

扬”一案的请示报告》说：“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12月，省委批覆同意这个报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给了他一纸刑事判决书：“免于鲁礼安刑事处罚。”

他说：我既然能够咬着牙挺过来，我就是胜利者，身后的监狱之门，便是我的凯旋门！

走出了牢狱的监禁，走不出社会的禁锢，连大批知青都难找工作呢，何况他这个已经33岁的“文革”造反派头头、释放犯！他打短工、拖板车、踩三轮、代课……一度还动了考研的念头，但他怎么过得了“政审”这一关？

幸亏当时还有“顶职”这一政策。他父亲从阳逻船厂退休，鲁礼安顶替进了厂当仓库保管员，后来调厂人事科搞职工教育，对青年工人进行文化补习，工人们称他是“鲁老师”。

他的母校华中工学院给他补发了本科毕业文凭，他又完成了电大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业，撰写了一批论文，创造了一套历史网络教学模型，编写了一套地理形象趣味教材……他讲课很受欢迎，武汉市所大学想调他，让他试讲过几堂汉语文学课，但是最终没有能调成，原因之一，还是“文革”问题留的尾巴。加上当时还遇到一些别的不公正的事儿，让鲁礼安心里凉了半截，索性停薪留职，返回武汉。满怀抱负的鲁礼安，被自己的沉重过去拖曳着，总觉得自己的才华和精力没能施展。

当鲁礼安是“文革”造反闯将名震江城之际，颇引动一些姑娘的芳心，他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余，也对心仪的女孩萌生过情愫。被关进黑牢，自然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出狱之后“释放犯”的帽子又吓退了多少姑娘！据说有个女孩看上了他的才华，一到公安部门去打听，吓得花容失色：公安局的人说，这个鲁礼安是个“大反革命”，坐了十几年牢，差点给枪毙！

然而，终究有能慧眼识珠而不信邪的姑娘。一个在供电局工作、比他年轻十来岁的重庆女知青，得知了他的传奇故事。她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文革”中为几篇文章坐牢，又不是杀人放火！她与他见面，终于结成良缘，生了一个儿子。

1989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鲁礼安认识了一位英籍犹太商人，应聘成了这位商人驻汉办事处雇员。当地工商部门说：鲁有“历史问题”，这位商人却不在乎，对鲁说：“I know your story.”执意要雇他。他感谢这位老板的知遇之恩，便尽心尽力地工作。后来他与妻子都调到这家公司在浙江的部门，一直干到多维记者见到他的三天之前，他辞职回家来。

有人曾经劝他自立门户，鲁礼安却不愿考虑，他觉得自己在老板手下干得还算舒畅，更重要的，他总想着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读书、思考，反思那段刻骨铭心的“文革”岁月。他用近十年时间写出一本回忆录。正如江汉大学退休教授姜弘所说：“原来曾想，文化大革命是无法如实描述的，因为那一切太离谱，太不正常了，真实的不正常有可能成为漫画，使人感到荒诞。然而，读了鲁礼安的这本书，我改变了看法。……他不加矫饰地把当年那种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照原样再现出来了。”“鲁礼安给了我们一块‘文革’的活化石。”

鲁礼安现在是虔诚的基督徒——与他母亲一样。他为教会作词、谱曲、写文章，多维记者还读到了他写的一个儿童剧本《耶稣已经过来了！》。

对于文革，真相比结论更重要

• 方 方 •

应该说，鲁礼安是文革中的特殊人物之一，因为他在这场浩荡的大革命中，不
仅是追随，还有制造。他畅快淋漓的文章、唇枪舌剑的辩才、挥斥方遒的意气、侠
肝义胆的豪情，曾经成为武汉三镇的传奇。正因为此，当传出他被抓获的消息，竟
引发一场规模不小的“营救”运动。无论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当年，无论事情的发
生
发展是对是错，对于鲁礼安而言，那都是他个人最轰轰烈烈也最风光无限的年月。

只是好景不长，鲁礼安最终被投入了牢房。虽然关他入狱的理由现在说起来像
个笑话，但他却因为这个笑话，在不时转换但全部黑暗的小屋中度过了近十二年的
时光。21岁到33岁，一个人几乎全部的青春都被永远尘封在此并且永远也索取
不回。曾经与鲁礼安一起“革命”并也坐牢的诸多战友或死亡或崩溃，但鲁礼安却
没有。这应该是个奇迹，连鲁礼安自己也认为是个奇迹。或许是他的充满自信的性格帮助了他。他在狱中一遍遍回忆自己的往事，以致那些事情烂熟于心，睁眼闭眼
都清晰可见。那时候，他就下决心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

这是一本重要的书，重要的不仅是内容本身，而是鲁礼安所做的这件事。十年的
文革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漫长得我们无法看清它的真相。随着二十八年时间的
推移，越来越是非难分，越来越错综复杂。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中国产生如此之大
的浩劫？是什么理由使中国精英们一夜之间以排山倒海的姿态崩溃？是什么力量让
阳光一般的红卫兵突然成为人们眼里的恶魔？——这样的问题可以提出成百上千，
但答案却总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

当然，这样的问题，鲁礼安一个人的回忆录不可能解答，就算有其他更重要人

的回忆录也无法解答，它需要千千万万过来人最真实的记忆。文革若是暗夜里的
一
块巨石，浑然不见它的真实面目，而鲁礼安的回忆录便是一只射向它的手电筒。
虽
然它只能让我们看到巨石的一个点，但如果有无数无数的鲁礼安将自己的文革经
历
写出来，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身份地位相对特殊的人写出自己的文革历程，那么，
这就如同手电筒从各个角度向这块看不清的巨石投射去光照。聚光之下，就算最
本
质的东西无法触及，但它的轮廓却已然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或许这样，我们方
能
以最快捷的方式接近真相。

其实，对于文革，我个人以为，真相比结论更重要。这就是三年前我非常希
望
看到回忆文革的原始文本的原因。

□ 摘自《一个人的文革史——〈仰天长啸〉序》

历史是宗教 写作是拯救

——读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 胡 平 •

这是一本十分厚重的书：绝不仅仅是篇幅，六百多页，五十多万字，够厚重
的
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坐了十一年监狱——其间大部分时间还是单身监禁
——

的人，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写成的回忆录。这是用一生的心血，写下心血的一生。
这
个人就是这本书，这本书就是这个人。

鲁礼安是武汉人，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初期是武汉地区大名鼎鼎的革命小将，异端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1968年7月因莫须有的“恶毒攻击罪”被捕入狱，后来又因为涉及“反革命地下组织”案，差点被判死刑，被投入单人牢房长期关押，直到1979年才出狱。出狱后，作者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写成了这本回忆录。这本书记载了作者的成长 and 经历，记载了作者在文革初期短短两年时间内的热情投入，指点江山，然后就是漫长的监狱生活，痛苦的思考与回忆，极度的空虚与绝望。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了解到一代造反派红卫兵的思想与心态，更可以了解到作者本人，了解到作者非凡的毅力、才华与品格。

◇ 单身监禁——难以描述的恐怖

读鲁礼安的书，最令人震撼的一点莫过于他十一年的单身监禁生活。这种痛苦远非笔墨可以描述，因为这种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没有生活。人是天生的群居动物

物，人必须生活在人群之间。人群之间就叫人间，在各种语言里，死亡都被委婉地
叫做离别人间。可见人们都知道，离开了人群的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离开了人
群，生有如死。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话，单身监禁是“野蛮得无以复加的刑罚”。单
身监禁不仅对人的肉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它更严重地摧残了人的精神和心智。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象棋的故事》，其中的主人公 B 博士被纳粹
单独拘押，在牢房里他面对的是一片虚无的空间与时间，生活成了空白，围绕他的
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空虚。为了对抗孤独，B 博士朗诵诗、背儿歌、背法典条文、演
算算术……但问题是，就像他后来所说的，“在空虚中，我的记忆力什么也抓不住
。我已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任何事情上。”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他从狱卒那里偷来
一本象棋棋谱，就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拼命地读和背，不断地自己和自己下棋，
一盘接一盘地发疯似地互相挑战，结果他的棋艺竟然高明到可以下赢世界冠军，
但同时也陷入了精神错乱。

《象棋的故事》的中译本是在“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发表的，那时候，我们都
刚从没有文化，没有书读的时代走出来，对极度的精神饥渴有很深的体验，所以对
这部小说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有它的戏剧性和夸张性。真实

的单人监禁要远比小说描绘得更恐怖。和鲁礼安同案的十几个人，最后有四个精神失常。

不止一位坐过牢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本来是一天能读一本大部头的书，下笔能写洋洋万言的长篇大论的，可是在长期的监狱生活、尤其是在长期的单身监禁之后，从此再也读不进大部头的书，写不了长篇大论。注意力很难集中在任何一件事上，平时总是心慌意乱，神思恍惚，心不在焉。由此我们也理解到，鲁礼安能够挺过十一年单人监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又用十年的功夫写下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回忆录，这是何等顽强的意志，何等卓越的才华，何等坚挺的自信！

为什么鲁礼安能挺过十一年单身监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因为他给自己找到了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在被监禁的第八年的除夕之夜，鲁礼安向苍天 and 大地发下一个誓言：“我这辈子只要有一天能够走出这座人间地狱，我一定要把我狱中这段悲惨的经历写出来，我一定要揭露这桩钦定大案的真相。当然，我既不可能象《基督山恩仇记》里的基督山伯爵那样，去残酷地报复陷害我的仇人，也不会像《双城记》里的马奈特老人那样，去诅咒对我进行迫害的那些权贵们的子孙和他们家属中的所有人。我只将如实地揭露迫害者本人的罪恶，用笔将他们这些自由和民主的敌人、

扼杀人类道德和良知的刽子手，永远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说对于我们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那么，写作则是一种拯救。

◇ 文革活化石

鲁礼安是造反派。现在一提起造反派，许多人就以为他们都是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家伙，其实不然。例如鲁礼安，从小就是好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在运动初期，他对批判“三家村”和揪斗校长朱九思都是不以为然的。鲁礼安是从批评工作组而开始其造反生涯的，而他批评工作组也主要是出于对工作组整学生，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不满，可见他的造反带有反对政治迫害的成分。鲁礼安后来成为红卫兵的理论家，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宣言固然充斥着极左的词句，但其中仍然包含有反对官僚体制和向往民主的因素——尽管还是朦胧的、混乱的。

说来很有趣，鲁礼安的思想应该归为极左，但是它却引起了一批 57 年的右派的同情与共鸣。武汉地区不少 57 年的右派（如白桦、徐迟、姚雪垠等）利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介入造反有理的活动，他们对鲁礼安和他的《扬子江评论》与《北斗星学会宣言》尤其赞赏。江汉大学教授姜弘（57 年右派）在给鲁礼安

这本回忆录写的序言里指出，他和他的右派朋友们之所以赞赏鲁礼安，是因为“从他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那种青春的理想主义，洋溢的才华和初生之犊的勇气。

姜弘写道：鲁礼安们与众不同、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们“因受压而反抗，而独立思考，从而冲破思想禁锢，从毛泽东走向马克思，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而且不顾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自己组织起来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走向民主之路”。

当然，姜弘也指出 57 年右派和文革造反派之间的重大区别：“一是性质不同，二是思想资源不同”。“右派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主张而为毛泽东所不容，才‘因势利导，聚而歼之’的。造反派则不同，他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是被愚弄、利用之后又被抛起的牺牲品”。思想资源的不同，“主要是历史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里不仅有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这与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关。造反派就没有这种精神资源，他们生长在严格封闭的单一思想文化环境中，所能接受的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毛主席的教导’”。需要提醒的是，鲁礼安们只是造反派中的少数。这是我们评价文革造反活动时不应该忘记的。

鲁礼安回忆录《仰天长啸》写得很真实。这大约也和作者长期与世隔绝有关。无怪乎有人要把这本书比作文革的活化石。认真研读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文革，了解文革红卫兵一代，了解文革造反运动，了解文革异端思潮的来龙去脉，都有很大的价值。

□ 原载《北京之春》2006年5月号

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

——读《仰天长啸：一个被单监十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姜弘·

〔编者按：鲁礼安著《仰天长啸：一个被单监十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一书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鲁礼安在文革中的活动，请参看宋永毅等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第七章“武汉‘北、决、扬’：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的深化”，载本刊zk9908a。〕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我才读到第一本完整的个人回忆录，而且这样真实生动，把人带到了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那个疯狂的年代。我原来曾想，文化大革命是无法如实描述的，因为那一切太离谱，太不正常了，真实的不正常有可能成为漫画，使人感到荒诞。然而，读了鲁礼安的这本书，我改变了看法。也许因为我是过来人，而且曾参与过有关活动，所以读时如同回到了当年，一切都重现眼前，感到真实而亲切。这种真实感来自作者的真诚，他不加矫饰地把当年那种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照原样再现出来了。说幼稚也好，说愚昧也好，

或者干脆说奴性也好，当年确实就是那样——鲁礼安给了我们一块“文革”的活化石。

“十年文革”并不是一段统一完整的历史，其间有许多矛盾和反复。总的说来，那是一场夺权斗争，但上层与下层并不一致：上层是争夺领导权，即特权；下层则是争取生存权，即人权。一开始的近半年时间里，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有特权的“红五类”制造“红色恐怖”的时期。中间不到两年时间，是多年来受压的广大弱势群体为保护自己不受迫害，并进而起来争取生存权的时期，也就是造反派起来造反的时期。这中间，毛泽东鼓动人们造反的目的与人们自身的诉求并不一致。1969年以后，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是上层继续进行权力斗争并联手镇压造反派的时期。

说来可怜，造反派活动的时间不过两年，而他们的头头和主要骨干都受到了严厉惩处，且被后人说成是“文革”中所有暴行的制造者。这实在是冤枉，因为那些暴行和血案，主要发生在前后两个阶段，即一开始的“红色恐怖”中和后来的“清队”等有组织、有领导的镇压行动中。造反派当然也有暴行，但他们远没有保守派那样有恃无恐，在军队和各级政权的支持下大胆地“采取革命行动”。鲁礼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号称“敢死队”，实际上他一直沉浸在逻辑和激情之中，所进行的是思想理论上的战斗。他那种理想主义倾向，他的辩才和勇气，吸引了许多右派。我和我的右派朋友常在私下里议论他，称赞他，因为我们从他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

在“文革”中，1957年的右派同情并支持造反派，这是普遍现象。我和我周围的几乎所有右派，全都站在造反派一边，其中知名人物有老作家姚雪垠、李蕤，诗人白桦、王采、秦敢，翻译家章其，著名法学家韩德培，还有此间的著名记者赵F、刘若等等。这些人大都在运动一开始就受到了猛烈冲击，是造反派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才得以解脱，成为游离于斗争漩涡边缘的“死老虎”。造反派对待我们这些人的态度也远比保守派温和。当时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成员的有些讲话，如批判血统论，说十七年也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右派摘掉帽子也是群众等等，这些说法都在我们心里引起了一丝希望，以为中央可能会重新审视以往的运动。当然很快就发现，这是错觉，是一厢情愿。

事实上，当时我们都已成为俎上之肉，随时随地任人侮辱摧残，是争取生存权和对民主的渴望，使得一些右派介入了造反派的活动。最突出的是公开站出来造反的诗人白桦，因为他是现役军人，保守派奈何他不得。1967年夏天，白桦常常出现在大字报栏前和一些群众活动场所。在“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的武斗现场，他一个人面对大批暴徒，与之辩论，营救被围困的造反派学生。他的组诗《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充分反映了造反派群众那种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意愿和激情。这些诗被抄成大字报贴遍武汉三镇，传颂一时，脍炙人口。这些诗印成小册子以后，他亲自在街上散发。一次我遇见他，向他索取，他答应过几天给我。几天以后，他到文联大院来，把诗集送给我和徐迟、姚雪垠。徐迟对这些诗评价很高，他伸出拇指说：“全国文艺界头一份！”

连老作家姚雪垠也并未完全置身事外，而是以曲折隐蔽的方式表示对造反派的支持。1967年春天，造反派被镇压，军区发布《三二一通告》，取缔工人造反组织，把学生从《长江日报》的红旗大楼赶走。一时间，武汉三镇一片沉寂。对此，姚雪垠怀着悲愤的心情，一连写下了二三十首七言律诗，并加了一个小序，油印成小册子，偷偷散发出去。小序称：“三二一”以后，红旗大楼前人迹寥寥，大字报全被撕毁，纸屑飞扬，一片凄凉。他于无意间发现海关大楼旁有一组小字报，直行书写，虽已残破，尚可辨认，竟是一组七言律诗，而且格律谨严，对仗工稳，因而不忍任其湮没，择可识者抄下云云。记得第一首里有一联是“武汉关前月色冷，钟声寂奏东方红”。中间有一首把这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称为“新马日”，就是把军区镇压造反派比做1927年湖南长沙的“马日事变”——军阀何键镇压革命的工农群众。于此可以看出我们这些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倾向。

像这样暗地里支持和帮助造反派的人很多，鲁礼安提到的造反派小报《五千里狂澜》，他称赞的报头五个气势磅礴的大字，也是右派写的，此人就是武汉歌舞剧院的音乐家王同善。我自己也参加过一些活动，帮助他们办过小报，还参加过“钢工总文艺分团”的活动，这个组织的头头王振武和鲁礼安有交往，思想观点接近“北斗星学会”和“决派”。

当年有一种说法，说右派“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不知道这话是毛泽东还是康生说的，反正一样，他们二人至死都是一致的。这话并

没有错，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复辟”无非是讲民主、自由、人权，而这正是五七年的右派和“文革”中的造反派所追求所梦想的。我和我的朋友们注意并赞赏鲁礼安和他的《扬子江评论》、《北斗星学会宣言》等，是发现他们抓住了当代中国的两个最重要也最敏感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1957年“鸣放”中的关键问题，这就是实行民主和解放农民。当年在武汉大学的大字报栏上就有这样的醒目大标题：“争民主，争人权！”、“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鲁礼安他们呼唤巴黎公社原则，关心农民的现实处境，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巴黎公社原则就是彻底改变政权性质，实行直接民主；在中国，最需要这种变革的，就是压在最底层的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当时对于他们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赞赏和佩服的。但同时又为他们担心，感到他们已闯入了禁区。他们不知道，我们当年就是在这些问题上犯禁而罹难的。因为这个问题是毛泽东所最忌讳的，作为几亿农民的皇帝，他不允许任何人代表农民说话，更不允许给农民以自由。就像马克思所说，他要保持农民那种“一袋马铃薯”式的生存状态；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过是把麻袋变大些罢了。他不许“走资派”在农村搞“三自一包”，是担心农民冲破麻袋在地上生根发展，变成社会公民，危及他的皇权。鲁礼安不知道，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是只可以说说而不可以去做的，他的主张不但触犯了皇帝，也为各级官员所不容。当时，姚雪垠就看出了这一点，说他的思想很危险，会吃大亏的，要我千万不要介入他们的活动。当时，我们这些人既同情、赞赏鲁礼安，又为他的命运担心，如前所述，因为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我们当年的影子。

白桦的那本《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里有一首诗，就是表现这种心情的，里面有这样的诗句：“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 / 那时的战友 / 就像今天的你们”。下面他描绘了在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拼杀的场景，但在我心里、在我眼前，出现的却是1957年“大鸣大放”中的情景。和别的右派说到这一点，都有同感。我没有问过白桦，但确信他也会同我一样，心里想到的是1957年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笔下却只能这样写。1957年的我们和1967年的鲁礼安们，不是都像毛泽东所描绘的那样，“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谁又曾料到后来的“风云突变”呢？1971年林彪事件以前，

我对毛泽东有怀疑、有不满，但还没有看清楚，是《571工程纪要》起到了启蒙作用，好像对我猛击一掌，使我突然清醒过来，开始认识毛泽东的真面目。

十几年以后，当我再见到鲁礼安的时候，我已年过半百，他的青春也已逝去，成了中年人。那是在一次美学讲座课的中途休息时间，他来听课，并向我提出圣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回来后，我向朋友们谈到他的情况，都不胜感慨也非常同情。——可谁又想得到，历史好像在兜圈子，几年以后，我们和他们，鲁礼安们，又同时在心里产生了“我们也有过这样的青春”的感喟！

那是1989年5月，在武汉召开全国首届胡风思想学术讨论会，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传来了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绝食的消息。于是大家的注意力全都转向了北京，听广播、看电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大家兴奋激动，议论纷纷，有人担心，有人怀疑，绝大多数人是欢欣鼓舞的，因为这是专制制度之下不可能发生而民主社会里常见的正常社会现象——也许，中国社会从此将走上健康的民主发展的大道。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愿，我和许多人都在文化界支持北京学生的声明上签了字。其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胡风分子，有像我这样参加过四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的右派，也有“文革”中造过反的的中年人。面对电视画面上那滚滚的民主浪潮，燃烧的青春火焰，那热情激荡而又秩序井然的动人景象，自然都会在内心里产生感应，联想起过往的岁月——“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

我不知道当时鲁礼安在哪里，处境如何，但我相信他也会有同感。因为发生在上世纪下半期的这三次重大历史事件——1957年的“鸣放”、1967年的“造反”、1989年的“风波”，其间尽管有许多不同，但在反专制、反特权，争民主、争人权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是前后呼应的，或者说，这是三次被切断了了的民主运动。

1957年的“鸣放”，是一次夭折了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精神的一次回光反照。当时提出的问题既深且广，远超过以后的两次。特别是储安平的“党天下”，真是一针见血，一语道破了中国现实的本质，揭示出中国社会各种痼疾的真正症结所在。三十年后的89民运，所提出的基本诉求虽然并未超过当年的“鸣放”，但目标明确集中，都是有可操作性的现实问题，更富有实践意义，而且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这两次民主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已经为历史所

肯定，稍有良知的人也都明白了事实真相，“扩大化”、“动乱”之说也早已无人理会了。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夹在这中间的“文革”中的造反运动，对于参加那场运动的鲁礼安们，今天究竟应该怎么看？我认为，“文革”中那场造反运动与前后两次民主运动的不同是很明显的，一是性质不同，二是思想资源不同。表面看来，“鸣放”与“造反”都是“响应号召”，都是中了毛泽东的“阳谋”。但二者有重要区别：右派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主张而为毛所不容，才“因势利导，聚而歼之”的。造反派则不同，他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是被愚弄、利用之后又被抛弃的牺牲品。1957年的那场斗争确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野的知识阶级与掌了权的阿Q之间、五四新文化传统与游民造反传统之间的斗争。1967—1968年的造反运动则比较复杂，即是那次内讧中的一次反复，又是受压群众的一次自发抗争。

说到思想资源的不同，主要是历史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里不仅有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这与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关。造反派就没有这种精神资源，他们生长在严格封闭的单一思想文化环境中，所能接受的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毛主席的教导”。不应该忘记那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那是一场造神运动，愚民运动。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时所书写的那几句雷锋日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是听话，效忠！而那本由空洞的豪言壮语拼凑而成的《雷锋日记》，则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郭小川精心修改加工出来的宣传品。就这样，一本语录，一本日记，如同两个轮子，人们就是踏着它们滑进那个疯狂年代的。

鲁礼安们的不幸和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因受压而反抗，而独立思考，从而冲破思想禁锢，从毛泽东走向马克思，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而且不顾伟大领袖的战略布署，自己组织起来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走向民主之路。他们当然没有想到，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然而，正是在这里，他们遇上了1957年的右派，他们之间的思想观点相近，精神上相通，而且这种相近、相通的东西一直延续到1989年。上面谈到

的右派对这两次历史事件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这种相近、相通之处未能相互传承，积累发展，并上溯到五四源头，进行认真的研究总结。

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成为历史了，但是有关造反派的真假是非问题并未弄清楚，人们还没有把“文革”中的施暴者与受害者（牺牲）区分开来，鲁礼安的这本书有助于解决这一历史公案。书里有一个附录，注明了有关人物的基本情况，那些曾经为武汉人所熟悉所关注的活跃人物，那些造反派头头，不是悲惨的死去，就是沦落到了底层。——前两年我曾在街头遇见当年和我一起办报的那个“中学红联”的小刘，那个精明活泼的中学生，如今已是个形容憔悴的中年人，正在为下岗后的生活而奔忙。是他认出了我，我却认不出他了。当时，我不由得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心里戚戚然无言以对……

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八九点钟的太阳”，火样的青春，被愚弄、被利用、被毁灭了，反转来又要承担沉重的历史罪责，这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此，历史的发展总是要有人付出代价，作出牺牲的；问题在于，是用这沉重的代价掩盖历史真相，还是用以换取真正的历史教训？鲁礼安的这本书既是不平之鸣，更是揭示历史真相，提供第一手可靠资料。至于反思、忏悔、评判，那是以后的事。

以上是我读这本书时的一些想法。我已经年过古稀，鲁礼安也已经年近花甲，我们都老了。人老了，去日无多而往昔的记忆甚多，回忆是老年人的特长和专利，所以常常向后看。由此，我又想到了那个养老经，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健康为中心，潇洒一点，糊涂一点”以及“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等等。对此，我不敢非议，只想修改一下，是为“潇洒一点，清醒一点，老有所思，老有所为”——独立自主，无所顾忌，回忆我们曾经有过的青春，像鲁礼安这样，如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二〇〇四年中秋之夜于武昌东湖

□ 原载“新世纪”网站

《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节选） 柳英发 1963年秋到1968年底这五年多的时间，我是在武昌实验中学度过的。前三年是我的高中生活，后两年是我文革经历中的一段。武昌实验中学是很有名的学校，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

中南地区、湖北省的重点中学，校名是毛主席亲笔所书。1966 年夏，文革开始，改名红旗中学。文革中，红旗中学在武汉三镇也颇有名气。先是当时中央文革副组长王××的儿子为领袖的老红卫兵，后是群众组织的“红十月造反公社”，在江城都很有影响。我自己是红十月发起人之一。1966 年 11 月红十月加入武汉二司（1966 年 10 月 26 日成立，后称“武汉钢二司”）。1967 年 2 月起，我参与武汉二司勤务组的工作，是其中唯一中学生代表。1968 年 1 月 15 日武汉市红代会成立，我是副主任。接着（1 月 20 日）三结合的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以群众代表身份任常委。1968 年 12 月初，我离开红旗中学，和战友们一起到湖北省潜江县插队务农。

这五年多的岁月中，我经历的许多事情一直都难以忘怀。其中就包括发生在 1967 年的“12.5 事件”。下面我就集中说说这方面的事情。

1967 年 12 月 4 日，我们学校为实现大联合的基础上，革委会成立了。那段时间，我活动的重点在校外。作为武汉钢二司的代表之一，我参与武汉军区新领导曾思玉，刘丰（曾、刘在武汉“7.20 事件”之后，取代了武汉军区前任领导陈再道，钟汉华）以及武汉警备区（1967 年 8 月成立）首长方铭、张昭剑等主持下的大联合，三结合工作，很少回校。学校革委会成立了，这是大事，是我们的盛大节日，我就被通知回学校了。第二天晚上在学校礼堂举行文艺晚会庆祝革委会诞生。当时我在礼堂所有观众后面，站在一张凳子上看节目，李乾（时校革委会委员，负责保卫工作的 1966 届初中生）在礼堂找到我，可能是碍于周围有人，他具体没说什么事，只是说有事要我出去商量一下，并告诉了地点，我答应了，但没有立即去，我以为没什么大事。在演出的节目看完后，我才到开会的地方，就是学校原女生宿舍楼一楼的一间寝室，时为红十月的一间办公室，当时屋里已是济济一堂了。何儒非（时校革委会副主任，红十月一号头头，66 届高中生）、李乾等均在场。这时我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学校准备开文艺晚会的消息传开后，当晚 22 中（该校与我校仅一墙之隔）二司学生祁援朝跑过来向李乾报告，说丁洪宝（时 22 中学生，不时骚扰我校的学生之一）一伙，还有积玉桥的流氓头子韩转运等，在黄××（时 22 中一教师）的家里集中，准备过来冲击。于是李乾就通知集合些人商量怎么对付。我到时李乾正在布置去 22 中怎么个打法，说过去把他们抓过来。说谁要反抗就狠狠敲他，打死了也没关系。正

在这时，祁援朝跑来，说丁洪宝一伙人都走了。会场顿时乱哄哄。其中不知是谁提出（我至今也记不清是谁）说：他们晚上总是要回家的，到他们家里去打，此法大家都赞成。李乾说，要打，干脆就打死。我说，不要打死，打断他一条腿一只手就行了。钟立民（1966 届高中生）反对打死。说打死不好，顿时遭到激烈反对。大家七嘴八舌，说他们是一伙流氓，偷自行车，抢银行，奸污女生，打伤我红十月战友，纵火烧毁我校办公大楼，几番洗劫我们学校等，是三字兵特动分子，罪大恶极。你不打死他，待他伤一好，流氓的报复性是很强的，那我们学校一千多人的生命财产就不得安宁了，还搞个什么复课闹革命！打死流氓有什么关系？上海就是这样的，打死流氓根本没事。现在警司镇压流氓不力，公检法更是前门抓进后门放出，我们搞群众专政嘛。当时是群情激愤，同仇敌忾，被这样一哄，我就同意了。我说：好，那就打死。接着讨论打谁。大家提出来打丁洪宝、庄洪运（22 中学生）二人，认为他们是老打出手的。何儒非就叫同学去叫符军（22 中二司总部头头，学生，当时在礼堂看节目），是要他作向导的。符军来后听说要打死丁洪宝、庄洪运，他对大家拍着胸说：你们只管打，到时候我们负责抛材料。并说，丁洪宝还不是头头，头头是孔威、傅强，他们俩是流氓头子韩转运的左右手。经他这一说，就决定打死四人，即孔威、傅强、丁洪宝、庄洪运。并决定由李乾带队，由符军、祁援朝引路。夜 12 点行动。散会之前，李乾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说法律是保护我们的。若流氓打死我们，那就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他还说，我们现在成立了革委会嘛，完全可以学巴黎公社，可以把他们的罪行张榜公布等等。

会散之后，我和何儒非回到隔壁房间，当时是何儒非的寝室。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两个人的心情都显得沉重，完全没有以前作了什么决定之后显出的那种自信。这里我插说两件事：1966 年 10 月，红十月成立不久，文革正处于批资反路线阶段，红十月下属的几个战斗队在学校三楼会议室开会，要开除叶××老师的党籍，准备把他的入党志愿书烧掉。有同学告诉了我。我立即跑去，一进会场我就大喝一声：停下！这时反对的人也不少。七嘴八舌地说非要烧不可。我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文化革命是干什么的？16 条是怎么说的？斗党内走资派，批反动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你们这样做算什么？最终多数人听我的了，志愿书未烧掉。事后有同学告诉我，有人说你这是老保的作为，我没理睬。1967

年初夏，我校的三字兵贺××在学校后操场旁用垒球棒猛击索立平（时 1966 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的头部，同学们义愤填膺，要求严惩凶手。我们几个，何儒非，李乾，我等十分冷静，妥善处理了此事。多年之后我的战友们在谈及这些事时还说：夫子（我的绰号）平时办事蛮冷静稳重的，怎么在“12.5 事件”上那样冲动？是呀，是太冲动。当时，说实在的，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但没有反悔的决心，内心还有不能当群众尾巴的私念，还有侥幸心理，但愿说说而已，不会成为行动，毕竟是群众组织哪能做到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我和何儒非都心神不安，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入睡了。

凌晨时分，我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李乾，祁援朝等人进来了，李乾脸色嘎白，浑身发抖，平时说话都有点不太联贯的他，现在向我们汇报行动经过时，紧张得话都难以说清。从他的汇报中我们得知孔威，傅强已被打死了。讲完后，我们叫他回去休息，祁援朝留在我们寝室，当时他才十五、六岁，睡在被窝里，浑身都还在发抖。此时的我，我料定还有何儒非，都觉得问题严重了。

天刚刚亮时，肖××（我校 1967 届高中生）推门进来，把我拉到门外，向我要长裤。我问为什么？他说打孔威时，岳中杰，高胜祖（均为 1966 届初中生，红十月战士）大腿负伤了，被送到中医学院。谁知傅强被其家人也送来救治。为防万一，他转回学校了，现需要裤子。我叫他等着，只身来到耿其华（时校革委会主任、原校党总支委员、政治处主任）房间，与耿其华同住一室的还有陈××老师，他们还未起床。我问耿其华有没有长裤，他问我要裤子干什么，我没告诉他，只向他要裤子。他要我自己拿。我就在他床下的一个箱子里拿了出来交给肖××，并和他一起去看了受伤的同学（岳中杰）。

吃早饭时，在食堂里同学们就悄悄议论开了，我没理会他们。怎么办？中午耿其华主持召开了革委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我记得他先发了一通脾气，说这大的事情（指跑到别人家里打死人），连我这个主任也不告诉一声。会上大家议论了一通，最后决定了几点：不要声张，相关人员主要是李乾要避避风头。要向上级报告，同时要加强对学校的保卫工作。

会后我到水运工程学院借枪，水运在新河街长江边，去来都要经过孔威的家。我在汽车上看到门口拥着许多人。枪支由水运的车子送回学校，到校我即将枪支交给肖××等人。随后用车把李乾等人送出学校，说是暂避几日，谁知一去就是

二十多年，90年代初（1992年？）我才又一次见到李乾。他判刑二十年，青春年华都耗在监狱了。好在他没有自弃，在里面读了许多书，还刻苦学技术，练就了一手好的钳工活。出来后先是开了个汽车修理厂，后来又搞教育事业，目前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不错。

随后我向杨道远（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方保林（钢二司二号勤务员）等人汇报了此事。在他们支持下，在适当场合我也向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等领导人报告了此事。当时曾、方等领导没有异样反应。在事后约十多天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学校值班，手握一把五四手枪和肖××等人在学校内四处巡逻。我看见武昌区支左办公室的巡逻车接连几个晚上都在学校四周开来开去。我心稍安些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松懈，担心对方来个鱼死网破。

1967年12月15号晚，几辆吉普车开到学校大门附近，来了一大帮人，说要拘捕凶手。有同学赶紧来报告，我随即赶到校门口，门口已有许多同学，堵着不让来者进校。我走上前问他们是哪里的？此时不知是谁指着我问对方：你们晓不晓得他是哪个？估计对方知道我，口气和缓地告诉我，说他们是公安联司的，受警司之命来执行任务。我说毛主席有指示，你们知道吧。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抓人，就是一个组织里的坏人，也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处理。你们回去吧。对方无奈，撒走了。我是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他挡走了，但内心已很是不安，此时耿其华、何儒非等已来到校门口了。耿见状很着急，这是拒捕呀！怎么办？于是我们几个人商定，按毛主席说的办，我们自己先把冯栋（时1967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俞国新（时1966届初中学生，红十月战士）送到警司去，要从长计议。当晚我们一行数十人，陪着冯、俞二人，一路步行，过长江大桥、汉水桥，一直走到万松园路，当时警司所在地，把冯、俞二人送进去了。从此一别，冯栋我在1998年才见到，他在牢里关得一身病差点死去，1973年保外就医。之后在一家汽车出租公司干，后来开了个复印店维持生计。俞国新却一直没有消息，我们一直还在找他。

第二天有同学来报告，说昨天晚上李乾在他的一位同学家里被抓走了。三人被抓，不少战友和同学们一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学校一下就乱套了，复课闹革命无从搞起。而且，从此红十月内部分裂了。

我们一些人，特别是何儒非和我，受到昔日战友们的指责，说我们背叛、出卖了李乾他们。他们打出了“营救革命闯将李乾”的旗帜，宣布被打死的孔威、傅强是“十恶不赦的流氓，死有余辜”。一时间在武汉三镇造成很大的声势。我们不同意这样干，在校内一时有点孤立。当时在学校我的处境好像比何儒非好一点，对方战友好像还能和我“对话”，我委婉多次向他们表示：救李乾，我们都是同样的，但不能这样大张旗鼓的，这样会适得其反。我们造反派的地位现在同以前不同了，我们能直接见到曾、刘、方、张这些领导人，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是会有好的结果的，等等。但收效甚微。

“12.5 事件”后，我找过符军，他不是在会上拍过胸吗？我要他赶紧把材料整出来，但就是拿不出来。会上罗列的那些都难以准确地落实在孔、傅头上。例如焚烧我们学校的办公大楼，这是和“7.20 事件”同时发生的事，这很典型呀，如果能落实，那孔、傅岂不是罪责难逃？但就是落实不到孔、傅二人的头上（后来纵火者也被抓了，但据说不是孔、傅所为，是 22 中另外的学生）。我追符军很紧，后来他干脆躲着我，再后来，他也被抓走了。没有过硬的材料，我见到曾、刘都难以开口。但我没放弃努力，只要有办法，我就向曾、刘以下的一些人如张绪（时警司副司令员）、刘海江（时武汉军区的一个部长，支左人员）“吹风”孔、傅不是好人。我们对他是“罚不当罪”，李乾是革命小将，我们是小将犯错误。等等。他们告诉我：这事不能急，往后处理好，越往后越好。这些话，我向耿其华，何儒非，向我的战友们都说过。

因“12.5 事件”造成的“红十月”内部分裂，我心里很不安，感到压力很大。1968 年 1 月 20 日，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被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任市革委会常委。我窃以为是一个好的信号。为什么？因为在革委会筹建期间，其拟任人员都是填了政审表的，学校的“12.5 事件”早已不是秘密。我是“12.5 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军区领导都是知道的。而我被批准进市革委会了，那事件的相关人员，当然包括李乾等人的处理，可能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心安了不少。但我的战友中有的不是这样认为，我已经忘记具体为什么事，我和我同班的战友发生了争执，他最后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我，而这话与我们争执的问题毫不相干。他极冷峻地对我说：你以为你面前会再有一个李乾吗？那意思是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我是靠着出卖李乾等人，或者是踏着李乾等人这块垫脚石上去的，我当时惊

呆了！我昔日的战友怎么会这样看我？我很难过，后面还有难堪的事。1968年3月，二炮来汉征兵，当时来汉征兵的还有铁道兵，准备去越南的。可能因我们学校是重点中学，二炮到我们学校来招兵了。我当时谁也没打招呼就报了名，经过体检，我被录取了，我真高兴。不知是谁告诉的，李乾的妈妈、姐姐突然到学校来了，就在陈××老师的那间寝室里。他们说了许多，意思是李乾还关在牢里，你们是头头呀，你们有责任。你怎么参军屁股一拍就走了呢？李乾没出来，你不能走，等等。面对泪流满面痛苦不已的李乾的亲人，我真是百感交集，禁不住也哭了起来，真不知道该对李乾的妈妈、姐姐说些什么，怎么说。旁边也围着些人，长时间的静场。最后是陈××老师，他也是眼泪涟涟地安慰李乾的妈妈：柳英发虽然参军了，他说了还是要管李乾的，学校也要管的，他目前只能这样了，问题往后拖拖，只会解决得好些。那场面今天回想起来心里也是酸楚楚的。后来，“三反一粉碎”开始了。这样，我就没走了。当时方铭，张昭剑他们也不让我走，表面上是热情诚恳的，我内心却有疑虑，是不是因为学校的“12.5事件”？这个疑虑当时我对谁都没有说，是因为参军要走之前，我向张绪提出要求：想见见李乾。张绪当时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安排，就是留下来之后，张绪也不跟我谈这个了，这叫我不安，因为当时我是把他们对我的态度作为“12.5事件”的晴雨表的。但这个不安，后来还是因几个事的发生而打消了，尽管这个被打消的时间不长。

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在市革委会参与组织领导这个工作。当时在大会小会上我都表态：我带头上山下乡。在一次会上我还对张体学（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湖北省省长）说：干部子女要带头。我还点了他的子女在华师一附中要带头上山下乡。在省市召开的万人动员大会，我发言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现在我们上山下乡，是红卫兵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只能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在会上宣布，我本人决心上山下乡，请市革委会方铭主任批准。当时方铭站起来带头鼓掌。在市革委会，方铭特别对我说，我答应过你到我们15军当兵的，你要想去的话，现在还可以去。我当即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去当兵呢？不过方铭这话，让我认为当初不让我去二炮，与“12.5事件”没关系。1968年12月1日，我们下乡出发时，刘海江（时任市革委会常委，办事组组长）

特地到现场送我。下去不到半年，刘海江曾对我说，市革委会准备调你回来，愿不愿意？我说不行，不行，这不成了“下乡镀金”了，后来 1969 年国庆，二十年大庆，我下去的潜江县有两名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这是个特例，我是单独被通知，只身回汉到洪山宾馆报到的。梁仁魁（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观礼代表团团长）告诉我，你的名额是武汉市给的。但我编在荆洲地区分团，当晚湖北团就离汉赴京了。这些，使我对“12.5 事件”处理的结果看好了，心情十分舒畅。

10 月 16 日，我随湖北代表团从北京回汉，即参加省革委会贯彻中央 9.27 指示扩大会议。会议名义批“北、决、扬”，实际上是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我被人引导去见曾思玉时，他一反从前，脸色冷冰冰的，连和我握手都十分勉强。这是我到汉后第一次见曾思玉，说实话，心里发凉。接着，在荆州地区小组会议上，张体学也借杨道远的事敲打我。我年轻气盛，不懂政治，在会上同张体学争执起来。我的印象是一个下午的小组会，差不多就是我和张体学在讲。这是怎么回事啊？“北、决、扬”在武汉出现时，我们就不赞成、反对。中央指示要批，你批它好了，怎么批起我们来了呢？我问杨道远，他叫我不要吱声，参加会就是了。会议结束，我没随荆州团回去，自己留下来了。遵照中央指示精神，要去北京办学习班，我找到市革委会政工组长张景禄（军代表），要求参加。他说，学习班不要中学生。结果未去成。通过这个会，在北京观礼产生的那种兴奋喜悦的心情全没有了，我感到：厄运开始了。

在这之前，1969 年春节后，学校工宣队为“12.5 事件”把我们弄到学校办学习班，我、何儒非等相关人员都参加了。学习班主持人向我们介绍了孔威、傅强及其家人的情况，给我们很大的触动。我、何儒非等人都哭了。当时我们认为打死孔威、傅强，的确是错了，错得厉害。后来，交待事情经过。我们没有隐瞒，我们一直认为，事件的经过，在这次学习班就交待清楚了，并诚心诚意地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情还是好的。况且，刚才说了，在 10 月我还作为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但现在，贯彻 9.27 指示大会之后，我沮丧了，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的确如此。之后学习班不断，学校工宣队办，下乡所在的区、县办，省、市也办，我不细说了。我

粗线条地，主要还是讲与“12.5事件”有关的，当然有时“北、决、扬”、“5.16”问题也要涉及一下。

1970年新年伊始，就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12.5事件”再次被提出，我们又被从农村弄回到学校办学习班了。这次主办学习班的工宣队人员全换了。据说上次工宣队都是造反派人员组成，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变化，就是学习班除弄清“12.5事件”过程之外，提出要揪“黑手”，好像我们几个学生不可能决定这样的事，这似乎成了规律：一有事就要揪黑手。比如说，1969年春，朱鸿霞（钢工总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炎金（工造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三人写大字报，全市搞“反复旧”，除批他们外，就要大揪幕后黑手。“12.5事件”黑手是谁？学习班意图很清楚，要我们指认就是耿其华，因为他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他们直接对我说，祁援朝第一次来学校向李乾报信后，耿其华，宁汉文（时革委会副主任，教师），李乾等人开会就商定了，要集合人去22中抓人。耿其华对李乾等人说：你们去，打死了人我负责。我说我不知道这一情节，我参加的也不是这个会。我在参加会的期间没有见到耿其华在场。决定“翻门坎”是这次会决定的，我表态说打死。你们讲的情节就是真的吧，与我们这次会也不同。去22中抓人，冲突起来，场面肯定混乱，互伤死都有可能。耿说那个话也有可能，他是主任。但我们的会转了向，祁援朝第二次来说，他们走了。去22中抓人不可能了，而耿的话是具体对此的。后改为“翻门坎”，不是去22中了，耿不是对此表态。“翻门坎”是我们定的，耿不在场，不能负这个责。可能他说的那个话对李乾会有影响，但我们不知道。我还以第二天清晨去耿寝室拿长裤、中午开会耿发脾气为由拒绝指认耿是“黑手”。我反复说，“翻门坎”这事是我们几个人决定的，我表态先是不同意打死，后同意了。当时我虽不是学校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但以我的身份说同意打死，那份量是重的。他们就说，你们不要把担子往自己身上拉，这担子你们挑不起的，承担了对你们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反正是软硬兼施，要我们指认耿是“黑手”。

往老师头上引，抓“黑手”不成。后来随着“两清”（清查“5.16”和“北、决、扬”）运动的深入，就把“12.5事件”与任爱生（省革委会副主任、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挂上。他们先说，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流氓没关系”，

可能觉得这个说法没有份量，不久他们又改说成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老保没关系”。这个改变就意味深长了。我说不知道，也没听说任爱生说了这话。退一万步说，就是任说了，按语气推论，只能是事件之后，有人向他说了，他表个态而已。事件之前他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 22 中的符军在 1967 年 5 月营救任爱生之后（当时任爱生被三字兵绑架关押在 22 中，他跳楼把腿摔断，我们参加把任抢了出来），他与任的来往有一些。尽管如此，打死孔、傅的决策会是在我们学校由我们主持的。符军本人是中途被叫到会场的，我们告诉他才知道。当然他拍胸表态的作用不可小看，但完全不可能事先请示了任爱生，顶多是他事后向任提及了此事，怎么能说任爱生是“黑手”呢？还补充一点，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前，任爱生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之后，我与任爱生有多次见面（开会时或其它场合），但我对任爱生从未说过“12.5 事件”，他也没有向我说过，尽管他清楚知道我是谁。

黑手抓不着，事情的经过交待过去交待过来，就是那些了，后来就不提它了。他们一门心思在我们中间深挖细找“北、决、扬”、“5.16”了。我只说一件事，1972 年 4 月至 1973 年 1 月，我在省里参加学习班，做我的动力有两个人，一个是学校工宣队的工人师傅，一个是我下放的潜江县区银行的干部。学习班名义是“批林整风”，实际上是清查“5.16”骨干分子，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后来在 1974 年春季，批林批孔的时候，我被省委组织部通知从潜江回汉。其间我看到关于这次学习班的三个材料，一是这次学习班“268 名‘5.16’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有我；二是在这次学习班中“关于对柳英发的突破方案”，其中说我是“武汉‘5.16’分团核心班子成员、二司‘5.16’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三是在 1972 年 11 月拟定的（当时学习班还未结束）18 名特别‘5.16’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也有我，上有曾思玉的批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什么叫“惊心动魄”？什么叫“残酷”？我算是有体会了。

再回头说“12.5 事件”学习班。虽然指认黑手问题被我拒绝了，并且态度坚决，但说实话，一提起这事，我的腰杆子就硬不起来。在前段的学习班，一时“12.5”，一时“5.16”，翻过去复过来。“两清”说我在哪里开会、哪些人参加了、发填了什么表，时间、地点、人物，说得活灵活现，我硬是顶了起来，因为那是根本莫须有的，自己心中有数，底气十足，但一提起“12.5 事件”，腰

杆子就软了。打死两人还伤四人（包括我校误伤的两名同学），人命关天啊，所以老老实实写交待材料，主要责任在我，痛哭流涕地说自己是不沾血的凶手、是主谋，表示认错、认罪，愿意接受任何处罚。但要以此为要挟，要我承认是“北、决、扬”、“5.16”是办不到的。说实话，从1969年春开始办学习班，之后几年，连续不断，我们还是很自觉“斗私批修”，老老实实地交待“12.5事件”。尽管“北、决、扬”、“5.16”分子对我们是莫须有的，但对某些错误思想对自己的影响还是认认真真作自我批判的。但越往后来，越是发现他们对我们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要往死里整。

从1973年8月至1976年8月，我多次找军区“三办”有关人员，多次向省市领导姜一，韩宁夫，王克文写信，也在一些场合与省市的赵辛初，姜一，王克文等领导当面谈，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几经反复，对“12.5事件”总算有了个结果。1974年和1976年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人员在中法或在我单位讯问“12.5事件”。最后在1976年8月，未经庭审和宣判的程序就直接给了我一张判决书。其中关于我的一段是：“被告人柳英发参加枪杀孔、傅的策划会议，赞同被告李乾等人的犯罪活动，事后又参加纵容被告李乾逃跑的会议。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柳英发免于刑事处罚。”

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四人帮”被强力隔离。1977年1月23日至10月19日，经武汉市委批准我在武昌车辆厂被隔离审查，之后在车间边劳动边交待问题，听候处理。1978年3月20日武汉市中级法院到车间以“开枪杀人”案为由逮捕了我。在监狱羁押了18个月又7天后，于1979年9月27日释放，口头要我回原单位。后来又行文，说“关押不当”、“补发工资”云云。

说来也巧，1969年9月27日，有那个指示后，我的厄运开始，1979年9月27日我走出监狱。所以我说过：“始于‘9.27’，了于‘9.27’。”其实也没有全“了”。1987年武汉市工交政治部对我文革作结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所列有三条。第一条，1974年团省委“补台”是参与张立国（时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新华工负责人）的“篡党夺权”。第二条就是为杨道远翻案。第三条就是“12.5事件”。工厂并行文，说柳英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记行政大过一次。行文前工厂有关部门找我谈话，说你今后入党、提干是不行的，但不会影响你技术职称的评定和工资晋级。对三条我当即都作了申诉。

对第一条，1974年我“补台”团省委书记，是省委的决定，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过话，赵辛初，姜一两书记当面对我谈过。张立国只是把我引到团省委去见了毛菊元（团省委书记）等人。第二条，为杨翻案的文字经过写的是对的，但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是翻杨道远“5.16”、“北、决、扬”的案。他们说杨道远是“5.16”、“北、决、扬”，但他不是的”。第三条，“12.5事件”，法院已判，不能又打又罚。

后来我又看了“历史决议”，决议说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动机是好的，犯了严重错误。而我们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投身文革，动机却是要“篡党夺权”！当然也跟着犯了错误，错误不仅严重，而且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比他老人家犯的还严重，这叫人怎么想！另外，据说1982年初，中央下发9号文件，其中规定，作结论一般不用“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我“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是1987年下的。以此对照，我就不属“一般”之列了。我这样的人物就如此特殊？！

《悲欣交集话文革》

曹承义初稿，锤逸整理

曹承义是武汉市“文革”风云人物之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他在基地设在武汉的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简称“一冶”）当技术员。在“文革”中，他被推选为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一冶”）这个庞大的群众造反派组织的一号头头，经历过很多重大事件。“文革”结束后被捕，1981年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现已年过七旬的曹承义，回顾“文革”经历，写出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后经锤逸整理，在中国大陆自费印行了《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分赠亲友和“文革”研究学者。

我1937年12月31日出生于武汉市武昌大东门傅家坡“博文中学”（现为武汉市第十五中学）对面一个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我的祖父是菜农，我家这一带当年是出产闻名天下的武汉特产蔬菜“洪山菜苔”的地方，周边有很多湖塘，还出产武汉人煨排骨汤最好的配料——莲藕。我的祖父1920年因病去世时，祖母才23岁，她带着3岁的我的父亲，依靠种菜和打短工维持生计。

我 1955 年毕业于武汉市武昌钢铁工业学校，在校期间加入青年团。毕业分配后，先后在鞍山钢铁建设公司机装公司、酒泉钢铁公司机装公司、洛阳冶金建设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基建处工作，1964 年调动到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一冶”）施工处任技术员。

一冶是冶金部下属最大的一支建设我国钢铁工业的基建队伍，以建设武汉钢铁公司和马鞍山钢铁公司等大型钢铁企业而名扬一时，当时被称为特别能战斗的“野战兵团”。文革前，一冶和武钢同属省辖厅局级国营企业，一冶当时有正式职工 28000 多人，下属有 18 个县团级的单位，有省厅级干部近 20 名，处级干部 100 名左右，科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各 1000 名左右，加上家属工及附属职工医院、技工学校、子弟中小学职工等共三万多人。当时武钢、一冶合起来职工人数约 10 万人，武钢约 7 万多人。

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一冶”。勤务员除原“野战兵团”的 5 名勤务员外，黄家祥（一冶筑炉公司工人，“红学员”头头）、徐彪（一冶特种公司工人，“红卫军”头头）、谢建生（一冶机装公司工人、“红卫军”头头）等人都成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勤务组由曹承义、于湛东、桂大庆、杨连洲、徐正全、谢建生、徐彪、黄家祥等人组成，我为一号头头。一冶的大联合形成以后，由于增加了“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学员”、“红卫军”、一冶“红旗”等新鲜血液，造反派实力空前壮大。

曾经在计划经济年代无比辉煌的一冶，将自己的大名前面冠上“中国”二字，在深圳黄贝岭，“中国一冶”四个大字还赫然耸立在高楼屋顶上。可惜一冶早已今非昔比。一冶现在已改成股份制企业。还留有一个一冶公司的空牌子解决为“内退”的老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发放内退工资之类的遗留问题。另一个已改制的股份制公司与市场接轨，专门搞建设，负责挣钱。原来的公司党、政领导都成了新公司的股东即老板。一冶这个为新中国冶金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国家队”，几万产业工人买断工龄，绝大部分下岗，顷刻土崩瓦解。多年以来，一冶公司大院一直有人静坐、罢工、闹事，长期不得安宁。曹承义的幽灵始终在一冶上空徘徊。 一冶一中的“六一一反革命事件” 1966 年 6 月 1 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

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继中央开展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以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紧接着点名抛出武汉大学李达、朱邵天、何定华“三家村”黑帮，中共武汉市委也跟着抛出程云、武克仁等黑帮分子。全省从上到下，直到每个基层单位，都在党组织的控制下揪出了“三家村”、“四家店”反党集团，各级党委以积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姿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牛鬼蛇神”和党外群众。

6月11日，一冶第一子弟中学的教工团支部书记管典芬老师和辜正年同学在校内召集了一部分学生团支部书记开会，反对阻挠学生写大字报揭发校领导捂盖子、定调子问题，并决定派代表到省委汇报反映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的情况。

“六一一事件”被学校党支部汇报到一冶党委，被认定为“反革命事件”。第二天，经请示省委同意，一冶党委派出由机关各处室、各公司领导和骨干组成的近100人的庞大的工作组，由一冶处级干部、团委书记满守昌和一冶党办一位姓翁的女处长担任正、副组长，进驻一冶一中，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当时作为党委的红人、骨干分子，脱离生产岗位，被调入工作组去镇压一冶一中的学生运动。我在工作组的工作，先是被派到教学班上课，不过是保持高压态势，把学生们控制在教室里，叫他们不要乱来。接着是在一冶业余学校将30余名教师集中学习、读报，再发动、引导大家讨论发言，要求我们工作队员和骨干们做好记录，以便发现有攻击言论的人。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摘帽右派、平时对党有不满言论者，都是重点关照的对象。

我们每天通过查阅老师们的档案，从中分出左、中、右，找出落后分子和有不满言论的人。如有一女教师，档案内记载她有一次将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带进了厕所，就说她是反革命，工作组将这个内容告诉党团员教师，让他们写出大字报贴在操场上，将这位女教师搞臭。还有一位50多岁教语文，教过汉剧、楚剧名角的夏老师，每次学习时总让他发言，想让他讲出点错误来好整他。

工作组发动大家积极写大字报，相互开展揭发批判，发动全校师生批判管典芬等人，把他们打成现行反革命，把他们自发地反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的行动镇压下去。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将文化大革命搞成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把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引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是最符合官僚集团利益的。我当时虽然是工作组的成员，是积极分子，但我对工作组的做法是不满的。好像并没有搜集到什么实质性的“反革命”言行，怎么就轻易地把教师、学生打成了反革命。我在翻看这些档案材料时没有找出我认为有问题的东西，也没有向工作组领导汇报出有价值的材料，无法充当工作组的干将。

工人庞玉来被判死刑

我到一冶一中工作组不几天，在一冶的近邻武汉钢铁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武钢综合经营厂有个“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黄连生响应厂党委的号召，将自己在“四清”运动中了解到的本车间工人、33岁的二级钳工庞玉来曾被资本家收养过的内幕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庞玉来认为自己只是个小工人，不是当权派，不应该写自己的大字报，就撕掉了那张揭发自己身世的大字报，并且与黄连生发生了争吵。庞玉来见黄连生人多势众，仗势欺人，就捡起一块砖头去打黄连生，不想打在一位前来劝架的积极分子女工蔡先梅头上。这本来是一起不大的群众纠纷，中共湖北省委却认定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月5日，在事发15天时间后，在武钢、一冶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将庞玉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一天，本来是烈日高照、晴空万里的天气，当大会宣判庞玉来死刑时，突然狂风大作、惊雷滚滚、暴雨倾盆，老天爷也发怒了。一声声炸雷惊心动魄，敲打着每一个沉默人的心。

我参加了在武钢四中广场举行的这场宣判大会，我感觉非常奇怪，对当局的用意难以理解，一点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快、这么轻易就枪毙了一个人？这时湖北省委已经开始播下工人起来造反的种子，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此时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的面目出现的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他们的实质是把运动的方向引向镇压无辜的人民，当局对一个小工人大动干戈是想转移文化革命的斗争大方向。正是中共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引发的这一声惊雷，点燃了湖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我们这些本来对政治完全无知的小人物，就这样关心起了文革运动。

这不是两派武斗，这是屠杀暴行！

“六一七”胡双全被活活打死

在 1967 年“六一七”血案发生以前，百万雄师已经武装攻打过汉口居仁门中学、武汉汽车配件厂、武汉搪瓷厂等革命造反派的广播站和据点。但这些都还没有引起造反派头头的警惕。

武汉的夏天，艳阳高照，最高气温可能达到 40 度。驻守在南洋大楼的造反派，大多睡在垫着报纸的地板上，少数人睡在办公桌上，电扇日夜不停地转动，洗澡只能到水池旁用自来水冲洗一下，吃的饭菜质量也很差。大家都是满腔热情地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计条件，不怕艰苦，根本没有想到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我们头上。有一天晚上，我去了红太阳广播站，我爬上没有照明的高高的楼梯，只见到几个中学生在那里坚持，还有两个女学生。我问他们怕不怕，他们都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

有一些人，自称是造反派，被百万雄师赶得无家可归，也被我们收留，我们每天免费发给他们餐票吃饭。他们白天去民众乐园，晚上回到南洋大楼睡觉。每天深夜我都要在南洋大楼逐层检查有无闲杂人员混入大楼。见到不认识的，我一定要当面问清楚，以防止百万雄师的人混入大楼，里应外合偷袭。

6 月 17 日的上午，天气非常炎热，我这个在武汉土生土长不怕热的人，也感到热浪袭人。9 点多钟，中南旅社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发现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向三民路方向开来，于是广播员大声疾呼：“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钢八师的战友们，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现在向六渡桥方向开进，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不一会儿，六渡桥十字路口就自发聚集了几百名群众，他们在中山大道的五马路、工艺大楼、前进一路口等东、西、北三个方向，用各种石块、木头、废铁等，设置了路障，防止百万雄师的车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街道两边的商店一听到百万雄师出动，立即关闭商店的大门。街上行人有的逃走，有的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不久，驻扎在离三民路约一公里的江汉公园开出十来辆满载全副武装百万雄师的车队，来到造反派驻守的三民路老会宾酒楼至六渡桥中山大道十字路口一带，这是一片四层楼的老商业区，一楼全部是商店，二、三、四楼是江汉区一、二商业局的办公楼，当时称为财贸大楼。据一直在现场围观的群众后来讲述，百万雄师武装车队一到，就像日本兵进了南京城，惨案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商店纷纷关门、公共汽车停驶，他们不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打，见人就杀。从一楼攻到二楼、三楼、四楼，

从南到北，一间间房屋破门而入，再爬上屋顶。他们到达屋顶以后，开始遇到了抵抗。抵抗的一方手无寸铁，揭开屋顶的红瓦，砸向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而手持长矛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基干民兵或复员军人，他们步步进逼，所向披靡。下面围观的群众几乎全是支持造反派的，他们见屋顶上的抵抗者节节败退，就用“打到陈再道！”“打到百万雄师！”来牵制百万雄师，这一招果然奏效。百万雄师的战士们放弃了追赶，从脚下揭起红瓦，进入四楼的百万雄师也将房间里的家具、锅碗瓢勺暴风雨般地砸向街心的群众，满街的群众四散奔逃躲避，跑得慢的就惨遭重创。一时间，三民路上满街的碎砖瓦堆积有几十厘米厚。为配合百万雄师的扫荡，军区及时派来了用吉普车、大客车各一辆改装的宣传车。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断地高声呼叫：“造反派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和百万雄师配合默契，一唱一和。群众则围着宣传车起哄，高喊：“打到陈再道！”军车上的男女广播员则叫喊：“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当时在南洋大楼内，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中南旅社和红太阳广播站高音喇叭在呼喊：“打倒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接着又听到胡双全同学在南洋大楼的广播台大叫：“快！快！快！一冶的同志到下面集合。”我感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要发生，就跑过去问胡双全。胡双全没有理我，他两手拿着一面红旗、一面绿旗跑下楼。这两面旗帜，约 50 公分见方，是前两天搭建天桥时从一冶工地带来的，肖银宝负责用这两面旗在南洋大楼屋顶每天跟北边的新一中用旗语联络，如两面旗帜从两边合在一块就表示平安无事，如发生武斗就用绿旗在下垂直红旗在上平行，指向发生武斗的方向，呈“丁”字形状。胡双全很喜欢它，天天拿在手里，脖子上还套了根绳子，绳子拴着口哨。胡双全的独立性很强，他参加的钢二司也不属于新一冶管辖，我赶快跟着他跑下楼去了解情况。

我跑到民众乐园门前一看，有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马路边，车头朝着六渡桥方向，车上仅有三五个人，还有一个是少年。有一位中年妇女拦在车头前。我去拉她起来，她又躺在地上，连哭带叫，不让汽车开走，不许车上的人去和“百匪”拼命。她知道，这些人只要上了车，就等于白白去送死。在我去拉那位妇女的时候，旁边拥上来很多人抱住我，也拼命地劝我不要上车。

我知道，很可能是中南旅社方向造反派的据点遭到了百万雄师的武装攻击。但我们不可能去增援他们。我们人数太少，寡不敌众，又手无寸铁，前两天开进民众乐园的新一冶的汽车已陆续开回单位，这辆汽车也不是新一冶的，我指挥不了这辆汽车。拉拉扯扯了十几分钟，大家才冷静下来，已决定不去六渡桥那边。胡双全这时也不在场了。那位妇女慢慢走进了民众乐园。我叫车上的人都回民众乐园去，直到车上的人走光了我才回到南洋大楼。

离开了那辆空无一人的解放牌汽车，我到了南洋大楼广播站，有一位新一冶的女广播员在坚守岗位，她在播放《红军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我在大楼内一层一层地找人，大楼内已是一座空城，有的已经到北京告状，有的去家里拿换洗的衣物和钱粮，也有少数人自动离去。当时我们也从来不打考勤，实行来去自由。我那天即使想派人去现场支援也无人可派。这时已经不见了胡双全。

据当事人肖银宝回忆，吃过中午饭不久，我正准备将门口收集的捐款交给民众乐园指挥部“新中原”的一位女同志，南洋大楼下面有人喊我，我下楼以后，来到一辆解放牌货车前，车上站着几个新一冶的人，有张重阳、陈连生、马三元及一冶一公司的……（此处有一行乱码）路马路上追杀无辜群众，要开车去冲散百万雄师的武斗队伍，将他们赶走。”我不假思索就拿着两面红绿旗帜，站在驾驶室左边的踏板上。这时车上连我一共只有六七个人，而且全是新一冶的。我们一边开动车子，一边叫马路上的钢八司群众快上车。汽车开到六渡桥百货公司门口又调头开了回来，这时上来了一些人，一共才十几个人。当汽车从民众乐园再次开往六渡桥方向时，在中山大道清芬路口毓华茶庄门前，胡双全追了上来，说指挥部找你有事，你赶快下来。我就下车将手上的两面旗帜交给了胡双全，胡双全站于驾驶室左侧的踏板上。我离开汽车时，还有不少人往车厢上爬。

时隔一个多小时，我才听说，就在我离开那辆解放牌汽车一段时间里，由于百万雄师大兵压境，在三民路光天化日之下追杀无辜的老百姓，他们的暴行，激起现场围观人员的义愤，民众乐园指挥部没有任何人作出决定和进行指挥，完全是无组织的热血青少年，包括在场的“钢八司”^⑤群众，自发地扒上这辆汽车。这辆车后来在开往三民路铜人像方向时，在老会宾酒楼附近的街面上，车上的人还来不及下车，遭到了屋顶百万雄师的攻击。长矛、砖瓦如雨而下，后来汽车在靠近铜人像（孙中山先生铜像）的东风绸布商店门口被百万雄师的汽车拦劫，逼

汽车熄火，又遭到地面武装的百万雄师杀人凶手的杀戮。这根本就不是两派群众的一次武斗，而是在军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单方面有指挥的武装大屠杀。地面上百万雄师冲杀过来，见人就刺杀，一汽车人多数被杀死杀伤，少数几人跑回了民众乐园。这一天，百万雄师不断地派出车辆和人员，对三民路和中南旅社反复冲杀，公安局的保守派也派出三四辆消防车助战，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

刚听到人们传说这场血案，我当时根本就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直到晚上，我才在民众乐园里的大院花坛旁看到 9 具尸体。所有死者身上的伤口都是铁矛戳的。其中有一具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武钢的龙克发正在动手将一具尸体清洗干净，盖上白布。其中有一具尸体看不见伤口，我叫龙克发将尸体翻转来看，才在后背看见一个很象嘴唇的小伤口，皮肤向外翻开。我的泪水不停地流淌着，悲愤充满胸膛。

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一辆车上究竟死了多少人，因为当时在民众乐园的造反派上这辆车的人互不认识，还有不少无单位、无组织的支持造反派的钢八司群众。我甚至无法知道究竟是谁开的这辆汽车。有人说开车的是汽运六站的头头张麻子。还有一说是一冶三公司工人谢观德，“六一七”后我看到谢观德裹着满头的纱布，纱布浸透了血迹，他告诉我是“六一七”被百万雄师杀伤的，差一点被杀死。一冶除胡双全死亡外，还有一冶一公司工人余望生被杀死，谢观德、张重阳和马三六 3 人重伤。张重阳身上竟有 9 处伤口。这一天，新一冶勤务组成员黄家祥

在骑摩托车过长江大桥时，被百万雄师一伙暴徒打伤住院，半月后才出院。

我永远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我不该离开这辆车，我应该始终挡在车头前，我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完全估计不足。根本就没有想到一个小时以后，会有人再次上车去营救老会宾酒楼一带遭打杀的群众。这些“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年轻生命是完全不应该这样悲惨地消失的。

说来奇怪，我这个新一冶的司令，我这个抗暴的副指挥长，尽管能指挥一冶的所有十多个加工厂，拥有生产成千上万只长矛的材料和设备，我却没有命令我的部下生产过一只长矛，也没有带领指挥我的造反兄弟们去发动武斗。我们只是为当权派镇压下的劳苦大众鸣不平，为被武汉军区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工人总部翻案，行使党和政府赋予人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民主权

利，就成为当权派操纵的武装集团杀戮的对象。我如果是一个想搞武斗的头头，我当时完全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队伍，但我根本就没有这样想过。

“六一七”这一天，在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8201 部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出动了十多辆汽车，他们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拿长矛，身穿统一的蓝色全套工作服，完全军事化地整齐站立在汽车上，他们武装攻击民众乐园、南洋大楼、中南旅社、工艺大楼等造反派的宣传站，强攻下老会宾酒楼旁的江汉区财贸大楼，登上屋顶，赶走当地居民，发动巷战，见人就打，连同情造反派的老百姓也不放过。这完全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行。

武汉成立揪陈抗暴总指挥部

1967 年 6 月初，随着武汉部队“六·四”公告的出台，武汉造反派和武汉军区陈再道等军队领导人的矛盾日益激化。为克服造反派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情况，应对武汉军区领导人操纵的御用工具——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武力围剿，武汉造反派急需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指挥。由“新湖大”头头张维荣、彭勋、龙铭鑫、谢帮柱等人发起，组成了“武汉揪陈抗暴总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交通方便的湖北大学内。参加总指挥部工作的人有工总的夏邦银（后为九届中共中央委员）、沈复礼，“二司”的杨道远，“九一三”是刚当上总团一号头头的李想玉，“工造总司”有吴炎金、龙梅生、蔡大祥等，“新一冶”是我参加，“新华工”有张立国、张汉卿（教师）、吴家丕（教师）等人，“新华农”有小谢和谭志发，此外，以新派组织为主的革司、联司也有很多组织参加，如新武船联司的林子忠、胡必清，新武机八一七的余平，省交通联司的傅廉、余明生，长办联司的郑兆鳌、严常，市安装公司的孙厚智、黄金善，新中原的陈茂祥，新汉纸联司的张智华，省直红司的王志良，公安联司的李正才，武汉财司的梅林生，武汉红工的丁喆生等。还有小教总部的代表参加会议。中学红联则派出新一中的陈德胜等人参加活动。揪陈抗暴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是张维荣，杨道远、我和吴焱金担任副总指挥，夏邦银 1967 年 5 月被造反派从监狱里营救出来以后，带了 50 多人一直住在新湖大，他也担任了副总指挥，一直到 7.20 事件前才离开新湖大。

从总指挥部成立开始，就形成了每天上午召开碰头会的传统，各组织头头或亲自或指派专门的联络员参加碰头会。每天开会少则二十多人，多则四五十人，主持会议的多半是新湖大的头头。每次碰头会先是由主持人介绍由驻京联络站打

来的长途电话的内容，多介绍一些首都文革动向、中央首长讲话内容等。其次是各个组织头头轮流发言，交流各自单位及武汉市新近发生的情况。

六月上旬开始，百万雄师（武汉最大的保守派联合组织）已经开始对造反派的广播站和宣传站进行武力围剿行动，如攻打汉口的居仁门中学、武汉市汽车配件厂、武汉搪瓷厂等，都是在开碰头例会时各单位汇报的情况。总指挥部只能将收集的武汉市最新的重大事件通过驻京联络站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总指挥部虽然不可能组织人员去搞武斗，但当时是一个团结一致、共同战斗的集体，起到了相互鼓舞和相互支持的作用。指挥部要求各单位做好防止百万雄师杀人的思想准备，为了避免牺牲和重大损失，不要死守宣传站，随时做好撤退和转移的准备。在碰头会上，大家也建议，多将百万雄师挑起武斗、杀人的情况向武汉军区首长反映。

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团结了全市的革命造反派，坚持了“揪陈抗暴”的斗争。总指挥部及时将百万雄师“六·一七”、“六·二四”等大规模围攻、屠杀工厂、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的情况通过三新、二司驻京联络站向中央反映，才有了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六·二六”来电。总指挥部还决定在6月底将孤立无援的汉口民众乐园、汉阳轧钢厂、汉阳商场等宣传站撤离到湖大、华工、水院、武大等地，才避免了造反派遭受更大的伤亡。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武汉造反派统一整理了向中央汇报的材料，在坚持抗暴斗争中团结了钢、新两派组织，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钢、新两派头头仅在上层少数个别人中思想存在一定的分歧，这丝毫不能替代在血与火的生死考验面前，钢、新两派绝大多数头头和广大群众空前的大团结。

新一冶遭到百万雄师全副武装围堵

每次全市造反派大游行，“新一冶”的组织工作都特别出色，各单位成建制统一领导，每次都能组织几十辆甚至上百辆“大红头”载重汽车，整齐出发，游遍武汉三镇，一幅幅迎风招展的造反大旗，铁流滚滚的车队，充分展现了武汉产业工人的强大实力。这是一支压不垮、打不烂的革命工人队伍，所到之处，受到万人空巷的群众欢呼，真是威震江城，令党内走资派闻风丧胆。当权派后来把新一冶列为重灾区，反反复复进行清算和打压。

1967年6月，武汉两条路线斗争进入了空前激烈的阶段。一方是得到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各级人武部、公检法专政机关和所有当权者全力支持的半军事化组织百万雄师，他们头戴安全帽，手执钢铁长矛，利用当权派提供的各种机动车辆、各种物资装备和活动经费，对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工人、学生、市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的口号是“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他们要从肉体上杀光一切牛鬼蛇神，这当然和造反派始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走资派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他们所代表的是走资派的利益，而造反派所代表的是遭受走资派镇压、迫害、打击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将要失去的天堂对革命人民无情的杀戮。

新一冶是这时走在全市造反派最前列的队伍之一。我们参与了1967年5月支持“新公校”（武汉公安学校的造反派组织）的全市大绝食斗争和在汉阳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营救夏邦银的斗争，是最早提出彻底为工总翻案的实力最强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位于红钢城武钢业大与位于八大家的一冶公司办公大院之间的三十三街坊的“新一冶”造反总部，是一座五层楼的招待所和单身宿舍，6月11日晚6时起，很多造反派工人聚集到总部周围，还有人举着新一冶的旗帜。我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人问我说：“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我当然记得今天是一冶一中“六一一”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几个工人围着我说：汉口的民众乐园现在很危急，百万雄师要攻打民众乐园，我们要去声援民众乐园的造反派，保卫那里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我看人越聚越多，就通知一冶总调度室调动了30多辆大红头的“斯柯达”进口载重运输汽车，满载着新一冶的造反派，还有武钢一冶红旗、武钢新焦化等青山地区组织也各上一辆车，开在车队最前面的是一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指挥车，为声援造反派设在汉口市中心的几个主要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从青山红钢城向汉口进发。我们30多辆车上除了每辆车有人拿着新一冶或其它几个组织的战旗外，没有一支长矛，也没有任何武器，完全没有一点武斗的思想准备，完全是一支和平的游行队伍。当浩浩荡荡的车队经过和平大道、大东门、长江大桥，来到汉口的闹市区中山大道，受到全市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

车队晚上 7 时游行到汉口水塔附近，距江汉路大约 200 米时，从江汉路方向跑来了许多惊惶失措的群众，我当时站在整个车队前面指挥协调车队行进的速度，我看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开着雪亮的车灯，从北向南快速驶过中山大道，百万雄师的车辆大约是 8 至 12 辆。车上满载着队列整齐、手握铁矛、戴着藤条帽、身穿清一色蓝色工作服的打手，长矛一律指向天空。将我们游行车队行进的方向完全隔断，我们遭到百万雄师全副武装车队的围堵。有人凄厉地高叫：“百万雄师来了！”给人以突如其来、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不知道百万雄师早已经成为一支准军事化的、训练有素的专业武斗队伍了。我立即叫宣传车调头，叫车队后撤。就在我指挥车队后撤时，百万雄师的车队已经开到离我们几十米的距离，向西边逃跑的群众边跑边骂：“打倒陈再道！打倒黑乌龟（武汉民众对“百万雄师”中的主体“红武兵”带有贬意的称呼）！”

我亲眼目睹看热闹的 5 名群众被“百万雄师”（保守派群众组织）杀伤，其中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手臂被铁矛刺伤，一边哭，一边往民众乐园方向跑，找临时医疗点包扎伤口。我们和平游行的车队受到冲击，车队调过头以后，从水塔经过民众乐园返回一冶。车队经过民众乐园时，武冶机修厂九一三一个叫连传庆的工人像交警一样站在路中间，指挥八九辆汽车开进了民众乐园，另一部分车辆回到一冶。连传庆还对我说：“你们进来了正好，百万雄师已经封锁了长江大桥，你们就不要再回去了。”当他带我登上民众乐园最顶端的时候，民众乐园指挥部的人员已经将进入民众乐园的新一冶大队人马带到了南洋大楼。当时各造反派组织在民众乐园成立了抗暴指挥部，九一三汉口办事处头头张鹏程任指挥长，新华工和二司各有一名学生任副指挥长。张鹏程对我说：“我已将你们新一冶分配驻守南洋大楼。我们这里人太少，你们来了，我们就安全了。”张鹏程还说：“这里有食堂，但一下增加了这么多人，你们可以加派一名炊事员帮厨。”我对这一切既毫不知情，他又根本不跟我商量就自行其是，如果那天我们不在江汉路被百万雄师围堵，我们的和平游行车队会全部返回一冶，是百万雄师逼迫我们进入了民众乐园。

在张鹏程的带领下，我查看了民众乐园的地形和各个剧场，我在考虑，万一百万雄师打进来，我们的人如何撤退出去，如何保证人员的安全。我进入南洋大

楼已是半夜，我看到我们的人就睡在地板和办公桌上，这里条件较好，每个房间都有吊扇，他们已经按单位自己划分了房间，很好管理。我就住在顶层。

为了便于撤退，一两天后，我安排一冶机装公司及设备处造反派运来跳板、竹竿，在屋顶搭建了天桥，使南洋大楼和民众乐园联成一体，使民众乐园的安全得到了加强。还运来了广播器材，成立了南洋大楼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我们进驻民众乐园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宣传阵地，根本不是准备来打架的。我多次到民众乐园与南洋大楼之间的文书巷反复查看，万一有紧急情况，我们的人员从哪里可以撤走。我想万一百万雄师打进来，我们就撤到武昌去。新一冶出现“敢死队” “六一一”游行时，我看到在一辆大红头汽车顶棚上，有两个工人护住一面红旗，旗帜上部印着较小的“三公司”三个字，旗帜中间有“敢死队”三个较大的字。三公司的头头对我说，他们公司的年轻人打出这面旗帜，还把旗帜涂上黑乎乎的机油，好像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下来一样，完全是为了达到一种威慑敌人的宣传效果。游行时，这辆汽车上的年轻工人大多光着上半身，少数人穿着背心或将工作服搭在脱光上衣的肩膀上。这面旗帜和这辆车果然特别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呼。第二天，新一冶各基层单位都打出了“敢死队”的旗帜，但是，新一冶司令部并没有组织敢死队（七二〇事件后，新一冶为纪念“六一七”抗暴事件，成立了“新一冶敢死队”，黄家祥任队长）。

大约 200 人住进南洋大楼以后，我请青山的新一冶司令部尽快送钱和粮票来，还要司令部送广播器材和笔墨纸张，我特别要求多送一些红旗来，以便挂在南洋大楼临街的窗户上。我们从来没有叫新一冶司令部和任何基层单位送长矛、洋镐把和安全帽之类的武斗用品，没有作任何作战的准备。有一天，有几个“敢死队员”从民众乐园指挥部领到了几根洋镐把，供民众乐园大门口站岗的人员壮胆。据新一冶负责宣传工作的肖银宝讲，民众乐园里没有一支铁矛，为了自卫，他们准备了一些砖头石块和石灰，仅此而已。

我这段时间很久未回到家里，有一天，我夫人抱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在武钢一中造反派同事的陪同下，给我送来换洗的衣物、粮票和零花钱。我们完全忘我地投入了这场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秋毫无犯——南洋大楼发现黄金饰品 这时，民众乐园、南洋大楼、红太阳大楼（六渡桥百货大楼）、中南旅社（六渡桥路口）四个宣传广播站互相呼应、互相支援，从早到晚，广播里播放的

是“打到陈再道，为工总翻案”的口号和革命大批判文章，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央文件、毛主席最新指示和激昂的革命歌曲。中山大道和三民路的马路上成天挤满了热情支持造反派的革命群众。那种万众一心、热血沸腾的场面，使我永生难忘。民众乐园和六渡桥一带成为造反派的革命根据地，但那是一个专搞文斗，非武装的和平根据地。

第二天，指挥部通过会议研究，指定新一冶曹承义为副指挥长，负责新一冶到民众乐园来的造反派队伍的管理。民众乐园内部的每个房间，包括杂技厅和京剧院，都由指挥部统一分配给各单位使用。吃饭统一由指挥部食堂供应。指挥部每天早上都有碰头例会，研究后勤等方面的问题，只有涉及新一冶的问题才通知我参加。

南洋大楼的管理秩序很好。我们进驻南洋大楼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一冶机装公司有两人在他们所在的办公室发现一脸盆黄金饰品之类的东西，送到我的办公室里，我让他们立即送回一冶机装公司保卫科封存保管。后来当权派在“清查”时追查过这件事，这些贵重的黄金饰品丝毫无损，说明造反派纪律严明，造反者完全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我那时要参加两个指挥部的会议，另一个是设在新湖大的武汉造反派揪陈抗暴总指挥部，每天要在民众乐园和新湖大之间来回奔忙。我每次都带一两个随从人员，从汉口三民路坐一路电车来往于这两处。

“六一七”胡双全被活活打死 在“六一七”血案发生以前，百万雄师已经武装攻打过汉口居仁门中学、武汉汽车配件厂、武汉搪瓷厂等革命造反派的广播站和据点。但这些都未引起造反派头头的警惕。

武汉的夏天，艳阳高照，最高气温可能达到 40 度。驻守在南洋大楼的造反派，大多睡在垫着报纸的地板上，少数人睡在办公桌上，电扇日夜不停地转动，洗澡只能到水池旁用自来水冲洗一下，吃的饭菜质量也很差。大家都是满腔热情地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计条件，不怕艰苦，根本没有想到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我们头上。有一天晚上，我去了红太阳广播站，我爬上没有照明的高高的楼梯，只见到几个中学生在那里坚持，还有两个女学生。我问他们怕不怕，他们都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

有一些人，自称是造反派，被百万雄师赶得无家可归，也被我们收留，我们每天免费发给他们餐票吃饭。他们白天去民众乐园，晚上回到南洋大楼睡觉。每天深夜我都要在南洋大楼逐层检查有无闲杂人员混入大楼。见到不认识的，我一定要当面问清楚，以防止百万雄师的人混入大楼，里应外合偷袭。

6月17日的上午，天气非常炎热，我这个在武汉土生土长不怕热的人，也感到热浪袭人。9点多钟，中南旅社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发现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向三民路方向开来，于是广播员大声疾呼：“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钢八师的战友们，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现在向六渡桥方向开进，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不一会儿，六渡桥十字路口就自发聚集了几百名群众，他们在中山大道的五马路、工艺大楼、前进一路口等东、西、北三个方向，用各种石块、木头、废铁等，设置了路障，防止百万雄师的车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街道两边的商店一听到百万雄师出动，立即关闭商店的大门。街上行人有的逃走，有的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不久，驻扎在离三民路约一公里的江汉公园开出十来辆满载全副武装百万雄师的车队，来到造反派驻守的三民路老会宾酒楼至六渡桥中山大道十字路口一带，这是一片四层楼的老商业区，一楼全部是商店，二、三、四楼是江汉区一、二商业局的办公楼，当时称为财贸大楼。据一直在现场围观的群众后来讲述，百万雄师武装车队一到，就像日本兵进了南京城，惨案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商店纷纷关门、公共汽车停驶，他们不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打，见人就杀。从一楼攻到二楼、三楼、四楼，从南到北，一间间房屋破门而入，再爬上屋顶。他们到达屋顶以后，开始遇到了抵抗。抵抗的一方手无寸铁，揭开屋顶的红瓦，砸向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而手持长矛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基干民兵或复员军人，他们步步进逼，所向披靡。下面围观的群众几乎全是支持造反派的，他们见屋顶上的抵抗者节节败退，就用“打到陈再道！”“打到百万雄师！”来牵制百万雄师，这一招果然奏效。百万雄师的战士们放弃了追赶，从脚下揭起红瓦，进入四楼的百万雄师也将房间里的家具、锅碗瓢勺暴风雨般地砸向街心的群众，满街的群众四散奔逃躲避，跑得慢的就惨遭重创。一时间，三民路上满街的碎砖瓦堆积有几分厚。为配合百万雄师的扫荡，军区及时派来了用吉普车、大客车各一辆改装的宣传车。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断地高声呼叫：“造反派回工厂抓革命，促生

产！”“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和百万雄师配合默契，一唱一和。群众则围着宣传车起哄，高喊：“打到陈再道！”军车上的男女广播员则叫喊：“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当时在南洋大楼内，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中南旅社和红太阳广播站高音喇叭在呼喊：“打倒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接着又听到胡双全同学①在南洋大楼的广播台大叫：“快！快！快！一冶的同志到下面集合。”我感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要发生，就跑过去问胡双全。胡双全没有理我，他两手拿着一面红旗、一面绿旗跑下楼。这两面旗帜，约 50 公分见方，是前两天搭建天桥时从一冶工地带来的，肖银宝负责用这两面旗在南洋大楼屋顶每天跟北边的新一中用旗语联络，如两面旗帜从两边合在一块就表示平安无事，如发生武斗就用绿旗在下垂直红旗在上平行，指向发生武斗的方向，呈“丁”字形状。胡双全很喜欢它，天天拿在手里，脖子上还套了根绳子，绳子拴着口哨。胡双全的独立性很强，他参加的钢二司也不属于新一冶管辖，我赶快跟着他跑下楼去了解情况。

我跑到民众乐园门前一看，有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马路边，车头朝着六渡桥方向，车上仅有三五个人，还有一个是少年。有一位中年妇女拦在车头前。我去拉她起来，她又躺在地上，连哭带叫，不让汽车开走，不许车上的人去和“百匪”拼命。她知道，这些人只要上了车，就等于白白去送死。在我去拉那位妇女的时候，旁边拥上来很多人抱住我，也拼命地劝我不要上车。

我知道，很可能是中南旅社方向造反派的据点遭到了百万雄师的武装攻击。但我们不可能去增援他们。我们人数太少，寡不敌众，又手无寸铁，前两天开进民众乐园的新一冶的汽车已陆续开回单位，这辆汽车也不是新一冶的，我指挥不了这辆汽车。拉拉扯扯了十几分钟，大家才冷静下来，已决定不去六渡桥那边。胡双全这时也不在场了。那位妇女慢慢走进了民众乐园。我叫车上的人都回民众乐园去，直到车上的人走光了才回到南洋大楼。

离开了那辆空无一人的解放牌汽车，我到了南洋大楼广播站，有一位新一冶的女广播员在坚守岗位，她在播放《红军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我在大楼内一层一层地找人，大楼内已是一座空城，有的已经到北京告状，有的去家里拿换洗的衣物和钱粮，也有少数人自动离去。当时我们也从来不打考勤，实行来去自由。我那天即使想派人去现场支援也无人可派。这时已经不见了胡双全。

据当事人肖银宝回忆：“吃过中午饭不久，我正准备将门口收集的捐款交给民众乐园指挥部‘新中原’的一位女同志，南洋大楼下有人喊我，我下楼以后，来到一辆解放牌货车前，车上站着几个新一冶的人，有张重阳①、陈连生②、马三元③及一冶一公司的工人余望生等人，见对方在马路上追杀无辜群众，要开车去冲散百万雄师的武斗队伍，将他们赶走。我不假思索就拿着两面红绿旗帜，站在驾驶室左边的踏板上。这时车上连我一共只有六七个人，而且全是新一冶的。我们一边开动车子，一边叫马路上的钢八司群众快上车。汽车开到六渡桥百货公司门口又调头开了回来，这时上来了一些人，一共才十几个人。当汽车从民众乐园再次开往六渡桥方向时，在中山大道清芬路口毓华茶庄门前，胡双全追了上来，说指挥部找你有事，你赶快下来。我就下车将手上的两面旗帜交给了胡双全，胡双全站在驾驶室左侧的踏板上。我离开汽车时，还有不少人往车厢上爬。”

时隔一个多小时，我才听说，就在我离开那辆解放牌汽车一段时间里，由于百万雄师大兵压境，在三民路光天化日之下追杀无辜的老百姓，他们的暴行，激起现场围观人员的义愤，民众乐园指挥部没有任何人作出决定和进行指挥，完全是无组织的热血青少年，包括在场的“钢八司”⑤群众，自发地扒上这辆汽车。这辆车后来在开往三民路铜人像方向时，在老会宾酒楼附近的街面上，车上的人还来不及下车，遭到了屋顶百万雄师的攻击。长矛、砖瓦如雨而下，后来汽车在靠近铜人像（孙中山先生铜像）的东风绸布商店门口被百万雄师的汽车拦劫，逼汽车熄火，又遭到地面武装的百万雄师杀人凶手的杀戮。这根本就不是两派群众的一次武斗，而是在军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单方面有指挥的武装大屠杀。地面上百万雄师冲杀过来，见人就刺杀，一汽车人多数被杀死杀伤，少数几人跑回了民众乐园。这一天，百万雄师不断地派出车辆和人员，对三民路和中南旅社反复冲杀，公安局的保守派也派出三四辆消防车助战，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

刚听到人们传说这场血案，我当时根本就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直到晚上，我才在民众乐园里的大院花坛旁看到 9 具尸体。所有死者身上的伤口都是铁矛戳的。其中有一具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武钢的龙克发正在动手将一具尸体清洗干净，盖上白布。其中有一具尸体看不见伤口，我叫龙克发将尸体翻转来看，才在后背看见一个很象嘴唇的小伤口，皮肤向外翻开。我的泪水不停地流淌着，悲愤充满胸膛。

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一辆车上究竟死了多少人^①，因为当时在民众乐园的造反派上这辆车的人互不认识，还有不少无单位、无组织的支持造反派的钢八司群众。我甚至无法知道究竟是谁开的这辆汽车。有人说开车的是汽运六站的头头张麻子。还有一说是一冶三公司工人谢观德，“六一七”后我看到谢观德裹着满头的纱布，纱布浸透了血迹，他告诉我是“六一七”被百万雄师杀伤的，差一点被杀死。一冶除胡双全死亡外，还有一冶一公司工人余望生被杀死，谢观德、张重阳和马三六 3 人重伤。张重阳身上竟有 9 处伤口。这一天，新一冶勤务组成员黄家祥在骑摩托车过长江大桥时，被百万雄师一伙暴徒打伤住院，半月后才出院。

我永远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我不该离开这辆车，我应该始终挡在车头前，我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完全估计不足。根本就没有想到一个小时以后，会有人再次上车去营救老会宾酒楼一带遭打杀的群众。这些“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年轻生命是完全不应该这样悲惨地消失的。

说来奇怪，我这个新一冶的司令，我这个抗暴的副指挥长，尽管能指挥一冶的所有十多个加工厂，拥有生产成千上万只长矛的材料和设备，我却没有命令我的部下生产过一只长矛，也没有带领指挥我的造反兄弟们去发动武斗。我们只是为当权派镇压下的劳苦大众鸣不平，为被武汉军区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工人总部翻案，行使党和政府赋予人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民主权利，就成为当权派操纵的武装集团杀戮的对象。我如果是一个想搞武斗的头头，我当时完全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队伍，但我根本就没有这样想过。

“六一七”这一天，在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8201 部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出动了十多辆汽车，他们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拿长矛，身穿统一的蓝色全套工作服，完全军事化地整齐站立在汽车上，他们武装攻击民众乐园、南洋大楼、中南旅社、工艺大楼等造反派的宣传站，强攻下老会宾酒楼旁的江汉区财贸大楼，登上屋顶，赶走当地居民，发动巷战，见人就打，连同情造反派的老百姓也不放过。这完全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行。

7.20 事件发生以后，历史虽然宣判了这一伙人的彻底失败和滔天罪行，但是重新上台的多次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篡改历史，把这次骇人听闻、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凶手竟然奉为英雄，在报刊上公开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歌功颂德，而被杀害的工人、学生却含冤九泉。更

不可思议的是，从 1969 年文革中“两清一批”开始到文革结束几十年后，历代的当权派不但从不追究真正的凶手，反而将全市人民亲眼目睹、家喻户晓的百万雄师大规模屠杀人民这一铁的事实诬陷到我的头上，无中生有地将不在现场的我，说成是武斗总指挥，以此罪名（本文附件一、二、三，略）将我判刑，真是人间奇冤。

几天以后，我见到了母亲，她对我说：“你们四兄弟①一个也不在家里！有一个在家里也好一点啊！”那天，我家四弟兄全部都在民众乐园，母亲一人在家。当她听到街坊们传说一汽车造反派被杀，母亲的心几近崩溃，一夜苍老了十年。

6 月 24 日，还是这伙官方豢养的暴徒，在武汉三镇武昌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铁道部第四设计院，汉阳的汉阳轧钢厂，汉口的工造总司同时大开杀戒，他们调集重兵同时围困攻打这四处造反派的据点，仅在“工造总司”一地就杀死 28 人，其中包括 15 岁的女学生、广播员朱庆芳，重伤无数。在汉阳轧钢厂杀死 5 人，杀伤无数。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杀死 1 人，杀伤无数。 撤离、避难和留守

“六一七”以后，特别是“六二四”大屠杀以后，民众乐园里的人员越来越少，南洋大楼的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人也所剩无几，许多人陆续离开，我没有去阻止，也未再增调人员补充。我当时每天到湖北大学武汉造反派揪陈抗暴总指挥部参加造反派主要头头的会议。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揪陈抗暴总指挥部要求民众乐园等处人员全部撤到新湖大、新华工、新武大（武汉大学）、红水院（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已合并到武汉大学）、红武测（原武汉测绘学院，现已合并到武汉大学）去避难，另一部分骨干去北京告状。“六二四”以后，我带南洋大楼一部分人员先行撤离到了新华工，由桂大庆接替我留守大楼，直到 6 月底，我们新一冶人员全部撤出了南洋大楼。

针对武汉市 6 月以来愈演愈烈的武装围剿革命造反派的大屠杀现象，中央文革、中央军委 6 月 26 日给武汉军区打来电报，电报称：

武汉军区：

最近，武汉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

1967年7月上旬，新一冶造反派头头徐彪被百万雄师抓走并被非法关押。我们组织新一冶造反派数千人高举新一冶战旗，上午10时从青山区一冶大院出发，徒步游行20多公里到武汉军区大院门口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我们高呼：“打倒陈大麻子（指陈再道）！还我徐小麻子（指徐彪）！为工总翻案！”的口号，使受“二月逆流”打压的人民群众无比高兴，沿途人民群众自发为我们送茶水、送冰棒、送西瓜、送饭，好像迎接自己的子弟兵。经与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交涉，当晚，徐彪被百万雄师释放回到了一冶。我们的斗争充分显示了新一冶工人阶级的巨大革命威力。

1967年7月13日，我们还组织突击队，由徐彪、黄家祥、肖银宝等人带队，开着救护车，机智勇敢地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①救出被百万雄师非法关押的长办联司头头顾建棠②。

到新华工避难的新一冶造反派工人纪律非常好，我们100多人集体住宿，每天早上按方阵集合出操，高唱革命歌曲，显示出昂扬的精神面貌。一冶革命领导干部、红军老干部江勇副经理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主动站出来，给我们送来一部分活动经费和粮票，帮助我们解决吃饭问题。

留守在一冶大院的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始终坚持广播，7月初曾被百万雄师偷袭，杀死一名一冶四公司工人。于湛东等人为防止百万雄师再次武装袭击，在新一冶总部的大楼上绑上几个氧气瓶，表示了与大楼共存亡的决心，使百万雄师不敢轻举妄动。参加支持造反派的“革干联”组织的一冶处级干部达20多人、科级干部100多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半数以上参加了造反派组织，而年轻工人大多数是参加我们新一冶的。说明我们新一冶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造反派组织，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得到广大工人阶级支持的，而当权派扶植的保守派组织在一冶力量非常微小。

10月8日至1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谢胡、阿利雅等，访问刚刚发生七二〇反革命事件的武汉市，目的是想通过此事，向全世界宣告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在湖北取得了全面的伟大胜利，武汉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统天下。周总理通过精心挑选，邀请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以外的未被中央公开点名支持的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头头，都来参加这次公开的外事接待活动，巧妙地弥补

了中央七二〇事件后公开点名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武汉革命造反派时，遗漏了许多重要造反组织的问题。武汉工造总司、新一冶、新中原、中学红联、公安联司等一些“新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了10月8日晚在东湖长天楼举行的欢迎阿尔尼亚贵宾的盛大国宴和10月10日在汉口王家墩机场的欢送仪式。我有幸受邀请，代表新一冶参加了在长天楼举办的“国宴”。周总理妙解未被中央点名组织难题 这一天我不在一冶，警司一位姓车的军官坐一辆吉普车来找我。他将一冶的谢建生带上车，先到新华工去找我，最后找到新华农，通过院广播台广播才将我找到。到了东湖，警卫人员核对身份后不让随行的谢建生进去。我进长天楼宴会厅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要经过一段林阴小道才能进入长天楼。在小路两旁黑暗中，站着挨一个的解放军警卫战士。

这次与我同时被找去的还有新一冶的二号头头于湛东、工造总司的头头吴焱金，还有新中原的头头陈茂祥，说明我们这些迟到者是总理临时点名增加的。10月8日晚上7:30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部队接替陈再道上将的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接替钟汉华上将的新任政委刘丰，武汉警备区司令部首长，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总司、中学红联、新一冶、交通联司、湖北电台、湖北日报等共20个组织的代表参加。周总理还当着阿尔巴尼亚贵宾的面，在宴会前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会，号召革命造反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吴焱金还代表这些未被中央点名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作了重要的发言。我把新一冶袖章献给了谢胡同志和康生同志。对周总理不肯题词的讲话守口如 周恩来总理在致祝酒词前和我及于湛东同志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在宴会进行中，我大胆走到主宾席的周总理身边，弯着腰，附耳轻声请坐着的周总理在我拿着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题字。周总理身边有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阿利雅，还有钢二司头头杨道远等。我说：“总理，我是新一冶的。”总理用手摸了一下我佩带的袖章，说：“哦，新一冶，我知道。”我接着汇报：“在这次揪陈抗暴中，我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总理连连点头，无比关怀地说：“知道，知道。”我拿出毛主席语录，对总理说：“我们全体战士，在最艰苦的日子里，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坚定不移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总理能不能

给我们题词，献给光荣牺牲的战友。”总理伸出右手和我又热烈握手，亲切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的这个精神很好。文化大革命以来，只有毛主席题词。我还没有题过词，不能开这个例，要不，以后就多了。林副主席题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果引起了两派武斗。”我感到不安，马上说：“那就请总理在《毛主席语录》上签名。”周总理略停了几秒钟，站起来说：“我要敬酒了。”他走到身边不远处摆放的落地麦克风前，没有拿讲稿，作了第二天见报的“祝酒词”。我呆呆地站在主宾席的桌边，周总理作“祝酒词”时，我只好轻轻地从他身边经过，回到自己的席位上。

周总理对我讲的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话，仅我一个人知道，我既没有记笔记，也没有讲给任何人听。当时，我不敢对任何人讲周总理对我的最后一句谈话。我如果说出去，就会成为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林副主席和周总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人会相信这是周总理说的话，等待我的，将会是灭顶之灾。我吞下了这句话，逃过了当时的这一场劫难。

讲完“祝酒词”后，周总理还到每张桌子前向到会的每一个人碰杯敬酒。总理双手握住我的手，无比关怀地问：“你们和九一三联合得怎么样了？”我回答说：“我们联合得不好，我们有缺点。”总理点了点头说：“我知道，这个，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

第二天，我在武钢接待阿尔巴尼亚贵宾一行参观。我扶着李富春副总理在武钢炼钢厂平炉车间行走。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一直跟在我的身后。刘丰很不高兴地问我，这些跟着照相的是些什么人？我说他（一冶工程师宋瑞玉）是我们《新一冶》报的记者。宋瑞玉后来一直是挨整的对象，被整得死去活来。这一天，刘丰对我和宋瑞玉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

中午我陪同李富春副总理乘专车来到洪山宾馆，下午又一起来到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周总理又在万人大会上致词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一行。

10月10日，周总理离汉时，有一张在王家墩机场与武汉造反派头头及曾、刘首长的合影流传至今。当时没人通知我参加，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在那天的宴会上我突然走到周总理身边，是否动作太大胆，使某些人感到不安；也可能由于刘丰政委在武钢陪同外宾参观时，我一直扶着李副总理，把他这位主角晾在了一旁，

使有心人对我心生不满。我好像从此渐渐被排除在主要造反派头头的活动以外了。

周总理离汉后不久，在曾、刘首长和武汉警司一手操纵下，武汉造反派实现了大联合，分别成立了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武汉市工代会由朱鸿霞任主任，胡厚民、李想玉、吴焱金任副主任，我也担任了常委一职。1968年元月25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我成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1968年8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两个“8.15会议”，即国防工作会议和冶金工作会议。武钢、武船等单位分别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造反派开始挨整。我看了那次冶金会议的会议纪要，记得是周总理主持会议，点名要“钢九一三”负责人李想玉发言，汇报武钢的生产情况。李想玉说，造反派在挨整，武钢的“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是军代表在负责，责任不在造反派身上。由于李想玉讲话太快，又是一口地道的武汉方言，中央首长们很难听清他说了些什么。江青插话说：“不知道你说的些什么，像讲外国话。”在这一次会议上，江青也没有为武汉造反派说句什么好话。回武汉以后，警司就将武钢“钢九一三”头头胡启生、张克勤（武钢机械总厂工人）、杨连成抓起来，关进监狱，罪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头头”。这是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在湖北、武汉抓得最早的造反派头头。从此，整造反派头头就开始了。最先打击的就是跳得高的头头，他们开始排挤一部分不听话的头头，找一些他们认为“听话”的人来“充数”，取代造反派头头。

他们就是在这时找出了董明会，推荐他去参加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安排到中共武汉市委书记。他们并不是真正地想用董明会这样的人，而是为了排挤“钢九一三”上层的造反派头头，把斗争中涌现出来最有威信、最有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头头打下去。曾思玉等决不会因为胡厚民是党员而重用他、喜欢他，决不让胡厚民这样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而是把胡厚民当成第一个打击的对象，一遇到整人的适当时机，胡厚民就会首当其冲地挨整。

在湖北武汉文革历史上，造反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物中，地位最高的是董明会。武汉造反派工人担任九大、十大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共有3人，董明会和夏邦银分别是代表“钢九一三”和“钢工总”的工人代表，被选为

九、十届中共中央委员。谢望春（女）是作为造反派工人组织工造总司的代表，被选为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人都是军代表从造反派中挑选出来，都属于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的产业工人造反派代表。但三人的各自情况又很不相同。

夏邦银原是汉阳轧钢厂钢工总头头，1967年3月17日被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下令逮捕入狱，1967年5月底被全市造反派在汉阳公安局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静坐绝食斗争营救出狱，担任过武汉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负责人之一，七二〇事件后进入钢工总勤务组，属于造反派头头的类型。

董明会、谢望春一直是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一般成员，从没有当过头头。夏邦银和谢望春两人在历次运动的反复中都坚定地站在广大工人造反派群众一边，和省、市当权派有合作又有斗争。但董明会自从当选九届中央委员后，从不参加武汉造反派头头的任何派别活动，一直听命于当权派。所以，董明会还有着夏邦银、谢望春所从来没有过的许多省、市其他更高级的职务。

七二〇事件以前，我在青山区认识众多“九一三”和其他造反组织的头头，并不认识董明会。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董明会被推选为党的九大代表并被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成为湖北、武汉及武钢的知名人士。有了解董明会情况的人告诉我，董明会是武钢耐火材料厂窑前工，七二〇事件前参加钢九一三，他仅是一个基层的造反派普通成员，是由驻武钢的军代表康星火把他挑选出来，指定为党的九大代表，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其本意是不愿意推荐钢九一三的造反派头头去当中央委员，而是专门挑选一个老实、胆小、听话，在群众中没有影响的一般基层造反派成员来挤掉武钢产业工人造反派头头的名额。这是武汉军区当权派在操纵湖北、武汉地区推荐九大代表、中央委员人选上欺上瞒下搞的小动作，是曾思玉、刘丰为了排挤、打击武汉革命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

董明会当上中共中央委员后，省、市委就安排他为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民兵总指挥部指挥长和武汉市总工会主任等，这完全是一个挂名的，没有任何实权的，按当时中央要求的产业工人造反派身份设计、挑选的一个政治花瓶。董明会只有小学文化，又没有组织、领导、工作的能力，更无任何当头头的经历和工作经验，完全只能是一个听从军代表任意摆布的傀儡。他们想用安排一个造反

派工人出身的董明会说明他们是依靠和重用广大工人阶级的，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的。董明会在被军代表选中直到 1976 年底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坐牢关押 7 年，完全是当权派始乱终弃的政治需要。

他除了挂名当官，参加党中央、省、市委各种会议，常常坐上主席台，名字经常见于中央、省、市报刊以外，根本没干过什么有意义的具体事情。我知道他在文革中仅仅做过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 1973 年 10 月他参加党的十大和前湖北省长张体学追悼会从北京回来，找我和曹佩贤传达过张体学要落实我和彭勋政策的遗嘱。第二件事是 1976 年春节正月初二那天中午，董明会坐着市委派给他的专用小轿车，到徐道基家中，谈了他在北京参加中央读书班学习的情况，传达了毛主席说“马克思是造反派的老祖宗”等一系列重要讲话。这是徐道基事后告诉我的。

董明会的夫人也是武钢的工人，她曾经向我诉苦，董明会担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职务以后，市委行政处为他分配了解放公园路市委大院对面市委书记院的一套小别墅，院子大门有部队战士站岗，他们全家搬进去以后，出出进进、上班上学、上街买菜都很不自在。由于文革中当官提职不提薪，董明会工资低，住在里面被人瞧不起，他们家也极少去大院里专为高干开设的特供商店买东西。大院内周围那些邻居的主人、小孩甚至保姆都看不起他们一家人。

董明会被当权派安排当官后，从来也不敢和省、市、武钢的任何造反派头头有过来往。他从来也不是造反派的代表，只是军人政权用来愚弄毛主席、党中央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一个政治符号。所以，从 1969 年春天到 1976 年秋天，所有湖北、武汉造反派为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和当权派进行殊死斗争时他都从来没有参加或表示支持，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或派人去做争取他的工作，也从不去勉强他、邀请他参加我们造反派头头的任何活动及会议。尽管董明会始终和当权派高度地“保持一致”，没有任何有违当权派意旨的言行，但在 1976 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因为董明会 1974 年参加过王洪文副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读书班，回湖北公开传达过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讲话，为了把湖北武汉的造反派和四人帮联系起来，照样被赶出了省、市委，照样被逮捕、批斗、坐牢。因为省、市委再也不需要在政坛上摆放有造反派头衔的政治花瓶了。

董明会被隔离审查以后，原来分配给他家居住的市委书记别墅被市委收回，他的家属被赶出了书记大院，市委行政处在外面为他家找了一间很小的房子临时居住，直到六七年后董明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家人才重新搬回到原来居住的青山区红钢城武钢职工宿舍。董明会免于起诉出狱后，武钢按中央政策，并未开除他的厂籍，安排他回原厂上班，工龄连续计算，直到正式退休。

董明会家距我家仅几百米距离，因我们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是邻居，因参加文革挨整有相同的命运，他退休以后，成为我家经常的客人。董明会请我帮忙为他找个工作，可以增加一点收入，解决家庭的困难。大约是 1995 年，我介绍他到广东省东莞市一个外资工厂担任门卫工作。老板为了照顾他，提出允许他带家属，他们夫妇两人包吃包住，每人每月可拿 500 元钱。因董明会夫人要在武汉照顾孙子，不能同去，老实、善良的董明会就跟我这位介绍人商量，将老板照顾他夫人的工作机会让给同他一样生活困难的一冶一公司工人朱师傅。于是，董明会与朱师傅一道去东莞那家工厂打工。大约一年多以后，由于朱师傅不仅能做门卫工作，还能为老板干木工活、做饭等，适应能力比董明会强，老板于是留下了朱师傅，董明会被裁员回家。

2000 年前后，我以祖父母、父母迁坟为由，请了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吴焱金等 20 余名湖北、武汉造反派头头聚餐。我这次破例请了董明会，并告诉他几乎所有在世的湖北武汉造反派主要头头都要来我家。文革以来从不参加造反派头头和任何非官方组织活动的董明会兴奋异常，他说，我从牢里出来后还没有见到过夏邦银、谢望春及这些大头头们。当他兴冲冲地来到我家，破天荒地参加我们这伙人的聚会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意外、惊讶和高兴，这时的董明会，才恢复了他作为一个造反派老工人的本来面目。

董明会的个人悲剧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本来是一位朴实、善良的普通工人。当权派先是用心险恶地选中他、利用他，尽管他服服帖帖地听从调遣，竭力配合当局演好双簧，也从未参加所谓的“篡党夺权”活动，但还是遭到当权派无情的抛弃和镇压。

2007 年月 12 月 21 日初稿

2011 年 10 月 14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11）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十一节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加强管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情况报告

省军管会并报国务院：

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市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出现了新的高潮，工农业生产大发展，市场活跃，物价稳定，革命、生产形势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阶级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地、富、反、坏、投机倒把分子，妄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社会治安，以达到其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以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内外勾结，城乡串通，盗卖国家资财，炒买炒卖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和工业品，盗卖票证，金银，外币，毛主席象章，甚至贩卖枪枝，弹药，毒物，汽车，私设地下工厂，雇工剥削。他们抗拒管理，活动猖獗，甚至围攻殴打市场管理人员。而在这股妖风的影响下，无牌商贩和无牌手工业纷纷出现，乱摆乱卖，哄抬物价，一些资本主义自发思想较重的生产队和社员，弃农经商，擅拿产品进城，高价出售，扰乱了市场秩序。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在市场上尖锐斗争的反映。

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日的“十二条规定”中所指示的：“必须向扰乱市场的行为作斗争，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分子”。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

为纲，自十月中旬开始，紧密结合当前的大联合、大批判、斗批改，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主要是：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批深、批透、批臭中国赫鲁晓夫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在市场方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清除其流毒，促进了当前革命大批判，大联合的深入发展，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加强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向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使投机倒把分子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陷于人民群众包围之中。一个多月来，查获非法贩卖物资和票证的有三千五百七十一宗，其中作没收处理的一千零三十二宗，收购处理的一千七百二十七宗，冻结的三百七十二宗，拍卖的四百三十七宗。所查获非法贩卖物资有黄金，银元、粮票、布票、象章，钢材，电线，钨矿，香烟及属于国家统购的农副产品等，还有雷管十一条，炸药九筒。同时，还取缔了无牌商贩和无牌手工业户，加强了农村集市贸易管理，改善了收购、供应关系，促进了农副产品收购计划的完成，巩固和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阵地，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由于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在市场的进攻，粉碎了他们的破坏阴谋，市场面貌焕然一新，物价稳定，秩序良好，群众反映很好。

但是，市场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的，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有关部门相互配合不紧密，有些措施，制度没完全跟上去、加以有的地方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深透，有些隐藏的投机倒把集团还未很好破获。我们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把社会主义市场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通过开展这场打击投机倒把的斗争，我们几点初步体会：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用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武装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是取得这项工作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的威望最高，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最大，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万万句。同扰乱市场行为作斗争，打击投机倒把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

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宣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毛主席八月二十日批示的“中央十二条规定”，大力宣传打击投机倒把和市场管理的政策、法令。工作一开始，我们就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全市设立了上千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阵地，机关、学校、公共场所，集市，街道、戏院等单位，都运用了各种宣传工具，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作到家喻户晓。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最大，只有在毛主席思想的指引下，才能方向明，决心大，措施有力，行动迅速，效果显著。只有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深入人心，才能调动千百万人民大军，在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斗争中，打一场人民战争。

二、以“斗私，批修”为纲，把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紧密结合当前的革命大批判进行，是搞好这项工作的重要关键。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只有紧密结合当前革命大批判来进行，作为大批判内容之一，通过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刘、邓、陶所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才能肃清其流毒，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如有些农民过去认为自己生产的东西，拿到城里出售，不是违法行为；现在认识到是中了刘、邓、陶的毒，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表示以后坚决不干，并积极把农村产品交售给国家。有些群众过去认为不管什么市场，只要有东西买就行了，现在也懂得购买“自由市场”的东西，是助长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从而在行动上加以抵制。还有不少革命群众，自动将投机倒把分子扭送公安机关和检举他们的罪行。甚至有的投机倒把分子也开始痛改前非，不仅自己不干，还检举了投机倒把罪犯。实践证明，搞好大批判，提高群众觉悟，有力地推动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的顺利进行；而通过打击投机倒把分子，也进一步促进了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的深入发展。

三、依靠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搞好这项工作的关键。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工作，也必须依靠群众，发挥各方面的力量，打一场人民战争，才能打垮资本主义势力在市场上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依靠群众，首先要相信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党的方针、政策和我们的要求，做法，告诉各革命群众组织，同他们商量，征求他们的

意见，取得他们的支持。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最听毛主席的话，而这项工作又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因此，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拥护和支持。他们主动配合搞宣传，发声明，有的组织队伍协助进行市场检查。有的还提供线索，协助破案，有的亲自扭送投机倒把罪犯，使投机倒把分子无处藏身，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四，正确掌握政策，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中，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严格区分两类矛盾，认真贯彻执行“教育为主，惩处为辅”的方针。对于人民群众一般违法买卖，主要坚持说服教育，把他们集中起来，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用对口语录），去教育和启发他们觉悟，只要他们认识错误，对其商品作适当处理后，不加追究。重点是打击那些搞投机倒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和屡教不改的惯犯。这样，才能有利于教育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少数，有力地打击一小撮投机倒把的坏分子。

五，加强领导，建立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机构，组织一支坚强的队伍，是搞好这项工作的有力保证。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在当前的情况下，仅依靠原来的业务部门去抓，显然不行。为了使这项工作顺利进行，市军管会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发布了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布告，成立了有军代表、政法、工商部门、各区的领导干部和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领导机构，并配备了一部分人民解放军参加这项工作，作为专业队伍的骨干，以加强专业队伍的力量。在工作方法上、实行发动群众与专业队伍相结合，解放军与专业队伍相结合，教育与打击相结合，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与日常巡查相结合，交通要道（车站，码头，港口）设卡把关与市场整顿相结合等方法进行工作，经过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因此，要组织一个坚强的队伍搞好这项工作。必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先于一切的地位。以“老三篇”为座右铭，破私立公。以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以毛主席最高最新的指示武装

干部思想，克服部分干部轻敌麻痹的右倾思想和畏难情绪，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定决心，是作好这项工作的根本保证。

以上做法，是否妥当，请指示。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国务院批转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情况报告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现将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报告中总结了几条经验，请参考。

目前市场上的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獗。各地务必要重视加强市场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的工作，有关部门要大力配合这个工作。对于投机倒把活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狠狠地给予打击，以安定社会秩序，巩固社会主义市场阵地，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国营农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请示

中央文革小组：

最近各地纷纷请示，国营农场的文化大革命是按“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搞，还是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搞；农场职工是参加工代会，还是参加农代会，有些农场职工为此事争论不休，影响了运动的开展。我们认为，国营农场是以农为主，而且许多农场是场社合一，因此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应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进行，农场职工以参加农代会为宜，当否，请复示。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批转广东革筹小组关于国营农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请示

1968.01.29；中发〔68〕20号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一月二十五日报告悉。同意你们的意见。各地国营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应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进行，农场职工应参加农代会，不参加工代会。现将广东报告附后，望各地参照执行。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六集）》，北京：1968年5月）

二、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20；中发〔68〕32号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八十名委员组成；由黄永胜、孔石泉、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陈德、林李明、罗天、赵悼云、寇庆延、袁德良、孙正乾、白平、党向民、舒光才、范布贤、王世琳、刘继发、丘学科、莫超海、梁锦棠、刘均益、程定章、田华贵、钟荣欢、黄育英（女）、梁秀珍（女）、高翔、武传斌、林昌文、易作才，和六名待选代表共三十九位同志担任常委；并由黄永胜任主任，孔石泉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刘继发、黄育英（女）七同志和待补一人至二人任副主任。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广东省四千万革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一年多来，广东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揭出了以陶铸、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了地方主义小集团企图翻案的阴谋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和驻广东部队，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担负起了“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以来，狠抓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大力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积极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条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广东是祖国南方的大门，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在成立以后，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和相信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提高革命警惕，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广东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

广东省地处国防前线，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南大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陶铸在广东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给了帝、修、反又一个沉重打击。这对巩固我

国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对支援港澳同胞的爱国正义斗争、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们谨向具有悠久革命斗争光荣传统的广东省人民和驻广东省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广东省是我国人民百余年来多次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策源地。四十多年前，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广州举办了著名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毛主席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始终鼓舞着广东省四千万革命人民。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怀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给予光辉的指示。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广东省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是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运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同陶铸和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过程。陶铸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长期在广东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通过在广东的代理人，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极“左”方面，破坏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在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破产之后，又玩弄笼络利诱手段，妄图软化革命群众，并且极力散布无政府主义思想，挑拨离间，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阶级敌人的阴险狡猾，给斗争带来了复杂性，但也极大地锻炼了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擦亮眼睛，识破和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在工人阶级的带头下，经过激烈的斗争，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坚定地忠于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驻广东部队，在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中，以毛主席的指示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他们狠抓了支左人员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轮训班，强调在工作之前，首先要学深学透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支左人员的思想和行动。他们坚信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坚决抵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侵袭，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以满腔热情宣传和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以极大耐心做好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发扬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勇于

进行自我批评。广东省驻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保卫祖国南方，建立了新的巨大的功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切切不可忘记敌人绝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地处边防前沿的广东省，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美、蒋、英、日、苏修特务，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必然会不断地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广东军民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百倍加强敌情观念，警惕敌人煽动、利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队伍；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派性，斩断黑手。要坚决维护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筑起钢铁般的南海长城。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目前，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片大好形势。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东省革命人民，一定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让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祖国的南大门上永远飘扬！”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社论）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林彪听取丁盛同志汇报后的指示

林副主席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听取了广州军区丁盛同志的汇报。作了如下指示：

要大力加强政治工作。抓好政治工作是抓好一切工作的根本环节。不从政治上去领导，就无法领导。抓住这一环，一切都好了。要强调政治挂帅，部队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打仗，就要靠勇敢，勇敢就需要抓好政治。毛主席的书，要天天读，天天用。一切工作都要依靠毛泽东思想，依靠群众的觉悟。

要抓好连队工作。连队是冲锋陷阵的，连队工作一定要过硬。不突出政治，不好政治工作，武器、技术再好，打起仗来也会向后跑。要继续强调抓好“四好”，按四好去安排连队工作。连队工作不过硬，就说明机关不过硬。领导要深入下层，机关要面向连队。

部队工作要有主次。主是政治，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有主也要有次，少一个方面也不行，作风和军事也要搞好。部队要有好的作风，稀稀拉拉是不行的。要拉出去就能打，不怕困难，不怕伤亡，平时就要有这种好的战斗作风。安排工作的时候，首先要安排政治，军事也要有一定的比例。毛主席著作“天天读”，军事技术也要“天天练”。打仗要靠政治，靠勇敢，但技术也不能丢。枪要打得准，坦克要开得动，基本战术要熟练。训练要少而精。要从打大仗，打恶仗着想，从最困难的环境着想。打太平仗不行，不能过硬。

在各项工作中，特别要注意对上多请示报告。凡重要事情，都要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请示。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问题，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要尊重中央，尊重中央文革。要经常不懂就问，不要自作主张。对我这里也可以打电话。

总之，对上要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加强请示报告。

对下要搞好政治工作，依靠群众的政治觉悟。

对同级要团结，要合作得好。

对地方要靠政治挂帅，靠毛泽东思想，搞好军民团结。

三、广东省的批林整风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广州军区召开的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

根据讨论精神写成的纪要：

《纪要》指出：军区现有 2 万多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其中担任省（区）、县和相当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工作的有 3744 人，有 78% 的县以上党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队干部。

《纪要》指出：军队三支两军人员对地方党委组织也应当尊重和支持。为了保证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的领导，维护地方党委的威信，

《纪要》规定：凡参加地方党组织生活的三支两军人员，必须接受地方党委（支部）的统一领导；在地方各级党委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特别是担任一、二把手的军队干部，必须正确理解党的一元化方针，对三支两军人员实行军队和地方共同管理，以地方为主的办法。

《纪要》反映：三支两军人员中存在骄傲跋扈、好大喜功、任人唯亲、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等错误的思想作风；有些人存在着特权思想，不尊重、不支持已经成立的地方党委。这些现象必须加以改正。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毛泽东批准并在中央批语上增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要求引起重视。

毛泽东在南方巡视途中与各地负责人谈话时，再次就这个《纪要》所提出的问题说：

“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

毛说：不能说 he 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

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毛把话题转到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毛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

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又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转向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莫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问韦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刘兴元做工作汇报）毛听完后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讲到延安整风时）毛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讲到打锦州，毛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又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毛沉思一会，把谈话转向“天才论”，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毛接着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进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和汪东兴的谈话

（当谈到林彪一伙人的问题时）毛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

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毛说：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 81 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又说：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

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 1 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

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人不看，由他们去。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看了看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说：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接着谈起中苏关系）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又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

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毛最后说：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汪东兴在广州的讲话

同志们：

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和杂志最近都发表了不少批判古典小说水浒传的文章，批判水浒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亲自领导下，一次极其深入、广泛的政治运动，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严肃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全国人民开始走向新的生活。同时也说明了用暴风骤雨的方式，用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的阶段告一段落。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建设时期。但是阶级斗争并不因此而结束，只是斗争的形式改变，斗争性质仍然是政权的斗争。这种斗争的表现，有时激烈，有时和缓。激烈时充满着曲折、尖锐和复杂，有时则呈波浪型，特别激烈表现在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部的路线斗争，这种围绕着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会继续相当长的时间。每一个人都要有进行这种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混进党内、军队内、政府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代理人，他们之所以能同革命力量相对抗，一次又一次顽抗正确路线的执行，甚至于阻挠、抵制和破坏。是因为他们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它们或明或暗的受到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直到目前它们人还在，心不死，而且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显得更疯狂、更阴险。彭德怀的“万言书”，刘少奇的假四清、二月提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到最近“放下鞭、落下帆”、“射人不射马，斩尾不革头”都是同一货色，它们不断的变换手法，用一个倾向掩盖着一个倾向，接过革命口号，拉起革命大旗，用合法的手段施阴谋、

放暗箭。一方面高喊团结，一方面却在暗地里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有计划有步骤的准备叛党叛国，投降社会帝国主义。我们过去说有些干部“一打就倒，一轰就跑”现在慢慢我们才发现他们是怂恿人来打，鼓吹人来轰，一打一轰，把一个个炮口最后轰上中央，轰上主席。

从四届人大以来这局势的变化看得很清楚，一小撮自命为共产党员的人，竟然暗中鼓吹两个议会制，党派轮流执政论，甚至于提出司法、立法、行政相立又相持，军队脱离党的领导，离开政治路线独立存在的观点。这种步步向党篡夺权力的阴谋和右派反动谬论不能得逞后，便迫不及待利用“反修正主义思潮，反封建主义意识，反资本主义倾向，批倒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全面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把矛头对下不对上，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提出“在政看廉洁，在党讲纯洁”、“不问根源，不看罪行大小”，它们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目的：在于对一小撮阶级的镇压和对广大干部群众，包括对犯有不同的程度缺点错误，而又不是坚持不改的教育。钦差大臣满天下，包青天到处是，三句话没说就拿起中央这个上方宝剑革人家的命，却偏革不了自己的命。在中央弄一弄，在地方搞一搞，搞了什么名堂？真正修正主义根子还是没有拔掉。相反地损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人人自危，革命、生产抓不起来，这一小撮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六月份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上下内外都有，根子在中央、在国外，这里就是有黑司令部，红黑分明。黑线断不了，有人搞鬼。”并坚决指示各省在处理基层干部的问题上“半年一次，十年二十次检讨……”。在对上海和西安市的问题，主席一再指示：“敌我问题易处理，人民内部问题难处理，人民内部中混入敌我问题处理更宜慎重”。“抓住阎王，放掉小鬼，不要钟馗抓鬼，要孙悟空打玉帝”。当在社会主义每个关键的时刻，阶级敌人都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空隙，有时抓住我们的困难，有时利用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或错误，在上拆台发难，在下挑拨煽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恢复旧制度，推翻新政权，要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不要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很明显，它们正在利用广大革命群众对修正主义、对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憎恶，打着反修防修的旗号，把地方上一些犯有严重错误，以致个别蜕化变质分子的问题，扩大为党内整个已受资产阶级分子腐蚀的问题，并提出“严重的问题不在被腐蚀的程度和贪污的个别罪

行，而在于这是普遍性的存在。党的任务应该是毫不留情的清洗，事情的大和小，上和下的关系，应该不时去重视。性质是一样，在于处理要坚决”的论调，混淆视听，藉此又拉又打，把广大群众和干部对错误领导的善意批评和斗争，引向邪路上去反党和党中央。他们阴谋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挑动事端，制造分裂，破坏生产，利用“打击一大片”的错误路线制造混乱，孤立中央一些坚持正确原则路线的同志，实际这样做，并不是打击一小撮，而是保护一小撮。但是一切反动阶级都时常把自己估计的高，往往打错算盘。这样做不单无损于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声誉，相反更加暴露了自己的丑恶面目。目前所出现的地区性事件，都有关联性，绝不是偶然的事件。要联系的看，不要孤立看而认为是局部而无关连的事。敌人不糊涂，我们的同志也绝不能糊涂。什么才是修正主义，用简单一句话，修正马列主义的原则来解释是太笼统。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在内复辟资本主义，屈服于资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林彪以及目前还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准备投降社会帝国主义，并在国内站在地、富、反、坏分子一边复辟资本主义。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使社会主义的国家变色，使我们的党变成法西斯党，这是一套反马列主义的投降路线和政变计划。针对着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毛主席发出“批判水浒传”号召，是要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上去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粉碎它们的投降路线和政变的阴谋，挖掉这一小撮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

主席说：“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一句话直接打中了混在中央和地方中大大小小的宋江式人物。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主席用宋江的叛徒面目比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投降，揭穿他们的投降本质。就希望同志们看清反革命投降派的面目，“往往就是那些高喊最力的人，才是机会主义者”。我们在今后的运动中必须：

一、把批判“水浒传”同学习形势认清苏修反动本质，揭穿新沙皇侵略阴谋强盗行径和其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实质联系起来，才能看清社会帝国主义就是与封建皇朝一样，才能更好领会主席的指示，在反修防修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二、要用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的基本观点和学习方法去分析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我们不是希望大家都成为历史小说的评论家，而是大家通过历史上这本反面教材做为借鉴，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过去看现在，不要为批判而批判，要警惕阶级敌人诱使我们陷入纯学术批判的圈套，放弃路线斗争，让他们混水摸鱼，蒙混过关。

三、要理论联系实际，用路线斗争的高度去对照当前阶级斗争的实际，抓住几个关键性东西，进行深入批判。宋江的问题主要有几点：

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出卖农民起义，在革命起义节节胜利时，暴露他的地主阶级的本性，变节投降，卖官求荣，无耻屈膝甘当奴才，看周围，往上追，追这种人今天有没有。

宋江与高俅的斗争性质要弄清，进一步看看十次路线斗争，是刘少奇也好，林彪也好，他们之间有斗争，这性质又是什么？全国最近刮起一股翻案风，这是什么风向？不就是打倒刘少奇，“大为地方主义喊冤，打倒林彪又为刘少奇一夥叫屈”，把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间的派别斗争，说成是正确与错误路线的斗争。这事有没有呢？全国有，广东也有，广州也有。

捋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这事刚才谈过了，的确如主席说的有人搞鬼，不要大团结，搞小集团，施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封官许愿，招降纳叛，阴谋阳谋一起来，他们架空“谁”，宋江的衣钵，共产党里头也有人接班，这不是很奇怪吗？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里头这样搞的大有人在，表现不反修不革自己的命，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他们对地、富、反、坏、资本家、阶级异己分子，叛徒特务、托派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分子施仁慈，但对我们广大群众干部，对党内正直敢于同一切错误倾向的同志却恨之入骨，竭力排斥打击，造谣中伤，残酷斗争，无情围攻，何其毒也！这那里是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维护修正主义利益，地主阶级的利益……。我们要同这一切做斗争，对照、批判、深挖，要打活老虎，别死抓死老虎，要稳、要准、要狠、阶级斗争就讲雷厉风行。

四、要从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各个领域去批判，要有妥善的安排，有统一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战斗作用，充分的发动群众，要群策群力

打人民战争，集中火力打歼灭战，步步深入，各个击破，防止一片散沙，独断专行，搞寡人哲学。相信这样一来，局面很快就会打开。

广东省来说，情况还是好的，还是跟得上、抓得紧，“批林批孔”也有成绩，“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也很好，这是同志们努力的结果，也是全省人民紧跟党中央，按主席指示办事的表现。最后谈一些事，这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到南方几个省走了一下，一些地区确实实领导上有些问题，工作搞不好，加上水灾，生产任务没有完成，农业收成不太理想，具体方面有困难，中央是理解的。主席很关心广东的情况，让我代他向你们问好，希望我们每一个同志不辜负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搞好运动，学好马列理论，武装思想，提高路线觉悟，化精神为物质力量，领导全省人民与部队把生产推向前，超额完成今年生产任务。这里接近香港、澳门，又是国防前线，情况比较复杂，还不能松懈，要做好备战工作。黄永胜在这里搞了自己的一套，增加同志们一些困难，我看大家努力总是行，让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李一哲文章事件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人们都在关心着四届人大的召开，尤其关心着与每个中国人命运密切相关的国家法制。

人们为甚么这样关心呢？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动荡，发生了一些甚么新的问题使得人们必须关心新的国家法制这个四届人大的产儿呢？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斗争：一次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与刘少奇集团的斗争，一次是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斗争的实质是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过去的反右和社教运动也进行了这样的斗争，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么新的问题又是甚么呢？

新的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

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反革命演变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复他们的贵族世袭就是证明。早在流失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党全国人民警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发生复辟，那就不只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难道不是林彪路线给人民带来的祸害才帮助人们真正开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吗？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到今天的特点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企图是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那么革命人民应当拿起武器去反对他们呢？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研究中，毛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式上说，实际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武器。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如说是为了锻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还有甚么能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议论国家大事，批评错误路线更能成为生产力解放的标志呢？

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没有过的，生气勃勃的，这是革命的奇勋。

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毛主席愤慨地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林彪为甚么要镇压人民的民主呢？他们不是还鼓吹过“天然合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么？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林彪及其党徒把人民的革命运动当作他实行篡权复辟的“借用力”，于是对待“天才”的态度这个准则代替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准则。“共诛之”，“共讨之”和“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原则向法制挑战，成了保卫对“天才”绝对崇拜的上方宝剑。当他的地位一经确立并由党刊宣布以他的地位的确定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标志时，他便要建立“新秩序”了，就要“正名”了。在这方面，他还有他的董仲舒哩！

甚么“新秩序”？就是“最后胜利论”、“四大过时论”、“政权即镇压论”、“军党论”，总之，就是把我党我军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关系的社会法西斯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否则，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务，相反将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群众获得的只是新的枷锁。

（三）关于林彪体系

甚么是林彪体系？这是指林彪已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的时期，他在党内推行了那一整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党、全国的东西。这就是哲学领域的唯意志论，历史领域的天才史观，政治领域的政权即镇压论，经济领域的“公产”论和对外关系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天才史观则是其纲领。

毛主席一开始就和林彪体系发生了矛盾，当林彪体系尚未确立时，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便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而林彪体系一旦确立，并使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面临着巨大危险时，这个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

如果我们不去懂得毛主席对林彪法西斯主义镇压人民民主的深恶痛绝，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毛主席为甚么在庐山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斗争所反映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笑话所应当给予我们的教训呢？

“路线斗争不可知”的说法和“路线斗争不过是中央内部的权力之争”的说法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站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否认了一切错误路线，无论是“左”还是右的，给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带来的直接损害。人民群众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总是要以各种形式（甚至包括消极或“反动”的形式）去进行抵制和反抗。中央的斗争无非是社会斗争的集中表现罢了。

（四）关于批林批孔以来的形势

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动，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启发下逐步地懂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这一次，人民的要求又披着历史的外衣出场了，哲学家作了新的政治变革的前导，这个人杨荣国。

当“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颈上的深痕尚未消愈，杨荣国和它的助手们甚至是在“牛队”里就开始了他们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这位白发苍苍的教授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揭破了“礼治”秘密，“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杨荣国同志控诉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们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

杨荣国反复地控诉“礼治”，反复地控诉孔子杀少正卯，少正卯有甚么罪？他无非是“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罢了，这样就该杀了么？！

毛主席支持了杨荣国派要革命要民主的呼声，给李庆霖那封到处谓之“反动告状书”的复信，是多么大的鼓舞了人民群众啊！真的，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仇恨的呼声喊出来啊！

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锁、恐吓和镇压，李庆霖的遭遇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耽心。他们在说：“幸亏信让毛主席收到了”，他们在想，是甚么压制着他们的民主权利呢？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他们耍了一个诡辩，歪曲主席的思想，把林彪体系实质的极右说成是甚么“右倾”，或者回避林彪在成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他所推行的那一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国的东西，用林彪那些见不得人的反动言论来掩盖林彪见不得人的蛊惑言论。他们站在要求批判林彪体系的人民的反面，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复辟”“反回潮”，好像他们就是革命，动他们不得。

可笑的是他们也来批孔，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被杨荣国揭发出来的“礼治”的秘密，把血淋淋的“礼治”说成是一种假仁假义。肯定焚书坑儒的革命作用使他们自以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专制，非历史主义地鼓吹要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动派，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他们不敢触及秦王朝面临的两个否定：即来自六国旧贵族的反动否定和来自大泽乡农民的革命的否定。农民为甚么要反对秦王朝？秦灭六国时，农民“莫不虚心而仰上”，不都是拥护它的么？因为秦王朝终于损害了农民。人民群众为甚么要反对林彪体系？当年横扫一切的红卫兵运动不是高喊着林彪“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口号去作英勇的战斗的么？也因为林彪体系终于损害了人民群众。几千年来凡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终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这就叫做奴隶们创造历史。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他们客观上要求进步，主观上却不懂得进步而已。这几乎是

一个历史规律。被毛主席称为天才的陈胜。吴广，不都是自命扶苏，自号楚王，在反革命复辟的旗号下，举行了他们的革命起义么？既然我们无产者对这样打着反革命旗号的农民起义都要给予他们以历史上崇高的地位，为甚么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在批林斗争中有了一些错误的怀旧情绪，就非大兴问罪之师不可呢？更何况否定之否定，“仿佛是向旧的事物的回复”，不也是列宁的辩证法么？革命的道路要笔直而笔直是王明的形而上学，对革命作辩证的否定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历史的前进。

当然，如果真正的反革命复辟派孔鲋之流可以混进从大泽乡出发的革命队伍，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反攻倒算和辩证否定，便更可鱼龙混杂。我们必须反对反攻倒算派，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然而，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总之，批林以来的形势，纵横观之，斗争是激烈的，批林整风仍是首要任务。第十次路线斗争尚在继续深入。也许在这种深入之中，它还孕育著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哩！

（五）谈反潮流

“十大”废除了林彪塞进“九大”的“共诛之”“共讨之”的原则，而代之以反潮流的原则。这是“十大”的一个大功绩。

然而，现在情况是一个口号响亮了，人人都来喊：反潮流！

今年（七三）年八月，不是有个张铁生的也出来“反潮流”了么？结果一没有杀头，二没有坐牢，三也好像没有老婆要离婚，反倒是扶摇直上，据说到甚么学府深造“反潮流”的奥秘去了。可是，那些为反对林彪体系作了真正战斗的革命者，不少的情况是杀了头的，头还是杀了，坐了牢的，仍旧坐着，罢了官的，照样罢着，他们那有那么优哉游哉？“你们是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翻案”、“你们是‘571’”，不对。林彪的“571”不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当作一种“借力量”去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罢了。“借 B52 打 B52”本身何罪之有？甚至“571”自己也明白那些被损害的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力量呢！

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他们深知所受的根源，它们攻击的锋芒是向着林彪体系，他们谁也没有表现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憎恨，相反，他们憎恨那些歪

曲和阻挠这个路线和政策的林彪及其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甚么？你们要民主？你们是反动派！因为你们是反动派，所以不能给你们民主。”他们振振有词，喜欢引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段话。

但是反动派的头上是没有“反动派”三个字的。“只给人民以民主”，很对。可是，你们还为林彪体系大喊大叫时，又给了反对这个体系的人民群众那怕一点民主没有呢？给他们的只是残酷的斗争和拘押呢！“不给反动派以民主”，应该这样。但不要忘了林彪体系风靡一时，甚至庐山成百个中央委员跟着跑，不就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民主么？这个民主不用你给他也有，一他有权，二他有革命的旗号；你不给人民群众，他就没有，一他没权，二他有时也打不出革命的旗号。

历史教训我们，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派有时会被认为是反动派而没有民主，反动派有时会被认为是革命派而有民主，甚至出现了革命派遭到镇压，反动派青云直上的反常局面。我们必须对谁是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被打成“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分析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对阶级的民主作过许多论述，他们是把整个的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来加以对立的考察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内部的派别斗争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把派别的民主突出地推到了愿意研究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因为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改变成基于团结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派别专政，这个专政派别若是“正确”，它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王洪文同志报告号召人们发扬“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现在的情况，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报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涌来之势的潮流。古今往来，中国总会有人为了说话而不怕杀头的。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

不怕”的人们又能到那里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着他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

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曾经使全世界在它的面前目瞪口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所给予中国的社会深刻震动和它的深远意义，必将影响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

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它将怎样反映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呢？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那么，它所要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新宪法里，它将怎样表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呢？

现在人民群众在想些甚么？要求甚么呢？他们对“全国人民”的代表大会抱着怎样的希望？

一、要法制，不要“礼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造资反线的反”“夺走资派的权”为其基本内容的。但是可以说，镇压（人民民主）与反（资反线）镇压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而且，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中。

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社会主义的，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所形成的传统，顽强地盘踞在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法律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吗？

还有甚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是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了（实际上他是已经实行了）吗？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如果我们不去反对这种封建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礼治原则，我们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法治真正实行起来吗？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护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这是摆在“四届人大”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不用说党的领导应当细心倾听群众意见，也不用说人民群众对党的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监督的权利，更不用说对走资派造反有理了，即使群众的意见是错误的，过火的，或者对党的政策某些方面不理解而发生不满，难道就可以“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么？而且，香花与毒草、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么容易鉴别的，要有一个过程，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因此，我们不应当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界限是服从纪律不要搞阴谋诡计。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二、限制特权

承认不承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刘少奇、林彪等不过是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罢了），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

必须首先指出，我们的党员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

“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的现实从哪里来？对社会的财产肆意挥霍，高级的惊人享受，是从哪里来的？相当的部分高干子弟理所当然有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

从哪里来的？新资产阶级占有方式和维护这种占有方式的政治手段凭籍的又是甚么呢？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难道我们不可说苏联的演变是从苏联的高级干部实行了高薪制而向资产阶级专家看齐的么？在我们中国，对据说为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干部实行某种特殊的照顾，即使是传统所允许的，老百姓也没有表示多大的异议的话，但是我们能够轻视对政权的腐化作用和对新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么？我们能够对正在产生和形成的新贵族、新的资产阶级熟视无睹吗？

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承认我们社会现阶段存在着种种差别，它并不是一个法令所能完全消灭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是要扩大这些差别而是要消灭这些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甚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

三、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一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把林彪这样一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同时，也给人民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呢？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应当怎样才能“千千万万”地涌现出来呢？

使“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学活用”（即投机取巧）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毛主席提出了接班人的五条，但林彪也提出了他的三条。在林彪体系得到了确定的那几个年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主要地是用了林彪的三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从天才家族的根苗中挑选的；还是在大风大浪成长，在阶级斗争中涌现的呢？这个问题直到如今理论和实际还是多么矛盾啊？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人民给的。我们的干部不应是做官当老爷，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是权力是最能腐蚀人的。一个人的地位变了，是最能考验他为大多数人谋利呢，还是为少数人谋利？能否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除了他自己努力之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监督。而群众运动是一个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丰富的源泉。

应当怎样规定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权利呢？并且应当怎样明白规定，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呢？

“四届人大”应当回答这些问题。

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我们的宪法、党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写上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是的，写了，不但写了，而且还规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击报复”，“严禁逼、供、信”。可是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中国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纲领，在反动派的手里就变成为对群众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利害的杀人武器。

不惩办一些坚持反革命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血腥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的民愤极大的蒋匪帮，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确立不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巩固的。必须对镇压人民者实行镇压。“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

五、落实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甚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了？

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我们认为“四届人大”应重申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那些经实践证明是

正确的应长期实行的政策，并应通过法的适当形式体现出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那些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人应当严肃处理。

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一九六八年夏季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的压制，特别是林彪的法西斯的组织路线，他们任人唯亲和对逆己势力采取惩罚主义的人事调动，搞大换班，使得“各尽所能”、“任人唯贤”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摧残。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共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险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列宁不是欢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为“伟大的创举”吗？中国的劳动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也涌现了无数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的革命英雄么？这正是极为宝贵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但是，能不能由此而绝对化，认为精神可以代替一切了，可以代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了？显然这是极其荒谬的，它必然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它也已经遭到了惩罚。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反对了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但是我们应当绝对地否定奖金的作用么？一个比较积极、认真负责、超额完成任务或者有所发明创造的工人，为甚么不可以比他的同级工资多得些适当的奖励？一个业余从事写作或者对某一专业有所发现、新发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为甚么不可以得到适当的物质鼓励呢？空头政治的原则是奖懒罚勤的原则。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原则，而且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也是对特权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条文。我们对“四届人大”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希望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开成一个反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群众统一意志和愿望的大会。但是，毛主席在与林彪反党集团激战的关头引吭高唱悲壮的国际歌，已经深深地震动了广

大人民群众。他们知道，新宪法的规定只是再次给了我们一个武器，要真正实行还必须靠广大人民自己的斗争。

一九五四年的宪法不是也规定过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毛主席不是还多次说道：“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么？但是，一方面存在着林彪为代表的镇压人民的反民主势力；另一方面也由于人民群众自己对这个民主权利运用得太少了（这是由于中国封建传统的根深蒂固，也由于我国生产还比较落后，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比较缺乏民主精神的缘故），毛主席提出多年的“造成一个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

正如一个南方水乡的客人来到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惜一样，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是在遭到剥夺的时候，才更感到民主权利的珍贵。尽管一九六八年把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革命造反派群众）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现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动派只是一股逆流。”一个彻底摧垮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他们必将重新恢复和发展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精神。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初稿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二稿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定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李一哲《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 （三）关于林彪体系
- （四）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 （五）谈反潮流
-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但是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继续了批判，殊不料，我们的一些朋友却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一批判中涉及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是，这种体系——即使我们也可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林彪体系的新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们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的（第三稿）前五部分只作了少量修改，对于第六部分——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议，随着一年来形势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以重新写了，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简略提及，有待发挥和新牵连进来的问题，我们想在这篇序言里说一说。

* * * * *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使某些人感到吓人，首先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

据说，稍微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讨论甚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我们算是连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但是，我们却知道六十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几件事情：一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了，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二是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全文抄录在这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那么多国家打不过新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实就是明证。无产阶级必须在今后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几点，不算马列主义常识。然而，我们却可以据此断言，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甚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个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引自列宁全集第四卷一八七页）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的这篇文章里根据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基本路线的启示，提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他们作斗争的问题。

正当我们的文章对于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的阐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评的时候，一个处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的青年以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叛逆了出来。虽然钟志民学生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霖愤怒的呼喊，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微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这个回声却引起了连锁般的震动了。这一叛逆行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互不相同的反响，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便在实际上对这部分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

改变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争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提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基础是从特权中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生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你今天不承认，可以，因为有钱守维、黄国忠们帮忙，还有蒋匪帮经常派人来。廿年不承认，也许可以，勉强维持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又怎么办呢？总归还是要承认的。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三，是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这岂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断言有什么根据呢？

当我们再次面对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一次兴起半年之久了，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它的序幕和武汉几乎一样，撕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斗争。

在外国人眼里看来，中国是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的。当埃塞俄比亚皇宫前出现贴在墙上用大字报写成的传单时，西方通讯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之为“中国式的大字报”。

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准备好水龙头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干净。如果说他们终于没有清除干净，这只是因为前仆后继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曾经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关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也是“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吗？可是当被镇压下去的革命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已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苦战哩！正当广州街头贴——撕——贴大字报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十八号文件下来了，毛主席又一次地为大字报表了态。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喑几年之后，大字报重新被宣布为合法，十八号文件的深远意义，至今还没有完全向人们展示出来，但人们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而十八号文件正是为这种人民的管理权和批评权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即使人们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再次兴起原来所抱的期望绝大部分没有达到，他们获得了十八号文件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没有完成任务”的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因为现在在大革命第八个年头结束的时候，人民群众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但是一年以前，有多少人承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说了话，也是没有人承认的，这其中不是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吗？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四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林彪体系”，并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确立的事实。什么是“体系”？就是事物有联属关系的全体——全部系统。林彪体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党风、学风、文风、作风，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祸害人民、流毒全国的东西。六年前，林彪那一整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到绝对不可调和的表现）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破坏、抛弃林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么？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

“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脸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申、五十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籍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

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甚么积极成果可言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了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在这里，我们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悲剧式的胜利反而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和坚强的大革命，由于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有在和这个敌人斗争中，来发展成了真正的革命党”。（“1848——1850 法兰西阶级斗争”）

这就不用我们罗嗦了。

在林彪体系统治十分严密，显得似乎会永世长存的那些日子里，忠于马克思的共产党人就是根据马克思指示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历史现象，知道它是暂时的，他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现在我们看到了，从 1968 年以来，我们党和林彪体系这个新式的敌人之间进行的这场空前激烈、复杂的斗争，对于党内的今后的发展何等重要呵！没有空前强大的敌人，就没有空前的激烈斗争，就不会造成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会完成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空前艰巨的革命任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们涉及了林彪路线是右还是“左”的问题。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那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时“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 1960 年到 1971 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付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们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锅煮，越煮越糊涂。“五七一工程纪要”只能说明林彪集团是反革命匪帮，怎么说明他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

必须把反革命两面派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一五三页注（三〇）），毛主席对张国焘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二五八页注（一〇）），为甚么对林彪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区别呢？

这是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混淆两类矛盾，这本身就体现了林彪在党内的形“左”实右路线。

现在看到了那些参与了“五七一”计划阴谋，响应政变的死党，以所谓的“路线错误”逍遥法外，而不少仅仅在某些方面执行了刘少奇、林彪在党内贯彻的错误路线的好干部却继续被当作敌人加以无情打击。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么？

马克思说：“如果说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

我们的理论家们，你们为甚么对林彪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1966 - 1971）推行的实右而形极左路线那个形左的问题讳莫如深呢？我们能举出一百个、一千个现象形态来说明林彪的“左”，而你们能举出多少林彪作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在党内表现的现象形态的右呢？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挂这幅对联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哩！

“黑格尔在一处说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实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如果王明反对李立三的“左倾”是第一次的话，现在谁又高兴来扮演第二次出现的王明呢？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们对“反复辟”、“反回潮”口号的评论。但是，我们去年在评论中所作的判断已经被证实了。

甚么时候发生了“复辟”，甚么时候发生了“回潮”呢？今年以来某些大人物和权威性的文章（例如“评湘剧园丁之歌”告诉我们，“复辟”和“回潮”发

生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大吹特吹的市一医院的那张所谓“反潮流”大字报里甚至把一九七一年说成是“热血沸腾”，“火红的年代”，而一九七二年后便几乎是进入了“复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为甚么林彪不垮台到处都是好好的“一片红”了，“全面胜利”了，林彪一垮台就是“复辟”了，那里也是“回潮”了，年代也不火红了，热血也不沸腾了。这倒是咄咄怪事！

难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一九七一年秋的伟大胜利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人民的进一步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相反的倒是为“复辟”和“回潮”开辟了道路吗？这是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嘲弄。

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反复辟的，但是他们亲眼看到的鲜血淋漓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〇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但是，“反复辟”这个口号的实际效果比我们原来预料要好，因为人民的革命不会对革命的口号容易发生怀疑的，他们一般没有对一九七二年开始“复辟”、“回潮”这种提法发生大多数的敏感，于是，尽管鱼龙混杂，纠缠不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反复辟”毕竟还是成了人民群众向林彪及其党人作斗争的旗帜了。

现在需要研究一下的是，为甚么那些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在林彪垮台后，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要高喊“反复辟”“反回潮”呢？

很清楚，他们现在的地位，是随着林彪的体系的确立而确立的，动摇了林彪的体系无疑是动摇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叫喊“反复辟”，乃是他们对一九六九年“全面胜利”的规定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现实矛盾尖锐化的反映。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褻渎，那时候

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〇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我们在这里以老大不敬的态度提出一连串“挑衅性”问题本身就是“复辟”、“翻案”的证据，更不用说这整篇序言和本文以及“广东怎么办？”、“星火燎原馆的始末”……，还有甚么“革命死了，

革命万岁！”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够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资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打成“反革命”了，于是他们哀叹：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啊！

三年以来，中国人民确实确实看到了一些“仿佛是向陈旧东西的回答”（列宁）的东西，可是，那又有甚么办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向前发展的，历史车轮不可抗拒，它是不会照顾甚么人的面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奉劝那些狂热追随林彪而至今还保有“高官厚禄”的大人物，不妨把这对联徘徊吟咏，深入领略其中的意味吧！

那么，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就没有任何“回潮”呢？我们说存在着各种修正主义路线的各种表现，但决不能说是“回潮”。因为“回潮”这种提法本身就是美化林彪体系确立的时期，把它说成是没有修正主义的“无差别境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决定教育路线和文艺路线。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甚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我们的“体系”颇吓住了一些人，第七还因为我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但现在看来这没有甚么可怕了。儒法斗争史的批判正在深入展开，对秦王朝封建

的肯定已经开始变得有原则了起来。“文汇报”刚刚开展着很有意义的讨论。毫无疑问，法家先驱者们对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所引起的历史作用是伟大的。然而，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又何尝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欧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是也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吗？既然我们那样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从克伦威尔到罗伯伦斯庇尔，从“百科全书派”到别、车，从贝多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甚么对地主阶级的秦皇朝却要看得那样光明呢？恢复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统天下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肯定必须遵守严格的界限，以便以后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这是我们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面临着的反封建任务所决定的。

很可以让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现在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着多么巨大的矛盾呵！“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无论是吴晗笔下的海瑞还是田汉笔下的武则天那个不是法家呢？然而对他们的批判确实变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我们认为，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是革命深入的结果。但是，既然吴晗说海瑞是“爱护人民的”，曾经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那么，现在又有人说，“法家是爱护人民的”，这岂不真是一个吓死人的“回潮”吗？海瑞无疑是个法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少数民族出身的法家。现在有人从秦始皇到孙中山，罗列了一大堆“落实政策”的名单，可是为甚么对海瑞却要刻薄妒恨，拒不“落实政策”，最近还要在报上臭骂几句呢？这说明骂法家的人还是有的。何况我们对秦始皇还没有骂哩！

我们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斗争，为甚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那里烧？为甚么不可以联系一下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强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对世卿世禄，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枉法徇私，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一下这些实际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

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很有实际利益么？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于民何益？

在我们看来，既然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批林批孔问题除了应当研究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外，应当着重地批判经过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如果“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了彻底的反封建口号，那么我们今天的批孔运动就应该是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彻底的实现反封建的任务了。我们不应当如某些人那样，在批判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同时，却极力讴歌地主阶级的所谓革新派，他们根本忘记了秦、汉以后的所谓儒法两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斗争实质都是维护封建专制这一基本事实。而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不也就忘记了我们今天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孔的根本任务了么？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最后还因为据说它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余唾。

是的，“民主”、“法制”的口号是右派分子高呼过的。可是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群众所呼喊的右派呼喊过的口号难道还少么？“炮轰黑省委”、“反迫害、反镇压”不是至今还使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右派翻天”么？李庆霖信件的“右派言论”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为甚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在一九五六年布达佩斯曾经集合起来了反革命，而同样的口号在一九七〇年的波罗的海南岸却成了波兰工人阶级战斗的旗帜了呢？为甚么一九五五年苏联出兵匈牙利曾遭到了我国右派分子的反对，而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抗议了呢！

批评我们的朋友完全没有根据基本路线对六十年代以来国际和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作一番分析，他们不明白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似乎同样的口号，反对的却是不同的内容。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线，特别是反对林彪所推行的那

种面目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他们的目的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懂得的。

关于重写的第六部分，我们不打算多讲了，留给人们评判吧。作为对“四届人大”的希望，无论它们能否得到充分的实现，重要的是，林彪体系的冰山正在溶化，思想开始解放，问题已经提出在愿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们面前了。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我们希望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不要忘记了一九七一年庐山大笑话的沉痛教训。

对我们这篇冗长的序言，如果读者们竟能够看得下去，不觉得索然无味，我们只能感到高兴，现在再写几句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抓痕，不是漂亮人物。

显然，我们读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严酷现实的教育，懂得一点，说几句坦率的话。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对于“全国人民——我们还总算其中一分子——的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革命发展表示我们的希望和信心，也是试一试违了报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会怎么样？也算是以身试“礼”吧！如果我们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论权威的特别关照，我们只能认为是好事，必定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效益，虽然我们并不怎样期望他们。

然而，我们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头读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们给我们提出批评指正意见，特别希望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们不吝赐教。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志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深信：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应该是生长鲜花的时候。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 稿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李一哲《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为了打击李一哲，全市上下都大张旗鼓地“动员”起来了！

在那些人那里，批林批黄他们完全没有发挥的积极性也一下子迸发出来，他们把全部的怒气都倾泻到了李一哲身上，他们把全部的积怨都算到了李一哲身上——李一哲有罪！李一哲有罪！李一哲有罪！

李一哲是什么人？一个工人，一个青年学生。他们有什么罪？他们写了一篇文章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那些盘踞在广东土地上，为林彪的南逃搞反革命割据，长期进行着准备的毒蛇们，罪是不大的。他们策划反革命军事演习，他们阴谋夺取报纸和电台，他们为了反革命目的制造大量军火……总之，他们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所干的这一切都可以算作是“同志”犯错误。而李一哲只是写了一篇为相当大部分工人和群众所同情、所支持，为某些人认为是“反动”的文章就有罪了，而且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为了压制李一哲进而压制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掩盖他们的毫无原则和理论上的软弱无力，他们搬出了为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和鲁迅所不齿的吓人战术。

什么是“吓人战术”？为了把他们的面目勾画出来，我们不妨引用两段毛主席对这种“战术”的评论：

“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可以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

毛主席又说：

“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

毛主席指出：

“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广大的革命同志们，请拿毛主席的这些评论和那些现在正在施行着吓人战术的人对比一下，看看像不像？在我们看来真是维妙维肖，像极了。他们也自称马克思主义，可是为什么他们吃的却不是真理、实事求是和科学这三碗饭呢？

他们现在在“动员”群众的时候，对人民群众说：“我们对李一哲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不要跟他在学术上兜圈子，不要跟他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而是要在政治上压倒他们。”

是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斗争性质是一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这是说得对的。但我们什么时候要求过他们作“学术”上的斗争呢？我们的文章从来也没有以“学术”的姿态出现过。

“不要和他们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而是要在政治上压倒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在理论上是抵抗不住的，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们就企图回避理论上的辩论，回避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只有一个法宝，就是“压”或“压不服就抓”。压服了自然是胜利，压不服就抓也是胜利，都可以雄纠纠气昂昂地“得胜回朝”了。

在思想领域里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然也是“压”。但是，为什么“不要和他们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呢？难道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时候是不能讲理论，不能通过现象去揭露实质，也就是说，不能摆明道理，讲清事实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最无赖歪曲。

我们再来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毛主席又说：

“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

有人会跳出来说，不对，这种充分说理的、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判，只运用于人民内部，李一哲是“阶级敌人”，李一哲的文章是“反动文章”，当然不能和他讲理。

可是，难道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便可以是不讲道理的了么？毛主席在上面提到的需要批判的“牛鬼蛇神”难道也是人民内部吗？但在毛主席看来，对敌斗争也同样适用讲理的原则。在上面，我们也看到毛主席说过，吓人战术，对敌人也是“毫无用处”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针对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写的“九评”便完全不是多余的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们究竟有什么理由把我们——一个工人，一个青年学生从人民划到“阶级敌人”那边去呢？你们有什么法律根据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哪一条告诉你们可以这样随便地把人民群众划成“阶级敌人”？如果你们可以这样随便把我们划成“阶级敌人”，那么，广大支持、同情我们的工人群众是否也可以划为阶级敌人或阶级敌人的同情者呢？为什么你们这样敌我不分？联系到你们对刘、丁之流那样心慈手软，对人民群众却如此心狠手辣，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你们说，划我们是“阶级敌人”有根据，根据的是毛主席的“六条标准”。

不对！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是划分我们人民内部言论行动是非和香花毒草的政治标准。而且毛主席也多次说过，衡量言论行动是非需要时间的检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经验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何况在我们看来，在相当部分同情、支持我们的工人群众看来，我们的文章也完全没有违反这六条标准。为什么你们那样热衷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

敌我不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穿了都是为了一个——吓人！

以下就是他们吓人战术的逻辑：

李一哲的文章——“反革命的大字报”——不进行理论辩论——压倒（甚至可能抓）——于是就胜利了。

是不是这样呢？一切有革命正义感的人民群众可以再看一看，议论一下。

1974年12月11日

（附注：“批林批黄”，黄指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刘、丁之流”，刘指曾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的刘兴元，丁指曾先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的丁盛。）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李一哲《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我们的一评（《吓人战术》）刚贴出，某些权威立即打上门来，毫不羞耻地反问道：“怎么能说我们是吓人战术呢？怎么能说是煽动群众围攻呢？”他们炫耀着一篇“宣集文”的文章，（这篇文章像文件一样发到各个单位，组织学习，供人在批判时参照），并吹嘘说，这是一篇“像样的文章”了，已经把李一哲批得“体无完肤”了！

好一个“没有吓人”！好一个“没有煽动群众围攻”！你们在许多单位强迫干部和群众对李一哲大字报表表态，这难道是假的？你们从上到下，层层动员，层层加码，这也不是事实？就在你们这篇“像样”的文章里，在这几万字的“批判”中，你们几次、几十次返来复去地重复下面这些字眼：“恶毒”、“极其恶毒”、“极尽诬蔑之能事”、“疯狂”、“丧心病狂”、“极端狂妄”、“别有用心”、“蓄意破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动理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诬蔑文化大革命”、“诬蔑批林批孔运动”、“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煽动匈牙利事件”等等，“简直无以复加”！——这些东西是不是吓人？用这些东西来吓唬工农群众，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妄图煽动他们来压制不同意见，围攻革命同志，围剿李一哲，白纸黑字，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吓人战术又是什么？

好一篇“像样”的东西！一篇文章，颠来倒去，几顶帽子，几根棍子，总是那么几个名词、形容词，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么？你们用这些东西就可以吓住人民群众，就可以把李一哲驳得“体无完肤”了么？好吧，在这里，我们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首先剥掉“宣集文”的革命权威的外衣，让广大革命群众看一看，他们在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的狰狞面目，而且以后我们还将陆续予以评论。

“宣集文”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

“宣集文”说李一哲“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使他们感到“特别令人不能容忍”，这岂不是说，在这些威心目中从来就认为毛主席就是秦始皇了么？右派分子恶毒攻击毛主席是秦始皇，林彪恶毒咒骂毛主席是秦始皇，现在“宣集文”公然把毛主席看成是秦始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是的，毛主席在右派和林彪的攻击面前，是承认过“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但是，毛主席在这里完全是从镇压反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说的，是有条件的，怎么能把右派和林彪咒骂我们的东西神圣起来呢？怎么能够说毛主席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秦始皇呢？

我们在文章里“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难道不对么？我们要搞评法反儒，“宣集文”他们要搞尊法反儒，一个评法，一个尊法，一字之差，正是反映了两种立场。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尊法呢？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评法呢？

无论怎样，作为广东理论权威的“宣集文”把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伟大领袖和封建专制的皇帝合二为一，等同起来，这难道是我们能容忍的么？

“宣集文”对毛主席的咒骂，比他的前辈又有了一个发明——叫做指桑骂槐，他们借打击李一哲之名，行反对毛主席之实。请看两段话：

“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么？这是李一哲的无耻捏造，这是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恶毒的诽谤。”

注意！“宣集文”用了“无耻的捏造”和“最恶毒的诽谤”来破口大骂。他骂谁呢？骂李一哲么？不是，他在代表他那个特权阶层骂毛主席。因为这个“无耻的捏造”全部都是毛主席的意思，我们几乎是逐字照抄的。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把这个意思传达了出来。他写道：

“毛（主席）的信念所指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一个掌权的官僚阶层，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吏阶层。”（见《斯诺访华文集》第 6 页，新华书店发行）

“宣集文”，我们不能不愤怒地质问你：

难道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是毛主席“无耻的捏造”吗？

难道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是毛主席“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最恶毒的诽谤”吗？

“宣集文”，你决不能滑过去，你必须正面回答以上的两个问题！因为你的又长又臭的文章的整整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向毛主席的这个诊断开火，都是在代表着混进党内的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向毛主席发泄最刻骨的、咬牙切齿的仇恨。如果你们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了，从此哑口无言了，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你们是被毛主席打败了，你们是被我们打败了，你们是被中国人民所切身感受到的事实打败了！

“宣集文”另一个反毛主席的真凭实据是：

“宣集文”说“李一哲说封建独裁专制的恶习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因此，“宣集文”说这是“强加”，是“诬蔑”广大群众、党员。

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李一哲创造的，而是毛主席说的（见毛选《井冈山的斗争》）。也是我们逐字逐句抄下来的。那么，按照你们的说法，岂不是毛主席在“强加”，在“诬蔑”广大群众和广大党员了么？你们该当何罪？你们该不该打板子？

出一身冷汗吧，“宣集文”！

“宣集文”疯狂反毛泽东思想

“宣集文”写道：“李一哲大肆攻击毛泽东思想，胡说什么‘不准思考，不准研究，不准探索，……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注意！这里有个省略号——六个点，我们的原文是“天才史观”，“宣集文”把它代表了“毛泽东思想”，这岂不是明明告诉人们“毛泽东思想就是天才史观”么？这岂不是承认你们从来就是把林彪的“天才史观”作为正统的毛泽东思想么？

“宣集文”还写道：“党章上明确规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李一哲却诬蔑为‘封建性的新礼教原则’，并且别有用心地把它诬蔑为维护林彪体系的神圣支柱。”

无赖+流氓的卑鄙歪曲！我们明明讲的是林彪提出的“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个礼教原则，“宣集文”却说成是“党章上明确规定的指导思想”，这不是明明告诉人们，他们还要把林彪这个被“十大”废除掉的原则塞进我们的党章，而且还要把它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么？

“宣集文”猖狂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宣集文”说，找遍李一哲的全文，都找不到一个镇压地富反坏右的字句，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李一哲主张保护地富反坏右。

他们还当面责问道：“你们‘对四届人大的希望’里不是写得很清楚么？”

我们当场反驳了他们。我们说，我们写的是：“除了放火杀人……等实行专政外，应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民主权利。”这里说的明明是人民的范畴，难道你们认为人民应当包括地富反坏右么？他们当场哑了口。

其实，“宣集文”的这个指责本身，不仅暴露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满脑子浆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敌我不分，总是喜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也许他们还会说，你们没有一字一句提到对地富反坏右的专政！先生们，“抓鸡脚”不要抓得太离谱了，我们文章里完整地引用了党的基本路线，你们是不是说，党的基本路线里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镇压地富反坏右呢？而且党中央在许多文件里，例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里不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镇压地富反坏么？那是不是说《十六条》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保护地富反坏了么？这个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的罪名，你们担当得起么？

“宣集文”蓄意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宣集文口口声声提到镇压地富反坏右，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要被那些“万岁不离口”的东西迷惑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写得好：“难道高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人们，都真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了么？”

“宣集文”不惜造了一个大谣，胡说李一哲主张“一切为了民主，民主就是一切。”根本不敢提及李一哲主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特别是那些小蒋介石的观点。不言而喻，这恰恰是“宣集文”最反动的东西。

即使是在镇压地富反坏右的问题上，“宣集文”也歪曲了毛主席的专政思想。毛主席主张的是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强迫他们改造成成为新人，而镇压的是那些抗拒改造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

一九六八年教训了我们。林彪一伙曾在“镇压阶级敌人”的口号下镇压了成千成万的革命群众。现在“宣集文”又大肆鼓吹李一哲是阶级敌人，是不是又要镇压李一哲及同情支持李一哲的干部和群众了呢？说穿了，他们高喊“专政”时就是要镇压人民的民主权利。

“宣集文”真的要无产阶级专政么？如果真要，当然很好。但是他们根本否认我国出现了一批新资产阶级分子，根本否认有镇压人民群众的“小蒋介石”的存在，举个例子吧，广东就有一县委领导班子非但抗拒中央“不准私建楼堂馆所”的指令，反而变本加厉地动用国家资财，为几个人营造别墅，甚至变县木器厂为私人家具厂，而且在上级发现后又一直拒不退赔。这是不是喝人民血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一类事实，即使仅仅是前一段的运动揭发出来的还少吗？你们为什么不去主张严厉惩办这些大贪污犯、大盗窃犯、新资产阶级分子呢？

“宣集文”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

“宣集文”说，文化大革命的焦点和实质，是解决两个司令部的问题，是解决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问题。

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这是一个如同毛主席批驳过的社教运动中“四清四不清”、“两类矛盾交叉”的理论，这是一个用杜林的模式印出来的绝对的终极真理，因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谬论！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的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实质只能是毛主席指出的“一反两继续”，只能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

“宣集文”说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但是他对“走资派”、“特权阶层”、“新资产阶级分子”、“新贵集团”的提法那么恼火，否认它的存在。那么何来的两个司令部呢？难道刘少奇、林彪真的是光杆司令或者仅仅是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的代表？究竟中央的路线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抑或相反？

按“宣集文”的说法，岂不是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纯粹的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了么？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放肆污蔑！

“宣集文”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权威，请问，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联想到你们在批林以来拿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却反而对人民群众的批林运动咬牙切齿，你们的面目不是很暴露了么？

“宣集文”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

“宣集文”以上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他们多年来不读马列，甚至不读毛主席著作么？不仅仅是。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即坚持林彪那一套东西。

他们以为对李一哲的批判，只要扣上“反动”、“反革命”的帽子，就可以任他们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就可以把李一哲压下去，就可以“得胜回朝”了。

工人同志们，一切正直的同志们，现在在你们面前有两篇东西，一篇是李一哲的，一篇是“宣集文”的。有对立面就好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究竟哪一篇是反动文章，究竟李一哲反动，还是“宣集文”反动？而且，究竟什么是批林批孔的大方向？现在这么大张旗鼓地要“批判李一哲”，究竟是为了什么？

结束这篇评论之前，我们再说两句话。

自告奋勇充当“批李”马前卒，耀武扬威杀进北京路的赵真哲同志，你不是说“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个口号本身没有错么？你不是说要坚持这个口号么？现在“宣集文”在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基本路线、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文化大革命——请你在北京路上带头高喊一句“打倒宣集文！”吧。

对于“宣集文”，我们这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便抓了他几个“鸡脚”，把他送给我们的帽子回敬给他。让他尝尝戴上他自己制造的帽子的滋味罢了。我们并没有对他“打倒”或“专政”的意思，但是，我们一定还要继续揭露他，批判他。

帽子是要你自己戴才合适的，“宣集文”同志：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以势压人的新“党阀”，“新学阀”——这顶帽子，你戴一戴，看合适不合适？

1974年12月16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李一哲《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

列宁在揭露杜岗时说，先歪曲社会主义，把一大堆谬论说成是社会主义，然后成功地推翻这些谬论，就以为把社会主义驳倒了。

现在“宣集文”和其他“权威”以及街头那几条不三不四的汉子耍的就是这一套把戏。

一切正直的工人同志和广大群众都看得很清楚，我们论述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可是这群无赖却喋喋不休地大骂我们，说李一哲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法制，李一哲鼓吹“绝对的民主”、“纯粹的民主”，于是他们便煞有介事地长篇论述为什么没有绝对的民主，为什么没有纯粹的民主。

还有什么比公然的歪曲更可恶呢？难道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吗？难道社会主义的法制是资产阶级的法制吗？

（二）

我们从来就认为，民主是有着强烈的阶级性的，因此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这种人民的民主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个专政。反过来，党内走资派、野心家剥夺人民的民主本身就是对人民的专政。那种把民主与专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八年，我们亲眼看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里，有了刘少奇镇压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了无产阶级揭露他们的民主；一九六八年夏季在广东省有了林彪、黄永胜镇压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了无产阶级反抗他们的民主；“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了林、黄的一伙在广东捂盖子的民主就没有了人民群众揭盖子的民主……难道这一切不是事实吗？

因此，我们从来也没有主张过什么超阶级的绝对民主，也从来没有主张过超阶级的绝对自由。那些对我们作了诬蔑的人完全是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捏造。

那么，我们主张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我们主张的是人民群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作斗争并对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地富反坏右实行革命专政的民主。

难道这个民主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吗？难道这个民主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吗？

为了使那些无赖开开眼界，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把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整个基本意思表达出来，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

制，应该保护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并镇压或制裁那些剥夺人民这个斗争权利的“小蒋介石”，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他们会质问我，难道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这样一种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吗？

我们说，这种民主权利，路线正确时就有，路线不正确或受严重干扰时就没有。

他们说，这种民主权利，从来都有，什么时候都有。

其实，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无产阶级民主，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歧恰恰在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权利，曾经有过被剥夺的事实，他们不承认在保护还是剥夺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到底是他们的看法有根据呢？还是我们的看法有根据？让我们来看看事实。

我们现在知道，刘少奇之后，林彪便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野心家，但是“九一三”前，人民群众有没有揭露和批评林彪，并向之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呢？

大家都记得很清楚，甚至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也不能否认，那时候是不能揭露和批评林彪的（甚至对林彪的党羽也不能揭露和批评，广东 1968 年对革命人民的镇压就是证明），因为林彪已经把谁反对他就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条文塞进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之中，（见“公安六条”），难道这不足以证明革命人民群众向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民主权利——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曾经遭到过剥夺吗？

现在从“宣集文”到赵真哲之流却在那里吵吵嚷嚷说，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从来都有，从来也没有被剥夺过。在他们看来，昨天喊“林×××永远健康”是“无产阶级民主”，今天喊“打倒林彪”也是无产阶级民主。但在我们看来，人民群众喊“永远健康”的时候，恰恰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完全被剥夺了向林彪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民主权利的时候。

他们现在大吹大擂说，他们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粉碎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好吧，让我们来问问他们：

“九一三”之前，你们究竟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去揭露、去批评、去反对林彪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呢？

你们采取这些具体行动的时候，又去一些什么样的“最好的大厦”开会，又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最好的纸张”乃至笔墨呢？（见赵真哲“三批”）

就是说，在“九一三”以前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首先是林彪）作斗争的无产阶级民主权利，你们究竟是如何“最广泛地”具体享受到了呢？

你们能够回答出来吗？如果你们回答不出来，那么，就请你们不要在那里吹牛皮，唱高调吧，就请你们靠边站吧！

（三）

他们又会跳出来说，好吧，就算人民群众向林彪一伙作斗争的民主权利曾经被剥夺过，但现在不是又有了吗？

好一付无赖的嘴脸。

是的，向林彪一伙作斗争的民主权利，人民群众基本上有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反潮流的结果，也是人民群众付出了大量鲜血和生命的结果，好了，有了结果了，在林彪路线淫威之下，连屁都没有放一个，甚至可能还在那里为虎作伥的“宣集文”、“赵真哲”之流便出来摘桃子了，充英雄了，吹嘘他们粉碎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了。

也许，他们会抱怨说，在人民群众向林彪作斗争的民主权利遭到剥夺的时候，要他们出来反潮流是对他们的要求太高了，那么，在前一段的运动中，在基本上有了这个民主权利的时候，你们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你们那时为什么不出来“集文”一下，“真哲”一下呢？你们打人民群众的屁股那样积极，那样卖力，打林彪、黄永胜一伙的屁股却是那么消极，那么不得力，人们不得不问，你们这些像瘟疫一样，像臭虫一样，像狗屎一样的文章，它的策划者，它的炮制者，它的执笔者，“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呢？

（四）

对于“宣集文”的批判，我们发现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每当我们明确地指出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时候，他总要把“人民”砍掉，然后再来问一句：哪个阶级的民主？似乎是“左”得很，似乎是“马列”得很，但是这一切仍然掩盖不住他顽固地企图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面目。

我们说：“人民群众绝对地、无条件地使用大字报这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他们却把这种人民民主说成是“纯粹民主”、“一般民主”，那么，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求的“不纯粹的民主”和“不一般的民主”究竟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是林彪、黄永胜使用刺刀和子弹的民主，是私立专案，私设公堂，私设监狱，草菅人命的民主，是“政治市容清扫队”使用水龙和扫把的民主，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于人民群众使用大字报这个“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毛主席曾经热情洋溢地说：“已经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矛盾绝对地、无条件地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绝对地、无条件地存在，因此，作为人民群众（整个意义上来说的人民群众）揭露和解决这两类矛盾的武器的大字报，也应当绝对地、无条件地“永远使用下去”。这个道理，和由于阶级敌人的存在，无产阶级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掌握枪杆子的道理一样，是不难理解的。

最近，《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第一版连续发表了几篇署名文章，他们在教训人民群众“怎样看大字报”，“怎样对待反潮流”，“怎样辨别香花与毒草”等等。

但是，非常奇怪，这样教训人民的先生们，就是闭口不谈毛主席是“怎样看大字报”的，闭口不谈毛主席亲自圈阅的十八号文件的内容。

他们把我们的大字报说成是“反动大字报”和“反动潮流”，可是他们绝对不提倡广大干部和群众运用大字报去反潮流，据说，大字报会破坏“安定”，会上李一哲的当。

于是，毛主席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标志”应当取消了，应当换标志了，马列主义的“标志”（大字报）应当收起了，修正主义的标志（水龙和扫把）要准备了。

先生们，你们是大字报的取消派！你们是中央十八号文件的顽固抵制派！你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运动）的拼命反对派！面对着这些反对派，我们必须再次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警句：“人民得到的权利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五)

为了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宣集文”公然炮制了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理论。他说：

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就是必须遵循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规定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

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公然歪曲。

所谓“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条件”，就是说，什么人能够享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呢？

毛主席说：人民。

“宣集文”说，不管什么人，“符合六条标准”的就有资格行使民主权利，不符合六条标准的就没有资格行使民主权利。

究竟是毛主席正确，还是“宣集文”正确？

对于六条标准，毛主席自己是怎么说的呢？就在提出六条标准后，毛主席紧跟着说：

“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讨论，而不是妨碍这种讨论。”

毛主席还说：

“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

认真学习一下毛主席的这番话就可以看出：

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是在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基础上检验是非和香花毒草的标准。

“宣集文”的理论对毛主席所作的“修正”就在于企图在六条标准的幌子下去剥夺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就在于企图用毛主席鉴别是非的标准去代替划分敌我的标准。

两者之间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吗？没有，完全没有！

“宣集文”这种反动理论在实践上所必然带来的危害，和事实上已经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

就是由人民的一部分去压迫人民的另一部分，就是由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专政。

我们知道，人民内部，甚至在工人阶级内部，都始终存在着左、中、右的派别（“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矛盾，解决它的办法，“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只许一种观点讲话不许另一种观点讲话是有害的。一派压一派的“派别专政”是不行的。“一派掌权（是）不灵”的（毛主席）。难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

必须揭穿的是，“宣集文”鼓吹和炮制这样一种由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专政的反动理论，他的真正祸心，决不是要搞什么“派别专政”，他炮制这个反动理论，是为了使他们可以随便剥夺被他们自己认为不符合“六条标准”的人民群众行使民主的权利。所以，尽管“宣集文”“无产阶级专政”不离口，但他们主张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

（附注：这四份大字报原文张贴在广州中山路到北京路口的墙上。后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即“宣集文”大量印发全省各基层单位供群众批判参考。奇怪的是，在印发的这份批判材料中，前边是“宣集文”批判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文章，后边是李一哲反驳“宣集文”的这“四评”。因此给人的感觉是：李一哲批倒了“宣集文”。批判李一哲的主持者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令人不解。）

研究资料

《广州的夺权模式被中央否定——市公安局的夺权和反夺权》（叶曙明）

（原载：wehoo-威虎网www.wehoo.net）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指出，公安部门的任务是“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但后来在运动过程中，只要给对方扣上一顶“四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就可以把任何人列入公安六条的打击范围了。因此，公安六条在军管以后镇压造反派，以及 1968 年彻底瓦解造反派组织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省委被夺权时，省公安厅、市公安局也被接管了。1 月 21 日上午，负责接管公安厅权的几个群众组织，包括暨大东方红、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等，把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寇庆延抓来，勒令他通知厅、局长晚上开会，然后通过政法系统内部的造反派组织“北京政法公社驻穗联络站”，于当晚宣布接管，成立 13 人监督小组，其中本单位 10 人。

市公安局的接管大致相仿，1 月 21 日下午，由武汉三司抓到副局长王丰业，令其将所有当权派集中到省联站，晚上 12 时以省联站名义口头宣布接管。局本部的造反派并未参与其事，后经政法公社说明，成立监督小组时，才吸收了四个本单位的组织代表参加。

林李明曾经说过，对省委、省委办公厅、文革办公室的三个印是夺权，在监督下使用；对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是接管。刘田夫在回忆录中，也把夺权和接管区分开来，但不同的是，他把省人委的夺权也称为接管：“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广东省部分‘群众组织’组成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并于 1 月 22 日，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省人民政府、省公安厅也先后被‘造反派’接管。”这一细微的区别，也许不为人们所留意。

按照一般的理解，被外单位人员夺权的，称之为“夺权”；被系统内人员夺权的，则称之为“接管”。接管和夺权，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人们也把接管视作事实上的夺权。在林李明的同一次谈话中，他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也使用了“夺权”这个词。

问：中央对这次夺权（指省委夺权——笔者注）有没有表态？

（林李明）答：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夺权我们告诉军区，军区打电话给中央，周总理打了电话说：革命行动支持，必要时派军队维持秩序。

公安局的问题，对广州地区的形势，有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弄清当时公安系统内部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

省公安厅有四个群众组织：一、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一总部）；二、革命火炬造反联络总部（简称二总部）；三、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三总部，因内

部意见分歧，于 2 月 16 日宣告解散）；四、劳改局红色造反总部（简称四总部）。前三个总部，在北京政法公社等组织支持下，参加了 1 月 22 日的夺权，四总部因成立较迟，没有参加。

广州市公安局内，也有四个群众组织：一、毛泽东思想一二五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一总部），1966 年 12 月 30 日成立，人数约 2000 至 3000，属反对省革联的组织；二、毛泽东思想红色战斗兵团（简称二总部），1967 年 1 月 3 日成立，人数约 1000，属支持省革联的组织；三、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联合总部（简称三总部），1967 年 1 月 9 日成立，人数约 800 至 900，参加了省革联，但军管后宣布退出；四、广州公安战斗兵团总部（简称四总部），1967 年 1 月 27 日成立，支持省革联；另外还有一个广州公安公社（五总部），2 月间成立，支持省革联；广州起义公社（六总部），2 月 23 日成立，反对省革联。但五、六总部人数很少，不起什么作用。

市公安局被接管后，由九个单位（外单位有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三司、北京政治公社、中大红旗、广医红旗、珠影东方红等）派出了 13 人，成立监督小组，其中一总部派了四名代表参加。监督小组选举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邹力志为组长。然而，当小组一开始运作时，马上就遇到问题了。由于公安局内部的大多数文件，对外都是保密的，不能让外单位的人看，而监督小组大部分是外单位的人。矛盾就出现了。

（省军管会的调查材料称）由于盖公安局大印的一些文件，都是关于对敌斗争、国家机密的，没有让外单位的监督小组成员看，外单位的某些监督小组成员就认为这是邹力志“独断专行”，从中操纵的结果。于是，在监督小组内部，以邹力志和“一总部”的四名委员为一方，以其他组织的八名成员为一方，发生了矛盾。

1 月 23 日，一些监督小组成员提出，把一总部代表逐出监督小组，要他们交出大印。1 月 25 日，省革联驻市公安局的监督小组开会时，要求一总部和北京政法公社成员退场，并交出大印。双方正式决裂。据黄意坚说，军代表授意一总部实行反夺权。

下午，一总部派人到省公安厅与政法系统各群众组织开会研究，决定成立“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由这个组织接管广州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下午

4 时，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全体代表，齐赴市公安局，宣读了《夺权通令》，要求监督小组离开公安局。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市公安局“二次夺权”。

“省革联”代表便认为是“反革命政变”，随即调集了数千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向市公安局冲击，铸成了“一·二五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 18 名干警和群众被殴打、踩挤成重伤送医院。“政法革委会”被“省革联”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命令立即解散，几千名革命干警被打成“反革命”，北京政法学院学生邹立志（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复员军人）被挂上黑牌、戴上高帽斗争，斗争后又是在市公安局院内“游院”，还扣押了邹立志和“一总部”负责人黄××、陈××、梁××等人。

这是引自广州军区的一份关于省革联的材料。当时市内各大造反派组织都闻风而动了。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造反总部（简称中造总）——这是 1 月 16 日由中科院中南分院下属单位的 10 个战斗队共 400 多人组成的造反组织——打电话给下属各单位：“北航红旗被围了！北航红旗是江青同志肯定的，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要求各单位立即派人增援。25 日凌晨，包围公安局的群众组织愈聚愈多，包括中造总、省重工业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省水产厅系统驻穗单位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南林学院红卫军等等，共有上万人之多，殴斗之激烈，是广州地区文革以来，在群众组织的冲突中，前所未见的。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迟泽厚在现场，他是最早介入广州地方文革的军队干部之一。后来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我去给他们调解，调解不行，两派打起来了。我估计里里外外有万把人吧。一二五总部很多人在里面顶住，关起铁门。外面的就上去攻，人海战术，使劲往里挤、挤、挤。顶到最后像决堤一样，‘哗’的就冲开了，一下子冲进去了。就把一二五总部砸垮了。”

从那以后，一二五总部成了造反派里面的一个“修正组织”。既不是保守派，保守派也不承认它，它自己也不甘成为保守派；可是造反派又不承认它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迟泽厚说，“它变成游离于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这么一个组织了。”

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的观察认为：

1 月 25 日，广州市公安局发生了由“监督小组”内部分裂而引起的二次夺权斗争。“监督小组”中的多数派（包括北航红旗、哈尔滨军工、武汉三司、中大红旗公社、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珠影东方红等单位），取得这场斗争的表面胜利；

少数派（北京政法公社的几名学生和公安局的“革命造反第一总部”）被赶出“监督小组”，并被宣布为“反革命”。

这次夺权斗争，非但未使双方的矛盾得到缓和，反而发展得更加复杂和尖锐，而且把“监督小组”以外的许多组织也卷入这一斗争中来。

在这次事件中，双方都对军队表示不满。两派互相指责对方犯了“路线错误”，是“现行反革命”，要求军队镇压。对我们力主协商调解的态度，认为是“合稀泥”、“搞折中”，甚至说军区是“制造”这次事件的“幕后人”、“凶手”。

《1967 年军队是如何介入广州地方文革的》（一听）

（原载：wehoo-威虎网www.wehoo.net）

随着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和省革联的衰落，以八一中学、七中、铁路中学、省实验中学、华师附中、十三中、十六中、十七中和二十七中学生为主的主义兵，在广州再度活跃起来。华师附中出现了两张令人瞩目的大字报，一张题为《我们就是好汉》，另一张题为《满天怨恨满天仇》。两张大字报，都重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并大放厥词：“我们红五类就是靠对联翻身的。对联就是好得很！好得很！我们是顶天立地的自来红，我们里里外外都红透了，崽子们，叫你们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大字报又呼吁：“革干、革军子弟，狗崽子骑在你们头上，你还沉默吗？抬起头干下去，干下去才有活路，砍头如同风吹帽，坐牢算得什么！”

2 月 26 至 28 日，主义兵四处出动，一口气砸了七中红旗、十六中红旗、二十四中井冈山、二十中井冈山、三十八中井冈山、五中东方红、华师附中红旗、广雅八三一、中学红卫兵广州兵团、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等组织总部。大街小巷，到处响彻了他们的怒叫声，令人心胆俱寒。在广州兵团门口，他们贴了一副大大的对联：“老子英雄儿滚蛋，老子反动儿好汉”，横批是：“狗仔子翻天”。

3 月 2 日下午，华南实验学校、铁中、广雅、三中、七中、四十四中、五中、十七中、六中、二十一中、十五中、十三中、四十中、二中、八中、红一中、外语学校、人民一中、华师附中的主义兵，在八一中学开会，决定先砸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然后再砸五中、六中的对立组织。他们宣布了行动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私人财物；讲文斗不讲武斗；作好打的准备。他们对前来劝阻的空

军联络员说：“我们决心都下了，谁说也不能改变。我们已开过会了，人都通知啦。珠影太坏了，我们抄这一次珠影就垮台了，以后就不抄了。”

军区指示，想尽一切办法不要他们去。要现场劝解，要他们按十六条和军委八条办事。不能砸，要破私立公，搞大联合。万一去了，也只能是辩论，谁违犯纪律就制裁谁。

在3月3日广州军区的值班日记中，有如下记录：

询问警备司令部（“主义兵”砸中大红旗和珠影东方红的情况）。

答：“主义兵”在六中集中时（九百余人），警司已去人劝告。“主义兵”说：不砸可以，要去示威游行。已去。未在六中集中的一伙去砸了。

去珠影东方红一百多人，抄了家，未抄出什么东西（已转移），抓了三个人已放回。收（搜）出的两个铁锤，一条钢鞭已交。

去中大红旗五百人左右，进院内一百多人，四百多人堵在外面，女学生手挽手，筑了几道人墙，未冲进去。已进去的，砸了中大红旗的牌子，并烧掉了。至中午已散。全部散后部队才撤回。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在在堪忧。就在会议举行的同时，警司毅然决然，宣布对广州市公安局实行军管。这是恢复社会秩序的第一步，军管布告宣称：

一、军事管制之后，必须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保护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二、军事管制小组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支持公安厅、公安局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贯彻“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实行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建立以毛泽东思想统帅的非常革命化的无产阶级公安机关。

三、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的全体革命干、警和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必须在军事管制小组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坚守各自战斗岗位，认真履行职责。对于抗拒军事管制，消极怠工、擅离职守、自由行动、违抗命令以及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者，则一律依法惩处。

四、从军事管制开始之日起，外部群众组织派驻公安厅、公安局及其所属机构的代表应立即撤离。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冲击和扰乱军事管制的公安机关。外部群众，一律不要到公安部门进行串联。

五、全市革命人民，各革命群众组织，应积极协助军管小组和公安机关维持社会秩序。革命群众对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有意见，可向军管小组反映处理。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擅自抓走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

市公安局宣布军管一小时后，省革联驻公安局监督小组，即交出了小组的印章。3月3日下午，几名小组成员不得不向驻公安局军代表低头认错。军代表提出四点意见：一、你们自己来，我们抱着欢迎的态度；二、你们在公安局所作所为，要很好交代，要承认错误；三、在公安局拿走的东西要送回；四、军管小组随叫随到，不得违抗。

3月3日至6日，陆续对市电信局、航运局、黄埔港务局、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发电厂实行军事管制。3月4日，警司在中山纪念堂、省人委礼堂、省科学馆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万人誓师大会。军队似乎有决心扭转目前的混乱局面。

3月2日、3日两天，警司主持召开有150个群众组织、市、局、公司及部分工厂企业领导干部共四百多人参加的广州市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正式成立广州市生产临时指挥部。指挥部由警司代表、群众组织代表和部分领导干部组成。这是领导全市生产的权力机构。

当时广州市的经济情况相当严峻，市库存粮食只有1.64亿斤，2月份要销售0.7亿至0.75亿斤，库存粮食至多可供应到3月底。1月至6月，粮食缺口达2.5亿斤，需要省粮食厅调拨。第一季度市粮食局向省粮食厅请调二亿斤，只批给一亿斤。而广州市居民手中的粮票，多达0.6亿斤，一旦发生抢购，后果不堪设想。煤也是一个大问题，目前市民用煤存量只有25万吨，月用量四万吨，只能供应到7月底。去年每个月进煤三万吨，现在每月只能进煤一万吨，煤的来源和运输都成问题。由于缺煤，广钢第一道工序、广东轧钢厂、红旗轧钢厂均已停止生产。

省革联垮台以后，军区开始大规模扫荡与省革联关系密切的组织。3月1日凌晨4时，警司部队在公安机关和民兵配合下，以突然的行动，按预定计划，一

举捣毁了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地区总部及下属各分部，并宣布八一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原计划拘捕 130 名首要分子，实际拘捕 243 名，其中有些是其他组织抓来，或自动投案的。该组织七名常委中，有五人被捕。

取缔八一战斗兵团，除了因为它参与了一系列冲击军区的行动外，主要是依据去年 12 月 3 日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 12 月 1 日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其中第一条指出：“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而八一战斗兵团既犯了不准成立跨行业组织的天条，也犯不准转业、复员军人成立组织的天条，两罪并罚，殄厥渠魁。

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方式，与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相类似，按广州铁路公安处广州分处的一份文件规定：

凡大队正副队长、正副教导员、联络员以上骨干，罪恶民愤较大的，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六条第四条里所列的各种分子，参加后又有破坏活动虽不是大队长以上骨干，但有严重罪恶的，都要依法惩办。

凡中队正副队长、正副指导员、联络员及独立单位骨干，虽非骨干，但有一般罪恶行为的，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六条第四条里所列各种人。这些人要向当地公安所或本单位保卫科履行登记手续，并公开检讨，声明退出反动组织，接受群众批判。

一般成员不履行登记手续，但要向所属单位或街道以大字报等形式，公开声明退出反动组织，即不予追究。

在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同时，军区出动了大量的宣传车，沿街广播，并派直升飞机在广州市上空散发印有八一战斗兵团“十大罪状”的传单。

在主义兵砸珠影东方红的翌日，军队也采取行动了。3 月 4 日清晨 4 时，警司出动了一个排，公安派了 15 个人，重型机器厂、麻袋厂、橡胶等几个厂的民兵八百多人，包围了珠影东方红。据警司的报告：“行动迅速，没有发生事故，民兵动作好，天冷衣服少，也坚持二、三步一岗。”三名头头当场被捕。上午 6 时开全厂大会，宣读布告，解散珠影东方红及其下属组织。散会后把被捕的人带走，民兵、部队撤回，行动在 7 时 30 分结束。

警司宣告：“一、勒令‘珠影东方红’及其所属组织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不得改头换面，名亡实存。二、对一小撮首恶分子，逮捕法办。三、所抢劫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必须立即全部交给本司令部处理，不得销毁或转移。所劫的一切财物，必须立即如数退还原单位。违者，从严处理。四、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概不追究。”

3月5日上午9时，中大武装部召开中大师生员工群众两千多人大会。会上宣读警司对中大红旗、八·三一实行打击的命令，警司派出两个连全副武装的部队，进驻中大，驻扎在教学大楼。

警司颁布命令，指中大红旗“一再违抗中共中央的指示，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袭击革命群众组织，围攻革命群众，任意打人抄家，大搞非法武斗，实行白色恐怖；多次冲击军事机关和已经实行军事管制的广东、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恶毒地攻击人民解放军，狂妄地叫嚣‘要夺军权’……”罪名不一而足。同时勒令中大红旗的五名头头，“自命令宣布之日起，限五天内，将本人和‘八·三一战斗团’所窃取、窝藏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和烈性毒药全部交还，不得抵赖拖延、转移、销毁。并全部退还所抢劫、占用的一切公共财物，不得有任何损坏，对所进行的非法活动，必须彻底坦白交代，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将功赎罪。违者，从严处理。”

被取缔的组织还包括：电台东方红、红色广播兵、石井小坪红农友，以及军内造反组织战士歌舞团的千钧棒等，一批头头被抓。据千钧棒自称：“自3月16日警备司令部宣布‘千钧棒’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五个‘首恶分子’后，我们剩下的六个同志，在全国群众中成了唯一的‘劳改犯’，每天上午劳动一小时，其他时间是写检查，交代‘首恶分子与自己的罪行’。劳改的内容是：打扫院子、厕所，有的是团内派公差与团内的黑帮到外面扛木头。”

与此同时，军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纷纷奔赴各单位，演说、宣讲、做报告，批判省革联是“右派夺权”、“假夺权，真保皇”。

解放军开进了省委大院。造反派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也不得不拱手相让。广医思想兵、继红军等组织，派出汽车上街报喜；华师一月风暴等组织，也派宣传车上街广播；中医三〇一打电话给军区祝贺说：“解放军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

音，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由解放军接管广东。”广州三司表示：“通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听起来颇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

3月初，广州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部分重点单位包括：

单位名称军管时间军管小组人数

省、市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市 1 月 19 日 12

市粮食局 2 月 3 日 2

市第一商业局 2 月 3 日 2

广州日报社 2 月 28 日 12

省公安厅 3 月 2 日 11

市公安局 3 月 2 日 49

市电信局 3 月 3 日 15

市航运局 3 月 3 日 10

黄埔港务局 3 月 3 日 39

3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连（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师生，必须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的文化大革命。各大专院校师生，立即开展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的工作，按统一安排，分期分批进行短期军政训练：

各大专院校，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以外，对各级领导干部、教授、讲师、助教、职工，都应当采取团结、教育的方法，吸收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安排他们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

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已经由革命左派学生组织掌握领导权的，应着手吸收革命教职员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在条件成熟时，实行全面选举制，正式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权力机构。

规定中关于权力机构组成的一段，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为文革的最终目的：“改”——改革政权体制，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大专院校率先试行，可视作一场实战演习。如果行得通，很可能就会在全国铺开。

为了贯彻中央这一规定，3月7日，警司发出关于在广州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应立即回原地的通告。各外地大专院校驻穗联络站，陆续撤离广州。

至3月12日之前，全部撤离广州的有：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司）驻穗联络站、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驻穗联络站、北京工业大学驻穗联络站、北京医学院“八一八”战斗团驻穗联络站、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穗联络站、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井冈山之声”、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赴穗点火队、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等33个组织。

撤离后尚留部分人员的有：新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驻穗联络站，留下八人办报纸；清华井冈山驻穗联络站，留下四人办报纸；哈军工被警司留下三人交代问题；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警司留下16人交代问题；武汉三司被警司留下三人交代问题。这类组织共12个。

还没有撤离广州的，只剩下一个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穗联络站，共三十多人。

广州地区各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均奉命整风。截止至3月4日，广州一司、三司、华农东方红公社、外语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总部、中山医东方红公社、华工红旗公社、中医学院三〇一大队、广东艺专学校东方红公社、中南林学院东方红公社、广医红旗、广工红卫兵、广州体院革命造反总部，先后开始整风。而尚未有动作的单位有暨大、华师、行政教育学院和美院。

整风的办法，通常是先用一周或半月时间，进行动员和学习文件，然后大鸣大放，揭发问题，检查整改步骤，进行整风。

而中学则开展军训，准备开学。3月10日，在省体育场召开有几万师生员工参加的“中学复课闹革命的誓师大会”。市十二中、二十二中、三十四中、省实验学校、铁中等校的学生，纷纷回校报到，参加军训。后来康生在接见广州军区负责人时说：“军训有四大成绩。第一是把学生集合起来了。军训以前，一个学校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军训以后，学生回校达到95%。第二是组织学生学

习了毛主席著作。第三是左派发展了。第四是在有的学校促成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所以，军训的成绩是主要的。”

但困难仍然很大，经过近一年的动乱，许多创伤，不是马上能够愈合的。据军区中学联络员称，当前中学开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教员与学生关系紧张，被斗过的教师不愿在原学校工作，要求调动；武斗过教师的学生怕报复，不敢回校；二、组织涣散，领导班子难以形成，夺权组织管不了事，学生生活散漫，不接受管理，下厂学生，工厂不放；三、思想兵对主义兵矛盾很深，对主义兵势不两立，到处打击；四、公物损坏严重，桌椅缺损相当多。

整风运动一来，一些以前和军队关系比较紧张的组织，昨天还是轰轰烈烈，八面威风，今天的日子就黯淡下来了。3月5日，广医红旗召开全体队员会议，负责人公开检讨，承认反对军区的错误，“向毛主席请罪”。解放军联络员在会上发言。广医红旗无话可说，随即派代表到军区请罪。

中南林学院东方红公社，也从3月1日开始整风，大鸣大放。据军区文教组反映，“各群众组织对东方红公社意见很多，主要是：不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没有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群众要求解散监督小组，彻底闹革命。”对中南林东方红参与了冲击电台、冲击工程兵司令部等活动，要求公开向群众检讨。3月6日，东方红派代表到电台检讨，暴动纵队也派人到工程兵司令部承认错误。

3月7日，广州一司、三司中学部等单位发起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有五千人参加的大会，表示支持解放军。会上有12个群众组织代表发言，七中红旗等四个单位代表则“向毛主席请罪”，并声明过去他们所攻击军队的传单、漫画、标语等，一律作废。大会通过对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信，会后群众上街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支持解放军的一切革命行动。

3月11日，广州一司发表公开表明，对他们曾在电台围攻军管小组，表示认错，声明称：“对于受我们攻击过的电台新领导黄业同志及其他解放军同志，我们诚恳地表示向他们赔礼道歉。其外，驻电台小组在撤离电台时，为了掩饰我们一司参加电台‘一.二二’夺权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而印发的《一.二二电台的夺权是革命行动》的传单，观点同样是不正确的，在此，也一并声明作废。”

作为广州地区最大的工人组织，地总也于 3 月 10 日发出“当务之急——开门整风”的号召。总部以及所属分区、分部，开展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的全面整风运动，“整掉队伍内不自觉地滋长出来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等不良思想作风，（根据）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对总部进行精简机构，调整人员，纯洁组织”。地总是和军区关系较好的群众组织之一。他们兴高采烈地把 3 月称作“东风浩荡的 3 月，成绩辉煌的 3 月”。

由地总、红总发起的筹委会，从 1 月底就开始酝酿串连了，2 月 4 日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发出“实现广州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倡议书。2 月 13 日发表大联合筹委会宣言，参加发起的单位有 14 个总部，所属成员约 27 万。广州便有两个大联合筹委会了。“这个问题，直到 2 月 21 日晚上，经部队同志耐心说服才统一了思想，一致通过吸收‘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参加了‘省联总筹委会’。”

省联总核心小组成员包括：王云亭（红旗工人）、吴开东（三司）、李广（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何登培（省直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陈保伟（红旗农民总司令部）、黄秀琨（地总）、冯春青（市工交战线红旗造反总部）、赵树安（一司）、张礼敬（省政法革命委员会）。由地总的黄秀琨担任核心小组组长，办公地点在原省委大院内。

地总负责人之一的莫超海和黄秀琨曾向笔者详细讲述省联总的情况。莫超海说，广州“首先叫做大联合的就是这个（省联总），这是最早的大联合，但这个大联合非常短命，3 月军管以后就没了。”黄秀琨也说：“这是一个松散的联合。军管以后就自然消失了，名存实亡，各个山头的人都不回去上班，各走各的，搞自己的。它也没有说消失，也没有说存在。”

但 2 月份，在军区看来，观点对立的两派群众，现在统一在一个组织之下了，广州的大联合似乎露出了曙光。省军区政委陈德在 2 月 18 日，高兴地指示部队支左人员：“广州最近成立夺权指挥部，这是一个进步，给他们密切搞好关系，其中可能有个别的组织不好，暂时没什么关系，要好好研究一下，了解他们的政治态度，进行必要的帮助。”陈德所说的“夺权指挥部”，就是指“省联总”。据广州市工交系统武装部的支左人员摸底研究结果如下：

这些单位初步掌握的情况看，其中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等六个单位是比较好的左派组织，约 23 万人，是大联合的骨干力量，团结协作也比较好。有毛泽东思想机电工人广州造反联合总部等四个单位，大方向基本对头，但领导班子和基层组织都存在一些问题，可算是中间偏左的组织，人数不足一万。另有毛泽东思想工人造反团广州总部、广东红旗工人誓死保卫毛主席总司令部、红旗工人赤卫队、秋收起义工人广州革命造反总部等四个单位，约三、四万人，对大是大非问题还摇摆不定，领导班子或基层组织也有问题，系中间偏右的组织，对大联合敷衍应付，实则在酝酿小联合，筹划出版广州工人小报，和大联合相对抗。

这种对群众组织作左、中、右划分的做法，在今天看来，可圈可点。因为从来没有人正式对左、中、右的划分标准，在法律上（或者政策上）作出界定。以往的标准，无非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就是左派，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就是右派，但什么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言人人殊。为什么说这个组织左，为什么说那个组织右，也从来没有作过清晰准确的依据解释，有时全凭联络员一句话，让人觉得带有很大的个人主观性和随意性。

同样是市工交系统武装部，可能是另外一些支左人员，在 2 月初一份对工人组织左、中、右的调查报告，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从政治态度方面来看，较好的有红旗工人赤卫队广州总部、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广州工交战线红旗造反总司令部，较差的有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最差的是八一战斗队。”此一时，彼一时，实在不知何所据而云。

对于大专院校，军区也是照样划分左右派：“左派势力日益联合壮大，右派势力正在分化瓦解，这是近一个月来大专院校派别斗争的总的发展趋势。广东实行军事管制，特别是坚决打击、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等反革命组织后，更加速了这一发展趋向。据对若干较有影响的大组织的二万七千人的初步划类，左派占一万四千，中间偏向左的占一万一千，右派占二千多。”

若按左中右派别占据优劣势的现状来排队，则其情况是：

左派占优势的有华农、中医、广工、师院、体院、中大等单位。这些左派组织中有的组织和成员，在运动初期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扣上过“老保”的帽子。

右派占优势的有暨大，但正处于瓦解中。

左、右派势均力敌的有广医，但左派正趋于壮大中。

中间派占据优势，左派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有华工、中山医、中南林、外语、美术学院、教育学院等，其中有些中间偏左的组织经过整风之后，可以跻身左派行列，有的则要靠左派力量的生长壮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力量的对比。

因此，军区认为，现在还不具备马上实行大联合的条件，院校中的阻力还很大。这些阻力主要来源于：

第一，阶级敌人挑拨，派系斗争激烈。左派力量还要经过一番艰苦斗争，团结争取广大中间层，彻底孤立右派，才能最后形成巩固的大联合。

第二，各院校普遍存在的造反派与原“保”字号组织的矛盾很多，裂痕较大，一时尚难解决。造反派多为运动初期受压制，被整黑材料的同学，以后他们的组织发展壮大乃至掌权了，却又反过来采取砸、压等办法压制所谓“保”字号的组织和同学。而原“保”字号的一些组织多为党团员、学生干部，出身成份都很好，他们被砸后，纷纷长征串连，最近陆续返回院校。他们怨气大，对立情绪大。要彻底消除老大（造反派）和不服气（原“保”字号）的思想，须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价别人，并就本学院的若干重大问题取得统一认识之后才能从思想上、组织上真正联合起来。

第三，采取什么形式联合分歧也很大，其中主要是以谁为主的问题，是以现在已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为主联合，还是全部取消，重新建立红卫兵组织。这个问题，立场地位不同，看法也不同。需要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破私立公中加以逐步解决。

军区没有公布划分左中右的标准，但基本上以省革联问题为线。在造反派中间，则把所谓“四大事件”——“冲击电台、市公安局”、“二·五反夺权”、“二·八冲击军区”和省革联问题——作为标准，“当时社会上把四大问题看得极其严重，看成区分革命与否的分界线”。因此，各派群众组织，在联合之中，又酝酿着分裂。3月6日，广州一司忽然开除广医红旗，并在社会上散发传单。这件事又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担心会触发各组织之间新的冲突。

据广州一司公布的开除原因是：广医红旗在四大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一、2月7日广医红旗自己带队伍冲电台；二、因为广医红旗本身是省革联主要成员，

公安局就是省革联在 1 月 22 日夺的权，而 1 月 25 日反夺权就与他们对立了。1 月 25 日因反夺权问题，引起武斗，广医红旗等把一总部几千名民警打成反革命，把反夺权定为反革命暴动。三、2 月 8 日广医红旗自己带队伍与省革联其他组织冲军区。四、省革联的夺权没有实行三结合、大联合，只有几个学生组织参加，把广大革命群众排挤在外，同时夺权后把矛头向广大革命群众，广医红旗参与了这些行动，仍不承认错误。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解放军联络员把他们所犯错误看得过于严重，故其看法影响了我们（广州一司）”。一司召开下属各单位头头会议，有 23 个组织参加，“其中中南林学院东方红、中山医学院东方红要求开除最积极”，会议结果，21 个组织同意开除，两个组织反对（艺专东方红和市一卫校）。最后决定开除。这成了广州一司分裂的先兆。

在军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后，内乱似乎出现了结束的迹象。3 月 25 日，广州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成立。《广州日报》在翌日发表社论《广州的第一声春雷》祝贺，因为这是广东省第一个实行了三结合、联合夺权的单位。解放军对此表示支持。而那些曾经闹得最欢的组织，现在落马的落马，摔跤的摔跤，在解放军巨灵之掌打击下，化作野马尘埃。即使幸存的组织，对军队以雷霆万钧之势，介入文革，也感淡惶惶然不知所措。除了个别与军区关系较好的群众组织，还在那儿欢呼雀跃，摇旗呐喊之外，其他组织普遍陷于迷茫之中。大家心中的疑惑表现在：

一、搞不清“接管”（指军队接管一些单位—笔者注）的含义，如首都三司有的人问接管是什么意思？夺权怎么办？广州三司中学部李××认为“接管”就是“包下来”，因此感到自己今后“无事可干了！”

二、对军事接管后，广东省大联合、大夺权的发展趋势感到心中无底，普遍要求军队加强宣传，及时指导。三、少数人感到军队这也接管，那也接管，手伸得太长，形成了包办代替。

广州一司开除广医红旗，其实反映了这种迷茫情绪。他们纷纷向军区提出疑问，而军队也莫衷一是，以至不得不由广州军区统一拟定一份回答群众组织提问的标准答案，以供支左人员采用。这份标准答案在解答“军事管制之后夺权斗争还搞不搞”时说：

一定要搞，而且要搞得更好。由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参加，1、可以更好地了解各方面情况，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弄清谁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可以更有力地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大长左派志气，大灭右派威风，大有利于左派队伍的巩固、发展，实现大联合。3、可以更好地在与革命左派一起战斗中，互相学习，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加强团结，迅速发展和壮大左派力量。4、可以使真正的革命领导干部迅速地站出来，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在一起，开展夺权斗争；可以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使他们积极工作。

对于军区来说，其实它自己连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弄不清，遑论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弄清谁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对于造反派来说，吃不到的葡萄，说它是酸的无所谓，但已经煮熟的鸭子，从碟子里飞走，就决不善罢甘休了。因此，他们更关心的，不是军管后还夺不夺权，而是军管以前的夺权还算不算数？军队的回答是：

这要区别对待。

一、经过调查研究，凡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按照“三结合”的正确方针，联合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应予承认，并热情地帮助他们掌好权、用好权。

二、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但没有实行“三结合”的，应民主协商，依靠革命群众，按照“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核心。

三、中央规定不准夺权的单位（如外事部门），领导成员个别人问题严重的可以撤换，多数人有问题可以改组。

四、右派夺了权或“假夺权”的单位，必须实行“三结合”，重新把权夺过来。对右派组织，经过一定手续，予以解散。

由于弄不清军队以什么形式介入文革，介入到什么程度，大部分群众组织都采取观望的态度。1月底2月初那种风横雨骤的局面，似乎归于平静。

3月15日，星期三。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当天下午3时，广州市隆重召开有部队、群众组织、干部代表五千多人参加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大会。黄永胜在大会上讲话，他说：“今天这个会议，是遵照中共中

央指示，正式宣布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从今天起，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全省，对全市实行军事管制和统一领导。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我们表示最热烈地拥护！最坚决地贯彻执行！”

黄永胜在阐述军管理理由时，公开批评了省革联：“省、市人委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广东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得较晚，革命左派还需要在斗争中成长和联合起来；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站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就把一个省的大权轻率地让给了‘省革联’的一小撮人，而‘省革联’在接权以后，又唯我独‘左’排斥革命左派和人民解放军，抵制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这不仅妨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而且也对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黄永胜宣布军管的任务是：“一、坚决贯彻执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的作用，积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早日实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建立起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胜利地实现夺权斗争，彻底地完成斗、批、改的任务。

“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掀起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生产的班子，狠抓工农业生产的关键性措施，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工农业生产计划，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坚决反对和彻底肃清反革命经济主义。

“三、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坚决反对右派，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彻底粉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逆流，保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正常进行，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黄永胜、刘兴元、詹才芳、温玉成、陈发洪、邱国光、江燮元、阎仲川、任思忠、吴富善、吴瑞林、陈德、黄荣海、王道全、邓秀芳。主任黄永胜，副主任刘兴元、陈德。

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组织小组、宣传小组、无产阶级专政小组、文化革命小组、文教小组、统战小组。生产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计划小组、农林水小组、工交小组、财贸小组、卫生小组。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黄荣海、江贤玉、阳震、罗兴洲、张鸣夫、鱼鉴、高宋卿、汤林、徐良、江田。主任黄荣海，副主任江贤玉、阳震、罗兴洲。

省军管会部队干部总人数为 1519 人，军职以上八人，师职 44 人，团职 253 人，营职 315 人，连职以下 899 人。市军管会部队干部总人数 132 人，师职以上 14 人，团职 27 人，营职 52 人，连以下 39 人（不包括在省军管会内）。

全广州一片沸腾，“毛主席万岁！”“向解放军学习、致敬！”“热烈祝贺省、市军管会成立！”的口号声，响彻全城。拥护和支持省、市军管会成立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贴满街头。各群众组织举行五花八门的庆祝活动，到军事机关、省、市军管会报喜的队伍，络绎不绝，仅当天晚上，就有 21 万人到省军管会报喜。刚好在广州访问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居然也兴致勃勃地跑出来接见报喜的群众，一尝接受群众欢呼的滋味。

当天，省军管会布露全省：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自 1967 年 3 月 15 日起，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全省实行统一领导。

广东省地处东南沿海前线，面临港澳，情况非常复杂，为了适应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需要，保卫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的。

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是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它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和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各项方针政策，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广州市的三街六市，贴满了市军管会第 1 号布告。这是一份历史性文献，全文照录如下：

布告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广州市自 1967 年 3 月 15 日起，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全市实行统一领导。为了贯彻执行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第 1 号布告的要求，必须：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依靠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把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踞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二、坚决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生产的班子，组织和领导好生产。当前首先动员一切力量，大力支援春耕生产，多、快、好、省地完成工业生产计划，积极搞好财经管理、交通运输和市场供应工作，保障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需要。

三、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做好治安保卫工作，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对过去清理回乡而又窜回城市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应坚决清理回农村，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之下，进行生产劳动。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治安，破坏生产、交通和扰乱市场者，依法惩办。

四、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决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翻案，违者，必予制裁。

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把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彻底。

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以及回乡生产的干部，都应当遵照中央指示，迅速离开广州市，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好春耕生产。

七、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希望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提高警惕，坚决支持和维护军事管制。对那些抗拒与破坏军事管制者，依法惩办。

八、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把广州市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努力奋斗！

此布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

军管以后，解放军继续打击那些被定性为反革命的组织。3月19日凌晨1时，省公安厅和警司派人到广州远洋分公司，逮捕了“五湖四海红色造反兵团总司令部”的三名负责人。清晨5时，警司在市公安局配合下，按计划行动，突袭“老红军总部”，拘捕了九名负责人。

据造反派的材料说，军区准备在3月22日大规模扫荡造反派组织，预计该战役将持续到3月25日，被军区列入了“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和“非法组织”名单的，共计147个（未包括公安厅二办的名单）。

公安厅二办也制定了一份打击名单，重点是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按照部署，要在4月15日交易会开幕前，有组织、有计划，分期分批，把反动组织取缔完。口号是：“奋战一个月，摧毁一切反动组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公安厅二办从3月12日起至3月27日，对省直站下属102个群众组织（其中重点组织27个）展开了全面调查。同时结合调查的有暨大东方红、暨大工人大队、中南林学院教工红卫队、省中医学院反迫害大队、中南科学院等，另抽调七八名干部负责调查中大红旗、八.三一等组织。调查任务：一、调查反动组织和非法组织；二、处理有关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案件，如写“反动标语”等；三、追查秘密文件档案和物资；四、保卫生产。为了迅速达到取缔的目的，各单位的组织要进行排队，参加省革联的不能依靠，坚决依靠反省革联派。

初步调查结论，把27个重点组织分了类，定为一类的（条件是“三冲一抢”，搞白色恐怖，干坏事多的）群众组织十个，1670人；定为二类的（参加“三冲一抢”，但问题一般）群众组织八个，1693人；定为三类的（有一般活动，但问题不大）群众组织九个，801人。所谓“三冲一抢”，即冲公安局、冲军区、冲电台，抢文件。对一类组织的头头，无论是幕后指挥的、为首的，还是转入地下的，都要严厉打击。

据原公安厅副厅长、二办领导小组组长杨步尧披露讨论取缔省联站的情况：

3月20日或21日，二办领导小组开会（专政小组寇庆延、马芳、鲁少泉等人参加）研究“省直站”（不包括其下属组织）的性质问题，初步认为“省直站”（不包括其下属组织）属于反动性质。但又觉得定为反动组织太重，故初步货币于定为非法组织，准备进一步的调查，充实材料后，再研究定性定案，然后向省军区汇报请示，予以取缔。

省军区较为慎重，指示二办必须进一步调查和核实材料后，才研究定性、定案。最后省直站被划为“内定反动组织”，不戴帽子，列其罪谴，宣布取缔。所属基层组织内定为反革命组织和反动组织，进行取缔，或不定性质勒令解散的有17个。其中省政协分站、粤剧院在险峰战斗队为反革命组织；文化局东方红、广州海关革命造反总部、粤剧院东方红、省话剧团东方红、省科委革命造反兵团、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分站、南海水产研究所1110兵团、省化工机械进出口公司革命造反大队、省政协东风战斗兵团等被划为反动组织；中南公路工程处修配厂联合兵团被划为右派夺权单位，勒令解散。除此之外，还有六七个被列为重点组织，“接近反动组织边缘”。人员方面被列为打击的重点对象15名，其中准备拘留五名。

3月28日，广州市军管会就“镇反”问题召开会议。江贤玉在会上作了指示，他说，“目前，对敌人打击不力，反革命气焰未打下去，与广州军区首长要求还差得很远。”他提出目前必须解决以下问题：第一，“解决干警的思想认识问题……要使广大干警认识镇压反革命的意义，对敌人要坚决镇压，否则内外反革命复辟，我们就要人头落地。”第二，“改进工作方法问题。为了适应当前要求，打破关门主义办案，各级领导要深入第一线，不要在机关批案，要在那里抓人，就在那里批判斗争。”第三，“加强宣传工作，教育群众，分化瓦解敌人。”第四，“下次战役行动主要是解决打击敌人不力的问题。”初定4月2日为第二战役的日期。

30日下午2时，中大武装部以召集红旗工人赤卫队骨干会议为名，2时30分宣读命令，在驻中大部队和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拘捕九名负责人。

军管小组陆续进驻各重要地区和单位。

单位名称军管时间军管小组人数

省委办公厅机要局 3月15日 5

花县 3 月 15 日 30

从化县 3 月 15 日 16

文冲造船厂 3 月 25 日 15

省航运厅 3 月 29 日 34

中科院中南分院 3 月 23 日 10

广州海关 3 月 26 日 13

南方日报社 3 月 30 日 7

省水产厅 3 月 30 日 17

第二轻工业厅 4 月 2 日 7

从此，广州地区的文革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迟泽厚访谈》（叶曙明）

叶：您认为文革分几个阶段？

迟：我认为文革分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从 1966 年五一六通知，到 1967 年上海一月风暴以前，大致上可以称为破四旧阶段，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这一阶段的主力军是红五类，也就是保守派的社会基础。全国有两个有名的代表人物，一个是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一个是谭力夫，这两人提出了血统论。这时打击的是地富反坏右这一批人，抄家啊，杀人啊，干得很来劲。社会乱起来了，学校停课了，红卫兵组织起来了，党政机关也开始不那么灵验了，文化大革命被提到日程上，全国人民都卷进去了。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开始形成一个气候了。

到了上海夺权以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以造反派为主体的。批判反动血统了。血统论就是要保护旧的官僚体制，维护旧秩序。毛泽东说 1967 年形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要把这条黑线彻底搞掉，就要冲击各级党委。结果贺龙被关起来整死了，刘少奇也关起来了，大部分高级干部都被打倒了。红五类以前骂别人是狗崽子，现在自己变狗崽子了，马上偃旗息鼓，灰溜溜了。

这时造反派起来了。造反派是不讲出身的，当然也有干部家庭的，但大部分不是。我记得 1967 年 5 月，黄永胜、温玉成在军区接见华工红旗的头头高翔，当时就有人揭发，说高翔的父亲是 13 级干部，在当时算是高级干部了，是一个

进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相当于厅局级干部，所以他（高翔）不能当（群众组织）一把手。后来连周恩来都过问此事，可见当时大家对高干子弟是很忌讳的。高翔的父亲算是最大的干部了，当时一般市民家庭、工农家庭可以（参加造反组织），高干不行，臭了。高干子弟差不多百分之百参加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是打砸抢的能手，可以说杀人不眨眼，抄家啊、打啊、破四旧啊、砸啊、烧啊，干的是这些。抄地富反坏右、抄民主人士、抄国民党漏网分子、抄资本家，他们有积极性，你叫他打省委、抓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他不干。1967年1月造反派起来后，他们就成对立面了。

叶：广州主义兵和军区的关系一直不错吧？

迟：主义兵都是军区领导的子弟嘛，像七中、铁中、八一中学都是军区领导的小孩在上中学。那时军区领导的孩子都在上中学这个档次，上大学是个别的。主义兵（和军区）有这样一个天然的联系嘛。后来都偃旗息鼓，躲到家里了。

叶：广州主义兵杀人与外地相比，不算多吧？

迟：广州总体来说，比较注意政策。广州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死人最少的一个城市。社会上很多人胡说八道，上次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XXX写了一篇关于广东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东西，千把字，拿给我审稿。列举了一二十条，说军区和林彪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啦。我看了以后不客气地说：这些事情一件都没有，完全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甚至是颠倒黑白的。这是第一。第二，你写地方志，就写地方的问题嘛，军队支左做了什么错事，你可以写，但你写军队的事情干吗？又是军队印了多少万本林立果的小册子啦；又是林立果到哪个工地搞什么活动啦；又是军队给林彪修了什么房子啦；又是9月13日那天出动演习，形迹可疑啦。我说这些事由军队查去，和你有什么关系？全都是牵强附会！军队天天训练，9月12日训练没事情，9月13日就不行了？9月13日不训练，军队干什么去？都关在营房里？躲在营房里不是更成问题了？你躲在营房里干什么？是不是在等候命令？这是胡闹嘛。说9月13日有一趟军列进入广州，这军列天天在运，军火天天在消耗，当然要不断补充了。兵工厂在北方，在三线，当然要往广州运，不是广州往北运。那都是胡说八道嘛。

我是广州市志军事志的主编之一，最后定稿也是我定的。写到文革那一段，我就坚持这个原则。广州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在全国是最小的。全市死亡在全国更

是微乎其微。武斗发生最晚，清理最早，死伤最少。湖南（1967年）6月份就死人了，广西更早，广州到7月下旬（才死人）。总说广州是面临港澳，情况复杂。这么一个大城市，二三百万人，才死了200多人，在全国算什么呀？湖南死多少人？江西死多少人？广西南宁一次死几百人，广州一共才死两百人，连那些被当成监狱逃跑人员（劳改犯——叶注）打死的吊死鬼也算了，也就两百人左右。而且大部分都属于两派武斗中死的，真正抓到后凌迟刀刮的，基本上没有。如果不是广州军区在这里，管住这个局面，那还不乱套了？

叶：1967年二·八冲军区的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迟：这文革第二阶段是造反派当家，冲冲杀杀。开始对着党政机关，后来不过瘾了，就转向军队。为什么要冲军区呢？就是因为军队支左，不支持造反派，支持了保守派，所以就到军区造反，把军区包围起来。既有地方的，也有军队的，地方的就是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都是些知识分子。这知识分子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珠影有些演员、编导，要保自己过关，为了活命，就不惜踩着别人。他们包围着军区，用半导体喇叭——那时还是一种新科技——开着宣传车大声叫：希望解放军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指挥员。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军队里的也有，主要是文艺团体，歌舞团的、文工团的、体工队的，小知识分子，都是过去不受重用的，这些人也容易煽动起来。2月8日把军区包围起来了。后来中央军委下了命令，这才撤离了。

叶：那时军队的文艺兵已经搞起群众组织了吧？像千钧棒。

迟：搞起来了。千钧棒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

叶：军区机关有没有搞？

迟：广州军区的机关是全军最稳定的，军区的党政机关没有群众组织，一直比较团结。个别人有看法，有活动，但整个机关是团结的。司令部的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没有泄露出去，如果分成两派，那还有什么重大机密？都荡然无存，没有机密啦！

这是造反派最风光的时期，持续到1968年7月。这时刘、邓、陶司令部已经被彻底打倒了，造反派的使命就完成了，他们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可这些人的头脑继续发热，据说蒯大富还拉了个班子，准备筹备九大呢。这件事是康生

讲的，康生这个人虽然经常撒谎，可这件事蒯大富是做得出来的。他们觉得自己在共产党内占个一席之地，是理直气壮的。

到1968年对广西的七·三布告为标志，造反派从此以后就一蹶不振了。一个七·三布告，一个七·二四布告。七·二四布告是对陕西的。从1967年1月开始，军队一直不敢行动的，包括军区站岗哨兵的枪，都没有撞针，没有子弹，是用来装样子吓唬人的。军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死不开枪。军队是不得不干这工作，勉为其难，夹在当中很难受。部队不断有伤亡，被造反打死的也就打死了。

8月23日那次冲军区最严重了，连军区作战大楼都占领了，就是作战室没敢进，趴在窗户看看，里面确实挂满地图，门口写着“机要重地，闲人免进”，关着门。就这里没进去。温玉成还真躲在里面，躲在作战室的电话楼里。其余大楼都进去了，连红旗都插到楼顶了，造反派确实嚣张。警卫员徒手挡住他们，不让他们上，他们五六人抓住一个战士，一拖就拖出去了，他们的人源源不绝，几千人上万人都进来了，你一个警卫连堵住楼梯口，拖一个少一个，拖一个少一个，最后毫无办法。如果军队可以开枪，一个排可以打一万人，但不行嘛。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就不客气了，真开枪了，造反派马上就老实了。

7月26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五大司令，蒯大富、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说他们既不斗，也不批，也不改。他们五人联合发表了一个认错声明，然后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以那为标志，造反派从此完成历史使命了，以后陆陆续续被抓起来了。这就是第二阶段。

叶：文革中有很多事情至今仍讲不清。

迟：能讲得清，怎么讲不清？是不想讲清。现在有档案在，有人在，怎么会弄不清呢？有很多禁区不想弄清。九·一三事件搞不清？林彪事件那么多活口都在，那么多材料都在，怎么搞不清？搞得清，就是不想搞清。我举个例子来讲。1975年由《南方日报》发起，批判前省委主要领导人，实际是指刘兴元，说他反对江青同志，反对由江青倡导的样板戏创作路线，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谁打头呢？把红线女推到了第一线。

有这事情吗？根本没有。刘政委在省委会议上讲过要走自己的路？刘兴元是非常谨慎的，他能这么说吗？哪有这个事情啊？有没有在军队讲过？军队也没

有！军区文化部长都很熟啊，哪有这事？可当时铺天盖地，《南方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批前省委的主要领导，就是配合四人帮的政治需要，要整广州军区的某些领导。半年以后，四人帮垮台了，江青的三突出也受了批判了。如果刘兴元当年有这个发明创造的话，刘兴元不就成了反江青的英雄了吗？可刘兴元照样臭。你说想不想搞清？肯定是不想搞清，需要就给你扣上去。江青倒了，刘兴元还是无声无息的，也没说他反对过江青，倒是说刘兴元他们在林彪垮台以后，又一头扎进了江青的怀抱。

叶：周恩来 1967 年 4 月在广州的讲话，对广州文革有什么影响？

迟：1972 年基辛格访华前夕，中央集中了一些人在北京钓鱼台，整天准备材料，军事方面的、外交方面的。总理的顾问班子、外交部的老领导干部都在。周恩来的秘书钱家栋——就是 1967 年跟总理来（广州）的那个秘书，他的名字叫家栋，“家庭的栋梁”，有四旧意识，文革后期到外交部当大使时改了个名字叫嘉冬——钱家栋见到了阎仲川，就凑上来对阎仲川讲：“唉呀，总理叫我向你说个话，总理讲，67 年 4 月那次啊，他在珠江宾馆讲话，那时候啊，他要不表那个态就好啦。”

叶：这话是 1972 年讲的吗？

迟：是 1972 年大概 1 月吧，因为 2 月份尼克松就来了嘛。这就说明总理当时在珠江宾馆的那个讲话，很多是违心的。调子是中央文革定的。那时很多材料是中央文革广州记者站的记者给总理提供的，其中的记者五花八门，既有新华社的，也有军队调来的，那些记者都是极左分子，其中有一个政治学院姓姜的，浙江人，他是主要的。好像还有一个女同胞韩舞燕，驻香港特派记者，写了长篇文章。他们在广州采访广东文化大革命，这些人我不具体评论，但谎报军情、煽风点火的事情干了不少。

比如七·二〇事件以后，8 月 13 日我到了北京。杨成武和黄永胜关系很好，都是原来红一军团的嘛。杨成武那时是军委办事组组长，跟毛泽东到南方巡视。中央文件他都看了，他悄悄地把他的情况简报给黄永胜看——黄永胜经常往杨成武那儿跑——黄永胜拿回来看，我就看到其中一份，是反映广州军区对七·二〇事件的反应。七·二〇事件是个测温表啊，你什么态度？对武汉事件你拥护谁？是拥护三钢造反派，还是拥护百万雄师？是同情陈再道，还是拥护谢富治、王力？

这是不能含糊的。这个驻广州记者写得很厉害，说七·二〇事件传到广州后，广州革命群众组织——就是说旗派了——怎么样同仇敌忾啦、义愤填膺啦，对百万雄师反革命保守组织怎么样愤慨啦，怎么样对谢富治、王力同志表示敬佩啦，什么慰问啦等等。“我们也到了广州军区大院，令人不解的是，广州军区营房的墙上，却见不到一张拥护中央对七·二〇事件指示的大标语。”

这家伙没有直接说你广州军区怎么样坏，就像说廉颇一饭三矢，一顿饭拉三泡屎，还能上阵吗？这廉颇的前途就被葬送了。我很纳闷，广州军区表了态了呀，不对呀。我回来一看，（军区）墙上还写着“向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致敬”、“拥护中央对七·二〇事件的英明指示”呢，敢不表态吗？

叶：是新华社记者写的？

迟：就是中央文革的记者，刚才说了，来自四面八方，有新华社的，也有从一些大学调来的，也有从军队调来的，都打着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名义，其实什么人都有。哪个人写的我不知道，但像这样的简报报上去，让上面的人看了作何感想？这不是害了你吗？记者就干这种事。

所以，总理（在珠江宾馆）那个座谈会，总理就是听他们的，他们提供的材料，一叠一叠，一口袋一口袋的。当然总理不会完全被他们蒙蔽，有时晚上听他们的，白天总理就在留园听军区常委们的汇报。他是兼听的，但最后的表态是中央文革定的调子，哪个保，哪个革，总理是不能讲的。

叶：总理回到北京以后，还打电话到广州，对一些提法作了更正。

迟：是的。原来讲的更激，就是保守组织，后来更正了，就是思想上偏于保，而且他们有那么多的人，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就没有用原来那个话了，原来那个话让造反派抓住更不得了，用这个来压东风派，东风派就更艰难了。就在他（周恩来）回到北京的当晚，又叫他的秘书周家鼎给广州军区打了电话，对他离开广州前的讲话作了补充和修改。来电特别指出，东风派的两个最大的工人组织，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这就定了个性。

那时的造反派分几个等次，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群众组织，也叫造反派组织，是响当当的；革命群众组织是中间派，不死不活的，可以不打倒；再就是保守组织。后来总理发明创造出“思想上偏于保守”。所以后来就叫东风派“偏于保”。偏于保还是保，也还是要打倒。七·二〇事件以后就压军区，一定要把它打倒。

保守派是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社会基础，从理论上讲是敌我矛盾，是要镇压的。

对总理在广州的表态，应该说，广大群众组织是不满意的，军区领导是表示遗憾的，但也有它的好处。他没有把这些组织说成是保守组织，军区以后就守住这条线，总理已经讲了，他们只是思想上偏于保守，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反对把他们瓦解。这就比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强多了，那些地方对保守组织是格杀勿论的，打得家破人亡，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基础”啊。广州就紧紧守住总理的这条线，对这些人还要教育、争取、团结、改造，他们（造反派）就没话可讲了。从这点上讲，总理还是留有余地的。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他没有完全按四人帮定的口径做结论，这是不幸中之大幸。

叶：军区支左的指导思想是怎么样的？

迟：（文革）第三阶段就是从七·三、七·二四布告到九大前后。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就是尾声了。以后说文化大革命是76年结束，那也是一种算法了，但基本上没有暴风骤雨式的大运动了。

这时右倾保守派抬头了，造反派倒了，保守派自然就扬眉吐气了。革委会在此之前已经陆续建立了，广州的革委会是1968年2月21日建立的。当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权威，他们（造反派）要冲就冲进来了。从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造反派就老老实实了，你不听话的，真抓；你要敢动武的，真打。造反派都非常现实，过去放纵他们，他们当然厉害了，你只要不放纵他们，他们最老实了。

文革分这三个阶段，两头是保守派为主，中间是造反派为主。闹得最凶的是造反派，时间也比较长，一年多吧。广州市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这个总的格局下发展的。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第二阶段开始，就不断地受到冲击。那真是疲于应付，可以说是狼狈不堪。军队的政策、纪律观念是很强的，你上面要支左，我当然就要去支左了，介入群众运动中去。但支持谁？为什么支持保守派？主要还是根据上面。几十年所受的教育、实践经验，什么叫群众？不就是劳动人民吗？到这些组织一查，他是工人，他是农民，他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个体劳动者，这个组织不错，都是正经人；他们拥护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政治态度好；拥护解放军，

支持解放军，那（解放军）当然支持他了。造反派不是，他们来了以后咄咄逼人：你们对赵紫阳什么态度？你们对旧省委什么态度？你们对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什么态度？对军队怀有很大的敌意，训斥、责难，军队能有好感吗？像黄永胜接见造反派头头，武传斌在黄永胜跟前，叼着个烟卷，有点称兄道弟的味道，根本不放在眼里，很自傲，军队对你能有好感吗？所以军队必然支保，开始都支保。

后来中央文革一再指示：你们错了。毛泽东讲得更形象，你们不要“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尽管这么说，但很难改，思想上还是倾向保守派。你不是说群众嘛？群众就是多数人嘛！可后来毛泽东讲了，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大家就不理解了。不是说要和多数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吗？群众总有个量吧？这就拧不过来了。

军队在支左问题上，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前，广东一直是坚定地、非常明确地支持保守派。七·二〇事件以后，理论上讲，要改变态度、端正态度了，要支持左派群众了。但是，形势稍微一变，广州军区马上又提出来，要一碗水端平。而且这个很快《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承认了。一碗水端平总不能说错吧？用一碗水端平来抗拒支持左派这个上面的指示。

应该说，自始至终，广州的支左，对两派一直没有采取有的地方支持一派，镇压一派，像湖南最后出现的那个情况，像四川出现的情况，更不用说像上海了。没有出现这情况。开始支持保守派，后来上面讲要支持左派，不支持不行。特别出现武汉七·二〇事件，表示要支持，但并没有完全支持，对保守派也没有把它压垮、解散。七·三布告以后，造反派倒霉了，被整下去了。这时，广州军区以刘兴元为代表的领导班子提出来，只要他们（指结合进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叶注）自己不坏事做绝，就叫他自生自灭。也就是保留他的位置，没借这个机会把造反派整下去，你当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还继续当；你当省革委会常委的，还继续当，让他慢慢地自然地消亡，也没采取组织措施。所以广东两派比较稳定，没有大量死人，1969年以后再没出现群众对立场面。这应该归功于当时的军区领导，在对待群众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

叶：广州空军的支左是不是也由广州军区领导的？

迟：广州空军、海军——海军机构不在这里，它有基地。后来怕口径不一致，在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在宣传的时候，三军联合组织宣传车。军区有权威，空军、海军基本上按照军区的指示办。

叶：省革联时对军区冲得比较厉害，到 1967 年 8 月份以后炮轰军区，也搞得比较厉害。

迟：炮轰就早啦。我记得 1967 年 6 月 6 日，中山大学八三一战斗队就登了小报，“炮轰黄永胜动员令”。那时批二月逆流，全国以谭震林为代表，各地都有谭震林式的人物嘛。广东的谭震林是谁呢？就是黄永胜嘛，“抓广谭”。有一次在北京汇报，戚本禹当着周恩来的面问黄永胜：黄司令，现在抓广谭啦，谁是广谭啊？是不是讲你啊？戚本禹也是得意忘形。抓广谭实际上就是抓黄永胜、刘兴元。有人说广谭是代数的 X，X 就是任何值，你反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政策，你就是广谭。这是胡说八道嘛，广谭还是要对象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黄永胜。

叶：当时军区是怎么应付这种炮轰军区的局面的？

迟：由你轰，你轰吧，没办法。小报到处出，我们也买小报回来看，也找一点给黄永胜看看。“炮轰黄永胜动员令”就给他看了嘛。

我就说这一条，广州不但生产没停顿，生产形势在全国是最好的，广东历来是从外地买粮食吃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支援了粮食部（？），一次支援几亿斤粮食。粮食、油料都上调的。拿交易会来讲，只有 1967 年 10 月份那次推迟了一个月，应该 10 月 15 日开，推迟到 11 月 15 日。其他每一次都是照样开，那么多外国人，没有出一个伤害外国人的事故。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你不能拿今天改革开放的情况来对比，那时候人身没有保证，动不动就拿枪，广州抢枪抢了一万多支，随便杀个人还不容易吗？杀个外国人制造点事端还不容易吗？可交易会照开，生意照做，外国人没有伤害一个，没有点工作基础，没有点力量，没有点政策，行吗？文化大革命既然整个是在错误路线领导之下，当然无功绩可言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但辩证地讲，成绩还是有的，损失少就是成绩。打仗谁都失败了，但你全军覆没，我只损失 10%，我就比你全军覆没的强嘛。你要提拔应该提拔我这个 10% 的嘛，不能说打了败仗，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能这么说的。为什么你全军覆没，我还保存了 90% 呢？为什么你 6 月就大批

死人，我拖到7月底才死人呢？就是工作不一样嘛。还是有差别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要说政治局面哪都没广东复杂，人头也是，中南哪个城市也没有广州人多，但广州出现的问题相比较少。

叶：军区对八一战斗兵团的处理，从开始取缔，到后来平反，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

迟：对八一战斗兵团，是抓住它成分不纯这一点，取缔了它。军区（因此）犯了路线错误。八一战斗兵团造反太强了，它是造反派里的骨干组织。对学生组织军区不好抓，八一战斗兵团是社会组织，第一它跨行业，第二它有假复员退伍军人。当然也有真的复员军人，莫竞伟（八一战斗兵团的头头——叶注）确实是复员军人，但这人行为不端。（军区）抓住他，调查这个组织有多少社会闲杂人员，有多少在部队犯过错误的，调查回来一汇报，就决定趁着军管这个东风取缔它。

后来这些人不服，旗派抓住这个事情反复地攻。到底给攻下来了，给平了反。当然这个组织到最后也没成气候。因为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不太高，没受过好教育，跟在学生后面冲冲杀杀的。军队一介入文化大革命就取缔它了。中山大学的一个工人组织，叫什么工人赤卫队的，也是抓住它这个，牌子也砸了，门封了。我亲自去了嘛。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革造会）的工人当然鼓掌欢迎了，广播站高声广播，赞扬军管会的行动。

在谈到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时，迟说：军队真正介入文化大革命应该是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对安徽造反派的批示：“人民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因为安徽要批斗省委书记李葆华，南京军区（似应为安徽省军区——叶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要求军队组织警戒。南京军区接到安徽省军区报告，不敢怠慢，马上请示中央军委，毛批了：“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军队接到命令了，要介入文化大革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回避了。军队过去是很谨慎的，不能干预地方党委的事情。但这时地方党委实际上已经基本瘫痪了，政令不通，赵紫阳这帮人已经是躲躲藏藏的了。

在这之前已经感到一点苗头了。除了电台工作组外，应该说，我是军区最早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我是秘书科副科长，是首长的参谋、助手，当时文革席卷全国，对军队的冲击很大。首长也很关心，我要向首长提供一些情况。1月23日的指示下达前，阎仲川叫我去了解地方文革的情况。我就代表军区去找北京三司驻广州联络站了解。北京三司是清华井冈山蒯大富那一派的，联络站在广东工学院。

1月23日的指示下达后，就不需要再遮遮掩掩了，我们到处去调查。广州名气比较大的造反组织都去了，像地总——就是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后来周恩来说，名字这么长，就叫地总吧。莫超海是名义上的总理（管），他是广东人，比较斯文一点；孙亦武是江苏人，复员兵，广州氮肥厂的，他是武斗司令。这些组织我们都去了。

军队介入文革，广东应该说是没有思想准备，是奉命行事的。到了1967年1月一月风暴以后，军队就坐不住了，特别是1月23日的指示下来后，军队就要介入了。紧接着2月北京开生产会议，要军队出面抓生产，因为省委、政府都瘫痪了。广东省就由陈德出面了，他是省委常委，又是省军区政委，当然责无旁贷了。

陈德去北京开会。赵紫阳也去了。他们回来还议论，赵紫阳虽然是走资派挨斗了，但到北京还照住京西宾馆的套间，陈德是实际负责的，却只住单间。上面对赵紫阳还是以礼相待的。会上要军队抓生产，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那时还没有实行军管。到3月初，内部就下通知了，广东要实行军管。3月15日就全省实行军管了。广东省、广州市同一天挂牌成立军管会。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全国几乎没有例外，军队只要一介入，支持的一定是保守派。什么叫保守派？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比较拥护、支持、接近党政机关的，主张小修小补的，也就是过去说改良的这么一些群众组织。他们拥护文化大革命，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参加文革，但你说要打倒广东省委、打倒广州市委，他们就感到过头了。撤换某个领导可以，但如果说整个都是黑线，他们就受不了。

《广州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一听）

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乱动之后，已经无从考证，广州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诞生于何时何地。但至少在 8 月 11 日发生“中医学院事件”时，各大专院校的学生，还没有公开亮出红卫兵的旗号，进行集体行动的。然而，这一事件，是各校学生出现分化的一个明显信号。随之而来的，将是急风骤雨般的大串连、大辩论。省委对掌握运动的进程，渐渐显得力不从心了。

其实，学生队伍的分化，早在工作队时期，已经彰彰甚明，但发展成大规模校际之间的公开冲突和对抗，则是自“中医学院事件”始。对这一事件的始末，省委曾经有一份很详细的报告给中南局：

8 月 11 日中午，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的喜讯传来，广州中医学院 301 名学生离开该校在校内游行的队伍，汇同其他一些院校队伍，游行到省委报喜和表决心。当晚中医学院的 301 名同学要求支援他们，由广东工学院发起，得到广州地区 6 所高校近七八千人（后来到一万人）的响应。事前未通知中医学院，就于 12 日凌晨 2 时集中到中医学院，开声援大会。一进院，他们就和中医学院不同意外出游行集会的多数同学发生争论。他们指中医学院多数同学是“保皇派”，喊出“打倒保皇派”口号，要解散中医学院的文化革命筹委会。

中医学院一部份学生指责这些人是“非法集会”，双方展开辩论，气氛颇为紧张。到早晨 5 时许，省委林李明、刘田夫、张云、王阑西匆匆赶到中医学院。由于听说情况紧张，林李明到校时情绪也很紧张，群众喊欢迎口号时未一齐喊，也没有举手，学生顿时出现不满的骚动。

又由于一时对情况不了解，林李明以询问的口吻问大会主持人开什么会，询问时间稍长，于是广工学生对全体同学广播说：“林李明态度很不好。”会场便哄了起来，立即有人喊“把林李明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广东工学院一学生还写了一张很大的标语：“把林李明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挂在大楼上，甚至有人要林李明下命令解散中医学院文化革命筹委会。这时，中医学院多数同学也马上广播：“保卫林李明同志！”并自动召集了几十名纠察队员，站在主席台后面。接着他们把“把林李明揪出来”的标语撕下来，贴上“保卫林李明同志”的标语。斗争较紧张，会场一度混乱。

林李明等人再三要求大家保持冷静，双方摆出事实，把自己的道理讲清楚，然后学习“十六条”，大会随即转入辩论。辩论的主要问题是，一方认为，中医

学院阻挠革命师生游行，文筹会不是民主产生的，以及错误地提出保卫校党委，保卫省委，和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连在一起，因而要求解散文筹会。另一方则认为，301名同学（包括外校学生）别有用心地把矛头指向省委负责人，不经调查研究，就对中医学院运动横加干涉。

争了半天，最后林李明讲话，表示省委一定坚决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表示，省委工作人员一定向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学习、学习、再学习。希望大家对尚未解决的问题，继续采取各种方式开展辩论，并对自己初到时的不恰当的态度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接受大家提意见，贴大字报。

林李明在事隔一年多以后，对这一事件的追述是：“‘八·一二’中医学院事件是压制群众运动的行为。去年8月12日，也就是‘十六条’公布第三天的深夜，广州中医学院301名同学，因受该校压制，即到外面串连其他学校的革命师生几千人去到该校进行大串连大辩论，这是我省大串连大辩论的序幕。”

林李明接着说：“我带着‘怕字当头’、调解纠纷的心情去处理这一事件，当时表现态度不好，想劝阻外校革命师生回去，说了错话，引起革命小将的尖锐批判，使我冷静下来参加他们的大会，听了双方的辩论，更明白了谁是谁非，知道了‘三〇一’和外校革命师生这一行动是革命的，我不但对情况有错误的了解，而且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小将们估计过低。当场我就起来表明态度，支持他们这一革命的行动，作了简单检讨，承认错误！”林李明讲这一番话时，广州地区的学生，已经分成尖锐对立的两派，因此，他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无疑是受到当时环境条件的压迫和限制。

这一事件，在广州地区文革史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标志着，第一个洪峰，已经冲垮了堤围，洪水越出了省委所安排的河道，四处滔滔泛滥。

分化的趋势，迅速蔓延到中学。学生们整天陷于互相辩论，互相攻击，互相斗争之中。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十分普遍和严重。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接待组的一份材料，反映了当时学校里的混乱情况：

一些学校和单位仍有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情况，广州市红女中曾斗争一初三（3）班女同学，斗争时，剪掉她的头发，撕破了衣服，斗得她当场拉尿。

学生张××由于被斗，怕打和怕送去劳改，曾串连张××企图自杀，后给她哥哥劝止。

广州实验学校学生陈××遭同学皮带抽和脚踢，头部和腿都被打破流血……粤剧学校有的人迫人事干部（党员）交档案锁匙，人事干部坚持不交，结果加以“反革命”罪名，又打又骂，游街戴高帽持续一晚，还罚她在高桌上站至天亮，后昏倒在地。

在“中医学院事件”中，省委的电报和林李明的材料，自始至终，均未出现“红卫兵”这一名称，但到8月底，红卫兵这一名称，已经铺天盖地充斥于各种文件、报导、材料之中了。也有一部份学生组织起“赤卫军”。他们一诞生，就以一种急先锋的姿态，杀向社会。8月23日，《南方日报》报导广州市中学红卫兵连日来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宣传破“四旧”，立“四新”。

广州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总部设在中山医学院，成为各大学学生组织的联络枢纽。尽管省委一再强调，不准大字报上街，不准红卫兵到工厂串连，不准工人参加大辩论，工厂不要组织红卫兵，但学生们一上街，社会就动荡起来，工人就无法置身事外了。最早动起来的工人是学校里的校工，包括司机、电工和实验工厂的师傅。他们组织起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并积极和产业工人联系。

8月25日，陶铸在接见中南地区学生时，作出了某些让步，其中一项，就是允许大字报上街，他说：“贴大字报可不可以贴在街上？我看，你们觉得有必要，可以贴。”其实这时大字报早已上街了。8月27日，陶铸再作一个让步，允许学生到党政机关看大字报，他以电话通知中南局：“党政机关的大字报，学生要看，可以经过正式手续介绍，派代表来看。学生不能看机关的档案文件。”“广播电台等，还是不要让学生进去看。”“一般工厂，学生经过正式手续介绍，可以派代表去看大字报，但不要去生产车间。”8月29日，赵紫阳托中南局秘书长薛光军打电话转告陶铸：“广州运动已起来，轰轰烈烈，到处冒烟，街上到处是大字报，辩论人山人海，有反面意见起来，省委亲自下去。”这到底是报喜呢，还是报忧呢？

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在短短3个多月内，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来自全国的1100万红卫兵。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姿态。毛泽东每接见一

次红卫兵，广州街头就充斥着游行欢呼的红卫兵队伍。9月1日，《羊城晚报》宣布“接受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意见，经上级批准”，改名为《红卫报》，听起来就像是红卫兵的机关报。

9月3日上午9时许，广州地区4000多名红卫兵代表，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第一次大会，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部队和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体到场，红卫兵为他们戴上了红袖章。大会通过了广州红卫兵宣言，红卫兵们庄严宣誓：“谁敢反对毛主席，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谁敢反对党中央，谁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要革他的命，专他的政，夺他的权，造他的反，就要和他刺刀见红。”海军战斗英雄麦贤得在会上发言。陈郁、赵紫阳、焦林义等省市领导，也分别致词，赞扬和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赵紫阳在讲话中说：“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要注意斗争方法，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向解放军学习，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人民利益，保卫国家财产。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

《广州日报》当天发表社论《英雄的红卫兵万岁！》。但就在会场上，已经出现学生互相攻击的场面了。其中一些是从北京或其他地方来的外地红卫兵。省委文革办的材料，记载了当时会场内的情况：

9月3日，广州开红卫兵第一次大会，正当战斗英雄麦贤得在台上会见红卫兵前后，北京一〇一中学8人，串联广州市二十一中部份红卫兵20多（人），不听劝阻，直闯上讲台，声称：“我们要造大会的反。”李尔重（中南局农委主任，当时在广州市委担任顾问——引者注）劝他们到后台商量，他们说：“你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硬冲上台，秩序大乱。麦贤得离开后，他们又抢扩音器，迫大会主持人请参加大会的中南局、省委、市委负责人先退场，红卫兵留下来和他们辩论，称“大会是失败的”，“是一次修正主义的大会”。

台下的红卫兵，有人在叫喊，有人在跺脚，一片沸反盈天。9月4日，首都东方红大学（即原科技大学）“南下革命造反队”，油印散发了一份题为《揭穿一个大骗局》的材料，指广东省委利用红卫兵大会，“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想利用毛主席的莫大威望，利用红卫兵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建立的伟大功勋，施放

烟幕，迷惑群众，转移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掩护省委过关”。他们质问，为什么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大会，且接受红卫兵的袖章呢？“广东省委想把自己与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相提并论，以此说明自己是代表党中央，代表党的领导”。他们发出震撼人心的号召：“广州的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应该走出学校的大门、机关的大门，炮轰司令部，火烧广东省委，火烧广州市委，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9月3日至9月17日期间，陶铸一再以电话指示，要说服红卫兵不要随便抄家和没收财产；不要挖回墓和朱执信墓；把工厂、农村稳住，大、中城市放手革命，没有什么可怕；外地学生搞串连只到大、中城市，不要到县城，县城中学生也不要到工厂、农村串连；干部处理要慎重，领导不要随便罢官；上层民主人士还要照顾等等。但省委在红卫兵心目中，还有多大的权威，他们说的话还有多少人肯听，实在不敢作乐观估计。

由于全国大串连开始，北方红卫兵汹涌南下，进入广州。他们把北方的各种小道消息带来了，把激烈的斗争方式也带来了。北方学生南下，成了加速广州学生分化的催化剂。

各大学都在进行大辩论，但这种辩论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只会加深学生之间的裂罅。

华南农学院对如何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意见分歧。有些人提出要从批判原来的党委入手，有些人则要从批判筹委主席团入手，有些人提出要从批判学生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入手。大家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聚讼盈室，永无了期。

暨南大学的情况是，学生对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茫然无知。甚至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说不清楚。“抓不到问题的本质，辩论不起来，批判得很不得力，有的变成一个组织整另一个组织，在学生间争论不休，批判不下去。”

中山大学一位学生向省委反映：“自从清华大学学生到该校点火后，该校红卫兵总部（有900多人，还有相当部份学生拥护他们）和红卫兵兵团矛盾很大。近日来，红卫兵总部不断开会，决定暂不外出，并准备把学校搞乱之后，带领学生来造省委的反。”

中山医学院一部份学生与筹委的关系十分紧张，学生中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关系，也剑拔弩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它的外围组织‘东方红公社’已抢走了筹委会的公章，宣布解散筹委，封了学校的武装部、资料室、四年级筹委会办公室和部份同学的宿舍。有的同学半夜被拉起床，把人叫出去后就封门。目前，搜查、封门成风，造成同学间的关系比过去更为紧张了。”

省委希望把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到辩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上，但现在的情况是，愈辩论，学生间的矛盾就愈大，对立情绪就愈严重。处于少数派的学生，往往成为攻击围剿的目标。省委在10月14日，专门就学生的少数派问题，发了一个通知：

在运动过程中，学校学生中出现多数派和少数派以至更多的不同意见的革命派别，他们对于工作队和筹委会，对于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炮打司令部，对于贯彻阶级路线，对于扫“四旧”，对于文斗和武斗，以至对于革命串连和运动部署等一系列问题，往往持有不同的看法，这本来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而是正常的现象；不是什么坏事情，而是好事情……

省委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于团结少数派学生的问题，各地党委首先必须从思想上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这是我们是否真正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的问题。应该看到，学生中的多数派是要革命的，少数派也是要革命的；绝不能把依靠左派仅仅理解为依靠多数派。

这些措辞听起来是多么软弱无力，对于烈火狂风般的红卫兵运动，毫无约束力，就像一块石头丢进了泥潭，一下子就淹没无踪了。省委不敢对任何一派的学生表态，甚至不敢作出任何喜恶的表示。华工一派红卫兵在大会发言时，张云鼓了掌，马上被另一派学生批评为“一边倒”。华工“心向党红卫兵”埋怨，省委在“十六条”公布前是怕字当头，现在更怕。一些原来的核心小组成员，纷纷向省委哭诉：“以前为了搞好运动，整天整夜不睡觉，毫无怨言，怎知到现在却受到‘上逼下逼’的处境，落得这个下场。”

学生分化的一个原因，是“血统论”大行其道。家庭出身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关乎一生的特殊意义。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排队的程序，按一定比例划分左、中、右，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先按家庭出身排队。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资本家、甚至小商小贩这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人，往往会首先成为

运动的牺牲品。不同家庭出身的人，际遇截然不同，有些人“根正苗红”，天生是无产阶级的坯子，是为革别人的命而生的；有些人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每次运动都在劫难逃，天生是被人革命的料。

9月3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广州成立。省军管会文革资料组一份材料披露了主义兵成立的经过：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建立，早在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后，就开始酝酿了。8月20日，首都第一批来广州串连的二十六中红卫兵5人，住在八一中学，帮助他们发起和筹备成立全市性的总部，很快得到各中学的支持和响应。总部初期设在八一中学，后来迁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得到原市委的支持。

去年（1966年——引者注）10月以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均为军干、革干子弟，而且都是高干子弟。陈伯达同志提出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领导工作后，他们先后离开了总部。

当主义兵成立时，家庭出身好坏，已经成为能否参加红卫兵的重要条件了。一个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张根生对主义兵曾经有这么一段评论：“主义兵问题，这个组织在去年8月底，9月初由旧市委搞起来的。得到中南局、旧省、市委的支持，中南局李尔重在市委当顾问支持‘主义兵’，当时的头子都是高干子弟……‘主义兵’在破四旧时起了作用，旧省、市委有问题，依靠他们去解决，受反动血统论影响很深。”

青年学生打着“自来红”的招牌，俨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华南师院有一个叫“毛泽东主义自来红红卫兵”的组织，一听名字就知道，参加者都是清一色红色革命家庭的子女，在娘胎里就是红的。这种家庭包括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即红五类）。这并不仅仅是学生自发制定的标准，10月11日，陶铸在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中，提出参加红卫兵的条件包括：“一、出身成份好（劳动者家庭出身）；二、政治思想好；三、纪律好；四、关于红卫兵条件，应当通过红卫兵代表会自行讨论会通过。”他也是把家庭出身摆在第一位。事实上，“家庭出身”这一观念，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支撑现存社会结构的支柱之一。

1966年8月以后，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开始出现。仅一个华南工学院里，便有3个不同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又冒出了诸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红卫

兵、红色工人战斗队、赤卫队（主要是教工）之类的组织，而且还不断有新的组织冒出来，有些所谓的组织，其实只有三五个人。组织之间，温和的，大逞词锋，互相谩骂；暴烈的，啸聚围攻，大打出手。省委文革小组接待组有这样一份记录：

中山医、华工、广工等校已开展两条路线问题的大辩论。他们来访，多是反映辩论中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求给予解答。一、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表现不好或有错误的同学，被点名批判对不对？二、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不让他们参加战斗组，不让他们上京，不给或减少助学金对不对？三、出身非红五类的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学生，组织“红外围”对不对？中山医内，思想兵（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引者注）和主义兵斗争激烈，思想兵（即筹委一派）说非红五类子弟是狗崽子，并责成他们200多人写检讨，要解散“红色娘子军”组织（一个女学生组织——引者注），说她们是反革命组织，并要她们公开反省承认错误，现在主义兵要求给写过检讨的200多人平反。

9月25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说，“各方面稳住，让学生闹一下怕什么？”但学生们不是闹一下，而是愈闹愈凶。尤其是那些红五类学生，愈来愈无法无天了。各方面也无法稳住。省委接待组一些关于广州市六中的情况反映，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该校一些红卫兵打人情况很严重。从8月下旬开始到昨天晚上（9月6日——引者注）止，全校70多位教师，被打的约有40多人，被打得严重的有20多人。个别的被打到吐血，有的还要被打者互相殴打，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成年家属排成队来打。昨晚有12位黑五类同学也被打了，两人被打伤，还不让护士包伤。有些同学躲在床底，也挨脚踢。打人都用军用皮带、胶轮带、竹子。

广州市六中，对入牛栏的人不分青红皂白，经常鞭打，一时叫他们笑，一时叫他哭，或者叫他们在地上打滚，或者罚他们跪在地上。10月28日晚，以石榴岗海军高级首长之子吴××为首的一小撮人，在晚上通知牛鬼蛇神集中到六中最偏僻之处，勒令他们弯腰，把附近电灯熄灭，用木枪、木棍等武器、工具，刺杀、毒打、鞭打牛鬼蛇神，不少人胸部、骨骼受伤。

小学的情形也不遑多让。荔湾区立新小学（即原洞神坊小学）的教师，不堪其扰，向省委诉苦：“现在的学生根本不听老师的话，上课时，在桌上、凳上嬉

笑吵闹，无法上课。老师随时都会被围困斗争或关起来，甚至被罚站晒太阳。学生叫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是狗崽子，成份不好的是龟老师。有些学生还要到老师家贴大字报，有的红小兵（一种模仿红卫兵的小学生组织——引者注）向牛鬼蛇神要钱，将广播器搞坏，把图书拿走，甚至搞坏抽屉，拿走校章。把老师的会议室要去做红小兵总部，现在又要老师宿舍，学生还成立夜老虎队，晚上不睡觉，到外面跑，集体到学校睡觉。”

省委文革办接待组称，综合来访来信的反映，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省委的注意：

一、戴高帽、游街甚至打人的现象较为普遍（有的是牛鬼蛇神，有的不是），学校有，机关单位和街坊居民也有。广州市有一中学，25%的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捉去戴高帽、游街、辱骂和鞭打；有的还被搜家，没收东西和罚款，其中有一个教师被打致满背是伤痕；佛山市委书记张力耕和副书记方兰，据说因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等错误，给学生先后两次捉去戴高帽游街，后被工人制止……

二、机关单位不断出现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围攻群众的现象……

许多教授被红卫兵搜家，封闭卧室，掳走财物，有些还被剃去须发，满脸涂墨，挂上“反动分子”、“三反分子”的纸牌，在校内游行批斗。各级当权派、教授、地主、右派统统关在一起。机关也组织起红卫兵。虽然赵紫阳曾指示处以上干部，尽可能退居二线，但大风暴一来，无论一线、二线，任何明暗角落，均无可幸免。搜家、戴高帽游街之风甚炽，许多局长、处长、科长和科员，都被叫上台戴过高帽。

和全国一样，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旋风，横扫广州。市文化局宣布撤销古海遗迹、南海神庙、九曜石、大司成牌坊、海瑞牌坊、南朝砖墓、绍武群臣冢、黄兴将军墓等文物保护单位；对名胜古迹、寺观庵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绘画，一律进行清除。在8月19日的省委常委202次扩大会议上，赵紫阳提出，“陈家祠尽力说服学生不要砸掉，先锁起来不开放，展览会搬家。保护文物嘛。古物有价值的还是要保护。”

但省委很快连自己也保护不了，遑论古物？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啸聚街头，到处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8月25日、26日，红卫兵和部份群众一声呐喊，捣毁了大佛寺等14个教堂和寺庙，烧毁了各种神品。全市的“封

建迷信场所”统统销声匿迹，宗教活动全部停止，神职人员也不能避过尘世的浊浪，一时间，揪斗的揪斗，关押和关押，还俗的还俗，落得个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的收场。8月28日，一阵杂沓急遽的脚步声，打破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公园的寂静，一伙红卫兵呼号着冲了进来，挥动铁锤，把自由神像砸毁了。

红卫兵还在大街小巷设立哨卡，拦截路人，检查他们的裤子是否太窄，头发是否卷曲，妇女是否涂脂抹粉。凡是被他们认定属于资产阶级的衣服，一律当众用剪刀绞烂，或泼上墨水；抹了发油的头发，或扎了长辫子，也成为攻击目标，红卫兵们一哄而上，七手八脚，把他们的头发剪成一窝乱草，再当众训斥一番，方可放行；皮鞋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尖，窄和尖都是生活糜烂和颓废的标志。人们除了军用皮鞋之外，什么皮鞋都不敢穿了，满街都是胶底布面的解放鞋（即假军鞋）；“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人民日报》号召。于是，衣服的式样和颜色、帽子、鞋子、发型，以至书包，都得向军队看齐。所有自行车的车把上，都得安装毛主席语录牌，否则就会被红卫兵罚背毛主席语录。

红卫兵热衷于为街道、医院、公园、酒家和工厂、商店换上新名字。广州的路牌，纷纷换上“延安路”、“红书路”、“朝阳路”、“曙光路”；改称“北京路”的原永汉路上，触目皆是“东方红”、“太阳升”、“新文化”一类商店招牌。美利权冰室的牌子被拆除，一乐也理发店改为“新风理发店”，并取消电发、落香水、发油、发蜡等项目，不理怪异发型；服装店不做奇装异服。名闻省港澳的酒家陶陶居改为东风楼，蛇王满改为卫红饭店，泮溪酒家改为友谊饭店，华侨大厦改为东风大厦，平安大戏院改为前进剧院，保滋堂、陈李济药厂改为广州中药一厂、

二厂。中学也纷纷改名，广雅中学改为红旗中学，华师附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有人甚至标新立异地提议把白云山改为红云山。饭店不再有服务员，顾客统统要实行“自我服务”，自端饭菜。

~{红卫兵把养金鱼、雀鸟和猫狗宠物，统统斥之为“封、资、修”。他们闯入民~}

~{居抄家，把名贵的酸枝木家具砸烂；把花鸟鱼虫的国画和线装书投入火中；把金银~}

~{首饰当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证据，拿去公开展览。~}

~{文化大革命以前流行的歌曲，绝大部份，被斥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唱片被红~}

~{卫兵从商店货架和人们的家中取走，用锤子砸烂，用脚踏碎，扫入了垃圾堆。
“千~}

~{言万语同一声，千歌万调同一曲，支支颂歌飞北京，歌颂领袖毛主席”（这是报纸~}

~{一篇关于文艺晚会的文章标题）。作曲家劫夫谱写的毛主席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

~{的核心力量》，风行全国，成为群众集会、游行的必备节目。全国有十几个文艺团~}

~{体和近百名作曲家，加入了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行列。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耀。据~}

~{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人们创作了近 4 0 0 首毛主席语录歌，还有一些语录谱成~}

~{戏曲唱腔。其中一些著名语录，被谱成不同的曲子，到处传唱，《工人阶级是领导~}

~{阶级》就有 4 个不同的版本。有一些语录歌，后来成了劳动号子，像《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成了水利工地、伐木工场和仓库、码头最常听见的歌曲。另外一首语~}

~{录歌的歌名，则长得可以列入世界纪录大全，它的标题全文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8 月 2 7 日，广州市委文革小组成立机关、中等教育及文化等 4 个办公室，各~}

~{办公室成立若干联络组，向各学校派出联络员。市人委决定，撤销市、区各行业小~}

~{商小贩联合会。8月31日，广州市人委发出《关于处理破“四旧”财物和接管教~}

~{堂寺庙房屋的通知》。决定成立市处理破“四旧”财物小组，并要求区街也成立处~}

~{理小组。9月7日，市人委又发出通知，规定破“四旧”没收的物资，一律上缴。~}

~{北京一〇一中学的10名南下学生，在破“四旧”总行动日，向省委递交了一~}

~{份“最后通牒”，要求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和在《南方日报》刊登。“最后通牒~}

~{”以君临天下的语气救命：一、一切私营、公私合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明天~}

~{(5日)上午立即封门，否则后果自负；二、广州市委立即把私营、公私合营国有~}

~{化，同时要马上妥善安排市场，如果影响人民生活，要承担责任；三、一切旧商标~}

~{、旧商品、旧招牌立即毁掉，否则格砸勿论，拿你们问罪；四、一切国营企业必须~}

~{立即断绝与非国营企业的任何关系；五、一切收旧货的国营企业，立即停止收购具~}

~{有封、资、修色彩的东西，如旧书、首饰等，要一律没收，决不允许坏份子投机；~}

~{六、40岁以下的人，要戒烟、酒，商店出售烟酒要严格控制，烟酒工厂也要有计~}

~{划地少量生产。~}

~{鉴于红卫兵强烈要求取缔小商小贩，并发出通牒，9月6日，市委批转市财委~}

~{《关于迅速取缔小商小贩并安排其出路的请示报告》。全市共3。5664万个~}

~{小商小贩，根据不同情况，作出转街道服务站、新组织合作商店或插进合作商店、~}

~{收回牌照和取缔等几种处理。~}

~{在这股狂潮之中，各种无稽谣言，也不胫而走，漫天乱飞。虽然事隔多年之后~}

~{反观，觉得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病态谵妄，但在当时却为大破大立之风，注入了更加~}

~{狂热的动力。9月上旬，一个离奇古怪的消息，见诸街头传单。~}

~{最好消息!!!~}

~{一、北京城改为“东方红”城!~}

~{二、天安门广场改为“东方红”广场!~}

~{三、毛泽东思想发展为毛泽东主义!~}

~{四、中共中央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五、团中央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头子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

~{六、彭真“重在表现”那个报告是株大毒草。~}

~{七、现在有条件的红卫兵可以穿绿军装，可以自己做，可以穿着平时出街。~}

~{八、现在红卫兵代表可以随便什么时候经过省、市委同意，分批到“东方红”~}

~{城见伟大领袖毛主席。~}

~{九、凡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干、革烈、革军子女都可以参加红卫兵，名额不~}

~{限。~}

~{十、轮船禁止分舱，火车禁止分座，禁止使用保姆。~}

~{上海的中学生向省委反映，广州运动比上海搞得好的方面有 4 个：一、家家户~}

~{户贴有毛主席语录；二、小学生上街宣读毛主席语录；三、自行车全部有语录牌；~}

~{四、文斗掌握得好。但不如上海的是：一、辩论空气不浓；二、宣传站（台）没有~}

~{建立；三、商店的橱窗没有陈列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著作。~}

~{北京、南京来的学生则批评，来到广州，听不到宣传“十六条”的声音，看不~}

~{到一辆宣传车，买不到“十六条”的小册子，广播宣传也很少。他们质疑省委是否~}

~{真正贯彻“十六条”和对运动的态度。武汉的学生说，广州的街道和学校，普遍张~}

~{贴了毛主席语录，处处皆是，但是张贴毛主席像的还不够，尤其是学校张贴的更少~}

~{。~}

~{经过破“四旧”运动的荡涤之后，广州市的茶楼和茶市，有些取消或缩短营业~}

~{时间，不接筵席；神香、蜡烛、冥镪等迷信品禁止出售；中秋月饼也成了“四旧”~}

~{，不再生产；9 8 0 0 多个个体小商贩停止经营；因取消银行利息，存款急剧下降~}

~{，最多时日下降 7 8 万元；香水、口红、扑克、象棋等均停止出售。商店招牌、广~}

~{告被拆除，或改作政治宣传牌。~}

~{9 月 1 3 日，陶铸电话指示中南局，群众“搜查主要是反革命，政治性的，藏~}

~{有武器和反动证件。此外，便不要搜查，不是一般的不搜，就是不搜。”他认为现~}

~{在“战线太长，同意收缩；宗教，暂不搞；文物不动。”但中南局控制得了红卫兵~}

~{吗？要搜查的已经搜了，宗教已经搞了，文物也已经动了，现在才制止，时间上迟~}

~{了一个月。~}

~{进入 9 月中旬以后，破“四旧”的高潮，渐渐过去。城市表面看起来，热火朝~}

~{天，人人载歌载舞，如登春台，但内里已经满目疮痍，一片劫后余烬的景象。红卫~}

~{兵运动处于巅峰状态，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破“四旧”了，不满足于斗争“黑五类”~}

~{、“黑七类”，不满足于取缔小商小贩，他们的重炮口，开始对准了党政权力机构~}

~{了。~}

~{8 月 1 8 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被视为大串连的开始。其实，在此之前，红~}

~{卫兵的大串连已经开始了。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许多就是从外地到北京串连~}

~{的学生。根据省委的记录，第一批到广州串连的红卫兵，是 8 月 1 8 日抵达的
北师~}

~{大学生，一共 1 3 人。也就是说，他们在 8 月 1 8 日之前就离开北京了。当火
车在~}

~{月台停下，当熙来攘往的旅客匆匆而过，当他们的脚一踏上广州，刹那间，这
片土~}

~{地仿佛响起隆隆的回响。~}

~{震撼全国的大串连正式爆发了。这是一幕惊心动魄的世界奇观。火车站挤
满了~}

~{南来北往的学生，每一辆火车，包括运载牲口的车皮，都被串连的红卫兵挤满
了。~}

~{客运列车挤得快要爆炸了，厕所也被人霸占了，行李架上也躺满人，过道上挤
得只~}

~{能站着；车厢门根本无法关上，因为门外的梯子上，也坐着好几个人。在火车
站上~}

~{不了车的人，就在沿线疯狂地爬火车，不顾生死地坐在车顶，奔赴“世界革命
的中~}

~{心”北京。~}

~{由于学校推迟开学，没有了学习的负担，而且可以免费旅行，广州学生汹
涌北~}

~{上。许多在 5 0 年代和 6 0 年代初，被迫下乡的知识青年，也乘天下大乱之机，
纷~}

~{纷回城“革命”，混在串连学生中，赴京上访、请愿，要求把户口迁回城镇。
所有~}

~{机关、团体、学校、企业，都设立了接待站、联络站，为串连学生提供食物、
住宿~}

~{、医疗、交通工具和宣传工具，没钱吃饭的可以要求补助或记账。大、中学校、党~}

~{校、党政机关的办公室、招待所、礼堂、饭堂，全部腾出来，给学生们安营扎寨。~}

~{连省人委办公大楼，也挤满了红卫兵。~}

~{截至 9 月 7 日止，省委、省人委安排广州市的上京人数达 1.865 万人，其~}

~{中学生 1.6935 万人，教工 2.1715 万人。北京和外省到广东的学生人数~}

~{，先后共达 1.2 万多人，其中北京来了 7000 多人。省委在 8 月中旬成立接待~}

~{组，每天都有大批学生涌到接待组，有的是了解运动情况，有的是要求解决生活问~}

~{题，有的是要《毛主席语录》，有的是要国庆节观礼票，有些是了解外出串连的手~}

~{续。最受关注的是北京一〇一中的学生，他们似乎是一伙武装到牙齿的好斗分子。~}

~{从 8 月 28 日至 9 月 5 日，他们陆续来了 5 批共 65 人，分成 13 小队，好像水银~}

~{泻地一样，分散到广州各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进行活动。~}

~{8 月 30 日晚，北京一〇一中的学生，对专诚前来取经的广州十七中红卫兵介~}

~{绍了 3 条经验：一、毛主席已贴了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你们就把党支部砸了，可以~}

~{抓他们游街，游街不算武斗，北京就打死被游街的 50 人；二、向小商小贩进攻，~}

~{北京的小商小贩都给铲掉了，你们可以到处都砸，叫他们顾也顾不过来；把公私合~}

~{营也给砸了；三、剪辫子，北京的红卫兵上街带着剪子，看到留长辫子的就剪。~}

~{对于这批学生在广州的活动，中南局和省委都密切留意，因为在 9 月 3 日的广~}

~{州红卫兵第一次大会上，带头捣乱会场的，是北京一〇一中学生；向省委下“最后~}

~{通牒”的，也是北京一〇一中学生。后来（12月13日）陶铸在北京的一次讲话~}

~{中，也特别提到这间中学的学生在广州的活动。他说：“北京一〇一中的革命学生~}

~{革命性不差，但打人也相当厉害，一去就找红线女（著名粤剧演员——引者注）。~}

~{给她剃阴阳头，水门汀地上跪了两个钟头，抄了家，才子佳人剧本拿到造纸厂造纸~}

~{，挂牌子，牛鬼蛇神红线女，扫了一个时期的马路，作了一点体力劳动，香港就说~}

~{她自杀了。她说，她坚决革命。”~}

~{张根生在回顾当时的情形时说：“中山医学院批斗陈耀真、毛书文（二人均为~}

~{中山医眼科医院院长——引者注），弄得要全家自尽。中山大学有名的教授都被批~}

~{斗。这时省委还可以勉强维持局势，但是顾得了东顾不了西，已陷于十分被动。”~}

~{9月8日，省委、省人委联合发出《关于组织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

~{职工代表上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内容与中央通知基本相同，只是补~}

~{充规定，中等学校师生上京参观日期为9月24日至10月23日，并强调“各地~}

~{一定要按中央规定，坚持原则，严格控制人数，对有些学校学生要求多去京的，决~}

~{不能随便答应。各级领导都要负责进行说服工作，不要把矛盾都往上推，给工作造~}

~{成困难。”~}

~{9月15日，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接待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通知》~}

~{，主要是针对从北京来的红卫兵而发的。通知写道：“首都是革命的中心，是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首都和全国其他各省、市都有着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宝~}

~{贵经验。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来到之后，党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和各校文化革命委~}

~{员会，要主动向他们介绍当地和本校运动的情况，听取他们对省委、市委和本单位~}

~{工作上的批评和意见，虚心学习他们的好经验，并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把他们的~}

~{好经验应用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

~{(通知接着写道)在当前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首都和各省、市大批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怀着旺盛的革命热情和高昂的革命斗志，~}

~{陆续来到广州和省内各个中等城市，进行革命串联，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交~}

~{流革命经验，这是对广州和广东全省红卫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的巨大鼓舞和有~}

~{力支持，这对于推动我省和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尤其起了还将继续起~}

~{着重大的作用。~}

~{北方来的学生，果然“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把浓烈的火药味，带到了~}

~{广州。从此不复平静。他们向广州红卫兵介绍了什么样的革命经验呢？~}

~{北京大学附中陈××等 7 人，到广州市委要求把所有政协委员名单、大资本家~}

~{名单交出来，说：“我们在北京每天都打死地、富、反、坏份子几十人，广州打死~}

~{几个有啥问题？打死就算！”~}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3 个红卫兵到市十一中召开学生大会，说：“北京斗争时是~}

~{将对象押上高台，要他们跪下，用皮带打，对顽固派就把他打死。搞完校内就搞校~}

~{外，限令四类分子离开北京，不执行就打死他。北京每晚外出打流氓，一晚就打死~}

~{1 0 个、2 0 个。我们南下时，在火车上就把四类分子打死了十多个，打死后由窗~}

~{口掉（丢）出去就算。要搞红色恐怖。”~}

~{9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十五中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在广州散发了一份~}

~{《向省委猛烈开火》的传单。宣布要“炮轰省委，把盘踞在省委的一切大毒蛇统统~}

~{揪出来！坚决造他们的反，革他们的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烂！不反出一个用~}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省委，不反出一个毛泽东主义伟大红旗高高飘扬、处处飘~}

~{扬的新广东、新广州，死不瞑目！”这份传单不仅散发到省委办公大楼，而且张贴~}

~{于街道墙壁，还派人到茶楼饭馆宣读。~}

~{9月5日下午，由华南工学院一部份红卫兵发起和主持，1000多人在省委~}

~{礼堂开揭发和批判王阑西大会。这是高校红卫兵第一次到省委来“炮打司令部”。~}

~{大会开到晚上10时许，二三十名北方红卫兵，突然从后台冲了上去，按着王阑西~}

~{的头，要他跪下。这时台下的华工红卫兵不断齐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

~{“非主席团成员请离开主席台！”扰攘了半天，那些北方红卫兵才悻悻退下。大会~}

~{结束后，他们还不肯走，拦住华工红卫兵辩论。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名学生叫喊着：~}

~{“大会是失败的！让王阑西坐在椅子上，和人聊天，记笔记，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 “广东的文化革命运动冷冷清清，没有火药味！”~}

~{北方学生成了省委最头痛的一群人。~}

~{国庆节后，两张由“首都红卫兵”印制的传单，在广州街头，广为散发，
一张~}

~{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部写的《广东省委机关运动向何处去！》，另一张是
署名~}

~{“红卫兵爆破组”的《特急倡议》。两张传单内容，大致相同，指责省委存在
3大~}

~{问题：一、十六条公布前，省委把运动引向歧途，造成群众斗群众，同时到处
为自~}

~{已打保票；二、省委到处渲染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是文而不斗，保护了右
派，~}

~{打击了左派；三、十六条公布后，省委迫于形势，写了几张表态的大字报，同
时退~}

~{居二线，但通过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筹委会，继续控制运动，定出了许多
条条~}

~{框框，缚住群众手脚。~}

~{传单说，省委定下的框框有5种：一、在高潮出现就布置学习任务；二、
斗争~}

~{黑帮分子要通过战线；三、斗争黑帮分子定时间、定人员；四、对一些黑帮的
保皇~}

~{派、运动绊脚石说要放在运动后期来搞；五、筹委把群众的手脚缚住，今天不
知明~}

~{天事，一切活动要他们布置。广东省委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严重，阶级斗
争十~}

~{分尖锐复杂。传单要求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在机关内大搞革命串连，互通情
报。~}

~{最后，这个爆破组还强烈呼吁：~}

~{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都要在这次大革命中重新受到检验，只要他不按照毛泽东~}

~{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对他进行坚决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让我们像陶铸同志说的那样，用 2 4 寸的大炮，对准广东省委，轰！~}

~{红卫兵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全市炮轰中共广州市委大会。1 0 月 1 9 日，华南工~}

~{学院红卫兵向省委下战书，直斥省委犯有严重错误，“你们不是勇敢地站在运动前~}

~{头，而是落后于群众运动”。~}

~{中南局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首先成为牺牲品的是宣传部长王匡。据《红卫报~}

~{》报导，6 月以前，“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直属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第一个鸣放~}

~{高潮，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揭发出王匡大量的严重~}

~{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行。随后，中南局决定王匡停职反省。从~}

~{6 月中旬以来，中南局直属机关和广东省委的有关部门，曾多次召开会议，对王匡~}

~{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但是，王匡一直不肯在真理面前低头认罪，态度极不老~}

~{实。”在 1 0 月 1 8 日的《红卫报》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王匡感到痛苦的我们~}

~{感到幸福》。《红卫报》的前身《羊城晚报》一直是王匡亲自抓的报纸。~}

~{在中南局召开批判王匡的大会之后，广东省委也于 9 月 28 日召开同样的批判~}

~{大会。从造反派后来编印的揭发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省委对批判王匡，确有无可~}

~{奈何的难言苦衷。~}

(9~{月 25 日}) 广东黑省委开会汇报斗争王匡的准备情况。~}

~{赵紫阳说：“首先要按中南局的规格开，中南局开得很顺利，很文明，也很神~}

~{秘，不准学生进去，让王匡坐下。中南局开不出问题，若省委开出了问题，不好交~}

~{代，要作出样子来，省委常委参加会议出武斗是不好的。”~}

(9~{月 28 日}) 广东省直属机关革命干部开大会斗争王匡。为了怕红卫兵小将知~}

~{道，28 日开会，到 27 日才发票，赵紫阳指示，票上不准印“斗争王匡大会”字~}

~{样。~}

~{10 月 16 日，《红卫报》发表《坚决炮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匡》的~}

~{社论，声称：“王匡是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秉承他的后~}

~{台老板周扬等的旨意，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社论把王匡的“后台老板”，~}

~{说成是周扬，避免提到长期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用心可谓良苦。赵紫阳在~}

~{批判会上说：“王匡是广东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言下之意，除了王~}

~{匡，广东没有更大的走资派了。~}

~{如果赵紫阳希望借着批判王匡，把省委和中南局分开对待的话，他的希望落空~}

~{了。在北方学生的奔走呼号之下，火终于烧到了省委大院。华南工学院红卫兵要求~}

~{斗争张云、林李明，华南师范学院红卫兵要求斗争区梦觉。喧嚷狂嚣之声，不绝于~}

~{耳。~}

~{赵紫阳不得不作出公开表态。11月4日，他代表省委检讨。他说，省委在运~}

~{动中，“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冲破旧秩序，定了许多框~}

~{框，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消极限制的措施，严重束缚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这类~}

~{陈辞滥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了干部过关的常用语言。但这次运动非同一般。~}

~{(赵紫阳继续说)“十六条”公布以后，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汹涌澎~}

~{湃，出现了许多伟大创举和新生事物，省委对于革命大串连、红卫兵、破“四旧”~}

~{、立“四新”等革命行动，是表示欢迎和支持的，对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衷心感~}

~{到高兴的。但是，由于省委对这些伟大创举和新生事物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思想~}

~{准备不足，感到有点突然，对有些事情很不理解，因此不是勇敢地站在运动的前列~}

~{，同革命同学一道，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而是被动应付，处于软弱~}

~{无力的状态。使得省委的领导，仍然远远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但他坚持认为，省委没有把学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没有挑动学生斗~}

~{学生，没有挑动革命群众斗学生。但检查并没有取得学生的谅解，红卫兵认为这是~}

~{假检查，想蒙混过关。~}

~{北方学生继续汹涌而来，本省各地准备外出串连的学生也云集广州，人数愈聚~}

~{愈多，而离开的渠道却十分有限，造成许多想走的学生走不了，不得不滞留广州。~}

~{随着深秋的到来，气温一天天下降，他们御寒的衣物不足，钱也花光了，离家太久~}

~{，归心似箭。10月下旬，在大串连的学生中，哄传着一份未经证实的陈伯达讲话~}

~{，主要内容是：~}

~{长征去——陈伯达同志25日讲话摘抄~}

~{劝你们（指北京师院等红色造反者——抄者），步行走，步行回来……破四旧~}

~{，批判资产阶级是长期的事情，你们走半年回来还不晚。1、人走了，会有另一种~}

~{布置；2、可以走半年、三个月，也可以走一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长期的~}

~{事情，一定要到群众中了解，你们要步行，就是要准备大斗、大批、大改。~}

~{一切听从中央文革号令的学生们，其应如响，纷纷要求步行串连。仅 1 0 月 2 9 日一天，就有 3 8 批学生（其中包括中大、暨大、华工、华农、华、广工等高~}

~{等校），响应号召，准备步行出省串连，华师学生劲头十足，一下子批准两千多~}

~{步行串连。华工、华师和华农有一批学生甚至兴冲冲地告诉省委，他们打算一直~}

~{走到新疆家落户，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建设祖国边疆。对于不堪重负的铁路来说~}

~{，这个好消息。

~{但也有学生反对。中大、中山医、华师的一部份学生，怒气冲冲地到省委反映~}

~{，这次要求外出远征的，本身就是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思想的影响，“想趁机溜~}

~{走”。这些人走了，要批判就没有对手，怎么批判得起来呢？广东交通学校的学生~}

~{说，步行外出串连一年、半年，其实是逃避运动。他们更质疑陈伯达那个讲话的真~}

~{实性。~}

~{省委对学生要求步行，倒是积极支持的。不仅可以减轻铁路压力，更可以减轻~}

~{他们的压力。有一句话他们嘴里不说，心里肯定会这么想的：学校的批判搞不起来~}

~{更好，少了学生斗学生。省委一心只想“尽快把停留在广州的学生送走”。1 0 月~}

~{2 8 日，省委、省人委发出通知：“本月 2 2 日，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

~{《难》的社论，在各地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个徒步行军的新的革命大串连的~}

~{高潮已经开始出现。”~}

~{省委表示，只要是步行，来广州也可以。但这只是一种姿态，这时广州市不仅~}

~{对外交通非常紧张，市内交通也已经无法承受。粮食告急，医疗告急，住宿告急，~}

~{全面告急。前景不可预测。~}

~{11月15日，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叶剑英等中~}

~{央领导，在北京接见全程步行到北京串连的红卫兵队伍。周恩来高兴地说：你们的~}

~{长征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是毛泽东思想的播种机。你们的长征是万里长征的~}

~{第一步，这个头开得好！长征式的全程步行串连，好得很！毛主席支持你们。他振~}

~{臂一呼，“我们希望全国大、中学校的广大革命师生，学习你们的经验，今年冬天~}

~{试行，明年春天推行全程步行的革命大串连。”~}

~{11月21日，广东省委、省人委再发一个通知，对徒步串连的经费问题，作~}

~{了巨细无遗的规定：

~{二、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伙食费应该自备，各地服务站伙食收费标准，原则上~}

~{按每人每天3角计算，对于工人、贫下中农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弟，因生活困难~}

~{，原领有助学金者，可预发原享受的助学金。助学金额过少而自筹伙食费又有困难~}

~{的，或没有助学金，本人只能负担一部份伙食费者，经过学校筹委会研究同意，或~}

~{同学民主评议，每人每天可补助 1 角到 2 角。对于少数既没有助学金，而生活又特~}

~{别困难，本人确实完全无法自筹者，可按上述同样手续，每人每天补助 3 角。各地~}

~{一定要根据实际生活情况进行补助，严防平均分配。~}

~{三、徒步串连的革命师生除带足原定粮食标准外，一律由县或省的接待站按 3~}

~{6 斤大米补足。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学生长征远方，要求发给 3 个月以上的伙食费~}

~{(指助学金)和粮票的，由院校文革委员会(筹委会)或红卫兵组织研究决定发给~}

~{。补助费则经市、县有关部门批准发给。如果中途改变计划，多领部份应退回原发~}

~{单位。~}

~{四、凡参加徒步串连的革命师生，在省内串连每人发给学习、宣传费 1 元；到~}

~{外省长江以南邻省串连的每人发 2 元；到长江以北各省串连的每人发 3 元。~}

~{五、医药费。在省内串连的每人每月发 5 角；到外省串连的每人每月发 1 元；~}

~{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可按公费医疗标准发给。~}

~{但目前滞留在广州的外省学生，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而且愈来愈严峻，成~}

~{为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库。一伙急疯了的哈尔滨学生，闯到省委接待组，跳脚~}

~{大叫，他们来广州已经一个多月了，还不能回去。他们威胁说，11月1日或11~}

~{日一定要回去，如果10日下午6时前不解决回程车票，就采取行动，强行上车，~}

~{到时就不管什么影响不影响，什么纪律不纪律了。这是不祥之兆。11月9日，省~}

~{委发出通知：~}

~{目前，外省和本省各地来广州进行革命大串连的革命师生已达30万人，由于~}

~{铁路运载能力的限制，入多出少，停留在广州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吃、住、行都发~}

~{生了很大的困难，急需加强对接待工作的领导，把做好接待革命学生的工作作为当~}

~{前最重要的任务。为此，省委决定，除了抽调赵卓云、欧初、郑少康、何文等同志~}

~{全力以赴抓好接待革命学生的工作以外，省人委办公厅的文化大革命要暂时停止一~}

~{段时间，除挑选若干人留下来管日常的行政秘书工作外，其余的力量都应集中来搞~}

~{好接待工作（当然两方面的工作有时还要结合起来搞）。~}

~{然而，仅仅几天之后，11月14日，据省委办公厅的估计，“现在广州市外~}

~{来进行革命串连的同学已经达40万人，其中外省市来的约占20万人……本省各~}

~{市、县来广州进行革命串连的同学也达20万人。目前正在路上和即将步行来广州~}

~{的还约有二三十万人。”这是令人悚然的数字。省委办公厅频频告急：~}

~{广州现已来的40万革命同学，本地、外来各约一半，每天增加3万至5万人~}

~{，走只 1 万。人数急速增加，很快就可达六七十万，准备达到 1 0 0 万。广州市等~}

~{于成年人增加一倍。交通是最大的困难，火车每天只能走五六千人，最多一万人，~}

~{而且很不正常。北京积存 2 0 0 多万人，要输送出来，把火车控制起来，在毛泽东~}

~{接见红卫兵的当天又停止贻 d 去，否则会冲击会议，所以很不正常。交通带来一系~}

~{列困难，人越积越多，走不了，没钱，没粮，没衣穿；有的住 2 0 多天一个多月，~}

~{非常着急。天天冲火车站，使旅客无法乘车。吃、住、市内交通都有很多困难。疾~}

~{病——急性脑膜炎、副霍乱流行，1 1 月 1 3 日已经昏倒七八人。外地蚌埠死 1 2 ~}

~{人，北京也挤伤几十人……~}

~{文革办公室、接待委员会的工作，极感困难，每天来访二三千人，大楼随时挤~}

~{着几百人、上千人，并且住着一二百人。“困难！困难！困难！”到处都听见人们~}

~{在喊着这个词。省委办公厅提出了 4 点建议：~}

~{一、做好宣传工作，说明情况，使大家明白交通的困难，同时说明生活安排，~}

~{使之耐心等待。按秩序持票乘车，要不断召开代表会，出通报。~}

~{二、做好生活安排，吃饭，住宿（衣被），学习（组织老红军介绍，一起学老~}

~{三篇，回忆对比），医疗，交通，安排参观，看看电影。吃饭用具、粮食、菜蔬、~}

~{喝开水，都立即采取措施。每个人都当服务员、炊食员（调 5 %工人）。~}

~{三、交通问题，铁路尽量多安排车辆，分票办法要急需改进，市内公共汽车，~}

~{汽车、船支（只）输送到汕头、湛江。~}

~{四、提倡徒步行军，各县都已建立三四百个服务站，要加强领导，政治挂帅，~}

~{两条腿走路，靠腿走是主要的。~}

~{据省委接待组反映，由于交通紧张，许多南下串连学生和本省北上串连学生都~}

~{运送不出去，积压在广州的时间太长，有的竟达 1 0 多 2 0 天，所带钱粮已尽，御~}

~{寒衣服又缺乏，他们心情焦急，无心在广州串连和参观了。因此每天前来接待站要~}

~{求解决车票的人数激增，有的到接待站来大吵大闹，说为什么广东省委不让他们出~}

~{去（或回去）？有的哭着求情，要求写证明优先领车票。有的扬言要向广东省委提~}

~{出强烈抗议。~}

~{他们对分配车票的办法，非常不满。有些住地住了几百人，一天才分配到几张~}

~{车票，像华南农学院住了两千多外地学生，但每天只有 5 0 多张车票，即使只出不~}

~{进，也要 4 0 多天才能全部走光；暨大全校学生只有 2 5 0 0 人，但学校却开出 3 ~}

~{7 0 0 多张外出串连证明；有些学生十几个人集体来，现在却要分散走。他们质问~}

~{为什么每天能把上万名学生运进广州，却只能运少量人出去？他们因为广州积压学~}

~{生太多，希望省委向中央建议，广州暂停开放几天，以便把积压的学生运走。~}

~{根据接待组的记录，1 1 月 2 日这天，有 5 2 5 批群众来访，人数达 2 2 1 4 ~}

~{人。主要因为当前交通紧张，加上 1 1 月 3 日毛泽东第 6 次接见红卫兵，开往北京~}

~{的火车，又停开了 5 天，造成省内的学生出不去，外省的学生也走不了，大部份来~}

~{访者都是要求解决车票和生活困难的。1 1 月 1 2 日，在 3 3 9 批来访者，有 2 0 ~}

~{8 批是要求解决车票的。1 3 日有 3 6 0 批共 1 5 3 3 名来访者，其中外省来的有~}

~{2 1 9 批共 7 3 3 人，也几乎全是要求解决车票的。一名南下学生写信给赵紫阳说~}

~{，他们于 1 0 月 2 8 日到达广州，至今未得到火车票，不能外出串连，他气急败坏~}

~{地恫吓，要组织暴动，与省委和接待站拼。~}

~{悲剧终于发生了。1 1 月 1 4 日晚 1 2 时，开往北京的火车进站还未停定，站~}

~{台上的学生便蜂拥而上，争先恐后，互相推挤，结果武汉市四十五中 4 名学生被挤~}

~{下路基，摔到车底去了。其中一人重伤，左腿上骨粉碎，生命垂危。其他 3 人也不~}

~{同程度地受伤。~}

~{1 1 月 1 5 日，悲剧再度重演。海南劳动大学的一名学生，被火车压伤，不得~}

~{不锯掉右腿。1 1 月 1 6 日，当火车进入广州站时，一万多学生疯狂扑上去爬车，~}

~{结果又有一名女学生被推至路轨被火车辗死。混乱还在持续，到晚上再有 3 人受伤~}

~{。~}

~{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至 1 2 月中旬，滞留在广州的外地学生，总算大部份送~}

~{走了。但也有不少人自愿留下，并建立起各色各样的联络站，在以后广州地区的文~}

~{革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役，凡是亲任其事的人，对那些不眠~}

~{不休的日日夜夜，毕生难忘。1 2 月 2 3 日的《南方日报》报导，在过去几个月的~}

~{大串连高潮中，广州市共接待了 1 6 0 万从各地来广州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至 1~}

~{2 月 1 日止，广州市接待红卫兵开支 1 0 8 0 万元，仍感不足，又向省人委要求借~}

~{款 1 0 0 0 万元。~}

~{当大串连告一段落时，整个广州地区的形势，确实完全不同了。省委已经成为~}

~{斗争的焦点。赵紫阳在 1 2 月对省委成员们说：“怕也怕不过去，是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怕也不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用不着怕。极而言之，无非是罢~}

~{官。”他们对前景已经不抱任何乐观了。雷霆即将降临他们头上。~}

~{作为洪峰的尾声，1 2 月 2 4 日，省委发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通知，听起来就像~}

~{一个人在喧闹的场合大声说话时，四周突然安静下来，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既响亮~}

~{又突出，而且刚好正说着一句蠢话。~}

~{中共广东省委对 1 9 6 5 年大、中专（毕业）实习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作出如下决定：~}

~{一、放假闹革命，工资照发。回母校往返旅费一律由实习单位报销。~}

~{二、进行革命大串联，串联的范围由自己选择。~}

~{三、春暖以后自由组合去北京见毛主席。~}

~{四、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与学生一样，政治待遇与学生相同。~}

~{五、愿回母校参加斗、批、改的，由本单位办理手续。~}

~{仅仅相隔 1 7 天，1 9 6 7 年 1 月 1 0 日，省委又匆匆发了一个劝大家不要外~}

~{出串连的通知：~}

~{鉴于目前我省文化大革命正在进入新的高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粉~}

~{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斗争正在深入开展，力量不宜分散。因此，各单位~}

~{革命群众以不外出为好，去年底今年初，省委和一部份省直单位的领导，为了照顾~}

~{这一部份革命群众的要求，曾批准一部份人上京，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

~{省委突然改辕易辙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因为 1967 年 1 月 4 日，作为广东省委在中央最大的靠山——陶铸，在北京突然倒台了。~}

宋永毅 孙大进：《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闻名于世的“李一哲”，其实是三位青年的合名。他们是：李——李正天（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一——陈一阳（广州十七中高中学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乡务农）；哲——王希哲（广州十七中高中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厂当工人）。在这张大字报的酝酿、写作、修改的过程中，广东省电台中共老干部郭鸿志自始至终参与，也应当是文章的作者之一。这张罕见的长达三万字的大字报，王希哲是主要执笔者。

1974 年 11 月 10 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由六十七张白报纸组成，作为一张大字报贴于广州市最热闹是北京路口。大字报一出：“市民围观，水泄不通，车辆改道。入夜还有用手电筒照着读的。大家争相抄录，四处流传……大字报空白处，写满了“好得很！”“好！”“说出真正问题！”“表达了人民的声音！”“向李一哲学习！”“向李一哲致敬！”的读者批语。而且掀起了一阵拥李和反李的大字报论战热潮。”〔1〕在中共方面，广东省委迅速将大字报呈送中央，据说毛泽东曾手持该文，在某中央会议上询问出席会议的中央要员们能否“批倒李一哲”。尽管“毛泽东对这份大字报的表态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份大字报印发中央委员人手一份，并下发到全国各党、团支部以供批判。这在当时，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首肯，是不可能的。”〔2〕

作为一场从根本上藐视任何民主，践踏了所有法制（其中也包括了中共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文化大革命，在其尾声阶段，却由三个这场大革命的产儿——青年红卫兵，贴出了一张以“民主与法制”命名的大字报，不能不说本身就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悖论，更何况大字报提出了一系列既不同于有意无意地维护了

十七年旧秩序的保守派，又不同于由派性而投靠到“四人帮”麾下的造反派头头们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见解。这些异端见解甚至截然不同于“省无联”、“北、决、扬”等“新思潮”的思想家们，而又是他们对于中国社会一系列独立政治思考的成熟与升华。

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思想价值，在于它所含有的现代意义上的追求民主、人权与自由的因素。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序言）》里，李一哲们一开头就无所畏惧地自称“异端”。并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什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作为“讨论”的结果，李一哲们首先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允许有“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其次，李一哲们要求“‘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对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而决不能对不同政见者“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3〕——换句话说，李一哲们主张取消以言论治罪，主张言论自由；主张取消中共镇压人民群众一贯采用的“反革命言论罪”。再次，李一哲们主张反腐败，限制特权，主张用法律保障工人、农民的物质利益。李一哲们第一次把林彪的“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界定为“维护封建礼治的神圣支柱”，主张破除迷信，鼓励不同政治见解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涌现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李一哲们看来，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务并不是什么“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是“锻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而是“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4〕毫无疑问，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是李一哲们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口号。面对文革的残酷现实，作者愤怒地质问：“社会主义法制跑到哪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有开，现实是无法无天了！”这实际上是“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的演变”。〔5〕虽然，李一哲们的思想在当时还只是停留在“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这一层面上，但他们要求法治（法制），反对人治（礼制），并进一步探讨了“林彪体系”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了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新命题，并明确提出“反封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无疑是切中时弊并直涉体制的。

如同国内外的文革思想史的研究者指出：“作为公开张贴的文章，‘李一哲’虽然抽象地肯定了‘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却几乎具体地否定了‘文革’以来的一切做法。‘李一哲’提出必须批判‘林彪体系’，指出林彪体系的纲领是‘天才论’，而‘天才论’的要害在于要‘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于是‘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这实际上提出了思想解放这一重要问题。”〔6〕又如海外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揭示：“在李一哲笔下有一个林彪体系，实实在在地压在人民身上，作为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体系只是一个理想的存在，却没有实质的内容……没有毛泽东，何来‘林彪体系’？林彪体系就是实际的毛泽东体系，而毛泽东体系则是理想化了的林彪体系。归根结蒂，林彪体系也就是现实的中共体系。”〔7〕因而，李一哲大字报在客观上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而对毛泽东思想的挑战。当然，如同执笔者王希哲后来反省的那样，在主观上他们当时“并没有突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框架，相反，他们仍然忠于这个框架并竭力企图表明对它的忠诚。他们仍然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他们相信这个制度会优越于资本主义，关键只是在于说服毛泽东。”〔8〕所以，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副标题是“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这一历史的局限，在今天已为李一哲大字报的执笔者王希哲在上述引言中深刻地认识到了。然而，如同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无法缺少必由的阶梯一样，李一哲的大字报，代表着年轻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终觉醒的开始，又启迪着人民群众的更大的觉醒。据说当时李一哲大字报上写满了观看群众的密密麻麻的眉批。在“序言”里，李一哲提出一个观点：“……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一位读者针对这一观点用“又一哲”的笔名眉批道：“党内走资派却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可追溯到五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更久远，其根源深植于作为官僚组织的党的本质之中。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过加强了党的官僚化；‘党内走资派’从来就是党和国家的主要危险。”〔9〕与李一哲大字报不同，‘又一哲’的眉批非但否定了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而且锐利地揭

示了共产党的“官僚本质”。从李一哲大字报出发，中国的民主运动向更成熟的，“以与共产主义理论决裂为时尚，以反共为特征”〔10〕的方向走去了。

李一哲大字报贴出后，一方面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被视为“社会的良知未死”，李一哲团体得到迅速地扩张。另一方面，中共当局组织了数百场批斗会，动员了数百万人围剿，斗争李一哲。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还专门组织写作班子“宣集文”写批判该大字报的文章。1977年3月，又以“李一哲反革命集团罪”逮捕了这三个年轻人及其支持者。一年以后，他们在中国思想解放的热潮中被平反。

李一哲大字报分为“序言”和“本文”两个部份。“本文”写于1973年9月13日，是“为了表示对林彪垮台日的庆贺”，〔11〕当时也正是“批林批孔”运动的热潮中。而李一哲们的思想形成得更早，那时，“四人帮”一伙有意将林彪批成极右势力的代表，而李一哲大字报却鞭辟入里地抓住了林彪一伙极“左”的实质。这篇“本文”曾由李正天，王希哲署名作为一封上书寄给毛泽东，而被中共广东省委内部定性为“反动信件”。“序言”写于1974年10月7日。因为传闻四届人大就要召开，而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有向“四人帮”靠拢的倾向，所以他们决定增写一个长序，连同“本文”贴上街头，直接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史实是：尽管这三个年轻人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出身，但他们关于“民主与法制”的独立思考却遭到了原广东省众多的造反派头头的抵制，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充当中共的枪手，参加了对李一哲大字报的围剿。但这也正从反面说明，李一哲们的思想，已完全超越了狭隘派性和造反派的利益。他们所依傍的并为之奋斗的，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广阔未来。

李一哲的思想同样也不同于以“省无联”、“北、决、扬”为代表的极左派“新思潮”。不错，李一哲承续了“新思潮”关于摧毁“党内官僚资产阶级”，“限制特权”等闪光的思想，但他们已把它们提高到了民主与法制的层面。在政治上，李一哲们决不主张打倒周恩来及一大批共产党老官僚，相反坚决地反对“四人帮”。王希哲后来解释过这一不同：“对文革中垮台的共产党的大批老干部，李一哲与造反派一样，认为他们是一批理应受到人民冲击的官僚，但他们并不赞成‘四人帮’为取而代之必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与其让

一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层，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宽松一些政治钳制，对人民略有有利。因此，在文章里，他们毫不掩饰地为老干部直言，为周恩来说话，并公开地向‘四人帮’宣战。”〔1 2〕除此之外，李一哲还在经济体制上对社会主义制度作了独特思考，他们主张“物质鼓励”，从物质上通过法律“保护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尽管这一思考并不是系统与深入的，但在文革所有的异端思潮中又是绝无仅有的。

当年，“宣集文”在李一哲大字报的批判文章中指出：“这张反动大字报在‘批林’的幌子下，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进行了一系列极其恶毒的攻击。它还极力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法制，妄图纠集一切牛鬼蛇神，煽动群众，制造混乱，在中国重演‘匈牙利事件’。”〔1 3〕实践证明他们似乎说对了，一年以后这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四·五运动终于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数万与李一哲有着同样思想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高呼着矛头直指毛泽东的“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的口号，给了以为十亿人民只会喊万岁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狠狠一击。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尾声中，李一哲们曾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人民——“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1 4〕们，历史证明了“街头读者”们并没有辜负他们的预言与希望。

注解

〔1〕 漆蒙校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和尚打伞出版社，1976年，第3—4页。

〔2〕 王希哲《从李一哲到王希哲》，洛杉矶：《中国之春》，1996年6月，第59页。

〔3〕 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4〕 同注〔3〕。

〔5〕 同注〔3〕。

〔6〕 雷颐，石云《狂热·幻灭·批判——文革十年青年思潮初探》，载北京《青年研究》，1991年第2期，第34页。

〔7〕 漆蒙《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载《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1976年版，第8—9页。

〔8〕 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载《中国之春》1994年12月，第18页。

〔9〕 子川《李一哲和我》，香港：北斗出版社，1978年，第55页。

〔10〕 同注〔8〕。

〔11〕 同注〔2〕。

〔12〕 同注〔8〕。

〔13〕 宣集文《对“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批判》，载玄默编注《李

一哲大字报论集》，台北：中共研究社，1976年，第241页。

2008年3月24日初稿

2011年10月19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12）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十二节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吉林省军区报请中央批示的几个教改中的实际问题
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

我省大、中、小学校根据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正在陆续开学，同时正积极进行教育革命。当前各校在教改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问题，现就我们遇到的几个实际问题报请中央：

一、目前有些大、中、小学校在教改中要求到北京、上海、天津、山东等地，有的甚至要求到边疆、海防等地去学习教改经验，并要求到本省各地农村公社和工厂、企业、事业等部门作调查研究。这些活动多是以班、系为单位，要外出的人员也较多，同时要求解决外出交通和经费等一系列问题。

二、最近有部分大专和中专院校提出调整专业方案，急于要求我们批准。还有少数系要求缩短学制，这些系学制缩短后都应在六六年或六七年毕业，同时要求分配工作。

对上述问题，我们的意见是：

一、到外地学习教改经验和调查，目的虽然是为了搞好教育革命，但发展起来，外出人员势必日益增多，不仅不利于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而且将会给接待单位增加许多困难，甚至影响接待单位的教改和生产正常进行。我们意见教育革命首先应在本校、本地进行，交流经验主要是通过报刊、广播和材料的交换，个别单位因教改急需派出少数人员到本省有关方面调查，也要经校革命委员会统一安排，事前应征得接待单位同意方可派出。

二、关于调整院校系专业和缩短学制问题，目前我省大、中、小学校多数尚未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也没有建立起来，有些问题需

经群众反复讨论和实践才能决定，因此，目前各校提出的教改方案，不应过早批准，一般的待运动后期再进行审批更为稳妥。

上述报告当否，请批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军区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对吉林省军区报请中央批示的几个教改中的实际问题

1967. 12. 15； 中发 [67] 383 号

吉林省军区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十二月九日报告收悉。

中央同意你们关于教育革命先在本校，本地进行的意见。目前，大、中、小学校的根本任务，是根据《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所阐明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复课闹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学生和教职员工，一律不要外出串联。为了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今年大、中学校一律不放寒假。

关于学制改革问题，应当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作好调查研究和典型试验工作，提出改革方案。报纸也应加强对教育革命好的典型经验的报导。全面的学制改革实施需报中央批准。

（发至县团级）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吉林省军区《关于吉林省小学放寒假的请示报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我省小学已于十月份陆续复课闹革命。目前，由于北方处于严寒季节，坚持上课有一定困难，因而各县（市）普遍要求放寒假。

我们的意见是：全省小学从一九六八年一月中旬起，至二月末止，一律放寒假，三月初开学。小学教职员工仍应坚持上班闹革命，以“斗私，批修”为纲，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特别是要立即掀

起一个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同时，要积极地组织和辅导小学高年级学生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并努力准备迎接新学期的各项工作。

上述报告当否，请批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军区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小学放寒假的请示报告

1968.01.15；中发〔68〕6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中央同意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小学可以在一月中旬开始放寒假四个星期。小学教职工则仍坚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吉林省长春市两大派四个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的批示

1968.01.24；中发〔68〕15号

长春市两大派四个革命群众组织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经过斗私批修，达成了《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这个协议的达成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吉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大成就，中央同意并支持这个协议，希望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认真贯彻执行，保证落实。吉林省地处反帝反修前线，中央希望吉林省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开展革命大批判，抓革命，促生产，争取在最短时间内，

实现各地的革命大联合和吉林省的革命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康生接见吉林省群众组织和军队代表时讲话

〔地点：京西宾馆。康生接见吉林省群众组织代表、专案组部分人员和军队代表。陪同接见时首长有：吴法宪、张秀川、陈锡联、宋任穷、李伯秋同志。根据记录由长春两大派四个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代表共同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很快就要成立了。你们能不能争取第十五名？现在已经有十四个单位了，看你们是第十五，还是广州第十五。要竞赛了。可不要落后。你们的条件是比较成熟的

（吴法宪同志插话：吉林的干部条件比广州的好，解放得好一些）。

代表回去了吗？

（答：各地区的回去了，长春的没回去）

长春的还没有回去。总理让你们把干部问题解决一下，所以你们不回去。现在一共还有多少人在这？

（答：十八个。接着康老一一询问每个代表的情况。）

今天请同志们谈谈，到底你们革命委员会什么时候成立。你们有没有个打算？现在你们的形势很好。条件，基本上成熟。实现了联合解放军做了很多工作。你们自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后达成几个协议？

（陈锡联同志插话：三个。）

这就很好。中央的同志和中央文革的同志。希望你们去掉派性，增强党性。对达成大联合协议。我们很高兴。这是吉林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很好基础。你们吉林成立革命委员会，不经过革筹小组，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你们还是比较先进的。你们虽然占十五、十六位，但有新的创造。

（吴法宪同志插话：还有河北）。

河北也是不经过革筹小组，就是河北一个，其他的地方就没有了。

（陈锡联同志插话：还有辽宁。）

那你们东北都是直接成立革委会了。黑龙江也没有经过革筹小组。黑龙江是东北的新曙光，你们这也是新曙光嘛，不经过革筹小组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是很好的经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想和同志们谈一谈。是干部问题。干部问题你们经过讨论有几个解放了。有几个干部这一派那一派有些意见，怎么能够很快地在这问题上达成协议，使他不阻碍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据联络员同志讲，阮泊生、郑季翘几派的意见还不完全一致，还有对宋振庭、宋任远的意见不一致，其他的意见不很大。这四个同志，我想在干部问题上今晚和同志们交谈交谈，帮助同志们把思想解放一下，不要因为这个问题阻碍革委会很快成立。首先毛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条。244 页第三段：“必须善于识别干部”、“识别干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善于识别干部，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专案小组的同志懂得这件事的复杂性。”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不光看干部在一个事上有这样的错误或那样的错误。要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大概我们革命造反派对干部识别最难的是不大容易了解一个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大都是根据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的表现。当然也进行了调查研究，但调查研究中对过去的环境时代不大了解。不大容易弄清。但这是个重要问题，不但要看一时一事，还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主席的教导，应当说各革命组织对解放干部，取了很谨慎很严肃的态度。这是对的，但我想和同志们交换一下意见，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要弄清什么叫革命委员会？我们解放干部是让他参加革委会的，参加革委会的委员、常委、主任、付主任。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叫革委会，过去常常有偏差的理解。我觉得黑龙江各派达成的协议有一个说明很好，我在各省都介绍了。黑龙江在这里解决问题时，几派达成的协议共有十二条，第三条中对革委会看法中写道：“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浴血奋战的伟大成果。这个意思是说革委会这个组织不是各派的联合会不是各派的联合组织。也不是各派的代表会。更不是各派的联络站，她不是群众组织，她是临时的权力机构，这和你们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红革会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她早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新型的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一政权性质的机构。你们成立革委会也不是联络站。也不是群众组织。她是权力

机构。你们和黑龙江一样，也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浴血奋战的结果。“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我们必须爱护她。支持她。巩固她并使之不断完善”新生事物她不会一下子很完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爱护她、支持她、巩固她。“绝不允许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她，颠覆她”。革委会成立了，就不允许阶级敌人、走资派从右的方面或“极左”的方面动摇她。颠覆她。“对于革命委员会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爱护的角度出发，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帮助。”革委会是新生事物，工作中难免有缺点有错误，必须按毛主席的教导，从爱护的角度出发，善意的批评帮助她。“广大革命群众是革命三结合的基础。革命委员会的各级负责人。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永远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密切联系群众，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这就谈到了第二个问题，一方面革委会是个政权组织，另一方面参加革委会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委员或常委不是各派各组织的代表，比如说长春公社也好，红革会也好二总部也好。你们将来参加革命委员会。你们不是长春公社的代表，也不是红革会的代表，你们是吉林省一千七百万人民的代表，他不仅仅代表长春公社去参加革委会，他不是仅仅代表红革会去参加革委会，他的言论、思想、行动应该从一千七百万人出发，从一千七百万人的利益出发。因为她是临时权力机构，参加革委会的不是代表小团体的利益要求他代表吉林省一千七百万人的利益。群众也是这样要求的。在座的将来会有参加革命委员会的，你们必须弄清代表什么人。要象黑龙江协议所说的，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永远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密切联系群众，联系群众不是长春公社只联系长春公社的，红革会只联系红革会的。不仅要联系长春的，全省的都要联系，你们作了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要有这个想法。大而七亿人民出发，小而从一千七百万人民出发。你们参加的是政权机构，不象群众的团体，这就要求不要有任何的派性，力戒作派性的代表，小团体的代表。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是一个一千七百万人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委员，不是长春公社、红革会的委员。所以第一个问题我讲什么是革命委员会。什么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你们将要登上东三省的政治舞台。必须按毛主席指示去办，一点派性也不能有。邬孟庄同志。你是长春公社的代表。将来人家把你搞上去当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我这是随便说罗。如果长春公社犯错误你怎么办？你就不能说，我是长春公社的。我就包庇一下吧，也不能说我不能叛变。朝里有人好

作官嘛。这就错了。你们要大公无私。如果红革会做对了怎么办呢？那你就坚决支持了。因为你即是长春公社的代表，又是红革会的代表。是一千七百万人民的代表。你们当了权，有私就不行了。要大公无私。封建社会还有这一条，那是假的了。无产阶级政权的代表。应该真正的大公无私，你们长春公社也好、地院也好、师大的也好、红革会的也好，你们不能要求参加革委会的代表来徇私。相反地要来监督他，他要有私，如果不公，我选的代表我就特别有责任监督他，当了委员就不是长春公社的干部，是成了毛主席的干部了，如果说派，那就是毛泽东派了。他的地位有了突变了，他从群众团体变成专政机关的人了，眼光必须照顾到全体了。要识大体，要公正。革委会的委员主要是掌握主席思想凡是符合主席思想的就支持。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不支持。部队支左不是有一条支左不支派嘛，革委会委员要支全体一千七百万人民，不去支那一派。包括我所在那一派。原则和部队支左是一样的，是支革命不支派。因为他已经成为专政机关的干部了。就象我们部队的干部是一样的。要支左不支派，支革命不支派。包括我参加的那个组织。我在的那一派。他有错误。我反对过去反对过我的那一派，他对，我也要支持。应该采取部队的态度。你们将来作革委会委员必须有这种态度，就是跟解放军学习。

今天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了一个文件。不久你们就会看到了。题目是“关于军队必须尊重、支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你们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解放军同志就要尊重，支持你们。如果你们还用派性作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而军队是要按毛主席革命路线支左不支派的，那军队怎么支持你，保卫你？这就不象样子。这是要向同志们交待的，现在同志们就要做思想准备的，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做一个新的革命的干部。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各派解放干部中，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看来吉林省解放干部是有条件的。几派也协商了，有些干部可以解放出来。有的干部还有些意见。我今天和同志们商量一下，不要在这个问题上阻碍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首先我们要认识对干部怎样看，比如说，长春公社要解放郑季翘。红革会、二总部要解放阮泊生。你们要解放的是什么人呢？首先，第一条，他是毛主席的干部，共产党的干部。不是你们各派的代表。不要要求他们成为你们各派在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这一条非常重要，你们解放的干部是毛主席的干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

是要求他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和中央的政策，不是你们长春公社的代表，也不是你们红革会的代表。不然，如果你们犯错误。这个干部也一定会犯错误，这方面必须弄清楚。因此，不管你们解放那一个阮泊生也好。郑季翘也好，都不是你们的干部代表，是党的干部，毛主席的干部，是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干部，是三结合的干部。你们不要把他当成资产阶级的议员。他是这一党的议员。他是那一党的议员。这就要犯原则错误。他是什么干部，你们要求他去干什么，要他到革命委员会去干什么的？他和你们一样，是要为一千七百万人民服务的。他有派性，你们要监督他，批评他，如阮泊生有派性，首先你红革会要批评他，郑季翘有派性，首先你长春公社要批评他。你就说，是我保了你，你搞派性怎么行呢？我要对你负责。我要监督你。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必争多和少。你解放几个，我也要解放几个，要从革命利益出发，能解放几个就解放几个，不能解放的不要勉强。在这个意义上我讲，解放干部的思想。人选要从大局想，从原则想，不要把干部当成自己组织的。要看成党的干部，毛主席的干部。

（吴法宪同志插话：按照毛主席干部政策解放干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共同的任务。）

因此，关于解放干部你们要看到毛主席最新指示，这不是对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态度问题，是不是坚决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问题。比如阮泊生问题，你们说有个党籍问题。光看这个问题不行。要看他的整个历史。我不认识这个同志，不能光看一时一事。郑季翘我接触过几次，这个同志是不是没缺点，没错误呢？那不是。人只要做工作，总会犯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要看他的大体。他大体对陆定一的中宣部，对周扬的批判。他有他的长处，同志们，你们知道罗，他是批判了周扬从苏联贩卖来的形象思维论的。他和陆定一阎王殿中宣部是有斗争的。看干部重要的问题要贯彻主席的干部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你们打倒的不少嘛！赵林是个老叛徒、富振声，这是我知道的，我在莫斯科，他去，我审查的，这个人不但和陆定一的关系很恶劣，我估计他个人历史上也有问题，他从东北到莫斯科这一段有问题，还有李砥平，是叛徒。粟又文，省长，这个人是个“民主人士”，我接触过，问题很大。你们这方面两派成绩是很大的。总要相信毛主席这句话，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相信这一点。还有宋振庭、宋任远。宋任远我不认识，据说他在统战工作上反对李维汉、

徐冰的路线，也执行过也反对过。就说郑季翘，他就没有错误？那是大体上来看。宋振庭这个人我有接触，是延安鲁艺的学生，这个人说过错话，写过杂谈式的文章，据说还有两本书，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罢了官，这不要去看，我们要看这个人有没有他好的一面。五八年我到长春，他专门向我汇报了长影的问题，他对长影的斗争是坚定的，当然这是吴德同志领导的。这不但是对长影的斗争，这也是和阶级斗争分不开的。另外，他对陆定一宣传部和教育方面都作过斗争的，这个人你要抓他的错话错事随便都可以抓到的，但从大节上看，基本上还是反对阎王陆定一的。这个人大概是这样的。我打个比方，林付主席讲，一个人要做革命的一分力量，又要做革命的对象，宋振庭这个人反右斗争时他会是一分力量，反“左”时一定会成为革命的对象就是了。从这方面看他不是三反分子。所以凡是能够结合的，都要根据主席的思想来结合。今天报纸上有一篇评论：“放手发动群众解决好干部问题。”主席讲：“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又指出：“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因此我就想，从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针讲，宋振庭肯定有错误，但也有好的一面。宋任远有没有错误呢？但他也有反对李维汉、徐冰的一面，希望同志们思想要解放，坚决执行主席解放干部的指示。

同志们解放思想就有几个问题。有的会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半了，千辛万苦，调查研究，最后成了空的，我不白干了吗？”你们代表回去，有的群众要问你们：“你们怎么签了字？你们修了，成了陈独秀了，我们辛辛苦苦调查了一年，被你们否定了”。这个要向调查的同志讲，他们有很大成绩。没有他们的调查，反复的调查，怎么会使中央把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弄清楚。不能否定他们的成绩，应当支持他们，他们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调查干部的目的是弄清是非，我们经过调查，进一步了解了干部，这是好事，并不是一年没成果。你们还有专案组，有这个人的专案，有那个人的专案。搞专案的，我放肆一点，你们要听我一点经验，这件事很苦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你不能参加，关在屋子里钻材料，一个材料接一个材料，钻得头晕眼花，跑了很多地方，结果是个空的，你说恼火不恼火？有时派性斗起来，还要武斗，还要挨打，但同志们，这件事情是个大学习。脑子里要经常有辩证法，来不得半点的主观主义。自己的材料不但人家否定，我自己也要否定，不断的肯定否定，对一个干部好不好，我们要负他的政治生命责

任。这一点和戴个帽子、游街不同，你戴个帽子游街、坐喷气式，看样子很凶，只不过是肉体上受点挫折，但专案是定他政治生命是死还是活的问题，必须很慎重，必须有真凭实据，必须是经常辩证的，有时人家否定，我自己也要否定，这样脚跟才能站得稳。我的材料人家否定了，是帮助我，不是拆我的台。因为这个东西必须经过反复，必须实事求是，是关系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的问题，责任很大。有个地方一个组织叫“抓叛徒兵团”我说这个名字不好，原来没有，叫你一抓就成了叛徒了，这个事情怎么得了？是对干部的政治生命不负责任。这种事情我用一个形象来讲，好象刀上跳舞，走钢丝绳一样，一方面思想一麻痹，就右了；另一方面，稍微一偏，就特务如麻，草木皆兵，就“左”了。这两方面要经常注意。因此做专案的同志必须掌握主席思想，掌握辩证法。第二必须有明确的阶级观点。搞长了脑子就糊涂了，今天这里弄一个叛徒，明天那里弄一个叛徒，所有的黑材料都集中到你这里，哎呀，中国共产党叫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可是在我这里就是黑暗，慢慢地自己的立场就会动摇，搞出个刘少奇是叛徒，彭真是个叛徒，罗瑞卿是个特务，没有入党，陆定一是个叛徒，杨尚昆里通外国，安子文是个叛徒，一看两眼漆黑，还什么伟大，还什么光荣，还什么正确，所以说阶级观点不明确就会发生动摇，专案搞了半天，搞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并不是我白费了力气，我就没有成绩我自己思想老早就有两个准备，一个是，一个不是，调查材料时，人总是有点主观，如抓叛徒，就老往那方面想，总觉得这个象叛徒；如思想麻痹，就容易往另一方面想。必须实事求是。因此，专案必须与群众相结合，还要正面与反面相结合，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中央对六十一个叛徒的批示你们看到了吧？这件事中央很慎重的，对一个人要负政治责任的。由于环境的复杂性，有时弄错了难免，如延安审干有的就弄错了，后来就平反了。全国解放了，经过文化大革命，现在看来许多是对的，所以平反有时也有平反错的，这个问题要掌握政策。

青年团转党的问题，党的历史各个时期是不同的，不要拿你们现在这个标准去看整个历史上青年团转党，有时在历史上，在战争环境中，转党并没有履行什么固定的手续，他就参加党的工作了，参加党的会议了，就成了党员了。还有候补期问题，以前没有候补期，七大以后才有。开始时青年团转党也没有候补期，抗战以后把团取消了，才有候补期。这在各个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还有自首的

问题，叛变的问题、被俘的问题、情况很复杂，一方面立场要坚定，给敌人供出东西就是叛变，但在这个原则下要具体分析，有不同的情况，因此审查时就要注意了。所以，我们做专案工作的，第一，要掌握主席思想，辩证地看问题，千万不要主观主义。第二，阶级观点要明确，什么时候都不能对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有丝毫的动摇。第三，要掌握政策，搞专案是很辛苦的，应当说你们成绩很大。在东北这方面成绩很大，黑龙江审查干部成绩很大，他们的报告中央转发了，辽宁在沈阳军区领导下，各派联合审查敌伪档案，成绩也很大。你们吉林这方面不够，因此，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要抓这件事，根据黑龙江的经验和辽宁的经验，抓下去，要继续深挖，你们不要在专案上对干部争论不休，相反地，要提高你们的敌情观念，这一点，东北的同志应该特别注意，我觉得过去你们各派闹派性，搞武斗，敌情观念淡薄了，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你们想想，你们面临着什么，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有国民党，美帝国主义，还面临苏修，朝修。苏修的特务活动、朝修的特务活动，在你们那个地方有长期的基础，最近我们知道朝修通过他的大使馆组织叛国活动，我相信你们那个地方一定会有。苏修在那个地方是很久的，这一点要引起你们很大的警惕，不要因为解放了干部，好象专案就白费力气了，也使敌情观念淡薄了，也不要由于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敌情观念就淡薄了，相反地要加强敌情观念。很多地方成立革委会以后，敌人马上就跟上去了，你们要注意，一定要把苏修特别、朝修特务、叛徒挖出来，学习黑龙江，学习辽宁。你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了解了一些情况，学习了很多本事，将来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你们就成了骨干了。敌人是狡猾的，上次我不是讲了吗？说辽宁东工把候志搞了去。我批评了一下，我批评他不是说抓候志不对，是说不交给专政机关。这个苏修老特务，在苏联学习学很久，不但青年人弄不清她的问题，就是一些干部也弄不清她的问题，她多方面伪装，把自己伪装成反王明的，伪装成老干部。伪装老干部对党忠实，用这个假面具进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她伪装是一个受害者，她丈夫在苏联肃反时被搞掉了，实际上是她出卖的，反来说中国党不帮助她解决问题。她还装作检查错误来散布流毒。她已经活动二十多年了，像这样的人，你们弄不清她的问题，东工审问她，你越审问她就越放毒，所以要他们交专政机关，不是说他们抓的不对。在东北像她这样苏修训练的特务，并不是她一个，因此，你们必须提高警惕，千万

不能放松。蒙修也在搞叛国的活动，朝修在搞叛国的活动，苏修在派特务，你们对这些，对日本的残余，对国民党的残余，要提高警惕，你们搞专案的，经过锻炼，这对反修、反特、挖叛徒是有利的。解放了干部也不否定专案工作。还有高岗啊，公安系统的汪金祥啊，情况复杂了呢。

就谈这些问题，把思想解放一下，把干部解放出来。最后提醒同志们注意，毛主席去年在给红卫兵的信中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去年毛主席批天津延安中学军训经验时，又写了这句话。我对江苏的同志讲过，你们为什么不解放干部？干部解放不了，革委会不能成立。你们自己也解放不了。所以最后特别提醒你们吉林的造反派，只有大胆地解放干部，才能解放自己，才能把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这是个关键问题。因为你们这个问题卡住，向中央的报告就不好写，成立革命委员会有一大堆事情，写报告中央讨论，请主席、林付主席批准，还有一系列的工作，干部问题这样挡住，就耽误了时间。所以大家要解放思想，对一个干部看错了也不怕，文化大革命没搞完嘛。要去掉派性，不要你提一个，我提一个，那样纠缠就没办法解决。希望同志们去掉派性，增强党性，解放自己的思想，同时解放干部，把主席的思想在自己的行动中贯彻。

你们自己再讨论一下，有个问题向同志们讲一讲，不要相信自己的材料一定就对，也不要相信人家的材料一定是错的。调查干部必须有这样一个态度，不然就会片面地、主观地看问题，就不会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一分为二是个复杂问题，这里我不想多讲。一分为二，一切事物中间都是存在的，毛主席特别讲过这个问题。光争这一个就说是反毛主席的，不能这样做，这个矛盾你们要仔细的研究，你们看一看“矛盾论”，在材料上不要绝对相信自己的材料是对的，自己提的，容易偏重自己这一面。还有个问题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不要完全相信口供，我们讲不能搞逼供信。他在一定的情况下讲的我们要分析，就是他自己讲的，我们要分析，在审查干部中，不要完全相信自己的材料，不要完全相信口供，各派都要这样子，即使我们自己的材料，也要反复否定它，口供绝不能完全相信，有时相信要上当的。

（红革会和长春公社代表汇报干部问题）

康老说：我看你们就是不愿意成立革命委员会，如果不愿意，就别争十五名了，作最后一名，人家调查的材料，你们不相信，你们调查的材料又一定叫人家相信，这要到什么时候才完？

阮泊生三八年总入党了吧，填表是真的吧，四八、五八、六八、三十年，三十年你们不看，就咬住那一个时期，这是不对的，主席不是说对干部不只看一时一事吗？可是三十年你们不管，这是有派性，说是没有，脑子里是有的，派性的危害可大了，像鸦片烟一样。

我举个例子，把你们代表的历史都写出来，我来抓你们的小辫子，一个一个地抓小辫子，保证抓得住。好吧，你们自己好好讨论一下，根据主席的思想，把派性去掉，何必那样扭住不放呢？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22；中发〔68〕33号

中央同意《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二月十四日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央同意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三十五名委员会组成：由王淮湘、阮泊生、郑季翘、肖道生、何友发、徐中禹、苏俊禄、蒋克诚、王振华、兰干亭、周光、张士英、邹明友、吴钊弟、耿志才、边仲科、徐飙、李树、陈贵、赵桂兰（女）、张振标、乌孟庄、王维宾、孙凤歧、尹家英、姚美玲（女）、许肇昌、周文贵、朱淑珍（女）和四名革命领导干部，两名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暂缺）共三十五名同志担任常委，并由王淮湘同志担任主任，阮泊生、郑季翘、肖道生、何友发同志和地方革命干部两人、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一～二人（暂缺）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吉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一年多来，吉林省的广大革命群众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揪出了以赵林为首的吉林省党

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吉林省的代理人的大批判，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全省八个地、市已经有七个地、市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一批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吉林省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工业得到了发展。

长白山麓，辽松平原，一派大好形势，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吉林省军区和驻吉林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吉林省地处反帝、反修前线，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把刘、邓及其在吉林省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坚决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加强各民族的革命团结；以“斗私，批修”为纲，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做好各项工作，夺取吉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吉林省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1968年2月29日晚8时30分至9时20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接见的首长还有：伯达、康生、江青、文元、富治、成武、法宪、东兴、叶群、秀川和陈锡联同志。

伯达：现在请江青同志读一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问同志们好。今天由我读一读中央的批示，同志们，大家都收到了吧？（读批示全文）

伯达：现在请总理讲话。

总理：同志们，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是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要说的在这里头都说了，没有更多的话，现在有几件事提醒大家。

第一件事，革命委员会是权力机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你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夺回来由革命人民掌握，这是在毛主席思想的指引下掌权。既然是个权力机构，现在来说还是个临时权力机构，就是要把各种革命力量都团结在一起，来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委员会不管委员还是常委，都不能拿一个组织派性来影响革命委员会。你们吉林是四个组织啰，如果说在没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前，对这个人或那个人有意见，多几个少几个，争来争去，现在就不要争了，既然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批准，你们回到长春开大会宣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就不能站在一派的利益上，一派的主张上，就都不能站在派性的立场，应该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合乎的就改嘛，我们的权力机构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不是各派的联合政府，各派各的代表。尽管你们现在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还没有成立，这些代表会还要回去商量，但是革命委员会一经成立，就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按照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意见不同是允许的，但不能争吵，要求大同存小异。

第二件事，革委会的名单，中央文件上已经写了，要加强各民族的革命团结，在吉林省有朝鲜族，但因朝鲜族自治州还没有三结合，干部问题还没有解决，还不能选出代表来，常委里面都给他们留下名额了，那里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补进去。吉林省是多民族地区，汉族是大多数，还有朝鲜族，西部白城地区还有蒙古族。有苏修、朝修、蒙修在挑拨，但要相信广大的民族群众和干部，都是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总会奋斗在一起的，要有信心，一时没选出来是时机问题，不是没有，一定会有，相信还会有好的，革命委员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要吸收民族干部，还希望你们帮助延边自治州建立革命委员会。

第三件事，加强敌情观念。过去你们忙于各派斗争，搞武斗，敌情观念不强，今后要加强敌情观念。不仅要警惕明显的敌人，还要注意到我们队伍中的坏人，这么大的组织，每个革命组织总会有漏洞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内奸有空就钻，挑起武斗，造成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医大基础楼解决了吧？

(陈锡联同志说：解决了，已经联合了)。

现在想起来哑然失笑，我都问过多次了。为那么一件事对立几个月之久，我们解放军那样辛苦，一直夹在当中，这说明总有人挑拨。要自己把坏人揪出来，有材料要交给对方组织，让人家自己揪，自己把自己那派坏人揪出来，这样子比较好，不损害革命组织本身。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通常情况下容易识别好人坏人，但在特殊情况下，背后有坏人容易被蒙蔽，要自己把他揪出来，这样不损害这个组织本身，这个组织就更好。

第四件事，生产问题。批语和报告中都说了，吉林的生产基本搞的是好啰，农业获得了空前大丰收，工业生产就差一些。在长春表现的特别是汽车厂，汽车厂在这里订计划的十八个同志不是来了嘛，还有革委会常委嘛。你们过去外因干扰内因。去年你们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互相串连是多一些，影响一些生产那就不要说了。今年就不应该了，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年了，应该把生产搞好，夺了权，权力机构建立起来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更高了。专、县(市)都建立革命委员会了，生产应进入高潮。汽车厂在全国很重要，不仅国内重要，还有战备、援外任务，我们希望汽车厂要带头，希望你们计划要订得高一些，因为你们是最先进的工人阶级，机械化程度最高、最先进的工厂。要求你们在生产上，第一季度过两个月了，第三个月要转入正常生产，第二季度要跃进，吉林省在工业战线上打响这一炮，希望你们能够实现，你们有没有信心？(众答：有)这样你们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来兑现，真正做到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今天把毛主席的要求转达给你们，庆祝你们胜利(热烈鼓掌)。

伯达：请康生同志讲话。

康老：同志们，我完全同意总理的讲话，同时希望同志们把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中央批示条条落实、句句落实，我再一

次热烈庆祝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思想的又一胜利。今天这个会议 135 名革命委员会委员大多数到会，35 名常委差不多都到了。同志们，你们很光荣了，你们被群众推选为革委会的委员和常委，而且经过了中央，经过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批准，还把名字写在批示上，这是同志们的光荣，这是毛主席、中央、林副主席对同志们的极大的信任，希望每一个委员和常委不辜负毛主席的委托，不辜负党的委托。希望你们掌好权，用好权。怎么样才能掌好权用好权呢？首先正如批示上讲的，主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挂帅，首先把毛主席的思想，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学好、跟好、用好。这是最主要的，这是高于一切、先于一切，最重要的。离开毛主席革命路线、离开毛泽东思想，就要犯错误，走错路，就要发生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你们委员、常委们要紧跟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把学习班办好，每个工厂、学校、机关、农村都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高于一切、先于一切、大于一切的。

再一点，文件讲了，要依靠人民解放军，这一点希望同志们从思想上、行动上做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批示上专门有一段谈这个问题，对沈阳军区、吉林省军区和驻吉林省的野战军，他们在三支两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想一想，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我们的军队是毛泽东思想培养起来的军队，应该向大军区、省军区和驻吉林的野战军学习，但我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有缺点要帮助。要向解放军学习，要紧紧依靠他们，要以最大的信心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因为毛主席教导要“三相信”、“三依靠”，离开这一点就全走错路的，我们的工人、农民、学生要好好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我们都要好好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当然，解放军也要向群众学习。

再一点，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这一点希望同志们、委员们、常委同志们要特别注意，要到群众中去。委员、常委是人民推选出来的，不是派性代表，是革命人民的代表，他不是官，他是人民的勤务员，要相信群众，经常到群众中去，《人民日报》有一篇报导，北京西直门车站革命委员会委员作广大人民的代表，《人民日报》还作了评论，希望同志们好好进行学习。到群众里面去，主任、副主任、常委、委员特别要注意到过去不同意我的观点，反对过我的群众里去，向他们征求意见，向他们检讨，要按照毛主席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第三

条去做，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而且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又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一道工作。过去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不大来往，不大了解，现在大联合了，成立革委会了，要很好地团结，这样子把吉林的工作搞好，真正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办事，争取吉林文化大革命彻底、全面的胜利，把吉林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庆祝同志们胜利。

伯达：请杨成武同志讲话。

成武：同志们，首先向同志们祝贺，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宣布的中央批示，完全拥护总理、康生同志的讲话。中央这个批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对吉林省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也是最大的光荣，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解放军同志们，特别是驻吉林省部队的同志们，要永远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决响应林副统帅的伟大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坚决执行江青同志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特别是去年的“九·五”指示。我最后预祝同志们文化大革命中取得更大的更新的伟大胜利。（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向小将们学习，向同志们学习。

伯达：我们这个会就这样结束。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驻吉林省的人民解放军和吉林省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成果。吉林处在东北的中心地带，那里有强大的工人阶级，一片的大好河山。我的话听得懂吧？我是到过吉林省的，不会说吉林话，那里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民族问题是比较多的，苏联修正主义还在那里活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同志们不能粗心大意（江青：不能粗心大意！）中央批示所讲的，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做好各项工作，这几句话十分重要，希望大家特别注意，要保持高度警惕，可能有或大或小的反复出现（江青：要保持高度警惕，可能有或大或小的反复出现，要有精神准备。）要巩固革命委员会，巩固大联合，巩固三结合，基础是办好各级各单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级各单位都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经常的，不是办一下子就完了，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才

能巩固革命委员会，巩固大联合，巩固三结合，做好各项工作，搞好生产。最后一句话，希望大家学好毛主席著作，继续前进！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最后江青同志一一介绍到会的中央首长，康老又建议把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介绍一下，女常委也介绍一下。江青同志说：吉林的特点是有女同志，你们不是大男子主义。

（根据记录，由四个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代表共同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1968. 3. 18 《合刊》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红日高照长白山——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号中，紧接着南海之滨欢呼革命委员会成立，从壮丽的长白山下又传来了激动人心的凯歌：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当前，长白山麓、松辽平原，一片大好形势。吉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吉林部队大力支持下，经过反复较量，粉碎了阶级敌人种种阴谋诡计，揪出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吉林的代理人、大叛徒赵林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性的胜利。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谨向吉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一千七百万各族人民，谨向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民解放军驻吉林部队全体指战员，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战斗在吉林省“三支”“两军”第一线的人民解放军，在狠抓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过程中，有力地抓了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最新指示的落实。他们通过帮助革命群众组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来全面地、历史地考

察干部，使广大革命群众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区别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促进了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们希望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各方面肃清其流毒，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吉林的代理人批臭、批透。大批判要坚持地持久地开展下去，决不能松懈。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批判无政府主义，不断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大力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革命委员会不是各派的联络站，而是革命三结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权力机构。不但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干部，要做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干部；参加革委会的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也不能只做一派的代表，而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做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代表，做广大革命人民的代表。

吉林省地处国防前线，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吉林省的军民担负着重大的战斗任务。我们希望吉林省革命委员会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大力加强军民团结。要坚决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加强各民族的革命团结。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阶级警惕，坚决揭露和粉碎一小撮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各革命群众组织中如果混进了坏人，要自己加以揭发和清理。要认真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一定要把工农业生产抓好，保证革命和生产的双丰收。

长白山下春风浩荡，松花江畔红旗如画。我们相信，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一定能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领导全省革命人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吉林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社论）

一九七八年四月八日，胡耀邦就吉林省单奎章迫害知识分子一事的批示

〔按：文革中，吉林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单奎章在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淮湘支持下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一百六十六人、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一百一十一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打成特务。〕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材料。对我们党的干部人事部门、政治部门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党从有政权以来，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五十一年以来，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极其错误的审干政策和肃反政策；在错误路线的统治或干扰下，这种政策可以发展到极端荒唐、极其野蛮的地步。这个材料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同坏人当权有关，同我们平时教育不严有关，同人们的法制观念不强有关，一句话，同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落后有关。因此，我们的干部部门、政治部门应该经常注意用这种反面材料教育我们的同志，以提高我们这一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水平。

2008年5月22日初稿

2011年10月21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13）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十三节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陶铸谭震林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的座谈纪要

〔时间：晚十点二十五分至二号凌晨一点许，地点：中南海小礼堂。〕

陶铸同志和谭震林同志同大家见面，会议正式开始后，文凤来同志带领大家一起学习最高指示，接着他又代表全体同志讲了话，问首长新年好。陶铸同志亲切地站起来说：“同学们新年好！在中南海给你们拜年啦！”在谈到和我们一起来到北京的还有梁、杜、吴〔注：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三同志时，陶铸同志立即又站起来说：“他们有没有来，见见面嘛！”

葛忠龙同志代表全校革命造反者愤怒控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冲的一系列滔天罪行和江苏省委仍然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事实。这时，到会代表个个义愤填胸，高呼：“彭冲站起来！”“彭冲把头低下来”！彭冲乖乖地站起来低下了头。葛忠龙同志宣读了五项要求后，请求首长指示。

陶铸同志：请谭震林同志先谈谈，他是老华东，情况比我熟悉。先解决这个五项要求好不好？五项要求你们同彭冲交换过意见没有？（葛答：基本上是知道的。）（对谭）你讲讲，你讲讲。

谭：我不了解情况，没有研究。（推托了一番）

陶：你们都是南大的吧？上次是来的一部分，我这是第三次跟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见面了（指江苏）。也有一次接见保守派，不是单独见的。（葛把南大红旗战斗队的所谓陶铸同志接见他们，并支持他们的“北京来电”传单一份交给了陶铸同志看，并介绍他们不敢公布全文的情况。）那是不对的。同学们一定要我讲，我先讲一点好不好？（站起来讲话）其他的不用讲了，要讲的前二次都讲了，大道理你们比我们懂得多。你们主要是来谈问题。（对谭）我们没商量，我先谈谈

个人的意见。

（读五项要求：第一，强烈要求罢彭冲的官，撤彭冲的职，彻底改组省文革小组，省文革小组成员必须有革命造反派参加。）同学们可能有意见，你们叫“打倒彭冲”我没举手，你们注意了没有。其实“打倒”就是罢官的意思。（文插：打倒不光是罢官，还要斗倒、斗臭。）彭冲就是不罢官，也在你们南大斗了三十多天了嘛！（插：我们没有斗，只是进行了批判。）斗批也差不多，罢官同打倒差不多。你们的提法有根据的，你们有你们的看法，我个人觉得你们可以这样提。我们没举手，但不是不赞成你们。我们是中央的工作人员，是不能随便表示态度的。我们举手，等于中央赞成，但中央还不知道，毛主席也没批准。对省委，中央不是打倒的问题，是处理的问题，改组就是了，撤职啦反省啦，这个请同志们谅解，这样是不是保皇派呀？你们的要求我们有义务反映到中央。省委书记撤职要中央考虑，省委书记全国只有二百多人。你们的要求很强烈，我们一定反映给中央，要得到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同意。省文革小组长可能是不能担任了。（众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是我个人意见，我向中央报告。文革小组长可以先不干嘛，保留省委书记以观后效，做什么事情都要留有余地，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不要当文革组长了，再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再不行就撤职。你们同意的话就是大家的意见，不同意就是我们两人的意见。毛主席的方针总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达到团结的目的。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再看看嘛！看样子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还有一部分同志不赞成，有两派意见，不同意都可以，我们都向中央反映。（插：以后再不改，就非罢官不可！）当然罗！不能老错不改嘛，老是不改不行。（文插：改组省文革的问题。）你们造反派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造反总部，到你们成为多数的时候再改嘛。省文革小组可以不行使职权，由省委来领导就可以了，彭冲不搞这个工作了。

（读第二条：江渭清、彭冲等人必须深刻检查交代对南大工作队中革命造反派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等同志以及省机关造反派的迫害。）有政治迫害为什么不交代，彻底检查，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读第三条：省委责成公安厅立即解散一贯违法乱纪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南京直属纠察队，警备纠察队，红一团、红二团等黑组织，对其中的首恶者及其后台，必须逮捕法办。）这个我看，造反派可以代省委去好好调查研究，北京西城

区纠察队就是榜样。只要是人民，都可以享受宪法上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集会，还有大串连都可以，不管是保字号也好，不管是革字号也好，只要不搞地下活动。但打人、法西斯行动是不允许的。西城区纠察队不是解散了吗？（插话：同西城区纠察队就是一样。）你们刚才讲的几个单位，可以调查，如果同西纠一样，就同西城区纠察队一样处理。（问彭冲）这样好不好？

（彭冲说：好。）为什么北京能解散，南京的为什么不能解散呢？暗杀、武斗等是对待敌人的，不允许，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允许思想不同。不能搞法西斯行动，侵犯民主，破坏人民的权利，是绝对不允许的。现行反革命可以进行处理，确实如同同志们所讲的，如果同北京西纠一样，那也一样处理。（凡石同志揭发省委包庇那些组织，反映了多次也不处理。）

（谭震林同志插话：西城区纠察队也是最近才处理的，以前中央没有下决心，地方也不好下决心。西城区纠察队开始还做了一些好事，后来受了坏人的操纵，变坏了，但是，大部分还是受蒙蔽的，多数是好的，少数坏的领导人要法办。）

（读第四条：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对于用罢工、破坏国家财产，挑动武斗等手段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省委必须立即出面制止，并且要严肃处理，对其中主谋者及后台要严加惩办。）这个还不好吗？这个是十六条，罢工、打人应该制止，不制止怎么行呢？

（读第五条：江苏省委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陶铸同志在场、江苏省革命造反派和省委书记达成的八项协议。）那个八条是我和汪东兴在场，省委书记当着我们的面，当着你们的面，同意的就要履行，否则怎么行呢？我从三司和军区得到一些材料，江苏省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比以前有所进步，（万金华同志立即列举事实，揭穿江苏省委的花招）这些我知道，江渭清确实在转变，但下面阻力很大。包厚昌、李士英确实支持你们，（万金华同志又举例控诉）徐州一万人提出五个条件，省委征求中央意见，我们要他同革命造反派商量。省委在转，转得那么好不一定，当然有你们的帮助啦，这也是他们造成的恶果。他们转，保守派也很尴尬，不满意。只有坚决依靠坚定左派，来做保守派的工作，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你们南大有多少学生？造反派有多少？（文答：学生、教职工八千多，造反派五千多人。）总还没有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吧？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讲得很清楚，一个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

十五。对保守派，你们还要做工作。保守派硬要同我和汪东兴见见面。我们也要做点工作，好吧，就见一见吧。我说：你们确实比人家差，必须承认这一条，你们必须承认错误，要检讨改正错误，你们要向人家学习。当然左派也要团结你们。对梁、杜、吴，你们过去保他们，现在他们转过来了，为什么要向你们作检查？现在不必去，以后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向全校作个报告，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现在不是要他们作检查的问题，而是你们要改正错误的问题。我上一次是这样讲的，两派都是这样讲的，搞两面派还行吗？我们在中央做工作，难道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第一条，我说他们革命精神差，要开门整风；第二条，他们大多数人还是要革命的，还是应该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你们要团结他们。我们要有革命的气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我们要得到全世界嘛，不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团结全世界人民，夺取全世界的胜利。最近中央批了个黑龙江师院关于团结保守派的经验。（下略）这个经验是对的，我看你们可以采取这个政策。

（谭震林同志插话：希望你们也创造一个新的经验，把南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团结起来，中央一批拿到全国去学习。）省委要坚决支持你们，毫不动摇地支持你们，你们要把他们团结过来。我就讲这几点，（对谭）你讲几点好不好？

谭震林同志：同学们，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他是第三次，第一次见面，首先是拜年罗，今天是元旦，一九六七年开始，一九六六年过去了。六六年是大变化的一年，六七年要有更大变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批判到底，社论讲得很清楚，社论不但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还总结了过去，希望你们把过去的一年的斗争总结一下，求得今年或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把南京以至江苏省百分之九十五革命师生，革命员工团结起来，做到这一点要向哈尔滨红色造反派学习（陶铸同志更正：黑龙江师院），然后有所发展。运动是向前发展的。十六条没有红卫兵，没有大串连，十六条讲重点主要是大中城市。现在革命发展了，工厂企业都在搞，除了军队以外，全国都在搞，运动都在搞。运动在发展，我们的斗争策略也应该向前发展。前一阶段虽有很多创造性好的东西要总结，也可能有缺点，哪个人没有缺点，百分之百的好？最高指示讲要一分为二。要很好地总结过去一年，今年来个好开端，争取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团结群众靠你们，团结干部也靠你们。革命主要是群众，第二条是相

信党，这是根本的两条。关于团结问题，最高指示里谈到这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比如，先把彭冲的文革小组长的官去掉的做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嘛，当然还要批评，还有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彻底的，不是弄虚作假的，真心诚意地改正错误，这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相信江苏省委是会这么做的，也应该这么做的，如果你是革命者，应该有这个勇气，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呢？我事先没有跟同志们接触，只能抽象地说几句，相信你们根据社论精神，总结经验胜利完成一九六七年的任务。

（陶铸同志要彭冲表态略）

谭震林：一位同志问：“我们与彭冲的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矛盾从现在来讲，还没有罢他的官，还没有经过中央的讨论，主席、林彪同志批准，现在的矛盾还没有转化，批准了才转化，现在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读毛主席语录 217 页第二段）跟彭冲的矛盾要得到解决嘛，不解决就不成了，错误不改正矛盾还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我们两人没有商量，也没有请示中央，五条事先也没有看，还要同你们商量。省文革现在看来可以不要了，（陶铸同志说：群众不是不要，而是要改组。）你们同意分两步走，文革小组的事要商量，明天要接见黑字号，（陶铸同志指着手臂比划着说：不是，不是，是黑字兵。）是保字号。（陶铸同志讲：还是讲“保字派”好。）怎么办，怎么讲，要征求你们的意见，我们年纪大了，但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新兵，革命干劲不如你们，你们可以把我们考倒，可以打我们零分，（陶铸同志说：零分也不至于吧！）因此我们要先同你们商量，或者说先请教先生，然后再同他们谈。怎么说要做工作，按林副统帅的话就是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今天晚上来说彭冲还是人民内部的范畴，要转化的话，还要中央、毛主席的批准。

文凤来：我们认为多年以来彭冲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是一贯的，我们主张打倒，把他斗倒斗臭，中央的处理那仅是处理的问题，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不能决定他的性质，矛盾的性质是客观存在的，……

陶铸同志：刚才有许多同志写了很多条子，一个是关于彭冲的矛盾问题，你们把他当作敌我矛盾，同志们完全可以这样提，充分揭露批判，我们赞成，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中央还没有做结论，放手让你们揭，最后是什么就是什么。全国到底有多少，也要平衡在百分之五以内，要有个标准，现在中央没有讨论，

没做处理。你们认为是敌我矛盾，以后把事实搞得很充分，是敌我矛盾就是敌我矛盾。今天同你们的看法稍有不同，双方意见可以有些保留，我们大家不强求一致，我不强求你，你不强求我。刚才反映的意见，我们反映给中央，我们可以研究。省文革组长可以撤，省文革可以改组，你们认为陈光同志比较好，我们可以向中央反映，至于彭冲的省委书记罢掉，我个人认为还是分两步走。你们还是要按毛主席的话去做，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当然彭冲有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我们现在拿高标准来讲，是否够三反分子，那还要看。

工作队三位副队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觉悟得比较早，江苏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不可以揭呢？不能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叛徒，恰恰是革命行动，他们觉悟了，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这一边，很好。

（看了关于林副统帅说保字派保对了的传单后，手里拿着传单说）这纯粹是捏造造谣，（有的同志说要逮捕法办造谣分子）逮捕还是由公安部门去办，你们可以提供材料。

省委是支持你们的，有的同学讲不能这样讲，我认为开始是不是够呢？那当然肯定不够，根据我的材料，江苏省委下了决心，走出了一步，按着步子，是不是能走下去，还要看，总是有了行动了的，当然不够啦。

开会问题，明天晚上我们要找多数派就是保守派谈，先找革命派，后找他们谈，我们帮助你们做工作，省委支持你们，他们下不了台，我们做点工作，把两方面情况向中央汇报，把你们的五条报告中央，文革组长能否罢掉，由中央最后决定。兼听则聪，偏听则蔽，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多听意见有什么坏处呢？同志们应该相信我们嘛，我们是坚决支持你们的，相信我们有分析能力，然后再宣布中央的决定，让他们接受教育，安徽也是这样做的，还是要团结大多数的，多数派革命差一些我们要帮助他，中央找哪些人谈话完全有权力，为了开得更好，你们不必参加，你们应当相信我们，我们两方面的稿子写好了给你们看，这样光明磊落，也不会把一些词句改掉。

你们多留几天，把问题搞透，这样更好地帮助你们做工作，使你们的阻力少一些。今天是初步地交换意见，是不是到此为止，留下十几个人再谈一谈。

（葛忠龙同志问及彭冲任南大党委第一书记，有的同志提出罢彭冲这个官陶铸同志说：那就不必要再搞了，兼得太多了。

（葛问到保字号的人把斗争矛头指向敢于造反的梁、杜、吴。）

陶铸同志说：那当然不对，他们作了检查，还起来造反了，立了功嘛。

（一些同志揭发省委的压制和迫害。）

江苏省委要公开检讨，道歉。

（同学问：他们三人是不是革命造反派）那当然是革命造反派了。

（同学问：彭冲汇报的假材料是不是能给我们批判？）

陶铸同志：材料还不够吗？俯拾皆是，到处都有，我们请示中央，如果对你们有好处，个别的文件可以给你们，我看是可以的，但今天不能答复。

（当谈到窦长春回南京批判时，陶铸同志说）

对窦长春这个人批判是可以的，肯定是必要的，他在北京，不是见中央的，你们跟中央打个招呼就好了。

（当谈到黑字兵利用这点大肆攻击我们时）

你们有缺点要批评，但决不会增加你们的负担。

（当同学们问到是否可以到《新华日报》社去看大字报，《新华日报》社的人说这是中央的指示，中央有没有这样的指示？）

我们没有发这个指示，报社的大字报怎么不能看？我们中宣部不是也可以去看吗？我的大字报也少嘛。具体可以同省委商量。

集体接见到此结束。

（南京大学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记录组整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和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关于九项问题的协议

为了接受在江苏饭店发生武斗的教训，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发生，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和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市委代表达成以下协议：

一、立即追查一月三日在江苏饭店挑起武斗事件的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幕前、幕后的策划者，挑动者依法予以严惩。

二、凡参加工矿企业赤卫队的基层干部（党的支部书记、副书记、车间主任和副主任）。要立即一律退出。如果今后他们中间一小撮人在幕前、幕后挑动策划武斗要追查出来，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是干部的一律撤职，情节严重的依

法严惩。

三、以省、市委名义发出通告，立即要外地赤卫队员迅速离开南京，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其中的基层干部拖延不走者按旷工论处。

四、省、市委对在江苏饭店发生的武斗事件没有能够制止，是有严重责任的，必须向全省革命造反派和其它革命群众公开检讨、认罪。今后坚决依靠革命造反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作好工作，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五、要动员离开生产岗位的工人立即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凡是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以后，干部策划破坏生产的要追查责任，坚决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要罢官，其中是党员的要给以党纪处分。

六、省委、市委组织慰问团对受伤者进行慰问。

七、省委、市委立即和革命造反派协商，固定办公地点。

八、认真解决外地来南京的革命造反派的吃、住生活问题。

九、在江苏饭店发生的武斗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应由省委、市委负全部责任。

以上协议自达成之时起立即生效。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下午四点于南京

南京大学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上午十点于北京

（华东工程学院东方红公社驻京联络站 一月八日 北京化院（红色宣传员）翻印 一月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元月六日，周恩来与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元月六日晚上十点十六分，周总理在中南海会议厅接见了我们南京大学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 27 名代表，主要就元月三日南京惨案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作了重要指示。总理亲切地询问了每一个同志的姓名和籍贯等情况，以后，就立即详细地向我们了解了南京惨案的情况，在关键之处总理反复询问，核实。现将谈话纪要整理如下。】

周总理：交通问题关系太大，上海的煤也不够了，码头停了几十条船。你们既然是左派，一说就通了，不能再停了。江渭清讲已经达成了九条，我说九条比八条（指 12·5 南京革命造反派与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达成的八项协议）更加支

持你们。省委最先站在革命造反派方面，我们就很高兴罗！

同学：赤卫队在省委把桌子、椅子都劈了。

总理：连省委的东西都给劈了怎么行呀！现在的问题首先是交通要恢复。如果九条对你们有利，轮渡一定要恢复，你们应该恢复。（总理看到九条的第二条时说）哦！对了，参加了工矿企业赤卫队的有直属干部。彭冲同志，这就不好了（严肃地），我们懂这个道理，党内基层干部有些思想保守的，没有想得通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偏爱保守派。这是一个原因，这也是一个重要影响。你们造反派不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你们要帮助党，不要让老干部继续增加反感。除了少数坚持不改，甚至还在顽抗，那些自然是自觉的；还有那些不是有意顽抗的，是不自觉的，你们提口号不要一律骂到，要跟我们合作，你们这些勇敢的闯将，是帮助我们党中央作好工作，同我们一起克服这一时的困难，一时的波折。一种是自觉的，一种是不自觉的，分两类，成为一般逆流。当然要一分为二，否则对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利了。

（当我们揭露省委一工作人员给南京黑字兵总部的一封黑信后）

总理说：省委里有一部分干部很难接受省委对造反派的态度，他们和保守派的观点相同，所以和保守派联合起来造江苏省委的反。各造各的反，标准不一样嘛！不过这还是合乎情理的，实际上还是有这种人的。

（这时周总理又和江渭清通了一次电话回来）说：这个九条已经签了字，他们正在印，还没有公布，问国务院有什么意见。这是比较支持左派的一个协议，会不会下面会出事情。这个协议不管将来执行如何，文字本身是支持造反派的。

（总理讲完后，十二点三十五分我们休息，总理又去接见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的代表。到七日凌晨二点十分总理又与我们座谈。）总理指着九条协议说：这个总是好的，你们总得支持。你们不能采取旁观的态度，这对你们有利，不是对组织有利，而是对方向有利，也可能会有波折，要相信省委是想搞好的。江渭清刚刚问：你们有什么意见？我说：中央国务院同意了，是好东西，但有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我给江渭清讲：我正在接见造反派的学生，鼓励他们支持你们，要采取积极的行动，不要采取旁观的态度。下面就要看明天的反应。你们是不是电话打回去，说中央支持你们的行动，但你们要积极支持。我看原来的太复杂了，达成协议不要太复杂，不要那么细致，太复杂了反而束缚了手脚，太细致就会影

响对另一派的工作，就把他们置于很不利的地位，你跟这方面达成了协议，跟那方面怎么教育改造保守派呢？对保守派总得要做工作，第二条讲要追查赤卫队的幕前幕后，这一条使他们处于不利，首先就要起来闹，问题如江渭清所说：这次事情省委中有一部分人到江苏饭店，不是省委挑动的，是他们自己去的。问题是二千多人的车子送到江苏饭店，这一点符合事实，赤卫队肯定是输理的。这一条既然肯定赤卫队理输了。希望你们交通不能断，无论如何支持这个。支持你们了，最后不要再扩大了。多数赤卫队员都回工厂了，如果贴出来赤卫队没有什么，就不要批评他们了，什么黑字军了，老黑等都不要叫了，都是阶级兄弟，省委已经支持你们，你们不要盛气凌人。你们的矛头要对准省委市委。刚才为什么要把你们留下来，不然的话我心里不安，你们对了不要以胜利者自居，这是主席思想。胜不骄，败不馁。造反派伤得多，造反派的话我们都相信了，一定不要去刺激他们，不要叫什么投降，缴械，都是阶级兄弟。不是他们，而是挑动的人，把那些人要揪出来，要照顾大局，毛主席说：“大道理管小道理嘛！”南京的影响很大，基层干部赤卫队很多。他们有保守情绪。文件有好处理，号召他们退出，首先是这一关。我要省委连夜开会进行解释，第一是接受，第二是退出，第三是不准再犯。

这三条是相当严肃的决定。要给他一个机会，不要太急，至少要看几天，不要干扰他，让他们去传达，不要一开会就说是黑会，这个会要一级一级传下去，把这批干部问题解决，这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要上十天要上月。南京来说工人同志中他们还是多数，总要把工人造反派扩展起来，要争取多数。我也问江渭清，他说：一、二条要费功夫，要允许他一个时间。第三条据他说浦口方面不是赤卫队，主要是渡口的堵塞，今天轮渡一开，就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说的剩下一万人，大概就是这回事。我说是不是沪宁线上还有，他说，没有了。现在正是大做工作，外地来的还有少数。我说要连夜发出通知，现在要回去。第四，要他们认罪检讨，对赤卫队来说，是不愿意的，我就这些意见，特别是头两条，检讨总是要给他两天时间。做好工作，你们和南京的总部商量，有不同意见就立即写条子告诉我，我们要紧跟毛主席走，要做到老，学到老，省委机关里可能是有些问题。

我是解决九条问题，其余的材料还是看看，还要见你们。九条出来以后先看看，如果平息了，向健康发展了，那就好了。先把这第一关搞好，把南京革命秩

序恢复，你们占了优势，那就好了。回家要调查，总会查出一些线索来的，武斗你们造反派无论如何不能要，你们要根据林彪同志的报告，不要搞武斗。

当同学请总理对八条协议表态时，总理说：九条比八条更高嘛，更加支持你们造反派。

当我们控诉了南京“一·三”流血惨案中动用武装人员时，周总理说：你们对战士更要好好对待，如果不好就有反感了，不是他们犯法，是上面交给他们的。给你们缴了枪也没有抵抗，那里比较好了。这是对你们革命左派的最大信任，如果要对敌人，他们是死也不会做的，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缴枪是耻辱的事，他们没有反抗，把枪给了你们，是最大的信任你们。反过来，你们要尊敬他们。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是不是安慰他们，把他们送回去，另外写封信给军区，告诉他们介入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当然写封抗议书也是可以的了。

当我们问总理：南京黑字老保打电话回家说你接见了他们，并且达成了几项协议。请问总理有没有这回事。总理说：那个谣一定要辟，跟保守派我根本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如果没有协议的话，那就是两条：一条是他们同意许家屯回去，二是我同意过几天接见他们。根本没有达成什么协议，这根本不对。

周总理因为很忙，他还要接见好几批代表，于是在二点五十分结束了与我们的座谈。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周恩来第二次与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

周总理：

你们从电话中还得到什么消息没有？你们得到的反映有工人赤卫队还在南京，刚才得到消息，三元巷 500 名赤卫队和 1000 多造反派有点冲突，新街口也有事，在街上捉他们游街，遇到挂黑袖章的就捉，肯定要发生摩擦。学校有个不同，可以到外地串联去，工人不同还是要回到工厂生产。这次工人运动来得猛，本来想学生左派搞好了再搞，十一中全会后，学生左派也没搞好。

十一中全会前，江苏省会搞了一个报告，搞了个摆擂台辩论，还说南大最好的方式是辩论。第一次是上新华日报的一次，第二次是辩论省委的一次。第三次是关于给匡亚明戴高帽子的辩论。

我看了电报，还有这样形式（指三场辩论）为了说服保守派，我还介绍了，

让江渭清、谭启龙到清华作介绍，江渭清还生动地摆了擂台。原来才知道工作组的报告还不确实。这是十一中全会以前，实际上是一样执行了刘邓路线，那时候他们还以为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很自负。这样反而把意见加深，辩论八次之多，继续支持保守派，压制左派，这样就把错误加深了。6、7 两个月，8、10 两个月，四个月了，工作队是错上加错，到中央工作会议，你看时间多长，是错上加错，江苏省委对错误的认识不那么明朗（总理问谭副总理：你听到他的检查没有？）我没有听到，听别的同志告诉我，很不深刻，错的一定要改并且要采取具体步骤，进行实施，我委托许家屯同志回去作检查，省委写给那个总部的信是你们查出来的，江渭清的检查你们嫌不够，他们嫌高，希望许家屯同志回去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支持左派，加强教育保守派，最后才能团结 95% 的人，省委要作工作，你们也要作工作。省委来电话说：坚决站在左派方面决不动摇（读来电）。实际上不信左派，还要宣传教育保守派，干部可以退出赤卫队，教育保守派认清形势，摆脱被动的形势，批判省市的错误，应该有这样的决心才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复？一是外地的未轰走，一是可能省市没有采取措施。（读九条协议）如果立即追查幕前幕后的，查出省市的人幕前幕后的一条处理，这样可以按第一条处理，第三条是要引起波动的，最好不要引起冲突，昨天六点我又跟铁道部的谈，说交通还未恢复，轮渡只能运客车，货车还不能运，这是最紧要的事，南京是枢纽，上海的存煤只有两天了，当然北方的船可以运，不过冬天有的地方冻了。地方冻了，这是最紧急的事，影响到国内外，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主要还是谈九条，尽管对第四条，省市说承认责任，没有说是指使人，原则的是第一条，我担心的是第三条，双方剑拔弩张。挑起两方武斗的人当然要低头认罪，要法办，对同志对阶级兄弟这样，群众不能同意的。不责备一个组织，而责备挑动的，阶级弟兄打架，是群众斗群众，由领导负责。有些形式你们很好回去做工作，今天晚上联络站开会，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交通问题我最担心，问家里的意见怎么样？你们开会的情况，南京现在的情况，对九条有什么意见，九条我是同意了，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发表；我要江渭清赶快到红色造反司令部去联系。省委支持造反派，这是个基本转变，这是最大的前提、大方向罗。追查出幕前幕后策划的人要惩办。要省市号召外地来的赤卫队回去，江渭清要作检查，

我担心，赤卫队集聚起来，把省委的人弄成，这是不聪明的办法，聪明的办法是把事实真相暴露出来，这是聪明的。我认为省委的这个态度，大方向是转过来了，一下子转一百八十度很困难，这基本上是一百八十度了，应该欢迎这个转变，我打电话给许世友，要江渭清无论如何要回来，要支持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也打电话给江渭清，要他无论如何要支持革命造反派。

（南京大学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华东工程学院东方红公社驻京联络站
1967. 1. 10）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第三次与南京大学代表座谈纪要

〔地点：中南海会议厅。首先南京大学等革命造反派介绍了南京惨案后，最近南京情况……，现在他们工人赤卫队到处抓人。昨天南大“八·二七”二位同学被抓，现在下落不明，夫子庙用硝镪水洒在造反派身上。……造反派工人说，九项协议不符合十六条，本身是与当权派达成的，不是群众组织之间达成的。九条协议矛头指向群众，不是指向当权派。协议给省委定了调子……我们造反派很愿意撤，但怕我们撤后赤卫队不撤，反而集中起来进攻造反派，那怎么办？我们要求快派人去解决。〕

总理：中央没有人去做。

同学：张春桥同志能去吗？

总理：张春桥同志在上海。

造反派代表：外地红卫兵大量集中去南京……我们把抓的人都放了，赤卫队不少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感到我们都做得不对。当场有不少人撕毁了黑袖章。……

同学：南大红旗战斗队，南京赤卫队等保字派在北京大肆攻击我们革命造反派，把我们“八·二七”等革命造反派与陶铸连在一起，称我们为“保陶派”。

总理：你们保他什么！……对南京事件省委不一定有协议，可以表态，到底那个挑起的，你们回去查一查。

同学：南京流传主席最近三点最新最高指示，昨天在西单辩论时，他们保守派说：总理支持我们。

总理：根本没有，他们造谣。

（当同学去接电话后，向总理汇报了北京去南京的火车不开了，我们要回校的二十几位同学等在车站。）

总理马上说：派飞机送你们，解放军报社二个记者与你们一起去。（总理叫人要飞机，九点起飞）总理对许家屯（省委书记）说：你们省委有一个地点公开办公，与造反派联系，接气，你们不要去搞（对造反派说）这样可以与我们保证联系，要求快。

同学：造反派准备把江渭清带回北京，并希望中央能否有个书面的意见，让我们带回去。

总理：你们过去与“八·二七”和红色造反派说清楚，让他们有机会考验他，彭冲因在南大问题太多，你们带他回去，其他人将功赎罪，希望干部在大风大浪中考验，总要给他们考验，现在初期，没有同志代替，中央不同意停职反省太多。叫他们作工作，又去批评他，你们回去与领导、造反派说通，否则领导不了解，回去与总部共同商量，把意见告诉我们。（对许家屯）省委要引咎自责，号召群众不要把矛头指向群众，要认罪，认过，这样中央指示才能对症下药，究竟现在说什么，还需要你们回去以后给我们打电话。九条太具体了，有困难，搞原则些比较好，你们这个建议很好。……

总理对许家屯说：谈话你听到了，省委要完全支持造反派，说服教育保守派，……省委要引咎自责，重点放在支持造反派，支持左派，教育保守派。使他们认识到受蒙蔽，这样使他们内部分化，不致顽固地对立，主要表现在对党和政府，国家利益负责的态度……

总理一夜没休息，为了照顾总理健康，我们让总理去休息，总理与我们又一握手告别。

（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连会驻京联络站华东工程学院《东方红公社》驻京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周恩来谭震林与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座谈纪要

周总理：

学习最近的毛主席的关于夺权的指示才行。《红旗》三期社论是毛主席亲笔改的，是毛主席的最新思想，尤其是第三段，主席改得最多。学毛著必须和当前实际斗争相结合才能活学活用（翻开《红旗》三期社论第三段）

这一段（指第三段）对于你们今天接见很重要，各方面都说到了，你们夺权我们已看到，中央要经过与你们会谈才能表示支持或不支持。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没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没有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又怎么能够夺权呢？今天的夺权，是 1949 年夺权斗争的深入和继续。但情况不同了。主席批示我，各省夺权后，要一个一个地接见。昨晚我委托康生同志先找李一英同志来谈一谈，你们要派人来监视，来记录。我们这样支持你们，你们这样不尊重我们，我很难过。你们对包厚昌、李士英什么态度？究竟是可以合作呢？还是带来见工人的呢？给不给中央权利呢？主席写这一段（指《红旗》三期社论的第三段）是有的放矢的。

毛主席、林副主席批了三条意见：全国复员军人不能成立单独组织，全国有九百多万复员转业军人，99%都是好的，只有少数有问题的对我们不满意。

我们应该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示。我找他们开过会，说不要搞全国性单独组织，可以设联络点，联络，登记、询问，但是座谈以后他们还是要成立全国单独性组织。安亭事件后，我回复了许家屯，十一月十三日我很早就回答了工人可以单独成立造反派组织，也可以综合的即工农兵学的组织。以前发表的两论抓革命促生产，现在不适用了。原来想分期分批搞，革命洪流一冲击，现在不适用了。允许学生组织，为什么就不允许工人组织呢？现在真正实行宪法上组织自由了。这一点，许家屯他总是传达了。（当总理问到南京的复员转业军人的组织时，一工人回答：解散了。）解散了，应当称赞，还要说服人家。中央至今没批准过全国性的组织，临时工、合同工中央没批准过任何正式文件，但有人（劳动部）编造说全部转正，造成经济主义泛滥。61 年、60 年、62 年下放的工人，干部如果都回原单位工作，单哈尔滨就要多支出六亿，全国就得多支出 100 亿以上。上海工人阶级觉悟高，首先反对经济主义，文汇报首先登出来的，主席一看到，就把我们叫去了，当晚就广播了，蓬蓬勃勃的夺权斗争展开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高潮。学生必须与工农兵结合。一九六五年毕业生要求无条件，普遍回母校，陶铸就发了文件，说可以不转正，可以回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组

织，全要回去。应该在工厂，科技机关闹革命。而且本校也不欢迎这些人回去。这是不对的，使我们增加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中的不必要的麻烦。可能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我说，冲还是要冲，闯还是要闯，林彪同志提倡，首先要革命性，还要科学性、组织性、社论第三段就是对干部的科学的分析。总理讲了东北地区重要性，三面是修正主义，苏、朝、蒙修。你们要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你们的老家不但包括哈尔滨，也包括长春、沈阳、大连。（我说，南京很紧张，这些地方文化革命搞得并不好。）东北也很紧张，是工农业生产基地，南方有上海就行了，南京是你家（指尤念祖），他们（指南京造反派）是否要留你们？你到你们北京联络站去一下，他们会动员你们回去的。

建议不采用江苏人民公社的名称，用了发生政权问题。中央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国际上震动问题，首先造反派是政治上占优势，现在有些单位是人数上也占优势了。保守派在瓦解。造反派人数上占优势后，就会骄傲了，包办代替了，当然这只是苗头。希望你们警惕。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江苏代表团时的谈话

【时间：3.2 夜至 3.3 凌晨，地点：人大会堂西会议室。出席：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穆欣。】

一、关于如何对待人民解放军

康生：南京有冲军区的没有？（代表：八一医院发生过）你们要和他们（指八一医院）斗争，要反对，到处贴他们的大字报。

当前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是一个标志。因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部队，是林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有力工具。要夺好权、党好权、主要靠你们，但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解放军。一定要拥护解放军、支持解放军、依靠解放军。不管什么理由，在当前情况下，冲击解放军就是反革命行为。要坚决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这是主席批准的，主席签字的。

军队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是正确的，但不能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要支持所有的革命派……不然的话，就会卷入他们的宗派斗争中去了。

二、关于“亮相”

康生：“亮相”好象是说化了妆出来唱戏，下了妆后还是原样，这不叫“亮相”。要有革命行动，要真正出来革命才行。

态度要鲜明。提倡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赞成什么，必须鲜明，不能折衷。亮相不是为了保乌纱帽。

关锋：亮相就是公开站出来揭发问题。

王力：亮相必须有鲜明的旗帜，真正站出来和群众一道揭发他们是怎样搞阴谋的，怎样镇压群众的，并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然后跟群众一起闹革命。“亮相”这个词是可以借用的，但要作科学的解释，不能作庸俗的理解。领导干部要到群众中去亮相才能算数，才能看得出来（真假）。

三、关于三结合

康生：根据《红旗》四期社论，对老干部要全面的看，要从他们的整个历史，也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来全面的分析。在一定时期，对他们加以保护是一回事，把他们作为革命领导干部，搞三结合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三结合是指革命的三结合，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结合。

叫江渭清来北京，是要开导他，承认错误，是很好的检查。中央并未对他说“三结合”。

伯达：你们可以考虑一下，那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谁可以作为三结合的核心人物，这要从实际行动中考察。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差一点（指能力）也可以。那么多干部总会有的。大致上是不错的，旗帜是鲜明的，是真正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就可以。有的是要争取团结他们，但不能作为“三结合”的核心。

关锋：请他们挂帅，作领导核心，跟争取团结他们是两回事。

四、关于江苏省委

王力：江苏省委干了些什么事，要充分揭发。对于江渭清，单凭江苏饭店“一·三”事件，就应该打倒。江苏省委已经搞到顶点了，够严重的了，应该彻底揭露江苏省委。合二而一不能解决问题。江渭清好？还是高啸平好（代表：没有多大区别……江渭清更坏。）你们要冷静考虑，不要感情用事。根本的界限是看他站在那一边。

关锋：李世英、陈光，你们不起来揭发江渭清、彭冲在过去干的那些坏事，

凭什么搞三结合？！

康生：我有两句话。一句是杜方平说：“至今还看不见省委有什么革命裂痕（裂痕是指路线上、原则上的分歧）”。另一句是张建山说的：“直到现在还看不到省委有什么革命行动”。（王力：直到现在，他们对中央文革还是敌对的！）建议你们省委听听他们的意见，拿这两句话，很好地检查自己的行动。

以江渭清为首的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事？反对了什么？……我们还是希望他们挺身而出，坚定的站在主席一边，反对刘、邓路线，和革命同志一起将江苏省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革命的组织打你们，不是为了把你们打成右派，而是要打成左派。自己要争作三结合的对象，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的成员。我们对这些同志寄予希望，但自己也要创造条件。李世英、包厚昌参加了生产委员会，你们不要以为有人支持，就有资本了，已经亮相了。参加生产委员会，并不等于在原则上（和错误路线）分裂。希望省委挺身而出。旗帜鲜明。

五、关于宣传工作

康生：你们要把宣传工作好好检查一下，从你们的报纸上看，你们的宣传工作不太好。……马路新闻不要相信。……你们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天，好的东北要学，不好的东西不要带回去，比如有个“百丑图”你们不要搞那个，那是自己给自己抹黑。本来他们是一小撮分散的，被群众包围着的，你们把他们集中到了一起，本来他们没有组织起来，你们却把他们组织起来了。结果群众一看，呵，这么多！而且很快传到香港登了报，两三天就又到了莫斯科。大高帽子、持黑牌子……，你们要说服群众，不要这么搞。毛主席说造反有理嘛！这么干说明你们没理可说了。还有”砸烂×××有狗头”，陈伯达同志说要把这个”砸”字砸碎。骂人不等于战斗。比如说：”×××混蛋”，这能增加他们攻击我们的资本。我们的讲话，你们不要出大字报，不要登报纸。

关锋：报纸必须成为无产阶级的报纸，不能成为一个集团的，不能成为”集体所有制”。

六、关于几个口号

康生：昆明提出“左派内部必须大乱”，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你们那里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所有这些，都是以“反对右倾机会主

义思潮”为中心提出来的。中央的精神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是目前的大方向。你们提出这样的口号，内部互相打，放松了敌人，这才是真的形“左”实右，要坚决反对！“革命的打、砸、抢万岁！”。那有革命的？是反革命的行动。

（王力：是流氓、土匪的行为！）

一九四九年我们解放上海、南京时，工人还组织起来护厂，而现在都要砸？！

关锋：“江苏的天下是《红总》的天下”的口号，是宗派主义的口号。江苏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天下，是江苏人民的天下。

七、关于“私心杂念”、“内部整风”

康生：你们到北京来，总理接见了几次，不要回去就写大字报说总理接见了我们几次，用来压对方。这样做是借人抬高自己，实际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主席著作、中央文件、人民日报和红旗社论以及报纸上的好文章，要好好地学。我看你们学的不够，天天闹闹嚷嚷。你们主动检查自己好，人家报纸上有错误，你们报纸上有没有？人家有些缺点，我们有没有？人家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看自己有没有？你看人家夺权委员会中有几个成员不大好，可不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组织内部纯不纯，是否也有不大好的？共产党内还有彭、陆、罗、杨，我们不相信一个群众组织内就没有。敌人不但在外部反对我们，也会钻进我们的内部来反对我们。思想上的整风很重要，组织上的纯洁性也很重要。我们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破私立公，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反对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同时我们脑子里也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也有敌人，也必须反对它。

八、关于反动、保守组织

康生：赤卫队要充分揭露，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坏人总是一小撮，多数人是可争取的。

关锋：要把群众和核心领导人分开，多数人是可争取、团结、教育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接见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东侧厅会议室。被接见的：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团 26 人，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 33 人。〕

周总理、康生等同志走进会场，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周总理、康老进来后，总理说：张建山样子有点象蒯大富，是苏北人样子。

康老说：那里，都是苏北人的面孔嘛！

总理问双方代表：全来了吧？（答：都来了。）葛忠龙呢？葛忠龙回去了？（答：回去了。）丁日泗也回去了吧？（答：回去了）双方都回去人了。回去罚跪是他（指丁日泗）吗？（答：不是。是曹洪涛。）今天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康老已代表中央文革说了话，中央文革同志也在这里，伯达同志也代表中央文革说了话，我也多次接见，说过了。因情况复杂，所以耽搁的时间长了一点，今天商量了一个共同的认识。江苏一月份形势确实很好，正在开展，但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省委领导人里没有站出来检讨批判，一直未站出来，这是对夺权斗争很不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军队得到通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革命的“三结合”比较晚，在二十日之后，正式文件是二十三日发的。本来有个好处，参加工作组的解放军是支持左派的，同情你们，但不能介入，只能在外面同情。最直接的问题是造反派本身，首先表现在学生，工人和其他方面。革命造反派中形成几个派别，主要是两个，本来是一道，八月份起来斗争的。从南大八·二七开始，然后影响到其他学校。南大斗争更早了，以反匡亚明开始，北京、西安、南京是全国最早的，三大：北大、南大、西交大，我们一提起来就想起这三个学校。文化革命发展半年多了，工人起来了。今年一月三日，有一次斗争发生了武

打，“一·三”之前，十一月份，比上海还有个有利条件，上海发生安亭事件，受上海影响，工人就起来了，受上海的影响嘛！上海有张春桥、姚文元，是中央文革派去帮助的，在上海取得了经验，我们从群众中取得经验，在工人中除了红卫兵外可以组织，宪法上有个自由嘛！只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大方向下，成立组织是许可的。同意了上海，原则上就同意了全国。这时正好，南京工人起来了，我们同意了南京工人组织，工人组织也就起来了！跟着，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一样，犯了错误，比上海更严重，用赤卫队对抗，“一·三”就交锋了。跟上海一样，保守派也来请愿了，实际上后面有人指使。我们打过多少次电话，阻止住了。后来发生了江苏饭店流血冲突，革命造反派取得胜利，这还是个好形势。

南大八·二七起来了，工人运动发展啦，“一·三”是保守派挑起的，革命工人与学生站在一起，取得了胜利，这个形势向好的发展。但是，到月底造成了分裂的形势。严格说来，排斥南京八·二七，排挤一派，夺权派应负主要责任。我给文凤来，张建山讲，他们也承认了。最关键的是夺了权了，《新华日报》也在这派手里。准备在“一·三零”召开大会，三十万人。南京八·二七这一派写了个声明（指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等单位二十九日的联合声明——整理者注），承认这个夺权，但认为有严重错误，还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个态度很好。那是个关键，如果《新华日报》同意登了，就好了嘛，但夺权方面拒绝了。第二天南京八·二七去了五万人参加大会，照顾团结，把夺权斗争推向前进。可是夺权派找了个反对南京八·二七的中学生上台发言，批评了南京八·二七，说他是站过来了，这样不仅不登声明，犯了严重错误。声明很好嘛！这个态度很好嘛！很合乎我们的要求。第二天还当场指责人家，这样越走越错，发展趋势是越来越错。夺了权，不是向好处发展。夺了权有严重错误，不是纠正错误，而是错上加错。关键是声明，是“一·三零”大会。确实，夺了权，在公安机关设起监狱，挂起牌子来了。你们行使了权，对方就受压制。你们提的口号是在压制人的，“谁反对一·二六夺权就是反革命”。在《新华日报》上登了：“谁反对一·二六夺权就是反革命”，“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一直登到十八号，还在登，还有文章，长篇文章！这样向错处发展，错上加错！这是就几个大的方面说的。

“一·二六”之后打、砸、抢发生了，打、砸、抓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这

不仅不是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我们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革命的“三结合”夺权。“三结合”暂时没搞起来，有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也是允许的。但这样变成一派的权力机关，这样的权力机关，我们不能承认。我们必须考虑另外的办法，不能看这趋势发展了。这不仅我这样说，就是夺权的负责人，回去之后，回来，我找了张建山，葛忠龙。张建山一见我就说：认识到夺了权掌不了权要犯罪，不改正就成了犯罪。我很感动，这还是诚恳的。他说：各厅局都来问我这事，那事，我还是未毕业的大学生，怎么知道，不好回答。这个态度还是好的。

这不仅是没有“三结合”，就是“三结合”晚些，总应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我们根据双方表示，觉得应在革命派联合之前，“三结合”条件成熟之前，搞一个过渡，实质是军事管制，但不宣布，在边疆搞了也不宣布。我们现在抓生产也是请的军区。从二十八号到三月二号开了个农业生产会三天，也是省军区主持的，有省、地、县三级参加。现在“抓革命、促生产”也委托军区。用什么组织什么形式，将来大军区、省军区一道宣布。怎么行使还要军区同志说，由军区同志宣布。现在由军区行使临时权力，这是中央肯定的，已向毛主席报告了。你们回去不要忙于在报纸上宣布，一般不宣布，贴告示，回去要把意见说清。

只有这样，军管的临时机构才能推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有利于推动省委，人委各部委人站出来检讨，向群众表态。由群众作统一尺度，决定于群众。（转对在场的省委干部讲）你们问了康老，问底，康老说了，我们的底是毛主席，毛主席的底是群众。今天跟省委干部也说了，任何人都要在群众面前接受考验。一个是认识自己的错误，当然主要责任是江渭清负了，既要划清界线，又要把自己的责任说清楚，军事权力机构帮助。另一方面抓生产，搞好工作。主要是军事机关负责，但你们也要抓，立功赎罪，将功补过，要有行动，要实践。否则，口说无凭。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派。

因为发展快，队伍一大，主要方面是革命的，是左派，但由于组织扩大，中间，偏右的也吸收进来啦。学生组织中有，工人组织中有，各机关组织中也有。各组织自己本身要有一个整顿，大联合本身要有整顿，这也是要临时军管权力机构推动。南京主要三个学校，南大、南工，这两个比较大，还有其他的。你们可以搞军事政治训练嘛！要开门整风。工人组织也需要整风，军事机关帮助。你们

实行军事政治训练，实际上是整风。还是以政治学习为主，学习“毛著”时间要长，要比军事训练的时间多。也可以选一、二个工厂，利用生产业余时间训练，作典型，由军区安排。最近毛主席已经批了北京学校军训的经验。工厂怎样训练还是新问题，将来总结好经验，将来公布。这是帮助整顿组织的好办法。

思想整顿，组织整顿，大联合啦，省市某些干部又为群众通过了，真正能参加“三结合”，军队也有准备了，革命的“三结合”也就水到渠成了。刚才说了一、二月的曲折，还不如把夺权时间拖长一点，也不是二次夺权的问题，而是真正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夺权。这是一个总的方面。

具体来说，在军事管制中，既要抓革命，又要抓生产。一个班子还是两个，由军区商量后再公布。生产方面，不仅要抓农业，还要抓工交，财贸。江苏有力量搞，江苏有大军区，而且有省军区，还有野战部队，条件很好，完全可以抽出力量到农村、工厂、学校去，还可以搞宣传。有紧急行动时，可以调动。东北有这种情况，工厂中几派斗争，经常离开工作岗位，争论不休，特别不按贵阳棉纺厂的按系统组织，开会各系统都有一部分人参加，就要有一部分人停工。这就要按报上登的贵阳经验推荐，很多地方都这样做了。凡是做了的，生产赶上去了。江苏大中城市比较多，但野战部队也不少，不仅抓工业农业，还要抓财贸交通。江苏不仅供应江苏，还有供应上海的任务。上海不仅要靠郊区十个县，还要靠江、浙二省。工人要按照这样的系统来调整。尽管一个工厂有几派，譬如说属于红总，八·二七，可以协商，按照生产行政系统组织嘛！业余时间开会，生产时即使在一个小组里，也不能互相争论。如果有这样的规定，大家是会守秩序的，工人同志是懂得这个道理的，这对生产有利嘛！对工人阶级，对整个国家有利。不管哪个地方夺权都要以本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为主。二月二十一日军委发了一个通知，除第七条外，地方也适用。我们做了五点补充。夺权以本单位造反派为主。除了必要时，才由外单位协助。从十一月到现在已四个月了，自己的力量已培养起来了，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了，总要离开裸姆嘛！这是讲组织方面，生产方面。下面更具体一点：

(1) 首先是专政机构。除军队外，就是公安机关，就是要镇压反革命，还要管制违法乱纪分子，保护人民，保卫文化大革命。公安系统不能成为一派的。决定公安厅，公安局军事接管。外部造反派都退出，内部经过一段时间，培养出

新生力量。北京已这样作了。这样才能照顾全局，就能真正地不算一派了。这样就能真正地实行中央的有关指示，真正的反革命案件，反革命分子就能得到审查，捕获，革命秩序可搞得更好。当然公安系统也可能有两派，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即使观点不同，但还要服从全体，服从军事管制，服从命令，服从整体利益，还要坚守岗位，不能消极怠工，不允许搞小集体主义。

(2) 报纸是党报。造反派夺权之后，在一个长时间内，成了派系报纸。里面有些口号是错误的，是很错误的，不符合革命要求的。当然，最好是协商，改组，现在看来不行，还是军事接管。外部的都要退出。内部若有力量，能够很客观地报道，就出报。否则就停它一个时间，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力量就印上海的报道。戴国强在吗？为什么这样？那天你坐在哪儿，把我的讲话打电话传回去了，这就不对嘛！本来找你们，说好了是谈心！既然是造反派嘛，要求大同存小异，叫你们协商研究，结果你们传出去了，这样很不好。康老和你们的讲话，也弄出去几个，根本不符合事实！

康老：（生气地）这样做很不好！这不是革命派的做法！是一种造谣，是骗人的扒手做法！

总理：……现在看来报纸还是军管好。报纸宁可停一下子，听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声音，介绍其他地方的经验，很好的学习。广播台，有线广播台也如此，也采用同样的方法。邮电局有没有接管？（代表作了回答）邮电局也在这个范围内，不然，这派电报发得很快，那一派慢，扣压另一派电报。怎么能压人家电报呢？只有反动的，反革命的电报才能扣压，就是中间派的也不能扣压，要一视同仁。

(3) 工厂方面，特别是军事工厂，很长时间搞两派斗争，生产搞得不好。工厂怎样军管，正在考虑。用哪种形式还在考虑。有的派军代表，有的派军队保卫。不叫外面去串联，看情况。

这样可以使你们目前南京马路上，表现出不恰当的种种错误标语，做法，对骂，打、砸、抢，譬如说群丑图，不应该有。不仅你们来之前有，你们来之后，还翻印了这个东西。事情已经过了，会议是十六号，二十二号开的，曾邦元同志不赞成戴高帽子，过早下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就因这个，就闹分裂。到北京来了，为了证明你们做得对，还赶印了，补印了，还用那么漂亮的纸，用一等道

林纸。（看着那张群丑图）把国家的财富，这么浪费！当然你们反对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何必表面丑化呢？我们要触其灵魂，批判思想，不是表面丑化。北京也有这种情况。还要追查一下，那里来的纸？

康老：当权了就这样，国家非灭亡不可！

总理：山西工人讲得好：打、砸、抢，打是打的阶级兄弟，我再加上一句革命学生；砸是砸的国家财产；抢是抢的人民财富。

康老：这个只有帝国主义，国民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赞成，你们这就叫大方向正确？！

这是污辱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总理：西安提“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一个革命者看这些怎么能看得下去？！你们这样搞下去，我们国家象什么样子？！

总理：曾邦元一月十六号提出反对是有道理的。不同意见你们不听，这就是形“左”实右。

康老：这说明你们心里状态不是革命，听不进不同意见。（指群丑图上）这还有毛主席的诗，这是污辱毛主席的诗！污辱毛主席！这哪里是自发的！自发的这么搞，我们国家自发成这个样子还行！

总理：当然你们说对方也搞了，也画了文凤来。不过是油印的，只是个别单位。

康老：超过了北京，纸还这样好（指群丑图），北京还没有掌权。

总理：（对康老）北京掌权了，要超过他们了。

康老：恐怕要出画册。

总理：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当然不是一派，对方也有，局部的。这是最典型，这是掌权了。回去好好整风，军训，政治学习为主，工厂也要这样。南京六月以来好的气象，这两个月搞的不好。我们不赞成打、砸、抢。就是抄家也要各革命组织商量，通过公安组织。

康老：你们看到连讲都不讲。你杜方平参加他们组织，看到连讲也不讲。怎么不说话？你还像不像个解放军？

（杜方平：在家没有看到。）

康老：都带到北京来了，在南京不会看不到，在南京也看到。什么三结合？！

一方面搞这个（群丑图），一方面又“三结合”，这不是开玩笑，儿戏吗？

总理：这不能促进人家的分化。我一直到今天才收到，今天才收到（那张图）。听说在北京也散了？贴了？

（控告团答：在北航，火车站……都贴了。）

康老：什么叫文化大革命？！这是出我们的丑！

总理：还有，主席提倡的，回去整风。不管工厂、学校，以革命造反派本身为主。现在有的是一派，多数分为两派。整风主要检查自己。我们讲了大原则。回去不要抓住人家一点就攻。不管怎样，自己总有些缺点吧，检查自己，不但不会降低威信，反而会取得别人同情，你正确的话，人家就容易接受。别人缺点多，也还总有些优点吧。局面都是闯出来的，林彪同志提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要有革命性，没有革命性，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生闯得最早。闯劲我们是提倡的。但是，光有闯劲不行。在这个时候，就要有科学性了。现在就要分清是非，区别对待分清两类矛盾。当然，不要抹杀初期的成绩。整风很重要。整风时，要检查自己，把自己的缺点承担起来，这样就容易前进。首先检查自己，就容易团结，这样就能求大同存小异。所以我刚才强调张建山说的话，他懂得这个困难是好的。特别是同学们是知识分子，虽然不少来自农村，也有工人，职员，但毕竟是知识分子，社会经验少，没有参加过战争，没有参加过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农村阶级斗争。你们还小就进了学校，没有参加长期的劳动，三大斗争，差得很，一下子掌权还差得远。不搞三结合，不向解放军学习，是不行的。机关也如此。要排排队，当然也不要人人过关。主要是党委领导，执行了反动路线，有轻有重，有的沾了边的。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打倒一切。这就是《红旗》十三期与今年二期社论所讲的，还要继续发表，你们要好好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把工厂生产，机关业务搞起来，抓起来，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工人是能抓起来的，会搞得好的。三月份就会有起色，四月份就会上升。机关搞好了，第二季度就会变化。学校进行军训。这样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准备了条件。时期不会很长，你们要创造条件。学校主要是整风，这要你们共同努力，认真抓两头，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语录，也要学透，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也很好嘛！何况还要学“毛著”、“老三篇”、“古田会议决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央文件，《人民日报》文章，《红旗》社论，去年的和今

年的，好好地学一下。

还有一点，你们机关有两派，太庞大，要缩小，工人回工厂，学生回学校，少数人留下来联系工作，这样才能把工作搞好。不然旧的机关瘫痪了，又成立了新的机关，机关加机关，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成个官僚主义机构。你们掌权的一派自己也说，忙得很，忙于事务，到处逼着签字，被群众追得跑来跑去，象旧省委一样。张建山回去了十天，他取得了经验了，文凤来也讲不知怎么搞法好。要学习十六条，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革命的“三结合”，也不是复辟。把所有的人员用起来，那是复辟，复旧，不能搞复辟。这点很重要。学校如此，机关如此，特别是省市机关。所以我们要通过军管，做好“三结合”，就讲这些。

康老：

我拥护总理的讲话，希望大家冷静地考虑考虑。补充几点：

第一，“一·二六”之后，南京革命群众团体大辩论，“一·二六”大方向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把这个问题搞得这么尖锐化。

凡认为“一·二六”夺权是不对的，反对“一·二六”夺权，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当然就“镇压”。在一个很长时间内，直到来北京，大家还辩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辩论方向正确不正确，首先第一条把敌我关系搞清楚。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按照《红旗》社论（总理插话：十二期），十六条，总结我们的方向对不对。我只举一个例子，夺权派把八·二七，曾邦元说成是反革命。到底八·二七，曾邦元是反革命，还是我们的朋友？这一点我想了，我认为想一想，容易看得清。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我们的阶级敌人还有地、富、反、坏、右，彭、陆、罗、杨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们现在革命对象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说南京红总面前的敌人就是八·二七吗？敌人就是曾邦元吗？这一点看来，这一时期把真正的敌人放松了，把自己的朋友当着敌人去反对了。我讲这个问题，不光红总这方面，不光夺权派这方面，八·二七这方面也应该查。控告团也有这个缺点，在一个时期忙于宗派斗争，放松了敌人。首先不要从宗派主义，小集团，小圈子出发，要真正分清敌人朋友。你们两派斗争给了敌人可乘之机，赤卫队最

近活跃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你们的分歧，挑动你们。希望你们注意，判断方向正确不正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夺权派夺权一个多月了，你们检查一下，一个月来你们自己的实践怎样？不要提口号去压人，人家不仅看一个口号，一个标语，一张传单，人家还要看实践。刚才总理讲了这情况，你们自己去看看，大方向对头不对头，符合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你们大反“右倾”，在造反派内部提出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到底合乎不合乎中央的政策。革命造反派内部还没有联合，就去夺权，到底合乎不合乎中央的政策。要自己检查一下，对不对。不能掌了权就强迫人家承认大方向正确，否则就是反革命，这个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是虚弱得很。

所以你们看看敌我关系，看看实践，就容易把问题看清楚。刚才你们说了，三月二号我们接见你们夺权这一派，你们就到南京去说了，我们肯定你们的大方向正确。我们没有肯定，现在也不可能肯定！同志们！再重复一遍，没有肯定！同志们很容易看清楚，不管什么，刚才总理讲，实行军事管制，为什么？什么叫军事管制？就是没有肯定你们一·二六夺权。当然解放军还和你们合作，不会排斥你们。搞“三结合”，革命的“三结合”，象中央所讲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权。实行“三结合”，大联合，这是解放军的任务。

第二个问题，你们两派无论那一派，要正确对待解放军，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亲自统帅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保证。解放军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声誉是很高的，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是保证我们不被修正主义篡夺，不使我国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她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了光辉的成绩，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当前对解放军是反对还是拥护，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同志们要好好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这是毛主席亲自批的。不能有任何反对解放军，侮辱解放军，冲击解放军。即使解放军某个部门，某个事情，某个问题，某个情节犯了个别错误，也要善意帮助，不能反对。我直爽地说：现在杜方平是站在文凤来这边的，就是这样，八·二七对解放军也一点不要动摇。梁、杜、吴这是很多人知道的，要同他们好好团结，这一点八·二七的同志要注意，特别要注意！要与他合作，更不要因为一个人就对解放军产生一些看法，动摇，

不满这是不应该的。

看来南京问题的解决，解放军的帮助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能促进你们的团结，革命化，特别是促进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三结合，大联合，也起很大作用。在这方面意义很大，这一点我想你们两派都会同意的。过渡时期怎么办？要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帮助解放军，这是决定南京工作的关键。顺便说，解放军在左派内部不能支持一派，反对一派，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方面去做工作，不能受宗派主义影响。应该成为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模范，要以身作则，教育广大群众，这是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同志们回去后，要一起把南京砸机关，抓人，镇压的行动立即停止，不管那一派。我们军事接管，也必须首先解决这一条。这样发展下去，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严重影响。我们要坚决反对。

文凤来同志也许不知道，据曾邦元等同志反映，控告团一代表同志回去以后，罚跪了五个小时，这不仅侮辱了八·二七，也侮辱了你们自己，也侮辱了我们！

这是什么大方向？哪有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到底哪一个是我们的朋友，哪一个是我们的敌人？

另外，我们看到八·二七这方面的报纸（指南工《红色造反者》报），说“砸烂文氏黑店”，这也很不好，很错误的，把他们当作敌人，还有什么“好个屁”，首先自己是“屁派”，真糟糕。

总理：他们说好个屁，就被说是“屁派”。

（文凤来：他们先叫“好个屁”的，以后我们再叫“好得很”。曾邦元接着说：“屁派”是别人加给我们的。）

康老：宗派不分先后！你们传单上“文记”很多，这样不好，不仅人身攻击，对群众也不好。当然一分为二，这报纸也不能说不好，倒也有好处。（康老指《红色造反者》报）下面是“迎头痛击砸抢风”。

但是上面又说“砸烂文记夺权委员会”，下面又提“迎头痛击打、砸、抢风”，这不是“迎头痛击”是“迎屁股痛击”。

我那天问过，曾邦元说红总抓人，砸机关，那是不好的。也谈了你们八·二七砸了三个地方，可能多一点。

康老对北京赴宁学生说：现在没有“三司”了，不能以“三司”压人，去招

摇撞骗。不回去了吧？（答：不打算回去。控告团代表插话：我们不欢迎他们回去。又插话：要他们回去检查。）

康老：留在北京检查也一样。特别工厂，保护工厂，保护机器，军事接管后，按工业十条。尤其使我担心，大家担心，南京梅山铁矿生产大大下降。（工人代表汇报铁矿生产问题。）你们宣传工作要重新整顿一下，不要再宣传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现在是大联合。你们提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不仅是宣传，而且是方向问题。中央提倡大联合。

有人提出什么“革命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那怎么能大团结？那怎么能大联合？这是大方向问题。你们还有广播电台，新华日报，传单标语，到处宣传，这很不好！与中央唱反调。刚才总理讲了，对敌人有利的，就对我们有害。双方都要把互相攻击性的标语，大字报刷掉。我看双方回去联合起来，通通把街上这一类标语刷掉。那类宣传（群丑图）是反宣传，出你们的丑，也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丑。

我看你们双方同志先不要开会，把这些标语刷掉，不管夺权的也好，反夺权的也好。

总理：（拿看守所照片）看守所是对待敌人的，对待违法乱纪分子，不能对待革命群众。

康老：宣传，报纸，我上次谈过了。总理讲《新华日报》要军管，党报，不能成为派报。

第四个问题，要学习。总理讲了，两派要好好学习，要开门整风。有一个条件：彻底地实行自我批评。不要去攻击人家，先攻自己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等。整风的目的，是检查自己的思想，言论，行动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央精神，《红旗》社论。检查自己，不会降低自己的威望，恰恰会提高自己的威望。至于学习什么东西，你们自己去订。总理提出军训，恐怕很需要。

第五，要纯洁组织。不管哪一派，难免有混进来的不纯分子，敌人会想办法钻进来。这方面要特别注意一下。

第六，最后一条，省委、人委的同志，市级、厅、局长同志，要真正觉悟起来，检查自己的错误，彻底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派的一边，用实际行动取得群众信任，把生产，业务好好地抓起来。我

们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有的犯错误，要允许改过，允许立功，要帮助他们站到革命这一边来，给他们补过的机会。但是这些干部同志应该诚诚恳恳，不要耍两面手法，蒙混过关，这不是蒙人家，而是蒙骗自己。大多数是好的，要接受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

南京、江苏的工作，中央曾经关照过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毛主席也关照过，要他们不仅要把上海的工作搞好，而且要利用上海的经验帮助浙江，江苏把工作搞好。我们还要找军区几个负责同志来北京谈谈，你们要与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发生联系，吸收他们的经验，接受他们的帮助，把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彻底！

已经讲了很久了，今天大家回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敌人，敌人没有睡觉，被斗的还不是死老虎，敌情观念千万不能忘记。要讲原则，我们很担心，宗派主义如鸦片烟上瘾，一下子很难改掉。双方要注意！

总理：康老刚才讲了。大方向问题从敌我方面讲就清楚了，把朋友当敌人，大方向就错了。过去掌了权，“谁反对一·二六谁就是反革命”。后来到了北京，吃到一点空气，知道犯了错误。南京也提出“谁反对反一·二六夺权就是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康老：你说我是反革命，我说你是反革命，结果都不是反革命，敌人在边上看笑话。

总理：我不能简单的说，说了以后，恐怕一方又压过去。现在军管是为了促进大联合，三结合。今后你们南大八·二七要负更多责任。八·二七打电话回去，头脑不要发热，你们别的不砸，恐怕“文记”要砸的吧？大家都不应砸！联合起来，你们要警惕。

他们要改正错误，你们要防止错误。过去是夺权派要多负责任。今后你们要多负责任。

抢的东西，能归还的就还给人家。我建议你们宣传车少搞一些，大家走路嘛，南京城就那么大。宣传车，大卡车归还国家，回去促生产不好吗？双方要整风，两方对吵，两个大喇叭对着吵，再吵军队就要干涉了！我们还要请军区的同志来谈一谈。

（总理看了代表团递上去的条子）刚才说十一人接见的座谈情况，你们传出

去了，戴国强说没有传，总是你们这派传出去的。同样，二日的接见情况你们也传出去了。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你们领导同志要自觉，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与上海联系很重要，要实事求是向上海学习，要学习好的方面，才能得到帮助。这样，把上海，浙江，江苏都联系起来，把革命，生产都搞好。

（曾邦元问：以前好几次接见，回去传达，是不是以今天为准。）

总理：对！今天是带结论性的，还要你们去消化，去认识，这也是一个考验。问题都谈了，就这样吧！

（杜方平表态：错了就改，没有跟得上就再跟上，我自己知道有错，不知道有这么大。

杜方平向八·二七同志表示，你们批评，要怎么批评就怎么批评。我欠了八·二七的债，有多少，还多少，我支持了夺权的一派。）

总理：你刚开始支持还是好的，邢文举开始也支持的嘛，后来他们做错了，曾邦元二十九日不也是支持的嘛？当然后来又收回了。斗争是在发展的。

康老：要说支持文凤来，我比你还早。

在围攻文凤来的时候，梁、杜、吴的态度怎么样？

（邢文举答话。）

总理：斗争很复杂，事态是不断发展的。

康老：文凤来也要发展变化的，不要吃老本。

（控告团代表：军队不能支持一派，压制一派。）

康老：左派之间不能支持一派。话又说回来，如果是一个左派，一个右派，就是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

（控告团表态：我们不要债，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到底。）

康老：过去你们没有梁，吴等同志的支持，军区的支持，你们现在的形势就不会这样。

（杜方平：我的指导思想是支持一派，团结另一派。支持以后，实际上支持了一派，打击了一派。虽然对南京八·二七有团结的愿望，但过早表示了态度，事情发展就难以控制了，没有能力把他们拉在一起，没有完成任务，心里很着急。）

（文凤来发言。我完全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执行，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原则性，方向性错误，回去以后先要夺“私”字权。欢迎八·二七，东方红帮我们整

风，和解放军搞好关系，支持解放军。回去一定好好干，一定做团结的种子，绝不做分裂的苗子。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共同敌人江渭清是一致的，过去由于受压制，对压制过自己的同志有意见。后来学“毛著”少。）

（张建山：中央首长对我帮助很大，我一定要夺“私”字的权。最近南京黑字兵很猖狂，更重要的江渭清这一派还在起作用。我们做了一些事，的确是违背了中央指示，反正群众要干就干了，有人说我们的后台是江渭清。）

康老：随便提揪后台，谁是谁的后台，这个提法不好。人家说北京地质东方红的后台是林×，林×的后台是关×，关×的后台是我。另一派又说我是谭力夫的后台。实际上，我一个台也不是。

要从政治上看问题，要看事实，不要随便猜测。

（张建山：我自己有决心，解放军接管，我们双手欢迎，否则收拾不了。）

（当谈到学校里宗派斗争影响到社会上时）

总理：南大，南工的同学都抽回来整风。

（曾邦元发言：首先拥护中央的决定。不欺骗党中央，不阳奉阴违，这是革命者起码的品质。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而斗争，彻底揭开江苏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我们来因为受压制，是带宗派情绪的，我们也要从掌权派所犯的错误中吸收教训，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保证按中央指示去做。刚才杜方平讲欠债，我们说，不是欠债还债的问题，我们都有错误，对革命是损失。）

（外地驻宁联络站代表：我们外地的也犯了很大错误，提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总理：你们初期还做了些好事。

（外地驻宁联络站代表：这是无政府主义，我们要作触及灵魂的检查。）

（代表团一个工人提出合同工问题怎么解决。）

总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借口取消合同和扣工资是不对的，中央有规定，你们按规定办理嘛！

康老：有的地方还有工作做，就可以延期，没有工作做就可以回去，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代表团姓张的工人：我们不了解情况，简单的支持一·二六，说了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回去不要吵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有的代表提出：赤卫队最近很活跃。）

总理：回去以后你们调查，报告军区。

（南体一一·四代表提出新运会问题。）

总理：那个问题我们解决，我们还要商量，你们回去等电话。

康老：我关照你们一下，你们对王范怎么看？

（南体一一·四代表：我们还要调查一下。）

康老：还要调查？！他公开骂毛主席还要调查？

（南体一一·四代表回答：王范肯定是叛党分子，王范死了以后，又死了一个，……问题比较复杂。）

康老：从北京看来，体院同志特别要努力整风，长期以来，荣高棠的影响很坏，另外又常常出国，沾染资产阶级习气。北京体院在社会上名誉不好，作风不好，一小撮坏家伙常常利用你们体院的学生去当打手。不知道你们南京有没有这种情况。王范是叛徒，荣高棠也是叛徒。所以你们这一方面要特别注意。我最了解王范，他变质啦。原来在上海当巡捕，同情革命，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坐了牢。原来看还不坏，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来到延安学习，还朴素。全国解放以后，我在上海看到他，他完全变了，成了饶漱石的走狗，所以这个人走到叛党的道路，不是偶然的。

总理：你们对这个问题重视了就对了。

（有人提到江渭清问题。）

总理：牵涉到军队问题，可以与军区联系，与别的省有关的，可以通过中央来调查，一定要揭省委的盖子，不能因为江渭清不在就不揭，还有其他人嘛，应该继续做。重点放在各机关内部，造反派来解决问题，也可以联合嘛，没有什么限制。机关干部总是有自己的业务，既要揭问题，又要搞业务，这更能考验。

刚才有人讲，南京在抢干部，如果干部把问题揭开来，好嘛，亮相嘛，应该是把立场转到造反派这一边，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方面。与军队有联系，更方便。

“一·三”事件，不管“红总”和革命学生中有多少缺点，都不能否定，不能动摇，这个事件是革命的，是件大事。我们跟你们分别，合起来都讲过，不能因为有缺点，就有别的看法。因为赤卫队要象上海那样来北京告状，我们阻止他

们，叫他们回去，他们回去跑到江苏饭店捣乱，工人起来自卫，学生后来增援，把他们打退了。这是革命的胜利。从那次以后，赤卫队瓦解了。总之，这是革命的行动，不要动摇。

（有人提出有关长江大桥问题。）

总理：关于长江大桥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还看了图，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关于和张春桥同志联系的问题，中央直接通知他们，我们把今天会议记录和重要材料转过去。

你们联合去也好，分别去也好，反正今后总是要联合起来。

军事管制机构也要和上海联系。

（控告团代表反映，旧省委压制革命造反派问题，当汇报到南京已经开了揭发江渭清大会。）

康老：揭发会好嘛，不要搞武斗，坐飞机，要改变斗争方式。

（控告团代表又汇报了省级机关文化大革命情况，省委怕革命造反派，用小干部守大门。）

康老：我建议你把小干部守大门这件事写出来。

（代表团提出要把江渭清带回去揭发批判。）

总理：江渭清的问题，你们要继续揭发，并不因为他不在南京就不能揭，可以背靠背，更好地揭。

（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团整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江苏省革命造反派炮轰省委联合会、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省委办公厅分部：《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家屯》

本文为该书第一、五、九、十章节的摘选，现标题为整理者自拟。

(一) 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分子

(五) 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九) 横行霸道，仗势欺人

(十) 肮脏的灵魂，腐朽的生活方式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旧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是一个假党员、政治扒手。他混入革命队伍以后，一贯施展资产阶级权术，招摇撞骗，窃居要职，干尽了坏事。

许家屯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四清运动中，大搞形“左”实右；在文化大革命中，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在经济建设中，复辟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工作中，走资产阶级专家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宣扬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生活，腐朽透顶，糜烂不堪。

许家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必须彻底揭发他的滔天罪行，把他斗倒，斗垮，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一)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分子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家屯，从一九三八年混入革命队伍以来，一贯进行政治投机，两面三刀，见风使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分子。

脱党之后，搞两面派

许家屯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河南潢川青年军团调到五战区战地宣慰团，由俞铭璜、濮思成介绍入党的。入党后两个月，他被派到运河站前线服务。因当时战事混乱，宣慰团走散了，许家屯就失掉了党的关系。

许家屯脱党之后，为了找寻自己的出路，从潢川回到了灌云，投靠他在潢川青年军团任职的胡灏。胡灏是个叛徒，又是地主、国民党区长，与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长王公瑛有密切关系。经胡灏介绍，许家屯和王公瑛也有联系。这样，他就投靠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两面派活动。一方面依靠胡灏，建立“民先”抗日组织，并同托派分子孟宪禹勾勾搭搭，建立假党。另一方面，又和我党取得联系。当我党决定要建立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时，许家屯竭力反对党建立公开武装，提出要与国民党挂钩，成立灰色武装。wengewang.org

冒充党员，招摇撞骗

一九三九年七月，发生了“汤沟事变”，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团团长被国民党暗杀，许家屯就指责当时成立三团是错误的，以示自己搞两面派的主张是正确的。后来，他去见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要求介绍回家乡一带活动，金明叫

他同苏皖区党委管辖的如皋去搞武装斗争。许家屯见有机可乘，就不到如皋去，而伪造金明的信件，冒充党员，跑到苏北特委去找惠浴宇。惠浴宇根据许家屯伪造的信件，就分配了他的工作。据金明讲，当时他根本不知道有个惠浴宇，根本不可能给惠浴宇写信。

此后，许家屯就把自己的丑恶历史吹嘘成为“英雄”的历史。一九三九年，灌云地区的“民先”抗日组织，是党领导建立起来的，许家屯却胡说是以他为首搞起来的，以欺骗组织，窃取荣誉。当时，他投靠和通过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搞到了二、三百条枪，但他在自传中却大肆夸张，说拉起了二、三千条枪的抗日队伍。一次，他到鲁南去找党的关系，同来时无耻谎说他听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传达报告。一次，他南下同新四军接头，到了扬中，根本没有看到管文蔚，同去后却大吹见到了管文蔚。他就是靠这一套招摇撞骗的手段，混入党内没有多久，就当上了“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和“分区的副政委”。wengewang.org

保护地主阶级利益

一九三九年冬，许家屯这个冒牌的党员，捞到了一个泰兴县“县委书记”。他借口做地下工作，夏天穿绸衣，冬天穿皮衣，手指上三颗金戒指闪闪发光，讲阔气，摆排场，吃喝玩乐，官气十足，从头到脚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倒活像一个地主少爷、土匪头子。

一九四零年新四军东进后，许家屯到解放区如西县当“县委书记”。当时该县名为解放区，其实还是地主的天下，县政府的班子，从县长到科长都是地主成份。在实行减租减息时，他们用成打的美国派克钢笔向许家屯送礼，许家屯就“礼尚往来”，蓄意包庇地主阶级的利益，对中央的减租减息政策，阳奉阴违，采取假减租不减租的反动手法来欺骗农民。一九四一年五月，他竟然恬不知耻地在地委扩大会议上大吹大擂，兜卖其如何通过地主路线进行减租减息的“经验”。到会的同志当场向他展开了斗争，他还死不认错。会后，党为了革命的利益，调动了他的工作。为此，他对党深怀不满，直到一九六五年还忿忿不平。

借机报复，陷害异己

据揭发：抗战期间，许家屯在泰县任“县委书记”时，有一个区委书记叫杨鹤天，能说会写，资格比许家屯老。许家屯认为杨对他不尊重，经常顶他，触犯了他“个人英雄主义”的尊严，就怀恨在心。当杨鹤天犯了男女关系错误时，许

家屯就借机报复，把杨鹤天枪毙了，事后才向上级报告。这个问题，许家屯必须老实交代。

承受地主丈夫的土地

许家屯的老婆顾逸萍，是如皋县一个有三千亩地的大地主的女儿。这个地主分给顾逸萍、许家屯四百亩地。堂堂的“地委书记”许家屯，竟然指使顾逸萍盗卖人民土地一百五十亩，捞到十两黄金，供给自己挥霍。剩下的一部分黄金，顾逸萍又借给商人做生意，指望再捞油水。但是，金子被商人骗走了，顾逸萍偷鸡不着蚀把米，一直怀恨在心。解放后，顾逸萍专门回家，仗势通过公安部门，把这个商人扣押四天，直到赔了钱后才把他释放。

挪用公款，大搞投机

当苏北地区广大人民，节衣缩食，支持解放战争的时候，许家屯竟丧心病狂地利用职权，挪用公家大量黄金，给他的地主亲戚到江南进行投机活动。许家屯还要他的老婆，通过地主、商人的关系，携带了大量黄金、伪币，逃到江南去“打埋伏”，住在镇江等城市里，继续过着地主的寄生生活。

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解放战争时期，许家屯又当上了三地委书记、分区副政委。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蒋匪集中兵力对苏中一分区南线进犯，吓破了许家屯的胆。他不敢在敌后坚持原地斗争，表面上却提出“入虎穴，安如泰山；坐绣房，不是佳人”的口号，实际上是为了退却逃跑，耍了一个花招。他带领的分区司令部及其所属特务团从未和敌人打过仗，终日逃跑，疲于奔命。一次，遭敌人合击，部队被打散，司令部电台丢失，许本人与部队失去联系，后被战士找到。许家屯叫干部躲起来革命，实际上是放弃斗争。其结果，葬送了解放区很多优秀的革命干部，损失了党的部分武装力量，丧失了大块解放区。

后来，蒋匪向靖江、泰兴、泰州、如皋四县进行重点进犯。当时，党曾提出敌后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要做到党政机关和武装力量，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党派许家屯带领分区的部分武装在南线坚持斗争。他贪生怕死，又提出所谓“塘小鱼大，转不过身来”，不敢坚持原地斗争，慌慌张张把地委、专区、分区机关，从南线撤到北线。在逃跑时，由于惊慌失措，过封锁线渡通扬运河时，淹死、走散和牺牲了许多干部。南线部队和大批干部撤走以后，许家屯的狗命保

住了，但是南线的许多优秀干部和广大群众，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这是许家屯逃跑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

依靠吹捧，隐瞒历史

解放以后，许家屯更是吹吹拍拍，飞黄腾达。他先是在福建当福州市“市委书记”，因犯了狂妄自大、目无组织和腐化的错误，工作不下去了，当时江渭清要他，就调到南京当“市委书记”。他到了南京，却恬不知耻地自我宣扬。在第一次同市级机关中层以上干部“见面会”上，他就自吹自擂地说：“我二十多岁就参加革命，参加革命第二年就当县委书记……”。平时，他玩弄权术，在这人面前是一套，那人面前又一套，两面三刀，讨好上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渭清看中了许家屯，可以作为自己的忠实助手，就提拔他当省委书记。许家屯当了省委书记，更加得意忘形，盛气凌人，蛮横专断。对上观言察色，对下目中无人，心里只有一个江渭清。江渭清对许家屯“忠心于自己”很为满意，因此，就对许家屯肆意包庇。

许家屯是假党员的问题，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有人揭发了。一九六三年，中央将揭发的材料转交省委处理。当时，省委决定要江渭清找许家屯谈这个问题，但是江一直拖到一九六四年还不找许家屯谈。后由省组织部副部长孙执中和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张克辛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了一年半时间的调查。他们向省委作了调查报告，有许多材料证明，许家屯脱党后，没有恢复过党籍。

但是，以江渭清为首的省委书记处，不顾历史事实，纵续包庇许家屯。把调查的证明材料，全部交给许家屯本人看，让许家屯写假检查，并要许家屯“在检查中不要写有火气的话”，以免触犯揭发的人，混不过关。许家屯在自己历史问题的检查中，对恢复党籍这个关节问题，继续说假话。他称：“约在一九三九年二、三月，向余耀海要求恢复党籍，余耀海口头上答应恢复了党籍。”但是，据余耀海的证明说：“我只见过许家屯一次面，从来没有答应恢复许家屯党籍这回事。”

后来，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渭清为首的省委常委，竟然根据许家屯的假交代，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向中央写了一个含糊其词、企图蒙混过关的欺骗报告。其中对许家屯的党籍问题，是这样做的结论：wengewang.org

“许家屯同志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潢川入党，有俞铭璜同志证明；一九三九

年南下到苏北工委时有党的关系，有张彦、金明的证明；至于如何恢复组织关系的，尚未有明确证明。省委常委认为：因为这段时间不长，而且一直在党的领导或影响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没有发现其它政治问题，因此，同意这段时间按照恢复党籍处理。”

这样一条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不打自招的结论，能够蒙混过关吗？既然提到：“如何恢复组织关系的，尚未有明确证明”，怎么又能够相信一九三九年南下到苏北工委时有党的关系呢？因为，无法证明他恢复党籍的时间在先，南下到苏北工委的事情在后，不是党员那里来的党的关系证明呢？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江渭清和旧省委常委有意包庇许家屯伪造信件、冒充党员的罪责，是抵赖不了的。

省委的结论中，避而不谈许家屯是不是假党员的问题，不谈脱党以后是不是恢复过党籍的问题，反而去替许家屯在二十七年前因脱党补行恢复党籍的手续。这是不打自招，说明许家屯过去从来就没有恢复过党籍。否则，既然已经肯定一九三九年南下到苏北工委时就有党的关系，又何必今天来办理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这段时间按照恢复党籍处理的手续呢？那么我们要问，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许家屯做了二十七年的假党员又如何处理？

就是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这段脱党时间，许家屯能象省委的结论中所说的那样，什么“对他没有发现其它政治问题”吗？当时，许家屯投靠国民党区长，又与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长有联系，与托匪组织假党，反对建立八路军的公开武装，要与国民党挂钩，等等，这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又是什么呢？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必须坚决把冒牌党员、一贯进行政治投机的许家屯清洗出去。

(五)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家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顽固执行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将，是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

蒙骗黑字红卫兵保省委

许家屯是去年八月下旬，开始抓文化大革命的。他一插手就大肆进行蒙蔽黑字红卫兵的活动，千方百计组织他们起来保省委。

他通过做自己子女的工作，控制有关中学的黑字红卫兵。他经常开家庭会议，

要子女首先对他自己、对省委是不是黑帮的问题表态，然后对他们讲“江渭清跟毛主席一直跟得很紧”，要他们确立保父亲、保省委的信念。他经常对人说：“我家小孩子此较多，我差不多天天要同他们磨，一方面要他们讲讲学校的情况，一方面向他们作些宣传。我向他们宣传，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看我是什么人？他们说：你是个好人，但是有缺点错误。我是个好人，所以才谈得起来，先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子女在他的欺骗和蒙蔽之下，积极进行保省委的活动，经常找高干子弟到家里开会。他的好几个女儿成了学校黑字红卫兵的头头，儿子是黑字红卫兵的纠察队员。

他对抗大附中的黑字红卫兵控制得最紧，经常找他们的负责人到自己的家里，到文革办公室去汇报情况，谈问题，施加影响。他还亲自到抗大附中去做报告，参加黑字红卫兵的小整风。其目的是利用他们保省委。

许家屯为了要加强控制红卫兵中学总部，去年九月初他亲自去作“指示”，对红卫兵总部负责人讲了话，表扬他们有“五敢”精神，表示省委坚决支持他们，要和他们合作。

他对大专院校黑字红卫兵，从政治上欺骗他们，从物质上引诱他们。去年九月初，大专院校黑字红卫兵总部，为了配合省委的行动，一度搬到琅琊路小学。许家屯连夜去看他们，并说：“省委在主观上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由于我们对毛泽东思想跟得不紧，工作中是有缺点错误的。希望同学们监督我们，和我们合作。我们和你们之间不是领导关系，有事要平等协商。你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尽量帮助。”大专院校黑字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受毒很深，回答说：“我们保省委不是盲目的，是经过分析的。江苏省委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我们跟省委是跟定了，保省委是保定了。”许家屯听了这番话高兴极了，竭力从经济上去引诱，当场答应给他们一批汽车、自行车、油印机和活动经费，并对承办人说：“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一定要快，我们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才能取得发言权。”

许家屯除了大肆蒙骗大中学校黑字红卫兵以外，还亲自布置和组织南京市郊区社教工作队、公安干校的学员冒充红卫兵来保省委。当时，江渭清和许家屯都接见了他们。

挑动学生斗学生

许家屯是挑动学生斗学生，转移斗争目标的能手。他有一套在学生中搞“平衡”的反动论点。他说：“只要有两派不同意见的学生争论起来，我们就可以处于主动地位。”并说：“我们的讲话，要那些闹得很凶的学生相信是不可能的，主要是说给那些不明真相，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听的，是为了争取大多数。”

九月初，无锡轻工业学院的革命师生，徒步来宁，要省委负责人接见，并要省委通知无锡市委副书记吴镇来宁听他们的揭发。许家屯就大搞“平衡”勾当。对革命同学讲：“你们要吴镇来宁可以，但是，要把不同意你们观点的师生(指保守派)找来一起开会。”当吴镇和另一批师生来宁后，许家屯对姚远说：“还能把吴镇交出去斗争？”他就立即接见吴镇和吴镇带来的一批师生，向他们交代对策，积极准备把“揭发”大会开成“辩论”大会。当时，无锡轻工业学院的革命师生，识破了许家屯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阴谋，没有上他的当。

九月初，华东水利学院等校的革命同学，为扬州地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件，到省委门口来提出抗议。许家屯在幕后亲自指挥，组织了南师附中的黑字红卫兵赶到现场，控制讲台，冲散了华水等校的革命同学。许家屯为此十分高兴，专门到二十九号食堂接见了南师附中的黑字红卫兵，招待他们吃了夜餐。接着，又组织这部分黑字红卫兵，到三十三号门口去围攻人民大学南下串连的革命同学。当时人民大学的革命同学为了顾全大局，主动撤走，才避免了一场群众斗群众事件的发生。

直到去年十二月中旬，他一面和革命造反派签订了八项协议，一面又恶意诬蔑革命造反派，积极支持黑字红卫兵。他被黑字红卫兵带到北京后，对他们讲：“你们过去善于革命是好的，就是敢于革命不够，今后要发扬好的一面，克服差的一面；他们(指造反派)敢于革命是好的，就是善于革命不够，现在他们乱抓人，乱抄家，如果不纠正，就要走向反面。”又说：“运动不断发展，今后还会有反复，原来激进的可能变为缓进的，原来保守的可能变成革命的，真正的左派，要到运动后期才能形成。”

他在北京时，还和南航黑字红卫兵达成一项协议，要戴为然去给黑字红卫兵作检查。当时，南航黑字红卫兵已被南航革命造反派宣布解散了。但他从北京同来之后，还要省文革打电话去安排戴为然向黑字红卫兵作检查，妄图再次挑起南航黑字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冲突。同时，许家屯还挖空心思，要省文革对

红卫兵进行全面调查，想找出有些院校的黑字红卫兵组织，也是处于少数和受压制的地位，用来说明某些黑字红卫兵组织也是革命的，以进行诡辩，妄图挽回黑字红卫兵的命运，继续保省委。

大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许家屯自认为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表白地说：“自己衡量还不是这样的人物，自己心里多少有点数，自己主观上还是想跟主席革命的。但自己也意识到有缺点、有错误、有问题。自己要革命，但没有想到象今天这样革法，这样触及灵魂深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完全不是以许家屯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他始终是站在同革命师生对立的地位，仇恨革命师生对他的革命冲击，采取各种手法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九·九”事件，是许家屯镇压革命师生的大暴露。九月九日，南大八·二七、红色造反派和无锡轻工业学院的革命师生，要省委负责人接见，澄清人民大会堂反动画像和雨花台陵园建设的问题。当时许家屯亲临指挥。除叫洪百川出来搪塞一番以外，还用高音喇叭捣乱革命师生的控诉，派出大量黑字红卫兵去抢占讲台，企图找文凤来同志进行辩论，以搞臭文凤来同志。结果没有找到，许家屯还说“很可惜”。后来，革命师生被迫冲进了省委大院，进行静坐绝食斗争。许家屯非常恼火，他一再指使组织更多的黑字红卫兵来保省委，对静坐绝食的革命师生施加压力。革命师生坚持斗争到第二天，派代表和许家屯谈判。许家屯完全象国民党的官僚政客一样，不顾革命师生的生命安危，采取“磨菇”战术，大耍“平衡”伎俩，和黑字红卫兵一起，不肯承认革命师生冲进省委院子是革命行动。谈判长达六个小时，已有十三个革命同学晕倒，他还推卸罪责，一意诡辩反驳，说：“无论如何不能承认爬墙头进来是革命行动。”结果谈判决裂，九·九事件就被他镇压下去了。事后，他还登上省委大门口被黑字红卫兵占领的讲台，公开污蔑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是“无理取闹”，并当场指名文凤来、浦湘海是“无理取闹”的带头人。

“王金事件”发生之后，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揭发批判省、市委，许家屯就赤膊上阵，极尽压制的能事。九月二十八日，许家屯召集市级机关和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开会做报告，竭力为“王金事件”中的主要凶手官沪宁开脱罪责，还要南京市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做思想工作，把群众的怒火压下去。他说什么“象宫

沪宁他们打人这件事当然是错误的，不对的，但只是大运动中的暂时的问题，局部的问题，个别的问题。”“这些小鬼，从他们主观上来讲，并不是象有些人讲的那样要把好人打死，他把王金当成了坏人，结果犯了严重的错误。”“我看了官沪宁的检查，十六岁的小鬼检讨写得不错。你不要看他犯了错误，打死了人，用主席语录用得比较恰当，最后还引了主席的诗，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也写不出来。”又说：“在这么大的运动里，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这同平常时候打死人的事情是不同的。”“这不是敌我矛盾，是象打仗一样发生了误伤。我们打仗也是这样，挂花、牺牲的是不是都是敌人打的呢？不是的。也有自己人的枪走火，误伤的。”“你怎么能把走火误伤的人当敌我矛盾对待呢？你能都抵命吗？这是不可能的。”他要大家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说什么“应该敢于严肃指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又要敢于指出这件事情同平常打死人不同。”同时，他又反而威胁大家说：“今天已经犯了错误，我们如果用错误的态度和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把他们抓起来抵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会怎么样？这就打击了青年一代。我们要从整个运动，从全局，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世界革命利益出发来处理这个问题。”

污蔑革命左派，欺骗革命群众

许家屯对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是非常恼火的。他认为省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笼统提“炮打司令部”，感到受了委曲。因此，他狠狠地说：“如果自己是修正主义分子，受炮轰活该，自己不是修正主义分子，炮打是打的空炮。”而且，还公开地威胁革命师生说：“最近南京有这么一些人，是先肯定我们江苏省委是黑帮，然后拼命的找材料。这种做法是不行的！”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他在南京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又说：“有的是先定黑帮，再找材料，你还能不让他闹吗？你让他闹嘛！是黑帮，应该打，不是黑帮，你让他闹好了，我们心中有数！”这不是充分暴露他“秋后算账”的狰狞嘴脸吗？他还随意把起来革命造反的师生戴上“右派”的帽子。九月中旬，许家屯在徐州地委招待所，公开对人说：“文凤来说过，他不把省委打倒，自己就要坐牢。看来，文凤来是个右派。”

他经常发泄对革命师生的不满。在去年专员、县长会议上和南京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都说过：“过去我们这些人讲了话，人家总是鼓掌的。就是党内大民

主，也没有这样程度！他（指革命造反派）要你答复，你感到没法答，不答了，他就问你这是什么感情！你扇扇子，他就提抗议，你笑一笑，他也向你提抗议。”当各地专员、县长在会议上提出在生产建设工作中要钱要物时，许家屯就指桑骂槐地说：“去抢去偷，去爬墙头。”继续污蔑“九·九”事件中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

他把革命师生的讲话，污蔑为“歪曲事实，扩大事实，无中生有”，而对谭力夫的文章则竭力吹捧。他说：“我认为谭力夫这个讲话，是很正确的，阶级立场鲜明，充满着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很有水平，讲得很好。”他要省委办公厅的同志好好看看这篇文章，他到了淮阴，也向地委负责人推荐。

他还叫人编写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宣传资料，去欺骗群众。去年十一月初，南大革命造反派把彭冲揪到了南大，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同志揭发了省委和彭冲的问题。许家屯匆匆忙忙签发了一个假的宣传口径。如：

关于法四二十二人的问题。明明是组织了围攻，却说成是“同学间贴大字报，互相批评是正常的。”又假惺惺地说：“这样做，对法四二十二人起了围攻作用。”把责任完全推给学生，妄图说成是群众中自发的现象。明明搞了黑材料，照了相，竟抵赖为“队委会没有研究过，没有整理什么人的材料，未定什么性质，未戴什么帽子。”还说什么：“中共江苏省委不知道有法四二十二人的调查报告草案。这只是南大工作队的问题。”实际上是江渭清、彭冲动用公安厅，去调查文凤来和法四二十二人的材料。许家屯明目张胆地包庇江渭清、彭冲，罪责难逃。关于匡亚明的问题。彭冲对匡亚明说过“你反击得太早了”，而许说成是彭冲问匡亚明“你是不是有组织反击的？”

关于“九·九”事件。明明是省委调派了大批黑字红卫兵保驾，却说：“红卫兵维持秩序，这是他们的任务和职责。红卫兵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维持秩序，这是红卫兵自己的事情。省委不好通知哪个红卫兵干这样，干那样。”把省委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真是撒了弥天的大谎。

转移和拍摄黑材料

九月四日下午，许家屯怕革命师生冲击机关，亲自召开有关部委厅局负责人会议，布置转移材料，并要把省委大院子的的大字报洗刷掉，还说：“学生冲进来要找你们，不暴露身分，拖你们找书记，不要找，不要讲书记的住地”。他还经

常批评省文革办公室的同志，不认真处理和转移材料，怕把柄落到革命师生的手里。wengewang.org

在十一月中旬，公安厅副厅长顾亭到省文革办公室来找许家屯，说有一份南大法四二十二人的材料，保存在公安厅，南大革命师生要追问这份材料。他们怕暴露，就商量决定把这份材料通过高教组放到南大的材料箱里，掩盖把法四二十二人的材料藏到公安厅的事实。

十一月中旬，在一次省委书记处会议上，研究对一份法四二十二人的材料要拍照，以便伺机算账。因省委办公厅的同志提议不要拍照片，就决定“不拍”了。但是，事后许家屯又同意公安厅拍了照片。

勾结陶铸死保江渭清

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许家屯被江苏省革命造反派第一次带到北京。十二月五日晚上陶铸接见，欺骗革命师生，搞了八项协议。陶铸千方百计地保省委，保江渭清，保许家屯。当革命师生在会议上控诉江苏省委镇压学生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时，陶铸就说：“你们不要在这里控诉，要控诉到南京去控诉。”他不顾江苏省委根本没有转的情况，却说“江苏省转得太慢”，为江苏省委定调子。革命师生要许家屯当场答复八个问题。陶铸就暗示许家屯说：“你不是第一书记，你要以省委书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来解答问题，有什么说什么。”当许家屯讲了一堆废话之后，革命师生就轰他，结果八个问题，绝大部分是陶铸代替许家屯解答的。最后，确定的这八项协议，实质上是陶铸包庇江苏省委的罪证。它的主要斗争矛头，不是针对省委，而是针对基层，不是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陶铸在这次接见中，虽然大保特保江苏省委，大保特保江渭清、许家屯。但是，许家屯由于第一次接触陶铸，没有摸透陶铸的用意，一同到北京饭店就哀叹地说：“多么被动”，“事先怎么一点不知道”，“这下子是决堤了。”又说：“八项协议有什么办法呢？陶铸当场要表态，我只好采取高姿态，真要命啊！”当时，许家屯特别对八项协议中要公开江渭清养病的地址，表现很紧张，怕回来不好向江渭清交代。他说什么“江渭清病中允许人去看，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因此，他就决定写个信给陶铸，“立此存照。”

许家屯写给陶铸的信是这样的：“关于同学们要告诉他们江渭清同志生病住

院的地址问题，由于你接见前我没有来得及向你汇报，有些情况会上又未能说清楚。根据渭清同志的病情，如果同学们知道他的住址，万一控制不住，病情可能恶化，发生危险。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恳请你百忙中抽空听我当面汇报一下。盼示！——许家屯。”

于是，在十二月六日深夜十二点半，陶铸派车子把许家屯接去了。许家屯同来吹了一下，大意是陶铸继续替江苏省委、江渭清定调子。陶铸说：“我们相信江苏省委，相信江渭清同志是拥护主席的。”“你这次到北京来，坏事变好事，和学生打成一片，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争取把局面转过来。”陶铸还讲到：“我在讨论工业十条的会议上作了检讨。农业五条，工业六条，两论抓革命促生产，都是我提议的，现在看，堵的方面太多，放的精神不够。向你们交交心。”当许家屯讲到由于工作没有做好，给中央带来很多麻烦时，陶铸说：“你们省委在第一线，不是你们，中南海怎么保得住呢？”他们这种促膝谈心，真是狼狈为奸，污蔑中央，污蔑革命群众。

去年十二月十七日，黑字红卫兵、赤卫队要上北京，许家屯和陶铸通过电话后，表面上到火车站去动员他们回来，实际上他早已准备和黑字红卫兵、赤卫队一同上北京。他到了北京，陶铸又接见了。许家屯向陶铸吹了“江苏省委对八项协议的执行情况和转的情况。”陶铸就对许家屯说：“江苏在转了，八条在江苏起了很大作用，如何转的，要写一个二千字的简报来。”根据陶铸的意见，许家屯打电话回来通知省委，用电报发了一个假转的报告。这是陶铸和许家屯合伙欺骗中央的罪证。许家屯同到南京之后，人家问他陶铸犯了什么错误，他还为陶铸遮瞒，说什么：“陶铸是和我犯的一样错误，就是他太敏感，说话太快。”

许家屯两次上北京，陶铸竭力为他“镀金”。因此，他同来之后就一直吹嘘，特别自从体育馆宣布“八项协议执行意见”以后，许家屯得意忘形地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省委讲话获得掌声最多的一次。”又说：“现在，他们(指革命造反派)至少已经承认我是一个口头革命派了。”他还自认为是江苏省委书记处唯一可以以“左派”面貌出现的人物。企图依靠这点可怜的“本钱”，继续玩弄两面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住以江渭清为首的黑司令部。

(九)横行霸道，仗势欺人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家屯，平时官架子十足，对下级干部，不论厅局长、

处长、秘书，做事稍不如意或看不顺眼，动辄批评训骂，暴跳如雷，泼口大骂。听不进反面意见，对向他提意见的人实行打击报复，甚至政治陷害。

打击报复

一九六二年，许家屯对手工业的调整，提出了一系列分散单干的措施。一九六四年，手工业局韩某某就手工业发展方向、道路问题，向许家屯提出了意见，许就对韩怀恨在心。一九六五年召开全省手工业局长会议，韩某某到许家里汇报，许根本不听，说“明天到书记处汇报”。当时，姚某某估计许不怀好意，要韩注意。果然，第二天到书记处汇报，许就凶相毕露。当时李士英也在场，许家屯不等韩汇报完，就对李士英讲，“你不了解情况，我来谈”。他根本不谈正题，辟头就责问韩某某、姚某某：“你们去年还向省委提出方向道路问题的意见是不是？”弄得他们莫明其妙。随后批评了一通，说“手工业部门不是支农，而是吃农、害农”。强制手工业局把农具大幅度降价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这在当时很难办到。这不是什么指示工作，而是明目张胆的打击报复。

仗势压人

原手工业局长吴某某，对许家屯领导工作上意见，并对在该局任人事处副处长的许家屯的老婆进行过批评。许家屯就不择手段地对吴进行政治陷害，说“刘少奇到南京的时候，吴某某发动手工业局党组集体打报告，告省委的状”，并将此谣言告诉包厚昌、田兰田。用“反省委”这项大帽子压吴某某，居心十分险恶。wengewang.org

吴某某一次向省委汇报手工业局处局长干部情况时说“负责同志的爱人安排得太多，长期休养，光照顾，不工作，占了名额”，这下可触怒了许家屯老爷，因许太太长期休养不到手工业局去工作，怀疑吴某某说的就是许太太。于是第二天，许就大发老爷脾气，扬言要把太太顾逸萍精简回家，并把所订的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杂志退掉，以示节约。如此吵吵嚷嚷，闹个不停。手工业局长见势不妙，怕“大祸临头”，只好派人送给许太太一百元，说服许太太不要把报纸退掉，这才免去一场是非。

纵容老婆，作威作福

许家屯老婆在手工业管理局，经常吃饭不做事，就是做点事，也是狐假虎威，正副处长要听她的指挥，局长也不敢对她重言多语。许太太工作，大事做不来，

小事不愿干，分配这也不干，那也不干，分配组织指导工作不干，接待工作不干，分配下乡搞社教运动，又扬言“我家老许不在家”，埋怨对她不照顾。一次她到广州参加“春季物资交流会”，到广州不几天，许家屯就打电话叫她同来。她任务没有完成，还要一个女同志陪向回来，公家却化去路费三百元。

大闹天生港

许家屯出差到地、市、县委，都要奉为太上皇，稍有疏忽，就要整你。一九五七年冬，他要从南通过江到常熟，因贪玩好吃，狼山的和尚请他吃饭，素菜荤做，吃了二十六只菜，从上午十一点钟一直吃到下午一点钟，离开船的时间只有二十分钟，赶到码头，招待所的同志买票事先没有落实，船开走了。他就在天生港党委办公室大发雷霆，大骂“你们这些人，只怕管，不怕官”，要挟航运部门找木船让他过江，后来，只得重新放一只轮船送他过江。南通地委招待所副所长为此事受到撤职处分。

(十)肮脏的灵魂，腐朽的生活方式

许家屯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带着满脑子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冒充党员混入了共产党以后，靠着资产阶级权术，爬到了“省委书记”的职位。他的肮脏的灵魂，腐朽的生活方式，非但没有得到改造，相反却变本加厉，发展到不可救药的程度。

打牌成瘾，跳舞入迷

许家屯有牌必打，逢舞必跳，在全省是出名的。即使在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全省人民艰苦地同自然灾害作斗争，而他仍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把大量的时间消磨在麻将桌上和跳舞场上，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抛之九霄云外。许家屯打牌，星期天打，平时也打；在南京打，到外地也打。有时办公没有下班就要人替他打电话约牌友。每次打牌，都要警卫员、驾驶员、服务员、炊事员七、八个人服侍。有时，要驾驶员开专车到中山陵十一号或南京饭店拿饭菜供这些混蛋老爷们享受。

什么工作要紧都没有他打牌要紧。每年台风季节，全省人民群众在暴风雨里抢险护堤，进行抗台斗争，抢救庄稼，维护国家财产。省级机关有些干部也日夜值班，与各地联系，掌握台情，调度物资，支持前线。许家屯是怎样“值班”的呢，他却带着一批人马，到南京饭店老楼四十号，约上几个牌友，日夜不息地乒

乒乒乓乓打麻将。值班的同志，向四面八方打电话，十分忙碌，许老爷在麻将桌上“红中”、“白板”吆喝得也十分紧张忙碌。有事去请示他，要等他把一圈麻将打完，特别紧急的事，也要等到把手上的牌打完，他才答复问题。打牌饿了吃鸡蛋糕，打牌热了吃冰西瓜。

许家屯是“四大舞神”之一(余三人为彭冲、洪沛霖、姚远)，人所共知。在南京，到高干招待所跳，到南京饭店跳，到歌舞团跳。出差，到无锡、苏州跳，到徐州也跳。到北京开会，每到星期六就要搞舞票。有时已经睡觉，听说有舞会，连忙从被窝里钻出来，换衣服，穿皮鞋，擦发油，喷香水，化装一阵，赶去跳舞。有时为了赶舞会，甚至把秘书找到舞场里去交待工作。每次跳舞，都是跳到深夜，跳得筋疲力尽，第二天上午就睡大觉。

许家屯在舞场上，丑态毕露，把舞伴搂得紧紧的，捏人家臂膀，甚至靠在舞伴身上，嘻嘻哈哈，眉开眼笑，样子十分难看。他平时对待同志，老是板着面孔，象个活死人。下面干部向他汇报工作，总是爱理不理，似听非听。但是，对待舞伴，总是轻言漫语，低声低气，百般讨好，唯恐照顾不周。舞伴要看电影，看戏，只要开口，他都积极设法解决。舞伴的夜餐费，任意由每人两角的标准提高到五角。对经常和他跳舞的舞伴，来往总是派小汽车接送，在南京是如此，到外地也是如此。一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跳舞，因为一个舞伴长得漂亮，舞跳得好，他就用小汽车自己陪着送她回家。一九六一年庐山开会时，他经常跳舞到深夜，第二天就有女的来约他出去游山玩水。有时，他因开会不能去，还要派车专门送她们去游览。更荒唐的是，有人托他的舞伴向省人委要抽水机、发电机，舞伴趁他舞兴正浓的时候提出来，他竟满口答应解决，置国家计划于不顾。wengewang.org

一九五九年在北京开计划会议，忽有一个青年女人手持一盒点心，操福建口音，到许的房间来找他。似乎是老相识，但行动鬼祟。因许家屯出去看戏，她急忙转身就走了。许家屯看戏间来，知道此事，很后悔不该去看戏。隔了一个月，他回到南京，这个女人却从合肥给他来信，说“在合肥温泉疗养，因条件不好，托他帮她设法进南京汤山疗养院疗养。”他就通过省工会把这位女人送进了汤山疗养院。在一九六零年元旦前夕，这个女的从汤山给他一信，说“很想念你，希望能在元旦进城和你跳一次舞”。

许家屯经常和歌舞团女演员跳舞，竟有一个女演员给他写情书。这件事被他

老婆知道了，她非但不和许斗争，反而害怕别人知道此事，声张出去对许不利。她就把同许一齐工作的人找来反复追问，直到知道别人确实不了解，才放了心。

许家屯丑恶的灵魂还不止此，他经常和舞伴、演员鬼混，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一次，他向流氓分子宋词倾吐了肺腑之言。他说：“我和爱人关系不好，精神生活感到很苦闷，要离婚又怕影响不好，……”。又说：“我对某剧团的某某女演员十分爱慕！”示意宋词为他穿线搭桥。真是冒牌的“共产党员”，修字号的“省委书记”，腐朽透顶的灵魂！

名曰蹲点，实为享乐

许家屯经常到各地、市、县检查工作，不知内情的人认为他的工作作风深入，但是，这位老爷下乡下厂的真实情况究竟是如何呢？一九六一年，许家屯到徐州贾汪煤矿“蹲点”，住在南关高干招待所，睡的特等房间，每天伙食费二元。要到煤矿去，先通电话，让矿上领导干部作好准备，然后坐小汽车到矿党委会议室听汇报，作指示。在矿上吃饭喝茶，用的碗筷、甚至副食品，都是从交际处带去的。在徐州说是在煤矿蹲点，实际上在招待所指挥。白天工作，晚上依然是看戏、打麻将，星期天还逛云龙山，有时，还跳交谊舞。这次蹲点，还算是比较“艰苦”的一次。

一九六四年，许家屯管农业，六、七月间下乡一次，其二十几天的活动情况是：

走路——不坐火车，不坐公共汽车，坐美国翘屁股的小轿车。

住地——地、市、县委招待所最好的房间。

伙食——标准每天两元以上，但只收一元或一元五角。除了饭菜，有时有水果、点心。

随员——有关厅局长、处长、秘书、警卫人员、护士。工作——第一，坐在沙发上作指示；第二，下田看庄稼或水利工地现场，当然是车子不能到的地方不去，能到的地方，也只是走马观花；第三，叫厅局长打电话，下命令，或叫秘书、处长写材料，拟文件。

业余——打麻将，下围棋，看戏。十个晚上有八个晚上是如此度过的。下棋、打牌不能输，一输就不肯下台，左一盘，右一盘，一干就是深夜二、三点；但又不能赢，赢多了，不是说对手没有水平，就是兴奋起来又不肯下场。

携亲带着，游山玩水

一九五五年五月，上海举办苏联工业展览会，许家屯、彭冲、徐步前去参观。许还带了太太、小姐、秘书、警卫员等，共十余人，浩浩荡荡到了上海。他们白天看展览会，游百货公司，游大世界，照哈哈镜；夜晚进戏院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整天车水马龙，花天酒地，玩了将近一个星期。这些坏蛋还不过瘾，决定再到苏州、无锡等地游山逛水。wengewang.org

到了苏州市，市和专区的头头亲自迎接。苏州市的市面也顿时繁荣起来。老爷们的汽车首尾相连，飞驰而过，群众争热闹。偶而汽车停下来，男女老少前拥后挤来看新的官僚贵族。

他们住在高级招待所，每天起身很迟。早饭以后，就有苏州市的当权派前来陪同游玩，整天沉醉在狮子林、拙政园……拾封建余孽的唾余牙慧，自命“消雅”，欣赏楼亭，品评草石，赞赏那块石头宝贵，那块石头符合“漏、透、瘦、绉”的条件。又争论《西厢记》中“隔墙花影动”之句，为什么隔了墙还能看到花影在动，充满了臭气。城里玩够了，再乘轿车逛寒山寺，登虎丘山，玩遍苏州所有的名胜古迹。他们象苍蝇一样，臭味相投，去拜访遗老遗少的私人家园，观赏他们收藏的古玩古画，并欣然在签名簿上签名留念。甚至还和那些吸血鬼称兄道弟，情如手足。

有一天，这些混蛋老爷们乘车到木渎，饱吃了一顿苏州风味的午餐以后，改乘吉普车登灵岩山，观赏太湖风光。就在这次登山中，苏州市委特派的保卫人员乘坐的一辆小吉普，为了赶上老爷们的专车，加速爬山，不幸翻车，驾驶员跌得血肉模糊，身受重伤，好几个警卫人员都受了伤，不仅如此，还撞倒了一个在公路旁边劳动的农民。由于这次车祸，老爷们担心“影响不好”，打消了再游无锡的念头，偷偷地溜回了南京。至于受伤人员和那位农民的死活，都不放在他们心里，统统留给苏州市委去处理善后了。

多占多用，损公肥私

许家屯在两年之中，不花钱或少花钱占用公家五件棉衣，两套单军衣。一九六五年搞社教，花十块钱买了一件军大衣，两套单军衣。社教回来，又到行政处拿了一件军大衣。去冬搞文化大革命，在公安厅拿了一件棉袄，又到文革办公室要了一件棉大衣，不久前上北京，海军又给他一件棉大衣。一个人要穿这么多棉

大衣吗? wengewang.org

有人向许家屯拍马屁，拿公家的东西送给他，他还嫌少不怕多，嫌孬不怕好，有送必收，来者不拒。照相机厂送给他照相机，自行车厂送给他机器自行车，照收不误。无线电厂送给他一架两用收音机，价值二百多元，后来工厂里要钱，他不给，结果公家出钱，由他使用。连天津市铝器厂送给江苏的一套铝制品样品(铝锅、铝勺子)，也给他老婆留下用了。至于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之间，省内县市和兄弟省市送来的水果、副食品，如洪门果园的梨、无锡水蜜桃、东山枇杷、连云港的对虾、镇江的鲥鱼、淮阴的苹果、阳澄湖的蟹……等等，不花钱或只给少量的钱拿回家的，更是不计其数。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走后门买毛料做衣服，买出口的缝纫机，不给布票买布，不给粮票买山芋、花生则是经常的事。

许家屯夫妇二人，每月工资三百四十元，按他家人口平均每人收入，超过一般干部二倍以上，但是，每年还要公家救济。从一九五八年起，省委组织部每逢春节都要送给他二百元的救济款。经秘书和驾驶员替他拿回家的，到一九六三年为止，共达一千多元。

为了保命，浪费惊人

许家屯一面通宵达旦的跳舞、打麻将，一面拼命打补针吃补药。丙种球蛋白、鹿茸精、蜂乳、力勃隆等贵重药品，经常不断。每打一针进口的丙种球蛋白，需要四十元。仅据一九六五、一九六六两年统计，许家屯一人耗去药费达二千多元。

许家屯的老婆顾逸萍，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四年，十年不工作。要她上班浑身是病，打起牌来浑身是劲。她可以通宵打牌，疲劳了就打针吃药睡懒觉。十多年来，大吃贵重药品，浪费不计其数。用人参配制的膏滋，每瓶几十元，她高兴就吃，不高兴就倒掉。有十多支红参，长期放在家里不吃，结果蛀了丢掉。有二十多斤贵重的中药喂了鸡。护士见顾逸萍有些中药不吃，为了爱护国家财富，就将没有煎熬的生药带回门诊部。她发觉了，就交待保姆，以后不吃的中药，宁可煮一煮倒掉，不要让护士带回去。一九六零年，她生肝病，听说苏联有一种什么药，疗效特好，就要商业厅金逊动用外汇，托我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去买，化去数百卢布。有一次，她又借口配制肝病的药，用公款十八元买了番瓜子，结果没有配药，被孩子当零食吃了。还有一次，她为了治子宫瘤，当许家屯在华东开会，赶到上海找“著名中医”诊看。医生开了一个“高级”药方，拿到药店计

算一下, 要化一千元左右, 有几味贵重药品还找不到。这个药方, 带到南京交给省委门诊部去配, 后因省委办公厅也不敢做主, 才罢休。许家屯对这样一个严重问题, 却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

许家一年到头不离护士, 门诊部派到他家的护士, 不仅要为他全家煎药打针, 还要为他家打毛衣, 扫地, 泡茶。连家里熏蚊子、打滴滴涕, 也要护士做。小孩子生病, 要指定护士, 随叫随到。

官僚住宅, 无比阔气

许家屯住房也是要多要好, 院子要大, 好种瓜果蔬菜, 甚至种粮食棉花。他调来南京共搬三次家。从兰园搬到莫干路十四号, 后来见到北京路三十号房子好, 又搬去了。这幢房子原是国民党某次长的住宅, 主房两层楼, 大小房间十间, 钢窗, 打腊地板, 冬天有暖气设备, 光线充足, 还有附属房屋楼房平房十余间。除去驾驶员住了两间小平房外, 许家共有八口人, 全部占用了主房和部分附属房屋。使用的地毯、沙发、弹簧床、衣镜、梳妆台、皮椅、办公桌等家具都是第一流的, 外加上辆翘屁股的小轿车。许老爷一家比之国民党的次长, 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欺弱凌下, 俨若地主

许家屯到省委十年, 先后换了八个保姆, 四个炊事员, 四个驾驶员。他的老婆象地主婆虐待家奴一样对待保姆。她选择保姆要没有丈夫的, 没有小孩子的, 在南京没有亲友往来的。保姆做的是重活, 吃的是剩粥剩饭。一个保姆除了负担他一家八口的繁重家务劳动外, 还要为他家养鸡、养兔。最多时养鸡四十多只, 养兔二十多只, 为了盖鸡房兔笼, 公家化去二百多元。保姆忍气吞声地为他家干活, 稍不如意, 地主婆顾逸萍就以保姆作风不好, 手脚不干净, 偷东西, 好串门子, 家庭成份不好等等为借口, 随时解雇。最令人气愤的是, 有个比较年轻的保姆, 有一次请假回苏北家乡看望丈夫, 同来时, 地主婆发觉她怀了孕, 就要解雇。这个保姆家庭生活非常困苦, 一再恳求不要解雇, 并设法打了胎, 结果, 还是被地主婆赶出了门。wengewang.org

炊事员受尽欺凌压迫的苦也是说不完的。杨瑞康同志, 为人勤劳正直, 除了烧饭, 还兼家务劳动。但是地主婆诬蔑他偷粥、偷饭、偷香烟、偷粮食、偷山芋、偷油。炊事员吴荣生同志, 一次买了一些香菇, 因文化水平低, 记账时把香菇误

记为香瓜，地主婆查帐后就泼口大骂，说：“你吃了香瓜还要记到我的帐上吗？”有的炊事员被调动是蒙了不白之怨的。如杨瑞康的调走，是被诬蔑为生活作风不好，赶出了许家大门。

驾驶员白天黑夜、寒冬酷暑，任劳任怨为许家屯开车，一不如意就要调换。一九五六年，驾驶员谢小俊，由于对公家的车子非常爱护，许最溺爱的一个孩子，经常在车上乱搞，谢小俊同志对地主婆提意见，她置之不理。谢就对小孩说：“你再乱搞车子我要揍你！”不料给地主婆听见了，就泼口大骂：“你驾驶员还能管我的孩子吗？真是翻天了！”立即通知办公厅行政处把谢小俊调走了。许家屯对驾驶员的学习、思想、生活，从不照顾，不许驾驶员离开车子，驾驶员连参加党小组会和学习的时间，也被剥夺了。

警卫员跟着许家屯，根本不是做警卫工作，而是象奴仆一样，早上端洗脸水，晚上端洗脚水，平时端茶水，稍不如意，就横加训斥。有时打电话稍微慢一点，就大骂警卫真是“草包”。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家屯，由于他精通资产阶级的权术，招摇撞骗，吹吹拍拍，两面三刀，阴一套，阳一套，打着“红旗”反红旗，因而，长期冒充共产党员，窃取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职务。但是，假面具总是要被揭穿的，狐狸尾巴总是要露出来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震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许家屯终于落网了，许家屯的反革命嘴脸终于被彻底揭穿了。许家屯这个钻进党内的冒牌党员、政治扒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终于披揪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大快人心的大好事！我们一定要宜将剩勇追穷寇，狠打落水狗，彻底揭发，彻底批判许家屯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他的反动影响。

（以上材料，是根据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揭发，综合编写成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杜平对江苏和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讲话

〔地点：南京；杜平：江苏省军管会主任〕

张春桥同志讲话

革命的同志们，亲爱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同志们好！（掌声、口号声）

我们这一次到南京来，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叫我们来的。（掌声、口号声）我们带来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南京和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限的关怀。（掌声、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早在二月中旬，我和姚文元同志到中央汇报工作的时候，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指示我们，说你们回到上海，要关心一下江苏和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江、浙两省的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你们上海啊，有些孤立。要我们能够关心这一方面的事情，能够对江、浙两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所帮助，对于这两个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能够有所帮助。我们接受这个任务以后，感到很光荣，应该来看望同志们，但是，那个时候上海的事情也确实忙乱一些，一直等到三月底，我们说再不来了不行了，我们下决心到南京来了，火车票也买好了，但是就是那一天，北京又打电话来，要我们马上到北京去。我们就估计到，江、浙两省我们一次也没有去呀！见到毛主席是没法交账的。果然不错，我们到北京以后，第二天，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见我们的头一句，就说：你们没有到南京去呀？（掌声、口号声）这是毛主席对我们两个人的批评，同样，也就是毛主席对江苏的关怀。（掌声、口号声）

这一次，我们要走了，我们就向主席请示，说我们要回去了，要南下，主席有什么指示？这一次，大概主席怕我们不来吧！主席就把路线给我们划清楚了。（掌声）就说你们这一次回去，先到济南，然后到南京，然后到上海，然后到杭州。（掌声）同志们，上次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坚决地执行，犯了错误，这一次最高统帅的指示，我们就坚决执行，有错误就改么！（掌声）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完全按着毛主席指定的路线，到南京看望同志们了。（掌声、口号声）

我们到这儿来，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是来做同志们的小学生的。（掌声）我们到这儿刚刚是七天，今天是第七天了。在这个七天里面，我们和南京军区的同志、省军管会的同志见了面，谈了话，交换了意见。但这个时间花的不多，我们主要的时间是花在同南京的，也就是全省性的一些主要的革命造反组织的领导人谈话、开会。同时，看材料，看信，看你们的传单。我们的桌子上，从这里算起，大概这么一堆吧！我们看了，当然还没看完，因为天天往这儿送来，刚才一坐又是一堆，又送来了。我们也到街上去看了你们的大字报、标语，也参加了一点辩论会，不过他们不认得我们就是了。（掌声）我们没有参加，光听了。也看了你

们打架，打的挺热闹。你们武斗这几天可是带劲哪！真是斗得上劲啊！我们就是看了这么多，谈了这么多。从这中间受到很多教育，学习到很多东西。不过，时间总是太短了，同时我们的水平实在很低，毛泽东思想知道的很少，接触到的群众也很少。一句话学习得不够，调查研究还很不够，还没有发言权，或者只有很少的发言权。但是，很多同志要求见我们，要求跟我们谈话。如果我们都接见呢，而且都要求单独谈，那我们时间实在安排不过来，最后也想啦，还是像今天现在这样，大会上咱们见面谈话吧！

我们到这儿，很多同志问我们，现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怎么样？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象，总的来看，是大好的。特别是四月初开始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黑《修养》以来，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意志更加旺盛了，斗争更加深入了。可以说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这样一个大的批判，最大规模的批判，促进了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也促进了各个地区、各个单位革命的大联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一步一步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原来所预计的，二、三、四、五几个月就可看出眉目，那么这个眉目，现在我们看得更清了。除了有六个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外，还有一些省市已经建立了筹备小组，他们现在接受了这些最初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的经验，他们的工作现在做的细致一些，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从报纸上看，好象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少哪！实际上都有进展，包括有一些地方曾经曲折比较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遇到的挫折比较大，那些地方现在的局势也都在改变。所以，整个形势是很好的。生产形势，也是好的。全国的农业今年整个形势都很好。北方，往年总是春旱，今年，华北地区、济南地区我们看了，山东地区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山东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今年春天都没有发生旱，只有少数地方有旱，雨水比较好。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农村干部，贫下中农，公社社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了。所以，今年农业形势是好的。工业生产整个形势也是好的。那么这样子，我们吃饱了饭，就可以放手闹革命。当然，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各个地区所面临的任务，所碰到的问题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是发展的顺利一些，往前走的远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这个倒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事情不可

能发展得那么平衡。也可能现在发展得比较顺利的地方，过一个时候，又要遇到了新的困难，发生反复；也有可能。这是讲全国。

那么江苏省的形势究竟怎么样？这个问题当然是应该你们答复罗！是应该我们问你们的，你们知道的比我们清楚。我们从这几天接触中间，和根据我们过去的了解，我们觉得总的看，江苏的形势也是很好的吗！生产的形势也是好的。比如四月份的生产，三、四月份都好的，五月份有一点问题。革命的形势呢？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省军管会的领导之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很好的工作。人民解放军驻江苏的部队，在南京军区的领导之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有力的支援。应该说比起军管以前全省的工作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掌声、口号声）

同志们要我们对这里的工作发表一点意见，我们这个意见很难提，因为事情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不过我们也感觉到有些问题，想提出来和大家商量一下，看看是不是一些这样的问题。关于工作，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前的任务、工作，这些，人民日报的社论、红旗杂志的社论，党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都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想做全面的讲解，我们只想说这么几个问题。我和姚文元同志有个分工，我说两个问题，他说一个问题。（掌声）因为刚才都是讲的好听的话，你们都鼓掌，我下边的话有的不见得那么好听哪！（掌声）不过我还是希望不管我说的你们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希望你们还是耐着心听一下。（掌声）

同志们，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主席台，主席台这儿为什么都是当兵的呢？你们当然可以得出一个答案，因为是军管会么，所以都是当兵的。但事情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和姚文元同志给你们的各个组织的负责人谈话的时候，他们都要我们跟大家见见面，讲讲话。我们就有一个建议，说这个会可否由你们双方联合召开。他们当时说可以，我们说到会场上会不会打架呀？他们说保证不打。那么结果呢？一直协商啊，协商，没达成协议。所以，最后由军管会的同志来主持开会。那么你看，又是好事由军管会来主持开会，你们想鼓掌，但是，我举这个例子并不认为这是个好事儿，就是革命群众组织呀！这种对立呀！相当深了，同志们啊！就是都上一个主席台都有点困难了。按这样子搞啊，我看你们这里成立革命委员会呀！那就要相当长了，就一直是当兵的坐在这儿了，就是我们这些穿军装的坐在这里，那么这个老百姓上不来。或者一上来么就吵架！就从这儿说起吧，我的

话就从这儿说起。

请同志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革命斗争的大方向问题。在江苏地区，首先在南京，我们是不是紧紧地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我希望所有的今天到会的同志，不管那一派的同志，包括今天到会的，也希望你们散会以后，跟他们一块，郑重其事地来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南京，究竟是不是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掌握的紧不紧？这是头等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大方向呢？这个中央的同志都一再讲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讲了。就是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现在正处在夺权的阶段，全国还都是这样，都是正在夺权，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现在是处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当前的大方向，就是要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要和本地区、本单位的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经过这个革命的大批判，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样子来为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必须紧紧掌握住的革命的大方向。简单地说，就是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就是要掌握这几个东西。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里究竟怎么样，你们掌握的怎么样？我们问过一些同志，有的同志承认说掌握的不算太好。我们跑到街上去看一看，你们街上的标语呀，大字报啊，真多呀！那倒不是冷冷清清，而是热热闹闹的。但是，这里边究竟那一方面多呢？批判刘邓的有多少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不多。你们当然也可以批评我们啦，说我们有一些，你们没有看到。但是，至少我可以说一句，你们那些最重要的贴标语、写大字报的地点，这一方面很少，主要的街道我们不是看了一次，每天我几乎都去么，我们来到的当天，第一件事就是看大字报、大标语，因为这非常灵。到一个城市，你转一圈就知道这个地方当前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一看，你们对刘邓不大关心，你们关心的什么？这一个派说那一个派某某人是罪魁祸首，某某人是罪责难逃啊！那个都是小厂，以厂为单位贴来贴去。当然一个厂的事情么也是国家大事罗！但头等的国家大事是什么呢？是批判刘少奇么，是批判刘邓，这是总后台么，如果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地摧毁啦，你那个厂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啦。如果你那个厂都是你的天下啦，但是刘邓上台，同志们啊，你那个厂的天下就维持不住，那维持不住的。你们的广播站我们也听，一直到深夜，还在广播，也都是两派互

相在那吵啊吵啊，就是听不到你们批判刘邓。这个我觉得我不冤枉你们。这是讲全国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们这个批判究竟怎么样？我们再看一看批判省的，江苏省的。据说都进行了一些，前天还为了抢彭冲打了一架。说是进行了一些，但是，我们看不是那么集中，就是全市人民的革命造反派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对刘邓对旧省委，你们的精力呀相当分散，不是很少的分散。我们看那些标语我们不知道，刘少奇这个我们知道的，你们那些标语上的那些人名啊，我们只有几个人知道，文凤来呀，曾邦元呀，这几个人知道，其余的都是一个厂里边的什么某某人，那标语写那么大，比刘少奇的名字都大，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是讲大批判。

那么大联合啦，同志们，我们在街上几乎没有找到一条，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一条，就是讲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样的标语。倒是这一种很多，你是老保，你是什么反革命。这些你们大家都没办法来解释吧，这个地方两派都不能上台，这是最现实的啦！今天开个会，希望你们两派的负责人到上台来主持会，那么你不来主持会，如果说主持会还有个问题呀，谁来当主席呀，那一定要打破头的，那么要军管会的同志来主持，你坐在这也好，坐也不能坐，哎呀！这个无产阶级政治家都是这样子的气度，还叫无产阶级革命派呀！你们看看五一天安门上那个名单，毛主席是什么气度，什么样的人都让他上了天安门么。所以，他才是毛主席呀：他才成为我们大家的领袖啊！（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你们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当权呀！同志们，夺了权掌权就是这样子掌法呀？我看危险呀同志们。现在武斗么还是不断，而且发展到绝食，不但发展到绝食，又看到一个传单，要三绝，绝食、绝水、绝医，就是不但不吃饭，而且不喝水，那么如果不吃饭不喝水不是身体就不行了么，医生要来给看病即绝医，不准看病，这个传单我想念，许多单位都署了名的。我反对这个传单！（掌声）同志们你们看，我为什么要反对哪！我们毛主席率领我们红军，率领八路军、新四军，率领人民解放军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什么时候要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绝食过哪！（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应该是吃饱了饭，睡好了觉，喝足水，有了病要好好看。如果是敌人，咱们就和他斗，拚死的斗。（众：对！）何况你们，我下面还要讲，你们现在绝食已经发展到不是对敌人！（众：对！）这样一些现象能够说我们江苏的首先是南京的斗争符合党中央所规定的革命的大方向吗？能够说这是在一个

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吗！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革命的大方向的，这不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轨道上的前进的。（掌声、口号声）同志们，革命的大方向，这不是我们自己随随便便来决定的，不是我认为这一个就叫革命的大方向，或他认为这一个就叫革命的大方向。确定革命的大方向，是根据客观的实际，根据社会的基本矛盾来决定的。

我们江苏地区和全国一样，江苏的基本社会矛盾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革命的人民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掌声、口号声）同志们，就是说这一个矛盾，我们如果大家都共同的承认这是基本的社会矛盾。江苏并不特殊，上海的矛盾也是这一个，新疆也是这一个，黑龙江也是这个矛盾，这是全国的共同的矛盾，江苏难道说例外呀！说江苏这里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不是革命人民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什么文凤来同曾邦元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你们能够得出这个结论来吗？（众：不能！）这一个基本矛盾它就决定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它本身就提出来究竟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革命的对象，要打倒谁，要联合谁。离开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没办法来分析问题，我们就不能确定正确的方向，就不能够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就不能够把我们的队伍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现在看起来，你们这里好像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至少有一部分同志头脑里边淡薄啦，模糊啦，混乱啦，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刘邓，不是指向旧省委，而是两方面互相指向。两派交给我们那么多材料，这些材料里边，揭发省委的有一部分，不多。揭发刘少奇在江苏的罪恶的一本没有。大家都知道么，刘少奇在华东地区，首先是在江苏地区，影响是很深的呀！同志们，他在江苏工作了很久，在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影响很深啊！可是我们大家不管，你北京啊，你批判刘少奇你批你的，我的兴趣不在刘少奇，我是在文凤来，曾邦元。给我们绝大多数的材料，都是这一派揭发另外一派的。那些材料，同志们，我在这里在我们同志之间我可以讲，要是过去江渭清搞这么多材料，哎呀可宝贵啦！他搞不到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搞你们的黑材料搞不到这么多啊！但是，现在我们彼此之间就揭发，我说他背后有什么人是后台，他说他后台是谁，他干了什么坏事。

究竟那些事实是不是事实，老实说，我们两个不愿意查，我们不愿意听那些东西，因为我们觉得这离开了大方向。革命同志之间，下面我还会讲，就是对方

犯了严重错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用这种办法互相揭发，都弄到街上，贴到街上，究竟谁高兴啊！老实说，我们开了几天会，看了这几天的材料，我们心里很难过，我们心里很痛心啊！怎么两个革命派会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材料来看，我们根据这些材料还不能够证明两派中间那一派是保守派、保皇派，我们认为三月五号中央在接见江苏省两个代表团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作的评价，就是两派都是革命组织，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口号声）当然，同志们，现在在哪，我们当然也需要仔细的分析一下，特别是因为两派的组织都不是原来最初那个时候啦，也甚至于不是后来在三月那个时候，因为后来都有些发展，在发展中间有没有一些问题，那个需要具体的分析，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一点，因为基层组织有了一个问题，或者某一个组织有了问题，甚至于说某一个大组织他的某一个负责人出了问题，那么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一个组织整个是坏的。如果根据这样的逻辑去推论，那么一个外国人跑到中国一看，说你们中国共产党出了那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原来你们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就是个坏蛋，因此判断中国共产党是个坏的党，那你们同意吗？（众：不同意！）所以不能够这样形而上学的不作阶级分析，不作具体的分析，这样子来判断一个组织，以至于从这里得出结论进行互相攻击。根据你们给我们的材料，我们刚才说啦，我们的判断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认为现在两派互相攻击的作法是正确的，而是认为两派应该根据中央的指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间，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众：对）

同志们，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段语录，我们同志们大概在各种会场里边，或是在日常的学习里边念了至少几十次，几百次了吧！但是，一碰到具体问题，就恰恰忘记了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恰恰不是去看一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在三月五号中央的同志接见江苏的两个代表团的时候就已经很严肃的指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在北京，中央只是把谈话的要点告诉了我们。这一次到了南京，互相告状揭发中间就把这个记录，说这个本子和那个有什么不同，说传达的本子如何有差别，都给我们啦。那好吧，我们就把这个本子，也看一遍，那个本子也看一遍，我们看的结果，我们觉得大家争论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争论的问题。但是，中央所指出来的最关紧要的问题，你们都不争论，都不重视，中央那讲话里边最关紧要的东西，都丢在一边啦，枝节问题争的一塌

糊涂，争的面红耳赤。总理也讲啦，康生同志也讲啦，其他同志也都讲，里边着重的说过一个就是敌人朋友的问题，特别是康生同志讲的时候，根据记录上讲，有的加了注解，说当时康生同志非常严肃的很生气的讲了这一段话。我和姚文元同志我们两个说，要我们讲话我们讲什么，我说就把过去总理和康生同志讲的话再念一遍就够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同志们，我们希望今天这个会后，你们不管那个本子，你们把两派自己的记录本都拿出来看看，你们看一看中央同志讲话的要点究竟在哪里，是劝你们大联合哩，还是劝你们大分裂，是劝你们回来要各自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哪，还是要你们各自攻击对方。就是讲要各自批评自己的缺点，自己批评自己，不要去批评对方，着重的要批评自己，这个是我们不但是对江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最近接见了十几个省的代表团，统一的方针，话都是一样的，就是那几句话，都是要凡是发生这样的两个革命组织之间的问题，中央的方针，都是要他们回去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这是行之有效的。历史的教训，就是拥军爱民。抗日战争时期，四三年和四五年，毛主席那个时候就规定啦，军队和地方发生了问题，怎么办？就是开这种会，军队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地方开会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军队，双方进行自我批评，一个拥军，一个爱民。现在我们解决当前，下边我简单的会说到，解决当前的拥军爱民问题，也采取这个办法，革命组织之间，革命人民之间，革命的同志之间，发生了问题，用这种办法最好，中央给你们方针也是这样啊！希望你们回来批评自己，中央给我们打的电报里边，同时也是给江苏军管会的电报，也是这样说的，这一段话我还可以再念一下，这个不是你们的记录，这是中央正式的文字：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各自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原则一致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枝节问题的分歧，应求大同存小异，原则分歧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革命派团结起来，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中央给我们的谈话要点里边的第五点就是这一点。这个是中央正式通知我们的。也通知了江苏。

但是，看起来，从北京回来以后，你们双方恐怕都没有坚决的按照中央的指示来作，相反的据说憋了一阵，不是进行自我批评，而是憋着，憋了一个月，到后来说是憋不住了，还是干吧，这样子搞来搞去，就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没有能够端正。在这里我们就想说几句，有这样的意见，我们感觉到，本来江苏的形势是

很好的。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在一月三号事件以后，那个时候的形势比上海还可能好一些，因为我们看一看历史么，你们南大在全国大学生站出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最早的啦，最早的几个学校中的一个吧。总理上一次接见你们的时候不是也讲过吗，那时候就是三个大学站出来最早啊！北京大学，南大，西安交大。你们南大比上海的大学生站出来早，南京、江苏的工人建立大的组织也比上海早。大概是早成立了三天，晚批准了一天，因为早么还是这里先建立，建立啦江苏没批准，上海建立啦也未批准，但是后来上海因为中央那时候派我们先到上海的，上海就先批准啦，上海批准以后，江苏才批准的，那也只是差一点，差一天的时间么，但是，建立还是你们江苏的早。江苏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发动起来的数量比上海不少，你们同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斗争进行得也很英勇，很艰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在和赤卫队作斗争的时候，那是一场非常大规模的战役啦，几乎是从杭州、上海、苏州、无锡过来到南京，一直到蚌埠，整个全线大战，十二月底一月初哇，那个时候是这样一条铁路线上的革命造反派和赤卫队同时进入了战斗，肩并肩的互相支持，互相援助。十二月底我们还在北京，接到的电话，不只是上海的同志给我们打电话、打电报、苏州、无锡、南京，我们都得到了，一直到蚌埠，我们就看到是那么一个大规模的斗争，当时革命派团结得多好啊，多么大规模的联合啊！（掌声、口号声）

我希望同志们冷静地听听我讲的话。应该说，我有许多话是给你们领导人都说过的，但是没有效果，所以在今天，在这里再一次讲！那个时候，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肩并肩的在一块儿斗争，我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们是对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不管遇到多么艰苦的环境，我们相信毛主席支持我们，我们任何困难都能够去克服，所以不管你是杭州的也好，你是上海的也好，你是安徽的也好，你是江苏的也好，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能够联合起来，就能够站在一条战线上，进行共同的斗争。但是，这种形势现在好像同志们都忘记了，为什么不再回忆一下我们共同在一块作战的时候那种深厚的阶级感情呢！为什么会忘记了我们战斗的友谊哪！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众：对！掌声、口号声）

同志们，在十二月底，一月初，那个时候的形势，我刚才讲，老实说，南京的形势不比上海差，我不能说我在上海工作就说上海的好话，同志们不是这样，

我现在也在江苏工作，我没有这个本位主义。（掌声）但是，现在我们比一比同志们，你们是不是承认南京比上海落后了一些呀！（众：对！口号声）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比江苏前进了一些，当然，我刚才讲现在形势比你们好的地方，如果自己不小心，自己骄傲啦，也可能出大纰漏，将来落后你们，走向反面，那是上海的事，到上海我们再去算那个账，今天在这里不讲那一面。上海所以形势好一些，据我们看，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和赤卫队作斗争中间所形成的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遭到破坏，相反的，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引导之下，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之下，巩固和扩大了在战斗中间形成的革命的大联合，而且他们实现了革命的联合的夺权。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不是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虽然也有几个组织，个别的组织，有的是比较大的组织，曾经从他们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鼓舞之下，他们干了一些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样的事情，但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的捍卫了这个大联合，使大联合没有遭受破坏。

上海的夺权，也不是那么顺利，同志们大概如果从报纸上看，好象上海一次就夺下来了，实际上我们算了一下，上海夺权，大概夺了五次，就这个中间，我们认为处理的比较正确，第一次两个单位去夺的，两个单位，一个工人组织，一个学生组织，他们两家突然在一天晚上，一月十四日，比你们早，到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这几个机关，宣布夺权，他把华东局也夺了。我们发现了这个情况，我们就找了他们，我和姚文元同志就找了他们，就说你们这样子两家夺不行吧，你能够夺得下来呀，我们是劝了他们，他们这两家说，那怎么办哪！他们一看是夺不下来，只占领了几个电话机子。第二次哪，又有四个组织，这四个组织都是大组织，四个最主要的组织，他们也是深更半夜，去夺啦，夺了以后呢，而且通告都准备好了，但是报社的同志打电话给我们，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有通知我们的，打电话给我们说要登这一个通告。我们就说，这样不好，通告坚决不登，由我们来说服他们，我们就说服他们，说无论如何你们四个组织固然已经代表了上海的革命派的多数，按人数来说，但是你们这样子，权夺不下来，夺下来以后也掌不了权，掌不好，要搞还是搞大联合，还是把一切能够参加夺权的单位都参加，这一些同志总算好，听了我们的话，没有搞。又一次，又是另外两个大一点的组织，还有五、六个小组织，他们又去夺了一次市委和市人委的权，那当然还

有几十个组织去夺华东局的权，这些我们都说服啦，我们说只能大联合夺权，不能够一部分单位夺权。一直到二月二号，这一次总算是夺了，就是三十八个单位已经联合了，三十八个单位联合，他们把宣言也搞好啦，委员也搞好啦，到了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和姚文元，说我们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向你们报喜。我们说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呀，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他们说明天开成立大会，你们来参加，现在我们就向你们报喜。我说这个事情要报告一下中央才行啊！我们就给中央打电话，说上海三十八个组织今天晚上宣布夺权，宣言、委员都弄好啦，要向我们报喜，我们准备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谈一谈，去接受他们的报喜，同时请中央考虑还有什么指示没有。这个就是第四次啦，我们到那里当然大家很高兴，我们也祝贺了他们，然后就回家。回到家，中央就打电话给我们，说这样子不好，就这样子没有三结合，他们搞得成啊？我们说三结合市委没有人站出来啊！中央当时就做了一个临时决定，张春桥、姚文元参加好了，为了支持革命群众，因为我们原来也在上海工作吗，也算上海的革命干部。然后我们就马上打电话通知三军，请他们参加，由我们来邀请了。然后我们再把三十八个单位的负责人找来，跟他们协商说，请你们明天不要开大会。先通知他们，中央决定要我们参加，他们当然欢迎。我们说，既然你们要我们参加，宣言总要让我们看一看吧！你们的委员咱们还可以协商一下吧！大会是不是明天不开，迟几天。不过因为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革命的大联合没有破坏，所以事情好商量，立刻就决定推迟，我们就连忙连夜地忙着几天，给他们搞宣言，搞委员名单，筹备新的成立大会。那个时候就发现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市一级的革命组织就有一百多个，那么现在只有三十八个，其余那些组织怎么办？而且已经有个消息，他们要成立第二个公社，你不是叫上海人民公社吗，那我们再成立一个公社，那就两个政权怎么办呢？这个矛盾就很尖锐啦！我们当时是这样处理的：一方面，说服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三十八个单位，说把你们这三十八个单位，不叫做组成单位，不是说我们三十八个单位组成了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其余的各个革命组织，都可以参加，我们不过是发起。这样子不就是处于主动地位了吗！就不是我们独占了。他们就同意了。就是说：不是组成单位；另外，我们又去说服剩下的要组织第二个人民公社的几十个单位，找他们代表来，就说：你们是不是不要另外组织一个了，因为已经有一个吗，上海只能有一个政权，怎么有两个，他们那

三十几个单位。叫做发起单位，你们稍后参加，因为还有争论吗，有的说你是老保组织，有的说你是什么大杂烩，那么人家不接受你，需要讨论一下。这个理由不能完全说服他们，他们就要求无论如何当时要参加。后来有两条，他们在这两条下同意了，一条我们就说，那你们要考虑一个问题，中央已经决定我和姚文元参加这个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不能参加两个啊！我们参加这一个，你们再成立一个，我们不参加，中央不批准，你们怎么办呢？你们不是很被动吗？他们想一想这个是。第二吗，我们这个成立大会你们都可以参加，成立大会都可以来吗！包括那些有名的老保组织，我们说他们的群众可以来参加庆祝会，有什么不可以呢？上海人都可以，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因为是庆祝吗，所以，这样子没有再引起大的波动，还是保持了革命的大联合。所以说，上海的形势为什么比较稳定，发展的比较顺利，不是波浪那么多，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那里的革命大联合，是在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虽然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缺点错误很多，但是因为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扩大，所以形势就比较好。这是在一月十一号中央给上海各个革命组织的贺电里面明确地讲到的。我们上海就是根据中央这个贺电，一月十一号的贺电，那是给我们指出了方向的，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把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团结起来，这个贺电讲了嘛，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个革命组织的贺电，成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整个革命行动里面遵守的原则。

那么，江苏今天的形势，我们觉得问题也就在这儿。就是因为没有能够巩固这个大联合，相反地你们的联合发生了破裂，你们不是联合夺权，而是一派夺权。在中央对这个问题上作了耐心帮助以后，在三月五号中央的同志讲话以后，在实行了军管以后，我们感觉到，你们没有能够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弯子转过来，认真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把缺点和错误纠正了，走上正确的轨道。我们感觉到这个状况是不好的，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我们建议你们把中央的讲话再好好地学一学。我们感觉到有一些同志，可能不是少数同志，现在头脑里面敌人的观点淡薄了，甚至忘记了，好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睡觉了。同志们，你们要知道他们没有睡觉，他们是不甘心下台的，他们还是想复辟的。我们不能

够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抱有任何的幻想，不经过斗争，胜利果实到了手里面是不牢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种出来的桃子吃起来也是不甜的。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全国的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江苏的、南京市的、无锡市的、苏州市的……统统把它打倒，那样子我们才能够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我们感觉到，在南京、江苏，在我们面前有两个方针，两个前途，一个方针就是中央所规定的方针，就是要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江苏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如果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那么我们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准备以后，我们就可以建立省一级、市一级和各个单位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那么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个方针，一个前途。

另外一种方针，一种前途，那就是违反中央的指示，不按中央的指示办，离开斗争的大方向，你打倒文凤来，我打倒曾邦元，就这样干，不批判刘少奇，不批判江苏省江渭清等等这些人，不去搞大联合，不去经过斗争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就使得我们一天天在这里两派之间斗来斗去，不把对方打垮，不把对方打倒，就誓不罢休，那么这样子很可能两败俱伤。你们两派，同志们我们想到的一点，这个话我们可以不说，但是我们为了请同志们清醒起来，我们跟你们讲，有危险，搞的结果，你们两派，如果那一派希望把对方打倒，我们的判断是做不到的。（掌声）但是，同志们，你们要看到，这样的斗争中间，你们两派斗，保守势力就要抬头，就要利用这个形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利用这个形势，那么，资本主义就可能复辟。我们相信，南京和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两派的同志，会选择第一个方针而反对第二个方针的。（掌声）我们相信，你们会选择第一个前途（掌声），而绝不会走第二个前途的。当然，你们已经选成今天这个局面，马上解决相当困难，要想一致联合起来不容易。那双方就应该有诚意，有团结的愿望，有联合的愿望，凡是对革命不利的事不做，凡是对革命的大联合不利的话不讲，想一切办法，促进双方的接近。有一些事情既然不可能一次都解决吗，先从局部解决也可以，或从一部分解决也可以啊。比方说，批判刘少奇，这一条我看没有理由反对吧！打倒刘少奇，这个有什么能够说不能联合，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说我打刘少奇是为了另外的一个目的，没有嘛！一千条

理由，一万条理由，我看都找不出来，只能找出一个，可以联合起来批判刘少奇嘛！这个有什么不能联合的呢？批判江渭清是可以联合的吧？

我现在提一个问题，在这里今天不要求你们马上答复，江渭清在北京，前天总理写个信来，给我和姚文元，就问，你们这里有些要求江渭清回来开斗争会。总理要我们在这里看一看，现在回来，究竟是否适合时宜？我们两个看一看，觉得不是时候，你把个江渭清搞来干什么呢？看你们打架啊！看你们在打架，他才高兴呢！开个斗争会，也不是两家开，一家开一个，开的时候说不定另外一派来了，要抢他走。那个，江渭清高兴啦。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联合有点眉目，我们再考虑这个问题吧。这个事，不要你们马上答复，请你们想一想。我们现在也没有答复总理。还有嘛，比如说，在某些问题上，在这些大的问题上，可以完全采取联合行动嘛，在一个单位里面也可以吗嘛。一个工厂里有两派，我们共同来批判江渭清，可以不可以？我们共同来批判刘少奇，可以不可以？甚至于在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两个组织看来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分裂，而应该联合。为什么不可以联合？如果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机关，原来属于两派的，或者属于几个组织的，现在要联合在一起，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应该得到他们上级组织的支持。为什么不支持呢？如果大家都主张大联合，下面要求联合了，我这个上面组织本来就应该促进你们联合，而你们真的联合了，我应该支持。我可以在这里说一下，我和姚文元同志，我们的态度，我们支持你们各种形式联合，包括你们基层自己的联合。（掌声、口号声）因为只有这样的联合，你们才有希望开工代会，开红代会。否则的话，那好，将来你看，大概是两个或三个工代会，两个或者三个红代会。那最后怎么办呢？两个三个革命委员会呀？省、市可以几个政权吗？我们建议你们考虑这些问题。为了创造联合的气氛，我们建议你们能够首先停止武斗，不要再打嘛！你们要想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拳头打倒啊？那个是打不倒的，他的影响，黑“修养”的影响是在人们的头脑里边，你把人头砸烂了，影响在另外一个人头脑里还存在，这个只有经过批判，而批判呢，就要花脑筋，就要动脑筋。现在同学们啦，我看你们也是这个神气，反正屁股坐不住，就是想斗，手就是痒，你要真批判一下刘邓啊，就艰苦一点儿了，就要好好地看点儿东西，写一点象样的批判文章。

刘少奇上个月还说，现在发表的文章，一篇也没有能够驳倒他的。南京的同

志们，你们听到这个话，你们很高兴啊？你们服气啊？（口号声：打倒刘少奇！）我们希望你们这里写几篇能够把他批倒的文章出来。你们南大是有名的大学嘛，为什么不应该写几篇好文章啊？那个比拳头困难噢，另外，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建议各个组织，都要警惕一个问题，或者说要正确处理和干部的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发现这样的现象，一是有些干部，现在不敢站出来，说站出来，你们两派，要站在那一边呢？站在这一边，那一边就要揪。这个在别的地方我们也发现过。到你们这儿一看，你们这儿特别尖锐，这个问题非常突出，这个问题你们如果不大联合呀，使得要造反的干部不好站出来，站出来日子也不好过。这个当然希望你们大联合，同时现在你们如果有联合的愿望，就不要把某一个干部拉在自己这一边儿来，说只准他在我这边，不准到那边去。你们也不要希望哪一个干部站在我这边，给我撑撑腰，我就有力量了。那个不好，同志们，革命群众组织最大的撑腰的是我们的毛主席！（掌声、口号声）我们也希望革命领导干部，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局势下边，也要站出来革命，在表示站在那一边这个问题上，要十分谨慎。因为这里面，我们看可能两种或三种情况都有，有的确实是要站出来造反的，那么，他要站在一边，就要加深你们的分裂，这不是他原来的愿望。但是，也可能有这样的人，他稀里糊涂就站在那一边，造成你们的分裂。也可能有的人就是故意地要加深你们的分裂，就宣布站在那一边。所以，我们希望所有革命的领导干部，真正的革命领导干部，要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否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还在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任何一个革命领导干部，只有促进革命大联合的义务，没有破坏或妨碍革命大联合的权利。（掌声）

中央明确地规定过，不能够在两个革命组织之间，支持一个，排斥一个。有人想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自己，那我们就明确地劝告这些人，这种办法保护不住你的，最后革命的小将们会识破你们的面目的。（掌声）我们希望南京和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好地考虑一下中央三月五号给江苏的那些指示，也参考一下我今天提出的这些建议，好好地研究研究，冷静下来，你们用那么三五天，不要出去打架，就在家想想这些问题，好不好呢？（众：好！）如果你们想要的结果，说张春桥今天讲的都是胡说八道，我们还是要干，那我们没有办法，你们打你们的。这是关于大批判、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问题。

我再说一点，关于拥军爱民的问题。这就很少了，因为这一方面报纸上的社论，江青同志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了。拥军爱民的问题，我们觉得南京部队从老早，实际上不是现在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老早就介入了，而且创造了比较好的典型。（掌声）他们是从左边介入的，那就是最早梁、杜、吴在南大站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掌声）而他们的这个行动得到许司令员、杜政委的支持，得到南京军区的支持。我们认为，这是南京部队的光荣，也是南京革命造反派的光荣。（掌声、口号声：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在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以后，在林彪同志的坚决支持下，整个南京地区的部队积极地参加了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流。（掌声）当然因为时间短，没有经验，也有缺点错误，有的地方出的错误也不小，也不少。但是这些缺点错误，我们看，应该像对待红卫兵的缺点错误一样。（掌声）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不是也常犯错误吗？也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十六条是怎么写的呢？是说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为什么对老红卫兵就另外一个标准啦！我们应该是一个标准。（掌声）咱们都是兵，老红卫兵，小红卫兵，都是一样。错误有，下决心改了就行了，改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他们现在也在改，而且我们这一个时期和部队的同志接触，他们在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方面，还是像我们解放军的样子。

我们应该记得，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离开了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是搞不成的。（掌声）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开会啊？包括你们武斗吧！（掌声）没有人民解放军保卫着祖国，你们怎么能够在这里武斗啊？！国民党能给你们自由吗？可以打呀、闹呀，可带劲儿啦！如果人民解放军出来干涉，一个一个都抓起来，你们就没有这样自由了。因为现在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毛主席讲过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一个是毛主席的领导，一个就是人民解放军，保护着我们在这儿搞革命。这样一个条件，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有缺点，我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一样，热情地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来改正，不要把这些东西弄到街上去。（掌声）我不是不要你们批评，对解放军有缺点有错误，你们尽可以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当面谈都可以，就是不要上街。（掌声）还有对军管会，既然是军管了，同志们这就是个严肃的事情，军管了的地方那就不能

够那样随便地冲了。因为那是军管了吗？它是带强制性的，它是军事管制，是强制性的，这一点希望小将们碰到实在忍不住的还是忍一下。忍住嘛，有意见还是要讲，要批评，包括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你们也可以批评。你们这里不多，北京的街上很多啦！“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那个口号嘛，我们当然不能叫他取下来，不过我们一再声明过的，对我们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都可以批评。今天我和姚文元在这儿讲话你们也可以批评，欢迎你们批评。批评有好处，如果听到你们批评，我们会高兴的，不会不高兴。

同志们，你们大家要知道，江苏这个地方，特别是南京这个地方，是很复杂的呀，是蒋介石的老窝。同志们，这一点，头脑里不要忘记。你们刚刚纪念过南京解放十八周年，不要以为十八年，这个地方就都是我们的啦！这个地方有坏人，有敌人，他们会利用我们的缺点，利用我们的错误，利用我们的不当心，利用我们的疏忽，来挑拨，来制造事件。我们无论如何要警惕！我们相信，不管道路怎样曲折，你们中间对立多么严重，我们看这都是暂时的现象，你们会好起来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会把你们联合起来的。（掌声、口号声）跟着毛主席的路线前进，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掌声）我们希望整个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声）也希望你们和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声）我们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联合起来。（掌声）这样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伟大的祖国真正变成按照毛泽东思想建设起来的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掌声）我就讲这一些，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狠狠批评。（掌声、口号声）

姚文元同志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向你们问好！（掌声）向你们学习！（掌声）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南京和江苏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掌声）刚刚张春桥同志已经带来了毛主席对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心！（掌声、口号声）

我们的讲话有一点分工，刚刚春桥同志讲了两个问题，斗争的大方向的问题，拥军爱民的问题。我这里再讲一个问题，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掌声），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

革命路线。讲这么一个问题，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

我们的一切胜利，归根到底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掌声）。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所有的伟大的成就，包括南京、江苏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导下面取得的。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调动了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性，团结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向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地开火，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地进攻，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堡垒。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灵魂，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战斗的旗帜！（掌声）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是在集中广大人民群众智慧当中，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发展。我们看全国一些运动搞得好的地区，好的单位，好的组织，根本的一条，都是因为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得比较好，比较坚决，这是我们一条根本的经验。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拿毛主席的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为我们区别是非，判断争论，指导方向的根本的标准，不是小团体主义，不是宗派主义，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所有的新的指示，新的精神，我们要学得快，跟得紧，要执行得全面，要执行得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

同志们，我们回忆一下过去的一年，如果从去年五月十六号起，今天是五月十四号嘛！中央发出那个重要的通知，揭露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揭露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是五月十六号发出的，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嘛！再过两天就是一年啦。如果从去年六月一号毛主席批发和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来，那么也很快地要到一周年。当然要从搞京剧革命算起，那就更早一些了。我们是讲群众运动。这一年，我们经过了冲锋陷阵，这一年斗争是非常丰富的，是不平凡的，是充满了很多宝贵经验的，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的。我们希望共同的回忆一下，在这一年当中，毛主席给我们的，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给我们的关键性的宝贵的指示。拿毛主席这一些指示来对照一下我们的工作，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因为南京啊，也是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早起来的地方嘛！一个北大，一个西安交大，一个南大，都是全国文化大革命起来比较早的嘛！那么这样子哪，来促使我们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

促使我们搞好当前的工作，用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来统一我们的认识，我觉得是很必要的，这样做可以使我们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红旗，使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所指出的这一条轨道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前进！因为这个里面啊，我们假使回想一下就可以发现，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主席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都给我们指出来了。我这里下面讲的还不完全，为了我们共同学习，我们回忆了一下。

从去年毛主席点燃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以来，全国各个革命造反派纷纷起来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在这个时候，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这一些人，他们在北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这一个时候，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搞资产阶级专政，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了下去，在全国大搞白色恐怖，一批革命的小将被打成反革命。同时，他们在干部路线上，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主持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亲自制定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毛主席亲自写的起了划进代的那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鼓掌），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的面目，揭露了他镇压群众的反革命路线，这样子使得这一条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彻底破了产。毛主席热烈地支持了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支持了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新生事物——红卫兵。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指出：造反有理，再一次指出“造反有理”。同时，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里面，就指出了：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争取团结的人们，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还是很早的时候。从这以后，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两条路线激烈地反复地斗争当中开展了起来，一批批红卫兵小将勇敢地起来造反，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激烈地斗争。

在这个时候我们回忆一下，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搞什么哪，他们搞了一个挑动工农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毛主席很快地就看出了这一阴谋，所以在去年九月七日，毛主席就发出了一个指示，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中央发出一个指示，要人民日报发一个社论，不要挑动工农整学生，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对于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是在全国范围内一个重大的回击。毛主席这一个指示大大推动了当时两条路线的斗

争，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反扑，从那个时候以后，不但全国的学生运动起来了，而且全国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在这样一种形势下面，在去年的十二月，毛主席提出了，现在的形势是全国全面地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在各条战线上，我们向资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个总攻击。在这样的形势下面，不甘心灭亡的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又搞了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个新反扑就是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同时，用各种办法来分裂、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想分别击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面前，也是毛主席给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出了方向。毛主席肯定了上海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亲自决定向全国播发，同时毛主席高度评价了当时上海文汇报的夺权斗争。指出了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是一场大革命。一月九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贺电里面，就把毛主席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写进去了，就是刚刚张春桥同志也念过的。指出了，你们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因为当时主席在北京指出了，上海基本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我们当时在上海听到了主席这个话。基本的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主席肯定了这个基本经验，后来又亲自批发了黑龙江的基本经验，又把革命的大联合发展成为革命的三结合。这样子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啊，就有了重大的发展，就是矛头紧紧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粉碎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提高自己队伍的觉悟。这一条路线，就指引了全国很多地方，很多部门，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保证了这一个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同志们，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在全国范围以内，对毛主席的这一些重大的指示，执行得好，执行得坚决，运动的发展就比较快，就比较顺利。如果在这个当中，那一个方面忽视了，或者对主席这一些指示不是执行得很全面，不是执行得很坚决，那么我们这个运动的发展就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回忆一下，临近到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哪，也出现了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个就是小团体主义呀，无政府主义呀，宗派

主义呀，个人主义呀等等。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要把夺权斗争搞好，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一定要用毛主席的思想，在斗争当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假使没有这一个条件，就不能够实现毛主席上面讲的这一条路线，夺了权也是不巩固的，也是会发生分裂的。这里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矛头是不是对准主要的敌人，是不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一个，是搞不搞革命的大联合，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放在前头，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还是把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放在前头。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经验，队伍的问题提出来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连续地批发了很多文件，譬如说，当时北京三司有一篇文章叫要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红卫兵小将自己提出来的，毛主席看到以后很赞扬，马上就在人民日报登了，而且在全国广播了。这个时候，毛主席还向全国红卫兵发了一个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派开门整风的经验。毛主席又支持了上海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边战斗边整风，边战斗边整风。接着又批发了延安中学的搞军训的这一个经验总结等等。同志们，为什么前一个时期毛主席连续的支持了这样的一些群众当中的创造呢？因为毛主席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临近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红卫兵、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必须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觉悟，整顿自己的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当前这一场大决战搞好。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做了很多报告、指示。对于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有的同志，有的单位，有的组织接受的比较快，但是也有的同志接受的比较慢，甚至有少数人、个别人思想上有抵触。那么现在看来，凡是这一方面搞得比较好的，夺权斗争都搞得比较好，夺权以后掌权比较好。凡是对毛主席这一系列指示，领会不深，不是很深刻的去领会他，夺权斗争就遭到了挫折，夺了权之后又遭到了重大的挫折，然后再回过头去再学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领会就比较深刻了。

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要不要、能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是半途而废，还是进行到底？要进行到底就要把我们队伍的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无产阶级觉悟要提高。违反毛主席思想的东西要去掉。我觉得这一些指示，对于我们当前，江苏和南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非常重要的，是值得我们同志们很好地再来学习毛主席这一些指示。（掌声）

在这一段时候，毛主席还抓了什么问题呢？毛主席抓了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批判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必然的发展。我们各地都揭露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总根子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抓了这个革命的大批判，同时，毛主席还指出了要批判在干部路线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毛主席在这个大批判开展之后，又进一步肯定了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样一个方针。这就把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了。就是把当前的对敌斗争，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同各地对本省、本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结合起来。在这个大批判当中，来提高我们的觉悟，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带动斗批改。毛主席的这一个思想，希望同志们要很好的学习，很好的领会，很好地接受并坚决地执行。（掌声、口号声）

在这一个时候，主席还抓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支、二军”的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在各地都参加了，积极地支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个过程当中，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一月二十八号军委的八条命令，一个是四月六号军委的十条命令，还有最近毛主席又提出了“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掌声）毛主席的思想是很明确的。毛主席批发的军委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怎么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为什么那个时候要着重讲拥军呢？因为有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冲击人民解放军的这样子一股苗头，有一些左派组织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了一些错误，所以制定了八条，特别讲了一下，重点是讲拥军。在八条出来以后，我们军队“三支、二军”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个主流。同时在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在支左工作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四月六号军委发布的十条，毛主席批准的十条，他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该怎么对待群众，是讲爱民。在十条出来以后，左派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受到了很大的支持。后来，人民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在纠正一些缺点错误的时候，有些地方又出现了否定解放军一切的错误。就是把解放军支左的成绩都否定了。这了完整地执行八条和十条的精神，主席提出了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掌声），这就把八条和十条的精神完全地正确地、全面地统一起来了（掌声、口号声）。

江青同志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的时候，就说了，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指拥军爱民的问题。一个是怕同志们犯错误，另外是怕坏人利用。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过程，就知道拥军爱民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就是说革命造反派，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应该在毛主席的伟大路线，伟大旗帜指引下，肩并肩的共同战斗，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掌声）。我上面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一个回顾，就是把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怎么在斗争当中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不断引导我们运动前进，把一些关键问题我说了一下。我们都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没有问题。可是，我们执行这一条路线是不是很彻底呢？是不是很完整呢？是不是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就拿毛主席这一条革命路线作为我们行动的标准呢？做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呢？我看不见得。刚刚春桥同志讲的那许多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明我们在具体工作当中，在处理两个革命组织相互关系问题上，还没有能够完全做到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他的一些具体的指示、具体的政策，做为我们争论的一个基本标准。不然你怎么解释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透？怎么解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虽然中央三月五号的指示、三月九号的电报说得非常明确，还没有实现呢？怎么能够解释整风搞了一段又搞不下去了呢？

我们应该看到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本精神。他的矛头始终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始终是支持革命左派，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始终是要团结各方面的广大的革命力量，包括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的革命干部，始终是坚持革命的三结合。特别是在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左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政策，始终是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同时，这一条路线，是在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就是同镇压群众，欺骗群众，用什么物质刺激来毒害群众的反革命的经济主义，还有分裂革命群众，挑动群众斗争等形形色色的错误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当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正确地认识毛主席的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些东西，我们要认识得比较深刻。历史告诉我们，胜利的历史和暂时一段挫折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只有把毛主席这一些指示领会下来，把毛主席这条路线坚决贯彻，好好地、反复地学习毛主席这一些思

想，我们的运动才能取得胜利。由于离开了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或者在某一些问题上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那末革命运动遭到暂时挫折的事情呢，也不是一个地方。我又看了一下中央关于安徽问题指示，曾经指出了，根据两个月实践的经验，从安徽的夺权，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而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组织，革命干部。我想了一下，为什么毛主席这些指示已经发出好久了，还是一月革命时候嘛，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同志总是不能完全的接受，不能用这些东西来自觉地改正一些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东西呢？还是因为我们头脑里有一些“私”字在作怪。

不要紧，任何人有了缺点，改就是了。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毛主席这些指示多么重要，离不开这些指示的。有了这些指示我们就能够根据这些指示，来去掉我们头脑里的“私”字。犯了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是发现了就改，并且接受教训，防止再犯，我们自己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大革命运动当中，不犯一些错误，问题哪，不要不接受教训，不要只看到别人的错误，不从别人的错误中吸收教训，不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吸收教训。如果我们这样的话，那就可能重犯自己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我们要力求不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志们在这几天把毛主席这些指示好好地回忆一下，重温一下，拿这个东西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段的工作，至少是这两个月的工作总结一下，看看我们那些地方是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的，那些地方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的，我相信，只要是我們这样做了，我们一定可以使江苏和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踏步地前进！（掌声）因为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这一些指示，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战无不胜的。（掌声）谁掌握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一些指示，这一条路线，就一定能够胜利，这是不必怀疑的。（掌声）

这里，我想再简单的说几句，革命的大批判的问题，这是我们当前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搞好当前革命斗争，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因为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我们对这个大批判的认识需要提高，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当前的一场群众性的、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因为多年以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等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当中发

展起来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同刘少奇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最近中央的会议上，很多负责同志，以大量的材料揭露了历史上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背叛无产阶级革命，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的罪行。（口号）

当前这个批判首先是在批判黑《修养》，批判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问题上展开，它已经并且正在深入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党的工作各个方面上，成为推动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巨大的动力。同志们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革命，就是要批判，就是在革命，在批判当中，在斗争当中发展。不搞革命，不搞批判，马列主义就会失去自己的生命。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一个关键的时刻都充满了毛主席的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激烈的斗争。这一种斗争，总是为我们各个革命阶段实现这个任务扫清道路。所以当前这一场大批判，绝对不仅仅是写几篇文章的问题，它要深入到各个方面去，成为推动我们各项工作的巨大的动力，成为推动我们斗批改，成为推动我们各个单位斗争的一个巨大动力，所以这是一场很大很大的革命，这是对于我们党内多年来，修正主义的一个总清算。这个批判，大大提高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斗争，譬如说最近我们看到很多标语，这是从北京传来的了，打倒刘少奇写成打倒刘少狗，但是你这样子写一写很容易的，把刘少奇这个字丑化一下啦，我们不提倡这样子。真正地要把刘少奇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货色，丑恶的灵魂，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批透，这就要花一点功夫，这就不象写一张标语那样简单，那样省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这个大批判的问题上，准备花很大的力量去搞，大家不是已经看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一篇文章吗？这仅仅是一个开头，还要继续地搞一些这样的文章，要把他那一套批透、批臭、批垮，使他永世不得翻身。（掌声）

这个大批判，还会接触到一些保守派的思想根源，从思想上摧毁保守派的思想基础。（掌声）过去那些资产阶级当权派组织的什么赤卫队，还有什么反动的血统论啊，总根子就是刘少奇！（掌声）所以把这一些东西摧毁，就可以帮助更多的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人觉醒过来，会大大促进我们争取中间派，瓦解保守派的工作。（掌声）这个大批判，会使我们更深刻的掌握毛泽东思想，关于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为刘少奇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一个总的问题，就是从各个方面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他是无产阶级的背叛，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口号）所以我们批判这个东西，批判他那一套，什么外交啦，统战啦，还有什么宣传啦，组织啦，一整套的东西，可以大大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你对照一下么！毛主席的思想是什么？毛主席的路线是什么？刘少奇的东西又是什么？就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来掌握毛主席的路线。刚刚张春桥同志已经说到了，刘少奇在华东、在江苏是有他们影响的，包括他的历史上的影响，我们江苏的革命造反派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刘少奇在江苏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把他彻底肃清、消毒。（掌声）要把毛泽东思想插遍我们南京、江苏的每一个阵地。（掌声）这个大批判也一定会促使我们更彻底的揭开，揭透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和幕后活动彻底揭出来。（掌声）在这样的斗争当中，有大量的、繁重的工作要做，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因为要中国不变颜色，沿着毛主席的路线走下去，走到底，当前这一仗就一定要打好。

我们为什么不能搞革命的大联合呢？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共同搞这一场战斗呢？为什么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这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影响我们对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呢？我觉得不能。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场斗争的重要性，我们就一定能够在这个斗争当中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同志们能不能做到？（众：能！掌声、口号声）

同志们，刚才张春桥同志已经念了三月十日中央电报当中的指示，我就不去念了。用毛主席的思想检查一下，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我们革命的大联合？同志们想一想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执行中央很明确的指示？想一想。如果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用毛主席的思想把这个问题想清楚，解决好，我看我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有了保证，或者能有一个良好的开始吧！这个问题不想清楚，不解决，那是不行的。最近我们看了很多材料，也和一些同志交谈过，我觉得有这样三个原因在妨碍着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妨碍着我们执行中央的指示，有外因也有内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别有用心的一些坏人，在利用局势挑动和扩大革命造反派的矛盾。包括有一些保守派，想利用这个机会

来分化瓦解左派的力量。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警惕！这个问题只要认识了就好解决，我们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江青同志说，不要上当，不要被坏人利用。我希望同志们不要忘记这一句话。

第二个原因，觉得是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革命组织之间的分歧，中央的指示指出，原则分歧，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辩论，要求大同存小异。这是符合毛主席的一贯的思想的。毛主席从来就告诉我们，要区别两类矛盾。对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解决。如果我们方法不对头，这个矛盾就不能解决，甚至就要扩大。看了这几天的“大字报”，有这个感觉，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对，用了些什么方法呢？有的是用打架的方法。打架的方法能够解决头脑里的矛盾吗？还有一些就更不是了，我看了有一些送给我的，有这一派把那一派画一个乌龟，那一派把这一派画一个“袁世凯”。同志们，这一种斗争方式，我很坦率的讲，是比较低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要进行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采用这一种办法。我不希望看到这一些东西，毛主席有一句话，我们应该很好地想一想，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句话是矛盾论里面讲的。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性质方法才能解决，倒过来说呢？你不是用这样一些办法，你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另外一种办法去解决，是解决不了的。比如说，美帝国主义要侵略我们，我们就要保卫祖国，用人民战争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用打倒的办法去解决；我们革命组织同保守组织，比如说，与赤卫队之间的矛盾，我们用争取、教育、瓦解及孤立极少数坏人的办法去解决。但是，我们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怎么样呢？我们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解决。刚刚在会场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吗，大家这个情绪，火一上来，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忘记了大方向。如果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不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而是用武斗的办法，或者用其他一些办法，是不能解决的。我们头脑里有不同的认识，拳头怎么打得掉呢？或者把电话砸掉，把杯子砸掉，把玻璃通通打碎，这样的办法还是解决不了分歧，只能把分歧扩大，甚至于原来不是对抗性，硬是把它扩大到对抗性的，即是真是原则分歧，用这个办法也是解决不了的。

这里我要说明一点，我们要看一看北京，同志们，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之间也有矛盾。最著名的革命造反组织之间也有矛盾吗，大家到过北

京的同志都知道的吗，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不是还闹过一场吗，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能够一致，就是说，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北京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一点上他们一致，在这一点上一致了，他们就能够联合起来，成立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之后，有没有矛盾呢？还是有矛盾的，还是有争论的，天下哪里有没有矛盾的，没有争论的事情呢？两个人还有不同的意见吗，何况两个派别呢，总是有点差别的吗，这个人抽烟，那个人不抽烟，不也有一点差别吗？假使我们忘记主要的矛盾是什么，不能在解决主要的矛盾问题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而是在另外一些矛盾上，纠缠不休，或者认为，只有这些矛盾解决了，才能实行革命大联合，认为我们革命造反派之间，没有一点矛盾，才能实行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那得出的结论啊，就是永远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你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呗，不永远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吗？假使不是这样，根据中央的指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用求大同存小异的办法，原则分歧也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那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不同的意见可以来辩论吗，就是辩论暂时不能解决，放一放吗，我们在当前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逐步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解决桥或船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我希望同志们在处理革命组织之间的问题时，能够掌握正确的方法，不要用对待赤卫队的办法，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拚命去搞，挖空心思地去搞那些材料，那不是对待敌人的办法吗？只要我们革命组织之间，用正确的方法处理，这个矛盾是能够解决的，是能够促进对敌斗争的，是能够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的，这一点也希望同志们能够想一想，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妨碍我们革命的大联合，没有很好执行中央指示的，就是我们队伍内部的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比如说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等等，这一点我们谈的时候，双方面也都承认的，有这些东西，被这些东西分散了共同的斗争目标，分散了我们的精力，使我们联合不起来。我认为这是当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中央指示要大家回去，当时不是要大家自己批评自己，回去整风，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整风，不是整一次吧？！不是

整人吗?!是边战斗边整风吗!小团体主义的最大坏处在哪里?首先是在于,他使我们看不见大的斗争目标。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对我们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有一个根本的指示,就是刚刚大家念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小团体主义呀!就使我们不关心国家大事,甚至于不关心省里面的大事,市里面的大事,而只是关心我这一个团体的事情。你们这里的团体很大,不是小团体,而是大团体,但是这个大团体哪,也是很容易犯小团体主义的。我们看到过一些街头的争论,有一天晚上,我们出去了,发生什么“五·八”事件,还不晓得五九事情,两派在这里争论,我们就去听了,我们觉得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谈问题的时候,总是以我这一方,八·二七这一方怎么样,你那一方,红总一方究竟怎么样,如何如何?而比较少的听到,究竟是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方。同志们,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我们要分,首先是这样分,就是说拥护毛主席,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凡是这样子,我们都要支持,都要拥护,都要赞成。凡是不符合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就要批评。不要因为那个地方发生了纠纷,而这个纠纷发生在我这个基层组织,就肯定我这个组织一定是对的,你怎么能这样肯定呢?而首先要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衡量一下。我们觉得有这样一种情况,一听到两个组织的基层组织发生了纠纷,先没有问一问是非,眼睛就红了,一红啊,就闹起来,就是昨天晚上,我这里也不回避吧,我十二点以后,到原来省委那里一个地方,不晓得这两派是哪两派我就看到在那里闹,是不是有什么原则分歧呢?问了一下,问那里的战士,也没有问到,但是有这种语言,“把文风来揪出来”,“把你们的后台曾邦元揪出来”等等,我一听这种话我就想,大概总是与两派的基层组织有关系,我希望同志们眼界要扩大一点,遇到了争论的时候,首先要问一问总的是非,不要只从自己的这个团体这一个立场出发,而要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点出发。

刚刚张春桥同志讲过了,我们两个革命组织的基层组织,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基层组织是好的,但是,也难免有个别的坏的组织,因为现在组织发展得很大了吗?我现在想讲一讲另外一方面的道理,比方说,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缔造起来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党,但是我们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因为有这么一小撮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否定了我们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党。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就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激烈的斗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还是放手发动群众揭露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说这一点就希望同志们在看问题的時候，能够从无产阶级的根本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小团体主义的情绪是很容易滋长的，我们一定要坚决的警惕。我们革命造反派，对于自己的工作，要采取一分为二的马列主义的辩证方法，这是毛主席多年来教导我们的方法。就是要看主流，看方向，既看到成绩也看到缺点。中央不是讲了吗？大家要以自我批评为主嘛，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大家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很好地采取一分为二的两分法，因为我们采取了一分为二的两分法，我们就能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同时也能够对工作中的缺点，自觉地去改正。大方向正确，并不等于十全十美，假使哪一个组织认为自己的组织是十全十美啦，那就等于讲这个组织不要进步了，不要革命了。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在看到我们这个革命组织成绩、主流、方向的时候，对待自己还要看到缺点、错误，要把这些缺点错误当着我们队伍内部的灰尘，脸上的灰尘把它洗掉。我们对于别的革命组织也是这样，也要看大方向，要看主流，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过去我们在山东的时候，提出了两个主流，两个支流：希望革命造反派对待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二军”的工作，要看主流，成绩是主流，缺点和错误是支流；我们对部队的同志也提出了，看我们革命造反派，要看大方向，要看到他们什么是主流，革命的大方向是主流，缺点和错误是支流。两个主流，两个支流。现在，我想再增加一个，三个主流，三个支流。就是指革命组织相互这间，看对方的时候，也要看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看另外一个革命组织的时候，要看他大方向，看他什么是支流。缺点和错误如果是支流，那就应该采取与人为善的方法，积极帮助他去解决，不要只抓住对方的缺点和错误，忘掉了对方的主流。所以我想，这样子三个主流、三个支流，这样子提出来，是不是就能够帮助我们把相互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正确一点，把我们的成绩发扬得更好一些，把我们的缺点错误，去掉的更多一些。

这里，我们有这样一个建议，希望你们两个革命组织，中央指出不是以自我批评为主吗？这个也可以开个小的座谈会，遇到了分歧，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对对方那些意见要听，要认真地听，同时对另外一个组织提意见的同志，也要区

别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些思想问题上，逐步地解决我们的分歧，在大方向上一致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掌声）这里什么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采取调和折衷态度，这叫作折衷主义。（掌声）折衷主义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是反对折衷主义的，我也是从来反对折衷主义的。（掌声）但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标准，同时反对两种倾向，这叫不叫折衷主义呢？这不叫折衷主义。因为这两个东西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都要反对。这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不能叫折衷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毛主席前一个时期，最近吧，在北京一次会议上批评说，无政府主义不是不要政府，只是不要别人的政府，只要他自己一家的政府。（掌声）这个话当然毛主席是概括地来说的啦，是说的很深刻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毛主席还引用了列宁的话来教育我们，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那么怎么领会呢？机会主义走向反面成为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走向反面，修正主义走向反面，就成为无政府主义。这两个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潮，资产阶级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曾经用这么两种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交替使用。

我举一个陶铸的例子，陶铸开始镇压群众是镇压的很厉害的，在那个文教口，拚命镇压群众，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后来看了不行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路线行不通了，革命群众起来了，他又搞无政府主义，他就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还提出过一个什么绝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就是陶铸的东西嘛，陶铸这种思想该不该打倒呀？（该：高呼：打倒陶铸）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希望你们看到这样一种思想，也是不应该怪我们革命小将，因为有这样一些人曾经把这样那样的东西怪我们革命小将。同志们不是的，所有这些错误思潮，包括干部问题上的反动路线，其根源，其出处都是那些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对！掌声）但是我们要警惕他们这种影响，就要肃清这种影响。

（掌声）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们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上完全一样，都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群众，压制群众，搞白色恐怖，也批判了他们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其目的都是为了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支持革命的左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高呼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所以我们对这

种思想，我们也要反对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过去在中国是没有多大市场的，只有在欧洲比较多，特鲁泡特金等等这些人，搞一套无政府主义，还写书。中国过去这种无政府主义从来是抬不起头的，这个你要算，过去上海有个巴金，此人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有个小说叫“灭亡”，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里面就是描写一些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才是英雄，群众都是群氓，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本来没有什么市场，就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这种思潮偶而出现一下呢，也是对我们的反面教员，就说明我们革命队伍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它的出现不过是教给我们必须这样做，增加一个反面教员而已。

所以我在这里说了这一些，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我刚分析了这些方面，三个原因吧，妨碍我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妨碍我们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给我们的指示。你们的成绩很大，工作很多，为什么今天着重讲一讲这一些问题呢？因为我们是同志和战友，因为我们要共同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讲一讲这些问题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拿毛主席那些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的指示，作为我们的正面教员，作为我们思想上的无价之宝，好好地学习，好好地温习，希望我们能够去掉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更高地举起毛主席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这条革命路线，更坚决地更好地贯彻下去，把江苏的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月之内，能够再大踏步地前进。刚刚张春桥同志讲到了文化大革命两种可能性，今后的两种可能性我就不重复了，我相信同志们。这里我说一点，就是出现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说革命的大联合还联合不起来，或者出现了打、砸、抢发展，生产上下降，甚至于保守组织也起来了，来乘我们革命派闹分裂的时候。假使出现了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三个相信，我们相信依靠人民群众，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革命干部，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我们相信广大的革命人民和革命干部，还是要革命的，就是出了暂时的曲折，我们的运动，也一定会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胜利的，（掌声）但是，我同大家一样，还是希望大家根据中央的指示，力争第一种可能性，是不是这样？（众：对！掌声）

当然罗，希望同志们眼界放大一点，从整个南京市，从整个江苏省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来想一想，从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要求来想一想，我相信同志们一定会按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力争第一种可能，一定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的更好，对不对呀？（众：对！）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因为全国的的形势是好的，江苏的形势也是好的，有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有广大革命造反派，还是很强大的呀，这里的革命造反派还是经过战斗洗礼的呀；（掌声）还有梁杜吴这样很早就和革命造反派一起杀出来的革命干部。（掌声）所以你们要很珍惜这一些好的东西，要去掉那些不利的因素，要发扬这一些好的因素，假使我们这样做，就一定会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形成。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的红卫兵，上海的工人、农民、干部，都非常关心江苏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掌声）。我们一定同你们共同战斗（掌声）！今天的会议，虽然开得不大，还有那一边，人民大会堂还有一些同志要求见面，我们想今天就不去，我们共同在执行毛主席路线这一点上，我们随时可以见面的（掌声）。只要我们是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条大路上的战友，我们就能永远走在一起的（掌声）。如果在将来，你们在江苏省军管会的领导下，你们能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开更盛大的会，那个时候我们上海一定派出更多的同志来到这儿，和你们更多的同志、和战友见面（掌声）。最后我们一起来呼几个口号：

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对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

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

揭透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

边战斗，边整风！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杜平同志讲话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小将们！同志们！

刚才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给我们做了十分重要的讲话，我建议同志们很好的讨论，认真的执行。

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来南京，是毛主席派来的。（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江苏省、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关怀！（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敬祝我们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掌声、口号声）

江苏省和南京市实行军管以来，得到了南京市、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代表省、市军管会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江苏省、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掌声）同时，希望你们今后继续的帮助我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及时的批评！同志的批评是最大的阶级友爱，我们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批评的过程中正确的认识世界，并且改造世界。南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同全国是一样的，是一派大好形势。（掌声）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高地举起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口号声：毛主席万岁！）在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批判、大斗争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掌声）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更好地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开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集中精力打击敌人；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在干部问题上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确地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为干部站出来革命创造条件；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清除武斗，才能消除无原则的“内战”，促进生产大发展；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掌声）我们是相信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是坚决要求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是坚决反对无原则的“内战”的。（掌声）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小将们！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用最实际的行动，热烈的响应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

派大联合的号召，关于拥军爱民的号召，（掌声）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为彻底地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为夺取南京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而奋斗！（掌声）

最后让我们高呼：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张春桥接见南京地区三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南厅。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张春桥同志进来时，代表们起立热烈鼓掌，首长与前排代表一一握手。

张春桥：来了很久了吧！本来今天还要参加另外的接见，因为你们来的时间很长了，所以那个会我就请假不去了，来听听你们的意见。我离开南京两个月了，不知你们的进展怎样了！有的省比江苏还要紧张，不过无锡，徐州武斗已经相当严重了。五月又去过南京，我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不到半个月，杭州也没有去，就来到北京了。今天来听听你们的意见，主要是怎么解决问题，你们那个谈谈吧，有些已经讲过的就不要再详细谈了，谁先讲？

（葛忠龙首先汇报，谈到铁道兵问题时）

张春桥问：铁路上有几个组织，镇反是哪个镇反的？（答：南京部队。）这么大的牌子？当时南京实行军管了没有？（答：宣布军管了。）铁道兵，铁联司有多少人？（有的代表作了回答。）

（葛忠龙汇报到无锡主力军打出来了，铁道兵把他们从无锡接到南京。）

张春桥：有多少人？（葛：有两个火车约四千多人。）

张春桥：没有上海多，上海有二万多人，革委会很头疼，对上海有些影响，他们背着大刀拿了铁棍，上海不信这一套，上海工人不信这一套，上海工人不欢

迎。

（汪淘之接着汇报，当谈到五·一四指示以后，南京曾出现一段比较好的局面时）

张春桥：顶多半个月吧！我有个经验，我的讲话只管半个月，我和姚文元同志在上海讲话也只管半个月啊！我现在离开上海已经一个月了，不知上海又怎样了，看来最近又得回上海了。

（接着汪又汇报了五·一四指示以后，有人说张春桥讲话是大毒草，要和张春桥辩论，抵制，缩小张春桥同志讲话的影响。）

张春桥：我也知道这个情况，我在南京就收到不少反对的来信，回到上海又收到不少，有人反对我的讲话，这也难怪！我的讲话，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呀！

（接着又汇报了揭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情况，南京最近武斗情况，以及杜方平的问题。）

张春桥：你们南京这个样子，对无锡也很难表态。上海就好办了，他们到上海，人家就问他，你们拿武器来上海，看看上海形势，适合不适合？就劝他们回去了。

（促联代表汇报以后，春桥同志作了重要指示）

张春桥：我想跟你们介绍一下情况，你们带来的材料我们都看了。材料带来不少了，现在看来不可能一件一件地解决这些问题。无锡、徐州打得很厉害，王效禹同志去制止武斗，也被包围了，住处的玻璃窗都被打碎了。江西武斗也很严重，江苏要发展到江西这种局势也不难，到那时，局势连你们自己也控制不住了。比如说，甲方先动了拳头，乙方就拿起棍子，那么，以后甲方就不再是拿棍子的问题了。江西的情况复杂一点，区人民武装部，县人民武装部，公社人民武装部，甚至军分区有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情况，有的把枪发给农民了，这也很自然，是基于民兵嘛！结果开枪了，先是小口径步枪，接着是步枪、机关枪、六〇炮也用上了。我不是吓唬你们，枪开起来，双方就管不住了，中央下死命令，还是那么难。现在双方都有人到北京来了，军区也有人来了，但局势就是控制不住，枪收了很长时间还没有收上来。最近好些了，枪也不开了，但晚上还会朝天放的。这样大的革命，出现这样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牺牲了一些人，革命是要付出一些代价

的。现在中央已把军区负责人召到北京来开会了，两派都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是也说要听毛主席的话吗？毛主席是反对武斗的，毛主席什么时候叫开枪的？南京的问题，我看南京第一位工作是制止武斗。五月份武斗规模还小一点，当时我是希望你们联合起来，现在武斗规模慢慢大了，看来南京一搞起武斗，比一·三事件更大了，以前是两派一起对付赤卫队，现在是两方面自己打了，是否双方面努力把武斗制止下来？过去是中央下命令，执行六·六通令呀，六月二十四日通知呀！六·二四通知是各人通知各人一方，但这几句话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还得有个协议书。一般是搞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书，双方协议，签字，传达，双方都要真正的组织执行机构，譬如说，武器，枪支集中封存，自己制造的武器，土枪、土炮、棍棒也要收起来，双方都不制造武斗舆论，高音喇叭，宣传车都撤掉，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可以送些材料给你们，江西、河南的协议书可以送给你们参考。浙江的双方也签字了。这几个省对立情绪都比你们强，他们能达成协议，你们就不能吗？你们双方是否能派出代表，由军管会出面主持，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这可以说是第一步吧！南京的工人、农民、学生就会拥护你们。现在群众中都有人厌战了，不愿意武斗，我们的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应该应用四大武器嘛！现在有人提出以武斗制止武斗，这是错误的。还有人提出要用农村包围城市，毛主席说现在提出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口号，历史条件不同了嘛。过去，是国民党统治，不可能解放城市，所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现在城市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你们包围城市，实际上包围谁呢？农民进城一般是打的造反派，他们都上当了，有一些人用一些煽动性的口号去蒙蔽他们，例如，去捉特务呀！把农民带进城市里，说农民去那个院子里，其实院子里都是造反派，还有用记工分拉，还有的是一天给多少钱拉，等等，动员农民进城这是错误的，不管有多少理由，都是错误的。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要向农民做工作，但也不要伤害农民，他们是受蒙蔽的，一定有人挑动，许多地方农民进城，影响了秋收。当然啦，你们日夜忙着搞武斗也不怕了，反正丰收了有得吃，要是在六一、六二年困难时期，你们武斗大概也没有这么大的劲头了。城市里是不要武斗了，更不要调动农民，因为有的农民就是农民的战斗员！农民不进城，武斗好制止，就好办，一进城就难办了。希望你们在北京商量一下，能不能达成协议，把能达成协议的写进去。如果双方都有制止武斗的愿望的话，要

我签字也可以在上面签字。在南京地区先做个样子，然后处理其他地区的问题才有发言权！

第二个想谈谈大方向问题。三·五和五·一四讲话还适用不适用？我看除了个别词句外，现在情况还差不多，联合问题没有解决，夺权还没有解决，还是军管嘛！我看军管会现在有瘫痪的危险。要是那样子，江苏的形势是有利，还是不利？你们没有理由不联合，我们是希望能创造联合条件的。那个讲话，我并不要求你们马上联合起来，这要有个过程，一·二六夺权问题已经过去了，不要再争论下去了可以作为历史教训吧！如果是追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还可以搞嘛！但是要划清界限。人家就是这样希望你们联合不起来。江渭清在北京搞三结合的问题，这笔帐不要再算在“红总”身上了，应该算在谭震林身上，算在江渭清身上，或者省委其他什么人身上。你们应该联合起来，划清敌我友，这个关系一直搞不正确，你们的水平就不算很高，毛泽东思想就不算学得很好。毛主席告诉我们，首先是划清敌我友的问题。要是刘、邓上台，搞资本主义复辟，那时要一起杀，曾邦元、文凤来一起杀，你们在座各位也要杀，哪能这一派要杀，那一派不要杀，当然那时可能有人会投降，但是有的就是投降他也不要，因为你们两派是造他反的呀！他对造反派就那么宽大吗？如果你们是坚定的造反派的话，怎么能不想这些敌人呢？当然他们上台，首先中央文革是要杀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你们这两派呢？监狱在等着你们。我们就要使他们永远不能复辟，就是要想这个问题。他们还没有打倒呢！省委就打倒了吗？没有呢！有些同志有这样一个错误观点，觉得这些都是死老虎，他们还没有死呢！你们一边忙着打内战，你们忙得很哪！他们在那里吃得好好的，很多人都养胖了。我们要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当然这次革命象上海鲁迅兵团的小将讲的那样，不是罢官革命，而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批倒、批臭，使他们没有基础才行。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就不想这些事，我们的同志，要分析江苏的形势，看看江苏的文化大革命进展到哪一步了？省委的权还没有夺下来，我这里讲的夺权，不是形式上的夺权，而是在政治思想上，把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树立起来，还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宣传深、宣传透。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是军管嘛！江苏有个很好的条件，还有梁、吴等同志，有些同志对杜方平有意见，当然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他，对其他同志也有意见。如果有缺点，错误，你们可以说话嘛！我们还可以继续观

察嘛！总之，你们还是有条件的，我估计你们要是不联合夺权的话，那一方也掌不了权，要不把保守派争取团结过来的话，也掌不了权。要取得多数人的拥护，如果不密切联系群众，不听群众的呼声，他们就会自己起来的。比如他们建立反内战联络站，我看很值得你们考虑，他们不信任你们了嘛，那样子你们将来的处境就很困难。至于联络站，只要你们掌握大方向，就不是什么分裂了，有宪法规定，有结社自由嘛！在南京有句话讲还是不讲，我同姚文元同志商量了半天，后来还是含蓄一点，不那么直接了，这句话，我原来想讲，下面搞联合，上边不支持，我赞成下面脱离总部。上海当时也是这样，当时上海工厂里都叫工人造反派，但是总部常委下去，我支持这部分，他支持那部分，下边要搞联合，上边不支持，我就赞成他们脱离总部，他们当时意见可大啦，但是后来这样做还是促进了大联合。无论南京也好，无锡也好，工人阶级没有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当然我不反对学生跟工人相结合，但是知识分子不能左右工人运动，加上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学得并不那么好，很容易感情冲动，左右摇摆，当然我不赞成学生马上脱离工人运动，我是说要多尊重工人阶级，发挥他们的作用。上海这一点就比较好，上海的学生，到上海的北京学生，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写宣言都是把工人摆在前面，召集会议都是由工人主持，尊重工人，虽然工人也有缺点与错误，正因为这样，上海工总司的威信是比较高的，夺权以后，局势也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整个城市决定因素是工人，北京也是这样。南京在这个方面是弱点，虽然南京工人运动比较早就开始了，但是没有能领导整个南京的革命运动。要依靠工人、学生、干部共同努力，不是由我们包办代替，工人阶级天然的最终得要联合，这是由先进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他们感到联合的必要，比如一个工厂一分裂，生产就不好进行了，煤矿一停止生产，发电厂就不行了，铁路一停止行驶，其它工厂就不行了，这是其他人所理解不到的。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也就在这里，工人不能老是跟着学生左右摇摆，我希望，学生与机关的同志应当尊重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我们应该承认自己有弱点，承认了这点有好处，才能有利于改造思想，不断进步，这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你们还提了许多其它问题，我们还要回去商量一下，当前主要解决武斗的问题，如果不先把武斗制止下来，你们提的要求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许多事情本来不应该由中央解决，可以由当地军管会解决。很多问题中央都作了规定，

中央也只能这样解决。

你们对军管会还提了许多意见，我看是正确的。军管会该坚决支持的和该坚决反对的都不够大胆，有点怕，自己的缺点纠正的也比较慢，该平反的就早些平反，晚一天解决又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当然这主要是他们没有经验。中央，主席最近也讲了，解放军支左有缺点错误，只要改了就好了。军委十条以后，受压制的造反派起来了，但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以后又有了六·六通令。

你们蹲在这里，心挂两头，在这里头脑比较冷静一点好商量，当然不一定有用了。我们要往前看，历史上的教训应该总结，但不是采取相互攻击的办法，你们谁也保证不了今后不犯错误，可能今天批评对方的缺点，过些时候你们自己又犯了，但不要怕，某些时候犯了错误，改正了就是一个经验教训。我们要把全部力量用来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要看大局，今天我没有更多的时间谈了，就武斗这件事先解决。

（汪洵之：我们有的同志被抓进去还没有放出来，要求对方立即放出来。）

张春桥：这些都写上，这可能都有，你抓他一个，他抓你一个，双方抓的人一律都放回。（省革总统战分部代表提出高啸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让他们揪回本单位批斗。）

张春桥：我觉得这些问题一定要我们中央表态，也没有什么必要，当然可以回去商量，这事不妨碍制止武斗，其它省还有比这更严重更尖锐的，他们都能达成协议。

（葛忠龙：武斗主要是高啸平策划的，高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高啸平不回去，武斗就制止不了。）

张春桥：那我不相信，现在两派后面都有干部出主意，武斗不会只是高啸平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是高啸平一个人，弄走后能制止南京武斗的话，那我明天就可以把高啸平弄到北京来，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情况很复杂，我就不相信高啸平会有那么大的能力。

（“公革会”的一个代表两次站起来要汇报“公安联总”的问题。）

张春桥：今天不谈那么多问题，就武斗一件事能不能达成协议？（双方答：能。P派代表表示完全拥护首长指示，回去后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首长指示，要把首长指示的主要精神向南京的同志传达，立即制止武斗，还表示希望能

约好时间，地点按照首长指示和红总方面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最后又提出李士英的问题。要求康老接见解决李士英的问题。)

张春桥：李士英的问题，我问过康老，康老讲对他那段情况不很了解，因为时间久还要回想一下，前一段时间他比较清楚，后一段他离开了。

李士英是哪年被捕的呢？

(P 派代表答：是一九三二年五月。)

张春桥：是不是那段时间康老已经离开上海了，我再问问康老。

(P 派代表提出还有很多代表团，如“六·二七”常州事件代表团等，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并简单汇报了常州情况。)

张春桥：武斗全部都要制止，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不好谈，很多东西都是由武斗所引起的，再发展下去你们就控制不住了，湖南湘江风雷是很有名的，但也有缺点错误，以后大规模镇压就错了。

(省革总统战分部代表再次要中央支持他们把高啸平揪回去批斗。)

张春桥：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他回本单位，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高啸平不是你们一个统战部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另一个群众组织的问题。

搞成两派组织的对立，这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有些光为一个人的争论就形成两大派。老实讲，你们那一个组织后面都有革命干部和非革命的干部，问题很复杂，不要想得太简单，请你们认真考虑。

(P 派代表谈到六·二七机校纵火事件。)

张春桥：这件事中央都知道了，当时军管会处境也很困难，都不敢去，因为牵涉到两个群众组织的问题，后来杜平同志给林总挂了电话，林总亲自批准派军队去，因为是放火嘛！

(省革总统战部分部代表又提出高啸平问题。)

张春桥：你们现在是两派，联合起来，这些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你们(指红总方面)把这个问题作为第一个要求提出来一定要我回答，也得让我回去研究吗？你们给我那么一大堆材料，很多都是我在南京看过的，只有很少才是以后加上去的。主席最近还问我，你看究竟什么时候江苏才能搞出个局面来？我是想在东南沿海几个省早些打开局面。五月十四号的时候，我说你们回去讨论一下，如果认为我是胡说八道，你们就干，果然不错干起来了。我对军管会也有意见，很

多问题都抓得不紧，大方向也没有好好的抓。把双方都找来开会嘛！那方不来就是他的事了。你们武斗的水平也差不多了，再提高就要动步枪，机关枪了，应该提高一些文斗的水平。我们觉得江苏差不多了，因为已经闹了半年了嘛！其他有的省闹一闹还可以，如果你们象上半年一样，再闹半年那也可以，那就迎接一九六八年去吧！到时候就由群众自己去干，群众还是要革命的呀！他们看到生产搞不好，老是搞武斗，自己要起来干的。不要脱离群众，今天你们是负有领导责任的。现在不早了，今天就讲这些。能否双方在这里达成这个协议，并且打电话回去，先把武斗停止下来，其他问题再谈。

全体代表起立，张春桥同志绕到后排和田普同志亲切握手，并和其他代表一一握手，代表鼓掌欢送首长离开。

（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P》赴京代表整理）

三、江苏两派大规模武斗，中央解决江苏武斗问题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江苏简讯》载：《南京两派分歧简介》 最近，南京“好派”窜到上海北京等地，到处活动，大肆造谣，妄图迷惑广大革命群众，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为了澄清事实，让广大群众真正了解南京两派斗争情况，特作简解如下：

一、夺权问题上的斗争： 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鼓舞下，江苏南京地区的广大革命造反派强烈要求联合起来夺权，但在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操纵下，发生了1.26“红总”单方面抢印，排斥了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派：“八.二七”“东方红”“华水革联”等广大革命派，并公开对抗周总理“夺权不要见报和广播”的指示，竟然在“新华日报”上以大量篇幅报导抢印消息，导致了江苏、南京造反派的大分裂。当时，P派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1)没有大联合的夺权不行；(2)没有经过群众审查的所谓“夺权委员会”不行。但是，“红总”方面非但不接受批评，反而变本加厉压制、攻击P派，成批的“新华日报”社论、“观察员”文章、电台广播向P派压来，把

P 派打成“反革命”、“新老保”，提出“造反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类极端反动的口号。与中央唱反调。同时大肆进行打、砸、抢、抄、抓，“八·二七”有 75%以上基层组织被抄、砸，妄图用武斗压垮 P 派。而且“红总”利用赴京汇报之机，在北京大搞假亮相，三凑合，欺骗中央。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书记陈光、李士英(叛徒)、包厚昌(叛徒)游园照相，并由陈、李、包等人拟定“革命委员会”机构和人员名单。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打不垮、压不服的，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把九个人的“夺权委员会”中的牛鬼蛇神一个个揪出来：“文化革命保卫会”主任易潜是历史反革命(已逮捕)，夺权委员会“农民代表”赴京代表团成员耿兴是反攻倒算的阶级异己分子(已逮捕)，“委员”相英杰是贪污腐化分子(已拘留)，“付主任委员”杨华是腐化堕落分子。面对这种现实，难道我们不该造反吗?我们高举革命造反有理的大旗，坚决地造了 1. 26 “夺权”的反!这个反造得好极了，1. 26 抢印大方向错定了! 三月五日康老明确指出：“判断大方向正确不正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们检查一下，一个月来的实践怎样?……刚才总理讲了些情况，你们自己去看看大方向对头不对头，符合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你们大反右倾，在造反派内部提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到底符合不符合中央的政策。革命造反派内部没有联合就去夺权，到底符合不符合中央政策……不能掌了权就强迫人家承认大方向正确，否则就是反革命，这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是虚弱得很，所以你们看看敌我友关系，看看实践，就容易把问题看清楚。”“什么叫军事管制?就是没有肯定你们的 1. 26 夺权。”

二、3. 5 以来两派主要原则分歧： 三. 五中央指示对 1. 26 夺权作了最明确的结论。“红总”方面本应吸取教训，承认错误，两派联合起来夺权，但“红总”方面对中央首长指示阳奉阴违，根本不承认错误，回来继续高叫：“1.26 大方向正确”；大反“八·二七”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沿着错误的道路越滑越远。在一系列问题上与 P 派存在着原则分歧： 1、在对待省委黑书记陈光、李士英、包厚昌等黑当权派的看法：

三月五日以后，“红总”方面仍然顽固地与陈、李、包搞“三凑合”，纵容他们继续假亮相，搞反动的一边倒(即公开宣布：支持好派，打击 P 派，对抗中央肯定两派都是造反派，不能支持一方，打击一方的指示)直到五月十二日还吹捧他们为“革命干部”。而我们 P 派战士在 1. 26 前前后后始终坚定不移地认为

陈、李、包三人是黑当权派，一贯提出：“打倒江、陈、李、许、彭、包”的口号，并无情地揭露他们的种种阴谋，对他们进行了最周密的调查。我们的口号和行动始终是正确的！五月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两首长来宁，严肃指出这反动的“一边倒”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阴谋。以后，我P派战士又公布了李士英和包厚昌是可耻的大叛徒的调查材料，在铁的事实面前，“好派”终于无可奈何地改变了腔调，喊起：“打倒李、陈、包”的口号来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他们！

2、在干部问题上的分歧：四月初“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吹响了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号角，我P派战士闻风而动，立即提出了“解放一大片，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革命口号，同时以最大的热情召开大、中、小会议，个别谈心，对干部进行一看二帮和忆苦思甜的教育。在对黑“修养”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中，把大批干部解放出来，参加革命行列。我们的做法体现了毛主席干部政策的光辉，许多干部争先恐后起来表态，勇敢起来揭发批判，纷纷组织战斗组，大杀回马枪，反戈一击，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我们的做法在省级机关中得到了巨大的反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感召下，他们终于冲破了精神束缚，大胆地杀出来造反了。他们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江、陈、彭、李、许、包集团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因此使江、陈、李、彭、许、包之流吓得要死、怕得要命。而“好派”头头从他们宗派主义出发，正迎合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需要，在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支持下，公然攻击P派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改良主义”，是“江苏的康有为”，并顽固地以“刺刀见红”以及片面歪曲“打击一小撮，解放一大片”等口号来推行以材料多少来区别干部好坏，打击真正造反的干部的反动路线。在具体做法上对大批干部仍然采用“勒令”“限令”在一旁监督写材料的压制强迫手段，并把与江、陈、李、彭、许、包作斗争的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尾随江、陈、李、彭、许、包的未经亮相的厅局长以上的干部捧为“革命干部”，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大灭了革命造反派干部的志气，大长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威风。谁是谁非，不是很清楚了吗？

3、资本主义复辟来自何方：我们从来认为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主要来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好派”却认为来自群众组织，来自“八·二七”，把“八·二七”打成“老保”，对抗中央肯定两派都是革命派的明确结论。

4、对军管会和军区的态度：三月五日

中央首长接见江苏南京两派时宣布江苏实行军管，否定了“好派”1.26的分裂夺权。因此，“好派”对中央这个决定深感不满。最近在南京一手制造的特大武斗中，竟然占领了南京军管会，并缴去了守卫军管会的一营解放军的枪支，使军管会陷于瘫痪状态，以达到他们推翻中央决定的罪恶目的。张春桥同志在今年五月十四号对江苏两派的讲话中也谈到：“整个南京地区的部队积极地参加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流”。P派战士坚决拥护中央为解决江苏问题做出的正确指示，并一贯以毛泽东思想来对待军管会，凡属正确的领导坚决执行，对错误的领导和个别负责人分裂运动的错误言行予以坚决的抵制。我们一如既往地支持苏州踢派、无锡主力军，长大6.26、常州主力军、徐州踢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对于南京军区的个别负责人在江苏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以及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压制解放军军事学院、文艺团体、后勤部门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行为，我们一贯高举革命造反大旗，坚决造反！这是有目共睹的。而南京“好派”在南京地区勾结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大搞反革命分裂活动，在今年二、三月份，配合无锡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九匪”镇压长大6.26的反革命逆流，把我P派南工东方红支持6.26的革命行动打成反革命。在苏州又与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在一起表示与苏州“支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事实俱在，不容抵赖。

三、最近的流血斗争

从以上的事实看南京的两派谁革谁保是很清楚的，南京“好派”在政治上一连串失败以后，最近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纵容和挑动下，蒙蔽了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南京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流血大惨案。他们用六零炮、机枪大肆屠杀我英勇的P派战士，进行反革命大逮捕，在南京实行空前的白色恐怖，妄图用武力来压垮我们，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杀出来的，经过艰苦斗争考验的P派战士，是打不垮、杀不绝，压不服的。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开始战斗了，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江苏简讯》载：《南京两派组织简介》 P派主要组织：
 ★江苏(原)工总：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成立，十一月十六日周总理亲自批准。江苏工总与旧省委“走资派”搏斗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江苏饭店

“一·三”事件中，工总战士彻底摧毁了旧省委保皇工具——赤卫队。因此阶级敌人对工总恨之入骨，在三月黑风中，“工总”下属基层组织打成了“反革命”而被取缔，“工总”受到了暂时的打击。但是广大“工总”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始终掌握斗争大方向，终于在今年五月份重新杀上社会，代表着江苏的曙光和希望。江苏(原)工总是一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大军。 ★南大八·二七和南京八·二七：南大八·二七是全国最早的学生造反组织，是横扫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闯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巨大作用。南京八·二七在去年年底成立，有文教，卫生，工矿、农民等四十余万人。其中，中学分会包括了大部分中学的造反派，如五中“八·八”，反修战校等。中央三·五指示和五·一四指示中，都肯定了八·二七为革命造反组织，任何人想把八·二七打成“老保”都是痴心妄想。

★南工东方红和江苏东方红：有着小老虎般杀劲的南工东方红是冲垮旧省委资产阶级专政的一支劲旅，是粉碎形形色色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一支铁军。江苏东方红在今年一月份成立。有工厂、农民、文教等分社。 ★南工东方红、南大八·二七、南大红色造反兵团，炮工八·一等共同组成南京红三司。 ★华水革联：华水革联是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搏斗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迎着被打成“新老保”、“反革命”的疾风恶浪中胜利前进。华水革联越战越强。 ★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和新总部：是两支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省级机关于部队伍。他们冲破重重艰难险阻杀出来，为揭开旧省委阶级斗争盖子，为粉碎“走资派”的复辟阴谋作出了巨大贡献。新总部是在今年四月份从旧总部(好派)中杀出来的，现在越战越强。 另外，还有公安联总等革命造反组织，他们都属于P派。 好派主要组织： ★红总：下设工总、大专院校、农总、文总(文艺界)中等学校等司令部。起作用的是工总。红总的骨干是以无政府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狂热而著称的极“左”派南大红色造反队。红总在一·二六抢印后矛头始终对准八·二七，大方向一错再错，已堕落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小工总(江苏新工总)：一月二十八日“工总”分裂后的产物，领导权控制在一些军事工厂(如长江“红旗”、晨光“革联”等打手)手中，是江苏省革命大联合的绊脚石，被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利用，成了戳杀江苏工人运动的急先锋。

★二司：刚成立时受旧省委操纵，后来杀出来造反，主要组织有南工井岗山、南师八. 三、南医六. 一三、南航革反团及著名法西斯暴徒炮工革造，打手南体 11. 4。除炮工革造以武斗臭名远扬外，其它组织在社会上作用不大。 ★省级机关革总(旧总部)：领导权被旧省委的一些黑线神秘人物所操纵，为大叛徒李士英假亮相“三凑合”摇旗呐喊，是旧省委一小撮“走资派”江渭清之流的保皇防空洞。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某日，刘锦平在苏州两派谈判签字会议上的讲话

〔刘锦平，中央调查组组长。记录稿〕

同志们：今天到硕放来，准备到无锡去看看，正好碰到苏州两派谈判，谈得不错，这是一件好事，我相信广大苏州的人民一定拥护这件事。因为，第一次见面，没有调查，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同志们经过几天来达成协议，这是大好事。现在存下的问题，是如何贯彻的问题。两派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真做好思想工作、宣传工作。各派主要负责同志，要学习党中央的政策，毛主席司令部发出的战斗号召，“拥军爱惜”，大批判要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现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斗争进入决战的时刻，是毛主席为代表的司令部与刘少奇为代表的司令部决战的关键时刻，更好地动员全国广大群众向刘少奇为代表的司令部进行大批判，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它们彻底打倒！“拥军爱民”在当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前制止武斗，贯彻毛主席司令部的伟大战斗号召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要通过宣传教育，弄清武斗危害，反对武斗的伟大意义。所有群众组织负责人，广大群众要认识到武斗发生带来了什么危害，这一件事情是一件大事，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武斗算不算关心国家大事？武斗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启发群众，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武斗对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利，对“抓革命、促生产”不利。武斗的结果学生没有心思搞批判，有些厂生产停产或半停产，有些大工厂停产损失很大，如武钢停了几个月，国家贷款不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是几千万呢。如果

农民参加了对国家的损失就大啦，武斗对人民没有保证，苏州武斗以来伤亡近千人，我看大部分是阶级兄弟，坏人是在幕后指挥，武斗对国家不利、对人民不利，我们考虑问题要把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能派别利益高于一切。协议达成了，关键问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做好思想工作，消除群众的对立情绪，为双方达成的协议创造良好基础，双方要从人民利益出发，采取坚决措施把武斗停下来，这样才能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四大”进行，大批判进行，就是这一点，希望同志们认真办好这件事，为人民立功，为国家立功，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立功，武斗不是好事，是坏事，坚决反对！为解决这个问题调查组同志根据中央指示，与当地的群众组织，支左部队了解情况，解决这个问题。南京两派达成了协议，中国批示了，我把电话记录稿念给同志们听听：

南京军区，南京调查组，江苏军管会，红总，八·二七，促联三派各革命群众组织：

中央完全同意。支持你们三派代表在九月四日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书，高兴地听到你们三方在南京实施。中央要求你们，把这一附件，发给全省，号召全省各市、县革命群众组织，统统按照这个协议书和中央有关的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逐条付诸实施，同时，要求各军管会、军管小组、军事代表协助保证各派群众组织对协议的贯彻执行。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革命大批判中联合起来。

中共中央 九月十日

希望你们老老实实的不折不扣的贯彻下去，这样做一定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但是，我们要警惕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可能破坏，一小撮坏人可能破坏，要教育群众，戳穿阴谋，不要上坏人的当。

第二个问题讲讲“拥军爱民”的问题。我们要坚持贯彻执行中央九·五命令，这是当前全国范围内广大群众，包括解放军都要做的，拥军爱民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要教育群众正确对待解放军，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任何时候不能动摇。有些同志有想法，武汉出了陈再道，到处揪陈再道，因此，到处出现揪军内一小撮。中央最近指出，揪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赵永夫，陈再道是极个别的，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军队。是毛主席领导，

广东群众支持下，打败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中国人民斗争史上，解放军立下不朽的功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担负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抽调了成百万的干部、战士，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缺点错误是有的，但是支流，不是主流，不能有缺点就怀疑解放军，这是不对的，要相信解放军他们是听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话，毛主席指向那里，他们就打向那里，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三支二军工作中，成万的干部、战士抽出来，他们有的被打、抓、揪，一直发展到夺解放军的枪，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执行林副主席的四不，这样好的军队，我们不支持他，爱护他？到底要爱谁呢？要教育广大群众，对解放军的支左缺点，可以向支左的领导干部提出诚恳的批评，帮助解放军改正错误，更重要的是教育群众，向这个军队提出正确的意见，解放军有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时刻准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因此要根据伟大领袖的号召、命令，学习解放军，支持解放军，尊重解放军和解放军团结一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党内的坏家伙，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千方百计破坏这个关系，我们不要上坏人的当，各群众组织要执行这个号召，制定拥军爱民公约，真正做到不打、抓解放军，不夺枪，严格执行命令，解放军进一步爱护群众和群众站在一起，与广大的左派群众站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三支二军中为人民立新功，军队强调爱民，群众组织强调拥军，对待解放军的态度，也是考验这个群众组织是否革命的问题。不这样，就会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军队搞乱了，不管怎样，客观上帮了敌人。军民团结密过长城，把部队搞乱，就是自焚长城。凡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无论如何不能干，广泛宣传教育不折不扣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命令，这样才能巩固国防，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三、希望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整风，双方检查前一阶段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的事，有那些经验教训，运用自我批评武器，自我教育，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自己组织，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的革命群众。当前来看真正的革命群众，就要看他是不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认真搞好大批判，抓革命、促生产，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解放自己，是最有效的方法，最灵最有效的武器，比炸弹、原子弹的威力更大。任何一个组织没有毛泽东思想，武器最好是要失败的，这是千真万确，中国革命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来证明

这一点，一年来所以取得胜利，把刘少奇，中国的赫鲁晓夫揪出来了，是靠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另外有一支保卫力量，人民解放军，因此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就要更好斗争，就要学习、贯彻、执行毛泽东思想。

今天和同志们见面，就谈这一点意见。

（来源：刘锦平，中央调查组组长。记录稿）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刘锦平在无锡两派谈判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刘锦平，中央调查组组长。纪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首先，我代表调查组的同志祝贺无锡两派代表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就立即制止武斗问题达成协议，并预祝协议贯彻执行胜利！同时，我希望双方代表，你们既然是代表就要代表得好，你们不仅代表两派全体战士，而且也代表全市六十五万人民；希望同志们不要辜负两派战士的期望，不要辜负全市革命群众的期望，不要辜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殷切期望。下面，我讲几点，讲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你们批评。

协议的贯彻执行问题

协议是达成了，而且订得还不错。但是，这仅仅是纸上的东西，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还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斗的过程。要使协议能真正地贯彻执行，最重要的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党中央的政策教育好双方广大群众，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希望同志们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传播到全体同志的头脑中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不是靠枪杆子所能解决的。枪杆子对付敌人是需要的，对待群众要靠毛泽东思想。靠拳打脚踢，用大刀长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才能斗倒、批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只有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显微镜才能揭穿从右的方面、从极“左”的方面出现的破坏、干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生

的革命委员会的破坏活动；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才能识破一切牛鬼蛇神和帝修反的破坏活动；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才能引导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使这场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取得胜利！因此，任何革命群众组织，不管人多少，武器多少，这都不是决定战斗力的决定因素。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是不可战胜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在革命的过程中，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并将取得最后胜利！

周总理在九月十日的一次讲话中说，目前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夺权阶段。无锡市还没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还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还在军管的过渡时期。在当前的这一阶段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更多的群众。如果我们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小资产阶级派性就不能消除，无产阶级党性就不能发展。要真正贯彻协议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方法向两派战士就制止武斗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抓好各自组织中全体人员的活思想，要使所有的同志都懂得为什么要制止武斗，有什么意义，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来制止武斗，动员所有同志忠诚老实，不折不扣地执行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要排除各方面的思想障碍。这些障碍来自领导阶层的少数人，来自一部分群众的小资产阶级报复情绪，值得引起同志们注意。也可能遇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再次挑起武斗，也可能自己队伍里的个别坏分子企图继续蒙蔽群众破坏协议。作为代表，作为双方中心组的成员，这是一个考验。我们要以无产阶级的党性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我们双方代表要在思想上作好这样的准备：执行协议不可能没有障碍、一帆风顺，可能双方会出现一些个别的冲突和一时的冲突。遇到这些问题，双方领导也要掌握好，从大局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要从派性出发。

以上讲的这些对我们领导来说是要十分注意的问题。贯彻协议要通过斗争，最主要最主要的是看是否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能否下定决心做队伍内的政治思想工作。当然，也要采取一些组织措施，经常检查督促，军管会要执行义务，监督小组要抓紧，要多出力。同志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领导要到北京去谈判，但是思想、组织工作要做得很严，要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否则会使协议的执行遭到

很大困难。执行协议的决定关键在于领导，根本在于是否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按中央命令、政策，按协议书办事。

对待军队的问题

江青同志九月五日接见安徽两派代表的讲话讲得很清楚，党内一小撮坏蛋利用武汉事件“揪军内一小撮”，企图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搞垮，破坏无产阶级领导，破坏中央文革。这要引起我们广大革命群众的警惕。

在无锡来讲，是对待二十七军的问题。镇江、苏州等地也是对待二十七军的问题。二十七军是什么部队呢？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直接领导、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军是很好的军，很有战斗力的军，在过去民主革命、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中有很大功劳的军。其中许多干部都经过战争的考验，有些还是著名的战斗英雄。要正确对待解放军，在无锡来讲，就是要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在思想上、行动上都要爱护、帮助、支持这个部队。对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一些缺点错误要正确对待，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进行自我批评。同志们在协议中双方都提出了不绑架、扣押、围攻、殴打和侮辱解放军。这个军的支左工作人员都是很好的，不要认为部队在支左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就对部队不信任，就疏远。这样对军队、国家、人民利益是不利的。因此，各派群众组织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的指示，进行广泛的“拥军爱民”的宣传教育，也要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再不要绑架、扣押、殴打和侮辱解放军，再不要抢夺解放军的枪枝了。军队方面要加强爱民教育，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人民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要不断立新功。对革命群众、造反派的一些缺点、错误也要耐心帮助，对革命群众、造反派向军队提出的意见也要耐心听，对他们的某些过火行动也要原谅。希望同志们在对待军队的问题上搞得更好，防止坏人破坏，不要自毁长城。这对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有深远意义，要教育自己的同志懂得这一点。

学习和整风问题

群众组织负责人更要学习好毛泽东思想，研究党的政策。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不能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来挂帅。否则，必然会使自己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就会脱出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泽东思想

的轨道，就要犯错误。因此，学习问题是个重要问题。我建议双方负责人学习上海的经验。春桥同志讲：“上海的中心组、勤务组人员每天学习半天毛主席著作，思想水平提高了。”总理指示要学习江青同志九月五日的讲话、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汇报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以及《红旗》杂志今年第十四期的社论。同志们要认真对照，总结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整风、学习很重要。我们相信，无锡两大派和革命群众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定会为无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立新功，完成毛主席交给同志们的光荣使命！

（来源：刘锦平，中央调查组组长。纪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康老讲话：

同志们来自江苏，同志们身体好吗？（大家答：好！）今天晚上第一次和同志们见面，时间很晚了。张春桥同志，张政委明天要走，他对江苏情况比较了解，我对江苏情况是今年春天接见南京来的同志，才了解一点，其他如常州、无锡、苏州、南通、扬州根本不晓得。现在和同志们一道学习。是不是都到齐了？（杜平同志答：常州没有到。）南京、苏州、无锡、南通来了，就是常州没有到。部队同志，梁辑卿同志来了没有？（梁辑卿同志站起来答：到了。）很好，很好。我想今天晚上见一见面有些话以后再谈。我很了解同志们的心情，代表同志有好多问题要向中央反映，希望得到解决，这是同志们的责任，也是同志们的心情。同志们来到中央开会，基本上有两个任务：第一反映江苏各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有许多情况需要向中央反映，提出，汇报，解决。但是，还有一个任务，同志们来到毛主席身边，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学习毛主席革命路线。一句话，要很好地掌握革命大方向，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没有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同志们也了解，大问题管小问题，大问题解决了，小问题就解决了。同志们在这里，环境比较平静，要好好考虑问题，把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和中央的方针政策好好学习。张春桥同志天明就走了，利用

这个时间，请他把江苏的事情向同志们讲一讲。现在请张春桥同志讲话。

张春桥同志讲话：

首先，我想应该说一下，对江苏问题的解决，我也没有完全尽到责任。以前是一般的义务，二月份后毛主席叫我和姚文元同志关心一下江苏问题，因此五月份去了一次南京、镇江、常州、无锡没有去，离上海最近的苏州我也未去，南通，苏北更没有去。（康老：徐州有没有来？）徐州主要是济南部队管，我和王效禹同志商量了一下，他去过了。所以，我应该首先说我有责任，当然事情也不只是那一个人的责任问题，可能时机未到，矛盾还没有暴露够，你们都没有感到需要解决问题，打也没有打够，武斗没有斗够，（康老：骂架，还没有骂够。）打倒曾邦元，文凤来的标语没有刷够。在你们没有打够的时候，我们出来说话没有作用，这是实话。五月份，在南京我和姚文元同志研究，根据我们判断的情况，讲不讲话？既然来了，不讲话不行。讲了效果也不大。当时我说过，我今天讲的这些话，请你们考虑，如果有些道理，就照办。不对，你们就打，算我是胡说八道。果然，效果不大。你们认为我说的是胡说八道，我的话只管十天，没有十天就干起来了。所以，矛盾没有暴露彻底之前，问题难以解决。这不是我个人估计，主席也是这样看的。七月初六月底主席曾说江苏形势很好，大有希望。为什么？江苏军管会，无锡，常州军管会也瘫痪了。大概可以解决了。但后来证明只是瘫痪了，武斗还没有斗够。七月中旬，我在这里见过江苏三派代表，那时候就谈到能不能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他们说可以，以后又说第一把手在南京，要到南京去谈判。实际上一边谈判，一边武斗，你们以为武斗可以解决问题。那时候有一种思潮：“武装解决问题”，“武装夺取政权”。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想的？最激烈时，“八·二七”退到下关，那时候我们想出来说话，主席说慢一点，他们还可能没有打够。我们现在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打够了？（文凤来答：打够了。）（康老播话：如果没有打够，你们回去再打。）开始，我们对武斗也是着急的，但着急没有用，只好让它打。我不是提倡武斗，我是反对武斗的。但你们要打，有什么办法？你们打够了，就会感到需要到这里来谈判了。证明主席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你们觉得还不够，还要干，我们有这个耐心等待。（曾邦元：群众是不愿意等待的。）是啊！群众不会同意。五月份，我谈过，这样干下去群众会抛弃你们某些人。

现在，全国形势很好，已经成立七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有八个省市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基本方向定了。主席希望在年底前再解决十个省，其中毛主席提到江苏。主席希望江苏的问题能够在年底以前解决，当然到那个时候解决不了再说。主席提出这个希望是有根据的，觉得你们打得差不多了。这样华东地区，还有福建也是希望今年解决。现在华东地区，山东、上海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安徽这几天发展很好，浙江基本解决了，江西也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福建，江苏的问题等待解决。这次我们到南昌看了，也是形势很好，他们那里发的枪和夺的枪有七万枝，大多数是发的，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收回五万多枝。现在就剩下一个江苏，一个福建，这两个省。一个是前线，面对金门、马祖；一个面临长江口，也是前线。如果江苏问题解决了，对保证上海地区的生产和江苏本省的生产都有很大好处。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一点，而且对于战备也是需要的。我们不能忘掉敌人。既然条件成熟，又有需要，我们觉得可以来解决问题。是不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请同志们考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解决问题，今天军队的同志来了，希望军队的同志把思想清理一下。因为江苏是在军管会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如果军管会本身有缺点错误，不马上改过来，或自己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有偏差，就很难把江苏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而且在这一方面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南京军区，省军区，二十七军这是主要的，当然六十军也有一部分，我希望这几个单位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很好讨论一下，江苏形势，究竟有哪些缺点错误，有多少，下决心改正，不要掩盖，虚心听取革命群众的意见。如这个问题解决得好，那就能够保证江苏文化大革命顺利发展，这是决定性的关键。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大家都要互相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很重要的。这是军队问题。

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要搞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这是总的方向，应该牢牢掌握住。在目前江苏发展也很快，就我看到的一些材料，大批判开始了，有些搞大联合了，铁路局就实行了大联合。听说南京大学进展很迟缓，如果南京大学进展迟缓就不能不是一个问题。使人感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问题难办多了。毛主席讲：“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主席说我就想不通，为什么造成对立的两大派。研究了上海为什么没有成为两大派。南京、

上海在沪宁线两端，一月形势南京和上海是一样好的。“一·三”事件那时候你们是并肩战斗的呀！那时候是一派，如果说有两大派，另一派是赤卫队。上海赤卫队问题的解决靠江苏革命派的帮助，因为一些人逼得跑了，到苏州、无锡、常州，最后到南京。上海、南京造反派是联合作战的，大家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那时形势多么好呀！上海没有接着来一个分裂，但是南京分裂了。这一些原因，我希望同志们好好的想一想。毛主席说，为什么上海形势比较好呢！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无非是你（指我）不去搞武斗，警备区也不去挑动武斗嘛！又说，北京为什么没有武斗，就是谢富治同志，……没有去挑动。上海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干部，军队三方面关系处理比较好，所以局势始终比较稳定，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分裂。内部矛盾是很多的，几次要大分裂，我们都处理得很好，问题解决得好。因此，毛主席说工人为什么要分裂，一个工厂分为两大派，而且你死我活。第一个原因就是有走资派操纵，挑拨。调查一下几个地方的情况，没有一个超出主席这个估计，都有人挑动。如果不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造反派内部混进了坏人，这些人就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或者坏蛋、特务，利用你们造反派的缺点错误，利用一些不正确思想来搞阴谋活动。第三造反派的私心杂念，特别是领导人的私心杂念，什么以我为核心呀！争席位呀！受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人就是想搞以我为核心，到处发展势力，把别人打垮。道理说不过，就动武；拳头不行，就开枪。上海有一个大学，造反派是比较有名的，但他们就是联合不起来。彼此私下都承认是造反派，但是写标语就说对方老保，目的就是要争以我为核心。主席所以说，以后不要提以我为核心，核心不是自封的，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要我去劝说他们联合起来，不要去争这个核心，争核心没有什么必要。你执行的路线正确，群众就会选举你。主席说：“人家要我为核心，我还不要呢！”遵义会议，主席领导地位已经确定，但没宣布以他为核心。遵义会议以后的十年斗争中，形成了以主席为核心。

这三个原因，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造反派内部混进了坏人，再一个是造反派存在私心杂念，特别是领导人的私心杂念比较多，这是造成分裂的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有时在一个单位同时存在。至于江苏、南京、无锡怎么样？我们没有很好调查研究。请同志们考虑，究竟是什么情况？安徽就是刘秀山那么几个坏人，两派那么武斗，把黑手一揪，问题就解决了。证明毛主席的分析非常的正确。把

这些黑手一斩断，群众很快就联合起来了。究竟什么问题障碍着江苏问题的解决？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你们情况熟悉。这是谈的原因。

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个方法是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所形成的光荣传统。多少年来，从井冈山，从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就是采用这个方法。毛主席讲嘛，有些同志看古田会议决议，不知道那里面批评的是谁，没有点名，问题解决了。以后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团结——批评——团结。最近，主席特别强调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这次坐火车，一个列车上就有三派，毛主席就找三派谈话。三派在主席面前辩论了两个小时。主席说：我看你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联合嘛！三派还有些不想大联合，都指责对方，不是自我批评。主席说：不要讲人家的缺点错误，你就讲你自己的。这一点可不大容易了。等到他们从主席那里出来，又跑到我们的这个车厢来了，还是谈这个，说对方是老保，说有原则分歧，其实没有多少原则分歧。联合以后总还有原则分歧的，是否有原则分歧就要分裂？特别搞组织分裂呢？毛主席语录一百三十五页那一段，特别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这两句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先实行这一条指示行不行？（群众答：行。）不见得！这一段语录是四三年写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但是开会从来没有念这一段。念这一段就打不起来了，我希望在每次开会中，都念一念这一段，虽不能完全执行，至少知道主席有这一条语录对自己有个约束。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是不是不分是非？是非总是有的，那就看大是大非，还是小是小非。如果还是停留在原来的观点，老是不改变，那就很难联合了。特别是要去掉私心。这次我们在毛主席谈了以后，一直同三派做工作，火车离北京还有三小时了，我说怎么样？还不能联合？又说主席跟你们讲了二小时还不能联合，那你们回去怎么交帐？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才达成了联合协议，到主席那里去报喜。主席说祝贺你们，送你们四个字：“斗私，批修”。“斗私，批修”就是这样来的。如果私字不去掉，无法达成大联合的协议，达成了也还会分裂。就是把黑手斩断了，不把私心杂念去掉，特别是造反派领导人头脑里的私心杂念去掉，就不能大联合，三结合，联合了也是不会巩固的。有些人对三结合不感兴趣，因为他已是当权的了，不愿意解放干部，那样又要领导我们了。也不与军队结合，那样他不能独断专行了。因为

私心重，派性大于党性，党性抛在一边，不看大局，不照顾阶级的根本利益，那么这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联合呀？当然总有一天要联合的。批修，就是搞大批判。这四个字是互相联系的。要把修正主义那一套，刘邓陶那一套，彻底批倒批臭。这四个字不仅是解决大联合以后的问题，在江苏能不能首先用这四个字解决大联合。联合是为了革命，为了批修。要批修就要斗私，要斗私就要批修。

和这个问题联系着的，我希望江苏的工人阶级在大联合、大批判，斗批改，就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发挥他的更大作用。江苏的产业工人的数量很大的，也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他们最懂得也是最容易接受毛主席思想的，他们私心比较少，这是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的。我们总感到江苏的工人阶级在这方面发挥不够，还有学生掌握局势的现象。当然，不排斥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工人闹革命有困难的。但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应该向工人阶级学习，不要老是想当老师，应先当学生嘛！上海，江苏的学生对工人运动起了启蒙作用，先锋作用，推动作用，这是不可抹煞的。去年十一月底，陶铸压制了工人运动，那时候工人很难起来，学生帮助了工人，冲破了束缚。但当工人起来了，学生最好是当参谋，不要代替。当然，我讲的工人阶级的整体，工人内部也有坏人，有的工厂是走资派操纵，也不是那么纯洁的。

无锡“六·二六”是不是都回去了？（有人答：没有；有人答：回去一部分。）常州主力军回去了没有？（有人答：回去了。）全部回去啦？苏州那个地区相反，踢派在城里。那些地方要首先执行制止武斗协议，没有协议，要订个协议，首先要把武器收回来。常州是武装回去的，当时我在上海一听，就说糟糕，这个形式回去怎么行，非打不可。应先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把枪放下再回去。在城里那一派要负更多责任，应该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回去，把他们请回去。被打到上海的主要是工人，少数是学生，这样搞谁高兴？还不是走资派高兴！到上海去的有的把老婆孩子都带去了，现在天冷了，没有衣服，因为人太多，没有办法解决。被打到上海去的有五、六万人，最高潮达到十万人。安徽走的早些。这一方面，希望南京军区，省军管会，各地的军管会，还有二十七军要主动帮助解决，劝说他们回来。无论如何不能采取武装打回去的办法。我们表示过这样一个意见，我已向主席汇报了，也告诉了杜平同志，……就是先达成停止武斗协议，不要武装打回去。主席同意了。只有达成协议，只有把武器封存起来，才能解决。

中央决定一定要武装左派，要发枪，但有个条件，等到大联合搞好了，局势稳定了才发枪。现在枪在你们手里没有什么好处。南昌、武汉造反派说：最初都非常想枪，第二步夺枪，人家有枪去打你，就只好夺枪。现在就怕枪了。因为局势缓和了，枪没有办法放，生产带枪怕丢了，晚上睡觉放在枕头下边。最后就交还了。现在你们不交枪，武装左派就无法实现。现在有的枪流落到坏人手里。有的把枪卖了，有的把枪换东西了，谁知道你们把枪换给了什么人。你们把枪交回来了，彻底清理一次，再把队伍里的坏人清理了，编成班排，进行军训，然后再发枪。我们过去也是带枪的，而且是来之不易的，但是也交了，现在我身上就没有枪。所以，希望你们按中央指示把枪交回来，一是为了制止武斗，一是为武装左派准备条件。

我今天只能说一般的意见，我们估计，也是主席的估计，觉得江苏的问题了解决的时候了，希望在年底前解决。早一点好。一定要拖到年底吗？那也不一定，我看拖得也够长了，差不多了。解决问题，大家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多想一想自己的缺点错误，多想一想对方的长处，这样就可以在短时间实现大联合。对军队的意见可以提，也希望军队的同志在这一期间，应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有了错误，改了就好了，这是主席的方针。大家看到今天的报纸，毛主席昨天晚上接见军队干部就是这么样嘛！那里有些干部犯了错误，情绪很低，主席，中央首长看望了他们，中央首长谈了话。只要他们认识了错误，改了就可以了。军队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过去打仗有战功，今后打仗还要靠他们。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说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因为南京贴了大标语，准备开大会，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我们说这不符合实际，如指责许世友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这个问题我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不符合事实，许世友同志没有反对过我嘛！至于四方面军的问题，那是张国焘的问题。是过去的事，张国焘负责。我看了你们的传单，完全是胡说八道。在延安罗瑞卿把许世友同志押起来，是主席下命令放的。我看了传单，说许世友同志反对毛主席，被关起来，是彭德怀放的，这是胡说。这完全是颠倒事实，颠倒了是非。是罗瑞卿关了许世友同志，主席放出来的。（康老插话：许世友同志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解放战争和我在一起嘛，我是他的政治委员嘛。一系列战斗，打济南，打兗

州也好，打淮海战役也好，都是很坚定的。而且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也是党的一个好同志。同志们要我介绍的话，还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在抗日战争，在山东，以至于反对彭德怀、罗瑞卿，他一直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当然许世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有些可以说是严重的。但许世友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有正确的认识，他向中央表示，南京军区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负主要责任，愿意作检查。最近他身体不好，中央要他休息。（康老插话：文凤来同志、曾邦元同志要分析一下，你们是知道的许世友同志是一贯的反对江渭清的。）梁吴杜起来造反是他支持的嘛！那时候，他能站出来反对江渭清，支持梁吴杜是不容易的。在浙江问题上他提出的三点是完全正确的。（康老插话：在安徽问题上，许世友同志对严光同志保李葆华压八·二七，许世友同志提出的批评都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看全部的传单，有些传单是很坏的，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攻击田普同志是“南京的王光美”，说他到北京搞夫人外交。这样把叶群同志骂进去了，把江青同志骂进去了，而且把我也骂进去了。我不知道是谁搞的，这样的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给主席、林副主席送材料嘛！那么我们向中央送材料就是搞夫人外交，这不是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也骂啦！这些，南京的造反派没有人出来抵制，被派性压倒了。这样把我们党说成什么呢？我看了很生气，那里象个造反派讲的话。我希望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要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能敌我不分。那时有一股风嘛，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而且不去调查，道听途说，又没有历史知识，根据自己的想象就一定要打倒。最后，我给文凤来同志打了电话，北京给军事院校也是打了电话的。我当时讲一是会不要开，二是口号撤销。我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当时文凤来表示坚决照办。中央调查组做了工作。这证明造反派是听话的。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是算这个帐，只是说一说，当作一个教训就是了，利用这个机会说一说，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个情况。当然，这不排斥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的批评，善意的批评，同志式的批评，我们是欢迎的。这对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就说这些，天亮以后，我还要回到上海，国庆节以后可能回来，回来再见面，要是不回来，以后再南京去见你们。

康老讲话：

同志们，我觉得张政委讲话对解决江苏问题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根据毛

泽东思想提出解决江苏问题纲领性的建议。同志们照办不照办？同志们考虑。我觉得这个讲话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提出的，是解决江苏问题的一个纲领性的讲话，希望同志们好好的研究思索，好好地考虑一下。到这里来开会，首先要把思想整理一下，使我们的思想合乎毛主席的思想，合乎毛主席的指示，合乎毛主席的路线。各代表同志面临着一个任务，就是如何做一个代表，每一个代表如何能使得我们这会议开得好，每一个代表团以及成员的任务是什么？这是首先应该考虑的。

其次，我们这次会议怎么样进行？到中央来解决问题的有十二个省市，事情很多，同时又面临着国庆，许多外宾，许多兄弟党的代表都来参加我们的国庆节，中央的时间是很紧张的。拿我来说，我一方面不大了解江苏情况，刚才我讲了需要向同志们学习，要靠派到江苏的调查组和军管会的帮助，各个革命组织的帮助。我了解江苏问题是四十年以前的情况。我是在江苏上海加入共产党的，当时的地委有徐海蚌，南通、如皋地委，镇江、常州地委，松浦地委，无锡地委。无锡是我比较了解的，那也是以前的情况。南通地区有个红十四军。这都是过去的事情，而且已经换了人间了。另外我自己还管五个省（安徽、江苏、宁夏、辽宁……），因此，这个会议怎么才能开得好，希望各方面的同志考虑。首先靠同志们发挥积极性。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同志们来到这里以后，首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的讲话，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特别是九月五日江青同志的讲话。同志们录音放了没有？（大家答：放了。）放了几次？（大家答：放了四次。）这不够，应该每隔一天放一次。我建议每个同志每天少则二小时，多则四小时学习毛主席著作，林副主席讲话，中央的文件等，端正自己的思想，清理脑子，不必天天往外跑。到外地去串连，你对北京的情况又不了解，三串两串串到“五·一六”里就糟糕了。（众笑。）每天学习二到四个小时行不行？（大家答：行。）两派能不能达成协议？（大家答：能。）

第二、你们有没有带打伤打死人的材料，照片，传单啦？就是说你这一派把我这一派打死打伤了多少人，用很好的纸印成传单，在马路上贴，这样，谁高兴？美帝国主义，苏修特务高兴，不知不觉地出我们的丑。美帝国主义拿一百块美金来买一张。这些东西千万不要到马路上去贴。现在过国庆，你搞那些干什么呢？

当然不是不可以在街上贴大字报，贴标语，但是要慎重些，不要写刺激对方的，对革命大团结不利的，有些口号也不一定准确。北京现在已经变了，希望你们同北京配合一下，不要搞那一套东西，但不是说有好的意见不能张贴。这一条不晓得大家赞成不赞成？（大家答：赞成。）

第三、你们各派来北京有没有带武器带枪的？如果带了武器，带了枪，赶快交给北京卫戍区。在中央开会不能带武器，开会带枪是很危险的。（张春桥同志插话：北京革命委员会已有通知。）北京革命委员会已有通知，各个代表团要严格检查一次。（张春桥同志插话：不然到天安门有问题了。）那就没有资格了。你们带没有带？（大家答：没有带。）我倒很愿意听到没有，但下面还要加一句话，彻底检查一下。要辩证一点，不然话说出来就被动了。同志们，你们告诉我，北京到南京去的学生有没有还没回来的？（有的答：还有，大多数回来了。）他们有没有带枪回来的？（有的答：不大清楚。）要做好工作，有的人带枪回来还说是胜利品，那是什么胜利品啊？缴美国的，还是缴国民党的？还不是咱自己的，把夺的解放军的枪当胜利品，是什么胜利品？希望同志们帮忙查一查，各代表团要向各代表讲清这个问题，彻底查一查，好不好？（大家答：好。）检查以后，说话就过硬了，“确实没有”。

第四、大家来开会千万不要再搞打、砸、抢、抄、抓。你们在家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嘛！刚才张政委讲了，如果你们没有打够回南京去打嘛！北京不愿意接受你们这种（张春桥同志说：国庆献礼。）（吴法宪同志插话：据说军队院校，外语学院二十多人还冲到了总参。）军队院校，外语学院二十几个人冲总参谋部，这是违背中央的指示的，违犯中央的命令的，在中央三令五申之后，尤其是国庆节前夕，搞这种事情是完全错误的。你们是代表，要代表正确方面，不要代表错误方面，你们要做一个模范。你们能不能不搞打、砸、抢、抄、抓？（大家答：能。）能不能达成协议？（大家答：能。）怎么说的劲头不大？应该响亮一点嘛！我不是说你们家里都这样做到，家里全都做到还有困难，但在北京不要搞这些东西。

第五、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有意见尽管讲，但是不要骂架，因为那样不仅耽误时间，而且不能解决问题。过去开会，一个人没有讲完，就说人家是完全造谣。我说，你何必那样急哩，人家造谣不是对你有好处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行大民主，开民主会，不是开吵架会嘛！当然，这不是说有意见不可以辩论，你要让人家把话讲完嘛！摆事实讲道理嘛！

第六、最后我希望这个会议作出一个模范，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向前看不是说在原则问题上不分是非，而是不要在小节问题上争论不休。这样使我们这个会议逐渐走向分清是非，走向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会议，不是吵架的会议，分裂的会议，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会议。希望你们保证这个会开成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会议，而不是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会议。

我们在这里讲这一点，希望你们考虑一下，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相信，在革命的大联合高潮中，大家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我们有这个信心，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江苏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今天上午还要到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那里去会谈哩！（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中央首长身体健康！）

（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整理）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铁路局系统代表的讲话

中央首长张春桥姚文元在九月廿九日晚 20 时 40 分接见了上海铁路局系统包括上海、南京、蚌埠、杭州四个分局在上海谈判大联合的全体代表，张春桥同志一开始谈到铁路系统联合的重要性时，曾沉痛地说：“我说出来同志们会感到很痛心，毛主席原计划坐火车从南京走，结果无法走，常州不通，不能走，你们不痛心吗？”联指破坏铁路真是罪该万死。

张春桥同志讲南京的大联合：

我们很高兴，南京问题解决了，当然还有问题，解决了内部矛盾还是存在，内部矛盾总是有的，没有矛盾生命也就停止了，问题是内部矛盾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主席讲没有理由一定要搞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今天存在今后还存在，甚至代表名额，席位现在有的组织争得厉害，争名称、名次、名额、这是“三名”主义，三名主义总是有点不好，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是作默默无声的，这是工人阶级的光荣，看那个同志毛泽东思想水平高，分清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少奇的

路线，不管他哪个派，选他来当头头。当头头只能说明他的责任重大，没有其他好处。有些人私心杂念很重，想弄个长当，我觉得我们无产阶级不应该为个人为小集团去争名额、争名称、争地位、应该为整个无产阶级去争地位、争利益、不是争山头，不管你是那个山头的，希望你们搞好联合，所以希望你们顺利地联合。以后的问题，当然联合后还可能有反复，不过我们希望反复不要太大，要掌权就要代表整个阶级来掌权，小团体放前面的人是不对的。要把很多人团结起来，包括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认错了已经改了就要团结他，这不是调和主义，是讲原则的，只要他对吕正操、武竞天和你们铁路局最大“走资派”。我们就应该联合起来，不要为名次地位。谁当第一把手，不要到这方面去争，因为群众是会判断的，有的人一定要干，我看也可以上台以后一定也搞不好的，这是要垮台的，有的人可能勉强争了第一把手，我看做不好无非是他垮台，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在这方面多花时间了，我希望你们包括杭州的同志要很好正确处理，局势稳定了也还会出现分裂，如果没有这样准备分裂了就难办，刚刚联合起来的单位应该搞好大批判，从斗争中巩固。敌人会挑拨，利用我们的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来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上海局的运动，反反复复，总是后面一定有黑手，肯定有坏人，我不相信工人阶级内部那么喜欢打内战，蚌埠的问题正在谈，我们希望你们联合，早一点联合好。蚌埠斗得很凶，当然你们那里有很多方面矛盾，但比起刘邓陶的矛盾，比起“走资派”的矛盾还是次要的是第二位，还是以大局为重。那么过去的事情要不要谈？过去的事情是非总有的，有时在这个问题我是你非，有时在那个问题是我是非，是不是不讲是非了呢？过去的事情我是他非，但是这笔帐都应该算在“走资派”身上，“走资派”弄分裂，我们工人是要联合，那么工人阶级内部问题谈不谈，可以谈，谈的主要方法是自我批评，不是一般的自我批评，我有缺点我向你们检讨要采取不批评对方的方法，这是毛主席的意见。这个意见并不是现在就有的，看语录 135 页就有，毛主席在 1948 年就讲了，现在读语录开始都不读这一条，但是现在联合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读一读（读语录），这是谈拥军爱民的这一条就是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这一条是不好办的，但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最好的办法。主席这次到上海及其他地方都讲了这一点。有一段路我们坐火车，车上有三派都是铁路的，他说他是造反派，他说他是保守派，主席找他们三派代表在车厢内听他们辩论两个钟头，都讲别人缺点错误，主席插话说：

“别人的缺点你不讲，你讲自己的问题嘛，人家的问题他自己会讲，人家的缺点应该人家讲，你讲什么，”这样一来就吵不起来了，结果三派都检查了自己，彼此越听越感动，这三派在车上就大联合了，当然也不那么简单，这个条件那个条件，我们也做了工作，但是联合了，蚌埠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来解决，已经联合的也可以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工人阶级，当然也可能混进坏人，但整个阶级来说，解放前受压迫，解放以后都当了国家的主人，政权是工人阶级的，我们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是一个阶级有问题可以互相帮助，我讲的请你们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在上海谈好，就在上海谈，我们欢迎你们留在上海过国庆，如果回去谈也可以，因为你们那里还有群众，听听群众的意见，也可能群众走在你们前头你们就要听群众的，群众在你们后头你们就要领导群众，我昨天回来，我回来前问江苏红总，八·二七，我们问他们打够了吗？不够我们还耐心等待，曾邦元讲中央有耐心群众没有耐心了，不要打了，我讲曾邦元的这句话是对的。要相信群众，再这样下去群众会抛弃你们的，因为群众是要求联合的，不会把个人利益小山头利益放在前面的，你们如果有条件就在这里谈，回去谈也可以，上海有些工厂头头在谈，群众锣鼓喜报却准备好了，包围起来了，谈不好就请你们出来到广场上谈，还是回去谈，你们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当然不会赶你们走的，欢迎你们和我们一块欢度国庆，你们的贡献不是对你们本身，而且是对全国，我们没有别的意见，主要是希望很快的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姚文元同志谈斗私、批修：

响应毛主席革命大联合的号召，逐步实现了大联合，希望已经实现大联合的地方巩固大联合，进一步实现三结合，搞好大批判，我们向毛主席汇报铁路联合时，毛主席提出来革命大联合以后搞什么，毛主席讲“斗私、批修”（张春桥插话：这句话是对工人阶级讲的，首先是对铁路工人讲的，也是铁路工人光荣）。我们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我想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一定能够搞好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批修就是要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你们铁路的坏蛋反革命分子吕正操以及武竞天以及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斗私就是要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斗资产阶级的东西，毛主席讲斗私就是要大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的大联合有个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毛泽东思想，如果把

私字斗掉，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批修、斗私是我们的大方向，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就破坏这个大方向，利用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我们就可以利用毛泽东思想来识别明的暗的阶级敌人，有的同志犯了错误，我希望大家学习“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希望我们在大方向上团结起来，敌我矛盾要狠狠斗，狠狠批，内部矛盾要用团结——批评——团结来解决，希望大家要把毛主席“斗私、批修”四个字很好执行。

（讲话记录未经本人审阅，供参考）

江苏常州主力军《挺进报》1967. 10. 29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刘锦平接见江苏红总方面代表讲话

一、林彪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新老革命干部，红卫兵小将都要认真学习，这是关系到每个同志能否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自己，提高毛泽东思想的大问题，关系到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大问题。我们要好好学习，学出成绩来，学出效果来，在破私立公上来个飞跃，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革命群众组织批修的能力，这是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对每一个同志都很重要，要把这个放在最中心最中心的位置，总结前一阶段经验，接受教训，反复学习，反复斗私，反复批修，使大家的政治、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一步，使自己的队伍能够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江苏问题的解决，毛主席提出了要求和希望，希望在本年底以前解决。现在算算时间不长了，能不能解决？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的关怀下，相信中央一定会对江苏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

（一）中央的方针政策，首先要通过江苏、南京尤其是两派同志不折不扣地、老老实实地正确贯彻执行。否则即使作出了正确决定，仍然不能解决。同志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根本，抓住这个根本就会方向正确，不会犯错误，就会把队伍引向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引向中央的方针政策胜利前进，才能推进江苏首先是南京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春桥同志的9·28讲话，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同志已经肯定了，说这是纲领性讲话，不仅在北京的全体代表要贯彻执行，在南京的同志也要认真贯彻执行，要正确理解讲话的中心和精神实质，任何一方都不

能抓有利的一段，甚至根本不讲不利的一段，否则就是实用主义。不管社会上发生多大的干扰，你们都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你们下决心搞好斗私批修，这样广大群众就会跟着走。

（二）一定要拿出充分时间，不仅今年学习，明年还要学习。主席已下定决心，斗私批修不搞出成绩，主席是不会下命令“收兵”的，机关、学校、工厂要安排一定时间，机关、学校多些，工厂少些，机关、学校每天至少到学半天。

（三）今后，如无特殊情况，无什么必要，少开数万人的游行大会，多余的时间扎扎实实地学习，要狠狠斗私批修，促进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建立江苏的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军管不是长期的。林彪同志将毛主席斗私批修四个字作了精辟的分析，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纲。

二、继续贯彻毛主席 8·25 拥军爱民的号召、九·五命令以及南京三派在九·四、九·卅达成的两个协议，进一步改善造反派和军管会的关系，增强军民团结，坚决制止武斗。无论如何不能发生大的武斗，小的也不要发生，使得毛主席、党中央再也听不到南京地区武斗的消息，要作大量工作。双方都要作大量工作，要将注意力集中到“斗私，批修”上，要继续宣传不要武斗，要搞臭武斗，要宣传江青讲话，八·二七把张建山同志打伤是不对的，我已经批评了他们，希望你们不要写成大字报，不要在群众中宣传，否则会激动群情，容易打起来，一定要压制这方面舆论，从南京人民利益出发，千万不要从本单位、本部门出发，要看到全局问题，要按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思想办事，要将群众组织当作阶级兄弟来看待，按照毛主席指示，上交一切武器、弹药，包括长矛大刀。将来条件成熟了，主席一定会发给你们的。现在条件不成熟，拿着枪好处不多，身上带着枪，看来安全，实际不安全，一定要相信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必要掌握武器、弹药。为什么呢？①有毛主席的领导；②有解放军保卫“四大”；③现在形势大好，向好的方面发展。虽然还有小摩擦，有一小撮走资派、坏人挑动，但这是很少的现象，要教育你们自己组织的群众执行主席命令。常州开始双方都不肯交枪，提出要封存，我讲封存还要派人看，谈了四、五天，答应交枪了，但下面造反，几天的工作，三句话就破坏了，双方都没有交。于是我们讲谁破坏了谁负责，又谈了一天，终于在晚上十点钟才交出枪。有的为了不肯交枪，甚至制造谣言，还有个

别几个坏人在活动，当然也有真的。

江苏问题已到解决的时候了，无锡、苏州、常州都打了，苏州打得更厉害，打坏了二百多间房子，尸体没人收，死伤一千多人，常州一仗就死了二、三百人，调查组到现场看了，有的掉了泪，死的都是小将、工人同志，使人看了难过。双方都不要搞制造武斗的舆论，现在是大造毛主席思想舆论，大造斗私批修舆论，天天想到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如何教导我们的，大字报、大标语、广播站都要搞这方面的舆论，不要搞互相谩骂、抗议、攻击的舆论，要把群众引导到斗私批修方面来，引导到大方向上来，加强这方面宣传，出了事情要冷静处理，从大局出发，要多做自我批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使武斗没市场，搞好革命大批判、大联合，实行三结合。

三、希望大家很好地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和“复课闹革命”的号召。

四、干部问题：旧省、市委班子要审查清楚，现在革命干部站不起来，什么原因？干部要：（1）自己教育自己；（2）要和走资派作斗争，在揭开旧省、市委盖子中站出来。两派都是革命组织，站在那一边都行，如站在保守派一边就不行。站出来以后还要看他们是否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和按中央政策办事。有的站出来还动摇，甚至还会犯错误，但也有很坚定的。总之，要按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办事，是三反分子，坚决打倒，如不是就要让他站出来。要相信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问题是江苏的一个大问题。

五、如何联合八·二七问题，希望红总方面认真下点功夫做些工作。你们人多，组织大，也是掌权派，这对实现革命大联合有很大关系，要具体研究，处理好同八·二七方面的关系，要做大量工作。要真正地热情地欢迎他们，不要挖苦讽刺，要根据中央政策处理好和八·二七的关系，风格应该高一些。现在这派，你们不承认不行，要消灭这派，现在必须承认这个派，主席讲过，承认这个山头的目的在于消灭这个山头。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刘锦平接见南京八·二七方面的代表讲话

北京谈判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现在不清楚。谈判中间有些同志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那么高，主要是思想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很好斗“私”。我们希望在北

京谈判的同志和在家的同志，尽一切努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做工作，创造条件，为解决江苏问题贡献力量，为江苏的人民立大功。我们如果不狠狠抓紧根本问题，那就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干扰，就不能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去完成光荣的任务。这是最大最大的问题，最大最大的原则问题，最根本的利益所在，关系到江苏四千一百万人民的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问题。要以这个问题为纲，抓好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工作，不要被今天骂人打人的具体细节问题纠缠住，影响我们的大方向。

我们要组织好斗私批修的学习，通过学习大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只要我们在这个最根本问题上能抓得紧，学得好，形势就会愈来愈好，对江苏问题的解决就会越来越有利，就能够为人民立新功。如果把这个问题丢了，那就危险了。因此，学习不是一个两个星期问题，而要化相当长的时间来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希望同志们坚定不移地按照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号召去办。无论如何不要听别人小道来的消息，旁敲侧击来的、搞小动作得到的消息要坚决抵制。如果不抵制，就要犯错误。只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最正确，一句顶一万句。只有毛主席的思想最符合人民的利益，最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

形势一片大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去看形势，要看全面，特别要看主流，不要以个别或局部的现象而忽略了大的方向。现在的形势比前两个月大大前进了一步。大好形势里当然还有问题，武斗是停下来了，个别摩擦还有，还要继续做工作。大联合的形势出现了，但还有许多具体问题，特别是思想问题没有解决，通过斗私批修，可以更好地促进革命的大联合。

正确的分析形势，认识形势，作为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否则会自己给自己提出错误的作法，甚至错误的方针。七、八月份有些人对形势的估计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把形势看错了，因此提出了错误的口号。要教育群众，从思想入手，思想领先，才能处理好具体问题，才能知道处理问题时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有些问题互相不认账，主要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矛盾越来越深。本来问题不大，因为处理不好，思想认识不够端正，群众也跟上来了，出了一鼻子气，把问题复杂化，造成了一种不好的舆论。

正确估计形势，找出正确的方针办法，是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无论如何要贯彻中央八·二五号召、九·五命令和二条协议，再也不准搞武斗了。要继续加强正面宣传，把武斗搞臭。某些单位、某些个人对武斗没有搞臭，特别是青年人，打了再说。他们方面有，你们方面也有，他们有缺点，你们也有缺点。要进行教育，要好好的坐下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好好启发同志们坐下来文斗。只有文斗才能解决斗私批修的问题，要讲道理，发生了事情，负责人要出来严于责己，做好思想工作。坚决遵照命令，交枪，坚决停止互相攻击的广播、吵架。现在群众不敢讲话，将来老百姓都要向你们要人，不向你们要人才怪呢！结果阶级敌人、走资派高兴得要死。要用阶级观点教育自己的队伍，教育青年。长矛、大刀要毁掉它，万一发生事情处理要正确，不要煽动，要努力克服阻力。即使打死了人，也不能发回击命令。

杜方平同志去北京谈判是中央决定的，如果杜方平同志是坏蛋，还会要他去谈判吗？你们喊“打倒杜方平”，你们这样做法对大局有利有害？把杜方平超过了与江渭清走资派的矛盾，这样搞好不好？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刘锦平接见江苏工总勤务组时的讲话

一、工人阶级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了，应当承认学生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先锋作用和促进作用，这个历史功勋是不可抹杀的，但学生与工人阶级不一样，要领导这场运动，把他们作为领导力量是不行的，有困难的。你们是产业工人，要发挥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第一次，已经进行一年多了，还要进行相当长的时间，工人阶级应起到很好的作用。怎么发挥领导作用呢？领导作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看首先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工人阶级要成为团结的模范，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运动中，工人阶级应当走在学生的前面，走在整个社会的前面。当然，还要有工农联盟，但首先要搞好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消除工人阶级内部的分歧，逐步消

除分裂的局面，这是毛主席对工人队伍的最大信任。工人阶级要有共产主义的伟大气魄和共产主义风格。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旗帜下好好革命。

二、坚决制止武斗，抓好“斗私，批修”的学习，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群众，要很好地收拢思想，下最大的决心，制止武斗。你们在基层多数是掌权的，就要下最大的决心，制止武斗，再不要打仗了，坚决做到消灭一切武斗，要把大刀、长矛和枪支、弹药全部上交，工人阶级要老老实实，百分之百的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做老实人，办老实事。不要对毛主席的指示，对中央的指示打折扣。武斗可能有坏人在挑动。

斗争是会有反复的，运动中有大波浪和小波浪，有大反复和小反复。但是一个个波浪总是向前推进的，向胜利发展的。

在工人阶级内部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执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能盲目执行，不要站在小资产阶级派性的立场上，把非毛泽东思想当作正确的，合乎自己口味的就讲“好啊！好啊！”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明明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也照办，那就不好了。谁用毛泽东思想，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真理，就听谁的，谁不掌握就不能听，这样对革命才有利。

八·二七要打倒杜方平的口号是错误的。杜方平是不是有错误呢？有了错误能改正就算了，要允许左派犯错误嘛！不能犯了错误不分性质就打倒，那是错误的。干部也是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的，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一个大革命，谁都没有经验，出些问题是难免的。有问题要教育，要引导。总理、江青等同志他们一年来作了多少讲话啊，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多少引导啊。学生年轻有冲劲，但也有可能犯错误，要诱导，要反复的教育。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刘锦平接见南京促联方面代表讲话

现在是大好形势，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被革命群众打得落花流水，全线崩溃。江苏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文化大革命必定会按毛主席战略部署进行下去，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领导下，必然会取得胜利，帝修反也好，走资派也好，地富反坏右也好，用极“左”极右动摇毛主席战略部署，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都是不可能的。必然在群众面前失败，这是无疑的，是肯定的。胜利的取得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要胜利，一个要捣乱，必然在一个长时间内有反复斗争。同志们对胜利要有信心，不要光看到表面现象，这里有几支枪，那里有几个弹，这里抓了几个人，那里死了几个人，这些是不是问题呢？是问题。总是要解决的，现在你们三派代表在京谈判，在总理、康生、江青同志领导下。一定会作出正确决定，会取得圆满结果的。但是中央决定能不能在江苏贯彻，关键决定于江苏驻军、各级军管会、军代表、各级革命群众组织，中央的决定必定要人去执行。执行得好，有可能按毛主席的期望解决问题；执行得不好，就不一定在年底内得到解决。我们要求年底内得到解决，年底解决不了，稍微拖长一些时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具体工作：

一、抓斗私批修学习。任何群众组织不抓斗私批修，就会脱离主席路线，背离大方向，就要犯错误，不要搞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用实用主义对待主席指示和中央决定，一定要犯错误。希望促联同志要认识到斗私批修的伟大意义。

二、群众组织负责人要带头学好，头头学不好，群众也学不好。群众组织的负责同志要在本组织开展斗私批修的学习运动。

三、加强组织工作，把队伍组织起来。有组织有领导，有时间安排，现在斗私批修不是光凭大会、游行解决的，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坐下来多做自我批评，敢于和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作斗争，和我字作斗争，和坏人坏事作斗争。通过斗私批修，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去掉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東西。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就坚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就坚决反对。现在有些组织，干部支持我这派，就把他捧得老高，捧上了天，比毛主席还高，简直不象话！不按它主席指示、中央指示办事，而按各派自己的利益办事，会搞坏的。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嘴上讲不行，要见之于行动。

怎样促联，值得研究，大有文章可做，促联不好，搞成分裂。

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不要争席位，三派组织都不应当在其他组织中发展

组织，挖墙根，不要搞山头。促联同志要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要在对方发展组织，不要争席位，有的人要参加促联，要他们在内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促进革命大联合，要起到真正促联的作用。

不要吸收对方组织的人到你们方面，我们要有勇气观察两大派是否贯彻主席思想，要教育群众，帮助他们搞好团结。

南京坏人较多，是蒋介石老窝。别的地方是 1%，南京可能 2%，没有具体统计。你们要把队伍组织好、宣传好。前一阶段你们做得好，他们靠刀枪，你们没有一支，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抓坏人要靠群众，群众觉悟了，情况弄清了，就会得到大多数群众支持。

杜方平同志是老造反派，这是肯定的，有缺点犯了错误。前天我对人讲：“打倒杜方平”是错误的。人民公敌还能到北京去谈判？你们要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提自己的看法。

要搞好生产。八·二七方面有些人被打了一下就跑了，有的人借口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也跑了，你们要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生产上损失很大，停产五个月。南京是开放城市，国际友人多，不仅看长江大桥，还要看工厂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生产不仅关系到我国，还关系到援越抗美问题，支援世界问题，在这方面要多做些宣传。

刘锦平同志讲话以后，促联同志问了几个问题，下面是刘锦平同志的回答：

问：归口大联合单位，群众不愿参加好派，也不愿参加屁派，群众要参加促联怎么办？

刘：在本单位搞嘛，不要参加，具体你们考虑，可以参加活动，不要参加组织。

问：大联合归口单位，八月份杀出来，现在归口还是联合？

刘：最好是归队。

问：社会上有人想搞垮促联怎么办？

刘：谁也不能搞垮谁，谁也搞不垮谁。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刘锦平在省军管会委员会上的讲话

中央调查组来了两个月了，在各地驻军、军管会、群众革命组织支持下，做

了一些工作。但我们任务完成得不够好，有很多缺点。

关于军内的问题：

1. 两条路线斗争教育抓得不紧，干部、战士不够理解。明明是错了，但总感到还是对的，正面的教育少。社会上两条路线斗争反映到部队内部，这是必然的。但是在接受的时候各有各的观点、立场，自己支持的那部分就容易接受。现在部队看造反派的大方向看得少，看缺点看得多。

2. 为什么转得很慢？有的表面上转了，实际上没有转，这是阶级感情问题。有的部队上下都看错了，改得很快。有的是领导上改了，下面跟不上，或者是少数人转过来，多数人转不过来。有的是从上到下都转得很慢，表面通，实际不通。有的不是三支两军的干部，他们没有做社会调查，下不了决心，摇摆不定。造反派对军队的意见主要是取缔了一些革命组织，没给他们平反，平反后又没有认真帮助群众组织抓大方向，中央的东西贯彻得不力，军管会内部支持一派，打击一派。

3. 在某些地区支左部队多了。统一认识不够。

建议：

①加强军管会支左干部本身的思想工作，这是突出的问题。否则群众组织问题就不好解决。现在要集中时间学习最新指示，开办训练班，加强两条路线的教育。

②对群众组织要抓大方向，抓方针政策性问题。这个问题抓好了，其他问题就好了。要抓群众头头的学习，搞训练班，派有经验有水平的人去抓，主要是斗私批修。今后要把工人作为重点抓，现在工人运动还受学生的控制，受学生左右。

③大联合的政策要研究。南京三派不要发展自己的势力，不要争势力，争席位，争权，争是争不来的，而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有人这次带派性到中央去谈判。要相信中央会对江苏问题作出正确的处理。中央的东西再正确也要落实，一个是军管会，一个是群众组织，否则就会出问题。现在是小将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帮助群众组织少犯错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支左支谁，争取谁、团结谁，这是很大的问题，弄不好屁股就坐错了。要用阶级分析，要教育干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自己。要防止新的大规模武斗的发生。总的看来，不大可能。掌握不了，也有可能。要抓一些单位，突破一点，带动全面。要开展一个斗私批

修的群众运动。

军管会在关键时刻要加强团结，发扬民主，该集中的一定要集中，坚持原则，及时改正错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步调一致，不能背后做小动作。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张春桥在江苏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你们感到会开得怎么样？这一个半月大家有些什么进步？还是原地踏步？还是倒退了？你们是如何估计的？你们想家中打还是不打？有的人说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我看就决定于在座的同志。如果大家觉得没打够，就回家去，打够了再说。我不是开玩笑，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你们看过江苏周围的形势嘛，上海比较好，浙江也不错，当然也有些问题，江西打得很厉害，现在形势很好，安徽现在也不错，可以回去了。江苏处在四面包围之中，究竟如何办？你们考虑考虑。

（当方敏同志讲到何朴等问题时）

春桥同志说：赵俊，你有没有这么回事？你可以向中央查问嘛！何朴问题是容易判断的，怎能相信他是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派调查组还能不通过你们？你可以打电话问中央文革嘛！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与中央文革毫无关系么，他到上海就碰回来了么！就让他这样招摇撞骗！

（当丁立平讲到有人乱通消息，说“三代会”已贴出大字报，说康老、春桥同志说的，镇江只有一派是造反派时）

春桥同志说：我至今连镇江有几个组织都不知道，这个问题不要全信，不要看得太严重了，不要搞派性。那天我与安徽的讲话，他们四条就出去了，我说还是我来辟谣，还是你们自己声明作废？他们就刹住了。他派性发作了，没有办法。

（当丁立平讲到赵俊曾指挥造反派抢枪时）

春桥同志说：上海没枪抢的，枪从哪来？一是浙江，一是江苏。

（当吴克明讲到江苏，徐州有人反王效禹时）

春桥同志说：徐州反王效禹同志，南京反刘锦平同志。刘到南京做了很多工作，为什么要反他？！

（当杜方平讲到自己错误性质时）

春桥同志说：三月五日指示时，康老已批评过你，可你并没有改！我看了康

老讲话的记录。

（当杜方平讲到自己有派性时）

春桥同志说：你的派性够厉害的了，不是有没有。1.26 夺权错误非常明显。如果是正确的，那为什么还要军管？军管就是否定了你们么！五月份我在南京讲过了，不要再争论了，要算账的话，算到谭震林、江渭清身上去。当然，两方面都有问题。“三·五”指示就是标准，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具体落实到江苏的几条。我们是搞联络还是搞分裂？是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来贯这个方针的？为什么大方向始终受干扰？按“三·五”指示，都应做自我批评。

（当任亦山讲到现在会议对两派分裂的原因有争论和对支左应如何支未解决时）

春桥同志说：这些问题中央已讲过了，没有解决辩论嘛！这样的问题，当然会牵涉到南京军区不能回避，如孤立地去看问题就解决不了。（南京）军区有（南京）军区的账，省军区有省军区的账，廿七军有廿七军的账。我觉得还是应该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标准，搞自我批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张春桥接见第二十七军首长谈无锡文化大革命

〔时间：下午五时。张春桥同志在京西宾馆接见 27 军王付军长，对无锡市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极其重要指示。军区杜平政委在座。〕

张政委首先说：关于 27 军问题，我准备谈几点意见，不要当指示，只是谈谈个人想法。（杜平政委说：就是作指示嘛！你是我们的政委。）

（一）对部队加强毛主席革命路线教育，张春桥说：“你们二月份取缔革命组织时，对部队进行了教育，犯了错误，部队转过来不容易，现在“626”、“主力军”来了，对部队要多进行教育。

（二）作好工人队伍的工作，先使工人队伍联合起来，张政委说：上海工人联合了，没有谁能影响他的。你们无论如何先把工人队伍联合起来，可先把工代会搞起来。

（三）（提到革与保的问题）张政委说：革与保的关系是有这个问题的，但需要做历史分析。1.3 事件以前，两大派是在革或是保，在非常鲜明。1.3 事件

基本上把保守派打垮了，后来造反派胜利了。原来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有些到造反派去了。情况就复杂了。每个大的组织，都有左中右，就是有坏人钻进了造反派，也要保护群众，把坏人揪出来，我们要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

（四）（当研究如何加强领导时）张政委说：你们可以多想一些办法，也可以学习山西省的办法，搞个政治协商会议。你们 27 军、空军炮九师、人武部和“九·二”、“主力军”、“626”等大小组织的负责人，在一起定期开会，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时间：晚九时，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当总理和康老、春桥同志等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很久未见你们了。

康老：同志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同志们好吗？（众答：好！）这一次到北京来很幸福，见到毛主席了。你们见到几次？（众答：两次。）好多人一辈子没有见过毛主席，你们两个月就见了两次，你们高兴不高兴？（众：高兴！高呼毛主席万岁！）你们见到了毛主席，但有个问题呀！

总理：没联合起来。

康老：是呀！怎样执行主席的最新指示？不然，再见到主席，主席问你们两次见了我，对我的指示怎么样？怎么联合呀？你们怎么回答？所以，今天晚上主要是听同志们谈谈怎样学习主席最新指示，怎样实现的。现在大好形势，江苏也不例外。你们是怎么准备的？什么时候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你们代表团能不能达成大联合的协议？你们怎么打算的？还有自我批评，还有干部问题。来了两个月了，今后打算怎么办？还是回去学习，将来再来呢？还是在这里联合？今天晚上不是来听你们打“内战”，你骂我，我骂你，你攻我，我攻你……。

总理：那听得不少了，听够罗。

康老：要向前看，怎么执行主席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今后怎么打算，怎么搞法？不要辜负毛主席的两次接见。今天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张政委，是不是

这样？

总理、春桥同志：听你们的。

康老：集中到如何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个问题上。你们两次见到了毛主席，参加了国庆，天安门也去了，还听了林副主席的报告。我这段时间比较忙，搞外事工作，江苏的事没有怎么过问。江苏，特别是南京文化大革命发动比较早，南京大学搞匡亚明问题那是几号？（有人答：六月二日。）是去年六月二日。那个时候，四个学校比较早，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大、河南郑州大学。现在在北京早解决了，郑州也解决了，就剩下陕西、江苏。你们开始的很早，但问题解决得比较迟。

春桥同志：南京的工人运动比较早，常州、苏州工人运动也比较早。

康老：河南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了，河南工人要成立工代会，江苏南京要急前直追，也可能后来居上。本来去年十二月份形势很好，是有希望的，后来你们打内战，一直打到现在。

总理：南京工人运动比北京早。

春桥同志：工人组织成立比上海早两天，迟批准一天。

总理：许家屯打电话的嘛！葛忠龙来了吗？在不在？（葛起立答：来了。）曾邦元来了吗？（曾起立答：在。）

康老：文凤来呢？（文起立答：来了。）是老朋友了，见的最早了。

总理：张建山怎么没有来？（文答：没有来，他被打伤了，住在医院里。江苏东方红代表：他现在在家里作报告哩。）什么时候受的伤？（有人答：十月三、四日）现在怎么样？（有人答：刚出院。）那是内战罗！确确实实的内战。

康老：那就多了，一个礼拜也讲不完。现在主要研究怎么搞法。当然我知道你们有一些问题要反映，要解决。军区有些同志来了，在门口说要见首长。我们是什么首长啊？见见罢。当然，大家要说的话很多嘛，可是今天要抓住最主要问题，如何搞好大联合？同志们赞成不赞成？（众：赞成。）现在有些地方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已在考虑建党问题，整党问题，恢复党的生活问题，准备召开“九大”的问题。人家在干这些事，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你们要急起直追。

总理：南大还没有复课？（曾邦元答：有些系，有些班级复课了。）是联合复课的吗？（曾答：还没有联合。）

康老：现在请你们开始谈。

新工总南电红总钱鸿森首先发言。

康老：你是那一组织的？（钱答：属于工总的。）

总理：你是哪个工总的？（钱答：我是江苏工总。）你们江苏工总有什么差别？陈克兴呐？（钱答：他是老工总的。）新老工总都是一个工人阶级嘛。

康老：工人阶级应该联合起来嘛！

总理：应该带头！（钱鸿森和朱士吾表示一定联合起来。）

康老：我等着你们联合起来向毛主席报喜。

总理：两广的工人运动发动的比较晚，现在联合比较好。广州工人联合起来，开了十几万人大会。广西工人也联合了，你们江苏是落后了。（文凤来插话：我们是落后了。）你们不要干涉他们，包括你在内，你不干涉他们，让他们自己搞，你又不是工人。（文答：我们没有干预。）你不点头，他们能联合吗？（文答：我们过去有错误。）

康老：文凤来，这样就好了，我过去支持过你，现在还保护你。

钱鸿森继续汇报，说到北京来还没有联合，感到惭愧时，康老问：你们一天学习几个钟头？（钱答：整个上半年学习，四个小时以上。）天天读吗？（钱答：是的。）是呀，要天天学，我们也是天天学，刚学完来的。

钱鸿森谈到陈永康和八·二七农民代表达成农民大联合协议时，总理问：是全省贫下中农？还是南京的？（好派有人答：全省的。八·二七姜光照答：是南京郊区的。）

康老：是农村包围城市噢！（众笑。）

钱鸿森谈到“打倒许世友”的大会没有开，周总理表扬了时，总理问，表扬你们什么？表扬你们打倒许世友？（钱答：不是，是表扬我们大会不开了。）

钱鸿森谈到促联时，总理问：南大促联头头是谁？（曾邦元答：头头不在南大，他们头头是工人，就在这里——指身旁促联代表。）总理问促联代表：你叫什么名字：（答：叫乐义茂。）哪个单位的？（答：建筑公司的。）你是工人？（答：过去是工人，现在是职员。）

钱鸿森谈到两大派分裂原因时，总理说：一·三事件打垮赤卫队，你们没有分裂嘛！陈克兴同志是老工总的吧？来了没有？（有人答：没有。）

当南电“烈火”朱士吾表示要和新工总联合时，总理问：你也是老工总的吧？（朱答：是，现在是八·二七的。当初赤卫队要砸烂我们的狗头，我们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你们是一个工厂的？（朱答：都是南京电子管厂的。）你们就可以联合嘛！（朱答：我们和钱鸿森同志原来感情很好，我们工人阶级在大联合中应该先走一步，我们两家倒旗联合起来。总理鼓掌，全场鼓掌，众呼毛主席万岁！向工人阶级学习！）你们的生产怎么样？（钱答：生产基本上正常了，但还有困难。有人插话：基本没生产。）这个责任在谁？你们南京电子管厂，是个很重要的电子管厂，军管了没有呀？（有人答：军管了，现在瘫痪了，没有用。）

钱鸿森谈到对八月形势估计错误时，总理说：不只是你们南京，北京有影响嘛！（有人说：北京去了两千多人。）

接着，文凤来检查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时，康老说：对了，南京的同志第一个上天安门的是你，是去年八月十八日。

总理问：从三·五到现在，你们批判走资派的东西有多少？（文答：也写了一些，对刘邓的东西主要是转抄的，对江渭清的批判也不够，对刘少奇在盐阜地区的罪行做了些调查。）那是调查组，批判了没有？

康老：你们对匡亚明批判的怎么样？（文答：没有很好批判。）这个人很坏，很不简单，写过好多书，你们要批判。如果你们批判的话，我还可以帮助你们一点。你们一搞匡亚明的时候，我就说可以登报。他还给我一封信，说小将说话不算数，说学术权威还没有讲话哩！这个人的问题很多，他还自首过。无论思想上，组织上，你们批判他很有油水。文化大革命一起来，镇压你们，不是偶然的，我认为是很正常的。

总理问文凤来：军管会大楼是不是你们占了？（文答：没有。）联络员说有嘛，还有揪许站也是你们的吧？（文答：已经撤了。曾邦元问：红四联住在里面没有？对中央首长老实一些。文答：只占了几天。葛忠龙：我们是被八·二七打出来的，去军管会解决问题的。有人答：是徐州支派占的。）徐州来了没有？（有人答：没有。）

当曾邦元汇报，谈到九·四协议后，武器没很好收交时，总理问：南京武器收交情况怎么样？（张政委：收交情况不好。杜平答：收得很少。促联代表：只上交了百分之十五左右。好派代表姜继敏：有的不但不收，军管会还在发枪。）

总理问好派：你们封存了吗？（好派有人答：封存了。）是不是封存了？（好派有人答：我们查一查。曾邦元插话：在总理面前应该讲老实话。姜继敏说：十月七日，我们港务局的船到上海经大桥时，大桥开了三枪。）

总理问：南大八·二七回南大没有？（曾答：多数回去了。）在大桥的人是不是都回去了？（曾答：有的回去后又被打出来了。好派郭公举插话：梁辑卿叫他们不要回去，有三点黑指示。）你们比梁辑卿还清楚？一边说梁辑卿，一边说杜方平，是吧？

康老：那是什么时候？（葛忠龙答：九月二十三日。）九月二十三日，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还是谈谈主席的指示，今后怎么办？（曾邦元说：如果说梁辑卿这三点指示是给我们负责人讲的话，我可以说完全是造谣。）人家的缺点，让人家自己讲嘛，你们就一点缺点也没有吗？要多做自我批评嘛。

总理：刚才他们讲了，讲了。

康老：要讲怨气，大家都有，要多做自我批评，多谈谈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联合的可能？

当曾邦元谈到复课闹革命，倡议南大的曾邦元、文凤来、张建山、袁服武都回校时，总理说：对了，这个意见很好！你们都回去复课闹革命。文凤来、葛忠龙你们同意不同意？（葛答：我同意。文答：我坚决同意。）你们一同回去。曾邦元同志，在南大你们是多数派嘛，你们要欢迎他们回去，回去不要打罗。（对文凤来）你们不要带枪回去。回去以后批判匡亚明，批判江渭清、彭冲，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江苏要搞的人多呢，应搞出一点成效来。工人让他们自己搞，电子管厂的工人要带头联合起来，你们同意不同意？（众：同意。）

康老：我告诉你们一个情况，你们南京和西安一样，工人起来很早，但是解决问题很迟。为什么分裂到现在呢？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干扰工人。你们两派都有这个问题。上次我跟西安讲了，工人首先要做模范，应带头执行主席的路线，响应革命大联合的号召。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嘛！总理讲了，电子管厂可起个带头作用嘛！你们就先在这里达成协议。代表和群众结合起来，这是个经验，上海革命派为什么联合得早，就是上海工人阶级带了头。

曾邦元谈到杜方平等人要彻底检讨交代时，总理说：他们要检讨交代，但你

们南大自己可以先复课闹革命，他们保卫你们，不要挑动武斗，现在你们不是需要他们保护，而是他们不插手就好。你们回去斗匡亚明，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嘛。

康老：他们不要插手，高啸平也不要插手。（八·二七代表：高啸平已回统战部了。红总代表：回去几天又跑了。）你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曾邦元讲的群众自己先联合起来。

曾邦元谈到双方都要摆脱外界的影响，首先要摆脱阶级敌人的干扰时，总理说：是呀！要把一切仇恨集中到阶级敌人身上，首先对准敌人，集中到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集中到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坏人，要把自己的队伍清理一下。要去斗江渭清、彭冲、匡亚明，南大首先做个榜样！我看问题就会解决。

当促联代表冯祥源汇报谈到放松了敌人时，总理说：是呀！走资派养得胖胖的，没有人斗，是你们没有触及他们的灵魂嘛！

冯祥源谈到促联为了大联合，随时准备解散自己组织时，总理说：先联合，不一定马上把所有旗帜倒下来，那是最后的理想，名字不一定马上取消，可以待下一步。如果大家都觉悟到了，取消更好。现在有许多地方，先基层联合，自下而上，一个车间，一个工厂，一个系统联合起来，成立工代会。以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为方向，斗私批修为纲，实现革命大联合。现在先达成几条协议，作为联合的基础，纲领。各省的协议你们可以参考嘛，最近广西十条很好。看谁执行协议最好，谁执行得好，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只要真正执行了，不管是偏保的，还是激进的，都是好的，就上来了嘛！只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或犯了错误的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原来革命精神旺的，现在不执行协议，那就落后了嘛！以毛主席指示为纲，先达成一个协议就好，有个共同纲领，不然没法考验。左派不是自封的，要在斗争中考验，造反派组织要时时刻刻接受考验。

冯祥源谈到南京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决心为促进两大派大联合而努力时，总理说：你们是促联嘛！说他们两派都是革命组织，我们三·五指示也是这么说的，没有分高低嘛！他们两派打内战，你们分出来了，搞了一个三角鼎立，分成第三派。（好派代表：促联大量发展组织。）你们是否派性发作？他们两派有私字，你刚才不是说自己也有私字吗！要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斗私批修嘛！只要把私字去掉，这并不难嘛！你们主观愿望是好的，要注意方法。你们不要认为你们去号召他们联合，他们就听你的了，不那么简单吧！人家批评你们，

对的就要接受。你们再不联合，那就困难了。南大能不能先做出样子来啊！

江苏东方红代表李凤鸣汇报，谈到对好派方面的发言表示欢迎时，总理说：这很好嘛！（李说，但是我有一点怀疑。）你表示欢迎，我们很高兴，你这一个怀疑就不对了，不能怀疑。事实是两派都打了架，都有死伤嘛，应该把仇恨集中到走资派身上，坏人身上，不仅南京有死伤，无锡、苏州、常州等地都有，已够多的了。为什么淮阴没有打？（有人答：十二军在那里支左好一些。有人说：最近也打了。）为什么现在还打呢？恨要恨在敌人身上，恨在特务身上，不要互相埋怨，要往前看。（李说：好派方面对达成的很多协议没有很好执行。）你们是不是都执行了？（李答：我们比较好一些。）不要比了，我们不评功摆好，你们也没有很好执行嘛！（李答：对，但是……）不要：“但是”了，一个“但是”，一个“怀疑”，就难联合了。你们要看着南京。它是首府嘛！大桥那一枪，哪一个打的？（李答：我们查一查。姜继敏插话：是八·二七打的。）不要你说了，刚才你说，我不是听到了吗？我一说，你就火上加油。（李说：八·二七有人被刺杀。）这次大革命要有一点牺牲，有一点代价。

康老：是有坏人，不要提得那么高，有时是一个组织搞的，不要把一派组织说坏了，遇到这种事要冷静。一方面打死人要负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不要拿这个来扩大分歧，打击另一派，还是从大联合着想。执行协议，不能一签了字，一切都好了，执行是有个过程的，有曲折，你说他不执行，他说你不执行。思想上要有个准备，协议是联合的开始，不能认为一签了字一切全好了！你们九月四日协议是这样，各地都是这样，再努力就好了嘛！

总理：互相打起来都有死伤，打起来没有好拳，骂起来没有好言。是走资派挑动的，恨要恨走资派，要恨阶级敌人。有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看清，主观上还以为是革命的，群众有些误伤，这样被打死了当然是可惜的。这场大革命，一点代价不付不可能。这次代价最小。江苏武斗是比较多的地方，上海就没有那么多。大家想一想，三年解放战争付出了多大代价！抗美援朝战争将近三年，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也要三个年头，我们能一点流血都没有？阶级斗争嘛！有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嘛，我们内部也有阶级斗争反映嘛，免不了失手错打了人，有误伤。这种事要分成两类：一是打群架，打起来总会互有死伤。两派都打了，都不要怪对方。

另一类是专门打人，用武器杀人，凶手，当然要抓起来交专政机关处理。（曾邦元说：搞暗杀的也要抓起来。）暗杀更是那个了，当然不行。（有人插话：有的被活埋了。）活埋，一定有坏人在背后出坏主意，安徽就有，是阶级敌人插手。象你、我，会去活埋人吗？把仇恨集中在阶级敌人身上。内部团结了，就找到出路了。现在，常州还在打，很紧张，铁路又不通了，沪宁铁路经常停车，上海、金华那边都通了就是常州这个关口过不去。我要向你们呼吁！今天请煤炭工业部，铁道部的同志也来了，今天晚上谈不到常州问题了，联络员明天给你们安排一下。现在淮南煤矿的煤运不去，你们那个关口过不去，影响上海冬季生产，影响整个五年计划。毛主席号召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你们要认真执行嘛！（周锡禄插话：那些群众是受蒙蔽的，群众无罪，帐要算到江渭清，陈光，李士英一小撮走资派身上。）对罗！这样讲就对罗！

康老：落实一下，刚才总理讲了，希望你们南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新工总，老工总，促联的工人（曾邦元插话：工人组织还有八·二七，东方红的），都在北京达成一个协议。你们是代表嘛！你们能不能达成协议？（众答：能。）你们促联代表同志同他们两派代表研究一下。（促联代表：坚决按照中央首长指示去做。）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这是一个结果，要实现这个结果就要很好落实。

今晚听了南京的汇报，现在时间已十二点半了，我们还有事情，今晚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作了自我批评，开始活学活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中的最新指示。能不能大联合，先靠自我批评，大家都做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就是批评自己，各人在工作中有缺点嘛！钱鸿森同志发言中说自我批评以后心情就舒畅了。听了你们斗私批修，努力实现大联合，我们觉得心情也舒畅。根据今天的会议情况，我们这个会议还要开下去，明天不可能了，广西要开会，大概在礼拜一或礼拜二开，继续听同志们的意见。

我还告诉同志们一件事，供同志们参考。最近。我们接到云南的一个电报，报告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经验。他们在自我批评中斗私批修，打掉派性，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以便促进大联合。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检讨了有八条。这八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很好。我在这里向同志们介绍一下。第一，以势压人。就是以自己的力量压制别人。特别是在一个城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人多的那一派要注意。我在青岛听到机车制造厂有人自我批评说“我们有大国沙文

主义”，就是说的以势压人。第二，唯我独左。就是我们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其他都是老保，以我为核心。这不是主席批评了吗，是最愚蠢的！第三，对干部你打我保，你保我打。反正从派性出发，（总理插话：这恐怕对你们有点写照吧！）第四，自己不作自我批评。讲是讲了，是叫人家作自我批评。第五，从派性出发，对干部也好，对群众也好，谁支持我，我就结合谁。是派性，不是毛主席路线。同我的意见一致的结合，不大一致的不想结合。第六，报复主义。你搞我一下，我搞你一下。第七，学习毛主席著作只针对别人，不针对自己。第八，对人家光看缺点，对自己只讲长处。这是比较普遍的。他们检讨这八条以后，原是按派系组织学习班，以后联合起来组织学习。这是云南一个地方（下关）的经验。主席看了很好，比较简明扼要地把派性，阻力检讨出来了，希望同志们作自我批评时参考。

此外，今天晚上其他地区不能再谈了，各地区，无锡也好，常州也好，希望准备一下，下次讲时扼要地讲，根据主席指示讲。总理讲向前看嘛，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搞大联合。困难是有的，但一定可以克服，都是革命同志，工人阶级内部没有势不两立的利害冲突嘛！

总理：刚才军区来的二十一位同志在门口要求接见，我们准你们进来了，但要告诉你们一条，你们有意见可以到军队会议上提，但不能到地方去串联，不能把它带到地方上去扩散。军事院校的同志应该回去搞斗批改，你们到处扩散就不好。军区，军事院校不干涉地方，地方也不介入军队，这是军队的事情。中央早有指示了。（军区同志：我们要求参加京西宾馆的会议。）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参加军区的会议，有意见在那个会议上提，你们要守纪律。你们遵守不遵守呀？（答：遵守，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希望你们不要到西苑旅社去扩散。（曾邦元插话：也不能参加地方武斗。）对罗，更不要参加地方武斗。（军区同志有人讲：我们司，政，后的代表也都到了。）你们都参加军队会议，不能挑动武斗，你们要守纪律。联络组同志要注意监督。你们有些人好象见过面的，护校七位同志来了没有？（答：到了。）这本来是张政委讲的，我代他讲了。

还有两件事要查一查：第一，刚才查了，军管会的房子确实占了，有好派的人，还有洪泽踢派的，怎么洪泽踢派又是好派的？（好派代表：不是我们的。）你们查一查嘛！第二，刚才讲的大桥开枪，也要查一查。一切事情都要认真，负

责到底，不马虎，不要认为自己方面犯的错误就不认真查，别人犯的错误才认真查。要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一切事情要认真。越是自己犯的错误，越要抓到底。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当扬州代表要求扬州首先达成一个协议时，总理说：由联络员帮你们搞。当常州代表要求首先就铁路问题达成协议时，总理说：你们两派研究，由联络员推动。常州铁路不要与地方合在一起，明天铁道部与你们一起研究。

康老：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

在热烈掌声，口号声中，总理，康老等首长退场。

（江苏省军管会革命委员会整理）

8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中央首长对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的指示
〔周恩来、康老、姚文元、杨成武、吴法宪接见了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

康老：

特别是最近六条，就是十一月十四日哪个指示的六条，要很好的研究一下，学习一下。另外方面，犯了错误的同志要自我检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也要帮助人家检讨，让人家作检讨。自己多看自己的毛病，犯错误的同志可以理解的。不是林付主席八月九日讲过了嘛！大家没有经验嘛！你们那个决定说要学习我对安徽军区机关造反派的讲话，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记的，我在你们江苏会上，也讲了许多司令的好话嘛！我看了严光的检讨，我保了他了，我看他的检讨没有你们好。军队犯错误，领导同志犯错误是可以理解的。

南京工人为席位问题达不成协议，什么九九五、五五一堵住啦？协议就达不成了。可不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达成协议？我看可以，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就把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放在一边，达不成协议，这是不对的嘛！代表应该推动群众联合，群众是要联合的，不联合，头头就要脱离群众。联合达不成协议，制止武斗达成协议嘛！一个个地来嘛！可以协商解决嘛，就是人头数达成了，还有一个人的问题。二二一，三三一，这只是抽象的数目。你提出的三个人当中我已赞成两个人呐，这一派说那两个人很好，那一派说这两个人不好，宁夏就是这样。一方面死保，一方面死打，你打我保，你保我打。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固定数目也是不行的，各个地方具体情况不一样，要灵活些，

有些地方这一方面多一点，总的几条是不行的，三三一有些地方恰恰是那一个的地方人多呢，所以单订那几个数目还不能具体解决，大家应该很好地学习一下。

二十一位同志也好，住京西宾馆的同志也好，包括总理、姚文元同志、杨成武同志，我们也好，也是天天读的，每天读两个半小时。每天下午五点半到八点，都坚持学。（总理插话：是雷打不动。）为什么约你们八点钟才到这里来，就是我们要学习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你说大家没有事情，大家都很忙的。来京的同志也好，上访的同志也好，我们是天天读两个半小时的毛主席著作，你们应当超过我们才好，你们年青嘛！天天读是林付主席、解放军提倡的，我们就是跟你们学的嘛。

姚文元：

毛主席已经三次接见到北京来的军队同志，伟大领袖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我们应该体会到主席的这种心情。我们应该用实际行动来回答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

康生：

主席在九月廿六日接见了学习班的同志，那时主席视察回来，就是在这个楼的底下，接见湖北、河南几个省的。主席是晚上来的，很晚来的啊。周总理在讲话，来了我们都不知道，主席那么关心我们部队同志。这是第一次接见。第二次在人大大会堂接见一万多人，前天又接见了一万多人。主席那么关心我们，我们不要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主席、林付主席在天安门接见，都统统地去了，犯了错误的，和没有犯错误的，都统统地去了。

总理：

你们明知许世友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一月以来多次……许世友同志讲话。同志们知道，主席、林付主席讲了，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哪一个没有一点缺点！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有缺点嘛！但他是忠于毛主席的，这是大节嘛！当然，你们 21 个人年青，我们不怪你们，但是你们有些老同志嘛！

康老：不要听信谣言。

杨代总长：主席讲：许世友在延安没有反对过我嘛！

总理：四方面军的事情，那是张国焘指挥他们东杀西打，下面不负责任嘛！

罗瑞卿为了制造分裂，把张国焘问题扩大化，利用这个制造派性，把许世友同志关起来了，是毛主席放出来的。他性子暴，说几句错话，好训人，但是他不是江苏刘邓的代理人，江苏的走资派是江渭清、彭冲、陈光嘛，还有其他的，不是他嘛。

康老：许世友同志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这是一个大节嘛！你们的“决定”，实际上是针对他的嘛！他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从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看，对干部要全面看，从历史看，看大节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总理：大节好嘛！我们敢于出来保他，就是看到他的大节好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人民大会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当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以及谢富治、吴法宪、叶群等同志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总理说：同志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十一月十八日到现在快一个月了。一个月来，你们在集中学习，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取得初步成绩，加上有军队的同志在这里开会，还加上穿插其他的事情。军队的问题，连队内部讨论解决，地方不要介入，只在军队内部讨论，不向你们宣传。这样，有利于军队内部解决问题，有利于搞好“三支”“两军”工作，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江苏有几个组织已达成了几个协议，有的签了字，有的还有待于落实，有的还没有签字，但总是件好事。十一月十八日接见后，首先是南大达成了四项协议，只是在组织上，人数上还有一些争论。这些都是小事。不管几个组织，不管一个组织几个人，也应参加大联合。当然，不管多少组织，大致都是两派，大多数是因为夺权分裂成为两派的。总的两个名称，一边是支派，一边是踢派，或者一边是好派，一边是P派。长江下游都是如此，安徽如此，江苏如此，浙江也是如此。最厉害的是苏皖两省，安徽也受江苏的影响。因此，希望江苏的问题在这里尽早地解决好，带个头嘛！从去年十二月中央就注意了，整整一年了，乱了一年了嘛！闹到相当程度了，最近又出现了武斗。你们是不是都读了李文忠的报道？曾邦元同志你读了没有？（答：读了。）李文忠妻子王邦敏的那篇文章，我想只要读了

这一版的同志还有什么私字可谈呀？你们想一想，李文忠、李从全、陈佃奎三个人是多么光荣的支左爱民模范啊！李文忠是山东人，李从全是安徽人，陈佃奎也是山东人。（康老：这个部队原是华东×××军的，现在在江西。）不但他们三个人，前两人的妻子都写了文章，真正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们的哥哥和弟弟都跟上去了，改了名字，李文忠的弟弟改名叫李文红，李从全的哥哥改名叫李从卫，陈佃奎的弟弟改名叫陈佃兵，一个是二弟，一个是哥哥，一个老四，三个都到那个排里去了，接上枪。这样忘我牺牲，全家都是如此。我本想读一遍给你们听听，现在时间不够。我不相信你们每个人都读了。如果读了，我向你们致敬，因为我今天才读的。连队同志读了？（答：读了。）你们司令员，政治委员们读了没有？这是眼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模范，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他（指李文忠）提出几句话是怎么说的？（众答：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好啊！我们大家都要照这四句话办。他们是模范，我们都要学习嘛！

南大协议首先达成，就因一个组织问题不能达成协议，希望你们两派头子很好地商量，我期待你们。曾邦元来了没有？（曾：来了。）文凤来呢？（文：来了。）你给我的信我收到了，信上的态度是好的，希望你们好好达成协议，首先南大达成协议。南大，南京受你们影响，甚至全省受你们影响。（文凤来：坚决照总理的指示去办。）南大是带头的嘛！上次康老讲了，去年开头是四个大学，为什么还这么落后呀，不应该嘛！要继续起带头作用嘛！现在形势不同罗，你们头子都要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进行斗批改，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南大的斗批改，搞出成绩来。你们受过害，你们很清楚，应批判得更有力，你们应回校搞斗批改。你们都回学校，都从工厂回来，让工人自己达成协议；从农村回来，让贫下中农达成协议；从外县、市回来，让外县、市自己达成协议。都要起这样的推动作用嘛！这一点，我希望十一月十八日首先响应的南大带好头。

没有几天，快一个月了，到年底只剩半个月了！江苏问题总要争取在年内解决才好嘛！还要过一个年啊！葛忠龙来了吗？（葛：来了。）你就是去年年底来的嘛，去年在这里过了一个年，你还要在这里过年吗？（葛：不能了。）张建山来了吗？（张：来了。）哦，来了。你们同学两派原来都是受压制的，受彭冲，匡亚明压制，一起杀出来的，共同战斗的，现在不能联合在一起，不可设想嘛！

第二、扬州两派达成协议，有决心实现，我们祝贺你们。（康老：听说家里人说你们修了，不要怕！）你们在毛主席身边，是按毛主席最新指示办事，怎么会修呀！相反，你们前进了。

第三、南通达成了一个大联合协议，家里不放心，又派了代表团来，后来也同意了，回去做工作。等会你们说一下。

第四、无锡双方搞了一个重申十四条，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如果确实落实的话，那就是一大胜利。无锡是闹得很厉害的地方。

常州也达成制止武斗保证铁路运输畅通的协议。我们印了几份。我们也议了一下，有的可能不容易执行，比如日期定得很紧，如说两天，四天内怎么办啊！时间太短了不能执行；有些是不应该写在协议书上的。我们联络组的同志可以向你们建议修改一下。常州能够达成协议，也是一大胜利。常州是江苏的一个关键，铁路经常不畅通，影响沪宁铁路运输。

除了上面五个、第六个正在推动的是南京工人阶级三派的联合。

康老：上一次，我没有弄清楚，南京的工人到底是几派？（答：三派。）

总理：就三派，好派、屁派、促联。（曾邦元：上次康老讲，新、老工总，促联工人联合起来。南京还有八·二七、东方红工人，有人就认为不要联合这些组织中的工人。）

康老：我们讲话还要都点出名字来啊！还是要按主席最新指示，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嘛！组织的名字可多了，广东的名字一列十几个。

总理：就是讲三派联合嘛！组织可以有很多名称，广东就有十几个组织，名字多呢！广东都联合起来了嘛！现在还是广东工人联合有成效。他们有海员罢工的光荣历史，先是海员工人联合，后来铁路联合了。工人有革命传统嘛！应当领先嘛！

康老：就是按照主席指示的办，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总理：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两派嘛！都是造反的，有先进一点的，有缓进一点的，但也会有变化嘛！有的在这一个问题这一点上做得对，有的在那个问题那一点上做得对，现在就要看他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执行主席最新指示，执行协议来考验。实现革命大联合并不难嘛！开步走，搞几条条，全面的也好，不全面的也好，达成个初步协议，就有个标准嘛！南大、南通、

常州、无锡、扬州，已有了五个协议，还有一个南京工人阶级大联合协议，用什么名义不是主要的，各派工人阶级大联合协议或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协议，名字嘛！没有什么嘛！今天见你们一次，来推动你们。首先希望南京作出榜样，来带动全省。南京是江苏省会，是省军管会所在地，是大军区所在地，文化大革命又是开头闹起来的，希望南大四条协议落实，南京各派工人阶级组织达成协议，带动全省。南边是无锡、常州、苏州，北面是南通、扬州。南京带头，达成协议，就可以影响徐州嘛！徐州也是受你们的影响，一个是支派，一个是踢派，对立得很严重，现在武斗还很厉害。徐州的问题与江苏有密切的关系。我开头就说这几句。南京上一次说过啦，现请其他地方先谈。常州达成制止武斗保证铁路畅通协议，是个好题目，那就请常州的同志们说一说吧。话不要长。

康老：希望同志们讲话，紧跟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怎么样达成协议，特别是今后怎么样紧跟毛主席的指示。现在有些进步罗！可见同志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最高指示有进步罗！是全国大好形势鼓舞的结果罗！是同志们学习努力的结果罗！向好的方面走，是好的罗！但是，进步还不是很快的，主要是派性还没有完全克服。现在希望摆共性的东西，共同的东西，对怎么样促进大联合多想一想。

（先常州两派代表汇报，接着扬州两派代表汇报。当扬州有的同志谈到军管会人员都跑了时）康老问：是不是你们打了他们呀？（有人答：不是。有人答：有人冲了军管会。）是呀，总有原因嘛！要不他们怎么会跑的。

有的同志汇报开庆祝签订协议大会发生武斗时，康老说：各地区有个经验，达成协议以后，各派自己内部先把思想统一好，先把思想搞通，不要急于先开大会，一开大会就容易打架，好多地方就是这样，心情一激动就开会，一开会就打架。

当扬州一工人同志汇报时，江青同志问：扬州有多少人口？（答：二十多万。）有多少产业工人？（答：六万多。有人答：不超过三万。）你们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左右形势？工人阶级应该带头嘛！现在看起来你们还是学生在那里左右形势。

周总理问了扬州有哪“九大总部”后说：九个总部不相称嘛！工人总部只有一个，机关总部就有两个（市、地机关两个总部），你们应该工人起主要作用嘛！

工人对协议的态度怎么样？（有人答：思想工作还做得不够细，有的执行不够好。）你们收武器了吗？（答：还有一部分。）

总理对一位代表同志说：你们在工厂是多数，应该有责任欢迎少数回来，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你们要高姿态。高姿态，这是主席讲的嘛！工人自己要站出来，不要学生干扰嘛！

康老问：你们有枪没有噢？（答：有。）你们有枪，人家怎么敢回去呀？你们刚才讲要交枪是好的，人家不交枪，你们先交嘛！大家都交。

总理对扬州鲁大的一工人同志说：要按系统归口搞联合，学校要复课闹革命，学校的工人同志总得按系统服从复课闹革命嘛！你是学校系统的嘛！你到北京几个大学访问访问，北京大学就有一千多工人嘛，他们是服从学校复课闹革命的嘛！不然那样搞就乱了，你们那个组织问题回去研究一下。

总理说：扬州的协议是达成了，你们说关键问题是军管会没有管，好罗，我问一问，军管会如回去领导运动，监督协议执行，你们支持不支持？（有人答：支持，只要他们改正错误。）

总理对一个同志说：你要么责备对方，要么责备军队。军队同志犯了错误，就是犯了严重错误，他们自己批评嘛，你们总不应该把军管制度冲掉！（有人说：军管会一个人找不到。）你们冲掉了嘛！你们的问题主要是要执行协议，首先是工人要联合，学生不能支配一切。扬州学生尽管不那么多，但是影响很大。刚才江青同志提醒这个问题，工人多，学生不多，还是学生控制工人。学生要复课闹革命！

当双方有几个学生还争论时，总理讲：不要讲了，你们还是对立的很厉害，就是你们这几个学生对立的很厉害。

当无锡有的同志谈到对方抓人未放时，总理指示王挺同志说：王挺同志请你直接打个电话回去，双方抓的人要一律放，不管那一派通通要放，限在今天二十四小时内双方放人，都要坚决放。你说这是中央的命令！

康老：一方面打电话，一方面你们各派自己检查。

总理：伯达同志给我一个条子，叫我代他讲一讲，他的话，你们听不大懂。他发现各省许多群众组织系统有一个问题，跨行业的组织是个大杂烩，一定要按照系统成立组织，如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总是要按系统按口子成立组织，

不要跨行业，跨行业谁也管不着谁，都用这个名字，谁对谁也负不了责任。要改变，还是要按中央的指示办，按系统按行业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学生成立红代会，学校少的可以大中小学一起成立红代会。总之要按系统，按行业，不要跨行业。你们南京八·二七，工人也有，学生也有，学生还是回到南大去，工人同工人联合。这是第一。第二，伯达同志还讲，他说，派性是一条大毒蛇，谁要被这条毒蛇缠住，就要被它咬死。派性发作，私心杂念重重，派性是条大毒蛇。

李文忠同志充满了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无比热爱，他是这样，全家也是这样。读了这个报道，有什么私心杂念不可抛弃呢？李文忠全家，他们这样子前赴后继。刚才说，一个老二，一个哥哥，一个老四都参军了，这样的人民解放军还不应该学习嘛！我们应该向解放军学习嘛！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军队。我们应该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个别领导同志有错误，在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经验嘛，错了，他会改的嘛！有错误改了就好嘛，这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应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嘛！

在江苏，我看拥军爱民成为关键问题。各革命群众组织，P派也好，好派也好，不管哪一派，都要拥军，矛头不能指向解放军。军队同样要爱民，支左不支派。私心杂念要去掉，毒蛇就不会缠身了，你们现在一讲就是对方不对，军队不对，完全是个派性嘛！你说我，我说你。江苏是个工业发达的省份，不仅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都有工业，不是一般工业，是重工业，大工业，有不少产业工人嘛！工人要带头嘛！工人应该起来领导嘛！象上海工人阶级那样，上海就是工人阶级领导夺权，形势就大好了，推动了全国。我们北京也向上海学习嘛！不要受学校影响，工人同志应该懂得这个。

康老：你们（指受压制的）受了一些压抑，讲话有些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你坐牢九十天，讲起话来有些偏激是可以理解的。特别对方也应该理解他们的这种心情。但是不管哪一派，两派都有受了压制，受了打击，或者是逮捕，凡是有这种情况，自己应该从另方面想想，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不是直线的，搞革命总会遇到挫折、打击，甚至坐牢，冤枉，甚至于流血，这是革命中常有的。共产党员要有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气概，坐牢也可以锻炼自己嘛！况且对方也不一

定是坏人，应该说大多数是阶级弟兄犯错误，是一时犯错误。军队的错误也是一时的错误。或者自己有错误引起的。自己一定要解脱这个东西，不要因一时的错误就想不开。要从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方面去想，还要向群众解释，做好别人的工作。这样就容易解决了，就不会有报复主义，就不会有怨气，可以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群众组织使用电台时，总理说：私设无线电台，搞无线电报话机，广播机，控制长途台，搞电话窃听，都是犯法的。我们警告了不听，也不取消，那就是反革命了。以后再发生我们就要依法逮捕。现在警告你们，各个组织都打电话回去查一下，还要如实向联络组报告，过去搞了那些，要检讨。今天是十二月十五号先宣布，今后再查出来，就要以反革命论处。邮电不管那一派控制都不能偷听，铁路要军管，邮电系统也要军管，不管你那一派，都要和社会上脱离组织联系。

康老：我同同志们讲，这一个问题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已有命令公布，各地方都要彻底检查，已经宣布了，这件事情，不是开玩笑的，是犯法的。特别是电台罗！有的电台，还有人编密码，就更严重了。再发生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使用雷达那就更严重了。

总理：联络员把两个命令拿来，在大旅社宣读一下，不仅江苏，还有其他省。现在各派自己检查自己。

康老：现在我们讲了，你们不要再抓住别人的辫子去发展派性。

总理最后说：从这三个地方汇报看出来，也听出来了，协议定了，本来应该很好执行，但总是受到干扰。一个就是没有按系统联合，一个就是学生去干扰。如果不是工人阶级首先按系统联合起来，协议执行就有问题，只要一个学校干扰，就会影响工厂。如工厂联合起来，就不会受干扰了。各省都是这样，江苏也是这个问题。我记得十一月十八日的号召，南大很快达成协议，提出退出工厂，但实际上这个协议没有实行。南大八·二七还到各县去串连嘛！上次说了，不要到工厂串连，也不要到各县串连，现在要停下来。一个学校不能包办。文化大革命开始串连是对的，那是起了带头作用，破旧立新嘛！立下了丰功伟绩！这我们是忘不了的，在文化革命历史上要大书特书一笔。但是到了今年，情况不同了，夺走资派的权，应该以工人为首了，上海就带了头嘛！如果运动的领导者是学生，就

不稳定，就会摇摆，最容易受社会思潮影响，出现无政府主义思潮，派性发作，忽而极左，忽而极右，就不能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江苏之所以拖到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现在看的很清楚。南大协议，首先达成，希望南京大学做个表率，协议要执行嘛！你们是受过压制的，你们回去，你们的贡献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和你们都个别的谈过嘛，如果把手伸得很长，又要管工厂，又要管各县，就象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北师大等五大院校要管全国，手伸得很长，结果自己管不了自己，还得收回来。

康老：想管全国，全省，连自己都没管好。

总理继续说：北大两派，清华两派，北航不止两派，现在三派了。我劝你们南大在八·二七的光荣旗帜下联合起来，这就是对江苏的贡献了。南京的两派，现在是三派，要真正把自己联合起来，推动全省。

常州应该把协议修改好，戚墅堰铁路机车车辆厂与地方分开，单独搞个协议，树立个样板。扬州工人虽少，但总比学生多，不要被学生支配。师范学院你们叫鲁迅大学也好，都要复课闹革命，建立红代会，职工搞工代会，农村搞农代会，按照中央十月十七日通知，按系统大联合，不要去干涉地方上的事情，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以斗私批修为纲，特别是要斗私批修。你们在北京听得很多了嘛！报纸上也介绍很多嘛！我想到今晚上是江苏开会，就读了报纸上关于李文忠这一版报道，我革命四十六年，读了还是很受感动，要向他们学习，难道你们就不感动啦！（康老：那真正是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李文忠同志和他的一家，确实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你们搞文化大革命，不向他们学习，向谁学习呀？！要首先责备自己，自己总有错误嘛！我希望今年年内解决，南京也好，常州、无锡、苏州、扬州、南通也好，都要做出榜样来，那能拖这么长的时间！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嘛！军队一定要把军管搞好，铁路，交通都要实行军管。港务局无论如何要军管。如果你们认为军管有的人不行，我们可以换人嘛！（有人答：服从军管会正确领导！）但你们一定要服从军管。军管会的威信一定要树立起来。毛主席，林副主席派的人，权威一定要树立起来。一定要把军管会的权威树立起来。明天我再找部队少数人谈谈，军管会没有权威怎么能行？！搞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没有军管会这个桥梁怎么行？！能靠你们一派领导？！

总理问曾邦元同志：让你当省长行不行？（曾答：不行，要向工人阶级学习。）

康老：南大两派的同志们，你们要想在全国发生一点影响，在全省起一点作用，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紧跟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把你们南大自己搞好。这是唯一的一条。如果你们想管全省，结果越搞越坏，威信越来越低。

当有的同志谈到要与外县基层组织脱钩问题时，周总理说：铁路交通系统要脱钩。但你们笼统的提脱钩也不行，还是要工人阶级一个地方，一个单位觉悟起来，组织起来。

康老：要脱钩，先要挂钩。各个单位，各个系统首先要把钩挂起来。本单位的两个钩子不挂起来，那两个钩就要向外钩嘛！不解决这个问题，不搞好大联合，就脱钩，这个钩是脱不掉的。

总理：铁路系统，交通系统要脱，各地工人要联合起来，多数的要欢迎少数的，象解放军欢迎新战士一样欢迎他们回去。因为都是阶级兄弟嘛！有缺点各自作自我批评嘛！简单的说脱钩，不那么容易，要达成几条协议。订协议要双方都能做到，不是用对自己有利的去压另一派。铁路系统的人到铁道部，交通系统的到交通部去谈，我同意，可暂时住西苑。脱钩要积极脱，要有几条协议保证，谈好再离开代表团。

康老：我看，首先是你们工厂，学校两派要挂钩的问题。

总理：首先必须树立军管的威信，首先是服从军管。他们有错误，你们要相信他们会作自我批评，要相信他们在最高统帅和最高副统帅身边，会通过作自我批评解决问题的。

当还有许多代表要发言时，总理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办，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

中央首长离场时，全场起立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向李文忠学习！向总理学习！总理说：不要向我学习，我向同志们学习，我有一个要求：要你们兑现！

（江苏省军管会革命委员会整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铁路运输系统造反派和军管会代表以及南京大学两派代表的讲话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讲话有关江苏部分记录。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当周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以及李天佑、温玉成等同志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周总理：从今年一月起到现在，抓铁路整整一年多了，装车效率很低，我现在觉得很沉重，对不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们怎么安心啊！武斗要这样搞下去啊，订了计划不起一点作用。这中间没有坏人吗？这里检讨书写来了，你们后面有没有坏人哪！常州工农学的同志来了吗？（答：来了。）总理一一问了常州工农学，主力军代表的名字，听了以后说：江苏十四号在这里开了会，都说了铁路不与外界挂钩，地方不跟铁路搞在一块嘛，还达成了协议，怎么还是搞在一块哪！周总理问戚墅堰的同志，××回去了，为什么回去，是打架呀！（答：不是，是回去做工作。）为什么回去做工作越打越大啦！总理又问了主力军的一个同志，我问你：是来中央达成协议，还是来耍花招，耍外交的？我不愿意看到这个样子。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半了，造反派训练成这个样子，说假话，怎么对得起毛主席，你们自己说一说怎么办！文化大革命，备战，要办点事情，都要靠铁路畅通，工农业建设，城乡人民的生活，都要靠铁路畅通，援外也要靠铁路畅通嘛！你们就这样子搞下去啊！你们这样搞，谁高兴？你们这样搞，到底算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还是没有？你们在那里认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吗？常州工农学犯了错误，不管犯多大的错误，写了检讨，作了检查了，至少对中央还是说了老实话，对中央还是一个好的态度。你们连一点都不承认吗？

接着总理读了工农学写的检讨报告。当念到没有命令就开枪时，说：是谁给你们下命令的权利？当念到没有重视加强部队建设时说：他们自己把他们编成队伍，是什么时候中央授权把造反派编成队伍的呀！总理念完以后说：刚才念了工农学的检讨，是他们四位同志写的，他们至少承认他们打了埋伏，开了枪，承认错误。总理问：你们这个队伍有多少？（工农学的代表回答：十一万人。）谁给你们组织十一万人的队伍呀！你们队伍有多少枪？（答：有六百多条。）你们主要是学生还是工人？（答：是工人。）常州的工人比较多嘛！戚墅堰的工人也算在里面吗？（戚机厂有一位同志回答：我们工总没有和铁路外面联系。）我不愿意在毛主席身边听到说不老实的话，说不老实的话，一无好处的。都是人

家不对，你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总理问工农学的代表你们回去的人是不是回去打仗的？（答：回去做工作的。）做工作武器没有封存吧？（答：打在前，是二十一日打的，回去在后。）我问你们，达成协议是准备实施还是欺骗中央的？既然不能保证实行，对中央就是欺骗嘛！（答：我们要求派部队去监督。）派军队去武装缴枪行不行？（答：行。）查出的枪都能上交吗？（答：能交。）戚机厂双方都同意吗？（双方答：同意。）好！你们铁道军管会马上写一条，让他们签字，派军队去收枪。常州是两派也是一样，也写一条，签字。凡是你们住的地方，我们派部队去检查，双方缴枪。（双方代表回答：可以。）民兵的武装也封存起来。（双方代表回答：可以。）

总理对主力军方面说：他们把战士的手指砍了去抢枪，我听了很难过。现在你们在镇江也把战士捆起来啦，如果我们派部队去你们交不交枪？（答：我们要求马上派部队去，我们坚决支持交枪。）你们在这里签字，你们家里能不能算数？

（答：能算数。）这个问题很难向主席交待。你们那样做对不对啊？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思想，违背主席的指示。铁路抓了一年啦，抓成这个样子，我们真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主力军你们说没有抢枪，镇江“三代会”是不是和你们的观点一致？（答：是。）你们抢了五捆枪要运，被二十七军护路部队发现了，扣下来了。但是，当即遭到“三代会”和主力军的围攻、殴打、打伤了十一名战士，并抓走了九名战士，抢走了三捆枪，这是矛头对准解放军嘛！我们听了不觉难过呀！我们具有二·七光荣传统的铁路工人，居然能够这样做，你们还说枪不交出来就要向部队开枪，你们听了作何感想？（代表答：我们感到难过。）你们真难过，还是假难过？（代表答：我们不知下面哪个组织做的。）

总理说：射击十四次列车，左边有枪眼，右边也有枪眼。主力军也射击了吗？（主力军答：那是他们的据点，我们的人肯定进不去。）我怀疑，现在要调查。你怎么能肯定你们没有埋伏啊！这时候总理当即请十四次列车包乘组的同志介绍了当时的情况，总理对包乘组的同志说：你们受了惊险，这对你们也是一个锻炼嘛。文化大革命总免不了要付出点代价，不然怎么能发现坏人呐。总理接着问：你们工农学没有坏人吗？（代表答：有。）你们自己赶快揪出来嘛。你们号称这么多万人，人这么多，难免混进了坏人。带头的，指挥开枪的，就是坏人嘛。你们首先要揪出带头的人，指挥开枪的人揪出来。你们工农学就犯了一个大错误。你

埋伏就不对嘛！目的是干什么？是要把车上的旅客都打伤吗？你说主力军运枪，应该叫停车，停车再检查，应该向军管会报告嘛。（这时候有代表说：军管会只有少数几个人。）你们这样闹人家怎么办公？你们打电话给镇江军管会查一查。一问就可以查出来嘛。

总理问：海航五师有人来吗？（马健同志回答：有。）你们和工农学接近一些吧？（这时主力军一个代表答：马健同志现在转过来支持我们啦，他们就揪他。）单支持你们也不对，支左不支派。什么叫左，就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不是造反派嘛，造反派不能自封为左派，不能自封为核心，你要以你为核心，怎么能办到。总理对工农学方面说：你们当时不找军管会，擅自行动，完全是错误的。你们不仅写这个检讨，还要把决定这次打埋伏的坏人揪出来，你们来的四位同志回去开个会，很好地检查一下，把事情弄清楚，把为首的肇事人检举出来，指挥伏击的查出来，今天是二十八号啦，到元旦三天以内查出来，一定要把坏人检举出来，你们要打电报回去。

总理说：部队要开进去，中央早就决定了。派那一个部队去，我们和军委，南京军区商量，明天宣布。不管那个部队去，你们都要坚决拥护，这是军委派去军管的。你们铁路两派组织，统统把武器封存起来，上交。常州两派组织统统把武器封存，上交。贫下中农的民兵武器，统统封存起来。

总理问：二十七军的同志来了没有？（王挺同志回答：来了。）喔！王挺同志，常州有什么部队啊！（这时候马健同志回答：省军区有×个连，六十军有×个营。）枪收不起来吗？（马健同志回答：做了一些工作，现在看起来比较难收。）两边都不交？还是一边不交？（王挺同志说：两派收不起来，而且镇江不断往那里送枪。）总理问赵俊：你们镇江抢枪怎么办？就在你们镇江。你们省军区对这个事情怎么处理？（赵俊回答：我们没有办法。）二十七军部队挨打啦，你们不管啦？（赵俊答：我们管不了。）枪是从你们人武部拿的，是送的嘛！（赵俊答：送的要查一查。）为什么捆几捆？（赵俊答：是三代会抢的。）所谓抢，实际上就是送的，要好好地检查这个问题。为什么二十七军的战士挨打，就是因为护枪嘛。（赵俊答：我们最近也有战士挨打。）你们对主力军支持，主力军在常州是少数，但是你们采取的那个办法就不对嘛！弄成这个样子。

总理说：二十七军如果说过去支左工作有错误，改了就好了嘛。你们挺起身

子来干嘛！包括常州由你们负责。总理问常州的四个组织的代表，你们同意不同意？（四个组织的代表都答：同意。）好嘛，你们都同意啦，等会签个字，由你王挺同志负责。你们二十七军是毛主席的部队，挺起腰杆子来干，错了就改嘛。你们过去犯了错误，现在也检讨了，你们二十七军这次立新功。（王挺答：坚决照总理指示办。这时候全场热烈鼓掌。）

总理接着说：归根到底，还是依靠解放军，才能建立新的革命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快步伐前进，这就是我们迎接一九六八年的起点。常州的问题不是最难解决吗？我们就是要解决，就依靠二十七军。二十七军过去犯了错误，他们有检讨，检讨的很好，我看了很满意，一点不拖泥带水，不吞吞吐吐，现在没有公布，必要时可以发给你们看看，你们要相信部队，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你们要在三天以内解决，我就不相信不能解决，上海那么好，就不能影响常州，江苏，江苏的人民对你们太不满啦。

总理说：镇江的问题，赵俊同志一定要打电话查清楚，解决二十七军战士被打的问题，如果三代会不听，就把他们找到北京来。他们里应外合整人家嘛，不象一个群众组织。要他们把枪还给二十七军，好好承认错误，被打的十一名战士在医院，要到医院去慰问，抓走的要赶快释放，承认错误。枪是从那里来的，让二十七军的护路部队调查清楚。

总理说：现在上海压了很多车不能通，铁路主要问题在东北。沪宁线上常州通了，全线就通了。浦口也打得很厉害。上海铁路局来了吗？（上海铁路局代表答：来了。）你们自己也在闹，上海也要军管。李天佑，你们两位副总长派部队去。现在全国铁路就是上海没实行军管，你们上海应该为全国作出很好的榜样嘛！请你们包乘组的同志谈谈看法。（这时候十四次列车包乘组的同志汇报了上海铁路局的情况。）总理问他们：你看用军管帮助你们大联合好不好？（包乘组的同志答：好。）你们包乘组有几派？（答：一派。）这样很好嘛。军管主要是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都是雷打不动的，我们每天都学两小时，编“毛选”。要真正的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才能解决，这样才能推动革命的大联合，派性就受到打击。我希望你们把这个精神带回去。（十四次列车包乘组的同志答：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

总理问：南京的情况怎么样？浦口发生问题是什么原因？（答：受外界干扰很大。）当有代表谈到劳动纪律松弛时，总理说：铁路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都不能发挥出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怎么说？长江大桥派六十军去军管你们同意不同意？（大桥代表答：同意。）

总理问：港务局来人了吗？（答：来了。）你们三派都要和社会上脱钩。（答：脱钩了。）怎么你是武汉钢工总的？你不但是跨行业，还跨地区了吗！当有代表谈到港务局最近武斗是走资派挑动时，总理说：你们三派那一派有坏人，你们自己抓，按主席的指示办。你们那一派都要警惕坏人钻进来。再是队伍大了，就发展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有派性坏人就插手利用嘛！不管那一派都有坏人，沈阳也是这样，你们沈阳三大派坏头头有没有，我都知道，还要指出来嘛？

当有人谈到港务局被打死两个人时，总理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牺牲是免不了的，三年解放战争流了多少血，流血是为文化大革命嘛！要付一点代价嘛！实际上这是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流点血，要把仇恨集中到走资派的身上。有的是坏人挑拨，要把仇恨集中到敌人身上去，不要指向群众。我问你们，派部队到港务局实行军管行不行？（代表答：坚决拥护。）统一由六十军把港务局的南、北两面都管起来。（这时候方敏同志回答：已经管了。）你们要好好地学习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枪同不同意封存上交啦？（代表答：同意，部队可以武装收交。）

总理说：铁路、长江大桥、港务局统统归六十军管起来，好好地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武器封存起来上交。（这时候有个代表说：枪交了人家打我们怎么办？）解放军战士来保卫你们，用生命来保卫你们，同你们同生死共患难嘛！我们的战士为你们流血牺牲，世界上那有这样好的军队。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军队。打伤了多少，你们知道吗？江青同志的录音你们听到了吗？再给你们放几次，要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讲话。

这时候周总理走到会场的一边，问南大的文凤来、曾邦元等人来了没有？（南大的代表都站起来答：来了。）总理说，你们的协议准备执行吗？有效吗？这时候总理给大家介绍说：你们看，这是八·二七的，响当当的。南大搞了两派，江苏的问题，根子就在他们这里。我们搞了一年多了，都很熟悉了嘛，你们就不能联合起来？我们经常说，思想要经常改造嘛，你们不需要改造啊？你们有什么势不两立的，现在你们搞的那样紧张，匡亚明是舒服了，江渭清在北京，彭冲他们

都很舒服啦！你们的派性应该少一点嘛！要照顾大局。你们个人写信来，都表示的很好，可是没有这样做嘛！（这时候袁服武说：如果中央同意，我们明天就回去，脱离代表团。）总理说：那一天回去都可以，中央可以考虑，但是如果你们回去增加麻烦，中央能够放心嘛，你们对南京推动一下嘛！在南京的三派工人达成了原则协议，你们看到他们达成协议不是就心安理得了嘛！（这时候南大两派代表要求中央批准他们的协议。）总理说：中央是可以批的。批了不灵怎么办？主席一批，不到一个礼拜垮了，我怎么向主席、林副主席交待。我们能够欺骗主席、林副主席吗？我是带着眼泪期待你们的，我不希望你们小将犯错误。张建山、曾邦元你们能不能合作？（曾邦元回答：当然可以。）总理说：你们应该伸出手去。（这时候曾邦元同张建山握手。）总理说：好。（全场热烈鼓掌。）江苏受你们的影响，搞了一年多了，江苏不能放一点光辉啊！我也是江苏的一分子嘛！你们有军训团没有？（答：没有。张建山说：现在达成了协议，我们都要回南大，军训团进去，正是好机会。）好嘛！达成协议后，派个军训团去，找六十军去帮助你们军训。（曾邦元说：欢迎六十军去帮助我们军训。）六十军派人帮助你们军训好不好？（南大的代表共同答：好。）总理问方敏同志：行不行？（方敏答：好，我们向他们学习。这时候全场热烈鼓掌。）总理说：毛主席说，六十军在南京的支左工作不错嘛，你们应该成为南京的支柱。（方敏答：我们很不够。）总理对南大的同志说：你们订的协议，你们作了好事，我们可以送给主席看。

（下面，周总理谈安徽和东北的铁路问题，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南京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1967.12.31； 中发 [67] 411 号

中央批示：

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关于南京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希望南京大学各派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

目前，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应该立即回到本校去，根据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所阐明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复课闹革命。要认真学习 and 确实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

阶级派性。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校的斗、批、改。

要以执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实际行动，来推动南京市和江苏省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驻江苏部队和镇江市代表的讲话

〔地点：北京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总理、康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同志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向周总理学习！向周总理致敬！

总理说：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总理说：镇江的同志来了，三代会的同志来了，这么难请啊！

总理在一一地问了镇江市两派代表的简历和情况后，因有要事离开会场。接着康老问了两派组织情况和江苏省军区，镇江军分区，市人武部和八十一师到会同志的简历和情况。

康老说：今天和同志先认识一下。同志们来了几天了，先学习了吗？

李作鹏同志说：先学习三天，今天是第四天了。

康老说：先谈一下情况罗！杜平同志你们看会议怎么开法？（杜平同志答：请康老作指示。）我们下面还有事情，还要接见福建的同志。你们学了哪些文件？（梁辑卿同志作了回答。）

康老问：陈茂辉，你们那里武斗还有没有？打够了没有？（两代表简单地介绍了最近的情况。）

康老说：关于镇江问题，由李作鹏等同志同南京军区的同志共同来帮助解决。镇江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很坦率地讲，你们那个地方两大派由于派性发展，社会上的派性影响到部队。部队意见不一致，军队的派性也影响到地方。因此，中央很关心江苏省的问题，镇江是江苏省的一个重要城市罗，所以找同志们到中央来谈一谈问题。应当说同志们来了，我们很高兴，但是同志们来以前也发生一些曲折，这在我们解决各省问题中是很少见的，没有这个情况。当然，同志们可以说有很多原因，但是中央的决定，中央的命令，还是希望你们很坚决很严肃的

来执行。过去的事情可以有一个标准，主要的还是向前看。今天晚上由于时间不多，主要是见一见面。

我想首先向同志们提出一个问题，无论省军区的同志也好，军分区的同志也好，人武部的同志也好，以及三代会和联委的同志也好，你们来北京干什么？这么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同志们是怎么想的？我们常常遇到这个问题，也常常同同志们讲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情况证明了的，各地同志到北京来就是没有仔细考虑来干什么？我们接触过这么一些人，他们来北京干什么呢？说是来北京谈判的。来北京谈判这个话对不对？不对的。我们是不是两个党，两个国家？我们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过，也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谈判过。现在我们不是这种关系嘛，不是来谈判的嘛，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同志们来干什么呢？来告状的吗？你们有的同志是不是来告状的？但是我们知道，地方上的群众组织这一派，那一派，在没有来以前整理大批材料，具体的讲是准备来打官司的。打官司有输有赢，谁也不愿意输，所以就整很多材料。自己总认为自己很有理由，对方是输理的罗！准备来告状，打官司，是不是这样？我们认为也不是。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呢？请同志们想一想，北京是什么地方？北京是党中央所在地，是毛主席司令部所在地。你们到北京来干什么？是来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来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和著作的，是来学习林副主席对部队对地方的指示的。我们的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不晓得你们学了林副主席“八·九”讲话没有？（有人答：学过了。）还要学习中央的精神。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就是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的。首先要学习什么呢？首先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几个区的最高指示。在军队方面同地方方面有元旦社论，最近人民日报还转载了打倒派性那篇社论（指文汇报《论派性的反动性》）。总之，中央的指示是很多的，要很好学习！

你们来到这里的任务，首先，第一个任务是政治挂帅，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如果不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什么问题都很难谈通，派性也很难克服。只有掌握毛泽东思想，才能反掉派性，增强党性。因此，你们来到毛主席司令部，不要辜负这个希望，就是首先来学习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你们的思想也好，要解决问题也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离开了这个是不行的。这是一个什么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大方向！你们不是讲这派大方向是正确的，那派大方向是

不正确的，现在就要真正的来看一看大方向是不是正确的。大方向有个标准，就是要看他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符合不符合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因此，你们来了以后，我们提议先学习三天，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使同志们不至于抓住小问题，把大问题丢了。学了三天够不够？那很不够。因此，同志们每天除了开会，汇报外，要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学习。这一点，我们跟你们介绍一点经验，你们要跟我們学，这就是解放军的经验——天天读。我们中央常委天天读，还包括星期天，我们每天都是这样。

吴法宪同志说：刚才就学了三个钟头。

康老接着说：你们每天除了开会汇报外，要有天天读，一定要规定这个制度。各省的情况，有的半天读，有的读三个钟头，有的读两个钟头。而且这都要象林副主席讲的，要带着问题读，不是教条式的读。要为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去读，为斗倒你们脑子里的派性，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去读，为解决镇江的大联合，三结合去读。所以不仅要天天读，而且要带着问题读。再一条，读了就要用。就是要根据林副主席所讲的，活学活用，在“用”字上下功夫，立竿见影；就是要看你解决问题，是不是很好的运用了主席的著作。活学活用，这是一条。再一条，学习主席的著作，最新指示，就必须遵循主席所讲的，要能够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刚才，你们两派的同志同我所接触的其他各省的情况一样，首先是戳别人一下。但我要说明你们比较文明一点，也可能好戏在后头。总是对方不对，就是那么一回事。最好用毛主席著作，最新指示，首先自我批评，讲自己有什么缺点，讲自己有什么毛病。所以这是来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同志们来这里干什么呢？在家里环境都比较紧张罗？有的时候两派还要武斗罗！来这里以后就比较安静，把头脑冷静一下，参照人民日报的社论，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开会的过程，就是一个斗私批修的过程，也是双方自我批评的过程，也是双方促进大联合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希望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指示作武器，用极大的努力，克服派性。同志们从文汇报的社论可以看到什么叫派性，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这种性质叫作反动的性质，就是说他不是革命的性质，他是反革命的性质。所以，要以中央，主席的指示，人民日报的社论作武器，拿着这个武器检查自己，反对派性，就是要打倒这个派性。不打倒派性，就不能增强党性。要打倒派性，就必须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思想为武

器。因此，同志们来到北京第二个任务，就是要下定决心，排除一切困难，不要怕丢面子，要无所畏惧，彻底肃清头脑里的私字，彻底打倒派性。有派性，一切问题都看反了，就没有真理。我讲过了嘛，有了派性，就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派性，就没有敌情观念；有了派性，就没有阶级观念；有了派性，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国家观念；有了派性，就没有整体观念；有了派性，就没有党的观念；有了派性，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观念。因此，一切问题，如铁路问题，运输问题，交通问题，联合问题，等等问题，都无法解决。所以，派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凶恶的敌人。它不是革命的，是破坏革命的。它不是朋友，是敌人；不是小的敌人，是最凶恶的敌人。它不是在面前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是藏在你们脑子里面的。因此，同志们来的第二个任务，就必须打倒派性，增强党性。你们开会的过程，就是自我批评的过程，自我斗争的过程。

在上面这两个前提下，然后你们才是反映情况。没有前两点，从派性出发，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问题是可以搞清楚的嘛！是可以讲道理的嘛！你们是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嘛！我们文化大革命不是有四大民主吗？有什么话都可以讲的嘛！但是希望同志们实事求是的反映情况。反映情况有一条原则很重要，就是到底是向后看，还是向前看的问题。向后看，那就要算旧帐。旧帐有两种，一种是原则问题，离开正确的原则，离开中央的政策，离开毛泽东思想，那当然要算的。我们的联合是党的政策，要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涉及到这类问题，是非当然要分清罗！但是有的是枝节的，不是主流的，如果把我们的会议完全纠缠在这个方面，就不好了。我们相信同志们要反映的问题很多，摆一个月也许摆不完，所以，我们摆问题也好，反映情况也好，还是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我们想法还是向前看，因为文化大革命已经大大发展了，发展到一个大好形势，发展到今年要争取全面的胜利这样一个阶段，发展到全国出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潮流，许多地方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不要老是跟不上形势罗！主席在指示上说形势大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就是这样罗！比如，今天晚上，我皮包里有甘肃的材料，甘肃马上就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了，甚至他们连到北京来汇报都不需要了，另外一个河南筹委会小组昨天说要来汇报，因为我们时间倒不过来，天天开会，没有机会谈，前天他们就要来汇报，准备春节前成立革命委员会。形势发展不仅是这样，你们听到说了嘛，我们伟大领

袖毛主席现在准备要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了，各地都在整顿建立党的组织了，是发展到这样一个时候了。反转来讲，你们江苏省文化大革命开始是比较早的，首先是南京，匡亚明就是在前年六月揪出来的嘛！你们那里很早，但是现在你们江苏什么时候才成立革命委员会呀？你们勤务组的同志（指两派勤务组）什么时候成立革命委员会？（有的代表答：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斗私批修，争取早日搞好大联合，保证早些成立革命委员会。）是呀！那都是好话罗！究竟什么时候成立，你们联委也想过吗？（有的代表答：我们争取在春节前联合起来。）联合起来，那革命委员会还不行嘛！上海要搞一周年纪念了啊！因此，同志们要赶快的赶上去，以前的问题应该向前看，再不要以前的派性，不前进者是进步很慢，那就落后于形势了。这是第三问题。反映情况，反映问题，我们采取很大的民主，什么话都可以讲，讲错了不要紧，要从原则出发，从向前看出发。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在毛泽东思想引导下，不论部队的，地方的也好，把思想统一起来，促进大联合。假如整个过程是斗私批修的过程，自我批评的过程，其目的就是一个促进大联合的过程。你们是代表罗，希望你们能够在北京对江苏特别是对镇江革命大联合有所促进，并得出具体结果来，象各省一样，最好能够统一思想，达成一个大联合的协议。这个协议，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要停止武斗，要收枪，要保障交通运输通畅。希望你们两派凡是能够统一的逐步的达成协议。你们两派过去有没有协议？（有的代表说：过去没有达成真正的协议，上月底我们四次邀请对方，对方一直没有表示态度。）同志们，你们这个态度我不同意，你这个方法就是派性的方法，我出一个通知你们不同意，责任就在你，这是不行的，这是派性的方法。而应先商量好，你们头头先协商好，然后再去做群众的工作。你们先写几条，要人家表示赞成不赞成，那是容易的，但是不解决问题。所以，要先通过协商的方法，不要采取那个方法。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就一个一个地来解决，譬如停止武斗，你们赞成不赞成？（双方代表答：赞成。）中央有这个决定，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怎么能反对？收枪你们赞成不赞成？（双方代表答：赞成。）都赞成，但是不交。一个革命者应该言行一致。（有的代表说：我们从来没有抢枪。）话不要说得那么绝对，什么从来都没有啊！

最后就是要先促进你们的大联合，要实现大联合，就要先解决当前存在的最

重要的问题，所以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来的人比较多罗，一句话，大家要把这次来当做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我们建议不是一派，而是联合起来进行学习，你们赞成不赞成联合起来办？（答：赞成。）

我就讲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好象是老生常谈，大家都听过多少次了，但是，事情常常在很平凡的道理上忽略了。我也相信同志们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特别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江苏的驻军，在江苏各地的部队也不例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保卫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支柱。毛主席讲过了嘛，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嘛，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三者看起来，军队所起的作用很显著的，各地方的情况说明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哪个地方军队思想一致，遵循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哪个地方革命大联合，群众革命团体的大联合，就真正的得到成绩。哪个地方的军队内部不一致，派性反映到军队里去了，哪个地方就比较难以很快地联合起来。从你们江苏的问题，无论是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也好，你们回忆一下，情况都是非常明显的。军队三支两军工作有很大成绩，但是由于过去对社会主义革命，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思想准备不够，情况不熟悉，难免犯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人民解放军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只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同广大指战员见面，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领导干部正确掌握了，就是他在一个问题上或一个时期里犯了错误，他会坚决改正错误的，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所以，我们的军队应该说是举世无双的。他们在工作中难免犯错误，但是犯了错误就改正，我们人民解放军有这个特点。所以，我希望你们省军区、镇江军分区的同志和人武部的同志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彻底检查一下那一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军队也沾上了派性，如果说有错误，坚决把它改正过来。我们很坦率地向同志们讲，江苏要实现大联合，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你们省军区，关键问题在这里，这一点希望你们很重视这个问题，不然为什么中央请你们来这里呢！所以，希望同志们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带着问题活学活用，用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的指示，彻底检查一下。因为人民解放军是核心力量，统一了思想，支左成绩

就显出来了。如果军队不统一，地方就很难统一。部队的同志也好，地方群众组织的代表也好，经过学习，经过中央帮助，经过认真地斗私批修以后，会得到成果的，会完成你们的任务的，也不会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要求和期望的，也不会辜负广大群众对你们的要求和期望的。大家一致努力，把镇江，江苏问题来解决，促进大联合，使江苏省和镇江市革命委员会很快成立起来，我们是有这个信心的，但这要靠你们努力了。

我就讲这些，先给你们交代一下，祝你们成功罗！

（当康老等中央首长离开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欢送。）

（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整理）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人造反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同志们！

风雨送春归，风雪迎春到。”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火线上，回想去年今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生死搏斗。在“一月革命，”风暴兴起的日子里，从杭州湾，到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直到蚌埠、徐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肩并肩，心连心，日日夜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整个长江两岸，歌声震天，红旗如画，到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战友们，同志们，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些壮丽的战斗的日子，我们大家是多么高兴呵！

但是，一年来，我们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一月革命”的风暴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内部一度出现了分裂现象，江苏、浙江、安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发生了“内战”。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到现在也还没有停下来。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的教导，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不久以前，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各地的战友们协同作战，揪出了一小撮专门干罪恶勾当的坏人。尽管我们

动手迟了，这些坏人给我们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但是，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示众，是一件大好事，它将会帮助我们擦亮眼睛，帮助我们更深刻地领会毛主席的指示。

下面，我们举出一个小集团作例子，请大家看一看这是些什么货色。他们在某些地区、某些单位，是很有点“名气”的，曾经欺骗了一些人。但是一查，却原来都是一些牛鬼蛇神。这个小集团的头头李顺之，在抗战时期钻进革命队伍，一九四〇年，因为他同一个匪特案件直接有关，开除党籍，后又混入党内，曾窃据江阴县副县长、常州地委委员等职务，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清洗出党。又一个头头戚拯，先后窃据高邮县某局局长，上海市某局科长等职，是原上海市某局局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的亲信，因为触犯国法，判了长期徒刑，是这个姓黄的把他减刑释放出来的。罪犯胡汉，一九四〇年混入党内，曾任武进县第四区区长，一九四一年带枪叛变投敌，参加了常州、江阴日寇特工站，从事特务活动；一九四二年又混入党内，先后窃据扬州市某局局长等职。罪犯黄盘林，是早在一九五二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清洗出党的坏人。这一小撮坏人不是孤立的。上海和江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不少人是这批牛鬼蛇神的“老上级”、“老同事”，他们从来就是相依为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有人说，李顺之、戚拯、胡汉、黄盘林是“老造反”。不对。他们有的是特务、叛徒，有的本身原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从来没有造过反。恰恰相反，他们死保他们的“老同事”，大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当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向旧上海市委内的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之流进攻的时候，李顺之写给同党的一封信中，就肉麻地吹捧旧“上海市委是正确和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严重考验的”，旧“上海市委与上海工人阶级的关系，可以说是母亲与儿女的关系”；上海革命群众批判、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他们更是如丧考妣，痛哭流涕地说什么“这些负责同志政治上‘威风’固然‘扫地’，即肉体生命，也遭到严重威胁”。他们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是十分清楚的。

在上海是这样，对江苏也是这样。镇江地委内有一个姓高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革命

群众揪了出来。一九六七年一月，他就派人到上海同李顺之、戚拯等人联系，要这批牛鬼蛇神为他“翻案”。李、戚等犯高兴极了，表示一定要为高某卖命。他们还运用黑话、代号，通过信件、电话和派出联络人员，往来频繁，交换情报，密谋策划。他们还写信给江苏省××厅副厅长、叛徒张××，要张××同江苏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省委书记处成员陈×、包××取得联系，要陈、包“站出来领导”。张××在一九六七年国庆节还到上海住了四十多天，同李顺之、戚拯、胡汉等多次在密室中分析形势，研究反革命策略。当戚拯向张汇报了苏南地区情况以后，曾“请示”张，计划在秋收后把武进、江阴、丹阳、镇江等农村的群众组织“统一起来”，要张××回南京后报告“陈书记”，由“陈书记”加强“领导”。张××向戚拯查问了有关常州各个群众组织的情况，问戚拯：“手中有没有力量？”戚答：“有一部分，就是武器少。”张××当即决定：“如果有力量，索性把‘××’（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干掉它；没有力量，不要零零碎碎地搞。”戚犯就照张的“指示”办了，想方设法搞武器，在常州和沪宁线制造事端，使几个群众组织长期对立，并多次发生武斗。他们几个人还狂妄地做出计划，要先控制沪宁沿线的城市和乡村，占领苏南，进而控制上海和浙江。他们在苏南一些县市“串连”了许多被革命群众打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清运动中的下台干部，鼓励他们“站出来造反”，为自己翻案，“千万不要等待”。请看，他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得多么紧呵！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中，有哪一点可以称得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气味？说他们是一小撮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不是更切合实际吗？（1）（2）那末，他们为什么要打着“造反”的旗号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中，旧上海市委终于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陈丕显、曹荻秋之流也终于完蛋了。原来公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死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的李顺之、戚拯一伙亡命之徒，感到这样做不行了，太露骨了。于是，内心怀着一股反革命的“怒火”，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也打起“造反”的旗号来，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派”来了。他们钻进革命队伍内部，搞孙悟空的“挖心战”来了。

李、戚之流不只是一要“造反”，而且装得比谁都革命。大家知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是大家公认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在上海造无产阶级的反，就不能不造“工总司”的反。李顺之、戚拯之流是懂得这一点的。

但是,要造“工总司”的反,也不大容易。他们凭着他们反革命的嗅觉,发现了“工总司”工作人员中某些人的私心很重,就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的派性,要他们另拉山头,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间,他们串连了一些人,秘密筹划建立所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请看,这是一个多么难读的名字,应读作:造“工总司”反的司令部),并分别自封为常委、委员、顾问,李顺之自任“秘书”,起草反对上海“工总司”的反动文件,印刷传单,刻制图章,决定“抓实力”、“拉队伍”,妄图把上海“工总司”搞垮。但是,上海的工人同志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上海工人阶级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这一小撮坏人的阴谋破产了。

李顺之、戚拯之流还把罪恶的黑手伸向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和农村。

这一伙政治骗子,在苏南采用的手法,更加卑鄙可耻。他们竟敢冒充和盗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常委”和“顾问”等名义,到处招摇撞骗。他们就是靠这一套,在沪宁线上的常州、无锡、镇江、江阴等地,骗取了一部分群众的信任,有的当上这个组织的“参谋”,有的担任那个组织的“顾问”,有的充任“总指挥”,有的甚至同时操纵了两派革命组织。在常州,他们曾经冒充“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的名义,“支持”某个组织去夺旧常州市委的权;不久,又“支持”同这个组织对立的另外一些组织去夺旧常州市委的权。他们就是用这一套手法,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极力煽动某些人的派性,制造大分裂,挑动大武斗,阴谋用这个革命组织去攻打另一个革命组织,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好实现他们的反革命复辟计划。沪宁线上和苏南地区的大规模武斗,同这伙反革命分子是密切相关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常州发生严重武斗,戚拯就守在上海铁路分局水电段的铁路专线电话机旁三天三夜,进行“遥控指挥”,并且多次召集同伙在上海开会,拟定“作战”方案。一九六七年九月,常州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时,戚拯又通宵达旦地守在镇江火车站的专线电话机旁,对着地图进行指挥。戚拯一面和守候在上海某单位的李顺之、胡汉等保持密切联系,一面同来自常州的他的同伙召开紧急会议,想方设法搞到武器,派出“增援部队”,并且在镇江成立后勤指挥部,

挑拨离间，加深某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挑动两派继续武斗。

这伙坏蛋，挑动武斗的手段是十分狠毒的。他们唯恐两派打不起来，唯恐群众不上他们的当，竟自煽动“先放第一枪”，煽动不要“单纯的军事防御”。李顺之在给常州一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信中说：“这样的武斗，用不着怕犯‘先放第一枪’的错误。”“单纯的军事防御是不行的，现在看来应当进攻，可以进攻了。”这伙坏蛋就是这样煽动群众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开枪！

他们还唯恐群众组织不听他们的指挥，就利用各种关系去建立自己能够直接使用的武装。李顺之在××就直接控制一个有数十支枪的“武卫连”。他还起草了一个反革命活动计划，提出要“武装一批农村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配备机枪一挺，步枪一二十支。……另外再抽调若干连机动活动。”

一切反动势力，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他们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为绝对劣势。李顺之、戚拯这批狐群狗党，当他们在苏南某些城乡和上海一些革命力量薄弱地区招摇撞骗，一时蒙蔽了一些人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利令智昏，得意忘形啊！他们在给江苏省××厅副厅长、叛徒张××的一封信中，情不自禁地道出了他们反革命的喜悦：“京（指南京）沪沿线可以说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下了。”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曾几何时，他们就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现出了牛鬼蛇神的原形，被革命群众清查出来了。

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

我们这里讲的只是李顺之、戚拯这么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全部罪行，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没有完全公布。但是，就是这些事实，还不足以发人猛醒吗？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现在应当是擦亮眼睛的时候了。

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既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有些地方两个革命群众组织不能联合起来？为什么有的地方接二连三地出现武斗，发生流血冲突？当有人煽动我们伸出拳头打自己阶级弟兄的时候，应该多想一下，究竟为什么要打？这是谁的主意？他是个什么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当然，象李顺之、戚拯之类的坏人，只有一小撮。看不到有坏人，是错

误的；认为坏人多得很，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决不能因为这类坏人的黑手曾经插进某些群众组织，就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组织统统列入坏组织。

要知道，李顺之、戚拯之类的坏人，是一伙反动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今天可以支持这个组织，明天又可以反对这个组织。他们所以支持或反对这个组织，完全是出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一旦他们实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狂妄计划，他们是会对所有的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会上他们的当呢？原因可以找到好多条，但是，应当坦率地说，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毒蛇，就是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社会上的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利用革命造反派中某些人所受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的影响，当作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特别是当着阶级敌人末日来临，一切镇压、欺骗手段失灵以后，他们象抓住稻草一样，拚命地利用我们革命队伍里面某些人的私心，恶毒地灌输派性。你要搞实力，拉队伍，树山头嘛，他就竭力为你发展人马，扩展山头，骗得你的信任。李顺之、戚拯之流，就是化装成“老造反”的毒蛇，就是用这种手段缠住了某些人。

在这里，我们没有讲他们是怎样利用某些人的派性的。因为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仅仅是举出这个小集团所干的罪恶勾当，向我们的某些仍然热衷于搞派性的战友们敲敲警钟。我们衷心地希望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仔细地回顾一下战斗的历史，为什么同一条战线上的同志，忽然对立起来了呢？难道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吗？难道我们不是有千条万条理由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而没有半条理由闹分裂吗？究竟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分裂了呢？难道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侵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吗？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黑手插进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吗？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革命斗争中，我们无产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吧！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转载 《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1968.01.26；中发〔68〕18号

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自从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中央希望，南京军区能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希望你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首先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大力促进、巩固和发展南京和江苏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光荣任务中，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当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以及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李作鹏等同志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祝中央首长身体健康！

总理：你们还对立吗？

（有人答：我们联合了；有人答：现在已合成一个代表团了。）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今天开会，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的同志都来参加，

都来看你们了。毛主席很关心南京和江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也听到在十月份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从上海谈起，一直到北京。姚文元同志就是亲自听到主席最新指示的，……江苏离上海那么近，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去过南京一次，作了推动，今天总算有了良好的开端。

康老：南京到上海只有五、六个小时的行程，就相差一年。

姚文元：一个是“大联合夺权”，一个没有“大联合夺权”。

总理：一派夺权未夺好，就差在这里。现在江苏主要地区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连镇江七个地区已达成协议，有的是“大联合协议”，有的是“停止武斗协议”，数目是相当可观，连交通方面的加在一起，共达成三十七个协议。这是大家认真研究的结果，所以有了良好的开端。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庆贺你们！（大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

总理：首先应该提到的，南京军区“三支”“两军”进行一年了，这次他们作了一个书面检讨，经过中央批准，今天发给你们了。这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有些问题要解释一下，现在宣读一下。

总理在宣读了中央对军区党委“检讨报告”批示的第一段后说：请同志们注意，头一句话肯定了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在许世友同志，杜平同志领导下的部队，过去是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你们大家也听说了，我们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的有些话在群众组织也传达了。南京军区是长江的门户，江、浙、皖、上海三省一市，地处重要地位。最高统帅毛主席委任许世友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他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好同志，在这一点上必须肯定。当然，部队进行“四大”的一些单位和地方进行革命运动的小将们不了解历史，有一个时期觉得军区犯了一些错误，提出一些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对军队同志必须有全面的认识。许世友同志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在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有很大功劳。我们康老跟他一起战斗过的，作过他的政治委员。这个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忠于林副主席的，忠于党的，忠于党的事业的，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这是肯定的。他领导的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你们看十二军在安徽。二十军在浙江，六十军、二十七军在江苏，工作不是做得很好吗？当然也有错误，听到主席一声号令，有错就改了嘛！所以在这一点

上我们要多说几句。野战部队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个新的任务。抗美援朝结束以后，部队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学习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自己搞生产，群众工作比较生疏。介入“三支”“两军”以后，特别是在支援农业方面，广大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对农村熟悉，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显著，江苏也不例外。我手头一张生产表也证明了这一点，去年农业生产，在江苏也是丰产，征购方面虽然没有超额，但也接近完成，到一月半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六点五，现在也可能完成了。这首先表现在劳动人民自己的努力。在座的有来自农村的贫下中农的代表，他们是清楚的。这也说明学生虽然搞了一些宣传活动，但不同于其他地区搞农民进城，干扰生产比较少。所以整个江苏粮食，棉花生产都比较好，这要归功于解放军。去年支农化肥方面比较少一些，春节以后就农忙，搞积肥，这方面要依靠解放军去发动，去动员。将来还有一批大学毕业生到农场去劳动。支工方面，部队主观愿望也是想支好的，但是常常因为两派斗争有些影响，比起上海来，江苏成绩就低了。现在两派已达成大联合协议（镇江是制止武斗协议），要打掉派性，增强党性，首先就要表现在抓革命促生产上。工人阶级应在抓革命促生产上站在前头。江苏也是工业地区，南京有重要工业嘛！南大两派代表表示回校复课闹革命，搞大批判，斗批改，你们带了头，中央批了你们的协议，中央支持了你们，你们也应该这样做，这样使军队在支工方面就会做出更显著的成绩来，不然就妨碍支工工作。在军管，军训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去年一个时期，由于缺乏经验，群众工作生疏了，不象过去又打仗，又做群众工作，又宣传。对群众工作生疏了，就不免站错了队，有一段时间过早表了态，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犯了错误。同时，在部队内部，总是要求有个稳定的局面，部队领导同志总是要考虑海防，边防，舟山还接近台湾，有美蒋敌人，所以总想部队稳定。部队四大单位造反精神旺盛的时候，不顾军区的要求，造成对立，一对立，军区在处理上做了一些错误的措施。这只是讲对待军内开展四大的单位的处理上，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就应按军委指示办事，不搞四大。这一点，我上次在京西宾馆都讲了，二十一位同志都表示了态度，很好。大军区犯的错误的已经做了检讨了，中央认为态度是诚恳的，他们的错误已经或正在改正，有的地方已经做出显著成绩。如无锡吧，二十七军过去有错误，和地方一派对立，现在也推动和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表现很好。今天不仅王挺副军长

在这里，而且把尤太忠军长也请来了，他在无锡支左工作做得很好嘛！你们欢迎不欢迎？

（无锡代表同志答：欢迎。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是呀，你们小将们，前年我们林副主席就说了，红卫兵就是我们解放军的后备军嘛！你们要向解放军学习嘛！解放军是称得起你们学习的。他们确实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实行了“四不”，做到了“四不”，就得到群众的拥护，群众就感动了，群众的团结就促进了联合。他们就是从群众中来的嘛！只是比你们年纪大一点，我们解放军是从劳动人民中来的，也要向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群众学习，向革命小将学习，学习革命小将的革命朝气。这样互相学习就更团结了，标准就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加强团结。不但无锡的二十七军，南京的六十军工作开展的也很好，对推动南京的大联合有成绩，六十军在支左工作中更前进一步。他们在滁州也有很大推动。所以我们也把六十军的朱军长请到会了。（群众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朱军长带领高呼：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这两个军对江苏“三支”“两军”工作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十二军在安徽担负“三支”“两军”工作，所以在江苏这两个军很重要，中央正在划分他们“三支”“两军”地区和任务。同时，江苏省军区正在开会，学习，检查工作，回去还要继续学习，检查，因为省军区跟地方关系更密切，分区，人武部也有一部分同志在这里学习。有一部分在这里学习，有一部分要回去学习，都到北京来学习，容纳不了那么多人。还要和群众在一起学习，江苏革命派，军队，干部，联合在一起学习，办学习班，光在北京办学习班还不够，在南京、镇江，在各个地区都要办学习班。学习中，要遵照毛主席教导，多讲自己的缺点，少讲别人的缺点，求大同存小异。这样，就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和团结。学习好了，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同样要参加“支左”任务。有这样的例子，河南、湖北两个省，凡是到北京来学习的，回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精神，原则性更强了，群众也欢迎。如在原来的地方不合适的也可以调换，江西就是这样。经过训练，互相调换，群众也欢迎。临川（就是抚州）发生了武斗……，军分区，独立营训练好以后，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群众列队欢迎，部队也受到鼓舞。这个情形在河南，湖北也有。我们相信江苏也是会搞得很好的，因为解放军勇于学习，按毛主席，

林副主席的教导，是会有进步的。

南京军区的检讨报告是经过许世友同志，张春桥同志看过的，都同意这个检讨。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好的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我们同意这个检讨，你们应该欢迎这个检讨。（群众热烈鼓掌。）但这不是说军队就没有个别犯错误严重的，军队有派性，首先在军内自己检讨，犯了错误自己检讨好了，再与群众见面，不然要把自己的派性带到群众中去。江苏的北边连云港就是这样，现在连云港我们委托山东管。凡是犯错误的都在军内检讨解决。有的同志错误很深，如从去年以来就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我们屡教，他就是不改，我们要点他一下名，点谁的名？就是杜方平。他的错误是严重的，康老下面还要讲的。他的派性很强，影响了地方，影响了武斗。所以我们对个别同志有严重错误的要点名，这是经过我们中央文革讨论的，应该点一下名。

总理宣读了中央批示的第二段后说：这一段刚才也都说了，我希望军区也好，省军区，分区，人武部也好，两个野战部队，独立团，营也好，都要按照中央的批示，支左不支派。今天报纸上有篇社论（指《解放军报》社论《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没有来得及学习吧，还要继续学习。今天的形势，比去年不同了。那个时候，走资派组织一些保护自己的官办组织，赤卫队，黑字兵那一些组织，到了军队“三支”“两军”以后，都纷纷垮了嘛！拿南京来说，“一·三”事件一打，都打垮了嘛！曾邦元同志不是亲自参加这个战斗的吗？都打垮了嘛！那些跟走资派走的是少数，多数的是受蒙蔽的，军队一介入，就垮了。以后分裂为两派，一般来说，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观点不同，但，有的受压制多一点，有的革命造反精神旺一点，有的革命造反精神差一点，有的造反早一点，有的造反晚一点，但是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到了去年军队支左以后，很长时期还说革与保，是不恰当的。当然个别地方也有，那是武汉“百万雄师”，陈再道组织起来保他的，号称百万，其实不到一百万，我们去看过，没有那么多。以后一犯错误，不就瓦解了嘛！广大群众在基层，在工厂，在学校，不就反戈一击有功了嘛！群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应该欢迎，还要和他们联合。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夺走资派的权，工人阶级带了头，姚文元同志有这个经验的。“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高举了夺走资派的权的大旗。上海工人阶级夺权，有过准备阶段，十一月份起被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组织的赤卫队压制，他们自己造反了，不到

五十多天，就有一百万工人。南京本来也有这个形势，南京日期也差不多的，都是在十一月份左右，而且南京工人成立组织在先，是经过中央批准的。这一点我要提一下许家屯同志，他提出来，我们同意了，他给你们传达了。本来上海夺了权，全国都在学习，南京应该学习。都在一月份这个时候，什么“一·二六”呀！“一·二七”呀！还有什么“一·二九”呀！要是象上海那样，就成功了。我们总结了经验，除了上海以外，第一次夺权几乎都没有成功的，一派夺权，排斥另一派，你就不能成功。什么大方向对，我讲了南昌起义的事，不要再说了吧。大多数在外边，你夺权就不成功嘛！你现在还来纪念“一·二六”，就没有必要罗。因为你纪念“一·二六”就把军管否定了嘛！军管是中央批准的。夺走资派的权，这一点上没有错，但不成熟嘛！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所以还要军管阶段。军管就是要促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革命派联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在上海夺权成功，在南京夺权没有成功，一派夺权，另一派反对，夺权的是好派，当然没有参加夺权的要说好个屁罗！这是我们江苏的土话。有的说的文雅一点，一个支派，一个踢派。这在江、浙、皖三省都是这样，到现在安徽还有好几个地方没有很好解决，要从反面取得教训。军队要做好这方面工作，不能支一派，压一派，应提倡革命的大联合。过去没有做好这方面工作，支持一派，打击一派，没有在去年四、五月份以后分清形势，去年四、五月份以后，很明显，就是革命群众组织对立了，我们就提出了大联合，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大联合。当时上海《文汇报》写了社论，有许多地方没有认识，有的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不但革命小将没有认识，工人认识的也不多，我们军队也没有认识，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这不是党性，而是发展派性。那时两派已不是革与保的斗争，不存在革与保的问题，本来应该教育群众，向前看，大联合。毛主席说应该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嘛！有的却不是这样，长期摆脱不了派性影响，不仅群众的派性影响军队，军队的派性也影响群众。有的支持一派，后来又反过来，支持另一派，压这一派，这就引起夺枪，搞武斗。走资派利用派性，还有特务内奸挑拨离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派性斗争发展了，形成武装斗争。这是部队没有超脱，特别是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错误更多一些。

你们到这里四个多月了，通过学习，推动了大联合，消除派性。派性有个根

子，江苏的派性根子，从群众组织来说，是南大。南大造反早，是一面造反红旗，斗匡亚明嘛！全国四个大学，康老已讲过，就是北大、南大、郑州大学、西安交大。南大夺权以后，把自己的战友分成两派，斗了很久。去年十二月底，中央呼吁你们总算联合起来了。中央专门对这个协议写了个批示，鼓励了你们。南大的联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脱钩，不干涉工人运动。南京的产业工人不少嘛！数目相当大，总是比大学生多嘛！工人要站到前头来。尽管学生起了先锋作用，但在夺权时主力军是工人、贫下中农。学生要与工农结合，权才能夺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青年是先锋嘛！但革命知识分子总是要同工农结合的，要向工农群众学习，逐步掌握毛泽东思想。错误是难免的，知错就要改。现在我再要求一点，南大既然联合了，就要带头，不要干涉工人运动。南京三方面的工人“大联筹”小组在五台山召开大会，落实大联合，这个很好嘛！军队也去了。“大联筹”讲了话，讲话时，就冲杀出来一股什么“捍联”，哪里钻出来的？我们中央不承认嘛！这里没有代表嘛！现在大联合了，据说是九月份以后才搞起来的嘛！那个时候毛主席说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毛主席发出这个号召以后，还要拉队伍，树山头。解放战争的时候，提出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削平山头。你在解放战争以后，还要再拉山头，就不对了，时代不同了，现在抵制山头嘛！毛主席拿这样精辟的语言来提醒我们，这样子再出来个山头，就不能统一，不对头嘛！而且会议开得很好，你冲杀出来，还跳到主席台上去，这不是捍卫大联合，是破坏联合的。

康老：是破联。

总理：是呀，不是“捍联”，是破联了。这里总有人在后面捣鬼，我今天不想点名了，总是有人嘛！南京一年的运动，我虽然记不清楚，但几件大事还记得的。你们小将们既然搞了“大联筹”，就要支持“大联筹”，爱护“大联筹”。这样，军队就站在支左不支派的立场，凡是不赞成大联合的，解放军就不支持，对破联就更不支持，这要肯定。南京应该向上海工人学习嘛！上海工人是先驱，是老大哥。军队要把内部的派性消除，要支左不支派，把“三支”“两军”工作搞得更好。符合毛主席指示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十六条，符合你们达成的协议的就支持。符合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符合的就不能算是无产阶级革命

派, 不管他是那个组织都不支持。革命群众不可能没有错误, 今天可能有这样的错误, 明天可能有那样的错误。人数多的组织容易犯错误, 人数少的就比较谨慎。人数多的组织高姿态, 人数少的就不争了。南大“八·二七”采取的态度就比较好嘛! 所以就联合了嘛! 总之, 要力求少犯错误, 解放军要帮助你们。现在复课闹革命, 搞大批判。你们不是要求把江渭清要回去批判吗? 你们总要先把大联合搞好嘛! 联合起来再批判, 不然你拖过来, 他拖过去, 拖来拖去不好办。搞文斗, 不要搞武斗, 把他的错误批透。这样, 我们才同意把他送回去。这个批判, 一定要把联合搞好了才行。还要大批判, 批判刘, 邓, 陶。你们南大不是还有匡亚明吗? 就要好好地批斗嘛! 要批还要改嘛! 南京这么多大专院校, 怎么改法, 要靠你们自己嘛! 我们不能代替你们, 就是靠你们根据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去改嘛!

康老: 一九五七年反右的时候, 南大的教育改革搞得很好的, 革命的气氛很浓。

总理: 你们自己讨论, 你们提出创造性的意见来。

康老: 文化大革命以来怎么样? 过去你们学校地质系好象很有成绩, 发现了地质结构的理论, 这是教育改革的成果了。

总理: 五七年改革了一些, 成绩是有的, 以后, 没有继续下去, 受了刘、邓黑线的干扰。南大做出成绩来, 对全国有好处。

总理: 读完第二段最后一部分时说: 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军队首先要学好, 也要结合群众一起来进行, 把毛主席最新指示很好的落实。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 首先要学习。解放一批干部, 也要通过学习。一个省总要有几个革命干部解放出来嘛! 在学习班批判也首先要联合好, 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 不是以派性为标准, 否则就统一不起来, 你反对, 他去保, 就搞不下去, 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江苏点名的不少了, 江渭清已经点了, 《文汇报》的文章又点了陈×, 包××, 你们是知道了, 对象有得批判的嘛! 一边批判, 一边要解放一批干部。全省每个地区总要有一些干部参加三结合嘛! 有军队的, 有地方的干部, 有革命群众, 才能成立三结合的政权嘛! 那里面是没有派性的, 求大同存小异, 大同就是要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 大同就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大同就是你们达成的协议。在一些小问题上, 就不要去计较了。比如镇江达成了停止武斗的协议, 因为联委会抓了三代会两个人, 联委会已经答应放, 只是电话打不通, 他们在焦山

嘛！省军区要去做工作，省军区也是两派嘛！有接近联委会的嘛！把人送到三代会嘛！这是我出的主意。（有人插话：抓的是解放军，不是群众。）解放军更好办了，联委会答应放，解放军愿意去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嘛！为了这个事就迟迟不签字，如果达成了协议，他还不放人，联委会就输理了嘛！那就输了一分嘛！还有不成熟的，就等一等嘛！

还有苏州、南通这两个地区不肯签字，就是对苏革会，南通革筹会承认不承认，争论很久了。苏革会已经行施权力很久了，但面不够广，应该充实，扩大，调整，使没有参加的参加进去。已经在革委会的，应该欢迎没有参加的人进来。应高姿态允许给他们适当的数目。我听说有的愿意同等数目，这很好嘛！另起个名字没有必要。已经达成大联合协议，不必要推倒重来嘛！南通革筹会，对方反对，现在达成了协议，要扩大，还争论承认不承认，现在还是革筹会，答应同等数目，就解决了嘛！这在大原则上可以达成协议的，因为大家都说了嘛！问题要向前看。其他都达成协议了，就是一个名称问题，应该得到解决了。这个问题都要向前看，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办事。只要我们军队的同志很好去说服，去做工作，如果一时不通，就好好学习，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不要去一个承认，一个反对，数量增加了，就起了质的变化，就应满意了。就是要向前看嘛！所以，需要军队去说服教育，呼吁你们回到本地区去，都应加强学习，这样有利于江苏革命大联合。现在南京总的实现了大联合了，签字了，有一方面还说姿态不高，不够满足，我看就已经了不起。如果把十条都实现了，就大大前进一步罗！要在实践中去考验。签了字，说了就要言行一致，不要说一套，做一套。革命小将不要搞小动作，成为两面派。在运动中有少数坏人钻进来，搞两面派，把革命小将带坏了。如明知是事实，因为是对方说的，就说是造谣，这不是面对事实。还有当面说得好，回去不愿做，如主席说的，嘴上说文斗，桌下踢一脚，言行不一致，就不好罗！这不是毛主席提倡的革命学风，而是刘少奇的黑“修养”。表面上很老实，实际上是背后搞假的。一年半以来，对刘，邓，陶揭出了不少东西，有许多事，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一定要去掉这种坏作风。有的偷听电话，中央的讲话不是全面的传达，打电话，贴大字报，总是对自己有利的抓住几句话，搞几条，这就不好，不老实，不是毛主席提倡的作风嘛！要老老实实。我们内部的事，不能对敌人去讲，对我们自己的战友，我们自

己的错误应该说出来嘛！我自己在南昌起义中的错误对同志们讲了嘛！不要面对阶级弟兄，把阶级弟兄当敌人，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战友嘛！常州戚墅堰就是这样，完全是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一定是背后有坏人挑动。姚文元同志很耽心，煤都运不去，上海是工业城市，很需要煤的嘛！当然，现在常州好了些，希望你们回去要好好的团结。总有坏人钻空子，挑动，如南大“八·二七”原来很相信高啸平，后来要他回统战部去检讨，他就不高兴了，过去把你们分成两派，现在又在你们内部制造分裂。

康老：现在他反对曾邦元罗！

总理：现在你们撇开他，他又挑拨罗！这种人他有个人企图，个人野心，因此我们要点出来。这两个人都叫“平”，一个是高啸平，一个是杜方平。

康老：有的人自己叫“平”，实际上不公平。

总理：有的人叫“平”，还是公平的。你们都要提高警惕。“八·二七”跟他划清界线，就要学“八·二七”，自己揪出来。开始不认识一个人是常有的事，辨别不清一个人，也是常有的事。通常情况下，辨别一个好人和坏人是容易的，在特殊情况下，识别一个人就不那么容易罗！有的表面上是拥护毛主席的，其实他们在背后搞鬼。如刘少奇、彭真，我们长期共事，他的许多事情我们完全不知道。你们年轻受蒙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长期搞了那么多坏事，现在查出来了嘛！另外一部分人，他是受蒙蔽。革命队伍里头有几个坏人，不要大惊小怪，没有什么了不起。主席教导我们，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要革命的，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浪潮中，一切问题就容易暴露出来，个别坏人一时可以蒙蔽我们，长期是不可能的。暴露了要本组织和他划清界线。另一派知道，发现材料，也送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搞。就是按照毛主席说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帮助对方发现坏人，对方是高兴的，也会感谢你们的。这是友好的，而不是攻击对方，贴大字报，这样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纸张。现在提倡节约闹革命嘛！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的话，不节约是个缺点。有的时候，开大会下帖子都是用套金的。所以节约闹革命这一条很重要。

我们点了两个人的名，回去不要互相指责。你要指责，他要自卫，武斗就发生起来，搞这些东西不利于团结和联合。各方批评自己，这样才有利于江苏的革命大联合，有利于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我看江苏在你们的努力下，一定有一批干

部可以站出来，现在军队有，革命群众有，就是要推荐一批地方干部，关键要解放几个负责干部，你们自己要共同商量，要靠你们的努力。现在无锡、南通、常州、扬州、苏州、镇江都有人来，有两个分区没有人来，一个是淮阴，一个是盐城，希望你们去转达，给他们一点好的印象，推动推动，但是不要去指挥人家，只能作帮助工作，真正的事要靠他们自己去做。

康老：淮阴有反革命组织，什么“中国劳动党”，什么“新共产党”。

总理：江苏暗藏的反革命不会少，是国民党的首都嘛！留下的人不少，买办阶级影响很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地方，不可能没有暗藏的反动组织活动，还有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还有党内个人野心家，这一点希望你们注意。我们要眼明心亮，要提高警惕，部队内也有坏人。站出来的干部也要勇于揭发，明知道有人是叛徒，就应揭发嘛！这样就能坚决地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根子挖掉。最近上海揭发的反革命集团，根子就在苏南嘛！这是报纸上登了的嘛！南京《新华日报》就要办这样的报纸。否则会把群众引到错误道路上去。

姚文元：《新华日报》现在能不能出啊？搞了两个报纸！

总理：那就是派报了，不能帮助群众。你们是先大联合的单位，同军管会一起来帮助解决。军管会如何组织，我们要研究。南京要出个象样的报纸，把毛主席的声音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结合本地的情况，要有群众的言论。

江苏究竟是中游，还是下游，看你们自己的努力。现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已经有十二个省、市了，河南已经开会了，报纸上过两天就要发表。江苏十二个以前已经是没有希望了。河北、吉林、湖北、浙江、广东，这几个加上去，就是十七个省、市了。

康老：新疆也快了，形势很好，你们江苏不能落在新疆的后面，第十八个了。

姚文元：春风已到玉门关了，江南反而落后了。

总理：姚文元同志也是半个江苏人。

康老：春风也吹到你们紫金山嘛！

总理：春风吹到紫金山好不好？（众答：好！）我就讲这些，请康老讲一讲。

康老：我同意总理这个讲话，完全同意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我提醒同志们注意，这个批示，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大家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批示，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中央

在批示中讲，南京军区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军区犯了一些错误，影响到对革命群众组织的看法，因此派性发展了，军队内部一个时候也不一致了。因为有这些错误，一个时候南京地区“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报很多。但是，尽管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批示说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我对许世友同志说好话，今天是第三次了，因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实事求是的讲话。这一方面，毛主席语录告诉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对许世友同志也应该看他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毛主席说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这不仅是对许世友同志，对地方上的干部，对军队的干部，也要用这个方法罗！我曾讲过，南京有人讲，许世友反对毛主席，这恰恰相反，许世友同志在历次重大斗争的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多功绩的。这一方面，我同他一道工作过，有责任向同志们介绍。许世友同志我觉得应该向他学习。他在延安遭受罗瑞卿的严重迫害打击，在华东受到饶漱石歧视排斥，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起来，动摇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诚。他照顾大局，讲求团结，不闹分裂，那个时候只有团结才能打仗。他虽然受了坏人的打击，挑拨，但是，他是很坚定的。当然我不是说他没有一点错误，他自己也承认的。大家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全面的来看。对许世友的造谣，是坏人别有用心。这一方面，中央的批示中说是信任这个军区，这是很重要的。军区在座的王必成同志犯了错误，只要检讨就好了。他的检讨还是诚恳的，他也是在解放战争中有功劳的。南京有些好同志，我认识的很多，如周冠五同志、钱钧同志、廖容标同志、杜平同志，都应该从全面的来看，不要从一时一事来看。刚才周总理讲了，南京军区广大干部战士，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有很大成绩。我接触过十二军，他们在安徽支左很好，是支左不支派的，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同时我接触到六十军，六十军在滁州，六十军的政委在安徽支左工作一向很好的。二十七军我们最近接触尤太忠同志，尤太忠同志在无锡的工作，也是很好的。虽然一个时期没有接触过，但对二十七军过去我是熟悉的，就是华东的九纵嘛！华东的九纵我过去是知道的，在山东打仗是很勇敢的，解放济南嘛！这样的部队，

一时犯了错误，懂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很容易转过来的。如批示中说的，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不仅是支农、支工方面也是做得很好。军区所属的三个军，十二军、六十军、二十七军，在支左工作中，都做得很好。证明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我们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同志们要经常的想一想呀，你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依靠谁呢？应该象毛主席所说的，三依靠：就是依靠你们群众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第二是依靠人民解放军，没有人民解放军，你们能够进行这样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吗？这一点要有坚定的信念！毛主席和党中央都依靠人民解放军，难道你们江苏各群众组织不要依靠人民解放军吗？第三是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这一点，总理讲了，要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就要解放一批干部嘛！文凤来同志，你们想过没有想过呀？你们能不能成立革委会或革筹小组？（文答：没有干部。）在省委书记里面有没有能够站出来的啊？排一排看。（文答：没有）我在这里不是指名，“瞎点”一下，不是暗示你们的，张仲良怎么样？许家屯怎么样？你们自己要议一下哟，革命筹备小组搞不搞得成？曾邦元同志，你们考虑怎么样？

江青：省委委员也可以嘛！

姚文元：省委委员，常委里面怎么样？

（曾邦元、文凤来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

总理：不要争了，联合审查嘛！

姚文元：去掉派性就好审查了。

总理：对。（有的同志说，现在南京抓干部很多。）你们要说服他们不要抓。

康老：联合审查嘛！另一方面，要给人家机会，你站出来就挨打，谁敢站出来？（有的同志说：抓的人三方面讨论要放，联合起来审查，电话还没有打回去。）

江青：今天晚上就打电话回去，三八作风嘛！不要拖拖拉拉的，大家同意不同意？（众答：同意。）

康老：要相信毛主席说的，相信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你们提出这一个不好，那一个不好，照这样说法，毛主席说的话就要倒过来了，绝大多数干部是不好的和比较不好的罗！（众笑。）现在你们懂得毛主席的话罗！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不解放干部，你们自己也解放

不了。你们有派性，被坏人利用了。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了敌人嘛！《新安徽日报》是这样讲的。你们连个报纸都解放不出来！

姚文元：你们那个电讯版不象话，我要批评一下，报道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问的消息都报不出，一共两版，连字都搞错了。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音在你们那里听不到，这怎么行呀！应该办成紧跟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新华日报》。（有的同志说：就是杜方平搞的鬼。）杜方平以后不能再管《新华日报》了。

总理：杜方平也不能再搞军管会了！他犯了错误，一直不检讨，要中央点了名再检讨，好呀！现在点了名了，你应该检讨了！

康老：干部解放不了，你们也解放不了。刚才总理点了两个人的名，你们P派有高啸平，去年春天来了，开始我也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哩，因为他报过公安部一个案子，……所以开始我对他有一点好感。同时，他说陈光不好，不久和陈光对面时，他又把这个话收回去了，我看出他不是好的，讲话靠不大住。他不但反对这一派，支持那一派，而且又反对张春桥同志，这是“八·二七”，“大联合总部”自己揭发的。他在大桥时说：华东局还没有垮，几个省没有一个书记站出来，有张春桥在，谁敢站出来？

姚文元：完全是两面派。

康老：最近上海揭发一个反革命案件，这个反革命分子从香港到上海，带着炸药和打倒张春桥的反动标语来的。所以你们要注意，这个人很值得你们警惕。

姚文元：他还写过《吴越春秋》，就是《海瑞罢官》那样的大毒草，是吧？（有人说：高啸平找不到了。）

总理：应该找回来。

康老：“八·二七”这方面有责任把他找回来

江青：“八·二七”自己搞。

康老：省级机关“八·二七”的一个同志是好的，周锡禄同志写信给我，他把高啸平的十大罪状揭露出来。（有人说：我们“八·二七”战士有责任把自己内部的坏人揪出来。）

总理：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这个态度是对的。

康老：关于杜方平，在这里四个多月了，自己不检讨。现在我问一下杜方平，

你和林杰有什么关系？（杜方平站起来答话）林杰是你的部下这个我知道。我们要问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他有什么关系？（杜又答话）

江青：邢文举来了没有？（答：来了。）不管那个报社的，邢文举你对高啸平搞了几个月，我们上了你的当，你不是冷静地客观地反映问题，而且非常主观的，我们不包庇我们派出去的任何一个记者，反正你的话不诚实，你留下来，你犯了什么性质错误，你自己检讨。

总理：江青同志要求很严格，无产阶级司令部派出去的人做错了事，要很好检讨。

（杜方平又谈了一些情况）

江青：你在这里不要算流水帐了，谈实质性的问题，你在这里是算流水帐，不谈实质性的问题，时间很宝贵不要拖我们的时间。你在这里多久了呀！还不很好检讨，这些事够你检讨的了。你有什么关系，写一个检讨给我们，也向群众检讨。

（当杜方平说到四月份写过信给康老时。）

康老：不是给我写的信，而是给林杰写的信。你是叫朱念州怎么样找林杰的？你不要装糊涂了，我这里有信，你叫林杰去找朱念州发生关系，插手江苏文化大革命，你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另外，还有关于何朴的问题，何朴是科技大学的，冒充中央文革调查组，你同他勾勾搭搭干什么？何朴唯一的目的是去打倒许世友，你就是打倒许世友的黑后台！你是解放军，你却组织人把矛头对准我们解放军，你是什么解放军？！（杜方平起来辩解）

江青：你不要解释了！

总理：你回去检讨吧！

康老：好派要看清杜方平的假面目，他在北京与林杰勾结，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军区，反对许世友同志，搞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两派不能大联合，同杜方平有关。希望红总方面眼睛要擦亮，警惕性提高起来。去掉了派性，眼睛就发亮了有了派性就看不见坏人，如果不去掉派性，就没有阶级观点，就没有革命的观点。总理讲了南京不能大联合，后头有黑手，南京有，北京也有。这一点省军区有些同志要特别警惕，何朴就利用了你们。我想在中央的批示下，迅速实现大联合，迅速实现三结合，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全面落实，把南京和江苏地区

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现在几个地方联合了，南京三大派联合了。因此，现在应该看到，春风已经吹到紫金山了。希望春风沿着长江吹遍江苏各地吧！

总理：我们要感谢康老的希望。（众呼口号：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

康老：还有一个问题，总理说了，千万不要言行不一致，青年人要警惕这个事情。最近我们编毛主席著作，看到这么一个文件，一九五〇年五月四日毛主席当时对华北革大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的批示，这种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作为在机关、学校、部队清查反革命分子是很有用的。我们自己言行不一致，会被敌人利用。刚才我们总理讲，点名了，不要这一方面攻那一方面，那一方面攻这一方面。我们点了杜方平，你们“八·二七”如果去攻击“红总”，那么，那一方攻击你们方面还有高啸平呐，这样就攻打起来噢！北大出了陆平，南大出了匡亚明，南京大学是不是要到北京大学揪小陆平肃清流毒啊！北京大学是不是要到南京大学揪小匡亚明肃清流毒啊！群众和坏人要严格分开，你们两派都有坏人嘛！我们党还出了一个刘少奇呐，中国共产党光荣、正确、伟大就动摇了吗？还出了彭、陆、罗、杨呐，我们中国共产党还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党。你们江苏还出了江渭清，不能说你们每个江苏的人都是个小江渭清！那怎么行啊？所以总理今天交待这个事情很重要。你们今天晚上赶快打电话，把抓的人都放出来。

江青：中国这么大，还怕跑掉了？跑掉了一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跑掉两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总理：高啸平也总会找出来的嘛！

（当有人要杜方平对他的假党员表态时。）

总理：材料都在这里了。

江青：都看到了。今天先谈他关于大联合方面的派性，有些问题，你们回去再搞。

（当杜方平又起来辩解时。）

总理：你坐下来，反正你明天还不走嘛，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康老：信以后再给你看。

（总理请伯达同志讲话。）

伯达：总理、康老都讲过了我没有了。

总理：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我觉得今天的气氛很好，总理、康老讲的很多，我对南京了解一点，但是很长时间没去了解，很对不起同志们。现在情况有些缓和了，同志们在北京四个多月，走的时候我们欢送，再来，我们也欢迎。

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总理、康老讲了也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教导，各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都不要到对方去揪坏人，要不就影响团结，最好是自己揪自己组织里头的坏人。你们大联合了，没有空子钻了，他们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过去南京这个城市我向来没有好感，蒋介石统治多年，渣滓很多，那是个渣滓城。解放初期，我到农村调查，路过南京，柯庆施同志当时在那里做工作，现在我们悼念柯庆施同志！那时柯庆施同志说：这么大的城市，没有工业，都是一些渣滓。经过十几年了，南京成为一个工业城市，我觉得可爱了，要爱护自己的成就。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一个不是生产的城市，改造成一个工业城市。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仅仅经过十几年。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那要几百年的历史，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起决定性作用。无产阶级最不讲究资产阶级派性，无产阶级最强调党性，不容易摇摆，忽左忽右。南京有多少产业工人啊？（有人答：三十多万。）很了不起了，完全可以左右形势了。上海一百多万嘛！当然，这不否认青年人的先锋作用，闯将作用。但工人阶级不动摇，联合的好，团结的好，你们的大联合，三结合就会很快地实现。今天，我就感到很大不同，这样，你们就会心明眼亮，顾大局了。江苏是一个有四千多万人口的省份，而且有革命传统，工业也很发达，有上海这样一个中央的直辖市可以做你们的榜样。闹得这样久，每一个人应该想一想，这对国家，对人民是有害还是有利？这一点我想提醒同志们。当然，同志们有很多革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研究。

有一个问题，我有几次没有说，今天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康老也讲，读了毛主席的语录，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这个我就不说了。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年春季，他就有揭发。他揭发上海陈丕显他们如何在主席，林副主席，总理，我住的地方装窃听器。他的揭发你们不知道。另外他还揭发江苏李××，洪××，为了保护反革命，叛徒，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受命于北京的反革命分子，烧掉××卷档案，邮检，你们知道不知道？不要只看到他说过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而要看到他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他是热爱

党，热爱我们军队的。去年，有一个时期忽然又揪许世友同志，一个同敌人作战那样勇敢有人，被揪的钻工事，我知道了，打了两次电话要他来，他在国庆节来到了北京。有人抄了他的家，他说，抄了家日子更好过，这个态度很好。当然，抄家是不对的。

总理：许世友同志一开始就支持“八·二七”，他给我打过电话，他是支持“八·二七”的，在当时是不容易的。

江青：他的揭发，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都不知道。这应该记人家的功，不要光记人家的过。有些人就是趁火打劫，这是很恶劣的，不允许的。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是不允许这样的人，是不允许趁火打劫的人的。当然，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要取得经验，不要搞武斗，搞喷气式。我觉得应该很好地讲道理，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摆事实，讲道理。首先是三大派真正的联合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没有理由不联合嘛！就是后头有人在那里挑唆嘛！台前幕后的，这只有自己组织更清楚。要相信另外一个组织里的革命同志是自己的战友，不要把自己组织抱成一团，那就是派性了。今天好多同志都讲了，只要你们真正的实现大联合，对好多地区有影响嘛！江苏海岸线很长，是相当重要的地方。所以我向同志们建议，不要只记自己的功，要记别人的功。如许世友同志的功，我是记了的。他这个揭发很重要，有材料寄来。这个事你们不知道，光想到他说错了话，做错了事，这是不对的。我跟许世友同志没有私交，但是这是普遍的原则，对别人要多讲长处，对自己要多讲缺点，这是毛主席号召的“要斗私，批修”，“实行革命的大联合”。

革命群众要很好的想一想，没有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而且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有没有这样大的民主啊？（众答：没有！众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军队如果没有看到这样好的群众，我们的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呀？！总理，康老才说了你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人民解放军也要向你们学习。我们这样的人没有什么本事，就从群众那里来，听一点意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去。我们没有一点本事，说错了话，你们可以批判，大字报，小字报都可以，但要讲理，不要动起拳头来了。不要上面讲道理，下面踢一脚。我们也总结经验，你们也要总结一点经验。这样，军民团结，上下团结，

搞了革命大联合，坏人藏不住。如果尽搞派性，坏人就钻你们的空子。如果你们不搞大联合，坏人就钻你们的空子。江苏这样一个大的省份，在我们国家占很重要的地位，不要老是纠缠不清。这一次，听说有三十七个协议。我希望你们不要学蒋介石，达成协议第二天就撕毁了。要学毛主席，要学我们共产党，说话算话。刚才，这个女同志说，电话没有打回去，应该今天晚上打回去，不要拖拖拉拉。

当然我了解情况很少，过去过问了一下，后来又很少管了，不如总理、康老、姚文元同志了解的多，我觉得很抱歉，很对不起。希望你们那里春风多一点，早一些。结果你们那里刮西北风。

姚文元：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争取后来居上。

江青：你们在北京四个月了，总算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搞三结合很有希望了，这是很好的。已经开步走了，我们祝贺你们，并向同志们学习！你们想把问题搞清楚，生怕我们国家出坏人，变颜色，这是很可贵的。也要向军队学习，军队是很耐心的，应该回去做踏踏实实的工作，不要浮在面上。这是我个人对同志们的希望，同志们觉得不对，完全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我都不怕。

（工人代表表示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决心。）

总理：江苏，南京的工人阶级应响应江青同志的号召，迅速联合起来，带头推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达成的三十七个协议，中央不一一的批了，中央对南大的批示，同样适用于你们。这些协议，中央、中央文革表示同意，向你们表示祝贺！希望在实践中来证明你们是紧跟毛主席走的，把江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毛主席对江苏问题很关怀，前天在接见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前，我向主席报告江苏，南京等各派达成大联合协议的情况，主席听了很高兴，说：江苏又前进了。这说明主席对江苏多么关心啊！（众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协议签订了，希望你们真正的执行协议，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最后一点，还有军队的问题，搞四大的单位的两派也要联合起来，再不要继续派斗下去了。二十一位代表在京西表现很好，继续保持下去。在军队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三团两队等搞四大单位，能不能联合？（众答：能！）不要再搞什么平反团，平反组织了，王必成同志已作了检讨，搞那五条是错误的，改了就好了，不要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了，什么一级级平反，什么戴红花，一个个

的赔礼道歉！

江青：那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的！

总理：我们代表中央文革，对过去受压制的，搞错了的，宣布一律平反。你们回去都传达一下，平反组织不要再进行了。（有人答：我们坚决遵照总理的指示办事。）这样才象解放军战士嘛！你们不要把派性搞到地方革命群众组织里去。什么“高参团”，“心中司令部”，“地下司令部”，这是国民党那一套，统统取消，打倒派性。

当总理、伯达、康老、江青、文元等中央首长离开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送，一次又一次高呼；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整理）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国务院，中央文革给南京市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的贺电

江苏省军管会转南京市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热烈祝贺南京市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召开。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胜利，是南京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重大成就。

目前，南京和江苏省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并且越来越好。希望你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切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依靠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加强军民团结，高度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相信，在南京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后，南京地区的工人阶级将进一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定不移地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早日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而奋斗。

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希望南京地区的工人阶级在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起带头作用，继续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

新功。

国务院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许世友在南京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时间：上午，地点：华东饭店。参加会议首长：周冠五、吴大胜、杨新亚、王军长。参加者：南京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共 15 人。〕

吴大胜：许司令员要大家来座谈一下，有什么谈什么。

许世友：大家随便谈。

（由工人大联委、南大、省级机关、江苏东方红先后作了汇报，都以自我批评为主。）

许世友：今天大家谈的气氛非常好，大家都在用脑考虑问题。不像过去没有敢把大家放在一起，大家都虚心了。自从上次和大家见面后，我就没有管过事。杜方平、高小平是坏蛋，是黑手就应该斗，一切责任要向黑手，是他们在搞鬼的。同志们对以后想了很多，怎么办？这些意见都很好，成立革委会要很好学习上海，特别是报纸，《文汇报》跟中央跟得很紧，我只看《文汇报》，《解放日报》只发了 30 万份，《文汇报》发了 60 万份还不够。江苏南京的问题要搞好，关键在头头，你们说要搞好就搞好了，你们说要搞坏就搞坏了。抓黑手、抓坏人一定要自己搞自己的，自己清理自己的组织，否则就要乱。上海的经验你们要很好的学习，我们虽然比上海推迟了一年，但也有好处，经验教训要多一些。红总方面受了杜方平的骗，八·二七就没有受高啸平的骗吗？现在要向前看，要顾全大局。军管会要硬一些，对一些坏人、杀人的、破坏的、强奸妇女的，该抓则抓，该捉则捉，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反复，因为你们的联合就是敌人的完蛋，敌人是不甘心的，干部问题应该联系调查，这样好，干部解放要联合解放，坏人也要联合审查，现在干部要照顾到整体，要有全局观念，这是你的，那是我的，应该是国家的，我们都是国家的人，山头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否则你们的山头一下子也搞不好，红军也有山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起来，一定要照顾到大局。

对南京的问题我一直不管，生病去了，今天我是来了解一些情况的，今天的

气氛很好，你们派性少了就好了，群众是要跟毛主席的，你们的思想落后于群众，群众就会把你们抛掉，你们不能掉在群众后面，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曾邦元同志反映现在有骄傲自满情绪，有什么骄傲，现在才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要提高警惕，要注意小资产阶级派性一定要抛掉，有派性，组织上联合起来实际上并没有联合。现在还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一定要打倒，它是破坏大联合三结合的，有无政府主义的人要来就来，要走就走。一切他自己说了算。

上海把坏人拉出来，挂牌子，戴高帽子进行斗。这些人你不打击他，他就打击你。你们这些头头也要特别注意，弄不好有人暗杀你们的。军管会要大抓毛泽东思想学习，在组织上要抓好干部，对杜方平、高啸平的斗争，还是联合起来斗，这样比单独起来搞好，斗坏人不能联合还能联合起来组织政府吗？杜方平是前线指挥官，他与林杰有关系，杜方平后面还有杜方平。你们八·二七没有上高啸平的当吗？我看是上过当的。你们在北京四个月，我去过一个月，是住在主席那里，你们见不着。你们关心我的身体，老是自然发展规律。我今天讲的可能是主观主义，过去打，现在不打就算了吗？你们犯了一点错误，接受经验教训就行了吗？我们犯的错误比你们多。

吴大胜：同志们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军管会革委会要好好研究，许司令员给我们提了不少意见，工作作得不好，今后改，过去我也犯了不少错误，今后一定在同志们的监督下，来搞好工作，今天我向同志们提一个问题，对不对同志们商量。我们从北京回来后看到街上的大字报，对办学习班、革命大联合的很少，对杜、高、陈、包、张揭发也很少，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坏人可以揭发呢？新的气氛看到不突出，这个问题同志们要重视，要宣扬一些积极因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联合）。对坏人坏事要强调自己揭发自己，要自己纯洁自己的队伍。对坏人应该揭发，特别是一些黑手，无论如何不能把矛头指向群众组织，对主席指示要不折不扣，你们对不符合主席和中央指示的做法，你们去抓过没有，现在有的组织好象没有什么劲道，有不同意见可以组织辩论，但不要带派性，讲团结讲联合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

王治平夫妇都是坏蛋，老婆是特务。

（根据传达记录整理）

一九六八年三月，许家屯《向毛主席请罪》

最高指示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我是一个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的干部。今天，我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伟大的党，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请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伟大的党，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对我一再进行了热情、耐心的教导、帮助、挽救；这次，又让我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再教育。使我逐步觉悟到，在过去党内生活的二、三十年中，在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那些是属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些是属于以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我觉悟到，我在历史上许多重要时期，是站在刘少奇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渭清、陈光一边，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想起来，实在万分愧对毛主席，愧对党和广大革命人民多年来对自己的哺育，培养和期望。自己是已经掉进死亡深渊里的人，只是由于毛主席，党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热情而耐心的挽救，才使我重新获得革命的生命，重新做人。我衷心感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衷心感激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对我的关怀慈爱和挽救，衷心感谢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和挽救。让我一千遍，一万遍的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教导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的历史，是一部充满错误和罪恶的历史，是一部愧对毛主席，愧对党，愧对广大革命人民的历史，经验是非常惨痛的。我先简要地交待我历史上几个主要问题。

一、关于春泥文艺社和管维霖的问题。一九三五年，我在如皋平民工

厂当造纸学徒，业余时，在当地报纸上投稿，发表一些短篇文艺作品，因而认识了俞铭璜、吴健等人，他们都是春泥文艺社的人，因而参加了该社的活动，成了这个社的主要社员之一。

春泥文艺社，创始在什么时候，我现在仍不清楚，可能是在 33 年~34 年间。这个团体，据我现在的认识，是一个自发性的，小资产阶级左翼文艺青年为主体的新文艺团体。社员大约有五、六十人，多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分布在如皋、南通、东台的拼茶一带。发起人可能是叶胥朝、俞铭璜等人。

春泥社的成员是比较复杂的。文艺倾向，主要是“左联”，也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第三种人，甚至还有个别倾向所谓民族主义文艺的。在政治上有共产党的脱党分子，自首分子，当时不知有叛徒，也有国民党员。主要骨干，大约十多人，大多倾向“左联”，但后来分化较大。三六年元旦俞铭璜，吴健，徐静渔，潘也如，沈絮，我等人，成立了一个“左翼作家小组”，作为春泥文艺社的核心组织，对其他社员是秘密的。明确这个组织是“共产党的外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后来有一个上海地下党的人来如皋察看了我们活动情况，没有发展组织，留下一部分印刷品。（其中有王明《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油印小册子。）

春泥文艺社的活动主要是搞文艺创作，出刊物。当时，主要在叶胥朝担任总编辑的国民党如皋报上出副刊。后来发展到宣传大众语，搞汉字拉丁化，学世界语及其他外文等等。左翼作家小组成立后，发行了一些油印秘密传单，小册子，进行了一些扩大社员的活动。八一三上海抗战暴发后，曾做过打游击的准备等等。

三七年底，我在上海流亡抗敌宣传队，陈定、韩国柱等人的影响下，和俞铭璜、徐静渔等十人，组织抗敌救亡宣传队，离开如皋北上去延安。就这样，实际上脱离了春泥文艺社的活动。后来的情况，没有查问过。

管维霖是春泥社的老社员之一。他父亲开澡堂，是个资本家。自己在上海上学，毕业后留校当图书管理员。我和他关系一般。主要是文艺倾向上合不来，他又在上海上学，很少见面。抗战暴发后，我们去内地，管从上海回到如皋。如皋城沦陷后，管不久便当汉奸，在如皋的新皋报当社长或总编辑。当他知道俞铭璜在江都大桥地区新四军工作后，写过信给俞，表示做汉奸是所谓“不得已的，还想为抗日做些工作”。四〇年我到如西当县委书记，俞铭璜曾和我分析过管的

情况，认为这个人没有革命气味，苟且偷安，保家保命。但多少受过一些影响，当汉奸内心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据其来信看，有机会还是可以利用的。我到如西后，正是根据地开创之初，如皋城是当时苏中根据地前哨最突出的一个敌占城市，情报基础很差。地委书记常一平，新四军一旅旅长叶飞交待我任务，要加强这方面工作。我便集中精力，抓了一个时期。当时，想到利用管维霖的问题。时间大致在四〇年底，四一年初。我便找关系去找管维霖，要管到根据地来谈抗战问题。管表示原意和我见面，但又不敢下乡，怕为敌人发觉。我就要他在如城附近找一地方，我去和他见面。管便约了时间，在城东南郊一个美国传教师家见面。我便去和管见了面，对他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他立功赎罪。管表示接受，并报告了敌伪情况。后来约定情况传递关系，我便回根据地了。在敌占区停留约一、二小时。回来后，便将管的关系交给有关部门管理。后来，看到近和一些情报，但没有再和他有什么接触。这个关系的建立，和我去敌占区和管见面，当时都向地委书记常一平，和分管敌工的专员朱克靖汇报过，经过他们批准的。

四五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九、十月间，我军攻克如皋，我随军进城，便和如皋县委一个领导干部去看过管维霖。管当时闲居在家，要求出来做工作，我答应可以考虑，后来，我把他介绍给专区干校学习，这是一个吸收知识青年培训干部的训练班组织。后来怎样安排的，我没有查问，就不了解了。

五四年我回南京工作。我的印象中，记得接过管的一封信，说他在上海当教员，失业又回到如皋，要求为他解决工作问题。我毫不警惕，随手在信上写了几行字，把信转给如皋县委或县人委，证明管在抗战时间为我做过情报工作，请他们对管安排。信是由市委办公厅转的。

我和管相识二十多年中，管一共给过我四、五封信。有三、四封是我参加工作后写的，多是对我捧场的。大约有两封信是解决工作的。我只回过一封信。参加工作后，和管见面就是前面交待的三次。管维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仍不了解。

在处理管维霖问题上，我有严重错误。四五年如皋解放，我立即到他家去看他，当时我是地委书记，不去看军烈家属，而先去看管维霖而且是在没有查清管维霖在当汉奸期间，究竟为敌人做了些什么，为我们又做了些什么，他的政治面目到底是什么，便主观轻率肯定他是我们地下工作人员，右倾的立场、思想，

使自己完全丧失政治警惕敌我不分，丧失立场。后来，还在这个错误基础上，为他一再安排工作，让他打进革命队伍中来，是严重的包庇行为，错误更加严重。

二．关于党籍问题。我是三八年四月，在国民党第五战区青年敌军团加入共产党的。地点是河南潢川，介绍人是俞铭璜、祇思澄。

三八年六月左右，徐州失守，国民党军溃散。我当时所在的工作单位，战地宣慰团正在陇海路上的运河站前线服务，也溃散了，我便和党的组织失去联系，脱党了。

三八年底，我在灌云从事救亡活动。知道山东南部有八路军活动，便去鲁南找党。在营县大店镇找到八路军某支队的政委景晓村，向他要求恢复党籍，报告我在灌云某地活动情况。他要我先回灌云，待他查明我的党籍时再派人来找我。约一月左右，有一叫孟宪宇的持景晓村的介绍信来找我，信上同意恢复我的党籍，并决定成立东海，灌云两县工作委员会，指定孟为书记，我为组织部长。负责开辟两县的党的工作。孟是东海县政府的科员之类的人员，当时也在东海县一带从事救亡活动。从上海下来的陈飞，冯国柱当时也在东海境内从事救亡活动，我们经常碰头，交换情况和工作的意见。他们曾介绍孟宪宇的情况，怀疑他是托匪。因此，当孟来找我时，我以为景晓村不了解孟的政治面目，受骗了，便将他敷衍走了。随即派人持信去山东向景报告。去的人走到半路，遇敌人进攻，占领新浦、东海过不了陇海路折回。不一、二天，灌云城也险陷，我们便下乡打游击了。就在这时，孙朝旭，于隆海（当时我知道他叫于辰）等来东海，灌云一带发展党的组织，他们是属于苏皖区党委系统的。他们由陈飞带来见我，谈关于灌云的建党问题。我当时向他们表示，景晓村已同意恢复我的党籍。我的党籍等我去鲁南时，仍由景解决。和我在一齐活动的同志，他们可以先发展。就这样，吴健等入了党，建立了灌云县委。于耀海是书记，吴健是组织部长。我们还是在一起行动。因此，事实上有了两个领导中心，我感到于对我采取宗派态度，实际上是不愿接受他们的领导。后来，我去兴化活动搞灰色武装，不成，回来时拉起来的游击队是和三团合并，原来一齐工作的同志已分配了工作，都走散了，我感到没有再去山东找景晓村的必要，便主动找于耀海，要求恢复党籍。当时，正值三团五里槐打日本鬼子有了一个大胜仗，于很忙。但他答应考虑我的要求。隔了一、二天他告诉我，他们研究同意为我恢复党籍。并要我到当团三营指导员。我存在

地位观念，不愿居人之下，要求他介绍我回如皋开辟工作。在我一再要求下，又过了一、二天，他要我代表八路军三团到大桥地区和新军取得联系。我感到不好再推辞，便去扬中找到当时新四军挺进纵队的政治部主任魏天禄，约好了以后互相联系。回到灌云，于耀海等都集中在汤沟开会，我又找到汤沟，没有找到于，三天便发生汤沟事件，我被俘。隔天释放出来后，和陈飞（他当时可能是东海中心县委的组织部部长或副部长）一起去宿迁方向找三团。路上，我向陈飞发泄了对于耀海等人的不满，并对成立三团认为搞“左”了。表示要回去工作。到了三团后，陈飞直接把我介绍给苏皖区党委青年部长张产，他是来东海一带巡查工作的。我又把和陈飞说的一套向他提出。张对我提的意见不表态，却要我留在海滨工作。经我一再要求，他表示，我回南边去他做不了主，要我直接去找区党委书记金明。我拿了他的介绍信沿交通站在皖东北四县灵璧一带见到金明，要求他把我介绍给苏北工委，回如皋开辟工作。金明说了他不知道有苏北工委这个组织。上级党把陇海以南，长江以北，京浦路东的地区都划给他管。如皋也归他管，我要回去可以，由他直接派回工作。这样，金明亲自写了一个证明文件，要我回如皋组织中共如皋工作委员会，负责开展如皋一带工作。回到太州，到大桥找俞铭璜联络。那时俞是苏北工委的宣传部长。俞看到金明给我的证明文件后，交给了惠浴宇，当时正值苏北工委改组为苏北特委，常一平来当书记。他们商量后，惠浴宇来和我谈话，要我不去如皋，去太兴任县委书记。我当时向惠浴宇说：金明派我回如皋，你们要我去泰兴，我怎好向金明交待。惠浴宇表示，不要你负责，有我们负责。我便接受了他们的派遣，去泰兴了。

于耀海为我恢复党籍，就是他和我两个人之间接触解决的。他现在不承认这件事。但实际情况就是我上述交待的。如果于那时不为我解决，我可以找景晓村，还可以找陈飞，更可以找俞铭璜解决。当时我没有伪造的必要。

四五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党籍问题我做过交待。组织结论是相信本人交待。五六年旧省委审查过一次，结论大概是不妨碍使用。六四年至六六年旧省委又审查一次。结论是承认党籍。六五年旧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步春为此找我谈话两次，表示承认党籍。

在处理党籍过程中，我是有错误的。当时，我个人英雄主义恶性膨胀。在我们伟大领导毛主席和党的崇高威信下，在抗日高潮形势下，灌云等地革命群

众共同努力, 创造了一个局面。可是, 我却据为己有, 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 以领导人自居。在向景晓村汇报时, 并夸大事实, 说沦陷后在海属几县可以拉起二、三千条枪。丑恶的目的, 主要是表现自己有办法, 搞起了一个颇为不小的局面, 想当党的领导人。在孙朝旭, 于耀海等来发展党的组织时, 因不甘居人之下, 不肯接受他们的领导, 要另立局面, 便搞灰色武装, 制造分裂。后来, 我还借口汤沟事件, 向张产报告, 说当时海属党的组织成立八路军三团“早了”“左了”, 其实是自己右了。四五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 仍然夸大枪支数字, 并把对孙明旭, 于耀海等人的意见, 说成是和他们的争论, 以炫耀自己的所谓正确, 有办法。还是为了表现自己, 骗取荣誉。在个欲望得不到实现时, 又不顾大局, 不顾抗战和党的需要, 蓄意求去。后来接受了金明的派遣后, 又接受惠浴宇、常一平的派遣, 而不向金明交待, 都是以我为中心, 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这些, 六五年我虽做过检查但是无组织无纪律, 自由主义到了极点。

关于汤沟被俘问题。三九年夏, 我完成于耀海交代的, 代表八路军三团和新四军联系的任务, 回到沭阳县的汤沟镇。当天上午, 我去汤若愚家看了顾逸萍, 下午, 我到汤沟小学去看陈飞, 当时我知道汤沟小学是三团办的青年训练班的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顾逸萍才告诉我, 当时海州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 会址就在汤沟小学。我和陈飞, 孙若溪, 武进明等晚饭后正在操场纳凉闲话, 听到外面枪响, 接着有人来报告, 说三团团长汤曙红被县常备队大队长周发乾骗到乡公所打死了。正在忙乱间, 县常备队来包围学校, 便关上大门, 相持一、二小时, 门被冲开, 就这样, 我和在学校里的人, 约百人左右便被俘。被俘时, 我看到陈飞在内。当时, 已夜间十二时左右, 被分关在几个教室里, 也没有灯火。我便将在南方新做的一身学生装, 和一个不相识的学员掉换了一套破衣。随手拿了一个斗篷, 混在学员一起。天拂晓时, 周发乾来学校, 把俘虏排在操场上, 要人来认里面的共产党。结果, 把孙若溪认出来, 带出去了。其他的人都说是学员, 又关回教室。上午, 不断有学员家属来带学员出去。近午, 有一穿便衣的人, 查问姓名, 带走一些人。当时, 也询问了我, 我回答姓许, 他问我那里人, 我说是南方人。他便走了。过了一、二小时, 这人又来了, 要我跟他出去, 我不知为什么, 只得跟他出去。走到汤沟镇外, 他用马送我到顾逸萍的住所, 汤若愚的家里。汤父亲是国民党的汤沟乡长, 我住在那里一夜, 第二天他们又用马送我到党的交

通站，和陈飞会合，一齐向宿迁方面去找八路军三团。

我的被营救出险，是汤若惠、顾逸萍等活动的结果。带我出来的人是国民党沐阳县常备队的军需官，姓葛，他在党校里便追求我们一个姓武的女同志，女的不理他，但他却一直没有放手。汤若惠、顾逸萍等利用这一点和他开谈判。要求营救关在汤沟小学的一批人，作为交换条件，是替他做媒。姓葛的答应了，她们便开了一批名单给他。当时不知道我也在汤沟小学，没有我的名字。开的主要的是参加中心县委扩大会的人。姓葛的带了一批人出来后，说到有一个姓许的蛮子，汤若惠、顾逸萍等才知道我也在学校里，使要姓葛的再进去带我出来的。

我被俘前后十余小时，没有经过审讯，没有做过任何手续。出来见到陈飞后，便将获释的情况向他们讲了。陈飞是怎样出来的，我没有问他，不了解。

关于枪决鹤天问题。四一年，我在太州县任县委书记工作期间。化周区人民政府区长杨鹤天，每到一处宿营，都奸宿妇女，不从还用强。一次，他把宿在一个房间里的姑嫂二人强奸了。群众反映很大，敢怒不敢言。他还公开吸食白面，和地、富坏人打麻将，聚赌；和伪军勾结等等。民愤很大反映“根本不是新四军的区长。”有一次区干扩大会上，揭发出来了，会上干部要求严办，很多人要求枪决。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县委副书记杨源时，县长晋长明，组织部长丁辉雯等，都一致主张枪决，我一时冲动，便同意立即执行了。我向地委书记常一平，专员朱克靖当面汇报过，他们没有批评我。为过去没有认识到这样处理有错误，没有交待检查过。

对杨鹤天的处理，应先报请上级批准，不应先斩后奏。我以小资产阶级的所谓“正义感”“疾恶如仇”的冲动，无视党的组织律，把自己视作为党的化身，个人越权。错误是严重的。

关于一百两黄金借款问题。四六年，顾逸萍去上海生孩子，是通过她的妹妹顾莲的关系进行掩护的。年底她妹妹顾莲从上海来解放区找我，要向公家借一百两黄金做猪生意，表示愿意为公家买药品、布匹等，作为还款。顾莲的丈夫吴绍其在上海开猪行，我因顾逸萍是他家掩护的，从个人情面出发，不好推却，便找专员汪海粟商量。我想了一个所用“公私两利”的办法。当时，区党委陈丕显要我汇款给十地委做活动经费。我想先以此款借给顾家贩猪，让他周转一下，使作为汇款还给十地委。当时汪海粟同意了。（当然，这是我的责任）便由管钱

的蒋诚付给顾莲，说好马上有人持条到上海取款。不久，十地委政治交通员范国荣来，我给他汇条到上海顾家取款。那知顾家贩猪折本，一时拿不出。范国荣又来根据地找我，说十地委等着这笔款子用，要我再给一百两。顾家借的一百两以后再取。同时，和我商量，能否用顾莲家做联络站。我考虑顾莲入过党，后因吃苦不下脱党的，她有家产在根据地，认为比较可靠，便由范国荣带信给顾莲，要她为党做些工作。并要倪浩堂，蒋诚又给了一百两给范带去。范去上海后，便以顾莲家为联络站。十地委金柯叛变出卖了这个联络点，金柯带特务宪兵去顾家捉人，范国荣正在顾家，由顾莲掩护逃走敌人把顾莲丈夫的哥哥、姐姐捉去南京，解放时才放出。在这时之前，顾莲又来根据地一次，是告诉我贩猪折本，一时还不起欠款的。那时我已到台北地区，便带他去到分区财经处处长刘和庚处，重新立了借据。四九年底，顾莲萍从衢州回如皋带孩子，我要他带信给如皋县委、县人委，请他们帮助向吴绍其索此欠款。吴家还不出，借了两部飞机旧引擎抵偿的。

我利用职权，假公济私，为了顾个人情面，借此巨款给亲戚，还以“公私两便”的谬论为自己的错误进行掩护，使党和国家财产遭到巨大损失。在金子已借出，范国荣去上海取款当中，陈丕显当面查问我十地委汇款汇了没有时，我那时没有估计到顾莲家会因贩猪折本还不起款子，只答已汇出了，没有向他汇报具体情况。这有一个思想活动，怕暴露私心，给领导上以不良印象，出来以后，一心只想如何善其后，又没有勇气向组织汇报，承认错误。五三年整党中，有人揭发后，我只交待了顾莲借一百两的情况，对范国荣后来又取一百两的问题没有交待清楚，顾虑说了后问题会更复杂化，搞不清楚。私字当头，党和群众都不相信了。直接请县委索款，而不向当时领导人交待，向组织交待，也都是同一原因。错上加错，使错误更加严重，是我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严重错误。

关于党内处分问题。五三年，我在福州市委书记期间，犯了严重错误，受到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的处分。五六年福建省委或省监委通知江苏，宣布处分撤销。受处分的错误有三条：第一，四六年借一百两黄金给顾莲问题，这是假公济私的严重错误。第二，抗战前，我母亲将我姐姐卖给国民党一个高级军官作妾。解放战争后期，这个军官死了。淮海战役后，我找到了我母亲。福州解放后，我母亲把我姐姐叫来住在我家里。我只不理睬她，没有正确处理，包庇了反革命家属。第三，严重的骄傲自满。对省级机关和省委某些负责人不够尊重。

我再检查这一时期，我在工作中所犯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三九年初，灌云沦陷后，我和胡灏搞了一个几十人的游击队。为了另立局面，便幻想利用胡灏出面，用合法方式，向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长王公与活动，要他任胡灏为灌云县长，县常备旅长，搞所谓灰色武装，扩大力量后再公开政治面目。我用青年抗敌军团学员的名义去兴化找王公与活动，碰壁而回。这是我为了另立局面，表现自己，而不顾党的统一领导向国民党屈膝求乞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四四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交代过事实，因为没有认识到有错误，没有检查过。

四一年我在如西县任县委书记时，不着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政府法令，出布告，开所谓开明士绅座谈会，和平进行减租减息。在三三制政权中，让所谓开明士绅的地主分子和地主子弟担任实职；在扩大主力时，采用招军卖马的发委任的方法，这些，都给根据地工作，党和军队的工作和崇高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失，在地委扩大会上受到批判，结论是地主路线。这也是我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和罪行。

二、四六年底四七年初，解放战争初期，我在苏中一分区南线坚持斗争中，因对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地委，分区机关，部队和地方干部搬得过早过多，对敌军事斗争上我提出近洋击土的错误方针，过分强调了隐蔽斗争，特别是批准了如皋县委提出的，让党员混在群众中以群众面目，向敌人自首，打进铁义队组织的极为反动的措施等等，造成南线斗争的严重失利，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到极严重的损失，并坑害了一批党员的政治生命，这是我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右倾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极为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四七年下半年，苏中区党委曾专门开会批判了我和地委的这个错误和罪行，结论是严重右倾。

由于我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工作中就累犯敌我不分，认敌为友的严重错误和罪行。靖江城解放时，我委任组织投降的大汉奸陶明德为城防副司令，让他们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严重地损失了党和人民的联系和党的崇高威信。对太兴县委统战部长钱保康的投敌叛变开除党籍，一个时期怀疑他投敌是否是事实。后来证实钱是国民党，汪伪双料特务后，将他诱捕。在地委讨论如何处理时，我又提出留用的意见。虽然没有通过，都说明我右倾思想的严重。此外，还包庇管维霖，王孝祥等坏人，介绍他们工作，给他们混入革命队伍的机会。

我历史上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是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结果。春泥文艺社时期，我把周扬等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当作党的路线全盘接受，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都没有觉悟到这是王明路线的产物；青年抗敌军团和在灌云活动时期，又接受了中原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主要表现在对国民党蒋介石存在严重幻想，偏重片面搞“合法斗争”，统一战线上的阶级投降主义等等；根据地工作中，又在刘少奇、饶漱石直接影响下，推行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就使我在许多重要关键时刻，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下了许多滔天罪行。这一历史时期中，我不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有时还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成了地主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毛主席教导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又复辟的危险性。”我是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回到江苏工作的，也正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十多年来，我在许多关键时刻，又是站在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渭清，陈光之流一边，为江、陈王朝在江苏大反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充当了急先锋，主要的帮凶。我是江、陈王朝在江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魁祸首之一。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还未结束，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就放出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我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就立即接受了。以为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只剩下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了。对于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创造性地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却听不进耳。五六年，我认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资产阶级消灭了，只剩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可以接受改造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在我国已经解决了。认为：都是一家人了，有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完全和刘少奇一鼻孔出气，唱的一个反动的调子。在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上，“轻改造，重安排”，认为资本家已交出资本，只剩下一个定息的尾巴，改造得差不多了；认为资本家有所谓经营管理的经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利用他们的经

验，安排他们的实职，调动他们的所谓积极性。就这样，不抓限制、改造，不抓阶级斗争。在我分管工业六、七年中，象江苏这样工业资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地方，我从没有比较系统地抓过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对资改造问题，相反，和江、陈之流一道，一再毒害基层干部，要他们向资本家学习。向大资产阶级刘国钧学习；只强调资产阶级在企业中要有职有权，而放弃监督改造。在这条右倾阶级投降主义的反动路线下，许多公私合营企业出现了合公营私的资本主义复辟极为严重的情况。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方面，我推行降低党员标准，大批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入党，以为这些人大都改造得差不多了，他们又多是所谓知名之士，都是建设上需要的所谓人才等等；这是在思想上政治上拜倒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脚下，在组织上执行招降纳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六二年，我坚决执行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和陈毅广州会议的黑指示，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改造好了，为他们“脱帽加冕”，说他们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并向他们赔礼道歉，说过去党所谓委屈他们了。我当时认为：过去几年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确是搞得太紧张了，所谓应该“松”一下，让他们讲实话，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和资产阶级一道，攻击、污蔑伟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这是鼓励资产阶级及莫知识分子向党进攻，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清道，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

一直到六五年，我还鼓吹什么阶级没有了，有阶级斗争，也只属于思想范畴；什么生产建设也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继续，等等，都是我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伟大学说和阶级斗争伟大实践的滔天罪行。阶级斗争熄灭论，它的要害是企图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点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是灭资兴无，而是灭无兴资。我所传播，鼓吹，实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是这样一个极为反动的货色，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在我分管工业期间，正是毛主席亲自制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时期，正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鞍钢宪法公布的伟大时期。可是，我和毛主席背道而驰，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渭清，陈光之流，大反总路线，大反大跃进，大反人民公社，大反鞍钢宪法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跃进中，我片面追求产值指标，大搞浮夸，干扰、破坏了多快好省的客观规律，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主席在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听了江渭清汇报，当时江要不顾客观可能超额完成钢铁指标，毛主席及时指示说：“只要超过一吨就行。”可是，我在彭真、江渭清的指使下，却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大放所谓钢铁口放卫星，大搞浮夸虚假。说是为了不甘落后，主要还是为了表现个人的所谓才能，讨好彭真、江渭清，反对毛主席指示。为了在产值上争取工业列上全国第四位，搞大厂建设，我发动有关厅、局、地、市委到中央争项目，争投资，大搞所谓“拉郎配”，“自由恋爱”而不择手段；还大搞计划外协作，无限制权力下放，大量调动全民，集体所有的基金，所有这些，严重破坏了国家财政统一，刮了集体所有制的“共产风”，破坏了集体所有制；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统一经济计划，是发展资本主义盲目自由竞争，无政府主义的罪恶行为，都是反对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

鞍钢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伟大宪法。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可是，我却反动地认为：“经验不完全，须要补充”。把毛主席批示，只作例行公文分发了事，没有主动向旧省委提出要求讨论部署，相反，却对薄一波交代的黑指示，为七十条搞一个草案，立即泡制了一个江苏工业十二条，得到薄一波的表扬。这是歪曲，反对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鞍钢宪法的一个大毒草，是对大跃进的反动，是对总路线的反动。也就是在我所谓“经验不完全”反动思想指使下的所谓补充。如政治挂帅，就篡改成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这是明目张胆地打着红旗反红旗，采用折衷主义形式，是修正主义的本质，是彻头彻尾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三年困难期间，我和江渭清，陈光一道，大刮困难妖风。胡说：城市困难方才开始。攻击大跃进，胡说：没有根据客观规律办事，逆流不行，我对社会主义工业便进行了大砍杀，使社会主义工业大倒退，严重地摧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社办工业，为了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反对人民公社的要求，我进行了所谓调整，制定了一刀切的黑计划，把社办工业基本砍光。对手工业、渔业，我一批一批地把大集体改变为小集体，改变为个体，直到六六年，我还为了适应农业上复辟资本主义的要求，强迫搞所谓划核算单位，搞前店后坊，强迫手工业降价等等，这都是我忠实地，创造地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陈之流大反

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滔天罪行，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否定鞍钢宪法，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否定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在这场伟大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是站在否定、反对的一边，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我是六三年分管农业的。这期间，我又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江渭清，陈光之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产上，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农村社教上，大搞形“左”实右。

我忠实的执行了“政治要落实到生产上”的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反动路线，抓指标，抓技术，抓措施，抓物质刺激；大搞所谓重奖政策，突出抓生产，业务措施，不抓农业机械化，不重视小型农田水利；在救灾工作上，或则蔑视人民疾苦，或则片面强调救济；在半耕半读农校中进行资产阶级双轨制。在科技工作中，不是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和在工业上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一样，依靠所谓技术专家，推行所谓科技领导一条鞭，把技术领导大权交给资产阶级专家，走的是资产阶级专家的反动路线。如此等等，都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我还在所谓“党委抓政治，政府抓业务”的资产阶级运动分工谬论指使下，不抓毛泽东思想，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不抓阶级斗争。有时即使也提政治，也讲革命，但是，或则和业务并列，或则和业务混淆，还是政治要落实到生产的黑货，是反毛泽东思想，反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不是什么革命的货色，而是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黑货。表面上，也学大寨，但又热衷于搞所谓江苏大寨式的样板。吃小灶，搞特殊化，目的是表现自己，为自己和江、陈王朝一小撮树碑立传，捞取政治资本的，是和毛主席教导的，农业学大寨唱对台戏的。谭震林要搞样板，我投其所好，想在这方面搞发明创造，作总结，写文章，以表现自己。后来谭震林，江渭青要利用这篇所谓经验总结反对毛主席，吹捧刘少奇，为江渭清在全国涂脂抹粉，谭震林提出，不用我的名字发表，而用江渭清的名字发表，我高兴地答应了，实际上是和做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想吃小亏占大便宜，取得他们的好感，作为未来进身之阶的。我所强调的所谓突出政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货色。

把刘少奇在工业上托拉斯的一套，运用到农业上来，在国营农场大搞资

本主义托拉斯，还想在整个农业推行这个黑经验，也是我在农业上的所谓创造，得到了谭震林赏识和支持。为了执行谭震林在农业上所有制倒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六年我不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强令国营拖拉机站下放集体。还主张所谓“王坊下放”，都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

最后让我高呼：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68年收麦时于金坛县朱林公社

向毛主席请罪（下）

农村社教运动中，刘少奇亲来江苏，攻击、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第一期社教运动，执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运动路线。我和江（江渭清）、陈（陈光）一道，紧紧跟随。为了照顾江、陈王朝的修正主义大局，不致得罪黑主子刘少奇，我不去邗江蹲点，而改去涟水，做了泡制刘少奇黑样板高沟事件的主凶，打击一大片的刽子手。当时，我对刘少奇的一套黑货是坚信不疑的。我相信后十条是前十条的发展，对两者做了对比之后，我的资产阶级运动立场，使我发现了两者之间的所谓差别。我胡说前十条关于阶级斗争表现形式的分析，已不能说明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不完整了，而后十条抓住了农村阶级斗争的核心。这是攻击毛主席的指示已经过时，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谓抓住核心，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谓抓住了核心，就是吹捧刘少奇的两面政权，两面党的胡说。我当时，唯恐犯右倾错误，戴右倾帽子，怕发现不了所谓问题，也就是说，找不到农村已经变成一团漆黑的材料。在这样反动思想下，我批准了高沟公社分团推广对所谓犯四不清干部的反动政策，就是，在政治上搞臭，在组织上搞垮，在经济上搞光。同样，我在李集，在整个涟水社教运动中，在对农村形势估计方面，在对农村阶级斗争矛盾的性质方面，在对贫下中农的认识方面，在夺权方面，在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方面，在对工作队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方面，一系列地创造地推行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

制定二十三条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渭清要我在小组会上发言。他要我

把他在蔡巷，我在李集和高沟的黑经验集中起来作为发言基础，我和他一样，发言唯恐“左”得不够，不合刘少奇的反动口味，在大会上继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席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指示后，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模糊地意识到这是刘少奇社教一套搞法的“纠偏”，根本没有觉悟到这是一场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在旧省委的常委会上，我发言时透露了我的这个思想，立即遭到刘少奇派来江苏蹲点，督战的一些中央部长的非议，我感到自己可能说错了，闯了祸。江渭清做总结时，明确肯定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这期社教运动“成绩是基本的”，不是“纠偏”，胡说二十三条是双十条的继续和发展。我迷信江渭清比我水平高，了解中央精神，比我接近中央，比我强，可能又了解了中央什么新精神，肯定自己的理解有了问题，立即跟着一起唱起反调，从右的方面来抵制，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继续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就不可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可能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突出资产阶级政治，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抓农业期间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三年困难时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同样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复辟资本主义的。

我不管文教工作，却以文化老手自居，假充斯文，以个人爱好为名，插手文化界，频频放毒，传播、散发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毒素、传播、散发从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贩来的黑话黑货。整风反右伟大斗争前，我对全省戏剧界鼓吹抹杀阶级内容的所谓放，攻击、污蔑戏改是否定什么遗产，是虚无主义，鼓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牛鬼蛇神出笼，鼓励他们向党进攻。六二年，我指使新华日报还要面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倡所谓知识性，趣味性；提出什么学习旧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反动策略，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报纸上所谓“出出气”等等。篡改党报的大方向，把党报变成资产阶级的反党阵地，供给资产阶级以反党工具，这是我在对形势一团漆黑的估计下，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严重罪行。三年困难期间，我支持了不少坏戏，反动戏剧；特别严重的，是我组织，支持了歌剧“河伯娶妇”大毒草的改编。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反动思想的支配，加上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潮，使我在审稿时，产生反动的共鸣，不可能发觉这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江思想的大毒草，而且给以很大的支持，罪责是很严重的。所有这些，都

是为封、资、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文化艺术出笼鸣锣开道的。在帮助制造反理论上，我同样起了封、资、修在党内代理人的反革命作用。

青年工作上，我妄自称大，以青年导师自居，用资产阶级的庸俗不堪的名利观腐蚀青年一代，鼓吹什么志气，理想，鼓吹什么成名成家，从小人物变成大人物；什么劳动锻炼得好，可以当省、地、县、公社干部等等；鼓吹什么红不易，专亦难，用折衷主义手法，传播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等等；都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改造青年一代，反对用“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去教育改造青年一代，把青年引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的滔天罪行。在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工作中，也是物质挂帅，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宣扬劳动做官论。我还在实际上积极为此树立典型，我积极地宣传过某些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掺进修正主义的毒素，加以夸大歪曲，散播毒素。在我直接间接建议下，旧省委提拔了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到公社、县、地委担任领导职务，杨培刘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前次在大会上的控诉，就是对我的罪行的批判和控诉。在这方面，我所推行的是一条道道地地的制造修正主义接班人的资产阶级反动干部路线，完全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组织准备的。

在江、陈王朝推行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资产阶级反动组织路线上，我的罪行同样是极为严重的。整风反右伟大斗争中，我忠实地推行了江渭清保护所谓高级干部的，不让他们放毒的包庇方针。他包庇陈立平的黑指示，我是传达者和执行者。包庇汪海粟，不划右派，既是江渭清的主谋，也是我的愿望，我也投了重要的一票。因为汪海粟是苏中三分区的干部，和我感情较好，包庇右派文人叶志诚，不划右派，由于我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怜惜他是所谓文人才子，便不问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如何，投了反革命的一票，包庇下来。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我又投票包庇了黄云祥、莫珊等，也还是因为他们多是苏中三分区的干部，是老熟人。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还包庇了顾复生等。江、陈之流包庇了大批坏人，大搞招降纳叛，还自吹执行政策是什么稳，我是衷心拥护的，而且，在不少这样反动的决定中，我是投了票的，是有共谋罪责的。我和江、陈之流从一个共同的反动立场出发，维护这个所谓稳，稳住了资产阶级的反动阵营，捂住了江、陈王朝的阶级斗争盖子，保了江、陈，包庇

了他们的党羽，自然，也保护了我自己，和我所想保护，包庇的一小撮。都是在组织上为资产阶级复辟增砖添瓦的。

特别严重的，是我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这也是我犯一切严重错误和罪行的总根子之一。我长期贬低毛泽东思想，认为学习毛泽东思想，只是学习毛主席的立场、思想、方法，而且胡说：不可能每一桩事都在毛主席著作上找到解释。这是反对林副主席教导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英明指示的。我还不区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胡说什么学习中央文件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胡说什么光学毛主席著作，不学党的方针政策，会变成考古学家。这些胡言乱语，是攻击、污蔑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已经过时，贬低、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反动思想，反映在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认识上，我反对把学习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根本的根本，认为这样提是什么不留余地，把马列主义放到什么地方去了；还胡说什么学毛主席著作，不抓阶级斗争，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等等，都是无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伟大教导的。我的这些反动谬论，是反对林副主席教导，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农村社教运动中，解放军同志运用老三篇和毛主席著作，传播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林副主席立即肯定批准了这个经验，英明指出，社教运动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可是，我跟着江、陈一道，反对、抵制、攻击老三篇不能解决所谓阶级斗争问题，胡说只能做好人好事，这不仅是贬低伟大光辉的老三篇，主要还是反对社教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兴起。我这个时期，还放肆地攻击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要防止什么“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简单化”等等，都是一样的反动动机。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革命群众热爱毛主席，创造了在放电影前请示，唱语录歌等革命新风尚，我从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感情出发，还加以反对、污蔑，真是罪该万死。

以上交待，检查的这些主要罪行，说明我十多年来在江苏的实践，是刘少奇在江苏黑店里的一个忠实黑伙计，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十多年来，我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一个旧社会的维护者，新社会建设的阻力。毛主席教导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我在这十多年来伟大的两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扮演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派的角色。历史是无情的，不管我的主观意志怎样，事实就是这样。我应该鼓足勇气，正视自己这个严酷的历史，正视这个惨痛的历史；正确接受这个历史教训。

毛主席教导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继续站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谭震林、江渭清、陈光之流的一边，继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严重的较量，直到旧省委的垮台，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值得庆幸的，也是我政治上新生的开始。

运动开始，我以为是“老一套”。只是文化艺术方面的革命，仍是抓我分管的业务，对运动漠不关心。四月，彭、罗、陆、扬反党集团揭发出来以后，震动很大，想不到这些人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可是，又完全接受江渭清提出的，所谓接受教训，夹起尾巴来做人，转移目标，歪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指示，幻想在这个伟大斗争中，明哲保身。伟大的五月通知中央明确指示，要注意防止“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以为就是指的彭真，罗瑞卿等，中央的问题解决了。旧省委呢？我认为没有这样的人物。旧书记们虽有些问题，但还是好人犯错误，没有三反分子。自然，自己是包括在内的。资产阶级运动立场，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反动本质，认识到江、陈王朝的本质，颠倒是非，把资产阶级司令部看作无产阶级司令部，为江、陈王朝和自己定下了反动的基调。运动一开始，就把江、陈之流和自己排除在运动的革命对象之外，就和运动、和革命群众对立起来。在看到革命小将对江、陈王朝的冲击时，立即从反动的既得利益出发，考虑到整风、反右斗争的经验，认为有坏人，至少有坏人在背后操纵，是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以为只要旧省委内部团结，就可以“顶”得过

去，在运动后期抓右派了。

十一中全会，我开全国工业机械化现场会议也到北京，江渭清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向我吹嘘他如何反对刘少奇的谎话，我信以为真，十分佩服。增加了我对他迷信的程度。他又吹嘘什么“南京不是北京，南大不是北大”的欺骗说法，我更相信他的领导是所谓正确的，对他坚信不疑。江渭清和陶铸、谭震林、魏文伯等共同策划的，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决定“暂时不炮打旧省委”，说什么为了“集中力量，抓生产，抓运动”，实际是以生产压革命，集中力量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大阴谋。我因为怕群众，怕民主，怕运动触犯自己的资产阶级尊严，表示拥护。心里还夸耀：江渭清有胆识，在大风大浪中掌舵稳。完全和他们站在同一个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江渭清宣布陈光要调安徽做李葆华的资产阶级接班人，我考虑到以后我在旧省委的位置可能会更加重要起来。为了争取江渭清进一步的信用，能随着他的升迁而升迁，就更加卖力积极起来。八月以后，我死保江渭清，死保江、陈王朝和他们一道，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犯下了一连串的滔天罪行，这些，就是我在这一期间的反动动力。

“九九”事件，革命小将冲进旧省委大院，我以为这是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莫大污辱，流了没落、反动之泪。江渭清被迫出面接见，无人陪同，我主动保驾，主动出面和小将搞所谓“谈判”。谈判中，我坚决不承认他们的革命行动，无视他们为革命自我牺牲的精神，完全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耍外交辞令，搞两面手法，公开污蔑他们的革命行动为“无理取闹”，公开点名打击造反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反派步行数百里来南京向旧省委请愿，我无动于衷，采用利用一派，制造一派，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阴谋手法，保护旧省委，保护旧无锡两委一小撮。后来，我还总结经验，颠倒是非，把反动的说成是所谓“依靠左派，争取中间，孤立右派”。江、陈王朝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的所谓八比〇事件，大都有我参与和共同策划的，我还在九月下旬去苏北抓生产之机，向有些地、市、传播了这些反动经验，流毒很广，罪行是严重的。

为了镇压革命群众对江、陈王朝的冲击，保护自己在内的一小撮，我向江渭清献策，要大抓红卫兵组织。说什么“这是壮大左派，依靠左派”，实际是要江渭清依靠一派，镇压另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江渭清要我立即组织红卫

兵，以保护所谓革命秩序，我连夜动员自己的子女，组织他们的同学，搞起中学黑字兵。因为人太少，还动用了专政工具，公安党校的学员，伪装红卫兵，来旧省委门前保驾。后来，我还多次和他们接触，蒙蔽他们，要他们控制领导权，说什么“当仁不让”，交出江渭清的地址，顾虑很大，要求陶铸修改，陶不同意，说：不要失信于同学。后来他又要我取信于造反派，我领会他的反动意图，要我不要因小失大，就解除了顾虑。陶铸第一次和我谈话，就向我说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我向你们说几句心里话，我保得太多了，已在中常会上做了检查了。说：今后谁要再靠保是保不住了，要自己解放自己。又说：八项协议是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就此转过去。说：再不转，就危险了，就要滑下去了，等等。我听得很感亲切，以为陶铸关心下级，是体谅旧省委处境的，还是保江、陈王朝的。感到如果按陶铸的一套做去，旧省委还是有出路的。我就将黑八条摘要成五条，用电话传给江渭清、陈光。这五条，就是所谓屁股要转到造反派一边去；所谓分开办公，联合办公；所谓平反；所谓那里有武斗，领导人随时亲临现场劝阻；所谓坚决处理黑材料。这一套，根本没有涉及江、陈王朝的利益，三条都是以假支持骗取造反派信任，为的达到搞所谓分开办公，联合办公。实质是妄图在骗得造反派的支持下，复活当时已濒垮台的江、陈王朝的反动统治，继续捂住旧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保护江、陈等一小撮的。我当时反动立场照旧，本能地接受了陶铸这个假转变的反革命新策略，用假支持的手法，骗取了造反派的信任，自奉为所谓“左派”，妄图充当江、陈王朝侍卫官的角色。十二月中旬，在中山东路体育场宣布了黑八条以后，当街上出现了称我为“同志”，要我不要做口头革命派的横幅大标语时，我忘形地说：他们至少已经承认我是口头革命派了，以骗取的这一点点可耻的资本自得。黑八条在我积极推行下，只处理黑材一项，全省就开除了几万党、团员，打击了一大片，我的罪责是严重的。

陶铸第二次接见我时，对江、陈之流的假转变极为满意，认为：江渭清决心转了，江苏省委真的转了。我认为不仅是对江、陈的表扬，也是对我的表扬，以得到陶铸的赏赐为荣。当他要我写一个二、三千字的假转变黑经验的黑报告时，我感到不能胜任，立即转告江、陈，他们立即泡制了一个“快转、猛转、彻底转”的假报告，呈报毛主席，党中央。这是陶、江、陈勾结起来，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妄图骗取信任的又一大阴谋，我参与活动，也有严重罪责。也就是这次接见

后，陶铸和我一齐走出他的办公室，我为了讨好，说：中央首长为我们操心，内心实在不安。陶铸立即说：我们有中南海保护，你们为学生拖来拖去，为你们做这点事还是应该的。陶铸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诬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黑话，我不但没有一点愤慨，还感到一股反动暖流在内心激荡，以为陶铸确如江渭清所说，是平易近人的，是可以巴结，可以依赖的。这完全证实，我和陶铸是站在一个反动立场上，也是一丘之貉。

一·三事件后，总理让我和革命造反派一齐回南京，做了一系列的批示，给我将功赎罪的机会。可是，我对江、陈王朝一仍旧观，坚持反动立场，幻想旧省委能集体转过去。接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篡改了性质，依然推行陶铸假转变的一套，仍然依靠黑八条所骗得的一点点可能的反动资本，继续搞假支持，妄图在骗取造反派的支持下，搞所谓公开办公，为江、陈王朝搞维持会，复辟资本主义，完全辜负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自己的期望和挽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江、陈王朝的垮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我在党内二、三十年来的阶级斗争盖子。事实说明，我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和王明，刘少奇，饶漱石，邓小平、谭震林，薄一波，江渭清，陈光等一道，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对抗，只不过是过去几十年斗争的继续，从我自己的实际出发，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就怀有阴谋的目的还是依靠一派，镇压另一派，保护自己，保护江、陈王朝一小撮。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渭清不断从北京传回黑指示。我和陈光一道，件件落实，事事照办。如江渭清先打回电话说：关于工作队问题问了陶铸、王任重，他们说派工作队不一定犯方向、路线错误。隔了几天又打回电话说：已经检查了，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了。要向下面打个招呼。几小时后，又来电话说：会议上还会有反复，暂时不要向下打招呼。如此，我就反复奔走，向各方打招呼，统一反动口径。南京革命造反派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誓师大会”，江渭清、陈光要我代表他们的王朝，以所谓“高姿态”去出席大会，宣读江渭清从北京发

回的所谓“贺电”，胡说旧省委是什么“过去，现在，将来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抵制、破坏大会的影响，继续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此等等，江渭清牵线于北京，陈光和我，一内一外，左右跳动，南北配合，对抗中央。

三级干部大会，江、陈蓄意继续反对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拒不接受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教导、挽救。在他们的策划下，成为向各地、市、县和直属单位传授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黑经验的黑会。会议越开，大多与会者越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满情绪越是增长。会议结束时，江、陈都忽然病起来了，要我去做会议总结。这个会，我根本没有参加，情况、问题根本不了解。可是，我从资产阶级共同利益出发，以江、陈王朝正在困难时期，他们重视我，我应当为他们分忧，知恩图报，就根据他们的预谋讲了话，肯定了会议的所谓“成绩”“收获”，也就肯定了他们继续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阴谋，遗害全省，坑害了大量的干部，使他们较长时期陷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而难于自拔。

梁辑卿、吴大胜同志在南大造反，我内心不满，认为这是内外不分，不遵守党的纪律，污蔑梁、吴同志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违犯党的纪律，是我完全颠倒是非。在处理“法四二十二”材料时，我又动用专政工具，对材料摄影留底，准备对吴大胜同志秋后算帐，进行打击报复。这是在中央关于材料问题决定下达之后搞的鬼，应该罪加一等。

总理批准工人造反司令部的成立，我封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不让无产阶级革命派知道这是总理对革命工人的支持，拒不执行总理要亲自出面和革命工人协商成立工人造反组织的指示。原因是我怕群众，怕扩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影响，怕引起革命群众对自己、对江、陈王朝更大的冲击。相反，我坚决推行江渭清的所谓“凡是革命组织成立都予以支持”的阴谋，批准了另一派受蒙蔽的工人群众组织的成立，继续推行依靠一派，镇压一派的阴谋。在我第二次被带去北京期间，我的反动立场，思想，感情根本不变，我却动员在北京的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旧省委资产阶级运动路线的反，还蒙蔽他们说：你们能像造反派一样，冲劲大一点我就高兴了。这是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三事件的祸根是我种下的，我的罪责是不可饶恕的。

江渭清对抗革命造反派，发了旧病，我代表他做了一个假检查。大会上，数万革命群众要我交出江渭清的住址，我死保江渭清，不顾数万革命群众愤怒的要求，顽抗不交，宁愿随造反派去北京，矛盾上交。后来，陶铸要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答应交出江的养病地址，以骗取造反派的信任，搞更大的阴谋。我一再找谭震林向陶铸提出要求改变这个协定，为的是怕江、陈说我无能，怕和彭冲同志一样，彭在晨光机器厂支持造反派后，被江渭清斥责为“叛变”。

黑八条，即八项协议，是陶铸应江、陈的求助，搞的一出对造反派假支持，对江、陈王朝真保护，假转变的反革命丑剧。这是用新的反革命策略继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阴谋。我开始因耍心眼，搞反动的多中心，个人野心勃勃，锋芒毕露，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恶性膨胀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参加革命后，长期是革别人的命，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根本没有做过认真系统的自我革命，长期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动力，根本没有想过，要革好命，还须先革自己的命。一九四四年的整风学习，不但高估了自己，而且错估了自己，以为自己是手工学徒出身，较早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以为自己的世界观已经无产阶级化了，自己是代表党的，成了党的化身了。正如毛主席英明指出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就把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当作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用来指导自己，指导工作和斗争，要按着自己资产阶级的面貌去改造自己，改造别人，改造世界，改造党，一系列错误和罪行的老根子就在这里。

对社会主义革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根本没有认识到，还有社会主义一关没有过去。相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已过，以为自己早就过了社会主义关了。因此，还要在自己身上破私立公，斗私批修，兴无灭资，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要革自己的命，是毫无认识，毫无思想准备的。自己盲目认为，自己已经无产阶级化了。即使有问题，也不过是小节。因为自己官越做越大，名誉地位，物质享受不断随着水涨船高，得到满足，而且和别人比较，并不突出，也就心安理得，根本说不上什么警惕。自己就没有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过去，看看没有参加革命以前的情况，做做比较。忘记过去，就是背叛，自己没有看到自己，这多年来，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事实是，多年来对物质享受和资产阶级法权，是迎面追求的。入城后出入小汽车，住的小洋房，学会了跳舞，打

麻将，搞特殊化，自以为都是生活小节，放之任之，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生活上早已蜕化了，又迅速促成思想上政治上修正主义的发展。可是，还盲目自满，自封可能回头，不可能觉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可耻的反动的东西，不可能得到挽救和新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我过去的半辈子中，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我多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以这样，是有着深刻的阶级和历史的根源的。

我父亲是钱庄和小市镇警察局雇佣的文书，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从小我就受到剥削阶级社会和家庭的影响。青少年时期，因读了一些旧书，旧小说，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毒素中得很深。小学毕业后当了三年多的造纸工徒，又做了一年多的小职员，在旧社会是一个正沿着世袭的为剥削阶级服务的阶梯，缓慢地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由于父亲的失业，母亲把姊妹卖掉了，家中经常盖锅断炊，我还到亲戚家做过几年帮工式的杂活，混一口饭吃。经过亲戚的帮忙，才找到一个学徒的职业。由于自己好舞文弄墨，引起亲戚的另眼看待，做上了小职员，但总是有怀才不遇之感，觉得在旧社会找不到理想的出路，对旧社会存在不满的情绪。抗日救亡运动中，我开始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模糊地知道要革命，接受的实际上仍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接受了一些抽象的名词，概念，实际是无知的。抗战爆发，怀着国破家亡，找国家民族出路，也是找个人出路，实际是以找个人出路为主的动机，参加了革命队伍，入了党。由于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工作、斗争需要，党给了我以独立工作的机会，当上了所谓领导，党对自己的哺育，培养，使用，愈来愈器重。但是，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了不起，不知谦虚，谨慎，骄傲自满，随着地位的增长而增长，把自己估计得高上了天，看别人都不如自己。在革命队伍中，我以为己所谓无产阶级化了。在江、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下，旧省委内部一潭死水，互相包庇，和平共处，十多年来根本不开展原则思想斗争；还耳濡目染，学会了许多资产阶级政客的极端反动丑恶的国民党作风，结果，自己不是向无产

阶级方面改造得差不多了，而是向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改造得差不多了，旧质未变，又有了新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自己在党内，居高位，掌大权，可是，却是“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林副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我的这种以私为主，以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在阶级社会中，所作所为，不代表资产阶级，还能代表什么？这种世界观附在我这样具体条件的人身上，不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还会是其它什么东西吗？答案只能是这样，我不能正确对待自己，首先的问题，就是没有能正确认识自己。

资产阶级世界观里，是说不上有真正的群众观点的。毛主席教导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在我身上反映是很明显的。我入党是做官的，视群众为阿斗，对同志如下人。脑子里只有自己，“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本来就和群众没有什么联系，官越做越大，就越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口头上也讲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实际是使用群众，利用群众，恩赐思想，行政命令，运动群众。所以犯地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亲上层，疏基层，亲地主，资产阶级，疏工、农群众的必然结果。对同志，对人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喜则所谓爱抚一番，怒则横暴斥责，国民党作风，军阀残余，有过之无不及。我对待干部，对待群众的粗暴程度，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和群众是对立的，平时就怕群众，怕民主，怕失去自己的资产阶级尊严，怕失去乌纱帽，失去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既得反动利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由怕到恨，由恨到镇压，还依靠平时受蒙蔽的部分群众，继续蒙蔽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坐山观虎斗，以保护自己，保护江、陈一小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我的揪斗，是完全应该的，是革命行动。可是，我在一个时期内，认识不到自己的真面目，感到委屈，抵触情绪很大，是极为错误的，是反动立场，思想，感情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本能反映。我的群众观念，是资产阶级的。

毛主席教导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

是没有调和余地的。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有很多历史关键时刻，我多是站在王明，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薄一波，陈丕显，叶飞，江渭清，陈光等一边，一贯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和罪行，不是偶然的。民主革命阶段，我不仅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严重的。在解放战争上，指使党员以群众面目自首的滔天罪行，这是站在敌人立场上，做了敌人想做而没有做到的极大的坏事，做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代理人，坑害了大批党员的政治生命，造成了党和革命事业无可挽回的损失，是万死不足以谢罪的。这是我当时为敌人暂时表面优势所吓倒，根本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员的革命力量，妄图以此达到所谓保存有生力量，右倾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极为严重错误和罪行。社会主义革命中，我又不断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在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下，政治上摇摆，投机的必然结果。由于我是怀着一个找个人出路的丑恶动机入党的，在旧社会，为了混一口饭吃，不得不仰人鼻息，观察主子的颜色行事。入党后，为了取得领导信用，保官升官，就把这一套用来观察领导意图，看眼色行事。因此，就不可能看到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相反，把党内关系看成是拉拉扯扯，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宗派关系。在苏中，在福建，以陈丕显，叶飞作靠山，到了南京，又以江渭清为靠山。自己错误地认为：党内路线斗争，遵义会议后已经解决了，只要紧跟领导，紧跟第一书记，一般是不会犯错误的。反之，很可能犯所谓组织错误，影响自己修正主义的前途。因此，回到江苏后，便处处摸江渭清的鼻息，看江渭清眼色，投江渭清之所好，以取得江渭清的宠信。五九年庐山会议，明知中央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伟大战略部署，明知柯老点了刘顺元的名，也看到刘顺元确有问题，但在误认江渭清决心整刘顺元时便首先开炮。在摸清江渭清要包庇刘顺元时又收场下台，反对庐山会议决议，抗拒柯老批示。社教运动中，在制定二十三条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后，自己虽没有认识到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已认为是对刘少奇形“左”实右的“纠偏”。可是，在江渭清说不是纠偏以后，以为江渭清又得到什么新精神，便又顺风转舵，跟着他一齐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解放军在方巷创造了社教运动中学习毛著的经验，我去看了以后，认为是好经验，立即要人去学习。可是，在向江、陈汇报以后，见他们反对，立即感到自己做冒失了，

立即想以折中的办法，来调和这个所谓屁漏。就采用了所谓在社教中主要学习二十三条，结合学习毛著的办法，立即到苏州去做黑报告，抵制，反对方巷经验，幻想这样做，既能得到江、陈的同意，也不致得罪创造方巷经验的解放军，两面讨好。如此，等等，就是这样，不顾反对毛主席的指导，教导，不顾党的路线，原则，在政治上见风使舵，摇摆，投机。因此，在苏中得到陈丕显、叶飞的信用，到江苏后，得到江渭清的信用。可是，又引起刘顺元，惠浴宇，陈光等的不满，他们背后搞鬼，当面指责。五九年，六四年，还借题发挥，两次重点整过我，便又感到他们在党内根深树大，对他们也是得罪不起的。也就注意对他们的奉承，逢迎。发展的结果，不仅在认为他们所谓正确的时候是这样，明知他们不对时也是这样，拿原则做交易，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党和革命的利益都置脑后，根本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员的气息，发展的信条就是，求得不犯所谓错误，保护自己第一。从奴隶主义发展成奴才主义，原则是非可以不问，领导人不能得罪，在政治上搞投机的罪恶活动。刘顺元的三反言论，自己早就有些发觉，正面侧面都向江渭清反映过。江、刘本是一丘之貉，不理睬是当然的。自己也曾考虑向中央揭发，可是，既怕揭发信转回被发觉，又怕中央追查起来，引起酣然大波，破坏旧省委一团和气的修正主义局面，破坏江渭清对自己的信用，还怕危及自身。就这样，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资产阶级态度，不了了之。这是自觉地包庇刘顺元，包庇江渭清，包庇旧省委一小撮，也是包庇自己的严重罪恶。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政治上摇摆投机的态度，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就必然要投向刘少奇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陈丕显，叶飞，江渭清，陈光等一伙，成了他们的黑伙计，马前卒，黑帮凶。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只能忠于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只能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完全背道而驰的。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摇摆性和投机性，终究不可能摆向或投向无产阶级，而只能摆向或投向资产阶级。我堕落的关键就在这里。

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反革命思想，接受是顺行的，一拍即合。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接受是逆行的，格格不入，难于接受，还加抵制，反对。我长期对毛泽东思想没有奠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信念，没有奠定毛泽东思想是

当代马列主义顶峰，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指导方针的信念。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一看而过，一曝十寒，满足于一知半解，实际并不理解，还有很多歪曲。学了也多是联系别人，不联系自己，是为了装潢自己，做为所谓教育，改造别人工具的。脑子里听不进，留不住毛泽东思想，自然充塞满资产阶级思想，即刘少奇思想。三年困难时期，在滚滚乌云密布之下，自己就不但相信而且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一道，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攻击，污蔑。主要的原因之一，因为我那时存在过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的极为反动想法。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活着的列宁。毛主席的指导，就是一千个正确，一万个正确。这是我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最大的污蔑，最严重的攻击。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大最严重的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六四年农村社教运动期间，我又和刘少奇，谭震林，江、陈之流一道，反对林副主席亲自肯定的社教运动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正确经验。并进而和他们一起，攻击林副主席倡导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无比正确的学习方法。重要的原因之一又是在那期间，我存在过认为林副主席只是军队的领袖，还不是全党的领袖的极为反动的想法。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最高，紧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学习毛主席著作，用得最活最活，林副主席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的副统帅。我反对林副主席，也就是反对毛主席，这又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都是罪该万死的。为什么我二、三十年来，不断地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呢？根本的原因，就在我脑子里的毛泽东思想太少太少，而刘少奇的反动思想太多太多，世界观是反动的，立场是反动的，因而不断犯下许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

我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罪行是滔天的，不可饶恕的。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毒害了许多干部，党员，是应该打倒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对我不咎已往，热情而耐心地教育我，帮助我，挽救我，对我的揭发，批判，斗争，进行得愈彻底，冲击得愈利害，对我的帮助愈大。事实确实就是这样。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我个人的演变来看，再看看旧省委，江、陈王朝，看看全党全国，看看全世界，千真万确，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

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不搞是不得了的。就我个人来说，我被冲击掉的，是我身上的污泥浊水，是历史上的严重错误，滔天的罪恶，得到的是政治上的新生，是有机会重新做人。我感谢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挽救，我感谢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感谢伟大的党，对我的教导，关怀和挽救。我决心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陈之流彻底决裂，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决裂；决心和自己罪恶的过去彻底决裂，打倒过去的许家屯，彻底否定过去，彻底改造世界观，从零开始，从新做人。决心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回到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来。决心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一辈子照毛主席的批示办事，一辈子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决心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和革命干部的再教育，一辈子做群众的小学生。决心以毛主席的光辉伟大的老三篇为终身的座右铭，不做官当老爷，完全，彻底，全心全意地做人民的勤务员，革命一辈子。决心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革命一辈子。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革命进行到底！

我的检查，交待，仍是很不够的。我衷心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继续对我揭发，批判，帮助。由于我的错误，罪行很多，极为严重，我请求给我以严厉处分。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我们以万分激动的心情，代表江苏四千七百万人民和驻江苏部队的全体指战员，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报告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已经筹备就绪的胜利喜讯！

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同全国各地一样，空前大好。

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和及时的具体的指导下进行的。在运动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都及时地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起来造反，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中央文革又最先批准江苏成立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先后登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了江苏的每一个角落。一月革命风暴以后，中央召集两派代表去北京汇报学习，在三月五日对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纲领性指示。大大推动了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去年九月，中央决定江苏几个主要城市的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代表，到北京汇报学习。在京期间，全体代表受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接见，中央、中央文革同志四次接见中，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对江苏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江苏部队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教育、最大鞭策。今年二月份，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央、中央文革又决定各专、市、县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和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大大加快了各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

近几个月来，江苏各地出现了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抓两条路线斗争，大抓“斗私，批修”，大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大好局面。江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遵照毛主席“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教导，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已经在全省范围内蓬勃兴起。仅在部队主办的学习班学习的近二百万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经和群众见面，有如春风化雨，迅速化为广大革命群众的自

觉行动，有力地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一场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伟大斗争正在广泛深入进行。与此同时，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也发展得更加广泛、深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内所散布的流毒，正在进一步肃清。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发展迅速，基础比较牢固。

全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取得了显著成效。伸进革命队伍里的黑手被揪出来以后，又一次深刻地教育了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滚滚洪流，迅猛发展。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南京工人，首先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为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树立了榜样。国务院、中央文革为此发来的贺电，使全省革命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各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目前，全省除徐州专区，徐州、连云港市外，七个专区、五个省辖市，全部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其中盐城、六合、扬州专区，无锡、苏州市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六十个县（市）中，已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五十六个，占百分之九十三，其中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二十一个，占百分之三十五。预计三月底，专区和省辖市可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绝大部分县（市）的革命委员会也可成立起来。全省二十九所大专院校，已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有二十三所，其中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九所。南京市九个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卫生、财贸、手工等系统，省、市直属机关，也都按系统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七十二个大型工厂，已有五十六个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其中十九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领导干部大批解放。由于各地两派群众组织较长时间的的对立。有的领导干部站不出来，有的又站到一边去了。干群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在学习班里，各级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起“斗私，批修”，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大大提高。全省各地都有一批革命领导干部解放出来，有的已经成为革命三结合中的核心。全省地委和部厅局长以上领导干部已有一百一十名站了出来，全省县（市）已有百分之三十的主要领导干部站了出来，还有一批干部正在各地学习班学习。

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战斗号令下，全省工农业生产形势也是

很好的。去年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今年三麦长势尚好，可望丰收。工业生产正在积极恢复、发展，交通运输及市场供应正趋向正常。

人民解放军驻江苏部队，热烈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担负了繁重的“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军队内部一度认识上的不一致，对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带来了不利的影晌。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又及时给予指示，我们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统一了认识，加强了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了“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用毛泽东思想支持左派，坚持了“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同时，开展了群众性的拥军爱民运动，大大密切了军民关系，增强了军民团结。

根据江苏省当前的大好形势，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四千七百万人民迫切要求迅速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更好地领导全省人民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关于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组成，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协商，意见是：

一、省革命委员会拟由一百六十五名委员组成（不包括徐州地区），其中十名作为机动。一百五十五名委员的分配是：

1、革命群众代表九十五名，占 57.5%。工人代表三十七名，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五。贫下中农代表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一。红卫兵代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七。其他系统的革命群众代表 12 名，占 7%。

2、军队代表三十名，占百分之十八点二。

3、革命领导干部三十名，占 18.2%。

二、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由三十九名组成。

其中：工人代表八名，贫下中农代表二名，红卫兵代表四名，机关干部代表二名，军队干部 12 名，革命领导干部 11 名（名单附后，暂缺 11 名）

三、建议省革命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七名；由许世友同志任主任，吴大胜、杨广立、王珽、彭冲同志任副主任（另三名待补。）

四、省革命委员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政法工作组。遵照毛主席历来教导的“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的原则，省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暂定二百名左右。

以上报告当否，请审查批示。

南京军区党委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

江苏省革委会常委名单

(二十八名，暂缺十一名)

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男、汉、党员

吴大胜：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男、汉、党员

杨广生：六十军、政委、男、汉、党员

王珽：二十七军、副军长、男、汉、党员

钟发生：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男、汉、党员

杨新亚：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男、汉、党员

赵洪：南京军区军事法院、副院长、男、汉、党员

方敏：六十军政治部、主任、男、汉、党员

彭冲：省委书记处、书记、男、五十三、汉、市贫、学生、党员、福建漳州

黄以干：省农林厅、厅长、男、五十二、汉、贫农、贫农、党员、江苏沐阳

朱辉：省监委、书记、男、五十七、汉、贫农、工人、党员、江西上饶

周泽：省委、副秘书长、男、四十五、汉、手工业、学生、党员、江苏太兴

迟明堂：省贫协、副主任、男、四十五、汉、贫农、店员、党员、山东

姜启彤：省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男、五十三、汉、破落地主、自由职业、党员、江苏宝应

李芸华：苏州专区、副书记兼专员、男、五十三、汉、富农、职员、党员、河北安平

陈烈：六合专区、副书记兼专员、男、五十、中农、农民、党员、山东黄县

曾邦元：南京大学、助教、男、二十七、汉、贫农、学生、党员、江苏太兴、南大八·二七

文风来：南京大学、教员、男、三十九、汉、贫农、学生、党员、辽宁海城、南大红四联

顾阿桃：太仓洪泾、社员、女、五十四、汉、贫农、农民、党员、江苏太仓、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曹莲凤：海安角斜、民兵政教、女、二十二、汉、贫农、农民、党员、江苏海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章瑞英：无锡国棉四厂、工会主席、女、三十四、汉、工人、工人、党员、江苏无锡、劳动模范

吕志光：五一厂、工人、男、三十三、汉、市贫、工人、浙江新昌、促联

朱开地：晨光厂、工人、男、二十九、汉、贫农、学生、团员、江西兴国、新工总

唐省智：南京化肥厂、宣传干事、男、三十七、汉、贫农、学生、党员、江苏淮阴、新工总

陈克兴：长江机械厂、实习教员、男、二十五、汉、贫农、学生、团员、江苏武进、老工总

薛德元：南京跃进钢铁厂、工人、男、三十二、汉、市贫、工人、团员、江苏高邮、南京八·二七

周锡禄：省人事局、科员、男、三十、汉、贫农、革命军人、党员、江苏南京、省大联总

徐松林：共青团江苏省委、干事、男、三十六、汉、市贫、工人、党员、浙江吴兴、省革总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 03. 20；中发 [68] 49 号

江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江苏是我国东南的重镇。江苏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艰巨的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把江苏省会南京作为他们进行血腥的反革命统治的巢穴，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被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所摧毁。这就是象我们的统帅毛主席当时所说的那样：“百万雄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江苏省人民群众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江苏省的面貌为之一新。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利用刘少奇、邓

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省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互相配合，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江苏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按照毛主席关于“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教导，对这些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英勇的斗争。经过了反复的较量，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特别应当指出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苏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下了卓越的新功。人民解放军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江苏的胜利，起了很巨大的作用。

中央批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许世友同志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报告中所提的副主任及常委名单。

中央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继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江苏省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暨江苏在京学习班的讲话

〔地点：北京京西宾馆礼堂。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当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以及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同志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长时间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向中央首长学习！向中央首长致敬！

伯达同志：现在请姚文元同志宣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意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众：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姚文元同志宣读中央同意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每念完一段，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伯达同志：现在请许世友同志讲话。

许世友同志：

刚才姚文元同志读了主席，中央的批示，中央一系列指示，我们只有坚决照办，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胜利进行到底！我们活着做毛主席的人，死了做毛主席的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有人想搞什么鬼名堂，陷害毛主席，陷害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我们就对他不客气，叫他人头落地，就和他干到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伯达同志：请江青同志讲话。（众：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

首先问同志们好！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祝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众：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我讲了一两次了，没有新鲜的话要讲了。我讲的不对，同志们批评，讲的罗唆，你们就轰我一炮，叫我不要讲了。我想讲一讲国际国内形势。目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世界陷于一片财政混乱状态。这就从上两个月英镑，美元贬值开始，黄金出现了两种价格。美元一贬值，就要囤积居奇，抢购物资，物价上涨，工厂倒闭，人民生活就要发生困难，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国内究竟是什么样的形势呢？我们国内货币稳定，人民的基本生活是稳定的，这在全世界还找不出象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众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讲这么两句一对比，就看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一贯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不同。帝国主义出现了二、三十年来没有的混乱。敌人混乱，对我们来说就是胜利！就是大好！

（众呼：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那么国际形势如此，国内形势也大好。江浙是祖国富饶的省份，目前形势也大好。这在同志们今天的热烈情绪上就可以看出来。从不打不相识，到现在在一起成立革委会，不是形势大好吗？但是在大好形势下，敌人是不是就睡大觉呢？就不活动呢？不能这么说。也还是有曲折的，有某些反复的，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是正常现象。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贯串着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那就是“左”倾，或叫极左，形左实右和右倾分裂

主义，我们就是和他们不断进行斗争，不断前进的。在大好形势下，我提醒同志们，在目前来自敌人的干扰，右倾保守，分裂主义是主导，而不是形左实右，这不是说他们没有表现。去年下半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击退了形左实右以后，也可以说击溃了钻进我们心脏的刘、邓、陶、彭、罗、陆、杨的爪牙以后，右倾分裂主义苗头就开始了，到今年右倾分裂主义便大肆活动，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相当可观，表现在为“二月逆流”翻案。同志们知道什么“二月逆流”吗？（众：知道！）从前年冬到去年二月，蹦出来个谭震林，他是“二月逆流”的干将。（众：打倒谭震林！）他跳出来把锋芒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企图搞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搞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动摇新生的红色政权。他和形左实右是一脉相承的。目前他们跳出来想翻案，我们藐视他们，要他们跳出来，不跳出来不好，你们说要不要让他们翻案？（众：不让！）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叛徒。特别要点他的名，是因为我过去保过他，他在江、浙有一定市场的，我提醒同志们要警惕！去年春天他就在这里干不正当的勾当，利用他在新四军的关系活动，今天有重新告诉同志们的必要。另外，过去中央文革这个班子，就是刘、邓留下来的班子，个别坏人隐藏下来，干了些坏事，现在把他们揪出来了，不能再干扰了，他们利用这个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企图否定革命小将的功勋，否定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军队要不要把他们打倒！（众：打倒刘、邓、陶！打倒谭震林！）（江青同志领呼：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二月逆流”干将之一谭震林！）同志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他们要动摇新生革命委员会。你们现在正在成立革委会，一个新生事物，缺点错误总是难免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不要上坏人的当去动摇她。这个新生事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口号）现在我们提出，在革命的过程中，防止敌人从右的方面来动摇瓦解我们，要向他们进行斗争。同时，也要防止“左”倾冒险主义。这两“极”是一脉相承的。我只讲这么一点，供同志们参考。（众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伯达同志：现在请总理讲话。

总理：

同志们，今天姚文元同志宣读的中央批示，很快得到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批

准，我们向大家庆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鼓掌，口号）今天，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整装待发，急着回去开成立大会，这是一件大喜事。

刚才江青同志说的很对，我们首先应该从形势看问题。形势大好，世界一片大好，尤其是中国形势大好。敌人一片混乱，帝国主义金融，财政危机，赤字上升，通货膨胀，四十年来未闹过这样大的金融风潮。现代修正主义者开了一个二月黑会，报上也评论了，也是支离破碎，矛盾重重。帝、修、反在一起，美帝，苏修的指挥棒不灵了，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革命人民的日子越来越好。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年，我们要夺取全面胜利！（口号）兄弟的越南人民在中国人民支持下，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前后方配合得很好，仗打得很好，美帝、苏修日子更难过。现在中央批准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是第十八个，在中央等着批的还有四、五个省，照这样，三、四月份二十九个省市基本上可以全部成立。南京是蒋介石的首都，十九年前解放了，现在文化大革命又取得了辉煌胜利。从上海一月夺权，到现在江、浙两省成立革委会，全国人民是很高兴的，敌人是恐慌的。我们就是要敌人恐慌，美帝、苏修要捣乱，他们也要考虑考虑，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如果他们冒险，就会彻底灭亡！（江青同志领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台湾！）谁要挑衅，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我们在这样大好形势下成立革委会，江苏四千七百万人民，要在江苏省革委会的领导下，首先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大叛徒刘、邓、陶、彭、贺、彭、陆、罗、杨、谭震林以及他们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大批特批，批倒！批臭！（口号）把两条路线斗争进行起来，就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进行大批判，对广大的群众教育就更深刻了，就更好地推动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从这个关键问题着手，不要忘记当前形势。

第二，从去年冬天到今春斗争有反复。去年的“二月逆流”，他们想恢复旧秩序，经过半年斗争，批臭了，后来极左思潮，“五·一六”形左实右闹了几个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声号召，就击退了，钻进几个坏人，中央文革自己挂起来的，感谢中央文革劳苦功高的同志。极左批了，右的又来了，老保翻天，反攻倒算，总有一小撮兴风作浪。可以肯定，只要中央文革一

声号召，马上他们就垮台。目前在北京街上可以看出这一小撮人在活动，搞右倾分裂主义，不会不影响到江、浙、上海。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是，反动的就要打倒。只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就能推进江苏各地、市、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对敌斗争。江，浙，安徽处东南前线，曾是蒋贼财阀统治地区，南京曾是国民党的巢穴。要有敌情观点，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间谍，都要提高警惕，他们要干扰，他们闹不起大事，但可以干扰我们。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群众结合在一起，我们对敌斗争眼睛就亮了，对敌斗争就会节节胜利。南京大军区，不仅管江苏，而且要管上海，浙江，安徽。江苏是东南重镇，很重要。所以江苏成立革命委员会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好好地进行斗争。

第三，批准的常委名单，没有批满，三十九位名额，只有二十八位，还空十一位。主任就是大家热烈欢迎的许世友同志，副主任七名，有可能多一些，有的省九名，十几名。副主任，还有十一位常委没补，军队、地方名额都未选齐，尤其是群众组织的代表，还没有选为副主任的。提议副主任改为若干名，另几名待补，究竟选几名由常委讨论，逐步充实，不要仓促定下来。浙江采取这个办法，江苏也可采取这个办法。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懂得大联合的重要性。人民解放军支左不支派，所谓支左不支派，是不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而要支无产阶级革命派。

第四，拥军爱民问题。这是毛主席所号召的，刚才江青同志说了，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去年“九·五”江青同志对安徽讲话，以后又接见红卫兵讲了。根据毛主席三相信，三依靠的指示，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事物，要巩固加强以毛主席为主，林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红卫兵要在拥军爱民中表现出成绩。过去这方面有反复，不仅有正面的，还有反面的，这种反复不仅过去有，今后还会有，这有好处，反复，取得经验教训。靠什么解决？林副主席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思想作为标准。拥军爱民要双方作，人民解放军最听话，犯了错误，一声令下，马上就改，改了就好。世界上那有这样好的军队！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才有这样举世无双的军队。这一点，江苏驻军，六十军，二十七军，一个去江南，一个

去江北，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还有其他军种，兵种。犯了一点错误，改了，为人民群众所欢迎。

最后，江苏已成立了革委会，上海要与浙江，江苏配合起来。生产要有煤，运输要畅通。农业生产去年增产，今年江苏麦情好，在座的几位女同志，都从公社来的，她们清楚。农业好，工业只要革委会抓，一抓就灵，江，浙工人阶级抓革命促生产一定能上去，把安徽带上去，在全国起作用。

两个学习班参加了今天的盛会，很快也要回去。我们以非常兴奋的心情，庆祝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们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今后还要向你们学习更多。

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打倒蒋介石！解放台湾！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世界！

伯达同志：现在请康生同志讲话。（众：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

康老：

同志们，革命小将们，解放军指战员们：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我对江苏讲话不少了，没有多话可讲了。我们跟江苏革命群众，革命小将，人民解放军，学习了很多东西，向同志们学习不是随便讲的。现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正式成立了，这是江苏四千七百万人民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表示热烈祝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就是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实际上是国民党，共产党国内战争的继续。这是毛主席亲自告诉我们的。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点，同志们从批语上可以看出来。刘、邓、陶、彭、陆、罗、杨、彭德怀、贺龙、谭震林等等，还有他们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他们是什么人，自己吹是老革命，经过文化大革命，群众揭发，他们都是老反革命，老叛徒，老特务。在浙江省代表团我讲过，刘少奇四次被捕，二五年在湖南被捕自首，二七年在武汉投降汪精卫，二九年在沈阳投降日本，三六年投降国民党蒋介石。刘少奇老婆王光美，是美国、日本，国民党打进我党的死特务。邓小平是逃兵；陶铸是叛徒；彭德怀里通外国；贺龙是土匪，投降国民党；彭真是叛徒、特务；罗瑞卿是特务，假党员；陆定一是叛徒、特务；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间谍；谭震林是叛徒。这些人是帝国主义，国民

党反动派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所以说是国民党，共产党国内战争的继续。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工人阶级与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这场对国内外敌人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经过反复，现在在全国，江苏，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代表国民党的刘邓路线，彻底失败。我们的胜利是伟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江青：打倒邓小平！）

邓小平是逃兵，希望你们继续揭露。在这个伟大胜利中，正如江青同志讲的，国际国内形势大好，今后还要更好，但敌人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我们要牢记毛主席教导，在全面胜利的时候，越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进攻，破坏胜利果实。江青同志“九·五”讲话说过，他们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主，林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动摇解放军，动摇我们红色新政权。从斗争中我们知道，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能长期隐藏在党内呢？就是他们耍两面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必须眼明心亮，善于识破他们的面目，要依靠广大革命群众，依靠人民解放军，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就能识破一切坏人。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反对两面派，两面手法，刘邓耍两面手法，小将坚决反对他们的特务两面手法，反对搞阴谋活动。

江青同志讲，当前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分裂主义，极左思潮也要防止。实际上，形左实右，北京有，南京也有。现在有一小撮替“二月逆流”翻案，替“二月逆流”的头子谭震林翻案。要坚决打击他们，不让他们有任何活动。江青同志再三讲了，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毛主席最近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搞山头，搞宗派，要搞全中国的大山头，要做革命派。革委会成立了，委员们千万不要带山头主义思想参加革委会，要当四千七百万人民的勤务员。革命委员会是红色政权，不是各派联合会。不管哪一派，哪一种山头，只要真正实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样的人就要相信，依靠。要消灭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加强无产阶级党性。革命委员会是政权机构，有缺点要帮助改正，新生事物难免有缺点，不要认为这个人犯错误，动不动就打倒。这是无产阶级权力机构，不是各派联合会，要好好地爱护，帮助。

周总理讲要拥军爱民，中央批示中也讲了，我几次对江苏讲话中讲过，我是共产党员，有义务为一些老同志讲好话，不管一小撮反许世友同志，我和许世友同志一起工作过，许世友同志是热爱毛主席的，热爱林副主席的，是毛主席司令

部的人，今天证明我这个话没有错！同志们，错了没有？（众：没有。向许世友同志学习！向许世友同志致敬！）我不是说许世友同志没有缺点错误，他是共产党员，有很好的品质，他有缺点错误就敢公开承认，就改，这点要向他学习。中央批示中说，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觉得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革委会，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有保证的，他不会搞阴谋，不搞两面手法。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拥军爱民。

最后，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同志取得很大成绩。只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今后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江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争取全面胜利，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祝同志们取得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毛主席万寿无疆！

伯达同志：我讲几句，同意许世友同志刚才的讲话，同意江青、总理、康生同志的讲话。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件大喜事，不但对东南各省将起很好的作用，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将起很好的影响。希望江苏的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继续奋勇前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中央首长步出会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整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天翻地覆慨而慷——热烈欢呼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当前大好形势下，从祖国的东南又传来了新的喜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切关怀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我们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向英雄的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四千七百万江

苏人民，向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下卓越功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苏部队广大指战员，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江苏是我国东南的重镇。江苏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艰巨的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把江苏省会南京，作为他们进行血腥的反革命统治的巢穴，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被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所摧毁。这个伟大的胜利，使江苏省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利用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江渭清、陈光之流在江苏省复辟资本主义黄粱美梦的破灭，给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走狗又一个沉重的打击。“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江苏省的历史又揭开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在当前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接近全面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复杂。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虽然被打倒了，但是，他们必然要不断利用各种卑鄙恶劣的手段，进行破坏。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必须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要高举革命批判大旗，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大力加强军民团结，保持高度警惕，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一切公开或隐蔽的反革命分子。

在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指出了胜利前进的方向。毛泽东思想是向阶级敌人进攻最锐利的武器，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新生的江苏革命委员会，必须把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必须继续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继续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要坚决反对山头主义、宗派

主义的错误倾向，认真执行毛主席教导：“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不管来自什么山头的革命同志，都要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要使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机关，发挥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在革命的风暴中又前进了！我们预祝江苏人民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更大的胜利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喜，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社论）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许世友在江苏省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江苏省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开会了。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的最新指示，学习中央对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学习《革命委员会好》这一纲领性文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认真分析江苏省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动向，讨论和确定今后的斗争任务。

我讲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关于形势问题

国际国内形势空前大好，越来越好。“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全世界革命人民无限热爱伟大导师毛主席，无限热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中吸取了无穷的力量，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武装斗争有了新的发展。越南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中高度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

力，打得敌人焦头烂额，取得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与此相反，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日子很不好过，越来越不好过，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最近在美国发生空前规模的黑人抗暴斗争，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同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苏修的指挥棒也越来越不灵了。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那样，“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已经有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预计“五一”节前后，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建立革命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江苏省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全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空前高涨。仅由部队主办的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有六万八千一百多期，参加学习的有三百一十八万多人次。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洪流正在迅猛发展。全省十二个地委、市，有十一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四十六个县成立了革委会。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正在进一步开展，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指引下，去年农业生产获得了全面丰收，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指标；经济作物除油料有些减产外，其它都有大幅度增产。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应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之流主动地发起猛烈的进攻，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斗。

第二、狠抓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最深刻地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意

义，最精辟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内容，又一次给了我们向阶级敌人进攻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政治大革命。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之流代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和他们的斗争，就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就是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省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统帅下，同阶级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搏斗和反复的较量，打败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揪出了江苏最大的走资派江渭清、陈光之流，揪出了反革命两面派杜方平、高啸平，揪出了一批叛徒、特务，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性胜利。新生的红色政权——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江苏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标志。

江苏过去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巢穴，也是中国赫鲁晓夫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据点，阶级斗争历来是相当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敌人绝不甘心失败，他们必然要作最后的挣扎，只是随着形势不同，反革命策略也发生变化，手段更加狡猾了。在我们打垮了敌人从极“左”的方面的进攻以后，当前又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右倾保守、右倾分裂的逆流。有些坏家伙怀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刻骨仇恨，妄图为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江苏的代理人翻案，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叛徒、特务翻案，为黑手翻案，搞保杜、保高活动，公然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故意制造混乱，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经常放阴风，点鬼火，挑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关系，挑拨军队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关系，甚至挑拨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他们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甚至已经改正了的缺点、错误不放，进行恶毒攻击，妄图否定伟大的群众运动，否定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伟大成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这些现象，说明阶级敌人还在作垂死的挣扎。但这并不要怕，它们不过是几只嗡嗡叫的苍蝇。问题是有些同志对这种反革命行为不愤恨、不追查、不回击，对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不批斗，对混进自己组织的坏人不坚决清除，对黑手不痛恨、不揭发，有的

甚至继续打内战、闹分裂。收交枪支的协议，已达成四个多月了，据说有的单位还没有全部上交，这在客观上起了掩护敌人的作用，对当前斗争十分有害。

我在这里顺便讲一个问题，过去也讲过多少次了。有的同志过去反过军区和我，担心我报复。我再讲一次，这件事一笔勾销，把帐记在黑手身上，这次在北京我还向主席汇报了。我说上过坏人、黑手的当，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对青年人来讲，是难免的。只要把问题讲清楚了，积极揭发、批判坏人，和他们划分界限，我就对他放心，信任他，保他。如果有的人不划清界限，还在背后搞小动作，那就不是认识问题了。这种人就不能信任。

革命大批判，始终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巩固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最有力的武器。不搞革命大批判，就是忘记了敌人，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清算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之流的罪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它们彻底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的流毒。革命的大批判，要和各个地区、各个单位的阶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要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大搞“人民战争”，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把走资派、叛徒、特务和各种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斗倒斗臭，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要在阶级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是我们整党的伟大纲领，必须贯彻执行。在整党过程中，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发动群众大批大破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搞好思想上的整顿，并把混进党内的坏人清除出去，纯洁党的队伍。

我们要有领导有步骤地清理阶级队伍，纯洁革命群众组织，提高战斗力。各个群众组织一定要有坚强的阶级观点，坚决把混进自己队伍中的那些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统统揪出来。各个组织的坏人，要发动各个组织的群众自己去揪。要警惕阶级敌人以揪坏人为名，混水摸鱼，乘机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制造分裂，妄图把矛头引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对人民对同志一定要和，对阶级敌人一定要狠。

我们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团结，粉碎阶级敌人破坏军民关系的阴谋。

江苏省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的重要省份，我们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加强劳动纪律，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工农业生产。阶级敌人想用停产的办法，给革命委员会施加压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一定要做抓革命的模范，促生产的闯将，坚决击破敌人的阴谋，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第三、关于加强革命委员会建设问题

我们要同阶级敌人打大仗、打硬仗，就要有一个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指挥部。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是建设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纲领，我们一定要坚决照办。我们一定要在阶级斗争中，把各级革命委员会建成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能够率领革命群众对无产阶级的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革命司令部，使新生的红色政权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要永远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里，一辈子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指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战斗号令，要以最大的热情，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措施，坚决贯彻，认真落实。革命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到心往“忠”字上想，劲往“忠”字上用，行动往“忠”字上落实。成为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模范。生为毛主席而战斗，死为毛主席而献身。

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要勤勤恳恳地做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政权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是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根本问题。我们一定要扎根于群众之中。每个成员，随着地位的变化，要特别做到永远保持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永不忘本。要时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虚心做群众的小学生，真正成为群众的带头人、贴心人。

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要加强团结，互相学习。要注意培养革命的接班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积极的思想斗争，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永远保持蓬勃的革命朝气和昂扬的战斗精神。

有的同志要我讲一讲这次去北京的情况。我们十四号到北京，十五号下午毛主席找中央、中央文革的同志开会，要我也去参加了。我告诉同志们，毛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健康，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对“派性”进行了最科学的分析。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二十日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中的一段话。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我们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即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表现。大家应当认真地学习，我就不多讲了。

同志们，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大革命。我们革命委员会肩负着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赋予我们的重任，肩负着全省四千七百万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带着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为把全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努力奋斗！

让我们共同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尤太忠在镇江的讲话

〔尤太忠：驻江苏无锡第二十七军军长；梁政委：江苏省军区政委梁辑卿。〕

同志们！今天跟大家来见见面，有梁政委，有军区谢副司令。特别是梁政委，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学习六、七个月，有很多的问题要跟同志们谈一谈。谢副司令在北京学习了两三个月，也有很多问题要跟同志们讲。我在无锡工作，对镇江很多情况不太了解。前天下午来的，同志们接触不够。昨天在大街上看看大字报，到各处跑了一跑。有一些问题可能讲得不对头。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派，请同志们批评。

第一，首先讲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现在全国已经有二十二个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形势很好。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去年视察三大区时的指示中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国际国内形势越来越好。全国二十二个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剩下的正在北京学习，谈判。现在还有四川、广西、云南、辽宁，新疆……等，一共还有七个吧，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总理、江青同志在讲话中指示说：在“五一”前后，基本上全国一片红。所以形势是很好的。

那么江苏的形势呢？也和全国一样，形势发展得也很快，而且发展得也很好。江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基层，特别是专区、县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了。大概苏北还有十个市、县，一个淮阴专区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苏南二十五个地专、县和市，就是一个镇江市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形势发展很快，同志们看看国内形势，再看看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也是很好的。看国际形势主要看中国。中国形势好，国际形势就好。因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因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全世界革命人民，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希望，都寄托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上，寄托在中国身上。所以中国形势好，世界形势也就好。尤其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四·一六”对美国黑人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无不欢欣鼓舞，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都寄托在毛主席身上。

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有一百四十多个县城都发动起来了。美帝国主义的日子很不好过，不仅发生军事危机，经济也是危机的。

苏联等现代修正主义的日子也不好过。想在布达佩斯开个黑会，没有开起来，这个会想联合起来反华，但是没有开起来。特别是经济危机，每年要拿二百吨黄金到外国买小麦，每年要进口小麦一千多万吨。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中国形势很好，世界形势也是很好。我们国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地向前发展。

镇江市也是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使我们国家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文化大革命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等等坏家伙统统挖出来了。他们在各个地区的代理人也统统挖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把这些坏人挖出来了，使我们国家永不变色。你们镇江也是一样。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锻炼了广大革命群众。把这些坏人挖出来是毛泽东思想为伟大胜利。

第二个问题，讲一讲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政策，都是为人民利益的。你们在毛主席身边签订协议，就要紧跟，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要紧跟，而且要跟快点，而且要步步跟。同志们刚才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就是要搞大联合，搞三结合。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嘛！共同对敌嘛！

所以，你们无论如何要坚决执行你们自己在毛主席身边签订的协议。你们三代会，我虽然没有来，你们签订协议就双方委员对等进行，调整、充实、扩大，是不是这样签订的？（众答：是！呼口号：坚决执行 2·23 协议！）

同志们呀！我们喊的口号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那不是两句口号问题。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你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假拥护毛主席；是真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还是假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这个问题要弄清楚，否则那革命怎么搞？每个时期的指导思想你都搞不清楚，那怎么行？你们在北京是二月吧？是二月签订协议的，今天是

五月了！不是批评同志们，要说批评就是批评吧！我敢讲敢负责，我不怕死，当解放军就是不怕死，怕死不当解放军。

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希望你们镇江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把大联合、三结合迅速搞起来，不要闹派性。人民解放军真正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打倒资产阶级派性。解放军就是支左不支派，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帮助教育，最后抵制，我到一些地方讲话，就是这样讲的。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无产阶级派性，打倒资产阶级派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就是先锋队的党性。（口号：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资产阶级派性！斩断黑手！）

这一条，同志们！很希望你们赶快一点，你们镇江市是江苏省的组成部分之一，你们基层也好，从下到上，赶快联合起来，实现三结合，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希望同志们快一点。这是要讲的第二个问题，简单说这一些。

第三个问题，坚决打击阶级敌人，要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口号：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赵、陈、刘、方！）

对阶级敌人，要主动向他进攻，把我们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把暗藏在我们阶级队伍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统统干掉。要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你们镇江市是有点油水的，是国民党的老巢，国民党的省政府就驻在这儿，没有坏人留下来？我不相信。你们镇江没有国民党特务？没有日本特务？没有叛徒？没有自首分子？我不相信。我这次到苏州等那些地方去了解，叛徒、特务在造反派里都有。他们把档案都烧掉了，无锡烧了一百三千多件，苏州烧了一万多件。我对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说，你要向敌人进攻，为什么不进攻啊？我说把那些王八蛋逮捕起来、游街示众，狠狠地斗他几家伙，该劳改的就劳改、该杀头的就杀头。

这种情况，镇江也有！当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要主动向敌人进攻，要打硬仗，打恶仗，打进攻仗。今天在座的也可能有个别的人是坏家伙，如果不相信话，你们今后看看。同阶级敌人，要坚决斗争。你们读语录 15 页里讲的，拿枪的敌人消灭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一定要主动进攻。革命群众

组织不能打内战，要打内战，就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不要有资产阶级派性，要有无产阶级派性，要有无产阶级党性。派性就是掩护了敌人，敌人利用了派性，它寿命就延长。所以怎么能把斗争大方向转移了？要始终把矛头对准阶级敌人。

你们前几天打起来了，四月二十三日，轮船也不开了，街上打起来了。我听到以后，就向南京军区报告，向省革命委员会报告，向中央文革报告。你们也向中央报告了，材料整理得好好的向中央文革报告了，我一点也不害怕，搞革命就不怕死，怕死就不来了。（口号：向 27 军学习！向 27 军致敬！）

所以，你自己打内战，谁高兴？阶级敌人高兴！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任务就更重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提高警惕，要防止你们队伍里一小撮坏人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特务、叛徒，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挑动，你们不主动进攻，怎么自己打起来了？

轮船也不开，运到农村搞生产的物资运不出去，一天有几千人运不走，昨天下午想到码头去找几个人谈谈，问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开船？你违反交通规定，总理指示你不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你不执行？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你为什么不紧跟毛主席？为什么违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而互相打内战？不行！再有内战，坚决不行！要把敌人揪出来，当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是好人，坏人要统统揪出来！

军队不是揪出坏人来了吗？江苏军区揪出赵俊、陈茂辉、刘超、方晓嘛！（热烈鼓掌：喊：打倒赵、陈、刘、方！）他们是江苏军区的几个坏人嘛！

同志们，以梁政委为首的党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在北京开会，他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那些坏人都向梁政委进攻，还斗了他。（口号）梁政委在北京领导江苏省军区广大指战员，坚决把这些坏人揪出来了，赵、陈、刘、方，他是反许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也是反革命两面派。这个问题，梁政委在后面还要详细讲。

我们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当然，同志们要掌握一个问题，阶级敌人是少数，我们无论如何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你们要把各自的阶级敌人揪出来，把他们揭深、揭透，斗倒，斗臭，使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更加巩固。

第四个问题，同志们对待军队的态度问题。

我也是个解放军，这次镇江搞武斗，把解放军打伤了四百九十三个人。

我听了很不高兴，怎么到现在还打解放军？解放军支左工作有些缺点和错误，要按中央指示办事，送大字报，小字报嘛！被打了住医院的二十七个人，打成残废的两个人，打成重伤的七个人。就是这一场武斗，打伤解放军四百九十三个人。我们解放军吃饭，把解放军的饭倒掉，买菜、买米，把米从车上拉下倒掉！还骂黄老保，黄老保的。（口号：谁骂黄老保决没有好下场！）对不对？同志们，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少数人的蒙蔽。（口号）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林副统帅教导我们说：我们国家能够搞大民主，能够搞四大，最根本的保证是，第一，有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第二条，有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四十多年斗争经验的解放军，有这两条根本保证，所以我们国家能够搞四大。所以有些人受了蒙蔽，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把大路挡起来，不准解放军走大路，只好走小路；还不准解放军吃，还说解放军是黄老保，所以，这个问题，同志们要注意，再不能够把矛头对着解放军了。解放军怎么是黄老保！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我们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江青同志，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为什么不好？我看好得很！（热烈鼓掌！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所以，这个问题，请同志们要警惕一下，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矛头要对准阶级敌人，千万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我们的军队在支左方面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革命群众向我们提意见，我们欢迎，按照中央首长指示，真正做到支左不支派，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坚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帮助，最后抵制。现在，镇江市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委员会，支持和热爱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坚决拥护江苏省军区领导，和梁政委的领导，八十师在镇江，要服从省军区的领导，服从以梁政委为首的江苏省军区党委的领导。

最后一件事情，我有这个建议，你们能不能把头头集中几十个，找个地方去办学习班。听说有的同志讲不想去，不到北京去就不去，只有到北京才去呢。要好好学习，斗私批修。毛主席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所以大家要去学习。有很多事你们考虑一下。（口号）头头都去学习他几个礼拜，来个斗私批修，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有些人说其他地方都不去，到北京才去。我想如果省革委会办学习班要请我去，我马上就去报到。

今天讲话，可能有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完了！（热烈鼓掌！口号）

（1968 年 5 月 6 日）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4]锡中法刑字第 26 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4]锡中法刑字第 26 号

公诉人：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纪民生。

被告人：陆渭文，男，四十六岁，常熟市人，汉族，捕前系无锡市铸造一厂工人，住本市南长街一百二十五号。现在押。

被告人：袁达洪，男，四十二岁，无锡市人，汉族，捕前系无锡市第十中学教师，住本市塘泾新村十二号 204 室。现在押。

辩护人：无锡市法律顾问处律师孟邻。律师工作者李雪芳。

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因反革命一案，由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公诉来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纪民生出庭支持公诉，经本院依法不公开审理。现查明：

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自一九八另年以来，经常纠集在一起。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胡说“共产党腐败了”；污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是一次和平演变”，我国是“封建专制主义”；恶毒诽谤党的中央领导。“寄希望 X 的死”，妄想变天，鼓吹用“三民主义”取代党的领导等。

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还曾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一九八二年六月初，被告人陆渭文伙同丁 XX 以帮助社队办厂为名，窜到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探听金门岛等沿海情况。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院认为：上列二被告，思想反动，恶毒攻击和污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秩序制度，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为严肃国法，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判处被告人陆渭文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从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前羁押的日期，以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起至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止]

二，判处被告人袁达洪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前羁押的日期，一一折抵一日，即自一九八四年一月九日起至一九八七年一月八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员 汪承苍

人民陪审员陈锡彬

人民陪审员陆华清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院印章]

书 记 员 赵宛聪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无 锡 市 中 院 驳 回 通 知 书》

[1992]刑二申字第 49 号

陆渭文：

你不服本院[84]锡中法刑字第 26 号判决的申诉悉。

现经复查认为：原判决认定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和量刑并无不当，原判决应予维持。你提出“原判决定性不当”的申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为此，对你的申诉予以驳回。

特此通知。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市中院印章]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江 苏 省 高 院 驳 回 通 知 书》

[1997]苏刑监字第 223 号

陆渭文：

你为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对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84]锡中法刑字第 26 号刑事判决不服，以事实有出入等理由向本院提出申诉。

本院对该案进行了复查，证实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正确的。原判决认定你与袁达洪自 1980 年以来，经常纠集在一起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密谋潜逃苏联，台湾后窜至福建晋江县安海公社探听沿海情况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以上犯罪事实有你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你申诉中否认犯罪事实的理由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你对该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应予维持。特此通知。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江苏高院印章

二 00 四年十月二十八日，陆渭文的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陆渭文，男，67 岁，汉族，江苏常熟市人，高中文化，原无锡市铸造厂工人，现无正常职业，现在住址是，无锡市江海

新村 15 号 202 室，邮编是 214026，电话号码是 8292153

申诉事由：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院][84]锡中刑事第 26 号刑事判决书[附件]认定本人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

徒刑五年，本人表示不服。

于 1992 年曾向无锡市中院提出申诉，92 年 8 月由无锡市中院“予以驳回”[附件]

于 1997 年曾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直至 98 年 12 月“予以驳回”经办人于法官[女][附件]

本人对以上两次驳回仍表示不服，

一，原判决事实不清，定性错误，以权代法，野蛮硬判。原判决，罪名内容，五句言论，“一个企图”。

所谓“胡说共产党腐败了”，“我国是封建主义专政”，“鼓吹用三民主义取代党的领导”，是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与当时原话

有原则的不符“一次政变”，“寄希望 x 的死”这两句与本人无关。所谓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还曾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是故意

捏造，陷害。在庭审时，公诉人拒绝当庭出示证据，证词[以上庭审记录在案]

所谓窜到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探听金门岛等沿海情况，并无此事[由同行入丁可南作证]

无锡市中院根据《刑法》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错误的。

根据当时的《刑法》规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指以反革命为目的，煽动群众抗拒，破坏国家法律，法令实施的，以反革

命标语传单或其他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的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

本人在 82 年左右，与袁达洪，李伏阳，二，三人，闲谈的地点在袁达洪家中，方式是茶余饭后，观看电视节目时，言论内

容中，从未谈到不要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不好。这样归纳：A，主观上从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目的。B，并无故意宣传煽动。C，即使是有错误观点，并无向社会扩散，不存在客观上的反革命行为。按《刑法》规定就不构成犯罪。

历朝历代，衙门审案，只有屈打成招，而从来没有不要当事人承认，不听当事人申辩，不要证据或与证人对质，而判处刑罚的。

二，1992 年，本人接无锡中院“驳回通知书”时，[经办人一男一女]说，你的事表面上是我们处理的，实际上我们管不了你的事，现在还是党的一元化理领导。。。本人当时完全谅解中院及经办人的为难之处。但足见是，“以权代法”的司法不公。

三，1998 年 11 月，由江苏省高院经办人于法官[女]俩人在无锡三凤楼饭店房间内找本人谈话，内容，A，从现在看你的言

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看来是不得了了。B，判你的刑是根据他人的揭发材料。C，你的案子是省，市委共同定的案。

本人当时就表示不服，理由：

1， 1， 1， 1， 本人并不要求用现在的法律来处理我过去的问题。

2, 2, 2, 2, 在省高院的复查中仍然是偏听偏信, 当时的所谓揭发材料, 三人各自阐述自己的记忆, 有人因诱供交代问题, 有人为

立功交代问题, 对待言论的回忆, 以谁为准?

四, 如此简单的案情, 当事人申诉 20 年, 而不给平反纠错, 问题的结症所在, 恐怕省高院还是不敢推翻省, 市委作过的决定。

经办人不敢违背领导的意图, 如果这样, 要法律何用? 依法治国不过是一句空话。

要求, 请求省高院依事实为依据, 法律为准绳, 对本案再次复查, 纠正这一冤案。

希望, 不要让国际社会笑话, 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 居然一个普通老百姓, 因为在家中私下里议论了有关政治的话和到福建厦门在鼓浪屿上出于好奇想看看金门岛而就成了反革命, 吃了五年官司。至今当事人仍在贫困线上挣扎, 中国人权何在?

今年年初本人继续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几日后答复曰, 该案已多次书面答复作出处理, 今后不再受理, 来信也不再回复。

即将此申诉打入死牢。当事人实难瞑目, 充分相信法院乃人民法院之心不死, 苦心等待。

近日, 又闻肖扬院长之声, ” 司法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有错难纠, 甚至有错不纠, 则不仅使公民权利一旦受损再无从恢复, 而且严重者还会激化社会矛盾, 影响社会稳定。再审作为给公民权利提供救济的一个重要途径, 应该是一扇门, 而不是一堵难以撞开的墙。司法的权威正来自于尽一切可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公正。 ”

尽一切可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公正, 此语当能为我的申诉起死回生。一言九鼎, 掷地有声。

谢谢, 谢谢!

呈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

申诉人陆渭文上

2004. 10. 28.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陆兰秀：《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这几天，满城敲锣打鼓，满街都是大幅标语，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从66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起，到今年已第四年了。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立志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革命的家长们，你们觉得这样做对不对？中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农业人口，农村人口不是嫌少了，而是嫌多了。而且农民至今还是集体所有制。

列宁早就下过结论，农民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里的。虽然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但他们自身还是应该向无产阶级学习。为什么不把知识青年直接送到工厂、矿山，立志务工，直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何况，将来工业的发展，工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正需要大批有一定文化水平、特别是有一定科学知识的工人呢？

历史的事实证明：从来没有一个农业国，可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盛、能左右世界局势的国家；而只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相剥相，成为他们的变相殖民地，永远不得翻身。要想使中国强大起来，必须大规模发展工业；而大规模发展工业，需要大量工人。中国城市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工人人口占多少我不了解，但数量肯定是不算多的。如果前三届毕业生都分配到工厂、矿山学工，到现在多是相当成熟的工人或徒工了。

而现在他们却都在农村。以后国家大规模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走错了路。而发生这种错误，并不是他们的责任。

现在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这种反面教育出发，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单纯幼稚，他们热爱毛主席，把一切时髦的口号都当成真理，而不能分辨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修正主义。于是，他们在反面教育的美丽词句蒙蔽下，被送上了歧途。而他们的父母呢，或者单纯得和他们的子女一样，把谬误当成真理；或者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怕在反面教育的强大压力下，被当作阶级敌人处理，更害了子女。

有人认为，把大批城市人口疏散下乡，是消灭城乡差别的一种简捷途径。我并不反对把城市的闲散人口疏散下乡；但如果把大批知识青年疏散下乡，试想一想是什么情景呢？农业人口增多了，工业人口相应地减少了，农业装备也就更困

难了，农业就只好长期处于原始落后状态，形成先进的工业、落后的农业的畸形发展，工农业的矛盾就更突出了，城乡差别能从本质上消灭么？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应该是工业不断发展，突破城乡界限向农村渗透，农业生产不断被工业所代替，工业面积日益增大，农村面积日益缩小，青年农民不断流向工业，穿上工装走进工厂、矿山，最后剩下必要的农业，被强大的工业装备起来，农民成为农业工人。这才最后从本质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甚至消灭了工人和农民思想感情上的差别。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说，有一百万俄国农民，被德军俘去送到德国的工厂做苦工，结果却为苏联培养了一百万产业大军，在苏联的工业化中发挥了极大作用。我们国家一穷二白，旧社会没有给我们留下大批的、数以百万计的、成熟的产业军，只有靠我们自己培养。现在又到了应届毕业生分配的时候了，还有很多机关单位精简机构，号召青年上山下乡。做家长的、做老师的、做领导的，请考虑一下，能不能让这些青年都到工厂、矿山当工人？如果说，从战略出发，城市应该疏散人口，那么，是否可以让这些青年跟随工厂一起迁移呢？如果说，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才把他们送到农村中去，请想想，每人每月 15 元生活费，只相当于四美元，世界上那里去找这么廉价的工人呢？何况，他们的劳动还能产生价值？各宣传机构，是否也能考虑一下宣传的内容呢？记得过去报纸上还对已分配到工厂的学生坚决要求下乡进行表扬，这种宣传方向就更不对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向这里的负责同志写过汇报，希望能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去。但下面的意见不一定能及时反映上去；即使反映了，一手一足之力也不容易引起注意。这几天在锣鼓喧天的报喜声中，我不能不给革命的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们写这封信，要求大家一起，本着对下一代负责的态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过，对错误的领导应坚决抵制，不应无条件服从。又说，真理在谁手里就听谁的，不管他是扫大街的，挖煤的，还是挑大粪的。这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如果革命的家长们，各级领导同志们，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或至少方向是对的，就请把城市里的历届毕业生和各单位精简下来的青年分配到工厂去学工。这样做，可能会暂时增加一些工厂的负担，但工人同志们想到国家发展的前景，是会乐意承担这样的培训任务的。各地农村的同志们，为了同样的目标，也

是会乐于让这些知识青年回到工厂里去的。而且他们自己的青年，在不远的将来，也会穿上工装，走进工厂去的。

当前，负担大批知识青年的生活费用，国家可能有困难。关于国家财政收支的情况，我一点也不了解。但我想革命的家长们，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暂时再继续负担一段时间子女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谅解的。相信这个问题，以后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政策都是反面教育。毛主席向来是允许大家独立思考的。请求革命的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一面这样办，一面给毛主席打报告，写决心书，向毛主席表态。我一定和大家一起，再给毛主席写汇报，把情况讲清楚。

一个人说话不一定有效，大家一起来做工作，效力就大了。毛主席最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全国革命家长、各级领导同志一起来做工作，群起而促之，相信毛主席是会接受大家意见的。

陆兰秀

1969年11月22日

附言：

这封公开信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对，仅供各革命家长、各革命师长、各级领导同志参考。如果你们认为意见是正确的，就请这样做，这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出发的；如果你们认为我的意见不对，而你们原来的做法是对的，我就收回这封信，保留我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各人可以独立思考，但真理只有一个，将来总有一天，不同的意见会统一起来的。到那时，我们就有了共同语言，就可以共同研究其他一系列问题，并把这些意见向毛主席汇报，求得解决。历史是永无止境的。迟一点早一点关系不大，只是早解决困难少一点，迟解决困难多一点罢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小将们印发了一些毛主席的讲话摘录，证明毛主席很早就有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毛主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高度的民主制和国家机器的性质等思想，都没有贯彻下来。我想，这一则因为都是新问题，干部水平有限，吃不透毛主席的意图，执行起来总是有距离；二则人民没能真正从旧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即使这些讲话都已流传于全国，毛主席允许人们独立思考，人们也没有养成这种民主习惯。所以长期以来，凡事总待毛主席决定。这样下去，全国人民

什么时候才能学习使用民主这个武器呢！毛主席给了全国人民诸多的几乎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例如：真理在谁手里就听谁的……等等。这么好的礼物，人们在世界上那个国家见过呢？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也曾对人民说过，国家机器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从苏联的实际情况来看，这里的为人民服务，只是它做的事情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而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改变，仍是“被统治者”。我这是从实质来说的，在文字上，是“被领导者”。

社会主义和它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前几千年历史的一个极重要的标志，就是人民在社会上居于什么地位，是被统治者，还是世界的主人。毛主席给了人民最珍贵的礼物，给了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叫人民自己起来做世界的主人，而把国家机器看成加工厂。毛主席是真正的人民队伍里的一员，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他把上方宝剑送给了人民，而自己愿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应该不辜负毛主席的深情厚意，赶快接过来并使用起来。如果毛主席给了，人民不接不用，或者不敢使用，象叶公好龙一样，天天喊民主，真的民主来了，又害怕起来，有困难还是喊毛主席万岁，叫毛主席怎么办？他就只好耐心等待人民自己教育自己，甚至加强反面教育，迫使人民觉悟到民主的重要性。

有些英雄们写了一些美丽的诗句，如“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等等。这是人们用以表达对毛主席衷心热爱的颂词，而不是行动的指南。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有意识地引导人们向各个不同的政治方向前进，人们应该紧跟那一位毛主席呢？万一将来战争发生，失去和毛主席的联系，人们怎样应付突发事变，又怎样独立作战呢？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教导说：“有人说，跟着某人不会错。这话不对。又跟又不跟，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七亿人民尽舜尧，是毛主席的最高理想。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毛主席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我提出我的想法。这封信是写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也是写给全国人民的。因为哪家没有家长，哪家没有子女呢？要求全国人民接受毛主席的礼物，在真理面前不要退缩。毛主席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当他看到人

民开始运用民主的武器行动起来时，他一定高兴。人民开始觉醒了，地平线上就出现曙光了。

□ 原载《陆兰秀狱中遗文》，成家出版社出版。摘自《新世纪》网站

二、研究资料

《从南京大学“倒匡”事件看“文革”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相》（董国强）

一、引子 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向全国宣告“南京大学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紧接着这篇社论的，是新华社长篇电讯〈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 江苏省委决定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受到热烈拥护〉，该电讯报导了6月12日南京大学批斗匡亚明的情况，并对所谓“六二事件”做出了简要说明（1）： 6月1日以前，南京大学广大师生响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七位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后，进一步激起了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正在进行劳动建校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革命师生，2日下午贴出大字报。他们一致声援北大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同时对匡亚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态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匡亚明以卑鄙毒辣的阴谋手段，镇压校内的革命群众运动，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道路。 中共江苏省委及时发现了这一严重事件，立即派人进行检查，发动南京大学党组织中的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师生，彻底揭发了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现在，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霎时间，地处东南一隅的南京大学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成为路人皆知的“牛鬼蛇神”。 事隔十三年以后，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于1979年2月19日作出了〈关于“六·二”事件的平反决定〉，该文件指出（2）： 1966年6月13日《新华日报》和6月16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了我校党委第一书记兼

校长匡亚明同志，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诬称6月2日发生在溧阳分校的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把分校的一些干部打成“资产积极保皇派”、“黑帮”。这纯属诬蔑、歪曲。为此，校党委决定：对因“六·二”事件受迫害的康贻宽、徐福基、秦向阳、胡福明等同志以及其他干部和群众，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为甚么人们的理解和评述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文本背后，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真实故事？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1966年初夏的历史现场。

二、溧阳分校的大字报

当年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位于宁杭公路边，距离南京市大约九十公里，原来是溧阳县属下的一个果园，占地面积约为1,320亩。“六二事件”发生的时候，溧阳分校正处于筹建阶段，在这里参加建校劳动的是南京大学文、史、哲三系的五百多位师生。溧阳分校的创办是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产物。早在1961年7月，毛泽东曾经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认为该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学模式很好，希望全国学习他们的经验〔3〕。后来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和批示，主要内容包括减少课堂教学，加强社会实践，学习“抗大”经验，缩短大学学制等。他认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4〕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南京大学党委在中央高教部和江苏省委的支持下，于1966年1月17日作出了〈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提出将文、史、哲三系迁往溧阳果园，打通合并组建“大文科”，实行“半农半读”的构想。此外还拟定了建设溧阳分校的八点具体方案〔5〕。在全校宣讲该〈决定〉的大会上，匡亚明还提出要让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成为全国高教战线的一面旗帜，与工业战线的大庆、农业战线的大寨并驾齐驱。

1966年2月底，文科三系师生在匡亚明的率领下，打着红旗，背着行李，花了三天时间徒步行军抵达溧阳果园。起初因为没有校舍，师生们分散居住在当地老乡家中。初步安顿下来以后，学校领导计划集中3、4、5三个月的时间建设一批“乾打垒”〔6〕房屋，先让学生集中居住下来，然后再陆续建一些教室和办公用房，进行半工半读教改实践。一些亲历者为我们描述了他们此后三个月的劳动、生活和学习情况。一位当年的政治系

学生回忆说（7）： 建房子没有石头，我们就到深山里去开采，每天劳动十个小时。拉黄沙，拉石子，这些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干。……劳动的时间太长，就没有时间学习了，课都不能上，唯一的学习就是每天早上听听广播、看看报纸，吃完早饭以后马上就要劳动。 劳动太累了，我们班有个男同学累得晕倒在地。把他送到校医院后，其他同学都很羡慕他：他可以不用劳动了，而我们还得继续劳动。 除了劳动辛苦以外，日常生活似乎也不大令人满意。一位当年的历史系学生回忆说（8）： 当时大家最感到头疼的是缺水。当地有一个小水库，我们就用水库的水。这个水库原来供应当地几十户老乡的用水，问题并不太大，但是我们一下子去了五百多人，用水就显得有点紧张了。地质系有一个找水专家叫做萧楠森，匡亚明就请他去找水，可是忙活了几天，就是找不到新的水源。因此盛夏来临的时候，大家开始担心缺水的日子不好过。……还有一个就是蚊子。那比南京的蚊子厉害多了。谁愿意呆在农村受蚊虫叮咬呢！因此都想回到南京去。另外，那些毕业班的学生还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毕业分配问题忧心忡忡（9）。由此可见，许多学生对创办溧阳分校是存在抵触情绪的。这种抵触情绪与其说是针对匡亚明个人的，倒不如说是针对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的。但是在当时的舆论压力下，学生们并不敢将自己的不满堂而皇之地表露出来，他们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 “六二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公开发表。溧阳分校的广大师生是在6月2日早晨的新闻广播中知道这个消息的。当天下午，分校学生周冠华、陈云绮、郑立业、王钟元、吴相乔等人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接着，二年级学生蔡琼、潘玉玲、李为华、施锐琴、王秀英、鲍玉花、周慧等人又联名贴出了〈十问匡校长〉的大字报（10）。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学生也纷纷贴出自己的大字报。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造成一股很大的声势。由于当年那些大字报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在这里无法向读者展现那些大字报的原始风貌。不过通过新华社电讯的简要介绍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那些大字报的大致内容还是清楚的：第一是对北大师生的“革命行动”表示声援；第二是集中火力批判匡亚明为一位工人来信所写的“按语”；第三是指责匡亚明搞溧阳分校的目的是将南大师生下放到农村去，与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隔离开来，用建校劳动冲击革命大批判。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大字报内容，第一条属于政治表态性质，无须深究；第二条事出有因，本文在稍后还要作出分析

说明；第三条则完全不顾溧阳分校筹建的背景和初衷，明显带有“诛心”之论的味道。匡亚明对“六二事件”的过激反应显然与此有重要关联。三、匡亚明的“反击”

今天的人们在谈到匡亚明的时候，常常会以一种赞誉的口吻提到他的多重身份——革命家、教育家、学问家。但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在四十多年前，这些不同身份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气质有时是会发生激烈冲突的。“六二事件”爆发前后，匡亚明的困惑和苦恼恐怕是局外人难以理解和想像的。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具有浓厚知识份子气质的大学校长，匡亚明有一整套鲜明独特的办学思想。择要说来：第一，他主张依靠知识份子办学。第二，他认为高校应该加强科研工作。第三，他主张尽一切可能改善办学条件。第四，他虽然没有公开否定“又红又专”的口号，但是他强调“红”必须体现在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上。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外界因素的干扰，匡亚明无疑会成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学问家。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匡亚明又不得不随时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搞一些与上述教育思想无关甚至冲突的举措。前文所述到溧阳农村去办分校，就是他身上“党性”战胜“个性”的具体表现。

〈五一六通知〉发布前后，匡亚明的困惑和苦恼有增无已。在5月7日江苏省委召集的在宁高校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虽然知道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学术批判而是政治斗争”，但是“政治斗争”的确切含义是甚么？斗争的对象是谁？斗争究竟如何开展？中央和省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由于缺乏“通天”的渠道，加上个人政治嗅觉迟钝，匡亚明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根本不可能从毛泽东那些含义晦涩的言谈话语中窥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为了有所动作同时又不致引起太大麻烦，他在5月11日的全校总支书记会议上提出了南京大学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三个步骤：第一是批判“三家村”；第二是开展群众性的“灭资兴无”自我教育运动；第三是深入进行学校教学改革。按照一般的理解，他的这个决定是比较稳妥的：“三家村”是中央已经定性的“三反份子”，把他们作为批判对象应该没有甚么疑问；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倡导的“斗私批修”、“思想改造”主张的一个积极呼应；而深入进行教学改革，则是积极贯彻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本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五一六通知〉正式下达以后，匡还根据江苏省委的部署，从溧阳分校各年级抽调了十几个能写文章的学生组成

“大批判组”，准备写文章批判“三家村”和江苏省委出来的几个本省“反动学术权威”，其中包括南大教授陈嘉、陈瘦竹，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叔平，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等人。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匡亚明主观上对上级的号召是亦步亦趋的。大概唯一可以指责的，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按语”。那还是在〈五一六通知〉正式下达前，南京的一位青年工人致信南大党委，批评该校中文系编著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书。匡亚明对这封来信显然是有看法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他又不便对之公开否定，于是他在指示溧阳分校政治处印发这封来信的同时，亲自撰写了一个“编者按”，一方面指出在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中，“学生可以批评教员，青年人可以批评老年人，群众可以批评任何干部和领导”，另一方面又强调批评“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尽可能避免在小是小非问题上纠缠不清”（11）。这个“编者按”的确与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如出一辙。不过这个事件只能说明匡亚明由于消息闭塞，未能及时掌握中央高层内部斗争的最新动向，而不能看作是对伟大领袖的质疑和挑战。因此在匡亚明自己看来，他所做的一切无论在无产阶级“党性”还是在个人“良知”方面都是无可厚非的。因而大字报中那些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无限上纲的“诛心”之论无疑激怒了他。长期以来形成的“阶级斗争”思维定势和1957年的“反右”斗争经验，使他错误地理解了〈五一六通知〉中所谓“政治斗争”的具体含义。他执着地认为，他匡亚明就是“党的领导”化身；对他的任何批评指责就是对党的领导权威的蔑视和挑战。此外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毛泽东的一次与南京大学和前南大党委书记陈毅人有关的谈话。毛泽东在1965年11月视察各地工作时曾经说过（12）：你们这里有个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1957年大鸣大放时吓昏了，现在到那里去了？（答：下放几年后，现在图书馆工作。）这些人，要看他的变化怎样。当时党内就是不布置，只对党委书记打招呼。但像清华有个党委书记就不能打招呼，他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总支书记、党员、团员都不讲，让右派进攻，让它混战一场。一个学校左派可能是百分之二十左右，中间派占大多数，右派极少数，但让他们闹起来，也会猖狂一时。以后遇到备战、形势变化、运动等紧要关头，都要注意让敌人暴露一下。这叫“诱敌深入”嘛！

此时此刻回想起毛泽东的上述谈话，不能不促使匡亚明将“六二事件”看作一次对他

个人的党性和忠诚的严峻考验。如果他对学生的胡闹行为听之任之，就有可能重蹈陈毅人的覆辙。因此他必须立刻组织有效的反击！一位亲历者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匡亚明获悉“六二事件”后赶往溧阳分校时的杀气（13）：非常突然地，我在大字报的现场看到了匡校长。匡校长看到我，冲我摆摆手，我就过去了。匡校长问我：同学，你见过右派吗？我说我见过，我们系就有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分配，一个月就拿十八块钱。匡校长说：我告诉你，我在吉林大学，写我大字报的人都是右派！大概有两三千吧，这些人写我大字报，都是右派！我一听，哎呀，因为我也在批匡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了。这下惹了大祸了。当天匡亚明就在分校召开了党总支扩大会和全体党员大会，把学生们贴出的大字报说成是“毒箭”，布置立即组织反击，并告诫大家“不能手软”。6月3日上午匡亚明再次召集党总支扩大会议，要大家“跟踪追击”，召开“讨论会”批斗有关学生和教师。6月3日下午回到南京，他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通报了“六二事件”以及处理经过，得意地宣称“粉碎了一次六小时的政变”。他还命令溧阳分校负责人对被斗的师生要“扭住不放”。据统计，在6月2日至5日四天的时间里，在溧阳分校遭到批斗的多达七十人，包括学生六十四人、教师四人、工人二人。其中党员九人、团员二十二。四个团总支书记除一人不在家外，三个全被斗了（14）。关于匡亚明组织“反击”的具体情形，一位亲历者回忆说（15）：当时宣布全校停止劳动，召开批判大会。那个时候大多数学生还是跟着学校领导的，立即把我们这几个贴大字报的人孤立起来了。首先批判几个教师，包括政治系的林××、中文系的胡××、外语系的苏××等人。这些老师当时三十多岁，而我们都是一些年轻学生，所以匡校长认为贴大字报是他们策动的。老师批斗完了，就开始批斗学生干部。第一个被批判的是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中文系的胡才基，他的年龄比较大，是调干生，老共产党员。第二个受到批判的是中文系的孙家正，他是中文系的团支书。此外还有政治系的学生朱英才等人……。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批判大会声势浩大，残酷恐怖。所谓批斗会的模式，就是一旦哪个人被确定为批斗对象，立刻就发动群众起来，不管真的假的，统统的往你身上扣，上纲上线，甚至要侮辱你的人格，你根本没有分辩的余地。批斗者使用的都是“阶级分析”的观点，平时的各种言行表现，包括个人之间某些极为私密的问题，统统被揭发出来，使人有一

种被剥光衣服、赤身裸体的感觉。看到平时我们尊敬的老师被学生围在中间批斗，甚至于有的人开始动手，我们当时站在后面就感到恐怖。另一个亲历者回忆说（16）：学校召开党总支扩大会议和全体党员大会之后，我那个党员老乡纠集了我们班八个出身最好的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这是为甚么〉。这是当年“反右”运动时《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原来写大字报的人都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就蔫了，八个写反击大字报的同学就很开心，没写大字报的同学则比较轻松，他们可以看热闹。到了夜里12点，紧急集合。刚刚被任命为我们年级党支部书记的Q老师（原党支部书记藉故离开分校），就到我们这边召集全体同学开会。他一来就给我们发表演讲，说我们这里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件，和1957年差不多。他还叫写了大字报的人站到右边来，没写大字报的都站到左边去。这样我们无形中就变成右派了。然后，他要写大字报的人回去反省，准备做检查。这时已经下半夜了，我们写大字报的同学都不敢睡觉，坐在宿舍里学习和写检查。溧阳分校的蚊子又多，遭到蚊虫叮咬，很是受罪。那些没有写大字报的同学这时就贴反击的大字报，那些想入团、入党的同学更积极，他们就牺牲我们了。他们把我们蚊帐的门口都贴上了大字报，我们即使想睡觉也没有办法，因为不敢把他们的大字报撕掉。所以那天晚上，我们整夜都在学习分校发给我们的学习材料，一方面还要写检讨。以上对“右派”学生、教师的处理办法是否出于匡亚明的直接授意，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不过即使不是出于他的直接授意，匡亚明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亲历者都公道地指出，匡亚明和分校负责人对“反击”目标的确定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断成分，“反击”的方式方法又过于残酷，这不但造成了被批斗者的怨恨，而且使得一些旁观者的感情天平发生了向不利于匡的一端倾斜。

四、江苏省委的介入

当造反学生与匡亚明形成对峙的时候，江苏省委的介入无疑举足轻重。但是这种介入多少显得有些来迟。究其原因，如果说匡亚明未能及时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那么江苏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六二事件”发生以后，江苏省委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不过他们也派了人去溧阳分校，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据一位当年在溧阳分校政治处工作的教师回忆（17）：在5月25日前后，省委派了一个姓杨的干部作为联络员来到溧阳分校。“六二事件”爆发以后，这位杨联络员就鬼鬼祟祟地到处摸情况，

然后再跑到几里路以外的地方给省里打电话，说南大的校长组织对学生进行批斗了。但是这个情况反映到了省里，省里面有底吗？要把匡亚明搞掉，我估计省里面一开始也没有底。这位老师的说法不是没有来由的。按照一般的分析，既然北大揪出了陆平，那么南大当然可以对等地揪出匡亚明。但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匡亚明，行政六级干部，其资历和声望又岂是“一二九”运动中参加革命的陆平可以相比的？如果没有上级党组织的支持，江苏省委宣布打倒匡亚明，他匡亚明会买账吗？关于此前匡亚明与江苏省委的关系，我们在南大师生中听过许多与以下描述大同小异的说法（18）：匡的个性比较强，干革命的资历也比较老，行政级别比江渭清他们都高，所以对于省委这些人呢他就不太理睬。省委叫他去开会，他不能不去，去了以后又对会议没有多大兴趣，他就带一本英文的《资本论》去看。不过一旦中央作出“倒匡”的决定，江苏省委负责人会毫不迟疑地贯彻执行。当时在中央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是康生。他接到江苏省委的报告以后迅速做出批示：匡亚明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职反省，接受群众批判。于是江苏省委于6月6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6月8日，江苏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联络组。在此背景下，溧阳分校的斗争形势迅速出现逆转。一位亲历者回忆说（19）：到了6月5、6日的样子，溧阳分校二把手徐福基突然找我们写大字报的人去开会。他向我们传达了匡校长的指示，说你们写大字报初衷是好的，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把矛头搞错了。匡校长和南大党委，还有溧阳分校总支，都觉得你们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还是我们的同志。哎哟，听了这话，下面哭声一片，大家都很有感动。当时就有人表态，说匡校长太宽厚了，我们对不起他。实际上后来才知道，匡亚明到省里去汇报“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省里汇报到了中央，康生听了特别恼火，批评了匡校长，说他整人整得不对。所以匡很快找到了徐福基，下达为我们平反的处理意见，说我们是好人犯错误，学校里不予追究了，所有问题“一风吹”。那天中午食堂还加餐。大家好几天都没有心情吃饭了，这次算放开了，感到没有事了，我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饭。然后又继续劳动。大概到6月7、8日的样子，我们正在建筑工地筛沙子。忽然来了两个人，问：你们谁写大字报了？我们不认识他们，就没有理睬。他们说：看样子你们是写大字报的，看起来没精打采的样子。我问他们是哪来的？他们说江苏

省委宣传部的。我问他们来干甚么？他们说：你们写大字报是对的，你们受委屈了。我说：你们胡说八道甚么东西呀，匡校长都说我们不是右派了，我们都解放了，我们要好好干活，你不要和我们罗索。另一位亲历者回忆说（20）：我们写大字报的几个人都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了，都感觉对不起党。实际上江苏省委已经在调查这个事情了。本来省委已经提出文化革命的斗争对象了，本来的斗争对象是吴天石、孙叔平、陶白、叶子铭这些人，想不到匡亚明为镇压学生跳出来了，江苏省立刻抓住不放，派省委宣传部领导率领的调查组进入学校，而我们呢还不知道。6月8号晚上，学校广播站突然播放《东方红》歌曲，让全体学生到大操场集合。我们集合以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在会上向全体学生宣布：明天你们就看不到匡校长和分校的其他干部了，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被调走了。他还说：同学们你们贴匡亚明的大字报是对的！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你们不是反党先锋，而是革命先锋！听完这个话以后，我们都激动得哭了。当时孙家正带领我们高呼口号，心里面激动啊！而批斗过我们的那些同学都呆住了。但是，那几个被批判的、被拳打脚踢的老师还不敢动。然而省委的介入也诱发了一些新问题。一位亲历者告诉我们（21）：省委调查组在大会上宣布支持我们，下面是欢声雷动。突然有人提出：“我们写大字报的人是革命急先锋，那些整我们的人是甚么？”当时大家认为被整了，心里不平衡，所以有点想报复原来整我们的人。省委的人就讲：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大批判，主要矛头要对准匡亚明，批判〈二月提纲〉。同学们互相之间不要再纠缠了。但是他们的这些话没有多少人听。分校实际上陷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大概到了9号，南京大学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从南京来到溧阳分校。小轿车一进分校的大门，大家就把他围起来了。他向我们传达省委的指示：第一，匡亚明就是北大的陆平。第二，南大党委不等于北大党委，你们不要把南大党委和北大党委等同了。第三，溧阳分校的同学要坚守溧阳，一面搞文化大革命，一面继续劳动建校，那个时候溧阳分校严重缺水，挖井又挖不出水来，大家洗澡也渐渐困难。晚上蚊子又多，大家觉得这个夏天怎么过呀！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我们要求回校干革命。”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马上就有人坐在小轿车的顶上，大家就要求回校。组织部长说：不能回去，你们要在分校进行文化大革命。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匡亚明又不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回南大去闹革命。

还有人说：怕甚么，我们自己走回去。我们学习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 组织部长见控制不住局势了，想溜。同学不让他走，叫他打电话反映学生的要求。最后，江苏省委从南京军区借了几十辆军用卡车，把我们在溧阳的所有南大师生都接回南京。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6月10日和12日又发表谈话。听到传达以后，江渭清从华东局回到南京，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22）。等到溧阳分校师生返校的时候，这边早已做好了准备，不但留在南大本部的所有理科学生被组织起来夹道欢迎溧阳分校师生“胜利凯旋”，许多其他在宁单位也敲锣打鼓来到南大，对溧阳分校师生“倒匡”表示声援。一位当年的溧阳分校学生回忆起那个激动人心的欢迎场面，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23）： 我们乘坐的汽车开到汉口路的路口，整个南大沸腾了！理科的学生早已等候在那里，一看到我们，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欢呼雀跃，大家一起握手拥抱。 我们以一种英雄凯旋式的姿态，受到火一般热情的夹道欢迎，所以那个心情啊就特别激动！当时那个情形啊，真是人山人海！我们都激动的哭了。 12日下午，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声讨匡亚明的罪行。除了南大师生以外，参加大会的还有南京各大专院校推派的大批代表。大会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宣布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宣布以后，全场热烈欢腾，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紧接着，分校师生代表胡才基等人在台上以极其愤怒的心情，揭发了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校本部学生代表陈季平在大会上发言，对遭到匡亚明打击的师生表示亲切的慰问。分校学生唐力行、王世泰、杨家玉、张秋良等纷纷表示：省委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是对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撑腰。参加大会的各大专院校师生热烈拥护中共江苏省委的决定，坚决支持南京大学革命师生的斗争（24）。 此后事态的发展，在江渭清的回忆录中有简略的描述（25）： 《新华日报》从6月13日起，除错误地公开报导撤销匡亚明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外，还错误地开始了对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钱静人，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孙叔平等同志的点名批判。当时，曾有二十万人涌到南京大学“声援”，校园里除大字报之外，还扯起了广播喇叭，操场上搭起了台子，一些人登台讲演，展开所谓“大辩论”。 一位教师回忆了后来学生斗争匡亚明的情况（26）： 当时在南大大操场批斗了匡

亚明，我印象当中中文系的学生胡才基等人是批斗的主力，他们起来揭露匡亚明的“叛徒”问题。就这样开始了对匡亚明进行武斗，戴高帽子，游街，泼墨水，有的学生还让匡“坐飞机”。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江苏省委于6月15日向南大派出了由汪冰石任队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林克任副队长的工作队（27）。7月4日，省委又改派彭冲为南京大学工作队队长兼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同日，省委工作队和南大党委发出〈关于改组溧阳分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通知〉，赵复华、胡才基等人被任命为溧阳分校党总支负责人（28）。至此，南大学生的“倒匡”运动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五、“倒匡”事件的历史反思

南京大学的“倒匡”事件无疑标志着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南大“倒匡”事件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介入事件的学生、教师和江苏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在“六二事件”爆发前都与匡亚明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客观地讲，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非你死我活的矛盾。就造反的学生而言，最初令他们感到不满的无非是艰苦的建校劳动和闭塞的乡村文化生活，他们的最基本诉求无非就是尽早离开农村回到城市。这至多表明毛泽东时代长期的理想主义和禁欲主义的道德说教实际上收效甚微。就匡亚明而言，他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无非是希望培养出一批“又红又专”的人才。这与此前许多教育家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契合的，似乎也没有多少值得指责的地方。那么，这样一些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多大错误的想法，为甚么在当时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这样一些原本善良的人们，为甚么最后会走到暴力对抗的边缘？是甚么因素使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激化，最终给大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从某种意义上讲，造反学生和匡亚明都是极“左”观念的受害者。一位当年的造反学生在接受我们访谈时，并不讳言自己那一代人是“吃狼奶长大的”，他们从小学到大学所受到的教育，是“不忘旧社会的苦，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不讲人情，斗争哲学”之类的信条。另一位当年参与镇压学生的党员教师则十分强调“反右运动”对学校当局和他个人的深刻影响，当大字报铺天盖地袭来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右派份子向党进攻”。联系到当年的特殊语境，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上述言说的真实性。它们的确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奇特影像。如果考虑到这一点，矛盾双方的那些过火言行就不难理解了。

——那些言行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外在表现。然而，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极“左”观念难道是“六二事件”成因的唯一解释吗？在“倒匡”学生与匡亚明的思想深处，有没有其他值得检讨的东西？造反学生在高压状态下的犬儒主义倾向，以及后来在自在状态下的暴民主义倾向，是否都反映出他们的人格缺损？匡亚明固执地把自己看作“政治正确”的化身，丝毫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这是否意味着在他身上“民主”观念的淡漠和封建家长制作风的根深蒂固？此外，江苏省委对于筹建溧阳分校以及南大党委的其他各项工作负有领导责任，但是当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時候，省委主要负责人不是勇于承担责任，而是见风使舵，大玩“丢车保帅”的把戏，其“党性”和“人格”难道没有令人质疑的地方吗？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参与演出“六二事件”的有关各方都不是最后的赢家：匡亚明虽然在“六二事件”之后的几天里依靠高压手段制服了造反学生，但是江苏省委介入后，他在南大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个人遭到批斗和长期监禁；江苏省委玩弄“丢车保帅”的把戏也只能自保于一时，8月以后群众运动的汹涌波涛迅速将旧省委吞没，省委主要负责人也遭到了灭顶之灾；南大的学生造反派尽管在“文革”前期的“造反”、“夺权”运动中风光一时，但是到1968年3月江苏省实现“大联合”之后他们立刻遭到唾弃，在“清队”、“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受到批斗、监禁，许多人因不堪凌辱而自杀。由此可见，当基本的政治伦理丧失以后，政治就变成了一场危险的赌博游戏。如果一个社会容忍了对少数人权利的践踏，那么其他社会成员权利的丧失，就只是时间问题。

在南大校史资料中，我们看到了如下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文革”爆发时，全校有教职工2,784人，学生5,911人，共8,695人。“文革”期间立案审查的533人，面上审查的100人，计633人，占全校总人数的7.3%（不包括清查“五一六”期间受审查的800多人）。当时有教授70人，副教授35人，计105人。除一人因病住医院于1968年病逝未受冲击外，104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和冲击，绝大多数被抄家、挂牌、关“牛棚”，不少人被扣上“特务”、“叛徒”、“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全校被定为“敌我矛盾”的132人。审查中，不堪凌辱、自杀身亡的27人。“文革”结束后，南大共清理、销毁各种检举揭发材料重量达3,219斤（29）。就全国的情况而言，南京大学的“文革”还不算是

十分惨烈的……注释：1、10、14、24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6日。2 〈关于“六·二”事件的平反决定〉，载《南大百年实录——南京大学史料选》，下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590—591。3 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282。4 毛泽东：〈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1965年12月2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493。5 〈南京大学党委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96—97。6 “乾打垒”是一种用毛竹、稻草、泥土和石棉瓦搭成的简陋房屋。7、15、20、23 笔者与J先生的访谈记录，2006年3月10日。8、13、16、18、19、21 笔者与C先生的访谈记录，2006年3月1日。9、17、26 笔者与G先生的访谈记录，2006年3月9日。11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376。12 毛泽东：〈在一次视察各地工作时的讲话〉（1965年11月），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22、25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515；516—17。27 〈省委南京大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南大党委联合通知（第一号）〉，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235。28 〈工作队、党委关于改组溧阳分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通知〉，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237。29 〈南京大学落实政策工作总结〉，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602—603。□ 原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四期2006年9月30日

《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潘祝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是北京出现了一个“5·16”组织，被认定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的“5·16”组织，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不该在全国搞清查？笔者不明真情，不便评论。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5·16”组织。

然而自 1970 年 4 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1971 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十三万人被打成“5·16”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5·16”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江苏清查“5·16”涉及范围很广，造成打击面严重失控。“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被视为“5·16”极易进入的黑窝，其成员大都成了清查对象。这些群众组织在“文革”中都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有些还犯有打砸抢和参与派性武斗的严重错误，但其成员的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当成敌我矛盾从中打出了成批“5·16”。少数坏头头有罪行应依法惩处，但与“5·16”并非一回事。此外，原地方党政机关及其它机构，在“文革”中被称为“旧机关”，其工作人员被视为“旧人员”。认为这些“旧人员”中有不少人对“文革”、军队“支左”、军管等，有抵触不满甚至反对情绪，易与“5·16”气味相投，也成了清查对象。这些“旧人员”中的原各级地方领导干部，成了清查重点，尤其是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假党员”的领导干部，往往被当作“5·16”的黑后台、黑顾问深挖。有不少领导干部已经“三结合”进入各级革委会也不能幸免。省“二办”为了深挖全歼“5·16”，还列出 31 个问题，不管有未填表参加“5·16”组织，只要沾上其中一条，都要戴上“5·16”帽子。

1970 年 4 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5·16”说不过去。1975 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后，当年 5 月 3 日省委调查研究组

的调查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 13 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 2 万多。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 2000 多人，伤残人数更多。仅以溧水县和滨海县为例便可说明。溧水县死亡 36 人，被严刑拷打重伤 100 多人；滨海县死亡 18 人，伤残 60 多人。

◇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5·16”的突破口

南大被认为是“5·16”敌情最严重的单位。1970 年 4 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5·16”分子 108 人，点名“5·16”248 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 1154 人，共有 1560 人卷入了“5·16”漩涡。其中有 21 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 13 个昼夜）攻下“顽固堡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5·16”，也逼出了人命。一位吃尽苦头的受害者事后谈及当时的处境是，“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

南大作为突破口，不仅在教职员学生中打出了成批“5·16”，而且揭出了地方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的“5·16”问题。这两点突破非同寻常。

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5·16”。1971 年 2 月靠边审查，1971 年 10 月隔离审查，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这一突破为日后成批地方领导干部打成“5·16”开了先例。省“二办”奉命抓紧对全省地市厅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摸底，排出了一批涉嫌“5·16”问题的对象。在省级领导干部中占 72%，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 38%，十五个地市领导干部中占 41%，地市一把手中占 69%。以此为依据加紧了对各级地方领导干部的迫害。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5·16”骨干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查。此后省“二办”奉命大整军内涉嫌“5·16”问题的干部材料。据 1

1975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此举大大超越了江苏的范围,也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职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 ◇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江苏清查“5·16”,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5000人左右。清查“5·16”在两部分人员进行。一部分是省革委会机关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人员”,另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1971年干校的人数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60%以上,因此干校承担了省级机关清查“5·16”的重任。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清查“5·16”的高潮在1971年。经过“春季攻势”,到1971年6月,被打成“5·16”的占33.4%。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55.5%,处级干部占42%,一般干部占30%。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到1971年11月,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连同已经打成“5·16”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70%以上。 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8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5·16”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43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外面来人联系工作,除派人监视一楼值班室,还在三楼放了望哨监视传达室。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5·16”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5·16”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消息传开后,好几个月谁也不敢来省农业局。 省农业局64名“留守人员”,有39人打成“5·16”。打成“5·16”的局领导占60%,处室负责人占62%,党支部委员占80%,党员占64%,党支部几乎成了“5·16”支部。 省科技局被视为“5·16”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5·16”的重点。1000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

“5·16”关押1000多人，逼死5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单位100%的科以上干部和80%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5·16”。省科技局在清查“5·16”最紧张时，直属科研机构的工作几乎全部停顿。1972年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大面积集成电路新工艺，组织了研究所、高校和工厂的科技人员三结合试制队伍，经过一年多努力，就在科技成果快拿到手的关键时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参加科研的师生，奉命回校参加深挖“5·16”，科研课题中途而废，使200多人辛勤劳动，投资500多万元试制出来的设备束之高阁。省五七干校，1971年有3000多人，除原在干校搞“斗批改”未分配的1000多人外，其余是在清查“5·16”开始后陆续进来的。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5·16”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到1971年底已增加至200多。首批进干校的省革委会常委、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许。其他涉嫌“5·16”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已经下放在南京钢铁厂的60多名干部也被装上卡车押进干校，下放在外地的也一批批揪回干校。到1971年底，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80%以上。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5·16”、批臭“5·16”、深挖“5·16”、全歼“5·16”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在干校被审查的对象一律与他人隔离。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段，罚站10多小时（最长19小时）更是常见。不少受害者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参加了“5·16”，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使清查形成了滚雪球。一时间干校出现了一种景象，干校内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为了做到“一个不漏、一网打尽”，干校还发动“以毒攻毒”，要被审查者检举揭发专案人员和小分队成员中的“5·16”。这就给被审查者泄愤检举的机会。以干校一大队为例，一名小分队长今天斗人，第二

天进了密封室；一名大队核心小组成员，今天要“5·16”缴械投降，第二天办了他的学习班，要他缴械投降；大队的一名主要负责人也挂上了“大名单”，成了“5·16”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结果，在干校引起了一场混战。

1971年下半年，干校多次召开宽严大会。9月份的一次宽严大会要宣布对几名“5·16”顽固分子从严处理。为大造声势，动员干校周边农村的部分干部群众参加。一些农民见会场周围有荷枪武装警戒，误以为干校要杀人。干校虽未杀人，但超越司法机关的职权，给从严处理者戴上手铐宣布法办。◇ 清查

“5·16”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 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将清查“5·16”作为头等大事，与“一打三反”结合，全力以赴。三年多时间内，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从上到下先后组织了2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3900多个、2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1200多场，收到举报材料2万多件。在1971年6月至10月，4个多月内就有5000多人打成“5·16”，其中骨干600多人。到1972年底，2万多人打成“5·16”，逼死300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5·16”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5·16”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

“5·1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5·1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市级机关清查“5·16”，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检法机关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一位在此主管清查工作的军队“支左”人员，事先即预言，市公检法机关的“5·16”有一个加强营。强攻的结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5·16”。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600多干警，159人打成“5·16”，逼死4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没。 其它市级机关清查“5·16”也相当激烈。市革委会机关450余人，

至 1971 年底已有 107 人打成“5·16”，加上挂上“大名单”的 200 余人，也占 70% 左右。南京市各系统的基层单位，清查“5·16”也搞得“轰轰烈烈”。如华东电子管厂在一个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5·16”问题，并检举揭发别人，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5·16”干部名单。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5·16”。又如江南光学仪器厂，要求所有干部职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5·16”问题，人人都要过“5·16”关，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干部职工稀里糊涂地成了“5·16”。江苏其它地市清查“5·16”也不甘落后。以盐城地区为例。原地委常委 13 人，打成“5·16”的 6 人，挂上“大名单”的 4 人；中层干部 84 人，打成“5·16”的 43 人，占 51%。地区公检法机关 500 余干警，打成“5·16”的 327 人，占 65%。江苏清查“5·16”的冤假错案，是十年浩劫的一部分，不应被遗忘。因史料不全，本文虽未能作全面回顾，但也可使读者从片断情况中得知江苏这场浩劫的部分真相。□ 《炎黄春秋》2007 年第 1 期

二 00 三年四月三日，孙维申：《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记无锡市长达三年多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调查报告》

人性的权要人物拖进了“处处牢房遍地鲜血”的恐怖的大黑洞……。但是，这段历史被有些人有这是三十年前的一场恶梦，整个城市都被某些为了权势而泯灭了意或无意地掩盖了、歪曲了。掩盖或歪曲历史，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于社会的今天和明天都是不负责任的。为了今天改革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笔者遵循一位伟大思想家关于“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名言，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记述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祈望读者和学者诸公能仔细地研究这段历史，总结出有益于社会的经验教训。

挖地三尺 一个不漏

你听到“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这个词儿，会作何感想呢？也许你会想到那些冒着雨雪风霜或烈日曝烤，忙忙碌碌的考古工作者。不由得对他们献身学术的精神产生无限敬意。也许你又会想起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终年挥汗的农民，那粒粒皆辛苦的粮食更显珍贵。如果你知道这是一种政治变态心理支配下，笼罩

着整个城市的歇斯底里政治大迫害行动口号后，不会毛骨悚然吗？我听到一些过来人说，“何必再回想那些早已过去的事情。历史是根据需要写的，那些陈年往事也许方志上就用寥寥几个字就含糊过去。也许一个字都不会提到……”。是吗？历史就是那么随便由人搓捏！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只不过是一场无足轻重的恶梦，晨曦、鸟鸣外加一阵和煦的清风就能把它驱散得无影无踪？！

人类难道能靠忘却或臆造来求得自身的发展吗？人类难道靠着对昨天稀里糊涂的记忆，来求得有把握的，明朗清晰的明天吗？政治健忘症是人类进步的大敌。遗忘不可能克制历史留下来的病毒。你若不经意把它淡忘了，说不定什么时候旧病毒经过一番变异更新再出来横行于世，恶梦又会变成现实。历史是不能随心所欲东涂西抹的啊！尤其是那些社会瘟疫的病案更需认真记取。在我们讨论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回忆一下这段三十年前曾经在无锡大地上发生的悲剧，会加深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的认识。以史为鉴，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愿先辈们的血不会白流！

在十年文革期间，无锡市所经历的各种反复动荡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就是从一九七〇年初到一九七三年底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所谓“一打三反”就是“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狠狠反击极左思潮、狠狠反击右倾翻案风、狠狠反击资本主义复辟”。而整个运动的重中之重就是“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和罪行”。这次运动前后进行了近四年。而其中近三年多是从事“重点打击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超大型政治运动。

“一打三反”是从七〇年初开始的，历时半年多。当时，无锡市出动了数万名脱产或半脱产的专案工作人员（包括“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和当时实际行使专政行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工人纠察队”以及各单位的“群众专政办公室”“群众专政组”……），被触及、被用各种形式（诸如“学习班”或拘留、隔离审查等等）审查者起码达两万余人。这短短半年中，在当时仅六十五万人口的无锡市，直接死於运动中就达一百四十余人（按官方即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政策复查办公室一九七四年统计数）。其间无锡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等机构也抽出很大力量配合运动。消耗各种社会资源更是无法统计。

到了一九七〇年秋末冬初，运动就转入更为深势浩大的重点阶段即“清查五一六”（在无锡叫做“挖地三尺”或“深挖五一六”）。这个“深挖五一六”历时三年，被“触动”者按官方（即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政策复查办公室）统计为将近五万人。按民间人士的不完全估计，包括“隔离审查”“脱产审查”“半脱产审查”“业余学习班”以及各种形式“触动”者，超过十万人。“非正常”死于“学习班”中人数，按七四年官方（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政策复查办公室）统计为六十七人。按民间人士的不完全统计为八十一人。这还没有包括在“学习班”里因酷刑致伤致病后返家不久病情恶化而死者。用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原无锡市公安局长、已故的陈文章老人的话说“这哪里是什么群众专政，是专群众的政，是不折不扣的无法无天的法西斯！”。用原无锡轻工业学院师生的话说是“处处牢房遍地血泪！”。用已故的原市委书记，也是运动受害者韦永义老人的话说，“什么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这是当年蒋介石搞“四一二”和日本帝国主义搞清乡扫荡用的口气啊！”。按原总字三〇八部队一军官说“这是草菅人命、横行不法最典型的历史教材。”。用广大市民的话说，这是“昏说乱话抓人关人打人杀人的三年！”

虽然事情已过去三十年。笔者也从青年变成老年。但是往事是难以忘怀的。虽然手边资料已荡然无存。但是笔者和许多人从不同角度，不同地位经历过这场“浩劫中的浩劫”。特别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和无锡市轻工业学院教师，已故的沈静园教授等“深挖”死难者家属一同搞过自发调查。迄今印像深刻。现在凭记忆写出如下史实，供读者和学者阅读参考。

（一）春天里的“十二级红色台风”

在世纪之交人们也许把这个全市都沉沦在恶梦中的三年，深深埋在记忆深处了。但是往事时不时会冒出来。也许是由于阴雨天引起陈伤复发，也许是在中秋或春节全家团聚时难要想到屈死在“群众专政学习班”中的亲人，也许……

其实这场“一打三反、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早在一九六八年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初，就已经显出端倪了。

在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很快就在全市城乡刮起了一场“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十二级红色台风”（其正式名称为“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并建立各级“群众专政”机构。市里有“群专办”，区局或党委级大单位也有

“群专办”以领导“红色台风”。而中小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则建立“群专队”、“群专组”。另外“旧公检法”尚未完成“斗、批、改”没有“彻底砸烂”，所以只能“配合运动”，而另外成立一个“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后改名为无锡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下面有十个建制连队的“工人纠察队”，下属各连分别以数字序列授番号，如“工纠一连”“工纠二连”……）分驻全市各处要津。总指挥部设在市工人文化宫内。另外在“工宣队”里也抽调一批“政治上可靠”的队员“结合斗、批、改，投入清队运动”。由于在建立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原两大派群众组织中，和无锡驻军中主要的“支左部队”关系密切的“九二革命串联会”一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及各级“工人宣传队”和各级“工纠队”，特别是各级“群众专政”和“清理阶级队伍”机构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清队”运动一开始就明显地成了是以“清派”为主体的全社会大混乱、大恐怖运动。

这场“清队”历时半年。一开始就以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红无锡报》的一篇长长的评论员文章《掀起一场横扫一切阶级敌人的十二级红色台风》为信号，同时在全市城乡全面铺开。迄今五十岁以上的无锡人，一提到那场“红色台风”往往心有余悸。

一开始是把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四名原市委常委，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无锡的代理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挂着牌子，涂黑了双手，由用长矛等冷兵器全副武装的“工纠队”押上卡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游示众。然后各级各单位一齐动手，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和“各式各样暗藏的阶级敌人”也被“群众专政”揪出来斗批游街和关押刑讯。一时间市中心的人民路和中山路，天天都被挂着大牌子的“老牛队”（即所谓“牛鬼蛇神”），和手持棍棒或细竹鞭押解他们的“群专队”充斥街衢。斥骂声和呻吟声不绝于耳。接着，运动就把矛头对准了“革派联总”（即原“主力军”一派）方面的成员。以“坏分子”、“假造反真保皇”、“打着红旗反红旗”、“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潜伏特务”“阴谋复辟”等等莫须有罪名揪斗关押。到了高潮时每天都有人死于“十二级红色台风”。

原蓬帆厂厂长丁国荣，是小皮匠出身，在五十年代被提拔为干部。“文革”前夕调任蓬帆厂厂长。因其为人宽厚清正，勤於职守。且经审查政治经济生活均无任何问题。两派群众一致同意其参加筹建中的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并经上级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正待厂革会成立即上任时。突然被原单位揪了回去。原来几年前，丁国荣在家中杀了一只鸡招待老同事。此事被打成了“杀鸡滴血为盟成立小集团案”。丁国荣被揪回去第二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畏罪自杀”。死人无法斗批，就做个稻草人穿上死者的衣裳匆匆开了个斗批大会了事。笔者作为蓬帆厂被派去该厂参加斗批大会的代表之一。只见现场是一个挂在门上的细草绳圈，其高度仅到我的颈下，一个成年人根本不可用以自杀，且隔着薄薄透隙的板壁就是日夜不断有起码有三个以上人值班的“群专”办公室。我们被告知“群专队员们正在吃早饭，早饭前曾有队员送进早餐给丁国荣。再过了不到半小时，另一群专队员推门进去，丁已畏罪自杀。”在当时的高压政治态势下，非但没有向我们出示任何有关丁国荣系“自杀身亡”的司法鉴定，而且被威胁道“要严防别有用心的制造谣言为丁国荣搞翻案……”。事后证明这个“杀鸡滴血为盟成立小集团案”纯系子虚乌有。

除了种种捕风捉影制造冤案的全面政治大迫害外。挂牌当街示众也成了无锡市的一大景观。笔者曾见到在众多被示众者中有年及七旬的原市委委员，在抗战初期毁家纾难率众投奔陈毅元帅的季恺老人。他被挂着“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三反分子”的大牌子，站在市中心手工业大楼（现商业大厦）前广场上示众。时值春末夏初，正午骄阳当空，老人已被这样成天“枷号示众”多日。过往群众只能投以怜惜的目光，敢怒而不敢言。我只见到一位过路的板车工人，乘看守者不备，给他送上一玻璃瓶凉茶……。

工商业者沈渊如先生，是我国著名兰花专家，号称“兰王”。酷爱兰花的朱德元帅每次来无锡视察，百忙中往往抽空和沈渊如切磋兰花，互赠兰花和兰艺书籍。六八年刮起一阵“揪朱德”风潮时，沈渊如被从省里来的专案人员和无锡地方当局抓起来，要这个七旬老者交代朱德元帅来无锡时和他一起搞了什么“阴谋活动”。可是两个痴爱兰花的人碰在一道，除了互赠兰花切磋兰艺外哪有什么“阴谋活动”可交待？结果沈渊如先生被“群众专政组”吊起来一顿死打。当即老人就完全瘫痪，不能说话了……

台风”越刮越盛，部分市革会委员和一些群众提出质疑，反被斥为“阶级立场有问题”、“资产阶级派性掩护敌人”、“干扰破坏运动”。有部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原“革派联总”人员，只能采用“非组织手段”在郊区一条小河的船上秘密商谈抵制“红色台风”措施。商量了一夜还是一筹莫展，只得草草散去。可是这个幼稚的举动竟被当局打成了“企图颠覆市革会红色政权，全面为死不悔改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复辟的反革命暴动阴谋”。并由市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参谋强迫“红无锡报”美术编辑陆廷栋等人绘制所谓《暴动方案示意地图》。陆廷栋等人明知是捏造，在淫威之下不得不画，因此他们不肯认真绘制，只是含糊应付草草画就。那位参谋大为不满，就自行按军事地图规格炮制了一张《暴动方案地图》，作为“罪证”刊登在《无锡九二报》上。与此同时，全市召开万人大会，掀起一场“彻底粉碎反革命暴动阴谋的人民战争！”。全市数以千计的干部群众被关押拷打。其实绝大多数人对那次所谓“小船会议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无所知。眼见被罗织罪名迫害者越来越多。有上千名干部工人农民被迫逃亡他乡。笔者本人那次未及逃脱，被揪斗后打入“老牛队”长达数月。这个所谓的“五月暴动”案，在两年后又被当局捡起来作为“无锡五一六十大阴谋罪案”之一，更大规模、更残酷地进行政治迫害。

这场“十二级红色台风”，直到“九大”前后，渐渐转弱，被“三忠於，四无限”的新浪潮取代。全市人民稍稍松了一口气。

谁知这个令人惶惶不安的春天，还只是“老鼠拉木掀”，大头还在后面……

（二）“一打三反”更胜“红色台风”

一个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侥幸逃脱的“漏网右派”，惴惴不安地对笔者说，“这回可是放大又放大的反右斗争啊！那回还有什么右派边缘，这回可是没边没际了……”

在“九大”高昂的凯歌声声的气氛下，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冲突似乎平静下来了。市革会当局还处理了几处“严重违反政策”的单位。各单位的，用以管理被揪出来的“各种阶级敌人”、“专政对象”的“老牛队”（按即牛鬼蛇神的俗称），绝大多数在“严格政策界线”“团结大多数”的中央政策下，纷纷解散。在“红色台风”中逃到外地、特别是集中在徐州和鲁南的人，也由省、市革命委员会，用“热烈欢迎战友回家共同抓革命促生产”的大红横幅和锣鼓掌声接回无

锡。不过这些“战友”并没能回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而是被送到位于太湖边的疗养院去“学习”。这是一种似乎比较温柔的拘留审查。多数“战友”还会享受到放假回家过个星期天，和家人亲友团聚的优待。再后来大多数“战友”因为“油水”不大，就陆续“毕业”回家了。剩下的或转为拘留，或转为“隔离审查”。

这时却又冒出了新一波的运动，由于中苏边境形势日益紧张，全国展开了战备高潮。几乎同时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们一边汗流浹背到处在挖防空洞，一边又敲锣打鼓“欢送”起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们。和全国许多地区有所不同的是，无锡这些挂着大红花，噙着眼泪被逼到苏北农村去“战天斗地修理地球”的人，除了按当时中央精神所规定的干部、学生（即所谓“知识青年”）外，还有许多工人和其他城市居民，甚至有年过七旬的老人。许多今天还是被审查的“走资派”、“暗藏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黑干将”，在一个晚上都变成了胸佩大红花的“革命同志”，被“光荣”地赶到苏北大地。这是一场在派性、权力欲和“超指标完成任务”争功邀赏心态支配下的人口大清洗。

这场“几万大军下苏北”的悲剧还没谢幕，一九七〇年春无锡又开展了一阵在十年浩劫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运动“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包括深挖五一六，其中前一年是一打三反，后三年多是深挖五一六）。来势汹涌的“一打三反”就是“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击无政府主义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简称。无锡市为“全面领导运动”成立了一个“运动办公室”。这个“运动办”下又按各类职司分设了“一办”“二办”“三办”……。其中“二办”负责处理清查最核心的“暗藏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和“要案中的要案”，是由当时任无锡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无锡军分区政委的原xx军政治部宣传处长王晏和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张文治等直接掌握。这个“运动办”成了无锡市民头顶上悬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而“二办”又成了“剑上之剑”。据一九七四年无锡市委专案调查组对已停职审查的王晏和张文治等进行调查时，才发现，这个“运动办”尤其是“二办”的建立，竟然没有经过市委常委会的讨论通过。是王晏等人用非组织手段搞的“黑办”。可是这个“黑办”竟然长达三年半的时间，又是抓人，又是发文件，又是召开大会小会布置运

动或听取汇报。“二办”成了无锡最大的阎罗殿。其下各区、局和基层单位的“群众专政办公室（小组）”一律改称“运动办公室（或领导小组）”。“群众专政队”也改称“运动小分队”。当然其成员也从新调整充实。经过一番厉兵秣马，又搜罗整理了一整套“无锡地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后，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就在无锡市揭开大幕了。

一九七〇年春天开始的“一打三反”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当时由上而下层层传达的精神概括来说就是“虽然已粉碎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社会上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还在利用各种反动思潮，时刻企图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所以要狠批反动的社会思潮（即所谓形左实右的极左思潮），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份子，粉碎右倾复辟翻案风。”

于是在无锡市，一张比“红色台风”覆盖面更大的网张开了。首先是动员各单位根据运动的精神来个“大揭大批”。在各级“运动办”、“运动领导小组”的布置下，用大字报或检举揭发的“群众揭批”形式，把矛头重点对准他们心目中的打击对象。在这基础上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学习班”。这各种“学习班”的打击对象也是五花八门的。例如在一次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王晏就义正辞严的痛斥过“……有个做散工倒马桶外加捡垃圾的老太婆，靠着拾来的砖头居然把茅草棚翻建成了砖瓦房……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运动的主要对象当然是那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在这期间，几乎是“公判大会三六九，暴死自杀天天有”。公判大会主要是刑事罪和孤立的现行反革命罪，一律从严再从严，以至留下不少冤假错案。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有些那时造成的冤假错案还是司法部门难以善后的头痛事。笔者最近见到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休司机，当年他出车途中，路遇一个骑自行车的醉汉。醉汉摇摇晃晃撞到他汽车的后挡泥板上，他急忙下车抢救，但那个农民还是不治身亡。当时目击证人，警方现场勘察，甚致法院的判决书上对此情节认定都明确无误，死者家属对此也无疑义。但因为那位司机的父亲是工商业者，他本人在文革初期又参加了“红总主力军”一派，该单位“运动办”出于运动的需要和个人嫌隙，经过种种以组织名义的活动后，硬把此事定为“阶级报复”，把他判了刑。如此情况在无锡不在少数。迄今还留下许多难以善后的尾巴。直接

死於这个阶段的人，按官方（一九七四年无锡市委政策复查办公室统计）公布为一百四十余人。

特别令人骇然的是在医务界居然挖出了以卫生局原副局长，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著名外科专家朱庆云大夫为首的“国民党地下军”反革命组织。其中多数都是各科专家骨干，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士。朱庆云等一些名医“畏罪自杀”，其他“地下军”也备受折磨。笔者认识的一位医术精湛的外科大夫，因市里某要人及一些皇亲国戚身患贵恙，离不开他那一把手术刀，这才从生死关口逃得一条性命。像这样的“地下军”、“反共组织”之类，在无锡煞有介事地“揪出”出了一批又一批。“畏罪自杀”了不少。这些“自杀”者的死亡情节有些都留下明显的漏洞，过了三十多年成了被深埋在积尘下的悬案。当然，什么“地下军”之类都是凭空捏造的间谍故事。这个时期，笔者在街头曾见到一位当技术员的远房哥哥，他大学毕业时恰逢“反右”运动。不谙世事的他，虽然毫无可供批判的“右派言论”，而且上下左右也没有得罪任何人，还是弄了个“右派边缘”，分配工作没有着落。好在居民委员会的老阿姨发了恻隐之心，把他派到一个小厂当了“临时工技术员”。他从此变得沉默寡言，文革中一派也不参加，只管当个“抓革命促生产的“逍遥派”。他四顾无人，凑到我耳边说：“……我们厂开牛头刨床的张大块头，还是厂革会委员，生产办公室副组长……昨天半夜里死在学习班里……这场一打三反远远比反右斗争结棍！是放大又放大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还有个右派边缘，这次可是无边无际了……”

随着运动的发展，这场“无边无际”的“一打三反”越来越明显地集中到原参加“革派联总”特别是其中拥有十多万人的“红总”即“主力军”的成员头上。不久，“一打三反”就引入了“重点”，这就是在无锡文革十年中占了三分之一时间的“深挖五一六”。

（三）云遮雾罩的《中央（七〇）二十号文件》

关于当年那个《二十号文件》，据说发送级别很高，往下都是逐级用口述笔记方法层层传达。那时“中央文件”这个概念很模糊。中共中央的《中发》文件、国务院的《国发》文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下发的文件，以及中央军委颁发的文件等等，甚至连中央各部、委、办，但凡沾有“中央”字号的机构所下发的文件，一般人都称之为“中央文件”。笔者近年求教过一些当事人，包括当年在

“二办”等运动枢纽部门工作的军官，他们也记不清楚；因为他们当时谁也没有看到正式文本。现在也弄不清这是《中发》《国发》还是什么《x发》……只知道那个《二十号文件》，以及附带的关于文革开展以来江苏省的“敌情分析”，逐级用口述笔记方式传达完成后，立即按指示把这些“手抄本”统统付之一炬。三十年后，跨进了二十一世纪，这个轰轰烈烈运转了三年多的《中央（七〇）二十号文件》，对绝大多数当事人说来，还是云遮雾罩的一部天书……

到七〇年秋天，面上的“一打三反”似乎停顿了。可是社会上的紧张空气丝毫没有松弛下来。人们纷纷传说有更大的抓反革命运动就要来了。那可不是什么“潜伏特务组织”、“地下军”之类的小玩意儿，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机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阴谋份子”。听说在北京已经把那个当年挺身而出、痛斥《血统论》的遇罗克枪毙了。再后来又有传言说中央要查清一个什么“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这是由功勋卓著的杨成武将军“操纵”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人们似乎还记得前两年在什么红卫兵小报上看到过，在那些抄来抄去的《动态》栏中曾有，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取缔“联动”、“特动”、“五一六兵团”等首都的“保字号”红卫兵的简短消息。据说那是由一些北京的高干子女搞的秘密组织。怎么现在又要大查特查这个“五一六”了？

就在七〇年秋冬之际，“狠批形左实右”，“狠批极左思潮，深挖现行反革命”的舆论又热起来了。在干部群众中互相传递着一个“半官方”消息，

听说有一个中央《二十号文件》已经到省里了，马上就要大规模抓五一六反革命份子了！”

听说参加五一六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干部、有工人、有学生、有解放军……秘密得很，人数多得吓死人……”

听说这个五一六非常秘密。参加的人都规定了纪律，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都是单线联系……”

听说我们无锡的五一六就多得上杀人！各单位都有一批五一六……听说参加五一六的人要填一张表格……”

听说还有不填表格的五一六。还有被别人发展进去了，自己还不知道的什么五一六呐……”

笔者当时和多数市民一样疑惑不解，既然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单线联系的秘密组织。”怎么各单位都有“一批”？不是“一小撮”而是“一批”啊！而且竟然还有自己都不知道就被发展进去的反革命组织……笔者回想起数月前在街头碰见那位“老运动员”族兄的话，

这回可是无边无际了！……”

萧杀的寒风，惶惶不安的社会心态，这一年的冬天分外寒冷。只听到说，某某人进去了，还有某某人和某某人……”

浦相海前天也进去了！”。

浦相海是无锡轻工业学院学生，轻院“六二六兵团”主要负责人、无锡市革命委会副主任。三个月前，在无锡市的一次公判大会上，他还代表市委和市革会作了一个照本宣科式的关于“一打三反”运动宽严政策的报告。而在无锡全面清剿所谓“五一六份子”的信号弹，恰恰就是从浦相海等人“落网”打响的。刹那间无锡全市铺天盖地刷上又一波新的标语：

宁可瘦掉一身肉，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宁可少活十年，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更有甚者是杀气十足的标语这样写着“挖地三尺一个不漏！”。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政策攻心”，从车间、办公室、走道、食堂甚至厕所里都张贴了标语。走进食堂买饭，在写着“红烧肉一角五分、萝卜肉丸汤一角二分、青菜五分……”等价码的菜单的上方是一条温情脉脉的标语，

早点交代问题，吃饭也香，睡觉也安心啊！”。

当你走到厕所小便的时候，一抬头，只见小便池上方赫然一行大字在逼问你，喂！你的问题交代了没有？”。

无论是谁从早到晚都生活在“政策攻心”的海洋中，除了少数“依靠对象”外，人人都变得谨言慎语、忐忑不安。

在这一片“深挖”声中，各单位都宣布正式成立“清查（深挖）办公室”或“深挖领导小组”。这些机构下面还有专案小分队。小分队队员都是从“依靠对象”中精选出来的“斗争意识最强、立场最坚定、政治上最可靠”的人。许多臭名昭著的打手都成了小分队里的骨干队员。因为他们平日里仗势欺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人往死里打，是“斗争意识最强”的典范。另外，许多在文革初期“横

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专门搞材料、整理材料的人，也是各小分队的理想骨干成员，因为他们“立场坚定、经验丰富”。这文武两类人，是“挖地三尺一个不漏”、“政治上最可靠”的行动班底。

运动要全面铺开，总得先亮出“上方宝剑”。各级都正式传达起“中央二十号文件的精神”。中央文件不正式传达只讲“文件精神”，这是自文革以来没有的怪事！这就令人感到十分惶惑不安。而且传达时会场纪律之严肃更令人心惊。

这个层层“记录传达”的“中央文件精神”，令人惊讶万分的是，不知怎么搞的，连以往的“毛主席批示 照办”或“毛主席批示 已圈阅”等中央文件必不可少的前置词都没有。而且也没有“中发”“国发”“中军发”或发文单位的简称。还有惯常的“发至某某级 传达至某某级”等发文级别也含糊不清。不过“文件精神”确实证实了前些日子的“小道消息”。就笔者和一些过来人的记忆，这个《中央二十号文件》的“精神”大体如下，

五一六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行将崩溃时，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着刻骨仇恨的新生反革命份子组成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五一六集团的后台是杨成武（原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副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的，由社会科学院的某某人等指挥的……”

五一六的反革命能量很大，他们的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用种种极左或形左实右的口号煽动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矛头对准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煽动武斗，反军乱军阴谋篡夺政权，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五一六不但学校有，机关，企业、部队和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有。非但在北京有，全国各地都有……”

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有三性，即反动性、隐秘性、顽固性。此外还有欺骗性、群众性……”

五一六有极大的欺骗性，所以参加的人很多……为了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彻底肃清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同时省里还下达了不知什么人对于江苏省的所谓敌情分析，“……江苏是国民党的老巢，残渣余孽很多，他们趁着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打着造反的旗号，勾结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他们重新扶上台来复辟资本主义。江苏省是全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的重点……”

同时无锡市各家大小单位的“当家人”在大小单位的动员会上，都信誓旦旦地宣称道：

我们江苏是全国的重点，我们无锡是江苏的重点，我们 xx 局（或 xx 区）又是本市的重点。而我们单位则又是 xx 局（或 xx 区）的重点。是重点中的重点！大鱼小虾多得很呐。就等我们一网一网打出来……”

有人说我们单位没有五一六。你们看吧，到了运动后如果我们单位抓不出五一六，我就在地上爬几个来回给你看！”以示其不成功便成仁的“铁血精神”。

与此同时，为了“联系无锡实际，引导运动深入开展”，有关当局抛出了一个《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在笔者的记忆中，这个“十大案件”大概如下，

（1）二一六、二一七反革命大游行

笔者按：一九六七年春，在无锡主要驻军单位开始介入地方时，以“反动组织”的罪名连续取缔了“毛泽东思想红艺兵”、“无线电厂 1022 兵团”等等工人和文艺界群众组织。还有更多的基层组织被勒令停止活动听候处理。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轻工业学院“六二六兵团”、二中“七五兵团”等等学生组织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举行了一场请愿大游行。次日，有十万人之众的工人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及一些其他的工人组织，举行了一场更大规模但又更温和的请愿大游行，参加人数约五万余人。其中最“刺激”的口号，无非是摘自报刊文件上毛泽东主席关于军队“支左”的指示，如“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左派”等等。二月底，这二次和平请愿游行被定性为“反革命大游行”。“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红总”）也作为反动组织被取缔。主要负人金坤泉（共产党员）、殷松勤（共产党员）、周炳荣等以“反革命份子”罪被逮捕。（到同年五月“红总”平反，三人被释放）。

（2）《红无锡报》社绝食静坐事件

笔者按：同年五月，“六二六兵团”、“七五兵团”等学生组织，为抗议《红无锡报》的诋毁之词，举行静坐绝食抗议。也有工人和干部参加。约有三千人。（一说五千余人，又一说最多时达七千人）。

（3）冲击十三个系统，矛头对准军管会

笔者按：以“二月革命总部”（由原四清工作队成员和文革工作队成员组成）和部份单位中层干部为主体的一部份人，在“红总”被取缔后，在军管会的支持下，匆匆组建了“十三个系统归口大联合”，把以原“红总”为代表的广大群众排斥在外。有些单位还迫不及待地打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企图造成夺权的事实。“红总”平反后，就和“六二六”、“七五”、“八一八”等学生组织，还有“机关兵团”、“红艺兵”等其他群众组织，对此提出抗议，并喊出了口号“冲垮十三个系统大杂烩！”。

（4）“假批判真保皇”制造事端挑起全市大武斗

笔者按：一九六七年五月，“红总”等组织获得正式平反，声势大振。“红总”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红代会）、“机关兵团”、“红教兵”、“红艺兵”、“卫生兵团”、以及由公安局系统的群众组织“红色公安战士”等，联合组建了“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革派联总）。在此同时，原来的“十三个系统大联合”，为了摆脱政治上的被动，改组更名为“无锡市九二革命串联会”。“九二”在无锡军管会当局的支持下，单方面垄断了对以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十二位常委的批斗审查权。“革派联总”向军管会”当局多次交涉，当局才同意，将十二名常委从“九二”手中“借来”交“革派联总”方面斗批审查一星期。可是不到两天，“九二串联会”的“红联会”（学生组织）即扬言革派联总是“假批判真保皇”，并冲击批判会场，企图夺回十二名常委，在全市引发了一系列摩擦殴斗。军管会当局未采取有效行动平息骚乱。骚乱越演越烈。“九二”方面遂抢先备战，选择全市要害地区的工厂、校舍大楼为据点，在无锡机床厂等单位内暗中制造大批长矛等冷兵器。六月初，“九二”忽然集中各单位骨干成员到据点内，以复员军人为主体组成战斗队列编制，并发给事先早已大量制造好的长矛等冷兵器。在“九二”大集中的过程中，顺势横扫了数十家工厂企业，抢走“主力军”的旗帜、印章，打伤了许多正在上班的“主力军”工人，甚至“九二”方面还在上班的工人也多有被“误伤”。

“革派联总”方面仓促应对，也集中人员，以随手取得的铁管、木棍，和从红星刀剪厂仓库中抢得的数百把出口甘蔗刀和咖啡刀（俗称“古巴刀”）武装起来。

于是爆发了全市大规模武斗。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也被说成了是在“五一六”策划下的，由“革派联总”挑起的以保“旧市委走资派”、反解放军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五）火烧装甲汽车案

笔者按：六月中、下旬，两派武斗更激烈。“九二”方面派出用钢板焊接外壳的土制“装甲汽车”，向“革派联总”人员集中的市一中至轻工业学院地区冲击，一路上向人群作S形挤压冲撞，并用弹皮弓、砖块石子向人群射击，击伤多人。土装甲车横冲直闯至轻工业学院门前弯曲路段，驾驶失控后撞上一棵树，倒翻在地，土装甲车起火，司机逃出，车内三人烧死。

（六）七月三日大撤退

笔者按：无锡武斗开始后，由于“革派联总”方面事前毫无准备、仓促应战，且军管会当局又明显倾向“九二”一方；为避免造成更大的被动，避免更大的流血，“革派联总”於七月三日主动撤出无锡，分两路向南京、上海退去。同时，“革派联总”派人向江苏省军管会和中央告急，欲请中央和省里来和平解决无锡问题。这次为避免更大流血而主动撤出的行动，当时被定性为“在五一六阴谋操纵下，故意撤出以嫁祸解放军，趁机反军乱军陷害解放军。”

（七）洛社武斗

笔者按：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二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的两派纷纷抢枪进行“文攻武卫”。“革派联总”方面有三百余名武装人员进驻当时属无锡县境内的洛社镇。“九二”方面集中几个武器精良的“基干团”，以十多倍的优势兵力，按正规的作战方案，分几路急行军二十多公里对洛社发动突然袭击。这次大武斗死伤多人，沪宁铁路曾被迫中断。最后，“革派联总”退出洛社。有关当局把这次事件定性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为了乱军篡权的全国阴谋部署中的重点，血洗无锡进而夺取全苏南，以洛社为攻击出发点。九二被迫还击自卫。”。

（八）夏季阴谋

笔者按：此事是在“深挖五一六”中期追加的一个荒诞的神话。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无锡当局用种种惨无人道的逼供诱供手段制造出来的故事。

大意如下，……一九六七年夏某日，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和军长左平忽然秘密召见“革派联总”当时正在上海的一位分部负责人，并出示林彪亲笔手令，命其组织可靠人员，在毛泽东主席专用列车途经硕放车站附近时，用爆炸射击等手段谋害毛泽东主席。空四军以无后座力炮，飞机等支援行动……。由于这个神话是“发生”在一九六七年，是时林彪集团“大、小联合舰队”远没有形成。虽然王晏等人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案卷上报邀功请赏，但因实在太荒唐，被当时的上级专案组退了回来。此“大案”搞了上千人，有人被迫“畏罪自杀”。

（九）五月暴动

笔者按：前文已讲过，一九六八年五月，为抵制无锡当局搞的“十二级红色台风”，原“革派联总”方面部份成员曾在郊区小船上商议对策。此事被定为“企图暴动颠覆革命委员会”，是“五一六企图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和对敌斗争的全国性反革命阴谋的重要步骤。”

（十）流亡政府

笔者按：六八年初刮“十二级红色台风”时，无锡有上千名干部群众出逃躲避。其中有一部份人集聚在徐州和鲁南等地，一面避难，一面搜集整理无锡当局在“十二级台风”中的劣迹，上报中央。此事被定为“五一六集团组织流亡政府，破坏革命新秩序，企图让旧市委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从新上台复辟资本主义。”

靠着用这些罗织出来的“十大要案”，以及其他“要案”，如：“破坏革命的三结合，企图把走资派塞进革命委员会”。该“要案”即指六七年底至六八年初，“革派联总”方面曾经提出，按中央指示“大胆解放一把手”精神，让原市委书记韦永义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这也成了“企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新扶上马以复辟资本主义”的“五一六罪恶阴谋”。凡此种种“五一六罪行”多得不胜枚举。其中多有像“夏季阴谋”那样天方夜谈式的离奇神话。

总之，当时主持无锡市以及下属各级单位“深挖互五一六”的人们，凭他们的如科幻作家或侦探间谍小说作家的想象力，杯弓蛇影的“对敌斗争敏锐性”，以及各式各样的逼供、诱供刑讯手段，炮制出了各色各样五花八门的“五一六案件”。特别是当时省里还有话传下来，说，“（深挖五一六）网口要大，网眼要密，下网要沉，一网打尽，雷厉风行！”这又进一步促使这些人在“深挖五一六”过

程中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样的形势下，“深挖五一六”一开始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面积下网了。一种由“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被推向了极端化的情绪，一种追求权力的无限满足感的心态，派性，和“案件越大越好，五一六抓得越多越好”的变态性成就感和趁机泄私忿心理，加上“火线入党，火线提干”的种种诱惑混合在一起，形成无锡市“深挖五一六”的“巨大精神动力”。无锡市当局向各级专案机构和数万脱产、半脱产以及“业余”的小分队员公开喊出了血腥味十足的动员令，

挖地三尺，一个不漏！”

宁可少活十年，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宁可瘦掉一身肉，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深挖、深挖、再深挖，彻底扫清五一六！”

解放思想，深挖细找，认真排查，决不让一个五一六份子逃过去！”

对五一六的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与此同时，还用各种“专案工作会议”、“专案工作经验交流会”等等名目来传授刑讯逼供的“好经验”。当有人提出“审查对象实在顽固，我们应该掌握什么原则？”

市革会一位主要领导人是这样回答说，以不打死为原则！”

而主持大局的权要人物的说法就更“通俗易懂”且更具“理论性”了。他说，必要时触及皮肉，是为了更好地触及灵魂嘛。”

当然在大棒的外面还是要包上一薄层温情脉脉的胡萝卜皮。他们在用刑之前总是对被审查者念上一段“大悲经”，诸如，

你在泥坑里陷得太深不能自拔了！我们怀着火热的阶级感情来帮助你一下。”

我们来替你加加温，让你能战胜错误的思想。”

加温”、“帮助”成了专案小分队搞刑讯逼供的专用术语。

至于“学习班”的“校址”放在什么地方，那更是不拘一格了。诸如，旧仓库、废弃的厂房、报废的炼焦窑都能作为审查“五一六”分子的“校址”，满是积水的防空洞成了不折不扣的水牢，甚至停止使用的旧厕所都用来关押“重犯”（指隔离审查者）。有时“全日制”班（所谓半隔离者，比隔离审查

稍自由些，可在小范围内走动走动），也享受这种待遇。至于那些“班组帮助”、“车间帮助”以及“集体帮助”，则就在大食堂、办公室、车间里“加温”。总之一句话，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空间，因为要挖的人实在太多了！

用来关押隔离审查的囚室可谓周到严密，门上终日一把大锁，只有提审（术语叫“启发帮助”或“加温促进”）时、或一日三餐时才开启一次。窗上加了铁栅栏再钉上木板，再在板上裱糊上几层纸。这可能是防止蚊蝇蚂蚁之类钻进来通风报信搞“黑串联”吧。

在这样昏沉沉又空气不流通的房间里，一个人守着个没有盖子的粪桶，甚至于三九严冬、寒冷刺骨的日子，也就是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铺薄薄一层稻草就算卧榻。笔者就是一个人在这样的隔离室里度过了两年的“学习”生活。其他的审查对象，“学习”时间短的几个月或年把，时间长的达三年多。“学习”期的长短是根据“态度好坏”或“罪行大小”来“机动灵活”处置的。据有被“升级”到公安局拘留所的人，平反放回后对笔者说：“比起学习班来，拘留所的日子要好过多了！”

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学习班”里长达数月，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以上，这还算不得什么。那花样百出的“加温”、“帮助”，才真正显示出“深挖”运动的取供方法的残忍性和随意性的本质。为此，有关当局还用工业生产统计的形式来及时掌握“深挖”进度和“产量”。笔者在运动进行了三年之后解脱隔离时。曾在一堆没有烧尽的字纸堆里看到一张八开大的统计表，至今还有印象。现凭记忆复制如下，

清查五一六运动进度日报表 年 月 日

突破案件数：

突破组织人数：

业余学习班审查人数：

半脱产学习班审查人数：

脱产学习班审查人数：

住单位学习班审查人数：

隔离审查人数：

发现重要线索及重点排查人数：

解脱人数：

拟报批升级审查人数：

其他情况：

这就是当时有关当局给各级“深挖”执行者们发下来，要求逐日逐级上报“五一六”产量的一张“生产日报表”。不知当年在奥斯维辛或是在达豪的集中营是不是也用过类似的“工业文明”成果。统计学居然被用到“挖地三尺”上来了，可见其“一个不漏”决心之大和雷厉风行之气魄了！据事后原“深挖”专案工作人员说，在运动最高潮时还有特定大要案的《日报表》、《周报表》。其内容主要都是按图索骥，在各单位照所谓“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这个框子去统计“触动”、“学习班帮助”、“审查”等人数，以及“阶级斗争新动向”等等。在他们心目中，一个空前规模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秘密团体似乎是可以大工业方式成批生产出来的。

另外在专案组和专案小分队内部，居然也用起他们一再批判的所谓“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的那个“五一六反动纪律”，来约束控制他们自己人。如发现有人泄露内部情况，哪怕是泄露如何对被审查者施刑，或者泄露被审查者在虐待下受伤、患病等情况，也要受到轻则呵斥、重则立案审查的处理。当然这种“不锈钢加锰钢的纪律”（某工业局“深挖办”主任语），并不能完全泯灭良知；有些有道德、有勇气、而又有独立人格的小分队员和专案办人员，在他们不得不参与深挖“五一六”时，仍然会尽可能地从肉体上保护这些被审查对象。这些有良知的人们，以后笔者会讲到的。

这场声势浩大而且必须斩获“五一六”众多的“深挖”运动，既然是打着彻底肃清一个有名有姓的组织的旗号来开展的，总得要抓出有模有样的、有组织的“五一六”来才行。而且这些大大小小的“五一六”们，还必须要有在公开活动之外的隐蔽罪行，才象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模样。要凭空在各单位都弄出这些“组织”、“阴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运动刚开始，的确“阻力”很大，谁肯平白无辜承认自己是什么“五一六反革命”呢？虽然各种“政策教育”唾沫飞溅，小分队员个个吼得口干舌燥，也收效甚微。有些单位主持“深挖”的领导干部，因“对敌斗争右倾，单位运动进展滞后”而遭训斥甚至被“夺去顶戴花翎”。轻工业局革委会主任、军代表李明（还是当时市革会主任王晏同一部队的战友），

就因为“对敌斗争右倾，单位运动进展滞后”而被撤职。对此，无锡有关当局也大伤脑筋。于是又召开各级专案工作会议，布置新的战术，即“重点突破，撕开裂口，扩大战果”，“加大力度，突破重点与面上展开相结合，查组织与查阴谋相结合，查动向与追线索相结合，政策教育与无情打击双管齐下……”。这些满口政治军事术语其实很容易解读，那就是一句话“狠很来点硬的！”。当时有人问“加大力度要掌握什么原则？”。一位市委副书记干脆脆地回答说“以不打死为原则！”（据说这位市委副书记因和一把手王晏之间有什么矛盾，也被暗中上了“五一六”的大名单。如若“深挖”再延长个一年半载，说不定他本人也会领教这个“以不打死为原则”是个啥滋味了。）。这次各级专案工作会议迅速得到认真贯彻。在一九七一年的夏天，“深挖”运动最残忍的一幕上演了。运动中不幸死难者大多数就是在此时含恨身亡的。这时候的“加温帮助”方法也更见水平了。就事后笔者和沈静园教授等死难者家属了解到的就有二十五种花样的“加温帮助”方法。现凭记忆简述如下，

（1）触及灵魂法 A

数人或十数人将审查对象围在当中，命其不停旋转身体，由小分队员轮流凑近其耳旁高声吼叫，并辅以铁丝鞭或竹稍拨打“纠正姿势”。

（2）触及灵魂法 B

此法是上法的“改进型”，因上法全用人工“土法上马”，往往令小分队员们个个口干舌燥喉管充血声音嘶哑。故加以改进“土洋结合”，用一个或数个高音喇叭悬於被审查者头上方近处，不停地播放“样板戏”或革命歌曲中高亢的唱段。以上两法虽基本上没有触及皮肉筋骨，但其“轰炸灵魂”之杀伤力颇大，有人为之休克甚至神经失常，也有人听力严重受损，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者很多。

（3）烟熏法 此法多用在盛暑时节，将被审查者手足捆绑置于门窗紧闭之室内，用湿柴草、蚊烟条加干辣椒甚至六六六药粉点燃薰烤之。

（4）“电疗”法 此法比较罕见，即将被审查者捆在椅上，用调压器联通电源和人体，忽高忽低变化电压。此法对人伤害极大。

（5）老虎凳

此法为传统古典式刑法。虽无专用刑具，但各种长椅凳或钳工台均可供“就地取材”。此法对人伤害极大，尤其是双足。有人被伤害终生不愈。

(6) 马拉松立正

这是最普遍的“加温帮助”方法，笔者就领教过几次。即让受刑者面壁直立，但不准用手触及墙壁。少则半天多则可达数十甚至上百个小时。姿势稍有不“规范”，即遭拳脚“纠正态度”。如因长时站立疲劳昏沉，即被揪住头发往墙上撞击，“让你清醒清醒头脑！”。笔者本人就因马拉松立正而小腿肿胀和大腿一般粗细，而脚面肿胀得溢出布鞋园口近寸。在马拉松立正期间不许稍事休息。

(7) 三点一直线

此法大约是马拉松立正的改进型。即让被审查者背墙立正，后脑、臀部、脚后跟必须紧贴墙壁，在膝关节后弯塞进木块或砖块。如姿式稍有松懈砖块或木块掉下来，即遭痛毆并重新再来。

(8) 跑步段练

此法多施于女性，令其脚穿半高跟硬底皮鞋，在浇了水的广漆地板或磨光水泥地坪上原地跑步。地滑鞋底又硬，时时摔倒，倒地即令爬起再跑。一般都被“段练”得鼻青脸肿。脑震荡、骨折者多有之。

(9) 挂黑线

令受审查者高举手臂系于电灯开关拉线上。时间一长手臂疲劳不支，稍一松懈引动拉线电灯熄灭，即被狂斥为“你到现在还挂在黑线上顽固不化！”。一顿痛打后再重新来过。此法显系轻工系统某厂所独创，故不多见。

(10) 清醒认识

三九严寒滴水成冰、冷风刺骨时，令被审查者身穿单衣站立于室外，少则数小时多则连日夤夜。谓“帮你清醒一下认识！”。无锡汽车厂厂长，已下放苏北农村的市革会委员杨菊森（共产党员），被“深挖”回无锡。该厂专案小分队就用此法对他“加温帮助”。

(11) 站得高看得远

叠起两三张方凳令受审查者长时间站立于上。稍一失去平衡，即连人带凳摔在地上，免不了受伤。谓之“让你站得高看得远，认清自己的前途。”。

(12) 抓梦话

此为精神战法之一。即在夜睡正酣时，突然把受审查者拉起来，谓“你刚才说梦话已讲出某某事，干脆认真交待这个问题吧。”此法实在拙劣，笔者也曾领教过，虽然曾一时普遍采用。但因效果实在太差，很快就被废止不用了。

(13) 伪造申供法

此法实为诱供法之一，笔者也曾领教过。在七二年春节后某夜，笔者正被囚于隔离室中，突然隔离室的窗户被猛击出一碗口大洞，扔进一纸团，我展开一看，是另一“同案犯”“统一口径”的内容。字迹七歪八扭，显系伪造。此法虽有一些单位用过，但此法非独无效且都令专案小分队自己下不了台。后也废止不用。

(14) 踩杠子

此法亦为“国粹”古典刑法。即将人双手用一长木棍捆成十字状，令其跪下，在小腿后侧近膝弯处横放一粗长方木。先两旁各站一人，同时用手下压受刑者双手上的木棍。如若没达到要求则两边再各加一人如法实施。受刑者疼痛无法用语言描述。几经昏厥，冷水浇头醒来后重复施刑。有一女青年因之“畏罪自杀”。

(15) 阿莫尼亚醒脑法 将受刑者揪住头发脸部凑近尿桶，将火红之炭火淬於尿液上强令受刑者嗅闻。如郊区农民邵 xx 被恶臭薰得狂吐不止至喷血。

(16) 鞭鞑法

此为最常规之“加温帮助”法。唯其“教具”五花八门。有钢丝鞭，此物一抽一道血痕。后改进为橡皮包裹之钢丝，此物虽令受刑者表皮不太难看但内伤更甚。另有用机械传送带、金属链条或皮带等“就便器材”者，亦有用湿水之棕绳电线者。

(17) 拷打法

此法亦为普遍采用者。笔者就不止一次被施此法。所用刑具多种多样，诸如木棍、竹杠、椅腿、钢管、铁元等等。亦有在钢管铁元外包一层橡胶或数层布料，以免受刑者表皮伤痕太触目，显得“太不讲政策了。”其实躯体所受内伤更甚。

(18) 滚水泼面 此法不多见，受刑者满面燎泡混身烫伤发炎经久，甚至终生留下疤痕。

(19) 清醒头脑 此法十分普遍。即揪住受刑者头发连续撞击墙壁桌面，少则十数次多则上百次。谓之“帮助你清醒一下头脑。”。

(20) 巴掌雨

此法更为普及且简便易行。据悉亦用来“考验”小分队员是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笔者多次领教此法。有一次受“教育”后，头肿如斗，脸部淤血肿胀，全呈清紫色伴以多处发炎麻木无丝毫感觉，久久不得痊愈。

(21) 饥饿疗法

此法几乎每个受审查者长期领教。每日仅给一两粥二两饭，副食几乎断绝。更有连续两三天断绝饮食者。小分队员谓之“饥饿疗法，用来治你的思想毛病”。

(22) 电化教育

七十年代无锡只有少量钢丝录音机，当局悉数征用。将已被“突破”者的所谓“坦白交待”录下，然后在各“学习班”内播放，并辅以各种“加温”手段，强迫被审查者按录音内容写供状或揭发别人。此法在“夏季阴谋案”等案中用得最充分。

(23) 车轮鏖战（简称“车轮大战”）

此法最“文明”。即由被审查者坐在小木凳上，由两三人一组之小分队员轮流在耳边大声“教育”。每隔几小时换一组小分队员，昼夜持续不得稍缓。每当被审查者昏沉欲睡时，或是捶桌子、或是揪头发、或是踢翻其坐的木凳使之重重跌倒在地。此法用得极其广泛，笔者曾多次经历，长者达百多小时。原“拱北楼”餐馆职工、“星火战斗队”负责人、“红总”发起人曹桂宝先生（笔名卜岩），有一次曾被此法连续“鏖战”十三昼夜！此法对人的伤害绝不比那些血淋淋的肉刑稍轻分毫。

由于当时所记录资料散失，且又时过三十年，原记录之二十五种“突破”用刑法中有几种已无法回忆起来了。其实，当时小分队用来“突破”之法又何止二十五种啊！

另外还有一种更恶毒的“突破”法，那就是把一些全市重点审查对象中已被“突破”者的讲话，用钢丝录音机录下，而后到各学习班播放，迫令被审查对象按录音机播放的内容和口径来交待。这样一来，互相佐证咬得死死的，假案就成了铁案……

无锡市有关当局，一方面抓紧再抓紧各级专案班子的“内部纪律”，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把各式各样“突破”、“加温帮助”的残酷方法透出风来，甚至顾不得“严格掌握政策”这块遮羞布了。有的单位甚至在大会上公然吓唬群众说，

“讲政策要看是对什么人？对那些死不承认，死不交待的顽固份子，首先是要讲斗争，讲打击。你要抗拒，我就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不怕撬不开你的嘴……”。以此造成笼罩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即他们自己津津乐道的所谓“高压态势”。个别单位为了达到这个“高压态势”，疯狂到公然行凶的地步，某厂年仅二十四岁的工人孙金生，就是在光天化日下被活活打死的。

多年后一位专案小分队队员很沉痛地告诉笔者说，

……（七一年）五月底六月初，因为面上突破进度缓慢，市里抓得紧，上面传下精神说，讲政策是为了斗争的需要，不能为了讲政策而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对敌斗争是第一位的，决不能心慈手软……要雷厉风行打开新局面……小分队人人都要批右倾思想，个个都要表决心。所以学习班内外都打得更凶了……”

这个以“高压态势”来“打开新局面”果然让有关当局喜出望外。“五一六份子”以几何级数暴增。学校、科研院所和某些机关单位中的“五一六”往往是高达全员人数中的百分之八、九十，东门外的一所“职工子弟小学”，从校长以下全体教职员工，甚至连门卫和烧开水的老校工百分之一百都成了“五一六”。

这个“面上突破”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在文艺单位尤显突出。如无锡市歌舞团的舞蹈演员项国良正在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担任男一号角色洪常青，当他在台上完成了这个英雄形像来到后台，还没来得及卸装，甚至观众席上掌声还没断，就被专案小分队用种种精神折磨的手段进行“加温帮助”。人们说他是“台上是革命英雄，台下是反革命”的“阴阳人”。

工厂企业的“五一六”百分比虽然较之上述“上层建筑”稍低，但总人数却位居第一。农村的“五一六”也十分可观。因“教室”奇缺，有些集体牛栏猪舍也被充作“学习班”用。

另外，部队也决非世外桃源。驻无锡的各个兵种、各个单位也都揪出一批“五一六”。其中尤以军事科研单位（如总字三〇八部队，海军一〇一舰艇实验基地）等为甚。关于部队的“深挖”详情，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加上消息严密封锁，地方上很少有人知道。只是在专案组或小分队在得意忘形之际和恫吓人之时透出一阵风来。总之在无锡地界上，有关当局是决心要“不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来一个兜底翻。许多“运动骨干”也趁机发泄派性，打击报复。江苏省荣军休养院

内的从抗日战争到朝鲜战场中负伤的残废军人，有的战功屡屡，有的还有相当高的级别，也无法幸免。

运动刚开始的近一年光景，在“抓言论”上，是本着“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彪）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条为标准的。有的人就因为谈论间不小心议及林彪的秃头，就被作为“五一六”揪了出来。在学习班内，也把“疯狂反对林副统帅的言论和行动”列为重点进行刑讯逼供。因此，当“九一三”事件突然爆发时，无锡当局一时手足无措。他们一面对被“隔离审查”的人严密封锁消息，一面匆忙“调整”案由方向，把一切作为“五一六”的所谓“案情”都从“刘、邓、陶”改挂到林名下。而后再按这个新的方向“深挖”，以至弄出了“夏季阴谋”那样荒唐的大案。“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专案组和小分队内部的思想混乱。为了要继续深挖“五一六”，有关当局首先是要稳住这些人。他们用诸如“同志们不要感到奇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手法既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也有故意假装反林彪来迷惑人心的。我们不要受表面现象干扰。前阶段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应该结合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来进一步推动深挖五一六运动……”。为此他们还编造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理由，来解释这场“深挖运动”中在林彪问题上的前后矛盾。例如“这正是运动的策略之处，先把下面的大大小小爬虫爪牙和社会基础挖干净，再动到林彪，所以先要迷惑林彪一下。”可是人们私底下不免要议论，“林彪远在北京，要你在无锡花了吃奶的力气去迷惑吗？”“口口声声说是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指示执行的，究竟是毛主席还是什么人部署要这样做的？有什么文件指示说明这是中央精神吗？”莫说是许许多多市民了，就是一些当初对运动意义深信不疑的专案工作人员和小分队员也开始动摇了。据一位某局“深挖”办公室材料组负责人后来对我说，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们参加办案的工作人员思想上引起了很大动荡。运动没法开展下去了。有人向上头要毛主席关于运动的相关指示。有人问我们无锡这种搞法是不是符合中央精神？还有人问运动要不要搞下去，怎么搞……后来上头拚命强调内部纪律，硬是把深挖五一六运动结合揭发林彪集团这个调子给定下来。为此，有一些对这些做法提出质疑的专案工作人员还倒了霉……”

的确，王晏等权要不知为什么原因就是拿不出理直气壮的“合法依据”。虽然靠着手握的生杀大权及所谓“纪律”，用“结合揭发林彪罪行”这一移花接木的把戏渡过了这场不大不小的危机，得以让庞大的“深挖”机器继续运转。但其底气大为虚弱，而且为他们日后埋下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在法纪废弃的年头里，往往只要能抓住毛泽东主席的一句或是中央某个人一句话或是一个批示，就能用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可是王晏等权要为什么连这点都那么难办呢？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或是难以启齿的隐情？笔者和绝大多数过来人（包括一般专案工作人员和小分队员），迄今没能见底。在当时“深挖”稍微迟滞了那么个把两个月，又按王晏等人重新定的调子，继续“向纵深发展”。虽然底气不足，而且手忙脚乱，又要重新“挂后台，挂背景”，弄得更加不三不四。这些权要们硬着头皮还要往下搞。因为运动一旦停顿下来，他们自己的麻烦就来了。

到了一九七二年春末，“深挖”已面临新的问题。一是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挖掘一上来是“目标清楚方向明确”，也就是用所谓的“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为主线，带动“其他各式各样大小案件”，并在挖“案件”的同时大挖“组织”。可是随你怎么“突破”，用尽了刑讯逼供之能事，搞了长时间的所谓“政策攻心”，而且公开宣布了什么“只要有二个以上的旁证，哪怕你死不承认照样定你的案！”之类的“定案法则”，就这样用暴力加恐怖搞了两年，却定不了一个案。其中尤以面最广量最大的“五一六组织问题”，更是令当局倍感头痛。因为原来当局不知依据什么规定宣布过，凡参加“五一六”组织的人，“有填写表格者，有口头发展者，有被别人发展进去自己还不知道者。”。可是就凭这么无边无际的定案条件，还是定不了一个“案”！多年后一位参加过市“专案办”工作的军官告诉我，

“……那时候上头要求抓紧定案，为这事王政委（王晏）急得很！搞了两年还定不了一个案那还怎么交待？说是有两个以上旁证就能定案，可是弄上来的材料五花八门。光说五一六的表格弄来几万份交代材料，没有两张一模一样。有的说是油印的，有的说是铅印的，还有红黑双色套印的呢！有的是大八开张，比入党志愿书还详细，有十六开，有三十二开，最小的只有一张发票那么大。表格的名称更是各不一样。有的叫《中国五一六兵团登记表》，有的叫《革命五一六

战士登记表》，还有叫《某某厂五一六战斗队 登记表》，还有更干脆的叫《五一六秘密地下战士登记表》，反正什么花样都有……再怎么深挖细找也弄不到一张标准的五一六表格，更不用说是表格的原件了……”

深挖“五一六”运动一开始，有关当局就毫不遮掩的采用依靠一派（九二）打一派（革派联总）方针。可是现在别说是“挖地三尺”，就是挖地三丈也弄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了。为了摆脱长期定不了一个案的被动局面，也是为了堵住社会舆论，显示自己“没有派性”、“公正无私”，王晏等权要又开始寻找新的“矿脉”以持续其“深挖”事业。因为一旦停止这个“深挖”大工程，他们自己就筭筭可危了！于是他们又放出风来，什么“五一六不仅是在一派里，另一派里也有的”，“红色政权（市革会）领导班子里还有埋得更深的定时炸弹！”云云。首先是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马健（是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市革会成立时第一个被“解放结合”的原市委领导干部）奉命带领一个工作队到远离市区的川埠煤矿去“抓革命促生产”。白天是马副书记领导工作队从事各项工作，天一黑工作队员一个个都成了小分队员，而马副书记就成了被“加温帮助”的审查对象；次日天一亮，惊恐疲惫不堪的马副书记又要一本正经地领导那些从小分队员变回来的工作队员，从事各项日常工作。周而复始，当上了个“阴阳人”。

王晏等人为了继续“深挖”的需要，也因为一些权力分配上难以抹平的矛盾，开始对和他们数年来“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也下起手来了。首先是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密捕了一个原在“九二”总部的女工作人员。紧接着又以各种借口抓捕了原“九二”方面的几名成员，并开始暗中搜集整理一些“九二”主要成员及其“高参”们的材料。如市革会副主任周锡林（机床厂工人“九二”总部负责人）。邹海根（市革会副主任，无线电技校教师）等等。

其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王晏在部队里的老战友、转业干部、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将近两年以来也曾参与全市“挖地三尺”领导工作的董万华先生，也因他是“九二高参团”成员之嫌被列入了待查的黑名单。

这场“窝里斗”的闹剧，也波及到一些中层和基层。或是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或是为了“出新成绩”、或是为了免于被动挨打来个“先下手为强”，那些原先一同起劲“深挖”的人们，也互相间下起了手。笔者就遇到过这种怪事。笔者被隔离审查一年有余之后，有一天，领着小分队全程对我“加温”的厂革会副主任

有事外出。难得见到的厂革会一把手忽然来到囚禁我的小屋，先讲了一番“运动要向更纵深发展”的大道理，然后就露骨地要我提供那位副主任的材料。一把手走后没多久，那位副主任回来，得知此事，一面告诉我“千万不要胡说啊！”，一面大事发泄对一把手的不满。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说什么不利于他的话，当天晚饭居然吃到了一小碗久违了的红烧肉……，如是情况，事后知道不少单位都发生过。

由于全国和江苏省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王晏等权要人物这个“纵深更纵深”的“深挖”还没展开来就陷于停顿。否则无锡市六十五万人，不论男女老少军民文武，百分之九十九都要“一个不漏”地“深挖”殆尽了。！

少数权要人物拼命“深挖再深挖”的后果，一方面是残害了广大市民，引起了无法遏制的公愤，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级“专案办”“小分队”不少人的质疑。特别是王晏等人的手开始触及本是作为“深挖运动”基本力量的原“九二”一派人员时，那些把持上上下下“党、政、财、文”大权的人，或是恍悟到这场“挖地三尺”大闹剧的荒谬，或是深深的危机感所致，也对王晏等人切齿痛恨起来。这实际上动摇了王晏等人不可一世“坚如磐石”的权势基础，等于王晏等人在自己屁股下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

在这场大浩劫中各级专案工作人员中，有一些人出自一个公民正直的良心，站起来进行不同方式的抵制。他们有的暗中给受刑致伤致病的“五一六”送来药品；有的偷偷地给被罚挨饿的审查对象塞上几个馒头烧饼；有的被派搞定案工作的总以“不合规范，不合标准”等原因拒绝按权要们的尺寸来“定案”；有的给审查对象家属暗通消息。更有人冒着极大的风险通过极其曲折的渠道向中央反映实情。这些人有干部、有工人也有现役军人。其中最勇敢也最令人惋惜的是崇安区一家小小区属企业“振华染厂”的一位姓顾的青年工人（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他原是驻青岛某部的战士，在“一打三反”时复员回无锡。因政治条件好，当然被当作骨干。因为他公开斥责学习班中严重的行刑逼供手段，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最后把这个正直善良的青年逼疯了，断送了他一生的幸福。类似发生在专案组和小分队里的法西斯式的“内部整顿”并非只此一桩。

七三年底到七四年初。当时“深挖”虽已是强弩之末，但少数权要人物还要强自镇定加强控制。他们为“誊出牢房换新囚”，把先前关押多时的一批审查对象以各种名目放出了“学习班”，改为“边劳动边审查”；把那些从苏北等地揪回来的下放干部，插队知青，已毕业分配的大中专学生放回原地。这些措施名曰“降级审查”。虽然“降级”了，仍派专人严密监视，并会同其家庭所在地区监督，随时互通“阶级斗争新动向”。可是权要们越怕这个“新动向”，“新动向”就越来越多。随你在车站码头要津明岗暗哨严密盘查，但一个又一个“五一六”逃出了天罗地网，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央送状子。其中尤以残废军人、前志愿军某部参谋、某中学英语教师周海泉的出逃，更具传奇色彩。这个连走路都很困难的老汉居然化了装，在细雨霏霏的日子里，靠着友人的帮助，从乡间小道潜出，甩脱重重追捕，成功地演出了一场《胜利大逃亡》。这事令王晏气极败坏七窍生烟！他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拍案狂吼道，

……五一六翻案风嚣张到极点了！一个老蹊脚居然大白天就在眼皮子底下楞是溜出去了。这还了得……”。

除了本市的市民，外地人也有向中央或各自所在部门反映无锡市“挖地三尺”无法无天倒行逆施的种种恶行。例如外省某部的一位军官，出差到无锡，正好看见青年工人孙金生已被殴打得奄奄一息了，小分队员们还不肯住手。这位军官好言劝阻，反遭到围攻和非法扣押，这位军官毫无惧色义正严辞继续指责他们的行为，终因其是军人身份，又系外省驻军，只能放走了事。这位军官回去后立即通过军队系统上报此事，并在两年后政策复查时为此事作证。他维护了军人的荣誉和尊严。他的事迹在百姓中普遍传颂。可惜事过三十年了，他的姓名已记不起来了。

到了一九七四年初，这个笼罩在无锡上空的大铁盖再也捂不住了。小小的钢球厂工人们首先发难。他们勇敢地贴出大标语质问当局，“深挖五一六究竟镇压了谁？”。这下子不啻是在无锡上空响起了一声炸雷！权要们慌了手脚，王晏等人急忙召开各级会议统一口径。诸如什么“深挖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有文件有批示，深挖的大方向不容怀疑。谁要是抓住一点点细枝末节不放，就是为阶级敌人翻案……”。而且要各级组织“……认真观察阶级

敌人新动向，五一六翻案风在哪里一露头，就在哪里狠狠地把它打下去……”。可是这股怒火万丈的“翻案风”再也压不下去了……

（四）一风吹去是和非

叶剑英元帅怒斥道，“……搞清查（五一六）逼死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干部群众，还讲什么大方向？，……无锡有个支左的干部，搞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乌龟壳壳，你搞这个壳壳是用来对付谁的？”

正当权要人物拚命东堵西补为已陷入绝地的“挖地三尺”打强心针的时候，一向被王晏视为得力可靠的市革会报导组和《无锡日报》编辑部一批年青人冲出来了，而且还带动了一部份机关人员和共青团组织，矛头直指王晏等权要人物。主要内容是揭发王晏等人与林彪的关系，并且把“挖地三尺”着重提出来列为王晏等人一大恶行。他们指出王晏等人搞的“深挖”那一套根本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并指出这是蓄意残害人民。接着又有许多政宣理论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揭露这些权要的言行。这是王晏等人始料不及的“奇兵突袭”。因为这些政工宣传一条线的秀才们，既不是受尽折磨的审查对象，也不是那些为了权力分配上的矛盾如今已反目成仇的昔日“亲密战友”，而是为了公民的良心站起来公开向王晏等人叫板的“半腰里杀出来的程咬金”。权要们心里的惊恐仓惶已不可名状。他们一方面密商对策，派人到邻近城市去打探形势；一方面竭力上下统一口径，还想修理已分崩离析的“心理防线”。可是如今整个城市都站起来向他宣战了。就是一些原本死心塌地跟着他们起劲“深挖”的人，眼见大势已去，当然不肯当他们的政治陪葬品。陷入“孤家寡人”境地的少数权要情急之下又干出了一件大蠢事——偷偷涂改市委常委会议记录，这可是破坏重要档案的大事啊！这事很快被市委档案保管人员揭发。王晏、张文治被停职审查。全市一片欢呼声起。

几乎就在同时，“挖地三尺”的受害者在越来越大的声讨揭发的基础上，自发地在城中公园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后群众涌入市委并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市委必须明确态度，彻底查清“深挖五一六”的问题并向全市人民作出交代。

（二）市委必须给所有被屈打成“五一六”的干部群众平反，及时落实政策、赔偿损失、医疗伤病。

(三)对那些在“深挖”中行凶打人、致死致残、民愤极大者交付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四)现尚因被“五一六”罪名尚被关押的人应予立即释放。对前此在“红色台风”“一打三反”中被拘压的市革会委员匡建中,原“红总”中心组成员陆渭文二人应按“有罪定罪,无罪释放,错了平反”的原则立即解决。

当时市委常委们的答复大体如下:

……王晏、张文治破坏清查(此刻不叫深挖叫清查显得文绉绉了),搞了扩大化,打击了很多干部群众。市委支持同志们结合“批林批孔”狠批“克己复礼”,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的问题。关于平反的问题要慎重,不能搞一风吹,要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关于在清查中违反政策打人的事,同志们应从大局观念出发,按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一原则出发,不要纠缠在这些事情上,搞好团结共同对敌……”

关于陆渭文、匡建中等尚在押人员的事,常委和请愿群众间是以一种“个别人对个别人”的非正式交谈方式许诺释放,并约定次日下午释放陆、匡二人。虽然尚有许多问题令群众困惑不满,但群众还是接受了这个并不太满意的答复。谁知这是一个缓兵之计。仍在市委掌握大权的一些人,因为过去和王晏、张文治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在“挖地三尺”中更有摆脱不了的干系。如果对“挖地三尺”问题进一步清算下去,全部真象一旦水落石出,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也要垮台。为此,必须压下群众这股势头。他们匆忙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没有任何可资作为依据的定案材料,“讨论”了半个小时就“决定”了陆、匡二人的性质为“现行反革命”。

笔者按:陆、匡二人早在一九六九年底就以所谓“分裂市革会、阴谋暴动”的罪名被关押迄今。在“深挖五一六”时又是“夏季阴谋”的顶尖“要犯”。在“深挖”中以与陆、匡有染而被株连的人数以万计。在市委和市革会内的某些“王晏后时期”的新权要人物,以为只要把陆、匡二人揪在手中,就等于在市民头上重新祭起了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群众对此提出质问,市委一名常委连哄带吓地“解释”,以下就是当时对话的内容:

群众:“为什么王晏花了几年的功夫都定不了他们的案,而你们上午只用了一支烟的功夫就定了案?”

某常委：“同志们应该相信市委，现在不是王晏那个时候了，我们定案是很慎重的。这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嘛。”

群众：“既然是慎重，你们又怎么能一下子就忽然定下案了？”

某常委：“这个问题正说明王晏的问题，他是有意拖延混淆敌我界线。”

群众：“你们定性定案是依据什么材料？是王晏、张文治搞的《无锡五一六十大事件》里的那个《夏季阴谋》的旧案卷吧？”

某常委：“怎么，你们莫非是怀疑市委吗？怀疑一切是不对的，那可是极左思潮，是刘邓，陶铸和林彪的那一套啊！小心上当犯错误啊……”

群众要求他公布材料，他却含糊其词说“以后会公布的，大家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让阶级敌人和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乘机兴风作浪！”云云，借口有事扬长而去。

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行为，让群众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王晏后时期”的市委里，还游荡着王晏“挖地三尺”的影子，要靠恩赐得到平反只是一场春梦，只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新一波揭露“挖地三尺”种种罪行的高潮又兴起了。这些血泪控诉更激发了市民的愤慨，

……工人孙金生被公开毒打致死的惨状……

……中学音乐女教师张 xx，和丈夫沈静园都被各自单位抓到“学习班”里。家中只撇下年幼无人照料的五个儿女，他们眼巴巴地望着父母回来，却得到慈母惨死的恶耗……

……工人高兴大被用铁管猛击后吐血身亡，撇下了七旬老母和结婚不久的妻子……

……已毕业分配的女学生 xxx 被“深挖”回来，由几名彪形大汉轮番“踩杠子”，实在不堪忍受，自杀身亡……

……工人沈 xx 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半夜里撬窗出逃，力竭倒在农民的菜园地吐血不止身亡……

……工人孙汝济（笔者哥哥），自七一年一月先我两个月被关进“学习班”，经常被小分队“加温”刑讯。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四日高温闷热难忍，却被故意关在一个密不通风的地下室内“清醒头脑”。他被折磨得口吐白沫语言困难，几次

要求出来透透气都遭恶声叱骂，终于喷血身亡。后来连骨灰也被有关当局扔到不知何处。此事令我母亲终生痛苦至死不能释然。尸骨不知去向者远非这一桩……

…陆渭文的妻子张 xx 因实在不堪毒刑，撇下孤苦零仃的一双小儿女，投身古运何……

无锡钢铁厂厂长张养生，他的妻子张荣沁已在“红色台风”中被活活打死。他本人又惨死在这次“深挖”中……

……工人高 xx（复员军人）从“学习班”放回家中一月有余即伤势恶化不治而亡……

……老工人、共产党员刘金根夫妇二人都惨死在“学习班”……

……会计陈 xx 什么组织也没参加，是个标准的“逍遥派”。只因不肯违规替某些掌权者胡乱报销，硬被抓进“学习班”当作“五一六”毒打，最后饮恨身亡……

农民蒋 xx 被小分队长时间吊打，大小便失禁，放下来不多时气绝身亡……

笔者当年和沈静园教授等死难者家属曾调查过数十位死难者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笔者原记录的一包资料已不知去向，这是我终生大憾！

除了死难者的种种惨状外，生还者伤痕累累病痛缠身的不堪遭遇，更是不胜枚举！有而因儿女亲人身陷“学习班”气竭而死的老人，有因配偶被“深挖”本人又被强迫“划清界线”不得不离异者，诸类家破人亡的事更是如恒河沙数……

例如原市委常委田洪，多年倍受折磨。笔者七四年底去看他时，只见老人双臂疤痕遍布，那是被施刑者用办公用的钉书机钉的……

……原市委常委吴镇，他的妻子常铃医生已惨死在“红色台风”中，本人多年被关押折磨。在刑讯中，他说了句“我所说的都是实事求是的”为自己辩护，就遭小分队痛斥：“你有什么资格实事求是？只有我们才有资格实事求是！”。为此，吴镇先生遭到了这伙连“实事求是”都要垄断的好汉们更残酷的“加温帮助”。良知被颠倒错位的事太多太多了……

原市悉委常委张再生被残酷“加温帮助”实在不堪忍受跳窗逃跑，腿骨折断终生残疾。

当群众的揭发越来越旺的时候，市委和市革会掌实权的人，也在那里层层设防。他们一方面在大小会议上公开宣称什么“当前的重点是狠批克己复礼，联系本市阶级斗争的实际，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忠实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警惕有人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冲击干扰当前的大方向……”。另一方面，他们对全市广大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认真平反的呼声，则推诿说“清查（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发了文件，二十号文件是有批示的，由于王晏、张文治推行林彪极左路线，搞了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干部群众。我们市委常委抵制不力也该深刻认识引以为诫。不过落实政策不能搞一风吹，那样是会漏掉一小撮阶级敌人……”

社会上也放出一股阴风，说什么“……为什么陆、匡二人不放？说明被搞到的人还是有反革命，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别看有的人现在闹平反起劲得很，哭的日子在后面呢！现在是为了运动需要，让他们再跳跳，再暴露暴露……”

当然他们也在基层装模作样搞了一些“试点落实政策”。找人个别谈话，将以前几年搞的几尺高的案卷一张张“核对事实”。然后给一张盖了大印的纸头，上面写着，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经人揭发对 xxx 同志进行审查，现已核查清楚 xxx 同志没有参加五一六兵团，现根据政策予以排除……”。有的还加上什么“……该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希该同志认真汲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和组织的审查……”

这样的“落实政策”，分明就是说，“你虽然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五一八。搞了你还是不错的！”。正当无锡市有关当局以“大方向正确”“不能一风吹”等等强词夺理的“道理”来坚守“挖地三尺”的生命线时，市民们也以更深入的调查揭露并上书中央，来争取得到一个公正的裁决。在此期间我和沈静园教授又知道了一些尤其令人发指的禽兽恶行，那就是利用“深挖”之便强奸女的被审查对象。如一位女工在被“加温”两天两夜精疲力竭之后，被看守她的小分队员趁她昏沉之际强奸。又如一个女护士也是在类似情况下，被工宣队小队长和两名队员轮奸……如此兽行，一般受害者都羞於启齿。我们核实到的三件都是其丈夫或父母口述。鉴于对社会习俗压力的惧怕，基本上都不敢公开揭露。故而那些禽兽都能逃脱法网。其中只有一个工宣队长，是驻在某单位领导“深挖”的

“专案办公室主任”。他邻居一对夫妻都被“深挖”进了学习班，家中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那个禽兽不如的队长竟在半夜里翻过房顶穿窗而入强奸了可怜的女孩。兽行过程中惊动四邻，被邻居发现扭送居委和派出所，一直被有关当局包庇。直到此刻，由于民愤太大，市委才拿出了一幅“比王晏公正无私”的面孔，给这家伙判了六年徒刑。（笔者按：当时强奸幼女是要判死刑或死缓，起码也是个无期徒刑。）这个六年徒刑还是用“内判”代替公判。显然是“三娘教子”式的“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般的处分。

沈静园教授和我曾为要求惩办凶手的事去找一位市委副书记，那次谈话我在近三十年后记忆犹新。下面就是那次谈话的情况，

问：“x 书记，那些在运动中行凶致人死亡的凶手，难道不应该依法惩办吗？”

答：“这个问题嘛……要从路线的高度来看，要知道那些打你打得最凶的同志，其实心里最热爱毛主席……这个你们这个这个要有认识。”

问：“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有林彪才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x 书记，现在批林批孔，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啊？”

答：“同志们，你们怎么还不能站在路线高度看问题啊？这样很容易迷失方向上当受骗，到时候犯了大错误后悔可就晚了！像王晏就是个活教材嘛。”

问：“x 书记，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路线问题吗？”

答：“这个……这个你们想想，这个二十号文件可是中央文件啊，上面还有批示。所以我们市前几年搞的这个清查，大方向是不错的，出了一些偏差嘛。总不能搞翻烧饼。”

问：“x 书记，你说的这个中央二十号文件的完整文号是什么？是中发（中共中央颁发）还是什么中央部门发的？”

答：“这个……这个好像不是中发。文件是发到省军级，我也是听传达……”

问：“谁批示的，是毛主席批示的吗？批示内容是什么？”

答：“不是主席批示的……反正中央领导好像有一个批示……我现在记不清，不能随口乱说……”

这句话令我和沈教授不胜惊讶。按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如果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那是最过硬的合法依据，x 书记尽可理直气壮讲出来的。看到他一副窘迫之状，我们又提出另一个问题，

x 书记，那二十号文件上有没有说可以打人，可以把人打死打伤了不负责人？”

这句话可能是触到 x 书记的痛处，他悻然大怒道，

你们还是要死死揪住这个什么打人啊，什么凶手啊的问题不放！照这样搞下去，今后再有运动，谁还肯出来当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

说毕他抛下一头雾水的我俩，拎起公文包悻悻而去。原来 x 书记是怕打手杀人犯绝了种，以后再搞什么“挖地四尺”、“挖地五尺”就缺少了“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可是他还是没说出《二十号文件》的子丑寅卯来龙去脉啊……

当时市委为了避开在“挖地三尺”这个头痛又被动的局面，就以当时正在全国自上而下的“狠批克己复礼，批判林彪、孔老二反革命复辟”（批林批孔）为由，要大家“紧紧抓住大方向不动摇”、“更深入地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等人贯彻林彪修正主义的问题”。一大批按照当时所谓“权威写作组”口径的“大批判文章”冒出来了。群众对官方组织的言之无物的“高射炮”（即空对空）的“运动八股”十分反感。尤其是有些所谓的“揭批”大字报津津乐道一些“隐私”、“绯闻”，更引起普遍反感。不过有一些揭发权要人物们奢靡生活和损公肥私丑行的大字报倒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例如

一九七二年初正值“深挖”进一步引向高潮时，农历小年夜下午在市人民大会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上，权要们在声嘶力竭要全市进一步“深挖”再“深挖”决不动摇云云之后，号召全体与会干部说，祝同志们过一个简朴又快乐的，革命化的春节！”

会议一散，权要们跳上小轿车直奔太湖饭店去过灯红酒绿、山珍海味的“革命化春节”。又如，他们每次去太湖饭店等涉外宾馆“革命化”时，往往总要开上几瓶名酒“提提精神”，尤其爱喝特供外宾华侨的“茅台”。为此，竟想出了“偷梁换柱”的绝招。把茅台瓶中之酒倒出来享用，再用别的酒注入空瓶去应付外宾华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外宾头上刮点点，内宾肚子里补点点”。这种“鼓上蚤时迁”的把戏偶而被一老华侨撞见，影响十分恶劣。他们却不以为然，照样时不时去涉外宾馆“革命化”。三十年后为举国上下痛诟的“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歪风，他们早已“超前化”身体力行了。

又如，当时无锡无线电五厂开发出了一种“小六管”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这种可以放在衣袋里的灵巧玩意儿，如今在地摊上多得数不清。可在七十年代初就像现在的什么 GPS 卫星定位仪一样稀罕！权要们居然以“试用”之名成箱成箱私分了。

又如，当时无锡纺织业开发出了多种棉毛化纤混纺面料。在那个每人一年凭票供应几尺布的年头里，这东西穿在身上，那感觉更胜如今的什么国际名牌服装。权要们居然也以所谓“出厂优惠价”甚至干脆一文不付，就成捆成捆地“试穿”。

此外，机关干部们还揭发出了少数权要们严重违反规定擅用高档药品的行为。如当时严格控制使用的进口“白蛋白”针剂，权要们动不动就当成“滋补品”使用。须知在外汇奇缺的年代，这种进口药的价值超过现在的什么“美国伟哥”“印度神油”等等“壮阳神药”的几十倍！

再如在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商品奇缺的年头里，一般人结婚都以“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加一台木壳闹钟）及“三十二条腿”（一堂家俱的木腿总数）为最高标准。权要们却能以各种名义时不时弄到十几立方米的上等木料，四时八节鲜鱼活虾肥蟹不断，自己吃还不算，还用来巴结上司或分赠亲友收买亲信……

这些丑行被曝光，也使市民进一步认清了，这些道貌岸然权倾一时的大人物，一方面是对老百姓的“挖地三尺”血腥手段，另一方面是穷奢极欲地侵吞国家财物。

但是“王晏后”市委中某些权要人物搞起的这个“紧抓大方向”把戏，却又开始越出了他们的既定方针。许多揭发“王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字报，已开始触及到他们自身。而对“深挖五一六”问题的控诉声讨依然一浪高过一浪。虽然他们还竭力用“大方向正确”“不能一风吹”等来拖延，拒绝为广大受害者平反。但是已没有多少人再听他们这一套了。就在这时终于经过层层传达，人们听到了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代表中央的重要讲话。叶剑英元帅愤怒斥责道，

“……搞清查（五一六）逼死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干部和群众，还讲什么大方向？……无锡有个支左干部（应是指王晏），搞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乌龟壳壳（意为独立王国）！你搞这个壳壳是对付谁的？……”

叶剑英元帅在讲话中虽然只点了王晏，但是也给那些起劲地用“不能一风吹”、“大方向正确”以拖延时日保住“挖地三尺”这块通灵宝玉的人当头一棒。特别是搞了那么多年，关押刑讯了那么多人，死难病残那么多人，株连者就学、求职、参军，提干升职受到影响乃至社会生活中严重被歧视者不可胜数。民愤实在太大了！如今叶剑英元帅的讲话，又完全剥夺了其“有文件、有批示，大方向正确”的所谓“合法性”。特别是无锡当时曾宣称搞出了那么多“五一六”，可是实际上一个货真价实的“五一六”也没有（据悉江苏全省搞了百来万人，最后也是一个“五一六”都没有）。这和当时刚刚颁发的，虽然有严重错误的《文革宪法》也严重抵触。他们深知再拖延下去，眼看就要陷入没顶之灾，手下的打手杀手们更是难逃法网，必需搞个“金蝉脱壳”法术逃脱难关。

于是一夜间这些坚决“反对一风吹”的人忽然改了调，自己大搞起真正的一风吹来。各单位都搞起什么“座谈会”“茶话会”甚至摆起酒宴，把昔日的阶下囚奉为上宾以示“诚意”。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千仇万恨都集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审查人的和被审查的都是阶级兄弟，不能再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紧紧抓住当前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甚至有“在平反过程中只能批判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不能提到参加清查工作的同志”的正式规定。然后一阵风飘下来数以万计的《平反决定》。其基本文字内容如下，

xxx 同志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由於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受到错误审查。今查明该同志没有参与五一六兵团的组织 and 任何活动。党委依照有关政策决定为该同志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死难者则含乎其词加上一句，

……审查期间，该同志於 x 年 x 月 x 日在错误路线下非正常死亡……”

谁要是这种“一风吹大平反”提出质疑，谁要是要求进一步查清死因依法惩办凶手，就被冠以“干扰大方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铁帽子。笔者就多次受到这种恫吓。由于“文革”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旷日持久的“挖地三尺”，就此一夜间匆匆谢幕！

至于作为“五一六”特大要犯，又被“王晏后”市委再次宣布为“反革命”的陆、匡二人，在“一风吹大平反”后继续被关押。匡建中在一九七五年，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在当时江苏省级领导的干预下才被平反，恢复其共青团组织生活和无锡市革委会委员的职务。而陆渭文则在“四人帮”垮台后才被稀里糊涂的放出来，回到残破的家中，迎接他的是孤苦零丁的幼儿稚女和长年担惊受怕的姐姐……这大概就是“挖地三尺”的最后余响了……

八十年代初，我在电视中又看见了多年消声匿迹的杨成武将军，这位令日本名将、国民党名将、美国“二战名帅”麦克阿瑟五星上将都异常头痛的人，虽然雄风犹在，毕竟“将军老矣”。想必是这么多年来，将军和我们这些被人莫名其妙硬编排到他“麾下”的人一样受尽煎熬！这许许多多的是非恩怨，大概都被一阵风吹个云消雾散了吧。在“批林批孔”中不能解开的种种迷团，如《二十号文件》的来龙去脉和文件具体内容。如“有批示”既然不是毛泽东主席所批，那又是谁批了什么话？江苏省尤其是无锡市这场历经数年惨绝人寰的“挖地三尺”又是根据谁的“敌情分析”搞起来的？难道仅仅是王晏等一伙“五品郡守”一时兴起的发明创造？人们曾希望在公审林彪集团成员和四人帮时得以弄清楚。可是历史的脚步又是那样匆匆忙忙……

近年来见到一些个当年从学习班中幸存下来的“同案犯”时，他们一面抚摸着阴天下雨时疼痛难忍的旧伤，一面不堪回首道，

……一场恶梦……啥人喜欢再想那些恶梦？想也没有用。三十年早都过了法律的追诉期。你就是每天二十四个小时不停地转动脑子，死了的人还不是白死的！又不能让他们又活回来……”

一天到晚沉在恶梦里不得解脱，生命的价值何在？人死了还能复生吗？

朋友啊，这世上并非只给人们准备下鲜花、阳光和明媚的春天。其实春天也不一定都是明媚和熙的，“十二级红色台风”、“一打三反”、“挖地三尺”不都是在春天大行其道的吗？至于那些学习班内外的冤魂，谁来为他们申张正义？希望大家重温一遍马克辛·高尔基在《母亲》中的一句话，

“……那些无辜的死者，只有真理才能让他们复活……”

这场浩劫中的浩劫，恶梦中的恶梦将给后来的男男女女留下什么有益的东西吗？难道仅仅是“浮生如梦”的无奈感叹？我想，起码在人文学的角度上，这是

一个可供开采的富矿。涉及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文化学、经济学和心理学（尤其是变态心理学）诸多学科领域。人们只有进一步分清兽性和人性、野蛮和文明、浮躁和真实，我们才能进步，才能发展，不至於让旧日的恶梦披上华丽的新装之后再作祟人间。

一九九三年初，我母亲带着对我哥哥时时萦系心怀的痛苦离开人世，我在她入葬的时候，附葬了我哥哥二十多年前遗下的一件破毛线背心和一张像片。让他们都得到安息吧……

在安葬完母亲下山的时候，我忽然碰到一位多年不见的故人，他曾协助沈静园教授和我搞过许多调查。望着满山在寒风中发抖的枯草，他谥然问我：

“那些事情，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吗？”

是啊，悠悠往事何其多，不是都化作一缕轻烟散入了九霄外！

一刹那间，我忽然想到了捷克伟大的革命家、爱国者尤利斯·伏契克在其绝笔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最后一句话，那也是他行将被纳粹匪徒处决前，满怀深情留给全世界的告别词：

“人啊 我爱你们，可是你们要警惕！”

2003年4月6日 初稿

此稿为征求意见稿，阅后务请将宝贵意见和您所知道的一些被笔者疏漏的情况赐告。诚乞诲正，不胜感谢！

孙维申 地址 无锡市塘南新村97号201室 邮政编码 214026 电话 5044089

王协昌：《深挖“5.16”：来自苏北滨海县的报告》（摘自原是一中学生王协昌的回忆录）

1971年1月3日，马金山（原无锡市一中“红代会”负责人，无锡市“革委会”委员）被无锡市清查“5.16”专案组来汽车在一通翻箱倒柜后，卷着生活必需品，替换衣服，铺盖等押回无锡审查。

同一天，被押回无锡审查的还有耳朵被拉到萎缩，去上海几次整容也不能恢复的高级干部张履冰。

1月4日，滨海棉织厂革委会主任闻怀龙，找我谈话，宣布撤去我厂革会政工组政治干事职务，下放织造车间劳动。春节前夕，厂革会宣布取消我探亲假，

不得回锡探亲，不得擅离工厂。（王协昌在“深挖‘5.16’”运动中被“审查”四年零四个月）

1971年3月，由浙江调来的独立师进驻滨海县城，全力以赴开展了清查“5.16”行动。顷刻之间，滨海县象翻烧饼一样，凡与南京“好派”同观点的那派头头，不管原先担任什么职务，统统被“学习班”隔离审查，当时所谓“学习班”，就是大搞“逼、供、信”，逼迫承认自己是“5.16”反革命，逼迫承认同一派的都是“5.16”，棉织厂被列为清查“5.16”的重点单位，阵容强大的军宣队进驻，每天深夜，从滨海棉织厂传出的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可以复盖隆隆的布机声。

穷山恶水的滨海县，称得上是“庙小阴风大，水浅王八多”光“5.16”由六大系列：

一是北京蒯大富，蒯氏滨海振东公社人，从滨海县中学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文革中成了全国出名的学生造反司令。

二是上海的顾正红，顾正红烈士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早在20年代的“五、三十”惨案中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英勇牺牲，滨海正红公社就是烈士的故乡。顾正红烈士的侄儿是滨海糖果厂的造反派头头，在清查“5.16”时被迫害致死。

三是南京“好派”头头文风来的所谓的滨海“爪牙”，是清查的重点。

四是盐城的董加耕，他高中毕业放弃考大学，毅然回乡务农，成为“革命的傻子”，由毛主席请他吃过饭的，全国下乡知青的楷模。

五是进口“5.16”，专指下放滨海务农的无锡，苏州，两市的学生，干部，城镇居民中的“5.16”。

六是土生土长的“5.16”，即所谓与北京，上海，南京，盐城没有任何联系，完全是滨海自己出产的“5.16”分子。

滨海县的清查“5.16”真可谓是“史无前例”，一些丧失了理智的“野兽”，从法西斯的阴魂那里搬来了残酷迫害革命者的刑罚，不知羞耻地称为“棍棒底下的材料”，为了达到“半夜三更出成果”创造了假枪毙。半夜三更突然将“顽固不化”的“5.16”分子从隔离审讯室提出来，五花大绑，押往阴森的乱坟堆，在坟墓的空间，强迫“5.16”分子蹲下，用步枪顶着脑壳，“最后一次给你

‘五分钟的’坦白从宽的机会”。指挥者在数着：“五、四、三、二、一预备……”将人折磨到精神失常。

在滨海县城东饮镇，最热闹的新建桥堍，人们看到这样一幕：十八寡妇披麻戴孝，扶老携幼，拿着死去丈夫血渍斑斑的血衣，等遗物，排成长队，求助社会各界募捐。十八寡妇凑到了路费后，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状，这字字血，声声泪震惊了中南海。

顾正红烈士的侄儿被打死，一时间，滨海县城东饮镇传出了“上海工人阶级愤怒了”顾正红烈士的战友将率领数万工人来滨海等马路消息，年迈的顾正红烈士的母亲亲率子子孙孙大闹滨海县革会，随同来的有党的干部，人民解放军的师长，人民教师等等，迫于强大的压力，促使省革会的二把手吴大胜副主任赶来处理此事。

一天夜里，滨海剧场放映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电影。棉织厂有位女工想等齐人后一同进场看电影，欲靠在树下停放的自行车上“借借力”，是谁知自行车的书架上竟然放着二具尸体，吓得她失声尖叫，引起一片恐慌，原来自行车刚从一百华里外的公社运去二具死去的“5.16”去火葬场，途经剧场门口，运尸者停了车，自己混进剧场去看电影了……。

二〇〇四年十月十日，作者：陆渭文：《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纪实》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风起云涌

一、“逼上梁山”

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三、文革中的中共无锡市委

四、工人造反

五、“12.4”事件

六、“741”轮船会议

第二章 血与火的回忆

一、取缔“红总”

二、二中“七·五”树战旗“红无锡报”静坐

三、“红总”平反

四、“大武斗”

1、“6.20”事件

2、西门桥“6.23”事件

3、“6.27”火烧装甲车事件

4、“7.3”大撤退前后

5、“8.9”抢枪

6、武装进驻无锡县

7、在无锡县发生的几次武装冲突

8、武装小分队撤回镇江

9、“大联合”谈判和主力军返回无锡

五、“大联合”和“三结合”

第三章 流亡和狱中

一、造反派的无奈

二、流亡生涯

1、陆渭文被宣布为反革命

2、在徐州的“流亡政府”

3、在山东的日子里

4、在浙江的日子里

三、十年牢狱之灾

1、在牢笼中

2、清查“5.16”运动

3、狱中后事

尾声

结束语

前言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这段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近年来人们几乎忘记了党中央已经对“文革”作出了全盘否定的《决议》，重新提出了对“文革”的反思，并引发了对文革的争论，因为，文革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人民心甘情愿参加的，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运动，同时这又涉及到，对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的功过评价。

近年来对文革评价的争论，实际上是人们对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阴暗面产生的强烈不满情绪的反映。这种“争论”，也是人们想“以史为鉴”，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去寻找改变现实生活中阴暗面的道路。在当前对文革评价的争论中，有些人采用了“讽刺”和“挖苦”的方式去攻击论战的对方；然而，“讽刺”和“挖苦”的方式决不能达到以理服人、统一认识的目的。如何来认识和评价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最好的方法应该首先如实地反映当时的真相，然后才有可能正确地去总结这段血的历史，为后人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以回忆录的形式来真实地书写江苏无锡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这不仅是想让我们的下一代更为实际地了解文革的真相，同时也可以让无数当时身在文革中的普通群众知悉“庐山真面目”，知道无锡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内幕。

作者的自我介绍：本人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在文革开始时是一个工人，现已步入“古稀之年”。在文革中任“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革派联总”）的“总指挥”，是“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是无锡文革中的一个最大的工人群众组织）的中心组成员；本人不仅是无锡文革大武斗中“六派”方面的总指挥，而且是1968年无锡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因受迫害逃往徐州的“流亡政府”的总头头。本人在无锡文革中的这一特殊身份，使我成为对无锡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核心知情者；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在已经为时不多的有生之年中，将无锡文革历史中许多从未公开的内情与活动的真实情况，献给锡城的百姓。为了表达方便，本人在正文中是以第三人称出现，敬请谅解。

第一章 风起云涌

“无锡”，因为是“无锡锡山山无锡”而取名。地处于宁沪线的中段，从建国前就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由于交通运输方便，又是苏南地区有名的商埠，工商业发达，在解放前，素有“小上海”之美誉，非但经济繁荣，而且因为还座落在太湖之滨，有山有水，山青水秀是座名驰中外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

如果在早春二月，人们踏步无锡“梅园”，可真是：

湖滨青山千枝梅， 春寒未尽独吐艳。

报春有意争春早， 傲骨风姿惹人醉。

如果在初夏季节，人们去游览无锡五里湖畔的“蠡园”又见另有一番风情

（西江月一首）

柳堤清风拂面， 桃李竞相争艳。

不知胸中何是愁？ 欢歌笑语一片。

游鱼穿梭戏水， 兰天飘落飞燕。

楼台亭阁把酒处， 逍遥恰似神仙。

在秋冬交换的季节里，踏在太湖边沿的“鼋头渚”更有一番景色。

当你抬头望山上是：“满山枫叶红。”

回首看近处湖水是：“山湖映青天。”

远眺太湖是：“飒风起银浪。”

回过头见坐落在中独山畔的工人疗养院是“红瓦斜阳艳。”

文革前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生存着六十五万乡亲父老。正因为无锡这块土地，在苏南仅次于省府南京市，也算是苏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故而整个苏南地区在文革中出现的“善”与“恶”，对与错。就从这里开始，他是苏南地区文革的“龙头”城市。

一， “逼上梁山”

从苏联赫鲁晓夫上台，从根本上篡改了了苏联共产党的路线之后，毛主席就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当时除了以中共中央的名誉发表了

“九评”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论战文章之外。同期毛主席又以诗人的情怀作“七律诗一首”：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同期还有“满江红”等词，“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从诗文中可见毛泽东主席对修正主义的激愤，分析了当时共产国际出现的恶劣形势，又十分自信有战胜修正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在党内一次再次地提醒人们在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在公开的教育中一再指出干部变修的“懒、谗、钻、贪、变”的规律。可见毛主席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的思想境界，并对全党，全国人民做了力所能及的思想教育，直至在全国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四清”。可见毛主席在当时的思想意识中，所谓的“阶级斗争”内容，已经不是在政治，经济上被剥夺了权力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之后的主要危险。是防止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出现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党变质，国变色。而当时掌握国家行政大权的刘少奇主席，他同样也是在搞“阶级斗争”，但他的“阶级斗争”的内容仍然是对着“地，富，反，坏，右”等已经失去阶级属性，不再存在有任何作为剥削手段的生产资料的阶级敌人，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四清运动”中，就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一位是党中央主席，一位是国家主席，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奠定了文革中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思想基础。

一九六五年冬季，锡城社会上一片祥和之气，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的男女老少，闲来无事嘴里轻轻哼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等当时最为的流行革命歌曲，为自己生活在安实，祥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而自豪，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蒸蒸日上而欢欣鼓舞。此时按中央的指示，有一个“四清”工作队，静悄悄地来到了“无锡铸造厂”开展“四清”工作。

无锡铸造一厂是当初由众多的小翻砂工场在 56 年“对私改造”中公私合营起来的铸造专业工厂，经过了大跃进年代，几经发展现在已经是拥有 1 千多工人的国营企业，“四清”工作队进厂以后，就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向厂党委提意见揭厂党委的盖子，帮助厂内干部“洗澡”，“四清”工作队队长徐有恒在铸工车间蹲点，选中了做炉工的陆渭文，作为车间“四清”代表，做陆渭文的思想工作要他出来揭露厂党委内存在的问题。在现代的知识精英的眼里，普通工人一定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陆渭文这一个人也确实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了一些，如果头脑不简单又怎么敢去向党委一班人去提什么意见呢？再说了党委一班人中间有些人与陆的关系还算是相处得不差的。

陆渭文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旧社会因父亲过早地亡故，直至解放，只断断续续地读到小学毕业。解放初期，在幼小的心灵中他始终没有忘记人民政府将白花花的“救济米”送到他家中的情景，他从心底里热爱这个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解放后，他以失学青年的身份进入“无锡市民主青年联合会”（青年夜校）学习，白天搞社会活动，晚上读书。在这期间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教育，以后入团，并担任过街道团支部书记的职务，58 年进铸件厂工作后，在 58 年大炼钢铁的热潮中，水里火里不要命地工作，这时 20 多岁的陆渭文又担任了车间团支部书记值班长等职务，也算是在厂内一度的“红人”，并且陆在白天工作之余，晚上坚持业余学习，补习完了高中课程，又进了“无锡市机关业余大学”中文系就读二年，所以陆渭文此时在工厂内除了是普通劳动者之外，还挂了“无锡日报”“电台”通讯员之名，平时帮其他工人群众写写“忆苦思甜”，通讯报道等小文章，正因为陆渭文在厂内的实际活动情况，是工厂内的“活跃分子”，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多，了解厂内的情况也广。这时“四清”工作队找到了他，也算是找对了人，陆欣然地答应起来提意见了，就调进厂的保卫科科长 XXX 与 X 车间机床女车工在半人高麦穗将成熟的麦田里“绊跟斗”（意欲强奸），厂工会主席的妻子放高利贷，逼得本厂职工 XXX 走投无路几乎去卧轨自杀。原来这位职工到了付工资的日子一个人呆坐在车间门口的地上，闷声不响，作为好管“闲事”的陆渭文就关心地问他：“唉，怎么啦？”工友回答：“今天领了工资还不够还人家的债。”“那你欠了人家多少债务？”“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怎么会呢？原来这位工友在困难时期，开始因为肚皮吃不饱，向厂工会主席的老婆借了一笔高利

贷，买了高价粮，结果二、三年下来，利上滚利，到现在究竟欠了人家多少，对这个文化水平不高，为人善良的工人来说已经是一笔“糊涂帐”了，想想日子过不去，还是死了的好。当陆渭文知道了这一内幕之后，顿时火冒三丈，果断地对这位工友说“这个帐不还！我作主，你仔细算一算当初借了他多少钱，分期分批还他本钱，其他利息不采他。”工厂内发生这样的事情，陆渭文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今天“四清”运动来了，当然要揭这个老底，揭露这些人间不平事，事隔个把星期，厂党委在“四清”工作队的帮助下，算是洗过了澡，大概都是居于可以教育好的干部，所有干部都已官复原职，继续开始他们应该做的工作。

六六年的春夏之交，“四清”尚未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上海《文汇报》上姚文元发表了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批判北京的“邓拓、吴晗、缪沫沙”三家村里店“燕山夜话”黑文，铸件一厂也开始搞“文革”了，全厂首先倒霉的批判对象，就是那个好管闲事，向党委提过意见的陆渭文，他们先抓住陆曾为同厂职工写的“忆苦思甜”的“报告文学”的标题上用错过一个字，并在文章未刊登之前已经作过更正的这一点上开始，大批陆渭文的“黑文”“黑诗”“黑话”，陆渭文就是无锡铸造一厂内的“三家村”。一个一千多人的工厂内，在党委领导下的“文革”大批判就贴了六十多个对陆的大批判专栏，陆渭文面对那种断章取义，无限上纲，造谣，污蔑的不实之词，以泰山压顶之势，汹涌而来。陆渭文此时此刻的心情真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他在工余的休息时间，独自点燃了一支香烟，闷坐在炉台边，胸中的怒火要崩发。这时只有知情者的好友偷偷地在陆的耳朵旁，真情安慰，善意地告戒千万别硬顶，要沉住气……，陆渭文这时在自己的工厂内已经是内定的“黑帮”人物了。与此同时，工厂内那些净“红五类”的青年职工，已经和社会上的“红五类”的青年学生（老红卫兵）联结在一起采取了对厂内的以前的资本家实行抄家，古董、玉器、字画席卷一空，对“四类分子”挂牌在厂门口示众的革命行动。可幸的是他们口诛笔伐陆渭文，但因为他们知道陆是“无产者”，所以他们没有抄他的家，因为陆没有历史的污渍，所以也免遭了挂牌的劫难。这是在党委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无辜人群的第一次侵害。

陆渭文的耿直、倔强，又善于同情弱体人群的性格，决定了他在高压下的暂时沉默。迟早是要爆发的，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在下一段文革中必然会拼得个家破人亡。身陷囹圄的悲惨下场。

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是一群有知识，讲道理，怀着一颗对党，对毛主席，对自己祖国的前途，一腔真诚的心情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十年路程，好比是那批曾经步行串联上延安的红卫兵队伍，走上了一路山石的崎岖道路，走得那么艰难，走得那么筋疲力尽，最后又被那些知识精英们拿着他们手中的画笔，迎合了政治舞台上导演的意愿，在他们的脸上涂上几笔，使一张张青轻俊逸的脸上几乎成了不三不四的文革怪物，然而终究经过历史真实的冲洗，使人们慢慢地认清了他们的真实面貌。

文革中“红卫兵”有两大类，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是在各级党委指导下进行革命的红卫兵，他们执行了“破四旧立四新”大肆抄家，对“地富反坏右资”黑五类，一切阶级敌人挥舞了往死里打的无产阶级铁拳的任务之后，又继续了他誓死保卫各级党委的神圣职责。直至他们的最后胜利。在文革中深受红卫兵之害的人们，用血泪控诉红卫兵的错误及罪行的时候，往往忽视了红卫兵中丑恶及光明的两个区别。

1966年7月锡城的天气，显得那样的闷热，太阳象一团火球，悬挂在高高的天幕上，叫人感到到处是滚滚的热浪，无锡市第一中学的学院内，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真在熊熊燃烧，前一阶级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领导指引下进行的。工作组根据档案中的记载材料点名XX老师，XX职工是“叛徒”（汪澄曾参加过抗日军政大学）“坏分子”孙希民（原是清华大学优等生，据说有生活问题）“右派”张其栋等由革命师生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声讨批判。这就是所谓遵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步骤办事。“党指向那里，我们就战斗到那里。”而年轻的学生们对于这个“党的指示”逐渐地清醒过来。产生了怀疑。因为从最近阶段以来，代表党中央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社论文章精神与“党的指示”有明显的差异，指导文章一再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党支部工作组致所以抛出那些所谓“叛徒”“右派”“坏分子”等等这无非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其目

的是为了保护你们自己，有思想，有感情的青年学生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就终于摆脱了党支部，工作组原先设计的轨道开始了叛逆行动。

7月2日，由学校的学生会主席，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三好学生等一大批在校学生中的优秀生，上百名学生，联名贴出了《张其栋是位好老师》的大字报，这张与工作组唱反调的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轰动全校，由此引起了校党支部和工作组成员的震怒。

7月3日，工作组组长立即找了一位姓王的在这张大字报中起重要作用的学生去谈话，工作组组长先是铁青着脸，对王同学一顿训斥。最后开导地说：“今天我看你年纪轻，好多事情还不懂，这次文化大革命按刘少奇同志的要求，就是‘反右’斗争的继续，先让‘右派’分子跳出来，暴露、暴露，然后一网打尽，你知道高二班有多少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大字报上签名，你和他们同流合污，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党报称你为革命小将，你对得起党吗？我今天就是代表党找你谈的，希望你悬崖勒马……。”王同学受到了工作组的训斥，倔强的性格，坚定的意志，并没有退缩。退出工作组办公室门后，便将工作组的训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的同学们。

7月4日，由该校学生陈友根（以后是该校红卫兵头头之一）贴出《告全校革命师生书》呼吁革命师生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工作组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问，还责令学校党支部立即向全校师生传达毛主席的春节指示（即64年春节，毛主席就教育工作的指示）

7月7日，校园内似翻了热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出现了万炮齐轰校领导和工作组第一次出现了三百名学生的联名大字报，这使学校党支部，工作组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7月8日，当这位姓王的学生，坐在自己的教室里，提笔构思新大字报的内容，刚提笔写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这十一个字，工作组组长带了5.6名工作组人员闯进了教室，一把抢去了王同学手中笔，桌上纸，凶狠地把他带进了工作组的办公室，工作组组长十分严肃地宣布：“你向党进攻，反党支部，成了大胆妄为的反革命。现在我宣布，撤消你团支部书记职务，隔离审查，从现在起，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接着被几名工作组人员押进学

校的宿舍大楼，看押在其中一间作为临时隔离室，责令王同学交代反党材料，从这天起校园内有的大字报被全部撕毁，换上了全新的大幅标语。“坚决粉碎陈、王向党的猖狂进攻。”，“揪出陈、王为首的反革命分子是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陈、王必须向全校师生低头认罪”等等。大幅标语的口气，来势汹汹，确有 57 年反“右派”时的那种气派。工作组勒令王同学交代反党罪行，这位小将在白纸上写上了豪情满怀的词句：

昨天，我还是搏击长空的雄鹰，
今天，我成了跌落深谷的鸟雀，
明天，我将是展翅万里的鲲鹏。

1966 年 8 月，这是中国政坛上很不寻常的岁月。

8 月 1 日，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同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8 月 5 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谈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用心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右”实右的错误倾向，它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8 月 8 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 月 10 日，毛主席会见首都群众，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8 月 12 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主席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

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并发表了“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的讲话。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接受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检阅。”

中共中央在8月党的会议上，作出了重大决策，颁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毛主席的亲自号召，讲话，鼓动了红卫兵起来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这些都成了革命小将强大的精神武器。这个无锡市一中的王同学等自然地从“反革命”的帽子下争脱出来，对文革五十天中所受的委屈，以百倍的仇恨发出了他们继续战斗的“宣言书”。

“战鼓咚咚，红旗飘飘。”

在这振奋人心的日子里，喜讯频频传来，所有这一切是那样激励我们去战斗，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如雨露，滋润着我们干裂的心田；像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坚决打到哪里，我们最爱毛主席，永远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强烈的革命愿望，使我们积极投身到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大风大浪不可怕，我们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经受考验，增长才干，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经风雨见世面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游泳难免要吃水，前些日子里，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往我们头上乱套，他们说我们要“暴动”，骂我们“狂妄”，还污蔑我们有“反党野心”，他们趁机进行阶级报复，揪住我们工农子弟不放，肆无忌惮地整工农子弟的“风”，把我们的行动污蔑成“妖风四起，乌云翻滚”，他们转移斗争目标，在学生中进行大混战，他们实实在在地对贴党支部大字报的革命师生进行反革命的大围攻，大镇压。

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阶级仇，血泪恨，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比忠诚，我们是天生的“大头”，“反党”“反革命”的

帽子显得实在太小，是戴不上我们的头颅的，我们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能做到甘洒热血，甘捐身躯。

有人认为，给我们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加了那么多的压力，造了那么多的谣言，进行了那么多的批斗，我们就会安分守己了，缄口沉默了。告诉这些人，你们完完全全地想错了，我们要继续战斗，要坚强地战斗，更聪明地战斗，战斗就是我们的生活，压是压不服的，吓是吓不倒的，我们要继续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敢想，敢说，敢闯，敢造反，敢革命，坚决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到底，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阳光照耀下，忠实地贯彻《十六》条，为三大任务而战斗。

为把我们的学校办成抗大式的共产主义学校而战斗，这是我们的行动和准则，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造自观世界，跟全校师生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共同战斗！

我们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红卫兵！

我们誓做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无锡市第一中学高二丙班《红卫兵》战斗小组，1966年8月15日

这个中学的造反“红卫兵”，在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重压下，杀出重围在与“老红卫”的对立中诞生了。

无锡市唯一的一座高等学府……无锡市轻工学院坐落在惠山相连的青山弯，66年5月开始，由校院党委书记陈德钧，从北京回锡向全校师生传达了有关中央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在陈书记的传达中，所谓文革只准批“三家村”“四家店”，处此之外，宣布了“这个不准”，“那个不准”一条列“不准”的规定，陈书记在传达中的条条框框，引起了许多师生的质疑。直到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学者”，“专家”，“权威”祖师爷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威风扫地。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号召群众起来造党委的反。同时毛主席又称他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代表党中央喉舌的“人民

日报”发出了毛主席发动群众起来造反的号召。由轻院 631 班的学生首先站出来，在校园内贴在了第一张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他们也经历了无锡市一中一样的激烈斗争，贴大字报的学生被打成了“反革命”争论斗争，直至 6 月 26 日，由市委副书记吴镇来到轻院，发表了他对大字报“不反对”，“不支持”的观点，在轻院内宽大的讲台上，全校师生经过了一整夜的大辩论。在辩论结束后，代表院党委的领导发出通知，把一切支持党委的师生全部集中。与此同时，凡坚持造党委反的师生员工也同样发出通知全部集中，二派不同观点的师生阵线分明。坚持造反的师生以大辩论的日期为标志，建立了轻院“6.26”造反兵团，要革命的师生为了他们取得合法地位，又被迫步行北上告状，直至南京后返回，以后将“轻院”改名为“长征大学”。在大辩论中击败了工作组所推行的“资反路线”及保皇势力的围攻，全市各学校的造反红卫兵揭竿而起，成立自己的造反集体。

无锡市轻工业学院为“长大 6.26 造反兵团”

无锡市一中成立“红革会”

无锡市二中为“七.五造反兵团”

无锡市三中为“红旗造反兵团”

无锡市二女中“红革会”

抗大财会战校“毛泽东思想”一反到底战斗兵团

锡师：“8.18”

机床“4.15”

印染厂“锡印九、一九”

.....

这些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无锡市成立了他们的总部-无锡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从此，他们以红卫兵的战斗集体出现在无锡文革历史舞台上。那些原先在各级党委一手扶植起来的以对过去的“地富反坏右”实行抄家、挂牌为“斗争大方向”老“红卫兵”们，或者加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或者成为逍遥派，或者成为一些人用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在无锡文化大革命中这支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红卫兵中，轻院“6.26”兵团是他们的老大哥；在文革的历次斗争中，轻院“6.26”兵团发

挥了强大的作用；这就自然地使轻院“6.26”兵团成为无锡文革的“龙头”。故而“六派”，就成了无锡造反派的代名词。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天中，由刘少奇的路线，将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小将们经受了批斗压制的无情打击，再由毛主席将这一大批革命小将和造反派从受压制，打成“反革命”的绝境中解救出来，“爱”与“恨”的阶级感情不言而喻的产生了。

这些红卫兵们，自然痛恨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心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三、文革中的中共无锡市委

文革初期，中共无锡市委领导班子是由以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 12 位常委组成（市委常委原来是 13 名，文革开始后，代表人武部的常委吴体仁退出了常委会议）。除韦永义外，还有江坚（市长）、吴镇（市委副书记）、田洪（副市长）、张再生（副市长）、马健（副市长）、孙富中、克宁、徐静渔、杨增、宗毅、任贵发等人。

市委书记韦永义中等身材，解放初期当过地方军区司令，是个有少将军衔的九级干部。在文革中，保守派开始死保他；后来，因为他能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造反派，保守派又抓住他加入过国民党这一点（他在历史上曾经按共产党的指派打入过国民党内部），企图将他定为“叛徒”。

市长江坚，身材矮小，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他在文革前，主抓全市的工交工作，为无锡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因为他平时工作时习惯对下级训斥，态度不好，所以“人缘不好”，文革中被人称为“江坚老贼”。

副书记吴镇，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相貌堂堂，讲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本当是内定省委领导的接班人，来无锡任职是下基层锻炼的。在文革中，支左部队领导原准备让他出面支持市内工作，但因为他按当时共产党中央精神办事，没有污蔑造反派，而表态“二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就违背了无锡支左部队主要领导的意图，故而他在文革被打成“黑手”，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最后家破人亡（妻子被逼死，子女流离失所）。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势不可挡地席卷无锡。面对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这批市委干部来感到一片迷茫。平心而论，在一定时间内他们也弄不清文革究竟是

怎么一回事。作为党政干部，有他们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一切运动、生产建设，都有中央发出的文件，逐级向下传达，先党内后党外，这是多年来的工作程序。而在文革中，共产党中央的政策、方针和方法，许多都是直接由媒体传达的。文革初期由刘少奇主持工作时下达的有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是把“文革”的主要对象指向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而后来，共产党中央又公开说“文革”的主要对象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叫他们感到难以适从。这是客观的外在因素。另一方面，他们在过去进行的“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的对象都是指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在这样的主观客观条件下，作为地方党政领导，按文革初期的文件精神，派出工作组，走上一条压制群众运动，将革命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的“资反路线”道路，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他们先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大、中学校控制学生运动，续则暗派“联络员”进驻工矿企业“控制”工人造反，再扶植“保皇派”与“造反派”相抗衡。这是文革初期无锡市委的主要表现。

在文革中期，特别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才从迷茫中逐渐地清醒过来。无锡市委先委派吴镇进轻工业学院，委派田洪进市一中等学校，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做一定的安抚工作；以后又派马健作为市政府与“红总”之间的联络员。他们是在寻求一种既符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又能避免各种矛盾激化、维持无锡市的社会秩序的办法。无锡市委的这一批当权派在混乱复杂的环境里，为党的事业和恢复政府的职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当时无锡市以“红总”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也看到了这一点，对他们的处境和所作的努力表示了解和谅解。因此，在无锡文化大革命中，代表无锡市委的12个常委，与以“红总”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相处过程中，除了受到过按政策进行的“批判”、“审查”以外，没有受到过象现在有些“文革”小说中出现的那种虐待。

“9.2”事件，66年9月2日，由无锡“抗大一机校”的红卫兵小将揪斗他们的当权派而去市委施加压力逼市委表态，要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在市委的指挥下，最后在“老红卫兵”等保守势力的围攻下，以失败而告终。

“9.3”大慰问。66年9月3日，在无锡市委的指示下，发动了全市工矿企业中的工人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向市委“慰问”，参加慰问的队伍红旗飘飘，呼喊着重“誓死保卫市委”的口号，声势浩大的游行，以压倒一切的气魄，显示了“工人阶级”保卫党委的巨大威慑。力量的相比之下，上百名红卫兵小将就变得“势单力薄”，在短暂的几天里“坚决支持无锡市委的正确领导”，“誓死捍卫无锡市委”，“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等大幅标语，大字报贴满了锡城市中心的“三阳”街头。造反的红卫兵一下跌进了深谷。

四， 工人造反

无锡市委首先动用了“工人阶级”，围攻红总兵。同时也等于无锡市委作了工人造反的“催生婆”，使无锡的工人造反走在上海工人之前。

无锡市中心“三阳”街头，有一处以无锡特色的“拱北楼”面店。这个面店正好是大字报的“闹市区”，对大字报的争论，进入人们的眼帘。客观的现实必然地进入人们的大脑进行“思维”，然而再产生大脑对客观事物作出不同的反映。这是很正常的所谓从“感性”向“理性”的发展。在这个面店里有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职工，他的真名叫曹桂宝，初中文化，文革前在这种服务行业里的初中生已经算得上是个“小知识分子”了，他还是一个“党报”（无锡日报）的通讯员，他的文化程度在大字识不得几箩筐的老职工眼里，小曹这个人他是有知识，有见解的人物。于是在早市忙碌以后的空余时间里，职工们拉了个板凳，坐在一起，喝口茶，叼支烟，闲聊起来，老职工开口：“唉，小曹，你对当前的形势如何看法？”小曹根据历史上学生运动的性质，及当前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明朗地表示：“学生当然是无罪的。”这一鲜明观点，小曹他非但在口头上表明了他对“9.2”事件，“9.3”慰问的看法，还竟然将他的观点，以他“卜岩”的笔名，写成了“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贴上了“三阳”街头。这张在全市工人中第一张支持学生的大字报似一枚炸弹爆炸，震动了全市，轰隆隆地热闹起来，许多人要找这个“卜岩”辩论，从这时起，就在“拱北楼”的店门外面，在老红卫兵破“四旧”中从许多人家中搬来的不少“寿材”（是尚未亡故老人备用棺材）因为不是“破四旧”中的金银珠宝，古董玉器，名人字画而可以入库，所以堆集在“三阳”街头的人行道上了。堆边上搭起了临时的木台，作为“大辩论”的讲台，晚上灯火通明，那些市民，下班后的工人，人山人海地围挤在台下，

都想去听听双方辩论的观点。在这个“论台”的附近，有人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蛋儿混蛋”的对联，这种鲜明的“血统论”者代表了文革中的一股势力。在辩论的现场，谁想上台发表观点，台下先有人发声质问：“你什么出身？”如果上台人回答：“工人”，或“贫下中农”，这还可以让你说话，如果说：“出身小业主”（当时属于“地、富、反、坏、右”出身中的人是不敢出来讲话的。）台下立即吼叫：“滚下去！”

这种大辩论的热潮也吸引了身在铸造一厂的陆渭文，每天晚上中班下班后的午夜 11 点前后，还踏了自行车去辩论台前听听造反的观点。

“辩论”至 9 月下旬，卜岩等人压力重重，于是在辩论中结识的志同道合者联合起来，总共集结了 81 人，有工人，学生组成一个小的战斗集体，取名为“星火战斗队”，队长是江汛，指导员是卜岩，韦晓鸣是卜岩的所谓“秘书”，“星火”之名，当然意味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含义。步行上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无锡文革的情况，这支“星火战斗队”到达北京后，受到了国务院接待站的接待安排，并且还赶了毛主席在天安门第四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的盛况，这一下他们受到了鼓舞，造反的劲就更高涨了，他们完成了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汇报”任务之后，于 10 月 26 日返回无锡，仍在“拱北楼”门口的台上向全市人民“汇报”，“我们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红光满面，身体健康，毛主席支持我们红卫兵，造反派一起来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台下的听众不断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有许多没有见过世面的群众在台下发问：“我们没有地方设立我们造反队的办公室，怎么办？”这位年轻的“卜岩”也正是“大胆妄为”，果断地回答：“抢”。“我们没有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怎么办？”“抢”。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在造反派的嘴里，尊称他为“卜司令”，而在不同观点的群众嘴里就称他为“抢司令”。当然这个“抢”字人们十分理解当时的特殊含义，只能是指去抢为文革服务的办公用品，而不是唆使人去抢他人的钱财。无锡广大群众由这帮从北京毛主席身边回来的人口中得到了启示，壮大了胆，从此在无锡的许多工矿企业的职工，赶走了市委派出的“联络员”，纷纷揭竿而起，所谓“抢”只是壮了“造反”的胆气，实际上全市所有造反队的一切用品均有本单位当权派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战斗队”“造反团”似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地面。

10月26日，由“星火战斗队”的秘书韦晓鸣，根据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发来的函件精神与无锡市人委（市政府）副市长XXX谈判经市人委批准成立“无锡市红色造反军总司令部”后改成“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在三皇街“工人俱乐部”树起了“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的造反大旗，第一届“红总”中心组人员由卜岩，江汛，李希生（钢铁厂），何达明（国棉一厂），袁向东（建筑公司）周炳荣，等人组成。“红总”下面的造反队员，根据何达明的建议，因为这次运动，工人阶级是这次运动的“主力军”这一层意思，所以称为“主力军”。“红总”的成立，下面各基层同观点的造反组织纷纷前来“挂钩”，“红总”的造反势力不断壮大，没有多长的时间，“主力军”队伍竟发展到十万之众。其他还有与“红总”同观点，但又各自为政的造反组织，如占市内第二位的“野战军”，由名叫周雷的工人当“司令”；“挺进军”“司令”果品公司的蒋俊，代表失业工人的组织“10.18”，“亦工亦农”“造反兵团”“红色公安战士”“无锡市机关革命造反团”“红艺兵”等等，一时间真是司令多似牛毛。

在无锡文革历史上，一张“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拉开了无锡工人运动的序幕，是由学生“红卫兵”运动转向工人运动的划时代转折。“卜司令”是“有功之人”？还是“罪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卜司令”为此而二次跌进监狱，他的行为如果不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落在真正的国民党手里，恐怕早就成为“烈士”了。

66年11月初的一个午夜，在无锡市铸造一厂的铸工车间工人下班时，全厂的路灯突然全部熄灭，暗洞洞大炉工段的陆渭文等人骑着自行车在向厂门口踏去，突然发现在厂区的阴暗处开出了二辆草绿色的小吉普车，关闭着车灯，偷偷地溜出厂门，陆渭文同他一起下班的工友便踏着自行车加速追赶，二个轮子是跑不过四个轮子的，不一会吉普车在夜色中消失。事后才知道，当夜是保卫科偷偷将全厂职工的档案材料运出厂去，目的是防止起来造反的“牛鬼蛇神”抢档案，这时在当权派眼里对“阶级敌人”的高度警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他们心里怕啊，在大约过了一、二个月，在造反派控制了局面的时候，还时这个造反头头陆渭文将这批档案“完璧归赵”地送回厂里，这时接到归来档案的保卫科科长才

感慨地说了，如果这批材料真的遗失了，特别是厂内十多份重要档案，那我真是犯罪了。

当陆渭文等人追不上那二辆吉普车之后，心中不免产生了“恐怖感”。于是第二天上午就去了“红总”反映了自己厂内见到的事。“红总”的人就建议，你们可以上北京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陆渭文当时就决定与同厂的锻工顾XX俩人立即“赴京告状”，从无锡买了二张到南京的火车票，正好赶了红卫兵串联的列车。车厢里人头拥挤，塞满了身穿草绿色旧军服，臂戴“红卫兵”袖套，肩上横挂着绿色小包的青年学生，车厢的座位上，地上过道，座位的靠背上，甚至在车厢顶部的行李架上都塞满了人，车厢的进出口已无法通行，只能在火车的窗口爬进爬出。在北上的红卫兵列车上充进了二位年轻的工人“老大哥”，列车开开停停，几乎经过了二天多时间，才抵达了首都--北京城，陆，顾二人抵京后，找到了无锡“星火队”驻京联络站，第一次结识了卜岩。以后再上国务院接待站，由国务院接待将陆顾二人安排在招待所，大米饭，土豆粉丝炒肉片的大锅饭，陆顾二人在向国务院反映了一些无锡的情况后，走进过清华大学的校园，看到一些校园内的大字报，在天安门附近的大街上，已经见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陆渭文领悟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含义。在北京这个免费吃住的五、六天中，使陆开了眼界，于是就返回无锡，在自己的工厂里，第一个贴出了“控诉党委对我的迫害”的大字报，将文革初期在党委发动下把自己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的怒气一瓜脑儿的吐了出来，并把“四清”时揭露某些厂领导的阴暗面全数地向全厂职工作了披露，并在厂内组织了第一个造反队，取名为“保卫毛主席敢死队”这个“敢死队”不吉利的名称，在文革中后期一名头头鲍惠兴在被对方抓去后活活打死，尸体抛进太湖，一名队员任永泉在清队时被迫害自杀身亡。成立了造反队并与“红总”挂上了勾，随着造反形势的发展陆渭文被革命的浪潮推上了“四兵团”（重工系统）头头的位置，直至67年1月进入了“红总”的中心组，成为“红总”宣传部负责人。红总第二届中心组成员，由：江汛，殷松勤，李希生，袁菊余（袁向东）。第三届中心组成员，由：政治部金坤泉（党员），钱祖根（党员），殷松勤（党员），陈胜度，陈志文。宣传部陆渭文，后勤部周炳荣等人。

五，“12.4”事件

66年12月4日，这是无锡文革历史上，在工人内部“革”与“保”的第一次直接没有流血的冲突。无锡“红总”等造反组织，在中央至地方没有明确可以组织“造反派”的形势下揭竿而起以后得到中央政策上的允许，被地方政府及人民群众承认。在这种形势下，那些曾一度按党委步骤办事的群众，才敢公开组织自己的队伍，以有组织的集体与造反派对抗，他们先后以转复军人为主体的组织了“五军”，以工人为主体的组织了“工联”。以66年12月1日，“工联”在看不惯“红总”到处揪斗老干部，并任意挂牌，戴高帽子等革命造反行为的指导思想下[王德冀所著，长篇小说《清清太湖水》如是说]，宣布成立，革命不分先后，他们树起“造反”大旗，也是他们在文革中应享有的权利，12月4日下午，他们集中了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市委大院，强烈要求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呼喊“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强烈抗议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等刺激性口号，和大幅标语，激起了主力军的极度反感。

当“工联”的游行队伍进入市委后，一队“国棉二厂”的“红总”造反队员，举着《欢迎国棉二厂的“工联”队员回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幅标语，亦进入市委，当即被“工联”的队员围困了起来，有人报到已搬至原“总工会”的“红总总部”，并同时找来了市委书记韦永义和市长江坚，“6.26”的浦湘海也已赶到“红总”，几位头头在市委头头们在场的情况下，当即开了紧急会议，

因为“国棉二厂”的部分主力军被包围在最中间，无法脱身。为及时解救他们，先是由“卜司令”带了二名造反队员，从市七中挤进市委大厅，轻院的“6.26”浦湘海因为是学生，从大门进入市委，江汛从市委后门进入，这些学生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头头们，希望找到“工联”的头头们，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次冲突，结果遭到了围攻，愤怒的拳头，落在“卜司令”的身上，副市长顾玮璜为解救卜岩，以自己的身体拼命护着，戴在手上的上海牌手表也在混乱中被打落，并始终没有找到。这里已不再有大辩论的场合与条件，难以以谈判达到和解。

与“卜司令”一起进入市委的两名造反派队员，许建平，王国忠翻墙逃出包围，向“红总”讨救兵，“红总”派出了主力军的筑建兵团，和港务队等，同时许多单位的主力军亦问讯而赶到现场，救出了被围困在市委小礼堂的“卜司令”，同时，外三层，里三层地将市委围个水泄不通，围困整一夜，“工联”队

伍中的那些受蒙蔽的女工在露天树阴下熬过了冬季寒夜的霜冻，大院内到处是大，小便之类的污物，在这第一次较量中，最后“工联”群众以失败而告终。

紧接在无锡文革历史上，出现了第二轮的挂牌游街风，从北京悄悄地吹进无锡城，不过这次被戴高帽子，挂牌游街的对象已不是那些“地富反坏右资”，而是挂着“铁杆老保 XXX”“叛徒走资派 XXX”的字样成串地在街头上游走遭到群众批斗。

67年1月初，无锡“工联”与上海“赤卫队”互相呼应准备数万人赴京告状，无锡“红总”接到上海工总司的电话，请求无锡“红总”配合上海工总司拦阻这批庞大的“告状”队伍，无锡“红总”派出了交通系统的主力——“海燕兵团”等队伍，从锡沪路开始，一直到无锡市区“五爱广场”拦阻了上海“赤卫队”六卡车的“上京告状”队伍，由铁路走的上海“赤卫队”经过南京时，在南京饭店被南京的群众组织阻击。结果为此事上海一个“通令”北京的一篇“社论”使上海“赤卫队”和无锡的“工联”土崩瓦解。

同是工人阶级的”工联”兄弟姐妹，何以在文革中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是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和认真总结的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尽管，在”工联”成立的一开始，作为市委书记的韦永义就已经表态，你们[工联]是保守组织，我们已经在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你们保市委和各级党委实实在在的是帮了倒忙，请你们理解市委的立场，市委是不能支持你们的，还有”五军”，你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是立了大功的，党和人民是感谢你们的，但你们同样不要帮倒忙，希望你们尽快解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和疗养好自己的身体，要不断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红总司令卜岩在与五军司令郑挺谈判时，韦永义书记当面对郑挺说的，那是在1966年11月份12.4事件前夕]。所以，一开始，无锡的造反派就认识到无锡市委只是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只要检讨得好，又在行为上与刘，邓资反路线划清界限，广大造反派群众是会原谅他们的。

现在有人说，许多人都喜欢，赞赏的美国，美国也在包容和欢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的问题上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可以容纳”6.4”自由主义精英们，但决不会容纳文革中坚持毛泽东

思想的造反派，以至于象上海潘国平这样的造反英雄，也不得不以美国”反共产主义斗士”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六， “741” 轮船会议

67年1月，所有的造反派神气了，在大街小巷的人群中几乎人人左臂上套着各种名称的造反队员的红袖套。由于受到内外冲击的无锡市委，市人委（市政府）瘫痪了，书记，市长和他们的常委们已转入“地下”，所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都躲在家中观望，一部分即使想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也已无法正常工作。社会一度进入“无政府”状态，处于“权力的真空”，但全市的生产，人民群众的生活还要继续下去，群众中的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东家家中夫妻相骂无处调解，西家家中自来水笼头坏了，无人管理，一切发生的事都到“红总”去求解决，大有“一切权力归农会”的趋势，这怎么得了？而“红总”及其下属组织也只能应付，而无实际解决能力。有责任感的造反派急需政府出面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企求支持原市委，市人委（市政府）领导恢复他们的工作。当时正值周总理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明确指出，在那些不能夺权的地方，可以由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对市委，市政府进行监督，促使机关工作正常运转，“抓革命，促生产”。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吹到无锡，无锡“红总”等群众组织，根据无锡的实际情况在无锡市委内“走资派”不明确的这一实际情况，决定按周总理的讲话精神，不采取上海的夺权方式，由无锡市机关兵团牵头联络“红总”“野战车”航运公司的“海燕兵团”，轻院“6.26”兵团，等群众组织与无锡市委书记韦永义进行一次会晤，目的是想听听他的意见，探讨无锡未来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恢复正常秩序。

67年1月上旬，在上海“一月革命”的第二天，原定参加与韦永义会晤的群众组织没有到齐，到会参加会议的人员由市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野战军”的周雷“海燕兵团”的姜文泉，轻院“6.26”兵团浦湘海，“红总”负责人江汛缺席，会议是在航运公司的一艘编号为“741”的轮船上进行，故而历史上称为“741”轮船会议。

待人员到齐，已近上午10点，当时韦永义身穿黄呢军大衣，戴着军帽和红领章，身边还带着一名市委办公室的秘书，正式参加会议的共五人，为了排除可能发生的干扰，“741”轮船从大洋桥登船走运河向西行驶，船边行边议，

通过“大扇口”行将进入太湖，会议由周雷支持，徐志纯介绍了上海“一月革命”的情况，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精神，以及“机关兵团”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者的分析和看法，提出了无锡市群众组织不能照搬上海的夺权模式，而是要根据本市党政领导干部的实际，没有足够的证据认定谁是“走资派”的情况下，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先由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对市委，市人委（市政府）实行监督管理，让市级党政机关的所有各个部门和全体人员正常上班，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抓革命，促生产”，对那些有问题的干部该批的批，该斗的斗，该工作的工作，使机关的工作正常起来，解决无政府状态，以恢复全市的生产秩序和市民的生活秩序。一席话表示了造反派的一番诚意，其实对于一个无锡党政的老干部出于他们对党的工作的责任性，他何尚不想尽快地结束当前的混乱，早在 11 月份韦永义已经和“红总”头头卜岩吐露过希望造反派能支持他们工作的心愿，这时群众组织提出建议，可以说正合韦永义的心愿，所以双方很快达到共识，并进行了一系列实质问题的讨论，会议一致同意。

一，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红总”，“6.26”“野战军”，“机关兵团”，市一中“红革会”，市二中“七、二、五”兵团，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抗大临革会”，等十七个群众组织组成。

二，由机关兵团支持起草“监管会”文告，根据韦永义提议起草文告可与市委副秘书长邓平一起商量（后由邓平起草了三个文告）

三，立即召开一个有十七个群众组织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共同参加并承担监督管理的重任。

“741 轮船会议”的（第二天 1 月 20 日）第一次十七个群众组织联席会议如期进行，会议地点设在轻院“6.26”总部，由浦湘海支持会议，徐志纯讲了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及如何开展工作等要求。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在无锡市实行对市委，市人委进行监督管理，以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1 月 22 日上午，第二次十七个群众组织的联席会议在机关兵团会议室进行与会者一致通过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督管理委员会”组成的勤务组，组长由“红总”的江汛担任，副组长，有浦湘海周雷，徐志纯，在监管委员会下设办事组，分市委监管组和市人委监管组，分别负责对市委，市人委各部门

进行监督管理，与会人还一致通过了“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 1、2、3 号公告，并确定 1 月 23 日上午八点，在市机关小礼堂召开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当天上午会议一结束，全体机关工作人员欢欣鼓舞，立即进入各自的办公室，开始准备工作了。

1 月 24 日 25 日两天，市委全体工作人员秩序井然地到机关上班。

1 月 25 日早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解放军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社论，人们奔走相告，中央要派解放军到地方参加“三支二军”的喜讯，全市人民欢欣鼓舞，1 月 25 日下午，联合监管会成员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等人满怀希望携带着“联合监管委员会的 1、2、3、号通告，前往 27 军军部请示汇报，尤太忠军长亲自接见的还有军部保卫处长王明清，和参谋林镇廉等 4、5 人，尤军长听完徐志纯的汇报之后，当即表态”你们这种联合监督管理，是不彻底的革命，是改良主义的，我们不能支持，你们如象上海造反派向走资派那样夺权，我们坚决支持。“支左”部队的首长简单地表明了他们的观点，没有任何商讨的余地。一个造反派企求恢复正常秩序的良好愿望，从此“流产”了。“741”轮船会议被定为“和平让权，联合办公”，在清查”5.16”的过程中，又定为了无锡造反派的”5.16”一大罪状。

如果当时能够按照无锡造反派与原市委领导达成的协议，用成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办法处理文革期间的社会秩序，无锡的文革中可能不会出现以后发生的那些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实际上，无锡驻军介入地方文革前，无锡市的社会秩序是相对稳定的，虽然发生过几次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但都是不流血的冲突，冲突中没有死过一个人。

自从无锡驻军介入无锡地方文革以后，无锡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失衡了。由于部队的各级领导中，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不多，对文化大革命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为数不少。这种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上混乱的思想经“支左”带到地方上后，使地方上的文革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有些原来可以用辩论、用示威游行等比较文明的方式表达的意见，变成用刺刀和枪杆子来表达意见了。从此，灾难降临到了无锡造反派和无锡人民的头上。

就如李宪源先生在其文章中所说，“受地方与军队干部之间同类利益关系的制约影响，实际出现了军队几乎全面“支右”的情形。从中央到地方，以军

队为主角对群众批判冲击当权派作出强烈反弹的“二月逆流”，不仅颠覆逆转了“一月革命”的大好形势，反而在全国造成了更大规模失控形势，直接导致了军队所扶植的“新保守派”跟中央文革支持的“老造反派”，在 1967 年夏季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混乱局面。”

“就本人非常熟悉的无锡家乡文革情形看，“一月革命”时的形势可以说非常之好，全市各行各业造反派已经自觉形成“革命大联合”的基本势态，并且参照《人民日报》有关外地“夺权”经验的介绍，难能可贵地排除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之“极左”思潮干扰，遵循“团结两个 95%”的中央指示精神，与受到群众冲击但已经初步认识到文革正面意义和“资反路线”危害的原市委领导班子，达成了不搞“一锅端”、不搞“改朝换代”的协议草案，而是维持市委机关正常运作，造反派派代表全面进驻市委大院实行民主监督，构成了一种后来被军方指责为“和平让权、联合办公”的“夺权”模式。面对“资反路线”制造“停产、停电、停水”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的政治反扑，全市广大工人造反派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学生造反派深入工厂与工人造反派一起劳动、一起学习讨论中央文件、一起开展“斗、批、改”。受“资反路线”蒙蔽煽动脱离生产岗位的保守派群众，也逐步醒悟反戈一击，纷纷自愿返回原单位上班工作，各行各业和公交战线生产正常秩序井然，市民们政治热情高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文革初期因为独立思考和看不惯单位领导官僚习气受到迫害打击的受害者们，得到彻底平反昭雪，重新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有的个人尊严，一曲“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的颂歌，常常会让他们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热情燃烧岁月的人，恐怕真是无法深切领略体会“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节日”的那种滋味！

令人惋惜的是，在北京文革高层精力有限、情况不明、防止失控思想等多种因素指导推动下，一道“一刀切”的军队加入地方“支左”命令，却在无锡引发了与全国各地大同小异的镇压造反派“二月逆流”历史倒退，不仅断送了上述一派大好文革形势，而且种下了而后两大派分裂和血腥武斗的政治种子和起始缘由。”

这是江苏无锡地区当时“文革”形势的最客观描述，也是一条十分值得总结的文革经验。

人民解放军解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对全市人民来说心中都十分喜悦，“喜悦”的出发点首先在文革前解放军在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其次在造反派方面认为自己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左派”，他们期待着解放军能按毛主席的指示，支持自己，在部队的支持下尽快地使社会生活进入正常化，而“工联”的群众心中同样是万分高兴，他们知道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的救星到了。

在苏南地区能够有资格参加“支左”的部队有哪些呢？毛主席曾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有枪就有权，枪多权大。苏南地区最有力量的是属南京军区管辖的 6410 部队，军部在无锡，79 师在苏州，80 师在无锡，81 师驻镇江地区。其次省军区在镇江属空四军的 15 师在硕放机场，硕放空军的驻地在无锡与苏州之间，空军在文革的后期也加入了“支左”，凭军事实力，在苏南地区支左的当然是非 6410 部队莫属。

在 67 年 1 月下旬，先由驻军代表进入“红总”，在铁道兵团所在地和“红总”的中心组成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向“红总”了解了目前“红总”中心组成员的名单，及这些中心组成员的个人情况。

在部队参加“支左”后的日子里，“红总”总部不断听到原“工联”的群众前往军部设立的接待处去“控诉”造反派对他们的种种迫害，还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去“控诉”造反派的成员中还有许多是原驻锡部队的随军家属，大概在他们去反映的情况中，可能漏掉了文革初期，自身死保各级党委和自身的利益如何去揪斗“牛鬼蛇神”这段历史中，曾一度充当了“资反路线”的打手。他们去反映情况，自然会激起部队的“阶级感情”，同时作为军人，从首长到战士，他们也是人，也有思想，他们每个人的思维能力，在未参加“支左”之前，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切，早有了他们的观点，最主要的部队上面有军区领导，军区上面还有老将们的观点影响。

一、取缔“红总”

66 年 2 月 8 日，“支左”部队首先以武力取缔了无线电厂“1022”主力军基层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并逮捕该组织头头周 XX。

2 月 X 日“支左”部队宣布湖光仪器厂主力军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逮捕“坏头头”。

2月X日“支左”部队宣布建材仪器厂主力军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逮捕“坏头头”。

这一文革动态首先由敏感的学生组织“长大6.26”兵团察觉，他们召开了“中心组会议”研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作出了必须对“支左”部队目前的行为作出反响，于是他们派出他们的联络员冷老师，向“红总”通报了他们学生方面决定在2月16日这一天举行全市红卫兵上街游行，以示抗议。

从这时候起，无锡文革中形成的造反派队伍开始分化了。其实，驻锡部队一些领导人采用的这种手段，对无锡其他的一些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也采用了。只是绝大多数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认为，部队镇压无锡工人造反派组织是错误的，如果屈服于部队的压力，这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背叛。无锡绝大多数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坚持原则，坚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信念，毫不犹豫地参加了“2.16”大游行。1967年2月16日，数万无锡红卫兵在无锡大街小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在游行中高呼：“坚决支持工人造反派！”“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

在这次“2.16”学生上街游行中，原先以“9.2”事件中出了名的“抗大一机校”的红卫兵事先得到了“支左”部队中的宣传处长王晏的警告，王晏说如果你们也参加这次行动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他们的头头在王晏的警告下屈服了。于是非但决定不参加游行，而且在行动上向支左部队倾斜，在以“6.26”为首的学生游行时，在大街上刷出了“6.26的大方向错了”的大幅标语，这种屈服于压力，见风使舵，实在是识时务的聪明人，因为这种识时务的俊杰，使他今后能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因为他的聪明日后投靠更大的后台，最后被定为“三种人”而被赶下了历史舞台。“2.16”的学生游行，他们不断地高呼“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的口号。

2月17日，“红总”方面集中了三、四千的主力军队伍，前面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紧跟着由“红总”宣传部负责人陆渭文扛着“红总”大旗在前面领头开道，从学前街“红总”总部门口出发走中山路，崇宁路，经市公安局门口，绕道返回，游行队伍一路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在无锡文革历史上“2.16”“2.17”二天的游行被定为“反革命游行”。

学生与工人的二天游行之后，“支左”部队也作出了反响，部队出动了数十辆全付武装的军用卡车游行，并配有数十辆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高昂激烈的词语要坚决镇压“反革命”。镇压，镇压，再镇压！打击，打击，再打击！

2月28日中午，支左部队一个武装连包围了“红总”由无锡市公安局配合宣布“红总”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当场逮捕了“红总”主要负责人金坤泉，江汛，周炳荣三人，把“红总”工作人员的自行车堆集在一起拍成照片，把“红总”向市委领用的经费摊在桌上拍照，这些照片就是“红总”“抢劫”财物的“罪证”。“红总”这个造反派的“龙头”被砸烂了，原“工联”的人员，弹冠相庆，各单会把主力军人员低头，受斗争批判。红总除三个主要头头被抓之后，其余工作人员数十人被公安局集中审查。无锡发生的事并不是孤立的，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取缔造反组织，在北京出现了众位老将与副总理“大闹怀仁堂”反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事件。

中央斗争的反复，反映到地方上，造反派是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批斗的受批斗，一时间数十万之众的造反派“万马齐喑。”早春三月，太湖之滨寒气袭人，而此时的人心更冷，造反派由地面转入地下，原“工联”人物由地下进入面上，一个天翻地覆。

附四十年前文革，〈红总〉中心组成员老照片四张

二、二中“七.五”树战旗“红无锡报”静坐

经过1967年2月到3月的逮捕、审查和批斗，除了上面所说的以邹海根为代表的“红卫兵”外，无锡的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几乎全部解散了。无锡的文化大革命就象被春寒打蔫了的秧苗，没有一点儿生气。

1967年4月，正好是农历的阳春三月，这是个百草回春、大地返青的季节。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周国彦、傅耀良等返回无锡，组织了“又来了”战斗队，把毛主席在北京怒斥“二月逆流”的春风带到了无锡城；在当时的人民日报等中央的报刊上，也出现了为造反派说话的文章。有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撑腰，被踩在脚下的无锡造反派又开始活动。一批以陆渭文为首的在公安局接受审查的“红总”工作人员也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除了上面所说的舆论情况外, 据当时 27 军宣传处处长在 2000 年写的“回忆录”中说: 尤太忠(27 军军长) 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会议安排他第二个在会上介绍 27 军“三支二军”中的经验。第一个介绍的是青海军区司令员赵永夫(全国第一个向造反派开枪的人)。他介绍取缔青海“8. 18”造反派的经验。他正在介绍时, 林彪突然来到会场。他宣布青海军区取缔“8. 18”造反派是“反革命事件”, 下令逮捕赵永夫, 解散军级干部会议, 立即在全国展开痛击“二月反革命逆流”的斗争。这一军队内部的军级干部会议的情况, 对无锡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月下旬, 骄阳当空, 火红的石榴花在阳光下照射下显得格外的鲜艳。一阵阵春风开始化解“二月逆流”在造反派心中留下的寒冰。受压的造反派要翻身, 要求解放, 可是, 驻锡部队仍旧不肯承认介入无锡地方文革时镇压造反派的错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政策, 造反派与部队发生矛盾时, 不能采取对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办法。怎么办? 怎么样才能既保住驻锡部队的面子, 又能督促驻锡部队纠正所犯的错误。无锡的造反派都在想办法。当时无锡市二中的一批红卫兵造反派(即“7. 5 造反团”)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在讨论中逐渐认识到可以从要求“红无锡报”(当时的无锡日报的名称)承认批判“6. 26”是犯了方向路线为突破口。这样做, 表面上是针对“红无锡报”而不是针对驻锡部队; 而如果“红无锡报”能真正承认了错误的话, 也就等于驻锡部队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这时候, 驻锡部队就会自己纠正前段时间所犯的错误的了。当时市二中的红卫兵认为, 驻锡部队只要能认识错误, 就会改正错误。但是, 如何能促使“红无锡报”承认错误呢? 你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 “红无锡报”不理睬你怎么办呢? 我们既不能采用不合法的手段, 又要迫使“红无锡报”回应我们的要求。无锡市二中“7. 5 造反团”的中心组商量了多次, 想不出一个好办法。这时候, “7. 5 造反团”的负责人匡建中在翻阅学校图书馆书籍时, 看到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仔细阅读了宪法。当他看到宪法上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结社等自由的条款时, 一个大胆的设想浮现在脑海中。他立即召开了“7. 5 造反团”的中心组会议, 在会上他提出: “红无锡报”在 2 月、3 月间发表了大批的攻击轻院“6. 26”兵团的文章, 这是攻击红卫兵小将的明显错误。我们可以抓住“红无锡报”的这个明显的错误, 贴出声明: 要求

“红无锡报”在三天内向全市人民公开承认犯了方向性错误;如果三天后“红无锡报”仍拒不承认错误,我们将采取革命行动。我们所谓的革命行动,就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内容写在标语牌,抬着这个标语牌去“红无锡报”社门口静坐示威。“红无锡报”一天不承认错误,我们的静坐队伍就一天不撤。由于这个办法中没有任何违反政策的过火行为,又能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设想得到了“7.5造反团”中心组全体人员的赞成,并讨论好了分批去静坐的名单、争取其他学校的红卫兵支持的联络工作等。

1967年4月23日,“7.5造反团”贴出了要求“红无锡报”在三天内向全市人民公开承认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声明;贴出3天后,“红无锡报”仍无承认错误的动静。“7.5造反团”又派人去交涉,“红无锡报”仍不予理睬。1967年4月26日上午,无锡市二中“7.5造反团”的第一批自愿去“红无锡报”门中静坐的队伍,在匡建中的带领下,抬着写有宪法条文的标语牌出发了。当二中“7.5造反团”数百名红卫兵在“红无锡报”门口静静地坐下来之后,无锡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在政策上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斗争开始了。当天下午,二女中红革会的红卫兵在沈红军带领下参加到了静坐示威的行列;市一中“红革会”的红卫兵在马金山的带领下支援了。紧接着,锡师“8.18”、八中“8.18”、二女中“红革会”、机床技校“4.15”、七中“4.23”、“抗大红旗”、抗大财会战校由李福阳带队下进入静坐现场,“农机红旗”等全市各中学的红卫兵纷纷起来声援,并自觉地加入了他们的静坐的行列。一批“6.26兵团”的大学生,也到现场,“九.一三”火箭造反司法部为中学红卫兵们的静坐示威维持秩序,防止外人破坏。红卫兵们的战旗一面面地增添,他们的队伍逐渐增加到几千人。当天晚上,经过参加静坐的全体红卫兵的代表讨论,决定除了继续静坐以外,自愿以绝食抗议的形式强烈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红卫兵们不顾白天的烈日和晚上的寒风,静坐绝食;从第二天开始,队伍中已经不断地出现有人昏迷倒地,但清醒着的人仍旧坚持斗争。4月底,静坐绝食仍在进行着。这时候,随着北京反“二月逆流”斗争的形势的明瞭,在27军干部内部对红卫兵静坐绝食的看法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与争论(表面上是以军政治部主任吴戈华为一方、以宣传处长王晏为代表的另一方)。由于受到北京政治形势的转折和地方上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27军委派了作战处的解经伦处长出面与学生代表匡建中进行了谈判。由于绝食,

谈判前匡建中已经接近昏迷。在接受注射了一支葡萄糖盐水后，匡建中向解处长阐明了学生尊重部队，同时又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的想法。经过 2 次谈判，解处长代表军管会承认了“红无锡报”在前阶段批判“6.26”是错误的，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谈判结束后，由各参加静坐绝食的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组成的临时指挥部宣布静坐绝食取得胜利。1967 年 4 月 30 日下午，几千带着疲惫的身体和喜悦的心情红卫兵，返回了各自的学校和家庭。这次静坐绝食胜利结束后，静坐绝食临时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加上“6.26 兵团”，开始组建无锡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红代会（筹），以此代替因被“二月逆流”的打击而自行解散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

如果说 1966 年 9 月卜岩一张“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轰动了全市，支持了受压的学生，为文革中无锡“工人运动”的提前爆发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那么 1967 年 4 月在“红无锡报”门口的静坐，是以无锡市二中“七、五”造反派为首的红卫兵在无锡文革中又一轰动全市的英勇之举。这次行动的胜利，不仅为轻院“6.26”兵团向“红无锡报”讨还了公道，而且实际上是为“红总”这个无锡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平反铺平了道路。这是学生支持工人，使无锡文革进入第二高潮的重要转折。

三，“红总平反”

“红无锡报”事件的中学生斗争的主题是为轻院“6.26”兵团讨还公道，实质上是在“资反路线”围剿造反派的包围中发出了“反围剿”的冲锋号，杀开一条血路，为“主力军”的平反铺平了道路整个“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红总”平反已是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聪明的支左部队主角王晏，想出了新花招，在 5 月份，他先找原“红总”中心组成员殷松勤等人去 27 军军部，找他们谈话，他的谈话要点是企求让殷松勤等人站出来，作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用原“工联”的群众作为核心班底，重新建立造反组织，“我们部队支持，一切费用等由部队解决。”殷松勤是由建筑系统推荐到“红总”的代表，35、6 岁年龄中共党员，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为响应毛主席号召，像参军一样怀着一颗保卫国家的赤子之心，投入了文革运动，出于对毛泽东的发动文革的理解，有自己的信念，在原则问题上不能为自己的私利而变节。当他听完王晏讲话的含义之后，他当即回绝了王晏的“好意”，他不

愿意接受用造反派的牌子去扶植一个保守派的“造反派”队伍。王晏的第一次收买造反派失败了。于是王晏他们就找到了无锡机床厂主力军人员周锡林充当了他的代理人，于是在工人中挂起周锡林的牌子，在学生中找到了“无锡抗大一机校”的邹海根，召集了原“工联”的人马，树起“十三系统”（按行业划分）的造反组织。一个由部队一手扶植的新的保守派诞生了。

5月底支左部队决定为“红总”平反，在狱中放出了金坤泉，周炳荣二人。江汛于67年8月出狱，金坤泉等人的出狱后，主力军的战友们为他庆幸，到他门上去看望他，殷切地希望他带好主力军这支队伍，但金坤泉当即表态，“我不敢了，里面（监狱）日子不好过的。”“红总”的一大批老人员再三劝说，金始终保持不想再干了的态度，人们出于无奈，但又必须“保住”这块共产党员及老造反的“金字招牌”，只能让他挂着牌子随意他在家休息。“红总”的主要头头被三个月的“官司”吓退了，主力军队伍不能跨，于是数十万主力军的领导及指挥责任，落到了军方背后称之为“黑秀才”的陆渭文身上。在红总平反前，第四届红总中心组调整由金坤泉（挂名），陆渭文，殷松勤（党员），陈书刚（轻院老工人党员），章传贤（党员市劳模）等。

6月1日在无锡市体育场上召开了十万人的“主力军重震军威大会”。上午九点，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这次平反大会的主力军群众们喜气洋洋，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唱毛主席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红旗飘扬，几个月来放在口袋里的主力军的红袖套，从新套上自己的左臂，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由这个当时29岁的年轻工人陆渭文站在宽阔的主席台中央支持了这次会议，他操着带有浓重的常熟土音的不标准的“普通话”，带头举起“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高呼首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付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台下十万主力军同时振臂高呼。“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毛主席诗词，作为大会主席的开场白。

会上由“6.26”兵团负责人浦湘海发言，由清华大学“又来了”战斗队代表众多的外地学生代表上台作祝贺词，在十多位代表发言之后，会议宣布结束。

经过了这段曲折的历史，教育了人们，革命造反的目的是一致的，命运一也是相同的，从此无锡地区所有的群众组织全部自动倒旗，全部同意称主力军，在这时“红总”的内部组织作了明确的调整，“红总”下属十二个兵团。

一兵团，（建筑兵团）下面还有辖管的小兵团。

二兵团，（财贸兵团）

三兵团，（纺织兵团）

四兵团，（重工兵团）

五兵团，（轻化玻陶兵团）

六兵团，（交通运输）

七兵团，（轻工兵团）

八兵团，（塑料系统）

铁道兵团，（无锡火车站）

电讯兵团，（电讯系统）

邮电兵团，（邮电系统）

市机关兵团，（市级机关工作人员）

主力军队伍号称三十万之众，实际估计在 20 万左右。

从另外一方，在支左部队扶植下的“十三系统”改名为“九、二革命串联会”（简称“九、二”）从此无锡地区的势均力敌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正式确立，“六派”与“九派”，两大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工人阶级内部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由此开始。

“红总”平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揭旧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的盖子，于是在轻院内召集了由学生，工人，文艺工作者，“红色公安战士”，市机关兵团等单位联合，对旧市委的斗批。这个“联合”名称一致认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革派联总”）为了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由于红总方面殷松勤推让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在才干上并不十分相称的年轻工人陆渭文任“总指挥”，真可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了。由徐志纯，浦湘海为“付指挥”。这个“革派联总”在轻院内让十二位旧市委常委们大家坐在长桌上同“革派联总”的代表坐在一起，进行互相揭发当时旧市委所执行“资反路线”，会议进行了三天，第四天晚上在三阳街头，公开斗批十二位常委，也

算是向全市人民公开汇报斗批当权派的实况，同时还表示了“革派联总”方面企求让这些常委在全市人民面前公开亮亮相，取得全市人民对他们的了解和谅解，并无摧残老干部的恶意，时局一步步地在向有利于“六派”方面发展。

四，“大武斗”

在“红总”平反前，曾发生过“火烧”小延事件，这是“六派”学生向“九派”学生发起的进攻，“红总”平反后，“6.17”事件是“九派”学生向“六派”学生进攻，在中途六派学生得到了主力军一兵团的拔刀相助使“九派”学生在砖头瓦片下头破血流的败走，但这些另另星星的冲突，不属于正规的大武斗。

这时有一个武斗的巨大恶魔的暗影悄悄地笼罩着无锡的上空。这个恶魔真似的三国演义中杨修的吊丧中曰：“君在梦中，丞相不在梦中。”“六派”方面从上到下并没有意识接着来临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死相搏。

66年6月中旬，据王晏《回忆录》第25页记载的一段文字：“‘九、二’总部见‘红总’对他们的抗议不予理睬，反而把九个市常委藏起来，觉得‘红总’太有点猖狂了，立即决定进入战备状态。

(1)，成立‘文攻武卫’（当时还没有这个口号，只能说武斗指挥部）聘请五位高级参谋，一位是军队转业英雄团团团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团参谋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坦克团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侦察处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师政治部主任。

(2)，挑选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组建四个基干团，担任应急任务。

(3)，选准‘红总’主力队伍，给予狠狠打击，以示警告。

按，原九派观点的无锡搪瓷厂团总支书记刘祝林，批林批孔时，公开在无锡当时的三阳门前贴大字报揭露，曾担任”9.2”武斗高级参谋的董万华，在一次布置武斗的会议上表示，打人[武斗]就他膝盖骨，让他终身无反抗能力。这就是作为人民子弟兵，对待无锡两大派群众组织武斗的主导思想，所以无锡的两大派武斗，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就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谁是真正挑动两大派武斗的罪魁祸首，也同样是自明自白的。

这天，（准确时间应是67年的6月20日）下午1点，‘九、二’派出基干团六百多人，突然袭击主力军建筑兵团指挥部驻地，因为建筑兵团没有预防，

只一个小时就把整个建筑公司全部捣毁了，打伤七八十人，烧毁了旗子，牌子和一切办公用品……”

大武斗 1、“6.20”事件

作为“九、二”后台的王晏文字记述，真是这个称为无锡大武斗的开端“6.20”事件。

6月19日晚，西门桥附近又发生了自发性的武斗，现场人头挤挤，这天正好“红总”有陆渭文，陈书刚等人值班，得悉在西门桥地区发生武斗，情况不明，这时由主力军群众来“红总”报告情况，并请求总部派队伍前去增援。当时值班的陆、陈等人因对情况不名，为避免事态的扩大，故没有派队伍去增援，但有一点比较明确，近几天来，市内不断发生武斗，事态日益严重，目前是军管时期，军队有责任出面制止武斗的权力，故当晚作出决定，明天（6月20日）组织主力军游行示威，目标是去军管会请求军方制止武斗的发展。

6月20日中午，主力军数千队伍按计划集结游行，当游行队伍抵达军管会，办公所在地——无锡饭店时，竟发现军管会人去楼空，不见一兵一卒，军管会在当时是无锡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何不见人影呢？回想历史，在国内战争时期，由美国大使出面调停国共二党的矛盾，当国民党的内战准备就绪，美国大使就宣布“调停无效”走之夭夭，可以让国民党放开手脚向解放区大肆进攻。当时军管会不宣而走，也是附合这个道理。当陆渭文带领的游行队伍真在找不到管事的主人，处于为难的当口，忽有人来报告，主力军建筑兵团受“九、二”攻击，同时“九、二”武斗队伍已包围轻院“6.26”，陆在人民路段得到二个消息，一方面派一部分人赶奔建筑兵团所在地救援，一部分队伍自由散去，自己亲自率领500名左右的队伍赶奔轻院前去“解围”，陆渭文带领了这支手无寸铁的群众队伍赶到轻院时并无拳脚相见的武斗，只是以声势逼退了“九、二”队伍，从这晚起，陆渭文作为“革派联总”的总指挥，暂时脱去了斗批旧常委的职能，挑起了“六派”方面指挥应付武斗的艰难担子。

从这天起全市数千名工人离开了自己的工厂，守在自己的据点里，第二天又有无数从农村赶来的“六派”农民进入轻院。“6.20”当天夜里，就有许多年轻人自动来指挥部报到，自动组成了在无锡武斗中的“五虎”队，其中有无锡市二位拳教师的徒子徒孙。一名叫许寿康，他的徒子徒孙，有王明华，苏金坤，

小铁功等二、三十人组成了“小猛虎”队，由叫名徐才宝的拳教师下面的徒子徒孙，有吴阿二，王波，王销，陈凡等二、三十名人员组成“游击兵团”，负责指挥部的保卫工作，另外还建有“小老虎”，“夜老虎”，“老虎警卫团”人称“五虎队”、“6.20”事件以后的第二天“六派”与“九”派之间各自建立了据点，这些据点的地理位置，处在“犬牙交错”之间，“六派”的大本营在轻院内处在青山弯向左，惠山方向延伸，市一中由主力军一兵团和一中的学生“红革会”驻守，再向前，由主力军“四兵团占领”绿阳点心店，四层大楼，西门桥畔“机电大楼”由主力军锡柴“东方红”驻守，六兵团驻大洋桥一带，七兵团一部驻守在湖光仪器厂，市内现商业大厦[原称东方红商厦]，由“6.26”兵团等学生负责宣传广播等等。

而“九派”的大本营设立在与轻院相对的“抗大机校”，轻院右面相隔二、三百米的“742厂”和荣院由“九派”驻守骨干队伍，在主力军四兵团对面是“九、二”的“二、八公社”（无线电厂）两军相对似同仇人，分外眼红，主力军四兵团与“九、二”的二、八公社相距最近，由于“九派”预作准备6月21日起，已全部冷兵器武装手执钢管做成的长矛，主力军方面不敢出面接触，只能是坚守防御，从工厂内弄来的罗帽，作弹子，用弹弓射向“九、二”，“九、二”群众当时还无钢盔，只能临时用面盆或者铝锅顶在头上作防御工具。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革派联总”立即召开全体总指挥部成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红总”主力军的一些兵团头头、“626”兵团头头、红代会（筹）负责人等数十人。在会上，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这是“保守派”用武力向造反派的反扑；同时又认为，现在党中央、毛主席支持我们，“保守派”是受蒙蔽的群众，我们要争取他们站到造反派一边来，我们不能靠压服，要靠说服。因此，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文攻武守”。“文攻”，就是要加强我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宣传；“武守”，就是要守住目前还在我们手中各基层单位和总部所在地，守住我们原有的宣传阵地。不要用武力去进攻对方，若对方用武力来攻打我们，为了自保，只好自卫。这些基本想法，贯穿了“六派”在整个武斗的全过程。后来，总指挥部又下令，对于在武斗中抓到的俘虏，一律不准殴打，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做工作争取他们；谁殴打俘虏，一律要严肃处理。正是这一决定，确保了在整个武斗期间，主力军方面没有打死过一个从“九、二”方面

抓来的俘虏。而“九.二”方面认为,主力军队伍中牛鬼蛇神多,对于牛鬼蛇神就要打,以不打死为限。在这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在武斗期间有几十个被抓的主力军被活活打死。这是后话。

6月21日,体育场桥发生二派冲突,“六派”派出队伍增援,“九派”已使用土制的燃烧瓶攻击,在这次武斗中有一名主力军群众躲在树上,可能是暴露了身份,结果被“九、二”一武斗人员将长矛从下向上对准这名“六派”群众,从肛门口内刺入,死于非命(这名“九、二”人员在文革后期被判刑)。

6月22日,由无锡市印染厂技校学生(锡印九、一九)去无锡红星刀尖厂抢出一批向古巴出口斩甘蔗用的古巴刀,领头去抢刀的学生陈X,文革后期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这批抢来的古巴刀当夜就武装了“六派”的武斗队伍。从这时起“九派”是长矛,“六派”是大刀,“大刀”“长矛”势均力敌。

大武斗 2、西门桥“6.23”事件

“6.23”事件。6月23日晚上,在西门桥至“五爱广场”路段人头拥挤,大部分人是在马路二旁看热闹,一边是主力军占领的“绿阳点心店”,一边是“九、二”的重要据点“二、八”公社,这时有七、八个十多岁小孩子,他们自称为“红小鬼”,人们说他们懂事吧?不见得。说他们什么都不懂吧也并不一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可能认为“主力军”好“九、二”不好的“六派”观点,同时也受到了革命战争的思想感染,所以才会称自己是“红小鬼”,这批“红小鬼”究然大胆妄为,在“二、八”公社门口放火,他们与“二、八”公社的敌对行动立即受到“二、八”公社内“九、二”的驱赶,这时正好由“锡印九、一九”的学生组织,100多人的队伍,自由行动经过“二、八”公社门口,见到“红小鬼”们受欺,即上前帮助,“九、一九”的学生年龄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嫩皮嫩骨,在“九、二”武斗人员面前简直是一盆豆腐,不堪一击,被打得头破血流,败阵下来逃回指挥部报讯,“九、一九”队伍被打散,由三兵团一部群众前来支援,被“九.二”用长矛刺死俩名纺织厂工人.又正好“小猛虎”队二、三十人从市区返回指挥部途径“二、八”公社,见状立即接替了学生,“小猛虎”正好昨夜在“九、一九”手中接过了一批古巴刀,古巴刀敌住长矛,双方对阵。轻院指挥部见到跑回来受伤的学生,又接到从市内的灯光讯号在手工业商场楼顶上用红黄白三色灯光向指挥部报告市内发生了武斗,指挥部根据这一情况先后派出

了一兵团下属的“房管兵团”，五兵团一部约 500 人左右的队伍赶奔前去增援（增援队伍大部分没有兵器）双方以四路纵队的队形，僵持在从西门桥下到“五爱广场”的路面上，当时的局面“九、二”进出的大门已被封住。“九、二”百名左右的武斗队伍处在被人群的包围之中，（正面是手执古巴刀的主力军，周围是围观的“六派群众”右前方是“绿阳点心店”的主力军据点，后方是“机电大楼”主力军“锡柴东方红兵团”，据点内在摇旗呐喊助威，围观中的“六派”群众还不时地向“九、二”发出砖头瓦片的“暗器”，正在“九二”处于劣势的时候，又有主力军六兵团数十人问讯后从“锡师”出发向西门桥奔去，这批运输工人，有的上身赤膊，下身穿条短裤，有人甚至光着脚板，个个是五大六粗的壮汉，一阵奔袭从西门桥上向“九、二”的背后杀将过来，“九、二”队伍腹背受敌慌乱了，真是兵败如山倒，败兵向西门桥二侧散去，向右“棉花巷”，向左“棚下街”，谁知在旧城没有改造的“棚下街”下去是一级级的石级，人轧人，互相挤压，不少人跌翻在大地上，无情的古巴刀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向下砍去……，一个又一个的“九、二”战士倒在血泊之中，这次事件的结果“九、二”留下了 9 条不能动弹的死尸。

直到黎明前主力军队伍整队返回轻院。这次事件，如果发生在反对外围侵略者身上，那些打了胜仗的战士凯旋归来，一定要庆功表扬，但这不是对敌斗争，主力军内部“军心”亦发生了微微的震动，有一部分主力军群众偷偷地离开了他们集中地，有的从此远走他乡投亲，靠友“避难”去了，他们是怕死吗？可能有一点，但恐怕最主要的还是不忍心见到这种无为的流血与牺牲，作为“指挥部”当然知道这种倾向，但作为群众组织，在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对群众的态度只能是顺其自然，愿留则留，愿走则走，绝不用“纪律”去强留任何一个人。

大武斗 3，“6.27”火烧铁甲车事件。

6 月 27 日下午，因为轻院与“九派”的荣院和 742 厂相距只有三百米左右，实在是近在咫尺之间，下午三点多钟，由无锡化工学校的几个学生，在荣院边上捡起地上的砖头往里面投掷，引起双方互为砖头石块的掷投战，以后化工学校的学生被砸开了头，血流满面。

下午 4.5 点钟，由“小猛虎”队出动对付荣院的“九、二”，即着又从轻院内开出一辆红色的消防车向荣院方向开去，站在轻院化学楼顶的总指挥陆渭

文见状，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即单身下楼，意在阻止自己的队伍继续向荣院方向开进。在这辆消防车除驾驶员之外，车内还坐着一位年仅 14 岁的少年名叫杨树华，小杨生得清秀可爱，他是跟着他的父亲（三兵团主力军）留在战乱中的轻院内，今天他身上打扮成抗日战争时期的小卫生员，身上上身口袋中装满了红药水，纱布，消毒棉之类的急救物品，他什么时候留在车子里，为什么要进入车子的目的谁都不清楚，当这辆红色消防车经过荣院时，被“九、二”拦截，“小猛虎”队的王明华见到车子被截，急忙上前一手手执单刀，一手抱着驾驶员逃离现场，小杨与车子便成了“九、二”方的俘虏。这个 14 岁的小杨在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敲掉了牙齿，抛尸在荒野。

在 5 点多钟时，身为总指挥的陆渭文只身前往荣院方向走去，准备唤回自己方的队伍，这时在荣院内开出二辆“铁甲车”，前面一辆是用五吨卡车改装而成，整卡车用 10cm/m 厚的钢板封闭起来，在驾驶室前方留着两个大饼大的园孔，园孔中间用 5 厘园的铁条一根根地焊好，似现代人家的防盗门上的条子，车下面只露出三分之一的轮胎。后面一辆是用公交车改装，在每个玻璃窗口封上 2.3cm/m 厚度的铁板。二辆铁甲车在前面 S 形地开路，S 形地前进目的是撞人，二辆车后面紧跟着四、五十名头戴钢盔，手执长矛的“九、二”武士好似现代战争中在坦克掩护下的冲锋队伍，当第一辆“铁甲车”向荣院方向冲来，离陆渭文接近约十米距离时，陆已经无法退回轻院，只能随身一转，向身边的轻院学生宿舍内躲去，并一直奔向学生宿舍的楼顶，这时“九、二”武士已经把学生宿舍包围。大约再过去了一、二十分钟，轻院门口已浓烟滚滚，包围学生宿舍的“九、二”也随之撤走，这时陆渭文立即赶回轻院门口，但见前面一辆铁甲车在撞到了路旁二、三棵手臂粗小树之后，轮胎被卡住动弹不得，并且车身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第二辆铁甲车已逃之夭夭，周围围满了主力军的群众，陆见状就呼叫众人，赶快抢救，围观的人告诉陆“来不及了”，据说，车子被卡停后，立即起火，外面的人高喊：“缴枪不杀”。在车厢开处，先由一名“九、二”握着长矛冲杀出来，这第一个冲杀出来的“九、二”被人一刀砍伤，掷进车内，以后车里的人就抱成一团，死命不肯出来，现在要救为时已晚，只有一名驾驶员被火烧伤后，被主力军从车内拖了出来，现在正在抢救，这次“6.27”事件待到第二天早上，火

熄车冷以后，才从车内钩出了九具被烧枯的尸体。全车除驾驶员一人被主力军所救外，无一生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如果不是有人挖空心思地制造这秘密的杀人武器就不会有这种恶果；如果不是以害人之心，就不会兴冲冲地放下手中的晚饭碗钻进这辆自缚手脚的“铁甲车”；如果车内的死者肯放下架子，举手投降走出车厢，也不至于使自身“灰飞烟灭”；如果他们的冲锋队不将“六派”的总指挥包围在学生宿舍，形成火烧铁甲车的现场“群龙无首”的状态，后果就不一定如此严重。这一事件的后果有谁来承担呢？在《血火痴情》的作者笔下，对遇难者临死前写下了许多心理描述，这是小说中的逻辑推理，这些逻辑思维忽略了点，就是这些死难的灵魂深处，中了“血统论”的毒太深，他们无法理解主力军大部分群众的善良心情。他们认为主力军是无恶不作的魔鬼，于是他们放弃了生的渴望，而选择了死的道路，四十年过去以后对于那些挑动武斗，设计制造这种杀人武器的人，不知他们的内心是否内疚，是否有所反思，及忏悔，当然对死者来说已经失去了反思的思维能力。

“6.27”事件发生之后，对两派群众组织内部来说也发生了很大的震动。就“六派”方面来说，头头们已感到武斗的形势日趋严峻，在不断地升级。这里要引出“六派”方面的一个“大人物”，他就是原轻院的副院长——何泄，何泄四十多岁年龄，是原X军的师政治部主任，转业地方后，在轻院任副院长之职，文革中学生造反，何泄表态站在“6.26”兵团一边，因此“6.26”的学生称他为“革命干部”，受到“6.26”学生的尊重，“6.26”对何的尊重，也是整个“六派”群众心目中尊重的“革命干部”。他在整个武斗中一直在轻院，当“6.23”，“6.27”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他的年龄，经历，他当然比起年轻的学生和主力军群众更清楚以后的后果会怎样，“六派”原来所占据的地方大多是学校，物资、资金和设备匮乏，难以支撑这愈来愈严酷的局面。“九派”可以利用所占据的工厂的设备制造长矛、装甲车这样的武器，而“六派”手中除了那批“古巴刀”外，无法寻求更好更多的武器；几千人的吃饭问题、伤员的治疗也是这些学校难以承受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总指挥部就有了找一家大型工厂作为后方基地的想法。6月28日前后，红代会（筹）的负责人、二中“七.五”的匡建中带了一批人去处于东北角的大型工厂国棉二厂作了侦察，发现国棉二厂已经停工，食堂、

医院一应俱全。他随即向总指挥部作了汇报，建议派一队主力军占领国棉二厂，把国棉二厂作为“革派联总”的后勤基地。这时候，“革派联总”指挥部对大局起指挥作用的实际上是三个人：陆渭文、浦湘海、何泄。当时何泄，可能考虑今后可能要承担的责任，于是他在寻找“退路”，他表面不动声色，却秘密地找“6.26”兵团中心组成员商量，准备他将“6.26”兵团的学生拉出无锡，让主力军单独留在无锡顶住局面。他的这一设想并没有被纯真的学生接受。于是在6月28日，指挥部根据何泄的建议，将指挥部从轻院转移到在周山浜的国棉二厂内。“指挥部”的转移，客观上反映了，1，何泄的内心打算，2，动摇了军心，从根本上改变了武斗形势的格局，原来“六派”与“九派”之间所设立的据点，是各占“半壁江山”，而从“六派”指挥部转移之后，在无锡市区，“九派”控制了“东南西”三面，“六派”的实际控制区缩在北面一角。当时的“六派”防区，由六兵团驻守“中国饭店”“航运大楼”，实际上是守住大洋桥。火车站是铁道兵团，坚守岗位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兵团。铁路后面是周山浜国棉二厂，七兵团等驻“湖光仪器厂”，一兵团，十二中学生守市一中，四兵团守绿阳点心店，仍未变动。而每个据点，仅有数十人，并没有武斗能力。六兵团是一个有实力的兵团，头头叫李文庆，他26岁，部队复员军人，但在武斗中李文庆基本上是“佣兵自保”，对武斗形势采取观望态度。

7月2日晚，“九、二”武装冲进轻院校内，对留守学校的少量学生发起攻击，只烧去了校内的大字报棚，并无伤亡。

大武斗 4、“7.3”大撤退前后

7月3日傍晚，忙碌一天的陆渭文在“指挥部”的屋角里沙发上偷偷地闭上已经十分倦劳的双眼，养足精神。这时有一个属六兵团的小青年，急匆匆地奔来，将陆推醒，神秘地告诉陆“我们六兵团全体马上出发去上海‘休整’”。陆急忙翻身起来问：“是谁决定的？”“我们头头通过何泄同意。”小青年说完就匆匆而去。陆得到这个消息不能再休息了，于是找来浦湘海，王明华等兵团负责人，召开了“指挥部”紧急会议。在这个会上陆渭文，先将六兵团私自撤出的消息告诉了大家，然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六兵团撤走上海，等于将我们目前防地的大门主动打开，火车站就暴露在‘九、二’面前，如果‘九、二’控制了火车站，我们指挥部就好比将可能是‘瓮中之鳖’，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为此

陆向大家提出建议，立即将主力军队伍撤出无锡，当大家接受了陆的建议后会议上进行了第二个主题争论。“撤向何方？”有人说我们也去上海，根据陆渭文心中把握的“有理，有利”的“尺寸”，提出应该撤往南京，“理由二点，一、南京是省军管会所在地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去省军管会告状。二、南京的两派群众组织‘好派’与‘屁派’虽然他们内部之间有对立的观点，但这两派都是支持无锡主力军的。”陆的撤离方案被大家所接受，当时作出决定：在 10 点钟将撤离无锡的决定传达到兵团一级，在 11 点钟传达到群众，为了队伍的安全，不准提前走漏消息并由陆派出周炳荣一人前往火车站，通知“铁道兵团”，在今晚 11 点前为主力军撤离队伍准备一趟列车，铁道兵团头头，陈志文（文革后期入狱，出狱后病故）高汉卿（在深挖“5.16”中受迫害致死）龚太泉，三人，他们是车站调度室的文职人员，有能力有权调动列车，等到 10 点半左右，由周炳荣回报“铁道兵团”已将一列有 20 多节车皮开往北方运煤的货车，停靠在“木专线”上候命出发，一切准备就绪，在午夜 11 点半左右，根据指挥部的命令在国棉二厂将睡梦中的主力军唤醒，只通知转移，并无诉说撤退，于是在国棉二厂内二、三千之众的主力军男男女女，秩序井然的列队出发，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在主力军作出撤离决定后，指挥部即去通知“革命干部”何泄，但来人回报，在 1 小时之前，何泄带着一名“6.26”的亲信，化了装，已不别而行，扬长而去了。）当整个队伍撤离国棉二厂时，指挥部的警卫人员向陆渭文请示：“12 位常委怎么办？”“全部带走。”“还有几名‘九、二’俘虏怎么办？”“就地释放。”（包括“6.27”事件中的铁甲车驾驶员在内）此时 7 月的午夜天气闷热，在主力军队伍登上列车后，天空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列车在雷雨中启动，徐徐向北面方向开去。

7 月 4 日上午，9 至 10 点钟，在宁静的南京街头上出现了一批身穿汗衫，短裤，拖着拖鞋，有些人手里还提着古巴刀这样不伦不类的人群，引起了南京市民们的惊奇，交头接耳，指指点点的议论纷纷，这支无锡主力军队伍都往南京省军管会方向集中。江苏出现了这样的大事，省军管会不会无动于衷，当天中午就有省军管会三位首长，接见了无锡来的陆渭文、浦湘海等三、四人，这三位军首长，一位是梁辑卿，一位是杜方平，一位是吴大胜，当时总称为“梁、杜、吴”，在这次接见中由善于严词的浦湘海向省军管会首长汇报了无锡发生的武斗，并请

求省领导能给予支持，这三位首长耐心地听着汇报，最后表示，你们既然来到了南京，先把你们的人安排住下来，你们的问题由我们同无锡市军管会来商议解决，热情的南京两派群众组织亦主动前来联系，拉无锡主力军这支队伍到他们单位去具体地落实吃、住等问题“革派联总”指挥部，“红总”这个首脑机构，被南京军事校院的“屁派”拉进了他们一处非军事区的大院内居住起来，主要队伍也集中在这里，其他学生等队伍，也被“好”，“屁”二派群众拉进他们的单位。近千名学生被安排在中山路 307 号省委招待所内居住。

在“7.3”撤退中，虽然是“秩序井然”地离开无锡，但还有一部离开指挥部较远的据点，市一中，“湖光仪器厂”，等地，因为没有通讯设备，便成了撤离的遗忘之地，当这些据点里的群众发现“突然寂静”的异常之后，立即探听出指挥部已撤离的信讯，在 7 月 4 日凌晨之前便各自为政地带上自己的队伍赶上了去上海的路，同时在 7 月 4 日清早起，许多原在家中的“六派”群众，得讯后纷纷以上海为近的缘故逃往上海，这样便形成了无锡主力军在上海“华师大”，等地的集中地，以后建立了“上海分指挥部”。再说由李文庆带领的六兵团，十多辆公交车的队伍走常熟往上海方向而去，结果受到了常熟反对派群众的阻击，再转江阴，又遇困难，转辗路途，以 7 月 4 日上午也比较艰难地进入上海。“7.3”撤退在民间及某些官方的记载中由无锡市委内当权派的策划而引成，这不过是一种误传。甚至是对市委内吴镇、田洪等人的栽赃陷害。

“7.3”撤退以后的无锡当然是“九、二”一统天下了，从 7 月 4 日上午起“九、二”各基层单位纷纷出动队伍抓捕留在无锡的“六派”群众，正如王德骥先生最近出版的文革小说“清清太湖水”中描述的那样“铁滚皮鞭顿时雨点般打在被抓人的头上，腰上。倒似乎象当年红军撤离之后，地主还乡团进村向农会群众报复那样，抓、打、杀的疯狂。无锡铸造一厂主力军头头之一鲍惠兴（电工）从“红总”平反后，特别在武斗期间，由于身体欠佳，故而基本上已退出了“是非”圈子，班不上，一直在家中打打扑克，消遣时光，谁知在主力军撤走之后，你要想安稳，可人家还是把你当作“敌人”，被本厂“九、二”抓去一顿敲打，半死不活，再把他捆绑在电线杆上，身上绕满了绳子，直至他的胫部，鲍惠兴有气无力的瘫下去，结果被胫部的绳子勒死身亡，“九、二”群众将鲍的尸体抛入太湖，（文革后期，二名杀害鲍的替罪羊判了有期徒刑 6 年）这期间，太湖

漂浮尸已不是一件新鲜事了。不管算是“红色恐怖”也好，还是“白色恐怖”也罢，无锡在恐怖的笼罩中，人性被兽性所代替，恐怖的消息不断从无锡逃往南京的人口中传来。前往上海的六兵团数百人，也由水路奔向南京。市机关兵团数百人员也由上海经水路来到南京，在宁负责对 12 名常委的生活管理，并在宁期间组织过两次小型斗批会。武斗能把“六派”的群众赶出无锡，着实在是个好经验，无锡的魔爪在向周围城市伸去。常州没有几天时间武斗也把常州主力军赶出常州，苏州武斗把“踢派”打到城市的边沿，“踢派”群众不断地向外发出阵阵的呼救。

无锡主力军在南京军事学院得到了暂时的安置。陆渭文主持带好这支队伍，上管“国家大事”下管“肥皂草纸”，浦湘海每天奔走在外，与南京“好派”头头文凤来等保持着外交联系，无锡“红总”的头头金坤泉带着他的老婆在这支队伍中避难，7 月 10 日左右，“小猛虎”队全体接受了南京“好派”的要求去 X 地占领一个“据点”，此处正好是百货公司，任务结束后，有整卡车的生活用品运回军院，傍晚，由“小猛虎”队队长苏金坤叫人把自己的身体用绳索捆绑起来，效仿古代人向指挥部“负荆请罪”，陆、浦二人通知全体“小猛虎”队集中，“立正、稍息”，口令传出，小猛虎队队员立得整整齐齐，接受“训话”，指挥部表扬了他们自觉遵守纪律的榜样，并“迫使”队员们交出了实际需要的球鞋，毛巾等生活用品，并将这些抢来之物，仍用卡车运回原地。在乱糟糟的造反队伍中许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自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7 月中旬，由“革派联总”新任副总指挥匡建中带队，500 多名无锡红卫兵到长江以北的大厂镇为“好派”驻防。为制造声势，这 500 多人举着红旗和铁棍，分乘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来到江边，再分乘几艘江轮，直驶大厂镇。由于声势造得大，这批人在大厂镇期间，没有人敢来进攻。（后来，无锡主力军从南京撤到了镇江。8 月下旬，这支 500 多人的红卫兵队伍被船接回镇江；这是后话。）

7 月 23 日，在官方的报道中传出了江青的就武汉“7.20”事件，造反派要“文攻武卫”的口号。在南京的无锡主力军一下子沸腾起来，许多人骂“指挥部”头头“右倾”，“你们看，中央首长都讲话了，你们带头撤离无锡就是错误的决定。”“文攻武卫”给受压的群众，原本满肚委屈的复仇心理火上加了一

瓢油，同时“文攻武卫”也被挑动武斗者接过口号，披上了武斗的合法外衣，更嚣张了，整个文革的形势，变得更复杂，更激烈。

无锡主力军中群情激昂，要“杀回无锡”。但苦无办法。由省军管会出面与无锡 27 军的交涉无效。摘自王晏回忆录 43 页：“7 月下旬，南京军区一位支持工作的领导，指示尤太忠（军长）马杰（政委）A 主任（政治部主任吴戈华）三人到南京 A、B 大楼，解决 27 军‘支左’的问题。尤太忠，马杰决定带王晏参加……”时间不到十一点钟，一位秘书带他们四个人进了 B 楼，上了二楼会议室，还有十几个人都已经等在那里。等大家坐好后，那位领导说，今天请你们 27 军的人来，不是开什么会，是由我代表军区领导和江苏省军管会给你们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你们写的镇压造反派那个错误检讨问题。那个检讨我们都看了，觉得根本不像个检讨，不痛不痒，不象个样子。你们一点也没有放下架子，你们把人家一个几万人的一个组织给镇压了，把头头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几个月。你们还说这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理解怎么知道他们是反革命？这个检讨是谁写的？

A 主任指着王晏说：这是王处长写的。领导瞪了王晏一眼说，你这个处长有点乱弹琴，把你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里，我说这是不理解，你愿意吗？还有什么不理解呢。你们本来就是出来镇压的嘛。不是你们招待所有人布置的吗。你们要好好地写，写不好就要被动，现在你们 27 军够被动的啦，把这么多人赶到外面来，听说你们还使用坦克打他们。同志哥，这太不像话啦！你们看现在全军，全国都说话啦。同志哥，你们争取主动吧！等着中央说话就晚啦。

尤太忠有点忍不住了，插话问“你听哪个说的我们开坦克车打造反派的？”领导说“还用听说吗？火车上，汽车上，大街上，大字报，小字报到处都写着，还问个啥卵球！”

领导不太高兴地说：不管用没用坦克打，反正坦克是有的，反正他们是被你们打出来的，反正你们的检查要重新好好写。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加强，充实无锡军管会组织的问题。我们考虑，无锡驻军单位很多，他们应该参加军管会。空十五师，炮九师，无锡人武部，工程兵，还有海军航空兵，他们都应当参加，这样有了事大家商量着办就好了。只有

你们 27 军一个单位包办，这样不好，你们回去做个准备，过几天他们的人就到了。

尤太忠说：你不要学着文绉绉的说，你不就是要给我们掺沙子吗。

第三个问题，是民主作风的问题，听说在取缔“红总”的时候，A 主任就不赞成，你们硬是不接受他的意见，结果搞到这个样子。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听说 A 主任坚决主张“转屁股”全部支持“红总”，解散“老保”，你们还是不听，反而把“红总”打跑出来，同志哥，不行啦！军管会里搞那些没有路线觉悟的人，不是坏了事吗？应该把他们请出去，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把手一挥说完了，老尤，你看还有啥格说话。

尤太忠说：“马政委，你先说吧。”

马杰说：（1）关于检讨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写，（2）关于“红总”是打跑出来的，还是有人指使他们撤出来的，是会搞清楚的，（3）关于坦克的事，请领导上打个电话问一问装甲兵部，不就清楚了吗？（4）关于 A 主任提出“转屁股”的问题，我们军党委讨论过多次，觉得屁股绝对不能转，若是军区党委认为一定要“转屁股”，就请下个文件，我们照着执行如果哪个领导个人意见，我们是不会执行的。（5）关于驻锡单位都参加军管会的问题，请军区与他们联系好，他们提出名单，什么时候到，我们都欢迎。

尤太忠说：“我完全同意马政委的意见。”然后转身问王晏：“今天谈的都记下了吗”？

王晏答：“记好了。”

尤太忠又问那位领导，你还有什么指示？若是没有了，我们马上就走。说完站起身来，走出会议室，下楼走了。

军党委常委会是在军机关会议室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马杰，尤太忠，王铤，徐学忠，A 主任，秘书蔡惠然，因为工作需要吸收王晏，王明清二人参加会议，会议马杰主持，他宣布会议议程：

- 1 讨论军党委的检查。
- 2 讨论要不要“转屁股”。
- 3 讨论要不要撤换军管会的人员。

他接着说：“前几天，军区主持工作的领导，受军区党委和江苏省军管会的委托，召见我和尤太忠，A主任同到南京，向我们传达了以上三个问题的意见，他指示（1）我们党委取缔“红总”的检讨写得不象话，要重新写。（2）他说我们党委应该接受A主任的意见，彻底“转屁股”支持“红总”，解散“九、二”。（3）他要把我们军管会里没有路线觉悟的人请出去，（4）他决定驻锡的各个部队和南京步校，都要派干部参加军管会。这几个问题，我和军长在南京都表示了态，我们俩的态度是不同意他的意见，若是一定要我们执行，就请军区党委正式下个文件，今天，我们军党委的常委都在，大家讨论我们在南京的表态，常委若是认为我们表的态不对，可以否定，按常委多数人的意见办，下面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检讨要不要重新写，怎么写？

王铤说：“你们在南京的情况，王晏昨晚已对我说了，我同意你们俩的全部意见，也没有补充。

徐学忠说：“那么我看问题很明白了，屁股是不可以随便转的，好转老早就转了，要派人到军管会来的问题，那么要是军区相信27军，我们就自己干，不相信，我们就不干，叫别人来干，军管会是个军事机关，不是个大杂烩！”

雪国衡说：“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

尤太忠说：“马政委咱们把意见再明白地说一下，检讨不再写，屁股不能转，军管会的人不需要清理，不要外单位来掺沙子。

马杰说：“为了郑重起见，常委对上面的意见进行表决，赞成尤太忠意见的人请举手。尤太忠，徐学忠，马杰，王铤，雪国衡都举起手来。

马杰又说：“反对的请举手。”A主任举起了手。

马杰说：“常委五个人，四个赞成，一个反对，多数通过。

马杰对蔡秘书说：“按照今天会议讨论的结果，正式给南京军区党委写报告。”

27军在无锡“支左”中的态度如此的坚决地支一派，打一派，通过这段军方的内部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出来。

15

大武斗 5, “8.9” 抢枪

8月9日上午，南京军事校院内的“屁派”军人，来到指挥部找上了陆渭文，浦湘海俩人，并将他们带到他们“外人不准进入”的办公室内，介绍了有镇江 252 部队李德康等俩人认识，同时在场的有常州主力军头头梁炳生，李德康热情地询问了无锡常州主力军情况，开口讲，你们无锡，常州主力军总不能老是

蹲在南京，总要想办法逐步向本地靠拢才是，我们镇江“三代会”（镇江群众组织）欢迎你们到镇江去，并愿意帮助你们杀回本地，陆、浦、梁三人对李德康的承意表示了感谢。李德康又说：我们同这里的负责人，已商量好了，你们可以在今天下午把这里军院的枪抢了，带走。陆渭文，浦湘海也提出了相关的问题，“枪支的仓库在什么地方？”回答：今天下午你们行动时可以由“屁派”军人派人给你们带路。军院的人又详细地介绍了，他们仓库位置的大概方向。这里有一个武装连负责保卫工作的，他们的位置在那个方向，抢枪主要是仓库里的枪，仓库保管员，也是他们的人，等等情况做了较详细地介绍。这次商议结束，李德康从他们的小挎包内拿出了二支“五四”式手枪送给了陆渭文，浦湘海俩人，商议结束各自返回，做各自的准备工作。

陆、浦俩人回到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各兵团头头，指挥部警卫班（游击兵团）“6.20”部队（原小猛虎队改名）等人。陆渭文把任务布置完毕。

中午饭后，12点半开始，先由“游击兵团”的人走到由哨兵站岗的大院门口，先向哨兵敬了个礼，然而将哨兵抱住，夺下了他手中的半自动步枪。哨兵解决后，才由千人左右的队伍，冲进了存放武器的大院，由内线带路，直进武器仓库，七手八脚地将仓库里的武器（没有弹药）尽数地搬了出来，由于这里的武器主要是军事教育所用。所以品种上从18世纪的木柄手枪开始，一直到现代的“火焰喷射器”，日本的水桶机关枪，苏联的各式轻重机枪，应有尽有。这次“抢枪”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结束，手中有了现代化武器的队伍和手无寸铁的群众组织，已经有明显的不同，必须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这时252部队的李德康他们提出了改变原设想在南京本地整顿队伍的方案，立即通知镇江252部队派出数十辆军用卡车，将在宁的主力军全数当夜运回镇江，住进了镇江金山寺，陆渭文带二、三十人留守南京三天，亦去镇江。

南京主力军抢枪的消息，当晚就传到无锡王晏他们的耳朵里，王晏要向“九、二”送枪，当然比主力军抢枪更方便，（王晏回忆录54页）：“周锡林和邹海根从无锡市人武部一位外号叫‘豆腐部长’的副部长那里得知，无锡市的民兵武器和弹药，都放在27军二号坑道里。这条坑道有二个出入口，一个通向武器库，一个通向弹药库。坑道离市区有二十公里，坑道口在一个大山的岙里，

大小汽车都可以通行。看守坑道的是陆军八〇师的一个步兵排。”这天上午七点钟，邹海根带领一女中“红革风雷”造反兵团和二女中“云水怒”兵团，共三百多人分乘十辆卡车向坑道进发。周锡林带无锡柴油机校造反派‘1018’兵团和动力技校造反派“小延”兵团共五百人，分乘十五辆汽车，随后跟进。半小时后邹海根的车队到达坑道口，哨兵放下栏杆，表示不准进入。

邹海根跳下车，走到哨兵面前说：我是“九、二”中心组的邹海根，是到这里来搬运民兵武器的，哨兵拿起电话向值班室报告，不一会仓库主任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走到哨位口，问邹海根：你们是哪个单位的？邹海根笑嘻嘻的样子向主任招手，请他到跟前来，库主任走过来了，邹海根递给仓库主任一支香烟，主任挥手说“这里不可以吸烟。”邹海根收回香烟，又把嘴巴贴在主任耳边，低声地说：我是“九、二”总部的邹海根，现在“红总”要来进攻无锡，他们在南京抢了军事学院的枪，装备了自己。现在他们各种武器都有，还有飞机配合。我们“九、二”什么都没有，我们向人武部说好了，他们同意把民兵武器借给我们用，现在我就是带着人来搬的。

主任问：“有批示吗？”

邹海根说：“没有。”

主任说：“没有批文不能搬。”

邹海根说：“情况太紧张了，你先让他们搬，我陪着你一块到人武部去办批文。”

主任说：“不行，那不行！武器不好开玩笑，我担待不起这个责任，要不我请示一下我们团长，你看好不好。”

邹海根说：“来不及了，让我们先搬吧。”

主任一再说“不行，不行。我担不起。”

二人在说着，争着，三四个身材高大的女学生来到主任面前，行了个军礼，说：“解放军叔叔，实在对不起，再晚了，‘红总’就要来啦！我们无锡人民就没命啦！”说着，几个人前后包围，把主任抱住了。主任一动也不敢动，只是嘴里喊“太不礼貌了！太不礼貌了！”一个女学生把主任手中的钥匙夺到手里，朝汽车上的人一挥手，几百个人蜂拥而上，哨兵见势不好，拉响了警报。接着一个排三十多人荷枪而出。

三百个女学生毫不犹豫把战士们团团围住，战士手里虽然有枪，但一点都没有用处，因为一来早就有命令不准开枪，二来他们枪里根本没有子弹。开始只是后退，后来退到坑道口，再也没有地方退了，嘴里叫着我们开枪啦！实际上毫无办法，七、八个学生包围一个战士，使他们不能反抗，也跑不掉。不多一会，连他们手里的枪也被夺走了，这时周锡林带领“1018”兵团也到了，这些小伙子冲上去拿钥匙就去开库门。门开不开，就用斧头砸，主任急着喊：“不要砸锁，我给你们开。”坑道门开了。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武器弹药全被搬走了。“8.9 抢枪”，由不同的军方“后台”把现代化的武器明抢暗送地送到了两大派不同观点的群众手中，“武斗”在向更尖锐、更激烈的阶段上升。

8 月 10 日以后主力军方面由浦湘海带队又从镇江出发去扬州打开了一个抗日时期留下的弹药库与军院抢来的枪配套起来，完整地装配了主力军队伍。

8 月 10 日以后，陆渭文最后地到达镇江金山寺，便有 252 部队通知陆渭文、浦湘海二人去受江苏省军区赵司令的接见，赵司令大约五十多岁年龄、头发微带花白，同时受接见的有常州主力军头头梁炳生。宾主坐定，主人热情接待，中华牌香烟招待几位客人。首长说话保住一定的分寸，除了表示关心的话题之外，连明确的“坚决支持”都没有表明，一切尽在不言中，招待几位客人在省军区午餐。这次接见之后，便有 252 部队帮助无锡、常州主力军在金山寺等地进行军事训练。还在 7 月份流向上海的无锡主力军传来了上海当局对暂留在上海“华东师大”和“同济大学”二处的无锡群众分发伙食费，目的是赶无锡人离开上海，发生了这一情况南京指挥部不能不管，将数千人的群众集体转移到南京集中，在条件上不允许。于是陆渭文主动地与主力军头头金坤泉商量：“老金，上海出现了这一情况，我们不能不管，我的意见是否请你带几个人一起去上海解决这件事，你看好否？”金坤泉很坦率地回答：“去上海坐火车要经过无锡，我害怕的，我不去。”陆渭文无可奈何只能自己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周国彦俩人，从南京乘火车经过无锡抵达上海“华东师大”，在和许多群众见过面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陆渭文发现在沪的人员中有轻院王国栋老师在内，于是在上海帮助他们建立以王老师为首的六、七人为上海分指挥部的领导班子，全权处理上海主力军的一切事宜，陆渭文这次到上海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解决无锡主力军的吃饭问题，于是就东奔西走的找关系，当然第一个首先想到“上海工总司”这个工人造反组织，想寻访他

们的头头王洪文。与他商量，祈求他的帮助，陆渭文找到了上海国棉 X 厂王洪文的“老家”，王洪文没有找到，却见到了几个曾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小兄弟”们。陆渭文向他们表明了这次找王洪文的来意，这帮“小兄弟”对陆说：“侬不要去找伊(上海话他的意思)，这个小赤佬现在找不到伊了，找到伊也不能解决问题，伊现在到东到西身边有个军代表陪同，一切问题都要军代表表态，伊才敢作主。”陆渭文听了这番对王洪文的近况介绍后，心中就想用无锡人的土语说法“这个表浆既不(无锡土话，不够交情之意)交易的”以后陆对王洪文产生了一种轻蔑的看法。以后在王洪文奉命到无锡来“作报告”，并没有见到主力军的热情态度，只能受到“九.二”群众的欢迎，在陆渭文等人的眼里“王洪文算什么造反派？它只不过是张春桥的傀儡代理人而已”。

同期上海出现了“上海工总司”砸“上柴联司”的武斗事件。“工总司”出动十万人马封锁了上海郊区进入上海支持“上柴联司”的农民，对“上柴联司”进行了一个个车间，一座座大楼的强攻，使“上海柴联司”的造反派在孤不敌众的情况下伤残无数的后果。使陆渭文拍案而起，心里骂张春桥披着左派外衣，口口声声支持“造反派”，实际上是啥人不听张春桥的话，他就镇压啥人。陆的这种思想直到 68 年陆逃到徐州的所谓“流亡政府”时，由陆亲自起草的“告全市人民书”的传单中暴露了对张春桥的看法，以后被无锡当局抓住“辫子”定了陆渭文“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这是后话。

陆渭文这次上海之行是无功而返，最后还是靠上海分指挥部成员的努力，才解决了留在上海主力军的吃饭问题。8 月中旬，苏州踢派与支派的武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苏州由 27 军 79 师支左）踢派又面临被打出苏州的危局，踢派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向上海无锡主力军求救，上海主力军分指挥部负责人王国栋即派人前往镇江，说明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出武装力量，支援苏州踢派，总指挥部接受了这一要求，由陆渭文派出一支以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为主体的武装连，一百人左右取名为“7.22”部队随上海分指挥部来人奔赴姑苏城，从此随这支“7.22”部队之后，大批在上海的无锡主力军涌进苏州，经过多次激烈的巷战，帮苏州踢派守住了苏州城。

到文革后期，苏州踢派兵团级以上头头大部分进入监狱，支派主要头头因为是“四人帮”的人，华 xx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8 月中旬的文革形势，似乎在向有利于主力军的方向发展，过去纯属“民办”的造反组织，现在有省军区，硕方空 15 师的支持，使原主力军头头金坤泉的头脑发热起来了，从原本避难者的身份转换为当然的“红总”头头，跳出来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了“主力军杀回无锡的誓师大会”，并且为了自己今后能踏进仕途与原市委常委的关系也显得十分亲热，在不经“红总”中心组的讨论，与不通过“革派联总”的情况下，力图单独宣布，原市委副书记吴镇为“红总”的“顾问”，副市长田洪，张再生为 xx 部长的职务。金坤泉的这一企求，有自己的目的，但可悲的是在运动后期，使吴、田、张三位老干部被打成“黑手”吃尽了精神和皮肉之苦，更为可悲的是到无锡市实行大联合、三结合的关键时刻，又是这个金坤泉坚定地站在 27 军方面，不承认“吴、田、张”是革命干部，排斥在三结合的范围之外。历朝历代总是有忠奸二派，国难当头总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金坤泉的行为，他不触犯法律，当然不会受到任何处分，他是无锡文革中唯一的“既得利益者”，最后以“副局级”待遇退休养老。

在这里还应该特别需要澄清的事实，在无锡文革中，“吴、田、张”三位干部，从未参与过对主力军做任何“参谋”决策。在以前的某些无锡文革是上记到“吴、田、张”三人在主力军的某些事件中，参与他们的意见，这是误传甚至是故意的陷害。

8 月中旬，由镇江 252 部队李德康在 252 部队内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无锡的陆渭文，常州梁炳生，上海工总司身份的戚丞，镇江三代会的李玉宝等人，李德康主持了会议。

李德康说：“这次召集大家一起来的目的是商议如何帮助常州主力军杀回常州的问题，是否可以考虑清无锡主力军帮助常州主力军一起杀回去。”

梁炳生详细地介绍了杀回常州在常州外围的对立派的一些武斗据点的情况三代会李玉宝表态：“你们常州，无锡主力军杀回去的一切后勤供应由我们镇江三代会包下来。”参加会议的无锡陆渭文有自己的考虑，考虑的问题有二点，

(1) 首先是无锡主力军去参于常州武装攻打常州，是否妥当。(2) 如果参于了攻打常州，“战争”难免会有流血与伤亡，如果在帮助外地武斗中，无锡主力军出现了伤亡，自己如何向无锡人民交代。由于陆的思想顾虑，所以在会议中迟迟不作表态。

接着，省军区赵司令第二次接见，被接见的有无锡陆渭文，常州梁炳生，陪同接见的有省军管会的 XXX 及“252”部队李德康。

赵司令员很关心常州主力军返回常州的问题，在听取了梁炳生的汇报之后，赵司令提出了一个送常州主

力军回去的方案，他可以派出 XX 部队思想倾向主力军的一个解放军连队，在前面开道护送常州主力军回去。正个接见都是谈的常州问题，陆渭文等于旁听，可能也是接受对无锡主力军的一种思想感染。在接见将近结束时，陆渭文开口询问：“我们无锡主力军怎么办？”赵司令没有回答，而在旁边的省军管会的 XX 首长接口：“你们也可以逐步向本地靠拢嘛。”陆渭文得到这句话，做到心中有数。

大武斗 6、武装进驻无锡县

“逐步向无锡本地靠拢”的基本思想已定。在陆渭文的思路里在设计如何使主力军接近无锡的方案。陆渭文首先找到了五兵团头头蒋群商议。蒋群是无锡农药厂职工，原坦克兵复员军人，二十四岁，陆向蒋群表明了准备让他们作为先头部队进入无锡县洛社地区。无锡县洛社镇是无锡县内的工业镇，镇上有一个洛社造纸厂，厂内有一名叫大彭的科室人员和一名姓杜的技术人员，是这个厂的“六派”头头，这二位头头来镇江指挥部联系，希望主力军首先进驻洛社镇，同时洛社地区包括石塘湾，玉祁镇等附近地区都属于“六派”的势力范围，如果主力军进驻这一地区，等于进入了过去的“抗日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根据这一情况，所以陆渭文所下的第一枚“棋子”，就选中洛社地区。蒋群当他明白了陆渭文意思之后，当即表态“过去使用大刀长矛，我没有本事，现在用枪动炮了，我不是外行，你可以决定由我们前去就是。”但蒋提出，因为他与电讯兵团头头周文宝的关系比较亲近，请陆渭文考虑同时安排俩人一起去。陆渭文同意了蒋群的要求。但进驻洛社，从镇江出发，到无锡县必须经过常州，常州当时是在“常州联指”的控制之下，想要安全抵达无锡县，必须想法避过常州这一关。

因为这是军事行动，必须注意保密，陆渭文先将五兵团一部约八、九十人先从金山寺主力军的大本营内调到镇江师范，指挥部所在地，造成这支部队“不知去向”的假象，然后再由无锡铁道兵团头头龚太泉去上海铁路局借二节车厢，事先“埋伏”在镇江车站。在 8 月 22 日半夜，由南京开往上海的 92 次快车

经过镇江车站，将这支进入无锡县的主力军小分队偷偷地进入车厢，然后由龚太泉亲自将这二节车厢挂在 92 次列车尾部，92 次列车在寂静的夜色中“轧、轧”作声地行使，在黎明初现出东方的鱼肚白时光，列车停靠常州车站，下车的旅客秩序井然地离开列车，列车继续向上海方向驶去，当列车到达洛社时，调度室来了临时停车一分钟的指令，在这一分钟时间内二节车厢内的主力军武装小分队已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第一次偷渡常州的计划成功了。这一行动很快引起了无锡当局“九、二”派的高度警惕。

在镇江的陆渭文又在布置第二次大队伍进驻无锡县的计划，第一次的特点是人数少，而且是在“敌于无备”的状况下进行的。第二次武装人员多，而在“敌”有备的情况下，不能再用老方法实施。

8 月 31 日，由陆渭文亲自带队，组织了一兵团，七兵团，“6.20”部队，及二个“老虎队”，全员有 5.6 百人，向镇江三代会商借了二艘大型木船，经长江水路，走江阴进无锡洛社镇，临登船时发现船小人多，不能容纳所有队伍，于是只能临时改变计划，将一兵团全数 3 百人暂留镇江码头，由陆渭文带七兵团等 3 百人队伍按计划先行，木船向江阴方向进发，江水滔滔，木船在破浪前行，等到满天繁星稀落，东方将晓时刻，陆渭文根据手中的地图，指挥木船在离江阴市不到 5 公里处停船上岸避开了江阴反对派的阻击，领队伍从江阴郊区的缝隙中步行向洛社方向走去，木船返回镇江，准备载后续队伍前来，从江阴到无锡步行一天，露宿在荒郊，直至第二天 9 月 2 日到达玉祁镇，受到玉祁“六派”群众的热情招待，下午到达洛社镇，队伍住进洛社师范学校。

当夜由周炳荣带了七兵团一百多人进驻张村东北塘地区，陆对所带队伍进行了“布防”，由五兵团“飞虎警卫团”驻守二面临水，一面通往市区的唯一的一座水泥长桥——皋桥，背靠铁路，看守了洛社的“东大门”，由“6.20”王明华及机床“4.15”一部驻守石塘湾，由“小老虎”队一个排驻守在通往钱桥的小道，守住洛社的“西大门”，陆渭文带一个警卫班及电讯兵团三、四十人坐镇洛社师范，洛社造纸厂，作为主力军搞宣传工作的文职人员留守，是表面上的“指挥部”，作为一个没有当过兵，没有军事知识的年轻“总指挥”认为这样的布防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格局。9 月 3 日过去了，不见后续部队到来，9 月 4 日从洛社的火车上来来了镇江指挥部的副指挥，徐志纯等人，找到了陆渭文，并当面传

达了“指挥部”的最近决定。从8月31日陆渭文带头离开镇江后不久，由硕放空15师政委吴世俊赶到镇江，阻止了在镇江码头等船出发的一兵团所有人员，继续向无锡县开进，这一决定引起了原野战军头头周雷的不满，周对空鸣枪，为此“指挥部”对周雷作出了处理，空军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已派出以徐锦平为首的中央文革“无锡问题调查组”来到江苏，并通知“六派”“九派”双方在军事上不得擅自行动，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责任。陆渭文接到这个严肃的口头通知之后，理所当然地绝对服从，对无锡市内作出不越雷池一步的打算，留守在洛社待命，但由于这个决定亦使已经进入无锡县的主力军队伍变成了“孤军深入”的被动局面。但“九、二”方面由于有后台的支持，他们就根本不理睬什么中央决定不准任何军事行动。这样无锡主力军方面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于是出现了“9.6”事件。

大武斗

7， 在无锡县内发生的几次冲突

9月6日深夜由“九派”的武装人员从河对岸泅渡到皋桥，将“飞虎警卫团”放哨的芦洪生捉过去，以后将芦洪生装进麻袋后活活打死。

9月9日深夜，一支“九、二”武装小分队从皋桥上偷摸过来，与五兵团发生“遭遇战”，冲在前面的“九、二”人员被主力军方面击毙，主力军方面，五兵团头头蒋群，身中对方一梭子子弹而死亡。

9月13日深夜，在东北塘有“九、二”一个东片武装连私自行动，偷袭东北塘主力军，“九、二”前哨一个班由连长徐耀富带领，在刚进入东北塘地区，恰好由七兵团头头华仁良，李伏阳，许万祥等四人出门巡哨，在黑暗中相距不过10公尺左右，当华仁良发向口令时，对方回答了一个主力军七兵团内的名字，华仁良误为自己人，准备上前握手之际，对方发出“叭叭”二声枪声，击中华仁良胸部，随接一枚手榴弹在华仁良腿部爆炸，当时华仁良与陆志良两人应声倒地，华仁良身边的其他人迅速伏地，身边的警卫员对准从黑暗中发出火光的方向“嗒嗒嗒……”回射一梭冲锋枪子弹，将“九、二”连长徐耀富当场击毙在草堆旁，同时冲锋枪子弹亦击中徐耀富身后的二名机枪手，二名机枪手受伤倒地，主力军方面听到枪响，纷纷出动，由于“九、二”方面既对地形不熟，又缺乏群众基础，故在主力军的包围中俘虏“九、二”武装13人，“九、二”出动的一

个班一死两伤俘 13 人全军覆没。一夜激战之后，由驻守张村的主力军七兵团人员立刻赶到东北塘，主力军的增兵，吓住了潜伏在模具厂的其他“九、二”武装，东北塘发生夜战和七兵团头头胡仁良，陆志良牺牲的消息，于 9 月 14 日早晨，通过电话传到了设在洛社师范的前指挥部。由于洛社“9.6”事件，“9.9”事件的发生，陆渭文与副总指挥徐志纯商议，准备将驻守在张村，东北塘的七兵团队伍调回洛社，当时徐志纯的意见，因陆渭文要照顾全局，还是由他去张村传达指挥部决定，于是，徐志纯带领一个警卫班和七兵团头头金浩良从 9 月 13 日出发前往张村，巧遇“9.13”事件发生，于是 9 月 14 日清晨，由徐志纯，金浩良，蔡艺群，杨锡昌等人带领队伍接应东北塘队伍，并执行指挥部决定，将该地区队伍全数撤往洛社地区。在 9.13 事件中主力军撤离东北塘，这时由主力军内部有二名队员，一叫李介明，一叫王耀坤，处于气愤，偷偷地返回当地医院对二名受伤的“九、二”“叭叭”二枪，结果了他们的生命，这二人在运动后期被判处“无期徒刑”。（王耀坤现已减刑出狱，李介明死于狱中）但撤离队伍受到了当地“支左”部队的阻挡，这时在刚刚撤离战场的主力军，面对这一情况，也顾不得尊重解放军这一传统观念了，立即端起手中枪，在半自动步枪上推上刺刀，子弹呼拉一声上膛，逼退包围过来的解放军，带领所有队伍包括东北塘地区的“六派”群众 3 百多人迅速撤离，主力军一走“九、二”增援武装马上赶到，“九、二”的气出在主力军居住过的房东身上，将一家的住房拆掉，把他家饲养的肥猪杀掉。

“9、15”事件：洛社“9.15”事件并不是单纯的武斗事件而是一次政治事件。是在“中央文革调查组”进入无锡着手解决无锡问题的历史背景下，由“九、二”发动大批武装进攻洛社围歼主力军的事件。根据王晏《回忆录》记载：……“九、二”早有准备了，他们的力量，主力军根本抵挡不了，他们组织也很周密，半夜十二点，他们的水上部队就秘密地运动到洛社附近，早上六点钟，他们东面一路来五节火车，沿铁路直接攻击洛社车站。西面一路来 15 辆卡车沿 312 国道迂回到洛社侧后，切断了洛社主力军的退路。七点钟打响，不到一个钟头，就结束了。王晏的“回忆录”内容有相当的夸张之词，但他不敢说出制造这次血案的真正指挥者，支持者是谁？指挥制造血案的是原 27 军转业团长徐××（“九、二”参谋团）支持者笔者缺少真凭实据，但不难想象可以得出的结论。把责任推在“九、二”头头周锡林，邹海根身上，这是推卸罪责的手法，凭周锡

林，邹海根二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更没有这个能力，指挥这场战争式武斗，在 9.15 事件中主力军所受到的严重损失，作为年轻的“总指挥”也犯有错误，9 月 14 日，在发生东北塘事件之后，洛社也得到了“九、二”将要大举进攻洛社的“情报”。9 月 14 日当晚洛社主力军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了“九、二”大举进攻洛社，我们怎样应付。会议由陆渭文主持，除自己主力军方面的人之外，还邀请了洛社当地“六派”头头大彭等人参加。

强敌压境，怎么办？三种意见，

1，暂避锋芒，将主力军暂时撤离洛社。

2，以洛社头头的意见，主力军不能撤离，撤离算什么意思。

3，最后会议决定主力军坚守原地，但必须做好防范措施，于是陆渭文安排增加哨位，由单人放哨改为双岗，等等，但因为陆渭文在军事上缺乏“知己、知彼”，对“敌”没有估计到如此强大的武力，对己没有看到自己队伍的素质，二点估计错误致使吃了大亏。

9 月 14 日夜，洛社地区显得分外宁静，半个月来，从皋桥到洛社的沿线，不断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全然消失。陆渭文和他的参谋周梅泉（原太湖游击队队员）俩伏在洛社师范学校的室内，整夜守在电话机房，洛社师范的指挥部里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指挥东北塘主力军在深夜撤退的行动。这支队伍的行动是这样：向洛社靠拢的一切情况。

徐志纯电话告诉陆渭文，撤下来的”主力军”已经到达离石塘湾东面约七、八里地的一个村庄，因队洛社地区的情况不明，拟在原地休息，待天明后再行动，陆同意徐的意见，不料从此和总部失去联系，直到 7 点钟左右听到石塘湾方向传来阵阵枪声，又同从石塘湾那边走来的农民说，洛社已经打起来了，徐志纯打电话给陆渭文，无人接听，感到情况严重，立即和七兵团的头头们商量，决定先派 3 名主力军前去侦探，待弄明情况后再行动。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回来说，”九、二”进攻洛社，石塘湾没有发生什么事。八点钟左右主力军全体及东北塘群众 300 人向石塘湾挺进，在部队将到石塘湾，整个石塘湾已经战火冲天，这时一名陆渭文的通讯员找到徐说，”我是老陆派我在此接应你们的，总部将要移到玉祈，陆命令七兵团向玉祈方向靠拢。”

9月15日清晨6点左右，忽然，听到洛社镇上传来了“叭、叭”二声清脆的枪声，陆抓起电话与造纸厂内通话，电话里不断传出“嘟嘟……”连续的“忙音”，陆再与洛社或车站值班人员通话，值班员电话中回答，造纸厂已被“九、二”占领。这支迅速占领洛社造纸厂的“九、二”队伍，从何而来的呢？原来这支“九、二”约二百人左右的精锐队伍是从钱桥方面走小路直插洛社镇的，中途遇上埋伏的“小老虎队”一个班，这一个班由于不是正规的军人出身，遇上这支“九、二”队伍之后，心急碰上机枪卡壳，打不响，立即撤离阵地，结果另外二个班的主力军被“九、二”活捉，所以“九、二”武装能顺利进入洛社直扑“指挥部”，“九、二”武装开枪击中宣传组负责人XXX，XXX中弹倒地，无人救治，后因流血过多死亡，一名宣传组成员跳窗逃跑，一名冒充外地业务员混出造纸厂，其余数人被抓。陆渭文得到造纸厂失守的消息，立即带领指挥部所有的四、五十人冲出洛社师范，将队伍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洛社小石桥并进，企图抢占洛社桥，陆渭文自己带着中路10多人进入离洛社桥约50米处的一片桑树地里，伏地观望，但见洛社桥顶已有一名头戴钢帽的“九、二”机枪手架设好机枪，凭陆渭文在文革前民兵训练中的八环、九环的射击能力，只要将手中的苏式步枪瞄准，手指一扣有十分把握将这名“九、二”机枪手击倒，但陆渭文下不了这个手，所谓枪声一响，爷娘白养，眼看洛社镇上制高点已被“九、二”抢占，只得下令队伍向后撤，数十人的队伍伏在与洛社镇相对的洛社医院高地与“九、二”隔河枪战，机枪、冲锋“嗒嗒嗒……”的对射子弹呼呼地在头顶，身边飞过，主力军的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抬下来。

大约到9点钟左右，离洛社东面三公里处的石塘湾亦是枪声大作，“九、二”的水陆二路武装正面向石塘湾主力军“6.20”部队进攻“6.20”部队由王明华指挥，机枪扫射阻击来犯的“九、二”，一名由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机枪手，站起身来端着机枪扫射，结果腹部中弹，可幸的这名机枪手因人高腹大，射来的子弹竟从他的腹部脂肪层上穿过，并无进入腹内，他再次射击，一颗子弹又中了他的面部，这颗子弹又像长了眼睛一样，并无进入他的头颅却从他的牙齿缝内钻过，打掉了二颗牙齿，他真是命大，没有死在罪恶的子弹中。

陆渭文在洛社接到石塘湾的战况报告，在陆身边的二名参谋，周梅泉，邱旭东（原无锡红卫玻璃厂厂长，解放前是镇江茅山游击队短枪队队长，文革后

期被“九、二”打瞎一只眼睛，而精神失常）向陆渭文提出建议，“根据目前的情况分析‘九、二’有十倍以上的兵力包围我们，我们不能硬拚，要想法脱离战场”陆渭文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立即派出通讯员，通知石塘湾“6.20”立即撤出战斗，向后方玉祁镇集中，这时东北塘主力军亦已赶到，陆命令队伍亦向玉祁集中，石塘湾“6.20”部队接到通知后，因为自己没有吃到亏，十分恋战，机床厂技校“4.15”学生丁小波（是市内举重一级运动员）园混混的身体，手端机枪，不断连续地向冲锋而来的“九、二”发射，突然一颗步枪子弹击中了小波的后脑，丁小波应声倒在地上，当担架抬着他撤离时，在昏迷中的小波躺在担架上还不断地念着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表示了他对自己年轻的生命结束，无悔无恨的心情，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这时东北塘主力军已经到达石塘湾，七兵团的头头立即组织了一支 60 多人的队伍准备进入阵地参加战斗，徐传达了陆的命令后才阻止，徐接到五兵团彭永锡的电话，彭说，我这里形势大好，要全歼“九、二”，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徐告诉彭和五兵团，“对方人多势众，后方比我们近，供给，救治伤员，增援都比我们有利，要听从指挥，赶紧乘隙撤下来，向玉祁方向靠拢。

在洛社方面，激烈的枪战，无法停歇，到上午 10 点多钟这时正好有洛社驻军出面，找到了陆渭文建议双方停战，陆渭文接受解放军的建议，抓起车站上的电话与“九、二”方不知名的代表“谈判”，“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陆渭文乘这 2.3 分钟的枪战停息，立即通知自己的队伍撤过铁路线，伏守在铁路的路基上，“谈判”失败，主力军守住铁路线，这时才使主力军在铁路边的农民村巷上喝上一碗稀粥。到 11 点钟将队伍徐徐向玉祁镇方向退去。“9.15”事件使沪宁线上交通停了半天。傍晚时分三路队伍全部在玉祁镇结集，从 9 月 1 日起到 9 月 15 日半个月的时间内武斗这个恶魔夺去了 20 多位主力军中年轻的生命。

在玉祁的集中地，一边是主力军的伤员和遗尸，一边是 13 名活生生的“九、二”“俘虏”，主力军中的许多人真可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对着“俘虏”拳打脚踢，“九、二”人员拼命抱头躲闪，陆渭文知道，如果听其自然 13 人的生命会造成严重后果，但群情激昂，难于止住，于是命令自己身边的警卫班将 13 人隔离起来，一起带回镇江。

主力军在“9.15”中虽败而不溃，在当夜请当地农民作“响导”要绕过“敌占区”，戚墅堰机车厂，和情况不明的常州市，向镇江方向退去。

农历8月中旬，一轮明月当空，在田间的小道上一队5.6百人的队伍，一字长蛇地在缓缓行动，直到人们习惯的中秋节，这支撤退的主力军队伍已抵达“奔牛”车站，每人二个大饼算作“月饼”充饥，陆渭文此时此境写下了“卜算子”词一首：

“岁岁中秋，今又中秋，六七中秋走‘奔牛’，佳节亲人不聚首，枪林弹雨，数百战友，峥嵘岁月写春秋。”

这个中秋之夜，二个大饼之后遇上了镇江金坤泉带队的六兵团船队，将这支败军之旅接回了镇江。

大武斗 8， 大联合，谈判和主力军返回无锡

9月下旬，在中央的干预下，无锡“六派”，“九派”各派出九名代表前往北京，进行两大派的谈判，最后商量“大联合”。“六派”方面，派出了浦湘海，陈象川，杨仁荣，匡建中，戴永刚，裘家栋，金坤泉，李文庆，徐志纯等人，“九派”方面派出了周锡林，邹海根，陈卫等人，部队的代表：27军方面有副军长王挺、宣传处处长王宴、侦察处处长王明清；此外，还无锡人武部部长吴体仁、炮九师高师长、硕放空十五师师长郑刚。谈判在国务院办公厅派出的联络员和部队代表的参与下进行。谈判开始后，首先谈交枪一事。当时中央已经有命令，在群众组织手中的枪支弹药，一律就地交给当地的驻军。无锡造反派当然听中央的话，二话没说，答应立即将手中的武器全部交给所在地驻军。当时无锡“六派”代表还提出，交出武器后，人身安全由谁负责给予保障？这时所有在场的部队代表都异口同声地说，解放军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并都在相关的协议上签了字。在后来的大联合谈判中，“六派”代表在大联合的协议中又要求写入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的条文。这些协议还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认可，并说“谁不遵守协议，谁就是蒋介石！”当时无锡“六派”的代表深信解放军代表的承诺，立即要求在镇江和上海的“六派”人员把所有的武器全部就地交给所在地驻军。无锡造反派从拿起武器的第一天起，心中就把武器仅作为自己生命安全的保障，没有想靠武器去取得压倒对方的胜利。交出了武器，也就交出了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手段。但是，以后的形势发展表明，27军在无锡军管会中的代表，辜负了

无锡造反派的信任，他们没有能够保护无锡“六派”人员的生命安全。在无锡“六派”交出了手中的武器以后的几个月中，又有许多主力军或支持主力军的群众被“九派”人员抓去殴打致死，被殴打致残的更是难以计算。两派代表从9月26日离开江苏去北京“谈判”达三个月之久，于68年1月28日返回无锡。

在上海，苏州的无锡主力军于67年9月30日被无锡军管会接回无锡，全部人员数千人暂时全部集中居住在无锡市第一中学校院内。在镇江的主力军于67年10月15日，由无锡军管会接回无锡，全部集中居住在老轻院内，二地在外的主力军群众回锡后，仍在“九、二”的武力包围之中，虽回到了无锡，但仍不能回家，凡自私回家的人仍经常被“九、二”打伤后送回一中和老轻院住地。

“11.1”事件，11月1日下午陆渭文正好离开无锡“九、二”无故包围老轻院，人山人海将老轻院住地围得水泄不通，“九、二”武装发起冲击将老轻院后面围墙打破，企图冲进轻院，“九、二”邮电局职工，万常培头戴钢盔，手执长矛，探头探脑，试图在围墙的缺口处冲进轻院，正好被主力军中的王建昌，手中私藏的卡壳枪横向放出一枪，“碰”的一声，正好击中万常培的钢盔，脑袋开花，倒地毙命。王建昌到文革后期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次事件老轻院被围36小时之久。

“11.26”事件，无锡市国棉三厂的位置就在老轻院的背后，主力军三兵团头头李兴宝找陆渭文来商量，“我们主力军一直被围困在轻院内总不是个办法，我们兵团人员商议，是否可以组织些力量，护送国棉三厂的职工回厂“抓革命，促生产”陆渭文想想三兵团头头们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抓革命，促生产”符合现行政策，再说自己的队伍目前基本上“手无寸铁”又不准备回去挑动武斗。于是表示赞同李兴宝等人的想法。就在11月26日下午，陆渭文在轻院内组织了近三百名群众，列队护送国棉三厂的主力军回厂。当陆渭文亲自带队走出老轻院大门口，巧遇了弹丝一厂主力军头头王炳贤，王对陆说：“老陆，你是总头头，家里事多，国棉三厂还是我替你去吧。”陆一想也有道理，于是这支队伍就由王炳贤带头前往，队伍刚进国棉三厂厂门，外面“九、二”武斗据点里响起了自动步枪的枪声，主力军在镇江返回无锡时，全部交出武装（除有二、三人私藏几支短枪外）而“九、二”方面从“11.26”实践中暴露的情况看，他们根本没有交枪，这里不能不说明当时27军对“九、二”的庇护。进国棉三厂的主力

军全部被包围活捉。代替陆渭文进厂的王炳贤被抓去后，被“九、二”人员用外表包着橡胶的铁棍猛击头部，无外伤而使头颅出血，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在北京谈判的“六派”代表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找在北京的无锡军管会代表交涉。开始无锡军管会代表只是说做工作，实际上无锡仍旧不动。后来，在北京谈判的“六派”代表全体绝食抗议，惊动了接待这次谈判的国务院办公厅，在国务院办公厅的严令之下，被抓的主力军才获释放。

五， 大联合和三结合

随着之间的推移，在直 68 年 1 月 28 日，在京的“六派”“九派”代表，经过了周总理的接见后，返回无锡，无锡的两大派组织被定为“二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在毛主席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二大派组织”的最高指示下，无锡文革进入了“大联合”，“三结合”阶段。

革命的“三结合”是由“支左”部队的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红总”中心组会议上，讨论革命干部代表时，以陆渭文为首的一帮人，坚持支持吴镇，田洪他们为“革命干部”代表进入这个权力机构，陆在会议上表示：如果像我这样的人进入革命委员会，他们把无锡市的权交给我，我懂什么？如果没有革命干部的加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的态度是：我今后在街头上走路，只要背后的老百姓说一声陆渭文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愿自己坐在小车内，被群众指指点点骂山门。而这时的“红总”首席代表金坤泉，忘记了当初在镇江时极力吹捧吴镇，田洪，要请他们担任“红总”顾问等职务的亲近态度，而为了私利倒向军方赞同孙富中，马建两人作为革命干部代表进入“三结合”机构，将吴，田等打成黑手，受尽折磨。

“群众代表”进入三结合权力机构，从表面上看有你们群众组织自己推选，实际的主动权完全控制在军方代表手中，在“九、二”方面他们是自己人，他们选择了他们的精干力量进入权力机构，在主力军方面，他们在物色有利于他们一统天下的合适人选。“红总”的主要头头中，一个是挂牌头头金坤泉，一个是实力派头头陆渭文，军方王晏力主选择绵羊式的金坤泉，而害怕主力军中的死硬派陆渭文，怕担心陆是一个牵不住的猴子。直到以后“孙悟空大闹天宫”时，

王晏他受到上级的指责，后悔没有将陆渭文锁住。“红总”方面推派的工人代表，除金坤泉，李文庆之外，其他推选的代表大部都是“学毛选的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劳模”等等的老好人，就此无锡市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班子军队代表是“九、二”观点的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是“九、二”观点的干部，“九二”代表是相对的精干班子，尽管无锡市革命委员会于 68 年 3 月 1 日在无锡市体育场宣告成立。但狼走千里改不了吃人，狗走千里改不了吃屎，“派革会”的诞生，没有给无锡人民带来安居乐业，他们将利用手中的权利，更合法的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路线，挂起“群众专政的牌子”，“专政群众”，激起陆渭文、匡建中等一批人的反抗，逼出了一个所谓的“流亡政府”来。

第三章 流亡政府与狱中

1, 造反派的无奈

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下属机构有“大联委”，由执行“群众专政”的“工人纠察队”十个连队，驻

守在全市的四面八方，这十个连队统一由“工纠总部”指挥，（以后改名“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部的“指挥”由军方代表担任，“付指挥”由“九、二”的李鼎铭担任，“工纠队”在革委会建立之后，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也做了一点工作[自欺欺人]，但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方向是“革委会”“专政群众”的工具，是镇压群众反抗的打手，是一座人间魔窟。

市革会建立之后，曾一度担任“总指挥”“红总”实力派头头[群众称]的陆渭文，在“红总”内部做一些扫尾工作，然后，准备回到自己的原来单位去做一名普通工人。树欲静，而风不止。由江苏省革会的负责人向下传出了“要一派打掉一派”的指示，（根据张宁回忆录记述）无锡开始行动了。

为清洗主力军观点的造反派，首先以查群众组织中的坏头头为由，重新由工纠队把原“红总”的主要负责人，卜岩，江汛，周炳荣，殷虎，王明华，苏锦坤，胡阿二等，以至于后来连支持主力军观点的革命干部何泄也统统被抓了起来。并同时，集中几个单位的“九、二”突然袭击正在上班的主力军，将这个厂

的主力军群众赶出厂门，有些单位的主力军实力比较强大，组织反抗，“工人纠察队”马上出面，抓主力军的人，“九、二”方面如此横行霸道，市革委会如此纵容，又激怒了将退未退的陆渭文等人，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由陆渭文，匡建忠（市革会委员）杨锡昌（市革会委员）周志鹏（市革会委员）等人一起商议，鉴于目前的情况，各基层单位的主力军群众纷纷前来“红总”诉苦，怎么办？总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商量对策，于是召开了“5.8”，“5.9”二次会议。

主力军七兵团下属有一个渔业大队，又一批捕鱼的小船，于是有七兵团头头金浩良去借了一条小渔船，“5.8”会议就在小船上召开，称之为“小船会议”。

5月8日夜，静悄悄，在荒野的郊区小河水里，停靠的小渔船上，由陆渭文，匡建中，周志鹏，杨锡昌，金浩良，李伏阳，丁可南等10多人进行了秘密会议，会议由陆渭文主持，会上讨论了目前的形势和相应的对策，陆的看法，“目前是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必须组织力量，进行反抗。会议认为“目前又是在进行‘复辟’”。根据大家的建议，建立“反复辟指挥部”，推选陆渭文为“军长”，杨锡昌，丁可南俩为“副军长”，由陆渭文等人着手组建武装队伍，有计划地攻打几个“工纠连”，抢出主力军中的老造反，抗诉市革会对主力军的又一次镇压。会议直至凌晨六点钟左右结束，大家登岸各自散去。

5月9日晚在中山路“牙科门诊所”继续召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5.9会议的人除“5.8”会议的一部分人员外，还增加了“红总”中心组成员章传贤（市劳模），后勤人员陆鸿，愿“6.20”部队王明华，苏金坤，原警卫班负责人，吴阿二等人。为了造反派的利益，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

但晚九点多钟，会议刚开始，还未正式安排个人的任务，却已被“九、二”学生发现，并有“九、二”武装冲进会址，会议被冲散，参加会议人员翻窗跳屋突围而去，其中两人腿骨受伤。

根据情况在市内已无法活动的现状，于是在5月10日下午，在硕放机场附近的荒野地里再次召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市革会内的浦湘海派人来向陆渭文传达了市革会主任，27军军长尤太忠带来的口头通知，叫陆渭文等10人进大箕山开办的二派头头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陆渭文对这位从感情上没有多大抵触的全市“父母官”，军队首长的通知，为了造反派的利益，为了捍

卫文化大革命陆渭文，冒当时天下之大不韪，断然拒绝参加这个名正言顺的“学习班”，陆的决定可能是起到了干扰革委会建立后需要稳定的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但这个年轻的工人只是出于市革会对主力军再一次镇压的本能反抗，对“通知”产生了“反弹”。这次会议还未正式开始，又被硕放当地的民兵查问而未讨论任何内容。种种现实，在革委会成立之后，“权力”已被法定，陆渭文等人企求组织力量反抗，已经是件不现实的举动，“学习班”不参加，何去何从，唯一的一条路，离开无锡。去南京？等于羊入虎口。北京上访？去告革委会的状，此路不通，最后会被送回无锡。陆渭文想到了徐州。徐州是江苏的地盘，但是有济南军区“支左”，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是支持造反派的，徐州是“踢派”掌权，陆渭文作出了逃往徐州的打算，于是陆渭文就与匡建中等人分手，对匡建中等说明，自己在未去徐州之前，先去常州，苏州等地，向他们通报一下无锡的情况，然后再到上海与匡建中，周志鹏碰头。陆、匡在5月10日硕放分手，各奔东西。

5月12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李伏扬起草红总公告开除金坤泉。

2， 流亡生涯

1， 陆渭文被宣布为反革命

陆渭文先去常州，与梁炳生见面，通报了无锡情况及自己的打算，再去苏州与苏州踢派头头见面，5月12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李伏扬起草红总开除金坤泉公告。然后返回上海去周志鹏亲戚家中。

在陆渭文从常州赶回上海，在周志鹏家中碰见匡建中，正好有时任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浦湘海，派陶念龙（陶在揪“5.16”时自杀身亡）也到上海，在周家碰见陆、匡俩人，小陶说：“他受浦湘海委托从无锡特地赶来。最近几天，无锡主力军中在无锡不见你们几人，情绪比较低落，所以定于今日下午二点，在市体育场室内球场召开全市主力军基层头头会议，叫你们俩人（陆、匡）回锡与大家见见面，鼓鼓气。”陆、匡俩人听完小陶带来的口信，也十分相信，陆渭文心中明白，此去无锡凶多吉少，但为了与基层头头见面，义不容辞，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大不了牺牲自己，于是答应来人与小匡俩人即刻动身。陆渭文今天身穿黑色军便装，将风衣扣，扣好和匡建中等人离开周家，准备乘火车赶回无锡，

三人走出周家在弄塘口的小便处“方便”一下，走上十几步路，“302”公交车正好开走，在公交车车站上不过等了三、四分钟，坐上 302 公交车赶到火车站，排队买票，在车站售票处排队，还有二、三人时，售票的窗口小门关闭，时间到，停止售票，三人买不到车票，就往火车挤，准备在火车上补票，谁知今天的列车员特别认真，不允许车上补票，硬将陆、匡等人从车厢里推将下来，陆、匡等人出于无奈，只得下车，就在车站上就餐，准备下午乘上还开往南京的快车回锡，估计时间虽赶不上开会，但到锡后，会议还不会结束，陆渭文等人在车站午餐后等车时，抓紧写好二封家书，托人带回家中。下午 1 点多钟三人乘火车赶奔无锡，抵达无锡车站的时间是下午 3 点多，三人赶乘公交五路车到市体育场，下车，会议刚刚结束，会议主持者都已离开会场，散会出来的群众还在先后慢慢离去，陆渭文走到市体场桥上，见到原纺织兵团的顾×，顾×见到陆渭文神情十分惊讶，开口：“你怎么还来到这里？”“怎么啦？”“今天会上尤太忠已宣布陆渭文，殷松勤，金浩良，陆福根四人为反革命”。陆渭文到这时方知今天的会议原来是个圈套。今天下午的会议由金坤泉主持，无锡市革委会主任尤太忠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始尤太忠上台宣布陆等四人为反革命，这时混进会场的“工人纠察队”立即将原先暗藏着的“工纠”袖套套上左臂，在会场的四周围架设好机枪，这是恐怕会场发生骚乱的弹压措施，布置得十分周密，当陆渭文听完了顾×的介绍之后，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匡建中自持自己是学生，又是市革委会委员当然不怕，匡走了一段路，回身追上陆渭文，用借来的自行车，将陆渭文送到硕放火车站，从此陆渭文开始了他为时一年的流浪生涯。

古人有诗云，“一朝脱得金勾去，摇头摆尾再也不来”。

强权政治，将主力军中的维护正义死硬派逼出无锡，一烙铁将无锡烫平。在无锡大街小巷到处刷上斗大一个字的大幅标语：“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枪毙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油炸反革命分子陆渭文”这还不解他们的心头之恨，在陆渭文三个字上用红色打上×××。

更为可悲的事，由军方的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陆、匡组织武装进攻“市革会”的路线图。登在“红卫兵报”上，这样陆渭文“颠覆红色新政权”的罪名成立了。无锡刮起了“十二级红色台风”。他们的文革口号也增加了，第一句“打倒刘、邓、陶！”第二句“打江（渭清）陈（光）包（厚昌）”第三句“打倒韦

（永义）江（坚）吴（镇）扬（增），”，后面再拖上一句“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捉拿反革命分子陆渭文的“通缉令”似雪片飞扬，无锡街头巷尾，陆家乡常熟市的每个角落，真个苏南地区……南京刷出了“陆渭文倒台了，你文风来怎么办？”的大标语。文风来是南京”好派”的一把手，在”深挖 5.16”运动中被逼疯去世。

3， 在徐州的流亡政府

陆渭文只身由匡建中用自行车送到硕放以后，等到天明，去上海和自己的妻子张毓珍，无锡印染厂的陈东兴三人，坐上北去的列车，踏上了素称“南蛮北侩”交叉之地—徐州城。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徐州“革委会”主任由一名铁路工人叫杨振祥（以后被判刑）的担任，副主任中有一位徐州淮海大学的女学生叫周明霞等。陆渭文到徐州，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去找谁联系呢？于是首先找到了徐州“工总司”这个群众组织，由他们的头头顾炳华（文革后期因反邓小平判刑 18 年）等人接待了这三位江南的来客，他们听完了陆的介绍之后，将信将疑，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收到了无锡市革会寄给他们捉拿陆渭文的“通缉令”，他们相信了，于是他们将陆等人暂时安排在徐州市一中的校园内，陆渭文逃往徐州的消息在无锡市革会的宣传下，在无锡地区传流开来。没有几天，无锡的群众接二连三地逃往徐州，由丈夫被抓后打死的孤儿寡妇，由屁股被打烂的工人，又从“工纠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内逃出来的，随后无锡市革委会委员匡建中，周志鹏等人亦来徐州。

无锡是“样板”，这股“十二级红色台风”刮向苏南各地，常州“揪李、戚死党”（李戚反革命集团亦是冤案）见过李顺之，戚承的人是“李戚死党”，与“李、戚”素不相识的群众是“李戚”“小爬虫”，“李戚”的“毛毛虫”，常州主力军被逼得无路可走，也来到徐州，苏州踢派，整个苏州地区农村都有人逃往徐州，镇江“三代会”的头头也逃到徐州，逃往徐州的人越聚越多，直至 8 月份，苏南地区逃往徐州的总人数已有 500 多人，这里众多的流亡人员，是不是因为陆渭文的号召而来的呢？并非，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求生存””反复辟”而走到一起来了。

这 500 多人聚在一起，他们借徐州这块可以使他们生存之地，写材料，揭露各自本地所发生的种种罪恶，向中央告状，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刷大幅标语，

控诉苏南地区的暴政，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支逃难队伍的存在，在客观上起到了与江苏省革会的错误政策相抗衡的一支政治力量。使无锡当局既恼怒，又毫无办法，所以他们在无锡又宣布：陆、匡他们在徐州组织“流亡政府”，“他们的人数虽少，但能量极大。”这个“流亡政府”的存在倒是在一定程度上使苏南地区各级革委会推行错误路线时起到了“牵制”作用。

有关当局在内部发出一条命令，在江苏各地各级革委会如果抓住陆渭文，可以不问口供“就地枪决”。无锡尤太忠，在某些公开大会上也宣称“只要陆渭文能够回来，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还是留着”。他们以“就地枪决”和“市革会副主任的位子”这两手来打压，坚持真理，正义的文革捍卫者，陆渭文，及这支反抗各地革委会压迫的造反派队伍中潜逃者。

在徐州的人群中，又一位从无锡市供电局逃出来的青年职工华文良，在徐州的交往中相识了“徐州淮海大学”无锡籍的女大学生，小尤，年轻活跃的女学生，对无锡主力军的遭遇，十分同情，通过小尤的关系，与徐革会的副主任周明霞有了间接联系，于是无锡主力军的外逃人员住进了宽大的淮海大学，华文良与小尤之间“他乡遇故知”，你来我往，日久生情，爆发了爱情的火花，在文革结束后华与尤“喜结良缘”，这是在“文革”悲剧中的喜剧。

在徐州市革委会的大门口，有人偷偷地贴上了一首打油诗：“踢得好，支得对，一年一个徐革会，干部乱站队，群众跟着活受罪”。这首打油诗体现了徐革会其实也在动荡之中，也说明了不问三七二十一的一刀切的成熟弊病。这是一条值得总结的又一文革教训。

4， 在山东的日子里

68年8月下旬，徐州市传出了：徐州“淮海八三一”（支派）要从南京回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消息，没有几天“淮海八三一”的群众，进入徐州市，数百人的队伍一进徐州，迅速占领了火车站附近的“淮海饭店”，在淮海饭店垒起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露在饭店的大楼窗口，徐州开始骚动了，徐州踢派也建立起自己的武斗据点，徐州踢派眼见自己也处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没有力量再帮助这帮来自苏南各地的逃亡人员，苏南来的数百人员又面临了何去何从的选择，陆渭文在徐州“淮大”召集了头头会议，决定在徐州的数名有关人员，立即离开徐州。

往何处去？举棋不定。山东济南，在济南军区王效禹的治理下，社会已经稳定，要想在济南立足的可能性极小，于是会议决定，派丁可南等十多人，由丁可南带头前往武汉试探性求助。由陆渭文，匡建中等人率队前往山东济南，将数有人员分散，作为普通旅客身份，乘上往济南的列车，约定在济南“大明湖”集中，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这天傍晚，在济南风景优美的“大明湖”畔，坐下了数百名“不速之客”，这使济南的安宁环境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好奇心的山东人纷纷前来，观看这些不可思议的男女老少，衣衫不整的人群。第二天上午，由陆渭文、匡建忠、蒋文明（江阴）徐光耀（常州，死于深挖“5.16”）芦向阳（苏州，他妻子×老师死于“5.16”）几人前往山东省革会，代表苏南“四市十八县”的受压群众，向山东省革会提出收留的请求，受到了山东省革会的热情接待。第二天有关方面派出了医疗队前来对苏南人群进行体检，同时在山东济南也传出了苏南地区“已经资本主义复辟”的流言。据悉王效禹为这帮人特地向中央文革写过“紧急报告”请示，中央文革如何答复，虽然内容不详，但从以后的行动中看来，中央文革对此并不表示支持。所以山东省革会最后以“收容”的名义，将这数百人的队伍“收容”在济南，每人每天二个白面馒头，二只山芋粉窝窝头，二碗玉米糊，一碗白菜汤，不管怎样，山东省革委总算将这批“难民”收留下来，使他们能够度过了68年严寒的冬天。

“千佛山会议”，时间进入10月份，丁可南等人去武汉等地试探的人员返回济南集中后，无锡主力军在济南的头头，陆渭文，匡建中，周志鹏，朱砚龙，殷松勤，丁可南等在济南郊区，“千佛山”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大家听取了丁可南等赴武汉的情况汇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山东对苏南人员的热情，改为“收容”，说明了王效禹的为难及策略对待，会议认为：“我们逼走济南，离开无锡越来越远，但仍要加强与本地群众的联系，要派出小队人员进入靠近江苏，无锡地区开辟新的联络点，到无锡发传单等。会议之后，即派出戴国荣，张永康等人进入连云港等地区开辟新点，这时的无锡外流人员心中唯一的希望是祈求着争取中央对苏南地区的“表态”。

11月份，由于常州主力军内部发生争吵，山东负责管理这帮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派人出面驱赶常州主力军数十人离开济南，双方发生冲突。陆渭

文为维护常州主力军人员的利益卷进了这场小小的冲突，结果常州主力军在第二天被迫离开济南，陆渭文被山东“文攻武卫”抓进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关押了起来，关押十多天后，陆渭文亦被“驱逐出境”。

陆渭文带着妻子，母亲和六岁的小女儿离开了济南，先到达山东枣庄煤矿，在山东枣庄煤矿先期到达的有常州主力军数十人，及无锡主力军方面十多人与当地枣庄煤矿踢派方面的头头，已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吃在煤矿食堂，住在附近的驴马旅店，济南的队伍在逐步收缩，由于无锡的外逃人员内部的团结，及“领导班子”的坚强尽管在一系列不顺利的事件出现之后，整个队伍并无受到影响，陆渭文仍然在指挥全局，济南的“摊子”，由匡建中等人在支撑，陆渭文在枣庄逗留了大约半个月左右时间，便带了自己的家属和当时的秘书朱砚龙等十多个无锡人进入了地处江苏和山东的交界之地，微山湖畔。

在津浦线上微山湖边有一个小站，“韩庄车站”，韩庄车站全部人员，包括他们的铁路家属都是“踢派人员”，他们对这些苏南来的“难民”寄予十分的同情，他们在韩庄养路工区内让出了家属宿舍，由陆渭文等人居住。“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在当年“铁道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无锡的一部分人在这安下营寨，由于铁路职工的支持，陆渭文等人弄了个铁路“路徽”挂在胸前，在徐州，韩庄、枣庄三点之间的走动，既安全，又可免费乘车。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陆渭文又即兴写下了几句：“早饮微山水，午燃枣庄煤，夜宿千佛山，议事徐革会”。

“微山湖”会议，陆渭文，匡建中等人分别了一段时间，需要大家在一起砰砰头，讨论一下，以后所要做的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由陆渭文，匡建中，朱砚龙，殷松勤等十多人，在韩庄养路工区召开，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无锡文革初期，卜岩写的“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大字报作了历史的评价。朱砚龙提出了“如何建立我们的思想体系”，匡建中提出了“怎样提出我们今后的口号”，“口号”好比是一面高举的旗子，可以起到号召群众如何去奋斗的作用，会上听取了戴国荣等人在连云港地区的工作汇报。，会议进行了一天时间。会议结束，匡建中等人仍然返回济南。

在冰天雪地的微山湖畔，陆渭文等 20 多人过渡了 68 年的旧岁，迎来了 69 年的春天。

69年3月，党的“九大”在北京胜利召开，陆渭文，匡建中等人认真地学习，研究了“九大”公报，在欣喜的心情下，但没有看到有关对“文革”的遗留问题作如何处理任何讯息。

“九大”的胜利闭幕，象征了无产阶级已全面夺取了全国的政权，象征了由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之后，以后的一切都应该是在政府领导下的稳定，不可能允许众多的群众继续留在外地，对于这一点大家心中都十分明白。

69年4月，江苏省革会与山东省革会取得联系之后，由无锡市革委会派员要将济南的无锡主力军人员接回无锡，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但无锡市革会与陆、匡之间，双方的“敌意”并无消除，无锡市革会已将陆渭文、匡建中定为“陆、匡反革命集团”，陆、匡对无锡当局的认识不可能“放下屠刀”。

无锡当局在接回无锡在济南的主力军时，考虑到因为陆渭文等人在韩庄车站，恐怕会发生劫车事件，故而他们将济南人员由走青岛，由海轮“接回”无锡，将数有人员送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匡建忠为了逃避回锡，带着干粮躲进了济南住地的天花板上，待队伍全部走后，只身离开济南，来到韩庄与陆渭文等相聚。

4、在浙江的日子

陆渭文和匡建中等人在韩庄相聚后，召集在韩庄的无锡“六派”人员商量今后怎么办。大家认为，“九大”结束后，应尽快靠近无锡，这样一方面便于听取无锡“六派”群众的呼声，以继续在新形势下为无锡“六派”群众的解放做点事；另一方面，由于离无锡近了，就有可能选择适当的时机返回无锡。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陆渭文和匡建中带了在韩庄的无锡“六派”人员于1969年4月份离开了山东韩庄车站，来到了浙江省湖州市。为什么会选择浙江湖州呢？据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浙江由南京军区下辖的20军“支左”；20军政委南萍，与南京军区在“支左”观点上不同，是支持浙江的老造反派的。因此，陆渭文和匡建中等人估计可以在湖州地区依靠当地的造反派站住脚跟。这时，到湖州地区的“六派”外逃人员仅有二、三十人了。但在“九大”结束后，无锡尚有那么一帮

人以躲避殴打的名义留在外地，这对无锡市革会来说也是一件失面子的事，急于想拔去的这个“钉子”。虽然湖州与无锡是仅相隔数百里地的“近邻”，但江苏省却不能直接采取措施。于是无锡市革会只能报告省革会，请省革会出面解决。

6月下旬，湖州市当局突然包围了无锡二、三十人的住地，并说明无锡将派人来接你们回去。湖州当局采取的行动，被当地造反派得悉后，立即设法营救。连夜派汽车将二、三十人分批送出湖州。当无锡二卡车全副武装“工纠队”到达时，非但人去楼空，而且被当地造反派抓住了把柄，“你们说来接他们回去，怎么是全副武装来的。”于是大打出手，将二卡车无锡“工人纠察队”打得人仰马翻，只能空手灰溜溜地回锡。后来，在20军的干预下，在1969年7月7日晚上，陆渭文和匡建中被驻浙江的解放军送到江苏和浙江的交界处（靠近宜兴），交给了驻无锡市的解放军。据说，驻浙江的解放军的这次行动，是由江苏省革会中的军方与浙江省革会中的军方的一次谈判的结果。在这次谈判中，双方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江苏军方把浙江躲在江苏的浙江“红暴会”头头送回浙江，浙江军方把躲在浙江的无锡“六派”头头送回江苏。至于是否有这样的谈判和“政治交易”，无锡的“六派”无法考证；但最后发生的结果是如此。

自从陆渭文和匡建中被浙江的解放军送回江苏后，在浙江剩下的无锡“六派”人员，大部分先后自行回无锡。有一部分“六派”人员因为原来受殴打太厉害了，仍不敢回无锡。其中戴国荣，张永康等十多人继续向浙江舟山地区谋求出路。他们在当地利用自己各自的技能与当地群众相结合，办工业、搞生产，一面为当地发展生产出力，一面也为躲避可能的报复，隐居他乡求得生存。直至70年全国性地开展深挖“5.16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时，才被全数送回无锡。到这时，前后为时二年左右无锡“六派”人员被迫流亡历史才彻底结束。

5， 十年牢狱之灾

陆渭文回到无锡后，先是被关押在“工人纠察队”一年多。1970年9月，“工人纠察队”撤消了。在“工人纠察队”撤消前夕，有关当局讨论了对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的处理办法。把他们放了吧，不甘心，好不容易把他们抓回来，怎么能轻易放了呢！放了他们的话，万一他们又要来揭市革会的疮疤怎么办？（因为有关当局心里清楚自己有许多做法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不放他们吧，把他们关到什么地方去呢？以前把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关在“工人纠察

队”，就是因为查来查去查不出什么够判他们刑的“罪行”，才关在以“群众专政”名义建立起来的“工人纠察队”里，这样上面问起来也好说“他们还在受审查，我们还没有把他们当敌我矛盾处理”等等。现在“工人纠察队”要撤消了（据说这是当时中央的决策，其目的就是防止各地滥用群众专政的名义抓人、关人），对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的模棱两可的处理办法再也不能采用了。怎么办？当时，无锡有关当局下了决心，在 1970 年 9 月把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关到正规的监狱中去，名义是“拘留审查”。促成无锡有关当局下这个决心的是从 1970 年春天起在无锡秘密开展的清查“5.16 反革命集团”的行动。无锡有关当局认为，虽然在刑事问题上没有可以关押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的事实依据，但是，可以把他们与清查“5.16 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挂上钩。如果查出他们是“5.16 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无锡有关当局就立功了；即使查不出来，先以这个名义关他们一下，以后用一句“运动中偏差是难免的”就可搪塞过去了。

16

公元一九七〇年的冬天，天空阴云密布，北风呼啸，寒流侵袭大地，天寒地冻，人心更冷。在无锡市东门看守所中漆着黑色的铁门，铁窗，更显得阴森恐怖。

监狱中的午夜，一片肃静，唯有在昏黄色的灯光下，在铁丝网的上面，荷枪实弹的值班部队“咯、咯、咯……”来回走动的脚步声。突然晴空霹雳的一声“狱—警—传，似—狼—嚎—……”悲壮激烈的京剧样板戏的唱段。在狱中小监房内响起，震碎了狱中宁静的空气，铁丝网上的值班武警的脚步声乱了，监房走廊中传来了值班看守匆匆的脚步声，“哐啷”一声响，小监房的铁门被打开，这个高唱《红灯记》革命烈士李玉和唱段的“犯人”，被推出了监房，不一会监房外面的水泥地上发出了“嚓啷—嚓啷—”有节奏的铁链拖地的脚步声，一步一响地回进监房，铁链拖过“013”监房门口，“013”监房内的“文革犯”陆渭文静心地倾听着，他已经从刚才唱腔的口音，及镣铐拖地的走向判断知道有一个难友的入狱在遭受磨难。

今年 33 岁的陆渭文以“颠覆革命委员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被“群众专政”关押在“工人纠察队”一年之后，被关进了监狱，在这个“013”大约四平方米的小监房内接受审查。东门看守所座落在“亭子桥”边羊腰弯的路口，里面有 18 只大监房，16 只小监房，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共产党的监狱里多了一个任何法律中找不到的名称——“文革犯”，现今已有不少“文革犯”与一般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主力军方面的要员，陆渭文、匡建中、卜岩、何泄等人都关押在小监房内单身囚禁，其他的殷送勤、戴国荣、王明华、

苏金坤等数十人关在和刑事犯一起的大监房内，“九、二”方面也有不少占有血案的犯人。监狱内虽然没有像敌伪时期，对待共产党，革命人民用上“老虎凳”，“灌冷水”等酷刑，但也有一套比较“文明”的手段，在折磨着每一个“犯人”，首先是饥饿，每人每天八两，二粥一饭，一碗青菜汤，以维持不死不活的生命，其次，每天要犯人坐在监房的中央，不准靠墙，屁股下面不准垫任何物件，甚至一张薄薄的草纸，稍有违反，拳打脚踢，上铐，带镣，任意“惩罚”。陆渭文熬过了一天的折磨之后，此时正蜷缩在草垫上进入梦乡，现在却被狱中的震动而惊醒，睁眼望见头上昏暗的灯光，想起此时此刻同在受难的同伴，有多少个青年工人，学生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淫威下，倒在血泊之中，由于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监禁，陆渭文还不能知道他自己年轻的妻子张毓珍，也已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而受迫害致死，留下两个孤儿在人间受苦的消息。陆渭文身处逆境，把思绪拉回来，思考着如何来应付当前的危局。监房的粉墙上刷着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尽管目前共产党内的某些人，正在举起屠刀砍杀无数无辜群众，“相信群众”对！人民是历史的见证人，人口是堵不住的，相信迟早有那么一天，历史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狱内经过了一番骚动，随着“铿锵”的铁链声停息之后，狱中又渐渐地恢复了宁静。陆渭文在迷迷糊糊中度过了一个寒冬的长夜。

淡淡的阳光，从天窗上照射在监房的墙上。看守俞天杰，似猴子般消瘦的脸盘，竹竿似的身材，学着人样，手中拿着一大串象征权力的监房钥匙，在走廊里高声嚎叫：“各监房听着，从现在起，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督促杜律明投降书》要背出来，突然间房内有个病号在开口，“报告俞干部，我身上有病，请求给我一点药。”俞天杰面无表情，迅速将监房门打开，举起他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对着“病号”一阵脚踢。口中还骂道：“你这个婊子养的，有什么病？不老实，站好！”这个“病号”只能服从命令，站在监房中间的地板上。这种治疗方法，在押的“犯人”称他为“踢打疗法”。陆渭文听着邻监房内发出的嚎叫，轻轻地叹息一声，大监房内服从命令使劲力地在朗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文章。岂不知这篇文章的本意矛头是针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文革期间，“南京政府”也可以说是以许世友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文章的内容可以对“张三”，也可以对“李四”，“犯人”高声朗读这篇文

章，有何乐而不为呢？正是愚昧的时代，造就了愚昧的人才，也干出了愚昧的事情。

深挖“5.16”反革命

上午九点过后，吃官饭的人上班了。照例铁门上的“将军锁”一响，小监房的门被拉开。看守俞天杰，尖削的头脸，狼嚎般的一声：“‘013’出来。”陆渭文凝视一下对方，默不作声地跟着走出监房，走进审讯室，在靠墙的提审桌上坐着三个提审员，桌上摊着记录用的材料纸，旁边放着“宗卷”袋。为首的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陆、匡级革命集团”专案组负责人徐世忠及张×，另一个是手中拿笔的记录员。徐世忠中短身材、是个老公安人员，他在当时几乎所有“公、检、法”干部在深受迫害时，却表现得异常活跃的整群众的得力干将，他坐在用群众血肉堆垫起来的官位上。徐、张两人靠办“陆、匡反革命集团”及“余党”的案整整混了十年。在这场“浩劫”中发挥了他们特有的才干。徐世忠面对着坐在小木凳上的“阶下囚”皮笑肉不笑地开口：“陆渭文，前几天向你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70年20号文件，你怎样来交代自己的问题？这个‘5.16’反革命，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真是罪大恶极，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难道你还不交代吗？”

陆：“揪‘5.16’反革命是应该的，可是我不是‘5.16’，有什么好交代呢？”

徐：“你不要抱任何幻想，难道说你们‘红总’的其他人都是‘5.16’就你一个人不是吗？”

“我从未发现有什么‘5.16’在我身边。”

“你这个人不要抱任何幻想，可以老实告诉你，你不是吃不吃官司的问题，而是杀不杀头的问题”徐世忠的脸上收起了“笑容”用一个“死”字来胁迫对方交代问题。

陆渭文默默地静听他说话的分量，看着他一忽儿轻，一忽儿重的说话腔调，没有回答。有什么好回答的呢？在“死”的威胁下，心中正在默读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小说《不死的王孝和》中的词句：“我对着死亡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再笑声中动摇，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心想文革以来，已经有多少群众被你们的“群众专政”而死于非命，难道别人可以去死，我陆某人就不能

去死吗？顶多了不起被你们“五花大绑”“噙”的一下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了不起。陆伟文依然默不作声，两眼凝视着对方。

徐世忠的言语中继续加重份量：“你挑动武斗，你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你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你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指骂过张春桥），你最后是要被处决的。”

陆渭文性格倔强，听到这里再也沉不住气了，不冷不热的回答：“我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参加了‘文革’，别人打过来，我抵挡一下就是挑动‘武斗’，我为了避免流血事件扩大，逃了出去，我就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反正都是错的。”回答到此。但身处囚室的陆渭文此时此刻毕竟还没有胆量正面抗诉“革委会”做了许多坏事。张春桥眼前还是“红人”，虽然陆渭文在文革中对张春桥在上海以“左派”自居，血腥镇压无辜群众的罪行，曾含沙射影地骂过他，但眼前对此只能把仇恨埋在心中。

审讯陷入僵局，磨了两个多小时，毫无结果。上午结束，下午两点再来，不过提审还是没有结果，晚上再来，一日三次“穷追猛打”。

“陆、匡反革命集团”的二号人物匡建中，此时也被关押在监狱的 06 号小监房内。一日三次，日夜审讯，逼他承认和交代“5.16”组织及“罪行”。此时才 20 岁出头的匡建中，身材瘦削、却有一种勇敢不屈的性格。他也没有承认参加“5.16”组织，更没有交代所谓“5.16”的罪行。他蔑视这些专案人员，心中明白，目前此地已无理可讲，有机会话，一定逃跑，去北京告状。有一天下午提审结束后，提审员拎着黑色的提包，扬长而去，叫匡建中独自一人回进监房。夕阳西下，四面由电网包围的看守所大院内正好空寂无人。匡建中一看机会来了，于是机灵地爬上矮屋，登上高墙，翻过带电的铁丝网……；在岗楼上的哨兵还没有来得及扣动自动步枪的扳机，这个瘦削的身材，已经跳出了十几米高的狱墙。这是从看守所建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越狱事件。监内警铃大作。荷枪实弹的部队紧急集合，立即出动，追捕这个年轻的“逃犯”。匡建中跳出狱墙后，因逃跑路线选择不当，很快被抓了回来，被钉上了一付脚镣。狱内的难友戏称匡建中“挑了一个月的铜匠担”。据说当时驻防看守所的武警的领导审问了匡建中，问他为什么越狱。匡建中说：“我是无锡市革委会委员、共青团员，我不是“5.16”分子，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现在既没有撤消我市革委会委员的职务，又没有开除我

共青团团藉，怎么可以用对待处理敌我矛盾的手段把我关进看守所呢？”一席话，说得那个武警的领导哑口无言，只能说：“我们不管你们的案情，我们只管看住你们。如果你造谣的话，一定加重惩罚。”事后，他大概向他的领导问了情况，估计他的领导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结果，从此以后，站岗的武警就对匡建中另眼相看，匡建中在狱中的处境反而比以前好了。

一九七〇年初冬的一天，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带了他的警卫班来到无锡，在大箕山召开了“市革会”由两派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传达了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70年20号文件——揪“5.16”反革命集团，会议紧张而严肃，坐在前一、二排的是进入革委会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每一位“代表”，的两旁隔着腰别短枪的警卫战士，许世友登上主席台，咬牙切齿振臂跳脚地呼喊，“深挖‘5.16’反革命，要挖地三尺，一个不留，你们（指无锡六派）当初（指67年夏天）去抄我的家。（南京‘好派’和无锡‘六派’中的部分学生的擅自行动，‘六派’头头根本不知此事）现在我欢迎你们再去……”传达中央文件中非常明朗地夹带了个人恩怨的报复心理。许世友身为军区司令员，党政军财文大权一手在握，一声令下，在江苏全省范围内64万人受审查，血肉飞扬，尸横遍地，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民血，孤子泪“撒向人间都是怨”，陆、匡等人囚禁于铁窗之内，而无锡社会上又怎么样呢？笔者捧上一份由无锡市原“工艺品美术公司”孙维申先生写于2003年4月3日的《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记无锡市长达三年多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调查报告”。

3，狱中后事

陆渭文在狱中，在提审员徐世忠等人面前最后果断地否定了自己不是“5.16”反革命之后，徐世忠无可奈何，徐世忠咬着牙说一声：“好，如果今后查出你是‘5.16’时，新帐旧账一起算。”陆渭文否定了自己不是“5.16”，但全市列出的“5.16”十大罪状还得交待，在这“十大罪状”中陆渭文直接参与，甚至是“组织者”占了“八大罪状”。

写交代材料的材料纸写完一本又一本，不过对陆渭文来说写交代材料也是一件“好事”，首先可以背靠着墙，在自己的膝盖上写材料，总比空身坐在监

房中间，人要舒服一点再说自己在文革中并无亏心之事，写就写，实事求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本身的心态十分平衡，心中唱响着文革中曾一度流行的一首词句：“革命无罪罪何来。听毛主席话参加了‘文革’有什么罪？”“造反有理理应该”，对待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造反”并没有错，“含笑甘当反革命”，今天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有什么了不起。“昂首走上断头台”，如果真要将我五花大绑推出去，我就准备着昂首阔步地走。

陆渭文坐在冰凉的地板上，不停地写，累了停一停手中的笔，呼一口气，擦擦手，轻声地吟一段毛主席诗词《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声音警动了铁网上面值班的“天兵”，扛着枪的值勤向下怒目训斥，“反动！”但他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毛主席诗词。不过用的场合不同，词义有了不同的含义而已。

“铁门呵——铁窗——铁锁链，锁在我牢中想外面，外面的生活多美好呵，我却在牢中受折磨……”“囚歌”轻轻地时断时续地牢房中回荡。这不知道是那位囚徒在狱中的杰作。向世界在倾吐受苦受难的悲苦。

在“013”隔壁的大监房内，同时也关押着一名“政治犯”。他与陆是同一单位的一名青年工人，并且在“文革”前与陆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那是在1961年的事，铸造一厂的翻砂工潘学明，因为受了精神刺激，突然精神失常，变了神经病，厂方将潘学明交给了陆渭文，由这个年仅20多岁的青年单身护送潘去南京五台山标精神病医院治疗。一路上陆既要防止病人武力伤人，又要服侍病人上车，走路，生活起居。潘在南京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病情有所康复，潘学明康复后回厂上班，与陆在感情上比较接近，但同厂的工友都知道，潘的病虽然已好，但毕竟还是语无伦次的“十三点”。“文革”开始后，因为大家都知道潘学明是个“神经病”，谁也没有让他参加什么组织。谁知文革后期，“革委会”建立之后，他竟闯下了弥天大祸，因为有厂革会的人向他借钱，他开始骂人，骂到了厂革会的头上，那还了得，这不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吗？马上实行“群众专政”，送进“工纠队”，“你是疯子吗？”把大粪塞进潘的嘴里，“看你疯还是不疯。”潘经过了一段群众专政，作为一名“政治犯”被送进了大牢。此时真好关在陆伟文临近的大监房内，“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直到潘学明受迫害之死，陆与潘始终未能见上面。

77年7月14日，炎炎的夏天，“革命”的政权将潘五花大绑，押上刑车，绑赴刑场，所谓“假枪毙”。烈日当空，火辣辣地照射得“犯人”光头上发烫，使他汗流浹背，身边有同厂的“群众专政”的勇士，故意在潘的脚面上砸了一记，潘出于生理的本能出声呼叫，于是“革命”的勇士们，立即采取“革命行动”，将一团破布塞进了潘的嘴里，不够，往深处塞、塞、一直塞到潘的咽喉深处，潘的脸色开始由白变青，发紫，直到倒在车上一命呜呼。潘的老母亲得到了一份“中暑身亡”的死亡报告，厂里出了几百元钱的送葬费，就算了结。这可能就是无锡市一打三反中的政绩之一。那年代人命就是这样的不值钱。人已死了，当官的很忙，白天他们要耗去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内查外调”寻找更多的“隐藏”的“反革命”。晚上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抱着妻子，搂着孩子，享受那“天伦之乐”，在中国反正人多，多死几个小百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哪里还有空闲时间去做那些可能吃力不讨好的追查伤害人命的真凶。

“文革”的历史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历史滚滚，时间推移，陆渭文自比“立关和尚”，剃了光头，闷坐在半阴半暗的小监房内接受“审查”。六年多时间过去了。“5.16”反革命集团全国性的冤案，得到了纠正。死的死了，伤的伤了。但总算得于真相大白。千千万万的“5.16”分子得到了“解放”，但是革命委员会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5.16”平反了，但是，他们的头头陆渭文、匡建中怎么办？社会上要求释放陆、匡的呼声愈来愈强烈。这是摆在掌权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如果陆、匡无罪，他们自己就彻底的错了，更主要的社会上成千上万被“平了反”的“5.16”分子，他们准备在陆、匡释放时“夹道欢迎”，这样的群众情绪，陆、匡出狱，岂不是“革委会”又要摇摇晃晃了，为了表示他们一贯正确，为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只能是硬着头皮顶，于是市里头头召开紧急会议，宣布陆、匡为“反革命”把群众中准备迎接陆、匡出狱的热潮再次压了下去。直至75年匡建中在江苏省领导的干预下才于释放恢复“职务”。

76年冬天，由看守所干部出面找陆渭文进行了一次试探性地谈话。

在看守所的院内，放着一高一低二张方凳，看守所的干部坐在高凳上问：“陆渭文你承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陆坐在低凳上不亢不卑地回答：“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

既然中央定性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何来方向路线错误？”陆心里明白我不承认犯有错误，势必要革命委员会承认把我关错了。这种可能性很小，这样下去事情必然继续僵下去，但自己不愿意屈膝求饶，就只能这样回答。

看守所干部是受人之托找陆谈话的，简短的“问”与“答”，已经决裂，没有更多的废话可讲，于是陆只能继续回到小监房内坐下去。

“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新的“政治犯”进来了，监狱中人丁兴旺，已容纳不下这个关押六年多放又不能，关又不好好的“老反革命”了。陆渭文被排挤到四面是水的北堵农场去“恢复一下身体”。陆渭文开始了与大自然的接触，抬头能望见蓝天白云，俯首看去碧波涟漪，但虚弱的身体几乎不知道讲话舌头是如何转动的。

北堵农场当时是“强劳农场”里面一半是社会上犯有一些打架之类的小错误的年轻人，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在强制劳动中耕田种地；另一部分人是被“砸烂”了的“公检法”人员。陆来到农场里与猪为伴。见到了过去公安局的副局长，科长等等。大家见面，发自内心有点好笑。昔日文革初期，“造反”群众在正统公检法眼里，视作“牛、鬼、蛇、神”。世态的变化，真是“此生何料？”昔日的正统人物，今天也与“牛、鬼、蛇、神”为伍，而且他们吃的苦，遭的难偏偏又不是“牛、鬼、蛇、神”赐给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互的“敌意”在共同的处境中淡漠，带来的是谅解和同情，但是旧的封建的等级观念还不可能完全消失，于是这种“理解”和“同情”也是有限的。

初冬，地处无锡县与江阴交界的农场里，农田里的稻谷已经收割，堤边上的林木开始枯黄，大地在沉沉地睡去。陆渭文一人在北风呼啸的傍晚，用冻木的双手在堤边的空地上栽冬菜，突然从空气中飘传而来隐约的声音：“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沉痛哀悼……”传来了毛泽东主席撒手西去的消息。一个月以后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震动，打倒了“王、张、江、姚”“四人帮”。

历史往往会闹出“笑话”，其实也不过是“职业官”的权属变化而已。在革委会的统治下，有些人为了林立果“选美”效力，高呼“永远健康”，对曾一度大权在握的军区政委张春桥捧场，吹喇叭，抬轿子之流。当陆、匡等人反对他们的错误行为时，陆、匡就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四人帮”打倒了，曾反对过张春桥的陆渭文又变成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在政治舞台上，登台表现

的“演员”行行色色，各自做出了本能的精彩表现。正派的“小生”使人敬佩，最能使人发笑的可能是“跳梁小丑”，“白鼻头的奸臣”，在帝王面前三呼“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背地里却干着“谋王篡位”的勾当。“化妆师”的技能更大，非但可以使自己为了扮演各种角色的需要乔装改扮，更有本领为他人改装，根据他的需要，抓起手中的彩笔，在你脸上画上几笔，把你变成“天使”，由抓起一把黑灰，往他脸上一抹，把它叫做“恶鬼”。经过年长月久，风吹雨淋，这些“演员”脸上的油彩与黑灰，也慢慢地退去，渐渐地露出了本来面目，到了这个时候，台下的“观众”才看清楚，发出一声惊叹，“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陆渭文从一九六九年七月失去自由，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才算“无罪释放”。（与苏金坤两人同时释放）历时九年另九个月，从历史的长河来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从人的生命来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陆渭文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在“跌、打、滚、爬”中度过。现在还在地上不停的爬着。一爬、一拖地慢慢地寻找在“文革”中贫病交迫而离世的母亲，被打成“5.16”反革命而跳河自杀的妻子，还有那些同样身遭飞来横祸的朋友们。在陆渭文爬过之处——太湖之滨一块狭小而泥泞的土地上，留下了一条淡淡的痕迹。

宋代爱国诗人陆游七绝一首：

僵卧荒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来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尾声

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曾被“砸烂”的公检法人员大部都已复员职，权力回到了他们手中。1969年，27军调防归属北京军区，军部设在石家庄市，由于27军很多干部家属是无锡、苏州、镇江等苏南人，子女也有在苏南各地城市工作成家的，一些27军的离休干部很想回到无锡来，因为27军留在无锡市革会掌权的王晏等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时”，非但大整“主力军”、“红代会”的群众，而且原市委的老干部也是吃尽了苦头。他们砸烂了“公检法”，凡吃过这些苦的人，真是寒天吃凉水，点滴在心头。27军在无锡十分孤立，别的队伍来无锡建造干休所，热烈欢迎，27军来无锡建干休所，坚决反对。

27 军无法，只好通过王新亭副总参谋长出面，与南京军区聂凤智司令员打招呼，聂司令出面做工作，好不容易才在属于锡山市的前桥镇无锡火葬场的旁边让出了一块地皮，建造了 27 军的干休所。抬头就见冒烟的火葬场的大烟囱，随时随地可以闻到烧死人的枯焦味，天天可以“享受”到军乐队吹吹打打的哀乐。

无锡市里有关领导还是不肯放过 27 军的某些人，在各个方面力所能及地“管、卡、压”，公安局招收新民警，27 军干部子女就是坚决不收，已经进了公安局大门的，必然天天夹紧尾巴做人，否则，毫不留情地清除出门。卡住 27 军离休干部的子女户口，是十分厉害的一招，这些离休干部，不管你有三、五个子女，在无锡只准迁进一个。户籍警多次接到指令，“要严格把住 27 军干休所随带子女的户口关”。这是文革中 27 军内的某些人多行不义的报应。

1984 年在无锡市石门下看守所中关押着一名来自四川的×××，他的亲妹妹是文革传说中王晏的“情妇”，这位老工人的女儿长期居住在无锡他的姑妈家，女孩子到了一定年龄，自由婚配也是正常事，谁知这位老工人的女儿与男友同居半年后，被男友抛弃，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女方的莫大耻辱，在一般民间，也必然会引起是非、风波。于是这个老工人接到无锡妹妹的情况通报后，立即从四川赶回无锡，与他的外甥两人赶到男方的家中，将男方家中的一套家具打坏。这本来是一件极普通的“民事纠纷”，无锡市公检法方面对这一案件的处理：男方抛弃女方是“道德问题”，但动手打坏男方的家具，则是“侵害了他人财产权利”，这样完全合法有据地判处这个为女儿之事的老工人，有期徒刑二年，缓期执行，老工人的外甥则在看守所拘留半年。问题很明显，有关方面对原 27 军在无锡掌权的王晏非常气愤，但出气却出在与王晏最亲热的人身上。这位老工人吃了哑巴亏，“赔了夫人又折兵”。

结束语

笔者——当时“陆、匡反革命集团”的陆渭文在文革中关押审查了九年另九个月后，时隔三年，为在家中与朋友议论了“党内存在腐败现象”等问题后，被以“污蔑共产党腐败了”的主要罪名，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送苏北五河图农场服刑，正可谓：

十里芦塘十里田，粮棉芦草两无边，
田间少见农人过，遍地囚衣下夕烟。

至今在全党，全国“反腐败”的浪潮中，仍然不能纠正我“污蔑共产党腐败了”的罪名，不能要回本应有的老有所养的经济基础。

原“陆、匡反革命集团”的匡建中，文革中被关押了六年左右时间，释放后，被剥夺了报考大学的权利，现在私营企业帮助搞企业管理。

本文最后衷心感谢王协昌，徐志纯，卜岩，匡建中，浦湘海，李伏阳等文革幸存者，为本文文革初期提供了真实材料。

还应该感谢，原市革委政委王晏在他的回忆录中提供的、原来社会上无法知晓的当初“支左”中他们的立场观点、无锡武斗的起因等内部资料。真是难得啊，难得！

特写上几句：故园三年前，拜读王晏书，剔去诬陷词，喜知军中言。明朗支一派，文革害忠贤，军人参谋团，武斗祸根现，近日并作文，功罪留人间。

陆渭文 2006 年 10 月 10 日 完整稿

二 00 一年，钟沛璋：《不应忘却的历史，不应忘却的教训——读《陆兰秀狱中遗文》

一个民族不应忘却自己的光荣，也不应忘却自己的羞耻。前者能给人以鼓舞，后者能激人奋进。上世纪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都知道“9.18”是国耻。这种耻辱感，终于汇成全民抗战的伟大力量。

但是有人却认为，“反右”、“文化大革命”、“6.4”等，都是“敏感问题”，都应该赶快忘却，在一切传媒中消失。认为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主旋律”只能是歌功颂德。在这样的“舆论导向”指引下，全民得了健忘症，才能国泰民安。

1940 年加入中共的陆兰秀是又一个张志新式的烈士。因反对“文革”被判为“现行反革命”，于 1970 年 7 月 4 日被处以极刑。在“五一六”文革爆发的国耻日来临之际，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了《陆兰秀狱中遗文》一书。

一位在 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亲身参加过新中国建设，勤奋博学，通晓四国外语，一贯勤恳工作的共产党员，因为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竟被判为“反革命”，枪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刑场上。对这样的羞耻，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苏州市委没有因为考虑“主旋律”而予以忘却。也没有象当年主管宣传的邓力群对待另一位烈士王申酉的报导那样：“不要公开发表了吧，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吧。哈哈！”（见金凤：“《王申酉文集》序：十年生死祭”，载本刊 z k 0 2 1 0 a——编者）1978 年，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苏州市委就为这位杰出的女共产党员——陆兰秀初步平反昭雪。1982 年，中共江苏省委又作出决定追认陆兰秀为革命烈士：在烈士陵园建立陆兰秀烈士墓碑，汇集陆兰秀的遗稿作为革命斗争的史料。并将陆兰秀的事迹印发全省，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向陆兰秀烈士学习。1993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代女杰陆兰秀的传记《殷殷关心血》。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捧读没有被遗忘的陆兰秀狱中遗文，仍能强烈的感到陆兰秀燃烧着的革命热情，感到陆兰秀明澈的思想照耀我们今天仍在探索前进的道路。烈士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历史和遗文，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一份遗产。

陆兰秀树立了我们今天、我们后代都应该学习的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

当刘少奇一夜之间被戴上“叛徒”、“工贼”的帽子，要被打倒时，陆兰秀站出来说：“不！”她坚决反对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迫害。

当广大知识分子遭受残酷迫害时，陆兰秀说：“不！”她尖锐批判对干部的法西斯审查方法，要求恢复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当现代迷信盛行，把毛泽东晚年极左的理论奉为神明时，头上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遭受残酷迫害的陆兰秀，仍然针锋相对地指出：“对某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只要是科学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在科学的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

她批判“文化大革命”使“世界已整个颠倒着”，她相信颠倒的历史总有一天会被重新颠倒过来。她多次致书毛泽东，要求他纠正错误，解放全国人民于“文化大革命”的水深火热之中。她责问毛泽东：“你可以把迫害人民的一切责任推

给下级，但文化大革命是你亲自领导，是逃避不了的。你把坚持共产主义立场的人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和凌辱，你又扮演另外什么角色？你曾否想过，等你演毕反面角色，卸装归来，你到何处去找你原来的马列主义真身呢？”陆兰秀在狱中多次绝食抗议，要求结束文化大革命，她说：“我死于狱中之日，也就是历史为文化大革命定案之时”，“我为全人类的解放献出生命在所不惜”。她多次致书全国人民，要求大家自己解放自己，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她说：“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从国庆二十周年以来，我所写二十来篇文章，自信都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我为真理受尽苦难，或将死于狱中。故要求全国人民、后代子孙，认真研究，加以发展，求其实现。”

陆兰秀的“劳改”日记和狱中遗文，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压力下从被扭曲，到觉醒，到奋起抗争的历程；记录了用她通读马恩全集所掌握的思想武器和掌握的历史知识，全面地批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所作出的贡献。陆兰秀用自己的鲜血向我们指明了探索真理的道路。

当多少人或是摇着“红宝书”热衷于群众自己斗自己的派仗，或是向伟大领袖“早请罪，晚汇报”，苦苦检讨自己的时候，陆兰秀清醒地呼喊，要把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还鼓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这样的现代迷信。陆兰秀面对专横的造反派，就明确表示，对毛主席的话要具体分析，谁掌握真理，就应该听谁的。

经过拨乱反正、真理标准的讨论，摆脱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直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才被彻底否定。在这以前的十一年，陆兰秀在她遗书中，就明确指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苦难深重之中，证明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场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匈牙利事件，扼杀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毛泽东犯此严重错误后，又拒不接受人民意见，拒不解放全国人民，包括受其蒙蔽、充当起御用专政工具或变相专政工具的人员在内。凡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儿女子孙，都应世代牢记这一切的沉痛教训，清算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并且永载史册，以儆后人。”

比起许多同时代的人来，陆兰秀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先觉者。她为什么能够先知先觉，而且如此勇敢、坚强呢？首先是因为她无私无畏。她在给她丈夫的遗书中说：“能够为人民利益贡献自己的生命，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条件，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些老大难矛盾的最后解决，这应该是我们一家的光荣。所以你不要难过。”

由于无私无畏，陆兰秀就一往无前地去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她在遗文中写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实际上，屈原终其一生，什么也没有求索到，因为他所索的东西，当时中国不存在！死者以矣，生者如何！我恐怕也将终我一生而求索下去吧！”

陆兰秀这样无私无畏，是因为她坚持真理。她通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她不把它当作迷信或教条。而是用革命理论的科学思想来指引自己的路。

对这样的先烈，这样宝贵的遗产，我们能够忘却吗？用陆兰秀的遗训，来看看我们今天现实中仍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我们会感到信心和力量。

对先烈最好的纪念，也就是她遗言中就希望的那样：“全国人民、后代子孙，认真研究，加以发展，求其实现。”《陆兰秀狱中遗文》得以出版，我希望大家都能来认真读读，认真研究。我也希望那些把“文革”看成是“敏感问题”而不敢碰的人们，也都来读读这份“文革”遗产。为了我们中华民族，让大家都象陆兰秀那样觉醒起来，懂得思想，懂得追求，共同去创造美好未来好呢，还是让大家“健忘”，处于麻木、愚昧状态好呢？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载负十几亿人民的这条中国大船，将何去何从？愿所有掌握着航向权力的水手们，勇敢地担起历史的重任，正确把握好航向！

（原载《陆兰秀狱中遗文》，丁群编著，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

二〇〇一年，丁东：《丁群和《陆兰秀狱中遗文》》

今年夏天，广电部表彰该系统的老人，前江苏电视台台长丁群先生来京，我们终于得以见面。

丁群先生文革前是省报记者，平反冤假错案的年代任苏州市委秘书长。张志新式的思想烈士陆兰秀，就是在他一手推动下得以昭雪的。以后，他又写成《陆兰秀传》一书出版，并由李锐先生作序。

在“五一六”文革爆发的国耻日来临之际，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了《陆兰秀狱中遗文》。

陆兰秀生前是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她40年代就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对党的历史有较多的了解。她从事过理论工作，较为系统地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都促使她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产生了怀疑。最初，她只是不满文革中的某些现象，比如批斗她所信任的领导干部，继而不赞成打倒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她曾经寄希望于毛泽东、林彪，想通过上书，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由他们来纠正这些错误。但她的努力，马上招来残酷的迫害。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迫害不但没有吓退她思考的勇气，反而促使她的思考进一步深入。在失去人身自由的严酷环境里，她明确地提出，文革是历史倒退，是毁灭性的灾难，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并冒死呼吁立即结束文革。对于当时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清理阶级队伍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她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说：“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立刻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按照毛主席一贯政策，无条件解放还没有解放的干部。不要他们再多作检查，不要他们认罪服罪。已经没收的文件、书籍、用品，凡未上交可以整理出来的，请一律发还；冻结的存款和扣发的工资，避影响本人和实用性家属生活，使低于一般工人生活的，请酌情补发。如因生活残疾病等问题有债务的，也请发还部份，使够偿还。”“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不是共产主义方向，无论锣鼓多么热闹，大红花多么热闹，多么鲜艳，欢送多么热烈，本质是不会变的。”追根寻源，她意识到中国之所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问题出在毛泽东身上，出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她在一篇题为《自由》的文章中说：“思想的禁锢，现代迷信的盛行，可能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我相信，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历史的审判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度会有所扩大，人民独立思考问题的自由会得到尊重。”并且，她寄希望于党内的其他领导人能够出来结束这场灾难。可以说，陆兰秀是文革中最早的批判者之一。可惜历史只给了她两年多一点的思考

时间，从 1968 年表达独立的见解，到 1970 年 7 月 4 日，便被残酷地枪杀了。

我因为研究民间思想，很想与丁群先生相识。接下来是李锐先生告诉我丁群先生的地址，于是我和他建立了通信联系。不久，得赠他写的新著《刘顺元传》，读后颇受教益。刘顺元是当过中纪委副书记的老革命。抗战胜利后在大连主持工作时，曾抵制苏军方面的大国沙文主义，被斯大林所忌恨。以至于数年不能公开担任领导职务。直到斯大林去世之后，刘少奇才提议重新启用他担任江苏省第二把手。我想，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应当加以传播，于是让当时参与《百年潮》编辑工作的妻子向他约稿，专门介绍刘顺元这段往事。

同时，丁群先生又整理出《陆兰秀狱中遗文》一书，并让我一起寻求出版机会。

我通读书稿，感到十分沉重。这部书，包括了陆兰秀在狱中的全部日记、文章和审讯记录，这是一件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独立思考而坐牢杀头的不止一个人。像遇罗克、张志新式的思想先驱，曾经出现过一批。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国内报刊曾经报导过其中一些人的事迹。以后，他们留下的言论也曾得到或多或少的整理出版。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这样的思想先驱者留下的文字和言论得到全面的整理出版。陆兰秀留下的这些文字和言论，绝大部份产生于牛棚和囚室。这是最没有思想自由和表达权利和环境。但她仍然顽强地表达，并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三十年过去了，回头看这些血写的文字，我们一方面为陆兰秀的精神而感动，一方面为思想专制的血腥而震撼。思想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保障公民的思想权利，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文化大革命期间，颁布了“公安六条”这样以表达思想致人死罪的政策，并开动国家机器实施，使中国公民的思想自由受到空前的践踏。陆兰秀就是殉难者的一个代表。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人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

陆兰秀说，普罗米修斯把上帝带来的火偷给人间，受到了上帝的惩罚而终不悔；我非普罗米修斯，说出这些可能被认为大逆不道的话，受到人们的惩罚也是终不后悔的。今天回过头来看，陆兰秀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仅仅是一个开始，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免受到环境的局限。长达十年的文革，她仅仅经历了三年多，就被野蛮地杀害了。她没有来得及看到文革的全部过程和全部恶果，也没有

来得及更加系统地挖掘文革的背景和原因。苏州不处于全国的政治思想中心，可以得到的信息有限；陆兰秀早早就被关进牛棚，失去人身自由，没有机会和志同道合者讨论交流。同时代的另外一些思想者，虽然处境也很艰难，但或者有交流切磋的机会，或者有较多的信息来源，因而产生了更见条理和深度思想。如果在一个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里，人们可以要求思想者的成果，更加精粹，更加深入，更加缜密，但考虑到陆兰秀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思考和表达，后人无权提出更多的苛求。她的每一点先知的思想闪光，都应当得到后人的珍视。

愿丁群先生编的这本好书，及早和公众见面。愿我们的出版环境，变得有利于中华民族优秀思想遗产的传播。

（《陆兰秀狱中遗文》，丁群编著，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

2008年6月15日，陆渭文：《古稀之年的哀叹》 一股新一轮反对毛主席的浊浪在中华大地滚动，他们要彻底清算毛主席的“罪行”，他们妖言惑众，混淆视听，瞒骗人民，他们的“理论”企图影响现政权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彻底地背离、拔掉毛旗，这必须引起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

前段时间老朋友相聚，见到一位知识分子朋友的包内一份材料，“材料”的标题（大意）是要“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行’”。笔者想接过“材料”看看什么具体内容，结果因为朋友知道我是“拥毛派”，故而将材料收了回去。过去曾是知己好友，但今天在对待毛主席的看法与评价问题上，则发生大是大非的原则分歧，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那么只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直到前几天，听说江苏省无锡市委宣传部召开了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的“座谈会”，在这个出席“座谈会”的某些学者的发言中竟然较详细地发表了他们要彻底清算毛泽东“罪行”的内容。

1. 要清算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饿死了三千四百万人的‘罪行’”。

2. 要清算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破坏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古文化的‘罪行’”。

听说他们同时也承认在“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贪官，腐败，通货膨胀等社会弊病。

笔者认为，在这帮要清算毛泽东“罪行”的反毛势力中，极为少数是本身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怀有仇恨的反动分子，借目前的形势散布反毛舆论，以达到从反毛开始，进而彻底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在中国企图全面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在这股反毛势力中，也有相当一部份人是认识问题。有人是被不断加工资，“汽车、洋房”小恩小惠收买，出卖了良心。也有人被非毛派的谣言舆论搞得晕头转向的糊涂人。对于那些极为反动的反动势力，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不完全是说服教育，而是要组织革命的力量将他们批倒批臭，将他们爆光，彻底地打倒。对于被眼前利益所收买的人群及糊涂盲从之辈，我们要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去争取他们的觉醒。

这里有一个如何判断一个人的简单标准，一个人一生做尽好事，偶然犯有错误或者做了件坏事，但他终究是属于“好人”。如果一个人一生做尽坏事，偶然做一、二件好事，历史的评价他还是属于“坏人”。

对毛主席的评价概括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毛主席至今仍然健在，在国际上美帝国主义量他没有这个胆量在世界上称王称霸，让他生十个胆也不敢炸我使馆，撞我战机，支持藏独，破坏奥运，干涉我国内政。在国内共产党的干部中也不可能有如此贪污腐败的嚣张气焰，更不会有“黄、赌、毒、黑”等沉渣泛起。

1. 对于“饿死三千多万人”的问题。

反毛派人士似乎装出了“为民请命”嘴脸，掩盖了他们恶毒攻击的罪恶面貌，首先饿死了三千多人的数据在哪里？在那个“困难时期”，笔者是“过来之人”，受过饿，以“瓜菜代”来度过，这一困难时期，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生过“浮肿病”，在全国范围内有没有饿死人？可能有，但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吗？这是个未知数。如果当时全国人口依六亿计算，就等于在 20 人中就饿死了 1 人，如果作 10 亿人口算，饿死的也是 30 多人中饿死 1 人，有这么严重吗？简直是屁话。再说造成这一“困难阶段”有其自然因素（天灾），当然也有人为了因素。历朝历代有哪一个朝代没有发生过特大的自然灾害，可称为“荒年”。人为因素有苏联修正主意的逼债（外部因素）有国内地方官吏要“政绩”，刮“浮夸风”，地方虚报粮食产量……促使中央对全国经济形势作出误判，从现在解密的资料上看，最先发现问题的真是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之“罪”从何而来？再说当困难局

面出现后, 作为党的主席, 中央领导同样与全国人民一起, 节衣节食, 共渡难关。毛主席同现代某些高干相比, 现代高干中的一部份人, 他们及其家属, 或是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甚至是亿万富翁, 而毛泽东作为一国之主, 却“两袖清风”, 相比之下, 这样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好领袖却要遭到“清算”, 这帮人的良心真是被狗吃掉了。

2. 关于“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说他一生做了二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 就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那场“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在中华历史上不可跳跃的历史阶段, 现代人如何来看待这段历史, 不同阶级的人必然对此会有二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共产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全盘否定了“文革”的正面意义, 认为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这场“革命”。在以后的舆论上又把参与这场“文革”运动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描写成青面獠牙的魔鬼, 并打入十八层地狱, 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这个彻底否定“文革”, 是某些人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主席后半生, 是为他们自己改变党的路线, 走资本主义道路扫清障碍。

如何评价“文革”? 在中国历史上有《水浒》这本巨著, 在人民群众中有深厚的影响。“水泊梁山”“替天行道”, 一百零八将被称为“梁山好汉”, 杀人如麻的李逵, 为劫“生辰纲”报信的赤发鬼刘唐, 参与劫“生辰纲”“智多星”吴用, 阮士三雄等等。后世的人称他们为“好汉”, 而无丝毫指责。隋唐演义中吃白食, 贩私盐, 做过三十六天“混世魔王”的程咬金, 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可爱的人物。但站在当时地主阶级及仕大夫阶层, 则把这批梁山好汉视作占山为王的强徒, 欲消灭而后快。在文革中的红卫兵, 造反派与水泊梁山的好汉们相比毕竟在素质上, 行为上要更体现了更好的现代文明。所以对“文革”中红卫兵, 造反派的想法是不同阶级所持的不同看法而已, 太正常了。

文化大革命中毛、刘之争, 决非个人恩怨之争, 而是路线、道路之争。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二个不同的纲领: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指向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党内发出的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时一次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

在文革初期，在刘少奇的指示下，由各级党委和以后的工作组领导的文革，就是斗“地、富、反、坏、右”，他们从掌握的档案袋中翻出一些人的历史问题，供年轻的红五类学生起来批斗，把现成的“地、富、反、坏、右”（以后再加上一个“资”）拿出来挂牌，游街，抄家，“破四旧”，等等暴力行动。文化初期的红五类学生“老红卫兵”，批斗老师，逼死知识分子的惨案，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与毛主席的“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何牵连？

这是刘少奇为了保护“走资派”而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冤有头，债有主”，“报仇”找错了人。硬说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罪恶，这是无视历史事实的歪曲。

当众多的革命学生与群众从党报的公开传达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识破了“走资派”转移文革斗争的大方向的阴谋之后，对领导他们进行“文革”的各级党委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开提出了质疑。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将大批革命学生与群众打成“反革命”与内定右派矛盾开始激化，广大革命学生与群众既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又是为自身的命运抗争，真正的造反红卫兵与造反派才揭竿而起，纷纷成立各级造反组织。在“文革”的造反派中相当一部份人是这样地“逼上梁山”的，资反路线逼出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段历史是文革中走资派对革命群众的第一次镇压。

从网上材料看，全国闻名的造反派聂元梓的经历，因为文革前，对上级党委提过意见，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于是贴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被推上了文革的历史舞台。清华大学“井冈山”的蒯大富被打成“反革命”，以后成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人物。笔者在文革前“四清运动”中曾作为车间“四清代表”，帮厂党委“洗澡”，提了意见“揭了盖子”，下来文革开始，在厂党委领导下，将笔者打成工厂内的“三家村”“四家店”，莫须有的罪名成了全厂的批制对象，等到《十六条》颁布，明确了“文革”的方向，胸内的怒火喷发，起来造反，最后被历史推上了无锡文革造反派中的“头头”地位。

有人说文革中的极左思潮，表现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毛主席说，要达到团结二个百分之九十五（干部中的 95%，群众中的 95%）毛主席的主张总不能说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吧，那么参加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派又是怎样的呢？

当年的红卫兵与造反派是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一腔真诚地坚信社会主义道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派，在今天也无需违言，当年的造反派对毛主席的话是绝对信任，但还是不能十分深刻地理解。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反面教育，才对当年毛主席的预言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什么叫一旦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广大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同时当年造反，在某种意义上讲，还多少带有一些“盲目性”，譬如学生、工人对本单位情况是清楚的，但对上层的情况是“无知”的。因此当时只认为“矛头向上”，大方向是正确的。根据这一点“造反”从基层开始，一直造到市里，当造反直接接触到无锡市委的那帮干部时，直觉告诉了造反派要讲实事求是，于是开始了转变，对无锡市委的看法。万万没有想到无锡市的许多老干部的“苦头”恰恰吃在当初死保他们的“保守派”手上。时间到了 67 年 1 月份，无锡工人中的保守组织——“工联”和上海的“赤卫队”群众由于对文革的不理解，心中有怨气而一起联合“赴高告状”，结果被上海，无锡，南京等地造反派阻拦，中央一个表态，就全部土崩瓦解，这样就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

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夺权。而邻近的无锡造反派非常清醒，认为无锡旧市委内谁是“走资派”无明显特征。所以不存在“夺权”的事实，出于对社会秩序，全市工业生产秩序的高度负责的态度与原无锡市委书记韦永义坐下来共同讨论（7 4 1 轮船会议）如何管理好无锡人民的生活，生产问题。经过讨论当权派与红卫兵造反派达成了共识。造反派支持已瘫痪状态的无锡市委和市人委（政府）出面支持无锡市的一切正常工作；市委，市人委同意红卫兵造反派联合派出代表对市委，市人委实行工作上的“监管”。就是说市委，市人委仍然掌握工作的“执行派”，而群众组织对市委，市人委工作中有“监管权”。这一协议达成后，刚开始执行，市委，市人委工作人员刚刚上班。中央发出了部队加入地方“三支二军”的命令，造反派当即派出代表向驻锡部队首长作了汇报，无锡造反派的打算。谁知驻锡部队首长当即否定了造反派的这一良好愿望，认为是“不彻底”的革命，不予支持。要象上海那样“夺权”才是正确的。

以后这段历史被说成是“和平让权，联合办公”，而且是属于“5.16”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之一，受到批判，今天可以说，如果当时“支左”部队根据无锡文革实际情况加以引导，而不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犯有错误，在江苏的苏南地区不会发生“武斗”，就不可能出现大的动乱。

这里要澄清一个事实，67年7、8、9几个月中，发生了全国性二派群众组织的大武斗，死伤无数。武斗是怎样发生的？在某些人的笔下，认为二派群众组织为了“争权夺利”而打派仗，这种认识是没有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事实是因为“支左”部队的偏见与错误才是武斗的根源。在67年二月开始，全国性的动用“枪杆子”将许多造反组织打成“反动组织”，而取缔、逮捕造反派的负责人，这是“反文革派”对“文革派”的第二次镇压，这段历史称之为“二月逆流”。但这次对造反派的镇压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和抵制之后，“反文革派”当即变换了手法，在地方上扶植一批能代表他们利益、思想比较保守的群众组织，形成两大派，并利用他们组织起来的群众之手，对造反派实行非“枪杆子”自己出面的暴力镇压，造反派为了自身安全而奋起抵抗，于是“武斗”就发生了。“武斗”是“反文革派”对“文革派”“打击、打击、再打击，镇压、镇压、再镇压”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已，也是文革中造反派受到第三次镇压。其实对于当时“武斗”的起因，毛主席看得十分透彻，所以当时报刊文章有“走资派挑动武斗”的提法，才有67年7月份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文攻武卫”四个字拆开来解释“文攻”就是要坚持“文斗”，“武卫”就是要造反派也要以武力保护好自己，所以有毛主席默许各地的“抢抢”事件。以后“文攻武卫”的口号又被“反文革派”接了过去，（所谓“反文革派”在上层是主观故意的，在下层是客观存在和无意的）以后的形势则武斗更为激烈。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过许多“冤、假、错”案，是的。

全国最大的“冤、假、错”案恐怕莫过于“深挖5.16反革命集团”，在“深挖”阶段，江苏全省受审查的有64万人，无锡市内在“深挖”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有70多人（不包括被打伤后回家死亡的人数），文革中“清理阶段队伍”，“一打三反”，“深挖5.16反革命集团”等的“冤、假、错”案使广大干部群众深受其害，更有甚者在湖南，广西等少数地区出现过对“四类分子”造反派的大屠杀。这可以说是文革中的罪行，但必须搞清楚谁是罪犯？

这些“罪行”是归咎于毛泽东么？事实回答是否定的。这事实上是“反文革派”在掌握了地方权力之后，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接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方针，似“反右”运动那样以极左的手段大搞扩大化，对造反派与无辜人民进行第四次血腥镇压。毛主席在文革中曾严肃地指责：对广大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在江苏出现大量的“冤、假、错”案之后，毛主席在接见许世友时，要许世友“高抬贵手……”造成这些“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是谁？革委会成立之前是军管会掌权，革委会建立之后，又是以部队为主的保守派掌权，制造这些“冤、假、错”案由谁来承担？

文革之后的邓小平时代，就没有“冤、假、错”案了么？没有根据的事不说，单就 83、84 年“严打”这一段历史，在网上某些网友对此已经提出了质疑，但他们都是“严打”的旁观者，很难说清当时的真相，笔者在“严打”中既是亲历者，又是幸存者。在江苏无锡 83 年 9 月 4 日，84 年 1 月 9 日（以后还有但不是亲历，无法记忆）全市进行了二次大逮捕，口号是“镇压反革命”，当时的气势确似 50 年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机枪架在卡车头上，整卡车地抓人，抓进看守所，人多为患，牢房不够，加设临时简易牢房。逮捕的对象大部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是“反革命”吗？牛头不对马嘴。在这些被捕的人群中大部份在平时有这样与那样的小错误或有一点轻度犯罪行为，简单地说是属于“刑事”。当时对死刑案件的审批权下放到了省一级。一场“从重、从严、从快”的“严打”在中国大地上大开杀戒，三天两头的“公判大会”，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地枪毙。这些“死囚犯”当真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么？笔者有幸与几个“死刑犯”关押在一起。

略举几例：

有一家兄弟俩（不知名）兄长 20 岁左右，弟弟刚刚满 18 岁，兄长因与几个小兄弟一起喝酒，期间到外面去抢了几个鸡蛋作酒菜，因此这兄弟俩就是“流氓团伙”，一起逮捕，刚满 18 岁的弟弟有与女性发生过性关系，被定为“强奸罪”哥哥以“流氓罪”判无期徒刑或死缓，后据说在服刑期间因不服从改造而死于狱中，弟弟因“强奸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一家二个孩子，难道就不能留下一个么？

王X X男30岁，家住无锡吴桥附近，“文革”前不知犯什么错误被“劳教”三年，文革期间因不宜释放而留场，文革后回家，投靠姐姐，为生活私下教人跳“迪斯科”舞，同时与一个女性“非法同居”，因此而以“教唆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临行前王X X写好“申诉书”塞在牢房的墙角里。

无锡南郊顾X X青年人谈恋爱发生过二性关系，定为“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无锡南郊邵氏兄弟俩把沉在河内多年的一条无主水泥船打捞起来卖了数百元钱，兄弟俩定为“盗窃罪”，一个三年，一个六年徒刑。

当时只要三、五人以上的小青年打群架，就可认定“流氓团伙”为首者不死也得判处重刑

凡是男女两性关系，则需女方口头说一声“我是不愿意的”，（不管是出于畏惧“严打”声势，还是羞于自己的名声）男方均为“强奸罪”判处死刑。

笔者怎么会列入“严打”对象呢？情况非常简单。

1982年受朋友之托，跟了另一个朋友去了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商谈办厂之事，因自己曾是造反派，故被怀疑有政治，经济问题，而被“收容审查”，经无锡市公安局“收审”站一年半的“审查”，结论是不触犯《刑法》。正在准备解除审查之际，“严打”开始了。于84年1月9日大逮捕进了看守所，三个月后以四句言论，一个企图的“罪名”，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四句什么言论？

第一句，因为赞同了82年中纪委书记黄克诚发表的关于党风问题的文章指出党内存在腐败现象，这一观点，就是“诬蔑共产党腐败了”。

第二句，在全国批制了“二个凡是”之后，江苏“新华日报”发表了批制“封建主义”的文章，我的朋友（“同案犯”）认为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的一套就是“封建主义专政”，因此我的罪名是“诬蔑共产党是封建主义专政”。

第三句，当时社会上传统华国锋的下台是一次“政变”，此话既不是本人所讲甚至听都没有听到。（庭审时证实）

第四句，是在朋友家看电视时，本人根据《毛选》上对“三民主义”作了解释，因此罪名为“妄图用三民主义取代党的领导”。

本人与朋友去晋江县时途经厦门市，处于好奇，登上“鼓浪屿”，想看看“金门岛”，这就成了“探听沿海情况”。

最后一点指控“被告”曾与X X X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笔者当即质问“公诉人”，请出示有关“证据”，“证词”，本人与X X X何时，何地如何“密谋”的，“公诉人”“厚颜无耻”地回答“证据”我们是有的，出示不出示是我们的问题（当时庭审记录在案）。二、三人在茶余饭后的家中闲谈，既没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又无侵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凭这几句话，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判于“反革命”罪，这算不算是件冤案，在历朝历代封建衙门，只有“屈打成招”，而没有不要证据而判处刑罚的，这就是邓小平“要抓一批，要杀一批”“严打”下发生的一切。因为笔者是“政治犯”所以无所畏惧，依法申诉20多年无效，就敢呐喊。而那些“严打”中无罪定罪，轻罪重判的“刑事犯”，就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冤沉海底了。

笔者现已过“古稀之年”，本来可以按工龄有1000多元的退休工资，现在只能得到政府的“恩赐”每月领取“老年生活补贴”人民币150元。

以上这一小节似乎是个人的“私事”，但主要是对谁说文革后没有“极左”，没有“冤、假、错”案的历史揭示。

说文革破坏了中国古老文化。

文革初期曾出现过在党委领导下的那些纯红五类的红卫兵，出于年轻幼稚，及自身的“优越感”，等因素带来无法无天的破“四旧”，确实一定程度地造成了对某些珍贵文物的破坏，这是应该反思和值得吸取的教训。

但什么叫“古老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许多优秀的古老文化，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地优良传统，有许多领先于世界的创造发明，有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有诸子百家时期的哲学思想，又孙子“十三篇”的军事思想，但这众多的“古老文化”中既有“精华”之处，也有“糟粕”的存在，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现代某些人所崇拜的理想）难道不应该受到现代思想的批判，不应该破坏么？林彪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信条不应该批判，破坏么？“克己复礼”恢复“周礼”，“周礼”有“刑不上大夫，礼不对庶人”难道

现在对当官的犯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重罪可以轻判，对“庶民”可以草菅人命。对于这种“周礼”，国人可以让它发扬光大么？

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法家的改革思想，对儒家的传统思想的大批判，大冲击，大破坏，否则怎么叫“文化大革命”呢？

“文革”就是要废除权贵者所持有特权的封建意识，批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谛，毛主席发出的要“斗私批修”这简单的四个字，包括了深刻的含义。就是要求全党，全国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决裂，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潮，文化大革命要对古老文化“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地继承。

反毛派的逻辑矛盾。

反毛人士一方面拼命地要清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罪行”，另一方面又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社会负面现状表示不满，他们也反对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反对社会上“黄、赌、毒、黑”物价飞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今日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弊病，难道不对么？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思维说明了什么？不是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就是一堆不明是非的糊涂虫。

对历史，对历史人物的功过评价，必须抛弃个人恩怨的束缚，否则必然地产生不公正的结论，自觉地步入歧途害人又害己。

拥护毛泽东，树立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改革开放的阻力，这句话又错了。

拥护毛主席，承认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出于公心。拥护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当前的改革开放。笔者个人观点“改革”必须是一个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就是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这是个原则。反对的是“改革”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掉，“开放”反对的是敞开国门让外国资本对中国人民的经济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的奴役。不希望“改革”违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向资本主义靠拢，“开放”不希望出现“丧权辱国”。

“改革开放”的成果与民共享，这是句假话，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是社会现状。

暂时不说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的苦楚，先从笔者就自身经历说起。文革前本人三级工，月工资收入 42.5 元，妻子三级工，月工资守约 43.5 元，夫妻俩合计收入 86 元，全家人口夫妻两人一双子女，一个老母共 5 人，孩子多病，每月要上医院 86 元，5 人生活，看病，孩子上学，全家生活平平而过，生活上节俭一点，每年还可以添只手表，买辆自行车，无后顾之忧。“改革”开放后，如果工薪阶层夫妻俩工作的工资收入算 2500 元，凭这点收入要养活全家五口人试试看，还谈不上上学，看病，住房等意外支出，现在通常说“生活水平”提高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过去是一人工作，养活几个人，现在是几个人工作养活一个人（独生子女），更何况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无固定收入者，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何等艰难。

笔者在解放前（1947 年）记得街头艺人卖唱小曲，其中有几段（醒世曲）对富人：“进出坐汽车，上下坐电梯，吃喝嫖赌，浪荡逍遥百样全欢喜……”对穷人：“百物飞涨，难度光阴，穷人出泪痕……”

对于目前经济上的物价飞涨的现状，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退休工人加工资，干部发“补贴”，收紧人民币发行量，提高银行利率等等宏观调控，这些措施能控制物价飞涨的势头么？笔者并非有意与政府唱反调，泼冷水，笔者不是经济学家，拿不出好办法，但经验告诉我，政府目前的措施时不会收效的，在 70 岁以上的人都知道解放前，物价飞涨，蒋经国以“太子”身份坐镇上海，采取行政手段“限价”，向不法资本家开刀，“限价”成功了么？没有，因为是国民党的半殖民，半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命脉不控制在自己手中，政府的行政手段与资本的较量必然是一败涂地。

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是无法避免的，要使国家经济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还必须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阿弥陀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反毛派的上层铁杆分子真是：“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不是笔者小看他们什么精英，学者，如果真有“国难当头”，外国武装入侵中国，这批人保证轻则带了老婆孩子逃命，重则在敌人的枪口下跪地高喊“饶命”，汪精卫，陈公博等汉奸不也是政治，文化精英么。真正能够保卫国家的一定是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

年轻的 8 0 辈爱国青年，世界是你们的，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陆渭文

2008 年 6 月 15 日初稿

2011 年 9 月 1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14）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十四节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王力同志：

你们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很多问题。我们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东西，你们讲得很好。同志们反映了一个最迫切的要求：我们的国家不要变颜色，大家不要受二遍苦，不能让修正主义分子篡夺领导权。

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也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人，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自己掌握起来。

工人阶级是最关心生产的，大家离开生产岗位是被迫的，大家迫切希望解决问题，很快回去搞好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口号，我们相信靠工人自己是能够妥善安排好革命和生产的。

我们一定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一定很好地研究。党中央正在研究，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彻底。

大家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大家最关心的是以下这些问题：

大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对你们这次行动作出估价、表示支持。同志们，三千八百人的行动能说是反革命吗？一万个不行！大家会上反映的都是革命的情况、革命的要求，对所受的压迫进行控诉，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革命的。有人对同志们的这种革命行动，说成是匈牙利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保证同志们回去不受任何迫害，同志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应受到任何损失。我们负责通知浙江省委，不得打击报复，所有的谣言都要省委负责辟谣。

你们工厂在错误路线支配下，斗群众，把工人、一般干部打成反革命的，把革命群众打成牛鬼蛇神的，应根据十月五日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一律平反，

宣布无效，当众恢复名誉。工作队强迫你们个人写的检讨，应退还本人处理；工作队整理的各式各样整工人的材料应全部集中，当众烧掉。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支持革命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的。但革命要靠自己。十六条基本精神就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们有好几千人，为什么不能回去干！坚决向与毛主席路线对立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斗争到底。你们要精神变物质，更好地完成国家任务。

文化革命的命运你们自己掌握起来。工作队在背后操纵搞起来的文革委员会，你们可以不承认。你们按巴黎公社的原则（即工人自己创造的原则）进行全面选举，选举前要充分反复酝酿讨论，真正选出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来，把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人罢掉。你们文革委员名单中只有一个生产工人。我们建议你们要以生产工人为主体，重新建立工人自己的文革委员会来领导文化革命。

生产问题，如果原来领导生产的机构还可以领导就领导，如果不能领导就以老工人为主，你们自己组成生产领导班子。革命和生产都应由我们工人自己来讨论安排。革命、生产都要靠工人阶级。

同志们说得对，如果修正主义上台，搞好生产为谁？说得很好。

同志们对《人民日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有意见，我个人认为你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这篇文章是有缺点，唐平铸同志对我说准备再写一篇，支持你们搞革命。有人拿这篇东西来压你们，你们不要怕。这篇东西中有正确的东西，你们要拿起来当武器。

毛主席和你们是心连心的。我们相信你们。革命、生产都靠你们。工人阶级是最拥护毛主席路线的，对一切反对毛主席路线的都要批判斗争。

你们一个厂的力量就这么大，杭州市还可以联合起来，你们要团结绝大多数工人。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根据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有权成立自己的团体。也可组织联合组织，最好叫联合会、协会等适合工人自己的组织形式，一般的最好不脱产。你们不要搞官僚主义机构。过去搞的那些官僚主义机构，今天要作为革命对象。

罢官问题，（指大家要求罢工作队队长徐钊的官）她的文革职务，你们不赞成就算罢啦，至于其它职务，是否今天定要在这里罢？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要求的，

认为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在这里罢掉不合干部处理手续，对你们的斗争也不利，为什么不能由你们自己回去把她斗倒、斗垮呢！（姚文元插话：革命要有反面教员）你们回去自己去斗，我们支持你们，斗出个结果来。你们把她的事情都摆出来，摆事实，讲道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她斗倒、斗垮，罢掉一个人，换一个人就一定是好的？不一定。不是罢一个人的问题，而且要把错误路线批臭。但应叫她随叫随到。签了字还不来是完全不对的。同志们还要求刘钊（副省长）检讨，是合理的要求，刘钊应去检讨。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

同志们这样多的人到北京来，这件事对生产是不利的，这个责任应由省委、市委负，不能责备群众。

你们对华东局有意见也可以提。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提。

同志们能否认为主要问题解决了，可以回去了？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把革命、生产都搞好，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要在生产上也做出个样子来。

同志们要求见毛主席的心愿，我们一定负责转达给毛主席。毛主席也很想见大家。毛主席的心永远和同志们在一起的。

我们提议，同志们早些回去，你们商量一下，回去更好抓革命促生产。

姚文元同志：

我们今天见到的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姐妹。你们讲了很多很好的话。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我们不是首长，是你们的同志、勤务员、战友，是和你们一道来闹革命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和群众在一起。大家批评有些人这样怕群众，这样压制群众，这些人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非常关心工厂里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把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转达给毛主席。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对文化大革命有特别重大的责任。文化大革命先是在学校里搞，现在我们工人阶级起来了，这是个好现象，说明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前进。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毛主席思想世代地传下去，保证无产阶级江山不变色，大家不受二遍苦。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主席讲“要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不仅要关心一个厂、一个市，还要关心整个国家的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徐钊这个人坏透了，她所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现在全国都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这个厂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全国斗争的一部分。你们去街上看大字报，工业部门就有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

革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学生团结起来，一定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一定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下去，还要把各种修正主义的东西搞掉，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真正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你们要罢徐钊的官，我个人是支持的。但这个时期的经验证明，革命需要反面教员，把她留着进行批斗，由你们回去斗争。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

过去搞土改就有过两种搞法：一种是领导把地主抓起来；一种是群众起来把地主斗倒。后一个办法才是真正巩固的。你们要靠自己斗争。

总的形势很好。“抓革命、促生产”是革命的口号，革命的方针。有人把这个口号说成抓生产压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工人阶级应该把革命，生产都搞好，精神化为物质。

是否可以考虑，大家回去自己对革命，生产做出妥善安排，做出个榜样来，把革命搞彻底，又把生产搞好。我们等候你们的好消息。

大家回去再继续去斗争。有些人对你们来北京是仇恨的。你们不要以为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你们就没有问题了，要靠你们自己去进行斗争。

大家回去后有问题写信到中央文革小组来，我们一定负责处理。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3）》；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总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和浙江省革命造反派通话纪要

〔全省八十五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于一月十五日下午五时采取了联合行动，封闭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楼，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解放军报社论明确指出：“在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事实证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军队内部不仅存在，而且是尖锐的、复杂的。”“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搞彻底，这一点是共同的，毫无疑问的，决不能借口军队情况特殊，而有丝毫的动摇！”但是，浙江省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窝藏黑材料，隐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至包庇杀人凶手。它还纵容杭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践踏十六条，挑动解放军斗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难道这样的司令部不该火烧吗？这样的司令部不该炮轰吗？这样的当权派不该揪出吗？这样的当权派不该打倒吗？就是要把他们一个个揪出！一个个打倒。

对于浙江军区的一系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曾多次向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反映，一月十七日凌晨，周总理与革命造反派的代表通了电话，对我们的行动表示支持，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我们无限的关怀，给革命造反派带来巨大的鼓舞。为了使革命同志能详尽了解这一革命行动的情况，现将总理与我们的通话公布于下。〕

时间：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凌晨四时正

接电话地点：军区

周总理：你是不是军区的代表？

军区代表：是。

总理：你们不是有几位代表吗？

军区代表：有十个。

总理：请他们推选一个代表出来我跟他通电话。（清华大学代表接电话）

总理：你是哪一位、哪个学校的？

清代：我是清华大学的，参加三司联络站工作的。

总理：那浙江本区的人呢？

清代：好，浙江同学跟你谈话。（浙大刘英接电话）

刘：周总理，我就是浙江的。

总理，你是哪一位同学？

刘：我是刘英。

总理：你是浙江大学的？

刘：是。

总理，你们现在在浙江军区多少人？

刘：现在大约有二百个。

总理：你们这个问题在浙江不容易谈好。我们中央很关心你们的事，怕你们事件耽搁久了不好。我们想叫你们派几个代表，也想叫省委的同志和军区的同志到北京来谈。你看好不好？你们想派几个代表？

刘：派十个。

总理：造反的有没有北京同学在内啊？

刘：有的。

总理：你们同意的话，我们把浙江军区负责人张秀龙就是你们说犯有严重错误的，龙潜就是政委，还有何以祥叫到北京来。何以祥你知不知道？

刘：我们要求是政委江华、龙潜、张秀龙。

总理：我问你，何以祥要不要他去呀？

刘：我们认为不需要他去。

总理：按照你们的意思，就是江华、龙潜、张秀龙。是吗？龙潜、张秀龙是没问题的罗！龙潜被弄到衢州去了，许多同学把他包围起来，你们知道不知道？

刘：不知道。

总理：这样好不好？张秀龙是肯定会来的罗！因为他人是在杭州。肯定在杭州，可以同你们一道来的。龙潜听说在衢州，我们打电话去问他。如果在衢州，我们在衢州派几个学生代表把龙潜带来。第三个江华同志一直在上海养病，如果他病不是很重的话，我们可以把他找来，如果他病很重的话，可以把李丰平找来。

刘：不！李丰平不在。江华是一定可以去的。

总理：那我们打电话去问他，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一直在上海养病，没到北京来，也没到杭州去。我们可打电话问。同学，我们和空军商量，杭州有飞机的话，明天就是十七日上午九时坐飞机起身行不行？

刘：好。周总理，我跟你讲一个事情。

总理：你讲啊！

刘：十三日那天我们浙江省杭州市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要阮副司令一起到北京去。

总理：什么司令？

刘：这是紧急事情。有个副司令员叫阮贤榜，它是新从新疆调来的。现在他住在医院里，心脏病很严重，生命有危险。这几天我们根据很多现象判断，军区附属医院耍了一个政治大阴谋，他们想害死阮副司令员。

总理：我不清楚浙江军区的情况。

刘：张秀龙事件发生后，他来参加我们的群众大会，大会上他表示了态度，是比较好的。后来在医院里他讲的话态度也是比较好的。是和群众站在一起的。可是他在医院里受到很坏的待遇。一个副司令员病床非常简陋，非常寒冷。这个病房不是一个高级首长的病房，是在门诊部旁边的一个病房。他是犯有严重心脏病的，这个房间里除了一张桌子、一张床以外没有其他东西，还有二只狗，这二只狗还是后来搬进去的。他开始入院时，病情还不是那么坏，据说打了一针后就打坏了，病就越来越严重，起不来了。曾经发生休克，休克以后给他输氧，输氧输到半中间，氧气发生故障。

总理：哦！

刘：然后发现他有痰，将痰从喉咙里吸出来，利用电动吸痰，后来电源切断了。

总理：啊哟！

刘：经过抢救，活过来了，还是用血。二次都发生严重错误。我们同学看到护士医师都在那儿很忙碌，出了不少差错，找这样东西没有，找那样东西没有，反正很乱。我们觉得这儿是有阴谋的。阴谋有二个方面。第一方面生病起因，由于他参加群众会议以后身体疲劳，起先病没有那么严重。这个会是革命造反派开的，开好后他就离开了，到医院里去了。我们可以说阮副司令员如果死了，那他们可以给革命造反派加一个罪名，就是阮副司令员是给我们逼死的。

总理：噢，我懂了。

刘：第二方面，我们根据阮副司令员的谈话来看，他对浙江军区其他一小撮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和张秀龙、龙潜观点不太一致的。他在医院里曾对我们说：

我离毛主席路线很远了，我有罪。我要到革命师生中去，毛主席的红卫兵万岁！我很想到革命师生中去。他说了很多这样的话，他很感动，我们听来是发自肺腑的话。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护士拦住，不让他继续给我们讲下去。我们觉得他们有个企图要把阮副司令员拖垮，拖死，企图灭口。我们觉得有这么个问题。

总理：噢！

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很紧急，阮副司令这个情况很严重。我们有七个同学采取了绝食行动来抗议他们的罪行，（总理：哦！）抗议这种政治上的陷害，抗议他们执迷不悟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有 43 小时左右了。我们现在有个同学汽车接到这儿来了，她身体已很虚弱了，让她跟你讲几句话好吗？就是参加绝食中七个（后来有八个）中的一个。

总理：她现在吃了一点点东西没有？

刘：她现在还没有吃。

总理：现在吃点东西，反正我们用飞机把阮副司令接到北京来嘛！

刘：现在让她谈几句话好吗？

总理：好！好！好！

（赵大岭按电话）

赵：喂！

总理：哪一个？

赵：你是周总理吗？

总理：是。

赵：我是赵大岭。

总理：我说你赶快吃点东西吧！你饿着我心里难过。

赵：我给你讲，我们到医院以后，我们发现很多地方做得不对，对副司令员采用这种态度是不人道的。（总理：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必要见院长，需要了解情况。

总理：对！对！

赵：他们骗人说院长不在，有的说院长在开会，有的说院长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总理：他住什么医院？

赵：他住 117。

总理：噢！117 医院。

赵：军事医院。

总理：117，我晓得了。

赵：我们要见院长，他不见我们。我们问他们院长叫什么名字，他们说是军事秘密，不告诉我们。

总理：你们见到阮副司令没有？

赵：见到了。

总理：待遇不好，是吗？

赵：嗯。

总理：这样子，他现在能不能坐飞机？你们看看。

赵：我也不知道，起先他让我们进去，因为我们是学生，我是中学学生，不懂医术。所以他让我进去看，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现在我们来医生了，他不让我们进去看。

总理：哦！

赵：我们原来没有医生的时候，他让我们看病历，让我们跟他们一起讨论。在讨论中发生了许多差错，他们有的药开错了。可后来我们请来了医生，我们说让我们医生研究病历，他说他不相信。我说那你让我们去看病历，他也不让去。他们说相信我不相信他们。我说那我担保，他说那不行。这样我们昨天跟他辩论了一夜，他还是不答应。

总理：嗯，不答应。

赵：我们说我们坚决要见阮副司令，我们看他情况到底怎么样？他们有六十多个人围牢病房门口。

总理：哦！

赵：我们一走进病房，他们马上就起来，原来不是病房，就是门诊部。我们觉得他们的现象可怪，我们要汇报中央军委。我们就要照相，他们就大喊大吵，使劲嚷。他们知道阮副司令需要安静，不能嚷，他们还存心嚷。我们提出强烈抗议。我们说你们要辩论到下面辩，不要进行政治迫害。

总理：对！

赵：他见我们照相，就追我们，把我们锁在一个房间里，不让我们出去，要查我们。后来我们说你们没有权利查我们，他们不让我们出去，当时房间里很乱，我们提出抗议，我们非要出去不可，他们不让出去，我们就要跳楼。从楼上跳下去，跑出去。后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他才肯让我们出去。我们照相的时候，他本来嘛，都是使劲喊，在下面屋子里他们先动手打人的，我们没还手，他们打人了。后来我们要照相了，他们就遮，他们有的拿语录都拿倒了。

总理：哦！

赵：我们都乐，我们觉得他们太虚伪了，中国人民子弟兵嘛，怎么搞的？我们都觉得丢脸。后来我们就提出抗议，因为我们十四日就说我们要见院长，他一直不理我们，我们到十五日以后，我们就开始强硬手段，我们进行绝食。我们不吃饭，也不喝水，我们已绝食四十三个小时了。可是他还不出来接见，他们昨天宣读了中央军委指示，都是涂改过的，本来的题目是关于对于群众挑动……什么，反正是“中共中央关于炮打解放军”，他把“解放”两个字划掉、换了“队”、变成“军队”了，在阮副司令进院的时候，他们没有高音喇叭，因为医院是不适于安的，但是马上就安上了，（总理：哦！）从早上五点一刻开始广播，一直广播到下午。我们提出抗议，他们不接受，我们就自己上去把喇叭拆下来了，所以我们认为他们这种做法就是不对，是政治迫害，所以我们就走，他们就哄我们走，他们用抓革命、促生产来压我们，因为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小房间，他们说这个房间要看病，叫我们出去，他宣读内容以后，他们的人就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扣押我们的证件，要我们登记。我们提出了抗议。原来理我们，现在不理我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只要我们走到那个房间，离那个房间将近十多米他们就拦住了，六十多个人拦住。

总理：还是六十多个人？

赵：是他们六十多个人，有一会儿，我们走过去，他们就高喊，你看，他们打人啦！“你轻点嚷”，我说“你要嚷就下去讲”。他们打人的人开始还冲锋陷阵，挡在最前面，死劲堵住门不让我们出去。后来我们说你们职工打人啦！他们就慢慢地从后面偷偷溜掉，我们要求进医院病房，他们根本不让我们去，他们骗人，所以我们说应该把他带到北京去，你派一名有名的军医来，给他看看。

总理：同学，你们绝食有多少人哪？

赵：我们有八个人绝食。

总理：好，这样子，我今天天亮以后派一个小分队去，医生、护士去，看阮副司令员，如果身体可以的话，接到北京来，你们看好不好？

赵：我看好！因为我们来医生他不相信哪！他说是骗人，他说我们的医生都是牛鬼蛇神，不可信的。

总理：噢，这样子，我派护士、医生去，跟你们一道见面。你们这八位同学现在在医院，还是在军区？

赵：在医院里。

总理：你们还在医院里，好，但是我请你们吃点东西好不好？

赵：不，我们一定要见院长，我们不见院长一定不吃东西，院长见了我们再吃东西。

总理：你们要见院长是不是？我给副司令打电话，叫院长一定要见你们。但是你们见到院长吃点东西好不好？

赵：我们见到院长马上就吃。

总理：那好，那好！这样子，你们吃了东西不要走，你们还是留在医院里。

赵：好，我们留在医院里。

总理：明天天亮以后，我们派了飞机送医生、护士去了以后，你们见了北京军委派的军医、护士以后，你们跟他们一道去看阮副司令。

赵：周伯伯，这样好不好，你派了医生来一定到一一七医院找我们，让我们及时同我们的吴同志一起去好不好？（总理：好，对！）因为我们派的医生都是造反派的（总理：对！对！）是可信的。他们说普通医生医术不高不可信。我们找的是主任以上的，他们说主任以上的都是当权派了，是牛鬼蛇神，更不可信了。

总理：这样子，你叫什么名字？

赵：我叫赵大岭。

总理：你是哪个学校的？

赵：我是北京女五中的。

总理：你们 8 个同学还是在医院，告诉他们七个同学，我现在给浙江军区副司令打电话，叫他通知院长一定要见你们。见完了以后你们去吃点东西。

赵：好。

总理：在医院里休息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军委里的医生护士到了以后，跟你们谈话，然后检查阮副司令员的身体，如果他身体还可以，就乘飞机来，你们同学派几个陪他来，好好？（赵：好！）由专门医生给他检查。明天天亮以后，派一架军用飞机，带一名军医和二名护士到杭州，然后去找医院，跟你们接头，跟院长一起去看阮副司令员。如果他能够坐飞机就坐飞机上北京，你们派几个同学陪一道来好不好？（赵：好！）就这样子！

赵：我们《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到他们那里去了，他们不肯见，他们说我们没有请你们来。他们可变啦！他们骂人、也打人，根本不象人民解放军。他们说，他们如果再骂人、再打人的话，我们打算把他领章拉下来。

总理：这样子，我叫院长一定要接见你们，让解放军报的记者也跑进去看一看。现在你们吃一点东西，慢慢地、认真地休息！

赵：你等一下，让工人讲讲话。

总理：那好。

总理：喂，你是哪一位？

工人：我是工人，我是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的，我姓徐，叫徐红。

总理：你是那个工厂的？

工人：杭州针织厂。我们杭州的工人也参加了这个运动。（总理：很好嘛！）

总理：你们都是造反派吗？

工人：我们都是造反派！我是代表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的，我受工人的委托去看阮副司令，可是他们不给我们进去看，因为我们不懂医术，就派了几个医生跟我们去看，委托他们看了以后向我们杭州工人讲阮副司令的病情。他们也拒绝了，不让我们看。他们讲是病情紧急的时候，不能看。我们讲我们一起进去看。

总理：你们做得对啊！

工人：谢谢周总理！

三司红卫兵杭州联络站代表林刚：总理我给你反映一个情况，就是军区，就是后来我们跟秘书讲了一个情况以后，秘书说他们走了很多，可是最后啊，还剩下三个工人二名机要员，另外还有二名省委的同志也参加了接电话。我们封闭了军区。从冲进军区后他们一直对我们同学进行了白色恐怖。（周总理：我们知道了一点）我们的同学被打了，有的打伤了，一个昏过去了，鼻子出了很多血耳朵

打伤了一点。昨天(十五号)晚上大概十点钟左右，发生了一个事情，我们有一个同学对一个解放军同志进行辩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解放军同志有二十几个人，不知道那一个人，一个坏蛋，挑动了他打了我们一个同学，鼻子打伤了，流了很多血，耳朵也打坏了，人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我们把他扶进去，扶到房间里，睡了很久很久，然后把他送医院了，我们觉得很痛心呢！解放军同志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殴打我们革命的同学，他沾污了解放军的名字，总理啊！浙江军区就是有这么一小撮坏蛋，我们的枪杆子怎么能掌握在这种人手里，他们调动部队镇压我们学生，挑动解放军同志镇压我们学生，他们利用解放军同志，解放军战士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还说自己呢就是毛主席就是党的化身，有的解放军战士受蒙蔽很深，他们说我们保卫张司令员就是保卫毛主席，就是为了张司令去冲啊！我们觉得枪杆子在这种情况下是实在太危险了，所以我们才采取了这样造反的行动啊！把军区封了，把权夺回来，我们要把权交给毛主席，交给林副主席交给中央军委。要中央军委派出得力的干部，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来接管军区。(周总理：对！对！对！)我们认为浙江军区是资产阶级反动堡垒，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再这样下去啊要把我们部队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了。他们根本不是保护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而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总理：你们这样引起是因为怎样原因啊？我们看了几个消息我们很着急，直接跟你们通电话，所以决定今天白天把你们接到北京来谈，我们意见，在北京中央和军委直接给你们来解决，一会儿就来。

代表：他们的人现在依然在这儿跟我们在一起。刚才浙江军区有个人想溜出去，是一个副参谋长，我们认为浙江军区很多行动是有鬼的，我们到军区来，盯了我们的梢，说我们是特务。我们跟你总理直接通电话时他们也要捣鬼。

周总理：哦！那是不应该的。我们谈的是差不多了。

代表：最后，我们要戴副司令负责(总理：对！对！)还有我们的同学安全、生活要军区负责。我们这里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被子都没有。我们这里很多同学、很多同志连被子都没有坐在那里过夜，杭州冬天夜里还是比较冷的，屋子里很冷，不象北京有暖气或者有火炉，是比较冷的。

总理：你们现在在军区大约有多少同学？

代表：有二百来人。

总理：这个事情我叫戴司令办。

代表：我们是要保护大楼的，他们军区广播内对我们威胁：你们不能守围我们，要对大楼负责。是这样威胁我们的。我们是要保护大楼的，我们要对大楼负责。一定要把浙江军区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不把这个反造到底，我们是决不离开大楼的。

总理：你是不是戴××同志？

戴：是啊！

总理：我告诉你，我是周总理，中央、军委、国务院现在给你几件事，我告诉你。第一件事对于学生，在军区里，大礼堂，大楼里的学生不要威胁他们，要保护他们。告诉解放军战士要对他们很好。没有盖的要每个人给他们军毯盖，并且给他们搞东西吃。（戴：好！）要等待北京解决了以后。

戴：听到了！

总理：第二件事，你要打电话给一一七医院，告诉医院院长，要给阮副司令很好的待遇，同时要给八位绝食的同学让他们去看一看阮副司令员。同时要医院院长接待他们八位同学，见了面以后要接待他们，就可以吃点东西，吃点东西后就可以看看阮副司令员。

戴：坚决执行。

总理：你对第二件事情要照办。（戴：好！）第三件事，我们要派一只军用飞机到杭州接张秀龙司令员和他们十位代表，明天白天赶到北京来。我问你，龙潜政委现在是在衢州吗？（戴答：是在衢州。）那我另外打电话到衢州去好了。你叫张秀龙司令员跟李丰平一道来，本来应该叫何以祥也来的，他们说不要他来，如果他自己愿意来也可以来，懂吗？这是一架飞机，另外再一架飞机，我们派出军医和护士到杭州以后你们负责把他送对 117 医院，他们负责检查一下子阮副司令员的身体，如果身体可以，能够坐飞机来就把他接到北京来住。如果身体不行，由医生、护士和同学陪他经过上海坐火车来。不管飞机来还是火车来，都要绝食的那几位同学派几个代表来。这四件事情，一个事情是在军区的同学要好好招待他们；第二件事情是医院绝食的同学让他们见院长；第三件是我派飞机接张司令员和同学跟红卫兵代表十个人，如果何以祥能来就同时来；第四件事情是派军

用飞机、派军医、护士去看阮副司令员。检查完了能从飞机就飞机来，不能坐飞机就火车来。这四件事，我们在北京谈的时候，你们在杭州的情况要照旧，不要发生任何情况，你要负责的。经常跟总参谋部保持电话联络。

戴：好！好！

（接着浙炮李龙华同学反映 117 医院情况，三司赵大岭同学问总理是否可以照相，总理说可以的，你同院长说）。

浙江杭州工人造反总部代表要求周总理代向毛主席问候、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总理问起浙江省委没有人，只有一个王起副省长，总理就跟王起通话。总理问他李丰平在哪里？王起说被化工学院的同学叫到北京去了，现在在南京。一个同学问：总理，军区十五号半夜里广播了一个中央指示，指示的名字叫做“不准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指示。

总理：我跟你讲，中央确实有这个文件，现在你们那个情况跟这个情况不同，不适用啊！我告诉你，这个文件确实有的，是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指示的，我们把你们的情况弄清楚了，我们报告了你们的情况不适用的。

同学：对对对！那是对地方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的，现在他们把它扣到革命派头上来了。最后高呼：

毛主席万岁！

（来源：《红色风暴》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编印，第四期 1967 年 1 月 18 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等《打倒农村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工农联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浙江省农村中轰轰烈烈展开。广大的贫下中农纷纷起来投入文化革命的滚滚洪流，他们

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地、富、反、坏、右的反，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反，形势好得很！

这一场大革命的胜利必将在我国农村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促进广大农民的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现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

这一场大革命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决战，大搏斗，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当前，农村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已陷入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但并不甘心于自己的死亡。他们和农村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刮起了一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黑风，企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他们利用一部分落后农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破坏农村集体经济，搞资本主义复辟。

在生产和分配问题上大搞经济主义的阴谋诡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在当前农村中的主要特点。

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造反”、“串连”之名，蒙蔽一部分群众离开农业生产岗位，他们故意制造纠纷，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挑起武斗；他们叫喊“造超产征购的反”，或者无理要求国家以高价来收购超产粮，煽动群众拒绝国家对超产粮的征购，破坏国家征购任务的完成，损害国家利益，发展农村的自由市场；他们以“关心群众生活”为名，大量私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和集体储备粮；他们甚至以种种借口向国家大量贷款，并到银行、信用社强行取款。最近，在年终分配到来时，有的地方还提出了“吃光分净”的资本主义口号，少留甚至完全不留公共积累和生产资金，妄图挖空集体经济，并把农业生产搞垮，以达到他们扼杀正在浙江省广大农村迅猛发展的农民革命运动的罪恶目的，把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失败。

我们革命造反派，广大的贫下中农绝对不能让阶级敌人的这个恶毒阴谋得逞！

年终决算、分配即将开始，当前农村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为了彻底粉碎农村中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玩弄的

一切阴谋诡计，巩固农村集体经济，保证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我们特发出以下通告。

一、广大贫下中农和各级革命干部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一方面要积极参加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私”立“公”，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一方面要坚守农业生产岗位，争取革命和生产双胜利。

二、坚决遵循毛主席“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教导，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社员的三者关系，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并要力争提前超额完成，为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保证市场供应作出贡献。

三、年终决算和分配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按照六十条中有关分配的政策办事，不准“吃光分净”，必须按适当的比例留下公共积累和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资金和物资。这些资金和物资在留下后不得擅自私分或挪作它用。

四、为了维护集体经济，防止坏人利用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挖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墙脚，生产大队、生产队自合作化以来到一九六六年为止的全部公积金、公益金和集体储备粮一律暂时冻结，不得加入年终分配。（社员个人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不冻结）

五、农村中任何组织和个人在社会上破“四旧”中所获得的财物，除按党的政策应归还原主的以外，其它一切均应上交银行及公安等有关部门，归国家所有，而不得为任何单位、任何组织或任何个人私自占有。各级党政机关、公安等有关部门必须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对这些财物迅速予以处理。任何生产队、生产大队或公社，均不得将这类财物隐瞒私分，也不得用于集体生产和基本建设。

对于借破“四旧”为名，抢掠民财，贪污盗窃，强占集体房屋，破坏国家财产和欺压群众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处。

六、各级财务会计人员，保管人员，银行、信用社干部必须坚守岗位，坚持原则。凡是不符合党的政策和本通告规定的财务开支，不论是哪一级领导批准的，一律拒付。一九六七年的农业贷款在年终分配之前暂时冻结，待年终分配后，经过调查研究，再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发放。

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要发扬当家作主的精神，对各级党政组织的财务审批实行切实有效的监督。对于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错误决定，必须坚决抵制。

七、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要听信坏人的挑动和欺骗，盲目流入城镇，以免使农村的革命和生产受到损失。

八、省、地（市）、县各级干部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把农业生产搞得更好。绝对不准任何人耍阴谋、放暗箭，用经济主义来腐蚀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不准借口“串连”、“造反”，躺倒不干，破坏文化大革命和集体生产。

九、农村中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分子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准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许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惩。

十、农村的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武装部门和民兵组织，必须切实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支持革命左派，严禁武斗。凡违反以上各条以及犯有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不法行为的，都要严肃查处。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有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陷害和镇压的，要依法严惩。

责令省、地（市）、县各级党政机关自接到本通告之日起，立即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定具体措施，保证本通告的贯彻执行。并派出革命的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原原本本地宣读本通告及有关政策规定，做到家喻户晓。贯彻执行本通告的有关情况，各地要及时向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汇报。

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浙江省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杭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杭州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杭州联络站杭州市郊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部杭州重工业工人革命造反总部杭州市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杭州大学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红卫兵战斗队浙江省“炮打司令部”联

络总站浙江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浙江日报革命造反兵团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革命造反兵团浙江省文艺界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浙江省新文艺战斗兵团杭州日报革命造反总部金华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金华地区“11·3”革命造反团一月二十日（原载于1967年2月1日《人民日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并责令浙江省委书记李丰平到会。〕

周总理一到会场，就亲切地与被接见的代表一一握手，然后还个个问情况。现将接见时周总理的重要指示摘录如下：

当杭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代表和红雷丝织厂代表向总理汇报他俩都是转业军人，都参加工人革命造反总部时，

总理说：“你们四个工人代表中，有两个就是转业军人。都参加本单位的革命造反组织，转业军人就不需要单独成立什么组织嘛！”

当杭州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代表，先向总理汇报杭州市红色劳动者造反总部有关临时工，合同工的问题。

总理对谭副总理说：他们的话说明了一条真理，这个问题六月一日以前有，六月一日以后也有，过去的临时工，都是农民来做的，亦工亦农不是很好吗？都变成了正式工，行吗？你们脑子里要想一想他们为什么变成正式工，国家的财政开支合理吗？到底是产业工人，他们懂得这件事，我们没有他们懂。不要以为他们哭哭啼啼都是有道理的，有些人生活很困难，就作个别问题处理，个别问题个别解决。刘，邓反动路线一定要批判。什么问题都是刘，邓反动路线，这样不科学，我非常赞成你们夺权，国家大事大家来处理，我们化了几十年才取得一些经验，你们比我们幸福，有毛主席领导，不用那么多时间，有句封建的话：“当家才知柴米贵”，这句话是封建的，但反映了一部分的真理。

当代表们谈到工人与学生联合的问题时，

总理说：每个工厂夺权后的组织里，可吸收一个大学生参加，但不要当权，主要是取得知识，可半天参加劳动，半天参加管理，如做秘书工作，一起讨论研究问题，取得知识，不要把革命看得那么简单。

当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代表向总理汇报了省委内部一小撮人大搞经济主义，给步行串连学生发六大件等情况时，

总理说：我准备向中央提个建议，春节以后，初中生可以考虑开课，数理化可以教，语文与政治可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诗词，教师不行，你们大学生可以去教嘛！中学教师有没有，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不能都打倒，打倒了没有事好做了。

当省级机关造反派总部代表向总理汇报了省委内部阶级斗争与省机关革命造反派情况，时，

总理说：你们机关造反派那么多，发展那么快，恐怕还没经过大的斗争的考验，你们的组织要好好的整顿。

总理向浙江日报代表说：你们报纸改变后，有没有学生参加工作？

代表回答说：有二十多个学生参加，原来编辑有十几个，每星期炮轰一次，不断地改！

总理说：不断改革，错了就改嘛！阿 Q 正传的作者浙江。阿 Q 可以革命，你们普通人有点错误，当然可以革命。

当总理听了代表们汇报了最近有关军区的事件后，

总理说：你们到军区去的斗争是对的，我们支持你们，这是第一条。

最近军区的事件，由浙江省委应负完全责任，军区一些领导人员有部分责任，这些可都是省委引起来的嘛！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冲突不仅一次，有大有小，四次还是五次？（浙江同学回答：六次引起五人受伤）这说明军区部分负责人没有真正站在中央，军委这边，没有很好执行军委关于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的命令，特别严重的是最后一次，没有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中央对此很关心，主席很关心。

现在中央决定，派出南京军区杜平同志去浙江，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也一起回杭州，会同浙江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指定的正式代表，并进行彻底调查，查清肇事凶手，对受伤者进行慰问，如查有幕后指挥者，严加查办。

关于两个孩子的问题，应交到杭州市公安局去，公安部也派一个代表去。有原告，有造反派代表，按中央规定原则，严肃处理。打人的可能不止两个。

最后一点，对待群众运动犯有严重错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责成他们向群众检讨。

中央希望造反派同志见到中央的决定后立即离开军区。

在谈到如何处理军区事件时，

总理谆谆教导代表说：你们搞政治斗争，应抓大是大非问题，不要抓一句两句错误的话，我们党内有一批人是从东方大学回来的，多数是好的，有不少牺牲了，但他们的作风不好，尽抓一些琐碎的事情，还有一些从中山大学回来的更坏，大家讲话，他不发言，都记下来，到党小组会上整你，搞特务活动，弄得大家一天到晚过那惶恐生活。主席从遵义会议后，就抓党内整风，抓了十年，才把党内思想统一了，“七大”主席作了报告，三年多时间，取得了全国胜利。

听完代表的汇报，总理最后向大家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我想同你们再谈谈夺权问题：

下面纷纷夺权，本来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但是夺权引起了连锁反映，成了一个普遍的呼声。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不可能掌权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同意把所有领导干部都一脚踢开。从省到下面，夺权如何夺，主要还是十六条上写的，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矛头对准这里。有些单位不一定是这样也要夺，我们归纳为两句话，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取业务上的监督权。也就是领导人要由群众管。夺权怎么夺，我们有五点建议：

第一，夺权要发动群众，从下而上，一定要反动群众，如果条件不成熟，就宁可暂时不夺，要一个一个单位来夺。造反派要联合起来。造反派要占优势，如果不能团结起来，怎么夺？〈红旗〉十五期社论已经写了。工人要联合，学生要联合，不联合怎么夺权，要把真正造反派联合起来，中心问题是你们要抓大问题。现在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旗帜打出去，首先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要抓小事，不要陷入宗派主义旋涡里去。浙江是国防前线，不宜夺权太晚。

夺权是夺当权派的权，但对当权派要分析：

1、三反分子，反党集团，是黑帮。

- 2、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 3、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这是前三种，还有后两种：

- 4、有严重错误，但改得比较快。
- 5、问题不严重，改得也比较好。

解放后干部是由上而下地委派的，不能说没有一点错误与缺点。讲群众路线，我们比苏联好得多，但干部自上而下地委派，就不是彻底的群众路线。

六二年主席在十中全会上阐明阶级斗争学说，六三年又出来了十条，搞四清，但这样公开贴大字报还是第一次。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开后，一声春雷，接着大串联，大民主就来了。原来设想以文化各部门，党政领导机关为重点，后来看不行，十二月底把城市十条发表了，后农村十条也发表了，把运动引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上海不是起来了吗？最高领导一提倡，高潮就起来了。我们有五个伟大：伟大的中国人民，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出现了伟大领袖，组织了伟大的军队，诞生了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五个伟大集中表现于毛泽东思想。没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史无前例的民主，所以要高度集中，这个高度的集中即集中在中央，毛主席。为什么这次运动对你们特别容易接受，因为你们没有包袱，没有框框，那些领导干部的包袱，框框就特别多，这些问题要向你们讲清楚，如果我们一味的捧你们，你们进来也要犯错误，你们做得对就支持你们，你们做错了，就提醒你们。

第二条，以造反派为核心来夺权，争取团结大多数，造反派不能看人数多少，而是看是不是占优势。保守派瓦解了，中间派形不成组织，但不能以此为满足，要争取团结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这是长期的工作。

第三条，夺权应该以本单位革命造反派为主，外面革命造反派为辅，革命总是靠自己嘛！特殊的单位，如领导烂掉，本单位造反派还未形成组织，那可以暂时由外面造反派去帮助，帮助的目的，是帮助他们自力更生，但不能包办代替。

第四条，夺权，一般是夺革命的领导权，生产业务监督权。有些单位可以全部夺过来，连生产，业务的权都夺过来，有的单位先夺革命领导权，慢慢再夺业务权。

第五条，一个部，一个省的夺权，总是从上而下地夺。先把一个部或一个省夺过来，省里不夺，地，县委一起来更被动，省里夺了，省里可以派人到下面去煽风点火。

处理方法，贵州提了几条，抓一批，罢一批，调一批，用一批，提一批。北京几个部门有几种不同形式，一种是允许他们工作，第二撤职留用，第三停职留用（以观后效），第四监督工作。

这样，就让革命青年学会搞政治斗争，不陷入事物主义。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王力与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于一月二十九日到首都，受到周总理的两次接见，在一月三十一日又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情况，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接见了我们，接见中王力同志做了许多重要指示。〕

王力同志在同我们一一握手后，就说：你们什么时候来的？见到总理吗？

（答：总理接见过两次了。）什么时候回去？越快越好，大革命要快，越快越好。

王力同志举起手中当天的《人民日报》，指着上面的《红旗》杂志的社论说：这篇文章是主席亲自修正的，是指导当前运动非常重要的文件。要好好学习。

王力同志询问总指挥部的主要领导核心是那些人？主要领导人是谁？有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总部设在哪里？现在革命群众团体同你们的关系好不好？

（代表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

王力同志说：要真正联合，主要真正联合，主要是工厂、学校、机关，首先是重要工厂、重要的学校、重要的机关造反组织联合起来才行。北京没有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学生组织，和工厂中的石景山钢铁厂等单位的革命组织，造反派就很难维持局面，杭州也要有大的学校，对国民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大工厂等单位的造反组织联合起来，这样就能站得住了。

当杭州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的代表，汇报了杭州丝联厂两个革命组织闹纠纷，自觉革命造反团接管了厂里的一切权力，事先没有同红色造反团商量，后来红色造反兵团又造了自觉兵团的反。

王力同志说：接管前应当同他们商量，他们有那么多群众，他们砸了自觉兵团当然不对，接管不同红色造反兵团商量是错误的。

当代表谈到红色兵团翁森鹤，到处说自己同中央文革小组挂过钩，卖老资格时，

王力同志说：谈不上什么挂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同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特殊联系，他们来了嘛，我们要接待，要做思想工作，要帮助解决问题，谈不上什么挂钩，你们来了同样要接待。他有问题可以揭露，他下面还有不少群众，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处理，你们找他们谈谈，人民内部矛盾，批评与自我批评。

代表们汇报到杭州红色劳动者总部，拿了中央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文件，要合同工临时工统统转正时，

王力同志说：总工会、劳动部那个文件是非法的，临时工都统统接受进来，扩大了工人队伍，又要重犯五八年的错误，要有几条办法。

上海也是这样，合同工、临时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精简回乡的工人，回去了一百多万人，都要求分配工作。成立了这个总部，这些组织不是社会主义的组织，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组织，要取缔。他们在那里做工就参加那里的革命组织，不要单独搞什么组织。

总工会、劳动部发那个文件，是故意捣乱，对文化大革命是破坏。造反派要讲原则，讲道理，他们要斗你就让斗吧，斗得光荣，全红总（指“全国红色劳动者革命造反总部”）的头头已经抓起来了，组织也已经瓦解了。造反派要讲原则，要坚持原则。临时工、合同工问题要搞几条，请你们先写几条给我们参考，一条是反对这个制度，一条是在运动中不能打击他们，一条是按原则办事，该回去的还是回去。再一条是不能单独建立组织。请你们根据下面碰到的问题，写四、五条，最多六条，再不要多了。

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整理浙江金华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总部驻京联络站大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驻京联络站翻印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的信

1967.02.23；中发[67]64号

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自从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的决定以后，中央十分高兴地看到，浙江省军区和所属机关、部队作出的一系列努力，完全符合于中央上述决定的要求。你们无愧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和参加者的光荣称号。

总结四十天来情况，省军区和部队同志在处理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确实贯彻执行了林副主席的指示，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品质。你们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中央也高兴地看到了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二月二十日在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上发表的“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的社论。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也检查了在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表示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道歉，向广大的革命群众检讨。我们相信，有了这一表示，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将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同人民解放军合作，更好地团结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

中央号召浙江省军区和所属全体人民解放军当此关键时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历次命令，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积极支持和参加夺权斗争；同时，注意大局、警惕敌人，严守纪律，巩固队伍，加强战备，坚决贯彻执行保卫国防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浙江《革命造反报》第 3、4 期，1967 年 3 月 7 日)

二、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无私才能无畏——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郭嘉宏学习》

阳光雨露育青松，毛泽东思想哺英雄。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我国千百万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正在健康地、迅速地成长起来。他们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造出无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郭嘉宏烈士，就是这样一个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出来的。他是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优秀代表。

当祖国一声召唤，需要为农业生产贡献力量的时候，他抛开了所谓“个人前途”“家庭牵挂”，成了生产战线上的模范；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兴妖作怪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坚决斗争，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闯将；当国家财产眼看要被烈火吞没的时候，他奋身冲进火海，为保卫国家财产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竟被镇江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成了“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现行反革命”！甚至被非法关押、残酷斗争达四个月之久，直到他牺牲前夕还拒不给他平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这样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何其毒也！

郭嘉宏同志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毫不动摇，英勇斗争。他坚定地宣告：“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给我们撑腰……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烈士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郭嘉宏同志的斗争事迹，正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强烈的控诉，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热情的赞歌！

郭嘉宏同志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从何而来？

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他的头脑，是他坚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不断破私立公的结果。

无私才能无畏。

只有无私，才能成为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了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压倒一切的革命勇气，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气概。

只有无私，才能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才能不断抵制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腐蚀，不断地清除自己身上的灰尘污垢；香风刮不倒，糖弹打不中，不希罕金钱财物，不贪图名誉地位。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了人民的事业，永远保持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林彪同志也指出：“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破私立公的大革命，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扫除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大革命。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阶段。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各种社会思潮，都纷纷出来表演。在这种情况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抵制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就显得更为重要。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认真学习郭嘉宏同志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精神，在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搞臭无政府主义，搞臭风头主义，搞臭小团体主义，搞臭个人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以更高昂的斗志，更整齐的步伐，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战斗！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

四月以来，浙江发生的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这是浙江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玩弄各种卑鄙阴谋，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所造成的。浙江“省联总”“红暴派”代表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期间，中央四次接见两派代表，总理、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中央首长，对目前浙江出现的武斗流血事件极

为关心，并作了重要指示，我们表示坚决拥护、坚决照办。双方一致认为，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党内和浙江省委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过对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揭露和批判，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一致表示，双方代表六月三十日对《六·二四》通知已达成的协议继续有效。为了保证《六·二四》通知能在浙江实现，经双方再次协商，达成以下十二条协议，共同遵守执行。

一、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六·二四》通知，立即将该通知传达到所属基层组织，严格遵守，逐条执行。

二、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不抓人、不打人、不抄家，不私设公堂，不变相体罚，不逼、供、信。已抓的人，必须立即释放。立即拆除武斗工事。用于武斗的土枪、土炮、雷管、炸药、梭镖、匕首、木棍、铁器、砖头、石灰以及六六六粉和三酸等化学用品，应分别封存或交还原仓库。对于调查属实的专业打手组织，应立即解散，以保证四大和人身安全。医疗部门对各方伤员要一视同仁，不得因观点不同而拒绝治疗，保证救死扶伤工作正常进行。

三、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守生产、工作岗位、保证生产，生活资料的正常供应。双方派到各县的人员应立即撤回原地。对无故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群众，应进行教育，立即动员返回原生产、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对屡教不改的，应作旷工处理。

四、不准以任何借口动员农民进城参加武斗，不准拦路、拦车（包括火车）、拦船。不得动用国家粮食、现金，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今后如再发生唆使农民离开生产岗位、进城参加武斗的事件，对其首要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在人民公社生产队内，对持有不同观点的社员，不准克扣口粮，工分，肥料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

五、坚决维护交通秩序，保证铁路、公路、水路运输畅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许破坏交通工具，不得调动车辆、船只参加武斗。

六、消除武斗因素。各群众组织的广播宣传车，应立即取消，用于互相攻击而设置的高音喇叭，一律拆除。特别是公共场所的高音喇叭要拆除。

七、必须坚持节约闹革命，不准破坏国家和集体财产。各方占用的车辆、机具、设备、器材等，一律送还原单位，用于生产；其他公私财物，主动归还本人和原单位。

八、不夺枪，不开枪，不冲击军事、专政机关。各单位现有枪支、弹药，由当地军事机关收回或封存起来。不准重新发放枪支、弹药。今后如再发生冲击军事、专政机关，盗窃国家机密，抢劫枪支、弹药、国家档案的事件，对其首要分子，应依法惩办。

九、保证通讯、读报自由，不阻挠报刊发行，不拦截邮车、扣压拆查邮件、扣押投递人员。不阻挠新闻记者采访、摄影活动。

十、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现行反革命。不许盗用、捏造中央指示，不许造谣惑众。一切由于造谣惑众而引起的不良后果，应由肇事者负责，情节严重的，应予以法办。

十一、上述协议，由省军管会和双方派出对等代表，组成监督小组，共同监督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执，应平等协商解决。

十二、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日起生效，双方应立即电话通知所属组织，广泛宣传，遵照执行，违者应按《六·六》通令处理。

省联总赴京代表（签字）：张永生 孙宏兴 贺贤春 骆风生 韩贯虹
红暴派赴京代表（签字）：翁森鹤 周信忠 方剑文 王明远 张金木
省军管会（签字）：龙潜 阮贤榜 陈励耘 南萍 曹思明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于北京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对浙江省军区的电话指示

浙江现在有敌情，你们都知道嘛！敌情第一！浙江的沿海蒋介石很可能搞乱子，你们要提高警惕。

省军区直属机关搞四大。司、政、局直属学校可以搞四大，文工团也可以搞。军队不能搞四大，军委早规定了，军以下部队进行正面教育，可以用发扬民主的方式提出批评，不能用四大的形式。

最高统帅、付统帅早就规定了部队搞正面教育，独立师、独立营不能例外，部队不能搞四大。但是，他们有权批评省军区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送

大字报、小字报，可以进行讨论。部队是一个战斗组织，不能成立战斗小组，部队不能乱，部队一乱，就不能作战了。

浙江是前线，部队更不能这样，独立二师是公安部队改编的，他们的领导人自己不好，有错误，激起了部队的反感，可以允许他们民主讨论，用三大民主，不用四大的方法，要说服独立二师。

对二十多县来的造反派要动员他们回本县闹革命，通过军分区、人武部支持他们，使各地方军分区、人武部的态度明朗起来。当然有的支持，有的还会不支持。要劝二十多县的造反派回去闹革命。你们支持他们，对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主要从政治上满足。

杭州本地的造反派不要去军区来来往往，军队不要串联，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你们可以同造反派讲清楚，让省军区关起门来搞四大，不要把秩序搞乱了，部队秩序乱了对敌人有利。

杭州湾、浙江沿海敌人很容易钻空子，你们也可以设想设想。

对浙江省军区所属各部队，由造反派说服他们。不要搞四大，部队搞正面教育，发扬三大民主。

现在红暴会怎么样？（陈励耘北京回来后，已在分化了。）那就是说，红暴会回去后靠拢省联总，形势向好的方面转，浙江是个好形势，再往好转，要一致对敌，照顾大局，这是最重要的两条。要教育造反派照顾大局，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省一级不行的话，看看厅一级有没有人站出来。这样过一段，就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对浙大“红暴”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阅。

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1〕 这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编印的《快报》第五五一〇期上登载的《南萍和陈励耘同志在联合“红暴”派问题上发生分歧》材料的批语。材料中说，十一月十六日，浙江省军管会讨论革命大联合问题时，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在是否联合“红暴”（浙江大学群众组织）问题上发生分歧。南萍认为，对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现在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来，就应该联合他们，再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了。陈励耘认为，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组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还没有改正，为了保持造反派的纯洁，不能和他们搞联合，要顶得住。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将这篇材料报送毛泽东时写道：“我觉得两种意见中，似以南萍一方的意见较为符合主席的路线与政策；对‘红暴’派采取一概排斥、拒绝联合的方针，则是不利的。”〔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3〕 “百万雄师”，是武汉市的一个群众组织。在一九六七年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组织”。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为“百万雄师”这个群众组织作了平反。参见本册第381页注〔2〕。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红暴派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1968年1月18日，19时～22时30分，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杨代总长接见红暴方面代表。〕

周总理：

你们怎么啦，没好好的干吗？帮助、批评、联合，这不是说得清清楚楚了，毛主席批了示，说明你们不同于湖北百万雄师，但不等于没有错误，主席批的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与浙江的红卫军也不同。要听这句话与百万雄师比，百万雄师多臭啊，主席这一批示就是在关心你们呀，可是你们东串联西跑的，还到处造谣，简直不象话了，什么杨成武传达主席指示，批评空五军、二十军，要帮你们树旗，那有这么回事，造谣造到中央，中央是集体领导的，还什么王力什么的，

王力与浙江有什么相干的，我说同志，你们干革命怎么能这样子呀，你们挑拨离间，破坏中央名誉，过去你们与军区合造谣说翁森鹤死了，你看翁森鹤不是在吗？还说他老婆也死了，哪有这回事。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者革命的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们为什么不在浙江开会要跑到上海去开？还说上海工总司叫什么潘国平支持你们，我们也要批评他们的，这样子不对，我今天一起来就给你们一闷棍。就是要批评你们，不批评不行了，尾巴翘得老高。我们天天批评派性，可是你们头脑里就是派性，你们要说此实在的话，我们要帮助你们解题，我们中央忙得没法子呀！你们进来我还在看文件啦，你们住哪里，都住在京西宾馆吗？那更好，有两位政委在一起商量的，你们到会后，我和代总长就找了你们的政委，一起商量问题，根本是在一起的么，怎么又去造谣说我们批评他们七、八次了，那有这事。今天姚文元同志请假没有来，他去参加一个宣传工作会议了，现在我帮助你们，我就早决定你们来了后先找你们谈谈，联总方面不谈不急事，已经管事了么，有了“12·2”指示你们又去把乱七八糟的队伍拉起来了，要明白，并不是叫你们去把队伍拉出来，连红卫军这样的一些保守组织都去拉，还不是拉了杂牌队伍了吗？乱七八糟的大杂烩了。

你长期脱离了生产，作了小头头已经有些变了，不了解群众的情况，象你这样尾巴翘到那里去了。你想拉队伍，想拉多大的，拉到那里去了呀，想到歧途去呀，文汇报十大罪状看过没有，你们桌上都有，你是工人是小头头，就闹，想队伍拉大，你那一搞，反而搞坏了（杨代总长插话：社论很尖锐，要好好学习。）你有话就说吗，（方剑文说不出来），怎么当面不说，当面不说，背后去说，这那象一个工人阶级，上海工总司潘国平你们怎么认识的，他支持你们呀？他怎么给你讲的呀，（方剑文说：讲了怎么实现革命大联合，要斗私批修，给我们讲话就表示支持我们呀？）（腾铸说：杭州有谣言，说姚文元打电话有三点指示：一、不要去串联，二、不要去拉队伍，三、不要重犯过去错误，到底有没有这回事，翁森鹤讲有这个意思。但不是你这个说法的，一、二、三电话是张春桥同志打的，不会错。）这意思可能有。可能不那么正确，因为电话不是我亲自打的，这意思是对的，因为你拉山头，我们不同意，不赞成，这样要搞分裂了，我们反对这样搞，外县的情况怎样，你们怎么弄在一起了，（方剑文说：外县我们金华、温州都有联系，军管会把我们一千六百万人打成反革命，什么匪的，什么匪的都有）

那么这样的事，没有什么根据吗？是谁给你说的那一套不实在的谣言，我刚才听说你被打了，很同情地听你讲话，从七点开始听你讲了一个半小时，我亲自作对象，很耐心，很冷静地听你讲话，可是你就是那么不老实的说实话，你这个人真没法了，你不讲道理，真没办法讲。想听你讲老实的话，好给他们解决问题，你总是那么不老实，同志干革命呀，不能瞎搞一气呀！就是尽量由你算，两个专区也没有一千六百万人，（方剑文说：我刚讲的全部人口数）就算全部人口数也没那么多，难道都是你们的人吗？（杨代总长说：还有独立思考，还有农民，那能都算你们的人）你看刚说出口又变样了，刚才说一千六百万人被打成反革命，现在说全部人口数，一点也不老实，（方剑文说：这是军管会自己出的通告中写着的）你这种讲话一点不符合逻辑。你怎么能这样讲，这不是军管会自己在脸上抹黑了，把一千六百万人打成反革命还出通告，还光荣吗？军管会那能这样作，你把文化大革命形势说成这个样子，这一说影响多不好，外国人听了都成实话了，还不是浙江有 50%以上的人成反革命了，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着搞的，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呢？这样不是把军管会说成一塌糊涂了，又把矛头对准军管会了，现在军管会是空五军、廿军，把矛头对准解放军，那就是说：说到最后你还是站在保江华，保龙潜的立场上，你们立场到现在正是站错了，还没有站过来，难怪别人要说你保江保龙了。全国有七亿人口，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抓的文化大革命但也没七亿人口都参加，你一个人一讲就是一千六百万，难道你的威力比主席还大吗？同志：你在中央面前讲话，不能那样不老实，你老用一顶大帽子，想把人家压住，如果你不这么说那又闹成严重对立了。不是又冲突了吗？你的立场就是站错了，想把军管会压垮，刚才我同情你，因为你被打了，但你要老实点说话好解决问题，可你又是这个样子，同志我说你吗？太不谦虚了，你把矛头对准空五军、二十军就是立场站错了，从这里看你的立场是错的，同志怎么能这样的错法吗？我们到这里来是解决问题的，首先我找你谈，你们这样子满肚子委屈情绪，带着气那就不对了，你们口口声声不是为了个人，谈的问题都是离不开个人，你们说，你们到底有如何打算，要求如何你们说，主席的指示是最高的，用主席的指示亲自给你们说了，该平了反难道还不够吗？难道要敲锣打鼓给你们送上天安门去吗？这个最高指示，目的也不仅是为了解决你们的红暴，问题因为其他的省市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都应该要这么解决的，不是讲你的

一个组织，也不是讲连保守组织也要这样搞法，你们尽听谣言，当心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你们受压制钻空子搞分裂，继续大乱，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你看，你刚才一算一讲就是一千六百万人打成反革命，你这一宣传，政治影响多坏，你有否关心一下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呢，你说诸暨 12 月 11 日下火车就开枪打伤三百多人，打死了七人，那会有这样的事呀，铁路我们都有解放军押车，那有这样的事。我先问你，我可负责调查一下，我要调查有这回事，我负责办，杨代总长在这里我们负责办。如果没有这回事你怎么说，你能答应吗？（方谨慎地说：没有这回事，中央处分）这不是处分的问题呀，是一个立场认识问题呀，你们说的一千六百万人打成反革命的事，也不是处分的问题呀，是一个认识问题呀，你这是在中央面前说话呀，同志，你不要是听什么人讲了，你身边的人，不一定是好的，你这话在我们面前讲，我可以给你调查，（叫联络员负责查）要是说到另外群众那里那又不是煽动起来挑起武斗，那势必会冲突更大，（杨代总长：你们要弄清楚目前是一个什么形势，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什么，应不折不扣听主席的话，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全面落实，条条落实最新指示）我先问你几件事，你要求翁森鹤不代表红暴，因翁森鹤已发表声明退出红暴，这要求合理的，可以给你们解决吗！翁就不代表你们，最近杭州发生了很多谣言，康生怎样，春桥怎样，杨代总长怎样，在京西宾馆发出了电话，（方即阻止不承认，说有坏人挑拨离间，并攻击南、陈两政委把话带开去了，）（总长：红暴不等于没有坏人，当然是少数，浙江是很复杂的地方，如温州不可能没有美蒋特务）温州左派政策上有点过激，但温联总是坏的，这不等于省联总不好，你们又怎么去和他们联系的呢，要提高警惕，还有很多谣传什么空五军、二十军有分歧，南、陈为了夺第一把手在争权夺利抢位置。所以革委会成立不起来，有黑手黑帮，南萍在中央检查七次，这全是造谣。你们在上海开会就是错误的，上海什么潘国平有没有支持你们？你们在外地到处设联络站，南京、北京，当然在处理温州的问题政策有点过激是有的，上海各地、县都有吗？（方：不承认）没有就好，有的话统统撤回去。

你们在上海开会都有其他地县参加的吗？（方说：金华、宁波、诸暨、温州、嘉兴、兰溪，等一百人参加。）召集各地县的开啥呀！现在还有人住在上海吗？

（方：都回去了）回去了就好的，我再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说：浙江成立革委会

我们要采取一顶二拖的办法，有否讲呀！（方：没有这么讲过）没有吗？没有就好了。（方：现在两大派还没有大联合，成立不妥当吧！我们红暴总是一派的吗？）现在基层都联合，你再要去出来恢复什么的就可以不必要了（方：那是被吃掉的）联合也是不断完善的，如果有的确实被压下去的，可采取补的办法，在革委会中充实他们中选拔些人充实领导班子就行了吗！过去的有错误的检讨一下，同心同德搞好生产，不然的话生产搞不好，二派不要严重对立了，矛盾也颠倒转化了，不能把矛头对准解放军了，原来基层组织中的红暴，现在还没有联合好的，我们就承认你们，同意你们联合吗！已没有组织那就不要恢复了，再恢复就不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了，岂非变了，联合分裂了吗？杭州的问题好办，确实有吃掉的受压服少数派，可适当的选挑一些人送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样可以，不要再去搞反复了。过去有“联总”对你们压一下，这是很可能的，但你们反过来再反一下就不行了。现在你们既不能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更不能对准自己的阶级兄弟，要冷静一下。（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材料没有拿来。）材料不要那么多，我一听就清楚的，省联总压你们会犯一些错误，因为他们处掌权地位了，肯定有压别人的现象了，但如果你们认为以前犯了错误，现在毛主席给你们讲话，一定要来一下子反案那不行了，搞错事总是有的，比如我们在过去红卫军时候，抓人抓错绑架打错人，这些事情，也是发生的，只要讲清楚了，是好人就是误会吗！我过去同你们说过，干革命嘛，有时还要付出生命代价，革命总是要代价的吗！省联总也来了吗，我没有去找他们谈，张金木、车广无可以不回去，下一次也一起叫他们一起来听听，我们再谈一次，你们要注意，不要被坏人利用，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现在就是大批判，斗、批、改，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要专门考虑争地位，争名次多少，以后省联总来了以后也是要批评他们的，他们也有很多错误，对他们我也谈很多错误，对你们谈你们的错误，我就是这样做工作。

（结束时总理同翁森鹤握手时嘱咐不要把今天的谈话告诉省联总的人，否则又要不团结。）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部队及省联总派代表讲话

〔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陈励耘、南萍、石英、张永生、刘福元、孙宏兴。〕

总理、文元同志一一询问张永生、刘福元、孙宏兴有关浙江省和本单位大批判，大联合，解放干部等情况。

总理：（在询问美院教学改革情况之后）美院要搞个彻底的教改方案。美院学生要到工农兵中去，劳动一两年，到部队去搞一搞。

在谈到塑造主席形象时

总理说：雕塑，画，如何体现主席形象，这是很严肃的事情。现在有一种毛主席语录，上面有贴金的主席象，这是非常不好，用贴金的办法，这是封建主义的办法，把主席形象歪曲了。主席历来主张朴素，应该体现主席庄严，朴素，伟大。这是美术界的责任。（文元：有的毛主席像章也根本不好，花样越来越多，不朴素，应该很庄严，朴素。）北京美术学院在江丰，华君武等人搞了后，风气不好，那时他们排斥徐悲鸿。真正有点硬功夫，而且有正义感的是徐悲鸿。徐悲鸿死的那天，正在听我在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报告，我叫他不要听了，但他很热情地要听完。主席对他有一定的估价，但许多人压他，这不对。他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有正义感。他很想画主席像，想接近主席。有次画后，不成熟，我看了后劝他暂时不要拿出来，他就不拿出。美术到底如何搞基本功，接近工农兵，怎样把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任务实现。

在问省联总的同志联系本单位的情况时，

总理说：以后革委会建立，革委会中的成员不能脱离本单位。你们一方面参加革委会，一方面不能脱离本单位生产，工作。

（在听说刘福元在省联总工作很少回厂时，

总理说：你不大回厂，不大好罗，一个星期回去一次，一个月只有四天就少了些。

（在问刘福元是否知道方剑文在重型机器厂待过。刘回答不知道，厂里没有告诉时，

总理说：你当时不知道，你们那个组织不报告，这个就不好了。那组织纪律性到那里去了，工人阶级是最讲纪律的。你是厂里负责人之一，是代表厂里参加省联总的负责人，把方剑文弄到厂里，就不告诉你，方剑文总是红暴的头头。你

们总有点派性。这样做不对，这就是中央讲的私自抓人、扣人。有关这件事，中央去年一共发了四个文件，按六·六通知不行，按九·五命令更不许可，按公安六条更不行。去年一年你们是造反的，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这样做就不好了，这样大事不管，关了一百天不请示，军管会也不知道，如果打，审问，就是私设公堂，不符合中央规定。尽管红暴犯了许多错误，冲军区你们还是一起的，主要中间一段犯错误，关于江华问题，当时，我说不能说江华是刘，邓司令部的，他们就保江华，后来，龙潜就支持他们，和你们对立，结果发生武斗，认识上批判是应该的，但还是内部问题。

去年从北京回去，你们应该作他们的工作，结果你们与军区内结合起来批判龙潜，这一点我们和军队同志谈时也讲了，军队内对龙潜的批判不要搞到社会上，搞到社会上就不好了，他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是军区政委，批判应放在军内，你们在少年宫广场大庭广众下批判，让坏人照了相，送到台湾就是敌人攻击我们的好材料，香港、日本就是想搞这个。江青同志“九·五”讲话讲了三个保卫，第一是毛主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二是解放军，第三是革命委员会。解放军有错误要在内部解决，搞到社会上就不好，可能受揪军内一小撮的影响，这是北京先搞的，宣传上有错误。

（当省联总汇报北师大还有两个同学在浙江造谣要揪王、关黑手时，

总理说：你们打电话回去查一下，北京还有什么人在浙江，如果还有，很快报告我们，我们通令他们回来，他们这时候再去串联，就是帮倒忙了。

（当省联总汇报到有的学生到公安厅串联时，

总理说：公、检、法的组织不允许与外面联系，只许在内部搞揭发，不能到社会上去串联。因为它是专政机关，一手拿枪，一手搞群众运动就要搞乱了。

（当了解到省军区干部来北京学习，没通知红暴参加时，

总理说：那是个缺点，我们也没有注意这一点。

红暴要拉起大旗，搞全省组织，跟你们闹对立，那是不对的。现在就是要按照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红暴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红暴那里有那里算，基层有的就在基层联合，当然要帮助，批评他们，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工代会，红代会都允许他们参加，允许他们承认错误，实现联合。省、市革命委员会要有他们的代表。地县原来有红暴的，或者有观点与红暴相同的组

织的，在他们承认错误检讨之后可在市县与他们联合，当然温州、金华、肖山、诸暨等是另外性质。就是这些地方组织，在承认这些错误后，也允许他们回来。温州造反派在政策上掌握不好，不大符合主席的教育，争取，分化的方针，要有他们自己揪出坏人，走资派。工总司没有做好这工作，现在还有几百人在山上，武器在他们手里，这里还有些是劳动人民。工总司有些口号提得不当，非要叫老保，要他们投降。人民大会堂（指北京）有个工作人员，全家是工总司，就是一个哥哥在温联总，大家都批评他，但他说他们要我投降我就不服气，我是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不过被他们（指走资派）欺骗走错路了。要把黑手，走资派，坏头头和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因为他是走资派操纵利用的。温联总有点百万雄师的样子，你们是多数派，在全省也是多数。占优势了。现在已开了工代会，红代会建立革委会更是多数。正是这样，更要高姿态。（姚文元同志插话政策特别重要）每一步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要做模范。要比他们站得高，看得远，不要和他们斤斤计较一些小事，光注意一些小节。例如杭州机械厂把方剑文弄去，你（刘福元同志）不知道，你跟方剑文道个歉。红暴的错误是要批评，这种批评由我们去批评，你们不要批评。你们多说自己的缺点。这样批评我们就更有利了。你们虽然只来了一个人，但是代表多数，他们来的多，并不代表多数。要采取高姿态，讲政策，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元旦社论要好好学习，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红暴问题不解决，我们不好批你们的革命委员会。否则革命委员会成立，他不参加要到处闹，革委会基础就不巩固。许多省的革委会也是这样，一直闹到现在，象山西、山东部分地区，黑龙江闹得更厉害。你们在这里多花一点功夫有好处的。宁可在这里多花几点功夫，帮助教育，第一帮助，第二批评，第三联合。你们采取高姿态，我们就更有力量做工作，他们说错话，我们就批评。你们立场站对了，还要政策抓得好。立场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如果政策不当，就不能保证，要注意这一点。

要采取高姿态，在工代会、红代会代表中给红暴留点席位。红代会只留一名常委就不够了，组织上采取高姿态。当然，他们要在全省搞对等，平起平坐是不对的。人数对等不行。但你们要有精神准备，要设想他们参加工代会，红代会，革委会的人数比你们原来设想的要多一些。

北京学习班（指军区、人武部干部学习班）没有叫红暴来，红代会，工代会开得太快一点，这是你们缺理的。如果不在革委会成立以前谈好会带来干扰。

极“左”思想必然要和右的结合，将来总有一天要暴露的。现在形势大好，大联合队伍不断扩大，在革委会成立前做好这个思想工作，红暴中凡是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都团结起来，剩下极少数人还胡闹，那背后就有黑手了。将来会看见的。这些人的工作做好，省革委会就可以成立，你们现在对黑手就没有找出。温州就不同了，但也要把坏人和群众分开来，要把坏人王芳抓出来，把操纵他们的走资派抓出来，就可以分化他们，就可以解除群众的对立情绪。

你们把工作做好了，将来他们再出来闹，就是他们缺理。你们除了多作自我批评，不讲他们的缺点外，就是红代会，工代会多增加一些名额，革委会名额多增加一些，从思想上，组织上都做到仁至义尽，具体搞要一些时间，我提议把几个人都找来作点工作，把周信忠，韩贯虹，刘英，石云等找来，找他十几个人，你们这边也来一些人做工作。用学习的办法，来教育他们，草草批准，回去成立大会必定开不好。原则上在北京把他们说服了，总还有一部人要闹的，大部分人说服了，少数人闹就不怕了。宁可在这里多作工作，一起学习，不经过这个步骤，革委会成立也不巩固。

红暴已参加大联合了，就不算红暴了，如翁森鹤。不应再拉队伍，恢复组织。没有联合的要和他们联合。

（当省联总代表提出全省有些组织是保守组织时，

总理说：如果参加保守组织的是群众，不联合你还没有办法，他总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么！总不能保守一辈子，不能老叫人家黑老保。

由于你们两派长期对立，北京回去后，的确红暴有一部分人被省联总的人斗来斗去，方剑文他们讲的有夸张，但他被关近一百天是事实，这一点总是你们理亏。可能各个厂象方剑文这种情况不少。在一个厂是少数，加在一起有几十个人就不少，有几百人就更多了。你们斗龙潜，叫红暴六个学生陪斗就不好了。你们输理的地方，你们不说清楚，他们就抓住不放。

你是多数，不否认，但对少数的工作不做好，你们的政策不对，他还要发展，而且连你已经联合起来的，他还会再拉过去，你们不要相信你们那个联合就那么巩固。你们一定要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掌握好政策。不要太相信那个多数。

这次叫红暴再来几个人，就等于补这个课。当然你们也可以找个可以做红暴工作的人来，当面把问题说清楚。红暴多来几个比只和这两个人谈问题好，不至于回去把舆论造乱了。现在有些群众组织，在中央接见后，只宣传对他有利的，不讲对他不利的。多来几个人，大家都知道，如果他还贴那样的大字报，一下子就会被戳穿。

姚文元：（在谈到总理，杨代总长接见红暴后，杭州贴出许多传单与总理谈的精神不符时）任何一个组织，还是要靠毛泽东思想，靠路线、靠政策对头，靠小动作欺骗是不行的。人数多少也是相对的。

（总理：对！人数多，如果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对，多数也会变少数。到这里来谈，对红暴有好处，对你们也有好处，可以说这是革委会成立前，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思想准备阶段。

杨代总长：你们要高姿态，你们高姿态，工作就主动。所谓高姿态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要去争一个席位。浙江形势不错，很好么！

姚文元：现在有个有利条件，主席的最新指示越来越为更多的群众所掌握。什么人歪曲主席指示，那只是暂时的现象。全国几百万、几千万、几亿人都在学习么！一个革命组织占多数时，一定要注意政策，在关键时刻，政策掌握得好，就发展得顺利，不注意政策不行。许多教训告诉我们，越是胜利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就会发生曲折。

总理：你们这方面也可以多来几个。革命干部把赖可可同志找来。在这里多用几天只有好处。不然匆匆忙忙批准，将来还会有问题。（九点钟，周总理有事情先走了。）

姚文元：对红暴，他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你们要采取正确的政策。红暴自己要采取正确的态度，不然就会在关键时刻重犯错误。

（当省联总谈到去年四月一日浙大红暴会挑起武斗，军管会就表态指出他们是造反派犯错误时），

那个时候认识能有主席批示后这么高吗？不可能么！

（当省联总自我检查说对红暴有对立，思想工作跟不上时）

不管那一派，心中都要有一个公字，无产阶级的公字。丢掉资产阶级私字，去掉的这个私字中，就包括派性这个东西。革委会成立起来后，几个代会，都要

为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听毛主席的话，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不是为某一个派别服务，不管是派大派小派。这是一个根本观点，不管那个组织，那个人，那个革命干部，不把这个根本观点解决好，不把派性搞掉，就要犯这样那样错误，这个问题教训已经很多。一定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搞掉。

各地到北京来第一条就是学习，学习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然后再解决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三结合成立革委会的问题，群众组织问题，就在这里先定下来。好好斗私批修。然后再成立要好一些。

（当谈到红暴提出要地县来人时）

地县不要来，总理刚才没有说要地县来。

你们不要把接见记录马上打电话回去，这样没有好处。这种事出的太多了，这里一接见，马上打电话回去。大字报就出来了，结果增加了中央解决问题的困难。

（当谈到有人拼命拉省暴的时候）

我看重新拉省暴不一定会拉起来，形势发展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深入落实，全国都在搞大联合，三结合么，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要在席位上考虑太多。

（当联总汇报省，市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时）

一些情况我们都知道，不要怕保守组织。不要因为保守组织就干扰，影响到我们的政策。刚才讲了，任何一个组织，他要拉起来，要靠毛泽东思想，靠他的方针，政策，路线对头。

文化大革命不光揪走资派，文化大革命目的是要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一方面要把敌人，走资派、叛徒、特务打倒，一方面要改造主观世界，提高自己的觉悟。元旦社论，提出要整党，整顿共青团，红卫兵等革命群众组织，就是说一面要打倒走资派，一面要改造思想，提高觉悟。当然一部分可能很自觉，一部分可能不自觉。文化大革命越是向前发展，越是胜利，我们每个人的世界观的改造就越是提到我们自己面前。如参加革委会，就不仅代表自己的组织，还要代表全体革命群众。这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又是一个新的考验。元旦社论提出五项任务，好多工作还没有做，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工作。早一点来谈一谈，学习一下，对今后工作有好处。

（内部口头传达，不要抄成大字报上街，不要张贴。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代表团红暴派临时指挥部代表的讲话

〔参加接见的军管会首长有南萍政委、石英副参谋长、董明儒副政委，孟祥海副主任等。〕

总理：你们来了十多天了。（南萍：共九天，春节放假一天。）啊！你们放假，我们是没有放假。

南萍：有的同志没有来过北京，去玩了。

总理：学生都来过了，一千三百万红卫兵来过北京。（接着总理点红暴名单）

总理：于明和，你工作多久？海暴有多少人？你参加过军？（于明和：作了回答，当谈到高压时）什么高压，十二条协议还在这里，你们在协议上签字的，你们都应对历史负责。你是解放军么，要起模范作用。老家是山东，山东革委会成立了。红根，你是附中的，你们有多少人，红暴多少？

红根：我是抗大附中的，红暴还有 20 人。

总理：20 多人也不要紧么，人不在多少么！你是负责的吧？

红根：我是代表中学来的。

总理：胡忠亭，你们学校里有多少人红暴有多少？两派联合了没有？

胡：学校共有二千五百多人，去年北京会议时，红委会有一千三百多人，造反总部只有一千人左右，现在红委会有四百多人，至今还没联合……

总理：人不在多少么，你们学校另一个组织是否属于省联总？（胡：是的。）

总理：周信忠，你们浙大多少人，现在红暴多少人？你们有没有办学习班（周信忠一一作了回答，当答到大联合的名额时），你们受了些压，主席对红暴讲了几句话。你们就叫 12·2 公社，这个名字一起就将了对方的军了。你们就拿这个压人家，为什么不按毛泽东思想大联合？浙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不是更符合毛泽东思想吗？你们浙江大学要带头么！不管省联总的，红暴的，就是无产

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吗？你们两派的勤务组都在这里吗？名单不一定在这里协商，协商一个名额。

总理：王明远，你是大军过江时到浙江的，你在民政厅作副处长，民政厅有多少人？过去是红暴派的？（王明远：是的，民政厅有 45 人）

总理：人这么少？啊，精简了，这是霍士廉在浙江搞的。准备搞个点。陕西到你们那里调查过霍士廉吗？你们怎么说的？（王明远：调查过。）霍士廉在浙江工作十六年，实际上工作是他做得比较多。整个浙江工作比较稳，乱子出得少，在这一点上是有功的，当然还要靠广大人民群众。解放军保护。（又问王明远）你是老红暴吗？没有人说你是叛徒吗？主席思想就是大联合，旗帜不倒是暂时的，旗子只有一面。就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派就是一派，无产阶级革命派。

姚文元同志：这个旗子最光荣。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最光荣。

总理：开始总有点分歧，总有这个偏向的，你们大联合是自己搞的，所以分歧是对省联总还是军管会？（王明远：主要是对红暴政策有不同看法）你们要斗私批修，主要是打内战，本单位的斗批改就放松了，这个要纠正过来。（当问到民政厅老造反派是谁时，王明远说是×××）应当把他提上来。接着总理对省军管会南萍说：象民政厅这么少的单位军管会要保护。

总理问张来根：你是老红暴吗？生产队有多少人？红暴有多少人？你们生产队在什么地方？你们是农暴五个公社之一吗？你们大联合了吗？张来根说：还没有大联合，办个毛泽东思想训练班。

姚文元问：贫代会成立了没有？（南萍：杭州市成立了）问张来根你们有没有参加。（张答：没有）

总理问南萍：杭州市贫代会代表是否是各大队贫下中农选出来的？（南萍：没有张答：没有）

总理：你参加没有？参加几次会？（张答：没有参加，只成立革委会时参加一次）总理问刘英，你现在不是勤务组的，你回家去了吧？（刘作了回答）总理：你是辽宁的，那个县，你父亲在浙江工作吗？你考上大学靠毛主席（刘：是毛主席给我们幸福）

总理：你的看法如何？（刘作了回答：当答到不管人多少，只要是一个旗帜就要联合的）对。十二条不是有监督小组吗？（没有）那时候我找不到你们（刘：

说起来话来长了，把七月以后的情况谈了谈到省暴问题时）你们过去省暴没有吗？（刘：省临时指挥部的）（张金木：这是简称）全称叫什么？（张：浙江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省联总全称叫什么？（张：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总理（点点头）：上次你们把我的话歪曲了，现在证明林刚是不好的，是不是他们挑动你们，是林刚还是龙潜挑动你们（刘：这个是我们自己搞的）中央不是打电话给你们（刘英：我们不知道）对江华那时我有点希望，不是肯定。（在刘谈到曹时）

总理：曹不是当时说了这个人不好。林刚与你们是否有直接关系呀？以后全国七、八、九极“左”思潮你们有没有影响（车讲红色风暴上揪许世友的事情）总理：这报纸上有没有？（车：回去带来）总理：你们有没有参加（答：没有）

（石耘：关于拥军大会问题，搞这也是一种派性。）你们可以说服他们的。（方：提到宣传队）总理：我们可以做工作，你们这次开会（2·6）不自己开，还要九人（点了几个名，红革命等）。

姚文元：这个大会不对呀！上海市革委会成立一周年，也没有开庆祝会呀，只开了一个总结会，报纸也没登，这个总比你们大吧？

杨：这次军队加入一周年，也没有开庆祝会。

周：本来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吧！开头就派性出来了，容易造成对立，这不是越来越对立吗？把钢二司，新华工……他们都请来闹派性吗？北京现在比你们落后，你们赶上去了，很好，你们看南大不是联合起来了吗？

姚：中央给他们一个担子。

总理继续讲：把人家请来，要向人家赔礼道歉，这样做。不节约闹革命。这是派性的活动（刘：是的，这是说明了我们的派性还没有完全克服）对！不要不服气，以为压了一下，把气冲出来，那就是犯更大错误。青年人受点压，有好处的！锻炼么！我是出身在封建家庭，也要压制。借债还讲排场，这种生活太虚伪了，开始是无政府主义的，后来就慢慢认识了共产主义，青年人受点压制有好处。现在是毛泽东思想时代，大压是不会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青年人总是会有波动的；现在是毛泽东思想时代，敌人来了就有反抗，那是同仇敌了同学之间的压，不过只是打架，总比打仗损失少，受点压，受了伤，流了血，甚至死了人，要把仇恨集中到走资派身上，坏人，敌人身上，内部就团结了，错误两方面都有，不

会只有一方面，对方也有错误，听说你们在算错误的时间，这没有意思，算这个干什么，石英同志很好，承认那时犯了严重错误。错误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计算，李立三路线只有三个月，但危害性很大，三个月就坏了大事，后来王明搞了调和路线，犯错误一分时间长短，瞿秋白的盲动时间也不太长，毛主席说是白色恐怖把我们压回农村，当然主要也是靠毛泽东思想来领导。时间不要去算，看错误大小，红暴不要去算细帐，你们受了锻炼是好事，主席在 12 月份看了一个材料，作了批示，给我们看了，要我们研究，根据主席指示，我们向全国发了指示，我们考虑，全国也有同样性质的组织，拿你们作例子，现在有些完全靠打砸抢的组织，如武汉的百万雄师，中国红旗军，也说自己是老造反派，也想拉起来，主席不是讲了吗？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么！（总理读批示……）主要要我们中央一些同志（中央常委，中央文革）研究的，方剑文，腾铸同志来，我们就是从帮助，批评出发，红暴你们把我们的话歪曲了，在杭州扩大了，批评得少了，对你们有利的你们说，不利的不说，以后发到军管会方面的同志传达了，就不是那样了，你们不要负责任吗？

方剑文向总理做了说明，并且把朱××同志的公开传达的十二条送给总理看，你们说给你们平反了，那有这样的事。

方剑文又将军管会印发的讲话给总理看，总理看了好长时间，然后送给姚文元看姚文元对南萍讲，这个时候，大家要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总理问，这个文件是谁印的？（众说：是军管会印的。）

总理又仔细地看了十二条近十分钟。

总理：你们搞了这么多呀？（方：军管传达是总理同意的）我没有看过，我当时说军管去传达是可以的，那晓得搞得这么复杂，联总的还有个吗？（南萍政委：有的，联总的联总传达，红暴的红暴传达。）

总理：你们得到联总的吗？（答：没有）反正都会得到的。（董副政委：我们先把纪录交给总理联络员各一份，交给沈秘书一份，打电话请示，第二天他说总理同意传达）内部的座谈就是内部的，贴出来就不大好，学习学习，是可以的，我把你们的意见都听了，他们（指方腾）记得比我多，这里夸张了，性质变了，这是量变到质变，军管会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缺点的，以后去两方面联系起来，各自作自我批评，成绩是主要的。（姚：要看大方向，这一点是应该肯定下来。）

首先应该肯定两个改组，因为在改组前，空五军，二十军是支持造反派的，当时省联总与你们都是冲军区的，当时两派都是在一起的。那时张，龙不承认错误，杜平要去。部队起哄。你们受到更大的压，后来了个红暴，红暴是支持龙潜，保江华，当然你们检查了就好，你们承认犯了严重错误是好的。北京会议以后，你们受压，省联总姿态不高，有错误的，那时军管会首先还保护你们，你们几个头头，方剑文，翁森鹤不是都到军队里去了吗？但七、八、九月两个说明后，军管会当时注意力放在到处闹事的问题上，这时解决××，××，××等地区，当时注意力都集中到那里，那些地方，不是你们的，是保守派，他们是保江，龙，保当地的走资派，你们知道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经过杭州，主席经过一次就解决了××问题，我们那时还不放心，每天打电话，9月底经过浙江，原来是浙江军区为主的么，不负责任，到七月份，到北京开会，那时候你们红暴就保江，这个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回去后又解决××，××问题，比较忙，××，××是保省委内走资派，也有保地方上走资派的，象温州保王芳，你们也在省联总和保守派中间，一个从右，一个从“左”干扰斗争大方向，在××省联总没有把地方联总搞在一块，因此他们支持了造反派，你们从左的左在一块，省联总把你们当成保守势力，也是有客观原因。（又看记录）看来军管会不要把我们的话搞得这么多，这么复杂，我批评你们，要是告诉了他们，我批评他们的，要是告诉了你们，这不是挑拨了吗？

当时八、九月份到处闹，他们这样看法也有客观原因，他们写成这样的声明（关于浙大……）过份一点，我会同他们说的，不要去算旧帐，你们先把自己搞好，政治上就主动了。我劝你们不要算旧帐，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请罪不要，主席一向反对青年人这样搞，只要改了就好，除非当了坏头头，和走资派坏人一起。

现在有些坏人集中一些集团，在徐州破坏铁路，桥梁，那是反革命集团，这是必须与他们划清界限。（姚：要有敌情观念）多做自我批评，调查自己组织内部是否有坏人，是否有坏人在挑动，浙江是沿海地区，蒋介石的老家，陈诚，二陈（果夫，立夫）军统头子在江山，都出在浙江，多了，一大堆，说不尽的了，那有在家乡没有影响的吗？浙江也有窜进来的（杨代总长：蒋介石不就出在浙江）还有空降的，地、富、反、坏。

总理讲：要辨别真假，刚才你们说有人利用红暴名义发了传单（杨代总长讲了天台汽球爆炸，撒下传单一事）

总理：现在第一点：你们过去错误要深刻检查，第二：对你们不要拉队伍，过去联合了，好么，你们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把权夺过来，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而分派性夺权，如果派性的话，那还不是刘少奇夺权了吗？不是刘，邓，陶夺权了吗？因为派性是资产阶级的，刘、邓、陶人下去了，思想还在。

我们已报告最高统帅和林副统帅，凡是破坏铁路，桥梁都作为反革命，昨晚就出了一件事，解放军不开炮也有限度，阶级敌人叫小将去抢枪，反正解放军不会打你们小将的，这是大煽动，这种人就是坏人。九·五命令就是要执行了，致至下了五个月了。

江青同志九·五讲话说你们放一放，说得很亲切。所以对你们不要拉队伍，现在红暴的，就仍是红暴，已经脱离红暴的，就不要拉出来了，比方说翁森鹤已经成为杭丝联工人代表就很好么，红暴也是临时的么。

……

总理：这样就要分裂了，不管你们多少人，只要是造反派，第一，承认错误，第二，不拉队伍不要脱产，不管你们人少到如何，不管你们在那一个基层，每一个地区，省也好，都要劝联总与你们联合，如果他们不愿意，就是他们不对，我们就要说服他们，如果以到红代会去了，那就不要退出来了，如果没有进去，就要大联合。那么基本精神就是这样讲过。

总理：承认错误，多做自我批评，这样主动，二是承认空五军、二十军，军管会，而不是只承认军管会，不能把领导人和群众分开，有些话你们就不会这样说了，承认两个改组，你们初期受压，我们很同情，支持你们，当然，空五军、二十军在执行政策上有偏差，他们会改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联总代表谈话纪要

〔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总理用一个多小时，详细询问浙大大联合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

一、你们浙大能不能带头达成几条协议，今天晚上就达成协议。

总理看了五十多个单位的关于浙大大联合的声明，说：“你们上纲上得太高了，与中央批示就不一致了，现在被动了。首先你们学校大联合，你们高姿态，人数多么，作出榜样，就在这里达成协议，共同办学习班。你们应当批判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在教育界的流毒。陈伟达不是你们的校长吗？对陈伟达，陈冰多搞一些大批判。叛徒陆定一管文教，要把矛头，痛恨对准他们。你们姿态要更高一点，抓大批判。要向南大学习，学习南大，超过南大。你们要和南大比，为什么不能超过南大，南大已超过北大，你们没有南大对立，应该超过南大。”

“关于浙大大联合的班子，我劝他们（红暴）是五比六，我劝你们六比六，看谁姿态高。”

二、关于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总理说：“浙江要迅速推动革命委员会，这是大局。现在在这里水到渠成。今天五号了，我看再学习一个星期最多了。如果在十号以前，就在这里达成协议，马上把三结合和干部商量好。回去共同学习，各单位搞大联合，推动全省三结合。总之，在二月份要搞好。你们怎么能等到八月钱江潮吧！现在已成立革委会有十四个省，最近有六个省准备马上搞，广东、湖南、江苏、辽宁、吉林、新疆。你们弄不好连中游也赶不上了，落在二十个省后面，那不是下游吗？浙江地处下游，难道甘居下游吗？”

三、关于精简机构的问题。

总理讲：“省联总搞二，三百人搞工作，住旅馆，那不真成了官僚机构了？官僚主义助长派性。三代会也搞得太多了。我们已变成小班子了。才能为你们服务。一年能见到你们好几次。我劝你们赶快把那些机构撤销掉，工代会十个人，红代会十个人，农代会八个人就行了。杭州市革命委员会五十个就足够了，还是霍士廉搞得比较少。民政厅四十五个人。在全国还是树立榜样。搞小的领导班子，办好事。”

王子达讲：杭州市革命委员会是三部二室。

总理讲：“你这个部就糟糕了，我只有一个值班室，而你反而还有个办公室，你们几个组，不要搞部。办事组，政治工作组，搞个专政的。内蒙古搞得好的，他们叫群众专政。再搞一个生产指挥，这样你就可以经常到群众中去了。红暴派临

时指挥部，我对他们说搞十个人，你们省联总大一点，二十个人，连三代会五十个人就够了。”

四、大联合问题和三结合问题达成协议。我（对？）红暴讲了五条：

1) 红暴比省联总犯的错误要重，刘英，石耘他们自己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该多作自我批评。

2) 对解放军，红暴要支持解放军。两个改组以后，五军，廿军，二部分海军支左方向对嘛！军管会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有的，他们会作自我批评的。

3) 红暴不要拉队伍。因为一个已联合了，拉队伍要分裂开，另一个，原来没有红暴的地方，建立红暴，势必会搞打，砸，抢与走资派有联系的组织拉进来，那么，老造反派就变落后了。

4) 促使大联合，任何一个单位，十几个人也要大联合，红暴也要推动。

5) 推动三结合。后来，总理又说：还要推动大联合这一条。

凡成立革委会的，三代会的，不要推翻，要扩大，加强，吸收他们（红暴）参加。这样他们答应了。

五、关于正确对待红暴问题。

去年二月，怪他们。他们后来要请罪，我说：“请什么罪，改了就行啦！现在已经改了嘛！”

农大代表汇报说：“我有一个活思想，农大同浙大不同。农大红委会是两次站错队的。”

总理说：“人家站错队，现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应该联合他们。保守派难道永远是保守派？他前进了嘛！你造反派，难道永远是造反派？老本吃不了多久。党内有许多老将，你不能说他没有功劳吧！靠吃老本不行，要立新功。陈再道革命了四十年，结果还出了大乱子，跌倒了，重新站起来。人家革命四十年，你们才二十个月，不立新功。人是在变化的，老造反派会变保守派，落后派。他人数量小，你人数多，就要与他联合，平等待他。当然不一定要对等数目。”

农民代表汇报了大队一些情况。

总理讲：“那里有红暴派，你承认他，联合起来办学习班，开贫代会。”主席说过：“贫下中农是一家人，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总理讲：“八条，十二

条，回去后，如果按这个协议办事，要好得多。他们犯了大错误，灰溜溜了。你们压了一下，他阵营就站不住了。翁森鹤觉悟高的，站出来了，（退出了红暴）这样，他们压力更大了，特别是工厂，斗方剑文，斗得比较厉害，有的跑到上海去了，不是春节前，在上海开了会嘛！当然这样做是不对，但是，是有点逼成的，当然主要是他们自己没有想通。”

“不要认为他们人数少，应该重视不同意见，这是主席的思想。不同意见在一起，能补充不足，有好处。如果他错了，也可以考虑他为什么错，如果你错他对了，你就把他的吸收过来。”

有的同志讲：杭州如果搞红暴临时指挥部，会不会把已成立的革委会搞垮，我看，还是用补充名额的办法好。

总理讲：“他是一派嘛！怎么能不承认？主席批评了，你不承认怎么行！没有红暴，还有黑暴，不要想那么一大同，有个对立面有好处，可以使你头脑冷静一些。浙江红暴比是比较好的，比较听话的，如果是别的省，那可不容易，就要吵起来了。”

“要大学特学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行。第一条学习，学习是保证，多作自我批评，第二条，不拉队伍，不搞分裂，第三条，支持解放军，第四条，有革委会，三代会的，不要推翻，要加强，扩大。工厂里有，也不要推翻，增加几个人就是了（安排红暴），促进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总理讲：“应该顺其自然，按照主席自然辩证法。承认他，再搞几条，不使他乱来，允许他参加红代会，工代会。”

“以前，你们好象很（此处原来有一个空格），那是与论压力，你不能允许他存在，否则不是反对主席最新批示了？他是一派吗？共产党那么大，民建那么小，还是承认他。承认他，又不会动摇共产党的伟大。你们趁他犯重错误，借大联合的口号，把他们吞进去，现在还得吐出来，我劝你们高姿态。”

省联总刘福元汇报讲：九月高潮已经实现按系统大联合了，红暴派已失灵了，……

（总理发火了）总理讲：“你，那个时候是带压的，我今天不批评你，现在他不失灵了，主席这个批示一下来，不是失灵，而是灵得很！当然他要拉出来，你就不提自己的错误。我尽量地说服他们。他们都同意了嘛！你们犯了错误，应

该受惩罚。你承认他。他就会支持你。说穿了，你是一个一个把人家吞下去，还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大团体主义！吃下去，还得吞出来。他们（红暴）承认了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们采取高姿态，你们应该还要高，你就能用事实说服他，不要拉省暴。”

“主席九月十六日在杭州，跟南萍讲了：要帮助，批评，联合，你们那时气焰很高，没有拿出来。一直到十二月，主席的批示下来，主席说得很清楚，要帮助，批评，联合。最好在这里达成协议。我们帮助你们推动。”

有一个同志对总理讲，红暴原来没有组织机构的。

总理说：“这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本身问题是他存在，大联合一定要联合，分裂不对，他拉出十多人，还得和他联合，他不来，那他错了。特别是工人阶级应该带头。浙江省有那些客观的东西存在。如果有坏人，暴露了更好。你们里边，有没有坏人？浙江嘛！是蒋介石的家乡，很多反动军官都出在浙江，你们不要对接受你们意见的就支持，不要分裂他们（红暴），要照顾他们。如果与你们说的都一样，就不起作用嘛！是一分为二嘛！浙江不会那么平静，打倒派性。打倒分裂，不要促退，不要拉队伍。工代会，红代会，革委会的原则，都在这里定。各单位也是，浙江带头，回去不执行，那是他的错，要以执行不执行协议，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准。”

（电话记录稿，仅供参考，口头传达）

1968年2月8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军管会及“省联总”“红暴”两派代表的谈话

〔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总理：你们搞协议把我找来了，你们总是想单独接见，我总要联合接见。

（总理秘书孙秋玉，递给总理一张红暴驻沪记者站的传单，姚文元同志说这张传单是怎么回事，你们解释解释看？总理：啥传单。）

总理：搞这个东西干什么？那一天？二月五日的，你们这里不是写了浙江红暴派临时指挥部，这倒给我们抓住了，没有一个“省”字，就一言为定吧！方剑

文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这是扩大影响，你们管不了那么多，还是老老实实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好学，我们也如此。

（姚文元：你们要斗私批修）

你们离开毛主席，毛主席司令部，离开军队，什么都不行，这样非出大乱子不可，你们觉得了不起，我们可不能象广东赵紫阳那样，随便让位。革命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出智慧，毛主席把人民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你们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你们协议我看了，大体不错。

先请南萍同志讲几句，我再讲。

南萍：主要向总理汇报一下，过去一段工作我们没有做好，这次在北京解决浙江问题，也是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方协议由于一个字没有定下来。

然后南萍同志向总理汇报去年七月北京会议后，紧接着二个改组，开展革命大批判，九月份掀起革命大联合高潮，十月份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十月进行政权教育，当时考虑省革委会条件具备，接着批判刘邓反动建党路线，现在正在发动群众围剿派性，增强党性，浙江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工作也存在缺点，一度事务忙乱，当时政策性问题缺乏有力措施。特别对红暴方面工作抓得不紧。南萍同志提出，大家要做大好形势促进派，要从大局想问题，多想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反面问题，具体问题都容易解决了，现在主要问题还是派性问题了。

总理：南萍同志已经讲了过去情况，要向前看，协议中的好处是解决当前问题，又向前看。

带头的是浙江大学二月五日签了字，成立大联委，送到我处，感到是一件大喜事。江苏，南大带头了，推动了江苏好多地方联合，甚至闹得最凶的镇江二派也联合了，南京，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联合了，造成大联合气氛，江苏军管会，南京军区，考虑不经过革筹小组实行三结合，成立革委会。

浙江地、县联合得早一些，现在浙江带头了，要把回家的同学找回来，春节已过，今天是正月十七日了，再不回来就不象话了，要号召他们回校，复课闹革命，搞斗批改，现在大学落后于工人运动，北京把 21 所大学头头都找来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北大二大派，清华二大派……都来了，文化大革命已经二十一个月了。还要讲教育，青年人总是这样派性特别强，如果你们还要闹，也把你们请来学习。

你们在北京达成协议，要求你们贯彻执行。家里一些小头头可能象去年那样，说你们“修”了，这是个反动口号“你们屈服了”。这就是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身边达成协议怎么可以说“修”了呢？去年你们十二条协议没有贯彻好，南萍同志已经讲了。新的协议达成了，就要贯彻好。你们有的同志在家里做逍遥派，发一个声明就说你们“修”了，除了认识错误，就是有坏人在挑拨，如果不改，就会走向反面。怎么可以说在北京达成协议是“修”了呢？今年是1968年，不能这样说，你们既然作为代表，不管代表多少，你们是有代表性的，要挺起腰杆来，达成协议，群众是会支持你们的，不满意总是少数。

姚文元：去年达成协议，群众也是欢迎的。

总理：有的大头头来了，二头头在家不满意。二头头来了，大头头在幕后指挥，这完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作风，是资产阶级政客作风，北京这个地方，过去出皇帝，北洋军阀，那是今天说了，明天不算，翻云覆雨，那是五十年前。现在是毛主席在新中国，无产阶级的中国，为什么出现这一套，是因为你们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以前宣传部陆定一这是坏人，尽搞资产阶级教育，他有一个反动透顶的怪道理，先学封建主义，后学资本主义，再学社会主义，这是反动的，荒谬的，他如果在中央讲，主席一定会批判的，他是到下面去放毒。把封、资、修装满头脑，社会主义就装不进去，林彪同志讲：“头脑里不是无产阶级阵地，就是资产阶级阵地”。你们小学，中学到大学，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你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的，头脑里想的是一回事，北京就有这样情况，我们中央文革，政治局常委每星期一次碰头会，然后报告主席，林副主席，我和姚文元同志讲话都是商量过的，可是跟学生讲话，他们就看脸色，那一个声音大，那一个声音小，然后找差距，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学了资产阶级政客作风，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有多次反复，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小学到大学，文史方面很多旧的，上课又不发讲义，写在黑板上叫大家抄，死背讲义，束缚头脑，就是政治课，受杨献珍那一套，他是唯心主义的，冒充马列主义，实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唯心主义的，合二为一的，作为马列主义教育，就是散布修正主义流毒。主席论教育革命要好好读一读，对照对照，以前有许多不符合主席教育思想，要彻底批。靠谁，真正斗批改要靠你们，浙大的同学最了解浙大，你们学校走资派陈伟达，还有陈冰在后头，

这两个人在文教战线影响很大，要很好批判。斗批改要落入到改上面。浙江省革委会你们要参加，但你们主要的要把浙大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教学方式这样，不一定一个样子。浙大，南大，北大可以创造，试点，主席历来主张典型试验，那个好，推行那个，你们的主要任务在学校，当然你们的革命精神反映到革委会，又把革委会的决定贯彻到群众中去，浙大带个头是好的，你们要起推动作用。

工人阶级，浙江虽然不象江苏多，但是还有点底子吧！杭州工人阶级有多少？（答 18 万）是产业工人？连财贸系统……（答 27 万）杭州人口一百多万，连家属算起来，是多数，是领导杭州，浙江的主力。不光杭州，金华县地，地方也有工业，工人阶级要带头，浙江省，市工代会都开过，拿这个做依靠，加以扩大充实。红暴中工人有代表性的参加进来，进去后就代表工人阶级，联总红暴旗子要逐步倒的，工人是主力，还有和广大贫下中农结成联盟，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要很好开起来。浙江农业是很发展的，工人，贫下中农这是二个基础。学生应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先锋，但要跟工农结合，大学毕业生到哪里去？到工厂，农村去劳动，到农村中去锻炼。然后，按所学的到生产单位去，就是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说的：“把青年教育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青年，不然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无法实现。现在机关大得很，已经够大了……浙江革命委员会领导机构 100 多人就够了，你们省联总有二百多了（姚文元：主席说革委会只要二十多人到一百人）只要二十人就行了。你们打个电话回去做个模范给红暴看。你们要带头，张永生同志，别的事可以不打电话，这个事要打电话回去，这是毛主席的声音。（姚文元：主席是很强调的）联总要精简，有几个可以固定，有的可轮流，一个礼拜，二个礼拜一下，做联络的也可以今天这个厂，明天那个厂。这样不脱离生产，顶多出一些交通费。你们在那里办公？（张永生：工人文化宫）。有多少房子？（张：20 多间）你们让出几间给红暴，一起办公。他们就不会到处搞房子，要节约闹革命，这是主席的提议，一定要照办。你们协议中有这一条，现在红暴天天到军管会去闹，要经费，怎么批？

不管你们过去怎么好, 或者犯了多少错误。主要还是要现在, 是否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符合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违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就是右派, 这是支左不支派的原则。

省联总既然按照主席的主张, 二十个人, 房子分出八间给红暴, 联总十二间。在一起办公, 就联起来了, 难道还打架。你们本来是战斗在一起的, 以前冲军区是一起的, 这我可作见证, 千真万确的, 难道现在可以绝对, 吵了一顿架, 现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石云说, 那一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我支持这句。因为开始保江华, 后来又被军区龙潜利用, 后来我看浙大协议上签字没有石云, 是不是石云讲了几句公道话不要她签字了。(石云答: 不是的) 去年十二条协议签定后, 没有说取消红暴, 省联总想把红暴吃掉, 给你们上纲上线去, 这不是方向路线错误?(张永生答: 我们政策上有错误) 你是吃不掉的, 说明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要改。不要争论过去谁错误大。当然错误还是红暴大, 所以把他们找来, 帮助, 批判, 联合他们。也不要做观潮派。钱塘江潮每月有一次, 难道还要等到八月秋潮吗? 去年八月错过了, 难道还要等今年八月吗? 你们做促进派不行, 做观潮派也不行! 要把自己推到潮头上去。鲁迅写过“弄潮儿”。鲁迅当时承认自己是观潮派, 认识还是进化论者, 还没有发展到辩证唯物主义。后来他作了促进派。你们为了一个字争论十几个小时, 还达不成协议, 为什么拖, 还要壮大队伍, 队伍是毛主席的, 人数多, 政策不对, 不行, 人数少的更同样。你看北京来了一批人(指浙江地县的暴派), 方剑文也责成叫他们回去。(方剑文: 我没有做好工作, 现在是下面脱钩) 你们在上海开会把他们(地县)弄起来了, 他们在上海开会到了多少县,(邵素珍: 第一次 20 多个县, 昨天来了五, 六个县)这个会你参加了?(指方剑文)最近一次多少县,(方剑文: 这次多是我开的, 有 38 个县)什么时候开的?(方剑文: 一月六日至一月八日)上海工总司有位同志叫什么名字(方剑文: 叫潘国平)他讲大联合问题, 不去也不好, 去了, 倒象大联合, 你们那些人, 就是主张把红暴拉大来, 现在看不见的对你们有利。譬如最近来北京的, 舟山是四大总部的, 岱山联指, 金华革造总, 绍兴绍联总与温联总差不多, 嵊县大联委, 宁波宁联总……都该脱钩(姚文元: 中央早有通知)看来杂得很, 地方挂起钩来有什么好处, 不要他们支持你们, 你们就承认他们。地方上有军管会, 革筹小组可解决。(方剑文: 来的人政治面目不清, 舟山有个

姓沈的，政治面目很不好）我已经通知把他们安排下来，组织他们学习。当然要一分为二，有的通过教育。会认清楚的，还是劝他们回去，由地方上军管会解决挂红暴旗子，省联总名字很香，温联总就不香了，你们红暴不要忙于招降纳叛，这是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既然来了，组织他们学习，让他们听听毛主席的声音。当然不能作为代表，学几天回去，为什么造成这个，就是你们在上海的联络站，现在联络站撤销他们有埋怨情绪，他们会怪你们，我给你们说。双方都把联络站撤了。各回单位，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元旦社论是怎样说的，你们按照毛主席声音办事，不要怕人家说你们“修”了，只要我们站得正，打破了头也要坚持。打破头有什么关系，为有牺牲多壮志么！文化革命，在思想、政治、经济、组织上都要革命。每一个人的头脑都要革一革，林副主席说，“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动力，又要当作革命对象，否则就不是一个彻底革命者。”

你们的协议起草很好，具体化了，别的省还没有这样具体，何必争一二个字呢，你看（拿起红暴自己的传单示意）传单上写的明明是浙江红暴临时指挥部，这总不是我造成的，你们不要搞全省的。

（接着红暴和省联总各自阐明要不要加“省”字的理由。方剑文说：总理联络员郭长安同志说不要省字是总理指示）。

总理：是的，浙江的红暴，怎么能说明杭州市的。（方剑文：在杭州，省军管会不同意和不承认我们是省的）不是么！到底中央的话算数还是军管会的个人的话算数。我就同意主席的批示，帮助，批评你们，我是有根据的，去年十二条协议也是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我觉得没有一个“省”字更爽快。

总理接下去谈协议（逐条）前一条是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做促进派，不做促退派。第二，自己有错误，要作自我批评。第三，对解放军要支持；这条好。第四，要批走资派；在浙江的代理。这条要说明，你们贴标语，要保李丰平，这是谁出的主意？这不对，李丰平还有许多问题没搞清楚。你们保江华，现在江华站不出来。你们说他们保曹祥仁，也站不出来。李丰平本来希望他回去，把他的历史研究一下很复杂，最后要中央决定，干部问题，把走资派揪出来，不能说那一派的功劳，这是革命造反派的功。曹祥仁开始没有辨别出来，保一下后来放弃了。你们保江华是不对的，那时是保他的身体，那时候省联总把江华送到北京，

你们就保江华，林刚挑动你们吧？现在你们又贴大字报，要保李丰平，不对，这是资产阶级政客作风，小将，工人阶级有这种作风是很恶劣的，听了很难过……

第五条协议，你们第五条是具体的，促进支持基层革命大联合，已经联合的不要拉出来，已经建立革委会的不要再拉了。总的是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你们两个组织总要取消的。难道永远分二派，高兴去做民主党派吗？周建人是“民进”，又是党员，今天同你们讲，可以结合的。他是不要“民进”最好是党交给他的位子。都要搞派性，让你们到资产阶级派中去，不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当民主党派？！

“省”字关系不大，当时我说不要用“省”字，还不是浙江的，最后派的名字都要取消的。暂时不倒旗，不是永远不倒旗。承认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大联合，还搞什么山头。如浙大的高革委会，就要统一到革委会下面。你们再要闹，就调到北京来学习。不要以为你们头头了不起，中央一句话好了，现在刘少奇都揪出来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绝对权威。过去北京有联动，“五·一六”不过是跳梁小丑，你们当头头不过二十个月？不要背功劳包袱。有的几十年的老革命，还不是一败涂地。坚持不改，屡教不改，还是搞垮。（北京有个朱成昭，谁愿做朱成昭？）谁要对抗中央指示没有好结果，我也向你们学习，从你们的错误中学习。看你们派性怎么闹的，为了一个字争了二三天。你们承认已经联合的不要拉出来，革委会成立了不能拉出来，原来不是红暴指挥部的组织不许拉队伍，不树红暴旗帜，下面分六类；已成立革委会的，要维护权威，不准拉。如果你们再闹，把所有的头头都调到北京来学习，福建闹得最凶的革造会头头，中央叫他来，他也只得来了，陈再道要他来，他也来了，你们只有二十个月，陈再道已经 40 年了，一旦离开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跌倒了。主席在批示中对陈再道还加了“同志”二个字，主席讲“包括你们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有内，只要他承认错误并取得群众谅解，可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他现在还在学习，住在京西宾馆，因为年纪大了，给他一定的物质照顾，否则就不能活了。湖北的张体学，已站出来了，跟王任重跟得很紧，一旦认识错误，痛哭流涕。群众谅解，现在是湖北革委会副主任。你们二十多个月，这么骄傲！一调就可以调来学习，你们回去一条条宣传协议按协议办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革委会不能推翻，要推翻是错误的，凡有红暴没有保留一定名额的，应充实，这条也对，象麻纺厂就充实么；不要脱产，不要搞官僚机构，否则打倒一个官僚机构，树立一个小官僚机构，国务院办公厅机构原八九百人，现在是个值班室只有五个人，加上联络员四、五十人，今后各省革委会搞起来，人还要少，浙麻革委会多少人？（来成德：30 个人）不脱产几个？（来成德答：4 个）不脱产的太少了。（姚文元：主席提倡党支书也不要脱产）革委会 30 个人，脱产 5 个，你们 3 个，他们 2 个，这就气魄大（对来成德讲）大家都经费，纸张，那时革命初期搞的，现在不行。再那样搞，就象江青同志“九·五”讲话中讲的是败家子了。

原二派革命大联合比较好的，应进一步巩固，浙江大学搞起来了，你们要搞革委会，你（指周信忠）有许多派性，还有藤铸、刘英……石云他们开始闹得最厉害，你们是后起的，你们做了头头了，而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你们现在却又凶起来了，毛主席一批示，尾巴又翘起来了。

浙大要带头，回去成立革委会（朱和瑞：要求中央给协议作个批示）可以么。已经联合，不完整的，要促其完善的。已经联合，又拉出队伍，要劝他们不要另立山头，这很好么。原红暴组织已解散了，不要再树旗帜，何必还要树？杭丝联有点麻烦吧！

（翁：已经解决好了）联合不好的，再充入么。尚未实现大联合要实现大联合，这六点是对基层讲的。

总理：（谈第六条）“三代会”不能推翻，这个对的。红暴派参加进去，这是个代表机构，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三代会名额在这里商量好，请军管会批准就行了。

省联总，红暴派逐步完成历史使命，提得很有策略性，接下去是活动范围。为“省”字有争论，杭州市，还是杭州地区有争论，到的杭州那几个县有红暴？

（方剑文：临安、建德……）限于杭州，再写上几个县，就这样定下来，有个“省”字有什么可怕，如再拉，就是他们的问题了。限于杭州，写明几个地方，这样加个“省”字可以减少他们回去解释的困难，这也好么！底下一条也是好的（谈第八条，铁路，公、检、法……略）这都有了。（张永生：汽车，航运是否属于这个范围）长江航运公司已作了规定，钱江也是跨码头的，与地方搞在一起不好。交通运输部门，包括方剑文同志的这个运输段，你那种组织要独立，不要和地方

挂钩，当然有代表性人物要参加省革委会，你们革委会成立，不需要红暴派参加，当然三代会要参加（姚文元：你永远代表那个红暴派，你就是永远代表省联总，这不符合辩证法吧？）不然你参加民主党派去。

姚文元：我还有事，要早走了，先讲几句。协议很好，希望在这里达成，总理给大家讲了很多话，无非希望大家更快实现大联合，三结合，浙江省革委会的成立。希望浙大搞彻底，浙大有没有陈企霞（答：杭州大学的）是丁玲集团的头子，是叛徒，要彻底搞一下，不要把这些人都包起来，上次我说过一个意见，树什么旗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今天两派都有派性，派性是有阶级性的。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浙江省革委会排到最后，天也不会塌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地球照样在转动。你们为一个字，争三天三夜，这是无产阶级风格吗？资产阶级派性是一条大毒蛇，又是个陷阱，陷进去就是坐井观天，希望你们斗私批修，把派性去掉。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打倒一小撮走资派是革命的需要，现在打倒派性，增强党性也是革命的需要，你们有没有人想做中国共产党员（不知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我认为能够称得上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要努力奋斗，要斗私，批修。革命到底，北京有少数人，党中央正在挽救他们，如不接受这个挽救，就是走向反面。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一定是省联总，红暴派最光荣，脱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还光荣？事物不是静止的，是发展的，这一点希望你们考虑。

另外，还是要拥军爱民，三相信，三依靠，依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是大方向。

要节约闹革命，不要争房子，前年主席讲过，用金钱收买造反派的，是走资派的手段，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节约闹革命，精兵简政。有些可以用口讲，不一定用报纸，有的组织有那么多喇叭车，不讲毛泽东思想，有什么用？

最后讲一个作风问题，就是要培养言行一致的作风，说的和做的一样，理论联系实际作风，你们参加革命的时间还不长，不培养好作风，对革命是不利的，在青年时代，尤其要培养言行一致的作风，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表里一致，象刘邓陶就是反革命二面派，刘少奇看一篇“态度问题”文章，就是叫人耍二面派。

革命思想要用革命行动来检验，要斗私，批修，搞小动作要及早去掉它。无产阶级搞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取得胜利。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整顿，我们看得很多，是教训，提醒同志们。

希望你们协议能达成，能签字，更重要的是实现，然后二派一起在这里就干部问题达成协议。（姚文元同志有事先走了）

总理：刚才姚文元同志讲的很重要，青年人一定要注意作风。

（谈协议第九条）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清理队伍，这是很重要，不但不要拉队伍，还要清理队伍，你队伍大有什么用！只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只能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按主席指明的方向前进，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都取得胜利。

各省市革委会，现在已搞了一半了，你们浙江不赶不行。前二十名赶不上了，广东已批准，十五名，吉林十六名，辽宁、江苏回去准备，还有浙江、新疆，搞得不好，还有前二十名可能。湖南干部已经站出来，可以三结合，但出现一个反动的“应光明”（？）现在正在批判。还有个宁夏在准备了，搞不好，浙江搞到二十名以后，你们一定要推迟也没有办法。

要做促进派，队伍要纯洁，不靠人数多，靠领导骨干强，不要搞私心杂念，一点私心杂念没有不唯物的，因为受了家庭，学校的影响，但是要不断革命，封建社会还有大义灭亲人，何况现在社会主义社会。过去打、砸、抢的，很坏的，把他们招降纳叛来有什么好处？每个组织都要整顿队伍问题，人不在多，看谁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紧，何必要人多，人多只是打架有好处。军队过去是“四不”因为将刚起来，保护先锋队 现在形势不同了。

“九·五”命令，“二·六”命令后，不管那一派，对解放军，对工厂，对铁路破坏 那就不是革命派，而是反革命，运动初期解放军保护你们，现在解放军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全面胜利。

底下一条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在浙江更重要了。

对了，被扣工资问题，只要确实被赶出去，有困难不能回来应该解决，但要二派协商解决，上级帮助解决。

现在还有个问题，学生不回校，还要拿助学金，毕业生拿工资，在家里，要规定一个限期回来，不回来就开除学籍，难道培养一批逍遥派？

还要节约闹革命，三代会应有点文革经费，省联总、红暴派有点经费，应按节约原则。过去省联总开支大了，红暴不要拿省联总做样子，军管会要卡紧，省联总不等回去前就把家里的工作人员减到 20 人，那就算彻底革命了，省联总要作模范，要节约，红暴派更节约就更好，三代会也要节约。省工代会会有多少脱产干部（郭志松答：三十多人）用不了那么多，红代会呢？（李回答：二十多包括一个报纸）等红暴名额商量好，办一个统一的报纸，纸张要节约（张永生：后来打算工人报，红卫兵报并刊《红色风暴》是大报，到农村不大便当。）

分部都不设立，这是很好的。

下面一条是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你们协议达成了，由军管会与你们协商，当然还要经过中央批准，革命干部第一批结合少一点，好一点。李丰平历史问题复杂，就不能提出来，其他可共同调查，这就好办了，我这是讲省级的，厅局级可以大胆解放。

总理：揪出坏人，不尽是走资派，革命队伍里还有坏人，浙江这个省我已讲过了，蒋介石的党政军要员都是浙江出去的，他们还可以从海上钻进来，揪坏人在浙江要注意的面要宽些，在学校，在工厂、机关，铁路交通运输各部都要注意，大联合后各派清理自己的坏人。每一派先把自己搞起来。

最后一条，你们在协议说，准备在二月份成立革委会，既然如此，那就要很快在今天（16 日）达成协议，签了字。

把附件搞出来，然后军管会把干部提出来，名额问题，干部问题，你们讨论好回去。

我是想把这个协议和浙大的协议加在一起。中央加个批示，可以先回去几个人传达，你们可以在这里商量三结合问题。（张永生：反映北京有些学校到西范和红暴联系）

总理：到西范大旅社，把出入搞严一点……

五、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驻军代表时的指示

〔3月14日晚上9:00~2012:55，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同志接见浙江军代表南萍、白崇善等同志。中央对浙江情况非常了解，非常关怀，对代表团在京汇报学习思想的提高表示满意，在汇报时，中央首长作了许多指示。〕

1、省革委会主任南萍、副主任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工人一名暂缺，最后还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义批。

在谈到副主任时，中央说周建人在浙江有影响，赖可可中央非常了解，法宪同志说赖可可1929年入党后参加长征，一贯忠诚老实，艰苦朴素，康老说在山东时向明问题上有错误，态度很好，这我清楚。

当总理、江青同志说到革委会中没有女同志不行时，军管会介绍了华银凤情况。她是东阳良种场长，饲养员，38岁，党员，丈夫在抽水站工作，华同志思想作风、家庭出身都好，1954年以后四次到北京参加劳模、先进工作者会议，有几次参加主席团，三次同主席合影，一直表现很好，主席写信给她，寄照片给她，文化大革命中是最早起来造反的一个，中央认为不错。

现在革委会委员产生74名，打算150名，中央认为，不要一下子搞全，要求严一些好，可能有一些优秀的好充实。

2、南萍同志说打算在省革委建立后，大大推动地县大联合三结合，力争在三月底杭州和全省五个专区一片红（舟山、宁波、绍兴、加兴、金华）

江青同志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是跟不跟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问题。

3、军管会汇报到去年上半年宁波、台州等地曾经成立过革命委员会，这怎么办？中央说：一、缺乏群众基础，二、上级没有批准。在经过两个改组以后，这两个专区都成立了军管会。这些革委会已不存在，不要恢复。

4、江青同志批评了浙江过去演鬼戏，演四郎探母等坏戏。讲到陶铸到浙江奉化去蒋介石的家，还批评浙江有人为蒋介石修坟墓。中央认为要把蒋介石的墓统统砸烂，种上粮食，灭敌人的威风。

5、许世友同志在南大革委会成立大会上号召南大学浙大、赶浙大、超浙大。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现将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省革命委员会筹建工作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同全国一样，空前大好，越来越好。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彻底粉碎了浙江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妄图在浙江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拔除了中国赫鲁晓夫按在浙江的一个重要据点。毛主席视察浙江的喜讯，极大的激励了浙江三千一百万军民的斗志。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大大加快了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的步伐。广大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广泛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肃清其流毒；深入进行了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进一步推动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各条战线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毛主席关于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的重要指示进一步落实。全省基本上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县、市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杭州市和十六个县已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十二个县正在筹建革委会。原省委常委、副省长以上干部已站出来的有六名，占百分之四十三。省级机关、厅、局、处、级干部已站出来的有五百五十七名，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七。农业生产，战胜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粮食产量仍然超过丰收的一九六四年。工业生产，在缺电的困难条件下，不少产品的产量，都比一九六六年有所增长。市场供应情况良好。铁路运输、公路交通和内河航运畅通无阻。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秩序稳定。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综观全省大好形势，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具备。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革命群众的殷切期望。全省军民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用更大的努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用更新的成就迎接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二）

一年来，驻浙部队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

一、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去年三月军管以后，驻浙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浙江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疯狂反扑，一度使运动出现了曲折。经过反复斗争，特别是去年七月北京汇报，中央对浙江问题作了明确指示，为扭转全省局势打下了基础。接着，按照中央决定，对省军管会实行了改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受蒙蔽群众迅速觉悟，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快发展壮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浙江取得了统治地位。

二、加强沿海战备，稳定浙江局势。省军管会改组后，我们迅速调整了作战部队的部署；进一步加深了部队的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召开沿海守备部队干部会议，部署战备工作。建立杭州警备区，保证杭州局势稳定。及时封存和收交流散的武器弹药，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治安，建立革命新秩序。所有这些，使全省出现了一个稳定局面。

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浙江视察的巨大鼓舞和推动下，不断掀起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高潮，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高潮。毛主席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的重要批示和中央“一二·二通知”的下达，进一步促使我们按照“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大大推动了革命大联合。今年一月初，又展开了大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大批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群众运动。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标准，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大大地提高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政治觉悟。

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大力加强驻浙三军的团结。去年八月份，二十军、空五军党委分别作出了互相学习的决定，在两军中掀起了群众性的互相学习的热潮。这一活动，很快普及到省军区和驻浙各部队。各兄弟部队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军队内部的团结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团结，使驻浙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思想更加一致，步伐更加整齐。军队的团结又进一步带动了军民团结，拥军爱民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不断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五、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建立了各级生产领导班子，保证生产指挥不断线。派出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和工矿企业，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复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革命的工农群众，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们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学得不深，吃得不透；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得还不紧。在处理红暴问题上，思想政治工作做的不够，在一段时间内掌握政策有偏差。

今年一月上旬，省军管会、革命领导干部以及“省联总”和“红暴派”的代表赴京汇报。在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各自作了自我批评。汇报期间，中央首长对“省联总”和“红暴派”实行革命大联合问题做了重要指示，经过反复协商，“省联总”和“红暴派”达成了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协议。我们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坚决贯彻中央批示，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努力。

（三）

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基本就绪：

一、革委会委员设一百五十名左右。委员名额的分配比例定为：军队干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九；革命领导干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九；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九十四名，占百分之六十二（工人三十六名，农民二十一名，学生十九名，一般干部十二名，机动六名）。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浙江红暴问题的指示精神，在原省级机关和杭州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五十名代表中，安排十名红暴代表。鉴于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革命委员会以逐步充实为宜。

二、建议从委员中推选出三十七人担任常委。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十五名（工人七名，学生四名，农民三名，机关干部一名），包括“红暴派”代表三名；革命领导干部十一名（暂安排六名）；军队干部十一名。

革命群众组织代表：

张永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省联总”主要负责人）。

郭志松（浙江建筑公司工人，省工代会常委）。

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厂革委会主任,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

谢志明(火车司机,杭州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铁联指”负责人)。

蒋宝娣(女,杭州新华丝织厂工人,厂革委会主任,省工代会常委)。

叶仁德(杭州钢铁厂工人,省工代会常委)。

颜贻欢(浙江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

李显通(杭州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

孙宏兴(机关干部,“省机总”主要负责人)。

翁森鹤(“杭丝联”工人,“杭丝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省工代会常委)。

方剑文(杭州运输段车工,“红暴派”负责人)。

滕 铸(浙江大学学生,“红暴派”代表)。

华银凤(女,金华良种繁殖场副场长,劳模)。

莫显耀(杭州市郊东风公社红五月大队党支书,劳模,市农代会委员)。

张来根(杭州西湖公社玉泉大队社员,“红暴派”代表)。

革命领导干部代表:

周建人(原省长)。

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沈 策(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王子达(原省委候补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现杭州市革委会主任)

马向光(原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

邓清河(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军队代表:

南 萍(二十军政委,省军区代政委,省军管会主任)。

陈励耘(空五军政委,省军管会副主任)。

熊应堂(二十军军长,省军区代司令员)。

朱全林(二十军副军长)。

孟昭玉(五十九师政委)。

白宗善(空五军副军长)。

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

戴克林（省军区副司令员）。

曹思明（舟嵎要塞区政委）。

王学清（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

刘友法（舟山海军基地政治部主任）。

三、革委会主任请中央决定；建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和一位革命工人代表为副主任。

四、革委会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人民保卫组和生产指挥组。各组根据工作需要，下设若干办事机构。办公人员暂定二百人左右。

五、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准备在革委会中建立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由主要负责党员组成，并组织一个精干班子，作为核心小组办公机构。

考虑到革委会机构新建，要立即全部接替原省委、省人委的工作须有一个过程；同时，大批干部一时也无法处理。因此，将原各部、委厅、局暂时保留，逐步精简、改造。遵照中央决定，各部、委、厅、局都成立革命的“三结合”领导小组，在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搞好这些部门的文化大革命和业务工作。

以上报告当否，请中央批示。

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重要讲话

〔三月十八日夜间至次日凌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等同志接见了浙江省赴京代表团，并作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稿系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等中央首长健步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伯达：现在开会，先请姚文元同志念批示。

姚文元同志念批示，念到毛主席批示：照办时全场热烈鼓掌，高呼口号，姚文元同志每念完一段，全场都高呼口号。

当念到“把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各个阵地……”时，江青同志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

姚文元同志念完后，大家高呼口号。

伯达：现在请总理讲话。（众高呼：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

总理：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因为你们今天表示的气氛是到北京三次中最好的一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了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实现这样空前团结的气氛，我们深为感动，觉得很高兴。预祝同志们回去后开一个伟大的、浩浩荡荡的成立和庆祝大会。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都来祝贺，特别值得高兴的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南京军区第二政委杜平同志都来参加你们会议。（众高呼向许世友、杜平同志学习、致敬）

总理：毛主席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时，首先在杭州向军管会主任谈了话，后来发表了这个谈话，实际上对你们是个开端。去年一月风暴，上海工人阶级带头杀了出来，夺了党内走资派的权，夺了刘邓陶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的权，树立了榜样，当时我们认为一定有影响的。但是运动总是有过程，总是有曲折的。浙江、江苏靠近上海，现在批准你们浙江成立革命委员会。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姚文元同志，读这篇批示一定很高兴，浙江会推动福建、江苏、安徽，估计三月份形成高潮。现在北京讨论成立革委会的有六七个省，你们第一个批准是好事，你们应珍惜这个光荣，希望回去以后要加强团结，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中央对你们的希望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中央的批示中，这次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点得这么多，是最多的一次，你们得到批示，要重视路线的斗争，“要斗私，批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好，总要有目标，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还不止这些，这是点得比较多的一次。刘、邓、陶、彭、罗、陆、杨在浙江都有他们的代理人，你们以后的反修斗争中，把他们挖掘出来，通过群众的发动，把他们挖掘出来。联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之矢，射修正主义之的，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在思想上联合起来，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联合起来。支左不支派，就是指这个，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的就不支持，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进行两条路线斗争，高举毛

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你们回去后的任务。（众呼口号）

批语的第二条中说，希望你们在路线斗争中，在斗私批修的学习班中，革命大联合要促进。这个问题在浙江有争论，但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能联合起来。十二条协议中央已经批准了，要很好地执行。当然在这一阶段学习，你们有很大的提高，你们希望在中央把一切问题都解决，这个不能的。比如常委你们红暴就给了三位，副主任有一名工人代表，二派有争论，等你们回去后在学习中，交换意见，水到渠成，就能解决问题的。革委会的委员，杭州地区 50 名，给红暴安排了 10 名，你们回去后经过学习，就会解决的，除杭州地区外，44 名由其他专区推荐，你们希望一切都在中央解决是不可能的，你们回去后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现在只有一派，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则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你们到革委会去后，就不是哪一派了。

现在参加革委会的常委要担负起责任来，特别十二条是中央批示上所说的，作为你们战斗的纲领，共同来遵守。今后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像你们刚才说的，要有个忠字，要忠于毛泽东思想，要破私字，用这样来考验你们。因此在解决外地的问题都应由外地自己解决，不论那派都不能搞联络站，红暴在上海原来有联络站，现在撤了，地县也这样，省联总也不要干涉。地县的那派自己解决，其他专署你们都不要去搞，省联总也不要干涉，实际上地县的联总是与相反的，如温联总、省联总。其他专署的问题，你们不要干涉，都要脱钩。现在要按系统按部门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现在革委会中委员没有全部定，不要紧，逐步充实是个好办法，包括那些领导干部，干部不要急于一下都全，中央会议上，对干部我们也进行讨论。你们回去联合审查，由革委会组织人员审查，不是站在派性立场上，在统一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审查，这样更加踏实。那群众代表也同样，今后各地到上来的更妥当，逐步充实是个好办法，用这样来试点，解决干部也逐步搞。（高呼口号：向中央首长学习，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总理：我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江青同志插话：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我建议我们和同志们都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奋勇前进。浙江地处国防前线，靠近美蒋，蒋介石在浙江暗藏下来的人还很多，还没有改造好

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浙江是多的，但是跟人数来比，当然是很少的，按比例来说是不不少的。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你们不是在奉化把蒋介石的祖坟砸掉了吗，这很好。那里地方观点很强，最近有几多，残留在那里，要搞你们，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主要靠革委会，公检法要军管，要改造，根据北京经验，公检法要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转业军人来加强。一些窜至大陆上的特务，暗藏起来的，当然是个别的，大家如不擦亮眼睛，就要上当。刚才讲到打倒彭真，他们有的爪牙在浙江伸长手，他们做了很多坏事，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浙江都有代理人。江青同志在杭州养病，就受到迫害，这说明有黑手，你们不要上当。我们查出来由中央处理，你们得到材料要报告中央，你们不要上当，不要听到几句口号，就认为是响当当的哪派，许多地方都发生这些事，浙江不是特殊的，将更加严重一些。但严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们坚定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就一定能搞出来。 [江青同志插话：他们在主席、林副主席住的地方安装窃听器，偷听电话，搞特务手段，浙江的公检法要彻底解决。北京是选拔优秀的解放军、退伍军人去作工作。过去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是反革命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你们那里文化战线也很复杂，六十年代女人演男人的越剧这个戏就出来，你们那儿我就看不惯，还提不得意见，造了我的好多谣言，要彻底砸烂。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简直比以前的国民党反动派还凶，这一点周建人有揭发，其他同志也有揭发，南萍同志也有。公检法要彻底砸烂。你们那里不是有一个陈企霞，他是哪里的？（答：杭大的，已揪出来了。）不但是他，还有不少。（大家呼口号）]

要彻底砸烂，所以你们回去后要有敌情观念，你们要有这个决心，不能让美蒋特务做任何坏事，擦亮眼睛就会查出来的。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伸向浙江的黑手一个个揭发出来，砸烂公检法，文教战线上许多坏事要改造。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是领导浙江三千一百万劳动人民的，要保卫三千一百万劳动人民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决不能让美蒋来窜犯大陆。（大家呼口号）（江青同志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台湾！）（杜平同志呼口号：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要有雄心壮志，要把黑线一个个揪出来，不允许他们捣鬼，需要两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勇敢前进。首先要拥军，过去军区犯了错误，现在军管会个别同志也犯了错误，错了就改。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指

挥的，有优良革命传统。现在海陆空三军都支持你们，不要为一二件事就对立起来，这样黑线黑手就会钻空子。军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帮助、批评、联合。不仅杭州，其他地、县也要这样。但你们自己不要去发展队伍，让人家自己组织起来。他们自己会搞的，要抓革命促生产。浙江去年这样大的旱灾还增产，这说明广大劳动人民是紧跟毛主席的，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些话不多说，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祝你们胜利。（大家呼口号）

伯达：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大家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们好！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众呼口号）首先让我们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鼓掌，呼口号）我想没有很多话讲。刚才总理讲了很多，我同意。我想讲一下形势。

目前全国形势大好，有十八个省市成立了革委会。浙江地处国防前线，东海海防，浙江今天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想这是非常好的形势。我只讲革命形势，不讲工农业生产。目前形势，当然要和生产上一对比，很必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二年，我们生产货币是很稳定的。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国家里，日子很不好过，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些东西，国际上金融很混乱，这是以往所没有的。黄金要抢购，出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抗日战争时代金圆币那样。小将们没有体会，咱们老将就有体会。周建人同志很知道，货币一变，生产一定要大变。苏修日子就不好过，这样一对比就能看出我们的形势大好，对不对？（众答：对！）大好形势下也有反复，表现是不同的，有的是形“左”实右，极“左”，实际上很右。这种形式表现在去年夏天。从去年冬天开始，虽然击败了形“左”实右思潮，或者说是极“左”思潮，但右倾的多。右倾分裂，从冬天到今天有所抬头。对这，我认为要站稳阶级立场，提高警惕。现在有人替去年二月逆流翻案。所谓二月逆流是从前年开始的，二月逆流的斗争矛头直接针对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击溃后，但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党内有其代理人。你们浙江也有一小撮，表现在各种翻案风，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提醒同志们注意。当然要反对形“左”实右的右倾保守，这样使企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想瓦解人民解放军，想推翻新生革命委员会，特别

向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党斗争历史上一直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的以极“左”，实际上是右的。有的公开以右的面目出现，这是不奇怪的。这是客观规律的问题。出现后要识别他们，要勇敢地斗争，坚决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另外，浙江的问题，我了解的不多，知道了一点。我听了一次汇报。浙江跨行业的组织多一些。省联总、红暴会都有，当然现在是实现革命大联合，也就是总理讲的，归口大联合。大联合是手段，其目的是共同对敌。不搞好大联合，坏人就有藏身之处，搞好了革命大联合，坏人就没有空子可钻，这个问题，总理又讲得很多。我不再重复了。逐步实现归口大联合，这样是有利于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如果搞得不好，就不能实现。刚才有的小将喊打倒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不是一下子能够消除得了的，群众思想工作要做细致的工作。不过群众思想工作也好做，讲道理，讲清楚了是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我是这样相信的。在实现革命大联合、三结合过程中，要善于识别两面派。坏人钻入革命队伍中来，总要打着红旗反红旗，否则，他不容易钻入。当然对这样的人有一些认识过程，有的是表现够充分了，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搞出来。你们浙江有这样一个人，大部分材料未整理好，我们根据主席的教导，帮助批评了他，看其是否在一定条件下能揭发刘邓的问题，是否能进行触及灵魂的检查。当我知道他的综合材料后向主席反映，浙江公安厅有许多坏事都与他有关系。叶群代表林副主席向主席汇报，他们盯梢，他们对我每走一步路，都盯梢，简直比过去的国民党反动派还坏。（叶群同志高呼：要砸烂公检法）你们的材料我看了一些，打倒反动的公检法，我们还是在大好形势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奋勇前进，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向浙江的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小将学习，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祝贺同志们胜利！（众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伯达：现在请康生同志讲话。（众呼：向康生同志学习！向康生同志致敬！）

康生：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委会成立，这是我们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我完全同意总理、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对浙江省了解的很少，没有更多的话要讲。伟大统帅毛

主席、林副主席转批的中央批示，中央希望：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行路线斗争，总理讲了这个批示了，点了这么许多名，希望同志们特别引起注意，有的地方，也出现反复，刚才江青同志说，思想上有分裂主义的苗头，表现在路线斗争不强调。浙江情况我不清楚。中央的指示同志们要深刻的理解，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也是国内战争的继续，国民党与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继续。（江青同志插话：这是毛主席讲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许多同志的右倾思想未看到这一点，中央的批示，特别讲这些问题。（江青同志插话：右倾不是苗子，已有行动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一点同志们特别应当注意。下面讲到大联合问题，祝贺两派大联合协议的达成，大联合是要巩固下去，批示中讲了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浙江地处沿海国防要地，美蒋特务及其组织很多。总理讲，浙江是蒋介石的老窝，蒋介石的人在浙江很多，蒋家王朝，浙江是要地，我还记得上海有个×会长是浙江人，这样的人很多，买办阶级，美蒋特务很多，浙江还有一个特点，封建文化特别厉害，和尚尼姑很多，尼姑让她嫁人嘛！（江青同志插话：马路上逛来逛去，每天有几万人。）过去他们说学了有收获，其实是假的，到底还有多少和尚庙。（伯达：浙江文人也多。）

康生：这点……（脱稿）。文化大革命重大事件是把暗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揪出来，刘少奇是大叛徒，（众呼口号）刘少奇第一次被捕自首在长沙，被捕自首了，×××还送了他四书五经，27年在武汉缴械，向汪精卫投降。（江青：有确实证据。）29年在满洲里被日本捉捕，这个大叛徒，完全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有一次，35年在上海被捕。第五次36年到北方局又被捕投降。同志们知道，他投降敌人早就投降了。他自己说是老革命，实质上是老反革命。（众呼口号）他搞一个老婆是美国特务，也是日本特务，也是国民党特务，王光美是国民党特务，美国通过彭真、刘仁、武光让她搞林副主席。到延安以后和大叛徒结婚，一对夫妇是一个老大叛徒一个老反革命。（江青同志插话：王光美是搞战略情报的。）（众高呼口号）邓小平是个逃兵，真正是一个逃兵，他还有重大问题没有揭开，不但是逃兵……，陶铸是叛徒，彭真是特务叛徒，罗瑞卿从来也没有加入过党，是个特务分子。打倒刘邓陶！彭德怀里通外国与赫鲁晓夫勾勾搭搭。（江青同志插话：是汉奸）贺龙是土匪，小将揭发，南昌暴动以后，投降了，国民党给他封官，就是为了一个条件没有封。国民党代表在那里住，住了一个多月，

他们调转了（江青同志：杀了我们多少好党员）陆定一是大叛徒，此人很早就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任务，和胡克实一起，胡给他一千元钱，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汉奸。主席讲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江青同志插话：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现在有了确实的证据，是叛徒。我们还保过他，净搞阴谋，小将搞出来的，许世友同志立了新功。）现在江青同志讲了国内形势大好，浙江省革委会成立了，有 17 个省成立了革委会，还有六七个省在北京谈，革命形势大好，刚才江青同志讲了，国际金融抢购黄金，美国国防部长撤职，帝国主义出现经济危机，在这形势下，敌人在灭亡之时越是挣扎，越要提高警惕，在浙江要特别注意，据我们知道，蒋匪情报局，有潜伏在国内的特务，有五条任务：（1）企图在今年三月 27 日（蒋伪青年节）在各地，特别在广东，云南边境，进行扰乱，破坏。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我们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2）妄图动摇人民解放军。江青同志不是九·五讲话讲过了，现在的特务在边境，调查人民解放军番号，革命群众有义务，坚决打击，特别警惕，许多地方把军队的秘密情况泄露出去。（3）他们企图利用派性斗争作分裂，分化工作。希各机关各部门，提高警惕，心明眼亮，把坏人揪出来。（4）他们还要发展他们的特别机构，发展外围组织。浙江我不知道，很多地方出现反动组织，问题在他有潜伏的干部，打着红旗反红旗。（5）你们浙江武器要交，千万要警惕，千万要注意，按中央的指示办事，这些是你们的纲领，敌人是妄想，三千一百万人民会识破这些企图，他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要上当。不提高警惕，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上当。当前从思想上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分裂主义，组织上搞黑手、坏人，要拥护解放军，拥护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会。相信同志们能按毛主席最新指示，彻底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巩固已成立的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指引下，要把浙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胜利。现在文化大革命，革委会刚成立，可能遇到反复，这是前进中的困难，小的曲折会出现，但整个大局形势是不会变的，希望同志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祝你们胜利！

（康老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伯达：现在请许世友同志讲话。

许世友：刚才总理、江青、康老讲了很多。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批下来了，我们坚决照办。（众呼口号。江青：向革命小将学习、致敬。）我们坚决地好好地支左不支派。要提高警惕，如果敌人来了就坚决消灭。（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众：口号）

伯达：省联总、红暴代表是否有讲话，若没有准备，不要讲了。

方剑文、张永生代表两派向中央首长表示决心（略）

伯达：（众：向伯达同志学习、致敬！）今天会议发言就到这里，我说几句（众：向伯达同志学习致敬！）向同志们学习致敬！我没有什么可学的，我是同志们的小学生，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我们参加了好几个省市的会，对今天浙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这样的联合大会特别印象很好，（口号）你们两派都表现得非常之好，省联总、红暴两派姿态表现得很高，说明你们对毛泽东思想很热爱，使我们跟你们在一起开会很高兴，刚才总理、江青、康生、许世友同志的讲话我都同意，同志们刚才讲话提到毛主席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关于这一点浙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特别值得深思，四大家族（除了孔祥熙）都出在江浙两省，四大家族是在江浙财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浙江的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特别是宁波，国民党军阀很多都是从浙江出来的，蒋介石、胡宗南（总理：陈立夫、陈果夫、戴笠等）。江苏、浙江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江青同志：还有伟大的鲁迅在浙江。康生：我们周总理的家乡也在浙江）。

总理：我是出生在封建家庭里，封建家庭要打倒，绍兴等地不回去，至死不回家。

伯达：浙江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斗争的焦点，党内走资派在浙江有特别的活动，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现在所有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他们都是代表国民党，是国民党的代理人，包括浙江的走资派，事实上也是国民党的代理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浙江的胜利是特殊的作用。

总理：伯达同志特别勉励我们浙江，要谢谢他。

江青：江浙两省是中央直辖市的两翼。

许世友：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江苏省的问题。

总理：许世友同志来了，江苏省革委会即要成立，祝他们胜利。

伯达：要做阶级分析，江浙财办成了四大家族的基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许多强大的丰富斗争经验的工人阶级，在中国来说是最大的，斗争经验最丰富的工人阶级。（姚文元：上海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人民听到浙江省革委会的成立，一定会非常高兴。）

总理：江青同志在上海作艰苦的地下工作，三十年代就受压迫，讲她是内奸，从哪儿出来？（江青同志：学习鲁迅硬骨头精神）。

伯达：她不愧为硬骨头。

江青：应该向革命同志学习，我是小学生。

伯达：可以这么说，江苏、浙江的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斗争是很坚决的，有很顽固的反革命，把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锻炼得更强大了。你们的胜利是必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你们那里胜利是必然的。当然也要注意一些反复的可能性，这一点我提出来大家提高警惕，不要以为革委会成立就可以睡觉，大量的工作在等我们去做，斗批改，公检法，文教系统。精兵简政也可以研究，革委会工作人员不要那么多，回去研究一下，不一定这么多，开始可以少一点。

江青：不要搞滚雪球。

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是很少人办很大的事。

总理：红暴与省联总有否搬在一起？（张永生答）你们是否脱离生产岗位？（张答）

伯达：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学习，不要脱离本单位的工作，开会要精简，有些要精简，革委会不一定要集中开，开两个钟头的会就回到自己的单位去，刚才江青同志提到二月逆流的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样有点翻案风，谭震林这批坏人想翻案，想复辟，这股翻案风也可能吹到你们那里去，你们那里也有人喜欢二月逆流翻案，象江华、李丰华、陈伟达、陈冰，不要以为他们在睡觉，他们在活动，复辟资本主义活动，搞翻案复辟，今天这个会就这样完了，各方面都说了。

毛泽东思想在浙江胜利万岁！

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

同志们万岁！

预祝你们胜利，要继续前进，戒骄戒躁，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教导！

最后由周总理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热烈庆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诞生》

在春风吹遍全国，亿万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祖国的东海之滨，钱塘江畔，又树起一面鲜艳的红旗：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

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前进的道路，都受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特别是去年毛主席亲临浙江，视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对浙江军民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教育，最大的鞭策。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谨向浙江省三千一百万革命人民，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浙陆海空三军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浙江的一小撮代理人，猖狂地对抗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极力地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采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进行阴谋活动，妄图在浙江复辟资本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人民解放军驻浙部队的全力支持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排除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粉碎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破坏，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浙江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驻浙部队，坚决响应毛主席发出的“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革命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拥军爱民”的伟大战斗号召，执行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驻浙三军广大指

战士旗帜鲜明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贯彻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用毛泽东思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相信和依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把人民解放军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热情帮助解放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浙江军民在伟大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坚强团结，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有如钱江春潮，一浪高过一浪，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坚定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揭透批臭，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浙江地处海防前线，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全省军民要大力加强钢铁般的革命团结，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敌情观念，严防一小撮叛徒、美蒋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挑拨离间，坚决粉碎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同破坏军民团结、损害人民解放军声誉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巩固伟大的红色长城。要加强战备，严守海防，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战争挑衅，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保卫伟大的祖国，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战斗航程。我们相信，浙江革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浙部队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办好各级、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以“斗批，批修”为纲，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继续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批判无政府主义，做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节约闹革命”的方针，把工农业生产和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们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奋勇前进！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浙江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一九六八年某月某日，张春桥在浙江省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摘要，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

来了几天，只找了一部分同志交换了意见。今天是和同志们交换一些意见，不是作指示。

（当有的同志提出，保守组织承认了错误，能不能联合时）

保守组织承认了错误，基层可以联合，但不能把尾巴翘得高高的，搞对等联合，平起平坐。保守组织根本不应该拉队伍。都可以拉，那还有什么界限？上海赤卫队还能拉？！个人改了可以，队伍不能拉。否则这个革命大联合就得再分裂再联合，为什么要绕那么大的弯？

（当有的同志谈到第一把手问题时）

谁是第一把手的问题，不是看谁安在什么位置上，而是看谁执行毛主席路线，按毛主席思想办事。名义上是第一把手，尽干坏事，那有什么用！刘少奇原来是第几把手！国家主席。现在不是垮了！你原来是第几把手？第七亿把手。现在当了委员。问题不在什么位置，要从实际斗争、实际工作中去看。我在上海说过，如果我是好意的话，我劝你，不要争第一把手；如果我是恶意的话，就推你上去，让你表现无能，很快垮台。但是如果群众要我们干，信任我们，那也不能因为怕垮台就不干。有些干部就是怕犯错误、怕挨整就不干。要勇敢上前线，在斗争中改正错误，为人民立新功。世界上凡是争第一把手的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比如王明、赫鲁晓夫争第一把手，还不是垮了！

（当有人谈到今年二月有股翻案风，把矛头指向造反派时）

一定有人挑动。现在矛头还指向群众，一定有人挑动，我的话百分之百的正确。

（有一些同志汇报了情况，提了一些问题后，张春桥同志作了如下指示）

现在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革命委员会都成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还是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这次批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我这几个月在上海工作，就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紧紧地跟着毛主席，紧紧地

跟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前进，我们的工作就比较顺利；只要我们稍为放松一些，那问题就来了，自己内部就乱了，敌人就高兴了。这个情况可以回溯到去年九月。去年九月上海的形势很好，革命大联合高潮，十月国庆节的时候，我和姚文元同志回到上海，看看形势很好，因此我们两个也就有点放松了，特别是在大好形势面前，就没有具体的抓几件事，把工作布置得具体一些，使主席的最新指示能够得到落实。因此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一个多月样子，上海的局势那是不算好，就乱了。右的东西也出来了，刚刚批判了“揪军的一小撮”啊，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批判了三个东西，批判了极“左”思潮，我们一整极“左”，右的东西就又出来了，“共向东”这样一个思潮就来了，而且他们已经在那里开会啊，准备拉队伍要夺权了。那个夺权就是向造反派夺权了。他就觉得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够坐天下，要坐天下还是我们这些人。这是明显的右的保守思潮。另外极“左”的思潮也来了，另外一种形式出来的。机关里面就利用姚文元同志给主席的信里面关于九大问题的信里面有一段话，就是机关要精简，就利用“机关精简”这个口号要把机关马上分散下去，那就机关的斗批改就不管了，统统要下放，就闹得乌烟瘴气。有些人就要冲市革命委员会了。你们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还没有挨冲，就准备大家冲就是了，总要准备冲的。那个时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就冲了，革命委员会常委在开会，机关干部就来冲了，要求接见，唱着“造反有理”歌来了。实际上是右的，形“左”实右。那么一种乱，这种紊乱，它就弄得联合的组织又垮了，好多组织联合了又垮了，又分裂了。有一批保守组织又想出来了。上海的红卫军又要出来了，要打旗子。街上出大标语，说它要恢复组织。赤卫队也想出来了，上海赤卫队多次想出来，但是因为上海造反派没有分裂，所以有点不敢，总是试探。有次在群众大会上我还讲，我说你这个赤卫队老搞秘密活动干什么，老讲恢复，我说你要恢复就恢复，你没有办公室给你一个。你愿意戴袖章，欢迎，把队伍拉出来，拉出来咱们再干，造反派现在闲着没事，要跟你斗了，出来好了。我这样一说，它开了一个会，说张春桥搞阴谋不能出来，它又不敢出来。所以你们不要那么怕，刚才说的，有些同志感到这个事没办法，让它出来嘛，怕什么？！真理在谁手里，那要在斗争中来检查，人民群众会辩明的。所以我对于拉队伍，我向来是采取这个态度。第一反对，第二不怕。我们是反对的，但你要拉就拉，你要分裂就分裂嘛，这个有什么办法？要武斗，干！我

是不赞成武斗的，但是你要武斗，也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呵！这样把问题想开一点，我看可能胆子壮一些。但是我们自己要考虑好政策，不要只想这一面，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那个时候就考虑这样一个形势，怎么办？我们就首先抓了学习，再重新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强调全面落实主席的最新指示，反复地落实不是一次落实，而是要反复地落实。我们这个时期没有别的口号，就是全面落实主席的最新指示。因为主席在视察中间所谈的话，所作的指示，已经把我们面临的问题都解决了。问题是落实问题，不过片面的落实，不是各取所需，而是原原本本地照主席的指示办。一次学不通，再学一次。我们革命领导干部也好，造反派的战士也好，如果不抓紧学习呀，是非常危险的，我这几天接触中间，我就感到有些同志学习很差。如果要是老早就学习主席的指示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如果学习了以后照主席的办哪也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又不学习，又不照办，那非犯错误不可。有一些组织原来完全是保守组织嘛，早就瘫痪了的、垮了的，为什么又要恢复起来！我觉得没有道理。但是这个问题，一个我们要看走资派那方面的问题，有人挑动；另外一个方面造反派的工作做得不够好，支左部队的工作也有问题，没有在这些中间很好地进行教育，所以才有人能够把队伍拉起来。人家为什么能够拉起来？还不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至少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还是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个主席老早就讲了的，对保守派组织的群众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是艰难的，但只能采取这个方针去争取群众。因为我们可能过去在政策上考虑得不周到，或者不是很注意这个问题。上海保守派的组织当时是很大的，但是他们现在拉不起来呀，我觉得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政策上作了若干措施有关系的。比如说吧，杨富珍是个纺织女工，很有名的，是全国人大代表。因为她有这么高的名望，陈丕显他们就利用她。她刚刚从国外回来，出国了，回来时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利用她的名望发了一个声明支持保守派赤卫队。她稀里糊涂地就支持了赤卫队。她的这个声明，市委就大量印发，影响非常之大，那是直接打击了造反派罗！所以这个人物如何处理就成了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我们就比较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去年二月，我们就帮助杨富珍站出来，我们要树一个标兵，就是杨富珍。这样的一个人，又是劳动模范，又是老工人，但是站错了队，如果把她争取过来，作检讨，站起来揭发批判陈丕显，揭陈丕显如何利用她，这样就可以使一大批老工人，一大批赤卫队

员安下心来，就和造反派不那么对立了。我们就采取了这个措施。造反派就帮助她，我们的思想工作还做得比较细致，先开小会让她把自己的错误认识清楚了，然后叫她去参加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的大会，去发言，面对面的斗争，这样造反派就对她谅解罗！在造反派谅解她以后，就让她参加一些造反派的活动。这个人现在很好。她这样一个标兵就使那些犯过错误的老工人安了心，说我虽然站错了队，不会挨整的，你看杨富珍都站出来了嘛！不会整我的，我应该向杨富珍学习，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使得一批劳动模范安了心，犯错误的劳动模范很多，市委尽量利用这些人，我们就把这些人也争取过来了。老工人、老劳动模范就和造反派站到一起了。这样再有赤卫队的什么头头想拉队伍就不容易拉了，因为他没有这么大的名望。如果杨富珍这些人出来拉，那靠不住呀，她还是很有名望的。

当然还有一个造反派的工作做到得到群众的信任。所以在政策上也值得考虑。一方面我们不赞成他们拉队伍，这个如果我们不正确处理的话，一个我们可能是右的，光讲联合，不讲是非，那是不行的。你是错就是错，你保过就是保过，你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就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你不能现在说你一贯正确，那有这么回事呀？就是造反派，哪个人敢讲一贯正确呀，是不能翻案的。是保守组织就是保守组织，怎么能翻成革命造反派组织呢，如果那样的话，咱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要重写了。这个不行！造反派就是造反派，保守派就是保守派，但是我们允许他改正错误。你队伍已经垮了，就不应该再拉出来，而且还用原来的名字，你那怎么样，你是不是还要打出你那保守派的旗帜呀？而且必须要有自我批评，既然讲是非就应该有自我批评。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都经过自我批评的呀！没有自我批评，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你就变成造反派啦？！那不行的。特别是对有些头头，不过不要喷气式，不要罚跪，那些不要干罗！我讲的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教育的。但他们必须要有自我批评，没有自我批评，那联合起来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我们造反派对他们在政策上有错误，我们也自我批评，这样子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力量对比不一样，有些走资派玩的花头也不完全一样，还是要引导他们把矛头对着走资派，不要对着我们造反派，咱们的共同敌人是刘邓陶。你现在要谁平反呀？是要军管会给你平反，还是要造反派给平反？你自己错了嘛！但是也可能就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你怎么说服也说服不了他，他就是耍干，那我的想法他要干就干吧，你干你

的，我干我的，让他再表演一阵。不一定纠缠在那上面，我们紧紧地掌握着大方向，紧紧地跟着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但是不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始终坚持对他们的争取，是不是用这样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因为这都是最近出现的新问题。据我个人看是和二月逆流翻案有关。因为谭震林在浙江就那么几个人呀？靠不住！我看还可能有一些人念念不忘谭震林哩！浙江省的第一任书记就是谭震林嘛？后来他在华东局嘛！华东局还是管浙江呀！二月逆流他是干将咯！打头阵的，矛头对着中央，对着主席，对着中央文革，口口声声为老干部叫好、抱屈。这些人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所以我们的矛头还是应该对着走资派，不要对着群众，因为这些群众现在还是受蒙蔽的，又是什么老保，还能保个几代吗？！这个完全是煽动原来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群众，这就证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有些群众他背了个包袱，参加过保守组织，将来写档案要写进去了。我们应该向这些群众做好工作这些群众只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他就不是保守派了，只要站过来就好了，这个主席说过的，最新指示里面有的，你可以给他讲嘛！主席讲了的，站错队的，只要站过来就好了，并不是不能回来的，这些主席都讲了的嘛！

革命委员会只能够逐渐地完善。开头我也说过上海的情况，上海是很不完善的，我们希望你们的革命委员会能逐步地完善起来，开头可能不大完善，因为他在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嘛！有一阵保守派想那么闹嘛，就是我刚才讲的赤卫队那段话，是我去年六月时讲的。赤卫队一闹，我们就说过那个话，谁要是想搞反夺权就是否定一月革命，我们支持了这些片面夺权，因为都是造反派夺的权。如果说这些片面夺权都是无效的，那上海就大乱，造反派被人家整，我们只好支持造反派。但是这些造反派的同志啊，你就快点补台嘛！上级支持你，你聪明一点就快补台。噢！他就觉得，你看，市革命委员会支持我们，那你就攻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你就否定一月革命，就压人家，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这个时候就回过头来批评造反派，说你这个不对，多数委员会就接受了这个意见，把大联合解决了，补台问题解决了。

六、一些地区又发生大规模武斗，省革委个别领导人参与阴谋活动

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新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主办《工造总司战报》编辑部《看！王芳、王福堂之流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记温州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 血洗鹿城谁凶手？王、关之流。

王芳及其死党王福堂、关克涛之流，呼风唤雨，兴波作浪，举起血淋淋的指挥刀，向革命造反派杀奔而来。其势之凶猛，真无法形容！

王芳之流为了挽救其日薄西山的命运，施展了种种伎俩，玩弄了种种花招。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但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一年多战火洗炼的造反派面前，都一一告败。于是，王芳之流终于“图穷匕首见”，赤膊上阵了。顷刻，反革命的黑云密集在浙南上空，鹿城到处鬼叫神豪，腥风血雨两交加，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瓯江之滨。

人们打开用鲜血写成的六月史册，就预感到王芳死党关克涛、王福堂之流操纵着他的御用军“温联总”，正在策划着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场惊心动魄的血腥镇压正在孕育着呵。

六月十四日，“新温师”、“新四中”等七、八十名暴徒伙同人民印刷厂保守派，籍口“印传单”毒打该厂生产委员会负责人曹夏春等五同志。后被拉到军管会。谁知军管会接待组的判决是：“限令三天内，人民印刷厂造反派向全市、向军管会作出检讨”。真是打人有功，被打者有罪。助纣为虐，荒唐已极。王芳之流到处煽阴风、点鬼火，对其御用军“温联总”说，“要作好准备。是不是成立纠察队？如果外面有人来冲，就用汽车去挡，挡不住，就辗死他几个，反正都是牛鬼蛇神。”温联总中一小撮坏头头在其主子的授旨下，一边招降纳叛，收罗社会渣滓。招买拳师打手，操兵演马；一面散发着血腥袭袭的传单。什么“踏平温州，血洗鹿城，严阵以待，来犯者有老婆孩子的三思而行”等等。制造恐怖的气氛，大造反革命舆论，流血事件已是一触即发了。

七月十一日，天色阴沉，乌云浮游，温联总匪首叶少华、姚国麟在王芳及其死党关克涛、王福堂的授意和指挥下，拚凑了一个所谓八人小组，同时，一个武装叛乱的方案也随之泡制成了。自七月十二日凌晨起，温联总暴匪就有组织、有计划，抢劫枪枝武器，包围革命造反派。勾结军内一小撮坏蛋，打开了温州最大的战备军火库黄龙山军火库。王芳及其死党关克涛之流指使他的爪牙把枪枝弹药奉送给暴徒——温联总。就这样，全市八个军火库全部被劫，还被温联匪抢劫去

了 TNT 炸药 5700 斤，赤磷 1471 公斤，人民币几顿之多，雷管、手雷等不计其数。暴匪四设防岗，修建工事，警戒森严。处处是荷枪实弹，马嘶人叫。

海风在呼啸，瓯江在怒吼。

七月十九日下午九时正，温联总匪徒兽性大发，架着机枪向南山陶磁厂的革命造反派围剿扫射，工总司战士张银松同志，身中六弹，壮烈牺牲。于是，王芳之流及温联匪中一小撮坏头头所精心策划的武装暴乱的序幕就此揭开了。紧接着，匪徒在几十分钟内便立刻占领了市内的制高点：积谷山和华盖山。身披弹带，手持双枪的匪徒也开始向温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靠近。时钟在一秒一秒地过，暴徒一步一步地靠近。可是在医院里却住着 500 多位病员。有的因为动手术被麻醉而失去了知觉，有的气息奄奄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产妇正因分娩的剧痛而呻吟。怎么办？怎么办！工总司的战士这时向军管会提出了保障医院病员及革命造反派人身安全的正义要求，但是关克涛和王福堂默然不语，拒不表态。就这样，七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数百名匪徒在华盖、积谷两山的火力掩护下，冲进了附医。（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血溅惊飞鸟，硝烟掩蓝天

机枪扫射封锁了附医大门及附近的街道。前后夹攻，匪徒立即控制外科三楼，向门诊部楼上疯狂扫射，投掷手雷。工总司房管兵团王阿汉、姚连福、孙永生等人在附医守护伤员，当即遭到匪徒机枪射击。王阿汉当场中弹牺牲，姚连福头部中弹而死，二十五岁的青年孙永生腹部中弹，医师正在抢救，被匪徒抓走而死。就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工总司、红总司等革命组织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赶来抢救阶级兄弟，可是却遭到温联总匪徒的机枪截击。当场又打死温五中十七岁的红卫兵刘美蓝和文卫总司的蔡鼎武。过路的亦被打伤多人，正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附医革命组织革联站的全体医务人员也被从病房中、手术台旁、门诊室里一个个拖走。被分批押到第五中学，进行拷打和审问。医师俞××被抓去后低血糖病发作，发生休克，昏倒在地上，被匪徒强行拖走。一个没有参加温联总、也没有参加工总司的怀孕的工作人员也被五花大绑拖去毒打。匪徒们的铁棍雨点般落在他们的身上、头上，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真是目不忍睹。正在住院医疗的工总司伤员和在这里守卫伤员的“商总司”、“房管兵团”等五十多名

战士被全部抓走，甚至连温州军管会代表邀请“文卫总司”白求恩战斗团负责人和医师组成的张银松烈士验尸小组，也被匪徒扣押。Wenge wang.org

更加惨无人道的是对无辜的病员亦实施少见的法西斯暴行。匪徒用机枪对着病房扫射，向病房掷手雷、炸药包。小儿科二位病员当场毙亡，外科烧伤很厉害的病员王乐清已连续抢救了好几天，化钱三仟多元，由于医师被抓走，不能抢救而死。一位中毒性腹膜炎妇产科病人孙仲香，血压很低(60—70%M)，靠打针维持生命，也因医务人员被抓走，病情急速恶化而死亡。正在输血、输液、输气的许多病人，由于医务人员被抓走，使他们的生命处在垂危之中，婴儿室被匪徒搞得更惨，婴儿的床位和编号全被搞乱，母亲认不到自己的亲生孩子。住院病号四百多，wenge wang.org 由于医务人员被抓，医疗设备、贵重药品全部被抢、整个医院被破坏，这四百多阶级兄弟被驱散，停止治疗。生命遭到严重的威胁。炮火还在隆隆，战争在继续进行，情况在不断恶化。

二十五日另时另分，一个接一个红绿信号弹划破了漆黑的温州夜空。接着，轻重机枪从四面八方一齐响起。“温联总”匪徒从信河街、松台山、打锣桥口、公园路和解放南路等五个方向对市中心和邮电大楼发动全面进攻。在工总司战士的英勇阻击下，匪徒们不能前进一步。残忍的温联匪暴徒们竟从南门绑架了二十七名无辜群众，捆绑成队，排成人墙，肩架机枪，以作自己的掩体。工总司战士见此不忍开枪，怕打死群众。于是，温联匪们就乘机抢占了伊斯兰、小天津等阵地，廿七位无辜群众见此情景，愤怒填膺，向着工总司的战士高喊，“同志们，不要顾我们，你们快开枪呀！”匪徒又四次用火焰喷射器纵火烧房，最热闹的解放南路、公园路、五马街顿时烟火漫天，海风又猛，真是鸡飞犬叫、天昏地暗。居民扶老携幼背着包袱到处奔窜逃难。匪徒又挨户进行大逮捕，老人小孩也不能幸免，有的当场枪死示众，有的被活活打死，大部分被蒙上眼睛推上汽车整车整车的运送，或秘密杀害，或活埋，或掷在江里。到处是尸首白骨，碧血横流。Wengewang.org

今天已是廿七日了，匪徒死守在最高处——钟楼上，用机枪控制了周围的要道。工总司、商总司的战士几次冲上去都未成功，而光荣牺牲了。钟楼不能拿下，对战士们冲上去是不利的。火线指挥部的一位负责同志焦急的问大家怎么办。一个红卫兵小将斩钉截铁地说：成立爆破组，把钟楼炸开。对，把它炸开，同志们

表示同意了这一看法。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间，这一个红卫兵小将抱着爆破筒冲过去了，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五米，两米，这位红卫兵小将刚要举起爆破筒，突然，一颗无情的炮弹在他的身边炸开了，红卫兵小将躺在血泊中。人们的心弦在急剧的跳跃，人人切齿咬牙，为烈士报仇！喊声振天，使匪徒心惊肉跳。魂不附体。看，又一个冲上去了，冲上去了。隆，火光冲天，钟楼炸开了，匪徒的机枪哑了，匪徒慌作一团。喊爹叫娘，弃枪逃去。“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匪徒再一次在溃败时焚烧邮电分局、新华书店……经过两天两夜，无数的消防队员和救火战士在匪徒的机枪下倒下了，几千间楼房化为了灰烬。居民流离失所，子散妻离，真是：有家不能归。有厂不能回。

wengewang.org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革命造反派战士想念毛泽东，盼呀，盼星星，盼月亮，盼望亲人解放军。八月一日深夜十二时，解放军进驻温州城。

毛主席亲自派来的 65 17 部队来温的消息传遍了鹿城的每一个角落。革命造反派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凌晨，无数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走上街头，张贴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语。可是，惨无人道的“温联总”匪徒竟用机枪扫射，无数的战士和群众倒下了，碧血染红了标语。关克涛王福堂见机不妙、马上召集“温联总”头头在雪山秘密开会，阴谋策划对付 65 17 部队，扬言要吃掉 65 17 部队，来多少吃多少，真是胆大包天，嚣张至极，妄图垂死挣扎。全城风声鹤泪，草木皆兵，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挨门登记，企图继续与人民为敌。残暴的“温联总”匪徒为了残杀革命造反派，为了扑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他们把抓去的人都关在人间地狱——集中营里。温州医学院集中营，是关押“罪恶”最严重的一个地狱。在集中营内通往大门口的路面上，布下排排小尖刀。许多难友赤脚跨刀山，脚板划开条条血口，血染黄沙，疼痛穿心。这真是“跨进鬼门关，鲜血流一滩。” wengewang.org

集中营里为“犯人”设计的清规戒律多如牛毛，就是大小便，也不准叫“报告”违者挨打，而只能“举手”，存心刁难的狱吏又故装作没看见，弄得许多人只好把屎尿拉在裤裆里。受过酷刑生了病的人，不准呻吟，“哼”一声就招来一顿打。古云：蜀遭难，难如上青天，然而，“犯人”平日想讨点水喝比蜀道尚难

呵！杀人，已经成为这群野兽的游戏。匪徒为了“教育”“犯人”，经常拉人出去当众活活打死。残忍啦，鹿城倒退到希特勒时代的集中营。

深夜，每间牢房里传来了劈劈拍拍的皮鞭声，多少阶级兄弟在痛苦中渡过这漫长的黑夜呵！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就有斗争。他们没有被匪徒的淫威吓倒。地狱里燃起了熊熊的斗争烈火。巧妙地建立了各牢房之间的秘密联系，互通情报，传递小纸条相互鼓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位卫校东风红卫兵小将鼓励难友同志：我们是革命者，不怕坐牢砍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胜利！”他还低声崇敬地朗诵毛主席的诗词：“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wengewang.org

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在腥风血雨的岁月里同敌人作殊死斗争的《总司》战士，多么想念您！

同志们每天定时学习最高指示，唱主席语录歌，唱《东方红》，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匪徒们涌来干涉，歇斯底里号叫：“不准读，不准唱！”可是，这群历史舞台上的小丑的声音象蚊子一般，岂能干扰震撼大地的春雷！

八月十三日早晨。叛匪红楼指挥部乱成一团，惊慌异常。上午十时，匪徒在各牢房内摆上集束手榴弹，楼下的操场里架设了机枪。

分批大屠杀开始了。一群匪徒冲进四号楼房，带走了六位难友。九分钟后，楼下就传来了枪声和六位难友最后的口号声。楼下牢房的战友这时高声朗读起毛主席语录：“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段语录刚念完，匪徒的冲锋枪就朝牢室里扫开了。wengewang.org

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快来吧！快来吧，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忽然，集中营外面枪声大作，“拍拍！”牢门被打开了，一位解放军战士高喊着“同志们，你们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整座集中营。地狱，被炸碎了。呼声震撼着东海，海在呼啸。难友们用激动得发抖的双手扯下蒙眼布，交错着悲欢的眼泪象泉水般涌出来……。

“温联匪”在溃败逃窜之际，砸毁了发电厂和自来水厂，全城枯干漆黑。残忍的暴徒又一次纵火焚烧鹿城，雄伟的温州城又一次硝烟冲天，火海一片。

匪徒们往近郊牛山一带窜逃，企图死守。可怜近郊人民沦陷在暴徒之手，在白色恐怖中挣扎。

温州市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温联总中一小撮坏头头恶贯满盈，真是罄南山之竹为纸，决东海之波为墨，难书匪徒罪恶之万一。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把仇恨凝集在刀尖上，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向温州地区一小撮“走资派”冲去。直捣黄龙府，绞死王芳之流！

王芳之流终究是舞台上的匆匆过客，胜利定然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wengewang.org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自新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主办《工造总司战报》温州第一期，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

六、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从三月二十一日起，先后来到毛主席、党中央身边开会。一个月来，我们首先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还听取和学习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指示。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许世友同志的主持和帮助下，我们联系浙江省的实际，愤怒地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这使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四月十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重要指示，这是对浙江广大军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并进一步为我们指明了解决浙江问题的方向。我们表示热烈拥护，坚决贯彻执行。现将有关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浙江表现得十分尖锐。林陈反党集团在《“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

中对浙江十分重视。林贼死党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维国、王飞、胡萍、鲁珉、李伟信、刘锦平、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搞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并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粉碎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浙江省广大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一系列文件精神，逐步深入地开展了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总的形势是好的。通过这场斗争，使全省军民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真面目，激起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促进了战备，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自批陈整风以来，特别是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以种种手法，错误地打保票、捂盖子，对抗中央指示，压制群众揭发问题，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在检查交代中初步认识到，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月来，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耐心启发教育和与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态度逐渐好转，认识逐步提高。他们已检查交代的主要问题是：早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期间，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就秉承黄永胜、吴法宪背着中央向他们下达的黑“指示”，不顾大局，以“胜利者”自居，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南萍同志支持了林彪一伙“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配合林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同志继续充当林陈反党集团的吹鼓手，吹捧林贼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激动人心”。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在引用党章原文时竟又加上“三个副词”，篡改了党章。并在许多文章、讲话中，宣扬了“天才论”。尤为严重的是，直到去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等人，言听计从，积极投

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他们同陈励耘一起，根据黄永胜、吴法宪的决定，花二千余万元在杭州为林贼修建了“行宫”。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多次指示听不进去，而接受了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等人的挑动，反对南京军区领导，阻挠舟山问题解决，分裂军队，破坏团结。我们认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的这些检查，同刚来京时比较，是有进步的。但是，检查还不够深刻。他们表示，回浙江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彻底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同时，把自己摆进去，接受群众的教育帮助，并作进一步检查。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为了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解决浙江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搞深搞透。各级党委一定要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抓紧抓细抓到底。通过这场斗争，提高“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彻底揭发林彪一伙的罪行。

首先召开包括省军区、二十军、空五军、海军、舟嵎要塞区等主要负责同志在内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第二步，扩大到地委常委和部队师以上干部，传达学习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并联系浙江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自己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要向会议进行检查交代，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第三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县、团一级。关于如何向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部队指战员传达的问题，将另行请示。

在传达过程中，必须强调：浙江省广大军民，包括空五军、二十军指战员在内，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的所谓“根据地”、“固守浙江”、“基本力量”和“可借力量”，只不过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陈励耘那么一小撮。在浙江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个别人。在揭发批判个别领导同志所犯的错误时，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只要犯错误的同志认真检讨和交代问题，愿意改正错误，同林彪、陈励耘一伙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就应当欢迎。要严格地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

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要搞人人过关。对于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应和同志们一道，起来揭发批判，吸取教训。同时，要特别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以大局为重，防止反复。

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革命团结。几年以来驻浙部队，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现在，“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切实改进三支两军工作，军队支左人员一律归地方党委统一领导。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各级党委的军事部门，凡涉及全局的一切重大问题，如战备、民兵、征兵、复员退伍安置等工作，均应向地方党委请示报告。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统一部署和实施。地方党委要关心部队和民兵工作，“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要经常地扎扎实实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地方党委应把地区性的工作，通知所在地的驻军；军队应主动配合，大力协助，经常主动征求地方的意见，听取对部队的批评。

毛主席缔造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整体。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破坏军队的团结，妄图分裂驻浙部队。我们要遵照毛主席“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的指示，使陆海空三军各部队亲密团结，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的战斗任务。驻浙各部队都要尊重南京军区党委的领导。

遵照毛主席关于“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的教导，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政、军民、军队之间，有问题要主动商量，有意见要及时交换，有困难要互相帮助，有缺点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受骗上当，沾了边的，甚至陷得比较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团结他们、相信他们。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以路线为纲，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要把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在省委领导下，建立专案清查小组，依靠群众彻底查清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在浙江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按照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扎扎实实地把浙江的工农业生产搞好。现在春耕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各级党组织切记勿违农时。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做好民兵工作“三落实”，随时准备歼灭敢于来犯之敌。

由于浙江情况比较复杂，为把这场斗争进行得更好，必须加强领导，除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外，建议中央派人指导帮助。

以上报告，请批示。

南萍 熊应堂 铁瑛王子达 白宗善 马龙张孝烈 万振西 夏琦
侯建新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原题为：中共中央批语）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转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1972.04.25；中发 [1972] 16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浙江省委：

中央同意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浙江实际，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步骤地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认为，驻浙部队、浙江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南萍、熊应堂两同志。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认真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党还是予以信任的。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浙江地处海防斗争前线。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克服无政府主义。要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1972.06.28；省委 [1972] 9 号

省委扩大会议，从六月七日开始，到今天结束，历时二十二天。参加会议的共三千零三十八人。会议传达和学习了毛主席四月十五日、二十五日两次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指示和中央 [1972] 4 号、12 号、16 号文件。许世友同志和王洪文同志到会多次作了指示。到会同志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决策，英明正确，非常适时，完全表达了全省军民的热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一致表示衷心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一）会议收获

这次会议，认真贯彻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 16 号文件。到会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以《“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为背景，群情激愤，斗志昂扬，狠揭狠批了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狠揭狠批了南萍、熊应堂两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通过揭发批判，到会同志划清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界限，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大家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

导，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会议开得是好的，发展是健康的。

第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浙江表现得十分尖锐。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拼凑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他们在杭州策划了《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框框，为林贼建造了指挥反革命政变的“行宫”，干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勾当。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妄图在江浙一带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到会同志以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对林贼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揭发批判。越揭，对林贼及其死党越恨；越揭，越感到这场斗争非搞不可。通过揭发批判，大大增强了把对林彪反党集团斗争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深入揭发批判了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

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南、熊多次拒绝、对抗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教育，以种种恶劣手段，打保票，定调子，捂盖子，压制群众，阻挠和破坏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基础上，根据中央 16 号文件的精神，经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事实证明，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南、熊同林贼死党陈励耘一伙，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走在一条黑线上，坐在一条贼船上，陷得很深。正如同志们所说：问题越揭越深，南、熊的面目也越看越清。过去南、熊把自己打扮成“浙江正确路线的代表”，现在看穿了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林彪反党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过去南、熊宣扬同陈励耘是有“斗争”的，现在看穿了他们是互相勾结，疯狂向党进攻；过去南、熊伪装“老实”，现在看穿了他们欺上骗下，搞阴谋诡计，是典型的两面派。

第三，进一步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使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思想和政治路线

方面的教育。经过这场斗争，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和“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理解，提高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同志们说，过去南、熊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欺骗了不少同志，现在认清了他们的丑恶本质，决心从政治上，思想上同他们划清界限，积极投入斗争。所有这些，都为彻底揭开我省阶级斗争盖子，解决好浙江问题，肃清林彪反党路线的流毒，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第四，开始造成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风气，增强了革命团结。

到会同志认真学习了中央文件，掌握思想武器，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什么是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大家以大局为重，搞党性，不搞派性，着重从路线上分清大是大非。对跟着南、熊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不打横炮，不搞人人过关，不搞个人恩怨，鼓励他们积极投入到斗争中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会议的主流是好的。但是，发展不够平衡。有的同志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态度不够端正，个别同志也出现过一些急躁、抵触情绪。这主要是由于省委常委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引导不够。

（二）南萍、熊应堂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会议揭发和初步查证的大量事实证明，南、熊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不仅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而且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又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浙江的黑后台，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第一，在“九大”期间，南萍伙同陈励耘，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阴谋活动。

“九大”前，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期间，南、熊就同黄永胜、吴法宪秘密勾结，黄、吴背着中央向他们作了黑指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开幕前，南萍就在我省“九大”代表中灌输分裂主义思想。会议开始后，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四月十二日，

南萍抓住许世友同志在毛主席接见部分同志时的一句插话，恶意歪曲，攻击许世友同志的话“是放毒，要批判”，要每个代表表态。大会进入酝酿候选人时，南萍竭力污蔑、诽谤中央某些老同志，煽动代表反对这些老同志为候选人。毛主席指示要把这些老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南萍却根据林彪黑司令部的旨意，规定对这些老同志“得票只能半数多一点”，并在浙江代表中具体布置谁投反对票，谁投赞成票。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陈励耘暴跳如雷，盗用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一两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并借此大肆煽动代表反对南京军区。“九大”以后，南、熊利用传达“九大”精神的机会，继续恶毒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是“老右”、“老机”，破坏“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大搞分裂活动。

第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猖狂向党进攻。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主席作过多次明确的指示，南萍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对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却完全按照林彪的旨意，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为林彪抢班夺权大卖力气。

早在二中全会前夕，江腾蛟就叫陈励耘“做南萍的工作”，要在二中全会上坚持设国家主席。八月十一日，黄永胜跟周总理陪外宾来杭时，背着总理，深夜找南萍和陈励耘密谈，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向他们交了“底”。八月二十三日，林彪抛出了他的反党动员令，南萍和陈励耘都说这是“有所指”的。同时，他们和王维国两次秘密开会，进行阴谋活动。二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华东大组会上对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一次作了明确解释，并当面批评了陈励耘。但是，二十五日华北组的反革命简报一出笼，南萍就同陈励耘密商赶写反党发言稿。陈励耘根据吴法宪的黑指示，进一步向他交“底”说：“国家总得有个主席，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萍心领神会：“只要设了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肯定是林彪当，林当了，于自己有利。”所以，在这天下午的大组会上，当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狂叫要设国家主席，疯狂向党进攻时，南萍当即表示陈励耘的发言“是代表浙江小组的”，紧接着抛出了自己的反党发言。直到毛主席戳穿了林

贼的阴谋后，八月二十六日，他们还盗用浙江小组名义，由陈励耘口述，南萍执笔，再次写信向中央“表态”，顽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这“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的，继续向党进攻。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了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1) 加紧推行对林贼“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黑方针，大造反革命舆论，狂热吹捧林贼。

南、熊多次鼓吹要突出宣传“接班人”的问题。早在一九七〇年六月八日，南萍在各地区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就布置“要深入宣传接班人”，说：“现在是不是人家都那么服气了？不见得，所以我们要突出宣传这个问题。”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熊应堂也胡说什么对林贼的“宣传少了”，“党章上规定了，不一定都拥护”。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违背中央规定，私自复写和带回了林贼的“八·二三”反党讲话，在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的会议上全文传达。九月十一日，南萍和陈励耘盗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什么听了林贼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以后南萍还把这个讲话成段地塞进省党代大会工作报告和一些会议的讲话中。直到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南萍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继续鼓吹林贼的讲话“很重要”，“林×××讲的三个副词还是完全对的”，顽固坚持林贼的反党纲领。

南、熊伙同陈励耘利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大会，进行了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全面部署。从工作报告到会场布置，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会场门口挂的林贼和毛主席并立的巨幅画像，是南萍亲自选定的。南萍在会议上的报告，是他亲自交待按照吴法宪、李作鹏在空、海军“积代会”上报告的调子起草，并逐稿审阅，反复修改的。省党代大会后，南、熊利用会议、文件、报刊、书籍、广播、戏剧，展览等各种形式，吹捧林贼达到了高潮，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

(2) 南萍，熊应堂同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江腾蛟、周赤萍、王维国、于新野等早有勾结，随着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加紧实施，他们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勾结更加紧密。

近几年来，南、熊到上海，总是住空四军巨鹿路招待所（南住过八次，熊住过六次），大搞政治交易。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七日，王维国在宴请南萍夫妇和林贼死党 xxx 等人时说：“我们是一个观点，一家人。”南萍说：“我们是一家人。”时过不久，王维国带口信给南萍说：“要注意身体，不要人家打不倒自倒，人家没夺权就让权了。”一九七〇年国庆节，王维国夫妇为鲁珉一家、熊应堂一家举行“家宴”。鲁珉老婆敬酒时说，“为林 xxx 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干杯。”熊应堂同她碰杯，互相吹捧。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林立果来杭以前，陈励耘给南萍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切正在准备中，据说需亲开嘎斯—69，我这里没有这种新车，请速从省战备车中调拨一辆。”南萍在信上批示：“速予调拨。”同年七月，陈励耘还把林贼送给他的芒果转送南、熊，“分享幸福”。

特别是当林贼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加紧实施武装政变的时候，南、熊同林贼的一些死党分子打得更加火热，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一九七一年二月南萍到北京开会时，特地找江腾蛟密谈数小时。三月，周赤萍以“养病”为名来杭，南、熊热情接待，周还送了三本吹捧林贼的黑书给南萍。七月中旬，南萍到上海，王维国派×××、×××等到上海郊外十多里处迎候。七月三十一日，王维国等同南萍在空四军指挥员值班室密谈两小时，然后大加宴请。宴会上，王维国对南萍说：“记得你过去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风浪，我们要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南萍说：“向空四军学习。”在此前后，南、熊频繁活动，从七月六日到八月七日，他们亲自指名，分别召开了多次很不正常的会议，分析形势，布置任务。南萍说，“现在出现一股风，要注意，要顶住。部队要稳定，机关要稳定。大家要承担很重的担子，遇到困难不要后退，越是困难越要去斗争，遇到困难要看到胜利。”熊应堂说：“我们现在都在经受考验，经受复杂斗争的考验，准备迎接困难”。这同林贼死党的黑话“要准备迎接重大的政治风暴”，如出一辙。

(3) 在军事上，有许多行动是同林贼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相一致的。

南萍过去很少过问军事工作，但一九七一年八月初从王维国处回来后，却突然察看了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坑道和二十军指挥所坑道。

一九七〇年二月，熊应堂和陈励耘密谋后，把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变成“合成指挥所”，把封闭的坑道三、四口扩大幅员，作为空五军指挥所。接着，周建平

来杭，进行了具体勘察，并提出要在指挥所附近修建一个直升飞机场。吴法宪专为此事向南、熊表示“感谢”。这一工程南京军区和总参均不同意，而熊应堂却欺骗南京军区，调动两个营的兵力，强令加速施工，限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底完工，但林贼自我爆炸后，南、熊却撒手不管了。南、熊和陈励耘为林贼修建的“704工程”，设有作战室、地堡和直升飞机场，是林贼搞反革命政变的指挥所。现已查明，这个工程完全是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由南、熊和陈励耘三人共同策划的。他们一起看了地形，审阅了图纸和模型，批了建设经费。南萍在布置这个工程设计任务时说：完成这个工程“是个政治任务”，“是对世界人民作出贡献”，“房子本身就是战备工程”，“工程本身就是为了打仗”，“要保一辈子密”。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他们两次开会，限定八月底完工。

《“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提出：“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南、熊积极配合，派人为空五军进行捕俘、格斗、步兵战术、步兵打坦克骨干训练。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周建平以研究浙东南空军协同作战为名，窜到杭州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南、熊与周建平多次接触。在协同会议上，周建平提出“浙江陆、海、空三军要归南政委、熊司令统一指挥”，南萍提出要建立“联合指挥部”，熊应堂还叫省军区、二十军向周建平汇报了作战方案。他们决定把“联合指挥部”放在省军区前指。这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控制驻浙陆、海、空三军，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一个大阴谋。

一九七〇年，南、熊根据林贼“六大块四小块”的黑指示，擅自将中央定的建设多年的××小三线向××转移。同时他们与陈励耘密谋把二十军、空五军、省革委会的后方基地放在××山区，与空四军后方基地紧靠一起。

（4）“九·一三”前夕，南萍、熊应堂的一些活动，有参与林贼妄图谋害毛主席罪恶阴谋的重大嫌疑。

早在一九七〇年，南、熊和陈励耘密谋策划，由南、熊具名写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将警卫大权交给了陈励耘，使××处成了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来杭，×日中午中央直接通知了南萍，但南萍延至下午五时许才布置警卫，致使许多地方的警卫人员不能及时到达岗位。

特别严重的是，南、熊明知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阴谋活动，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点了他的名，但仍把主席的警卫工作交给陈励耘控制。

九月×日下午，于新野窜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贼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当晚，南、熊同陈励耘三人借机在××室密谈了一个多小时。

九日下午，南、熊一反常例，提前于一时开省委常委，到三时一刻结束，会后不带秘书，不告诉任何人，也不坐自己的车子，匆忙而去，形迹可疑。南萍在检查中谎称是向×××同志汇报警卫工作，但据揭发，南、熊是和陈励耘一起在××处进行长时间密谈。十一日上午，他们三人又进行了一次密谈，至今拒不交代。

毛主席离杭时，明确告诉南、熊和陈励耘不要去送，但陈励耘坚持要送，南、熊不加制止。据几方面揭发，陈励耘是带着两支手枪去“迎”“送”主席的。这一严重问题，正在进一步审查。

第四，同“五·一六”分子勾结一起，密谋策划，进行反党乱军活动。

一九六七年，“五·一六”分子林岗等人领受王、关、戚的黑指示，三次窜到浙江。南萍和陈励耘多次接见他们，让他们参加军管会的重要会议，安排他们住到公安机关，听凭他们在专政机构内部盗窃机密，收集、整理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经过南萍和陈励耘审阅后交给了关锋、戚本禹。

南萍和陈励耘与林岗等人共同策划，大刮揪军内一小撮的妖风，要在浙江搞出一个“揪军内一小撮的样板”。他们勾结南京军区下放干部组织的“批资总部”，对抗毛主席指示，反对南京军区领导和许世友同志。他们对抗中央关于军以下机关不开展“四大”的指示，插手驻浙部队，煽动军内起来“造反”。在他们的策划下，省军区部队从上到下，纷纷建立“批资”组织，非法开展“四大”，揪斗各级干部。他们公然支持舟嵎部队中少数不守纪律的分子搞“四大”，造舟嵎要塞区党委的反，南萍说“革命那有经过批准的”，“你们的大方向完全正确”。

南、熊伙同林岗等人，策划和挑起了一系列武斗事件，甚至发放武器，动用部队，开枪镇压群众，以致全省武斗不断升级，造成了严重恶果。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中，南，熊极力抵制，定了许多框框，束缚群众手脚，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使我省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始终开展不起来。

第五，反对“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制造分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南萍、熊应堂秉承黄永胜、吴法宪黑旨意，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分裂军队。他们大反南京军区领导，长期阻挠舟山问题的解决。他们不但破坏部队与部队之间的团结，而且在部队内部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对省军区，他们建立了“党办”、“学办”，凌驾于党委和司、政、后之上，搞单线领导，严密控制。他们妄图通过搞驻浙陆、海、空三军“团结”决议，统帅驻浙部队，夺南京军区的权，为林贼“一块一块拿到手”效劳。

南萍、熊应堂极力阻挠和破坏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分裂干部、群众。他们对抗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多次指示，对有些已经审查清楚的干部迟迟不予解放，解放了的也不妥善安排使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会上，他们还提出批判所谓“黑三论”（主要矛盾转化论，依靠对象变化论、三气有理论），公开对抗批陈整风，破坏一打三反运动，把有些已经站出来的干部重又打下去。他们违背党对群众组织的政策，支一派压一派，打击不同观点的群众。

南、熊否定十七年来公安工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硬说浙江的公检法是“特情专政”，把全部特情名单公布于众，进行批斗，同时大砍劳改单位，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对敌斗争的一些必要手段作为通敌的罪证，伪造证据，欺骗中央。去年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以后，他们对抗毛主席指示，封锁总理的批评，一意孤行，不思悔改。

几年来，南萍、熊应堂封锁，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极力推行林彪的反党路线，在全省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破坏了军队之间、军民之间、军政之间的革命团结；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正常生活；在农村大搞形“左”实右，破坏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经济政策，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有些地方坏人当道，好人受气，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损失。

在林贼自我爆炸以后，毛主席、党中央等待了南萍，熊应堂半年之久，他们不但不觉悟，反而千方百计定调子，捂盖子，对抗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多次

批评。中央调他们到北京解决浙江问题，他们却收集黑材料，准备“打官司”；讲假话，欺骗中央。回来后，经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扩大会议，在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和帮助教育下，南、熊虽然被迫承认了一些事实，但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没有向党交心，态度很不老实。

（三）必须进一步统一的几个认识问题

第一，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严重、最深刻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路线，集中反映了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反革命复辟的愿望。如果让林贼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将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地、富、反、坏、右一起上台，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南、熊积极投靠林贼，参与了一系列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生死大搏斗，是政变反政变，复辟反复辟的严重斗争。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关系到浙江三千三百万军民的根本利益的一场斗争。我们要站在党性立场上，从路线斗争高度来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质和意义，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划清界限，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到底，同南、熊的严重错误和罪行作坚决的斗争。如果站在派性立场上，从个人得失来看问题，那就会模糊这场斗争的性质，走到邪路上去，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

南、熊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下贼船。只要他们向党和群众交心，彻底交代问题，坚决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我们还是欢迎的。至于能不能把他们拉过来，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

第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同全国各地一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全省广大军民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过去，南、熊贪天之功为己功，把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事实恰恰相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熊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有许多干扰和破坏的。他们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决不是偶然的，不但有阶级根源，而且有历史根源。大量事实证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熊就逐步投靠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他们的反党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到一九六九年的一月会议，他们就上了贼船，在反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能割断历史看问题。我们揭发南、熊的错误和罪行，必须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但也必然要联系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办事，揭发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罪行，决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相反，它只会促使我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真正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促进大好形势的发展。

第三，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增强革命团结。

毛主席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驻浙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成绩是很大的。浙江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要团结不要分裂的。过去有些群众组织之间，存在一些隔阂和对立，有些群众过去受了压，肚里有点气，有些群众还有派性，这是林贼死党陈励耘一伙的破坏和南、熊推行林彪反党路线的结果。要把这笔账记在林贼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身上，记在南、熊身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我们不团结，阶级敌人就会乘机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大好形势。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有些同志过去在南，熊的影响下，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执行了错误路线，这是受骗上当的问题。对这些同志，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热情帮助，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转好弯子，也应当允许他们有个认识过程。这些同志自己应当端正态度，站稳立场，和群众站在一起，积极揭发批判，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划清界限，接受教训，改正错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取得主动权。有些同志过去受了压，挨了整，应当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要集中目标，重点解决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

我们相信，通过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全省广大军民必将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激发战斗意志，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今后意见

扩大传达中央〔1972〕16号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县为单位，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充分发动群众，组织揭发批判，时间十天左右。第二步，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工人、社员，主要是正面教育，也要进行揭发批判。

省级机关和杭州市先传达到党员、干部，然后传达到工人、社员。

驻浙部队，第一步，以团为单位，传达到排以上党员干部；第二步，传达到全体指战员。具体安排，由军以上单位自定。各军分区、县人武部分别由地、县委统一组织贯彻。

在传达贯彻中，要坚决按照16号文件和许世友同志、王洪文同志的指示去办，切实掌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抓紧、抓细、抓好。要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实际，大揭大批，不能捂盖子。通过这场斗争，提高“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革命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把各项工作促上去。

第二，认真学习中央 [1972] 16 号文件，弄通精神实质，坚决贯彻执行。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搞人人过关，不搞个人恩怨，始终把矛头指向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揭发批判南、熊的问题，养成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好风气。对贯彻中暴露出来的政策问题，要从全局出发，加强调查研究，弄清情况，经过请示批准，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第三，以路线为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传达贯彻期间，各级党委要分成两套班子，科学分工，既要贯彻好中央 16 号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又要扎扎实实把当前工农业生产搞好，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夏收夏种大忙季节即将到来，各地一定要不违农时，集中力量把这一仗打好。

第四，要保持军队和社会的稳定，防止反复。浙江地处海防前线，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排除“左”右干扰，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各级领导要转变作风，深入实际，经常分析党内外思想情况，注意阶级斗争动向，发现问题，抓紧解决。要加强组织纪律性，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要贴大字报。重要揭发材料可直送省委专案组。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复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报告悉。

中央同意你们根据主席、中央指示原则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职审查的决定。经过你们审查后，可派负责干部护送南、熊两人来京交中央专案组继续审查。

中 共 中 央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浙江省委传达中央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职审查的决定

1972.07.02；省委 [1972] 11 号

各地（市）、县委（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批复印发给你们，请你们随同中共中央 [1972] 16 号文件，按省委既定的传达步骤，同时向下传达。

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1975.07.17； 中发 [1975] 16 号

中共中央认为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浙江省问题的决定

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浙江省的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人民公社社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党中央和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路线觉悟普遍提高，“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工农与各大战线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全省呈现了一片大好形势。

正当全省人民意气风发，鼓足干劲，发展大好形势，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批孔”革命运动时，以林彪、刘少奇一伙在浙江省死党为首的一小撮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它们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狼狈为奸，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最近以来，它们肆意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纠起宗派斗争，挑起武斗，刮起经济主义妖风，制造事端，中断水电供应，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袭击部队，袭击公安部门，抢劫国家资财，以至杀人、放火、放毒、不顾中央指示，一再进行反革命宣传，搞反革命暴动。不仅严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并且破坏了社

会治安和国家财产及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此中央和国务院特对浙江省作成如下决定：

（一）以谭启龙为首的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党委，是执行正确的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是信任的，但对于他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只能通过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以利改正。

（二）派出工作组（队）是否正确的问题，不在派出工作组（队）的决定，在于工作组（队）是执行什么路线政策的问题。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派出工作组（队）协助基层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须防止任何阶级敌人利用工作组（队）的缺点错误削弱党的领导。

（三）铁瑛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即使是夏琦同志，只要不是坚持不改，或继续在错误路线上走，也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帮助，做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搞好党内团结的目的。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是捍卫无产阶级的强大堡垒，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任何削弱、破坏和分裂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关系的言行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为此，中央希望浙江省广大指战员必须牢记“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光荣传统，拥政爱民，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提高警惕，坚决粉碎一切阶级敌人妄图破坏军队内部团结的卑劣阴谋。

（五）中央重申，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组织派别活动，已成立者必须立即解散，并不得借故重新组织，或搞名亡实存的派别组织，对于由坏人组织操纵、或混进坏人的组织，必须予以取缔，首恶者依法惩办，对群众则予教育，既往不咎。

（六）中央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指战员，公安机关、广大工人、农村公社民兵，在浙江省委、浙江省军区的领导下，坚决镇压一切破坏生产，制造交通事故、挑起武斗、干扰运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反革命暴动的反革命分子和一切证据确凿的杀人、放火、放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阴谋篡夺领导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凡抗拒者应予立即逮捕法办。

(七)浙江省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应在解放军驻厂部队和工作组的协助下，尽快恢复生产。有关未能解决的工资纠纷，必须通过进一步学习和协商，以达逐步解决，学生应以学为主，搞好本单位革命，不要参加社会上的派性斗争，也不要干扰工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张永生反革命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浙检一起字(79)9号

被告张永生，男，三十九岁，安徽省含山县人，家庭出身手工业工人，本人成分学生，原系浙江美术学院学生，一九六九年五月混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窃取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委员等职。一九七五年十月调离浙江下放河北农村劳动。一九七七年二月因反革命一案，经党中央批准，押回浙江审查。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依法逮捕，现在押。

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和公安机关的专案调查，经本院审理，证实被告犯有下列主要罪行：

一、张永生出于反革命本性，肆无忌惮地进行挑拨、煽动，制造各种事端，诽谤诬蔑和陷害从中央到地方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收集和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挑拨和离间人民与人民，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团结，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

二、张永生投靠、追随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搞打砸抢，镇压革命群众。他竭力鼓吹江青的“文攻武卫”“不仅有国内意义，而且有国际意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条新鲜经验”，并书写黑文，大肆宣场。纠集打砸抢分子，拼凑“飞虎队”、“西湖纵队”等打手队。一九六七年他与陈励耘、X X等人秘密策划，制造了闻名全省武装镇压肖山、富阳等地革命群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其中肖山县打死二十七人，绝大部分是抓去后活活打死的；富阳县打死一百三十五人，打伤致残的三百一十九人，烧毁房屋一千二百余间，被砸单位一百六十六个，受害家庭二千零五户。一九六八年八月，他伙同 xxx 等人，带领所谓“宣传队”去浙南，血腥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仅丽

水大港头一地，就打死群众十一人。一九七四年，伙同反革命分子翁森鹤、贺贤春策划后，逼迫省委在全省五十九个县市(区)建立了反革命第二武装，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同年十二月，窜到金华、巨县等地策划破坏中央关于收缴武器指示的贯彻、执行。指使该地帮派头头私藏武器，继续打砸抢。仅金华县城关镇一地，被砸抢的就有三百多户，打伤二百多人，打死二十九人。

三、张永生长期以来，竭力追随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他投机钻营，为林彪、“四人帮”所赏识，得到“四人帮”多次接见，向“四人帮”提供大量黑材料，仅查获的表忠信、告密信就有三十三件之多。

在贯彻中央(72)十六号文件时，多方破坏抵制批林整风，竭力反对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一九七三年十月，伙同翁森鹤、贺贤春，组织“控告团”、“上访团”结帮发难，冲击党委，并先后以强行释放杀人犯张全千和杨金林为“突破口”，带头掀起了一股全省性反革命的“闹监”翻案风。据不完全统计，被强行释放了的在押杀人犯就有一百七十四名，造成严重恶果。we ngewang.org

一九七四年四月为首策划召开省“三全会”，层层揪“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同时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篡夺各级党委的领导权。伙同翁森鹤、贺贤春一次就突击提干五十余名，安插在省级各部门控制党政财文大权，并以浙江美术学院为点，成立“双突”党委的样板，流毒全省，使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权曾一度被篡夺。革命和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一九七六年三月，他坐镇北京，与冯仰澄等人遥控指挥浙江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他竭力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推销“四人帮”授意炮制的“批邓联纪打谭”的黑方针，大翻中央(75)十六号文件的案，策划召开翻案复辟的“省两全会”。疯狂扬言“拼出一条命同走资派斗”，“就是咬掉几只牙也不能放过那些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要尖、要硬、要韧，要像一把锋利的刺刀”，狂妄宣称“要抓住战机”，“向走资派再一次夺权”。紧密配合“四人帮”，妄图打倒各级革命领导干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四、张永生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策划反革命应变活动。“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将大批黑材料转移至北京，后又将其中的一大批偷运到杭州。并与同伙统一口径，订立攻守同盟，负隅顽抗。扬言“不上他们的当，就是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也不讲”。还指使省广播电台徐力印制反革命传单，到南京、广州、南昌、上海等城市散发，疯狂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他召开黑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表示“反正是个死”，要“发动一些人，豁出命来干一场”。疯狂叫嚣“准备丢掉一切幻想去斗争，乞求是条死路”，要“上山打游击”，“把造反派串连起来，坚持和他们斗”等。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此外，张永生道德败坏，生活腐化，长期与两名有夫之妇乱搞男女关系，破坏他人婚姻家庭。

张永生被依法逮捕后，对要害问题，有的避重就轻，有的拒不交代，认罪态度极差。

本院认为：被告张永生思想极端反动，在“四人帮”的怂恿和支持下，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目的，疯狂地把矛头指向我们的党，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是我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重要头目，是大乱整个浙江的罪魁祸首之一，是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打砸抢策划者和指挥者，是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全民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总任务的顺利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第十八条的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予依法判处。w

engewang.org

此致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杭法刑初字(79)第 5 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罪犯张永生，男，三十九岁，安徽省含山县人，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分学生，原系浙江美术学院学生，一九六九年五月混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窃取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委员等职。一九七五年十月调离浙江下放劳动，现在押。

案由：现行反革命。

案经广大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公安机关调查、预审，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审理，查明：

罪犯张永生，思想极端反动，野心勃勃，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怂恿和支持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搞篡党夺权反革命活动，犯下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张犯积极投靠、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纠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杀人犯、流氓阿飞等坏人，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搞打砸抢，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一九六七年以来不断与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浙江的死党及其代理人秘密策划，多次制造武装镇压广大革命群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仅肖山、丽水、诸暨等地就被打死打伤六百余人，烧毁大批民房，造成不少干部、群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九七四年，张犯伙同反革命分子翁森鹤、贺贤春，在全省普遍建立了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第二武装，任意抓人，私设监狱，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在全省挑起大规模的武斗，造成不少地区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交通阻塞，邮电中断，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使全省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wengewang.org

张犯长期以来，竭力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向“四人帮”提供了大批黑材料。张犯根据“四人帮”的旨意，竭力破坏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张犯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千方百计强行释放大批在押的杀人犯，让他们继续为非作恶，残害人民，造成严重恶果。张犯积极策划建立“批林批孔小组”，层层揪所谓“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狂叫“要尖、要硬、要韧，要像一把锋利的刺刀”，“拼出一条命同走资派斗”，一度篡夺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权。wengewang.org

张犯肆无忌惮地收集和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诽谤、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四人帮”被粉碎后，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极端仇视这一伟大胜利。策划反革命应变，转移窝藏大批黑材料，研究对策，订立攻守同盟，叫嚣要“豁出命来干一场！”还煽动他人印制、散发反革命传单，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上列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院认为：现行反革命犯张永生出于其反革命罪恶目的，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是一个罪恶累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我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总头目，是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打砸抢策划者和指挥者，是大乱整个浙江的罪魁祸首。给全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造成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损失，广大人民群众无不切齿痛恨。为了严肃国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第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第十七条之规定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特判决如下：weingewang.org

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永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后次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一式二份，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

一九七九年七月五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浙法(79)刑上字第 21 号

上诉人：张永生，男，三十九岁。安徽省含山县人，出身工人，成分学生。为现行反革命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法刑初字第(79)第 5 号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案经审核查明：原审认定上诉人张永生长期以来竭力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纠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流氓阿飞等坏人，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搞打砸抢，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诽谤、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革命领导干部，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等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

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有目共睹，铁证如山。上诉人在上诉中的所谓：“不能把我过去积极追随和卖力执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都归咎于反革命性质加以定罪”，云云，纯属狡辩。原审人民法院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第十七条之规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上诉人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完全正确，特此判决如下：wengewang.org

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审判长 卢管彤

审判员 张 松

审判员 沈沛源

一九七九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殷美清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下册，群众出版社 2000 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翁森鹤反革命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浙检一(78)5 号

被告翁森鹤，男，四十一岁，浙江省慈溪县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分学生，原系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一九七〇年九月混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窃取“杭丝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委员等职。因反革命一案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九日拘留审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依法逮捕，现在押。

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和公安机关的专案调查，经本院审理，证实被告犯有下列主要罪行：

一、翁森鹤出于反革命本性，肆无忌惮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收集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二、翁森鹤长期以来追随林彪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猖狂地向省委和各级党委进攻。积极进行反

党乱军和结帮篡党的阴谋活动，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伙同张永生、贺贤春等人，分裂群众，挑动武斗，破坏安定团结。他倚仗权势，称王称霸，镇压群众，大搞法西斯专政，唆使一小撮坏人，制造事端，大搞打砸抢，扰乱社会秩序，残害人民。如在一九七四年，翁为首策划和指挥了攻打解放街招待所、延安招待所、省事务管理局临时招待所，冲击展览馆广场的群众集会等多起打砸抢事件，被打、被抓群众达一百余人；他为非作歹，私设公堂，残酷迫害干部群众，大搞所谓“请财神”、“砸破庙”。凶恶地煽动说：“把他们的脚骨、手骨都打断”、“打死活该”，“把打死的人抛进锅炉里当柴烧”。在他的唆使和授意下，仅一九七四年就有一百二十名革命干部和群众被关进私设的监牢，遭到严刑拷打，有的被搞成终身残废。wengew ang.org

三、翁森鹤秉承“四人帮”旨意，疯狂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煽动停工停产。大肆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谬论，叫嚷：“凡是党委机器还在转动的，就是形势不好，就要想尽办法砸烂它”。在他煽动下，造成浙江许多党政机关一度瘫痪半瘫痪，厂矿一度停产半停产，使我省的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

四、翁森鹤品质极其恶劣，贪污盗窃，敲诈勒索，腐化堕落，奸污妇女，无所不为。从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七月，他就利用职权贪污盗窃、敲诈勒索人民币七千一百八十元，粮票一千二百五十八斤，这些钱和粮票除被翁及其身边人员集体吃喝挥霍掉以外，他一人侵吞的就有五千五百五十二元，粮票八百九十八斤。被他奸污的妇女，仅据已查证的就有六名。

一九七五年，翁森鹤的罪行被揭露后，他负隅顽抗，策划应变，转移和毁灭罪证，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依法拘捕后，仍不思悔改，拒不交代主要罪行，甚至记变天账，妄图反攻倒算，态度很坏。

本院认为：翁森鹤思想极端反动，在“四人帮”的怂恿和支持下，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疯狂地把矛头指向我们的党，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是我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重要头目，是大乱浙江的祸首之一，是穷凶极恶的新生反革命分子，是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打砸抢主谋和指挥者，是五毒俱全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浙江一霸，为全省人民所切齿痛恨。为了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安全，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第十八条的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予依法判处。wengewang.org

此致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8)杭法刑初字第 27 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翁森鹤，男，四十一岁，浙江省慈溪县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分学生，原系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先后窃取“杭丝联”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杭州市委委员、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浙江省革委会常委、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委员等职。现在押。案由：新生反革命。案经广大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和公安机关专案调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审理，查明：

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怂恿和支持下，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大搞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疯狂破坏党、破坏社会主义。给浙江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翁犯肆无忌惮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收集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残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

翁犯反革命野心很大，在“文化大革命”中，打着“造反”与“反潮流”的旗号，疯狂进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活动，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永生、贺贤春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纠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流氓阿飞等坏人，拼凑反革命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狂叫“要建立一支庞大的队伍”，做“四人帮”的基础，巩固“四人帮”的

地位。在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大搞反党乱军，盗窃国家机密，建立第二武装，妄图代替我人民解放军和专政机关、进行篡党夺权。wengewang.org

翁犯竭力煽动打砸抢，挑动武斗，伙同张永生、贺贤春等强占屏风山、三台山招待所作为反革命指挥据点，不断制造事端，在全省挑起大规模武斗，造成人心惶惶，交通阻塞，邮电中断等严重恶果。

翁犯网罗包庇坏人，为非作歹，大搞“砸破庙”、“请财神”，私设公堂、监牢，实行法西斯专政。他凶恶地煽动说：“把他们的脚骨、手骨都打断”、“打死活该”、“把打死的人抛进锅炉里当柴烧”。许多干部群众遭受残害，有的被打成终身残废，搞得家破人亡。

翁犯出于反革命目的，竭力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狂叫并实行“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凡是党委机器还在转动的，就是形势不好，就要想尽办法砸烂它”，造成全省许多党政机关一度瘫痪半瘫痪，厂矿一度停产半停产，学校停课半停课。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

翁犯品质极为恶劣，奸污妇女、贪污盗窃。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七月，他利用职权，以虚报冒领等手段，贪污人民币七千一百余元，粮票一千二百余斤。

上列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院认为：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出于反革命罪恶目的，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永生、贺贤春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是无恶不作的新生反革命分子，是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打砸抢主谋和指挥者之一，是五毒俱全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浙江一霸。给全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造成了极大危害和巨大的损失，广大人民群众无不切齿痛恨。

为了严肃国法，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镇压打砸抢者，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破坏活动，为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三款，第十七条之规定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判决如下：

判处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缴获之赃款、赃物，除归还原主的外，其余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另附清单)。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后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一式二份，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 2000 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叁、本节研究资料

二〇〇七年九月，李显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报告
尊敬的赵洪祝书记：

我叫李显通，今年 65 岁，是毛主席逝世后浙江省揭批查扩大化中制造的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我原系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原杭大外语系）67 届毕业生，1968 年 3 月 18 日被周总理任命、经毛主席批示“照办”的浙江省革委会常委（详见中共中央中发[68]47 号文件），并兼任杭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1976 年 11 月 21 日，以铁瑛（原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1976 年 4 月谭启龙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为省委书记的浙江省委个别领导为了彻底推翻周总理对浙江文革中的很多重大处理决定，并利用揭批查公报私仇，在全省首先将我隔离审查和批斗。他们组织庞大的专案队伍以清查“四人帮”在浙江的帮派骨干为名行收集、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之实。因为他们深知，浙江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杭丝联事件，萧山、诸暨问题，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两个改组，省革委会的建立以及张永生的入党问题等等，都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或直接过问下处理决定的。周总理曾在一次接见时说过，浙江的问题我必须直接处理和过问，原因有二：其一，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蒋介石的老巢，是与美蒋斗争的前哨阵地；其二，浙江是我的祖籍，按辈份排起来，周建老（原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鲁迅先生的胞弟）是我的叔叔辈。早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总理曾当着南萍、陈励耘的面委托周建人老人做张永生的入党介绍人，并指示南、陈将张永生推荐为“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陈励耘为了讨好张春桥，把张永生的名额让给了上海的于会泳或陈敢峰。

在“揭、批、查”中，原省军区杭州警备区副政委，后因整人有功而任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的高文泉（文革前因生活糜烂受军内免职处分）曾一再要我老实

交代：“一、周恩来与周建人是什么关系；二、周恩来、周建人与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三、周恩来在文革中接见你几次并进行过什么谈话？”等等问题，而原省公安厅某处处长、专案组成员潘文彪（文革前因与台湾派遣特务小姨子轧拼头而被江华开除出公安队伍）更是咬牙切齿、直截了当地对我说：“红卫兵、红卫兵，整个中国就是败在你们这些红卫兵以及支持你们红卫兵的那个人身上！”并说什么“现在为你们撑腰的人没有了，我们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

正因为这样，自 1976 年 11 月到 1980 年 2 月从省到地、县各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凡结合进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全部都受到审查和批斗，有的被直接执行枪决，有的被活活整死，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徒刑，而大部份则被判处了三到二十年的有期徒刑，还有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在这次运动中被整得致伤致残，据当时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省挨整人数达四百万以上。仅以台州地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十一人被逼死、二十三人被判刑、五十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三千二百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回家，至于其它形式被整的人数就无法计算了。临海县在那次运动中被逼死的有二十人、被判刑的有四十六人；黄岩县当时有二十人被逼致死，三十八人判了刑，其中一人被判死缓；仙居县被逼死二十二人，被判反革命罪三十八人；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四人，判刑三十九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四十四人。另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 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 202 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 662 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 7 个“反革命罪”。与此同时，金华地、县有 190 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 4 人被判处了死刑。就在铁瑛眼皮子底下的省城杭州，这里仅举两个厂的例子便可以借一斑而观全豹了：一个不到二千人的杭州机床厂在揭批查中就有三人被逼致死，一人被逼疯，三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三十八人；另一家仅有三百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三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十六人被无辜关入土牢。其他部份地县的有关情况见附件。

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劳动模范应四官（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文革前夕还专门向他打招呼，要他支持革命造反派，仅仅因为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任舟山地区革委会主

任期间镇压群众一事提出批评，铁瑛却对此怀恨在心直接指使该县委副书记刘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二百九十八次之多。并被定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而开除了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还株连了下面一大批干部、群众，甚至连当年报道他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记者都不放过，使他蒙受了“不揭发”的莫须有罪名，将他置于死地而不择手段。由此，在浙江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全面砍杀先进典型人物的恶流，如当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曾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为题大力表彰他在与山洪作斗争中舍己为人，不惜牺牲自家十几条生命而一心为公的桐庐县原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金荣被打成帮派骨干而遭逮捕判刑；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扬的农民哲学家江山原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被作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遭关押批斗，最后以所谓“写黑文章”、“作黑报告”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判刑五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全省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铁瑛在浙江制造冤假错案堪称一流，其中由他一手提拔的丽水地委副书记、专员邹宗仁在“揭、批、查”中所制造的冤假错案最为骇人听闻，令人毛骨悚然。邹宗仁本来就是丽水地区派性十足的一派头头，一上台就大搞派性，压一派抬一派，一派做官，一派坐牢，不仅把地区机关和丽水县二级干部群众任意判刑、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降职、坐牢达二百多人，而且无中生有地编导了一桩以原丽水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何纪明为首的所谓谋杀五位退伍军人的谋杀集团案。他们先树敌，后围剿，冤案从三人开始，蔓延扩大到一千六百多无辜群众，仅“杀人凶手”就遍及五个自然村农民及部分厂、矿、企事业单位一千二百多人；“抓人”、“抬尸”、“运尸”、“抛尸”二百多人；“外围站岗”、“值班”一百多人；“策划指挥”三十六人，其中涉及地级领导五人，县级领导四人，科局级领导三十余人。审查中刑讯逼供致死五人，被逼致死七人，神经错乱三人，致伤不计其数，关押判刑三十一人，其中死刑五人。军分区司令员何纪明以“谋杀集团首犯”被隔离，因不堪受此凌辱陷害而自杀，为此惊动了中央军委，当中央军委会同南京军事法庭来丽水查核此案时，发现是桩冤假错案，并向省委作了回报。但丽水专案组在铁瑛的支持下对此置若罔闻，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无辜群众，甚至对专案组内部的不同意见者也横加迫害，真是狠毒之极！

又如省城杭州，市城乡建委有位 1949 年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政工干部，名叫莫登旺，1977 年 12 月 2 日被“中共杭州市委”以所谓“上山打游击”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然后，指派六个人对他实行 24 小时轮番审讯，连续搞了七天七夜一无所获。在关押了三年后“中共杭州市委”下达文件判处他为“现行反革命”、“有期徒刑七年”。莫登旺在狱中收到“杭州市委的判决书”后感到十分惊讶！中共杭州市委个别头头竟然以权代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二周后，中共杭州市委觉察到自己的错误，即指使西湖区法院出面把“现行反革命”案由改为“打、砸、抢”，七年刑期不变下达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并指派市公安局刑警何进人、孔万祥向他强行索回杭州市委的政治判决书，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当事人的拒绝，此时何、孔二人恼羞成怒，大打出手，把莫登旺的左眼打得当场失明，抢走了市委的现反判决书。同年 6 月 10 日，市公安局何进人、孔万祥闯入莫登旺家以“搜查黑材料”为名，实行抄家，从晚上七时翻箱倒柜，甚至连墙壁都被凿穿直到次日晨七时找不到“黑材料”却将家用电风扇、自行车、各种家具、手表等私人财产 66 件全部装上卡车运走，其中连三岁小孩子吃的麦乳精、奶粉、白糖、饼干、香糕、味精、茶叶等都被拿走，至今仍未归还，可见他们对法律的践踏到了何等的程度！这哪有一点像共产党的样子！？

铁瑛在浙江“揭、批、查”过程中任意践踏人权的情况尤为严重。在对待张永生同志的问题上充分表现出铁瑛的为人及其残忍的本性。1967 年 7、8、9 三个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浙江萧山、诸暨铁路沿线被省军区个别人挑动农村民兵神枪手武装控制各个火车站，为了让毛主席的红色列车安全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铁道部和南京军区都分别下达指令要省军管会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好萧山、诸暨的问题。当时省军管会委托张永生去现场指挥，结果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成功地解决了两地的问题，事后周总理将具体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当时就很高兴地称赞张永生是个难得的将才、帅才。铁瑛等人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并几次要翻案，都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并再三警告以后不许再提萧山和诸暨的问题，谁提谁就是反革命。南京军区炮兵学院政委陈德先以身试法重提这个问题，结果得了个反革命的可悲下场。省革委会成立后，张永生当上副主任，每次开会，铁瑛碰见张永生时总是先立正，然后敬个军礼并叫

声“首长好”。这种情况我亦见到过多次。可是 1972 年铁瑛当上了省委副书记后，多次与谭启龙一起对张永生同志进行一次次政治陷害：

1972 年的“批林整风”运动，铁瑛“因个人问题出气，纠缠历史旧帐”大搞支一派，压一派，并以清查“5·16”和“反党乱军”分子对张永生等干部群众大肆整理黑材料，大翻“两个改组”（即周总理直接主持下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以及萧山、诸暨问题的旧案，“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张永生和部分干部群众。“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革委会四大组和许多地区、一些省属工厂、院校以及一部分县都成了‘清查重点’。”（以上加引号部份均摘自铁瑛本人在省三全会上作的《我的检查》）

1975 年 7 月谭启龙和铁瑛以省委的名义对张永生同志列了所谓“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张春桥对抗江青”，“反对和阻挠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突击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企图改变党的性质，让臭老九骑在省委头上拉屎拉尿”等罪名上报中央要将张永生调离浙江监督劳动，后因毛主席亲自批示“老九不能走”，谭、铁的阴谋未能得逞。

同年 10 月谭、铁又与纪登奎串通一起以省委的名义造谣说张永生“在任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权盗窃国画库 400 幅国画”，并以这样的罪名给中央打报告，将张永生调离浙江。这个报告按纪登奎的主意台头只写党中央，不写毛主席，这样纪接到后以中央组织部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强行把张永生押送到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穷棒子）大队，在民兵的武装看押下劳动，并被折磨得半身瘫痪。此事被毛主席发现后亲自给张永生同志平了反，而对谭启龙则作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北京接受审查的处理。主席当年的批示是：“永生同志是革命左派，应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6 年底开始的“揭、批、查”中，铁瑛便抓住机会，向中央打报告把张永生从北京押回浙江，关进死牢，然后罗织罪名，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欲把张永生置于死地而后快，完全置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而不顾抢在新刑法实施前夕先宣判后办理判决手续，不仅将张永生判了无期徒刑，而且毫不顾忌地把他送往青海大漠服刑，一关就长达三十年之久，创下了世界政治犯关押时间之最的历史记录。

铁瑛在揭批查中草菅人命，捏造罪名，还直接指使各地县枪毙了不少造反派头头：如台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陶冬春、台州地区公路总段车间党支部书记任丕春；温州市邮电局党委书记陈进春、温州港务局港口调度干部陈明田、温州港务局工人陈继光、温州市商业局食品公司职工胡松林；金华被判处死刑的有朱永斌、戴瑞忠、俞冠华、张根华（地区革委会常委，执行枪决前因省高院干预，改判死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洞头县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枪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跟国民党、日本鬼子当年残杀共产党人一样将其喉管割断，其家属全部被看押起来不让他们跑出去鸣冤叫屈，他们要接受嵊县（现嵊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全千和乐清县革委会副主任屠庆夏的教训，因张、屠两人临刑前由于他们的子女跑出去向北京最高法院鸣冤而受干预。可见铁瑛心之狠毒，手段之残忍，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当时党中央已三令五申，连连在《人民日报》刊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社论和大量重要文章强调清查工作要十分注意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的情况下干的。尤其是 1977 年春，陈云同志在杭州休养期间曾特别提醒铁瑛：“在省里清查造反派头头问题时，不要以感情代替政策，不要因为他们曾经批斗过我们，就像某些人要求的那样抓住他们不放，完全用对待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而是先将他们调离原领导岗位或工作单位，实事求是地给以处理。”可铁瑛实际上完全违背了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另搞一套，在浙江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摘自《征途》杂志 2005 年第二期 P14 铁瑛：《实事求是的楷模》）我本人于 1979 年 12 月 27 日在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程序下被西湖区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了五年徒刑（详见杭西法刑字[79]第 74 号：《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李显通反革命一案的刑事判决》及杭法刑上[80]74 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复印件）。正是这一纸判决弄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妈为此哭瞎了一只眼睛。我哥哥受株连在浙大被关在地下室逼疯致死！1981 年 11 月 20 日我从监狱出来后几年不给安排工作，后在我再三要求下总算安排我在杭大教材科工作，但不到一年即于 1985 年 4 月突然通知我去杭州农药厂总工办搞翻译为名，说是发挥我一技之长，实际上给厂里布置对我实行“三不”政策：不准加薪、不准评定技术职称、不准调离农药厂。从此以后，职工加工资、评定技术职称都没有我的份；旅游学院借用我去上课也得不到允许；平时一举一

动、一言一行受到省安全厅布置的线人密切监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甚至连我在业余学校上外语课的教学活动也被禁止，而且还株连了我们的孩子和亲属。

我是一个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血性男儿，是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从小学到大学年年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和“优秀共青团员”；在学生时期一直担任少先队长，学生班长以及大学里的校、系学生干部和学生基干民兵连长、营长等职。校系领导把我作为系主任接班人培养。文化大革命中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按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在杭大组织了东方红兵团并参与筹建了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多次赴京聆听过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教诲，曾接受过周总理指示直接向他老人家反映过浙江文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将省委一些主要领导安排在杭大留学生宿舍采取保护性措施；与此同时还接受过东海舰队司令员梅江声同志的邀请和省军管会主要领导的指派去宁波帮助处理驻甬部队与地方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宁波当时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本人是在杨海波同志（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杭大党委工作时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一员。所有这一切都是党直接教育与长期培养的结果。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参与了，作为参与者的我也不可能不犯错误，但不管怎么错，也不至于错到非要“先后窃取了浙江省革委会常委，杭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等职”不可！如果真是这样，那铁瑛等人究竟把毛主席、周总理置于何地？！这使我不得不怀疑铁瑛自己的这个省委书记职位是怎么窃取到的？！

《判决书》所列罪行如：“炮打省委”、“揪斗革命领导干部”、“阴谋夺权”等都属于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把省委派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法家著作注释会议”以及回杭后谭启龙主持、铁瑛在主席台上压阵的汇报会也被说成是“乘机大做反革命黑报告”的“反革命”行动；更有甚者，他们竟然把1974年，抵制由王洪文直接控制并一手举办的所谓解决浙江问题的学习班（有背于周总理对浙江问题的处理精神）也作为我“干扰、破坏中央对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条主要罪状！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铁瑛违背党中央的一贯方针、政策，在浙江另搞一套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开动了一切宣传工具，胡说什么对付我们要像当年对待“日本鬼子”、“国

民党”以及“黄世仁、南霸天”一样都不为过，并提出“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那样的气势；以当年搞土改，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以当年大庆会战那种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革命精神，投入这场斗争”（出自省委宣传部《宣传通讯》1977年第十四期）。他们无中生有胡说我在得知“四人帮”被粉碎后曾召集军区一些干部开黑会，准备上山打游击；还编造什么在江青的笔记本中发现“四人帮”一旦上台，我将担任团中央书记等等耸人听闻的谣言，及所谓的事实真相。他们的所作所为颠倒了历史事实和敌我的性质，严重地损害了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铁瑛在“揭、批、查”中一方面对我们实行残酷镇压的同时，另一方面对原“红暴会”（即原红色暴动革命委员会的简称）中个别劣迹斑斑的头头则关怀备至，百般呵护，给他们升官晋级，委以重任：如方剑文，原杭运段工人，1969年2月8日带领“红暴派”冲击舟山战备武器仓库，抢劫枪支三千多支，子弹五万多发。当晚，方剑文主持将枪支、弹药发给各地的一些“红暴派”组织；同年6月12日，方剑文带领红暴派赴京代表汇报团近二百人包围新华社，中央指示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以上均摘自《浙江方志》编辑部编印的《浙江“文革”纪事》P123、128和130）。这样的人，却被铁瑛提到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的高位，后因倒卖钢材而被判刑五年。与方剑文一起策划抢劫枪支、弹药，包围新华社的原杭运段职工邵素珍也受到铁瑛的重用，并享受正处级待遇退休。

又如温州的打砸抢总头目姚国麟，在文革期间抢劫枪支、弹药和船只，到处挑起武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震动了中央，周总理为此专门作过指示。他也被铁瑛提拔为温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兼打击走私贩私办公室主任，后因跟市公安局搞走私活动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十六岁就当了姚国麟小情妇的杨秀珠，被铁瑛看中后一下子当上了温州市副市长，后来又提拔她为省建设厅副厅长。当再次要提拔她为厅长时，杨却突然携巨款外逃，并震动了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在把我们一大批忠于党和人民的人们打成反革命的同时，也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自己灵魂深处的丑恶一面，我们亦亲眼目睹了一个个整人者的可悲下场。但是，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历史的沉冤一

定要予以纠正，这样做不仅可以抚慰一大批深受伤害的人们及其子女的心灵，而且更有利于构建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正如胡耀帮同志所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里的“两个不管”，体现了我们党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

尊敬的赵洪祝书记，铁瑛在三十年前一手制造的浙江冤假错案后果之严重，为害之大，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其蒙冤面积之大，受害人数之多，定性之草率，判刑证据之谬，司法程序之乱，实为历史罕见。那些遭受铁瑛极左路线打击和迫害的人们，不知道有多少被无理审查、批斗，不知有多少被撤职戴帽开除，被殴打致伤致残，不知有多少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不知有多少被迫害致死。这三十年来，虽然不断有人上访、申诉，仍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至今仍饱受着贫病和心灵创伤的煎熬，而且还累及到我们的亲属和子女，这对“和谐”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尊敬的赵洪祝书记，那么多人受到历史不公正的待遇，死的已经死了，就算“死者长已矣”，那么活着的人总还是多数，还有他们的子女那就更多了。然而，这些人均已年过花甲，有些已是耄耋迟暮之年，来日无多，他们为国家辛辛苦苦奉献了一辈子，到头来却一无所有，连最起码的劳保福利、医疗保险等基本待遇都被剥夺，总不能让这么多的人统统含冤衔恨地离开人世吧！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出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会议还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并号召党的组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要“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解决好本地区本部门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相信，浙江现任省委尤其是赵洪祝书记直接受胡锦涛总书记的委派来浙江主持省委工作，必将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一定能在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借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的强劲东风能抓住冤假错案这个影响浙江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对推动浙江经济的更快发展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我恳请赵洪祝书记对两手沾满浙江人民鲜血

的铁瑛当选为十七大代表一事引起高度的重视，并希望您能在百忙中拨冗接见我们一次，让我们可当面向您反映一些重要情况。这样或许对解决好浙江所存在的问题更加有利。当否，请酌情考虑！顺致崇高的敬礼！

翹

首以待的受害者原浙江省革委会常委李显通

《三十年前的温州武斗》（宋宏亮）·

温州在中国有了名气，是因为它的私有经济走在全中国前列。但今天有多少人

还记得，温州在文革时代亦是一座武斗名城。

1968年温州在文化大革命鼎盛年代，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相互进行了激烈

的武装冲突，双方凭借各自政治军事后台，动用正规军武器装备，战斗之激烈为温

州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温州武斗最后以有江青和林彪支持的工总司派胜利为结束

。为了悼念本派牺牲的同志，工总司大兴土木，在温州松台山建造宏伟的烈士群墓

，墓碑上有名有姓的阵亡者上千，加上伤亡更重的另一派温联总阵亡者，温州武斗

直接阵亡军民应该在三千上下，伤者无计其数。财产损失以市中区最为惨重。双方

火攻对方总部，市中区连带建筑全部化为灰烬，温州元气大伤。

◇ 温柔富贵之州

温州位于瓯江入海口，地势三面环山，一面朝海，这块瓯江的冲积平原与飞云

江出海口瑞安市相连，沿海狭长伸延，大约有300平方公里的世外桃源。这里山

明水秀，人灵地杰。

温州往内地陆路交通不便，火车直到 1998 年 5 月才通车。人文传统是出海经商，不问内地政治纷争，因而历史上从无剧烈战事，明末皇帝南逃，曾在温州得以喘气，曾经争取地方豪强支持以图再起，竟然无人响应，愤而浮海出走。温州人擅长买卖和小手工业，倦于政治，长期的国共内斗，在温州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民风和平，没人愿意铤而走险。

30 年代，温州监狱曾经是全国模范监狱，抗战期间，日军以一个排的兵力占领温州而未遭抵抗，解放军进城也是未费一枪一弹。温州人得益这个和平心态，政治安定而没有兵灾战乱，混合经济使自然资源得以保护，历代下来，民间积累了无数的财富，一旦制度开放，私有财产犹如冰山一角冒出水面，一旦制度稳定，温州民间财富还要更浮出一层，使世人惊讶！

◇ 保皇派和造反派

温州文革运动走势大致如全国其他边远一样，先是本地籍在京读书的红卫兵回家乡点火，再是造反派抓斗当权派，成立各级革委会成为权力中心，当权派通过未能进入权力中心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夺权，双方血战，最后背靠林彪江青的一派取胜，终于全国山河一片红。

一派温联总主要组成部分为温州市政府各直属单位的基层干部，中坚力量为温

州港务局和温州化工厂工人。温联总总司令姚国麟退伍军人出身，深受分区和人武部信任，温联总外围群众基本是文革前制度的拥护或既得利益者，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定名为保皇派正是名副其实。

工总司方面则通过温州籍的北京红卫兵与中央文革直线联系，占据当时温州最高建筑电报大楼，中坚力量为温州冶金厂和温州造船工人，基本群众为文革前制度的反对或受害者，定性为造反派恰如其分。

◇ 强龙压住地头蛇

上述温州两派政治特征在当时全国各城市两派特征基本一样，但也有其特殊之处：温州地方各级政权 49 年以后为共产党接管，干部来自两个系统：许世友带来的山东籍部队军官和龙潜领导的浙南游击队干部。浙江共产党于 1930 年前后在浙南山区组织游击队，时强时弱，时隐时现。主要领导人物为项英和龙潜，项英于皖南事变被俘处死，龙潜坚持下来，文革时任浙江军区副司令。两派时称北佬派和浙南派，一贯明争暗斗，每次较量总是强龙压住地头蛇。文革时期温州两派对立于血战。除了全国性的老军头和政治暴发户之争外，还有强龙与地头蛇之争的因素在内：温联总背后有山东强龙，工总司背后有浙南地头蛇。

◇ 铁杆保皇派王福堂

温州武斗战事特别激烈是由于双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温州属于对台作战的

前沿，温州军分区当时是全国范围内最大的军分区级单位，编制等于加强师。分区

司令王福堂红四军出身，一直在许世友的部下作战，长征时期跟着许世友一起受

张
国焘误导，陷入西康沼泽地区，被马步芳骑兵围歼，他追随许世友得以突围，与

其
结下生死知交。许世友最为毛泽东爱将，当时以南京军区司令至尊统管华东军事，
王福堂自以后台硬，不买造反派的账。对江青出言不逊。在他的授意下，温州军

分
区统管下的人武部发放民兵武器武装温联总。温州市委让出市委所在的市中战略

要
地，温联总在分区军事顾问的策划下，指定了一举歼灭工总司的作战计划。

工总司口号是誓死捍卫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受浙南干部派暗中支持，当地

底层民众中有广泛同情者，加上北京有人，通天有线，所以政治上一直占上风。军

事上却处于劣势，工总司领导层面基本由两类人组成：政治嗅觉灵敏的投机文人，
痛恨官僚体制，向往四大自由的青年工人。他们均缺乏军事斗争经验，所以武斗之

始就以守为攻，据点求援，占据电报大楼和温州酒家两座高层建筑物，拼命向中

央
文革求援。温联总很快扫清外围障碍，但是久攻不下两个制高点，1968年8

月
，终于，用火攻拿下了温州酒家，但最繁华的市中心区却烧成一片废墟。温州历史

名
人谢灵运故居，如今只剩下墨池巷一个空名。至此，工总司孤守电报大楼，温联

总
全胜只日可待。

◇ 梅岙渡口阻击战

就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央文革终于跟林彪达成政治交易，林彪命令驻浙

野战军 20 军火速赴温州武装支左。20 军毕叔普团为先头部队，从金华下火车，征用了当地几十辆汽车，浩浩荡荡通过丽水直扑温州。

温联总闻讯一面猛攻电报大楼，一面在温州军分区军事顾问帮助下组织阻击，

企图延缓 20 军的到来，战场选在离温州 15 公里的温金公路的梅岙渡口，温州军

分区基层军官着便衣直接投入梅岙阻击战，毕叔普团根本没有料到会遭到如此猛烈的

的阻击，一时被挡在瓯江北面过不来。毕叔普发起野性，组织重武器强攻渡江，惨

重伤亡之后得逞，一路浴血杀向温州。1968 年 8 月的梅岙阻击战是温州武斗最

激烈的一场战斗，也是温州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战事。梅岙阻击战实际上是南京军区

的地方部队和林彪的野战军对阵。三十年过去了，参加这场战斗官兵是否还记得

那激烈的战斗场面和在这场战斗中失去生命的兄弟？温州梅岙渡口阻击战应写入解

放军战史，它和六·四一样永远是解放军的耻辱的一章。

◇ 追捕匪首姚国麟

毕叔普团终于打进温州，在最后一刻解工总司之围。温州立刻实行军管，温联

总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参加过武斗的被定性为土匪。温州军分区被彻底解散，王

福堂被残酷批斗，批斗者将王福堂架起飞机，手指强箝他的两个鼻孔向后拉，老脸

几乎被撕裂，场面惨不忍睹。

毕叔普接管温州军分区和主掌温州军管会，全力组织索剿温联总残余力量。温州所属七个县，各县军分区人武部都有温联总的同情势力。毕叔普的清缴土匪工作非常艰难。匪首姚国麟几次眼皮底下脱身，其惊险离奇可著书拍电影。当时温州主要街头设有剿匪快讯专栏，每天报道追捕姚国麟进展。姚国麟曾经北蹿逃进文成的北雁荡山，南下逃往洞头岛，当时如有台湾接应，他可能会逃出大陆，该犯最后在温州北部藤桥山区被围数日，亲信打散，孤身持双枪拒捕，终于被轰毙。姚国麟尸照，成了毕叔普向九大献礼的材料。

姚国麟事迹具有传奇色彩，此处不是重点不予赘述，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他活到四人帮倒台，政治前景看好。王福堂遭难时曾对造反派明言：文革后骑马的还是骑马，抬轿的还得抬轿。果然，邓小平时代，王福堂以老病之身升任浙江军区第一付司令，对曾经死保过他的人当会重报。

◇ 祝福温州

三十年前我亲历了这段难忘的历史。在温州市中区大火燃起之日，我们全家逃往瓯江对岸避难，暮色已浓，小船在江心摇荡，目睹市区烟火冲天，恐怖深深打入我的童年的记忆之中。今天梅岙渡口早已不见了，但每次车驶过梅岙大桥都使我激动。我祝愿温州和平富饶！温州人民幸福安宁！

□ 寄自 songhongl@yahoo.com

《也谈三十年前的温州武斗》（老 陈）

《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五八期（z k 9 8 1 0 b）所载宋宏亮的《三十年前的

温州武斗》一文写得不错。

许多人可能想不到如今个体经济繁荣的温州地区，当年在政治上竟经历过如此

的风云激荡；精明现实的温州人，当初却曾为着自己的“革命理想”疯狂地自相残

杀着。从这一点来看，如今的这一代温州人，实在是胜过了我们这一代。

温州武斗的持续时间之长，对城市破坏之严重，战斗的酷烈及对战败者报复的

野蛮程度，两派政治军事后台对各自派别的长期强硬支持，在“文革”武斗中实在

是很有代表性的。近年来一些“文革”史著述对此没有足够注意，可能跟掌握史料

不多有关。本人目睹了温州的十年武斗（从1967年到1976年），在此也来

谈几句：

（一）宋文关于温州武斗的背景分析，有一定深度。“强龙”与“地头蛇”之争

，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当时，两派之争，南北干部之争，地方军与野战军之争，

以及各方内部的权力之争交织在一起，长期武斗不息。温州的武斗，可以看成是“

文革”武斗的一个标本，了解温州的武斗，对研究“文革”武斗不无帮助。

温州的武斗，起于1967年6月，在几周之内迅速从藤帽铁棍升级到热兵器

。黄龙山军火库被抢，两派以青年工人，复转军人为骨干，以中学生（温一中，六

中学生最为狂热）为先锋，迅即组织各自的“火线指挥部”，展开大规模武斗。

温州的武斗历经多次反复与起伏。1967年夏，“支左部队”（属二十军）

开进温州后，“温联总”被迫撤离市区，起先在近郊仰义，牛山一带抵抗，后来退

到三溪，藤桥以至永嘉，瑞安等县，与“瑞安联站”等协同作战，当时被称为“温

联匪”，“瑞联匪”。“工总司”几次进剿，伤亡惨重，终未能获全胜。

“温联匪”在市郊西部山区盘踞数年，终于迎来转机。1971年9月，林彪

事发。林彪在浙江的空五军、二十军头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被收审。

“温

联匪”乘“批林整风”之机凯旋归城。“工总司”人马大批下台，一些头头被隔离审查。

但“温联匪”好景不长。随着“批林整风”逐步演化为“批林批孔”，“工总

司”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重新得势。1973到1975年间，两派又多次爆

发大规模武斗。在“评法批儒”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温联总”政治失势，

再次被赶出城，上山为“匪”。但由于“温联总”得到南京军区许世友支持，“工

总司”始终无法制服“温联匪”。此时参与武斗的两派基本群众，已很少有学生（

上山下乡去了），主要是派性骨干分子，领取武斗津贴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以

及社会闲杂人员。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工总司”预感时局将变，在市区灯光球场召开

大会，叫嚣要“警惕资产阶级政变”。“温联总”针锋相对，积极备战。

华国锋逮捕“四人帮”后，在官方消息公布之前，“温联总”已将打倒“四人

帮”的大幅标语贴遍温州全城，“工总司”作鸟兽散。“工总司”头头相继被捕，

一些“工总司”头头和骨干稍作审讯后被处决，温州十年武斗结束。

(二) 1967年（宋文误为1968年）的梅岙渡口之战，只是温州多次武斗

之一役。当时“温联总”自封“左派”，其基层群众有的还以为“支左”部队是来

支持自己的。当然“温联总”的头头们是心中有数。“温联总”的主力武装为保

存实力，避开了与“支左部队”继续进行大规模冲突，维持住了自己的派系武装。

(三) 宋文说“温联匪”头目姚国麟在“九大”前被“轰毙”，实属讹传。姚国

麟是温州武斗中的主要人物，曾多次被“工总司”宣布“击毙”，却每次都死里逃

生，化险为夷，几起几落，一直坚持到“四人帮”垮台。

姚及其帮派在“文革”中能武装割据多年，除了其机诈坚韧的个人素质和许世

友的暗中撑腰外，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姚的

经历将来可以成为温州历史故事的绝好题材。

粉碎“四人帮”后，姚国麟，戴光荣（温一中学生，“温联总”名义总指挥）

及其派别终于翻身，姚与戴进入“文革”后的温州工人与青年团体担任领导职务，

但未能进入党政权力核心。数年后华国锋失去权力，官方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均被否定，姚与戴等政治影响逐渐消失。

（四）毕庶朴（宋文误为毕叔普）1967年“支左”有功，从二十军的一

个团职干部到掌握温州党政军财文大权，干了不少坏事。后来虽然倒台，但并未被

认真清算过。

（五）1967年夏，“工总司”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将“温联总”赶出温州

城后，在“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口号下对“温联总”成员尤其是参与武

斗的成员实施了无情的报复。打，砸，抄家，游斗，逼供这些在“文革”中属家常

便饭，就不去提了。当时还发明了“爬棺材下”，“吃死人汁”等手段来折磨落入

手中的对方成员。当时温州城里有多处“烈士”棺木的集中供奉处，被抓获的对方

人员被逼着跪在“烈士”面前“请罪”，逼着从架空的棺材下爬过去。由于时值酷

暑，尸体腐烂，汁水滴下来，逼着“请罪”者吞食。一些“烈士”集中的地方，浓

烈的气味飘出很远。

“温联总”因为是“保皇派”，“斗争性”不及“工总司”，在报复对手方面

稍为和缓一些，但也不乏血的记录。就在“温联总”退出市区不久，在南郊抓获了

贸然出城的陈春林（温一中学生，“红总司”头头）等数名“总司”派负责人。尽

管这些人立即丧失了“造反派的脾气”，百般求饶，依然遭到枪杀。“温联总”盘

踞山区时，常在“内线”带领下闯入居住在市区边缘的“总司”派成员家中，将财

物洗劫一空。

(六) 温州两派武斗，最倒霉的还是百姓。历来军事行动，平民往往比军人死得

多。如果说温州两派死了三千人，加上平民死的要超过这个数好多。两派成员多为

年轻气盛的工人学生，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忽然间手中有了武器，单单玩枪走火就

死了不少人。派系武装盘踞西郊冷冻厂时，我有一天经过厂门口，见一群人围在门

口哭闹。原来有一农村少年因扒在门口看里边人玩枪，里头一个人挥动手中枪吓唬

他，失手把少年打死了。闹到后来的结果是，武装人员从冷库里拖出几斤冻猪肉来

作赔偿了事。第二天我再次从那里经过，见那少年的父亲蹲在冷冻厂附近的路口卖

猪肉，一脸呆滞麻木的样子，令我三十年忘不了。

温州“文革”中连年武斗，本来规模有限的国有经济遭受重创。在动乱之中，

中央政令无论出自哪一派，均无法完整贯彻到基层，于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势力

”抬头。到“文革”后期，农村社队工业趁隙发展，隐蔽的个体经济和家庭经济亦

已初具规模，为“文革”结束后温州私营经济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恐怕是发动

“文革”者始料未及的。

寄自中国

2008 年 7 月 3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1 日修改